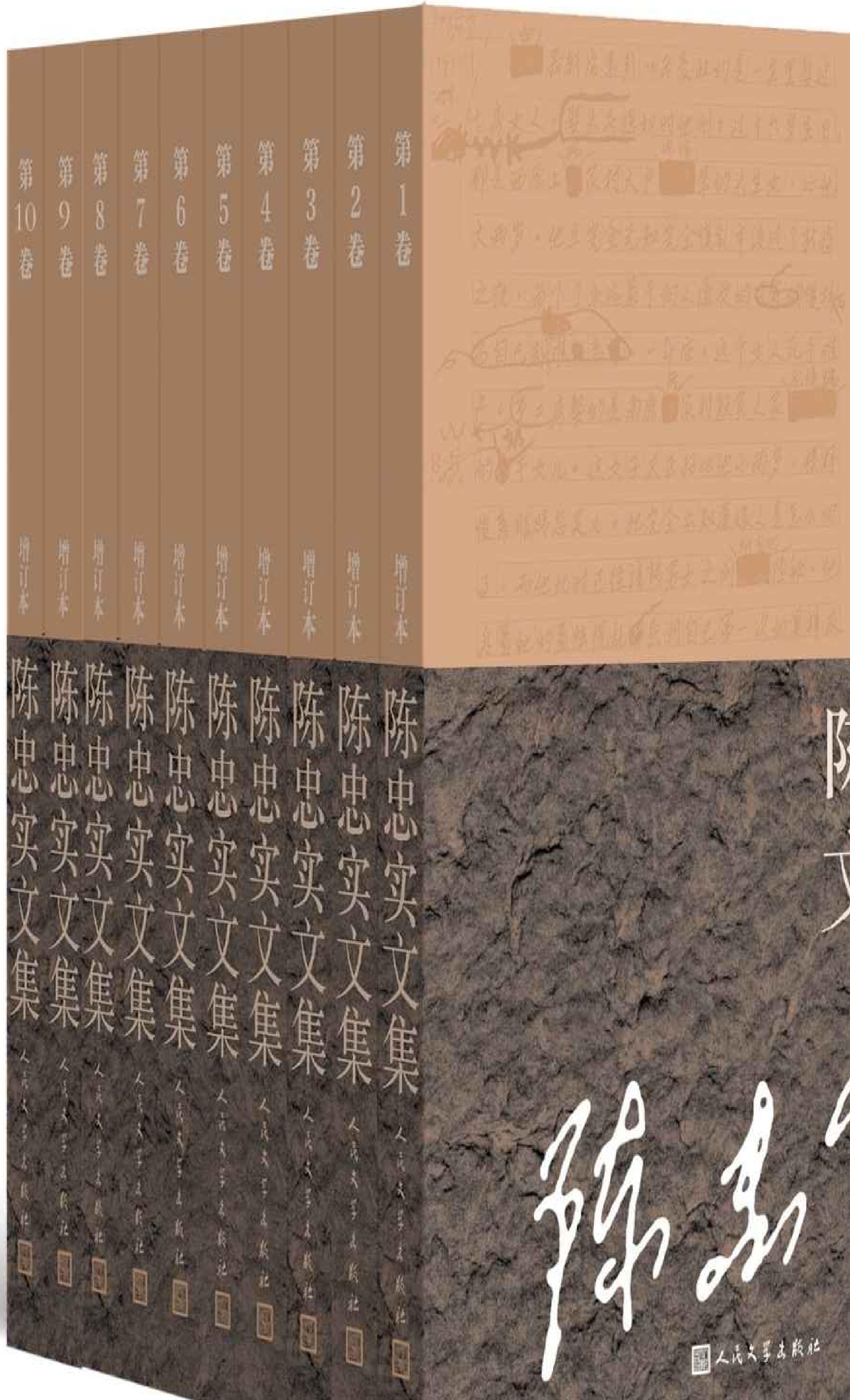

第1卷
1978-1982
陈忠实
文集
增订本
人民文学出版社
第10卷 增订本 陈忠实文集
第9卷 增订本 陈忠实文集
第8卷 增订本 陈忠实文集
第7卷 增订本 陈忠实文集
第6卷 增订本 陈忠实文集
第5卷 增订本 陈忠实文集
第4卷 增订本 陈忠实文集
第3卷 增订本 陈忠实文集
第2卷 增订本 陈忠实文集
第1卷 增订本 陈忠实文集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总目录

陈忠实文集：第1卷 1978-1982
陈忠实文集：第2卷 1983-1984
陈忠实文集：第3卷 1985-1986
陈忠实文集：第4卷 白鹿原
陈忠实文集：第5卷 1987-1994
陈忠实文集：第6卷 1995-2000
陈忠实文集：第7卷 2001-2003
陈忠实文集：第8卷 2004-2006
陈忠实文集：第9卷 2007-2009
陈忠实文集：第10卷 2010-2015

第 1 卷

1978—1982

陈忠实文集

增订本

人民文学出版社



陈忠实文集

增订本

第 1 卷

1978–1982

人民文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陈忠实文集：全10卷/陈忠实著.—增订本.—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21

ISBN 978- 7- 02- 016743- 2

Ⅰ.①陈… Ⅱ.①陈… Ⅲ.①中国文学—当代文学—作品综合集 Ⅳ.①I217.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20）第235781号

责任编辑　李宇

装帧设计　陶雷

责任校对　罗翠华　王璐　李晓静　杨益民

责任印制　王重艺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刷　三河市宏盛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3680千字**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32**

印　　张　**158.875 插页40**

版　　次　**2015年10月北京第1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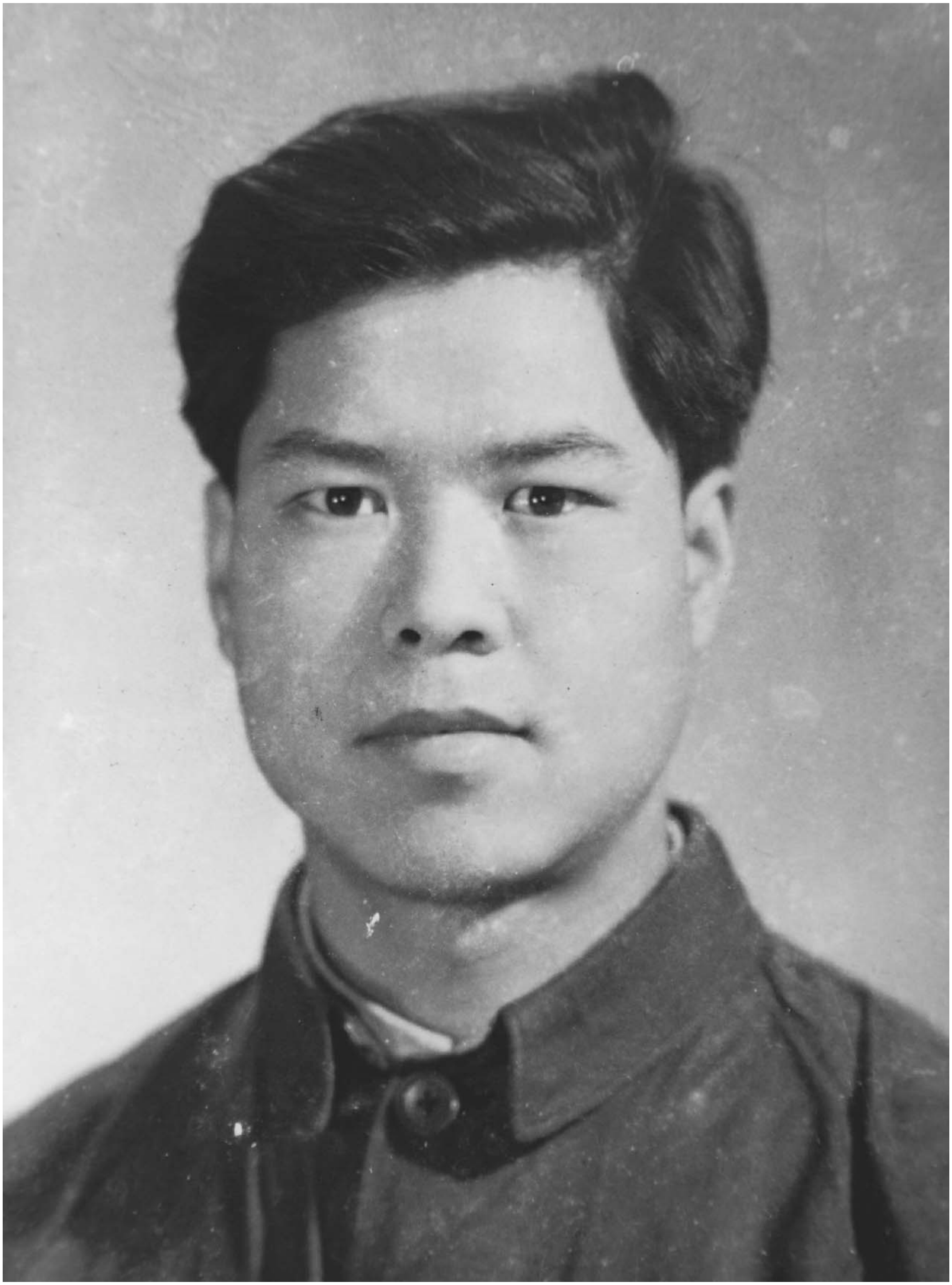
印　　次　**2021年3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16743－2**

定　　价　**580.00元（全十卷）**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文前插图



出版说明

二〇一五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十卷本的《陈忠实文集》。文集收录了陈忠实从一九七八年至二〇一二年创作的大部分作品，既有如《白鹿原》这类已被列为中国当代文学经典的长篇小说，也有如《信任》《梆子老太》《蓝袍先生》《四妹子》等有代表性的中短篇小说，还有散文、随笔、杂记、文艺评论、对话、序跋、诗歌等。在体例上，遵照陈忠实先生的建议，采用了编年形式，按创作阶段分为十卷，每卷再以文体进行分类，如中篇小说、短篇小说、散文、言论等。长篇小说《白鹿原》创作于一九八八年至一九九二年间，单独编为一卷。

陈忠实先生二〇一六年不幸辞世后，我社决定对其文集进行增补修订，希望出版一个定本。这次增订，我们主要做了三个方面的工作：一、在原有的基础上增补了作者于二〇〇五年至二〇一五年间创作的二十四篇文章，依据编排体例，按发表时间穿插于各卷当中。二、陈忠实先生的作品，较多地记录了陕西方言，因为有些方言词有音无字，导致同一语词在不同作品中用字不统一。为了避免产生歧义，我们在充分尊重作者写作风格的前提下，对作品中的大量方言词语的用字进行了辨析和统一。三、集中对文集初版时出现的个别编校问题做了进一步的修改订正。

这套文集完整、全面地展现了陈忠实先生的奋斗历程和创作成就。它的出版，将为当代文学史研究，提供一部内容可靠的重要文

献。当然，由于我们能力所限，此书或许还有不足之处，敬祈读者批评指正。

2020年7月

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部

- 短篇小说
  - 南北寨
  - 小河边
  - 幸福
  - 徐家园三老汉
  - 信任
    - 一
    - 二
    - 三
    - 四
    - 五
    - 六
  - 七爷
    - 一
    - 二
    - 三
    - 四
  - 心事重重
    - 一
    - 二
    - 三
    - 四
  - 猪的喜剧
    - 一
    - 二
    - 三

    - 四
    - 五
    - 六
- 立身篇
    - 一
    - 二
    - 三
    - 四
- 石头记
    - 一
    - 二
    - 三
    - 四
    - 五
- 回首往事
- 枣林曲
    - 一
    - 二
    - 三
- 早晨
- 第一刀
    - 一
    - 二
    - 三
    - 四
    - 五
- 反省篇

    - 一
    - 二
    - 三
    - 四
    - 五
- 尤代表轶事
    - 东沟“猿人”
    - “天不灭尤”
    - “我要革命”
    - 前沿阵地
- 土地诗篇
- 短篇二题
    - 张文之
    - 见面礼
- 乡村
    - 一
    - 二
    - 三
    - 四
    - 五
    - 六
    - 七
    - 八
    - 九
- 正气篇
    - 一
    - 二

        - 三
        - 四
        - 五
        - 六
    - 征服
        - 一
        - 二
        - 三
        - 四
    - 工字路口
    - 蚕儿
    - 初夏时节
        - 一
        - 二
        - 三
        - 四
        - 五
    - 土地——母亲
    - 霞光灿烂的早晨
    - 绿地
    - 田园
    - 珍珠
    - 铁锁
- 中篇小说
    - 康家小院
        - 一
        - 二

        - 三
        - 四
        - 五
        - 六
        - 七
        - 八
        - 九
        - 十
        - 十一
        - 十二
        - 十三
        - 十四
        - 十五
        - 十六
        - 十七
- 散文·报告文学
    - 躯干
        - 一
        - 二
        - 三
    - 分离
        - 一
        - 二
        - 三
    - 山连着山
    - 面对这样一双眼睛
    - 可爱的乡村

    - 崛起
        - 上任
        - 正气
        - 胸怀
        - 志气
        - 拳头
    - 万花山记
    - 延安日记
        - 五月六日 过介子河
        - 五月八日 在王家坪
        - 五月九日 在杨家岭
        - 五月十日 看《延安散记》
    - 春风吹绿灞河岸
- 言论
    - 我信服柳青三个学校的主张
    - 短篇小说集《乡村》后记
    - 看《望乡》后想到的
    - 和生活的创造者一起前进
    - 深入生活浅议

短篇小说

南北寨

腊月里，深更半夜，正是庄稼人棉被热炕睡好觉的时分。南寨大队党支部书记常克俭，猛然被一阵敲门声惊醒，接着就听见街门外传进来粗重的呼叫声："老常！老常！"这声音太耳熟了，是大队长吴登旺。家伙！刚才开毕大队委员会扩大会议，把春节前的工作包括社员的生活都做了安排，有啥紧事等不到天明！这样想着，他已经穿好衣裳，同时把脚往棉鞋里塞。他赶紧应了一声，再晚一会儿，那个小土门楼会给性急的家伙用拳头砸倒的！

他拉开街门，黑漆漆的门口，看不清大队长的脸色，只有他的烟锅一闪一亮。不等常克俭开门，吴登旺就亲昵地抱怨："说你性凉，真个性凉！把我在门口能冻失塌！你起来还缠裹脚布吗？"

进得里屋，常克俭坐在方桌边，摸出烟袋、烟包慢慢装烟。他不招呼大队长。他们俩在南寨共事二十多年，他进大队长吴登旺的家，吴登旺进他常克俭的家，都跟在自家屋一样，饿了在笼里摸蒸馍，渴了取暖水瓶倒水。事业把这两个年龄相差不多，而性格截然不同的人联结在一起，至今肝胆相照，信任无惑。二十多年里，还发生过几次这样的事，某一年老常被罢官了，某一年大队长被人推倒了，"文化大革命"初，他们都一同靠边站了！南寨能出来说话办事的人都显示过一番，结果人们又不得不把他俩推到南寨的主要岗位上来。他们的共同感觉是，无论风霜雨雪，双方都没有做过对对方昧良心的事，无论自

己当时承受着如何的压力和可能发生的最不好受的结局，都坚持是啥说啥，有啥说啥，既不包庇，更不栽赃！有了这一点，就使他们俩能畅快地说话，畅快地商量事情，畅快地工作，而不用花提防对方那一份心力。人在恋爱的时候，总希望找着和自己性格合得来的配偶；人在自己工作的单位，也希望遇着一位和自己性格差不多的同志。可是，南寨的书记和大队长，性格相差太远了！老支书蔫不拉沓，很少有失急慌忙的时候；大队长却是个“紧三火”。长相也差得远：老支书瘦小，背有点驼，一双眼里温厚多于严厉；大队长长得腰粗膀宽，立眉虎眼。这两个紧性子和慢性子的共产党员，却觉得谁也离不开谁，用吴登旺开玩笑的话说：“老常哥，下辈子你托生个屋里家，我娶你！定下咧！”

这时，吴登旺拿起捅条，把封严的只留一个透气小孔的砖盘火炉戳开，顺手从桌子上的搪瓷茶盘里拿起装茶叶的小铁盒，对着套间故意问：“老嫂子！茶叶在哪达搁着哩？”常克俭的女人在屋里嗔怒的回答：“还不是在老地方嘛！”吴登旺做个鬼脸，滑稽地一笑：“噢！我当你睡着咧！你把被子盖严噢——”

常克俭哑然失笑。这家伙，肯定是什么事儿办得顺利，正在兴头儿上，你看眉眼里那个得意劲儿嘛！看着自己的同志热心集体事业，情绪饱满，他的心里特别舒畅。他的清瘦的脸对着大队长，泰然而温和的眼睛催促对方：说你的好事吧！

压抑了半宿的火炉一经捅开，蓝色的火苗呼呼蹿上来，格外欢快地跳跃着。吴登旺把水壶支好，这才坐下，得意而神秘地说：“北寨俩人在咱村借粮来咧！叫我给逮住咧！”

“噢，这事——”多少有点出乎常克俭的意料之外，他眨着眼，说：“就这事，你也等不到天明，半夜三更，冷熊砸门……”

“好事！大大的好事呀！”吴登旺从炉边站起，牢骚大发：“我明天把这两口袋粮食，给北寨那个王样板背一袋，再给公社那个‘鸽鹁客’——韩主任一袋！我问他，你北寨是样板队，唱戏唱得美，编诗编得多，墙上贴得花，广播上扬，材料上登，你王样板到处介绍经验；现时，你的社员到俺‘黑斑头’南寨来借粮做啥？你韩主任大会小会刮俺南寨，咱俩的鼻子幸亏有骨头，要是肉囊子，早叫‘鸽鹁客’给刮平了！我要问他，你刮俺不学北寨，说俺是‘唯生产力论’，只拉车不看路，这咧那咧一大堆；叫俺学北寨的啥？学他们虚报产量，完不成公粮扣社员口粮吗？让俺社员学北寨社员靠借粮买黑市粮过活吗？”

常克俭仍然捉着烟袋杆，长着一溜黑胡须的嘴和鼻孔里同时悠悠冒烟，轻淡地说：“这何必要你背上粮食口袋去问他！咱早都料到这一步——瞎子也能猜摸到这一步！”

“我把北寨人借粮的口袋给他背去，看他给我说个啥！”

“嗨呀！好我的伙计呢！这还用得着你问嘛！”常克俭不屑地说，“韩主任早就敞开说：‘宁要低产的社会主义的北寨，不要高产的修正主义的南寨。’你再问啥吗？”

“鬼话！”吴登旺气愤得脸红了，“弄得交不起公购粮，让社员东跑西颠借粮、买粮，还是社会主义？俺南寨年年超交公粮，社员吃得饱，倒成了修正主义？啥嘛！啥屌道理嘛！”

“啥道理？颠倒子道理！歪歪子道理！现时就兴这！”常克俭说，“耍发牢骚了吧！伙计！说说事情怎么办吧！”

吴登旺像泄了气的皮球，拉长声调说：“那好吧，让北寨人跟上王样板和‘鸽鹁客’，享他们没粮吃的社会主义的福去吧！咱们——”登旺又来了劲，优越地说，“咱甘当咱的‘黑斑头’！咱今晚的会一开完，分给我的工作，我安排了一下，几个小队队长劲大着哩，赶腊月二十，全部结束平地任务！我跟饲养员老大说了会议精神，今年要多杀几头猪，老大高兴死了，说明天就加料，赶腊月二十七八，正好追肥！好哩！咱杀猪过年！……”

“好咧！不说那些了。刚才会上安排过的事就不说了。”常克俭打断吴登旺的话。显然，吴登旺没听明白他问话的意思，就直接提出来：“北寨人没吃的，年怎过呀？日子怎过呀？”

吴登旺睁着虎眼，直愣愣看着常克俭，吃惊不小！他忽儿眼睛一眯，脖子一仰，哈哈笑起来，笑毕，说：“北寨人过不了年，要你南寨支书同志操心吗？让他们朝‘鸽鹁客’要去嘛！哈呀，你是铁路上的警察管到西安钟楼下了——管得宽过余啰！”

“不宽。伙计！”常克俭说，“你知道不？北寨有人在咱南寨借粮，怎么借呢？今年借一斤苞谷，忙后还一斤麦子，还有掏高价买的，你看这问题是个啥问题呢？咱该管不该管？”

吴登旺说得很干脆：“开个社员大会，宣布一条，借啥粮还啥粮咱不反对，谁要是粗粮换细粮，卖高价的话……”

常克俭笑着摇头：“粮食政策谁不知晓？可没啥吃总得想法子喀！北寨人掏了高价，南寨人得了高价，都不吭气！你逮住都说借的！没一个人承认是买的，换的！咱的社员弄这号事，管不管呀？”

吴登旺闷住了，这是实际情况！他烦躁地说：“北寨胡整，弄得咱也不得安宁！”

“也能看出咱思想上的毛病，咱的工作没做好哩！”常克俭告诉吴登旺，北寨社员到南寨买粮借粮的事，前几天他就发觉了。先是亲戚到亲戚家来借，熟人朋友到熟人朋友家来借，后来就出现了经济宽绰的人来买，手头紧的干脆咬住牙借一斤苞谷还一斤麦……他想在社员里头进行一番教育，订一条制度卡严吧！好了，你说这不对，他不卖不借了，北寨人还是要跑其他队或渭河北去买！这是社员吃饭问题，你当干部能不管吗？现在才交上腊月，离明年收麦早着哩！开过春，到三四月青黄不接的时节，情况会更严重！这几天，他一直在想着这个麻烦事，一个共产党人最赤诚、最人道的想法形成了，就是拿出南寨的一批储备粮来，借给北寨。这办法，他首先考虑的是南寨人要骂他，干部也会发生争执，大队长就是头一个绊子！再者，北寨肯定不会接受，王梓板硬着头皮顶着社员的恶骂，两眼还看的是韩主任奖给他的奖状，能好意思接受南寨的粮食吗？前日北寨三队队长刘步高和他透过想集体借粮的意思。他想先跟大队长交换意见以后，再和其他干部商量，再让社员讨论。一来教育本队社员，不要趁北寨社员有困难，咱倒去发财；二来是大事，要经社员们同意。想到这儿，他说：“你和他们赌气做啥？过年该吃十斤肉，韩主任不会少吃一斤！受害受苦的是北寨，北寨的社员！”

“那咱有啥办法？”吴登旺说，“总不能叫咱给北寨把粮供上！”

吴登旺本来说的反反话，常克俭此时却抓住，大胆加以肯定：“我就想和你商量这事：拿一批储备粮，借给北寨！”

吴登旺把茶缸一放，从火炉边跳了起来，惊奇得瞪大了虎眼：“借给北寨？把咱的储备粮给北寨？”他重复着常克俭的话问，“让北寨人吃饱了再唱戏？编诗？让王样板再去介绍经验？再来和南寨对着干？让‘鸽鹁客’主任再来给南寨扣帽子？”

常克俭不恼，他早已料到吴登旺会激烈反对的。他说：“覅急嘛，你坐下说嘛！咱俩商量哩嘛！”真好脾气的人啊！

吴登旺重新坐下，摇着手：“不行！我通不过！哪怕把粮食交给国家，支援工业建设哩！给王样板那个瞎熊，不给！”

南寨人人佩服好脾气的党支书常克俭，真是脾气好！他还是慢悠悠地从嘴巴和鼻孔里喷着呛人的旱烟，脸上不恼，眼里不失笑意，不高的声腔，面对盛气的大队长，慢声慢气地讲他怎么知道借粮这个事，怎么考虑北寨，怎么考虑南寨，讲他怎么想，怎么犹豫，有什么顾虑！讲得真切、实在。他说韩主任拿北寨压南寨，他比别人并不少受气！现在说气话痛快倒痛快，解决不了问题嘛！

吴登旺喷着大口大口的烟气，沉静了。

常克俭从椅子上下来，找了一只小木凳，放到火炉跟前，和大队长面对面坐下，说：“伙计，咱明明白白看见北寨的病害在那里，瞎在那里嘛！你不听北寨社员和咱的社员遇在一搭，悄悄话怎说哩？他们没办法喀！”

“行么！”吴登旺拖长声音，带着并不实心实意的赞同口气说，“你开干部会讨论吧！只要大家同意，我没意见！”

克俭笑着：“干部会上，你还可以敞开说。”

吴登旺心里不禁纳闷，以往，他们商量事情，党支书是很尊重他的意见的，俩人想不到一块的时候，党支书总是等待，等待，三番五次交换意见，俩人想法一致了的时候，才交大队委员会讨论，今晚这事，他怎这么固执？尽管说话不高不躁，可主意不变！现在，在他没想通的时候，就要交干部讨论，这号事少有。他为啥这么急，这么固执己见地要去做给北寨人骚情的事呢？他纳闷了。

“你老哥的心长，真个心长！”吴登旺揶揄着，突然把戴棉绒帽的脑袋一拍，大声吃惊地叫：“啊呀！咱俩说了半夜话，那俩还在饲养室里呢！”

“谁？”克俭莫名其妙。

“北寨那俩借粮的——长顺和马驹。”

“你把人家搁在饲养室做啥？”

“我问他借的，还是买的？啥价？死活不说。我说，‘你几时露了底儿几时走’！”

“啊呀呀！你咋弄下这事嘛！”克俭老汉站起来，“走走走，快快快，咱俩送人家回去！”

“我只叫他交个底儿，了解咱南寨有没有人借机搞投机倒把的，又不把他俩咋的。”

“咱的事，咱能弄清！”常克俭说，“走，快！”

常克俭和吴登旺走出门，朝饲养室走去。村里传出第一声鸡啼。

夜正深，也正寒。

冬上金，腊上银。南寨大队各小队按照大队的安排，平整土地工程暂停，突击一周，给冬灌过的麦田施肥。抓住了生产的主要环节，社员那个劲头真是热火朝天。为了适应冬日天短的特点，各小队先后都改一天出三次工为两大晌，午饭在十二点吃。

党支书常克俭，肩头挂着牛皮车绊（车子放在饲养场外的粪场上），拱着微微有点驼的背，手里扣着棉袄纽扣，不紧不慢从村巷走过来。那些定额完成得快的青壮社员，已经端着大老碗蹲在靠阳的柴火堆边开起“老碗会”了。他答应着社员们亲切的招呼，仍然悠悠走着，好让推车跑了一上午的双腿松弛、缓歇下来。

大队长吴登旺和几个社员，正坐在玉米秆柴堆前吃着谝着，看见他，说：“老常，‘鸽鹁客’找你哩！”

“你没问啥事？”

“我没问！”吴登旺说，“他放他的鸽鹁，我务我的庄稼！谁不粘谁！”

几个一堆吃饭的社员哄地笑了。

这家伙总是这样！常克俭走着想着。他眼里容不得他看不顺眼的人！大队长的正直秉性，南寨男女老少都知情，所以，喜欢他，信任他。要不是这一点，他那个脾气，能干生产队这复杂麻烦的工作吗?难！他常克俭没学会挖苦人的本领，即使对谁有意见，也不会说挖苦的话。韩主任提拔成公社领导以后，在生产队和大队干部当中威信不高，砸他洋炮的不少。他的主意是，你说对的我办，你说的不符合南

寨实际的不办。今年春上，韩主任到北寨抓点，他开始也觉得新鲜。开现场会那天，他和登旺到北寨村里一看，又到地里一看，他的心凉了。“花套子！”他对登旺说，“村里搞得花里胡哨，地里的庄稼哄不过人！”从北寨开罢现场会，他仍然按他的步子走，不理睬邻家那一套。韩主任从北寨赶到南寨，问他为啥不推广北寨的经验，他老实说他的想法：“农民是种地哩！心劲儿要花在多打粮食上头哩！北寨现时把开会唱戏当正经事，庄稼倒荒了，这事，我心里不踏实！”韩主任甚至说：“人家外队外社的人来参观，路过你南寨，一看你这儿悄悄静静，说北寨的经验在南寨都推不开。影响太坏！”常克俭说：“这不难嘛！让参观的人走北边那条路好咧！俺不挡北寨的路！”个别谈不通，韩主任就在大会上点南寨的名，发展到前不久，就直接点常克俭的名。会完以后，他找到韩主任：“北寨那一套，我干不了；要是我挡路，你把我撤换了！”韩主任气得什么似的，拿这个瘦小的支部书记没办法！他还没有撤换一个大队支书的权力！即使思想分歧如此严重，他也不像吴登旺那样，一提到韩主任，就是“鸽鹁客”长“鸽鹁客”短，连名字都不叫！见了面连招呼都不打。他该接待还接待，心里却纹丝不乱。

拐过弯，他一眼瞅见，韩主任站在他门外的晒柴火的小场地上，屁股后头撑着一辆自行车，一手插在裤兜里，一手夹着纸烟，鹤立鸡群似的站在几个蹲在地上吃饭的社员旁边。他走到跟前招呼：“老韩，屋里坐嘛，到了门口也不进呀！”

韩主任现出急事在身的神气，事务式地说：“今日下午，在小学里开会，男女社员都参加！两点半，记住！”说罢，跨上车子奔北寨去了。

小学校位于南寨和北寨之间，两个村子的孩子在这儿读书。土改时，南寨和北寨是一个行政村，通称南北寨，经常在一起开会。合作

化时，成立了两个大社，以后又成为人民公社的两个大队，各自独立活动，在一起的时候不多。但这两村离得近，亲戚套亲戚，年时八节往来频繁，又加上地连畔，渠接渠，干活休息时，两村的社员对着烟锅点火抽烟哩！会议安排在这里，很适中。韩主任让北寨社员集合在北边，南寨集合在南边，各家干部好维持秩序。费了好大劲儿，也整理不好，亲戚见了亲戚拉家常哩！熟人见了熟人抽烟呢，交换各队的新闻哩！

常克俭进得学校操场，正想找一个地方蹲下来，却听见谁“克俭！克俭！”亲切地叫他。他一回头，北寨三个老汉围在一堆，笑着向他招手哩！

一个花白胡须的老汉，很神秘地问：“克俭，老叔问你个话，这整天叫农民唱戏打球，不务庄稼的政策，全公社是一律的，还是光叫俺北寨搞？听说你在南寨就没这样弄！”

克俭笑说：“俺还没顾得学哩……”

一个刷刷黑胡须的老汉说：“胡整哩么！克俭！俺老婆快七十岁咧，成天叫唱沙奶奶！这叫做啥？糟践人哩喀！”

一个秃顶老汉说：“人家这样胡折腾，社员瞎好不敢放个屁嘛！不对了就谈思想，上会！俺北寨人造了啥孽？受这号洋罪？”

常克俭在老汉的烟包挖着，猛然听到大喇叭上喊：“常克俭同志，吴登旺同志，请到台上来！”这就是社员称作王样板的北寨大队支书王焕文的轻浮的声音。

花白胡子老汉努努嘴：“克俭，俺那人物叫你哩！”

吴登旺走到跟前:“老常，你把我代表一下，我不上去了！”

老常说:“叫上就上嘛！怕啥！”

常克俭噙着烟袋，从人堆里挤过去，和登旺坐在一条木凳上。韩主任告诉他们，下午的会议两个内容，先由他做关于当前运动的动员报告，再由北寨联系实际反击“右倾翻案风”。

韩主任坐到讲桌前，把讲稿摊开在铺着一条花床单的桌子上。王焕文把麦克风挪挪、压压，压到正好对着韩主任的嘴的高度，又提起花皮暖水瓶，倒了一杯水，放在韩主任左手旁，这一切做得谨慎、小心，笑容可掬。

韩主任刚开口，突然广播里传出吱啦一声尖叫，刺人耳膜。王焕文立即折转身，笑脸变成恼怒的神色，斥责大队电工:“怎搞的？”

吴登旺翻了一眼，鼻腔里轻蔑地哼了一声。

常克俭也瞧见这一令人作呕的细节，他若无其事地抽烟。

韩主任讲起来，手舞足蹈，一会立起，一会坐下。

吴登旺扒在常克俭耳朵上，悄声说:“老哥，我看如今这世事，也跟放鸽鹁一样，看行市哩！这一集灰鸽鹁值钱哩，下一集白鸽鹁又值钱哩！咱们是脱了鞋也赶不上行情！”

常克俭说:“你悄着！你听他讲嘛！有意思哩！”他这样劝吴登旺，再看看韩主任一派大人物给农民讲话的派势，脑子里却也不由得浮现出解放前麻坊镇上的鸽鹁市场来。穿得七长八短的韩家庄的孤儿韩狗娃，鼻尖上吊着清鼻涕，一手压着鸽鹁盖子，一只手塞到别人的

袖筒里捏码号。父母死于突发的霍乱，把十五六的少年独独儿抛到人世。那时候没有共产党和共青团组织教育和关心孤儿少年，亲门本族也终究隔着层层儿，渐渐地狗娃在麻坊街的街痞二流子伙里找到了兴趣，把二老留给他的三亩地卖啰！买鸽鹁要起来啰！……解放后，狗娃回韩家庄参加了土改，好积极啊！积极得简直让纯朴的贫雇农吃惊！工作组能看出他动机上的不纯正，却也同情贫农孤儿的艰难处境，就让狗娃到乡政府当通信员，改名叫韩克明，后来就成了人民公社的一个干部。这个人的最大毛病是随风倒，说话没准星儿，当面夸你，背过身砸你，人都知道他有"吃谁的饭，砸谁的锅"这瞎毛病。"文化大革命"时，韩克明在机关里造反了！公社革委会成立时，当上了委员，一九七四年一反回潮，韩克明当副主任，成为领导人物了。

常克俭想到这些，心里倒觉得吴登旺说的不无道理，这韩主任大概把革命也当耍鸽鹁一样搞哩吧？你看他这阵在台上那神气！

韩主任从大到小，由远及近，终于从全国讲到了北寨和南寨："在北寨，出现了十件新事，呈现出一派新气象。有人对北寨不服，散布不少奇谈怪论……"

常克俭转回头，对满脸怒气的吴登旺说："伙计，听着……"

韩主任又说："有的队不学北寨，就出现资本主义泛滥，社员卖高价粮，大队干部也企图以粮食腐蚀北寨！北寨大队党支部很敏感，及时抓住这个新动向，今天开会，坚决反击……"

常克俭脑子嗡的一声，只觉一股热烘烘的东西冲上头顶，脸发烧，眼发花。他哆嗦着嘴唇，没说出话，却听见吴登旺骂了一句："真

正无耻！无耻！”他站起来，抽身想走，“你看看，咱想把粮给人家，还得挨人家骂，狗日的连良心都没有！”

常克俭拉住登旺的袖子，强迫他坐下，控制住自己的感情，说：“覅急，覅躁！看这场戏怎么演吧！”

王焕文很得意，走到麦克风前：“北寨有人吃粮没计划，铺张浪费，弄得缺点粮食，有的队就趁机卖高价。现在由杨长顺揭发批判——”

杨长顺，五十多岁的老实社员，一脸羞愧，低着头，走到讲台上来了。他停在麦克风前，手也没处放了，惴惴不安：“我，不该出去借粮，咱北寨是先进队，我给红旗抹黑……”老汉深深低下头，离开讲桌，在土台一侧，羞得蹲下身去。

王焕文很得意地追问：“你在哪个队借的粮？”

老汉头也不抬：“南寨。”

王焕文瞟一眼常克俭，又和韩主任会意地交替一下眼色，继续追问：“谁家的？到底是买的，换的，还是借的？”

老汉双手抱着头，不吱声了。

王焕文有点性急：“好，你再考虑考虑，让马驹揭批！”

三十六七岁的中年社员马驹，紧皱的眉毛下，交织着难受和愤恨的复杂神色。他被叫上台来，站在大家面前，像一节瓷实的榆木桩，栽在那里，半天没开口。

王焕文启发引导说："你和长顺那天黑夜回来，不是还有人给你送进村吗？说老实话吧！"

"那是人家克俭叔和登旺叔帮扶我哩！"马驹立即说明，"不是人家卖的！"

这个说明显然是没有力量的，因为他总不说是谁卖的。台下的眼睛一齐射向坐在台子一角的南寨大队的两个主要领导人，似乎在问，他们也卖高价粮吗？这是怎么回事啊？

这是搞阴谋！至此，常克俭完全明白了。那天晚上，他和登旺来到饲养室，向长顺和马驹赔了情，略略透出将来通过集体对集体的办法解决北寨社员的困难；之后，帮着他俩把粮食送进了北寨村。王焕文大约以为是南寨的领导人卖粮咧！拿这事到这稠人广众前亮他！台下的社员不明真相，眼光里有锥子一样尖利的责问，有迷惘不解的疑问，也有完全不信的同情眼光。克俭觉得，阴谋的制造者企图把他往烟筒塞，抹他一脸黑，在南北寨把他弄臭，这意图太明显了。他气愤，憎恶，也好笑！他的耳旁，传来大队长一声比一声粗的出气声。没等他回头，吴登旺忽地一下站起来，炸雷似的说："这是害人！"他想挡也来不及了。

韩主任回过头来，却嘻嘻笑着："不要激动嘛！你要说话，等马驹说毕！好，马驹同志，你说吧，不要怕！"

韩主任十分有把握的神情，登旺的举动，给在场的社员造成了真有其事的印象，常克俭感到了某些压力，像坐在被告席上；但他心里踏实，不乱！连看也不看登旺，摸出烟包来。

“我说，行！”马驹咬咬牙，说，“我马驹不该到南寨借粮！应该在家等着饿死！饿死也不该给王支书脸上抹黑！”

“你胡说！”王焕文脸上像挨了一鞋底，“手放下！嚣张成啥哩！”

韩主任却由气恼中很快换出一副笑脸：“现在要你说清，借谁家的粮。责任不在你嘛！”

马驹憋着嘴唇，扭着脖子不说话。台子上僵住了。

吴登旺又想站起，老常偏过头：“你不能看这场戏演完吗？坐稳！”

“买我的！”台子下边一声喊，台上台下满是吃惊的眼睛，朝着发出声音的右后角看去，南寨五队的张德明老汉正朝前头走来。

“买我的！”德明老汉走到台前，对王焕文说。他转过脸，对站在一堆的长顺和马驹说：“兄弟，你就照实说是买我的喀！怕啥？”他转过身，面对整个会场，“南北寨的乡亲们，马驹和长顺，借了我二百斤苞谷。长顺说他忙后还麦哩，马驹说他月底交了猪，给我钱哩！就是这事。俺的支书克俭问过我，我没承认！今日，看着长顺和马驹受难场，我的老脸上像鞭子抽！他俩，没吃的，掏高价买我的粮食，够苦情咧！回来还要挨批判……”老汉动了感情，说不下去了，猛地提高声音，大声宣布：“他俩借我的粮，我不要还咧！今日这会把我教育哩！当着南北寨社员的面，我说话算话！”说罢，大步走下台去。

德明老汉的举动太突兀了！台下的社员没料到！阴谋的制造者没料到！常克俭自己也没料到！前日他和德明老汉推粪休息时，了解这事，老汉矢口否认他卖粮。现在，企图整他常克俭的人，却替常克俭

教育好了这个私心重的社员，多嫽啊！企图拿石头打人的人，现在正发觉石头朝自己迎面飞来！你看台下两村几百双眼睛里是啥意思！

王焕文惶惶然瞧着韩主任，怎办?

韩主任尴尬地站起来，仍然绷着脸:“德明老汉能认错很好嘛！问题在于南寨的干部，他们想拿粮食收买人心，给北寨红旗抹黑！”

重新获得启发的王焕文说:“这事由三队队长揭批！”

这是个四十岁的老诚人——三队队长刘步高，忠诚淳厚，他说:“三队不少社员到南寨借粮，我当队长的，脸上像挨耳光！咱是集体，我想集体借下粮食，明年再还，甭叫社员受难场！我和南寨老常透了透这心思，老常说和其他干部商量一下，问题不大。昨日他见我，说大队干部都同意。就是这事！”

“没志气！没志气！”王焕文喊着。

刘步高难受地说:“我当队长五年了，大家伙儿知道我没本事！这几年，发展不快，好坏社员还没饿着，公购粮也没拖欠国家的。今年，大家明白，咱都干了些啥名堂！这个弄法，我干不了！南寨的粮，我不借了。你给三队另选队长吧，选能唱出粮食的能行人……”

北寨的社员，像受到撞击的蜂箱，嘈杂的议论，愤恨的谴责，难听的咒骂，像潮水一样扑向主席台，埋藏在胸膛里的积久的愤怨倾泻出来了！会场无法控制了。

吴登旺自坐上台后，一直黑煞煞的脸孔，现在眉眼嘴巴活动起来了，畅快地笑着。太嫽啰！实在好！他坐不住了，摸摸烟包，烟包却

空了，亲昵地捅一拳克俭，要过烟包挖着，毫不遮掩嘴角上轻蔑的神情，瞧着韩主任红一阵白一阵的脸。

常克俭仍然稳坐着，社员们激动的情绪，像海浪一样拍击着他的胸膛，把他心里那些窝囊气一齐冲击净尽！他的心忽闪忽闪跳啊！嘴唇不由得颤抖起来。

韩主任走到他跟前，严厉地瞅着他说："现在必须由你说话，说清你搞支援粮食的真实用心！否则……"

听见韩主任的话，台下前头站的社员静下来，从前头往后排，霎时屏声静气，鸦雀无声。南北寨的几百双眼睛，男人和女人的，老年和青年的，饱含着敬佩、爱戴的深情，投向一个目标——坐在土台侧角的驼背老汉。

阵势十分明显：

——阴谋的制造者企图挽回残局。

——受害的群众希望他替他们说话。

常克俭站起来，微微驼着背，手里捏着旱烟袋，走向台口，看着他熟悉的社员们的一张张热切的脸，两滴泪花扑出来了。他转过身，对韩主任看一眼，说："一切都清清楚楚，你自己总结吧……"说罢，他背起双手，走下台阶，穿过自动让开路的人堆，走出会场，踏上通南寨的白杨甬道……

1978年10月 小寨

小河边

科学大会上午进行的议程是颁奖。研究员李玉抱着奖牌走出礼堂大门的时候，心还在咚咚地跳，那场面实在令人激动。他夹在人流中，走过长长的楼道，在楼梯的转角处，猛然听见谁叫了一声“老九”！声音听来好耳熟。未及他回头，一只手掌已经重重地落在肩膀上，一张胖胖的脸膛正对他嘻嘻地笑着，又重复一遍道：“哈！老九！”

“呀！老八！”李玉惊喜地叫着对方。

两双手紧紧地握在一起，摇呀抖着。

一声老九，又一声老八，奇怪的称呼，惹来了拥挤着下楼的过往者好奇的目光。李玉那藏在近视镜多纹的镜片下的眼睛，窘迫地躲避着。老八却一手搭在李玉的肩头上，亲热地搂着他沿着楼梯台阶往下走，根本不理睬别人怎么瞧他。

“你到底成功了！值得祝贺！”老八说。

“你的事迹我在报上看过了，真是个好‘后勤部长’。”李玉说。

老八哈哈一笑，表示自己所做的成绩不值一谈。笑毕，悄声问：“你还到小河边去来没？”

“没。”李玉说，“你大概也没空儿去吧！”

“咱们再去一次，玩玩。”老八提议说，“顺便看看老大！”

“噢！老大——”李玉像勾起什么心思似的，沉吟一下，随之热烈响应说，“好！去！”

“下星期天，十点。”

“在桥头等。”

多年以来，研究员李玉几乎过着一种居士式的生活。四十出头的人了，既不喝酒，也不抽烟，更不会结交朋友。虽说分配到这个城市工作快二十年了，可这座北方古城的名胜古迹，郊区的山水风景，他一概没有光顾过。他有他的乐园，就是研究所里那座实验室。一旦进了实验室，他就忘了太阳在升在落，自然界雨雪风霜在变幻；脱下白褂回到家里，呆呆地坐在小桌旁，脑子里还满是那烧瓶里沸腾的液浆。

他有一个贤惠的妻子。她在工厂里工作，劳累的程度比他大得多，但她还是甘愿承担全部家务。

“吃饭！”妻子说。

“好！好！”他端起碗，捞起筷，往嘴里填。

“盐淡不淡？”妻子问。

“不淡不淡！刚好。”他点头赞许说。

“我给你碗里就没调盐！傻瓜！”妻子嗔笑着，爱怜地夺过碗去，调上了盐面儿，又递到他手里。孩子们哈哈笑着傻里傻气的爸爸。

他呵呵笑着，扶一下眼镜，接过妻子递过来的碗，也不在意——惯了。

吃罢晚饭，他钻进那间堆满大本小本的小屋里，一坐就坐到十二点。

有时候，他会轻快地跑上楼梯，扔下提包，满脸孩子似的喜气，钻进灶房来，忍不住说：“二号试验成功了！”似乎只有这时候，他才记得应该替妻子分担一份家务，蹲下择菜，打水淘米。这时候，她会满心喜悦地临时做出决定，增添一两个可口的菜、汤，表示对心爱的丈夫取得成功的祝贺。平时，做着再好的饭菜，怕是他连味也尝不出来呢！

他们少有穿戴时髦，进出服装店、饭店、公园的时候，可都觉得很和谐，很幸福。百人百性，世上谁也没有给幸福的家庭规定下统一的内容嘛！各人按各人的志趣生活着。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的生活被搅乱了。实验室门上交叉着贴上了十字封条；那卷着旋风的扫帚，一下就把他不足百斤的瘦小身躯扫进了“牛棚”。他惊魂未定，尽管对眼前发生的一切还看不透，尽管肉体和精神上都不好受，可并无怨言。从简陋的乡村小学到宽敞明亮的大学，他十几年来接受的教育所形成的坚定而神圣的信念，使他相信这是革命。既是革命，自己损失一点是不应计较的。他老老实实检讨，写了一次又一次，诚诚恳恳接受批判，站了一回又一回。终于，有一天，他被宣布解放了，从山沟里的牛棚，回到城市里的研究所。

他急急跑进研究所的大门，一步三级地跨上楼梯，奔到实验室。门敞开着，室内已经掠劫一空，水泥地板上撒满玻璃杯瓶的碎渣，窗

户上连一块完整的玻璃也不存在了。他的腿发软，无力地靠在一只残破的木椅上，那颗剧烈跳动的心霎时凉得像要冻结了。

他背着行李卷，拖着沉重的步子，走过大街小巷，回到家里，妻子不在，孩子们几乎认不出他了。他抱起小儿子，跑进他的小书屋，啊，塞满了面袋、米缸、蔬菜和不常使用的杂物。

他放下孩子，扶着门框，流下眼泪来。在那小山沟的牛棚里，他检讨，站台子，为的是能早一日回到实验室。现在，多么出乎意料！怎么办呢?

“再别学傻了！”妻子甚至不管孩子在当面，一把搂住他的头哭了。她揩掉眼泪，就说了这一句话:“咱们过去太傻了！”

他待在家里，没处去了。

他企图弥补结婚近十年来自己不顾家务的过失，替妻子烧饭，但却把饭烧糊了；给妻子和孩子洗衣服，怎么也洗不净。

妻子瞧着他笨拙狼狈的样子，笑说:“老天安排就的，还是我来服侍你！”

“那么，我该干什么呢？”他无聊而又惶惑。

“出去逛去！”

他出去了，没过点把钟又回来了，十分沮丧的样子:“没啥好逛的！”

“领着孩子看电影去！”

不等他回答，孩子们乱纷纷反对了。他明白，他不会使孩子们玩得开心；再说，那几部轮番上映的片子，孩子们早都背熟了，腻了。

坐着，躺着。坐、躺不住就踱踱步，从寝室到小灶房六七步长，踱着过去，又过来……无聊！无聊得心神不安！

这一天，妻子从工厂回来，从提兜里掏出一把伸缩式的钓鱼竿："去！钓鱼去！散散心。"

他踌躇了。虽然生在南国水乡，自上了中学，他像神话传说中的少年进了东海龙宫，贪婪地攫取人类智慧的珠宝，儿时在河浜钓鱼捉虾的兴趣早淡漠了。现在，却……

妻子像是看透了世事，对他劝解："什么也不要想！咱们过去真傻！"她的神情和语气是坚定的，又是痛楚的，"拿上竿子逛去！活动活动身体，老待在屋里，愁死你，啥也不顶！"

他难受到极点！妻子对他的事业的冷淡使他更难受一层。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

"到哪儿去钓呢? "他支支吾吾。

"出城，往东，有一条小河，风景不错哩。"妻子说，"俺厂一伙'逍遥派'，成天在那儿钓鱼摸螃蟹。"

这样，他来到了小河边上。

一道大堤，把沙滩和田地隔开。沙滩上，望不尽的石头、沙砾、茅草，沙子里的小粒赤金在火样的阳光下闪射着耀眼的光彩。一条细细的流水弯来拐去，在沙滩上静静地流着，河堤上密密丛丛的杨柳，

遮挡着阳光，丝丝凉风顺着河道吹过来，堤内是一畦畦吐穗的稻田和一片片白顶绿身的玉米林，多好的地方啊！

一座座石头垒成的大坝，全是一头接着河堤，一头伸进沙滩，坝头下都窝着一潭深水，那是洪水冲击石坝掏出的深潭。李玉顺着河堤，推着车子往前走，越往上走，空气越清新，城市的噪音渐渐消失了。他走到一个圆盘坝上，坝头有一道深水槽，背后有几十株大柳树，长长的枝条垂挂下来，拂到水面上。他撑起自行车，放下竹篓、挂包，坐下来，把长线抛到水里去，好舒心啊！

这儿，没有人对他呵斥，也没有人向他翻白眼，更没有无休止的争辩、吵闹，只有树间连成一片的蝉鸣，听得多了，倒听不见了。

他背靠在石坝高一台的石头上，任浮子在水面漂来荡去，并不在意是不是真有鱼儿在咬钩儿……

李玉猛然发现，沙滩上有一个人，沿着河水往上走，走走，停下，把一只网抛到水里，拉起来，抖抖，又往上走。近了，他才看清，那人只穿背心，短裤，从头到脚晒得油黑，屁股上吊着竹篓，手里提着网，秃脑门，胖胖的脸。他走到圆盘坝头，瞧一眼李玉，扔下鱼网，从背包里取出钓竿儿，把线儿抛到水里去。看来这是一位捕鱼行家了。

两人各据一方，自顾自钓。

李玉想和后来者拉拉话，却找不到搭讪的词儿，就闷着口。他看对方是位不安静的角色，立起、坐下、抽烟，几次瞧他。他等他开口，他相信对方是耐不过自己的。

那人终于忍不住，问:“敢问在哪个单位？”

“研究所。”李玉答。

“嗬！老九呀！”那人装出吃惊的神气说，“不错，我能闻出你那股味儿来！”

李玉有点不习惯，又闷住了腔儿。

“咱俩是兄弟。我是你老哥——老八！”那人自嘲自乐，“走资派！排行老八！哈哈！”

李玉笑了，这是个乐天派！

自嘲为老八的人告诉李玉，他在阴湿的地下室里趴了十个月，严重的肺穿孔已使他奄奄待毙，当作死了没埋的废物被抛了出来。他的老伴到处奔波，为他治疗。稍有好转，他就逃到小河边上来接受大自然的疗养了。他只承认医生的药物起一半作用，另一半呢？他说归功于他的不在乎:“活一天赚一天！我以为我是再也看不见太阳、树木了呢！”

谁也不再问谁的真实姓名，你老九、我老八地互相戏谑、呼唤。老八肚里装着那么多逗趣的事，逗得李玉好笑。一天，两天，三天，日子在逍遥中流逝，像小河中枯水时节那一股细流，无声无息。

十天没过，李玉又烦腻起来。是啊，中午河滩上燥热得无法忍受，沙子的反光刺得人眼睛发干发疼，杨柳的叶子无力地垂吊着，那施过皮渣的稻田里沤出一股难闻的臭味。他又想起他的实验室，那是多么令人沉醉的地方！

“这种日子，何时为止呢？”他烦躁地说。

“你问它——”老八指着没有一丝云彩的蓝天，说，“天知道！”

老九指着沙滩上，对老八说：“你看那个老汉——”

老八顺着老九指的方向望。在下面一个坝头上，有个老汉，年纪约略六十了，穿一件半截袖白褂，敞开前襟，露着绛红的肤色，赤着脚，在晒得灼人的沙滩上拾石头；拾满一担笼，挑上肩，担到石坝上。坝上支着一个用铁丝编织的大笼子，长五六米，宽、高一米多，他把担来的石头，倒进铁丝笼子里，摆正垒齐。

“天天这样！”老九说，“自我来到河边，看见就他一个人，一天三晌，不紧不慢。”

老八说他早就见着这位老汉了，整整一晌，老汉只在半晌时坐下来吃一袋烟，不过十分钟，就又干起这单调、机械而又笨重的活路。

“我看这老汉，保准是个劳模。”老九说，“没人督促，也没人管他，全凭自觉性儿，干得多踏实！”

老八也呆呆地看着，赞叹说：“还是农民兄弟好：不管社会上闹得再乱，他们两手不停。”

“贫下中农本质好！”老九说，“他们只相信：地里要打粮食，就得出力流汗，胡说和瞎吹是得不到丰收的！”

“与体制也有关系。”老八说，“他们凭工分吃饭，一天不上工，就没有工分。工厂不一样。逛一天照样发工资哩！”

“可这老汉少干一会儿，多歇一会儿，或者一担少挑几个石头，谁知道？照样记工分。”老九分辩说，“你看他每一担都装得满溜溜的……”

“这肯定是生产队的老实社员，干部信得过的，才放到这儿！”老八说，“要是滑头，他睡一天也没人知道！”

“对！肯定是个劳模！”老九这回完全同意了老八的话，高兴地说。似乎这个老汉已经成为他心目中最崇拜的英雄，不愿听到别人对他有些微的非议。一切热爱自己的工作并为之不顾劳累而奋斗的人，都引起他的敬佩和尊重。由此他又联想到自己，惶惑不安地搓搓手掌。

这时候，那老汉放下空担笼，坐到坝根的柳荫下，他休息吃烟的时间到了。

“和老汉坐坐去！”老九提议说。

“好！”老八是很随和的，立刻站起，头前走了。

俩人一前一后走到老汉靠着的柳树下。老汉仍然用手捉着烟袋，瞧着沙滩，一动不动，对来到身旁的两位来访者，不睬不理。老九窘住了。老八却畅畅快快说：“老兄，借个火！”

老汉瞧他们一眼，略一踌躇，从石头上取过火柴盒儿，递给老八，眼睛又投到河滩里去了。

老八坐下来，掏出纸烟盒儿，抽出一根，很实心地送到老汉面前。

老汉摇了摇头，叉开五个扒摸石头磨得很粗硬的指头，推开老八伸到胸前来的手。老八再让，老汉再推——烟被挤折了。

老九难为情了，张张嘴又合上了。

老八不在乎，又搭讪说：“老兄，贵姓？”

老汉又冷冷地瞧他一眼，磕掉烟灰，挑起担笼，走下堤坝，径直朝采集石头的水边走去。

老八望着老九尴尬的样子，傻笑着：“这老汉好倔啊！”

两人讨个没趣儿，又来到钓鱼的圆盘坝头。

老九坐在石头上，仍然出神地瞧着河滩上扒拉着石头的老汉，愧疚地说：“老头儿见咱天天来闲逛，不务正业，讨厌咱们哪！”

“也许是。”老八说，“好劳动人见不得游手好闲的人喀！”

“哎！真该死！”老九凄惶起来，“老汉哪知道，咱是有劲没处使呀！”

“看见别人干活儿，我手发痒痒！”老八也动了情，真诚地说，“消磨光阴。毫无办法！”

“何时是了呢？”老九又是这句话，想起明亮的实验室，摆满药品的阁架、烧瓶、器皿、量杯、天平……他说，“我宁愿在实验的爆炸中死去！”

“自己解放自己吧！”老八说，“我想给厂里扫地，做勤杂工，反正不白吃人民的！”

老九指着鱼竿说：“总比来弄这号事强！”

两人统一了认识。果然，第三天他们再没来。

两个月后，他们又在河边圆盘坝上相会了。

老九推着车子，刚到坝头，就瞧见了坐在水边的老八的胖胖的脸、秃脑门，“你……”

“哈，我猜你还会来！”老八说，“我已经等你几天了。”

老九给老八诉苦。他经过申请，算是被批准进了三结合试验小组，研制一种灭草剂。他在三结合小组的处境是：监督改造。不管别人用什么眼光盯他，用怎样令人难堪的口气和他说话，他都不计较；只要能穿上白褂子，能摸到那光滑的器皿，能嗅到酒精燃烧的气味儿，他什么宠辱都忘了！三结合小组的几位小青年倒是很尊重他，虽则对试验一无所知，可态度挺好，求知欲很强，也很勤快。他和他们相处得极好，试验虽不十分顺利，劲头可都越来越大。不料，“‘法家’们说：还是老臭说了算！老臭改造了工人！复辟回朝了！”老九说：“这样，‘法家’们的扫帚又把我扫到这儿来了！”

“殊途同归！”老八说，“我给厂里扫地，喂猪，帮大师傅担水、洗锅，都不行！说咱是‘故作姿态，卧薪尝胆，企图收买人心，复辟！’下令炊事班不准我进灶房，也不许喂食堂的猪……”

“好啦！现在只有坐着等死！”老九说，随之悄悄拉拉老八的胳膊，“那个老汉听咱俩说话呢！”

老八一回头，可不是，那老汉一手扶着笼，一手摸着石头侧着头，听这边俩人说话，看见俩人盯他，立时转过头，又拾起来。

“他听见也好，不会怪咱不务正业了！”老八说。

两人默默坐在河边。老八是个生性不安静的老活泼，看着郁郁寡欢的老九，顺口说一两句挖苦话，逗得老九笑一笑。

“走！逗逗这老汉去！”老八笑着说，“我非和他交上朋友不可！”

老九跟着老八，又来到老汉靠坐着的柳树旁。

“老兄，能不能给搞点水喝？”老八嘻嘻说。

老汉瞧一眼老八，又瞧一眼老九，眼里掠过一丝善意的讥刺：“钓鱼钓下功劳了！”他无可奈何似的站起来，顺着大堤走上去，不远处，有一个砖砌的小独瓦房，那是防汛时夜间值班用的。

老九愣愣地看一眼老八，老八却顽皮地一笑：“跟上！”说着，往老汉的小独房走去。

老汉一只手提着一口小铁锅，一只胳膊下夹着一捆干树枝，走出门，放下锅，看了老八、老九一眼，转过身，把门板合上，吭哧一声扣上铁锁，又朝柳树下走去。

老八扑闪扑闪眼皮，示意老九：再跟上。

老汉在石坝上的三个石头上支起小铁锅，顺手扒抓了一堆干草、树叶，点着了火，一股青烟呼呼冒上来，燃着的树枝劈啪响着。

虽则倔，老汉的行动却完全证明了他的好心肠。老九忍不住说：“大叔，贵姓啊？”

老汉一听叫他，不安地摇摇头，看看这个老实巴交的知识分子，连忙分辩说：“不敢不敢！叫我刘老大（音惰）！老大！”

“老大，家里有什么人？”老八诚恳地、小心谨慎地问。

老汉突然扔下树枝，拾起担笼：“你自个烧吧！”说着走下堤坝。

老八扫兴了，他说他从没见过这样难搭话的倔老头儿！他说他在厂里当副厂长的时候，负责后勤，什么脾气的人没接触过！包括工人当中个别同志的蛮歪老婆，他也有办法叫她们对男人亲热起来。他承认今天的失败，自我解嘲说：“咬住不开口，神仙难下手。果真！”

老九却双手搁着膝头，瞧着烈火一样的阳光下，晒得烫脚的沙滩上，老汉弯着腰，从沉积的沙石堆里，抠出一个个石头，装进笼里，眼里无端涌出一包泪水来……

这一天后晌，一阵突如其来的暴雨倾盆而下，乌云压到河面上，闪电抽打着沙滩……

老八和老九拔了钓竿儿，爬上河堤，朝防洪小房跑去。

老汉站在小房门口，焦急地向他们招手，赶快把他俩让进小房。

两人甩着手上脸上的雨水，相对一看，又看看老汉，心里热，这是个外凉内热的好心肠人啊！

就在他俩刚刚坐在小炕边上的时光，老汉却从墙上的木橛上取下稻草编织的蓑衣，赤着脚，头上顶着一顶破草帽，走出房去。俩人看着老汉在雷鸣电闪、瓢泼大雨中，一步一步走到那棵柳树下站住了。

“监视洪水吧？”老八问。

“不会。你不看就头顶上一块云，哪会涨水？”老九说。

“那，又是躲我们。”老八说，“这像话吗？”

老九走出房去，老八跟了出来，一直走到柳树下。

“你们——”老汉吃惊地盯着两个客人。

“我们在屋里，倒叫你淋雨！”老八说，“这像什么话？”

“我有蓑衣！”老汉狠狠地解释。

“你不进去，我们也不进去！”老九说。

“嗯……好！”老汉沉吟一下，终于下了决心，“进！咱都进！”

三个人一前一后进到小房里，老汉畏怯地坐在门口一只用树根砍成的木墩上，低着头，掏着烟包的手在微微颤抖。

老九的感情好像很脆弱，颤着声问：“老人家，你为什么老躲我们？”

老汉迟迟疑疑地说：“我怕给你们惹麻烦！”

“咋哩？”老八问。

“我不能和你们在一搭！”老汉声音低了，手颤得把烟末儿抖落到地上。

“为什么？”老九问。

“我是敌人——地主分子！”老汉终于说。

“啊！”老九不由得一惊，实在料想不到啊！看看老八，胖胖的脸上也满是惊慌和疑虑，半天对不上话来。

“要是好事的人反映到你们单位，会给你俩惹麻烦！”老汉委婉地说，“你们也是被难之人……”

可怜的李玉，在这种场合下，简直不知如何是好了。地主分子，这是敌人，一点不含糊，尽管他目前被当作臭知识分子整得要死不活，可这点阶级觉悟还是有的。

老八说话的警惕性也明显地提高了：“唔！怪道让你在这儿垒石坝，是改造呀！”末了，他随随便便问，“几年了？”

“十年！整整十年！”老汉反倒抬起头来，一扫畏怯的神色，“自打我和社员把这条河堤修起来，围进了五百多亩滩地，缺粮队变成了余粮队，我就戴上了地主分子的帽子，成了人民的罪人！”

“那你以前——”老九急忙问。

“我打土改到‘社教’，干部没离身，农会主任，农业社社长，大队党支书！”老汉说，“社教运动一完，给我定了地主分子。我记得清清楚楚，我家十四五亩地，我爸得绞肠痧死了以后，我爷七十多了，做不了活儿，我妈引着我姊妹兄弟五个，我顶大，十四岁，跟着我妈做庄稼；大忙时，雇上几个‘麦客’割麦，就这，说我雇工剥削……”

老九忍不住问：“你为啥不向上级反映？”

“反映过，不顶啥！”老汉说，“反映到哪达，材料原路退回来，反映一回，挨一回斗争：不服法管！翻案！差点进了砖瓦窑（监狱）！”

“你，可是苦了！”老八失去了警惕性儿，同情地说。

“我吃苦，没啥！连累的亲戚朋友……”老汉难受地说，“我女人一气之下，起不了床，没出一年，死咧！大儿子刚订下个媳妇，人家退婚了。娃三十多岁了，还寻不下个人；掏一千多块钱从山里办了个人，回来没过半年又跑咧！二儿子一看他哥的光景，好坏进了人家的门……我，唉……”老汉说不下去了。

李玉和老八，陷入深深的沉默里。

哗哗哗的大雨，猛烈地冲刷着白杨和柳树浓密的叶子，啪啪直响，稻田和玉米林里蒙蒙一片白雾，发出巨大的又像是遥远的海潮一般的轰鸣。

“我不是地主分子！我是共产党员！”老汉说着，从木墩上立起，神情庄重极了。他走到小炕边，从炕头上的土窑窝里取出一个小木匣，抱在怀里。

老九和老八看见，这是一只十分粗糙的木匣，木板是用斧子劈出来的，根本未用刨子推光。匣盖上，画着一个象征着镰刀和锤子的拙笨的图案，染着淡淡的红色。两人疑惑不解。

“这是我的党费！”老汉慢慢拉开匣盖，露出一扎捆得整整齐齐的人民币和一堆硬币，“夏天，我在柳林里拾蝉壳儿，到小镇药铺里卖了，月月按时交。”

老九一把抱过那只小木匣，眼泪哗的一下涌出来，一滴一滴，滴在那一捆纸币上和一摞摞硬币上。

老八双手紧紧抓住老汉粗硬的手掌，胖胖的脸上抽搐着，眼泪也流下来了。

老汉却不哭，一字一板，从那长满短胡须的嘴里迸出深沉的话来："我自解放见了党，就跟党走，听党的话！党叫搞互助组咱带头互助；党叫办农业社咱就办农业社，我把瓦房腾出来给社里做饲养室；党叫大办农业，我就领社员下河治滩……我对党没二心！"老汉紧蹙双眉，痛苦万般，"我活着是党的人，死了还是党的……"

老八和老九，被同样的问题苦恼着，无法回答老汉积聚在心头十年多的疑难，默然相向……

雨住了，乌云不散，老八和老九走出小独房，心事重重地顺着河堤走去。

这俩人，从此再没到小河边上来过，老大老汉想念起他们来了。

又一年的春天来了。不知不觉中，堤坝上，河边淤泥里，春草绣成团儿了。杨柳发芽，麦苗返青，春天给自然界带来了繁荣，可给老大老汉带来的是难以减轻的痛苦。他整天心事重重的，发狠地拾石头，垒堤坝。

这一天，老汉正挑起一担石头，从沙滩朝石坝走来，猛然听见一阵自行车链条的响声，抬起头，老八和老九正站在坝头上，冲着他和善地笑着。老汉心里一热，脚下加快了。上了石坝，他扔下挑担儿，拉着他俩的手，朝小瓦房走去。

因为客人到来，老汉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拢起脚底的柴草、杂物，用自扎的扫帚扫了地，嘴里嘟哝着：“真想你俩哩！”

老汉扔下扫帚，一抬头，却见俩朋友背对着他，面朝墙壁，呆呆地站着，那儿墙上，挂着周总理的遗像。当他俩转过身来，老汉看见他们的眼眶里闪着泪花。他再也忍不住，抱住两个朋友的肩膀，哭出声来了。

三个人坐定，揩干了眼泪，相对无言，默默地坐着。

李玉忽然提议说：“给总理献个花儿吧，咱们栽活花。”

“好！”老八说。

“我怎想不到呢！”老汉拍着自己的脑袋，“还是你们知识人……”

三个人出了门，在初春的河滩上，在初发的春草里寻找。老八回来了，捧着一株血红的小花，花朵不过豆粒大。老九回来了，双手掬着一株小白花，顶端只开了一朵，有指甲盖儿大，亭亭玉立。老大老汉回来了，双手握着一撮带着泥土的麦苗。三个人把无名的野花和麦苗栽进小盆里，端放在周总理的遗像下。

夕阳如血，染红了柳树和杨树的枝梢。三个朋友，促膝而坐，畅谈起来。

夜幕笼罩了山原和河滩，小瓦房里响着深沉的声音……

月亮升起来，满天星斗，愤怒的声音从小瓦房冲出来……

月亮落下去，河滩又被黑夜笼罩了，激昂的声音像小河的春汛爆发……

一缕曙光终于从山顶上冒出来……

春天是明媚的，小河边的春天更迷人。一川墨绿的麦苗给人以无限的生机，杨柳绽出一片片鹅黄小叶，两道长堤像两条黄色的绸带紧紧嵌在小河边上。

老八和老九，简直被小河美丽的春色陶醉了。

老远，他们就看见，在他们钓鱼的圆盘上，坐着黑压压一片男女社员，有人站在人堆里讲话，那声音好耳熟，可不就是老大老汉！他俩刚巧走得近了，会也散了，社员们一齐下到稻田里，扎翻起稻地来。

“老大。”李玉忍不住喊。

“老大。”老八扬起胳膊，抡着。

三个人对面跑去，在河堤上抱住了，拍着、摇着、问着、笑着。

正在地里干活的社员，看着这三个人亲热的样子，迷惑不解，有人奇怪地大声问：“吶俩人咋把咱支书叫老大哩？”

老汉笑着，对俩朋友说：“现时不能叫老大啰，平了反了！”

两人盯着老汉，像是问：平反连名号也平啊?

“在我那门子里，我为五。”老汉哈哈笑着，“你们不是老八、老九地叫吗？按这排行，我那阵儿算老大嘛！”

俩朋友听了，恍然大悟，又一齐拉着老汉的手，拍着老汉的肩膀，摇着、抖着、笑着。

1979年3月 小寨

幸福

从外面回来，门上贴着一张小纸条儿，书云：“叔叔，我爷叫你星期日到我家来。一定要来。”署名是“幸福”。

幸福，是房东的孩子，我前后两次在小杨村驻队，都住在他家。叫我去有什么事呢?

俟到周日，我出城去，来到阔别四年的菜区农村——小杨村。

走进北巷口，那幢熟识的砖腿门楼下，男人女人，出出进进。小院里，搭着席棚，几把菜刀同时剁出杂乱而和谐的音乐，油锅里不断地发出爆响。烧水的，洗菜的，担水的，打诨的……喜庆的气氛洋溢在人们的话语中，轻快的脚步上，小院的空气里——是给幸福订媳妇吧?

熟悉的人和我嘻嘻哈哈打招呼，房东杨大叔跑出来，瘦长条脸上的每一条皱纹里，都流动着欢悦的浪花，说：“咱幸福考上大学咧！”

噢，这事！实在可喜可贺。

“叔！”幸福从外面进来了，脸上泛着红晕，腼腆地笑着，悄声抱怨说：“你看我爷张罗大不大？弄这号事……”

瞧着爷孙俩快活的神色，我却追寻起记忆中的幸福的影子……

四年前初冬的一天，我受公司派遣，带着铺盖行李来到小杨村，队长宝全仍然把我安顿在幸福家。前年，我在这里住过俩月，一切都

是熟悉的。幸福奶从上房走出来，拍打着衣襟，慈祥地笑了。

“幸福呢？”我问。

“你还记得他！”大婶喜悦的眼光里掠过一丝不易觉察的难受神色，说，“吆车送菜去了。”

“他会吆车？”我不由一愣，难得料到，“他怎么会吆车呢？”

记得我头一次住进这个家里，十五六岁的幸福正读中学，长得细条条个儿，额前扑着一绺黄黄的头发，见了我，羞怯地低着头，转过身，跑到他住的厦房里去。

我住在厦房南间，和幸福是隔墙邻居，两个小门并开着，距离不过三米。住过半个多月，幸福从来没有跷过我的门槛。有时从我门口过，连朝这边看一眼也不看。

这一天，他却破例走进我的房子。我赶紧站起，招呼这位稀罕的邻居。

他顺炕站着，问我：“你过去念过的中学课本还在不在？”

“唔，说不定。”我毫无准备，又怕他失望，“大约还在，不会全的……”

“你礼拜天回去，给我捎来。”他说，“听说老课本深，我想试试。”

我打了几本残存的数理书，带给幸福。每当我夜晚从村里回来，总看见邻居窗上亮着灯光。

这期间，和社员们混熟了，我常常听见村里人说到幸福的聪明，有些事，甚至被文化不高的庄稼人传说得带上了神奇的色彩。我半信半疑，终于看见了一个奇妙的景象。

这天，队里买回当月的粮食来（蔬菜队由国家粮店供应口粮），正好是个星期天。会计把幸福叫走了。在仓库门口，摆着一台磅秤，围着一堆夹着口袋准备分粮的男女社员，翻捣粮食的尘土呛人嗓鼻。中年会计坐在桌子旁，一手提着笔，一手打算盘。幸福坐在会计旁边，袖着的双手搭在桌沿上。会计念过一户社员的人数（按五级定量，人数折合后有整有零），就急急忙忙拨拉算盘珠儿。幸福听到会计念出的人数，薄薄的嘴唇嗫嚅一下，就侧过脸报出一个数字。会计和他算盘珠儿的数字一对照，没错，就给过磅的社员大声呼报……我看呆了。

他怎么会赶大车呢？他那细条条个头儿，比姑娘还腼腆、还柔静的样子，说话像蚊子一样的细声，怎么呵斥、驾驶那些活蹦乱跳的骡马二骡子呢?

“这娃野了！谁也管不下！”大婶心事烦怨地说，“你先收拾住处吧。闲了，细细说。”

这天晚上，大队里开完会，我和宝全队长拾伴往回走。半圆的月亮贴在南原上空灰蓝的天上，蒙蒙月光洒在街巷里，一股淡淡的香味弥漫在清冷的空气中，直冲鼻膜儿。宝全蹙蹙鼻子，哈哈笑着转过头，说：“这几个崽娃子，又煮狗肉哩！你闻，多香！”

宝全告诉我，一伙小伙子，夜里常常到外村去，把人家的狗哄出村，在野地河滩打死，剥扒了皮毛，拿回来在牛犊家里煮吃，是几个

拜把子兄弟哩！派出所当成什么集团查问过几次，没查出什么案件，也就算了，指令他们再不许打狗聚餐。今天晚上，大约又从什么地方弄到手一只狗吧。

“走！尝一块狗肉去！”宝全说。

我未必想吃狗肉，却被一种好奇心驱使着，跟着宝全去了。

出了北巷，有一个独庄孤园，我跟宝全走进门，一眼瞧见靠墙的一张方桌上，摆着一只大瓷盆，半截狗腿苫在盆外，桌上，锅台上，地上，随处乱扔着啃剩的骨头，几个青年围着桌子，撕嚼着狗肉，大声谝着。看见宝全，牛犊并不畏怯，嘻嘻笑着：“队长，算你运气好，还有一条腿……”及至看见有生人跟在队长后头，他也并不在乎——经见过警察讯问的人，怕我一个蔬菜公司临时派来收储冬菜的“萝卜白菜司令”干什么！

这是个长得十分蛮势的青年。那双浑黄不清的眼仁，像榨干了油的棉籽儿，灰暗、死板而无灵光。他得意扬扬地给宝全队长学说，今天送菜路上，他怎样捉弄刚从陕北山区招来的新警察。我却一眼瞅见靠墙坐着的幸福，心里一震。

幸福侧身对着我，故意低着头。我叫了一声，他“嗯”了一下算是应声，并不看我。短暂的难堪之后，幸福就又伸手撕下一块狗肉，附和着牛犊得意的述说，轻狂地笑着。他的眼里腼腆、羞怯甚至有点像女孩子般妩媚的神色早已退净，一股野气蛮势在那长长的黑睫毛上浮游，头发蓬乱，衣裤邋遢。这哪是我记忆中的可爱的幸福，分明是牛犊的“哥儿们”了。他抓着骨头的一端，脖子一歪一拧，啃嚼着那煮得半生不熟的狗肉……

我和幸福一路回来，一进门，他懒散地靠在被卷上，狠劲吸着烟，躲闪着我困惑的眼光。

说话别扭极了。我问一句，他回答俩字；不问，他就一个字也不说。

“今天出车来？”

“嗯！”

“给哪儿送菜？”

“解放路。”

“啥时间回来？”

“天麻麻黑。”

他脸上很疲惫，很烦厌，似乎希望我快点走开。我偏接上一支烟，把烟盒摆在桌子上，做出一副下榻的姿势。我用时间和忍耐，终于打开了幸福的嘴巴……

幸福，是在筹办农业社的热火年月里来到小杨村的天地里的。受了半辈子苦的爷爷，给新生的孙子起了个带着时代色彩的名字——幸福。办社工作组白天黑夜抓紧时机向农民讲述农业实现合作化以后的幸福生活图景哩！哈，幸福！

幸福是在农业社的菜园里长大的。爷爷终日在苗圃里，吃饭才回家。和爷爷一块务菜的无勤叔，孩子多，把他的二女子引娣领在菜园里。两个孩子在菜地里捉虫扑蝶，揉泥做饭，移花栽木；夏天的夜晚

躺在门外的苇席上，数着天上的星星。少年时代的生活是这样天真烂漫，友谊是这样珍贵……

及至坐到高中班教室里的时候，俩娃的兴趣和爱好明显地发生了偏转，性格也各朝着一端发展。幸福的两只眼睛越长越大，越长越深，眉骨高高地突出来了，在腼腆羞怯中，更增加了一层深沉思索的神色。他对数理课发生了难以遏制的兴趣，话语越来越少了。引娣已经出脱成一个漂亮的姑娘，红润润的圆脸，两只明亮逼人的眼睛，泼辣，开朗，嘴巴利索，当着班团支部书记。在接收学习委员杨幸福入团前夕，引娣代表团支部很认真地指出：防止白专！幸福很害怕“白专”俩字，表示要向引娣学习。可是，一当人多的时候，他说话就结结巴巴，特别是讨论会上，大家都重复报纸上的说法，他有一种无法克制的厌烦情绪在心里翻搅，免言了。

将近毕业的时候，两个孩子中间发生了一场争执。放学以后，引娣发现不见幸福的人影，匆匆回到家，从锅里端出妈妈留给她的饭食，穿过上工后空无闲人的街巷，推开了幸福家虚掩的街门，喊：“幸福！”

幸福从厦房里出来了。

“会没开完，你就开小差咧？”

“唔！”幸福躲开引娣咄咄逼人的好看的眼睛，支吾一声，表示承认，“嗯！”

引娣坐在院中的石墩上，一边吃，一边问：“你看我下午的发言，下边反应怎样？”

“嗯……”幸福嚅嗫嚅嗫嘴唇，没说出话。

引娣这才看出幸福脸色烦恼，眼眉和嘴角有一丝反感的气色，她问：“你怎咧？”

幸福走下台阶，坐到石桌的另一侧，鼓起了勇气，诚恳地说：“你以后少出点风头吧……”

“啥，你说啥？”引娣吃惊地打断幸福的话，“什么‘出风头’？”

“就是，那些昧良心的话，别人爱说说去！”幸福肯定地说，而且更诚恳了，“你在台上发言，同学们在台下议论，砸洋炮！”

“是这样啊！”引娣明白了，激动地说：“你也认为我是‘出风头’，说‘昧良心’话？”

“我现在怀疑，世界上到底有没有真理？真理是客观的，还是由人随便解释、胡说？”幸福也激动了，赤红着脸，争持说，“明明考试得了零蛋，狗屁不懂，偏要吹成英雄！这样的话，还办学校干什么？没有知识最光荣，最革命……”

“你疯咧？”引娣吃惊地禁斥，“你说的什么话？回潮言论！”

“我相信事实！”幸福说，“看看我们班吧！有几个人认真演习题，写作文？三分之一的同学根本连书包也不背，难道……”

“我相信党！”引娣表明自己的立场，“别忘了你是个共青团员！”

“共青团员才应该尊重事实！”

“我不尊重事实？”

“反正我不给‘零蛋’唱赞歌！”

争论到此，变成短兵相接，一人一句，你来我往。幸福奶从屋里出来了，站在俩人中间，慈祥地笑着，嗔怒地斥责幸福，给引娣说好话：“你看你，平时想从你嘴里掏句话，比淘金还难，和娣娣吵架，嘴倒不松火……”

两个青年都窝了火，不欢而散。

不久，他们毕业了，一同回到小杨村，那次不愉快的争吵所产生的别扭，为新的生活环境冲淡了……

农村的生活是与学校完全不同的一种方式，单调些，却更实在些。幸福似乎适应得极快，他干活踏实，宝全队长很喜欢他，常常临时指定他负责某一项少数人做的单线活路；不用说，会计常常拉他去清理工分账和现金账；大队和小队的电工向宝全队长点名叫幸福去拉下手，简直成了个小能人、小忙人。引娣在这些事上插不上手，自然地似乎是顺理成章地进了大队广播站，利用农村三顿饭时间和睡觉之前，向农民播送报纸上的文章，有时夹着自己组织采写的本大队的通讯。时间不长，引娣认真、热情的宣传却招来糟糕的后果，社员们讨厌广播，甚至有人对引娣高昂的嗓音也砸刮起来。幸福听到这些话时，常常替引娣难为情，又不好向引娣说。

秋收以后，村里来了路线教育工作队，引娣很快被工作队吸收为积极分子。这似乎还是顺理成章的事。她整天参加会议，学习班，在各种会议上代表贫下中农发言，表态，批判。简直比党支部书记还忙。她在工作组做出批判定额管理的决定时，带头写大字报批判宝全队长的“工分挂帅主义”，气得人人赞成的好队长宝全几乎撂了挑子。

在工作组里，引娣的印象越来越好；在社员当中，人们在背地里开始用难听话骂起来了。有人掐着指头算，还得几年她才能出嫁，那时就该安生啰！等等。幸福的耳朵塞满了这些不三不四的话，下决心和她谈一回，能听进去好，听不进去让她知道一些群众的反映也好！他瞅了几次机会，都不行：引娣忙得很，忙得没一点儿缝缝儿。

这天晚上，已经很晚了，引娣突然来到幸福家。她的脸红腾腾的，眼里是难以抑制的激情，兴奋地说："我入党咧！刚开完支部会。"

"啊！"幸福吃了一惊，言不由衷，"这么快？"

引娣自豪地笑着："咱俩的争论，现在该做结论了！"

幸福脑子乱了，躲开引娣的眼睛，什么话也说不出来。引娣入党了——事实，把小伙儿的嘴堵死了。天，我还想劝人家呢！

引娣瞧着他的桌子上、炕头上乱纷纷的演草纸，吃惊而轻率地问："你还演这些题做啥？"

是啊，演这些东西能干什么呢？他陷入一种极度的困惑里。他的数学爱好者的严密思维解释不清他和引娣的是非了：谁对？他彻底抛开干部和社员对他的赞扬不想，自己觉得回农村来是实心实意的，无论怎么苦累的农活，没躲避过，也没偷懒过！无论会计、电工什么时候叫他帮什么忙，随叫随走，从没计较过工分！平心而论，他是倾其所有的能力和精力去工作的！引娣呢？群众议论纷纷，什么"小杨村的脱产干部"咧！"嘴上比手上功夫深"咧！等等。是社员群众，包括自己思想落后，看不惯新生事物呢，还是引娣跟着韩主任跑不得人心？前

一向，他是肯定后者的，所以总想给引娣提醒提醒。现在，引娣却入党了。入党，这是何等严肃的人生大事啊！啊……他的脑子乱了。

引娣说：“大队决定建立科研站，让你参加，把你的知识才能发挥出来吧！”

幸福进了科研站。引娣任站长，成员是包括他爷在内的几位老农，纯一色的务实派，并不保守，更没有偷懒人和勤劳人之间的矛盾，少有是非之争；技术上的争执不少见，可不介入人事，吵过算了。站长引娣的社会活动特别多，隔上七八天来一次，看看就走了。渐渐地，幸福的心全被蔬菜栽培上严格的技术措施和有趣的生态现象迷住了！

眨眼到了春天，试验站采取新式育苗法取得成功，夏菜苗儿生长健壮极了。工作队队长韩副主任在苗圃转了一圈，高兴得很，决定马上在小杨村召开现场会。

现场会结束了，被推广的科研站里却第一次出现了混乱，沮丧的气氛简直令人寒心。

话头是由直筒子王三引起的。他没开完会，就进了小房子，往炕上一躺，长吁短叹，及至会散，其他成员进来，他一骨碌爬起，摔摔掼掼：“啥是个礼（理）？六个糕子！”

大家瞧瞧他，没人吭声。

王三又喊：“俺不分黑明，受苦受累全没说起！反倒成了只拉车不看路的瞎子？”

幸福心里明白，在引娣和韩主任的讲话中，都说科研站有只搞业务、不抓路线的倾向，是他们及时纠正了这种修正主义的科研路线，才取得了今天的成绩。并且警告其他大队在搞科研站的时候，一定要与只抓业务的倾向“斗”！幸福当时也觉得这话说得太夯口，想不到直筒子王三简直受不了，动这大气。

精明的育苗土专家景文老汉也随着说：“引娣娃太狂了！从头到尾在站上能来几回？俺不说你，你倒批评俺……”

“她就给墙上贴了一条标语——路线是个纲。”

“她懂不懂籽儿怎样下，苗子怎样移？”

“说大话不费力，说假话不脸红！”

议论是一致的。王三更进一步发牢骚：“我不干了，叫‘会看路’的来……”

“出力不讨好，倒挨挫！”

幸福难受得抬不起头！他替引娣脸烧！这时间，他思想上早先混乱的问题清楚了：入党这事本身不能给他俩争执的问题做结论。正是因为这样，他替引娣难受！

幸福爷这时候开了腔：“哎，伙计们，咱科研站是干啥的！？为了务好菜！多增产，多收入，和谁憋气呀！你不搞，菜苗育不好，队里分不下钱，你婆娘娃受难场，后悔就迟咧！”

这一席话，结实的程度，使发牢骚的人都一下子消了气，不好意思地笑了。直筒子王三也点头说道：“话是实话！事情叫人气不顺！”

路线教育工作队撤离前，宣布了三结合的领导班子，引娣当了小杨村党支部副书记。韩主任带领工作队离开小杨村以后，干部、社员、老人、娃娃都长长地舒了一口气，开会开得没有“坐功”的庄稼人实在受不了了……

小杨村又恢复了安宁。引娣却感到无所事事了。韩主任临走时安排的一周三次学习，两次批判等等写到墙上的条文，老支书似乎一夜之间忘光了，其他几个委员也好像记性更坏！引娣向支书提过几回，似乎没引起多大重视。引娣难受了，脸上的气色阴沉了，脚步也蹦得慢了！幸福看得出来，这是他该同她谈知心话的最好时机了。

月亮从柳林背后升起来，河水在月亮下粼粼闪光，空气中有返青麦苗的清香。

“我现在才知道，农村干部不好当！”引娣说。

“怎咧？”幸福问。

“咱年轻，谁也不听咱的！人都不服年轻人！”

“不一定！”幸福说，“老支书土改那阵二十出头，合作化也不过二十五六，听说众人都服！”

这是事实，引娣不吭气了。

“值得思量！”幸福说，很诚恳，又很亲切，“我看你说得多，做得少，浮了点！农村人最讨厌只说不做的人，倒不在年轻年老。吉祥叔倒老，他当副大队长说话也没人听。他懒！”

引娣委屈地说：“我不想省力！工作队成天叫开会，我不开咋办？”

幸福感觉引娣还在为自己找遁词，还没有意识到她脱离社员的原因，就直接说：“说话做事，要脚踏实地，话说到社员心上，事能办到人心上，人保险听你的！像老支书，不说空话，不说大话！你想想……”

“老支书，没斗争性！跟不上趟！”引娣说，“光会抓生产，韩主任批评过多回……”

“老支书没斗争性？土改是谁领着贫雇农斗地主的？合作化是谁办起来的？”幸福说，“你听韩主任胡扯！”

“说他现在！”引娣说。

“现在？现在他比你斗争性强！”幸福说，“他对韩主任那一套，软磨硬顶，故意拖拉！社员们都看得清，更信服他！你听韩主任那一套，跟着跑，社员才不听你的！大人碎娃都讨厌那个韩主任……”

“唔……”引娣沉默了。

“我现在又要说，不管啥时候，脚踏实地！甭说昧良心的话！谁爱说谁说，咱不说！”幸福说，“看社员平时不言传，心里清白着哩！”

“你还说我昧着良心说话？”引娣说。

“我说你当了干部，更要注意！”幸福缓和一步。

谈到月亮西沉，引娣仍然认为她是在“坚持斗争”，不是说“昧良心的话”，却也接受了幸福的部分忠告，要少说话多做事，特别是参加生产劳动。交谈是平心静气的，幸福又不是那种好强的人，觉得引娣能部分接受他的劝告，很不错了。这次谈话以后，俩娃的接触又多起来，他们都不愿意再提起过去的争论，谁都清楚那是一个随时都会引起不愉快结局的导火索，都在躲避触动它！

一年一度的大学招生开始，经过许多繁杂的形式，大队里要在幸福和引娣之中定一名，再报公社。

“怎办？”引娣笑着对幸福说，“要不要打一场？”

幸福能听出引娣在说笑话，挖苦有些村子为争着上大学打架闹仗的丑恶现象。他也笑笑，说，“要是打架，我可占便宜！”

“那不见得！”引娣伸着结实的拳头，“你，别忘了自个儿的外号！”

幸福脸红了。村里人见他寡言少语，举止拘谨，叔婶嫂子们耍笑中把他叫“姑娘”哩。

“没啥！”幸福诚恳地说，“谁去都一样！”

“对！”引娣说，“咱俩之间，争没意思！”说完，脸红了，妩媚地瞧了幸福一眼。

幸福腾地大红了脸——“咱俩”二字，那么亲昵，像带着电波，使小伙儿正常的脉搏紊乱了。

从大队初次传出的消息是，因为引娣扯三结合的班子，老支书征求了公社意见，果然，原驻小杨村工作队队长韩主任不同意拆散他苦心搭起的三结合班子，引娣不宜走，定下了幸福。

第二天傍黑，韩主任又来到小杨村，亲自坐镇支委会，改变了主意。于是第二天又传出确凿消息：重新定下了引娣。

两天内变换人选的消息，在小杨村引起种种议论和猜测，那些打赌认为幸福根本去不了的人一下子气壮起来："看看，我早说过，幸福是牛犊儿跟着骡驹儿蹦——非窝了腿不解——你看咋着！"甚至有人窃窃私议，说在定下幸福后，引娣急了，跑到公社，搬来了韩主任云云。

幸福想，不管村里人怎么议论，两人只能有一个人高兴，引娣现在的政治条件比他强！在跨越公社最后一道关口时比他好办多了！再说，"咱俩"，谁去不都一样吗?

引娣果然被公社选定了。

临上学时，公社举行了欢送大会。幸福怀着热切祝福的心情参加了欢送大会，欢送他自幼相好的同学上大学。幸福挤在人堆里，看韩主任给三个大学生戴花。锣鼓、鞭炮震得人耳麻。之后，韩主任代表公社党委讲话。他一边读着稿子，一边添加着临时想起的发挥的话。幸福听着，听着，猛然看见韩主任一手扬着讲稿，一边说：

"有的青年回到农村，自己不积极参加路线斗争，对进步的同志看不惯，把参加革命大批判说成是'昧良心''出风头'……这样的人，我看他一百年也上不了大学……"

我的天，像一盆凉水迎面浇来，幸福从头冷到心！大伏天的露天会场，不停流着汗水的毛孔一齐关闭；手发抖，头发晕；讲台上空的红旗、横幅，戴着花的引娣，挥着手讲话的韩主任都在他眼前旋转，像儿时看见变幻无穷的万花筒一样。有如染上突发的霍乱，小伙子冷得打颤了。

从公社到小杨村这一段路，幸福也记不清是怎么走回来的，他躺在炕上，不吃，不喝，不说话。

奶奶劝："娃嫑难受。引娣今年去，你明年……"

幸福烦躁地对奶奶摆摆手，翻过身，给奶奶个脊梁。

爷爷劝："你和娣娣事先说得好好，'谁去都一样'咯。这阵怎……"

幸福鼻腔里憎恶地"哼"了一声。

党支书刘大伯来了，坐在炕边上只管一锅接一锅抽烟，并不劝解，坐了半晌，意味深长地问："福娃，大伯问你：上大学要紧，还是人格要紧？嗯？叫我说，人格要紧。"

两位老人听不懂党支书的话，发着蒙。

幸福却一骨碌坐起，抱住刘大伯的肩膀，眼泪流下来了。一句话，证实了他的纷乱的猜测，引娣把他俩的争论当作动态告发给韩主任了，这是韩主任最后决定不惜拆散他亲手搭成的三结合班子而改变打算的原因。太可怕了！

夜色笼罩着河滩，蒙蒙月光下，雄伟的防洪大堤变得低矮可笑，流水令人心烦地呜咽，山岭的轮廓更显得丑陋而又阴森，夜色改变了一切美好的事物的面目，幸福徘徊在河滩上。

一阵狂野的说话声从河滩上传来，是牛犊一伙又捕获了猎物凯旋了。

“幸福！”牛犊喊着跑过来，“走！难受啥哩！我早把世事看透咧——‘灵熊哄笨熊，还怪笨熊不灵醒！’当今就是这世事！走，到咱屋谝去！管他妈天塌地崩哩！”

几个人连推带拽，幸福来到了牛犊的孤园。

几次狗肉下肚，幸福奇怪地想：村里人都骂牛犊瞎，规劝自己的子弟不要和他粘，自己以往也和牛犊少有来往，现在呢？我看牛犊还罢咧！他讲义气！比之那些在关键时刻不惜友情，把对方当作垫脚石而跳进理想大门的人，牛犊算得高尚的人哩！

幸福在科研站小小的土围墙里待不住了，终于获得宝全队长的允诺，跟牛犊的屁股赶大车去了。三挂马车，六个青年，进城送菜拉稀粪，“离地二尺活神仙”！夜晚杀狗聚餐，打拳练武……

杨大叔和大婶只怕孙孙变瞎了，自己劝，把亲戚友人请来劝，又请党支书来指教，似乎全没有效果。我这次来，自然也要我开导开导，我感到无力。当社会把成批人推向毁灭的时候，家庭和个人的挽救，显得多么无力和困难！

……

从已逝的回忆回到现实，对面是喜气盈盈的大叔和大婶的笑脸。一切都无需解释，今天的喜庆局面是很自然的。

一阵胡弦响，我一回头，牛犊和几个青年走进院子，有的提着板胡，有的拿着鞭鼓、梆子。看架势，是要尽兴唱“乱弹”了。

牛犊看见我，嘻嘻哈哈说：“啊呀，你的鼻子真灵！从城里也闻见这儿的香味咧？”

“我闻见狗肉咧！”我打趣逗他。

“你闻不见了。我已经把‘狗肉铺子’的门关啰！”牛犊做个鬼脸，笑着说。

一庭院的男女老少哄笑起来。

鞭鼓急雨般敲打起来，梆子也砸出清脆的响声，板胡手和二胡手在调弦，被众人哄哄着推举出来的唱者在清嗓子……

我却不由得问幸福：“再没见到引娣吗？”

幸福迟疑一下，眼里掠过一缕痛苦的阴云，叹口气，摇摇头，又苦笑了一下，求饶似的瞧着我。我后悔自己问糟了。

大叔抻抻我的胳膊，说：“甭说哩！听戏吧！”

好！听小杨村自乐班的“乱弹”吧！

1979年4月 小寨

徐家园三老汉

农谚说:“大寒将完，菜籽下田。”

节令是农业生产无声的命令，蔬菜种植显得尤其当紧。

蔬菜生产专业队徐家园，在大寒节令到来的时候，准备务育夏菜苗儿的苗圃全部修整就绪，一方一方苗圃的矮墙上，重新抹上了麦秸泥皮，按在木格上的大块玻璃明光闪闪，圃床里铺上了由马粪、鸡粪和人粪混合的营养土，只等下籽了。

苗圃二人小组组长徐长林老汉，傍晚时，冒着三九寒风，骑着车子回到苗圃，进了土围墙的圆洞门，解下衣架上的白布袋，推开三间瓦房的木门，脚步利索得简直像个小伙子。

门里好暖和呀！无烟煤炉子上火苗呼呼直蹿，他的唯一的组员黑山老汉，正蹲在火炉旁淘洗着菜籽，那么认真，真是个实在人哩！不管组长在不在，他该做啥活就做啥活儿，不要人指拨，绝不会偷懒。长林老汉瞧着组员的黑四方脸，亲昵地说:“伙计，事办成咧！咱想试办的那几样菜籽儿，种子站都给咱解决咧！”

“那就好！”黑山笑着，诚恳地关心组长，“快，先到火炉跟前来，今日冷得很。”

长林放下装着新品种菜籽儿的布袋走到火炉边，摘下棉手套儿烤火。火苗映着他冻得红红的瘦码条脸，格外精神。他问:“‘矮秆早’番茄籽儿冒芽咧没？”

黑山高兴地答道：“冒咧！”

“冒咧好！”长林老汉语气里带一股热火火的劲头，“明日晌午天气好的话，咱摆籽儿！”

黑山却告诉他：“治安今日一天来了几回，寻你哩！”

“没说有啥事吗？”

“没！”黑山冷冷地说，“你知道，那人和咱没言儿！”

黑山老汉直杠子脾气，对他信任的组长毫不隐怀，直截了当说出他经过认真思索的猜测：“我看他是想往苗圃里头钻哩！今年蔬菜面积扩大咧，队长群娃前日说过，想给咱苗圃增加一个人，三人务苗。保险是那个灵人逮着风儿了，不信，你看……”

不等黑山把话说完，门外已传来治安本人亲切的问话：“长林哥，回来咧？”随着干散的声调，治安走进门来了。

治安老汉外表完全是一副闲闲散散的神气，随随便便坐在火炉边，对着火苗抽旱烟，大大方方问这问那，一副超然的神态。

长林老汉还是从治安老汉的眼神里看出了意思：不是闲谝的！只是碍于黑山在场，话不好开口罢咧！眼睛瞒不过人。

好一阵东拉西扯的闲谈，长林有点不耐烦，直接把话提出来：“听说你今日寻了我几回，啥事呀？”

“没啥事喀！没！”治安说着，瞟一眼黑山，“我随便转来苗圃，看看收拾准备得咋样，节令不饶人呀！这关乎明年一料夏菜，社员半年

收入，全看苗苗……”

黑山站起来，不吭声走出去了。他看出治安是碍于他在当面，不好开口，自动腾了地方，让人家畅畅快快和组长说话。长林老汉心里完全明白直杠子黑山举动的含义。

果然，黑山一出门，治安老汉那派超然姿势没有了，用很小心的声调打探：“老哥，听说苗圃上要添个人？”

长林心里暗暗叹服，黑山猜测得准！他装作不在意地说：“群娃有过这话，我给他说，春里事多活杂，劳力紧，苗圃上可以不添人！”

“你这老哥可想差池咧！省劳省工要会省，关键的弦口不敢省！”治安大加反对，精明地讲起苗圃应该添人的道理，“苗圃，啥地方？关键的弦口……”

“不怎不怎！”长林轻松地笑着，表示问题并没有那么严重，“我思谋来，我跟黑山脚手忙点，能支应下来。”

治安有点失望，掩饰不住灵活的大眼珠里灰暗的神色，又不甘心地问：“队长怎说？也不想添人咧？”

“队长还没吐核儿！”长林笑着说。

“看看看！还是人家干部想得周到，不像你老哥好强！”治安大声说，希望之光使他的眼睛又明亮起来，“今年扩大蔬菜面积成百亩，不是小事哩！这大的家业，怕多摊一个人的工分，把你和黑山累死图啥！”

说是表扬队长，其实连他俩也都捎带上了，多会说话的人呀！这会儿，他是哪个人都不敢伤害，够灵醒的啰！长林老汉瞅着治安，抿着嘴笑，淡淡地说：“其实，蔬菜面积扩大咧，大田里更费人手，劳力确实紧。”

治安沉吟一下，终于问：“不知队长把人定下没？”

“不知道。”

“嗨！”治安吁叹一声，脸上现出难受的样子，“不是兄弟今日拜在你门下，咱有这点技术，真个还带到黄土里去呀？前几年乱糟糟，如今世事大治咧！咱也想挽一挽袖子哩！”

“好么！好么！”长林老汉说，“你的技术确实不错！”

“不是我吹！”治安来了劲，“咱徐家园，除了你老哥，咱谁也不服他谁！要不是你老哥在这儿，我还不想来哩！”说着吹着，自觉说溜了嘴，又莞尔一笑，勉强地说起光面子话，“黑山老汉倒也实诚，就是脾气倔，难共事！这也没啥！”

几年前，长林老汉被抽到大队兴办的试验站去了，徐治安在小队苗圃里主事。友群队长给治安又派了个帮手黑山。大家都看见，花白头发的治安老汉穿着洗得干干净净的衣服，白褂灰裤儿，过早地蓄起一撮花白相间的短胡须，经常坐在苗圃井边的柳荫下，捏着三尺长的长管子旱烟袋，优哉游哉地纳凉。黑山老汉撅着屁股，浇水呀，施肥呀，忙得丢鞋遗帽子。治安老汉只是指拨他做完什么，下来再做什么。黑山老汉并不在乎，他抱定一条“不能白挣队里的工分”的主意，不管组长怎样，自己该做啥还做啥！他又管不了治安，人家是组长，技术也比他高，况且，社员们的纷纷议论倒使黑山心里踏实：咱对集

体事情要实心，社员有眼！只是那年发生了把芥菜籽儿当作白菜籽儿下进大田的荒唐事以后，问题白热化了。笑话传遍公社十里菜区，徐家园社员的议论和非难就更不用说了。友群队长一怒之下，挥起长胳膊：“避避避避避！避远！”治安老汉灰溜溜被撤出了苗圃。友群硬从大队长手里把长林老汉从大队试验站拉了回来，推进大队的苗圃。治安老汉好难为情啊！要是把黑山和他一起撤，他似乎面子上好受点；留下黑山，就是把责任全部压到他花白头发的脑袋上了喀！

一个有能耐不好好给集体办事的人，比之能耐不大或根本没有什么能耐的人，在队里似乎更被社员所瞧不起。在务菜技术上，人说徐家园有“俩半能人”，徐长林和徐治安，黑山只算半个。徐长林老汉，那是有口皆碑的。而徐治安老汉，一旦失去了菜农们敬重的苗圃那个位置，干起和普通社员一样的粗杂农活，就更显得不及一般社员勤快实诚了。他掏掏腾腾干那些出力少而工分多的活路，特别是在队上试行政治评工的那一年时间里，他成了众人背地里砸泡的闲话资料，有人说他是“四头”社员：上工走后头，放工抢前头，干活看日头，评工要舌头。几年来，老汉的威信一天不如一天，一年更比一年糟，“懒熊”“奸老汉”的绰号，几乎代替了他的名字。

现在，徐治安正式向他提出想进苗圃的要求。不用说，也能猜想黑山是啥态度！友群队长那一关都不好办，想想，他说：“这事得由队长定点！”

“我听说，队长叫你选人哩！说你看中谁，和谁能干在一搭，他就派谁！”治安说。

长林笑了。治安把什么都打听到了！他又反来一想，收下他又怎样，他无非是身懒，贪工分，自私；自己再把他往远推，那么，治安

在徐家园的处境就很困难了。他给治安畅畅快快地说：“是这，我把我的意思说给友群，问题不大！”

“老弟绝不给你丢脸！”治安拍着胸脯，“叫徐家园人看看，我徐治安是不是熊包！”

望着徐治安老汉的背影从圆洞门消失以后，徐长林折回身来。同样关心治安能不能进苗圃的黑山很快进了房子：“咋样？我估的不外吧？”

长林老汉用点头表示黑山估对了，随之探问道：“你说这事咋办呀？”

“我？”黑山听出长林的话有意思，倔豆儿脾气暴出来，“要问我，咱有话说响：他今日进，我明日出！就是这话。”

“呃呃呃！哪能这样呢！”长林笑着，“这人这几年在队里，把威望丢净咧！咱再不理识他，他怎办呢？他总有些技术哩！”

“我眼窝里搁不住要奸取巧的角色！”

“有咱俩拽着他干，不怕！”

“你不怕，我怕，我尝过辣子辣！”

“咱想法帮他治懒病，变个好社员！”

“我只能保证我给队里好好干！”黑山说，“想改变治安？我没那本事！我还是那句话：他今日来，我明日走……”

话说到此，简直说绝了。可是大大出乎长林老汉意料的是，仅仅过了一夜，第二天早上，黑山来到苗圃的头一句话就是：“治安那事，你同意，就让他来，我不反对。”

长林扑闪着眼睛，瞧着黑山多少有点为难的黑四方脸，黑串脸胡须，这个从来不会骚怪卖谎的实诚社员，怎么一夜之间完全改变了态度?

“昨日黑夜，治安到我屋，说……”

噢噢！长林明白了，有两片薄嘴唇、精通世事的徐治安，说服一个实心眼的黑山，能费多少唾沫儿呢！

……

队长友群一听长林选中了治安，中年人的有棱有角的四方脸吃惊不小！眼睛睁到额颅上去了：“啊呀，我的老叔呀，你怎选中了个这?噢呀！你老叔眼里真有水！”他常和长林老汉耍笑，说话向来随随便便。

长林早有所料，对他不像对黑山那么客气，慢慢地从嘴里拔出旱烟袋嘴子，说：“他在苗圃偷懒，你把他撤了；在大田锄草锄不净，你扣了他的工分；犁地犁得粗，你把牛牵走了……撤来换去，徐治安还是徐治安；这包袱扔到哪达，哪达就鼓出个疙瘩。堂堂队长，共产党员，把一个自私老汉改变不好，你不觉得自个儿也是个窝囊废吗? ”

“啊呀，倒怪我咧? ”友群咋呼说，口气却软了，“好，但愿再别种出遍地的芥菜儿来！但愿在苗圃里能修行出个勤老汉来！谢天谢地！”

徐治安老汉进苗圃了。

三个老汉头一次坐在火炉旁议事，商量当天的活路安排。老组员和新组员都叫组长分配，保证没有挑轻避重。长林随和地笑着，安置自己和黑山领社员在苗圃摆籽儿，让治安老汉在屋里洗那一盆盆一罐罐正在浸泡催芽的几十号菜籽儿。

分毕，黑山没吭声，治安老汉却说了："长林哥，籽儿一直是德山务弄（他当面不叫黑山，表示尊重），他熟悉，还是让我跟社员摆籽儿去！"

长林原想，治安刚来，先要到社员伙儿里去，原因是社员中对徐治安进苗圃有不少风凉话灌进他的耳朵，若是让治安听见不美喀！既然治安这样说，那也好！

长林老汉的担心毕竟是担心，而治安老汉又毕竟是治安老汉。他提着装着冒了芽的各种品种的菜籽儿的瓶瓶罐罐，分配给分散在各个苗圃跟前的男女社员，指点给他们这是什么品种，籽儿入土的深浅，行距和株距的尺码。他特别叮嘱说："别把没芽芽儿的秕皮下进去！下进去就缺一棵苗！缺一棵苗就少收十斤柿子！价值五毛！"

长林正蹲在一个苗圃边，给几个青年男女做出挖沟的示范，听着治安过分的渲染，心里有些好笑：苗圃即使缺一棵苗，往大田移栽决不会少栽一棵喀！超越了事物本来实际的渲染，总是给人某种虚假的感觉。你看治安周围的社员的眼色吧，有的接过籽儿就走开了，什么少收十斤柿子的话，没那回事；有的传递着戏谑的目光。有个小伙子故作严肃，说："治安叔，你可瞅准，别把芥菜籽儿发给俺噢！咱不是芥菜专业队……"嘻嘻哈哈的笑声从这边传到那边，治安脸红了。长林立即立起，狠那青年一句："小伙子，揭人不揭短！"大伙看看长林，悄声了。

长林脑子思量，论生产技术，说话办事，以至长相穿戴，治安比黑山哪一样都不差池！倔得像个蹦豆儿，说一句气话能冲倒人的黑山，就是一样好：对集体实诚。不管干部在不在场，蔬菜技术怎么要求他就怎么做，要求深翻一尺，绝不翻到八寸，该挖三镢头绝不少挖一镢头，集体劳动态度好，就获得大人、碎娃的敬重，谁要是和这个倔豆老汉说话，还得特别掂掂话语的分量。可是对治安老汉，什么难听的话尽可以敞开说，不怕他和他的家人听见。自打治安老汉穿戴周正的身影一出现在苗圃，村里的风凉话就扑过来，人们一致的猜测是，队里实行定额管理和作业组制度，奸老汉混不成工分啰！苗圃里的技术员，每天有两分技术工优待！“他瞅见这盘好菜啰！”众人的议论，许是最终解开长林老汉的谜的答案。他却想，即使这样，也没啥！共产党员就是要团结教育人哩嘛！

好在治安并不计较那些不热不冷的风凉话，他认真地要求作务技术。他那轻捷的脚步，干散的声调，那神气，告诉人们，他既内行又负责任，更不怕别人这些闲言碎语。一连几天，都是这样。

“新媳妇三日勤！”黑山不信任地笑笑说。

长林老汉也笑笑，没吭声。

不管怎样，治安对集体事业所表现出的勤劳和责任心总是无可非议的。在整整一周的早菜品种的摆籽阶段，治安老汉一个样儿，来得早，走得迟，该说的就说，该干的就干，谁干错了他还认真地批评哩！苗圃里没人撂杂话了，村巷里也听不到风凉话了。治安老汉用行动粉碎了一切对自己不光彩的议论，有力得很。

黑山老汉嘿嘿笑着，不好意思地向长林老汉承认：他说“新媳妇三日勤”的话撂到空里了。

长林却说：“伙计！还不一定。这是个老媳妇！”

三茬夏菜的种子分期摆进圃床，第一茬早菜已经长得逗人喜爱了，黄瓜和西葫芦的两片肥实的子叶中间，已经抽出一片黄绿色的真叶来，像刚出壳的小鸡，西红柿淡紫色的叶秆上，绣着一层细细的茸毛，再过几天，就要动手分床间苗了。

早饭后，长林到苗圃来上班的时间，拉着辆架子车。治安问：“拉车弄啥？”

长林说：“河湾队捎话来，说订给咱的草苫子弄好了，叫咱去拉。”

“那让小拖拉机跑一趟嘛！”治安说。

“拖拉机正给大田拉粪！”长林说。

“那让队长派社员去嘛！”治安说，“这不属咱苗圃的活路喀！”

“算咧！”长林说，“春耕忙，咱加个紧就把事办咧！”

治安也不再反对。黑山说：“咱俩去！”

俩老汉拉着车子上了路，黑山悄悄告诉长林，说有社员在苗圃干活时，治安一个样儿，没社员在苗圃时，又是一个样儿。这都罢咧，特别是长林老汉几次不在，只留下他和他俩人的时候，治安老汉一晌能坐下吃八回烟！这人就是个这！

“慢慢来！别急！”长林说，“该说的地方要说他哩！”长林为难的是，有他在场时候，治安永是一副勤快的样子，不好说喀。

一场母猪闯进苗圃的风波突然发生了。

温暖的阳光沐浴着隆冬的川道菜区，冻结的地皮消冻了。治安老汉揭去了温床玻璃上的草苫子，阳光下一片白色的玻璃照得人眼花，玻璃内壁的水珠儿挥发以后，一方方绿茵茵的幼苗在阳光下伸胳膊蹬腿儿，欢实极了。

洒水还得等后半晌，治安老汉坐在靠墙的阳光下晒暖暖。长林和黑山拉草苫子去了，留下他一人看守，他觉得浑身的筋骨都松泛了。冬日的阳光照在脸上，那么温柔舒适，被清早的寒风吹得紧紧巴巴的皮肤十分熨帖，治安老汉的眼皮直往一搭挤，简直用柴棍儿也撑不开了……

这当儿，一头母猪用长嘴拱开了圆洞门上虚掩的木栅，进了苗圃。入冬以来，它大约再没尝过嫩草的甘味吧！一片绿色植物馋得它口涎欲滴。这个蠢家伙忽视了那苗儿上面还有一层玻璃，长嘴巴一吞上去，哗啦一声，玻璃打碎了。母猪吓昏了，返身奔逃，猛不防又撞在另一方苗圃的玻璃上，又是哗啦一声，它自己也掉进苗圃里头了，更吓得东闯西奔，最后从另一框玻璃下跃出的时候，这方苗圃的玻璃打碎光了，可爱的西葫芦苗给糟践完了。

当治安老汉惊醒、跃起的时候，母猪已经夹着尾巴窜出门洞了。治安站在不堪收拾的残局面前，双腿发软，眼冒金星，蹲下去起不来了。他本来的名望就不高啊，怎么招得住这样的打击！想掩盖现场也来不及了，圆洞门里拥进一伙闻声而来的社员……

别提徐家园村巷、地头人们怎么砸刮治安老汉了，要多难听有多难听！

长林和黑山把草苫子拉回来的当儿，队长友群已经在苗圃里等得不耐烦了。长林老汉一眼瞧见友群黑煞煞的模样，就预料发生了什么变故。不等他把车子放稳，窝火的队长就拉着老叔的袖子来到遭事的苗圃跟前。

“啊呀！”长林老汉头顶像挨了一闷砖，麻木了。

“咋弄的？！”黑山毛须直竖，手指颤抖。

“猪拱咧！”友群气憋憋地说，“我早说这奸蛋老汉靠不住，你……”

“猪拱苗苗时，他做啥？”长林问。

“睡觉！”友群说，“靠在柴堆上晒暖暖！”

“唉唉唉！”黑山气得拍着大腿，一拧身走了。

“换，换人！”友群说，“给你另换个社员。”

“那当然容易！徐家园那么多社员！”长林说，“治安人呢？”

“他还有脸在这儿露！”友群说，“叫他来，他也没脸来咧！”

看着队长暴躁的样子，长林也生气了：“你先别发躁嘛！事情有事情在，你躁成那样，吃了炸药吗？”

“我躁？今日叫猪拱一方，明日叫羊啃一方，今年这菜还种得成？”友群难受地说，“咱和蔬菜公司订了合同，完不成任务，叫我坐蜡！”

“可你发脾气，糟践的苗子就能长起来？”长林说，“冷静一点，队长！”

……

晚饭后，蒙蒙的月光照着清冷的村巷，寒风吹得树枝刷刷响着。长林老汉袖着手，来到治安老汉的门楼下，屋里传出治安的小儿子拉奏板胡的声音，他听出那是秦腔曲调中的苦音慢板。当他跷脚踏过门槛的时候，猛听见治安烦躁地呵斥儿子的吼声：“咯吱啥哩！爱拉，到河滩拉去！”儿子在对面房里顶撞：“你做下丢人事，怪我拉胡琴儿！”

长林老汉想笑，进了门。

对峙面六间厦房，收拾得干净利落，由于人事不婵，平时少有乡党来此串门拉闲话。治安老汉坐在炕上，背靠墙壁，脸上无精打采，见了长林进来，倒显出又惊又愧的样子。治安老伴又是倒茶，又是递烟，手脚都慌慌乱乱。

长林坐在炕边，随随和和地问：“你后晌咋没上工？”

“上工？”治安一愣，愧悔地说，“我……没脸……去咧！”

“噢呀！你的脸皮倒这样薄呀！”长林说笑，“明天先上工！”

“唉，我……对不住……你老哥！”

“对不住集体！”长林说，“咱都是给集体干，对不住我啥！”

“对不住集体！”治安难受地重复长林的话，又说，“队里要赔多少钱，咱没二话！”

“赔？你的钱多吗？”长林笑说，“好好想想，还有比那几个钱有价值的东西！”

治安愣愣地瞧着长林。

“一个社员对集体的实心！”长林说。

治安扑地脸红了，说：“我太爱工分……”

“我也爱工分！社员谁不爱工分？不爱工分凭啥过日子？”长林说，“爱工分没啥错喀！”

治安暗暗吃惊，这个共产党员徐长林，人说爱社如家，他也说自个儿爱工分？他不由得说：“你老哥这话说得知心，是庄稼人对庄稼人说的话。”

长林说：“光爱工分，不爱集体，集体烂了，工分再多顶啥用？那一年咱队的友群被撵下台，那个‘拐八货’当权，劳动日值三毛三，你劳动一年，工分倒不少，结果是欠支户！”

精明的治安老汉听出来，那一年“拐八货”当队长，早晨起来不下地，念报纸，背语录，实行政治评工，他凭耍舌头搂了不少工分，结果却欠支，想到这事，他不由得脸红了，说：“老哥这话是实话！”

“集体的事办不好，地里长不好，收入不增加，工分是空空货！再多没用！”长林说，“工分本本上记的，是咱的收入，也是对集体的心血！”

话已经说到治安的病根上了，他惴惴不安。队长友群批评他的时候，他敢顶撞；社员砸泡的时候，他听见脸不红；可长林老汉像拉家常一样说着这些小孩也懂的道理的时候，他却惭愧起来了。

“国家除了‘四害’，中央又颁发了六十条，为的是生产大发展，农民有好日子过！”长林向治安宣传政策，“咱得给国家争气！国家要大发展，咱给城市供不上菜，影响实现‘四化’的大事哩！岂止咱少挣几个工分！”

“对！对的！”治安点头，表示接受了组长的宣传，“我给社员做检讨！”

一直旁听这场对话的治安老伴，插上话：“我看也好！反正人都知道这麻哈事咧！自个儿打自个儿，省得人家打！知错改错不为错嘛！”

之后，徐治安在社员会上“自个儿打了自个儿”，老汉竟然流了泪，感动了社员，也感动了队长友群。反倒再没人提起猪拱西葫芦苗儿的事了。

紧张而又细致的“倒圃”工作开始了，要一苗一苗把那些在温室里培育的既娇又纤的宝贝挖出来，再按不同的稀稠，移到只有玻璃和苫子而没有人工加温设备的冷床里去锻炼。徐治安似乎连脾性也改了不少，他很少说话，只闷着头干活，一屁股蹲下去，不到放工不起来，整晌整晌连一袋烟也不抽。

友群路过苗圃，问长林：“没看人最近怎样？”

长林笑着说：“你叫黑山伙计说。”

黑山憨厚地笑着：“这回，看起实在哩！”友群也憨笑着，似乎是对长林老汉的赞许，又是表示自己的愧疚。

传统的春节前几天，乡村的新年佳节气氛一日浓似一日。徐家园决分了，除了个别男人在城里工作而女人身体不好的一两户人家外，家家户户分了钱。小镇上的集市在萧条了多年之后显得空前繁荣热闹，徐家园一溜一串走出去挎篮挑担置办年货的男女社员。庄稼人对公历元旦马马虎虎，对农历春节还保持着浓重的送旧迎新的喜庆心理。

腊月二十八，公社召开群英会，嘉奖那些在生产队各条战线上为人民做出显著成绩的优秀分子，徐家园苗圃务苗小组被评为先进班组，三个老汉要去开群英会哩！

一早起来，老伴把一身过年走亲戚时才穿的新衣服给治安换上了，出门的时候，老伴还抻扯着不熨帖的褶皱，引得儿媳在门道里抿着嘴笑。

治安走进苗圃的圆洞门，见长林老汉刚从苗圃那头过来，还是那身粘着泥巴土星的衣裤，倒觉得自己穿得太新，不自然了。

“啊呀，穿这齐整！”长林笑着说。

“老婆子佯性子人，硬叫我……”治安哈哈笑着，摊开双手。

说话间，锣鼓从村里敲过来，青年们把三个老汉连拽带推，上了公路。天是这样蓝，太阳刚刚冒红儿。公社大门两边，插着几十杆彩旗，墙上贴着斗大的标语字。早来的几家锣鼓，在门外广场上摆开场子，比赛铜器哩！徐家园的锣鼓队，一来就加入了竞赛，把他们欢送的代表扔下不管了。

治安跟着长林，进了公社院子，迎面墙上，贴着光荣榜，围着一大堆观看的男女青年，治安老汉还没看见自己的名字，迎面走来了公社罗书记，满面春风地和他仨打招呼："你们三个务苗专家来咧！刚才我还寻你们哩！走走走，先到我屋里喝水。"

罗书记的房子里简单得很，一张桌子一张床，小凳子倒是不少，在火炉周围摆了六七个，满地都磕着旱烟灰，大概这儿常有人来坐，治安站起身，接过罗书记倒来的水，总觉得有点局促。看看长林，他倒是随随便便，一边抽烟，一边和罗书记尽谝！罗书记给他递水，他连身子都不动一下。黑山只顾在火炉上烤烟叶子，往烟包里揉。这罗书记在公社好几年了，治安从来没和罗书记说过话。有一回，罗书记到徐家园工作，午饭派在他家，他早早端着饭从后门溜到街巷里去了，觉得和这"官"儿一起吃饭不畅快，也没啥话可说。

"这位老人是今年新进你们苗圃的？"罗书记指着治安，问长林。

长林说："徐治安，务苗是一把好手，前几年没出世，今年把积极性调动起来哩！"

治安听了，心里好舒服啊！长林不说咱前几年那些麻哈事，只说"没出世"！这话说得得体。治安从心里叹服长林真是个好老汉。

“好啊！把你的技术发挥出来，把菜务好！”罗书记看着治安说，“压力大啊！市上今年的方针，要把郊区农村变成副食蔬菜基地，要保证新长征大军有足够的副食供应，事关重大！你们的苗儿务得好，菜长得好，我的压力就松泛一点，我是凭你们哩！”

“放心，咱明白！”长林说，“‘四人帮’捣乱不成了，政策也落实咧！你放心！”

治安老汉的心里鼓鼓，却说不出一句合适的话来。

“你们今年的苗苗长得好！全社还是你们挑梢儿！这回好好讲讲经验！”罗书记说罢，有人把他叫出去了。

长林老汉说：“刚才罗书记给我说，开幕式选主席团，叫咱务苗组出一个人。”

黑山说：“就是你。”

治安也说：“吩就好！”

长林笑说：“我说，咱们仨人，论起今年起色大的，还数治安。黑山，你说呢？”

黑山仍然憨厚地一笑：“对，对着哩！”

治安这回着实慌了：“不成不成不成，我绝对不行！”

不行也没办法，仨人中有俩人拥护，治安推辞不掉了，慌乱而又诚恳地说：“长林哥，黑山弟，我明白你俩的心意，是推着我往高处走哩！前些年，唉……”治安忽地动了感情，几乎掉下眼泪来。

“上上上！上。”长林热情鼓劲说，“上到主席台上，让全社的好汉模范都看看，徐家园的治安老汉，从今日起，另是一个人咧！”

治安却孩子般天真地问:“主席台在哪达？”

“在会场前头！和公社领导坐在一起！”长林说，“俺大伙坐在台下……”

“啊啊，啊……”治安激动得花白胡须颤抖了，那样的场合，他一生从来没经过！他觉得自己真是另活一重人，登上一个新的天地！

公社大院里，广播上欢乐的歌声停止了，召集会议的人呼喊代表们到大礼堂集合哩！会议就要开始了。

仨人出了罗书记的房门，夹在人窝里，朝装饰一新的大礼堂走去……

1979年4月 小寨

信任

一

一场严重的打架事件搅动了罗村大队的旮旯拐角。被打者是贫协主任罗梦田的儿子大顺，现任团支部组织委员。打人者是“四清”运动补划为地主成分、今年年初平反后刚刚重新上任的党支部书记罗坤的三儿子罗虎。

据在出事的现场——打井工地——的目睹者说，事情纯粹是罗虎寻衅找茬儿闹下的。几天来，罗虎和几个“四清”运动挨过整的干部的子弟，漂凉带刺，一应一和，挖苦臭骂那些“四清”运动中的积极分子；参与过“四清”运动的贫协主任罗梦田的儿子大顺，明明能听来这些话的味道，仍然忍耐着，一句不吭，只顾埋头干活。这天后晌，井场休息的时光，罗虎一伙骂得更厉害了，粗俗的污秽的话语不堪入耳！大顺臊红着脸，实在受不住，出来说话了：“你们这是骂谁啊？”

“谁‘四清’运动害人就骂谁！”罗虎站起来说。

大顺气得呼呼儿喘气，说不出话。

罗虎大步走到大顺当面，更加露骨地指着大顺臊红的脸挑逗说：“谁脸发烧就骂谁！”

“太不讲理咧！”大顺说，“野蛮——”

大顺一句话没说完，罗虎的拳头已经重重地砸在大顺的胸口上。大顺被打得往后倒退了几步，站住脚后，扑了上来，俩人扭打在一

起。和罗虎一起寻衅闹事的青年一拥而上，表面上装作劝解，实际是拉偏架。大队长的儿子四龙，紧紧抱住大顺的右胳膊，又一个青年架住大顺的左胳膊，一任罗虎拳打脚踢，直到大顺的脸上哗地蹿下一股血来，倒在地上人事不省……这是一场预谋的事件，目睹者看得太明显了。

一时间，这件事成为罗村街谈巷议的中心话题。那些参与过“四清”运动的人，那些“四清”运动受过整的人，关系空前地紧张起来了。一种不安的因素弥漫在罗村的街巷里……

二

春天雨后的傍晚，山清水秀，空气清新；块块云彩悠然漫浮；麦苗孕穗，油菜结荚；南坡上开得雪一样白的洋槐花，散发着阵阵清香。在坡下沟口的靠茬红薯地里，党支部书记罗坤和五六个社员，执鞭扶犁，在松软的土地上耕翻。

突然，罗坤的女人失急慌忙地颠上塄坎，颤着声喊：“快！不得了……了……”

罗坤喝住牛，插了犁，跑上前。

“惹下大……祸咧……”

罗坤脸色大变：“啥事？快说！”

“咱三娃和大顺……打捶，顺娃……没气……咧……”

“现时咋样？”

“拉到医院去咧……还不知……”

“啊……”

罗坤像挨了一闷棍，脑子嗡嗡作响，他把鞭子往地头一插，下了塄坎，朝河滩的打井工地走去，衣褂的襟角，擦得齐腰高的麦叶刷刷作响。

打井工地上，木柱、皮绳、镢、锨胡乱丢在地上，临近的麦苗被攘践倒了一片，这是殴斗过的迹象。打井工地空无一人，井架悄然耸立在高空中。

从临时搭起的夜晚看守工具的稻草庵棚里，传出轻狂的说话声。罗坤转到对面一看，三儿子罗虎正和几个青年坐在木板床上打扑克哩。

罗坤盯着儿子:“你和大顺打架来？”

儿子应道:“嗯！”

罗坤问:“他欺负你来？”

儿子不在乎:“没有。”

“那为啥打架？”

于是，儿子一五一十地述说了前后经过，他不隐瞒自己寻事挑衅的行动，倒是敢做敢当。

罗坤的脸铁青，听完儿子的述说，冷笑着说:“是你寻大顺的事，图出气！”

儿子拧了一下脖子，翻了翻眼睛，没有吭声，算是默认。那神色告诉所有人，他不怕。

罗坤又问:“我在家给你说的话忘咧？”

“没！”儿子说，“他爸‘四清’时把人害扎咧！我这阵不怕他咧！他……”

罗坤再也忍不住，听到这儿，一扬手，那张结满茧甲的硬手就抽到儿子白里透红的脸膛上——

“啪！”

儿子朝后打个闪腰，把头扭到一边去。

罗坤转过身，大步走出井场，踏上了暮色中通往村庄的机耕大路。

这一架打得糟糕！要多糟糕有多糟糕！罗坤背着手，在绣着青草的路上走着，烦躁的心情急忙稳定不下来。

贫协主任罗梦田老汉在“四清”运动中，是工作组依靠的人物，在给罗坤补划地主成分问题上，盖有他的大印。在罗坤被专政的十多年里，他怨恨过梦田老汉：你和我一块耍着长大，一块逃壮丁，一块搞土改，一块办农业社，你不明白我罗坤是啥样儿人吗？你怎么能在那些由胡乱捏造的证明材料上盖下你的大印呢？这样想着，他连梦田老汉的嘴也不想招了。有时候又一想，“四清”运动工作组那个厉害的架势，倒有几个人顶住了？他又原谅梦田老汉了。怨恨也罢，原谅也罢，他过的是一种被专政的日子，用不着和梦田老汉打什么交道。今

年春天，他的问题终于平反了，恢复了党籍，支部改选，党员们一口腔又把他拥到罗村大队最高的领导位置上，他流了眼泪……

他想找梦田老汉谈谈，一直没谈成。倔得出奇的梦田老汉执意回避和他说话。前不久，他曾找到老汉的门下，梦田婆娘推说老汉不在而谢绝了。不仅老贫协对他怀有戒心，那些“四清”运动中在工作组“引导”下对干部提过意见的人，都对重新上台的干部怀有戒心。党支书罗坤最伤脑筋的就是这件事。想想吧，人心不齐，你防我，我防你，怎么搞生产？怎么实现机械化？正当他为罗村的这种复杂关系伤脑筋的时候，他的儿子又给他闯下这样的祸事……

三

罗坤径直朝梦田老汉的门楼走去。当他跨进木门槛的时候，心里做好了最坏的准备，准备承受梦田老汉最难看的脸色和最难听的话。

小院停着一辆自行车，车架上挂着米袋面包和衣物之类，大约是准备送给病人的。上房里屋里，传出一伙人嘈嘈的议论声：

“这明显是打击报复……”

“他爸嘴上说得好，‘保证不记仇恨’，屁！”

“告他！往上告！这还有咱的活处……”

说话的声音都是熟悉的，是几个“四清”运动的积极分子和梦田的几个本家。罗坤停了步，走进去会使大家都感到难堪。他站在院中，大声喊：“梦田哥！”

屋里谈话声停止了。

梦田老汉走出来，站在台阶上，并不下来。

罗坤走到跟前:“顺娃伤势咋样? ”

“死了拉倒！”梦田老汉气哼哼地顶撞。

“我说，老哥！先给娃治病，要紧！”罗坤说，“只要顺娃没麻达，事情跟上处理！”

“算咧算咧！”梦田老汉摇着手，“棒槌打人手抚摸，装样子做啥！”

说着，跨下台阶，推起车子，出了门楼。

罗坤站在院子当中，麻木了，血液涌到脸上，烧躁难耐，他是六十开外的人了，应当是受人尊重的年龄啊！他走出这个门楼的时光，竟然不小心撞在门框上。

走进自家门，屋里围了一脚地人，男人女人，罗坤溜了一眼，看出站在这儿的，大都是“四清”运动和自己一块挨过整的干部或他们的家属。他们正在给胆小怕事的老伴宽解:

“甭害怕！打咧就打咧！”

“谁叫他爸‘四清’运动害了人……”

“他梦田老汉，明说哩，现时臭着咧！”

这叫给人劝解吗? 这是煨火哩！罗坤听得烦腻，又一眼瞥见坐在炕边上的大队长罗清发，心里就又生气了: 你坐在这里，听这些人说话听得舒服！他和大队长搭话，大队长却奚落他说:“你给梦田老汉回

话赔情去了吧？人家给你个硬顶！保险！你老哥啊，太胆小咧，简直窝囊！”

罗坤坐在灶前的木墩上，连盯一眼也不屑。他最近以来对大队长很有意见：大队长刚一上任，就在自己所在的三队搞得一块好庄基地。这块地面曾经有好几户社员都申请过，队里计划在那儿盖电磨磨房，一律拒绝了。大队长一张口，小队长为难了，到底给了。好心的社员们觉得大队长受了多年冤屈，应该照顾一下，通过了。接着，社办工厂朝队里要人，又是大队长的女儿去了，社员一般地没什么意见，也是出于照顾……这该够了吧？你的儿子伙着我的三娃，还要打人出气，闯下乱子，你不收拾，倒跑来给女人撑腰打气。把你当成金叶子，原来才是块铜片子！

罗坤黑煞着脸，表示出对所有前来撑腰打气的好心人的冷淡。他不理睬任何人，对他的老伴说：“取五十块钱！”

老伴问：“做啥？”

“到医院去！”

大队长一愣，眼睛一瞪，明白了，鼻腔里发出一声重重地嘲弄的响声，跳下炕，竟自走出门去了。屋里的男人女人，看着气色不对，也纷纷低着眉走出去了。

罗坤给缩在案边的小女儿说：“去，把治安委员和团支书叫来！叫马上来！”

老伴从箱子里取出钱和粮票，交给老汉：“你路上小心！”

罗坤安慰老伴:“你放心！自个儿也覅害怕！怕不顶啥！你该睡就睡，该吃就吃！”

治安委员和团支书后脚跟着前脚来了。

罗坤说:“你俩把今日打架的事调查一下，给派出所报案。”

治安委员说:“咱大队处理一下算咧！”

“不，这事要派出所处理！”罗坤说，“这不是一般打架闹仗！”

团支书还想说什么，罗坤又接着对她说:“你叔不会写，你要多帮忙！”

说罢，罗坤站起身，拎起老伴已经装上了馍的口袋，推起车子，头也不回，走出门去。蒙蒙月光里，他跨上车子，上了大路。

四

整整五天里，老支书坐在大顺的病床边，喂汤喂药，端屎端尿，感动得小伙子直流眼泪。

梦田老汉对罗坤的一举一动都嗤之以鼻！做样子罢了！你儿子把人打得半死，你出来落笑脸人情，演的什么双簧戏！一旦罗坤坐下来和他拉话的时候，他就倔倔地走出病房了。及至后来看见儿子和罗坤亲亲热热，把挨打的气儿跑得光光，“没血性的东西！”他在心里骂，一气之下，干脆推着车子回家了。

大顺难受地告诉罗坤，说他爸在“四清”运动中被那个整人的工作组利用了。“四清”后，村里人在背后骂，他爸难受着哩！可他爸是个

倔脾气，错了就错下去。“四清”运动的事，你要是和他心平气和说起来，他也承认冤枉了一些人，你要是骂他，他反硬得很：“怪我啥？我也没给谁捏造喀！‘四清’也不是我搞的！盖了我的章子吗？我的头也不由我摇！谁冤了谁寻工作组去……”

罗坤给小伙子解释，说梦田老汉苦大仇深，对新社会、对党有感情，运动当中顶不住，也不能全怪他。再说老汉一贯劳动好，是集体的台柱子……

第七天，伤口拆了线，大顺的头上缠着一圈白纱布出院了。罗坤执意要小伙子坐在自行车后面的支架上，小伙子怎么也不肯。“你的伤口不干净！医生说要养息！”罗坤硬把小伙子带上走了。

“大叔！”大顺在车后轻轻叫，声音发着颤，“你回去，也甭难为虎儿……”

罗坤没有说话。

“在你受冤的这多年里，虎儿也受了屈。和谁家娃耍恼了，人家就骂‘地主’，虎儿低人一等！他有气，我能理解……”

罗坤心里不由一动，一块硬硬的东西哽住了喉头。在他被戴上地主分子帽子的十几年里，他和家庭以及孩子们受的屈辱，那是不堪回顾的。

小伙子在身后继续说：“听说你和俺爸，还有大队长清发叔，旧社会都是穷娃，解放后一起搞土改、合作化，亲得不论你我……前几年翻来倒去，搞得稀汤寡水，娃儿们也结下仇……”

罗坤再也忍不住，只觉两股热乎乎的东西顺着鼻梁两边流下来，嘴角里感到了咸腥的味道。这话说得多好啊！这不就是罗坤心里的话吗？他真想抱住这个可爱的后生亲一亲！他跳下车子，拉住大顺的手：“俺娃，说得对！”

“我回去要先找虎儿哩！他不理我，我偏寻他！”小伙子说，“我们的仇不能再记下去！”

俩人再跨上车子，沿着枝叶茂密的白杨大路，罗坤像得了某种精神激素，六十多岁的人了，踏得车子飞快地跑，后面还带着个小伙子哩。

可以看见罗村的房屋和树木了。

五

罗坤推着自行车，和大顺并肩走进村子的时候，街巷里，这儿一堆人，那儿一堆人，议论纷纷，气氛异常，大队办公室外，人围得一大伙。路过办公室的时候，有人把他叫去了。

办公室里，坐着大队委员会的主要干部，还有派出所所长老姜和两个民警。空气紧张。大队长清发须毛直竖，正在发言：“我的意见，坚决不同意！这样弄的结果，给平反后工作的同志打击太大！他爸含冤十年……”

罗坤明白了，他瞥了一眼清发，说：“同志，法就是法，那不认人，也不照顾谁的情绪！”

罗清发气恼地打住话，把头拧到一边。

罗坤对姜所长说："按法律办！那不是打击，是支持我工作！"

姜所长告诉罗坤，经上级公安部门批准，要对罗虎执行法律：行政拘留半个月。他来给大队干部打招呼，大队长清发坚持不服判处。

"执行吧，没啥可说的！"罗坤说，"法律不认人！"

民兵把罗虎带进办公室里来，小伙子立眉竖眼，直戳戳站在众人面前，毫不惧怕。直至所长拿出了拘留证，他仍然被一股气冲击着，并不害怕。

清发重重地在大腿上拍了一巴掌，把头歪到另一边，脖上青筋暴起，突突跳弹。

罗坤瞧一眼儿子，转过脸去，摸着烟袋的手，微微颤抖。

就在民警把虎儿推出门的一刹那，一直坐在墙角，瞪着眼、噘着嘴的贫协主任梦田老汉，突然立起，扑到罗坤当面，一扑塌跪了下去，哭了起来："兄弟，我对不住你……"

罗坤赶忙拉起梦田老汉，把他按坐在板凳上。梦田老汉又扑到姜所长面前，鼻涕眼泪一起流："所长，放了虎娃，我……哎哎哎……"

这当儿，在门口，大顺搂着虎儿的头流泪了。虎儿望着大顺头上的白纱布，眼皮耷拉下来，鼻翼在急促地扇动着。

虎儿挣脱开大顺的胳膊，转进门里，站在爸爸面前，两颗晶莹的泪珠滚了出来："爸，我这阵儿才明白，罗村的人拥护你的道理了！"说罢，他走出门去。

六

罗村的干部们重新在办公室坐下，抽烟，没人说话，又不散去。社员们从街巷里、大路上也都围到办公室门前和窗户外。他们挤着看党支部书记罗坤，那黑黑的四方脸，那搀着一半白色的头发和胡茬，那深深的眼眶，似乎才认识他似的。

罗坤坐在那里，瞧着已经息火而略显愧色的大队长，和干部们说：

“同志们，党给我们平反，为了啥？社员会又把我们拥上台，为了啥？想想吧？合作化那阵咱罗村干部和社员中间关系怎样？即便是三年困难时期，生活困苦，咱罗村干部和群众之间关系怎样？大家心里都清白！这十多年来，罗村七扭八裂，干部和干部，社员和社员，干部和社员，这一帮和那一帮，这一派和那一派，沟沟渠渠划了多少？这个事不解决，罗村这一摊子谁也不好收拾！想发展生产吗？想实现机械化吗？难！人的心不是操在正事上，劲儿不是鼓在生产上，都花到钩心斗角、你防备我、我怀疑你上头去了嘛！

“同志们，我们罗村的内伤不轻！我想，做过错事的人会慢慢接受教训的，我们挨过整的人把心思放远点，不要把这种仇气，再传到咱们后代的心里去！

“罗村能有今天，不容易！咱们能有今天，不容易！我六十多了，将来给后辈交班的时候，不光光给一个富足的罗村，更该交给他们一个团结的罗村……”

办公室门里门外，屏声静气，好多人，干部和社员，男人和女人，眼里蓬着泪花，那晶莹的热泪下，透着希望，透着信任……

1979年5月 小寨

七爷

一

那年春天，县上给俺田庄派来了路线教育宣传队。麦收后宣传队马队长兜里装了一沓厚厚的经验材料，凯旋了。

令人寒心的是，马队长前晌刚从田庄拔出脚，俺三队队长志良叔后晌就宣布他不当队长了。

我慌了。

我是副队长，年初选举的时候，大家选我，不过是看我干活不惜力气，办事可靠点儿，让我给志良叔跑跑腿儿。跟他锻炼锻炼。至于四时节令的农活安排，经营管理，全是仰仗他的，我还不入门哩！现时正当忙后三秋管理的紧火时光，他撂了挑子，我怎么办呢?

月色很好。我奔进大队党支部书记田志德家的院子。

香椿树下，田志德被一伙社员包围在中间，吵吵闹闹。

七队妇女郭菊艾，高喉咙大嗓门，喊说:“把俺的围墙挖倒，现时咋办哩? 贼娃子要是把那一把粮食灌走，我一家子可怎么活? ”

我听出意思了，郭菊艾家的庄基地在村子最西边，打土围墙时，往外放出去一尺。其实，那一尺空地外，就是队里水泥砌的自流渠，集体根本无法使这一尺之地发挥效益，郭菊艾打围墙时就把这一尺空地圈进了院子，干部和社员也没有人嘁喳过此事。马队长不知怎样把

这事调查出来，亲自掮上镢头，用军队式的命令动员民兵，把郭菊艾家西边的围墙给挖倒了，为田庄大队争回了一尺之地……

田志德听着，皱着眉，苦楚着脸，说：“要急！大队开会，研究研究！”

二队的成林老汉赶紧抢上插话：“把没收俺的羊奶钱……”

这事我也知道。成林老汉的小孙子，一生下来就没奶吃，老汉买了一只好奶羊，一天能捋六七斤奶。孩子吃不完，家里四口人一个胃口，都喝不惯羊奶那股膻味儿，就用孙子喝剩的羊奶喂猪。恰好邻近小学校有个教员患胃疼病，想订奶……同样，马队长认为这是资本主义自发势力，把钱没收了……

田志德眉头皱得更紧了，脸上的表情更苦楚，重复着同一句话：“要急！大队开会，研究研究。”

我看着那一堆纠缠不休的社员，心里可怜起田志德老汉了：马队长在田庄东戳一扁担，西砸一杠子，打下一锅浆子，现时他屁股一拍，回县领赏去了，把这一摊黏浆子，全部倒在老汉头上了。

老汉像是麻木了，任谁用高嗓门叫喊也好，用哀求的调调诉述也好，他一概不动声色，开口就是那两句话：“要急……”

我敢说，站在这儿的人，谁也没有我心里的事情关系重大。我拨开人，尽量缓和口气说：“支书，俺的队长撂套不干咧！”

老汉猛乍扬起头，吃惊地张着嘴：“啥？”

我又说了一遍。他把头沉重地低下去，一只手撑着下巴，一句不吭。

他没问我志良叔为啥半路撂套。他心里比我更清楚：祸根还在那位马队长身上。

“我早就担着这份心！”他自言自语，站起来对我说：“咱俩一搭寻志良去。”

进了志良家院子，一见面，志良就摇手：

“支书，你要找，也要说，啥也不顶！”

志德坐在砍柴的木墩上吸烟。他是个实心眼的好人，不发躁，也想不出什么动听的词儿来软化志良，闷了半晌，才说：“马队长在时，你为啥不撂套？他在，你撂，我叫他给三队安排队长！”

“我怕把麦子瞎到地里！”志良说，“现时，麦收了，秋种了，我该作揖退庙咧！”

“算咧！要给哥难场受咧！”志德劝说，“你数数咱大、小队儿几十名干部，打下台的不算，谁没受过揉搓？还能计较……”

“你要费唾沫儿咧！老哥！”志良烦躁地说，“我的秉性你知道，说不干就坚决不干！”

“不管马队长怎么揉搓你，咱的社员心里对你没个啥啥喀！”志德好容易找着了话头儿，更加耐心，“都替你……”

“咱不说多余话！”志良无情地打断志德老汉的话，生硬地说，“谁再当干部，算是先人在河滩埋着！”

志德老汉尴尬地苦笑着，再也说不出话。志良把话说死了。

无奈，老汉召开三队社员会，选队长。开了三场会，选了四个人，没一个人愿意上场，像是谁教给他们同一句道理：“志良这样的人都挨整，当不下去，谁还能干成？”

我看队长选不出来，自己又驾不起辕，干脆，也撂吧！没等得我开口，老支书难受地拍拍我的肩头，说：“没办法！你就挑起来干吧！”

我急忙推辞。

“叔明白，你不说叔也明白！可眼下有啥办法？”他说，“我给你找几个老农，当参谋……”

看看支书为难的神色，我不忍心再给他加忧愁，想撂挑子的话急忙说不出口。这样，我忐忑不安地当上了三队队长了。

二

紧张繁忙的三秋管理季节，玉米要锄草，谷子要薅苗，红薯要翻蔓儿，棉花要打掐，接着就要施肥。化肥供应少得可怜，我正发愁这二百多亩秋田，真会成了卫生田哩！天又旱得秋苗发蔫；社员们思想散里散伙，大概对我并不抱什么希望吧！我急得东跑西颠，眼也红了，声也哑了。听说夜晚浇地的人把水放到地里，任水乱流，自己在渠岸上睡觉，我忍不住发火了，说了不少难听话，仍不抵事。

老支书还没给我把参谋找妥，就到公社参加什么学习班去了。我自己找了几个老农商量，有的说这样办，有的说那么干，有的干脆什么也不说——怕我把三队搞烂了，他们要落话把儿。

“缠马，快到公社找志德去！趁早把事卸了！”妈妈说，“再干下去，怕……”

“哼呀！你当那个队长好当？那不是抢篮球！”爸爸教训我说，“一百几十号劳力，二百多亩庄稼，那是闹着耍的？你，本事不大胆子大！”

我吃着饭，听着妈妈担心的劝说、爸爸的训诫，心一横：吃罢饭，上公社，找支书，不干咧——确实干不了呀！

主意一定，我赶紧吃饭。不料，一抬头，富农分子田学厚站在当面。奇怪，他找我能有什么事呢?

我问：“你有啥事？”

他答：“我来交思想改造汇报材料。”

噢，我记起了。按照马队长春天给队里严格立下的制度规定，“四类分子”每月逢十，三次向生产队长兼治安员汇报，月底给大队汇报，一季度末，向公社派出所汇报一次。今天逢十，我倒忘了。

我说：“你先拿着。我明天就不是队长咧！”

他说：“我得按时交。你今天还是！”

其实也无所谓，爱交你就交吧！

他从压着蓝布带子的口袋里，掏出折叠着的材料纸，放到我搁着饭碗、菜碟的石桌上，转过身，走了。

我哪有心思看他的什么思想改造汇报材料！他放在那儿，我冷漠地瞧了一眼，连动一指头的兴趣也没有。

一阵风从大门洞儿吹进院子，打着小小的旋儿，把那份材料从石桌上吹到地下，翻了几个过儿，散开了。

我捡起两页写得密密麻麻的纸，又照旧叠好，却发现地上还散落着二指宽的一绺纸条儿，也就顺手拾了起来。

无意间的一瞥，纸条上的字吸引住我的目光，像磁铁吸住铁屑一般，眼睛就再也移不开了。

天呀，你猜这纸条上写的啥哟：

“水肥是关键。抓紧浇地，晚上要派可靠的人去。快组织劳力拆旧墙，换火炕，动手慢就跟不上了。妇女锄秋，搞成定额。其他杂活能缓就缓，你亲自出马抓水抓肥。要慌！要乱！撑硬！不敢松劲！”

我抬起头，不由得瞧瞧大门口，那个微微有点驼的背影早已消失；低头看看手里的纸条，硬胳膊硬腿的字迹，切切实实还印在纸条上。

怎么理解眼前的事呢？听说他过去当过大队党支部书记，“四清”运动给他扣上富农分子帽子那时候，我刚刚脱下开裆裤。我所看见的，已经不是在人前讲话、办事的当权者，而是终年挑着一对大桶，给队里挑稀粪的“富农分子”。冬天和春天，担粪泼麦子，夏天泼玉米。他做着这样一项单独的劳动，很少和社员在一起干活。我对他说

不上憎恨，也不甚喜欢，按乡村延续下来的班辈儿，我叫他七爷。他给我写纸条，肯定是看见我狼狈不堪的样子了吧?

我把那两页思想汇报材料扔到桌子上，把写着生产安排的纸条儿，夹在一本从来未用过的红皮日记本中，这是不能让人看见的。

我觉得心里有数了，倒产生了一种试火试火的勇气，忽然改变了主意，不去公社找老支书了。

我把妇女队长和记工员叫来，一块下到田间，逐块查看了苗情和草情，酌情定下了每一块地的工分标准。从后晌起，分组锄地，定额管理。妇女队长笑了:“缠马，这下你放心！嫂子五天给你完成任务！”

当天晚上，我指派了几个老实可靠的社员去浇地，果然，浇得又快又好。

拆旧墙换火炕的活路也拉开了。

十天以后，全部秋田锄过头遍，浇完头茬水，旱象解除了。在打麦场上，堆起了一座小山一般的大粪堆。

又过了半月，二百多亩秋田，全部施过肥，眼见着三队的秋苗由黄变黑，由细弱变粗壮。大队检查评比的时候，流动红旗居然评给三队了。支书田志德老是皱着的眉头舒展了，拍着我的脊背:“崽娃子！没看出，你还有两手哩！”

社员们的赞扬就更多了。三队的社员增强了信心，人心齐了！调皮捣蛋的，偷懒耍滑的，也自行检点了行为。我说话顶话了。

我却总想打听，了解七爷的过去。劳动休息时，我往那些年老的人跟前靠，渐渐地，我明白了：当我诞生到田庄的土地上的时候，田学厚带领田庄的贫雇农，早已把田阎王统治田庄的那一页灾难史翻过去了，崭新的一页正在他手中展开：为从田庄的街巷里彻底驱除饥饿和贫穷，他带头创办农业社，日夜奔忙，把自家田里的农活和屋里的家务耽搁了，真正是公而忘家！农会主任，农业社社长，人民公社田庄大队党支部书记——时代不断变迁，社员和党员把适应时代的官名拥戴到他的头上。在他当权的十五六年里，田庄的土地，从田阎王的大块地分割成一绺一块，分配给一户一家耕种；又从一绺一块上拔除了界石，合并成更大的整块，全村集体耕种；防止河水泛滥的大堤修起来，从后沟的果园里，每年不断开出装满苹果、核桃的汽车，眼见得红瓦新屋一幢一幢盖起来……那是田庄历史上最红火的年月。四十岁左右的男女社员，怀念田庄历史上这一段欣欣向荣的日子，深深惋惜好当家人田学厚不在位了；憎恨“四清”工作组瞎了眼，把他们的好支书，硬给扣上富农帽子压死了……

那个微微有点驼的背影立在我的心中，那么实在，那么亲近，他算什么富农分子！他忍受着政治上的压力和人格上的屈辱，心里怎么想啊？每月逢十，给我交来思想改造汇报材料的时候，里面肯定夹裹着一绺或长或短的纸条儿，心里又想的是什么啊？

七月的最后一个逢十的日子到来了，我照例坐在院子里的石桌旁，吃着饭，不时瞧瞧敞开的大门，盼着那个微微背驼的身影的到来。

期待中，他果然进来了。

快六十岁的人了，步子多轻捷、利索！头上落了一层霜，面孔却红黑红黑！个子虽然不高，肩膀却又厚又宽，腰里终年四季扎一条蓝布带子，浑身恰如一块极富有弹性的钢锭。我瞧着他，忽然想，一旦他那微微驼着的前胸挺起，大约会把整个田庄都扛起来！

他走到我面前，还像往常每次来一样，不卑不亢，不恼不笑，说："我来交思想改造……"

我听不下去，早已慌忙站起，礼让他坐下。

他把材料塞到我手里，和善而精明的眼睛里有一丝几乎看不见的微笑掠过，随即转过身，走了。

我瞧着他的背影，踏着轻捷的脚步走过院子，消失在大门口。我呆呆地站着，捏着他交来的材料的手，不由得发抖了，绽开来，又有一张纸条！我心头一热，两眼怎么也看不清那纸条上面写着的字了……

三

一桩横祸却由此而生！

晚上，当我从村里归来，跨进我独身居住的小厦房的时候，无论多晚、多累，都要翻开那个红皮日记本。怪！一翻开它，瞧着那一绺一绺用各色纸头写着字的纸条，我的脑子就格外清醒。有时，因为生产上取得进展而兴奋，纸条教我冷静下来！有时，因一件棘手事而气恼烦躁，纸条又使我心地踏实！甚至因工作中的失误而横遭社员的指责、使人容易灰心的时候，纸条又把我鼓舞起来！纸条不仅是我的智囊，而且成了我思想情绪的"空气调节器"！

我翻开红皮日记本，习惯地瞧瞧亲爱的纸条，拧开水笔，记下我在纸条的指导下，所进行的实践活动中的得失。纸条攒贴了六七条，我的实践记录也有五十多则，一百多页了。我甚至想，明年再当队长的话，我的心里就有数码了。我一笔一笔记着，眼前总有一张奇妙的纸条在飞舞，又有一双和善可亲的眼睛在闪光，渐渐地，那纸条变成一只蝴蝶的翅膀，在青绿的田野上飞旋……

八月中旬，县上又分片组织秋田管理大检查，大评比。我们这一片区的检查团长，就是春上在田庄搞过路线教育的马队长。公社刘主任陪着检查，大队的田支书和各队队长，都参加了检查评比。

检查评比的结果，三队秋田的长势在这一片挂上了号。大家鼓励我的话暂不提起，马队长简直高兴得不得了。他一会儿拍我的肩膀，一会儿递给我一支恒大牌香烟，硬叫我抽。我有点难堪地想：春上，你没死活地批判志良队长的“唯生产力论”那阵儿，也捎带给我多少难听话！你那阵儿脸多难看，口气多歪！

评比总结时，马队长又夸奖我：

“田庄三队的秋田，大家都看见了吧？服不服？不服也不行！这是谁领着干的？不是长胡子，也不是刷刷胡子，是嘴上没毛的小伙儿！有的老先生，有一点生产经验，撞不得，一撞就拿势扣板，撂套示威！其实，你那一套经验，不过是修字号的货色！缠马同志干得好！证明春天在田庄进行的路线教育的深远意义……”

我听得出来，表扬我，是为了骂志良叔，又是为他自己在田庄胡整的行为所造成的严重后果遮羞。我心里像塞了一把猪毛，过分的别

有用心的赞扬，使我在众人面前抬不起头，无力正视任何人的眼睛，特别是田志德老汉那忧愁的眼光，只盼会议早点结束。

会议结束后，马队长吩咐秘书说：“把缠马同志的事迹好好整理一下，写成材料，一份送我，一份送报社，一份送县广播站。要造舆论，目前正需要这号材料……”

干部们走散以后，马队长居然亲热地提出：“走，咱到缠马家里去，好好谈谈，这个材料要快！”

我无法推辞，就领着马队长和秘书走了，其他随行人员，也跟着田支书休息吃饭去了。

在我的小厦房里一坐定，马队长就指示秘书和我谈，他靠在被卷上休息了。

秘书问我当队长的前前后后。我结结巴巴，说不顺畅。想想吧，马队长在当面，我怎么说呢？编又编不出来。最后就变成提问式的，我越发被动了。他又问我大批判搞了多少场，批判稿写了多少篇，怎么和守旧复辟派做斗争。我流着汗，终于鼓起勇气说：“那都是没来得及做的事……”

秘书为难地摊开手，瞧一眼马队长。

马队长耐心地笑笑：“不要太死板！灵活一点，譬如说批判，你在田间地头，给社员讲话，批评一些错误倾向，那便算数儿嘛！”

秘书得到启发，又问起我来。

我却忽然瞧见，马队长在我的枕头边抓起了那个红皮日记本！天哪，那个东西怎么敢让他看呢?

“马队长，那本本儿记得乱七八糟……”

“随便翻翻！”马队长兴味很高，“好多先进人物的思想，是从日记里发现的……”

想挽救也来不及了。

马队长翻着、看着，奇怪地问:“这纸条是谁写的? ”

“村里……一个……老农。”我撒谎。

“这个老农不错呀！给年轻干部撑腰！”马队长兴趣更浓更高了，“材料里插上这一笔，教训教训那些老不识相的，硬占着位子不让给年轻人，看这个老农风格多高！”

我心里简直哭笑不得。

“这个老农是谁? ”马队长问。

“一个……老汉……不出名的……”我搪塞。

“啥名字? ”他直截问。

“七……七爷……”我慌了，仍不敢说出名字。

“哪个七爷? ”

“就是那个七爷！田……”

“唔！田老七？田学厚？富农分子？”马队长忽地从炕上翻身坐起，眼瞪得鸡蛋大，一连串的问话之后，他沉默了，气得说不出话来，半晌，才沉吟着说：“怪道我觉得笔迹眼熟。春天，我在这儿的时候，叫他写过破坏活动的交代材料！想不到……”

他很快变了脸，进屋时眼里呈现的亲热的意思飞得精光，严肃地对我训话：“什么‘七爷’？富农分子！你怎么能把敌人叫爷？阶级觉悟跑到哪儿去咧？”

秘书套上钢笔，合上记录本，把椅子挪得离我远一些。

“难得的反面教材！”马队长说，“严重的问题啊！敌人钻进我们的心脏里来了，还不严重？！”他很快做出决断，立即打发秘书找公社刘主任和大队田志德老汉，又叫他们把七爷传来。他要亲自抓这个“新动向”。

刘主任和田志德一进门，看见马队长的脸上正在刮风走云，不知出了什么事。田志德老汉立时拧住眉头，预感不妙地站在一边，瞧瞧马队长，又瞧瞧我。我给支书惹下了祸，难受地低下头。

刘主任却不在乎，故意嘻嘻哈哈和马队长逗笑：“缠马，得是今晌午没给马主任嘴上抹油？我看人家嘴噘脸吊……哈呀！”

“哼！耍胡嘻哈！”马队长严肃地警告，很得意的样子，“你们等着看吧！”

“报告！”门外有人喊。

这是七爷的声音。他站在门外（按照规定的条律，面见大小干部，必须先打报告），大概还不知道，我给他招来了怎样的祸事！可

怜的老人……

“进来！”马队长威严地命令。

七爷跷上台阶，跨过门槛，站在门里。他谁也不盯，既不惊慌，也不谄媚。

“你最近干什么？”马队长开始审问。

“担稀粪。”七爷答，平静而又坦然。

“有什么破坏活动？”

七爷迟疑了一下，似乎在想：有没有必要回答这个可笑的问题。他轻轻说：“没有。”

“狡赖！”马队长拍了一巴掌桌子。

“你尽可以去调查。”七爷仍然平静而又坦然。

“我要你交代！”马队长说，“老实点！”

“……”七爷闭了嘴，不吭了。

马队长终于忍不住，把他手中的“赃证”——我的日记本——打开，啪的一声压在桌子上：“这是谁写的？”

七爷侧过头，溜一眼那些倒霉的纸条儿，扬起头，盯着马主任，说：“我写的。”

“交代你的动机！”

“我看缠马初上阵，手忙脚乱，给他提几条生产建议！”

“你是什么人，你也配提建议？”

这句话说得太欺人了！我的肝火不由得从心里往上蹿。看看七爷，他眉头间的皱纹轻轻颤动一下，腮帮上咬起两道硬梁，说：“我凭三队吃饭，社员也靠三队过日子，我怕三队烂包！我是什么人我清白，配不配提建议我倒忘咧……”

“胡说！你是狐狸给鸡拜年！”

“……”七爷又闭上嘴，不吭了。

马队长更得意了，挖苦说：“没见过，‘四类分子’倒关心起集体来了？纯粹是想笼络人心！”

七爷仍然沉默着，咬得腮帮上又暴出一道梁来。他大概永远也无法使马队长理解他的话，干脆不吭，任你说什么也不想分辩了。

“为了篡权，收买人心！”马队长再一次重复他的话，逼近七爷，对住脸问：“是不是？”

七爷微微扬起头，盯着马队长的眼睛，不紧不慢，说：“人心，那是笼络不来的，想笼络人心的人，结果一个好人的心也笼络不去；有的人不用笼络，人心打也打不散！咋说呢？全看自个儿的德行……”

“放毒！”马队长的脸由黄变红，又由红变黄，受不了了，喊了起来，“你不甘心下台，企图篡权、复辟！”

“篡什么权！篡缠马那个小队长的权？”七爷说，“太小哩！缠马那个权确实太小哩！要篡，就篡大权，起码像县长……”

“你……”马队长脸上像挨了一鞋底儿，攥紧拳头，简直要动手了。

这当儿，刘主任拿着我的那个日记本，和田支书头挨头在一块翻看。看着看着，他把本子轻轻合起，又放到桌子上，大约这才弄清了这场风波的根由。他站起来，面对盛怒的队长，虚叹着：“啊呀！想不到，实在想不到，一个富农分子，竟然会干这种事！”他转过身，又对七爷斥责说：“你怎么敢和马主任顶嘴？回去写检讨，认真交代你的动机。”

七爷转过身，出了门，跷下石阶。

刘主任给马队长圆场子：“马主任，你今天一来就发现了这事，觉悟比我们高！这事，交给我们处理吧，严肃处理！”

“要给我狠狠地批！”马主任也就此下台阶，“把情况向县委写出书面报告。”

“行呀！行呀！”刘主任点头。

田支书却哭丧着脸，为难地说：“这事，要是公布到群众当中，谁也不会批他！这算啥破坏活动嘛，是好事喀！”

“看看看！根子就扎在这儿！表现在敌人身上，根子扎在党内！”马队长说，“春天对你路线教育了一来回，你总不见提高！我看你这思想，确实跟不上趟儿……”

刘主任又呼呼啦啦说："马副主任，耍费你的宝贵时间咧！这些人的问题，都交给我！以后再出问题，你寻我！老田，别吭咧！"

马队长一生气，在我家的饭也不吃了，跟我连一句话都不屑再说。他大约就像老鼠钻进蜂箱，蜜没偷吃着，倒被蜇得鼻青脸肿……

四

刘主任和田支书去送马队长和秘书，我没动弹。他们出了门，我一下躺在炕上，眼泪再也忍不住，流下来了。

怪道这几年人都说：好人挨铐，瞎熊坐轿。田七爷从土改革命革到"四清"运动，在田庄真正是立下了汗马功劳，临了却被扣上了一顶富农分子帽子！志良叔是七爷手下的一员虎将，合作化培养起来的扎实队长，"四清"运动打下台，多年来三队烂得一锅粥！前年众人硬把他举出来，三队的生产刚刚还了阳，今年春天又挨了整！志德叔"四清"时整了个半死，恓恓惶惶保留下来，如今也是运动一来就头疼……我呢？才当了半年队长，现在又出了"路线问题"……

我不想干了！借着公社刘主任和田支书都在当面，把话说明，正好。

听见街巷里一阵汽车响，估计马队长起身回衙了，果然，刘主任和田支书回我的厦房。

田支书这阵无所顾忌，诉起难场，摊着两手，牢骚满腔："刘主任，你说，我这支书咋当？马队长春天来，把田庄搗弄得乱咕咚咚，社员整天围着我的屁股嗡嗡！把几个队的班子叫他戳得散里散伙，我好容易才拢到一堆，今天一来又戳了一杠子！你回去和公社党委商量

一下，把我免了！我越干越不会干，也不敢干咧！”他委屈得要哭出来。

“好啊，不想干就撂！”刘主任揶揄说。他不给支书解释，也不批评，随随便便：“撂吧！都撂套吧！干革命原来还要受委屈呀？天！我明天也撂他妈的套了！我凭啥给马二㞗赔笑脸？！不当这主任，不受这份气！”

田支书倒没词了，愣愣地瞧着这个领导者。

我一时摸不透刘主任话里的意思，看看他正在生气，尽管话说得豁达，眼睛迷不过人。我就把话咽下。

刘主任转过脸，问我：“小伙子，表扬话还没凉下，耳光又挨上了——撑得住哇？”

我说不出话，眼泪又涌上来。

“想到撂套了吧？”刘主任说，“当干部出力受气又挨整！农村干部又不挣工资，当这干屁呢！去他妈的！凭我这一吊子，哪儿挣不来工分！”

我低下头，他把我的想法全端出来，还说什么呢？

刘主任点燃一支烟，喷出浓浓的一口，换了口气，满怀感情地说：

“从今天的事，你们想没想一下那个田学厚，他为啥要写纸条？要是一般思想不纯净的人，他下了台，看见你田庄越烂，才越高兴呢！

他，看见三队乱套了，出来补窟窿，这事，实在少有！论压力，说委屈，我们谁比得他……”

刘主任停顿住了，眼白里泛起一层粉红的丝膜：“我和田老七最熟咧！俺俩一块逃壮丁，在三原一家轧花厂踏了三年轧花机子，村里人都当我死了呢！解放了，我在俺村办合作社，他在田庄办，他比我本事强！他之所以没抽调到乡上去，是考虑田庄村大，工作复杂，需得一个强手儿！那顶帽子，凭啥给他扣上？俺俩逃壮丁走了，他家里没劳力，忙时雇雇短工，收麦时，叫过几个麦客，谁不清楚？怎么能算雇长工？别说他不服，我也不服！我没办法给他解脱，只是相信，总有一天……”

田支书打断刘主任的话：“那你还给马主任答应，批斗老七？”

刘主任释然一笑，不屑地说：“让他等着我给他写报告吧，好好儿等去吧！”

田志德睁大眼睛：“你哄他？”

“对那个货，不能多粘！越粘越麻烦！哄得他快点滚蛋，耳目清静。”

田支书还不放心，啰啰唆唆：“那人家再追问这事？”

“你覅管，我应付。我耍他小子像耍猴！”刘主任说着，拍着老支书的肩膀，深情地说：“你看得对，谁在田庄批田老七，谁就要倒霉！”

田支书忽地也动了感情，惋惜地说：“俺俩在田庄搭手办事多少年，我不知他啥人品吗？好人！能干人！他当支书，坐镇，稳得很

哪！咱不是帅才！咱光能干！现时叫我在田庄坐镇，我才知道我不是帅才……”

这当儿，门口走进一个人来，我一惊，实在想不到，竟是志良叔。

他的脸上很明显地呈现着愧色，一进门就对刘主任说：“事情怪我……”

刘主任瞪起眼：“怎么怪你？”

“我要是不撂套，七叔也不会写纸条，哪来这场……”

“算了吧，伙计，谁想听你的忏悔！”刘主任的脾气真怪，性格生动极了，“回去吧！给老婆抱娃收鸡蛋去吧！这儿是是非之地啊！”

我真替志良叔难为情，这刘主任咋是这样给人做思想工作啊！全不像电影上演的：坐在树下，正儿八经……

志良红着脸，不好意思笑着：“你覅醃制我！刘主任！我来寻你，就是想说……要是社员同意，我……干……”

实在出人意料，想到我和田支书到他家那一回，他的话说得多难听啊！

刘主任哈哈一笑：“你不怕再挨挫吗？”

田支书惊喜地笑着，说：“志良，你这算做啥？‘闹本县’嘛！”

“不！我今晌午听说七叔写纸条的事，连饭也吃不下！我对不住他的培养！他背着黑锅，想的啥？我挂着党员的牌子，想的啥？愧

心……”

“好了好了！”刘主任说，“这才算说了一句人话！”

刘主任哈哈一笑，感慨地说：“志德！还是人家老七厉害。你看嘛！志良不干了，给你赌咒发誓不干！我给人家做工作，也没说服得下。老七挨了县上马主任一顿批评，志良跳起来上阵咧！你说，谁厉害？老七厉害！背着黑锅，还在田庄的事业里，起着榜样的影响的力量，厉害不厉害？！”

田志德老汉笑了，说：“老刘，你看，经过七七四十九，一难又一难，志良上了阵，俺的班子又齐全咧！趁这机会你今黑给俺开个会，给大家鼓鼓劲儿……”

“好！”刘主任满口答应，又悄声说，“今黑，咱们先去看看老七。你们敢去不敢去？”

志良笑说：“我从不把他当富农看！在他家进进出出，家常便饭。你是公社的刘主任，你不怕落罪名，我们谁怕？”

志德老汉也笑了。我这时才看见，一直笼罩在他脸上的忧愁的神色，烟消云散。我这才听到他一声干脆的、充满自信的调门：“走走走！咱几个人一搭走！”

1979年8月 小寨

心事重重

一

太阳刚刚从东山顶上冒出，初冬清早的雾气还很浓，弥漫在河川里落光了叶子的杨柳梢头，流荡在山岭的沟沟岔岔里。

还不到农村吃早饭的时间，方老三就被老伴从饲养室拽扯回来吃早饭。他蹲在院里的香椿树下，一满碗干面——这是庄稼人出远门的耐饥食物——已经下肚，三婶特意在里头浇了一勺热油，他似乎也没尝出来。他放下碗，摸出烟袋，皱着眉，绷着脸，瞅着台阶上的两根原木出神：一派心事重重的神色。

“他大——”老伴在屋里叫。

老三没抬头，也没吭声，他刚擦着火柴。

“你咋还消停地吃烟！”老伴站在门口，抱怨说。

方老三无可奈何地端起空碗，走进屋门。

靠墙放的方桌上，搁着一只黄色的帆布挎包，装得鼓鼓儿，两条系带儿结得扎实。

老伴用嘴和眼睛给他下命令：把挎包挎上！催促说：“快去！趁早！”

“这——”方老三瞅一眼挎包，又瞅一眼老伴，没有说出话，为难地摊开手。

“夜黑说得好好，你又变卦！”老伴盯紧他的脸说。

“这——”老三躲开老伴紧逼的眼睛，垂下手，在裤腰上摩擦着；似乎那挎包里装着易燃易爆的烈性炸药，不敢抬手把它拎起来。

“‘这’啥哩？耍‘这’咧！”老伴逼得更紧，帮他下决心，“快去！早去早回来！”

“这——”老三还是这一句，手足无措地苦笑着。

这老两口在为一桩什么事厮磨不清呢？说来简单：

老两口两儿一女，女大儿小。女儿玲玲出嫁到西唐村，已经生养过两个孩子了。大儿子得田在部队服役期间，订下东梁村个媳妇，当着民办教师。得田前年从部队复员，正准备结婚，那姑娘忽然转成公办教师了。这下，好事带来了麻烦，姑娘通过介绍人向老两口提出：等得田安排了工作再结婚。这不是为难人吗？国家现行的政策是，复员军人哪儿来哪儿去，从农村参军去的自然回农村，眼下招工的事又十分渺茫，谁给安排工作呀？三婶催促儿子得田到县革委会复退军人安置办公室跑过两回，办事人很同情他的处境，却无法解决他的困难。老两口白天黑夜为这事焦虑，心一横：算咧！给咱田娃另寻对象！可介绍人传过话来，说那女娃她妈她爸把女子抓得紧，表示绝对不能演出背信弃义的活剧来，令人耻笑。这样，事情就拖着，抗着。两年过去了，事情还在不冷不热地抗着。前日，介绍人从女方家里交涉回来，高兴地给方老三两口回话说，女方降低了标准，放松了口气：田娃到社办工厂也行。介绍人很乐观：“这不难！社办厂比不得国

营单位，说是不招人，悄悄儿进厂的月月有。你是老模范，公社林书记亲手给你戴过花，熟人咧！你去说一说，田娃到社办厂，没问题！”

老两口为这事，商量着，争辩着：

“你去找林书记，说说咱的困难……”

“这话叫人说不出口……”

“咋说不出口？”

“太夯口咧！咱是党员……”

“人家党员干部寻书记办事的多着哩！”老伴反驳，并且拿出本村和邻村许多证据来，十分有力。“林书记给你戴过花，人熟，好说！”

“那是叫咱好好给队里经营牲口，不是……”

“那咱有困难，不兴帮助解决？”

“这号困难……不好开口……”

“这号困难，能把人活活难死！你不想想，田娃过年就二十八咧！二娃眼看二十五！田娃的事抗着，二娃也得拖着！人家和田娃同岁的伙伴都抱上娃咧！你成天为集体，自个儿家里的事倒二五不挂！你当得好‘馍饭’来！我好苦命呀……”说着数着，竟抽抽泣泣起来。

话是实话。二十五岁晚婚年龄在农村已经是够大的咧，何况田娃眼看就是二十八！方老三看着田娃嘴唇上黄黄的绒毛已经变得乌黑，下工回到家脸上隐现的烦躁的神色，他明白，父母的关怀和温暖，对儿子来说已经是不能满足的了……现在看着老伴流泪，他心软了：

“你覅难过嘛！咱尽量……商量……”

“商量商量！还商量到牛年马年？”老伴带着哭声，不耐烦地向他进攻。

于是，方老三横了心，决定抹下脸，去找林书记。

不料，到老汉出马的时候，他又踌躇不前了。

“又不是叫你上杀场！难为得那样！”老伴说着，提起黄帆布挎包，往老汉肩上套。

这当儿，院里传来一阵架子车车轮轧轧的响声，接着听见西唐村女儿亲家响亮的声调：“亲家！”三婶急忙把黄帆布挎包取下，放在桌上。

“啊呀！你是出门呀！”亲家已经站在门口。

“到他老舅家去！”三婶随口掩饰说，“听说表哥……病咧！”

方老三低了头，苫下眼，心里愧：老伴嘴里说得硬，见了亲家却改口，可见总不是光明正大的事喀！

和方老三粗糙的关公脸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亲家那张开朗乐呵的细脸皮。同是捉锨舞镢的庄稼人，同是在一个日头底下曝晒——方老三的脸膛黑红黑红，粗深的皱纹刻在鼻翼两边；亲家的脸膛上，柔和而细密的皱褶里，显示着富裕和谐的家庭长者的通达和满足。

方老三盯着亲家，眼睛在问：你有什么事？

“你忙我也忙，咱直说。”亲家豁达地说，“你台阶上那两根木头，当下不用的话，先借我！”

“那是给田娃结婚割家具的……”三婶忙插话。

“放心！亲家母，不挡你的大事！”亲家说，“顶多半个月，我给你还来。”

“你借木头做啥？这急！”方老三说。

“尽惹得闲麻达！”亲家自怨自艾说，“咱建文的一个朋友盖房，酒都做熟了，不得破土，说差门窗料！”

“弄这号没把握的事！”方老三说，“庄稼人盖房，容易的？木料不齐，做酒做啥？”

“嗨！”亲家说，“人家托咱建文在山里买的，车在山里要麻达！咱应人事小，误人事大，要不，我给他劳神干屁呢！”

“噢！那成嘛！”方老三听说是自己女婿应下别人的事，松了口。

三婶暗暗瞪了老汉一眼，转过脸去。

聪明的亲家嘻嘻笑着：“亲家母，你放心！顶多半月，建文从山里回来，没一点点含糊！”

于是，两亲家一齐动手，把两根原木挪上架子车。

亲家也不再坐，扶着木头，推着车子走了。

老伴重新拾起黄帆布挎包，套在老汉肩头。

“这……不合适……”老三仍然迟疑不决。

“合适！刚合适！”老伴说着，把老汉推出门，“没见过你这号死吭吭！”

二

后半晌，方老三从城关公社回到方村。老远，就瞧见老伴朝西头路上瞅，她大概等得急了。

进了门，他把腾得空空的帆布包交到老伴手里的时候，老伴的神色是满意的。

他坐下端碗吃饭。

“见林书记来没？”老伴问。

“没。”老三答，“人不在家！”

“那你……”

“我跟他女人说咧，叫她给林书记带个话。”

“人家话咋说？”

“说是‘能成’！”方老三说，“那女人待人腻腻儿。”

“那咱现在咋办？等着林书记回话？”

“等着！”

大约等了十天，既没见林书记的面，也没见捎什么话来，三婶坐不住了。

凑巧，支部在广播上通知，全体党员和干部今天到公社开会。三婶再三叮嘱老汉，顺便问问林书记……

公社院子里，撑放着用五颜六色的塑料膜儿缠裹着梁架的自行车。落光了叶子的泡桐树下，坐着全社几百名男女党员和干部，静静地听公社最高领导人林书记给他们做报告。

方老三坐在人窝里，两肘搭在膝盖上，盯着讲台上林书记的脸，专心听他嘴里吐出的每一个字。林书记讲话讲得好！清晰，通俗，不紧不慢，那宽大的脑门里装得多少本事！方老三想，面对着这样一张严肃的面孔，提出个人的需要和照顾是多么令人难为情啊！林书记讲的是，要打击贪污盗窃投机倒把。老汉从心里往外舒服，觉得解气：胡整的家伙终不得好报！

看着青年男女们哗哗哗流水般一页又一页翻笔记本，他才觉得自己这双手在这样的场合里是十分笨拙的，这是这位合作化时期的老党员今生里最感到遗憾的事。不要紧！写不了用耳朵听！听不懂某些专用词听意思！穿着四个兜人民装的林书记讲得热了，解开脖子上的头一个纽扣，列举着什么地方的贪污分子许多吓人的数目字，方老三震惊、激愤，胸脯里一拱一拱。

林书记又讲起了党纪党风，说许多地方发生了行贿受贿的事。他用农村人的话解释说：“贿赂，就是‘塞黑食’！也叫‘黑拐’！”

会场里，逗起一片笑声。方老三觉得，庄稼人这句粗俗话一经从林书记嘴里说出，更添了几分令人发笑的味道。可是，他却笑不出

来，似乎有点心虚。想到那天硬着头皮结结巴巴向林书记女人叙说困难，提出要求的样子，太龌龊了！想到那女人板平脸上的腻色……唉！那叫做啥嘛……

一阵嗡嗡的议论声从会场前头泛起，后头的人也把头扬起来往前伸。方老三一注目，猛然看见，林书记正从扯开拉锁的黑提包里，取出两包点心和一瓶西凤酒来，摆到桌子上。啊呀，这就是他那天从黄帆布袋里取出来搁在林书记家桌子上的那三样儿……天呀！

“有人居然把黑食塞到我的口袋里来咧……”林书记说了一句，后面的话就被骤然掀起的笑声和议论声淹没了……

方老三低下头去，越低越下。最初的一刹那，他的心里像塞了一块冰，冷得打颤，头上的血直往下沉；现在，他的胸腔里又烧又憋，血又一股劲儿往头上脸上涌，耳朵里也呼呼呼响起来。他没有勇气抬头看前后左右任何人！任何人嘻嘻的笑声，俏皮的话语，对他都是刀林剑丛！“你做的好事！你败坏党风！”他觉得自己简直就是坐在这院子里的三五百人当中最卑下的一个了。

……

太阳落到山岭的那边去了，群峰上空还有一抹淡淡的余晖；风吹过来，冷飕飕的。方老三独自一人，挎着黄帆布包儿，背着手走着。这次会议对他教育太深了！唤起他对过去的回忆和反省。他想起自己十七八岁就扛上木模和石锤给人打土坯，靠出卖汗水和笨力混饭吃的日子；当农业社能供给他超出凡人两倍、三倍的大饭量的粮食的时候，他对农业社的感情是任何没有受过冻饿的人所难以理解的，众人一致推举这个不会用嘴而只善于用手的劳作表达全部感情的人进了饲

养室。他的心单纯得很，除了回家吃饭时顺路给女人捎一担水，吃罢饭给猪拌一盆食，其余时间，就全部花在牛马身上了……

“文化大革命”头几年，他站在饲养室的土场上，瞪着迷惑的眼睛看外部乱纷纷的世事。公社、学校、供销社的大小头头们，被人压着头，自己敲着小铜锣，游到方村来，方村的干部一晌之间全垮台了。地痞二流子张狂了，连那个外号“公共汽车”的女人，也在胳膊上套上红袖筒，过州走县地造反了！他站在槽头，对着骡马黄牛逞威风，发表醒世恒言：“乱世出奸贼！秦桧严嵩乱朝害忠良！不得久长！”

他的饲养室，历来是“闲话站”。社员们，甚至在省城工作的本村的工人、教员和小干部，星期天回到村里，都习惯到这儿来闲谝，交换从各处听来的新闻和传说，评论当今的世事，发表对种种复杂的社会关系和奇怪的社会现象的议论和感叹。方老三虽身居陋室，却保持着对外部世界灵敏的感触。近一期间，人们议论得多的，除了“四人帮”的丑闻笑料之外，就是走后门……他似乎觉得，“四人帮”给党脸上和身上抹了黑墨，“四人帮”垮台了，黑墨变成垢甲，垢甲又和肉长到一起了！

现在，他惭愧地感觉到，自己身上也有不光彩的垢甲！多亏林书记铁面无私，给他敲了警钟！“林书记给他领导下的共产党员，刮身上的垢甲！”他这样切实地理解林书记把那“三样”拿出来示众的举动；同时心里竖起林书记如钢似铁的坚实形象。“没啥！咱做下党纪不容的事，领导批评，应该喀！”他想通了，“刮垢甲，当然疼！”

这样想着，他对老伴也宽恕了。只怪自己不坚定！共产党员男人让一个普通群众的老婆缠得做出有害党纪的事，责怪老婆能说明自己正派吗?

他心里实实在在，跨步格外有力，抬头看看，村头饲养室的红瓦房脊已经可以望见一角了，耳边似乎响起一片铁链缰绳撞击槽帮的声音，心里无端地涌起一种异样的激动，眼角有湿溜溜的东西滚落下来……

三

“今日开会，见林书记来没？”

“见来。”

“说没说田娃那事？”

“说来。”

“咋说来？你倒是快些！”

方老三瞧一眼老伴热切期待的眼睛，慢慢解开黄帆布挎包儿的系带儿，把那三样东西取了出来，搁在老伴面前：“就这么说来！”

老伴睁着发痴的眼睛，张着脱落了牙齿的嘴，一下怔住了。直至方老三简单扼要地叙说过这三样东西曾经成了全公社的展览品的经过，老伴才捂着鼻子哭出声来。

她吓坏了：“不叫你受法吧？”

方老三又气又好笑：你逼着我干这蠢事的时候，胆大性又急，这会儿又吓得胡思乱想！他轻松地说：“你说到哪去咧！”

“党里头不会收拾你吗？”

“不会！”

老伴稳住心了，坐直身子，抹掉眼泪，叹气说：“咱烧香偏偏关了庙门！”

“谁都不兴烧香！”方老三用强硬的口气教育老伴，“林书记是清官，不受香火蜡表！”

“那咱田娃的媳妇……”老伴的心事又泛上来。

“我看还是我当初的办法！”老汉说，“让介绍人去和人家说响，同意和咱农民结亲，咱马上办；不同意的话，各寻各的相！”

“那……也对！”三婶也横下心了，“把人折腾得够咧！”

这当儿，院里又响起一阵架子车车轮轧轧的声音，随着又听到亲家爽朗自信的腔调：“亲家，给你还木头来咧！咱说到办到！”

老两口慌忙迎上去，帮着亲家把木头卸下来。

“红松木！”亲家夸耀说，“咱建文昨黑把车开回来，今日给朋友送捎带的东西去了，明日来看你。”

老三不在意地应承说：“回来了就放心了！”

亲家接过一杯茶，拍着方老三肩膀，喜不自胜地说：“亲家，你给我帮大忙咧！”

“两根木头，能帮你啥‘大忙’！”

“覅小看这两根木头！”亲家神秘地说，“给玲玲把问题解决咧！”

老两口相对一望，他们的女儿有什么问题需要解决呢？不由地同声问：

“玲玲咋咧？”

“玲玲进社办印刷厂咧！”亲家炫耀着，说话的声音像唱歌，“今天娃办手续，明天和建文来看你，后日就到厂里上班呀！”

“啊呀！”老两口同时惊叹一声，实实想不到，已经生过两个孩子的女儿，后天却要进社办印刷厂当工人了……

“你知道我给谁借木头？”亲家故弄玄虚地低声说，“林——书——记！”

方老三简直像傻了一般愣在那里，林书记矜持而严肃地把那“三样”东西摆到桌上的时候，曾经使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心灵受到怎样的震动啊！可是……

“你看，两根木头，给咱玲玲解决了这个大问题！”亲家只顾陶醉在快活的情绪里，根本不知对方心里在咽泪淌血，“你看嫽不嫽？”

“嫽——哇！嫽——”方老三笨拙地嚼着这几个字，猛然，一拍桌子，“嫽得好体面！”

亲家万万想不到老三竟躁了。他扑闪着眼皮，怔怔地问亲家母：“这是咋回事？”

听老伴给亲家叙说起来，方老三长长哀叹一声，双手抱住头，顺墙蹲下去。

亲家听完，却不恼，反倒笑了。他笑方老三太愚鲁了："好亲家哩！你不听人说，林书记家婆娘把点心都搁得发霉长毛咧！你笨得……"

"啊！"三婶的嘴噘起来。

"你老哥，太实心眼啰！"亲家说，"而今办事，跟早先不一样啰！公事兴得私办！你甭急，建文回来了，让他给林书记说说，田娃的事，问题不大！"

方老三苦不堪言，摇摇头，摆摆手。

"你甭死心眼！老哥！而今世事就是这！"亲家发表他的处世哲学，"你甭看你是党员，是模范，林书记给你在台子上戴花哩！论办事，我在林书记跟前说句话，比你顶用！千里国法人情在。老话还没过时！"

方老三抱着头，听着亲家用腐朽的人情思想大胆地教训他这个实实在在的共产党员，简直不能容忍！他痛苦地皱着眉，问："那两根木头，林书记给你多少钱？"

"说你傻你越傻！"亲家压低声儿，"咱能要钱吗？要了钱，玲玲能进工厂吗？"

"好！我要你这一句话！"方老三霍地站起，"咱告他！"

"你疯咧？亲家？"亲家从椅子上立起来，吃惊地说，"你不想叫建文给田娃办事咧？"

"不想！"

“你连玲玲的事都想踢腾了？”

“踢腾咧就踢腾咧！”方老三变成癫狂状态了。

三婶六神无主地愣坐着，不知如何开口。

“你真个要告？”

“真个！”

“哈哈！”亲家仰起头，放声嘲笑说，“上头来人问，我说没屌事！没有！挑断牙筋也说没有！”

“你咋是这号人？”方老三瞪大眼问。

“你咋是这号人？”亲家嘻嘻笑着反问。

亲家轻松地抖一抖肩膀，走出门去，诡秘地一笑，大声宣布结束这场争论：“亲家，我今日来，啥话也没说！没有！”

方老三头也没转，坐上板凳，摸出烟袋，眉头上暴起疙瘩，雕像一般，一副心事重重的脸色……

四

过了三天，田娃的媳妇来了。

姑娘一见未来的阿公和婆婆，开口先做检讨，把老两口又弄得发愣了，怎么净遇些料想不到的事呢?

媳妇先检讨她有错误思想儿，给田娃出了难题，让一家人伤了心！特别是听说林书记把阿公送的“三样儿”在全社党员、干部大会上示了众，她难受了；她妈她爸把她骂了整整一夜，学校党支部书记又找她谈话……说着说着哭起来了：“我对不住党，对不住俺爸，对不住俺妈，对不住你二老，也对不起田娃……呜呜……”哭得好伤心，鼻涕眼泪把花手绢都擦得湿溜溜的了。

三婶流着眼泪笑着，把可爱的姑娘搂到怀里，再不许娃检讨了，人来了就把她的心事完全取掉了。

方老三笨拙地站在一边，不知该说啥好，干脆退出门来，钻进他的饲养室去了。按说这桩心事已经取掉，应该舒心地筹办田娃结婚的事项了，可他仍然皱着眉头喂牲口，皱着眉头给家里捎回一担水来，仍然是一副心事重重的神色……

1979年9月 枣园梁

猪的喜剧

一

在正街背后，一家县办工厂的土围墙的墙根下，是猪羊市场。泡桐树浓密的枝叶搭成的阴凉下，摆着一摊一摊被缚着前腿还在活蹦乱跳的猪娃，吱吱乱叫；水渠边的白杨树上，拴着一头一头克朗猪，在水里躺，在地上拱。戴草帽背竹笼的岭上庄稼人和推着自行车的川道里的庄稼人，同时从狭窄的巷道拥进猪市来……

田坊三队的来福老汉，腰里缠着一条麻绳，背着手，把矮墩墩的身材也挤进猪市来了。他戴着一顶发黄的蘑菇帽儿，倭瓜脸上，有一双耷拉着眼皮的毫无光彩的眼睛，细小的鼻梁下，长着个瓢儿嘴，嘴角贴着两撮淡淡的胡须，长相实在是平凡到有点丑陋的程度；可并无狡诡的气味，给任何人的印象，都是老实巴交的。

他从猪市这头挤到那头，间或在吵吵闹闹的人堆前站一站，瞧一瞧正在争议着价钱的猪娃，听一听成交的行情，就毫不留恋地走开了。啊呀！猪娃好价钱！最好的仔猪娃卖到十八块，最次的比老鼠大不了多少的毛疙瘩货，出口也要十二块，这是今年最好的价钱了！灵啊！今年麦子稍微比去年收成好些，忙后猪就涨价！口粮稍稍宽敞点，庄稼人就想给圈里添一头猪娃！

了解了猪娃的行情，那些拴在树上的克朗猪，架格好的，毛色润的，来福老汉不用打问，也能估摸出价钱来。

来福转到最西头，在一棵白杨树下，瞧见了一个令他动心的对象——这是一头母猪，肚皮紧紧夹在一起，经过几代仔猪咀嚼的奶头滴溜得老长，嘴巴又长又弯；拱起的脊梁，骨头棱蹭；背部和臀部，毛已磨脱净光，而脖下长的毛倒有一拃多长。拴在那里，无人问津。主人蹲在一边，无聊地抽烟，真是张飞卖火晶柿子——人硬货软！

来福老汉走上前，主人苦情地解释说，他们口粮短，人凭买高价粮过活，猪是更受罪了！他长得身高气壮，满口热诚地保证说："你尽量看！保没麻达！货卖识家！只要搭一把粮食，还是一头好母猪，保生哩！"

来福把猪摸了一周，信了主人的话。病是没病，就是一身癞癣，这好治！

"价咋说哩？"来福仰起倭瓜脸。

"我看你老哥也是实在人，咱不说诓，按这相——"卖主伸出两个粗硬的指头。

"不值！"来福笑着摇摇头，"不值！"其实，他心里踏实了，这个价是要得不扩外的。

"值多少？你说！"卖主说，"漫天要，就地还！"

"这——"来福先伸一个食指，又伸出五个指头。

"啊呀！十五块能不能卖个猪娃？"卖主说。

"金猪娃，银克朗，仨钱一木锨的老母猪。你这还是个病货！"来福说，"好咧，添一声，十六！"

“我降一块，十九！”卖主叹一口气。

“我再添五毛——足顶喽！”来福也叹一口气。

“我再少赚五毛——到底喽！”

来福停住口，接近成交了，又在猪身上察看起来。他发觉，急于腾手的卖主肯定要着急。果然，那个急性的人喊说：

“算咧！算咧！你嫑看咧！咱当腰一斧两头齐——十七块！算你的猪！让猪跟你享福去！”

把十七块钱交给卖主，来福从腰里解下麻绳，拴在猪的后腿上，瓢儿嘴咧一咧，向卖主笑一笑，算是礼节性的告别。他顺手从树上折下一股杨树枝儿，轻轻拍着母猪的耳朵，指挥它按自己选择的路径，避开正街拥挤的人窝儿，绕到后街，上了宽敞的公路。

来福赶着猪，任那可怜的畜牲一摇三晃往前走。猪走得快了，他也快了，猪走得慢了，他也慢了；遇见一坑洼水，猪滚进去了，他就蹲下抽烟等待……回到田坊村的时候，日头已经压着西原的平顶了……

二

听到来福在街上拾合茬买回母猪的事，邻近的社员纷纷前来，挤在猪圈旁边看稀罕。庄稼人对广播上从早到晚吵吵的事情冷漠得很，对猪呀羊呀兴致蛮高。好多人跨着急步而来，探身朝圈里盯，脸上马上失望了。

“骨架美着哩！”这是极勉强的赞扬。

“吃食也美！”这是很现实的评价。

“要填起这空架子，怕得二百苞谷！”有人说起鼓励话。

来福蹲在碌碡上，绷着倭瓜脸，装着旱烟，不表示得意或失悔，他心里有数：等着瞧吧！等我喂出一头引着十来个小猪娃的大母猪的时光，看你们说啥吧！

女人家心里没底！来福对经不住众人的议论而埋怨他的老伴算起细账来：“十五块钱买个猪娃，一年长到百五，卖七八十块钱，得喂二百苞谷，而这么多粮食家里是无论如何也拿不出来的。这头母猪，换过那身瘦皮，末伏配上种，正好在秋后出一槽猪娃。春秋两季，是社员养猪娃的两大季节。按十个算吧，少说一个卖十三四块，会有多少收入？”他乐观地说，“你放心，我喂了一辈子猪，看不来货色吗？”

看着老伴噘得高高的嘴轻轻地舒出一口气，他知道老伴的担心解除了，喝了老伴端来的凉面汤，背上草笼，提着草镰，前脚就跨出了门槛。

背后传来老伴的声音：“你做啥去？”

来福回转身：“给猪挖一笼草去！天还没黑哩！又没事喀！”

“你跑了一天，也不歇歇腿……”老伴说。

“嘿！咱庄稼汉，那么值钱！”

钻进村子背后的坡沟，从沟下挖到半坡，肥嫩的青草就把竹条笼塞得满满的了。天色暗下来。来福老汉把草镰往地上一丢，长长嘘出一口气，两腿酸困得一扑塌坐在草坡上。习惯地摸出旱烟袋。

来福老汉是田坊村最老好不过的老好人。生活只教给他一种本领：靠双手出笨力吃饭。他只能从颜色的差别上辨认人民币，解放初在冬学夜校识得几个字，长年不见面，早已谁认不得谁了。农业社好！灵人一个劳动日分八毛，咱笨来福也分俩四毛！想想农业社初建立那几年的红火光景，看看这几年乱混混的景象，他庆幸：紧亏那年盖了三间厦房，要是这几年，年年二三毛钱的工分价值，他还得钻在那个祖先传下来的土窑洞里。

来福老汉想不来，那年为啥要吃大锅饭！大锅里吃光了，关了门，叫社员受了三年罪！刚刚还过阳来，又搞“社教”，一棍子齐刷刷把书记、队长打下去（尽是从合作化闯出来的好人），换上来一班新人。没干下一年，“文化大革命”开火喽，这些人又被另一帮人撵下台！田坊村人事关系复杂得谁也理不清了！

更值得庆幸的是，咱来福老汉社教从没给人提过啥意见，“文化大革命”胳膊上也没套过红套套儿！他不会说话，更不会咬人，谁也不需要他这样的笨佬儿作累赘！这倒好！“咱没朋友，也没敌人！嫽！咱过咱的穷光景。”

穷光景也实在难过。三队今年上来的队长，是众人硬说得拧不过脖子才应承下来的。他只保证自个儿按时出工，按时下工，至于社员干多干少，迟来早走，他是连看一眼也不看！他在“社教”运动中挨整挨得怯咧！决心再不得罪一个乡党！笨人来福看得出来，队里乱得一窝麻，年底能盼来什么好分配吗?

既然队里靠不住，老汉就得想办法，总得要吃要穿喀！这头母猪啊！盐要从你身上出来，醋要从你身上出来，炭也要从你身上出来呀！……

这一切都能出来！来福满怀信心：凭他养猪的经验，凭他的勤苦经营照料，能成！

拾起草镰，背上草笼，跨开有点僵硬的腿脚，来福老汉从坡上走下来，暮色苍茫了。

三

一月以后，来福老汉猪圈的栅栏门口，又围着一堆人，一个个把头从矮墙上探进去，就惊奇地叫起来了。

这母猪变得叫人难以置信：老毛老皮蜕掉了，长出一身黑油油的新毛，平直的脊梁下，吊着刚吃饱食而鼓起的肚子，四蹄粗壮有力，在圈里悠闲地散步，让众人欣赏它已经恢复起来的姿容。

来福被挤在旁侧，听着众人的议论，心里是一种胜利者的骄傲吧？没有。想想吧，老汉一天三晌，在别人工间休息抽烟聊天的时光，他爬到沟坎里挖一抱草；要是在河川，他就钻到玉米地里拔草，玉米叶子把老汉的脸皮划得一道道印儿，汗水浸渍得烧疼烧疼。天天有嫩草，母猪能不长吗？他拔来了几样草药，熬成汤水，连着给猪洗刷了七八天，癞癣除治了，老汉自己却累瘦了。

一天三顿饭，来福都是蹲在圈口的半截碌碡上吃的。猪在圈里吃食，他在圈口装着吃饭；当饭碗里的玉米糁的温度凉到可以伸进手指的时候，他就一揭碗底倒给心爱的畜牲了。然后，再去舀第二碗，那才是他真正下肚的食物。

有一天，老汉刚把饭倒进猪盆，转过身，呆住了，呀！老伴正站在身后。

这样浪费粮食，对于他们这个买着高价粮的家庭，意味着什么?老汉惊恐地瞧着老伴，准备承受勤俭的女人理所当然的数落。他看见的是一双贤明而又严峻的眼睛。

“你为啥要瞒着我？”

那音调是痛苦的，来福答不上话来。

“你不能一顿吃一碗饭！”

像一条热乎乎的东西贴在心口，来福老汉感动了，给老伴诚诚恳恳赔笑说:“我只说，从我碗里省出点……一点……”

“要省，从咱锅里省！怎能从你碗里……”她的声音颤抖了，没有说出那个“省”字。

来福老汉闪一下眼，顺着围墙就势蹲下去，抬不起头来了。

于是，他的老伴每一顿给锅里多添两瓢水；饭稀固然是都稀了点，给猪从锅里省出细料来……

来福的母猪能不改换容颜吗?

这一天，早饭后，来福喂完猪，走进门，高兴地给老伴下命令:“给我装俩馍！”

“做啥？”老伴正在洗碗，头不抬，问。

“到县里去！”来福动手取布兜儿。

“上县做啥？”老伴抬起头。

“好事！”来福笨虽笨，高兴时也会卖关子。

老伴低下头，又叮叮咣咣洗刷着碗筷，一副并不介意的老成持重的神气。

来福弯下腰，压低声儿，对着老伴耳朵说：“引咱那宝贝寻男人去……”

老伴听了，几十岁的乡村老婆脸红了，说：“老不死的！”

四

眼看着母猪的肚皮一天比一天鼓胀，奶头擦着地面，肚子表皮明显能看出新的生命在跳动，来福老汉心里又喜又怕，只怕出什么意外。这天后晌，看见母猪在圈里不停地拨拉柴草，他知道，这是临产的征兆。

为了防止母猪压死刚生下的猪娃，来福把架子车拉到圈边，铺上被子，守睡了一夜，夜里的露水把被子打湿了，母猪却没分娩。

连着三夜，来福毫不气馁，反倒更小心了。

第四天半夜里，一声又尖又脆的猪娃啼叫，带着欢乐，带着希望，也带着对于勤俭劳苦的主人的安慰，扑到来福的心怀里来了……

“啊呀！到底能生！”来福老汉心里最后一层提心的迷雾清除了。

从此，圈里有了十条新的生命在欢蹦乱跳。来福老汉上工一回来，就在圈里清除粪便，垫上干黄土，喂食喂水。

他做完这一切，就蹲在一旁，看那些小家伙在母亲的奶头下乱拱，在铺着干土的圈里撒欢，那叫声比音乐更动听，欢蹦的姿势是最优美的舞蹈，越看越令人心花怒放。

来福突然发现，母猪蔫头蔫脑，烦躁地躲避着追逐乳头的猪娃。他一愣，抓住母猪耳朵一摸，啊呀，烧烧儿！不好！要是有个三长两短，这里将会出现怎样不堪设想的惨景！

他借了十块钱，蹚过已经冰凉的河水，到小镇兽医院买回来兽用青霉素。只有这药退烧好！也快……花得那十块票儿剩不下几毛，母猪总算渡过了劫难。来福老汉好一场虚惊，照管得更加小心了。

老汉的倭瓜脸更显得干瘪了。他自己却丝毫觉察不出，仍然喜滋滋地忙碌着。

“猪离母，四十五。”

三十天刚过，来福老汉看着这些小家伙长得一样姿身。尖耳朵，和县良种站那头公猪——它们的父亲——一模一样。腰身修长，腿杆粗实，像它们的母亲。杂交货真不赖！

连续有五六个乡党来订货了，来福笑脸相迎，满口答应，不敢窝了乡党的兴头儿！

喝汤时分，最早提出订货的克贤老汉代表买猪户议价来了。

“好说！好说！”来福慷慨地说，“都是好乡党，给几个算几个！”

克贤笑着，说他们在一块私下商量了一下，参考比照集市上的行情：前日县集上最高的猪娃卖十五六块，来福的猪娃值得这个价……

“好说好说！”来福仍然笑着，“乡党情谊要紧！”

“俺们不亏你。”克贤仗义地说，“伢猪娃十六块，母猪娃十五块！”

来福明白，由于秋粮普遍减产，本来是涨价的季节，猪娃倒比他忙后买母猪那阵儿跌价了，十六块实实在在是顶高的价了。他的倭瓜脸显出激动的神色，决然说：“是这，伢猪十五，母猪十四。你回去给大伙说清。”

克贤笑了：“没见过卖猪的倒自己削价！你老哥真是好人！”说着，又提出，“啥时候捉呀？”

“四十五是老话，咱给乡党保险养足四十天。”来福说，“母猪多领一天，到底好！叫乡党捉回去，保养保活！咱多受一天麻烦没啥！”

克贤老汉带着满意的笑容，客客气气走了。

再过三五天，猪娃就要出槽了，一百四十多块钱就是实实在在的了。这一笔收入，对于来福是非同小可的。

老两口开始计议，如何把这一笔钱，花在最需要办的事情上，不敢乱花！

来福提议：先买三百苞谷，明年春三月，粮食肯定要涨价！

老伴同意这个结实的提议，重申庄稼人只要有一把苞谷吃，就能活下去的道理。她又提议，再买几串箔子，把房顶修补修补，阴天下雨漏得太凶。

“对对对！再不敢拖迟！”来福说。

俩人计议着，商量着，和谐而又合拍。

小孙女爬在奶奶膝头，叫着“奶奶！”撕扯着带补丁的衣衫。

老伴向来福神秘地一瞥：“孙女要衫子哩，你看见没？”她又指着孙女的额头，嗔声说：“你也看见你爷爷的猪娃咧？还不是你妈的鬼心眼教的！”

来福呵呵笑了：“买买买！给娃扯件花衫衫！”

“我不要花衫衫！我要雨鞋！”孙女说，“下雨上学没雨鞋，光脚片，钉子把俺脚扎烂咧……”

老伴收敛了笑容，一双雨鞋又得四块多！

来福想，已经分居的儿子，教书十多年了，只挣三十八块钱，欠下队里二三百，孩子们连双雨鞋也没有。他拍着孙女蓬蓬的头发，决然说：“买！雨鞋买下，花衫衫也扯！”

孙女高兴地笑着，跑出门去了。

老两口心里是少有的欢乐。来福长长地打了一个呵欠，几个月来的劳累一齐涌来，倭瓜脸上带着幸福的微笑，钻进被窝，拉起了鼾声……

一阵敲门声传来，来福被惊醒，迷迷瞪瞪下了炕，队长正一脚踏进门来。他一眼看出，队长神色不对窍！这个中年汉子，自打“社教”

挨了整，平时对一切人和事，永是一副冷漠的面孔，今日倒有什么事显得神色紧张？怕没好事吧？

果然，队长告诉他，公社天黑时召集紧急会议，公布了公社制定的“关于发展养猪事业的十条规定”。其中两条涉及来福的现实利益：社员养的母猪一律不准卖掉；母猪生下的猪娃，不许上市，交生产队分配给社员，价值统一定为七角一斤……

“啊呀！我的天！”来福简直不敢相信耳朵，似乎是在做梦。这怎么办？

“老天爷！制度光治咱命苦人！”老伴也慌了。

“是这样。”队长说，“咱队就你一家养母猪，你受的难场，我知道。我想，你明天一早把猪挑出咱县，到邻县集市去卖了……”

“那人家查问你时咋说？”来福急忙问。

“我今黑先不传达！他问时，我说我病咧！推诿过去！我明天传达时，你早走了；走在传达之前——不知不为过喀！”队长早想好了逃避的办法，胸有成竹地说，“顶多韩主任批评我几句，没啥，比你损失一半收入强！”

来福老两口简直感谢得不知说啥是好，这个平时冷漠的队长，有这样热心体贴人的好心肠啊！还能说什么呢！

“你快准备，早点走！”队长出门时，叮嘱说。

来福的瞌睡早已跑光，事不宜迟！他命令老伴：“寻草绳，捆猪娃！快！”

五

鸡啼出村，过河，翻过原坡，天明时分，来福的双脚已经踏在另一个县属的土地上了。庄稼人吃罢早饭的时光，来福在陌生的集市上找到了猪羊市场，在一个偏僻的角落里，放下装猪娃的担笼，双脚已经疲倦得站不住了。

集市刚开，那些买主们背着小笼，问问价，摸摸揣揣猪娃，并不还价，就走开了。他们刚来，还要看看行情……

当刚刚换上夹衣的庄稼人蜂拥进猪市以后，嗡嗡的市声在空中盘旋。来福周围蹲着一堆堆陌生的庄稼人。这份在市面上拔尖的猪娃尽管放在偏僻的角落，还是逃不过庄稼汉们的眼睛。好几个实心的买主，早已把挑中的猪娃压在手下，合伙向来福进攻：交涉价钱。他让价已让到十六，买主也添到十四，接近了……

这当儿，伸过来一只手，压住了竹条笼的木梁。那手区别于所有劳动过的粗糙的庄稼人的手，细长而又干净。来福抬起头，看见公社韩主任的脸，那脸正得意地冷笑着。

“这窝猪娃我全买下咧！要啥价，给啥价！”庄稼汉们一齐拧过头，看这个出口说出这大口气话的人。一看见那身政府工作人员的装束穿戴和神气，大家伙都不再吭声，有人预感到什么纠葛将要发生，悄悄儿溜走了。

“往那边担！”韩主任命令他的社员。

来福一看，那边正停着一辆汽车。

“韩主……任……”来福的倭瓜脸上堆起求饶的巴结的笑容，“俺只这一回……”

“少说废话！”韩主任往后一退，就有两位青年走上前，一人提起一只笼，朝汽车走去。

汽车上，靠车厢坐着五六个人，全是从几个集镇上抓获的本公社的社员，他们装猪娃的笼担一齐放在车厢里。

“自发势力真鬼！”韩主任手叉着腰，对着车上低头耷脑的那些社员讽刺说，“我早料到这一着！跑吧！你能跑出中国？”说罢，跳上司机台，砰的一声关上门，汽车开动了。真威风！

来福脑子里木了。过分紧张的神经刺激和长途负载跋涉耗尽了他的精力，那已到晚年的庄稼人瘦小的躯体里，现在只有酸困和疲倦，他靠在车帮上，迷糊了。

当韩主任的吼声把来福惊醒的时候，睁眼瞅见的竟是田坊村熟悉的村街和房舍，车上的人都不见了。

村里的人闻声围过来，大队和小队的干部也被传来，汽车是临时讲台，韩主任向社员和干部讲了“十条规定”和抓获来福的经过。讲毕，要来福做检讨。

来福低着倭瓜脸，一辈子没上过高台的人喀，现时站在这么高的汽车上，面对着那么多的眼睛，来福说不出一句话。

“钱要紧，还是社会主义要紧？”韩主任问。

“唔！”来福含含糊糊点点头。

“唔什么？问你哪个要紧？”

“都要紧！”他如实说。

“胡说！社会主义！”

“唔！社会主义！”他赶忙纠正自己的糊涂。

“现在要对小生产全面专政！”韩主任说。

“啊……”来福一听“专政”二字就慌了神，腰都几乎弯下来。

他终于被允许从车上爬下来，从背巷里回家去，倒在炕上……

当生命和力量又支撑起来福小小躯体的时候，他从梦里回到现实，屋梁上的电灯亮着，克贤和老伴在说闲话。

他被告知，那天他从汽车上下来之后，韩主任当众把十头猪娃分配给田坊村的社员了，七毛一斤。老婆劝他：“算咧！算咧！人平平安安，就谢天谢地了！”

“嫑难受！人要紧！”克贤劝慰说，“全当没养母猪！”

来福强装笑着。

“现时政策变化大！”克贤说，“比咱高一头大一膀的人，挨挫的还少吗？咱一个普通百姓，死一个人还不如只蚂蚁！想开点，好自为之！”念过几天书的人，给没念过书的来福讲宽心话。

来福敬重这个识字知礼的开明庄稼人，诚服地点点头。

“虽则一切归了公，政府还不放心！”克贤说，“怕咱庄稼人思想不归公！”

来福佩服这种看法，又不明白，问：“也把世事治得太死咧！咱吃盐吃醋都……”

克贤摇摇头，笑了。牵扯到对政府的是非话，他是守口如瓶的。避开话题，说：“分配得到猪娃的乡党，心里过不去，叫我给你把钱送来，补个差数！”

“啊呀！”来福吃惊了，感动了，一下从炕上溜下来，压住克贤正在怀里摸揣的手说：“贵贱不敢！韩主任逮住风了，我还能活吗？”

“不怎！”克贤小声说，“乡党们都说，‘咋也不能昧着良心，拾你的合茬喀’！”

“乡亲心意我领咧！”来福死死压住对方的手，“我寻着挨挫呀？快给乡党说，不敢胡来！”

“你留下……”克贤送。

“不敢！”来福推。

“留下……”

“不敢……”

当两双手推来推去的时候，最后都推不动了。来福瞧见克贤开明的眼睛里浸出一股湿溜溜的东西，他的眼睛也模糊得什么都看不清了！

六

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来福老汉一天三次扛上工具，走出小院去上工。他不向任何人叙述自己的不幸，平静地对待已经发生并且过去了的一切。休息时，年老人坐在地畔抽烟，他也坐下抽烟，再无兴趣和热情去挖草了。

回到家，来福蹲在院里吃饭，压根没有去猪圈的心思。一天三顿，只供给它三盆纯粹的粗饲料，再也舍不得一把麸皮咧。

不管来福的感情发生了什么变化，母猪仍然按照自己的生理规律在运动。看，围圈上的石头被拱塌了，栅栏门的小木柱也拱歪了，来福抄起一根木棍，打得那疯狂乱窜的家伙钻到窝棚里去。他发现：这贼又发情了……

后晌放工回来，栅栏门倒在圈口，那畜牲早不见踪影。

“找去吧！”老伴催他，“一条命哩！”

“让狼吃掉好了！”来福冷冷地说，不是赌气，是说实话，“我正熬煎腾不了圈哩！”

他没有找。

第二天后晌，当他要去上工的时候，那牲畜却蹿进小院的土门楼，从倒在地上的栅栏上踏过去，吞食昨日剩下的料食。

不久，来福老汉就看出，母猪的肚皮开始鼓胀起来，一摸，又有新的生命在母体里搏动——这个不知羞耻的东西，不知和哪里的公猪私通过一番，已经怀孕了。

来福心软了，怪猪的什么呢?

他开始给粗饲料里撒进麸皮，继之又每顿倒进一碗饭去，可别净生出些小老鼠似的猪仔来啊！

春节一过，母猪生下八胎小猪，尖嘴，细腰，个头小。来福怎么也提不起精神来。

已经超过了四十天，村里没有一个人来过问来福老汉的猪娃。老汉心里明白，春二月高价玉米涨到三毛钱一斤，猪价大跌，市场上最好的猪娃只要五块钱……

他却庆幸：咱不必上市场！咱按公社“十条规定”里说的，七毛一斤卖给队里，倒比市场强。

来福找到队长，说明来意。

队长很作难，说：“按理说应该给队里。可目下市场上，三两块钱就捉猪娃，你交给队里，谁逮呢？没人逮的话，我可咋办？”

“那……那上一回市场上猪价大的时候，就按‘十条’办，现实猪价跌咧，就不按‘十条’办咧？”来福说。

“上回那事，前后你明白，由不得我喀！”队长说，“那是韩主任一手做主……”

来福能听明白，队长无坏心，现在的事，要找韩主任做主。

恰好，韩主任因一件公差，从田坊村经过，在禾场边，来福挡住韩主任的自行车:

“我给你交猪娃，韩主任！”

“我要猪娃做啥？交到队里去！”

“队里不要！”

“队里不要，我没办法！我又不养猪！”韩主任摊开双手。

“你有‘十条规定’哩！”来福说，“那还算数吗？”

韩主任这才认真瞧瞧来福，发现这是一张他曾与之交过手的面孔，说：“队里不要，那你自行处理去。”

“那不行！”来福说，“你规定叫交给队里，我就交给队里！”

周围围来一堆人，韩主任说话和气了点，也客气了一点：“算了！队里不要，你到市场上处理去。”

来福摇摇头，问：“你批评我：‘钱要紧，还是社会主义要紧’？我现在知道，社会主义要紧！我不上市场那资本道路……”

韩主任看着抓住他把柄的老汉，“呵呵呵”笑着，说：“我啥时说过这话？”

“在汽车上，有乡党为证！”来福指着大伙。

韩主任仍然笑着：“那阵是那阵，现时是现时！这样吧，我回头给队长谈谈……”说着，推动自行车，“我还有急事！”

来福说不出话，呆呆地望着韩主任远去的背影。几个青年纵容他：你把猪娃担上，担到公社去，倒在他韩主任办公室，看他咋

说……

来福想想，这样做确实解气，也有理！不过，他终于没有做出这种英雄的举动来……

1979年10月 小寨

立身篇

一

民政干部薛志良坐在王书记对面的椅子上，眼睛瞅着写得密密麻麻的工作手册，汇报完县上关于招工工作的详尽安排后，抬起头来，看见坐在床铺与办公桌成直角交叉地方的王书记，右手手掌托着腮帮，胳膊肘撑在桌子角上，睡着了。

唔！他大概没听进去几句。老薛轻轻叹口气，心里很不是滋味。就此走掉呢，不好；不走吧，又不好意思叫醒他的领导者。为难的当儿，他无聊地观察起全社一万多人口的最高领导者来：头上带耳扇的旧棉布帽歪了，身上的衣服褶皱里，藏着灰尘，两只脚上，黄泥巴糊住了手工制作的棉鞋的多半个鞋面。他睡得挺香，嘴唇噘着，失修的稀稀落落的胡须又乱又长，挨近五十的中年人的长脸上，显示着疲劳和困顿。老薛忽然同情起自己的领导人来，他整天奔跑在公社所属的二十几个大队里，十多个新老社办企业里，帮助他的下属们解决许多棘手的问题，夜里总是熬眼吧！老薛原谅领导者不礼貌的行为了，无可奈何地又叹一口气。

这时候，王书记醒来了。

“嘿呀！”王书记抱歉地笑笑，眼白里罩着一层粉红色丝膜。

老薛也笑笑，表示谅解。

王书记站起身，扯下毛巾，在洗脸盆里蘸上水，狠劲擦拭着脸，一边问:“主要精神是啥? 用三五句话说。”

薛志良沉吟一下，企图把本本上记了六七页的记录，高度概括出来，他说:“县上要求，这次招工，所分配的名额，全部下到队里，公社不许半路拦截扣留一个名额，就是不准任何人以任何借口走后门。粉碎‘四人帮’了……”

“嗯！”王书记点一下头，又问，“给咱分了多少名额? ”

“四十。”薛志良回答，“知青二十五，农青十五。”

“县上具体怎样安排? ”王书记问。

“先用一周时间宣传，做好思想教育工作；第二周把名额下到大队，定下人选报回公社；第三周政审、体检；第四周报县待批。前后一月，不准拖延。”薛志良说。

“好！”王书记说，“你给咱提一个具体方案，周一晚上开革委会例会时讨论，通过了就办。”

薛志良点点头。

“多年没招工了，问题肯定多！”王书记说，“工作做扎实，争取甭出问题。”

“县上领导再三叮嘱的，也就是这意思！”薛志良说，“就怕各种‘关系’干扰……”

“甭怕！干扰是肯定的。”王书记说，“关键是咱俩，我是这儿的一把手，你是具体办事人，矛盾肯定会集中到咱俩头上。咱俩撑硬，把杆杆儿撑端立直，事好办！”

“我保险！”薛志良笑着保证说，满有信心地走出了王书记的房子。

二

薛志良用一块红纸写了“招工办公室”几个字，贴在门外的砖墙上，以免来访者乱敲冒推别人的门板，影响其他同志工作。然后坐在办公桌前，摊开纸，起草方案。

一阵汽车轮轧轧地响进院子，接着是车门开关的嘭啪声；再接着，他的门被推开了。

“玉生在不在？”来人着呢大衣，站在门口问。

在薛志良的记忆里，人们对王玉生的习惯称呼是“王书记”。他在公社当民政干部五六年里，几乎没有听过直呼其名而连姓也不带的声音，这是大人对小孩那种既藐视又亲切的口气。

“在！”薛志良立即站起，走出门，把来客引到王书记房门口，推开门：“王书记，有人找！”

王书记正和办公室的秘书谈什么，转过头，辨认着来人。

“玉生！你在这儿独霸一方！好难找哇！”来人嘻嘻哈哈说。

王书记醒悟似的慌忙站起，迎到门口，惊喜地笑着：“啊呀！老关！想不到是你，到俺这山沟野洼里来……”

“山里有神舍药，求者不远千里……”

薛志良走回自己的房子来，看着小院里蛋青色的小轿车，那玩意儿停在泥土地上，显得特别耀眼。县委和地委领导来公社检查生产和工作时，总是坐吉普；看派势，听口气，来人非同一般。

大约一小时光景，王书记走进门来，坐在老薛对面的椅子上，皱着眉头，一脸难色，抱怨说：“难弄！事情真个难弄！”

薛志良大约能猜摸出几成，问：“怎咧？”

“嗨呀！你猜那是谁？咱的老上级，现在在市里当什么部长。”王书记说，“来干啥？开后门来了！”

“噢！”薛志良证实自己猜得不错。

“老领导一来先翻老账：‘我在县上那阵儿，到你们村见你头一面，你小伙儿下雪天穿着单裤，光脚片穿着烂鞋，我当时叫人给你先解决了一身棉衣，记着没？我把你提拔到县团委，头一天，你一顿吃了七个软蒸馍……’他这么说话，我开不开口喀……”

“他要给谁办啥事？”薛志良问。

“他们部里一把手的外孙女，在咱东王插队……”

“你应承了没？”

“老领导甩出了这面子，我……”

“算咧！那就留下一个名额吧。”薛志良替领导解围说，“就是不好推。”

“下不为例！”王书记下决心说，口气有点气哄哄。

薛志良笑着，点点头。

“看来，这件工作比所能设想到的麻烦更多！”王书记走出门后，薛志良这样想。其实，在县上昨天召开关于招工工作会议之前两个多月，早就风传着招工的消息。他是民政干部，经常被关心这件事的人们询问着，打探着。他用一句话回答任何人：“没见上级正式通知。”许多穿着各色衣服的人，做出谄媚的、讨好的、巴结的脸色，提出将来一定要帮帮忙。他也用一句话应酬：“等上级传达咧，到时候看，不违反政策，尽量帮忙……”有什么办法？在文明的城市和落后的农村之间存在着明显差别的当今中国，谁有本事和力量能扭转这股强大的进城的洪水？特别是党的传统思想被污染以后，问题更加难以正常处置了。现在看吧，上午刚把招牌一贴出门，他的房子里就拥来许多人。他索性把要起草的文件纸张收拾起来，锁上门，躲到搞计划生育的女干部的房间里写，这儿是人人闻之却步的冷清衙门。

大约还没写两页，老薛就听见有人在院子里呼喊他的名字，那声音又粗又响，叫得又紧，简直跟叫驴的嗓子一般无二。

薛志良只好合起纸笔，走出门去，见社办砖厂厂长杨谋儿站在院子里，东张西望。此人四十多岁，墩墩个儿，光头发亮，肥眼泡下一双又大又诡的眼珠一瞅见他，就急不可待地喊说：“老薛！快快快！王书记叫你！”

杨厂长跨步过来，一只胳膊搂住薛志良的肩膀了；看去像是亲热的举动，而实际感觉那粗壮的胳膊是在推着他快走。

王书记旁边，坐着一位中年陌生人，从脸上的颜色看，他的营养是很好的，胖乎乎的圆头上，扣着一顶栽绒帽儿，带毛领的列宁式棉袄，脖颈衬着红蓝各半的两色围巾。

“这是一〇二信箱供销科科长老孙！”杨谋儿给老薛介绍对方。孙科长坐在椅子上未动，胖脸上略略显出一丝有限的微笑，而不像一般申求帮忙者那样过分地殷勤。杨谋儿又向对方介绍说：“这是俺公社民政科科长，老薛。”

薛志良握着客人的手，心里挺别扭：公社分工搞民政工作的，仅仅就他一个人，从来也没有什么“科”！他今日倒被社办砖厂厂长加封为科长了！他以为杨谋儿和他开玩笑，回头瞧瞧，杨谋儿脸挺得平平儿，说谎话比说真话的神气还严肃认真。

王书记笑着瞧一眼薛志良，侧过头擦火柴点烟抽，似乎故意把事情留给别人说。

杨谋儿把灵活的眼睛对住老薛，说话像打机关枪：“是这么一回事：孙科长是咱公社孙家湾人，一家人住省城，老常不回来，显起人生，说近了是咱乡党。乡党见了乡党亲，孙科长经常关心咱公社，前年咱砖厂筹办时，大马达到处弄不来，孙科长给咱解决咧！这回给咱支援两部汽车，新出厂的‘延河’。要是等上级分配，一年也靠不准能拨来一部……”

老薛听杨谋儿的意思，集中到一点，就是过了这个村绝没第二家店了。汽车虽然是奇缺货，与民政干部的工作业务却相差甚远，把他

叫来，意思是十分明白的。

“孙科长的侄女在队里，想借这次招工的机会……王书记叫和你一块商量商量……”

薛志良温和地笑着，看着王书记。他用随和的笑脸告诉屋子所有的人：书记看着办吧！你只要点头，我就再留下一个名额。我不想讨好谁，也不想得罪谁。五十岁的公社民政干部，难道还想靠讨好谁去求得一官半职吗？无聊！

“咱砖厂没汽车不行喀！成天拉煤，光运费就花得挨不起！清除窑渣，把场地都堆占满咧！要是有汽车，一下送到邻近村里去铺路，一举两得。老孙为解决咱的困难，把想不到的办法都想咧！用他们科上的名义先买下了。凭咱，嗨！给人家磕头叫爷也要想……”

老薛听着杨谋儿的话，心里厌烦！这些话，在他参加革命队伍的多少年里，是作为垃圾一样的东西被排除的。现在可好，“文化大革命”以后，这些垃圾一样的东西被杨谋儿一类人当作蜂蜜一样追逐着，而且敢于在公社党委书记面前，大言不惭地高声宣扬……

再看看孙科长吧！稳稳儿靠在椅背上，悠悠然喷出一口口烟雾，轻轻掸掉烟头上的烟灰，一句话也不说。有人替他说话，替他着急，替他办事，替他卖脸！他有两部汽车——物质真正是基础啊！能教孙科长腰硬气壮！

杨谋儿啰啰唆唆说完了，乞求的眼光瞅着王书记。薛志良也等待着书记的裁决。

王书记磕掉旱烟灰，从桌子上拿起三张票卷儿，在空中显示似的晃了晃（那是专叫他薛志良看的），又啪的一声压在桌子上，似乎带着某种嘲讽的口气说：

“怎样？老薛！两部汽车，换你一张招工表，这个生意，划得来呀！”

薛志良对于这样赤裸裸的问话，确实没有精神准备，咄咄讷讷：“你……你看……看吧！”

“我看是划得来的！”王书记说，“‘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嘛！”

杨谋儿释然笑着，向书记点头……

孙科长也显出矜持的笑意……

王书记把桌子上的票卷儿交给杨谋儿，吩咐说：“一部给你，一部给拖拉机站，不要误了起货期限！”

“那你放心！”杨谋儿小心翼翼把票卷儿夹进票夹，装进提兜。

“那个表？”孙科长说了第一句话。

“表？”王书记瞅着薛志良。

薛志良说：“表在县上，还没发下来。”

“放心放心！”杨谋儿拍着孙科长的肩膀，“俺王书记说话，是公社的最高指示，你放心！”

杨谋儿和孙科长欢欢喜喜出了门，先后钻进黑壳轿车，走了。王书记把民政干部留在自己房子，苦笑着说:

“下不为例！”

薛志良依然笑着点点头。

“下不为例！坚决！”王书记重申他的决心，“我现在就走，住到山岭上的东沟大队去，任谁问，甭透露！除非上级有紧急会议，你给我打电话！你按你的计划办！”

三

王书记下乡逃走以后，郑副书记，肖、何两位主任，也都招架不住没完没了的纠缠，相继逃走，住到某一个大队里去了。

老薛被围困在兼着寝室的办公室里，床铺上坐着来访者，房子的空当处站着没有凳子坐的人，火炉边围着人。水喝完了，有人自动打回来，放在炉子上烧……

从公社每个村子来的社员、年轻人、老汉老婆和一些大小队干部，还有城里来的知识青年的家长；工农商学兵，不论职位多大，知识多高，贫富如何——都一齐向这位瘦瘦的人民公社的民政干部倾诉心里话，恭恭敬敬……

薛志良不时点点头，表示对各种各样的困难和理由都听进去了。的确，有的家长申述的艰难，听了简直令人伤心，我们有许多人生活得并不美好！面对着一张张苦楚抽动的脸、一串一串甩出清鼻涕眼泪的述说者，他咬住嘴唇，不漏一丝缝儿，不承诺任何要求；他心里明

白，上级分给他公社仅仅四十个名额，农业户口的男女青年全社不下两千，知青也有二三百，照顾也照顾不过来喀！

他不能满足任何人，也不厌烦任何人啰啰唆唆的申述。他的脾气在公社二十多位干部中是头一个称得“待人和气”的。正是这一点，公社领导才量才使用，分配他做麻烦而又琐碎的民政工作，每年冬季，向最困难户发放有限的救济物资和钱款，检查各村对鳏寡孤独的五保户的生活安排、军人烈士家属的优抚，每季度一次的民用木材的批发……他的工作虽有许多可指责的尚不周密的纰漏，可他的态度永远是好的，笑嘻嘻……眼前这些挤到他跟前来的人，叙说完了，虽然没有得到确凿的许诺，倒也听了几句暖心热胸的话，擦了眼泪和鼻涕离开了，一批又一批……

薛志良看出，凡是挤到他的跟前来申述困难而希望得到照顾的人，大都是些不通“眼隙”的人。间有一些人，突然插进来，打断谈话者的话，问“王书记在不在？”或问“肖主任到哪里去了？”他按事先订好的默契，撒谎说不知道。这些人不甘心，眨着并不信任的眼睛，又到其他干部那里去探问了……

一向清静的山区公社的小院，现在熙熙攘攘，吉普车和小轿车在狭窄的院道里错不开进出的路……

尽管这样，有人还是把公社领导抓住了。这些人从山坡上解冻的泥路上回来，在老薛的办公桌的桌腿上，毫不客气地蹭着他们沾满泥巴的皮鞋，发着牢骚和叹息，要不是为他们的儿女、他们亲属的儿女，或他们首长的儿女，讨来公社领导者亲笔划下的那一绺纸头儿，他们大约做梦也不会光顾山区泥泞小路的自然风光的。他们把纸头儿

掏出来，诡秘地瞧瞧左右，交给薛志良。薛志良看一眼，照例点点头，小心翼翼地放进抽屉。然后，再听申述者被打断了的话头儿……

这当儿，一个老汉走进来，手里拄着拐杖，须发全白了，牙齿也脱落了，干瘦的脸上，结着豌豆粒大小的老年斑，抬脚举步相当艰难，看去肯定超过八十大关了，他的左右，走着一男一女两个中年人，男的像是国家职工，女的是生活优裕的农村妇女装束。他们搀着老汉，只防他绊脚跌倒！老薛担心：一旦跌倒，这具棺材瓤子就很难再爬起来！那样的话，他这民政办公室里将会闹出人命来的……这两个男女也真是，有话他们来说不行吗？把这样一个老汉架来干什么嘛！

站在屋子中间和坐在长条凳子上的人，自动让开路，老汉走到薛志良的对面，隔着桌子，张开没牙的嘴巴，问："兔娃子在不在？"老虽老了，说话的口气却又冲又倔。

薛志良一愣，公社干部中，没有叫这个名字的嘛。

身旁那个中年职工抱歉地笑了，解释说："王书记！是王书记！"

老汉自己也笑了，说："我叫他小名儿叫得顺口，这崽娃子把名字改咧！他在哪达？"

"下队去了。"老薛说。

"哪个队？"老汉问。

"不知道！"

“用他的时光，就跑得不见踪影儿！”老汉气倔倔地说，“他今日回来不？”

薛志良听出，这肯定是王书记的什么亲戚了，就说：“不一定回来。你是——”

“我是他老舅！”

“找他有紧事吗？”

“没事我找他干啥！我七老八十……”

老汉说了半截话，被身旁的中年职工拉一下胳膊，就停住了口。然后狠狠地说：“他妗子病重，快断气咧！想见他一面！”

老汉被人操纵着说假话，这太明显了。民政干部故意装着吃惊的神气，叹息说：“啊呀呀！这可咋办？他现在在哪个村，我也不清楚哇！”

“我听人说，他给吓跑咧！躲走咧！”老汉依然倔倔地，“我今日不走咧！等他三天三夜……”

真是不见兔子不撒鹰啊！老薛心里好笑这个不会撒谎的老汉，又倔又稚的脾气，他逗老汉说：“你要是在这儿等上三天三夜，我掏饭票给你管饭！晚上咱俩打对睡觉，十天半月都成咯！可是，你忘了，你老伴正断气呢！”

“你要耍笑我老汉！”老汉笑说，口气软了，“人说只你知道他的影踪儿，你俩捏得活码号儿……”

薛志良呵呵笑着，走出办公室，走进公社电话总机房，插了东沟大队，又挂了南梁，都说不在；最后，终于在隔河的北滩大队找着了。他把老汉一行三人引进电话室，把话筒交到老汉手里。

这种从国家大机关淘汰下来分发给公社使用的通信工具，虽不先进，拿在清末年间出生的公社王书记的老舅父手里，大约还是新奇的，老汉看看，半天不知怎么用。

薛志良把话筒一头对准老汉耳朵，一头对准老汉留着长胡须的嘴，坐在一边。那些没完没了的困难申诉听得他脑子压抑而又憋闷，倒想听听有趣的倔老汉怎样和他的兔娃子外甥说话。

老汉对着话筒，喊说：

“兔娃子！我是你舅！舅今日求拜到你崽娃子门下咧！”

半自动电话保密性差，话筒里传来王书记“嘿嘿嘿嘿嘿”的笑声。

“柿园村你表姐家那个二货，想当工人，你姐跟你姐夫，硬把我架来，叫给你说。你就给娃办了，全当给舅办哩！成不成？你光笑啥！不成？不成的话，舅没你这外甥，你没我这老舅……”

话筒里传出尴尬的笑声，夹杂着为难的叹息声。老汉接上话：

“你舅一辈子倔豆儿脾气，你还不知道？你妈你爸死到虎列拉瘟疫那阵儿，你大伯、你三大脾气倒瓤和，咋不管你？不是我老汉把你引到舅家，一把屎一把尿，从一尺长个棒槌娃，拉扯得长成七尺汉子……你而今当了官，不认你舅咧……哼！能成？早说能成的话，我都走咧！”

老薛早已笑得流出眼泪，逗笑说：“老先生，俺王书记，充其量也不过五尺半，你咋说七尺？胡吹冒撂！”

孩子似的老汉笑着，喘着气。

那一对中年男女达到目的了，满意思地笑着，扶老汉出门。

老薛继续逗：“快回！老先生！老伴在家大半断了气咧！”

老汉呵呵一笑，爽快地坦白说：“他妗子的骨殖，怕是早都化成水咧……”

四

薛志良一个又一个劝退来访者，收拾好被拉乱了的家具，清扫了地面，屋子里清静了。从窗玻璃上看出去，一轮明月托上山岭，清冷的月光照进屋子来。

他拉亮电灯，坐下来，浑身困倦，从抽屉里取出起草的方案稿本，着实作起难来：明天，要在全社基层干部会上下达招工指标，分配方案还没定下来，公社王书记，郑副书记，肖、何两位主任，托付他“考虑”的数字已经相当可观，名额实在不好分配了。特别是县上转回两三封人民来信，揭露了“汽车换人”的秘密，民政干部确实为难了。

“王书记今晚回社，等他定点吧！”老薛拿定不算办法的办法，“咱是具体办事人，领导咋说咱咋办！”

王书记从乡村回来了，端直走进薛志良的屋子，顺手丢下挎包，在火炉上烤火，搓着手脸，侧过头问：“你这几天日子不好过吧？哈，

保险热闹！”

薛志良苦笑一下，没有说话，拉开抽屉，取出那两三封群众来信，默默地送到王书记手里。看着王书记一脚踏在火炉边沿上，仔细地阅读着信件，时而把戴棉布帽儿的头侧过去，又歪过来，辨认着信纸上难以识别的草字。看完之后，王书记把它交回老薛手里，淡淡地一笑，似乎早有所料，沉静地说：“社员的议论，比这信上写的还多！话更难听！”

老薛瞧着王书记，仍然没有说话，他等他最后表态。王书记从火炉上取下腿脚，踱到屋子中间，抬起脸问：“我给你开了多少条子？”

“十张。”

“其他人呢？”

“十二张。”

“一共二十二张。”王书记说，“超过了全部名额的一半！余下十八个，你给二十四个大队怎么分配、下达？”

“确实不好办！”薛志良正好借机道出自己的难处，“如果群众问，那二十二个名额跑到哪里去了，我不好答复！”

“好答复！”王书记嘲讽地说，“就说王书记给他的老上级、老亲戚走了后门咧！”

“那……”老薛不好意思地笑了。

“你把我给你开的那些条子，让我看看！”王书记说。

老薛又拉开抽屉，取出一沓用别针扎在一起的纸条，交给王书记。

王书记接到手里，一眼也不看，顺手扔到火炉里去了，腾起一股黄色的火焰，说：“四十个名额，全部分配到大队。公社一个也不要留。”

薛志良瞧着王书记的举动，吃惊地说：“那你给人家答应过了的……”

“让他们骂我好了！”王书记铁下心说，“他们骂，不过十来个人！社员骂起来，一万多人呢！”

“别人都好说。”老薛说，“那个孙科长咋办？咱砖厂把人家的汽车已经开回来了……”

“开回来了好！”王书记说，“咱们社办企业要买一辆汽车，多难场！现在有人送上门来，还不好吗？”

“就怕孙科长不肯罢休……”

“不罢休能怎样？”王书记动了气，使劲磕一下烟锅，“国家生产的汽车，本来就有支援农业的一份，尽叫他们搞去以物易物，以车换人，该用汽车的部门倒分配不来！”

听到这里，一向拘谨的民政干部从迷蒙当中醒悟过来，忍不住哈哈畅笑起来：“哈呀！我明白了，你原来给他们布置了迷魂阵……哄他……哈呀！”

“不！不是！”王书记不笑，摇摇头，认真地纠正说，“我当初确实是同意了的！你把我的思想看得太纯了！”

薛志良收敛了笑容，心里一震。领导者在下级面前的坦诚，使他感动了：本来嘛！这是领导者掩饰自己思想污点的最好机会！他在有点心慌意乱的情况下，倒不知该说什么好了。

“我最近在几个队里，听到的议论不少！”王书记说，“社员们拿眼睛瞪着我们，看我们咋办？要是把好事、有利的事都让我占了，那么以后社员谁还听我说话呀！”

薛志良心头一阵阵发热，庄重地点点头。

“我们党丢掉的东西太多咧！”王书记满怀惋惜地说，“‘文化大革命’前，哪有这么多乱七八糟的鬼门道！如果我们不能立身于党的原则，社员怎会跟你走！如果不能尽快恢复群众对党的信任，就会影响我们的整个事业……”

“放心吧！这样，事情就好办！”薛志良增长了信心，“名额分配，好办得很！”

“通知委员们开会吧！”王书记说。

“好！”老薛趴在桌子上，摊开一沓表格，“我把方案一定，就去。”

老薛在表格里填上一个一个大队的名字，又填上分配的数字。当他抬起头，准备出门去通知革委会委员们的时候，看见王书记靠在床头的被卷上，睡着了；糊着黄泥巴的棉鞋搭在炉盘上，冒着蒸气；他太累了，轻轻地响着鼾声。

薛志良放轻手脚，取来自己的大衣，盖在领导者的身上，蹑手蹑脚出了门，拉上门板，心头轻松而又畅快，跑去通知其他委员去了。

1979年12月 小寨

石头记

一

“吃了火晶儿想板柿！简直是牛笼嘴——尿不满嘛！”

刘广生双手攥着铁锨，前躬后撑着腿，三五下挑开一道水口，渠水哗哗哗流进干燥的玉米田畦儿，心里还叨咕着这几句话。

他被一件事缠住心，犯着难；难得发冷发烧，拿不定主意。“到底怎么办呢？”

夏收后，他的副手——分管副业的副队长赵志科，跑进他的院子，高兴地告诉他，和城里红星机械厂的砂石合同订成了。

“我把嘴唇能磨掉一层皮！给俺老子也没说过的好话都说了，总算订成咧！一千五百立方，每方八块，一万二千块！不容易啊！政府一提倡社队搞副业，谁家不想在河滩捞油水？砂子石头堆成山，寻不下买主……”

“还是你办法稠，会说话！”广生也兴致勃勃，赞扬小伙说，“有这一万块副业收入，咱河湾西村的戏就好唱啰！好！”

俩队长高兴，全队社员更高兴。

刚拉了两天石头，志科给广生队长说：“基建科程科长头回来河湾西村勘察石料现场时，在他屋吃过一顿蒸红苕，到今还在夸：河湾红苕好！瓤子干面，没污染……”

“那容易，程科长再来了，咱蒸给他吃……”广生笑着，不在意地说。

“你傻的，人家堂堂一个科长，为吃一顿红苕，跑七十里？”志科斜着神秘的眼色，瞧着广生说，“那意思……”

广生听明白了“那意思”，自失地“噢噢噢”笑着，随之干脆地说：“把我那红苕带一口袋，你明天跟车给程科长送去！没啥，自家的土产货喀！”

第二天晚上，志科又来到广生家。

“啊呀！这下倒把麻达惹大咧！”

“咋咧？”

“司机听说给程科长送了红苕，也……”

广生这下不好干脆答复了。五辆汽车，七八个司机，他是拿不出这么多红苕送人情的。他皱着眉，闷了半天没说话。

志科帮他出点子：“干脆，从队里红苕窖里取……”

“那是种子！”

“可他们已经开了口！”

广生沉思半晌，最后吩咐儿子把分管农业生产的副队长生旺叫来，一块商量。

这是个硬家伙，一听就崩了："少糊弄这些曲里拐弯的事！终究是麻烦！"

"那好！这副业只好收摊！"志科赌气说。

"噢！捞不上油水就撕合同呀？"生旺瞪着眼说，"他敢……"

"你没办'外交'，不知当今办事难！"志科说，"我爱弄这号曲里拐弯的事吗？我……"

看看两位副手顶碰起来，广生居中调解说。

"都要急，咱商量嘛！都为咱西村翻身嘛！又不是为自个儿的私事！"

"几麻袋红苕，倒是值不了几个钱！"中年副队长松了口，态度平和了，"我看那个账，叫会计没法走……"

"好走好走！按损耗报销！"志科早都想好了点子，"咱留的红苕种子，哪年春天不烂掉千把斤，全当烂了扔咧！"

这是没办法的办法，只好如此！广生同意了，说："咱给社员把事说明。丢了这个副业，确实可惜！"事情就这么定下来了。

过了三五天，志科又来到广生屋里，一进门，就发牢骚："广生叔！这副业外交，我实在没法搞咧！"

"咋咧？"广生问。

"我没脸再向你开口，我又没办法……"

广生预感到又有新的索要……

果然，志科难为地说：“程科长那次来，看见咱河滩有稻地，问大米好搞不好搞？说他女人是南方人，至今吃不惯面食……那个串脸胡司机组长，看见咱河滩坝上的杨树，说他家盖房还缺木料……你看，给吧，不合法；不给吧，副业搞不成；有的生产队为订合同，蔬菜粮食，愣给人家塞！你说，我这副业队长咋当？”

“唔！这简直是没底洞嘛！”广生心里暗暗叫苦，再把生旺叫来商量吗？再给社员开会说明吗？他为难了，说：

“要急！这回要急！叫我尺谋尺谋！”

“程科长悄悄说，要是能给搞些大米，在石头量方时，给咱放宽……”志科说。

“放宽？啥意思？”广生问。

“多算些嘛！多算上百十方石头，价值一千块！”志科说，“程科长的意思，不会叫咱吃亏！”

“啊呀呀呀呀！”广生听了，吓得叹出声来，一迭声给青年人说：“不敢不敢不敢！志科，咱绝对不敢冒领公家的钱！这程科长，是个党员不？”

“当科长还能不是党员！”志科说，“我没敢给他应承。咋办呢？”

年近五十的劳动好手刘广生，丢剥了长袖白褂，粗壮的双臂又挑开一道水口子，还在心里问自己：“怎么办呢？”两三天来的苦苦思虑，缠弄得他脑子又涨又憋。

“广生哥——”

广生一抬头，生旺站在水渠边。

“人家不拉咱的石头咧！”生旺气哼哼地说，“我和社员在河滩等着装车，人家的汽车开到东村沙滩装石头去咧！”

“啊！天！事情做得真绝。”广生瞪着痴巴巴的眼睛，张着满是胡碴的嘴巴，实在想不到，连给他考虑的余地都不容让，可怕！

“社员们要去东村问个究竟，冷娃小伙子提着铁锨、抬杠，要是打起来，夏天人都没穿长袖衣裳……”

广生被急剧发展的事态吓得声音发颤，连声说：“快把人挡住！不敢去！谁去谁负责！”

“我挡不住！”

“硬挡！”广生说，“咱俩快走！”

二

广生跳过水渠，奔上通河滩的大路，碰见志科迎面跑来。他告诉广生，河湾东村的干部得知科长女人不习惯吃面食的“困难”，前天晚上亲自把“桂花球”大米送到程科长家里去了。“你看，咱不敢给，人家东村钻空子给塞上了。”

“狗日的，从咱碗里夹肉！”生旺听得火起，“叫我说，把狗日汽车砸了，我坐监狱！”

“迟了！你坐监狱也没用！”志科说，“我当初倒是想给了也就算了，现时就兴这个！过去讲个‘不拿群众一针一线’，现在是‘哪碗油水厚端哪碗’！你坚持原则吧！”

听着两个副手在发牢骚，广生却看见，河滩里，一伙一伙人往东村的沙滩奔去；村子里也骚动了，社员们下了场塄，拥下河滩来；河湾东村的沙滩上，停着五辆汽车，围着装车的社员；隐隐传来装车时石头碰撞的声音，那声音听来格外刺耳，似乎对人有一种无法压抑的挑衅性质。一溜一串的社员，从刚刚显绿的玉米地里和稻田塄坎上，朝沙滩奔走，夹杂着恶声恶气的咒骂……不祥的预感骤然闯进心中，可怖的殴斗厮打的景象闪现在眼前。本来这相邻的两个村庄关系就不合卯窍啊！历史上为争水争地界而打得头破血流以致闹出人命的事，不是没有发生过……

“事情缓后商量！先去挡咱的社员！不敢闹事！”广生当机立断，说，“你俩到河滩去，甭乱说乱戳！我回村去！”

广生转回身，几乎是跑着步，奔上场塄，跑进队办公室，对正在算账的会计姑娘说：“快，把广播机打开，叔要说话……”

武斗终于没有发生。

广生蹲在门前场地里的小碌碡上，看着一伙一伙从河滩走上场塄的社员，听着好些粗嗓门气愤的咒骂，总算放心了。那骂人的话，不避讳任何人：

“这事做得太可憎咧……”

“啥屌科长——吃人的贼！”

“咱队长太软，简直是阿斗……”

“砸了他的汽车，叫他程科长来……”

广生听着心里倒很坦然！尽管连他也裹进去怨骂，他一点气也生不起来。骂吧骂吧！骂两句风刮走了，只要耍打起来，打下人命就不会这么松泛了……

他蹲在碌碡上，等见了志科，又等见了生旺，他说：“听说程科长在东村，咱仨去找找！”

俩副手没有反对，三人一溜出了村。

一进东村口，就有一股荤香味儿在空中浮游。三人径直走到队长张玉民家门口，正好，院中香椿树下，摆着两张桌子，菜碟酒瓶摆满桌面，司机们坐在桌上，正在大嚼大喝；几个穿戴干净、手脚利落的妇女，不停地往桌上继续添加着碟儿盘儿。看见三人一进门，队长玉民从桌边立即站起，哈哈笑着，拉西村来的三位队长入席。

广生在空板凳上坐下，接住玉民塞到手里的筷子，又轻轻放到桌子上，问：“听说程科长今日来咧，人呢？”

“没来！”玉民说，“程科长没来！”

张玉民警惕地瞧着广生，态度很和蔼，又拉着志科动筷子。志科口畅，挖苦说：“这不是给咱预备的嘛！”玉民又拉背靠院墙蹲在地上抽烟的生旺，直性子生旺嘴里咬着旱烟袋，像钉在地上似的，怎么也拉不起来。

“我想找程科长问句话。”广生说，“跟我们订下的砂石合同，刚拉了二三百方，咋不拉咧？到底还……”

“他没来！”玉民早有准备地说，“这事你得问他。咱两个队没关系，都是卖石头哩！”

“那对！咱都想叫队里富！”广生很随和地说，随之露出一丝嘻嘻笑意，“伙计，我明天要是摆出五桌子，你一桌十个菜，我摆二十个！这车轱辘大半就滚到西村河滩咧！你咋办？”

玉民脸一红，没有反上话来。

广生即刻接上说：“你放心！你订的合同，我不抢！再说，我刘广生摆不出这席面来，倒不是西村穷到这地步……”

“你摆得起摆不起，咱管不着！”玉民脸上受不住，拉下脸说，“东村不管西村！”

那些司机们听出话味，纷纷丢下筷子，点起烟。广生一眼瞧见一个胖乎乎的司机，腰粗膀圆，没有修整的串脸胡须上，沾着油渍，这个大概就是志科说的那个司机组长了。广生瞧着，想，这人大概干起活来是个拼命的家伙，吃起来也够蛮的！那串脸胡组长敌意地瞧着广生。广生好笑：我碍得你没有吃痛快吧！他拔出烟袋，说：“吃吧！吃饱！吃好！这一顿大概能饱一年吧！”

啪的一声，司机组长串脸胡须竖起，把筷子甩在桌子上，呼呼喘气：“你嘴放干净点！”

“要躁！伙计！你应该感谢我呢！”广生仍然嘻嘻笑着，“要不是我，你今天可能回不去……”

“谁敢！”司机组长瞪起眼，“敢把我撞一指头！”

生旺从墙根忽地站起，愣子眼一睁，“你嘴要犟！”

玉民队长气得站起，冲广生说：“你今日来做啥？砸我的场合来咧？！”

“不，我是寻程科长！”广生仍然笑着，站起身，“人说工人阶级比农民兄弟觉悟高，想不到倒比农民嘴馋！在城里吃不够，吃到乡下！”

广生说着，把烟袋插到腰里，嘻嘻笑着，走出门来。

“现在这世事，变得瞎咧！”生旺说。

“你现在亲眼看见了，就是这！”志科说，“咱想公事公办，没门儿！人说‘要看公章比碗大，不及熟人一句话’……你信了吧！”

广生闷着头走着，脸上痛苦地抽搐着。

“没办法！都是这！”志科说，“你一个人坚持原则，事情就办不成。”

“真个没办法？有办法！”广生说，“明天，咱俩找程科长去！生旺留下管生产。”

“舌头是软的！程科长诡得很！”志科信心不足，“他会说，‘石子不合格咧’！‘泥土成分大咧’！”

“不怕，找他们厂长！”

“厂长管咱这小事？”

“厂长不管，找省纪委！”广生越说越上劲。

“啊呀！广生哥，没看出，你还是个咬住不放的角色！”志科来劲儿，“纪委再找不动呢？”

“写信给党中央！”广生说，“咱们是共产党！不能容忍这号赃官坑农民，害国家！”

三

果然，不出志科所料，俩人在基建科找到程科长，三言两语，就谈崩了。

刚一进门，志科把广生介绍给程科长。程科长的眉毛轻轻一弹，勉强地伸出手来，用几个指头轻轻捏了捏广生粗硬的手掌，算是礼节完毕。广生这才初识这张扁平的白脸，冷得能凝固洋蜡！

“什么事啊？”程科长事务式地问。

广生刚开口谈到石头合同的事，程科长笑了笑，那笑也是阴冷的：“你们的石头泥沙含量过大，不合格！工程上不能用。”

广生说：“你当初亲自去看过的……”

“你们的锣子粗！”

志科赔着笑脸说：“质量不合适，我们回去再改进。你看，咱们有不到处，你尽管说。咱山里农民，没经过世面……”

“国家工程质量要紧！谁家石头合格就采买谁家的。不要乱拉乱扯！”程科长说。

“俺的锣子和东村的锣子，都是公社综合厂做的，型号一致，粗细一样喀！”广生说，“这事这样弄，影响不好……”

“有什么不好的影响？”程科长瞪起眼，“我们要的是石头的质量！”

广生再也忍不住了！瞧着那张扁平脸，他不由得火起，冷笑着说：“同是一条河边的石头，东村和西村连畔，又用一个型号的锣，俺西村的石头不合格，东村的石头就合格……”

“那没有办法！”程科长也冷笑着说。

“怕是我们西村的大米、杨树，没有东村的来得顺手吧！”广生终于把这一口窝囊气放出来。

程科长的扁平脸一动，眉毛又轻轻一弹，拉下极难看的脸色：“你……诬蔑！”

“我今年活到四十八，倒想诬蔑你程科长来？”广生结实地说，“共产党员，不能说昧心话，也不能吃昧心食！”

“诬蔑！”程科长重复一句，嗓音也提高了，“再说也没用！你们的石头不合格！”

“那是小事！”广生点着了旱烟，冷静中显示着某种威严，斜眼瞧着程科长，声音中流露出轻蔑和挖苦的音调，“你能当科长，工资大概不会太少；看你的年岁，儿女也该有工作的了；爱人大概也挣工资。

想来你的生活不太差吧？你从俺农民碗里抢饭吃，好意思吗？吃到肚里好消化吗？”

那张扁平脸皮固然厚，终究招架不住广生结实辛辣的话语的进攻，开始变得臊红了，血涌在细嫩的脖颈上，鼻梁上沁出细密的油汗。虽然又说了一次“你诬蔑！”口气却硬不起来了，到底是吃人嘴软喀！

“我诬蔑你？太便宜你了！”广生说，“明给你说，我要告你！”

“随你的便！”程科长口气装得很硬。

“你自个儿占便宜，又拿国家钱财送人情！”广生说，“你把俺农村干部往瞎教呢！我能饶你？”

“随便！告去！我等着！”

“好！你等着！我把这场官司打不赢，我这共产党员白当咧！”

出了程科长的门，下了楼，来到党委办公楼。办公室里，一位中年女同志接待了这两位农民。

“你们有啥事？”女同志是本地人，本地口音。

“寻你们厂长，反映问题……”

“厂长开会。”女同志说，“你谈谈，我接待。”

广生想，也好。就从头到尾，根根梢梢谈起来，说了没有两分钟，女同志习惯地看看手表，说：

“你有没有书面材料？”

“有！”广生从腰里掏出装在信封里的材料。

“那好。”女同志接过材料说，“我负责给你呈送上去，你们回去，等着这儿的回音。”说罢，动手在文件盒里翻寻什么东西，一副忙迫的样子。

“那……就这样！”广生说着就告辞了。

走在厂区的水泥路面上，志科一副没精打采的沮丧神气：“打赢这场官司能咋！反正石头合同完蛋咧！副业收入完咧！”

“先把道理摆顺！”广生执拗地说，“小伙子，咱糊里糊涂弄下去，将来给社员咋交代？”

俩人走着，出了大门，回头瞧瞧那一层一层明光闪亮的玻璃窗子，那窗上遮阳的蓝色布帘，眼光又留在程科长的窗户上，广生心里很不是滋味，坐在这样漂亮的大楼里办公的人，不全是操心国家事情的喀！

四

整整等了十天，没见一丝音讯。

广生给志科说：“咱俩明天再去！”

“你一个人去，路熟咧！”志科没有兴趣，“反正打赢打不赢，副业没门咧！”

“我说，先要丧气，靠组织解决问题！”广生听出志科的意思，是怨他上次去和程科长谈崩了，合同没门儿了。年轻小伙子这么不相信组织，他和他是受了不同教育和不同影响的两代人。他故意表现出信心十足：“走！靠工厂组织处理，我不信厂党委管不住那个扁脸科长！”

志科仍然不信任地笑笑。

“事情是你经手的，人家问起来，得由你说。”广生说。

志科勉强应允。俩队长又来到厂党委办公室，找见了那位中年女同志。她开口就说：“厂长批示，叫交党委会研究。”

“党委啥时候开会？”广生问。

“说不定。你回去等着，要急。”

再坐也没话可说，俩队长又回到河湾西村。

生旺赶到广生家，急不可待地问：“咋样？”

“等着！”广生说，“再等它十天。”

“再等十天，人家在东村把石头就拉够了！”生旺说，“你知道不？东村给串脸胡司机伐了七棵大杨树，一棵才收八块钱，跟白送一样……”

广生只顾闷着吃烟，说不出一句话，丑恶的交易，深深地伤害着一个老共产党员的心！合作化那年入了党，他受的是党的严格的思想教育；“四清”运动被整下台，他精神里形成的信念和素质难能改易；

平反后，他重新当了队长，仍然按固有的素质行事，想不到在现在变化了的环境中，干工作竟是如此困难！他又不甘屈服，憋着气，憋着劲，要把这个道理摆顺，给年轻的队长拿出活的样子来。

又等了十天，广生拉着志科，又推开了厂党委办公室的门，瞧见了那位中年女同志。

“党委研究了没？”广生问。

“研究了。”中年女同志说，“厂长亲自和程科长谈了话。”

“咋办呢？”

“说让我给你们解释一下，生产队的副业要考虑，国家工程的质量也要考虑……”女同志说。

“回回回回回！快回！”志科听到这儿，就对广生气冲冲地说，“等了二十天，还是咱的石头不合格！”

“嫑急！”广生说着，又问女同志，“没见厂里去人到我们那儿了解嘛！”

“党委忙得……大事都办不完……”

“这是小事？”

“在你们队里，是大事；在厂里，比起来……”

广生的心里很难受，他急促地说：“我想见见厂长……”

“厂长让我给你解释……”

“我想和他亲自谈谈！”

“他忙。”女同志说，有点不耐烦，“大小事都找厂长，得多少厂长呀！”

广生再也反不上话，他退出门来。

“这下……死心了吧？”志科说，“我早就……”

“死心？我饶不了他！”广生气哼哼地走出厂大门的时候，说，“上省纪律检查委员会！”

“啊呀！广生叔，你真是个咬透铁锨！”志科笑着说。

“这是逼上梁山！”广生也笑了，劲头更足，“我想，党纪容不得程科长的这号作风！”

俩人正走着，听见后面有人喊：“等等！刘广生同志！”回头一看，办公室那位中年女同志快步走来了。俩人收住脚步。

“吕厂长叫你俩去！”中年女同志走上来说。

广生和志科相对一盯，愣着。

女同志告诉他俩，说公社打来电话，河湾西村的农民睡到汽车底下了……把程科长围住不放……

广生吃了一惊，自己不在家，怎么出了这个冷祸！

“吕厂长通知了保卫科长，俩人等着你呢，快，吉普车在院子等着！”

“不是说吕厂长忙吗？”志科问，“现在倒有时间了！”

女同志白了志科一眼，没有说话。

五

吕厂长把广生和志科拉着坐在他的两边，亲切地又是抱怨地说：“你咋搞的哟！让你的社员垫我的汽车轱辘！队长同志？”

听见这样亲切的话音，广生心里感动了，他侧身看着两鬓斑白的吕厂长，倒说不出话来。

“有问题好商量嘛！闹啥子？”吕厂长说。

广生咳一下嗓子，把事情的经过大略说了一遍。

“唔！我上当了！程科长，不老实！”吕厂长说着，一只胳膊亲热地搭在广生肩膀上，“给我也搞点子大米，我给你再把合同订上！哈哈哈！这些乌龟王八！”

广生心里一热，涌起一股豪壮的感情，不由地看看志科，小伙子也提起精神来了。

吉普车离开了公路，沿着宽阔的防洪大堤，在浓密的树荫下飞驰。笔直的小叶杨，垂吊的柳条，密不透风的芦苇丛，一闪而过，老远就可以看见，河湾东村沙滩上，堤坝上，围着黑压压的人群。

车在堤坝上停下。广生钻出车门，一眼看见公社罗书记和派出所姜所长；河湾东、西村的干部和社员一齐向吉普车围过来。

广生给双方做了介绍，姜所长和罗书记把吕厂长等一行人引到汽车跟前。五辆汽车的轮胎前头，躺着或者蹲着西村的老汉老婆，把脸歪向一边，谁也不盯，眉眼和嘴角，鼓着多大的仇气和恨劲！

吕厂长俯下身："老同志，不敢在沙子地上躺久了！小心风湿……"

广生看着，开玩笑说："他知道伏天躺在那儿舒服！要是冬天，摊上工分也不来！"随之对那些躺着蹲着的老汉老婆耍笑："你几个棺材瓤瓤子，这回给咱西村立下功劳了……"

罗书记把吕厂长一行人引到离开社员群众的一个坝头上，介绍了事情的经过：

汽车压了西村路边的十几株玉米苗儿，社员和司机吵起来了。社员说话不好听，司机组长出口也不文雅。惹怒了西村的社员，司机组长大概挨了两拳，没伤筋骨；西村一个社员也挨了两拳，流了鼻血。俩村的男女社员都拥到沙滩来了，多亏派出所老姜跑得快，才没大打起来。程科长正在东村队长玉民家吃喝，闻声跑到河滩，被社员围住了；人多嘴杂，出言不干不净，程科长没少挨骂。当然西村社员的气头儿不在那几棵玉米苗儿上头……

罗书记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方案：

成立联合调查组，厂方出一人，公社和派出所出一人，河湾大队出一人，把事情的前因后果调查清楚，再由厂方和公社协商解决。

"好！就这样办！"吕厂长干脆果断，当面指定保卫科长留下来参加联合调查组的工作。

罗书记站在石头堆上，宣布了解决问题的方案。那几个准备垫汽车轱辘的英雄，立即翻身爬起，拍打着沙子和泥土，混到人群里去了。

社员们纷纷散伙了。

程科长从围困中脱了身，来到吕厂长面前，那张阴冷的扁平脸上，眼皮耷拉下来，脸上失去了光……广生痛快地想：

“要是及早认真解决，绝不会弄到这种地步嘛！不过邪气总归害怕正气，到如今，你程科长能咋！”

1980年元月 小寨

回首往事

女儿今天领着她的对象要到家里来，这是头一回。刘兰芝把一切收拾停当，就坐下织毛衣，静静地等着。织过多少件毛衣的双手，忽然笨拙了，总是把针戳到岔儿里去。

楼梯上响起女儿的脚步声。

门推开了，刘兰芝扬起头，女儿笑着站在门里，把跟在身后的小伙子让进屋。她站起来，迎上前去。

一眼瞧见那张英气勃勃的脸，刘兰芝不由一愣，这年轻人和吴康长得多像啊！吴康是她在女儿这个年龄的时候，曾经热恋过的情人。

女儿羞涩地笑着，介绍说："这是我妈。妈，他是小吴……吴南。"

"坐！坐！"刘兰芝有点慌乱地让着。唔！姓也一样！怎么回事呢?

她几乎不敢正眼看吴南。把客人礼让到椅子上坐下，递茶的时光，她看见一双多么聪颖的眼睛，那简直就是二十多年来时时在脑际里闪光的吴康的眼睛……不会是幻觉吧?

"大娘，您也坐。"

一口浓重的陕南地方口音，更加深了她的猜疑。陕南，吴康就是下放到陕南山区的。刘兰芝在桌子对面的椅子上坐下，不由得仔细打

量起年轻人来：长条瘦脸——像吴康；宽宽的亮堂堂的前额也像；稍微向下撇着的左嘴角——简直像神了！长长的脖颈根，露出蓝条子土布衬衫的衣领……不错，只有吴康家乡那个县的人，才习惯织这种蓝条子土布……

刘兰芝第一次看见这种蓝条子土布衬衫，是进入高中的第一天。排过座次之后，她的同桌，一个从关中农村考进省立重点中学的新同学吴康，上身就穿着这样一件浆得显硬的蓝条子土布衫子。自小在城市长大的裁缝的女儿，总是穿着时兴的服装，看见这样一件土布衣服，多稀奇！在一个尽是城市学生的教室里，这样一件老式衬衫所显示的土气，就特别显眼。她带着嘲笑的口气，问刚刚坐在一条板凳上的同桌："你这衫子，是什么料子做的？"

周围的同学泛起一阵开心的笑声。

刘兰芝得意地看着，吴康眼睛里呈现出一缕窘迫的神情；她忽而有点后悔，生怕这个乡村来的野孩子骂出什么不干净的话来。没有，窘迫的神色瞬即从他的眼里消失了，整个长条脸上，是一副坦然的神志，语气稳重地说："是'乡村呢'料子。"

不出一月，这个乡下学生以他正直的品质和优秀的成绩，很快获得同学的尊重和信任，刘兰芝才真正后悔了。及至他们三年期满，一同考入大学历史系，她无法隐瞒自己心底的爱慕之情了。

一个春日的傍晚，校园里的丝丝垂柳下，她对吴康娇嗔地说："给大婶写信时，让她给我剪件'乡村呢'衬衫，行不？"

"蓝条子土布衬衫，你穿？"吴康停住脚，眼里闪着异样的光彩，惊奇地问。

“我喜欢。看顺眼了，挺好！”她说。

他脸红了，抑制不住欣喜的心情，大声憨气地说：“行啊！行啊！‘乡村呢’，要几件也不难！”说着，伸手抓住她的双手。她仓皇地逃开了……

现在，刘兰芝看见坐在桌子对面的吴南，神态和穿着，都活像当年的吴康啊。她问他：“家在哪里？”

“陕南。”

“陕南不种棉花，也不织布。”她指着吴南的脖子，笑问，“你穿这衬衫……”

吴南低头笑了。女儿插嘴说：“他老家在关中。他父亲被打成右派，下放到陕南，落了户。那土布是老家奶奶给寄的。”

“这布结实，耐磨，我们家大小都喜欢穿。”

果然是吴康的儿子，真是出奇事。刘兰芝至此完全证实了初见时的预感，心情怎么也平静不下来。二十多年了，没有机会见他一面，现在却看见他的儿子，要做我的女婿了，她的心在胸膛里震颤、抖动……她托词要去备饭，钻进灶房去了。

这儿安静。刘兰芝打开炉门，把早已切好的菜扔进小锅，转身扭开水管，冲洗了热烘烘的脸，又打开了小灶房的窗户。

蓝天。白云。古城春天少有的晴朗透碧的天空。越过一幢幢参差高矮的建筑，刘兰芝看见公园里那座亭台的尖顶。也是这样一个春光

明媚的日子，他们临近毕业了，她和吴康在草坪上谈论毕业论文的提纲，后来又扯到志向、理想、事业，海阔天空……

“史学的价值，就在于真实。没有真实，就不算历史！”吴康在草地上踱着，说着。

她坐在草地上，双手抱着膝，仰着头，听心爱的人儿谈着，附和说：“正是史料里夹杂着的许多假的东西，才给后人评价历史造成了困难。”

“科学地评价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唯物史观是最好的武器。我满怀信心……”

“我给你当个助手……”

“你要自己干。我们共同钻！”

春天的傍晚，雾霭笼罩着绿色的柳树，寒气潮起来。她依着他，从公园的小路上慢慢朝大门走去。

“饭煳了！妈！”女儿蹦进灶房。

刘兰芝慌忙回转身，提下小锅，一股焦煳味儿直冲鼻孔。

女儿吃吃笑着，封了炉门。

“你去打点酱油来。”

“不是有吗？”

“再去买点好的。那个不好……”

女儿被支使走了。小灶房又恢复了安静，她的思绪像小河的流水，斩不断，堵不住。

“划清界限！这是个立场问题！”已经被她撕过三次求爱信的同学刘剑，又来找她谈话。他是第一个在班级辩论中揭露出吴康在论文里用秦始皇影射的人，进入新成立的“反右”领导小组了。他很关心刘兰芝，对她在辩论中支持吴康的做法表示出焦虑和担心。他几次和她谈话，全是对她的关心和爱护。“自由辩论结束了，要组织反击……”

“……”她说不出话了。两三天来，校园里和教室里白天黑夜正在进行的热烈的辩论的气氛突然冷却了，刘兰芝心里也冷却了，惶惑了。

“各人的历史要自己来写。态度的转变，是关键的一步。”刘剑分析说。

“……”刘兰芝张张口，还是说不出话，心口不一的话是难以说出来的，但她不能不承认，刘剑说的是实际的情况。她支吾说，“我要再想想，我所坚持的观点，是不是真的错了……”

刘兰芝看着站起来走去的刘剑，头脑里混乱极了。她想哭，又哭不出。

“趁早剪断！”老裁缝对着几天内明显消瘦下去的女儿，挥着剪刀，训诫说：“爸爸旧社会受苦受气，新社会翻身做人，报恩还报不尽呢！这小子敢攻击……”

“土里巴叽个庄稼坯子，我早就不中意！”妈妈嘟哝着，现在有她说的话了；她早就不中意那个未来的乡村女婿，现在有了最结实的理

由：“哼！右派……”

于是，刘兰芝终于走上辩论会（实际已经是一边倒的批判会）的台阶，面对全校师生，痛哭流涕，慷慨陈词……“在风浪中，我要和左派站在一起……”她的行为，在学校一时传为斗争佳话。

因为运动，毕业分配推迟了。这一天，刘剑悄悄地向她透露，分配她到市内一家中学当历史教员。她有点不平，论学业，刘剑历次考试，成绩从来都在她之下，居然被分配到历史研究所去了。刘剑讨好地解释，说是她本来被分配到县区中学，经他多方力争才留在市里……比起偏僻的山区，城里是好多了。她算将就了，准备回家把这个信息告知老裁缝。

在校门口，她碰见了吴康。

几十个被打成“极右”的学生，肩头扛着被卷，手里提着书兜，排着散乱的队形，默默向学校的大门走去。

吴康夹在这支散乱的队列里，肩膀上挎着被卷……被卷外面包着的蓝条子土布床单，和他身上的蓝条子土布衬衫出于同一架织布机吧？那个为他纺棉织布的关中乡村老大娘，看见这样归来的儿子，会怎么样呢？她放慢了脚步，让他们的队列先出门吧。

吴康随着队列走出校门，转过身，停住脚步，抬起头来，瞧着学校古老的门楼上面刻的校徽，嘴唇紧紧抿闭着，左边的嘴角拉下去了，不动了。刘兰芝再不忍心看他的脸，低下头，闭了眼，她发觉她和他的界限还是没有划清啊……

当她抬起头来的时候，吴康也瞅见了她。两双眼睛对视的瞬间，吴康那笼罩着痛苦的迷雾的双眼，忽地燃烧起来了，嘴角现出一缕轻侮的笑，那是怎样居高临下的不屑一顾的嘲笑啊……她无力对视那双眼睛，慌忙偏过脸去。

当她再转过头来的时候，那个熟悉的背影，扯开长步，扬着头，肩头挎着被卷，走远了，萧萧秋风把那蓝条子土布衬衫的下襟扬起来……

“妈，酱油。”女儿蹦进门来，说话像唱歌。

“噢噢！买回来了……”她胡乱答应着。

女儿挤到案板前，搭手帮她做饭。她从女儿眼里看出一种期待的神气，希望妈妈说说第一次看见女婿的印象吧？应该满足女儿的要求，却怎么也说不出口。她能说什么呢？

女儿终于忍不住，说：“他爸爸可好了。”

“你知道？”她深情地问，心想，我比你清楚多了！

“他妈妈也好。”女儿说。

“你知道？”她急切地问，吴康找了个怎样的女人呢？

“他给我说的。”女儿骄矜地说，“他爸下放到陕南，落脚在一个山沟的生产队里劳动改造，公社安排让团支部书记暗暗监视他的举动。团支书是县上有名的模范团支书，很厉害，管他管得可严了，整天冷着脸，生怕他干出杀人放火、破坏集体的事儿来，自己也搞得很紧张。半年过去了，没见这个右派学生胡作非为，倒是看见他把长头发

剃了，像当地农民一样，光头上缠着一条蓝布帕子。团支书有点泄气。上级忠告她说，这些右派，表面上最会装相，别看整天不说话，肚里的黑墨水翻浪哩！她再也不敢松懈斗志和敌情观念了。有一天，团支书猛然发现，右派学生正蹲在墙角烧字纸。销赃灭证！好大胆！她气得立时火气直冒，跑到跟前，一把把他推开，从火堆里抢出尚未烧尽的材料来；她连拍带打，扑灭了火，坐在地上看起来；看着看着，团支书流下眼泪来了，最后竟然骂起来了……”

“怎么回事？”刘兰芝听得入神，迫不及待地问。

“哪里是什么赃证！”女儿说着笑起来，“是他在大学的一个女同学写给他的恋爱信，情书！”

“啊……”刘兰芝倒抽一口气，神色都痴了，心情很紧张，赶紧侧过脸去。

“团支书此后再不对他吹胡子瞪眼了，提出要和他结婚。”

“啊……团支书是个女的？”

“男的还能……嘿嘿嘿……”

“这么快？”

“哪能！他不答应，倒吓坏了。说他今生再不结婚了！”

“那后来怎么……”

“团支书一心不改！对他越来越好。为这事，她被撤销了团支书职务，开除团籍。”

“啊！”

“你‘啊’什么呀！”女儿说完这段传奇式的婚事，看着母亲惊奇而又紧张的神色，郑重地评价说，“这个乡村姑娘，比那个女大学生值钱！”

“你说什么？”刘兰芝感到女儿的话像针一样刺进她的心里来了。

“她比她，值——钱！”女儿又重复说。

“唔……”刘兰芝的心颤颤地发疼了。

“人家团支书说，她是从那个女大学生的信里，才真正认识了他，不是右派是好人！”

“你去……收拾……桌子吧！”刘兰芝胸膛里憋得透不过气来，赶紧把女儿支使开了。她再也经不住女儿一句更尖刻的话了。

女儿开始收拾桌子上的东西。那吴康的儿子吴南，从桌子上拿起正在读着的书本，举在空中，眼睛一直不离书页。女儿抹净桌面，那小子还举着书呆呆地看着。女儿嗔怪地从他手中夺过书，又轻轻地摊开在桌子上，妩媚地笑一笑，跑回灶房来。刘兰芝急忙把探出房门的身子收回来。

女儿把菜全部端到桌子上去了，刘兰芝无所事事，在灶房里空撩乱着；她觉得没有勇气再坐到小伙子旁边，对视他的眼睛。

“大娘，你也一块儿来吃。”吴南站在灶房门口，拘谨地笑着。

“好……好……”刘兰芝强装笑容，慌乱地支吾说。

“叔叔呢？”

“没下班！”她说，此刻提起她的丈夫，心里特别龌龊。

“那咱们等等，叔叔回来了一块吃。”

“不等！”刘兰芝断然说，“他今天开会，吃集体灶。”他不回来好；要是他回来了，知道女儿的对象是吴康的儿子，这个场面将会多么尴尬。

三个人坐定，动起筷子。

吴康的儿子吴南，坐在刘兰芝旁边，大大方方捉着筷子，畅畅快快吃着，连吃饭也像他爸爸吴康！吴康跟她头一回去见老裁缝的时候，吃着爸爸亲手做的饭菜，也是这种畅快样儿。从头吃到尾，筷子连一次也没放下！回学校的路上，她和他说笑，笑他是乡下佬，饿狼！他听了反而哈哈大笑，顽皮地说：“好东西都叫城里人吃咧！乡下人逮住城里人的便宜，客气才是傻熊！”她听着，笑得腰都直不起来……

女儿吃着，不甘寂寞，对妈妈心不在焉的样子大概很不理解，插话说：“他爸平反了。”

“噢！”刘兰芝应着，关心地问，“工作安排了没有？在哪个单位？”

“历史研究所。”吴南回答说。

“好。和他的专业对口。”刘兰芝说。

吴南轻轻一笑，说：“开头，所里有位领导不同意俺爸去。这个人是我爸的同学，‘反右’中整过我爸，他怕我爸找他的事儿。”

刘兰芝不由地嘘了一口气，这个整过吴康的同学，她当然明白是谁了；生活对他们三个人开了一个多么认真、多么严峻的玩笑……可是，刘剑怎么一直没有和她谈及此事呢?

“真坏！”女儿气愤地骂。

“其实，我爸哪有心思去想这些事！”吴南说，“他只是急于想有一个安静的环境，还想成点事；他过了五十岁了，只怕想做的事做不完……”

“他爸的两本史学专论，出版社已经定稿了。”女儿钦佩地炫耀说，“七十万字。”

“是吗? ”刘兰芝着实吃惊了。吴康下放以后，她和他的信息完全断绝，她能想到他肯定受了许多磨难，却想不到他竟然还在写史学论文；自己早已心如死灰，只安于完成中学历史教学的任务了。她惊异地问，“他在农村几十年，还没丢弃对历史的爱好? ”

“他丢不下，还叫我也读史书，给我妈讲历史故事，我们家成了历史研究所了。”吴南笑着，风趣地说：“一九六三年，上级安排他当中学教师，他又写起了书。‘文化大革命’中，成了他的反党罪行，被打断了一条胳膊，押送回家。当天晚上，他叫我把笔纸取出来。我以为他要写交代材料，没料到他说，来，从头开始，又写起书来！”

刘兰芝的脑海里，展开一幅这样的图画：

青青的山坡下，淙淙的泉水边，一幢稻草苫顶的农舍前，青石桌旁围坐着吴康和他的妻子儿女，听他讲述千百年前的历史往事，半圆的月亮贴在山顶的天上……

“不说了，不说了！”女儿说，“吴南，把你那张全家福照片拿出来，让我妈认认你的双亲。”

吴南顺从地从提包里取出一本日记本本，翻出一张照片，递给刘兰芝。

刘兰芝把照片接过来，手微微抖着，一时不敢把照片放到眼前来……那个她曾经与之山盟海誓的恋人，现在是什么样子呢——

一双严峻的眼睛刺向刘兰芝，像两把利剑！那脱光了头发的前额，更加显得突出而蕴藏丰富；微微向下撇着的左嘴角，有一道深深的折皱，一直勾到下巴后面去，显示着倔强、坚毅和顽强，这就是吴康！

坐在吴康旁边的是一位陕南农村装束的妇女，眼神安详而又庄重。这就是从她给吴康的那许多情书里认识了吴康的那个团支书！她占据了刘兰芝的位置，那么有理气长……

女儿不时瞧瞧吴南，吴南谦和地笑着；女儿又瞧瞧妈妈，有一种对幸福的乞求，渴望妈妈对她和她的恋人说些祝福的话……

“你们还年轻……”刘兰芝说不顺畅，结结巴巴，“像你……吴伯伯……那样做人……这是最珍贵的……”

女儿果然心满意足地笑了。

吴南庄重地点点头，也幸福地笑着。

刘兰芝却更苦楚了。这一双年轻人，看来已经完满地铸成他们幸福的基础了！可是，她将怎样面对吴康？面对那个从她给吴康的信里认识了吴康而义无反顾地结成生死之恋的陕南劳动妇女？她和刘剑投在吴康心灵上的阴影，一旦为孩子们所了知，她……

孩子们告辞了，要回学校去。他们就在她和吴康读过书的那所古老的大学历史系学习。她不强作挽留，让他们去吧！

刘兰芝站在残雪未融的地面上，望着两个孩子的背影在楼房的转角处消失，回过身来，怎么也抑制不住感情的潮水了。她缓缓走上楼梯，脚步十分沉重……

1980年3月 西蒋村

枣林曲

一

洗刷了锅碗，收拾了屋子，哄得小外甥睡着以后，玉蝉提上竹篮，上街去买菜。

背巷里人也这样稠，紧小心着就撞碰了肩膀；那个穿得花里胡哨、打扮得油头粉面的万货，明明是故意碰的！讨厌！

菜店里的水泥地板上，摞着一堆失掉了色泽的秋茄子、老冬瓜，正是蔬菜生产的脱茬季节哩！家乡的青山坡上，秋茬苜蓿正鲜嫩吧？小蒜大概还没有抽薹儿，那味儿比韭菜还鲜……

对过那家水果店门口，男男女女围塞满了。玉蝉走到跟前，唔，红枣上市了！多好的鲜枣儿……俺枣林沟的枣儿也该红了吧？层层叠叠的青山，一眼望不透的青葱葱的枣树。蒜瓣儿一样繁的红枣，压弯了枝条。社娃哥正在摘枣儿哩吧？他的红枣一般淳厚丰润的脸膛，正喜得笑哩！他生她的气吧？肯定……

一颗颗水灵灵的绿红枣儿从售货员的秤盘滚进她的竹篮，玉蝉退出身来，心还在扑扑地跳着。多美的枣林沟……

“蝉儿——”

好耳熟的声音！玉蝉抬起头，在人流里寻找呼叫她的人。

“蝉儿——”

多亲切的声音！在水果店的偏门口，她瞅见了玉山叔那张柿饼脸，正喜呵呵地笑着，扬起吊着黑色羊皮烟包的长杆儿烟袋，向她打招呼哩。

“大叔，你进城做啥来咧？”

“送枣儿。”玉山叔用下巴指着拥挤的水果店柜台，自豪地笑着说，“那儿卖的，就是咱们枣林沟的枣儿。”

“噢！怪不得，我一尝这味儿……就很熟！”玉蝉儿说。

“能尝出咱的枣儿的味儿吗？”

“能！我一口就尝出来！”玉蝉说，“我刚才还想，这多像俺枣林沟的大枣儿呀！果真……”

“昨日开园摘枣，我就给你挑了一兜儿，全是鸡蛋大的，准备今日进城给你捎来，临了记不清你住哪条巷……”玉山叔说得好动人。

“你还记着……我……”玉蝉儿突地觉得心里灰溜溜地，不好意思地说。

“记得！你在咱枣林沟出了不少力，怎么不记得！”玉山叔大声肯定说，口气十分热诚，“自打枣儿有了味，我跟社娃一天不知念叨你几回哩！”

“我不信！”玉蝉撇着嘴角，“不骂我才怪哩！”

“噢哟！蝉儿，你真是屈了叔的心，也屈了社娃的心！”玉山叔睁大笑眯眯的眼睛，噘起留着小胡须的嘴唇，似乎很伤心地说，“你可真

是屈了俺的心……”

“我是说……他……”玉蝉轻声说，不由得脸热了，用眼瞄着玉山。

“他——社娃？”玉山叔明知故问，像猜着了玉蝉的心思，摇摇头，更肯定地说，“他呀，比我还念叨得多哩！”

玉蝉的心又一热，羞涩地低下头。他怎样念叨呢？念叨些什么呢？

“你不知道，你刚走那一向，社娃焦眉苦脸，整日没个笑影。一个人钻进枣林沟，闷住头干活儿，不和我照面……”玉山叔用显然夸大了的口气，说得很动情，“我真担心他会闷出病来，就把他叫出沟来，坐下，说宽心话……”

“我才不信哩！”玉蝉心里像有个小毛虫虫在蠕动，口里却故意说出相反的话来。

“你不信？”玉山叔的柿饼脸上满是认真的神色，“前日，我到医院去，他还问你……”

“医院？他在医院做啥？”玉蝉奇怪，忙问。

“噢！你还不知道，社娃住院咧！”玉山叔难受地说。

“啥病？”玉蝉吃惊了。

“肚里疼……”

“肚里疼也住院？”

“疼得好凶！疼得社娃在地上滚……闭了气！”

“啊——”玉蝉惊得脸上变了色，“啥病这么疼？”

“绞肠痧！”玉山叔说，“医生说是阑尾炎……”

“唔！”蝉儿急骤跳腾的心稳下来，“现在呢？”

“没事咧！”玉山叔变出一副快乐的声调，畅快地说，“拆了线咧！再过一两天就出院呀！”

“在哪个医院住着？”

“咱县医院。”玉山叔说，“你该抽空儿去看看！”

“我？”玉蝉说，“人家稀罕我去吗？”

“看看看看看！你这女子——”玉山叔的小胡须又撅起来，“你的心数儿太多！刚才一听社娃病咧，你吓得脸都变咧！这阵儿，嘴里又尽说见外的话！”

玉蝉的脸扑地热了，耳根和发根，都有血在涌结。突然听到社娃哥病重住院的消息所产生的紧张情绪里，她不知不觉把心底的秘密泄露出来了。这个贼心眼的柿饼脸，把她套住了，探出了她的心……她索性认真地说：“我……不去！”

“你不去我也不拉你。”玉山叔冷冷地说，随后换了一副矜持的口气，“社娃一住院，全村大小干部都去看过，好多社员也去了，挡都挡不住。公社王书记也去看望了。前日我去的时光，县委常书记正坐在社娃床前，团书记陪着……”

“啊……”玉蝉后悔不该说出不去的话了。

“社娃上了报！还登着他和我嫁接枣树的相片！”玉山叔很自豪地说，“你没看报吗？”

“噢……”玉蝉不好意思地低下头着实吃惊了，青山里出了这样新鲜的事情！自己理该享有的光荣……可是，我却离开青山里的枣林沟了……

“新长征突击手！”玉山叔很神气地说，“省上给奖了好大一个镜框，一台电视机，社娃捐给集体，放在大队办公室。”

“啊！”玉蝉矜持的情绪跑得尽光，心里好生空虚。

“一个二十出头的青年娃，受到这么多人的敬重，不容易啊！”玉山叔感慨地说，“人活着图啥呢？”

“……”玉蝉好愧心啊！

“去吧！你该去看看！”玉山叔实心相劝，“咱仨在一搭干了几年……”

“他不恼我吗……”玉蝉说出心里话了。

“哪里话嘛！”玉山满口否定，“不是叔说你，你样样都好，就是有点二心不定，不及社娃……”

玉蝉闭了口，愧恨地站在玉山叔跟前，拧着衣角，心里难受了，自己怎么弄成这样。二心不定！二心不定！！她吃了二心不定多少亏了！自己为啥从青山里的枣林沟跑到这大城市来呢？姐姐说让她给看

看孩子，再让姐夫给她寻个合同工指标，干几年再想办法转正……还不是怪自个儿二心不定吗？怎么有脸去见社娃哥呢？

二

“蝉儿，在哪儿买的红枣？真鲜！”姐姐咔嚓咔嚓嚼着枣儿，“给你看个好东西！”

蝉儿怏怏未动。脑子里满是青葱葱的枣林，蒜瓣儿一般繁的红枣，社娃哥红枣一般丰润的脸膛。她讨厌听姐姐贪馋地咀嚼枣子的声音，也讨厌听她的得意的调门。

“你看——”姐姐把一张硬质表格亮到她的胸前，得意地笑着，“快去填了。”

蝉儿接住表格，看了一眼，这是一张合同工登记表，她轻轻放到桌上，说，“我不想填咧！”

“啊呀！你怎咧？”姐姐张着填满枣肉的嘴，迷惑地瞪起眼。

“我不想干那……合同工。”蝉儿终于说出口。

“你这娃！三天两头变卦，老是二心不定！”姐姐抱怨说，“你哥为这合同工，找了多少人，跑了多少路，费了多大神！你难道没看见？刚才一拿到手，就送回来！”

“我在……城里……过不惯！”想到姐姐和姐夫为给她谋得一个合同工，确实是人没少寻，路没少跑，神没少劳的，溜到口边的怨气话到底没说出口，只说自己不习惯。可姐姐也说自己二心不定，还不是你搅得人家没了主意！

“稼娃！”姐姐嗔怪地说，“怎么住不惯？龙头一拧，水到锅里了。乡下，你天天得到沟里去挑……”

“我情愿挑嘛！”玉蝉使着性子说。

“情愿？”姐姐一甩头说，“一个劳动日三毛钱，你干一年不及我俩月的工资！你不识数儿吗？”

“我刚才听玉山叔说，今年队里搞了几项副业，劳价要冒过一块，比合同工不少啥！”

“噢！怪道你又心变咧！”姐姐醒悟似的叹息着说，“你听那个老柿饼谝！尽吹！”

“队里实行了责任制，今年庄稼也长得好。我出来做合同工，为自己挣钱，不光彩！”玉蝉说。

“你哥给队里办了多少事？把路铺平了，谁也说不成啥！”姐姐撇着嘴，很神气地说。

玉蝉不吭声了。姐夫会办事。过春节时，姐夫跟姐姐领着外甥回到青山下看望妈妈的时候，得知队办工厂买不下车床，就一口包揽下来，一月没过，一台八成新的车床送到山村来，价钱是按废旧车床折合的。这下，队干部们对姐夫看得跟神一样敬重。随后又给队里联系好产品销路……他只办事，而不提个人的任何要求，到得“把路铺平”了，哪个干部好意思阻挡玉蝉进城做合同工呀！社员有意见，白有！你能买来合茬的车床吗？

姐夫能干！门道稠！他寻人办事，成天跑得不停；又有好多人找到家里来，求他办事。姐姐在她跟前老是很得意地夸耀，什么难买的

东西，姐夫都能买到，北京、上海、外贸公司，他都有熟人，都通着眼隙……而且花很少的钱，办很大的事。蹲在半截柜上那台电视机，才花了三十几块钱，说是内部试销，这可真使乡里娃玉蝉开了眼界……这儿——姐姐的家——是一个世界，一层世事；她和玉山叔以及社娃所在的青山坡的枣林沟，是另一个世界，另一层世事。两层世事，两个世界，玉蝉只能凭直觉看出这个存在和差异，而又想不透……反正想到枣林沟那个世界，她心里好生快活！想到姐姐家的世事，姐夫出来进去神秘的样子，她好生烦腻！

“人活着图啥呢？”玉山叔的话从她的心里跳出来，玉蝉冷不丁对姐姐发问，“只有钱吗？”

“越说你越傻！”姐姐嘲笑说，“我知道你的意思！为革命啊？哈哈哈……为共产主义啊？哈哈哈……为人类做出更大的贡献啊？哈哈哈……稼娃妹子，就为这些啊！怎么能为钱呢？”

听着姐姐一阴一阳嘲弄的笑声，玉蝉一阵一阵感到气往胸里憋。姐姐，社娃，姐夫，玉山叔，面目那么相差相背！看着姐姐猖狂的神气，玉蝉说：“人，得为集体办好事，大家才尊重你……”

“啊呀！没看出，咱们家还出了个活雷锋！”姐姐更加刻薄地挖苦说，“你要学雷锋吗？太迟咧！六十年代的雷锋，八十年代不时兴啰！现在时兴喇叭裤，长头发，想法子多挣钱……”

“总得是合理合法挣钱！”玉蝉说：“要是大伙都自找门路做合同工，生产队就没法子搞了！”

“这是不可能的！农民不可能都进城做合同工！”姐姐脸一横，“事实上不可能！”

“没有我这样个好姐夫！”玉蝉急了，赌气说。

姐姐脸一愣，一红，满是煞气，噎得半天说不出话，眼一沉，几乎是哭溜着腔调数说起来：“你耍跟我抬歪杠！我为啥来？前几年，家里买黑市粮没钱，寻我！过年过节过不去，寻我！把我搅得不得安宁！”说着说着就冒起火气来，“你有志气，你热爱农村，你‘人活着为革命’，为啥花钱时就寻我？”

玉蝉儿反不上话来，感觉自己处于难堪的劣势中。前些年，农村缺粮，劳动一年倒欠款，确实花了姐姐不少钱！花了人的钱，自己有理也气短！姐姐从来不把稼娃妹妹的话当一回事啊！因为生活上多年受到姐姐的接济，爸和妈对姐姐信崇得跟正宫娘娘一般！家里的事，都得听听姐姐的意见，妈在人面前出口闭口都是“俺大女咋说咋说！”当她和社娃有了那层意思以后，玉山叔兴蹦蹦地去给两家老人说合，社娃父母自然没啥意见，她的父母却轻轻把玉山叔给推出门去了。爸爸只笑不开口，拿眼睛瞟着妈。他拿不住家里的事，家里的万事都由妈做主；而妈万事又都要由姐姐给她做主。“等我跟俺大女子商量一下再说……”玉山叔心里凉了！社娃眉里愁了！这个婚事没提成，倒引起妈和姐姐的疑心和戒备……结果把她给弄到城里来！说是来给姐姐看娃，来了就活动合同工的门路。她婉转地给姐姐说，带了几个月小孩，她还是想回乡下去，既然合同工那么难，别让姐夫折腾咧！姐姐毫不动摇，硬是要妹妹按她的主意办。她不敢违拗姐姐。她知道姐姐在家庭里的位置。什么婚姻自主，自主不了嘛！她感觉畅快的青山坡、枣林沟，她钟情的亲爱的社娃哥，只好成为甜蜜的记忆了！她不甘心，夜晚老是做梦，梦见青山和社娃，人的感情又多么奇怪……

“我为了啥？”姐姐息火了，“你好好想想。”

玉蝉不想说啥，一个穷庄稼妹子，在姐姐眼里，懂得什么呢?

“你今天回去，让大小队盖上章子！”姐姐说，“明天早晨来，水紧好捉鱼！”

“正好！”玉蝉心里一亮，“我正好可以去县医院，看看社娃哥！”她把表格装进兜里。

三

时在秋分。正午一过，山区就显出秋高气爽的景象。一阵小雨过后，太阳撒出格外绚烂的光芒。青山、溪流、梯田里干壳焦糊的玉米，河川里泛黄的稻谷，涂上一层金色光彩。空气里融会着五谷成熟的郁郁香味，透人心脾。

玉蝉推着自行车，爬上十八盘的山顶了。她顾不得多看可爱的熟悉的山野，就又翻身跨上车子，顺着公路下坡了。出过汗的脸上，经风一吹，舒适极了。

刚到沟底，远远可以看见枣林沟所泛出的一片青色，清风送来枣子的清香，隐隐听见摘枣的社员嘻嘻哈哈的说笑声。玉蝉跳下车子，伫立在那儿，眺望着。多么亲切迷人的青山……

“蝉儿，我给你看个把戏儿——”社娃神秘地说。

她跟着他，从村子里跑出来，翻过溜马坡，钻进酸枣沟，一满是红石山坡，一满是乱蓬蓬的酸枣棵子。这个烂山沟里，有什么好看的把戏呢？玉蝉手上扎了两根枣刺，脸上也划出了血印，还是跟着社娃往沟里钻。

“你看——”社娃停住脚，站在一块漫坡地上，指着一棵被截掉了枝条的酸枣棵子，揭开了秘密。

“啊呀！接活了大枣！”玉蝉看见，那棵被截断的酸枣棵子，用塑料皮儿包扎着，冒出一根大枣的枝芽，一筷子高了，青绿水嫩，茁壮精神，她惊奇地喊，“你怎么嫁接的……”

于是，她和社娃把队长、支书引进酸枣沟来，他们当时多吃惊啊……

于是，酸枣嫁接大枣的枣林专业组在青山大队成立起来，大队派玉山叔领着她和社娃进了酸枣沟，安营扎寨了……

于是，酸枣沟罩起一眼望不透的枣林……

哎哎！我怎么中途跑进大城市去了呢？丢下社娃和玉山叔，还扎在青山里……我二心不定！

“社娃哥！你看我在枣林组这一向工作，有啥缺点呢？”她接完一株，擦着汗，问。

社娃停住手，侧过头，眨着眼，想不来她怎么突然征求起他的意见来：“没有！你干得比我还泼势。你手巧！”

“整个……一切方面……有啥缺点……”

“都没有！”他更肯定地说，索性低下头，继续接完那一株酸枣棵子。

他太老实了！想不来人的话里的意思！玉蝉想，对老实人不能把弯子绕得太远了："社娃哥！你看过《流浪者》电影没？"

"看过。"社娃缠着塑料片儿，仍然头不抬，"在县上开林业会时包的……"

"拉兹……和丽达，在水里……捉迷藏……真不害羞！"玉蝉挑逗社娃说，自己脸上先热了，心口里嘣嘣嘣跳。

"外国人不在乎。"社娃坐下来，活动着酸困的指头，老成持重地说，"洋人恋爱也洋得很！"

玉蝉又失望了。这个老实疙瘩，你能想到在酸枣上接大枣，心眼不算少哩！她干脆挑明问："那……中国人……土人……怎……恋爱……"

"这……"社娃回答不了了，扬起头，和她对视的时候，枣红脸腾地大红了，醒悟似的眯缝着眼睛，颤着声，惊喜地瞄一眼玉蝉，说："咱们……"说着一猛子站起来，伸出两条胳膊。

"你……坏！"玉蝉用手点一下他愣里愣气的额头，一闪身跑了，格格格的笑声响在幽静的山沟里，踢得小石径上的石子乱滚。

后晌休息时，玉蝉看见玉山叔在训社娃："我把你……还没看出！这儿……不是印度！"社娃的头，低在两膝之间，羞得抬不起来。玉蝉不敢再往前走，悄悄钻进沟里去。这个贼心眼的柿饼脸，怎么发现了她和他说的话？思想又封建死了！

谁料得到，当天晚上，她从大队部玩回来，听见玉山叔在屋里和妈爸正说话哩！起初还以为老柿饼来给妈告她，细一听，原来他给妈

提说她和社娃的亲事来了。真是个好心眼的老汉！全怪母亲把人家推诿……

我当时要是不跑呢？玉蝉这样想着，脸又一热。当初在枣林沟，三人畅畅快快，无忧无虑；现在却隔隔卡卡，不好见面；怎么弄成这样呢？她放稳自行车，蹲在水潭边的青石板上，想洗洗脸。清湛湛的水潭里，映出她红润润的脸膛，她缩回手，看着水里姑娘好看的眼睛，自言自语：怪你二心不定，几乎把事要弄瞎咧！一掬水，影子消失了，她扑扑洗着脸，在心里给自己鼓劲：去县医院！看社娃哥去！把窝囊话全说给他；他人老实，不会骂的；骂也不怎……

“蝉儿——”

蝉儿一侧过头，看见玉山叔正从十八盘上骑车下来了，跳下车子，笑呵呵地说：“我估摸你今日非回来不解！我的卦算准咧！”

那柿饼脸上喜眯眯的双眼，一眼不眨地瞧着玉蝉刚洗过的脸，简直想透视人心底儿！玉蝉说：“我回来有我的事！你的卦不准！”她把合同工登记表从提包里翻出来，递到玉山叔的手里。

玉山叔一看那张表，脸刷地变灰了，简直成了一块皱皱褶褶的真正的柿饼，满脸都是失望的晦气，眨着眼，把那张表又递到玉蝉手里，带着明显鄙弃的口气说：“好么！好么……”说着，就去推他的自行车。

玉蝉接过表，三把两把，撕得粉碎，扔到水潭里去了，赌气似的逼近玉山叔：“好不好？”

“啊！这娃——你怎咧？”玉山叔的柿饼脸像天气预报一样，由阴天转成多云，瞬即又是多云转晴天了。他笑着，感叹着，拍着玉蝉的肩膀，“好！我的卦还是准的！”

玉蝉也控制不住自己，哗地涌下两行热泪来：“玉山叔……”

玉山叔伸出粗糙的手掌，像哄女儿一样，随手给她把眼泪抹掉了，高兴地说：

“我今日顺路到药材公司订了合同，咱们给国家种药材，药场马上就要下种呀！咱山里人靠山吃山，好事才开头……”

“靠人不气长，亲姊妹也是这！”玉蝉说，“靠自己队里富，干帮硬正，自由！”

“对对对！有志气！”玉山叔喜得直点头，“走！咱回！”

“我不想回……”玉蝉妩媚娇嗔地说。

“怎咧？”玉山叔又一愣。

“你不是批评人……二心不定么？今回，我一心一意！”

“哈！一心一意，好！”玉山叔说，“噢，你是想先上咱枣林沟看看？走！”

玉蝉鼓足勇气，大声说：“我到县医院去呀……”

“噢噢噢噢噢！我倒糊住了！”

等得玉山叔反应明白，柿饼脸笑得开了花，看那蝉儿，早已跨上车子，沿着青山下的公路，箭一般飞驰而去……

1980年4月 灞桥

早晨

后院的鸡棚里传来一声雄壮而又洪亮的鸡啼，冯老五醒来了。蒙在木格窗子上的塑料薄膜儿，现出了蒙蒙的亮光，天明了。老五一翻身就溜下炕来，棉袄棉裤整整齐齐穿在身上。为了等待儿子，他昨晚压根儿就不曾解过纽扣。

冯老五走出上房，一边结紧腰里的带子，一边走到小院里。夜里落过一场小雪，瓦沟里坐着一层薄薄的白雪，天已经放晴了，农历正月末尾的一弯残月，挂在东原顶上。

儿子住的厢房的木门板上，挂着一把铁皮锁子。老五心里一惊，夜黑他去哪达了?

好事如果和瞎事恰恰遇在一起，就使人特别揪心！冯老五好容易从公社书记那里给退伍归来的儿子求得一个社办工厂的指标，昨天傍晚兴冲冲回到家，老伴却告诉他，后晌开了社员会，儿子被众人选上队长了！

他把老伴推出门，叫她把儿子找回来！

老伴在村里找来找去，前街后巷都找过了，没见儿子的影子。

老五喝罢汤，坐下抽烟，等待。

鸡叫过头遍，不见儿子回来。他实在困得受不住了，和衣躺进被窝里……

天麻麻明，村子里很静，从前街上传来扫帚刷着冰冻的地皮的声音，一下，一下，刷——刷——

春节过完了，队里还没有开工，庄稼人早晨可以尽睡觉哩。现在到哪里去找儿子？敲人家的街门，去追寻儿子夜晚的踪迹，会叫人产生多少错觉呢？他顺手捞起长把竹条扫帚，从小院扫起，一直到街门口。他拉开街门的木栓，跨过高高的门槛，准备清扫街道的时候，河滩里一阵叽叽嘎嘎的笑闹声传过来了……

老五拄着扫帚，望着。滩地里一抹白雪，耀得人眼花，他眯起眼睛，聚足了光气，终于看见了大堤的杨柳林丛中，有两三个人影在跃动，叽叽嘎嘎的笑闹声就是从那儿传到村子里来的，他似乎立刻预感到，那里边就有他的儿子。他侧耳静听，终于逮住了儿子一声浑厚的话音，更加证实了预感。

冯老五把扫帚顺着门框立好，就走到门前的场地，下了场塄，走上通河堤的田间土道。

薄薄的积雪在脚下发出嚓嚓嚓的响声。

冯老五走上河堤，却不见一个人影，雨季里护堤人住的瓦房里，飘出一缕缕淡淡的蓝色柴烟。

老五走进小瓦房，房子中间的脚地上，堆积了好大一堆玉米秆的灰烬，没有燃尽的玉米根，闪着火星，冒着青烟。火堆旁的一个石头上，放着半个烤过的玉米面馍馍……

他又审视一下炕头，有一本新订的白纸本子，封皮上写着几个字，他还能认得——“冯家滩三队委员会”。他翻开封皮，第一页上写

着什么制度，再一页上，又是什么管理办法，他淡漠地笑笑，把本子扔回到原处。

冯老五从小瓦房旋即出来，走上三号大坝，他吃惊地看见，在二号坝头上，他的儿子——冯豹子，正和两个青年在冰窟窿里掬水洗脸呢。

这就是老伴告诉他的昨天后晌选举出来的三个干部，夸下海口要让三队致富的三个人手！他们洗毕了，相继站起来，其中一个大概发现了老五，给他的儿子——那个只穿着绿黄绒衣的高个子指一指，儿子回头一看，随之就朝父亲站着的石坝走来。

“爸！”儿子站在当面，有点不自然，“你一大早跑来……”

冯老五故意问:“你仨在这儿弄啥？”

“开会。”儿子说，“三队管委会第一次开会。”

“冯家滩村里，还放不下你们三位大干部吗？”冯老五听着儿子认真的口气，不觉有点好笑，挖苦说，“这么秘密呀！”

“这儿安静，没有干扰！”儿子仍然认认真真解释。那两个小伙，站在豹子后面，对着脸，挤眼，噘嘴，做着鬼脸，表示出不买账的神气。

“豹子，你来，我跟你说句话。”冯老五叫儿子，他想避开那两个碍眼的青年，“干脆回家说。”

“不行！爸！”豹子说，“我要开会哩！”

“开啥会？”

“社员会。”

“开社员会做啥？”

“研究今年的生产、管理和制度。”儿子说，“我仨夜里凑了个计划，想交社员讨论。”

冯老五冷冷地说：“先霎张罗吧！你们选举的干部合不合乎原则？为啥不给支部打招呼？”

“开选举会的时候，你到公社去了，到处找不见，就叫副支书参加了。你不在，副书记就不能当家？”

“等支部研究以后再说。”冯老五说。

“不行，爸爸！我们昨晚研究决定了。”豹子恳求说，“你不能……叫俺们新班子的头一个决议就落空。”

“不行，得支部研究以后再说。”冯老五觉得，在那两个小伙面前，只有抬出支部来，才能压住阵脚。他严厉地对儿子说，“回！我有话说。”

豹子站在原地，两条浓浓的黑眉毛朝鼻梁上头挤，挤起来两道高高的肉梁。他沉默着，不看爸爸，也不看那俩同伴，半天，他猛然转过身，对那俩小伙说：

“你俩回村，打铃！开会！”

冯老五木然了，脸刷地红了，站在对面的儿子，既不尊重支部，又不尊重父亲，狂得没个相况了哇！他气得说不出话：“你……”

那两个小伙得了豹子的命令，早已奔下河堤去了，临走，故意白了老五一眼：看谁厉害！

豹子看了老五一眼，没有理会父亲的情绪变化，又高声喝住了那两个青年：

“二牛，你去打铃，挨家挨户都招呼一下；忍娃，你到饲养室，把会场打扫干净！”

二牛和忍娃又转过身，奔跑着走了。

天亮了，东山顶峰的那一片蛋青色愈来愈透亮，开始现出明亮净洁的白光。群山，河川，南原和北岭，已经呈现出清晰的轮廓。

冯老五在刚才最气人的那一瞬间，早就想甩手走掉！想想，走掉又怎么办呢？他强行忍耐着，到底没有走掉，蹲在石头上，掏出烟包来。

现在，空旷而寂静的河堤上，只有他父子二人了。豹子走到跟前，难为情地说：“爸，你得体谅我，我刚上任，头一个会。”

儿子说得真诚，老五没有看他。

一阵沉默。

冯老五点着了旱烟，看着儿子，恨铁不成钢地说：“你知道我昨日到公社做啥去了？”

“知道。”儿子很平静地说，“给我寻出路。”

“既然你知道，为啥还要把队长接到手上？”

“爸！我给你说过，我不想到社办企业去！”儿子说。

我的天！冯老五又气得说不出话。要不是他当着支书，硬在公社书记面前卖老脸，有你豹子参加的工作吗？公社里一年复员回来多少军人，有几个能到社办工厂当工人，他倒不想去！口气多大！眼头多高！老五气得失去理智，冒出一句难听话来：“军队上的军官名声好，你怎么不当啊？”

“你——”儿子愧疚地痛苦地抽搐着。他大概绝对不会想到爸爸会拿这样难听的话来刺激他。而他明明知道，当了七年机枪班的班长，在提干待批中，被一位军官的儿子挤掉了……

“爸！”儿子走到他跟前，流着眼泪，“你不要气我！你知道我为啥要当这个队长吗？”

冯老五转过头，瞅着儿子。

“我为你！”

“为我？”冯老五吃惊了，莫名其妙！

“为你。”儿子肯定说，“你知不知道，社员对你的看法？”

“我当干部二十多年，一没偷，二没逮！谁对我有啥看法？”冯老五理直气壮，“你娃……哼！”

“可是，你起手当干部的时候，大家分的粮食能吃饱，干了二十多年，现在倒吃不饱了！我参军那年，劳值二毛三，去年复员回来，涨了七分，三毛！”豹子说。

“那是‘四人帮’捣乱，农业生产受破坏……”

“‘四人帮’垮台三年了，你看邻近的那些队变化多大！可我们队里还是老一套。而今正月已经完了，我看支部里头也没有个啥举动！社员说，咱把三毛钱的劳值挣到何年何月呢？”豹子说。

冯老五沉默了，自打儿子去年秋后复转回来，他为儿子的出路结了一块心病，队里的事，一来想得少，二来看不准。公社里只是一般号召一下，他不敢自作主张呵！谁知道怎么干才对呢？

“爸！社员说你是个好人。”儿子说，“可也对你不抱啥希望。”

不能不承认儿子说的是实话。这一点，冯老五自己早就感觉出来了。

“你到社办厂去，我把你兄弟们安顿好！我下台呀！我早就不想当这空头支书咧！”冯老五说，“我还不是为你们嘛！”

“爸！大官捞大油水，小官捞小油水，你这个农村支书，只能给儿子求得个社办厂的工人！”豹子嘲弄地说，“社员呢？谁为他们想呢？”说到这儿，豹子居然激动了，声音也高了：“咱冯家滩，二十七八的小伙子不下三十，有几个订下媳妇了？为啥？人家谁把闺女给到这里来讨饭呀？”

冯老五觉得儿子说得太扎刺了，说：“你覅吹！农村事情的复杂性，你还没尝过，就说三队，换过十二任队长了，谁上去也搞不好！

你先要张罗！”

“三队的十二任队长，我一个一个都了解过了。”儿子胸有成竹地说，“我们三个昨黑专门研究了十二任队长的得失，给自己订下了纪律！”

“你再想想！霎一时热血蒙心！等得你后悔的时候，就晚了。”冯老五说，“三队这个烂摊子，凭你仨？哼！好好掂量掂量！”

“我们掂量过了！绝不会比现在更瞎！”豹子说，“要是一年没见变化，我绝不赖在台上！”

村口传来二牛呼叫豹子的声音。

“爸，我要开会去了。”豹子说，“你也该去听听，你是支书，又是三队的社员！”

“我不去！”冯老五说。

“你该去！爸！”豹子说，“我们给社员拿出一个新管理办法，你听了会吃惊的！”

“你……怎么弄？”冯老五担心，“要注意政策性儿！”豹子已经走了，回过头来，得意地说：

“大闹！红红火火地闹！怎样能叫社员吃饱穿暖就怎样闹！”

冯老五看着儿子走下河堤，扯开步子，朝村庄走去。

太阳刚刚冒红，把群山的峰顶染成了红色，雪地里闪烁出耀眼的色彩。

冯老五倒觉得身上更冷了，一股孤独和忧伤的情绪一下子潜入心中：我怎么办?

1980年7月30日 灞桥

第一刀

一

把两个副业组相继送出冯家滩，新任队长冯豹子腾出手来，按照队委会的计划，立即实施对三队生产管理制度的改革。一天也不敢拖延！阳坡上的麦苗已经泛了绿，时令眨眼就到春分了。

首先要改的，是鱼池、猪场、磨房、菜园以及“三叉机”（手扶拖拉机）的生产管理制度。这些单人单项活路，多年来社员意见最大，而又无可奈何：一来是因为单人独立的特定劳动环境，干部不可能跟着监督，干不干全凭良心；二来是能干这几种优越的工种的人，在冯家滩总是和大、小队的干部有着某种关系，大都有一定的来路，所以，干部历来也不管。社员只能在闲谝时撂几句杂话，“工分窝”“敬老院”，说过也就过去了。

豹子和副队长牛娃分了工，分别先找这些人谈谈新的管理办法。俩人商量好谈话的原则：讲清新的管理办法，能接受，愿意干，欢迎继续干；不接受，不愿意干，绝不勉强，队里另外寻人。

豹子和牛娃商量分工谈话对象，商量到最后一个——鱼池的管理人冯景荣老汉时，俩人都瞅着对方，不说话，都希望对方能承担起来。

豹子心里作难：冯景荣老汉是他二爸，自己亲门本族里的人，反倒难说话。

牛娃说：“那老汉说话难听得很。我脾气又不好，三句话说崩了，不好收场。那是你二爸，对你说话，他总得拣拣字眼……”

还有什么可说的呢？豹子笑笑，就这么定了。他心里有句话没说出口：二爸对当了七年兵而没有穿上四个兜的穷侄儿，说话比对旁人更尖刻。和牛娃分手以后，豹子下河滩来了。

晌午的太阳已经很有热力。自流渠上沿的背阴处，尽管还有一坨一坨残雪夹在枯草上，而河堤上杨树和柳树织成的林带，已经现出一抹淡淡的鹅黄。春风毕竟吹到小河了。

豹子心劲很高，给自来水公司挖管道和到货运站装卸货物的两个副业组总算开工了。如果不出啥大问题，预计的收入是可以指靠的。一般不会出啥大问题。他心里踏实，副队长忍娃带着副业队，嫑看年龄只有二十，他性格好，忍性大，甚至比豹子本人还要柔瓤。这样的人出门，是令人心地踏实的呢！

走过几畛已经解冻的稻田，自流渠的进水口旁边，就是三队那个永不产鱼的鱼池了。干枯的三棱草，长虫草长得半人高，锈满了池沿儿，偶尔能看见几尾杂鱼在被阳光晒热了的水面上摆动。

人呢？管理鱼池的他的二爸呢？不见踪影。豹子走上河堤，一眼就瞅见，在防洪坝的向阳面，坐着一个人，旁边的草滩上，有两只羊在啃着干草。那坐着晒太阳兼放羊的人，肯定是二爸了。小伙子心里不由地蹿起一股火来，大步走去。

二

二爸睡得舒坦。他坐在一块平整的河石上，背靠着大坝的石摺，脊背后和屁股下，垫靠着防洪时遗弃的烂稻草苫子；温柔的阳光抚平了老汉冬季里冻皱了的脸，眼睛安然地合闭着，修剪得很整齐的一溜短髭撅得老高，显示着熟睡者灵醒时那种根深蒂固的自信和优越的神气，轻匀的鼾气从围在毛领当中的脖颈里涌起，通过薄薄的嘴唇放出来。沙地上走路没有声响，豹子走到二爸跟前，仍然没有惊醒这位酣睡的长者。那两只大奶羊，在荒草滩上啃嚼着刚刚冒出地皮的野苜蓿、刺蓟等早发的春草。

豹子想，怎么叫醒二爸呢？二爸是三队里少数几个家境优裕的长者中最会品麻的一个，大儿子大学毕业，分到西藏搞地质勘探，工资高，又很孝顺，经常有令左邻右舍羡慕的汇款单由乡邮员送到家里来。老汉经常在地头矜持地夸耀儿子的来信："回回来信都有一句，要保护身体，要做重活！"可是老汉在三队里的乡信并不好。他对不能经常孝顺他的二儿子（那是个因为负担重、拖累大，而经常买不起盐和醋的农民），现在连话都不说了，比和乡邻的关系还僵。至于对扛了七年机枪而没有穿上四个兜的侄儿冯豹子，老汉压根就没放在眼里。文不成，武不就，最终归宿到冯家滩来抡镢头的年轻人，那是生就的庄稼坯子！顶没出息的人！

还是得叫醒他。要不，谁知他一觉要睡到什么时辰呢？豹子想：不管二爸为人如何，也不管人家怎么看待他，他现在管不了这些，也改变不了二爸几十年来的脾性。但是，二爸春天睡在这里晒暖暖，夏天躺在树荫下乘凉而挣取生产队劳动日的现状，是坚决不能再继续下去了。要改变管理办法，要使各种脾性的人，先进的或落后的，有良心的或没良心的，德行高的或德行低的，勤的或懒的，都统统纳进新

的管理制度当中来，动起来！干起来！再不能半死不活地瘫痪下去了！

“二爸——”豹子坐下来，很有礼貌地叫。

老汉睁开眼，并不以为难堪，很自然地吟出一句：“噢！是豹娃。”一边揉着被太阳晒得发红的眼睛，一边扭头看看沙滩上的那两只羊，然后回过头，慢悠悠地在皮袄口袋里摸出烟袋来。

“鱼池现在还有鱼没？”豹子随随便便问。

“没有鱼，我看守啥哩？”二爸冷冷地顶。

“大约有多少？”

“我也没下水数过！”

嗬呀，厉害！豹子被二爸顶得一时反不上话来。就凭这两句，二爸把任何一任企图过问鱼池管理状况的队长都碰得开不了口，而稳稳地坐在河边逍遥了六七年。原因呢？无非是二老汉的哥哥——豹子的亲爸，是党支部书记罢了。不看僧面看佛面，队长能避开支部书记而独立存在吗?

“有也好，没也好，过去的事了。”豹子放松口气，缓和一下气氛，“我今日来，想给你说，鱼池的管理，要改变法程。”

二老汉睁着警惕的眼睛，狐疑地瞅着豹子。

“包产。”豹子说，“超产奖励，减产……”

“减产扣罚我知道！”不等豹子说完，二爸就抢上话，冷冷地说，“我不干了。省得你给我头上挽笼套。”

二爸给豹子个下马威，揽不起。豹子忍着心火，说：“那好，你不干，那就省得我说了。”说罢，站起身来，准备走了。

“冯家门里出了你这个圣人！”二爸一见豹子要走，忽地跳起来，变了脸，“刚一上任，先在我头上开刀，真有本事！”

豹子有点始料不及，一看二爸闹事的架势，一下蒙了。他解释说：“二爸，你看，猪场、磨房、菜园，都要搞包产，咋能是对你开刀？”

“我早知道，有人气不平！”二爸喊说，“我不想受你的奖，也不想受你的罚！谁想在我头上拧螺丝，看把他的手�了去！”

“没有人想整人。”豹子说，“你不管鱼池，没人强迫你；大田生产也要实行成本核算责任制；不操心、不出力的工分是不好挣了——”

“我不挣你那工分！”二爸声粗气壮，“我离了那几个烂工分，照样穿皮袄，抽卷烟，喝‘西凤’！”

豹子憋得耳朵都要炸了。二爸这种以富压贫的欺人的口气，太残火了！想到自己刚上任，万事开头难，一气之下吵起来，会叫众人笑话的。势利而尖刻的二爸顾什么呢?

“那好！我另找人。”豹子说着，转身走了，走了两步，又回转身，“其实，你平心静气想想，包产以后，队里能增加收入，你也能增加收入。你再想想，到明天晌午开社员会之前，你要是愿意，还能成……”

豹子说罢，扯开腿走了，背后传来二爸尖酸的嘲弄侄子的声音。

三

经过不知多少回修修补补，村东头的这座“善庄庙”变得有些不伦不类了。古老的琉璃筒瓦中，掺杂着机械压制烘烧的红色机瓦，几根粗电线从山墙上穿壁而进，门里传出箩筐有节奏的呱嗒声。

豹子走到门口，管电磨的磨工冯得宽，正把一斗加工着的麦子倒进去，豹子摇摇手，冯得宽点点头，把磨口的螺丝拧紧，就从磨台上跳下来。俩人走到一棵桑树下，电磨的声响不再震耳了。

看着得宽不住地扑闪着大眼，豹子开门见山提出关于电磨管理的意见，免得这个老诚人费心疑猜：“得宽哥，咱们今年想对电磨的管理变个法程。”

“嗯！”得宽紧盯着他。那意思准是：怎么变呢？有利于他挣工分吗？眼神严肃极了。

“按实际加工粮食的数字计工。”豹子说，“磨多少斤一分工，还想听听你的意见。”

“那问题不大，队里不会亏待我。”实诚人很豁达，随后问：“白天黑夜磨下的都算数吗？”

“都算。”豹子很干脆，“那都是你劳动应得的。”

“那要是没人磨面时，我到队里上工行不？”

“欢迎。”

“好！”老诚人脸上露出开心的喜悦之情，“我欢迎队上这办法。”

“那就这样了。”豹子说完，站起身。

“要着急走哇兄弟！”得宽拉住豹子的衣袖，按着他又圪蹴下来，有点为难地开了口，“豹子兄弟，让俺锁锁他妈管电磨，行不？”

豹子没料到，一点也没料到，得宽会提出让他婆娘管电磨的事，不好开口。

“她跟我这几年学会了，管起来没麻达。”得宽说，“我平时有个头疼脑热，就是她代我磨面。”

豹子忽然想，让得宽嫂子管电磨，倒是把得宽这个硬扎劳力解放出来了；出去了两个副业组，男劳力，特别是中年男劳力显得缺了，正好呀！在他高兴地这样盘算的当儿，老诚人却以为豹子不肯答应，诚恳地解释着让女人替他管磨子的原因：

“好我的兄弟哩！我上有二老，七十多了；下有三个娃娃，正上学；都靠我跟你嫂子下苦哩！每年的工分也倒不少，日子过得稀汤烂，工分不值钱嘛！说句丢脸话，两个老人，连一副寿材都没备下，万一……唉！娃娃上学，看见人家娃穿着塑料凉鞋，回家向我要，两三块钱的事，咱给娃买不起，还打娃屁股……”

老诚人眼里有泪花花在渗出来，声音发颤了，耿直而又热心肠的边防军的机枪班长——新任队长冯豹子，不敢看这位同辈老哥困顿愧疚的眼睛，也不忍心看他那强壮的体魄因伤心而颤动。此刻，年轻的队长把自己复员回来未婚妻变心的不愉快忘得干干净净了，一满是对中年长兄的同情和怜悯。

“唉唉唉！不怕你兄弟笑话，俺爸七十几岁了，要说吃啥穿啥，老人烟包包装的，是干棉花叶子……”老诚人双手捂住脸，指缝间流下一串串泪水珠儿。

豹子咬着牙，让即将溢出眼眶的泪水倒流回去，一股咸涩的细液从喉咙流进肚里去了。他说：

“得宽哥，你的主意好。咱正缺劳力呢！”

得宽扬起头：“我不怕出力！只要咱的老人和娃娃能跟旁人的老人和娃娃一样，我挣断筋骨都愿意。”

“得宽哥，你的情况我知道。”豹子说。

“唉！这样好，这样就好了！”得宽由衷地感叹，“电磨刚买回来那二年，就是按实际磨面的斤数计工，多劳多得。那年来了工作组，人家说我多挣了工分，是暴发户！好老天爷，比别人一年多挣一百来个劳动日，价值只有三五十块钱，能暴发多大？那还是咱没黑没明磨面挣下的……”

“不说了，得宽哥！”豹子劝，“就这么办了。”

“好好好！兄弟，你好好给咱三队扑腾，我帮你嫂子把电磨管好，让社员满意！”老诚人心实口直，自愿作保证，“你指到哪，我打到哪，咱有的是力气！”

豹子倒有点不好意思了，转身就走。

四

豹子回家来吃午饭，在街门口，看见二爸从门楼下出来。他自然收住脚，给气冲冲的二爸让开路，礼让长辈先出门。二爸背着手，长驱直出，连正眼瞅侄儿一眼也不瞅，走进街巷里去了。

豹子当下产生了一种猜测：二爸给父亲告状来了。

他听人议论，二爸在鱼池混工分、图逍遥的这多年里，某一年新任队长被社员的呼声所激愤，做出撤换二老汉的决定；二爸找过当支书的父亲，父亲又去找队长“做工作”……之后，二爸仍然逍遥在鱼池边的柳林中，社员干瞪眼瞅去！现在，又是来搬驾了吧?

母亲把饭菜端出小灶房，摆到里屋中的方桌上，父亲已经坐在那里了。

豹子在父亲对面坐下，大老碗里盛的是黄玉米糁子，搪瓷碟子里装着去年初冬窝下的酸菜。自从去年秋天收下玉米，一直到今年农历五月收下新麦，这一年当中的八个月里，冯家滩社员一日三餐，就是喝玉米糁子。有人说“以玉米为纲”，更有人编出顺口溜来：“早饭喝糁糁，午饭糁糁喝，晚饭是玉米把皮脱。”而不买高价粮、能把糁糁喝到接上新麦的人家，就是令众人羡慕的优裕户了。

豹子不能对这种单调的饭食表示异议。一旦有不满意的情绪，爸爸就开始忆苦思甜，说在军队上给他把嘴惯得太馋了。

爸爸喝起饭来，声音很响，很长，像扯布。豹子刚端起碗，爸爸就停下筷子，问：“听说你要把猪场、鱼池下放给私人？”

“没有。”豹子说，“只是改变一下管理办法，猪场和鱼池都是队里的。”

“还不是把猫叫成咪吗？”

“包产，生产责任制，联产计酬。名字由人去叫好了。”豹子说，“关键是要调动起社员的生产积极性儿来。”

“你不能再等一等吗？”爸爸的口气倒是商量着，真诚的。

“这个‘大锅饭’，再不能吃下去了，爸。”豹子说，“干活时，你瞅我，我瞅你，单怕自己多出一点力；吃饭时，你瞅我，我瞅你，单怕自个儿少吃了一勺子！就是社员说的，灵人把笨人教灵了，懒汉把勤人教懒了！二十多年了，为啥大家都看见这样的管理制度混不下去，可又不能改变一下？”

爸爸苦笑一下，说：“我眼也没瞎！一九七一年我在冯家滩推行了定额管理，热火了两年，批孔子那年，我就成了冯家滩的孔老二……”

“那你现在就该干了。”豹子表示理解父亲的难处，“现在形势好了嘛！”

“哼！”父亲冷漠地笑笑，“我想等全社都搞起来了，冯家滩再跟上搞。”

“那你等吧！”豹子说，“三队不等了。”

沉默。两股像扯布一样的喝玉米糁糁的声音，在方桌的这边和那边，此起彼伏，交替进行。

“就说我二爸管的鱼池吧！”豹子不能沉默，又引起话头，“我查了查账，七年里，队里给鱼池投放的鱼苗儿花了五百多块，喂鱼的麸皮成万斤，他本人一年三百六十个劳动日，按三毛算又是一百多块，七

年就七百块，可是生产了多少鱼呢？除了送人情的没法计算以外，累年的实际收入不过三百元！”

爸爸脸上很平静，表明他并不是不了解这种状况，只是无奈罢了。他说：“还是再等等。万事要出头，枪打出头鸟。你二爸的事，我给他刚才说了，日后学勤快点儿。”

豹子想，二爸果然是“奏本”来了。未等他开口，一直恪守不干预朝政的母亲在旁边插上话：“老二也太懒咧！懒得看不过眼！社员骂他，咱耳朵都发烧！叫我说，你就不该理识他！”

爸爸轻轻“唉”了一声，对于这位不争气的亲兄弟的行为似乎有难言的苦衷。

豹子笑着对母亲说：“管理办法有漏洞，把勤人放在那里，两年也就学懒了，何况二爸……”

“搞包产好。”爸爸平心静气说，“我当了二十多年干部，还分辨不来吗？”

“那就好。”豹子说，很高兴在这一点上，和父亲取得的一致。

“我看还是等等好。”父亲终于悄悄儿说出他的担心来，挺神秘，“听说县上和地委意见不统一，所以至今没有个定着。”

“让他们继续讨论好了。”豹子嘲笑地说，“那些至今把赘瘤当作神圣的优越性的官老爷，如果给他们停发工资，让他到冯家滩来挣一挣三毛钱的劳动日，吃一吃一日三餐的玉米糁加酸菜，再尝尝得宽他爸装在烟锅里的烂棉花叶子——烟草专家至今还没发现的新烟草的滋味，这个争论就该结束了……”

爸爸停下筷子，放下碗，没有再进行忆苦思甜的意思，长长嘘出一口气，庄重地瞅着儿子。

“我一天也不等，爸爸。”豹子说，“对鱼场、猪场等生产管理办法的改变，这是割去赘瘤的头一刀。大田生产，紧接着也要搞责任制，还有第二刀、第三刀……”

五

按照事先的约定，豹子和牛娃今晚在豹子住的厦房碰头，交换各自分头工作的情况。

牛娃进来了，从兴奋的脸上豹子就看到了成果，放了心。

牛娃一进门，用力把手从上劈下，眉飞色舞：“没问题，都接受了新管理办法！”

豹子听着，心里好畅快啊！瞧着和自己同年生的二牛，幼时割草念书形影不离的伙伴，耳前已经有发达的鬓毛串到下颌上头来了。二十六七岁了，还是光杆一条！这样壮实而又耿直的小伙子，在小河两岸稠密的乡村里，却找不下一个对象，全是一个穷字！托人从商洛山区订下（实际是买下）一个姑娘，花费了一千多块，只见了一面，介绍人把姑娘引着跑了，至今连个人影也寻不见——上了“人贩子”的当了！他对改变冯家滩三队要死不活的现状的那种急切心理，比对渴望异性更强烈！

“豹子！菜园俩老汉，对咱的新规程，双手欢迎！猪场的冯来生，也欢迎，只是提出一条，要求把猪场东边那片荒地让他开了，作为饲

料地……我看能成，反正那地荒着；他种点黑豆、苜蓿喂猪，可以降低成本……”

“给他！”豹子说，“开了那片荒地，给队里喂猪，这有什么问题呢？降低成本，对他有利，对队里更有利！”

“我看，明天可以开社员会宣布了！”牛娃说，“只是你二爸一个人不接受，无关大局。想吃这碗菜的，有的是人。他二老汉耍胡拧刺！”

“对！”豹子很受鼓舞，“现在，咱俩把具体的方案再斟酌一下，明天就要拿出去……”

这当儿，门里悄没声儿地走进一位老年妇人来。豹子一拧回头，噢，是二娘啊，豹子赶紧从凳子上站起，让二娘坐。二娘是个贤明而温和的长辈，豹子很尊重她的。

二娘手扣着手，拘谨地搭在胸前，顺炕站着，有点不好意思地瞅瞅豹子，又瞅瞅牛娃，终于选择好开口的词句：“你俩娃正忙工作，我只说一句话就走。你二爸……让我给你回句话，说他愿意按新法程……管鱼池。”

豹子笑了，和蔼地对二娘说：“那就好么！”

牛娃和婶婶耍笑，带着挖苦：“二婶，我不同意。二叔早起话说绝了啊，怎么这会儿又‘爬后墙’？”

“你耍和那个老二杆子计较。”二娘笑着回话，“那老二杆子一辈子说话不让人，把人伤完了。”

“不行！”牛娃继续逗二娘，“让二叔自己来说。”

“算咧！”二娘乞求。

“不行！”牛娃更强硬。

“那……那我去叫他！整整他那个瞎脾气……也该！”二娘很认真，转身就要出门。

牛娃突然爆发出一声大笑，拉住婶子，按她坐在炕沿上，说：“好二婶，我和你说句耍话，你说了就对咧！”

二娘虽然受了牛娃的耍笑，反倒放心地笑了。

“你倒是说说，二叔怎么又接受了‘包产’办法呢？”牛娃问，“他不是吹说不想挣这烂工分吗？”

“听他胡吹！”二娘一下上了气，“成天写信给娃要钱！娃在西藏也有一大家子人口，吃用又贵，整得娃的日子也紧紧巴巴……”

“二叔那人，自己手里有了俩馍，就在叫化子面前晃呢！”牛娃挖苦说，“要是咱的劳动日价值今年涨到一块，看他在三队还晃得起来？”

豹子一直插不上话，面前是贤明的长辈二娘呀。他怕二牛图了一时痛快，无节制地继续说下去，伤了老人的感情，总不好喀！他扶着二娘的胳膊，说：“你给二爸说，行了。”就送她出了门。

俩人重新坐下，豹子深情地瞅着二牛。

二牛不好意思了，瞪起眼：“你瞅我，认不得我吗？”

豹子会心一笑：“你是个大学问家呢！”

二牛倒忸怩起来："你怎么也学会酿制人了？"

"不是。"豹子挺认真，"你刚才点破了一条真理！"

"啥？"牛娃子一听，自己也吃惊了。

"你说，'要是咱的劳动日价值涨到一块，俺二爸手里那俩馍，就在穷人面前晃不成了！'这很对，对极了！"豹子说，"咱们今年要做的事情，就是把大伙从贫穷中解放出来，再要因穷困愁眉结肠了！让社员腰硬起来，腰粗气壮地活人！"

牛娃听了，眼里射出异样的光芒，笑着说："我居然说出了一条真理！我是块正经料啊！可惜！可惜！可惜没有一个姑娘认得咱这块料……哈哈……"

豹子也哈哈笑了，重重地在牛娃坚实的肩头砸了一拳："说正经事吧！"

1980年10月 灞桥

反省篇

一

县委东院南排第三号房子，住着分管组织工作的严副书记。河东公社党委书记黄建国从砖旋的圆洞门走进东院，站在三号房子门外，旧门板上新刷的油漆散发着一股刺鼻的气味。他轻轻敲了两下，屋里传出一阵布鞋鞋底蹭着地面的轻捷的脚步声，门开了。

严副书记亲切地笑着，让黄建国进屋。这是一张典型的陕北老人的脸型，直而短的鼻梁，恰当地居于四方脸盘的中心位置；单眼皮下，有一双黑黑的眼珠。尽管五十多岁了，那眼睛里闪出的神光，仍然是犀利而又活泼的。黄建国很坦然地坐在椅子上，接住了严副书记递来的茶水。

“想把你动一动。”严副书记开门见山地说。

黄建国“嗯”了一声，不过是表示了自己对事情早有预料。昨天后晌，接到严副书记来电话叫他的通知，他马上就猜到可能要“挪窝”了。他随口说：“行嘛。”说完之后，自己首先感觉出来，他的回答里有一种明显的无所谓的口气。

“换个地方，回避一下，对你有好处，对工作也有好处。”严副书记诚恳地解释说。

回避一下！回避什么呢？黄建国心里太清楚了。

在中央发出纠正学大寨运动中的“瞎指挥”的批示以后，黄建国顷刻之间陷入了灾难之中。一向是说钉不铆的“黄硬手”，不得不硬着头皮，赔着笑脸，走村串户，去向那些被扒了瓜田、挖了芦苇的生产队做检讨；特别是向那些因违抗他的命令而被撤职、被批斗、被挂着牌子游街的干部和社员去赔情道歉！赫赫有名的黄建国，在河东公社一下子变成了黄豆腐，钻在房子里没脸出门了！

那股汹涌愤怒的洪水终于平息下去了，黄建国可以走出孤闷的小房子了。他伤透了心，心灰意懒，例外地破费从山货店买回来一张竹皮躺椅，摆在门外的泡桐树下，躺在上面，摇扇子，抽烟，喝茶；傍晚看那绚丽的晚霞从西原顶上空渐渐隐退，夜来眺望那一弦月牙从东原顶缓缓朝西原移动……

“躺着比跑着舒服多了！”他心里嘲笑自己，你怎么就爱修水库、打田井？你冬不避风雪，夏不避日晒，移山造田；一年到头，东奔西颠，熬眼劳神，临了可好，落下个“瞎指挥”的恶名，得下个“害农民”的罪过，你吃了傻子药么?

“黄书记，县上布置抗旱保秋……”主管秋田生产的副主任说。

“告诉上级，农民忙着逛自由市场！”黄建国挖苦说，“要抗，我可以担着水桶去，可我管不住别人！”

“黄书记，咱们今年的棉花面积比国家下达面积差了七百亩，县棉花公司追查原因……”分管棉花生产的专职干部汇报说。

“原因很简单，‘农民最会种庄稼’嘛！”黄建国提高嗓门，得意地嘲弄说，“农民愿意种啥就种啥，我黄某人还敢再搞‘瞎指挥’吗？”

“瞎指挥”彻底变成“不指挥”了。

所有这些，严副书记都一清二楚，他用“回避一下”也同时回避了这个问题，至于领导者对他黄建国本人的看法，他觉得没有必要去做任何辩解了，仍然用无所谓的口气问：

“调我到哪里？”

“你的意见呢？”严副书记探询地问。

“随便。”黄建国说，“最好让我到哪个单位去看大门，当传达……”

“你呀——”严副书记笑了，用指头点着他，“同志，我过去一直没有看出，你还狭隘！在你顺利的时候，好像看不出，现在，就很明显了。”

黄建国吐出一口烟，有没有必要辩解呢？

“到河西公社去吧。”严副书记说，“河西公社的老梁调到河东公社来，你俩换个地窝。”说完瞅着他，黄建国低下眉，又猛地喷出一口烟雾来。

多少有点出乎意料。河西公社的党委书记梁志华，在学大寨学得发疯的那几年里，比他黄建国名气大多了！要说“瞎指挥”，那“梁胆大”比他黄某人干的瞎活更多，民愤也比他大得多。可是这家伙转得快，农村新经济政策一公布，梁志华摇身一变，又成了全县贯彻新政策的典型。当河西公社变革的风声传过河这边来，飘进他的耳朵的时候，他躺在泡桐树荫下的竹椅上，反感！鄙夷！甚至对梁志华的人格也不那么尊重了，“随风倒喀……”

那么，把梁志华调到河东公社来是什么意思呢？让梁志华来河东开辟困难局面吗？这是很明显的……

黄建国说不出这些话，只是推诿说："我做农村工作几十年，越搞越不会搞了。"

"过去许多说法和做法，值得思考，不要在某些条文上死死抠掐，要面对农村的实际。"严副书记说着，又玩笑似的批评他，"这回到河西去，把躺椅收拾起来吧！立秋了……"

现在，黄建国完全看清了调动他的意图，在河东工作不力，必须像搬石盘一样搬开他，这就是让他和梁志华换一下地窝的实质。他重新点燃了一支烟，准备辩解了。

这当儿，门被推开了，走进一老一少两个农民来。

"我们是河西公社的。"来人中的老汉自我介绍说。

"我俩想找严书记谈个问题。"年轻人说。

两位农村干部模样的来访者互相对视一下，又疑虑地盯了黄建国一眼。黄建国立即打消了辩解的企图，站起来，告辞了。

"那好，你先回吧！"严副书记送他到门口，"县委准备搞个学习会，就当前的农村问题，再进行一次讨论，咱们有机会谈……"

二

推上自行车，出了圆洞门，来到县委正院，沿着院中花池的竹篱笆走向大门的时候，黄建国的心里毛毛乱乱，别别扭扭，说不出是一

种什么味道，灰涩涩酸溜溜，腿上怎么也提不起劲儿来。

县委大门西侧的民房的廊檐下，有一家茶棚，他索性坐在矮凳上，缓解一下情绪。卖茶的老太婆殷勤地招呼着，双手递上一杯凉茶来。

一杯清凉的茶水从发干的口腔流进肚里，顿时觉得头脑也清爽了许多，黄建国瞅着县委大门外接着公路的一段慢坡路出神。

七年前，为了加强学大寨第一线的领导力量，他和县机关的十几名干部被抽调出来，充实进工作落后的几个公社。当他戴着花，走出县委大门的时候，心里聚着多大一股劲啊！那时候流行一句“豁出掉几斤肉”的口号，他是充分做了这种思想准备，心甘情愿用自己的几斤肉去换取河东公社的新面貌的。

在河东公社里，他睡过安稳觉吗？坡陡沟深的原坡，沙石嶙峋的河滩，跑烂了他多少双鞋？泥泞狭窄的沟道小路，夜晚摔了多少回跤？那一年下雪，一下滑进沟道，摔得人事不省……我是为了坑害农民吗?

现在，自己倒落个什么下场呢？心酸，实在令人心酸……

卖茶的老太太又递上一杯茶来。黄建国在县委组织部工作那阵儿，老人就在这儿卖茶，老相识了。

“老黄还在河东公社吗？”

“马上要调走了。”

“走了好。那个穷地方，谁去也治不好。”

老太太是在给他说着宽心话，黄建国没有吭声，心里好像有点不服气。

“现在的政策，变化快！得想开些，那就好了。”

他又灌下一杯茶，自己宽慰自己：让真龙天子到河东来为民赐福吧！到河西就到河西，虽不能继续在躺椅上打发日月，可也不会像在河东公社那样拼命了，我看透了……

付了茶水费，他跨上自行车，觉得肚子有点空了，于是调转车头，到县城的老街上去，那儿有食堂，还可以逛逛自由市场，散散心，何必匆匆忙忙呢?

三

县城老街这地方，是全县农副市场中规模最大的一个。今天虽不逢集日，街道两边仍然到处摆着食摊菜担，只是没有木料、牲畜等大号商品罢了。整个街道给他的印象，使他想到五十年代中期城镇里的景象。这是繁荣？还是泛滥？他似乎很自然地在心里挂出一个问号。自打农副市场开放以来，他没有光顾过，没有兴趣。那有什么好看的呢？搞这种事情，用得着号召吗？多年来对小农经济的限制和斗争，是公社党委书记的神圣职责。现在要他去鼓吹农民上自由市场，甚至叫他去逛自由市场，要说理论，感情上也难得通畅！

刚近街心十字，一股油香钻进鼻孔，耳朵里也飘进一声甜腻腻、脆嘣嘣的声音：

“黄书记，吃油糕。来啊！”

那顶蓝布帐篷下，一口翻卷着浪花的油锅后面，正有一张淌着油汗的瘦长条脸，对他嘻嘻笑着，手里娴熟地捏弄着一疙瘩烫面团儿。这是河东公社麻湾大队的麻天寿么，前几年总爱偷偷摸摸搞点小买卖，属于自发势力的代表人物，多次上过批判会。从前老远一看见黄建国过来，早从后巷躲跑了！现在，这样躲躲溜溜的人物，居然在县城最显眼的地方声高气昂地招呼黄建国吃油糕。是想卖他的钱吗？鬼！明明是故意烧臊人！

黄建国这样想着，偏把车子推到油糕桌旁边，撑起来，吃你两个油糕，又怎么样呢！

刚走进帐篷，麻天寿倒是随和得很，早已把一盘油糕和一双筷子摆在桌子上，殷勤地劝说围坐在矮腿桌子四周的食客挤一挤，给黄建国让出一个位置来。

“生意红火吧？”黄建国挑逗地问。

“罢咧！不错！”麻天寿反而故意渲染说，“平时一天卖三五十块钱，逢集人多时，最多卖过一百二。”

“你这下可以先富起来啰！”

“今年还不成，要富得看明年。”麻天寿大约听出黄建国的话味，反而认真算起账来，“去年能赚一千来块钱，全部还了账！大货结婚借亲戚家七八百，孩子都上学了，咱给人家还不了，亲戚都生分咧！今年前半年能赚六七百元，给二货订婚花光了。赶明年，我就可以搭挂盖房了！要是凭队里三毛票儿的劳动日，甭说盖房，孩子长大了，也还不清他爷给他爸娶他妈借的钱呢！”

黄建国觉得刺耳，放下筷子，这不是等于抽他公社书记的耳光吗？他后悔不该到这油糕锅前来，凭麻天寿这样的油嘴，会说出什么好听话来呢！

“老黄，耍急！”麻天寿硬推开他拿票子的手说，“你好意思给，我还不好意思收呢！”

黄建国把钱扔到桌子上，刚出了帐篷，麻天寿招徕买主的声音又响起来：

“老五，来呀！好五哥，不吃也来坐坐呀！”

“不咧不咧！”被招徕者不好意思地推托着。

“啊呀！腰包硬了，只走不歇！朝老弟这儿连一眼都不盯呀！”麻天寿不像是真心诚意招徕顾客，倒像是耍笑什么同辈人。

黄建国侧过头一看，一个瘦小的老汉，肩膀倒挂着一只葛条笼，佝偻着腰，头上扣着一破草帽，在麻天寿耍笑取乐声中，如荆刺在背，匆匆逃走。这不是南原大队的刘老五老汉吗？他在南原大队驻队时，在老五家吃过派饭，是个旁人把指头塞到嘴里也不敢咬的老好人啊！他转过身，喊：“老五！”

老五刹住匆匆逃窜的脚步，看清是黄建国的时候，勉强地朝油糕桌前走来了，脸上和眼里强装的笑容，无法掩饰窘迫的情绪。

“老黄、黄书记，你也上集来了？”

这是一张被困苦的生活揉皱了的脸，长久的穷苦和困顿，使老汉难以高声说话，抬头看人；那蓬乱的头发、胡须，那透着汗渍的无袖

褂儿，那鼻翼两边深深的皱纹里，都无可奈何地标明他接近于乞丐了……

“五哥，给，吃俩！”麻天寿做老汉的生意。

“不不不！”老五慌忙举起双手，并成一排，挡住递到眼前盛着油糕的盘。

“怕油糕烫嘴吗？”麻天寿嘻嘻哈哈，“有钱不花，头号傻瓜！吃到嘴里，实实在在。”

黄建国从麻天寿手里端过盘来，一手拉老五的胳膊，重新坐到小桌跟前，把一双筷子塞到老汉手里。

穷困而又正直的庄稼老汉，在稠人广众的大街上，接受别人的馈赠，又是黄书记这样的大领导，尴尬为难得不知如何是好。盘是端上了，却总不好意思掀动筷子。

“你进县城做啥来了？”黄建国问，很随便，企图缓解老汉的心情。

“嗨！”老汉不好意思笑着，低声说，“卖点酸枣核儿。”

“唔！”黄建国这才明白，老五手背上、胳膊上和脸颊上为啥有一道道血印了，那是摘捋酸枣时被枣刺划破的。

“娃娃要上学了，得交学费哩！”老五说，“我领着俩孙子，摘了点酸枣，蒸过，搓下皮，晒干了。儿子不来卖，媳妇更不来，嫌丢人现眼！我老了，脸皮厚了，不怕人笑话。”

黄建国听着，实在是找不出安慰老汉的一句话。

麻天寿却叫起来："那怕啥？听说枣仁在广州是缺门货，出口哩！怎么样？生意发财吧？"

老五说："爷孙俩忙了半月，到今日卖了不上十块钱。哪比得你卖油糕的手艺。"

"我捏面蛋儿算啥手艺，能挣几个钱嘛！"麻天寿说，"听说你南原大队几个干部，雇汽车往青海贩苹果，来回一趟七八天，一人就抓得一千块！那叫啥挣头？老五，你也该入一股，何必摘酸枣子呢？"

"咱笨头笨脑……"老五笑了。

"你养上两头奶牛，也是好事。"麻天寿给老五热心地介绍起生财之道来，"俺村的麻天虎，养了两头奶牛，给一〇二信箱的工人家属送牛奶，天天收入二十多块！"

"咱旱原上，旱得草都干死了……"老汉摇头。

"那，你就只有摘酸枣了。"麻天寿佯装无奈地叹一口气。

黄建国听不下去麻天寿对一个穷困老人的耍笑，却又不知讲什么好。麻天寿却一侧脸，高声又拉起买卖来："曹支书，这儿坐！"

完全是一副讨好的嗓门。黄建国讨厌听这个调门，又怕老五再次受到麻天寿的戏谑，就拉着老汉的胳膊，走出帐篷，在一棵古老的槐树下蹲了下来。

"老黄，听说你要走了？"

黄建国没有作声。自从他做了“瞎指挥”的检讨以后这段时间里，总有传说他将调走的嘈嘈议论。一个干部在某个地方混不下去了，群众就估计他快要调走了。

“好。走了好。”老五平和地说，“咱河东这条件，有啥办法？你在河东多年，费了心，出了力，也不顶啥。”

黄建国听着老汉很友好的送别词，心里反倒更灰了，老人对他连一丝留恋的意思也没有。

“队里情况怎样？”黄建国习惯地问。

“还是老样样儿。”

“今年夏粮分得好不？”

“歉。”

“秋田长得咋样？”

“不咋样。”

“大队干部是不是到青海贩苹果？”

刘老五闭了口，怕招惹是非的老好人啊，叹口气说：“队里没人管。有木匠手艺的人割家具卖，年轻人骑自行车贩菜卖瓜，生产没人管了……”

黄建国心里冒起一股怒气，这怎么行呢？瞬间想到自己行将离任，又何必呢？

刘老五说："人家河西这二年翻得快！俺小女儿今年结婚到河西姚村，一个劳动日值一块八，一个壮劳力一年能挣成千块。前几年，姚村跟咱南原一样穷，三毛。听说人家把土地划给小组，分组包干，把懒人的屁股给缝了！队里办了砖厂、加工厂，还种药……政策是一样政策，咱河东咋不实行呢？"

黄建国能说什么呢？

"咱们要是能挣上一块钱的劳动日，保准没人出门。咱南原队里养不住人喀！"

老好老汉没有任何贬低黄建国的企图。他是作为一个穷困无着者自然地、几乎是本能地表示着对于富足日月的羡慕罢了。愈是这样，才使他的父母官黄建国此刻失去心境的平衡了。

他没有勇气再问老五更多的事。短暂的沉默中，油糕客麻天寿的油腔滑调又响起来：

"老五，看看！人家河西曹村的支书和队长是啥派势？两人吃了三十个油糕，哈，拿油糕往饱吃！"

黄建国侧过头朝桌子那边一瞧，哦，被麻天寿呼为支书和队长的食客，正是他在严副书记房里碰见的河西公社那两位来访者。他们面前放着一堆油糕，畅快地吃着、谝着，一派腰硬气粗的神气。

年轻队长嘻嘻笑着："有人做了统计，俺河西公社的小伙，今年订下一百二十多个对象，就有一百多个是河东公社的，河西嫁到河东去的，只有仨，还是男的在外挣工资的呢……"

老者笑着制止年轻人："覅尽吹。"

“吹？前几年我怎不敢吹？腰包是空的。吹不起来啊！”小伙子尽兴说，“钱这玩意儿真怪，尽管是纸印的，你没有的时候，腰不由得往下弯；腰里别上几张十块的票儿进城，哈！一下就把胸膛挺起来了……哈哈哈……”

那位老支书也仰着脖子笑起来。

看着两人畅快的样子，麻天寿神秘地问：“听说你们河西分田到户了，搞单干了，是么？”

“没有的事。”年轻队长说，“那是山区两个大队，住得散，包产到户了，平川上没分，搞的是责任制。要听别人给俺河西胡扬脏……”

“你们那个‘梁胆大’真有两下子。”麻天寿说，“听说前几年，‘梁胆大’把河西也折腾得够惨！”

“惨！比你们河东还惨！”老年支书说，“可好的是，他现在落实新政策，还是胆大！俺公社的责任田，在全县是头一家搞起来的，农林牧副渔，五业兴旺，红火尽了，票子像水一样往河西流！”

“噢！”麻天寿表示惊讶和敬佩。

黄建国听到这儿，对于他所鄙夷的梁志华在河西已经获得这样高的威望，多少有点意料不到，他的心又一次失去平衡了。他想就此走开，却听见那老人神秘地说：

“听说县上想把俺梁头儿调走，全社干部联名写信，要求县上让梁书记再留两年。河西的局面刚打开呀，底子还不厚。俺俩——”老汉指着小伙说，“就是众人委托的代表，向严书记请求去的……”

“噢！”麻天寿惊讶地叹息，“严书记咋说？”

“没吐核儿！”年轻人说，“过两天再找！”

原来如此！黄建国的心完全失去平衡，乱跳起来，河西人并不欢迎他黄建国！他再也无心逛自由市场了，把车头又调转过来，出县城——回！快回！

四

出了县城，沿着一条串连着河西和河东两个公社的柏油公路，黄建国踏着自行车，心乱如麻。两排碗口粗的白杨树，挡遮着午后烈日的光焰，从山岭上吹下来的阵阵清风，丝毫也吹不散他心中烦闷的郁热。跑这么快做什么？回河东公社干什么？收拾行李交差吗？河西人根本就不欢迎你姓黄的！河东呢？那些穷得直不起腰的社员，那些至今吃不起麻天寿价值一毛钱俩油糕的老人，还有给老师交不出学费的学生；歇息在地头的树荫下，睡在没有褥子铺的光席上，走在上学的路上，会怎么骂他黄建国呢？怕是恨不得磕头作揖盼他早点离开河东公社吧！

弄到这步田地！当着这样的公社领导，再乏味不过了！黄建国脚上没劲了，自行车轱辘转得慢了……

刘老五在麻天寿油糕锅前畏畏缩缩的神态又出现在脑子里。老汉可怜……

还是在他刚从县里来到河东公社的那年冬天，他驻在南原大队，亲自抓一个小库塘工程，轮到刘老五家管饭了。这儿农村习惯天明起来上工，九点钟吃早饭。他在工地拉了一清早的夯绳，肚子饿得贴着

脊梁了。刘老五陪他吃饭，喷香的小米稀饭，就着萝卜丝儿，盘儿里垒着一摞皮黄瓤软的麦面锅盔，散发着诱人的香味。他连吃两块，仍然有试一试第三块的动机，胃口是最好的一顿了。他发现老五只喝稀饭，而没有动一块锅盔，就让道：“你吃锅盔呀！”

“我牙不好，咬不动。”老五笑着说。

他没介意。一碗小米稀饭喝完，老五要替他再盛，黄建国拒绝了。让一个年龄比他大十多岁的老人给他端饭，他过意不去呀，便争着跑到灶房去了，万万想不到，灶房里正在演出一场悲剧：老五的老伴、儿媳，一齐压低声儿，神情紧张地训斥两个哭闹着要锅盔吃的孩子！他没有说话，说话会使爱面子的穷庄稼人更难堪！他只舀了半碗饭，再回到里屋饭桌旁时，食欲全没了。

中午，黄建国在大雪飞扬的工地上拉夯，自动领起号子：

鼓劲拉哟！

吃锅盔哟！

青年们笑得喊不出来，黄建国却觉得鼻腔里酸溃溃地难受……

计划中的小库塘，在原坡地区只修成了第一批，他就把全社的精壮劳力拉进南沟“干起大的”来。这个仓促上马的大水库，几年来，把河东人拖垮了，把黄建国也拖垮了；他撒手不干了，现在仍然是个“干电池”……

刘老五的口粮还是“歉”！锅盔还是吃不到口，油糕就更是望之莫及的高级奢侈品了！我却要调走了……黄建国开始愧悔：拍着胸膛上任，低着脑袋溜走。我也应了这条规律……

小河横在车前，旱季里的河床上，裸露着一片砂石和茅草；一弯细流，弯来绕去，在沙滩上静静地流淌。黄建国掬起一捧水，洗着手脸，透过清湛湛的河水，可以看见水底的沙粒在流动，沙底上映出他的脸，似乎一下子苍老了。

黄建国攀上用河卵石堆砌的防洪大坝，河风摆动着头顶垂吊的柳丝，可以眺望河东公社山坡上被树木的绿叶笼罩着的村庄。他望着那些村庄，回忆着在河东七八年间的往事，企图刨出一个根儿来。

从小河的上游，走下来三个人。他们在河滩的乱石中走着，说着，打着手势比划着什么，走走停停，离黄建国愈来愈近了。当他确凿断定其中那位低矮而又敦实的是梁志华的时候，心情更加不安起来。这个前几年比他干瞎活干得厉害、之后挨挫也挨得更惨的“梁胆大”，是怎样重新获得河西群众如此深厚的信赖？不能不使他对人家刮目相看了。

黄建国点燃一支烟，等着梁志华走下来。

那三个人站在沙滩乱石中，说了一阵儿，忽然折转方向蹚过河水，上了岸，要下河堤去了。黄建国站起来，喊：

“老梁——”

梁志华转过身，朝这边看着，接着就奔跑起来，那浑实的又粗又壮的身躯，活像滚动着的一辆坦克，顺着河堤跑下来。

“哈呀！黄大人！你是上任来了哇？”梁志华握着他的手，嘻嘻哈哈开玩笑。看来，严副书记在和他谈话之前，已经和梁志华谈过了将他们俩互相“换一下地窝”的意图。

“嗨！我——”黄建国自嘲地说，“我哪有脸进你河西公社嘛！”

“家伙！跟我耍什么客套！”梁志华的口气是坦率的、真诚的，“快来吧，决定过的事了。我准备给你交代手续，老兄！”

“河西人不欢迎我呀！”黄建国苦笑一下，也坦诚地说，有点尴尬地谈出了在严副书记房子碰见那两位上县请谏的河西干部的事。

“胡整！这些家伙，简直是胡来！”梁志华一听，火了，脸色立时变了。他大约这才恍然悟出黄建国郁郁寡欢的心情，同时觉得河西那两个尚不知名姓的干部的举动，把他牵进一个不大光彩的难堪境地。他急忙拉着黄建国坐下来，诚恳地解释，“他们背着我搞什么联名请谏，我是一点不晓得……”

“你覅解释。我没有想到是你搞小动作，真的没有。”黄建国也诚恳地说，“人民应该有权选择他们所拥护的干部。我倒是想请教一下，你‘梁胆大’这两年在河西是怎么弄的……”

“瞎扑腾！瞎扑腾……”梁志华敏感的猜疑解除了，脸上又现出轻松开朗的神色。这家伙在全县二十多个公社的头儿中间，是个有名的乐天派，性格爽朗，嘻嘻哈哈，没见过个忧愁的脸相，他不仅和下级，和同僚们如此，和地区县委的领导处事说话，仍然如此，“既然你不犯疑，那好，我向你汇报吧！黄大人——”

梁志华扔给黄建国一支烟，自己点燃一支，喷出一口烟雾：“你知道，我前几年比你胆子大，大得要发疯了，在河西干了多少蠢事、瞎活！”

这是个不安静的角色，说着就站起来，一只脚蹬在高一级的石摞上。梁志华双手搁着膝盖，对着把身子倾到他面前来的黄建国大声说：“后来，中央批示一传达，河西人简直能把我吃了！恨不得一棍子把我撵出河西。我挨得好重！好惨！我‘梁胆大’是真心想害河西农民吗？我想不通！冤枉！心里结冰——凉透了，再不干这号背儿媳妇朝华山、出力不落好的事啰……说吧！骂吧！反正就是这一摊子……你白天提意见，我晚上把笔记本一合，睡觉！”

黄建国听着，和自己当时的处境和心思一样啊！他后来怎么解脱出来的呢？

“一件事教育了我。”梁志华在石摞上踱着步，“在整风后期，大家的气儿出完了，却一致提议，要重新促‘丰收渠’上马！哈呀，这下，我睡不着了。”

黄建国约略知道，梁志华在“想大的、干大的”那阵风中，把“丰收渠”工程扔下，在河西的山原区，摆开二十华里劈山造田的战场，轰动了地、县。他去那里参观过，“梁胆大”的名字就是那会儿叫响的。

“他们居然提出要重开‘丰收渠’！”梁志华加重了语气，“他们不是反对一切农田基本建设，而是讨厌瞎折腾，不求实际的大铺排……这样，我冷静下来，才开始认真地回想我的过失……”

黄建国不由得“唔”了一声，“梁胆大”啊！他是在挨群众批评挨得最惨的时候，却又从中汲取了合理的东西……

“于是，我几夜睡不着觉了。从参加工作那时想起，自己审判自己！我得出一个可怕的结论。”梁志华带着少有的沉重的感情，停住

脚，紧紧盯着黄建国，“二十多年来，我给农民办过不少好事，也办了不少瞎事；在好多时间里，我们是在整农民，而且一步紧过一步……”

黄建国吃惊地睁大了眼睛。

梁志华看出他的吃惊的神色，不以为然，反倒轻蔑地冷笑一声，走近前来，掰起指头说：

“我合作化时期参加党，而后提拔到乡上。

“一九五七年怕农民跟着右派跑，我给农民算了一年账，证明合作化后比合作化前生活优越。

“一九五八年，那阵儿我在渭北家乡。为了叫我那个乡的农民明天早晨就过上共产主义生活，我带领全乡政府干部，连夜下乡，拔锅挖灶，吃大锅饭。

“从一九五九年下半年到一九六二年冬天，我的那个公社饿死过人，当时谁也不敢承认那是饿死的，说是病。

“一九六五年夏天，我从渭北被派到咱们县来搞“四清”。我所在的那个公社，二十九个大队，运动后保存下来一个支部书记，是为了体现政策的啊！其他干部、队长、会计都一竿子打光了……

“‘四清’刚毕，‘文化大革命’紧接上开战，刚上来的那一批干部又一齐倒台……我也靠边站了。

“一九七一年，我被宣布‘解放’，调来河西学大寨，大批促大干，想大的干大的，割资本主义尾巴，限制自发倾向……”

梁志华说着，越说越快，一泻而出，又猛地刹住，盯着黄建国，声调和神情，一满是对自己沉痛的甚至是冷酷的嘲弄。他猛地转过身，一挥手，把半截没有燃尽的烟卷甩进河水里，几乎是喊着说：“我们把农民身上的‘肉’都割掉了，岂止‘尾巴’！”

黄建国听着，这是怎样的一张工作履历啊！而又何止是梁志华一个人独有的创造！他——黄建国，既拔过农民的锅去炼钢铁，也割过农民的“尾巴”，而且干的时候是很硬手的呢！现在在县社两级工作的四十岁以上的干部，谁又没干过这些神圣的蠢事呢?

梁志华摆过这一笔流水账之后，神情变得严峻了；严峻在这个平素老是开朗乐呵的人身上表现出来的时候，混合着尖刻的辛辣口气：

“我干这些蠢事的时候，并不以为蠢啊！我是拼着命，没黑没明地干，只怕落在别人后头，对不起党呢！

“我砸了农民的锅，急急忙忙把他们赶进食堂；食堂的大锅里吃光了，又把他们赶散伙。自己的动机和效果正好相反，然而毫不脸红！我们把农民干部培养起来，干了十几年工作，再把‘漏划地主分子’的帽子给他们扣到头上，实行专政；农民多养了一只鸡、一窝蜂，也是阶级斗争。我们的公粮，说是一定五年不变，谁信？事实是一年两回、三回追加，忠字粮，爱国粮，支援亚非拉的粮……为了这些粮，我亲自带上干部，翻过农民的粮缸和粮柜……

“我们的农民太好了！尽管经过了三番五次的折腾，我干了那么多瞎活，他们骂我，可我修的那个‘丰收渠’，他们却不忘好处，还说我也吃了不少苦，只是惋惜我后来发昏发疯，农民有良心啊……干了这

么多伤害农民根本利益的事。我‘梁胆大’算什么‘胆大’啊？是‘梁残暴’！有胆子改正错误，才是真正的‘梁胆大’！”

黄建国惭愧极了，梁志华袒胸掏腹的自白，像镜子一样，照出了自己，那最难于割裂戳透的一层感情的帷幕，终于撕开了……

“于是，我走村串户，向那些被我整过的干部和社员赔情道歉。实在想不到，有些被我整得死去活来的社员，一见我去，反倒笑了，他们给我说宽心话……我恨不得揍自己。”梁志华动情地说着，脸上的肌肉弹动着，眼角流出泪花来了。他长长地舒出一口气，揩揩眼角，笑着说，“中央重新颁布六十条，我觉得给农民还债的时机来到了。这两年，河西变化大些，可比起我对他们所欠的账债，还远远不够。现在，我们社、队两级都有了一些积累，我想今年秋收后，把‘丰收渠’的引水工程干成。这样，二道原上就成自流灌区了。”

“噢！你们三个人刚才在河滩，是勘察引水工程呢！”黄建国说，不知什么时候，他的眼睛也模糊了。当他躺在泡桐树下的竹躺椅上回味自己过五关斩六将的功劳与苦劳的时候，梁志华却在进行着严峻的自我审判。是什么鬼缠住了他的心而想不到自己也有过“走麦城”呢？是严副书记巧妙地批评说的“我发现你狭隘”吗？岂止狭隘！梁志华在遭到群众批评的困境里时，面对的是人民！是被自己折腾得一贫如洗的人民！而我面对的是自己！问题就在这里。

黄建国站起来，握了握梁志华的手。他是个不善辞令的人，愈激动时，愈少说话。他放开梁志华的手，深沉地说：“老梁啊！你胆大！名副其实！”

梁志华又恢复了嘻嘻哈哈的轻松姿态，挥着又粗又短的胳膊，说：“老兄，你几时过河西来呀？”

“我？”黄建国说，“你等着吧！”

“我去河东之前，把丰收渠的引水工程踩踏好，设计出来，算是对河西人民最后的一个交代。你秋收后组织劳力干就是了。”梁志华畅快地说，“说真话，我现在确实留恋河西。”

“你等着吧！”黄建国重复说，他推起车子，又调过头来，向梁志华招招手，沿着白杨夹道的柏油公路，朝县城飞驰而去。风鼓起他的衣衫，背后传来梁志华哈哈的笑声……

五

顾不得礼貌，黄建国一把推开县委东院第三号房间的房门。

严副书记架着眼镜，正在批阅什么文件，看见黄建国，略显惊疑。他摘下眼镜，站起身。

黄建国坐下，很恳切地请求：

“老严，让我留下，留在河东吧。”

……

1980年10月 灞桥

尤代表轶事

鸡冠岭下，小河岸边，有个尤家村。这儿的村民有句俗话：人过一百，形形色色；有的爱穿红，有的爱穿黑；有的爱唱戏，有的爱做贼；有的爱守寡，有的爱拉客；有的心善，有的缺德；有的白日里正经八百儿，半夜却偷着和儿媳妇掏灰……尤家村是个人过千口的大村庄，这形形色色的人物自然都不乏实例；只是在出了“尤代表”这位人物之后，才使所有奇人异事相形见绌，黯然失色。

来到了尤家村，在田野上劳动休息的闲聊中，社员们谈论尤代表，笑声解除了劳作的疲倦；在东邻西舍互相串门谝闲的火炕上，尤代表很自然地又成为开心的话题；父母训示儿女的时候，也习惯拿出尤家村男女老幼都能看得见、摸得着的这位人物来做鉴戒。

尤代表几乎无所不在！

这是个人物……

东沟“猿人”

“四清”工作组组长老安同志，从炕上跳下来，在炕和桌子之间狭窄的空当里踱步。他刚从一户社员家吃罢早饭回来，等候着两名组员，约定中午去访问一户至今没有照过面的贫农。

老安同志踱着步，心里发急，进村快一个月了，揭露尤家村党支部书记尤志茂、大队和小队所有干部的政治、经济问题的各种形式的会议，开了几十场，还是没有抓到什么大问题。这是怎么搞的呢?

工作是够细致、够扎实的了。他和组员们对尤家村所有贫农和下中农社员挨家挨户访问过了，进门先问寒问暖，忆苦思甜；扫地担水，搭手做活；坐在炕头上，一点不怕虱子钻到裤腰里去。可是，一谈及大小队干部的问题，那些正在诚恳地憨笑着的男人和女人，立刻变得拘谨起来，吭吭吧吧，话不成串……

第一次下乡的这位城区的文教局长，几天来心里很不安，夜里常常失眠，县“四清”总团每周一期的“四清战报”，登载着多少显赫的战果！相比之下，尤家村的工作进展是迟缓的，只能算是下游了。这儿——尤家村——的干部真没有问题吗？不会！因为绝不会存在一个风平浪静的世外桃源。那么，是工作方法不入窍呢？还是群众落后呢？还是像“战报”上一再警告的“某些同志”思想右倾呢？他的脑皮发麻了……

政治上和经济上出不了战果的局面，无论如何，是不能再继续下去了。他从昨晚到今天早晨，连着开了工作组全体干部会，分析了原因，决定进一步发动群众……

就在早晨的会议上，一户一户分析了所有贫农和下中农社员的情况以后，他忽然发现，访问中漏掉了一户贫农。是谁呢？经过认真查问，才打听到村子东边沟里居住着一户居民。他决定带两个组员亲自去访问，以弥补工作上不该有的粗疏。

两个组员相继到来：一个是热情高、干劲大、文化低的小马，从外县农村抽调出来的积极分子；另一个是城里来的大学生小郭。

三个人出了村，沿着一条窄窄的小路，顺着东沟往上走。五月天，沟里一派鲜绿，桃树上结满一串一串毛茸茸的桃子，柿树上的方

形花蕾含苞待放，野花点点，蜂蝶嗡嘤。老安和两位小将无心赏景，一路走着，一路瞧着，寻觅那位独居东沟的阶级兄弟的住室。

走上一道坡梁，在沟西岸的崖坎下，有柱青烟袅袅升起，那儿有一孔窑洞。三人相对一看，加快了脚步。

老安和两个组员走进窑洞，看见脚地铺着一窝麦秸，胡乱堆着一疙瘩棉花套子。三个大块礓石上支着一口小铁锅，烧过的柴灰一直铺到窑洞口。一个衣着褴褛的人，跪在地上，对着小铁锅下的火堆，吹着火，洞里弥漫着呛人的柴烟，三个人同时咳嗽起来。

那个人从锅下抬起头来，烟火熏得满脸油腻，抹着一道一道烟灰，只是那一双白仁多黑仁少的眼睛扑闪着灵光。他从地上站起来，看见这么多穿制服的工作人员，吓得瑟瑟抖着，站在原地一动不动，狐疑地打量着站在面前的来人。

老安笑着，和蔼地问："你叫什么名字？"

"尤喜明。"声音也有点颤抖。

"啥成分？"老安更加和气地问。

"贫贫儿的贫农哇！"尤喜明带着感情回答。

"你在这儿住了几年了？"

"七八年了。"尤喜明叹一口气。

"大小队干部没有人过问你吗？"

"唉……"尤喜明不知如何回答，欲言又止。

“你不要怕！”老安说。

尤喜明眼里转过一丝亮光，摆出一副难言的苦楚神情：“人家谁管咱嘛？”

“你怎么弄成这光景？”老安十分动情地问，“你说说你的身世，让俺们受受教育。”

“唉！一言难尽！”尤喜明流下泪来，“我少年丧父母，地主尤葫芦霸占了我的地，国民党几次拉我当壮丁。解放了，翻了身，媳妇可跟咱离了婚，干部尽欺侮咱……”

这无疑是一个苦大仇深的贫农了，老安和两个组员不约而同交换了一下眼色，心里沉重得很，他压抑着感情，感慨地说：“看吧！在社会主义的尤家大队，生活着一个原始人！尤喜明同志过的是猿人一样的生活。”

小马气愤地说：“当权派尤志茂，新房旧房四大间。对比太强烈了！”

小郭感触更深：“农村阶级分化，想不到严重到这种地步！”

窑里的柴烟散去了，明亮起来，老安揭开小铁锅，正煮着半锅苞谷糁子；窑里仅有的一只小瓷瓮里，装着半瓮苞谷，这就是全部家当了。他反过身来，对两个青年组员说：“你去找尤志茂，叫他先给尤喜明弄些粮食！”说着，庄重地解开裤带，把套在外面的一条裤子脱下来，送到尤喜明手里，蓬蓬泪花，颤颤声音：“把你那条破裤子换了……阶级兄弟……”

尤喜明哇的一声哭了，“扑通”跪倒在地，紧紧抓住安同志皮肤细腻的双手，泣不成声：“你们……真是救命……恩人……”

“快起来！快！”老安双手把尤喜明拉起来，坐到麦草上，“你有苦，就诉说吧……”

“天不灭尤”

一直把工作组三位同志送到沟底，再送到尤家村东头的村口，尤喜明被六只手一齐挡住，才难舍难分地停住脚；看着三位同志的背影被村巷里的柴火垛子遮住了，他才转过头，顺沟走上来，回到被安组长称为原始人穴居的窑洞。

“天不灭尤！”

站在洞门口，他几乎脱口喊出从心底层涌出的这一句感叹来。

“哈呀！我以为今生永世出不了东沟呢！”尤喜明欣喜难抑，想到工作组要他明天上台揭发控诉尤志茂，他的心里失掉了平衡，总是稳不住，总想往上蹦，“我尤某，要上尤家村的高台台说话了！嗬呀……”

他突然明显地感觉到窑洞太窄小了，进洞出洞要低头弯腰；奇怪，从腰际到脖颈，似乎插进去一根硬棍，头低不下去，腰也弯不下去；窑洞里太寂寞、太曲卡了；站在窑洞外面的小坪场上，眼底的东沟，似乎一下子也变得丑陋而又窄狭，难以容置老尤五尺之躯了！

明天要开尤家村运动以来的第一场群众大会，斗争党支书尤志茂，尤喜明第一个发言，控诉，老安说是“打头一炮”！轰开局面！怎

么讲呢？老安对他抱着多大的热情和希望呀！

他坐下来，心里有点发虚，老安人生地不熟，一身知识分子的天真气儿，好哄骗；可是明天一上台，台下尽是尤家村男女，谁不知道他尤喜娃的根根筋筋？

他简直抑制不住自己已经花白的头发下面的思维的潮水，那些被人嘲笑了多少年的很不光彩的往事，此刻却顽固地翻上心来……

大约是解放那一年，二十三四岁的尤喜明已经卖过五六次壮丁了。每一回，他把卖得的身价钱往腰里一揣，连着在小镇上的饭馆里饱餐几天，然后听候命令开拔到任何地方去，不难受也不流泪。不出半月，尤喜明又活脱脱地出现在尤家村，向愚陋笨拙的庄稼汉讲述逃离壮丁队伍的惊险经历……

“那是拿小命换得一口饭吃……”尤喜明对土改工作队队长哭诉，眼泪鼻涕交加，“我孤儿喜明，没一丁点办法……”

这是实情。富于同情心的尤家村父老向穿灰制服的老八路干部证实了这一点。农会主任尤志茂也证明同龄人尤喜明说的是实情。于是，在分配地主财产的时候，尤喜明得到两间厢房。积极得令庄稼人眼花缭乱的尤喜明，拍着胸膛：“共产党，工作组，是我再生父母！我老尤……为革命，刀山敢上，火海敢跳……”

“喜娃，该收心过日子了。”土改工作队撤离后，农会主任尤志茂好心劝告说，“岭上沟岔村有个女人，结婚没过一年，痨病男人死了。你要是中意，让你嫂子给说说……”

“能成能成！”尤喜明迫不及待，“只要人家不弹嫌咱，咱弹嫌人家啥哩！”

农会主任的女人拉线做媒了。起初，那女人畅畅快快同意了；过了两天，大约打听到尤喜明某些根底，又不大满意了。尤喜明急了，他恳求农会主任亲自去，用自己在小河两岸所拥有的威望去说服那个动摇不定的女人。尤志茂去了，稳住了那个女人的心，最后拉个把把儿，说要“再尺谋尺谋”！

尤喜明还是不放心，“再尺谋”下去，怕是麻烦了。趁天黑，他上了岭，亲自找那个小寡妇去了。满嘴喷泉一样涌出新鲜而又进步的名词，热诚而又动人的保证，加之二十多岁时那张曾经是青春焕发的脸膛吧，尤喜明居然征服了小寡妇的心；以至在小寡妇送他出门的时候，他敢于一下把寡妇压倒在门外的麦草垛子旁……

“我老尤……”尤喜明结了婚，喜气洋洋，拍着胸膛。

在西安大兴土木的建设热潮中，尤喜明是尤家村第一个表现出对新分得的土地并不那么眷恋的农民，进城做民工了。他能说，能跑，好活跃！不出一年，被建筑单位吸收为正式工人，领起民工施工了。

“离婚！”穿上一身蓝制服，上身的口袋里插着两支明晃晃的钢笔帽儿的尤喜明，瞪着眼，嘴硬牙更硬，对搂着已三岁儿子的媳妇说，“你是个寡妇！我和你没感情！”

离婚以后，尤喜明把土改分得的两间厢房拆了，木料和砖瓦全部变卖干净，出了尤家村，再没回来。

也不知什么地方走了岔儿，尤喜明牵扯进一件贪污案，被解职了，背着铺盖卷儿回到尤家村，去向尤志茂报到。

“你看你，弄下这事！”已经是农业社主任的尤志茂惋惜地说，“当年你离婚，我劝你，你不听。你拆房卖房，我劝你，你还不听。现在咋办？吃的社里可以先给你分些粮食，住处呢？”

“我老尤，能享得福，也能受得罪！”尤喜明似乎并不像尤志茂那样忧心忡忡，反而想得开，“住处，我看好了一个地方，社里东沟那个看守庄稼的窑洞，平时空闲着，让我先住下……”

“唔！那个……”尤志茂记起来了，“那窑太小，离村庄又远……”

尤喜明在东沟住下了，一住就住了七八年。每年冬季到来的时候，人民政府的民政部门发下救济款和棉花棉布来，尤志茂在开会研究救济对象的时候，照例先给东沟的居民留过一份，然后再一家一家评议。

“喜明，有一份棉布棉花，社里给你缝成棉衣了，你到妇女主任那儿去领。”尤志茂说。

“我算着也该来咧！”尤喜明一点不愧。

在“瓜菜代”的年月，尤喜明倒庆幸东沟这个绝好的住所了，甭说黑夜，大白天偷豆挖薯，也不会担心有谁发觉；他是尤家村少数几个没有浮肿的人中的一个……

现在，尤喜明坐在窑洞口，想着多半生的不平凡的经历。他从来是个只瞻前不顾后的汉子，过去的事从来不回想。在尤家村的人看来，尤喜娃睡在烂窑洞里，要是想起卖掉的房子，想到撵出门的媳妇

和儿子，该是后悔死了吧？其实，尤喜明本人从来是不吃后悔药的。要不是工作组老安叫他明天上台“轰头一炮”，他才不会想起那些已经无法挽回的往事呢！回想，是为了如何说得合体些，让老安信以为真！

绝对不能提那些最不光彩的事！尤喜明想，可是，尤志茂是个不错的支书呢！单是对他本人，也没啥过不去的事喀！真正回想起来，在尤家村体贴照顾他尤喜明的，还要算尤志茂呢！想到这些，他的热情和勇气往下降，凭啥斗争尤志茂支书呢？安组长说尤志茂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那段很长的话他记不住，而意思是说，他就是当今尤家村的尤葫芦，新地主！

“怕是要搞二回土改！”尤喜明这样估计当前的运动，“要是这回事的话，我老尤就不客气了！”

尤家村村当中，有一幢戏楼，这是一九五六年合作化后头一个好年成里盖的。

尤喜明坐在台上，和老安肩膀贴着肩膀，他的心里热乎乎的。平时，尤家村男女们谁拿正眼瞧一眼自己呢？看着站在台角的尤志茂，他心里好笑，你把戏楼盖起来，怕是只知道自己站在台上传达上级决议的吧？没料到今日吧？好！现在你站端！立直！手顺裤缝垂下……台下那么多惊奇的眼光在瞅他，瞅吧瞅吧！尤喜明是在台子上坐的人物，不是在东沟烂窑洞窝蜷的……

宣布开会以后，老安同志走到台前，沉痛中带着义愤：“在社会主义的尤家村大队，至今生活着一个原始人！尤喜明同志过着怎么样的

生活？惨不忍睹！走资派把贫农社员迫害到什么程度了？简直跟猿人一般……”

安组长动了感情，说不下去了：“现在，请尤喜明同志控诉……”

尤喜明忽地站起，走到台前，瞧一眼老安，用凄楚而委屈的声音喊说：“贫下中农阶级兄弟们……”一语未了，哇的一声哭了，凄惨震人。在擦眼泪的时候，他看见老安的脸上露出满意的表情，这一声哭到要紧处了。

尤喜明刚要说话，台下却传来一片笑声，他有点慌。安组长立即走到台前：“笑什么？这是阶级感情问题！”

笑声反而更大更响了，从台子的前边到后边，左边到右边，卷起一阵阵笑的声浪。尤喜明感到笑声太刺耳了，却不知道为什么。

工作组员小马从台下跑上来，在工作组长老安跟前说悄悄话，老安立时脸变了，愠怒地瞅着尤喜明。尤喜明不知出了什么事，只看见安组长死死盯着自己的下身，他一低头，天啊！多少年没有穿过制服裤子了，今天穿上老安昨日送给他的制服裤子，却忘记了关前门……

尤喜明毕竟是尤喜明，他急中生智，猛地转过身，扑到尤志茂当面，挥起拳头，照准支书的胸膛，就是一记顶心捶：“你害得我好苦啊！”

台下的笑声戛然而止，没有人笑得出来了，成千双男人和女人的眼睛离开尤喜明的裤裆，一齐转向在台口挣扎着爬起来的尤志茂。尤喜明扣好裤子的扣子了，只见老安眼里向他射来生气的目光，停了好一阵，老安重新宣布说：“现在，由尤喜明同志继续控诉……”

“我要革命”

尤喜明的行为又得到报偿：他再次分得了两间厦房。这是原尤家村党支部书记、运动后期补定为漏划地主分子尤志茂的两间西厢房。

实在想不到，做梦也梦不到的嫽事啊，果真来了二次土改！尤喜明从东沟的“猿人洞穴”里搬进这间新房的时候，简直跟幻梦一般，不过多费了几星唾沫儿，甩了几串眼泪水水……

晚上，尤喜明钻进软和的被窝，美美儿睡了一觉；第二天，再到他居住过七八年的东沟的窑洞去上班。那被安组长称作原始人的洞穴的门口，现在挂着一个白底黑字的木牌，成了阶级教育展览馆了；每天接待着一批又一批前来接受教育的学生、干部、工人和战士；尤喜明现身说法，成了专职讲解员了。

尤喜明站在洞里，面对着拥挤在洞里洞外的观众，背诵着大学生小郭给他编好的台词：“革命的工农兵同志们！这就是走资派尤志茂残害我的罪证……”

那件又破又胖的衫子和裤子，那床烂得分不清里子和面子的棉被，现在都顺窑壁挂着，用塑料膜儿严严地罩起来；支着小铁锅的三块礓石也按原样摆着，只是把铺散在脚地上的柴灰清除干净了。尤喜明指着那一件一件展品，哭溜着腔调儿：“我过的是原始人的生活。我今天才获得解放。”接着，他就挥动胳膊，呼两声口号，完了，由他们自由看去。

寂寞了不知多少世代的东沟，一下子红火起来，长蛇似的队伍，从洞口一直排到沟底，激昂慷慨的口号声迎接太阳照进东沟，又送着太阳落下西边的原坡。好多善男信女，架不住这现场实物的强烈刺

激，用手绢抹着眼泪，慷慨地在窑洞里丢下钱、粮票和衣物，表示对阶级兄弟真诚的同情……

直到最后一个参观者下了山坡，尤喜明这才坐在洞门口的石墩上，从腰里摸出八分钱一包的“经济牌”烟卷来，美美抽上一口，心里好笑：人都知道串村走巷的野大夫卖的是假药，可偏偏人都爱买！管㞞它！咱只要一天挣十分工就对咧！不推车，不捉把儿，在凉窑里说几句话，比公家的干部少操心多啰！嫽！

东沟里寂静下来，尤喜明的耳边也清静了；清静了，反倒觉得无聊了，几天来不愉快的心事又翻腾起来。

尤志茂的成分一钉秤，财产一分过，老安就给尤家村重新安置干部呢。大小队原来的四五十个干部，差不多是一竿子打净了，可是给大队重新安排的干部中，没有尤喜明的名字；盼到给他所在的四小队安排干部时，又没有提到他！新发展的第一批党员，已经报到县“四清”总团待批，还是没有尤喜明的名字啊！他起初伤心，继而气愤。现在在东沟里想起来，简直要骂出来：“他妈的！跟土改那阵儿一㞞样儿！轰场面的时光用得我，选干部的时光一脚踢远！”

着实令尤喜明伤心、生气。土改时，他头一个敢于冲进地主尤葫芦的大房里去，抽他两个耳光……临到土改结束，他只落下个空有其名的贫农代表。这回“四清”运动——二次土改，眼看又是啥啥干部也当不上了。现在只剩下贫协组织的干部没有定点，他想，许是给他留着一个位位吧？难说！老安对他越来越冷淡了，那次斗争尤志茂的大会刚一结束，老安神情严肃地批评他，怎么能动手打人呢？又是当着全村社员的面？此后，他越积极老安对他越冷淡，再没有头一次到东沟那么热乎了。好多天了，连他一次面也见不上……

“得找他谈谈意见！”尤喜明站起来，下了沟，进了村，端直走进老安住的农家小院。老安被几个人围着，回答着询问，眼睛熬得红红的，头发蓬乱了，人也瘦了，黑了。“四清”运动要收尾了，安组长忙着收摊……

询问事情的人走完以后，老安才走到他跟前，事务式地问：“喜明，你有什么事？”

没有事就不能来了吗？尤喜明一听那冷淡的口气就想躁，他拿出一副激烈的架势，大声说：“我要革命！”

安组长一愣，扑闪着近视镜片下面的眼皮，半晌，才说：“你要革命，那好啊！没有人阻挡你革命嘛！”

“我要干革命工作！”尤喜明的声音更响了。

“你在东沟当讲解员，这就是革命工作嘛！”

“我要……”尤喜明说不出心里要说的话。

“哎哎！老尤！”安组长开始耐下心来，“具体说，你到底要什么？”

尤喜明这才坐下来，紧紧盯住安组长的眼睛，问：“安组长，你说，我的斗争性咋样？”

安组长有点窘迫，说：“不错……不错！”

尤喜明进一步逼近：“立场坚定不坚定？”

“没有人说你不坚定嘛！”安组长说，“你要说什么事，有什么要求，直说吧！”

“为啥安排大小干部，没有我的份？”尤喜明干脆亮出底儿。

“唔……”安组长近视镜片下面的眼睛瞪得老大，半张着的厚厚的嘴唇说不出话来，他大概能料事万千，却料不到尤喜明会明目张胆提出要当干部的要求！

“当不当干部，一样革命嘛！”安组长从迷茫中醒悟过来，应付说，“不能人人当干部……”

“好我的安组长哩！”尤喜明忽然变了腔调，难受地说，“我为革命打响了头一炮，轰倒了尤志茂；我回回开会发言，揭发问题；我不害怕得罪人。运动结束了，我要是不挂个干部的名号，旁人愣烧臊我，积极了一来回，也没……你看，在贫协组织里头，能不能给我挂个名号……”

“啊！贫协？贫协的干部今天下午刚刚选好。”安组长已经厌烦了，口气中很明显表示出对尤代表的轻蔑说，“再不要争了……”

完咧！毕咧！尤喜明从头凉到脚，和土改走的一道辙，他被甩开了，像甩开什么讨厌的东西一样。他想再乞求，门口走进一个社员，叫老安去吃晚饭。尤喜明叹一口气，站起来，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畅快地说：“老安，没有啥！我随便和你谝谝，没事！你放心，革命，咱照样干……”他已经走到尤家村的街巷里了。

前沿阵地

一场连一场干霜，打落了小院里那棵大柿树的叶子，入冬了。尤喜明再不必担心冬季里忍饥受寒了。天一黑，他就躺进软和的被窝里，炕上铺的，头下垫的，全是尤志茂给儿子结婚准备下的三面新的褥子被子；小厢房的顶棚，用新苇秆和新苇席绑扎得严严实实；炕上的三面墙壁，贴着花纸围。躺在这样舒适的为迎接新娘子的新屋里，尤喜明一根连着一根，抽着“经济牌”纸烟，要是能把这间新屋那个未来的女主人也分配给他，最好此刻就躺在他的身边，那……尤喜明鼻腔里痒痒儿，打了两个冲天揭地的喷嚏。

他睡不稳实了，索性坐起来，靠着窗户，对面的厢房里的人这会儿干什么呢？他拉开了小窗子的木栓。

小院里很静，风吹着地上的落叶，沙沙沙响。

运动刚结束后，这个小院里呈现的混乱和悲怆的气氛，似乎很快被一种无言的和谐所代替。地主分子尤志茂，一个人在柿树下吃饭，吃罢，女人从地上收拾走空碗空碟，他就一袋接着一袋抽旱烟。天冷了，还是这样，现在他还不睡觉，一炷烟锅的火光在柿树下闪亮，是他当干部形成了熬眼迟睡的习性呢？还是对他的倒台、家产的被分心怀仇恨呢？准是后头这一条！难受你就难受吧！也该让我老尤享享福；甭光恨我吧，是“四清”运动——二次土改给我带来了幸福……

尤志茂的大儿子尤年从兼做伙房的厢房里出来，钻进那间搭着麦草顶子的柴火棚棚去了。房产被分了，屋里睡不下，他在柴火棚棚里过夜。这小子平日进进出出，嘴噘脸吊，从早到晚不说一句话；看见尤喜明的时候，立即把头扭到一边去。眼看着要过门的新媳妇因为成分的变化而断然退婚了，尤年不恨死他尤代表才怪呢！恨不要紧，只

怕这冷娃想媳妇想急了，一旦动起手脚，还不把他尤喜明拆卸了零件吗！得避着点！

他奇怪，这一家人为啥不吵架闹仗呢？原大队会计在“四清”中挨整垮台了，退赔了七八百块钱，成分可没有改变，比尤志茂挨得轻多了，会计的婆娘整天和男人闹仗，跳井呀，上吊呀，扯到公社离婚呀！这个小院里要是吵架干仗多好，尤喜明隔着窗子就会有好戏看……全是因为尤志茂有个好女人。她一天三晌照样出工挣工分，回到屋里喂猪喂鸡；她不弹嫌男人变成地主分子了，照样一日三顿，把饭食端到柿树下，双手递到尤志茂手上，给他说宽心话，在屋子里又规劝毛毛躁躁的儿女……

尤志茂的好女人洗刷过锅碗，从门里出来了，解下围腰，在台阶下拍打着胸和后襟的灰尘，劈劈啪啪响着……四十出头了，胖胖儿的身材，墩墩儿的个子，胸膛高高儿，屁股蛋圆圆儿……她拍打干净，领着女儿莲莲到后边的窑里去了，此后就不再出来……和这样贤惠而又温存的女人睡一辈子，尤志茂前世给神烧过碌碡粗的香吗……和这么好的女人在一起，就是流落街头，头垫佛脚睡庙台，大约心里都是甜蜜蜜的吧？尤喜明想着，触景生情，一种无法摆脱的空虚和孤独袭上心头，他即使睡到金銮殿里，心里能有人间的温暖吗？哎哎！由于运动过去了，尤家村不开会了，社员们又是白天上工，晚上睡觉，运动后出现的复杂的人事关系，很少有人串门谝闲话了，尤代表现在住在村子中间，出出进进街巷，大人小孩都不理他，年轻女人们见他过来，故意转过脊背来……运动完了，革命凉了，尤代表也不时兴了……

尤志茂从柿树下站起来，背着双手，缓缓走过院子，进入对面的厢房了，咣当一声关了门。夜更静了。尤喜明叹一口气，从窗口上转

过脸，溜进被窝，眼皮发困发涩，一切美妙的想象只有托梦了……

窗下一阵轻轻的脚步声，夜深了，是谁在走动？尤喜明睡意全消，爬起身来，从窗缝看出去。

一丝蒙蒙的月光，影影绰绰看得见小院里的柿树和柴火堆的轮廓。有个人朝院里走进去，肩上扛着半口袋粮食，轻手轻脚走到窑门口，把口袋放下来，靠放在门框上，转身又走出来；走过窗口的时候，尤喜明认出来了，竟是贫协主任尤福来。

“贫协主任，你干的好事！阶级立场跑到什么地方去了！”尤喜明早已气从心起，这个抢占了他的干部位置的尤福来算什么东西！斗争尤志茂的时候，他出过什么力，能比得上尤喜明吗？结果却把贫协主任的位位占去了。他在心里骂：“怪道在没收财产时，尤志茂被分了个盆干瓮净，现在还有得吃的，原来有人偷偷儿相赠呀！”

尤喜明轻轻拉开门，从对面传来尤志茂沉重的鼾声。他走到窑门口，窑里寂然无声，那个好女人和她女儿正在梦中。他提起那半口袋粮食，一摸，是碎颗子——麦！他蹑手蹑脚走回屋子，关上门，解开来，那黄亮亮的麦粒里夹着一个纸条：

“分得你的粮食，我吃不下去。”

“丧失立场！”尤喜明在心里喊，“你贫协主任给地主分子退回胜利果实，是什么立场？和谁穿连裆裤？和谁坐在一条板凳上？”

应该把粮食放回原处，保持现场；立即把治安主任、党支部书记叫来，看你尤志茂咋说？看你尤年小子，见了我还敢瞪眼不瞪？看你贫协主任尤福来怎么下台？

他抓住口袋，想重新结口的时候，那黄亮亮的麦粒却从眼睛里拔不出来了：何必呢？神不知，鬼不觉，凭空里拾得七八十斤麦子，不是美事吗？细粮仅够磨一套了，今冬明春，年下节下，光喝苞谷糁子怎么受得了！他提起口袋，朝装麦子的那个已经空空的柜子走过去，心里的火气早已烟消云散了，“你尤福来吃不下去，我尤喜明能吃下去！天天晚上有人来送，我就能过个好年了。”

走到柜子跟前，尤喜明又犹豫了：如果把这半口袋麦子扛到公社去，放到安书记面前，他会怎么说呢？尤喜明和尤福来，谁是革命的，不就对比明白了吗？说不定贫协主任这个位位得让给他呢！也许会受到奖励，说不准还会在报上扬名哩！傻瓜傻瓜，怎么能贪图半口袋麦子而失此良机呢！

尤喜明主意铁定，重新扎好口袋，忽地一下扛到肩上，反身锁上门，扯开大步，走过沉睡的街巷，出了尤家村，踏上通公社的大路。他走着，格外有劲，在睡梦里的尤家村人，明天早晨，你们一揉眼起来的时候，就会听到一个爆炸性的消息……

“好吧，你把粮食放到这儿，回去休息吧！”安书记听完尤喜明的汇报，平静地说。

尤喜明心里凉了。安书记为啥不惊奇呢？他苦心费力从尤家村跑到公社，半夜三更，十几里路，连一句赞扬的话都没有！阶级斗争被我抓住，送到你安书记面前，你却冷冰冰地不起兴儿！尤喜明好气馁！忽而一想，他明白了，安书记从尤家村撤走以后，被上级留在公社当党委书记，尤福来是他亲手安排下的干部。现在尤福来投降了地主尤志茂，揭发出来，于他有什么光彩呢！噢噢，明白了！出门时只

朝一边想，没想到另一边有丝丝蔓蔓的瓜葛呢！他后悔不该白白损失了送到口边的粮食。

“好吧！你回去休息吧！”安书记催促说。

“那好，这事咋办呢？”尤喜明不甘心，“阶级斗争，尤家村特别复杂，我住在尤志茂对面，是前沿阵地。安书记，我睡觉都睁着一只眼睛！”

“问题由组织处理。”安书记仍不起兴，“处理以后再告诉你。”

“我也要参加这场斗争！”尤喜明说。

“需要你参加时，再通知你。”

尤喜明听得出来，安书记厌烦他，不过想快点哄他走开了事，他反而更热情地说：“我等着！你啥时通知，我啥时候来！阶级斗争咱不马虎！”

尤喜明回到家中，等了一周，又等了十天，眼看半个月过去了，没见安书记的通知，也没见开斗争尤志茂的大会，也没见撤换尤福来的贫协主任职务。他急了，实在急了！得去问问安书记，阶级斗争还要不要天天抓？

他真的去公社了，走在十字路口，碰见了安书记，正骑着车子，到坡岭上几个大队去检查生产呀！

“安书记，那个案件怎么处理？”

“什么案件？”

“尤福来给地主分子送粮的案件。”

“那事……不是案件。”安书记淡淡地说，“我已经处理过了。”

“我一点不知道！”

“你为什么一定要知道呢？”

尤喜明难受了，安书记和他说话这么难听。他咬住问：“咋样处理的？”

“批评教育。我和尤福来谈了，他认识了。”安书记平静地说着，舌头一转，反而批评教育起尤喜明来，“喜明同志，你也要注意参加生产劳动哩！”

“我接待参观的群众，从早到晚……”

“要是人少了，有空到地里去，参加劳动。”安书记说，“要注意群众影响，我听到不少意见呢！”

听着安书记肯定的口气，和那讨厌的神态，尤喜明什么也不想说了，转身走了。

参观的人也少了，寂寞的日子又开始了。

这天早晨，他突然从隔壁的半导体收音机里听到，什么“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他的心猛烈一跳，不由得把胳膊抡起来，走路也有劲了。他暂时还弄不清，这场运动弄啥呢？又要收拾谁呢？“文化大革命”，那是文化人的事，农村搞不搞呢？他想着，走着，走到街巷中心的十

字口，最好农村也搞，有运动才热闹！最好搞成……分得尤志茂的麦子已经吃完了……这回真的搞起来，该吃谁的呢……

1980年11月 灞桥

土地诗篇

月亮从小河那边的坡岭上露出半缺的脸儿来了，河面上罩着一层水汽，像烟，又像雾。川道里顺着河堤和灌渠排列的一条条林带，恰似高高低低峰峦起伏的群山。前日落过一场透雨，湿润润的夜气里，飘荡着秋庄稼业已成熟的腻腻香味，灌进夜行者的鼻孔里来。

河西公社党委书记梁志华，悠然踏着自行车，任清凉的夜风吹着没有蓄头发的光头。一个又一个后来者，驱车从他身旁穿过去，眨眼就消失在月色迷蒙的公路的远处。他忽然记起，是礼拜六了呢！那些车架上绑捆着大包小包的夜行者，大都是家住小河两岸农村的在外职工，从城里赶回来与亲人欢聚的。他忽然想念起他的在县医院里工作的妻子来了，那是一个兼有传统道德和新道德中的一切合理部分的好妻子啊！她这会儿干什么呢？尽管她早已习惯了他没有礼拜观念的生活，可是，要是她知道他此刻走在乡村公路上，既不是到某一个大队去解决纠缠不休的问题，也不是来与妻子儿女团聚，而是要去给一个被他错误地整治过的生产队长登门赔情，请求谅解，她会说什么呢？哦呀！检讨！赔情道歉！给胡家沟那个犟牛队长！弄到这种地步……

在公社召开的三级干部会上，传达了中央关于纠正“农业学大寨”运动中的“强迫命令”“瞎指挥”的文件以后，闻名全县的“梁胆大”，一下子被铺天盖地而来的愤怒的唾沫星儿淹没了……啊啊！这下毕咧！彻底垮台了！现在再没有哪位领导表扬他雷厉风行、敢想敢干的工作作风啰！那些曾经缠着他写文章、照相片的热情记者，再也不见光临河西公社来啰！提得高，摔得响！“梁胆大”——过去是光荣的标志，现在变成众人嘲笑的代号啰！“三干”会结束了，检讨还没有完，上级

派来的工作组，要求他会后到生产队去登门赔情道歉，他不能不遵行，心里却总有一股难言的委屈之情……功也罢，过也罢，检讨完了，赶紧从河西公社拔脚，随便到县里任何一个部门去，再不搞农业了……

梁志华一直想不透，在刚刚结束的“三干”会上，干部和社员代表争相揭发批评他的时候，胡家沟生产队的犟牛队长，坐在靠墙的条凳上，瞪着一双牛眼，不说话，直至为期一周的会议终结。要知道，在他手下，被整得最重最惨的，正是这位犟队长！因为抗拒挖掉胡家沟村子西边那条沟道里的芦苇，以“破坏”全社原坡梯田化的统一规划的罪名，被他撤了职，留党察看了……现在正是该他说话、出气、诉苦的时候了，为什么反而不开口了呢？为什么没有声泪俱下地控诉“梁胆大”的瞎指挥给他们带来的灾难呢？这个犟家伙，大概是不善于用语言表达感情的吧？这个头发和胡须像鬃刷一般硬的犟家伙，大概只有用拳头才能把心里的话表达出来吧……

岔开公路，走过一畛平地中间的土路，翻过一面并不太陡的坡梁，可以看见胡家沟村庄的轮廓了。由树木的伞盖和房屋的高墙组成的小小的胡家沟，静静地隐蔽在山洼里的蒙蒙月光下，没有狗吠，没有人声，农舍窗口上透出的点点亮光，像山野的眼睛，沟道里日夜不断的泉水声，静夜里听来有如金属连续撞击时发出的脆嘣嘣的响声……

梁志华推着自行车，心里开始发虚，咋样和那个有点逆生甚至睁眼不认人的犟牛开口呢？你给他检讨，道歉，赔情，他要是牛眼一瞪，朝你脸上吐一口唾沫儿，然后扭身走掉，给你一个揽不起的难堪局面，怎么下台呢？怎么收场呢？怎么从胡家沟里走出来呢？这是很可能的，那个犟牛给他的整个印象是这样……

梁志华双腿沉重，索性撑起车子，停立在沟沿上，点燃了一支烟。月光下，可以看见沟道两边光秃秃的坡地，倒塌的田堰和地埂，像古战场一样残破和荒凉，那在他手里造出的一台一台水平梯田、一道一道平洁如镜的地埂，曾经接待过数不清的参观者，也曾经被摄影记者照了相，登在报纸上，现在，都因为地下长年渗水而滑坡了，垮塌了。

这就是苇子沟。梁志华调来河西公社第一次来到苇子沟边的时候，沟道里自下至上长着密不透风的苇子，软茎野豆和丝藤缠绕着苇秆，蝈蝈蚂蚱的叫声此起彼伏，呱呱鸟纷杂的呱呱噪鸣响成一片，这是光秃秃的原坡上唯一的一片生机蓬勃的绿色世界。胡家沟的苇席和苇箔，是远近闻名的特产……就在那一年，在他制定的改造河西公社山川面貌的规划图上，要不要抹掉这一层绿色，不是没有伤脑筋啊！抹掉了，可惜；不抹掉，在层层梯田盘绕的山坡上，留下这一点旧痕，左看右看不顺眼！“不要怕打破坛坛罐罐！”这句流行的彻底变革的口号从心里冒出来，促使他的心最后朝一边偏倒了——苇子沟要生产粮食！

在把这个规划第一次公布给全社干部的时候，犟牛跳起来了，这是梁志华早有预料的举动：

“梁书记，苇子沟到处渗水，修不成梯田！”犟牛说，“上面修田，下面渗水，底座不稳……”

既然下了决心，梁志华是不会轻易改变的，这个头一开，那个规划图东改西改，还能付诸实施吗？他铁定了：

“渗油也要修成！”

“弄不好，打不下粮食，又毁了苇子，两头落空。”犟牛担心地忠告说。

“事在人为！”梁志华毫不动心，“定了的事，不能变了。”

犟牛坐下去，憋红了脸，再没开口。

临到实施这个规划图的大会战开战的前夕，梁志华坐在山野里的临时工棚中，电话员坐在他的身旁，从东到西，一个大队挨一个大队，往过挂电话，逐一落实开战前夕的准备工作，他被一种战斗的激情燃烧着，两眼红肿，却没有瞌睡，万人大战，再有三天就要打响了，作为总指挥，理想的局面是热烈而又有条不紊，准备组织工作是特别劳心劳神的。劳神劳心，他没有丝毫的苦怨情绪，他满怀信心，相信这一壮举在河西公社的历史上将成为举足轻重的一战。

这当儿，犟牛队长哭丧着脸，走进苇席搭成的总指挥部的工棚，还没坐下，就难受地说：

“梁书记，社员愣骂哩！我……”

“关键在你！”梁志华盯紧对方苦涩的眼睛，“你本人就不通，社员怎么能通呢？”

“我……我给人家……创不下家业，也不敢……毁业！”

“我不想再跟你啰唆了！”梁志华烦了，“三天！离开战只有三天了，你考虑！要是第三天不把劳力拉上工地，后果由你负责！”

“你现在就撤了我！”犟牛的犟劲来了。

“撤不撤你，三天以后再说！”梁志华更硬，“你覅吓我。你犟，我专给犟人治犟毛病！”

犟队长嘴唇嗫嚅着，发青了，再没说话，一转身走出了指挥部的工棚。

第三天，整个山坡上是黑压压的人群，迎风抖摆的红旗，会战终于打响了。梁志华来到胡家沟的时候，径直走到苇子沟边。苇子沟，依然是密不透风的苇子，蚂蚱和呱呱鸟的乐园。他气坏了，二话没说，走进了胡家沟。

社员已经出工了，散布在河川的秋庄稼地里，问了几个社员，都不肯说犟牛的去处，其余干部，也都躲得找不到下落。“你摆下空城计，我没办法了吗？”梁志华冷笑着，又出了胡家沟，“我不能让你一个犟牛，破坏了全社的统一作战方案！”

第四天晌午，梁志华采取第三步方案了，他也是说到做到。他的身后，整整齐齐排列着八十名男女民兵，全社最精壮的劳力，肩头扛着明灿灿的镰刀、镢头和铁锨，朝苇子沟开来。

梁志华领着民兵，走进苇子沟，又一个意想不到的场面出现了，苇子沟里，蹲着或坐着胡家沟生产队的男女老少。他明白了，也气坏了，气呼呼下了沟，走到犟牛队长当面：

“把社员带出来！”

犟牛队长蹲在地上，扭着头，盯也不盯他。

“把社员带出来！不然我处分你！”

犟牛队长呼地站起，瞪着牛眼，指着胸膛：“你让民兵朝这儿挖！”

梁志华一扭身又上了沟岸，派出两个民兵，把正在不远处作业的两台推土机调来了。

推土机的钢铁履带，在山坡的土地上搅起滚滚黄尘，司机打开车门，探出身来，等候他的吩咐。梁志华说明了情况，司机一听，朝沟下瞅瞅，惊恐地盯着他，六神无主了。

梁志华兀自跳上驾驶台，看也不看司机，盯着前边，冷冷地说：“开！”那意思很明白，一切后果由我梁某人负责！

司机搬动操纵杆，明光灿亮的大铲落到地上，引擎牵动以后，梁志华随着机身的颤动也颤动着身子，坐垫前的钢铁里发出浑实的呼隆声。梁志华喊：“把消声器去掉！”

司机眼一闪，跳下车去，拔掉了消声器，又跳上驾驶台，脸上轻松得多了：“吓唬人呀？”

梁志华仍然绷着脸，机车开动了，轰隆轰隆的吼声，在两岸夹坡的沟道里回响，一股股黑色的泥浪，裹着腐叶败枝，翻起又落下，铁铲下，苇根被斩断时发出嘎嘎巴巴的脆响。眼看接近苇丛了，司机回过头来，那意思很明显：就从人身上往过轧吗?

梁志华紧紧盯着大铲前头的苇丛，那儿有两个老汉，蹲在草地上，眼里露出满不在乎的神情，嘴里咂着烟袋，大概估计这台推土机无论如何不敢从他们头上轧过去吧？不过吓唬老百姓罢了！梁志华已经感觉到司机的眼睛里的意思，仍然冷冷地说：“加挡！”

“轧死人咋办？”司机吓坏了，终于喊出来。

“你为啥要轧死人呢？”梁志华笑了，“你得想办法；既要把他们赶跑，还不许伤一点皮！”

“啊呀！我当你真豁上了！”司机长长嘘出一口气，笑了，“那好办！你看——”

铲土机呼隆呼隆滚过去，铁铲深深地扎进泥土里，卷起半人高的土浪，梁志华看见，当翻卷的泥土落到那俩老汉脚边的时候，俩老汉眼里闪出一缕惊恐的余光，慌忙爬起来，滚到一边去了。

司机像是受到鼓舞，开得更快了，终于闯进密密层层的苇林了。

苇子林边的男女社员乱糟糟爬起来，好多人跑上沟去了，梁志华笑了，对司机递上一支烟，说：“没一个真正想死的！”

犟队长压不住溃散的阵脚，气急败坏跑过来，跳上驾驶台的踏板，从窗玻璃外边死死盯住梁志华，布满血丝的一双牛眼一眨不眨。

梁志华叫司机停了车，他打开车门，刚探出半个身子，万万没料到，犟牛队长猛地朝他脸上吐来一口唾沫，然后跳下车，走了……犟牛队长一口唾沫儿，换来的是立即被撤职，被留党察看，接着就挂上牌子游遍了河西公社的大村和小庄……再没有一个干部和社员敢于公开反对规划了，这件事被添枝加叶地演绎得更加有声有色，四下传播，轰动了全县，“梁胆大”的名号也就响起来了。

唔！恍如昨天！眼前的苇子沟里曾经发生过的轰轰烈烈的场面，现在已经不是敢想敢干的光荣的纪录了，而是带着令人羞愧的讽刺蒙

绕在他的心间；昔日那被铲除挖掉的苇根燃起的火堆和烟柱，熏烤着他的心，愈来愈难忍了……

发疯啊！真正是发疯啊！梁志华自叹着，做下挨骂的事了，让人骂吧！犟队长要是不客气地朝他脸上吐唾沫儿，就吐吧！让那些被他的强迫命令坑害过的干部和社员，出了气，平了心；好了，梁某人也该离开这河西公社了！唉！

山村的夜是这样静。走进村口的时候，自行车链条的响声听来似乎更响了，谁家门口传来一声凶猛的狗叫，吓了他一跳。别这么神经紧张吧！别这么丧魂失魄吧！搞过瞎指挥的公社干部，全省也不是我一个哩！他给自己宽解，有我的责任，也有上级的责任！别自己把自己搞得灰溜溜地抬不起眼……

梁志华推着自行车，走进了犟牛家的土门楼，亮着灯光的小灶房里，立即传出一声中年妇女沙哑的问话声："谁呀？"这是犟牛的媳妇彩娥的声音。

"我。"梁志华回应了一声，把车子在院子里柴火堆跟前撑起来，就朝里走去。

彩娥站在小灶房的门口，从门里泄出的亮光中，探身盯着梁志华，三十出头的彩娥，认清了来人的时候，直起身来，双手一拍，诧异地说："噢呀！梁书记呀！你怎——黑天来？"

"黑天闲呀！"梁志华随口说。

"书记总是忙啊！"彩娥拖着腔儿说，"还是忙着修梯田大会战吗？"

“呃……”梁志华脸红了，幸亏黑夜看不出来，这个中年女人一把抓到他的伤疤上，他噎住了。

彩娥开心地笑着，狡诡地扑闪着眼睛，得意地瞧着失掉了威风的领导者，仿效着梁志华过去的口号：“大批促大干，大干促大变，河川园田化，山坡梯田化。你现在化得咋个相吗？”

“哦……这……”梁志华更加窘迫，脸上热烘烘的，说不上话来。

“一批二斗三背砖，不怕社员不上山。你的这一套办法好啊！硬啊！咋不用了呢？哈呀……”

梁志华听着，难堪极了，而那个女人，说得正解气，看不出有停歇下来的神气。这当儿，上房里传来一个老年妇人呵斥的问话：

“娥娥，你和谁说话？这样没大没小的……”这是犟牛母亲的声音。

“是梁书记！”彩娥笑着说。

“啊呀！是……梁书记……吗？”老婶子结结巴巴说着，已经走出门，站在台阶上。

“是我，大婶！”梁志华赶忙走上前。

“梁书记啊！你黑天半夜，怎么来的？”老婶子亲切地问。

“骑自行车。”梁志华说。

“你怎么……骑自行车？”彩娥站在背后，仍然不放过机会，“坐推土机多威风嘛！”

“这挨刀子的……嘴长！”老婶子禁斥着儿媳，动手拉住梁志华的胳膊，“快，屋里坐。”

“嘴长犯法吗？梁书记赏给我一个牌子才好！”彩娥不理婆婆的训斥，更加来劲地挖苦，“我脸厚，不怕游街！在山沟小村有啥好游的？要游到西安城里游！咱乡下人难得机会进城，全当逛热闹哩！经世事哩……”

“打嘴！”老婶子真的变了脸，变了声，她大概觉得媳妇说得太过分了，客人受不了了，“来了客人，不见问吃问喝，光知道卖嘴！”

彩娥却哈哈笑着，进了灶房，似乎并不怕。

梁志华被老婶子牵着胳膊，进了上房，脊背上的芒刺似乎消失了。他坐下来，尴尬地装着烟末儿，划着火柴……她的男人犟牛受了他的整治，她跟着担惊受怕，现在自然要出一口气了。

“老梁，你黑间还不歇息，真是苦累！”老婶子念叨说。

“大婶！我今日来，专门给你做检讨来咧！”梁志华趁早说明来意，也许倒能免去彩娥的挖苦和讽刺，“我那年对犟牛……”

“嫑说了！事情过去了，再嫑提了！”大婶宽容大度地说，“吩有啥哩！犟牛是个平民百姓，挂一回牌牌，也没伤他皮肉，没啥！”

“犟牛是对的。”梁志华诚恳地说，“我当初脑子发热，听不进群众意见……”

“谁都有失手！”大婶仍然宽容大度地说，“一家人过日子，也有碰磕！大人训娃娃，也不定都是娃没理！‘老子训儿儿不羞，官家打民民

不恼’！”

“大婶，我们是同志，平等……”梁志华连忙纠正说，老人把他和旧时的官家连在一起了。

“一样！跟父母一样！”大婶又打断他的话，把谈话的意思又扳回自己一边，“你是书记，管了那么多人，有多少麻烦事，哪能把个个人都端平搁稳，把件件事都弄得清清白白呢？总有个不周到的时候……”

梁志华捏着烟卷，烟卷在手指间冒出一缕缕烟气，在他的脸前飘过，透过烟雾，他看见老人过分宽容的神情里，遮饰着疑虑和担忧。她怕他。怕他什么呢？怕他以后再行报复吗，抑或是其他什么原因呢？他的心里现在才真正感觉到了那一层无形的隔膜，他沉默了，倒不想过多地解释什么了。

短暂的沉默。隔膜着的难以相通的感情，使检讨者和接受检讨者都不自然了。彩娥正合时宜地走进来，打破了刚刚出现的沉闷的局面，俩人都感到解脱了。

她一手端着竹皮暖水瓶，一手勾着两只搪瓷缸，一身很合适的夹衣服下，透出一股健壮的中年妇女的强悍的气息，她一边倒水，一边笑着：“你今黑是专门做检讨来了？”

梁志华强装笑脸，准备接受彩娥的奚落了。

“那就向我检讨吧！”彩娥说着，在炕边的木椅上坐下，抬起一条腿，坐成一个二郎担山的姿势，双手搁着膝盖，挺直腰板，“你的心诚不诚呢？”

梁志华仍然笑笑，说：“心可掏不出来……”

“负荆请罪，应该自带荆条！”彩娥说。这大约是个读过几年书的有文化的妇女吧，可能上过初中，不然怎么知道这个历史故事呢！她挖苦说，“我灶房里可有的是笤帚疙瘩烧火棍……”

“彩娥！真该挨嘴板子！”老婶子斥责儿媳，“没大没小，满嘴胡喷！还不下面去！”

彩娥瞧一眼愠怒的婆婆，却哈哈笑着，从椅子上跳下来，顺炕站着，并不介意婆婆的斥责。笑毕，撇一下嘴唇，说：“梁书记，你有心做检讨，俺妈还不敢领受呢！你看怕人不怕人！”

“你越说越不像话！”婆婆开始动手拉扯儿媳的胳膊，“你走！去把犟牛叫回来！”

彩娥抽回胳膊，双手像铁钳一样抓住老人的两只胳膊，把老人推出门：“你去叫。你害怕，你走！我不害怕，梁书记不是老虎，吃人吗？”

老人竟然真的走出院子去了。

彩娥重新坐在椅子上，侧对着梁志华。婆婆不在场的时光，她严肃起来，说：“你那天晚上在广播上做检讨，俺一家人围在喇叭底下听。”彩娥抬头瞧瞧挂在门楣上方的有线入户的小喇叭，继续说，“俺妈听着，流了眼泪，说自古官家做了瞎事，谁见过给百姓赔情认错？听说你在公社受批评，下不了台，老婆坐不住，睡不着，硬逼着犟牛给你送鸡蛋去，叫你放宽心……”

梁志华扬起头，不由地轻轻“啊”了一声，眉头紧皱起来，“有这样的事？”

“娃他大是个孝子，拗不过俺妈，去了两回。头回去，你没在公社；二回去，你正在机关会上检查讲话呢，他没好意思叫你，回来俺妈还骂他不会做事……”

“噢！”梁志华眼一闭，心在胸脯里加快了跳速。卷烟燃到最后了，烫着了手指，他又抽出一根来，点上了。

“俺妈天天早晨叮嘱他，‘咱嫑揭发人家梁书记！人家揭发让人家揭发，咱嫑……’”

“老人怕我打击报复吗？”

“也许是。”彩娥说，“她可说是‘咱嫑推下坡的碌碡’！”

梁志华现在才明白了，在集中揭发批评他的专门会议上，犟牛闭口不吭的原因了。他一手拍着自己的脑门，盯着彩娥，什么话也不想说了，任何解释都是多余的，甚至是可笑的。

“梁书记！”

一声又大又重的喊声，伴着架子车车轮轧轧的响声在院子响起，带着热诚和亲切的气流，从门口冲进来。犟牛和老大婶，母子二人，已经站在门口，梁志华站起来。

“你嫑听彩娥胡说！”犟牛笑着，“那是个疯子！”

梁志华也笑着，没有说话。

彩娥撒娇似的瞟了犟牛男人一眼，出门走了，梁志华在这一瞬间，第一次发现了这个泼辣的中年女人那一缕柔媚之情。

“拉苇根去了？”梁志华问。

“噢！”犟牛高兴地说，“啊呀，老梁，前多年咱知道人家东古大队的苇子比咱的苇子秆高，皮子厚，却不知道人家是新品种！现在好了，你给咱铲了劣种苇子，正好栽良种苇子！你倒办了件好事！”

“因祸得福！”梁志华自愧地说，“我当初，可是强迫你去干劳民伤财的事，蠢哪！”

“人都有失算的时光！”犟牛不以为然地说，印象中执拗死犟的家伙，此刻变得通情达理，“你这几年在河西，苦吃得不少……”

“唉！”梁志华摇摇头，“尽干了些蠢事！”

“你的丰收渠工程，不该停……”犟牛说。

“我说不准再说那些事，你……犟牛，记不住吗？”老大婶提醒儿子。

犟牛哈哈一笑，表示再不说了。

隔壁的灶房里，传出两声爆响，是滚油烫击辣面或是葱花之类的声音，接着，彩娥双手端着木盘进来了，放在桌子上。盛着醋和酱油的小碗里，漂着一层油花花；葱花和辣子，也一满是油汪汪的；木盘的中央，有一大盘炒得嫩黄的鸡蛋。

彩娥一转身，随即又端来两碗干面，先递给梁志华一碗，又递给男人一碗。

梁志华接住碗，又推放到桌子一边，千辞万谢，说他刚刚吃罢晚饭。

犟牛放下碗，一家人全瞪起眼睛。

“你让老梁吃饭嘛，瞪眼做啥！”彩娥提醒男人，“让人也不会让！”

犟牛傻笑着，端起碗，硬往老梁手里塞。

合家围劝，老大婶最着急，甚至说出不相干的话：“俺娥娥嘴头不饶人，心好，梁书记要计较！”

老梁为难了。

“老梁，你知道，这鸡蛋，他大给你送过两回了！”彩娥说，“今日正好。”

“对对对！”犟牛说，“你吃了，俺妈就放心了。要不，她还得催我送第三回……”

梁志华提起筷子，饭是什么味啊……

犟牛在狼吞虎咽，大块的面片从喉咙里滚下去的时候，发出呼呼响声。梁志华停下筷子，问犟牛说：“你什么时候栽苇子根？”

犟牛头也不抬：“明天早上。”

“我跟你一块去栽。”梁志华说。

犟牛抬起头来，醒悟似的一眨眼，坦诚地笑了。

梁志华慢慢搅动筷子，隔壁灶房里，大婶和彩娥，一边吃着饭，一边管教着不安心吃饭的孩子，声音是严厉的，感情是疼爱的，小院里，一切都显示出农家特有的和谐。

梁志华一眨眼，两滴泪水滚到饭碗里，黄土一样纯朴的人民啊……

1981年元月 灞桥

短篇二题

张文之

“嗤——”

听见一声响，张文之跳下自行车，后轮黑色的橡胶车带上，紧紧扣扎着一枚大盖儿图画钉，车胎放气了。真倒霉！

离县城还有三十华里，到桑树镇车铺去修理也有十华里。将晚的暮霭从积雪的南原和北岭朝河川围拢。唉唉！意想不到的一枚小图钉，把县教育局干部张文之整治在乡村公路上。除了自认晦气，还能抱怨什么呢?

在这样的困境里，张文之和我们任何人一样，自然地搜寻起记忆中的救星来。他的记忆力不坏：眼前可以看见树梢的村庄，是吴村；吴村住着他认识的一位小学教师，叫吴育民。

“交九”后的傍晚的寒风，从脖颈和袖口往进钻，厚重的棉衣和棉裤，似乎也失去了分量，他把散开的围巾紧一紧，脖子里熨帖多了，加快了脚步。

真是无巧难编小说。张文之走近吴村村口，紧挨着柏油公路的一家庄稼院门口，有人拉着装满蒜苗的架子车，在土围墙的圆洞门口停下来。他上前打问吴育民的住处，不料那人恰好就是吴育民。吴育民扔下架子车，沾满泥土和蒜臭的手，惊喜地握住上级领导机关干部的手，就往屋里拉。

“快给老哥帮帮忙！”张文之朝院里走着，大声叹息着，叙说着倒霉事。

“好办好办。修理车子补胶鞋，那一套家具咱都有。”吴育民畅快地说，把张文之让进屋里，“你先坐下喝水。顶多半个钟头，保险叫你上路。”

张文之坐下了，接过茶，又接过烟，心里顿然踏实了。

心里踏实了，他就关心起自己下属的教师的实际生活来：“你真够辛苦的，回家来不得休息，还要拉架子车！”

“习惯咧！”吴育民不在乎地说，对于自己的生活，没有抱怨，倒现出一种自足自乐的神气，“咱这号人，进了学校是教员，回到屋里是农民。习惯咧！”

吴育民拉出一只木箱，翻腾着，找出锉刀、胶皮和胶水，对着后院喊：“桂芳——”

一个中年女人进来了，这大约就是桂芳，他的妻子。她看了张文之一眼，淡淡地说“你来了”，算是招呼。

“快去做饭！越快越好！”吴育民双手在拆车胎，对妻子说，“这是县教育局老张，俺的领导。”

那女人脸上现出一丝热气来，略微笑一笑，转身出去了，后窗外的小灶房里，水瓢响，风箱吼。

“别麻烦！我还要赶路哩！”张文之真诚地谢绝，看到了那女人——因为他的突然到来而给她平添了麻烦，又使她的男人停下了家里

的杂活——脸上那一层冷淡的神色，他能体谅她，农家人忙啊，“我又不饿……”

“把你最好的东西拿出来！”吴育民根本不管张文之的劝阻，面对后窗户，给妻子叮嘱，又回过头来，执意中显出最实在的诚恳，“我的天，平时请也请不来的。我心里记着你的好处哩！”

“记那做啥！应该的嘛！”张文之不在乎地说。一年前，吴育民由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的关键时刻，他给他帮过忙。他此刻却不想让对方提及此事，念念叨叨，便岔开话题，“现在生活咋样？”

“当然好多了。”吴育民坦诚地说，“工资虽不高，月月却是固定收入；屋里人又包了责任田，也有盼头了；那蒜苗，是自留地的出产……乱七八糟，合到一块，手头松泛多了！”

“公办教师的工资，还要升，县上已经接到正式文件了。”张文之对已经经他手转为公办教师的下属说，在报告喜讯之中，内含着转为“公办”可是受益匪浅的事，“你还能升一级。”

吴育民扬起头，睁着吃惊的眼睛，对这样突如其来的福音，一时难以置信，随之低下头，锉刀在内胎胶带上锉得更小心了。

人都喜欢谈工资，一谈起来就忘记了时间。

半个钟头不到，车胎补好了，一碗鸡蛋挂面也端到桌子上来了。

“咱乡间没有好吃喝……”桂芳把碗递到张文之面前，抱歉地礼让着，眉里眼里，是真情实意的气色。她怎能想不到自己的丈夫是在教育局领导下的小学里教学呢？“张领导凑合吃……”

“很好！很好！”张文之随和地说。

“桂芳，你还不认得，这就是那个老张！”吴育民给妻子介绍说，“咱的恩人哩！”

桂芳歉意地笑笑，对客人初来时自己的冷淡似乎感到愧疚了，更加抱歉地说：“到乡下吃饭，总受委屈……”

“很好！很好！”张文之已经挑动筷子，面是细的，鸡蛋是嫩的，那汤啊，油花点点，飘着几片蒜苗的绿叶，味儿真鲜！他吃得冒汗了。

张文之冒汗了，浑身被寒风冻得紧紧巴巴的肌肤，舒活了。他摘下缠绕在脖颈上的围巾，放在身后炕头的被卷上。

“听说你一直是带高年级重点班？”张文之吃着，问，“工作是挺好的。”

“凑合凑合！”吴育民自谦地笑笑。

“局里本学期想调你到重点小学去，你们校长死活不放手。”张文之说，“有水平的教师缺。”

“他在屋门口教学，家里啥事也不管，今天礼拜六，我才把他拉到地里去挖蒜苗。”女人诉说，“要是调远了，我一个屋里人，责任田，自留地，喂猪喂鸡，咋顾得过来？”

“好同志嘛！那是局里掌握的好教师，当然工作负责！不好怎能转正哩！”张文之给夫人解说，“家庭困难，局里也是考虑的。”

吃饱了，又接上一支烟，在吴育民夫妇热情的、歉意的送别声中，张文之被呼拥着，推起打足了气的新“飞鸽牌”自行车，发现车架上，已经捆扎着一大捆新鲜的冬蒜苗，出了门。

暮色已经笼罩了村庄上空的光枝秃柳的树梢。张文之跨上车子，风似乎也不那么冷了，腿脚上更有劲了，眨眼间，吴村甩到车后边去了。

糟糕！围巾——忘到吴家了！

好在离村不远，不必犹豫，张文之又掉回车头，骑到吴育民家土围墙外了。他把车子撑在门外，走进土围墙的圆洞门，进了院子。

房门虚掩，里屋传出吴育民夫妇大声的谈论声，他一下刹住匆匆的脚步——

“……要不是他，按条件咱三年前就该转正了！狗东西，死死卡了咱三年！”是吴育民妻子的声音，“去年，要不是塞给他那辆自行车，还是转不成！”

“你悄声点。”吴育民劝妻子，“过去的事了，算了。”

“我一眼认出，他今日来骑的那个车子，就是咱给他买的那一辆，我一看见就是气。”妻子桂芳的声音更高了，“买车子借的账，咱还没还清哩！他倒找上门来，叫给他补胎……”

“算咧！甭提那事了。”丈夫叹口气，仍然劝着，“你没听他说，要提工资了吗？”

“那是国家给教师的好处！我领他姓张的啥人情呢？”

“你知道啥？评工资，‘民办’转正，教师调动，都属人家管哩！”吴育民说，“弄不好，得罪了他说不定他就把我贬到山里，那个只有十来个娃娃的初小去，他才不管工作需要不需要，家庭困难不困难呢。能不能升工资……”

“哼！”妻子愤恨地说，“怪道你们那些穷‘民办’到咱屋，提起他来叫‘蚊子’。他自个儿也不知耳朵烧不烧？”

……

张文之站在院子里，脑子木了，浑身冷透，手脚气得打颤，却没有一丝勇气走进去理辩一番。他转过身来，放轻脚步，走出院子去。

他骑上车子，腿脚虚软，心里作呕，那鸡蛋挂面很不安静地在肚里翻腾。他想不到自己架着黑腿眼镜的小白脸此刻变成什么颜色了，只觉得“交九”后的乡村旷野里的风，是这样冷峻……

见面礼

晚饭以后，我坐在火炉跟前看报。

有人叩门，袁副书记走进来，对我说：“咱俩今晚给李书记汇报工作。”新任公社党委书记李明远同志，下午已经来了，应该去给初来乍到的领导者介绍本社基本情况。我跟上老袁便走。

前任党委书记老孙一月前调走时搬空了的屋子，又被新来的李书记的行李塞满了，床上铺上了单人被单，桌子和柜子上的灰尘也擦拭干净了，火炉里蹿起半尺高的蓝色火苗儿。李书记扔下正在整理的一摞书籍，笑着和我俩一一握手，问候，围着火炉坐下了。

“全社面积六十平方公里。总耕地面积二万九千三百一十四亩八方。总人口二万三千一百零五人……”汇报就这样由袁副书记开始了。

我坐在一边抽烟。袁副书记真是好记性儿，本本拿在手里，不过是以防万一，或者是一种习惯，其实他是不看本子的。由农业说到工业，说到副业、林业，以至教育、卫生、商业、计划生育等等。他的声调是平缓的，又是自信准确无误的，像他的平整而分明的偏分头一样，绝不紊乱或含糊。在介绍完某一项目之后，他回过头来，礼节性地问我一句：“是这样吧？”

其实我是无须回答的。他问过之后，不等我答话，甚至不等我点一下头，就转过脸去，笑嘻嘻地盯着李书记，开始下一个项目的汇报内容了。

新任党委书记李明远同志，坐在椅子上，挺着粗粗壮壮的腰身，一手搭在左膝头上，一手提着旱烟锅，悠悠然吸着。他连个本儿和钢笔也不拿，按常情该是记下一点什么东西的。那么多数字，流水般从老袁嘴里淌出来，他能记下多少呢？

表针转过一圈又一圈，我拼命抽烟，以压制难以按捺的“呵欠”……总算完了。

基本情况介绍完毕，刚刚结识的领导者之间十分谨慎，异常谦逊的谈心开始了。

“孙书记走了后，听县组织部说派你来，我高兴死了，整天盼呀盼着你来！”老袁诉说自己的心情，算是欢迎词吧，“你来了，好咧！我有主心骨了！”

“伙计，别这么说。”李书记笑笑，“我又不是神。事情靠大家出点子，想办法，工作也靠大家做……”

“蜂儿也得有个蜂王！”老袁收敛了笑，认真地打断李书记的话，“咱们虽然没在一起共过事，你的工作作风，早就听说过。那……哈呀！那是当今社会风气里少有的……”笑容又从袁副书记的瘦长脸上浮出来，朝眼睛里涌集。

李书记没有答话，此刻弯下腰去了，捞起拨火棍儿，漫无目的地戳着蜂窝煤的气眼。我看不到他的眼睛，猜不出会有一种怎样的神情。

“我这人——”袁副书记自我表白，眼瞪得大大的，脸挺得又平又静，“直杠子！生性难改。”

“我就喜欢直杠人。”李书记没有抬头，笑着说，“有啥说啥，直杠人好。”

“那看在谁手下工作哩！”袁副书记转换了语气，连着两声叹息之后，情绪急骤转折了，“老孙调走了。实说哩，他要是不走，我就要求调走，坚决走。咋哩？人没法在他手下工作嘛！咋哩？咱不会拍马溜须，不会说骚情话……”

我不想评价袁副书记平时的工作和为人，只是清楚记得，三年前迎接孙书记、五年前迎接田书记的时候，都是笑着说他们是他“盼呀整天盼着”的“主心骨”，而当他们共过几年事之后，调职离任，在迎接后者的时候，他们无一避免地又成为袁副书记诅咒的人物了。我瞧着李书记，你听得舒服吗?

“人在他手下，给他把力出扎，把腿跑断，把汗流干，唉！要想落一句好。”袁副书记说得伤情，气得脸都变了。拉长的脸和倒竖的眼睛忽地一缩，又轻松地笑了，“这下好了，你当班长，咱给你跑腿。给好班长跑腿，跑起来有劲儿……嘿嘿……”

李书记手里的拨火棍儿，停止了拨弄，直起腰，扬起头来，脸上平平静静，淡淡地说：

“我还不如孙书记哩！”

“你呀，也好办：你不要给我工作。咱们都给人民办事，为群众劳神，替社员跑腿。这样，我心里实在，你心里也就实在啰！”

老袁眨巴眨巴眼睛，灵活的眼珠终于停住，现出一缕隐约的尴尬神色，那不仅是意识到语言选词的不慎的过失……

我长长嘘出一口烟气，倦意全消：漫长而乏味的汇报介绍，至此，一下使人抖擞起精神来。

1981年1月18日 灞桥

乡村

一

川原上下那些被树木笼罩着的村庄，人家生产队里的干部也不知是咋样产生出来的；地处小河湾的小王村，年年换一茬队长，却是挨家挨户轮流上台坐庄的。

轮到五十岁的王泰来上台执政的时候，老汉愁得几夜睡不着觉，仓库里连一颗储备粮也没有；出纳员紧紧锁着的抽屜桌斗里，只有几枚硬币；而信用社里的贷款已经摞下近乎两万块了。

人事关系复杂到出门少说闲话的严重地步，常常因一句无根无梢的闲话打架骂仗，不惜合家整门子出动……

年景也不好，自打麦子播下地，没见过雨雪；麦苗又稀又黄，看了令人灰心！这个队长当到年底，有什么盼头呢?

连续有几个长辈劝说了四五个晚上了，每年春天，就是这几个老汉出面劝服将要轮到上台的干部。有什么办法！小王村和大王村是一个大队，党支部书记早已不行使他对这个挂在大王村偏旁的复杂的“小台湾”的党、政权力了。“小台湾，我管不了！”他公开在公社说，也公开在小王村任何人面前说，丝毫也不怕降低他的威信。所以，给小王村安排干部，就是既不属于党也不属于政的那几位长老每年必尽的义务了。

送走那几位胡子长辈，泰来的耳边还响着他们重复了四五个晚上的那几句话：

“你人正气！公道！不粘派性！大家都高兴，说是今年才轮上一个好当家的咧……”

“黑市粮买得人实实招不住，受不了了！大家盼得你今年……”

所有这些，也不能完全打动他的心。他深知小王村的深浅，只有一句话有力量：

“轮到你了！”

轮到了，不干也不行，自己不干，别人也上不来呀！他准备干了，免得那几个老汉今晚再来，四五只手一齐在他的旱烟盒盒里捏！

“干就好好干一年！”泰来盯着被烟火熏成黑色的屋梁，心定了，“明天赶紧浇麦！”

他万万想不到，出手头一件事，就插进一宗说不清、判不断的是非里，几乎连并不算老的姥爷也贴赔进去了……

二

两口机井，闲了整整一个冬天，麦子却干旱着，前任队长早在播完最后一块回茬麦子之后，就宣布他完成在职的使命了。

到处找不着水泵！泰来队长从早晨起，直到吃午饭，翻遍了保管库房，跑遍了饲养场，翻动了旮旯拐角，都没有找到，后来经人提

醒，在储藏碎麦草的破土窑里翻腾出来了。找到了，却是一堆废品，接上电源试试，全不转动。

“修！”他说着就拉来了架子车，为了快点，他最放心自己，亲自到公社农具厂去了。

当他把两台水泵抱到架子车车厢里以后，突然想到，四节胶皮水管连一节也找不到了。应该同时差人去买水管。他想到了王九娃，小王村只有他的门道多，是小王村最会办事的一个人。

“哎！”九娃一手弹着烟灰，叹口气，“我说过了，再不给小王村办事咧！”

“咋咧？”

“哎！”九娃又叹口气，十分委屈的样子，“我给小王村办了多少事？电磨买不下，我买回来了；三角带买不到，我又给买回来；咱队那两台水泵，两台马达，不也是我一手买回来！临了落下个啥呢？混工分！混出差费……”

“噢呀！放心放心！”王泰来说，“这你放心，社员会上咱把这事提明叫响！”

“我不……”

“麦子都旱死了！”泰来开始恳求说，“轮着叔坐庄，今天是头日上朝理政，你全当给叔帮忙哩！”

“好说！只要你老叔有这句话，好说！”九娃站起来，声音不高，却很慨然，一副讲义气的神气，“再难，我也得想办法！”

“那好！好！”王泰来队长转过身，“你明天一早就去，我现在去修泵！”

九娃拉住了他已经跨出门的身子。

“钱呢？”

啊呀！真是人到事中迷！他明知，出纳没钱，到信用社贷款，来不及了。他急中生智，说，“我现在先把马达送到农具厂，赶天黑回来，给你借下，你明早进城，不误事的！”

把车套绳挂上肩膀，他拉着架子车出了村，田野绿色泛起来了，麦茬却迟迟退不了冻旱而死的那一层干黄的叶子，望着河滩柳树和杨树上绽出的鹅黄，他加快了脚步，催促自己，快！快！快！麦子等水返青呢！

到谁家开口借钱呢？泰来拉着架子车，二三十户的小王村的家家户户，男当家和女当家的，都在脑子里冒出来。几户宽裕人家像旗杆高过筷子，显示着目标，向哪一位开口好呢？向哪一位开口之后而不至于伤脸呢！

泰来一个一个分析，在这方面，他要兼着经济学家、心理学家以及关系学家三方面的特长，综合分析、判断，要做到瞅准目标，一次开口，不伤脸面。谨慎的庄稼人为自己的家庭用度，除非到万不得已，是不轻易张口告借的……

最后，他想到王玉祥，老汉的儿子从朝鲜回来，在部队里当营长，百十块工资，虽说后来因为家庭成分的变化复员到地方了，工资

却没减。玉祥老汉肯定有货……只是……只是这老汉戴着地主分子的帽子……

“打墙的板，翻七下！”泰来自言自语叹出这句乡谚来，概括了他所经历过的小王村风云变化。谁能预测从土改、合作化到公社化，一直使王村大队在全乡、全县都有声誉的王玉祥会戴上地主分子的帽子呢？他在玉祥手下当队长时光，那是包括大王村在内的王村大队最红火的“贞观盛世”！只是遇到那年“放卫星”，他放不上去。“只放到树梢高”——这是王村支书王玉祥挖苦他的话，“你真是个拗家伙！”随之同意了公社的意见，撤了泰来这个拗队长的职。

只是在大家都经受了浮肿的劫难而幸免一死之后才灵醒了。王玉祥亲自登门给他甄别，并请他重新上马，恳切极了：“我也得了流感……发烧……”

泰来当时表示了体谅，并不记恨；可是对于再当队长，他的牙咬得好紧，一点缝儿也不漏，话说绝了：“你当支书，我当党员，要是我不出力，你处治我！队长嘛，我赌过咒了……”

随之而来的“四清”运动，把王玉祥那一班土改、合作化时期的干部连窝捣了！而其中挨得最重最惨的就是王玉祥自己……九娃当队长了，他是合作社时的头一茬会计，因贪污公款被王玉祥撤了职，“打墙板，翻七下”……九娃又翻上去了，玉祥却跌了下来……

经历了这些事，泰来更拗了，整天可以不说一句话。他凭劳动习惯和良心干活，而不管别人干多干少。他从不串门，天明了去上工，天黑了关门睡觉。他宁可在上集路上和外村人说笑打诨，而在小王村

保持免开尊口……这样，他跳出了外号“小台湾”的小王村的是非圈子……

现在又要上台了！又要沾是非了！泰来拉着架子车，走着想着，在心里制定着执政方针，在失去了正常是非标准的生活旋流中，他选择了逃避方针：闭眼不看，只求干活挣工分，混得衣食……今年执政，还是这个方针：搞生产，把生产搞好，口粮标准要达到四百五！其他是非，不染，坚决不染……唔，可以看见公社农具厂的高烟囱了……

夜已经深了，他在小王村漆黑的街道上走着，不慌不忙地走着，到了王玉祥家的小门楼跟前，一闪身就进去了。

小院里很静。被分掉的西厢房，新主人已经拆掉，搬出去另宅重盖了，旧址上现在是一个猪圈，传出猪在熟睡时的均匀的吭哧声。

东边厢房的灯光从窗纸上映出亮光，门掩着，泰来推开门，跨进一只脚，看见玉祥老汉坐在炕上，戴着花镜的头从小炕桌上抬起来，放下了手中的钢笔。

“你……还忙着……学习。”泰来笑着说。农民对于拿着笔或书的动作，一概称为学习。

“噢！是老拗！”王玉祥摘下眼镜，大声说，“学个屁！我写状子哩！”

“你还写那做啥嘛！”泰来坐在炕边上，心想，你往上反映一回，上面把状子原路转回来，批判斗争你一回，寻着往墙上碰哩嘛！

“我和你想事不一样！”王玉祥说，“我要上诉！除非我死了！我上诉了七回了，斗了我五回！我不停上诉，就准备让他不停斗争！反正，斗一回跟一百回一样，就是站站台子，大不了再挨几下！我不信天不睁眼——一直要把我冤枉到死！”

“你真是……是个……砸不烂！”泰来笑笑，说起玉祥老汉青年时代的诨号来。

“想把我当个面团，摆方就方，摆扁就扁，没那么便宜！”玉祥老汉气倔倔地，“我至死窝不下这口气！还是要告！”

泰来从心里钦服老支书这股子“砸不烂”的性气，却没有向他学习的心情。他没有忘记自己来干什么，便说出了借钱的事。

“有。正好有五十块！”玉祥直爽得很，“我准备买粮呢！你给队上急用，先拿走，我还能将就……那头猪也肥了！”

说着，玉祥老汉下了炕，蹬上鞋，到后面的窑里去了。老伴和小女儿睡在窑里，钱在老伴的柜子里呢！果然，玉祥从后窑转来的时候，把五十块钱直递到泰来手里。

十块一张，一共五张，好数。泰来把钱装进腰里，说：“队上的樱桃一熟，有了进账……”

“啥时间有了啥时给！”

“你写你的状子吧！忙——”泰来告辞了。

泰来老汉出了门，走过了自家的小门楼，一直向西，来到九娃的院墙外，他拍了一下大门的铁环儿，吼起九娃的名字。

夜静了，从院子里头传出九娃带着睡意的回声。他在门口等着。

月亮从河湾的柳林梢上浮起来，河滩里那一排排杨柳，像一堵一堵城墙横列在星空下。上端像锯齿一样高高低低起伏着。

听到九娃在院子里的轻快的脚步声，门开了。九娃裹着前襟，躬着腰，春寒啊！

“借下了。”泰来说，“你明天起早点，去！”

“啊呀！还是你老叔面子大！”九娃要笑说，“我前日买粮，借了半截村子，一块钱也没借下！”

“你数数。”泰来把五十块人民币从腰里摸出来，交到九娃手上，“五十，够了吧？”

“差不离。”九娃接过钱，在嘴里蘸上润滑剂数着，码着。说，“五张，没麻达！”

“抓紧。”泰来再次嘱咐，“咱等着抽水浇地哩！”

“放心放心！”九娃说着，吱扭一声关上了街门。

三

给离村庄远的麦田撒了化学肥料，近处的麦田追施了拆房换炕的速效土肥，两口机井不停地浇灌了七八天，小王村河川里的麦苗，像饥渴交加的穷汉一下子走进了天国，吃饱了，喝足了，像火烧火烤过的枯黄色完全褪掉了。被大路和灌渠分割成一块块长方形或正方形的麦田，像黑绿的毡毯，眨眼蹿到庄稼人的腰际高了。

新的希望把小王村社员多年以来心头的懊丧和失望赶走了，社员们似乎很自然地出工早了，效率高了，打架闹仗的事也少了，小王村出现了多年来少有的一种天然的和谐。人们在自觉不自觉地对王泰来队长表示着尊重和信赖……

看见自己对生产的谋划、铺排和劳作，在田野上显出喜人的色彩，泰来队长惊惶不定的心稳住了，借玉祥那五十块钱该给老汉还了。队里的第一料水果——樱桃已经开园，给果品公司交过两回了；账在九娃手上；前一晌，队上没钱哪，泰来可没忘。

“九娃，你到会计那儿把买水管子的账报了，我给人家清手续呀！”泰来队长在九娃家门口，提醒九娃说。

九娃端着饭碗刚从门楼下走出来，瞪起眼来，一副莫名其妙的神态，说：“买胶皮管的钱，我报了，已经给了你嘛！”

泰来队长笑了：“叔没空跟你说笑话，快去，报了账，叔还人家的钱，人家等着买粮呢！”

“真的！泰来叔！侄儿啥时候跟你说过这号笑话？”九娃的眼睛瞪得更大了，更吃惊了，“你忘性太大咧……”

看看九娃的神色，不是开玩笑，泰来的心猛地往下一沉，认真地问：“你啥时候给我还的？”

“上月……”九娃头一低，沉思一下，扬起头来的时候，就报出了准确的日子，“二十日后晌。”

“在啥地方？”泰来开始发急。

“你屋门口。”九娃不慌不忙。

“胡说！纯粹是胡说！”泰来队长已经完全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无法抑制的怒气从心里蹿上来，“我见你个鬼票子来！”

“队长，你可不能胡说！”九娃把碗搁在门外的石墩上，面条泼出来了，“你不能昧良心！”

“谁昧良心？”泰来一听“昧良心”三字，心火忽地扑上来，“九娃，谁昧良心，五雷轰炸！”

“谁昧良心……”九娃瞟了一眼愈来愈多围观的社员，大声喊起咒语，“羞了他墓坑里躺着的死的，瘟了他炕上坐着的活的！”

这大概是最严重的咒语了，泰来拙嘴笨舌，倒找不出比这更能表白自己无辜的话语了。他气得脸上黑青黑青，胳膊和腿都在抖颤，却急忙说不出话来。

围观的社员愈来愈多，里三层外三层，把王泰来和王九娃包围在中间，不管心里怎么想，怎么判断，倾向性如何，却没有一个人说话。泰来给九娃钱的时候，没有第三者在场。九娃给泰来还钱的时候，也没有第三者在场。两个人交手，别的什么旁证都没有，别人怎么评判?

泰来说：“队上一直没钱，你啥时候报销账单的？”

“上月有一笔收入。”九娃说，“国家给穷队退了一笔农业税！我听出纳说的。”

众人的眼光一齐盯住出纳员，泰来对出纳员说："我说过，用那笔钱买化肥，不准乱支……"

"买过化肥，剩了五六十块钱，九娃硬要报账。"出纳平静地说，做出不偏倚任何一方的姿态，"钱，九娃确实报了；至于你俩之间的事，我就难说了。"

"我从出纳那儿一领到钱，连屋也没回，害怕丢了，直端端跑到你屋。"九娃说得很逼真，头上冒着汗，"你老叔不该给我九娃使手段呀！我给你买了胶管，跑了路，贴赔了钱和粮票，你把麦子浇完了，反过来抽我一巴掌……"九娃淌着汗的脸上，抽搐着，眼泪快流下来了。

"九娃！咱俩……谁瞎了心？天知道！"泰来队长没咒念了，竟然忘记了共产党是不信迷信的，指着天说："咱们对着晴天大日头说……"

"跪下！跪下对天发誓！"九娃是一副更冤枉的模样，扑通一声跪下来，"你跪！咱发誓……"

泰来双膝一屈，也跪下了。

两人先后仰起头，面对着农历四月初已经相当炎红的太阳。

"谁赖账，不是人养的！"泰来咒。

"谁赖账，生下后代没屁眼！"九娃说得更绝，似乎还不解恨，"把他妈叫狗配！"

啊呀！泰来由于极度的愤怒而产生了一缕悲哀的情绪，他明白自己遇到什么对手了。为了五十块钱，不惜把亲生娘老子拿出来糟践的家伙！看热闹的姑娘和年轻媳妇都低着头，纷纷走散了。太污秽了，太肮脏了！和这样的人跪在这里，有什么意思呢?

火红的太阳正当头顶，光焰耀眼，对于地球上这个角落里跪倒赌咒的两个生灵，并不区分善者和讹者。

“上公社！”泰来队长心里一亮，后悔自己不该做出跪地面天的愚蠢举动了，应该相信政府和法律，他对九娃说，“走！”

“走！”九娃马上站起来，“哪怕上县！”

泰来队长还没站起来，感到肩头有一只手搭上了，他一回头，呀，公社刘书记正站在他的旁边，还有一位陌生人，他忽地站起来，嘴唇开始哆嗦起来。

“快起来！”刘书记说，“怎么能弄这号事呢！”

泰来一句话也说不出，把刘书记和那位陌生人引到小队办公室，九娃也相跟着。

听完了泰来和九娃双方的叙述，刘书记说：“问题暂缓一步。县上给咱们公社派来了宣传队，老胡同志住在你们队，结合路线教育，把你们俩的问题也解决了。”

泰来点点头，觉得有指靠了。

九娃更显出急不可待的欣喜，连连说着“好好好”，似乎他简直都要冤死了。

老胡同志在小王村住下来，受理这件并不复杂的案件了。

四

“老胡，你看这案子……”泰来队长说，既想催促老胡把这事抓紧，最好在今晚就能判出个谁是谁非，他就可以舒心地打鼾了；又觉得因为自己的疏忽造成的麻烦干扰胡同志的工作，心里很过意不去，说话就结结巴巴，“我实在料不到……咱把人当人用哩，谁知那不是人……”

“王队长，甭急！”胡同志很客气地说，“等我先熟悉一下情况，这事不难解决！你甭松劲，把生产管好。”

“你只要给我把冤明了，我……”泰来找不到合适的字眼表达他此刻的心情，“我负责把生产搞好。”

泰来队长回家了。他对老胡同志印象不错，听说他是从平原上那个公社抽调出来的干部，在基层工作过十年了，什么麻烦的事都遇到过，他说他在本公社就处理过类似一个案件。

“事情有眉目没？”老婆一见他从外头回到屋里，开口问，她已经急得减了一半饭量了。

“等胡同志把工作铺排顺了，马上解决。”现在，泰来队长压着自己的火气，给女人做缓解的工作，“能解决！甭看胡同志年龄不大，老练着哩。”

“你……压根就不该接手（队长）！”老婆现在有充足的理由唱“悔不该”了，“我不让你接，你……哼！现在倒嫽！倒婵！赔五十块钱莫

要说起，落下个不清不白的名声！”

泰来抱着头，抽闷烟。老婆说得急了，他冤屈地喊：“是我抢着当队长吗？净胡扯！”

“轮到头上你不干，他谁能杀了你吗？”老婆近于不讲理了。

脾性本来不大柔酿的人啊，此时表现出了最大的克制。咱惹下麻达，老婆跟着受累受气呢！能不克制吗？老婆爱嘟囔尽让她嘟囔，她不嘟囔他，去和九娃打架不成？

他睡下了，拉灭了电灯，瞅着没有楼板遮挡的房顶，心里再三回味这件事。现在，已经不像刚出事的那几天，他只顾怨自己，当初把五十块钱交到九娃手里的时候，为什么不让他写个条条呢？现在他开始透过这一层，进一步想，九娃难道真是想讹诈他五十块钱吗？

这个比他小几岁的晚辈远门侄儿，在合作化的头一年，贪污了社员的血汗。在事情被揭发以后，偷偷跑到小王村农业社副主任点着煤油灯的屋子里，扑地跪下了：“泰来叔，侄儿的生死八字在你手里……念起俺爸死得早，我没家教父训，你全当我的生父……念起你侄儿还没成家，要是进一回劳改窑，一辈子就毕咧……念起……”他被声泪俱下的小侄儿感动了，按当时的规矩，贪污一百元得蹲一年监狱，他和主任王玉祥说服了法院，保证把九娃教育好，也亏得九娃能说能写，检讨得好……

可是，当泰来队长因“放卫星”被王玉祥撤职以后，侄儿又来了，诡秘地煽动说：“你太傻了！你难道看不清白？人家把咱这一门儿的人，一个一个往外挤，先是我，后是你……”

“胡说！”泰来尽管对王玉祥有气，却没有想到门族斗争上去；因为在刚刚成立的公社里，和他一起被撤职的有五个队长！他劝侄儿，“好好劳动过日月，耍胡踢腾……”

“四清”运动中，九娃带着疯狂的报仇思想，把王玉祥扳倒了。扳倒了王玉祥，自己也没捞上干部，工作组的人临走时留下“此人不宜重用”的意见，这是尽人皆知的。捞不到就抢，抢权当干部的年月果然到来了，九娃造反当上了小王村的队长。几年没过，开选干会时，连几个社员也叫不到场了；后来，大队在小王村实行了轮流当干部的办法，就是为了防备九娃上台的……

这五十块钱的麻缠，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泰来苦苦思虑，似乎觉得有一个阴险的口袋正向他张开……

炕的那一头，老婆睡着了，睡梦中还挟着深深的叹息！他伤心了，惹下这样的麻烦事，老婆跟着担惊受怕蒙冤屈，孩子在部队上，说不定也受影响……唉！

他的眼泪从小眼角流下来，滚到头底下的木头枕头上来了。

早晨栽红薯秧儿，泰来队长挑着一对大铁桶，给栽秧的妇女供“坐苗水”。红薯地两边的麦田，已经泛出一片暗黄色，绿色首先从麦芒上开始消退了，进入阳历五月中旬的田野像十八九岁的姑娘，丰满而迷人。泰来心里更急了：再有十来天，就该搭镰收割麦子了，哪怕在开镰的前一晚，把那宗冤案判明，去掉精神上沉重的负荷，他也将会一心一意，领导紧张而繁忙的三夏。

放工了，社员一窝蜂似的拥到田间小路上，回村了。老胡同志在汲水的小潭边最后一个洗手，从裤兜里掏出手帕擦拭，然后点上一支

纸烟，站到他面前了。是要告诉他什么吗？调查有结果了吧？

“我中午回公社去，给宣传队葛队长汇报一下。”老胡果然说，“五十块钱的纠纷，有线索可查。我回去请示一下领导，回来就抖这个包袱。”

听口气，泰来队长放心了。

“不仅仅是五十块钱的问题啊！”老胡同志严肃地说，“人家制造这个案子，是要把你弄倒弄臭哩！你千万要撑硬！不敢撂套！那样正好钻了人家布下的口袋！”

“啊！”泰来激动得手都颤了！果然啊！年轻的老胡同志啊！你有眼力呢！“你放心！我不会上当！”

“派性在小王村是严重些。可是，真正捣鬼的，就那么三四个心术不正的人！”老胡说，“他们上不了台，整得你任何人也干不成……”

“你看准了！看准俺小王村的病根了！”泰来队长再也不能沉默，大胆地介入是非了，“小王村瞎，就瞎在那几个万货身上！”

“该做三夏准备工作了！”老胡说，“我请示领导之后，马上回来，争取在收麦前，把这一包脓挤了！”

五

泰来队长被一种情绪鼓舞着，吃饭香了，走路利索了，说来小小的然而牵动着小王村极其复杂的社会和人事关系的五十块钱的案件，马上就要揭明了。这将给小王村长期受到压抑的好人带来精神上的快感，同时必然让那几个心术不正的家伙亮一亮相，小王村可能从此朝

好的方面转化！他充分地估计这场斗争的意义，已经超出自己和九娃个人之间的恩怨了。老胡同志不简单啊！才来小王村一月多，就把病根看准了。

他心劲十足，做着三夏前夕的准备工作，麦子经过春天采取的应急措施，长势是令人鼓舞的，他等待着老胡同志的归来，把生产上的一切细微环节都尽可能地考虑周密……

他领着几个社员动手垫铺打麦场，在场面上撒一层细黄土，把凸的地方铲平，垫起凹的地方，泼上一遍水，再撒上灰，用石滚子碾平轧实。大麦和青稞已经芒干了，眼看就要上场了。他推着碌碡，独自想着，这两三天怎么没见九娃上工呢？坐不住了吧？专走黑路的鬼，这回可碰到吃鬼的钟馗手里了！

第二天，喝汤的时候，老胡进了他的门，身后还跟着一位比他年龄大些的中年人，看去四十七八岁了。老胡介绍了来人的身份，说是宣传队队长，姓葛，亲自到小王村来了。泰来心里更高兴了，领导亲自来到复杂的“小台湾”，小王村有希望变好了。

老葛同志坐下，点燃了一支烟，问：“那五十块钱……”

泰来忙说：“老胡同志一概尽知。起首是……”

老葛同志轻轻摆一下头，打断他的话：“事情的过程我知道了。我是问，你借谁的呢？”

“王玉祥的。”泰来说，“这与他无干。”

“王玉祥是个什么人呢？”葛队长声音平缓地问。

“是……是……”泰来队长有点说不出口了，一股寒冷的细流伴着葛队长平缓的声音，从他的耳朵里钻进去，通过脊梁，直透心肺。他手足无措了，嘴张不开了，舌头根也僵硬了。他虽是个笨拙执拗的庄稼人，早已敏锐地觉察到葛队长的问讯里包含着怎样的危险了。

葛队长眼里滑过一丝得意的冷笑，看着被他一句话击中要害而结结巴巴的队长，把头朝后一仰，就把话题转开了：“今晚召开党员大会，明早召开团员大会，明天晌午召开贫下中农会，明后晌咱俩谈话……”

泰来睁大眼睛，瞧着葛队长平静的脸，听着葛队长平缓的声音，心里开始毛乱了，葛队长只叫他通知开会，却对他保密会的内容；问王玉祥是什么人，意思不是很清楚吗?

当晚的党员会上。葛队长面对小王村的四名男女党员，语重心长地说：“派性在小王村是严重的，这是表面现象，五十块钱的问题，现象在两个贫下中农身上，根子扎在敌人身上，难道不是这样吗？”

在团员会上葛队长重申了这一席话。

在贫下中农会上，葛队长仍然紧紧抓住这一纲领性的思想进行阐释。

泰来看出来，葛队长是层层发动群众，要把目标集中到王玉祥身上去。

后晌，他早早来到葛队长的临时住屋。

葛队长很和蔼地给他谈话：

“地主分子用金钱分裂咱们贫下中农，你和九娃应该团结起来，首先揭穿敌人的阴谋；然后，你俩坐下来，心平气和地解决。阶级敌人想看咱们贫下中农的笑话，咱们不能上当。在这个问题上，你是党员，又是队长，应该主动和九娃团结……”

“好葛队长哩！”泰来耐着性子听着，实在忍耐不住了，“九娃捏着心眼讹我的钱，我咋样和他团结嘛！这有人家王玉祥个屁事呢嘛！”

“同志！”葛队长拖长了平缓的声调，“要从阶级斗争的高度去认识这场纠纷，通过斗争共同的敌人，使贫下中农在斗争中提高觉悟，自己解开疙瘩。”

“那好吧……”看着葛队长严肃而又固执的神情，泰来不想再说什么了。起身告辞的时候，他心里好笑，怕是越整王玉祥，九娃日后讹人讹得更凶！根本就没搔到痒处嘛！

泰来又坐不稳了，吃饭也吃不出味道了，终于瞅住老胡和葛队长不在一起的机会，问：“这是咋弄的？”

老胡的小平头上的头发硬硬地直立着，避开他的眼睛，不说话，眉眼和嘴巴都露出难言的神色。

“老胡，你看，葛队长说的办法，能解决问题吗？”

“能啊！怎么不能？”老胡正经地说着揶揄的话，然后告诉他，“葛队长接到从县上转回来的一封‘群众’来信，是告我的，说我和地主分子穿连裆裤。葛队长批评我把工作弄翻了，没有抓住小王村的主要矛盾。这不，他亲自来了！把我调出小王村了！”

噢！噢噢噢！泰来明白了，自然能想到那个“群众”是谁了。他能体谅老胡的难处，他是组员，老葛是队长，组员能犟过队长吗？他不想再和老胡多说什么，说了也不顶啥，只能给老胡加一层忧愁罢咧！

他心冷了，冷漠地等待着葛队长将要开展的工作和所要采取的措施。看你能成什么精吧！要是斗争了王玉祥，能使九娃幡然悔悟，那该多好啊！

六

斗争地主分子王玉祥的大会，在饲养室的院子里召开了，社员围坐在五月的树荫下，悄悄静静，中间自然留出一块太阳直射的空地。临时从谁家搬来一张三屉桌子，作为主席台，放到上首。老葛坐在桌子旁边，三次催叫泰来坐到前头去。他实在推让不过了，谎说他自年轻时就得下了腰疼病，坐在高板凳上，挺得腰部受不了，虽然走到桌子前头了，一撅屁股，又蹲在地上了。

王玉祥身后跟着两个民兵，走进会场来。他从围坐着的社员的空隙中走到桌子跟前，老葛同志指指中间那块空出来的阳光充裕的中心场地，他又朝前走了几步，站住了。他早已习惯于这种场合，洗得净净的白褂，两手垂在髀间，身子朝前倾着，头低下。

葛队长从桌后站起来，神态严肃，要小王村的社员都思考：五十块钱的背后隐藏着阶级敌人的什么阴谋？

泰来瞅瞅王玉祥，再瞅瞅葛队长，又扫一眼九娃昂着头、支着耳朵的得意神气，心里憋得好难受啊！他给玉祥老汉造成了今天挨斗的

场面，又使自己陷入说不清的境地中，倒使九娃占了明显的上风！葛队长啊葛队长，你把小王村的事情才是真正弄反了，搞颠倒了。

他不敢再瞅王玉祥在大太阳下已经开始淌汗的脸，虽然过去因为放不高“卫星”被他撤了职，丢了人，而后俩人一谈早消气了。他虽然发誓再不当干部，却也看见玉祥从那次教训后，工作扎实得多了，威望更高了。

“老拗！我不信把你拉不上台！你今年不干，我等你明年；你明年不干，我等你后年……我这个支书，非把你拉上来不解！看你有多拗！”

没有等到把拗队长拉上台，自己却被扣上一顶地主分子的帽子跌倒下去了……这个自土改登上王村舞台的王玉祥，给群众办过好事也办过蠢事的庄稼人啊，现在站在会场中间最不光彩的位置上，不是要人们对他的功过作客观的评价，而是要他交代阴谋！对他，一切都要从最坏处进行估计。挖空心思对他进行最恶劣的猜测，毫无顾虑地把最肮脏的语言泼到他头上去……

“王泰来同志，你发言。”葛队长点出他的名字。

“队里买胶皮管没钱，我借了王玉祥五十块，交给九娃，买回来水管。就这事。”泰来说。

“你想没想，王玉祥为什么要借给你钱呢？”

“是我朝他借的。”

“他为啥这么慷慨？”

“那是队里急着用。”

“你得好好从本质上想！”葛队长很不满意地盯他一眼，然后喝问王玉祥，“老实交代你的险恶用心！”

“我看泰来借得急，天旱……”王玉祥说。

“你倒关心集体！”葛队长冷笑着嘲讽说。

“我也靠集体分粮，吃饭！”

“你是狐狸给鸡骚情！鳄鱼的眼泪！腊月的大葱——皮干叶枯心不死！”葛队长一连串说出许多精辟的比喻。“你不老实交代，咱就七斗八斗，斗得你非低头认罪不可！”

泰来老汉盯着九娃，他是个男人，却一根胡须也不长，冬夏都是一张黄蜡蜡的脸皮，寒风吹不红，太阳晒不黑。这个黄脸恶鬼，他从来不在公众场合多说一句话，夜晚却像蝙蝠一样活跃在小王村的那些农舍里。这是小王村里一双阴冷的夜眼！瘆虫！

九娃看到了葛队长暗示的目光，站起来，不慌不忙地发言了：

“我提一个问题：王玉祥是明牌货，共产党员王泰来不知道吗？知道！知道为什么偏找到他的门下？”

话不在多，全看说到说不到要害的地方！九娃是善于猜度形势的，一句顺着葛队长的心意的话提出来，直接刺到泰来心尖尖上了。泰来心里的火像遇见了风，呼呼直往喉咙上蹿，眼睛紧紧盯着那个佯装得挺神气的家伙。

“我以往只觉得是泰来队长和我的纠纷，万万想不到有敌人的黑手，多亏葛队长帮我看到了本质！”

“放屁！胡说！”泰来队长忽地站起，吼道。正在要紧弦上，他却气急得说不出话来，腿簌簌抖着，嘴上却鼓不出劲来。

“不能骂人啊！”九娃仍不起性，很有修养的样子。

老葛站起，很不满意地盯了泰来一眼，制止了他的冲动，然后说：“九娃提的问题值得思考。”

“啊！”泰来坐下来了，千锤打锣，一锤定音，葛队长已经明显表态了，他泰来还有什么可说的呢?

“看到咱贫下中农之间闹矛盾，我心里很难受！深深地痛恨阶级敌人分裂贫下中农队伍的罪行！”九娃痛心疾首地表演着，然后一挥胳膊，大义凛然地说，“为了加强咱贫下中农团结，使敌人阴谋破产，我——”他面向群众溜了一眼，又盯住葛队长，“我给泰来队长五十块钱，啥话不说了！”

泰来简直料不到九娃使出这一个撒手锏！自己已经被纳进口袋了。

“好！九娃顾全大局的做法是值得欢迎的！”葛队长回过头来，兴奋地瞧着泰来，“你也得有点高姿态啊！”

泰来立起，朝前走了两步，瞧一眼葛队长，又瞧瞧社员，脸上聚起了一窝血：

“把问题搞清，谁讹谁的钱？该谁往出掏，谁就往出掏！我的姿态低！就这低！要高也能高，怎么不能高呢？我宣布不要五十块钱了！全当……全当给鬼烧了阴纸了……”

会场静默。

九娃那张阴阳脸仍然不动声色。

葛队长恼恨地盯着这个破坏了已经趋于大团结的气氛的拗队长。

“我宣布辞职！”

泰来说罢，走出会场，背着手，走进空寂的街道，吓得路上觅食的母鸡扑棱着翅膀跳开去了……

七

性格执拗而体魄健壮的泰来队长躺倒了。他的粗壮结实的腰板，一年四季，白日里很少挨过炕面。他从来不患感冒，消化系统的机件又运转得特别正常，干活是极富于韧性的。现在躺在炕上，茶饭不香，胸膛憋胀，脑子沉闷得像扎着几道粗麻绳，只有长长地呼出一口气，才松泛一些。

老伴吓坏了，请来村医看了两回，不顶用，就围在炕边催促他到县医院去。他不想动弹，任何人的面也不想见，烦透了！他在许多秦腔戏里看到过浆子官，却没有想到自己的党里头，也有这号浆子官。老伴出出进进，大声恶气咒骂着，除了骂九娃，连葛队长一齐裹进去骂。他不反感，听着老伴那刻毒的骂声感到解气，胸脯里能得到短暂的、药物也不能达到的松泛和缓解！从来遵守着勤劳、正直的家训的

泰来队长，很少和乡亲们打架骂仗（打架骂仗在中国农村的传统道德里也是不光彩的事），现在不仅不制止老婆骂，他简直想跳起来，蹦出门，站在小王村的街心十字，跳起来骂了！

房脊上的天空里传来急切的呼唤：旋黄旋割……旋黄旋割……叫声悠然消失到西边的田野上去了。全部让雨淋到地里，让风刮得麦粒落光！我拉上枣棍去讨饭，你们能吃得饱吗？我为了众人的事，落到这步田地，上级来人批我，群众噘着嘴不说话。唉！

九娃想上台，多数人又不举拳头，谁上台就给谁使脚绊绳。九娃当队长的那一年，把队里搞得乌烟瘴气，王村大队支书到小王村来，想把九娃拉下来，还没弄出个眉眼，说支书在小王村睡人家婆娘的谣言，就远远飘出了小王村的范围，传进大王村街巷里高高低低的院墙。支书的老婆骂得支书张不开口，死活不让支书再进小王村。支书为了防止九娃一伙上台，采取了轮流执政的办法。他认定：小王村再没本事的任何一个农民，都比九娃强！他要上台，得等到轮过二十年，才能轮上一回！而支书自己却再不进小王村——“小台湾”来啰！这个瞎熊上不了台就捣乱……葛队长，你瞎了眼了吗?

“王队长！”院里传来葛队长的叫声。

泰来没吭声，表示对这位长着一副大脑门的上级领导的轻蔑和抗议。

“王队长！”葛队长进了屋，站在炕前，“你病了？”

泰来看了一眼，葛队长脸上现着焦虑和诚意，有理不打上门客啊！他苦笑一下，心里谴责自己的无礼了，就坐了起来。

“你有意见，可以谈，不能躺下嘛！”葛队长劝说，“麦子黄了啊！”

“要是再有俩人出来，红口白牙讹诈我，咋办？”泰来说，“到年底，我卖婆娘当娃都还不起……”

“同志！凡事总要分清轻重。”葛队长说，“和王玉祥的斗争，是大事；和九娃的矛盾，是阶级兄弟之间的……”

“还是这一套！”泰来背靠在炕墙上，烦腻地想，长长叹一口气。他不想看葛队长那亮光光的大脑门，把头偏转到另一边去。长得那样大的脑门里头，考虑问题怎么这样简单！他听人说葛队长在城里工作，从来没下过农村，他是装了满脑子的钢（纲）丝，下农村来的！和他说什么呢？“我那天说过了，五十块钱我不要了。”

“你思想上没通……”

“通了！”

“你怎么躺下不当队长了呢？”

“我阶级路线不清啊！”泰来终于忍不住，鄙夷地说，“让那些路线清白的恶鬼上台吧！我自动让路！”

“不要打别扭。”葛队长说，“没有第三者作证，难啊！让九娃拿二十五块钱给你，吃亏的少吃点，占便宜的少占点……”

“哈呀！”泰来哭笑不得，“这算啥办法？王八三十鳖三十……”

“算了，都是贫下中农……”

“算了就算了！”泰来说，“你让九娃来，我和他当面说。”

“我让他给你把钱拿上。”

“行嘛！”

葛队长出门去了。

九娃跟着葛队长进来了，友好地笑着：“泰来叔！算咧，咱是叔侄，又都是贫农，闹矛盾，让阶级敌人高兴……”

泰来不冷不热地笑笑。

九娃掏出钱来：“你把这拿上……”

泰来从九娃手里接过钱，五张五元票子，哗哗数过，盯着九娃，死死盯住：“侄儿，你叔叔老不要脸，黑了心，到底讹下你的钱了！侄儿你真够人啊！”

“这……”九娃立时红了脸，那双阴冷的眼睛，慌忽乱闪，看着葛队长，抱怨地说，“这算做啥？”

“做啥？”泰来骂道，“我宁可一个人活在世上，绝不跟你龟孙团结！”说着，扬起手，连同那五张人民币，一同抽打到九娃的嘴脸上，吼叫一声：“滚！”

九娃抱着头，跑出去了。

“不像话！泰来同志！”葛队长气得脸色发白，没经见过农村人闹事的城里人啊，手足无措，毫无办法了。“不顾大局，真不像话！”

泰来眼前一黑，仰靠在炕墙上，呼呼喘着气，说不出话来。

“怎么收拾呢？”葛队长说，“你这种态度，值得好好考虑！”说罢，站起身要出门了。

“老婆子！”泰来像疯狂了一般吼叫。

老婆从隔着窗子的灶房跑进来了。

“把那些钱拾净，交给葛队长。”

老婆子吓坏了，慌忙蹲下，在地上捡着。

“啊呀！我的眼！”泰来眼前一黑，跌倒在炕上，双手抠着眼睛，什么也看不见了……

八

眼前是一片漆黑，自己看不见自己的手，只能凭声音辨听老伴所在的位置，只能听见医生和护士的轻重不同的口音。他被告知：患了急性青光眼——俗说气蒙眼。眼球里头痛啊！痛得鬓角嘣嘣响，恨不得一把把眼球抠出来！

躺了整整九天九夜。实际上是没有白天的，全是黑夜啊！手术后的第七天，揭去纱布以后，他第一次看见了把他从终生的黑暗里拯救出来的男医生和女护士，看见了和他过活了大半辈子的娃他妈，老汉流了泪了。

“老汉，病好了，千万再不敢生气；再生气，可能再犯，再犯就要摘除眼球了。”医生说，“生产队事情复杂，看得开点！”

“能想开，能！”犹如隔世重生，泰来呵呵笑着，似乎一切都没有必要计较了。

傍晚，病房里走进几个乡下人，泰来一眼瞅见，竟是小王村的乡亲。噢！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泰安老汉、会计勤娃、妇女队长麦叶，拿着家乡的黄杏、鸡蛋，还买了饼干和蛋糕，看望泰来队长来了。

泰来的心，在胸膛里忽闪忽闪摆动，执拗的五十岁的庄稼人，抑制不住感情的冲动，竟然当着乡亲的面，直抽鼻子，那酸渍渍的清液，仍然从鼻腔里渗出来。他能看出来，他们三人只说叫他放宽心的解脱话，绝口不提队上的任何事情，当然，连九娃的名字一次也没提到。他们故意避开这个瘟神的名字，怕他听到动气。

泰来能理解乡亲们的心，觉得没有必要了；在他来说，这件事已经过去了；当他一下子失去光明、气得休克，又苏醒过来、又恢复了光明以后，这件事就变得不那么重要了，甚至觉得当初就不该动那么大的气呀！他心里很平静，那件窝囊的事情已经丝毫不能引起他的肝火了。

“泰来老哥！祖辈几代住在小王村，谁不知谁的腰粗腿细？谁不知你的秉性嘛！”泰安老汉说，“你耍气，气下病，伤自个儿身体，人家才更高兴哩！”

“你今年当队长，麦子长得好，大家觉得刚盼到一点希望，偏偏……”妇女队长说，“老婆媳妇都叫我劝你，放宽心……”

“噢噢噢！”泰来老汉感动极了。

“你看——”泰安老汉从腰里摸出半拃厚一摞票子，说：“大家自动筹集起来这些钱，叫俺三人送给你。那个贼讹了你，你是为咱队上，不能叫你枉挨肚里疼！你收下，这……”

“啊呀呀！”泰来张大嘴巴，瞅着泰安老汉手里攥着的那一摞票子，惊呆了。那票子，从颜色上看，有一块、两块的大票，也有伍毛两毛的零票，那是小王村的男男女女，出于一种正义感而促成的慷慨的举动啊！谁说庄稼人吝啬呢？他们可以不吃醋，不吃盐，节省下几分钱来，而一旦为了申明自己的义气，都可以拿出整块钱来！泰来老汉无法抑制已经全面崩溃的理智的闸门，一把搂住泰安老汉的双臂，像个小孩一样哭起来。

泰来把那一摞印着小王村男女社员的手印的票子拿到手里，又坚决塞回泰安的掌心，说：“好咧！有了大家的心，这就够了！我的病也就好咧！”

九

饲养场的院子里，坐着小王村生产队男女社员，一百几十个人，稀稀拉拉。

葛队长站在桌子旁边讲话：

“三夏在即，龙口夺食，泰来队长不干了！没有办法，我们物色了三四个人，分别谈话，做了工作，都不上套！最后商定：九娃同志。大家有意见没有？”

沉默。庄稼人习惯用低下头，避开眼，表示自己不满的意见。没人说一声行，也没人说一声不行。

“大家考虑考虑，有意见就谈。”

仍然是更冷的冷场。老葛突然发现，一个一个社员，相继把头转过去，眼睛都专注地瞅到西边去了，是什么目标吸引了他们呢？老葛一扭头，唔，泰来队长正一步一步从村巷里走过来。

刚走近会场，不知谁领头拍了手，接着就波及许多人，冷清的会场被掌声轰热了。

热烈地明显地带着某种情绪的掌声，把泰来队长迎进会场，又一直送着他走上主席台，好些人都站起来了。

泰来走到老葛同志坐着的桌子跟前，一言未发，从腰里摸出来一扎票子，放到桌子上，大声说：“这儿还有五十块！谁爱钱，谁来拿！”

刚刚停歇下来的掌声，又突然爆发了。

老葛同志瞅着那一堆票子，弄不清怎么回事，刚张开口想问泰来，泰来已经离开桌子，走到人窝里去了。社员们围上来，问起他的眼睛，其实都知道他的病好了，还是要问。

泰来说：“乡亲们，我又不是给儿子娶媳妇，用不着送份子礼啊！钱我绝对不能收，队长嘛——”他顿一顿，不好意思了，大声说：

“今后晌，男女社员到南坡，开镰割麦！”

1981年1月11日草

2月改 灞桥

正气篇

——《南村纪事》之一

一

“查南村生产队会计、出纳账：

账存现金：七分（硬币）。

贷款：八千二百元。

社员欠款：四千三百元。

最大欠款户主：南志贤，一千二百元。

“查南村生产队仓库：

库存小麦：零。

库存玉米：四千斤（种子）。

储备粮：零。

社员借粮：五千五百斤。

最大借粮户主：南志贤，一千五百斤。”

在南村生产队五间宽的饲养室里，新任队长南恒，第一次召开全队社员大会，一开口，向众人报出这两笔账来。

饲养员们夜间歇息的大火炕上，磨得溜溜光的水泥槽帮上，架着农具杂物的木板楼楼口，饲养室里的空地上，木梯上，铡墩上，水缸沿上，一切能站、能靠、能坐的地方，都被社员们不分男女老幼挤塞满了。南恒站在炕角边的地上，在他说着这两笔账的时候，嘈嘈嘈的说话声一阵比一阵低了，少了，没了；只有谁家勤快的女人纳着鞋底，扯动麻绳儿的“哧——哧——”的很响的声音。

这两笔账，社员在耕地的垄沟里，上集来回的土路上，三三两两，议论了多少年了。骂也骂过，损也损过。时间长了，反倒没人再对这无可奈何的陈年老账有什么兴趣了。今天是什么日子？不是惊蛰，是一九七九年农历腊月一个普普通通的日子。这笔陈年老账第一次从人后提到人前，而且是全队近二百号男女劳力的面前。南恒，你这是想干什么啊?

南恒站在炕墙边，现在成为南村男女老少注目的对象，比之南村那些身强力壮的年轻人，他身架骨单薄，瘦小。自小离娘，没吃得饱奶！比之那些嘴快舌利的年轻气盛的庄稼人，他又显得斯斯文文的样子。不是帝王相，也不是大将军的胚！唯一区别于南村其他人的标志，是他窄窄巴巴的鼻洼上扣着的那一副近视眼镜，黄色的镜腿退了色，折断的地方用胶布缠扎着，大概是做木匠活儿时，斧下飞起的木屑砸断了的吧？割制新式时兴的桌子或柜子，你南恒算得一个心灵手巧的木匠，可要收拾南村这个烂摊子，填起这个穷坑，你南木匠能成吗？你把南村的歪人南志贤和他的“两大欠”唱到众人面前，你心里想咋呀？看看自个儿，是南志贤的对手不是?

不管那些低着脑袋或扬着光头的中老年男人眼里传递着什么情绪，不管耳朵贴着别人嘴巴的妇女们在交换什么看法，也不管青年们互相挤眼、咧嘴是什么意思；瞧得起瞧不起，信任或不信任，一个人人都关切的问题总是第一次被认真地提到众人面前，也提到“两大欠”者本人面前，这个举动所需要的勇气和力量，恰恰在一个看来并不具备这个条件的人身上体现出来，会场的气氛就发生了比较复杂的变化。但是，任何一个人都在绷着脸儿，认真地思考，算计，估量这件事可能的发展，这是谁都看得见的事实。南恒说完，透过近视镜片，瞅着搭靠在楼口的木梯的下端，那儿坐着“两大欠”的户主，前南村生产队队长南志贤。

他坐得很好，屁股压在第二级横格上，双脚踩在第一级横格上，左手抱着右手的胳膊肘，右手的食指和中指间，夹着一支庄稼人难得品尝的黑色卷烟。对于两次提及他的尊姓大名，丝毫不动声色，鼻孔和嘴巴里，三股蓝色的烟雾悠悠然流泻出来。

甭摆出这么傲慢的架势吧！这样的架势能给你那些不光彩的令人憎恨的事情解脱吗？南恒扶一下眼镜，用半握着的拳头的食指，顶着搓着鼻头和上唇交接的地方，背后的火炕边上，传来南盛茂鼻腔里又粗又响的出气声，这个和他同时上任的副手，难以容忍南志贤其人其事其架势了。南恒回头看一眼，示意这位比他小三四岁的嫉恶如仇的同事冷静下来。在南盛茂旁边坐着的，是比他大三四岁的又一个副手南尚杰。他嘴里咂着旱烟袋，不声不吭，看着自己吊在空中的脚上的棉鞋，似乎那双已经开花的棉鞋，有什么考古的价值！

“凡是在队里借粮借款的社员，五日内交出还款计划。要求三年还清。”南恒说，声音不高不急，“十天内，先交出欠款的百分之十。”

南恒说完这一条规定的那一刻，人们不约而同地扭转头去，瞧坐在木梯上的南志贤。按此规定，十天内，他要交出一百二十块现金。南志贤活动一下屁股，把烟卷从右手换到左手，夹着烟的两只指头，高高地跷起来，弹一下烟灰，嘴唇上有一丝淡淡的嘲笑。

那位勤快的媳妇，不知什么时候停止了扯动麻绳的动作，“唑唑唑”的有节奏的响声悄然消失了，牛马喷鼻和嚼草的声音，铁缰撞击水泥槽帮的声音，一下子浮动起来了……如果借款的人不交还款计划呢？或者应付差事交来一个根本不打算执行的计划呢？十天内不交百分之十的现金，你南恒有什么高招呢？肃穆静寂的饲养室的这一角和那一角，二百双男人和女人、老人和青年的眼睛里，现在就都逼着新任队长要说清这个意思！

南恒稍微提高了声音，宣布：

“十天内，还款困难，有正当理由者，向队委会说明情况。有钱不交也不写还款计划者……”南恒略作一停顿，然后脱口而出，“揭瓦拆房！”

短暂的令人窒息的静默，被一声失望的“嗯——”的叹息打破了。有人摇头，有人讪笑，嘈嘈嘈的议论声几乎同时从四面八方响起来，整个饲养室里，看不见几双信赖的眼光！多年来说了不算的大话，已经使庄稼人耳朵磨出茧子了，何况这样不切实际的办法！

在众人纷乱的情绪里，南志贤明显地得到了某种鼓舞，叼着烟卷的薄嘴唇更撇了。他把烟头在梯臂上蹭灭，夹在耳朵上，从梯格上下来，朝门口走去。看神气，他不屑于参加这个会议了。

“甭走哇！会还没完呢！”南盛茂喊，“你做啥去呀？”

南志贤在门口停住脚，回转身：“去尿尿！”

几个青年，几个妇女，忍不住哈哈笑起来。

南盛茂气得呼呼喘气，却反不上话来。

“你尿完尿回来，要对本制度表态！”南恒对站在门口嘻嘻笑着的南志贤说。

“制度咋订咱咋办！”南志贤随口说，轻佻中又含着明显的鄙视，“制度嘛，是订给南村全体社员的制度，大家都能执行，我也能执行！这个‘态’我现在就‘表’了！”

“那好！说到做到！”南恒一听就明白，那话里的另一层意思，就是挑起借户和欠户对本制度的反抗情绪，使南志贤本人摆脱孤立的境地。南恒顺着他的话追压上去：“你是借钱借粮两项中间的‘状元户’，不能看别人。本制度首先从你做起！”

嘈嘈的议论声又沉寂下来。

“你等着！”南志贤收敛了眼里和嘴巴那一丝嘲弄的笑意，狠着声说，同时眼里就泄出一缕深沉的仇恨，这才是他的真实的感情；说完，一闪身出了门……

二

一走进自家土围墙的圆洞门，就看见父亲坐在院中的木墩上，手里攥着一把斧头，在斫着不知从哪儿捡拾回来的干死的树枝。老人早已发觉他进院了，却只顾低头斫柴火，并不理睬儿子。

南恒刚走到父亲跟前，老人摔掉斧子，忽地站起，眼睛里全是气恨之色，问:“我说你，这样大的事，为啥不给屋里打个招呼？”

“啥事？”

“你刚才在会上说的啥？还问我！”

“噢！吶事——”南恒笑着，“那是队里的事，我在屋里说它做啥？”

“我不管队里屋里！”老人显然被儿子把他不当家庭长者尊重而激怒了，“我只知道，你是噙着人家志贤他妈的奶子长大的！你不记人家的恩情，我还忘不了！”

“我也记着。”南恒笑着对老人说，“救命之恩呢！”

“你记着，为啥要整人家志贤？”老人逼问。

“这是队委会研究定下的制度。”南恒说，“要是志贤哥借下我的钱，我可以不要！”

“既是队里的事，全村一两百号劳力，只有你得罪人！”老人更上气了，“你……生下没三天，你妈……不在了！要不是志贤他妈给你喂奶，你小子今天能在人前说话？志贤是你奶哥，你整人家，天理良心……你不怕人骂，我还怕呢！”

这是很能牵动人的感情的事。在他落地后的第三天，母亲得了产后风。志贤的母亲，一个刚强的农家女人，不幸把怀里的已经长到十个月的女儿撂了（死于天花），就把南恒抱过去，填了空怀，声明不要一分一文奶子钱。南恒至今记不来亲娘的面容，凭想象，只能想象

成奶妈的样子。每年端午、中秋和新年，无论家境如何困难，父亲也要买来“四样儿”，让南恒提着去拜望救命的奶妈……奶妈老逝以后，南恒仍然年年提上四样，送给奶哥南志贤……

“你甭担心，爸。”南恒说，“到今年过年时，我照样提上礼物，送到奶哥屋里。”

“呸！”老人鄙夷地干吐一口，“你还给人家送啥礼哇？人家不扔到茅坑才怪！”

“他今年扔了，我明年还送。”南恒仍然不动气，平缓地说。

“你……”老人被儿子这样冷静的态度更加激怒，“你……吃了饭，背上木工箱儿，出南村！”

南恒笑笑，站起来，朝屋里走来。

“你听下没有？后晌就走！”老人追上来。

“我把木工箱儿，已经架到楼上去了！”

“你把我分开！”老人无奈了，仍然紧逼不放，“我不跟你落瞎名声，挨人骂！”

“分吧！”南恒忍不住说，“面在瓮里，擀面杖在案板上，你自己去挖，去擀，想吃啥做啥，你去做！”

“啊呀！我把你拉扯大……你要分我！”老人像丧失理智，伤心地蹲到台阶上，抱着头，“我一个光身外头人，拉扯你……”

“分？要分把你分开！”媳妇这才从里屋出来，站在院子，“咱在外头做木匠活儿，挣几个零便钱，过咱的日月，安安宁宁！你偏偏要往南村的是非里头钻！你有本事，你去！根本就不要回家来端碗！”

南恒瞅一眼媳妇，她更气，再发展下去，就可能是他和她的难以预料的结局。他不想吵闹，又不想听父亲和妻子烦人的叨叨，而且看架势，一时三刻是难以平息下来的，中午这顿饭也不大好吃了。

他的脑子里，被南志贤占据着，他要考虑下一步的对策，双方的阵势都已摆开了。他无心纠缠在父亲和媳妇的吵吵闹闹的纠葛中，于是就转过身，二话没说，走出院子去了。

三

三九隆冬，即使是晌午，风也是冷冰冰的。眼前是南村的河滩地，并不开阔，麦苗好像冻结到地皮上了，呈出一片灰青色；河堤上的柳树和杨树的枝干，也是一片铁青色；背后是又秃又荒的原坡，这里那里散落着几株椿树和榆树，也是铁青的枝干，看不出一丝活气；脚下那条泥土公路，把夹在黄土坡崖与小河一湾之间的小小的南村，与西边的大吕庄连结起来，通到外部世界去了……

这就是生他养他的家乡！

这儿有他的长眠在黄土坡上没见过面的生身母亲和养育过他的奶妈。有像妇人一样一把屎一把尿拉扯他长大的父亲、他的媳妇和他的刚刚能端碗扒饭的小儿子。无论他背着木工箱游转到哪里，梦里总是萦绕着小小的南村……

人生到底是怎么回事？当他在陌生的主人家里做活儿，睡在异乡的热炕上，既不能享受漫长的冬夜里中年夫妻的温暖，也不蒙受繁杂琐碎的家务诸事的烦恼，常常就想到自己三十五岁的生活历程，究竟是什么主宰着命运?

小学毕业的时候，他被选拔到城里一所省立重点中学去读书。十二岁的山村少年，第一次走出了小河川道狭窄的天地。高中毕业的时候，在全市中学生数学比赛中，他名列前茅。谁也不怀疑，这个山乡俊秀将完全有把握考取全国重点知名大学，从而打开他一生灿烂前程的第一页。可是，正在这个节骨眼儿上，一场骤然而起的运动，把他自己编织的理想的花环撕得粉碎！

他回到南村来。到得婚娶的年岁，介绍人给他领来一位陌生的姑娘，于是就订婚、结婚了，接着就有一个孩子落生了。他也像南村人祖祖辈辈留传下来的所有后代一样生活着：出门在土地上耕翻。回家来担水，喂猪。早晨和晚上喝玉米糁糁，中午吃一顿只调盐和醋的面条。天一黑严，搂着媳妇睡觉……即使是如此乏味单调的生活，也难以为继。年年粮食不够吃，成为他——这个四口之家的主要支撑者极大的熬煎。他买来几样木工工具，没有投师，半年就能割制简单的家具了。一年后，他背上木工工具箱出门游乡串村去了，每天挣二元五角工钱，一天三顿吃既不付款也不交票的优等饭食；攒得百十元了，骑上自行车，到渭河北岸丰裕地区买回一家人赖以生存的玉米；把粮食和剩余的零钱交给家庭主妇，晚上和媳妇亲热一宿，天明又赶忙出村，到外乡去给新的主人割桌子、柜子、一头沉……

生活逼着一个很可能在数理工程上有所作为的人学会了木匠手艺，不仅不是令人遗憾的过失，反而成为南村穷困的庄稼人羡慕的好

事：一月有几十块钱的收入，常年在外可以节约一个人的口粮……啊呀，这个瘦瘦巴巴、蔫蔫搭搭的“眼镜客”，真是个人哩！

他走过多少村子，数也数不清了。有许多和南村一样令人失望的贫穷烂摊的村子，也走过一些相当优裕的村庄。有的村庄第一次去的时候，相当富足；隔了一年，换了一任队长，又烂得马踢牛叫了。有的村庄，第一次去的时候，穷得没有能容得南木匠挣钱的家庭；隔了一年，再转去的时候，好多人争着拉南木匠去割制家具。同样，是换上来一位好队长。

一个生产队搞得好坏，全在一个队长。南恒在转悠的几年之间，观察了解到的几十乃至上百个村庄的状况，得出了自己的结论。有些村庄的队长胡来乱整的恶事，传进他的耳朵，他为那些村庄的社员难受；有些村庄的好队长的事迹传进他的耳朵，他深表钦佩。他希望，南村能出一位好队长，领导得南村粮食分得够吃，劳动日值能升上一元钱，他就不必长年出门游荡了，可以和年老的父亲、可爱的妻子儿女过安宁的农家日月了……

令人失望的是，他一直没有盼来一位这样的队长。好多又穷又烂的村庄，找不出干部上台；而南村恰好相反，虽然又穷又烂，却是好些人抢着当干部！一些人物，纠集起一帮一派一宗，把本年的队长推倒，上台了！为自己和那一帮一派一宗的人“服务”一年，捞够了油水，下一年又被新的一帮一派一宗的代表人物所替换……他的奶哥南志贤，十年来上过三次台了。他三次上台的成绩是，从南村队里借去一千二百元现金和一千五百斤粮食！那些没有用欠条的合法手续记载下来的东西，就更难以计算了。

万万想不到，意外的事情在南村发生了。一九七九年的腊月里，公社给南村派来一位干部，组织社员民主选举，在社员的呼声中，投票采取无记名方式，给碗里投扔染上了红漆的玉米粒儿。那几个头面人物多忙啊！夜晚不睡觉，串东家走西家，企图争夺社员手中那一粒红豆儿。投“票”的结果，反而是一个长年不在家的人，轻易地得到一满碗染着红漆的玉米粒儿。最满意的当然要数公社那位干部了。选举结束以后，他拉上当选的南盛茂和南尚杰，骑车子跑了几十里夜路，找到了南恒做木工活儿的主人家，告诉了他这一切。

“自‘文化大革命’以来，南村换过二十任队长了！”那位公社干部说。他对南村相当熟悉，“南村能不能翻身，这回看你的了。”

他和他的两位副手，南盛茂和南尚杰，谈了几个晚上，最后确定下来第一步：收借款。这一步迈过去了，南村这架窝在坑里的大车，可能会滚动起来。这一步要是走不通，第二十一任队委会的结局，将比任何一任都要糟！而要迈出这第一步，将是艰难的，他的对手刚一露面，就使南恒意识到原先的估计不是过分的忧虑……

他的怕事的父亲，他的只图有木匠手艺收入已经心满意足的媳妇，一齐出来向他围攻，多么不体谅啊！可是，又能怪他们什么呢！只是时间和事态的发展，不容他有充分的时间去给父亲和妻子解说，赔笑……他要想出治服南志贤的对策来，一步不差，闯过这一关去。

一阵嘎嘎嘎的笑声传过来，南盛茂笑着、蹦着，后面跟着南尚杰，翻上小坡坎，朝他走来了。

“哈呀！真个婗啊！你叫俺嫂子赶出来了。尚杰哥叫老婆骂得抬不起头，不准端饭碗。”南盛茂开心地笑着，“还是咱当光棍好，没人在

耳根子上嗡嗡……”

南恒不由得笑了，瞅着南尚杰老成忠厚的胡碴脸，逗趣问：“尚杰哥，咱俩一样命苦哇……”

南尚杰嘿嘿嘿笑着，表示默认，也逗趣说：“恒娃兄弟，哥教给你对付婆娘一条办法：闭嘴佛！不管她骂也好，跳也好，哪怕撕你耳朵，你甭还口，只管笑！对着她的脸笑……”

南恒和南盛茂被他逗笑了。

“笑得她跳不起来了，骂不出口了，好！伸手端碗，到笼子里摸蒸馍……”南尚杰说着，从怀里摸出两个蒸馍来，递到南恒手上，“千万不敢跑。你跑一回，有我给你拿馍；以后要是老往出跑，我就拿不起了……”

“我拿！”南盛茂也从口袋里摸出两个蒸馍来，他更细心，馍馍的中间，夹着一层油汪汪的红辣椒，“南村乱了！从东到西，家家屋里都谈论咱的制度，都等着看咱下一步的举动……”

四

五天——规定向队委会交还款计划的时间期限过去了，只有两户欠款的社员，前来向南恒申述无力还款的情由，说着都哭了。他们是因为家人害病住医院，借了队里钱的。这不是本制度针对的主要目标。那些利用干部职权滥用滥借公款公物的人，没有一个按时交来还款计划，更不要说交百分之十的现金了。

南志贤照样叼着黑色卷烟，在南村的街巷里走来摆去；吃饭时端一碗干面条，蹲在门外人来人往的土场上，挑得高高，大口咀嚼，和过往行人说笑打诨，用意是十分明显的。

在村巷里，南恒朝东头走去，南志贤往西头走过来，两个在同一双奶子上吊大的奶兄奶弟，碰面了。南志贤挺起胸脯，喷一口烟雾，照直走过去了。南恒用手推推镜框，顶一顶鼻头，也过去了。肩膀几乎擦着肩膀，谁也不盯谁一眼，更不用说打招呼了。

路过一个墙角的时候，柴火堆前几个晒暖暖的老人，向南恒招手。

“恒娃，还是没人交吗？”几个人同声问。

“没有。”南恒老实相告。

“要是真的过了十天，那些人一个子儿不交，咋办？你真个上房揭瓦呀？”一个老汉不大相信地问。

南恒笑笑，没有直接回答老人的问话。

“恒娃，那人……脸厚心宽胃口开！你……不好惹……”一个老汉忧虑地估计双方的力量。

“那女人也恶！两口子两只虎……”

“他有一帮人！全是拿队里的粮食，吃得扭不过脖子的一伙！你得小心！”

南恒怎么说呢？这些老人的话是实情。他又不是那种踢脚扬手的人，也不想给老人们夸什么海口，只是对于老人们善意的担心和忠告，表示一概领受了，笑笑又笑笑，走开了。

南恒心里也吃紧了。规定的十天的期限，仅仅剩下一天了，仍然不见一个人交出还款计划和现金！看这个态势，明天也不会有什么希望可以期待。到得明天一过，确实再没有人按规定制度执行，怎么办?

南恒找到南盛茂屋里。他是光杆司令，单独住一间厦房，没有干扰。南恒让盛茂叫来尚杰，三个人面对面坐下了。

“狗日的！真个和咱来硬的，对抗！”盛茂拢一把扑到额前的头发，生气地说。

“借户都看南志贤的样儿。南志贤不交，指望谁交呢？”南尚杰说，“南志贤这人，从不知丢人现眼臊脸皮！你吐到他脸上，他照样伸手抓你盘儿里的菜……”

“怎么办呢？”南恒向两位副手征询意见。

南尚杰闭了口，闷住头，鼻梁上挽起了疙瘩。他在想，很伤脑筋地想着。

“社员群众也给咱鼓不上劲儿。”南盛茂怨声说，“背地里骂起来，一个比一个气儿大。和南志贤认真干起来，一个个都像驴把嘴踢肿了！”

“好兄弟，你还傻着哩！什么群众？”南尚杰对南盛茂说，“那些吃过南志贤的甜食的人，能高兴咱这一条吗？那些欠款借粮的人，都是

南村的头面人。没借没欠的老实社员，又都怯火那一帮歪人。你叫谁出面帮咱说话，他还得看看有没有那几个歪人在场……”

南村群众的基本情况是这样的。南恒同意南尚杰的分析，对南盛茂说：“社员看哩！看咱是不是南志贤的对手。现在，社员还不敢相信咱能办到，要看咱的举动哩。”

“干！按原先订的制度办，不含糊。”南盛茂说，“南志贤吃人呀？”

“我说，这样行不行？”尚杰盯着南恒说，“咱们去，和志贤坐坐，谈谈，让他交出……”

“去求他？”盛茂瞪着眼，“我没那样的耐性！”

“甭把事情弄僵，得转转弯，给志贤个下台阶的机会。”尚杰说，“你嫌给人下气，我去。”

“不去！南志贤要是懂道理，不是这号脸色！他是故意和咱们捣蛋！”盛茂说，“咱一去，他倒得意了。”

俩人争执着，都瞧着南恒，等他说话。

南恒的手，顶着鼻头，他同意盛茂的判断，志贤是故意硬顶，捣蛋。想想之后，他扬起头，说：“去，还是去一下也好。先礼后兵！”

“要去你俩去！”南盛茂年轻气盛，意气用事，“我一看见那个‘长指甲’货，由不得冒火！”

“尚杰哥一人去就行了。”南恒瞧着那位嫉恶如仇的血性汉子，又瞧瞧温柔敦厚的尚杰，说，“我们三个都去，倒像是我们欠着他什么，抬高他的身价了！”

五

这是农历腊月里的一个早晨，像南村古往今来的任何一个冬天的早晨到来的情景一样：漫长的寒冷的夜晚，西北风在庄稼院的屋檐上发出呜呜呜的嘶鸣。蜷曲在烫人屁股的火炕上的庄稼人，拉着悠长的鼾声。雄鸡经过五次奋力的啼叫，黎明终于到来了！

窗户上的木板窗扇，缝隙里透进一道道亮光，南恒被一阵敲门声惊醒了。

“兄弟呀！你真心宽，居然能睡到这时候！”南尚杰在门外说，“我夜黑一夜没合眼。”

南恒匆匆穿好衣裤，媳妇睁着眼，连一声也没吭，转过身去了。他出了门，把尚杰引到前边的空厦房里来。

“昨日黑，我去……那家伙歪得很！”

“咋样个歪哩？”南恒问。

“我想看看，谁来揭我的房瓦！”南尚杰模仿南志贤的声调和语气，气呼呼的脸上，又显出几分担忧。

“看看看！我说谈不出好结果，果然吧！”南盛茂一脚跨进门，接上话，“那个人，我认到骨头里去了。”

南尚杰又接上说："他还说：'敢揭我房上瓦的人，在南村还没生出来！'"

"欺侮南村无人！"南恒动了气，"好！让南志贤看看，南村人不是由他捏扁揉圆的！"

……

一家人围着桌子吃早饭，紧张的气氛在碟、碗和筷子中间弥漫着。父亲只喝了一碗玉米糁糁，就放下碗筷（饭量比平时少了一半），捞起旱烟袋来，不时用忧虑的眼光瞟着儿子。媳妇怀里拉扯着小儿子，连端碗的心思也没有。

南恒像往常一样，就着酸菜，吃了馍，喝了稀饭，打着饱嗝，放下碗筷，推一推鼻头和上唇交接的地方，给父亲和妻子下达安抚命令：

"今天晌午，你们都不要到村子东头去！"

"我不去！"父亲忍不住，赌气说，"等南志贤把你打死，我去搬尸！"

"哪能呢。"南恒轻松地笑着，宽慰老人。

"能！"老人更倔了，"你小子不要逞强，志贤不是平地里卧的！"

"我小心着就是了。"南恒顺着老人的话说。

"哎！咱何必要……"老人顺墙蹲下，抱住头，简直要难受死了。

"你甭走！"媳妇跳起来，"咱先把婚离了，你愿意做啥由你去！"

“跟上。等今日晌午一过，咱上公社离。”南恒笑着，“要是离了婚，你再也找不下个‘眼镜客’了！”

两个孩子挖了爸爸一眼，笑了。

南恒拔脚朝外走去。

“等一下！”媳妇追上来，“我和你一块去！”

南恒一看，媳妇把切面刀塞进棉袄襟里去了。他苦笑一下：“好我的瓜蛋儿！你这是做啥呀！”

“他南志贤要是动手动脚……”

“快去快去，快去给咱洗锅喂猪去。”南恒双手推着媳妇的后肩，“胡思乱想啥哩！”

南恒从媳妇怀里掏出刀来，扔到灶房里的案板上，对媳妇认真地说：“记住，都不准到东头去！”他的声音不高，却震慑了老人、媳妇和孩子，再没人敢说要去的话了。

……

正是庄稼人吃早饭的时间，街巷里的柴火堆前，蹲着或坐着一伙一伙吃饭的社员。这是新的队委会宣布交款限期的第十一天。南村人平时马马虎虎过日月，这十一天啊，可真是掐着指头，计算得清清楚楚。人们聚集在街巷里，看南恒他们怎么办吧！

南恒扣着眼镜，不时用半握着的拳头，顶一顶鼻头，似乎是在揩鼻涕，其实什么也没有，习惯罢了。街巷里，温暖的阳光照在一排排

庄稼院的房顶上，洒到在街巷里吃饭的社员的头上和身上。这些生活在南村的父老，在他们把牛拉进集体饲养室，又把土地交给农业合作社以后，怕是万万不会想到，经过二十多年，在南村的生产队里，竟然有不凭劳动吃饭的人！竟然有明目张胆侵吞他们心血汗水的人！这样的人不仅有，而且很歪，很恶，社员谁要提个意见，马上就不给你派活了，或者专门派你去干那种又累又脏工分又低的活路。想不到，太想不到了！当初参加农业合作社的时候，说干部是社员的勤务员，说不劳动者不得食，说生产合作社靠大家民主管理……生活并不是时时处处都是正义力量占上风的，有时候，在许多因素的挟持下，邪恶势力占上风，甚至占据相当长的时间。南村就是这样。

南恒想着，走过街巷，来到南盛茂家门前了。南盛茂蹲在门前的阳坡里，地上放着喝光吃净了的大老碗和白瓷碟。他把碗碟送进屋去，旋即出来，跟在南恒后头，走到南尚杰家门口了，俩人相继走进院子。

屋里传出南尚杰女人狠骂男人的声音：“你去你家祖坟里数数，看出过没出过一个敢咬人的狗！你想跟南志贤较量，摸摸你的脑门顶，看看硬不硬……”啊呀，够刻毒的了。

“笑啊！使劲笑啊！”南盛茂故意逗趣，用南尚杰的妙法挖苦南尚杰。

南尚杰正被婆娘骂得六神无主，一见两位同事进来，更窘了。他憋红了脸，无论如何是笑不出来了。

南恒对盛怒的尚杰嫂子说：“嫂子，甭骂！我俩去就行了。让尚杰哥在家，不去了。”

“恒娃，你得罪了南志贤，背上工具箱走出南村去了，俺呢？”嫂子又是捶手，又是跺脚，“凭他个笨佬儿，没个手艺，还得在南村挣工分。得罪了南志贤，日后有俺一家大小好受的？”

“你想的对着哩！”南恒诚心诚意说，“俺俩走了。”

“嫂子！把尚杰哥锁到你的裤带上，这样才保险……”盛茂挖苦那两口子。

“你小伙甭逞能。等你有了婆娘娃的时光，你就知道世事的深浅了！”嫂子回顶说。

南恒走过院子，快要出门的时候，背后传来南尚杰的喊声，人跟着也走过来。他站在南恒身边，威严地训斥追到跟前来的婆娘：“走开！甭挡我！我忍了几十年，还要忍到死吗？”老婆被震住了，愣愣地站在院里翻白眼。一贯怕老婆的人，居然站立起来，独立行动了。

“嫂子，放心！”南恒走上前，拍着嫂子浑圆的肩头，给她宽心，“谁敢撞掉尚杰哥一根汗毛，你拿我是问！”

一出南尚杰家的小门楼，三个人一溜走在街巷里，就为敏感的社员所注目，蹲着或坐着吃饭的人，站起身来，引颈跷脚，望他们朝那里走去。一群半大男女娃娃，尾追在后头，像滚雪球一样，越来越多。似乎整个临街的大门和小窗，都朝东头瞧，村巷里的空气，也朝他们走着的方向涌流……简直让人难以置信，在粉碎“四人帮”近乎三年多以后，无论城市或乡村，人们普遍有一种轻松感，可是在地球的这样一个微小的角落里，空气却紧张到令人屏声静息的程度……

南恒的左右，走着南盛茂和南尚杰，三人走到南志贤新修的门楼前，停住脚。

一色新砖砌成的高大的门楼，鹤立鸡群似的高出左右低头耷脑的庄稼院门楼之上；砖缝用白色粉灰勾饰一新；黑漆刷得乌亮的门框上，红漆勾画出笔直的红色线条；两扇黑漆大门上，钉着四排核桃大的蘑菇铁钉；泛着蓝色的铁门闩上，吊着拳头大的一只铁锁！

六

南恒半握着的拳头，顶顶鼻头和上唇交接的地方，放下手来，对南盛茂说：

“到饲养室去，把梯子扛来！”

南恒坐在门楼下的青石门墩上，双手交叉在一起，搁在膝头上。

“早晨我从这儿经过，门还开着。”南尚杰咕哝说，“两口子怕是故意躲起来，给咱难看吧？”

南恒没有吭声，瞧着村巷，一伙一伙男女社员，走过来了。孩子们把南志贤的门楼围得水泄不通。小家伙们大约也预感到事态的严重吧，一个个不说话，只是挤着。

南盛茂扛着木梯过来了。

“你在下边，俺俩上房！”南恒一脚踏上木梯，对南尚杰说。南尚杰领会南恒对他的体贴，没有争议，接受了。

南恒一步一格，踏上了围墙。围墙里，几只母鸡，在悠然觅食；三间瓦房的前墙刷得雪白，窗上的玻璃擦拭得明明亮亮；一株葡萄，两棵石榴，收拾得多么舒适的一座院落啊！自从奶兄在南村人嘈嘈窃窃的咒骂声中、修成这座院落的一年多时间里，他还没有光顾过呢！

南恒从围墙顶上走过去，摸到房檐了，一纵身，跳上房顶，回过头来，南盛茂也纵身跳上来了。

社员从村子两头拥过来，在南志贤门前的平场上汇集，一齐仰头瞧着房上。南恒转过身，朝房脊上走去。

走到房脊上，南恒蹲下身，揭下一页瓦来，咣当一声，扔到一边。这一页瓦，总是揭下来了！房下的平场上，嘈嘈窃窃的议论声霎时消失了。

南盛茂撅着屁股，已经揭起一摞了……

预料中的那一声嘶叫，终于响起来。南恒一侧头，南志贤的女人张水花，从邻家的门楼里冲出来，跑着，骂着。

奔到房下，张水花蹦得多高，抡着胳膊，两只奶头在蒙着棉袄的胸膛上颤悠。听来叫人七窍冒烟的污言秽语，从她泛着白沫的嘴里，像水一样喷吐出来：

“把你家没牙的叫人奸了！”

“臭尿浇了你家八代祖坟！”

南恒不动声色，瞧瞧盛茂，已经烧臊得面红耳赤，出气不匀。“你，到东边去揭！”南恒对盛茂说，把他支使到远一点的房东头。他

怕那个沉不住气的家伙一扬手，照那泼妇摔下一页八九斤重的机制大瓦，事情就糟了。

盛茂看一眼南恒，又狠狠地瞪一眼跳着蹦着骂着的张水花，出一口长气，朝房脊的东头走去。

张水花跑到南尚杰跟前，要夺梯子。南尚杰早已把梯子放倒在地，一百四五十斤的壮实的身体，稳稳实实压在上面，一任张水花拉他，扯他，他只是嘻嘻笑着：

“嫂子，这梯子是我经手借队里的，你要是给摔坏了，得我负责任呀！”

南恒看着，不由得想笑，看来把南尚杰留在房下，倒是真派着好用场了。要是南盛茂，早该和那泼妇厮打到一起了。

“狗日的！等着——”

一声粗重的男人的骂声，从房下的东侧响起。南恒一看，南志贤手里提着一把斧头，从村巷里冲过来，闯进人窝。社员纷纷避开一条路，哗哗惊呼起来。

南尚杰正和张水花软顶厮磨，抬头一看南志贤已奔到跟前，忽地从梯子上站起，挤出人窝，一溜烟跑了。南恒瞅着那胖墩墩的腰腿跑出人堆，又气又好笑。他胆子小，怕那斧子落到头上，娃娃没爸爸了，婆娘没男人了！

南志贤并不去追南尚杰，一把从地上抓起木梯，搭靠在山墙上，朝上爬。

三几个老汉围上来，拉住了南志贤围在腰里的蓝布带子，他未及提防，跌落到地上。

“志贤！不要上去打架！有话好说……”

“把家伙放下！捅下乱子可不是耍的……”

南志贤挣脱不开几双拉拉扯扯的手，急得满脸煞煞白。

这当儿，有人出来说话了：“太欺侮人了嘛！新社会，哪里兴你上人的房、揭人的瓦？啊？”唔，这是南玉如，人称南志贤的黑高参，一个只在人背后说话的人，现在浮到水面上来了。

“上！上房！和狗日的拼了！豁上！”

又跳起来一个！这是南志贤的亲门本族堂兄南志德，一贯依偎在队长堂弟的皮袄下、只占便宜不吃亏的恶鬼，算得南村一霸！他按捺不住了。

有这样一文一武、一阴一阳的两位保镖出来助威，南志贤得着势，更冲了。他甚至动手摔打那几位拉扯他的老人的手臂。真要上房抡斧头了。社员此刻一齐屏了声，闭了口，似乎那两位人物一说话，社员倒憋住了。

“下！”南盛茂双手提着两页瓦，顺着屋脊走过来。他气得眉毛直竖，对南恒说，“狗日是人不是人的，都跳起来了！”

“等等！”南恒对盛茂轻声说，“还有人哩！让他们都露露面，亮亮相，这才好！”

果然，不出南恒所料，南卫红开口了。这是南村另一派势力的头目，一个善于辞令的中学毕业生，多年来和南志贤争权夺利的死对头，现在在第二十一任队委会面前，结成圣战者同盟了："这南村到底是谁的天下？看看小河川道十里八村，有谁敢上人的房？揭人的瓦？这哪里还有社员的活路……"

差不多了！多年来在小小的南村上来下去折腾过的几个头面人物，该出来的都出来了。还有一股势力的头目，因为女人住医院，不可能在这儿露面了。南恒对盛茂说："我下去。"

"我也下。"

"不许动手。"南恒叮嘱。

"那得看南志贤老实不老实。"南盛茂说。

"你走在我后头。"南恒说，"甭乱喊乱骂！"

南盛茂没有说话，也不知同意不同意。

南恒从屋脊上走下来，站在房檐口，对着下面拉扯着南志贤的几位老者喊："甭拉！放开他！"

几位老者反倒拉得更急更紧了。那几位跟着南志贤吃馋了嘴的、争着吃的人，现在也哑了口。他们大约料想不到，这个瘦瘦巴巴的"眼镜客"，居然照着挥舞斧头的人迎面走下来了。

南恒双手背扶着梯臂，一级一级走下来，走到离地只有两格梯级的地方，说："把志贤放开！"他一回头，南盛茂紧跟在他的背后，瞪

着一双豹眼，双手提着两页机制大瓦，随时准备投掷出去。他说：“把瓦扔了！”

南盛茂死死盯着还在冲着蹦着的南志贤，一动不动。

南恒从南盛茂手里夺下瓦，撂到梯子下的空地上，当当两声脆响。

整个平场上，几百个男人和女人，老人和娃娃，屏声静息，一动不动，瞧着矮小瘦巴的“眼镜客”用手扶一下镜框，又顶一下鼻头，轻轻从梯级上跳到地上，站在南志贤当面了。

南志贤猛地挣脱了拉扯他的人的手，棉衣撕开一道口子，扑到南恒面前，抡起了斧头，人堆里发出一阵惊呼。

南恒左手一扬，准确地抓住了南志贤攥着斧柄的手腕，终年推刨扯锯的有劲的手臂，轻轻往外一扭，南志贤几乎滚跌倒了。

“绑了！把狗日绑了！”

“捆了！取麻绳！”

一阵乱纷纷的愤怒的呐喊声中，跳出几个小伙子，一下挤到南志贤面前，扭住南志贤的双手。

南志贤的婆娘张水花，一把从男人手中夺下斧子，扑通一声跪在南恒面前，在地上碰头：“好我的兄弟！我没把你当外人待呀……”

南盛茂一把拽起张水花：“少来这一套！”

有人真的取来了麻绳。刚才那几位给南志贤助威呐喊的人——黑高参和演说家不见露面了，只有堂兄南志德，拼命把已经缠到南志贤臂上的麻绳往开扯。

“甭捆！”南恒拉住了绳头，挡住那几个小伙儿。

小伙们气咻咻地罢手了。

“你想干啥？”南志贤扬起头，已经威风尽失了，仍硬打硬充说。

“我要你把吃到肚里的黑食，吐出来！”南恒狠着声，沉沉地说。

“你拆民房，违犯法律！”南志贤说。

“你当着社员说：你盖这三间新房用的砖瓦、木料、吃用的粮食，哪来的？哪一样是你自备的？”南恒说，“法律哪一条，允许你侵吞社员血汗？”

“我借有借据，欠有欠条。”南志贤仍然强辩，“走到天尽头，欠账不犯法！”

“你假借修饲养室，买来瓦，用到你房上了。队里的树，任你伐，四把粗的白杨，给你只合十块钱。盖房吃的粮食，你尽着从队里仓库往出灌。末了打个借据欠条摔到会计账上。这是南村人的生产队，还是你私人办的庄园？”南恒越说越气，“你把南村‘借’空了，吸干了！”

“反正，欠账不犯法！也不是我一个！”南志贤在众人面前，拉不下脸认输。南恒已经揭得他脸黄手颤嘴哆嗦，不敢正视左右前后那一双双气愤的眼睛，“我告你！拆民房犯法！”

“随你的便吧！”南恒说，“你不交还款计划，不交百分之十的现金，我还是揭你的瓦！”

张水花扑上来，拍拍扯扯南恒的胸膛：“好兄弟，咱写，咱交！”

“让志贤说话！”南盛茂这才找到说话的机会，“你说了只算一少半儿，那多一半儿，让南志贤说！”

“咱写‘计划’！咱交！”张水花又去拉扯男人。

南志贤软了，噘着嘴，不好下气拉脸说交款，也不敢硬着嘴说不交！南恒挡住继续进攻的南盛茂，应该给人台阶下了！

“当着全队父老的面，我给你说！”南恒说，“你按本制度执行，交来还款计划和现金，我给你再把瓦盖好！”

一个多年来在南村为所欲为的家伙，一旦置身于往常被他完全藐视的群众面前，被人揭开了丑行和恶迹，即使脸皮比牛皮还厚吧，也不能无动于衷了。南志贤第一次在南村遇到了难以逞性的对手！借着婆娘推推搡搡的手臂，退出场去了。

征服

——《南村纪事》之二

一

一弯金钩似的月牙儿，落到西原背后去了。夜已深，天很黑，田野悄悄静静。中伏里使人透不过气来的闷热散开了，夜风吹过，有一丝凉意了。

南葫芦蹲在玉米地里，让半人高的玉米叶遮掩着他的犍牛一样强壮的身体，两只手紧紧攥着一柄钢叉，死死盯着那个已经溜进菜园里来的贼。

玉米地里，又沤又热，蚊子在耳边嗡嗡，在脸上叮，在赤臂光膀上咬，他忍耐着，生怕弄出一点声响，惊动了那个已经爬到坎沿儿上来的老鼠。他大气不出，两只眼睛一眨不眨，死死盯住那个人：溜进菜园以后，绕过西红柿架，蹲在葱地里了，他惊疑不定，瞧瞧两边，就用短把镢头在葱垄上刨起土来。

好！等得狗贼拔下葱来，拿出地去，然后冲过去，抓住手腕，捉贼要捉赃。

狗贼呀狗贼！南葫芦承包了这几亩菜地，有合同压在南恒队长办公桌里呢！葫芦我吃了多少苦，流了多少汗，摊了多少本，你知道吗？葱长起来了，还没等得上市，你倒是眼尖手快，今晚偷了葱，赶天明用自行车带到城里农副市场卖了，票子装进腰里，吃香喝辣多

美！我呢？到年底跟队里算账，只有按合同赔偿，婆娘娃吃啥穿啥呢？

把狗贼一叉戳倒！拉到队长南恒面前，赔！不光赔今黑偷下的，凡是菜园往日丢了的葱、西红柿，全得由你赔！南葫芦渐渐看分明了，那是南红卫。高中毕业生，把书念到狗肚里去了。你在南村扯旗造反，整人家南恒他二爸，给老汉头上糊高帽帽，胸膛上挂白牌牌……南恒今年当了队长，有你好受的，等着！

你那年造反当了革委头儿，把南村弄得鸡犬不宁。我葫芦养了两窝蜂，你说蜂儿酿的是资本主义毒水，一把火，把蜂烧咧！我在自留地种了二分葱，你给我把葱秧儿拔咧！你满嘴革命名词，黑夜却做贼！好，今日犯到我的手里了！

南葫芦蹲在玉米地里，愈想，气聚得愈足，浑身像打足了气的车胎，憋得紧绷绷的，两只手把钢叉的木柄攥出了水。狗贼拔下一堆葱，抱起一捆，猫着腰，往菜园外头转移了。

南葫芦也猫下腰，从玉米地里溜出来，跨过土路，贴着梯田的塄坎，从背后包抄过去，轻手轻脚，突然出现在南红卫面前，举起了钢叉。

南红卫起初一惊，看看已经无可挽回，反而镇静下来。他把葱捆扔到地上，既没有逃跑，也没有厮打，一句不吭，站在那里，摆出一副随便咋办的架势。

南葫芦把钢叉收回，噌的一声，扎进脚下的土路上，呵斥说：“走！见队长！”

南红卫没有求饶，仍然一句话不说，拍拍手上的土，照直走了。

南葫芦从地上拔起钢叉，等得南红卫走出三四步远了，握着钢叉，跟在后面。要紧防那小子突然转过身来，打你个措手不及！这是个吃生米的家伙，不可不防。

二

倒霉透咧！南红卫走着，对他偷葱的行为没有一点悔恨的意思，只是觉得自己太大意了。虽然事先探察到庵棚里没人，以为葫芦晚上办什么事去了，却没料到这家伙躲在暗处。丢人是丢定了！罚款就罚吧！南恒队长是他的对头，甭梦想他宽大吧！南葫芦更不用说了，在他任南村革委头儿的时光，烧了葫芦的蜂箱，拔了葫芦的葱秧，完全可以想见葫芦心里怎样恨着他。随你杀，随你剐，走到这一步了。

齐腰高的玉米，把肥大的叶子伸到田间小路上来，碰着裸露的胳膊，痒痒的。稠密的星星，像无数双眼睛，闪着眨着，讥笑着已经落入不光彩的境地的角色。

自流灌渠里淌着悠悠的清水，他蹲下来，洗濯一下刨土拔葱时沾在双手上的泥土和葱汁的臭味。洗了手，抹了脸，撩起汗衫的下襟擦了水珠，站起来，绕过杂草丛生的水渠，走吧！就是那么回事了，看你南恒怎么揉搓我吧。

“文革”中，他整了南恒的二爸，属实。那又怎么样呢？南恒的二爸，在“四清”运动中，把我南红卫的老子整得还不惨吗？退钱，退粮，扫地出门！那年正好他高中毕业。考大学分数够了，政审通不过：“其父系四不清下台干部！”

说“文革”是浩劫也罢，灾难也罢，南红卫总算出了一口恶气，心里松泛了！本来就是为出气、报仇，明打明就敢这么说！

南恒上台了，这意味着什么，还用问吗？南红卫的警惕性早已提高到头发梢上啰！来吧，给你二爸报仇，给我要狠心，穿小鞋。我等着！

万万想不到，南恒走进他家院子了。在猪圈旁边，南村两个不共戴天的仇人的后代，面对着面了。

“你来干啥？”硬邦邦的问话。

“想和你扯扯。”软绵绵的回答。

“没空儿！”南红卫更硬了。

“啥时候有空呢？”南恒更耐心了。

“少来这一套！”南红卫瞪起眼，“我是软的硬的全不吃！”

南恒红着脸，为难地走出去了。

在村口，俩人又碰见了，南红卫扬起头，目不斜视，跨大了步子。

“红卫，我给你说件事。”

南红卫收住匆匆的脚步，又要耍什么花招？

“队委会昨黑开会，想把你抽出来，给队里搞副业……”

收买！南红卫心里立时反应出这样的看法。把我拉到你的伞下面，给你跑腿儿，我才不跟你跑龙套哩！他一口回绝：“咱干不了。”

“你再想想……”

“没啥好想的。”南红卫打断他，话里带上刺儿了，“咱……向来不会绕弯弯。”说罢，扬长而去。

大约到此为止了，南恒该把真手段使出来咧！南红卫更警惕了。想不到，南恒又一次走进他家的门楼来。

“联办小学要咱队出一名民办教师，队上决定让你去。你是老高中生。”

这是好事，别人争都争不来的好差事，工分照记，每月还有十来块钱的津贴，不淋雨，也不晒太阳。这样好的事，能轮到我南红卫头上吗？想干什么啊？

父亲睁着惊疑的眼睛，似乎有点动摇了。

母亲已经浮出一脸巴结的笑容，看着这位给家庭带来福音的人。

全是见识短浅！他横了父母一眼，干脆地说：“我不去！”

“你们合家再商量商量。”

“不用。我的事，我拿主意。”南红卫说，好执拗啊，“想把我赶出南村，给你拔了眼中钉？”

“这……”南恒笑不出来了，生气地回转身，“记住你这话，红卫，日久见人心！”

……

南红卫走着，快到村口了。他是从来不吃后悔药的硬汉子，可是在此刻，这些往事却如此顽固地从脑海里浮游起来，像漂在水里的气球，怎么按也压不下去。

不管真心也罢，假意也罢，现在南恒可以说他做到“仁至义尽”了！南恒也不是平地里卧的角色，那家伙为了收借款，跳上他堂哥的瓦房去揭瓦，逼得堂哥服服帖帖交了钱，也是睁眼不认六亲的家伙！对他南红卫还有什么可客气的呢？可是，南红卫一不想爬上，二不想出去工作，反正是个农民，顾那么多脸皮做啥！罚款加检讨，还能怎么样呢?

走过街巷，人都睡完了，这家那家敞开的窗户里，传出沉重的鼾声。走到南恒家门口了，南红卫收住脚。

南葫芦走上前，砸得街门板上的铁环叮当叮当地响，同时扯起嗓子叫喊起来。

三

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南恒惊醒了，他披上布衫，出来开门。

他拉开街门的门闩，门外的街道上影影绰绰站着两个人。他忘记了戴眼镜，看不清是什么人半夜三更来砸门，就问：“啥事？”

“光彩事！”是葫芦的得意的调门。他说得细致，绘声绘色，带着情绪。其实南恒只听一句就明白了：南红卫偷了他承包的大葱。

黑暗中，南恒看不见南红卫的脸色变化。那么盛气凌人的南红卫啊，堂堂的高中毕业生，能说会道，十二张嘴也辩不倒的南村文化最高的农民，现在做下最丢人败兴的事了，站在那里，把脸摆到另一边，一句话不说，一任南葫芦这个粗莽大汉连挖带损。

——哈呀！听说山西那位大哥从国务院回家了，副总理的位置空着哩，等咱南村的劳模去坐哩！这是他在街道里高声大气给新任队长南恒撂的难听话。

——南村出了真龙天子了，等着过好日子吧！他在地里劳动时，和他们那一派人撇腔，哈哈大笑，给南恒办难看。

现在，那张能言善辩的嘴张不开了，人总是无法抵抗不光彩的行为所产生的心理上的压力。他站在一边，头扭到另一个方向，身子也斜歪着，一只脚在地上弹着，似乎是一副不失威风的派势。在南恒看来，那不过是硬撑面皮罢了。

“菜园的菜，丢得我受不了咧！你还批评我责任心不强！”南葫芦四十几岁的壮年人的粗喉咙大嗓门，吵着，“我辛辛苦苦种下菜，他偷去卖钱，到头来我给队里按合同赔款……良心叫狗吃啦！”

葫芦年初承包了菜园，夏葱长得不错。夏季里，葱在市场上是短缺货，价钱很好，葫芦这一卦是卜灵了。他透露过，用这一笔超产款要办他早都梦想着的事哩！儿子该订媳妇了，盖屋要备木料砖瓦了。蔬菜不比庄稼，黄瓜、西红柿这些口费东西，总免不了丢失，害得他一家几口，白天黑夜在菜园轮流看守。现在他抓住人了，够多解气啊！他站在南恒当面，等他一斧头两开交。

“哈呀！葫芦叔——”南恒习惯地用食指顶顶鼻头，似乎那儿有什么不舒服的东西，其实什么也没有，那大约是他琢磨木工活儿时养成的习惯动作吧，笑了，“红卫是我派去的……”

“你说啥？”南葫芦打断他的话。

“我派他去拔葱的。”南恒肯定地说。

“你……”南葫芦张着嘴，合不拢了。

“我想试一试，看你到底负责任不负责任。”南恒仍然平静地说，简直跟真的一样。

“噢！这……”南葫芦一下泄了气。

“你没有睡大觉，”南恒表扬南葫芦，“可见联产计酬就是好，人人都关心集体收益啰……”

“嗯……”南葫芦完全泄了气，嗓门也低了，懊丧地转过身，要走了。他又转过身来，“就算是试验我吧，拔下那么大一堆葱，损失谁负责？”

“那当然是我嘛！”南恒说，“我派人去拔的，造成的损失，自然由我赔偿嘛！”

南葫芦又不走了，蹲在地上，掏出烟包，说：“叫你队长赔……不合适……”

“合适。”南恒说，毫不含糊。又转过头，对南红卫说，“红卫哥，我叫你去试一试嘛，你咋实打实地拔起来了呢？这下，我该折本儿

了……”

南红卫转过脸来了，身子也不斜扭了，脚不弹地了，低着头，发出两声含混不清的尴尬的笑声。

“睡觉吧！”南恒朝自家门楼走去，“好咧！这下再没人敢偷蔬菜了。”说罢，走进门去。

他站在门里，关门的当儿，看见南葫芦提着钢叉，走到黑影里去了，传来他扫兴的大声叹息。

南红卫也同时朝村巷里走去，脚步缓慢而沉重。

四

南恒太累了，从天不明起来，直到这时候还不能安然落枕，当个生产队长，着实不容易哩！他头一落枕，就拉起了鼾声。是嘛，夏日夜短，四点多钟起来，在地里干活，给各作业组解决临时出现的琐碎问题，都是队长的工作嘛，直到深夜一两点钟。还有南葫芦这样的人来打门告状，一天能睡几个钟头呢？而且天天如此，月月这样……瘦瘦条条的南木匠，脸坯更显得小了。

也不知躺了多大一会儿，又有人敲门。

南恒坐起来，披上布衫。媳妇早不耐烦了，小声骂起来：“死了人，急着报丧，等不得天明吗？”南恒笑笑，戴上眼镜，走到院子。既然能来敲门，肯定是搁不到天明的急火事；当着众人的队长，就得耐烦哩。

南恒拉开门闩，一眼瞅见门口站着南红卫，忙问：“你还没睡？”

“睡不着……”

“好，进屋，咱俩扯扯。”南恒热情地说。

“咱们出去说说。”南红卫站着不动，“甭影响屋里人休息。”

南恒一脚跨出门，顺手拉上门板。俩人走到街巷里。

“那件事，你下一步……准备咋办呢？”

“没有下一步了。这件事，已经处理完了。”

村巷里很静，俩人的脚步声在那拥拥挤挤的房屋的墙壁上，发出回声。

田野里比村巷里亮多了，清凉的带着湿漉漉的水汽的夜风，吹得人心胸里好舒畅，河滩里无名水鸟单调的叫声，更显出田野的寂静。看着南红卫在村外的大路边上坐下，南恒也坐下了。

“你为啥要包庇我呢？”南红卫突然转过头问。

南恒倒被问住了，回答不了了。是啊，为什么要包庇这种丑行呢？纳闷了一会儿，说：“我觉得应该这样。”

“你为啥不整我呢？”南红卫问，“这是最理想的时机。”

大约只有南红卫这样的人，才能说出这样直截了当的话，南恒反倒觉得痛快，也就照直说：“我不想整任何人。我今年当队长，能不能把南村的事办好，是另一回事。本人心里有一条老主意：不整人！”

“你刚一上台，把你堂哥南志贤整惨了。”南红卫说，“你在这件事上，落下不少好名声。黑脸包公……对我，怎样这么客气？”

“对他，应该那样；对你，应该这样。”南恒说，“我堂哥当干部，连挪带借，欠队里一千多块，自己盖新房，买缝纫机，人家该分钱的社员，年年不能得款，我是逼得没办法了！你呢？说实话，我想拉你进队委会，我找你谈了……既是想用你，就得给你护着点面皮；要是把你的面皮扒光了，就不好用了。”

“你为什么一定要把我拉进你的班子呢？”南红卫问过，自己又回答说，“我心里清楚，你不是喜欢我，是有些怯火；不是怯我的火，是看见我跟前有一股势力。那些‘四清’运动中受了挫、挨了整的人，尽管现在平了反，经济上也退赔了，心里呢？说实话，他们跟我一心。你是怯火这一帮人，是不是？”

“你说得对。”南恒承认了。

南红卫得意起来：“我早就看穿了你。”

“所以你很硬，我三顾茅庐，你拒不上任。”

“你八顾也不行！”

“你先别得意，”南恒说，“你只说对了一半。”

“那一半是啥？”南红卫问。

“你有文化，有本事，对南村队里有用处。”南恒说，“你当干部那几年，队里烂了，穷了，有你的责任，也有当时社会的原因。我想过了，你有几件事办得好，比如办秦川牛场，办砖场，想种植药材……”

“甭提了，甭提了！”南红卫叹了口气，“连一样事也没办成。”

“不成事的原因，你想过了吗？”

“刚开办，上头精神就变，就批判……”

“还有呢？”南恒自问自答，“除了社会上的歪风之外，你不成事的关键，就在你只依靠你的那一股势力，把另外几股势力当敌人。”

南红卫沉吟半晌，不得不承认：“那几股势力，不管我办的是好事瞎事，一股脑反对，宁可车翻，也不想叫我驾辕。”

“说句不客气的话——”南恒盯着南红卫的脸，“你现在对我，也用的是别人对付你的办法。”

“这……”南红卫噎住了。

“宁可南村继续烂下去，穷下去，也不能容忍我南恒当队长！”南恒尖锐地说，毫不回避，既然谈开了，扯开头道幕布了，就把二道三道幕布都扯开，畅开心说个明白，“我上台半年来，你给我摆下的，就是这样一副架势。”

“是这样。痛快！我都承认了。”南红卫激动了，忽地站起来，“我今黑来找你，就是想听你说句实话。”

“完了。”南恒也站起来，“你问我为啥不整你，就是这原因。说实话，要是我家里任何人偷了葱，我坚决罚，决不含糊！”

“我这号人……吃软不吃硬。谁要跟我来硬的，我豁上命也不怕；谁要软磨着来，我可就……”南红卫表白说，“其实，真正厉害的，是

你老弟这号人……”

“甭钩心斗角了！老哥！”南恒也诚恳地说，“斗了十几年了，斗得大家碗里一天比一天稀，还有啥意思嘛！”

“南村不是没能人。”南红卫说，“能人都把本事花到钩心斗角上去了，力气空耗了。我算一个！”

南恒扶一下眼镜，高兴地叫起来：“这才是一句实扎扎的话。再往下说呀？”

“完了。”南红卫说，“我睡不着。你包庇我，比罚我更叫人羞愧。我找你，就是想说这句话……”

“好了，不说了，话不在多！”南恒说，“告诉你吧，我准备重办秦川牛繁殖场，这是独门生意。你过去没办成，现在是成事的时候了。你准备一下，县里物资交流会就要开了，你去给咱物色几头纯种秦川牛回来。”

“那没问题！”南红卫说，“那年为办牛场，我专门研究过秦川牛，混不了杂牌子！”

“咱俩可要共事了……”南恒说。

“要共事就共到底……”南红卫说。

繁星在不知不觉中隐匿起来了，湛蓝的天幕上，只有几颗很大的星儿，发着红蜡头似的光。晨风轻轻掠过田野，肥大的玉米叶上露珠闪闪滚动，黎明了。

一个多么令人心情舒畅的黎明哟！

丁字路口

——《南村纪事》之三

住在南村，我想进城去办点事。恰好队里的卡车今天进城给供销社拉货；天麻明，我就赶到司机南小强家里去等待。

小强刚起床，坐在炕沿上，弯腰拴着鞋带，不停地甩着扑落到额头上的黑乌乌的头发。炕和桌子的空当间，支着涂了红漆的钢筋盆架。印着红双喜字的脸盆里，红格毛巾叠成三折，泡在冒着热气的温水里。口杯上横架着牙刷，毛刺上已经挤好一滴牙膏，只需端起来，塞到嘴里去。小强端起口杯，走出门去，院里就传来牙刷刷牙的有节奏的声响。

我暗自想：司机小强娶了个好媳妇，真会服侍男人哪！

媳妇走进门，两只手端着两只碗，碗上都横放着一双粉红色塑料筷子。她把一只碗放在桌上，双手把另一只碗递到我面前，那碗底沉着三个荷包蛋。

“你不吃，她不高兴。”小强擦着脖颈，对我诚恳地笑着，“我这位就是这脾性。”

“看你眉毛上头的油墨。咋洗的脸？”媳妇用指头按着小强左眉上头一丝隐隐的黑斑，“重洗。胰子在那儿放着，不用，邋邋遢遢！”

小强咧着嘴朝我笑笑，虽然是无可奈何的神气，还是顺从地又撩起水来。

媳妇长得端眉正眼，算不得画报上的美人，却也挺好看。她对小强的卫生要求如此严格，自己倒不见得收拾打扮得多么花哨。上身一件男式黄军装，脖子里露出一圈红色的毛线，头发是女运动员的那种自由发式，熨熨帖帖地披在头上。她出出进进，给小强做着出车前的准备事宜。现在，她又端着茶壶走进来了。

“这回合格了吧？”小强面对媳妇，淘气地笑着，说着就去端那碗鸡蛋。媳妇抿着嘴，把一只盛着脂膏一类东西的小盒拧开盖儿，递到小强面前。

小强又咧开嘴，朝我笑笑，不好意思的样子，还是把指头伸进盒子里去了。

媳妇拧好盖儿，说：“天冷了，风刮得皮糙肉裂的……”

我后悔了，应该在街道里等待；插在这一对如此热火的年轻夫妻之间，多碍眼嘛！

“记住——”临出门时，媳妇郑重地说，含有警告的严重语气。

“什么？”小强站住，瞪起眼。

媳妇用手指在自个儿嘴上轻轻拍了两下。

“噢噢噢！记着哩！”小强释然地笑了。出了门，离开媳妇好远了，小强给我解释这个哑谜，“不准我出门喝酒。”

卡车从街巷里开过去，出了村，就拐上一条柏油公路。“你瞅！”小强努着嘴指指窗外。

我从窗玻璃上望出去，那媳妇站在门外的土台上，目送着汽车出村。小强笑笑，朝她点点头，然后回过头来，自豪地对我炫耀：“天天这样，成习惯咧。”

“好媳妇！难得。”我信口说，企图引出他们夫妻间的趣事来；早就从旁人口中得知他们有一段不平常的恋爱，今日逢到好机会了。

“嘿呀！”小强笑了，是那样由衷的喜悦……

冬天的傍晚，干冷干冷。南小强背着竹背篓，终于走到峪口了。他把背篓倚靠在石头上，探出双臂，又酸又麻的肩膀顿然松解了。

山根横着一条大路，和通到平原上去的柏油公路构成一个丁字形。

新年佳节的浓重气氛笼罩着乡村，丁字路口，走亲访友姗姗归去的男女来来往往；小伙儿在屁股后头带着媳妇，把自行车铃铛摇得山响，从南小强面前一闪而过。

小强把双臂又伸进背篓的套环里，咬咬牙，站起来。不就剩下十里路了吗？山里那么窄狭的路都走出来了，平川上这样宽敞的大路，闭着眼睛也走回去了。

刚刚踏上丁字路口，远远望见从平原上伸展过来的柏油公路上，一个熟悉的身影骑着自行车过来了，那是娟娟。他们在桑园镇中学的同一间教室里，读了三年初中，又一同考入县城的重点中学，读了两年高中。同学们说他俩好。他也觉得俩人挺合得来。她敬慕他，相信他肯定能考上一所像样的大学，甚至比相信她自己能考取大学更坚

定。而当紧张的高考结束以后，在难以忍耐的期待中，他们先后接到了不予录取的通知。那是怎样令人丧魂落魄的失败的痛楚！

“明年再考！”她到他家来了，鼓励他，“扎扎实实复习一年。经济上不行的话，我支援你！”

“再考！”他确实不服气，落榜的耻辱严重地伤害了高才生的自尊心，“卧薪尝胆，自强不息。”

他钻在那间小厦屋里，除了吃饭、拉屎和尿尿，大门不出，二门不迈，免得因看见父亲和母亲汗流浃背的劳作而动摇。

这年秋后，南村新选上一位队长南恒，按辈分该叫他哥哥。南村换过多少任队长了，社员的日月照样难过。他把自己埋没在一堆堆演算纸当中，并不留心窗外的街巷和田野上有什么动静。

村巷里和田野上的响动，通过门窗，通过父母在小院里的唠叨，传进小厦屋来了。为收回前任队长（新任队长南恒的亲哥）侵吞的集体财产，南恒和他闹翻了。土地承包了，大锅饭停伙了。种牛场筹办起来了，砖瓦窑冒烟了，药材种子破土而出了。南村街巷里多年来弥漫着的灰败气氛，被一种欢腾热烈的气流所代替，从门和窗户冲进小厦屋来了。南恒那显着急迫神色的眼睛，在书页的字里行间闪动。他几次强迫自己坐下，抄起钢笔和演草纸，又总是把心力收拢不住，终于从书桌边站起来，把书籍和演草纸收拢到一堆，塞进了箱子；他背上背篓，上山捡羊粪去了，投入到新队长发动的积肥热潮中。

娟娟连着来了三封信。他在回复第一封信之后，就狠着心再不回信了。她跟着当校长的爸爸，在西安复习功课，下决心继续考下去，

直到最终走进某学院的大门。生活已经使他们各自走向自己的天地，一切不切实际的奢望，对于南小强来说，没有必要啰！

自行车愈来愈近了。黄衫，蓝裤，头上一顶红纱巾。烟雾般的暮霭，遮不住那闪动的艳丽的红纱巾，南小强的心加快了跳动的节奏，一低头，看见膝盖上露出的一串串棉花絮儿，那是山野里的刺蓬和石刃擦划的结果；两只手，被酸枣刺扎得血印叠着血印，活像两只乌鸦爪子；没有镜子，可以想见灰尘和汗水已经打扮出一副怎样的尊容了。怎么偏偏在此时此境里遇上她了呢?

想躲避也来不及了。小强放下背篓，背对着公路，让高高的背篓遮挡住他的身体，好强的年轻人啊，掩不住心里那一丝弱点。

自行车轧轧轧的响声从背后响过去，拐上丁字路口了。他想扭过头去，看看在大城市里待了一年的女同学现在是什么模样了，却终于没有抬起头来，只是盲目地揪着干枯的草叶。

“南小强！”

听见一声呼唤，铃铛似的悦耳，他慌忙站起，几乎将背篓撞倒了。

她已撑起车子，蹦蹦跳跳，站在当面了。

“唔……你……走亲戚去咧？”

她没有回答，双手扶住背篓，瞅着小强，眼睛浮动着幽怨，浮动着疼爱，很动人的神色。半晌，才问:“就这样背回去？”

“就这样……背回去。”

“还有十里路哩！”

“十里，不远。一会儿……”

“用架子车拉上，多轻嘛！”她建议。

“没有车子。”他老实相告。

“我家里有。”

“划不着折腾，背回去算咧。”

“就知道出笨力！”娟娟说，是那样一种动人的口气，“背篓就放这儿，没人偷你的。”

南小强没有力量再执拗了，坐在自行车后座上了。

天色暗下来，灰雾把村庄和田野遮罩得迷迷蒙蒙。小强端端直直坐在车后座上，那黄衫罩着的花棉袄里，有一股温馨的气息透进他的感觉里来，只觉得一天的疲劳已经消散了。

“听说你们村新上任的队长很厉害。”

“是厉害。”

“听说订了个五年规划。”

“对。五年规划订下了。”

“听人传，你们队长说：‘农民娃，招不了工，考不上学，做啥呀？务庄稼。把农村办好，农民也要穿皮鞋，戴手表，住洋楼！’是这

样说的吗？”

“有这话。”南小强说，“你咋知道的？”

“人都说哩！”娟娟说，“这话说到农村青年的心尖上了。有志气！”

“没志气不行嘛！”小强觉得自如了，话投机了，“我们村……”小伙子们找不下对象的话，他不好意思说出口来。

“所以你不考学了。”

“嘿嘿……”

到王村村口了，俩人先后跳下车子。

“我在这儿等着，你把车子拉来。”

“到家里去嘛，走到门口了。”

“不咧……”

“怕啥？”

“我这样……”小强瞅着自己浑身上下的衣服，为难地支吾着。

“好大的架子！”娟娟反而这样说，“自己不动手，让我给你送来？”说着径自前头走了。

小强跟着走进一幢陌生的乡村的门楼。

“这是我的同学，南小强。”娟娟一进门，介绍说，“借咱的架子车用一下。”

娟娟的父亲，在西安一所中学当校长，寒假回到乡间来，现在披一领大衣，站在院子里，热情地说：“车子在过道放着。”

娟娟的母亲，白白胖胖，比乡村一般妇人显得富态多了，干干净净的头发从后脑勺朝上揭起，用一把黑簪子别着，那双本来是和善的眼睛，现在有一缕狐疑和厌恶的神色。小强处于这样的劣势里，对于贫穷就有着十分敏锐的感觉。而她对于女儿和这样穿戴的同学打交道，难以理解了。

老校长已经亲自动手，将架子车从空屋里拉出来，交给小强，招呼他喝水、抽烟，像对待任何一个劳动者一样，显示出正直的知识分子的诚恳。

小强仍然慌慌乱乱，既不抽烟，也不喝水，接过架子车，向送别到大门外来的校长和他的女儿告别了。

第二天一早，当王村人还在酣睡着的时候，南小强把架子车推进娟娟家的土围墙，放在院子里，悄然走出去，背上背篓，上山捡羊粪去了。其时，满天星斗，银河灿烂。

山沟里静得令人呼吸不畅，远处传来一两声狐狸的很难听的叫声。他背着背篓，走着走着，踢得路上的石子轱辘辘滚到沟下去了。唔，真慌神儿！她问了他那么多话，而他却连问她一句也没有。她在西安复课复得怎么样？大城市里的老师比小县城的老师讲课讲得好吗？今年考学把握如何？这些，都慌乱得一句也没问。唉唉！

晨曦在山的这边和那边，投照出若明若暗的神秘的色调。这是使敏感的年轻人的情思最容易流动的时刻。他想起他在自己的课桌里发现了一包糕点，惊疑中自然回看一眼坐在旁边的娟娟，那会说话的眼睛使他的心怦怦跳起来。他又想起夏天的傍晚，他们顺着河堤步行回家，突然一场暴雨把他们浇成了落汤鸡，地上一步一滑，又似乎是自然地把两只手握在一起，奔进河堤上防洪的小独房里。他把小炕上的麦草点燃了，脱下汗衫，拧干了水，烤着。她也脱了带着小花点的短袖衫，拧干了水，站在他对面烤着，湿透的内衣紧紧裹在她的身上，女性胸部和腰部那优美而清晰的线条，使他第一次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诱惑。那双经过雨淋的冰凉而柔软的手握在他的手心里的感觉，此刻又明显地感觉到了。

当他伸出手指，从结着霜花的枯草中和石板上拾起冻得邦硬的羊粪粒儿的时候，心里一下子凉了。粗糙的手指，被山间的寒风冻裂出数不清的小口子，纵横交叉着被酸枣刺针划破的血印，指头蛋儿已经被石板蹭磨得没皮了，触到霜花，冻得好疼啊！娟娟在城里住了一年，年节回到乡下，对当了农民的老同学没有鄙视的神色，已经很不简单喽！他在心里顶真诚地祝愿，她再苦攻一年，走进神秘的大学的校门。大娘完全不必用那样嫌弃的眼光看他。他一个农民，能那样缺乏自知之明地去纠缠她的大学生女儿吗？笑话！

太阳从九重山的东边升起，在渭北高原上空广阔的蓝天上运行，又沉入河水里去了。小强背起满满一背篓羊粪粒儿，从九重山崎岖的山道走出峪口的时光，第一颗灿亮的星儿已经在天幕上出现了。他猛然看见，在他往常歇脚的青石板上坐着娟娟，身旁放着昨晚用过的那辆架子车。

如果说昨晚的相遇和帮助纯系偶然的巧遇，那么今晚就是有意的自觉的等待了。

“你在这儿……等谁？”明明心里清清白白，他却结结巴巴说出糊涂话来。

她没有回答，把架子车摆顺了，扶住车辕，等待他把背篓卸下来。

小强把背篓搁进车厢里，长长嘘出一口气。娟娟把一只小布包塞过来，解开，是过年蒸的花皮包子；他转眼看她的时候，看到的是当年发现课桌里的糕点时那种神色。谦让对于真诚完全是多余的。娟娟已经推动车子，离开峪口了。

苍茫的灰雾和烧柴烘炕的蓝烟在村庄周围的田野上融汇在一起，缓缓地向麦田里扩散。通到平原上去的公路，漫坡而下，只需用双手扶住车辕，车子便自然朝前滚动着。一批疏疏落落的星星闪烁着光亮了。

“羊粪好拾吗？”

“好拾。”

“满山满坡都有吗？”

“近处捡完了。我走得远，摸着了放羊人避风躲雨的一个崖窝，羊粪铺地一层……”

“路好走吗？”

“难走。翻两架山，过三道沟，只有一脚宽的路。”

“就从这峪口一直走吗？”

“就从这峪口一直走。”

架子车车轮的声响，和谐而优美，像音乐，像流水。又是她连声问，他连声答。他的话全都躲得无踪无影，寻找不出一句来了。她一停问，俩人就默默地伴和着车轮轧轧轧的节奏踏着步子。

娟娟又转过头，庄重地说：“跟你商量一件事，想听听你的意见。”

“啥事？”她有知书达理的校长爸爸，她自己也是个干脆、果断甚至有点任性的姑娘，什么事需要听他的意见呢？

“我不想考学了。”娟娟说，显然是深思熟虑过了的口气。

“咋哩？”小强完全没有料到，“别人想去补课，没有你这样好的条件哩！”

“你现在先甭问为啥。”娟娟平静地说，“我们家这几天正为这件事闹矛盾。我想听听你的意见。”

小强默然了。这样关系别人生活、前途、事业和家庭关系的大事，他怎么说呢？

“你想想，改日见了面再告诉我。”

她轻盈地走着，夜色遮住了那张好看的脸。他抬头望望，南村农舍伸出缩进的不规则的围墙的轮廓就在眼前。他挡住娟娟：“让我背回

去吧，到了。”

“怕我到你家去吃饭吗？”娟娟扬起头。

“哪里……”小强为难地说，“我家地方太窄。”

“我不信。”她故意试探。

“真的。”他愈加为难，低矮的厦房，柴烟熏得发黑的屋顶，破旧的家具。

“你是怕村里人说闲话，”娟娟说，“说你恋爱。”

“呀……”小强扑地红了脸，不知说什么好了。

“要是怕人说，甭在世上活了。”娟娟停住车子，有点赌气的样子，“背你的羊粪背篓吧！我要回去了。”

小强扶住背篓，六神无主了，可怜这个能从悬崖峭壁上背来一百多斤重负的强健的身躯，此刻呆呆地站在那里，连一句圆场的话也说不出来了。简直难以想象，这个县中众多学生中能说会算的高才生，在一个姑娘面前变得如此笨拙。

小伙子怎么睡得着啊！父亲沉重的鼾声里夹杂着叹息，从灶房里的火炕上传过来。后院羊棚里，偶尔有小羊羔咩咩的叫声。公鸡已经叫过两遍。那个壮健的姑娘，在他心里跳，在他心里笑，红纱巾在他眼前飘动。话已经说得再明显不过了，满眼都是鲜花和阳光……

一睁眼，意识到自己躺在破旧的厦屋的炕上，那些浪漫迷离的花环和彩带消逝了。贫穷给已经成年的小伙子精神上铸成的自卑情绪，

是如此难以抗拒，迫使他就范：从实际考虑！

他不能眼看年迈的父亲和母亲从早到晚放下镢头捞起锨，让自己钻在小厦屋舞文弄墨。他更受不住南恒大哥上台后在南村掀起的新的气势对小厦屋的冲击。他终于放下书本，背起了背篓。可娟娟有什么必要放弃继续求学的机会呢？他不妒忌，也不狭隘，他希望她能考上大学。她的父亲是校长，母亲虽然在乡村，那是过着优裕于一般农民的生活的。他，典型的烂杆南村的典型穷汉家的后代。敢娶中学校长的女儿吗？所有处于劣势中的男子面对优势中的恋人，必然会产生的无形的沉重压力，他是双倍地感觉到了。

得劝劝她好好念书，把过去同学时代的友情当作美好的记忆留在心里吧。

天已薄明，比往常迟了，赶紧进山。

丁字路口，又是红纱巾在黎明的寒风中抖动。

南小强忽然壮起胆子，大声喊：“娟娟——”

“哎——”旷野里传来动情的回声。

“你在这儿等我……回答你的问题吗？”

“不……我跟你去……捡羊粪粒儿……”

“走——哇——”贫穷造成的自卑，为突然猛涨的热情压倒了。

正月清晨的山谷的风，似乎也不像往常那么刺人了。早起的山雀从刺蓬或崖缝中飞出来，清脆的叫声在山谷里震颤，繁星一批接一批

销匿了，瓦蓝瓦蓝的天空如此高远。

“你今日为啥起迟了？”

“昨黑……考虑你提出的问题。”

“不要说，不要你说了。你不说，我也知道你会说啥。”娟娟说，“不管出于怎样的考虑，你肯定跟我妈是一个观点。”

小强一惊，她太灵了。

“主意我早都拿定了。”娟娟说，“给你说，不过是打句招呼。”

“你爸同意吗？”

“现在同意了。”

“你妈呢？”

“她能挡住我吗！”

“可你……究竟为啥不考学了呢？”

“我烦了。”

“咋会烦呢？”小强问，“你说过，非考上大学不可，哪怕连考五年。”

“你那阵也说过，非上清华不可！”娟娟反问。

“我和你情况不一样嘛。”小强笑了。

“是不一样。你有你不想考学的原因，我也有我的。”娟娟说，“我是烦了，烦透了！”

“咋会烦呢？”小强还是不明白。

“怎么会不烦呢？”娟娟说，“好多人要到我爸的那所中学去补课，白天黑夜川流不息。有人托熟人说话；有人甚至提上烟酒求情；有的领导把教师请到家里，晚上和周日给他娃补课辅导，情愿自个儿掏腰包。我忽然想，这些人都是为‘四化’学习吗？才不见得呢。不过是想谋一个好饭碗！反正大学每年就收录那些学生，大家拼命挤呀挤，竞争呀竞争，能挤进去的还是那么多。我觉得我也在挤，也是想抢一个好饭碗，我有些乏味了。”

“唔！”小强没有想到，得到那样令乡村学生羡慕的学习条件的娟娟，心里反倒发生了这样的逆转，太想不到了。

“接到你的信，我的心里更烦了。”娟娟说，很诚恳，动了情，“你说你要跟南恒大哥在南村创业了。信上说着‘背水一战，改变自己和乡亲的命运’，我看了都哭了。你，在学校时比我学得好，要是补习一年，明年保准考中。可是你选择了另一条路。我睡在床上，想呀想，十之八九的乡村青年还得走你这条路。”

“啊……啊……”小强憋红了脸，心在棉袄下跳弹，听到这样知心的话，简直想流泪了。他忽然想一把抱住知心的姑娘，哭一场，笑一场；面对大山，放声地哭，畅快地笑，而不要说一句话！理智抑制了冲动。南小强停住脚，盯着娟娟，从心里涌出一句话来：“咱们共同来创造自己的生活！新的生活！”

一架陡峭的山梁横在眼前。南小强爬上去，伸下手来，抓住她伸上来的柔软的手，似乎一股拔山擎地的力气从心里冲出，娟娟就从下面轻轻飘上来，跌落到他的怀里。

他两手抓住她的胳膊。她跳开了，哈哈一笑，站到崖边，望着起伏的群山，奔放地说：“咱们来创造自己的生活，新的生活！小强傻哥，你说得不完全……也创造我们的爱情！”

“我俩冬天结婚了。”小强扭着方向盘，对我说，“够你写故事了吧？”

我正听到热闹处，心里很不满足，问：“就这么简单吗？”

“就这么简单。”

“她家里人……没有绊路吗？”

“她爸开明，不愧是教育人的人。”小强说，“她妈——我的丈母娘，说啥也不同意。”

“那怎么办呢？”

“先是哭，后是闹。抱住娟娟哭，落崖呀，跳井呀……”小强说，“闹得我都心凉了，我爸我妈劝我收心哩。”

“唔！”我觉得这才符合生活实际，“后来呢？”

“娟娟跑到我屋，用自行车把我带到公社，领了结婚证。”小强说，“我跟做梦一样。”

“啊！”我钦佩那位校长的小姐了。

“她既不要嫁妆，也不举行啥仪式，住到俺屋了。”小强说，“你信得下去吗？”

“她母亲咋办呢？”我相信她会做出怎样的行动。

“断绝关系了，不准娟娟登她家门。”

这需要怎样的勇气啊！我说不出话，又盯着小强：“现在还不来往吗？”

“和解了。”小强笑着，“南村翻身了。这不是，我驾驶汽车了，丈母娘也消气了，现在倒特别心疼我。她给娟娟悄悄说，她要补她的心。”

汽车在秋末冬初的渭河平原上奔驰，收获过秋庄稼的田野上，复种的小麦现出一抹淡淡的嫩绿，无边无沿。一排排白杨落光了叶子，柳树依然绿葱葱的。太阳从九重山的群峰上头露出脸来了，沐浴着丰饶的渭河平原……

蚕儿

从已经开花的粗布棉袄里撕下一纥繨棉花，小心地撕开，轻轻地扯大，把那已经板结的棉套儿撕扯得松松软软，摊开，再把铜钱大的一块缀满蚕子儿的黑麻纸铺上，包裹起来，装到贴着胸膛的内衣口袋里，暖着。在老师吹响的哨声里，我慌忙奔进由关帝庙改成的教室，坐在自个从家里搬来的大方桌的一侧，把书本打开。

老师驼着背，从油漆剥落的庙门口走进来，站住，侧过头把小小的教室扫视一周，然后走上搬掉了关老爷泥像的砖台。教室里顿时鸦雀无声，只有我的邻桌小明儿的风葫芦嗓门里，发出吱吱吱的出气声。

“一年级写大字，三、四年级写小字，二年级上课。”

老师把一张乘法表挂在黑板上，用那根溜光的教鞭指着，领我们读起来：

“六一得六……”

我念着，偷偷摸摸胸口，那软软的棉团儿。已经被身体暖热了。

“六九五十四。”

胸口上似乎有毛毛虫在蠕动，痒痒儿的，我想把那棉团掏出来。瞧瞧老师，那一双眼睛正盯着我，我立即挺直了身子……

难以忍耐的期待中，一节课后，我跑出教室，躲在庙后的房檐下（风葫芦说蚕儿见不得太阳）绽开棉团儿。啊呀！出壳了！在那块黑麻纸上，爬着两条蚂蚁一样的小蚕，一动也不动。两颗原是紫黑的蚕子儿变成了白色，旁边开着一个小洞。我取出早已备好的小洋铁盒，用一根鸡毛把小蚕儿粘起来，轻轻放到盒子里的蒲公英叶子上。再一细看，有两条蚕儿刚刚咬开外壳，伸出黑黑的头来，那多半截身子还卡在壳儿里，吃力地蠕动着。

“咏咏……”上课的哨儿响了。

“二年级写大字……”

写大字，真好啊！老师给四年级讲课了。我取出仿纸，铺进影格，揭开墨盒……那两条小蚕儿出壳了吧！出壳了，千万可别压死了。

我终于忍不住，掏出棉团儿来。那两条蚕儿果然出壳了，又有三四条咬透了外壳。我取出鸡毛，揭开小洋铁盒。风葫芦悄悄蹿过来，给我帮忙，拴牛也把头挤过来了……

哐的一声，我的头顶挨了重重的一击，眼里直冒金星，几乎从木凳上翻跌下去，教室里立时腾起一片笑声。我看见了老师，背着的双手里握着教鞭，站在我的身后。慌乱中，铁盒和棉团儿都掉在地上了。我忍着头顶上火烧火燎的疼痛，眼睛仍然偷偷瞄着扣在地上的铁盒。

老师的一只大脚伸过来，从我的木凳旁边伸到桌子底下去了。一下，踩扁了那只小洋铁盒；又一脚，踩烂了包着蚕子儿的棉团儿……我立时闭上眼睛，那刚刚出壳的蚕儿啊……

老师又走回四年级那第一排桌子的前头去了。教室里静得像空寂的山谷。

放学了，我回到家里，一进门，妈就喊:“去，给老师送饭去！”

又轮着我们家管饭了。我没动，也没吭声。

“噢！像是受了罚！”妈妈看着我的脸，猜测说，“保准又是贪耍，不好好写字！”

我仍然立在炕边，没有说话。

妈妈顺手摸摸我额头上的“毛盖儿”，惊奇地睁大了眼睛:“啊呀，头上这么大的疙瘩? ”她拨开头发，看着，叫着，“渗出血了！这先生，打娃打得这样狠！头顶上敢乱打……”

我的眼泪流下来了。

“不打不成材！”父亲在院子里劈柴，高声说，“学生哪有不挨板子的? ”

妈妈叹口气:“给老师送饭去。”

“我不去！”

“去！”父亲威严地命令，“老师在学堂，就是父母，打是为你学好！”

我一手提着装满小米稀饭的陶瓷罐，一手提着竹篮，竹篮里装着雪白的蒸馍、菜碟、辣碟，走出了街门。这样白的馍馍，我大概只有在过年过节时才能尝到的。

进了老师住的那间小房子，我鞠了躬，把罐和竹篮放到桌子上，就退出门来，站在门外的土场上等，待老师吃完，再去取……

“来！”从小房里发出一声传呼，老师吃完了。

我进了小房，去收拾那罐儿碟儿。

老师挡住我的手，指着花碟子，说：“把这些东西带回去，不准丢掉……”

我一看，那盛过咸菜的花碟里，扔着一块馍，上面夹着没有揉散的碱面团儿；另有稀饭中的一个米团儿，不过指头大，也被老师挑出来。我立时觉得脸上发烧，这是老师对管饭的家长最不光彩的指责……

妈妈看见了，一下子跌落在板凳上，脸色羞愧极了。

父亲瞅着，也气得脸色铁青，一把抓起“展览”着碱团儿和米团儿的花碟子，一扬手，摔到院子里去了。

后晌上学的时候，风葫芦在村口拉住我，慷慨地说：“我再给你一块蚕子儿！”

我心里冷得很：“不要咧！”

“咋咧？”

“我不想……养蚕儿咧！”

没过几天，学校里来了一位新老师，分了班，把一、二年级分给新来的老师教了。

他很年轻，穿一身列宁式制服，胸前两排大纽扣，站在讲台上，笑着给我们介绍自己："我姓蒋……"说着，他又转过身，从粉笔盒儿里捏起一节粉笔，在木头黑板上，端端正正写下他的名字，说："我叫蒋玉生。"

多新鲜啊！往常，同学们像忌讳祖先的名字一样，谁敢打问老师的姓名啊！四十来个学生的初级小学，只有一位老师，称呼中是不必挂上姓氏的。新老师一来，自报姓名，这种举动，在我的感觉里，无论如何算是一件新鲜事。他一开口，就露出两只小虎牙，眼睛老像是在笑："我们先上一节音乐课。你们都会唱什么歌？"

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没有人回答。我们啥歌也不会唱，从来没有人教我们唱歌。我只会哼母亲教给我的那几句"绣荷包"。

蒋老师把词儿抄在黑板上，就领着唱起来：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没有丝毫音乐训练的偏僻山村的孩子，一句歌词儿，怎么也唱不协调。我急得张不开口，喉咙里像哽着一团什么东西，无端地落下一股泪水。好久，在老师和同学的歌声中，哽在喉咙里的硬团儿，渐渐融化了，心里清爽了，张着嘴，唱起来：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我爬上村后那棵老桑树，摘了一抱最鲜最嫩的桑叶，扔给风葫芦，就往下溜，慌忙中，松了手，摔到地上，半天爬不起来，嘴里咸腻腻的，一摸，擦出血了，烧疼烧疼。

"你俩干什么去了？"蒋老师吃惊地说。

我俩站在教室门口，低下头，不敢吭声。

“脸上怎么弄破了？”他走到我跟前。

我把头勾得更低了。

他牵着我的胳膊朝他住的小房子走去。这回该吃一顿教鞭了！我想，他不在教室打，关在小房子打起来，没人看见……

走进小房子，他从桌斗里翻出一团棉花，撕下一块，缠在一根火柴棒上，又在一只小瓶里蘸上红墨水一样的东西，就往我的脸上涂抹。我感到伤口又扎又疼，心里却有一种异样的温暖。他那按着我的头顶的手，使我想到母亲安抚我的头脸的感觉。

“怎么弄破的？”他问。

“上树……摘桑叶。”我怯生生地回答。

“摘桑叶做啥用？”他似乎很感兴趣。

“喂蚕儿。”我也不怕了。

“噢！”他高兴了，“喂蚕儿的同学多吗？”

“小明，拴牛……”我举出几个人来，“多咧！”

“你养了多少？”

“我……”我忽然难受了，“没养。”

“那好。”他不知我的内情，喜眯眯的眼睛里，闪出活泼的好奇的光彩，“你们养蚕干什么？”

“给墨盒儿做垫子。”我说着话又多了，“把蚕儿放在一个空盒里，它就网出一片薄丝来了。”

“多有意思！”他高兴了，拍着手，“把大家的蚕养在一起，搁到我这里，课后咱们去摘桑叶，给同学们每人网一张丝片儿，铺墨盒，你愿意吗？”

“好哇！”我高兴地从椅子上跳下来。

于是，后晌，他领着我们满山满沟跑，采摘桑叶，有时候，他从坡上滑倒了，青草的绿色液汁沾到裤子上，也不在乎。他说他家在平原上，没走过坡路。

初夏的傍晚，落日的余晖里，霞光把小河的清水染得一片红。蒋老师领着我们，脱了衣服，跳进水里打泼刺，和我们打水仗。我们联合起来，从他的前后左右朝他泼水。他举起双手，闭着眼睛，脸上蹿下一股股水来，佯装着求饶的声调，投降了……

这天早晨，我和风葫芦抱着一抱桑叶，刚走进老师的房子，就愣住了。

老师坐在椅子上发呆，一副悔恨莫及的神色，看见我俩，轻声说：“我对不起你们！”

我莫名其妙，和风葫芦对看一眼。

“老鼠……昨晚……偷吃了……蚕！”

我和风葫芦奔到竹箩子跟前，蚕少了！一指头长的又肥又胖的蚕儿，再过几天该网茧子了。可憎的老鼠！

风葫芦表现得很慷慨：“老师，不要紧！我从家里再拿来……”

老师苦笑一下，摇摇头。

我心里很难受。我不愿意看见那张永是笑呵呵的脸膛变得这样苦楚，就急忙给老师宽解：“他们家多着哪！有好几竹箩！”

“不是咱们养的，没意思。”他站起来，摇摇头，惋惜地说。

三天之后，有两三条蚕儿爬到竹箩沿儿上来，浑身金黄透亮，扬着头，摇来摆去，斯斯文文地像吟诗。风葫芦高兴地喊：“它要网茧儿咧！”

老师把他装衣服的一个大纸盒拆开，我们帮着剪成小片，又用针线串缀成一个一个小方格，把那已经停食的蚕儿提到方格里。

它想网蚕茧儿。我们把它吐出的丝儿压平；它再网，我们再压，强迫它在纸格里网出一张薄薄的丝片来……

陆续又有一条一条的蚕儿爬上箩沿儿，被我们提上网架。老师和我们，沉浸在喜悦的期待中。

“我的墨盒里，就要铺一张丝片儿了！”老师高兴得按捺不住，像个小孩，“是我教的头一班学生养蚕网下的丝片儿，多有意义！我日后不管到什么地方，一揭墨盒，就看见你们了……”

第二天，早饭后，上第一节课了。他走进教室，讲义夹上搁着书本，书本上搁着粉笔盒，走上讲台，和往常一模一样。我在班长叫响的“起立”声中站起来，一眼看见，老师那双眼睛里有一缕难言的痛楚。

他站在讲台上，却忘了朝我们点头还礼，一只手把粉笔盒儿也碰翻了，情绪慌乱，说话结结巴巴：“同学们，我们上音乐课……”

怎么回事啊？昨天下午刚上过音乐课，我心里竟然不安起来，似乎有一股毛躁的情绪从心里蹿起。老师心里有事，太明显了。

老师勉强笑着：“我教，你们跟着唱：‘春风，吹遍了原野……’”

我突然看见，刚唱完一句，他的眼角淌下一股泪水，立即转过身，用手抹掉了；然后再转过身来，颤着声，又唱起来：“春风，吹遍了原野……”

我闭了口，唱不出来了。风葫芦竟然哇的一声哭了。教室里，没有一个人应着唱。

“我要走了，心想给大家留下一支歌儿……”他说不下去了，眼泪又蹿下来，当着我们的面，甩手绢擦着，提高嗓音，“同学们，唱啊！”

他自己也唱不出来了，勉强笑着，突然转过身，走出门去了。

我们一下子拥出教室，挤进老师窄小的房子，全都默默地站着。

他的被卷和书籍，早已捆扎整齐。他站在桌边，强笑着，说：“我等不到丝片儿网成了。你们……把蚕箔儿……拿回家去吧！”说罢，他

提起网兜，背上被卷。

我们从他手中夺过行李，走出小房。对面三、四年级的小窗台上，露出一个一个小脑袋。一声怕人的斥责声响过，全都缩得无影无踪了。

我的心猛一颤，还得回到驼背的那个教室里去吗?

走出庙院了。走过小沟了。眼前展开一片开阔的平地，我终于忍不住，问:“蒋老师，为啥要走呢? ”

蒋老师瞧着我，淡淡地说:“上级调动。”

“为啥要调动呢，你刚来！”风葫芦问。

老师走着，紧紧闭着嘴唇，不说话。

我又问:“为啥不调动驼背? ”

蒋老师看看我，又看看风葫芦，说:“有人把我反映到上级那儿，说我把娃娃惯坏了！”

我迷蒙的心里透出一条缝儿，于是就想到村子里许多议论来。乡村人看不惯这个新式先生，整天和娃娃耍闹，没得一点儿先生的架势嘛！自古谁见过先生脱了衣裳，跟学生在河里打水仗? 失了体统嘛！我依稀记得，我的父亲说过这些话，在大槐树下和几个老汉一起说。那个现在还不知姓名的盘踞在小庙里的老师，也在村里人中间摇头摆手……他们却居然不能容忍孩子喜欢的一位老师！

三十多年后的一个春天，我在县教育系统奖励优秀中小学教师的大会上，意外地握住了蒋老师的手。他的胸前挂着“三十年教龄”纪念章，金光给他多皱的脸上增添了光彩。

他向我讨要我发表过的小说。

我却从日记本里给他取出一张丝片来。

“你真的给我保存了三十年？”他吃惊了。

哪能呢？我告诉他，在我中学毕业以后，回到乡间，也在那个拆掉古庙新盖的小学里教书。第一个春天，我就记起来该暖蚕子儿了。和我的学生一起养蚕儿，网一张丝片，铺到墨盒里，无论走到天涯海角，都带着我踏上社会的第一个春天的情丝……

老人把丝片接到手里，看着那一根一缕有条不紊的金黄的丝片，两滴眼泪滴在上面了……

1982年1月 灞桥

初夏时节

一

节令已过小满，交近芒种，正当午时，一天里太阳最毒的时光。

从杨树和柳树浓密的枝叶遮罩下的河堤上，传来铁刀剁击木板的钝重的声响，咣……咣……咣……刀声里，攒着劲，又似乎带着气。

伴着刀剁的响声，有人在骂人：

“给我头上挽套枷……龟孙！”

杨树和柳树已经变得墨绿的叶子，在顺河而下的微风中，轻轻摇曳着。

这是冯家滩三队鱼池管理人冯二老汉，读者诸位在《第一刀》里已经见过一面的熟人了。

二老汉坐在一块平整光滑的河石上，汗渍把石头表面已经浸润得紫红油腻了。他左手抓过一把青草，按在脚前的木板上，右手攥一柄弯腰长刀，剁着青草；剁着，骂着。

老汉骂他的亲门侄儿——年初上任的三队队长冯豹子，以及和他共事的那一班干部。他们给冯二老汉立下一纸合同：联产计酬！要是鱼池里捞不出货来……唉唉！一纸合同把二老汉紧紧拴捆起来啰！“熊管娃”的逍遥日月过不成啰！二老汉收拾起丢弃多年的草镰和刀片，挎

上葛条大笼，自打草牙儿一冒出地皮，一天三晌在河滩里，渠沿上，挖着割着，剁碎，再撒到鱼池里去……

曾经修剪得整整齐齐的短须，荒芜了；头发也长了，居然抽不出时间到对河小镇的理发铺儿里去剃掉；永是干干净净的灰色棉粘布衫，肩头和脊背上，透出一圈一圈干涸的汗痕，前襟和袖肘上，沾染着泥土的黄色和青草的绿汁。

草剁完了，二老汉的嘴唇也骂得干涩了。他把碎草揽到笼里，顺着河堤，朝鱼池走去。河川里已经泛起黄色的麦田里，刚刚插上新秧的稻地里，绿色遮不住地皮的棉田，河滩直通村庄的白杨甬道上，空无一人。布谷鸟从湛蓝的天空掠过白杨树梢，留下一声声急切的呼唤，“布……谷……”

“哗……”一把青草撒出去，那些小生灵儿从鱼池的四面八方一齐汇集到食箔周围来，叼起一片草叶，又沉入水里去了。二老汉笑了。

撒完青草，二老汉蹲在鱼池边，惬意地观赏着绿水中活跃着的生命。……

“娃子们！想整我吗？倒给我弄得一件嫽事！等我抱上一摞票子的时光，哈呀……我冯二灵着哩！”

二老汉在水里洗了手，走上河堤，瞅着通往村庄的大路，女儿小莉该送饭来了哩。他为了防备城里来的那些钓鱼客，一天三顿，由女儿或老伴把饭送到河滩来。肚子空空儿，四肢酸困，他想打个盹儿，饿得合不实眼；想和谁说说闲话儿，午饭时光，鬼才到这蒸热的河滩上来呢！

“老二！”

听得一声叫，二老汉一回头，异姓同辈的刘红眼老汉，从背后的河堤上走到跟前，这是个专长说媒的人物，肯定是说媒回来了。他托刘红眼给女儿小莉“寻向”的事，怎样了呢?

二

“老不死的，把烟包掏出来，喉咙痒得受不住咧！”

“说媒吃得嘴馋了，尽干铲！”

俩老汉一见面，先笑骂一阵儿，心里舒服。

二老汉把烟包递过去，半是奚落的口气，“又给谁家说媒去咧？吃得几碗？”

刘红眼睁大似乎根本就没有长过睫毛的红眼，拿腔捏调地说：“开会。在公社里。”

二老汉不屑地撇着嘴，十分好笑，走东村串西庄的说媒老汉，到公社开什么会！装什么大货！

刘红眼却神气地说：“公社成立什么婚姻介绍所，约请我去当参谋哩！”

二老汉真是有点吃惊，忙问：“唔，那就该去公社上班咧！”

“对。”刘红眼神气地说。

“是挣工资吗？”

“挣。”

“多少呢？”

“还没说定。”刘红眼说，“先叫上班。”

二老汉瞅着对方，那脸还是往日的歪歪皂角脸，下巴上还是稀稀疏疏几根黄胡须，那鸡屁股一样红的眼睛仍然没有睫毛，这样的人物居然要进公社机关上班了！而仅仅在几年以前的几十年里，刘红眼还一直是个被人嘲笑的角色，虽然儿女的婚嫁总免不了求他帮忙，而当婚事告成，人们都反过脸来嘲笑刘红眼了。跑腿耍嘴说媒，在一般庄稼人的印象里，应该跟吹鼓手划为一等。虽然家家都免不了需要他们帮忙，却并不能获得人的尊重。每当村子里来了工作组，刘红眼也总是躲躲溜溜，有一回可真就被揪到台上去交代：图了多少财礼？买卖婚姻！这样的人物，居然要骑上车子，穿上四个兜制服，进进出出公社机关大院当干部去了。二老汉心里似乎有点不大舒服，嫉妒起来了。

“团委书记硬叫我去，不去不成喀！”刘红眼吹嘘起来。二老汉笑着挖苦说：“蛐蜒变成龙了！”

“变咧也就变咧！”刘红眼说，“我也没想到……”

二老汉再无兴趣取笑刘红眼，诚诚恳恳问：“老哥托付你的那件事……”

“啥事？”红眼瞪起眼。

“咱小莉的事……”

“噢……噢……”刘红眼仰起头，大声悟叹，“那事……不能办！”

“咋哩？”二老汉忙问，“没有合适的人家吗？”

“合适的人家多的是。”刘红眼也认真起来，“问题儿——不能办！”

“我给你说能办，就能办！”二老汉心里明白，村里有人议论说，小莉和牛娃如何如何呢！正因为有这些闲言碎语，二老汉才托付刘红眼尽早给女儿找一个合适的对象，以正视听。想不到刘红眼居然听信了流言碎语，根本就没给他办事。他正言说：“你给想法儿办！甭听闲话！”

“怕不是闲话哩！”刘红眼试探问。

“不是闲话是真话，也不行！没门儿！”二老汉上了气儿，“你按我托付你的办！”

“那……不好吧？”刘红眼有点为难，“婚姻不兴父母包办，第一要娃娃们情愿……再说，我现时……是公家干部了……要按政策……”

“狗东西！啥干部！我认得你，你是刘红眼！”二老汉躁了，全不把将要成立的婚姻介绍所的老参谋当一回事，“我托你办一件事，你倒讲起政策……”

“嘿嘿嘿嘿嘿……”红眼不生气，只是赔着笑。

“听下没？办！抓紧！”

“嘿嘿嘿嘿嘿……”

“你笑啥？”二老汉抓住不放，“办！”

“你看，他来了——”刘红眼站起，指着河滩。

二老汉转过头一看，牛娃正蹚过河水，走来了。

“你要是征得他同意，我才敢办！”刘红眼转过身，吐了吐舌头，“我要是按你说的办了，那个冷家伙不把我捶死才怪！”说罢，狡黠地扑闪着红眼，轻脚快步，抽身走了。

三

牛娃算个弄啥的？凭啥资格做二老汉的女婿？二老汉瞅一眼河滩，牛娃已经涉过河水，戴着草帽，弯腰洗脚穿鞋哩……就凭他那两间破得修缮不起的小厦房？除了大得惊人的饭量，他还有啥长处呢？二老汉鄙夷地想，你冯牛娃经人介绍的对象不少了，人家一来会面，看看你那两间破厦房，就连筷子也不捉了……反正没一个姑娘愿意学三姑娘跟你挖荠荠菜过日月的！你托人从山里买来个“山妞”，花了一千多块，账还没还清，媳妇却跑得无踪无影了……在二老汉的意念里，只有有严重的政治缺陷（比如成分）、生理缺陷（诸如跛子或瓜子），才不得不从山区买回来那些操着呜啦呜啦的外乡口音的人，这样的人，怎么敢把眼睛瞅到冯家滩少数几户过着软和日月的冯二老汉的闺女身上呢？太不自量了！

宽阔的沙滩上，沙金在阳光下闪闪发光，牛娃挎着竹笼，跨着大步，急急走来了。

二老汉背过身，挪到紫穗槐稠密的丛棵旁，把自己隐蔽起来……牛娃，熬光棍熬急了的家伙，鼻梁上老是挽着两道皱起的疙瘩，说话

生冷撑倔，居然几次有事无事转到河滩上来，笑嘻嘻地问：

“叔哎，你一个人能撑住吗？要不要给你派个帮手？”

“叔呀！你甭只图节约饲料，狠劲割草，该领的麸皮还是要领呢……”

当时听到这些关心体贴人的话，二老汉心里好舒服啊！他曾经奇怪，看来那么冷倔的年轻人，一旦肩膀上扛起了众人委托的重担，有了心劲，明显地克服着自个儿的弱点，说话和气了，叫人听来顺耳了……

现在，二老汉冷笑了：骚情！全是给二老汉献殷勤，要骚情！心里想给小莉打卦哩……

“叔哎——”

预料中的那种骚情的叫声到底来了，二老汉从紫穗槐柔软的枝条下站起来，冷漠地绷紧脸儿，警惕地瞅着站在槐丛旁边的年轻副队长，那笑脸，那巴结的神气，讨厌！

“哈呀！联产承包了，人都盯着自家地里的庄稼，牲口病了，找不下人去抓药！”牛娃说着，把挎在胳膊上的竹条笼放到地上，那笼里装着一摞捆扎得整整齐齐的畜用中药的纸包。

骚情！二老汉不屑地蹙着鼻子，你老远跑来，就是为了给我说你给牲口抓药的事吗？也不看别人想听不想听！

“吃洋柿子——给！”牛娃从竹笼里取出两三个鲜红鲜红的番茄来，真情实意递到二老汉的胸前。

“不不不——”二老汉干涩的喉咙眼里，早已被那诱人的番茄撩拨得渗出玉津，嘴里却拒绝了。要是往常，何必要人请让，早该伸手抓摸过来了。二老汉仍然板着脸，强行控制住自己的贪欲，说，“不！”

牛娃这才意识到老叔脸上不同寻常的冷漠，抓着番茄的手，僵住了：放回笼里，不好；老拿着，也不好。诚恳的礼让，遭到怀有戒心的拒绝，憨直的小伙儿，尴尬地一弯腰，把三个番茄放在一块干净的河石上，转身要走了，嗨！

“给他点颜色看看，趁早死了心！”二老汉坚信处理这件事的方式并不过分，省得日后麻烦，“你等等！”他抓起三个番茄，紧走两步，塞进牛娃的竹条笼里。

牛娃难堪地瞧着他，没有说话。

“问你一句话。”二老汉站在牛娃当面，“是不是合同要变卦？”

“你听谁说？”牛娃一愣，问。

“你甭管谁说，你只说，有没有这事？”

“没！”牛娃大声否定，释然笑了。他至此明白了老叔冷淡他的原因了，以为老汉怕干部对合同变卦，苦心饲养的鱼儿又得不到实惠了（其实又想到岔儿里了），畅快地保证说，“纯粹是谣言。”

“我的脾气——”二老汉声色俱厉地说，“说一不二，说是订下合同，就要按合同办！说是办不成的事，坚决办不成！”

其实，早在一周前，他听说有人想推翻年初订下的合同，去问过队长豹子，豹子早给他肯定答复了。无非是个别社员忙于倒把小买

卖，把庄稼耽搁了，看看麦子现黄，想推翻合同，豹子连睬也不睬。本来已经明确的事，又在牛娃面前提出来，他是想借此事，旁敲到牛娃和小莉的婚事上。听听口气，我说办不成的事，坚决办不成……

“甭听旁人胡煽！”牛娃并不理会，仍然解释说，“我倒忘了给你说件事，你天天晚上睡在河滩看守鱼池，队委会决定每晚给你加记两分工。原先订合同时，倒是没有想到夜晚有人偷……”

这是不是骚情呢？每晚加记两分工，队委会决定！二老汉心里忽闪一颤，闭了口。往年年终记工分时，多少人对鱼池管理者翻白眼，说是“养老工分”！他装着听不见。现在，倒是第一回领略到受人关怀、敬重的异样感觉了。向来在舌头上不打绊子的人，此刻口笨舌塞，说不出话了……

“多好的洋柿子！”

二老汉一抬头，女儿小莉已经站在跟前，大方地从牛娃的竹条笼里摸出一个番茄来，在衣襟上擦擦，笑着咬了一口，弯腰放下饭罐来。

“呃——”二老汉反感透了！瞧一眼女儿，她正蹲在地上，从搪瓷罐里往碗里舀面条。

“牛娃哥！吃碗面！”女儿让着。

“不——”牛娃笑着对小莉说，又瞅一眼歪鼻子咧眼的二老汉，收敛了笑容，转身走了。

“等等！”小莉喊，“我舀完饭，咱们一块回去！”

牛娃停住脚，犹豫地回过头来。

“你——甭急！”二老汉气呼呼地对女儿说，“我跟你有句话要说！”

四

瞧着牛娃在金色的麦地里远去的背影，小莉一脸不悦的神色，问：“有啥事？你说。”

哼！想跟牛娃肩并肩在大路上走吗？不害羞！二老汉瞅一眼女儿的神气，翘起胡须：“我……问你一句话！”

小莉警觉地瞟他一眼，但装得很坦然：“啥话？你说。”

二老汉想问：你和牛娃……这话又怎么问得出口呢？应该是女子她妈去问的事。他端起碗，终于把已经冲到舌尖上的话，连同面条一起咽到肚子里去了。远处，白杨甬道上，牛娃穿的白布衫，在黄色的麦海里越来越模糊了。

“爸，今日砖场正出窑，我还忙哩！”小莉说，“你有话快说，我还要上班去。”

女儿的花衫上，沾着新砖红色的粉屑，头发上也扑落着灰，队里砖窑烧成第一批产品了。他不能耽误女儿去上班：“你……”嘴张得大大的，说不出。

“我咋咧？”

“你……”

“我到底咋咧吗？”

“你……听没听见人说……闲话？”

“听到咧。”小莉干脆地说，“我不管。”

“怎能不管？”二老汉不满，“你的主意呢？”

“我有我的主意。”小莉说，“没空儿听闲话。”

女儿是什么主意呢？二老汉诚心诚意说：“小莉，你也不小。你红眼叔给你在城边菜区瞅下一户人家……”

“我不要他操闲心！”小莉真是干净利落，毫不含糊，“我没空儿想！”

一下子证实了二老汉的探测，火儿不由得从心底冒上来：“你的主意到底咋办？”

“我还没想好哩！”小莉不露。

“你甭哄我！”河滩里午歇时没有旁人，二老汉声大了，不怕人听，“你说……你为啥……给牛娃……洗衣裳……”

小莉脸色略略一红，眼里现出一缕怨恨父亲的神色，遮掩说：“我给砖场几个人都洗过，又不是单给……他一个洗！”

他听到的闲话更多，有的说牛娃和小莉俩人，在砖场办公室算账，头和头快碰到一起了。有的说小莉和牛娃已经谈妥，三年要把冯家滩三队搞得翻了身，盖上新房；等得豹子哥找下对象，再一起办喜

事……更没鼻子没眼的酸话，老汉不堪回想了。他挑来选去，拿出洗衣裳的事实来。不料，小莉一句话冲得无缝可找了。

“反正……反正……”二老汉一笼统概括了，“不成！”

“爸，你要是再没啥事，我上班去了。”小莉站起来，“要割麦了，砖场加班突击呢，明日出完砖，赶搭镰还要再装一窑砖坯哩！”

二老汉气鼓鼓地瞅着女儿。

女儿说罢，轻快地走过河堤，转上白杨甬道，淹没在黄色的麦田里。

五

跟着女儿的脚跟，二老汉从河滩赶回村子，端直走进侄儿豹子的院子。

豹子坐在院中的石墩上，头顶是胡桃树密密实实的枝叶，累累的青果。二老汉发现，侄儿瘦了，黑了，从军队上穿回来的黄布衫子，沾满了红色的粉屑，黑色的墨烟，和汗水混合在一起。

“二爸。”豹子端着大老碗，筷头上发出呼噜呼噜的面片儿滚进喉咙的声响，站起来，招呼老者长辈。

“听说这窑砖成色不错。”二老汉问。侄儿一手抓着砖场的筹建和生产，头一窑砖烧成了，二爸也高兴啊。

“成色好着哩！”豹子轻松地说，“你有啥事吗？”

二老汉坐下来，现出沉重的神色，把小莉和牛娃的事提出来，问:“你听到了没？”

“听过。我没管它。”豹子淡淡地说。

“你怎能不管！小莉是你的妹子……”

“二爸，要是真有这事，你看咋办？”

“没门儿！”二老汉一口回绝，“我找你，想叫你给牛娃把话挑明。”

“要是小莉一心情愿，你咋办？”

“我不能睁着眼叫她跳崖！”

“这怎能是跳崖呢？”豹子笑着问。

“你说，牛娃哪一样占长？”二爸反问。

“牛娃哪一样又不好？”豹子仍然笑着，公开为他的好友辩护，“没房。没钱。穷！可这些东西都能有呀！”

“咱不嫌人家穷！”二老汉声明。

“其实，叫我说，小莉和牛娃……倒是蛮好的。”豹子沉吟说，“你和二娘都老了。大哥和大嫂在西藏，虽然能给你用钱，可帮不上忙，小莉和牛娃要是结了亲，不离咱村，你俩老人有个头疼脑热，随叫随到，也不显得孤单……”

这样设身处地地想问题，二老汉感觉是实际的，亲切的。可惜，可惜小莉不能嫁给他，全当今年劳值升到一块，明年呢？后年呢？你豹子能当一辈子队长吗？眼下的政策，永远不会变化吗？而小莉一旦嫁给牛娃，就是一辈子的事！他早已给女儿设计下一条生活道路：在临近西安城郊的蔬菜专业队里，给娃寻一个殷实人家。目下，农村姑娘要找在外工作的对象，太难了。他只要给小莉在收入稳定的蔬菜生产队找一家落脚，年下八节，女婿常常送来新鲜的蔬菜，就很好了……

“她日后要是日子过不下去，到我跟前哭哭啼啼，我咋办？”二老汉问。

“我们不是正在努力干吗？”豹子说。

“干归干。世事……艰难！”二老汉笑笑，表示对侄儿雄心大志的欣赏；却也表示出，不一定靠得住，他相信的，是他六十多年经过的世事。“你告诉牛娃，甭胡思乱想。”

二老汉说罢，瞧一眼豹子，侄儿的脸色不大好看，不大好看就不大好看吧，只要给牛娃把话捎到就行了。说罢，转身走出院子来。

街巷里，一溜一伙男女戴着草帽儿，推着小车，说说笑笑，从街巷里汇集到通河滩去的路口。午歇时村巷里和田野上呈现的静谧气氛消失了，吆牛声，打诨笑闹的声浪，呼叫人的粗的或尖的嗓门儿，从村庄到河滩，融会在一起。

二老汉走下场塄，朝他的鱼池走去，他忽然觉得，自己心里的负担太重了，别人似乎都比他轻松，少事，他心头的这些负担，究竟有没有必要呢？

1982年1月 灞桥

土地——母亲

“妈，你有啥揪心不下的话……你说。”

他坐在母亲旁边，说话的声音顶真诚了。母亲躺在炕上，花白的头发散散乱乱，落在枕头上，松弛的眼皮覆盖着那双明亮、温柔的眼珠，眉间轻轻弹动一下，间或在枕上摆一下头，证明那难以忍耐的痛苦正在疯狂地折磨着老人，似乎那一丝微弱的气息，随时都可能中断。他守在母亲身边，已经三天三夜了。

他的鬓发已经霜白，尽管几年前提升为掌管四十万人口的县委副书记了，依然觉得不能离开母亲……每当他星期六从县里下班回家，或者是从省上开会归来，一脚踏进家门，立足未稳，总习惯地瞧一眼母亲住的那间厦屋的门板，如果没有上锁，准是冲口而出一声：“妈！”那屋里随着就传出一声拖长的应声：“哎——”听到这样温存的声音，会使人的一切辛苦劳顿霎时消失精光，化烦躁为平和，使空虚变踏实……

他紧紧抓着母亲的后襟，两眼死死盯着那扑前跃后的黄狗。母亲左手挎着竹篮，右手执着一根溜光的枣木棍子，吓唬着疯狂扑跃的黄狗，走到一家陌生的庄稼院门口，从门里接过一碗剩饭，抖抖地倒在自家的黄碗里，退出来，坐在门前的柴火堆前，把碗和筷子一起塞到他的手里……

夜晚，母亲解开大襟棉袄，把他搂裹在胸前，那温暖，那乳香，抵御着破庙廊檐上鬼哭似的西北风的呼啸……

流逝的岁月能使一切纷争归于淡漠。母亲对于儿子无私的抚爱在这死别之际异常清晰地浮上心头，他默默地流泪了，难以遏制的痛楚压迫着他的心：在母亲身体健康的时日里，没有能尽上儿子的一份孝心，这将成为永世的遗恨。

他在祖传的空庄院上盖起令村里人羡慕的三间瓦房，让母亲搬进去。她却不搬，仍然住在这两间破烂的泥坯厦房里，说是住惯老窝儿了。他给她买回来好吃食，她尝过一点之后，就全部分给孙儿和左邻右舍的孩子了。他给她买来挺好的布料，让媳妇做成衣服，她高高兴兴试过大小，就压在箱子里，再不见穿上身来……

“妈，我带你到城里去！”

“做啥？”

“逛逛！”

“不……”

“你受了一辈子苦，出去看看！”

“不……”

“你离不得你的火炕呀？”

“嘿嘿嘿嘿……”

“出去逛逛，妈，趁你能行能走！”

“你刚到县上，好好操心公家工作。”母亲说，“我哪儿也不想去。”

在他从一个农民变成一个县委副书记的巨大变化中，以及由此变化而带来的精神、物质乃至声誉上的明显变化中，母亲是最少享受这种变化所带来的福荫的一个家庭成员。而她恰恰是最有资格享受这种福荫的家庭长者。他的大儿子当了工人，正和一个长得秀气的姑娘恋爱呢。二儿子当兵去了。女儿已破例提前转为正式公办教师了。这个农业家庭基本完成了“工业化”改造了。他的女人在乡里住闷了，到县城去住上一月半月，穿戴和生活习惯已不拘于乡村妇女陈旧的格局了。只有母亲，仍然穿着依旧，终年四季起居在这两间破厦屋里，“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竟然一次也不放过老太太们能够干活挣工分的机会。他是一个孝子，却有心使不上。

他沉重地叹口气，泪眼模糊地瞅着母亲那张已经板滞的脸，颧骨愈加高耸，额头愈加宽阔，两颊却塌陷了。他轻轻呼唤着：

“妈，你有啥揪心不下的话……你说！”

母亲仍然闭着眼。眉间现出两道浅浅的褶皱，是病痛的折磨呢？还是有什么难于出口的心头话呢？她的头在枕头上艰难地转动一下，面朝儿子，睁开眼睛。那失掉了光彩的眼珠里，隐隐透出一缕羞愧的神色，嘴唇嗫嚅两下，有微弱的声音说出来了：

“妈……一生在世……做过……不少错事，做过了……也就过去了……”

“不！妈！你是世上顶好的妈妈！”他安慰母亲说，“谁一生能不做一件错事呢！”

“有一件事……妈至死……心里……不安宁。”母亲说，眼里那种羞愧的神色更明显了。“我当时……怎么就……疯张起来了唉！”

一声沉痛的叹息，从母亲干瘪的嘴唇里涌出来。他的心紧紧地收缩起来，那是一件令人难堪的事，太难堪了！母亲始终不能忘记那件事带来的内心的悔恨，他的心里也埋藏着最不光彩的记忆……

“妈吔！”已经四十多岁的白杨寨大队党支书杨生金，像小孩一样奶声奶气地唤着母亲，“你在咱白杨寨带个头儿，行吗？”

“带啥头？”

“打篮球！”

母亲笑了，笑得喘不过气儿来：“打篮球还要带头儿？小伙子们把球场都挤满咧……”

“咱们要组织一个老婆篮球队！”他说，“五十五岁以上的老婆，打篮球！年轻的不要……”

母亲这才相信儿子不是说笑话，停止了笑，迷惑地问：“折腾老婆子们做啥？”

他告诉母亲，他到天津一个队里参观回来，那儿的农民唱歌、赛诗。媳妇们都上了球场，全国各地的人都去参观学习哩！白杨寨这样的先进队要落后了。

“妈，你不是为我争光，是为咱白杨寨争……”

“妈都六十好几咧，上场打篮球……”母亲撇着嘴角，“再不要胡糟践妈咧！”

“新生事物……开头难！”他给母亲讲政治，“带我们去参观的领导说，老先进在新形势下能做出新成绩，意义更大！好多老先进、老模范，跟不上形势，现在都落后了……”

母亲耷拉着眼皮，不言语了。

“妈，你一贯支持我，这事……”他说，“你要带头哩……”

妈妈领着九个老婆婆上了篮球场，抢啊，碰啊，摔倒了……那些来白杨寨参观的人笑得前俯后仰，一个冷门爆响了……

“妈，还得你带个头儿！”他说。

“又带什么头儿哇？”

“演节目。”

“篮球场上乱跑乱碰，还凑合；上台演节目，那可怎么行哩？老胳膊硬腿……”

“人家就是专门要看老胳膊硬腿！”他说，“年轻人演不新鲜！”

他告诉母亲，电视台要来白杨寨拍片子，报社记者要来写稿，拍相片，白杨寨历史上最红火的日月来到了……

母亲上台了，四个六十多岁的老婆婆，经过日夜连续的排练，终于登台了，在电视摄像机轧轧轧的响声里，同台演出了《四个老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节目……

他坐在母亲旁边，一口连一口喷出的烟雾在脸孔前飘绕。他不敢回头去看母亲的脸，去面对那一双充满着羞愧神色的眼睛。是啊，在

那时作为光荣的成绩，于今天却变成让人羞于出口的丑闻。它是怎样沉重地挤压着一颗行将停止跳动的心啊！

母亲自言自语说：“要是能有……机会，让妈……在社员会上……检讨几句……妈也算……把心明咧……”

“过去的事，算咧！”他转过身，安慰母亲，找不出更合适的话来，“错在你儿身上……”

“妈演节目……把好人枉骂咧……”妈妈说，“心里老是……过不去嘛……”

“你一生，做了数不清的好事。”他宽解说，“不要光想做错的事……”

“唉——”又一声沉重的叹息，“你爸……还是有……主见……”

一句话，把倔倔脾气的父亲唤到他的面前，那个已经离世的老人，现在似乎就蹲在炕下的脚地，咬着烟袋儿，蔑视地瞧着儿子……

“打篮球！演节目！你忘了自个儿的年龄啦？哼呀！六十几岁的老柴火了……”父亲在厦屋的脚地蹲着，喊道，“你跟着他胡整，全不怕乡亲骂祖先！”

他站在院子里，听着厦屋里两个老人之间的一场冲突，够尖锐的了，母亲依然很和气，说：“你是老脑筋，你啥都看不顺眼！”

“事情做得不顺眼，叫人怎看得顺眼？”

“别忘了，那年娃搞农业社，你就看不顺眼，结果呢？老顽固……”

父亲不吭声了。母亲声音不高，回击得十分有力。在办农业社的时光，父亲反对，他的媳妇反对，全家只有母亲支持他……当他办成小河川道第一个农业社，作为青年建设社会主义积极分子，进了北京，一下子把父亲在这个屋里的权威地位动摇了。父亲承认自己是老脑筋、老顽固，只是埋头干活，再不出头干涉儿子的任何举动了……

“可他报下的十万斤产量，打下了没？”父亲又找到有力的事实，反驳母亲，“十万斤粮没打下，得来的是‘瓜菜代’……”

母亲嘿嘿嘿笑了：“你就咬住这件事情不放……”

这件事，那是父亲至今常常引以为荣的事。那年，他在县上报了亩产十万斤的产量，放了最大的一颗卫星，回到白杨寨，动员起男女劳力，挖地一米，肥铺三尺，连夜苦战。父亲在屋里悄悄问他：“十万斤哪，用口袋装满麦子，一亩地铺得一层……”他笑了，“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你别管！”

“把地挖得三尺深，生土全翻到上头来咧，怎能长庄稼？”父亲带着深深的担忧说，“再别糟践土地了……”

每当一家人喝起绿菜糊糊的时候，父亲就用筷子敲起碗，“糟践土地……得下的报应！”

这是父亲最得意的胜利。母亲现在只是嘿嘿嘿笑着：“你就咬住这事不放……娃那会儿是冒了，可也是人家促着他往高报……”

“他的心里没个尺码吗？”父亲不放松，“现在呀，我看冒劲儿又来咧！让几十岁的老人上台演节目，打篮球……胡整！糟践人哩！”

“你爸一生，倔倔脾气，可不做虚事，不做冒失事。”母亲说，“我死了……见了他……”

“妈！”杨生金窒息得喘不过气来，“我……这两年……也常想到那些事……日后再不会……”

母亲紧紧盯着他，胳膊撑在炕上，想坐起来。他扶住母亲的肩膀，慢慢地搀起来。

母亲拢一拢散乱的头发，喘着气，像在运集气力，眼里突然闪出一股异样地神色：

“妈说一件事……”

“你说，妈！”

“你能答应吗？”

“能！”

“你……”母亲聚足力气，终于说出来，“回来务庄稼！”

“这……”他愣住了，真是万万没有想到，不知如何回答，心里惴惴不安，“唔……”

“你想想……好好想想……”妈说，“赶在……妈断气……前一阵儿……给妈一句回话……”

她很吃力地说完这句话，期待地瞧了儿子一眼，松弛的眼皮又覆盖了眼珠，顺势躺下去了。头枕在枕头上，嘴唇紧紧闭着，异样地平静，安详。她终于说出了哽结在心头的一句话，显得轻松了。

他默默地瞧着母亲的脸，胸膛里憋得难受。母亲始终不能原谅自己的过失，她被儿子推到许多熟人和陌生人的面前，做过不大光彩的表演，现在成为难以瞑目的遗憾了。他给亲爱的母亲造成这种心理上的伤害，当时出于什么动机呢？他几乎不敢再看那张平静而安详的脸孔了。

杨生金从炕上轻轻下到脚地，蹑足缓步，走出厦屋的小门。夜很静……

月色朦朦胧胧，洒满山原和河川。坦坦荡荡的田野，平静而安详，像母亲熟睡的脸膛。夜雾潮起来，像土地轻盈的呼吸中呼出的气流，又像母亲头上的银白长发……

那边小塄坎下，是父亲的坟堆，春耕秋翻的犁铧已经将它蚕食得只留下一个象征性的小土圪垯了；再过两年，将被削平，从土地上消失。一辈子在黄土地上抓呀摸呀的老人，已经归宿于黄土了。远远近近那些新的或旧的，大的或小的坟丘，埋葬着白杨寨一辈一代的男人和女人。他们和父亲一样，生在黄土地上，长在黄土地上，在黄土地上挖啊，推啊，犁耕啊，汗水洒进黄土里，几十个夏天和秋天，从黄土地里收获汗水的结晶：谷物，最终又都归于黄土地里去了。

母亲啊，眼看着也要归宿于黄土了！

流逝的岁月可以冲淡一切。过去的都过去了。过不去的却怎么也过不去。

“再别糟践土地了！”

是父亲在呼唤吗?

是母亲在呼唤吗?

土地啊，母亲！

杨生金坐在塄坎上，点燃一支烟，沉思起来……

1982年1月 灞桥

霞光灿烂的早晨

不管夜里睡得多么迟，饲养员恒老八准定在五点钟醒来。醒来了，就拌草添料，赶天明喂完一天里的第一槽草料，好让牲畜去上套。

他醒来了，屋子里很黑。往常，饲养室里的电灯是彻夜不熄的，半夜里停电了吗？屋里静极了，耳边没有了缰绳的铁链撞击水泥槽帮的声响，没有了骡马踢踏的骚动声音，也没有牛们倒嚼时磨牙的声音。炕的那一头，喂牛的伙伴杨三打雷一样的鼾声也没有了，只有储藏麦草的木楼上，传来老鼠窸窸窣窣的响动。

唔！恒老八坐起来的时候，猛乍想起，昨日后晌，队里已经把牲畜包养到户了。那两槽骡马牛驴，现在已经分散到社员家里去饲养了。噢噢噢！他昨晚睡在这里，是队长派他看守一时来不及挪走的农具、草料和杂物，怕被谁夜里偷了去。

八老汉拉亮电灯，站在槽前。曾经是牛拥马挤的牲畜圈里，空荡荡的。被牛马的嘴头和舌头舔磨得溜光的水泥槽底，残留着牲畜啃剩的麦草和谷秆。圈里的粪便，冻得邦邦硬，水缸里结着一层麻麻花花的薄冰。

忙着爬起来干什么呢？窗外很黑，隐隐传来一声鸡啼，还可以再睡一大觉呢。屋里没有再生火，很冷。他又钻进被窝，拉灭电灯，和衣躺着。合上眼睛，却怎么也不能再次入睡……

编上了号码的纸块儿，盖着队长的私人印章，揉成一团，掺杂在许多空白纸块揉成的纸团当中，一同放到碗里，摇啊搅啊。队长端着碗，走到每一个农户的户主面前，由他们随意拣出一只来……抓到空白纸团的人，大声叹息，甚至咒骂自己运气不好，手太臭了！而抓到实心纸团的人，立即挤开众人，奔到槽头去对着号码拉牲畜。一头牛，一头骡，又一匹马，从门里牵出来了，从秋天堆放青草的场地上走过去，沿着下坡的小路，走进村子里去了。

队里给牲畜核了价，价钱比牲畜交易市场的行情低得多了，而且是三年还清。这样的美事，谁不想抓到手一匹马，哪怕是一头牛哩！恒老八爱牛，要是能抓到一头母牛，明年生得一头牛犊，三年之后，白赚一头牛了，唉唉，可惜！可惜自己抓到手的，是一只既不见号码，也不见队长印章的空白纸团……

不知从哪个朝代传留下来抓阄的妙法，一直是杨庄老队长处理短缺物资的唯一法宝。过去，队里母猪生了崽，抓阄。上级偶尔分配来自行车、缝纫机或者木材，抓阄。分自留地、责任田，抓阄。十年不遇的一个招工名额，仍然抓阄。公道不公道，只有阄知道。许多争执不下的纷扰，都可以得到权威的解决。老好人当队长，为了避免挨骂和受气，抓阄帮了忙。虽然没能得到一头牲畜，恒老八不怨队长。队长本人也没抓上嘛！

“老八，你今晚……在饲养室再睡一夜。”分完牲畜，队长说。

“还睡这儿做啥？”恒老八瞅着牛去棚空的饲养棚。

“看守财产。”

“你另派人吧！”老八忽然想到，在没有牲畜的饲养室里，夜间睡下会是怎样的滋味儿哩！

“你的铺盖还在。省得旁人麻烦……”

吃罢晚饭，老八像往常一样，在蒙蒙的星光下，顺着那条小路走到远离村庄的饲养场。他坐在炕头，一锅连一锅抽旱烟，希望有人来这儿说说闲话，直到他脱衣落枕，也没有一个人来叩门。往昔里，饲养室是村里的闲话站。只有伙伴杨三的儿子匆匆进来，取走了他老子的被卷，一步不停地转身走了。杨三抓到手一头好牛，此刻肯定在屋里忙着收拾棚圈和草料，经管他的宝贝牲畜哩！

杨三抓到的那头牛，是本地母牛和纯种秦川公牛配育的，骨架大，粗腿短脖颈，独个拉一具大犁……八老汉早在心里祈愿，要是能抓到这头母牛就好了，可惜……这牛到了杨三家里，准定上膘，明年准定生出一头小牛犊。人家的小院里，该是怎样一种生气勃勃的气派……他嫉妒起杨三来了。

满打满算，杨三不过只喂了两年牲畜，却抓了一头好牛。杨恒老汉整整喂了十九年牲畜了。“瓜菜代”那年，队里牲畜死过大半，为了保住剩下的那七八头，队长私自分到社员家保养。养是养好了，上级来人却不准分，立时叫合槽。大伙一致推选他当饲养员。经过干部社员的商议，为了给原坡上的田地施肥方便，咬着牙把饲养场从村里搬迁到坡上来了。

从新盖起的饲养场到小小的杨庄，有两华里坡路。青草萋萋的地塄上，他踩踏出一条窄窄的小路；阴雨把小路泡软了，一脚一摊稀泥；风儿又把小路吹干了，变硬了，脚窝又被踩平了。日日夜夜，牛

马嚼草的声音，像音乐一样和谐悦耳；牛马的粪便和草料混合的气味灌进鼻孔，渗透进衣裤的布眼儿……

这样的生活今天完结啰！从明天开始，他就要在自个儿的责任田里劳作了；晚上嘛，和贤明的老伴钻进一条被筒，脚打蹬睡觉啰！整整十九年来，他睡在原坡上的这间饲养棚里，夏天就睡在门外的平场上，常常听见山坡沟壑里狼和狐狸的叫声。想起来，他自觉尚无对不起众社员的地方。集合起来的那七八头牲畜，变成了现在的二十头，卖掉的骡驹和牛犊，已经记不清了。可惜！没有抓到一头……

挂在木格窗户上的稻草帘子的缝隙里，透出一缕缕微微的亮光。山野里传来一声声沉重的哼哧声，伴和着车轮的吱吱响，响到屋后的小路上来了。谁这样早就起来干活呢？家伙！

一听见别人干活，恒老八躺不住了。他拉亮电灯，溜下炕来，一边结着腰里的布带，一边走到门口。他拉开门栓，一股初冬的寒风迎面扑来，打个寒颤，走出门来，场地上摊开的草把把上结着一层霜。地塄上的榆树和椿树，落光了叶子的枝丫上，也结着一层厚厚的白霜。灰白的雾气，弥漫在坡坡沟沟上空，望不见村庄里高过屋脊的树梢，从村庄通到原坡上来的小路上，有人弓着腰，推着独轮小车，前头有婆娘或女儿肩头挂着绳拽着。那是杨云山嘛！狗东西，杨庄第一号懒民，混工分专家，刚一包产到户，天不明就推粪上坡了，勤人倒不显眼，懒民比一般庄稼人还积极了。好！

八老汉鄙夷地瞅着，直到懒民和他的婆娘拐进一台梯田里。他想笑骂那小子几句，想想又没有开口。懒民在任何人当队长的时候，都能挣得全队的头份工分，而出力是最少的；懒民最红火的年月，是乡村里兴起凭唱歌跳舞定工分那阵儿……好！一包产到户，懒民再也打

不到混工分的空隙了！看吧，那小子真干起来，浑身都是劲哩！既然懒民都赶紧给责任田施冬肥，恒老八这样的正经庄稼人还停得住么?回，赶紧回去。“冬上金，腊上银，正月上粪是哄人”。要是捂下一场雪来，粪土就不好进地了。

恒老八返身走回屋里，把被子卷起，挟在腋下，走过火炕和槽帮之间狭窄的过道，在尽了最后一夜看守饲养室的义务之后，就要作永久性的告别了。回头一望，地上撒满草屑，以及昨日后晌抓阄分牲畜时众人脚下带来的泥土，扔掉的纸块，叫人感觉太不舒服了。老汉转过身，把被子扔到炕上，捞起墙角的竹条长柄扫帚，把牲畜槽里剩下的草把把扫刷干净，然后从西头扫起，一直扫到门口。他放下扫帚，又捞起铁锨，想把这一堆脏土铲出去。刚弯下腰，肩膀猛地受到重重的撞击，铁锨掉在地上了——一匹红马，扬着头，奔进门来，闯到圈里去了。

恒老八呆呆地站在原地，盯着红马闯进圈里，端直跑到往常拴它的三号槽位，把头伸进槽道里，左右摇摆，寻找草料，打着响鼻，又猛地扬起头来，看着老八，大约是抱怨他为啥不给它添草拌料?

老汉鼻腔里酸渍渍的，挪不开脚，呆呆地站着。红马失望地从圈里溜达出来，蹄下拖着缰绳，站在老八跟前，用毛茸茸的头抵他的肩膀，用温热的嘴头拱老八的手，四蹄在地上撒娇似的踢踏。

八老汉瞧瞧红马宽阔的面颊，慢慢弯下腰，拾起拖在地上的缰绳，悄悄抹掉了已经涌出眼眶的泪水。这匹红马出生时，死了老马，是他用自家的山羊奶喂大的（队里决定每天给他五角钱羊奶的报酬）。这匹母马，已经给杨庄生产队生过三头骡驹了。

“哈呀，我料定它在这儿！”

八老汉一抬头，红马的主人杨大海正从门口走进来，笑着说。

“整整踢腾了一夜。嘿呀呀！闹得我一夜不敢合眼。好八叔哩，你想嘛，八百块，我能睡得着吗？”杨大海咧着大嘴，感慨地叙说，“天明时，我给它喂过一瓢料，安定下来，我才躺下。娃娃上学一开街门，它一下挣断缰绳，端直往这儿跑！”

“唔！”恒老八一听，心里又涌起一股酸溃溃的东西，支吾着。红马大约还不习惯在大海家窄小的住室里过日月吧，马是很重感情的哩！

杨大海表示亲近地抚摸一下红马披在脖颈上的鬃毛。红马警惕地一摆头，拒绝大海动手动脚。大海哈哈一笑，说：“它亲你哩！八叔。”

“给马喂好些，慢慢就习惯咧！”恒老八把缰绳交到大海手里说，“回吧！”

“唉！要是我能抓到一头牛就好咧！”大海接住缰绳惋惜地说，“‘八百块’拴在圈里，出门一步都担心。人说务马如绣花。把我的手脚捆住了，出不了门咧！女人家喂牛还凑合，高脚货难服侍……”

话是实话。八老汉信大海的话。大海是个木匠，常年在外村盖房做活，多不在家，屋里一个女人，要养一匹马，也是够呛的。万一照顾不周到，损失不是三块两块。

“要是你能抓到这红马，那就好哩。你一年四季不出门，又是牲畜通。一年务得一匹小驹儿，啥收入？”大海说，“却偏偏又抓到我手

里。”

假话！八老汉在心里肯定。昨天大海一抓到红马，连停一步也不停，拉回屋去了。他即使真不想养，怕耽搁了他盖房挣钱的门路，也不会把马转让给别人的。敢说像红马这样的头等牲畜，一上市，准保卖过千二，净捞四百，大海是笨人吗?

“那……你转让老叔养吧！”老八故意试探一下精明的大海，“咋样？”

“嘿嘿嘿嘿嘿！”大海笑起来，不说话了，半晌才支吾说，“暂时先凑合着。嘿嘿嘿嘿嘿……”

“快走吧，咱俩都忙。”

看着大海拉着红马，走出门，呵斥着趔趔趄趄的红马，下了坡，他反过身，咣当一声锁上门，夹着被卷，走出饲养场的大院了。

天明了，初冬清晨常有的灰雾似乎更浓了。从村庄通原坡梯田的土路上，男男女女，已经穿梭般往来着推车挑担的社员。土地下户，闲了干部。不用打铃不用催，你看一个个男女腿脚上那一股疯劲儿！

恒老八下了坡，刚到村口，老伴迎面走来：“你不看看，人家都给麦地上粪哩，你倒好，睡到这时光！”

“咱也上嘛！”老八说，“回去就干。”

老伴是贤明的，也不再多舌，转身就走。

“八叔——”玉琴跑着喊着，挡在当面，“我那头黄牛，不吃草咧。你去给看看——”

恒老八瞧着玉琴散乱的头发，惊慌的神色，心软了。男人在县供销社工作，她和婆婆拖着俩娃娃，还好强地要养牛。三十出头的中年媳妇，大约从来也没喂过牲口哩！现在却养牛。

不等老八开口，八婶转过身来：“各家种各家的地，过各家的日月了。他给你家去看牛病，谁给他记工分？”

“你这人——”老八瞪起眼，盯着老伴，这样薄情寡义的话，居然能说得出口来，还说她贤明哩！

“好八婶哩！八叔给牛看病，耽搁下工夫，我——”玉琴难为地说，“我哪怕给你老纳鞋底儿——顶工哩！”

“净胡说！”老八摇头摆手，“话说到哪里去了。”

“嗨呀！我说笑话嘛！”八婶勉强笑笑，算是圆了场，转身走了。

在一明两暗的三间大房中间的明间里，过去是招待来客的地方，现在拴着大黄牛，草料临时搅拌在淘洗粮食的木盆里，地上堆着黄牛的屎尿。

玉琴的婆婆站在院里，慌慌乱乱地向老八抱怨儿媳妇：“我说咱家里没男劳力，养不成牛。铡草起圈，黑天半夜拌草，你一个屋里家，咋样顾揽得起！玉琴偏不听，非要抓阄不可。你看看，现时弄得牛要麻达……”

“你先甭嘟囔我，让八叔给牛看看。”

玉琴顶撞婆婆，“你儿子要是一月能挣回七八十，我才不爱受这麻烦哩！”

老婆婆噘着嘴，站在一边不吭了。

玉琴的男人在县供销社工作，挣得四五十块钱。屋里老的老，小的小，年年透支一百多，这个好强的媳妇，在家养猪养鸡，上工挣分，比个男人还吃得苦。看着别人都抢着抓阄，她知道牛马价钱比市场上便宜，也抓，一抓就抓了一头黄牛。八叔很赞成这个泼辣勤苦的年轻媳妇。他不好参与婆媳俩的争执，径自走到黄牛跟前去了。

老八一把抓住牛鼻栓，一手拉出牛舌头来，看看颜色，放开了，又捏一捏牛肚子，摸摸耳朵，转过身来，那婆媳二人愣愣地站在那里，大气不出。他从腰里摸出一只布夹，抽下一支三棱针，抓住牛耳朵，放了血，命令道:“取两只烂鞋底，点一堆火。”

老八接过玉琴递来的鞋底儿，在老人点燃的麦秸火上烤着，直到烤得鞋底热烫，再按到黄牛肚皮上，来回搓揉。

“你照我的办法，就这样熨搓。”老八叮嘱玉琴说，“到吃早饭时，我再过来看看，好了就好了，不行的话，再拉到兽医站去。”

“你甭走，八叔——”玉琴担心地说，“我怕——”

“甭怕。没事。”老八笑笑，宽解地说，“牛夜里受了点凉气，没大病。往后把屋子收拾严点。”

“没事就好。老八，甭走！”老婆婆已经端着一只碗从灶房走来了，“你吃点。”

“啥话嘛！”老八一瞅递到胸前来的碗里，沉着三个荷包蛋，大声谢绝。他在饲养室里多少次治好牛马的小伤小病，也就是那么回事了。给社员的牲畜小施手术，就受到这样的款待，真是叫八老汉感慨系之。他大声说，“给娃娃吃！我一个老汉，吃鸡蛋做啥？”

婆媳二人，挽留不住，左右两边厮跟着，说着感恩戴德的话，送到门口。八老汉受到这样诚心实意的送行，反倒觉得别别扭扭，刚一出街门，头也不回，只摆摆手，大步走了。

恒老八倒背双手，在杨庄街道里走着。走到杨社娃庄院门口，他看见社娃年近七十的老子杨大老汉，正挑着一副担笼从门里出来。没良心的杨社娃把孤独一人的老子扔在老屋里，领着婆娘和儿子住到新盖的三间新房里来，两年多了，不给老汉一分零用钱，气得老汉到公社去告状。杨大老汉怎么在儿子的新房里出出进进呢？他不是在杨庄街道里大声嘲骂过儿子是“杂种货”吗?

杨大扔下担笼，向老八招手。

“你看狗日鬼不鬼！”杨大说，“昨日后晌抓到一头牛，不等天黑就跑过去，把我拉过来，要我跟他一起过活！”

“唔呀！”老八真是意料不到。

“想叫咱给他当马夫！”老大一针见血指出，“你当那小子良心发现咧？鬼！”

“那你为啥要过来呢？”老八笑问。

“唉！总是咱的种嘛！”老八粗鲁地说，“看着他不会服侍牲畜，咱心里也过不去。再说，娃低头认错了，那婆娘也……唉，和儿女置得

啥气嘛！”

“对对对！”老八附和说，“总是亲生骨肉哩！”

“他图得有人管牲畜，我图得能吃一口热饭。”老大说，“混到死算咧！”

老大的口气是舒悦的，老八听得出，看得到，这可真是杨庄的一桩新闻哩！人都争着干哩，老八感到一种不寻常的气氛在杨庄村巷里浮动。

“刚才，公社郑书记在门口碰见我，问你哩！”老大说，“说不定现时正在你屋等你。”

“郑书记？找我做啥？”老八说，“现在还有啥公事哩？”

老八磕了烟灰，朝村子西头走，老远就看见郑书记站在自家门口的粪堆前，帮老伴敲碎冻结的粪疙瘩，还笑着说着什么。作为模范饲养员，郑书记给他戴过花，发过奖状，现在还贴在屋里正面墙上。现在，土地分户种了，牲畜分户养了，郑书记到村里来，还有啥事可干呢？

“老杨，听大海说，你见了红马，还落了泪？”郑书记哈哈笑着，“是吗？”

老八咧着嘴，不好意思地笑笑。

“我信哩！你为那些四条腿熬费过心血，有感情哩！”郑书记蹲下来，掏出烟袋，“我倒是想，你们杨庄不分牲畜行不行？已经分槽的那些队，有利也有弊。好处是人人都经管得用心了，牲畜肯定能养好。

不利的是，家家都添了许多麻烦，特别是没男劳力的家庭，不养牲畜，地不好种；养吧，很费事劳神哩！我倒是想在杨庄试一试，牲畜集体养，是否更好些？这儿，有你这个老模范，其他队比不得。”

“已经分了。”老八说，“分了好。”

“我来迟了一步。”郑书记说，“算了。”

“土地下了户，牲畜不分不行咧！”老八说，“用起来不好分配。”

他给郑书记举出一桩事例来——

去年，队里抽出两犋牲畜给社员种自留地。轮到杨串串的时候，那家伙天不明拉走牲畜，直到半晌午还不见送回来，急得八老汉赶到地里，天爷呀，老黄牛累得躺在犁沟里爬不起来，杨串串手里抡着鞭子，牛身上暴起一道道鞭子抽击后的肉梁，嘴里吊着一尺长的涎沫，浑身湿透。

“你想想，现在土地下了户，家家户户地更多了。不分行不行？”老八叙说了这件使他伤心的事，慨然告诉郑书记，“前日，队长征求我的意见，问牲畜分不分？我说分，坚决分；分了自家都知道爱惜牲畜。要不，扯皮闹仗的事才多哩！”

郑书记点点头，表示同意老八的意见：“这是各队分牲畜的主要原因。”

“问题是，现在好多三十来岁的年轻社员不会喂牲畜，特别是高脚货（骡马）。”郑书记又说，“问题很普遍。我今日来，想请你到咱公社广播站，讲讲牛马经。”

“我说不了话……”老八着实慌了。

“好多人要求请你讲哩！”郑书记说，“我还想办业余农校哩！土地包产到户，社员要求科学种田心切！往常，挣不操心的工分，糊里糊涂种庄稼，土地一分到户，好多年轻人连苗子的稀稠都搞不准，甭说高产了。”

“倒是实话！”老八说。

“我还得找队长，要帮社员安排好牲畜棚圈，不能一分就不管了。”郑书记说，“一言为定，明天晚上到公社来，我在广播站等你。讲一小时两块，按教授级付款！”

太阳已经升到碧蓝的天际，雾气已经散尽，冬日的阳光，温暖灿烂，街道里的柴火堆，一家一户的土打围墙，红的或蓝的房瓦，光秃秃的树枝，都沐浴在一片灿烂的晨光里。

“跟你商量一件事。”走进房，恒老八蹲在灶锅跟前，对着扑出灶膛的火焰点着旱烟，给老伴说，“咱得买牛。”

“钱呢？”老伴停住了拉风箱的手。

“不是有嘛！”

“那是给娃结婚用的。”

“缓半年。”老八说，“先买牛。庄稼人不养牛，抓摸啥呢？”

“那得一疙瘩钱哩！”

“暂时紧一紧。一年务育一头牛犊，两年就翻身了。现时处处包产到户，牛价月月涨。”老八说，“放心，我没旁的本事，喂牛嘛，嗨嗨……”

老伴从灶下站起，揭开锅盖，端出一碗荷包蛋，放到老八面前。五十多岁的老妇人，居然嗔声媚气地说：

“吃吧，吃得精神大了，再满村跑着去给人家看牛看马……”

老八却像小孩一样笑眯了眼睛。

1982年5月15日改定 延安

绿地

春天里一个平平常常的星期六下午，河口公社党委副书记侯志峰骑着自行车回到家里。

刚进大门，两个孩子大约听见车子响，一齐从后院奔过来，抢他挂在车头上的黑提兜。

“一人一个。”侯志峰取出面包来，笑着塞到孩子手里。虽然工资不高，每周六回家，总要买点糖果什么的，以便让盼望爸爸归来的孩子不致扫兴，已经习惯了。

娃子和女儿的脸颊上鼓起来。吃着乡村里粗食淡饭的孩子，对于软乎乎的面包，馋是很自然的。他拍拍这个的背，又摸摸那个的头，是一种做父亲的幸福感觉。一接近四十这个年龄，他觉得自己更贴着孩子了。

“回来了，侯书记。”

踏进里屋，一位陌生的老年农民笨拙地从椅子上立起，殷切地和他打招呼。

“这是汪水寨我妹子家的门中叔。”妻子秀绒给他介绍说，“等你半天了。”

肯定是求他办事。好多人求他办事，不去公社机关，专等周日赶到家里来，弄得他不得安宁。家里有自留地，又养着猪，好多活儿要趁假日劳作哩！

“有啥事？”他问，想尽快打发他走。

来人开始诉说，啰啰唆唆，前后重复，总算说清了一件事：他的儿子在本大队小学当民办教师，有四五年教龄了。支部书记现在正串通校长，要把他的儿子解雇，再把自己的女儿（去年秋天刚刚从高中毕业），填补进去。

“事情做得太可憎咧！”来人十分愤恨，“我是平头百姓，实实没有办法……”

这是可能的。干部利用职权，搞些乱七八糟的事，在他们公社的几十个大队里，时有发生。他干脆地回答说：“你说的要是属实，我负责解决。下周上班后，我了解一下再说。”

“你歇息。”来人站起告辞了，“你在公社辛苦……”

他解开自己的黄帆布袋的结绳，把一盒点心放在桌子上。

“甭弄这号事！”侯志峰死死抓住他的手，要把点心盒盒塞进帆布袋里去，“这算做啥？”

“咱是亲戚，我头一次上门。”他说，“咱这儿的风俗，‘空手不进亲戚门’嘛……”

“留就留下。”妻子说，“又不是外人！”

侯志峰松了手，羞得把脸转到一边去。他的女人秀绒，文化不高，体魄壮健，常常显示出比他更能吃苦，挣得队里妇女们的头等工分，又养猪养鸡；就有一样不好，总是收留来人带着的东西，使他对她尊重爱怜的感情里，常常蒙上一层龌龊的阴影。眼窟窿太小咧！

送走客人，两口子回到屋里，几乎同时愣了：娃子一手拿着点心，一手攥着一把十元票子，扬得高高，给爸爸妈妈炫耀自己的发现："点心盒里……"

"放下。"侯志峰明白了，脸色也变了。

"给我。"从儿子手里抓过钱，脸色也变了，压低声儿警告儿子，"出去甭胡说，耍去！"

儿子大约感到了这件事具有严重的神秘性儿，悄悄走出门去了。

"多少？"候志峰问。

"一百。"秀绒答。

"给我。"

"做啥？"

"还给人家嘛！"

"跟得上。"她把钱装进内衣口袋，转身出门的时候，回过头来，"我去借架子车，赶天黑给猪圈拉两车土。你在屋歇着。"

他惶惶不安。这件意料不到的事，破坏了他回到家中的愉快情绪。他在屋里打转转，坐不住也躺不稳，听见街巷里有架子车拉过的哐当声，他想到土壕里去，和妻子秀绒把话说透。

刚出门，碰见驼背二叔。二叔青筋突暴的胳膊上，挎着葛条大笼，笼里装着整翻稻田时拾下的稻根和水草。

“峰，叔问你一句话。”二叔神秘的样子，“听说……要分地分牛？”

“唔，是实行责任制。”他淡淡地说，心里有点不安然，“咱们公社也准备实行哩！”

“你是懂政策的人。”二叔说，“这是真的？”

“真的。”他说着，心不在焉，“我要去……拉土。”似乎有一股愧对江东父老的隐情……

村子西边的黄土坡根，是整个村子居民取土的黄土壕。秀绒面对土崖，挥动着镢头，她进入中年以后，腰粗了，腿壮了，抡镢挖土的姿势像一个强悍的男人。

他走到土壕里，捞起铁锨，把秀绒挖下的黄土铲起来，装进架子车的木板车厢里。在这里，远离村庄，没有外人，也没有孩子，两口子啥话不能说呢！

“秀绒，那个钱……咱们不能收。”

她挖下一镢，吭哧一声，扑下一块黄土。

“这是贿赂，违犯纪律，我会挨挫的！”

她又挖下一镢，吭哧一声，不搭话茬。

侯志峰想，应该给她讲她能听懂的道理：“你爱看戏，好多戏里头，都有个白脸白鼻的奸臣、贪官，遭人痛骂哩！”

她仍然头不转，手不停，继续挖着。

“我是党员，大小算个负责干部，不能自己往自个儿鼻脸上抹白。又是在本地工作……”

“哼！”秀绒终于停住挖土，转过身，手拄镢把，讥诮地说，“咱村玉玲的阿公，在西安百货公司当经理，你去人家屋看看，吃的啥？穿的啥？一米料子三毛钱，还不跟白拿一样。仙惠男人在县上工作，拉了一车木头，只花了一顿饭钱……你当得好大的官，吓死了！”

“各人是各人的事嘛！”他耐心地给女人解释，“社会复杂，什么样的人都有。钱呢？应该还给人家。”

“迟了！”秀绒早有准备似的，“我交给出纳了。”

“你……”他急了，瞪起眼。

“欠队里的粮款，赶收麦交不齐，不给分口粮。”秀绒揶揄说，“你脸上搽红也好，抹白也好，我不管！我跟娃娃要吃粮，你挣三十九块五，好多的钱呀！你革命，你清官，你红脸忠臣——你羞你先人！”

“你——”侯志峰气得脸色煞白，把锨往地上一扎，嘴唇哆嗦，说不出话来。

“朝这儿扎！”她把胸脯一挺，“跟你过的这种烂穷日子，早够了！”

他狠狠地盯了一眼那张不顾一切的脸，厌恶地急转过身，甩掉铁锨，走出了土壕。

侯志峰没有吃饭就躺下睡了。一双儿女，早已响起匀称的出气声。秀绒坐在脚地小凳上纳鞋底，麻绳穿过布鞋鞋底的嗞嗞声，令人

心烦。如果老婆是一位深明大义的女人，他将会把钱送还那位农民，轻轻儿批评他几句，也就完了。自己的家里绝不至于弄得这样气氛不协调。

秀绒熄了灯，在他身边躺下来。

“你的心太窄，胆太小咧！”她爱怜地说，胸脯贴着他的臂膀，劳动过的粗糙的手掌抚着他的胸脯，给他宽心消气，“这事嘛，你给他娃把‘民办’问题解决了，他敢给人说吗？一个民办教员的事，还不是你一句话吗？本来没事的小事，你看得比天大！”

心窄吗？即使心怀宽阔到能容纳高山大河，也不能有一块角落藏污纳垢。侯副书记要是在公社党员干部会上，会这样深刻而生动地演讲的。现在，说着这种错话的，是他的老婆，一个农村妇女中的黏浆子，她才不管他是堂堂的人民公社党委的副书记呢！她敢碰撞他，她也爱抚他；急了，她敢开口骂他。他怎么办？他们经人介绍见面时，她怯生生坐在屋子的角落里，羞得抬不起头来，一个实实在在的农村姑娘，生养了两个孩子，当了四口之家的家庭主妇，现在泼辣而蛮不讲理了！她一晌不缺地挣工分，一会儿不闲地忙里忙外，为一分钱和卖菜的人争呀吵呀，丢了一个鸡蛋在街巷叫骂……他给她讲了多少道理，她反倒越来越泼了，“农业社里时兴的是恶人！老好人尽受欺侮！”

唉唉，有什么办法呢！他把她压在自己胸脯上的粗壮的胳膊挪下来，哎嘘一声，做出决定，算了！不必再惹这位“惹不起”了……

窝窝囊囊地过完了星期天，周一清早，侯志峰出了家门，上班去了。他发觉，他的精神处于一种难以控制的敏感状态中。

“侯书记，起得早！”

“老侯，上班呀！”

……

和他打招呼的人中，有的是他中学时期的同学，有的是邻村的乡党。他是当地人，又是当地地方党的基层组织的负责干部，熟人老友总是以尊重的口气和他说话。他却不敢把眼光在那些热情的脸上久留，只是勉强地装出一副生硬的微笑，支应过去了。那些通过合法的或非法的手段，贪馋地吞食人民的财富的家伙，居然能够心安理得地奢谈革命和道德，他佩服他们了，那也是一种本领，需要怎样的力量来保持自我的心理平衡呢?

走到公社机关门口，四方水泥柱上，挂着中国共产党河口公社委员会的白底红漆大字的牌子，心里觉得更愧了。往常，出出进进，似乎不大留神，今天，那牌子上的红字显得特别显眼了。

初夏的清晨，微风吹动泡桐树的绿叶，公社小院里很静，好多门上挂着铁锁，他无疑是早到者。

办公室小乔把一卷夹着公文的卷宗放到桌上，笑笑就走了。

他打开卷宗，看看有什么急件需要立即办理。隔了一个星期日，又是这样厚一摞公文，人民公社包揽多少事情呀！

大清早，院子里就吵闹起来。两个农民，撕扯着走到他的门口，其中一个满脸血污。

“侯书记，你看，他把我打成……”满脸血污的社员在陈诉，“哎呀——”

“你甭给我赖账！”另一个更硬，“他把鼻血抹到脸上，装哩！”

问问缘由，不过是分粮中有五斤差错，一场不大的官司。侯志峰说：“先到卫生院去擦洗了血，有伤包扎了，再来说话。”

两个社员出门以后，他又坐下来。五斤小麦，值不到一块钱，打得头破血流。一百块钱，白送来，偷偷夹在点心盒子里。一百块钱能买多少小麦呢？他将怎样出以公正之心去评判这个意思不大的经济纠纷呢？

卷宗里有一份通报，是县委发出的打印件，地处秦岭山区的岔子公社的一位副社长，参与了盗伐森林的活动，给开除党籍了。通报前面有县委加的按语。要求在各级党员会议上传达，以示警诫。党的纪律是无情的。挂着共产党的招牌去干危害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的投机分子，迟早会被剔除出党的队伍……党委书记老严已经批阅过了，要他在全社党员会上讲读。他是分管党委组织和宣传工作的……

必须卸下这个精神负担！唯一挽回的办法，就是立即还清那一百块钱。既不能让老婆知道，也不要给组织说了。组织上倘若一宣传，却可能引起家庭的矛盾。家庭矛盾闹得他早已疲倦了。他不怕她，无非是他比她更顾及影响，想得更多些罢了。算了，只要自己良心上能过去就行了！

急急赶到汪水寨村口，侯志峰跳下自行车。他至今不知道妻子妹妹家的门中叔叔的名字。民办教师是有目共睹的一个职业，他打问出来，民办教师的父亲叫汪生俊。

汪生俊正在院里的猪圈旁抛土垫圈，扔下锨，笑嘻嘻地推让他坐到厦屋里。

“你所反映的问题，我负责去调查解决。”侯志峰坐下，把汪生俊硬塞到手里的纸烟接住，又搁在桌子，他不会抽烟。“问题是会得到合理解决的，你放心。”

“没掺得一点假，你尽管调查。”汪生俊说。

“这个——钱，”侯志峰从内衣口袋掏出十张十元票，放到桌子上，这是他刚刚借来的，“点点你的钱数。”

“这——唉！”汪生俊慌忙抓起钱，又塞回他的手里，连他的手一齐抓紧不放，“你这人——”

“放开手！”侯志峰生气了，恼怒了。他讨厌那张巴结的笑脸，即使他反映的问题属实，他也令他讨厌了！他给他的家庭平添了麻烦，害得他活活儿受了两天煎熬。“你再不听劝，我就把这钱交到县上去！”

汪生俊的手松了，起先是愣神，后是吃惊，随之就尴尬绝望了。

“我走了。”侯志峰站起身。

浑身轻松自如了，心儿又稳稳实实地落到实处，正常地有节奏地搏动着。他扬起头，走出汪水寨的村巷，行走在乡野间的黄土路上，高原上的初夏时节，梯田里卷迭着一层层绿浪，点缀着几株桃树和杏树的墨绿色的帐篷，落日前的一瞬，正呈现出一派绚烂的色彩。他踏着自行车，朝中心小学的方向驰去。

实在料想不到，汪生俊本人就是大队支书的近门哥哥，他的儿子原来进学校当民办教师，凭借的就是支书哥哥的权力。他的儿子不仅没有体音美方面的特长，连一、二年级学生也组织不到一起。他在十年动乱中读完小学和初中，严格地说，他本人现在应该坐到四年级教室里去重新学习。

问题不是很简单吗?

现在唯一的问题，就是如何归还一百元欠款的债务了。

每月开资以后，他照例把二十元钱交给秀绒，由她去安排家庭的吃穿用度，留下十九元五角。要是每月节约出十块，需得十个月，要是咬咬牙，每月节约下十五元呢，七个月就做到了。公社的伙食是很便宜的，一周吃一次肉，平时一天花一毛钱菜金，他毫不踌躇地把每周一次的一顿肉食缩减了。

困难的是由他参加的会议太多了，每周几乎都要进一二次县城，盘费是一个很难避免的开销，人下了狠心，办法总是可以找到的。他在会前赶到县城，端直走进牛羊肉煮馍馆，站在只有一只拳头大的售票窗口前，递进五毛毛票，说:“要小份。三个饦饦。”小份三毛，烧饼一毛五，四毛五分钱就可以饱餐一顿了。国家财经纪律给干部规定，在本县出差，凭发票每天补助四毛伙食费，他只需花销五分钱，这是早就预算好了的。

接过售票员从窗口塞出来的票卷儿，他不急走，在屁股后面拥挤着的买票者前头，仍然认真地说:

“给一张发票。”

他吃得很满意，然后走进县委礼堂坐下，取出笔记本，拧开水笔，把县委关于某项工作的安排意见详细记录下来。他不羡慕任何衣着上比他阔绰的同行，也不参与议论市场上新添了什么文明家具和时装。他按自己三十九元五角的生活水准生活着。他坐在会场里的靠背连椅上，端端正正，既不傲慢，也不畏缩。工资收入低微，穿着袖肘上和屁股上都纳着补丁的中年的党的工作者，精神上并不比任何在座的同志低下或空虚，收入的多少，吃穿的优劣，并不决定人存在的价值。

他的水笔在日记本的细格上移动，记录着县委领导的指示，什么还账借债的事，早已逃匿得无影无踪啰。

春去秋来，他已经攒下七十多元钱了，恰好上级给公社干部增加了一项下乡补助费，办公室小乔一次给他送来三十块，说是累计前半年的总数。他喜出望外，立即凑够一百元，一举还清了债务。窝在心里的那一汪污水，至此彻底荡除干净了！

他特别思念孩子。半年多来，每周六回家，给孩子的少许糖果也节约了。此刻，他感到未免太苛刻了，孩子毕竟是孩子，谁小时候又不贪嘴呢？尤其是乡村里的娃娃，本来就已经够节俭的了。他走进供销社，买了一块钱的糖果，破费了，今天应该回家去看看。

家家冒炊烟，柴烟萦绕在村庄的上空，形成一幕淡蓝的雾团。伏后的阴天晌午，溽热溽热。他走进院子，看见女人坐在灶下烧锅。他停住自行车，呼儿子，唤女儿，俩娃睁着淡漠的眼睛，迟疑地走到跟前来，他俩早已不指望父亲会给他们带来什么口福了。

“吃糖。”他把纸包解开，放到桌子上。

俩娃立即欢蹦起来，叫爸爸时声音也甜了。

灶房里的风箱劈劈啪啪响着，分明是有意摔打的声音；碟碗在案板上很不安生地碰撞，声音十分刺耳，这是女人向他挑衅的先兆。

他的快活的情绪被破坏了，又是什么不顺心的事？或是她蓄意要引起纷扰呢？明显是蓄意的！他不吭声，等待事态的发展。

“抬水去！”她吆喝孩子，“我一天挣死累死，侍候死人哩！”

俩娃怯生生地低下头，不吃不嚼了。

“咋回事呀？”他不能不搭话了。

“滚！”她走进里屋来，呵斥孩子，“抬水去！”

孩子相继出了门。

“我问你……你做得好大方的事呀？”她显然早已经忍受不住，“你瞒着我……你……”

她隐约提到那一百元的事，说她要不是今天早晨去妹妹家，她要被他瞒哄一辈子了！

侯志峰一听还是为那一百元的事，心中骤然蹿起一股火气。半年来，他为积攒一百元，受了多少艰难！他不责难她，已经够宽容的了；她反倒向他挑事逗火，太不像话了！他还要在河口公社工作，日后难免再次遇到类似点心盒里夹钞票的事！要是由她收受贿赂，由他悄悄节约还债，那还得了吗？既然她不甘罢休，就此把话说明，说明了好。看来夫妻间的某些矛盾，不是忍让完全能够解决问题的。

“屎巴牛站粪堆，生装得大货！”秀绒开始出言不逊，“挣得三十几块钱，养不活婆娘娃，还当自己能上天，能入地……”

“秀绒，冷静一下。”他压着火，不想吵吵闹闹，惹人笑话，“有话慢慢说，咱们说清白，也好……”

“人家给你个小官帽，你当你做了皇上！看看你祖坟里也是没得脉气！”她的嘴巴好残火，连挖带损，“人把你当人敬，你偏不识抬举！”

“放屁！”侯副书记头上冒火，眼里迸星，一把击在桌子上，颤抖着身子，“太混账了！”

“离婚！”秀绒声音更高，跳起来，“我早都不想跟你受罪了……”

“离就离！”侯志峰怒不可遏，“我离不得你这号恶鬼吗？”

“谁不离不是人……”

俩人扯到街道上来了。

左邻右舍奔来几个邻居，拉拉扯扯，女人们封住秀绒，男人们劝住志峰，问起闹仗的原因。

问起闹仗的原因，侯志峰说不出口了，只是哀叹婆娘太不像话了。秀绒也说不出口，只是哇的一声哭起来，说他当了官，看不上农村妇女，要寻洋婆娘，云云。

邻居婶婶嫂嫂们死拉活拽，把秀绒拉走了。

人们走散了，孩子抬水还没回来，他越想越气不顺，后悔自己不该回家来。

他提上兜，拧开车锁，推着车子出了门，回公社去。他今天第一次站在女人面前，显示了他并不怕她。虽然没有完全胜利，却也没有示弱，她也就是那么一回事了。

翻过一道不太高的坡梁，可以看见公社所在的小镇了。这儿是公社的制高点，可以眺望河口公社秀丽的田园和村舍。太阳已经西沉，坡原上秋风习习，河川的青纱帐里，浮动着淡淡的乳白色的水汽，贯穿河口公社的那条柏油大路，车来人往，隐隐传来汽车的鸣叫。这是他的家乡，可爱的家乡啊！

他背着装满馍馍的口袋，从乡村到城里中学念书的那阵，路是不足一米宽，晴天黄土扑扑，雨天稀泥滑溜，他靠着新中国学校里的助学金，读到中学了，高中快要毕业了。

他被抽调出来做校团总支书记，没有考大学。他的年龄超过三十五岁的时候，显然已不适宜做青年工作了，县委把他派到河口公社做党的基层干部来了。

眨眼就到四十岁——不惑之年了。他惑过没有？惑过。当他被"铁杆保皇"的纸帽压得直不起腰的时候，他何止于惑，简直糊涂莫名了。现在还惑吗?

在河口公社这块土地上，他生活和工作着，四十年了，那些村村寨寨的乡亲，像自己的父母兄弟姊妹一样，在这里劳动着，生活着。他能做出有愧于他们的事吗?

侯志峰忽然记起中学时期一位班主任的话来。那是进入高中的第一天，陌生的班主任走进教室，和他的又一班新生见面。他是一位语文教员，声情并茂，像朗诵诗一样和同学们第一次开口：

“你们今天已经跨上了新的里程，

三年后，你们将走向生活的各个领域。

我愿你们，从年轻的时候，

就注意培养自己——

心灵中的一块绿地……”

培养和保持心灵中的这一块绿地，真是不容易呢！有多少诱惑企图污染它啊！

他从草地上站起，拍拍屁股上的草屑，推动车子，晚霞愈加灿烂了。

1982年6月17日草成

7月10日改定 灞桥

田园

早班远郊公共汽车开进桑树镇，把古老的乡村小镇从黎明前的酣睡中惊醒了。宋涛从咣当一声自动打开的车门里下来，踏着厚厚的积雪，向镇外走去。他与前妻所生的儿子今天结婚。他是赶早回到乡下来参加儿子的婚礼的。他得知这个消息是在昨天，置买什么东西显然已经来不及了，腰里装着三百元现钞，让孩子们日后再去置买他们需要的物品，比他买什么礼物可能更合乎实际。

大雪覆盖了原野。黎明的微曦中，无垠的雪原闪着清冷的白光。从桑树镇通南宋村的小路早已拓宽了，雪路上有汽车或拖拉机碾过的辙印。路两边的白杨树长得小桶粗了，像两堵齐刷刷的墙壁，一直伸展到黑黝黝的河滩里。黎明时的风好冷啊，田野寂然无声，软软的积雪在脚下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

宋涛穿着长袍，戴着礼帽，帽壳上缠着一匝红绸子，被前呼后拥着，走在这条小路上。他的身后，是在唢呐鸣奏中忽闪忽闪行进的花轿，轿里坐着尚未见面的媳妇。

呜呜哇……呜呜哇……悠扬的唢呐声吹得宋涛脑子里混沌一片，总是像在问，是啥样……是啥样……

当左邻右舍的婶娘和嫂子们把蒙着脸的新娘搀进新房，他立即跳上炕去，跷起一只腿，想从新娘的头顶绕一匝。这是自古流传下来的风俗，为了防止新娘婚后疯长，新娘进门先跷一个“尿臊”。她的个子又几乎和他一样，还敢再长吗？尽管他当时已经是小学教员了，仍然很认真地跷起腿来。

她似乎早有所料，一扬手，就把他的腿隔到一边去了。他打个趔趄，想再次抬脚，她已经躲到墙根，远远地站着。

他跳下炕来，在隔壁二婶努嘴示意下，忐忑不安地揭起蒙在她脸上的红布，心里嗡的一下，血涌到脸上，眼睛也花了，那是一张多么漂亮的脸蛋呀！

她羞怯地瞧他一眼，就颔首低眉，坐在椅子上，双手搭在膝间，一动不动……

一批又一批的亲戚坐过席，挎上提盒笼儿上路了。夜晚闹房的小伙子们也离去了。所有繁冗的乡村传统结婚礼仪的最后一道手续，是新婚夫妻吃合欢馄饨。馄饨是由娘家儿女双全的嫂子们捏的，装在一只红漆木盒里，由弟弟跟随花轿提来的。他的二婶从厨房里端着一只木盘进来了，木盘里有两只金边细碗，两双新筷，他早已听过母亲的叮嘱，默默地急吃急咽，想一口咬到那只包着一枚铜钱的馄饨，那是福气和吉祥的象征。她却慢吞细嚼，并不在意的样子。眼看碗里只留下三四个馄饨的时候，二婶一把夺过，又把她的碗递到他手里。

轻轻一声碜牙的咯响，他看见，从她细密的牙齿间，夹着一枚金黄的铜钱。她的脸略一红，把铜钱交到二婶手里。

“俺娃有福。”二婶笑着，拍着她的头，“跟了个女婿是先生，谁有这福气！”

二婶把铜钱递过来，很严肃地搁在他的手心里，用眼睛和嘴巴同时示意，放到嘴里去！

金黄色的铜钱，湿溜溜的，沾着她的唾液。他有点不好意思，一抬眼，她正专注地盯着他，神情严肃极了，她在揣测和试验，他嫌她的口液脏吗？他一把把铜钱填到嘴里，那铜钱使他的口腔里产生一股奇异的感觉，淡淡的，甜甜的，心儿在胸腔里忽悠悠飘动起来。一侧头，他看见她低下头去，脸颊上浮起一层红晕，现出两个浅浅的酒窝。

“二婶，我咽到肚里去了！”他故作懊恼地说。

二婶嗔笑着，从他嘴里掏出铜钱，压在炕席下，拍拍手，狡黠地一笑，压低声儿：“知道不？俩人的头要压着铜钱……”旋即走出门，从外面把门拉上了。

她的脸腾地飞红了，双手捂在脸颊上，弯下腰去了。

他的脸发烧，呆呆地坐着，出着粗气。院里走过父亲和母亲送二婶出门回家的脚步声，街门咣当一声插上门栓了，父母在里屋住的木板也响起关闭时的吱扭声，小院里静息下来了。

他轻轻关上房门，心跳得更厉害了。她仍然双手捂着脸颊，弯着腰，低着头，压抑着的出气声，越来越不匀称。他站在窄小的厦房的脚地，瞧着离他两三尺远的媳妇，似乎今天不是第一次见面，而是早就熟悉的。是的，他日夜在心里渴盼着、乞愿着、描绘着的，不就是这样一位可心的人儿吗？不，她比他想象中的朦胧的影子生动多了。

他没有陌生感，先是轻轻地搂住她浑实的肩膀。今天清早才挽起的发髻，把蓬松的刘海和鬓发一齐拢梳到脑后那个头发疙瘩里，做姑娘时覆盖着的耳朵和脖颈露出来了，像刚刚揭开的豆芽的颜色。她的

身上，有一股奇异的香气（不是脂粉）扑到他的脸上来。他紧紧地拥抱着那温热的肩头。

“你……要……”她挣脱开他的手臂，自己也挺身坐端了，“我有话……跟你说。”

“说呀！我听着。”他在另一只椅子上坐下。

“我……”她抬起头，沉静地瞧着他，“我不识字……你不嫌弃吗？”

“我教你认字，写字。”他笑了，当是什么严重事情，并且随即摊开一张纸，拔出插在制服口袋上的水笔，刷刷刷在纸上写起来，“看，这是你的名字：田——秀——芬。”

“我能学会吗？”

“能！”

他把水笔塞到她手里，把她的手和笔一起握在自己手心，脸贴着她的头发，在纸上一笔一画写下她的名字。

她侧过头来，眼里腾起一缕雾样的东西，像小河早春弥漫的水汽，颤着声说：“再帮我，写下你的名字……”

她在两个名字之间，画着一颗拙劣的心的图样，然后端详着，久久地端详着，折叠好，从席下取出那枚铜钱，包在纸折里，又压在席下。

他恍然醒悟，这个没有文化的农村姑娘，有着怎样的细腻的感情啊！

她走到他的跟前，沉静地盯着他的眼睛，然后扑跌进他的怀里："哥……"

一辆手扶拖拉机开过来，车轮溅起的雪粒甩到他的脸上，凉冰冰的。车上坐着男女农民，女人们用头巾包裹着脸颊，只露出眼睛，男人们把耳扇紧紧拴在下巴底下，脸冻得红红的。腊月中旬了，传统的新春佳节就要来临了，他们大约都是一早赶到镇上去置办年货的。

天色完全亮了，雪原上白茫茫一片。临近村庄里的大喇叭正在播出当日新闻，打破了黎明时天地间静谧的气氛。湛蓝的天空像一望无际的蓝色锦缎，白色的原野似无限伸展的白绸。骤然而降又骤然而止的大雪，把入冬以来干旱的黄尘洗濯得干干净净，大地净洁，高空深远，空气清新，这是生养他的北方故乡的田园。

离开大路，斜插上一条积雪茸茸的小道，他走到河沿上来了。河滩上的雪似乎更厚，一堆堆的河卵石，包裹着雪衣，一条细流在雪地里弯来绕去，哗哗响着。河道两岸修起高大的河堤，临水面用水泥砌成一方一块的护坡。河堤上高大的杨树和柳树，枝条上锈着一层霜。

河上架着木板桥，河对岸就是他的村庄。宋涛一步一步，终于从滑溜的木板桥上走到对岸了。那株大柳树，有两三合抱粗了，中间似乎已经空心，而枝条依然稠密，临近水，柳树的寿命是很长久的……

"你怎跑到这儿来！"他从村子里下了河，顺着弯弯曲曲的河岸走下来，在大柳树下，看见了秀芬，她蹲在河边洗衣服，搓呀，捶呀，涮呀，河水中漂流着皂角的白色泡沫。"回吧！"

“我一会儿就洗完咧。”秀芬转过头来，轻轻嘘口气，妩媚地笑着，“马上完。”

“回去！”他抓住装衣服的笼，“回去，陪我坐在屋里，啥啥也嫑干！咱俩在一起……只有三天了……”

“你坐在这儿。”她指着身边的一块石头，“你不能穿着脏衣服走呀！”

“歇一会儿。”她说。

她多情地盯他一眼，温顺地笑笑，把手上的水在衣襟上擦擦，和他靠肩坐在柳树下。四周是高过人头的苇丛，呱呱鸟的叫声响成一片，它们在苇丛里追逐、嬉戏、热恋，然后合伙衔草造窝，产卵，哺育幼鸟。

傍晚温馨的河风吹过苇丛，她的散乱的鬓发拂到他的脸上，她闭着眼睛，靠在他的肩头上。

“朝鲜很远吗？”

“很远。”

“你……不去……不成吗？”

“我是青年团员。”

“我总觉得……害怕。”

“嫑怕。”

“我想你了怎办？”

“……”

他回答不了了。看见她的脸上，泪珠轱辘轱辘滚落下来。

“要哭。”他说，自己喉头也哽住了。

“我没哭。”她噘起嘴，“当面把眼泪流完，省得你走后再流。”

“我走了，谁都放心得下。爸和妈年龄还不大，有哥哥照看。”他说，“只有你……一个人……”

“要挂念我，”她看他难受了，反倒一挺身子，给他宽心，“我小时候啥苦都吃过，现时好到天上了。爸妈人都老好，待我也好，我跟在亲娘跟前一样……”

多好的妻子啊！

“朝鲜在哪儿？”她问。

“在那边。”他指着东边的天空。河柳和白杨织成的浓密的林带。老鹰在五月湛蓝的天空悠然展翅。秦岭的群峰隐没在淡淡的灰雾里。

“我们离得太远了。”他说。

“不远。”她说，“你永远在我跟前。”

她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他们新婚第一夜里，他捉着她的手、写下俩人名字的那张纸，纸上有她画的一颗心的图像。那枚被夫妻合吮过的铜钱，当的一声掉在石头上了。

“你日夜都在我心里。”

远处有脚步响，宋涛放开搂着秀芬肩膀的手。苇丛中的荒草地上，闪过一个人挎着草笼的身影。他看出来，那是父亲，知趣地躲到苇丛中去了……

冬季里，雪把一切都严严地遮盖着，分不清苇园、稻田和麦地。呱呱鸟早已飞回南方过冬去了。他静静地站在大柳树下，那一块河石上，秀芬曾抡着棒槌给他搓洗衣服呢。

冬日的太阳迟迟从东山峰群的巅顶露出脸来，雪野里反射出耀眼的光环，雪在变幻着色彩，这是十分明丽壮观的景象。

走上河堤，有一条在雪地里任意踩踏出来的便道，直通南宋村。

他从朝鲜光荣回归，到城里一家工厂当宣传科长了。每个星期六，骑着自行车回来，和父母妻子欢聚一天，留下工资的大部，周日晚再去城里工厂上班，一家人和美地过日子，左邻右舍谁不夸他们一家人啊！公公是最好的阿公，母亲是顶贤明的婆婆，媳妇是头梢贤惠的媳妇，而他，是南宋村当时顶有出息、干成大事的伟人！可谁能料到，不过两年，在朝鲜仅仅只是认识的一位女文工团员分配到了宣传科。这儿是正在掀起新的建设热潮的古老的城市，两个从战火中结识的战友，从同志和上下级的关系，很快发展到……他和她结婚了。

重新结婚是欢乐的，而与秀芬离异是痛苦的，没有文工团员给他的欢乐作安慰，他是无法忍受离异的痛苦的。父亲是一个传统道德的忠诚卫士，母亲是太喜欢秀芬了。他在朝鲜的几年里，和家庭多少有些陌生了。而秀芬却和这个家庭结成了血肉浇铸的关系……父亲和母

亲，居然下决心赶走了叛逆的儿子，甘愿继续和一个异姓的媳妇过他们的农家生活。

“滚！至死，你都甭进我的家门！”父亲说。

“你享你的荣华富贵，俺过俺的庄稼汉日月，俺和孙孙饿死，不求拜你娃子！”母亲咣当一声，把街门关上了。

他从紧关着的街门口，走到村口，四下的树后墙侧隐藏着看热闹的村人，是一种怎样鄙视的眼目！他沉重地走出村，过了木板桥，进了城……

他和后妻的家庭是幸福的。她比秀芬长得脱颖，眉目传情，面貌秀气，皮肤细腻，说话和气，知书识礼，对他体贴爱护……短短的狂热时期一过，他却总也感觉不到秀芬那些特有的东西，他常常暗暗思念她，有一种负疚的心情。如果秀芬也像父母亲一样刻毒地骂他，咒他，也许会把她最初给他的幸福而美好的印象冲刷淡漠，可是，她除了哭，就是苦心劝，劝不下，她就任他去了，什么也不说……

在城里偶尔遇见南宋村的乡党，他托他们带些钱和衣物给孩子，想不到，过后又被南宋村进城的乡党用包裹带回来了，而且捎来母亲或是父亲的话：“黄面馍，稠米汤，能养大宋涛，也就能养大孙孙！”

他开始憎恨父亲和母亲。尤其令他不能容忍的是，秀芬一直寡居着。新社会，有这样顽固的阿公和阿婆，秀芬太苦了。如果她能找到一个可心的丈夫，对他的心是一种安慰。可是许多年过去了，她仍然在没有丈夫的阿公阿婆家里过活着，这样的日月，她怎么过啊……

算着儿子已足二十的成年年龄，他早已升任人员和设备扩大了几倍的中型工厂的副厂长了。适逢工厂招工，破例地有一批招收农村青年的名额。他想到儿子，是尽父亲最后也是最初的一次责任了，他写了急信，要儿子来找他。

儿子没有来，任何人也没有来，却收到一封信，说他在农村生活尚好，爷爷和奶奶年迈了，母亲也接近晚年，农村生产队里，没有一个男劳力是不行的，吃水都困难……

踏上场塄，一眼就看见他家的门楼、土围墙。门锁着，显然，一家人不在。临河这一排老庄基的东边，过去是一片荒树园子，他和伙伴们掏鸟蛋、打弹弓的乐园，现在是一排整齐的新住宅区，一律是砖包墙，宽敞的新式门窗，现出一片红色的机制大瓦，庄前屋后大大小小、高高低低的树木，标志着房屋落成的迟早，那儿拥着一堆人，他隐约得知，儿子已经盖起一院新房，肯定就在那里了。

年轻小伙和媳妇们，没有人认识他。他也不认识他们。直到门前人多的地方，才有一位老妇人挤眨着眼睛："这不是涛娃子吗？"他也认出，这是二婶，强迫他把合欢铜钱填到嘴里去的二婶呀，老得佝偻着腰，拄着拐杖，头发全白了，像田野里的雪。她惊叹他也老了！

好多年长的老者围住他，问长问短，全没有记恨他的意思，他们当年不能容忍他的心情现在淡忘了，和他客客气气说话，羡慕他升了官，发了财，是城里人了。

二婶指使一位中年媳妇，叫秀芬出来迎接客人。她知道他此刻的难处，怎么贸然进去呢？二婶真是好二婶，老了仍然知人心。那媳妇

旋即出来，在二婶耳根悄悄说着什么。他猜到了。前妻秀芬不来迎接他。二婶装作无事一样：“走！跟二婶进。”

他跟二婶走着，身后传来乡党们的窃窃议论：

“现时看，当时人家在城里成家，倒是对。”

“吃穿不愁怅，儿女有工作！有文化人看世事就是远……”

“比咱笨庄稼人眼光宽哩！”

是这样吗？庄稼人现在这样看世事了。乡党们对他这样评议了。他却想着，如果当初不离开秀芬现在在故乡的田园里修一院房，退休之后，帮儿子种种自留地，责任田，前院里养点花，后院养些鸡，傍晚到小河里钓鱼，又何尝不如城市那两三间小阁楼呢？他愈到晚年，愈觉得乡村的亲切。可是，乡里人现在却赞成他当时有远见的举动……

大门用黑漆刷饰一新，勾着红边，门框上贴着大红对联。院子上空吊搭起苇席，挡着寒风，席棚下摆着一排排桌凳，后院临时安顿着厨房，传出滚油的爆响。

走过院子，里屋门口，老态龙钟的母亲和鬓丝灰白的秀芬在迎接他。

“妈——”他走到跟前，带着忏悔的真诚口气，声音哽住了，顿一顿，他转过脸，“秀芬——”

母亲的多皱的嘴角痉挛似的抽动着，没有应声。

“你……回来了！”秀芬招呼他，眉间现出两道褶皱，“坐屋里。”

二十多年没有听到这熟悉的声音了。显然，声音和她的面容一样苍老了，浑厚了，隐伏着暗暗的悲凉的韵味。

“……我不识字，你不嫌弃吗？”

“……你……永远在我心里！”

他在椅子上坐下，那么迫切地点燃了一支烟，问母亲：“俺爸呢？”

“喂牛去了。”母亲说，“和宋老大家合伙养了一头母牛。”

父亲该有七十六七了，还在喂牛，儿子却按照国家规定的职工劳动条例，过不了几年就该退休了。

一个年轻小伙端着木盘进来了，放在他面前的，是家乡的臊子面，每当过年过节，红白喜事，庄稼人早饭都是一律的臊子面。肉丁、豆腐、黄花和木耳烩制的臊子，那味道留在儿时的记忆里，至今不忘。进城以后，也没少吃这种面条，可味道和母亲做出来的差远了。他一早赶路，腹中空空，那碗里的香味，一下子撩拨起他的食欲来。

他捏灭了烟，抓起红漆竹筷，搅动起长长的机制面条。这当儿，秀芬却抢先一步，从他筷下把碗端起来了。他一愣，扬起头，她要惩治他、报复他吗?

“我去冒一下滚水。”秀芬说。

宋涛脑子里嗡的一声，足足麻木了半分钟，像突然遭到电击一般……

她和他结婚的那年夏天，热得人心烧目乱，她给他用新打的井水冰了一碗凉面，拌了香油，调了芝麻盐。他吃得好香。可是，到后晌，他的肚疼病犯了，疼得在炕上打滚。

她急得挠头抓腮，手慌脚乱，眼泪直流。

母亲进来了，问："晌午吃啥饭来？我不在？"

"凉面。"她紧张地回答。

"他自小肚子不好，不能吃凉饭，过了凉水的面，要到滚水里再冒一下。"母亲说，并没有责难的意思，"我忘了叮嘱你。"

"可他……咋不说呢？"她流着眼泪，怨自己也怨他，那怨声里含着怎样一种挚情啊。

"他贪嘴！"母亲疼爱地看着儿媳，替她解脱。接着就坐在炕上，伸出一只手，撩起衣襟，在他的肚子上揉抚着。他偷喝了河渠里的水，他偷摘了人家的酸杏毛桃，一次次害得肚子疼的时候，母亲就这样揉得他安然入睡，母亲的那双手啊！

母亲揉了一会儿，说她还有事，就出去了。

他和她都明白：母亲是在给儿媳做示范。

她照母亲在炕上的姿势坐好，把手伸到他的肚皮上，轻轻地按着、揉着……那是区别于母亲的一双温柔的手……

“……我去冒一下。”

她还记得他不能吃凉饭的毛病。而他自己连这一点也忘记了。在朝鲜战场的烽火硝烟里，恶劣的自然环境，早已锻炼出他一副销铁化石的胃肠……可她还记着！

“……我去冒一下！”

秀芬端着一碗面进来了，双手递到他的手里，然后转过身，低着头，坐到母亲旁边的一条凳子上，头低着。

他看着冒着热气的面碗，再也抑制不住心头的酸痛，两行热泪夺眶而出，滴在碗里了。

母亲的嘴角抽动得发抖，拄着拐杖，长长地哎嘘一声，走出门去了。

他抬起头，秀芬也盯着他。屋子里很静，院里嘻嘻哈哈的吵闹声，打诨说笑声，更衬托出这一间小屋里的安静的气氛。他终于忍不住，哽哽噎噎地说：“你……受……苦了……”

她一把捂住自己的嘴巴，没有哭出声来，眼泪却从鼻梁两边涌流下来，从手背上滚过，滴在前襟上了……久久地沉默之后，她一甩头，扬了起来，说：“过去了的事，再……再甭……提说了！”

她如果痛骂他几句，他可能得到心理上的平衡。她没有骂，离婚时没有，离婚后也没有，今天他和她当面，她仍然没有。她对他太宽容了，这种宽容所产生的负疚心理，与日俱增，在岁月的流逝中负重越来越深了。

“我错了第一步，父母错了第二步。”他终于把积在心头的话说出来，“只有你……”

她的眼里现出一种凛然的神色，说：“不怪父母，他们叫我走……那一条路，是我不想。”

“为啥？”他问，“你何必折磨自个儿？”

“我……的心里……再装不进……别人咧……”

她又一把捂住自己的嘴。

他跌坐在椅子上，唉的一声，说不出话了。果然是这样！

1982年7月

珍珠

不用收听广播电台的天气预报，我已确信室内温度超过人体常温了。墙壁是热的，桌椅是热的，窗户敞开着却没有一丝风，刚用新打的凉水洗浸了头脸，短暂的一阵舒适之后，热汗又涌流出来，胸膛里憋得人简直要窒息了。

我关了电灯，锁上门，到河边上去，那儿也许有点夜风。

古老的乡村小镇的街道上，偶尔驶过一辆卡车，雪亮的车灯，照出街道两边坐着或躺着纳凉的赤膊裸腿的男女。南街那头儿，传来一阵弦索声。拐过街心十字，声音突然放大了。远远看去，一只大灯泡吊在树杈上，亮光下围挤着黑压压一堆人。我猜定那一户居民有丧事，请来了乐人，为死者奏乐哩。一个沙哑的男声和一个清脆的女声正在对唱：

要斩要斩实要斩！

不能不能万不能！

……

待我走到跟前，一折戏刚刚唱完，从围观者的脸上，我看到了他们得到的满足。古镇上的居民，近年间虽然没有少看传统秦腔剧目，但仍然愿意听这种不化妆、不动作的对唱，主要是品尝唱家嗓音里的那一股味儿的。现在，他们交头接耳，议论中带着赞赏，说那女的唱得美，其韵味和西安秦剧团某名旦相比，可以乱真。

我早已不奇怪近年间兴起的埋葬死人请乐人唱戏这样的习俗，却着实没有见过女人搭帮当吹鼓手的。在儿时的记忆里，吹鼓手是属于三教九流一类人物的，即使十分穷苦的庄稼人也不愿将自己的子弟送去挣这种不光彩的钱。吹鼓手活着不能与正经庄稼人通婚，死后不得葬入宗族的官坟。解放后，这些陈规陋俗早已打破，吹鼓手作为一种职业存在不灭。可女人，特别是年轻女人弄这号营生，还没有亲眼看见过。

被市民、农民和拖着长布的孝子围在中间的，是十数个年龄相差甚远的一班乐人，每人怀里都抱着一件乐器，铙，钹，边鼓，板胡，二胡，梆子等。那位女乐人背对着我，短发，浑实的肩臂，雪白的短袖衫。她正用毛巾擦汗，衣领湿透了。

我的心里微微一动。似乎预感到一点什么，就从人堆的外围转到她的对面，从男人和女人的头上看过去。她正好放下毛巾，抬起头来。唔！珍珠，果然是她，我的学生，印象里比较深的珍珠！这是实在没有料到的事。

她坐在那里，坦然而又庄重，没有羞怯，大约早已习以为常了。任前后左右围观的男人指指点点，纷纷议论，她似乎一概听不见，不予理睬，也不看任何人，只听着班主小声暗示着什么。梆子嗒嗒一响，板胡悠扬的音乐跟上来，下一折戏又开始了。

我立即转身走开，许是不愿意在这样的场合听珍珠唱戏，许是怕珍珠偶然看见我会使她难堪，心里却不知是一股什么味儿。

星光灿烂，月色朦胧，小河两岸的杨柳现出山峦一样的轮廓，发出轻微的哗响，稻田里的青蛙在悠悠地叫，萤火虫一闪一闪，微微的

河风从河道上吹下来，夜是这样静，陇海路上东来西去的列车隆隆驶过，夜更显得静谧了。我坐在柳树下，看着星光粼粼的河水，点燃一支烟……

两条又粗又长的黑辫子，胖胖的紫红的脸膛，两只黑乌乌的大眼珠，活脱就是两颗晶莹的宝石，这是田珍珠。她是班长，又兼着学校文艺演出队队长，舞蹈和歌唱，都是学校里拔尖的。尤其是她表演的秦腔清唱，音色纯正，韵味悠长，学校附近村庄喜欢秦腔的农民听过她的演唱，是很欢迎的，热心地议论，说有这样好的嗓门，应该到剧团去。

我曾试探过，她说她爱念书，不想去做演员。我很赞成她的志向，因为她不光擅长演唱，学业也很好。

记得有一天后晌，放学了，她抱着一摞作文本，走进教研室，放在我的桌案上，敬过礼，就把书包往后一甩，走去了，刚要出门，坐在门口办公桌边的李老师挡住她：

“珍珠，嫑走！”

她站住，宝石似的黑眼珠盯着李老师，“有什么事呀？”

“唱一段戏！”李老师笑着说。

她不好意思地笑了，又回头看我一眼，似乎在问，唱不唱呢?

李老师是个秦腔迷，自己就会拉板胡，说时已经从墙上取下板胡来，调着弦。

郑老师是刚从师大毕业的青年教师，也笑着凑热闹：“已经下班了，该活动活动，娱乐娱乐了。来啊！”

我笑笑：“唱吧。”

珍珠放下书包，大大方方站得舒畅些，问：“唱什么，《山花烂漫》？”

“唱《游龟山》里《藏舟》那一段！”李老师点出戏名来。

“那是老古董，现在不准唱！”珍珠说。

“没事儿。”李老师坚持说，“放学了，谁也听不见，我们一听就完了。”说罢，已经拉响板胡，开始了悠扬的“过门”音乐。

珍珠唱起来：

耳听得谯楼上起了更点，

小舟内，难坏了胡氏凤莲。

……

我对秦腔没有特殊的爱好，听听也觉得挺合兴味，不听也无不可。珍珠这段唱腔的韵味，我是从李老师入迷的神态里间接感受的。他歪着头，闭着眼，拉着板胡，从脸上的表情看，已经忘记自己是坐在一所乡村中学的语文教研室里了，大约已随着渔家女儿胡凤莲细腻的心理抒情，进入月光下的河中小舟之上了。

珍珠唱完，弯腰深鞠一躬，背着书包跑了。李老师睁开眼，屋里只有绕梁的余音。他明显带着戏瘾未足的遗憾，快快地松了板胡弦

索，挂在身边墙壁的钉子上，感叹着："这女子她爸她妈都是老实巴交的农民，她却会唱戏，真是天生就的……"

这样的事在我心里本来留不下任何记忆的。可是，随之而来的一场运动把它冲刷出来，竟然成为终生难忘的一件憾事。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铁帚之下，举世混沌。笔枪舌剑，唾液溅飞。为了生存，就得杀戮。教师们全都失掉了往日里文质彬彬的风度，自相残杀，企图洗清自己，把一切能抓到的脏物秽什抹到别人脸上去。中学生们理论有限，拳头出手比文章出手自然更方便些。为了躲避学生的拳头砸到自己的头上，于是就有人给学生把方向和目标指向与自己毗邻的窗户……

我被第一个推到斗争台上。

李老师出面揭发我培养黑苗子，唱才子佳人，到处放毒。似乎不能理解，这却是事实。人在非常的生活环境里，会突然亮出你从来没有见过的那一面。小郑也出来作证，他和他结成同盟了。现在，李老师点出田珍珠，要她揭发。三人证龟龟是鳖了。

珍珠站在班级的混乱的队伍中，我不敢抬头，看不见她的脸，只听见李老师催促了几次仍不见珍珠走上台子来。

学生中有人呼起口号：打倒保皇派！

我盼她走上台来。因为对我已经是无所谓了。即使珍珠不承认，也不能使我免罪。我倒是盼她尽快解脱。她是学生。

台下一阵骚动，嘘声、骂声轰轰而起。我悄悄偷眼一扫，田珍珠从操场上的人窝里挤出来，夺路奔逃向校门口去了。操场上一阵一阵

“打倒保皇”的口号声把她轰走了。

她大约再没有到学校来。

李老师得意的时间也不长久，又被别的老师和学生攻倒了……他和我一样，由学生监押着，在附近农村强迫劳动改造。

翻了一天稻地，我觉得浑身的骨节似乎都松动了。在农民家里喝了一碗苞谷糁，躺在村外打麦场的场房里的麦草地铺上，一动也动不了。李老师比我年龄大，身体更差，仰面躺着，半张着嘴，微弱的灯光（十五支灯泡）下，那张脸活像一张死人的脸。他比我更吃不消。

村里的大喇叭传来响声，我听出，是公社文艺队今晚到这个村子来演出。一个一个时兴的节目进行下去，我没有兴趣，却吵得睡不着。李老师轻轻呻吟着，也是无动于衷地僵死似的躺着，听着，不管愿意不愿意。

“刁德一耍的什么鬼花样……”

这是正在演出《沙家浜》中《智斗》那一场颇为精彩的选段。阿庆嫂的扮演者是珍珠。这折戏一开场，我就听出珍珠的嗓音，心里一动，静静地听着从仓库式的场房的小窗户里流进来的演唱声。又听到田珍珠的嗓音了，我的心里似乎稍为轻松，她能参加公社文艺队，肯定再不会因为保皇的臭名而痛苦了。

我看看李老师，半张着的嘴早已合紧，也停止了呻吟。听到“鬼花样”这一句对唱唱词，他忽地从地铺上跃起，劈啪两声关上仅有的两个小窗的木扇。

“这是样板戏！”同铺的郭老师威胁说，站起来，又打开了窗户木扇，“反正睡不着。”

我似乎一下子意识到某些令人快慰的东西，是一种报复的心理活动吧。也许是李老师忌讳“刁德一”这个名字，因为学生早已偷偷给他起了这个外号，而且广为流传。也许田珍珠优美刚健的嗓音，现在对于秦腔迷李老师来说，不是一种艺术欣赏的享受，而是一种嘲弄吧！真是自食苦果，此刻谁能为他解脱呢?

我和李老师都被划成“内部矛盾”，回到学校，又坐在一间办公室里，小郑已经是学校革委会的负责人之一了。我和他俩，整天进出一个门，谁和谁从来不说一句话。

这天晚饭后，李老师走进我的宿舍，笑笑，一点也不难为情：“咱们谈谈心。”谈心本来是同志们一种自觉的交流感情的需要，那时却带有某些令我胆怯的味道，然而又不敢拒绝。不管这场谈心成功与否，我和李老师总算说话了。这对我来说，也觉得稍有宽释，毕竟是在一个办公室进出。

时过两天，李老师又约我到他屋子去坐坐，我去了。刚进门，里面坐着一位陌生人。李老师介绍说：“我的大哥。”接着告诉我，他的大哥刚刚从县上调到这个公社来当书记了。

他的大哥很客气，早已站起，给我递上一支烟。我受宠若惊。那时节，我是自惭形秽的，能受到公社书记这样客气的礼待，自先诚惶诚恐了。我坐下，对着他打着的打火机，点着烟，却不知说什么好。

李书记问我的家庭状况，儿女，妻子，父母，工资收入，生活状况。我尽可能用最简短的话回说清楚，而且一律都说成“可以凑合”，

不需要麻烦打搅别人帮助解决什么困难。

“公社搞了一批机动粮，解决机关里一些同志家庭吃粮的困难。你晚上带一条口袋，到公社会计那儿去。”李书记说，“我给他招呼一声。”

“我家粮食够吃的。”我说，“感谢您关照。”

“我听他说你家吃粮很紧张。”李书记指着他弟弟李老师说，“我听他说你是个好人，你们关系不错，所以……不要客气。”

我不敢再拒绝了，这里头似乎牵扯到我和李老师刚刚经过谈心所取得的感情和关系上的初步弥合……

“要不是这样吧！”李书记站起来，“我给你们弄好，放在我的房子，你回家时从我那儿带走，免得在学校造成影响。”随之给他家老二说，“晚上你把口袋送到公社去。”

也许是李老师对于《藏舟》事件果然懊悔了，以此来补救他的良心？李老师去公社给他大哥送口袋去了，我坐在房子里，很不安静，左猜右想。如果不是良心发现，何以又要给我弄这些粮食，而且是公家牌价。当时的粮食，那是紧张而又紧张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我可以不必再计较了。作为特殊的社会环境中的不正常现象，予以忘却。

“嗒嗒嗒。”

有人敲门。

我拉开门，珍珠站在门口，正在月亮光里锁车子。

“我来请你给我出点主意。”珍珠一坐下，似乎很急，气也有点喘。

我给她倒下一杯开水，放在桌上。

她变了，几年不见，已经完全由一个小姑娘长成一位俊秀的大姑娘了。她似乎知道自己长得出众，所以更多一层拘谨，比唱《藏舟》时拘谨多了。

她的丰满的额头上扑散着刘海，两道黑黑的眉毛朝鼻梁上方挤来，眼里现出一丝焦灼的粉红丝膜。什么事难为她了呢?

“公社调来了一位李书记。老师，你认识他吗？”

“见过一面。”

她顿一顿，扬起头，像是下了决心：

“他托人给我提亲……”

“和谁？”我问。

“他儿子。”

“噢！”我问，“你没见过吗？”

“见了。”珍珠说，“是个跛子。”

“噢！”我一惊，又问，“人品怎样？”

“流里流气。都二十八了。”珍珠说，“那天，介绍人把他引到我屋，三句话没说完，就动手动脚……”

我的心失掉了平衡，怦怦跳了。可是，婚姻之事，我怎么说呢？想想，我忍住气说：“这是你的事，由你做主，自己做主吧。”暗示是很清楚的。

“我的主意没乱。”珍珠说，“我爸我妈都很害怕，要我答应这桩事呢！”

“你父母都是社员，务庄稼的，怕什么？”我说。

“听人说，李书记原先给儿子强订一个媳妇，女方不愿意，父母倒霉了，寻缝找茬儿，开会批斗，老汉气疯了！”

“你要征求我的意见……我说……”我说不顺畅，心里憋得慌，“自己一定要有主意。”

珍珠感激地点点头，流出泪花来，说：“你要有空，到我屋，给我爸我妈开导开导。”

“行。”我说。

珍珠走了。我送她到校门口，看着她在月亮下渐渐模糊的身影，长长嘘出一口恶气。

刚回到屋里，一支烟没抽完，李老师进来了。他笑着，亲热地笑着，活像刁德一。我知道他和他的书记哥给我粮食的原因了，也明白他找我谈心的真实动机了。果然，他一开口，就说到婚事上来：

“那女子信赖你，你是班主任。给咱侄儿帮帮忙。我和家兄日后给你帮忙……”

我真想说：把口袋给我！立即给我！那样的麦子我能吃下去吗?想想，这要坏事的。不仅我日后有难以预料的祸事，而且可能给珍珠带来更糟的结局。我装出笑脸，哈哈笑着，欣然应允：“只要李老师瞧得起，我跑一步路怕啥？事情办成办不成，我尽心跑路！你放心！”

我在第二天晚上，去到田湾村，我狠狠地批评了那一对糊涂胆小的夫妇，又和他们商量出一些可能出现麻烦时的对策：俩老人继续装糊涂，万事由珍珠做主！

“俩老人满心欢喜，珍珠还不通。”我给李老师汇报此行的收获，“慢慢来吧！”

不久，我调走了，到了这个乡村古镇的中学。珍珠的事虽令人惦念，但结果是早就清楚的。

过了两年，见到田湾村另一个学生，谈到珍珠，说是她结婚了，就和原来班里一位同学刘鸿年结婚了。刘鸿年是个在我印象里很好的学生，他们的结合，该是美满的，我心里释然了。

她怎么干起吹鼓手的营生来了呢?

夜很静，热气渐渐退去了，夜气凉凉的，我走过小镇回家的时候，从那家门里传来弦索的隐隐的唱戏的声音。中夜以后，按习俗该是在死者的灵柩前头奏乐唱戏了，直到天明。

我坐在屋子看书，有人敲门。

“老师，让我好找！”珍珠进来了，“早都听说你在这儿，总是没机会见你。人埋完了，我也完事了，打听了几个人，才问到这儿来。”

她大约三十多岁了，有一般强悍的气息。脸上淌着汗，扑着黄土，不用我招呼，自己从竹竿上抽下毛巾，在脸盆里洗。

“我当吹鼓手了，老师！学生给你丢脸了！”她洗毕，坐下，自己这样解嘲说，“人都想门道挣钱。我凭我的嗓子挣钱，不偷不抢，管它名声好听不好听。”

我给她沏下一杯茶，很想得知我走后她的婚姻问题，倒不在乎她做吹鼓手丢人不丢人。

“李书记给我许愿，保证给我解决工作问题。我不想要这样的工作，回绝了。那个跛子又往我屋跑了几次，我一见他来，就从后门溜走，整整一天不回家。这样也不是办法，跛子最后一次来，我把他从门里推出去，把点心和酒瓶扔到街巷去！跛子脚下不稳，在门外滚倒了。他爬起来胡叫乱骂。我关着门，在院子里气得打颤。我村的乡党动了气，小伙子们把他轰出村去了。

“李书记恼了，把我的党员审批表退回支部来。老支书悄悄给我说：‘以后再说吧！’我心里清白，李书记在我们公社，我入不了党了。

“第二年，甘肃一家县剧团到西安招收秦腔演员，我去报考，选中了。剧团的人到公社来给我办手续，李书记眼窝一瞪，手一挥，说我这不好，那也坏，把人家撵走了。我念书那时候，还不想当演员呢，这会儿想当却弄不成了。连公社机关的干部也气恨，下乡到俺村来，

也骂他，说人家珍珠这不好，那不好，你为啥还给你儿子恋媳妇？狐子吃不着葡萄，就骂葡萄是酸的！

“我和鸿年结婚了，穷是穷，心里踏实。现时有两娃娃了。”

她叙说着，似乎有点气，却不甚厉害，像是已经很久远的事，没有任何动气的必要了。我就信口说：“还好，没有出大的乱子。我还担心那人给你搜事整人呢！”

“我后来知道，他调到咱公社当书记，就是先前给儿子逼着订人家一个姑娘，在原先那个公社搞臭了，才调到我们公社来，在我这件婚事上，他不敢像先前那样明目张胆……”

“唔。”我问，“你家里现在生活怎么样？农村政策宽了，好一些了吧？”

“生活好多了。”珍珠说，“我和鸿年包了五亩地，今年夏粮收了三千斤麦子，两年也吃不完。他在家种地，闲时养蜂养鸡，一年收入成千块。我跟上这些人搭班唱戏，一年也能挣成千块钱呢！”

“能挣这么多吗？”我暗暗一惊。

“能。一天一夜，给死人唱七八折戏，挣二三十块钱。一月至少有五六次，冬天丧事更多些，常是从这家唱毕，又赶到那家。”珍珠说，似乎很得意，“人说当吹鼓手丢人，我开头也觉得羞愧，时间长了，惯了。老师，你看，我弄这事丢人吗？”

我回答不了，勉强应付着笑笑。

“我才不管丢人不丢人，反正是凭出力唱戏挣钱。”她自己回答说，“我不偷不逮，不贪污不受贿，我比那些人光荣！现在，不比念书那阵儿了，要养娃娃，要过日月，要挣钱！”

我不想评论吹鼓手比贪污受贿到底光荣多少，却是深深感到，坐在我面前的珍珠，已经不是在我当班主任时候的那个珍珠了。

1982年冬

铁锁

去年春上，我到柳庄大队去。听说五队队长柳大年跟刚上任三四个月的小会计铁锁关系不太美气，我的心里挂着一个问号。

柳庄在灞河边，是蔬菜生产专业队。我来的时候，正是移栽菜苗的大忙季节。

四月，各类菜苗先后移入大田。追肥便成为关键的一着。闻名公社的种菜行家柳大年，当栽苗任务一折过腰，就把下余的任务交代给副队长独独去料理。他骑上自行车，腰里别着带锡纸的卷烟，挎包里装着半扎厚的发面锅盔，起早贪黑跑个不停。跑啥哩？想方设法购买稀粪。

天麻麻黑，大年回来了。社员们从他的眉里眼里可以看出，一定把事办婥了。有人说，队长没办成事的时候，眉毛像是羊角一样竖着的；一旦眉毛拉平，覅问，车吆到辙里咧！

晚饭时候，队长走进铁锁的办公室，不等铁锁问，就诉起他这几天找稀粪的难场来。返乡一年的高中毕业生铁锁，深深为队长几天来的辛苦劳累所感动，却不理解地问：“大年叔，国家不是分给咱稀粪了……”

“憨娃！”柳大年神秘地说：“那怎么能够嘛！菜苗一进大田，啥是关键？粪！巧做不顶笨上粪咯！”

“昨日公社又给咱分了一批化肥！”

“不够！”队长不问数字，就权威地下结论，“化肥上多了地板结，稀粪越上地越软和！啥肥料也不顶稀粪……”

“那对着哩！”

哈哈哈，队长畅快地笑着，“今年前半年，只要有粪，我就放心了。你看着吧，看咱的菜愣个长吧！”

铁锁也被队长出自心底的兴奋情绪感染了，高兴地说：“好，大叔，干吧！我一定给咱把会计工作搞好，按时结账，按时公布，给社员鼓励，财会内务，你放心……”

“对对对，你不说我倒忘了来做啥！”大年说着，从腰里摸出几张票据，放到办公桌上，“发票！”

铁锁把队长让到旁边的条凳上，自己坐在椅子上，拉开抽屉，取出账本，然后一张张审查起票据来。

铁锁把一张一张国家印制的发票检验着，突然在一张白纸条上眼睛停着不动了。那焕发着青春活力的红脸膛，由刚才的兴奋，变成疑惑，继而又变得异常认真和严肃，终于转过身把那张白纸条据递到队长手上，说：“大年叔，这不能报！”

“咋？”大年的眼睛睁得愣大。

“烟、酒招待不能报账，这是规定！”

“那还叫叔为队里贴老本？”

“本来就不应该做这些事！”

“哎哎哎！好我的憨锁哩！”柳队长说，“你娃知道啥？紧把纸烟往人家手里塞，都办不成事哩……哎！”

“集体和国家打交道，公对公，谁叫你给人送酒来？”

柳队长嘴里说不出了。他窝着一肚子气，气恼地说：“算咧，算咧！以后哪怕它地里长成猴毛哩！我也不弄哩！”

会计柳铁锁，当夜找到我的住处，谈了这件事的经过。小伙子再三向我申明，他不怕队长以后给他为难，况且大年叔根本不是那号给人穿小鞋使心眼的人，只是要求我向队长作些解释，做做思想工作，不敢在外头乱花乱支，搞不正之风，不然会摔跤哩。我肯定地鼓励了铁锁坚持原则的做法，欣然应允一定和大年谈谈心。

大年是个直性人，我还没来得及和他谈心，第二天晚上，在大队召集的各小队的干部会上，他就把窝在心里的情绪放出来了：“现时这事情也真难办！”他叙述了自己买粪和报账的经过。这件事在干部会上引起了热烈的争辩，几乎有一半小队干部同意大年的观点，甚至同情大年；有一半人不同意，说大年压根就不应该搞这些烟酒交易。铁锁自然站在后一半干部中，争得面红耳赤。

在他们争得搁不下的时候，有人指着我说：“你怎么当逍遥派？你当裁判吧！”

我才不当裁判哪！我觉得这件事情虽小，但涉及了一个普遍存在的思想作风问题，不妨多争一争好。既不能先入为主，也不能放任乱扯。如何把这场争论深入下去，通过学习党的文件，更深地理解这个问题的发生、危害，究竟应该怎样正确对待，难道不是很有必要吗?

散会之后，我和党支部三个同志商量安排了这件事。

一个包括党员和干部的学习会，利用单日的夜晚，搞了半个月，通过学习和讨论，自然是柳队长一派人的观点错了，铁锁一派人的观点成为大家肯定的东西。后来铁锁和柳队长谈了一次心，效果确实不错。大年最后说："没关系，你以后咋办就咋办，叔不计较人，不信你问咱队社员去！"我当时旁听了他们两人的谈心。我发现，这个刚回农村一年、不足二十岁的小伙子，不仅能坚持原则，而且会做思想转化工作。他和队长的谈心，既认真，又诚恳；既说理，又不显出丝毫的有理者的傲慢。我觉得这小伙子确实不错。

之后，我从侧面得知，大年对他请客花钱的个人损失，还有点心里不快，但是在工作上，对铁锁，并没有显出什么来。他们仍然亲亲热热，称叔道侄，团结得很好。

紧接着发生了另一件事。

大车把式柳合合，拿着一张医院开的发票找到队长说："上回到蓝山县里拉谷草，半路上骡子踢了个老婆，给人家在县医院看病，花了拾伍块！"

柳大年看着那张有名有姓又有红色印记的发票，心里仍有点不瓷实，问："真个？"

"哈呀，这事谁还能胡捏冒说？"

"谁跟车来，叫他也签个名！"

"八叔跟车来，他现在到部队看儿子去了，我目下等着用钱哩！"

柳大年重重地看了一眼柳合合。大车把式脸上是一副极其老实的表情。他从压在带子下的白衫子口袋里摸出水笔，随即就签了字。

十分钟没过，会计铁锁来了，把给柳合合刚才签过字的那张发票摊在队长面前："这事，等八叔回来再说，合合那人你还不知道……"

"你怕他骚怪卖谎？"

"哕人是个活络络，转泼泼，我有点不放心！俩人经手的事，就该俩人都签名。万一……"

"他敢！"柳队长说，"应该坚持原则，可也不要太胆小了！你发！没事！"

事情过了十天，八叔从部队探望儿子回来了，铁锁跟着进了门："八叔，可把你盼回来了！"

说明了情况，八老汉短胡碴一翘，大声说："没这事！纯粹是胡捏！"

年轻的新任会计脸气得通红，心脏腾腾腾跳，他再一次问八叔："这事你敢作证？"

"咋不敢？面对面顶证都行！"

小伙子攥着拳头，大步流星找到大队长，把从八叔那儿了解到的结果一说，大年猛地放下碗，把两个韭菜饺子都震到桌子上，睁大眼睛说："真个？看我把他这'转轴'不扭断！"

铁锁压着自己的火儿，劝队长：“大年叔，生气不顶用，现在要紧的是做工作！我把合合叫来，咱俩问！”

大年说叫他的女儿去叫合合，为的是他好和这个年轻的小会计商量一下，如何问法。此刻，大年心目中的那个只不过写写画画的会计概念正在淡漠，一个小战友的感觉正在形成和明朗化，他第一次感觉到遇事需要和他多多商量了。

柳合合来了，扑闪着一双精明的狡黠的大眼，装得傻不愣愣的：“队长，啥事？”

柳大年铁青着脸色，狠狠地看了柳合合一眼，把头转过去，显出十分恼火的样子。

铁锁说：“你上次报的账，说骡子踢了人。这事，跟车的人知道不？”

柳合合头一偏，眼一转，扬起头来的时候，很肯定地说：“八叔跟车，他……他不知道。那天歇晌，在路上喂骡子，八叔到县供销社买东西去了，骡子踢了个老婆，是我扶人家去看的。好在伤不重，我也没给八叔说。”

“那老婆住在啥公社，啥大队？”

“我可没顾得问！”

“叫啥名字？”

“啊呀，你看叔这‘慌慌慌’，事过不记事……”

“你胡日的啥鬼！”柳大年突然站起，额头上青筋直暴，发出雷一般的吼叫！

“你要血口喷人！”一向善于运用语言技巧的“活络络”，此时眼睛一瞪，也来了硬的。

“等事情弄明白咱再说！”柳大年说。

“等事情弄明白再说！”柳合合也说。

“事情一定能弄清！”小会计斩钉截铁地说，“这事并不难，很快就会弄清；你自己倒是要好好考虑！”

第二天，小会计铁锁和小出纳玉梅，一人一辆新“飞鸽”，准备到县医院调查的时候，队长柳大年把他俩送到村头，正要分手时，柳合合来了：大眼珠上现出许多红血丝，那是睡眠不足和思虑过度的征兆，鼻里眼里，现出一种羞愧之色。三个人相对一看，不知合合又要什么花样。

短暂的一瞬沉默、对峙之后，合合突然对着自己头发稀疏的光亮脑袋打了一拳，就蹲在旁边，双手抱住头，长吁短叹起来。

“哼！”柳大年生气地瞅着他。

铁锁撑起车子，走到合合对面，“你有啥话要说吗？”

“叔不是人，哎—嘘！”

“你干脆点！”铁锁说。

“你俩要跑冤枉路了……哎！嗨……”

“到底咋回事？”

“都怪叔……产生了……瞎瞎思想……那……那张发票是……是我……拾下的……”

柳大年狠狠瞪了合合一眼，气得说不出话来，捞起铁锨下地去了。

……

这件事之后，柳大年见了熟人就夸：“伙计，俺队今年选了个好会计，真正的铁锁子，铁疙瘩——金不换咯！”

至此，我心里的问号消失了，挂上了一把结结实实的铁锁。

中篇小说

康家小院

一

没有女人的家，空气似乎都是静止的。

康田生三十岁上死了女人。把那个在他家小厦屋里出出进进了五年、已经和简陋破烂的庄稼院融为一体的苦命人送进黄土，康田生觉得在这个虽然穷困却无比温暖的小院里，一天也待不下去了。他抱起亲爱的亡妻留给他的两岁的独生儿子勤娃，用粗糙的手掌抹一抹儿子头顶上的毛盖头发，出了门，沿着村子后面坡岭上的小路走上去了。他走进老丈人家的院子，把勤娃塞到表嫂怀里，鼓劲打破蒙结在喉头的又硬又涩的障碍：

“权当是你的……”

勤娃大哭大闹，抡胳膊蹬腿，要从舅妈的怀里挣脱出来。他赶紧转过身，出了门，梗着脖子没有回头；再看一眼，他可能就走不了。

走出丈人家所居住的腰岭村，下了一道塄坎，他双手撑住一棵合抱粗的杏树的黑色树干，呜的一声哭了。

只哭了一声，康田生就咬住了嘴唇，猛然爆发的那一声撕心裂肺的中年男人的粗壮的声音，戛然而止。他没有哭下去，迅即离开大杏

树，抹去眼眶里的泪水，使劲咳嗽两声，沿着上岭来的那条小路走下去了。

三十年的生活经历，教给他忍耐，教给他倔犟，独独没有教会他哭泣。小时候，饿了时哭，父亲用耳光给他止饥。和人家娃娃玩恼了，他占了便宜，父亲抽他耳光；他吃了亏，父亲照样抽他的耳光。他不会哭了，没有哭泣这个人类男女皆存的强烈的感情动作了。即使国民党河口联保所的柳木棍打断了两根，他的裤子和皮肉粘在一起，牙齿把嘴唇咬得血流到脖子里，可眼窝里始终不渗一滴眼泪。

下河湾里康家村的西头，在大大小小高高矮矮拥挤着的庄稼院中间，夹着康田生两间破旧的小厦房，后墙高，檐墙低，陡坡似的房顶上，掺接得稀疏的瓦片，在阴雨季节常常漏水。他和他的相依为命的妻子，夜里光着身子，把勤娃从炕的这一头挪到那一头，避免潮湿……现在，妻子已经躺在南坡下的黄土里头了，勤娃送到表兄嫂家去了，残破低矮的土围墙里的小院，空气似乎都凝结了，静止了，他踏进院子的脚步声居然在后院围墙上发出嗡嗡的回音。灶是冷的，锅是冰的，擀面杖依旧架在案板上方的木橛上……妻子头上顶着自己织成的棉线布巾（防止烧锅的柴灰落到乌黑的头发里），拉着风箱，锅盖的边沿有白色的水汽冒出来。他搂着儿子，蹲在灶锅前，装满一锅旱烟。妻子从灶门里点燃一根柴枝，笑着递到他手上时，勤娃却一把夺走了，逞能地把冒着烟火的柴枝按到爸爸的烟锅上。他吸着了，生烟叶子又苦又辣的气味呛得勤娃咳嗽起来，竟然哭了，恼了。他把一口烟又喷到妻子被火光映得忽明忽暗的脸上，呛得妻子也咳嗽，流泪，逗得勤娃又笑了……一条长凳，一张方桌，靠墙放着；两条缀着补丁的粗布被子，叠摞在炕头的苇席上，一切他和妻子共同使用过的家具和什物，此刻都映现着她忧郁而温存的眼睛。

连着抽完两袋旱烟，康田生站起来，勒紧腰里的蓝布带子，把烟袋别在后腰，从墙角提起打土坯的木把青石夯，扛上肩膀，再把木模挂到夯把上，走出厦屋，锁上门，走过小院，扣上木栅栏式的院墙门上的铁丝扣子，头也不回地走出康家村了。

第二天清晨，当熹微的晨光把坡岭、河川照亮的时光，康田生已经在一个陌生的村庄旁首的土壕里，提着青石夯，砸出轻重有致、节奏明快的响声了。

三十岁，这是庄稼汉子的什么年岁啊！康田生丢剥了长衫，只穿一件汗褂，膀阔腰粗，胳膊上栗红色的肌肉闪闪发光。他抡着几十斤重的石夯，捶击着装满木模的黄土，劈里啪啦，一串响声停歇，他轻轻端起一块光洁平整的土坯，扭着犍牛一样强壮的身体，把土坯垒到一起，返回身来，给手心喷上唾液，又提起石夯，捶啊捶起来……

他要续娶。没有女人的小院里的日月，怎么往下过呢！他才三十岁。三十岁的庄稼汉子，怕什么苦吃不得吗?

十四五年过去了，康田生终于没有续上弦。

他在小河两岸和南原北岭的所在村庄里都承揽过打土坯的活计，从这家那家农户的男主人或女当家的手里，接过一枚一枚铜元或麻钱，又整串整串地把这些麻钱和铜元送交给联保所的官人手里，自己也搞不清哪一回缴的是壮丁捐，哪一回又缴的是军马草料款了。

他早出晚归，仍然忙于打土坯挣钱，又迫于给联保所缴款，十四五年竟然糊里糊涂地过去了。人老虽未太老，背驼亦未驼得太厉害。而变化最大的是，勤娃已经长得和他一般高了，只是没有他那么粗，

那么壮。他已经不耐烦用小碗频频到锅里去舀饭，换上一只大人常用的粗瓷大碗了；也不知什么时候学的，勤娃已经会打土坯了。

康田生瞧着和自己齐肩并头的勤娃，顿然悟觉到：应该给儿子订媳妇了呢！

二

勤娃在舅家，舅舅把他送给村里学堂的老先生。老先生一顿板子，打得他把好容易认得的那几个字全飞走了。他不上学，舅舅和舅母哄他，不行；拖他，去了又跑了；不得不动用绳索捆拿，他一得空还是逃走了。

“生就的庄稼坯子！”听完表兄表嫂的叙述，康田生叹一口气，“真难为你们了。”

勤娃开始跟父亲做庄稼活儿。两三亩薄沙地，本来就不够年富力强的父亲干，农忙一过，他闲下来。他学木匠，记不住房梁屋架换算的尺码。似乎不是由他选择职业，而是职业选择他，他学会打土坯，却是顺手的事。

在乡村七十二行手艺人当中，打土坯是顶粗笨的人干的了，虽不能说没有一点技术，却主要是靠卖力气。勤娃用父亲那副光滑的柿树木质的模子，打了一摞（五百数）土坯，垒了茅房和猪圈，又连着打了几摞，把自家被风雨剥蚀得残破的围墙推倒重垒了。这样，勤娃打土坯出师了。

活路多的时候，父子俩一人一把石夯，一副木模，出门做活儿。活路少的时候，勤娃就让父亲留在屋里歇着，自己独个去了。

他的土坯打得好。方圆十里，人家一听说是老土坯客的儿子，就完全信赖地把他引到土壕里去了。

这一天，勤娃在吴庄给吴三家打完一摞土坯，农历四月的太阳刚下原坡。他半后晌吃了晚饭，接过吴三递给他的一串麻钱，装进腰里，背起石夯和木模，告辞了。刚走出大门，吴三的女人迎面走来，一脸黑风煞气:“土坯摞子倒咧！”

“啊？”吴三顿时瞪起眼睛，扯住他的夯把儿，“我把钱白花了，饭给你白吃了？你甭走！”

“认自个儿倒霉去！”勤娃甩开吴三拉拉扯扯的手说。按乡间虽不成文却成习律的规矩，一摞土坯打成，只要打土坯的人走出土壕，摞子倒了，工钱也得照付。勤娃今天给吴三家打这土坯时，就发觉土泡得太软了，后来想到四月天气热，土坯硬得快，也就不介意。初听到吴三婆娘报告这个倒霉事的时光，他咂了一下嘴，觉得心里不好受。可当他一见吴三变脸睁眼不认人的时候，他也来了硬的，“土坯不是倒在我的木模上……”

吴三和他婆娘交口骂起来。围观的吴庄的男女，把他推走了。骂归骂，心里不好受归不好受，乡规民约却是无法违背的。他回家了。

“狗东西不讲理！”勤娃坐在小厦屋的木凳上，给坐在门槛上的父亲叙述今天发生的事件，“他要是跟我好说，咱给他再打一摞，不要工钱！哼！他胡说乱道，我才不吃他那一套泼赖！”

康田生听完，没有吭声，接过儿子交到他手里来的给吴三打土坯挣下的麻钱，在手里攥着，半晌，才站起身，装到那只长方形的木匣里。那是亡妻娘家陪送的梳妆盒儿。他没有说话，躺下睡了。

勤娃也躺下睡了。父亲似乎就是那么个人，任你说什么，他不大开口。高兴了，笑一笑；生气了，咳一声。今天他既没笑，也没叹息。他就是那样。

勤娃听到父亲的叫声，睁开眼，天黑着，豆油灯光里，父亲已经把石夯扛到肩膀上了。他慌忙爬起，穿好衣裤，就去捞自己的那一套工具，大概父亲应承下远处什么村庄里的活儿了。

“你甭拿家具了。”父亲说，“你提夯，我供土。”

说罢，父亲扛着石夯出了门，勤娃跟在后头，锁上了门板。村庄里悄悄静静，一钩弯镰似的月牙悬浮在西原上空，河滩里蛙声一片。

“爸，去哪个村？”

“你甭问，跟我走。”

勤娃就不再说话。马家村过了，西堡，朱家寨……天麻明，走进吴庄村巷了。父亲仍不停步，也不回头，从吴庄的大十字拐过去，站立在吴三门口了。勤娃一愣，正要给爸爸发火，吴三从门里走出来。

“老三，还在那个土壕打土坯吗？”

吴三一愣，没好气地说：“我还打呀？”

“你只说准，还是那个土壕不是？”

“我另寻下土坯匠了。”

勤娃早已忍耐不住（这样卑微下贱），他忽地转过身，走了。刚走开几步，膀子上的衣服被急急赶上前来的爸爸揪住了。一句话没

说，父子俩来到勤娃昨日打土坯的大土壕。

“提夯！”康田生给木模里装饱了土，命令说。

勤娃大声哀叹着，提起石夯，跳到打土坯的青石台板上。刚刚从夜晚沉寂中苏醒过来的乡村田野上，响起了有节奏的青石夯捶击土坯的声音。

太阳从东原顶上冒出来，勤娃口渴难忍。往昔里，太阳冒红时光，主人就会把茶水和又酥又软的发面锅盔送到土壕来。今日算干的什么窝囊事啊！

乡村人吃早饭的时光到了，土壕外边的土路上，踽踽走过从原坡和河川劳动归来的庄稼汉，进入树荫浓密的吴庄村里去了。爷儿俩停住手，爸爸从口袋里取出自带的干馍，啃起来。勤娃嗓子眼里又干又涩，看看已经风干的黑面馍馍，动也没动，把头拧到一边，躲避着父亲的眼光，他怕看见爸爸那一双可怜的眼光。他第一次强烈感到了出笨力者的屈辱和下贱，憎恨甘作下贱行为的父亲了。

农历四月相当炎热的太阳，沿着原塄的平顶，从东朝西运行，挨着西原坡顶的时光，五百数目为一摞的土坯整整齐齐垒在昨日倒坍掉的那一堆残迹旁边。父子俩收拾工具和脱掉扔在地上的衣衫，走出土壕了。

“给老三说，把土坯苫住，当心今黑有雨。”父亲在村口给一位老汉捎话，“我看今晚有雨哩。你看西河口那一层云台……”

“走走走走走！”勤娃走出老远，粗暴地呵斥父亲，“操那么些闲心做啥？”

勤娃回到家，一进门，掼下家具，就蹲在灶锅下，点燃了麦草，湿柴呛得鼻涕眼泪交流，风箱板甩打得劈啪乱响。他又饿又渴，虚火中烧。父亲没有吭声，默默地在案板上动手和面。要是父亲开口，他准备吵！这样窝窝囊囊活人，他受不了。

“康大哥！”

一声呼叫，门里探进一颗脑袋，勤娃回头一看，却是吴三，他一扭头，理也不理，照旧拉着风箱。父亲迎上前去了。

“康大哥！实在……唉！实在是……”吴三和父亲在桌前坐下来，“我今日没在屋，到亲戚家去了。回来才听说，你又打下一摞……”

“没啥……嘿嘿嘿……”父亲显然并不为吴三溢于言表的神色所动情，淡淡地应和着，“没啥。”

“你爷儿俩饿了一天，干渴了一天！”吴三越说越激动，“我跟娃他妈一说，就赶紧来看你。我要是不来，俺吴庄人都要骂我不通人性了。”

“噢噢噢……嗬嗬…”康田生似乎也动了情，“咱庄稼人，打一摞土坯也不容易，花钱……咱挣了人的麻钱，吃了人的熟食，给人打一堆烂货，咱心里也不安宁哩！”

“不说了，不说了。”吴三转过脸，“勤娃兄弟，你也甭记恨……老哥我一时失言……”

怪得很，窝聚在心胸里一整天的那些恶气和愤怨，一下子全都消失了，勤娃瞟一眼满脸憨笑着的吴三，不好意思地笑笑，表示自己也有过失。他低头烧锅，看来吴三是个急性子的热心人，好庄稼人！他

把爸爸称老哥，把自己称兄弟，安顿的啥班辈儿嘛！反正，他是把自己往低处按。

“这是两把挂面。这是工钱。”吴三的声音。

“使不得！使不得！”父亲慌忙压住吴三的手。

“你爷儿俩一天没吃没喝……”

“不怎不怎……”

勤娃再也沉默不住，从灶锅间跳起来，帮着父亲压住吴三的手：“三叔……”

第二天，吴庄一位五十多岁的乡村女人走进勤娃家的小院，脸上带着神秘的又是掩藏着的喜悦，对康田生说，吴三托她来给勤娃提亲事，要把他们的二姑娘许给勤娃。乡村女人为了证实这一点，特别强调吴三托她办事时说的原话：“吴三说，咱一不图高房大院，二不图车马田地，咱图得康家父子为人实在，不会亏待咱娃的……”

按照乡间古老而认真的订婚的方式，换帖、送礼等等繁章缛节，这门亲事终于由那位乡村女人做媒撮合成功了。康田生把装在亡妻木匣里那一堆铜元和麻钱，用红纸捆扎整齐，交给五十多岁的媒婆，心里踏实得再不能说了——太遂人愿了啊！

婚事刚定，壮丁派到勤娃头上。

“跑！”康田生说，“我打了一辈子土坯，给老蒋纳了一辈子壮丁款，现时又轮着你了！”

勤娃拧着眉，难受而又慌恐：“我跑了，你咋办？”

“你跑我也跑！”康田生说，“哪里混不下一口饭？只要扛上木模和石夯！”

勤娃逃走了。半年后，他回来了，对村里惶惶不安的庄稼人说，解放了！连日来听到南山方向的炮声，是追打国民党军队的解放军放的。他向人们证实说，他肩上扛回来的那袋洋面，是在河边的柳林里拾的，国军失败慌忙逃跑时撂下的……

三

日日夜夜在心里挂牵着的日子，正月初三，给勤娃婚娶的这一天，在紧迫的准备、焦急的期待中就要来到了。明天——正月初三，寂寞荒凉了整整十八年的康田生的小庄稼院里，就要有一个穿花衫衫、留长头发的女人了。他和他的儿子勤娃，无论从田野里劳动回来，抑或是到外村给人家打土坯归来，进门就有一碗热饭吃了。这个女人每天早晨起来，用长柄竹条扫帚扫院子，扫大门外的街道，院子永远再不会有一层厚厚的落叶和荒草野蒿了，狐狸和猫豹子再也不敢猖獗地光临了。（有几次，康田生出外打土坯归来，在小院里发现过它们的爪迹和拉下的带着毛发的粪便，令人心寒哪！）肯定说，过不了几年，这个小院里会有一个留着毛盖儿或小辫的娃娃出现，这才算是个家哩！在这样温暖的家庭里，康田生死了，心里坦坦然然，啥事也不必担忧啰！

乡亲们好！不用请，都拥来帮忙了。在小院里栽桩搭席棚的，借桌椅板凳的，出出进进，快活地忙着。平素，他和勤娃在外的时间多，在屋的时间少，和乡亲乡党们来往接触少。人说家有梧桐招凤

凰，家有光棍招棍光，此话不然。他父子一对光棍，却极少有人来串门。他爷儿俩一不会耍牌掷骰子，二不会喝酒游闲。谁到这儿来，连一口热水也难得喝上。可是，当勤娃要办喜事的时候，乡党们还是热心地赶来帮忙料理。解放了，人都变得和气了，热心了，世道变得更有人情风味了。

今天是正月初二，丈人家的表兄表嫂吃罢早饭就来了。他们知道妹夫一个粗大男人，又没经过这样的大喜事，肯定忙乱得寻不着头绪，甚至连勤娃迎亲的穿戴也不懂得。勤娃自幼在他们屋里长大，他们和娘老子一般样儿。他们早早赶来为自己苦命早殁的妹妹的遗子料理婚事。

康田生倒觉得自己无事可干了。他哪里也插不上手，只是忙于应付别人的问询：斧头在哪儿放着？麻绳有没有？他自己此刻也不知斧头扔到什么鬼旮旯里去了。麻绳找出来的时光，是被老鼠咬成一堆的麻丝丝。问询的人笑笑，干脆什么也不问，需要用的家具，回自家屋里拿。

康田生闲得坐不住，心里也总是稳不住。老汉走出街门，没有走村子东边的大路，而是绕过村南坡梁，悄悄来到村东山坡间的一条腰带式的条田上。那块紧紧缠绕着山坡的条田里，长眠着他的亡妻，苦命人哪！

坟堆躺在上一台条田的塄根下，太阳晒不到，有一层表面变成黑色的积雪，马鞭草、苍耳、芨芨草、蒿子，枯干的枝叶仍然保护着坟堆。丛生的枳树枝条也已长得胳膊粗了，快二十年了呀！

康田生在条田边的麦苗上坐下来，面对亡妻的坟墓，嗫嚅了半天，说：“我给你说，咱勤娃明日要娶亲了……”

他想告诉亲爱的亡妻，他受了多少磨难，才把他们的勤娃养育大了。他给人家打下的土坯，能绕西安城墙垒一匝。他流下的汗水，能浇灌一分稻子地。他在兵荒马乱、疫疠蔓生的乡村，把一个两岁离母的勤娃抓养成小伙子，够多艰难！他算对得住她，现在该当放心了……

他想告诉她，没有她的日月，多么难过。他打土坯归来的路上，不觉得是独独儿一个人，她就在他身旁走着，一双忧郁温存的眼睛盯着他。夜里，他梦见她，大声惊喜地呼叫，临醒来，炕上还是他一个人……

四野悄悄静静，太阳的余晖还残留在原坡和蓝天相接的天空，暮霭已经从南原和北岭朝河川围聚。河川的土路上，来来往往着新年佳节时月走亲访友姗姗归来的男女。

康田生坐着，其实再没说出什么来。这个和世界上任何有文化教养的人一样，有着丰富的内心感情活动的庄稼汉子，常年四季出笨力打土坯，不善于使用舌头表达心里的感情了。

再想想，康田生有一句话非说不可：“你放心，现在世事好了，解放了……”

他想告诉她，康家村发生了许多亘古闻所未闻的吓人的事。村里来了穿灰制服的官人，而且不叫官人叫干部，叫同志，还有不结发髻散披着头发的女干部。财东康老九家的房产、田地、牲畜和粮食，分给康家庄的穷人了。用柳木棍打过他屁股的联保所那一伙子恶人，三

个被五花大绑着押到台子上，收了监。他和勤娃打土坯挣钱，挣一个落一个，再不用缴给联保所了……

他叹息着：你要是活着，现时该多好啊！

康田生发觉鼻腔有异样的酸渍渍的感觉，不堪回想了，扬起头来。

扬起头来，康田生就瞅见了站在身旁的儿子勤娃，不知他来了多久了。

“我舅妈叫我来，给我妈……烧纸。”勤娃说，“我给我爷和我婆已经烧过了，现在来给我妈……”

唔！真是人到事中迷！晚辈人结婚的前一天后晌，要给逝去的祖先烧纸告祷，既是告知先祖的在天之灵，又是祈求祖先神灵佑护。他居然忘记了让勤娃来给他的生母烧纸，而自个儿却悄悄到这里来了。

勤娃在墓堆前跪下了，点着了一对小小的漆蜡，插在坟堆前的虚土里；又点燃了五根紫红色的香，香烟袅袅，在野草和枳树的枯枝间缭绕；阴纸也点燃了，火光扑闪着。

勤娃做完这一切，静静地等待阴纸烧完。他并不显得明显的难受，像办普通的一件事一样，虽然认真，却不动情。康田生心里立即蹿起一股憎恶的情绪，想想又原谅自己的儿子了。他两岁离娘，根本记不得娘是什么模样，娘——就是舅母！

康田生看着闪闪的蜡烛，缭绕的香烟，阴纸蹿起的火光，心里涌动着，不管儿子动情不动情，他想大声告慰黄泉之下的亡灵：世道变

了。康家的烟火不会断绝了。康田生真正活人的日子开始啰！祖先诸神，尽皆放宽心啊！

四

勤娃脸上泛着红光，处处显得拘束，因为乡村里对未婚男女间接触的严格限制，直到今天，结婚的双方连看对方一眼的机会也没有过，使人生这件本来就带着神秘色彩的喜事，愈加增添了神秘的色彩。平常寡言少语甚至显得逆愣的勤娃，农历正月初三日，似乎一下子变得随和了，连那双老是像恨着什么人的眼睛，也闪射出一缕缕羞涩而又柔和的光芒。

长辈人用手拍打他剃得干干净净的脑袋，表示亲昵的祝贺；同辈兄弟们放肆地跟他开玩笑，说出酸溜溜的粗鲁话，他都一概羞涩地笑笑，不还嘴也不介意。

舅母叫他换上礼帽，黑色细布长袍，他顺情地把借来的礼帽，戴在终年光着而只有冬季包一条帕子的头上，黑细布长袍不合身，下摆直扫到脚面。无论借来的这身衣着怎么不合身，勤娃毕竟变成一副新郎的装扮了。

按照乡村流行下来的古老的结婚礼仪，勤娃的婚事进行得十分顺利。

勤娃完全晕头昏脑了。他被舅家表哥牵着，跟着花轿和呜哇呜哇的吹鼓手，走进吴庄，到吴三家去迎亲。吴三还算本顺，没有惯常轿到家门口时的讲价还价。当勤娃再跟着伴陪的表兄起身走出吴三家门

的时候，唢呐和喇叭声中忽闪忽闪行进的轿子，已经走到村口了。那轿子里，装着从今往后就要和他过日月的媳妇。

回到康家村，女人和娃娃把他和蒙着脸的新媳妇一同拥进小小的厦屋，他一把揭去媳妇脸上蒙着的红布，就被小伙子们挤到门外去了，没有看清楚，只看见一副红扑扑的圆脸膛，他的心当时忽地猛跳一下，自己已经眼花了。

媳妇娶到屋了，现时就坐在小厦房里，那里不时传出小伙子和女人们嘻嘻哈哈的笑闹。所有亲戚友人，坐过午席，提上提盒笼儿告别上路了。一切顺顺当当。只是在晚间闹新房耍新娘的时候，出了一点不快的风波。

勤娃和新娘被大伙拥在院子里，小伙子们围在他俩周围，女人们挤在外围，小院里被拥挤得水泄不通。新婚三天里不论大小，不管辈分，任何人有什么怪点子瞎招数儿，尽都可以提出来，要新娘新郎当众表演。这些不断翻新花样，几乎带有恶作剧的招数儿，不文明，甚至可以说野蛮，可是，乡村里自古流传不衰，家家如此，人人皆然。老人们知道，对于两个从来未见过面的男女，闹新房有一层不便道破的意思：启发挑逗两个陌生的男女之间的情欲。

勤娃还不是了知这层道理的年龄的人。人家要他给新娘子灌酒，他做了。人家要新娘子给他点烟，他接受了。人家叫他“糊顶棚”，他迟疑了。

勤娃知道，所谓“糊顶棚”，就是在舌尖上沾一块纸，再贴到媳妇的口腔上腭里。他看过别人家耍新娘时这么玩过，临到自己，他慌了。

有人打他的戴礼帽的头。谁把礼帽一把摘掉了，光头皮上不断挨打。哄哄闹闹的吼声，把小院吵得要抬起来了。有人把纸拿来了，有人扭他的胳膊了。他把纸沾在舌尖上，只挨到媳妇的嘴唇上……总算一回事了。

一个新花样又提出来："掏雀儿"。要勤娃把一条手帕儿从新娘的右边袖口塞进去，从左边袖筒拉出来。他觉得，这比"糊顶棚"好办多了。他刚动手，新娘眼里闪出一缕怨恨他的眼光。勤娃愣愣地想，这有什么关系呢？于是就有人夹住新娘的两条胳膊……勤娃的两只手在新娘胸前交接手帕的时候，他触到了乳房，脸上轰的一热，同时看见新娘羞得流出眼泪了。勤娃难受了，他此刻才意识到自己太傻了。

"掏着雀儿没？"

"雀大雀小啊？"

勤娃低下头，羞愧得抬不起头来，哄闹声似乎很遥远，他听不见了。

他猛地抬起头，掼下手帕儿，挤出人堆去了……

忽地一下，人们哗的一声走散了，拥挤着朝门外走了，小伙子们骂着，打着呼哨，院子里只留下新娘，呆呆地站在那里。

"啊呀，勤娃！你真傻！"舅母怨他，"闹新房要媳妇，都是这样！你怎的就给众人个搅不起！"

"这娃娃！愣得很！"父亲也惶惶不安，"咱小家小户，怎敢得罪这么多乡党？人家来闹房，全是耍哩嘛！你就当真起来？"

“去！快去！把乡党叫回来，赔情！”舅母说，“把酒提上去请！”

“算哩。”舅舅说，“夸不过三日，笑不过三日。只要往后待乡党好，没啥！明日，勤娃把酒提上，走一走，串串门，赔个情完事……”

……

勤娃进了自己的新房。父亲已经在小灶房里的火炕上安息了。舅舅和舅母也安睡了。小院的街门和后门早已关严，喧闹了一天的小院此刻显得异常静寂。

媳妇坐在炕沿上，低眉颔首，脸颊上红扑扑的，散乱的两绺鬓发垂吊在耳边，新挽起的发髻上，插着一支绿色的发针，做姑娘时被头发覆盖着的脖颈白皙而细腻。勤娃早已把闹房引起的不快情绪驱逐干净了。他不像舅母和父亲那样担心失掉乡党情谊，他要保护他的媳妇不受难堪，乡党情谊能比媳妇还要紧吗？屁！

他坐在椅子上，说什么呢？他找不到一个可以和她搭讪的话茬儿，而心里却想和她说说话儿。久久，他问：“你……冷不？”

她头没抬，只摇一摇。

“饿不饿？”

她仍然摇摇头。

他又没词儿了。他想过去和她坐在一块，搂住她的肩膀，却没有勇气。

“你怎么……刚才就躁了呢？”

她仍然没有抬头。

“我……我看他们，太不像话！”他说，“怕你难受。”

“你……傻！”她抬起头来，爱抚地剜了他一眼，“你该当和他们……磨。你傻！”

他似乎一下子醒悟了。他在村里也看过别人家闹新房的场景，好多都是软磨硬拖，并不按别人出的瞎点子做的，滑过去了。他没有招架众人哄闹的能力……直杠人啊！“你傻！”新娘这样说他，他心里却觉得怪舒服的。男人跟女人怎样好呀？他猛地把媳妇搂到怀里。

“啊哟！”媳妇低低地一声叫，压抑着的痛苦。

他放开手，媳妇的左臂吊着，一动不动。他把她的胳臂蹽了吗？天啊，她是泥捏的呢，还是他打土坯练出了超凡出众的臂力？他吓坏了。

“一拉一送。”媳妇把胳膊递给他，“我这胳膊有毛病，不要紧的，安上就好。拉啊——”

胳膊又安上了。他站在一边，不敢动了。

她却在他眉心戳了一指头：“你……傻瓜……”

五

农历正月里的太阳，似乎比以往千百年来所有正月里的热量都要充足，照耀着秦岭山下南原坡根的小小的康家村的每一座院落，勤娃

家的小院——康家村里最阴冷荒凉的死角，如今也和康家村大大小小的庄稼院一样，沐浴在和煦温暖的早春的阳光下了。

新婚之夜过去了，微明中，勤娃没有贪恋温适的被窝，爬起来，动手去打扫茅厕和猪圈了。笼罩在两性间的所有神秘色彩化为泡影，消逝了。昨天结婚的冗繁的仪式中，自己的拘束和迷乱，现在想起来，甚至觉得好笑了。他把茅厕铲除干净，垫下干土，又跳进猪圈，把嗷嗷叫着的黑克郎赶到一边，把粪便挖起，堆到圈角，然后再盖上干黄土，这样使粪便窝制成上等肥料，不致让粪便的气息漫散到小院里去。

做着这一切，他的心里踏实极了。站在前院里，他顿时意识到：过去，父亲主宰着这间小院，而今天呢？他是这座庄稼院的当然支柱了。不能事事让父亲操持，而应该让父亲吃一碗省心饭啰！他的媳妇，舅母给起下一个新的名字叫玉贤，夫勤妻贤，组成一个和睦美满的农家。他要把屋外屋内一切繁重的劳动挑起来，让玉贤做缝补浆洗和锅碗瓢勺间的家事。他要把这个小院的日子过好，让他的玉贤活得舒心，让他的老父亲安度晚年，为老人和为妻子，他不怕出力吃苦，庄稼人凭啥过日月？一个字：勤！

他拄着铁锨，站在猪圈旁边，欣赏着那头体壮毛光的黑克郎，心里正在盘算，今日去丈人家回门，明天就该给小麦追施土粪了，把积攒下的粪土送到地里，该当解冻了，也是他扛上石夯打土坯的最好的时月了。

他回到院里，玉贤正在捉着稻秫笤帚扫院子，花袄，绿裤，头顶一块印花蓝帕子。他的心里好舒服啊，呆呆地看着这个已经并不陌生

的女人扫地的优美动作。怪得很啊！她一进这小院，小院变得如此地温暖和生机勃勃。

“勤娃！”

听见父亲叫他，勤娃走进父亲住的屋子，舅舅和舅母都坐在当面，他问候过后，就等待他们有什么指教的话。

“勤娃。”父亲掂着烟袋，说，“你给人家娃说，早晨……甭来给我……倒尿盆……”

勤娃笑了。

“这是应该的。”舅母说，“你爸……”

“咱不讲究。咱穷家小院，讲究啥哩！”父亲说，“我自个儿倒了，倒畅快。我又不是瘫子……”

勤娃仍然笑笑，能说什么呢，爸是太好了。

太阳冒红了，他和玉贤相跟着，提着礼物，到丈人吴三家去回门。

走出康家村，田野里的麦苗渐渐变了色，温暖的阳光照耀着坡岭、河川，阴坡里成片成片的积雪只留下点点残迹，柳条上的叶苞日渐肥大了。

“玉贤——”

“哎——”

“给你……说句话……”

“你说呀！”

“咱爸说……”

“说啥呀？”她有点急，老公公对她到来的第一天有什么不好的印象吗?

“咱爸说……”

“说啥呀？你好难场！”

“咱爸说，你往后……甭给他……倒尿盆！”

“噢呀！”玉贤释然嘘出一口气，笑了，“怎哩？”

“不怎。”勤娃说，“他说他自个儿倒。”

“俺娘给俺叮嘱再三，要侍奉老人，早晨倒盆子，三顿饭端到老人手上，要双手递。要扫院扫屋，要……”玉贤说，“俺妈家法可严哩！”

“俺爸受苦一辈子，没受过人服侍。”勤娃说，“他倒不习惯别人服侍他。”

“咱爸好。”玉贤说。

两人朝前走着，可以看见吴庄村里高大的树木的光秃秃的枝梢了。

六

平静的和谐的生活开始了。院子里的榆树枝上，绣织着一串串翡翠般的榆钱，一只花喜鹊在枝间叫着。玉贤坐在东院根西斜的阳光里，纳着鞋底。后门关着，前门闭着，公公和丈夫，一人一把石夯，天不明就到什么村里打土坯去了，晚上才回来。她一个人在小院里，静得只能听见麻绳拉过布鞋鞋底的嗞嗞声。有点寂寞，她想和人说说闲话；不好，过门没几天的新媳妇，走东家串西家，那是会引起非议的。她就坐着，纳着，翻来覆去想着到这个新的家庭里的变化。感觉顶明显的，是阿公比亲生父亲的脾气好。父亲吴三，一见她有不顺眼的地方，就骂。阿公可是随和极了。他从来不要求儿媳妇对自己照顾和服侍，打土坯晚上回来，锅里端出什么就吃什么。平时在家，她请示阿公该做啥饭？宽面还是细面？干的还是汤的？阿公总是笑笑，说："甭问了，你们爱吃啥做啥。"她在这个庄稼院里，似乎比在亲生娘老子跟前更畅快些。人说新媳妇难熬，给勤娃做媳妇，畅快哩！

勤娃也好，勤快，实诚，俭省，真正地道的好庄稼人。她相信在结婚前，母亲给她打听来的关于勤娃的人品，没有哄她。他早晨出门去，晚间回来，有时到十几里以外的村里去打土坯，仍然要赶回来。他在她的耳边说悄悄话："要是屋里没有你，我才不想跑这冤枉路哩！"

昨天晚上发生的事，很不寻常。

勤娃打土坯回来，照例，把当日挣的钱交给老人。老人接住钱，放在桌上，叫勤娃把媳妇唤来。玉贤跟着勤娃来到阿公的住屋。

阿公坐在炕上，看一眼勤娃又看一眼玉贤，磕掉烟灰，说："从今往后，勤娃挣下钱，甭给我交了，交给贤娃。"

老人不习惯叫玉贤，叫贤娃，倒像是叫自己的女儿一样的口吻。玉贤心里忽然感动了，连忙说：“爸，那不行！你老是一家之主……”

“一家人不说生分话。”老人诚恳地解释，“我五十多岁了，啥也不图，只图得和和气气，吃一碗热饭。这日月，是你们的日月，好了坏了，穷了富了，都是你们的。日子怎么过，家事怎样安排，你们要思量哩！勤娃前日说，想盖三间瓦房，好，就该有这个派势！三间房难也不难。爸一辈子打土坯挣下的钱，盖十间瓦房也用不完，临到而今还是这两间烂厦房。怎哩？挣得多，国军收税要款要得多。现时好了，咱爷儿俩闲时打土坯，不过三年，撑起三间瓦房！”

“爸，还是把钱搁到你跟前……”勤娃说。

“你俩都是明白娃嘛！爸要钱做啥？还不是给你攒着，干脆放你们箱子里，省得我操心。”老人把亡妻留下的那只梳妆匣儿，一家人的金库，一下子塞到勤娃怀里，作为权力的象征，毫不迟疑地移交给儿子了，“小子，日月过不好，甭怪你爸噢！”

勤娃流泪了，说：“爸，你迟早要用钱，你说话，上会，赶集……”

“嗨！不知道吗？”老人爽快地笑着，“爸一辈子只会打土坯，挣汗水钱，不会花钱。”

现在，那只装着爷儿俩打土坯挣来的钱的梳妆匣儿，锁在箱子里的角落里。玉贤觉得，这个家，真是自己的家了。她在娘家时，村里的媳妇们，要用一块钱，先得给女婿说，再得给阿公阿婆说，一家人常常为花钱闹仗。她刚过门两月，老公一下子把财权交给她手上了，是老人过于老好呢？还是……

她看看太阳已经上了东墙墙头，小院里有点冷了，也该当去做晚饭了，勤娃和阿公晚间来，都想喝一碗玉米糁糁暖胃肠的。

街门吱的一响，妇女主任金嫂探进头来。

“玉贤，政府号召妇女认字学习哩。乡上派先生来扫除文盲，办冬学，你上不上？”

玉贤早就听人说要办冬学扫除文盲的传言，今天证实了。她觉得新鲜，人要是能认识字，该多有意思哟。心里虽然这样想，嘴里却说：“这事……我得问一下俺爸。”

“你爸不挡将，勤娃也不挡。”金嫂说话办事都是干脆利落，“人民政府的号召，哪个封建脑瓜敢拉后腿？”

“挡不挡也得给老人说一下。”玉贤矜持而又自谦地说，“咱不能把老人不当人敬。”

“好媳妇，真个好媳妇。”金嫂笑说，“我先给你报上名，谁要是拉后腿，你寻我！”

金嫂像旋风一样卷出门去了。

“好事嘛！认字念书，好事喀！”康田生老汉吃着儿媳双手递上前来的玉米糁糁，对站在桌边提出识字要求的玉贤说，“我不识字，勤娃小时也没念成书，有一个人会认字了，谁哄咱也哄不过了。”

阿公虽然不识字，并不像村里特别顽固的那些老汉们封建。玉贤并不立刻表现出迫不及待的样子，故意装出对上冬学的冷漠，免得老

人说她不安分在小庄稼院过生活了、心野了:“要上让他去上。我一个女人家，认不认得字，没关系……”

“啥话！新社会，把妇女往高看哩！”老公公大声说，“我和勤娃忙得不沾家，想学也学不成。”

她达到目的了，服侍阿公吃饭，给勤娃把饭温在锅里。勤娃得到天黑才能回来。春三月，正是翻了身的庄稼人修屋盖房的季节，打土坯的活儿稠，勤娃把远处村庄里的活儿干了，临近村庄的活儿，让老阿公去干。真的学会了读书识字，那该多有意思啊……

康田生喝着热乎乎的玉米糁糁，伴就着酸凉可口的酸黄菜，心里很满意。对新媳妇过门两三个月的实地观察，他庆幸给儿子娶下了一个好媳妇，知礼识体，勤勤快快，正是本分的庄稼人过日月所难得的内掌柜的。日常的细微观察中，他看出，媳妇比儿子更灵醒些。这样一个心性灵聪的女人，对于他的直性子勤娃，真是太好了。他心甘情愿地把财权过早地交给下辈人，那不言自明的含义是：你们的家当，你们的日月，你们鼓起劲来干吧！他爽快地同意儿媳去上冬学，也是出于这样的考虑，让聪明的玉贤学些文化，日后谁也甭想捣哄勤娃了。保证在他过世以后，勤娃有一个精明的管家。俗话说，男人是筢筢，管挣；女人是匣匣，管攒；不怕筢筢没刺儿，单怕匣匣没底儿。庄稼人过日月，不容易哩！

七

在一个陌生的村庄外边的土壕里，勤娃丢剥了棉衣，连长袖衫也脱掉了，在阳春三月的阳光下，提着二三十斤重的青石夯，一下重砸，又一下轻间，青石夯捶击潮湿的土坯的有节奏的响声，在黄土崖

上发出回响。打土坯，这是乡村里最沉重的劳动项目之一。对于二十出头的康勤娃，那石夯在他手中，简直是一件轻巧自如的玩具。他打起土坯来，动作轻巧，节奏明快；打出的土坯，四棱饱满，平整而又结实。在他打土坯的土壕塄坎上，常常围蹲着一些春闲无事的农民，说着闲话，欣赏他打土坯的优美的动作。

勤娃整天笑眯眯，对打土坯的主人笑眯眯，对围观的庄稼人笑眯眯；不管主人管待他的饭食是好是糟，他一概笑眯眯。活儿干得出奇地好，生活上不讲究，人又和气好说话。他的活儿特别稠，常常是给这家还没打够数，那一家就来相约了。

他心里舒畅。在喝水歇息的时候，他常常奇怪地想，人有了媳妇，和没有媳妇的时光大不一样了。身上格外有劲，心里格外有劲，说话处事，似乎都觉得不该莽撞冒失了，该当和人和和气气。人生的许多道理，要亲身经历之后，才能自然地醒悟；没有亲身经历的时光，别人再说，总觉得蒙着一层纸。

打完土坯，他吃罢晚饭，抹一把嘴，起身告辞。

“明天还要打哩，隔七八里路，你甭跑冤枉路了。”主人诚心相劝，实意挽留，“咱家有住处。你苦累一天，早早歇下。”

“不咧！”他笑着谢绝，“七八里路，脚腿一伸就到了。你放心，明日不误时。”

他定了，心想：我睡在你家的冷炕上，有我屋的暖和被窝舒服吗?

他在河川土路上走着，夜色是迷人的，坡岭上的杏花，在蒙蒙月光里像一片白雪，夜风送来幽微的香味。人活着多么有意思！

“你吃饭。”玉贤招呼说。

“吃过了。”他说。

“今日怎么回来这样迟？”玉贤问。

他笑而不答，从贴身的衬衣口袋里掏出一摞纸币来，交到玉贤手上。

玉贤数一数，惊奇地问：“这么多？”

“我两天打了三摞。”他自豪地笑着，“这下你明白我回来迟的原因了吧！”

“甭这么卖命！甭！”她爱怜地说，一般人一天打一摞（五百块），已经够累了，他却居然两天打了三摞，“当心挣下病！”

“没事。我跟耍一样。”他轻松地说。她愈心疼他，体贴他，他愈觉得劲头足了，“春天一过，没活儿了。再说，我是想早点撑起三间瓦房来。”

春季夜短，两口睡下了。

他忽然听到里屋传来父亲的咳嗽声，磕烟锅的声音。回来晚了，父亲已经躺下，他没有进里屋去。他问：“你给咱爸烧炕了没？”

“天热了，爸不让烧了。”她说，“你怎么天天问？”

“我怕你忘了。”

“怎么能忘呢。”

“老人受了一辈子苦。”他说，“咱家没有屋里大人，你要多操心爸。”

“还用你再叮嘱吗？”玉贤说，“我想用钱给老人扯一件洋布衫子，六月天出门走亲戚，不能老穿着黑粗布……”

“该。你扯布去。”他心里十分感动。

静静的春夜，温暖的农家小院，和美的新婚夫妻。

“给你说件事。”玉贤说，“金嫂叫我上冬学哩。我不想去，女人家认那些字做啥！村长统计男人哩，叫你也上冬学，说是赶收麦大忙以前，要扫除青年文盲哩！”

“我能顾得坐在那儿认字吗？哈呀！好消闲呀！”他嘲笑地说，“要是一家非去一个人不可，你去吧。认俩字也好，认不下也没啥，全当应付差事哩！”

八

吴玉贤锁上围墙上的木栅栏门，走在康家村的街道里了。结婚进了勤娃家的小院，她很少到村子中间的稠人广众中走动过。地里的活儿，父子俩不够收拾，用不上她插手。缸里的水不等完，勤娃又担满了。她恪守着母亲临将她嫁出前的嘱咐：甭串门，少说是非话，女人家到一个村子，名声倒了，一辈子也挽不回来。在娘家长人哩，在婆家活人哩！

她到康家村两三个月来，渐渐已经获得了乖媳妇的评价。她走在仍然有些陌生的街道里，似乎觉得每一座新的或旧的门楼里，都有窥视自己的眼光。做媳妇难。她缓缓地大大方方地走过去，总不可避免拘谨；总算走到村庄中心的祠堂门前了，这是冬学的校址。门口三人一堆，五个一伙，围着姑娘和媳妇们，全是女人的世界。

她走进祠堂的黑漆剥落的大门了，勤娃给她介绍康家村人事状况的时候说，这是财东康老九家的祠堂，历来是财东迎接联保官人的地方。康家村的穷庄稼人路过门口，连正眼瞧一眼的勇气也没有。一旦被传喝进这里，就该倒霉了。这是一个神秘而阴森的所在，那些她至今记不住名字的康家村的老庄稼人，好多缴不起税款和丁捐，整夜整夜被反吊在院中那棵大槐树上……现在，男人和女人在这儿上冬学了，男人集中在晚上，女人集中在后晌。

祠堂里摆着几张方桌和条桌，这是临时从这家那家借来的。玉贤在最后边一张条桌前坐下了，听着妇女们叽叽喳喳说笑，她笑笑，并不插嘴。

金嫂和村长领着一位先生进来了。她从坐在前边的两位女人的肩头看过去，看见一位年轻小伙儿白净的脸膛，略略一惊，印象里乡村私塾里的先生，都是穿长袍戴礼帽的老头子，这却是个二十左右的年轻娃娃，新社会的先生是这样年轻！只听村长介绍说先生姓杨，并且叫妇女们以后一律称呼杨老师。

村长说他有事，告辞了。金嫂也在一张方桌边坐下来，杨老师讲课了。

玉贤坐在后面，她有一种难以克服的羞怯心理，不敢像左右那些女人们扬着头，巴眨巴眨着眼睛仔细观看新来的老师的穿着举动，窃窃议论他的长相。她一眼就看见，这是一张很惹人喜欢的小白脸，五官端正，眼睛喜气，头上留着文明头发，有一绺老是扑到眼睛上头来，他一说话，就往后甩一甩，惹得少见多怪的乡村女人们哧哧地笑。玉贤只记得爷爷后脑勺上有一排齐刷刷的头发，父亲这一辈男人，一律是剃光头。文明人蓄留一头黑发，比剃得光光亮亮的头是好看多了。

老师讲话了，和和气气，嘴角和眼梢总带着微笑，讲着新社会妇女翻身平等的道理，没有文化是万万不行的，讲着就点起名字来了。

他在点名册上低头看一眼，扬头叫出一个名字，那被叫着的女人往往痴愣愣地坐着不应，经别人在她腰里捅一拳，她才不好意思地忸怩着站起——她们压根没听人叫过自己的名字，倒是听惯了“牛儿妈”“六婶”“八嫂”的称呼，自己也记不得自己的名字了——引起一阵哗笑。

在等待中，听到了一个陌生的而又柔声细气的男子的呼叫“吴玉贤”的声音，她的心忽地一跳，低着头站起来，旋即又坐下。

点过名之后，杨老师在黑板上写下“妇女解放，男女平等”八个字，转过身来领读的时候，那一双和气的眼睛越过祠堂里前排的女人的头顶，端直瞅到玉贤的脸上，对视的一瞬，她忽地一下心跳，迅即避开了。她承受不了那双眼光里令人说不出的感觉……教的什么字啊，她连一个也记不住！

……

不过十天，杨老师和康家村冬学妇女班上的女人们，已经熟悉得像一个村子的人一样了。除了教字认字，常常在课前课后坐在一起拉家常，说笑话。几个年龄稍大点的婶子，居然问起人家有媳妇没有，想给他拉亲做媒了。

杨老师笑笑，说他没有爱人，但拒绝任何人为他提媒。他大声给妇女们教歌，“妇女翻身”啦，“志愿军战歌”啦。课前讲一些远离康家村甚至外国的故事，苏联妇女怎样和男人一样上大学，在政府里当官，集体农庄搭伙儿做庄稼，简直跟天上的神话一样。

玉贤仍然远远地坐在后排的那张条桌旁，她不挤到杨老师当面去，顶多站在外围，默默地听着老师回答女人问长问短的话，笑也尽量不笑出声音来。她知道，除了自己年纪轻，又是个新媳妇这些原因以外，还有什么迷迷离离的一种感觉，都限制着她不能和其他女人一样畅快地和杨老师说话。

杨老师教认字完毕，就让妇女们自己在本本上练习写字，他在摆着课桌间的走道里转，给忘了某个字的读音的人个别教读，给把汉字笔画写错了的人纠正错处。玉贤怎么也不能把“翻身”的“翻”字写到一起，想问问杨老师，却没有开口的勇气。一次又一次，杨老师从她身边走过去了。

“这个字写错了。”

杨老师的声音在她旁边响起，随之俯下身来，抓住她捉着笔的手，把“翻”字重写了一遍。她的手被一双白皙而柔软的手紧紧攥着，机械地被动地移动着，那下腭擦着她耳朵旁边的鬓发，可以嗅着陌生男人的鼻息。

“看见了吗？这一笔不能连在一起！”

杨老师走开了，随之就在一个长得最丑的婆娘跟前弯下身，用同样的口气说：“你把这字的一边写丢了，是卖给谁了吗？”

婆娘女子们哄笑起来，玉贤在这种笑声中，仿佛自己也从紧张的窘境里解脱了。

……

年轻的杨老师的可爱形象，闯进十八岁的新媳妇吴玉贤的心里来了……

她坐在小院里的槐树下，怀里抱着夹板纳鞋底，两只唧唧鸟儿在树枝间追逐，嬉戏。杨老师似乎就站在她的面前，嘤嘤地多情地笑着。他在黑板上写字的潇洒的姿势，说话那样入耳中听，中国和外国的事情知道得那么多，歌儿唱得好听极了，穿戴干净，态度和蔼，乡村里哪能见到这样高雅的年轻人呢！

相比之下，她的男人勤娃……哎，简直就显得暗淡无光了。结婚的时候，她虽然没有反感，也绝没有令人惊心动魄。他勤劳，诚实，俭省；可他也显得笨拙，粗鲁，生硬；女人爱听的几句体贴的话，他也不会说……哎，真如俗话说的，人比人，难活人哪！

新社会提倡婚姻自由，坚决反对买卖包办，这是杨老师在冬学祠堂里讲的话。她长了十八岁，现在才听到这样新鲜的话，先是吃惊，随之就有一种懊悔心情。嫁人出门，那自古都是父母给女儿办的。临到她知道婚姻自主的好政策的时候，已经是康勤娃的媳妇了。要是由

自己去选择女婿的话，该多好哇……那她肯定要选择一个比勤娃更灵醒的人。可惜！可惜她已经结婚了，没有这样自由选择的可能了……

杨老师为啥要用那样的眼神看她呢？握着她的手帮她写“翻”字的印象是难忘的，似乎手背上至今仍然有余温。唔！昨日后晌，杨老师教完课，要回桑树镇中心小学去，路过她家门口，探头朝里一望，她正在院子的柴火堆前扯麦秸，准备给公公做晚饭。杨老师一笑，在门口站住。她想礼让杨老师到屋里坐，却没有说出口。公公和勤娃不在家，把这样年轻的一个生人叫到屋里，会让左邻右舍的人说什么呢？她看见杨老师站住，断定是有事，就走到门口，招呼一声说：“杨老师，你回去呀？”“回呀。”杨老师畅快地应诺一声，在他的手提紧口布兜里翻着，一把拉出一个硬皮本子来，随之瞧瞧左右，就塞到她的怀里，说：“给你用吧！”她一惊，刚想推辞，杨老师已经转身走了。那行动举止，就像他替别人给她捎来一件什么东西，即令旁人看见，也无可置疑。她不敢追上去退还，那样的话，结果可能更糟。她当即转过身，抱起柴火进屋去了。应该把本本还给人家，这样不明不白的东西，她怎么能拿到上冬学的祠堂里去写字呢？

他对她有意思，玉贤判断。康家村那么多女人去上冬学，他为啥独独送给她一个本本呢？他看她的眼神跟看别的妇女的眼神不一样。他帮她写字之后，立即又抓住那个长得最丑的媳妇的手写字，不过是做做样子，打个掩护罢了。

已经有了几个月婚后生活的十八岁的新媳妇吴玉贤，尽管刚刚开始会认会写自己的名字，可是分析杨老师的行为和心理，却是细致而又严密的。她又反问自己，人家杨老师那样高雅的人，怎么会对她一个粗笨的乡村女人有意思呢？况且，自己已经结过婚了……蠢想！纯粹是胡猜乱想。

肯定和否定都是困难的。她隐隐感到这种紊乱思想下所潜伏的危险性，就警告自己：不要胡乱猜想，自己已经是康家小院里的人了，怎么能想另一个男人呢？婚姻自由，杨老师嘴巴上讲得有劲，可在乡村里实行起来，不容易……

事情的发展，很快把农家小媳妇吴玉贤推向一个可怕而又欣喜的地步——

轮着玉贤家给杨老师管饭了。她的丈夫勤娃给二十里远的关家村应承下二十摞土坯，说他不能天天往回赶，路太远了。公公在邻近的村庄里打土坯，晚上才能回来。他早晨出门时，叮嘱说："把饭做好。人家公家同志，几年才能在咱屋吃一回饭，甭吝啬！"她尽家里有的，烙了发面锅饼，擀下了细长的面条。辣子用熟油浇了，葱花也用铁勺炒了，和盐面、酱醋一起摆在院中的小桌上。

杨老师走进来，笑笑，坐在院中的小桌旁边，环顾一眼简陋而又整洁的小院，问她屋里都有什么人，怎么一个也不见。她如实回答了公公和丈夫的去处，发觉杨老师顿时变得坦然了，眼里闪射出活泼的光彩，盯着她笑说："那你就是掌柜的了。"她似乎接受不了那样明显的挑逗的眼光，低头走进灶房里，捞起勺子舀饭。这时候，她的心在夹袄下怦怦跳，无法平静下来。

她端着饭碗走到小院里，双手递到杨老师面前。杨老师急忙站起，双手接碗的时候，连同她的手指一起捏住了。她的脸一阵发热。抽回手来，惊觉地盯一眼虚掩着的木栅门，好在门口没有什么人走动。杨老师不在意地笑笑，似乎是无意间的过失；坐在小凳上，用筷子挑起细长的面条，大声夸奖她擀面的手艺真是太高了，他平生第一次吃到这样又薄又韧的细面。

“杨老师，你自个儿吃。俺到外屋，没人陪你。”玉贤说着，就转过身走去了。

“你把饭也端来，咱们一块吃。”杨老师说，“男女平等嘛！怕啥？”

“不……”玉贤停住脚，他居然说“咱们”……

“哈呀！咱们成天讲妇女要解放，还是把你从灶房里解放不出来。”杨老师感慨地说，“落后势力太严重了……”

她已经走进自己的小厦屋，从箱子的包袱里取出那天傍晚杨老师塞给她的硬皮本本，现在是归还它的最好时机了。她接受这样一件物品意味着什么呢？她走到杨老师跟前，把那光滑的硬皮本放到杨老师面前的小桌上，说：“俺用不上……”

“唔……”杨老师一愣，扬起头看她，眼里现出一缕尴尬的神色，脸也红了，愧了，解释说，“我看你的作业本用完了……就买了这；你不……喜欢的话……”

“俺用不上。”玉贤看见杨老师尴尬的样子，意识到自己的行为太唐突了。她不想回答自己究竟喜欢不喜欢这只硬皮本本，只是把交还它的动机说成是用不上，“你们文化人……才当用。”

“哈呀！好咧好咧！”杨老师听罢，已经完全体察到一个自尊的农家女人的心理，脸上和眼里恢复了活泼的神态，“没有关系……”

玉贤走进小灶房，坐在木墩上，等待着杨老师吃完饭，她再去舀。在娘家的时候，屋里来了客人，总是由父亲和哥哥陪着吃饭，她和母亲待在灶房里，这是习惯，家家都是这样。

她坐着，心里忐忑不安，浑身感到压抑和紧张，当她越来越明晰地觉察出杨老师一系列举动的真实含意时，她倒有些怕了，警告自己：拿稳！可是，心里却慌得很，总是稳不住……

这当儿，小灶房里一暗。玉贤一抬头，杨老师走进小灶房窄小的门道，手里端着吃光喝净了面条的空碗，自己舀饭来了。

“咦呀！让客人自己舀饭，失礼了。”玉贤慌忙从灶锅下的木墩上站起，伸手接碗，“你去坐下，我给你送来。”

“新社会，不兴剥削人嘛！”杨老师抓着碗不放，笑着，盯着她的眼睛笑着，“自己动手，吃饱喝足。”

“使不得……让我舀……”

“行啦行啦……自己舀……”

两只手在争夺一只碗，拉来扯去。

玉贤的腰部被一只胳膊搂住了，“不……”声音太柔弱了，没有任何震慑力量，忽地一下涌到脸上来的热血，憋得她眼花了，想喊，却没有力气，也没有勇气，嘴唇很快也被紧紧地挤压得张不开了……她的一双戴着石镯的手，不由自主地勾到陌生男子的肩膀上……

九

又是一钩弯镰似的月牙。田野迷迷蒙蒙，灰白的土路，隐没在齐膝高的麦田里。远处秦岭的群峰现出黑幢幢的雄伟的轮廓。早来的布谷鸟的动情的叫声，在静寂的田地和村庄的上空倏然消失了。岭坡的沟畔上，偶尔传来两声难听的狐狸的叫声。

勤娃甩着手，在春夜温馨空气的包围中跨着步子。他谢绝了打土坯的主人诚心实意的挽留，吃罢夜饭，撂下饭碗，往家赶路了。他有说不出口的一句话，因为路远，三四天没有回家，他想见玉贤了。二十里平路，在小伙子脚下，算得什么艰难呢！屋里有新媳妇的热炕，主人家给他临时搭排的窝铺，那显得太冷清了。他走着，充满信心地划算着，自开春以来，已经打过近百摞土坯了，父亲交给玉贤掌管的那只小梳妆匣儿里，有一厚扎人民币了。这样干下去，只要一家三口人不生疮害病，三年时光，勤娃保准撑起三间大瓦屋来。那时光，父亲就绝对应该放下石夯，只管管家里和田里的轻活儿了，或者，替他们管管孩子……新社会不纳捐，不缴壮丁款，挣下钱，打下粮食全归自己，只要不怕吃苦，庄稼人的日月红火得快哩！

勤娃走进康家村熟悉的村巷，月牙儿沉落到山岭的背后去了，村庄笼罩在黑夜的幕帐之中了。惊动了谁家的狗，干吠了几声。

他站在自家小木栅栏门外，一把黑铁锁上凝结着湿溜溜的露水，钥匙在父亲的口袋里。他老人家大约刚刚睡下，要是起来开门，受了夜气感冒了，糟咧。不必惊动老人……勤娃一纵身，从矮矮的土围墙上，跳进自己的小院里了。

他轻轻地拍击着小厦屋门板上的铁栓儿。深更半夜叫门，不能重叩猛砸，当心吓惊了女人，勤娃心细着哩！

“来咧……”女人玉贤在窸窸窣窣穿衣服，好久，才开了门。

“怎么不点灯？”勤娃走进屋，随口说。

“省点……煤油……”玉贤颤颤地说。

“嗨呀！”勤娃笑了，“黑咕隆咚，省啥油嘛？”随之啪的一声划着了火柴。

屋里亮了。勤娃坐在炕边，嘘出一口气，他觉得累了。

“你还吃饭不？”玉贤坐在炕上，问。

“吃过了。”勤娃说，盯着玉贤的煞白的脸，惊得睁大眼睛，“你……病咧？”

“没……”玉贤低下头，“有些不舒服……”

他伸手摸摸她的额头，说：“不见得烧……”

“不怎……”

他略为放心。脱鞋上炕的当儿，他一低头，脚地上有一双皮鞋。他一把抓起，问：“这是谁的？”

玉贤躲避着他的眼睛，还未来得及回答，装衣服的红漆板柜的盖儿哗的一声自动掀起，冒出一个蓄留着文明头发的脑袋。

“啊……”

勤娃倒抽一口气，迅即明白了这间厦屋里发生过什么事情了。他一步冲到板柜跟前，揪住浓密的头发，把冬学教员从柜子里拉出来。啪——一记耳光，啪——又一记耳光，鼻血顿时把那张小白脸涂抹成猪肝了；咚——当胸一拳，咚——当胸再一拳，冬学教员软软地躺倒在脚地，连呻吟的声息都没有；勤娃又抬起脚来。

冬学教员挣扎着爬起来，扑通一声，双膝跪倒在勤娃脚下了。

勤娃已经失去控制，抬起脚，把刚刚跪倒的杨先生踢翻了。他转身从门后捞起一把劈柴的斧头，牙缝里迸出几个字来：“老子今黑放你的血！”

猛然，勤娃的后腰连同双臂，死死地被人从后边抱住了，他一回头，是父亲。

老土坯客听到厦房里不寻常的响动，惊惊吓吓地跑来了，不用问，老汉就看出发生了什么事了。他抱住儿子提着斧头的胳膊，一句话也不说，狠劲掰开勤娃的手指，把斧头抽出来，咣当一声扔到院子的角落里去了。他累得喘着气，把癫狂状态的儿子连拽带拖，拉出了厦房，推进自己住的小灶屋。

“你狗日杀了人，要犯法！”

“我豁上了！”

“你嚷嚷得隔壁两岸知道了，你有脸活在世上，我没脸活了！”老汉抓着儿子胸前敞开的衣襟，“你只图当时出气，日后咋收场哩！”

这是一声很结实也很厉害的警告。勤娃从本能的疯狂报复的情绪中恢复理智，愣愣地站住，不再往门外扑跳了。

“把狗日收拾一顿，放走！”老土坯匠说，“再甭高喉咙大嗓子吼叫！”

“我跟那婊子不得毕！”勤娃记起另一个来。

“那是后话！”

父子二人走到厦屋的时候，冬学教员已经不见踪影，玉贤也不见了。临街的木栅门敞开着，两人私奔了吗？勤娃窝火地“嗯”了一声，怨愤地瞅着父亲。他没有出足气，一下子跌坐在炕边上。

老汉转身走到前院，一眼瞅见，槐树上吊着一个人。他惊呼一声，一把把那软软的身子托起，揪断草绳，抱回厦屋，放到炕上。忽闪忽闪的煤油灯光下，照出玉贤一张被草绳勒聚得紫黑的脸，嘴角涌出一串串白色的泡沫，不省人事了。

勤娃看见，立时煞白了脸，哎的一声怨叹，跌倒在厦屋脚地，也昏死过去了。

“我的天哪……”康田生看着炕上和脚地的媳妇和儿子，不知该当咋办了，绝望地扑到儿子身上，泪水纵横了。

十

勤娃躺在炕上，瞪着眼珠，一声连一声出着粗气。父亲已经给打土坯的主人捎过话去，说儿子病了，让人家另寻人打土坯。

他没有病，只是烦躁，心胸里源源不断积聚起恶气，一声吁叹，放出来，又很快地积聚起来。

真正的病人现在强打起身子，倒不敢沾一沾炕边。玉贤头疼，恶心，走一步心就跳得嗵嗵嗵。她用一条黑布帕子围着脖子，遮盖着被草绳勒出一圈血印的脖颈，默默地扫院，悄悄地在前院柴火堆前撕扯麦秸，默默地坐在灶锅前烧火拉风箱。

红润润的脸膛变得灰白，低眉搭眼地走到公公跟前，递上饭碗，声音从喉咙里挤不出来。她又端起一碗饭，送到勤娃跟前：“吃饭……”

勤娃翻过身，一拳把碗打翻了，破碎的碗片，细长的面条，汤汤水水在脚地上泼溅。

他恨她恨得咬牙，打她的耳光，撕扯她的头发。晚上，脱了衣服，他在她的身上乱打。打得好狠，那双自幼打土坯练得很有功力的胳膊，在她的身上留下一坨坨黑疤和红伤。他不心疼，觉得一阵疯狂的发泄之后，心里稍稍畅缓一些了。她不躲避，忍受着应该忍受的一切报复，这是应该的。她只是捂着脸，不要让那双铁锨一样硬邦的手给她脸上留下伤痕，身上任何地方，有衣服遮着，让他打好了。

康田生坐在自己的小屋里，听着前边厦屋里儿子抽打媳妇的响声，坐不住了，那每一声，就像敲在他的心口。他走出门，蹲在门前的小碌碡上，躲避那不堪卒听的响声。可是，一袋烟没有抽完，他又跳下碌碡，走进小院了，他不敢离远，万一闹出意外的事来就更怕人了。

春光是明媚的，阳光是灿烂的，房屋上空的榆树和椿树的叶子绿得发青，岭坡上的桃花又接着败落的杏花开得灿红了。而这个岭坡下的庄稼小院里，空气清冷，阳光惨淡，春风不止。

整整三天过去了。

儿子和媳妇都失了脸形，康田生本人也因焦虑和减食而虚火上升，眼睛又黏又红，像胶锅一样睁巴不开了。他愈加想到这个破裂的家庭里，自己所负的支撑者的责任了。怎么劝儿子，又怎么劝媳妇

呢？他一看见儿子痛不欲生的脸相，自己已经难受得撑挂不住，哪里还有话说得出来呢？他知道儿子遇到的不幸在人生中有多重的分量。对于儿媳，那张他曾经十分喜欢的红润的脸膛，如今连正眼瞧一瞧的心情也没有，看了叫人恶心！老汉抽着烟，睁巴着黏糊糊的眼睛，寻思怎么办。对儿媳再恨再厌，他不能像儿子那样不顾后果地愣下去。他想和什么人讨讨对策，然而不能，即使村长也不能商量，这样的丑事，能说给人听吗？他终于想到了表兄和表嫂，那是自己的顶亲的亲戚，勤娃的养身父母，最可信赖的人了。

他仍然觉得不敢离开这个时刻都可能出事的家，让顺路上岭去的人把话捎给表兄，无论如何，要下岭来一趟，勤娃病了，病中想念舅舅……

十一

“就这。”康田生把家中发生的不幸从头至尾叙说一遍，盯着表兄的长眉毛下的明智的眼睛，问，“你说现时咋办呀？”

“好办。”表兄一扬头，“把勤娃叫来。”

勤娃走进来了，眼睛跌到坑里了，一见舅舅，扑到当面，呜的一声哭了。田生老汉把头拧到一边，不忍心看儿子丧魂落魄的颓废架势。

“头扬起来！甭哭！”舅父严厉地说，“二十岁的大人了，哭哭溜溜，啥样式嘛！”

“我……我不活了……”勤娃一见舅舅，心里的酸水就涌流不止，用拳头砸着自己的脑袋，“我……哎……”

舅父伸开手，啪啪，两记耳光，抽到勤娃鼻涕眼泪交流着的扭曲的脸上，厉声骂：“指望我来给你说好话吗？等着！”

勤娃哭不出来了，呆呆地低着头站着。

康田生吃惊了，瞅着表兄下巴上一撅一撅的花白胡须，没见过表兄这样厉害呀！他忙把勤娃拉开，按坐在小木墩上。

“你妈死得早，你爸咋样把你拉扯这大？亲戚友人为你操了多少心？你长得成人了，人高马大了，不说成家立业，倒想死！”舅父训斥起来，“死还不容易吗？眼一闭，跳到河里就完了。值得吗？”

父子二人默声静息，不敢插言。

“那——算个屁事！”舅父把那件丑事根本不当一回事，“大将军也娶娼门之妻！我在河北财东家杂货铺当相公，掌柜的婆娘就和人私通，掌柜的招也不招，只忙着生意赚钱！咱一个乡村庄稼汉，比人家杂货铺掌柜还要脸吗？”

勤娃似乎一下子才醒悟，这样的丑事绝不是他康勤娃一个人遇到了，比他更体面的人也遇到了。他讷讷地说：“我心里恶心……像吃了老鼠……”

“事情……当然不是好事。”舅父把话转回来，“这号丑事，张扬出去，于你有啥光彩？庄稼人，娶个媳妇容易吗？那不是一头牛，不听使唤，拉去街上卖了，换一头好使唤的回来。现时政府里提倡婚姻自由，允许离婚，你离了她，咋办？再娶吗？你一个后婚男人，哪儿有合适的寡妇等着你娶？即使有，你的钱在人家土壕里，一时三刻能挣

来吗？啊？遇到事了，也该前后左右想想，二十岁的人啦，哭着腔儿要寻死，你算啥男子汉……”

“对对对！实实在在的话。”康田生老汉叹服表兄一席切身实际的道理，自愧自己这几天来也是糊涂混乱了，劝儿子说，“听着，你舅的话，对对的。”

“吃了饭，出去转一转，心眼就开畅了。”舅父说，“明天把石夯扛上，出去打土坯！舅不死，就是想看见你把瓦房撑起来。”

勤娃苦笑一下，这是他近日来露出的头一张笑脸，尽管勉强又苦楚，仍然使老父亲心里一亮啊！

“记住——”舅舅瞅瞅勤娃，又瞅一眼康田生，压低声音叮嘱，“再甭跟任何人提起这事。你祖祖辈辈子子孙孙都在康家村，门面敢倒吗？”

康田生连连点头。

“勤娃，”舅舅叫他的名字，悄声郑重地说，“在外人面前概不提起，在屋里可不敢松手！女人得下这号瞎毛病，头一回就要挖根！此病不除，后祸无穷！”

听着舅舅前后不大统一的话，勤娃这阵儿才真正感服了，睁着苦涩的眼睛，盯着舅父花白胡须包围中的薄嘴唇，等待说出什么拯救他拔出苦海的好法子来。

“你——再甭打她了。你打得失手，她寻了短见，咋办？再说，打得狠了，她记恨在心，往后怎样过日子？”舅父说，“你去找她娘家人，让她爹娘老子收拾她，治她的瞎毛病。省得……”

“唔唔唔，好好好！”康田生老汉对于表兄的所有谈话都钦服，一生只会摔汗水出笨力的老土坯客，对于精明一世的表兄一直尊为开明的生活的指导者，“我当初想过这一招儿，又怕伤了亲戚间的和气……”

“他女子做下伤风败俗的事，他还敢嘴硬！”舅父说着，特别叮嘱勤娃，“这件事，不能松饶了她；可跟人家爹娘说话，话甭伤人……”

勤娃点点头，感激地盯着舅父，这个养育他长大、至今还为他的不幸费心劳神的长辈人，似乎比粗笨的亲生父亲更可亲近了。

舅父站起来，在门口朝前院喊：“玉贤——”

玉贤轻手轻脚走到舅父面前，低头站住，声音柔弱得像蚊子：“舅——你老儿……来咧！”

“快去给舅做饭。”他像什么事也不知道，也或者是什么都知道了而毫不介意，倚老卖老地说，“吃罢饭，你爸和勤娃还要劳动哩！”

十二

半缺的月亮挂在河湾柳林的上空，河滩稻田秧圃里，蛙声此起彼伏，更显出川道里夜晚的幽静。勤娃迈开大步，跳过一道道灌溉水渠，沿着河堤走着。他避开土路，专门选择了行人罕至的河滩，要是碰见熟人，问他夜晚出村做啥，可能要引起猜疑的。

他憋着一口闷气，想着见了丈人和丈母娘，该如何开口说出他们的女儿所做下的不体面的丑事。舅父教给他的处理此事的具体措施，

似乎是一种束缚，按他的性儿，该是当着她家老人的面，狠狠骂一顿他们的女儿辱没了家风。他走进熟悉的吴庄村了。

这样的夜晚赶到亲戚家里去，本身就是一种不祥的征兆。丈人吴三，丈母娘和丈人家哥，一齐围住他，三双眼睛在他脸上转，搜寻和猜测着什么，几乎一齐开口问：屋里出了什么事？这么晚赶来，脸色也不好……

勤娃看着老人担惊受怕的样子，心里忽地难受了。因为给吴三打土坯而订下了他的女儿，婚前婚后，两位老人对他这个女婿是很疼爱的。常常在他面前说，玉贤要是有不到处，你要管她，打她骂她都成。他们是正直的庄稼人，喜欢勤娃父子的勤劳和本分，很满意地把自己的小女儿嫁给他了。往常里，丈母娘时不时地用竹条笼提来自己做下的好吃食……现在，事情却弄到这样的地步，他们听了该会怎样伤心！

勤娃看着两位老人惊恐的眼色，说不出口了，路上在心里聚起的闷气，跑光了。他猛地双手抱住头，长长地哀叹一声，几乎哭了。

“有啥难处，说呀！”丈母娘急切地催促。

“唉——”勤娃又叹出一声，实在太难出口了。

丈人吴三坐在一边，不再催问。他从勤娃的神色和举动上，判断出了什么，就吩咐站在一边的儿子说：“你去，把你姐叫回来！”

丈人家哥走出门，他觉得话好说了，这才哽哽巴巴，把玉贤和冬学教员的事说了。丈母娘羞惭得骂起来，老丈人吴三却气得浑身颤抖，跌坐在椅子上，说不出话了。

“我回呀！”勤娃告辞，“女儿出门，怪不了老人。我不怪你二老，你们对我好……”

“甭走！”丈人拉住他，“等那不要脸的回来再说！”

勤娃坐下了。

“你狗日做下好事了！”吴三一看见走进门来的女儿，火暴性子就发作了，“你说……”

玉贤站在当面，勾着头，不吭声。

这种不吭声的行为本身，就证明了勤娃说出的那件丑事的可靠性。吴三火起，两个巴掌就把女儿打倒了。

“甭打！爸……”勤娃拉住丈人爸的胳膊。

“不争气的东西！”丈母娘在一旁狠着心骂，“在娘家时，我给你说的话，全当刮风……”

“狗日至死再甭进俺家的门！”丈人家哥骂。

玉贤没有同情者。在这样的家庭里，她不指望任何人会替她解脱。她的父母，都是要脸面的正经庄稼人。她做下辱没他们门庭的丑事，挨打受骂是当然的。她躺在地上，又挣扎站起。

“跪下！”吴三吼着。

玉贤太屈辱了，当着勤娃和父母哥哥的面，怎么跪得下去呢？这当儿，父亲吴三一脚把她踢倒，她的腿腕疼得站不起来了。

吴三从墙上取下一条皮绳，塞到勤娃手里：“勤娃，你打……”

勤娃接住皮绳，毫不迟疑地重新挂到墙上的钉子上，劝慰吴三：“算哩……”

丈母娘向勤娃暗暗投来受了感动的眼光。

吴三又取下皮绳，一扬手，抽得只穿件夹衣的玉贤在地上滚翻起来，惨痛而压抑的叫声颤抖着。

勤娃自己在打玉贤的时候，似乎只是被一股无法平息的恶火鼓动着。当他看着丈人挥舞皮绳的景象，他的心发抖了。看着别人打人，似乎比自己动手更觉得残忍。他抱住吴三的手。

“甭拉！让我把这丢人丧德的东西打死！”吴三愈加上火，扑跳得更凶，“你不要脸，我还要！”

勤娃猛然想到，他刚才不该留在这儿。丈人留他，就是要当着他的面，教训女儿，以便在女婿面前，用最结实的行为，洗刷父母的羞耻。他要是不在当面，吴三也许不至于这样手狠。他劝劝吴三，就硬性告别了。

十三

玉贤吹了昏黄的煤油灯，脱完衣服，就钻进被窝里了，她怕母亲看见她身上的不体面的伤痕。母亲似乎察觉了她的行为的用心，从炕的那一头爬起来，嘣的一声划着了火柴，煤油灯冒着一柱黑烟的黄焰，把屋子里照亮了。

母亲揭开她盖的被子，哎哟一声，就抱住她的浑身四处都疼痛的身子，哭了。她的身上、腿上，有勤娃的拳头留下的乌蓝青紫的瘀血凝固的伤迹，又摞上了父亲用皮绳刚刚抽打过的印痕，渗着血。她是母亲身上掉下来的肉，母亲心疼自己的骨肉，哭得很伤心。

玉贤没有想流眼泪的心情，疼是难以忍受的疼啊！凡是被拳头或皮绳抽击过的皮肉，一挨着褥子，就疼得想翻身，翻过去，那边仍然疼得不能支撑身体的重压。可她没有哭。那天晚上勤娃的突然敲门，她吓蒙了，此后所发生的一切，似乎是在梦中，直到她的阿公粗手笨脚地把一根生锈的大号钢针从鼻根下直插进牙缝，她才从另一个世界回到她觉得已经不那么令人留恋的庄稼小院。现在，母亲的胸部紧紧贴着她的肥实的臂膀，眼泪在她的脖根上流着。她不想再听母亲给她什么安慰。她想静静地躺着，静静地想想，她该怎么办。在和勤娃住了近半年的新房里，她不能冷静地想，时时提心那铁块一样硬的拳头砸过来，甚至在夜晚睡熟之际，他心里怄气，会突然跳起，揭开被子，把她从梦中打醒。现在，她的父亲吴三当着勤娃的面，打了，也骂了，给自己挽回脸面了。她应该承受的惩罚已经过去，她想静静地想一想，往后怎么办?

“唉……嗨嗨嗨嗨嗨……”母亲低声饮泣，胸脯颤动着。她生下这个女儿，用奶水把她养得长出了牙齿，就和大人一样啃嚼又硬又涩的玉米面馍馍了。她和吴三虽则都疼爱女儿，却没有惯养。自幼，她教女儿不要和男娃娃在一起耍；长大了，她教女儿做针线，讲女人所应遵从的一切乡俗和家风。一当她和吴三决定以三石麦子的礼价（当时顶小的价格），约定把女儿嫁给土坯客的儿子的时候，她开始教给女儿应该怎样服侍公婆，特别是没有婆婆的家里，应该怎样和阿公说话，端饭，倒尿盆，应该怎样服侍丈夫，应该怎样和隔壁邻居的长辈

相处，甚至，平辈兄弟们少不了的玩笑和嬉闹，该当怎样对付……家内家外，内务外事，她都叮嘱到了，而且不止一次。“教女不到娘有错。”她教到了，玉贤也做到了。在玉贤婚后几次回娘家来，她都盘问过，很满意。从康家村的熟人那里打听来的消息，也充分证明土坯客家的新媳妇是一个贤惠的好媳妇。可是，怎么搞的，突然间冒出来了这样最糟不过的丑事……母亲流完了眼泪，就数落起来：“你明明白白的灵醒娃嘛，怎的就自己往泥坑屎坑里跳？”

已经跳下去了，后悔顶啥用呢？玉贤躺在母亲身边，心里说，我死都死过一回了，现在还想用什么后悔药治病吗？

“你上冬学的事，为啥不给我说？”母亲追根盘底，“你个女人家，上学做啥？认得俩字，能顶饭吃，能当衣穿？人自古说，戏房学堂，教娃学瞎的地方……你上冬学上出好名堂来咧！”

她仍然不吭声。她需要自己想想，别人谁也不了解她的心情和处境。

“给你定亲的时光，我托你姨家大姑在康家村打听了，说勤娃父子都是好人。老汉老好，过不了十年八载，过世了，全是你和勤娃的家当。勤娃老实勤谨，家事还不是由你？这新社会，不怕孬人恶鬼，政府爱护老实庄稼人。你哪一样不满意？胡成精？”母亲开始从心疼女儿的口气转换为训诫了，“人嘛！图得模样好看，能当饭吃？我跟你爸过伙的时候，总看他崩豆性子不顺心，一会躁了，一会笑了。咋样跟这号人过日月？时间长了，我揣摩出来，你爸人心好，又不胡乱耍赌纳宝，为穷日子卖命。我觉得这人好哩！娃家，你甭眼花，听妈说，妈经的世事……”

她不分辩，也不应诺，静静地躺着。

“在咱屋养上十天半月，高高兴兴回家去，给你阿公赔不是，给勤娃说说好话。”母亲说，“往后，安安生生过日子，一年过去，没事了。人心都是肉长的嘛！”

母亲不再说话，哀叹着，久久，才响起鼾息声。

玉贤轻轻爬起，移睡到炕的那一头。

屋里很黑，很静，风儿吹得后院里的树叶嚓嚓地响。

当她被蒙着眼脸抬到一个陌生的地方，被陌生的女人搀进一个陌生的新的住屋，揭去盖脸红布，她第一眼看见了将要和她过一辈子日月的陌生的男人。她心跳了，却没有激动。这是一个长得普普通通的男人，不好看也不难看。不过高也不过矮。几个月来的夫妻生活，她看出，他不灵也不傻。她对他不是十分满意，却也不伤心命苦。对给她找下这样的女婿的父母，不感激也不憎恶。他跟麦子地里一根普通的麦子一样，不是零星地高出所有麦子的少数几棵，也不是夹在稠密的麦稞中间那少数的几枝矮穗儿。他像康家村和吴庄众多的乡村青年一样普普通通。她也将和那许多普普通通的青年的媳妇一样，和勤娃过生活。自古都是这样，长辈和平辈人都是这样定亲，这样撮合一起，这样在一个炕上睡觉，生孩子……

她第一眼看见杨老师的时候，心里就惊奇了。世上有穿戴得这样合体而又干净的男人！牙齿怎么那样白啊！知道的事情好多好多啊！完全不像乡村青年小伙们在一起，除了说庄稼经，就是说粗俗的男人和女人之间的酸话。杨老师留着文明头发的扁圆脑袋里，装着多少玉贤从来也没听说过的新鲜事啊！苏联用铁牛犁地，用机器割麦，蒸馍

擀面都是机器，那是说笑话吗？烂嘴七婶当面笑问：生娃也用机器吗？杨老师就把那些能犁地能割麦的照片摊给大家看，并不计较七婶烂嘴说出的冒犯的话。他总是笑眯眯的，笑脸儿，笑眼儿，讲话时老带着笑，唱歌时也像在笑。

她对他没有邪心。她根本不敢想象这样高雅的文明人，怎么会对她一个乡村女人有"意思"呢？她第一次感受到他的不寻常的目光时，他捉着她的手写"翻身"的"翻"字时，她都没有敢往那件事上去想。直到他接饭碗时连她的手指一起捏住，她也只想到他是无意的。直到他一把搂住她的腰，她瞬息间就把这些事统一到一起了。她没有拒绝。因为突然到来的连想也不敢想的欢愉，使她几乎昏厥了。

"我爱你，妹妹……"

他说了这句话，就把嘴唇压到她的嘴唇上。那声音是那样动人的心，她颤抖着，本能地把自己戴着石镯的手勾到他的肩头上。

她从来没有听一个男人这样亲昵地把她叫妹妹，也没人说过"爱"这个字。勤娃只说过"我跟你好"这样的话，没有叫过她"妹妹"。勤娃抚摸她身体的手指那么生硬。杨老师啊……

她挨勤娃的拳头，咬牙忍受了。她是他的女人，他打她是应该的。父亲打她，也咬牙忍受了，她给他和母亲丢了脸，打她也是应该的。可是，她虽然浑身青痕红斑，却不能把自己再和勤娃连到一起。她为可亲的杨老师挨打，她没有眼泪可流。

她如果能和勤娃离婚，和杨老师结婚的话，她才不考虑丢脸不丢脸。《婚姻法》喊得乡村里到处都响了，宣传《婚姻法》的大体黑字写在庄稼院房屋的临街墙壁上，好些村子里都有被包办婚姻的男女离

婚的事在传说。她和杨老师一旦正式结合，那么还怕谁笑话什么呢?如果不能和杨老师结婚，继续和勤娃当夫妻，那就一辈子要背着不能见人的黑锅了。

她得想办法和杨老师再见一面，把话说准，之后她就到乡政府去提出离婚。现在无法再上冬学了，和杨老师见一面太难了，但总得见一面。不然，她心里没准儿，怎么办呢?

在康家村要找到和杨老师见面的机会，是不可能的。在娘家，比在阿公和勤娃的监视下要自由得多。杨老师是行政村的中心小学教员，在桑树镇上，想个借口到镇上去，越早越好……

十四

爷儿俩半年来又第一次自造伙食了。老土坯客看着儿子蹲在灶锅前点火烧锅，沤出满屋满院的青烟，重手重脚绊磕得碗瓢水桶乒乓响，心里好难受。昨晚，他坐在炕头上，等见勤娃从丈人家告状回来，叙说了经过。他对吴三的仗义的行为很敬佩，心里又暗暗难过。相亲相敬的亲家，以后见了面，怎么说话呢?他痛恨这个外表看来腼腆、内里不实在的媳妇，给两个安生本分的庄稼院平生出一场祸事。他更恨那个总是见人笑着的杨先生。你狗日为人师表，嘴里讲什么男女平等，婚姻自由，难道就是让你自由地去霸占老实庄稼人的女人吗?他恨得咬牙！三五天来家庭剧烈的变化，给饱经过孤苦的老土坯客的刺激太沉重了。他一生中命运不济，性情却硬得近乎麻木，对于一切不幸和打击，不哭也不哀叹。可是，当生活已经充满希望的时候，完全不应出现的祸事却出现了的时候，老汉简直气得饭量大减，几天之间，白发增多了。他恨那个给他们家庭带来灾难的白脸书生！

后悔那天晚上拦阻勤娃太早了；虽然不敢打死，至少应该砸断狗日一条腿！

他活到五十多了，不图什么，只图得有吃有穿，儿辈可靠。可是，如今却成了这样不酸不甜的苦涩局面了。

勤娃烧好开水，把两个蒸馏得热透的馍馍送到老汉面前，老汉忽然想到自己在刚刚死了女人以后，不习惯地烧锅做饭的情景，难道儿子勤娃又要钻厨房拉一辈子“二尺五”了吗？啊啊！老汉看见儿子愁苦的面容，几乎流下泪来。

勤娃拿了一个馍馍，夹了辣椒，远远地蹲在门外的台阶上，有味没味地慢腾腾地嚼着。

他担心勤娃，比自己要紧。他迅即抑制住自己的感情波动，用五十多岁老人的理智和儿子说话：

“勤娃——”

“嗯！”勤娃应着。

“明天出门打土坯去。”老汉说，“她爸她妈指教过她了，算咧！只要日后好好过日月，算咧。”

“……”

“人么，错了要能改错，甭老记恨在心。”他劝慰，“咱的家当还要过。你舅的话是明理。”

勤娃没有吭声。老汉从屋里走出来，想告诉儿子，他已经给他在南围墙村应承下打土坯的活路了。这时村长走进门来，后面跟着一位穿制服的女干部，胸膛上两排大纽扣。

“老哥，这是县文教局程同志，想跟你拉一拉家常。”村长说，“你们谈，我走了。”

“我叫程素梅。”程同志笑着介绍自己，很大方地坐到老汉的炕边上，态度和蔼，和蔼得教见惯了旧社会官人们凶相的老土坯客反倒不知如何是好了。她说，“我想来和你老儿坐坐。”

老汉心里开始在猜摸，程同志究竟找他来做啥？一般乡上县上的干部来了，总是和村长接手，和他一个只会打土坯的老汉有啥家常好拉的呢？

她问他家里都有什么人，分了几亩地，和谁家互助，老汉都答了。最后，程同志把弯儿绕到老汉最担心的那件事上来了，果然。

“没有啥！”老汉的嘴很有劲地回答，“杨先生教妇女识字有没有啥问题，咱不知道喀！咱一天掮上石夯打土坯，谁给管饭就给谁家卖力，咱没见过杨先生的面，光脸麻子都不知……”

“勤娃同志，你没听人说什么吗？”程干部转脸问，“甭怕。”

勤娃摇摇头。

“康大叔，你老儿心放开。”程同志说，“新社会，咱们把恶霸地主打倒了，穷人翻了身，可不能允许坏人再欺侮庄稼人，糟蹋党的名誉。咱们的干部，有纪律，不准胡作非为……”

这些话说得和老汉的心思刚刚吻合，他觉得这个清素淡雅的女干部完全是可以信赖的，可以倾诉自己一生的不幸和意料不到的祸事。可是，他的话出口的时候，完全是另外的意思：

“杨先生胡作非为不胡作非为，咱不知道嘛！他在哪里胡作来，在哪里非为来，你到那里去查问。咱不知情喀！”

老汉忽然瞧见，勤娃的脸憋得紫红，咬着嘴唇，担心儿子受不住程同志诚恳的劝导，一下子说出那件丑事，就糟了。新社会共产党的纪律虽然容不得杨先生的胡作非为，可自己一家的名声也就彻底臭了！他急中居然不顾礼仪，把儿子支使开：

“南围墙侯老七等你去打土坯。快去，再迟就要误工了。”

勤娃猛地站起，恨恨地瞅了父亲一眼，走出门去，撞得旧木板门咣啷一声响。

“这娃性子倔……”老汉不自然地掩饰说，盼他快点走。横在老汉心头的这一块伤疤，无论是恶意的撞击，抑或是好心的抚慰，都令人反感，任何触及都是难以忍受的痛苦。

“没关系。回头我再来。”程同志很耐心地说。

“甭来了。”老汉很不客气地拒绝，心里说，你一个穿戴和庄稼院女人明显不同的公家干部，三天五天往我屋跑，那还不等于告诉康家村人，康田生屋里出了啥事啊？老汉今天一见到她，心里的负担又添了一层，意识到这件丑事，尽管尽力掩盖，还是闹出去了，要不，县上的这位女干部怎么会来到他的小院呢？即使外面有风传，他们一家

也要坚决捂住。“咱庄稼人忙。实在是……我跟勤娃，啥也不知道咯！”

程同志脸上明显现出失望的神色，失望归失望，却不见反感或厌恶。她是做党的干部纪律的监督工作的。严肃的职业使她年龄轻轻儿就已经养成严肃而又和蔼的禀性。此类问题在她的工作中，不是第一次，不说庄稼人吧，即是觉悟和文化都要高一级的工人和干部，在这样的丑事临头的心理矛盾中，往往也是同样首先顾及自己和儿女的名声，这样，就把造成他们家庭不幸的人掩蔽起来了。

十五

紧张的体力劳动，给心里痛苦痉挛着的庄稼汉勤娃以精神上极大的解脱。他走进侯七家打土坯的土壕，胳膊无力，腿脚懒散，浑身的劲儿叫不起来。侯七在一旁给木模装土，不断投来怀疑的不太满意的眼光。勤娃像受了侮辱——勤劳人的自尊。他暗暗骂自己一声，提起石夯，砸了下去，一切烦恼暂时都被连珠炮似的石夯撞击声冲散了。

劳动完了，烦恼的烟云又从四面八方朝他的心里围聚。吃罢晚饭，他怏怏地告诉侯七，自个儿有病了，另找别人来打土坯吧！侯七盯着面色郁闷的勤娃，没有强留。他扛着木模和石夯走出村来。

勤娃懒散地移着步子，第一次不那么急迫地往家赶了；赶回家去干什么呢？甭说玉贤不在家，即使在，那间小厦屋也没有温暖的诱惑力了。

浪去！勤娃鼓励自己，一年四季，除了种庄稼，农闲时出门打土坯，早晨匆匆去，晚上急忙回，挣那么几块钱，从来舍不得买一个糖

疙瘩，一五一十全都交到她手里，让她积攒着，想撑三间瓦房……太可笑了！你为人家一分一文挣钱，人家却搂着野汉睡觉……去他妈的吧！

勤娃已经叉开通康家村的小路，走上官路了。

这样恼人的丑事，骂不能骂，说不敢说；和玉贤关系好不能好，断又断不了，这往后的日月怎么过？既然程同志赶到家里来查问，证明他的父亲和舅舅要他包住丑事的办法已经失败，索性一兜子倒出来，让公家治一治那个瞎熊教员，也能出口气。可是，他爸却一下把他支使开了。

勤娃开始厌恶父亲那一副总是窝窝囊囊的脸色和眼神。窝囊了一辈子，而今解放了，还是那么窝囊。他啥事都首先是害怕。不敢高声说话，不敢跟明显欺侮自己的人干仗，自幼就教勤娃学会忍耐，虽然不识字，还要说忍字是“心上能插刀刃”！他现在有些忍不住了！

沿着官路，踽踽走来，到了桑树镇了。

夜晚的乡村小镇，街道两边的铺店的门板全插得严严的，窗户上亮着灯光，街上行人稀少。勤娃终于找到了可以站一站的地方，那是客栈了。

门里的大梁上吊着一盏大马灯，屋里摆着脚客们的货包。大炕上，坐着或躺着一堆操着山里口音的肩挑脚客。

“啊呀！这是勤娃呀？”客栈掌柜丁串串吃惊地睁大着灵活的小眼睛，“来一碗牛肉泡，还是荤油臊子面？”

“二两酒。”勤娃说，“晚饭吃过了。再来一碟花生豆儿。”

“啊呀，勤娃兄弟！”丁串串愈加吃惊了，“好啊！我知道，这两年庄稼人翻身了，村村盖房的人多了，你打土坯挣钱的路数宽了！好啊！庄稼人不该老没出息，攒钱呀，聚宝呀！临死时一个麻钱，一页瓦片也带不到阴间！吃到肚里，香在嘴里，实实在在……掌柜的，给康家勤娃兄弟看酒……”

丁串串长得矮小、精瘦，声音却干脆响亮，说话像爆豆儿，没得旁人插言的缝隙。他唤出来的，是他的婆娘，一个胖墩墩的中年女人，同样笑容满面地把酒壶和花生摆到勤娃的面前了：“还要啥，兄弟？”

“吃罢再说。”勤娃坐下来。

花生米是油炸的，金红，酥脆，吃到嘴里，比自家屋里的粗粮淡饭味儿好多了。酒也真是好东西，喝到口里，辣刺刺的，进入肚里以后，心里热乎乎的。接连灌了三大盅，勤娃觉得心里轻松多了。怪道有钱人喜时喝酒，闷时也喝酒！他觉得那股热劲从心里蹿起，进入脑袋了，什么野汉家汉，丑事不丑事，全都模糊了，也不显得那么重要了。

“再来二两！”勤娃的声音高扬起来，学着丁串串的声调，呼唤女掌柜，“掌柜的，买酒！”

女掌柜扭动着肥大的臀部，送上酒来，紧绷绷的胖脸上总是笑着。勤娃从腰里掏出一卷票子，抽出两张来，摔到桌上，好大的气派！女掌柜伸手接住钱，眼睛却直勾勾地盯着他把那一卷票子塞到腰里去。

“还有床位么？”勤娃干脆捉住白瓷细脖酒壶，直接倒进喉咙，咂咂嘴，问着还站在旁边的女掌柜。

“有啊！”女掌柜满脸开花，“要通铺大炕？还是单间？兄弟倒是该住单间舒服。”

“好啊！我住单间。”勤娃满口大话，一壶酒又所剩不多了，支使女掌柜，“给我开门去！”

他妈的，我康勤娃也会享福嘛！酒也会喝，花生豆儿也会吃。往常里倒是太傻了哩！

“勤娃兄弟，床铺好了——”女掌柜在很深的宅院里头喊。

“来了——”勤娃手里攥着酒壶，朝院里走去。脚下有些飘，总是踩踏不稳，又撞到什么挡路的东西上头了，胳膊也不觉得疼。那些坐着或躺在通铺大炕上的山里脚客，在挤眉弄眼说什么，勤娃不屑一顾地撇撇嘴角。这些山地客，可怜巴巴地肩挑山货到山外来卖钱，只舍得花三毛票儿躺大炕，节省下钱来交给山里的婆娘。可他们的婆娘，说不定这阵也和谁家男人睡觉哩……

“在哪儿？”勤娃走进昏黑的狭窄的院道，看着一方一方相同的黑门板。

“在这儿。”女掌柜走到门口，“我给你铺好被子了。”

勤娃走到跟前，女掌柜站在窄小的门口，勤娃晃荡着膀臂进门的时候，胳膊碰到一堆软囊囊的东西，那大概是女掌柜的胸脯。

女掌柜并不介意，跟脚走进来：“新被新床单，你看……”

勤娃一看，女掌柜穿着一件对门开襟的月白色衫子，交近农历四月的夜晚，已经很热，她半裸开胸脯上的纽扣，毫不在乎地站在当面。勤娃一笑："好大的奶子！"

"想吃不？"女掌柜嘻嘻一笑，一把扯开胸脯，露出两只猪尿泡一样肥大的奶头，"管你一顿吃得饱！"一下子搂住了勤娃。

勤娃本能地把脸贴到那张嬉笑着的脸上。

"瞎熊！"女掌柜又嘻嘻一笑，嗔声骂着，转过身，走出门去。

丁串串正好走到当面，站住脚。

"勤娃喝多了，在老嫂子跟前耍骚哩！"女掌柜说。丁串串哈哈一笑，忙他的事情去了。

勤娃往腰里一摸，啊，那一卷票子呢？啊呀！脑子里轰地一下，一瞬间的惊恐之后，他就完全麻木了，糊涂了。

"哈哈哈……啊哈哈哈哈！"勤娃从门里蹦出，站在院子里，"一把票子，几十块！只摸了一把奶！太划不来了……哈哈哈哈……"

他豁脚扬手，笑着喊着，从后院蹦到前房，又冲到门外。

"这瓜熊醉咧！"女掌柜也哈哈笑着说。

"大概屋里闹仗，生闷气。"男掌柜丁串串给那些山地脚客说，"这是方圆十多里有名的土坯客，一个麻钱舍不得花的人。今日一进门就不对窍嘛！大半是家事不和，看起来闹得很凶……"

丁串串说着，吩咐女掌柜："你去倒一碗醋来，给灌下去……"

十六

月亮半圆了，村外的田地里明亮亮的，似乎天总是没有黑严。玉贤匆匆沿着宽敞的官路走着，希望有一块云彩把月亮遮住，免得偶尔从官路上过往的熟人认出自己来。

经过一夜一天的独自闷想，她终于拿定主意：要找杨老师。在娘家屋比在勤娃家里稍微畅快些。一直到喝毕汤，帮母亲收拾了夜饭的锅灶，她才下定决心，今晚就去。

父亲一看见她就皱眉瞪眼，扔下碗就出门去了，母亲说到隔壁去借鞋样儿，她趁机出了门，至于回去以后怎样搪塞，她顾不得了。

桑树镇的西头，是行政村的中心小学，杨老师在那儿教书。月光下，一圈高高的土打围墙，没有大门，门里是一块宽大的操场，孤零零立起一副篮球架。操场边上长着软茸茸的青草。夜露已经潮起，她的脸面上有凉凉的感觉。

一排教室，又一排教室。这儿那儿有一间一间亮着的窗户，杨老师住在哪里呢？问一问人，会不会引起怀疑呢？黑夜里一个年轻女人来找男教员，会不会引起人们议论呢？

左近的一间房门开了，走出一位女教员，臂下夹着本本，绕下台阶过来了。她顾不得更多的考虑，走前两步，问：“杨老师住哪里？”女教员指指右旁边一个亮着的窗户，就匆匆走了。

走过小院，踏上台阶，站在紧闭着的木门板外边，玉贤的心腾腾跳起来。她知道她的不大光明的行动潜藏着怎样不堪设想的危险结局，没有办法，她不走这一步是不行的。

她压一压自己的胸膛，稳稳神儿，轻轻敲响了门板。

“谁？”杨老师漫不经心的声音，“进。”

玉贤轻轻推开门，走进去，站在门口。杨老师坐在玻璃罩灯前，一下跳起来，三步两步走过来，把门闭上，压低声音问：“你怎么这时候来了？”

他怎么吓成这样了呢？脸色都变了。

“见谁来没有？”杨老师惊疑不定地问。

“见一个女先生来。”玉贤说，“我问你的住处。”

“她没问你是谁吗？”

“问了。”

“你怎样说的？”

“我说……是我哥哥……”

“啊呀！瞎咧！人家都知道，我就没有妹妹嘛！”杨老师的眼睛里满是惊恐不安，“唔！那么，要是再有人撞见问时，说是表妹，姨家妹妹……”

玉贤看见杨老师这样胆小，心里不舒服，反倒镇静了，问：“杨老师，我明白，这会儿来你这儿不合适，我没办法了。我是来跟你商量，咱俩的事情咋办呀？”

“你说……咋办呢？”杨老师坐下来了。

“你要是能给我一句靠得住的话……”玉贤靠在一架手风琴上，盯着杨老师，认真地说，“我就和勤娃离婚！”

“那怎么行呢！”杨老师胡乱拨拉一把头上的文明头发，恐惧地说，“县上教育局，这几天正查我的问题哩！”

“我知道。”玉贤说，“今日后晌一位女干部找到我娘家，问我……”

“你咋样回答的？”杨老师打断她的话。

“我又不是碎娃，掂不来轻重……”

“噢！”杨老师稍微放心地吁叹一声，刚坐下，又急忙问，“不知到勤娃那里调查过没有？”

“问了。”玉贤说，“听她跟我说话的口气，他也没给她供出来……”

“好好好！”杨老师宽解地又舒一口气，眼里恢复了那种好看的光彩，走到她面前来，“真该感谢你了……好妹妹……”

“要是目下查得紧，咱先不要举动。”玉贤说，“过半年，这事情过去了，我再跟他离！”

“你今黑来，就是跟我商量这事吗？”

“我跟他离了，咱们经过政府领了结婚证，正式结婚了，那就不怕人说闲话了，政府也不会查问了。”玉贤说，“我想来想去，只有这条路。”

“使不得，使不得！”杨老师又变得惊慌地摇摇手，“那成什么话呢！”

“只要咱们一心一意过生活，你把工作搞好，谁说啥呢？”玉贤给他宽心，“笑，不过三日；骂，不过三天！”

“你……你这人死心眼！”杨老师烦躁地盯她一眼，转过头去说，“我不过……和你玩玩……”

“你说啥？”玉贤腾地红了脸，几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这是你说的话？”

“玩一下，你却当真了。”杨老师仍然重复一句，没有转过头来，甚至以可笑的口吻说，“怎么能谈到结婚呢！”

玉贤的脑子里轰然一响，麻木了，她自己觉得已经站立不住，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嘴唇和牙齿紧紧咬在一起，舌头僵硬了。

“甭胡思乱想！回去和勤娃好好过日月！他打土坯你花钱，好日月嘛！”杨老师用十分明显的哄骗的口气说着，悄悄地告诉她，“我今年国庆就要结婚了，我爱人也是教员……”

他和她“不过是玩玩”！她成了什么人了？她至今身上背着丈夫勤娃和父亲吴三抽击过的青伤紫迹，难道就是仅仅想和他玩一玩吗？她硬着头皮，含着羞耻的心，顶过了县文教局女干部的查问，就是要把他包庇下来，再玩一玩吗？玉贤可能什么也没有想，却是清清楚楚看见那张曾经使她动心的小白脸，此刻变得十分丑陋和恶心了。

“我不会忘记你的好处，特别是你没有给调查人说出来……”杨老师这几句话是真诚的，“我……给你一点钱……你去买件衣衫……”

玉贤再也忍受不住这样的侮辱，一口带着咬破嘴唇的血水，喷吐到那张小白脸上，转身出了门……

十七

月亮正南，银光满地，田野悄悄静静。

玉贤坐在一棵大柳树下，缀满柳叶的柔软的枝条垂吊下来，在她头上和肩上摆拂。面前是一口装着木斗框架的水井，应该结束自己的生命了！一低头，一纵身，什么都不要想了！

也许明天早晨，菜园的主人套上牲畜车水的时候，立即就会发现她……十里八村的男人女人，就该有闲话好说了。啊啊！她将作为一个坏女人永远留在村民们的印象里……

她忽然想到了阿公，那个在她过门不到两月时光就把“金库”交给儿媳掌管的老人，小河一川能数出几个这样老好的老人呢！多少家庭里娶下媳妇，父子，兄弟，妯娌闹仗分家，不都是为着家产和金钱吗？她太对不住阿公了，如果能见一面，她会当面跪下，请求老人打她。那样，她死了，会轻松一些。

她想到勤娃了。他笨手笨脚，可搂起她的双臂是那样地结实。他讷口拙舌，可说出的话没有一句是空的。他从外村打土坯回来，嘿嘿笑着，从粗布衫子的大口袋里头掏出钱来，很放心地交到她手上，看着她再装到阿公交给她的那只梳妆盒子里……

她对不起阿公和勤娃。她没脸面再去盯一眼这样诚心实意待她的人。她应该立即跳进井里去！

她对不住阿公和勤娃。应该在离开阳世的时候，对自己已经觉悟到的错事悔过，补一补心，再死也不迟啊！

她站起来，冷漠地盯一眼透着月光的井水，离开了。她从田间的小路重新走上官路，从桑树镇上穿过去，直接回家，免得回到娘家，父亲没完没了地责问，死了也该是康家的鬼！

玉贤走到桑树镇上了，街上已经空无人迹。经过客栈门前的时候，门口围着一堆人，嘻嘻哈哈，哄哄闹闹。她不想转过头去，这个客栈，早听人说过，是个乌七八糟的地方，丁串串开栈挣钱，婆娘卖身子挣钱。

“哎呀！喝了醋就醒酒了！”

“灌！”

“把鼻子捏住！”

又是什么人喝醉了，玉贤走过去了。

“我——不——喝！”

玉贤听到被灌着醋的喝醉了的人的吼声，猛然刹住脚，怎么像是勤娃的声音呢?

“毒——药——”

这回听真切了，是勤娃。天哪！他怎么跑到这个鬼栈里来了呢?她的心紧紧地收缩下沉，意识到她害得勤娃变成什么人了！

玉贤折回身，跑到人堆前，拨开围观的人堆；从门里射出的马灯的亮光里，看见勤娃被一个人紧紧夹住，丁串串正给他嘴里灌醋。勤娃咬着牙，闭着眼，醋水洒了一脸一胸膛，满身泥土。玉贤一下扑上去，抱住勤娃，哭喊出来：“我的你呀……”

丁串串和众人停住手，议论纷纷。

玉贤扯起衣襟，擦了勤娃的脸，抓住一只胳膊，架在她的脖子上，另一只手紧紧搂住勤娃的腰，几乎把那沉重的身躯背在身上，拽着拖着，离开丁家栈子，走上了官路……

1982年9月18日至11月3日灞桥

散文·报告文学

躯干

一

连续两三次寒潮入侵，把素有“十月小阳春”之称的关中平原强行推进冬天冷冻世界的大门。农历九月二十一，离小雪节气还有半月之远，就下起雪来；雪势来得猛，时间却太短促了，降水量不大；入冬以来干旱的空气得到调节，川原上下的麦苗洗净了叶片上的灰尘，显得葱绿水嫩。寒潮退去以后，节令过了小雪，又过了大雪，滴雨未见，空气干燥，麦苗又显旱了。川道里有灌溉设施的田头，有社员在引水浇麦，这是促进小麦分蘖的关键一水（农民叫盘根）。旱原上没有水利条件的麦田，只能等老天爷的恩赐了！

一周前，公社水利干部兴冲冲地告诉我，陈广汉试办的坡原喷灌成功了，可灌七十来亩地。我为这小小的水利工程所吸引，几天来，竟然心神不安，一种急切的情思牵引着我，上陈家坡去看看……

陈家坡坐落在白鹿原北麓的半坡上，从灞河川道的公路上，依稀可见笼罩着村庄的树梢，有一条小路盘沿而上……

在公社工作的十年里，这个村子留给我的，本来没有什么好的、美的或者是诗情画意的东西可资回忆！印象深的倒是，陈家坡的干部到公社来，大约不外乎这样几件事：要救济粮，要救济款，要公社派干部去帮助他们选干部，他们的什么干部又撂套了。虽然每年春天都

拨给他们一批救灾粮款，可是社员们从渭河北丰产区买回来的高价粮，还是比从打谷场上分回家的数字多！这是实实在在的事。公社多次派干部去驻队，少则十天半月，多则三五个月，往往是苦心巴力扶起一个班子，刚刚离开陈家坡不久，就又垮塌了。印象更显明的是，这个小村庄的居民很勇敢，连续几次，因为争水争地界，把邻近两个比他们大一倍乃至几倍的村庄打败了，这无论如何是使周围村庄居民敬畏的“光荣纪录”。

前年夏天搞平整土地会战的时候，指挥部扎在陈家坡村。我们的任务很单纯，两个月完成八百亩坡地的平整工程。住了不上半月，旱象加剧，秋苗旱得发蔫，这儿的蓄水库塘里有水，地却浇不好，施肥也跟不上。没劳力吗？他们给改土工地上只安排了不上十个妇女应付场面……我被社员的呼声所感动，插手干涉他们的内部事务了。又过了不到半月，连续几家打架闹仗，告状告到我的门上，我是想甩也甩不脱了。接近会战结束时，陈家坡的队长、副队长、妇女队长全部撂套了，甚至中共陈家坡支部书记也宣布他不干了！

这个严重的局面使我吃惊。我把情况汇报给公社党委，得到的决策是：指挥部按计划撤离，让我和另外三个同志留下来解决陈家坡的问题，用四个干部，解决三十八户一个大队的问题，够大方了，也就可见党委的意思了。

无须赘述后来的过程。当我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给这儿撑起一个班子的时候，我并不宽慰，倒是时刻担心，不久还会塌台的。

好心的社员对我们说：“难弄吧！没想到小村子事情这么难办吧？嗨！要是陈广汉上马领头儿，根本不够收拾！何用你们费心费力！”

陈广汉是陈家坡原大队长，从农业社成立干到一九六五年夏天，陈家坡社员得到最后一场小麦大丰收之后，正在进行的“四清”运动到了后期，他被开除党籍了。从一九六六年到一九七八年的十三年间，陈家坡就像一个被抽掉了脊梁骨的人体，再也支撑不起软瘫的躯体来。

人民在忍耐中，终于走到了一九七九年，陈广汉平反后回到了陈家坡这具躯体之间。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并不惊奇，只是证实一下自己的愿望而已。可是，不到一年，首先从那儿传出喷灌成功的消息，我渴望见到陈广汉的情思自然无法抑制了。

二

从村子东南面的停马沟蓄水塘里把水引出来，通过埋设在地下的硬塑料水管，直达最下边一台梯田。每隔六十米，从主管道引出一个接头，安上喷嘴儿，用很长的塑料软管可以把喷嘴延伸到两边的梯田里去。

广汉接好喷头，叫两个社员拧开闸门，可以听见地下哗哗哗的流水声。猛然，刷的一声响，两个喷头在空中扯开两道乳白色的水帘；蓬蓬啪啪的雨声，夹杂着喷头转动时有节奏的轧轧声；干燥的空气霎时变得湿润润的，清香的泥土气息扑鼻而来；西斜的太阳，在雨帘里映出一道五彩缤纷的彩虹，真是壮观极了。

陈广汉尚未成年时，在西安一家鞋铺锥过两年鞋底儿。解放后，这个刚刚成人的青年很自然地投身于党所领导的农村革命，表现出出众的坚定、公道和富于组织能力；初级农业社成立，二十四岁的小伙

子被选为副主任，干到一九五八年，他就位驾辕了；三十户人家的集体事业的大车，一直拉到一九六五年，整整十年。

这十年里，陈家坡村年年完成国家下达的公购粮任务，从未吃过返销粮；即使三年严重困难时期，河川里有水浇地的村子也买国家返销粮的时光，地处旱原的陈家坡仍然自给自足。“麦囤子”的美誉就是那时候显出来叫起来的。

广汉下台了，“麦囤子”随之烂包了。干部走马灯似的你上他下，吃返销粮加买高价粮的困难局面却一直未能扭转。有人挖苦说：“咱的户口关系在陈家坡，粮食关系在渭河北……”

有这个人和没这个人，大不一样！社员从切身饥寒温饱中更清楚地归结到这一点。于是，村里形成一股股呼声：促广汉上马！

“四人帮”乱国的头几年里，风云莫测，派系复杂。自知脊背上扣着黑锅的人，生怕再度卷进糊汤浊流里，躲到城里一家工厂去挖土方，逃出是非之地了，村里群众的情绪，他还不知道。

一个休息日，他回家来，走到坡下驻军营房的围墙边，部队政委亲热地叫他的名字，硬拉他的袖子，要广汉到里边去坐。

“我是有问题的人，你少和我接触，小心影响你……”

政委哈哈笑着，没有松开使劲拉着的手。

坐在政委办公室，从问寒问暖拉家常开始，最后政委终于把底儿亮出来：上台！

“我不干！子孙后代都再不当干部！”用不着丝毫犹豫和片刻考虑，陈广汉一口回绝，脸色都变了……

挖土方的合同期满以后，陈广汉回到陈家坡。这一天，驻军干部在半坡上的饲养场召开社员会，把广汉拖去参加。部队同志告诉他，已经开过不下十次座谈会，群众仍是一句话，要陈广汉上马！会场上，广汉的名字一提出，随声举起一片攥着拳头的胳膊。陈广汉感动了……

“把社员的粮食关系，从渭河北转回陈家坡！”这是他集中了大伙的心愿而给自己立下的目标。经过几次会议，明确了主攻方向：水！

一上马就抖出了威风！柳沟水库立刻动手，从三里远的灞河滩里用口袋把砂石背上原坡，三九寒天，汗把棉袄湿透了！陈广汉和社员夹杂在一起，背！大雪天，泥泞的坡路上不断有人滑倒，爬起来，继续上！真有几分悲壮的气氛呢……奋战两年，地处千古旱原的村子，终于有了水浇地。

当干部不可能不触犯一些人的自私违章行为，听到刺激伤疤的冷言恶语，他常常难受得几夜睡不着，须知他是含冤忍辱而又负重啊！公社领导了解下级的困难处境，把广汉抽到公社来，当生猪收购验收员。

此间，陈家坡又乱得不堪收拾了，直至“四人帮”垮台以后，继续混乱的局面，又使公社领导的眼睛瞅住了陈广汉：

“现在，你可以上马了！”

“唔……”

“可以让你的孩子接替你的工作，你回队！”

“只要我的问题得到解决，我回老家！孩子安排不安排，不是主要问题！”

响鼓不用重锤。陈广汉刚一平反，就回到队上。摆在他面前的局面是：人无粮，牲畜缺草料，内外债欠下一万七，按人均摊八十多块。他驾起的是这样一辆破车！

一九七九年夏季，陈家坡获得大丰收，秋季收成也不错，全年总产突破十二万斤，是解放三十年来最高的收获量了。再没人夹上口袋黑天半夜借粮买粮了，粮食关系从渭河北转回来了！多么豪迈的一步，简直是奇迹……

彩虹随着雨帘在空中移动，激情使我难以自制，瞧着梯田里推车挑担送肥的男女社员，瞧见广汉淌着水珠儿的笑脸，听着那哗哗哗的喷水声像奇妙的乐曲在飞扬，那雨帘里的彩虹，似乎是社员们初展愁眉的笑脸……

三

归去的时候，暮色苍茫，冬日傍晚的灰雾笼罩着原坡，烧锅点炕的蓝色柴烟弥漫在村庄四周，与灰雾融会在一起，偏远山区少有车鸣人嘈声，田野清冷而恬静。

陈广汉还占据着我的整个脑海。他平静的脸上，显示着素有的冷静和坚决，很少能看见他有得意的神色；单眼皮，直鼻梁，因为颧骨高耸显得下颚瘦窄了，这是一张极普通的脸。他的耳轮上部，帽圈下

露出两绺银白色的头发。他今年四十七岁，远远不到白头年龄啊！而据说好几年前就霜染鬓斑了。

从生理学上是不是能解释得通，我不大清楚；我所知道的他受的冤苦，他费的心血和气力，绝不会不是四十白发的一个重要因素。

当组织决定复查陈广汉的问题的时候，打开据以开除他党籍的那一堆材料，办案人员好笑：合作化以来，陈家坡果园收入没有一年超过两千元，可是，仅仅一九六一年一年，就给广汉和其他干部算下了三千元的果园收入贪污款。在硬行定案并要求即刻退赔“赃款”的时候，粮食、家具和自留树木一齐折价没收，四年前广汉掏五十元买了一棵活杨树，未伐，长了四年，退赔时折价四十元。谁能相信这是在教育人嘛！整人整得连起码的常规也不顾了。

就凭这些，陈广汉被开除党籍了。当时他只有三十三岁，正当精力旺盛和心力成熟的富有年华！他的政治生命被断送了，陈家坡的脊梁被抽掉了！他忍辱含冤而白发，群龙无首而遭罪受苦，整整一十三年。

在陈广汉从一九五五年到一九六五年当权的十年间，陈家坡说不上十分富裕，也算得一个“小康之家”，不欠一分一文外债内债，社员能得温饱。他一下台，外债内乱就接踵而来。一九七〇、一九七一两年，他上台的时候，面临的是社员缺粮，牲口缺草，他办了两件大事：水利和电力，困难的局面才有转机。他退位到一九七九年初上来时，又是债台高筑，人心涣散到难以收拾，神仙莫治陈家坡了。可是不足一年，这儿就还过阳气来，办成了原坡第一家喷灌！

我怀疑自己是否在神话陈广汉，却又无法否定铁一般的事实。现行的党的方针政策好是总前提，风调雨顺是好机会；可是，这样的现象如何解释：陈家坡一年里，大小干部没有一个撂套的，社员和社员，社员和干部，干部和干部之间闹矛盾以至打架闹仗的事也很少发生，表现出多年来少有的“人和”景象。

我于是想到一个人，一个人的重要和价值。

像陈家坡这样一家只有三十八户人家的大队，大约是我们九亿大国里很小的一个细胞了，生活在这个小细胞里的一百九十四个居民，要产生出一个可资信赖的领袖人物，竟然这样难！可是毁灭这样一个群众领袖，却凭着一摞杜撰的材料就能轻易做到了！造成人民自相残杀、毁灭忠诚战士而使阴谋者逞能升迁的极左路线，愿它永远寿终正寝！

“干部”一词在日语中的原意是“躯干之部”，实在是贴切恰当。想到陈广汉这样一个三十八户人家的大队的干部，我联想到人的躯干。愿祖国母亲的每一个细胞里，尽快成长起背负民族希望的“躯干之部”来……

1979年

分离

初次听到农业技术中“分离”这个词儿，觉得陌生而又新鲜。分离，这是对种子提纯复壮过程中使用的主要技术手段，就是对同一优良品种，淘汰劣种，选择优种，坚持数年，不断分化，直到取得一种最优良的植株的种子为止。当我们听完孙峰自己的介绍，以及他的科研站的伙伴们的述说，奇异地发现：在这个被团中央命名为“新长征突击手”的青年的生活中都贯穿着一种严峻的“分离”的精神……

一

一九七六年初冬，灞河和浐河交汇区广阔坦荡的平原上，一排排白杨落了叶，复种的小麦绿色葱茏，恰似一张素雅简洁的织锦。

这时节，二十四岁的安邸大队试验站副站长孙峰，从武功农业技术学校短训班学习结业，回到了家乡。他一进家门，和妈妈只打了一句招呼，就又闪身出了门，旋风似的卷进生产队长家里来。

队长正抱着大老碗吃饭。小伙子简要地向队长汇报了他的学习情况，急切地提出：“我想去一趟安康！”他说他在短训班里认识了安康一位同行，得知安康农科所引进了一种优质高产的油菜品种“日本平头”。那位同行自愿帮忙，设法从安康农科所搞几株。他特别向队长强调：现在是阴历十一月末，已经是移栽油菜的晚期，倘使错过这几天，就要再等一年，农业生产就有这个麻哈劲儿！他说得急，说得恳切，想得单纯：“我想明天就起身，赶到安康……”

他的眼睛一直没离开队长的大老碗，队长的眼睛也一直没离开他的老碗和菜碟。他只是轻轻地说："峰，先回去吃饭！"

一瓢凉水！小伙子心里灰了。唉，这儿没有种油菜的习惯，谁见过亩产三百多斤的菜籽！想到这些，孙峰又想通队长的冷淡态度了，热火的情绪又升腾起来。他奔回家，对老母亲倾谈了自己的心事："妈，你有钱吗？"

母亲把孙峰哥哥平时给她的零花钱积攒下来的三十块钱，连同包钱的手帕，一齐交给儿子。加上自己在农校省吃俭用积攒的钱数，去安康的路费凑够了。只差粮票，实在借不下，把馍背上，来回五六天，又是冬天，馍不会霉坏的。主意就这么定了。

试验站的姑娘王知斤，得知孙峰的困难，一手把粮票塞到孙峰手里，慷慨而又真诚。

第二天一早，孙峰已经登上南下安康的火车……

实在糟糕！下公共汽车的时候，他踒了脚脖子，钻心似的疼痛，举步艰难。孙峰抚着扭伤的脚，心里怨自己，太急了嘛！太冒失了嘛！哎哎！想不到会弄下这麻达事！

被一种心爱的事业迷住了心思的年轻人，往往会表现出一种超乎凡人想象的坚强的忍耐的毅力。他咬着牙，头上滚着汗，跛着脚，一路探问着，一路甩着汗水，在山城安康的街道里艰难移步，找到了在武功农校结识的伙伴。又马不停蹄，找到了安康地区农科所，终于在试验的苗床上，看到了生态勃然的日本平头油菜生长植株。

真诚能感天动地！农科所的老师们，听完这位关中农村小伙子的叙述，看着他一跛一跛的腿脚，从已经定植的圃方里，忍痛割爱，挖出来十株，再三叮嘱：要注意陕南和关中的气候差别……

孙峰得到多么舒心的精神上的满足！他提着装着油菜植株的硬质纸箱，坐上公共汽车，又转上火车。第六天，他凯旋而归，回到了灞河岸边的家乡。

第二年初夏，麦梢黄了，孙峰的十株日本平头油菜苗儿，经过严寒的关中冬季的折磨，好容易保存成活下来了两株，简直贵重得如夜明珠一般，结荚了，角干了。

割下来，一个一个摘下荚角儿，小心地揉搓，多么简单而又严肃的收获！得到了紫红色的一撮种子，称过：四十克！

不少不少！孙峰攥着这四十克种子，心里乐死了，忘了去安康自个儿花了六十多块钱，赔了六天工分，崴了脚脖子的痛楚；冬春月里天天观察、记载、精心管理的辛苦，都一齐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九月初，孙峰把四十克夜明珠般的种子播进苗床里，十一月初，孙峰又把一株株幼苗儿移栽进田地里，围上土粪，盖上麦秸；没有覆盖塑料薄膜，让生长于温带的日本平头经受秦岭北麓灞河平川冬季严寒的锻炼……

春天来了，灞河解冻，春水哗哗。油菜复苏了，从厚厚的土粪层下，钻出来一片绿生生的新叶，孙峰更是天天几次观察，田间踩出一条细径。

起秆儿了，分叉了。孙峰的眉头却一天比一天皱得难看了。我的天！不到一两种子，仅仅只有一畦地！竟那么多株，秆歪枝稀、株形疏漏、花苞点点稀拉，没有一株高大健壮、秆粗枝密、结荚繁稠的理想植株。好容易等到开了花，结了荚，干了角，他心里难受极了。优越性在哪里？要按分离的原则，全是劣种，均应舍弃。一切辛劳都将落空，一切希望都将化为泡影！搞种子分离的人，心是硬的，甚至有点残忍，抛弃劣势病态的植株，毫不留情，须知，非此不能分离出优势状态植株啊！

孙峰面对着一片稀稀落落的景象，他不甘失败，他想：也许是气候、土壤的差别所致，而不能使优势发挥出来吧？他又经过选择，在每株有一点优点的植株主花上，采集下种子，今年再播。

一切从头开始。这是一九七七年秋天，九月播种，十一月移栽。一九七八年春天，真正关键性的一个春天来到了。

成功往往孕育在失败之中。你看，只有那么几株从发芽到抽叶，以及株型的形成，就显示出勃然优势，直到分叉，仍保持着遥遥领先和鹤立鸡群的优势之态，叶阔秆粗，分枝多而又密，花苞繁，主秆直至长到一米七；同时，也有一两株却表现出另外的特征，一起秆就分叉，两服主秆同时并进，同时分叉，花苞一样稠密。孙峰，眉头的疙瘩绽开了，一满是压抑不住的喜悦，难得的珍贵的生态现象，给他指出了无限的前程，这是三年的心血啊！

试验取得成功，获得了理想的植株，无须赘述后来的充满凯歌式的欢快的进程了。只需向读者报告一个数字：一九七九年，孙峰分离出来的日本平头油菜亩产三百六十斤，可在他们队，历史上最高年份只有一百九十斤。这数字，饱含着有志者的辛劳和心血，化作了诗，

化作了丰收，幻影般的奇迹实现了，灞河岸边的春天，一大片一大片的油菜花覆盖了原野……

队长看到这个景象，对孙峰说：“峰，把你到安康去的路费报了吧！”

孙峰先是一愣，从安康回来，已经是几年了啊！他把此事早已忘了。等他记起这件事的时候，瞧着队长诚恳的眼神，小伙子心里涌起一股热浪，倒说不出话了……

二

和对油菜试验中的分离一样，孙峰在爱情生活上，也经历了一段严峻的分离过程。和油菜试验中的分离不同的是，恋爱中的分离和选择，则要更困难一层。植物试验中，生态长势，摆在那里，清清楚楚，一目了然；而对象呢，外表和内心的美，往往存在着难以捉摸的不统一现象，这就使年轻人的恋爱往往难以一次完美地成全。

在中学读书时，同班一位城镇知青，和他往来多些。毕业后，孙峰回到了自己的家乡安邸村，那位女同学也插队下农村了。她给他来了一封信，其实也没有谈什么爱情的事。他回了一封信。随着日月流逝，年龄继增，他们都成年轻人，各自都得到对方三十多封信，互相倾慕、互相恋爱的心思都表现得清清楚楚。这时候，孙峰接到姑娘又一封信，信中有劝孙峰设法到外部世界找一碗商品粮吃的意思。孙峰正热心于种子的揪心试验中，很明显表示：他不想离开他的试验站，人各有志，农业粮吃着也不寡味嘛！

这样，在他们的爱情里，卡下了一道横竿，姑娘一次又一次来信，愈来愈明晰地提出，孙峰必须吃一碗商品粮的饭，这成为她和他结合的唯一的最低的也是最高的纲领。孙峰处于困惑中，丢弃培植起来的友情，是痛苦的；答应这样的条件，是违心的，他有着自己的理想和志向。

姑娘亲自骑着自行车来到了安邸村，从试验站把孙峰叫了出来，进行最后一次谈判。

姑娘也很痛楚，她要丢弃自己心灵上的所爱也是痛苦万状，最后终于放宽尺码：在社办企业里当个工人也可以，总之，要孙峰和他的试验站分离。

满足这样的要求并不困难。当个社办企业的工人比国家企业职工要容易得多。但是，孙峰，他的心已经完全迷恋于种子试验了，要他和这分离，去当工人，不管是国营的，或是社办的，对他来说，不是幸福，而是精神上的痛苦。他再三思量，他无法与试验站分离，与心爱的日本平头分离……

谈判破裂了，姑娘伤心痛楚地离开了，孙峰重新走进自己的试验站，他经历了一次严峻的爱情分离。

本村一位姑娘，异常热烈地又闯进孙峰的心里。她多情，也漂亮，帮助孙峰洗衣服，甚至到他家帮忙做饭，她向他暗暗地倾吐了爱慕……

孙峰觉得不能太轻率，尽管同生一个村，同在一个站，也不能如此简单地宣布结合，总得有一个互相了解、信赖的过程。

这当儿，有人给姑娘介绍了另外一位青年，长得排场，家境又宽绰，一见钟情，按照农村目下时兴的手续订了婚。没有办法，在长相和家境经济方面，孙峰是处于劣势的，他被姑娘淘汰了，分离了！

生活是复杂的，人也是千姿万态的。浮光掠影，五光十色，令人眼花缭乱，要捕捉实在的真诚的东西，真是不容易呢！试验站另有一位姑娘王知斤，却是实实在在地倾心爱着孙峰。

她既没有给孙峰写情书，也没有明显表露过“我爱你”！孙峰一直没有发现。

这年年终，队里决分以后，孙峰得到二百多元的现金。他抽出八十块，找到王知斤，塞到姑娘手里。

知斤被这突如其来的举动搞得愣住了：“这是做啥？”

孙峰诚恳地说：“这一年，零儿白儿拿你的钱，我估计不下这个数儿！我给你还……”

“噢！”知斤明白了，倒抽一口气，脸上立时变了色，气恨恨地抿着嘴，胸脯一起一伏，眼泪在眼眶里打转，一甩手走了。

孙峰也愣住了，不要钱也用不着生气呀！

于是，他想起：在自己忙于田间作务、抽不出身回家吃饭时，王知斤给他把饭带到田头来。多少次，记不清了哩！

自己家里穷，夜里给棉花防虫，睡在河滩露天地里，他只有一条薄被，王知斤给他送来褥子、暖壶，怕他冻着……

为了掌握害虫的活动规律，他整夜坚守在棉田地里观察，是王知斤不叫苦，不知累，有时陪他一块观察……

他需要一个认真负责的助手，王知斤是最满意的一个，你怎么吩咐，她遵照完成，认认真真，从不偷闲……

他家里只有个七十多岁的老母亲，吃饭穿衣都有困难，知斤姑娘给他缝过衣，做过饭，次数也记不清了。

是不是知斤有那个意思呢？自己可是万万没有想到呢！孙峰问自己。她比他大两岁，像他的姐姐，他心里感激知斤对他的体贴，可没有想到另外一层意思。现在，他手里捏着知斤生气地塞回他手里的票子，愣愣地想着，似乎真是负了姑娘一片痴心挚情了。他的心被强烈地震动着，感觉到了一股强大的热力。

他找她去了。

一见面，没有说话，姑娘竟流了眼泪。

孙峰感动了，懊悔自己怎么竟没有想到呢？他不想解释，那是多余的！彼此至今完全肝胆相照了！他开玩笑说："知斤，你是独生女，家境好，天天早起吃糕点；我家穷，早饭老是喝苞谷糁……"

"甭胡说！"知斤说，"俺哥在城里，礼拜回家看我妈，买些糕点，俺妈让我吃。我不吃，让它发霉长毛，这才对吗？"

孙峰笑了。

迟开的花儿更香。他们结婚了，实实在在，心心相印。共同的事业，并肩的劳动，把两个纯朴青年的感情扭结在一起。真挚的爱情在

共同追求的事业的奋斗中萌发，开花，结果了。

三

像一切不完全成熟的年轻人一样，孙峰也有因年轻气盛而干出蠢事的时候。

孙峰在试验站里，队上每天给记十分工，全年大约有三百三十个劳动日，这要和队里的同等劳力比，差别就明显了。同等劳力每年能挣六七百个劳动日。原因是他们在队上能挣额外的计件工和额外的加工工分，而孙峰只能得到每天出勤才有的十分死工分，夜间观察和加班，也不给补记工。

想在事业上有所作为的年轻人，总是对个人的生活表现得稀里糊涂。

七十多岁的老母亲的眼睛，却难得离开那个关系着她和小儿子衣食温饱的工分本本。家里也实在是太穷了，屋里空荡荡的，吃饭连多余一只碗也没有；即使能分得几个钱，也需要等到年终决分。娘儿俩没有一分钱的收入，真是吃盐吃醋也成了问题。看着儿子从早到晚，从晚到早，迷在那试验田一块块小棋格似的田地里，回家来胡乱刨满一肚子少油寡味的粗食淡饭，母亲终于忍不住了，流着泪劝儿子：“你不搞试验不成吗？”

孙峰扬起头，停住筷子，傻愣愣瞧着母亲。

“让人家家境宽裕的人去搞，咱穷，贴赔不起！”

孙峰明白了，笑着，不在乎地笑着。

“你是个瓜瓜！”

“瓜瓜，啊，我是个瓜瓜！”孙峰自笑着，也不正面回答妈妈的话。

孙峰经济上的明显损失，时间一长，引起了试验站的姑娘们的意见。她们觉得，像她们站长这样的彪实小伙子，像她们站长这样从早到晚不知累乏的干劲，要是在队里，肯定要拿队里上稍工分！她们议论之后，在路上碰见了队长，提出了这个问题：“站长夜晚的加班加点都该记工分，平时的底分，也应适当提高。”

队长没有多余的话：“河滩给汽车装沙子工分大，要干了去试试！”说完扭头就走了。

听到姑娘们乱口纷纷的议论，孙峰火气冒了上来。我在试验站是想偷懒吗？是想挣轻省工分吗？捞沙石我怯场吗？干给你看看——第二天，他扛上铁锨下了河滩。憋着一口气，他一连干了十多天，无论谁都承认，小伙子抡锨装沙，干得不亚于任何精壮劳力。

时间稍过去了几天，他后悔了，难道咱为了几个工分，自己的志向就这么浅？哎，他痛苦了，难受极了！他走过自己日夜恋在心里的试验站，停住了步！流下了泪……

他终于又回到了他的方格格试验田里了。

可是，困难还是接踵而来，大约是日本平头试验几无希望的那一年，支部一位负责同志看到他家的困难，照顾他去当民办教师——虽是“民办”，在乡间也是年轻人眼里向往的差事！

不，不，孙峰不能在困难的时候离开他的试验田，即使有金筷子银碗！为着农村科研事业决心献身的孙峰，向领导表示了坚决的志愿！

当日本平头的高产喜讯传开以后，当他试验的其他油菜新品种同样获得喜人的产量以后，孙峰的名字和油菜的花香一同传遍了原野，素来不习惯种油菜的当地农村，春天，在绿毡似的灞河和浐河平原上，大片大片的油菜花像黄色的锦缎，点缀在绿野之中……

一九七九年，共青团中央命名孙峰为新长征突击手。公社管委会把孙峰从大队调到公社农科站。他还和在队里时一样，挽着裤管，奔跑在各个生产队的田野上，给生产队那些干部和社员当参谋。在他的脚下，刚刚是起步，但是无论如何，他的天地却是更加广阔了……

1980年春

山连着山

大约经过了九拐十八弯，汽车终于从原顶上盘回下来，进入黄土高原的一道河谷了。两岸黄土山峦，蓝天变成窄窄的一溜儿。汽车贴着山根，顺着河边的公路行驶。一座座被风雨剥蚀得满身沟壑的黄土山，从窗玻璃外面闪过去；闪过去了，迎面又扑来了，仍然是满身沟壑的黄土山。

山连着山……

初看，雄伟，纯朴，庄重；看得多了，就觉得单调，贫瘠，无彩少色，令人感到沉闷和厌倦。

朋友这时告诉我，就是这里——这川道，这山地，这莽莽的黄土高原，曾经是某某将军在陕甘宁边区时代屯垦和练兵的疆场。一时，眼前这连绵不断的黄土山似乎一下子改变了色彩，变得格外雄浑，肃穆而深沉，像黄河滚滚滔滔的波浪，奔腾着，起伏着，涌向远方……

“井架！”

就在那高高的几乎是光秃秃的黄土山顶上，矗立着一副钻取石油的井架，钢的身架，钢的筋骨，巍然耸立！

“井架！又一座！”

就在那泛着淡淡的绿色的黄土山的半山腰上，矗立着又一座井架，钢的身架，钢的筋骨，紧紧贴着黄土山的胸脯。

“井架！又……”

就在那被玉米、糜、谷覆盖着的郁郁葱葱的河川里，一副钢身铁骨的井架，拔地而起！

这就是长庆油田陇东高原会战区的一隅。

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古老、贫瘠而又艰涩的黄土高原啊！中华民族繁衍、生息的摇篮之地，哺育过中国共产党人、孕育过新中国的红色土地啊！就在这深厚的黄土层下，涌动着炽热的黑色的液浆……

山连着山。井架连着井架。不断地闪过去，又不断地向你扑来。我简直想伸出双臂，去拥抱这黄土山……

离开公路，从小河沟的青石上绕过去，就开始爬山，一条小路通往半山腰的井场。

弯弯的小路，不过二尺来宽。朝右，拐上一道塄坎；朝左，又拐上一道塄坎；弯来拐去，小路就像从天上垂下的一条链带儿，飘落在野草野花中。蓬蓬的野草，把枝枝叶叶扑到小路上来，紫红的马兰花，火红的山丹丹，雪白的野萝卜花，还有挂在藤蔓上的野豆花，拂动着行人的裤脚……

这二尺宽的小路，不是用推土机铲出来的，也不是用镢头、铁锹劈出来的，而是用脚踩出来的。是那些工作在半山腰里的井架下的钻井工人，在荒山草丛中踏踩出来的。

上山，从草丛中踩过去，上班。

下山，从草丛中踩过来，下班。

清晨，踩着露珠闪闪的草丛……

夜晚，踩着星光迷蒙的草丛……

朝霞。夕阳。雨雪。霜雾。寒冬。酷暑……接班交班、上山下山。路，就这样从草丛中踩踏出来了。

井位确立在那里，井架就竖立在那里，弯弯的小路接着就朝那里延伸。是塄坎，拐上去；见沟堑，翻过去；齐塄立坎，抠出台窝，爬上去！

想想吧！那些朝朝暮暮，日日夜夜，不避雨雪风霜而踩出这条小路的石油工人啊！

就在这叫作野狐沟的沟道里，几十年前，红军战士歼灭过马匪一个精锐骑兵团。黄土里，埋着年轻的红军战士的忠骨；青草上，溅着人民子弟兵的鲜血。现在，就在这经过血与火洗礼的黄土高原上，每天从早晨到夜晚，响着新中国石油工人欢快的脚步……

这弯弯曲曲的小路，是一首血与汗写成的诗！

推土机硬是在七十度的陡坡上推出一块平场，井架就贴着山的胸脯竖立起来，好一派钢铁的雄姿，钢铁的质朴，钢铁的硬骨！

机器轰隆，钻杆旋转，脚下的黄土在微微颤动。黄泥浆涌出来，夹裹着钻头在岩石上咬啃下来的碎渣薄片，钻杆向地下掘进。

握着刹把的，是一位留点小胡的卷发青年，安全帽下，一双全神贯注的眼睛，监视着钻杆的转动，那一身工作服，斑斑驳驳，沾满了油渍和泥污，很难辨认本来的颜色了。他双足叉开，站在井台上，一

手操着刹把，一手按着电钮，操纵着当今世界上也许并不算最先进的设备，义无反顾地向地球开钻、掘进！一派威风凛凛的神气！

那飞旋的钻杆，是他的手臂吗?

那隆隆的声响，是他奋进的呼号吗?

铁丝网筛上簸下的石屑，是他执着的意志的结晶吗?

那荧光镜下含油砂样的光点，是他青春的闪光吗?

这个作业班的七八个工人，全是一帮年轻人，最小的只有十七岁，顶大的没有超过三十。他们坐在活动板屋里，正在开午餐。送饭的也是一个小青年，从山下的河沟那边，把饭送上井台。他们随便坐在木箱上，蹲在地上，饭盒里盛着豆角炒猪肉，手里攥着三个馒头，吃着谝着。

“你，娶媳妇了没？”我逗身旁一个白脸大眼的小伙。

“丈母娘还给我养活着呢！”

于是大伙笑起来，十七岁的少年笑得竟然喷出了饭。

“你呢？也是丈母娘养活着吗？”我问一位红脸大个。

“我还不认识丈母娘呢！”他佯装叹口气，“姑娘们都不愿意跟咱钻山哟！”

这确实是他们苦恼的一件心事。我从向导的嘴里得知，这些年轻的石油工人，年年月月，从一个山头钻到另一个山头，从这条沟道转到那条沟道，这儿的条件，很难在恋爱的情书上把姑娘们吸引进来。

可是，我看他们虽然玩笑中夹杂着叹息，却绝不会因此而跳崖落井。他们乐哈哈地打诨，又精神抖擞地走上钻台。长年的野外工作，与高山大川为伍，和风雨雪霜结伴，处处洋溢着粗犷豪爽的气魄。

那位十七岁的少年，是刚刚告别了农家小院，走进这黄土大山中来的。他的父亲，从戈壁的沙漠，到白山黑水的草原，最后转战到大西北的黄土高原上来，是打了一辈子油井的“老石油”，带着光荣和自豪，和井架告别了。十七岁的儿子又走上井台，从头开始……

材料库的保管员，是一位中年人，胖胖的，红红的脸膛，光头，半截袖衫洗得十分洁净，这是井场上唯一不着工装的干净人。他很会生活，窄狭的料库里摆了一排料架，有条不紊地放着各种零件；顶头安着他的一块床板，活动的余地不过两平方米。他是从玉门转战到这里来的，四十七八岁，倒有三十多年工龄了。他吃在山沟，住在活动板房，春去秋来，一年又一年……

在发电机房工作的，是一位二十出头的姑娘，同样是一身油污的工作服，那发电机却擦拭得明光灿亮；她的两绺短发，用两根皮筋扎着，小辫上别着一朵紫红的马兰花……

这就是我们的石油工人，把黑色的浆液从地腹中解放出来的英雄的工人。当我们可以用石油而不仅仅依赖农民的猪肉和鸡蛋与外商做生意的时候，想想他们，不正是民族的脊梁吗?

这是一个怎么样的油田啊！

从车窗上望出去，展开这样一幅奇异的景象：在那高高的山顶上，远远近近，矗立着一个一个井架；在那河川的玉米地里，一字排开五六架采油树，高过正在冒长开花的玉米梢，悠然运转；在生产队

的饲养场后墙外，竟然有一架抽油机向正在歇息的牛马“点头”调情……

浅蓝色的载重汽车，驮着油罐，装着机械，往来穿梭，尘土飞扬，真像进行着一场紧迫的战争。飞扬的尘土中，大帮大帮的民工正在赶修公路，手扶拖拉机，手拉车，一齐上阵了，使人很容易想到战争年月支前的老乡！现在奔忙在这块英雄的土地上的，毕竟不是抱枪冲锋的战士了；安全帽代替了军帽，操在手中的也毕竟不是步枪，而是刹把了！然而这景象，这气氛，又何尝不是另一种战斗呢？当地估队从一个一个山头爆破过去，定下井位，钻井队紧跟着在一个一个山头上开钻、攻坚，直到采油树一架一架运转起来，这才是最后占领的标志。

油田会战指挥部，就设在英雄的385旅旅部的窑院里。现在在这里运筹谋划着的，也是另一种战役……

那些曾经向往胜利的曙光而长眠在黄土高原上的先烈，听到而今这一派轰隆机鸣闹山川的火红景象，看见那一架一架钻机旁生龙活虎的工人，该是怎样的喜悦啊！那些贪馋地追逐着“家庭现代化”的朋友，难道不想到一点什么吗?

山连着山。

过去的战争连接着今天的新的进军。在陕甘宁边区时代那样的困境里争得了革命胜利的中国共产党人，一定能够克服现存的困难而赢得这场新的长征的胜利！

1980年8月 庆阳—西安

面对这样一双眼睛

我不会绘画儿，却爱看画儿。对于某些尚不能看懂的画儿，不敢妄加评论。然而，我还是喜欢能看得懂的好画儿。画家创作时在题材、构思、手法上有选择的自由，看画的人也有选择作品的自由，谁也没有办法强迫谁，感情使然。

一幅题名《父亲》的油画从画册中掀开，一眼触及画中这位农民的眼睛，我的心猛地一沉，又猛地一跳，翻腾起来。我久久地端详着，眼睛就离不开了，心绪怎么也平静不下来，这是一张多么熟悉的面孔啊！

占据整个画面的是一位老年农民的头像，脸上纵横交错着的深的或浅的皱纹，从额头和脸颊粗大的毛孔里滚流扑落到眉毛上鼻尖上的大滴大滴的热汗，脱落得仅存一颗牙齿的半张着的嘴以及粗糙干裂的嘴唇，稀疏而又芜杂的胡须……都表明这位大自然的骄子在风霜雨雪和炎炎烈日下劳作了一生而麻木了。那叉开的端着水碗的手指，也无异于枯死的树枝，只是那一匝用青线缠扎着破口儿上的白布，证明这手掌还有挥镢舞锨的活力……

只有那双似乎笑着又似乎哭着、似乎喜悦又似乎哀愁、似乎麻木而又没有失之生的希望的眼睛，叫我的心里难以平静。

这是一双怎么样的眼睛啊！

在这样的脸色和眼光中，我看见了闰土，那饱经过“多子、饥荒、苛税、兵、匪、官、绅”之灾苦而变成了的一个“木偶人”。

在这样的脸色和眼光中，我看见了阿Q，耳朵里似乎响起“假洋鬼子”的哭丧棒落到他头上的声响，“啪！啪啪！”

在这样的脸色和眼光中，我看见了杨白劳，你是怎样从通往另一个世界的悬崖而终于止步，挣扎着，忍受着，最终盼到了黄世仁们的垮台?

在这样的脸色和眼光中，我看见了可爱的梁三老汉。父亲啊，在新的生活秩序展开的时候，你像梁三老汉那样忧虑、怀疑、颤抖过吗？可笑吧！肯定像梁三第一次穿上里面三新的棉袄时那样舒心地笑过！

在这样的脸色和眼光中，我看见了李顺大和陈奂生。父亲啊！你也像他俩一样，想盖一幢瓦屋吗？想戴一顶价值二元五角的绒毛帽子吗？你想在邻居和亲友面前显示显示：我住上瓦屋了！摘掉那条又笨又脏的白布帕子了！

在这样的脸色和眼光中，我看见了冯幺爸。父亲啊，冯幺爸已经从低矮的房檐下站到梨花屯的乡场上，理直气壮地说话了，你呢？腰挺起来了吗?

我在乡村里，又看见过多少双活生生的像父亲一样的脸色和眼光，使人难忘，催人自省，令人深思。

那个地处旱原坡上的小村庄的王队长，从油画《父亲》的画面上走出来，站在我的面前了。他们队里，除了种一把粮食，什么副业也没有。因为十伏九旱的自然条件，加之极左的政策的苦害，年年缺口粮。他当过好几任队长了，人人都钦服他是个好人，而终于没有使队里翻过身来，自己的生活也过得恓恓惶惶。我在某年春节后到这个村

子去的时候，得知他在前一天晚上丢失了两只羊的事，就去打问。他和他的女人坐在我当面，只是叹气，神情沮丧极了。他家已经断粮了，诚心指靠将这两只已经养肥的山羊卖掉，再到渭河北岸的丰裕地区买回度春荒的苞谷来，不料，贼却抢在前头，夜晚将两只羊一齐偷走了……

“咋办呀？一家六口……”女人哭了，“咱们再没一点指靠咧！”

“哭啥哩！怪只怪咱不小心！”王队长双手抱着头，坐在灶房里的木墩上。他不怨天，也不怨地，只是后悔昨晚应该把羊从后院牵回到自己睡着的厦房里来。他那一声无可奈何的沉重的叹息，久久留在我的耳朵里，难于消失。

当我设法从上级发下的春荒救济款中给他争取来有限的一点补助的时候，心里更加难受。他们夫妇眼里流露出来的感恩戴德的眼光，反使我的心里十分酸楚。凭他们强健的体魄，凭他们从不知疲倦的吃苦和勤劳的精神，眼里本来不应该有那样一种低微而感激的神光的。

父亲责备我的眼光又闪现在我的眼前。

他患了绝症，我领他到市里一家医院就诊之后，走进一家门面相当讲究的饭店。我是居心不惜有限的财力，想让他在尚能进食的有限时间里，尝一尝那些在旁人也许已经吃腻了的饭菜，尽一份孝心。他吃得很困难，但可以看出，他吃得很香。人的味觉器官的功能大同小异吧！我的心里暂时得到一点慰藉，以酸菜和苞谷为主而吞嚼了一生的父亲啊！

下了楼梯，还没出门，他却问：“花了多少钱？”

“七块。”我说，倒是想让他知道，在他于这个世界上生活了七十多年的漫长岁月里，到底也吃了一餐几块钱的饭食了。颇有一点陈奂生花五元钱住一宿旅社的情绪。

他的眼睁大了，满是责备的神色，掺和着后悔的情绪：“啊呀！花多少钱！你——”他抱怨着，给我教训，“看病花钱，那是没办法了；吃饭嘛，花这多钱……”

我不敢再看他的眼睛。惶惶然引着他走出了饭店的大门。站在街道上，我忽然想流泪，泪眼中似乎瞥见报纸上关于“吃面包还是吃馒头”的讨论文章，觉得那无论如何是离父亲他们太遥远的毫不相干的问题了……

……

面对这样一双眼睛吧！

面对这样的一双眼睛，政治家，从僵死的条文中解放出来，勇敢地改革，坚决地“变法”，剔除赘瘤，让社会主义制度焕发出活力。这样的眼睛曾经是满含热忱地盯着百万雄师踏进伪总统府的，应该让这双眼睛扫清忧郁，重新焕发出热忱和信赖……

面对这样一双眼睛，领导者，从干净明亮的办公室走出来，到乡村，到山野，到平原，到河川，走走，看看，听听，问问，看父亲们怎样劳动着，生活着，想着什么，希望什么，从而把政策——党的生命——掌握得稳一些，准一些，好一些。这样的眼睛，再也经不住瞎折腾了，该当让它去掉疑虑，闪出踏实和喜悦的光彩……

面对这样一双眼睛，朋友，停下拨拉“小算盘”的手指吧！这双眼睛瞧见你的手指的那种动作，该会多么失望啊！他们期待着，期待看见您重新抖擞起来的精神，义无反顾地奋进的英姿，热切的呼号……这是执政党的生死存亡的大事！

面对这样一双眼睛，艺术家，直面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现实，从“自我表现”的天堂走向切实的大地，看李顺大们已经盖起一幢又一幢瓦屋，陈奂生又因转业而产生了新的烦恼，他们期待着艺术家们去反映他们的心声……

……

面对着这样一双眼睛，我惭愧，我的笔下，写出这种眼神的内涵了吗？自以为了解他们，熟悉他们，其实多么浮皮潦草啊！

当我奔跑在灞河岸边的乡村，眼看着那本来已经很稠密的村子之间的距离在一天天接近，早几年去过的熟悉的村巷里，空庄空院几乎在一二年间全被崭新的房屋所充塞、挤实了！每逢约定的日子，交售肥猪的拥挤的场面，实在是令人感动的。面对着那一排排、一幢幢新房新厦，我常常想，如李顺大一样的父亲们，一旦他们多年来的夙愿得以实现，当他们这样一双眼睛欢笑起来的时候，该是多么动人心魄啊！

我不敢怠慢自己的脚步，去追逐父亲的足迹，去捕捉这眼睛里的神光……

1981年4月

可爱的乡村

农历八月下旬，时令刚过秋分，正是渭河平原上收获和播种的繁忙季节，我住在礼泉县的袁家大队里。

乡村的夜晚是这样静，站在村外的田间土路上，听不见车鸣人嘈声，秋虫嘶嘶嘶的叫声已经变成有气无力的挣扎。没有月亮，稀稀朗朗的星星似乎很大，看不清天的颜色。空气是如此的清新、湿润，浓重的夜气里，融合着翻耕过的新鲜泥土的气息、秋庄稼成熟的果实和枯干的叶秆儿的气味。

从袁家村巷里，隐隐传来电视机的音乐节奏。这儿的农民在田野上辛勤劳累了一天，喝毕汤，抱一壶酽茶，靠在软和的沙发上，一家人看电视节目……

在这儿的农民的脸上，无论男人或女人，青年或壮年，以至后脑勺上披着从民国初年传留下来的长发的老人脸上，现在看不见李顺大的忧伤的脸色了，也没有像陈奂生那样为一顶二元五角的绒毛帽子费那么多的心思。因为缺粮，少穿，看不起病，交不出学费，买不起油盐，即贫穷所引起的一切艰难造成《父亲》眼神里的那种灰暗悲凉的色彩，看不到了！不管肤色是黑是白，无论眼睛是大是小，那脸上和眼里所显出的神色，是欢悦而又踏实的。剧作家老戴在这儿体验生活，手腕上的电子手表被一伙年轻人发现了。他们看见这新鲜玩意，以为很贵，问过价钱，全笑了："哈呀！我当值牛价马价，不过三四十块钱，给我捎一块回来。"于是，就有十几个姑娘小伙，约请老戴回西安时给他们捎带回来。相对之下，陈奂生是显得太有点抠抠掐掐了。

我自然想到郭裕录，一个从贫穷、灾难和混乱中奋然崛起的英雄。他以他宽阔的胸怀，把分裂成三宗五派的男男女女团结成一股力量，扎扎实实在这块土地上与贫穷作战；他以他一个青年农民所能理解的程度，最大可能地抵制了当年弥漫在这块土地上的歪风。十年生聚，十年奋斗，终于实现了他所提出的“农民也要住洋楼，穿皮鞋，要和工人一般样”的目标。而仅仅在十年以前，当中国的天空从早至晚喧嚣着“文革”伟大成果的时候，生活在这个小小的村庄里的居民，住在低湿的地窑里，日夜熬煎着下锅的玉米糁子。经过十五年集体化的生产队里，槽头拴着七头牛，其中五头染上了老鼠疮，脖子流脓，天天清早要靠饲养员和社员用木杠抬起来，才能吃草……

于是，我又一次想到一个人的作用，或者说一个领袖人物的作用。从成立农业合作社到一九七〇年郭裕录当队长的前十四五年间，袁家换过三十五任队长了，最多一年换过七任。除过两个生理有缺陷的人之外，成年男人们，人人试过手了，结果是谁也无法挽救日益破败贫穷的袁家。以郭裕录为首的第三十六届队委会，却征服了愈来愈贫困的难于翻越的大山。

郭裕录不是神。在关中平原的任何一个乡村里，都有许多这样的小伙子生活着。他长得瘦瘦儿的，中等个头，长条脸，眼睛也不怎么大，额头并不那么饱满，中国的电影导演绝不会一顾的普通农民。据说他在从工厂刚回来（合同工）那年，穷极无聊，买了一对鹁鸽，和同伴儿玩。

郭裕录是人，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共产党人。他把自家的麦子背给一位只靠苞谷糁子灌肚的老人。在山洪铺天盖地而来的危难时刻，他救社员，救牲畜，最后去照看自己的媳妇和孩子。井下发生险情，他下去排除，被塌方砸得休克。从他嘴里宣布出来的管理制度和奖惩条

例，总是首先从他的亲属和门族的成员身上得到实施和体现。当袁家有了名气，参观访问者日渐涌集的时候，他清醒地退出那种场合，让支委们轮流做接待参观访问者的工作。袁家队里的工作，也由队委会的五名主要负责人轮流执政，一人一年，负责全盘工作。除了本年度主持工作的那位干部有补贴工分，其余干部和社员一样，全凭劳动手册上记下的工分计酬……

他在袁家大队是富于权威的。在他刚上任的那一年，拥护者甚寡，绝大多数人像对待历届干部上台一样，冷漠地瞧着他：不过是因为实在没有人愿意当队长了，而人民公社的生产队又不能没有一个队长，谁上来都是一㞗样！生活显然不是以热情和真诚的态度欢迎他，他却以真诚和热情的态度拥抱生活。一年，两年，八年，十年，袁家的男男女女，终于看见了一颗赤诚的心，自自然然为之倾倒了。

我在袁家的村口，听他给来访参观的几十位各级脱产干部讲体会。他站在那里，操着渭北淳厚的口音，讲：“有权还要有威。有权没威，啥也不顶。啥是威？威就是威信，是群众对你信任，放心。只有实实在在为群众办事，为社员谋利益，群众才信任你。你要是拿上权，只给自己办事、谋利，群众拥护你做啥？”我在一旁听着，他的简洁明快而又结结实实的这一番话。不禁想到：我们党从她创立的那时候起，有了六十年的历史，党章经过一次又一次修改，但有一条是统一始终、坚定不渝的，这就是要求她的儿女一心一意为人民服务。因为这一点，人民才拥护共产党。郭裕录这个党的基层领导者，以本身的模范行为，体现着这一原则，赢得了人民的信任与敬服。

夜愈深，愈静；站得久了，四野渐渐亮了。蒙蒙星光里，可以眺见村北九嵕山高高矮矮的峰峦的轮廓。最高的那架山峰里，躺着贞观盛世的皇帝唐太宗。在主峰周围的群峰，一直到沿慢坡而下纵横几十

华里的山地和平原上，几百个墓冢所隆起的大大小小的土堆，依稀可见，他们是为李世民实施文治武功的主要谋士和将军。他们在中国历史上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业绩。

在这肥沃的黄土地上，历朝百代，出过许多杰出的人物，素称地灵人杰。在袁家大队开创出这样一个崭新局面的共产党员郭裕录，算不算一个人物呢?

在他手里，从袁家这块黄土地上消灭了贫穷，建立起一个富足康乐的乐园，实在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几千年封建经济所窒息下的中国农村农民的贫穷状况，无须说它了；合作化以后的广阔的中国农村，经过二三十年，有多少干部和能人没有做到的事，郭裕录在袁家这块土地上做到了。他凭什么？凭一股志气。在他上任以后，召集了袁家男女青年，直截了当地把他的心里话撂出来：“咱们祖先把咱生养在黄土地上，城市好，去不成；大学好，进不去。农民当定了。我不想再当这样可怜巴巴的缺吃少穿的农民。咱们农民要住洋楼，要穿皮鞋。把咱农村办成叫城里人也眼红的乡村。只有一个字：干！”这一夜，袁家青年突击队组成了。后来的整个艰苦创业过程中，这一支青年突击队立下了汗马功劳……

我刚刚读过一厚扎写给袁家大队党支部、团支部以及郭裕录本人的信。看那些横式的或竖式的一封封信皮上所署的地址有的来自东北，有的发自西北，有贫瘠的北方山区，也有富饶的江南水乡。读着那一页页、一行行热情洋溢、仰慕欣羡的文字，热泪模糊了我的视线，令人感动，发人深思。这些信，大都出于青年男女的手笔。他们在广播上听到或在《人民日报》上看到了关于袁家大队的美好生活的报道，不安于他们那个村子里贫穷的物质生活和空乏的精神生活，要

求到袁家来落户，有的女青年甚至寄来了照片。有的是国营单位的职工，也愿意到袁家来当农民。这是多么令人深思的事！

郭裕录是黄土母亲的儿子，在他的名字通过报纸、广播、电视，逐渐介绍给更多的人的时候，他没有被沸沸扬扬的誉词所醉倒。起码在我认识他的现在，是这样。

对于前来找他写文章、拍照片、摄电视的人，他并不表示过分的亲热，你不找他，他决不找你。除非万不得已，他是不接待参观者的。他冲出了那种可怕的包围。许多对人民做过一些好事的模范人物，在这种包围中隔断了和人民的联系，迅即销声匿迹。更有甚者，以至胡吹冒撂，先前的赞誉变成了后来的笑柄，而终结归于令人叹惋的悲剧。

他冲出了那种包围，和他的社员们在田野上忙碌。我看见他和社员一样五点起来，突击给收获过的玉米地里追压土肥。我看见他抱着钉耙，在旋耕得松软的土地上刨畦梁；也看见他当众批评两个没有把畦梁刨好的青年，那言词说不上严厉，也不是敷衍潦草，叫你听了脸红，却又乐于接受；我看见他骑着车子，为队里的事务出门交涉。我旁听过他召开的干部会，是关于秋种秋播的进度和质量的阶段安排，组织得十分严密。

裕录告诉我，周围的村庄大都实行了种种形式的包干办法，好多队土地按人按劳力下户了。他的社员怎么想呢？秋收前，借着阴雨天，停产开了三天社员会。为了摸清社员的思想状况，他提出大包干的主张。整整三天里，没一个人愿意分。社员们私下推举出两位老者，反来给郭裕录做工作。两老汉从清末说到民国，从民国说到解放，又从解放说到当今……郭裕录被深深地感动了。他搞了一次成功

的民意测验，心底更踏实，信心更足了。在社员对新的农村经济政策的讨论学习的基础上，他们进一步完善和严密了劳动组织形式和管理办法。我在这儿看到的社员秋收秋播的劳动场面，那种自觉的劳动态度，大汗淋漓的脸膛，是十分动人的。

按照队委会的规划，今年冬天，大队浴池将开炉烧水，袁家的男女社员在田野上劳动出汗之后，可以舒舒服服洗一洗热水澡了。稍后些时，暖气也将通进社员的每一间住室。再远一点呢？逐步实现喷灌化，进一步提高机械化生产的水平，把社员的劳动强度一步一步减轻下来……

电视机的音乐旋律从街巷里消失了，夜愈显得静了，吊着花花绿绿的窗帘后的灯光，相继熄灭了。我看见的是一个显示着美好希望和光明前景的多么可爱的乡村……

崛起

由于人为的或自然的原因，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原因，造成了中国农村进步的缓慢和农民的普遍贫穷。

他长在红旗下，却经历了饥馑、动乱和疯狂的年代。在他从孩子长成大人，又成为孩子的父亲的整个生活史中，贫穷和困顿像影子一样追随着他，命运之神一股劲把他推向绝望的境地。

在混乱、贫穷与绝望中，他豁出来了，抱着背水一战的决心，与命运挑战，奋然崛起了。

十年奋斗，他和他的乡亲们，把袁家村建设成为一个社会主义的乐园，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他叫郭裕录。

上任

人们以冷漠甚至鄙视的眼光对待他，而他却以热情和忠诚去拥抱生活。

郭裕录睡在炕上，翻来倒去，睡不着，有一件事，像一根横木卡在脑子里，怎么睡得着啊。

这是一九七〇年秋末冬初。驻在袁家大队的公社领导干部老邓，经过二十多天艰苦的工作，选干部的事，却毫无结果。现在把眼睛瞅

到郭裕录身上了。他已经找他谈了几次话。郭裕录推卸着。他不放手。郭裕录心里紧张了——

草棚里喂着七头牛，五头染上了老鼠疮，脖子上流脓淌血，天天早晨要靠人用木杠抬起来才能吃草，更谈不上使役了。一架老式木轮车，两架新式喷雾器，队办公室设在村边那座椽腐墙裂的小庙里。从一九五六年实行合作化，经过十五年发展，到了一九七〇年的袁家生产大队，全部家当大约价值五千多元，而在信用社的贷款已经摞下一万有余了。

人事关系更令人沮丧。郭、袁、王三大主姓老户，经过“四清”和“文革”，派性像催化剂，使宗族斗争更趋尖锐、复杂和表面化。三十七户人家中，竟有二十七户互不招嘴，外村人给袁家一个雅号：小台湾……

你郭裕录有多大力气，能背起这个沉重的包袱?

已经有三十五任队长轮番上台试过了，袁家村队除了两个生理有缺陷的人以外，几乎所有成年男人都当过干部；有众人推举上台的，有造反夺权上台的，也有轮流无奈上台的；不管本事大小，水平高低，品质如何，反正队里是一年比一年更穷了……

你郭裕录有多大能耐，能扭转袁家的局面?

他翻来覆去，下不了决心，脑子里火烧火燎，出闷汗，冒虚水。

试着干一干又怎么样呢？反正生产队已经烂到不能再烂的地步了。他自己家里，借欠亲友的粮食已经超过三千斤了，像大哥那样精明严谨的家长，也无法使这个二十口人的大家庭摆脱困境，往下怎么

过呢？生产队真的就那么难搞吗？不能使袁家比现在的情况稍好一点吗？他的一个同学在上古村当支书，人家粮食分得多，他亲眼看见人家每人分得二斤多清油；可怜袁家的社员，一人一年才分二两油，够泼辣子不？要是把袁家搞得起码像上古那样的局面，行不行呢？

天明了。他一夜未眠，穿好衣服，揉着困倦发涩的眼睛，找到老邓的住所。

“邓主任，我怕干不了！想了一夜，不敢……”

“哈呀！”邓主任倒显得轻松，不在乎的样子，尽管住到袁家一月多了，选不出干部，他在表面上却不见焦急。他就是这号乐哈哈的脾气，说：“还没经过社员选举哩。人家社员不选你，你想干也干不成。”言下之意，倒是郭裕录过虑了。

他和邓主任说妥，让社员选举。

选举会倒是充分体现出民主精神，一下子提出来三十七名候选人，可见派系斗争的复杂了。表决的结果，郭裕录得了五票，太令人寒心了。

可是，郭裕录仍然当选了，在三十七名候选人当中，五票是第二名，占绝对优势，选举目标的分散，无法要求当选者的票数过半，只好论票的多少来决定了。

当场，郭裕录的父亲沉不住气了：“你们选他，快斫枣棍子去！”枣棍子，那是讨饭打狗的玩意儿。

没有人鼓掌。他能看出来，没人信赖他。中学毕业以后，他在城里干了几年合同工，一九六九年回到袁家的时候，心灰意冷，穷极无

聊，买了一对鸽鹁，又养着一只训练有素的狼犬，走在路上，狼犬开路，鸽哨儿奏乐，身前身后厮拥着一串串穷哥们。这是他回乡一年来留给众人的不大美气的形象。玩鸽子养狗，那可不是正经庄稼人感兴趣的营生。

“试一试吧！”郭裕录上任了，心里不大服气。这是烟霞人民公社袁家大队第三十六任队长。

像对待历任队长上台一样，人们以冷漠甚至鄙视的眼光对待他；他却以热情和忠诚去拥抱生活。出手一拳，就在死气沉沉的袁家村里，砸出了声响，惊得人们瞠目结舌，不能轻视这位角色了。

正气

在歪风邪气盛行的袁家村里，他带来一派正气。一年，二年，八年，十年，社员看见了一颗正直的心，自然朝之倾倒了。

买肥料，没有钱。买农药，没有钱。以至买二斤煤油，也没有钱，饲养员只好在脚地烧一堆麦草，借着火光给牲口拌草添料……

郭裕录两手空空，干急没办法。他查了会计账，账上记着社员和干部在队里的欠款，竟有三四千元，其中有透支款，也有历任干部借着权力借用挪用的。队里难到了没有煤油照明的程度，他们却占用集体的钱财，买自行车、缝纫机，盖房子，想也不想归还队里的欠款，以至那些应该分钱的社员，多年不能兑现。

“收欠款。时限十天。”郭裕录在队委会统一看法之后，提出要求。对于欠款者的不同情况予以区分，对于无理长期占用集体资金

者，提出强硬措施："凡是拒不交还欠款者，要用自行车、缝纫机折偿，以至揭瓦拆房。"

社员同样以冷漠的态度对待这个决定。没有人相信。不可能做到。十天过去了，果然是一分钱也没见谁交来。

他卖掉自己的自行车，把母亲卖鸡蛋的钱要来了，又到老同学家去借，首先把自己家里所欠的一百七十元钱交齐了。

他又去动员门中哥哥郭西录，带头交钱，支持他工作。西录半是被说服，半是被感动，交了！

尽管他带了头，却没有人响应。他明白，社员的眼睛在瞅着一个人：他的叔伯哥哥郭福录。此人在他当干部的时光，连欠带借，摞下六百多元了；虽然是最大欠债户，却有自行车、缝纫机，而且新盖了三间厢房。他稳坐钓鱼台，把三十六届队委会的决定，根本不当一回事。社员谁交呢?

裕录多次到他家，谈心，讲道理，说好话，他不交；后来竟然烦了，一走了之。

郭裕录被逼得下不了台，端来梯子，上了房，揭瓦了！

嫂嫂和哥哥一齐跑出来，看看裕录真的豁上了，也就软下来，随即把欠款交来了。

真灵啊！七天没过，收回来三千七百元欠款。冻结的冰河涌起波浪来了。郭裕录手里有了钱，买回一辆胶轮大车，两匹骡马，三头牛犊，发展生产呀！

袁家的社员普遍震惊了。是嘛，多年来，大伙眼巴巴看着这个上台，那个下台，都是给自己和他们那个宗族的人捞上一把。大伙看惯了这样的现象，没想到郭裕录一上台，先给集体置家当，端端正正一斧头，砍的是他叔伯哥哥！

又一斧，砍到亲生老子头上了——

春三月，麦子正浇水。郭裕录和社员正在地里引水浇灌，发觉渠里的水越来越小了。估计到可能是什么地方渠沿冲垮跑水，他提着锨巡渠查看。

在自留地边，水渠被挑开一道口子，哗哗哗的流水淌进自家自留地里，父亲正捉锨引水。

郭裕录一句话也没说，挖起土块，把水口子堵严了。老人自知理亏，噘了噘嘴，没吭声。

他刚一走开，父亲又取来脸盆儿，从水渠里舀水泼灌。他生气了，父亲给队里经管菜园，上工时间，给自己干活，而且社员都没有浇自留地呢，影响太糟了。他返身走过去，站在老人当面：“你把被子背回去，队上不要你看管菜园咧！”

这是队长的命令！老人摔了盆子，气呼呼从菜园草庵里夹起铺盖卷儿，回家去了。多少人用眼睛看着，又一次吃惊了。

再一斧头，砍到亲哥天录身上——

这一天，天录跑来给队长弟弟反映，说社员王友法平整的那一块地不合质量要求。裕录听了，问过几个社员，都说友法包干平整的那块地，符合“去生保熟”的质量要求，确实把力出了。原来是天录的孩

子放学回来干了一晌活儿，天录要记工员王友法给他记上全天工分，友法拒绝了。他想借用弟弟手中的权力，报复王友法。

郭裕录明白了。社员会上，他不仅表扬王友法平整土地质量好，而且赞扬他坚持原则、不徇私情的好作风。

郭天录好羞恼啊！社员会结束后，干部们留下来，在饲养室继续开会。天录不走，仍然一口咬定王友法不放，破口大骂弟弟六亲不认，吃里扒外。郭裕录没有退让，兄弟二人几乎打起来。

这一斧，把维持了几十年的二十口人的大家庭砍散了。父亲和大哥，再也不能容忍他了，提出了分家，态度十分坚决，连话也不和他说了。

分家以后，大哥天录置气不和他说话，长达三年，当一九七七年袁家人住上第一幢两层楼房劳值升到一块八的时候，天录折服了，当着母亲的面，与弟弟和解了。

和解了，天录的劳动积极性高了，关心集体了，想不到，却又挨了弟弟一斧——

这是一九八一年春天，袁家队里已经有了两部大卡车。天录的女儿坐月满月了，想来娘家。天录叫上弟弟友录，开上八吨汽车，到东周村把女儿接回袁家。

郭裕录知道了这件事，在二十多人的一揽子干部会上，叫来友录，好一顿批评。天录听说了，赶到会场："那是我叫友录去的。"

"你有啥权力支配队里的汽车？"

“我看没啥！”天录说，“让外村人看看，袁家有汽车，富裕，是干部领导得好，给干部争光扬名哩！”

“社员的女儿坐了月子，接不接？袁家的媳妇回娘家，送不送？”郭裕录问，“八吨汽车拉一个人，你给干部争的啥光，扬的啥名？”

天录没话说了。

二哥买了队里一根木头，会计正给他在街道里算账。裕录撞见了，随便问：“多少钱？”会计说：“四十来块。”他不在意地走过去了。回到家里一想，不对呀！那么粗一根木头，怎么才算四十来块钱呢？他把会计叫到屋里来：

“你再算算。”

会计在纸上列起乘法草式，算完以后，大吃一惊：“啊呀！七十块，我把账算错了。”

他把二哥叫来：“会计算错了账，你也装傻！”

二哥辩白说：“我不知道。”

“笨眼也估得出来，木材价格谁不知道！”他抓住不放，把二哥心底的隐私挖出来，“我看你是想混哩。”

二哥红了脸，真是一丝情面也不留啊……

亲弟友录，开了一部柴油汽车，到了咸阳，发觉没有柴油了，悄悄加进了汽油，这是违犯汽车技术规定的事。采购员郭西录发现了，

劝说不下，反映给郭裕录。郭裕录眼一睁，按照奖罚制度，宣布罚款一百元，奖励给坚持原则的采购员。

在歪风邪气盛行了多年的袁家队里，郭裕录上台以后，带来了一派正气。一正压百邪。他在袁家队里是富于权威的人物，他能一声喝到底。他的权威是靠上述这些大事小节树立起来的。一年，二年，八年，十年，社员看见了一颗公正的心，自然朝之倾倒了。

胸怀

多年来宗派间的钩心斗角，使许多有才干的人空耗了气力。他接受了这个教训，让自己的心里能容得下所有的乡亲。

和郭裕录同时当选的有袁生瑞。他历任干部，虽是党员，却没有摆脱户族观念，代表袁姓，与郭、王两姓鼎立。也许出于宗族的圈圈吧，也许根本不屑于给郭裕录拉下手吧，他拒不就任副队长的职位。

这是很令人难堪的事。人家不与你合套，不跟你搭班，自己想想去吧！他的哥哥天录又在后边不断咕叨，怎能和那样的人一起干呢？那是仇人！

郭裕录心里有自己的主意。在街巷里遇见生瑞，他老远就笑着打招呼。袁生瑞背着手，斜一眼，鼻子里哼一声，倒加快了脚步。

郭裕录又找上门去，和生瑞拉家常，谈心，请他出来工作；诚诚恳恳说，自个儿年轻，生产经验不足，需要老农指导；再说，自己是非党，希望班子里有党员，党起领导作用。

袁生瑞却不说话，只管咂着烟袋儿，皱着眉头，把脸扭到一边。连着三次，都是这样令人好进而难退的场面。

他不灰心，又去找生瑞的弟弟生义。生瑞和生义兄弟俩，是袁姓里的头面人物。他们屁股后头，有几十双眼睛哩。不把这两个人团结到身边，他这个队长，一切想法都是难于付诸实施的。

带着固执的偏见，狭隘的宗族情绪，袁生义和他哥哥一样，连正眼瞧他一眼也不屑。

裕录心里很不是滋味儿，人皆有自尊，有面皮啊！他无意中一瞥，看见生义的老母亲坐在炕上，端碗喝着稀溜溜的玉米糁糁。他站起来，走到跟前："给老人光喝这呀？"袁生义瞅他一眼，没有回答，谁有麦子舍不得给老娘吃呢?

郭裕录回家去了，背起二斗麦子，端直扛到袁生义家里来。袁生义眼睛瞪起来了："这叫做啥？"

"磨了给老人吃。"裕录说。

"你家里也要吃哩！"袁生义再也不能执拗了。

"咱年轻人好办，有玉米、红苕，行咧！"

"啊呀！裕录……"袁生义的声音好动人。他的偏执、狭隘和猜疑所筑成的感情上的顽固的堤坝，垮塌了，温暖的春水在心头漫流。

袁生瑞也被小伙子诚恳的行为、博大的胸怀感动了。他找到裕录："我……怕给你还不起呢！"

裕录也动了感情："我当队长，要是还弄得社员不够吃，哪里还有脸要你还粮呢！"

袁生瑞被小伙子的决心震动了，相信这娃是实干哩！相信他在社员会上许下的决心不是胡吹冒撂：三年，要是还弄得大家不够吃，我自动下台。我干三年，三年看深浅……

诚能感动天地。袁生瑞出幕了，高高兴兴地挑起副队长的担子。郭裕录很受鼓舞。眼睛又瞅到宋伯杰身上，这是一位同辈异姓兄弟，有本事，有体力，见过世面。他很想把此人拉进他的内阁，负责工副业生产，这是一个很合适的人选。因为"文革"中的矛盾和纠葛，他和大哥天录结下了冤仇，正百倍警惕地注视着刚刚上台的裕录，将怎样报复他。这毫不奇怪，因为袁家历任干部上台，总是带着强烈的宗派色彩，给自己人谋利，出气，整另外一派人；下一年换马，整人者又被人整……

郭裕录几次找伯杰谈心，请他进"阁"，这个青年农民拒不上"套"。

他不被人理解，也就算了，日久见人心吧。

一九七三年一场意想不到的洪水，把袁家集体和社员的财产掠劫一空，却也冲开了宋伯杰心头的闸门。

洪水是深夜里突然发生的，郭裕录从古庙里（队办公室）冲出来的时候，大雨瓢泼，山洪在慢坡地上卷起半人高的水浪，他听见妻子在呼喊他的名字。他喊："啥都不要了，把树抱紧！"他奔到宋伯杰家屋场去了，宋伯杰的女人和俩孩子被洪水围困着。中间隔一条小沟，洪水顺沟扑下来，人是连脚也站不住的。郭裕录取来绳，扔过去，让

那女人捆在树上，这一头让逃出来的社员和干部拉住，他扶着绳蹚过去了，往返三次，把孩子一个一个背过来，又把宋伯杰的女人保驾扶起来，送到安全的高地上。当宋伯杰天明从外边回来，听到妻子叙述的时候，这个袁家大队的“造反派”，前大队革委会主任，悔愧交集的心情是难以说清的。他主动向郭裕录请战了。郭裕录把他安排在副业组，具体负责石灰窑场。这样一个在两年多的时间里一直戒备着郭裕录的人，一进入新的岗位，一天担水一百二十担，简直是在拼命了！他在后来袁家大队的副业生产中，有头脑，办法稠，立下了汗马功劳。

郭裕录是个农民的儿子。他的生活道路不同于终年累月在猪圈羊棚与锅台火炕之间抓摸的农民。他在小学和初中读书时，就寄宿学校。初中毕业后，虽然结了婚，生活又把他推到更广阔的天地。他随着一家建筑公司，先后走过西安、咸阳、宝鸡，整整五年里，吃的集体灶，睡的大铺，直到一九六九年初回到袁家的时候，已经二十五岁了。从少年到成年，他过的是群体生活，不习惯独居。刚回到家乡，空寂的精神生活和匮乏的物质生活，简直难以忍受。他耍狗玩鸽子，把许多同年龄的穷哥苦弟吸引在身边，解除精神寂寞。他思想开阔，不像一般人那样自私和狭隘，青年们喜欢和他在一起。

他从困境中站起来，企图改变自己的命运。他从一些先进人物身上受到过不少启发，更多的却是从袁家的现实中接受教训。袁家许多人并不比他文化水平低，也不比他少心眼、差本事，只是他们陷入了宗族和派别的斗争，把精神和力量消磨在那种毫无意义的纠葛之中了。袁家越来越糟的事实，证明代表任何一派一族的利益是难于成事的。郭裕录清醒地看到这一点，再不能蹈此覆辙了。

他显示出创业者宽阔的襟怀，这大约是一切成大事业者的必备的素质。

队里有一位高中毕业生，文化高，平时不大瞧得起农业中学毕业生郭裕录。他不在乎，在选择民办教师的时候，照样推举出这位高中生来。

当上了民办教师，他回过头来就朝郭裕录要高工分。裕录劝说：“给你记中等偏上工分，是干部会定的。你不能攀饲养员的最高工分，劳动强度不同。”

高中毕业生理直气壮，傲慢地说：“牛出的力大，人给它吃的是草；鸡不出力，人给喂的是粮食！”

工分该不该提加，是一回事，而这样的话确是说得有点欺人过甚了，郭裕录批评了他。他不服，而且丝毫不隐瞒自己的观点，在那些没有文化的农民中间，满不在乎地显示着自己的优越性，早已引起社员的厌恶了。

他不以为然。因为高工分没有得到，讥诮郭裕录的话更多了。有文化的人说起二话来，意味更酸更辣。

一件不光彩的失误，使高傲的高中生落在郭裕录的手中。

他偷了西红柿，被夜晚看守菜园的两个社员捉住了，因为菜园几次丢失，两位看管菜园的社员刚刚挨过郭裕录的批评，现在抓住了“贼”，正好是俩人立功表现的好机会。

他们二话不说，将民办教师拉到郭裕录家门口，叫醒了睡梦中的郭裕录。

郭裕录听到急促的敲门声，神秘的说话口气，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出得门来，听了菜园看守者得意的述说，明白了。民办教师低头耷脑，羞愧得抬不起头来，等待着发落。

“哈呀！我当啥事。”郭裕录笑了，“那是我派他去摘西红柿的，试验你俩夜晚是不是睡大觉，负不负责任！”

“噢！这——”两位社员大失所望，半信半疑，悻悻地走了。

民办教师猛地扬起头，睁着吃惊的眼睛，夜色遮盖着这一复杂的表情变化。

过了几天，民办教师的父亲，死拖硬拉，把郭裕录拉到家里。裕录进门一瞅，桌上摆着菜和酒。郭裕录给他的儿子遮掩了一场丢人伤脸的丑闻，感激是出自真诚的内心。

“把菜端走。”郭裕录站着，“端走咱坐下说话。”

媳妇把菜端走了，郭裕录坐下来。

父子二人有多少感激话要说呀。

“你们有文化的人，爱面子；你是在人前说话的人，丢不起人呀！吵吵出去，你日后咋样管学生？”郭裕录说，“这样的事，不好。”

保护了一个人，也教育了一个人。这位民办教师从此变成另一个人了，工分问题自不必说，常常利用工余和假期，主动帮助队里搞工作。一个冷眼旁观的人，也投身到郭裕录改变袁家面貌的行列中来。他成了优秀教师，又转成公办教师了，成为教育阵线上一位踏踏实实的工作者。

“不要整人！”这是郭裕录经常告诫他的领导班子成员的一句话，“批评人，罚人，是因为他伤害了公众的事，目的是教育他。表扬人，奖励人，是因为他给公众的事业立了功。奖罚不是拉拢人和打击人的手段，谁要这样，谁就站不住脚！”

志气

靠着昂扬的志气，实干家和鼓动家的气概，他征服了人心，从贫穷困苦和灾难盖顶的困境里，走到一个光明的天地。

凡是在有生之年里成就过一番事业者，大约没有什么人是轻而易举地获得成功的。在摘取数学皇冠上那颗璀璨的明珠的攻坚中，陈景润几乎变得不知人情世故了。在夺得世界女排冠军的艰难的历程中，中国姑娘们经过了怎样刻苦的磨炼啊！同样，郭裕录在带领乡亲们把一块贫瘠苦焦的土地变成一个社会主义乐园的进军中，可以说是惊天地而泣鬼神的。

从一九七一年到一九七六年的六年间，他们集中搞了平整土地，兴修水利，发展工副业生产几个硬仗。把分割成一百零六块的五百零三亩地改造成四百三十亩渠井双保险的平地，使粮食产量由二百五十斤提高到一千六百斤，稳定在一千四百斤的水准上。年总收入由一万五千元上升到二十万元，副业收入超过了农业收入。

全面叙述这个艰苦创业的历程是本文有限的篇幅所不能允许的。而贯穿在这场旷日持久的艰苦劳动中的那一股志气，是感人心魄的。

有这样一件事，至今尚留在袁家社员的记忆里。有一年，袁家社员和邻近一个村庄的社员在连畔地里劳动。休息时，袁家一个社员掏

出一块红苕来充饥；邻村有个社员从口袋里掏出一块酥软焦黄的麦面锅盔，举在空中，烧臊说："啊呀，你们袁家人光吃红苕哇？看看咱们吃的啥……"

所有在场的袁家社员，感觉到了羞辱。穷，在没有地主压迫的当今，不仅不能引人同情，反是被人瞧不起啊！郭裕录也在场，脸上像被人浇了一盆尿，激起他身上的血液加快了流速。他说不出一句话，气和力会合到一起，鼓到胳膊上来了，那么粗的锨把，咔嚓一声挑断了……

在旱地里打第一眼大口井，进展到五丈深的时候，井底遇到石块，水泥瓮壁不能顺利下沉而倾斜了。一旦发生折裂，井下工作的人是难以设想后果的。

郭裕录脱了衣服，下去了，危险的时刻，必须和处于危险中的乡亲站在一起。

郭裕录抡起铁锤，捶击钢钎，击碎石块，让瓮壁自然平稳下沉。突然之间，最顶上的井壁塌方了，破碎的石块和土块砸下去。

宋伯杰掌管卷扬机，眼尖手快，把井下的人救上来的时候，一个个全负了伤。郭裕录满脸血污，躺在地上，人事不省。失败的晦气立时覆盖了袁家村的每一户农舍。

昏昏迷迷躺了两天两夜，第三天，郭裕录醒来了，又到井场上去了。空寂的井场上，是一片残破不堪的景象。宋伯杰跟着屁股也来了。

“这井，算咧！”伯杰安慰他，“第二年，宝鸡峡的水就引来了，要费这神了。”

“那水，要钱呢，还要各队轮流排队浇灌。”郭裕录说，“有渠，有井，庄稼才保险不受旱。”

他不死心。过了两天，他得知，一场塌方事故把人都吓木了。他的哥哥天录，在严重的事故之后，话多了，是最活跃的促退派。打井队的队员，有的灰心丧气，有的被父母妻子拖住胳膊，没人上井场来了。

郭裕录叫上他的小弟友录，俩人来到井场。他的头上，缠着纱布，一只胳膊，用绷带吊着。

“你下去，万一有事，哥在上头拉你。”裕录把一条皮绳拴在弟弟腰里，给他壮胆，“放心，现在没危险了。”

友录抓着绳，溜下五丈深的井底，清理现场。

郭裕录蹲在井口，咬着牙，监视着井壁的些微变化，一撮溜土，一声撞响，都使他的心猛然一跳，受伤的头反感觉不到疼了，汗水不停地滚落下来。

宋伯杰也跑来了，一把从郭裕录手里夺过皮绳，大声喊：“你不想活了吗？”

郭裕录也激动了：“我想活得更好！”

宋伯杰哑了口，热泪夺眶而出。他把郭裕录推到一边，动手干了起来。

那些被塌方吓住了的打井组员，挣脱了父母和妻子拉拉扯扯的手，纷纷奔到工地上来了。

这样，袁家终于有了一口机井。

现在，村前村后的田野上，有五口机井，在旱地里喷金吐银；自来水通到每一户社员的后花园里，吃用方便极了。

富兰克林在把自然雷电从天空引到人间的时候，是以他的生命作为这一伟大实验成功的代价的。

郭裕录是一位实干家。他明白一条基本道理，砂质坡地跑水跑肥，需要改造；威胁当地庄稼生长的主要灾害是干旱，要靠人出力气把水从地下引出来，才能获得收成。六年里，土地被改造了，水引来了，粮食和棉花连年稳产高产。社员终年四季全部吃麦子也吃不完，给国家一年卖几十万斤。而六年以前，他们年年吃返销粮，买黑市粮。

郭裕录又是一位鼓动家。他善于用最结实的话去说清楚最基本的道理。在组织青年突击队的时候，他是这样演说的：

"咱们生在农村，长在农村，想上大学，推荐不到咱头上；想进城当工人，没后门。农民当定了，'农门'跳不出去。咋办？

"我干过五年合同工，三十六块钱，日子也难过。我会开汽车，又是瓦工，要出去混个事儿，比你们方便。我养鸽子耍狗，丧了气咧！可这样下去不行嘛！

"农村真个弄不好？我想试干一下。我是豁出去咧！干三年，办两件事：一是弄得大家能吃饱肚子，二是让老青年（年龄大的青年）能

订下媳妇。三年能办到这两件事，我再干；办不到，下台，让大家骂去。

“我一个人不成，咱们一块干，把穷根拔了。农民也要住洋楼，穿皮鞋，戴手表！问题是先得吃苦，出力，苦干，先苦后甜……”

他把青年们轰热了，青年突击队组织起来了，在袁家平地、打井、出外搞副业的创业过程中，这支突击队是一支最活跃的力量。

他说的是他们心里想着的话，实话；他做的是他们所想做到的事，实事；他用实话和实事，征服了人心，为实现一个共同的目标，去奋斗。

一九七三年春节，乡村的大路小路上，到处是穿戴整齐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走亲戚串朋友。袁家村人一溜一串，提笼夹袋，爬到九宗山的沟沟坡坡里，在乱石之间，刺蓬之下，捡拾羊粪粒儿。郭裕录的手脚是很利火的，捡啊，抓啊！饿了，啃一口玉米面烙成的饼子；渴了，掬一把阴坡里干净的雪团吃下去。到山间变得昏暗的时候，他背着一口袋羊粪下山了，暮色中，走亲访友姗姗归来的年轻情侣、温厚夫妻，讥笑袁家背着羊粪袋的人，酸枣刺蓬把衣裤刺割破烂了。年轻人脸皮薄，害羞了，躲闪着熟人和同学。郭裕录不羞，扛着口袋气昂昂走过去。自他来到这个世界，生活对于他就不是面包和鲜花。他学会的头一项劳动是拾粪，当同龄的伙伴早晨背着书包上学的时候，他已经在霜花蒙地的乡野里拾了满满一笼牛粪猪屎回家了……

夜晚，灯下，他把扎进皮肉的枣刺挑出来，指头蛋儿被石头磨得没皮了，钻心疼；手心和手背，被刺划得满是血口子，活像鸡爪子。

他走到社员屋里去，电灯下，女人帮着男人，儿女帮着父母，互相捏针挑刺。他的心里泛起一阵阵热流。鼻腔里酸溜溜的，悄悄走开了。

“给咱袁家的好亲戚好朋友，把话说明白，现在来啊，咱们没啥好吃食招待；等到翻了身，日子过窝逸了，好好款待他们。”郭裕录动情地说，“我哥给我撂杂话，说我是‘秦始皇磨民哩’！可老鸦屉下的不是吃食哇……”

一九七三年，施过羊粪的棉花地，亩产一百八十斤皮棉！连续四年，袁家男女捡拾了十万余斤羊粪粒儿，那是靠三个指头一粒一粒从刺蓬下、碎石间抠出来的。劳价就是这样从二毛票儿升到二元四角的！

一九七三年那场铺天盖地而来的洪水，袁家人清楚地认识了：郭裕录，是条硬汉子。

暴雨瓢泼，郭裕录在雷声和电闪中，直奔饲养室，那儿地势低洼，首先可能遭淹。他背起饲养员老汉，转移到高地上，返身再奔回饲养室的路上，恐怖的吼声传来了。山底水库倒坝，洪水像凶猛的野兽从山上扑下来，灌进每一家低陷的地窑。饲养室里，麦草和牛粪在漂浮、打旋。他抱起铡刀，连着砍断几条牛缰，拖出牛来。当他去拉最后一头牛的时候，涌进牛圈的洪水已经淹没到脖颈上来了。亏得他拉着牛尾巴，被牛拖到高地上，救了命。

他把社员们集中到高地上，点过名，万幸万幸，没有一个人淹死；所有家产在顷刻之间，都被洪水化为乌有了。

一片哭声。女人号啕，娃娃哭闹，男人们大声哀叹。郭裕录抱着头，蹲在地上，也哭了。

他没有一直哭下去，抹了眼泪，站在众人面前，沾着泪痕的脸膛上现出笑容，这是他比社员厉害的地方。

“哭一哭，算咧！再哭下去，乏味咧！哭不出房子，也哭不出粮食哇！动手收拾烂摊子吧！干！烂地窑冲垮了，该着咱们提前住洋楼了……”

有人信，有人不信。信不信是一回事，干却是都干上了，因为没有第二条选择。一九七六年，当袁家的土地上冒出第一幢一色青砖水泥拱顶的两层楼房的时光，人们嬉笑着，自然回忆到郭裕录在被洪水冲得一塌糊涂的村庄里说的那一番“狂话”……

拳头

他和他的战友，以廉洁奉公的克己精神，始终如一地表现了对社员的忠诚，树立了权威，形成一个攥得紧紧的拳头。

郭裕录不是独臂擎天的英雄。

在一九七〇年秋天上台的时候，他诚恳地三访老农，四顾参谋，希望对农业懂行的人能和他协力合作。时间不长，他感觉出来：老农们总是恪守传统的劳动和生活的套套，对新的科学技术往往表现出怀疑和否定；长期的贫困生活，很难使他们摆脱斤斤计较、小家小气的习性；再说，作为农业生产第一线的干部，年龄大了，手脚笨了，干活干不到前头，就不好指挥社员了。

郭裕录摸索出一套选择干部的办法。

他把全队三十岁以下的青年男女排成队，编了组，仨人一班，轮流执政，负责袁家大队的全盘工作，主要是生产，为期一周。上台的时候，由班长宣布“施政方针”；一周结束，由社员评价，哪件事干得好，哪件事失误了。袁家几十名男女青年，人人都有施展本领的机会。

从一周延长到半月，从半月延长到一月，从一月延长到三个月，再延长到半年。

这种筛选过程历时四年，袁家村那些最优秀的人物日渐显出了明显的目标。他们锻炼得硬邦了，老练了，成熟了，深得众望了。这时候，袁家大队的五人支部委员会形成了。除了一名出嫁的女同志，这个班子一直稳定到现在，只有郭裕录超过了三十岁。

大队长王志学，膀大臂阔，二十岁挑起青年突击队的战旗，在当年平整土地、兴修水利的热潮中威震烟霞公社，立下了赫赫战功。上山捡羊粪的时候，他起早摸黑，一天往返八十余里，钻进深山，一次捡得一百六十多斤羊粪，从悬崖峭壁上背回来，膝盖上的棉絮磨得吊出来，像个野人……

副大队长郭建军，一九七二年高中毕业，回到队里，经过七天、半月、一月、半年反复多次的带班，显示出他忠诚公正的特性，同样是干活不知累的拼命汉子。他带着十名青年，在泔河引水工地上，把二十人一月的任务，十天干完了，轰动了整个水利工地……

副支书张文西，一九七三年高中毕业。在校期间，品学兼优。郭裕录让他当出纳，谈了几次，他不干，想上大学。

郭裕录批评他：“你不干，我不强迫。你心不在袁家村里，干也干不好。我要找死心塌地跟我吃农业粮的人干！”

张文西仍不动摇。他家祖祖辈辈没一个识字的人，父亲和兄长，一心想把他供给得能上大学。他学习好，有这个条件。可是，郭裕录后头几句话，却使他于心不安了。

“文西，我成天掰着指头，算你几时毕业。好在把你盼回来，你心里想跳‘农门’。我文化低，盼有学识的人搭伙儿办袁家的事哩！”

张文西被感动了，裕录哥也有条件跳出“农门”嘛！他为谁挣死累活地干呢？强烈的集体主义和小小的个人打算发生尖锐矛盾了，犹豫了，终于把胸襟敞开了。

敞开了，他的文化知识就显出了优越性。

在棉田里，文西接受使用新的作务技术，防虫治虫，配制农药，发挥了创造性的劳动。其后，在兴建居民住宅楼房的过程中，他跟着一位请来的建筑师学识图，学施工。到第二幢楼房开工兴建时，文西就兼着技术和施工的总指挥，独立工作了。一直到完成四幢楼房的工程，全部居民住上新的房屋。

他有文化，又肯钻研，土办法掺着洋办法，自己设计，自己施工，建成了自来水塔。今年秋天，他设计施工的浴池，还是相当阔气的……

这一班青年干部，有和班长郭裕录一样的共性：热心集体事业，负责任，公道，干劲大，文化水平高，接受新的东西快。这是一个强有力的拳头，总是攥得紧紧的一个拳头。

这个拳头之所以攥得紧，是因为有一个严格的纪律作保证，就是从郭裕录自己做起，在待遇上绝不特殊于社员，不断地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乃至必要的斗争。

大队长王志学是人人钦服的猛将，尽管郭裕录很喜欢这位忠诚的战友，可是对他绝不特殊。有一次，他去参加县上一个训练班，按通知规定，可以从队上提走两斤清油。郭裕录知道后，连续开了三个晚上的会，经干部们讨论，不应从队里拿油。因为队里给王志学和社员一样，分过八斤多清油了。至于县上通知的规定，那是有其更全面的考虑。王志学在社员会上做了检讨，退了油，未免有点太苛刻了吧?

副大队长郭建军，虽然只有二十七八岁，却是最早和郭裕录一起奋斗过来的“老”干部了。一九八〇年，他负责主持全面工作。夏收开始后，在麦子成熟的火候上把握不准，没有和其他干部商量，盲目地用汽车从赵镇拉来了六十三个“麦客”。来到地头，麦子外黄内不熟，不能搭镰，给麦客每人赔偿三元工钱，给集体造成了不应有的损失。郭裕录为此事召开全体干部会，讨论这件事产生的思想根源，作出惩处决定：郭建军给集体赔偿损失三十元，并在社员大会上做检讨。

对于领导班子的严格纪律，有一个基础，这就是郭裕录本人廉洁奉公的克己精神和模范行为。

为了避免个人专断，充分体现集体领导，大队里的五名主要领导成员，轮流执政，一人一年。每年年初，由即将主持工作的人发表在新的一年里的“施政纲领”，年终由社员和干部给予鉴定。每个主持工作的干部，总是千方百计企图在自己“施政”的一年里，有一个大的进展，对袁家乡亲有较多的贡献，对他们的事业多所建树。其余干部，

各把一关，互相配合。除了当年主持工作的干部有适当的补贴工分，其余干部和社员一样，凭劳动手册上记载下来的工分算账。

社员信赖这一班年轻后生，不是他们厉害，而是他们在创业的近十年间，始终如一地表现出对社员的忠诚……

到这儿来参观的人啊，学习他们艰苦奋斗的精神，学习他们经营管理的办法，尤其对他们发展工副业的经验很感兴趣，这都很对，但不要忘记：领导班子，尤其是主要领导者的作风问题，是事业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

县党代会上，经过无记名选举，郭裕录被选为出席省党代会代表。在省党代会上，经过无记名选举，他又被选为党的十二大代表了。

郭裕录信心百倍，朝着自己的目标前进：进一步提高机械化生产水平，把社员的劳动强度逐步减轻；完善生产责任制，提高管理水平，增产增收，进一步提高社员生活水平。浴池今冬即可使用，暖气需得明年。把农村办成叫城里人也眼红的乐园。

1981年10月14日 袁家

万花山记

自延安沿杜甫川南行约四十华里，就到了万花山下。万花山以无数的野生牡丹闻名，五月中旬正是花期，凡到延安的外地人，都想来此观赏。我趁会完等车的空闲，赶到了万花山下。

半山坡上，一大片牡丹，花苞绽开，艳丽妖娆，红的紫红，白的雪白，黄的金黄，五彩缤纷，全是天然野生，而非人工雕琢培育，更有一番自然天成的风韵。据朋友介绍，这万花山上，现在野生牡丹三万余株，去年有五千多株开过花，今年花事更稠。

传说王母娘娘的四女儿不甘天宫寂寞，私自下凡，嫁给花原头村的樵夫崔生，两人相亲相爱，美满甜蜜。四仙女在茅舍旁的山地上，种下了从天宫带到人间来的各色牡丹花种，夫妻二人精心务育，花苗壮健，花色格外艳丽，两人便以卖花为生。后被延安城里一富豪嫉妒，带领家丁，赶至万花山上，抢人拔花。四仙女气急之下，上天搬来兵将，打得富豪家丁死伤逃奔，二人又安然种花度日。此事后被王母娘娘察觉，四仙女落得和妹妹七仙女一样惨痛的结局。但是，四仙女从天宫带来的牡丹，留在万花山上，冬去春来，生殖繁衍，历朝万代，经久不衰。美丽动人的传说和美丽的花儿一样流传下来。

幼年时期，我就记住了中华民族那位巾帼英雄的名字——花木兰，至今也搞不清历史上是否真有其人。想不到，今天竟然来到花木兰的故里来了。据说她是万花山下的花原头村人。花原头村临近的村子里，至今仍有花姓的农户。此地还有花木兰墓，有一块石碑上书“花木兰之墓”五字。另外《木兰辞》里有“对镜贴花黄”的诗句，而延安郊

区的妇女在嫁前刮掉眼眉以上的茸毛，贴一对剪得精细的纸花的风俗至今还传留在民间。

即使这些证据全不可靠，我仍然相信花木兰就是花原头村人。人民需要她啊！

杜甫在“安史之乱”的年头，携家逃至富县，将妻子儿女安置在羌村，只身南下，绕道延安，路经万花山下，曾上山观景。可惜不遇花期，没有留下一句诗来；也许是国难萦绕心头，无心问花吧！而诗人经万花山前行入延安的这一条狭窄的川道，得名“杜甫川”，沿用至今。

党中央在延安的革命岁月，毛主席偕同周恩来、朱总司令、任弼时等同志，曾经两次来到万花山欣赏牡丹，一次在一九三九年五月，坐车后步行两小时到此。一次在一九四〇年五月十日，骑马前来。毛主席对当时村政权的农民说：“全国解放后，这儿可以修成公园，建立疗养院，让劳动人民游览，疗养，休息。”

万花山美，牡丹花美，万花山的传说更美。

1982年5月16日 延安

延安日记

五月六日 过介子河

一过铜川，汽车就开始钻山。连绵不断的圆顶山包，散立着几株小树。虽然已经进入五月初夏季节，淡淡的绿色，仍然遮掩不住荒山秃岭丑陋的容貌。乍一从绿色的麦浪覆盖着的渭河平原过来，顿生厌倦，昏然入睡。

“介子河！小伙子们，这就是介子河！”老作家杜鹏程几乎是喊起来，“当时红区和白区的分界线，生死线！”

那是什么河啊！一条紧紧夹在山间的小河沟，淌着一股浑黄的细流，不过几米宽，十来步也就跨过去了。

就是这条狭窄的小河沟，往北，划出了一个举世瞩目的新天地——陕甘宁边区。这是红区和白区的天然划界，是光明和黑暗、进步和反动的分水岭。

介子河北岸的山头上，驻扎着保卫边区的红军战士；南岸，国民党重兵把守，特务密布；革命和反革命对扎营垒，隔河相持。这条小小的河沟，在边区的地图上就有了粗重的一笔。

“好多追求光明的青年、学生，从全国各地跋涉了几百里、几千里，投奔延安，没有冲过最后一道封锁线，被特务杀害了，连个名字也没留下。”老杜激情难抑，感慨不已：“介子河，就那么几步宽！”

“我是从旬邑通过封锁线的。当时化装成‘麦客’由交通员带过去的。”王汶石说，“因为组织上严密安排，很顺利地过去了。”

车上的四位老作家，都是二十上下从秦晋两地的乡村奔到延安寻求光明和进步的青年，党和革命，把这些不名一文的穷庄稼人的后代，铸造成为战士和文学家。中国共产党在延安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小米培育的这一代作家，用笔蘸着自己和战友的血，写下了人民革命和人民战争的史诗。他们无愧于民族，无愧于世界。

他们有多少难忘的往事可资回忆啊！他们争相辨认着一条川，一架山，哪里曾发生过什么战斗，哪里曾是他们的行军的路线和演出的场地！他们口口声声“回老家”“看母亲”。那种真挚的感情，我是难以体味的。

我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正是老一代共产党人在延安处境最困难的时候。我是属于第一代享受革命胜利成果的青年。

我切切感到，今天去延安，在我，是“寻根”来的。

五月八日 在王家坪

参观完延安革命纪念馆，站在王家坪的坪场上，我在思索“革命”这两个字的含义。

黄土崖上凿成的窑洞，住着推进中国历史进程的一代巨人。粗糙的黑麻纸，黄色的马兰纸，墨写着一页页铁血交战的命令。灰色粗布军装，似有战士的温热存在。自己种出的小米，犹闻谷香……从大江南北，黄河两岸汇集到延安来的，有皮鞭下逃出的长工、苦闷彷徨的

知识分子、热血澎湃的学生，接受了那一场洗礼，扭转了历史的进程。

所有曾经在延安纺过线，种过小米和南瓜，打过仗，写过书，演过戏的人，从领袖到马夫，从将军到文工团员，他们今天所能感到的，是历史的骄傲和光荣。他们在文武两条战线上，给一个罪恶的旧制度挖掘了坟墓，给一个崭新的中国，举行了接生和洗礼。

所有保存下来的历史遗物告诉我：当年这儿的物质条件大约是世界上任何政府里最差的，而这里的精神生活却是世界上最崇高的。当年的革命，绝不像后代人想象的那么浪漫。流血，死亡，疾病得不到及时医治，几个月中一天只吃一顿的土豆汤，冬天塞在单裤里的麦草“棉裤”……需要怎样坚定的信念坚持到明天?

站在纪念馆前的草坪上，以延安的名义，想想过去，历史必然以最无情的手段惩罚万恶的“四人帮”。以延安的名义，必须打击那些经济罪犯，他们是党的肌体中的蛀虫。以延安的名义，把我们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投向人民。

五月九日 在杨家岭

这是杨家岭，两壁土墙围成的小院，一幢灰砖砌成的小楼，上刻“中共中央办公厅”。哺育了一代又一代中国无产阶级艺术家的《讲话》，毛主席就是在这里演讲的。

白色的柳木桌椅，依照原样摆着，似乎会议刚刚散场，笼罩在屋里的烟雾也好似刚刚散尽。那棵高过小楼的大柳树，当年可曾长在这里？能否记得那位历史伟人讲演时飞扬激越的神采?

一幅模糊不清的珍贵的历史照片，把当年有幸参加座谈的文艺工作者和他们崇拜的领袖的真实风貌保存下来。

这是中国无产阶级文艺大军的一次检阅。

从杨家岭出发，艺术家走出延安的窑洞，奔向华北，奔向晋东南，到民族解放战争的火线上去了，到解放区轰轰烈烈的减租减息的乡村里去了，像种子一样，扎进人民群众的土壤里。

有生命的种子一扎进土壤，或早或迟，萌发了，出土了，青枝绿叶了，五彩纷呈了，丰硕的果实收获了！王贵和李香香的秧歌扭到天安门广场了，白毛女走遍了千家万户，二黑和小芹交结下多少青年知心朋友，暴风骤雨般的土地革命刚刚结束，开创新生活的创业史又展开新的画卷，保卫延安的英雄们，在和平的日子里，又进行了怎样惊心动魄的战斗……

陕西作协主席胡采，是我省参加过那次历史性座谈会的唯一健在的老人。站在那张放大了的照片跟前，大家围住他，询问了当年座谈会召开的情况。

历史从那时到现在，走过了四十年，留在照片上的百多名文艺工作者，有的倒在人民解放的战场上，有的病逝了，有的被“四人帮”迫害致死了。胡采本人，也从勃勃英气的青年变成白发稀疏的老人。

“四人帮”在十年浩劫中把党和毛主席在延安苦心培养的老一代艺术家一律打倒，这个反常的历史教训太沉痛了！发表过那样深刻、精辟、明快的理论演讲的伟人与世长辞，而坚持《讲话》基本原则的，恰恰是那些被“四人帮”整得最惨的所谓的“黑帮”。延安的小米和粗布

养育的这一代艺术家，服从真理、坚持真理、发展真理的文学家胸怀，令人感佩！

曾经创造过人民战争英雄史诗的作家杜鹏程，因为彭总的冤案被折腾得九死一生。这样一位老人，回到延安，该有多少历史的感慨！他在发言中的一段话，感人肺腑：

“人，总是一辈比一辈更聪明。这不仅是因为发展的时代把他提高了，还因为他是站在前人的智慧积成的高山上。前辈也和我们一样，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他在构筑智慧之山时，也会显露出弱点和失误。有思想的后来者和真正的艺术家，会以严肃而深沉的态度去思考这一切。后来者如果忘记自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而以自己的一得之长或一孔之见，笑傲前人，那太浅了。太浅的人，对我们这伟大的民族和辽阔的祖国来说，很不相称。”

五月十日 看《延安散记》

坐在延安剧院里看历史文献片《延安散记》，真情和实景自然地交融到一起了。

古旧的山城，狭窄的街道，低矮的房子，简陋的窑洞——四十多年前的延安。

战士在荒野里操练，在跃马劈刺，在窑洞里学习，唱歌，跳舞，在荒山上开荒种地……从延安出发，到抗日的前线去了……

感谢摄影家，把这样一组一组真实的历史镜头记录下来，保留到今天。使那些为了民族而长眠于地下的先烈活跃于后人的心中，使那些经历过延安岁月的老战士可以回眺自己当年的风姿，使一代一代的

后来人可以真实地了解当年的革命是怎么一回事。人们都可以根据自己亲身经历的、书上看到的、听人讲过的关于延安的记忆，融会到历史的画面里，去丰富短少得令人遗憾的镜头，去印证自己的记忆。

一队一队人马开进处于原始状态的南泥湾梢林，披荆斩棘，浓烟弥漫，开荒播种，搭棚挖窑，这是大生产运动中令人感奋的图景。来延安的路上，王汶石说，当时，他们二十几个小伙子，驻扎在一架山头上，脱得一丝不挂，精尻子开山种地，像野人一样，夜晚住在庵棚里，点着松明子，学习讨论，还做笔记……电影镜头里，是他们开荒的山头吗?

强烈的民族仇恨，炽烈的理想追求，坚定的马列主义信仰，熔铸成一个强大的朝气蓬勃的延安！崇高的精神生活战胜了难以忍受的艰难困苦，而终于把革命从山城推向天安门。

哲学家们在研究物质和精神的关系的时候，不要忘记或忽视这一历史事实吧！要求今天的人光着屁股去开荒是愚蠢的，“四人帮”越穷越革命的高调早已破产。物质和精神的相互作用却绝不可偏颇。人不能在不吃不喝的境况下空喊前进，人也不能完全变成金钱和物质的奴隶！

那两个衣服褴褛的小八路，举着铜号、面对东方的英姿留在烽烟漫天的祖国大地上，留在历史镜头里，也应该留在世世代代中华民族的子孙的心里，不要停止前进的脚步……

1982年5月 延安

春风吹绿灞河岸

灞河川道的庄稼人把正月十五元宵节称为过小年。小年刚过，我的耳际还萦绕着热烈亢奋的迎春锣鼓的声响，鼻腔里似乎残留着火铳爆响后细微的火药气味，就踏着自行车，赶到远离城镇的灞河下游的区党校去，参加中共灞桥区委召开的三级干部会议。

离开农村实际工作岗位三年多了。三年来，农村究竟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在有区、社和大队主要领导干部参加的会议上，那些长年累月工作在渭河平原、骊山山地、白鹿原坡和灞河川道的基层干部们，将带着他们亲自进行农村经济变革中的喜悦、问题和困惑，集于一堂，学习和交流，这无疑是学习和了解当前农村现实的一个难得的机会。顺着河堤，我骑着自行车，料峭的清晨的寒风，虽然还使人脸上麻辣辣地难受，杨柳枝条上已经肥大的叶芽儿，分明可以嗅到绿叶的气息了。

踏进党校的大门，我就被热烈的会议气氛包围了；直至为期八天的会议结束，我一直沉浸在一种激动的情绪里，夜里常常失眠……

会议的组织者将我编在毛西公社小组里。毛西，是我工作过十年的故乡，大多数基层干部都是熟悉的。大家坐在铺着麦草的地铺上，双脚塞在棉被底下，靠着墙，屋子里弥漫着旱烟和烟卷的混合气味。我专注地听着一个人的发言——

“三队和四队，大白菜实行包工包产，平均亩产过万了。一队和二队，还是‘大锅饭’，亩产四五千斤，长了一地‘草帽’。光白菜这一料庄稼，三、四队比一、二队多收入四五千块！

“灵得很！一包，地里缺了苗儿，社员提上铲儿，端上盆儿，一窝一窝补栽苗儿哩！怪得很，栽一窝，活一窝，保栽保活。可一、二队到收白菜的时光，还有几步长的断行……”

这是刘修年，刘村大队大队长，党支部副书记，黑脸，上唇有一绺黑胡碴，几乎看不见白仁儿的眼睛上架着一副黑腿眼镜，明显的劳动者的体型，像一块富于弹性的钢锭。他说话声音很大，全是他们大队实行责任制当中的事情。开头怎么考虑，出了什么问题，如何弥补了漏洞，坚持下来了。言语间似乎有一种固执得意的神气，却使人毫无虚夸的感觉。

我认识他多年了，过去的印象是，他不爱说话，无论是在大队或是在公社开会，总是坐在一个黑旮旯里，下巴支在统进袖口的手腕上，听别人说话；要是听腻了，就溜出门去了。他在刘村三队当过多年队长了，年年分配当中，劳动日价值不仅在刘村大队里挑梢儿，在整个蔬菜专业队里也总是前三名，这是闻名全社的一位实干家。公社几次想把他捉到台上去，介绍经验，他总推辞说自己不会讲话；逼得急了，他打个哈哈，一转眼就溜得找不着人影儿了。我真以为他生性不爱在人前说话，只会实干，及至后来在刘村大队住过一段时间，才弄明白，他在生产管理当中，一直暗暗使用着“小段包工”的办法。那时候，对这样的“流毒”的批判，躲都躲不及，怎么能当经验拿到台上去讲呢？于是我便不再勉强他。

那年春节刚过，我住到刘村，组建全部塌台的四个生产队的干部班子，晚上就住在刘修年家里，他女人领着孩子到天水走娘家去了。

我和他躺进被窝，动员他继续出任三队队长。

“熟人不说外话，今年实在干不成了。”

“咋咧？”我问，“三队今年分配很不错嘛！”

“有人成天搜咱的事。”他说，“我再三思量，不敢……”

“我开过几次社员群众座谈会，大家拥护你。”我给他解释，“搜事找碴儿的是个别人，覅怕！”

“怎能不怕呢？”他很沉静地问，“运动来了，你连自个儿也保不住，还能硬得给我撑腰吗？”

我一时回不上话，默然了。生活显然证明了，他的话是正在经历着的事实，无法辩驳的。我出一口长气，旁边也响起一声沉重的叹息。

经过多方工作，他同意了社员会选举，面对一双双举起的拳头，他上任了；仍然偷偷使用着“小段包工，落实责任”的办法管理蔬菜生产，仍然取得了当年年终令周围生产队社员眼馋的经济分配。他仍然坚持不在任何场合介绍经验，坐在会议偏远的角落里抽烟。

他的沉默的结束，当是党在农村实行切实的新经济政策之后。

我在这样的场合看见他，歪着头，两指间夹着一支黑色的雪茄，面前放着一只盛满酽茶的大号瓷缸，谈他们在蔬菜、粮食和工副业生产中实行不同形式的责任制的成功和出现的问题。尽管上衣口袋里插着一支钢笔，却没见他写一个字的发言稿，竟然一开口就谈了一个多钟头。

“家伙，好口才！一肚子的蝴蝶全飞出来了。”

“嗨！而今咱好开口了！”

休息时，我和修年站在院子的泡桐树下，攀谈起来。他高兴地给我说起刘村大队近两年间的变化，四个生产队的劳动日值都超过一块多了，两个队接近两块。一九八一年，在春旱秋涝的严重自然灾害中，全大队取得年收入最高水平。我听了并不惊奇，似乎是意料当中的事。他倚在树干上，侧过戴着黑框眼镜的脸，右手掰着左手指头，一户一户数计着年终分配超过千元的社员户。他念出的那些男人或女人的名字，有的我认识，有的则记不清了。直到他的左手指头一个一个被压倒，又一个一个支起来，我已记不清他数过多少户了。

他的神态，他的魄势，明显地流露出一种信心十足的气势；他的外形，他的精神，都比他年近五十的实际年龄要轻松活泼得多。他当过十年生产队长，正当中国农村处于最混乱最困难的时候；现在他已经是刘村生产大队大队长了。听公社王书记说，这是一个强硬能干的大队长。刘村大队长期以来是个多事的烂杆队，自他出任大队长以后，日见整端，收入逐年增加，集体积累和社员收入都成倍地提高了。

“好好干几年吧！现在正是成事的时候！”我说。

“车才吆到辙里。”他说，“敢松套吗？哈呀！”

他说他这次来参加三干会，是他参加过的会议中最积极的一次。他听人说中央关于农业政策发下来新的文件，想听个明白，心底就踏实了。“真个，这个文件好！中央给咱交了底儿，两个长期不变！我心里实在，集体经济的性质不变，责任制是解决生产管理的法程。”修年得意地说着他对文件的理解，对我说，“再不敢变来变去了，实话！”

想到这样一位实干家过去闭嘴沉默的内心矛盾和痛苦，看到他当今畅快自信的神态，我的心里十分舒畅。是嘛，现在正是修年这样的实干家创业成事的时候。

讨论十分活跃。每当我从院子里走过，从那一排排平房和楼房的门窗里，传出阵阵热烈的争论声，有男人的粗喉咙大嗓门，也有女人尖声锐气的声调，有时又突然爆出一阵哗笑。我每每站在门口或窗下，听一听，不忍离去。中央关于稳定和完善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方针和政策，在这些农村干部中间，引起了多大的反响啊！那些陌生的声音在我心里同样唤起亲切的感觉。这种争论，往往从讨论房间里溢出来，在他们捏着进餐票证，夹着粗瓷大碗排队买饭的时候，仍然余兴未尽，说着谝着。他们许多人没有文化或文化很低，却那么认真地抠着字眼。“长期不变。多长？一年二年不叫长期嗒！”“那当然！一两年咋能算长期？中央叫稳定哩，往完善地搞哩！好——稳定完善！”对于中央文件阐明的方针和政策，你看这些生活和工作在乡村的干部们兴致多么高涨吧。

过去在公社工作的那么多年里，记不清参加过多少次三级干部会了。一切实际工作中的问题，都是要用“斗争”这一把钥匙去解围。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把孔老二的话精印出来，人手一册，请专门人才来讲解，然后让他们再批判。他们坐在那里，吃烟，喝水，发困，开会是他们休息和养神的极好机会，一当时间磨完，沉闷了一晌的屋子立即被笑话、粗语所充塞。“吃肥肉，说空话。”这是他们对诸如此类会议的精辟辛辣的概括。任你把孔老二说得多么可憎，他们照样靠住墙打盹儿。方针和政策一旦离开了群众的实际，离开了生活的实际，只能被群众所冷漠，被生活所嘲弄。

无论在小组里听他们发言，抑或是私下里个别交谈，我常常觉得，那些张着嘴巴高谈阔论的农村干部，一个个都是经济专家，生产管理专家。他们在自己领导的生产队或大队里，因地制宜（近年间一句流行于乡村的话）地制定出五花八门的生产管理办法，那是在经济学家的专著论文里看不到的生动有趣的管理形式。他们毫不隐瞒自己对于农村方针政策的关切心情，“政策，那决定咱农民碗里稀稠哩……”政策在农村干部和社员的眼里，不是干枯的条文，而是带着生动的感情色彩进入乡村的父老胸膛的……

当我听到石家道大队党支部副书记谈到，他们大队第四生产队队长把自己应得的六千多元奖金，拿出来奖励所有干部和全体社员的事，我的心里失掉了平衡。四队队长杨强汉的名字，一下记入心中，忘不了了。我想见见这位年轻的生产队长，是个什么样儿？努力搜寻自己过去在石家道住队时的记忆，仍然没有印象，他是谁呢？

三干会刚一结束，我就赶到石家道四队，走进一位满头银发的老大婶家的门楼。她当过党支部书记，现在老了，早卸任了，因为习惯，队里干部仍然喜欢在她家聚会。我到她家去找干部，也是一种老习惯。

大婶去找人，我坐在屋里等着。

抽完一支烟，院里一阵响，脚步很重，肯定是杨强汉来了。我走到门口，对面门外站着个小伙儿，盯着我，笑笑问：“是你叫我呀？”

我点点头，把他让进屋里，瞧着他坐下，个子不高，很强健，浑身溅满泥水污点，他说是给旁人帮忙盖房子，弄得这样。他大约过早地失却了年轻人爱美的兴趣，衣着过于不讲究，虽然穿着并不差池的

布料，却是乱七八糟裹缠在身上；眼睛不怎么大，鼻梁高高，一个极普通的关中农村小伙子。他递给我一支烟，说他早就认识我；我表示歉意，过去的印象里似乎还是没有关于他的记忆。他有点腼腆地告诉我，他的媳妇是我当教师时教过的一个学生；一说名字，我惊喜地笑了。于是，我们之间一下子缩短了感情的距离。他也就称呼我为老师，谈话畅快了——

去年年初，大队管委会根据各个生产队前三年的平均产值，定下来各队的包产计划，给四队定下六万五千元的农业总收入，原任队长不接受，几次大会和小会都落实不下来，原任队长说，超过六万，多一分钱他都不干，僵了。

大队召开四队社员会讨论，杨强汉站起来了，说他愿意接受这个合同，而且提高到六万八千元，超过了大队下达的总产指标。社员们拍了手，强汉接任队长了。他在合同上签下了歪歪扭扭的名字，大队干部也签了字，当时推选出来的群众代表，照样在监督栏里签名盖章了。

合同规定：超产部分，提取百分之二十，作为队长的奖金；如果完不成六万八的总产，亏损部分按百分之十扣罚队长。这是很硬的一条。

他上任了，当晚就去拉老队长跟他合套。老队长坚持不干。他请与老队长关系好的人去做说服工作。老队长生产门路精通，他离不了他。老队长同样放心不下四队的生产，答应做副队长，但他声明，有奖不吃，遇罚不受。杨强汉为首的四队新班子组成了，上任了。

无须赘述整个夏菜和冬菜的生产过程，社员们最关心的，是年终决算时会计算盘上最后一粒算盘珠儿。杨强汉心里是踏实的，赔不了。社员心里也是踏实的：谁看不见地里长得好赖吗？问题是超了多少！

会计终于把手指从算盘上落下，在账本上记下最后一笔阿拉伯数字，吃惊地睁大眼睛，告诉强汉：总收入九万九千九百五十元，超产整整三万元还多；按百分之二十提取奖金，不用拨算盘，该是六千多元哩！生产费用也节约了，合同规定节约部分仍然提成奖励队长。杨强汉已经不去注意这个小数字了。

“你算准了？”

“准咧！”

“算账的责任在你，日后出麻达，你负责。”

“我负完全责任。”

杨强汉走了，走过一条街巷，又转过一条街巷，就要进自己门楼了。六千元！惊人的数字，将会在自己小院里和石家道几百个农家小院里引起怎样的反响啊！

一天一夜，不用广播，惊人的消息就传遍了南街北巷里高高矮矮的庄稼院门楼。

“啊呀！强汉这下搂住了！……”

“呃！六千块！能盖两层六间洋楼……”

那些牙齿不全的老人的嘴巴，那些精明强悍的壮年汉子羡慕的眼神，同辈小伙子们嘻嘻哈哈的笑闹，都在渲染着这个消息。也有人压低声音，表示忧虑：

“敢拿吗？要是日后有个运动，‘暴发户’！”

“订得有合同，怕啥？”

“上级文件也变哩，甭说队里一张合同……”

当村里的乡亲议论纷纷的时候，杨强汉已经征得媳妇（我的令人自豪的贤明的学生）和兄嫂的同意，拿定主意，走进会计办公室了：

“生产费用节约奖不提了。超产奖六千元，拿出三千元奖励全体社员，按总投工量计算分配。”

会计姑娘睁大眼睛，又吃惊了。

强汉说：“你算算，一个劳动日摊多少钱？”

会计姑娘拨拉起算盘珠儿，每个劳动日均摊一毛五分。这样，劳值从三元钱提高到三元一角五分。

“就这样办，你给各家算去吧！”

杨强汉又走进党支书家里，坐下，商量：

“剩余三千元奖金，所有干部一齐奖。”

党支书十分赞赏这个年轻的后生。

于是，四队的生产组长、技术员、出纳、会计、保管，都拿奖金了。他坚持和两位副队长拿一个等级的奖金：六百五十元。大家一齐围住他呼吵，一定要给他多奖一百元。他接受了。

杨强汉结结巴巴说完这件事，我很不满足，想了解得更细点，就提出几个问题来。他咄咄讷讷，说尽管合同是大队与他一个人订下的，他把六千元奖金全揽了，也不违反合同原则。“可那样做不好，谁还和你共事呢，咱不能那么做。超产是干部和社员搭伙干下的。”再问，他就现出局促的神色，而且说，“这点小事，问的人太多了。”我才知道公社、区上和市里有好多人找他了解多次了，问得他回答不了了。

我于是罢问。看着他局促不安的眼色，想到盖房工地可能正缺人手，天上又落着雨星，我便告辞。

天阴沉着，远处的村庄和更远处的原坡，隐没在低垂的灰雾里，疏疏落落的雨点，无声无息地洒进刚刚起伸泛绿的麦田，我忽然记起，农历节令中的“雨水”正是今天。灞河长堤上的柳树，绣满叶芽的枝条泛出一抹淡淡的嫩黄，在微风中摇曳，甩出一派轻柔婀娜的风姿了。

我骑上车子，顺着河堤缓缓地走。我在城镇里，多听了些诸如“汽车大王”一类蛀虫的传闻，心里曾经有一股忧闷，在从石家道街巷走到河堤上的时候，我发觉我的心情顿然踏实了。

河滩上的麦田里，已经有人蹲在地里锄草了。春风。细雨。泛绿的原野。我陷入沉思，思索着人的新的美德……

1982年春

言论

我信服柳青三个学校的主张

——《信任》获奖感言

《信任》在一九七九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中获奖，我一直认为这并非《信任》本身在思想和艺术上有什么突破，获奖并不能掩饰作品本身的幼稚和缺陷，鼓励而已。愈是这样想，愈觉惭愧和不安。

就自己写作的实践来说，我还是信服柳青著名的三个学校（生活的学校，艺术的学校，政治的学校）的主张，而且越来越觉得柳青把生活作为作家的第一所学校是有深刻道理的。我刚刚读过《创业史》第二部第十九章，梁大老汉的发家史如此叫人料想不到而又合情入理！特别是梁大老汉大年初一坐在炕上等待梁生宝来给他拜年时的心理状态，生动极了，准确极了，细腻极了！没有经过长期深入农村生活的作家，抓破头皮，也难得写出人物这样惟妙惟肖的心理活动。由此想到我的习作，往往是把作者的思维和感情硬性移植到作品人物的心里，而不是像梁大老汉有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独特的心理活动和独特的举止言谈。我读过一些写农业合作化题材的文学作品，觉得在《创业史》众多的人物群里，没有一个与其他文学作品里的人物相雷同的。这部史诗所显示的雄厚的真实的力量，是这样强烈而有力地征服着读者的心，使我每读一次，便加深了对“三个学校”的主张的深刻理解。

在生活中观察、研究、分析一切人，一切阶级，这一句老掉了牙的话，我觉得仍然受用。如果作家笔下的生活和人物不是自己从生活中观察发现而来的，那么除了胡编乱造而外，还有什么办法能奏效呢？没有。我在《徐家园三老汉》的写作之初，有一个小小的企图，试一试能不能写出三个年龄相仿、职业相同的农村老汉的性格差异来。另一篇《幸福》，也出于同一目的，试试能否写出三个青年人的性格差异来，以练习自己刻画人物的基本功。习作发表后，我自己觉得三个老汉比三个青年的眉目清晰一些（就我的习作相对而言；总的来看，都不典型）。想想原因，还得归结到生活这个根本上头来。我在公社工作的十年里，分工做过宣传、蔬菜、养猪、文教、卫生、农田建设等方面的工作，唯独没有做过青年工作。接触最多的是中、老年干部，所以写起来对中、老年人物的脾性就熟悉一些。这一点简直做不得假。

一九七八年冬天到一九七九年春天，党对“四人帮”十多年来推行的极左路线所造成的冤假错案进行复查，农村积存的大量的此类案件是“四清”运动中的案件，这一问题的彻底解决，大得人心，反响十分强烈，牵扯面又很广，各种思想，各人的利害，发出种种议论。此时我虽已离开公社，这种反响仍然通过各种渠道传到我的耳朵里来。走在乡村路上，随便碰见两个同行的生人，就可以听见此类议论。我心中怎么也平静不下来，于是写成了《信任》。

《信任》在报上发表后，引起了一些反响，有一种说法“实际生活中哪有罗坤这样好的人”！我很矛盾，因为在这个罗坤身上，确实寄托着作者对一个生活原型的崇敬和钦佩之情，也自然作了一些典型的集中；我又担心，这种做法是艺术上所允许的正常手段呢，还是重蹈了“三突出”的旧辙而造出了假大空的神？不久我听到一个平反后重新工

作的农村干部的先进事迹，激动不已，立即跑去采访了他，心情顿然踏实了。他是西安市郊区大明宫人民公社新房大队党支部副书记陈万纪同志。他的模范事迹，他的宽阔胸怀，他对党的事业的忠诚，深深感动了我，教育了我，他比我所赖以创造罗坤的生活原型还要动人，而与罗坤的精神世界又是相通的。生活中原来有罗坤这样的好人啊，只是我们没有发现他！这样优秀的共产党员可能为数不多，唯其少，才更珍贵，才更有宣传以造成更大影响的必要。继之，我又写了报告文学《忠诚》，把他介绍给读者。

写作在我们整个的事业中，尽管是个人劳动的标记比较明显，但受到党和人民的关怀和教育仍是十分重要的。我们写作品是教育人，我们自己也有接受党和人民教育的另一面。老一代作家为我们做出了榜样，并为党的文学事业付出了巨大的以至血的代价。记得《信任》在《陕西日报》刚发表以后，我在一个座谈会上遇见杜鹏程同志，他高兴地问："听说你发了一篇小说，很不错。我还没见到，在哪个报上？"他说早晨到作协机关，碰见王汶石同志，"一见面，汶石给我说，忠实发了一篇作品，不错。"我听了他的话，说不出话来。他们都是创作过许多优秀作品的有声望的老作家，对于一个习作者的一篇小故事，却如此关注！他们关注的岂止是一篇习作的成败？实在是表现了对于一个走了弯路的青年作者的艺术生命的真挚之情。以后，又得知作协热情地向《人民文学》推荐转载《信任》的事，我深感温暖和鼓舞。

不久前，从友人那里得到一份柳青同志对我的一篇习作批改过的手稿，灯下，我一字一句琢磨着修改过的文字，心里有一种难以遏制的激动情绪。在一节不足四千字的文字中，他删改过两百多处，添加了近乎一千字！整个版面上，连圈带画，眉头和行间，全注满了。当

时，他正患病，而且艰难地进行着《创业史》的修改工作，定是很忙又很累的，对我的习作做出如此认真详细的批改，这需要付出多么艰辛的劳动啊！

把文学作为自己终生所要从事的事业，就应该是“六十年一个单元”（柳青语）。新的生活命题需要作者努力去开掘，新的创业者的精神美需要我们去揭示，生活中新的矛盾需要我们去认识。我想还是深入到农村实际生活中去，争取有所发现，争取写得多一些，深一些，好一些。

1980年4月

短篇小说集《乡村》后记

修饰完这本短篇集里最后一篇小说的文字，熹微的晨光照亮了窗户上的玻璃，院子里那棵高过小镇上的两层楼房的大柳树，缀满鹅黄叶片的柳条，像农家少女披在肩膀上的柔软的长发，在春天的晨风中悠然飘荡；后墙外的乡村土路上，响起男女社员出早工的匆匆的脚步声，嘻嘻的说笑声，牲畜拽着铁犁踏过土路走向田野的踢踏声……

我的心里失掉了往常干完一件活儿的欣慰的情绪，反倒不安了——

把这样轻薄的一份礼物，献给乡村，献给自幼至今不曾拔脚的乡村的土地，献给祖祖辈辈耕耘着乡村土地的农民，献给哺育了我的亲爱的土地和人民，太轻了，太薄了……轻薄得令人愧疚……

农民终生永无竭止的追求，是土地上的丰收，是丰收果实的优质。为此，他们辛勤耕翻土地，除草施肥，不断改善培育农作物的技术，从来不吝惜汗水和气力。可是，费了心，出了力，秋天获得的并不一定是丰收，也不一定是优质。原因呢？有天灾的威胁，有人祸的骚扰，重要的还有自己作务上的不周和管理上的失算。

像农民对于土地上的丰收的追求一样，我总是企图在自己的“土地”上翻耕得深一些，匀一些，细一些，争取创作上的丰收和优质；可是，从获得的成果看，仍然有歉收，有次品。

然而，农民有一种极可贵的品质，决不以一料庄稼的丰收或歉收而自足，而一蹶不振。他们总是把更大的希望寄托于继来的春天，总

结了本年里的得失，记下了教训，更加辛勤地劳作，不断地提高耕耘土地、培育新的绿色生命的能力，满怀信心地争取又一个丰收的秋天！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的愧疚不安的心绪消除了。应该聚足力气，去争取又一个秋收了，而春光是短暂的！

1981年3月26日 灞桥

看《望乡》后想到的

《望乡》影片的热潮已经过去，关于《望乡》影片孰优孰劣的争论也已平息，我来凑热闹，显然已经不是时候。我的一点感想，却是与影片本身关系不大的题外的话。

许是因为职业的关系，我对影片中的记者（实际是作家）的采访活动很感兴趣。我常常苦于在生活中发现不了“金子”（细节），也苦于访问中得不到被访问者内心里头的东西，倒是想看看：这位作家怎样从一个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口里，了解到了那种难于出口的往事。

作家离开她的温暖的家庭、丈夫和孩子，飞到九州。在小饭铺的一次邂逅中，结识了阿崎婆。她跟她来到偏僻的山乡。她和她住在茅草屋里，睡在光板床上铺着的草苫子里，有毛毛虫蠕动。她跟她吃土豆拌就的米饭。她和她一同下河捞菜。已经做到同吃同住同劳动——“三同”了。到影片结束前，作家要离去的时候，她流泪了，阿崎婆则放声长哭，可见已同感情了。这就够“四同”了。

我不知该片的作家是否系日共党员？是否学过《讲话》？是否受中国对干部“要坚持与群众‘四同’”制度的启发？没有资料可以证实这一点。开一个不是玩笑的玩笑罢了。

我所看见的事实是：《望乡》的作者去南洋，是自觉自愿去的，要了解日本妇女运动的历史。她睡在有毛毛虫的床板，没有跳起来，也没有忸怩作态，更没有闹小姐情绪。尽管粗糙的米饭下咽困难，仍然是安静地吃下去；那碗筷肯定没有消毒，也没有用开水烫一烫……作家对阿崎婆的整个采访过程中，看不见上流社会的人与社会底层人

之间的隔膜，也看不见一个无论社会地位抑或经济地位都比一个老妓女要优越数倍的人的傲慢与自恃，相反地，倒是她处处谦恭自检，像个担惊受怕的小媳妇……

她终于了解了阿崎婆的身世……

她终于写出了《望乡》！

一部《望乡》，揭示出日本现代文明的起因，透视出日本妇女血泪交织着的历史，创造了阿崎婆这样一个活生生的形象。除了作家的艺术天才之外，还有她与受苦的人民共着感情这样一条。她的艺术天才只能使她得心应手地剪裁编织这个故事，却无法编出阿崎婆这个人许多独特的个性细节：她的走势，她的坐姿，她在新铺的毡子上像小孩一样打滚……这些细节，任何天才也编造不出来，我相信作家是在与阿崎婆的生活中观察入眼的，进而落到纸上的。

表现手法可以变，千变万化，千方百计，这样那样，都可以。但是，没有对实际生活的独立见解，对人的深刻了解，怎么变也变不好。纸糊的衣服，式样再时髦，总是穿不得。只有在衣料上动剪刀，才能裁剪出衣服来。中国人的恋爱方式，实际上也不知是怎么恋的，一上电影全都成了神经病：又跑又追。这部片子是男的跑，女的追；那部片子就变成女的跑，男的追；再一翻新，你们在地上跑，我们就跨上马跑、追。再下来该怎么办呢？怕是要驾上喷气式飞机追了！最近看过一个新上映的电影×××××，人物之矫揉造作，无病呻吟，“无情人硬配亲眷”。看来真叫人难受，很难相信这样貌似时髦，实则是拼凑的作品，出于一位久负盛名的作家的笔下，更使人怀念他的那些结结实实的作品。可见，即使有天才的人，一旦生活库存空了，也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

有趣的是，去年在《大众电影》上，读到柯岩写的出访日本时会见《望乡》原小说作者山崎朋子的文章，说在作家的住室里，就挂着她和生活中的阿崎婆的合照，背景是小河上的桥栏，可见影片中的那个细节乃是真实发生过的。由此可以想见，作家与阿崎婆共同生活的那些细节，大约都不会是灵机一动编派出来的……

看来，作家要写小说，要编剧本，要创作电影剧本，就得深入生活，了解生活，了解人；不应该是救世主式的对下层劳动者的怜悯，而应该是普通劳动者与普通劳动者的同舟共济。毛主席在《讲话》中关于“到火热的生活中去”的意见，不是对中国作家的苛求，而是切实可行的路子，是创作的规律。不仅中国许多作家在这条路上做出了杰出的建树，不受毛泽东领导的日本作家，完全自觉自愿地这样做着，做出了成绩。

作为一个观众所能期望于银幕的，是想多看到真真切切表现着中国当代各种人的真情实感的影片，尽量少来点忸怩作态、花里胡哨、与中国人真实生活相去甚远的东西。

1981年9月

和生活的创造者一起前进

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号召作家和艺术家“到群众中去”，“根据实际生活创造出各种各样的人物来”，因为“人民生活……是一切文学艺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唯一源泉”。

这个深入生活的观点，我是经历了几个不同的认识阶段的。首先是在中学语文课本上接受的概念，并无创作实际的切身感受。那时在生活中，是因为家在农村，不在农村不行。有了初步的创作实践，了解到许多著名作家深入生活的事迹，我才清醒地认识到，要创作一部好作品，除了天才和勤奋之外，深入生活大概是一条共同的规律性的路子，是靠得住的路子。作家们往下跑，我自己就置身在生活中，了解生活更方便了。这样，就在自己的生活天地里安下心来。当我在自己的工作和生活的领域里发现了自己的人物，并把这些人物通过作品推到读者面前，受到一些鼓励的时候，我才真正理解了毛主席给艺术工作者指出的深入生活的创作道路是广阔的，也才真正理解了前辈作家刻苦深入生活的奥秘。这种亲身得到的体会给我的影响是巨大的，深刻的，自以为是可靠的，不是某一句时兴的口号所能轻易改变的。

这样，我在自己的家乡工作了十五年，特别是在公社工作的十年里，搞过宣传、种蔬菜、养猪和农田水利建设，干过好事也干过蠢事。要说对中国农村有一点了解，对农民有一点了解，尽管至今仍然觉得是肤浅的，都是在公社的实际工作中得到的。

创作要具备多方面的修养，政治修养、艺术修养，等等。而当这些方面具备了一定的基础，起决定作用的，是作者生活积累的程度如

何，是对时代，对人民群众了解深入的程度。实际生活是丰富多彩、千姿百态的，在重大的社会变革时期，必然引起社会各阶层中的各种人复杂的心理情绪的变化。这种变化，往往是作者难以想象出来的，必须经过对实际生活长期的深入的了解，才可能抓住那些反映生活的闪光的金子。这样，一个鲜活活的主题，一个活生生的人物，就可能产生出来了。生活不仅使作者获得创作的素材，而且纠正作者认识上的局限和偏见。实际生活按照它的规律在运动。它蔑视一切虚妄的不切实际的理论，它给许多争执不休的问题最终做出裁决，毫不留情地淘汰那些臆造生活而貌似时髦的作品。在深入生活过程中，我们往往悟然感叹：原来是这样！偏见和局限打破了，对事物的认识深入了一步。

我们总是想不断地突破自己现有的创作水平，探索新的课题，而基本的一个功力，就是直接从生活中掘取素材的能力。直接掘取，意味着要直接进入生活，不仅是观察生活的旁观者，而且是要和人民一起进行新的生活的创造。我们的国家正经历着一个伟大的历史的转折。我们这一代人，生活在这样一个除旧布新的时代，要努力争取把党领导下的人民所进行的伟大实践充分反映出来，这对于当代，对于后代，无疑都是很有意义的事。

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老一代乡村父老和新一代生活在乡村田野上的兄弟姊妹们，他们希望于我这样一个能写点乡村小故事的作者的是什么呢？我常常反躬自问：我了解他们吗？我了解得准确吗？我写出来的东西有益于他们的事业吗？有益于他们的后代吗？而要做到这一点，切实感到手中这支笔的分量是不轻的。

生活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三中全会以来农村新经济政策给亿万农民带来了创造的活力。我对这种变化认识不足。今天的农民，特别

是年轻一代，与老一代农民也有了许多不同之点。新的生活，新的人物，常常使人有新鲜感，也有陌生感。我已切身感到需要进一步到生活中去学习，去感受，去结识新的人物，创造新的艺术形象，才不辜负时代对我们的期望。

“文学是愚人的事业。”（柳青）扎扎实实，埋头苦干，不务虚名，更不能投机取巧。谁以为自己已经得到了“宝葫芦”，扬扬自得，不可一世，那么文学生命就可能是短暂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要学习，要奋斗，人到中年了。

永远和生活的创造者一起前进！

1982年5月

深入生活浅议

创作需要深入生活。这样一个极普通的道理，我却是经历了较长的创作实践之后，才心悦诚服地接受了的。

开始接触深入生活这个概念，是在中学念书的时候。当时的兴趣开始偏重于文学，主要精力和用心，都集中到阅读中外文学作品上，寻求潜藏在那些优秀作品中的艺术技巧，而并没有注意和考虑深入生活的问题，以为那是对专业作家讲的，自己生在农村，长在农村，不存在深入不深入的问题，一切取决于写作技巧的提高。这样盲目的认识，在较长一段时间里，影响着创作的进步。

后来有机会到公社工作，而且担任了一点职务，一下子卷入一万多人口、二十多个大队的矛盾漩涡中。工作任务迫使我调查研究一些村庄的历史和现实的演变过程，人事的，政治的，经济的；工作任务迫使我接触了农村各级干部和社员，也接触上级领导部门的各种人。这些人，有各自的独特的命运、性格、教养，以及对诸种问题的态度。我与他们发生的是工作上的联系，有时争论，甚至争执不下。有的交往多了，逐渐产生个人感情上的联系，他们的喜悦、苦恼、幸运和不幸往往波及我的感情。

十年动乱中的农村，问题错综复杂。公社干部最耗费精力的，是生产大队里瘫痪的领导班子。我常常从这个村赶到那个村，去解决此类问题。造成领导班子瘫痪的带有普遍性的一个原因是不团结。而一个大队或小队的两位主要领导者的团结问题，除了反映在他们个人的缺点和毛病这些表面现象之外，往往牵扯着整个村子的历史纠纷，历

次政治运动在他们身上或明或暗的投影。尤其是“四清”运动和“文化大革命”，新的派系和老的宗族关系错综交织到一起，形成许多微妙的关系。表面上的一句无关重要的话语里，隐藏着运动中造成的死仇，波及子孙后代的关系中。为了尽可能完满地解决问题，需要了解，需要调查，需要分析。这样，渐渐地，我对家乡农村的现实有了一点认识，对七八十年代的农村的农民也有了一点认识。把自己在生活中接触、发现的人物，通过作品推到读者面前，受到一些文学前辈和读者的鼓励。这时候，我才认识到，深入生活才是创作切实可靠的路子，也才理解了柳青为什么长期居于长安农村的奥秘。我想，一部好作品的产生，除了天才和勤奋之外，深入生活大概是一条共同的规律性的路子。

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经历的独特的道路。有某些共同点，也有许多不同点。就自身而言，总是企图选择一条适宜于自己创作发展的路子，尽可能可靠的路子。尽管不可避免地要走一些弯路，总希望少走一些。这样，需要学习和借鉴别人的经验，也需要总结自己的教训，特别是后者，那些自己学习创作以来的得失，对于选择而后的路子，就带有更切近的意义。比较冷静地总结自己的教训之后，实践本身给我的影响是深刻的：坚持深入生活而进行创作，这条路子对于我是适宜的，可靠的。

近三四年间，我离开了公社的具体工作岗位，时间是充裕了一些，得以把多年间的生活积累写成习作。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我感到空了，也感到某些气力上的不足，加之这三四年间农村生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我切实感到需要立即进入生活。今年春天，我随区委工作组下乡，在渭河边的一个公社里落实中央关于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有关政策，钻进矛盾之中，有了对今天农村的直接感受，心地充实了。

生活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三中全会以来，农村新经济政策给亿万农民带来了创造的活力。今天的农民，特别是年轻一代，与老一代农民有了许多不同之点。新的生活秩序，变化中的人与人的关系，新的人物，新的问题，常常使人有新鲜感，也有陌生感，切实感到需要到生活中去学习，去感受，去结识新的人物，才能创造富有八十年代特质的农民形象。

创作要具备多方面的修养：政治修养、艺术修养等等。而当这些方面具有了一定基础，起决定作用的，是作者生活积累的程度，是对时代发展的把握，对人民群众心理情绪深入了解的程度。特别是在重大的社会变革时期，必然引起社会各阶层中各种人的复杂心理情绪的变化，这是由他们所处的政治经济地位以及个人独特的生活经历形成的独特的心理变化，作家只有深入到这些人中间，对他们作历史的和现实的深刻了解，才能得到自己对生活的发现，才能抓住反映生活的闪光的金子。我以为，作家深入生活，认真地研究生活，在自己的生活领域里有了独自的发现，通过作品发出独特的声音，也许能逐渐根除文坛上频频而起的“一窝蜂”“雷同化”的现象。

有一件事，我印象极深。有个周末回到家里，公社连通各村各户的有线广播上，公社党委书记正在做检讨，检讨自己在极左路线指导下开展的“学大寨”运动中犯过的错误。我站在院子里，心里很不安，他做的那些错事，我在和他共事的时候，间接直接地一起参与执行过，我也应该承担自己的责任，而且感到了心理上的压力。我的父亲听完后说：“共产党还是共产党，自家揭自家的短，百姓倒没气了。”第二天，在村子里，又听到不少反映，有人说：“过去那么厉害，现在做检讨哩！”也有不少人说：“这人到咱公社，还是把力出扎咧！”而且

列举出他干的许多好事来。我的心里愈加不能平静，我们的农民多好啊！他们对于干部的错误所造成的损失，容忍的胸怀够博大的了。

在极左路线指导下，“学大寨”运动中，有一些人利用那个运动，搞“一刀切”，搞浮夸，干了不少坏事，除了许多社会原因之外，有一个个人品质的主观因素。又有一些人，主观上想为农民干些好事，因为指导思想的偏差，也干出许多错事和蠢事来。前一种情况的作品写得不少，后一种情况就不多了，我根据自己对这方面的生活感受，写出了《苦恼》和《土地诗篇》。

生活按照它的规律在运动。生活现象纷繁复杂。我们总是企图了解生活，了解社会，研究生活，研究社会中的种种人，触摸到生活的主动脉，这是十分困难而又费力的事。看见了生活现象，理解不深，仅仅只能反映生活的表象，或者把文学作品变成图解一项具体政策的简单的模式，人物成了具体政策支配下的传声筒，人物的活的灵魂没有了。因此，需要学习理论，学习哲学，学习历史，增强理解生活的能力，对不断发生着的生活现象，能有较深一步的认识；对生活发展的趋势，有一个总体的把握；有这样的对时代特质的把握，对纷繁的生活现象就能深入一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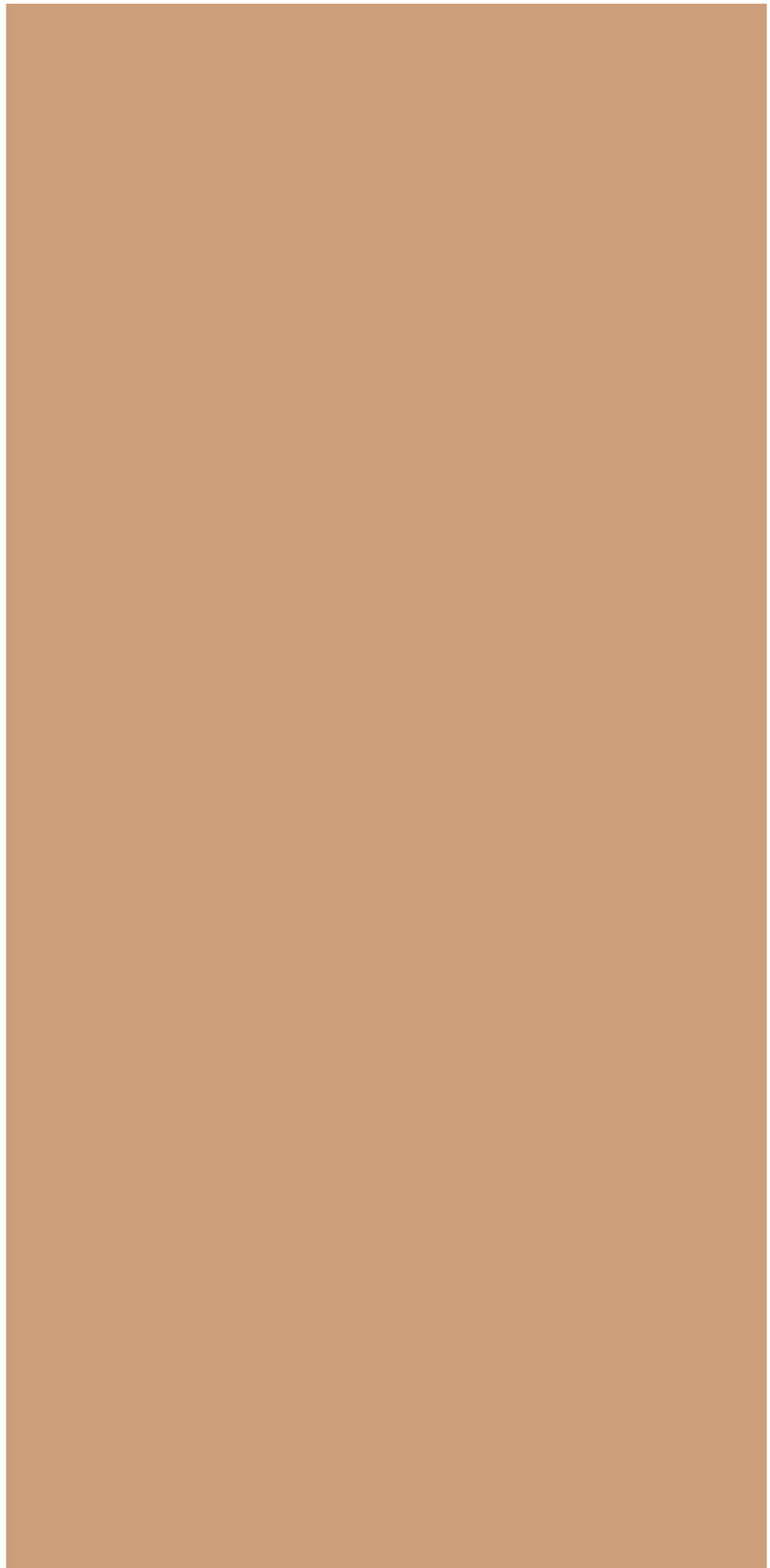
创作的唯一依据是生活。是从发展着运动着的生动活泼的现实生活中直接掘取原料。尊重生活，是严肃地研究生活的第一步。尊重生活，就可能打破自己主观认识上和个人感情上的局限和偏见。生活不承认任何人为地强加于它的种种解释，蔑视一切胡乱涂抹给它的虚幻的色彩，给许多争执不休的问题最终做出裁决，毫不留情地淘汰某些臆造生活而貌似时髦的作品。

每个作家都有自己深入生活的方法和习惯，我觉得有一块生活根据地为好些。

在一个生活基地里，有较长时间的乃至终生的联系，可以对这一块土地上的人物，老一代和新一代，不断地加深了解。生活发展了，这些人发生着怎样的变化，自己会不断地获得新的印象。中国农村，领域辽阔，农林牧副渔，分工不同，习俗各异，但都是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活。一个县或一个公社，一定时期人与人的关系，一些人的情绪变化，总是带着社会的特征，反映着时代的色彩。我们从南方的陈奂生身上，同样亲切地感受到自己身边的北方农民的气质。吃透一个点，就为我们透视整个农村提供了一个天窗地孔。为了不至造成狭隘和局限，还要接触和了解广阔的社会生活，特别是今天，城乡、工农，许多领域的生活已经有了千丝万缕的联系。

深入生活，应该想方设法有一个具体的位置，争取卷进漩涡的中心，和生活的创造者一起生活，一起焦虑、苦恼，避免从上往下，从外往里地看生活。做生活的主人，不做旁观者。作家是社会的普通一员，有权利也有义务和人民的心息息相通，自觉抵制自己思想中某些不纯正的东西，才能感受时代和人民的脉搏，不断发出自己的歌唱。

1982年12月



第 1 卷　1978—1982

第 2 卷　1983—1984

第 3 卷　1985—1986

第 4 卷　白鹿原

第 5 卷　1987—1994

第 6 卷　1995—2000

第 7 卷　2001—2003

第 8 卷　2004—2006

第 9 卷　2007—2009

第 10 卷　2010—2015

第2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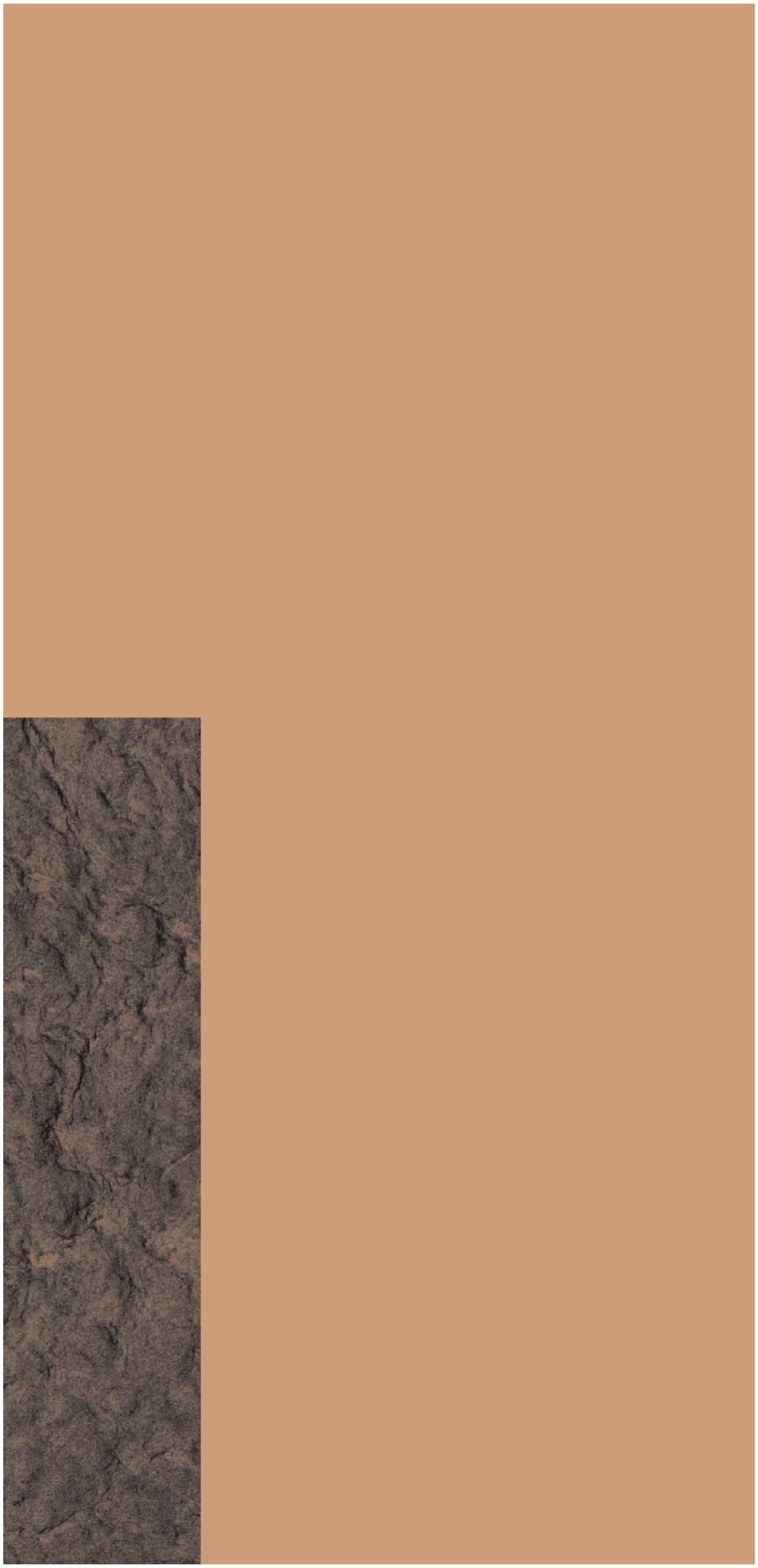
1983—1984

陈忠实文集

增订本

陈忠实

人民文学出版社



陈忠实
文集

增订本

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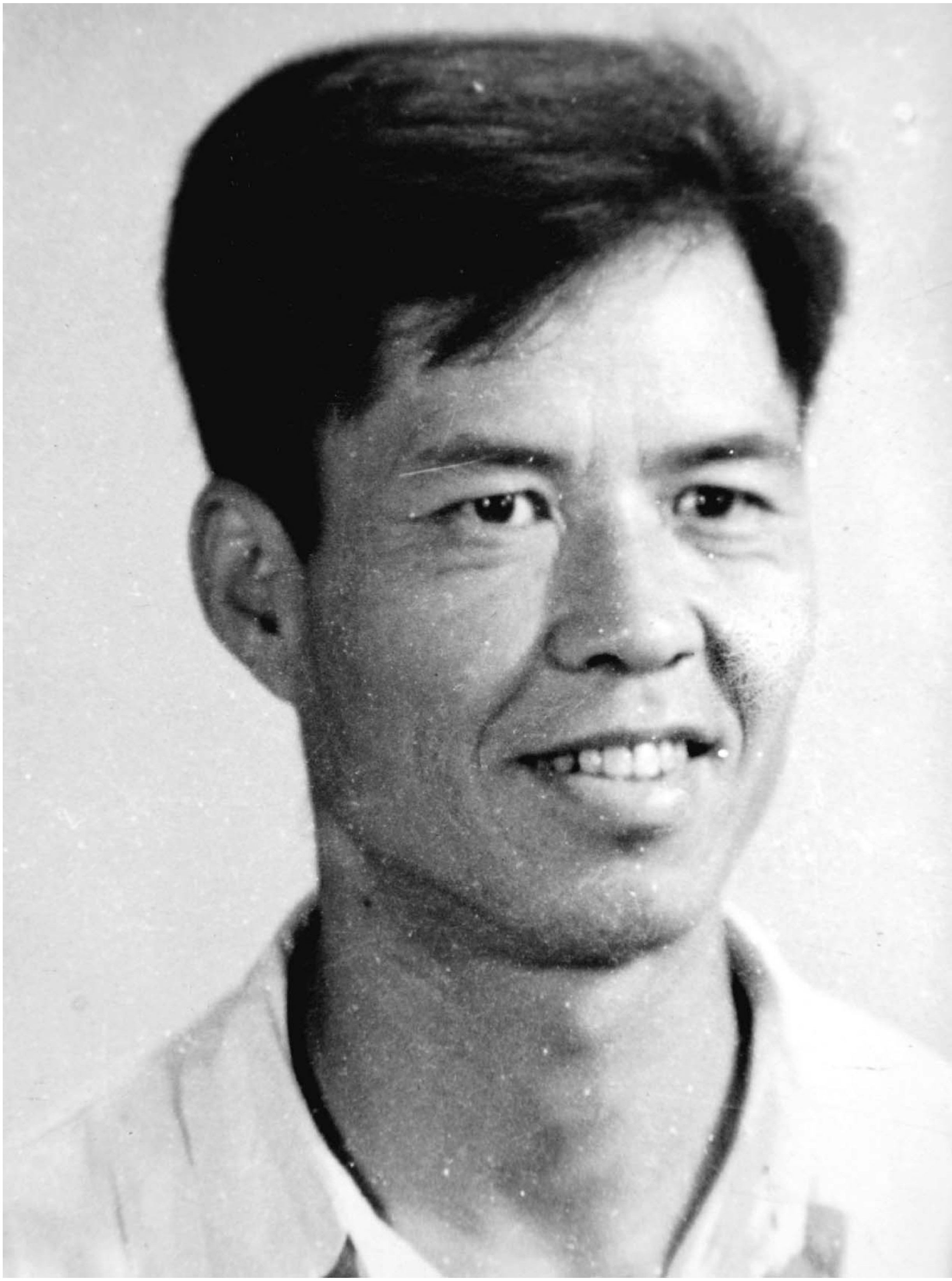
2

卷

1983—1984

人民文学出版社

文前插图



- 中篇小说
  - 初夏
    - 第一章
    - 第二章
    - 第三章
    - 第四章
    - 第五章
    - 第六章
    - 第七章
    - 第八章
    - 第九章
    - 第十章
    - 第十一章
    - 第十二章
    - 第十三章
    - 第十四章
    - 第十五章
    - 第十六章
    - 第十七章
    - 第十八章
    - 第十九章
    - 第二十章
  - 梆子老太
    - 引子
    - 一、梆子井村的梆子老太
    - 二、“盼人穷”

    - 三、艰难时月
    - 四、真成了一种毛病
    - 五、梆子声声里
    - 六、报复事件
    - 七、光荣的孤立
    - 八、梆子声声响
    - 九、春天的梆子井
    - 十、跌落
    - 尾声
  - 十八岁的哥哥
    - 一
    - 二
    - 三
    - 四
    - 五
    - 六
    - 七
    - 八
    - 九
    - 十
    - 十一
    - 十二
    - 十三
  - 夭折
    - 一
    - 二
    - 三

        - 四
        - 五
        - 六
        - 七
        - 八
        - 九
        - 十
        - 十一
        - 十二
        - 十三
        - 十四
        - 十五
        - 十六
        - 十七
- 短篇小说
    - 旅伴
    - 送你一束山楂花
        - 一
        - 二
        - 三
        - 四
        - 五
        - 六
        - 七
        - 八
        - 九
    - 马罗大叔

    - 鬼秧子乐
    - 田雅兰
    - 拐子马
- 散文·特写
    - 诗情不竭的庄稼汉
    - 鲁镇记行
        - 百草园的月色
        - 在“咸亨酒店”
    - 一九八三年秋天在灞河
- 言论
    - 突破自己
    - 从昨天到今天
    - 关于中篇小说《初夏》的通信

中篇小说

初夏

第一章

冯家滩第三生产队副队长兼砖场场长冯德宽，夜晚宿住在油毛毡搭顶的制砖机房里。知更鸟尖锐响亮的叫声把他吵醒了，跳下用架子车搭成的床铺，他便提着裤子走出机房。被引来和泥制坯的泉水，从砖场背后的坡沟间流下来，一夜之间，水池里便聚起了满满一汪清水。德宽撩起水，洗着手脸，然后站起身，从腰间扯开缠着的蓝色布带，一边擦拭着手脸和脖颈，一边眺望着小河川道里初夏黎明时分十分迷人的景致。

秦岭东山群峰的巅顶，清晰地映现在蓝色的天幕上，夜的帷帐正从那里徐徐消退。稀稀落落的星星暗淡无光。乳白色的水雾，在已经吐穗扬花的麦田里浮游。沿着河堤和灌渠排列着的高大的白杨林带，在清凉的晨风中发出呼吸一般轻微的吟唱。知更鸟儿吵闹不休，追逐嬉戏。坐落在黄土原下、小河岸边的冯家滩，一座座被榆树、槐树和椿树庞大的树冠笼罩着的庄稼院，开始从夜的沉寂中苏醒过来。

河川的姿容是这样的优雅，空气是如此的清新湿润，使一切雄心勃勃的人脚步更觉轻快，也会使一切备受艰辛磨难的人顿然充满希望，感奋起来。

德宽使劲擦拭着结实的胳膊和粗壮的脖颈，胖胖的脸颊被搓擦得变红了，突出的前额闪闪发亮。他把蓝布带子重新结扎在腰里，就朝坡根下走去——他要找的负责烧火的郭师傅住在窑洞里。

去年腊月，他和马驹、牛娃组成了冯家滩第三生产队的队委会，雄心勃勃地要干一番事业了。他兼任砖场场长，砌窑，安装砖机，制坯……跑了多少路，费了多少唾沫儿，受了多少白眼，遭遇了多少难场，现在都没有计较的必要啰。无论如何，砖窑砌起来了，砖机运转起来了，光滑油亮的砖坯流水一般从砖机里推出来了。装窑了，点火了，一炷滚滚浓烟，在冯家滩村东的原坡下腾起，惹得邻近村庄里的庄稼人仰头观看……今天终于要揭窑亮宝了。

德宽从垒满砖坯的场地上走过去，心里是一种胜利者的喜悦和暗暗的担忧。他巴望一打开窑门，就看到一片红红亮亮的新砖；要是烧出一窑半生不熟的夹生货，会使人多么扫兴——新砌的砖窑烧第一窑砖，是常常会烧出不理想的残次货的。

烧窑的郭师傅站在自己住的窑洞外的场地上。烟锅的火光在微明中一闪一亮，平静的咳嗽声，使德宽的心里顿然安稳了。这是他们掏一百二十元月薪聘请的河南人。合同上明白地签订着这样一条：一级砖保证达到百分之八十以上，否则按比例倒扣工资。他不操心行吗?

“郭师傅，今日开窑吧？”

“开。”

郭师傅简短、平静的回答显示着自信。他至今不知烧过多少窑新砖了，早已司空见惯，平平常常。可是对于冯家滩三队砖场场长冯德宽来说，却是第一次看见自己所负责的队办工场出第一窑产品，心里

的兴头儿怎么也抑制不住。他仍然忍不住问：“成色不会赖吧？”郭师傅鼻腔里发出两声轻淡的笑声，仰起头看着东山顶上出现的淡红的霞光，不屑于回答了。德宽反倒笑了，心里更觉踏实了。

这当儿，一帮一伙男女青年从村口通砖场的大路上走来，围住德宽，乱哄哄地嚷嚷说，在县饮食公司当经理的冯安国，今天给小儿子娶媳妇，邀请他们去帮忙，去助兴，不去要伤乡党情谊哩……

德宽记起来，冯安国的儿子昨天后晌亲自跑到砖场来，邀请他今天去参加婚礼。他只是牵挂着那一窑新砖成色的好坏，把这样的喜庆大事忘记了。

“咱们今天开窑呀！”他说。

“迟开一天怕啥！”一片呼声。

砖场场长为难了。开窑推迟一天，整个生产计划就可能受到影响：麦子眨眼就要黄了，而五月的关中，常常是阴雨绵绵，能保证赶搭镰割麦之前，把第二窑砖坯装好，点起火来。可是，乡党情谊也要紧呀！甭说像冯安国这样有头脸的人物，即使是冯家滩很不起眼的庄稼人给儿子操办婚事，也得热情相帮——人一生能办几回婚丧大事呢？面对年轻人期待的眼光，中年汉子冯德宽，略显筹思之后，胡子拉碴的四方脸上，显出温和而又宽厚的笑容，对他的工人们说：“应该去，真个。只是老冯家用不了这么多人去帮忙，是不是去几个人代表一下大家的心意，剩下的人……开窑……”

年轻人不吭声了，你看看我，我瞅瞅你。那是不满意的明显表现，却不公开顶撞领导者的话。德宽心里一动，整个春天里，这一班年轻人，在他带领下，和泥、制坯、装窑，确实把力出了，把苦吃

了；借着冯安国给儿子办婚事的机会，让他们畅快地歇息一天，到冯安国家去凑热闹，甭窝了小伙子们的兴致，也甭使冯安国疑心他给他难看，乡党情分不敢马虎。他把手一挥，喊一声："放假！"这时候，分工负责农业生产的副队长牛娃，已经走来了。

牛娃脸上是一派奇怪的神情，大声宣扬说："哈呀！冯经理大人给娃子完婚，好大的派势！冯家滩一百五十多户人，人家不管谁家行不行份子礼，挨家挨户一齐请。羞得好多没钱行礼的人失急慌忙借钱哩……"牛娃说得兴起，在德宽的肩膀上砸了一拳，扬起粗大的手掌比画着，"德宽哥，人家准备待八十席客，光猪肉买下一百五十斤……"

牛娃的口气和语意间流露出的嫉妒和不满，太明显了。德宽怕他说出更难听的话来，就说乡党情谊还是要照顾的，他想给工人放一天假，马驹队长不在家，逢事他俩得多商量。

"放放放！放假！我那儿的棉花移苗也停了。"牛娃反而声音更大，带着一股气，长胳膊一挥，嘻嘻哈哈对周围的年轻人说，"走吧！到冯大人家过生日去！人家从县城饭店带回来高级厨师，油水厚哇……"

德宽让年轻人去了。看看脸上仍然呈现着嘲弄神色的牛娃，他把话岔开了："咱们马驹不知……"

"他妈的！官大了，家发了，荣耀祖先哩！"牛娃反倒毫不掩饰地骂起来，"害得咱们砖场不得开窑，农活也停了。"

德宽宽厚地笑笑。牛娃二十五岁了，仍然是光棍一条，看见人家娶媳妇，心里难受哩。其实冯安国一家从来没惹过他，更没伤害过他。冯安国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先后在城里参加了工作，每一次，都

要招来牛娃的嘲骂。他嫉妒，他愤恨，他猴急干叫唤罢了，冯安国照样当县饮食公司的经理……德宽有意谈起砖场的令人鼓舞的情况，好使牛娃回到自己应当关心的事情上来。果然，牛娃渐渐安静下来，兴致很高地猜想估摸着，马驹现在该进山了？到了种牛养殖场了吗？他可是鸡啼时分就从家里动身的……

“甭操心。马驹办事稳当着哩！”德宽说，“先前说妥了的事，不会出麻达。你倒是应该把草料准备好，顶好割些青草……”

天已大亮，东山群峰燃烧在火一样红的朝霞里，轮廓反倒模糊了。两位副队长的心思，一下子飘到陌生的秦岭山里去了。按照已经交涉好的协议，种牛繁育场同意把冯家滩三队作为优良的秦川牛繁育点，今天他们的队长马驹去赶种牛回来。

“德宽哥，牛娃哥，”冯安国的大儿子什么时候来了，站在跟前，满面笑容地邀请他们三队两位副队长，“俺爸叫我来请你俩……”

“噢……好好……”德宽诚恳地笑着，盯着这位已经在县城工作、结婚而且有了孩子的青年，客气地说，“你先回，我随后就来。”

“大家都去了，就差你俩……”

“俺俩去一个——德宽去！”牛娃仰起头，像分派什么工作任务似的说，“我还有事哩！”再不容别人分辩，他扯开长腿就走了，这个拗家伙！

“好。我马上来。”由于牛娃生硬地拒绝、走掉，德宽变得更加真诚，以便使邀请他的人不感到难堪，“我去给郭师傅招呼一下。”

冯安国的大儿子匆匆地朝村子里走去，因为牛娃的不友好而显现在脸上的尴尬神色瞬即消失了。德宽心里也舒展了。他的心性跟他的名字完全一致——德行宽厚。他和媳妇兰兰过着自家的日月，穷虽穷到叮当响，却不像牛娃那样嫉妒任何比他宽裕的人家。冯安国的三个儿女一个一个通过合法或不合法的渠道进城参加了工作，每一次都在冯家滩村里引起一阵又是眼红又是忌恨的声浪，而冯德宽脸面上却安之若素。他想，自己没饭吃，不必仇恨人家手里端着碗嘛！他虽然一年四季吃着无法计算营养成分的粗食淡饭，胃口却很好，饭量惊人，身体十分壮实，脸膛胖乎乎的，浓密的串脸胡须也遮掩不住赤红的脸颊，眼睛里永远是平静踏实的神色。

在就任三队副队长兼砖场场长之前的十余年里，他是三队的磨坊主人，一年四季扑一身细茸的面粉，给这家那家加工粗粮和细粮。这个容易引起纷争的磨坊，自他当家以后，常常伴着嘎嘎轧轧的机器的响声传出嘻嘻哈哈的女人的笑声。他能教那些歪鼻斜眼的麻迷婆娘喜笑颜开地背上面袋走出磨坊，再把又一位扛着麦子的家庭主妇迎接进来。大家都觉得他人好心好脾气好，却不大注意他还有更高的能耐，而当马驹把他安排到新开办的砖场当场长以后，他的本领大放光彩了。旁的不说，单是那一帮小伙子，那是连大队的干部们也觉得头疼的人物，在他手下，一个个却全都成了砖场里的干将。这一点令冯家滩人人佩服。

他要到冯安国家帮忙、助兴去了。当他走上沟泉上的小土桥的时候，心里不禁油然生出一股怨气来。冯经理呀冯经理，你鼓捣三个儿女参加了工作，乡党们背地里骂你哩！你给儿子办婚事，这样大操大办，是想捂乡党的嘴呢，还是显示你的荣华富有呢？无论出于哪种意思，都不好哩……

第二章

冯家滩党支部书记冯景藩老汉今天成了全村起得顶迟的一个人。在屋脊上空追逐嬉戏的知更鸟的叫声，没有惊动沉沉酣睡的老汉，村巷里两声响亮的汽车喇叭的鸣叫，却终于把老支书惊醒了。

老汉睁开眼，透过后墙上的木格窗户，看见后院里那株缀满红色的花蕾的石榴树上，已经洒满初夏清晨明丽的阳光了；麻雀在残挂着枯黄榆钱的树枝间跳跃，吱吱喳喳吵闹不休。怎么睡到这个时候呢！他急忙翻身坐起，穿上夹袄，突然觉得头晕，眼涩，四肢酸软，心里烦乱。这才想到，昨天晚上，翻来覆去，辗转反侧，几乎整整一宿没有合眼，直到知更鸟儿在屋脊上空叫起来的时候——那是勤劳的庄稼人起床的时间，他才迷迷糊糊地睡着了……

昨日后晌，冯家滩大队三个生产队的六槽牲畜中的最后两槽牛马，分给社员拉回自个家里饲养去了。原坡和河川的全部旱地和水地，在此之前，也已按照人口和劳力分配给一家一户经营耕种了。土地和耕畜，作为冯家滩大队的集体经济的基础，现在分配完毕了。而当这一复杂、琐碎、麻缠的分配工作完毕以后，主持整个大队进行这项工作的党支书本人，反而有一种无法排解的失落感了……

景藩老汉不紧不慢地结着夹袄上的布纽扣，顺势靠在身后的墙上，不急于下炕了。现在，忙着起来做啥？一家一户种庄稼了，还要党支书操什么心呢？

昨日午饭后，第二生产队的男女社员，老人娃娃，媳妇姑娘，不用打铃集合，也不要干部吼喊催促，一溜一串拥到二队饲养场上来了。队长简单宣布了牛马分配办法，就拿出早已制作停当的纸团，放

在一只瓷碗里，让各家各户的男主人或女当家抓阄。一只只粗壮的庄稼汉的黑手，迫不及待地又是抖抖索索地伸到瓷碗里去了，随之就是一声愉悦的欢叫或是一声难受的吁叹。抓到“实阄”的人笑嘻嘻地按着号码到槽头牵出牲畜来；抓到“空阄”的人有的一拍大腿懊丧地走掉了，有的眼馋地去品评人家拉到手里的牛马。整个饲养场的小院和拴牲畜的场地上，三人一堆，五人一伙，围着一头牛或一匹马，议论着价值的合理性，把主持这场分配的大队领导冷落到一边去了。

景藩老汉甘愿领受这种冷落。他在队长宣布了抓阄分配的办法之后，干巴巴地讲了几句注意事项，就远远地走到堆放青草的平场一边，蹲在铡草的铡墩上，咂着短管旱烟袋吸烟，没有一丝兴致参与对任何一头牲畜的品评和议论。

老汉心里难受啊！二十六年前，年轻的庄稼汉子冯景藩，不分白天和黑夜，出东家小院，进西家门楼，熬红了眼睛，嘴唇上暴起一层焦死的干皮，终于说服了一家一户的庄稼人，把自家宝贝似的黄牛或青骡，拉到刚刚盘起的大槽上来了，在小河川道里集合起来第一个大槽的牲畜……二十六年后，仍然由当年的农业社主任冯景藩亲自主持，再把三个生产队的六个大槽百十头牛马，一头一匹折了价，分给一家一户庄稼人，由他们重新牵回自家的小院里去独槽喂养……哦哦！老汉蹲在铡墩上，咂得旱烟锅里吱吱响，心里说不清是一股什么味道。看着那些熟悉的面孔在笑，听着那些熟悉的声音在喊，哪头牛价钱高了，哪匹马的价钱合茬了。老汉鄙夷地瞅着这些人：分给你们的时候，总是嫌标价太高；当初入社合槽折价时，总是嫌价钱合得低……他转身走掉了。

老汉从二队的饲养场转身下坡时，暗暗流出一股泪来，又悄悄用大拇指抹掉了。冯家滩三个生产队的饲养场，都是在他的领导下逐步

由草房换成红瓦砖房的。为了施肥方便，三家饲养场按计划分别从村子里搬迁到向阳的原坡上。每年冬季到来之前，他都要逐一检查饲养场里牲畜过冬的防寒设施：苫盖窗户的稻草帘子织好没有？烧水的地灶盘好了没有？干土准备得足不足？怀犊儿的母牛或母马，“小灶伙食”缺不缺饲料？他是庄稼人，自小喜欢抚弄牲畜；他是中共冯家滩的党的领导，深知这些宝贝牛马在一个生产队里的分量。

岂止是牲畜的安全越冬问题！冯家滩一百五十多户，七八百口人，粮食和棉花生产，社员的生活和分配，再加上连年不断的政治运动，这家那家的纠纷，足以使他从天明起来，忙到天黑，甚至忙到夜深人静，才能落枕。

一晃二三十年过去了，强壮的庄稼汉子冯景藩，已经变成一个两鬓霜白的老汉了。冯家滩耗尽了他庄稼人的黄金岁月，在几乎精疲力竭的时候，却猛然发现，他拽着的冯家滩这辆大车好像又回到二三十年前的起点上……他现在从村巷里走过去。夕阳映照着一座座庄稼院高高矮矮的房屋，狭窄的街巷里，这家那家门外的槐树或椿树的树干上，系拴着一头黄牛或者叫驴，悠闲地甩着尾巴，在夕阳余照里反嚼。这景象，使人一下子回忆起合作化前乡村里的景象。景藩老汉背着手，心里灰败而又空落，匆匆走进了自家的门楼，又一股酸渍渍的东西从鼻腔里泛起来。他揉一揉鼻子，使劲咳嗽两声，没有答理老伴的询问，走进里屋去，也没有吃夜饭，就脱光衣服躺下了。

春节过后，景藩老汉参加了中共河口县委召开的农村工作三级干部会议。无论县委书记的长篇报告也好，农工部长的讲话也好，小组讨论也罢，参观试点也罢，都不能扭转景藩老汉心里那一层看法：单干。“责任制”这个绕口的新名词，老汉总是说不顺畅。他在小组会上仅有的一次简短的表态式的发言里，三次把责任制说成分田单干，惹

得同一小组里的男女干部哈哈大笑。他自己则在心里说，其实就是单干嘛！地分了，牛分了，一家一户自己种庄稼，不是单干是什么！责任制——那是把猫叫成咪，名词不同罢了。

然而，党的决议他总要执行的。会议结束的那天后晌，他把带领他们来开会的河西公社书记老王引到县委党校院子的一棵泡桐树下，真诚地说："我保险赶搭镰割麦以前，把土地和牲畜分到社员户里……"

"好嘛！社员正好赶上种秋。"王书记笑嘻嘻地说，同时提醒他，"甭说'分'，是责任制，或者说承包、包干，不是分田单干。"

老汉嘿嘿笑着，点点头，随即说："责任制落实了，我想……把支书的担子卸了……我老了，跑不动咧！"

"唔……"王书记警觉地瞅了他一眼，表示理解地说，"那你得先给自己找个年轻人呀……你怎么办呢？"

景藩老汉实心实意地说："我想来想去，只觉得公社奶牛场合适。我去喂牛，倒是有经验……"

"可以。"王书记干脆地答应了，"只是你得先找一个接班人……"

景藩老汉早已给自己找好了退路。他睡在县党校印着红字的干净被窝里，想着分地分牛以后自己怎么办。社办砖场、化工厂、钢窗厂和农机修理厂，这些地方他当领导不行，当工人又不懂技术。他瞅中了奶牛场。他可以当一名完全合格的饲养员，挣一份工资，够他老年享用就行了。

得到了王书记的允诺，他回到冯家滩，坚决贯彻执行中共河口县委一九八一年“一号文件”。按照预先的计划，现在还不到夏收，土地和牲畜已经全部分配到户了。等到二队最后分掉这两槽牛马，老汉心里慨然系之：完了！他终于抑制不住心情的伤感，涌出眼泪了……

景藩老汉结好纽扣，下了炕，他想立即到公社去，找王书记，到奶牛场喂牛。土地和牲畜已经提前完成分配下户任务，责任制落实了，至于中共冯家滩党支部的接班人，让王书记派党委干部来选择安排吧！他等不及了……

“安国来过两回了，叫你哩。”老伴从伙房里端来一盆洗脸的温水，提醒他说，“我说你刚刚睡下……安国说叫你一起来就去。”

“我到公社寻王书记去呀！”景藩对老伴吩咐说，“安国有啥事，等我回来再说。”

“你忘了？”老伴仍然和颜悦色地提醒他，“人家给娃结婚哩！”

“噢……”景藩洗着手脸，满是水珠的脸上，显出失误的神情，淡淡地说，“我从公社回来再去。”

“明日到公社去吧。”老伴劝他，“甭叫人家说咱冷淡。”

“冷淡就冷淡！”景藩没好气地说，“人家给娃娶媳妇，我跑那么欢做啥？”

“甭忘了，咱还托人家给咱办事哩！”老伴悄声提醒他说，“你不去不好。”

“不提这事我还不生气！”景藩老汉掼下毛巾，生气地说，“咱托他办的那事，他怕是早丢到耳朵后边去咧……”

去年秋天，儿子马驹从部队复员回到冯家滩，原先订下的未婚媳妇——薛家寺村薛老八的二女儿，提出了苛刻的结婚条件：只有马驹参加了工作才有资格和她去领结婚证。这不过是解除婚约的借口罢了。景藩老汉陷入了内外交困的艰难处境里：出得自己家门，就是督促队长们抓紧分地分牲畜，在那些被自己亲自拔除了界石的大块田地里，重新栽下写着各家户主名字的木桩；回到自家屋里，就看见老伴因为失去未来的儿媳而一筹莫展的愁苦脸相。一九八一年的春天，对于冯家滩那些分到责任田和牲畜的庄稼人来说，是心劲空前高涨的一个难忘的春天；对于党支部书记冯景藩来说，却是太凄苦了！

尽管如此，他不能眼盯着这门亲事告吹。老汉一方面让媒人刘红眼从中周旋、调解，希求打开薛家女子关死了的大门；另一方面，老汉加紧自己给儿子寻找工作的脚步。老汉骑着那辆破旧的自行车，跑到县政府，找到复转军人安置办公室，气喘吁吁地陈述一番，得到的却是严格的、政策性极强的回答：哪里来再回哪里去。他去找县委刘书记，这是河口县的一位老领导人，和景藩老汉相识已久，曾经很赏识很器重全县最早试办起农业社的冯家滩农业社主任冯景藩。刘书记听着他的话，不住地点头，不住地叹气，表示很能理解他的困难，却无法为他农村户口的儿子在城里安排工作。他仍不甘心，找到县饮食公司请冯经理帮忙。乡党毕竟是乡党，冯安国满口应承，而且热情地招待他在县国营第一食堂吃了午饭。他曾经高兴过一阵子。可是时过半年，没见丝毫信息。他忽然想到，人说冯安国是个“谝大嘴”，“应得展，撂得远”，怕是早已扔到耳朵后头了……

“马驹呢？”他记起儿子来。

“到山里买牛去咧。”老伴说，“鸡啼时走的。”

“尽是胡闹！胡整！”老汉气恼地说，“队里现有的牛都分咧，他还买！”

老伴不再说话，她知道父子间在公事上的不和，常常拌嘴。老汉当支书，儿子当三队队长。儿子在腊月里一上台就分地分牛。老汉骂儿子是分田单干，是拆集体化的墙根。不管老汉怎么喊，儿子还是把一捆写着户主名字的木桩栽到三队的耕地上去了。谁料想，麦子刚刚锄罢，老汉自己也领着一队和二队的干部在大田里分地，在饲养场里分牛马。她弄不清公事里头父子间谁个理长理短，一如既往地保持中立，只管给老头和儿子缝衣做饭，给老汉捞一碗干面条，给儿子也捞上一碗干面条，笑盈盈地听那父子两个在方桌对面一边吃饭一边争论。现在，她只是劝老汉：“快去，甭叫安国等急了……”

景藩老汉点着烟锅，虽然神情上仍然表示出对冯安国家婚事的冷淡，还是听顺了老伴的劝告，转身走出门去。

第三章

冯景藩老汉一步跨出街门，耀眼的太阳已经在东原顶上升起一竿子高了。村巷里，土场上，到处走动着穿饰一新的陌生人，大都是安国家的亲戚吧。还不到坐席就餐的时候，他们站在场边上，大声地说笑或谈论，欣赏着刚刚进入初夏时节小河川道迷人的景色哩。好多的亲朋呀！

唔唔！景藩老汉更吃惊了，村子北边空闲着的打麦场上，大卡车、小吉普和明光锃亮的小轿车摆下一长排，是谁在用粗喉咙大嗓门

禁斥乱摸乱动的乡村娃娃……好大的气派呀！

冯安国家门楼以外的半条街巷，已经被本村或外村来的男男女女、老人娃娃围塞满了，简直像河口镇上逢集过会一样。景藩老汉从人窝里挤过去，走到门楼下。黑漆刷过的门板和门框，用红漆勾出笔直的缝线；两条大红对联，足有八尺长，贴在门框两边刷得雪白的墙壁上，嗬呀！冯家滩的庄稼人，谁家贴过这样长的对联！

院子里，撑起一顶绿色帆布帐篷（庄稼人都是用苇席搭棚），遮挡着阳光。庭院四周，悬挂着亲朋乡友赠送的绸缎被面和印花床单，五颜六色，流光溢彩，平时清淡雅静的屋院，现时看去跟百货商店的布匹展销货架一样了。收音机（其实是收录机）播放着欢快的乐曲，渲染着婚事的喜庆气氛。景藩老汉看得眼睛花了，辨认不出自己老伴昨晚送到安国家的那条被面，究竟挂在哪个角落里。

“老书记到——”谁在喊。

忙着和闲着的人，都转过头来和他打招呼。景藩老汉忽然觉得在这样的场合里有点拘束了，不像以往参加冯家滩任何一个小伙子的婚礼时那样从容和坦然。他有点窘迫地走到庭院里，看见一伙人围着小学民办教师在用毛笔记写礼单。民办教师仰起脸，笑嘻嘻地说：“老书记，啥时候给马驹兄弟办事呀？也按冯经理家的这个派势办！”

景藩老汉脸一热，心一沉，扭过脸去了。民办教员并无恶意的一句玩笑话，正好撞到老汉心中的伤疤上头了。老汉走进这个门楼的时光，强烈的现场实景的刺激，早已使他悔愧得难以抬头了。他坐在小学教员写字的方桌旁，悻悻地苦笑着。

“老哥，你怎么坐在这儿？走，屋里坐。”

冯安国站在当面，剃刮得干净的腮帮上泛着串脸胡楂的蓝光，红光满面，两只大眼笑眯眯地瞅着他，实心实意地把穿着黑呢制服的胳膊搭到他的肩头上，亲热地搂着推着他往里屋走去。冯家滩的庄稼人，看着这两个曾经一同在本村创办过农业社的第一任干部，搭肩勾背地走过庭院，纷纷投来奇异的眼光：两人的穿戴和气度，相差太远啰！

接过安国递来的一支黑色机制卷烟，景藩老汉坐下，掩饰住自己灰败的情绪，勉强用恭贺的口气说："百事顺心吧？"

"凑合。"安国矜持地笑笑，头一摆，吁叹着，"嗨！我说叫俩娃把钱带上，到上海、杭州逛一程算咧！现在兴得旅行结婚，也省得家里劳神。老婆子是个老脑筋，非得要在家里办不可。花钱莫说，搅得亲戚朋友不得安宁……"

景藩老汉深深低下头去，洋溢在冯安国脸上和话语里的优越感，是这样明显。人家是媳妇不愁，花钱不愁，仅仅是结婚方式上的一点小矛盾喀！

安国正说到扬扬得意时，有人传报，说是有哪家重要亲朋来到门外了，要他去迎接。

"老哥，你坐着喝茶，抽烟，"安国站起来，无可奈何地摊开双手，叮嘱说，"我一会儿就回来，咱俩好好谝一谝，平时老是遇不到一块儿。"

安国走出门去了。里屋里坐着的人，从服装举止上看，全是在国家单位或机关的"工作人"，只有他冯景藩一个农民老汉。有那么两位干部，他看去有点面熟，只是记不起名姓了。他没有和他们说话扯闲

的兴致，就咂着卷烟，坐在那里，二十多年前的那一段路，现在是这样强烈地从脑袋深处映现出来——

冯景藩二十五六岁的时光，在小河川道里办起了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高鼻梁、深眼窝的年轻庄稼汉子，表现出一种令人尊服钦佩的大公无私的献身精神，热情而又踏实的工作作风。中共河口县委组织部的负责人，早已瞅准了这个优秀的干部坯型，等到冯家滩农业社刚一建立，就给河西乡党支部下了调令，调冯家滩中共党员冯景藩到河东乡任乡党支部书记。即将开始的农业合作化高潮，需要大批得力的干部。

冯景藩接到调令的时候，激动得厉害。党的信任，使这个在旧中国农村遭难受辱的庄稼汉子，心里涌起怎样高涨的革命热情啊！为了一个紧急会议，他几次深夜涉过结了冰的小河，把通知送到河那边去，而不愿意绕道走两里以外的独木桥。从河西乡冯家滩初级农业合作社主任，到河东乡的党支部书记，这之间有多大的台阶，他充分想到了，却不怕。什么不是人学的呢？他已经亲手创办了河西乡的第一个农业合作社，到河东乡开展合作化工作，他心里很踏实，很有信心。

就在他筹思河东乡未来的工作的时候，屋里一下子拥进来农业社的男女社员，乱口纷纷：

“咱农业社刚刚成立……”

“你一走，就怕社里乱套……”

“你迟走一年行不行呢？”

……

冯景藩愣住了，激动得热泪滚滚，大张着嘴巴说不出话。看着那一张张男人和女人以至满腮胡须的老人的脸，他忽然问自己：冯景藩呀冯景藩，你是个什么东西，自个还不清楚吗？缴不出国军捐税粮款，保公所的保丁把你压倒，打断了两根柳木棍子；抓了壮丁，开拔到河南，逃跑时，枪子儿挂着耳朵梢儿，你是重过一世的人。那时候死了你冯景藩，跟踩死一只蚂蚁一样。那时候在冯家滩，你说话不顶财东家放一个屁响。而今你活着，有这么多乡亲离不得你，自己能不理会众人的热肠话吗？他实心实意地对众人说："县委调我哩！事先没跟我说一声，我也实情离不开咱的社……"

刚刚加入农业社的新社员们，还不懂得新社会里干部调动的政策，他们当场推荐出三位社员代表，连夜赶到河西乡乡政府，向中共河西乡党的负责人"进谏"……

乡党支部书记正中下怀，他也担心全乡新建的第一个试点社出现问题而影响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开展，乐得把冯景藩这样强硬的干部留下。于是，他特别加重语气地向县委组织部汇报反映了社员的呼声。县委组织部收回原调令，改调冯家滩农业社副主任冯安国，就任河东乡乡长……

"老哥，你看……本来是调你。"冯安国为难地说，态度十分诚恳，"我的能耐不行……"

"咱俩再甭推让了……快上任去吧！"景藩诚恳地劝说，"咱穷兄弟能有今天，做梦也想不到。党器重咱，社会相信咱，咱在哪里都一样咯！都是党的工作需要。"

……

这是难以补救的一步之差。景藩老汉重新点燃熄灭了的卷烟，轻轻吁出一口长气。冯安国和他年龄相仿，现在当着县饮食公司经理，两儿一女，先后参加了工作，屋里只剩下一个老婆，过着清闲日月，每逢年下节日，儿子领着媳妇，女儿跟着女婿，回到乡下来看望养得白白胖胖的老母亲，院子里摆起一排明光闪亮的自行车……冯安国的小儿子今天完婚，三个儿女的最后一件大事就完成了。冯安国现在过的是一种多么舒心的日月啊，难怪脸膛越来越红润，腰越来越粗，人家操什么心嘛！

景藩老汉现在正陷入内外交困的艰难境地。三十年来，他泡在冯家滩，还是穿着老伴一针一线缝制的黑布夹袄，嘴里填的仍然是苞谷糁子就酸菜。“四清”和“文化大革命”经受的折磨就莫要说起，已经过去了。最使老汉难受的是，两儿一女（和安国一样），没有一个安置到正路上。大儿子是个农民，已经娶妻生子，分居另住，日子过得紧紧巴巴。女儿虽然在社办厂工作，还是吃的农业粮，本质上还是个农民。现在只剩下小儿子马驹，看来也是吃一辈子农业粮无疑了。可恶的薛家寺的薛老八和他的二女子，竟然提出苛刻的结婚条件，欺辱冯家滩党支书和他的儿子，太叫人难以忍受了！

景藩老汉吸着烟，脸上痛苦地抽搐着。二三十年来，他不仅没有实现当初实行合作化时给社员们展示的生活远景，而且把自己的家庭的日月也搞烂包了。无论公私，三十年里，他竟然一事无成啊！坐在里屋里那些前来给冯安国贺喜的人，抽着烟，呷着茶，谝着笑着，令他反感。设在后院里的临时厨房，传来刀勺叮叮当当的响声，滚油的爆响，打诨笑闹的声浪，这些乡村婚事中特有的喜气盈盈的气氛，丝

毫改变不了景藩老汉灰败的心情，反而使他感到腻烦，感到压抑，愈觉难受了。

冯安国跨进门槛，仍然是喜气洋洋地吁声哀叹："嘿呀呀！农村办婚事这一套，太啰唆了。"说着，在景藩旁边坐下来，点燃一支烟，慨然说："你托我给马驹办的那个事，成咧！"

"啊……"景藩老汉猛地仰起头，盯着安国的大眼睛，如此随口说出这样重要的事情，可不是开玩笑吧?

"我们公司新添了一台车，要找一个司机。马驹在部队上开过车，我心里清楚，正好。"安国说明原委以后，就神秘地告诉他，"好多人给我推举司机哩！我一概回绝说，已经找下了……"

景藩老汉激动得简直有点痴呆了。日日夜夜和老伴念叨着的头等大事，急也急过，怨也怨过，恰恰就在他觉得最难受的时候，居然轻轻松松地由安国那两片薄嘴皮说出来。他终于盼到了呀！啊啊！

"订一份合同先干着，等待机会转正。"安国解释说，"县上每年都有一些照顾解决复转军人困难户的招工指标哩。只要他干得好，到时候……"

"安国……"景藩老汉感情真挚地叫了一声，喉头哽塞了，"你给我帮了个大忙……"

"好老哥哩！甭说见外话！"安国义气地说，"我看见你的境况，心里难受哩……"

两人正说着，又有人来传报，说是媳妇快要进村了，要安国去安置诸事，迎接新人进门。

“老哥，你要宣读证婚词。”安国站起来，叮嘱说，“你是地方领导嘛！”

景藩老汉随之走出里屋，身体里像注入了一剂强刺激素。马驹到冯安国手下去开汽车，他将到公社奶牛场去喂牛，再不在冯家滩这个酱缸里搅缠啰！主意既定，从心里到脸上，灰败的情绪一扫而光，腿脚也轻捷灵便了。他站在庭院里，指挥小伙子们挪桌移凳，安排新婚典礼的场所。他又追到大门外，叮嘱挑着一长串鞭炮的小伙子，要掌握好时机，把炮放在新人进门的前几步……

第四章

鸡啼时分动身，搭乘头班汽车进山，喝罢一杯水，吃了两个自带的干馍，从种牛场场长手里接过缰绳，冯家滩三队队长冯马驹，吆赶着八头纯种秦川牛，步行一百多华里，在乡村人吃夜饭的时光，从秦岭北麓浅山区的种牛繁殖场，走回坐落在南原坡根、小河岸边的冯家滩来了。

一路上，怕把这八头宝贝种牛累着，他不敢驱赶得太急太紧；为了防备惹下麻烦，他跑前跑后，用树枝训诫偷偷把舌头伸到路旁麦子地里的畜生。一百多里路走回来，腰酸腿疼，口焦舌燥，他感到累极了。

虽则累点，小伙子的心劲却不见稍减。种牛买回来了，秦川牛繁育点的牌子，明天就可以在冯家滩三队挂起来了，计划中的第二项队办副业也落到实处了。半圆的月亮贴在南原上空的天幕上，河川里弥漫着吐穗扬花的麦子散发出来的气息。蒙蒙月光下，牛娃站在村外沟口的土桥上等候他，嘴里嚼着馍，口齿不清地迎接他说：“呀呀！你跑

得真快！我估摸你得到半夜才回来。”说着，把馍塞进口袋，大声惊呼：“好大的牛啊……”

马驹笑着说：“我一路没敢耽搁。赶着这些活宝，进不成食堂，坐不得茶棚，碰到有水草的地方，歇缓一阵儿，这些家伙又乱跑哩……”

“好咧。你快回去吃饭。”牛娃从马驹手里接过一头公牛的缰绳说，“你吃罢饭，咱还有好些事要商量哩！”

“砖场开窑了吗？成色咋样？”马驹迫不及待地问。

“没开。”牛娃的口气瞬间变冷了，“冯大人给儿子结婚。大家都去喝油水去了！”

“吃一顿好饭，能饱一年吗？”马驹也有点生气，“你给德宽哥说，今晚加班开窑。三拖两拖，赶收麦子前，第二窑货装不进去了。好多事都坏在计划不能执行……”

“好。我在饲养场等你。”牛娃痛快地答应着，接着又神秘地笑着催促，“你快回家吃饭。大叔今日问了我不下八回，早就等你回来……”

“啥事？”马驹才出门一天，想不到有什么事让父亲这样着急，“他没说有啥事吗？”

“依我看……八成是……给你瞅下媳妇了……”

牛娃说着，哈哈笑着，吆赶着牛群朝饲养场走去。马驹走进村子，朝自家门楼走去。

父亲在街门外的皂荚树下站着，烟锅的火星一闪一亮，未等他开口招呼，已经用亲热的口气说话了：“噢呀！马驹回来了，快回屋吃饭。”说罢，抢先几步走进街门，传报式地朝里屋喊，“马驹回来了，赶快给娃下面……”

马驹刚走进院子，父亲又喊：“给娃端洗脸水！”母亲在小灶房里连着应了两声，声调也是欢悦的，马驹怎能让母亲服侍自己这样的大小伙子呢！他赶忙自己打了水，扑哧扑哧地洗着脸。

父子间平日里很少有在一起亲亲热热交谈的时候。他当他的支书，他干他的队长。父亲很少过问儿子在三队工作的成败。无论他外出或者在家，迟回早归，父亲向来是不屑于过问的。父亲今晚的情绪一反常态，这是怎么了？真如牛娃所说的有人介绍对象来了，也不必这样高兴嘛！现在，小院里又传来父亲和母亲的争执：

“给娃捞干面！”

“娃跑了远路，吃汤水面好……”

“小伙子吃汤水面，不耐饥喀！”

“那你去问……看娃爱吃干面，还是爱吃汤水面……”

父亲居然不厌其烦地走到厦屋门口，认真地征询儿子的意见来了。到底是咋回事呀？马驹觉得好气又好笑，随口说：“干的汤的都好。”

农历四月的夜晚，湿润的夜风令人心胸舒畅。母亲把摆着醋瓶盐碗辣子碟儿的小瓷盘，搁到院子里的小饭桌上，端来一碗漂着葱花的

清汤细面。父亲坐在矮脚小凳上，咂着旱烟袋，和母亲同时交口叮嘱他调好调料，菜要多放些，辣子调重些，饭更有味……

整整一天里，马驹啃着自带的干馍，喝着山泉里的凉水，早已渴望有一碗热乎乎的醋辣细面了。马驹喜欢地吃着，满碗漂浮着一层红艳艳的油泼辣椒末儿，喉咙里发出呼噜呼噜的响声，汗水从头上冒出来，浑身都舒服了。母亲看着儿子吃得又香又快，满意地笑着。父亲也笑吟吟地抽着烟，有意等他把饭吃完再说话。

“马驹，”父亲终于忍不住了，欣喜而又神秘地说，“爸给你把工作找下了。”

“啥？”马驹猛地仰起头，停住筷子。从门窗泻到院子的电灯光下，瞅得见父亲喜盈盈的眼睛。这实在是没有预料得到的事情。他惊诧地问：“你在哪儿给我找下工作了？”

“得感谢你安国叔哩！”父亲诚恳地说，“县饮食公司刚买回来一辆新车，需用司机……”

这件事来得太突然。马驹说不清自己是喜是忧，心神慌乱了。是这么一码事！原来是有一颗福星高悬在屋脊的上空，使父亲一扫愁容，喜气洋洋。他自己却高兴不起来。他在三队里刚刚铺展开一大摊工作，怎么能一拍屁股走掉呢！但他又不想使父亲当即扫兴，就低下头，漫不经心地用筷子挑动起所剩不多的面条来。

“这下好咧，马驹！”父亲毫不掩饰心中的喜悦，给儿子叙说早已谋算稳妥的计划，“你一出去工作，就把爸的心病除了。我也走呀！公社王书记叫我到奶牛场去。现时地分了，牛也分了，‘一号文件’我给

他落实了。我去喂牛，吃一碗不操心的饭，算咧！冯家滩……我待得够够的了……”

父亲要到公社奶牛场去，他不阻挡；父亲觉得在冯家滩“待够了”，他能理解。可是，他冯马驹怎能走得了呢？我的天！信用社贷下成万块钱，刚刚从山里买回来八头秦川种牛，准备开办种牛繁育场；新建成的砖场，刚刚烧出头一窑新砖；正在落实过程中的土地、果园、菜地、鱼池、磨坊等等责任承包的善后工作，繁杂而又啰唆……自己铺排下的这一摊子给谁撂下呢？啊呀！马驹在心里哀叹，不大满意地盯着爸爸说：“你让安国叔……给我找工作，事先也该……给我招呼一声嘛！”

“那还招呼啥哩？”父亲立时睁大眼睛，不解地盯着儿子的脸说，“这样的好事，盼都盼不来，还有错？”

“你看，我刚买回牛来，钱花下一河滩，咋弄呀？”马驹为难地说，“我走了，交给谁管？”

“好弄！”父亲口气更干脆，断然说，“社员谁愿意养，就卖给谁；没人要的话，干脆给人家种牛场退回去！”

“说得那么容易。”马驹苦笑着摇摇头，“我跟秦岭种牛场订着合同哩！”

“你本来就不该去买！”父亲似乎动了气，“现时地分了，牛也分了，你还办啥种牛场嘛！”

“土地该分，耕牛也该分。”马驹说。这是自去年冬天以来父子间一直没有统一的矛盾。去年腊月马驹上台当队长的时候，乡村里到处

风传着四川、安徽、河南分田到户的消息，他终于下定决心，在三队实行包干到户了。父亲吓坏了，先是阻挡，后是劝解，父子间几乎失了和气。可春节过后，老汉从县委三干会回来，自己也夜以继日地忙着开会，研究如何分田分牛的事了。生活的急剧变化，把老父亲的嘴巴堵死了，他无法理解这变化，却又习惯于执行上级文件规定的政策。马驹体谅父亲的心情，平静地解释说："种牛场是一项好副业，更该兴办哩。"

父亲的态度更加强硬："你走你的。你去开你的汽车，谁爱办种牛场让谁去办。"

"你……那么高喉咙大嗓门……吼喊啥呀？"母亲斥责父亲，委婉地说，"你跟娃好好说嘛，凡事总得商量……"

"我在冯家滩干了一辈子，落下个啥结果，得了个啥下场，你看不见吗？"父亲不但没有被母亲劝解下来，反倒气更冲了，"你还想在冯家滩干呀？哼！办啥球砖场、种牛场……"

"娃又没说不去嘛！"母亲替儿子说话，"娃只说，那些事情咋样给人交代……"

马驹看着父亲冷峻的脸，克制住自己，把想说的话咽回去了。牛娃还在饲养场里等着哩，绝对不能和父亲在此时吵架。他做出并不在意的样子，轻松地说："即便就是明日去上班，我现在还得去安顿一下，今黑还没人喂牛哩！牲畜不能饿着……"

"你抓紧安顿。"父亲从地上的木墩上站起来，口气缓和了，态度却更坚定了，"这两天，你把自个手里的手续，该给牛娃交代的，该给德宽交代的，都给人家赶紧交代清白，省得自己走了，再找麻缠。"父

亲显然是早在他回来之前，已经深思熟虑过，“你到饮食公司，先做合同工。合同手续，我来办，我在公社人熟，你甭管，我这两天给你把合同关系办齐全，你也把三队的手续交代完了，就去找安国叔上班。”

“噢呀！弄了半天是合同工呀！”马驹故意失望地吁叹，“我还当是正式招工哩……”

“日后有机会就转办正式工人。你安国叔说，县上年年都有名额，解决复员军人当中的困难户。”父亲很有把握地说，“说是这事包在他手上。你想想，他是县饮食公司经理……”

“噢……这样……”马驹站起来，“那我走了……”

“你今黑就跟牛娃、德宽交代手续。”父亲再度催促、叮咛，“事不宜迟，小心中途变卦！”

马驹走出街门。寂静的河川夜空里，传来一声声布谷鸟动情的叫声。生活并不平静。他们这个三口人的小小农家里，现在潜伏着一场不好调节的矛盾哩。怎么办呢?

去年秋天，人民解放军边防部队运输连的班长冯马驹，服役七年，复员回到冯家滩来了。回家的第二天，他带着从新疆带回来的葡萄干、哈密瓜，去看望未婚妻。涉过小河，兴致高涨地走进薛家寺村薛淑贤家的小院，令人难堪的事情在毫无准备的时刻发生了。

“你怎么复员了？不是说你提干当排长吗？”

“没有……我没说过这话……”

“刘红眼骗人！”薛淑贤气得脸色变黄了，“原先订婚的时候，他说你马上就是排长了。原来是骗人！”

马驹张不开口。他不知道介绍人刘红眼曾经给人家说过这号话。他在部队时，确曾有过想提他当排长的事。但他最终被挤掉了。他没有对她说过，连给父母也没有说过呀！他看着薛淑贤那气恨的脸色，心里的火直往喉咙眼里蹿。民办小学教员，在乡村里算是令人羡慕的职业，有可能转为国家正式教师。他复员时曾经暗暗担心过，人家会不会弹嫌他一个农民呢？可是万万没有料到，刚一进门就听到这样的绝情话。共产党员冯马驹，即使务庄稼当农民，也不能忍受这样辱贱！他一句话再没说，转身走出门去了。

生活的艰难，何止是婚姻上的挫折！队里穷得拿不出给牲畜抓药的钱。挣这样的劳动日有什么心劲嘛！不到年终决分，社员纷纷议论要改选，大家把眼睛瞅到他身上了。

“不干则罢，干就要干出个名堂来。”他对另外两位新当选的干部牛娃和德宽说，“不然趁早就别干。”

三个人居然出了掌，有一点桃园三结义的架势。三只手攥在一起，他慷慨陈词：“咱们这是背水一战哪！人家瞧不起农民，咱们可不能自己瞧不起自己啊！三年改不了三队的旧局面，我要求公社党委取消我的党员资格……”

土地和牲畜包干到户了，三队的社员简直跟疯了一样，趴在自己的责任田里下功夫。问题也很快暴露出来，整个麦收前漫长的春季里，劳力闲下了——土地面积太窄了，不够一家男女劳力干呀！他提出办砖场，足以使三队的小伙子和姑娘们有出力挣钱的场所；他的一

位老连长复转到地方工作后，安排到秦川牛繁育场当场长。因为这点关系，老连长给他们提供了方便。这是两项好副业。砖场办起来了，种牛场也办起来了，当他的改变三队穷困局面的计划刚刚展现出令人振奋的开端时，父亲却要他去当工人。

月影婆娑，村外隐隐传来德宽呼喊什么人的厚重的声音，砖场今晚加班开窑出砖哩；牛娃肯定等候在饲养场，和他商量选定饲养员哩……无论如何，现在不能分心走神，不能过夜的工作中的问题，容不得他现在考虑去不去县饮食公司当司机。马驹把这个事压到心底，扯开长步，朝村子东头走去。

第五章

饲养场明亮的电灯光下，槽外的走道里，围着不少庄稼人，正兴致勃勃地欣赏着在槽里嚼食的那八位新客。马驹走进来，大伙纷纷向他称赞，这是少见的好牛。

这是八头纯种秦川牛：大骨架，粗腿蹄，短脖颈，狮子头，犄角又短又粗，仅仅露出头皮两寸，鼻际肉红色，从头到尾，一身紫红色短毛。这样纯净的秦川牛，在小河川两岸的田地里或饲养场里，早已很难看到了。

“牛是好牛，单怕养下牛犊，不好出手里！”有人算计说，“一家一户种得三五亩地，养这样大的牛做啥？甭看目下牲畜市上牛价涨，不过两年，社员户里养出牛犊来，多了，非跌价不结。”

“熬煎你的娃子怎么长大吧！甭给俺操闲心。”牛娃一边精心地在槽头搅草拌料，一边玩笑式地驳斥别人的怀疑，“鸡不尿尿，没见憋死

——各有各的出路嘛！”

马驹被牛娃粗鲁的话逗笑了。这个伙计，眼睛里揉不得半点灰渣儿，耳朵里听不进一句逆言。其实，那个庄稼人的估计是很精明的哩！看着那个精明人被牛娃呛得一时窝了兴头儿，马驹解释说，三队兴办的秦川牛繁育点，是和国家设在秦岭山里的种牛场订了合同的，成牛全部由种牛场调拨包销，不用担心市场上牛价的升跌。他说他今天进山买牛时，场长正犯愁，说全国有十几家畜牧科研单位，要求他们提供种牛，好和当地的良种牛做杂交试验，还怕满足不了要求哩……

“国家包销，一头牛卖啥价？”庄稼人关心的实质是这个，“比市场价高，还是低？”

“咱买这八头，七母一公，八千多块。”马驹说，“你算算比市场价怎样？”

“噢呀！这倒好哇！”庄稼汉子惊得眼睛睁大到额头上去了，“咱们一家养上这么一头纯种牛，一年只要养下一头牛犊，稳拿千把块，比啥副业都稳当。咱庄稼汉没旁的本事，喂牛可是谁都能抚弄……”

“这样说，养咱的那些杂牌子黄牛，划不着账了。”有人接上议论，“一样地割草铡草，推土垫圈，一样地受累，小黄牛犊能卖几百元嘛！”

“账都会算——那是明摆着的喀！”有人说，“你目下到哪儿去买这种货？”

马驹听出来，这些话里巧妙地包含着他们一层不好直接说破的意思，就畅快地说：“咱们把母牛发展到十几二十头的时光，就准备给社员提供一部分牛犊，扩大繁殖……”

“只限你们三队吗？”

“三队社员可是有好菜啰！”

“看发展吧！”马驹没有直接回答，“不过，种公牛马上可以开庄配种，改良本地黄牛……”

“能人大叔，来吧！”牛娃嘻嘻哈哈说，“把你屋里的老黄牛明日拉来，先让咱的公牛享一回福……”

饲养场里，立即爆发出一阵哄笑……

“你看中谁了，你说。”关于饲养员的人选，牛娃已经提出三四个名字了，都是三队里精通牲畜的牛王爷和马王爷，却不见马驹吭声。他掰着指头，再也提不出更合适的人选，就催问马驹，“看你究竟瞅中哪个行家咧。”

“德宽哥，你说呢？”马驹没有回答牛娃的话，征询另一位领导人，“你可甭只考虑你的砖场……”

德宽咂着短杆旱烟袋，坐在一只木墩上，笑眯眯地盯一眼牛娃，又盯一眼马驹，没有当即开口。他想，种牛场是马驹提出来办的，这些牲畜，马驹爱得宝贝似的，能不考虑喂牛的人选吗？能把这些心爱的种牛交给那些二马虎去喂养吗？牛娃把善于经管牲畜的几个行家几乎全都说到了，不见马驹表态，他还能提谁呢？提得再多怕也是浪费时间，他便反而笑眯眯地问马驹：“你看谁合适呢？”

“叫我说——”马驹看着两位副队长，试探地问，“你俩看看，来娃咋样呢？”

“谁，你说谁？”牛娃一下子从炕边上站起，瞪大眼睛，紧盯着马驹问，“你再说一遍！”

“冯来娃。”马驹果然重说一遍，而且在名字前头加上了姓氏，以示郑重。

牛娃听罢，一仰脖子，发出连续不断的大笑。他笑得前俯后仰，一直弯下腰去，还在笑着。好笑！马驹提出来的这个冯来娃太可笑了，甚至连提出这个名字的马驹也是可笑的——眼里太没水了。

德宽也是一愣，没有料到马驹会提出这个人来。冯来娃，那是一个啥样儿的庄稼人嘛！不知小时候受过什么症，已经四十挂零的来娃，长得不过三四尺高，头大，腰粗，跟正常人不差上下，只是个子矮小得简直像个怪物。他以往只干一样活儿——在村边田地里吆赶啄食庄稼的猪羊和鸡鸭，混几个工分，实际是三队养活着的一个废物。马驹怎么会提出这个人呢?

德宽时时注意尊重别人的意见，特别担心三位领导者之间产生矛盾和隔阂，从而导致一班人的分裂和垮台。三队历史上并不缺乏这样的先例，一些本来很有能力的干部，因为闹不团结，而使磨子空转了，精力空耗了。他比马驹和牛娃年龄大，近四十了，本该更慎重嘛！他谦和地制止牛娃说:“你甭尽管笑嘛，让马驹把话说完……”

“那有啥好说的呢？”牛娃止住笑，盯着德宽，不屑地咧着嘴，“就是那个‘半截人’冯来娃，长到老都有资格戴红领巾的活宝，让他喂牛，怕是连牛槽也够不着……”

“把牛槽盘低点儿，再给槽根砌一道垫脚砖，他就能够着添草拌料了。”马驹仍然认真地说。他和牛娃自小在一块儿耍，早已习惯他的脾气和秉性——正直得可爱，也简单得近于粗鲁。他只管说出解决困难的办法，而不愿去计较牛娃的嘲笑。

“自找麻烦！”牛娃干脆地说，“冯家滩三队的喂牛行家死光了吗？”

“来娃以前多年混工分，现在混不成了。旁人分得责任田高兴，嫌地少不够种；他可种不了，发愁哩！”马驹不管牛娃怎样叫喊，仍很动情地述说自己的意见，“来娃本人有残疾，又养着个哑巴女人，还有个上学的娃子，怎么混日子呢？”

“哪怕三队把他全家‘五保’起来，哪怕我去给他种责任田，也甭叫他把牛给糟践了。”牛娃依然不相让。把这样好的八头宝贝种牛交给来娃那号人去喂养，他不放心，“我敢说——一头种牛，比他来娃值钱……”

“尽胡说——抬死杠！”马驹有点生气，顶了牛娃一句。话音刚落，饲养室虚掩的房门“吱”地一响，来娃进来了。

矮短的冯来娃站在槽前的空地上，脸上的肌肉抽搐着，以怨恨的眼光盯着牛娃，短短的胳膊在空中一抡，怒气冲冲地说：“牛娃队长，你说话甭那么欺人！我是冯家滩三队社员，你值多少钱，我也值多少钱……”

马驹心里暗暗叫苦：糟了，牛娃损人的话，让来娃听到了。他立即赔上笑脸，真诚地说：“来娃哥，甭急。咱们正在商量……”

“甭商量了！”来娃又一抡那又粗又短的胳膊，对马驹说，“算我前日没给你说那个话。有牛娃当队长，请我我也不喂了！”说罢，吐一口唾沫，转身走了。

马驹从饲养棚里的光炕上跳下来，鞋也没有顾上穿，三两步跑到门口，把来娃拉住了，死推硬拽把他重新拉到炕前，按他坐在炕边，才笑着说：“老哥，你的脾气好倔呀！我……”

德宽走到来娃跟前，把短杆烟袋的化学嘴儿在衣襟上擦了擦，递到他的手里，憨厚地笑着说：“老哥，咱们正在商量嘛！你怎的就急了呢？坐下，甭急……”

牛娃却并不为自己的失言而后悔。他对来娃的发火根本不放在心里，甚至觉得可笑：那么短的两条腿，蹦来蹦去；那么短的两只胳膊，一抡一抡，人不强，口气倒硬；马戏小丑似的动作，令人好笑。看着马驹和德宽那样恭而敬之地劝解来娃，他反而说出更尖刻的玩笑话：“蝗虫蹦到土地爷神堂里，你算哪一路子的神嘛！是你自己蹦进来的，不是人家用香表漆蜡请你进来的……”

“我自己蹦进来，有啥不对的地方呢？”来娃从炕边溜到地上，仰起头，并不示弱，“我是三队社员，我有资格喂牛呀！你不放心，不让我喂，那没啥！你甭说难听话，我没有一头牛值钱，你这是啥话？”

马驹又把来娃拉到炕边：“牛娃那家伙说话，嘴上从来不站岗，你甭在心。”

“好马驹兄弟！”来娃带着深重的感情说，“我种地有困难，俺老婆说叫她娘家人来帮收帮种。我心里难受，不想拖累亲戚。咋哩？咱是冯家滩三队社员呀！眼下虽说地分了，牛分了，各家自奔前程哩！可

我想，共产党在冯家滩的支委会没撤销嘛！难道就闭眼不盯咱这号困难户了吗？你说让队里给我帮工，还说对我家按‘五保户’照顾，我给俺哑巴老婆说，看看，党对咱有安排哩！可我又想，我也是个人，为啥要旁人照顾呢？我不要别人可怜我，我能干喂牛这活儿嘛！只要集体给我安排一个我能干的活儿，我凭自己的劳动过日月，谁也甭拿斜眼瞅我！就这，我才给你说，我想喂牛……”

“来娃老哥，你把我说灵醒了！”马驹深情地盯着来娃说，“我只想到如何照顾你，帮助你，没想到你心里这些话……你说你也是个人，你说你宁依靠冯家滩三队，也不依靠亲戚，说得对呀……”

“咱不是残疾人，总想不到来娃哥的难处。”德宽也受了感动，连连点头，“我看来娃哥喂牛，肯定能喂好，咋哩！别人有退路，他是死心塌地没退路喀！”

“啥呀，没看出来娃哥，你是一块槐木楔儿——正经材料哇！”牛娃走过来，一把从来娃手里夺过烟袋，这是一种亲昵的表示，滑稽地笑笑，“你喂牛睡在饲养室，哑巴嫂子要是把别人抓摸到怀里……”

怒气冲冲的来娃，无可奈何地笑了。

“回家背铺盖卷去吧，今晚你就上任了。”马驹拍着来娃老哥的肩膀，“奖罚制度让牛娃告诉你，回头还得订一份合同。”

牛娃留在槽边。月亮已经西斜，大叶杨在头顶上轻轻吟唱，夜很静。三人走出饲养场，来娃转身回家去取铺盖卷儿，马驹和德宽朝村外走去。

“开窑了没？”

“开了。”

“砖的成色怎样？”

“嫽得很啊……”

马驹和德宽走出村来。砖场上，电灯明亮，小伙子们拉车出砖的身影在电灯下晃动，新砖撞击出杂乱的声音。德宽紧走在马驹的身旁，郑重地告诉他：为了庆祝开窑，他准备下几样酒菜，算是给郭师傅庆功，要马驹去给郭师傅敬上一杯酒。这是手艺行道的俗规。

“好好好！该该该！”马驹兴奋地说，“德宽哥，你真是个细心人哩！我想不到这些……”

马驹拍着德宽浑实的肩膀，表示亲热之情，佩服他做事认真、细致，前后左右都考虑得周到。自从三队决定在这南坡下开办窑场，他白天黑夜住守在这里。砌窑时，他是瓦工；安装砖机时，他就是机械师；任什么不太高深的技术，他看看，捏弄捏弄，就摸出门道来了……直到今天胜利地烧出第一窑新砖，这个人付出了多少心血，怕连他自己也说不清。

走进砖场，马驹从刚刚堆起的砖摞上取下两块新砖，碰撞两下，剔透而响亮的声音，表示烧砖的火候恰到好处。他不由得说：“这个郭师傅的技术真好。新窑不好把握火功哩！”

德宽到给郭师傅做饭的小窑洞去了。马驹径自走到郭师傅住宿的窑洞前。河南籍的郭师傅坐在月光下，悠闲地端着茶壶在品茶。他抓住郭师傅的胳膊，高兴地说：“郭师傅，真亏了你了！我真担心这头一窑货……”

郭师傅自信地笑笑。那意思很明白，没有这点把握性儿，敢从河南到渭河北岸来挣人家一百二十块的月薪吗?

德宽把四个菜盘摆在郭师傅面前的光地上，马驹接过德宽递过来的一瓶“太白酒”，用牙齿咬开瓶盖，在一只喝水用的搪瓷杯里倒酒，一股芬芳的香味散发开来：“郭师傅，辛苦了！请——”

“领情……领情！”黑黑瘦瘦的郭师傅操着河南口音，说罢呷了一口酒，又双手把瓷杯推送到马驹胸前，“队长，请！”

马驹张开十指，挡住郭师傅的手。他看见对方脸上浮出不悦的神色，就接住酒杯，说：“郭师傅，你甭在意。俺三个上台的时光，给社员立下规矩，无论谁发现干部喝酒，不管三七二十一，对着嘴巴扇……你还是自斟自饮，吃好喝足，给咱把砖烧好，我就感激不尽了……”

郭师傅盯着对面站着的诚实爽快的年轻人，倒不知该说什么了。他从河南老家出来，已经十多年了，在陕西关中渭河两岸一带，给许多生产队烧过砖，队干部不陪吃陪喝的情形还真是少见。跟前虽然只摆着四个菜盘，两荤两素，小气虽则小气了些，却叫他感动了。

马驹和德宽谢别郭师傅，走到砖窑上来了。小伙子们从窑门里拉着架子车出进，砖屑和窑灰已经把他们涂抹得面目不清了，搬动新砖撞击出的响声，像爆豆一般。他忽然想到兴办砖场之初，他曾对这一班年轻的伙伴们许过愿：“哥儿们，跟哥到这砖场干一场吧！咱们的手表、皮鞋、瓦房，还有媳妇……都在这南坡下的黄土里……”

马驹想到自己鼓舞过别人的话，心里涌起一阵激动，立即丢剥了外衣，拉起一辆架子车，钻进尘土飞扬的砖窑里……

第六章

五月里天气多变，乍阴乍晴，忽冷忽热，流行感冒在冯家滩蔓延。乡村医生冯彩彩，出东家门楼，进西家小院，给那些被流感折磨得浑身酸疼、躺卧在炕上痛苦呻唤着的庄稼人吃药打针，直到夜深人静，才拖着疲倦的双脚，耳朵里装满患者亲属热情诚恳的感激的话语，走回自家小院来。

两间破旧的厦屋，奶奶住在南间，她住在北间小屋里，靠墙立着的药架上，摆满药瓶和纸包。

“彩娃，我从窗子给你塞进去一封信。”彩彩刚走进门，隔墙南屋传来奶奶的说话声。奶奶总是在她回来之后，才能睡着。彩彩一眼瞅见窗根的桌子上，搁着一封信。从那一边倒着的字体就能看出，是她的未婚夫——县地段医院大夫冯文生写来的，她放下信，再从肩头卸下“十”字皮包，洗手洗脸。

“是文生的信不是？”奶奶隔着墙问。

“不是。”彩彩哄奶奶。

“是表姐的信不是？”

“也不是。”

奶奶不再问了，除了这两个人，奶奶再想不出还有什么人会给孙女来信了。

洗罢手脸，彩彩坐到桌前，扯开印着古装仕女画像的彩色信封，掏出信瓤儿，三页绿格信笺，写得密密麻麻，一律是朝左边倒着的歪

斜钢笔字迹。

这是一封绝情书。

彩彩看完最后一行字，有一阵儿愣呆，把那些信纸扔到桌子上，随之在眉眼之间浮出一缕讥嘲的冷笑。这样的话……完全不必写三页纸，还啰唆什么嘛！她在心里轻蔑地嘲笑在县地段医院当大夫的冯文生，虚情假意地说了那么多多余的话；似乎离了他，冯彩彩当即就会跳崖落井、痛不欲生似的。

她早有精神准备。冯文生到县地段医院工作的半年里，对她日渐冷淡的态度，已经清楚地表明了这个人的意向，这封信不过是迟早总要到来的预料中的结局罢了。

即使是预料不到的突然打击，彩彩也不会像一般乡村姑娘那样，被有幸迈进大学门槛的（或顶替老子吃了商品粮的）未婚男子抛弃之后就失去理智，寻死觅活。她的不幸的童年生活，已经铸就了她应付一切不幸的冷峻的性格。

彩彩长到五岁那一年，冯家滩发生了解放以来最大的一次动乱。二十多位操着南方北方口音的“四清”工作队员一下子拥进来把冯家滩搅翻了。大小队干部一律“上楼”（隔离交代问题），身任冯家滩大队长的彩彩的爸爸是工作队紧抓不放的重点人物。他经不住这场被说成是“二次土改”的“革命”的考验，把指头塞进电灯接口里，结束了自己二十多岁的生命。工作队不许对自绝于人民的叛徒举行乡村一般死者惯常的葬仪，也不许唯一的女儿彩彩戴布行孝，只由两个民兵用架子车拉出村，埋到冯家滩背后最偏远的沟坡里。

父亲一气之下告别了冯家滩村民，却把无法忍受的灾难留给了尚不懂世事的女儿来承担。母亲改嫁到北岭上的一个村子里去了，彩彩和奶奶偎依着生活在越来越混乱的冯家滩里。“四不清”——“畏罪自杀”，这样一个说不清有多大罪责的负荷，到了随之而来的十年动乱之中，更增添了分量，压在孤孙寡婆的头上……

彩彩的少女的体态却不受任何邪恶的威逼和压抑，日渐丰盈地显现在冯家滩人的眼里，人们暗地里猜度，彩彩好看的嘴唇是她妈的，女儿家少有的高鼻梁是她爸的，只有那双眼睛，说不清是像母亲，还是更像父亲。她的父母，眼睛里总是洋溢着喜气；而他们的女儿彩彩，一双很大的黑眼睛里是和她的年龄很不相称的忍耐、冷漠和理智的复杂神色。

她学会了忍耐，这是孤女寡婆赖以生存的办法。她变得冷漠，冷漠地看待冯家滩发生的一切变故和事件。她有理智，这是她的特殊的生活处境教给她抑制个人感情的本领。即使是人生意义重大的婚姻爱情问题，她也是以理智的力量做出了自己的选择的啊！

冯文生的父亲冯大先生（乡村里把教员和医生一律称为先生）被县地段医院开除了，原因是有当过国民党军医的历史问题。冯大先生回到冯家滩，属于国民党的残渣余孽，当然列入另册。冯大先生的小儿子文生，在冯家滩的处境，和彩彩不差上下，只是跟着老父亲偷偷学了一点医术，常常为庄稼人所急需，于是就不能不对他客气一些。冯大先生不敢出头，让他的老婆出面，托冯家滩专事说媒联姻的刘红眼，夜晚悄悄走进婆孙俩生活的小院里来了……经过断断续续差不多一个月的商量、等待、回想，婆孙俩终于控制住自己复杂的感情，服从于理智的考虑：嫁到冯文生这样一个和自己地位相差不多的家庭

里，他们家庭的成员，至少不会下眼观看“畏罪自杀”的前冯家滩大队长的女儿……

彩彩心目中切切实实爱慕着的不是冯文生，而是可亲可敬的马驹哥呀，他参军远在新疆边界上……

生活开了一个残酷的玩笑——冯家滩前大队长冯志强自杀案件经过甄别，不仅无罪可畏，当初定案时根本就没有弄到一份真实可靠的一分钱、一斤粮食的贪污问题材料……可怜的彩彩，这时候才能穿一身白布孝衣，头上挽一条长布，奔到只留下一堆石头和酸枣刺棵的坟头，大声哭叫爸爸……她哭得死去活来，指头扒抓着坟地上的石头和泥土，血把干草枝叶染红了。

冯大先生也恢复工作了，又到县地段医院上班了。前国民党军医涕泪交流，大声在院子里喊“邓青天”，刚刚上班半年，冯大先生领取了一张光荣退休证书，按月领固定工资的百分之七十五，回到冯家滩安度晚年，他的小儿子冯文生，顶替老子，到地段医院穿上白大褂儿上班了，随之又被送到省中医学校深造了……彩彩居然因祸得福，成了地段医院的年轻大夫的未婚妻，村子里一些俗气的姑娘反倒眼红她命运太好了。

彩彩心里平静如故。是的，无论文生在冯家滩当狗崽子也好，无论他现在成为吃商品粮挣固定工资的大夫也好，她对这个人在心里总是燃烧不起热情来。这个细眉细眼白脸蛋的冯文生，常常在村里那些歪人恶干部面前，露出一脸乖觉相，巴结地笑，令她生厌。他常常来给她家担水。当恶干部批判他和她是“黑五类臭气相投”的时候，他就不敢在白天挑水了，到晚上才偷偷给她家送水来。她能体谅他的处

境，却不欢喜他挑水进门时那种担惊受怕的眼神——可平心想来，这个人也没有什么坏毛病，既然已经定亲了，彩彩也不想再反悔了。

可是，当马驹从部队上复员回到冯家滩以后，她看见他长高了的魁伟身躯，戈壁风沙吹黑了的英俊面孔，有劲的嘴巴周围黑乎乎的胡楂，透着坚强气魄的黑眼睛，她的心在胸膛里一阵狂跳……夜晚躺在北屋的小炕上，她又理智地劝自己，马驹早已和薛家寺的民办教员薛淑贤订婚了，那人有文化，长得也漂亮，马驹哥满意着哩；自己也已和文生订婚，再不能胡思乱想了。她把对马驹哥的那种热烈的感情强行压到心底，绷紧脸皮，像冯家滩任何一位乡党一样，和马驹说话，打招呼……

这种心理矛盾是十分痛苦的，特别是当马驹的未婚妻薛淑贤提出苛刻的结婚条件以后，她无法控制自己了。她十分鄙视那势利眼的民办教员，枉长了一副漂亮的脸蛋子！她设想：一旦马驹和薛家的关系撕扯干净，她就和文生提出解除婚约。可在她还没有做出最后抉择的时候，冯文生已经向她提出退婚的意见了。好！冯文生呀冯文生，你当了正式大夫，瞧不起农民冯彩彩了，岂不知农民冯彩彩，也没把你在眼睛当中搁着！

彩彩拉开抽屉，取出一厚沓信件。这是文生的杰作。即使住在同一个村庄，他悄悄地给她从窗孔和门缝塞进来多少封信啊！她毫不犹豫地划着了火柴，把那些写满了甜言蜜语的各色信纸，海誓山盟的情书，化成灰烬。黄色的火焰里，彩彩冷漠的眼睛，看见了一张怎样生动的虚伪的嘴脸啊！

“彩，你在屋烧啥呢？”奶奶还没睡着。

“烂……纸……”彩彩慌忙回答。

“快睡。”

“噢！”

最后一页信纸烧掉了，最后一丝火苗熄灭了。窗口吹进的夜风，吹得纸灰在地上飘滚。她懒得清扫，一把拉开门闩。对着满天星斗，热泪夺眶而出，心里涌起难以压抑的呼唤：马驹哥呀……多年来被理智控制着的真实感情，迸发出来了。她激动得浑身颤抖着，简直想立即奔到村庄西头去，扑打冯景藩大叔家的街门，扑入马驹的怀抱……她现在怕什么呢？堂堂的共产党员冯志强的女儿，现在和冯家滩任何一位青年男女一样平等了！她要按自己的心，去选择自己爱慕的男子，光明正大，怕什么呢？

一阵杂乱而急促的脚步声从村子东头响过来。彩彩一惊：又有谁病情加重等不到天明呢？她抹去眼泪一瞅，黑暗里，有人背着一个什么人，正朝自家门口走来，待到门口的电灯光亮下一看，呀！趴在别人脊背上的正是马驹哥呀！

“咋咧？”彩彩大惊失色地问。

“砖摞倒了，把马驹哥的脚砸烂了……”

彩彩二话不说，扶着马驹坐到板凳上，把受伤的左脚垫得高高的，转身取来了药棉和镊子。这是一双怎样污脏的脚呀！砖屑和尘土，被伤口流出的鲜血染得一塌糊涂。啊，快点止住出血吧，轻点再轻点，可千万不要撞疼了马驹哥呀！她一遍一遍地擦洗伤口周围的血污，敷撒消炎粉，用药棉和纱布包扎起来。尽管这一切做得小心翼

翼，敏捷准确得无懈可击，彩彩还是看见马驹的嘴角在扯动，那是因为酒精刺激了伤口，实在无法解除的痛苦。

她又给他注射了一支防止破伤风菌感染的针剂，捏着针管，轻轻舒了一口气，才觉得自己已经冒汗了，心情太紧张了。

“好咧。”马驹装出无事一样的神情，把胳膊扶在两个小伙子的肩膀上，“扶我回去……”

“不要动。”彩彩正在涮洗针管，转过头，用大夫对待患者的严厉口吻说，“一动就出血。”

“那……得等多久，”马驹不在乎地问，“才不出血呢？”

“至少两个钟头。”彩彩想，平时，这位马驹哥几乎没有光顾过她的医疗站，有意回避似的。今天晚上，真是鬼使神差，当她正急于想见他的时候，他自己寻上门来了。她故意把时间说长了，好把那两个小伙子支使开。那两个小伙子向马驹说了几句热心关照的话，便匆匆赶回砖场去了。

这间窄小的厦屋似乎一下子扩大了好几倍，马驹坐在这里，有点不自在。敞开的门口吹进乡村五月夜晚温馨的风。他找不到什么话说，又不习惯这样静默着，就叹息地说：“把它的！弄得手脚不利索，正忙着哩……”

彩彩在药架旁边默默地收拾用过的药品和器械，撞得瓷盒叮当响。马驹哥现在就坐在她的侧旁，无话找话地自言自语。想到自己刚才涌起的那一股狂念，她的心又在胸膛里狂跳了，脸上阵阵发热，嘴里却一时找不到合适的话。甭忘了，马驹和薛家寺那个势利的民办教

员还没完全断绝婚约哩！马驹的父母还在催促媒人刘红眼尽心撮合哩！不过，马驹是个硬性子，不会说出低三下四的话去乞求民办教员的。这场婚事实际已经完全无望了。既然是这样，她又何必着急呢！

彩彩转过头，看见马驹无聊地坐着，顺手捡起她扔在桌上的文生的来信，刚看了一眼，又慌忙放到原处，反而更显得局促不安了。

“你看看。”彩彩正想让他了解自己的婚姻状况呢，便主动劝他说，“没关系，你尽可以看。”

“不不不！”马驹连连摇手，不好意思地笑着，“怎能随便看别人的信呢！”

彩彩走过来，干脆从桌上捡起信纸，塞到马驹手里，大胆地紧紧盯着他的眼睛，热烈地说：“我正想寻你，专门请你看看哩！”

马驹接住信纸，狐疑地盯着彩彩，不禁纳闷：什么人的信值得她专门请他看呢?

彩彩走到药架旁，靠在架边，专注地瞅着坐在对面的马驹，正低着扑落着砖屑、灰尘的脑袋，一手把信纸在膝盖上摊开，看着。一股强悍的男子汉的特殊气息，充溢在小小的厦屋的空间里。她想看他读信时的表情变化，可他低着头，只能看见浓密的一头黑发。突然，马驹仰起头，一把把信纸摔到桌子上，猛地站起来，意识到脚上的伤疼，又旋即坐下，脸孔气得紫红，粗野地骂：“说他妈的屁话！狗东西！冯家滩的粮食，怎么喂出这号东西……”彩彩一惊，急忙指指南屋，压低声儿说：“小声，甭叫俺奶听见了……”

马驹气呼呼地闭了口，从口袋里摸出半截纸烟，叼在嘴里，划着火柴的手指颤抖着，猛吸一口，喷出一股浓厚的烟雾来。他的愤怒几乎是本能的。他的未婚妻薛淑贤，不过是有转为公办教师的可能，实际还没有转正哩，就要和农民冯马驹退婚；说是将来转正以后，和农民在一起，生活上不好安排。刚刚穿上白大褂儿的冯文生，也在信上说和农民冯彩彩生活上不好安排……农民啊农民！无论男的，抑或女的，不论长相如何，本领大小，品格怎样，在当代爱情生活上，屈居于这样的劣势……更何况是彩彩，一个自幼死爹又离了娘的苦女子，背着屈死的爸爸留给她的黑锅，从“四人帮”的迫害之中长大成人，刚刚扬眉吐气了，可恶的冯文生又在她心上扎了一刀！

“彩彩，你先甭急。”马驹胸膛里沸腾着一股正义之气，“我要去找文生，叫他收回这封信，叫他给你赔情道歉……”他相信自己和文生自幼耍大，都是好伙伴；他没有歧视过文生，文生很敬服他。马驹很有把握地说：“文生……我跟他能说，瞎话好话都敢说给他听。”

“你不要找他，不用说了！”彩彩看着激动得脸孔变了色的马驹，自己反倒冷静异常，指着飘落在墙根和桌腿根的烧过的纸灰，告诉他，“已经彻底结束了，我又何必自作下贱呢？”

“不行。我要问他，还有良心没有？”马驹仍然坚持要找文生的想法。在他看来，姑娘家一冲动，特别是像彩彩这样自尊心很强的姑娘，一冲动起来，烧信件，还信物，你硬我更硬，把本来可以挽回的事弄僵了，过后又后悔，“你要冷静，先甭张扬。”

“你为啥一定要去劝说他呢？”彩彩问。

“为了你好哇！”马驹直言说。

“离了他，我活得就不好了呀？”彩彩问，试探着，暗示着，“冯家滩这么多姑娘，嫁不了一位挣工资吃商品粮的男子，就都活得不好吗？”

“不……”马驹噎住了。彩彩话里的那层说不清的意思，他似乎想听到，又害怕那层意思被明明白白地说出来，以致一时语塞了，“那么……你叫我……看信做啥？”

“让你知道这回事就是了！”彩彩一摆头，把已经微微发热的脸孔转过去，不让马驹看到脸上的红晕。她心里想，他已经意识到她不是求他去给冯文生撮合的这层意思。她为啥要叫他看这封信呢？自个慢慢想去吧！她已经向他显示出不在乎与文生解除婚约，这就够了。她心里镇静了，便接着说：“你大概是觉得我可怜吧？自小受苦，婚姻又发生问题……你是同情我吧？这样，你错了，我活得很好！我给乡亲们看病，不是无用的人，你的好心我领了。你知道，强扭的瓜不甜……”

马驹低了头。他现在还不能完全摸透彩彩的心思，再不敢贸然说话了。沉默一阵之后，他憨厚地笑笑，诚恳地说：“我一见这种瞧不起农民的人，就不由得冒火……你的事情，当然由你拿主意。我倒是觉得……你和文生……挺好的哩……”

“你和薛淑贤，不也是挺好的吗？”彩彩听着马驹的话，反而动了气。这个老实耿直的人啊，真令人发急！她讥刺地说：“你要不要我到薛家寺去，劝说那位民办教员呢？”

“你……”马驹立时羞红了脸，苦笑着，猛地站起来，“大概……过了两个钟头了……”

彩彩也不再留他，走上前，扶住马驹粗壮的胳膊，送到门口，说：“我送你回去……”

“不……不要。”马驹挣脱开彩彩的手，顺手从门口抓住一根棍子，仍然红着脸说，“我能走回去。”

彩彩站在门口，看着那强健的背影渐渐消失在月光忽明忽暗的街巷里，猛然回身，走到桌旁，拉开抽屉，取出一叠白纸，扭开水笔，给冯文生回信——她要彻底从心里抹掉这个人！

第七章

天麻麻亮，景藩老汉站在大队会计冯三门家的门楼下面，连续叩着街门上的铁环儿。院里传来一阵慢腾腾的脚步声，门开了。三十七八岁的会计冯三门，粘着眼屎的眼睛很不悦意地瞅着打搅了他的睡眠的人，懒洋洋地结着纽扣。

景藩权当没有看见三门眼里的神色，亲热地拍拍会计的肩膀，讨好地笑笑：“快，给叔帮忙办点事。”

“弄啥？”会计翻了一下白眼仁，冷漠地问。

景藩老汉不计较老部下对他表示的厌烦神色。他当支书，生产大队不准设立秘书，会计实际上代替了这种角色。他文化低，凭会计三门代笔代言。多年来，三门是冯家滩没有脱产的脱产干部，一身干部装束，偏分头，细指头上熏染着纸烟的黄垢。土地和牲畜下户了，三门失去了能写会算的特长在冯家滩村民中的优越位置，一当走进田地里作务起庄稼来，就不大为众人所敬重了。农业技术太“老外”了，而且吃不得苦，龇牙咧嘴的苦相惹人讪笑。老汉明白，三门过去处处巴

结讨好他，那是为了保住自己坐办公室避免晒太阳的优越位置，现在没有这种必要了。他现在要求三门办事，愈加耐心地哄劝说："走，咱到办公室说。"他听见会计的女人在炕上恶声恶气地呵斥娃娃，便没有进屋，拉着三门的袖子就往门外走。

"担水！"女人在屋里喊。

这女人真不是东西！景藩老汉在心里骂。三门过去给队里一天干不了两个钟头的差事，挣得和支书、大队长同等劳动日，一天三顿给婆娘做饭，迟早看见他手里引着娃娃。现时虽然土地下户了，会计的职务还在嘛！一月还给他补助十块钱哩！写个便条能用多长时间，会耽搁你家做饭用水吗？你自个长得腰粗腿壮，挑不来一担水吗？明明是给景藩老汉难看哩嘛！虽然这样想，老汉还是用不计较妇道人家短见识的宽容态度解释说："只是叫三门给我盖个章子，来回用不了一袋烟时光……"

"好支书哩！人家现时都忙着扑着干哩，他一天尽是效闲劳！"女人在窗户里说，口气虽然和缓了，怨气却加重了，"现时谁管谁呢？农业社垮台了，单干了，各家创各家的农业哩……"

景藩老汉拖着三门就走。他不敢再和这个利益受到损失而对现行政策明显不满的女人纠缠。老汉自己对农业政策的重大变化不理解，但他和她不一样，她的男人在队里沾不上光了，她纯粹是想着个人利益的损失。他却是中共冯家滩党支部第一个加入党的老党员，对党的指示和政策，从来不会当众顶撞，哪怕个人一时想不通，仍然先照办执行。他对这个女人能说什么呢？他是来找三门办重要事情，不是和这个麻迷婆娘讨论责任制是不是单干的问题。好在那女人没有再使性子坚持要会计男人去挑水，正好躲开完事。

“弄啥？你说吧。”三门拧开水笔，冷冷地问。他现在有什么必要像过去那样讨好实际上也已失去了权威的党支书呢？“快说呀，我还忙呢……”

“你先抽根烟。”景藩老汉从腰里掏出一包纸烟，撕开金箔，抽出一支，递给会计。

三门斜里翻起白眼，开始探究老支书反常的慷慨举动，除了腰里别着的那根旱烟袋，他可是从来不接别人奉献的纸烟，更不会给别人递上这种机制的白皮烟卷的。

“给咱写张证明。”景藩老汉说，“马驹想到县上……”

“哈呀！”三门从椅子上站起，惊奇地睁大着眼睛，“老支书，没看出，你在暗里鼓这大劲，弄下这样的好事……”

“悄声点，甭嚷嚷得人听见。事情还没办实在哩！”景藩担心地说，却是喜悠悠的口气。

“写这证明，没麻达！给你保密，也没麻达！”三门爽快地说，眼里现出馋相，“唔……马驹出去工作了，你老叔也给自己找下落脚点了，你一家有父子俩挣钱了。你想没想老侄儿？瞎好跟你在冯家滩拉马伸镫十多年，你屁股一拍走了，把老侄儿撂下不管了……”

景藩老汉尴尬地笑着，没有料到三门会说出这样的话。

“老叔哎！”三门亲切地叫，恢复了惯常的那种对上级领导人的巴结的喜眉笑眼，恳求说，“你和县上、公社的头头们熟悉，给我说说情，找个差使。任啥工作，咱不是吹，凭咱这水平，著书立说不行，应付一般工作，没一点点儿麻达！财会、文书也行，采买推销也行，

县办社办单位，咱都不嫌弃！老侄儿如今只是难受，肚里装了那么多的墨水没用场咧……”

“行行行！”一任三门自吹自擂，景藩老汉只是点头，满口应承，“我一定在心，给你联系。”

三门重新拧开水笔，歪着头流水般写着，故意摆出一副好写家的架势。写完，他仰起头给老支书念道：“县饮食公司负责同志：经本大队管委会研究，同意本大队社员冯建华（马驹的学名）同志到你处工作，合同由本人与你们直接签订。该同志家庭出身贫农，中共党员，复员转业军人，一贯表现积极，作风正派，自觉执行三中全会路线，工作吃苦耐劳。特此证明。河西公社冯家滩大队管理委员会。一九……”

景藩老汉满心欢喜地听着，真是佩服了。懒人自有懒本领，别人代替不了嘛！他叮嘱说：“暂时先甭跟谁说，免得乱嚷嚷。记住！”

“放心，要紧话进了我的耳朵，跟锁进保险柜一样。”三门豁达地说，“你也甭忘了，老侄儿对你的指望……”

景藩老汉把证明信折叠好，装进口袋，走出大队办公室，注意收敛一下可能外露在脸上的喜悦，端直走过街巷，进了自家小院，轻轻舒了一口气。他站在厦屋外的台阶上，从敞开的窗户里，看见儿子马驹还在睡着。想到儿子昨日进山买牛，晚上又歇得迟，就决定不叫醒他。好好睡一觉吧，老子给你到公社去办手续。

景藩用眼神告知迎上前来的老伴：一切顺利，甭操心。

“马驹睡醒来了，你再跟他说一说。”景藩郑重地叮嘱老伴说。昨日黑夜儿子对合同工表现出的冷淡情绪，一直使他心里不大踏实；马驹没有说不愿意，可也没有他所想象的年轻人有机会到外部世界去工作时的狂喜劲头。他担心，万一在关键时刻儿子爆个冷门，他会气死的。他神情庄重给老伴说：“我到公社盖章去。你跟他拿结实话开导，叫他再甭牵扯三队砖场牛场的啥事了。甭像他老子当年把路走错了。一步路，定他一辈子的秤……”

“噢！知道。”老伴点点头，领会了老汉的意图。她同情老汉，也很关心儿子的前途大事，“等娃醒来，我跟他说。”

景藩老汉推出自行车。车子太旧了，一走动就浑身乱响。他怕惊醒儿子，提起车子走过小院，在街门口才放下来。跨上车子之前，他仍然很不放心地瞅一眼儿子住着的厦屋的窗户。心里说：老子给你跑腿办事，为了你的前程啊！你知道做老子的心不?

油毛毡搭顶的制砖机房里，传出马达的皮带有节奏的噼啪声。平场上堆起一摞一摞新砖，几个小伙子拉着装满红色砖头的架子车，从砖窑里鱼贯而出。“砖的成色不赖！”景藩老远瞅见，自言自语说。他忽然想到，公社机关现在也实行八点钟上班制度，不像学大寨年头日夜值班；五月天明很早，现在充其量不过六点钟，赶到公社也是找不见办公室的人喀。利用这个时间，跟德宽谈谈吧，看看马驹昨晚给他交代队里的手续了没有。自己也该给德宽招呼一下，千万甭拉扯马驹的后腿。

“德宽——”景藩老汉把自行车撑在公路边上，走上塄坎，站在砖场边上，老远里呼喊一声，招招手，再不往前走了——那儿人多，说话不便。

德宽急急地走过来，搓着沾满泥污的手，笑眯眯的眼睛告诉景藩老汉，有什么指示，尽管说吧。

“出窑咧？”景藩老汉表示关心地问。

“出咧！”德宽实心实意地向领导汇报。

“砖的成色不赖！”景藩赞赏地说。

“还好。”德宽舒心地笑着，“我真怕头一窑……”

景藩担心德宽一说起窑场的事来，可能就没个长短，忙截住他的话头，问:“昨晚你见马驹来没？”

“见来。先在饲养场，后在砖场，整整一夜都在一搭。”德宽说。

“他没跟你说啥事吗？”景藩心里起疑问了，儿子大概没有给德宽交代手续。

“说的事多。”德宽不知底里，随口说，“选定饲养员的问题，队里借款支持社员买塑料膜儿，覆盖棉田……乱七八糟的事。你要问啥事呢？”

看着德宽兴致勃勃地和他谈这些事情，一如既往的笑眯眯的神情，景藩老汉心里断定，马驹准是还没有把自己要离开三队出去工作的事给德宽说明哩！他们三个接管三队的工作，表了决心，“击了掌”，党支书听过他们的汇报。现在马驹要离开冯家滩，德宽心里能安然吗？不会的。既然儿子没有给德宽说明，现在由他来说破这件事，可能比儿子更好开口。他是长辈，又是上级，德宽能不听从吗?

“县上抽调马驹去工作。”景藩老汉干咳两声，终于选择好了说话的方式，用完全是行政公事的口吻，把自谋的职业说成是上级抽调，就具有不可违逆的意味了，“你把三队的工作，暂时管起来。”

永远是稳诚厚道、温和平静的微笑，迅即从中年副队长兼砖场场长胖胖的脸上消失了，半晌，才结结巴巴地说：“我……怎能……挑起这一摊子……”

“先让马驹去上班。”德宽的反应是预料中的事，景藩毫不动摇，用上级对下级的强硬态度说，“三队的干部班子，大队出面安排，你放心。”

德宽笑不出来了，满是忧愁的眼睛，漫无目的地瞅着青葱葱的小河川道。他原以为党支书关心三队窑场头一窑产品的质量，不过说几句话，自己还得赶回砖机上去呢。老天爷，马驹走了，三队铺展开的这一摊子工作，怎么办呢？凭自个能顾得住吗？看看老叔跟他说话时强硬的态度和不容置疑的气势，宽厚的砖场场长闭了嘴，扭开脸，难受得从腰里摸出短管烟袋来。

“德宽，听叔说……”景藩老汉意识到自己刚才说话的态度太生硬了，有点过火了，就缓和下来，声音变得委婉恳切了，“机会难得呀！关于马驹一辈子的前程……你是明白人，叔不用说，你也能掂出轻重的……”

德宽茫然地点点头。他被这突兀的消息弄得心神慌乱，没了主意。听了老支书这样委婉的几句话，心头活转过来了。是嘛！农村青年，谁不想到冯家滩以外的广阔世界里去闯一闯，找一个理想的国家单位的工作干一干呢？这的确是关乎马驹一生的大事，自己怎能说出

拦阻马驹的话，过后让马驹怨他，让老叔恨他？德宽毕竟是德宽，理智、宽厚的明白人，就诚诚恳恳地给老支书表明自己的态度：“大叔，你放心。马驹兄弟有了工作，这是好事，我也高兴。三队虽然离不得他，这是小事……马驹兄弟的前途是大事。这个我明白……不会拉扯住马驹兄弟的……”

“我知道你是好人喀！”景藩老汉心情舒坦地笑了，“三队的事，有我哩！马驹走了，我负责安顿三队干部班子，绝不会把你的手压到磨盘下……”

德宽苦笑一下，从地上站起，拍拍屁股上粘下的土屑，懒洋洋地朝砖机那边走去。

景藩看着这个刚才还为砖场的胜利兴头十足的汉子，一下子没了精神，忽然同情起这个好人来了。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他不能眼看着儿子接着自己的脚步，再把脚伸进冯家滩这个泥沼里。他转过身，跳下土坎，推起自行车，又毫不动摇地跨上车子，上了公路。

“景藩同志，我想让马驹主持冯家滩大队的工作哩！因为有这个打算，我才考虑让你退下来，到公社奶牛场去。”河西公社党委王书记，听完景藩老汉的申述，四方脸盘上有点为难的神色，直截了当地说，“你把马驹支使走了，冯家滩大队的工作咋办呢？”

“要是一时找不下合适的年轻人，我先撑着。”景藩老汉坚定不移地说。他知道，这阵儿绝对不能松口，脸上虽然强装着笑容，态度却更坚定：“我去不去奶牛场，关系不大！”

“老同志，甭急。一个合同工嘛，让我们一个得力的大队干部去干，划算不划算呢？”王书记摊开手，比画着，企图说服急于把儿子塞

进汽车驾驶室的老支书，“一个合同工，一个司机，好找，一个好干部，可真是不好发现培养哩……”

景藩老汉看着王书记在房子里踱来踱去，知道他为冯家滩大队新的干部人选在伤脑筋。你越是强调好的农村干部不容易培养，他就越是急于把儿子从冯家滩弄出去。一旦把腿伸进这个泥沼再要拔出来就难了。他的脑子十分清醒：决不能松口！便回答说：“合同是临时的，有了机会就能转正。”

“转正……不那么容易吧？”王书记表示怀疑，“单是城镇青年，也是以参加集体性质的企业为主，农村户口的青年，要转办正式工人，不好办哩！”

“人说，复转军人当中的困难户，国家照顾哩！”景藩老汉说，“咱……困难得很呀！”

王书记不再劝解了。看景藩老汉那么固执，把话再说得硬些，可能要伤这位老同志的感情哩。冯家滩党支部书记冯景藩同志的状况，他是清楚不过的：身体欠佳了，思想也难以适应已经发生了急剧变化的农村工作。老汉把三中全会以后党在农村经济政策上所作的重大调整，看成是对合作化的否定；把责任制总是叫成分田单干，那不仅仅是口语上的失误。这种思想状态，不是冯景藩老汉一个人的特殊反映，和他年龄相仿的那一批“老土改”，大都如此。他想在冯家滩把老支书换下来，安置到适宜他工作的某个社办单位去，拿一份虽然不高却可以保证老汉晚年生活的薪金，革命不能无情无义啊！现在，老汉坚持要把儿子弄出去当合同工，公社书记的计划被打乱了。他想想之后，忽然问：“马驹自己愿意去吗？”

“愿意。”冯景藩毫不含糊地回答，“他在部队时学会开车技术。他爱开汽车……”

“那好。马驹愿意去开汽车，就去吧！”王书记作出决定了。凭着多年来的农村工作经验，他深知一条：把那些根本不安心农村工作的青年勉强留下来，没有一个能把国家和众人的事情办好。他畅快地告诉老汉：“你到办公室去盖章吧！就说我同意马驹走……”

“好。”景藩老汉放心地说，从椅子上站起来，“我在冯家滩暂时撑着。奶牛场……去不去……没啥……”

“你还是去奶牛场。”王书记盯着老支书说，“按咱们原定的意见，不变。我已经给奶牛场打过招呼了。”

景藩老汉张了张嘴，没有说出话来，低头走出王书记挂着竹帘的房门，来到熟悉的公社院子里。解放前，这儿原是河西村的一座庙堂。解放后，泥像搬掉了，门口挂上了河西乡人民政府的木牌。景藩老汉的入党宣誓仪式就是在“佛爷殿”举行的；被搬走佛像的墙壁上，挂着镰刀锤子图案的党旗，他曾经和河西乡第一批加入党的庄稼汉子们庄严地举起攥紧的拳头……他走在已经扩大了住宅面积的公社大院子里，心里很不自在：王书记分明在为冯家滩大队党支部的后继人选发愁，为什么却不同意让景藩老汉暂时撑住局面的意见呢？唔呀！在中共河西公社党委王书记的心目中，是不是已经把他看成是一个累赘了呢？

真是令人寒心哪！想当年，冯景藩在冯家滩办起河西乡第一个试点社的时光，乡上县上领导们嘴里喊着他的名字的声音，够多亲切！你王书记调来河西公社才几年？你知道冯景藩为了办农业社熬过多少

心血？你知道冯景藩在三年困难时候领着社员大战小河滩的壮举吗？你知道冯景藩从县里乡里领回去多少奖旗锦标吗？你知道中共冯家滩支部书记在“四清”运动中挨打受骂的委屈吗？你知道冯支书挂着木牌被斗争了七七四十九回而没有叛党的情况吗？冯家滩生产搞不上去，怪他还是怪“四人帮”呢？冯景藩走过院子，心里好凄惶！老了，成了让王书记嫌弃的累赘了！自己还有什么意思在冯家滩去撑那个局面呢？走到办公室门口，老汉从腰里掏出会计冯三门写下的介绍信，毫不踌躇地走进门去……

第八章

日有所触，夜有所梦。马驹夜里做了一个荒唐的梦：彩彩当着他的面，把文生写给她的信撕得粉碎，扔到火堆里去，猛然扑进他的怀里，双臂紧紧地搂着他，头枕在他的胸脯上，一句话不说，只是嘤嘤地啜泣……

马驹惊醒了，彩彩满腮泪珠的令人疼爱的脸不见了，窗外小院里已经洒满耀眼的阳光，里屋传来母亲叫鸡的声音。他的心还在胸膛里扑扑地跳，脸上烧躁躁的。他把头脸埋进清凉的水盆里，洗呀搓呀，企图把脑子里这荒唐的一幕荡除出去，眼前却总有一双泪汪汪的动人的杏核眼……

昨晚从彩彩家里回来，他虽然已觉疲惫不堪，躺在小木板床上，却一时睡不着。彩彩既然完全信赖地让他看那封绝情信，却为啥一再拒绝由他去劝解说服文生回心转意呢？如果她对文生毫不留恋，为什么当初又要和他订婚呢？她当初和文生订婚的行动，曾经使马驹多么伤心啊……

马驹的父亲是冯家滩深孚众望的老支书，彩彩的爸爸是冯家滩年轻有为的大队长。工作上的频繁交往，使两个年龄差着一截的共产党员的个人感情日渐交融。马驹和彩彩，在两家人亲密的往来中玩耍在一起，情同兄妹。在他八九岁的时光，经历了冯家滩惊心动魄的那一幕——脸孔被电流击得紫黑的志强叔，粘着泥土，被民兵塞进架子车拉出村去了。他扶起哭叫着跌倒的彩彩，号啕大哭……他默默地给孤孙寡婆家挑水，把咬他和"四不清"划不清界限的人不放在眼里。在他参军走的前一晚，彩彩跑来了，把一双扎着漂亮图案的鞋垫儿塞到他手里，只说是吃了他担下的那么多水，无法报答。他在祖国边陲的几年里，每次接到母亲寄去的小包裹，里头肯定有一双纳得细密的鞋垫儿……已经长成一位英俊的人民解放军战士的冯马驹，心里萌动了爱的念头，常常思念起彩彩。当他第一次得到回家探亲的假期，心头想的第一桩大事，就是和亲爱的彩彩妹妹把话说开——他相信她不会拒绝的。

当他急切地回到冯家滩，却听到彩彩早在半年前已经和文生订了婚的消息，心里一下子凉透了。他没有和彩彩谈一次，没有必要。正直的小伙子在心里劝自己，彩彩妹妹自小受够了苦，但愿在婚姻上能得补偿。她既然喜欢文生，自己绝不能再怨恨她。他装出满心欢喜的笑脸，去看望大婆和彩彩，注意尽说文生的优点，恭贺她和文生将来美满欢乐。他随即听从了父母给他定亲的话，和刘红眼引来的薛淑贤见了面。薛淑贤长得丰满、白胖，嘴两边有一对讨人喜欢的酒窝。据介绍人说，她家三代贫农，本人高中毕业，思想进步，是薛家寺大批判小组的积极分子，和军人匹配，真是天造地设……他同意了。

当他服役七年复员回到冯家滩以后，这个曾经尖锐地批判过孔老二的民办教员，却认为农民冯马驹不能和教员薛淑贤生活在一起，提

出退婚了。他不勉强，也不乞求，任她去吧！处在这样的婚姻状况下，他自觉地与彩彩保持距离，甚至有意回避。他身体强健，不需要到医疗站寻彩彩看病吃药，在街巷里迎面碰见，他用和任何社员一样的态度和她打一声招呼，就匆匆走过去，忙自己该干的事情去了。他说不清楚为什么要用这样的态度对待彩彩，只是本能地觉得，应该这样——正直的人必须这样做。

现在，当他躺在有点冷寂的小木板床上，回想起这一切，隐藏在心的底层的那一缕情思，涌涌波翻起来了……

他跛着走出小厦屋的门，坐在槐树下的石墩上，仰起头看看蓝天上的太阳，已经过了庄稼人吃早饭的时辰。从敞开的街门里，可以看见男女社员扛着工具去出午工了。

“你的脚……咋咧？”母亲笑吟吟地端着饭碗和菜碟来到槐树下，一眼瞅见儿子脚上缠扎着的白纱布，吃惊地询问，随即把碗搁到石桌上，蹲下身来，抚摸察看着儿子那包裹得严严实实的脚背，急切地再问：“咋弄的？”

“砖头塌了，不怎。”马驹不在意地说，“俺爸呢？”

“到公社去了。”母亲还是放心不下他的脚伤，“伤口不小哇！你看肿得多高……”

“擦破一点皮。”马驹说，“过三两天就好。”

“吃饭。”母亲在一旁坐下，招呼催促儿子端起碗，就记起老头子临出门时交代给她的使命，开始把话引到儿子的工作问题上来了，“你爸……为你的前程……把心都操烂了……”

“嗯……”马驹吃着饭，应承母亲的话，心里却在想：文生是个正式大夫，乡村人最看得起的职业；彩彩失掉文生这样一个未婚夫，怎么表现得这样冷淡，真的不在乎吗?

“你爸一辈子尽受苦，没享得一天福。”母亲声音委婉，有点凄楚，“他年轻时，跟你一样，直脾气，硬性子，把公家的事看得重，扑上躺上干……落得啥结果呢? ‘四清’时挨斗争，‘文化大革命’活活脱了一层皮……”

“我知道……”马驹仍然心不在焉，想着：彩彩把文生的信给我看，到底是啥意思? 这个猜不透的姑娘……

“你爸而今后悔了！”母亲长叹一声说，“当初没听我的话，现时后悔跟不上了！”

“妈！谁不听你的话，肯定要吃亏！妈比诸葛亮还……”马驹笑着，和母亲逗趣，心里仍然在不断地猜度着彩彩，她到底是怎么想的呢……

“他当初要是听了我的话，离开村子，现时会是啥光景? ”母亲继续对端碗吃饭的儿子说，“你看看人家安国一家……就明白咧！”

“俺爸要是听了你的话，现时，他可能比安国叔的官儿还要大。我哥，我姐，还有我，都会有商品粮吃了。逢年过节，一人引一个卷头发媳妇，回来孝敬你，妈怕是要喜得分不清前门和后门了。”二十五六岁的大小伙子嘻嘻哈哈地和母亲逗乐。

“一步路走错，差得天上地下。”母亲并不在意儿子说笑逗乐的神气，依旧耐心地进行两个家庭的对比教育，“你这回出去工作，机会着

实难得啊！”

马驹停住搅动着的筷子，这才明白母亲不是随随便便和他拉家常哩。母亲虽然一字不识，谈话的方式方法却颇有讲究，由远及近，一步一步伸展过去，直至接近她要说出的中心话题。马驹再也无心和母亲逗乐了。

“你的主意拿定着哩吧？”母亲探问。

“早拿定了。”马驹爽快地回答。

“拿定了就好。”母亲仍然循循善诱，“可甭经人一哄弄，又变卦。你爸就吃了这号亏！”

“我不会让人哄弄的。”马驹说，“妈，你跟俺爸都放心，我的主意定下了。”

“去？”母亲盯紧儿子的眼睛问。

“去！”马驹一摆头，主意铁定的样子。

母亲脸上浮出慈善的笑容，收拾了碗碟，放心地走回小灶房去了，那儿传来洗涮碗筷的声音。

小院里很静，坐在槐树和香椿树浓密的荫凉下，仍然能感到五月晌午阳光灼人的热力。马驹抚一抚肿胀的脚腕，该当认真思量一下去县饮食公司当司机的问题了。

这是一个诱惑力很强的工作。在部队的七年里，他开一辆草绿色的“解放”卡车，在坦坦荡荡的戈壁滩上奔驰，蓝天，白云，羊群，热

情奔放的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男女……自从离开部队，几乎没有摸过方向盘了。

马驹搓一搓手指，似乎有点痒痒。如果去了县饮食公司，开上一部汽车，对这个职业的浓厚兴趣，肯定会使他适应新的环境，结识新的伙伴。他不会偷懒，会把一切任务圆满完成。待有机会转为正式司机，他就会一辈子操着永不会腻味的方向盘，过着有固定收入的城镇工人的生活了。

可是，怎么从冯家滩拔得出脚来呢？去年，他从部队回到冯家滩，房屋依旧，街巷肮脏，队里穷得拿不出钱给牲畜抓药，他的心凉到脚跟了。薛淑贤的毁约，给他当面羞辱，使摘下领章帽徽而仍然穿着草绿色军装的冯马驹，几乎无路可走了。乡村里，虽然青年男女间解除婚约并不罕见，可是被迫解约的一方，无论男女，都不会感到光彩……他终于忍受不住，和牛娃、德宽接管了三队的工作，在全体社员面前拍了胸脯。半年来，计划中要干的几件大事，虽然艰难，总是开始了；唯其艰难，要他现在一拍屁股离开冯家滩，还真有点难分难舍的感情哩！

牛娃要是知道他要走掉的消息，准会跳起来，骂他说话像放屁。什么击掌盟誓，不过是说说罢了。那家伙的脾气，一当翻脸，谁的账也不认哪！德宽不管心里满意不满意，脸面上不会给人难看的，那是个厚道人……他们三人共事半年多以来，合作得不错，他感到那两位副队长，很敬重自己；他也和他俩之间有一种难舍难分的感情。他和牛娃自小一起割草，放羊，上学，自不必说。德宽比他年岁大，自从搭班在一起共事，他在这位老哥身上发现了许多自己所缺少的长处，愈加敬重他了。马驹暗暗难受：怎么能忍心撇下这两个正在努力奋斗的同志，而去给自己找一碗安生饭吃呢？

三队能改变穷困的局面吗？从现在的生产状况看，年终肯定要超过去年的收入。可是，明年呢？后年呢？十年二十年以后呢？谁能预料农村经济政策上有没有反复和变化呢？权当你自己铁了心，豁出来在这里干一辈子，要是政策一旦变得使你无法干下去的时候，怎么办呢？父亲搞合作化时的劲头也是够高涨的，随之兴起的吃大锅饭、“四清”“文革”和“割尾巴运动”，整得连他自己也保不住。批来斗去，老人变成“维持会长”了，有人说他是只冒烟不冒火的一根湿柴。志强叔更惨了，他放弃大学不考，回到冯家滩，几年没干出来，连命也赔上了。如果自己在某个时候遇上这样的处境，会不会在回想今天这一步路时，像父亲一样产生悔恨莫及的情绪呢？唔呀……去年起手的时候，似乎只是贫穷和屈辱给人心理上带来的压力，冲起一股背水一战的勇气；而当今天有一条可以摆脱那种贫穷和屈辱的道路展现在脚下的时候，年轻的复员军人冯马驹，便切实地意识到，他所面临的，是人生道路上的一个不能回避的三岔口……选择是困难的，痛苦的……他把双手的十指插进蓬乱的头发里，撑着脑袋，像是有一百个号筒对着他在吹奏：去不去?

“哈呀！建华——”

谁在叫他的学名呢？“建华”这个名字，念书时只有老师提问时叫，在部队，点名时排长才使用它。回到冯家滩，老人们甚至不知道冯马驹还有这样好的一个大名哩！马驹听着有点陌生的声音，一抬头，冯文生的父亲冯大先生走进门楼来了。灰褂黑裤，秃顶白发，瘦脸明目，和气的笑容，随时准备向人道歉的神态。马驹赶忙站起，礼让这位长者坐下。

说了几句闲话，冯大先生环顾左右之后，忽然激愤起来：“建华，你知道不？我那个小畜生居然做出不仁不义的事……”

马驹佯装不知，认真地听着冯大先生叙说文生要和彩彩解除婚约的事。冯大先生一边叙说，一边骂，骂自己的小儿子是混蛋，是畜生，忘恩负义的陈世美……老先生的脸都气得变了色，银白的长胡须颤抖着。马驹被老先生的情绪感染了，连忙说：“你先甭急，咱们都想法调解……”

“你想想，这样伤天害理的缺德事，我们家里的人啥时候干过？”老先生擂着拳头，“我一生以行医为本，虽则给国民党服务过，可没伤害……咱总是有错，人民政府宽大我，起用我，我为人民服务。虽则‘四人帮’把我整了，邓青天的政策又使我老来适得其所。我一生行医，只重医道，无论穷富，不管贵贱，一视同仁。现在遇见这号不争气的孽种，丢人丧德，我在冯家滩何以为人？”

看着冯老先生慷慨激昂的样子，马驹心里油然蹿起一种正义感。他觉得他向彩彩提出的劝服文生的举动是应该的；他为自己昨晚的梦悔愧了。

“彩彩这姑娘，哪一样比不上他？”老先生说，“我是实实舍不得这个好娃娃……”

“那……我去劝劝文生。”马驹说，“等我脚伤轻了，我到医院找他去。”

“好！我来找你，就是想让你去劝他。”老先生说，“他敬服你，和你自小一起长大，你不歧视他，他至今都说你是正直人。”

“我一定去。”马驹认真地说，“我去试着尽尽心……”

“你下狠劲说，甭怕！”老先生恨铁不成钢的样子，态度诚恳极了，“你骂他，骂他个忘恩负义的贼，骂得他回心转意……”

第九章

太阳正当午时，小河川道里，绿色的麦穗梢头，浮现着一层淡淡的轻烟一样的蓝色雾霭。这儿那儿的棉田里和稻地里，穿花衫的女人和赤臂裸身的男人，在移栽棉苗，在撅着屁股插秧。弯腰曲背在大太阳下的劳动是沉重的，田野里繁忙而又沉寂。

偏远坡原地带的河川公路上，车少人稀。一个小伙子，牵着一头肥大的公牛，晃悠着长腿，在公路边上杨树的荫凉里走着。公牛粗壮的脖颈上挽着一条红绸，牛头上套着一个用柳条编成的遮阳帽儿。这是牛娃拉着纯种秦川公牛，走村串寨，向那些饲养着母牛的庄稼人夸庄哩。冯家滩三队不光自己繁育良种秦川牛，还要办配种站（庄稼人叫开庄），不仅是一项很好的副业收入，而且也为国家畜牧改良部门的工作出了一份力。

他串过三四个村庄了。每到一个村子，这头公牛引起庄稼人多大的兴趣哟，像看珍禽异兽一样欣赏着这头秦川公牛的雄姿，问长问短，啧啧称赞。牛娃陶醉在自豪感里，耐心地回答庄稼人的询问，得意地大声宣传：

“咱这头公牛是纯种货，跟本地黄牛配种，生下牛犊，是杂交种。杂交优越，绝不会赖的。咱们和公家一个牌价，保配保生。生下牛犊了再交配种款，生不下牛犊不收钱，保证替农户负责……”

他很自信自己这种活广告式的宣传的力量。想想吧，牧畜包养到户了，社员家里养着母牛，割草呀，垫圈呀，黑天白天喂养着，一年到头受多少劳累，谁家不盼望生一头身架壮实的牛犊？庄稼人选择种公牛是很严格的，宁可多掏三五块钱，也要找一头好公牛哩。

牛娃刚刚从康家村出来，准备再到河岸边的草甸村去。他晃悠着长腿走着，手里攥着一根树枝，并不驱赶，好使宝贝公牛任着性儿自由自在地走。牛低头走在路旁嚼起青草来，他就站住脚，耐着性儿等待。天气热，不敢驱赶得太紧太急了。

牛娃心情舒畅得很哪！三队开春以来几项工作的胜利开展，使小伙子大受鼓舞，心劲高涨。和马驹、德宽搭班当干部，人合脾气马合套，再苦再累也心情快活。

小伙子自小命运不济，当他刚能撒开腿在冯家滩村巷里奔跑的时候，做中学教员的父亲扔下母子两个，在城里重新成家了。牛娃一当明白了自己的身世，倔强的家伙把父亲寄给他的制服衣裤脱下来，用切菜刀剁得粉碎，塞到炕洞里烧了。他把父亲赡养他的汇款单退回去以后，撕扯了课本，砸了笔盒，从学校回到冯家滩生产队来，立誓要以自己的双手养活自己，养活因为父亲的离去而急得双目失明的瞎眼母亲。

小伙子的志气令冯家滩人敬服，可是生活实际却令人伤心。三队的劳动日价值太贱了，口粮分得太少了，母子俩不仅缺钱花，常常弄得口粮短欠，秋不接夏，夏不接秋，因为家里有一个瞎眼母亲，牛娃到了乡村娃娃该当定亲的年龄，掏多大彩礼也招不来一位愿意服侍瞎眼老娘的媳妇。亲友托人给他从商洛山区引来一位姑娘，花了一千多块，在屋住了三天，偷偷跑掉了。他上了人贩子的当了。

牛娃今年是第三次在三队任职当干部了。头一次，大伙把刚刚十八岁的耿直的小伙子扶上台，干了仨月，他干不下去了。那时候的队长明目张胆侵吞社员血汗，他不能容忍，骂了一仗，打了一架，自动辞职了。三年以后，大伙儿又把他选上，干了半年，因为对抗公社学大寨的统一规划，拒绝白出劳力到原坡上的吴家坪修水库，被公社通令撤职了。两次上任都没干满一年。小伙子在冯家滩落下了两种评价：一是说他耿直正气，一是说他太死太牛，当不成干部。牛娃憋着一肚子气，和马驹、德宽搭班，第三次登上冯家滩三队的首脑席位了。三击掌的动议是他提出来的，他憋红着脸说，这一次甭说干不到年底，要是还干不出一点名堂，冯家滩的人就要把他笑臭了，他永远再不与人共事当干部了。马驹和德宽笑着跟他拍了手，立了誓。他要使三队翻身，也使自己翻身；他要改变三队的落后穷困面貌，同时也要使自己扬眉吐气。除此，他没有出路。他豁上一切了，表现出一如既往的耿直品格，又表现出对工作的非常热情和吃苦耐劳的精神。他要让冯家滩人看看，牛娃是什么样的人！

好，三队已经展示的局面果然令人鼓舞！他乐悠悠地用衣襟抹着脸颊上的汗水，用树枝在公牛眼睛前晃一晃，把那贪食的畜生赶到公路上，继续朝前走了。

田野掠过一丝微风，暑热得到短暂的驱除。牛娃一时兴起，脖子一仰，放开粗壮的嗓门，唱起了秦腔《武家坡》中的一段：

窑门外拴战马嘶声不断，

夫望妻妻望夫擦泪不干。

王三姐你本是千金名媛，

跟随我贫花儿多受磨难……

正唱到动情处，一个人从背后骑车过来，到跟前跳下了车子。牛娃一看，没有哪个当代的“三姑娘”与他邂逅，却是党支书景藩大叔站在身旁了。他立即闭了口，停了唱，不好意思地笑着，问候大叔到什么地方去了。因为和马驹自幼交好，他很尊重景藩大叔和大婶二位老人；二位老人平时也喜欢他，向来不当外人看待。

“大叔，咱队办配种站呀。马驹哥叫我拉上公牛到各村宣传哩！”不用支书问，牛娃自动汇报自己的工作，抑制不住的喜兴心情，“你看看，这头公牛美不美……”

“嗯，美……”景藩老汉鼻腔里先哼出一声，淡淡地说了一个字，算是应承，斜眼瞅一眼公牛，推着自行车和牛娃并肩走着。他刚从公社给儿子的合同证明信上盖过章，归途中遇见了牛娃。他正想找牛娃哩，现在在远离冯家滩的河川里撞见了，正好。

“我走了几个村，好些人问我哪天开庄哩！”牛娃沉浸在喜悦里，毫不注意老支书的脸色和说话的口音，只顾自己说得畅快，“现在茬口正好，春末夏初，正是母牛发情的时月……”

“牛娃，我给你通知一件事。”景藩老汉对什么开庄配种的事毫无兴趣，打断牛娃的话，完全用大队党的领导对小队干部做指示的腔调说，“重要的事情。”

“啥事？”牛娃这时才回过头，注意景藩大叔不寻常的神色，随口热情地说，“需要我办的工作，你只管说。”

“从今天起，三队的工作，由你和德宽负责。”景藩老汉直接说，像安排任何一个生产队的干部班子一样，“再甭拉扯马驹了……”

“咋咧？”牛娃大吃一惊，猛地回过头，停住脚。粗心的汉子，这时才发觉大叔一脸严肃郑重的神色，“出了啥问题吗？”

“县上给马驹安排工作了。”景藩老汉平静地说，“工作需要嘛！”

“噢——”牛娃明白了，领悟似的叹息一声。

“他手上黏着的手续，该交给德宽的就交给德宽。该交给你的，你先接着。有啥问题，由我解决。”景藩老汉严肃地说，不留一点分辩的余地。他要为儿子顺利走进县饮食公司扫清一切障碍。牛娃是一条可能的绊索。他和马驹形影不离，简单而又易动感情，要是一听马驹走了，自己没得靠山，要起脾气使出性子，就多了一层麻烦。跟他说话不像跟德宽说话，不能商量，不能留缝隙，必须一句说死，不容置疑。“我给你正式通知了，就是这事。”

“好叔哩！县上调马驹哥，三队就是离不开，也得服从。”牛娃无可奈何地说，深表惋惜，“可是，三队咋办呀？刚刚铺开的这一大摊事……”

“刚才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景藩老汉不耐烦地说，“你先接手管着。”

“嘿呀，大叔！”牛娃难受得摊开手，摇着头，大声哀叹着说，“我的本事你知底，咋能挑得起三队这担子？”

“你这娃……我给你说了两遍，让你暂时接手先管着。凡事有我嘛，你怕啥？”老汉显得不耐烦了。

牛娃说不出话了。三队展开的这几项令人鼓舞的工作，老支书连丝毫的兴趣也没有；对于马驹走后可能发生的问题，老支书连想也不想，倒显得牛娃啰唆了，讨厌了。他感到心里有一股火在往上蹿。他闭口不言就是要把这股火压下去。如果这不是党支书，他很尊重的大叔，而是旁人，他早吵上了。

“就是这事。”景藩老汉看着牛娃不再说话，以为他接受了。但他仍然担心牛娃回头再找马驹啰唆，动摇了儿子，于是说：“马驹马上要走了，在屋里还得做些准备。你这几天……甭找他，有事寻德宽商量。就是这话！”

说罢，景藩老汉跨上车子，头也不回地走了。那辆除了铃儿不响什么都响的杂牌破旧自行车，在坑坑洼洼的公路上抖着，响着。

牛娃看着景藩老汉远去的背影，猛然从老支书最后的那句话里领悟出一层令人恼恨的意思，什么“通知”不“通知”，完全是怕他挡马驹到县上去工作的路嘛！老汉居然警告他不许再和马驹接触，把牛娃当成什么人了！他胸膛里涌起一股受辱的愤怒，骂起来：“去他妈的黑脚！哪怕三队烂光烂净，能烂我冯牛娃多少呢？马驹今日走，老子明日走！老子出了冯家滩，凭这一身力气，哪一天弄不到几块钱呢？要我为三队的问题去找你，我还嫌你没水平……”

公牛在路边上啃草，不管它的主人如何破口大骂，悠然摆着尾巴，享着口福。牛娃看一眼公牛，醒悟到自己的使命，从白杨树上解下缰绳，猛地把正在吃草的牛头扯起来。公牛惊恐地瞪起眼睛，不理解对它一路关怀备至的主人，怎么忽然变得这样粗暴了。

牛娃抡起拳头，在公牛屁股上擂了一拳，狠声骂道：“我拉你夸个鸟庄！回家！”

“德宽哥，从今日起，三队的事情，我不管了。”牛娃站在砖场边的塄坎上，把德宽从砖机房里吆吼过来，开口说道，“我手里现在没染一分钱的经济手续，就是这话。”说罢，扭身拉着牛就走。

“咋的话呀？”德宽着实慌了神，拉住牛娃的胳膊，惊吓地问，“啥事把你气成这样？跟外村人……打架来吗？”

“我不想干哩，再没二话。”牛娃挣脱德宽拉拉扯扯的手，“甭拉！”

德宽愈加用劲地抓住牛娃的胳膊，强迫地把他按下去，蹲在地上。德宽瞅着气得歪鼻瞪眼的牛娃，奇怪地想，昨晚三人商量决定叫牛娃今天到各村里去夸庄，牛娃高高兴兴接受了，今早出村时还嘻嘻哈哈说着粗鲁的笑话，怎么突然变成这种模样？早晨，景藩大叔告诉他马驹要走的消息，已经使他心里压上了沉重的石头，一天来虽然照样在砖机跟前忙活，心情却很不好。午饭时，他借口看望马驹的脚伤，到屋里坐了一会儿，马驹问了砖场出砖的定额定得合适不合适；问了良种牛吃草正常不正常，来娃一个人能否照顾得过来；还问了县农科站指导棉花生产的李技术员吃饭安排在谁家……始终没见提说自己要到县上工作的事。他也没有开口问。现在，牛娃冷不丁甩手撂挑子，德宽就特别慌乱了。这个轻易不起性儿的人，这时也忍不住，恨着声说：“你二十四五岁的人了，还当你是鼻嘴娃子？有话不说清白，耍啥牛脾气嘛！”

“嗨！人家把我当贼防哩……”一气之下，牛娃把景藩老汉在路上说给他的那些难听话，全盘端出来，瞪着牛铃大的眼睛，说，“我牛娃哪怕穷死饿死，谁也甭想下眼看我！”

德宽暗暗在心里怨老支书，话说得太硬了，伤了牛娃的心，也有失你支书的身份呀！马驹还没走，把关系已经弄得这样紧张，实在不好。考虑到他们和马驹的亲密关系，也考虑到影响，他诚恳地说：“兄弟，小声点，甭让那边的人听到了，影响不好。”

“党支书不考虑影响，我顾啥呢？”牛娃执拗地说。

“好兄弟，先甭说这号话。”德宽耐心地劝慰，“咱俩还没见马驹的话哩……”

“身为党支书，为了自家……把我牛娃当成啥了？我是为我自个吗？”牛娃仍然消不下气，赌气地说，“凭我……嘿！明天我过河去，找我表哥去呀！人家买下一台大拖拉机跑运输，早给我捎话，叫我给他帮忙装卸，说下一天两块半。想到咱和马驹击过掌，咱不去挣那钱。好！现时他走，我也正好走……”

“三队这一摊子工作，给社员咋交代？”

“让党支书去给社员交代吧！”

“甭说赌气话，兄弟！”德宽拍着牛娃的肩膀，难受地说，“马驹要是真个走，那好，咱俩都甩手。我看哪，要我挑这一摊子，也是够呛。不过，咱们先稳住架势。咱也甭去问马驹，免得景藩大叔疑神疑鬼。马驹终久要跟咱俩说清楚的……好兄弟，等上两三天，不误你去表哥家挣钱的。”

牛娃长长吁出一口气，从地上站起，碍于德宽苦口婆心的劝说，没有再说执拗的话，拉着牛，懒洋洋地走进村子去了。

德宽站在原地，看着牛娃丧魂落魄的样子，心里难受了。他喜欢牛娃，虽然鲁莽，却正直诚实。他同情牛娃，遇见了个没良心的爸爸，比别的娃短缺父亲的爱抚；二十五岁了，还拉光棍，没有哪个姑娘愿意光顾他和瞎眼老娘住的那两间破厦房。他有心和马驹在三队干一番事业，却落得这样的结果……

德宽难受地咂着舌头，十分惋惜：昨天晚上，三个人还在这儿热热火火地研究种牛场饲养员的问题哩，给烧火的郭师傅敬庆功酒哩，仅仅隔了一晚，配合得相当不错的三个干部之间，一下子变得稀酸了……唉唉！

第十章

彩彩姑娘这天也骑着自行车出了冯家滩。她要去代销医药的河西公社卫生院去购进药物。她从家起身的时候，太阳已经托上东原的平顶了。这时候，景藩老汉正在紧张地和公社王书记“谈判”，牛娃正得意地溅着唾沫星儿在夸耀良种公牛的优点……

彩彩今天出门完全是临时想到的行动。库存的常用药物还可以维持几天，本没有打算今天出去买药的，只是昨天接到文生的绝情信以后，她当晚写下了给对方的回信，一早起来，就急切地要把这封回信立即塞进河西镇邮政代办所门口的那只绿漆邮箱。

灿烂的阳光照耀着河川和坡地上绿色的麦穗，塄坎上的野花一团一簇地开放了，湛蓝的天空飘着几缕淡淡的云丝，远处秦岭的群峰隐

没在淡蓝色的雾霭里。彩彩踏着自行车，双手扶着车把，轻快地在沿着坡根伸展的河川公路上行进。黑色塑料提兜挂在车头上，那封回信就装在里面。这封信一投进邮箱，她和一个人的婚姻关系就宣告彻底完结了，与另一个人的爱情就要开始了……她的心在罩着花格衫子的胸脯里扑扑跳着。“在你的脚下，昨天结束了，今天接着就开始了……”记不清读过的哪一本小说上有这样的一段意味深长的话。彩彩的昨天与今天，也不寻常啊……

她和奶奶在沟泉边抬水，那挂着水桶的木棍，压在她的肩膀上，是那样死硬死沉啊！她咬着嘴唇，不让眼泪流下来，趔趔趄趄走出小沟了。她看着那些挑着两满桶水的叔叔和婶婶忽闪忽闪走过去，就想念死去的爸爸和改嫁他人的妈妈。孤孙寡婆现在只能艰难地抬一桶水吃了。

这当儿，马驹放学回家了。他站在彩彩当面，挡住去路，从彩彩肩上抬起棍子，喊了一声：“牛娃！”牛娃跑过来，身子一蹲，马驹把木棍搁到牛娃肩上；他再跑到后头，从奶奶的肩上把棍子的另一端搁到自己肩上，两人抬着走了……从此，马驹和牛娃，每天给婆孙俩抬两桶水，一年四季，没有中断。及至他们能单独挑动一担水的时光，就放下木棍而捞起了扁担……

她上学了，常常受欺侮，几个捣蛋的男娃骂她“四不清”。她委屈得哭了。马驹赶过来，一脚把骂人的小子踢倒了。他们以后想欺侮她，得先看看马驹在不在旁边……

她有一次偷跑到后沟里，趴在爸爸的坟上，哭啊喊啊，手指头在石头上抠出血来了。马驹和牛娃在后沟坡梁上割草，奔跑下来，扶起

她，用自己染着草绿的手掌给她擦眼泪，又用嘴吮她的流血的指头……

马驹参军走的前一晚，和牛娃一起来到她家。奶奶抚着已经穿到身上的崭新的绿军衣，流着眼泪。马驹也流泪了，说：“大婆，我走了，水有牛娃给您担……”牛娃当面保证说不会耽误大婆吃水……

她在得知马驹哥被批准服役的确凿消息以后，就夜以继日地纳扎起鞋垫儿来。赶到马驹哥要走的前一晚，马驹和牛娃来到她家的时候，她把两双纳扎着漂亮图饰的鞋垫送到马驹哥手上。马驹脸孔有点红了，装得乐呵呵地说：“哈呀！我这双臭脚，怎敢铺这样好的垫子！”她只是十四五岁的小姑娘，并没有想到以外的事情……

她和马驹哥通了三四年信。马驹哥的每一封信，她都反复读过，一遍一遍读到可以背熟的程度。这些信，温暖着她，鼓舞着她，伴着她走过了艰难的生活路程。她终于长成一个十八九岁的大姑娘了。可惜！可惜在她和马驹哥往来的那些书信里，没有说及婚爱的事！

有一天，两位军人走到景藩大叔的门楼里去了，直到吃罢午饭，景藩叔和大婶亲亲热热送两位军人出了村。彩彩在自己的小厦屋里，坐不住，心里总在猜想，那一定是马驹哥部队上的领导或是战友，来看望景藩大叔了，他们一定带来了马驹哥具体而又可信的消息吧。他长得多高了？立功了吗？她急得团团转，好容易等到天黑，她到景藩大叔家去了。

“哎哟！彩娃，快坐。”大婶格外热情地招呼。

“吃呀！马驹捎回来的葡萄干……”大叔也特别客气地礼让着，“给你奶还专门捎了一包……”

彩彩的心在胸膛里咚咚地跳，脸上阵阵发热。两位老人脸上表现出的兴奋和高兴，一丝也逃不过她的聪明的眼睛，肯定是那两位客人带来了马驹哥的好消息。她抑制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手里捏着大婶硬塞给她的葡萄干，不好意思填到嘴里去。哦，马驹哥远在几千里之外，还不忘记给奶奶捎一包葡萄干，果真只是捎给奶奶吗?

“彩娃，叔给你说件好消息。”大叔咂着烟袋，眉毛在颤动，嘴巴周围的短胡须也在抖，“你关心你马驹哥，这喜事，该当让你早知道……”

彩彩的心都要跳出喉咙了。先不管马驹哥有什么好消息，单是大叔这种对她说话的意味，已经毫不掩饰地把她看成是和他们家有特殊关系的人了。彩彩的脸上热乎乎的，似乎血一下子都涌到脸上去了。她微微低下头，急切地等待着大叔说话。

“你马驹哥，要提拔排长了。”大叔说，“今日来的那两位军官，就是来调查咱家的社会关系。”

“噢！”彩彩抬起头，高兴得要掉眼泪了。她强忍一忍，克制住涌涌波动的感情，说，“没什么麻烦吧？”

“没有！”大叔一摆头，“咱家的亲戚，没得‘五类分子’！那俩同志说，情况很好，没有问题。”

“好！”彩彩高兴地说，“马驹哥是好人，走到哪儿都受欢迎。”

“有一句话，叔今黑要跟你说明白……”景藩老汉说，顿一顿，似乎难开口，终于还是说了，“你跟你马驹哥通着信？”

彩彩忽地一阵眩晕，深深地低下头来，默认了。她处于一种莫名其妙的紧张情绪里，猜想那个幸福的时刻就要来到了。

“你和马驹把话说透了没有？”景藩老汉问。

“没……”彩彩颤抖着声音说，“啥话也没说……”

“噢！这样！”景藩老汉似乎松了一口气，“今天那两位领导说，给马驹订婚，对象要经过部队审查，同意了才能……”

“啊——”彩彩猛地仰起头，旋即又低下来，脑子里轰然一声，麻木了。

“你看——”景藩老汉立时大声叹息，“本来我跟你大婶啥也明白，可人家军队上严格……志强跟我搭班干了几年，我也明白他是好党员，可现时弄得……”

“甭说……咧！”彩彩浑身颤抖，“你的话……我听……明白咧！”

“唉！”景藩再度叹息，“为了你马驹哥的前途……”

“我知道……该咋办。”彩彩仰起脸，咬着嘴唇，“我不会……妨害马驹哥……你放心！”

彩彩说罢，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就从屋里奔出来。她在自己的小屋里，整整睡了三天，任奶奶怎么说，她也不说为什么，吓得老奶奶简直要疯了。

第三天晚上，她走出自己的小屋，脚下有点打飘，如同大病过一场，脸色苍白，走进奶奶住的南间屋：“奶，你给刘红眼回话，我愿意

跟文生定亲。”

她的平静的态度使奶奶吃惊，一直拒不考虑刘红眼所牵线的婚事的孙女，怎么一下子自动同意了呢？奶奶怕孙女话里有话，就表明自己决不勉强可爱的孙女，说：“奶奶听你的话，你不愿意，奶奶也就不愿意。你觉得不合心，也就不合奶奶的心。你甭……”

“我愿意。”彩彩更加镇静地说。

“愿意了，你就该高高兴兴地跟奶说呀！”奶奶难受地说，“你看你那样儿，像不像办喜事……”

彩彩再也忍不住，一头扑到奶奶怀里，放声痛哭……

不能因为她背着政治上的黑锅，影响马驹哥提拔人民解放军汽车排排长的大事；为了亲爱的马驹哥的远大前程，彩彩甘愿做出一切牺牲。她不怨恨景藩大叔，那本来是没有办法的事。为了解除大叔的思想顾虑，她答应了冯文生父母几次三番托刘红眼登门撮合的婚事……

马驹那年从部队回家探亲的时候，她已经是文生的未婚妻了。她没有向他做任何解释，他也没有问她……马驹随后和薛家寺的民办教员薛淑贤订婚了。

这一切因为主观和客观、有意和无意、必然和偶然诸种因素造成的彩彩婚姻问题上的历史和现状，现在都要结束了。她将按照自己的意志，去进行新的选择。过去的种种不合理的东西尽管使人痛苦，毕竟已经过去了。唯其如此，彩彩姑娘面对今后的新生活才如此心情激动。她骑着自行车，在白杨夹道的公路上飞驰，从麦梢上空掠过的小鸟啾啾鸣叫着，飞到河川深处去了。她准备和马驹哥说明过去的一

切：她喜欢他，无论他是军人，无论他是农民，她都喜欢。她喜欢他这个人，而不是像那个势利眼的民办教员，只喜欢他的军官头衔。

彩彩骑车走进河西镇，卖粮食、蔬菜、猪羊肉的摊贩已经在镇子两边的公路上排得拥拥挤挤。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她跳下自行车，推车走到邮政代办所的门口，从提兜里取出那封给文生的回信，迟疑一下，就折身走到墙角，倚着身子，再看了一遍。没有问题，信写得很得体，她没有骂文生的背叛行为，也没有乞求他回心转意。她对自己昨晚写下的信中的这一段话特别满意："你不必自己谴责自己是'忘恩负义'，我对你本来没有什么大恩，你无恩可负。你也不必担心我不能接受解除婚约的痛苦，因为我没有痛苦。你从此可以自由选择能与你（大夫）在生活上便于安排的人，我也同样获得了选择能与我（农民）在生活上便于安排的人的自由。你担心我会骂你，这你就错了，说明你还不了解我……"

她重新把信纸装进信封，从小邮局的营业员手里接过一枚邮票，贴在信封上，转身出来，最后看一眼那写着冯文生名字的信封，就毫不犹豫地塞进小邮箱里去了。

彩彩推起车子，在拥挤的街道上走。耳朵充溢着小摊贩们和顾客为一只鸡、一颗蛋、一斤肉或一斤菜的价值争来争去的吵闹声，她心里却感到从未有过的轻松。她从人窝里好容易挤过去，就来到百货商店门口，她选择了几种颜色的彩线，好用心用意给马驹哥扎纳鞋垫儿。

彩彩走出百货商店，跨上车子，就赶往位于街道西头的公社卫生院，去那里购买药物。她要很快地赶回去，有几位流感病人还等她回去打针呢，后晌还要给马驹哥的脚伤换药哩……

尽管景藩老汉小心谨慎，甚至行动有点神秘诡谲，却无法封住大队会计冯三门那张向来不挂锁子的嘴。于是，一个嘴巴对着一只耳朵，眨着惊奇、眼馋的眼睛，传布着这条自冯安国家规模浩大的婚礼之后的最重大新闻。彩彩姑娘是在给一位老爸爸打针时，听服侍老人的儿媳妇说的。

这个消息太突兀了，也太叫人意料不到了。看着那媳妇压低声儿说给她这个消息时的神秘的样子，彩彩姑娘心里轰然爆响一声，连回问一句的力气也没有，就拎起药包走出人家的屋院了。

太阳已经转到西原的平顶上，村巷里的柴火堆、羊栏猪圈，涂着一层金红的夕照的光，这是落日前小河川道极其绚丽的一瞬。彩彩走过村巷，看见奶奶在半边明亮半边灰暗的麦秸堆前撕扯柴草，一低头走过去了。

“彩娃，你的脸色不好。”奶奶在她身后说，“是不是染上感冒了？”

她摇摇头，匆匆走进小院，跨进自己的小屋，就支撑不住有点瘫软的身体，躺在炕上了。

彩彩的命太苦了。她的尚未成年的幼嫩的肩膀，她的尚不懂得人生的无邪的心灵，过早地承担起生活强加给父亲的灾难，悄无声响地在冯家滩长大成人了。在她最富于青春活力的年龄，不能像别的姑娘一样跟男青年们开会，说笑，甚至串门也得看看门楼……她要排除农家漫长而寂寞的冬夜的苦闷，自觉不自觉地把书抱到怀里了。她没有崇高的读书目的，纯粹是为了消磨时光。什么样的书，凡能到手的，她都能耐着性儿读完。冯家滩男女青年手里，偷偷传递着不少小说、

剧本和其他书籍，那是趁造反时机从学校图书馆里偷出来的。无意间，那些中国或外国的书籍中的人物，美的和丑的灵魂，照亮了乡村姑娘冯彩彩一双忧郁的眼睛。她顽强地忍受着无法躲避的灾难、冷漠，甚至傲慢地蔑视那些恶人的丑行，理智地处理自己和奶奶这个两口之家的内务和外交，勇敢地活到了做梦也无法预料的那一天——父亲的冤魂得以昭雪了。她感激那些书。

她和文生的婚约，是理智驱使的结果，而不是感情的自然结果。这最后一件使她心里痛苦的压力，今天也随着那封给文生的回信而掀掉了。她自由了，精神上自由了，感情上也自由了。她的心刚刚舒展了一天，开始编织和亲爱的马驹哥的爱情花环的时候，他却要离开冯家滩了……

时风变化了，乡村人也开化了。过去，冯家滩在西安或县城里工作的男人，一般都习惯在老家娶个媳妇，好照顾父亲。现在，首先考虑的是将来有了儿女能不能报上城镇户口哩，没有哪一个傻瓜还要在农村娶妻生子了。马驹一旦有了工作，薛淑贤肯定会改变态度的，自己怎好意思从中插足呢？再说，在马驹要出去工作的时候，怎么好意思说自己喜欢人家呢?

彩彩沉静下来，逐渐恢复理智。经受过许多折磨的姑娘，总是能很快地在打击当中恢复理智。现在不能向马驹哥有任何明显的表示，鞋垫儿也得缓一缓再纳扎。现在必须证实，马驹出去工作的消息，是实的还是谣言？马驹的态度如何？一切都得在证实了这个消息之后来决定。

彩彩从暖水瓶里倒了水，洗了脸，免得眼泪在脸上留下痕迹；用化学梳子拢一拢散乱了的短发，再用小镜子照一照，好，眼睛里依然

是平静而理智的神色。她背上小药包，走出门，给马驹哥的脚伤换药去。

太阳已经沉下西原，天边只留下一抹淡淡的红云。彩彩朝那个熟悉的小院走去，心里复杂极了。过去，她常常串到这个小院来，把给马驹哥纳扎的鞋垫儿交给大婶，坐一坐，聊一聊，听得大叔大婶关照的几句温暖的话，她就心满意足了。现在到那个小院去，心里矛盾得很哪！

小院里有一股清淡幽微的香气，那是香椿树的枝叶在傍晚的时候散发出来的。马驹坐在树下，双手叉进浓密的头发里，低着头，没有察觉有人走进小院。他大约在想着要去县上工作了吧？彩彩咳嗽了一声，打招呼给他。

“唔！彩彩。”马驹仰起头，有点愣呆，显然是从专注的思索中醒悟过来。

“该换药了。”彩彩说，完全是医生对病人履行义务的声调。她早已提醒自己，不能带任何感情色彩，不能有任何心思的流露。

彩彩蹲下来，轻轻撕开已经发黑变脏的胶布和棉纱，用棉球擦洗。怎么开口问他呢？

“嗨呀，彩彩，给你说吧——”马驹说，“冯大先生晌午来寻我了。”

“寻你做啥？”彩彩淡淡的口气。

“叫我去劝解文生哩！”马驹说，“老先生在我面前愣骂文生，说他儿子忘恩负义，简直不是东西。老先生还说他一家都喜欢你，决不能

做出让乡党们指脊背的事。他说他叫大女儿也去劝弟弟……看来，老先生还算有良心，正在动员一切家庭和社会力量……”

“那……好么！”彩彩应酬着说，心想：我自己已经把回信寄给文生了，还劝解什么呢！

“我的脚伤好了，马上去找文生。”马驹说，“我想很好地跟他谈谈，你放心。”

“我昨黑给你说过了，不必再找了。”彩彩有点不耐烦，“你爱跑路，由你！”

马驹的热诚和好心得不到回报，就闭了口，看着彩彩在自己的脚上敷药。他看不见她的脸色，只能看见姑娘扑落下去的黑乌乌的头发，那头发里散发出一种奇异的好闻的气味；姑娘低头时露出的脖颈是白皙的，被头发覆盖着的耳朵也是白皙的，可以看见细细的淡蓝色的血管。这个猜不透的姑娘，心里到底打的啥主意呢?

“你看见牛娃了没有？”马驹仰起头，不好意思再看彩彩白皙细腻的脖颈了，“一天没见，不知他从外村回来没有？”

“你寻牛娃做啥？”彩彩给伤口盖上纱布，仍然没有抬头。她已经抓住了话茬：“还操心那些牛吗？你不是要走了吗？”

“你听谁说？”马驹忙问。

“还保密呀！”彩彩笑着说。

“嘿，保啥密呢？”马驹笑了，坦率地承认了，“有这事，我还主意不定哩。你说，去好呢，还是不去好呢？”

“去了当然好呀！”彩彩故意用毋庸置疑的口气说，“当工人，开汽车，吃公粮，挣工资，不去才是傻瓜哩！”她想探一探马驹的心。

“嗬呀！你说得这么好哇！我就去了。”马驹笑着说，拍了一下膝盖，下定了决心的样子。

彩彩的心猛地一沉，顿然觉得胸脯里压抑得透不过气来。她终于证实了从那家媳妇嘴里听到的消息，他要走了。可笑的是自己从昨晚到今天还在做好梦哩。现在还能说什么呢？什么也不能说。她压好最后一条胶布，站起来，强装出满不在乎的口气问：“啥时候走呀？”

马驹皱一下眉，仰起头，说：“明天或是后天，脚伤好了，就去。”

彩彩勉强笑笑，点点头，算是告别，提起药包，转过身，走出了这个日夜令人回味的小院。脚下的路面像是在抖动，她的脚下绊了一个趔趄。最后的一丝侥幸的希望破灭了，她努力克制住自己，不能在村巷里流出眼泪……

第十一章

日暮中，景藩老汉带着几分酒兴，跨进自家门楼，就瞧见儿子无精打采地坐在已经昏暗的前院里的槐树下。他对儿子摆出的这种愁怅苦相的架势十分反感。

老汉没有招理儿子，推车径直走进去，放下车子，走进里屋，问老伴：“你跟他说来没？”

“说来。”老伴回答，“娃说他愿意去开车。”

“愿意个屁！”老汉斜眼瞅一眼老伴，表示不信任，“你看他难受的那个架势！”

“晌午我再三问，娃都说愿意嘛！”老伴对于老头一进门来的这种气势不满意，“你甭疑神疑鬼的。”

“要是真心愿意去，他会蹦蹦跳跳的。你记不记得，那年刚一接到参军通知书，他跑前跑后，嘴里唱唱嘀嘀的，啥架势？”老汉观察到了儿子行为中的漏洞，“你看他现时那个架势，愁眉苦脸，像是要上杀场，哪像是要去参加工作！”

老伴不能不信服老汉的眼睛是厉害的。她又何尝丝毫没有觉察呢？她明明白白可以看出，儿子想去开汽车，又撂不下自己一手经办起来的砖场和牛场，正像老汉自己当年撂不下刚刚兴办起来的农业社一样。她主张耐心劝导，劝得儿子一两天后到县上去报了到，坐进驾驶室，啥事也就没有了。她很担心老汉动不动就想发火的神气，有可能把事情弄僵。她要劝儿子，又要劝老汉，使这个农家小院里保持平静和安宁。老汉今日一回到家，她就发觉老汉说话腔调很高，脖颈红红的，口鼻里喷出一股烧酒味，就问：“你在谁家喝酒来？”

“在永槐家。”景藩老汉掼下毛巾，掏出一支卷烟，夹在指缝间，挺着腰站在屋子中央，声高气壮地说：“今日喝得痛快，谝得痛快！”

景藩老汉从公社出来，觉察到王书记似乎把他当成累赘而急于换掉的用意，感到有点寒心；在路上遇见牛娃的时候，自然就没有顺气，以致态度有失检点；在路过何家营村的时候，被党支部书记何永槐拉到屋里去了。

两位在土改中结识的农村基层干部，现在坐在方桌对面，对饮起来了。老了，何永槐也老了，土改中冒出的那一茬干部，现在都跟景藩老汉一样，霜染鬓发了。景藩老汉呷着酒，感叹着。几十年的经历，两人都差不多，不过永槐是蔬菜专业队何家营的党支书，家庭经济状况比他好；而个人经历，简直如出一辙。在河西公社里，他俩曾经是粮棉和蔬菜两类作物生产的先进人物，常常代表河西公社到县上和地区出席各种会议。“四清”和“文革”中，两人都被整惨了。他俩作为河西公社大队一级的“走资派”代表，被造反派们押在一辆汽车上，游遍了公社的所有村寨……有幸和不幸，使两人结下了友谊。

何永槐端出一盘猪头肉，提出一瓶“雁塔大曲”，招待老朋友。

“地分了？”何永槐明知故问，“牛也分了？”

“全都分光分净了。”景藩老汉说，“你们蔬菜队不分吧？”

“喝！”何永槐端起酒，招待景藩老汉，“原先说蔬菜队不分，现在也保不住。”

“蔬菜队分了地，社员保准不给国家蔬菜公司交菜，差价太大嘛！”景藩老汉问，“工人和干部，都得上自由市场买菜了……”

“爱上哪儿买上哪儿买去！”何永槐不屑一顾地说，“我盼着分地哪！都他娘的分了，省得我劳神了。”

景藩老汉呷着酒，瞧着何永槐烦恼的神气，心里说，甭看他嘴里说得那么不在乎，其实他比自己更想不通，不过是赌气话罢了。

“分了地，分了耕畜，还要咱们这号干部做啥？”景藩老汉说，“各家各户种庄稼，干部没事干了。”

“抓计划生育嘛……哈哈哈！”何永槐嘲笑似的说，“只剩下这一项工作了……”

景藩老汉也笑了。

“你听没听说，‘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社员有了钱，干部丢特权’？”何永槐念着他听到的顺口溜，悻悻地说，“当初为办农业社，咱把心操尽了；而今倒好，分地分牛……”他说着，又灌下一杯酒，手在桌上一拍，“广播上说干部不愿意分地，是怕劳动，尽说的屁话！我要是分得几亩地，让他们看一看，看我种得出何家营的头一份好菜……”

酒逢知己，话更投机。景藩老汉觉得心里畅快——何永槐把他心里的话全都说出来了。他虽然这样想，但嘴里不敢说。公社王书记在传达县委关于搞好责任制的文件精神时，批评过永槐刚才念的那几句流传在乡村里的顺口溜，再三解释责任制和单干的本质区别。老汉服从纪律，把自己的“不一致”的看法藏在心里，决不在公开场合乱说乱道。如今何永槐毫无顾忌地说着对实行责任制的“不一致性儿”的话，景藩老汉听得痛快。

两个“老土改”喝着，谝着，对正在贯彻的责任制的农业政策发牢骚……一瓶“雁塔大曲”揭底了。

这个时候——一九八一年初夏时节，渭河平原的农村里，“责任制”这个新名词，正如当年的“农业社”这个名词一样，在庄稼人的嘴里热烈而新奇地叫响了。大队和小队的干部，纯粹靠土地生活的社员，还有儿子或丈夫在国家机关、工厂工作的农村家属……都在讨论会上，地头场间，街巷屋院，热烈地发表自己的见解。满意的和不大满

意的，高兴的和担忧的，喝彩的和叫骂的，种种听来都似乎理直气壮的意见，汇成一股喧闹的声浪，在乡村里涌流……

冯家滩党支部书记冯景藩和蔬菜专业队何家营党支书何永槐，两人在摆着烧酒和猪头肉盘子的大方桌上的谈话，还在继续着。景藩老汉听到了合心合拍的话，憋在胸膛里的忧虑顿然宽舒了。何永槐又提出一瓶“灞陵”酒来，说他们以后也许见面的机会不会像以往那样频繁，难得痛饮一场。景藩老汉也不执意要走，给儿子马驹要办的手续业已办妥，心地踏实了。

“叫娃快走！”听完景藩老汉的描述，何永槐大声说，“开汽车挣工资，跟谁不犯一句唠叨，多好的事嘛！何必要当那个队长呢？”

“人家还想在三队成一番气候哩！”景藩老汉嘴一撇，嘲笑说，“那小子不知深浅……”

“哈哈哈……”何永槐大笑，“你把你三十年喝的酸辣汤，让他尝一尝，他就灵醒了！”

景藩老汉和老朋友何永槐，大声嘲笑着儿子的愚蠢行动，现在还想在农村大干一番事业，真是太不识时务了……老汉喝得尽兴，谝得畅快，苍茫暮色里，告辞回家来了。

和老朋友何永槐一席畅谈，景藩老汉愈加坚定了自己的想法和做法：必须尽快地跳出冯家滩这个泥沼。进门来一眼瞅见马驹愁眉苦脸的样子，就难以相信老伴的话。现在，公社的章子盖到合同上了，老汉给德宽和牛娃分别打过招呼了，一切可能成为障碍的因素全都排除掉了，只等儿子明天带上介绍信到县饮食公司去报到了。但他看出了儿子的心病。为了彻底打消儿子还想在三队干什么事业的愚蠢想法，

他从里屋走到前院，站在儿子对面，直截了当地说："马驹，手续办完了。你明天就去找你安国叔。"

马驹一仰头，还没来得及开口，母亲就提醒父亲，儿子脚上负了伤，他还拿不定主意哩！

"迟去一天半天问题不大，只要你主意拿定。"景藩问过儿子的伤情，直逼着问，"你实说，你的主意定下没有？"

"定下了，"马驹说，"昨晚跟你说过了……"

"你的主意没拿定。"景藩老汉仍然盯着儿子的眼睛，把潜藏在心里的危险索性揭破，"我能看出来，你三心二意。"

"我……没有。"马驹口里支吾说。

"你心里有啥为难事，尽管说。"景藩看着儿子支支吾吾的神色，料定自己把儿子的病根抓准了。他坐下来，点燃烟锅，把儿子心里正在思量着的事，全盘端出来，"你怕德宽和牛娃说你不守信用，你们仨击过掌；你撂不下三队的工作，几件大事刚刚拉开摊子；你想着自己是个党员，又是复员军人，想为众人干些好事……我说得对不对？"

父亲这种坦率令人吃惊，马驹抬起头，瞧一眼父亲，心里不由得"咯噔"一下。父亲把他心里的矛盾，全都看穿了，端出来摆在当面了。他忽然想，既然如此，认真地谈一谈，也是好的。他诚恳地笑笑，表示默认。

"按说你这些想法，都没错。"景藩老汉看着儿子静默不语，料定自己说准了。他很理智地对儿子说："共产党员嘛！总应该知道自己姓'共'，不姓'私'。"

“对，你说得对。”马驹说。

“我在冯家滩讲了几十年大道理，这点子事还翻不清里外吗？嘿呀！岂止是道理，老子一生为公众的事，连自家性命都赔上了……”景藩老汉借着酒兴，痛说起自己的革命历史来，“老子当初办农业社，啥时间睡过一个透觉？农业社办得好不好，你问问村里的老社员就知道了。刚把农业社办得巩固了，上级号召‘大跃进’，逼着我放‘卫星’。一个‘卫星’没放得上天，跌下来把冯家滩农业社的家底砸烂包了。咋办？农业社是咱办下的，‘卫星’也是咱放的，共产党员能跌倒也能再爬起来，我豁出来了——”

这是冯家滩历史上悲壮激昂的一幕。冯景藩急于挽救自己“放卫星”给冯家滩造成的损失，高中毕业生冯志强立志改变家乡的困难局面，两人提出一项改造河滩的大胆计划：修一道大堤，可以从沙滩上夺回三百亩稻地。社员们通过了。开工那天，夜里下了一场大雪，冯家滩男女站在村子当中的戏楼前面，听完新任大队长冯志强的讲话，大伙一致拍手欢迎老支书讲讲。冯家滩的庄稼人，对刚刚回到村里的高中毕业生还没有建立起信任。这一仗能不能打胜，沙滩能不能变成稻田，能不能收获黄灿灿的稻谷，以取代大伙肚子里塞得太多的糠皮和野菜，大伙想听听冯景藩的话。

四十岁的中年汉子冯景藩，走到台前，手里没有拿讲稿，却抱着一摞奖牌和奖旗，那是从大队办公室的墙上卸下来的。他没有大声疾呼要求社员三九寒冬到沙滩上去卖命，却以一个出人意料的举动震慑了冯家滩。

“啪嚓！”玻璃装面的“卫星”奖牌摔碎了。

“哧啦！”绣着金字的紫红色平绒奖旗撕破了。

冯志强站在景藩旁边，挡住他的手：“大叔，这太可惜了，上等丝绒哪……”

“那……谁要谁拿吧！”冯景藩停住手，“做块尿布，还有用……”

没有人笑，会场里那些面呈菜色的男女，默不作声地瞧着党支书的举动。

冯景藩突然扬起手，打了自己一巴掌，颤抖着声音说：“入社时，大伙把土地牲畜交给我，现在弄得人没粮食、牛缺料，我对不住冯家滩父老兄弟……”

新任冯家滩大队年轻的大队长冯志强，经受不住这样强烈的刺激，抱头趴在讲桌上，眼泪从指缝里流出来。整个会场，唏唏嘘嘘，哭哭溜溜，悲壮激越，感天动地。

冯景藩热泪纵横，大声说：“这次修河堤，天冷，肚子饿，我不强迫大家。谁相信我冯景藩，谁跟我下河滩……”

男人女人，婆娘女子，扛着铁锨，挑着担笼，一哇声跟冯景藩下到白雪皑皑的沙滩里……

“稻地整好了。大堤修成了。白米吃到嘴里了。冯家滩男女的脸上放光了，菜色褪净了。我跟冯志强可成了罪人！”景藩老汉磕掉烟灰，痛心疾首地哀叹，“冯家滩刚刚还过阳气儿来，‘四清运动’开火了；‘四清’还没收完场，‘文化大革命’又闹上了。这下好，冯志强娃娃赔了一条命，我活剥了几层皮，冯家滩乱成一摊泥沼了……”

“爸，你为冯家滩出了力，受了苦，社员还是记着你的好处的。”马驹安慰父亲说，“现时党的农村政策，就是纠正前多年的瞎折腾……”

“有人把我叫‘维持会长’，我知道；有人还说我是‘湿湿木柴，只冒烟不冒火’，我也知道。”景藩老汉苦笑着说，“我不管，谁爱说啥由谁说去。我的火嘛，早给‘四人帮’浇灭了，冒不出火啰！”

马驹听着父亲的话，深深同情父亲那一辈“老土改”干部的不幸遭遇，如果没有那些挫伤他们积极性的“左”的失误，而是给他们以党性和政策的教育，给他们以科学和文化的武装，他们自己以及他们领导下的农村就绝不会是那样要死不活的局面。他庆幸自己正当年轻有为的时候，遇到了现在全面恢复农村经济的好时机，便安慰父亲说：“现在，振兴农村的时候到了，所以我想放开手大干一场。”

“土地耕畜下户了，跟单干没啥两样。你干啥呀？”景藩老汉说，“政策一天三变，你能保证日后是咋回事吗？”

“现在政策是在变，是往完善的地步变哩。”马驹不能同意父亲的意见，“不是过去那样搞‘大呼隆’了……”

“十年二十年以后呢？”景藩老汉严厉地提出一个问题，“你能保证日后再没有害人的运动了？”

“我相信不会再发生那号事了。”马驹说。

“发生不发生，谁也难料。”景藩老汉只相信自己的亲身经历，根本不把儿子的话当一回事，只是用藐视的口吻说，“冯家滩这一摊子，谁也弄不好。”

“难弄肯定是难弄，现在是人穷地薄，社员没信心，干部不管事，确实难弄。”马驹说，“再难总得有人弄。我想试火一下……”

“你甭试火，不行。你那点本事我看得见，你不行。”景藩老汉说，“我没本事，把冯家滩没有搞好，冯志强呢？高中毕业，本领比你强多了，也没搞好嘛！何家营的何永槐呢？老模范，现时也要撂挑子，觉得没法干了！你娃娃有多大本事？你想试火啥？我试火了一辈子，也不成！”

马驹闭了口，说不出话来。父亲故意这样灭他的志气，他还能再说什么呢？

“我今日见了永槐，他也说你应该快走，不敢再把脚伸进泥滩里。”景藩说，“我知道你二心不定，今黑把话扯明，只怕你再走老子的那一步错路，后悔来不及了……”

马驹仍然不开口。父亲今晚的谈话，表明老人的态度更强硬了。父亲对他去县饮食公司的态度，不放心。他不能再和他争辩。父亲的话，也不是全无道理，自己中午不也想到过十年二十年中间会不会遇到无法干下去的境况吗？他需要再好好考虑一番，也许能定下一条好主意来。

“话说得不少了，能说的话，我都说给你了。听我的话，由你；不听，也由你。我今黑有话说在你当面——”景藩老汉站起来，攥着烟袋的手背握在身后，“你愿意去，明天早晨起来，高高兴兴到县上找你安国叔去报到；你不愿意去的话——”

老汉突然顿住了。

马驹盯了父亲一眼，会发生什么事情呢?

“咱们父子一刀两断！”

景藩老汉说罢，转过身，头也不回地走进院子里去了。

马驹低下头来。他相信父亲的话不是吓唬他。怎么办？明天早晨不去县饮食公司，这个家里就有好戏看了。去不去？今晚必须做出抉择，不管他心里怎么左右为难，时间却仅仅只有一夜了……

第十二章

马驹站在牛娃家破烂的木栅门口了。

他要跟牛娃、德宽商量一下。究竟去不去县饮食公司当司机，他想听听两位共事的朋友的意见。

一天没见牛娃的面，没有听到他粗壮的嗓门说出的粗鲁的笑话，马驹思念起朋友来了。平日里，两个年龄相当的伙伴在一起，说了队里的工作，就在一起浪谝。谝天南海北的奇闻传说，谝小河川道这村那村的怪事笑话；谝得最多的，自然是女人。两个在爱情生活上都有令人遗憾的遭遇的光棍，特别是牛娃，谝起女人来，一下子就忘记了饥饿和疲劳……

木栅门没有上锁，马驹走进被柴草和乱七八糟的杂物充塞着的院子，发现牛娃常住的屋子黑着。瞎眼大婶在屋里回话说，牛娃出门浪去了，至于浪到啥地方去了，她可说不清。马驹走出木栅门来，心里纳闷：这个家伙怎么不到他屋里去呢？怎么不来谝一谝夸庄的情况呢?

脚伤还是有点疼，在影影绰绰的街巷里看不清路面，低一脚高一脚地走着，马驹忍着疼，走进饲养棚里了。

一片和谐的嚼食草料的声音。七头秦川母牛，齐刷刷站在圈里，正在槽里吃草。公牛被单独分槽喂着，也在低头吞食着草料。看见从山里买回来的这一群宝贝种牛吃草正常，马驹烦忧了一天的心胸，顿然舒活了。

“半截人”来娃，蹲在槽头外的走道上，一手提着瓦刀，一手抓着砖头，正在那里砌一道垫脚的砖台，专心用意地干着，没有发现有人走进饲养棚来了。

“来娃哥，”马驹很恭敬地叫，“给你叫个帮手嘛！一个人要和泥，还要搬砖……”

“不用不用，我一个人闲了，弄一阵；忙了，先搁下。这不是啥紧活嘛！”来娃转过身，对马驹笑着，“我从砖场拾来一堆烂砖头，和点麦秸泥，抽空就垒了。人都忙，不要叫人了。”

马驹受了感动，想说几句夸奖他的工作态度的话，又觉得没有必要。残疾人来娃，得到了适宜他身体条件的工作，心劲很高。这个干不成其他农活的残疾人，把守在槽头，却可能比那些身体强健而心志不专的人要可靠实在得多。

“我准备把南头那一道槽修好，分开喂，牛吃草时不抢，卧下不挤。”来娃仰着头，兴致很高地给马驹说他的谋划，洋溢着对自己所担负的工作的热情。南头那一道槽，槽帮塌掉了。牲畜下户以前，饲养员用一块木板挡着添草，凑合了半年，居然没人动手修复一下。牲畜下户喂养以后，槽道闲置下来，更没有谁会想到要修补它了。来娃准

备动手修复，而且说得很轻松：“那不费多少事，我抽空就拾掇好了。”

看着来娃心劲高涨的神气，马驹心里反倒有点不是滋味了。他大约从来不会想到自己要到外部世界去找一份更轻松的工作吧？他大约不曾考虑自己的前途问题吧？更不会考虑十年二十年以后自己还能不能喂牛的问题吧？有做豆腐手艺的人挑着担儿游村串乡去了，有资本的人买下拖拉机跑运输去了，能找下临时工的人进城去了，会算命捉鬼的人黑夜哄人骗钱去了。他没有这些挣钱的门路。他要养活哑巴老婆和儿子，他看中了给三队喂养种牛这个差事，按合同挣得一份相当可以的收入，这就是他的现实要求了。马驹满足了他的正当要求，他就欢欢喜喜地干起自己的工作了。如果来娃知道他要去寻一份公粮吃，会怎样想呢？

“牛娃把合同条例给你说了没？”马驹问。

“说了，”来娃靠在槽帮上，“昨黑就说了。”

“你有意见，尽管说。”马驹坐在炕边，笑着说，“合同要合理。不能亏你。”

“有一点点意见，问题不大。”来娃很豪爽地说，“咱这人，弄事不爱抠抠掐掐！”

马驹笑着说：“有啥难处你就说嘛！”

“想着也不会有啥大困难。只是一样……”来娃有点不好出口的样子，还是说出来了，“牛娃这人脾气太倔，我怕日后不好共事……”

马驹点点头。

“牛娃倒是个直性人，就是摸不来辰时卯时他就犯毛病了。”来娃说，“你看，今日后晌，他拉牛夸庄回来，把缰绳往地上一扔，连牛棚大门也不进，端直走了。我紧赶快撵。问他话，他只摇手不招理我。我也不知啥地方得罪他了。”

马驹不由一惊，牛娃怎么了呢？到现在不见人影，出了什么事吗?

“当农村干部，要能硬得来，也要软得下，要会笑也会哭，要能上也能下，才能干得久长。农村嘛，比不得机关工厂。”来娃在说着农村干部应该具备的条件，对牛娃不大满意地说，“牛娃这人呀，只硬不软，只会笑不会哭，只能上不能下，一遇麻烦就瞪眼，他干不长久……”

“牛娃现时在哪儿，你知道不？”马驹已经不在意牛娃的脾气符合不符合来娃的标准了，他想尽快找到牛娃。牛娃的行为里有没有与自己有关的因素呢？他担心了：“他啥时间回来的？”

“午饭后，人还没上后晌工的时候。”

“这样早就回来了？”马驹更加疑惑了，就告辞来娃说，“我得找他去。”

……

经过马驹再三追问，德宽才结结巴巴述说了牛娃夸庄路上遇见马驹父亲后所发生的事。他轻描淡写地说了说景藩老汉有失检点的使牛娃气恼的话，大大减低了牛娃发火闹脾气的严重程度，又隐瞒了牛娃流露出要去表哥家帮工的意图。尽管这样，马驹听罢还是生气了。

“怎么能这样对牛娃说话呢？俺爸……太过分了。”马驹确实生气了，“不怪牛娃闹脾气，不怪。这些话放到谁的耳朵里，也不好受。”

“我给牛娃解说过了。”德宽宽慰马驹说，“没事，景藩大叔一时说话不合适，没啥，咱们兄弟们在一起，不是一天两天了，谁计较谁……”

“我要给牛娃赔情。”马驹叹一口气，难受地说，“我爸为我的工作伤了牛娃，只有我去赔情。”

“算哩！”德宽劝说，“没啥……”

“牛娃到哪儿去咧？”马驹问。

“日落时，我看见牛娃……过河去了。”德宽故意用轻淡的口气说，“也许是给他老娘买药……”

“糟了！”马驹一拍大腿，打断德宽的话，“他肯定是找他表哥去了。开春时，他表哥买下一台大拖拉机，要他去装卸。他给我说，他不去挣那个钱，他要在冯家滩挣自己的钱……”

“不会……”德宽说。

“保险的。”马驹说，“他把牛缰绳扔给来娃，连牛棚也不进；今日一天不到我屋去，这还不明摆着吗？”

德宽看着隐瞒不住，就叹息着说出实情来。他说他不想在马驹走的时候，一下子弄乱套，使马驹不好离身，现在掩盖不住了。

“好德哥哩，我至今还拿不定去不去的主意，朝哪儿去嘛！”马驹苦笑着说。

“噢！这样。可我听景藩叔的口气，该是立马就要走了。”德宽说。

“我咋能随随便便就走了呢？”马驹说，“咱们给三队弄下这一摊子，我能说走就走吗？”

“这是实话。”德宽点点头，“我知道你丢心不下哩！”

“德宽哥，”马驹恳切地叫，“我为这事想了一天，还是拿不定主意，憋得脑子又闷又涨。你说，去好呢，还是不去好？你老哥处事稳当。”

“去了好。”德宽不假思索地回答。他料就马驹要跟他说及这件事，早已想好了自己的态度：“去了当然好嘛！”

“我思前想后……”马驹很为难地说。

“你的难处我知道。”德宽从嘴里拔出短杆烟袋，盯着马驹，恳切地说，“你考虑咱仨击过掌。可那阵儿，谁也没想到你日后有出去工作的机会。甭说你，农村青年，哪个不想出去在外头工作？只是没有机会，不待在农村不成咯！所以说，不会有人说闲话，我跟牛娃更不会。景藩大叔为你的前途大事着急，对牛娃有一半句不中听的话，牛娃那股气一放，过后屁事也没了。我见牛娃时，他也没说不同意你走的话……”

“牛娃能这样说吗？”马驹问。在他想来，牛娃一听到他要走的事，会跳起来骂他不守信用的。

“牛娃对你去工作没意见，只是景藩大叔的话说得太硬了。”德宽给马驹解释着，“再说，景藩大叔也可怜，当年为了冯家滩公众的事，把好差使耽搁了；不光他现时后悔，村里人也都说，‘老汉把铁饭碗拿脚踢了，倒是给安国让了一份好菜……’你看看，机会难逢，错过去了，一辈子可能再遇不上了。兄弟，甭错打主意，你走。”

“这些，我也想过。农村青年想进城谋一份工作，这是不奇怪的，现时城市比农村好嘛！”马驹推心置腹地说，“可我心里总不安宁。刚才一进饲养场，看见来娃给他自己砌垫脚砖，又给我说他想法子喂好种牛的打算，我心里就不好受……”

德宽又点着了旱烟袋，深表同情地点点头。

“你看，牛娃过河找他表哥去了。”马驹说，“你老哥嘴里不说，心里咋想呢？我走了，牛娃撂套了，你……”

“你甭管我，我反正一时不会离开冯家滩。”德宽说，“牛娃走了，我临时在三队先撑住局面，你顺顺当当去工作。过后，我跟景藩叔商量……”

马驹看了一眼德宽，心里更难受了。这个老成的好人，还相信爸爸给他说的话，等待给他安排三队的工作哩；他哪里知道，爸爸也早已打定到奶牛场去的主意了。

月亮在南原的平顶上空运行，河川一片蛙声，两个朋友坐在砖场边的场塄上，想着自己的心事。

“唉！说心里话……”德宽动情地说，“我心里明白自个在那个秤星上吊着。我的思想不高，面情又太软，当你的帮手凑合，当正头儿主

事不行。牛娃倔豆儿脾气，也难弄。我心里明白，你走了，俺俩都不好弄……这不是老哥当面给你说骚情话，是实情。按咱三队目下的局面，着实离不得你。你看，现时地虽说分了，一人分得不足一亩地，哪一家没有两三个劳力？三五亩地不够一个人干，劳力闲下做啥？有些眼隙稠的人能挣钱，好多人寻不下挣钱门道哩。咱办砖场，好多社员要把娃子塞进砖场里，就是给娃寻活儿干哩。咱办种牛场，好些人等着养牛犊哩。咱给社员找下活路了，社员高兴哩……我已经想过了，我能撑住的话，尽量撑住干；实在撑不住了……活人总不会叫尿憋死！我有我的特长哩。我到集镇上去摆个小摊儿，修自行车、钟表、半导体……你甭考虑我，现时政策宽了，活套多了。”

原来打的是散伙撤摊的主意啊！马驹的心猛然被什么东西紧紧地揪住了。牛娃已经一拍屁股，过河找表兄帮工去了，德宽也已谋划着下一步到河西镇上去摆一个修理小家什的摊儿，只有来娃还实心实地在给自己砌喂牛的垫脚砖。德宽叫他放心地去县上工作，不过是出于他的好心人的面情罢了。

他心里有点酸溃溃的味道，瞅着坐在身旁的德宽，胖胖的脸上现在有一丝淡淡的哀愁。生活中忍受过过多艰辛的人，这种哀愁就又显示着一种麻木和无所谓的神色了。他同情德宽这位忠厚的兄长……

德宽年轻的时候，可没有现在这样胖，四方脸上一对睫毛很长的大眼睛，是冯家滩最俊的一个小伙子。六十年代的中学毕业生，学习好，品行好，性格也温柔，结结实实迷住了邻村同学兰兰，死活都要跟德宽结婚。她的父母和哥哥劝不下，骂不回心，打也不顶用。兰兰和德宽领了结婚证，连任何仪式也没举办，就和德宽在一个屋里过日月了。她和德宽结婚十六七年了，没有回过娘家，娃娃们至今不认得姥姥和舅舅——德宽一直得不到岳父岳母的承认（老丈人执意要把女

儿嫁给一位收入优厚的司机，根本不把穷得缺吃少穿的德宽放在眼角里）。

德宽拼命在队里劳动，凡是队里肯出大工分的苦活脏活，他抢着去干，千方百计想着把自家的日月过得好些，让兰兰和孩子生活得好些，不枉她跟自己生活一场，也在老丈人面前争一口气。可是结婚多年以来，这对儿以追求婚姻幸福的大胆行动震动过小河川道十里八村的夫妻，日子越过越紧巴了，反倒使岳丈岳母更有了嘲讽他们的口实。曾经被庄稼人称赞为“三姑娘”的兰兰，仍然像《武家坡》里的三姑娘一样，在寒窑里为日月发恓惶哩。

去年他们三人在三队接手的时候，德宽抱着改变自己婚姻问题上的屈辱境地的强烈心情，对他和牛娃说：“不怕你两兄弟笑话，哥实在是穷得心里疼呢！咱的娃娃看见人家娃娃穿凉鞋，朝咱要，三两块钱的事，咱给娃买不起，还打娃屁股……老人眼看古稀了，烟锅里装的啥呀？干棉花叶子！兰兰不顾死活进了我的门，想来真是对不住人家……”他很痛快地和牛娃击了掌，又和马驹拍了手，挑起了砖场的担子。他自走进南坡下的拟定的砖场，整个半年里的工作成绩，表明了这位老哥的用心……

现在，德宽劝他离开冯家滩，而且把他心里为难的事一件一件解释了，虽然是毫不做作的真情实话，却无法掩饰那种几乎是根深蒂固的穷的忧愁。他给自己谋划的，是到小镇的街道上，摆一个修理车子、钟表、锁子的小摊儿。

马驹默默地坐着，想着。天空深邃，星星稠密，不时地有一颗流星从天幕上划过，闪出一道亮光。他不但觉得骄傲，德宽和牛娃确实舍不得他走。他也觉得乡土难离，特别是自己洒下过热汗的乡土。这

些人，德宽、牛娃、来娃，那些想把儿女插进砖场来找一份稳妥的活儿的父母，那些已经表示等待喂养一头纯种秦川牛犊而给家庭找到一条可靠的经济来源的庄稼人，对他抱着希望。他悄悄从冯家滩溜出去，会使他们怎样评价他这个共产党员呢？父亲因为“错走一步”而后悔不迭，殊不知社员早已对他那种“维持会长”式的工作失去了信任和希望。一个人，尤其是一个共产党员，能受到众人的信赖，是一种巨大的幸福。马驹觉得，去掉了这种信赖，是很可悲的。

德宽在默默地抽着旱烟。

马驹忽然站起，右手捶在左手掌里，愤恨地骂起自己来：“我冯马驹是啥东西？啥值钱的宝贝疙瘩吗？一不会造导弹，二不会给国家创造发明，是个普通庄稼汉嘛！这儿的事情离不开，你只想着往好的地方跑，你算什么东西！”

“马驹，你……”德宽惊恐地转过头来说，“你这话……我听村里人说，景藩叔当年在去不去当河东乡乡支书的时候，也是这样说的……”

“我不去了。”马驹坐下来，“就这样！”

“脑子甭发热，马驹。”德宽不安地站起来，立到马驹当面。他惊慌了，没料到自己实心实意的劝解，不仅没有让马驹拿定走的主意，反倒叫他不走了。了得！景藩大叔要是知道他说得马驹变了卦，不恨死他才怪呢！他连忙说：“生产队的事，一辈子也搞不完。你的前程事关重大，甭一时脑子热了……”

“你呢？牛娃呢？彩彩呢？冯家滩百十名没考上大学回村来的男女学生呢？”马驹像是问德宽，又像问自己，“他们都能出去工作吗？他们能在冯家滩活下去，我也能！”

“我跟牛娃，还有那一伙青年，都是没得办法嘛！不在冯家滩，上天呀？”德宽真正发急了，搓着手，“你有了机会你就走，为啥要挤在冯家滩受罪呢？我要是有机缘，我也一拍屁股就走了……”

“好了，再不说这件事了。我为这事伤了一天脑筋，再甭叫我伤下去了。”马驹安定地说，“德宽哥，咱们明天该干啥，照样去干，全当没这回事情。”

德宽无奈了，再也找不出更能说服马驹的话来。他担心地问：“景藩叔能同意不？”

“那好说，”马驹不想再提到父亲，父亲这两天的言行使他想起来难堪，“我只要自己定下心来，其他事好对付。”

德宽仍然不放心：“你再想想，多想一两天，想得周全些，过后不吃‘后悔药’。先甭急着定弦。”

夜已深沉。湿润的初夏夜晚的空气，有一丝凉意了。蛙声渐渐低下去，偶尔有一声无名水鸟单调而沉闷的叫声，夜愈显得沉寂了……

第十三章

当景藩父子正在为去县饮食公司的工作问题折腾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斜门里又插进一只脚来——冯家滩以说媒联婚为特长的刘红眼，领着已经几乎断绝关系的马驹的未婚妻薛淑贤和她的母亲，踏进冯景藩老支书家的小院来了。

天未明，马驹就爬起来了，准备动身上县城。他打定主意，当面向安国叔表示感谢，并向他说清自己现在不想离开冯家滩的意思，请

求他谅解；顶关键的一条，就是要安国叔给父亲随便制造一个什么借口，证明情况变化了，原先的司机位置已经坐上人了。这是没有办法的，他现在既不能说服父亲，又不愿意眼看着公开闹出家庭矛盾，让人看笑话。当然，这样一来安国叔要负一点人格上的责任——这实在是不得已的办法呀！

主意既然定下来，马驹就急于把这件伤脑筋的事彻底排除出去，好一心专注地办他要办的事情——麦子眨眼就黄了，节令不容他再为这种事分心。

父亲和母亲从小院里把他送到门口，满心欢喜，满心疼爱地叮嘱他路上注意来往车辆，跟人说话要和气，应该在县百货公司买上点烟酒糕点等礼物带上，空手不进亲友门呀！

马驹对于父母啰啰唆唆的叮嘱，一律点头应诺，变得既听话又顺情。走到门外，父子三人却相继愣住了。

薛家寺薛老八的女子和老婆，在刘红眼的陪同下，结伴而行，姗姗走来了。

一家三口愣呆在门口，全瞪起眼睛，一时没有了主意。这几天，他们只是忙于办手续和善后工作，根本来不及商量如何处理和薛家的那宗婚事。这宗婚事伤透了一家人的心。

“哈呀，赶早不如赶巧！”刘红眼老远递过话来打招呼，“好呀，早赶上了，巧也赶上了。”

三位客人已经走到当面，薛淑贤母亲脸上露出巴结的笑颜，未婚妻藏在母亲背后，羞怯地低着头走路，介绍人刘红眼无休止地眨巴着

没有睫毛的红边烂眼，嘻嘻笑着走来了。

马驹脑子里“嗡”的一声，木了。肯定是他要到县里工作的消息，吹到小河那边去了，翻了脸也绝了情的未婚妻，现在自己找上门来了。乡村里把这种婚姻行为，鄙称为“爬后墙”，很不体面哩。马驹顿生厌恶，说：“爸，你跟俺妈陪客人坐，我走了！”

“你走。”景藩冷漠地瞅客人一眼，对马驹说。他过去总是催促儿子到薛家去说好话，使薛家母女放松苛刻的结婚条件。他甚至骂儿子性太傲，嘴也太硬，不愿意在薛家低头，从而导致了婚事的最终破裂。现在，儿子一当上司机，在乡村里就占有恋爱结婚问题上很优越的条件了。他报复似的瞪着眼，不露一丝笑容，毫不犹豫地催促儿子上路：“你快走。”

“哈呀！景藩老哥，这你就不对了——有理不打上门客嘛！”刘红眼一把抓住马驹的自行车，红眼睛不再眨巴了，“人家娘母女一早赶来，就是要跟马驹说说话儿。你把马驹支使走了，人家淑贤和谁谈话呀？和你能谈吗？哈……”

“马驹有紧要事哩！”景藩仍不松口。

薛淑贤羞红了脸，抬不起头，她母亲也是难堪的神色。“爬后墙”，无论发生在男女任何一方，都很难摆脱尴尬被动的地位。

“皇上降下圣旨吗？紧火得连跟他媳妇、丈母娘说几句话的时间也没有吗？”刘红眼真是不负盛名，两边解释，四面周旋。他明白自己在此时此境里所扮演的特殊角色的重要性儿。那娘儿俩过去把话说得太绝，现在张不开口了，一切要求和希望都寄托在刘红眼这一张嘴的功夫上头了：“先把客人让进屋。有啥话到屋里说……”

两家人在刘红眼的拉扯下，先后走进门楼里去了。

“两亲家还是两亲家。”刘红眼眨着眼皮，“谁都不怨，全怪我把路没跑圆。今日坐在当面，把话说透，过去的事再不提起……”

“死心眼！我早跟她爸说，甭看马驹当时在农村，日后准保有出息。你不听我的话……”丈母娘当着马驹和父母的面，训诫女儿，以示忏悔和认错，“还不快给你爸你妈赔罪，站在那儿做啥？”

马驹心里一沉，看见他过去的未婚妻薛淑贤居然走前两步，白胖胖的脸上浮着羞愧之色，低眉耷眼，叫了一声“爸”，又叫了一声“妈”，结巴地说：“你二老……甭跟俺小辈人……计较！俺日后……实心服侍……你二老……”

景藩老汉脸上终于转换出和悦的颜色，无所措手地掏出烟包来。老伴已经慌忙站起，把低头拧着衣角的姑娘拉到凳子前坐下了。

马驹痛苦地闭了眼，再不想看这样的表演了。咦咦！

“这是……娃们的事。”景藩老汉不甘就此罢休，现在的局势是还有没有必要与为难过他们一家的亲家重新和好，他把矛盾推到儿子身上，由马驹做主吧：“大人，不兴包办。”

“那当然啰！今日就是要当面锣，对面鼓，两边敲响，过后没话。”刘红眼滑得像泥鳅，马上抓住话题做文章，“马驹，你跟淑贤到你的厦屋去说话。两人坐下一笑，啥气儿都没咧……”

马驹靠着门框站在门口，一下子被推到漩涡当中，慌了，脸憋得红红的，不知该怎样应付这种场面。刘红眼动口又动手，拉起马驹，推着搡着：“灵灵醒醒的娃嘛！尽发痴做啥！淑贤，你也来呀！”

两人被刘红眼拉扯进小厦屋了。

把仅有的一把木椅让给客人坐下，马驹坐在自己平时就寝的床边上，可谁也不好意思开口说话。

“你……原谅俺……”还是淑贤先开口了。

马驹侧过脸，看见了淑贤脸上羞愧和乞求混合着的难堪神色，这种神色使人很难受。现在，她的体态比以前更加丰满了；当了多年民办教师，穿戴也显著地区别于一般农村姑娘了；轻度的烫发，披在肩上，有一种城市姑娘的气质了；白净的脸膛上浮着淡淡的红晕，花眼皮依然妩媚。可是，却无论如何也唤不起马驹的热情来。

“你原谅俺的过错。”淑贤重复一遍说，“其实，不单是我，哪一个女娃不想嫁一个有工作的人。农村里，生活没保证……”

这样实实在在说话，马驹倒多少有点能体谅她了。乡村里，像德宽家的兰兰嫂子那样痴情的“三姑娘”，小河川道几十个村庄，能遇见几个呢！这样想着，马驹便体谅地附和着说：“你说的倒也是实诚话，任何人嫁人，起码得看看他锅里有没有米下……”

“那你可……原谅俺了！”淑贤惊喜地说，活泼的气色开始显现在脸膛上，说话也顺畅了，“其实，你也跟俺一样，情愿到城里工作，不爱在农村受罪。将心比，同一理。”

“唔……”瞧着淑贤满脸得意的神色，马驹顿时警惕起来：自己既然已经决定不离开冯家滩，那么这场误会就更显得过分了。他想告诉她：你又上当了，走错门楼了！可眼下又不能说明内情，只好忍着性儿看这场闹剧继续往下演。其实也用不着多费口舌，只等他从安国叔

那里走一趟回来……那时拿绳子也没法把她捆来了。这样，马驹只好应付说："过两三天，咱们再定点儿吧。"

"你刚才不是原谅俺了吗？"淑贤敏感地说，"怎么一会儿又变卦？俺可是一言为定！"

"我怕你……过后又后悔……"马驹暗示说，心里嘲笑坐在两三尺远的薛淑贤，你爱的是军官冯马驹，吃商品粮的司机冯马驹，不是爱的冯家滩三队队长冯马驹呀！他希望这场误会造成的闹剧快点结束，薛淑贤却在缠着要他做出肯定的答复。马驹不禁想开开这位民办教员的玩笑了，就煞有介事地问："能一言为定吗？"

"能。"淑贤用妩媚多情的眼睛瞟了他一眼，发出温柔欢悦的嗔笑，"俺今日来就为……"

"日后再不后悔吗？"马驹继续开玩笑。

淑贤不说话了，用一串响亮甜蜜的笑声和多情的一瞥回答了他。

马驹急忙转过头，不忍心看那张已经完全活泼起来了的脸。

笑声从小厦屋敞开的门窗传出去，给里屋那几位紧张地等待着他俩谈判结局的人，带去多大的精神慰藉呀！

……

日暮黄昏中，把媒人刘红眼和薛家母女送出村庄，看着他们朝小河边走去，马驹和父母才返回家中。父亲站在小院里，大声哀叹，说刘红眼做事太不像话，事先连个招呼也不打，就把那母女引上门来，弄得一家人措手不及，简直是捉弄人哩。更使他着急的是，马驹去县

饮食公司找安国交办上班的手续的时间，只好推迟到明天了。因为这桩曾经使一家三口伤透了脑筋的婚姻，花去了整整一天时间，太划不来了。尽管如此，父亲的心情还是畅快的，脸上是毫不掩饰的得意的神气，解气地说：“哈呀！这回是你薛家求拜到我的门下来咧！不是我求拜你哩！我本来想把她送出街门就行咧，可又一想，我把你母女送出村，让冯家滩人都看看，你薛家母女求拜到我冯景藩门下来咧……”

马驹没有吭声，父亲自鸣得意，报复似的奚落薛家母女的话，使马驹听来更加难受，发生在自己爱情生活上的丑恶现象，实在叫人心里感到不好受哇！须知这一切都是暂时的假象，一旦他明日从安国叔那里走一趟回来……他的口无法张开呀！

“只要她回心转意，也就算哩！”母亲说，“现时的年轻娃，都想嫁给城里工作的人……”

“现时先不管她。”父亲打断母亲的话，“现在顶要紧的是先把工作的事办妥。”

马驹点点头，赞同父亲的意见。他已经毫无兴趣再谈论这件实际上已经不存在的婚姻关系，就走出门来。

听说文生后晌从医院回家来了。他想去找他，冯大先生托他劝解文生哩。

第十四章

柳条从头顶上垂吊下来，在河面上轻轻舞摆，顺河而下的微风，饱溶着田野里的麦子和河边的水草散发出来的混合气味，西斜的太阳把小河流水染成淡淡的红色。彩彩坐在堤坝下的一块河石上，赤裸的

双脚伸进清凉的河水里，从洗衣板上搓挤下来的白色泡沫，打着旋儿随着流水消逝了。

彩彩抬起头，无意的一瞥中，看见了两个人正从大堤走到沙滩上，朝小河那边走去。她认出来，那是薛淑贤跟她的妈，到马驹家里来“爬后墙”，现在要涉过小河，回薛家寺去了。

彩彩停住手，搁下正在搓洗的衣服，拢一拢扑落到眼眉上的头发，瞧着那一老一少在沙滩上缓慢移动的身影。她的好看的嘴角撇了撇，冷漠的眼光鄙夷地瞅着两位人格低下的人。她朝水里吐一口唾沫，表示她对她们的藐视。

彩彩坐在河石上，瞅着沙滩上那母女二人渐渐远去的背影，在心里嘲笑说，脸皮真厚呀！商品粮吃来就那么香吗？香得连脸皮都不顾了吗？你们母女今日踏进冯家滩村巷，知道不知道婆娘女子们在背后怎样议论呢？脸皮不觉得烧臊吗？呸呸！

彩彩完全有资格藐视那位民办教员。她自信，对亲爱的马驹哥，她没有一丝一毫的杂念。因为担心自己身上所背的黑锅影响马驹哥提升排长，她自觉地避开了；在马驹哥回乡当农民后，薛淑贤要和他退婚的时候，她准备和马驹哥重修旧好……她喜欢马驹哥的人品，而不管他是吃的商品粮还是农业粮。她问心无愧，不失人格，永远也不会做出薛淑贤那样势利眼的行为来。

至于薛家母女今日到马驹哥家里交涉的结果如何，彩彩已经没有丝毫的兴趣去关注了。昨天傍晚，她从马驹嘴里证实了他要去县饮食公司工作的消息以后，晚上整整难受了一夜。

天明后薛家母女的光临，反而使彩彩苦恼着的心事顿然变得简单了。听着婆娘女子们在街巷里嘲笑薛家母女的话，彩彩心里顿然踏实了——人不能失掉尊严啊！

前冯家滩大队长的女儿冯彩彩，端端正正地行走在冯家滩的村巷里，为乡亲们诊治疾病，解除痛苦。她可能终生里默默无闻，她可能收入低微，她注定一生都要吃农业粮，她可能还会遇到这样或那样不如意的事。可是，她绝对不会像薛淑贤那样为了追求一个吃商品粮的男人，而丢掉一个姑娘家的人格和自尊。

彩彩瞅着小河的对岸，薛家母女的身影已经消失在河岸边的杨柳林带里。她低下头来，继续搓洗衣服。河湾里是这样幽静，水边有几只细腿水鸟忽然飞起，忽然落下，追逐着，嬉戏着，发出清脆的叫声。

“彩彩——”

听见一声厚重热切的呼唤，彩彩直起腰，扭过头，看见身旁的石坝上，站着马驹哥，一脸怒气，正在直愣愣地瞅着她。她甩着手上的水珠，有点迷惑地问：“你有……啥事？”

马驹在石坝上坐下，掏出一支烟来点着了，喷出一口浓浓的蓝色烟雾，转过头，说：“你倒像是没事人一样……”

“我有啥事嘛！”彩彩淡淡地说，“我给社员吃药，打针；打针，吃药。还能有什么事呢！”

“我问你，”马驹问，“你给文生写过回信了？”

“写了。”彩彩平静地说。

“你为啥不给我招呼一声呢？”马驹生气地说。

“我自己的事，为啥要给你说呢？”彩彩说。

“我要是知道你在信里回绝了，我就根本不用再去找文生劝解。”马驹懊丧地说，“我蒙在鼓里瞎跑……”

“我没有请你去劝解他嘛！”彩彩并不领情，仍然沉静地说，“我早都给你说过……”

“嗨！彩彩——”马驹气愤地说，“你不知道内情哇……”

彩彩坐在水边，看着马驹眉头上挽起的疙瘩，猜不透他在生什么气，他又从哪里得知她给文生回信的事呢？就问：“你生啥气呀？”

“嗨！想不到！实在想不到……”马驹一抡胳膊，把烟头摔进河水里……

冯大先生家的宅院很深。太阳没有落下去，这个屋院里已经显得昏暗了。马驹脚伤未愈，脚步轻轻地走进街门，看见院中停放着一辆轻骑摩托车，料定文生确实回来了。他想招呼叫文生，却听见从里屋的窗户里传出压低的说话声。他并不想听人家墙根，正要回避，耳朵里却听到了大夫父子神秘的、令人震惊的谈话：

“你的主意要拿定，甭听旁人一劝，又三心二意。”冯大先生的声音，“谁说啥话也不听。”

“放心，爸。”文生的声音，“我给她写了信了，把话说明了。等于完咧！”

“她咋说哩？”冯大先生急切地问，“她能接受不能？”

“她已经给我回信了。”文生说，“她的信倒是写得干脆，看来问题不大……”

“这就好！好！”冯大先生释然的口气，“我还得考虑乡党的口舌……”

“我才不管谁说长道短哩！”文生很傲气地说，“我在冯家滩受了十几年罪，好容易跳出去了。我再也不想回冯家滩来了，管他乡党什么口舌……”

“我跟你妈还要在冯家滩养老归终。所以——”冯大先生得意地说，“我给马驹说过，叫他去劝你。我给乡党任何人说起这事，都说是‘彩彩是好娃呀’，乡党都说我和你妈喜欢彩彩……”

马驹的拳头攥起来，无法压抑胸中涌起的愤怒了。这个老家伙，伙同儿子谋算彩彩，而且设下圈套，虚情假意地央求马驹去劝解文生，以造成他坚决反对儿子背弃婚约的假象，减轻乡党们的舆论的压力，死要一张面子！自己听信了人家的话，郑重其事地来找文生，结果却钻进了狡猾的冯大先生张开的口袋。马驹想一脚踏进门去，当面揭穿大夫父子的嘴脸，想想又觉得没有必要，终于还是控制住自己，转身朝外头走去。

里屋的门咣当一响，奔出大夫父子。冯大先生用明显的虚假的热情遮掩着满腹狐疑，硬拉马驹进里屋去坐。文生也笑着劝，说他正准备去找马驹哩，好久没见面，想见老朋友了。

马驹站住脚，死死盯着冯大先生那张花白胡须的瘦脸，鼻翼翕动着，鼻腔里轻蔑地喷出一声“哼”，甩掉大夫父子拉拉扯扯的手，转身走掉了……

马驹叙说了找冯大先生父子的经过，余怒未息，气恨地骂：“这个老家伙，鬼心眼真多！”

“你自找苦吃，怪谁呢？”彩彩却冷淡地说，反倒是幸灾乐祸的样子，“我本来就不让你去……”

“冯大先生找到我屋，让我去劝文生，说得跟真的一样，我怎能想到是圈套呢？”马驹窝气地说，“我也觉得，文生这事做得缺德。”

“我不明白，你一定要去劝说文生，究竟为啥呢？”彩彩盯着马驹，问，“我真有点不明白。”

“为了你好呀！”马驹说，“我觉得，你过去受了不少苦，刚刚砸掉了黑锅，又遇到这样沉重的打击，我怕你经受不了这种残酷的挫折……”

“你的心肠好呀！”彩彩挖苦地说，“我早给你说过，我不觉得是啥挫折嘛！”

“你真的不觉得难受吗？”马驹问。

“我可不会装。”彩彩说，“你以为，文生是吃商品粮的大夫，挣工资，经济宽裕，丢了这门亲事，我大概要难受死了。是不是？”

“那倒不是……”马驹语塞了。

“商品粮吃来就那么香吗？”彩彩讥诮地说，“你以为农村的女子都跟薛淑贤一样，只认商品粮不认人吗？我还没学得那么下贱！”

“你……”马驹顿时羞红了脸，气急地问，“可是你当初……为啥要跟文生订婚呢？”

彩彩张了张嘴，咬住了嘴唇。她想说，你去问景藩大叔吧，看他怎么告诉你。她想说，为了不影响你的远大前程……但她终于什么也没有说，胸脯猛烈地起伏着，憋得像要炸裂了。胸脯里的这一窝苦水，压了多少年，现在猛然给马驹一下撞击得翻腾起来了。她不会任性，在任何易动感情的关口，都会理智地控制自己的感情。

夕阳收尽最后的一抹余光，暮霭从杨柳林带的底部朝树梢上爬，水雾从河滩里朝麦田梢头弥漫。河湾里静极了。

马驹又点燃一支烟，看见彩彩微微偏转着头，不说话。他猜到了她肯定有什么难言的苦衷。既然彩彩和文生已经彻底破裂，他心中压抑已久的疑问就再也忍耐不住了。小伙子心情激动了，颤抖着声音说：“我从部队回家来探亲，万万没想到，你和文生已经订婚了……”

彩彩紧紧地咬着嘴唇，眼泪溢出来了。她装作梳拢头发，悄悄抹掉了。现在不是她向他说清这一切的时候，不能说。马驹马上要到县饮食公司去工作了，薛家现在抓住他不放了。她说了那一切，后果会是怎样的呢？她摇摇头，轻声说：“过去的事了，我不想再提起……”

“你应该告诉我……”马驹说。

“你今天为啥要问这些呢？”彩彩反问。

“今天……今天我遇到的丑事太多咧！”马驹想说而又难于说出心里要说的话，结结巴巴地说，“我气恨冯大先生，觉得你……太苦了……”

“我不苦，”彩彩摇头，沉静地说，“我爸爸得到平反，我也跟任何青年一样平等了，这就够了。我说过，我给乡亲们看病打针，不是个无用的人，这也就满足了。我能看出来，你是同情我，过去遭遇不好，又丢了文生这样的婚姻。你错了。我不想让别人总是用同情的眼光盯着我，用同情的眼光和我说话。我现在生活得很好，很自由，也很畅快。”

“你说得对，彩彩，我是同情你。”马驹真诚地说，“你还应该想到，不光是同情，还有……”

“还有什么，我也不管了。我只是讨厌同情。”彩彩知道马驹想说什么，把话岔开了，“你明天该去县上了？”

“我已经决定不去了。”

“为啥？”

“‘商品粮吃来就那么香吗？’”马驹用彩彩刚才说过的话，讥诮地说，“我在这儿办砖场、牛场，‘不是个无用的人’，生活得很好，很自由，很畅快。我们应该有志气把农村搞好，为啥非要寻情钻眼去开汽车呢！”

“那……薛淑贤又要白跑一回了！”彩彩笑着说，“这一回白丢脸了……”

“再别提这个人了。”马驹烦恼地说，“丑死了！”

彩彩沉默了。

“我明天就去县上给人家回话，退了那个差事。”马驹直截了当地说罢，又把话引回到自己心里想说而至此仍然没有说破的话上来，“我想给你说一句……”

彩彩的脸扑地热了，似乎全身的血一下子都涌到脸上去了。她知道他要说什么。她没有精神准备。她今天到这儿来洗衣服，完全是想避开薛淑贤来到冯家滩所引起的纷纷议论，图一个安静的场合。既然马驹哥决定不去县上开汽车了，那么她将有充分的时日来处理和他的关系。她要在自己完全有把握的时机，说出自己压抑了多年的心里话。现在，太突然了！她断然说：“在你取掉同情的思想以前，啥话也甭提。”

“我只想说一句话……”

“我要给病人打针了。”

彩彩收拾起洗净和还未洗净的衣服，提上笼，夹着洗衣板，走上石坝，回头瞧一眼马驹，便转身走了。

天已黑了，蓝天上出现了第一批星星，夜色笼罩了小河川道，杨柳林带的梢头还有一抹淡淡的亮色。彩彩已经隐没在麦田里的小道上了。马驹在石坝上一动不动地坐着。他猜不透彩彩几次回避他的问话的原因，却不颓丧。他和她的一场谈话，发现了她身上的许多没有发现过的东西，这是一个多么自尊的姑娘啊！“商品粮吃来就那么香吗？”能说出这样的话的姑娘，不是很多的哩！相比之下，薛淑贤太低下了，文生太低下了。如果自己昨晚拿定了去开汽车的主意，那么也就不比他们高明。不管彩彩能不能接受他的爱情，他总算选择了一条

能够面对彩彩的生活道路。明天给安国叔回一句话，这件事情也就过去了，和薛淑贤的令人烦腻的关系自然也就结束了，他将一心一意地办三队里该办的事……他脱下衣服，从石坝上跃身跳进水潭里去了，小河的水好清凉啊！

暮色苍茫中，牛娃涉过小河，在齐腰高的麦田当中的小路上走着。一天两块半，一月有七八十块现金收入，对于多年来常常是口袋里不名一文的冯牛娃来说，是个不小的数目了。他跟着表哥的拖拉机跑运输，常受到拉运货物的主顾的款待，酒呀肉呀，既不用开饭钱，也不必付粮票，嘴一抹就完了。活儿虽然又累又脏，可他有力气，不在乎。顶使他满意的是，完全不用操心费神，装砖就装砖，拉沙就拉沙，出过一阵力气，流过一身汗水之后，爬上车厢，在尘土飞扬的大路上飞驶。活路有表哥联系，车有表哥掏一百元月薪雇用的司机驾驶，笨人冯牛娃凭出笨力气吃一份不操心的饭，够满意的啰！

牛娃是个孝子。他吃着不掏腰包的酒肉饭食，总是想到瞎眼老娘碗里盛着缺油寡味的粗食淡饭，心里过意不去。现在，他手里提着一串用柳条串起来的油饼，走回冯家滩来了，焦黄酥软的油饼，孝敬给抚养他长大的老娘。

“牛娃哎——”

牛娃一抬头，砖场塄坎上，站着德宽和半截人来娃。他从漫坡上走上去，把油饼递上前，大方地礼让说：“德宽哥，吃油饼！”

“哈呀！牛娃挣下钱咧，买这多油饼。”德宽从牛娃手里接过柳条，取下一个油饼，也不客气，咬了一口，脸腮上鼓起一块疙瘩。他

又取下一个，塞到来娃手里，“吃吧！咱们牛娃兄弟挣下钱了，不在乎俩油饼。”

来娃推让着，看着牛娃豪爽的眼神，才哈哈笑着填到嘴里去了。

“吃吧吃吧！”牛娃蹲在地上，爽快地说。

“伙计，你甩开手走了，黏在你手里的事情咋办哩？”德宽吃完一个油饼，满意地咂着舌头，抹一抹厚厚的嘴巴，用烟锅在羊皮烟包里挖着，笑眯眯地说，“你走得好洒脱呀……”

“经济手续，我没染一分一文。”牛娃说，“还有啥事情呢？没有了。”

“种牛场的合同，倒让来娃老哥催着咱们订哩！”德宽指着站在身旁的来娃，“这可是你负责的工作。”

“我今日找了你几回，婶子只说你不在家，也不说你弄啥去了。”来娃证实说，“你走也不给人打个招呼……”

“我不当队长，也就不负责啥工作了。”牛娃拖长声调，盯着来娃说，“我给你说过，任啥事甭寻我了。你该寻谁就去寻谁。你怎么不会听话呢？”

“牛绳是你交到我手里的，合同条例是你亲口给我说的，我不寻你寻谁？”来娃强硬地说，挥动着短小得令人好笑的胳膊。他四肢畸形发育，脑机能却完全正常，“要不，我把牛交给你，我不喂了。你们干部这样扯皮，我敢订合同吗？”

“你愿意订合同也好，不愿意订合同也好，随你的便。”牛娃仍然不动声色，拖长腔调，不冷不热地说，“跟我……没有关系啰！”

来娃气得瞪着眼，说不上话来。

德宽却微仰着头，悠悠然吐着烟雾，他知道马驹并不离开三队的实情，心里踏实。对于牛娃故意拖长的冷漠腔调，他不急也不气。在牛娃撂套走掉的这一两天时间里，自觉地弥补他留下的工作上的空隙和失误。他了解牛娃的脾性，知道该用什么办法来对付这个火暴的家伙。他笑着说：“你拉上咱的公牛，游村串寨去夸庄。好些人拉着发情的母牛，满冯家滩寻你牛娃哩。我和来娃好歹把人家劝回去了。开庄的准备工作还没弄妥，让人家再等两天。人家不知从谁嘴里听说你不当队长了，庄场也不办，气得愣骂愣骂——”

“骂我？”牛娃急问，“骂我啥话？”

“骂得好难听。‘羞先人哩！把公牛拉上满世界夸庄，惹得别人把母牛拉来配种，自家又不开庄咧！冯家滩三队的干部，说话跟放屁一样。’你听听，骂谁呢？”德宽不紧不慢地说。

“哈呀！狗东西骂得真残火！”牛娃听罢，脸臊红了，“我好冤枉哇！”

“人家没骂你一个，骂的是‘三队的干部’嘛！”德宽看着牛娃发火了，又劝慰牛娃说，“你挨两句骂怕啥？只要天天能挣两块半，给老娘天天孝顺一串油饼，骂两句风刮跑了……”

“骂吧骂吧！”牛娃叹口气，似乎一下子变得没气了，“他能骂多久呢？反正我不管了。”

“伙计，我给你说，开庄的准备工作全部弄妥了，围架装好了，人手也安排好了，后日一开庄，你等着看热闹吧！”德宽满怀自信的口气，激励牛娃说，“来娃的合同等你签字哩！”

“你签字去吧。”牛娃摇摇头，漠然地说，“好了，来娃老哥，德宽哥会签合同的。你快回吧！”牛娃想把来娃支使开，好让他和德宽单独说一点心事。

“只要是三队的干部，谁签字咱都没意见。”来娃说着转过身，走了。

牛娃瞧着远去的来娃，回过头来，压低声儿，不好意思地说：“德宽哥，我想托你办一件事……”

“只要哥能帮上忙，尽管说。”德宽满口应承。

“俺表嫂给我介绍下一个女人……”

“噢！”

“那女人是离下婚的。男人前年考上大学……”牛娃脸上热臊臊地，给德宽介绍情况，“那女人要寻个可靠农民，不管穷富，正合咱的境况。好在她没生娃，没得牵连……”

“好喀好喀！”德宽赞同说，“咱农民就要寻这号实心实意以土为生的女人。你加紧办。”

“我表嫂说，她负责做女方的工作，叫我再寻一个介绍人，向人家说明咱的境况。”牛娃说，“我想来想去，你老哥办事稳当，也知我的底细。”

“我可没有说过媒啊……”德宽有点为难，“这事你该找刘红眼，那是说媒联婚的专家……”

“我跟那货没言儿！”牛娃一口回绝，诚恳地央求说，“咱要寻可靠的人办事。”

“好！”德宽一拍手，爽朗地说，“我让你兰兰嫂子去给你办事，人家嘴巧，比我会说话……”

“也好。”牛娃笑了，“你给兰兰嫂子说说。”

“怪道……你今日给我吃油饼，原是有喜事……”德宽哈哈笑着站起，“不管咋样，这个媳妇哥让你嫂子全力以赴……”

牛娃羞怯地笑着站起来。粗鲁的小伙子，在渴盼的喜事临头的时候，反倒扭怩局促了，为难地说：“我没得依靠，俺妈眼窝不好，凡事都得自己张罗……”

“放心！你的事就是哥的事。”德宽畅快地说，“明天叫你嫂子就过河去。”

牛娃感激地点点头，羞怯而幸福地笑着。

第十五章

北方五月的夜晚很短，天亮得早。马驹骑着自行车，跑过四十华里路程，踏进河口县城的时候，机关单位才刚刚上早班。

古老的河口县城，现在分成新城和老城两部分了。老城是旧县城的所在，狭窄的街道，低矮的栈铺，高低不平的青石板铺成的路面。

新城是近两三年间兴建起来的新街，宽阔的柏油路面，设计新颖的一幢幢楼房。县人民政府已经搬迁到新城区来了。农贸市场沿袭历史习惯，设置在老城里，这里的市声早已喧闹熙攘起来。从山地赶来出卖山货的农民比河川里的农民穿戴更不讲究，头上缠着油渍渍的布帕，沾染着松脂和污垢的黑手，在草帽底下捏码号。穿着讲究的县城居民，一早赶来采买鲜菜鲜果和鲜蛋，到处是买主和卖主争议价格的声音。这儿也有穿着当代中国最时髦的服装的青年男女在人流中溜达。紧绷着屁股的牛仔裤和喇叭裤，与庄稼人的大裆裤混杂在一起；披肩的长发与庄稼人的光头同时并存。马驹推着自行车，在拥拥挤挤的街道上走着，好容易找到饮食公司的原址，人说公司搬到新城里去了。他急匆匆从人窝挤过去，找到新区大街上。这儿清静多了。在大街正中，竖起一座四层楼房，米黄色的墙壁，这是河口县城最显眼的一幢建筑物了，半空里挂着“河口饭店”四字横匾，大门口挂着“河口县饮食公司”的白底黑字的漆牌。安国叔在这儿肯定无疑了。

一楼是食堂营业厅，二楼是旅馆部，马驹走上三楼，在挂着“经理办公室”木牌的门口停住脚，叩响了木门板，心在胸脯里不安地腾跳起来。他是找安国叔说一句欺哄父亲的谎话，想来真有点别扭。

安国叔手里捏着一支黑色雪茄，指指对面的沙发，让他坐下，说：“你来得这早？”

马驹笑笑，坐下来，接过安国叔递来的殷红的茶水，怎么开口呀？

“我以为你昨天会来的。”安国叔说，“你把证明和介绍信都带来了没有？”

“昨天有点事……缠住了。”马驹不好意思说出薛淑贤来到他家的事，“本该昨日来……”他没有回答介绍信的事。

“这几天，好多人围着我嗡嗡。买了一辆汽车，人都瞅见了，都来给我举荐司机。嗨呀，一个桃儿，惹得一山的猴儿都急咧！”安国叔以一种莫可奈何的口吻说，“你一来，往驾驶楼里一坐，省得我给那些人白费唇舌。”

安国叔用他开车是十分真诚的，马驹愈觉不好开口了。这当儿，门被推开，走进一位戴着黄腿近视眼镜的中年人，打量了一会儿马驹，似乎有话不好直说，隐隐晦晦地说：“冯经理，木材公司要麻缠了。业务科长的小舅子从部队刚回来，是个司机。咱要是不答应，原先给咱的那几方松原木，就没门儿咧……”

“先不管他，”安国叔手一挥，“离了他娃子，我照样睡松板棺材。不要了，他的松原木不要了！”

马驹不安地坐在沙发上，看着安国叔生气，看着那位戴眼镜的干部走出门去，心里感到窘迫和压抑。

“看看，又是一位竞争者。”安国叔毫不掩饰地说，“木材公司答应给我五方松原木，我们这儿有几个同志想给老人做棺材，我也想弄两副，我和你婶都老了。这个业务科长想叫他小舅子来开车，卡我的脖子……”

马驹其实早已揣摩出这种关系，安国叔一说便朗然明白了。

“安国叔，那就让木材公司那个业务科长的小舅子来开车吧。”马驹借机撒手，“免得起摩擦。”

“你不管。你只管开你的车。”安国叔又一挥手，“业务科长那娃子算哪一路的‘报马’？撇开他，我照样弄来松原木，还要从木材公司买。他能卡住我，算日了鬼咧！”

“安国叔，我今日来……”马驹为难地说，“就是想给你说回话……我不能来开车了。”

“你说啥？”安国叔停住踱着的脚步，一愣，瞪着眼。他显然完全没有料到会有这样的答复。

“我手里拴着队里好多事，甩不开。”马驹诚恳地解释说，“你的好心好意，我知道。”

“唔！”安国叔恍然大悟，显出一缕不屑的微笑，“那你何必跑来呢？打个电话告诉我一声，省得……”

“我得当面把话说透。”马驹难为情地说，“俺爸日后要是问起这事，你甭说我不愿意的话……”

“噢！明白明白。”安国叔眼睛闪眨两下，头一仰，哈哈笑了，“我明白了，你爸要你出来工作，你想在咱冯家滩治穷致富，两人有矛盾哩！”

“我怕因为这件小事，俺爸跟我闹仗，惹人笑话。”马驹委婉地说，“俺爸最近心情不好……”

“你……这个娃哎！”安国叔坐在罗圈藤椅上，徐徐喷出一口烟，数落说，“你二十五六的人了，在外当兵也该经见了不少世面，全不看世事发展到啥地步了，难怪你爸心情不好。”

马驹本来就没有指望得到安国叔的支持。他并不动心，却也不想辩解。“世事发展到啥地步了”，这是不难回答的问题。安国叔的原意不过是说人都变得更注重实际利益了，自私了，有哪个傻瓜会去完全彻底为人民服务哩。他通过合法不合法的手段，给儿女们一人谋得一份城镇户口和城镇工作，基本上完成了家庭的“工业化改造”，甚至已经准备给自己和老伴一人做一副松板棺材，大约都是对于发展到今天的世事的考虑吧！如果河口县里的共产党员都这样考虑问题，那会怎样呢？世事本来就是被这些牟取私利的人给搅浑沌了呀！

“我跟你爸是老交情，不忍心看他而今穷酸的情况，才给你找下这个出路。”安国叔动情地说，完全是恨铁不成钢的口气，“瞧这儿——”他顺手拉开抽屉，取出一个小本子，翻开，指着说，“想爬进这个驾驶楼的，不下二十个人了，全是县上干部的子女和亲属。人家都不懂得让他的娃娃在农村干革命吗？嗬呀！你……”

“农村青年，好多人都想进城谋一碗饭吃，我知道，因为城市比农村富裕，也比农村文明。”马驹点点头，诚实地表示承认这种现实。他又认真诚恳地说：“可我又想，都是人，都在党的领导下，我不信农村就永远贫穷、落后下去……”安国“哼”了一声，一副不屑置评的样子。马驹便又执拗地苦笑一下，似乎是自我嘲讽地接着说：“也许是我不符合潮流吧……嘿呀！”

“你不来没关系，”安国叔说，“我总算给老朋友尽了一份心。”

马驹再无话可说，就站起来告别。安国叔也不强留，送他出门。走到楼梯口，马驹又叮嘱说：“安国叔，俺爸日后问起这事，请你随便说个缘由，推诿一下就过去了……”

“放心放心！”安国叔说，“这费啥事嘛！”

马驹从饭店出来，推起自行车，从新城宽阔的街道上骑过去，又转上河川的柏油公路了。想想自己为这种毫无意义的事情耗费精力和时间，不禁懊恼地摇摇头。但脚下却不觉加了劲——还要快点回去，再去哄弄父亲哩。哎嗨，有什么更高明的办法呢？

景藩老汉撅着屁股，裤腿挽到膝盖上，戴着草帽，在自家的责任田插秧。头顶的大太阳直照在身上，老汉汗水淋漓，汗渍浸得眼角麻辣辣地疼。他在身后，留下横竖成行的嫩绿新秧，赤裸的稻田顿然变得生机盎然了。

老汉没有帮手。儿子到县上去了，老伴下不了水田，他独自一人耙地，插秧。全家只分得一亩稻田，插秧能用几天呢？马驹一到县饮食公司上班，他也要到公社奶牛场去了，走前必须把稻秧插完。老汉心劲很足。

然而毕竟老了，心强而力不支了。他只好不时直起腰，使弯曲酸疼的脊背舒展一会儿。看看太阳已经端南，老汉插完手里最后一撮秧苗，在水渠里涮洗了腿上的泥巴，从稻田塄坎上走过去，便踏上白杨夹道的机耕大路。

老汉拖着困倦的双腿，走进家门。树荫下，老伴正在铺开的苇席上缝被子，那是给儿子准备上班的铺盖。他一眼瞅见老伴脸上忧郁的神色，心里纳闷：老婆子又怎么了？是怕他和儿子离家以后太孤单吧！唉，妇道人家就是这样。

“马驹回来了。”老伴没有抬头。

“这样快？”景藩老汉问。

“事情毕咧！”老伴丧气地说。

“说啥？”景藩老汉大吃一惊，“人呢？”

“还车子去了……”老伴难受得抬不起头。

马驹走进门楼来了。

景藩老汉瞅着儿子的脸，忙问：“咋闹的？”

“名额让旁人抢占咧……”马驹站在大门里说。

景藩老汉大为吃惊，喜悦的心情，承受不住突如其来的变故，满是灰白胡楂的嘴张得老大，合不拢了，汗水从爬满皱纹的脸颊上流下来。他不能相信这个意料不到的变化，疑虑重重地盯着儿子的脸，听着儿子的回答，生气地问：“他安国给咱说得好好的嘛，怎能给旁人抢占了去？”

“安国叔说，他的饮食公司添了一辆车，惹得一山的猴儿都急了。寻他的人不下二三十个，全是县上的领导和熟人……安国叔倒是真心实意给咱办事，可是没办法啊！”

景藩老汉听完儿子的叙说，大声哀叹着，怏怏地坐到石墩上，丧气地低下头去。他信了马驹的话，几天来处于喜悦状态的脑神经，一下子委顿了，由此而产生的晦气和烦恼充塞了胸膛。老汉颤抖着筋条裸露的手臂，重重地在大腿上拍了一巴掌，痛苦地摇摇头，抱怨说：“安国老弟呀！你尽给我弄这号空欢喜的事！”他一侧头，看见老伴低着头，手里的针线停下了，眼角潮湿了。他不忍心看老伴丧气的脸

色，把烟袋噙到嘴里，却什么滋味也尝不出来了。他仍然不甘心地问:“那现在定下谁了？”

“说是县木材公司业务科长的小舅子。”马驹说。既然无奈要撒谎，就得撒到底。说是业务科长的小舅子，也不会冤枉他们，安国叔就是想给自己搞计划外的木材指标嘛！他说:“安国叔在木材公司要买松木板作棺材，你想想……”

“唉！没老百姓的活路了！”景藩老汉愤怒地一拍大腿，猛然站起，悲哀愤恨地叹息着。自己的后门被堵住了，他恨那些比他有势力的人，“世事全叫这些人弄瞎了……唉！”

“唉……”老伴也难受地吁叹着。

失望和晦气笼罩了小小的农家院。马驹不忍心看父亲和母亲被痛苦折磨得扭歪了的脸，心里一动，可怜起两位老人来了。他想安慰老人几句，可又找不到合适的话，只好默默地走出大门。

太阳高悬在头顶，村巷里流动着燥热的气浪。村子东头，三队饲养场外头，大叶杨树和楸树浓密的枝叶在地上投下了一片清幽幽的荫凉。马驹走过来，看见冯来娃脱光了上衣，只穿一条蓝色短裤，双手抱着一把长柄竹条扫帚，马戏丑角似的围着高大壮健的秦川牛打转转，扫刷着种牛卧圈时粘在皮毛上的粪巴和土屑，牲口紫红色的短毛干干净净，油光闪亮。来娃没有发现马驹正站在身后，仍然自顾自地忙着，不时地停下扫帚，从屁股后面的裤腰里拔出蝇拍，毫不留情地拍打落到种牛后腿之间的虻蝇，硕大的脑袋上汗水渍渍。

“来娃哥，”马驹满意地笑着说，“牛这两天没啥麻达？”

“噢！马驹。”来娃转过身，仰起头，自豪地抹着脸上的汗水，“你看嘛！你看跟你买回来的时光，一样不一样？”

“我怕牛倒水土哩。”马驹满意地笑着。

“我头天晚上弄了一锹黄土，在锅里炒焦，再熬成汤水，给牛饮了。”来娃动情地说，“这样一饮，牛就服咱山外的水土了。”

来娃的办法究竟有几分科学性，马驹没有去考究它，而半截人对待牲畜的细心，着实使马驹感动了。他钦佩地盯着这位残疾人，心里十分舒畅，父母亲痛苦的脸色给他心里投射的阴影，被来娃的忠诚行动冲淡了不少。

“明日开庄呀！”来娃快活地向他报告，“附近村庄不断有人来询问，咱给人家安排了日期，明天开始配种。你看，框架早已安好了。”

马驹摇一摇框架的木桩，稳扎结实，公牛拴在木桩上，雄狮一般昂首挺胸，不安地踏着蹄子，全不像那几头母牛那样安闲地站着。好哇，明天这儿就热闹起来了。马驹给这个配种站安排了两个高中毕业生。往后，得逐步采用人工配种，提高母牛的受孕率。种牛有了，下一步再养种马和种驴，办起一个像样的牲畜配种站来。现在看，种牛场是谋算到急需的空当上了，方圆三十里，没有一家开庄的种牛。他问：“那俩呢？”

“一个到镇上买些用具去了，一个骑车子到各村贴广告去了。”来娃说，“俩娃积极得很。我原先想，这两个学生娃，会喜悦弄这号腌臜事吗？没料想，两个货热心得很。”

“现在的年轻人，思想开通。”马驹笑说，“老人还觉得干这号事丢脸哩！”

马驹说着，走进饲养棚里。院里屋里，清扫得干干净净。槽道里不留一撮草把。圈里垫着一层干黄土，几乎嗅不见粪尿的臭气。槽道外头的垫脚砖已经垒好了。马驹由衷地赞扬说：“来娃哥，你弄得不错。”

“嘿嘿嘿！”来娃憨笑着说，“马驹，我在生产队里二十多年，没听见一个字的表扬话，你今日表扬我了，稀罕哪！”

马驹笑了，这大约是实情。

“马驹——”来娃庄重地问，“我听说……你要走咧？”

“不走，”马驹说，“走的话，还能不给你老哥招呼一声吗？”

“我也这样想。”来娃点点头，“旁人说得跟真的一样。我还是喂我的牛，心想，即便你走，也得把我喂牛的事安顿稳当……”

“好好喂牛吧，来娃哥。”马驹真诚地说，“咱弟兄们的希望，在这些宝贝身上哩！”

“对！”来娃大声说，“现时政策宽咧，庄稼人活套了。地里打得够吃，副业挣得有钱花，窝窝逸逸过日月，比城里差多少呢？”

马驹点点头，这个人说着他心里的愿望。有吃有穿有钱花，这本不算太高的生活要求，几十年里没有得到，领导他们的父亲却早已顾不上考虑这些，而只是急于把儿子塞到城镇里去。马驹瞧着来娃诚实的眼睛，心情颇为激动地说：“来娃哥，青年人往城里跑，是由于农村

太穷太落后。比方说，咱们村里要是修成水泥街道，戏楼前修起俱乐部，大队办起文化室，有书有戏有电影，家家屋里蹲一台电视机，你看如何呢？”

“啊呀呀！”来娃吐吐舌头，“我没敢想到这样阔气。我只说不愁吃不愁穿，我冯来娃就跟人一样啰！”

“为啥不敢想呢？”马驹说，“渭北原上的南村大队，已经做到了。那村在外干合同工的青年，自动回到队里去了，咱们为啥不行呢？”

来娃半信半疑：“怕不容易……”

“难是难，”马驹肯定说，“世上没有容易的事。我反正豁上了，你陪我干吧！”

“啊呀呀！我……”来娃受宠若惊，“你相信老哥，把牛交给我，放心好了。俺哑巴老婆灵得很，看我当了饲养员，给我的伙食也改善咧！给我吃白面，她吃黑面……”

生活呈现出纷繁复杂的色彩。父亲一生几经挫折之后已经疲惫不堪了；彩彩经历了过多的不幸反而更加坚强了；安国叔一生顺畅，现在正谋划他和老伴百年之后能睡一副松木棺材；来娃老哥想着够吃够穿有钱花的日月……他们都给年轻的冯马驹以有意无意的影响，马驹终于做出了也完成了自己的抉择，此刻里，心情轻松了。

第十六章

这是初夏一个平平常常的日子。太阳从秦岭东山群峰的巅顶冒出来，向西南方运行，空气燥热。这一天，冯家滩的平静的生活失去了

正常的节奏，变得有点纷乱了。

从天明开始，两辆延河牌载重汽车驶进冯家滩，到三队砖场来拉砖。满载新砖飞驰的汽车把街巷里的尘土、鸡毛和草屑扇起来；卸了货，又哐啷哐啷响着开回村里来。

配种站也在今天开庄。一大早，从外村来的陌生庄稼人，拉着自己的母牛趁着天凉赶来了，好多庄稼人围在三队饲养场门前看热闹。女人们是避讳这样不太文雅的场合的，全是男人们打诨调笑的声音。

马驹心里被一种激情鼓舞着。一位采购员告诉他，想不到三队第一窑新砖质量竟然这样好，他们宁愿多绕几里路，专门买三队的货。马驹心里难以抑制地喜悦：第一窑砖，十二万块，价值四千多元，今天进入三队空空的账本了。

“德宽哥，看清了吗？质量！质量是关键。”马驹大声说，“你算算，小河两岸这几年办起了多少砖场？好货不愁卖，全凭质量争前景哩！”

“我心里明得跟镜儿一样。”一向言语谨慎的冯德宽，口气也硬朗了，“制砖，晾坯，装窑和出窑，都得把关，砖才四楞饱满。这有我负责。火工有郭师傅，那河南老哥可靠。”

“把这笔钱，还是要抠紧，不敢乱花。”马驹和德宽用商议的口气说，“医疗站上的开支怎么办呢？彩彩说她手里没钱了，夏收快到了……”早晨，他在街巷里碰见彩彩，想到前日在河湾里她拒绝回答他的话，就有点不好意思。彩彩却老远就叫“马驹哥”，声音特别亮。待他走到跟前，看见彩彩满脸喜悦地盯着他，说是医疗站上的资金所剩无几了，她问过大队长，大队长说土地下户了，医疗站该当解散了。

她说："解散当然太容易了，问题是社员从外头医院看病回来，还寻我打针；谁有点小伤小病，犯不着跑远路去医院，也照样寻我来，怎么办呢？"她说着，盯着马驹，问他怎么办。他笑着说散是不好的，让他和德宽商量一下。

"问题牵扯一队和二队，他们不给钱，咱们三队一家给钱，负担不起呀！"德宽说，"这事本该大队长出面。召集三个队的干部商量一下，不难解决。"可大队长根本不理事了，他跟康家村康老三合买了一辆汽车，正在西安和西宁之间搞长途贩运哩，哪有心思去解决什么医疗站的资金问题呢！德宽为难地说，"咱们队单独给医疗站出钱，其他队社员看病咋办呢？"

"收款。"马驹说，"三队社员的这点福利，我们保持住。其他队的社员嘛，我们队里负担不起，没有办法。"

"只有这样了，"德宽说，"那两个队账上空着，没有钱，拿不出医疗费。"

"你给会计说一声，先给彩彩支出一百元。"马驹说，"夏收到了，没有常用药品不行。"

"只要咱的砖场多烧一窑砖……"德宽说，"一二百元有多难嘛！"

"实话。"马驹赞同说，"咱们这两项副业，现在看来都不错。这样干上两三年，你看吧，咱们何止是为社员解决一二百元药费的问题……"

"马驹，我想赶到夏收前，把这一窑货也烧出来，再装上第三窑。咱们割麦，让郭师傅烧火。生意红火了，就要趁热打铁。"德宽心劲也

很高，“你想想，一窑货就烧得十二万，四千多块，买多少麦子呢？”

马驹会意地笑笑，算是回答。在这样令人扬眉吐气的时刻，他想到另一位和他共事的人来。遗憾的是，他昨晚去找牛娃，没有谈得拢。牛娃跟他表哥的拖拉机跑短途运输，每天两块半，对三队的砖场和牛场不感兴趣了。

“牛娃前日见我，让我给他做媒哩！”德宽告诉马驹，“昨晚我过河去了，那女人对牛娃挺满意，只是弹嫌牛娃脾气太倔……”

“有这事？”马驹惊喜地问，“怪道昨晚我去找牛娃，大婶说，‘你甭拉扯牛娃了，俺牛娃急等用钱哩。三队收入再好，俺等不得……’老婶子没有说明，牛娃也没给我说。”

“我给那人解释说，牛娃要是有了媳妇，性子就绵软了。”德宽很得意自己的本领，“那女人后来就……差不多了。”

“要是有必要的话，咱俩今晚一块过河，非说服这个女人不可。”马驹热心地说，“可别给咱牛娃错过了。”

“那当然好。”德宽说，“咱俩去说，准保成功……”

两辆卡车卷着滚滚黄尘，又开到砖场门前来了。德宽笑着去招呼他们拉砖，马驹又转到饲养场门前了。来娃蹦跶着一双短小的腿脚，急得满头大汗，兴奋地告诉马驹，说是有好些邻村的庄稼人又来询问配种的情况，有的农户，其实牲畜还没发情哩，就先来挂号排队了。

马驹愉快地听着来娃哥的话，帮他干着活计，看着那两个高中生把一头母牛领进框架里去，心里舒畅极了。三四天来，去不去县饮食公司当司机的思想波动，已经过去了。鼓舞人心的胜利，令他情绪高

涨，胸襟舒畅。冯家滩三队已经转换过来的生气，实在令人走路带劲，吃饭有味哩！

“听说你打算买种驴，有没有这事？”一位老汉问，“啥时间买呢？”

“种驴……正在交涉。”马驹给老汉耐心解释，“咱看了几头，没看中。正在跟畜牧学校联系，要买一头纯种关中驴。”

“有种驴就好咧，”老汉说，“马用驴配，生骡子。种驴骨架好，生下骡驹才出色……”

马驹和陌生的外村来的老汉说着，来娃又跑过来，指指村子中间，示意有人叫他呢。马驹一看，母亲远远站在村巷里，向他招手，急急火火的样子，又有什么事呢?

父亲的脸色多难看呀！马驹一走进小院，简直吓了一跳。父亲坐在槐树下的石墩上，用草帽扇着凉，灰白的连鬓络腮胡楂儿显得芜杂了，汗水从脸上流淌下来，粗大的鼻翼在翕动着，似乎浑身都在哆嗦。怎么回事呢?

“你说，到底是你不愿意干，还是人家安国……”

景藩老汉看见儿子进门，早已忍耐不住，“你反倒说安国把名额给旁人了……你居然蒙哄我！”

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了，马驹苦笑一下，坐在一边。本来是怕惹父亲生气，现在看来是难以避免这场冲突了。马驹只好诚实地坦白说：“你甭气，也甭急，有话缓缓地说。我怕惹你生气，就那样给安国叔说……”

“你——嘿！”

景藩老汉气得嘴唇哆嗦，手脚颤抖，一时间话也说不顺畅了。

昨日马驹回来告诉他名额让旁人占去的话，他初听时信下了。比他有势力的人顶掉儿子的司机位置，是可能的。奇怪的是，儿子失掉这样的工作机会并不难受，反而更有劲头地在砖场和饲养场跑腾，这就令人生疑。一早起来，景藩老汉在村口爬上装满砖头的卡车，进了县城。老汉一见安国，听得安国说明原委，一下子气得煞白了脸……他一口水顾不得喝，一口饭吞咽不下，走出县城，又等见那辆到冯家滩拉砖的汽车，气鼓鼓地回到村里来了。

“你说——”景藩老汉紧盯着儿子问，“你愿意不愿意？”

“我不想去。”既然回避不开，马驹就实说了。

“你不想去！哼！”景藩老汉呼的一声站起，大声吼喊说，“你想做啥？你死守在冯家滩，想干啥呀？啊——”

“你甭喊叫，爸。”马驹劝父亲。父亲毕竟是党支部书记，不同于一般庄稼人。父子间的矛盾已经扯开，不如把话说明白，也许更好。他冷静地说：“有话你慢慢说。事情弄得惹你生气，也怪我没有细细给你说清白。我想跟你说说心里话，你听了，哪些不对，你指教我……”

“你眼睛睁得大大的……硬往泥滩里跳嘛！”景藩老汉气得声音变了调儿，恨铁不成钢地说，“我翻前倒后地给你说了多少道理，你不听……你将来后悔了，跟不上了！”

“我不后悔，也不抱怨你。”马驹说。

“我拿我一辈子的教训给你说，还拿志强的下场作比方，还……还说过何家营支书何永槐的意见。”景藩老汉稍微平静下来，委婉地劝儿子，“这些人在农村干了一辈子，哪个没本事？哪个不使劲？你不听人劝，还要……”

“爸，你和志强叔，受早先那错误政策的苦害，公事没办成，自个也受苦了。永槐叔可能一时还不理解党现时的农业经济政策，他慢慢总会理解的。”马驹不急不躁，想说服父亲，“我的看法，现时党的农业经济政策，得人心；要想在农村成点事，现在正是时候。”

“地分了，牛也分了，各家打各家的算盘，各人寻各人挣钱的门路，人家谁要你管呢？”父亲说，“你眼睛瞎了吗？难道看不见？”

“地是我分的，牛也是我分的，我怎么看不见！”马驹说出自己的看法，“新的问题出来了。咱们村里，一个人水、旱地分不到一亩，一年只忙秋夏两月，庄稼人闲下做啥呀？咱村年年回来一二十个高初中毕业生，做啥呀？有手艺的人凭手艺挣钱，多数庄稼人寻不着挣钱的门路哩！叫我看，大队和小队干部，要帮助社员找活儿干，提供挣钱的门路。劳力不能闲下呀！”

“你看看而今的社会，谁不是为自个谋算？”父亲粗暴地打断马驹的话，“你小子倒想得好。”

“牟私利的人是有的，可能为数不少。”马驹承认父亲说的社会现象，“可是只牟私利不管群众，总不是共产党员应该做的嘛！你托安国叔找门路，也是……”

“也是谋私利！”景藩老汉抢先说出儿子要说的话，满口应承，像是报复似的说，“我过去只为众人谋利益，结果呢？挨整挨斗，没完没

了地‘斗私批修’。我现在才知道该给自己谋点……”

马驹看着父亲灰白的须发，深深的横着和竖着的皱纹，心里叹惋，虽然年近六旬，父亲还是苍老得太甚了。批判，斗争，没完没了的“斗私批修”，不仅没有使父亲这样一个共产党员保持住革命的热情，反而从一个群众拥戴的基层干部变得私心重重了。他怎么说服父亲呢？他心里很不平静。大道理父亲可能比他听得多几倍，还容得他给他讲吗？马驹想到来娃，终于很动情地说：“爸，那天晚上，来娃在饲养棚里给我说，‘土地和耕畜虽然分户经营了，共产党在冯家滩的支部没有散伙嘛！’他还心地踏实地相信，党支部帮他治穷致富哩……”

“哼！”景藩老汉讥诮地发出一声鼻响，说，“政策一天三变，我连我也致不了富，我能帮他致富吗？”

“爸，你怎么老是怕变呢？过去那些死套套不变，农村有前途吗？那些极‘左’的东西整了你，斗了你，不变行吗？你倒反而怕变！怪事！”马驹也有点急，“我想，往后政策就是有变，也是往更完善的地步变哩嘛……不管怎么变，爸，我觉得有一条没有变：共产党为人民这一条没变……”

“哈呀！你娃子倒给我上‘政治’了！一边歇去吧！我的党龄比你娃的年龄还长一节子哩！”景藩老汉声音又高了，粗了，“我不跟你说这些话。你现在只说一句：去不去？”

马驹闭了口，气咻咻地扭过头去。父亲是党支书，现在竟然像一般落后老汉一样使出混闹的架势，他该怎么说呢？反正已经给安国叔回过话了，那个名额还没被旁人占去吗？父亲问他去不去，是什么意思呢？

母亲一直注视着父子俩的谈话，没有开口。关于政策变不变，关于共产党员应该为谁谋利益的争论，她插不上嘴。现在到了她该说话的极好时机了，一开口也是恨铁不成钢的急切的口气：“你爸给人家安国好说歹说，赔了好话；人家安国还算瞅了你爸的老脸，现时还跟得上。”

“你娃子过后想想，我为你好还是为你瞎？”景藩老汉委屈地说，几乎要流泪了，“我六十岁的人了，为你东奔西跑，拜了这个求那个……”

马驹痛苦地低下头，说不出话来。

“再甭傻想咧！”母亲走到他身边，拍着儿子的肩膀，“你看看，谁能把冯家滩治好？神仙也不成。”

“去。后晌把车子骑上，行李带上，到你安国叔那儿去上班。”父亲压抑着愤恨，勉强使出和悦的口气说，“人家车上等着用人哩！”

“爸！”马驹动情地叫，“你让我跟三队的穷兄弟们试着干一场吧！干成了，算是实现了你跟志强叔过去的愿望；干不好，我不后悔，更不能抱怨你。我看而今的农村政策，很好，正是成事的……”

“你说干脆点——”父亲似乎已经忍无可忍，打断他的话，“去不去？”

“爸！甭这么逼我……”

“滚！”父亲手一挥，细瓷茶壶从石桌上被摔到槐树根上，粉碎了，“你给我滚！”

马驹一惊，看着父亲暴怒的脸膛，不知该怎么办了。父亲自小疼爱他，他是一家人里的“老小”，比哥哥和姐姐更多地受到父母的宠爱。他从来没见过父亲这样斥骂他。他呆立着，忍受着，等待父亲的盛怒快点过去。

“你也太得死犟！”母亲狠狠挖了儿子一眼，走开了，“不听人劝……”

“立马滚远！”父亲更加怒不可遏，指着街门，“我没你这儿，你没我这个老子。把你的铺盖背上，滚！”

母亲大约觉得父亲的话说得太绝，拉扯着扑到马驹跟前的老汉。父亲却更加暴怒，摔开母亲，转身奔进儿子住的厦屋，抱出母亲昨日刚刚洗干净的黄布被子，扔到马驹身上，指着大门说：“快滚！”

母亲已经坐在台阶上，呜呜地哭出声来了。

马驹从木墩上站起，把被子背在肩头，瞧着父亲痛恨已极的脸，声音沉重地说：“爸，我可以走。你想想，社员当初为啥拉扯住你留在冯家滩？你是共产党员，大伙相信你。他们现在留我，我觉得比金子还贵重的……我什么都可以不要，就要这一点。我不是和你有意执拗呀……爸！”说罢，马驹走出门去了。

门里门外早已拥进一伙乡党、邻居，劝着暴怒不息的景藩老汉，拉扯走出门去的马驹。

蹲在街巷里树荫下吃午饭的男女社员，关切地询问，诚意地吁叹。马驹不好再说什么，背着被卷，只顾朝村子东头走去。怕惹得众人笑话，结果终究难得避免……到哪儿去呢？马驹茫然走过村巷，忽

然想到砖场，那儿有德宽哥搁置零碎家具的窑洞，就到那儿暂时安身吧。

第十七章

彩彩端着针盒走过十字街口的时候，正好碰见马驹肩头上搭着军用黄布被子走过来。她在医疗站上给娃娃接种牛痘疫苗，娃娃哭，女人喊，忙得满头大汗。她已经从那些抱着娃娃来接种牛痘的女人们的嘴里，知道了景藩大叔和马驹哥吵架闹仗的事，可没有想到闹得这样严重，马驹哥居然被景藩大叔赶出家门了。她停住匆匆的脚步，想和马驹哥说两句宽慰的话，看见马驹哥气得紫红的脸膛，朝她苦笑一下，她就觉得说啥话都不是地方，也不是时候。她看着马驹哥朝村子外头的砖场走的背影，简直难过得鼻腔里酸渍渍的了。

前日傍晚，在河湾柳林里，她已经知道马驹哥心里要说的话。她脸烧，她心跳，她好不容易才把涌到喉咙口的话压到肚里去了。现在马驹哥留在冯家滩是肯定无疑的事实了。那个厚着脸皮“爬后墙”的薛淑贤又该哭笑不得了吧？不管怎样，她是不会再有任何兴趣光顾马驹哥家的门槛了。现在自己还有什么顾虑呢？没有了。在马驹哥被景藩大叔赶出家门的时候，她要热烈地表达自己对马驹哥的爱慕之情——这种感情压抑得太久，现在无论如何抑制不住了，也没有必要抑制了。她这样想着，心在胸膛里怦怦地跳着。

走进门，奶奶正在案板上揉面，彩彩对奶奶说：“奶，多和些面。”

“这团面，够咱婆孙俩吃了。”奶奶平静地说。

“今晌午要添一个人吃饭。”彩彩说。

“给干部管饭呀？”奶奶说，“还没轮到咱们家。”

“马驹哥被景藩大叔赶出门了。”彩彩叹口气，“他还没吃午饭哪！”

“他吃不吃午饭，我管不上呀！”奶奶冷冷地说，“你也管得太宽了。”

“奶呀！你——”彩彩脸微微一红，撒娇地说，“我今日才看出……奶奶真小气！”

奶奶手里不停地揉着面团儿，转过头，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瞅着彩彩，然后从面瓮上端下木盘，揭去布巾，露出一盘早已切好的细长面条，说：“够不够你马驹哥吃的？”

彩彩顿时明白了，奶奶手里正在揉着的面团，无疑是添加的一个人的饭食了。她红着脸，抱住奶奶的肩头，用额头顶着奶奶的耳腮，笑着说：“我说奶奶……怎么就……小气了呢？”

“去，叫你马驹哥来吃饭。”奶奶说，像是吩咐孙女去叫自家屋里的一个成员一样，“饭时过了。”

彩彩心里一动，感动地盯着奶奶。在冯家滩里，只有奶奶最明白孙女的心。她知道孙女怎样喜欢马驹，却又不得不和她并不喜欢的文生订婚……看着奶奶早已给马驹哥揉面做饭，催促她去叫他来家里吃午饭，彩彩忽然有点不好意思了。马驹哥刚刚被老人赶出来，村里正在议论纷纷，她去领着马驹哥到屋里来吃饭，从街巷里走过来，让人看见会说什么呢？彩彩挽起袖口说：“奶，你去叫，我来擀面。”

“奶奶脚碎，走得慢。”奶奶笑着说，这是奶奶多少年来少有的欢悦的口气，“你擀面也擀不好。”

这是真的。奶奶擀了一辈子面条，那手艺在村子里是有名的，好多人家有红白喜事，常常请奶奶去擀面。彩彩只好亲自去叫亲爱的马驹哥到她屋里来吃饭。谁爱看就看吧，谁爱说什么就说去吧！她要把马驹从砖场叫过来，并排从村巷里走过去，从冯大先生家的门楼前走过去，即使人们议论她和他好，又有啥可怕的呢？冯彩彩喜欢冯马驹，今天叫他来屋里吃饭，过后某一天宣布和他订婚，结婚，谁还能说什么呢？光明正大，问心无愧，既不是贪财爱钱，也不是追逐商品粮，彩彩怕什么呢？她走到村子东头的土桥上了。

马驹哥坐在她家小院葡萄架下，她将给他递上一碗奶奶擀下的又细又韧的面条，叮嘱他调上各样配料，完全像他的媳妇那样关照他……彩彩走过土桥的时候，想到这里，脸上又发热了。是啊！从小到大，从早到晚，婆孙俩的小院里是缺少生气的。这样一个心爱的男人——马驹哥，坐在葡萄架下，会使寂寞的小院增添一种强悍的男子汉的气息……

彩彩走到砖场里。正午炎热的阳光烤晒着一摞摞砖坯。砖机停了，砖场上空无一人，正是歇晌时间。河南籍的郭师傅坐在窑洞门口，赤裸着上身，正在端着大号老碗吃饭。他告诉彩彩，队长马驹给德宽拉去吃午饭了……啊……来晚了，多遗憾！

“马驹，从今日起，你把伙食搭到嫂子灶上。”兰兰把一碗苞谷面搅团儿递给马驹，爽快地说，“不收粮票不交钱，放心。”

马驹接过碗，笑笑。他被德宽叫到屋里来，受到兰兰嫂子诚恳的款待。他的喉头好像鲠结着一团又硬又涩的生柿子，没有食欲。小饭桌周围，已经是一片吃喝苞谷面搅团儿的呼噜声。德宽的父亲，七十余岁的庄稼院长者，远远蹲在院里的榆树荫凉下，牙齿脱落的嘴巴扭动着，喝着这种粗粮杂面煮成的糊团儿。一家老小，全凭德宽养活，老人自知家中的经济实力，拒绝儿子给他买哪怕是贱到五毛一斤的烟叶儿，悄悄揉下干棉花叶子填进烟锅，熏一熏发痒的喉咙……这样的老人，活了一世，除了挥锨舞镢出笨力，有过什么享受呢?

马驹端着盛满搅团儿的大碗，醋水水上漂浮着一层红艳艳的辣椒片儿，虽然不见油星儿，却撩拨得他的胃口蠕动起来。这是贫困的庄稼人春荒里很不错的吃食了。

兰兰已经变成粗悍而又泼辣的中年妇女了。上有老人，下有围着锅台嗡嗡的三个娃娃，她根本无意收拾打扮自己的衣着，缀着补丁的旧衫儿，裹着她壮健的中年妇女的腰身。在马驹还小的时候，她违抗父母之命而大胆躲到德宽哥家里，干脆过活到一块了。那时候，她长得苗条，短发，穿一身学生制服，成为小河川道风传一时的“三姑娘”。大儿子已经长得和德宽一般高了，丈母娘至今不承认德宽是她的女婿……马驹深知，德宽跟他在三队干事的用心，那是憋着一腔难以出口的气呀。

“男子汉大丈夫，把事想开。”兰兰豪爽地劝马驹说，“我爸我妈把我撵出门，比你难受得多。我照样活着……”

穷虽穷，这个家庭却和谐而又温暖。在这样的家庭气氛里，马驹觉得舒坦。他和嫂子开玩笑说:“我怎敢比你……你是王宝钏哩……”

“人家王宝钏守寒窑十八年，盼回来一位大将军。”兰兰斜眼瞧着德宽，讥刺地说，“我争争抢抢嫁给他，二十年了，碗里还是盛的搅团儿……”

德宽抬起头，温厚地笑笑说：“明年再看吧！咱一料麦子打得够你吃一年，我承包的砖场……挣下钱，先收拾打扮你，咋样？”

兰兰哈哈大笑，几乎喷了饭，说：“我单怕你承包烂了，咱拆房卖娃也赔不起……”

“你放心！”德宽明知兰兰是随心说笑话，仍然认真地说，“你不看看，马驹兄弟下了多大的‘注头’，怎能烂了呢！”

“德宽，你可真得多出几身水！”老人已经吃完，站在儿子当面，“要是砖场包烂了，甭说咱家赔起赔不起，你——对不住马驹！马驹是踢了铁饭碗，跟你在冯家滩共事。”

马驹盯着老人凝重的眼睛，心里感动了，说：“放心，大叔，德宽哥在砖场流的汗水不少哩！”

“马驹，你今日到咱屋了，叔想说……”老人捉着长管子旱烟袋，挖着，“当年你爸办农业社的时光，好些人不敢入社，我是头一个把牛拉到大槽上去的。我说，咱旁的事先不管，咱只信服景藩老五这个人，不会哄得咱跳崖。社刚办起来，听说县上要拔走景藩，我心里慌了。背地里说实话，安国那人，话说得美，事做得不赢人喀！我当晚跑到你屋，劝你爸甭走……”

“那些事……我听说过了。”马驹点点头，安慰老人说，“那时你劝俺爸甭走，这没啥不对……”

老人摇摇头，苦笑着说："后来，我看见你爸被人家推到戏楼上，挨斗受辱贱，我悄悄溜出会场，回家来关住大门，捶自己的脑袋。是我害了老五呀……"

"过去了的事……"马驹也苦笑一下，"再说，那几年里，他那样的干部走到哪里，也躲不过挨斗受辱贱，无论乡里城里一模一样……"

"那是实情。"老人嘴里承认马驹说的事实，可心里仍然不平，"你爸在咱村劳心劳力几十年，唉，老五可怜！要是没有安国比对，倒也不显得。两人一比对，差得太远哩！我就觉得当年劝你爸劝瞎哩……"

"你自个的光景过得咋样呢？"马驹难受了，瞅着老人平静而又真诚的眼色，"你们这一辈老庄稼汉，而今有几个能享点福呢？除了几个儿子在外工作的老汉，家境稍微宽裕一些，大多数老汉跟你一样，嘴里填的是苞谷面搅团儿，身上穿的是补丁衫子，烟锅装的是棉花叶儿……"

"啊呀！马驹……"老人却不以为然地说，"咱农民都是这样嘛，享啥福呢！咱还有一碗搅团儿吃，你不见旱原上的人，苞谷面也吃不到嘴里。你爸本该……唉！今日你爸为啥跟你闹仗？我心里明白喀：老汉而今太后悔了呀！我也觉得后悔，当初不该把老五硬牵扯在村里……"

贫穷已经使老人彻底失望了，甚至麻木了……因为对于生活的失望，他现在觉得当年劝服马驹父亲留下来是错误的，像欠了他的情债似的，后悔不迭。马驹心里充塞着一股酸楚的滋味儿。他忽然想到，老人当年劝服自己父亲留下来，不仅是信服父亲一个人，而且是对新的生活抱着满心的希望哩！现在……必须用果决的行动，艰苦卓绝的

奋斗去改变现状，证明一个普通庄稼汉对共产党的信任是应该的，去证明庄稼人跟共产党追求生活的理想是完全对头的。生活实际作出这样的证明以后，庄稼人心头所充塞的失望和灰败情绪，不扫自消！马驹心里很不平静，父亲把他赶出家门，只是使他生气，而老人的话，却深深地打动了他的心。他的胸间涌起一股豪壮的感情，对老人说："大叔，你多活十年八年吧！我们奋斗几年，首先要叫老庄稼人享点福。你们受的苦太多了……"

"马驹，叔要是不死，许能享上你们的福。"老人贤良宽厚地说，"叔虽老了，眼还没瞎，啥人啥事都看见。你娃娃的举动，叔看得清清白白。我看你呀，跟你爸当年一样心性，跟志强也像得神……咱冯家滩是个好地方，有山有川，辈辈出能人，现在又出来你马驹……"

"爸！你啰啰唆唆没个完，马驹的饭都凉咧！"兰兰笑着说，"啥时间闲了，你跟马驹尽量说。"

老人嘿嘿笑着，忙让马驹吃饭，不说话了。

这当儿，马驹眼前一亮，彩彩穿着红色的凉衫儿走进院里来。未等马驹开口，兰兰已经招呼她了。兰兰看看马驹，眼珠一转说："噢呀！彩彩，你是来叫马驹吃饭呀？"

马驹看见彩彩的脸上瞬间掠过一丝儿为难，觉得兰兰嫂子的问话太突兀了。可是，他没料到，彩彩只有不易察觉的片刻犹豫，接着便大大方方应承说："可惜我来迟咧！已经端上你们家的碗了。"

"你给马驹做下啥好饭了？是长面肉臊子吗？"兰兰更加来劲地吵吵，"要是的话，马驹兄弟，甭吃嫂子的搅团儿了，跟彩彩去吃好饭吧！"

马驹傻乎乎地笑笑，仍然大口喝着搅团儿——他既然正端着碗，怎好意思再到彩彩家去吃饭呢?

老成厚道的德宽刚才看着父亲和马驹说话，一直没有插言，现在发现了马驹自彩彩进屋以后出现的窘态，那是无法掩饰的。他心里一动：这是多好的一对儿呀！他没有劝阻兰兰言语和眉眼里已经很明显的表现，只管坐在一边瞅着马驹，看他究竟有没有意思。

“后晌，把你家三娃子引来种牛痘。”彩彩给兰兰说，“过时没疫苗了。”

“噢呀！你是来通知种痘，我还当是请马驹吃饭哩！”兰兰仍然不放过彩彩，“看来彩彩是落空头人情。”

“空头人情也罢，实心也罢。”彩彩也笑着说，“俺家请人吃饭，绝不会给人端上……搅团儿。马驹哥，今晚到俺屋，烫面油旋饼子……”

马驹心里一热，不由得脸也热了，他哈哈笑着掩饰说：“好哇！”

彩彩走出门去了。

彩彩一走，马驹心里立时平稳了。怎么搞的？有彩彩在场，他的心就不得安稳，咚咚乱跳，无法抑制。兰兰走到当面，用嘴朝彩彩的背影努努，挤挤眼，挑逗地问：“兄弟，你看这位咋样？”

马驹腾地红了脸，避开兰兰锥子一样尖锐的眼睛：“你别胡说乱道……”

“啥也逃不过我的眼。广播上早就通知了，她又来单独给我叮咛给娃种痘儿做啥？”兰兰有理有据地说，“那是专门请你吃饭哩。老五叔

把你赶出门，没料想，还有人心疼马驹兄弟哩……”

德宽咧着嘴笑，笑马驹脸上和脖颈上涌起的红潮，也凑上说：“我也看出来……”

“哈呀，德宽哥，你也烧臊我。”马驹赤红了脸，“你们两口子，拿兄弟开心……”

“只要你有心，嫂子给你跑腿。”兰兰笑着，认真地说，“用不了几句话，保准说好。”

德宽哈哈大笑：“人家本来是一个有情，一个有意嘛！”

老人一听这号话题，早已噙着烟袋，躲避到门外的树荫下乘凉去了。

“听说文生变了心，我就想给你牵线拉扯。”兰兰神秘地说，“你自己和薛家没弄零干，我就没敢开口。”

“需要你帮忙的时光，我来寻你。”马驹看看兰兰实心实意，也就说，“你先给咱甭乱嚷嚷……”

德宽一听这话，心里有了实谱，高兴地咧着大嘴，畅快地笑说：“那没麻达。你嫂子有老经验……”

马驹终于喝完吃净，鲠在喉头的那一块又硬又涩的东西消除了。搅团儿虽是粗粮淡饭，味道还是可口的，绿茵茵的水芹菜，又辣又酸的菜汤，吃下以后，肚里舒坦了。

好了，应该发生的事都发生了。有心想避免父子间的这一场冲突，反倒弄巧成拙招惹得父亲更加不能容忍……既然跟父亲之间关系弄得这样僵，反该更加用心地办自己要办的事了，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了。

他吃完一碗搅团儿，再抓起一个苞谷面馍馍，夹上辣子，站起来，向兰兰嫂子点点头，和德宽一起出院子走了。

第十八章

景藩老汉和儿子闹仗，以至把马驹赶出家门的举动，一霎时传遍了冯家滩一百五十户人家的角角落落。庄稼人中几乎绝对多数的人都同情老汉，觉得马驹这娃太傻了，枉费了老人的一番苦心。不过，景藩老汉也未免做得太过分了，骂几句未尝不可，把儿子的铺盖卷扔到门外大街上，太绝情了，日后父子俩还说话不说话呢?

河西公社王书记听到这件事的时候，猛乍一惊，暗暗一喜，当下把手头的琐碎事务一安顿，跨上自行车，端直赶到冯家滩来了。

中共河西公社的领导人头脑敏锐，几乎立即意识到：冯家父子闹仗，不是乡村里一般父子或兄弟之间因为财产闹仗打架；他们父子间的矛盾带有思想上的深刻分歧，这种分歧已经发展到家庭破裂的严重程度。他坐不住了。那个他虽然认识而并不太熟悉的冯马驹，一下子使王书记感佩了。很长时间，他为冯家滩大队领导力量的软弱涣散伤脑筋，说句不客气的话，支委会和管委会实际上已经是形同虚设……现在，冯马驹自己在冯家滩冒出来了，表现出一股气势，叫党委王书记太高兴了。

马驹正在推着装满砖坯的平板架子车，来往于砖窑和坯场之间。弥漫在砖窑里的灰屑，落在脸上和手臂上，和着汗水，染出一道一道污痕。看见王书记，马驹停了手，把王书记领到水渠边的树荫下，自己在水渠里洗起脸来。

“马驹，你在这儿拉车装坯哩，我还以为你这阵儿……躲在哪儿哭冤枉哩。”王书记开玩笑说，自己倒不笑，“好，看你这架势，没有趴下。”

马驹擦着红红的脸膛，咧着嘴憨笑着。

“马驹，怪我。事情弄到这一步，怪我没有尽到责任。”王书记谦和地自我批评说，“前几天，你爸寻我时，我同意了他的意见。我不了解你的想法……”

马驹坐在砖坯上，接过王书记递给他的一支香烟，香喷喷地吸了一口，感激地笑笑：“这是避免不了的……已经过去了，算咧。”

“我当时要是找你谈谈，了解了你的想法，我可以给你爸做点工作，也许不至于弄出这样的局面。”王书记咂着嘴，对自己工作上的粗疏表示懊恼，十分真诚地进行自我批评，“让你受难场了……”

“这不算啥，王书记。”马驹开朗地说，“俺爸说我几句不好听的话，没啥。我能理解他的心情，总是自己的老子，不会记仇的。”

“对，要是能理解你爸的心情就好了。”王书记说，“这是个好同志，几十年来给冯家滩群众办了不少大事、好事。现在他老了，体力不行了，对当今的农业经济政策不适应，脑筋赶不上形势的发展了……”

“王书记，你说怪不怪，”马驹笑着说，“极左的东西整了他，他一提起‘放卫星’‘四清’和‘文化大革命’，头上就冒火。可是而今纠正这些极左的东西，他却又想不通，比如责任制……”

“不光是你爸一个人哩！”王书记沉吟着说，“好多老同志，把责任制理解成分田单干了。这里头，有几种情况……”

“俺爸只看见牛分户养了，土地分户种了，就怨气蛮大，说是自己几十年白干咧。”马驹说，“你说那个大锅里舀干了，再舀不下饭了，他还是舍不得把锅换了……”

“难怪哩！”王书记冷静地分析说，“一方面可以看到老同志对集体化的感情，另方面也确实是他对过去贯彻的‘左’的那些东西，一时认识不透……”

马驹点点头。王书记是一位实实在在的党的基层领导。他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的高中毕业生，有文化，人也聪明，没有一般行政干部的油腔滑调。有这样的领导支持自己，他心里感到温暖、实在，便实心实意向这位可资信赖的领导人汇报自己的思想：“我在三队起初实行责任制时，俺爸坚持不让搞。我去请示你，你说可以先试办。那时光，县上的具体政策还没下达哩……地分到各户种了，牛分给各户养了，生产积极性确实高涨了。可是，问题出现了：一人分得一亩地，大家大户也不超过十亩地，顶多够一个精壮男劳力经营。好多青年闲下了，特别是夏秋两个多月的忙时一过，冬季和春季，劳力闲下了。我这时才跟德宽决定：要给劳力寻活儿干……”

“这是个普遍出现的问题。”王书记赞同说，“你干得好。应该帮助社员搞好家庭副业，搞些队办工副业，这是改善农民经济状况的好办

法。问题出在哪里呢？好多农村干部借口分地到户，撒手不管了，还说什么，分田到户，闲了干部。你们家里出现的矛盾，你和你爸，正好是这两种思想的代表……哈哈，我说得对不对呢？”

马驹瞧着王书记的眼睛，笑笑，表示默认。他切实地解释说：“我开始也不大清楚，实际当中提出问题了，就得想办法解决。”

“关键就在这儿。”王书记肯定说，“同是一个村子，一队和二队，现在没人管；说到底，还得有一班好干部。”

“说实话，刚从部队回来那阵儿，俺爸要给我找下司机一类工作，我会去的。”马驹如实相告，“我在三队干了半年多，弄下这一摊子，几件事刚刚搞出个眉目，说实情，要我立马撂下走掉，还真是舍不得丢手哩！”

“我信。”王书记深情地盯着马驹，深有同感地说，“甭说生产队，公社里也一样啊！因为实行新的农业政策，好多人不愿意在公社干了，寻组织部、人事局，闹调动。我倒是觉得公社里头工作更实际，更具体一些。咱们河西公社，我只待了两年，也觉得大有发展前途……”

两位干部谈得很投机，互相都受到了鼓舞。“我不同意有些人说的，现在大家都是‘向钱看’。可能是‘向钱看’的人多了些，但不是全体一切人都‘向钱看’了。”王书记很有感触地说，“我们有不少党员和干部，还是实心实意为人民服务哩！老同志有，年轻党员也有……”

“王书记……”马驹听到这里，心里涌过一股热流，感情激动了，“这几天，去不去开汽车，离开不离开冯家滩，我也翻来覆去地想过哩！经过这一番折腾，倒是教我明白了好些事情。我爸那一辈人，跟

着党，给群众办了不少好事，大家拥护他。后来的‘左尺子’把他抽怕了。六十年代，冯家滩又出来一个冯志强，在乡亲们最困难的时光，放弃大学不考，回乡来和社员们一起苦干，刚刚显出一点成绩，又给‘左尺子’抽倒，连命也赔上了……”

说到这里，马驹心里翻腾得厉害。见王书记正全神贯注地听着，他便狠劲说出了自己的决心：“我遇到好年代了，应该实现俺爸和志强叔他们没有实现的计划……说实话，我是豁上了！”

王书记重重地在马驹肩头拍了一巴掌，脸上显出激动的神情，大声说：“农村广大青年的出路，还在咱农村哩！国家现时还不可能把农业人口大量转变为工业人口的。有志气的共产党员，应该和乡亲们一起奋斗，把自己的家乡建设好，做缩小城乡差别和工农差别的带头人。农村的物质丰富了，文化生活多样了，社会主义文明建设好了，谁还挤进城去做啥？”

“志强叔一九六〇年从学校回来，提出一套新农村建设计划，没有实现，大家都不信了。我现在比他的那个规划还大！”马驹兴奋而又畅快地说，“今年一年，做到家家有余粮；明年，使家家的收入平均一千元；五年过了，我要对学生实行免费读书，老人实行赡养制度，家家有电视机，队里建起文化宫……我能做到这些，算我一生没有白活……”

“有的人为自己谋利益，劲头大得很，甚至不惜冒犯党纪国法；也有人以为人民谋利益为幸福。”王书记又一次重重地拍了马驹一巴掌，“我们必须跟党同心同德……马驹，干吧，我和你搭手干。”

夕阳灿烂，晚风习习。两人说到这里，默默地相对着，良久，都不说话。

王书记站起来，瞅着原坡和河川，满怀感情地说：“冯家滩呀冯家滩……三十年出来三个好干部，一代一代……”他忽然问马驹，“你很了解冯志强吧？”

“我零零星星听人说过。”马驹摇摇头，“他死的时候，我才十岁……”

“那是我的同学，品学兼优的好学生。”王书记慨然说，“我调到河西公社来，刚刚碰上给他平反！我在河西公社工作，志强的幽灵总是在我眼前晃悠。我要是懈怠，总觉得没脸见他的母亲和女儿……”

“唔？”马驹惊讶地盯着王书记，“你们原来是同学呀！”

“整他的那些材料，我都看了，正好可以看作是他对党和乡亲的赤胆忠心。”王书记脸色严峻，声音激昂，“那些材料，由他的女儿保存着，你可以从彩彩那儿找来看看……”

马驹陷入一种默默的沉思里。

“我该走了。”王书记告辞。

“吃罢晚饭再走吧。”马驹挽留王书记，“咱们一块去看看志强家奶奶……”

“今天不行了，晚上召开党委常委会哩。”王书记如实相告，“改日来看老人家。彩彩这娃不错，好些人寻情托友找我要进社办厂，要当民办教员，彩彩从来没有找过我……”

“彩彩……”马驹沉吟一下，说，“她不会给你找麻烦的。”

“过两天，到奶牛场去看看你爸。”王书记紧握着马驹的手，“我也准备去跟老汉坐坐。”

马驹点点头，放开王书记的手，看着这位中年领导者强健的背影，跨过小桥，转上公路了。他的心情完全通畅了，顿然觉得自己心底踏实了。

景藩老汉站在槽头，把一抱一抱青草塞到牛槽里，又走到另外一头花牛跟前。看着这些有着美丽花斑的乳牛争争抢抢吞嚼起青草，老汉倚在槽栏上，点燃一锅旱烟，悠然喷出一股烟雾来。告别了，冯家滩，那块曾经煞费了老汉一生心血的村庄。

暴风雨过后的田野更显得寂静，发泄过怒气和怨愤的景藩老汉，心情十分平静。你娃子过后慢慢思量去！他在心里对儿子马驹说，你老子骂你赶你，是为了你有个好的落脚之地呀！老子尽了心，听不听在你，日后瞎了好了，甭抱怨你老子。

偌大的牛棚里，被刺鼻的粪尿的气味充塞着，奶牛吞嚼青草的和谐的声音，像流水一般响着。饲养棚里是这样静谧。老汉从敞开的木格窗户看出去，只见半缺的月亮从东原顶上冒出来。他要在公社奶牛场里第一次住宿了，晚饭时不再是老伴给他端上碗来，而是自己拿上碗到小灶房里去打饭。

老了！景藩老汉自己安慰自己，公事管不了了，自家屋里的家事也管不了了！管不了了，索性甭管，省得讨人嫌啊！快六十的人了，重活干不动了，也熬不得夜了，喂牛却是满可以胜任的。挣一份不算高的工资，够自己和老伴生活用度就行了。

景藩老汉磕了烟灰，再添上一遍草，准备回房里歇息。这当儿，窗台上探进一颗脑袋，叫了一声：“大叔！”老汉一惊，忙招呼说：“彩彩，你怎么来了？”说着，急忙从木栅门里走出去。

“我婶不放心，叫我来看看你。”彩彩说。

“噢……”景藩老汉心头一热，还是老伴好哇。

“马驹哥也叫我来看看你。”彩彩跟着景藩老汉边走边说，“他说他不敢来，怕你……”

景藩老汉半信半疑，不好意思地笑笑。说老伴不放心他出门，他信；说马驹也不放心，他不大信；不过也难料定，儿子倒不劣货，平时也懂得尊敬父母……他觉得心头有一股热烘烘酸渍渍的混合滋味了。走进新居室，老汉忙说：“坐，彩娃。叔给你倒水……”

彩彩坐在床上，放下肩头的挎包：“这个房子就住你一个人？”

“嗯。”景藩老汉应着，“刚腾下一间小库房。”

“吃饭咋办呢？”彩彩问。

“灶上起伙。”景藩老汉回答着。

“一天几顿饭？”

“三顿。”

“你吃得可口不可口？”

“我今日刚来，才吃过两顿饭，还好。”景藩老汉说着，心里却微微波动。这个姑娘受了老伴和儿子的委托，跑来看他，坐在这儿问寒问暖，倒像是他的女儿一样亲切自然。

“我给你把床铺一下。”彩彩动手铺褥子、单子。

景藩老汉站在房里，看着彩彩铺了褥子，又铺了单子。他在家里，这些事是老伴每天做的，无需动手。今天住进这间小房子，他把铺盖卷儿扔到床板上，还没解开哩，原想睡觉的时候再铺也不迟……彩彩铺好床铺，又捞起笤帚扫地了。这个留着短发、穿着花格红底的凉衫儿的姑娘，娴熟地做着这一切，使凌乱的小屋一下子变得清整了，老汉倒觉得有点儿过意不去。是嘛，彩彩算是自家的什么人呢?不沾亲又不带故，凭啥孝顺自己呢?

“马驹哥让我给你带来蚊帐，我给你撑起来。”彩彩从大挎包里掏出蚊帐来，“已经有蚊子了。”

景藩老汉愣住了。他家里那挂破旧的蚊帐，已经发黄变黑了，这顶单人新蚊帐，马驹从哪里弄来的呢？他瞅着彩彩，迟疑地说：“窗上有细纱蒙着，不要蚊帐了。”

彩彩已经在墙上扎进钉子，把蚊帐挂起来了。

“马驹……啥时间……买的蚊帐呢？”他问。

“借俺家的。”彩彩毫不含糊地说，“他说回头买下还我。”

景藩老汉瞧着那个站在床上的姑娘的苗条的背影，一刹那之间，竟不好意思看彩彩，老汉心里想起了那一层意思……

蚊帐挂好了，彩彩跳下床，又从兜里取出几个小纸袋说："大叔，这是几样治头痛拉肚子的药，给你留下。夏天到了，人容易发病……"

"噢噢噢……"景藩老汉嘴里应诺着，却没有勇气对视那一双诚实好看的眼睛。老汉想起那一年他对她说的那些话了。唉！原以为马驹在部队升排长无疑问了，他才遵照部队同志的叮嘱，不敢给马驹订下家庭有这样那样麻达的媳妇，硬是失情薄义地把彩彩甩开了。现在，这个被他隔卡掉了的彩彩，专程赶到奶牛场来，代表他的老伴和儿子来看望他了。如果彩彩现时真的和马驹有那一层意思，自己怎么对人家娃娃说话呢！

"俺婶说，叫你晚上睡觉，把被子盖严。"彩彩说，"万一拉肚子，吃点土霉素，要是红白痢，吃'痢特灵'，吃法用量我给你写在纸袋上……"

"噢噢噢……"景藩老汉只是点头，其实什么也没记住。他还在想：绕了一周八匝，马驹还是和彩彩……

"马驹哥说，叫你干活时甭太过分，小心累下毛病……"彩彩说。

"噢噢噢……"景藩老汉自己更窘了：咱真是对不住人家娃娃哩！

"大叔，你还缺啥东西不缺？"彩彩问。

景藩老汉终于仰起头，看了一眼彩彩。她端坐在床沿上，像女儿一样真诚地关切地询问着。他慌慌乱乱地说："不缺不缺……"

"那我回呀。"彩彩说，"我后晌给娃娃种牛痘，走得迟了……"说着，她又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塑料袋，"俺奶烙的烫面油旋饼子，让我给你带了点儿。"

“这……好好好！”景藩老汉手足无措地站着，拒绝不好，接受也叫人为难，心里着实感动了，“叫你奶……甭干活！有重活……找马驹帮忙。”

彩彩笑着点点头，走出房子，推起自行车，回头再看一眼送她的景藩老汉，跨上车子走了。

景藩老汉站在明亮的月光下，忽然动了情，暗暗流下一股热泪来。奶牛场的一位职工随便问：“是你儿媳吗？多孝顺的儿媳！”景藩老汉尴尬地摇摇头，说：“不是不是，快甭乱说！”

第十九章

月亮贴在南原上空的蓝天上，原坡上洒满一层银辉，迷迷蒙蒙。南原的刀裁一样的平顶透着亮光，勾出一条清晰的雄伟的轮廓。河川里，水雾溶着月光，柔和而又迷离。沿着河堤和灌渠排列的一排排杨柳，城墙一样横摆在河滩里，只能看出锯齿一样高高矮矮的树梢。彩彩踏着自行车，在河川公路上行驶。夜露已经潮起来，她的额头上，有湿漉漉的凉意。

看望景藩大叔，完全是彩彩实心实意的自觉行动。老人在冯家滩劳累一生，最后弄得很不愉快……她能理解老人的心情。马驹哥被他赶出门来，心里不好受；其实最难受的，还是景藩大叔哩！把马驹哥的被子扔出门，老人自己连午饭也没吃，夹起被卷，一气之下走出了冯家滩……她听在村口看见老人的社员说，老汉出村时眼里转着泪花花。她在医疗站上给孩子们接种牛痘，心里想着，不管老人的做法是否合适，都应该去看望一下。他们刚刚吵罢，马驹去了可能使老人更容易动气。她一个人去最好，代替马驹哥去行孝心，以减弱老人心中

的愤恨。她说她是受大婶马驹哥托嘱的，他不是笨人，会想到的。她把自己和马驹的关系暗示出来，难道他不会感到什么吗？他在儿子与薛家的婚事上受了窝囊气，丢了面子，难道不会思前想后吗？

会的。彩彩回味着刚才见到景藩大叔的细枝末节，揣准老汉的心病了，他肯定为自己那年隔卡自己和马驹的婚事难以张口了。彩彩在心里说，甭难为情啊，大叔，你心里明白了就好了。经过这一番波折，你看清了谁是真心，谁是假意，也是好事。彩彩挺直腰身，很自豪地骑车走着。她又在心里劝慰景藩大叔说，那时候我背着政治上的黑锅，为了马驹哥的远大前程不受牵连，是我心甘情愿地割断了和马驹哥的关系，我不责怪你呀！

清凉的夜风吹着她的热烘烘的脸蛋儿，原坡上飘下来沁人心脾的洋槐花的清香。刚才冒充着大婶和马驹哥的名义，送给景藩大叔蚊帐、药品和以奶奶的名义送去烫面油旋饼子，表面上大方而沉静，其实心里咚咚地跳弹着，只怕露出破绽，弄得她和景藩大叔都会不好意思的。好在没有什么纰漏。现在，经过了这一番心理上的紧张，彩彩的心情完全舒展了。

小河川道的夜色如此迷人，彩彩觉得自己忽然身体变轻了，像布谷鸟一样自由地在河川的麦田上空飞过。应该把心里话向马驹哥敞开了……她对他怀着一颗怎样纯净的心啊！彩彩想着那个令人心悸的时刻。她对他该怎么说呢？

应该写一封信，从从容容一诉衷肠，彩彩这样想，那样做要比说起来更尽情一些。

是时候了，再也不能等待了，感情的春水溢满胸膛了，今晚回去就给马驹哥写这封信……她的脚下踩踏得更欢了。

幽深而迷蒙的河川里，传来一声声布谷鸟动情的叫声。彩彩轻轻哼起歌儿来。

“彩彩——”

彩彩一惊，忙收住口，迎面飞一般驶过来一辆自行车，到她跟前戛然而止。彩彩猛然听到马驹的声音，忙跳下车子。

“彩彩——”

马驹哥喊着她的名字，气喘吁吁，抹了一把汗，愣愣地站着，几乎能听见他的心的跳动声。彩彩忙问：“你咋急成这样子，出了啥事吗？”

“啥事也没有……”马驹撩起衣襟，抹着头上和脖颈上的热汗，颤抖着声音说，“我……想你……”

“呀！你——”彩彩脸上轰然发热了。她想不到马驹哥这样突然地出现在面前，在这样寂静的河川公路上，突然说出这样毫不转弯抹角的话来。她羞了，也慌乱了：“你……胡说啥……”

“我对不起你，彩彩！”马驹颤抖着声音，炽烈的火样的感情在心里燃烧，“实在对不起你呀！”他难受得要流泪了。

彩彩看着马驹激动得失去控制的举动，感到十分惊讶。她瞧瞧公路两头，说：“马驹哥，你稳静一下，这路上来回有行人哩……”

“彩彩——”马驹仍然声音颤抖，难于控制，终于说出了要说的话，“我今晚到你屋吃饭，大婆给我把心里话说透了……”

“哦……”彩彩心里猛地一跳，慌忙说，“俺奶给你……乱说了些啥呀？”

马驹瞧瞧公路两头，难为情地提议：“咱们到……河堤上去，这儿不好说话……”

彩彩看着马驹难为情的样子，猜摸到八九成了，肯定是奶奶把她的心事告诉给马驹哥了。这一切来得太突然，没有等得及她给他写信，却由奶奶把话说透了。马驹哥明白地约她到河堤上去，那儿树大林密，夜晚无人走动。女儿家的羞怯心使她不禁发问：“啥话嘛……还要到河堤上去？”

“到河堤上再说。”

马驹已经推着车子，离开公路，走到麦田间的机耕大道上了，彩彩略一迟疑，甩甩头发，也跟着推上车子下了公路和机耕大道交叉的漫坡。

她和马驹推着车子，并排走在麦田间的机耕大道上，白杨的叶子发出轻微的响声，夜里的河川，空气中弥漫着麦苗和槐花的混合气味，撩拨着人的心胸。他们现在是有意躲开公路，去到夜晚里人迹罕至的河堤上去谈情说爱，这还能含糊吗？那令人心悸的时刻就这样在人还没有充分准备的时候来到了，啊呀……

“彩彩，大婆把志强叔的那些材料给我看了。”马驹大声说，“嘿呀！不可想象——实在气人！”

“噢！”听到马驹说着关于父亲的事，彩彩稍微冷静下来，“你看了也好。我也打算让你什么时候看一看哩！”

“整人整得眼红了哇！”马驹激愤地说，“连《中国青年》上登着志强叔光荣事迹的文章，也当作罪证装进整人的材料袋子里……”

彩彩默默地走着，没有说话。

“我一口气读完那篇文章，我……流眼泪了。”马驹动情地说着，“那篇文章写得好，志强叔的事迹也着实感动人呀！我今晚才比较全面地了解志强叔的人品了。”

彩彩仍然默默地走着，没有说话。除了仅有的一张照片，她至今也想象不来父亲真实的面孔，真实的笑声，真实的走路的姿势……她从奶奶、母亲和善良的乡亲们的嘴里，自小已经形成了一个越来越坚定的信念：父亲是一个真正的父亲。她和他，都是根据死者的遗物和乡亲们口头的传说来理解父亲的啊！

“彩彩，咱们明天去给志强叔……烧几张纸。”马驹沉重地说，“让他知道，冯家滩人没有忘记他。”

“嗯！”彩彩低声应着，点点头。

两人都不再说话，在坑坑洼洼的机耕大道上默默地走着，自行车的链条有节奏地轧轧响着，走上河堤了。

杨柳的枝叶遮挡着月光，河堤上幽暗而安谧，稻田和水洼里青蛙的叫声响成一片，更渲染出河滩的寂静。

“彩彩——”马驹轻轻地叫。

“嗯……”彩彩应着。她知道他有话要说，等待着。

“我冤枉了你的心……”

“……”

“唉！嗨！”马驹猛然撕开胸脯上的衣衫，在穿着背心的胸膛上用拳头擂着，捶打着脑袋，撕扯着头发，一声声沉痛的哀叹从嘴里连续涌出来。

彩彩吓慌了，急忙拉住马驹的手臂，颤着声儿问：“你咋咧——你说话呀！”

“大婆给我说……唉！”

“说啥来呀？”

“大婆说，俺爸不要你跟我……”马驹痛苦得说不出话，“你跟文生订婚……是为了不影响……我的前程……”

“啊……”彩彩听着，一阵晕眩，“呜”的一声哭了。她站立不住了，支撑她沉默到今日的那一根无形的支柱，现在被马驹哥扯断了。她一扑跌进马驹的怀抱里……

“我实在对不起你……”马驹抱住彩彩说。

“甭说了……啥话也甭说了……马驹哥呀！”

马驹立时闭了口，一切解释对于她都是多余的，任何最诚意的道歉都显得苍白无力。马驹张开双臂，把彩彩更紧地抱在怀里，猛烈得

近乎疯狂地吻着她的头发、脸颊、嘴唇，尝到她涌流在脸上的泪水的咸涩。

彩彩被马驹哥强悍的男子汉的气势包围了。生活过早地教给她的过多的理智，顷刻间灰飞烟灭了，她忘情地伏在马驹哥宽阔的胸脯上……

第二十章

太阳擦着西原的平顶了，牛娃踽踽走过小河来，阳光把他长长的身影投射在沙滩上，缓缓地随着他的脚步移动着。

连着两三天，牛娃没有回过冯家滩。他白天黑夜跟着拖拉机搞装卸，忙得没有回家看望瞎老娘的时间了。要不是拖拉机什么部件要了麻达，他今天也未必能回家来看看。

表哥这人啊，发财的心比救火还急。要是运输活路稠，白天黑夜转不停，整得司机抱着方向盘打瞌睡，几乎把车开到路下去。雇请的司机提出不干了，要另投门楼。表哥妥协了，声明凡是夜晚加班的时间，另加付工资，司机才稳下来。有几次，表哥不在场，司机把牛娃从车厢里叫进驾驶楼，开玩笑骂表哥："看你表哥像不像活扒皮？"牛娃笑笑，不说什么。司机却自问自答："论起他每月按数给咱票子，不像；要是论起你表哥想挣钱发财的狠劲儿和猴劲儿，真是那个活扒皮……哈哈哈！"

表哥上身穿一件粗呢外套，脚上蹬着人造革皮鞋，肩上挎着"北京"兜儿，乍一看，像国家工厂里的干部。国家政策许可私人购买大型运输机械以后，他辞了在社办企业里当采购员的工作，自己买车干起

来了。他门道稠，过去当采购员时拉扯下的“关系户”，现在都可以用来为自己的拖拉机运输业服务了。牛娃渐渐看出来，表哥为了找到足够的运输活路，最拿手的办法是送礼。在这方面，表哥很大方，舍得花钱，有时大方得令世面见得太少的牛娃瞠目结舌……

前天晚上，表哥把二百斤大米装到车上，亲自送到县城里一位居民家里，牛娃搞不清是送人情呢，还是表哥替这户居民代买的。昨天晚上，答案不找自明了。表哥指挥司机和牛娃，连夜从砖场拉回一万块砖来。牛娃悟觉出来：前天和昨天给县百货公司基建工地拉运的砖头，余下的尾数恰恰是一万，那位收受二百斤大米的人不说也知是谁了。二百斤大米，按农贸市场顶高的价格说，不过八九十块钱，而一万块一级砖，那是公家牌价——四百元。表哥准备秋后盖二层楼房呀……啊呀，这样盖楼房，当然容易啰！牛娃真是大开眼界。

这算啥鬼名堂嘛！耿直的小伙子开始用斜眼瞅东跑西颠的表哥了。真是没得良心啊！凭这种偷偷摸摸的办法，盖起二层楼房住着，晚上能睡得着吗?

西边的大太阳把牛娃长长的影子投射在沙滩上，渐渐模糊了。他现在唱不出戏来了，心里龌龊得很。跟这号人挣下这号不干净的钱，说不定会牵连进那潜伏的危险之中。有志气把遗弃了母子的父亲的汇款单再退回去的冯牛娃，心里怎能容忍得下这种肮脏的勾当呢？他想早日辞别危险的表哥和他的拖拉机，干下的这几天的工资不要啰，倒干净！

只是表嫂给他介绍的那位对象会是怎样呢？他已经和人家见过两面，人家尚未最后决定。兰兰嫂子和德宽哥都去说过一次了，那女人表示信任。事情有了六七成的把握性儿，在这个关口上，要是表嫂因

为他辞工反而去说起坏话来，怎么办？牛娃已经对那位少妇有十分好感了……

踽踽回到家中，他眉头紧皱。母亲看不见儿子喜悦或烦恼的脸色，只是急于把冯家滩的新闻说给儿子：马驹昨日被景藩老汉赶出门来了……

牛娃一听，立时愣住了。既然景藩大叔不顾父子之情而把马驹赶出家门，那么景藩大叔说给他几句不好听的话，又算什么了不得的事嘛！他莽莽撞撞走掉，给老汉难堪呢，还是给马驹难受呢？实际是给马驹示威哩呀！而马驹也受着委屈哩！牛娃为自己的盲目出走深深懊悔了。他捶了自己一拳，砸得头脑嗡嗡直响，二话没说，走出门来，照直朝砖场走去。

牛娃走进砖场，没见马驹，也没见德宽。砖场的工人告诉牛娃，场长刚才回家去了。

牛娃又赶到德宽家，兰兰嫂子告诉他，德宽和马驹给志强叔上坟去了，刚刚走。

既不是清明节，也不是志强叔的葬日，上什么坟？他愈觉蹊跷，就扯开长腿，出了村子。走过一道沟豁，翻过一架土梁，便远远看见后沟里的漫坡地上，有三个人肃穆地站在那儿，面前一堆色彩绚丽的鲜花，在傍晚的暮霭中闪耀。他跳下塄坎，奔跑起来了。

离得志强叔的坟墓十数米远的时候，牛娃止住跑步，一步一步走到跟前。马驹、德宽和彩彩都伫立在坟前。他压抑不住涌涌波翻的心情，大声叫：“马驹哥——”

马驹猛然回过头，瞅他一眼，没有应声，转过脸去，对彩彩说：“把志强叔当年写给校党支部的决心书念一下。”

彩彩翻动着一本旧杂志，那是六十年代出版的《中国青年》，念起来：

县中党支部：

我要求回乡，决心放弃高考，并不是想出风头。党培养了我，给了我理想和追求理想的力量。家乡的人民养育了我。在国家处于困难的时候，在我的家乡的乡亲处于严重困难的关头，我应该用党教给我的知识去承受困难的压力，去和家乡的人民一起尽快排除困难，建设新的生活。一句话，用党给我的知识去为人民服务。

我只会埋头奋斗，终生不悔。

应届毕业的共青团员

冯志强

暮色苍茫，幽静的坡沟里，空气微微在震颤……“我只会埋头奋斗，终生不悔。”

在过去了的那个年代，这个发出过时代强音的青年，当他把指头愤然塞进电灯接口的时候，后悔过吗？马驹站在那里，心里在问。

无须苛求死者，应该讨伐极左！

彩彩读完了，已经涕泪交流，肩膀颤抖着。

德宽长长地吁出一口气，用自己带来的铁锹在培土。那个长着野草的坟丘已经只是象征性的一个小土堆了，上面堆积着社员们从田地里拣拾出来的礓石，覆盖着野葡萄和野蔷薇的藤蔓，红色和白色的野蔷薇开得一片灿烂。

牛娃拧着眉头，站在那儿，一动不动。

马驹沉重地说："志强叔，等我有资格对你说话的时候，我来给你立一块碑……"说罢，他把一条胳膊搭在牛娃肩头上，默默地站着。牛娃忽然涌出眼泪了。

四个人谁也不再说话，告别了长满青草和开放着野花的坟丘，沿着锈满马鞭草的弯弯小路走下来。绿色覆盖了原坡和河川。收获的季节还没有到来，这正在孕育着希望的初夏时节的大地啊。绿色的生命蓬蓬勃勃。山风轻柔，洋槐花的香味弥漫着。几颗新星已经出现在湛蓝的天幕上。河天相接的地方，有一抹淡淡的红霞。

马驹走在伙伴们中间，心里涌起一阵阵热流。

生活在不断地死亡，生活也在不断地新生……

1981年4月草 灞桥

1984年1月3日改 西安东郊（原下）

梆子老太

引子

梆子井村的梆子老太死了。

头天祭灵，二天入殓盖棺，三天下土埋葬，这是目下乡村里贫富皆宜的丧葬仪程。这样照例一来，梆子老太刚一倒头，活人们趁着尸骨未冷，臂腿未僵，紧张地给死者洗脸洗手剃额剪指甲，穿戴起早已置备停当的老衣。在儿女们一阵高过一阵的悲恸的哭声中，安置起灵堂。用半生的小米做成的“倒头饭”献上了，意在死者吃饱之后，有劲走向阴世漫长的道路；彩纸扎成的童男童女已经侍立在灵堂两侧，准备给刚刚踏入冥国地界的梆子老太引路；招之即至的阴阳先生掐毕时辰，写过“亡期”纸牌（相当于讣告），又把一副白纸对联贴到街门门框上……屋院里外，紫香缭绕，蜡烛明灭，焚燃阴纸的黑色纸灰在院里飘落，弥漫起悲怆的丧葬气氛来了。

梆子老太的男人景荣老五，压抑着死别的痛楚，保持着一家之主的理智，和近门亲族的几个老年女人忙着安置这一切。现在不是他大放悲声的时候，关键的关键是把丧事安排稳妥，不出意外。好在这一切都进行得顺利，没有大的纰漏。

第二天午时入殓盖棺，板钉钉死，骨肉之情就永不复见了。在儿女、亲属男女混合的近于癫狂状态的哭声中，景荣老五使劲睁开泪水模糊的老眼，最后一次瞅一眼和他过活了一生的梆子老太僵硬灰黄的脸孔，就被人从棺材旁边拖走了，随之听见“哐当”一声压上棺盖，斧

头铆击板钉的声音……悲痛是人之常情，而作为一件必办的丧事，这一切也进行得顺利，没有出现偏差，景荣老五倒也心安。

问题出在第三天出殡埋葬的时候。

梆子井是个小村庄，历来死人的坟地都选择在村庄背后的原坡上。坡陡路窄，抬一副灵柩上坡，就需得全村精壮男子一齐出动，前拽后拥，左右帮扶，半路上易人换肩，才能保证棺柩在一路不挨地面的严格的忌讳下送到坟地。这样的地理条件就约成了这个村子的一条习俗：凡遇丧葬，不用邀集，所有男人都自觉前往，宁可劳力过剩而空闲，毋使人手紧张而把灵柩搁置在半路上，谁家也难保不遇丧葬之事而用着旁人的时候。还有一层意思，即是给与自己同在一个街巷里生活了半生的死者的坟地培一锨土，表示庄稼人的一点哀思，一种古朴的乡亲情谊啊！

乡村人至今遵循着午时入葬的迷信习律。眼看午时已到，景荣老五看见自家街门外的土场上，只有三五个尚未成年的娃娃掮着铁锨在晃悠，他有点沉不住气了，急得在屋里院里出出进进，慌急不安。眼睁睁等到午时已过，仍然不见人来，灵柩冷漠地停放在屋子中间的灵堂上，不能启动。队长龙生在村巷里吼喊人的声音，使景荣老五愈加惭愧和惶惑了。拒葬——最可怕的事情发生了！景荣老五心里不能不承受这个既成定局的事实。

这是令死者的亲属最难承受的耻辱。只有生前在世时劣迹深重的人，死后才有可能招致如此的冷遇。小小的梆子井村，人们只记得清末民初年间发生过一桩死者无人抬灵的事情。那是梆子井村的一个土匪被外村人打死了，村民们耻于为这个败坏了村风民俗的恶人尽此劳举，致使土匪陈尸三天而不能“入土为安”。土匪的三个儿子齐刷刷跪

倒在十字街心，替代土匪老子向乡党村民赎罪赎过，直到尚未成年的小儿子因羞愧冷冻而倒地昏迷，才感动得村里几位长老出面吆集起人手，把土匪被打得遍体伤痕的尸首草草塞进坟墓……

景荣老五蹲在房檐下的台阶上，年近七十的老人的皱脸，皱得更紧了，脸色蜡黄，眼睛痴呆，胡须颤抖，已经忘却悲伤，转化为怨恨死者的强烈情绪了。她眼睛一闭，直挺挺躺在棺材里，等待活人把她埋进地下，不曾考虑把难以承受的耻辱留给她的男人和儿女了！

“甭急，老爷。”生产队长龙生从街门外走进来，用明显的强装的镇静口气宽慰景荣老五说，“人马上就来咧！嗨！现时实行责任制，人都贪着自家的庄稼活儿……”

景荣老五没有搭腔，仍然直勾勾盯着冷冷落落的街门。龙生的安慰丝毫也不能减轻他心里的压力，反倒想，要不是当着队长这个官差，怕是你龙生也不来哩！老汉心里明白发生了怎样丢脸的事，现在无论如何也挽救不及了。

龙生看着景荣老五痛苦羞愧的脸色，难受极了。他急得在屋里站不住，屁股一转又走出街门，回过头来，恨声恨气地说：“老爷，我再去叫人，非把他们……”

“甭去咧！”景荣老五大喊一声，猛然从台阶上站起，奔出街门，拦住龙生，终于说，“我到……十字街心去……”

“啊呀！那算一回啥事嘛！”龙生惊慌地说，死死拉住景荣老五的胳膊，“万万使不得！”

农历三月温暖的阳光静静地照射在空寂的街巷里的土堆、粪堆和柴火垛子上，行人匆匆，村巷静寂，现出一种压抑着的难堪的气氛。那些紧闭着或虚掩着的大门里，男人们和女人们在怎样嘲笑那位不能出门的灵柩里的死者呢?

……

在时代已经进入到公元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时候，梆子井村的庄稼人，何以要用这种近于恶作剧的办法来为难一个业已死去的乡村女人呢?

一、梆子井村的梆子老太

小河川道里，黄土原坡下，有个小小的村庄叫梆子井。这个村庄古远的祖宗为啥选用这样一个奇怪的名字作为他们的村名，连村里现在已过八旬的白须老汉也说不清来龙去脉了。

梆子井村现在居住着六七十户农家，多数姓胡，杂姓不多；一幢幢新房和旧屋组成的庄稼院，紧紧凑凑地汇集在东沟和西沟之间的平场上。每到春夏，村里的榆槐椿楸树木，郁郁苍苍，河川里杨柳列岸，葱葱蓬蓬；数九交至，白雪覆盖了村后的原坡和村前的河川，房檐上吊下一尺多长的冰凌柱儿……一个景致幽雅的北方村落。

梆子老太本姓黄，是小河北岸黄家圪垯人，自幼以三石麦子两捆棉花的彩礼许订给梆子井村的胡景荣。过门这天，梆子井村的年轻后生用花轿把她从北岭上的黄家圪垯抬下来，涉过河水，抬进梆子井村来，停放到胡景荣家门口。男女老幼把屋里院外围塞得水泄不通，兴

致十足地等待进入洞房揭去盖脸的红绸巾的那一刻，新媳妇是怎样的眉眼呢?

窗户纸被扯掉了。新挂的绣花门帘也被踩在脚下。没有机会挤进窄小的洞房的人，焦急地询问已经先睹过一眼的人，模样怎样？看过的人因为拥挤而喘着气，作难似的笑笑：“说不上来……”又颇费思谋地眨眨眼，滑稽地一笑，悄悄说，“脸……长得像个……梆子……”

对于新来乍到梆子井村的任何一位新娘，谁也难以逃脱第一次亮相之后被众人品评和议论的难堪处境。男人们自不必说，已经被众人议论和品评过而且无一例外地曾得过一个形象的雅号的老媳妇们，也更有兴味地反复咀嚼着一个新鲜的绰号：梆子！哈呀！真像……

这是生活贫困而又单调的庄稼人的一种乐趣，一般只限于新婚之后的十天半月里，尽兴取笑逗乐，甚至当着景荣的面说他的新媳妇的脸能当梆子敲，也不怕他犯心病。时日稍微一长，庄稼人各忙各的日月生计，谁还有心思去管人家景荣的媳妇的脸长脸短的事干什么呢！

不管旁人怎样苛刻地取笑和逗趣，景荣对他刚刚娶进屋里的媳妇是满意的。尽管在揭去盖脸绸巾时第一眼看见这位陌生女人的眉眼时，他也觉得那脸儿未免狭长了些，可他不在心。我的天！老父成年累月串游在渭河北岸产棉区给人家弹棉花，攒下一串串麻钱和铜元，花三石麦子加两捆棉花的礼价，给他订下了这个媳妇。可怜老父未能等到看见儿媳妇过门，自己已经累下痨病去世了，三周年也过了。他能在该当婚娶的年龄娶回一个媳妇，不用担心打一辈子光棍儿，已经很令许多穷弟兄们羡慕的了，怎敢弹嫌媳妇的脸儿是长是短呢？管什么梆子不梆子，哪怕旁人把她的脸比作扁担长哩！他是个庄稼人，穷

庄稼人啊！要一个女人来给他管家，做饭，缝衣，生养孩子，而不是要一张年画儿上的人儿贴到墙上天天去欣赏！

景荣是胡姓景字辈里最后一个男人，人称老辈子，反倒比村里好多年岁高过他一倍乃至两倍的老汉们辈分高过一格，这样，新过门的媳妇的辈分自然也随着他而高了。景荣排行老五，晚一辈的人称他的新媳妇为五婶，晚两辈的叫五太，晚过三辈的就一律不分差别地叫五老太了。“差过三辈没大小，婆婆孙子不讲究。”小辈子的年轻后生和媳妇们，却一律叫起梆子老太来，久而久之，连景荣老五也被他们叫成梆子老爷了。

新婚三五天后，勤快的景荣老五不敢贪恋新媳妇暖和的被窝，背起亡父遗传给他的那张紫红溜光的枣木弹花弓，告别了母亲和亲爱的梆子脸媳妇，赶到渭北棉花产区去弹花挣钱了，结婚拉下的粮款欠债，需当尽早还清。亡父留给他的生活遗训是：“紧还账，慢结债。莫看一文少而不挣，莫视一文少而浪花。”庄稼人背上账债过日月，吃饭睡觉都不踏实啊！

一月之后，景荣老五再转回到梆子井村的时候，他的短头发上落着棉花绒毛；棉袄的袖肘上和棉裤的膝盖上，黑色的粗布面子已经四处开裂，露出一串串棉花套子；满脸扑着黄色的灰土，手指裂着一道道结着黑痂的裂口；从外表上看，俨然是个沿门乞讨的叫花子了。母亲和新媳妇惊愕地睁大眼睛，看着他直挺挺走进院子，不知遇到什么凶事，该当如何是好了。

他端直走进上屋偏门，解开破烂棉袄上的布制纽扣，又从腰里解下蓝布带子，“哐啷”一声扔到炕上，黄灿灿的麻钱和红亮亮的铜元抖撒在炕席上。他这时才一弯腰，吁出一口气坐在炕边的木凳子上。为

了防备土匪拦路打劫，他故意撕破棉袄和棉裤，把自己装扮成一个背着褡裢讨饭吃的叫花子了。百余里徒步跋涉，铜元和麻钱硬邦邦别在腰里，腰脊简直都要断裂了。谢天谢地，终于逃过了土匪的眼睛，把一弓一弓弹花挣下的血汗钱带回屋里来了！

老母亲和新媳妇顿然转换出一副惊喜的神色，不约而同地吁出一口气。新媳妇忙着烧水做饭去了。老母亲把散乱的铜元和麻钱整理成串，压到箱子里去了。

按照家规，景荣老五先向母亲问安。一月来家庭的内务和外事没有什么大的跌腾，他放心了。出门在外乡弹花挣钱，睡在这家那家的陌生的炕铺上，他想念刚刚过门的新媳妇，更惦记寡居的老娘。在兵荒马乱的乡村，把两个不能当事的女人撇在家里，他总是牵肠挂肚般地操心会不会遇到凶事呢。

母亲悄悄告诉他，经过对刚过门的新媳妇一月来的实际观察，勤快，孝顺，不抛撒米面，是庄稼院里过日月的可靠人手。更叫老人惊异的是，新媳妇居然能捉着铁锨，把猪粪挖起，从猪圈的矮墙上抛到外头去。她站在猪圈里挥锨挖粪的姿势，强悍而又潇洒，完全不亚于强健的庄稼汉小伙子。景荣老五惊喜地听着母亲乐悠悠的叙说，愈加觉得梆子媳妇可爱了。

美中不足的是，新媳妇有一个令人意料不到的缺点。老人咂着舌头告诉儿子，新媳妇的针线活计太差池了。这是一般乡村女人的本能呀，她却不会！

“唔……”景荣老五从嘴里拔出旱烟袋，笑眯眯的眼睛里顿时散了光，不会缝衣补袂的女人，对于一个农家来说是太叫人遗憾了，

“那……会不会纺线织布呢？”

“不会。”母亲噘着嘴唇，现出鄙夷的神气，“锅上灶上也不行，连好一点的饭食也做不出来。”

“唉唉！”景荣在母亲面前毫不掩饰地吁叹起来，“我怎么就遇上了……这号笨熊呢？”

“甭愁，荣娃。”看见儿子灰心丧气的样子，母亲立即反转来宽慰儿子。儿媳妇虽然有令人遗憾的缺陷，她却压根没有弹嫌厌弃的意思，穷人家娶个媳妇容易吗？“妈十年八年死不了，就不能叫你屁股露在外头，缝衣补袂，纺线织布，有妈哩！”

“唉……”景荣又叹一口气，摇摇头，担忧地说，“我能靠你一辈子？”

“赶妈闭眼的时光，就把她教会了。”母亲宽慰地说，“听说她爸死得早，她跟她爷整年在地里做庄稼，倒把女儿家的针线手艺荒废了。可怜人呀……”

“噢……”她的缺陷是可以原谅的，可怜人呀！景荣老五想到早逝的父亲，自己十五六岁就承担起一个庄稼汉子应该付出的全部艰辛，心动了，再不哀叹自己遇到一个笨熊了，问母亲，“她现时还能学会吗？”

“能。怎么不能呢？”母亲和悦地说，信心十足，“我权当是给自家女儿教针线……”

春夜短暂。景荣老五和梆子媳妇亲亲热热睡过一夜之后，第二天一大早爬起来，就赶往渭北弹棉花去了。梆子媳妇不会纺线织布的缺

点，他连提说一句也没有。

半月后，下过一场透雨，他赶回家来，该当收墒耱耙留作棉田的空闲地了。河川里杨柳泛绿，麦苗返青，路旁和田埂上，野草萌生了。

从河川的土路上望过去，沟坡下的三角洼地上，一个穿红袄的女人，叉开双腿，踩在耱上，一手牵着套绳，一手抓着黄牛尾巴，正在景荣老五家那块待播棉籽的空地上耱耙哩！那姿势，洒脱得完全像个熟练的庄稼把式。景荣老五惊呆了，远远地瞧着他的不擅长针线活计的梆子媳妇，心里一热，快步奔过去了。

“你……”奔到地头，景荣老五心里涌起一股男子汉的豪壮感情，“你歇下！让我耱——”

梆子媳妇嗔笑着，故意显示似的响亮地呵斥一声黄牛。黄牛加快了蹄脚移动的速度，在景荣面前停下来。她装出嗔怪的神气：“你刚走半月，又跑回来做啥？”

“我要是知道你会耱地……”他笑着，憨厚地笑着，“我怕晒得墒缺了。”

“单是为收墒棉田吗？”

“唔……”

“棉田误不了。你现在放心走……”

“你……”

媳妇瞧瞧四野，静寂无人，猛然搂住他的脖子，亲了一口，畅快地笑着，又跳到耱耙上，扯动套绳，吆着黄牛走了。她自如地站立在耱耙上，任黄牛拽着她前进，她扭腰移脚，保持着身体的平衡，忽然转过头来，甜甜地笑着：“你就坐那歇着，你走了远路……”

他完全可以心地踏实地串游到更远的乡村里去弹棉花挣钱了，不必操心家里那三五亩薄地的庄稼作务了！她倒是有这一手长处！

转眼三年过去了，新媳妇变成了旧媳妇。虽然免不了梆子老太的称谓，但谁也再无兴趣去看她的脸长脸圆了，似乎倒成了一个亲切的称谓；即使她不会女儿针线也早已成为过时的新闻，会像男人一样作务庄稼亦被众人司空见惯，不足为奇了。她像一片普通的树叶夹生在绿叶之中，完全融合在梆子井村的女人窝里，生活着。

这时候，不知谁家女人终于把奇异的眼光从她的脸上转移到腰里——没有鼓起来的迹象。任何一位新娘子被抬到梆子井村的任何一座庄稼院门楼下，少则一二年，多则三四年，那新媳妇就会在奶下吊着个娃娃，在村巷里出出进进。梆子老太过门五个年头了，腹部平平。一个可怕的流言悄悄地又是迅速地传播——

景荣老五家的梆子媳妇不开怀！

母亲早已担着这份心。她心里焦急、担忧，又不便于直问，直到这个传言灌进她的耳朵，才决计不让儿子景荣常年在外乡揽工弹棉花了。宁可日月过得更清苦些，但愿小院里早日听到新生命的第一声啼哭。

景荣老五顺从地回到梆子井，把弹花弓挂到墙上去了，只是在邻近村庄里做点零活儿，晚上赶回家来，和他的梆子女人厮守在一起。

整整一年过去了，没有任何令人欣喜的征象出现，一切已不再是秘密。

他终于忍不住:“你身子有啥毛病吗? ”

她难为情地低下头:“我感觉好好的嘛！”

一家人开始张罗给她治病，母亲顶操心了。景荣请来十里堡镇上的老中医先生，又粜出一石麦子，把钱全部买成大包小包的中药，由老母亲亲手熬成汤水，灌进她的喉咙，却仍不见有丝毫的变化。庄稼人是宽厚的，热心的，一当证实景荣婆娘确凿不抓养娃娃的不幸时，全都变成异常热心关照了，不断地有这家和那家的女人踏进小院来，神秘地向景荣一家举荐灵方妙药、单方验方。红公鸡肉啦，公猪肉的药引啦，外加三五样怪僻的中药啦。老母亲已经开始内心惶恐，日夜操心弹花匠家的后继人大事了。凡有推荐，尽皆一试，不怕花费铜元和麻钱，催促已经有点不大耐心的儿子，到处搜寻购买药物。而她呢？无论把什么灵丹妙药吃进去，仍是依然故我，毫无变化。老母亲急得束手无策，对一切药物神医渐渐失去信心，最后引着媳妇，到近处远处的神庙古寺，求拜起娘娘神灵施子赐福……

她的腰似乎更细，臀部也尖削起来，眼皮和嘴唇更薄了，燕翅骨愈加突出，更趋像一只梆子了。

十余年过去了，景荣老五不能不接受这个既成的事实，遵照母亲辞别这个家院时的临终嘱咐，抱养了别人一个女孩子，继之又抱养了一个男娃娃……总不能绝后哇！

两个不是亲生的儿女和他们组合成一个新的家庭。这时候，胡景荣和他的梆子女人，从他们满意又不满意的生活里仰起头来，聆听一

个陌生的名词：解放了……

二、“盼人穷”

由于土地的重新分配，由于彻底干净地废除吸吮庄稼人骨髓的苛捐杂税，由于人民政府颁布发展生产的政令，由于提倡男女平等，尊重女权，由于风调雨顺……梆子井解放后三四年间发生了——首先是经济上随之是精神上——惊人的变化。一幢幢新瓦房在荒园空院中撑起来了，一匹匹高脚牲畜从十里堡集镇上牵回村庄里来了，一个个光棍后生喜盈盈娶回新媳妇来了。梆子井村前的河川里，时时可以听见庄稼汉子粗声豪气的“乱弹”调儿。

景荣老五更是雄心勃发。他对老婆不能生儿育女早已死心，抱养的一双儿女填补了精神上和感情上的缺憾，重要的是新的生活时时刻刻在激发他大干一场的雄心。做梦也想不到的好世道呀！不怕财东欺侮，不怕土匪打家劫舍，不怕拉兵卖壮丁，不怕军马草料捐税……景荣老五心里说，庄稼人现时还操什么闲心呢？啥啥儿闲心也不用操念了！只有一样：劳动生产，过好日月！在这样好的世道里，谁要是过不好日月，还弄得缺衣少吃，就不会引人同情反而要遭到唾骂了。

他分得一亩坡地，半亩水田，连同自家的土地算一起，有五亩地了。他把这五亩旱地和水田的庄稼，完全放心地交给梆子老太去务弄，自己重操旧弓，几乎一年四季都串游在熟悉的渭河北岸的棉花产区的乡村里。“嘣嘣嘎——嘣嘣嘎——”光滑的枣木弹花弓，在他怀里弹出流水般的音乐。直到他的腰包胀满，才在夏秋两季收获和播种的时月赶回梆子井村来。他心里有自己的算盘：先攒钱，后置买土地，人民政府的纸制钞票，再不用担心贬值啰！一般庄稼人手里有钱了，总是急于买地。他不急，想想吧，他买下的土地稍一多，梆子老婆就

务弄不过了，就要把他的手脚拴到土地上去了，很难出门弹棉花挣钱了。他要攒钱，先盖一座三合院瓦房，住得宽敞舒服，再不必担心阴雨天漏雨滴水了。等到养子长得能扶犁耕地的时候，置田买地，那时他将是一户殷实的庄稼院的主人了。

“各家有各家的打算，咱有咱的计划。”景荣老五把他与众不同的打算，给梆子老太亮了底儿，自信地说，“你只管给咱把家管好，我在外乡弹棉花就放心了。甭看人家做啥！”

第二天，留下一厚叠人民币，交给梆子老太去保存，他背起弹花弓，雄赳赳地走出家门，又走出梆子井了。

收割麦子以前的漫长的春季里，小河川道两岸的乡村里，呈现着农闲时月的和谐景象。锄罢麦子以后，田间就没有什么大的活路了，棉花种得很少，整地花不了多少工夫。男人们各自寻找挣钱的门路，进城做工或者串游到外乡卖手艺去了。女人们从纺车下忙到织布机上，准备一家人夏季的衣服和拆洗已经脱下的棉衣棉裤。整个梆子井村，纺车嗡嗡叫，织机咔哒响，和谐而又优雅的农家三月。

梆子老太终于没有学会纺线和织布的技能。阿婆在世时，忙着领她到远处近处的山神古寺里去求神乞子，没有心思教她坐在纺线车前或织布机上学习纺线织布的兴趣了。阿婆去世以后，她只好学会了简单的缝补手艺，勉强可以给景荣老五和抱养的儿女缝制针脚粗放（式样更谈不上了）的衣裤。她家的棉花，只好花工钱请旁的女人纺成线，再织成布。好在景荣老五一身好力气，弹花挣得不少钱，弥补了这个亏缺。

新社会所展示出的新的生活秩序，给梆子井村所有的庄稼人几乎无一例外地带来了好处。经济上开始翻身，人权上再不受保长和财东的欺侮了，梆子井村那几个活得顶窝囊的庄稼人，也敢于走到村当中的大槐树下，笑吟吟地说闲话了。而仅仅在两年以前，这个大槐树下的这块显眼的位置，是保长和财东的领地，穷人们望一眼也要腿脚发抖的。好了，雨后初晴不能下地干活的时候，庄稼人聚集到大槐树下来，说笑逗趣谝闲话，下棋、纠方、狼吃娃，尽兴地玩了。

所有别人能得到的好处，梆子老太和她的男人景荣老五也都得到了。可是……梆子老太不能生儿育女的缺憾却是无法解除的。虽然养子和养女已经高过膝头，毫不生分地唤爹叫娘，总不能融化她心里的那一块冻土地带。虽然阿婆已经过世，她依然忘记不了阿婆领她求神乞子路上的那种怨恨的眼光，令人寒心啊！虽然景荣老五现在雄心勃勃地挣钱发家，她却忘不了他在那几年间对她的冷漠和鄙视。她和人不一样呀！从她对自己也失去生育的信心以后，就自觉低人一头了！她在屋里和丈夫、阿婆说话，有一种无法克服的理屈气短的心情；在村里和老婆婆或小媳妇们说话，也是有一种无法排除的不如人的感觉啊！

这一年春天，发生了一件不寻常的事。

河湾乡许乡长到梆子井村来，在村长胡长海的陪同下，亲自召开了梆子井村的村民大会，选举劳动模范。男人们围坐在大槐树的东侧，女人们围坐在大槐树的西边。妇女们扭扭捏捏，梆子老太则自觉地站在更远一点的地方，不料，快嘴二婶第一个发言，就提出了梆子老太，女人们纷纷表示同意了。解放后政府提倡男女平等，要把妇女从锅头、炕头解放出来，有好些女人听了只是笑笑，仍然心甘情愿地在锅头和炕头周围打转转，解放不了自己。可梆子老太早在解放前就

和景荣老五平等了，一样推粪，一样挑水，一样叉开双腿站在耱耙上，抓住牛尾巴耱地……梆子老太当选妇女们的劳模，是当之无愧的。

“黄桂英同志，不简单哩！”乡长问清楚梆子老太的真名实姓，当着全村女人们的面，大声感慨地说，“旧社会妇女受三从四德的层层压迫，出门不敢仰头，进门不敢大声说话，整天围着锅头转。黄桂英同志能打破束缚，参加田间生产劳动，真个不简单哩……”

女人们纷纷把眼光朝梆子老太投射过来，惊奇的，羡慕的，盯得梆子老太不好意思了。她低下头，脸热了，心在咚咚地跳。许乡长的话像一把火塞进她的胸膛，全身都热烘烘的了。阿婆在世时，没有当面说过她什么好话，寡言少语的景荣老五也很少夸奖过她。许乡长——河湾乡十里八村的一乡之长啊，这样的大人物在众人面前夸奖她，她简直承受不了这样的意料不到的光荣呀！

“大家要向黄桂英学习！”许乡长向梆子井的所有到会的妇女号召说，“男子汉能办到的事，妇女也能办到——黄桂英同志已经做出榜样了。”

梆子老太仰起头，许乡长的粗壮的声音在大槐树下飞扬，男人和女人们仰着头，听许乡长要他们向她学习的话。晚霞是明丽的，照在树梢、房脊上，天空多么蓝啊！

“你要发扬成绩，起带头作用。”许乡长侧转过身来，瞧着她，“带动全体妇女，积极生产！”

梆子老太发觉整个会场里那么多男人和女人的眼光，都随着许乡长的眼光集中到她的脸上来了，像突然面对无数强烈的灯光，不由得

低下头……

许乡长临走给村长胡长海安排了几项工作，其中有一项照顾烈军属和孤寡老人的事，村长把它吩咐给梆子老太了，让她发动几个年轻姑娘和媳妇，给这些需要关照的人扫屋，担水，拆洗被褥。她受到村长的重用，满心喜欢地吆集起一帮年轻姑娘和媳妇，热热火火干起来了。那时既不要工钱，也不知道记工分，完全是义务劳动，乡亲情谊。解放了，人和人之间更加亲热了。

刚刚干了一晌，后晌没有人来了。梆子老太挨家沿门去传呼，一个个姑娘媳妇们不是躲开就是支吾搪塞过去。梆子老太有点伤心，这个“带头作用”不好发挥哩……她终于从旁人口里得知，那些姑娘和媳妇，全是被亲娘老子或阿婆禁斥在屋里，不能出门了。原因呢？少跟那个不生养的假婆娘在一起，那是灾星！似乎梆子老太不生育的缺陷也会传染给她们的女儿和媳妇，可怕！

这真是太可怕了！梆子老太身上的热劲儿一落千丈，气得浑身颤抖。怎么办？给人家军属和孤寡户拆洗的被褥，现在还晾晒在绳子上，后晌缝不起来，晚上让人家装老虎吗？“带头作用”得不到称赞，反要招人骂了。她去找村长，说明原委，委屈得简直要淌眼泪了，胡长海一拍桌子，也生气了。这个梆子井村的第一个加入共产党的唯物主义者，强烈地感到了封建迷信思想的浓厚包围，鼓励黄桂英说：“甭灰心丧气！有共产党撑腰。咱能打倒地主、保长，封建脑瓜还怕破不开吗？我跟你一起去动员……”

给军属和孤寡老人的被褥总算在天黑睡觉之前缝好了。梆子老太回到自家屋里，抱着女儿痛哭起来了，眼泪像冒泉一样倾泻出来，浸湿了女儿的衣襟。阿婆死了，梆子井村这么多的女人，还是用阿婆的

那种眼光盯她哩！许乡长大声豪气表扬她的话，并没有改变她在她们心目中的位置，还说什么向她学习哩！

她哭得伤心极了。泪水终于流完了，沉重的脑袋里重复着一句话：让别人去起“带头作用”吧！黄桂英带不起头呀！她的心里却是平静了。

太阳照旧从东原上升起，在西原那边降落。月亮圆了又缺了。春风一天暖似一天，把庄稼人的粗布衣服一层层剥落，有人光着脊梁在河滩里整修稻地，准备插秧了。春天变成夏天了。

梆子老太的眼光不由自主地投注到每一个新来的梆子井村的媳妇身上。她们的针线手艺如何？线纺得细吗？布织得匀吗？当她获悉一个一个新媳妇不仅能缝单衣棉衣，而且会纺线也会织布的时候，常常有一种失望的心情。随之，她更加耐心地等待和观察新媳妇腹部的异常变化，等到确凿看出哪位媳妇怀孕的征兆，她就懊丧地转过脸，再也不愿瞧她一眼了，似乎功夫白花了，空等了，枉操了一番心思。

“牛犊的媳妇‘有了’！”梆子老太忍不住，给二婶说出自己的发现。

“‘有了’就‘有了’！”二婶不以为奇。

“真快！结婚才半年……”梆子老太说。

“新社会，男二十，女十八，果子一样熟透了。”二婶快嘴利舌，“只要茬儿遇得巧，睡一夜就‘有了’。”

梆子老太立时闭了口，低下头，二婶无意的一句话，又撞着她心里的疤疤了。只要茬儿遇得巧……她和景荣老五睡了几十年，一次都

没遇到茬儿上吗？她转过身，回家去了。

“根生媳妇过门八个月……”梆子老太又在街巷里碰见二婶，忍不住说出自己的发现，“八个月……娃娃夜格黑里落草了。”

“我早说过，新社会，男大女也大，果子一样熟透了。”二婶也很得意，“只要茬儿遇得巧……娃娃像在裤带上拴着，解下一个就是……”

“屁！”梆子老太这回不大信服二婶的话了，神秘地说，“新社会，婚姻自由倒是好。还没过门，你来我去，怕是带着‘肚儿’来的……”

“噢呀！五老太，快不要说这号是非话。”二婶惊吓地瞧瞧左右，“当心根生家里人听见……”说着，张开已经放大的封建脚，仓皇躲走了。

梆子老太暗暗地盼望着，梆子井村娶回一个不会纺线织布，也不能生男育女的媳妇。那样一来，在梆子井这个偌大的世界的一角里，她就会有一个伴儿了，不会显得孤单了。她会在任何人面前抬起头来说，不会纺线织布也不生儿育女的，不单单是我一个……可是，她耐着性子暗暗观察了娶回梆子井村的每一个媳妇，人家都会缝衣纺织，而且比赛似的一个比一个生得快。一次又一次失望，简直叫梆子老太妒恨起来了。

终于，梆子老太观察到了一个有希望的目标。

梆子井村的胡学文，在十里堡镇上的小学校教书，很受人敬重的，这是小小的梆子井村的庄稼院里脱出的第一位先生，有文化的人呀。他恋爱了一个媳妇，结婚三年了，那女人仍然不见“有”的征兆。

梆子老太于是推测到，教员胡学文之所以能不花彩礼拣便宜自由来一个媳妇，正是她有这个可怕的毛病，才甘愿让他“自由”。

梆子老太抑制不住这个重要发现的兴趣，凑到二婶跟前，还没开口，二婶已经借口躲开了。这个嘴快却又胆小的老婆子！

“你看出没？学文媳妇不开怀……”梆子老太又凑到年轻的根生媳妇跟前说。

“你怎么知道呢？”根生媳妇问。

“三年了，没见肚子有啥动静。”梆子老太说，“要是能生，早该生了，新社会结婚年龄大……”

“你把宝纳到空里去了！”根生媳妇笑着说，“人家两口子商量好的，自己不生。”

“那能由得人吗？”梆子老太不屑地撇着嘴，“能生的不想生不由人，不能生的想生也不由人。”

“人家文化人，能得出奇！”根生媳妇神秘地说，“那小两口……避哩……”

“能避得过吗？”梆子老太咄咄逼人地问。

“听说……学文戴着……橡皮套儿……嘻……”

“哈呀！天上的事！”

梆子老太头摇得像个拨浪鼓，嘲笑年轻的根生媳妇竟会相信这样荒唐可笑的什么橡皮套儿的事。不能生养的学文媳妇，为了遮丑，为

了护短，居然放出男人在那东西上戴橡皮套子的烟幕来，她才不信哩！她头二三年里没有怀娃娃的时候，阿婆为了遮丑也给人家说，那是景荣长年在外乡弹棉花，遇不上茬儿……

农业社社长胡长海在给锄麦子的女人们宣布歇息的口令以后，梆子老太刚刚坐到大渠沿的白杨树下，教员胡学文的妈妈手里提着小锄走过来，开口就问："老五家的，我问你，你凭啥说俺媳妇不开怀？咹？"一开口就能冲倒人，全是一派闹事的架势。

"我……"梆子老太猝不及防，口语短涩，无言应对，支吾说，"我也是……操心学文媳妇……"

"谁家媳妇要娃不要娃的事，要你操心？"学文妈妈寸步不让，直逼不退，"你操心你自个去！"

"我……"梆子老太退躲不及，又被揭着了短处，无力辩白说，"我真是……好心……"

"好心留给自家用！"学文妈妈毫不领情，一味进攻，"我看你是'盼人穷'！盼得人家跟你一样，不会织布，不会要娃娃。"

梆子老太彻底败阵，羞辱得难以还口。好在社长把学文妈妈拉扯走了，渐渐平息下来。锄麦的妇女们不做劝解，反倒三人一堆，五人一伙，窃窃议论：

"嘴长话多！你管人家要娃不要娃的事做啥？"

"她不会要娃，也盼人家不能要！"

"嘻！'盼人穷'……"

……

昏黄的煤油灯光里，景荣老五坐在木凳上，把工分本本交给女儿，让她代替爸爸到队办公室里去记工分。他早已挂起那把弹花弓，在农业社里挣工分了。支使开已经懂事的养女，他开始询问梆子老太和学文妈妈犯口角的原因。她说自己平白无故受人家欺侮，竟然流下委屈的眼泪。他静静地听完，不动声色，没有丝毫暴发起来去和学文妈妈雪耻的火气，反而平静地劝诫说："农业社里大帮人马干活儿，人多嘴杂，一句闲话出口，立马传得满村都知道了。咱只顾做活儿，甭说长道短。"

没有得到男人的支持，也没有遭到训骂，梆子老太倒也心安。景荣老五把弹花弓搁到木楼上去了，灰土已落下厚厚的一层；他的弹花技术不能施展，手里也短缺了活便零钱，常常郁闷不乐；对梆子老太招惹的是非，不管有理没理，他都烦腻。梆子老太根本没指望这样的男人为她撑腰壮胆，寻到学文家门下去干仗。

景荣老五继续说："社长派咱做啥活儿，咱就干啥活儿；只做活儿，甭多嘴……"

梆子老太把简单的饭食摆到男人面前，不应诺也不反对他的处世方式，心里却觉得闷气，眼前似乎浮现着学文妈妈恶气逼人的眼睛，耳朵里响着那些偏向学文妈妈的议论……盼人穷……

盼人穷，是梆子井村庄稼人对那些嫉妒心特别强烈的人的贬称。自己无能，盼别人也无能；自己受穷，盼旁人比自己更穷；自己倒霉，盼别人更加倒霉……这是一个令人鄙夷的雅号，居然随便安派到梆子老太头上来了！

像是故意给梆子老太示威似的，教员胡学文的媳妇，没过一年，果真生下一个娃娃来，足见根生媳妇说的“避着”的话是实事了。梆子老太想在梆子井村盼得一个伴儿的希望彻底破灭，看来继有的希望也很渺茫，也就没有耐心再去关注谁家媳妇迟“有”早“有”的事了。她的兴趣，随着生活的突然变化而迅速转移了……

三、艰难时月

越来越困难的生活，使梆子老太的眼睛从梆子井村女人的腰部转移到别人手中端着的碗里。

说不清从什么年代形成这样的习惯：梆子井村的农民，一年四季都在街巷里吃饭。冬天，围蹲在向阳的墙根前；夏天，坐在浓厚的树荫下，吃着饭，谝着闲话，舒适而又闲逸。这种习俗，即使在以瓜菜代替主粮的艰难时月里，仍然不改。一人一碗稀溜溜的苞谷糁糁，伴就着萝卜叶儿、雪蒿或是红苕叶子窝成的酸菜，香喷喷地喝着，嘻嘻哈哈地说着笑话。

“哈！妈的脚！稀糁子越喝肚皮越大……”

“你要是连着吃一月肥肉，保险越吃越少！”

“肉？哈呀……听说全都给黑豆小豆（赫鲁晓夫）坑去了……”

“唔……他们那儿净出产豆子……”

这些背负着国家沉重困难压力的庄稼人，满脸菜色，有的因为营养不足而浮肿了，可是依然在说笑。

梆子老太端一碗糁子，站在一边，有滋有味地喝着，似乎在听闲话，眼睛一转溜，就瞅遍了在场的男人女人手里的大碗或小碗，谁家锅里的稀稠，尽都一目了然了。

“差不多，一样稀。”她心里说，可见家家的日月一样艰难，原本就是从一杆秤下分得同样标准的口粮嘛。偶尔也能发现某人端了一碗面条，她无法抑制羡慕的心情，嘴里的舌头就像梆子一样敲响了：“啧啧啧！你家还有白面吃！我屋三月没动擀杖了……”

梆子老太家的日月似乎更艰难，一家四口，都是大饭量，两个孩子正是吃饭长身体的年龄，粮食越紧张，娃儿的饭量似乎增加得越快。她虽然腰细，饭量却不小。一顿饭做熟，总是先紧两个孩子吃饱。只有景荣老五似乎伸缩性很大，看着锅里多了，他就再盛上半碗；看着锅里所剩不多，就把烟锅点着了。他是四口之家里首先浮肿起来的。梆子老太看着男人黄肿透青的脸孔，心里难受，又拿不出什么吃食给他偏补一下。听说一般浮肿不会要命，她也就放心了，因为梆子井村有少一半的男人和女人都发生了这种奇怪的病症，多了则不奇嘛！

这天晌午，梆子老太及时出现在自家街门外边的“老碗会”上，左邻右舍的大人娃娃都围聚在这里，借着门外那一排高大的梧桐树的荫凉吃饭。大热天了，仍然是清一色的苞谷糁糁，没有发现新的饭色花样。梆子老太本来心里很平静，有心或无心之间，却发现饭场上缺少了胡三恒一家的成员，大人不在，小孩也没见一个，而三恒和他婆娘是梧桐树下的老碗会上最可靠的会员，几乎天天顿顿必到，又是能说会谝的受欢迎的角色。怎么回事呢？三恒一家干什么去了呢？梆子老太动了好奇心，大约是吃什么好饭，怕人知道，躲在屋里不敢出门吧？她端上饭，三跷两跷，已经走进三恒家院子串门子去了。

院里悄静无声，梆子老太愈觉神秘，一直朝上房里屋走去，朝侧旁的小灶房里一探头，冰锅冷灶，未见烟火。她好生奇怪，直到跨进里屋门槛，这才看见三恒老婆怀里搂着孙子，眼泪拍洒，三恒老汉蹲在屋角的矮凳上抽着闷烟，对门是儿媳妇的住屋，隐隐传出压抑着的啜泣声。这一家老少闹仗了吗？梆子老太想，乡村里公婆和儿媳闹仗以后，通常就是这种冰锅冷灶的别扭局面。

“咋咧？”梆子老太疑惑地问。

“嗨！明娃前日就去买粮，该是昨日回来。”三恒老婆诉说，“到现在还不见回来……”

梆子老太一听就明白了，买粮的明娃至今未回，三恒家等米下锅，现在断了顿儿了。

“那咋能成？”梆子老太不满意地说，“大人抗住一顿两顿不吃，也罢咧！娃儿不行呀……你该是先借下，吃了这顿饭，明儿买回粮来再还也成嘛！”

“而今都艰难哩！”三恒老婆说，“不好向人家开口……”

三恒老汉是个硬性子，老婆也是个好强的人，不愿意向人低头告借哩！梆子老太听着明娃媳妇在小屋里的叹息，看着三恒老婆怀里哭闹的小孙孙，她的鼻子酸了，不忍心再问什么了，立时转过身，跷过门槛，走出去了。

三恒老汉一锅旱烟还没吃完，梆子老太又跷进里屋门槛来了，手里端着一大碗苞谷糁子。她的脸上是一派仗义的气势，大方地说：“先去熬了，一家人喝上一顿，明娃回来就好办了。人不吃饭咋能成嘛！”

“哎呀！五老太……”三恒老婆放下孙子，慌忙接住盛满苞谷糁子的大粗瓷碗，动情地说，“你真是好心人哩……”

“咱们亲邻近门的，谁不用着谁一点……”

“明娃买回苞谷来，立马还……”

“说那么生分的话做啥？”

……

没过半月，又是午饭时间，梧桐树下又聚集起吃饭的男女。梆子老太忽然发现，木匠王师一家没有一个成员出席老碗会，也是揭不开锅了吗？因为电通到小河川道，机械弹花代替了手工弹花弓，景荣老五祖传的那把被爷爷和父亲的手磨得紫红溜光的枣木弓，永远挂在木楼上的南墙上，不能出世了。可是，木匠王师却挺红火，政府颁布了“六十条”，王木匠可以背上刨子锯子串游四方，挣得比梆子井的劳动日价值高过十倍的收入，生活比一般死守农业社的笨汉们好多了。他们家里没有人浮肿，脸色红润，怎么会断顿儿呢？

她向来轻脚快步，一脚踏进王木匠家洁净的院子，一缕奇异的香味弥漫在空气中，钻进鼻孔。这种香味，对于长年累月不断装进瓜瓜菜菜的胃，具有不可抗拒的诱惑力。梆子老太想到猪肉的那种无可比拟的味道，大约整整两年没有沾过了。

梆子老太一脚踏进里屋，自己先愣呆了。王木匠一家老少围着四方木桌，筷头上挑着白生生的麦面饺子。天爷爷！旁人连稀糁子都喝不饱肚子，木匠王师居然吃大肉饺子……

木匠一家也有点惊异，一齐转过头来。木匠婆娘眼里转过一丝勉强的笑意，礼让说：“五老太，吃碗饭——”

“不啦！我来借……”梆子老太早已感受到一家大小讨厌的眼光，随口编诌出要借什么家具的话，装出无意间打扰了他们吃好饭的样子，一边往后退着，“算咧！不借了……”

“啊呀！狗娃妈，人家王木匠今晌午吃大肉饺子……”梆子老太半是惊奇，半是嫉妒，逢人便说出自己的发现。在严重的荒年饥月里，一顿大肉饺子，不仅使梆子老太惊倒，确实使一切处于饥馑状态中的庄稼人惊倒了。不过天黑，小小的梆子井村，人人都知道木匠王师家吃了一顿令人口馋的饺子了。

没过一月，正值夏收前夕，庄稼人最困难的关口上，人民政府给梆子井村批调来为数不多的救济粮，社员们早就翘首以待了。

支书胡长海和大队长胡振武从公社开会回来，召集起社员会，说明上级对这些粮食的分配办法，是重点解决困难户，不能搞平均分配，因为数字确实太少了。在国家处于严重经济困难时期，干部们表现出严守党纪国法的高风亮节，为国家抵抗困局，他们很民主地把这批粮食的数字交给社员，让大伙民主评议，好把粮食分配给急需救济的人家。胡长海和胡振武则声明，他俩一斤也不要，好多人感动了。

尽管这样，评议的结果，仍然不能避免撒胡椒面的偏向，没有办法，需要救济的户数实在太多了。好多人申述困难的时候，鼻涕眼泪当着众人抹。梆子老太也被评为救济户。她哭得也很伤心，一把鼻涕一把泪，而且要众人去瞧景荣老五浮肿的脸色，证明她不是有毛偏装秃子。

因为干部和党员们表现出高姿态，本来容易出现纠纷的粮食分配工作进行得很顺利，一次会议就定了案。有点意见的人，碍于干部们的无私行为，也说不出口，就那样随合了众人。

木匠王师的老婆也提出了申求，没有获得众人的赞同，救济户里挂不上名了。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原因，是在这样严重的饥荒年月，竟然敢于吃饺子，太浪费了！木匠的婆娘再三解释，说是她的娘家哥哥从甘肃来了，至少十年没见过面了，才破费给重要的亲戚浪费了一回粮食，而且说明饺子里包的全是萝卜叶儿……无济于事，总是饺子嘛！

连夜开仓分粮。梆子老太背着小半袋麦子，从仓库里走出来，心里踏实极了。有这半袋子，可以凑合到新麦上场了，应该给景荣老五改善一下伙食，他才能恢复一下体力，夏收活儿重呀！

走过十字街心，再走到木匠王师家门前，明亮的月光下，木匠的婆娘从门外的茅厕里站起身来，双手结着裤带，跳出茅厕，转脸开口就骂，像是早就等待着她："你狗日现时分粮哩！你害得俺一家……"

梆子老太一听，明知骂自己，心里却发怵，木匠老婆没有拿到救济粮，恨自己不是没有原因的……她低了头，加快脚步，避一避也就过去了。

"你狗日是特务！你监视东西邻家……"木匠婆娘已经结好裤带，对着梆子老太的脊背骂，"你狗日盼人穷，盼人死……"

梆子老太避不过了，放下麦袋子，转身站住，回骂道："你是狗日的！你没拿到救济粮，猴急了吗？"

“给我我也不要！”木匠婆娘气壮地说，“俺屋天天吃肉疙瘩，你狗特务来打听……”

“你拿不上救济粮，是社员会决定的。”梆子老太也不示弱，跨上两步，“你狗日骂我，瞎了眼了……”

胡长海听到吵骂声，赶过来，问清缘由，批评了木匠老婆几句，推着梆子老太走了。

梆子老太虽然在道理上没有输，但并没有因此提高她的威望。木匠王师家因为吃了一顿饺子而丢失了得到救济粮的机会，使梆子井村的家庭主妇全都提高了警惕性儿：当心梆子老太来串门！严谨的内当家们开始限制男人和孩子到街巷里去吃饭，永久在自家屋里就餐，梆子老太总不至于一天三顿来检查吧？这样，梆子井村的习俗开始转变，热闹的梧桐树下的老碗会，逐渐变得冷清而又寂寥了。

“五老太，你瞅，我喝的苞谷糁子，够稀的咧！”胡二老汉把碗伸到她面前，戏谑地笑着，“咱不怕谁看咱碗里装的啥饭！”

“报告五老太——”狗娃也跟着把碗伸过来，“我也喝的是糁子，原料是苞谷。请检查——”

梆子老太顿时臊红了脸，说不上话来。她成了什么人呢？给木匠王师不分救济粮，是社员会上民主评议的，干部拍案决定的，大伙为啥这样对待她呢？梆子老太一肚子冤情。

景荣老五看着别人这样不尊重自己的婆娘，脸上像挨了鞋底，气得端起碗回到屋里，再不到梧桐树下乘凉吃饭了，也狠狠地禁斥梆子老太，不许到老碗会上去，更不要在人家吃饭的时候去串门子。

梆子老太在屋里寂寞地吃饭，三五天后也就习惯了。听见钟声，她捞起锄头或铁锨就去上工，工分是不能不挣的。走到村口，碰见莲花，她按照乡村人见面时的礼仪随便问："吃饭了没？"

"吃了。吃的大肉白米饭。"莲花高喉咙大嗓门，连珠炮似的数说起来，"昨日吃的肉菜米饭，今日吃的米饭肉菜，明日还是……"

"莲花，你这叫作啥？"梆子老太受不住这样的奚落，脸孔煞白，"随便招呼你一句话嘛！"

"我知道你爱打听，就自动给你汇报。"莲花嘻嘻哈哈笑着，全不把比她长两辈的梆子老太放在眼里，肆意挖苦，"让你眼红，让你嘴里流涎水，让你盼人穷……"

梆子老太真想破口大骂，无奈莲花却嘻嘻哈哈笑着，自己又不好翻脸，想想闹腾起来，别人明知莲花无理，却不会同情自己，也就忍受了这辱践的话……哎嘘！

四、真成了一种毛病

困难的局面没有延续多久。三年没过，梆子井村像一个被突发的霍乱击倒的壮汉，亏损的肌体逐渐恢复，又显出生命的活力。没有人再为三五十斤救济粮而在众人面前抹鼻涕眼泪了；王木匠家的一顿饺子，再不会引起任何人的妒羡，以至闹出纠纷了，属于一种很普通的面食花样了……作为梆子井从严重困难之中完全恢复丰衣足食的标志，社员胡振汉首先在梆子井村撑起三间新瓦房来。

梆子井村东头，胡振汉扒掉了居住多年的窄小而又破烂的两间厦屋，盖起三间新房，青砖红瓦，新式开扇的宽大门窗，竖立在左右那

些旧式厦屋的建筑群中，宛如一个风韵韶华的姑娘亭亭玉立于一堆佝偻驼背的老太太之中，更衬托得出众显眼。几天来，男女乡亲赶到村子东头，仰起头，参观赞叹一番，向胡振汉夫妇表示热心热肠的祝贺。

庄稼人啊！过了多年集体化生活，再不讲置买土地啰！三大心愿就只剩下盖新房和娶媳妇这两件大事了。他们拼命挣钱，攥紧拳头攒钱攒粮食，盼望在自己的有生之年里，撑起一幢宽敞的大瓦房来。他们对于旁人勤俭操持日月所积攒下的令人眼热的成果，由衷地表示羡慕和钦佩。

梆子老太也到村子东头来参观了。她来的那天，涌涌而来的势头已经过去。她原不想来参观，怕胡振汉两口子又犯疑，在家忍耐了两天，还是不能排除那新房的诱惑。别人都能去看，自己为啥不能呢？胡振汉家和她住得相距甚远，没有利害纠葛，那两口子人又厚道老好，看看怕什么呢？她心里提示自己：只用眼看，不动嘴说话。她随两三个女人一起走到新房跟前，眼前豁啦一亮，红色的机制大瓦在阳光下闪亮放光，红砖顶柱，白灰勾缝，这无疑是梆子井村顶漂亮的一座房屋了。

同来的那几位女人，在新房前和振汉婆娘说笑，讲恭维话，说他们夫妻能吃得苦，能节俭过日月，盖起这样好的房子，太不容易了。不听这样的恭维话则罢，越听越使梆子老太心里不服气，她努力使自己保持脸面上的平静，心里却嘲笑那些说着廉价的恭维话的女人们，太不晓得世事了。梆子老太心里再清楚不过——

前年春天，政府发布了“六十条”，准许社员开荒种粮食的政策一宣传，振汉两口子就扎进小河中间的荒草滩里，弯着腰，撅着屁股开

荒，接着就栽下了红苕秧儿。这是河水分流改道以后，在两股流水之间逐年淤积起来的一片孤岛。

“河滩地不成业产！”有人劝振汉。

“再好的庄稼，招不住一场洪水。”有人断言。

“我是碰运气哩！”胡振汉笑笑，态度平和，“碰不上大水，收一料算一料；碰上大水冲了，拉倒。我不过摊了几个秧子钱，汗水不算成本！”

那终年荒芜的沙滩上，涨水时携带的腐枝烂叶，层层淤积，倒很肥沃。红苕的叶儿黑油油地发亮，稠密的藤蔓覆盖了沙滩，三亩大的一片，该收获多大一堆红苕呀！好多人站在村口的场塄上，眺望河石粼粼的沙滩上的那一片绿洲。要是躲过了洪水，振汉就该发财了。

胡振汉也鬼得很，不等秋收，早早地割去青绿的叶蔓，挖收红苕了。秋收开始前的整个半个多月时间里，两口子天不明起来，在薄雾笼罩的河心里开始挥动镢头，直到天黑，拉回一车又一车红溜溜的红苕来。三亩地的红苕刚刚收获完毕，一场预料中的洪水从那块绿岛上齐刷刷漫流过去。梆子井村的庄稼人大声惊叹胡振汉神机妙算，运气真是太好了！甚至有人传说振汉天天夜晚星齐以后给河神烧香叩拜，才得到河神的保佑云云……不管旁人怎样说，胡振汉可是冒了一身冷汗，整整睡了三天三夜。

那两口子也真诡！他们挖下红苕，顺手用蔓叶盖住，害怕过往小河的人看出红苕堆子的大小。等到天黑，借着星光，用架子车拉回村里来，一般社员已经扯起了鼾声，谁也估摸不清究竟收获了多少红苕。可是，胡振汉两口子却无论如何也没有料到，就在他们喘着粗

气，把装满红苕的架子车从塄坎下的慢坡道里拽上村子的时候，村边榆树荫影里，站着梆子老太，义务替他们计数，累计下一个确切的数字：四十一车……

梆子老太从胡振汉家观赏新房回来，走过梆子井村的街巷，心里十分鄙视那些向振汉婆娘尽说恭维话的女人。她们糊里糊涂地恭维她勤俭持家过日月，盖起这样排场的三间瓦房太不容易了。屁！梆子老太心里清楚不过，那四十一车红苕，现在变成砖、瓦和木料，撑起在梆子井村东头了！这些糊涂的女人们难道忘记了？刚刚过去的三年困难时月里，市场上红苕的销价是一元人民币买三斤……不过，直到梆子老太走进自己的院子，也没有跟任何人说出自己的发现。可以藐视那些糊涂的女人，她却不便说出自己的发现。政策鼓励社员开荒种粮，胡振汉没有什么错处，自己说出来，不是正好应了"盼人穷"的绰号么？

……

梆子井村风景幽雅，却显得偏僻，也许那幽雅的自然景致正得助于地理位置的偏僻，偏僻造成村庄的闭塞和文化的落后。所有居民以务弄庄稼为祖传之事，仅有的一户地主也是属于土财东。地主分子胡大头也不过高小毕业，只会记账和春节时给大门上写一副歪歪扭扭的对联。庄稼人中，多有一些木匠、泥瓦匠、弹花匠和打土坯的手艺人，而有文化的人向来稀罕，几乎绝无仅有。

前头已经提到的那位小学教员胡学文，是解放后梆子井村出现的第一位教书的先生。在整个公社已经相当庞大的中小学教员队伍当中，他是一位很不起眼的小学教师，只读过师范，毕业后自动要求到

自己偏僻的家乡来执教，可是在梆子井众多的不识字的庄稼人眼里，他简直是一位和孔子不相上下的大圣人哩！

这位圣人也真是出奇，在梆子井村占取了太多的“第一”。第一位文化人；第一个自由恋爱而引回媳妇的人；第一个使用避孕工具，不仅使闻所未闻的庄稼人兴味十足地嘻嘻议论，而且使梆子老太闹了一场结局很不愉快的笑话。更稀奇的是，近日他在什么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文章，报社把一张十九元钱的汇款单寄到梆子井村来。这件新闻，霎时轰动了全村。十九元的汇款单，数字虽则不大，却压住了胡振汉新建成的三间大瓦房的新闻。胡振汉夫妻凭出笨力盖瓦房，梆子井的任何一位庄稼汉，只要运气顺，都可以办得到。而胡学文笔杆一摇，就有汇单飞来，梆子井村哪一位能办到呢？真是稀奇的圣人！

梆子老太一时弄不明白，写什么文章挣钱？她活了四十多岁，听都没有听说过。没听过的事，自然就稀奇，就惊异，就得赶到人窝里去听，去问，搞得明明白白。一当她听得多了，问得明了，反倒更稀奇，更惊讶了。天老爷！世界上竟然有这样美气的好事！二两重的笔杆捉在手里，坐在凉房子里头，不晒日头不淋雨，写画一篇文章就挣钱，太嫽了哇！听说不过是鞋样儿那么大一块文章，居然就值得十九块。十九块该买多少红苕呢？又听人说，学文给人说他只写了三个晚上；三个晚上挣十九块，那么一月呢？一年呢？世上有这样轻松易便挣大钱的事……

“没看出，这娃子真是块料！平日看起闷腾腾的样儿，倒是哑巴吃洋蜡——内里明！”有人说，兴趣也很高。

“有内才的人都是这个样儿，外表上并不张狂。”有人说，“这倒好，咱梆子井真是出圣人了！写文章，自古都是圣人才能做的事……”

“写文章挣钱，公家月月还给发工资吗？”梆子老太插上嘴，不介意地问。

“那当然发哩！”有人瞅一眼她，疑惑地说了一句，就闭了口。

“那……真好！一马备双鞍。”梆子老太装出替学文高兴的神情，不过太做作了，“可甭只顾写文章挣钱，把娃儿们的念书给误了……”

“放心！”有人随口说，“学文教出的学生，考中学年年考中的人最多。”

“听说他写文章，用公家的纸，公家的笔，连墨水也是公家的。”梆子老太终于控制不住，把心里的不平一下子全说出来，“挣钱连本儿都不摊！”

正在说着闲话的人，一齐哑了声，互相挤眼努嘴，忽然明白了什么似的，意识到可能会因此而牵扯到是非里，纷纷走散了，只留下梆子老太站在那儿。

初冬的夜晚，寒气袭人，天又黑得早。梆子老太一人站着无聊，也就回到家中。十里堡小学校长来家访，和景荣老五坐在方桌两边，交谈她的儿子在学校念书的情况哩。梆子老太和校长打过招呼，就收拾起晚饭，摆上桌子。校长说他已经在学校灶上开过晚饭，只喝水而不动筷子。梆子老太热诚地礼让再三之后，也就不再勉强，坐在一边，插嘴问：“校长，你看咱那娃子，念书灵不灵？”

“灵是灵着哩！是个聪明孩子。”校长笑笑，诚恳地说，“只是有点慌。”

“文章写得咋样？”梆子老太问。

“还可以，作文还不错。”校长回答，“比起来，这孩子算术学得更好些。”

“你教咱娃好好写文章……”

“小学阶段打基础，要全面练习……”

“我想叫娃长大写文章，又轻松，又干净。”梆子老太说，“俺村的学文……”

“噢呀！”校长一听就笑了，不过绝没有嘲笑的意思。他自解放以后就在乡村小学任教，熟知庄稼人盼子成龙的普遍心理，并不奇怪，笑着说，“那首先得看孩子爱不爱哩！”

“叫他爱他就会爱。”梆子老太不以为然，“这样的好事，他怎会不爱呢？”

“咱娃恁小，咋能写文章嘛！”景荣老五早听得不耐烦，就打断梆子老太的话，斜溜了她一眼，意思是，甭说没神儿的话了！

“哈呀……”校长眼里浮出一缕说不清不必再解释的超然神色，打着哈哈。景荣老五也不好意思地陪着校长干笑着。

“好！正好校长也在这儿——”门外有人气冲冲地说。人尚未进屋，声气却冲进来了。梆子老太一回头，教员胡学文的母亲刚好跨进门来。

“五老太，你给俺学文满村扬风，说俺娃是一马备双鞍，吃官粮放私骆驼……”学文妈妈连一句客套话也不说，直来直说，“校长，你是学校领导，你凭实际说，俺学文教书教得……”

校长眨着眼，摸不清头绪，搞不明白原委，却准确地预感到要被牵扯进一桩是非里去了。他只管笑着，不做正面回答。

“我啥时候说过？”梆子老太一口回绝，“你听谁给你挑唆？”

“你在村子西头说了，又在村子东头说。”学文妈妈强硬地说，“你说俺学文写文章挣钱，连本儿也不摊！”强悍精明的中年妇女，经济宽绰，向来不受任何人一句闲言，岂把梆子老太放在眼里！说着，她从腰里拉出两张纸，连扇带摔地铺展到桌子上，“校长你看，这号格子纸，是不是你们学校的？”

“甭急，也甭躁嘛！”校长瞧一眼桌子上的稿纸，不做裁判，只顾熄火，“没关系！没……”

“前几年，你说俺学文媳妇不开怀……”

“算哩！我给你赔不是。”景荣老五早已忍受不住，要不是有校长坐在当面，他会狠狠地骂一顿招惹是非的老婆。他按捺着性子，给学文妈妈赔笑脸，“算咧！你是明白人，甭跟那个黏糨子一般见识……”

在景荣老五的笑脸陪送下，学文妈妈总算走出门去了。校长也再无兴趣坐下去，起身告辞了。

“你不说长道短，由不得你吗？你不拨弄是非，也由不得你吗？”送走校长，转回屋来，景荣老五的火气爆发了，“我给你说过多少回了？咱们过自家的日月，甭管人家七长八短的事，你记不住吗？你一天招惹是非，让我也跟上受人辱践……你丢人不知深浅！”

梆子老太低下头，洗刷锅碗，一句不吭。和景荣老五过日月二十多年，她已习惯了当面遵从。尽管景荣老五不是那种架子大、家法严

的男人，可是她怯他；虽然景荣老五从来没动过她一指头，她仍是怯这个不常动火的男人。在屋里，凡事总要先征询他的主意；偶尔发生的矛盾磕牙中，她总是自觉地做出让步。这种局面形成的原因，只有她心里明白：自从确切知晓自己不能生养儿女的可怕缺陷——可怕就在于无法弥补——以后，她就觉得失去了和男人争高论低的气力。

她低头洗碗刷锅，一任景荣老五发一通火，完了也就没事了。她的多言招引来学文妈妈闹事，又恰逢十里堡小学校长这样有身份的体面人物在当面，理该让男人发泄一番。她开始问自己：错在哪儿咧？果真得下了一种难于改易的毛病了吗？她下狠心往后再不说长道短……这回刺激太深刻了！

可是，晚了，于她的声誉已经毫无补益。她的人格和乡誉降低到十分糟糕的地步。男人们不屑一顾这个多嘴多舌的女人；女人们和她碰个照面，斜眼咧嘴地走过去，不予搭理；娃娃们唱歌似的喊着"盼人穷"的绰号……梆子老太简直觉得在梆子井村活成了独人！

但谁也料想不到，连梆子老太自己做梦也不曾想到，一场连一场席卷梆子井村的旋风，居然把她从众人蔑视的龌龊角落里哄抬起来，搁置到梆子井村特殊显要的位置上，造成了她一生中的鼎盛时期……

五、梆子声声里

历时半年之久的"四清"运动即将结束的时候，梆子老太当上了梆子井大队新成立的贫下中农协会主任。

驻梆子井大队"四清"工作队队长把这一决定解释得合情入理："盼人穷"属于什么性质的矛盾呢？如果拿黄桂英同志在运动中揭露的两件

大案（暴发户胡振汉和写反动文章的胡学文）来看，那正好是她阶级觉悟高的铁一般的例证。这样的“盼人穷”，好得很！

梆子老太不是蓄意谋政谋权的阴谋家，只是在工作队队长“扎根串连”来到她家访贫问苦的时候，征询她对梆子井村现任的两位主要领导人胡长海和胡振武的意见的时候，她说她在梆子井村受欺压，受孤立，无意间说出了胡振汉在河滩种红苕而后盖新瓦房的事，又说出胡学文妈妈寻上门来骂她的事。工作队队长严肃地听着，在本本上记着……胡振汉在国家困难时期高价销售红苕，是新生的暴发户，新盖的瓦房予以没收，改作青年俱乐部了。胡学文的文章经过剖析，是攻击性质的毒草，建议县教育局处理，因为胡学文的行政关系属于教育系统。平心而论，梆子老太当初躲在榆树下，记下了胡振汉夫妻从河滩收获回来的四十一车红苕的数字，并非为后来进行的“四清”运动准备材料，她当初仅仅出于某种过分的好奇心，想得知胡振汉夫妻的家底机密。想不到，“四清”工作队队长正需要这样的人证和物证……

梆子井村的贫下中农接受了这样的决定，选举会上一律给梆子老太举起了拳头。人人心里明白，工作队队员们口口声声说“要依靠贫下中农”，实际呢？事事处处贫下中农得顺着工作队说话；要不，小心挨挫！

作为这件本来难于接受的事实的基础，前任梆子井大队大队长胡振武戴上地主分子帽子了，天天早晨在街巷里扫街道哩！这样意料不到的事变成实实在在的事实，那么梆子老太荣任贫协主任，就几乎是顺理成章的事了。一切无须追究它的合法性和合理性。意想不到的事太多了，整个中国正进入一个几乎天天都在发生使人意料不及的奇怪事情的时期。

与梆子老太荣任贫协主任这件事相映成趣的是：“四清”工作队队长自己顷刻之间垮台了！

宣布梆子井大队各级各部门新的领导人名单的社员大会正在进行，工作队队长刚宣布了贫协主任黄桂英的名字，一辆大卡车从村西大路上开进村子，一直驶进十字街心的会场。车上跳下十几个男女，一律的黄军装，一律的红袖筒，不由分说，把工作队队长扭胳膊拽腿地架抬起来，扔到汽车车厢里去了。梆子井村正在开会的男女社员吓呆了，这位三句话不离“革命”的老同志，怎么一下子……梆子老太也吓得脸黄如蜡，双腿颤抖。

“这是我们单位的‘走资派’！‘三反分子’！”一个中年人站在汽车上，向惊惊吓吓的梆子井社员宣布说，“欢迎贫下中农和我们一起造反……”

汽车卷起滚滚尘烟，开出村去了。

现在，谁也说不清工作队队长宣布的干部人选还算不算数儿，梆子老太一次也没有行使贫协主任的职责，梆子井村已被派性斗争搅得混沌一片了。

在激烈的口号和怕人的枪声中，梆子井村老成胆小的庄稼人缩在炕头上，度过了解放十八年来第一个兵荒马乱的春节。农历大年除夕的夜里，梆子井村背后的南原上枪声彻夜不息。两派大交战，枪声代替了鞭炮，家家关着门，提心吊胆地捏着饺子……老干部被“四清”工作队打垮了，新班子在武斗中自动解散了，麦子没有施肥，也没有冬灌，夏收收什么呢？日子怎么过呢？谷雨节气已经过了……

两名年轻的解放军战士来到梆子井，采取强硬的又是应急的措施，不管两派组织怎样表白自己如何敢于革命和造反，都得接受梆子老太的领导。在农村，贫下中农是领导一切的。两派各出两名代表，组成五人临时领导小组，贫协主任黄桂英任组长。

一枚刻着梆子井革命领导小组字样的印章，由解放军战士郑重地交托到梆子老太手里。已经交近五十大关的梆子老太的心里，一阵喜，一阵愁，忧喜交织，手也颤抖了。这是权力的象征。代表梆子井势不两立的两派头头，挖空心思想把这枚用红绸包裹着的印章攥到自己手里。解放军战士没有上当，双手交给她了。她怕因握有这个印章而招致祸端，心里怯得慌慌。解放军战士鼓励她说，他们支左的军队驻在公社机关，整整一排人马哩！

她接过印章来了。家里没有带锁的办公桌，搁在大队办公室更不保险，于是就装在一只吃完了点心的硬纸盒子里，搁在炕头上方的墙壁上挖出的窑窝里。这儿最保险了。

梆子老太每次攥着这只印章的圆把儿按下去的时候，虽然免不了常常把字弄反，心情却是神圣的。反了正了，只要有这几个红字在！

许是慑于解放军的强大威力，两派头头们不管心里怎么捣鬼，表面上却不能不接受梆子老太的领导。景荣老五不管心里怎样害怕，也不能不接受解放军战士三番五次的谈心说服。多数还想依赖梆子井的土地养活儿女的庄稼人，已经想得很少了，无论什么人，只要在春耕生产的关键时刻，能站出来领着社员去出工就行了！梆子老太应运而生，人们倒是感激解放军，给梆子井村扶植起一位能牵动铃绳儿的人来。

“赶紧整备棉田！”有人积极地向梆子老太建议。她就指派社员去耕犁棉田了。

“该下稻秧了！”想依赖梆子井村吃饭的人继续建议。梆子老太立即指派几位有技术的老农去下稻秧。她虽然不大精通各项庄稼的活路，却比一般妇女强多了，也乐于听取众人的建议。

几项当务之急的农事活路纷纷铺开，取得进展，老成的庄稼人悄悄在私下议论，这个梆子脸老太倒是不错的一位干部哩！胡景荣看看自己的婆娘受人赞扬，心头也舒悦了许多，常常在夜里睡下以后，提醒她遗忘了的漏洞：该清除自流灌渠里的淤泥了！在渠沿上点下黄豆，不是小事哩！梆子老太第二天就会派人去挖渠点豆儿。

梆子老太领导下的梆子井大队，生产上逐渐铺开，庄稼人心里开始踏实，自己也增强了信心。她的一生中没有生育过的身板，愈显得刚强，走起路来，腿脚利落，似乎梆子井村的街巷一下子变短了，气呼呼走过去，又噔噔噔走过来了。说话的声音也不同于以往，高了，也脆了，理直而又气壮，毫不拖泥带水，倒是活像呱嗒呱嗒响着的梆子声音了。年轻人学着她的腔调说话逗笑，老人们禁斥年轻人说，管人家像不像梆子呱嗒做啥？只要她能领得大伙混饱肚子，哪怕她说话像敲锣呢！

也难怪梆子老太在村巷里匆匆来去地走动，说话，她太忙了。梆子井村的内务和外事，革命和生产，上级下级，大事小事，都集中到她的身上来了。

刚刚送走公社派来的两位检查大批判工作的干部，又有两位骑自行车的陌生人走进梆子老太家的院子。

“黄主任，这是我们的介绍信。”来访者其中一位年长的人，把一张铅印的介绍信递到梆子老太面前，“我们向你了解一个人。”

梆子老太接过介绍信，看见那上面盖有红色印记，虽然不识字，也就放心地撂到桌上，随口说：“你要了解谁的啥问题呢？”

“我们单位的胡玉民，老家在你们村里。我们想了解他的社会关系。”

“唔……有这人。”梆子老太稍一筹思，就说，“这人全家住在西安城里，老不回来，家里没谁了。”

“我们‘清队’中查出他有‘现反’言论，想了解他的家史……”

“这人……他爸死得早，他妈改嫁了，他要饭混进城里，给一家褙子场抹糨子糊褙子；解放后听说干阔了……”

“他倒是工人出身。”来访者说，“可是‘文革’以来，尽说反动话……”

“他家没人了。”梆子老太说，“他在你们那儿的表现，俺就不知道了。”

“唔……”来访者显然失望了，几十华里路，从西安找到这个偏僻的山村，一无所获，实在有点不甘心地说，“他爷爷干什么呢？”

“他爷也是庄稼汉。”梆子老太回答之后，倒是想起一条重要的记忆，“他的老爷……要不要说呢？”

“他老爷……也是重要亲属嘛！”来访者眼里闪现出希望的光芒，“虽然出了三代，可以作为参考。”

“他老爷当过土匪……大概在啥时候呢？反正男人都留辫子那会儿。”梆子老太追忆说，“我听人说，他老爷让郑家村人打死了，尸首抬回梆子井，乡党没人去抬埋……”

“请你说得详细点儿。”

“就是这些了。”

“他老爷叫啥名字呢？”

“记不得……”

“请你盖章。”来访者把记录下的文字复述一遍，然后把写得密密麻麻的红格纸页送到梆子老太手里。

梆子老太看也不看（她不识字），从点心盒子里取出圆形印章，在印泥盒里蘸一蘸，又放在嘴前哈一哈气，庄重地压下去，揭起一看，很好，字迹清晰。似乎只有盖上了这记圆坨儿，那份材料才活像一份材料了。

“麻烦黄主任。”来访者满意地向她告别，推动自行车，告辞了。

梆子老太笑着，送客人上路。当她再回到屋里的时候，却看见景荣老五慌慌乱乱在院子里转圈圈，火烧火燎的样子。

“啥事把你急成这样？”梆子老太忙问。

“回屋里说。”景荣老五气急败坏地说。

两人相继走进里屋，坐下了。

“我说你……”景荣老五气恼地抱怨说，口语不畅。

“我咋咧？”梆子老太也莫名其妙，气咻咻问。

“你……唉！”景荣老五一拍炕边，“你说人家……老爷的事做啥？”

“我说谁的老爷的啥事啦？”

“你说玉民他老爷当土匪的事做啥？”景荣老五终于说出口来。他在后院里破柴，通过后窗，窃听了老婆和来访者的全部谈话内容，眼都要急红了。

“噢！是这事——”梆子老太倒释然笑了，“人家问我嘛！”

“人家只问到他爷这一辈儿。你把他老爷的事说出来了。”

“对组织负责嘛！”梆子老太忽然变了腔调，“他老爷当土匪是事实嘛！”

“你见来？”景荣老五一急，抬起杠来。

“我听人说过。”梆子老太也不示弱。

“你听谁说？”

“我……”

变成老两口之间难分难解的争执了。

“这是组织对组织的事。”梆子老太提高嗓门，郑重地告诫不问政治的落后老汉说，“人家跟我来谈的是公事，党里的事革命的事，你往后就……甭管！”

景荣老五一听老婆以官压人的话，不由得火起，烟锅“哐当”一弹，也提高了嗓门：“共产党讲的是以实为实，哪兴你给人胡说八道？”

“我说的哪句话不是实的？”梆子老太声调更高了，像吵架一样，“他老爷当过土匪的事，谁不知道？”

景荣老五软下来了。吵闹起来，把他们老两口的谈话内容张扬出去，结果肯定更糟糕。既然自己在气势上压不住老婆，他就忍气压火，恳切地说：“好我的你哩！你没看世事乱到啥地步了，好人尽遭罪哩！从那俩来人的话里，咱听出来，咱村的胡玉民现时也遭了罪了！人家专门来搜事整人哩，你还说那些几辈子以前的事，不是火上泼油吗？”

“你这思想，该当批判！公社里开会，革委会主任说，要批判‘老好人’思想！”梆子老太更加得意，嘲笑自家落后脑袋的老汉，“你只管劳动挣工分去……”

景荣老五彻底败阵，瞧着老婆子扬扬得意的脸色，厌恶地哼了一声，就掂着烟袋走出门去了。她虽然是梆子井村的头头脑脑，毕竟又是他的婆娘，和他白天在一个锅里搅稀稠，晚上在一个炕上脚打蹬，他不能不从一个男人的角度关照她的言行的合理性和安全性。这不仅是她一个人的事，也切实关系着他和他们抱养下的已经长得墙高的儿

女的声誉……想到这些，他把怨气归结到前后几位把她扶到台上的人身上去了。他们走了，却把不尽的忧愁和烦恼留给这个家庭了。

他独自一人，远远坐到场塄边的榆树下。想到而今混乱的时世，斗人打人的奇事怪事流传不断，塞满了他的耳朵，在这样的时世里，怎敢抛头露面，胡说乱道呢？他的心头愈觉沉重，总有一种祸事迟早要降临的慌恐感觉。这个不明世事的混账婆娘……

梆子老太继续接待来访者。

前来访问的人络绎不绝。大多数是男人，偶尔也有女人。他们操着叫梆子老太难得听懂的南方或北方的陌生口语，笑着打开公文包，递上盖着红色印记的介绍信，叙说他们所要了解和调查的对象。梆子老太热情待客，倒水，让烟，然后尽其所知，一一回答，再盖上梆子井大队临时权力机构的印记，送客人上路。

运动在继续，看不出有完结的可能。作为整个"文化大革命"的组成部分，清队，整党，一打三反……梆子老太刚刚把一个新的名词说得顺口，一个陌生的新名词又响亮地提出来了。她渐渐摸出一个规律，大凡一个运动兴起，前来梆子井村找她调查了解情况的人就多起来。她掐指一算，六七十户人家的梆子井，在西安以及本省南北各地，以至在新疆、北京或南方什么地方工作的人，他们所在的大工厂或小机关，都派员光顾过这个隐藏在黄土原下、小河岸边的偏僻角落了。

两位穿着军装的军官走进梆子井来了。

"黄主任很忙，我们打扰您了。"两位军人异口同声地说，态度和蔼，客气，照例先递上介绍信。

“没啥没啥！革命工作嘛！”梆子老太已经习惯于这种礼节性的客套，应对也已自如老练了，“有什么问题，直说吧！”

谈话正式开始了。

“你们村有个叫胡选生的？”

“有。是普选那年生的。”

“这个青年在我们部队服役。”

“噢。”

“这青年参军两年了，表现不错。”军人热情地赞扬梆子井村长大的人民战士，“连里想把他当个苗子培养，我们来考察一下他的社会关系。”

从众多的来访者口中，梆子老太听多了也听惯了梆子井村在外工作的男女们的不测之事，听多了那些人的不幸，反而习惯于听那些不幸的事，倒不习惯于听这稀有的有幸的事了。既然作为苗子培养，不言而喻的是，入党和提干。梆子老太不知该对这样的人怎么说话了。

“胡选生家庭是贫农成分。”她说。

“对。”军人点头说，“父母亲在队里表现怎样？”

“一般。”梆子老太说，“不积极也不反动。”

军人很不放心地问：“没有什么问题吧？”

“大的问题倒没有。”梆子老太叹口气，表示惋惜地说，“他爸他妈的历史……复杂……”

“唔——”两位军人相对一看，脸色专注而严肃起来，显然是没有料到的。

“有人在大字报上揭发，说他爸是个兵痞，卖壮丁，搂一把钱，去了又跑了，回来再卖……听说到过广东、云南……”

“干过什么坏事没？”军人吃惊地问。

“说不清白。”梆子老太反而平静地说，“他妈的事，更说不清了。有人说，他爸卖壮丁跑到河南，躲到一家地主家扛活，没过十天半月，把财东家的小姐拐带跑了……”

“你们调查清楚这个问题了吗？”

“查不清。”梆子老太说，“我们派人到河南，她老家那个地方，修了水库，村庄搬迁了，找不到下落……”

“这……怎么办呢？”一位军官摇摇头，犯愁地说，“到哪儿去澄清呢？”

“我们也没办法。”梆子老太说，“弄不清，先挂起来……”

两位军人轻轻叹息着，走出梆子老太家的院子。梆子老太照例用干脆响亮的声音送客人上路：“慢走……”

六、报复事件

那个曾祖父当过土匪的胡玉民，由他所在的西安那家工厂的两位干部押解着，遣返回原籍梆子井村劳动改造来了。他的老婆，他的两个孩子，由梆子老太安置在村口储藏麦草的场房里。之后又有两个人被遣送回来，一个是正在兰州念书的大学生，一个是陕南什么县城的什么公司的经理。尽管他们戴着不同名号的“帽子”，梆子老太在接收安置他们的时候，总是一律地用这样的话安慰说：

“你们都是梆子井村人，在外边工作，不给咱们村的贫下中农争气，尽搞反党活动！现在倒好，都回到梆子井来！回来了……好好劳动改造……”

每天早晨，在大队办公室门外的请示台前，站在这里来请罪的队伍扩大了，再不是新地主分子胡振武和老地主分子胡大头两个孤零零的身影了，已经有了一排溜儿。构成这一列队形的成分也多样化了。梆子井村的庄稼人看见，再不是纯一色的黑色裤褂的农村型号的五类分子了，掺杂了蓝色和灰色，衣服虽然破烂，却是制服式样。那一律弯腰低垂下去的脑袋，也不全是过去那两个新老地主分子的光葫芦脑袋了，有了蓄留着头发的工作人的脑袋了。

按照上级要求，梆子老太起初天天早晨监督他们请罪，后来就交给民兵连长去执行，只是在有新的成分增加到这支队列里来的时候，她才来亲自监督一次，看看此人老实不老实，规矩不规矩。

她站在他们面前，听他们一个一个依次开口，说那些天天重复着老一套的话。往昔里，他们都是梆子井村的头面人物。不屑说老地主胡大头了，新地主胡振武从村长当到大队长，一直是站在梆子井最显眼的地方说话的人。现在由梆子老太监视着悔罪哩！那些穿破烂制服的人，往昔里在天南海北干大事，挣工资，他们留在梆子井村的老人

和家属，过着比一般庄稼人明显优越的生活；他们在年时节假里回到梆子井，穿戴一新，令村里的男女老少都羡慕。他们和她见面时，打一句招呼就过去了，不大把她收进眼角里，现在，这些梆子井村的头面人物，全都匍匐到她——一个乡村女人的半解放式的小脚前头了。她的一句话出口，就可能使他们流下许多毫无报酬的汗水。

“五类分子修河堤！”她给民兵连长一句话，这些人就被吆喝到河滩里，在晒死青蛙的沙滩上，扛石头，推沙车，从早干到晚。

有时，看着这些人累得扭腰拉腿、疲倦不堪的样子，她心里又觉得他们可怜。是呀！一个没有抓摸过土疙瘩的手指头，长得那细，怎能有劲呢？细指头捉水笔和揭文件纸，倒是轻巧利索，捉锨挖沙扛石头，就显得太弱嫩了。她想派他们干些稍微省力的轻活儿，又怕那几位造反头儿说她同情反革命分子，也就作罢。转念一想，让他们流些汗，出些大力，吃点苦，也使他们亲身经受一下，该当知道庄稼人平日里受的什么苦了。再甭像以往回到村里，摆一副挣大工资的工作人的优越面孔了！

胡选生从部队复员回来了。

梆子老太站在十字街心，看见他穿着摘掉了帽徽和领章的草绿色军衣，背着军队上的那种黄绿色被子，走到十字街心来了。他和几位庄稼汉男女打着招呼，并不停步，从梆子老太旁边走过去，装作没看见，或者像是从来不认识她似的，端直走过去了，走进梆子井村中间胡大脚家的土门楼去了。

梆子老太心里明白，他恨她。三天过去了，这个胡选生不见前来报到，意向十分清楚。梆子井村的任何一个复员军人回归本土，不出

三天，就得向村里的最高领导者报到，由她再吩咐队长给他们安排活路。工分也不是随便可以去挣的。胡选生不仅不见来报到，也没见他像其他复员军人那样提上糖果糕点去走亲访友。胡选生回乡的第二天，就扛着镢头下地干活挣工分去了。他这样爱工分？他爸胡大脚也这样爱工分而不通人情世故吗?

他憋气，梆子老太猜想。她想指令生产队长：甭给他记工分！既然没有向梆子井的现任领导人报到，一句招呼也不打，谁认识你是什么人呢？你的户粮关系尚未在梆子井落下，能随便挣工分吗？她觉得理由十分充足，却终于没有给生产队长下达这样的指令。她心里有点虚，有点怕惹麻烦，终于忍住了这口气。

在一条没有岔道可循的田间土路上，梆子老太和胡选生迎头碰面了。她等待他先开口，和她打招呼。她是领导小组组长，又是长辈人，不能先开口问候他一个晚辈娃子，那样有失身份和尊严……可是，要是他还是不理她的话，怎么办呢？她总有点心虚，想到应该和他打一句招呼，缓和一下，这儿在河滩野地，谁先朝谁开口，没人看见……胡选生头一扬，脸一迈，丝毫没有放慢脚步，从她身边走过去了，满脸的傲气，这个狂妄的家伙！

现在清楚不过地证实了梆子老太隐藏在心底的那一层顾虑：他恨她。气她向部队的那两位军官说出了他的父母亲复杂的历史状况，使他失去了被连队当作苗子培养的可能，既没有提干，也没有入党，又回到梆子井村来务庄稼了……他不恨她才怪哩！有人恨她恨在心里，比如那个胡玉民，表面上一句不吭；那个什么县的什么公司的胖经理，不管心里怎么想，却总是踅到她跟前来汇报改造收获，满脸赔笑。这个胡选生硬得很！仇恨就摆在鼻子眼上，专给她瞅似的。她再

三思量，得忍着点，胡选生和那一帮人不一样，他头上没有“帽子”，不好抓摸哩……

大约过了半个月，相安无事，梆子老太也约略放心。他敢把她怎么样呢？这一天，胡选生终于亲自登门来了。

“这是部队给大队的介绍信。这是户粮关系。这是团关系……”胡选生站在院子里，不笑也不恼，像对一位陌生的人交接手续一样。

“屋里坐。”梆子老太礼让说。

“没有什么事情了吧？”胡选生打算立即走开的神气。

“甭急。”梆子老太把那份团组织介绍信，又塞回对方手里。那是参军时从梆子井村团支部转入部队的，现在换了一张表，又从部队转回梆子井村团支部来了。她说，“你到团支书那里去办团关系。”

胡选生把那张表格塞进裤兜，抬脚要走了。

“选娃。”梆子老太转念一想，不管怎样，表面上也该缓和一下这种紧张的气氛。她装出什么也不介意的样子，关心地说，“你回来了，要多帮助咱村干工作，老太我没文化……”

胡选生停住脚，转过身，从门口重新走回院子当中，咧开的嘴角上，荡漾着不屑的嘲笑。

“你在部队受过教育，表现不错。”梆子老太廉价地安慰失败者。她虽然不大习惯给胜利者祝贺，却能大方地安慰失败者，不惜言词，“咱们队里革命生产忙啊！正需要你们年轻人！”

“需要我？”胡选生眼里滑过一缕疑问的光，“你说的是真心话？”

“啊呀！老太啥时候哄过你？”

“黄主任，既然你把话说到这儿了，我就忍不住，想问你个问题——”胡选生冷声静气地说，“关于我爸和我妈的历史问题，做结论了吗？”

梆子老太愣住了。在这个年轻的复员军人的冷静的语气里，感觉到了蓄久而又压抑着的愤怒；那一双被蓬乱的头发掩遮下的眼睛里，透出一股憎恶的冷光；因为外表上努力做出平静，反倒使他那种愤恨和憎恶的怒气更显得深沉和不可压抑，像暴雨降落之前的静寂中掠过的一股风，带着冷气，直透进梆子老太的骨缝。

“你爸是贫农，你妈也是贫农，这不含糊。”梆子老太干脆地说，丝毫也不拖泥带水，“没有做不做结论的事嘛！”

“说我妈是逃亡的地主小姐的事，从何说起呢？”显然是经过千百回的思忖和度衡，胡选生不慌不忙，把自己心里要说的话，一句咬到要害处，“我想问个明白。”

“那是有人在大字报上揭发。”梆子老太做出不在意的样子，仍然和气地解释，“群众意见嘛！要正确对待，相信群众相信党嘛！”

“群众意见我不计较。”胡选生说，“如果有人以党和群众的名义，把这些专门害人的谣言当作事实，给我装进档案，我就会成为兵痞和逃亡地主的狗崽子……背一辈子黑锅！”

“咱们……没有……这样看待你。”梆子老太心里发慌了，一切已不再是秘密，看来是不好对付的，“你甭……背思想包袱……”

“我怎么能不背包袱呢？”他眼皮一翻，紧紧盯住梆子老太的眼睛。他想说，你给部队外调干部的一席谈话，把我一生的前途葬送了，还叫我不要背思想包袱！他忍一忍，继续谈他早就要谈清楚的问题，“我只有一个要求，把我爸我妈的历史调查清楚，做出结论。要是证据确凿，我当逃亡地主的狗崽子，算我活该！”

“我们派人到河南，查不到……”

“那应该再想办法去查！”

“不好办哩……”

“光说‘不好办’不解决问题。我背着黑锅哩！”

“群众意见嘛！正确对待……”

“什么‘群众’的什么‘意见’嘛！”胡选生终于忍不住大声说，“我爸背了河北宋家财东一身烂账，万般无奈，卖壮丁给人家还钱，你说他是兵痞！谁家里有一丝活路，愿意拿性命冒险换钱？俺妈家在河南，穷得要饿死了，才卖给财东家当丫鬟。俺爸从刮民党队伍里偷跑了，躲到财东家扛活儿，看见财东把个穷丫鬟打得半死，锁在柴火房里，他可怜穷汉人，救了她，两人逃回陕西……咱村人谁个不知，哪个不晓？你不想想，凭俺爸一个穷汉人，能勾引来地主家小姐不能？你……”

“我早就说过，是群众大字报上写的嘛！”梆子老太无法应付了，只是勉强地重复她领略到的这句政策性十分广泛的话，“群众在恁大的运动中……难免有不太实际的话写到大字报上……”

“哼！我说——”胡选生无可奈何地冷笑着，“如果有人贴大字报说，你不生娃，是当姑娘的时候，让野汉子给搞坏了……你能正确对待吗？”

梆子老太一哆嗦，眼睛里起雾了，黑了。这样刻毒的辱骂，从一个晚辈后生的嘴里吐出来，像迎头浇来一盆屎尿，她被呛得张不开口了，嘴唇颤抖，眼前发黑，脑子里嗡嗡响，几乎昏厥了。

“反正……我背一辈子黑锅了……活着有啥意思！”胡选生快快地转过身，眼里泛出恶毒的报复以后的得意神气，似乎什么都在所不惜了，他出够了气，准备走了。

“你放你妈的臭屁！”梆子老太一下子从沉重的打击中醒悟过来，蹦前几步，把一口唾沫喷吐到选生脸上，骂起来，“你狗日翻了天了！”

胡选生抹着鼻脸上的唾沫，阴冷地笑着：“看看你……这下也不能‘正确对待群众意见’了吧？”

梆子老太更加气急，一甩手，就抽到选生的脸上，再扬起手的时候，就被选生铁钳一样有劲的大手攥住了肘腕。她伸出另一只手，掐住了选生的领口，纽扣一个个挣断脱落了。

胡选生没有想到会打架，原来只想骂几句出出气罢了，他突然有些后悔，和一个老太婆打架，太没意思了。他甩开她乱抓乱撩的手，准备摆脱，不料梆子老太突然趴在地上，双手抱住他的左腿，大哭大喊：“救命——”

胡选生没有料到会有这样的麻缠，打不敢打，一个老太婆怎能招架得住他的拳脚呢？摆脱又摆脱不了……突然，小腿上一阵钻心的疼痛——她咬了他一口。小伙子疼得难以忍受，又听着她虚张声势的哭叫，愤恨的火气喷涌而出，抬起另一只脚，照梆子老太的屁股踢去——

这一脚，可能结果梆子老太的性命，从而酿成人命案件，至轻也会踢得梆子老太皮烂骨折。幸亏门外扑进一个人来，连滚带爬地扑倒在两人跟前，恰到紧要关头，抱住了选生刚刚抬起的腿腕。选生自己始料不及，身体失掉平衡，摔倒在院子里。

来人是胡选生的父亲胡大脚。他早已从儿子的言行神色中窥察出来某些异常的神态，暗暗地监视着儿子的一举一动，生怕闹出乱子来。他的心计没有白费，恰到好处地制止了一场可能酿成的祸事……

这件事处理得十分及时，三天没过，胡选生被县公安军管会拘捕了，性质定为阶级报复。

拘捕胡选生的吉普车刚一开出梆子井，村民们一股水似的涌进胡大脚家窄小的院子。女人们安慰号啕大哭得嘶哑了嗓子的河南籍女人，男人们劝解双手抱头唉声叹气的胡大脚，悄声怨骂那个瞎心眼的梆子嘴……太过分了。

“啊呀！这个梆子嘴，不知给外边来的人，都胡说乱道了些啥……”

“甭想从她嘴里听到一句吉利话！”

“上头来人尽听她瞎汇报……吹胀捏塌，好事说瞎，全由她叨咕！”

梆子井村的庄稼人都养儿育女，悉心盼望自己的儿女将来比自己活得更有出息，顶好能到外部世界里去干一番事业。那不仅是单纯的经济收益上的实际利益，重要的是标志着作为父母教养儿女的光荣啊！尽管他们自己在梆子井村里不打算加入共产党，甚至开会时总朝拐角挤，甚至甘当落后；但他们几乎一律诚心地希望儿女们在学校，在部队，在工厂或记不清名号的单位里，积极工作，思想进步，最好能加入共产党，能提拔干部……解放以来形成的新的社会观念是：党员和干部是一切角角落落里的优秀分子，是好人的同义语，处处受人敬重和爱戴啊！

现在，梆子井村的父亲和母亲们不能不切身考虑：如果自己的儿女将来参了军（或服现役），上了学（或已在校），在西安或外省工作的话，要入党，要进步，仍然与梆子井村的现任领导有割不断的关系哩！即使你走到天涯海角，仍然得由梆子老太向你所在的单位证明一家老少乃至骨头早已化成泥水的上几辈祖宗，究竟是好人或者是坏人！谁家几代人中没有一点纰漏和过失呢？梆子老太实实在在叫他们不放心呀！岂止仅仅是同情胡选生的厄运？一个盼人穷、瞎心眼的婆娘，能指望给你的儿子和女儿说什么好话吗？甭想！

于是，在胡大脚家的院子里，七嘴八舌，乱口纷纷，把梆子井村几年间所有人的倒霉和劫难，都有根有筋地与梆子老太联系起来了。梆子老太的存在，显然已经对全体村民都构成一种潜在的威胁：只要她健在，只要她手里还攥着那个“红圆木”（印章），他们就怕怕……谁能保证那不祥的梆子似的声音不会敲响在自己的头顶呢？

七、光荣的孤立

梆子井村贫协主任黄桂英被阶级敌人殴打的严重事件，震惊了公社和县上贫协的领导同志。他们或骑自行车，或坐吉普车，先后赶到南原坡根下的偏僻的小村庄来，带着沉重的心情，表示关切和慰问。

梆子老太深受感动，当着领导人的面，流出擦不干的泪水。她艰难地用胳膊撑起身子，想坐起来，躺着和县上的领导说话，太没礼节了。领导人亲切地按住她的肩膀，坚决地劝慰她继续躺着，安静地养伤，不能乱动，不必讲究礼仪，养伤要紧呀！她就躺着，仔细认真地聆听上级领导热心热肠的鼓励的话。她感到无上荣光，甚至受宠若惊。好呀！让梆子井村的男女老少都瞅一瞅，县上的坐小车的大领导亲自看望黄桂英来了！梆子井任何一位庄稼人生疮害病，甚至老死病逝，除了他们的亲戚来看望，公社和县上的领导看望过哪一位普通庄稼汉呢？她的心情十分好，胡选生的辱骂带给她的是难得的荣耀，而他自己现在则蹲到县公安局的拘留所里了。她向领导表示，自己决不怕打击报复。在梆子井这个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复杂的村庄里，为贫下中农掌好印把子……

所有来访的人，无不为这个五十岁的乡村老太婆所表现出来的斗争精神所感动。县贫协主任当着梆子老太的面，指示随身前来的小秘书说，把黄桂英同志的事迹整理出来，印发到各级贫协组织，学习她的斗争精神；而且诚恳地做着自我批评，因为官僚主义，竟然没有发现这样一位富于斗争精神的好同志……

梆子老太抱养的女儿已经长大成人，白天守候在身边炕前，默默地递水递饭，晚上就由景荣老五来代替侍候了。

“你觉得怎样？”整整躺着五天了，仍不见梆子老太康复，景荣老五有些焦虑，“腰还疼不？”

“轻是轻些了，腰还是疼得翻不过。”梆子老太皱着眉，很痛苦的样子。

景荣老五一声叹息，就低下头去默默地抽烟。不管怎样，她和他过了大半辈子，老夫老妻了。她被一个晚辈的年轻后生打伤，他心里难过。他不能解除她的痛楚，也体味不到她疼痛的程度，只是这么一直躺下去，他很担心，万一瘫痪了咋办？他是那种胆子小而不愿招惹是非的手艺人，就说：“要是还不减轻，我拉你到城里大医院去检查，看看伤没伤着骨头？”

“过两天再说……”梆子老太有气无力地说。

这时候，会计送来一张通知。

“啥通知？”梆子老太躺着问。

“公社召开‘活学活用讲用会’，通知你参加。”会计回答说，“明天上午八点。会期三天。”

会计走了以后，景荣老五劝说：“你有病，另派旁人去吧！”

“旁的会不开没啥，这个会非开不可！”

景荣老五正想认真地劝解，未及开口，却吃惊地看见，刚才哼哼唧唧痛苦呻唤着的老婆，忽地一下坐起来，一把掀掉被子，旋即溜下炕来，双手紧着裤带，像要出征的将军。他一下子愣住了，忙问：“你——病没好哩……”

“好了！”梆子老太赌气似的说，“我一没伤，二没病，让那娃子乖乖蹲劳改窑去！”

景荣老五听罢，难为情地低下头来，默默地装烟打火，张不开口了。担心老婆瘫痪的顾虑虽然解除了，可是她装病唤疼用以扩大事态而致使胡大脚的儿子套上法绳的行为，无论如何使善良的弹花匠老汉感到了良心的谴责。

他从父辈手里继承过来一张枣木弹花弓，也继承了父亲靠手艺吃饭、正直为人的家训。他给人家弹花挣钱吃饭，不想蓄意设陷伤害任何人。他参加农业社集体生产以后挂起了弹花弓，虽然留恋背一张弹花弓走四方的自由自在的生活，却仍然遵循着与人和善相处的父训，听从干部分配，不避不拣轻活重活，实实在在地在梆子井村生活着。因为老婆子登上村里的最高权力机构，他更加注意善言善行，与人和睦友善，意在弥补招惹是非的老婆子所造成的乡党友情方面的损失。看到梆子老太确实是装病装疼，他顿时产生一股厌恶的情绪，用吸烟来调节这种不快的心情了。

梆子老太倒水洗脸，梳理散乱的头发。

公社和县上的那些领导，要是知道了他们不顾路程僻远前来看望的并不是一位受伤的人，而是一个完全的好人，心里会怎么想呢？县公安局要是知道了胡选生并没有打伤黄桂英的真相，又该怎么办呢？唔呀！那样一来，从里到外，从下到上，他的老婆就臭名远扬了！近几天来，看着乡邻们一溜一串出出进进胡大脚家的门楼，庄稼人不来看望挨打受害的人，反倒同情打人肇事的胡选生的父母，已经使景荣老五心里承受着压力。现在，他觉得这种无形的压力愈加沉重了，出门怎么和乡党见面说话……

“你要去开会，我也不敢拦挡你。”景荣老五思谋再三，使自己的情绪缓解下来，委婉地劝说，“开会时跟领导说话，注意尺码！经过这场事，咱也该学得灵活些，说话办事，多想想前后左右……”

“阶级敌人斗到我的大门里头来咧，你倒叫我装乖学龟！”梆子老太气呼呼地说，“你倒说说，‘前后左右想’什么？”

“我是说，该说的说，不该说的就甭说。”景荣老五依然耐心地说，“咱已是五十岁的人了！”

“我说过啥不该说的话咧？”

“人家选生他妈的情况……你不该给军队上来的人乱说嘛！”

“你倒跟他一口腔！”梆子老太真的动气了，“我说得不对，为啥法办他娃子？”

“甭看法办了选生，乡党骂咱哩！”景荣老五难受地说。他认为有必要提醒已经丧失正常理智的老婆，甭看公社和县上有领导来看望你，梆子井村的男女却拥到胡大脚家去了。他终于把社会舆论摆到她的当面，想促使她冷静下来，“人家叫你‘盼人穷’，瞎心眼，连我也恨着哩！”

“被敌人反对是好事。”梆子老太不屑一顾地回顶道，反而更加气壮声粗，“县贫协主任那天批评你落后脑袋，你咋只笑不说话？”

“乡党不是敌人嘛！”景荣老五争辩说，“县贫协主任批评我落后脑瓜，我没说话，是看他远远地来了，礼让他了。我心里也没接受！”

“你怕人骂，你躲远。”梆子老太不愿意和落后男人再啰唆，“我的事情由我办，你往后甭在我跟前嘟嘟囔囔！”

厌恶地瞅一眼这个不明世情的婆娘，景荣老五站起身，掂着烟袋走出院子，蹲在门外平场里的青石碌碡上了。月色溶溶。梆子井村早已沉寂。从一家一户的大的或小的透着光的窗户上，他想到人家的夫妻们在灯下窗前和声细语，在商量如何安排家庭生活吧？在商量给儿子订媳妇或给女子寻婆家的事情吧？不管贫富，人家生活过得安宁和平静。他已接近花甲之年，希望晚年的日月过得安宁，特别是在已经纷乱得令人烦腻的当今社会里，他希望有一个安宁和谐的家庭。现在，在这样大的世界上，没有一块能叫他劳动、吃饭和睡觉的安宁角落了……唉！他断定自家这个门楼里日后更不会少事，和胡选生的纠葛不过是一种先兆罢了。那些骑自行车或坐吉普车来光顾他家门楼的县社干部，只顾鼓励他的老婆去斗争，却不知把景荣老五一家的乡邻关系完全破坏了！他们的话，像火一样烧燎着他的不知深浅的老婆，屁股烫得坐不安稳呀！他毫无办法……

梆子老太按时出席了公社召开的“讲用会”。她的发言，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真是人老心不老的‘老来红’……”

“黄桂英同志真是睁着眼睛睡觉——警惕性最高了！”

“学活了，用活了，有阶级感情呀……”

梆子老太简直应接不暇了，迎着她的是一张张笑嘻嘻的脸孔，钻到她耳朵里的是一句句热情赞扬话，始料不及的巨大成功，使她感到生活的欢乐了。第一天会议结束，她心里装着盛不下的欢悦之情，格

外有劲地走完公社离梆子井之间的十多里路程，凯旋似的归来了。自从一顶花轿把她抬进陌生的梆子井村，她从来没有今天这样得意过，几十年来别人赞扬她的话加在一起，也没有今天一天里听到的多！

梆子老太兴冲冲走进街门，看见儿子坐在院子里的青石礅上喝水，乘凉，瞅见她进门，巴眨巴眨看她一眼，既没打招呼，也没问饥问渴，狠狠地翻给她一副白眼，扭身走出街门了。

“你在公社胡乱讲些啥呀？”女儿腰里结着围裙，从小灶房里走出来，一瞅见母亲，劈头就问，像是早就等待着她似的。女儿嘲笑说，“你这下光荣了！光荣得全公社都闻名扬声了！”

“你——不想活咧？”梆子老太从热烘烘的公社会场，一下子跌进自家小院的冰窖里。她一时搞不清儿女们顶撞她的原因，无法忍受下辈人的放肆和无礼，骂道，“反了！”

“你是硬逼别人去跳井！”女儿根本不把母亲的斥责当一回事，看来已经是忍无可忍，火气更盛地反唇相讥，“你要积极。你逞能。你把俺爸也贴赔进去，糟践再糟践！你简直——”

在公社大礼堂的讲台上，梆子老太绘声绘色地讲述自己在梆子井村与阶级敌人做斗争的事迹时，公社自办的有线入户喇叭，准确无误地把她的每一句话，高兴时的笑声，难受时的哭声，一声咳嗽，都传遍整个公社的每一户农家了。其时，景荣老五和他的儿子和女儿，坐在院子里，一个个脸红耳赤地听着。当梆子老太讲到她与顽固派老汉作思想斗争的时候，儿子一跃身，从门楣旁边的土墙上，把那只纸质舌簧喇叭扯下来，摔到地上，踹得粉碎了。

梆子老太从女儿的言语间，大体明白了缘由。她现时置身于自家的小院，面对丈夫和儿女，回想起在公社的“讲用”发言，似乎觉察到有些话说得过分了，不仅伤老汉的面皮，也伤了儿女们的面皮，儿女已经长大成人了呀！那些过分的话，大约是在频频而起的掌声中，她的嘴巴变得收拢不住了。她有点懊悔，又不甘在儿女面前示弱。于是就把气使到景荣老五头上。一任儿女横加诘责母亲，他不拦挡，也不劝解，掂着烟袋倒像看热闹。她说：“说了就说了！谁要他一天尽说落后话！”

“你也该想想，五十多岁了，你积极得想当中央文革小组成员吗？”女儿气咻咻地挖苦，“你在公社胡说乱道，村里人听着广播骂，唾沫星儿把人都要淹死咧！你爱光荣，我嫌丢脸……”

这样的话，太叫做母亲的难以承受了，梆子老太气得脸色蜡黄，气呼呼地骂：“你嫌我丢脸，你滚！”

“你把丢人当喝凉水！”儿子此时走进门，粗声粗气地接上说，比姐姐的话更难听，“人家把你当猴耍，你还当你能行哩！公社干部吃公粮，挣工资，耍嘴皮子。你跟上人家瞎哄哄，难道不怕众人指脊背吗？”

梆子老太孤立无援，被四面围攻，气得浑身发抖，脸色由黄变青，双手捂脸，“呜”的一声哭起来。

景荣老五憎恶地翻一眼老婆，又低头抽他的旱烟。他也早已准备了一肚子难听话，准备和老婆闹一闹，甚至做了退一步的打算：分家另过，和这样的女人生活在一起，他无法安宁。现在，儿女们已经说得够多够难听了，他把想说的话全忍下了，老好的老汉啊！儿女们近

乎辱骂的话语是不该有的。可是对于头脑发热的老婆，好言规劝变得无济于事了，有几句冷言冷语，使她发热的头脑凉一凉，也许正好。他觉得事态不能再扩大，就开口斥责还不肯罢休的儿女。

“你要当积极分子，你去！”听了父亲的斥责，儿子赌气地说，“把我分开。我单独过。我受不了旁人的白眼……”儿子几乎哭了。

“把我也分开！我跟俺弟俺爸过。”女儿也施加压力，“你积极，你革命，你一个人过活。俺一家老落后不沾你的光，也不受你的气！”

梆子老太不曾注意，她和景荣老五抱养人家的女儿和儿子，已经长大成人了，开始在梆子井村里和周围的邻近村庄里，结交同龄的相好和伙伴了。在她超出一般乡村庄稼人接受能力的言语和行动中，不仅把自己孤立了，而且把儿女们在年轻的伙伴当中也孤立起来了。旁人撂下的杂话碎语，儿女们听到了，脸烧哇！

“你们多嫌我……我给你们离眼……呜呜呜……”梆子老太哭得好伤心，“我受苦受难……把你俩养活大了……呜呜呜……”

儿子一甩手走出门去了。女儿在灶房里也不再出声，磕碰得碗儿碟儿乒乓乱响。

“你要会听话。娃们原为你好。”景荣老五这时才开口，劝解哭哭啼啼的老婆，“人家公社那些人抬哄你，是哄得憨狗去咬石狮子！你当是人家赏识你哩！”

“你吆喝起一家大小骂我……你看我不顺眼……唉嗨嗨嗨……”

“该当修德养性了，甭叫人斜着眼瞅咱。咱们都是上了岁数的人咧！”景荣老五诚心实意地说，“娃儿长大了，要在人前站哩！咱们挨

骂，儿女在人前也难说话呀……”

这些陈腐的为人处世的俗理，与公社领导讲的话，恰好相背，相去太远了。她在公社受尊崇，受赞扬，回到屋里遭围攻，太叫她难以接受了。她听不进去，景荣老五不知给她重复过多少回的这些处世俗理，没有任何力量。她又无法辩解，儿女们几乎一边倒地站在顽固脑袋的老头子一边，对她的威胁太大了。要知道，儿子和女儿毕竟不是亲生骨肉，终究有一层后天无法弥补的隔卡呀！要是真的闹出分家的局面，她怎么办呢？哭着想着，梆子老太强迫自己吞咽了儿子和女儿的恶言秽语，就不再开口，算是平息了骤然爆发的这一场内乱……

无论是景荣老五诚心实意的劝解，抑或是儿子和女儿恶言恶语的刺激，都无法挽回梆子老太的“讲用”在外部世界所产生的影响，更无法使梆子老太安静地屈居于他们的农家小院了。

公社为期三天的“讲用会”结束以后，梆子老太被推选为出席县“活学活用”的积极分子了。下半年里，参加过县上“讲用会”，她的发言引起更大范围的反响，县广播站播放了全部录音，铅印的单行材料发至县属的各个单位。黄桂英的名字，已经从偏僻的梆子井村飞出来，叫响在全县的角角落落里。

第二年春天，梆子老太光荣地出席地区“活学活用积代会”，会后又被选为出席省上会议的代表了。梆子老太占有别的代表们无法竞争的优势：五十多岁的农村老太太，一个大字不识，尚且能学好用好，势必对众多的识字的人是一种刺激！她到处都受到重视和欢迎。省上的会议需得等到下半年召开，梆子老太暂且回到梆子井村里来。

景荣老五和他的儿女们大惑莫测，真不敢再往下想，说不定省上的“积代会”之后，他的老婆要上北京，怕是也难说哩！这对他们过去对她的那种态度，无疑是一个绝妙的讽刺。他在老婆归来之前，提早告诫过自己的儿女：

“看清了没？你娘现在落不下马了！凭咱爷儿们劝不回来了！她愿意做啥由她去，咱爷儿们过咱的日月……”

八、梆子声声响

在一年多的时间里，梆子老太参加各级“活学活用讲用会”，从公社走到县，又从县城走到地委所在的城市，后来又被地委选为巡回“讲用团”成员，到处去现身说法。她究竟走过哪些县城，已经记不清楚了，至于去过哪些工厂、学校、商店和公社，就更难于说得清了。笼统的印象是，所到之处，锣鼓、鞭炮、红旗和大幅标语，一处比一处欢迎的场面更热烈，更隆重，像暗中比赛着似的。所到之处，热烈的掌声，满台的笑脸，许多记不清名字的领导人的欢迎词，真诚而又谦恭。所到之处，七碟八碗，肥的瘦的，烧的炒的，辣的甜的，洋的土的，一齐涌上餐桌，也像暗中比赛着似的。

梆子老太一生只去过十里堡，县城一次也没去过，这回可是大开眼界，见到了平生没见过的大世面，受到许多有头有脸的领导人的欢迎和尊敬，尝腻了从来没尝过的美味佳肴……她的心胸也变得开阔了，没有必要和顽固脑袋的老汉计较了，他经见过什么呢?

乍一回到梆子井，梆子老太顿然觉得南原和北岭之间的这条小河川道太狭隘了，梆子井村的街巷太污脏了。她心里很不满意，街巷搞得这样脏，五类分子干什么去了呢？给他们规定的每天早晨清扫街道

的制度，因为她不在家，显然是松懈了。她去找干部，民兵连长到渭河北岸的什么地方买粮去了，生产队长给队里买化肥去了。

要不要到支部书记家去呢？在她外出的时间里，公社派人整顿选举产生了梆子井党的支委会，胡长海任支部书记了。她不想到他家里去，起码是不必刚一回来就去找他，给人造成她去朝拜他的印象。什么样的大领导，梆子老太都见过了，和地委书记握过手，照过相，吃过饭，地委书记还给她碟儿里夹过菜哩！县委书记扶她上车哩！胡长海算几级干部呢？本该在她一回到村里，他来找她汇报工作才对。虽然他是支书，可她是省“积代会”代表。

梆子老太觉得不去朝拜胡长海是对的，于是就从村里转过来，整个村巷里的树木、房舍、粪堆和柴火垛子，既熟识而又显得陌生。社员们看见她，有的远远走过去了，有的平淡地打一句招呼，也就没精打采地走过去了。梆子老太不大在意，这些只知道挣工分的庄稼人，又经见过什么大世面呢？她也许知道也许是不知道，梆子井村的社员，一年四季的吃食，主要靠渭河北岸的农户供应了，用一句调皮话说，户口在梆子井，而粮食关系早已转到渭北去了。

梆子老太走过地主分子胡振武家门前的时候，看见那家院子里，拥着一堆一伙妇女和娃娃，有人走出来，又有人走进去，熙熙攘攘的样子。她不由一惊，这么多社员围在阶级敌人家里干什么？地主分子太猖狂了，竟然敢把这么多贫下中农拉拢到屋里，搞什么鬼名堂呢？她径直走过去。

“哈呀！黄主任也来看新媳妇了！”

梆子老太刚走到门口，一个眼尖嘴快的妇女高声喊，她才明白了是怎么一回事。她停住匆忙的脚步，进去不进去呢？人家给儿子订媳妇，自己进去干什么呢？转而一想，在上级开会时，领导人反复强调，阶级斗争处处有，婚丧大事中更不会风平浪静，何况胡振武本身就是地主分子！这样想着，她决定：应该进去看看究竟。

“主任，回来了。”大队会计花儿正从门里走出来，急急忙忙的样子，和她招呼说。

“你急急忙忙做啥？”梆子老太问。

“我去开个介绍信。”花儿事务式地说。

“给谁开啥介绍信？”

“给解放哥开介绍信。他跟媳妇明天到公社领结婚证，急着要大队的介绍信哩！”

梆子老太闭了口，瞧瞧左右，就跟着花儿走到远离胡振武家门的街巷里，悄声问：“你审查过了吗？”

“两人都超过晚婚年龄了，再没啥审查的！”

“女方是哪里人呢？”

“陕北人。贫农。”花儿有点不耐烦地说，“女方合格不合格，由公社审查。咱们大队，只负责审查男方。”

“一个贫农女子，怎能嫁给一个地主儿子呢？”梆子老太紧盯着花儿问，“你想过没有？”

“人家两相情愿嘛！”花儿烦了，“我管不着。”

“你管不着？”梆子老太重复着花儿的话，加重了语气，“你知道不知道，你手里攥的啥？”

“章子。”花儿说，“公章。”

“贫下中农的印把子！”梆子老太纠正说，“怎么能丧失警惕性儿？”

“地主家的娃娃也得娶媳妇嘛！总不能去当和尚！”花儿不服气地说，“再甭疑神疑鬼了！”

“我没说不准他结婚！”梆子老太毫不放松，“要严格审查！”

“好！黄主任，你不放心我，你亲自去审查吧！”花儿烦腻地说，“你啥时候审查完毕，合格了，我再来开介绍信。”

“我就是要审查！”梆子老太一脚踏到底，毫不动摇，“你叫解放和那个女的到办公室来。”

……

“你叫啥名字？”

“兰铃铃。”

“哪里人？”

“陕北。兰家峁。”

“到这儿来干什么？”

“跟他……结婚。”

“为啥不在你们陕北找对象？”

“当地没粮吃。我想落脚到一个产粮的地方。”

“陕北革命形势大好！你咋说没粮吃？”

“俺家净吃糠。你不信，跟我去看看。”

“你家啥成分？”

“贫农。”

“你知道他家的成分吗？”

“知道——地主。他到俺家，头一回见面，就给俺说清白了。”

这个贫农的女子呀……梆子老太深深地惋惜，脸蛋儿圆圆的，眼睛很聪灵，可是太没出息了！眼看着这样好看的一个贫农姑娘要被地主的儿子引进屋里去，她心里难受，就耐心地开导说：“你仔细想过没？终身大事呀！”

“想过了，俺一家人都商量过了。”兰铃铃话语里不留一丝缝隙，表现出死心塌地的样子，“俺看出他人老实，对我好。他爸戴‘帽子’，那是他爸……”

梆子老太丧气了，甚至觉得这个甘愿投身地主家庭的贫农女子，未免太没骨气。她对呆呆地站在一边的解放说：“你俩先回去。介绍信

现在不能开，等干部会上研究以后再说。”

“我给支书说过了。”解放急了，生怕到手的媳妇再发生变故，急忙解释说，“他同意呀！他说这号事一律由会计经办，用不着找旁的干部。”

“我也没说不同意，得研究研究，不能一个人说了算。”梆子老太一听解放找过胡长海，心里就更不美气，冷冷地说着，又转过脸，叮嘱陕北姑娘说，“你再好好想想……”

……

解放领着铃铃走回家去。两人把梆子老太审查他们的经过如实叙述一遍，人家怎么问，她和他怎样答……感动得解放的妈妈热泪扑流了。不等两娃叙说完毕，她已经忍耐不住，一把拉过铃铃，把这个操着生硬的陕北口音的姑娘搂进怀抱，五十多岁的乡村老太婆皱纹密布的脸颊，紧紧贴到未来儿媳乌黑发亮的头发上，竟然呜咽起来了。

自打会计花儿来通知解放和铃铃到办公室，接受梆子老太的审查，解放妈妈的那颗母亲的心就冻结了。吉凶难测！简直完全可能是凶多吉少！她在屋里坐不住，站不稳，出出进进，慌慌乱乱，像是要发疯了。铃铃的回答真是恰到好处，这是多好的一个姑娘呀！她觉得那颗冻结在胸膛里的心，顿然舒脱了，紧紧地搂着陕北姑娘，可爱的未来的儿媳妇！

“四清”运动中，她的男人胡振武，一夜之间，由共产党员大队长变成了地主分子。她跟着受了多少折磨，且莫说起，她已经五十多岁了。使她日夜揪心的是，儿子解放长到二十八岁了，订不下媳妇，人家哪个贫农女子愿意进她的家门呢？好容易托人在陕北山区介绍下这

个姑娘……如果梆子老太一棍子把她给吓跑了，她的儿子解放就可能打光棍了！那样一来，她真的可能发疯。现在，这样的祸事可以避免了，尽管介绍信还没弄到手，尽管梆子老太说还要“研究研究”，她觉得心地踏实，那颗承受过太多的折磨和惊吓的心，一时盛不下这个可爱的陕北姑娘带给她的太多的喜悦了。

胡振武磕掉烟灰，长长地吁出一口气，这个姑娘给人心里的安慰，足以排除梆子老太给人的反感。他动情地瞅一眼老伴搂着未来的儿媳的动人情景，背起双手，放心地走出门去了。他已经养成不说话的生活习惯了。

他是地主分子。一九六六年初开展的“四清”运动中，他从梆子井的共产党员大队长，一下子变成人民的敌人了。他不服气，也不理解，却是硬得出奇。他可以天天无偿地扫街道，干最脏最重而工分最低的活儿，却是硬着嘴巴不请罪，只说自己有过错误，而拒不承认自己是剥削压迫群众的地主，即使没有蓄留头发的光头被打得疙瘩连着疙瘩，他的嘴里也咬得紧紧的。

他默默地出工，默默地收工回家，坐在院子的树荫下抽烟，无事决不迈出大门一步。梆子老太和民兵连长监督着他的一举一动，屁放得响了，她也怀疑他要嚣张起来了。他从早到晚可以不说一句话。无论是天大的喜事，抑或是地深的灾祸，他都保持沉默不语，遇事不惊了。谁能了知这个外表硬得像一块钢铁的汉子，心里整天在淌血！刚刚从三年困难生活中恢复起来的梆子井大队，现在在梆子老太一帮人手里，又穷得和三年困难时期不相上下了！他给家庭和儿女们带来的深重灾祸，日夜咬噬着他的心……面对这件本来就很伤情的喜事，他有什么好高兴的呢？看着老婆抱着陕北姑娘泪流满面的样子，他实实不忍心再看了！

人说胡长海当支部书记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胡长海自己说，他的两只眼都闭着。

问题恰恰在于：眼不见，心也烦！一个在梆子井村起早摸黑为党和群众利益工作了二十年的共产党员，强令自己容忍许多实在无法容忍的事情在眼前发生，是一种自我折磨，只好闭上双眼不看。多少回，他忍不住想站起来，只需三五句话（多了用不着），把梆子老太的瞎折腾的话驳斥回去，想想又作罢了，长叹一声：唉！何必！

眼前发生的这件事，他忍不住了。梆子老太卡住解放的结婚介绍信，已经一月了，那个陕北姑娘真是好，就死守在胡振武家里。他想看看，梆子老太将会把这件民怨鼎沸的事弄到什么地步，也就忍着，等待着。令他不能容忍的是，梆子老太竟然追到他家里，诘问起地主儿子哄骗贫农女儿做媳妇的事来了。

“地主儿子到处乱窜，两次跑到陕北，给你请假来没？”梆子老太一开口就咄咄逼人，“我可是一点不知——我在地区开会哩！”

“请假是给队长请。”胡长海淡淡地说，“我管不着社员请假的事嘛！”

“他从陕北拐骗回来个媳妇，请示过你没？”

“人家订婚娶媳妇的事，请示我做啥嘛！”胡长海一听就想发火，管得太宽了！他强迫自己依然保持住沉稳的口气，说，“人家是订媳妇哩！不能随便说是‘拐骗’。”

“一个贫农女子，咋会心甘情愿嫁给地主？”梆子老太眉头紧皱着，“我看有麻达！”

“解放是社员，不是地主分子。‘帽子’扣在他爸头上，没有扣着解放。”胡长海声音不高，口气却不软，不断纠正梆子老太言语中出现的概念上的混乱，“贫农女儿不能嫁给他；地主家庭出身的姑娘嫁给他，又咋说呢？怕是又要说成臭气相通了……地主家的娃子……只有断子绝孙！”

“反正……眼看着一个阶级姐妹被敌人腐蚀拉拢过去，我们不能不管。”梆子老太心里明白，胡长海偏向解放，就强硬地说，“党支部不能不抓阶级斗争！”

“婚姻法上没规定说，地主子女不准和贫农娃结婚！”胡长海也强硬起来了，“这件事算不算阶级斗争，我还没吃准哩！有什么责任的话，我担承着。”

“我看是阶级斗争的新动向！”梆子老太也不想再磨叨下去。她是个性急人，见不得拖拖拉拉，磨磨蹭蹭。听见胡长海要承担责任的话，她真想一下子戳破他包庇阶级敌人的问题；话到口边时，她又绕了一下，改为批评教育了，“这次，我在地委开会，领导们再三强调，阶级斗争……”

胡长海点起烟袋，一任梆子老太给他传达她听到的那位领导人的讲话。他觉得好笑，让他们到梆子井村来吧，住上三年两月，看看社员吃什么，就懂得饥饿比地主分子胡振武要凶恶十倍！黑市苞谷卖三毛八分钱一斤……看看庄稼人的日月怎么安排？哪里有劲去搞斗争……现在的紧迫问题是，怎么把这个有恃无恐的女人支使开，甭让她给解放把媳妇冲散了，那就不会给胡振武一家带来灾祸了。他忍着性儿，好言解释说：“解放已经二十七八岁咧！甭说他妈他爸着急，乡

党们都替娃操心这门亲事哩！咱们要是把这婚事给弄瞎了，不说解放本人吧，乡党们都要骂咱们当干部的哩……”

“你怕挨骂，我不怕！”梆子老太不假思索地说，“地委领导说，要和民主派思想斗争……”

“说我是啥‘派’我都应承了。”胡长海笑笑，“只是……这婚事……咱们最好再甭过问了。”

“我要管到底！”梆子老太说，毫不含糊，“你不管的话，我以贫协的名义，给她老家陕北打电话，让县上领回他们的‘盲流’人口！”

“我不同意！”胡长海一听，再也忍耐不住，霍地站起，把手中的烟袋“啪”的一声摔到桌子上，声音都颤抖了，“你没资格代表梆子井！也没有资格给陕北打电话！我还是支书！”

梆子老太真的吓了一跳，足足呆愣了半分钟。平素，无论开什么会，都是她说了算，他只是蹲在墙角吸旱烟，临走时给地上留一堆黑色的烟灰。所有她对梆子井的工作意见，他都不表示异议，更难见到他发怒动火了。梆子老太完全在心底证实了他和地主分子胡振武穿着连裆裤的看法，更加得意地说：“好！支书，把你今天说的话，全盘端到公社去，让公社党委评评理！”说罢，梆子老太转过身，气冲冲地走出门去。

“到北京告状去！”胡长海一听梆子老太有恃无恐的话，更加火冒三丈。这个平素闭着双眼的支部书记，现在怒目圆睁，呼呼喷火了。他跳出里屋门槛，站到院庭里，对着即将走出街门的梆子老太的背影，大声嘲骂说：“那个害人的婆娘给捉起来了！你找不上了……”

胡长海的老婆正在门外看守淘净晾晒的粮食，听见喊声，慌忙奔进院子："你疯了？"

"欺人太甚！"胡长海余怒未息，把老伴平素叮嘱他的话完全忘记了，"这个混世婆娘……"

九、春天的梆子井

梆子老太远远望见，大队办公室的玻璃窗户上亮着电灯光。春天的夜晚，温柔的夜风。从敞开的窗户里，传出忽高忽低的说话声，一阵争论，又一阵笑声，总能听出杂乱的声音里胡长海那种苍劲的声音，那声音里透出一种刚强和沉稳的气色。梆子老太听惯了胡长海吭吭吧吧的那种说话声，现在倒像是蜕换成另一个人了，说话畅快了，声音高昂了。她此刻听到这种变化明显的声音，心里怪不是味儿。

胡长海在办公室召开什么会议呢？咋能连她也不通知参加？梆子老太生气地想，没有她参加的会议，算是什么会议呢？自从梆子老太登上梆子井村的政治舞台，大队办公室是她一贯坐镇的地方。她在这儿主持召开各种会议，接待来人来访，给五类分子训话……胡长海像是有意躲避她似的，从来是绕着大队办公室的门口走。现在，他召开什么会议，竟然不通知梆子老太参加？她所负责的临时领导小组虽然名存实亡，而贫协主任却是毫不含糊的。

梆子老太愈想，气儿愈加不顺，把出席过地区一级"活学活用"的先进人物甩开，胡长海眼里还有谁呢？她照直朝大队办公室的大门走来，你不通知我，我自个找上门来，看你咋说？贫协主任有权监督一切！

她气突突地走进门，往屋子中间一站，一只手不自觉地叉在腰上了。果然，在她往常坐用的那把红漆靠背木椅上，坐着胡长海——不，这家伙不是坐着，而是蹲在椅子上，身子前倾，正在和谁大声争论，会开得好像很热闹。

“你们……正开会？”梆子老太想直问，你们开什么黑会呢？可是看看会场那四五个人的脸色，这样的话不好出口了。她的舌头临时打了弯儿，把话改变了。

“噢！”胡长海转过头，这才注意到她，眼一眨，完全明白了梆子老太的来意，毫不含糊地解释说，“党支部召开支委会，研究工作哩！”

梆子老太肚里气得鼓鼓，却开不得口，她不是支部委员，毫无办法！多年以来，在她执政的年月里，从来没有分门别类地召开过什么名堂的会议，全是“一揽子会”。在好多场合下，需要谁参加，全是由她点了名，再让会计花儿去通知。胡长海从来也没主动召开过支委会，倒是她有时通知他来参加一些会议，表示有党的领导人来哩。胡长海在她主持召集的大小规模的会议上，总是蹲靠在办公室里那根明柱下，头低在两膝之间，自头至尾不发表任何意见。梆子老太不由得瞅瞅往常开会时胡长海常蹲常靠的那根明柱，现在空下了，胡长海蹲到桌子旁边的椅子上去了！坐在他周围的那四个支部委员，没有谁打算搭理她，脸上全是明显的或隐蔽着的厌烦之色。梆子老太有点尴尬，贫协主任能监督一切，却不能参加党支部会议。她勉强装出无意间走进办公室的神气，说：“那好，你们开会……我走。”

“没关系，会开完咧。”胡长海大声说，“你坐下，甭急着走，我正想寻你哩！”

那位女支委懒洋洋地挪一挪屁股，给梆子老太在长凳上腾出一席之地，绷着脸儿招呼她坐下。

“关于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胡长海看着梆子老太坐下来，就说，“我晌午到公社参加了党委扩大会，后晌回来先给支委们传达。按照公社党委的安排意见，先成立一个领导小组，有计划有组织搞好这件工作……”

“唔……”梆子老太恍然大悟，早就风传着要给五类分子平反，现在可见是实事了！怪道你胡长海说话声音这么粗壮，调门这样响亮呀！这些五类分子要是都平反了，那么她这多年专他们的政，要他们老实劳动、老实改造的事，全都错了！她的心在往下沉，慌乱了，说话也有点结巴了，“那……怎么弄呢？”

“我来挂帅！”胡长海说。

梆子老太心里轰然一响，鬓角哏哏直跳。胡长海口大气粗，简直浑身都是劲儿了。这是上级党委安排的工作，她有什么办法呢？世事怎么一下子翻了过来，怎么料想得到……看着胡长海得意的样子，她张了张口，没有说出话。

胡长海确实完全变成另外一个人了。他的多年闭着的眼睛，现在闪闪放光了！这个受梆子井村庄稼人拥戴的领袖人物，重新抖擞起精神来了！

“四清”运动中，他被斗得死去活来，没有弄出一分钱一斤粮的问题。临近“四清”运动结束时，工作队长说运动“考验”出他是“比较好的干部”，要他继续革命。他说他再经不起拳头和唾沫的“考验”了，当不了支书。直至工作队长用开除党籍来威胁，他才松了口。胡长海留任

支书后，还没来得及开一次支委会，“文革”开火了，造反派们要夺权了。他拍手大笑，拱拳作揖：“不用抢不要夺，这权我还没掌稳哩！谁要谁拿去……”

前年整党时，公社里要他当支书……仍然是在以处分相加的压力下，他又当上了。他当是当上了支书，实际跟没当一样。他整天在地里出工，偶尔被梆子老太叫去开会，他低头蹲到散会，总是不哼一声。他冷漠地看着梆子老太在村巷里奔走呼号……

“支书，公社里布置批林批孔……”

“你领着人去批吧！我记性不好……”

“公社明天要汇报，开了几回批判会，写下多少批判稿……”

“你去汇报吧！我感冒咧……”

他把梆子老太从眼前支使开，自己就又扛起家伙下地去了。

他心灰意冷……待他从“四清”运动骤然而起的冰雹中苏醒过来，第一眼看到的是被这场雹灾彻底击倒的前大队长胡振武。他和振武从土改干到一九六六年春天，人称梆子井的“左右手”。他比他更惨，一巴掌给抽到敌对阵营里去了……每当他看见振武脊背上背着打×的白布块，在村巷里扫街道，在田地里担稀粪，在河滩里扛石头，和那个老地主胡大头一起做惩罚性劳动，心里就不寒而栗！太令人伤情了啊！他的老婆一天三次给他敲警钟：“你大公无私！你一心为社员！你……振武的下场等着你哩！”

他冷眼看着梆子老太东奔西颠，唾沫飞溅，而不予理睬。或者说，他根本就没有把这个多嘴多舌的女人放到眼里。那纯粹是一个既

没有本事，也没有德行的人；怎能指望一个既无本事而且心术不正的人办出有益于社会和群众的事来?

他和景荣老五年龄相仿，他和年轻的伙伴们从黄家圪(
)把她用花轿给景荣老五抬回来，在一个村庄里生活了几十年了，他不知她的什么秉性呢！作为一般妇女，她有令人同情的生理缺陷，谁也不能因此下看她，这是普通常识。作为一般社员，她心眼窄些，有点“盼人穷”的毛病，也坏不了梆子井任何人的任何事，须知旁人是无法“盼”得“穷”的嘛！可是，梆子老太一登上梆子井的权力宝座，这个女人一下子变得非同小可，搅得四处不安了！

他决计不跟她共事。她喊她叫，他只是不在乎地笑笑。他不屑于跟她去辩争——揭露和排除这样一个女人能费多大劲嘛！问题在于:时势不对。时势正在把这个昏头昏脑的女人哄抬起来，竟然登上县和地区的讲台了……他能跟她争执什么呢?

“我来当组长。”胡长海重复一遍，毫不拖泥带水，过去的那种干练的办事作风又显现出来，“领导小组三个人，还有你和大队长。”

梆子老太本想一口回绝：不当！不当你的什么平反领导小组成员！要她给那些人去平反，那不是让自己打自己的耳光吗? 想想，即使她不当，平反工作还是要进行的，反倒失去了监督胡长海他们的机会。她终于没有应声，算是默认了。

“下设专案组，拟定七个人。”胡长海继续说，“工作量大！咱们小小的梆子井，粗略算一算，两场运动（‘四清’加上‘文革’）中需要复查的人，不下二十个！当然，有些人的案子简单些……”

“专案组的七个人都是谁呢？”梆子老太问。领导小组的三个成员，是由支部、大队管委会和贫协三家的头头组成，各代表一方。专案组物色的什么人呢？胡长海肯定会把他的人手安插进去。她准备在这个问题上不作退让。

“专案组的成员，一要公道，二要有点文化。”胡长海说，“明天召开社员会，让大家推举。”

“那样……”梆子老太一愣，这样的选举办法，对于她所信用的那几个人，一个也选不上去。她急中生智，“我看应该先在贫下中农中间酝酿，提出人选，再放到社员会上通过。”

“算咧！咱村除过一户老地主，五户中农，剩下全是贫下中农，甭多费一番手续了！”胡长海断然说，“时间短，任务重，麦收前要搞出个段落，免得干扰三夏。”

“可是，党在农村的阶级路线……”

“那些受冤受屈的人，早压得一天也憋不下去了！”胡长海从椅子上下来，站在梆子老太当面，沉重地说，“咱们少绕些弯路，该当早一天给他们把套枷打开！”

“怎么能是‘绕弯路’呢？”梆子老太认真地争执说，“依靠贫下中农，是党的路线……”

“你有意见，咱们个别谈。”胡长海并不介意她的话，可也并不打算改变已经定下的办法。他对支委们说，“大家回去吃晚饭吧！”

四个支委一转身全走掉了，好像谁也不愿意再听她啰唆。梆子老太心里冒气，全都把她当什么累赘一样讨厌了。是谁刚走出门，就在

院子里呼喊起胡长海，也叫他赶快回家吃饭……

梆子老太似乎感到脚下铺地的砖块在下陷，在崩塌，不祥的阴云愈加浓厚地聚积到胸间。

无法改变了！无可挽回了！她也不再开口，示威似的猛转过身，走出门去了。给胡长海点难看！

夜幕笼罩着树荫苍郁的梆子井。西边河天相接的地方，有轻烟似的一缕亮光。河川里的麦苗的气息，随着夜风弥漫到村巷里来了。有人在畅快地谈论，日前那一场透雨下得太好了，太神了！于麦子拔节好，于棉花播种也好，于一切庄稼的生长都好极了！

“经公社党委批准，将胡振武同志在‘四清’和‘文革’中受到的一切诬蔑不实之词，全部推倒，予以平反。现决定：一、撤销胡振武家庭地主成分的决定，恢复下中农成分；二、撤销对胡振武做出的地主分子的决定，恢复一切公民权利；三、恢复胡振武同志中国共产党党籍……”

公社党委常书记亲自宣布党委的决定，还没落音，掌声就把一切声音都淹没了。

这是一九七九年的早春时节，历史将记载这个重要的年代，梆子井的庄稼人，也难以忘记这个年代发生的生动的一幕。

胡振武浑身颤抖，头脸上涌下黄豆大的汗珠。这个强硬的庄稼汉子，在他扣着地主分子帽子的整整十三年里，梆子井村的男女老少，谁也没见过他流一滴眼泪。现在，汗水和泪水从鼻翼两边涌流下来了，竟然站立不稳，一个踉跄，几乎摔倒。站在麦克风前主持大会的

胡长海双手扶住他，两人抱扶着，“哇”的一声哭了，同时在讲台上蹲下身去……

梆子老太作为平反领导小组成员，也坐在主席台一角，无论怎样努力使劲，总是抬不起头来。平心而论，在给胡振武定地主成分的问题上，她没有提供什么虚假的证据。只是在她把他当敌人专政的时候，也许过分了一些……人无法掩饰自己干过的亏心事被揭穿以后的尴尬情绪，更无法鼓出与几百双鄙视的眼睛相对峙相抗衡的力量……

“欢迎胡振武上马！”

一声粗浑的呼声刚落，立时激起洪大的响声，在会场背后的黄土崖上发出回响……

“社员胡振汉在河滩开荒种红苕，是党的政策允许的事。现在决定：将没收胡振汉同志的三间瓦房，退赔本人。”

胡振汉从讲台下爬上台子，愣呆呆地盯着常书记。梆子井村的庄稼人忽然发现，当年开荒种地的壮年汉子，现在老了！他腰弯背驼，一只眼睛里蒙着一层白盖儿，苍老成这个样子了啊！他哆嗦着手，狠着声问：“你这回说话算话？”常书记没有回答，瞧着老汉，嘴唇也抖动着，用涌满眼眶的热泪回答了乡亲父老。

教员胡学文十几年前在报纸上发表的那一篇小故事，“四清”时定为毒草，因为发端于梆子井，也一起平反了。常书记握着中年教师胡学文的手，鼓励他重新提笔……

胡振武、胡振汉、胡学文……一摆溜站在主席台上，接受公社党委常书记宣布的平反决定，接受台下几百个社员同情的目光。三月末

的太阳照射着南原坡根下的绿叶葱茏的梆子井，有人在会场剥掉棉衣了，太阳的热力好强呀！

梆子老太坐在主席台一角，心情与在场的庄稼人相去太远了。如果说胡振武被错划为地主分子与她的直接关系不大，那么胡振汉被定为国家困难时期的暴发户而被没收了三间新瓦房，却是她向工作队提供了“四十一车红苕”的确凿证据，工作队队长曾经赞扬她是“睡觉也睁着一只眼……”胡振汉老汉跌跌撞撞爬上台子，愣呆呆地问常书记“这回说话算不算话”的时候，梆子老太立时闭了眼，会场里投射过来的那么多眼光，简直要把她挤扁了。

梆子老太真想离开会场，立即回到屋里去，把门关紧，什么人也不要见，什么声音也不要听。她坐过多少次主席台，从来没有觉得坐在众人头前是如此别扭！可是，怎么好意思走掉呢?

需要平反的人太多了，啊啊！轮到胡选生了！梆子老太更加惶惑了，头上直冒虚汗。

“胡选生同志，你的问题平反了。”常书记宣布过平反决定以后，征询被平反者的意见，“你和家属还有什么意见、要求，尽管说。”

胡选生头也没抬，只是摇摇乱蓬蓬的脑袋。

“常书记！你不知……”胡选生的父亲胡大脚，挤到台前来，溅着唾沫星，急头急脑地说，“把娃的好前程毁了哇！人家军队上原先要……”

胡选生一把把老汉扯得坐在地上了。

会场里响起轻微的笑声。大伙笑胡大脚可爱的愚笨的举动。能给选生平反，再不按前科犯对待；彻底否定选生娘是地主小姐的说法，再不按逃亡地主去对待；彻底否定对你胡大脚兵痞的看法……还不足够你胡大脚和那位河南籍老伴畅快一番吗？居然提出选生毁不毁前程的事……

在那阵轻微的善意的笑声中，梆子老太愈加觉得如坐针毡了。

十、跌落

在社会上颠跑惯了也更多经见过大世面的人，一旦不得不把自己封闭在冷清的小院里，那种寂寞的慌乱简直不可忍受的。梆子老太关紧后门，又闭了街门，决心不复到村巷里去走动，工分也不想挣了。

景荣老五出工去了。女儿早在四五年前婚嫁了，成了别人家里的一位成员了。儿子也在三年前娶下媳妇，因为婆媳关系不和睦，分家另过了，搬到村子东头的新庄基上去了。屋里现在剩下她一个人，没有一丝声息，老鼠公然在大白天也敢于在屋里穿游。

透过窗户，可以看见蓝天上纹丝不动的白云，伸到屋脊上空的绿色的树梢，南坡上泛绿的梯田。春天给自然界带来了繁荣，给梆子老太带来的却是凄风苦雨啊！

可是，梆子老太毕竟生活在梆子井的村巷里，无法把自己与世隔绝。轻柔的带着草木的清香气息的春风，从窗孔和门缝里吹进来了，街巷里的说话声，女人们的尖笑声，男人们打诨骂俏的声音，还是越过土打的围墙，传进小院里来了。她听了心烦，烦一切人的一切声

音。那架在树杈上的大喇叭，把许多使她烦恼的消息倾泻下来，梆子老太仍然不能求得一个心里安静的去处。

平反大会以后的整整三天里，白天晚上，梆子井村的男女老少，掂着烟袋，抱着娃娃，赶到胡振武家里去看望。邻近村庄里的熟人，也有不少男人们走进梆子井村来，端直朝胡振武家的门楼走去。胡振武家远远近近的亲戚，提着鸡蛋和烧酒，也纷纷赶来庆贺了……

胡振汉两口子，在搬进退赔的那三间瓦房的时候，居然在门口放了一长串鞭炮……

胡学文家来了两位戴眼镜的记者，说是他曾经发表过文章的那家报社专门派人来访问，记者鼓励他重新开始写稿，文艺政策也放宽了……

平反会后的第三天，就有人给胡选生介绍下对象，把女方引来和胡选生见面了……

梆子井村的生活乱了脚步，变成沸沸扬扬的一番景象了，被柴火垛子、粪堆和树木充塞着的街巷，由葱绿的小麦、棉苗和稻禾覆盖着的田野里，到处都议论纷纷，传说着稀罕的事。

梆子老太却出不得街门了。

梆子老太百思不得其解，怪她的什么呢？她错在哪里呢？难道不是“四清”工作队队长亲自跑到她家里，千方百计鼓励她揭发出胡振汉的“四十一车红苕”的事吗？她当初记下这个数字的时候，不过是出于好奇，而决没有想到后来去揭发。她当贫协主任，难道不是众人举拳头选举的吗？她当临时领导小组组长，难道不是那两位解放军的命令

吗？让她抓对阶级敌人的斗争，难道不是各级领导每一次会议布置的要求吗？她从公社到地区逐步去“讲用”，难道是她自己能决定的事吗？现在，梆子井村的庄稼人，不管这些事情是谁布置她做的，而只知鄙夷地朝她翻白眼了！

大队会计花儿，尖着嗓子几乎天天晚上在大喇叭上宣布通知，有县上的，也有公社的，还有梆子井大队自己开会的通知。有的通知支书胡长海参加，有的通知刚刚被众人拥上台的胡振武参加，独独没有通知梆子老太参加的会议。贫协主任被闲置下来了，梆子老太被各级政府遗忘了，冷落了。十余年来，她在县、社两级参加了多少次各种名称的会议，会议多得她都开烦了。现在，十天半月里没有她出去开会的一次机会，似乎于生活里严重缺少了什么。听着别人去这里那里开会，她心里很别扭，觉得自己被冷落到这样的地步，简直活不下去了。

她有一肚子想不通的问题，决计到公社去找党委常书记问一问，现行的政策到底是啥政策？适逢花儿在当晚的广播中，通知贫协主任到公社去开会，正好。

梆子老太早早来到公社，端直坐到公社小礼堂的前排靠背连椅上。这是公社党委常书记亲自主持的会议，足见其重要了。梆子老太不会写字，就集中精力，努力去听。

万万没有料到，常书记宣读的文件，竟然是在农村各级政权中取消贫下中农协会这个机构的内容。文件说，以后再不提贫下中农这个说法，只说社员……梆子老太耳朵里呜呜呜响，怀疑自己的耳朵是否出了毛病。

就是在这个小礼堂里，常书记多少次强调过，要依靠贫农和下中农，抓紧阶级斗争这根弦呀！他现在却念着一份要取消贫协的文件，难道把他过去说过的话都忘记了吗?

不管梆子老太想得通或想不通，常书记宣读的文件，却是省委郑重其事发下来的。常书记一边念着文件，一边做着解释。梆子老太心里乱糟糟的，耳朵里乱嗡嗡的，一句也听不进去。邻近坐着的几个贫协干部，叽叽咕咕在小声议论，也是料想不到又不大想得通的话，夹杂着牢骚。她似乎受到鼓舞，在常书记要大家讨论的时候，第一个开口发言了。

“毛主席说，没有贫农，就没有革命。”梆子老太像受了委屈，委屈得几乎要流泪了，口气却是怒冲冲地质问，“老人家去世了，说过的话也不算数了？”

“黄桂英同志很直爽，把自己想不通的话直言提出来，这很好嘛！”常书记不恼也不怒，笑嘻嘻地说（梆子老太简直不能容忍这种不经心的轻松的笑），似乎早有思想准备，不慌不忙地瞧瞧众人，又笑着问，“黄桂英同志，你知道不知道，主席讲这句话，是在哪一年？”

“‘四清’运动那年讲的嘛！”梆子老太胸有成竹，不假思索，脱口而出道，“主席刚讲下十来年，就不管用了呀？”

有几位年轻的贫协干部吃吃笑起来，他们大约知道梆子老太说错了，而且错得太远了。

“你大概是‘四清’当中才听到主席的这句话。”常书记不笑了，表情庄重。他在农村工作好多年，此类笑话早已不足为奇。对于没有文化的农民，这种情况是正常的，像见多识广的城里人分不清谷子和糜

子一样正常。他耐心地解释说，“这句话，主席是在一九二七年讲的，离今天五十多年了。‘四清’运动当中重新喊响起来的。”

“不管哪一年，总是他老人家讲的话。”梆子老太不仅不窘，反觉得理直气壮，“现在不管用了吗？”

“五十多年前，地主阶级统治中国乡村，贫农受压迫，贫农是党领导的革命的中坚力量。五十多年后的今天，乡村里是共产党领导了，搞农业现代化建设，要团结全体农民群众，治穷致富，情况和形势早已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同志们应该想得通……”

“我想不通！”梆子老太积聚在胸间的闷气，终于压不住了，把她在自家小院里关门自守时想到的问题，捅出来了，“现在是：五类分子张狂咧！贫下中农不香咧……”

“黄桂英同志的这个话，我在其他村里也听到过。”常书记仍然不动气，倒显得老练而宽容，但是却认真地说，“我们也应该问问自己：脑子里有没有‘左’的东西？过去的工作中有没有过火的地方？”

梆子老太张不开口了。过去有没有过火的事呢？这是常书记巧妙的对她的批评了。她又多么委屈、多么服不下这口气呀！多少回，坐在这个小礼堂的连椅上，常书记安排任何工作，头一条总是抓阶级斗争，最后一条总是搞生产。他安排让她去抓胡振武等人的破坏活动，现在反问她有没有“左”的东西。她忽然想到儿子骂过她的一句话：“公社干部吃公粮，挣工资，人家把你当猴耍……”她的脑子里一震，真应了儿子的话吗？顿然觉得往常里很敬重的领导者也不值得那么可亲可敬了！

“我在公社这几年的工作中，有不少错误，主要是‘左’的思想造成的错误。”常书记诚恳地盯着梆子老太，又扫过整个会场，沉重地说，“我正在筹备党委扩大会，中心是解放思想，打破‘左’的教条。欢迎大家将来给党委，特别是对我本人提意见。”

梆子老太安静下来了，心里的气往下泄，既然常书记承认自己“左”了，她还能“端正”吗?

“我需要清理一下脑袋了！”常书记沉痛地说，“‘文革’中我赔了两根肋骨，重新工作以后，却搞了好多‘左’的名堂……”完全是痛心疾首的神色，对大家说，“我给你们也灌输过不少错误的东西，咱们应该一起清理……”

梆子老太有点难受，她忽然想哭，不是为常书记难受，而是为自己……会议结束后，她端直走出公社院子，又走出了大门。到这里来开会，大约是最后一次了，既然贫协取消了，她就什么干部也不是了！心里激起一股酸溃溃的东西，腿脚都软了，简直跟做梦一样啊！现在，她又是什么头衔也不披挂的那个弹花匠胡景荣家里的老婆了……

梆子老太在田野里的大路上走着。收割过麦子的土地上，秋庄稼又罩上一层淡淡的嫩绿。天空高远，热气蒸腾，人们躲在屋里歇晌，还不到后晌出工的时间，田野里静静悄悄。

——“黄桂英同志，睡觉也睁着一只眼！”

——“人家是哄得憨狗咬石狮子……”

那些胖的或瘦的各级领导的脸孔，和景荣老五憨厚的黑脸同时在眼前叠印；那些领导们热情赞扬她的话，和景荣老五的冷言冷语同时在耳朵边响起，不光彩的记忆啊！

苞谷苗儿蓬蓬勃勃长起来了，棉花已经开花坐桃了，一片连一片的苞谷，一块接一块的棉花，田野这样静谧。梆子老太走着，真想坐在地塄上，放声痛哭一场，胸间的酸水积得盛不下了，哭一场，也许会轻松一下。既没有丧事，又没有闹家庭纠纷，平白无故地在这儿哭号，遇见路过的熟人，会怎么说她呢?

梆子老太终于忍住没有哭，走回梆子井村了。她从来也没有像今天感到如此疲倦。走到村口，梆子井村通往南坡和河川的几条土路上，男男女女扛着工具去出工。从塄坎上朝河川里一瞅，在白杨参天的机耕大路和灌溉大渠交叉的拱桥上，站着两个人，梆子井大队支部书记胡长海和新任大队长胡振武，两人穿着汗夹，站在一堆，对着广阔的河川指指点点，大声说着什么。她心中不知是一种什么滋味，转头走回村子里去了。

走过代销店门口的时候，她听见几个婆娘说话的声音:

“多日不见梆子老太，怪想的……嘿嘿嘿！”

“你想听她敲梆子了? 耳朵刚清闲下来……”

“梆子长，梆子短，梆子从早敲到晚。不怕风刮日头晒，单怕梆子黄老太……哈哈哈……”

“嘻嘻嘻……”

梆子老太吐一口唾沫，走过去了，真是墙倒众人推！

她一走进院子，看见景荣老五扛着长柄锄头，准备去出工。梆子老太再也忍不住，扑到景荣老五怀里，失声痛哭了。

“这……咋咧？”景荣老五扔下锄头，扶住老伴，“看人家盯见……笑话……”

“唉嗨嗨嗨嗨……”梆子老太浑身都软了。

“这……”景荣老五也难受了。他能理知老婆的心情。虽然她过去不听他的话，而今落到这样难受的地步，他不给她宽心，还有谁呢？她毕竟跟他过了一辈子穷苦日子，给他缝衣绱鞋，虽然针脚粗放，总是能在下雪以前穿上棉衣，春天来到时换上单衫啊！再说，她是被人家哄弄得昏头昏脑了，没主见的傻女人……

“我现在才明白……”梆子老太被老汉搀扶进屋里，拍打着景荣老五的胸膛，哭着说，“只你是……我的……实在的亲人……”

景荣老五也难受了，鼻腔酸酸的，抽一下鼻子，想再安慰老伴几句，却没词儿了。许久，他只能用自己的老话安慰说：“过去的事……错的对的，都甭想了！咱过咱的……日月……”

不管梆子老太心里怎样想，急骤变化着的生活，还是把她从关紧前门和后门的小院里挟裹进梆子井村男女社员中间来了。

胡长海和胡振武召开社员大会，要在队里划分作业组了。她不参加别的会议问题不大，这个会不参加是逃脱不了的。人家划成作业组劳动，她跟谁在一起挣工分呢？日后分粮呢？

她坐在会场偏远的边角上，再不想到人前走动了。胡振武宣布了作业组的组合办法，胡长海叮嘱了几件应该注意的事项，就把男社员

划定到会场东边，女社员划到西边，让他们去商量，去自由结合，去选择自己的组长，原则是：人合脾气马合套，不要勉强。

妇女们叽叽嘎嘎的笑声、喊声、吵闹声覆盖了整个会场，显得聚积在会场东边的那些男子汉们太老实了。她们公开地互相串联，互相靠拢。很快的，那些老婆、媳妇和姑娘们，划归成三堆儿了，而且推举出三个组长来。

梆子老太远远地坐在一棵伐倒的榆树干上，没有人来拉扯她入组。年轻女人没人拉她，老婆婆们也没人来拉她入组，全都远远地躲避到一边去了。梆子老太坐在那儿，难堪地听着那些婆娘女子们叽叽喳喳地笑闹，冷眼瞅着会场。她不想向任何人低声下气，申求她们收留自己入组。她知道她们讨厌她，她也在这样的场合里抹不下脸呢！看你胡长海怎么办吧！总不能把我排除出梆子井吧?

胡振武接过三个妇女组长送交给他的名单，一一审查着，问她们："再看看，把哪个女社员漏掉了没？"

"没有。"三个组长说。

"没有参加会的人呢？还有今日不在家的……"

"唔！小牛妈到她娘家去了，划到俺组吧！"

"还有谁？齐摆摆数一遍！"胡振武大声说。

胡振武说着，抬头看到人堆后边坐在榆木树干上的梆子老太，又低头查看分组名单，没有发现黄桂英的名字，似乎明白了什么，问："黄老太划在谁的组里了？"

梆子老太立即偏转开脸，心想，明知没有人收留我，你大声咋呼，故意丢我的面子！

三个妇女都不说话。很明显，谁也不愿意要梆子老太入组。

“搁到你那一组。”胡振武命令似的对他的儿媳妇说，“再甭推诿了，再推下去不好了。”

怀里已经抱着一个会笑的娃子的陕北媳妇兰铃铃，没有说话，完全体察到了作为大队长的阿公的难处，抱着孩子走到她的那一堆组员跟前，操着陕北调儿说：“就这样吧！算我主观一回。要不，我也不当组长了。”

组员们勉强同意了。解放从陕北山区娶来的这个媳妇，到梆子井村几年来，以她的率直、朴实和勤劳，赢得了男女老幼的夸赞，甚至那一口生硬的陕北话儿，听来也别有风味。梆子井的庄稼人崇尚正直和勤劳，并不狭隘地一律排斥外地人。她们一致推举她当作业组长。

“黄老太，参加我们这一组吧！”兰铃铃抱着孩子，走到梆子老太面前，毫不介意这位曾经刁难过她和解放结婚的前梆子井大队的掌权人，像什么事也不曾发生过，或者是因为过去发生过那件令人反感的往事，今天更需要毫不介意地和这位长辈相处。总之，兰铃铃态度自然，说话得体，一切都恰到好处，“走吧，黄老太，咱们组里还得定几条劳动纪律哩！”

好多人在悄声叨咕，看着混混乱乱的会场一角里的这段小插曲，更加佩服这个陕北来的媳妇，心肠好，肚量大，不记恨人……

梆子老太反倒不知如何是好了。她的脸热躁躁地难受，似乎血液一下子全都涌到面部来了。这个因为要“找一个产粮的地方”而愿意走进当时是敌人的胡振武家门楼的陕北姑娘，笑盈盈地站在她的面前，拉扯她去入组，梆子老太从心底里惭愧了。

太令人尴尬了！梆子老太不好意思立马应诺，又没有力量拒绝，难在人家面前开口呀！

“好咧！”兰铃铃像是摸透了她的心思，也就转过身走了，唱歌似的畅快地说，“我把你的名字写上了！黄老太……”

尾声

胡长海和胡振武参加县委农村工作会议回来了。

新的农业经济政策又从中央传达下来了，县委已经做出执行决定：各种形式的责任制，由社员讨论选择，干部不要主观干涉，包括“大包干”的责任制形式，即把土地和牲畜承包到一家一户去……

生活发展的步子太快了，连性急的人也觉得赶不上趟了。这样宽限的农业政策，连多年来受批挨整的胡长海和胡振武，起初听到时也目瞪口呆了。他们俩在梆子井村的土地改革结束以后，组织互助组，又建立起农业社，地畔上的界石是他俩带领着社员，一个一个拔除掉的；牲畜是他俩一家一户说服动员集中到大槽上来的。现在，得由他俩再把一条条地畔划分开来，把一头头牲畜送交社员牵回家里去饲养……

不管感情上是否完全通畅，他们已经向县委明确表示：保证尊重社员意见，由社员选择责任承包的形式。他们也伤脑筋：包干到组的

办法实行不到一年，麻烦更多，难以为继了……

两人春风满面，走进梆子井街巷，突然看见队长龙生和景荣老五在门口拉拉扯扯，龙生急得满脸汗水，景荣老五急头晕脑，要从龙生的拉扯中挣脱出来，不知发生了什么事。经旁边一个看热闹的小伙子悄悄说明缘由，两人都愣住了：怎么弄出这号没名堂的事呢？

胡长海和胡振武快步走到跟前。

“好五爷，你咋胡来哩嘛！”胡长海说。

“你真个老糊涂了吗？”振武也说。

两人说着，把景荣老五拖着架着拉进屋里去了。

胡振武紧紧勒在腰里的布带，捞起皮绳，动手在棺材上捆绑抬杠。他说：“长海哥，你去叫人吧！”

胡长海走出门去了。

胡振武捆绑好抬杠，和景荣老五挨肩坐在条凳上，接过老五递来的一支纸烟，点着了，诚恳地说：“你一个人怎么办呢？想法子和娃娃合到一起过吧！要是你愿意，我给那小两口子说话……”

景荣老五感慨地摆摆头：“缓后再说……”

“心放开，五爷！”振武说，“庄稼人的好事来了啊！”

陆陆续续有人走进院里来了。景荣老五拿着纸烟，给大家敬着。

胡振武蹲下身，把一条抬杠压到自己肩上，七八个汉子先后蹲下身，肩膀顶着抬杠了。

胡长海大喝一声：“起！”装着梆子老太尸体的棺木平平稳稳离开地面，起动了。

孝子和亲戚在灵柩起动的一刹那，哭声骤然爆发了。

吹鼓手们吹打起悠扬哀婉的祭灵曲。

那些随后跟来的人，扛着镢头和铁锨，尾随在灵柩后，朝坟地赶去。

一切进行得顺顺当当，梆子老太的灵柩安然入土了，梯田根隆起一个黄土墓堆。所有参加埋葬的人，在坟地上轮流对着瓶口，喝了景荣老五敬奉给掩埋人的答谢烧酒，再接过一支香烟，就沿着山坡上的小路往下走。

往昔里，他们埋葬了梆子井村的任何一位死者，喝了酒，咂上纸烟，回去的路上，总是以惋惜的声调，谈论死者生前一切可以记忆的光荣，如何耿直，如何勤俭，如何孝顺父母，如何敬重乡党……绝不提死者生前一切不大光彩的作为，似乎也成了一条习俗，算是生者对死者的一种庄稼人式的伟大宽容吧！

现在，人们缓缓走在坡间小路上，既不谈梆子老太的好处，也绝口不提她的过失，什么都不说，只是感叹今年麦子长得好，好得简直令人难以相信这是梆子井村的田地里长出的庄稼！你看吧！坡地和滩地，旱田和水田，全是一样成色，不分彼此，似乎种到石头窝里，也会长出好麦子来！人说“麦吃三场雨”，从播种到入夏，场场雨都下得

及时而又足透，肥料又供应得充足，麦子怎能不长呢？真是政通人和，风调雨顺哪……

1984年2月 西安东郊

十八岁的哥哥

一

刷——刷——刷——

一张粗铁丝编织的双层罗网，用三角木架支撑在沙滩上，他手握一把被砂石蹭磨得明光锃亮的钢皮锨，前弓后踮着腿，从沙梁上铲起饱饱的一锨砂石，一扬手，就抛甩到罗网上，于是就发出这种连续不断的既富于节奏而又沉闷单调的响声。

经过规格不同的双层罗网的过滤，砂石顺着隔板，分路滚落到两只同样用粗铁丝编制的笼筐里，细沙透过双层罗网的网眼，丢落在沙地上。笼筐里的石头装满了，他把铁锨插在沙堆上，一猫腰，提起笼筐，跨开长腿，甩着左臂，扭着犍牛犊一般强健的身躯，走上沙梁，哗啦一声把石头倒在石头堆子上，直起腰，从脖子上扯下毛巾，擦拭脸颊上的汗水。

太阳即将出山的这一瞬间，秦岭的群峰沉浮在玫瑰色的霞光里，山峰的陡峭挺拔的雄姿顿然变得模糊了，线条柔和了，面目朦胧了，和玫瑰色的天空融合在一起了。蓝莹莹的细细的流水，冬季里裸露的沙滩，落光了叶子的杨柳林带，霜花蒙蒙的麦田，也都沐浴在瞬息万变的霞光里。整个河滩宽阔的沙地上，罗网林立，铁锨闪光，砂石撞击罗网的刷啦声响，杂乱而又刺耳，和这样瑰丽的初冬清晨的美景极不协调地统一在一起。

他把倒掉了石头的笼筐重新搁稳到罗网下面，往掌心喷一喷口水，双手搓一搓，掌心里发出嚓嚓嚓的响声，茧痂和茧痂搓摩，竟有这样粗糙的声响，铁锨木把儿在他手掌上开始留下劳动的印记了。他有趣地笑笑，捞起铁锨，低头铲起一锨砂石，扬手抛甩到罗网上。

一切都显得十分简单：抛沙取石，卖石头挣钱。只需给手心喷上唾液，攥紧锨把儿，使足劲儿，出力流汗就解决一切问题了。不要精心的谋划，也不必过细的算计，只要一天三顿塞饱肚子，胳膊上有源源不断的力气产生出来就行啰……绕口的数学公式呀，冗长的政治名词的概念呀，堆积如山的数理化习题呀，令人惶惶不安的频繁的考试呀，都像脚印一样留在身后，遥远而又冷寂了。他——十八岁的高中毕业生曹润生，作为一个年轻的庄稼汉，加入曹村庄稼汉们庞大的劳动大军中来了。

一切既显得简单，也很自然。

他背着书包，车架上捆绑着被褥卷儿，网袋里装着脸盆、牙具和杂物，涉过小河，从五里镇中学回到曹村来了。

父亲在门口的槐树下，正用一把铁梳子给黄牛梳刮着皮毛，抬起头，淡淡地问："念完了？"

"完了。"他说，也是淡淡的口气，"毕业了。"

"大学……考得咋样？"

"不咋样。"

父亲就不再问了，继续用铁梳子梳刮黄牛卧圈时粘在臀部和肚皮上的粪痂和土屑。他只精通作务庄稼和养育牲畜，连自己的名字也写

不到一块的粗笨庄稼汉，对于儿子念书和考学的事，大约连问询的话题也找不出来……

一月后，他接到一封信，那是高等学校统考成绩通知单。他看了一眼，就塞到裤兜里去了，结果是羞于让人再看一眼，或者告诉他人的。

“润娃，心放开！”父亲显然猜透了信的内容，不用询问，就朗声宽慰儿子，“而今考大学跟中状元一样，太难咧！听人说，咱小河一川几十个村子，只考中了一个女子，人说那女子连着考了三年才得中……”

“嗯……”他不置可否地应着。

“你要是不死心，再念一年，明年再考一回，爸供给你。”父亲说，“爸做那几亩庄稼，还成哩！”

“不咧！”润生苦笑着摇摇头，口气却是坚定的。他的高考成绩离得那个录取的分数杠儿，距离太远了。他看着父亲皱皱巴巴的脸颊上的笑纹，反倒难受了。是啊！他供给他念到高中毕业，花了多少钱哪！而他却把好多时间抛洒在五里镇中学的篮球场上了，他断然说，“不用补习了，爸。”

“那也好！而今做庄稼，日子也好过了。”父亲轻松地笑着，仍然在替儿子宽解。在他看来，年轻人都想通过念书考试而进入城市，达不到目的的就三心二意，连做庄稼也觉得没意思了。他说，“你看看，天底下的庄稼人有多少……甭在心！”

他和父亲在自家的责任田里秋收，掰苞谷，掐谷子，随后就在收获过庄稼的田地里播种下了麦子，当秋收秋播的忙季一过，父子俩闲下了。

“得寻个活儿干呀！庄稼人怎能闲吃闲坐呢？”父亲在灯下抽着旱烟，“整整一个冬天，整整一个春天，到搭镰割麦，地里没活儿。润娃，你得搞个营生呀！”

润生靠在炕边，他早就想着自己该干的营生了。五六亩责任田，不够父亲一双手收拾。家里那三十多只母鸡，属于母亲的宝贝，用不着他经营。黄牛生下一头母牛犊，母猪产下的十二只小崽，那是父亲的爱物，更不必他插手抚养。鸡呀，猪呀，牛呀，这些东西，他全无兴趣，见着都觉得烦！他喜欢蜜蜂，早就想着有一群蜜蜂，春天到南方，夏天到北方，搭火车，乘汽车，天南海北去放蜂，去赶花。那些嘎嘎嘎叫着的笨拙的母鸡，那肮脏的丑陋的老母猪，那行动迟缓的老黄牛，有什么意思呢！那金色的蜜蜂，嗡儿嗡儿的，酿出雪白的或金黄的蜜来，够多有趣啊！

“我早想好了——”润生看父亲一眼，胸有成竹地说，“我要养蜂，爸，我把一本《养蜂学》看得快要背过了。”

“哪来的本钱呢？”父亲总是切实地想问题，“一箱蜂要七八十块钱，咱能买起几箱呢？养得少，划不着；养多，又没那么大的本钱……”

“给我买一张罗网。”润生早有打算，“我下河滩捞石头，挣下钱来买蜂。东杨村俺同学家养了十群意大利蜜蜂，他爸不会管理，没赚着

利，不想养了。我想把他那些蜜蜂连窝端过来。我今年捞一冬石头，挣的钱差不多够了。”

“你爱弄，就去弄那蜂儿去。”父亲从来不违拗儿子，总是顺着儿子的兴趣。他生过六个女子，五十大关上才得到这么个宝贝儿子，爱子之心可以想见了。况且，曹村的曹安勤就养着一群蜂，走南闯北，赚得一把好钱。儿子养蜂是正经营生，不是玩狗耍鸽子的二流子行径嘛。他说，“你去捞石头吧！挣下钱你自个攒着，给你买蜂去。要是不够，爸卖了这窝猪娃，给你添补……”

他扛上铁锨和罗网，走出自家小院低矮的门楼，下了场塄，下河滩来了。河滩里刚刚落下头一场小雪，冬小麦嫩绿的叶尖翘在薄雪上头。像河岸两边的庄稼人一样，在宽阔的沙滩上，选择一道石头多的沙梁，用三角木架支撑起罗网，用铁锨抛起第一锨砂石，石头撞击崭新的铁丝罗网的第一声响亮的声音，新奇而又陌生，长久地留在他的记忆里。

沙滩上拥挤着多少人啊，男人女人，壮汉青年，有的是一人一张罗网，有的父子、夫妻合着一张罗网，摆开架势，抛沙取石。整个河滩上，都是石头撞击罗网的杂乱的刷啦声。土地下户了，冬闲了，多数找不到挣钱门路的人都下滩来了。这种劳动平稳，不需要四处奔波，一天三顿可以吃到自家锅里的热饭，晚上能在自家的热炕上歇息。不要投资，不要底本钱，只需花十几块钱买一张机器轧制的罗网就行了。不用任何人号召、动员，秋播一毕，庄稼人挂了犁、卸了铧，扛上罗网走下村前的河滩里来了。这儿是一个取之不尽、掏挖不竭的天然采石场，可以容纳一切人。

他没有烦恼，倒是很踏实地在曹村门前的沙滩上撑起了自己的罗网。他学业平平，只是个中等生，对于参加高考，本来就缺乏一定要考中的狠劲，结果自然是早可预料的。因为所望不高，失败时也就减轻了痛苦的程度。他喜欢蜜蜂，那个神秘的王国比什么大学现在都令人动心；他喜欢养蜂人的生活，天南海北去赶花采蜜……为了尽快地把东杨村那十群蜜蜂买过来，他现在必须埋头苦干，拼命抡动铁锨，从一锨一锨抛起的砂石中，挣下买蜂的钱来！东杨村那个同学他爸，简直是个大笨熊，把二十多箱可爱的金黄色的意大利纯种蜜蜂，弄死了大半，太可惜了……到他攒下千元款项的时候，就要把那十箱蜜蜂连窝端过来。那时候，他就扔下铁锨和罗网，离开这冬季奇冷而夏天特热的沙滩了……

刷——

曹润生抛着沙子。他穿一件蓝色秋衣，短头发的运动员平头上，热气蒸腾，红润润的脸膛上流着汗水，可胳膊上并不困乏。下河滩近一月来，最初的不适应重体力劳动的时期已经过去了，双手已经磨出厚硬的茧痂，无论速度和耐力，乃至捉锨扬沙的姿势，都完全可以与任何一位庄稼汉相抗衡了。在篮球场上训练出来的四肢，灵活而轻便；膀阔腰细，行动敏捷，连抛沙提笼倒石头的动作，都带着投篮时的优美的姿势。

他抹一把汗，欣赏着不断增高的石头堆子，嘴角露出得意的而又不满足的微笑，像球赛时瞥一眼记分牌上的积分数字的神气。这时候，一辆天蓝色的大卡车呜呜吼叫着，从河滩麦田间的白杨甬道上开到河岸边来了，这是今天早晨头一辆开到曹村河滩来的装载砂石的汽车。他扔下铁锨，迎着汽车奔去，有好多人已经从河滩的各个角落蹦起来，朝着汽车开来的方向奔跑。激烈的竞争出现了……

二

沙滩虽远离村庄，却不是世外桃源，竞争比在责任田里表现得更趋表面化、尖锐化。一家一户的责任田里，谁家的麦子长得好，谁家的棉苗齐壮，那得凭作务技术，默默地进行比赛和竞争，沙滩上不一样啰！不光是看谁的石头捞得多或捞得少，那只能是成功的一半，甚至是少一半；关键的关键是能不能及时地将汗水换来的石头卖掉；只有把石头装进大卡车或拖拉机的车厢，从驾驶员手里接过那一张盖有公社砂石管理站紫色条章的发票，那时才能心地踏实地说，汗水洗出来的人民币，切实地装进腰包了。石头捞得再多，堆在沙滩上不能卖掉，那只是一堆石头，不是票子！而一旦赶春节前后不能出手，小河在阳历四月就进入汛期，倘若一场洪水漫下来，汗水就算白流了。

每有一辆绿色或蓝色的卡车拐进河湾，就有一伙青年或老年的捞石头的庄稼人丢下铁锨，奔跑过去，汗渍斑驳的脸上做出巴结乞求的笑颜，捷足先登的小伙子一步跃上踏板，把早已点燃的香烟塞进司机的嘴巴，几乎千篇一律地重复着一句话："师傅，咱的石头，干净得跟水淘过一样……"

曹润生跑着，跑着，沙地上软绵绵的，跨出一步，软绵的沙子又把人滑回半步，全不像又硬又光的篮球场跑起来舒服。他也要卖石头，他必须参加这种竞争，他气喘吁吁地跑着，跑着，终于在半道上收住了脚步。晚了！已经有三四个人先后拦住汽车了，把汽车驾驶楼两边的窗口挤满了，自己起动得太晚了。他扭返身走回自己的沙梁，却听到粗壮的嗓音在吵闹，在对骂，进而动起拳脚了。好多人纷纷朝汽车跑去看热闹。润生也缓缓地跑过去，想看看究竟，谁和谁打架呢？

呀！五十多岁的长才大叔，鼻孔和嘴巴全给鲜红的血浆黏糊住了，怪怕人的。他坐在沙地上，双手死死地抱住一个名叫曹占孙的青年的右腿，嘴里叫骂着。曹占孙根本不在乎，嘴角叼着纸烟，眼睛瞟瞅着天空，一副傲慢而又蛮横的神气。

问题并不复杂，长才大叔和占孙大约同时奔到汽车跟前，占孙腿脚灵活，一跃就跳上汽车的踏板，肩膀把笨手笨脚的长才大叔撞倒了，跌扑在汽车旁边，差点给车轱辘压住腿脚。长才大叔慌忙爬起来，照着占孙的屁股踢了一脚，占孙反手一拳，打得他鼻血如注……奇怪的是，好多人围在汽车周围看热闹，却没有人动手拉架，长才大叔自知不是小伙子占孙的对手，没有敢再还手，就抱住他的腿脚不放，僵持着。为了出售自家的石头，争争吵吵的事时有发生，谁也不愿意介入到与自己关系不大的纠纷中去，冷漠地看一看，纷纷走散了。有几个人竟然围住司机，在缠磨，全然不顾这两个因为争执而发生冲突的人。司机坐在驾驶楼里，咂着烟卷，谁也不瞅，漫不经心地瞅着前头的沙滩，嘴里放出烟雾来。看着司机那副冷漠的架势，润生心里憎恶起来，瞧你那个架势！你下车来劝解一句，会劳你多少神呢?

润生看看长才大叔血糊糊的嘴巴，走上前，拉扯他的手臂，用一种自己也莫名其妙的大人们的口吻劝解："算咧！算咧！乡里乡亲，甭失了和气……"是啊，在学校里，班主任常常给他们讲文明道德，要尊重别人的人格，要尊老爱幼，要有礼貌……可是在这河滩野洼的地方，谁讲这些道理呢！

"叫他狗日的把我打死！我早就活得烦咧……"长才大叔喊着骂着。

“打死你？我划不着账哩……”占孙仍然傲慢地说。

长才大叔双手死死地抠在一起，掰也掰不开，润生一时找不到更有用的话劝解，作难了。他想对占孙说：你占了便宜，少说几句气话吧！或者道歉几句，长才大叔也就有脸从地上爬起来了呀！偏偏是占孙不买账，打了人还不松口，曹润生在心里憎恨那张蛮横的脸了。

“谁个叫曹润生？”

润生放开手，转过身，看见司机从驾驶楼的窗口探出头来，正在呼喊他的名字。怪！这位满脸络腮胡须的司机，从来没见过面，他怎么知道他的名字呢？润生愣愣地瞅着司机，说：“我就是。你找我……”

司机喷出一口烟，盯着他，问：“你的石头在哪儿？”

“下边……”润生愣愣地指着自己石头堆子所在的方向。

“装你的石头。”司机缩回脑袋，“走，引路。”

这是怎么回事呢？润生看见，围在汽车跟前纠缠司机的几位乡亲，全用一种探询的眼光一齐瞅住他了。润生明白众人那眼神里包含着什么意思：只有暗中行贿买通了什么人，才有这种指名道姓要装你石头的美事。可是，他没有给任何司机送过礼，也根本不认识公社砂石管理站的任何一位干部，这是怎么回事呢?

在这样的场合，遇见这种不期而遇的事，润生觉得众人的眼光像蒺藜狗子粘在脊背上，甚至觉得劝解长才大叔的举动都是虚伪的了。嗬！别人为拦车打得头破血流，你却不费口舌卖石头，还要装模作样来劝架……

他忽然灵机一动，对长才大叔说："快起来，装你的石头吧！"

长才大叔一惊，忽地从地上爬起，对占孙骂道："狗日的，走着看，我跟你不得完……"

润生已经跳上汽车踏板，手抓着驾驶楼上的窗边儿，引着司机，一直开到长才大叔的石头堆子跟前。

车门打开，中年司机从驾驶楼里走出来，跳到沙滩上，头发稀疏而胡须茂盛的中年汉子，挺着胸，凸着肚，帆布工作服的纽扣只扣住最下面一只，圆滚滚的肚子把毛衣撑得变了形。他走到石堆前，用脚拨拉一下石头，看看成色，随口问："这是你的石头吗？"

"是我大叔的。"润生说。

"别人指派我来拉你的石头！"司机说。

"我大叔的石头……"润生急忙说，"跟我的一码事。"

"装吧！"司机一摇手，车厢里的几个装卸工，纷纷跳下车来。

长才大叔已经在河水里洗过脸上的血污，用衣衫的下摆襟乱擦着水渍渍的脸颊，捞起铁锨，帮着陌生的装卸工们装起石头来，和占孙打架的事已经抛到脑后去了。刚撩拨了两锨，长才大叔停住手，从棉袄里掏出一包"金丝猴"香烟，一一塞给装卸工们。司机瞅一眼揉得皱皱巴巴的烟盒，不屑地推开了。长才大叔把烟盒又塞到润生手里："润娃，你陪着师傅抽烟！"

司机在沙地上坐下来，点燃了自己的黑色雪茄，用怪异的眼光盯着润生，说："小兄弟，你给公社砂石管理站进过多少贡啦？"

“进贡”这个词，是润生下到河滩以后常常听到的话，含义是行贿。在学校里，老师讲到过“贿赂”，乡村人过去说“塞黑食”，真是形象而又确切。不过，捞石头的庄稼人，既不习惯说高雅的“贿赂”，也丢弃了太直太露的俗语“塞黑食”，现在通用含蓄而又通俗的“进贡”这个词了。

可是，平心而论，简单而年轻的高中毕业生曹润生没有通过此道，连砂石管理站的前门或后门一概没有进去过。他压根儿不认识管理站任何一个人，即使想进点什么贡品，也是求告无门哪！他宁可去追拦卡车，和那些司机们纠缠，软磨，而这种乞求在河滩里没有人笑话。他追拦汽车的速度之快是无与伦比的，轻巧地跳上正在行驶中的汽车踏板的动作，也是无与伦比的。他曾经是本县中学生篮球代表队的主力中锋，那些笨拙的庄稼汉怎能相比呢！他的石头没有过多地囤积而及时卖掉了。

“有贡品我自个早享用了！”曹润生斜眼瞅着司机，感到了侮辱。你自个那么贪吃，以致把肚皮吃得连纽扣都扣不上了，却怀疑别人去进贡。他不屑地一扭头，“我还没学会哪！”

“那么……是你舅还是你姨父在管理站？”司机恶毒地嘲笑说，“那么一个狗屁管理站！”

“我儿子也不在那儿！”曹润生反唇还击，“谁要是进过管理站的大门——咱俩，谁是儿子！”曹润生解气地说，报复似的瞧着司机那张气得鼓鼓的脸颊。

“既然你没进贡，既然没有你舅你姨父在管理站，那——”司机紧盯着润生，两只鼓出的眼珠不怀好意地瞅着他，“那么我问你，砂石管

理站那个开票的女子，为啥把我调拨到曹村这个鬼地方来？为啥指名道姓要叫我拉你的石头？害得我多跑几十里路，多烧两公斤汽油……”

润生纳闷了，砂石管理站开票的女子姓甚名甚，他也不知道，真是摸不着头绪。看看司机愤愤不平的神气，不像说谎诓诈嘛！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那个长得怪疼人的女子，再三叮咛我，‘你到曹村去装石头，找一个曹润生的青年……’”络腮胡须司机压细嗓门，愚蠢地模仿着那个女子的嗓门调音儿，随之脸一变，戏谑地说，“那个女子是你媳妇吗？我看八九不离十……”

“胡说……”润生臊红了脸，心里忽然一动，会不会是她呢？她什么时候到砂石管理站去工作了？他可一点也不知晓。

“我说准了吧？脸红了哇！”司机开心地哈哈大笑，更加放肆地取笑说，“那女子长得好漂亮！小兄弟有艳福……哈哈哈……”

曹润生的脸一阵阵发热，心在胸脯里不安地跳弹起来。他的同班同学刘晓兰，什么时候到砂石管理站工作了，暗中给他行着方便。他无法抵挡络腮胡须司机那锥子一样尖锐的眼光，惶惑地避开了。

“有这样疼人的妞儿暗中保佑你……”司机站起来，友好地拍拍他的肩背，得意地笑着说，“你该当蹦起来才对呀！”

石头装满了，装卸工们先后爬上车厢，裹紧衣襟坐下来。司机钻进驾驶楼，发动了汽车，从车窗里探出头来，狡猾地笑着：“小兄弟，日后甭忘了老哥给你搭过一回桥哪……”汽车开走了。

长才大叔一边抹着脖子上的汗水，一边把一张卡片递过来：“润娃，你看，这上头写着几吨？”

“四吨半。”润生说。

长才大叔小心翼翼地把那张盖着紫红印章的卡片装进棉袄里头的口袋里，舒悦地笑着。他诚恳地拍着润生的肩膀，大嘴长舌头溅出唾沫星子，动情地说：“俺润娃到底念过高中，懂得礼行，跟那混蛋孙子不一样……”

润生听不进去长才大叔啰啰唆唆的话了，心里正在想着砂石管理站那个开票的女子……

“叔急着用钱哩！”长才大叔还在啰唆，“旁人给你小青哥说的那个媳妇，这月初六见面哩！正愁礼钱凑不够数儿……”

润生点点头，表示理会了。乡村里订婚结婚，那是庄稼人的头宗大事。他说：“你要是急用，我再给你拦车……咱们干活吧！”

长才大叔感激地点点头，夸赞着他，转过身走了。曹润生走回到自己的罗网前，捞起锨把儿，抛甩起砂石来，铁丝罗网上发出连续不断的刷啦刷啦的响声，刘晓兰的好看的脸蛋和眼睛，在他的眼前闪动着……

三

公共汽车在五里镇停下，他和她走下车门，暮色苍茫了。他们一块在县上参加中学生篮球联赛回来。她是本届女篮冠军获得者的五里镇中学代表队的替补队员，他却是男子季军的五里镇中学男队的主力

中锋。季军虽然不大显赫，而八号中锋的出色表现，却倾倒了县城居民中的球迷。这个秦岭山下的偏远的县城，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传统性的篮球狂热。赛后，他被选拔为县中学生篮球队队员，不久将到市里去征战。现在，他和她穿着球衣，走过暮色苍茫的五里镇，朝河滩走去，他们的家同住在小河北岸。

“到学校去一下。”她说。

“暑假里，学校没人，去干什么呢？”他说。

“去拿我订的报纸。”她说。

“那得快点。”他随和地说，“天要黑了。”

“夏天怕啥？”她说，“有月亮。”

他和她一起走进熟悉的学校大门，砖铺的甬道上，青草从砖缝里长出来了，散落着梧桐树的花边大叶子。看门的老头儿，光着上身，只穿一件宽大的短裤，在传达室门口的躺椅上摇着芭蕉扇。老头看见有女生进来，急忙套上短袖汗衫，接着就大加赞扬这两位为五里镇中学争得荣誉的运动员，热情地把一缸子酽茶递上来了。润生听着，只是憨憨地笑着，忽然瞅见传达室的墙上贴着一张红纸捷报，恭恭正正写着本校男女篮球队取得的战绩。有意思！暑假里没有学生，也没有教师，老校工还是要写这样一张捷报，为了抒发内心的欢愉之情吧！老校工这样重视五里镇中学的荣誉，这样喜欢体育运动，润生心里一下子缩短了和老校工之间的年龄上的距离，热乎起来了。是的，一个对任何体育活动都毫无兴趣的人，内心一定是很单调很枯燥的。

刘晓兰拿到什么人给她的一封信，坐在门口的灯光下拆看起来，看完了，又翻着报纸看起来。这人真是性凉呢！他们要过河，还有五六里路才能到家，天黑了呀！他催促起她来。

晓兰不在乎地格格格地笑着，站起来，把报纸塞进背兜，和老校工告别一声，走进五里镇狭窄的街巷。

小镇夏天的夜晚，比白天似乎更富于生气，一幢一幢店铺的门口，坐着或躺着乘凉的男女，电视机搬到室外的街道上，什么武打片子惊起一阵阵大吁长叹……

走过五里镇短浅的街道，走下场塄了。河滩里，抽穗的稻秧散发着沁人心脾的清香，水渠里透着星光，闪闪发亮。青蛙从路边的草丛里蹦起来，扑通扑通跳到稻田里去。夜风从河川上游吹下来，挟裹着瓜果成熟的丝丝香味，灌进人的鼻孔，令人心神清爽。

一只青蛙撞到她的腿脚上，吓得她尖叫一声，跳起来，差点摔倒，双手扑抓住他的肩头。他站住脚，哈哈笑着，笑她的胆子太小了。青蛙有什么好害怕的呢？小时候，他和小伙伴们在稻田塄坎上割草，把麦秸秆儿塞进青蛙的屁眼儿，吹得小青蛙肚子圆滚滚的，眼睛都翻鼓出来了。

她捂住耳朵，不要听他讲这样残忍的游戏。

“你投篮的时候，连看篮环儿也不看，怎么投得那么准！”

“怎么能不看篮环儿呢？看。”

“我发现你就不看，跳起来就投，刷——进了！我在场子外头看过好几次了。”

“当然，主要凭手劲儿……”

“我怎么越认真越是投不准呢？”

“不能太认真，越认真越投不进去。”

“哈呀！没听说过，随随便便倒能投中？”

“就是要随随便便地投……”

“教练老师可没讲过你这理论，总是要我们认真。”

“越认真越紧张，紧张了就投偏了。我就是随随便便。我一跳起来，就不管啥啥了，球场上好像只有我一个人，不必紧张……”

夜风轻柔，沙滩绵软，星光在河水里闪烁，河滩夏夜的安谧和清爽，简直使人无法回想晌午时分那令人燥热不安的阳光。旱季里，河滩裸露着沙子和石砾，只有窄窄的一道清流，哗哗哗地淌着，水声像金链条发出的脆响。

他脱掉鞋，把蓝色的运动裤往上拉一拉，裤脚的松紧带儿就卡在膝盖上头。河水很浅，他拎起鞋就下了水，清凉的流水，嗖嗖嗖地从脚面上流过去。他走过几步，没有听见她下水的声响，就转过身，发现她仍然站在岸边。

“水浅得很，过呀，没事儿！”

她站在水边，歪一下头，没有吭声。

“你在篮球场上拼得多凶呀！这点点水，倒怕咧！过吧，没一点危险……”

她又歪一下头，仍然没有吭声。

“咋回事呀？”他无可奈何地朝南岸折转回去，“你家也住在河边上嘛！河边的娃娃谁没耍过水……”他不在意地嘟囔着，走到她跟前，“你倒怕水。”

“我……不能……”她勾下头，羞怯地支吾着，“……不能……下水。”

他不懂，她怎么不能下水呢？又没有病嘛！他又不好意思细问，却又作难地说：“那咋办？夏天，木板桥早拆掉了。”

“你……”她微微扬起头，不好意思地说，“你不会背我过河吗？”

“那……”他口吃了，脸上先热了，他可从来没有背着一个大姑娘过过河，迟疑间，他忽然想，其实也没有什么大惊小怪的，河边上的庄稼人，男人背女人过河，是平平常常的事情。他给自己鼓劲，从不必要的拘谨里解脱出来，做出随随便便的样子，蹲下身来了。

她哈哈笑着，伏到他的背上。真好！她笑得恰到好处，天真的纯洁的笑声，不仅解除了她自己的窘态，也使他顿然觉得舒展自如了。他站起来，她可真轻，几乎感觉不到什么负载的分量。

她的手轻轻地扶着他的肩膀。他的双手背向身后，搁着她的两只膝盖，走到水里了。她仍然开心地在他背上嘎嘎嘎地笑着。

“你的肩膀多宽呀！”

“男子娃嘛，都是粗胳膊壮腿……”

走到河心了，水没过他的膝盖，哗哗哗响着。她的两只手从他的肩头上伸过来，搂住了他的脖子。他当是她害怕了，给她壮胆说："甭怕，深水槽只有三五步，马上就过去了……"

她的嘴巴却凑到他的耳边："你真傻，还要问人家为啥不能下水……"

"我……没有问。"他分辩说。

"问来……"她撒娇地说。

"没……"他还没有说完，她却把头伸过来，猛然在他脸颊上亲了一口。他的心怦地一跳，眼花了，双手松开了。糟了！扑通一声，她从他的后背上跌落下来，落到水里了。他愣愣地站在水中，不知该怎么办。

她嘎嘎嘎笑着，扬着甩着手臂，从河水里跑过去，站在岸边，笑得前俯后仰。

他从河里走上岸，为难地说："怎么办？你的衣服弄湿了。"

"你走吧！在河堤上等我。"她认真地说，"一直朝前走，不准回头。"

他老老实实朝前走，没有回头，脖子连拧歪一下都没有。走上河堤，在杨柳林带里坐下，他看见她蹦着跳着从沙滩上跑过来，走上堤岸，在他旁边的沙堤上坐下来，早已换上一条干净的运动裤了。

他的心在胸膛里按捺不住了，平生第一次想伸开手臂，拥抱身旁的姑娘。

“好呀润生！不背人家你就说不背，为啥把人扔到河里？”她故作生气地噘着嘴。

“不是你在我脸上……”他鼓起勇气，终于还是没有说清楚，“倒怪我！”

“那是……不小心碰的！”她低下头，羞怯地说，“真的……不小心……”

“那我也……碰你一下！”他无法抑制心里涌起的强大冲动，伸开手臂，猛然把她搂在怀里。

她蹦起来，嘎嘎嘎笑着，站在河堤上，向他招手。

他三步两步绕过去，站在她的跟前。

“坐下。”她按着他的肩膀，“咱们说说话儿。月亮多好！”

“我不想说话……”他坐下来了。

“那……我给你唱歌。”她说。

他轻轻地点点头，把一只胳膊搭在她的肩膀上，她没有动。

她凝视着星光闪烁的河水，轻轻唱起来：

九九那个艳阳天，

十八岁的哥哥坐在小河边。

……

他不敢再鲁莽了，把一只手臂轻轻地搭在她的肩上。夜风轻柔，歌声婉转。李谷一相形见绌了，从来没有什么人的歌声能这样一丝不露地融会进他的胸膛，他的心，他浑身的血液；什么流行的轻音乐，什么校园歌曲，也都相形见绌而销声匿迹了。整个世界就只荡漾着这样一曲歌儿……

四

刷——

十八岁的哥哥曹润生，现在双手攥紧锨把儿，前弓后箭踮着双腿，从沙梁上铲起一饱锨混合着沙子和石头的砂石，抛向双层铁丝罗网。太阳已经托上秦岭群峰的上空，温暖的阳光羞怯地洒在沙滩上，严寒开始消退，河水闪闪发光。

他有意无意地瞅一眼对岸的河堤，落光了叶子的杨柳枝，伫立在天空中，树下的河堤的沙地上，留下他和她相依相偎的足迹，人生第一次接触异性，第一次拥抱和亲吻，第一次听一个心爱的人儿专为你唱歌，永远烙进心上，难以忘怀了。他每天走下河滩，不由得瞅一眼他和她坐过的那一段河堤，他背她涉水过河的那一段河口，天天如此。

他后来就明白了，她说她不能下水，完全是一种托词。她说到学校去拿报纸，无非是把时间拖得更晚一些，好使那些在河滩稻田里贪恋干活的庄稼人走光去尽。由此可以追索得更远一些，在县上篮球联赛期间，女队员常常帮助男队员洗衣服，晓兰总是及时地从他的床头把汗渍斑驳的衣裤搜走，洗得干干净净，叠得平平整整，放到他的床头，别的女同学根本插不上手。她常常在他上场的时候，在场外观

看，给他递毛巾、橘子水……看来她对他早已有心了，而自己却糊里糊涂，不过觉得晓兰和自己既是同班，又同是小河北岸的同乡，自然更熟悉更亲近一些。没有料到，她忽然在他脸上亲了一口，令他不知所措，慌慌乱乱中把她从背上撂到河里了……真是不期而遇！

在学校的篮球场上，他一跃而起，空中揽月似的抢到对方的篮板球，冲过层层堵截，可以一气把篮球带过中场，那球似乎粘在他的手掌里，难得脱掉，然后跳起，单手托球，往下一扣，篮网上刷的一声响，球儿连篮环儿的边也不撞，动作简捷，姿势优美。在他的周围，常常围随着一伙崇拜者。可是一坐在教室里，他的魔力，他的风韵，完全失去了光彩，只是一个平平常常的学生。他没有想到过恋爱，更没有瞅瞄过班里哪一位女生可以成为他的追求对象，尽管已经有传闻散布，说他们班里已经形成了“四对”，可是没有包括他和刘晓兰。平心而论，他就是没有想过嘛！

没有想过的事一旦发生，不期而遇的事一当遇到，曹润生的心再也安稳不住了。他坐在教室的最后一排桌子上，眼睛不由得从书本上移开，越过一排排男生和女生的脑袋，停留在刘晓兰蓬蓬散散的头发上，那头发的颜色有点黄，下梢甚至有点发红，却是那样蓬松，那么柔软，随着她写字的动作一抖一抖的。

班际之间的篮球赛时常举行。他活跃在自己的自由王国里，不由得搜索扫描场外围观的观众，一旦在人丛中发现了刘晓兰，他抓篮板球的成功率更加提高，带球越过中场的速度更加迅疾，跃起投篮几乎是百发百中，当然，姿势是更加优美而简捷。相形之下，如果发现刘晓兰不在场外观看，无论抢接篮板球，无论跃起投篮，都往往发挥失常，令班主任叹惋。他在心里骂自己：你这是怎么了？依然不顶用。

紧张的毕业考试迫在眉睫，接着就是决定人生去向的关系重大的高等学校统一考试。教室里的灯光彻夜不熄。几个家在农村的老师的老婆利用两间废弃的勤工俭学的工房，办起了小饭馆，专售凉皮和红豆稀饭，昼夜开门营业，挣那些开夜车的学生的夜餐费。其实，真正在酷暑季节里苦熬苦斗的，不过是班级里的为数甚少的几个尖子学生，因为有考则必中的信心，所以苦攻的劲头愈足，而对于绝大多数学生来说，仍然是按时就寝，如时起床，有一些同学已经打定主意：一当毕业考试完毕，就自动回乡务农了。曹润生只是打算碰一碰，碰不上了，自然回家去务农。教室里，校园中的树荫下，五里镇旁边的小河边，全是应届毕业生的天地。在河边的柳荫下，他和刘晓兰在背英语词汇。

“晓兰。”他叫。

“嗯。”她头也不扭，在念着单词。

“休息一会儿吧！我念得嘴唇都麻木了。”

“你休息吧！我不……”

“要是考不上大学，学英语有啥用？”润生说，“我那天回家，在后院里咕哝咕哝背英语，俺妈养的小鸡一下子扑棱着跑到我跟前，以为我叫它们哩！我刚明白过来，俺爸养的十多只小猪娃，也从猪圈的缝隙里钻出来，拱我的脚，当是我给它们喂食哩……”

刘晓兰早已忍俊不禁，笑得前俯后仰，眼泪都流出来了，一手捂着笑得酸疼的肚子，一手拿着书本，在他头上打。

“真的！”润生说，“那些小鸡小猪……”

“你尽出洋相哩！”晓兰莫可奈何地说，“复习功课这样紧张，你尽出洋相……”

“反正我考不中，你也悬乎！”润生说，“白费劲儿！”

“总得争取争取嘛！”晓兰说，“你……”

“我心里没劲儿，思想老是抛锚……”

“甭胡思乱想！”

“自从那晚上背你过河以后……”

“背我过河又怎么了呢？”

“谁要你在我脸上亲一口哩！”

“啊呀！你……”

“谁要你给我唱‘十八岁的哥哥’哩！”

“啊呀……”刘晓兰飞红了脸，瞧瞧左右，用书捂住了脸颊，“快甭说了，羞死人了……”

“我现在看书看不进去，老是想瞅你；听课也总是听不进去，耳朵里老是响着‘九九那个……’”

“你权当没有那回事儿。”晓兰扬起脸，“集中精力，准备考试。”

“我试过，不行嘛！”

“那怎么办？”她也莫可奈何地叹一口气，放下书，双手抱着膝头，坐在沙堤上，有点茫然地说，“我们都考不上学，回农村干啥呀？我想到很快就要离开学校了，心里真难受！回家干啥？喂猪养鸡？做小买卖？烦死了！”

“养猪养鸡，那是老婆婆们干的事！乏味无聊没意思。”润生说，“我已经瞅准了一桩事儿——”

“做啥？”晓兰不以为然地说。

“养蜂。”润生眉飞色舞，“带上蜜蜂，春天走南方，夏天赶北方，走南闯北，自由自在。你跟我搭伴，咱们的生活多有意思……”

“想得多美！”晓兰笑笑，“那些动物家禽，我全无兴趣，那些蜜蜂整天嗡嗡嗡叫，烦死人了……”

“那叫声才好听哪！”润生说，“蜜蜂的叫声可不是苍蝇……”

“比百灵子叫得好我也不喜欢。”晓兰淡淡地，“我不喜欢嘛！怎么办？”

“那当然……”润生兴味索然了。

“我一看见那蜜蜂窝，身上就起鸡皮疙瘩。”晓兰说，“我看都不敢看！”

“噢！”润生叹口气，“我可简直入迷了。”

“你爱蜜蜂，你就养吧！”为了不使润生扫兴，晓兰调皮地说，“我可是爱吃蜂蜜呀……”

“我给你管饱。”润生也笑着，“能吃多少嘛！一箱蜂能酿……”

“好了，现在还是复习功课吧！”晓兰从草地上捡起英语课本，“我等着吃你的蜂蜜，未来的养蜂专家……”

……

曹润生抛着砂石，回味着离开学校前的那一段生活，自己也觉得好笑。当他和她以及十之八九的男女同学各自回到自己的村庄后，那熟悉而又亲切的五里镇中学，立时就变得陌生而又遥远了，似乎不是刚刚离开了三四个月，倒像是三四年前的事了。一切不切实际的想入非非的幻想全都沉淀到大脑后头去了。有的同学进城做临时工去了；有的在自行车后边拴上两只竹筐，贩卖瓜果蔬菜去了；有的买下小四轮拖拉机跑起运输来了；有的进社办工业单位当工人去了；他喜欢养蜂，为了把东杨村的那十箱蜜蜂尽早买到手，他现在正聚足力气，从早到晚，在沙滩上翻捣砂石。冷，不怕；累，咬咬牙忍下去，他被自己未来的养蜂事业鼓舞着，埋头在沙滩上，几乎与世隔绝了。

和晓兰见一面也不那么方便了。曹村和刘庄相隔六七里路，虽然不远，他也不能频频去找她。她的父母对她管得严，尤其是对女儿与异性接触很敏感。乡村间没有电话，通信十分困难。他埋头苦干在沙滩上，没有想到晓兰已经进入社办企业，而且是砂石管理站管开票的工作人员了。

她依然对他好。润生肯定地想，她一坐进砂石管理站的办公室，就指派毛胡须的司机到曹村来装运他的石头。可爱的晓兰，心里疼着他哩！后晌得去找找她，为了祝贺她有这样一份又干净又省力的工

作，为了她给他指派汽车来拉石头的好心，为了他又有一月多没有和她见面……他现在十分想见她。

他的胳膊上格外有劲，抛甩起砂石，必须把后晌找她所耽误的工夫加出来。

“润娃哎——”

听见一声亲切的女人的呼唤，他一抬头，看见长才大叔正在朝他招手哩，旁边站着他的婆娘，正在叫他。她给长才大叔送饭来了，老两口正在热情地招呼他过去一起吃饭哩……

五

乡村人习惯早晨起来先下地干活，八九点钟才回家吃早饭。冬季里，天明得迟，早饭就推迟到十点多钟了。沙滩翻捣砂石的活儿太重了，人一般很难支撑到饭时，就又渴又饿了。于是，就在天明和早饭之间，给干重活的人吃一顿加餐，乡村叫“贴晌”。现在，正是吃贴晌的时间，不断地有女人或娃娃，提着竹条笼儿，盖着花格毛巾，端着热水瓶，从河堤上走下河滩里来了。

长才大叔见他没有动静，急急忙忙走过来，不由分说，从他手里夺下铁锨，扔到地上，拉他的胳膊，推他的脊背，长舌头在大嘴里笨拙地搅动着：“歇一会儿嘛！人是铁饭是钢嘛！我一个老汉都饿得慌慌哩，甭说你年轻小伙……”

润生抬头看看河堤，母亲还没有给他送饭来，拗不过长才大叔实心诚意的相邀，他从沙地上拎起棉袄，披在身上，跟他去了。

竹条笼里装着烙黄的发面锅盔、白瓷壶里装着茶水，全部摆置在沙地上。润生刚蹲下，长才大婶就把一块锅盔塞到他手里，又把拌着辣子的绿白萝卜丝的菜盘挪到脚下。长才大叔双手把茶壶递过来，不无遗憾地说："先喝口水。没有茶碗，就对着壶嘴喝吧！咱庄稼汉讲不了卫生……人家城里人很讲究，茶碗也不乱用……"

"上山打柴，过河脱鞋——走到哪儿说哪儿的话！"长才婶子畅快地说，"润娃，你尽吃尽喝！咱农民不讲卫生，倒是黑瓷疙瘩般地结实。"

润娃笑笑，没有吭声，不管长才婶子的话有多偏狭，那锅盔的味儿可是真香！皮薄，酥脆，瓤儿绵软，就着清凉的萝卜丝儿，真是惬意极了。她虽然愚蠢得不相信讲卫生的道理，烙制锅盔的手艺真是高超哩！

"润娃，嗬呀！好润娃——"长才大叔嘴里嚼着萝卜丝儿，咔嚓咔嚓地响着，口齿不清地叫着他的名字，大声感慨着，永远给人一种亲热诚挚的感觉，说着对他有好处的人的感激话，"你老侄儿，风格真高！嗬呀！"

"不就是我帮你卖了一车石头吗？"润生不在乎地说，"我缓几天卖，又不急着用钱，你急着用钱，先卖了，有啥关系！"

"哈呀！看你说得轻松！"长才大叔瞪着眼，摇摇头，更加感慨地说，"你看看这沙滩上，为了卖石头，争得儿子不认老子！谁肯把到手的票子塞到旁人兜里去？所以说，你老侄儿真是……"

"主要是我目下不急用钱。"润生淡淡地说。

“照润娃这样的好思想儿，搁在河滩捞石头，真是屈才了哇！”长才大叔盯着老婆说，目的在于争取附和者，“我说，润娃该到公社去当干部，准是好干部！”

润生听罢，不由得哈哈大笑起来。一车石头，他没有卖，把出售的机会转让给长才大叔了，竟然感动得长才大叔给他吃锅盔、喝茶，喋喋不休地当面夸奖他，还居然说出应该让他到乡里去当干部的梦话……真诚得令人好笑呀！

“你笑啥？实情话嘛！”长才大叔更加认真起来，“至少……你不该跟叔这号笨佬儿一般捞石头……”

“我不捞石头，挣不下钱嘛！”润生说。

“你不该挣这号出笨力的钱，真个。你该去贩羊肉，又轻快又挣得多。”长才大叔说，“咱村那一帮贩羊肉的，今日到山根去买下羊，后晌杀了，明日一早带到西安，卖了，天黑又赶回来。两天一趟，挣这个数儿——”他伸出食指和中指，“两天挣二十多块，一月挣多少？我都眼红了，只怪咱不会骑自行车……”

“我干过一回。”润生笑着说。

“为啥不再干咧？”长才大叔问。

“烂包了！”润生自嘲地说，“咱不识货，买羊时捏不出肥瘦，杀的肉少，差点连本钱烂掉了……咱手头上的功夫不行！”

“那倒是。”长才大叔点头颔首，“那得凭眼看哩，凭手指头捏膘哩，没这功夫不行……”

润生转过头，看见整个沙滩上，现在都闲歇下来，此起彼落的嘈杂的刷啦声停止了，像秦腔戏里紧锣密鼓的响击骤然中断，河滩里现出素有的自然的安静。这儿那儿捞石头的庄稼人，都坐着或蹲着吃起贴晌来，他们的女人或女儿，在给他们递馍、倒水，款款地说着话。只有少数几个蛮命干活的家伙，仍然没有停手，连吃一顿贴晌，抽一锅旱烟的时间也不放过。

“润娃，叔跟你说句结实话——”长才大叔神秘地眨眨眼，压低了声音，“你是有文化的人，能断书识字，你说，而今这政策还会不会变卦？”

“大喇叭上成天喊，这是基本国策嘛！”看着长才大叔细声细气的神秘的神色，润生觉得好笑，故意提高嗓门，大声粗气地说，“都什么时候了，你还问‘变不变’！”

长才大婶撇撇嘴，不屑地瞅着男人，对润生说：“甭看你叔说话声大，胆子可小得不像个男人。他见人就问‘变不变’，成了毛病了。我说嘛！咱又没做犯法的事，凭出笨力捞石头挣钱，就是政策变了，能问出啥罪来……”

“你甭嘴犟！”长才大叔脖子一拧，声音又大了，“那年人家没收了你的鸡蛋，你咋不嘴硬？那该是你劳神养下的鸡嘛！人家说润娃他爸养的老母猪是‘自发’，你说，润娃，你爸敢犟不敢犟……”

“老皇历了！”润生不自觉显出老学究的神气来，“现在的政策，都写进宪法里头了……”

“只要不变就好！”长才大叔点点头，“咱一不会长途贩运，出了远门连火车站也寻不见哩！二不会弄鬼捣蛋，寻不着门路哩！只要允许

咱捞石头，这沙滩就是咱曹长才的摇钱树，金盆子！拿时兴话说，是咱的存折！”

长才大婶宽厚地笑了：“他这号笨人，打的笨主意，说的笨话……”

“实话！”长才大叔无端地兴奋起来，抑制不住了，对一个年龄相去甚远的晚辈后生，掏出知心话来了，“在这儿捞石头，不贴大本钱，不操心行情跌涨，不用东跑西颠，日有热饭吃，夜有热炕睡，沙滩的石头，十年八年捞不完。一天捞一方石头，五六块，到哪儿去找这好的营生？累当然是累些，咱笨庄稼人还怕出力流汗吗？”

“对对的。”润生点点头，长才大叔说的是实话，这也是沙滩吸引来这么多的庄稼人的全部缘由。那些少数敢于走南闯北搞长途贩运的人，钱虽然挣得多，一月里可能成千上万地挣，但总带有某种冒险性，某种不太稳实的因素。习惯于小农经济的长才大叔一类农民，现在还不敢放开手脚，一天能捞到一方石头，挣得五六块钱，已经很满足了。他没有打算在这沙滩上把罗网永远支下去。他顶多干一年。捞够了能把东杨村那十箱意大利蜜蜂买到手的钱，就要挂罗收摊了，走南闯北去放蜂，那无论如何是捞石头这种单调的劳作无法比拟的。

“润娃，你听说过吗？”长才大叔兴致勃勃地说，“刚解放那一年，穿灰制服的一排子军人从咱河滩走过去，赶到南原上去了，过河的时候，有个人说，‘嗬！一河滩银元，一河滩洋面！’叫在河边割草的曹二老汉听见了，传说开来，人都不解，明明是满河滩的沙子、石头，解放军咋会说是银元、洋面呢？而今，大伙才解开这话！你说神不神？”

润生听着这个传奇色彩甚浓的故事，笑着，打着饱嗝，拍一拍手，准备站起身走了。这时候，一个女孩把一疙瘩用毛巾包着的吃食塞给他，说是他的母亲给他捎来的，她忙得脱不开身。润生解开毛巾，是三个烤得焦黄的馍馍，夹着辣椒。他一抖毛巾，把三个馍馍倒进长才婶子的竹条笼里。

“这算做啥？”长才婶子问。

“你不要还的话，顺便捎给我妈。”润生说，“我已经吃饱了。”

长才大叔咂着旱烟，美滋滋地抽着，把一支“金丝猴”牌香烟塞到他手里。润生推辞不过，点着了，一口烟抽进去，呛得他咳嗽起来，赶忙捏灭了。

“润娃，叔还想跟你说句话，你甭急走。”长才大叔有点难为情地说，“叔给你说过，给那个碎货订媳妇，急着用钱，还得你帮叔卖石头哩！”

“没麻达。”润生豪爽地说，“我拦住汽车，先给你卖。”

“你不是有个同学……在管理站吗？”长才大叔终于说出他的用心，“你去找她，让她给咱放几趟车来，啥问题都解决了！”

“嗯……”润生沉吟一下，有点为难。他原打算后晌去找晓兰，可不是为了让她多放几趟车来。

“叔两眼墨黑，在管理站没有一个熟人。”长才大叔叹惋着，“管理站那些人，尽给他们的熟人办事。咱提上烧酒拿上烟，挨不上边儿喀！冒冒失失地送去，反倒给摔出来。其实，谁不知他们暗地里做啥！好了！你的同学在管理站开票，有咱们的人咧……”

“给她送礼吗？”润生笑问。

“当然。”长才大叔悄声说，“给我办事，礼物由我。叔买弄得合适的礼物，你拿给人家也体面……”

“快算了，快算了！”润生有点烦，“真的找她去，我啥礼物也不会拿的。”

“憨娃！而今兴得这一套！”长才大叔说，“你刚从学校回来，不懂人情！没有这办法，没有路走！”

“你甭管！”润生说，“我去找她就是了。”

六

三岔路口，是从城里展伸到乡下来的公路的分岔处。曹润生骑着自行车来到三岔口了，正是一天里公路上最拥挤的时候，大卡车和手扶拖拉机，单套马车和自行车，一齐在三岔路口汇集。天色已晚，远途和近程的司机和驭手，都在急不可待地赶路，冬天北方天气短，五点不到，已经暮色昏暗了。这儿没有交通警察，司机们在拼命按喇叭，自行车铃儿摇得山响，三岔口仍然拥塞得水泄不通。润生跳下车子，离开公路，从麦子地里绕过去，就上了另一条岔道儿。

在三岔路口的三角地带，修建起一幢三层楼房，铁栅门旁的水泥门柱上，挂着一幅显赫的白底黑字的木牌：河湾乡砂石管理站。任何一辆要进入河湾乡装运石头的汽车，必须到此登记开票，领取“通行证”。这个管理站的地址，真是选择得太适宜了。

润生扶着车子，停在大门侧旁。他过去多少次从这个三岔路口过往，似乎从来没有留意这个砂石管理站的存在，更没有想过他会有朝一日走进这个铁栅大门。现在，他要第一次踏进这个水泥铺面的大门了，要去找他的同学刘晓兰了，而哪里是一般的同学呢！他有点心跳，停一停，稳定一下情绪，拨拉一下头发，拍打拍打在路上落下的尘土，推着车子进去了。

刚走进院子，润生就看见了晓兰。她推着一辆小轮自行车，从楼房的门洞里走下台阶来。他几乎认不出她了，一件黑底红花的罩衫紧紧裹着腰身，脖子上露出高高的米黄色的羊毛衫的高领，头发披散在脊背上，迎着寒风在飘动，模样更俊了。他忽然想到《追捕》电影中那位勇敢而又纯真的日本姑娘，就是这样的装束，而她和她的模样也真像得神。

“啊呀！润生——”她也看见他了，紧走几步，停住车，喜笑眉开地问，“你刚来吗？”

“我找你有点事。”他的心在不安地跳动，努力做出无所谓的样子，似乎真是要来办什么公事似的，“你……忙吗？”

“下班了。”

未及晓兰说话，一个小伙子走到跟前，抢先说，显出腻烦的口气。润生一看，那小伙倒是长得细皮嫩肉，一张女人似的秀气的脸膛，白白净净，只是那眼里露出一缕超然的优越的神色，叫润生感到不舒服。他像排除什么累赘一样的口气继续说：“下班了。有啥事，明天上班来办吧！”

“这是我同学。”晓兰连忙回过头，对那青年介绍，“他没来过这儿，屋里坐坐吧！”

润生有点迟疑，看她和那青年同时推车的架势，大约是同路回家的。他忽然蹿起一股反感的情绪，我找刘晓兰，关你什么事！你怕下班回家晚了，你就骑上车子滚吧！我又没有找你嘛！

“你……”晓兰有点不大自然，对那青年说，“你先走呢，还是等我一会儿呢？”

“我等你。”那青年毫不犹豫，“甭忘了，七点一刻的电影。”

润生心里一动，她和他去看电影。他一看晓兰，晓兰似乎眉毛也轻轻弹动了一下，又显出某些不大明显的尴尬。他似乎敏感到一点什么，就说：“算了，不到屋里去了！”

“你不是有事吗？”晓兰说，“还没说啥事，怎么能走呢？”

“没什么……大事。”润生结巴了。离她看电影的时间，不过一个小时了，他和她能说什么话呢？他今天来，原就打算晚上畅畅快快和她聊一聊，一月多没见面，他十分想念她。现在，他只好拿出长才大叔托办的卖石头的事情来搪塞，好像他专门是来求情走后门的，“我想……你给多调几辆车过俺曹村那边去。我一个老叔，人太老实，捞下石头，总是卖不掉，家里有急事要办，需得钱用……”

“给他调过去几辆车吧！”那青年在旁边插言，急不可待的样子，对晓兰说，“我们都没吃饭哩！”

“好吧！”晓兰这回明显地现出尴尬的神色了，那青年的口气和态度，大约泄露出一种他们之间微妙的关系，她窘了，随口说，“我明天

给你调车过去，让司机找你，放心吧！”

“那么……我走了！”润生再无话说，那个文静而超然的青年就站在他和她旁边，他一句话也不想说了，“你……去看……电影。”

“咱们一起走吧！”晓兰说。

“不……我还要……”润生本能地推辞着，“去办……另一件事……”

“走吧！”那青年已经推动自行车，催促着晓兰。

三个人走出大门，润生谎说他要到三岔口的另一条路上去，刘晓兰和那青年就先后跨上车子，消失在已经很浓的暮色里。

十八岁的哥哥曹润生，心里顿然涌起一股醋意了。她和他并排骑车走了，去吃饭，再到五里镇电影放映站看什么有趣的电影了。他一个人站在三岔路口，平生第一次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孤独。拥塞的车辆已经走空，偶尔有一辆汽车从三岔路口开过去，明亮的车灯在田野里推开一片扇形的光亮。初冬的夜晚的风开始施威，电线在呜呜呜呜叫。他的胸膛里十分憋闷，厌烦，脚腿无力，怏怏地推着自行车走上公路，却不想跨上去，便沿着公路慢腾腾地踯躅着。

那是一个什么人呢？白白净净的秀气的脸上，架着一副紫红色的眼镜，像是一位很有教养的大学生的派头，眼里射出的那一缕缕超然物外的优越的神色，完全把捞石头的曹润生视若草芥了！妈的，是将军的儿子吗？瞧那副神气！他和晓兰是什么关系呢？晓兰好像一点儿也不违拗他，是怕得罪他呢？还是……

他跨上车子，尽管骑得慢，仍然感到了北风的寒冷。这可能吗?晓兰从来也没告诉过他有什么新的变化呀！而仅仅在两个月以前，他去找她，说他想买蜜蜂，却没有足够的资本，想到信用社去贷款。她兴冲冲地推出自行车，和他一起奔信用社去了。

“信用社贷不贷给咱们呢？”他担心。

“报上和广播上都说要支持专业户嘛！”她说，“怎么能不贷呢？”

“我也这样想。”

俩人骑车在公路上飞驰，说着笑着，成熟的秋庄稼从眼旁闪过，玉米棒子吊垂着，谷穗压弯了谷秆，满眼金黄，一小块一小块萝卜或白菜，在黄色的田野里点缀着绿色。

“刚从学校回来俩月，我都烦死了！”晓兰说，“出门下地，跟俺妈俺爸干活，连一句话也说不到一起。回到家里，后院母鸡前院的牛，嘎嘎哞哞地叫，我都烦……”

“我也一样。”润生附和说，“俺妈俺爸把那些鸡呀猪呀，看得宝贝儿一样，老人们就爱抚弄那些东西。年轻人心里捉弄不住那些……”

“你倒好，买下蜜蜂，到处放蜂，多畅快。”晓兰难受地说，“我怎么办呢？没事好干……”

“跟我去放蜂呀！”润生笑着说。

“不害羞……”晓兰莞尔一笑。

走进信用社的办公大房间，俩人站在高可及胸的水泥柜台前，看见三五张桌子上，一人一把算盘，各忙各的财务，谁也不抬头。这里似乎自然形成一种严肃细密的气氛，从早到晚与大宗的人民币打交道的特殊工作呀。润生不知该找谁，晓兰倒大方地叫了一声："同志！"

"什么事？"一个中年男人头也不抬，问了一声，手指头还压在算盘上。

"我想贷款。"润生忙说。

"贷啥款？"中年男人仍然头不抬。

"就是贷钱款嘛！"润生朦朦胧胧地搞不清贷啥款，不就是钱吗?

"唔！有贫寒贷款，有投资贷款，有私人贷款，有单位公用贷款……你倒好，贷钱款！"中年人终于抬起头，冷冷地笑着，嘲笑说，"我在这儿干了十年多，倒没听过谁说贷钱款！钱和款子是一个东西呀！"

旁边桌子上的两位年轻女同志，吃吃笑起来。

晓兰看他一眼，也忍不住笑了。

"我想买蜜蜂。"他顾不得说话中的漏洞，忙说，"需得一千块！"

"他要做养蜂专业户。"晓兰也递上话，"发展养蜂事业哩！"

"那当然好啊！"中年男人双手支着下巴，从柜台里的桌子上，朝上瞅着他们，"正当家庭副业，我们完全支持。"

"那好哇！"润生高兴地说，"现在能拿钱吗？"

“你的申请书呢？”中年男人说着，伸出一只手。

润生恍然大悟，一拍脑瓜，自己居然不知道贷款要先交申请书，瞧一眼晓兰，俩人为自个的冒失行为不好意思地笑了。他补救说：“我可不知道还要写申请书的手续。那好办，我现在写行吗？”

“这是贷款，不是你朝你家里要学费！”中年人有趣地揶揄说，“冒失鬼！”

柜台里的人全都哄笑起来。

“交了申请书，还有啥手续呢？”润生这回用心了，问道。

“交了申请书，先经过我审查，再经过领导审批，大约就成了。”中年男人说。

“得等多久？”润生忙问。

“过了春节再来吧！”中年男人说，“今年的贷款已经用完了，节后就是明年的任务了。”

“啊呀……”润生心凉了，猛然意识到这位不阴不阳的中年人，大约在柜台里闲坐得无聊，故意拿他开心哩！既然没有钱可供贷款，为啥不早说呢？他怎么能等到明年春天呢！他懊丧地说，“噢！那算咧……”

他和晓兰一走出信用社的大门，相对一看，哈哈大笑起来，笑自己的无知，贷款来居然不知道要写申请书！俩人笑毕，骑上车子。

“怎么办？”晓兰问。

“算咧！不贷了。”润生说。

“你怎么买蜂呢？”

“我去杀羊卖羊肉！要是不行，我就下河滩捞石头。”

“杀羊多残忍！捞石头太苦咧！”晓兰不赞成他去干这些营生，“找我姑父一趟吧！他在乡工业办公室当主任，我已经托他给我找事干了。咱们一起去找他，让他给你在乡办工厂找个差事。”

“乡办工厂的差事，我不干。”

“咋咧？”

“挣钱少。”润生说，“杀羊卖肉，甭看不好听，挣出钱哪！捞石头虽然苦些，也挣出钱哪！我现在不管干啥脏活累活，只要挣钱多，我不怕。我要在年前攒一笔钱，赶过年把东杨村那十箱蜜蜂端过来……”

“咱们都在社办厂干工作，多好！”晓兰柔情地说，“免得东颠西跑……”

“我不喜欢老待在一个地方，乏味！”润生说，“带上蜜蜂，走南闯北，多美！我有好几夜都做梦，梦见我成了养蜂大王了！哈……”

……

初冬的小河川道的夜晚，风愈来愈冷。润生在河川公路上骑车前进，心里渐渐平静下来了。也许，是砂石管理站给职工发了电影票，那位男青年和晓兰一块去看电影，自己有什么好嫉妒的呢？晓兰没有

给他介绍他是谁，自己怎么好无端地猜疑呢？晓兰既然和自己有过那么一次不期而遇的事，她绝不会……

他这么想想，又那样想想，之所以想不透，就是没有机会和她谈谈，谈谈以后就会把一切疑惑搞清了。他得再和她见一次面，好好谈谈，他喜欢清清楚楚，不能忍受黏黏糊糊……

七

第二天早晨，当润生坐在自己的罗网前，吃着母亲让人捎来的贴晌饭的时候，脑子里还萦绕着昨日晚夕在管理站与晓兰见面时的情景。他意识到他和晓兰的关系变得复杂化了，虽然还没有更充足的证据和事实，仅仅是一种预感吧！她和他好，他也喜欢她。她亲了他一下，又给他唱那动情的歌儿，他喜欢她开朗的性格，漂亮的模样；他们俩就好上了。事情简简单单，恋爱不就是这样简单：你有情我有意嘛！哪儿又夹挤进来那位戴眼镜的大学生派头的小伙子呢？是他们的关系确实已经变得复杂化了呢，还是自己太敏感，甚至心胸狭窄，把问题看得复杂化了呢？

不管怎样，从昨晚到现在，过多的思虑，已经使他脑子隐隐作痛了。他向来心里不搁事，考试分数差了点，别人愁得晚上失眠，他照样打呼噜；篮球比赛失利，战友们垂头丧气，他依然哼着小曲儿。世界上尚没有能使他发愁，或者愁得睡不着觉的事。现在，自他有记忆以来，昨天晚上是第一次失眠。十八岁的哥哥睡不着觉，脑子里黏黏糊糊，分不清眉目，一直睁眼到天明，扛着铁锨下河滩来了。

他四肢酸软，施展不开，心胸郁闷，馍馍嚼在嘴里，像嚼着一团泥巴，没有香味。他觉得自己的简单的脑袋，盛不下这么多复杂的事

情……这当儿，两辆汽车从河湾里开过来了。沙滩上，正在吃贴晌的人，丢下筷子和茶壶，跃起身来，纷纷朝汽车开来的方向追去。他懒洋洋地坐着没动，又低头想着自己的心事。

两辆汽车拐进沙滩，戛然停住，司机甩开层层包围纠缠的庄稼人，站在石头堆子上，扯开嗓门呼叫一声曹润生，又呼叫一声曹长才。未等润生动静，长才大叔已经笑着摇着细长的胳膊，歪扭着挑担推车累得变形的罗圈腿，奔上前去，把司机领下来了。润生心头忽然轻松了，晓兰尊重他的请求，如期调拨来汽车，自己大约是……确实是太敏感了吧?

润生动手帮那些装卸工装车，一片倒腾石头的哗啦声响。车装好了，长才大婶恰到好处地提着竹条笼儿送贴晌来了。

“同志，尝一块。”长才大叔拉住司机的胳膊，声大，心也诚，“你尝一块嘛！烫面油旋饼子，城里人不常吃的。”

长才大婶的烫面饼子烙得真好，焦黄的外皮，令人嘴馋，可惜拿得少了点儿。她大约只考虑到给男人长才一个人饱餐一顿，没有想到会遇见拉石头来的司机，而且有五六个装卸工人。润生替长才大叔作难，那么几块饼子，够谁吃呢?

“饼子少人多，俩师傅先吃。”长才大叔倒不作难，以实相告，安抚坐在汽车上的装卸工们，“下趟来时，管大家一饱。没办法，我不知道来这么多同志……”他的坦白的态度，倒惹得那些装卸工宽厚地笑了。

两位司机只是谦让着，不就座。

“认不得，是生人；认得了，一家人嘛！工人还是咱农民的老大哥嘛！”长才大叔居然表现出外交家的风度，尽管语言有点拉三扯四，态度却大方，“而今农民不缺粮了！你们吃公粮的月月有定量，俺庄稼人没定量，海吃！润娃，你站那么远做啥？来陪师傅吃饭……”

那位年长的司机盛情难却，吃起饼子来了，赞扬饼子烙得好，说农家的面食新鲜，吃来特香，而购买粮店的面粉，总是吃不出粮食自身的香味……

那位年轻司机，看去不过二十四五岁。一边嚼着饼子，自然地把头转向润生一边，问：“看你的架势，像是喜欢体育运动？”

未及润生答话，长才大叔就插言介绍说：“俺润生打篮球，全县第一名，到省城里也得过奖！”他显然对一切话题都感兴趣，只要讨得司机（财神爷啊）的欢心，而不顾自己对篮球运动的知识一无所识。篮球是个集体的对抗比赛，哪里有个人得第一的名次呢？

“喜欢足球吗？”年轻司机问。

“球类我都喜欢。”润生的神经兴奋起来了。回家几个月来，先是秋收，接着秋播，秋收秋播的大忙季节一过，他就扛着罗网扎进沙滩上来了，连篮球摸都没有摸过。曹村的那一副篮球架，早已倒掉了，乡民在球场上种下了不怕猪拱鸡刨的荠菜儿。乡村里的小伙子，都忙着弄着自己的营生，没有人对篮球感兴趣了。他没有伙伴，没有知音，谁现在舍得把大好时机消磨在篮球场上呢！现在，他遇到了陌生的司机，单是他喜欢看球赛这一点兴趣，就使润生感到亲近起来了。他和他有共同的兴趣，有共同的语言。他说，“乡下的学校，只重视篮球……”

“你看过亚太区足球分组赛了吗？”年轻司机问，又带着深重的懊丧的口气说，“国家队输得多窝囊啊！”

“技术差劲。”润生也表示惋惜，“那没办法。当然，有时候也凭运气……”

“希望渺茫哟！”年轻司机苦笑着，“中国的足球，跟中国的工业一样落后；要跟世界列强争雄，看本世纪末吧！等我儿子一辈人……”

“冲出亚洲，时日不会太久。”润生点点头，表示同意司机的估计，“要跟欧美强队争雄，真是要等下一代人，球场待有明星出世……”

“我把我儿子一定要培养成一名球星！”年轻司机得意地笑着，“三岁了，我什么玩具也不给他玩，只给他玩小皮球，每天下班，我教他练球，南美国家从六七岁开始训练儿童，我从儿子会跑就开始……”

看来司机不像开玩笑，狠着劲儿说得很认真，润生倒是动了情，附和说：“十亿大国，足球输给泰国，真是叫人憋气……”

老点儿的师傅吃完饼子，不屑地噘噘嘴，嘲笑说：“瞧瞧他俩，倒是说得投机。操那些闲心做啥？什么足球，输了赢了，管屁用！”

“你只要能塞饱油饼就满意了！”年轻司机不恭地说，也是嘲笑的口气。他回过头，摇摇手，对润生说，“咱们和这些老皮，没有共同语言……”

润生很有节制地笑笑，不介入他们两位司机之间的争议。

“交个朋友吧！”年轻司机站起来，很义气地伸出手，“你捞石头吧，我包了！你捞多少，我拉多少。不说别的，单是为了足球……”

润生握着年轻司机的手，高兴地点点头。

两辆汽车呜呜吼着，开出沙滩，拐上河岸了，沙滩的临时车道上空，卷起浓厚的黄尘。

“你交了个好朋友，润娃。”长才大叔高兴地说，“人家有这样朋友，那样朋友，你呀可是个球朋友……哈！不管咋样，交这个朋友好得很！咱们的石头不愁卖了……”

润生也笑着，没有料到因为对球类活动的爱好，交上了有利于卖石头的朋友，真是不期而遇的事。运气不错！他的心里这样想，真是运气不错哩！刚刚十八岁，一个可爱的姑娘在他连想也没敢想过的情景下，猛然亲了他一次，钟情地给他唱“九九那个艳阳天来哟……”这个年轻的司机头一次和他结识，既没吃他的烫面油旋饼子，也没抽他一支烟，却要包销他的石头，运气还不好吗？生活里处处都向他微笑，十八岁的哥哥心里美滋儿滋儿的，瞧着长才大叔憨憨地笑着。

“抽烟！”长才大叔大声豪气地往润生手里塞烟，同时装起旱烟袋，笨拙地把一支带滤嘴的香烟叼在宽厚的嘴唇上，“不抽，怕啥？”

润生笑着摇摇头。他没有接受烟熏火烤的那种刺激的要求，辣刺刺的烟味使嗓子眼异常难受。他瞧着长才大叔的脸，那脸上布满一条条又粗又深的皱纹，这些皱纹里，以往总是蕴藏着焦急和愁苦，使人一看便可看出他的家境的紧迫和拮据，人都说这是副苦命相。是的，困苦的忧愁在这张脸上表现得十分显露。

现在，长才大叔脸上的每一条粗的或浅的，横的或纵的皱褶里，都溢出欢悦的浪花来了。同样，心里的欢乐表现在这张脸上的时候，也是十分显露的。他不会像有些城府很深的庄稼人那样，不但会隐藏苦衷，也会隐藏喜悦。他的一切都时时表现在那张黑红色的皱皱巴巴的脸上。有两辆汽车同时来装他的石头，而且是指名道姓地要装他曹长才的石头，而且说好要把他堆积在沙滩上的那一堆石头全部买走、拉完，不仅解决了他给儿子订婚的彩礼钱，更有一层不便说破的隐情，那就是：他感到脸上有光彩了！

他既没有门路疏通任何可以卖掉石头的渠道，又是笨手笨脚无法追拦汽车，捞下的石头就堆积在沙滩上。在这远离曹村村庄的沙滩上，捞石头的庄稼人，既是嫉妒又是眼红那些有门道找来汽车卖石头的人，也是既嫉妒又眼红那些手脚灵便而能拦住汽车的人。无法卖掉石头的曹长才，太无能了，倒被人瞧不起了。

现在看吧！曹长才的石头有人指名道姓来买啰！同时有两辆汽车，而且说定全部买走啰！曹长才被冷落在沙滩上的无人问津的局面打破啰！他咂着过滤嘴纸烟，把一只手叉在瘦细的腰里，挺起胸瞅着沙滩上下的庄稼人，瞅一瞅升上山顶的太阳，像是一位有学问的人在欣赏小河川道初冬清晨的自然景致哩！

现在，三三两两的庄稼人，手里掂着馍馍，利用吃贴晌的歇息时间，悠闲地转悠到长才大叔的罗网跟前来了，很关心地询问卖掉了多少立方，那两位司机是什么单位云云。

“哈呀！你看我这号瓷锤愣种！”长才大叔恍然大悟，拍着自己的落满尘土的脑袋，“居然忘记了问问人家是啥单位……”不管怎样，有这么多曹村的乡党到他的罗网前来拉话，是一种荣耀。他连忙掏出招

待司机时吸剩的过滤嘴“金丝猴”香烟，一次抽出五六根，硬塞给众人，不接也不行。

润生坐在旁边的沙滩上，看着长才大叔的举动，未免有点可笑，却也终究使人高兴，作为一个庄稼人，长才大叔在这里，可以挺起腰和那些庄稼人说话了……

一连三天里，两部国产的“黄河”大卡车，往返十余次，把长才大叔和润生的所有积压的石货，装完揽净了。三天里，长才大婶把糯米酿制的醪糟酒坛子，搬到沙滩上来了，红壳或绿壳的热水瓶摆下四五个，给那些司机和装卸工们冲醪糟酒喝，如同过喜庆的大事一样。这种热气腾腾的场面，震住了沙滩上所有的捞石头的庄稼人，谁能有幸一次卖掉七八十立方石头呢？曹长才真是洪福洪财一齐发。那些或多或少都积压着存货的庄稼人，终于弄明白了缘由，把馋急的眼睛从长才的苦相脸上，移到十八岁的哥哥曹润生的紫红光亮的椭圆形脸上来了……

年轻的司机和曹润生已经成为很要好的朋友了，这是最后一次到曹村的沙滩上来拉石头，车装好以后，他给润生留下了单位的地址，热情地邀请润生到西安去的时候，一定要去找他。润生感动地点点头，送他上车。年轻司机刚一坐进驾驶楼，就大呼小叫着伸出头来：“啊呀！润生，你的信，我差点给忘了！”

润生接过信来，一看信封上的笔迹，心里一热，那信是晓兰托司机捎过来的。他当即撕开，只有一张纸条，写了短短的一行小字，约他今晚到管理站去。他把信塞进裤兜，跳上踏板，钻进汽车，坐在年轻的司机旁边：“捎我到三岔路口。”

“赴约会呀？”年轻的司机笑问。

“对。”润生第一次公开了自己的秘密，又从窗孔探出头，“长才大叔，把我的铁锨捎回家去……”

汽车从曹村的河滩里开过去，落完了叶子的一排排白杨从窗前闪过，灰色的雾霭从地上升腾起来，朝树梢上弥漫。润生的心在胸膛里，随着飞驰的汽车在狂跳。

“开得真快！”

“你着急，我也着急嘛！”

“急着回家训练儿子踢足球吗？”

“今晚电视转播国际足球比赛录像。”

“唔……”

润生也是第一次觉得，迷人的足球比赛现在失去吸引力了……

八

“你没有吃晚饭。”

“我从河滩直接来的，铁锨让别人捎回去。”

润生坐在床沿上，老老实实地告诉她，他没有吃晚饭。晓兰揭开火炉上的小铝锅，热气蒸腾中，端出一盘菜，又端出一碗包子，放在桌上，问：“你吃面条不？挂面是现成的……”

润生摇摇头，已经抓起一个包子：“有肉包子吃，面条就省下吧！”他想说得调皮点儿，却不见晓兰笑，他也不管，大嚼起来。

“我记得在县上赛球时，你最爱吃甜食。”晓兰说着，又从五斗桌的下边，取出一包蛋糕来，解开，摊在润生面前，“你随便吃吧！”

“还有什么好东西呀？全拿出来吧！”润生畅快地吃着，故意逗晓兰，“我可真是饿……”

润生还没有说完，看见晓兰取出一瓶啤酒，揭掉盖子，正要往玻璃杯里倒，他抢上一步，一把抓住瓶子，说：“你忘了？我喜欢对着瓶口喝……”

晓兰爱抚地瞅着他：“怎样喝，还不都是酒味吗？”

“你可不知道哇，对着瓶口喝来才解馋。”润生说，“你也吃呀！”

“我吃过了。”晓兰说，“这是给你预备下的。”

“你该是陪着我吃。”润生逗她说，“那才像是……一家人。”他想说“夫妻”，终于有点羞，没有说出口。

晓兰腾地红了脸，低了头，没有吭声。

润生发觉，晓兰变得腼腆了，说话声音低了，不像过去和他说话时的那种爽朗的声调了，也没有那高八度的嘎嘎嘎的笑声了。她现在在他面前，完全表现出一种贤惠的妻子的温柔和娴静。他倒觉得别扭，干吗要那么压低声儿说话呢？干吗笑的时候只抿一抿嘴角而不出声呢？什么时候学会了这样的规矩？

晓兰却在炉子上给他熬茶了。

“晓兰，你不吃也罢，你坐在我跟前。”润生说，“我在沙滩捞石头，总不由得瞧瞧咱俩坐过的河堤……”

“我把茶冲好，就来。”晓兰依然不为他的挑逗而动心，说，“就好。”

他吃着，喝着，一碗包子吃光了，一瓶啤酒喝净了，打着饱嗝，双手接住了晓兰递上的酽红的茶杯。

“你吃饱了没？”她深情地瞅着他问。

“这样好的招待，我还不吃饱吗？”他笑着说，同样深情地瞅着她，她却把眼睛避开了，装着收拾碗碟，转过身去。这一瞬间，他发觉她好看的眼睛里隐藏着忧郁的神色。他说，“你坐下，让我好好看看你。忙着收拾那些碗碟做啥？”

她却从床头的箱子里，取出一只包袱，解开，把一件新衣服送到润生面前：“你试试，看看合包不？”

“这……”润生有点不好意思。

“‘这’啥哩？试试！”她声音仍然不高，却很执拗，“穿上让我看看。”

润生穿上了。她拽拽前襟，抻抻后摆，用手熨熨平，欣赏一番，慰藉地笑着，完全像他的妻子要打发他出门走亲戚一样，那神态令他感动，他一把把她搂到怀里，动情地叫着：“晓兰……你真好……”

她偏过头，挣脱开他的手臂：“再试试裤子。”

“刚好。”他拎起裤腰，和自己的腿比了比长短，“你真有心啊！”

她把衣服重新折叠整齐，用废旧报纸包好，装进一只网袋里，说：“我第一次领工资，给你买一身衣服，算是纪念。”

“那……好，你等着……”润生感情的潮水在心里翻腾，激动得声音都颤抖了，“等我养起蜂来，我要把……我的蜜蜂……酿下的第一罐蜂蜜……送给你……”

晓兰听着，眼眶里扑下一行热泪来，似乎那泪水早就准备好了似的。润生以为他的真情打动了晓兰，又伸开双臂。晓兰结结巴巴地说：“咱们出去……走走……”

他和她避开公路，走上田坎，冻僵了的麦叶在脚下沙沙沙响。他把一只胳膊搭到她肩上，她却抖索了一下。这是怎么了？他轻轻地问：“晓兰，你冷吗？”

“不。”她说，“你呢？”

“我都要出汗了！”他故意夸张说，“你刚才打了个冷战……”

她没有吭声，走着，站住了。

没有月亮，星星在灰黑的天空闪着冷光，西北风掠过，虽然很小，却是够冷的。

“润生……”她站了片刻，轻轻地叫他。

“你的性格像是大变了！”润生说，“我可真是爱听你过去那利索的说话……”

她又闭口不说了。

“给我再唱一回《九九艳阳天》吧，晓兰！”润生动情地说，“听了你那天晚上的歌声，我再不听广播上唱歌了！”

“呜……”晓兰却哭了。

润生一惊，扶住晓兰的肩头：“你咋咧？谁欺侮你了吗？”

“我……对不起……你……”她终于说出话来，就一头扑跌进润生的怀抱，“你……骂……我吧……”

润生大吃一惊，急切地问：“快说，到底怎么了？”

“我……姑父……给我……介绍下……”十分为难的声音。

“是不是那天和你看电影的那个人？”润生推开晓兰，抓着她的肩膀，急问。

“就……是。”

“唔……”

俩人都垂下手，静静地站立着。

“那个男的是干什么的？”润生问。

“管理站的会计。”晓兰说，“他爸跟俺姑父是朋友，才给我说这人……”

“他爸干啥哩？”

“县上干部……”

润生醒悟似的“噢”了一声，骤然就明白了，她姑父在乡里，他爸爸在县上，既是上下级关系，又是老朋友，他们的儿子和亲属就可以在砂石管理站工作，还要联婚，正好门当户对……想到这层说来复杂实际简单的关系，曹润生——十八岁的哥哥啊，几乎本能地想到他的父亲，那只是一个养猪养牛的能手。他的那种自卑的精神里，冒出一股强烈的厌恶情绪，负气地摆摆手：“那好！那好！我走了……”

晓兰一把拉住他，怨怨艾艾地说：“你……听人说完嘛……”

他站住了，手塞在裤兜里，直立在麦田里，忽然想到，她还没说清楚她对那个会计的态度哩！自己怎么就要走掉呢？他问：“你到底愿意不愿意？一句话就说清了，问题很简单！”

“俺爸俺妈逼得我……”晓兰诉说着，“我原先到管理站来工作时，一点不知道俺姑父有这意思……”

“你现在知道了，咋办呢？”润生耐着性子听着，“我不强迫你，只想听你一句截断的话。”

“你说……我咋办呢？”晓兰问。

“你的终身大事，我咋敢掺言呢？”润生直率地说，“而今的年轻人，各人主各人的事。”

“我想听听你的意见……”晓兰坚持说。

“要叫我说……”润生毫不含糊，“辞了管理站的工作，回家另寻营生去！而今农村里，饿不死人！”

“我也这么想过……”她低下头，“好容易找到这个工作……”

“那就算咧！算咧！”润生说，“你按你的主意办，我不干涉你……”

“润生……”晓兰拉住他的胳膊，又哭了，喃喃地诉说，“我刚刚领下头一回工资，我就给你买下礼物，侍候你吃一顿饭，好不好，算我补一回心……”

“……”润生忽然觉得鼻腔里也酸渍渍的。他听明白了她的话，这一切又都显得没有必要了。他说，“好！就这样……我走了。”

“你甭急嘛！”她又抓住他的胳膊，“我对不起你！你骂我吧……”

“没啥对不起的地方！没有！”润生忽然觉得自己长高了，豪爽地说，“我骂你做啥？你没伤害我嘛！你的事由你定嘛！”

“我心里还是忘不了你……”

“甭把事情故意弄复杂！快点忘干净吧……”

“我知道你在河滩捞石头，苦累重……”晓兰动情地说，“你捞下石头，甭愁卖，我给你调车……”

“不不不！再不要了！”润生固执地说，“你给长才叔卖掉那么多石头，算是帮了大忙。我的石头不愁卖，我追车拦车可有经验了……”

“我隔十天八天，给你放一趟车过去。”晓兰多情地说，“算我一点心吧！”

“不要。晓兰，我走了。”他这回下决心走了。

“回管理站，把衣服拿上。”晓兰又挡住他，“你把我的车子骑上，这么晚了……”

“不要！”润生甩开手，扯开步子，刚走开两三步，却听见背后传来压抑的哭声。他想回过头，安慰她几句，略一踌躇之后，他终于没有转过头去，似乎后颈上别着一根棍子，脖颈梗得邦硬了。他大步走过麦田，冻僵了的麦叶在脚下嚓嚓嚓响……

结束了，他和她的初恋！那么令人心魄震颤的初恋，就这样完结了！他在平整的柏油公路上走着，现在才感到西北风的刺骨之寒了，他的脑子里混沌一片，乱糟糟的，只顾机械地扯开长腿走路，似乎懊丧，似乎伤心，又似乎是傲视一切，说不清是一股什么滋味……

润生终于走进曹村了，村巷静寂，一幢幢房屋的黑乎乎的轮廓，静静地隐蔽在冬夜的黑暗中。他走到自家门楼下，木板门虚掩着，推开门，从里屋就传出母亲的问询声。他不回家，门是不上关子的，母亲就坐在灯下做针线，等待他回来，这已经是习惯了。走进院子，左边的猪舍里，传出老母猪睡下时的呼噜声和小猪崽的梦呓一般的吱吱声；右边的牛栏里，老黄牛倒嚼的声音很有节奏地响着。他从空旷的原野回到熟悉的现实世界来了，心里顿然稳实了。

“润娃，你到管理站去咧？”母亲从针线上抬起头，“我听你长才叔说的。你吃饭了没有？我给你在锅里留着。”

“吃过了。”他坐在椅子上，低下头，想到吃她的那顿饭，心里又不自在了，“我去联系……卖石头的事。”他不得不撒谎。

“哼！你联系得怎样？”父亲并没睡着，坐起来，披上棉衣，不满意地说，“你看看柜子上——”

润生转过头，装着粮食的长板柜上，搁着一堆油渍渍的纸包，一堆未曾开启的酒瓶……这是怎么回事呢？

“村里人看着你给长才卖了石头，知道你有熟同学在管理站开票，这下倒好——”母亲不知是讨厌呢？还是欣赏这种事情，“都求你帮他们卖石头哩！”

“嘿呀！我怎么能……”润生说不出话来，这无疑又是一件不期而遇的事。他从报上看见过一些不正之风的报道，也从旁人的口中听到诸多的行贿受贿的丑恶行为，而他自己亲身经历，却是有生以来的第一次。是啊，没有什么人会给他的父亲行贿，他只会喂猪养牛，给别人帮不了什么大忙。他过去一直念书，也不会遇见什么人来求他帮什么忙的。现在，他第一次看见了在沙滩上被人谑称为“进贡”的贡品了，一包包糕点、纸烟、一瓶瓶贴着各种装饰图案的酒瓶，供奉在柜盖上了。甭说他受不受这些贡品吧！想到晓兰和他的不堪回想的初恋，他连看一眼那些贡品都觉得讨厌。

“你收人家这些东西做啥？”他朝母亲使性子，“你收下了，你去给人家卖石头吧！”

“啊呀！俺娃——”母亲不恼，亲热地叫着，“那些人一进门，挡都挡不住，不信你问你爸……”

“我一辈子没有白吃白喝过人家的东西。”父亲没有直接替母亲做证，却讲起家规来了，作为父亲，他比老伴更疼爱独生的儿子，却不忘时时处处给儿子以实际影响。他把这件事，看得远远比老伴严重，“即就是咱能给人家帮忙，也不能收受这些黑天黑地里送来的东西！啥味呀？”

“谁收下谁送走。”润生怨母亲。

“话虽这样说，理虽这样讲，甭忙——”父亲完全显示出他的一家之长的主事人的深谋远虑，“给人帮不了忙，也甭得罪乡亲……”

“你说咋办？”母亲也急了，“怎么还给人家？一还，就准定得罪人咧！”

“我想想……”父亲沉思起来。

“我还！”润生站起身，“谁送来的还给谁，简简单单的事，偏想得那么复杂！”

润生烦躁地走出里屋的小门，走进自己的小厦屋去了，他需要一个人静静地躺下，想想他和她究竟经历了一场什么，简直跟做梦一样呀……

九

神秘的动人心魄的初恋，竟是这样来去匆匆地结束了。在人毫无精神准备的时候突然发生，又在人毫无精神准备的时候突然中止，真是不期而遇，来去匆匆！

黎明时分的河滩里好冷啊！秦岭东山的群峰的上空，透出一抹亮光。田野里一片昏暗。河堤上落光了叶子的杨柳林带，像一堵雄浑的城墙，齐刷刷排列在河岸上，露出高高矮矮参差不齐的锯齿一样的树梢。小溜子北风在黑暗里溜过来，像挟裹着无数的钢针，扎刺人的脸颊，钻进脖颈和袖口，手指麻木得握不住铁锨的木把了。

沙滩上空寂无人，河水也像冻结了似的发出不大连贯的颤颤的响声，白日里熙熙攘攘的沙滩，现在显得空旷和广漠。黎明前的这一刻愈加黑暗，伸手不见五指，即使顶勤快的庄稼人，也要等这一刻过去，大地和村庄露出黎明的端倪的时候，才扛着铁锨和担笼下到河滩来。

十八岁的哥哥曹润生鸡叫三遍的时候，就在沙滩上撑起罗网了。他昨晚一宿未曾合眼，翻来覆去，那被窝里像是有石子和柴枝，蹭得他睡不着觉。他和晓兰就这样断了！刚刚热乎了起来，骤然又凉咧！唉……怎么处理这种事？老师在课堂上只教给他作文和计算，从来没有讲过怎么恋爱。有一次，老师严厉地批评两个偷偷谈情说爱的同学，凛然无情，直到那两个倒霉的家伙抬不起头来，老师干脆宣布：中学生不准谈恋爱……他却在心里说，晚了，老师警戒得太晚了！他和晓兰在河边上已经亲过嘴了！抹也抹不掉这样的记忆了……老师要是能给他们讲讲怎样恋爱，失恋了又该怎么办，现在对他来说就有很大的参考作用了，老师却只是一味地警告不许谈。父母亲只是教他好好念书，供给他吃的和穿的，训示他要尊敬先生，和同学友好相待，出远门念书一切得谨慎，从来没有告诉儿子，当一个姑娘突然亲他一口，给他唱歌的时候，他应该怎么办？没有，从来没有，因为政府里提倡晚婚，已成定律，庄稼人虽然不大满意，却逐渐地推迟了给儿女们订婚的年龄，一般都在二十岁以后才张罗，订得早而不能婚嫁，倒

惹得好多麻烦。他才十九岁，尚不见任何一位热心的婶娘或嫂子来提亲说媒，父母也没有因缘提及此事，他更不好意思告知父亲和母亲，说他和一个女同学如何如何了。

没有谁能帮助他，现在怎么办？他和晓兰在三岔口旁边的麦田里分手了，头也不回地走了，他拒绝了她要送给他的那一身合尺合码的衣服，走回曹村来了。他现在说不准他对她的这种态度合适不合适，以这样的方式结束他和她的关系好不好，只是……完全是凭着一种不可逆转的心性，就这样告别了。当他现在躺在小厦屋的被窝里，静静地回想刚才和她在麦田里的谈话的时候，他不觉得自己有什么过错。既然她要和那位县上干部的儿子……又何必给他送一身衣服呢？他穿上这一身衣服会是一种什么滋味呢？保持那样一种不明不白的关系干什么呢？要么就好，好得无遮无掩，像他们那晚过河时的情景一样；要么就断，断得一丝不连，各人奔各人的前程，她能找下一位大学生派头的管理站的会计做夫婿，他也绝不至于打光棍一辈子！他头脑简单，喜欢干干脆脆，小葱拌豆腐一青二白，脑子里盛不下缠缠络络的丝麻……尽管这样，他还是睡不着了。

令人哭笑不得的是，乡亲们悄悄送来了那么多糕点和烟酒，指望求他通过她卖掉石头，却不知他现在正打算再不和她交往了呢！既然睡不着，躺着特难受，上房里传来父亲沉重的舒悦的鼾声，更叫人感到心胸里憋闷，他悄悄爬起来，扛上铁锨，挑上铁笼，出了街门……

苞苞秆子燃烧起来，噼啪乱响，火光在沙滩上辟开一个小小的温暖而明亮的空间，他抓起一捆干透的苞谷秆子扔到火堆上，被黑夜收缩了的空间，又随着蹿起的火光而扩大了。他铲起一锨砂石，抛到罗网上，刷的一声刚落，又一锨砂石接着抛上去了。他发疯似的干着，像是和谁赌气似的干着，不让双手有一瞬间的停歇。忽而蹿起的火

光，照出他一副红扑扑的脸膛，眉毛拧到鼻梁上头的凹坑里，嘴里轻轻喘着气。

要是晓兰现在坐在苞谷秆燃起的火光里，嘎嘎嘎地笑着拢火，歪着脑袋唱《九九艳阳天》，那他就会……啊呀，胡乱想到哪儿去了！他揪一把自己的头发，眉头又紧紧地拧扭在一起了，用劲挖砂石吧！

用劲挖，使劲抛，一天争取增加一半收入，早点攒够钱数儿，把东杨村那十箱意大利蜜蜂买到手，早点离开这无聊的曹村的河滩，满世界赶着花开放养蜜蜂去。把晓兰和他的关系彻底割断，把她在他心里的影子彻底抹掉，一身轻松，无牵无虑，满世界去逛呀！

他将押运着自己的蜂箱，乘着火车，风驰电掣般地驰过平原和丛山，村庄和河流，春天到南方，夏天回北方，哪儿的花儿开了就赶往哪里，在平原上的某个陌生的小镇旁，或者在山区的某个小村庄里，摆开蜂箱，撑起一顶绿色的小帆布帐篷，戴上面罩，抚弄那些嗡嗡叫着的金黄色的蜜蜂，把那些已经无用的工蜂及时捏死，它们和蜂王交配以后就无用了，既不酿蜜，只是坐享其成。人工培置王台，不仅能控制蜜蜂的繁殖和分群，还可以生产蜂王浆，那是高级滋补品，听说资本主义国家的头儿把它当饭吃，所以一个个都长得头大腰肥。把那灌满蜂蜜的蜂皮装入摇蜜机，转动手把，那稠汁就被甩了出来……晚上呢？最好能带一台电视机，可以看球赛，问题是要钱！钱，他要挣钱，拼命地刨砂石，拼命地挣钱！

什么时候，南原那刀裁一样的平顶现出清晰的轮廓来，从夜幕黑沉沉的罩衣下分离出来，杨柳林带的梢头也从夜幕里摆脱出来，现出青色的枝丫，苞谷秆燃起的火光暗淡了，黎明来到了。

村子里有了响动，河滩里有人在大声咳嗽，白杨甬道上，有人影晃动，车轱辘在冻结的土路上撞出噔噔的响声……终于，有人走到沙滩上来了。

今天，他是第一个迎接黎明的人。往昔里，他总是睡得醒不来，即使偶尔被尿憋醒了，仍是舍不得离开暖烘烘的被窝。现在，他站在沙滩上的罗网跟前，看着黑夜的暗影怎样一层一层被黎明的光亮所驱逐，看着从曹村通河道的大路上走来一个一个庄稼人，他心里顿然萌生起一股豪气，我是第一个起得早的人啰！

“哎呀！润娃！哈呀呀呀！”长才大叔人未来而声先至，大声吁叹着走来了，“真是个勤快的娃娃，起得多早！真是发了狠心咧……”

润娃拄着锨把儿，没有吭声，瞧着长才大叔在沙滩上急急忙忙走过来，他的罗圈腿上裹着厚重的棉裤，在沙地上一踩一溜地走着，笨拙的样子，活像一只扑拉着翅膀的老母鸡。

“你昨晚啥时候回来的？让我老等！”长才大叔走到当面，喘着气，“刚才我去寻你，一摸被窝都凉咧！你大概一宿没挨炕面儿……”

“有啥紧事吗？”润生问，刚刚给他卖掉积存了几个月的石头，还有什么急事一天两头寻他呢？

“紧事，当然是紧火事，还是不小的个大事哩！”长才大叔语言重复，紊乱，这是他的一贯性的特点，不过口气听来却是乐悠悠的，“你昨日后晌走了以后，好些乡亲来盘问我，问你跟砂石管理站有啥样的熟人。我说，你的一个女同学在那儿开票。你看，我不说不成嘛！有人已经扫风咧……”

“这算啥紧火的大事呢？”润生笑笑。

“甭急。你坐下，烤会儿火，该当歇气咧！”长才大叔在火堆旁坐下，两个指头从火堆里捏起一块火星，轻轻按在烟锅上，在棉裤上擦擦被火烫烧的指头，说，“你听我说。”

润生蹲在火堆旁，把双手伸到火堆上烤着，头侧着，听长才大叔说什么紧火的大事。他料就他不会有什么大不了的事，长才大叔一向说话声高，有点虚张声势，大伙背地里叫他“刮大风”的绰号。

“润娃，你常看报不？”长才大叔问。

“大队的报纸全给队长他婆娘擦了屁股，谁捞得到手呢！”润生笑着说。

“收音机你该有吧？”长才大叔依然认真地问，“念书人都爱看报听广播。”

“你到底要说啥事？还说紧火，真要是紧火事，早叫你给啰啰嗦嗦地耽搁得冰凉了。”

“你要是常听广播，我问你——听没听到过，人家说西安城北啥村子，农民自己成立了‘养鸡协作会’？”

“听到过。那是个养鸡专业村。我在《对农业广播》节目里听过。那村子叫什么名字，记不得了。听是听过。”

“看看看！”长才大叔磕着烟锅，“昨日后晌，你不在，好些人说他们在广播上听到了。听到了就想学那样子，成立咱曹村的‘捞石头协作会’哩！”

“那就成立吧！”润生冷淡地说。他的心没有安在这沙滩上，不过是临时干几个月，捞够了足以买回十箱蜜蜂的钱，他就要撤罗拔脚了。他从来也没想过把自己的一生交给这沙滩，两年也不曾想过。至于成立不成立什么协作会，与他关系不大。要是成立养蜂人协作会，他会大感兴趣的。他说，“那就成立吧！”

“‘那就成立吧’，你倒像不染事一样。”长才大叔很不满意地说，“大伙瞅你……当会长哩！”

“那哪儿使得嘛！”润生急了，万万没有料到，他要当什么会长了，“我不干！”

“大伙瞅见你和管理站的那层关系啰！”长才大叔说，“当然……主要是大伙看你公道、老实，肯帮助像我这号笨佬儿……”

“我不干……”润生说，一点也不含糊，“我干到春节，过罢年，再不下河滩咧……”

这当儿，从滩地里通到河岸边来的大路口，拥挤着一堆人，嘻嘻哈哈，高声阔谈着什么，像是围观耍猴的游戏一样有趣。

“那些人围在那儿看啥西洋景哩？”长才大叔问。

“你去看看吧！”润生笑着说。

长才大叔站起来，又把一粒火星捏到烟锅上，喷着蓝色的烟雾，扭着丑陋的罗圈腿，赶去看热闹了，走出五六步远，又回过头来，叮嘱说：“众人托我先给你透透风，你甭一口回绝嘛！逢事多想想，甭违拗众人……”

十

润生拨拉着火堆，使没有燃尽的柴火重新冒烟起火，完全是一种下意识的动作。他已经没有勇气再次走进乡砂石管理站的大门了，好多乡亲却不明底细，给他送礼，又要成立什么劳什子的组织，企图通过他和她的同学关系图得卖石头的方便，真是叫人哭笑不得。不过，所有这一切令人难堪的局面，马上就要结束了，他已经完全摆脱了。那边——好多人围观的现场，正是他别出心裁制造出来的。他把昨晚收到的糕点、瓶装酒、香烟，全部装在一只竹编提笼里，搁到下沙滩的河岸边的路口，挂着一绺纸条：请认领自己的东西。

听见从那儿传来的嘻嘻哈哈的议论，润生现在很得意，很欣赏自己处理这件事的光明磊落而又奇特的方式。他虽然一直念书，没有经过世事，却耳闻过不少丑恶的社会现象，庄稼人对于有权而谋私的干部，表现出深恶痛绝的情绪，深深地震动过十八岁的哥哥的纯洁心灵，老师在政治课上讲到的不正之风对于党的战斗力的严重危害，深深地引起了他的担忧。他曾经想，我要做一个正直的人！如果我当县长的话，把那些赃官统统开销回家……他现在把那些送给他的礼物全部摆到大路口，表示他对此类事情的态度，这是他昨晚最后想到的办法。

“嗨呀！润娃，你咋弄下这号没名堂的事？”

润生一转过头，长才大叔从背后走来，脸色都变了，非常懊恼的样子，压着声儿抱怨他。未等他开口，长才大叔蹲到面前，火烧火燎的样子，说：“你这不是故意给人难看吗？”

“那有啥难看的！”润生不以为然，“是谁送的东西，谁领走好咧，简简单单的事嘛！”

“谁现时当着一河滩的人，好意思领走那些东西呢？咹？”长才大叔的声音又压不住，高了，“那里头也有我送给你的两样东西，你叫我怎好伸手取出来呢？我这老脸搁哪儿去？”

润生看着长才大叔扭歪了的脸，没有说话。是啊，这种办法虽然表白了自己，却使长才大叔这样老实巴交的人感到难堪了。

“你不愿意收受这些东西，也行嘛！你悄悄给人家送回去，两方面都好看嘛！这样——”长才大叔叹口气，惋惜地说，“你要得罪人了……”

“我想过悄悄送还的办法，又怕有人再送来。这样一搞，就没人再添麻烦了。”润生也有点惋惜地说，“这么办可能要得罪乡亲……”

“你说你不受贡，人家可要怨你高傲，不肯给乡亲帮忙。”长才大叔更加深入地阐释他的见解，“乡村里的庄稼人，虽是痛恨旁人走后门，临到自己有急事要办，还要寻情钻眼儿找门路。咋哩？正路走不通喀！只有走后门……”

“骂就让人骂吧！反正咱没做不明不白的事。”润生硬着头皮说，“天长日久，乡亲会明白的……”

“净说傻话！天长日久，人都叫你得罪完咧！”长才大叔开导他说，“农村里，人老八辈住一搭，得罪不起人哩！你娃正年轻，要活人，叔是替你担心哩！”

“唔呀！这事倒弄瞎塌咧！”润生悻悻地说，“世事真个复杂……”

“乡城里外一个样儿，哪儿也不是简简单单！”长才大叔得胜了，“走，快去把那些东西提回来，免得……”

“这……”润生犹豫不决。

“你不去我去，我去给你提回来。”长才大叔说着，竟然照直走去了。

那双丑陋的罗圈腿，在沙地上扭着移着，越来越远，倒像是有一根无形的绳子，一头牵着那双腿，一头牵着他的心。那双罗圈腿朝前跨出一步，润生的心就被扯动一下。让长才大叔把那只竹编的提笼拿回来，就等于在曹村众多的庄稼人面前，承认自己做错了！可是，错了吗？错在哪条理儿上了？得罪人并不一定都是做错了嘛！他的心在痛苦地扭动，头上竟然冒出汗水来了。长才大叔一旦把那些东西提回来，就等于自己唾到自己脸上，就会给曹村人留下一个谈笑的好话题……

长才大叔已经走近那个路口了，润生的心被揪得透不过气来，他终于忍不住，从火堆旁跳起来，像争抢篮球一样奔跑过去，在长才大叔刚刚弯腰的时候，抢先一步把竹编笼儿提起来了。长才大叔惊愕地瞪起眼睛，不知所措。

太阳已经升起来，微弱的却又温暖的冬日的阳光洒在沙滩上，已经有女人和娃娃提着装着吃食的笼儿罐儿走到沙滩上来了，好多人丢下铁锨，手里拿着馍馍，赶过来看热闹了。对于从早到晚抓摸石头的庄稼人，这无疑具有吸引力；对于沉闷而又沉重的劳动，这无疑更使人开心，算是一个插曲。大伙瞅着那装满瓶儿包儿的竹编笼儿，嘻嘻哈哈，议论纷纷，说着损话刺儿话，从沉重的劳动下得以解脱了。包

括那些最贪活儿的汉子，也经不住一阵一阵笑声的诱惑，丢了家具跑来凑热闹了。

“叔伯爷们！”润生自然地成为这场活剧的中心人物，他扬起头，红着脸，诚恳地说，声音都颤了，“我是晚辈娃娃，咋敢吃大叔大爷送给我的东西……”

众人骤然闭了口，齐刷刷静下来了。这些庄稼人也不是没有经见过世面的人，他们经过怕人的“四清”和“文革”运动；平常时月里，也常有县上和公社的干部到曹村来开会做报告，县委一位副书记还来过一回哩！他们听过一套又一套的理论，开过数不清的会议。现在，在沙滩上，这个十七八岁的小伙儿的一句开场白，把他们震住了，乱七八糟的喧笑全部销声匿迹了。这是怎么了？绰号“牛王爷”的曹老大的独生儿子润娃子，要干什么呢？

“我确实没办法给这么多人卖掉石头。真的，没有办法。管理站倒有个同学，可是……这么多人……”润生说到这儿，忽然心底一沉，有种十分难受的感觉袭来。他想到了她。她和他好过。她已经明白地告诉他，她和他的关系完结了。他努力抑制住自己的冲动，不要使眼泪忍不住而流出眼眶，“即就是我能替谁卖一些石头，我也不敢收受叔伯爷们的礼物，我是个娃娃呀！哪有长辈人给晚辈人送礼的……”

诚能感动天地。好多人投来赞赏的目光，窃窃私议着。长才大叔突然从蹲着的人后蹿到中间，溅着唾沫星儿，大声感叹着：“好娃好娃！乡亲们，大家甭为难润娃了。有事找他，他肯定帮忙，我敢保证！千万甭乱送东西，人家娃娃不受贡品……”他的愚鲁的憨态和实话，引得庄稼人善意地笑起来。

“这包点心是我送的，这瓶‘雁塔大曲’也是我送的，我现在领走了。”长才大叔把他的东西从竹编笼里拣出来，也不怕当众丢脸了。他高高地举起点心包和瓶装酒，像显示什么一样，坦诚地当众招认说，“大家看见，润娃帮我卖掉了囤货（石头）。我心里过意不去，就送了这两样东西。既是润娃不收，我心里也畅快，这东西大家享受吧！点心大家吃，酒大家喝……”

几个小伙子嗷嗷叫着，拍着手起哄，有谁竟然高声笑喊：“曹长才大叔——万岁！”点心包早被青年们撕破了，酒瓶不断地被抢来抓去，笑闹声遮掩了一切。

尽管气氛已经十分活跃，仍然没有人前来认领。润生记得的两个人，也躲在背后，不肯拿去他们送来的礼物，庄稼人好面子啊！

有个中年汉子挤进人窝里，在润生的笼里翻腾。他一看，认出是村子东头的曹五龙，忙说：“五龙叔，原谅我……”曹五龙看也不看他一眼，铁青着脸，转过身，走出人窝去。只听“哗啦”一声响，酒瓶在石头上摔得粉碎了，曹五龙头也不回，背抄着双手，走到他的罗网跟前去了。众人一齐盯着润生，润生难堪地低下头来。那帮青年却故意起哄似的在地上抢夺曹五龙摔下的点心。

长才大叔明显地斜瞅着那个不通人性的家伙，同情地盯一眼润娃，忽然提高嗓门，对众人说：“大家昨日后晌说要成立‘协作会’，我刚才跟润娃说了，问题不太大，借这个机会，大家商量商量吧！当着润娃的面更好……”

润生很感激地盯了长才大叔一眼，他把他从五龙示威的难堪中解救出来。话题一引到捞石头的庄稼人的切身利益上，没有谁再去盯那

个短见识的家伙了，七嘴八舌地议论起成立“捞石头人的协作会”的事了。

“咱们整天操心拦车，不是办法！你追车追得越紧，那些司机越品麻！”

“一个村子的乡亲，为拦车弄得红鼻绿眼，失了和气，实在难看！”

“咱们都是下苦人，下苦人跟下苦人为卖石头吵架闹仗，倒是给人家司机净赔笑脸，说骚情话，低三下四……”

“我说——”长才大叔完全是主持者的角色，“要是咱的‘协作会’成立了，统一安排，一家卖了一家卖，咱们何苦要追车拦车呢？何苦要给人家递烟赔笑说骚情话呢？咱有笑脸，给咱老婆看，把骚情话节省下晚上给咱婆娘说……”

长才婶子送饭来了，早已站在男人背后，听到此，捶了大嘴长舌头男人一拳，嗔骂道：“你那猪脸，笑起来能把人吓死！”

“长才的话丑，理端着哩！”曹七伯在众人的笑声中，郑重地说，“队长只顾挣补贴款，不理民事喀！这样，大家才想到举出一个人来。有个公道人出面，大家按顺序卖石头……”

润娃瞅瞅长才大叔，他倒蹲在地上不吭声，只顾抽烟。他把话题引出来，自己就不出头了，免得旁人说他让润生主事，看去粗笨的长才大叔，心数儿一个也不比旁人少。果然，有好几个人先后喊起来：“让润娃当咱们会长！”

“大家看咋样？润娃行不行？”长才大叔忽地站起，扫视一周，“有屁放出声来！”

“行！”众人一哇声喊起来。

“我……不行！”润生像被洪水卷着，身不由己了，他勉强地说，“我这人脑子简单……”

“事情本来就简单！”长才大叔大声说，“只要你娃子公公道道办事，我看啥事都不难办！脑瓜太复杂的人，倒是光给自家往怀里刨！‘公道’俩字，本来就简单嘛！”

又是一件不期而遇的事！他可真是没有想到自己会当什么“捞石头人协会”的会长。既然遇到了，而且无法躲避，无法推卸，他怀着不安的心情应承下来了。他说：“大家得订出几条规矩来，我才好办理这事……”

“你提几条出来，大家商量。”长才大叔像早有准备，“众人七嘴八舌，乱口纷纷。”

“我拟几条，大家再补充。”润生说，“关键是卖石头的次序，我说咱们抓阄，大家同意了，立马就抓，说不定一会就有汽车来。其余的规矩，缓后再立。”

“抓阄最公道！”

“抓啊！”

……

润生低头编制纸阄的时候，那些青年们已经把笼里的糕点和纸烟抢劫一空了，酒瓶在大伙的手里传来抢去，有人把一块点心送到他的膝盖上，他不由得笑了，一口咬去了半个。

长才大叔从他老伴手里夺过一只空碗，放进纸阄，伸到众人面前，一只只被河滩上的北风吹得皴皱的黑手，伸进碗里去了……

“二号，谁？”润生喊着，记下了名字，依次记完之后，他站起来，面对着那么多乡亲说，“一号我留下了，请大家原谅。”

众人一愣。

润生没有解释，走出人窝，径直朝沙滩上边走去，曹五龙现在独自一人，挥锨抛沙，没有参加抓阄的活动。润生坚定地朝他走去，手心里捏着那个留下来的一号的纸阄……

十一

一家三口，围在老祖宗传留下来的方桌上吃早饭。

润生着实饿了，母亲托人捎到沙滩上去的馍馍，因为忙于让众人抓阄的事而没有顾上吃，早已冻成一块块冰疙瘩了；昨晚一宿未眠，从鸡叫三遍起来下河滩直到现在，肚子里咕咕咕响，肚皮已经紧紧贴着脊梁骨了。他大口吞咬着又软又韧的发面馍馍，咔嚓咔嚓咀嚼着清脆脆水津津的萝卜丝儿，呼噜呼噜喝着甜腻腻油丝丝的苞谷糁儿，真香啊！重体力劳动造成的饥饿是这样难以忍耐，而大嚼大咽五谷饭食简直是一种至高无上的享受了。

母亲不时停下筷子，爱怜地端详着儿子狼吞虎咽的样子，似乎说，吃饭也像个男子汉了。

父亲的牙齿掉光了，两边脸颊的松弛的肌肉紧张地运动着，仍然吃得很慢，拿在手里的一只馍馍，总不见减少，而润生已经吃掉三个了。他瞥一眼父亲艰难地咀嚼食物的样子，忽然意识到，父亲老了。他的因为牙齿脱落而深深陷进去的脸颊，他的被粗大的和细密的皱纹所网罗着的皮肤，他的昏暗而又板滞的眼睛，都表示他衰老了。看着父亲的神态，润生忽然想到一条橡皮绳，一条失掉了弹性的疲惫不堪的橡皮绳。是的，出尽了力气的老父亲，正像一条被不停地扯拉着的橡皮绳，终于失掉了弹性，失去了活力，现在变得松弛而又疲惫了，很难承受重力的牵引拉扯了。

润生忽然记起，从早到晚，父亲从屋里忙到地里，又从地头忙到槽头，一天里很少能看见他有闲闲散散的一刻。他很少到人窝里去扯闲话，也很少赶集上会，牛棚和猪圈是他陶醉的游艺宫。他的最大的乐趣，就是咬着旱烟袋，蹲在黄牛后腿前，欣赏乳毛未换的小牛犊撑开四蹄，扬起嘴巴，在黄牛肥大的乳头上一拱一顶地吸吮奶汁……他过去熟知这一切，却从来没有在意，似乎本来就是这样，没有什么好想好说的。现在，突然之间，他强烈地意识到父亲竟是如此地苍老，那松弛的肌肤和疲惫的身体里，再也爆发不出强劲的力量了。

他的心里翻腾起来，有一股什么冲动在翻腾，应该接替父亲了，凭那样衰老的身体，不可能再有什么大的作为了。他是这个家庭里的最小的也是唯一的男孩子，六个姐姐，像硬了翅膀的燕子，一个接一个离开了这个老窝儿，只在年下和节日来看望父母，留下一袋礼物又匆匆回她们的村子，忙她们的日月去了。他才是这个小院的真正的主人。房子太破太旧了，被烟火熏成黑色的屋梁和椽子，不断地有虫蛀

的粉末飘落下来，阴雨天常常滴滴答答地漏下黑红色的水珠。四方木桌，直背靠椅，有的断腿，有的缺角，都像父亲一样出尽了力气，古旧而衰老了。应该有新的住房和新式的家具，彻底改换这一切了，村子里已经有不少人家盖起了新房，添置了新式衣柜和台桌，年轻人已经拆除了土炕，换成钢筋弹簧床了。改换和更新这个小院的房屋和设备，舒舒坦坦地生活，已经不能指靠父亲了，得由他来干。

“润娃，听说你当了啥‘会长’咧？”父亲已经点着烟锅，慢腾腾地问，“有没有这事？”

“嗯。”润生点点头。

“嚯！咱们祖辈三代没人当过官，你当了，改了咱的门风啰！”父亲半是喜悦，半是揶揄地说，“咱们润娃有才魄哩！”

“那是民间劳动组合，不算官。”润生给父亲解释，“责任制实行以后，农户之间发生了多种形式的联合，以便适应生产的发展……”

“不管算不算官，总带着个‘长’字嘛！”父亲蔫不拉耷地说，“我这辈子也挂过一回‘长’字……倒给吓得……”

润生笑笑，没有吭声，父亲当过一回队长，已经是他的老生常谈了。润生尚未出生的时候，父亲当了农业社的一个生产队长，到乡上去开会，要他放卫星，别人都放了，他却从会场吓得逃跑了，躲到姨妈家，不敢回曹村来。待他心惊胆战回到家里的时候，曹村农业社已经有新任队长执政了。他进了饲养场，直到前年牲畜下户，他才挟着那一卷铺盖回到自家屋里。他的胆小，因此而出名，他的当队长的逸闻，长久地留在曹村人的记忆中，他自己当然也不能忘记。润生早就

听说过这档子事了，他也觉得父亲太胆小太老实了，居然吓成那样……

“你想干不想干？”父亲问。

“众人……硬推举我……”润生答。

“那当然，是众人瞅中了你。我问你一句话——”父亲认真地说，“和村长相比，谁领导谁？”

“当然……村长领导我……”

“要是这话，你趁早甭干。”

“咋哩？”润娃急忙问，“怕啥哩？”

“你干不出好下场。”

“为啥？”

“一句话，那人不是个正路货。再甭多问了。”父亲说，“我跟他在一个队里三十年了，还看不清一个人吗？你信爸的话，就趁早撒手；不信了，你干着试试。”

“他当他的村长，我捞我的石头，只要按国法交税，跟他没啥关系嘛！”润生无法想象，村长究竟是怎么一个歪路货，“你怕他暗中使绊子？”

“那人呀……”父亲摇摇花白的脑袋，撇着没有牙齿的嘴，就不再说什么了，担忧是根深蒂固的，一切苦衷都在那无言的摇头叹息之中

了。他似乎很不愿意提及村长这个人，迅即把话题转换了，“再说，这政策还变不变，也是难得料定……”

“放心，允许农民发家致富，中央有红头文件。”润生早已听惯了那些担心的话，不在乎地说，“老人们全都得下一号病：怕变！”

“你娃娃没经过世事。没经过‘四清’和‘文化大革命’，你就不懂得世事。”父亲深深地叹惋，“那阵儿来曹村的工作组，拿的也是红头文件……”

润生张不开口了，瞅着父亲的皱皱巴巴的脸，他无法探知，父亲那一道道横的竖的深的浅的皱纹里，究竟隐藏着多少忧虑？既无法估计，也无法说服父亲。他仅仅只有十八岁，“四清”运动在曹村轰轰烈烈进行的时候，他还没有来到这个偏僻的小河川道的村子里呢！“文化大革命”对于他来说也是一片空白。对于电影上和人们口头上传说的“文化大革命”的种种奇闻逸事，在他看来，和《西游记》里的故事一样荒诞不经，怎么可能有那样荒唐的事情在我们的生活里发生呢？人们怎么全都变得神经客了呢？没有办法，他没有经见过嘛！没有亲身经历见过的事情，总是很难体味其历史的和现实的、主观的和客观的诸种因素的。在他这样的年龄，最容易用今天自己正在经历着的生活去想象已经过去了的未曾见过的生活的。他不在意地说：“没啥。爸。这个‘会长’，不算啥官衔。能干我就干，干不了拉倒。你甭担心害怕。”

“你能给大家把石头卖完吗？”父亲过问起最具体的问题，“捞石头的人多，石头不好出手，现时又兴得走后门，你凭啥呢？”

“润娃，妈听你长才婶子说，你的一个同学，在管理站开票。”母亲突然插上话，“说是人家给你派来汽车……”

“嗯。”润生不由一悸，低头喝饭。

“你长才婶子给我叨叨，想给你联扯婚姻……”母亲装出不在意的口气，探问着，“我说咱娃是农民，怕不行……”

“没那回事！”润娃立时臊红了脸，一口说死，避开母亲探询的目光，和父亲说，“走后门卖石头的人有，不凭后门卖石头的也有。咱们成立‘捞石头人协会’，就是要跟砂石管理站建立组织联系，合理安排，不走后门走正路。”

“众人信服你，你就干吧。”父亲已经站起身，走到门口又转过头，“凡事甭叫人指脊背骂祖先，你已经长大了。就是这话！”

润生放下筷子，看着父亲走出屋子，心里涌涌波动，他已经长大成人了。是啊，十八岁了！众人已经向他委以“会长”的重任了！今天无论如何是一个重要的日子，他在众人眼里不再是个不懂事的毛娃娃了，而是一百多个捞石头的庄稼人所寄托着希望的青年了。从不懂事到懂事，从昨天到今天，他第一次在生活中担负起责任来，而且是众人的责任。他第一次明显地意识到父亲老了，强烈地感到他在这个小院里的责任。人生的旅途中的第一个重要的驿站，他就要驭马奔驰了。

润生走出屋门，心里第一次有沉重的责任感了。人生的多么奇妙、多么重要的第一次觉醒！

十二

人需要别人的信任。被别人尤其是被众多的一群人所信任所拥戴，会产生一股强大的心理力量，催发人为了公众的某种要求、某种愿望、某种事业而不辞艰辛地奔走，忍受许多难以忍受的苦难，甚至做出以生命为代价的牺牲，也在所不惜，心甘情愿。他们的这种英雄行为，往往使那些极端利己的人迷惑莫解。

十八岁的哥哥曹润生，此刻就被这种强大的心理力量支配着。他骑着自行车，驶过沿着坡根伸展开去的坑坑洼洼的土石大路，穿过一个个大的或小的村庄，忍受着尖利的下山风的刺骨的寒冷，意气勃发地转上了平整光滑的柏油公路，更加快速地踩动着自行车的踏板，到设置在三岔路口的乡砂石管理站去，代表曹村所有捞石头的庄稼人，交涉出售砂石的公务。

为了刚刚成立的捞石头的劳动者联合体，润生要耽搁一整晌时光了，一整晌时间里，他可以捞出半立方米石头，价值两三块钱。他心里明白这笔账，毅然做出牺牲了。为了众人有秩序地出售石头，也使自己日后再不为出售石头而追拦汽车，低三下四地讨好司机，牺牲一晌乃至一天的时间是不足计较的。他第一次受到那么多曹村父老兄弟的委托和信赖，心里简直承受不住了；那些比他高过一辈两辈的叔叔和爷爷，那些和他平辈的老哥或兄弟，竟然对他——一个刚刚从五里镇中学下到沙滩上来的青年，寄予厚望和重任，他感到充实，感到有力，感到自己骤然间成为一个大人了。

这种强烈的心理力量，帮助他克服了隐藏在心底的重大障碍。他曾经暗暗下定决心，再也不进砂石管理站的铁栅大门了；既然晓兰已经另有选择，他就要狠心割断和她的一切来往和感情上的联系。现在，他必须再次走进那个宽大的水泥立柱的铁栅大门，说不定还要撞见晓兰，撞见了也就必得说话打招呼……他是为曹村一百多个捞石头

的庄稼人的切身利益来造访管理站的，理直而又气壮；不是找她走后门卖石头，也不是死乞白赖地纠缠她和他的那种关系的。他飞一般踩动自行车。冬日的冷风，即使在晌午，也仍然是尖利的，他的脸颊和耳朵冻得麻辣辣地疼。

刚到三岔路口，他跳下车子，尽管有那样强大的心理力量推动着，他还是感到心跳了，而且跳得越来越厉害，现在见了晓兰，该怎么说话才合适呢？他略停一会儿，稳一稳心情，硬着头皮走进铁栅大门了。碰得真巧，晓兰正在院子里打羽毛球，对手是那位戴眼镜的青年。她打得很开心，又很专注，没有发现他。晓兰穿一件红色的羽绒宇航服，蓬松的头发从后颈上束住，尾梢披散在肩上和背上，跳起击球的时候，头发被风张起来，落地时又像潮水一样跌落在肩背上。她的动作优美，跳起而又落下，蹲下而又跃起，进前退后，像是一种刚健的舞蹈。一个好球打完，她的嘎嘎嘎的笑声响起来。

润生突然觉得心里很别扭，看见她和他那么快活地玩着，听见她动人心魄的爽朗的笑声，他妒恨起那个戴眼镜的砂石管理站的会计了。他凭他的老子谋得这样一份不晒太阳也不挨风冻的职业，把他的晓兰轻易地夺走了。润生不愿意看见她和他玩羽毛球的样子，更不想在这种场合里和她照面，他想退出门去，过一阵子再来，然而已经为时过晚，晓兰已经瞧见了他，握着球拍跑过来，毫不在乎地和他打招呼:“润生，到屋里坐，午饭吃了吗？”

“我来找你们站长。”他立即说明来意，企图向她暗示，他不是来找她的。他用一种自己也觉得陌生的事务式的口气说，“和站长联系一下俺们曹村村民卖石头的事。”

“站长回家吃饭去了。你等一会儿吧！”那位青年用不耐烦的口吻说，“晓兰，快！现在是十比七……”

“到我屋里烤烤火，等会儿，站长两点来上班。”晓兰有点为难地说。

“不去了，我到外面转转。”润生已经推动车子，“我不打扰你了。”

“外头好冷！你到哪儿去？”晓兰说着，把球拍往他怀里一推，“你来玩玩吧！”

他的心里一动，撑起车子，接过长柄球拍，站到球网的另一边，从球网的网眼里盯着那位站在对面的情敌。他大约不太乐意他换下了晓兰，有点明显的扫兴的神气，没精打采地把白色的羽毛球掷了过来。

“开始计数！”润生看见对方懒洋洋的样子，不由火起，从地上挑起球，以一种挑战的姿态说，“你开球吧。”他又回过头，对晓兰说，“你做裁判。”

眼镜青年一震，愣了片刻，不在乎地笑笑，把球开过网来。润生忽然跃起，一记重扣，那白色的羽球像从绷紧的弓弦上怒射出的一支羽箭，栽死在对方脚下，眼镜青年的拍子还没有挥动起来。他脸色略略一红，迅即捡起球来，发了一个刁钻的旋转球，直飘到润生背后。润生灵巧地转身，背对着球网，把羽球从地上捞起来，送过网去，对方又一个轻吊，球儿落在网前，润生跃进两步，长臂猿似的从地皮上又把球儿挑过网去，落在底线周围，眼镜青年转身补救的时候，脚下绊了一下，摔倒了。

晓兰嘎嘎嘎笑起来，报着数：二比〇。

眼镜青年从地上爬起来的时候，面孔气得煞白煞白了，他的笨拙的动作出了丑，又在她的面前。他扶正眼镜，咬着嘴角，谋算着第三个球怎么开法。

润生随随便便地站在场地上，一副漫不经心的样子。他的心里，却凝聚着一股强烈的报复的火气。他要彻底打掉他的那种优越的干部公子的神气。他要打得他措手不及，疲于奔命，一败涂地。他要他在她面前出丑亮拙，他要把他彻底地击溃……即使在地区的中学生篮球联赛的时候，他的求胜的迫切性也不过如此吧！

第一局结束，晓兰也不好意思再笑了，大约怕那位同样十分自尊的青年太难堪——比分悬殊：十五比三。

“再来？”眼镜青年喊，企图挽回面子。

“来吧。”润生随随便便地应着。

一开局，又是五比〇。眼镜青年愈急愈输，愈输愈气，简直是一副气恼的神气，脸颊上淌下汗水来了。润生愈打愈熟练，挥洒自如，左右逢源。看看对方狼狈不堪的架势，瞥一眼晓兰也显出难堪的神色，他不忍心再使对方输下去。恰在这时，晓兰喊：“站长来了。”

润生停下球拍，歉意地笑笑：“站长来了，我该办事去了。你们玩吧！”他把球拍递给晓兰。

眼镜青年扫兴地说：“甘拜下风……”

“不！你是实际的胜利者。”润生拍拍他的肩膀，苦笑一下说。

眼镜青年悻悻地笑笑，以为润生在安慰他。只有晓兰体味出润生那句话里的真实含义，脸上掠过一丝难堪的神情，转过头，掩饰地说：“站长，有人找你。”

润生也借此机会跟站长走进他的办公室。

站长是个瘦老头，虽则是砂石管理站的脱产站长，其实从头到脚都是一个纯粹的农民的装束，属于那种精明强干的农民。听说他原来是原上一个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因为上了年纪，被年轻的新干部所代替，乡政府安排他到这个只有七八名职工的管理站来主事。他仍然习惯抽旱烟，仍然习惯蹲在条凳上和人交谈。听完润生的述说，很爽快地说：“那好嘛！咱们有计划地给曹村调拨汽车过去拉石头，你在那边有秩序地卖货，免得曹村社员白天黑夜到管理站来找熟人，要汽车。这是好事嘛！”

“那就这样，站长。”润生听了站长的话，十分鼓舞，一切都顺顺当当，简简单单。从这位老站长的直言直语中，感到了老干部秉公办事的品德，很钦佩这位干练的老站长了，“我等你派汽车到曹村……感谢您。”

“回去给你们村长谈谈，让他知道你们有了劳动组合。”老站长提醒他说，“免得村长说他不知道……”

“应该应该。”润生感激地盯着老站长，“应该尊重村长的领导……”事情已经谈妥，他就告辞出门，临走时叮嘱站长，顶好能派足够的汽车到曹村来……

第一次出门交涉公务，竟然这样顺利，十八岁的哥哥心里十分畅快，加之他略施球技，把那位优越感十足的情敌打得溃不成军，心里

更觉解气，一路顺风，回到曹村来。

村长曹子怀，年近五十，坐在自家的简易沙发上，接待登门请示工作的小青年曹润生。他嘴角咂着黑色的卷烟，只用半个嘴角说话：“你去乡政府请示吧！我吃不准，你们成立的‘捞石头协会’，究竟算个啥性质的组织……”

瞧着村长嘴角里上下闪动的卷烟，慢腾腾的声音，润生不由得发急，忙说：“民间劳动组合。城北一个村子是养鸡专业村，村民成立了养鸡协会，电台广播了，说是新事物……”

“报纸和电台，一天换一种说法，咱撵不上哇！”村长蔫不拉耷地说，“我得靠上级的正式文件行事。广播和报纸，只能参考一下。你说你那是新事物，旁人要说那是非法组织咋办？现时要肃清‘文化大革命’的无政府主义哩！”

“这是劳动组合嘛！”润生莫名其妙，“不是‘文化大革命’那种搞派性斗争的组织嘛！”

“我吃不准，刚才就说了。”村长仍不起性儿，“我保守脑瓜跟不上形势，你去问乡政府吧！乡政府批准了，我照乡政府的批示办。”

润生不再解释了，退出门来，村长的冷淡态度令人难以忍受。他走出门来，推起自行车，又奔公社去了。

乡政府一位主管乡镇企业的吴副主任回答了他的问询，也十分简单：“你们成立这样一个协会，不能算是‘文革’中的派性组织。可是，你们搞得迟了，曹村村长今晌午刚报来一份申请，大队里已经建立了砂石管理机构。大队统一管理就行了，再搞一个什么协会，成了重叠

机构了，势必加重群众负担。现在的政策精神是，要减少干部，要减轻农民负担……”

“我不是抢着干部当。”润生忽地红了脸，向吴副主任解释，“我说过不要报酬。”

“算咧算咧！小伙子——”吴副主任拍拍他的肩膀，“我不是那个意思。”

他没有信心再谈下去，越谈可能越造成他要抢当干部的印象。他退出门来，懊丧地转上回曹村的路。

刚走到村口，广播上正响着村长慢腾腾的声音：“经村民委员会和大队委员会开会研究，决定成立本村砂石管理站，统一经销……”

后面的话他听不清了。

傍晚的下山风吹下来，润生觉得从后背到前心，全凉透了。

“润娃！唉——”

润生木然地转过头，长才大叔垂头丧气地摇着头，摆着手，气哼哼地说：“村长的儿媳妇已经下到河滩，经营曹村砂石管理站的事咧！你还为大伙空张罗哩！唉……去他妈的黑脚……”

十三

十八岁的哥哥躺倒了！

他躺在自己单身独居的小厦屋的土炕上，没有开灯，插死了木门栓，用被子蒙住头，静静地躺着。

“润娃，吃了再睡。”母亲在窗外劝。

“不饿。”他一口回绝。

“世事就是这样子。”父亲并不惊慌，世故地说，“不跌跤长不大，不碰钉子就认不得人，不懂得世事。”

长才大叔哐当哐当摇门板，大嘴长舌头乱嚷嚷：“润娃！你开门，叔有话跟你说，要紧弦弦的话……”

他不吭声，也不开门，长才大叔大声叹息地咕哝着，走出院子去了。

他的心里烦得很，乱得很，想静一静，想一想，他的简单的脑袋被搅得晕乎乎的了。

如果长才大叔说的话是实情，那么事情就可以捋顺了，廓清了。

当他饥肠辘辘地吃早饭的时候，村长曹子怀已经坐在砂石管理站站长的火炉旁边了。

当他报复似的用羽毛球拍打得他的情敌大显其丑的时候，村长曹子怀已经把曹村大队设立砂石管理分站的简单的书面报告，寄交给乡政府分管乡镇企业的吴副主任了。

他完全听信了管理站站长要他向村长打招呼的话，实际的含义是，一经和村长接头，一切就一目了然，用不着站长来否定你的什么

“协会”。于是，他就开始钻进预备好了的圈套，像诸葛亮在陆逊尚未出生时就为其摆下了乱石阵一样，早已等着娃娃来钻呢！

他向村长曹子怀汇报的时候，曹子怀并不推翻他的意见，只说他对当今的政策“吃不准”，把他推到吴副主任那里去了。

吴副主任用不增设重叠机构，减轻农民负担的绝对符合政策的话，就把他搁到冰箱里冷冻起来了。而当他满含委屈向吴副主任表白自己不是为了抢当干部的时候，村长曹子怀的儿媳妇已经在腋下夹着合页夹子下了河滩，走马上任了。

他钻完了“乱石阵”，得到的是想抢当干部，甚至加重捞石头的庄稼人的负担的怀疑。

村长曹子怀不声不响，连个社员会也没开，就把儿媳妇派到沙滩上去，统管曹村捞石头的庄稼人的出售石头的业务了。当然，她不会在三九寒冬的沙滩上白挨冷冻的：抽取石头销售总款的百分之八，作为曹村大队的扣留，其中当然包括她的报酬。

曹子怀叼着黑色卷烟的嘴，现在异常清晰地映现在他的眼前，那说话时上下闪着的卷烟，轻轻地把他弹到干沟里去了；曹子怀只用半边嘴和他说话，已经使他里里外外说不清楚了！

他现在才强烈地意识到自己头脑太简单了，简单得令自个憎恨！一切都不简单，只是自己把一切都看得简单了，看不透才觉得简单。他第一次为自己的口头禅——事情很简单——懊悔了。

和晓兰的关系也不像自己以往想得那么简单吧?

第一次萌动的爱情结束了！

他被曹村的庄稼人推举为“会长”，还不曾执行过一次协会会员的使命，就被村长不动声色地排斥到一边去了……他却毫无办法！

现在，曹润生躺在小厦屋的单人床上，努力回味这一切的细微末梢，毛病究竟出在哪里？他搜肠刮肚，寻找自己的过失。平心而论，他觉得无愧，既无愧于晓兰，也无愧于曹村那一百多个在沙滩上捞石头的庄稼人。他终于归结到一点，自己头脑太简单了！

他心里有点冷，却不空虚，他仅仅只有十八岁，而生活的路还很长……

一声雄壮的公鸡的啼叫声，惊醒了他，翻身坐起的时候，窗户已经大亮，起得晚了。他急急忙忙穿上衣服，拉开门栓，嗬！雪！夜里落了一场大雪，院子里和屋瓦上全是一片白。

他扛起铁锨，走出街门，走下场塄，朝河滩走去。

大雪覆盖了原坡和河川。雪止风息，树枝上落着一层绵茸茸的白雪。太阳还没有出，雪地上闪动着一缕缕蓝莹莹的光彩。通河岸去的白杨甬道上，白雪已经被踩踏得稀烂了。

沙滩上，罗网林立，铁锨起落，刷啦刷啦地翻捣砂石的声音响成一片，偶尔传出一声沉闷的咳嗽。

润生突然看见，在河岸和沙滩的交接路口，站着一位披着草绿色大衣的人，头上包着红头巾，腋下夹着一本活页夹子，在路口踱步，大约是活动被冻疼了的双脚，那是村长的儿媳妇。他不想从她跟前走过去，就岔开大路，从积着厚雪的麦田里斜插过去，跳下河岸，走到沙滩上来了。

他的罗网已经被雪埋住了，他用铁锨刮积雪，用三角木架支起来，却不想把锨扎到砌石里去。他一侧过头，那个穿着军大衣的村长的儿媳妇，正在河岸边远远地瞅着他。

他用铁锨的木柄穿过罗网的网眼儿，背起罗网，转身朝河岸走去。

“润生——”长才大叔从雪地上奔过来，嘴里呼出大股大股的白气，“你——”

“不干了。”他的沉静的口气，连自己也暗暗吃惊。

“你干啥去呀？”长才大叔伤心地摇摇头。

“而今卡不死人了！”他淡淡一笑，“哪儿挣不到钱呢？路数多咧！”

他走了，背着罗网，雪把石头和沙子全遮住了，常常被雪下的石头绊得一滑一拐。忽然间，一种奇异的感觉在脑海里产生了，那刷啦刷啦地翻捣石头的杂乱的声音没有了，河滩里倒显得空旷而寂寞，耳朵边骤然清静下来。他停住脚，一回头，散落在沙滩上的庄稼人，手拄铁锨，一齐停住了劳作，正目送着他走出沙滩去。他忽然动情了，没有力量再看那自然形成的肃穆的场面，急忙掉转头，继续大步朝前走。

“润娃——”

他听见呼叫，又站住脚，喊他的竟是五龙叔。他人正中年，穿一件紫红绒衣，粗壮的身坯像个碾场的碌碡，在雪地上滚过来。

“润娃，你发给叔的这个一号的号码，还算数不算数？”

五龙叔站在他的面前，手里捏着那张写着一号号码的小纸片。他忽然想，五龙大叔在要笑捉弄他吗？他给他送了点心和瓶装烧酒，他把这些东西提到沙滩上来公开招领，他把自己的东西取出来，示威似的摔碎了。润生没有说话，瞅着五龙大叔煞有介事的脸色，不像是专门来烧臊他的呀！

“叔知道，这个号码没用了……”他大声说，大约不是说给润生听。他忽然意味深长地说，“虽然没用了，叔还是舍不得扔了。叔留下作个记物儿……”

他居然解开对门开襟的绒衣的纽扣，把那写着号码的纸条塞进衬衫的口袋，压了压，又结上纽扣，像藏进万元存折一样认真谨慎。

河滩里突然爆发出一阵哄笑，有人打起了呼哨，像山洪突然从河的上游奔泻下来的呼啸。

润生一转过身，看见站在只有三五步远的那位穿军大衣的村长的儿媳妇，他明白五龙大叔的举动的含义和那哄笑声中所包含的怨愤了。

润生背起罗网，扯开长腿，从村长儿媳的身旁走过去，头也没有拧一下。

太阳从秦岭东山群峰的巅尖冒出来，雪地上闪射出五彩缤纷的花环，令人眼花缭乱。十八岁的哥哥走上河岸，再没有回头……

1984年6—7月草改 西安东郊

夭折

——献给一位文学的殉道者

一

他坐在桌子顶头，给我念他刚刚写完的一篇小说。

他每写完一篇小说，都要念给我听，从来不让我亲自去看，说是草稿字迹乱，不大看得清楚。我却相信我能看得清楚，因为我有时看见他念的作品，实际是已经抄写得很整洁的修改稿了，然而又不好意思执意要过来看。我要是写出一篇习作，要征询他的意见，刚从桌斗或口袋里拿出来，他就伸过手来，说：“让我看看。”于是，他就用指尖在嘴唇上抹上一点口水，翻揭着纸页看起来。我多少觉得我们之间有点不平等。

我坐在炕边上，胳膊肘搭在炕头搁放油灯的土台上，用手撑着下巴，静心屏息地听他朗读那万余字的短篇小说。有时坐得累了，有时听得烦了，我就打量一下这间熟悉的小屋。一间窄小的老式厦屋。土炕占去了大半空间。靠墙放着一张同样是老式的带抽屉的条桌，条桌的拉把儿是一只黄铜铸成的树叶，闪闪发亮。门和桌子之间的空当恰尺等寸可以安置一把椅子，他就坐在这把直背老式椅子上，就着门口照到桌面的亮光，读书或者写稿。靠着后墙的那一步之宽的空间，放着一个大红色的条形板柜；柜子上方，架着两只同样是大红色的木箱，那是他的新媳妇的陪嫁品。他的新媳妇坐在炕的那一头，低头捉着剪刀，在一张褙纸上比画着、裁剪着鞋底儿。

每当我思想抛锚，神志不专的时候，他的朗读声就提高半度，而且侧过头看我一眼。我立即抖擞精神，做出专心致志听着的神态。他的声音又舒畅地继续下去。

每当读到有趣的情节或细节，他的声调里就泛出一种得意的色彩，惹得我和他同时笑起来。他的新媳妇也低头抿嘴在笑，却不出声。我特别注意她的反应，凡是她有明显的反应的地方，我就觉得大抵是他写得最成功的段落。

一篇稿子读完，他放下稿纸，笑着侧过头，爽快地说："感觉如何？随便说。"一边说着，一边用手在一个旧罐头盒子里捏起一撮旱烟末儿，撒在一绺用废弃稿纸裁成的纸条上，在手心三拧两转，就制造出一根喇叭形状的纸烟了。我也如法炮制，两人就对抽起来。我们没有固定工资，生产队要等农历年底才决分，通常是见不到什么钱的；我们谁也没有发表过一个字，自然没有稿费，谁也买不起一盒最廉价的纸烟，却又不习惯使用老庄稼汉们那种笨拙而又难看的黄铜或白铁铸成的旱烟锅子。

不足十平方米的小厦屋里，有两支又粗又长的烟卷在冒烟，他的新媳妇轻轻地咳嗽起来，呛得眯起眼睛。我们俩毫不理会，早在烟雾升腾里，为他的小说中的一个人物、一个情节或细节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争吵得一塌糊涂了。

他所极力维护着的某一得意之笔，我却毫不客气地说那一段应该彻底干净地删除掉，于是，争论就不可避免了。对于他看过的我的习作，类似的争议似乎更为激烈。我和他尚未养成高雅的涵养，譬如说，应该谦逊地听取对方的意见，不应该当面眼对眼牙对牙地驳斥；应该斟酌给对方谈意见的方式方法，尤应以鼓励为主，先谈优点，再

说不足，然后再提出修改补救的措施，使对方于心理和感情上易于接受。没有。我们之间从一开始好像就没有这种文质彬彬的习惯，一当讨论起来，就争就吵。开始时，他的新媳妇曾劝过我们，不要失了和气，后来习以为常了，就只顾剪她的鞋底或者纳扎鞋帮，一任我们去吵。如果是在冬天的夜晚，吵得夜深了，她会从锅里端来一盘刚刚蒸熟的红苕，送到条桌上，那是十分惬意的夜餐了……

看着他的新媳妇又一次捂着嘴打着呵欠，悄悄抹着困倦的泪水，我就起身告辞。他送我到村外，兴犹未尽，于是就站在小沟的水渠旁继续高谈阔论，丝毫也不担心谁听了去。

这个时候，刚刚进入六十年代的乡村里，正经历着解放十多年来最普遍、最严重的第一次饥馑的时月。我和他——惠畅，两个一前一后从县城一中毕业的高中毕业生，都在疯狂地追求着同一个目标，我们都需要这种推心置腹的毫不隐讳的直率的争吵。我们将在这种争吵声中，走向生活，走向世界，走向未来的中国文坛，争吵声中也许会诞生并不亚于《静静的顿河》那样的史诗……

二

天傍晚，惠畅到我家来，约我去看电影。

对河的五里镇上，大约一月里演出一场电影。这一晚，是五里镇方圆十余里几十个村庄青年们的节日。尽管是已经被城里人看腻了的过时的旧片子，无论好坏优劣，我们都有耐心看到最后，甚至觉得听一听电影音乐，也是一种难得的享受。村子里没有通电，收音机见不到一台，精神生活的贫乏和物质生活的贫乏一样使人感到饥肠辘辘。每当五里镇一月一次的“电影节”到来的时候，我们俩必定不能或缺。

月色柔媚。知了和纺织娘在河岸边的杨柳林带里叫成一片。从各个村庄通五里镇的好多条河川土路上，手电的光柱忽闪明灭，抽烟的火光瞬息即逝，男孩子们的呼哨，女娃娃的尖厉响亮的笑声，此呼彼应的欢愉的嗓门，轻狂放浪的哄闹嬉笑的声浪，充塞了往日里静谧的河川的夜空。

我们涉过浅浅的河水，急急赶到五里镇。小学校的门口，人头攒动，灰尘在明亮的电灯光里浮动，广播在大树杈上播出诱惑力极强的乐曲。我们俩不约而同地翻起裤兜，掏出零碎的天蓝色和黄色的二分、一分的纸币，数起来，两人的钱，合在一起，真是万幸，竟有二毛多了，买过两张票，花去二毛整，竟然还有五六分宽余，我们就盘算该怎样挥霍享受这一笔余款了。

“买糖还是买烟？”我征询他的意见。

“买烟。”他总是比我更有主见。

我真想吃糖。我大约有一年多没有尝过糖的那种美好的滋味了。站在露天的电影场上，瞅着银幕上的惊险的反特故事片的画面，手插在裤兜里，嘴里含一颗水果糖，那该是一种多么舒心的享受哇！不过，买烟的主意也不错，我们平时用纸条儿卷旱烟末儿的手艺，在黑暗的电影场上就有诸多不便之处了。好！我立即表示赞同，我们俩走到一个卖烟的小摊前了。

“买哪种烟呢？”我问。

“‘航运’。”他说，一点也不犹豫。

白纸盒上印着一艘造型简陋而又画技拙劣的轮船，此烟牌号叫“航运”，售价一角二分钱一包，我递上六分钱去，巧极了，正好可以买到半包。我们每人装下五支，转过身去了。

在一根火柴上，我们点着了两支烟。多么奇妙的香味啊！我真舍不得将那令人沉醉的香味喷吐出来，实在比老旱烟末儿又辣又苦的味道好过千万倍了。嘴角咂着一支雪白的纸烟卷，昂首从小学校的门道里走进操场，真是自觉神气而又排场，比在嘴里含一颗糖有声有色得多了。

看过电影，就不那么急着回家了。我们散涣地走着，品评着刚刚看过的电影，优哉游哉走回到小河边上来，那些大帮大伙的男女青年放浪的声息，此时已经远远地流动到村庄里去了，河川里已经恢复了夏夜素有的静寂。

我们俩脱光衣服，在清凉的河水里躺下来，头枕着一块光滑的河石，把全身都浸泡在河水里。蚊虫无法下口，团团飞旋踅摸在头顶，我们一人抓一把臭蒿子，悠悠拂打着蚊子。河水从胸膛上流过去，身子下边的沙子被掏空了，我就挪一挪位置。星星在蓝天上眨着眼睛，深邃无垠的天际神秘莫测，一缕缕轻纱蝉翼似的云丝在月亮的脸上飘过去，河滩上又明亮起来。

“胡万春起初是个半文盲，现在是第一流作家了，真厉害。”我说。

“我们比他基础好多了，正牌高中毕业。”惠畅说，“自学起来更快。”

“胡万春投过二百次稿，才发表了百把字的一篇通讯。”我深感钦佩，对于我们俩都已知晓的这件逸事，总是兴趣不衰，“啊呀！我真是缺乏这样的恒心和耐心。”

“我相信，我们发表第一篇作品，绝对不需要用二百篇作铺垫。”他十分自信，用蒿草在水里狠狠抽打一下，扬起来，“我要是写过五十万字还不能发表一篇作品，那我就自杀！”

我缺乏他那样的自信，也就没有他那样的狠心，我说：“搞不了创作，当不成作家，也不必自杀呀！”

“玩笑一个。”惠畅不在乎地说，轻轻笑了，笑毕，却深富感情地说，“我他妈的不知怎么从小就迷上文学创作了！说真的，如果真的搞不出一点名堂，我不知道这辈子该怎么活着好！”

“咱们就拿出胡万春那股傻劲干吧！”我说，“埋下头，干它十年再说。”

这样的内容的扯淡，不知重复过多少次了。上海的工人作家胡万春正活跃于当时的中国文坛，《家庭问题》那篇小说使我们十分钦佩，从思想到艺术，甚至情节的铺展和细节的选择，都不厌其烦地讨论过三五次了。这种讨论，到后来往往就离开作品本身，延伸到作家的成长道路上来了。何止一个胡万春，中国的或外国的，当代的或古代的，所有能搜寻到手的作家文人们的传记和逸事，无疑是我们最感兴趣的交谈的话题。

蝉鸣已经止歇，偶尔有零星的青蛙叫声从河岸边的稻田里传出。夏夜里虽然静寂，却使我们感到了潜伏着的生命的跃动，无边的苞谷林里，传来飒飒飒的绿叶摆动的响声，小叶白杨在夜风中欢乐地歌

唱。我们躺在南原和北岭之间的小河川道里，热烈地又是忧伤地谈着文学，谈着追求；谈到胡万春，我们就信心十足；可是一谈到神童刘绍棠，就黯然神伤了。

这个神秘的神童带给我们的，不是鼓舞而是悲哀。他怎么会在戴着红领巾的年龄就能发表小说呢？我们俩戴红领巾念完小学的时光，只是对娃娃书兴趣十足，连小说这个名词压根都没听说过。刘绍棠上中学的时候，已经是出了名的作家了；我们已经高中毕业，至今还躺在黄土山中的这一道小河里胡拉乱扯，一个字也没上过报纸或杂志哩！我们猜测他的宗室一定是文墨瀚海，祖荫厚极，自幼熏陶。然而，从一些零星的资料透露出的事实却是，他和我们完全相似，出之乡野，世代农耕。我很丧气，惠畅也不大乐观。从刘绍棠看来，文学创作需要天才，我们都暗自怀疑，自己是否具备这份天资？我们对批判“右派”刘绍棠的文章无暇一顾，却对那个神童的“神”字感到神秘莫测。

“唉！没劲了。”我不由得叹气，“说起这个人，我就冒气了。”

“甭忘了，中国虽然有‘自古英雄出少年’的古训，也有‘大器晚成’的成语。可见什么都不尽然。”惠畅是很富于思辨的，“少年时代能成起事的，到底是个别人，多数人是青年和中年时候才露头。”

“我们若是‘大器’，迟成早成关系不大。”我仍然心里不踏实，“我们要是‘小器’呢？或者根本就不会成器呢？”

“契诃夫说，‘大狗小狗都要叫，就按上帝给他的嗓门叫好了。’”惠畅反而气更壮了，他忽然从水里翻起身来，站在水中，大声说着，像是和谁吵架，亦像是对河川和原坡宣言似的，慷慨激昂起来，“我不

是天才。我不是大狗。我是小狗。不，连小狗也不是！我是蛐蛐。不，连蛐蛐也不够格！我是醋蛛儿，上帝只给了我一个破尿罐的嗓门，我要叫！多一个人的叫声，世界就多一份声音！醋蛛儿的叫声虽然难听，它还是拼命地叫着！它没有因为有百灵子而抿嘴不响！如果只有百灵子而没有醋蛛儿，世界也就单调了……”

惠畅赤裸全身，慷慨激越的思辨，使我大受鼓舞。我为自己的怯弱而难堪，忽然也从水里蹦起来，和他站在一起，狠声说：“我也权当自己是一只醋蛛儿……”

“咱们往后谁也不许再说泄气话。”惠畅说，“人家是人家，我们是我们！”

夜深了。当我们又鼓起劲头的时候，肚里却饿了。许久以来，我已经没有吃过馍馍了，晚饭通常是一锅绿乎乎的野菜，点缀着几粒黄灿灿的苞谷糁子。现在回到家里，自然无法找到任何可以充饥的食物。他家的状况和我家不相上下，也不会有什么可以指望填充肚皮的东西。于是，他去扒拉柴火，我就悄悄溜进早熟的苞谷地里去摸几穗嫩棒子。没有办法，未来的两位文豪，现在不得不屈身丧德去……

三

火苗在柴枝上跳跃，从这一枝上又蹿到那一枝上，呼呼呼烧起来，高高的堤坝挡住了火光，蹿起的柴烟与朦朦胧胧的夜空搅和在一起，不大分辨得出来，河滩里的守田人不会发现我们的踪迹的。

我和惠畅坐在火边，再没有劲头谈论其他什么事，肚子太饿了，目不转睛地盯着绿皮的嫩苞谷棒子，在火焰烘烤中逐渐变成白色，继

而就成黄色，接着就烧成黑色了，发出吱吱吱的细微的响声，随之有一股奇异的香味飘散开来，刺激人的鼻膜，撩拨人的食欲，肚子里受到这样美味的食物的诱惑，翻江倒海似的蠕动起来，发出咕咕咕的叫声，嘴里也溢满了口水，我简直忍耐不住，等待不及了。

“听说巴尔扎克一度也很穷……”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一声很重的咳嗽，从堤坝顶上传下来，震得自命为受大任于天地的我俩，同时惊恐地扬起头来，就看见了堤坝上兀然站着一个人，半截铁塔似的，右手里攥着一柄梭镖。我一眼看出，这是看守庄稼的马罗。

惠畅有点慌，似乎忘记了自己是将受大任的伟人，怯生生地悄声问：“这是谁？怎么办？”

我与马罗已经有过一次交往，半月前，他曾经邀请我到他在河滩看守庄稼的庵棚里，亲自给我犒赏过一顿烧烤苞谷棒子。被他抓住严惩不贷的，是那些用麻袋偷下棒子到城里去卖钱的真正的贼；对我好像比较客气，不过是烧几个充饥罢了，他不会过分计较的。

他依然站在那里，瞅着我们问：“谁？”

“马罗大叔，阿克西尼亚今晚没来吗？”

他嘿嘿一笑，把直竖着的梭镖放倒了，“是你个崽娃子，我当是贼伙哩！”河堤是用水泥和河石浆砌的直面，又光又滑，他下不来，绕那边的小路去了。

惠畅吁出一口气，释然了，坐下来。

我给他介绍，这是我们村一个老光棍，终年四季，给生产队里看守庄稼，夏收看守麦子；秋天守护苞谷和棉花；冬春两季，吆撵拔食麦苗的大雁。他在河那边的村子里有个情人，常常在夜静时涉过小河来，在他的小庵棚里幽会，那几乎是公开的秘密，我称她为阿克西尼亚。马罗虽然没读过《静静的顿河》，却知道我说的是谁，指的是哪一档子事。

马罗已经走到火堆跟前，扔下梭镖，准备找一块地方坐下来。

“葛利高里大叔，欢迎你。”惠畅抓住马罗的胳膊，“你真是个浪漫的人儿哩！”

“你可甭听他胡糟践我！”马罗哈哈一笑，佯装斥禁的口气，对我说，“你尽给我造谎呢！”

“咋能是我造谎呢？”我故意逗他，“马罗叔，你对月亮发誓，有没有一个阿克西尼亚？”

马罗从火堆里捏起一粒火星，按到烟锅上，喉咙里发出咯咯咯的憨笑，得意地仰起头，淡淡地说：“那是牛年马月的陈事了。而今那个可怜人，日月恓惶哩！我可怜她，周济她一升半斗……人家娃儿大了，咱还不自觉行吗？”

“马罗叔哎！”惠畅亲热地叫。他对马罗十分感兴趣，眼里闪出生动的光芒，说，“你一年四季给队里守护庄稼，很辛苦了。”

“不苦。”马罗头一摆。

“真不容易哩！秋天下阴雨，冬天下雪……”

“人家队长给咱工分哩！”

马罗吐不出一句更崇高的话，惠畅有点失望地闭了嘴。他大约想听听马罗说出诸如“为集体咱不怕冷”之类的话，然而他只能失望。

“你们俩说你们俩的话吧！”马罗自动拨着火，翻捣着已经烧得黑乎乎的苞谷棒子，义务为我们服务，“有文化的人说话，中听！乡村人尽说粗话。”

“我们说话有啥好听的？”惠畅问。

“好听。一样的话，你们文化人一说出口，味儿不一样啰！”马罗笑说，“比方我跟那个可怜人儿的事，我其实也不怕谁说。你们说成‘阿’啥子‘亚’，我就知道说的那个可怜人儿。乡村那些粗庄稼哥们，一开口就是，‘马罗伙计，这几天跟野婆娘弄了几回？’你说难听不难听？”

我和惠畅已经忍不住，哈哈大笑。惠畅猛然扑到马罗背上，抱住他的脖子，用自己的脸颊在马罗的脑袋上摩搓，亲昵地喊着：“马罗大叔，我的真正的葛利高里……”

马罗从火堆里捡出一个黑炭棒子，甩到惠畅的怀里，接着又甩给我一个，那熟悉的动作，使人感到豪爽而又亲切。我撕开一层烧焦的外皮，就露出冒着热气的内皮来，一层层撕开，就咬着了软乎乎甜腻腻的苞谷粒儿。惠畅动作更麻利，已经啃得满嘴响起咔嚓的声音。

“你俩谁有戏本呢？”马罗问。

“你要啥戏本？”惠畅口齿不清地问。

“《铡美案》《五典坡》都行。”马罗说，“《周仁回府》也嫽哇！啥戏本我都爱看。”

“你识得字吗？”惠畅好奇地问。

“识得几个。”马罗说，“我一边认，一边前后揣摩，也就碰出意思来了。”

“你上过学吗？”惠畅似乎才找到话头了。

“上学上了四年哪！”马罗沉吟着，自己也有趣地笑着，“那时候的学堂，先生爱打娃娃。怪得很哪！我在下边背书背得溜溜熟，一叫到先生跟前，瞧见那根二尺长的竹板子，背熟的书全忘光了，先生就捞起竹板子，抽得我的手心连碗也端不住了……”

“你要是不伸出手呢？”

“不行啊！那时候念书就兴打板子。”马罗莫可奈何地说，“有一回，先生的板子刚抽下来，我的手往回一缩，糟了，先生抽在自个的膝盖上，这下了得！先生左手掐住我的指头，咬着牙，在手心打。我闭上眼睛，手心疼到后来，倒是不知道疼了，也不知他打谁的手哩！”

“噢哟！马罗大叔，你认得几个字，代价不低呀！”惠畅半是玩笑，半是认真地说，“为了你好不容易认得的这些字不至忘记，我无论如何也要给你搞两本戏本子！”

我心里知底，马罗大叔的嗓门是很不错的，有铁嗓子的美誉。在夏天傍晚的余晖里，晚霞给郁郁葱葱的青纱帐涂一片赤红，从河渠边

的杨柳林带里，常常传出马罗粗壮而雄浑的声音。白雪蒙地的冬夜，在广漠的河滩上，他吆雁吆得烦了，就放开喉咙吼唱。他爱唱戏，更爱看戏，每逢县剧团下乡，他常常追到一二十里远的岱峪口去看戏，要是五里镇有戏，他是一晚也不会空缺的。看得多了，那些最流行的秦腔剧，他不仅能背唱大板大板的唱词，连人物的对白也能大段大段地道出来。他唱起"乱弹"来，嗓门难免跑调，词句也很难让别人听清，但人一听都能猜出是某一本剧里某某人的唱词，而味道则是纯粹不过的秦腔的戏味。关键是品尝那种不易说清的味道，而戏文和唱词不清倒在其次了。

"马罗大叔，唱一板'乱弹'吧？"我怂恿他，"拣你最拿手的来一段。"

"要唱'乱弹'，还数《牧羊》里苏武那一板唱腔好。"马罗一经触及，戏瘾就来了，他盯盯我，又瞅瞅惠畅，"你俩谁会唱不会？苏武和李陵，两人对唱才崭劲！"

十分遗憾，我对我们的秦腔听来虽也顺耳，却从来没能学会唱腔。惠畅是个文娱活动的活跃分子，在学校里上过台，演过戏，可惜在他演过的几折小戏里，总是扮演着小生的角色，大都是和姑娘、小姐对唱，苏武在《牧羊》中的唱词他一句也唱不下来。马罗也不勉强我们，已经干咳几声，清理嗓子，猛然扬起头来，就爆发出一声天崩地裂般的声音："汉苏武在北海……"

他的脸在火光中更显得红了，脖颈上的筋络暴突起来，慷慨激昂的剧情和戏词，大约正适宜他的嗓门。我从来没有这样近距离地听人唱戏，此时才觉得体味到了真正的秦腔。他一人身兼苏武和李陵两角，放开嗓门吼出苏武威武凛然的戏词，接着压细嗓子唱出李陵哀婉

曲折的心声，在紧密激烈的对唱中，把苏武以死报效祖国和李陵变节屈膝的两种气质活活地表白出来了。

我已经多次听过马罗大叔的嗓门，不足为奇，惠畅听完，已经激动得满脸喜悦，热烈地说：“马罗叔，我下回把板胡拿来，我拉你唱，咱们搞个自乐班。”

马罗却笑笑说：“我跟弦唢唱不到一块。”

惠畅甩掉一根啃完了的苞谷棒子，又从火堆里拣起一个来，撕开了，玩笑似的说：“马罗叔，我将来要是当了县长，首先接你去享福。吃烤苞谷听‘乱弹’，皇帝怕也享不到这样的福分！”

“那也说不定。”马罗笑着，“兴许你还当省长哩！”

他挺认真地举出实例来，说他家在山里的一个远门亲戚，在山坡上看守庄稼，山里狗熊特多，夜里出来啃苞谷。有天半夜，他的表哥刚轰走狗熊回来，窝棚里滚进一个人来。他的表哥打着火镰引着火，一看，那人腿上淌着血，就把那人救了。伤好了，那人夜里又走了，他的表哥也没敢问人家是啥人，倒忘了。解放了，乡上来了三个人，要接他表哥出山，不由分说，就用抬竿轿把他表哥抬到乡政府去了。爷！乡政府门口停着一辆卧车，那个伤员从车里走出来，抱住他的表哥……人家是北京一个部长！

“马罗大叔，等着吧！”惠畅笑着，煞有介事地说，“我将来用直升机接你！”

马罗哈哈笑着：“我可害怕坐飞机。你说，那东西要是在天上正飞着，像马一样惊了咋办？”

惠畅给马罗大叔开下空头支票，马罗大叔也畅快地吼喊了一阵“乱弹”，主要是我俩的肚里都装满了真正的粮食，在月亮已经溜下西原的黑下来的夜色里，三个人沿着三条路，各自回家去了。

第二天后晌，惠畅兴冲冲跑到我屋里，喜不自胜地说：“昨黑我回到屋，写下一篇小说，用马罗作模特。你坐下，听我给你念……”

四

县文化馆的浦老师给我们俩寄来两张蓝色的门票卡片，市里的文化馆为文学爱好者举办一次文学讲座，特邀省报文艺副刊的一位肖编辑主讲，讲题是《散文散谈》。接到信时，已是昨天傍晚，我们昨黑就约定了，今天后晌动身，晚上宿在城边，明天一早赶进城去，正好跟得上听讲。母亲特意破费给我用苞谷面烙了五个小烧饼，没有给里头掺进豆渣或者菜叶，那是真正的纯粹的粮食烙制的烧饼了。我焦急地等待着，却不见惠畅来。我忍耐不住，又赶到他家去，想不到，他正跟新媳妇拌嘴吵架。

新媳妇秀花，鼻子和嘴巴全都因为生气鼓劲而挪位；那秀气的鼻子，因为脸腮变色而显得又小又扁；那荡漾着温情的眼睛笼罩着污气浊水，显得难看了；嘴唇噘着，更使得脸型愈加不协调。我看见她的这副模样，暗暗一惊，她也有点不好意思，立时扭转身，坐在炕边上，把微微颤抖着的背脊朝向门口。

“你咋这样狭隘！”惠畅气呼呼地说，“真是莫名其妙！”

我看看惠畅气憋憋的脸色，劝他冷静一下。好在那秀花见有人来，也不再开口，我就拉着惠畅出门，回避也许是最好的办法。

上路以后，惠畅的情绪逐渐恢复正常，我不好问两口子因为什么发生口角，只是劝他不要和她一般计较，那毕竟是一位只读过小学四年级的乡村女子，长这样大只进过两次西安，都是和他订婚、结婚时，由他引着她去买衣服，去照相，去登临大雁塔的。

“嗨！为什么正经事来呢？”惠畅丧气地说，“全是小心眼！看来……农村女子的心眼更狭隘！我总以为乡下姑娘朴实敦厚……”

“天下的女人，无论是白种或黄种，都有一个不可克服的先天性通病——”我记不清在哪本书上看见过这样的话，统统搬出来，故作高深地说，似乎我对女人有专门研究似的，“这就是疑神疑鬼，对丈夫尤其如此。”

“为了一封信，跟我憋了三天气。”惠畅说，“我的一个女同学给我来了一封信，问候了我几句，有几个赞美我的词儿。她读得半懂不懂，居然说那个女同学是我的‘野婆娘’。我今日后晌正准备走，她可有话了，说我要去寻‘野婆娘’，所以才急得愁得……你看看，遇见这号女人，我咋办？”

在县中念书时，他比我高一级，自然也早一年毕业、回乡。我那时已经影影绰绰听到过他在恋爱的传闻，传闻中的那个女生，是一位细高挑个儿的圆脸姑娘，有一双不大却柔情脉脉的眼睛。当我毕业回乡之后，第一次到他家里去拜访他的时候，他的新媳妇秀花，已经坐在小厦屋的土炕上给他缝衣做鞋了。据我所知，他的那位细高挑个儿的女朋友，毕业后考上医学院了。他是个农民，这之间的差别有多远，我是完全可以体味得到的，所以从来没有问过他，也许我听到的传闻不过是捕风捉影。既然这个细高挑个儿的医学院学生已经使农家

女子感到威胁，而且使我的朋友惠畅陷入苦恼，我就有责任尤其有兴趣问问究竟。我直言不讳:“是医学院杨琴茹来信了吗? ”

“是她来了一封信，惹起了内乱。”惠畅也直言不讳地承认，“杨琴茹现在是大学生，我一个老农民怎能般配！这个蠢婆娘尽瞎猜！”

“也许你和杨琴茹有不检点的行为，给秀花察觉了? ”

“没有啊……唔！我结婚后的第三天，她来了，气色不好。秀花看出一点意思……”

“也许你心里还忘不了杨，对秀花热情不足，她敏感了！”我继续胡诌我从外国小说中看到的关于女人的议论，运用到惠畅的爱情矛盾中来，“人家说，女人对男人的敏感，并不受文化程度的限制。你可甭把秀花当傻瓜……”

“这话很有道理！”惠畅说，“秀花虽然文化低，心眼可不少……”

乡村的土路贴着南原坡根向西伸展，河川里是即将成熟的苞谷和谷子，叶子开始衰败了，好些田块里的苞谷，棒子刚泛黄，饥馑的社员已经等不及熟透而提早掰掉了，留下空空的青秆还栽在地里。棉花的叶子紫红乌青，斑斑驳驳，田野里呈现出晚秋时节一片纷杂斑斓的色彩。乡村土路上不通汽车，来往着推车挑担的农民或小贩。我和惠畅走着，长途步行的寂寞，完全被他动人的爱情的自白排除了——

“我跟杨琴茹的关系，打个比方说，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一点也不过分。

“我俩在高一时是同桌，她是化学科代表，我是语文科代表。高二时排座位分开坐了，开始有书信传递。传递书信的形式五花八门，多

种多样。她给我发化学作业本时，必定夹着一封信；我给她把回信又夹在她的作文本里送过去，如此这般。杨琴茹写给我的情书，有三十万字；我回给她的，有五十多万字；其中有许多抒情诗，她的诗写得比我更细腻，属婉约派。如果有可能，譬如我将来成了世界著名作家，我就准备把俺俩的信按时间编排下来，稍做整理，就是一部两卷本的长篇小说。我敢打赌，那将会是一部引起轰动的畅销书……

“你甭打岔，亲吻的问题我后头再说。老师不准学生谈恋爱，怕影响学习，好多人偷偷地谈着哩！我们俩可真是没有因为恋爱影响学习，反倒是促进了学习的劲头。要是稍长时间不给她唱一段赞美诗，我就心慌意乱，心里捉不住学习；看了她的信，我就心地踏实，劲头倍增了。所以说，老师虽然动机很好，方法却不妥，我们都是二十或超过二十岁的人了，够《婚姻法》规定的结婚年龄了。我可不像梁山伯那么傻，同窗几年还认不出祝英台属雌属雄，我可是一下子从她的眼睛里发现了，她喜欢我，而且十分喜欢我，我就大胆地写给她一封长信，专门描写她的眼睛，头一句就叫她心灵震颤：你的细眯的眼睛（恕我客观）令我难忘，似乎是一个地下湖的缝隙，蕴藏着无限深情……她被我打动了，给我很快送来回信。每一次通信的末尾，都缀着俩字：吻您。可是，我们实际上只是纸上接吻，没有……唔！毕业离校的那一晚……

“开完毕业联欢晚会，我们俩就走出校门了，沿着学校后边的河岸朝下游走着。月亮很亮，空气清爽。她没有洗去上台唱歌时涂在脸上的胭脂，我也没有擦掉饰演秦腔《游龟山》里田玉川时涂在眉毛上的墨汁。我们俩走着，瞅着对方化了妆的脸相，她笑我，我也笑她，笑着笑着就……接吻了，胭脂和墨汁抹得两人的眉眼一塌糊涂！我们立即跑到河边洗掉了……这是我们第一次接吻，也是最后一次……

“她接到录取到医学院的通知书，立马跑到我家来看我，我名落孙山了。她鼓励我明年再考，我假装同意，怕她失望呀！她走后，我睡了三天，就同意了家里给我订婚的主张，跟媒人引来的秀花见面了，模样挺俊，不比杨琴茹差多少，看来也腼腆，就订下了！仨月没过，她就过门了，枕着我的胳膊睡觉了！杨琴茹得知消息，跑到俺家，怎么也掩饰不住，让秀花从她的痴痴呆呆的神色上看出破绽来了。我送她到村西的大路上，她哭着跳上车子走了……

“你不理解我的行动？其实很简单。我现在是个农民，和她一个大学生要生活在一起，你想想这样实际吗？你说我结婚太早，这对。我也想过，等我在文学上取得成绩，功成名遂，再去花好月圆；可是，我如果永远也奋斗不出一点名堂呢？我这人，你可能觉得浪漫，切身问题我却很实际。我和秀花结婚，就是把自己定在一个终身农民的基点上，如果能有所成就，当然十分好了；如果一事无成，秀花也不会嫌弃我是个农民。这样，我心里无所牵挂，我死心塌地自学文学，连再次参加高考也放弃了……

“我努力将她忘记。把一个丈夫应该给妻子的一切都给予秀花，为此，我和琴茹不通信了。我也给秀花如实坦白交代过这一切，企图使她理解我，帮助我。她听时倒能同情我，可是，前日一见琴茹的来信，心里又起疑雾了，我才觉得给她坦白得太彻底，是失策……”

听完惠畅的叙述，不仅他自己动情了，我也动情了。我也出身于低微的贫穷的农村，在同类问题上完全能体味他的苦衷，纯真的浪漫的爱情，和极度贫穷的家庭经济状况的矛盾，无法统一，也无法回避。我深为钦佩他的抉择的干脆利落，更为钦佩他在文学事业的追求上所作的如此长远的打算，以及下了这样重大的注头。可以说，他的

婚姻问题的处理，完全是出于对事业的服从，这需要怎样的理智和残酷的感情割舍?

夏日的夜色缓缓来迟，我们不知不觉中已经走进水沟村了。我们已商定好，在这儿过夜，明天一早赶往城郊汽车站。听说水沟村有两家农民偷偷开的黑店，每晚每人只收三角钱，正好适宜我们的经济基础。晚上本可以赶进城里，旅馆的住宿费是无法支付的。我们已经忘掉了那位痴情的医学院的女生，开始向一位村民打问，谁家开着店子……

五

水沟村真是名副其实，由两条沟组成，从东南边那条沟里流下来的混浊的泉水，沟底落积着污黑的树叶，容纳了半个村子里居民的排泄物，水已变成黑乎乎的臭流了。从西边伸展过来的是一条干沟，晴天里没有流水，已经变成一条自然的通道。两条沟在原坡下交叉在一起，有一座小小的土桥，跨上这土桥便是进入水沟村的第一步。

我俩站在土桥边，同时在猜度，黑店在哪条沟里开着? 往干沟里瞅瞅，再往流水的南沟里瞧瞧，沟里全是倚着崖壁而凿成的一孔孔窑洞，窑院前的平场上，零零散散地竖起一座座后墙特高而檐墙甚矮的厦屋。经一位老者指点，我们就沿着干沟走进去。

沿着干沟走上去，他巡查左边，我逡巡右路，走到沟腰里，我终于在一座厦屋的土坯山墙上，看到一块小得有点贼头贼脑的招牌，大约只有一只锨板那么大一块木牌，挂在一根木橛子上，走近一看，木牌上写着两个畏畏缩缩的黑字：客店。我猜想，既然是黑店，当然不

敢明目张胆地张罗出一张醒目而体面的牌匾；这只小牌，大约只是在日暮天黑时挂出，给急于投宿的行人指一指所在，白天就要摘掉了。

惠畅已经叩响土垒门楼下的黑色门板。

小院里有轻快的脚步声，门开了，一个彪形大汉站在门口。

“请问，这儿歇客吗？”

“歇。”

“住一宿多少钱？”

“五毛。”

“有便宜点的铺位吗？”

“一律五毛。”

我和惠畅对看一眼，大约都在心里盘算，能不能支付这一笔住宿的开销。我身上只装着一张红色票面的一元币，住宿花去五毛，坐公共汽车进城票价要二毛，来回四毛，那么剩下一毛票儿，只够喝开水了。我正在为难，惠畅已经转身走了，转过头来招呼我说：“走吧！我已经瞅好一个地方了，火车站候车室挺宽敞！”

我和惠畅刚走下沟底，那位彪形大汉却站在沟塄上叫：“喂！四毛住不住？”

“三毛。”惠畅很嘎气地说，“我不会啰啰唆唆地讨价还价。”做出不耐烦的高傲神气，立马要走的架势。

“三毛就三毛吧！”彪形大汉口气软下来。

两间厦屋，一铺用土坯盘垒的土炕，铺着一页篾条很粗的苇席，叠垒着几条补疤连着补疤的被子。我立即看出，这厦屋其实并不是职业性的店房，而是地地道道的农家住屋，不过在光席上多搁了几条破被子罢了。脚地上放着一条长板凳，凳面横竖是沟沟道道，使人会产生一种百年古物的直感。

彪形大汉用黑釉瓷盆端来半盆已经凉透的开水，放在靠墙根的白色板柜上，就冷着面孔说：“现在交了房钱，明早迟走早走请便。”

我和惠畅又对视了一眼。他大约怕我们天不明起来溜掉，每人就立即交出了三毛票，我们明早起得早，倒是省去了麻烦。

彪形大汉收了钱，装在短袖蓝布衫的口袋里，没有走出门去，却在长板凳上坐下来，点着旱烟袋后，随口问：“二位从哪儿来？没有行李？”

他大概把我们看成肩挑山货进城的脚夫了，却不见行李。惠畅很快地说：“我俩到城里去开会。”

“唔！你们是队干部？”他扬起头，重新打量我们一眼，“既是干部，你们该是懂政策的，敢问这‘瓜菜代’年馑，还得多久？”

“快了！相信党和人民，困难很快就会过去的，今年比去年不就强一大截吗？”惠畅给他宣传，鼓励，“今年的秋田比去年好，生产队分的粮食肯定多些……”

“嗬呀！人真是饿得撑不住了哇！”彪形大汉叹着气，“盼得明年雨水好……”

煤油灯盏昏暗的光亮里，我打量着这个彪形大汉，敞开着短袖儿的前襟，露出肌肉棱蹭的紫红的胸脯，卧蚕眉，条形大眼，直通通的鼻梁，阔大的嘴巴，真乃一条关中大汉的体魄。从这样强悍的体魄里发出哀婉的叹息，使人感到如此别扭，真亏他长着这一架派势！照我推想，这样强悍的躯体该当有英雄的豪言如雷轰击，才显得与他的体魄相协调。我不由得问："你做啥营生？"

"种地嘛！叼空到长乐坡'拽偏套'。"他淡淡地说，"队里去年没决分，今年也悬乎。干一年白干了，没个指望。我到长乐坡去给人力车挂偏套，从坡下拽到坡顶，二毛钱，一天能弄两三块，买点高价苞谷，就这……"

我忽然意识到，我和惠畅虽然也免不了挨饿，却不觉得绝望和悲哀，是因为有那么一个虽然遥远而总是存在着的理想的目标，在诱惑我们，鼓舞我们，苦也不觉得太苦了。而眼前的这位彪形大汉呢？他自然没有想入非非的念头，也不会有将受大任于天的自我安慰吧？他的悲苦可能就双倍地沉重了。

"你该是在队里好好干，发展集体生产，困难就克服了。"惠畅不忘记自己是党的宣传员的责任，宣传群众，"光靠拽偏套顾眼前不是办法……"

"需得队里换了队长，换上好人，我就有指望了。"他摇摇头，"你们不知，现在的队长哇，一把能抠出六道渠儿……他不会长了，社员联名到公社告状了，党委杨书记说今冬整队，俺水沟五队是重点。我等着……"

他又叹息一声，捏着烟袋出门去了，沉重的脚步声，响到后院的窑洞口去了。

彪形大汉回窑睡觉去了，却把沉闷的气氛留在我们住的厦屋里。

“会有的。一切都会有的。”惠畅模仿瓦西里安慰妻子的声调和神态，顿时把厦屋的气氛烘托得轻松了，“粮食会有的，面包也会有的……”

我们脱光衣服，只穿条短裤头，把棉被拉开一角，就透出一股酸臭的汗腥，没有办法，盖住肚子睡吧。炕头横竖扔着几个木头做成的条形六面体，这是枕头，上面渗着黑紫色的油渍，也许有无数的脑袋享过它的清福了。

我们躺下来，依然兴致勃勃地讨论托尔斯泰和《安娜·卡列尼娜》……

我刚迷糊入睡，就被惠畅的惊叫吵醒。

“第三次世界大战爆发了——”

我睁开眼，惠畅穿着短裤站在脚地，早已点燃油灯。我莫名其妙，他又在恶作剧吧?

“飞机、坦克、装甲车，全面进攻！”

他说着，哈哈哈笑着，掌起油灯，在炕边上寻着、搜着，忽然大叫一声，脸色都黄了，尖声悲哀地喊:“我的妈吔——”

我跳下炕来，接过他手中的煤油灯，在他看过的地方查看。老天爷！臭虫从墙缝里爬出来，排成一条军用地图上的箭头似的长线，一直连到炕席上。整个三面墙壁上，有这样七八条由臭虫组成的浩浩荡荡的大军，长驱直入，向炕上睡熟的活物偷袭，一见灯光和人的声息，那些大的小的臭虫大军，立即溃散，纷纷逃匿隐蔽到墙缝里去了。我吓得浑身冒起一层鸡皮疙瘩，直想呕吐，坐在长条凳上，又蹦起来，似乎那百年古物的缝隙里，也埋藏着这样的甲兵。

“话说托尔斯泰和曹雪芹，一路走来，已觉腹饥腿沉，就在水沟一家客店投宿。盖的鸭绒薄缎被，枕的落风软枕，正睡到好处，忽闻飞机轰鸣，震耳欲聋，睁眼一瞧，万千饿蚊翻腾俯冲，扑面而来。两人正在惊慌，忽见四面山野里，摆出六七条长龙阵，装甲车和坦克铺天盖地，如同潮水般围卷过来……托尔斯泰丢了安娜，曹雪芹甩掉红楼里的小姐丫头，夺门而逃……”惠畅站在脚地，即兴演讲出顺口胡诌的评书，已经笑得前俯后仰，我也捂着肚子，只觉笑得疼痛难受了。

我取来衣裤，在门外的院子里摔打抖索，只怕衣缝里暗藏下一个贼兵，摔拍得衣衫噼啪乱响，才疑虑重重地穿到身上。我拉他快走，他已走到门外，又返身进去，从炕洞里拣出一块烧炕时未燃烧尽的黑棒，在墙上写道：

“还我血来！”

惠畅写罢，摔掉黑棒，吹灭了煤油灯，我们就走出街门了。其时，星斗满天，深秋的夜半时分，湿漉漉的夜气透着一阵阵寒意。

翻上干沟的顶端，远远可以眺见城市的灯火了。赶天明，可以步行到市区，倒是可以节约下二毛钱的车费，我们俩扯开步子，在乡村

和城市的边沿上赶路。

我俩大步走着，心里反倒畅快，走夜路有其独特的韵味，心里一阵激动，像是乡村那些七老八十的老婆老汉去朝拜古庙神寺，愈接近目的地，脚下劲头愈足了，心里凝结的信仰的力量简直是无可比拟的……

六

我拉着惠畅在剧院后排的连背椅上坐下来。舞台上吊垂着紫红色的帷幕，一只麦克风孤零零地立在舞台前沿。舞台上挂着一幅“向雷锋同志学习诗歌朗诵会”的红色横标，可能前几天在这儿举办过朗诵会，横标尚未来得及卸掉。

我们步行六七十华里，几乎一宿未睡，现在坐在靠背木椅上，腿脚首先感觉舒服极了，浑身尽管有一种紧巴巴的疲倦的感受，却仍然精神兴奋。剧场前头已经坐得黑压压一片，门里仍然拥进一伙伙青年男女，也有中年人和老年人。从服饰和举止上判断，可以看出听讲者中有青年工人、教师和其他角色，唯独没有农民装束的人。只有我和惠畅，一眼就可以看出是从乡下赶来的农民。我和他都是家织粗布衫儿，头发上落一层黄色的尘土，这是在乡村土路上长途跋涉的结果。我们没有穿袜子，脚背也已被尘灰污脏了。我感到拘束，又感到孤独。过往的穿戴干净的青年男女，冷漠甚至鄙夷地瞅一眼我俩两边空着的座位，走开了，挤到干净人窝里去了。

我的心里聚着的劲头，渐渐撒漏了，简直悲凉起来了。老天爷！在这个城市里，竟然有这样多的人赶来听文学讲座，可以断定尚不是全部爱好文学的人。在这个可以容纳千人的大剧院里坐着的，肯定有

一大部分人都在做着作家的美梦和进行着实际的努力，而终究能成为作家的，又有千分之几呢？那千分之几的幸运儿，绝对不会是我这个一身家织土布的乡下佬哇！我简直由自卑而愧悔了，真是，腰里揣着几个硬得像石头一样的苞谷面饼子，居然跑了几十里路来听文学讲座！

“甭看这儿坐的那些人，一个个神气十足，好大派头，好像他们就是马克西姆！”惠畅撇着嘴角，斜眼很傲慢地扫视着会场，以一种嘲笑的口吻说，“其实比我们强不到哪儿去！”

我不知他说这话的依据是什么？不敢全信，可是却很愿意接受这种意思的话，以及说着这种话时的情绪。

铃声响过，帷幕推开，会场渐渐静下来，一位中年人笑容可掬地走到麦克风跟前，宣布了报告会开始。

令人惊异的是，舞台左边走进一位风度翩翩的青年，腋下夹着一只黑色的皮夹，站到讲桌前，恰到好处地点头鞠躬之后，就坐下来，也不寒暄客气，一开口就讲起散文的概念来。他中等个头，乌黑的头发，白皙的脸庞，两只聪灵的眼睛，一看就是一个博学多才的书生。

坐在我前排的两位中年人交头接耳，说报告人不过二十三岁，大学文科毕业，现在已经是省报文艺副刊的编辑了。我仅仅比他小不过两岁，现在正愣头呆脑地坐在台下听他讲文学的基本知识哩！

我侧过头，惠畅正聚精会神地在小本上作记录，全然没有我这样的自卑。年轻的编辑口齿伶俐，语言准确，感情丰富，手势潇洒，讲得真是好极了。讲解举例中，他居然大段大段地背诵起俄国一篇有名的散文来……

……

我们重又走在来时的南原坡根的乡村土路上了，午后的太阳仍有热力。在一架水车前，一头骡子蒙着眼，拽着木棍转圈圈，木棍转动齿轮，叮叮当当，清水哗哗哗从筒管里冒出来。我们在水槽里洗了脸，喝了几口清凉凉的井水，又赶路了。

“这个人讲得好！”惠畅很钦佩地说，“散文是形散而神不散，一句话就概括了散文的艺术特质……我看你听讲时，好像总不踏实？”

“我总是怀疑自己。”我如实相诉，“我看在座的那千把人的派头，一百个中有九十九个都更像作家的派头，只有我不像！”

“哈呀！我和你刚好看得相反，完全相反。”惠畅扬着头，挥着手，“我看那一百个人中，有九十八个都不像作家的派头，只有你和我像。”

“有点妄自尊大吧？”

“我敢和你打赌——”

“打啥赌？”

“十年，顶多十年，我要以作家的名义，踏上这个剧院的舞台讲创作！”惠畅突然站住，紧紧盯着我，不是开玩笑，“请你记住今天这个日子，我说过的这个话！”

到此为止，我平素体会已深的他的自信的气魄，现在发展到顶峰了，完全可以说是狂妄了。我倒是觉得，对于我心里不知怎么形成的几乎是根深蒂固的自卑，应该接受他的一部分虎气。我掏出笔记本，

当真记下了他的狂言，而且记下了时间和地点，双方签字为证。这也许可以逼他更加努力去奋斗，我同时也觉得紧迫起来了……

七

我走进他的熟悉的小厦屋，煤油灯光里，我发觉他神色不正，出气也粗了。又是和秀花憋气吗？我暗自猜想，不由得瞅一眼秀花。她脸色有点抑郁，却不像和他存心怄气的样子。她平和地说："你就专心看书写字，少染人家团支部那些事……"我心里释然了，既然不是他们两口子之间闹矛盾，我就可以在小厦屋里坐下去了。

"怎么了？"我问，"出了啥事？"

"嗨——妈的！"惠畅气恨地骂。

他那样乐观，又那样自负，总是在任何艰难困境中能够找到幽默的话题，我几乎没有看见过他憋气难言的样子。看来，任何乐天派都不可能从早乐到晚，从生乐到死，总有纷繁的俗事缠得他皱眉的时候。

"你说，我该怎么办？"他瞅着我，像是征求我的意见，要做出什么非同小可的决断，"我简直不能忍受这种污辱！这个无赖！"

"到底出了啥事？"我意识到事态严重。

他一开口，就说到他们村的团支书，他和他有矛盾，而且不可调和……

他是惠家庄第一位高中毕业生，又多才多艺，很自然地成为惠家庄青年崇拜的核心人物。原任团支书用尽一切几乎是可笑而又愚蠢的

手段，限制他，打击他，以至毁谤他。他全不在意，暗自好笑，团支书怕他取代他在团支部的领导地位哩！他想，真要取代他，也许并不难，问题恰恰在于，他无心窃取团支书的位置，他有自己追求的理想和生活的至高无上的目标。他诚心诚意协助文化程度不高的团支书做好工作，给青年们编排小型文艺节目，居然在公社团委举行的纪念五四青年节的文艺演出中获得第一。他在村里办的墙报，在全县团支部的墙报评比中名列前茅，市上的团的宣传干部在晚报上写了报道。他的宣传工作越出色，团支书越嫉妒他，竟然悄悄向公社团委书记汇报，说他骄傲自大，自恃有文化，瞧不起农村青年云云。因为公社团委已有用他的意思，让他做团支部宣传委员，团支书反而说下一大堆不是。

所有这些他都忍了，不予计较。前日发生了一件事，才惹起一连串的不愉快。他晚上睡得迟，常常到半夜，而临睡前必要送去一次“皇上”。他照例走下塄坎，在河沟的白杨树下去大解，猛然一阵响动，看见两个黑影朝河沟里窜去。困难年月里，乡村常有小偷小绺的人，夜里翻墙入院，牵羊捉鸡。他断定那是两个歹徒了，拔脚追去，直追到河沟的土桥边，那两人分头先后爬上小桥边的土路，光线稍亮一些，他才辨出后头那一位是个女的，前头撒开长腿仓皇逃窜的，竟然是团支书，他的那双八字拐腿的姿势，即使在夜里，也很清楚……他立即收住脚，自认晦气，长吁一口气。解开裤带，送他的“皇上”了。

团支书已经娶过媳妇，而且在秋天已经有一个儿子出世，却偷偷摸摸干这种风流勾当。他已早有所闻，说团支书利用青年们要求入团的迫切心理，干些不干不净的苟且之事。这事发生后，昨天晚上，那位女青年哭着向他叙述了那件不光彩的事，临了却要他替她保存脸

面，不然，她就活不成人了……他完全答应了她的要求，请她放心，让她心地踏实地出了门。

万万没有料到，那位团支书今天后晌登门来找他了，好像任何丑事都不曾发生，团支书满腔热情地来和他商量如何响应县团委的号召，对青年进行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教育。团支书一条一条说着自己开展这项工作的设想，慷慨激昂，信心十足，一定要把这项工作搞得轰轰烈烈，有声有色……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需要他帮助团支部做好宣传鼓动工作，他想将他增添为团支部宣传委员……

他忍着满肚子的火儿送团支书出门，回到小厦屋里就憋不住了。

“这个流氓！”惠畅站起，以一种居高临下的藐视口吻说，“居然用团支部宣传委员的头衔来收买我！”

“这么个坏东西！”我忍不住说。

“公社团委书记有点官僚，不了解实际，还以为我和他不团结，是互不服气哩！”惠畅无可奈何地摆摆头，“不揭露这个坏东西，心里憋气。揭露他，又要耗费我的精力和时间，再说，受害的女青年也受不了……”

“久走黑路，总有碰见鬼的时候。”秀花劝她的男人，“咱们犯不着。让他胡闹去！总有事烂的时候，免得咱伤神……”

“我眼见这个败类胡作非为……实在忍不下！”惠畅在桌子上捶了一拳，“我主要考虑的是受害的女方……”

“等等再看吧！”我劝他，“总有水落石出的时候，他能蒙混多久呢？”

“要不是考虑女方的脸皮，我那晚追上他，非砸扁他的嘴脸不可！”惠畅攥着拳头，“这家伙二十六七岁了，早已超龄，还不退团，赖在团支书这个位置上，尽干坏事！这家伙也是穷家出身，可懒得哼哼，凭一张油嘴，吹天擂地，真是他妈的一个标准的流氓无产者形象……”

“在作品里刻画吧！”我说。

“要在作品中写他，我真有把握！”惠畅也松了一口气，笑了，“怕是这样的作品不好发表呢……”

他的情绪终于缓解下来了。

他的新媳妇秀花，又坐在炕的那一头，动起剪刀和线板儿……

我和惠畅的话题，渐渐归入我们的一贯的爱好上来。惠畅说他前几天进了一趟城，是他的一个表弟订婚，表弟引着女方到西安扯布，作为订婚的象征。整个买布料的过程中，表弟傻乎乎地跟着介绍人和姑娘转，给人家摆布得晕头转向，女方还一个劲弹嫌他太吝啬，几乎为买布花钱闹得崩了婚事！惠畅感慨万端：“真正的纯洁的爱情，只能在电影和小说上看到，实际生活中，尤其是我们的农村里，票子就是爱情！票子多，敢花钱，媳妇眉开眼笑；要是缺钱，媳妇就歪鼻子斜眼了……”

“一生就这一回，人家谁不想多买两件好衣服？”秀花在一边插上话，“人家谁像我那么好说话，由你凭良心买了几件……”

“噢哟！对了——”惠畅哈哈笑了，“对了，只有咱俩是真正的不以金钱为基础的爱情！”

秀花妩媚地斜瞟丈夫一眼，又不说话了。

“扯完布，办完事，我就逛书店去了。”惠畅说，“过省报门口时，我踅摸了几匝，到底没敢进去。我的用马罗做模特的小说，寄给他们三四个月了，总也不见回音，不用也不见退稿，这些编辑老爷，架子好大啊！我想进去问问，又怕人家瞧不起，说这样差劲的东西，也值得专门跑来问！看着报社大门里出出进进的那些人，个个神气十足，我踅摸了一周八匝，还是没敢进去……”

他也有自卑的一面啊！我想。我总以为他是自信的，很少见到过他有畏缩自卑的时候。想不到，在神秘的省报报社的大门口，他也自惭形秽，不敢贸然迈进，踌躇踅摸。看来，即使很强的人，也不能摆脱其卑微的社会地位给他心上长期投注的阴影和影响……

八

一场丰厚的瑞雪，彻底划清了渭河平原的秋天和冬天的界限。如果没有从西伯利亚南下的寒潮的入侵，渭河平原的秋季似乎就会无限期地拖延下去。冬小麦在温暖如春的适宜气候里蹿得好高，有些贪长的品种竟然拔节了，整得庄稼人用黄牛拽上碌碡到麦田里去碾轧，把它们忽忽忽扬起来的叶秆镇压下去，抑制它们生长，节约土壤里的肥力。农谚说，麦无二旺哇！现在旺起来，明年春里连穗儿都不结呢！庄稼人仰头望着绿色葱茏的田野，望着湛蓝的天空，盼望有一场大雪降至，对疯长的麦苗实行自然的不可反抗的镇压。或者起码应该刮一场西北风，降下几场浓霜，尽早结束这种“十月小阳春”的并不美妙的节气。

这场雪下得太神了，没有往常降雪前的先兆，那就是呼啸而来的西北风作先导，搅得昏天暗地，然后把雪花愤怒地抛甩到田野上和庄稼人的房上、院里和猪圈羊栏里。这场雪是和平进入，文文雅雅，温柔而又娴静地降落下来，使庄稼人喜滋滋地感受到大自然的恩情了。不过，善于动脑筋而又有点文化的农民，已经预测到这场雪的至期。雪前的两天，刮了一天一夜的东风，那是海洋性气候进入的标志，带来了大量的水汽，一当风息，便有雪至，他们已经明白了“长安自古西风雨”的实质，西北风仅仅起了点降温以促进东风带来的水汽凝结为雨雪的作用。

我站在河堤上，欣赏第一场大雪带给小河川道的迷人的景致。大自然真是神奇啊！昨天以前的整整一周时间里，我牵一条牛缰绳，手里掂一根断了半截皮子的短鞭，在河川的麦田里悠悠地转过来再转过去，看那黄牛屁股后头拽着的小石碌碡在绿汪汪的麦苗上碾过去……整个河川里和原坡上的梯田里，黄牛悠悠，青骡匆匆，鞭梢闪闪，庄稼人吆喝牲畜的粗壮的喊声，互相呼应，那声音并不像播种时节那么急切，而是一种悠悠然自得的声音，显示着庄稼人对牲畜的宽容和抚爱的音调儿。我第一次真切地体味到了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劳动的乐趣。

一场大雪，把农历十月里这种并不是年年都有的景象淹没了。田野里一片白雪。河滩里也是一片白雪。终年裸露的沙滩现在也闪着白雪的柔和色调。一道细流，在雪地里辟开一条曲曲弯弯的水道，把雪的原野割裂开来了。

田野是这样静谧，即使是最勤劳的那一部分庄稼人，也不能利用下雪的休闲时间到沙滩上割枯蒿了。他们聚集在村头扫过积雪的场院里扯闲篇，没有人到白雪覆盖着的田野里去转悠。我感觉到自己与庄

稼人不同的情致，喜欢在空漠的河滩里的河堤上散步，我怀疑是不是十二年的学校生活，染给自己小资产阶级气味了……

纷纷扬扬的大雪是黎明时分开始降落的，静静地下了大半天，午后停息了。现在，灰白色的云层已经扯开，露出一条条或一块块蓝天，云层在缩小，蓝天在扩大，遥远的西方河与天相接的地方，灿红的云霞已经把天地浑为一体，难以分辨其界限了。我拂去一块河卵石上的绒雪，坐下来，静静地沉浸在大自然的静谧的气氛里，水边有两只玲珑精致的无名小鸟，飞起又落下，那叫声像是从颤动的金链上弹出来的，更衬托出了河川的恬然静气。

我听到谁在叫喊我的名字。

我站起身，看见村庄通河滩的黑色大路上，正急急地晃动着一个人的身躯，那干练的走路姿势，以及那冬天也不戴帽子的脑袋上闪动的头发，使我一眼看出，他是惠畅。他大约到我家里去了，又找到河滩上来。雪天不能干活，正是他写东西的天赐良机，许是一天来写得闷了，要找我闲聊；也许又有得意之作草成，按捺不住喜悦之情，追来给我要念他的小说了?

“小河秋高——发……”他手里扬着一张报纸，从河堤下爬上来，话没说完，不料被脚下的石头绊了个跟头。他哈哈笑着爬起来，腿上和胳膊肘上沾着雪，也顾不得拍打，把手中的报纸递给我，“发表了——我的《小河秋高》！”

我惊呆了，久久盯着他眉飞色舞的憋红了的脸膛，猛然醒悟过来，打开了报纸。文艺副刊的头条标题，是四个笔锋遒劲的大字：小河秋高。标题的下方，是作者的名字：惠畅。我的眼花了！

惠畅从我手里夺过报纸，扔在雪地上，双手抱住我的肩膀，用他的滚烫的脸颊死死地挤挨着我的脸，竟然哭了。他的动作太猛而又使我始料不及。脚下一绊，两人都跌倒在雪窝里了。

“乌——拉——”他爬起来，扬着双手，对着河滩，可着嗓子吼喊，这是一句极易记住的俄语单词。

“乌拉——”我也高声呼喊起来。

我首先从惊喜中镇静下来，捡起报纸，坐在河石上，端详起来，真怪，同样是惠畅两字，一经铅字在报纸上印出来，顿然神气多了！

“总算——开始了！”惠畅一手叉在腰间，一手在空中用力一挥，“开始了哇，我的声音！”

我一看报纸角上的日月，已经出版一周了。真是遗憾，我们俩谁也订不起一份报纸。再说，书信和报纸，没有人直接送到村里来，只送到八里远的那所学校，由本村走读的学生捎带回来。他给我看的这张报纸，是学生刚刚捎回来的报社寄给他的两张。

“稿费二十块。”他告诉我，他的弟弟已经从邮递员手里领回稿费交给他了，“你说，我们该怎样享受这一笔巨款？”

“买点稿纸吧！”我说，“这是我们的基本物资。”

“那当然！不过——”他意犹未尽，“无论如何，我们得庆祝一番……”

其实，庆祝方案他早已想好了，要我此刻跟他过河去，五里镇那个公私合营的小铺里，有烟有酒，又有糕点，而且营业时间不作严格

限制，即使关了门板，谁有急事，只需拍拍门板，那个善眉善眼的老头就会不厌其烦地拔开插扇门板，迎你进去。

我们沿着河堤往上走，那儿有一架用木板搭成的便桥，可以跨过河水。

“看来哪！还是有个模特儿好！”惠畅兴奋地说，“那天晚上，咱俩跟马罗在河滩闲谝，回去后，我以他为模特儿，写下《小河秋高》……”

这无疑是他获得第一次成功的深切体会，也可以看成是经验性的启示了。他有了第一次成功，也就有了第一次获得成功的经验，不管谈这个经验用怎样的口吻，神气的或者是谦逊的，都不能改变成功本身所具有的权威性。我现在还没有这种体验，对于从书上看到的许多作家谈创作经验的文章，我都信，也都不可避免地存在着隔膜。至于人物创造中的模特儿说，我也早已知道，虽不新奇，却有他——我的朋友切身的体会为佐证。我就附和说：“好多作家谈经验时，都有这一条，如何从生活中受到了启发……”

“马罗本人的性格就是特别……”惠畅说。

“我也许和他太熟悉，反倒屡见不鲜……”

惠畅拍敲着小店铺的黑色门板。

咣当一声，门板拔除了一页，我和惠畅侧身挤进去，眉目和善的老头儿问：“买啥？”

“烧酒一瓶。”惠畅说，“顶好的是啥酒？”

“太白酒。”老头说。

“买一瓶。”惠畅的口气很大，俨然一位百万富翁，只买自己需要的东西，而价格是不屑于过问的，“两斤点心，两斤蛋糕……”

老头儿在煤油灯的昏暗灯光里，眯着眼，把秤杆伸到灯下去辨认秤星儿，然后包了，用纸带捆好，拨拉一下算盘，轻轻地说了钱数。

“甭急！我还要烟呢！”他说，“最好的烟买五包；还有茶叶，也要好的……”

我和他拎着包着糕点的纸包，走出小铺，老头殷勤地送我们到街道上。他大约看惯了庄稼人买东西时犹豫不定、盘算再三的神情，以为我们是腰缠万贯的富翁的魄势了。我们和老头道谢一声，老头笑着，哈腰点头，进门去了，咣当一声插上了木板。

“找马罗去！”走出五里镇短浅的街道，我们下了场塄，隔河遥见马罗庵棚上的马灯，像一点鬼火，在雪地上闪亮。惠畅感慨万端，又像报复似的说，“为了我们两人合抽一支‘航运’烟的困境，为了我们在水沟黑店里给臭虫吸去的血浆，为了马罗给我们烧烤的苞谷棒子，我们得犒劳一下，庆祝一番，热闹热闹……”

惠畅神采飞扬地说着，走着，兴奋之情难抑：“要是阿克西尼亚恰好也在庵棚里，那就更加罗曼蒂克了……”

九

马灯挂在庵棚立柱的杈柱上，昏黄的灯光在地上投下一片花花拉拉的光道和黑影。庵棚周围的积雪清除掉了，有一块小小的干净的场

地，倒像是庄稼院门前的场院。积雪在田野里透着一层亮光。马罗不在，大约又去吆雁了，河滩的下方，隐隐传来他的斥喊声。

瑞雪初霁的晚上，寒气逼人，我划着火柴，点着麦草，惠畅已经从渠岸上抱来一捆干透的苞谷秆子，火焰冒起来，苞谷秆节爆裂出一声声沉闷的响声。老光棍在三块石头上支着的一只小铁锅，锅沿边生着一层锈斑。我们给锅里添上水，架在火上烧起来，等到马罗一会儿吆雁回来，正好沏茶，真正的茶叶！

我和惠畅对面坐下，中间隔着火堆。火焰从三块石头的空隙冒起来，锅边上发出吱吱吱的叫声。我们就着火苗，点燃了纸烟，“海河”牌香烟，天蓝色的封皮，天津出品，六十年代享有盛誉的一种高级烟哪！我们可以连着抽掉三根五根了。

“我明年要发表十万字的小说。”惠畅说，“天哪！《小河秋高》一发表，我的劲头像火山爆发了，我觉得要写的东西太多了！”

我觉得他又狂劲上来了，胜利带给他巨大的欢乐，也把他的自信的本色发酵而膨胀起来了，正冲向疯狂的顶峰。我想，苦斗中忍受过太多艰辛乃至屈辱的人，一旦扬起头来，长吁一口气、呼喊一声“乌拉”的心情，大约人皆难免吧？我想，某一日，如果我也有这种幸运出现的时候，也会狂一下子的。我说：“对的。应该趁热打铁！第一级台阶总算跨上去了……”

“啊！理想的追求，苦难的历程，成功的狂欢……啊！”惠畅手撑下腮，感慨着，“你从我可以期望你的明天，坚定不移地埋头奋斗！”

“是的……”我的心里热乎乎的，劲头也更足了。

“我已做好五年的苦斗期……”

马罗的粗壮浑厚的调门在近处响起，是十分激扬昂壮的乱弹，可惜一个字也听不懂，那古老的剧种的激越人心的旋律却是令人心驰神荡的，尤其是在这样静寂的雪野里……

“哈呀！是你俩……”马罗声到人到，手里提着一杆火铳，靠放在庵棚上，“现在没有苞谷棒子了……”

“啊呀！我亲爱的葛利高里！”惠畅一跃跳起，搂住马罗的肩膀，“你跑到哪儿去了？让我老等你！”

“我吆雁去了。”

“我还当是你到河那边，找阿克西尼亚……”

“去你妈的脚！净逗老叔……”

马罗又侧过头嘿嘿笑着说：“你俩……今日像是……有喜事？”

“你猜！”惠畅说，“猜中了犒劳你。”

“你媳妇要下白娃子了？”马罗说。

“那不算啥！”惠畅摇摇头。

“你俩——有一个在外头找下工作了？”

“那更不算啥！”

马罗猜不着了。还能有什么事比得娃子和参加工作更令年轻人高兴呢？他憨憨地笑着，老实承认，自己猜不透了。

我告诉他：惠畅的文章在省报上发表了！

他似乎一下子理解不开这件事究竟有多么重要，傻愣愣地笑着。

“我今日来犒劳你——”惠畅从庵棚里取出大包小包，摆在苞谷秆子上，解开了，“马罗大叔，感谢你给我们招待过一顿苞谷棒子……”

“嗬呀——”

马罗瞪大眼睛，惊叹一声，往后倒退了一步。可以想见，这种豪华的吃食——蛋糕和点心，会使他多么吃惊了。甭说整个乡村里都在忍饥挨饿度荒年，即使在过去的正常年景里，庄稼人也只是在走亲戚或看望病人时，才忍心花费块把钱买一斤饼干或蛋糕送去，哪能这样浪吃海喝呢！他瞅瞅我，又瞅瞅惠畅，大约终于明白了发表一篇文章确乎不是一件寻常的事。他忽然转过身，从庵棚跟前捞起火铳，扛起来，对着星斗满天的寒冷的夜空，用纸烟头上的火点燃了导火线。导火线儿吱吱响着，爆出一串斑斓的火星，接着是一声沉重的响声，冲上天空，震得星星也抖动起来。远处栖息在杨柳林带里的什么水鸟，仓皇惊叫着逃飞了。

“咱们小河川道出下能人了……”马罗放下火铳，一扬手，高兴地说，“我给你放炮！”

“动手抓啊——”惠畅喊。

马罗伸出粗黑的指头，小心翼翼地捏起一块点心，送到嘴里，右手随即就接在下巴底下，使咬碎点心时掉下的渣儿皮儿不致撒到地上

去。

点心、蛋糕，这些食品的滋味，真是太好了，对于装多了南瓜、野菜和豆渣的胃腔，具有无法克服的诱惑力量。

“喝呀！”惠畅一口咬掉了酒瓶上的铁皮盖子，喝下一口，交给马罗。没有酒盅和酒杯，只好对着瓶口喝了。惠畅大声笑着，“世界多好！生活多好！”

“多多写……文章！”马罗口齿不清地说，“叔跟你们……沾光，吃点心……喝烧酒……”

“亏得你给我们吃烧烤苞谷棒子！”惠畅粗声豪气地说，“你是个好大叔哇……”

“我早看出……你们都不是……平常之人！”马罗不自觉地用秦腔道白的腔调说，“从古戏看，状元郎都有不得志的时光……”

点心和蛋糕，统共四斤，我们三人吃光的时候，似乎肚里还有很大的空间。马罗满意地咂着舌头，掏出烟包来：“噢！算我今日过生日。”

惠畅早已把茶叶撒在小铁锅里，用马罗唯一的一只大海碗从锅里舀出半碗殷红的茶水，喝了两口，递给我，他说：“马罗叔吔！我给你念一篇文章，你听了，谈谈意见。”

“那——我可不懂！”马罗摇摇头。

“没关系！你听听以后再说。”惠畅已经展开报纸，就着马灯的灯光，念起来了。

我和马罗香喷喷地抽着“海河”牌香烟，坐在火堆旁，静静地听惠畅念《小河秋高》。马罗很不自然，大约是受宠若惊，格外用心地支棱着脑袋，连咳嗽也压低了声音。

惠畅敢于给马罗念自己写下的小说，也令我钦佩，我至今没有这样的勇气。我的那些稿子，在整个人口开始出现膨胀趋势的中国，只有一位读者，这就是惠畅；寄出去的稿子，我一直怀疑报纸或杂志的编辑是否有耐心将其读完，充其量是半个读者。我尽管知道许多作家都把稿子读给工人、士兵或农民听，征求意见，再修改提高，我连给我父亲看一眼的勇气也没有，更甭说别人了。我觉得这种勇气需得有一个产生的基础，那就是作品有了一定的水平。惠畅的作品已经发表，无疑已经具备了这个水平。我离这样的水平还差得不知有多远呢！

惠畅在昏暗的灯光下，困难而专注地辨别着报纸上的字迹。我回过头看时，马罗刚才支棱得又端又直的脖颈歪下去了，脑袋低垂着。这个吃饱了点心、蛋糕又喝足了烧酒的马罗，已经响起了舒悦的鼾声……

十

我得到一个消息，公社要办一个民办中学，教员将从全社历届高中毕业生中选择，选择将通过考试的办法。我跑到公社一问，果然属实，而且已经到了报考的最后一个限日，真是侥幸。我不假思索，在报名册上依次填下自己的姓名、家庭成分、学历、年龄和籍贯等，又接着填上了惠畅。

公社文教干部姓仲，戴着一副黄腿黄框的近视眼镜，瞅着我填过的表格。这是一位黑大汉，黑油油的脸皮，透着红光；厚厚的嘴唇朝外噘突出来，真像一位来自非洲大陆的异族人。他瞪着一双黑仁小而白仁多的眼珠，瞅着我，并不严厉，倒有点奇怪地问："你咋填了两个人？"

"我给他捎带报名，他忙着哩！"

"不准捎带，要本人亲自来。"

"他有急事，他爸……病了！"我不得不撒谎，"他才托我来给他报名。"

"不成。"老仲摇摇头，直率地说，"报名时顺带目测体型。他要是跛子腿、背锅腰咋办？"

不准捎带报名的原因，不过如此，我释然放心了，就给他吹："你知道惠畅是谁吗？"

老仲扬起他的黑脸，眨眨眼。

"惠畅在省报上发表过小说！给民办中学做语文教师，谁能敌过他呀？"我说。

"噢呀！是他！"老仲眼里滑过一道不胜惊喜的光后，对我也热情起来，此时才想到让我坐下，问我喝不喝水，"我早都听说惠家庄有个回乡高中生，会写文章，没记住名字……"

我和老仲的第一次接触，就从此开始，而且喜欢他了。他对能发表一篇稿子的人所表示的热情和器重，使我自觉消除了心里诸多的界

碑。

“没有问题，你报的两人都有效。”他送我出门，在公社院子分手时，恳切地叮咛，“你和惠畅都来参加考试，后日早晨八点，在小学校哩。甭迟到了……”

……

“我不去。”他淡淡地笑笑，口气却不容置疑，固执地摇摇头，“我不喜欢教学这工作。”

我很丧气，又不死心，给他解释：“生产队里劳动太累了，干一天活儿，晚上就很难再熬夜，读书和写作的时间太少了。再说，学校里有收音机，有报纸，能听到新闻、时事……”

“所有工作中，我最烦教书。”他说，“那些鼻涕娃娃，无法交流思想和感情。打铃上课，下课又开会，晚上还得备写教案，批改作业。啰嗦！太啰嗦！使人无法集中心思……”

“当然，……是啰嗦一些，可也有好的一面哩！”我说，“有礼拜，又有寒暑假……”

“我宁愿在生产队里劳动，也不想干我不喜欢的工作。”他不为我说的那些教学的优惠待遇而动心，“生产队里，其实也自由着哩！我急着要写一篇稿子，就不出工了，反正生产队的工分不愁没人挣，队长才不计较哩！学校就不行了，缺一节课也得请假……关键是生产队里没人管我，学校对教员管得太死太严，我这个人哪……就怕有人整天在我屁股后头嗡嗡！”

“据说给民办中学的教员订下三十块工资。”我说，“有这点收入，我们可以买点书，买点稿纸，也能……买一盒烟抽了……”

“嗬呀！我可不为五斗米折腰……”

我这时就说不出话了。我的家境，似乎比他的已经很困难的经济状况还要糟，我得折腰去挣那三十块钱的月薪。我不能忘记，为了去市里听那一场文学讲座，我怎样难为情地向父亲提出了要一块钱的盘费。我已经二十出头了，我不能再为一块钱向父亲张口，我宁愿去做那种其实我也不大喜欢的教师的职业。

“你愿意教学，你就考去。”他说，“我要在农村扎根一辈子！当然，我不是像邢燕子那样扎根农村，我是为了文学，为了我追求的文学事业，同样要扎根。”

“民办中学是公社办的，也没脱离农村嘛！”我听到关于扎根的话，忍不住申辩我的见解，“在农村的民办中学工作，接触的生活面更宽了，比在自家门口能更多地见识世面……”

“柳青在皇甫村住下快十年了，写下了史诗。王汶石在渭北，听说在一个村子里，挨家挨户座谈访问，你看他写的那些短篇，绝了！我现在下定决心，有三个规划——”惠畅最近的思想活动，显然已经因为《小河秋高》的发表而大大地受到鼓舞，有了更大更远的考虑，“第一，我今年冬天，对我们村的社员，挨家挨户调查研究，给每一个家庭都写一部家史，一来配合团支部的阶级教育活动，二来我可以深刻了解农民和农村。说真的，我虽然生在这个村，人都认识，可不大了解他们，尤其是解放前的生活……”

不管他不愿意教学多么使我丧气，也不管他不为五斗米折腰的说法使我多少有点不愉快，而他的这种为进一步发展创作的扎实的打算，却不能不使我佩服。是啊，我和他一样，解放那年进学堂，直到毕业返乡回到家中，对农村的实际有多少了解呢？对生活在一个村子里的百余户农家里的种种人，过去和现在，能知道多少一点呢？在读了《创业史》和王汶石的短篇小说之后，我已经深切地知道自己对农村的所知所感是多么浮皮潦草！而惠畅的这种打算也正切合我的思索，就深表赞成："这当然……非常好了！非常有必要！"

"第二，培养我的夫人。"他笑着说，"从长远考虑，光叫她缝衣做饭不行呀！我已经给她制订了三年学习计划，从认字开始，三年内阅读五十至一百本小说。每天写一页大字，一页小楷，练习书法，将来好给我帮忙。计划已经开始实行，秀花，把你写的大字拿出来，让我们欣赏……"

秀花从针线上抬起头，红了脸，嗔爱地噘着嘴，腼腆地又是幸福地笑笑，说："见不得人……我才学，你胡吹啥嘛！"

他却不以为然，从桌上翻出一本用黑麻纸装订的本子，那上面布满秀花的歪歪扭扭的墨迹。

我知道那是一个读过小学四年级的农家媳妇的笔迹，鼓励是自然的。我从这两项计划里，已经感觉到惠畅的那种强大的心劲了，一个月薪三十元的民办教师的工作，怎么能与这样强大的心劲去抗衡呢？

"昨天接到《春雨》杂志一封信，我的那个《播种记》，他们准备采用。"惠畅说得很平静，像是司空见惯，不足为奇，更没有第一次发表《小河秋高》时的狂热了。他笑着，像是鼓励我，"他们让我修改一

下，提出的意见基本跟你相同，我倒佩服你的欣赏能力，那回你对《小河秋高》的意见，我没同意，结果省报发表时，把那一段删了！你看毛病看得很准……”

他的创作上的顺利进展，倒促使我想尽早地离开村子，希望到那个民办中学去教学。他已经跨上第一级台阶，正信心百倍地向前阔步进发。我依然信心不足，我不知我这一辈子能否发出一篇作品来。我并不惧怕农村里的沉重的体力劳动，我的比惠畅还要强壮的体格完全可以适应农村里最繁重的农活。我盘算在教学之余，一定会有更多的剩余精力，从事读书和写作……我决计去投考民办教师。

他送我到村口，水泉边是我们分手的老地方，似乎带着同行已久而终于走到一个岔道口了，我们都有一种分手的感觉。

“杨琴茹不久前来了一封信，她也在省报上看见我的小说了。她说她剪贴了那篇小说，由不得每天晚修课后拿出来看看……”惠畅动情地说着，随之一挥手，“我们要干的事业，路还长哪！我不能让她把我的思想搅得纷纷乱乱，我要集中心力，走我的路，所以我要把她彻底排除，下决心培养秀花。秀花不错——这女子真是不错！我发觉我对她的感情日渐深厚了。她前几天到娘家去了，我一个人坐在屋里看书，感到孤单了！我突然想她了，第一次——结婚一年多来，我第一次感觉到离不开这个女人了！黑天半夜，我赶到她娘家，造谎说我妈有病，把她给叫回来了。一出她娘家村子，我就笑着说其实屋里谁也没病，是我想她了。她高兴死了，抱住我的脖子直叫哥，说我想她，她都要高兴死了……你看看，人的感情原是可以培养的！”

我的直接感觉是，他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包括爱情上的割舍，以集中全身心的力气去走自己的路，这无疑给我以强大的冲击。

我参加了民办教师的考试，在百余名应考者中，我是被录用的四个幸运儿中的一个。

我背上念书时用过的那一卷简单的被褥，到社办中学去任教了。临走时，我和他做了告别，约定每周六我回家时，晚上聚面。话虽这样说定了，后来的生活实际却无法保证。作为先行者，他的新作一告完成，就急于送进邮箱，等不及听我的意见了。另外，我所去的民办中学，简直无法预料它的简陋。仲同志只交给我们两座古庙里的房屋，说是暂且“艰苦奋斗”，至于学生必需的桌凳，他说也要“自力更生”。于是我们就用土坯垒泥台阶，上面搭上木板，算是桌子，凳子只好让学生“自力更生”，从家里自带……无论如何，民办中学还是开张了，破旧而荒凉的古庙里，传出读书的声音了。

我也无法保证周六晚上去找他，民办中学太忙乱了。我们常常没有休息日，礼拜天用来做义务性劳动，整修学校。加上我刚刚走上讲台，业务生疏，需要更多的时间熟悉教学。这样，我们见面的机会日趋减少，甚至一月两月也难得聚面一次。我常常回忆和他在一起的情景，躺在水里，仅剩的一支“航运”牌纸烟，换着口抽；坐在马罗的庵棚前，胡说浪谝。那种生活结束了，我做了为人师表的教师！

谢天谢地！第二年春天，当绿色溢满河川的时候，我终于有一篇二千字的散文在市里的晚报上发表了。有例在先，我和他再次找到马罗的庵棚，吃了一顿野餐，谝了半夜闲话。虽是久别重逢，却不能再现当年的气氛。马罗没有为我放一声火铳。惠畅也没有惊羡之情，他已经发过大大小小七八篇作品了，早已没有新鲜的感觉。尽管这样，他热情地表示了祝贺，说我能及早发出作品，他心里也更舒坦，我们毕竟是共同患难过的……

谁也无法预知，就在我们欢乐的时刻，头顶正有乌云在悄悄地聚集，“四清”运动即将开火，首当其冲的，我们的惠畅应声趴下了，再也无力扬起他自信得有点高傲的脑袋……

十一

下课了，我夹着教案本走回自己的住屋，不禁一愣，秀花惴惴地坐在我那把唯一的办公椅子上，怀里抱着个正在哺乳的娃娃，这是实在料想不到的事。她看见我进门，慌慌地从椅子上站起，移坐到床沿上，把椅子给我腾出来。民办中学一切都很困难，给教员连第二把椅子也无法配备，任何人来访，反正只有一把椅子可坐。

她说孩子闹肚子，十多天了，总不见好，实在扛不过去，今天才抱到公社卫生院来就医，看完病了，想立马给孩子喂下药去，因此找到我这里来讨开水，好给孩子喂药。

这是她来找我的正当理由，显然又是很勉强的措辞，我料就她来找我一定是经过深思熟虑之后的举动，肯定是有关惠畅的情况。我已经从她说话时偷偷扫描和我同室而居的乔老师的眼光中看到了这一点，那简直是贼一样惊慌不定的眼光。我就和她先拉一拉闲话，把开水倒给她，好让她给孩子喂药。

她给孩子喂药，孩子哭起来，把头往她的腋下钻，企图藏躲起来。她两声委婉的哄劝，又两声严厉的禁斥，软硬兼施，还是把一小半白色的药面儿撒在孩子胸膛上了。

她的变化之大，真是令人惊异。印象中的蕴含在眼睛里的羞怯和妩媚，全然褪尽了。如果形象地比喻一下这种变化，她过去留给我的

印象，像是水汽和薄雾弥漫的小河川道早春二月的田野；现在呢？恰如收获净尽的秋风萧瑟的晚秋了。她瘦了，许是哺乳的原因，脸颊上的丰腆的红晕消失了，黄色中透着青色。最使我感到变化明显的，仍然是那双眼睛，那眼睛里有一缕明显的惊疑不安的慌乱的神色。

最后一节课的上课铃声响了，乔老师又夹着课本走出屋子去了。她问我上不上课，我说早上的两节课已经上完，她释然坐下来，又不放心地扫描了屋内，再瞅瞅窗外，看看没有什么危险，就压低声儿，说：“你哪天闲下了，到我屋去一下……”她的声音哽咽了。

“到底咋回事？”我也急忙问。

“他……”她难过极了，压抑着哭声，“他要走绝路……”

我的脑子里嗡的一声，顿然麻木了。我已经知道，“四清”运动中，他家的成分变了，由中农一下子升格为地主，他的父亲戴上地主分子的帽子了。我早就担心着他难以承受这样的打击，他的梦想当作家的强烈愿望自然要彻底破灭了，而他的那种自信和浪漫的气质，又怎样能够委屈得下呀！我早已盘算着去看看他，给他一点虽然于事无补，却也能得到安慰的劝解。可是，“四清”一开始，就向全县所有机关、学校、商店和工厂，传达下严格的禁律，在“四清”进行的整个半年时间里，不许干部和职工走亲访友，暗地串通……正常的礼拜休假也宣布取消了，有事须得向工作组请假。我已清楚地知道，一旦被划入敌对阶级的阵营，他的屋前屋后，日夜有民兵放哨，我是无法进入他的那间小厦屋的。大约一周前，“四清”运动宣布结束，从城里来的大批下乡干部，背着被卷，从各个村庄出来了，在公社集中，然后乘卡车回城里去了，只留下少数干部做运动之后的善后工作，主要是防止刮起“翻案风”来。禁令解除了，我们也将享受半年来的第一个休假

日，我原来就打算周六晚上回家去看惠畅，谁料秀花反而找我来了，可见问题是很严重的。

“他从早到晚不说一句话！”秀花说，“一天三晌去出工，回到家里，不抱娃也不担水，坐在门槛上，两眼死瞪瞪地老是盯着一个地方。我劝他，他根本听不进去；我想狠声骂，又不敢！晚上，他不睡觉，在院子里走过来，走过去。我把他拉回屋，停不了一会儿，他又出去了，在院子里来回走……”

我并不惊奇，几乎是我预料中的事。

“有天晚上，半夜了，他在院子转来转去，我也睡不下。他一下子奔回屋，把我从炕上拉下来，叫我给他寻一本书，他要看书！我说哪里有书嘛！他叫我到你屋去，随便借一本啥书都行。我说黑天半夜，让民兵知道了，了得！”秀花抹着眼泪说，“他不敢逼我去借书了，在院子里扯自个的头发，抠自己的胸膛。我抱住他，叫他打我，我说你想看书想急了，没处出气，你在我身上出吧……”

我有点忍不住，鼻腔里酸酸的，这个只上过四年小学的农村女子，真是太伟大了。她所能给予他的一切，还有什么没有给予呢？没有了。

“工作组撤走那天，组长专门找他训话，说是好好劳动改造，和反动老汉划清界限才是活路。要是翻案的话，就要收拾他！”秀花说，“他一回来，跟狂了一样，在屋里喊，‘你定的案要是实事求是，为啥怕人翻呀？哈哈，做贼心虚！我就是要翻！你不训我我还担心，你越训我，我翻案的劲头越大！我要是翻不过来，我活着还有啥意思？翻！翻翻翻！’吓得我捂住他的嘴……”

我立即提醒她，务必要劝他稳定情绪，不要轻举妄动。据我所知，运动结束前，已布置下严厉的打击翻案活动的条例，为着保卫这场运动的成果，是绝对不许翻案的。惠畅的行动，无疑会招致更惨的结果，怎么能硬撞墙呢？我再三叮咛她，一定要惠畅先沉住气……

“昨日晚上，他又逼我跟他离婚……”

“这家伙……打的啥主意啊？”

“他说，我娘家是贫农，我不必跟他背一辈子黑锅！我说我一不当官，二不写文章，三不想入党，任啥成分都一样。他又说孩子太可怜，跟他注定要受罪，长大了连个媳妇也难找！”秀花说，“他说要我跟他离了婚，把娃儿带走，进谁家贫农的门做后代去……”

“唔呀……”我的感情又承受不住了。

“他说……俺娘儿俩一走，他就……满世界逛去呀！再不回……惠家庄来咧！”秀花哭了，哽哽咽咽，“我今日哄他说我来公社离婚，稳住他……”

“闹成这样……”我坐不住了，“我这个星期六，后天晚上去劝他，你放心……”

“我实在没办法……才来找你。”秀花抹着眼泪，“我也知道，你到俺地主屋去，说不定要给你抹黑……实在没法子了！”

“后天晚上，我一定去，你放心。”我给她再次肯定说，“你要耐心，甭急，甭烦。他在难中，免不了胡思乱想……”

“我说他，咱当不了作家当农民，也一样活着。咱劳动挣工分，养咱的娃娃，只要我不嫌弃你是地主成分，咱就过咱的日月。”秀花委婉地说，“他这人……心眼太直，写不成文章，看不成书了，就不想活了……你去时，好好劝他，骂他，他不恼你……”

我的心情十分沉重，再也找不出什么安慰她的话来。是的，她对他已经做到了一个贤明妻子所能做到的一切，我还能给她说什么呢?她没有文化，与惠畅在思想上和知识上差着相当远的一大截。她和他吵过架，怄过气，因为惠畅与那个医学院的女同学的往来而生过疑窦，吃过醋。可是在惠畅遇到灭顶之灾的严重困境里，她却如此的主意坚定，支撑着这个濒临破毁的家庭。

她抱着孩子告别了，走出古庙改修成的民办中学的大门，下了土台阶，走到公路上，我叮嘱她慢走，她却悄声问:“我到你这儿来，对你有啥妨碍吗?我背黑锅，挨谁谁染黑……”

我又能说什么呢?似乎她是特务，和我密谋颠覆共和国政权似的……

她抱着孩子走了，脚下匆匆，因为抱着孩子，腰部朝一边歪扭着，往前走去，渐渐远了。我忽然想流泪。我记起在她家的小厦屋里，听惠畅读他新创作的小说的情景，在惠畅的自鸣得意的读稿声中，伴奏着她在炕头纳扎鞋底时麻绳穿过布底儿的嗞嗞嗞的声音，那么和谐，那么安详，而今已经恍若隔世了……

十二

他简直像一条被囚笼关锁着的……狼！

我不无胆怯地走进他家的街门，又走进他的那间熟悉的小厦屋，看见他的第一眼时所产生的强烈印象，就是这样：他像一条被关在笼子里的狼。

他的浓密的头发蓬乱而肮脏，粘着灰尘，大约两三个月没有剪剃了，几乎盖住了耳朵。他的胡须从两鬓直到下巴上，浑成一体，芜杂无章。最可怕的是那双眼睛，布满了红丝，呆滞而又冷漠，盯一眼令人心里打战。

他没有和我打招呼。坐在门槛上，朝我翻了一眼，就低下头去了，两只手的指头叉在一起，胳膊肘搭在膝盖上，竟是那样一种颓败的样子。

秀花急忙招呼我坐，却找不到一个可供人坐的椅子或板凳，等她从灶间取来一个小凳的时候，我已经在炕边上坐下了。变化太明显了，他支在墙根的抽屉条桌没有了，他往常坐的那把椅子也没有了，背墙根的装粮食的红漆板柜也不见了。不用问，属于被没收的财产而已经易换主人了。只有背墙的半墙上，凌空吊着的那两只红色木箱，还依然吊着。那是秀花娘家的陪嫁嫁妆，按政策条文不予没收的。这间小小的厦屋，现在变得空荡荡的了，只留下那个土炕，占去了厦屋的一半地盘，进门来找不到一只可以落座的东西。惠畅总是坐在门槛上。

我感到一种从未体验过的凄凉，不知该说什么了。是的，是凄凉，这个词儿准确不过，而且是我从未体验过的。我虽然熬过了从未经历过的三年困难时期，忍受过饥饿的种种滋味，却没有感受过什么凄凉。我没有什么可以安慰他的话能够说出口，不由自主地把一支烟塞到他的手上。

他接住烟，翻着红丝斑斑的大眼盯我一下，就擦着了火柴，猛吸一口，呼呼呼吐出一股又粗又长的烟柱，扬起头来，怪笑一声，摊开双手：“全完了！顷刻间天塌地裂，土崩瓦解，落得个白茫茫一片大地真……真干净！”他随口胡诌着，忽然两手抱住脑袋，哇的一声哭起来。

我已经意识到他的精神上的绝望，已经濒临崩溃的边缘，我说：“惠畅，你冷静一下，有话咱们好好说说，你需要我帮忙的话，我尽力而为，你甭……”说完，自己也觉得贫乏而又无力。

“你……可惜只是个民办教师，你能帮啥忙嘛！”他摇摇头，痛苦而又绝望，“我现在需要包文正来明冤……”

“你又胡说了！”秀花在旁边提醒他，“冤已经冤下了，你白说，不顶啥！现时咱只说低头过咱的日月……”

“低头？”他冷笑着，盯住媳妇，“低头低多久？这要我低一辈子哇！我给谁低头？要是我家里真正是地主，旧社会欺压过群众，那我向人民低头，低到死也活该！问题在于我们根本不是地主，我纯粹是给那个流氓低头！我受不下这口气……”

“即使是地主家庭，子女也无罪嘛！根本不存在向谁低头的问题。”我给他劝解，“暂时先稳定情绪，以后再向县上申诉……”

“你知道吗？那个团支书——那个流氓，现在就任大队长了！”惠畅说，“他早已说过，他在惠家庄有两个对手，这回全扳倒了！整垮了我，扫清了绊脚石；打倒了原大队长，他登极了！原大队长是个实干家，从来不尿他。老支书是个老好人……”

他说开话以后，情绪稍微稳定了。他告诉我，把他们家从中农变成地主的全部材料，都是那位团支书一手包揽的。团支书是工作组利用的积极分子中的头号种子，他有了报一箭之仇的极好机会。构成地主成分的关键一条是解放前三年的雇工剥削总量，占有多大比例。惠畅家没有雇过长工，只在夏收秋收时雇过短工，于是，用短工总数抵当长工，仍不够比例，团支书在私下哄劝威胁几个社员，干脆……

“俺家的地主成分晌午一宣布，后晌，五老汉的儿媳妇洗衣服时，在水潭边给秀花悄悄说，她阿公晌午参加完斗争会，午饭也没吃，躺下起不来了。”惠畅说，“五老汉把儿子叫到跟前，说他一辈子没说过假话，就说下这一回，全是让团支书吓昏了脑袋。他要儿子甭斗争俺爸！说他已经作下孽，后悔跟不上了……”

“有这号事？”我完全迷乱了。

“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惠畅悲哀地说，“我总相信工作组是会实事求是的……谁料想他们也有不实事求是的时候……”

“那个五老汉的话可靠吗？”我已经不自觉地卷入了，“怎样取得这个活证呢？”

“没门了！”惠畅依然悲哀地说，“老汉刚露出一点话头儿，团支书便扫见风了，在贫下中农内部把五老汉连批三会，老汉再不敢说话了……”

我参加过关于“四清”的所有必读文件的学习，自觉地遵守运动中的全部纪律。从理论上，我接受了这场运动必要性的全部论述；从行动上，积极拥护运动的开展。现在，我开始意识到运动中有偏差，惠

畅算一个极大的不幸，而那位团支书，该是一位投机而且成功了的奇迹。

“还是要相信党……相信群众……我把这句早已听熟说顺的真理端给他，五老汉的良心……可以证明。”

“唉……”他不说话了，眼里的活光又褪尽了，悲凉地叹息着，无可奈何地摇摇头，“完了！我将像猪一样活着！刨——食！刨——食！没有理想和追求而只有刨食的生活，不是人的生活，是猪的生活！”

“你看看，他尽钻牛角。”秀花说，“一村庄稼人，有谁管啥‘理想’哩！管啥‘追求’哩！都是为吃饭穿衣养活娃娃嘛！你多念了几年书，倒背的包袱越重了，连一般人的生活也不想……”

惠畅又摇摇头，苦笑着，显出不被理解的苦楚。

“你还可以写作嘛！即就是地主成分，谁也没规定不许地主家庭出身的人搞创作。”我尽管这样说，自己也心虚得很，我之所以这样说，只是觉得需要这样说。而且只有这样，我才有话可说，不然，我说什么呢？只要能有一丝一缕的促进他从悲哀中振作起来的话，我都想说出来，“有成分论，不唯成分论嘛！”

“你甭尽给我拣好听的说！”他一句话就把我隔远了，“我明白着哪！”

“无论如何，应该坚持活下去！”我没有任何根据，似乎只是要求。

“像猪那样活下去？”他嘲笑着盯住我。

“即使像猪，也活下去！”我直说了。

“在那个流氓大队长的眼皮下活下去？”

“无论在谁的眼皮下，都要活下去！”

“太难活人了哇！”

“再难也要活下去！”

“我没信心……”他垂下头去了。

“我今日头一回听见你说这号熊囊鬼话！过去你自信，雄心勃勃，总是你给我鼓劲。”我几乎是在恳求他，“你不考虑秀花吗？你不想想你的儿子吗？你只考虑你自己过的是猪的生活，意思不大，她娘儿俩又该咋办呢？你不觉得自己太自私吗？原以为你自信，现在看你脆弱！脆弱得连秀花都不如，亏你是个身高膀粗的男子汉大丈夫！拿出大丈夫的气魄来，在危难中才显出你惠畅是个真正的男子汉……”

我也许是实在急了，急中居然说出这一大堆刺激他的话。

“不要说了！”他忽地一下从门槛上站起，“正因为我从她和孩子的前途考虑，才让他们从这个鬼地主的门楼下逃出去……”他已经走到院子里去了。

我也走到院子里，看见他在院中一块石头上坐着，我也在旁边一块石头上坐下来。我再也找不出什么更有说服力的话，就把一支烟又递给他。

“你的好心我知道。你能想到的我都能想到。”他抽着了烟，“你甭说了，回吧！”

“那就坐坐吧！”我说。

“坐？坐吧！”他说。

……

我带着满心的惆怅和担忧，在鸡叫三遍之后，出了他的家门。他没有送我，在我出门之后，秀花轻声小气地叮咛我一句，就小心翼翼地插上门栓，竟然没有一丝声响。我似乎觉得墙角和柴垛后面，都透着团支书——现任大队长——那个流氓的阴森的眼睛，背脊上觉得沁凉了。

走出村子，跨上沟泉里的小土桥，我站住脚了。这是往昔里我来找他时，他送我的停步分手的老地方。他第一次没有出门送我，我感到的不是他对我的冷淡，我被一种比来时更大的压力压在心头，几乎确信那个不祥的预感愈加逼真了，我的天哪……

十三

惠畅没有走绝路，也没有满世界去浪逛，他仍然生活在惠家庄，和他的妻子秀花以及孩子。我没能劝得下他，秀花又是怎样把他终于挽救在自家小厦屋的土炕上，我不得而知，因为随之而卷起的更加猛烈的“文革”的狂风，已经把这个偏僻的黄土高原下的小河川道，搅得混沌迷乱了。他在自家的小厦屋里活着，即使如他嘲笑的那种猪一样的生活，总是活着，我就放下一条心了。眼前的生活现实是，不仅他谈不上理想与追求，必须过一种只顾刨食的猪一样的生活，小河川道

这个小天地里的一切人，除了那些乘风而起的野心勃勃的几条汉子，能够说理想和追求的人几乎已经绝迹了。

我虽然没有想到自己要过猪一样的生活，眼下却必须与猪在一起，从早到晚，朝夕相处。每日三餐，我必须按时供奉，晚一会儿它们就嗷嗷嘶叫。每天中午需得把它们排泄的粪尿清理出来，两天不清除就变得难以下脚了。夕阳西沉时，我背着一笼猪草从山坡间或河川里回到猪圈旁边的时候，那些大的或小的，伢猪或母猪，早已挤在栅栏门口，甩着尾巴，哼哼唧唧，向我致欢迎词。

民办中学本来就不大景气，经不住哄闹，学生就回家了，教师们的工资公社无力兑现，也都回队挣工分去了。民办中学搞半耕半读，养下一群猪，照常要吃食，作为对我的一贯“保皇”的罪行的惩罚，我和“走资派”校长一面喂猪，一面经管学校的生产地，另外兼顾护校。

猪饲料完了。我用架子车装了两口袋学校生产的小麦，到西安一家面粉厂去兑换麸皮。朝辞白帝，午达古城，完成了小麦换取麸皮的任务后，我拉着架子车，在背巷里转着，寻觅一家门口可以停车的饭馆，我已经很饿了。

我忽然看见了惠畅，这真是不期而遇。见面之后，他说他在这条小巷里的某居民家做木匠活儿，上街来买旱烟，没有找到，居民家用上好的纸烟招待他，实在不如旱烟过瘾。

我们在小饭馆里的很脏的桌子旁坐下来。

“你啥时候学会木匠手艺了？”

“我现在是个不错的匠人哩！”

“真是想不到！”

“生活是最严厉的老师啊！”

他已经从最初的绝望和慌乱中镇静下来，而今摆给我一副世故的面孔。他百无聊赖，借斧子、锯和凿，自己给自家做小凳，再做椅子，他不能永远以门槛为坐凳呀！这样，他的无所寄托的心，一下子依附在飞旋而出的刨花上来了，而且兴致极高。他有文化，识得图，流行的新式家具他最有兴趣……他可以出门挣钱了。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恶有恶报！”惠畅虽然是一副世故的面孔，口气里却有一丝明显的解气的意思，“那个爬上惠家庄最高座椅的流氓，这回可碰上辣子了！惠家庄的造反派一起来，就把他和老支书推上斗争台子了。人家批那个老好支书是做样子，批他可是实心实意。这熊包虽然伶牙俐齿，招不住一顿饱打，尿在裤裆了，也屇在裤裆了。你想么，造反头儿是原任的大队长，被他整下台的那个实干家，这回造起反来，能给他甜的软的吃吗？”

他的得到报复的得意是清楚不过的。他已经剃掉了头发，是和所有北方老农民一样的光葫芦脑袋了，鼻翼两边陷进两条又粗又深的皱纹，显示着一种强有力的气势，眼睛里却是傲慢和漠然混合着的得意神情。我吃着一碗羊血泡馍，不用插言，听他得意而解气地说着。

“你不知道这流氓得势的时候怎样折磨人哪！他知道我爱书，把我的书全部搜出来，就堆在我的门口烧，一边烧着，还一边唱着书名。我在屋里听见那个声音，真是心里往外冒火……好了！他也尝到了挨打挨斗的滋味了！斗他的时候，五类分子照例得陪斗，我爸也低头站

着，我已经习以为常了。只要把那个流氓收拾一顿，我爸陪斗十回也值得！

“你觉得我的报复心理特别强吧？我也是这时候才发现我没有容人的大量。那天早晨，他一个人在村子西巷扫街道，看看四面没人，我大笑一声，从他身旁走过去，他连头也没抬起来。后晌，我背着工具箱，进城来了……

“原大队长拉我造反，我不干，我和他不一样呵！我刚走半月，那个流氓也参加到一派里头，跟大队长干起来了。两路人马都归随了县上的两大派，完全是以‘四清’划开的，听说已经端上机枪干起来了。我们队里没人管，我也不想卖命，躲在城里做木工，挣钱买粮……”

县上两派武斗的情况，我已早有所闻，看不出有完结的时候，而且愈演愈烈了。我倒是庆幸他超然物外，躲在城里做木工活儿挣钱，正与我目下与世无求的心境相吻合。

“你怎么样？”他问，“拉车进城做啥？”

我告诉了他我的状况，不无感慨地说：“我现在真正过的是猪的生活了！”

“现在能像猪一样无忧无虑地生活，算是幸运的哩！”他现在又给我做宽慰的工作了，“整个国家机器失控了，疯狂地运转起来了，弄死一个人，简直跟踩死一只蚂蚁一样。那些省里市里的大官们，全都性命难保，你我算得啥嘛！活着，悄悄地活着，能活到世事平安就好了！现在，一切都可以抛弃不想……”

“我也这么想。”我说，“喂猪就喂猪，拉车就拉车，想其余的事儿，想不上了……”

“记得不？咱俩曾经几次想拜访柳青，都不敢去，怕扰乱了那位大作家。”他的脸上现出痛苦的嘲笑，“想不到，半个月前，我看见柳青了，在西安的大街上，正被人押在汽车上游街。还有……”

“唔！真是——”我告诉他，那天我也在西安有此幸遇，同样是拉车来兑换麸皮时巧遇的，“你知道吗？我那天回去，把几年来的日记和习作稿，全部烧掉了，书卖给废品收购站了，宣布与文学彻底绝缘……”

“文学？创作？唉——”他摇摇头，沉吟着，“中国连柳青这样的作家都要打倒，你我还瞎折腾啥呀！我那天晚上，躺在主人家的阁楼上，才觉得我们走错路了，才觉得刨子凿子比钢笔更有用，更实在了……”

我重新把套绳挂上肩膀，准备赶路。他帮着我推着车子，拐进另一条小巷。我们默默地走着。小巷里也是大字报和大标语的世界，谁也无心溜一眼。拉上东去的宽阔大路的时候，我们俩同时站住，准备分手。

“下次你进城来的时候，咱们喝一杯吧！”惠畅说，“看透世事，不过如此！”

我们没有握手，那种礼节不适宜我们。我向他点一下头，就弯下腰，拽动了车子。其时，午后西斜的太阳，正照在这座骚乱不安的古城的高高矮矮的建筑物上……

十四

初春的渭河平原绿茵如织，生机盎然。无边无沿的葱绿的麦田里，不时可以看见一片片灿若朝霞的桃花，真是令人目不暇接。吉普车在公路上飞驰，渐渐驶入原坡区狭窄的河口了。除了陌生的司机，车上坐着县文教局王副局长，文化馆馆长，还有省报文艺部的肖编辑，我们四人一起去参加给惠畅平反的会议。

我和省报文艺编辑老肖坐在越野车的后排座位上，心中不无感慨。将近二十年前，我和惠畅两个肚里装着豆渣和野菜的乡村青年，昼夜兼程，跑了六七十里路，赶到城里去听他的文学讲座，曾经是怎样一番心情啊！二十年后，我和他去给他平反，真是神仙也无法预料这样一种戏剧性的巧合。

我至今清晰地保存着第一眼看见他时的记忆，他走上讲台，步履轻捷，姿态潇洒，一种翩翩的才子风度，曾经使我顾影而自卑。现在，我和他挨肩坐着，可以清楚地看到他鬓角的一抹白发，眼角有一条条细密的鱼尾似的皱纹，无论如何翩翩不起来了。他告诉我，他刚刚回到省报文艺部不足一月，刚刚平过反。他在秦岭山中一个只有十来户山民的村子里改造了七八年，现在又“复辟”到原来的位置上办公了。他的这样的遭遇，没有谁感到惊奇，连他自己的口气也是淡淡的，因为有这样的遭遇的人太多了，多而不怪了。倒是我触景生情，说出二十年前和惠畅听他的文学讲座的事，他的近视镜下的眼睛睁得老大，吃惊之后就感叹世事的匆匆了。

有趣的是，惠畅的第一篇小说《小河秋高》，正是经过他的手发表在省报文艺版上。近二十年了，他没有见过作者的面，倒不奇怪，

经他的手编发的无名作者的作品也不仅仅是惠畅一人。令他吃惊的是，作者竟然遭到这样野蛮的待遇，真是无法想象的事。

“一个农村青年，刚发了一篇习作，连人家的书籍也给烧了，稿费也退赔了，这简直没法说……”老肖虽然早已跨入中年，情绪仍然很容易激动，“我接到惠畅给我们编辑部的信，看了以后都流泪了……”

“没收人家稿费干什么？”文化局局长也愤愤然，“农村里有些人净胡整！”

惠畅把自己的遭遇向报社申诉了，因为《小河秋高》的稿子当年是由老肖处理的，现在就仍然由他和我们县文教局联系，共同处理这件冤案。经过与当地公社联系，公社党委也不怠慢，而且提出稍等几天，等惠畅家的地主成分复查完毕，一次过手，彻底地平反。

平反大会是庄重的，热烈的。公社书记老王一个一个宣布对惠家庄的许多陌生的名字的平反决定，土台上居然站下一排溜，惠畅和他戴过十多年地主帽子的父亲站在那一排溜人中间，一样的黑布棉袄，一样的光葫芦脑袋，从外形上没有什么明显的标志可以区分开来。老肖默默地坐着，夹在指间的烟卷已经烧着指头，才扔掉了，回头对我感慨起来：“啊呀！这么小的一个村子，竟然有这样多人遭到冤枉，真是不可思议！我总以为知识分子遭遇不好，农村似乎没多大事儿！今天一看哪……真可以说是城乡里外，体无完肤了……”

我听着他的话，却在想我的心事，那个乘风而起的团支书，此时该作何感想呢？我留神在台下的人窝里睃寻他的踪迹，终于没有能够看见他的也许已经变得不好辨认了的面孔；而意外地在人圈的外围，看见了马罗大叔。

他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呢？他们村离惠家庄五六里地，他也赶来看热闹了吗？我坐在台子一角，看见马罗大叔双手背在腰后，翘起胡须花白的下巴，瞅着王书记在讲话。老汉老了，背也有点驼了，粗壮的腰身虽然还显着粗壮，雄风却一扫无存了。

我溜下台来，拍拍他的肩膀。他猛然转过头，认出是我，眨着浑浊的眼睛，大声感叹着，拉我在一堆麦草垛子跟前蹲下来。

“我说咋着！”马罗老汉一蹲下来，就得意地说，“我早就说过，没有千古不明的冤喀！你看咋着！我的话灵验不灵验！自古以来，都是奸贼害忠良，瞎人得势，好人遭罪。反过来呢？奸贼没一个能奸到底的，忠良也没一个窝囊不明的。你看那些老戏吧，《赵氏孤儿》呢，《白玉楼挂画》呢，嗨！都是这个理儿！而今也一样……”

他很得意自己的判断得到了现实的验证。他没有读过历史，也没研究过社会发展史，他只是看过好多古典传统的秦腔戏，他对历史的了解以及对历史人物的评价，都是以戏的内容为依据的，而且拿那些戏所给予他的影响来评价现实生活，有些很对，有些也就偏狭了。

“你看嘛！现时给人家平反，啥意思？”马罗盯着我，依然很得意，“我说么，为人在世，不管刮啥风，下啥雨，以实为实总也没错儿，你耍心眼搞下虚虚套套的假事，害了人，终究不得长久喀！”

我很同意老汉这种观点（权且称作观点），而且深有同感，附和他说：“对！实际上就是要实事求是。”

“有的人一遇运动，就疯张起来了，把实事求是当口诀儿念，实际尽搞虚套子。”马罗老汉有点愤愤然了，“‘四清’那年，惠家庄那个‘运动红’，跑到我的庵棚里，要我写个材料，证明给惠畅他爸熬过长工。

我给他说，我确实熬了一辈子活，可不是给惠畅他爸熬活，我在河北那家财东家，一直熬到解放。那小子还要缠我，我骂他，‘甭给人捏包子噢，包子是虚的，终究要从心里臭的！’”

“看咋着？”马罗更加得意，“我当初要是给人家捏下假事，现在有啥脸面跟人家惠畅父子说话？你看吧！那个‘运动红’而今黑下来了，我听人说，他今日钻在屋里没出门……”

那个被马罗老汉鄙称为“运动红”的人，自然是那位团支书了。我已不年轻，经历了世事，心中此刻倒也平静。这就是生活，生活就是这样。生活中有惠畅的落难，也就必然有团支书那样的乱世英雄，也不会没有马罗老汉这样用良心和传统道德的盾牌抵挡了袭击的人。

他已经年近七十，仍然住在河滩上杨树园子中间的庵棚里，队上干部让他搬回村里去，他不愿意，说是在河滩清静惯了，倒不能忍受村子里的嘈杂。我不好意思再问他的那位阿克西尼亚的情况，因为他毕竟是胡须花白的老者了。我对他的那个庵棚又顿生留恋之情，我和惠畅毕竟在那里度过最舒畅的月夜，保留着一种令人眷恋的浪漫色彩。我说：“马罗大叔，今天我顺路回家，晚上到你的庵棚去，咱们和惠畅放开谝一谝，让他带上板胡，我想听你的乱弹了！”

“好！惠畅今日平反，我给他放一声火铳！”马罗老汉也兴致大发，“为惠畅鸣冤放炮！”

平反大会直开到太阳偏西，会后，我和老肖一行四人，一齐拥挤进惠畅的厦屋。

那张老式抽斗条桌，依原样搁着，那只红漆暗淡的板柜，也依原来的位置放在背墙根下，墙上挂着大锯小锯，墙根的小木箱里装着刨

子、锤子、凿子、钻子，屋里有一股淡淡的木质的气味。桌子上只有一个墨水瓶，使人还能想到这是一位发表过小说与笔墨为伍的人。

“你最近尽快写出一篇小说，或者散文，寄给我。”老肖对惠畅说，“我们加一条按语发出去，在报上再给你平一下反。”

“我已经写下一篇了。”惠畅也很兴奋，“二十年没动笔，尽跟斧头锯子打交道，写起来好难哪！心里踊跃，临到提起笔来，没词儿了！我耽搁得太久……”

“原来的基础还是在嘛！多多写吧！”文教局副局长鼓励他，一片坦诚，随之又指示文化馆赵馆长和我说，“惠畅有啥创作上的困难，要尽量想法解决……”

秀花脸上和头发上落着烧锅时的柴灰，送来茶水，又忙着拉风箱做饭去了。作为一个家庭主妇，大约十几年来第一次接待这样多的城里干部，她很快活，也很拘谨，完全乱了手脚，烧锅也烧不出旺火来，柴烟从小灶房的椽眼里泄出来，她自己也被呛得泪汪汪的。

“稿子给我带走吧！”老肖说。

“不好……”惠畅拉开抽斗，取出稿子，交给老肖手里时，有点惶惶，“你要多指正。”

我们四人，说了许多重复的鼓励和安慰惠畅的话，就告辞了。惠畅送我们出门时，握手送别，我看到他的眼里已经潮起的红丝儿，有点笨拙地伸出那只已经变形的粗糙的手，和客人一一握过，站在那儿倒说不出话来了。

秀花拍打着围腰上的面粉末儿，有点懊丧地抱怨我：“你是熟人，也装起客气来咧！让我擀下那么多面，可怎么办？”

十五

省报编辑老肖打来电话，有关处理惠畅那篇稿子的事，想征求我的意见。他以令人感动的惋惜的口气告诉我，稿子写得不理想。发吧，质量不过关；不发吧，作者属于令人同情的一种特殊状况。他的心里十分作难，而偏于退稿的倾向却是明显的，而且要我给惠畅做些解释。

“争取发了！”我几乎在恳求老肖，“如果质量差点，读者可以原谅的。他现在需要鼓励，需要声援。哪怕删得只发一千字，就是最好的鼓励和支持……”

“我知道……”老肖听完我的话，更加难为情地说，“我是编辑，得为读者负责……”

我体察了一个老编辑的责任心，就不好再使他作难。稿子终于没有发出去。他把原稿退给我，并附寄一件诚恳委婉的长信，让我一并交给惠畅，再做些解释工作。

我看了这件退稿，稿子的确是差些。奇怪的是，他受了那么多苦难，而他的稿子却仍然是写一位爱队如家的老队长。《小河秋高》写的是一位铁面无私守护集体财产的老贫农。这两篇作品基本相似。他的笔调，仍然是六十年代那些报刊上常见的笔调，在伤痕文学席卷文坛的时候，显然觉得它太浅了。同时也使我看到，现在文坛上冒出的

一批新作家，较之惠畅六十年代发表的作品，起步要高过不止一个台阶……

他骑着自行车到县文化馆来了。我在院子里瞅见他，自行车后头的衣架上，捆缚着一摞短木头。坐到我的房子里，他说今日到县上的农贸市场，买下几节原木，正好可以作大衣柜的材料。他又从提兜里掏出两篇稿子，交给我说：“你给看看，怎么修改。”

自行车后架上载着他割制家具的木头，车头上挂着的提包里装着小说稿子，无须细问，我就可以想象出来他在怎样生活和追求着文学。

“还是你念吧！”我说，“你来一次县上很不容易，咱们当面听了谈意见。”

“你看吧。”他有点不好意思，不念。

人真是有一种对过去习惯的特殊心理，稍有改变，就使人产生明显的对比的差别，并因此而有许多联想。惠畅过去给我读他的新作而不让我亲自去看，似乎习以为常了，现在他不念，一定要我自己去读，而且脸上少了点自信而多了一点说不清的表情，令我心里反而难受了。

他坐下喝水、抽烟，翻阅着我桌子上堆积的杂志。我就认真地读着他的小说稿子。

两篇小说稿子接近读完，我的心里难受起来，与省报老肖退给我的那篇搁一起考虑，我便觉得心情沉重起来。我不能不承认，他的文学的表现方式和表现能力，依然停留在六十年代他写作《小河秋高》

的水平上，依这样的水平写出的作品，要满足七十和八十年代交接时期的读者的审美胃口，显然是不行的。我知道了，十多年来，他是着实与文学相隔太远了，现在所要努力的侧重面，应该在哪里呢?

“我可以看出，你觉得作品太差。”他笑着说，“我知道我的稿子的实际。你不要难为情，敞开说，我都能接受。”

我总也不能敞开说，更不能像二十年前我们所发生的毫无忌讳的争论那样，那样的气氛无法形成了。我终于决定以说长处为主，然后劝他多读些书，把近年间新出版的中外优秀作品介绍给他。我总怕因为语气不当而使他泄气，所以连自己也觉得莫名其妙地欲言又止，说不顺畅。

“你怕我灰心，所以不敢直言。”他说，“不过，稿子差劲我是有自知之明的。你放心，我现在的劲头，比六十年代那时候还大！现在文艺界的兴旺景象简直叫人睡不着啊！我拼死也要……”

我虽然在鼓励他，其实自己心里也不踏实，我深知，他要在当今的文坛上露出头角，不会是半年八个月的事，那么，他现在有没有长期苦斗的耐心?

他的信心很足，说他已经和秀花谈妥，家务事由她包揽，腾出他来看书和学习。他说他将豁出三年时间，从基本功上练起，争取三年以后大见成效。“大见成效”是当时国内建设的口号。他对个人事业的追求毫不动摇，信心百倍。

两个月后，正值暑期，文化馆决定举办一次全县业余作者的创作会议，邀请本省近年间涌现出来的几位青年作家讲创作经验，好多本县的文学青年闻讯后奔走相告。开会的第一天，就出现了没有通知的

文学爱好者要求参加会议的矛盾，弄得筹备会议的我和馆里的其他几位同志措手不及。可是，惠畅却没有来报到。

午饭时，我从县招待所回到文化馆，接到一封信，一看那飞扬的笔迹，我就猜出是惠畅的信了。是他病了呢，还是家里有事拖累？打开信封，他却写着让人伤心的话：

我不能参加创作会议，尽管是十分难得的机会，我要去一家工厂做工。工厂盖新楼，我与几个木工包揽了窗子和门的活路，有一笔收入。我现在无法放下刨子，暑假快完了，孩子上学要交学费、灶费，三个孩子需得近百元，我得去给他们挣回来，好让孩子高高兴兴去上学。这是最急需解决的问题。

我向省内外的杂志投递过七八篇小说了，全都完璧归赵了。我现在不能不从实际考虑，先放下钢笔，捞起刨子……

……

我在县上的创作会议结束之后，就写了一份申请报告去找文教局局长，我想应该给惠畅订一份合同，让他到文化馆来管理图书，有一点固定收入，好应付家庭日常用度，使他能够搁置下锯子和刨子，拿起钢笔来。

文教局局长同意我的意见，在我的申请报告上签了字。我就到劳建局去办理手续。

劳建局郝局长接过我的申请报告，只看了一眼，就把老花镜摘下来，搁到桌子上，顺手拿起一份铅印的文件，递给我，笑笑，没有说话。

这是一份由市政府发下的文件，要求县、区以下的机关和工厂全部清退所使用的农业人口的合同工，空缺下的名额用来安排城市待业青年。劳建局局长向我摊开双手，做出爱莫能助的表情，就把申请报告送还给我了。我也没有说一句话，礼节性地向他点点头，就把那份申请报告塞到裤兜里，走出县政府办公大楼。没有办法，惠畅看来还得玩他的锯子和刨子！

我走在尘土飞扬的古老县城的水泥街道上，朝文化馆走去。此刻，我深切地感觉到了：文化馆——这个被一些注重权益的人放不进眼睛的闲事单位，对我来说，实在是侥幸的理想王国了……

十六

我应邀到市里一个剧院去讲创作体会。

诚惶诚恐，惶恐不安，先一夜竟然吓得失眠了；无论何时，无论何地，一当我想到要面对千余双各种各样的眼睛，我就惶惶然起来。似乎只有在这时候，我才觉得应该读的理论书却没有读，应该有更好的作品写出来而没有写出，才造成这种理不直气不壮的诚惶诚恐的畏缩心理。

我终于走上千余人的大剧院的讲台了。我索性谁也不看，先用一根烟来镇静一下……

我刚才走向讲台的一瞬，突然记起我和惠畅那年来听老肖作《散文散谈》的文学讲座的事，我那时坐在后排听众座位上，诚惶诚恐，十分自卑；而今我来到讲台上的时候，心里依然自卑、畏惧；我的不知怎样形成的这种根深蒂固的自卑心理啊！

我不知我是怎样讲完的，只是在台下响起一片活动座椅的庞大的响声之后，我才觉得我属于自己了，这当儿，从台下拥来一伙青年，要我签名留念……

我和主持这场讲座的文联的老张从后偏门走出去，就进入一条背巷，我无法相信。老张竟然说我讲得不错，很实际，我只信他是出于鼓励我。

他约我到附近的一家小吃馆吃中饭。我跟他刚走到小巷里，惠畅却迎面走来。

“你怎么在这儿？”

“我来听你的报告。”

“你听我的什么胡扯……”

“嗯……”

我们走进小饭馆了。老张去交钱买饭，我和惠畅坐在桌旁闲聊。

他穿着一件破旧的细帆布料工作服，胸膛上尚有黄色的厂名，他说是工厂里给他照顾的一件工作衣。他大概是刚从木工车间里来的，身上散发出一股松脂的气味，衣服皱褶着，夹着锯屑。

“工厂里有报纸，我在晚报上看到了你讲创作的广告。”惠畅说，“我给人家请了半天假，专门来听。”

“我的那点子本事，你还不知底儿吗？”我不好意思地说，“你跑来凑啥热闹呀！”

“不！我就是要看看，你是怎样走上讲台的！”惠畅扬起手，神采飞扬，竟然激动起来，“记得吗？那年咱俩听老肖的文学讲座回去的路上，在那个骡子拉的水车旁边，我说过啥？我说，十年以后，我要以作家的名义登上讲台讲创作。怎么样？我没有登上台去，可你登上去了！咱俩总有一个人……”

啊！我不由低了头，不敢再看他喜形于色的脸孔。二十年前，他自信，我自卑；他以他的顽强的自信的气势，给我鼓励，给我影响，终于使我从泥泞的乡村小道上，歪歪扭扭地走过来了。可是他呢？

他夭折了！

他自信。他刻苦。他顽强。他敢于藐视一切，有一股虎气。他浪漫，思想开阔自舒。他具有成为一个作家的禀赋和气质。有十个惠畅就可能成长起十个中国的青年作家。可是，他却在刚刚迈开一步之后夭折了！

我抽着烟，不想说一句话。我从来没有这样深切地为他惋惜过。他被整垮的时候，我为他惋惜过，却没有今天这样强烈。我参加给他平反的大会的时候，替他惋惜过，仍然没有今天这样强烈。我由惋惜进而感到难受了。是的，心里十分难受。

“为我的朋友终于实践了我没有实践的诺言，干杯！”惠畅端起啤酒杯来。

“为你们二位患难与共的乡下来客在此欢聚，干杯！”老张也端起酒杯，站起来。

“为了一个夭折了的天才……”我举起杯子，却说不下去了。

我们重新坐下。

几杯酒下肚，惠畅的脸颊、额头都红了。他的兴致高涨，话特别多，盯我一眼，不满意地说：“你说我‘夭折’了？我还不服哪！还是老话一句：十年以后再说！”

我申辩说，只是惋惜，并不是说他已经完结了。“老张哇！咱俩今日初面，你不知道，俺俩年轻时，为了文学这个神秘的字眼，受过多少苦哇！”惠畅激昂地说，“我们穷得买不起稿纸，买不起一盒一毛二分钱的纸烟！我们住下三毛钱的黑店，晚上叫蚊子、臭虫给咬跑了！我们肚里填的豆渣、野菜，嘴里却讨论的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的结合问题……我们从乡村打出来，太不容易了……”

惠畅说着，伏在桌沿上，呜咽起来了。

我很心酸，看看四周那些食客在盯我们，我劝他不要太伤感了。老张也受了感动，诚恳地劝他吃菜，喝酒。

“现时的文艺政策太好了！在这样好的文艺政策里，我心里真是急得痒痒，可是我没有……本事！”惠畅痛苦地摇摇头，瞪着有点红丝的大眼珠，“放开手写吧！多写！写好东西！你写下好东西了，我感到高兴，还有……我们的那个马罗大叔，给你放火铳……”

我再也忍耐不住感情的潮水，搂住他的肩头，这金子般的言语啊……

“我已经如愿以偿了！我虽然趴下了，一时三刻难以站起来，没有关系。我们俩总有一个人没有趴下，这就够了！”他诚挚地说着，神态

安静，“没有办法，我现在还要去做工，要养活孩子，供给他们上学。你日后在哪里发了作品，甭忘了给我一本……”

我点点头，再也说不出什么话来，就默默地坐着，喝着酒。老张让我们聊着，自己先告辞走了。

我和惠畅走在古城的街道上，谁也不想去挤汽车或电车，只是悠悠地走着。街道两边的一株株古槐，浓密的叶子变成墨绿色了，初秋的天空，洁净而高远。

“生活怎样？”

“活泛多了。我包这批门窗活儿，马上就要完成了，能分几百元。”

“孩子念书行吗？考学有希望没？”

“考学？我看悬乎！娃娃倒是用功。”

“注意身体，挣得够养家就行了……”

“你也保重！咱们都不是二十年前那时候的体力了……”

十七

惠畅打来电话，约我到他家去，口吻执拗，不容推辞，他说有重要事情相商，暂时保密。

我走进惠家庄，他在原址上的厦屋已经拆除，留下一堆废旧的土坯。问问临近的人，说是不用再问，惠畅已经在村子东头盖下新屋，

那幢两层楼房便是。

走过村巷，刚刚泛绿的杨树枝丫中，可以透见一幢漂亮的小楼房，红砖墙，天蓝色的楼栏，米黄色的窗棂，在嫩绿的树叶的映衬下，使人容易想到是退职还乡的高干的居室。

惠畅正在院子栽花，抖着手上的泥土，哈哈大笑："如何？看看我这别墅如何？"

他在自压井管下洗了手，甩着手上的水珠，引我上楼，说："请你先参观我的书屋。"

二楼东边一间屋子，摆着三个书架，散发出油漆的气味。书架上摆满了一色新的书籍。临南窗摆着一张书桌，笔墨整齐地置于案头。我真有点惊呆了。

"如何？"惠畅得意地笑着，"这个学习环境如何？"

"我好坏算个搞专业创作的，也没有这样好的条件。"我说，"你可真是阔气了！"

"比较阔气一些了！"惠畅矜持地笑着，"不多，我现在存下两万元了。"

"嗬呀！两万？"我吃了一惊。

"你能拿多少稿酬呢？"他坐在藤椅上，捏着纸烟，"充其量也不过我的十分之一……"

两年多来，我和他很少照面了，我知道他在小河滩上办起一个水泥预制厂，专门预制水泥楼板。我曾经想到，他已经四十多岁，创作上怕是很难再有进展了，搞点实业，赚点钱，把后半生的生活过得舒服点，也许更实际。那个预制水泥楼板的小厂，够他忙乎的，我因此和他减少了往来。想不到，不到三年时间，竟然是这样一番天地。

“我从今天起，要做专业作家了！”惠畅从藤椅上站起，向我宣布，“我给自己创造下条件，现在要潜心读书，立志创作了！”

他告诉我，水泥预制厂办起不到三年，已经赚下两万多元了。儿子去年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回来在他的厂子里做工人。今年春节一过，他把这个预制厂交给儿子去经营了。

“小子有魄力！只有十八九岁，管理这个小厂还挺有办法！”惠畅很赞赏自己的儿子，向我夸耀，“秀花怕把这宝贝挣了，叫他学习写作，让我办厂子。这小子顶撞他妈说，‘俺爸的黑路我再不蹈此覆辙！我要以实业兴国安家！’你听听现代派青年的口气多大！”

“你现在……还不死心？”

“死不下这个心思！”惠畅说，“我和儿子谈了，又跟秀花谈了，家庭会议一致同意我的申请，让我退下来读书。秀花真不错哩！她说，‘甭急，哪怕十年时间发表一篇，也算争了一口气！’我的决心是，临死前能叫出一声来，也算我没白活……”

“噢呀……”我深深地被他感动了。

文学，这个神秘而迷人的魔鬼！一经缠住一个灵魂，足以使人终生难以解脱。我忽然记起这样一个人来，那是秦岭山根下的一位农民

业余文学爱好者，五十年代末发表过几首新民歌之后，一直在写啊写着。新民歌不时兴了，他写自由诗。诗歌写不出名堂，他又写小说。至今已经脱落了两颗门牙，年过五十的小老头了，怀里抱上孙子了，他还在写着哪个杂志也不肯发表的小说。他来找我看他的稿子，我首先很难受，想劝他好好搞点家庭副业，把屁股上的补丁裤子换下来，却又不忍心伤害他依然不减的创作热情……惠畅比他聪明多了，先把经济问题解决了，可是和那位老头一样，依然迷恋于文学这个魔鬼！

“县委通讯组两个同志来找我，要写我致富的事迹，还说要在全县树立我这个致富模范，我全部谢绝了！”惠畅笑着给我说，“我心里说，我挣钱是为了给自己创造学习条件哩！”

“现在，你可以潜心静气地学习了！”

“我作出两大决策，全都在家庭会议上通过了，刚才说的关于我搞专业创作的事，算一条。另一条是——”惠畅又从椅子上坐起来，这个不安静的家伙现在十分兴奋，“我拿出五千元来，交给县文化馆，设立创作奖金。凡在全国性刊物上发表作品的，头等奖；在省内刊物上发表的，设二等奖；在县办的内部刊物上发表的作品，评出三等奖。鼓励咱们县上的业余创作。我一生未能酬愿，我希望本县多出几位作家。我们这个县哪！人杰地灵，该当有更多的文人豪杰出世……”

“你可真想得出！”我说，“和文化馆联系了吗？”

“已经说定了。”惠畅说，“县委书记听到这个事儿，专门找我谈了话，鼓励我……”

“一种义举！”我说，“国家设下茅盾文学奖，你在本县设奖，以什么命名呢？”

“农民文学奖。”惠畅说，“我已经和文化馆赵馆长商量确定了，今年底明年初举行第一次颁奖活动。”

“颁奖时，请告诉我一声。”我说。我已经离开县文化馆了，对本县的这一创举十分感兴趣，“我来看你第一次颁奖。”

惠畅领我到小河川道里去，参观他的工厂。

河堤上和灌渠上的一排排杨树和柳树，披一身新绿，泛起朦朦胧胧的柳烟。麦苗起身了，绿毯似的铺满了河川里的田地。温暖的阳光静静地沐浴着春天的河川，使人脸上感到暖烘烘的了。

河湾的堤坝里，十多个青年男女正在忙着，和灰的和灰，推砂石的推砂石，水泥搅拌机哐唧唧响着，紧张而又繁忙。小伙子和姑娘们早丢剥了棉衣，只穿着鲜艳的绒线衣干活，使人可以感到青春的活力。

一座简陋的砖瓦房，冒着烟，老远可以看见，秀花腰缠围裙，正忙着什么。惠畅告诉我，秀花给工人们做饭、烧水，兼当材料保管。

惠畅指着一位小伙子给我说，那个正捉着掏浆机的青年，是他的儿子。和他的儿子正说着话的那个青年，是那位团支书的儿子。俩娃在学校时很要好……没有办法。他们毫不理会他们的父亲之间的纠葛，而只顾自己交朋友。惠畅一挥手：孩子们有自己的朋友，我不干涉。

我和他走着，聊着，直到走到那幢工房跟前，秀花才看出我来了。她扔下铲煤的铁铲儿，拍打着围在腰间的围裙，一下子大呼小叫起来……

短篇小说

旅伴

在同一车厢的同一隔间里，两位旅客同时找到了自己的铺位，都是下铺。他们谁也顾不得瞧对方一眼，忙着把随身带上车来的大包小包塞到货架上去，然后坐到车窗跟前来，火车启动了。

他们先后坐下，掏烟，点火，吁出一口浓烟，上车时的紧张忙乱情绪舒缓下来，心地踏实地开始旅途生活了，这时才转过头来，打量坐在对面的旅伴。俩人的目光一经相遇，几乎同时惊奇地叫起来：

“啊呀！是你——”

这两个人，是高中读书时的同学和朋友。一个被同学们公认为“数学王子”，一个号称“文学天才”。现在，二十多年以后，数学王子已经是国防尖端学科的研究人员了，而文学天才也已是当代颇有点名气的工业题材的作家了。二十多年前，他们同时爱上了班里一位名叫东芳的女生，那是个聪明而又动人的窈窕姑娘，大伙叫她东方美人，她是他俩心中的女神……异性相恋是排他的。这两个朋友也不能超凡脱俗，朋友关系破裂了，结下了怨。而时间的流水似乎可以冲散一切感情的烦忧。现在，当他们在列车上握手、拍肩的时刻，心中虽然还有那么一点不可言状的别扭情绪，却终究为理智所主宰了——都是四十多岁的中年了哇！

一阵闲聊之后，作家首先从尴尬的情绪里超脱了，豁达地说：“东芳现在好吗？”

“怎么……你？”军事科学工作者惊奇地睁大了眼睛，“她不是嫁给你了吗？”

这样——真是哭笑不得——他们才相互闹明白，谁也没有娶到东方美人，二十多年的误会，都以为对方和她结合了。

“噢！原来如此……”作家感慨起来，动情地说，“我当时感觉出来，她更喜欢你，说你聪明，冷静。她说她母亲不喜欢搞笔墨文学的人，容易招灾惹祸……二十多年了，我一直以为你们生活在一起……”

“嗨！哪能呢……”科学工作者淡淡地笑笑，“我当时判断出她更喜欢你。她常当我的面说你开朗，浪漫，有诗人风度……说我太死板……”

火车在宽阔的北方原野上奔驰。大片大片的金黄的油菜间缀在一望无垠的碧绿的麦田里，一排排白杨，从窗前掠过去，远处的山峦迷蒙在淡灰色的雾霭里。田野里春的温馨气息灌进敞开的车窗里来了。

“我毕业以后，家里太穷了，‘瓜菜代’也维持不住，舅舅把我带到青海，进了地质勘探队。我肩上扛着标杆，爬遍青藏高原，兜里总没有忘记装着一本稿纸……我的生活就这样开始了，第一次萌动的爱情却同时结束了！”

“我毕业后参军了。当了两年兵，从部队上了大学，再回到部队。在戈壁滩上‘隐居’了二十年，已经与‘尘世’隔绝了。那年回家探望父母，听人说她和小赖子结婚了，我坚决不信……”

“我也听说过她和小赖子结婚的话，也是不信。”作家证实说，“她怎么能嫁给他呢？那么一个猥猥琐琐的侏儒！”

“看来是真的嫁给他了。”科学工作者说，“他虽然猥琐，可他当时比你比我都更优越。他当了汽车司机，走南闯北，能弄到别人弄不到手的‘进口’物资，别忘了当时是困难时期……不过，我总不愿意这样想。”

作家显然激动了，创作的灵感顷刻之间激荡起来了，回味自己经历过的生活，心情往往按捺不住。他拉开手提兜，取出一瓶酒，用牙齿揭掉瓶盖，在两只喝水的杯子里斟上酒。科学工作者也急忙取出罐头和香肠，摆到小桌上。

“我们都犯了一个错误——”作家用富于哲理的口气说，“把一个俗不可耐的女人看得太神圣了！”说罢举起酒来。

“可笑的是——”科学家冷静地说，“我们之间因此而曾经互相妒恨！”说罢也举起酒来。

火车正以风驰电掣般的气魄，在北方的原野上疾进……

1983年10月20日 西安

送你一束山楂花

一

末班远郊公共汽车开进桑树镇，夜幕已经笼罩了这个平原上的古老小镇。正是伏天，街巷里拥拥挤挤的房屋门口，坐着或躺着乘凉歇息的小镇市民，消停而又悠闲。

“票？”女售票员在车窗口喊，“背被卷的——你的车票？”

他知道是喊他，把背在肩头的被卷放下来，提到手里，转过身来，看见女售票员从车窗口伸出乱蓬蓬的烫发头，一双审视严厉的眼睛正紧盯着他。他说：“没有票。”声音的沉静使自己也暗暗吃惊了。

“一块钱。”她说得干脆利落，“加罚一张票。”

“钱没有。”他的声音愈加沉静，沉静得有点阴冷，“要这捆被子吗？”

“你——”她噎住了，也火了，瞪起眼，声音提高了，“你在哪个单位？”

“我？”他冷笑一声，依然沉静地说，“刚从监狱放出来。”

“唔……”中年女售票员眼里掠过一缕不屑纠缠的鄙视神色，立时把头缩回车窗里，把穿着白衬衫的脊背转向车窗，车门“咣当”一声关闭了，公共汽车掉过头开走了。

他把被卷重新挎背到肩上，报复似的瞅着车尾上扑闪扑闪发亮的红灯，转过身，走进小镇。

二

他的一个远门哥哥的箱子里藏着百十本中外古今的文学名著，全是买不到也借不出的稀罕宝贝，他馋涎欲滴，整天围着哥哥家的门楼踅摸。为了讨好哥哥借给他一本书，他自觉替哥哥家挑水，推土，作为读书的报酬。借读过《静静的顿河》和《血与沙》之后，哥哥再不给他开那只油漆成红色的木箱了。

“不敢再借给你看了，要是别人发现了，说我贩毒，我受得了吗？”

像狐狸看着够得着而拿不到的葡萄，他简直想给远门同族的哥哥下跪了。没有办法，他太喜欢读书了。他忽然急中生智，恳求说：“那你……把这一箱书……卖给我行不行？反正你也不看。”

“敢卖吗？这是禁书。”哥哥说着，瞟了他一眼，试探地问，“你能买得起吗？我买这一箱书，花过不少钱哩……”

远门哥哥比他大不过十岁，读中学时，也是立志要当中国的第二个巴金。“文革”中回到黄家坪，娶了媳妇，生了儿女，现在早已成为方圆十里心灵手巧的一位木匠师傅了。他的这一箱子文学书籍，有的是他上学时省吃俭用买来的，有的则是在学校“破四旧”当中从火坑里偷抢出来的。哥哥现在已经无暇翻阅这些书籍了，他要养育儿女，他要挣工分，他要出门给人家割家具以挣取一家人的吃穿用度。他意识

到，哥哥大约想用这一箱书换得买粮食的钱，就不顾自己买得起与买不起，不失时机抓住哥哥已经流露出来的话柄。

“你甭管我有钱没钱。只要你卖，钱，我会想办法的。”

“……”哥哥嘿嘿嘿笑着，达到卖书——化废为宝的目的了，叮嘱说，“千万甭张扬……”

……

一月后，他被逮捕了。罪证确凿，偷卖生产队化肥，有买化肥的外村人的证词。他没有抵赖。公安人员在搜查他独身居住的简陋厦屋的时候，却意外地发现了一箱“封资修”的坏书和两本内容“反动”的日记。于是，问题的性质立时转化了，本该拘留教育的小偷小摸，一下子变成“思想反动”的政治案件，判处有期徒刑七年，一切都顺理成章……

“对你的政治问题，全部推倒，平反。”公安人员说，态度是那样叫人感到亲切，“你今天就可以回家去了。”

他愣呆呆地站在办公桌旁边，突然抱住头，哇的一声哭了，十八岁的乡村青年，哭得浑身颤抖，站立不稳，蹲下身去，眼泪从指缝间涌流出来，滴在脚下的砖地上。

“小伙子，你的日记，本来能使你成为反‘四人帮’的英雄。可惜……”公安人员遗憾地说，“你却偷了化肥……”

他止住了哭泣，从地上站起来，平静地对公安人员说：“把日记还我，把书还我。”

“日记本可以给你，当然要给。”公安人员说，“那些书……已经烧毁了！”

三

小镇上的两家国营食堂早已插门上锁，私人开的小吃铺里生意兴隆，跑短途倒卖的商贩，把装载着鲜瓜熟果活鸡蔬菜的自行车，停放在铺店门口，一边吃着大碗宽叶面条，一边谝着西安城里农贸市场上的交易行情，津津有味。啊呀！农民敢于公开跑生意了……生活显然发生了令人吃惊的变化，他感到新奇而又陌生。他从街巷里走过去，瞅着小铺里那口冒着热气的面锅，搁在桌头的焦黄的油条，咽着唾液，照直走去。

明亮的两盏门灯下，照出一块白底红字的匾牌：桑树镇文化站。

他停住脚步，站在那白底红字的匾牌前踌躇片刻，就走进去了。小院里，挂着阅览室木牌的门口，青年男女出出进进，他三步两步跨上台阶，走进门去，自觉放慢放轻脚步，像朝拜的信徒走进庙堂一般虔诚，悄悄地把那一卷被子从肩上取下来，放到墙角的地上。

生命和活力从心底涨溢起来，面对书籍，他觉得心在胸膛里颤动。他走到阅览室套间门口，那儿正围着许多青年在借书还书，嚷嚷吵吵，挤作一团。

“我借一套《外国短篇小说选》。”他挤到跟前，恳切地笑笑，“要是不行，先借本上册。”

“你的借书证呢？”扎着两根小辫的图书管理员，事务式地问。

“我没有借书证。”旁边有人在拥挤，他急了，说，“打借条行吗？”

“回去，到你们大队开一张介绍信，领一张借书证。”图书管理员耐心地解释说，已经接过另外一个青年塞进窗口的借书证，到书架上找书去了。她再回到窗口的时候，说，“去吧，这是制度，没有借书证不行。”

他退出人窝，走到阅览室大厅里，抓起一位小姑娘刚刚扔下的杂志，是《人民文学》，已经翻揉得又烂又破了。《神圣的使命》这个标题吸引了他，他贪婪地读着，不知什么时候眼睛被泪水模糊了。

“你是哪儿的？”

他抬起头，女管理员站在面前，两只本来和气的眼睛，现在正审视着他。他慌忙说：“黄家坪……”

“你们公社没有办文化站吗？”她问。

他这才弄明白，桑树镇文化站是桑树公社办的。他所归属的杨村公社办起没办起文化站呢？他在监狱蹲着，怎能知道呢！他抱歉地说：“要是不准外公社的人进来，那我就走……”

“看书是可以的……只是得打个……招呼。”女管理员犹豫地说，显然是临时想到的借口。

“看书可以，可不准偷书！”

一个头发长得盖着衣领的男青年，左手插在裤兜里，右手夹着一支烟卷，晃悠着一条腿，喷出一口烟，嘲弄地盯着他说。他的胸口像

扎进一把刀子，忽地从长凳上站起，攥紧拳头：“你再说一遍！”

“提上你的烂被卷，滚吧！”那青年愈加得意，对围拢过来的男女老幼读者们宣传，“我认识他。他是山根下黄家坪村的保管员，偷卖队里的肥料，给县公安局逮捕法办咧！你看他那被卷子，八成是刚从劳改场释放出来的……”

众人纷纷向他投来鄙夷的眼光。图书管理员迷惑地盯着他。他浑身都像被枣刺刷子抽打着，羞愧得无地自容，憎恶地瞅着那个青年。

“哈哈哈……你可得小心哪！他会偷……”那青年讨好地对女管理员说着，三两步蹦到墙角，拎起他那一堆破被卷，一甩胳膊，扔到门外去了，“贼娃子，装模作样来看书……”

他的血一下子冲上头顶，眼里冒火。公安机关已经为他平反，这个混蛋却在众人面前辱贱他。他忍无可忍了，扑上前，挥起拳头，照那张圆脸砸去。

那青年左手一隔，右拳直捣他的胸膛。他只觉眼前金星迸溅，跌倒在地……监狱里仅够维持生命的膳食，不能供给他打架斗殴的能量，几乎没有还击的能力了。

他抹一把嘴角的鲜血，不敢看任何人一眼，爬起来，趺趺撞撞逃出文化站，走过桑树镇的背巷，翻过河堤，在沙滩上躺倒了。

星星在湛蓝的夜空闪烁，流萤在草丛中忽明忽灭，流水在河卵石上撞出清亮的响声，夏夜是这样静谧而富于诗意。他没有眼泪，只感到嘴里的血污腥咸苦涩。他扒掉衣裤，赤裸全身，一跃扑进河水里，疯狂地扑打着河水，翻滚扑跃……

四

他正在酣睡中，被母亲叫醒了，睁开眼，从西边投射过来的阳光照进窗户来，该是后晌了。啊呀！睡了一整天哪！强烈的西斜的阳光耀得他睡眼难睁，隐约看见小院里树荫下的石礅上，母亲正陪着一位陌生的女子在说话。

“黄草同志——”

他跨出门槛，就清清楚楚看见了桑树镇文化站图书管理员的模样，听见她大方地叫他的名字的声音，一瞬间呆住了，发愣了，倒不知该怎么说和说什么了，只觉一股憎恶的火气从心底蹿起，顿时冲上喉咙眼儿来了。他没有招理她，掉转身子走到灶房打水洗脸去了。

“有理不打上门客……”母亲走进灶房，压低声音斥禁儿子的无礼行为，“人家几十里路赶来，就是想看你那个冷脸吗？快去，招呼一声……”

他扔下毛巾，勉强走到小院里，远远地坐在一块石凳上，冷冷地说：“噢……你来了。”

“黄草同志。”她站起来，把小竹椅挪到他对面，笑着说，“我来向你道歉，检讨。”

“唔……”他没有料到，顿时手足无措了。

“昨天晚上，主要责任在我，请你原谅。”她说得真诚，直率，“我已经做了检讨。”

她的眼神和说话的口气都是真诚的。她向他赔礼道歉，这就把他当作一个平等的青年尊重了。

他觉得心里窝聚着的火气开始悄悄飘散，反倒觉得自己狭隘而又窝囊！他慌慌乱乱点燃一支烟，尴尬地笑笑，颤抖着声音说："过去的事了……没关系……"

"这是你的日记本。"她从提兜里取出来，送交到他的手里。他接住了。她又取出一张硬质纸印的卡片，说，"你拿这张借书证，可以随时来借书。我今日给你带来两本小说，也不知你看过没有——"

他接过那两本小说，看也不看，淡淡地笑笑，"我现在……不需要了。谢谢你的好心。"说着，把那张借书证连同两本小说，一起递回到她的手上，摇摇头，痛苦地笑笑，"我再也不读这些书啰！"

"为啥？"女管理员瞪起秀气的眼睛问。

"我要老老实实种地了。"他难受地说，"种地，吃饭；吃饭，种地；再啥也不看了，不想了！"

"噢！你是这样想的。"女管理员叹口气，"我还以为自己把一个有抱负的人挫伤了！要知是这样的话，我来不来道歉，关系不大！"

"你……"他的已经沉寂的心被猛地撞击了一下，这个陌生的女管理员一句很厉害的话，又把他的心思搅乱了。抱负！他为自己埋在心底的抱负，付出了人身和人格的双重代价，真是太沉重了。他不想跟她多说什么，她知道他受过多少难场呢？他苦笑着摇摇头，"现在没有什么抱负了……"

“这样吧，书和借书证先留下，你要是爱看，就看看；不想看了，啥时候到镇上赶集，顺便捎给我好了。”她站起来，已经推动自行车，告辞了。出门以后，她回过头来，“我叫山楂，你到图书馆一问就问到了。”

他在院里重新坐下，翻开日记。显然，昨晚失败得很惨的打斗中，日记本从口袋里遗失了，被踩烂了的几页，经人精心修补过了。他抬起头，茫然若失地瞅着女图书管理员刚刚走出去的空门洞，心里掀起一股微微的波澜，手也有点抖了。

日记本里那些密密麻麻的潦草的字行里，有的地方打上了粗粗的红线，那是公安局同志用红铅笔勾下的手迹。那些红线勾画的字句，构成了他的七年苦刑的罪证。现在看来，不过是他——一个十六七岁的初中生，对“四人帮”倒行逆施的恶行所造成的反常的生活现象的一点肤浅的揭露……踩烂撕补的地方，她给修补得这样精巧啊！

她肯定翻看过他的日记了。她还会认为他是一个贼娃子吗？“我还以为自己把一个有抱负的人挫伤了。”她认为他是一个有抱负的人吗？他的心里又一次掀起一层微微的波澜。他抓起她留下的那两本书，久久凝望着书皮上的两个字：牛虻……

五

写完最后一句话，画上表示着意犹未尽的省略号——六个黑点，他掼下笔，从椅子上站起，深深地吁出一口气，又一篇小说完成了。院里的槐树上，麻雀吱吱喳喳吵闹起来。他拉开门栓，走到院子里，盛暑黎明时分清凉的晨风吹到脸上，够多痛快哇！

这是他从监狱平反释放回家的八月份的最后一天，他读过桑树镇文化站图书管理员——山楂同志送给他的两本小说之后，再也按捺不住，连续写成的第三篇短篇小说了。至于他是否对她说过“再不读书，只管种地吃饭”的话，早已不当一回事了。也许当时真的是灰心丧气了，也许是一时赌气，无论如何，他被内心燃烧着的疯狂的写作热情完全陶醉了。他白天到地里出工，待到天黑，便钻进小厦屋，关住门，任热气蒸沤，任蚊虫叮咬，发疯似的写着……他用那面小镜子照一照，看出自己脸色发灰，眼眶上罩着一个黑圈，不在乎地笑笑，他顾不得更多了。

他决定到桑树镇去，把已经写成的三篇小说投寄给杂志社，顺便到文化站借几本书。队长已经通知过他，到山里水库工地去劳动，黄家坪在那儿的民工该换班了。

把装着稿件的信封送交给邮局的那位秃顶男人，他迅即走出了邮局的绿色门框。

总算第一次给报刊投寄去稿件了，他不敢奢望一鸣惊人，却又担心失败，叫人欣喜而又惶惶不安的等待呀……

他走到桑树镇文化站门口，不由得停住脚，低头一看，结着白色汗迹的红背心太污脏了，光脚蹬着塑料凉鞋，脚面被黄色的尘土粘得一塌糊涂，要是有一双袜子穿上就好了。他想着，又无法弥补，一狠心走进门去，居然比那天晚上第一次登临更多踌躇。

“我知道你会来的。”

山楂正在院子的报亭上换贴当天的报纸，一看见他就笑了，像是对已经很熟悉的人那样随便地说，随之就把他引到图书馆里去。

“我知道你要来借书的。”她笑着，有点得意的样子，把一杯茶递到他面前。

他也笑了，没有拘束不安了，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好意思，畅快地说：“能不能多借几本？”

“你要几本？”她问。

“十本……不行的话，拿五本吧。”他说，“我要到山里水库工地去，两个多月哩……”

“你去挑挑吧。”她说，“按制度一次借一本，你是特殊人物，又要进山……可以照顾。”

他在书架上巡视一遍，很遗憾，好书大都借出去了。他听着她的话里有话，就笑着问：“我怎么算特殊了？”

“哈呀！作家嘛……”她笑着说。

“哎呀！快不敢这么喊。”他确实感到不好意思，“我是瞎折腾……”

她打开一捆包扎着的书，对他说：“这是我昨日刚买回来的新书，还没造册登记哩。你……可以选择几本。”

他瞅了她一眼，就趴到那一堆新书跟前，眼花缭乱了。真有这样的活菩萨呀！他抬起头，对她说：“我真想把这一捆书全都背到山里去。”

“不要急。”她说，“我每月到水库工地去一趟，专门给青年们换书，到时候我给你带去。”

他选了几本书，包好，装进帆布提兜，想说几句感激的话，却又说不出口。对于真诚实意的帮助，似乎更无必要说那些庸俗的客套话。他想说他将发奋努力，用创作成绩来回报她的热心，却也是话到嘴边又咽回去了。他终于什么也没有说，告辞了。

她挡住他：“我们就要吃午饭了，你吃罢饭再走。”

“吃咧！”他推着车子坚决出门，“我已经吃过了。”

他在撒谎，口袋里所有的钱，不够吃一碗羊肉泡馍，但他怎么能吃人家的饭呢?

他走到街巷里，在小饭铺里买了两个烧饼，就跨上自行车，沿着一条宽阔的白杨夹道的河堤飞驰，一手扶着车把，一手捏着烧饼，大嚼起来……

小河川道的阳光，在中午时分简直能把人烤得熔化，他在杨柳浓荫的河堤上行走，心里鼓起多么高涨的劲头哟。有了这样一包心爱的文学书籍，山里水库工地的劳动生活，也不会像从那儿回来的人说得那么艰苦到甚至可怕的程度了……

六

山区的夜晚是这样静寂，静得使人的耳朵里反倒有许多莫名其妙的声音，他趴在被卷上，垫着一块木板，写他构思的又一篇小说。茅草苫顶的临时工棚里，现在只有他一个人。县剧团到水库工地来慰问

演出，又是社员们多年不见的传统秦腔剧目《铡美案》，他们早在吃罢晚饭以后就去占领好位置了。

他自告奋勇留下来看守宿舍，这是难得的读书和写作的机会。平时，他跟大伙一起出工，抬土或者抬石头，累得精疲力竭，晚上躺在工棚的通铺上，这些远离家乡的男人们，说出一个又一个酸溜溜的男盗女娼的故事，引得哄堂大笑。他常常在晚饭后到天黑前的这一段宝贵的时间里，躲到山沟水泉边去读书；回到宿舍以后，就耐着性子听那些越说越不堪入耳的故事。工地每周放映一场电影，总是由他看守宿舍，求得这一周一次的难得的安静的夜晚。他不要娱乐，也不要休息。他这样想：如果他劳动完了睡觉，睡醒来再去劳动，那他就永远只能是一个普通农民；他要当作家，就得在劳动和睡觉以外，另有一番辛劳啊！

夜是这样静啊！偌大的工棚里挂着一盏风雨灯（马灯），昏黄的灯光下，更衬托出夜的安谧，他就着灯光，写啊写着。

“黄草同志在这儿吗？”

他抬起头，以为是耳朵出了邪音，可是朝门口一看，她——桑树镇文化站图书管理员——山楂同志，活脱脱从门口走过来了。他连忙应了一声：“在哩！你怎么到这儿来了？”

“好难找哇！”她说着，已经走到马灯下。

他慌忙从床上跳下来，不知该让她往哪儿坐，工棚里没有一条凳子，似乎现在才切实感到是一个缺憾。他问：“喝水吗？”

她笑着摇摇头，随便坐到麦秸铺床上，双手搁着膝头，说她随着县上组织的慰问团，给工地送图书来了。

“我猜你肯定不在剧场。”她大声响亮地说，“问了几个人，才找到这儿来，给你带来几本书。我说话算话吧？”她有点调皮地对他笑着。

“呀！啊……”他无法抑制自己的激动。如果这样的行为是从小说书里读到，他可能要怀疑其真实性，甚至问：世界上哪有这样好心的人呢？嗬呀！他搓着双手，在狭窄的通铺之间的走道上踱步，如果送书来的是一位小伙子，他会把他抱住，捶肩砸背，淋漓尽致地表达他的感激之情。然而这是一位姑娘，在这样寂静的大山的怀抱里，在这样昏黄的风雨灯的灯光下，他的心在猛烈地跳动，却不得不警告自己保持冷静，坐在稍远一些的草铺上，和她保持一定的距离。

“我给你捎来一封信。”她在背兜里翻着。

什么信嘛，是退稿。他接过一看，稿件中间夹着一张铅印的退稿笺，连一句意见也看不到，真是令人失望！他把稿子重新塞进信封，扔到被卷上去了。

“你怎么把信址写到俺们文化站呢？”她不管他的稿子的结局，随意问，“差点让站长给邮局退回去了。”

他不好意思地解释说：“我没有办法。自从我的日记出了问题，我爸就不许我写字动笔了。他一发现我写的东西，全都塞到灶锅下去了。我怕稿子退回来，落到我爸手里。想来想去，我想你那儿倒是保险些……”他想说他已经完全信赖她，却不好意思说得那么清楚。

“噢呀！是这样。”她爽快地笑起来，“只管写吧，我替你收存，万无一失，放心好咧！”

“要是你收到退稿，悄悄地存放在你那里，甭声张。”他恳切地说，仍然觉得难为情，“有些人听说我写稿，冷砸刮我哩！讽刺人的话，难听死了……”

她庄重地点点头，表示理解他的心情，却不像他有那样重的心理负担，淡淡地说：“我们文化站评选先进工作者，把我评上了，评上了倒像遭了灾，斜眼杂话一齐朝我飞来。没有办法，有些人干工作没劲，‘砸洋炮儿’尽是精神。要是害怕别人说杂话，那就干脆什么都甭干。”

“对对对！”他赞同她的话，“我缺乏你的这点子精神，总是……自卑！”

“我回去了。”她站起来，就朝工棚外走去。

“我送你。”他鼓起勇气说，“这儿山大沟深，很怕人的。”

她没有拒绝。

月亮贴在山顶上方的蓝天上，银光洒满山沟；山峰遮挡着月光，小路忽明忽暗。她走在前头，他在后面跟着。曲曲折折的小路，在山沟的草丛中蜿蜒。夜露已经潮上草叶，脚背上有露水浸湿的凉意。

这是很容易使人动情的夜晚。他平生第一次单独陪着一位年龄相仿的姑娘，在这样寂静的山间小道上走路，心在胸膛里怎么也平静不下来。

“哟！把一件事忘了告诉你。”她走着，说着，“我把你的情况给辅导创作的张老师汇报了。他说县上以后召开创作会议，通知你参加，还托我给你带来三本稿纸……我差点忘咧！”

“噢……噢……”他应着，已经无法考虑文化馆的张老师是否真的会通知他参加县一级的创作会议，他在想：她和他是不是在恋爱呢？她对他的关心和支持，难道仅仅是出于一个公社文化站的图书管理员的工作责任心吗？他的二十年的生活中，不幸和温暖的比例实在太悬殊了。他感觉自己的心里，一下子承受不了这种温暖，像饥饿的汉子一下不能接受珍肴佳馔。他想紧走几步，站到她的面前，握住她的手，说一声……他没有勇气，依然保持着与她三四步远的距离，在弯弯曲曲的山间小道上走着。任何时候，他都不会忘记自己是个农民，一个从早到晚推土抬石修水库的民工，一个梦想当作家而连连接到铅印退稿笺的想入非非的穷光蛋……勇气顿然消失净光了。

“张老师自己也搞创作。”她丝毫没有觉察到后面的黄草心里在想什么，管自热情地说，“张老师对业余作者热情得很……”

“噢！那好……”他支支吾吾应着，抬起头，瞅着朦胧月色里山楂姑娘秀美的背影，在心里发誓说，“等着吧！等到我在中国任何一家报刊上能发表一篇作品的时光，我就要向你说出今晚想说而说不出口的话了……”

七

树叶落了。白雪覆盖了原坡和河川。小河又解冻了，柳树首先用一抹嫩黄在河川里渲染出春的气息。

我们的黄草却心力交瘁了。他脸颊瘦削，头发蓬乱，眼睛里的红丝丝总也不见褪去……他觉得自己快要完蛋了。

通往神圣的文学殿堂的道路太艰难了！黄草无法理解那些驰骋在当代文坛上的幸运儿，究竟付出了怎样的劳动和牺牲？他在出狱后不到一年的时间里，读过几十本中外古今优秀小说，而且送给本省和外地大小刊物二十九篇小说稿了，竟没有一篇能够变成铅字，难道还不足以使人反躬自问：究竟自己具备不具备文学基因？报刊上日见频繁出现的关于天才的论述，使他愈来愈觉得沉重的威压……应该趁早自觉罢手了。

他的提兜里装着第三十篇小说稿，骑车来到桑树镇了。这是最后一篇，不成就再不做这样的无效劳动了。走过文化站门口的时候，他狠一狠心走过去了。自去年冬天以来，他就越来越少光顾这个熟悉的窄窄的门道了。总是退稿！那些从这个那个文学杂志编辑部退回的稿件，叫人羞于从她手里接过来，当面拆开……自尊而又自卑的复杂心理啊！

邮局里那位秃顶男人从眼镜上方瞟瞅他的眼神，更加怪气了。他把稿件塞进邮筒，几乎是仓皇逃出绿色的大门来。

“黄——草！”

他折转身，山楂姑娘迎面走过来。

“好长时间没见你来。”山楂亲切地说，“没见有你的信。”

“队里冬天忙……”他支吾说。

“走，到站上坐坐。”山楂说，“我们又进了一批新书。”

他没有拒绝，跟着她走进图书馆兼阅览室的屋子，坐下，照例接过她一杯水，点燃一支烟。

“你好像劳累过度了？”她看看他的脸色，关切地说，“脸色发灰，是不是生病咧？”

他苦笑一下，如实相诉：“我……精神上支持不住了！”

“咋咧？”她略一蹙眉，意料不到的神色。

“我过去相信马克思关于攀登科学高峰的名言，现在却相信人的先天的基因了。”他很坦率地说，“我不能不承认，我是属于愚蠢型的……”

她的秀气的眼睛扑眨着，有点吃惊地观察着他的说话的神态。显然，她只看到他形容憔悴，而没有料到屡屡失败正在折磨着他的心，已经到了意志崩溃的严重程度了。她没有安慰他，那是没有用处的。她站在桌角边，饶有兴趣地问：“你当初……想没想过自己有没有先天基因的问题？”

“唉！”他苦笑着一摆头，嘲笑自己，“那时候不知天高地厚……自不量力，想入非非……”

他痛苦地皱着眉头，自我嘲笑着以往的无知，完全丧气了。他告诉她，他喜欢读文学书籍，完全是出于一种兴趣，或者是因为乡村里的生活太寂寞了。他躲在屋里，津津有味地读着从远门哥哥那里借来的小说，眼前黄家坪发生的许多奇闻异事，一件一件记入十六七岁的乡村少年的日记了……

出狱以后，他面对浪潮一样涌过来的文学作品，激动得透不过气来；青年作家雨后春笋般地从中国的南方和北方冒出来，他看着那些介绍性的文章，心里鼓动起来：他要写他经历过的生活，他要当作家……

“我现在才明白，我不是那块料。”他向她叙述着，声调沉静而悲哀，像从赛场上败下阵来的竞技者，甘心于自己的失败了，“我……唉！”

“我不懂写作，不过我想，你该认真总结一下，看看自己的毛病出在啥地方，不要光是相信什么‘基因’……”她对他的痛苦哀叹不大在意，“我看过一本杂志上介绍一位青年作家，说他也写了一大箱废品……”

“……”他不和她争辩，只是苦笑着摇摇头。

“这么说，你完全灰心丧气咧？”她也苦笑一下，叹口气，惋惜地说，“我一直在等着……看你写咱们小河川道的小说哩……”

“哦……”他立时羞红了脸，不好意思地低下头，“枉费了你一番好心……”

“好心没有枉费的。”她却笑了，轻松畅快的笑声，驱除着屋子里由他带来的沉闷的气氛，自信地说，“我相信，好心不会枉费的。”

他的心又扑扑扑跳起来，她的话除了对生活的充实的信心以外，有没有双关的意思呢？他的令人伤惨的失败，已经使他想说给她的那一句话，那一层意思，愈来愈深地沉积到心的底层去了。今天来这

里，已经带有告别的悲凉，那一层说不出口的意思将永远不会说出口来了。

“我看过一个民间故事，很有意思……”

她笑着，讲述起那个民间故事来：有个樵夫在山里抓住一只受伤的小鹿。小鹿说它是山神的童子，要是樵夫放了它，它会引他到获得宝石的地方去。樵夫放了小鹿，遵照它的吩咐，在鸡啼之前爬上山顶，它在一块圆盘青石上等他。樵夫爬啊爬啊，从后晌爬到天黑，借着月光继续前进。月亮落了，樵夫爬得更艰难了，衣服磨烂了，手脚蹭出血了，山路却越来越危险了。樵夫开始怀疑，小鹿是在哄骗他。这样一想，心松了，手脚软了，躺在石阶上睡着了。天明了，睁眼一看，呀！他就躲在圆盘青石下面，不过三五步就可以攀爬上去，仅仅只差了一口勇气……

他笑了：“这样的故事，只能哄小娃娃。”

她却认真地争辩：“总是有些道理嘛！”

“道理是对的。”黄草说，“我怎么也鼓不起最后一股勇气来。”

她却毫不动摇地给他鼓劲说：

“不要做后悔的樵夫！”

八

“邮差刚送来一封信，你爸一拆，就往灶洞里塞。”母亲拉着风箱，叨叨叙说，“我说是书嘛！又不是三娃写的文章，你烧啥！这不是……”

黄草刚刚下工回来，从母亲手里接过书来，其实是一本《苗圃》杂志。他打开目录，只见清清楚楚编排着《脚印》，在许多熟悉的和陌生的名字中间，排列着“黄草”……

他转身奔到院子，不小心撞在喂鸡的木槽上，跌倒了，又跳起来，对着农历三月灿烂的阳光，猛喊一声“老天爷呀”，热泪涌流下来了。

他旋即奔进屋里，推出自行车。

“三娃，你做啥？”母亲惊恐地瞧着他。

“到桑树镇去。”他推着车子出门了。

杨柳青青，麦苗叠翠，杏花谢了，桃花正开得火红，这是他所看见的小河川道里最富于诗情画意的一个春天了。桑树镇街巷里的房屋似乎更加低矮和拥挤，他推车端直走进文化站狭窄的门道，“咔嚓”撑起车子，奔上阅览室的台阶。

“山楂——”他喊，从来没有这样大声壮气地叫过她的名字，“山——楂。”

“哎——”屋里传出她拖长的回声。当她看见他站在面前，淌着大汗，喘着粗气，微微吃惊地问，“你……怎么了？”

“你看——”他忙摊开《苗圃》杂志。

“啊！”她眉毛一扬，眼里闪出快活的光彩，惊喜地说，“你，有志气的樵夫……”

他的心都醉了，只觉一股酸溃溃的东西冲上鼻腔，强忍下去了。

“这下该请我吃喜糖了。”她笑着说。

“岂止吃糖！”他慨然说，“我该怎样感谢你呀……该怎样……”

“我不就借给你几本书嘛！那是我的工作。”她随即坐下，“快让我读一下……”

他看着山楂在阅读他的《脚印》，心里涌涌波动，现在该是他说透那一层意思的时候了。为了镇静一下情绪，他又点燃一支烟，声音颤抖着：“我有一句心里话，非说不可了……”

“说呀。”她的眼睛盯在字行上，随口说。

“我喜欢你！”他终于脱口而出，感情炽热，“我真心喜欢你……”

山楂猛然抬起头来，愣住了，脸红得像盛开的山楂花，羞怯地低下头，抬不起来了。

“你是我心中的……维纳斯！”他更加热烈地说，说过又懊悔，怎么说出这样不伦不类的话来了呢？他激动得热泪盈眶，“你说……”

她抬头拢拢扑落到眼前的头发，神情镇静了许多，问：“你今天怎么突然提出这话来？”

“我早就想提出了。在山里修水库时，你给我送书那天晚上，我就想说……”他真诚而又委婉地说，“那时候，我觉得我没有资格说……”

“什么资格呢？”

他语塞了，想想，对她不必隐瞒真实的感情，就坦率地说：“我是个农民，又很自卑……”

“现在你是作家了。”她笑着说，“你有资格了，我却没有资格了，不可能的事。”

“不不不。”他以为她曲解了他的意思，“你是我遇到过的顶好的人……”

她眼睛盯在字页上，却没有看书，心里在想着该怎样善意地回答他……

“我不能没有你。”他只管说，“你过去帮助了我，我今后不能没有你的帮助……”

她脸红了，满脸满眼都是羞涩的神情，但很快就镇静下来，说：“这样吧，‘五一’那天，我请你到这儿来……好吗？”

九

期待中的佳期良辰，总是姗姗来迟，渴盼着的“五一”节日，终于来到了。一早起来，他就爬上村庄背后的山坡，精心采摘了一束带着露珠儿的山楂花。火红的山楂花，这是他多日来思来想去的最终选择：富于诗意的山楂花，送给心爱的山楂姑娘，作为定情礼物。他从心底蔑视乡村青年男女订婚时送衣送物的俗气。

黄草有生第一次要注意仪容了，他一切收拾就绪，车头上扎着用塑料纸包裹着的山楂花，意气昂扬地驶往桑树镇上去。

他走进文化站的小院，撑起车子，刚踏上阅览室的台阶，看到木门板上贴着两个红纸剪成的“喜”字，什么人借着节日的文化站举行婚礼仪式呢？他不管别人闲事，走上台阶。

山楂从门里走出来，笑吟吟地在门口迎接他，随之给身旁的男子介绍说：“这是咱们地区的作者黄草同志，他来参加咱们的婚礼……”

“欢迎！欢迎！”那男子笑嘻嘻地说。

黄草脑子里轰然爆响了一声，只是傻笑着，说不出话来。

山楂又给黄草介绍说：“这是我……爱人，桑树镇小学体育教师……”

“坐里边。”体育教师热情地拉着黄草。

短短的一瞬，黄草顿然明白了一切，不仅仅是他对她的错觉所造成的失误，值得深思……他现在无论如何没有转机回味过去了的一切，体育教员正满面春风地热情邀他进屋去。他灵机一动，把那一束鲜红的山楂花举到他们面前，满怀真诚地说：“祝你们……幸福！”

1984年1月 白鹿园

马罗大叔

——《我自乡间来》之一

星期六回到家中，刚落座，母亲说："你马罗儿叔不在了。"

"什么时候？"我问。

"昨日夜里，还弄不清辰时卯时咽的气。"母亲叹了口气，"今日清早人才发觉。"

这也许不奇怪。一个老光棍儿，夜里独自一个人睡在窑里，死一百次，大约也不会被谁及时发现的。尽管这样想，我的心里仍然禁不住悲哀起来了。

"啥病也没添，昨日后晌还在村里转悠。这倒好，干干脆脆，免得受罪。"母亲这样说，言语中伴透着哀伤，"昨日后晌在街巷碰见我，还问你回家来没。回回碰见我，都要问你回没回来。我问他有没有啥事，要帮忙，他都说没有，只是想……问问。"

他其实并不要我帮他办什么事，却总要问我回家来没有！我的心倒不是滋味了……

我记起了和马罗大叔共进的一顿晚餐！

那一年，我怀着一股疯狂般强烈的追求，企望闯进某所有名望的大学的神圣的殿堂，结果呢？却不得不蜷缩在夏季闷热窒息而冬天四处透风的祖传的又矮又破的小厦屋里。一盏必须放在眼下才能辨清字

迹的煤油灯，常常烧焦我的马的鬃毛一样贼密的头发，火苗上卷着的黑烟熏得我总想作呕，为了省油，也为了节粮，庄稼人在天色刚一落黑就上炕躺下了。他们几乎本能地懂得减少活动量以降低能量消耗的科学道理，不到左邻右舍去串门，也不坐在街门外首的树荫下扯闲，全都静静地蛰伏在炕上了。这个时候，文明而又先进的城市正在推行“劳逸结合”的临时性科学措施，机关缩短办公时间，学校取消体育课和晚修自习……庄稼人不用任何人号召，全都自觉地“劳逸结合”了。

我没有瞌睡，无法忍受在黑暗里睁着眼睛躺在土炕上的惶惑和寂寞。煤油灯盏昏黄的光焰里，顿河草原壮丽的景致在我的眼前展开，葛利高里矫悍的身影驰骋而过……当我感到眼睛发花、发黑，脖颈困倦，难以再翻过一页的时候，眼前就只有母亲装馍馍的那只竹笼了。

是的，那只竹笼，是用竹篾编的，从我有记忆开始，就记得从屋梁上垂下的铁钩上吊着这只扁圆的竹篾编织的笼子。一年四季，这笼里都装着取之不尽、摸之不竭的馍馍，陈馍不等吃完，母亲又装进新蒸下的了。当然，一年中的近十个月里，这笼里总是装着黄色或白色的苞谷面馍馍，只有在年下节下和收麦碾场的时月，这笼子里才会装满纯净的麦子面馍馍。现在，那笼子里空了，整年整月地空荡荡地挂在那只铁钩上，悬在一家人的头顶。空着的竹笼子总是诱惑起我对香甜的馍馍的无限深情。空的！我真不明白母亲为啥总不把它摘掉，令人在半夜里想到它时，却是空的，多么沮丧！可反来一想，即使母亲把它摘掉了，扔到看不到的什么角落里去，甚或砸了烧了，此刻仍然会想到它！

饥饿像洪水猛兽一样咬噬着我的心！

我痛恨我为什么缺乏对于饥饿的忍耐能力。父亲同样和我在生产队的地里干了一后晌活儿，回来只喝了一碗盐水，就不声不响地躺在火炕上了，此刻已经响起令人羡慕的鼾声，我却在脑子里不断地旋转着那只什么也没有装的空笼。我很饿，饿得躺不下也坐不住，甚至痛恨起肖洛霍夫来了，你写他娘的什么葛利高里，这个哥萨克狗杂种，害得我不能早早睡觉，现在饿得像饿狼似的在小厦屋里打转转。

我走出门，村巷里死一般沉寂；没有月亮的秋夜，四野里一片黑暗。我没有目的，却本能地走出村庄，下到河滩里来了，正在孕穗的苞谷林里，散发着一股浓郁的苞谷棒子的腻腻的甜香气味，我在水渠边站住了。

我伸手摸到一根苞谷秆子，掰下一个又肥又粗的棒子，三两把撕掉嫩皮，蹲在水渠沿儿上啃起来。凭着牙齿和舌头的感觉，那棒子粒儿软软的，苞谷粒儿里的乳汁竟然溅到眼睛里，我一定是啃得太猛太快了。嫩苞谷粒儿在嘴里，还没有来得及嚼烂，就滚进肚子里去了，几乎尝不出什么味，只觉得十分香甜。渐渐地可以品尝到它的全部甘美的品质了，没有成熟的嫩棒子，生的，带着秋夜里凉冰冰的露珠儿，流进火烧火燎的胃里，太惬意了。甜甜的乳汁，甚至有一股牛奶的舒腻腻的味道，我觉得这就是只有上帝才能享受的善恶树上的仙果了。

我把啃光了的苞谷芯子丢到水渠里，从水渠沿儿上站起来，再伸手摸到又一个苞谷棒子，却猛然看见一个人，正站在三五步远的大柳树下。我一惊，一愣，从身影和体形上，立刻辨认出来，那是马罗儿，终年四季给生产队看守庄稼的老光棍儿。我也不知凭什么勇气，没有撒腿逃遁，也没有向他求饶，而是毫不动摇地把那个已经抓摸到手的苞谷棒子，“咔嚓”一声掰了下来，三两下撕开嫩皮，蹲下身，又

啃起来了，那夹在一排排苞谷粒之间的嫩须毛儿，连同苞谷粒儿一同吞咽到肚子里去了。

“哼！你倒胆大——”他冷笑着说。

我没有腾出口舌和他争辩的心思，反正我偷吃了苞谷棒子，跑也跑不到台湾去，任你去给队里干部告发吧！随你们怎么处罚好了！即使用我们家那两间破旧的房子来抵偿，我也不会后悔，因为那房子毕竟当下解除不了我腹中如洪水冲击着、猛兽吞咬着的饥饿。我已经无暇考虑后果，仍然大啃大嚼着生苞谷棒子，似乎越嚼越能品尝生苞谷粒的甘美香醇了；既然总免不了一罚，索性让我今夜饱餐一顿也划得着了。

“跟我走！”马罗吼着。

我站起来，并不特别惊慌，走就走吧，无非是赶出伊甸园去接受惩罚，后悔是无用的。我跟在他屁股后头，牙齿仍然在忙着啃咬苞谷棒子。

他猛然转过身，伸出手，我以为他要揍我了，却是一把从我手里夺下苞谷棒子，“噼啪”一声摔到水渠里去，溅起的水珠儿跌落到我的腿脚上。我憎恨地瞅着他，站住了，真有点阿Q式的怒目而视。只是黑夜笼罩了一切。他看不见我的怒目，我也看不见他是怎样得意的一张嘴脸。

我跟着他的屁股走，纵使下地狱，我也去。

顺着水渠往东走，渠沿上的草枝上的露水打湿了脚面，我感到一阵渗凉。葛利高里和阿克西尼亚在顿河草原的月光下尽情淘气，我却

跟着老光棍儿马罗走向耻辱的深渊。那条通村庄的田间土路横在眼前，我将跟他从那儿拐弯，朝南，走进村庄，呆立在书记或队长家的街门口，听候处置……

奇迹在这一瞬间突然发生了。

水渠和土路交叉的地方，有一孔用树枝搭成的便桥，老光棍马罗走上便桥，毫不迟疑地朝北走去，那儿将通到河滩的深处。他不打算把我交给干部，我的心里毕竟感到轻松了。

我也跨上了水渠上的便桥，树枝在我脚下软软地闪了闪，我背向村庄，走向广阔的河滩。我突然一想，他不把我送交干部，那么带我到河滩里去干什么？又是在这沉沉的黑夜里！我不禁毛骨悚然了。

我立即想起，村里人都知晓，六亲不认的马罗，常常抓住偷庄稼的贼，用他的牛皮裤带教训一番，然后放掉，倒是很少交给干部去处置。干部不打人，只会罚款，罚下款又是众人的；要么开群众会，斗争批判一番，无非是丢人现眼，远不如马罗自己发泄一下光棍过剩的力气过瘾……我现在开始考虑，如何对付这个残忍的老光棍儿了。如果他要……那么我就……我有好几种应急措施在脑子里形成了。

我不能不做应急的考虑。这个马罗，是个生性乖僻的老光棍。村里还有一位光身汉，却是个爱热闹的“呼啦嗨”，天天黑夜招惹一屋子闲汉，耍牌、“纠方”、“狼吃娃”，是老少皆宜的“俱乐部”。唯独这马罗，见不得闲人进门。有人暗里说，马罗常在他的窑里会野婆娘，怕旁人突撞了他的好事。不管怎样，我大约从来没有踏进过他的土窑的门槛，这倒不是怕冲撞什么，我是实在不想看他的那一张脸，从来也看不到一丝笑纹的冷脸，总是像刚刚和人打过架似的。加之我一直在

县城读书，只在寒暑假才回到村里住下，几乎没有和他打过什么交道，说话的次数都是极其有限的。

马罗一年四季只干一种活儿，看守庄稼。麦子熟了看守麦子，苞谷熟了看守苞谷；麦子和苞谷处于青苗时节，他就在村口路边转悠着，看守那些糟践粮食的猪羊鸡鸭。他曾经一梭镖扎透过一头公猪的肚子，吓得所有养猪的村民纷纷修补坍塌的猪圈和羊舍。他曾经把一个偷摘棉花的汉子捆在树干上，嘴里塞满他自个偷摘下的籽棉（真是自食其果），解下宽皮带，一手提着裤子，一手挽着皮带，抽得那汉子可想而知是什么滋味了。有马罗看守庄稼，比阎罗更瘆人。不过……我这样二十岁的刚强铁汉，总不至于束手给他捆绑到白杨树干上的……

再绕过一道水渠，朝东一拐，我就看见一盏马灯荧荧的亮光，那马灯正挂在一个庵棚上，这是老光棍的别墅式住宅了。

他在庵棚口站住，转过身来，在黑暗里瞅着我。

我也站住，紧紧盯着他的手。

“坐下！”他的头一摆，对我吼喊。

我没有坐，仍然站着；坐下了，要再站起来反抗就可能为时过晚，措手不及。我没有吭声，倒把两手轻轻提起，叉在腰间，暗示给他一点威势。

“啊……嗨嗨嗨嗨嗨……”

突然间，他放声大哭起来，那粗哑的男人的哭声，从他喉咙里奔泻出来。像小河在夏季里突然暴发的山洪，挟裹着泥沙、石头和树

枝，带着吼声，颤动着四野。我不知该怎么办了，在这一瞬间，我几乎失掉了知觉，脑子里一片空白，我和世界都不存在了，犹如穿开裆裤时候在河里凫水被卷进淤泥陷坑时的那种绝望中的空白……

我慌了。不知该怎么办才好，叉在腰间的手自觉松动了，垂了下来。马罗突然伸出双臂，把我抱住，硕大的脑袋压在我的胸膛上，哭得更加不可收拾。他的中年人的粗壮的身体颤抖着，两条铁钳一样的手臂拘得我的肩胛骨麻辣辣地疼了。他的鼻涕和眼泪一股脑儿倾泻在我的胸脯上，渗湿了我的衣衫。

他哭得好凶，我却找不到劝解他的话。实际的情形是，根本不用我劝慰，他自己已经戛然而止，松开抱着我的手臂，哭溜着声儿颤颤地说了一句:“咱们……好苦哇……”

我此时才理解了这个老光棍粗莽的举动中所表达的感情的含义了；而一当领会，我就再也支撑不住了，心酸了，腿软了，一下子坐在茅草庵棚门口的树根上，双手捂住脸颊，哭起来了，呜呜地淌泪，却不像他那样扯长喉咙号啕。

老光棍马罗，像疯了似的在庵棚前的草地上，跳起又落下，破口大骂:

“我日你妈——‘修正’！你狗日害得俺中国人好苦哇！你不吃自家的黑豆小豆（赫鲁晓夫），净想吃中国的白米细面！白米细面吃腻了，还想吃苹果！苹果……哼！还要拿圈儿套得一般个儿……”

我十分伤心，却又几乎被他的骂声所逗笑。我知道，公社里某些拙劣的宣传家向村民讲解宣传的结果，就造成马罗叔这样的胡拉乱扯

的可笑心理。他却依然恨着声，跳着骂着，像村子里的庄稼人打架干仗时一样的泼势：

“你害得俺中国农民……啃生苞谷棒子……”

我刚刚觉得心里轻松了一下，又酸楚楚地低下头来了。

“我日你妈——‘假积极’！你胡球欺哄毛主席，放你妈的臭‘卫星’！你得了奖状，得了表扬，叫俺社员跟着受洋罪——啃生苞谷棒子！”

戒备、羞愧，所有这些复杂的心情，全都随着马罗的骂声跑掉了，我心地坦实地坐在那只树根上，换一个更为舒适的坐姿。马罗蹦着，骂着，声音渐渐远了，钻进苞谷地里去了，那儿随之传来咔嚓咔嚓的断裂的脆响。

他走来了，怀里抱着一摞苞谷棒子，扔在庵棚口的草地上，又钻进庵棚，从吊床下扯出一捆干透的树枝，啪的一声划着火柴，点燃麦草，再加上树枝，火苗哧哧哧蹿起来，冒得老高，在一个用铁丝扭成的支架上，摆上了嫩苞谷棒子。他咕哝咕哝地说：

“去他妈的！这号烂熊苞谷棒子，而今倒成稀罕物了！咋说也不能……啃生的……”

干透的树枝燃烧起来，噼啪作响，火声是这样富于生气。我坐在火堆旁，双手搁着膝头，下巴支在膝盖上，看火苗忽而落下又忽而蹿高，在秋夜的黑幕中辟开的光亮的空间，随着火苗的起落忽而收缩又忽而扩大。火苗在树枝上跳跃，从燃烧着的枝条上攀缘到刚添加上去的树枝上，像万千猕猴在树林里嬉闹，跳跃翻跌；无数条火苗拢在一

起，就组成一个火的世界，充满了活力；火永远给人一种热烈、紧张、奋进的启迪……秋虫在四野的黑暗里啁啁啾啾，叽叽喳喳地吟唱，像无边无沿的一只大网在颤悠。

马罗蹲在火边，用树枝拨拢着火堆，促其烧得更旺。架在铁丝网架上的苞谷棒子，绿色的嫩皮变黄了，变黑了，烧焦了，一股浓郁的香味从火堆里扩散开来了。

我的鼻膜受到刺激，经不住这样无法抗拒的诱惑，口腔里不断地有口水渗出来，嫩苞谷棒子经过烧烤，散发出来的这股奇异的香味啊……这样浓烈，这样甘醇，我不能想象世界上还有其他什么美味佳餐能比它更香甜更醇美了。

马罗大叔的神态也使人动情。他坐在一块河卵石上，两手搭在撇开的膝头上，挺直腰板，俨然一副用斧头砍削出来的青石雕像。火光映照着他的脸，一会儿明亮，一会儿灰暗，四方脸中央，雄踞着一垛宽大的蒜头鼻子，脸颊上有两道粗糙的大动脉似的皱纹。这张脸上，现在呈现出安详的神态，专注的眼神，雄狮守护幼仔一般雄伟而又慈爱的神情。他间或用右手里的树枝拨弄一下火堆里的柴枝，甚至歪一歪脑袋，向火堆里吹两口气，然后又坐直了，却不开口说话。

“吃——熟咧。”

他从火堆里的铁丝架上取出一个苞谷棒子，甩过来，撂到我的怀里。好烫！烧焦的皮上，残留着火星，我在两只手中倒来倒去，舍不得丢到地上，撕开尚未烧透的肉皮，一股热气饱融着浓烈的香甜气味扑鼻而来。软软乎乎的苞谷粒儿，酥软香甜，一口咬进嘴里，我的眼泪禁不住扑洒下来了。

他也撕开一个苞谷棒子，用指头从棒子上抠下几粒，填到嘴里，缓缓地扭动着腮帮骨，款款地嚼着，很悠闲的样子。我却双手握着棒子，啃啊啃着。

我真吃饱了！大约两年以来，当城乡陷入严重的经济困难状态，倒霉的是我刚刚进入生理发育最活跃的时期，总是感到饿。我第一次给胃里装进去这么多没有掺假的真正的粮食，丝毫不担心消化不了而撑死在这河滩里的庵棚前。我很想说几句感谢他的话，却又说不出口，转弯抹角地说：

“我还想你会把我送给干部哩！或是……用皮带抽我一顿呢！没想到……”

“亏得你娃子没有跑！好——”他说，“好汉做事好汉当，偷了就偷了，吃了就吃了！你跑这个鸟嘛！我就见不得那些蛇溜鼠窜的东西！你威威势势站在那儿……我倒服了——这娃子有种……”

那晚我没有回家，和马罗大叔挤睡在他的庵棚里的吊床上。他的一条薄被子，大约半年一年也没有拆洗过，有一股臊腥味儿，包围着我的鼻孔；耳畔响着他毫不抑制的屁响。他像剖白一样向我解释，他用梭镖扎死的那头公猪，是一位只会说人话而尽干狗事的人家的；只有杀出这一条威风，才能免去更多的唇舌；尽管这样，他悄悄地给人家赔了猪款，还让人家悄悄地收下，他只要那一层威慑的声势。他用皮带教训过的那个偷棉花的汉子，大约也是出于同样的目的，在于震慑外村那些企图用偷盗而发财的惯犯。至于像一般人偷摸一把两把，他老远里发现了，大声咳嗽一声，让你冠冕堂皇地走掉也就完了。对于我这样偷而不逃的蠢汉，他反而视为上宾了……

我吃了一顿难得忘怀的晚餐！

我睡了一个难得忘怀的好觉！

他对我这样诚恳相待，倒使我不好意思偷偷去摸一摸那苞谷棒子了，即使饥饿仍然十分难忍，我还是没有勇气再次走到他的庵棚里去。这一夜，我终于忍不住了，那美味的烧烤苞谷棒子的回忆，使我心里像猫儿抓着。我硬着头皮走出屋子，又走下河滩。

有一块半圆的月亮贴在西原上空，路边的苞谷叶子刷到我的脸上，像锯刺一样割得人难受。我在想，怎么向他开口呢？真是有点不好意思，狗肉吃下熟路了吗?

庵棚前挂着的马灯灭了，一片黑暗，月亮清冷的昏光从树枝间透过，斑斑驳驳照在庵棚上。我站在庵棚旁边，叫了一声“马罗大叔！”没有应声，稍停之后，我又叫了一声。

“滚远！”

庵棚里吼出一声，我羞得无地自容了。是啊！太有点不知趣了……

我不知怎样离开庵棚，也没有心思回家，在河岸边的石坝上坐下了，撩起清凉的河水，刷洗烧烫的脸颊。

我发觉身后一亮，回过头，马罗把一支燃着的火柴按到烟锅上，瞬即熄灭了。我又把头转向河水，没有说话。

我凭感觉，知道他在我身旁坐下了，仍然没有理睬他。他咳嗽一声，却像无事人一样，乐悠悠地说：“你瞅，河心沙滩上，那是……”

我抬起头，朦朦胧胧的月光下，无掩无遮的沙滩上，一个人正踽踽朝对岸走去，似乎从姿势上可以辨出来，那是个女人……我突然像明白了什么，回过头，看见马罗喜眯眯地咂着烟袋，悠悠然喷出一口口烟雾："嫑记恨叔骂了你一句……你来得太不是时候！把叔差点吓失塌咧……"

我跳起来，扑到他身上，使劲捶他结实的肩膀，要他老实交代。他得意地嘿嘿嘿笑着，并不特别忌讳……

"那是我的老相好哩！

"解放前，我在河北岸王财东家熬活的时光，这女人就跟我好上了。她男人是王财东的大少爷，狗日长得白自净净，可是个白脸傻瓜！十个铜元数不完就乱了码号。土改的时光，王财东一上斗争台，这白脸臭瓜吓得拉下一裤裆稀屎，越是臭气了，嘴角成天吊着一串串涎水，她更见不得他了……"

"你该是跟她结婚，成家，何必偷偷摸摸的。"我说，"解放了，你怕啥？"

"结婚当然好，我咋能不想到。唉！这女人也真是说不清，又不忍心把那涎水嘴男人撂下。她怕孩子隔着一层，日后旁人骂'野种'。我呢？也没心思讨旁的女人成家；再说，那女人也不让我讨，就让我跟她这么混……十四五年了，我也习惯咧。这女人好啊！只是而今饿得慌慌，她背着地主成分，政府发下救济粮，根本没她的份儿。好！我这儿给她救济。没办法，那几个娃儿没跟得上沾他财东爷子的光，倒刚刚跟上挨挫。队里分给我的，政府救济下的粮食，都给她了。妈

的！解放前我给老财东熬活，而今又养活起几个猪娃子！没有办法！谁让我跟这女人……”

“那……你这么混下去，老了，怎么办？”我插嘴问，“你的好心，人家儿女大了想回报也没法回报，名不正言不顺哪！”

“不想！我马罗根本不想叫谁回报。老了死了，我啥也不留给旁人，也不想要旁人骂我。只要我活着，有这个女人跟我相好，行啰……”

星光在河水里闪烁。夜是这样深，这样沉。我突然想到葛利高里和阿克西尼亚。我们这黄土沉积层上的古老民族的子孙，也有顿河哥萨克一样动人的情话，只是格调不同罢了。

“你可要乱嚷嚷呀！要是嚷嚷得旁人知道了，该当何罪！唔……你刚才叫我一声，把我吓了一跳，也把那个可怜人吓坏了。我给她说，‘没事，俺老侄儿是个牢靠人，不会烂事的。你放心走……’她……那不是，已经走到河那岸去了……”

我抬起头，那个女人的身影，已经消失在河岸边的杨柳林带里。最后消失前的那一刻，似乎停站了那么一会儿，大约在隔水眺望她倾心相爱着的马罗大叔……

这一晚，马罗大叔话也多了，神情也格外活跃，说啊笑啊，直到村庄里传来一声鸡啼……自然免不了，犒劳给我一顿烧烤的苞谷棒子。

……

“给你马罗大叔送几张纸去。”母亲说。

我刚吃罢晚饭，放下筷子，母亲就提示我，应该给马罗大叔送一叠纸去。乡村里至今保存着这样的习俗，村民们为任何一位逝去的老者敬送一叠纸，由死者的家人烧在灵前，或焚化坟头，表示哀悼之情。时风进化了，乡村农民也有像城里人一样敬送花圈挽联的，终究为数不多，多数人仍然送一叠粗黑的麻纸。

我接过母亲拿来的一厚叠麻纸，走出门去。如果仅仅出于报答他在我饥饿如狼的困顿时刻给予过我一顿美味的晚餐——烧烤苞谷棒子，未免失之浅薄，而我又深知这与马罗大叔“不要回报”的本意相违拗的，我的心沉重起来了……

我在公社里已经工作过近十年了。那一天，在公社机关不算太大的院子里，我看见马罗大叔的背影。那硕大的头颅，粗而短的腰身，现在却教人感到是一具粗大的骨骼，而且背也略微驼了。我把他叫进我的住屋。

“吃饭了没？”我问。

“吃——咧！”他拖着声儿爽声朗气地说。

“可别作假！”我说，“虽不到开饭时间，馍和咸菜很现成，你随便吃点。”

“啥时代把你马罗叔饿下了？”他得意地扬起头，“五保户没定量……”

我信了。马罗大叔已经进入花甲之年了，他的吃穿，由生产队里包着，虽然不能说富裕，却也能填饱肚子。这个生活水准，在七十年代中期的农村，应该说是可以过得去的了。

“你到公社来有啥事呀？”我随便问。

“屁事也没！”他响亮地说，很轻松的神气，老虽老了，说话仍是一派刚阳之气，“我逛到镇上来，到公社院子转转。吵！我才不受忙迫，办吵啥事！我不打搅你了，你忙。我浪呀！逛呀！”说着就站起身要走了。

我送他出门，看着他从公路上摇摇晃晃走过去，拐进供销社的大门，就折回身来，办我要办的事情去了。

当我再次从院子走过的时候，却又看见了马罗大叔的背影。他大约也发觉了我，竟然有点仓皇地从墙角消失了。我有点疑心。他大约不像他嘴说得那么轻松，浪呀逛呀。我瞅瞅他走过的这一排房子，一间里头住着妇联干部，一间里头住着共青团专干，都是与他不会发生什么联系的部门。另一间屋子住着民政干部老乔，我意识到一点什么，就走了进去。

“刚才是不是有个老汉到这儿来过？”

“马罗儿，你们村子的五保老汉，刚走。”老乔说，“老汉领贫寒救济款来了。”

“给老汉救济了多少钱？”我问。

“嗨！现在还谈不上补多补少的问题。”老乔说，“队里不给马罗老汉盖章，说他不学大寨……”

我虽然分管民政工作，冬季贫寒救济的具体事项却是由老乔办理，我不太过多干预。老乔是位老同志，人又公正，完全可以放心他做好这件极容易闹矛盾的工作。现在，面对马罗大叔的救济问题，我

却忍不住甩出点子来了：“该给老汉救济多少，你定个数儿，队里不盖章拉倒，我签字负责！”

“咱们有些村子的干部……真不像话。”老乔也因此而发牢骚，“马罗老汉刚才来给我说，去年的贫寒救济款和冬令物资，全由干部悄悄地私分了。当然，咱们工作上也有漏洞。马罗说他不为要钱，为闹事！老汉大喊大叫，说他要把这事闹得全村都知道，还要寻县委反映。他说他才不在乎那几个钱，十来二十块的也发不了家……”

“这样的……原来是这样的。”我说，“刚才他和我见过了，可是一句未提……只说是浪哩逛哩！”

“这老汉倔得很。”老乔说，“我给他说，让他找你反映反映，他可直摇头，我还当是他和你不合卯窍哩……”

我没有再说话，走出老乔的办公室。马罗大叔对我只字未提，甚至有意躲避着我，本能地使我记起他说过的“不求回报”的话，自己也不知是一种什么滋味在心头了。

我还是坚持我甩出的点子，让老乔给马罗大叔送去了救济款和棉布棉花。老乔回来时，详细叙述了经过，他做得更严密，把棉布棉花直接交给妇女队长，让她给老汉缝制棉衣棉裤。我初听时很欣慰，稍一思忖，又不禁慌然，这难道是合他本意的吗?

……

一孔窑洞中间，停放着马罗大叔的棺柩。今日午时已经入殓盖棺，我再也看不见那垛宽大的蒜头鼻子了，以及那两条深刻在脸颊上的大动脉似的皱纹。窑里和窑院的一切空间，全被男女老少围塞满

了，门口仍然涌进一溜连串前来送纸的乡亲。他们在灵桌前放下麻纸，点燃一炷紫香，插进用瓷缸代用的香炉，鞠一鞠躬，就参加到人堆里说闲话去了。

我在灵桌前站住，放下纸，从香筒里抽出一支香，在蜡烛上点燃，插进香枝已经十分稠密的香炉，照着所有庄稼人的规矩，抱住双拳，举齐额头，向马罗大叔鞠一鞠躬。当我深深地弯下腰，虔诚地低下头去的时候，一个镜头闪现在脑际了——

在一座十分雅致的高层大楼上，我应邀参加一个规模不小的宴会，来自南方北方的新朋老友，杯盘交盏，词恳意切。我亦兴之所至，敞怀痛饮，酒过数巡，我的脑子里突然闪出马罗大叔一把甩到我怀里的那个烧烤成黑色的苞谷棒子来！细一瞅幻觉消失了，桌上是狼藉的鸡骨鱼刺，桌下是软茸茸的红地毯，哪有什么鬼苞谷棒子的踪迹……我可没有醉！

紫香焚烧的青烟，在灵堂上飘绕，空气里有一缕幽微的香味。我停立在灵桌前，脑子里又变得一片空白了，直到我被谁拥撞了一下，才发觉后面已经拥着一堆等候进香的男女，我立即让开位置。

她——马罗大叔的阿克西尼亚——站在灵桌前头了。她点燃一支香，插进香炉的时候，手指抖着，竟然两次把香弄断了。她的表面倒装得沉静，跪下去，磕了头，站起来的时候，我看见了她眼角渗出的泪痕。

所有老年女人们都表现出过分的热情，招呼她喝水，没有讥诮和轻薄的意思，她倒有点忸怩了。

我很快弄清，这场丧礼葬仪是由几位热心人组织的，土地下户以后，马罗没有心思弄庄稼，在一亩多责任田里全部种上了树苗，还没来得及卖掉，自己却死了。他仍然被村民们推举为护田人，统一看守各家各户的庄稼，按照田亩分摊给他一定的报酬。刚进腊月，本年的酬金还没领，他却死了。于是，村民们就形成一条动议，把他看守庄稼的酬金按户收齐——甭亏了马罗！再把树苗折价，由队里暂且垫付。把这两笔款子合起，筹办马罗的丧葬大事。

“八挂五”的乐人班子（十三人）已经在窑院里唱起《祭灵》，公社电影放映队的放映员正在打麦场上挂银幕，满村巷里都洋溢着欢悦的浪花。马罗生时寂寞，死时却热闹，能得到这种死而无怨的结局，也不容易哩！

我坐在乡亲们中间，抽烟、喝茶，听大伙儿高声说笑，看众人跑前跑后地忙活的身影，心里却不时闪出那个甩到我怀里来的烧熟的苞谷棒子，那是怎样美好的一顿野炊晚餐……

1984年10月草改 西安东郊

鬼秧子乐

——《我自乡间来》之二

“鬼秧子”是我一个远门堂叔的绰号，他的注入户籍卡的名字，是一个单字：乐。村里人提起他来，总是忘不了在名字前冠以鬼秧子的绰号，就唤作鬼秧子乐了。这种啰唆的称呼本来并不符合庄稼人说话喜欢简便的习惯，可是仍然喜欢这样叫，时日长了，似乎说来顺口，听来也顺耳。

单从这个绰号的字面上直观，就可以肯定他不属于高大完美的人物了。一个“鬼”字，就使人生出许多联想来。不过，在鬼秧子这个鬼字里，主要含蕴着诡的意味，大致概括了我的堂叔处事和为人的一贯特点，不那么豁达爽直，也不像一般庄稼人那么憨厚实诚；举凡大事小事，家事和外事，与人交手，总显出一副诡秘的样子；实话少，空话多，绝不会显山露水；有人概括说：鬼秧子乐要是说他去西京，实际准是去了东京，你要是按他说的到西京去找他，准会扑空上当了。

许是自幼受到这种民间舆论的蛊惑，我对堂叔自觉保持着一定距离，一种警惕和戒备；甚至看见他瘦小的身影，轻快的脚步，比一般庄稼人灵活的手势，也无不产生一种诡秘的印象；至于他那奔突的前额，深藏在眉棱下的那两只细小而灵活的眼珠，就更集中地蕴藏着深不可测的诡秘的气象了。庄稼人对于过于精明，精明到诡秘程度的人，就大大减低了信赖的心理依据，自然地表现出敬（卑？）而远之的保留态度了。我虽不敢鄙视我的长辈，却也不敢与他过从太密。

星期六回到家中，已是上灯时分，一进门便看见鬼秧子乐叔坐在堂屋的桌旁，正和母亲扯着闲话。他平时极少到我家来串门，于是就想到他是有意在等候我，大约要说什么话，或者要办什么事。因为他和母亲的闲聊，完全是一种心不在焉的神气，明显是在消磨时光。

“你咋瘦成这个样子了？”他惊叹地说，似乎不是上一周日刚刚和我见过面，倒像是十年八年未曾见过似的，“嘿呀！我说公家干部这碗饭也真是不好吃，甭看不背不挑，劳心伤神哩！劳心的事比劳力的事更叫人受不得。你看看劳心劳神瘦成啥样了……”

我自知其实并没有明显的变化，百二十斤的体重也没有减少，不过听了鬼秧子乐叔的话，似乎总比听到谁说“你肥了”要更熨帖些。

“听人说，县城的街道里，有小贩儿摆摊儿了，油糕桌子、凉粉案子都摆出来了。”鬼秧子乐叔说，完全是一种与己无关的闲谈的口气，“政府也不干涉？”

“不。”我说，“政策允许了。”

“政策怎能允许私人开铺面，做生意？”鬼秧子乐叔不解地说，“共产党怕是睡迷糊了？”

“正好相反。”我自作聪明地解释说，“中央从几十年的失误中总结教训，清醒过来了，对农民不能卡得太死。”

他的一双眼睛勾得很低，并不看我，只是盯着自己手里那只油腻的黑色羊皮烟包，幽幽地挖着。凭直觉，我觉察出他很专注地听着我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却摆出并不在意的架势，甚至连盯也不盯我一眼。

“你不是有炸油糕的手艺吗？”母亲插嘴说，“几十年没派着用场，现时用得上了。”母亲说着，又问我，“你记得不？你乐叔跟你二爷（乐叔的父亲）在五里镇摆油糕桌子那阵儿，红火得很哩！一街两行七八家油糕桌子，就数你乐叔家的生意好。你乐叔炸出的油糕，黄亮，酥脆，咬在嘴里一包糖，而今吃不上那样好的油糕了。”

我隐约有一点记忆。五里镇街心的水渠边，撑开一座篷帐，一张四方桌子周围，摆着四条长板凳，坐着或站着吃油糕的庄稼汉男女。那位已经去世的二爷在满面笑容地招呼顾客，而正当年轻的乐叔，站在翻滚着油浪的炸锅前，两只手灵巧地捏着面团儿，把一个个扁圆的油糕贴着锅帮溜进油锅里，立时冒起一团儿油浪。炸熟的油糕漂浮在油面上，乐叔用筷子夹出来，架在铁丝网架上……我曾经馋涎欲滴地在那油锅前踅摸过，怎能完全忘记呢！

“哈！那当然。咱们那油糕用的啥佐料嘛！黑白糖掺半，青红丝、核桃仁、柿饼，吃来啥口味？”鬼秧子乐叔自豪地感叹起来，“而今国营食堂里卖的那油糕，只包一撮黑糖。前年我到西安，在东大街一家甜食店买了俩油糕，全是干壳子！皮子硬得像皮带，咬都咬不动。我算是把一两粮票一毛二分钱白撂咧……”

“你而今要是在五里镇摆开炸锅，保准红火。”母亲说，“老人们还都记得的。”

“不！咱可不能再干那号营生了！”鬼秧子乐叔慨然说绝，“投机倒把那营生，咱绝对不能干。”

“那不能说成是投机倒把……”我说。

“纵然不叫投机倒把，也不是正经路嘛！”鬼秧子乐大叔摆出一副慨然的面孔，“党教育咱几十年，要共同富裕嘛！咱咋能图自个先……”

看着他激昂慷慨的面孔，听着他的冠冕堂皇的话，我的心里立即反射出与此完全相反的意思来。他的声东击西的惯用手法，无法对熟悉他的人隐藏他的真实目的，无非是套出我对此事的看法罢了。

“这些人哪！真是狗改不了吃屎的性儿。上头的手刚松开个缝儿，就混扑瞎飞！”鬼秧子乐叔嘲笑说，“哼！到时候……等着挨挫！”

“不会的。”我说，“你要是想做油糕生意，现在可以干了，政策允许的。”

“咱不干。允许咱也不干。咱要跟全体社员走一条路，吃苦都吃苦，享福都享福。”他仍然说着套话，官话。说到这儿，眼珠一转，他用一种超然的口气说，“其实嘛，我要是想卖油糕，条件谁也比不过。手艺咱自带，不用请把式。俺二女子家在五里镇，正好街面上有两间门面，在街心十字左拐角，人来人往刚适中。前几天女子来，跟我叨咕这事，我把她一顿狠骂，骂她年轻轻的，倒比我老汉思想差池。我骂得她再不敢胡说乱扑了……”

听着他的话，我却在心里这样猜测：鬼秧子乐叔想到五里镇重操旧业炸油糕，已经和二女儿商议过不止一次了。甚至连门面的位置也经过悉心的窥测，街心十字的左拐角，那是五里镇的繁华地带，像西安的钟楼、上海的南京路或北京的王府井，在这儿开设一爿油糕铺面，那是得天独厚的好地盘了。他说他狠骂过二女儿的瞎思想，我却偏偏猜成他在盘算如何利用女儿家的这一块无与伦比的好地盘了。我

分明觉察出他想做油糕生意的急切心情，无非是朝我探听刚刚放松的农村经济政策的可靠性如何。像狐狸蹲在农家的鸡舍旁，眼睛偏不瞅鸡窝而瞧着四周，察看是否有主人设下的陷阱，绝不是对母鸡的肉香无动于衷。

鬼秧子乐叔的这种心理，并不奇怪，我完全可以理解。村子里好多农民，面对刚刚颁布的活跃农村经济的条例，持一种慎重的观望态度，等等再看吧！他们以为我在县上工作，了解政策界限，向我探询这种政策的可靠性和种种挣钱门路的合法性，已不止一人一次。他们都是直率地说出自己的看法，心存的担忧，甚至抬出过去生活中的事实来证明他们的观点。而鬼秧子乐叔却偏偏否认他急于要干的事，真是诡得有窍，也令人好笑。

“咱当咱的老实农民，不走邪道儿。”他表白说，完全是死心塌地的毫不为金钱所动的样子，站起身来，不在乎地问，“听人说，县城那些小摊小铺，县政府给发下营业执照了？”

“对。”我说，“完全是合法的。”

“合法咱也不干。”他像给我做保证一样，懒洋洋地拖长声调，“叔早把世事看开啰！要那么多钱做啥？嘴里有吃的，身上有穿的，成咧！叔早都不想发财好过啰……”他走出门去了。

我却仍然想到那只并不瞅着鸡窝的狐狸，仿佛说，母鸡肉并不好吃，我根本不想吃……

大约又过了俩月，有一天，鬼秧子乐叔突然走进我的办公室，接过我递给他的茶杯，就自报家门：“人都说市场开放了，县城里热闹红火，咱始终没来过。今日一逛，真个热闹，真个红火！我闲逛了一

圈，吃了一碗泡馍。私人开的泡馍馆，肉肥汤香，比国营食堂泡得好。吃得渴了，我到你这儿来喝茶……”

我在县文化部门工作多年了，鬼秧子乐叔从来没登过我的门槛，今日来肯定不是因为泡馍吃得渴了跑来讨茶喝。我明知他是“王顾左右而言他”，也不好直问，就只顾给他的茶杯里添水倒茶，说些农贸市场里物资交易的行情。

我的屋子里原先坐着的两位朋友告辞以后，鬼秧子乐叔瞧瞧门口，那门板上的弹簧锁子自动扣上了。他从剃刮得干干净净的薄嘴唇里拔出烟袋，忽然提高嗓门，气吁吁地骂起他的二女子来：“这个贼女子，我咋劝咋骂都管不下了，非要开油糕铺子不行。我给她说，你卖你的油糕，我务我的庄稼；你发你的洋财，我过我的穷日月。想叫我来给你炸油糕，没门儿！”

我坐在他侧旁，只顾听着。

“唉！”他莫可奈何地吁叹一声，“贼女子说不转我，跑来搬她妈。嗨，娘儿俩哭呀笑呀，喊呀骂呀，缠得我实在没办法……”

我心里暗自想，他大约终于要向我承认，那母鸡肉的味道其实是香的。我应该给他垫上台阶，好使他少绕几个弯儿，说实话，走捷径，就说：“二妹的打算没啥风险可担，你的顾虑是多余的。”

“这下惹下麻烦了。她给县工商局递了申请报告，一月多了，营业执照还没见批下来。”鬼秧子乐叔用一种幸灾乐祸的口气说，“三天两头寻我，叫我到县上来探问。我才不管这号事哩！我盼得县上要批准她的申请，要给她发营业执照，省得把我搅和进去……”

我现在已经比较清楚地看出他的真实来意了，只是他还在绕弯子，转圈圈。我想开他一个玩笑，看他怎么办？就说：“叔啊！我听说现在申请办营业执照的个体户特多，县工商局倒比开初卡得严了。”

他的细小的眼珠一转，迅如闪光似的掠过一丝惶然的神色，随即消失了，勉强继续用幸灾乐祸的虚假口气说：“好……好！我盼县上覅批准她的申请，我也省得跟她冒险……”

“听说工商局赶‘五一’节前要批准一批。”我说，“回头我问问，看你的那个营业执照批准了没。”

“不是我的，是我二女子的。”鬼秧子乐叔仍不忘纠正我的言语中的差错，用轻描淡写的口吻说，“那也好，你到工商局去给问一下，要是批准了，算一回事；要是不批准，也好。咱早一点弄明白，也叫那女子死了这条心，免得成天麻缠我。也不知……你去打问……方便不方便？”

“方便。”我说，并不敢怠慢长辈堂叔，“我问出结果后，给你回话。”

“这就给你惹下麻烦了。”他仍然用轻淡的口气说，而且继续埋怨他的二女子，“她早就催我来寻你，说是要你帮忙，办下了营业执照，她记你一辈子好处。我给她说，我不给人家添麻烦，你哥在县上工作忙得很，哪有闲工夫操心这些闲杂事……”

真是滴水不漏！我的诡秘的鬼秧子乐叔，我真服了他的高超的谈话艺术了。

……

鬼秧子乐叔和他的二女儿合股经营的油糕铺子正式开张营业了。我因事到五里镇文化站去，远远地看见他腰缠白布围裙，在油锅跟前忙活着，手里捏着面团，不时抓起筷子翻搗锅里的油糕。他的二女儿忙着收钱，付油糕，忙得目不暇接。镇上逢集日，又恰值夏收前夕，庄稼人忙着添置杈把扫帚，扯夏令衣服布料，即使纯粹为着浪集逛会的人，都赶在紧张的夏收之前这有限的集日了。鬼秧子乐叔的油糕生意特别兴隆，油锅里炸熟的油糕，供不上那些捏着票子的手的索要，人就围堵在桌前锅旁了。相形之下，另外两家油糕铺子的生意，就显得冷清了。没有办法，老人们对鬼秧子乐叔的家传的油糕手艺记忆深刻，年轻人的舌头也是十分灵敏的，专拣好吃的买。我驻足看了看，就到文化站去了。

当我再一次回到家里的时候，母亲告诉我，鬼秧子乐叔早已给我送来了一瓶好酒，一条好烟，说是感谢我给他女儿办理下营业执照了。我是空里受人感谢。其实在我向工商局打问此事时，他们刚刚开过会，一次就批准了一百五十多家个体户，其中包括鬼秧子乐叔的油糕铺店。他弄错了，还以为我给他帮了忙呢！我已经早在批准后几日给他说过，他却绝然不信，坚信肯定是我帮了忙，不然为啥会这样灵？鬼人总多一层诡计，我倒无法说得他相信我的话。

鬼秧子乐叔生意兴隆，时间自然更加忙迫，晚上要烧水烫面，揉好，窝在蒲篮里。天不明就得爬起来，点火烧油锅。这时候，好些社办工厂的工人、小镇市民、教师和过往行人，已经等候在铺店门口要吃早点了。老汉忙得团团转，平时连回家的空儿也抽不出。我和老叔不大见面，时光匆匆，近乎两年了。

这一天，县委宣传部干事老杨找我，说县委准备在元旦那天给万元户披红戴花，以鼓励农民放开手脚发财致富。县委把这项工作落实

到宣传部和工商管理局头上了，让他们先调查摸底，然后确定表彰对象。在第一批被相中的万元户名单中，就有鬼秧子乐叔。老杨说他已经和老汉接触过一回，老汉顾虑重重，不说真话，不露实底儿。老杨不知从哪儿得知我与老汉是乡党，又有过密的交往，于是就拉上我一起来做他的工作。

我和老杨从县委出发，乘吉普车到五里镇时，镇上的庄稼人刚刚吃早饭。五里镇不逢集日，人迹寥寥，其余几家油糕铺店熄火停灶，只有鬼秧子乐叔的门面开张，稀稀落落的几个顾客在店门口徜徉。

鬼秧子乐叔一看见吉普车停在他的门前，眼里就罩上一层厌烦的神色，我从车窗里瞅见他把头扭到一边去了，及至看见我和老杨走进他的店门，才做出慌慌张张的热情的表示，让我们到店里坐下。他的二女儿凤子似乎不在意，笑吟吟地端上一盘刚炸出的油糕，又盛上两碗红豆稀饭，摆在我和老杨面前，然后接替父亲站在油锅前去操作，鬼秧子乐叔擦着油渍渍的手指，坐到桌旁来陪我和老杨说话。

“你俩还是为寻万元户来的吧？”鬼秧子乐叔率先开口，直奔主题，一语中的，“你老杨同志把俺侄子拉来也不顶啥！我没挣下一万块嘛！咱的县长亲身来也不顶啥，我不能哄咱县上的领导人嘛！披红戴花，多光荣多体面的事嘛，可惜咱不够格！咱而今要实事求是说话哩……”

我和老杨不约而同地对视一下，他的眼镜片后的眼睛示意我开口，我更觉为难了。鬼秧子乐叔一开口，不仅堵死了老杨的嘴，把我也给毫不留情地冷冻起来了。我知道他的为人，就尽可能做些解释疑虑的工作。老杨当然不肯就此宣告失败，态度更加诚恳殷切了。现在形成的局面是，县委的两位文职干部几乎是在巴结一个卖油糕的个体

致富户，甚至有几分乞求的意味，盼得他能应承自己挣下了一万元人民币。

“你们看嘛！平时不逢集，这街道上稀稀拉拉没有几个人，一天卖不下十斤面的油糕，能净落几块钱？三六九逢集，不过卖下三五十斤面，能挣多少钱？刮风下雨没人赶集，秋夏两季咱还要停业收庄稼，一年能卖多少钱，大略能算出来嘛！”鬼秧子乐叔数说起生意状况，甚至有点不耐烦了，“挣是挣下了几个钱，也不能说赔本儿；可是离一万块……老天爷，八年以后看咋样！”

看看再说下去也无用，老杨灰心丧气地告辞回县了。我正好顺路借便回一趟家。

老杨乘坐的吉普车驶出五里镇狭窄的街巷，鬼秧子乐叔把我叫进里屋，一直接进他的凌乱而油污的住室，睁着惊疑不定的眼睛，压低声，一派严重而又神秘的气色：“好老侄儿，你给叔打实处说，他老杨来做啥？”

我向他证实，老杨没有坏心，确实是要表扬他，不仅披红戴花，还有奖品和奖金。

“胡球糟践人哩！”他大概基本信下了我的话，疑神疑鬼的惊恐心情消除了，悻悻地说，“只要你县上甭变来变去，按而今的政策往下行，老百姓就给你县长磕头叫爷哩！何必要你披球啥红，戴球啥花哩！”

“给万元户披红戴花，这也是解除农民心头疑虑的……一种形式。”我说，“比如你自己……顾虑就不少……”

“你记得不？六〇年上级发下‘六十条’，鼓励农民开荒种地度荒年。好，咱开了荒地，刚收了三四料，碗里稠了，跟着就来‘四清’运动，算账呀，批判呀，还要退赔！‘六十条’上的政策又不算数了！”鬼秧子乐叔撇着薄薄的嘴唇，讥诮地说，“翻来倒去，只有咱农民没理！我怎能不顾虑？那个戴眼镜的老杨前日一来，就跟我算账，算我挣下挣不下一万元。我心里毛了，真是怕怕。我的爷！‘四清’又要来了吗？”

我再次向他解释，老杨可能一时急于完成县委交代的工作任务，急了点，他苦笑一下表示理解。这些历史的负担真是太沉重了。

“老侄儿，不瞒你说，我准备收摊了。”鬼秧子乐叔神情黯然，“真的。把余下的百十斤面粉卖完，收摊！”

“怎么回事呢？”我不解地问。

“自打老杨那日一来，我几夜睡不着觉了。”老汉有点难受，“没钱用时发恓惶，挣下俩钱心里又怕怕。钱挣得越多，心里越发慌慌。我老是心里不瓷实，老觉得祸事快来了。老杨前日来了，我后来跟俺二女子的老阿公一商量，你猜老亲家咋说？‘趁共产党而今迷糊了，挣几个钱赶紧撒手！共产党醒来，小心再来运动！’我就下狠心收摊……”

鬼秧子乐叔说着，竟然动了感情，六十岁的老汉，居然流下眼泪，我才更深一层体察到过去的生活在他心里的沉积太厚太重了。我觉得我以往对他的某些鄙而远之的心理，真是太不应该，完全是不了解他的愚蠢而鲁莽的举动。我喝着茶水，这才郑重其事地给他阐述党的方针、政策、时局和未来。企图向他证实：由一个人随心所欲地改

变国家体制和政策的时代已经结束了，中央是人民的中央，按照全体劳动者的意愿制定党政国策，完全可以信赖。

他苦笑一下，说他听听广播心眼就开了，要是听些杂言碎语，又不由得担心。我深知要彻底瓦解他心中的沉积层，还需要时间和生活的进一步发展。不过，他笑着说他可以改变前几天做出的收摊的打算，算是对我的宣传工作的令人鼓舞的兑现。农民啊！极左的政策造成的这一代如惊弓之鸟一样的农民啊！

县政府在元旦那天召开了表彰大会，十五个首先达到万元家当的农民，接受县委书记和县长给他们按照关中农村传统的褒奖习俗，在肩上披挂了红绸带，胸前戴上了斗大的红纸花，打扮得新郎似的，乘十多辆彩车，在县城游了一圈。鬼秧子乐叔也被通知来开会，我和他在会场匆匆一见，他的脸上有了光彩，有点愧疚地对我笑着，我也不便再说什么，料定对他不无好的感染吧?

大约又过了半年，又一个周日，我回到乡下老家，作为我们这个远离县城的偏僻山村的头条新闻，就是鬼秧子乐叔从五里镇扯旗拔寨，回到自家屋里，洗手不干了。我被一种好奇心所驱使，就找到他的舍下去打问。

深秋的冷月洒满庭院，落光了叶子的葡萄藤架下，鬼秧子乐叔正坐在一只小竹椅上喝茶。他的神色十分沉静，言语缓慢而凝重，手势也沉稳了。

“听说……你从五里镇回来了？”

“回来了——不干咧。”

“怎么回事呢？”

“……你先喝茶。”

我坐下喝茶。

“老侄呀！你总说叔顾虑多，心数多……”他像打赌赢了时的口气，“现时看，叔顾虑的事，没错！”

“到底怎么回事呢？”

“五里镇公社书记在广播上讲话，说乡村里要神闹鬼，投机倒把，强奸妇女，偷人抢人，都是啥……污染！还说所有污染的根子是‘一切向钱看’……”

“这与你卖油糕有啥关系呢？”

“卖油糕是不是为了挣钱？挣钱是不是‘向钱看’？‘向钱看’当然就是污染嘛！我给自己也会上纲挂线了。”鬼秧子乐叔说得很认真，“公社书记在广播上连说带喊，嗓子都喊哑了！你看看，县长刚给万元户戴花没过半年，公社书记又这样说……”

“没你的事！只是文艺和教育界……”

“老侄儿，叔已经安置妥当了。”鬼秧子乐叔给我压着指头，说他早已谋划好了的措施，“我干了三年多，确确实实挣了一点子钱。我把这钱全数存着，房不盖一间，家具也没添一件。我给娃们交代：日后要是来运动，要退赔，那好，咱把钱交给工作组。要是真的不来运动，那当然好，就算是爸给你们留下的家当，你们兄弟俩一人一半。

这钱是我揉面团挣下的，我现时不敢花，你们也要花；等我死了，随你们的便！我活着，你们要想动它一张……”

话说到这样的程度，可见心死如铁了。五里镇公社那位书记怎样慷慨激昂地发表了一通演说，吓得鬼秧子乐叔缩手蜷足，关了油糕铺店，从五里镇回到自己的老窝里来了，而且把挣下的一笔款子，分文不花，准备着将来某场运动中退赔出去……我曾经为冯幺爸在乡场上挺起了腰身而欢呼，也曾经为可爱的黑娃兄弟走进照相馆出尽洋相而鼓舞，我可实在没有想到，我的远门堂叔给我留下这样曲曲拐拐的心的轨迹！即使五里镇公社书记在广播演说中喊哑了嗓子，我看县城和五里镇的农贸市场依然熙熙攘攘，小铺小店里的个体户的生意也照样兴隆，唯有鬼秧子乐叔……大约太诡秘了吧？太精明的人，有时也往往失算，倒比那些头脑简单一些的人更多一层忧虑吧?

……

今年春天，我从南方归来，到五里镇下汽车，走进街巷，看见鬼秧子乐叔和他的二女儿家的那爿铺店地址上，已经竖起两层六间的楼房，外观十分漂亮，楼楣上书写着一排潇洒飘逸的行书字：“一字歌饺子馆”。

鬼秧子乐叔在门口看见我，连拽带拉，就把我拉上楼去了。下层三间，两间作饭厅，一间为作坊，二楼上开了一间雅座，供那些比较讲究的小镇上的“上层”人物莅临就餐。五六个青年男女，一律白衫白帽，很有气魄。坐下后，鬼秧子乐叔弄来几碟小菜，定要和我喝几盅。

“老侄儿呀！我这回豁出来啰！”鬼秧子乐叔呷下一口酒，“啃个鸡爪子也算动了荤，唓（吃）个全鸡也是动了荤，我宁愿唓个全鸡！”

我惊异他的变化，不用问，他就告诉我，油糕铺熄火灭灶的时月里，他心里其实很痒痒。看着那么多票子别人挣，心里那个味儿是很难忍受的。直到春节，两个女儿和女婿来拜年，向他声明，他不干，他们可要干了，而且要大干大闹，只是资金欠缺，要老丈人把那一笔款子借给他们兴建楼房。老汉阴沉着脸，说三天以后给他们回话。后来……他和两个女儿家合股……

“嗨！一号文件一下达，我就在心里骂五里镇公社书记，这回，你把嗓子吼出血，也吓不住我了！”鬼秧子乐叔畅快地笑着，“人都说我诡，这回不诡啰！我把全部家当拿出来，摆在五里镇上了。咱一生担惊受怕，心里多刻了几道渠儿，而今，我要耍一回大胆啰！”

鬼秧子乐叔几口酒下肚，脸像猪肝一样红了，话多了，声壮了，简直没有我插言的缝隙，他自嘲地摆摆花白的脑袋，感慨地说：“叔这多年里，就像在月亮地里走路，把自个的影子当作鬼了，自己吓自己……哈呀！”

“你这个饭馆的名字起得好！”我也受了他的情绪的感染，心情很畅快，“‘一字歌’，很雅致，也有意思！”

“我请了几位中学教员，摆了一桌酒席，请他们给我的新饭馆起名。”鬼秧子乐叔十分得意，“那些文墨人，起下二十多个名字，我就选中了这个，它合咱的心。”

我很畅快，就起身告辞。鬼秧子乐叔却兴致正高涨，死活不让走：“我还跟你没说完哩！”

我又坐下。他告诉我，前几天，五里镇公社开会，动员大家给学校捐款，多少不拒，一块两块欢迎，千元百元更好。鬼秧子乐叔当场站起，报了一万元。全场立时响起掌声。那个在广播上把一切乱七八糟的怪事都引申为“污染”的公社书记，带头站起来，当着千余人的面，代表五里镇几千名小学生向鬼秧子乐叔鞠躬致礼，感动得老汉热泪扑洒。

“人家领导问我有啥要求？我说，修好学校以后，把我的名字刻上，就这话。”鬼秧子乐叔说，“我跟朱举人平排坐着了！”

我在五里镇读小学的时候，老师讲校史时，说五里镇小学的前身，是朱家寨在清末中了举的一位朱举人捐款兴建的。正堂上的一块青石碑上，记载着这位举人给家乡文化建设所做的义举，在世世代代的庄稼人中传为美谈。“文革”中，那块碑石给搬掉了，不知扔到什么角落里去了；前年，被谁从庄稼人打土坯的土壕里发现了，抬回五里镇小学，重新栽在花园里。鬼秧子乐叔也想在五里镇这个小小的社会里，留名青史，我可没有料到。

“公社答应了！”鬼秧子乐叔有点得意，“公社书记亲自给我说，‘你的碑子跟朱举人的碑子并排栽着。’”

“叔吔！你给咱家乡的子孙后代做下一件好事，群众不会忘记你的。”我喝了几口酒，对鬼秧子乐叔的进步大加称颂，“你而今心里踏实了吧？再不……”

鬼秧子乐叔灌下一杯酒，撇着嘴唇，讥诮地瞥我一眼，不以为然地摇摇头，打断我的话，眼里又露出那种诡秘的气象，说：“好老侄儿，不瞒你说，我捐出一万元来，权当这几年没挣。捐出去，让五里

镇公社的每一户庄稼人都得一点好处，免得日后来了运动，乱口纷纷咬我。二来呢？我把一万块票子捐给你公社书记，你书记在成千人面前跟我握了手，亲口答应给我立碑，青石上刻下我的名字，看你日后还抓不抓我的‘污染’？”

鬼秧子乐叔得意地剖白他的诡秘的打算，又使我意料不及了。我正在心里琢磨着他的义举里所包含的新的意义，新的进步，新的心理变化……却想不到他竟是出于这样的动机。

“我不能不考虑留下退路！”鬼秧子乐叔扬起头，瞪着眼瞅着我，“傻瓜才只知朝前跑而不想退路哩！我捐出一万块，把上下左右的嘴都堵住，日后万一政策变卦了，看你咋好开口整我？”

他得意地笑起来。

我喝不下去了，愉快的心情又转为沉重起来，点燃了一支烟……

小说写到这里，本可告一段落；又一回想，觉得不免有图解政策之嫌；再想想，却无法完全回避。鬼秧子乐叔的所有诡秘的言行举措里，无一不折射着我们施行过的政策的余光。也许在世界上所有的不同肤色的农业人口中，鬼秧子乐叔的诡秘的心理算是一种独有的怪癖；因为世界上不同地域不同社会制度下的农民毕竟有职业上的共同之处，譬如丰年的欢乐和灾年的忧愁，譬如对于粮食价格的升跌的担忧。独有鬼秧子乐叔除了抵御自然灾害之外，又多了一层奇特的又是根深蒂固的变态心理，使人难以揣摸准确……令人可喜的是，而今刚刚成年的一代农民，譬如鬼秧子乐叔的二女儿凤子和她的丈夫，将不会循着鬼秧子乐叔曲里拐弯的心的轨迹思谋筹划他们的前程了！

无论如何，我仍然虔诚地祝愿，鬼秧子乐叔开张不久的“一字歌饺子馆”生意兴隆……

1984年10月21日 西安东郊

田雅兰

——《我自乡间来》之三

清晨的空气凉丝丝，湿润润，我拎着一只旅行大提包，在小县城外的长途汽车站门口等待；贴着县城流过的河水，已经闪动着夏日黎明的亮光了。我在汽车站门口踱步，心里急得慌慌，其实也没有什么急事，无非是怕等车、怕排队这些穷毛病又犯了。

一辆卡车急驰过来，嘎的一声在我跟前刹住，卷起一股混合着汽油味的尘土，我立即跳起来，躲避那令人讨厌的尘土。

“老陈——”

我回过头，驾驶室的小门口，正跳下一位中年妇女来，叫着我，而且毫不迟疑地朝我走过来，旁若无人地大呼小叫道：“哈！没错儿。你怎么在这儿哪？”

真该死！我却无论如何想不起她的尊姓大名来，看着她的面孔是这样熟悉，偏偏记不起她的名字，愈是着急，愈是记不起来。我只好抱歉地笑笑，装作不曾忘记的样子，和她打招呼：“唔！我来出差……”

“你到哪儿去？”她急火火地问。

“回城里。”我说。

“坐咱的卡车走吧！正好到城里去。”她说着就动手拎起我的提包，“上车吧！快！咱们都要赶路哩，趁着天凉。”

司机在方向盘上摊开一本杂志，正看得入神，我和她先后钻进驾驶台的时候，他仍然没有抬头。她在他头上敲了一巴掌：“也不知和你陈叔打个招呼！咱们的恩人哪！”

小伙子抬起头来，那是一张多么漂亮的脸孔，红润润的脸膛上的一双圆圆的眼睛，坦然地瞅我笑笑，他闹不清我怎么会是他们的恩人，我也搞不清她打哪儿说的话。他起动了卡车。

汽车在田野上疾驰，凉飕飕的晨风从车窗外扑进来，太舒适了。田野一片绿色，无边无际，大块大块生长茁壮的苞谷苗儿，连着大片大片正在开花的棉花，绿得深沉，绿得可爱。正是肥沃富饶的渭河平原最富有的季节，我在她的腹地上乘车奔驰，心里真是像诗人们说的那样陶醉了。

“你现在在哪儿工作？”

“报社。”

“来这儿做啥？”

“采访。”

“你为啥不来采访我呢？”

我回答不上来，心里却一惊，这样直率的发问，我碰到的并不多。我不由得看她一眼，这位农村妇女并不是开玩笑，而是认真的神

气，似乎还有点不满。我真是该死，至今记不起她的名字，话也不好直说。

“你给我登一回报，我给你开……工资。”她大约想说“开钱”，话已溜到嘴边，略一停顿，就换上了“开工资”。她又撇一下嘴角，“我看哪！报上登的有些人的事情，还不如我呢！”

她究竟是什么人？用这样自信的口气和我说话？“你是……”

“啊呀！弄半天你真把我忘啦？”她惊奇地又是遗憾地盯着我，“你怎么能忘了我呢？”

似乎她是撒切尔夫人，或者是英迪拉·甘地。可是毫无办法，我还是记不起她的尊姓大名来。

“我是田雅兰。”她大声说，“住在田家湾，一年四季朝你要救济的那个歪婆娘……”

噢！我恍然大悟，不由得转过头，瞅着她，把已经忘记的田雅兰这个名字和她的熟悉的面孔，这才统一到一起了，我的心反而不安了。

“这汽车……是你的吗？”

“买下一年咧。”

“开车的是你儿子吗？”

“大货——跃进。”

“你现在做啥？”

“我办了个家庭农场。我是经理……”

好个田雅兰，好个开办着家庭农场的田经理！在我的脑子里，眼前这位口大气粗的中年农村妇女，怎么也与那个她自个儿也不避讳的歪婆娘统一不到一起……

公社院子里传来吵闹的声音，一个女人粗大的嗓门在吵在喊，急促而又激烈，声调越来越高，我终于忍不住，放下笔，走出我的住屋。

公社小会议室前面的院子里，围着一堆人，有公社的干部，也有过路的农民，大约听见吵闹声，从大门外拥进来看热闹。一个三十多岁的女人，被围在中间，在大喊大叫：

“人民政府不叫饿死一个人，我一家五口断顿儿三天咧！政府发的救济款，轮不到我头上，我不要咧！我叫你乔部长给我开一张‘讨饭证’，这费你多少神嘛？只需一张纸，写上我的贫农成分，盖上章子，我出门要饭也好应付人家盘问。就这事，你不给我办，还说我污蔑人民公社！谁头上有毛爱装秃子？谁锅里有米下爱出门拉枣棍儿？你干脆说我是反革命，把我逮了关了……”

我站在人圈外围，听到这儿，大体也就听出一点缘由了。几个公社干部劝她到屋里去，她反而更加执拗，甩着被妇联干部拉拉扯扯的胳膊，坚决不到她的屋里去。她的头发蓬乱，粘着灰尘和油垢，黑布棉袄的袖头，已经破烂得条条缕缕，光脚片套着一双破烂的棉鞋，脚后跟露在外面。她的嘴唇开裂，沁出血丝，仍然大吵大闹：

“我不到你屋里去！实话明说，怕啥？我一没偷，二没抢，我就是要一张‘讨饭证’，也有罪吗？”

要是真想出门讨饭，她早就去了。公社怎么会给她开一张讨饭的证明呢？看来她的实质还是要救济款，或者是嫌给她救济的钱太少，或者是对别人的救济有意见，不公平，有话说不出，就使出这种手段。我去找民政干部老乔，救济物资和钱款的发放，是由老乔一手具体经办的。

老乔正坐在他的火炉跟前，伸着短管旱烟袋，就着蜂窝煤炉子上的蹿起的火焰吸烟。他态度平和，似乎与门外那个女人毫无关系，似乎那个女人大吵大闹与他毫不相干。我一直钦佩他遇事不惊的良好修养，现在却不能不产生一点不满了：无论怎么说，让这个女人在院子里混吵下去不是办法嘛！

“她爱喊，让她喊去！她喊得有谁敢给她开‘讨饭证’，算她喊得好！”老乔吐着烟雾，不紧不急，“反正我又不敢给她开‘讨饭证’，又不能捂住她的嘴，咋办？”

“那……你去叫她，到我屋里，咱们一块谈谈。”我说，“让她在院子大吵大闹，影响总不大好！”

“我叫她去找你，说你是主管民政工作的头儿，她不去嘛！”老乔说，“你看嘛！她才不是真心要球啥‘讨饭证’哩！她是专门来糟践人，‘闹本县’哩嘛！”

我不能眼看着这种闹哄哄的局面继续下去，又说不转老乔。我又来到院子里，对她说：“你来吧！‘讨饭证’我给你开！”

她一愣，眼睛发直了，大约根本不曾预料到，有谁会出面答应她的要求。瞬间，她双手一拍，强装出兴高采烈的神气：“好好好！只要你给我开‘讨饭证’，我就去！”

我把她引到老乔的房子，闭上门，我指着一张椅子，说："你先坐下。"

"我还忙着去要饭呀！"她歪扭着脸，"给我开证明吧！"

"开'讨饭证'，总得问清白才能开嘛！"我坐下来，点燃一支烟，考虑着怎么对付她，"你住在哪个村？"

"田家湾二队。"她说，"我叫田雅兰。"

"名字倒是挺脆气的！"老乔逗趣说，"人可是够厉害的！"

"厉害是逼出来的。人要是太龟了，就活不了！"她仍然火气十足，"你老乔要是落到我这步田地，说不定比我还厉害！"

"别赌气了，说说你的家庭情况吧！"我说，"赌气不解决任何问题。"

"你问他去！"她用眼睛给我指着老乔，"我给他说过几百遍了！他的耳朵磨出茧子了，我的嘴唇也磨得没皮了。说来说去，啥问题也解决不了！"

"哪一回没给你救济？"老乔从嘴里拔出旱烟袋，"一回也没空过！"

"你少朝我瞪眼睛。"她的一只手顺势叉在腰里，"救济款是共产党给的，不是你老乔给的！你朝我瞪什么眼？我吃救济款就低人一等吗？"

“你总得……讲道理嘛！”老乔说着，把一份统计表递到我手里，“自我接管民政工作这五年里，给你累计救济过四百多元了，棉布棉花在外……”

“四百二十五块钱，五丈蓝咔叽布，十斤棉花。”她大声说出精确的数字，“我让孩子在纸上记着，镶在镜框里，等我儿我女长大了，我给公家还！”

“钱是人家政府的，棉布棉花也是国家的，不是我老乔家里的。国家救济困难户，我没说过要谁还账嘛！”老乔仍然不起性儿地解释说，“我们应该感谢国家……”

“党的恩情我记着。”她仍然态度强硬，“我虽是领的国家的救济款，可是受够了人的白眼！大队小队那些头儿莫要说起，单是你老乔——”

“我怎么了呢？”老乔呵呵地笑着，“我没骂过你，也没奚落你，倒是你几回‘闹本县’，闹得我下不了台！”

“你虽没骂过我，你烦我！”她毫不退让，“你给旁人说过，说我是泼妇一个……”

“我啥时候烦过你？”老乔问。

“今年春季发救济款时，我来找你，你躲得不闪面。”她举出实例来，“你现时给陈领导说，你躲到哪里去了？”

“我……根本没躲。”老乔否认，口气却很软，眼里滑过一缕不好意思的神情，“你又吃不了我，我躲啥？”

“你一看见我来了，锁上门溜了，躲到厕所里，不出来。”她得意地揭露说，“我就等在外头，看你能蹲一天不能？”

“你看看……老陈——”老乔向我摊开手，不好意思地笑着，“你看这样的贫农，好领导不好领导？”

我已忍不住笑了。

田雅兰也笑了。笑得很短暂，她又换上强硬的口气说：“我一觉察谁拿斜眼瞅我，我也拿斜眼瞅他！谁烦我，我偏缠他！谁想下眼观我，我才不受哩！我接受的是国家的救济……”

“今天你来，为啥大喊大闹呢？”我把话题引到眼前的具体事情上来，“又是老乔躲到厕所里了吗？”

“今日倒没躲！”她说，“可是把我往门外推，还是烦嘛！”

“你问救济款，我说上级刚发下来，咱们公社还没研究确定哩！”老乔说，“我怎么又烦你了呢？”

我于是就劝她，表示完全理解她的困难处境，又不能不给她讲些僧多粥少的道理，劝她先回去，我们尽快研究，把冬季救济款和物资尽早发放到困难户手中。好说歹说，总算把她送出大门了。

“这个歪婆娘，泼货！”老乔瞅着她远去的背影，松了一口气，笑着对我说，“幸亏全公社只有她一个，要是再来仨俩的，我这民政工作就没法干咧！”

“可是你要留心，她……弄不好……可能真的引上娃娃去讨饭……”我有点担心，“要是她讨饭走了，你我都不好给县上和市里交

代。咱们一块到她家去看看。”我对老乔说，“无论如何，甭让她引着娃娃去讨饭……”

渭河平原的初冬，如果没有西伯利亚寒潮入侵，气候倒有点像早春天气，早晚冷点，而中午却有温暖和煦的阳光，人说“十月小阳春”。

持续了一天一夜的西北风，把冬天的萧索气氛全部显示出来了，一排排杨柳，枝梢冻僵了，在灰蒙蒙的天空，发出呜呜呜的呻吟。小麦葱茏的绿色顿时变得灰暗了。原坡上是一眼看不断的枯黄野草，没有生气，透着冷光。

我和老乔骑着自行车，赶到田家湾。

田雅兰家的住屋，一眼就让我感到了衰败的气氛。土打围墙坍塌得豁豁牙牙，猪狗可以自由出入；院子里，猪粪和柴草混搅在一起，铺满了院子，邋遢而又肮脏。一头克郎猪和六七只杂色母鸡，在院子里拱着刨着，听见我和老乔的自行车响，扑啦啦飞起来，扇起柴草和尘灰。

屋里不见田雅兰，也不见一个孩子。我正待呼叫，却听见屋里传出田雅兰熟悉的声音：“说！你狗日的给我说！对着日头爷说！你还胡来不胡来？”

“我……已经说过了嘛！”乞求饶恕的令人闻之恸心的男人的声音。

“说！再说！”田雅兰凶神恶煞般的声音，毫不放松，“连说三遍！对日头爷赌咒！”

这样不近情理的逼问，我有点反感了，在公社大喊大闹，在家里又是这样称王称霸，太过分了！男人即使有什么错，总归是病人，这样逼迫一个瘫痪的病人，近于虐待了。

“雅兰，你饶了我吧！我再不了呀！”男人用哭声求饶，“你听听，外边有人来了呀……”

“有人来了更好！”田雅兰说，“你还知道顾你男人的面子吗？”

我敲响了门板。门闩一声响，门开了。

我一眼瞅见，田雅兰铁青着脸，眼睛死勾勾地盯着我，嘴唇用劲地撇着，呆痴的眼神使我顿然产生了一种无名的恐惧。凭实感，我觉得站在我面前的，分明是一只被围困得几近绝望的母狼了。

她连招呼一声也没有，依然呆痴地站立着，扭过脸去，不看我，也不看老乔。

我照直朝屋里走去，炕上，一条破烂的棉被下，躺着她的男人，一个瘫痪病人。他的像烟火熏烤过的黑里透黄的脸色，现出一缕羞愧的神色，转到炕的里边，面向墙壁，避开我和老乔的眼光了。

“老田，怎么回事呢？”我问。

老田仍然没有扭过脸来，面对墙壁，长长地吁叹一声，没有开口。

“说！你干的体面事，你给公社同志说呀？”田雅兰奔过来，站在炕边，“你有胆子做，咋没胆子说？”

老乔摇摇手，劝说她：“甭这样。有话慢慢说。他是病人，你甭尽发火起躁……”

“你们看——”田雅兰一把揭开被子，又撕开男人的领口，“你看他给我干的好事——”

我一看，那男人已经很细的脖子上，有一道暗红的伤痕，围着脖子绕了一圈。这时候，田雅兰从地上拾起一条用棉线织成的腰带，甩到我面前的炕上，自己一下子扭过头，用手捂住嘴巴，不说话了。

“老田哪！你真是胡来乱整！”老乔拍着老田的肩膀，既是劝谕又是责备，“怎么能走这条路？”

老田双手捂住脸，呜的一声哭了，身子和被子一起抖颤着。

我深深地低下头，抽着烟。我不大会劝解人，默默地坐着。我觉得什么话语都苍白无力，无法使这位丧失了活力的男子汉解除痛苦。

“我一天奔前跑后，为了啥？”田雅兰气呼呼地又斥责起男人，“我好不容易喂大一头猪，换下几十块钱；我养鸡攒下鸡蛋，一个也舍不得给娃们吃；我死皮赖脸地向政府要救济款；全都买下药，给你灌进肚子里去咧！好……你倒想用一条裤带照顾我……”

“唉！我……”老田突然抓住我的胳膊，瞪着眼，哆嗦着嘴唇，“我成了废物了！一家人苦，全苦在我身上了。我不能再叫娃儿们跟我受苦受拖累，我不能再叫雅兰……再这么下去，雅兰也会给拖垮的……”他转脸对雅兰说，“你对我……尽够了！我自个儿对不住你和娃儿们，才想到给你减轻负担……”

田雅兰还要说什么，老乔制止了她再说话，推她出门，让她做饭或者喂猪，由我们和老田坐一坐，聊一聊。田雅兰走出门去了。

“陈同志……乔同志啊……”田雅兰一出门，老田挣扎着要坐起来。我和老乔扶起他，身前腰后用被子拥塞着，使他不致倒下去。他一只手抓住我的手，另一只手抓住老乔的手，泪水扑落到瘦削的脸颊上，“我的雅兰，全是为了我……我不忍心把她也拖累到死哇……”

汽车在渭河平原的腹地上急驰，广袤无垠的原野上，一排排顺着灌渠和公路排列的白杨，郁郁葱葱。夏日清晨，明丽的阳光铺洒在原野上，蓬蓬勃勃的苞谷苗儿，棉花秧儿，西瓜蔓儿，全都涂上一片红光。我坐在田雅兰和她的儿子跃进之间，透过车窗玻璃，眺望着这美丽的原野景致。

跃进双手攥着方向盘，目不斜视，熟练地驱车疾驶。他的脸膛红润润的，端正而秀气的鼻子，俨然就是从老田的脸上移植过来的。他的眼睛像田雅兰，大而明亮，透着一股强悍的气息。身上只挂一件红色背心，粗壮的胳膊有如抬杠一般坚实，这无疑是一个标准的关中人的后代了。唯其区别于老一代青年的，是他的头发。那头发长到盖住后颈，耳朵也被头发覆盖住了。他无疑十分喜欢这样的头发式样，很自信地甩一甩扑到眼睛上来的长头发，而不嫌碍眼。

在我陷入上述不能忘记的回忆的时候，田雅兰一直在给我叙述着我离开那个公社以后的事。尽管她费尽心力和财力，终究没有使老田站立起来，而终于在卧床五年之后去世了。令人惋惜而又遗憾的是，他没有看到他的妻子现在的魄势，也不能使我写的田雅兰的故事有一个大团圆的结局。田雅兰难过地告诉我，老田临死时，竟然没有痛苦，他最后向她笑一笑，说了句：“我盼的日子到底来了。雅兰，我死

了比活着好哇！于我好，于你好，于娃儿们都好……”我听了，心里不由得颤抖起来。

“我头年养了一百来只母鸡，一年就翻身啰！”田雅兰用一种男子汉们说话时常有的那种自豪的口气给我说，“第二年发展到五百只。第三年土地下户，队里有百亩果园，没人敢下手承包，我包了。我的儿子和女儿长大成人了，都是好劳力，我就承包了它。我包下了果园，把那些男人们给吓住了。当年卖完果子，还了队里的承包款子，我买下这台新车……说来真是从一个鸡蛋的家当起手的哩……”

诸如田雅兰这样的家庭变化，我早已司空见惯，不足以引为惊奇了。唯其因为我对她的过去生活的不能忘记的记忆，依然强烈地冲击着我的心扉。她很自在地倚靠在背垫上，怀里抱着一只黑色皮包，押着满满一车苹果，和她的儿子到城里去交易。她穿戴整洁，神态镇静而坦然，四十多岁的中年女人的脸色，倒比我十年前在公社院子第一次见到她的时候红润丰腴得多了。她现在和我说话时的那种神态和魄势，很容易使我联想起在电视新闻上看到的撒切尔夫人下令进攻马尔维纳斯群岛时的神态，那是一种拥有强大实力的自信的神态。

“我赚了钱，立马到公社去找老乔。他可真是个好人！”田雅兰有点愧疚地笑着说，“我说，‘老乔呀！我给你还钱来了。’老乔咂着旱烟袋，瞪起眼睛，连说我不欠他的钱！我说我来还救济款。他摇头摆手，说我胡闹哩！还说我要戏他哩，国家根本没有要谁还救济款嘛！我说我非还不可，为了我曾经和他胡搅蛮缠过，我要挽回我的名誉。老乔说他要是收下我的还款，自己就要犯错误了，硬是把我推出公社大门。我不甘心，拿这笔钱买下一台大彩电，送给俺田家湾团支部了。我这才算去掉了一块心病。”

哦！有这样的事！我不由得沉吟一声，又说不出话来。在她要还掉救济款的举动和心理活动中，包含着什么呢？我忽然想到一个被人说得多少有点玄乎的话题，就是：人的存在和人的价值。那些探讨这个议题的文章，虽也深奥，虽也开窍，终究无法使我彻底摆脱雾里看花的直觉；从田雅兰——一个中国农村的家庭妇女的眼神里，我毕竟要看得更实在一些……

“老陈哪！你到我的家庭农场来看看吧！”田雅兰真诚地邀请我，“你要是能给我登登报，我酬谢你一台电视机。”

我说我不要她用任何礼物作报酬，一定要去看看她经营的家庭农场和她的新的家庭。

“俺妈尽爱显耀！”跃进却扭过头，讥诮地撇撇嘴角，第一次开了言，“咱们家的收入，比村里那几家开办厂坊的人家差远了，她总想登报！”

“我想上报，真想。”田雅兰不在乎儿子的讥诮的口气，反而毫不掩饰地说，“你娃子甭忘了，为了拉扯你兄妹三个人长大，妈变成歪婆娘了。我要登报，让人看看，我这个歪婆娘是个啥样儿的人！”

跃进不再吭声，目不转睛地盯着前方的公路，按着喇叭。

我再次表示，回到城里，交清我手上的差事，立即回转来参观她的农场。

她相信了，满意地抿着嘴笑笑，抑制不住可能要上报纸的喜悦，再次叮嘱我：“你说话可要算话。真要按你掐的时间来了，那时正好——我的葡萄开园摘果了……”

拐子马

——《我自乡间来》之四

拐子马被县公安局拘捕了。

初听到这个消息，我着实吃了一惊，随之就惶惶然起来，立即想到了和他最近一次相见的情景。在那次偶然相见的闲聊中，其实已经预示着后来的这种结局，我当时粗心了，没有认真劝一劝他。

那是春节过后，农历二月初二，适逢河西镇一年一度传统的会日。我想在后院里栽两株葡萄，以遮挡夏季里直射到南窗上来的烈日的炎光，于是就赶到河西镇去。

与渭河平原的许多古会一样，河西镇的"丁"字形的三条街道上，摆满了各种物品和吃食小摊，从几十里外赶来的采购农副产品的城里人和主要是来逛会看热闹的乡下人混搅在一起，在尘土飞扬的窄狭的街巷里拥挤，嘈杂的声浪似乎结成一个巨大无边的网，罩在了古镇的上空。

街西路南的打麦场上，已经装扮停当的高跷社火正在集结。路北边的麦田里，临时搭起的戏台上，县剧团的午场戏正式开演，头一折是《杀狗劝妻》。坡根下那座早已被"文革"的风暴摧残殆尽的镇山庙的旧址上，枯干的荒草和粉碎的瓦砾之中，现在跪倒着一片女人。她匆匆赶来，略作选择之后，就扑啦一声跪倒在荒草瓦砾之中了，点燃蜡烛，再点着紫香，小心翼翼地插地荒草之间，叩拜三遭，然后从腰里摸出早已折叠停当的黄表三角，栽在香火跟前，合手闭目，口中念

念有词，乞求神灵赐啥神药。离此不过三五十步的麦田里的一伙年轻的乡村青年，正在扭着节奏强烈得近乎疯狂的迪斯科，收录机支放在麦田塄坎上。古老的国粹和舶来文明真正是熔于一炉了。

我在古会上转悠了一圈，就找到镇子东边卖花草树木的偏僻小巷来。

“老陈——”

我一回头，就看见了拐子马，正在向我招手。他坐在架子车车帮上，两条拐杖紧贴身放着，看见我走到跟前，忙去摸拐杖，拐杖却倒在地上，他无法站起来。我立即按住他的肩膀，顺势在他旁边的车帮上坐下来了。

他说他来卖树苗，用手一指，我就看见那面山墙上，靠着一大堆泡桐树苗，少说也有五六百棵。他说他在村口的半亩地里育了树苗，收入倒比种粮食强些。他说二儿子把他和树苗用“小四轮”一起送来，就到戏场社火场上逛热闹去了，留下他做买卖。

他的眼睛依然有神，闪着一种强光，一种执拗、专注的甚至有点厉害的光，这是我早就熟悉的一种眼光。然而岁月毕竟在这位强人的脸上留下了变化的印痕，几年不见，他的小时害过疤痢的头皮上，那么几撮稀疏的黄毛似乎更稀了；向前突出的下巴愈加突出，凝聚着执拗的力度；嘴角两边的深沟似的皱纹也似乎更深更粗了。

他毕竟是五十多岁的人了啊。

“咋样？日子还好吧？”

“娃娃们大了，能跑能挣了，日子活泛了。”

“算得一个万元户了吧？”

“球毛！哪来那么多万元户！”

闲聊了几句，他对我的询问就表现出不耐烦，毫不掩饰他的鄙夷的情绪：“你听那个广播上从早到晚乱吱哇！到咱村里来调查一下，看看有几个万元户？城里人一满爱听广播，当是农民现时都是万元户了！你才离开咱乡下几年？也变得耳朵软了……”

我说：“当然……”

“咱俩甭争执了，我想跟你说正经事呢！”他说，“前一向我还想找你，摸不准你的行踪，今日遇见正好。”

他找我有什么事呢？我等候他开口。

“我想蹲监狱了！”

这样的玩笑，不该是他这样年龄的人开的，也与他的气性不大协调。我不由得侧过头，瞅住他的眼睛。他的脸色是平静的，眼睛的神色也是平静的，根本不像开玩笑的样子，倒像蓄谋已久而认定了的非做不可的事。我迷惘了。

“太不像话了哇！”

“你说谁？”

“支书马成龙。”他说，“这个货呀！甭说党员，也甭说干部，连个人气儿也没有。”

马楼村的马成龙，我早在十几年前就认识了，比认识拐子马还早几年。几年不见，怎么就变得“连个人气儿也没有”了呢?

“土地下户后，处理集体财产，大队当时只有一台‘小四轮’，有十多个小伙儿争着买，原先说抓阄，谁抓到算谁运气好。小伙子们等呀等，总不见大队里叫抓阄，马成龙让旁人放出话来，说‘小四轮’给他留下了，还说他好赖当了多年书记，稍微特殊一下。反正只有一台拖拉机，只能使一家人高兴，小伙子们也就罢了。谁知马成龙只给自己折合了一千元，太便宜了，村里又议论纷纷。议论也就白议论了，反正干部占便宜也是最后一回了，往后各家种各家的地，搞自家的营生，集体也没有啥油水好捞了。叫人气恼的是，没出一月，马成龙把‘小四轮’卖到外村去了，卖价一千八，净赚八百块，这下子可就……”

我不惊奇，也不愤怒。农村实行土地下户经营之后，处理集体财产过程中干部大捞油水的事，我听得耳朵都塞满了，正如俗语的虱多而不知痒了。趁着分田分片包干到户的混乱机会，干部干点近水楼台先得月的混账事，是个较为普遍的风气，不是马成龙一个人的毛病。所以，我虽不能说拐子马的意见不对，却并不惊奇。

“社员说，占了便宜也就占了，干部不占能轮到社员吗? 反正吃亏占便宜的事，只有最后一回了。日后，各家搞各家的营生，他想占也没法占了。谁知——嗨！农业社散伙了，干部拿不成补贴工分了，反倒变成补贴工资了。支书一月四十五，一年五百四。当然，干部为众人办事，不能白跑腿！给工资也合情合理。问题是咱们支书马成龙，一年到头连一件事也不给众人办嘛！隔一月半载，他到乡上县上去开会，老也没见回来放一声屁。天旱得苞谷都‘挂孝’了（苞谷叶子晒干后呈白色），他也不组织劳力灌水，滩里四口机井，马达丢了，渠道

淤塞了，没人管，真是坐在井边渴死了人。再甭说兴办村企业、扶植社员致富的事了，连门儿也没有。他一年净拿五百四，且但不说，每次出外开会，回来还要记下误工，一天又按乡村手艺人的标准领钱，日工三块。你想想，这算啥名堂？”

听到这里我自然产生了疑问：他的工资哪里来呢？

“大队里没钱开销工资，”拐子马说，“卖树呀，你知道，俺村河堤上有一条白杨林带。队里的财产已经处理得一干二净了，只留下这些树。社员盖房子，想买两棵树作大梁，没门儿，马成龙一口咬定说县防洪委员会不许砍伐树木。可是，马成龙年年都卖树，全卖给他的关系户了。他的挑担兄弟，一次伐了五棵。他的女儿亲家做棺材，一次伐了两棵。他儿子所在的乡办厂的厂长，一次伐了四棵。顶大的树没过一百元，比公家木材公司的牌价还差了一大截子。你说，我能忍下这口气不？”

这一下，我的心里受到猛烈的撞击。马楼村河堤上那一排白杨林带，是拐子马一手护养长大的。那是在“学大寨”的年月里，拐子马只有一条肉腿，两条木拐，队里照顾他，让他在河堤上护林。他得了这个好工作，对干部——包括马成龙——感激不尽，吃住都在河堤上，终于使沙堤上插下的鞭杆粗的杨树条子长成了郁郁葱葱的林带。他曾经是河西公社的植树英雄，戴过花，上过广播，登过报。他护育成功的林木，价值少说也在十万元以上。看着马成龙随意处置他亲手护育的树木，自然比一般社员更有一层切肤之痛的特殊感受了。我完全能理解他的心情。

“我当年护林，一天十分工，一年三千六百分，十年三万六千分，抵不住十棵大白杨树。这且不说，咱当时又不是承包，是给马楼大队

务的树。我回旋不过的是，我务下的树，社员没歇到阴凉，阴凉全让马成龙歇去的喀！他一年卖十来棵树，够他领年薪了；到得他死了，这河堤上的白杨全给他卖了领去了。我越想越憋气！”

拐子马这样说着，我听得胸膛里也憋得难受，可又怎么办呢？我就劝他：

“你应该到乡政府去反映社员意见。”

“去过了，不顶啥。”

“咋能不顶啥呢？”

“我去反映了，乡党委书记客客气气地听我说了，还在本本上记了，说他们了解后再处理。半年过去了，没见啥响动，一年过去了，还没啥响动。到年底时，马成龙该领俸薪了，又卖了八棵树。我去问乡党委书记，他说他们研究了，等到整党时处理。你说说，乡村啥时候开始整党？”

我说不清乡镇一级整党的准确日期。即使知道，我也不想告诉他，那是没有什么实际意义的事，乡党委书记能容忍这样的事继续发生，整党中又何尝不能容忍呢？我说：“你甭等整党了，应该去找县纪委。”

“我不去找。”

“那为啥？”

“让他们来找我。”

“县纪委的同志怎么能知道你有意见呢！”

“我砍伐了树木，马成龙必然要朝上反映，最好把公安局的民警叫来，把我逮了办了，我就好说话了，说了也就有人听了——”

“这算什么办法呢？太蠢了！”

“我看只有这蠢办法。”

“不行。”我说，“还是应该去找县纪委。”

他咂着旱烟袋，闷住头，终于松了口说：“那好。我刚才说找你，就为这事，自己也觉得那样不妥……”

我也松了口气。

那年年底，我被分配到马楼村去，一是抓紧年终分配，一是抓生产队下属领导班子的选举。这两项工作，是每年年终前都要做的事，也是很棘手的事。

天阴沉着，灰黄的云层压得很低，数九的西北风在秃光的树梢上发出令人心烦的哨响。我骑着车子，缩着脖子，赶到马楼村去。

大队办公室设在三间民房里，这是“四清”运动中没收的一个“漏划”地主家的财产。偏房里支着一张桌子，有几只没有涂漆的白色木椅，党支书马成龙坐在一只椅子上，身子前倾，伸着双手在火炉上取暖。火炉是一只小号废旧的汽油桶改做的，填着无烟煤末和成的泥炭，墙根堆着一堆和好的湿煤，放着一把小铁锨，那是和煤或加煤用的。马成龙听见背后的脚步响，回过头来，看见了我，淡淡地笑笑，就把一把椅子拉到火炉跟前，示意我坐下，却没有说话，接着就用一

把破菜刀在一块黑色茶砖上砍起来。砍下几小片，扔进一只洋铁皮焊接的茶具里，在火炉上熬起来。我早已认识他，并不计较他待人的冷暖，他就是那号蔫不拉耷的性儿，话少，常常给初次接触的生人一种难以忍受的冷漠感。我是熟人，就不在乎。

我向他说明来意，他告诉我，马楼大队的三个生产队的决分方案都有眉目了，三队劳值最高，肯定在一块五以上。一队居中，低不过八毛，高不过一块。二队最差，顶高超不过五毛，这个工值，怕是连一般棉粮生产队的情况也不如，在整个蔬菜专业队里，肯定是下三滥了。

我和他约定，晚上召开大队和小队的干部会，谈谈情况，也了解一下三个生产队现任干部的实底儿。我就约他一起去找三队队长马长道，公社近日要召开一个年终总结大会，要马长道在会上发言，介绍一下他“学大寨”的经验，这个任务就由我捎带着办。

他笑笑，说他和我一起去反倒不好，却不说为什么不好，使我纳闷。他又推诿说他在办公室等候二队会计，问询决分方案的进展……我就独自去了。

从暖烘烘的房间里出来，村巷里冷风就使人不由得缩起了脖子，再走到无遮无挡的田野上的时候，那风就像刀子一样厉害了。马长道领着一帮男女社员在村南菜地里挖胡萝卜，远远可以看见空旷的野地里拥着一堆人。入冬时，用厚厚的一层黄土覆盖在胡萝卜缨儿上面，避免冻坏，现在挖出来，是鲜嫩嫩的胡萝卜，正赶上元旦前夕上市，价钱自然比入冬时要高了。

走得离那堆人群近了，我就看出来，那些人一个个缩头袖手，背着风向蹲在地上，一动不动。马长道腰缠一条蓝布带子，光着几乎没有头发的脑袋，正在给社员训话。我不由得放慢了脚步，有点为难起来，他不仅是训，实际是在骂人，在他这么大发雷霆训骂人的时候，我要是突然走到他的面前，他和我都会觉得难为情的。我就站住，抽支烟，大声咳嗽两声，给他一个暗示，使他有一个收场的机会。不料，他回过头，瞅我一眼，继续骂着，而且提高了嗓音。我意识到自己的担心纯属多余，人家根本就不会觉得骂人有什么不好意思。我就照直走过去，站在他的旁边。

他连瞅我一眼也不瞅，没有几撮黄毛的头皮呈一种红色，许是尖利的西北风吹的，也许是血冲脑顶，那害过瘌痢的头皮变得赤红了。他的向前突撅的下巴，显示着一股狠劲，那凹进的嘴巴里喷出的话太难听了：

“你给我磨洋工，我也松管呀！大家都磨，磨到年底，队里挣不下收入，决分没钱，看哪个龟孙吃亏吧！”

蹲在地头田埂上的，有老汉也有小青年（好在没有妇女），没有人愤恨，也没有人议论，扬着头的都是挺得镜平的脸面，勾下头的则一动不动，似乎队长马长道在骂胡萝卜，与他们毫不相干。于是我替马长道悲哀了，骂人训人而不能使任何人动情动容，训骂者应该感到悲哀。他终于丧气地大声宣布：“放工！”

老汉们从地上站起，扛起镢头，悠悠然往回走，小青年们像什么事也不曾发生，打打闹闹笑着叫着头前里走去了。

胡萝卜地旁边，有一幢低矮的单间电房。我跟他走到房檐下，躲避直钻脖子和袖口的西北风。他从井台上抱来一捆干透的茄子秆儿点燃了，风把烟窝到人的怀里，呛得我直淌眼泪，然而毕竟暖和了。我向他说明了要办的事。

“搂媳妇搂住了粮食口袋——”他的头一仰下巴一摆，哈哈一笑，“瞅错人了！”

“党委会研究定下的，蔬菜队里就选中了你一个。”我给他解释，“你好好讲讲马楼三队的经验。”

“我的经验是俩字，骂和罚。”他盯着我，打赌似的瞪着一双眼，“这样的经验能在台子上讲不？大寨的经验里头可没有这俩字呀！”

“甭拽开套，说正经事。”我说。

“我说的就是正经事。”他眨眨眼，再次申明，“大寨的经验我连一条也用不上。我的这俩字咋讲？凡是能搞小段包工的活路，我就包工，达不到标准就罚工分；凡是不能搞包工的活路，社员磨洋工，咋办？骂着干，不干了就骂。你想想，这号经验讲出去，我挨挫事小，你们也要招祸。”

“不骂不行吗？”我说，“做点政治思想工作怎样？”

“我没这个本事。”他说。这也许是实话，他本人虽然认识几个字，却从来也不读书看报，能讲出什么政治来呢？他又侧过头，紧盯住我说，“你要是能给我找一个帮手，只管政治，能把大伙的自觉性号召起来，我给他记最高工分。生产和栽培技术上的事，我负责。你

说，你能不能给我找到这个人？能的话，我保证再不骂人了。我要是还骂人一句难听话，你用鞋底抽我的嘴，我不避脸！”

“哈呀？你骂人倒有理了！”我讥讽他说。

“那咋办？大家选我当队长，既要年底多分红，还想屁股上肉舒坦——不出力，我能办到吗？”他理直气壮，“他想省力混工分，我就用包工治他；他磨洋工，我就骂，骂得他的脸上觉到烧臊了，就该出力干活了。你说，还有啥好办法？大寨那些经验，咱不敢说不对不好，只恨咱人笨弄不了。再说蔬菜区四十多家生产队，你说说，谁家用上那个经验了？一个也数不出来！我看还是我这俩字管用！”

我的心里开始盘算，应该及早向公社领导汇报，马长道的经验无论如何是不好上台讲出的。

经过一段时间对实际情况的了解，我基本确定下这样一套方案：三队干部班子采取基本稳定的办法，一队作个别调整，二队重新组建，工作重点自然在二队。我把这样的意见和支书马成龙谈了，他虽然还是蔫蔫的样子，却对我的意见表示赞成，这个难得现出情绪激动的十分内向的农民干部，眉眼里现出了一缕和悦的神色，说：“这就好。你跟我的考虑一模一样，这就好。”我听了他的十分有限的剖白，一时竟然很激动，似乎得到了皇上的首肯。我和他商定，在支委会上讨论一下这个方案，如果可行，就这么办了。蔬菜育苗的事该当做好准备工作了，节令催人哪。

我把工作重点确定在二队，想扶植起一个强硬的领导班子，以改变二队已经十分混乱涣散的局面。是的，由于分配的失望，二队社员的情绪灰败而涣散，一年白干了，竟然没有钱买衣买肉过新年，这在

蔬菜专业队是很难堪的。正当我紧张工作，而且出现了有可能推出一位深乎众望的中年农民出山的时候，想不到二队却乱套了。

街道里连续贴出两批大字报，目标十分集中地对着三队队长马长道。大字报的作者头脑冷静而清楚，全部选择的是那个年代掀翻一个人所最有力的措辞和事实，譬如，推行刘少奇的“三自一包”，在三队复辟资本主义啦，列举的是他采用的小段包工和奖罚的办法；又譬如，实行军阀统治，训骂社员，完全是国民党作风啦；如此等等。结论是三队已经复辟资本主义了，马长道是马楼三队的小刘少奇。

事情尽管来得突然，出乎意料，却不是什么爆炸事件。在那时，大字报司空见惯，普及到每一个偏僻村巷，庄稼人的房屋的三面甚至四面墙壁上，都刷着斗大的当代中国最时髦的政治口号，可以说村无净壁了。几张大字报，并不足将我震昏。在我刚刚步入社会的政治幼稚时期，大字报曾经糊住过我的屋门，糊住过我的睡床和办公桌椅……我从大字报纷飞的洗礼中活下来，可以做到于心不惊了。我略一筹思之后，就定下心来，继续做我为二队扶植新班子的事，对三队街巷里发生的大字报，不予理睬，看看会有怎样的发展。

大字报贴出的第三天晚上，支书马成龙找到我的住处，一脸急难的神色，说：“你看见了吧？大字报！这明明是胡搅和嘛！咋办呢？”这个蔫蔫性子的人看来着急了。

“有意见让社员尽量提，‘四大’自由嘛！”我说，“我在二队正忙乎，腾不出手来。等二队的班子有个定型，再说三队的事。”

“这大字报搅得三队乱了套，咋办？”马成龙一副忧心忡忡的腔调，哀叹着说，“长道要是撒手不干了，麻缠就多了。”

“有啥办法？我不能制止人家‘四大’的自由嘛！”我说，“缓一缓再讲，事情只能一宗一宗办。”

马成龙大声哀叹着走了，我替这位蔫性子的甚至有点黏糊的农民干部难受，他当着这个村的头儿，也真作难哩！

接着的一天晚上，一位尖脑袋的中年人走进我的房间。我认识他，名叫马成芳，一位十分聪灵的农民，性格活泼、热情，尤以在马楼村业余剧团演滑稽角色而惹人喜欢。他坐下后，点燃一支纸烟，问：“老陈，你知道大字报是谁写的吗？”

“不知道。”我如实相告。

“你想不想知道呢？”他闪眨着眼睛。

“想知道。”我说，“知道人了，就可以直接交换意见和看法了。”

“大字报是我写的。”他对我说，完全是一副进攻者的得意，“我今晚就是来和你交换意见的。”

“我没有调查，也没有考虑。”我说，“我集中力量先解决二队的问题，对三队的大字报，我还没有成熟的意见。”

“你总看过了吧？”

“看是看了。”

“看了总有一点看法吧？”

“一定要我说点看法——”我说，“对马长道队长，也要一分为二。”

“对刘少奇也要一分为二吗？”

“这是谈的马长道。”

“马长道实行的是刘少奇的路线！”

“他毕竟是个农民，有缺点是难免的。”

“你袒护他！”

“接受你的批判！”

马成芳走出我的屋子的时候，脸上鼓着劲，脚下带起一股风。第二天一早，街巷里又贴出了一排新的大字报，题曰：对马长道能一分为二吗?

“好人都是刘少奇！”马长道嘲笑说，“谁想害谁，就说谁是刘少奇，最解馋了！我没见过世面，倒是经过‘文化革命’，省里市里有刘少奇，县里和公社里也有刘少奇。哈哈！马楼三队也有了，我马长道成了刘少奇了！”

我心里的负担完全解除了，一阵轻松。虽然我并不惧怕马成芳的大字报，却担心倔强脾气的马长道经不住侮辱，一甩手撂了挑子，问题就难办了。我从二队抽出时间来看他，就是想先稳住他的心。想不到，他倒比我更豁达，根本不在乎那几张大字报。

“我现时最恼恨我爸，舍不得花钱供我念书。”马长道憋红了脸，“我要是会写字，把狗日马成芳的根根筋筋全写出来，叫他狗东西臭倒一条街！他在戏班子里的丑事，谁不知！”

“你该干啥还干啥。”我给他说。

“听见狼叫就不养猪了？怪事！”马长道说，“我这人哪！有个怪毛病，谁要是扶我推我，我倒是不想往树上爬；谁要是骂我压根儿没本事爬树，我挣死也要爬上树去。放心！马成芳，丑东西一个，凭他能把我抹脏，日了鬼了！在我心里，没有他这个对手！”

我暂且放心了。二队的班子一当促成，我就回过头来解决三队的问题。我和支书马成龙商量的时候，他现出很有心计的神气说：“让三队社员民主选举。马长道连选连任了，他马成芳也没有办法，众人选的嘛！想抓你我的把柄也抓不上。万一马长道给选掉了，马成芳上台了，三队没个好，那也甭怨咱，是他们选的嘛！叫我看，马长道十之八九能选上。咋哩？社员谁不知道自家腰里别着多少票子？没有长道，他们能分钱过年吗？”

我和他的想法大致相同，用群众选举的办法，解决马成芳几个人闹事的问题，是我能想到的最好的办法，与马成龙不谋而合了。关键是我相信马长道的威望，远远超过马成芳。他虽然骂人、训人，生产却搞得好，社员得到了实惠。再说呢，没有文化而独具责任心的生产队干部，解决普遍存在的磨洋工的办法，就是骂。何止一个马长道?

选举队长的会议在三队的马棚里召开，采取投豆的办法。结果令人吃惊，马长道落选了，马成芳以多数票当选了。他胜利了！

“你看看！弄下这局面……”马成龙对我摊开手，现出为难的神色，等我表态。

“就这样。”我当场表态，“按选举结果办。”

不说马长道吧！单是我自己，心里憋得说不出口。当我离开马楼村回公社的时候，我才意识到我犯了一个错误：我太相信群众了，我太低估马成芳之流的活动能量了。群众在煽惑和挑拨的伎俩面前，盲从并不是不可能发生的。群众的眼睛也并不是时时处处以至每时每刻都是雪亮的啊！尽管我在三队失败了，而生活给予我的教育却是十分珍贵的……

春节过后，公社决定小河防洪工程开工，由我去统领这件差事。在抽调施工人员时，我想到了马长道。他本人觉得在马成芳的吆喝下憋气，也愿意离开马楼三队到河堤工程上来。

他的脾气照样不改，为了工程的质量，常常和施工的民工争吵。这是一个实干家。

这一天，我从河堤工地检查进度回来，走到河岸边的帆布帐篷前，看见马楼村的三个老汉坐在柳树下，正在玩“纠方”游戏，虽然叫不出他们的名字，模样并不陌生。他们看见我，用脚踢掉了“方”上的“人马”，停止了战斗，三张脸同时作出讨好我的笑容，说他们专程来找我，已经等了好大一个时辰了。

我招呼三位老者在柳树下坐下，我也在一块河面上坐下来，实在料想不到，他们提出要马长道回马楼三队，立马上任当队长！

“不回！”我火了，“不是有队长吗？”

我一发火，三个老汉笑得更具有巴结的意味了。他们争相告诉我，三队的夏菜烂完了。一队和二队的黄瓜已经上市，抢上了头料菜的好价，三队的黄瓜才开花哩！等到三队的黄瓜上市的时候，价钱就

该掉到二三分钱一斤了。番茄、辣子和豆角几种大面积夏菜，没有一种种得及时，而且草荒了。夏菜的收入完蛋了。

“夏菜定秤了。”精明的瘦老头说，“现在全看冬菜了。冬菜再抓不好，三队社员年终该喝风吃屁了。所以俺们来请长道，叫他回去抓冬菜，现在该当准备了，种籽呀，肥料呀！”

“他能抓得好吗？”我故装糊涂。

“当然能哇！”三个老汉异口同声。

“他不是爱罚人吗？”

“嘿嘿嘿嘿嘿。”

“他是小刘少奇呀！”

“老陈哪！”一个胖脸老汉说，“你还提那些话做啥？那号混账话是俺三个老汉说的不是？俺三人怕长道执意不回，还想靠你说服长道哩……”

“哈呀！刚撵得人家下了台，现在又要请人家回去接那个烂摊子。”我故意和老汉们兜圈子，“要是我，我就不回去。”

“众人要靠三队吃饭穿衣哩！”一位斯斯文文的老汉说，“俺三人是受众人托付，向你和长道说明民意，众愿不当违拗嘛！”

“那好吧！”我说，“等长道回来，我劝他回队。你们先回吧！”

“俺三人今日要见长道，对面说清搁实。”瘦老汉掏出烟袋，一副非做不可的神气。

“现在队里有马成芳，长道怎么好回去呢？”我说。

“现在不是讲大民主吗？俺三个老汉也想民主民主！”胖脸老汉说，“今黑约定开社员会，由俺三个老汉召集人，重选队长。当然，需要长道答应回马楼。”

“‘欢迎马长道上马’！”斯文老汉说，“俺三人前日在街巷贴了一张大字报，就是这题目，你看看，长道不回行不行？”

我坐在河石上，咂着一支烟，瞅着初夏时节的河川，杨树和柳树郁郁葱葱，大片大片的小麦正在扬花孕穗，河岸边的青草像绿毡一样可爱，陡峭的南岸的崖坡上，红石嶙嶙的石缝中长着一株株荆棘，一棵棵枸树。布谷和黄鹂在麦田上空叫出动人的声音，瞬间就消失在蒙蒙的氤氲之中了。

马长道赶回指挥部来吃午饭。他看见本队的三个老者，蹲下身来，听完他们的述说，没有说话，抬头看看我。那眼睛在征求我的意见。

“你的意见呢？回还是不回？”我说。

“回。”他肯定地吐出一个字，就摸出旱烟袋来，装烟点火，脸上虽然很平静，捏着划燃的火柴棒儿的手指却在抖索。

“这才是咱马楼人的魄势！”

三个老汉一齐站起，得意地向我笑着。

马长道招呼三位老人吃了饭，就向我交代了他所负责的工段的手续，然后把被子一卷，用一根草绳拴住，挎到肩上，跟三个老汉一起

走出帐篷。

顺着河堤，我送他，竟有一种依恋之情。

“我不是想当官。”马长道声音抖抖的，“我一家八口，上有两个老人，下有四个娃娃，负担重啊！生产队烂一年，我的日子就恓惶咧！人家马成芳烂得起，我烂不起呀！人家说我一心为公，我实不敢当，我是为自家日月能混得下去……”

他动了情。这个硬朗的汉子竟然说不下去了，喉头哽住了。我的心也抖抖地发酸。

“今日走了，不定啥时候能见面。有一句话，我今日该给你说了。”他侧过头，看我一眼，“你在马楼三队时，上了马成龙的当了。我那年扣罚了马成龙婆娘的工分，马成龙说不出口，戳得马成芳贴大字报。你开选举会前几天，人家支书早在私下里把社员组织好了。你上了圈套了。”

我不由得站住脚，想到在马楼与马成龙共事的过程，我豁然明朗了。我问：“你为啥不给我早说？”

“我说那些话做啥？”马长道说，“如果不是今天回马楼，我还是不想给你说。”

我就不再问了，看着他大步走上去，追赶走在前头的那三位老汉。我的心里忽然浮现出那个蔫蔫巴巴的马成龙的脸来，那是一个令人毫不提防的阴阳人……

这年又到头了。马长道尽管使足解数，冬菜拿得好收成，终因夏菜亏得太多而没有赶上上一年的收入。可是，三队的社员仍然很满

足，倘不是马长道接手，让马成芳折腾到年底，真不知会是怎样一种局面呢！看来年吧！马长道早已着手下年夏菜的准备工作了。他给城里清洁队队长家送去了过年的白菜、大葱和点心，便买回城粪来了。那天晚上，拉稀粪的卡车砸断了他的右腿，砸得很惨，骨头给碾成碎渣儿，不得不锯掉……

按规定，他该吃马楼三队一辈子的劳保了。他才四十八九，正当庄稼人的好岁月，怎么躺得住啊！他向马成龙提出，让他到河堤上去护管幼树，他拿队里的工分也就不觉得什么亏欠了。

马长道拄着双拐，上了河堤。河堤两岸插下了杨树枝条。往年里，春天插树，夏天喂羊，冬天烧柴，只见插树不见林。现在，马长道架着双拐，从早到晚在河堤上逡巡，驱赶着那些割草放羊的娃娃。这个人，似乎只有架着双拐在河堤上一拱一拱向前迈步的时候，才显出他全部的倔拗的气魄来。他的头顶，头发依然稀疏而头发也依然发亮，两只四棱大眼，冷峻而逼人，愈加向前突出的下巴令人生畏。在他震人的咳嗽声中，放羊或割草的孩子早躲到河心的荒草滩上去了。在他的监护下，马楼村前五华里长的河岸，形成了一个自然保护区，那些新插的小叶白杨，在河风的抚育下，哗哗哗响着蹿高了，开始织成一片浓密的林带了。

人说，跛子烈倔瞎子犟，秃子的脑袋不敢撞。三种怪人的特点，他占了两样，脾气是愈加躁烈了。远远地看见一个人走上河堤，他就架着双拐迎上去，紧紧盯着那人走过河堤，走下沙滩。他容不得任何人以及畜牲挨蹭一下树皮，简直爱树成癖了。小白杨长得可以作盖房的椽子了，丢了几棵树，他悄悄地在河堤下的紫穗槐丛中隐蔽起来，监视了一周，一任蚊虫叮咬，而终于抓住了偷树的贼。那贼只顾撅着屁股砍树，慌慌张张。马长道拖着拐子，从沙堤上悄悄地爬到跟前，

抡起拐杖，照着那颗脑袋砸过去，那贼“哼”了一声就瘫软下来。他解开裤子，照那贼的脸上浇了一泡尿，就架起拐子走了。走出十数步远，马长道坐在堤坝上，吁出一口长气，点燃了旱烟袋，看那贼渐渐苏醒过来，回头瞧瞧他，惊慌逃跑了。

他被树立为植树模范，在县上接受过县委书记戴到他胸膛上的大红花。同时也有了一个绰号：拐子马。

我在听到马长道被拘捕的消息的第二天，赶到拘留所去看他。不巧得很，拐子马已经在前一天释放回家了。

看守所长把他的案情卷宗找来给我看，有一段审讯笔录很有意思——

“你为什么要砍树？”

“我气。”

“你因为盖房缺少木头生气吗？”

“不是。我的新房已经盖起来了。”

“你要做家具用木头吗？”

“不是。”

“那么你砍树的目的是什么？”

“出气。”

“你气谁？”

“气树。”

“气树？”

“气树。”

“树碍你的路吗？”

“不碍。”

“那你为什么生树的气？”

“我也……说不清。”

“你当时怎么想就怎么说。怎能说不清？”

“我一看见那些树，心里就气得慌慌。”

“你神经正常吗？”

“我不是疯子。”

“你砍树要达到什么目的？”

“使你们有理由拘留我。”

“你活得烦了？”

“让人都知道，马楼村有人侵吞群众血汗，上级就会派人来处理了。”

“你的想法好奇怪！好愚蠢！”

“我找不到巧办法。”

我合上卷宗，掩卷沉思，拐子马属于什么类型的犯罪心理呢？我翻过一本翻译的《犯罪心理学》的书，似乎没有这种奇怪的类型。

“我们又到马楼大队做了调查，才明白了马长道砍树的真实原因。”看守所长说，“那个支书马成龙虽不像话，却没有触犯法律。马长道拥有广泛的社会同情，行为却触犯了法律。”

“法律和良心，一个老话题。”我说，“你们因此才尽快释放了他？”

“不。”所长说，“他造成的损失是严重的。他出头一砍，村民们全涌上河堤去了，大树被砍光了。村民中最多的一家砍掉十棵，马长道砍倒三棵，却一棵也没有往家拿。我们和乡政府一块作出处理意见，凡是砍倒的树，一律交出来，合了价，编了号，每户来一个人抓阄……你猜这样处理的结果怎样？”

“村民们拥到马长道家，把他的两个儿子拖到现场，要俩娃优先挑选五棵树，然后大家再抓阄。马长道的两个儿子决然不肯，大家也就瞪住眼不抓阄。逼得两个小伙子爬在两棵树上，放声大哭……”

我的心里翻涌起来，潮起一阵阵热流。

“我从马楼回来，把处理树木的情况告诉了马长道，他大笑一声，说他的气出了，诉求判他三年刑。”所长说，“我告诉他，判你十天拘留，明天就可获释了。他说他回去后，要承包河堤，十年再育出一条白杨林带来。”

我又赶到马楼村去。

马长道不在家，真叫我窝兴儿。

马长道的大儿子告诉我，他爸到县纪委去了，去告马成龙。

这个拐子马，真狠！

散文·特写

诗情不竭的庄稼汉

在西安止园招待所里，我看见一位地道的关中农民装束的人：对门开襟的中式灰色布衫，黑色粘胶布长裤，圆口手工布鞋；衣服皱皱褶褶，纽扣也没有扣齐，敞着胸；光头，黑脸，黑手黑胳膊。即使在农村，他也没有一点出众的，特殊的，可以使人作为辨别记号抓住的东西。可是，在干部和知识界的代表荟萃的止园，他的装束和肤色，以至于完全是农民的随便的走路的姿势，反而使他显得“出众”而更加突出了。

这个人叫贺丙丁，临潼县人，赫赫有名的农民诗人王老九的学生和诗友，现在是“王老九诗社”社长，代表诗社社员参加作协代表会来了。

作家、诗人、编辑们汇聚在一起，热情地握手，友好地问候，频频地互访，畅快地交谈，难得的见面机会给互相倾慕的文学朋友提供了极好的场合，这样的气氛是可以想见的。我很快发现了他。也许他认识的朋友太少，他住的房间鲜有走访者；他大约不善交际，也很少走动，因此我想到他是否会感到孤独?

第一次小组会上，当大伙都客客气气地推让第一个发言权的时候，贺丙丁自动报名发言了，于是就打破了讨论会上第一个发言难的惯常的沉寂。他完全用庄稼汉的习惯说话，一口纯粹的关中东部农民

的地方语调，把“我”称作“叉”音。没有自负，也不自卑，直言直语，倾泻自己对党和社会主义的真诚感情，叙说自己对诗人王老九的怀念和对文学事业的不倦追求……他的发言给我以最实在的感觉。他和他的民歌同时存在，坦坦荡荡，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他对于诗的某些看法不一定能说服所有的人，然而他说了，他说是因为他本来就那么想着哩！

我在他的住屋里，看见了一只用旧了的布兜，搁在枕头旁边，没有拉锁，也没有打结，看来不会有太贵重的东西的。我拨开布兜开口，就看见里头装着几块锅盔，关中农民出门习惯带着的食物，大约是他的老伴临行之前给他烙下的……农民啊！

他在旧中国时代是靠给财东家打短工熬长年度生的穷人，一个大字不识的贱民。解放了，在人民政府开展的扫除乡村文盲的识字运动中，他是第一批获得识字写字能力的庄稼人。他的聪慧，他的诗情，因为获得初步的文化知识而骤然迸发，关中农民习惯的“顺口溜”、民间口头文学形式的快板诗，一下子从他的喉咙里涌出四百多句，形象而又生动地记下了自己翻身做人学文化的真情实感：

识字课本带身边，

劳动歇息抽空念。

一笔一画仔细写，

一字一句记心间。

指头当作好粉笔，

土地就是大黑板；

这块黑板大又宽，

粉笔永远磨不完。

……

他的快板诗被发表、出版了。一个翻身农民开始对新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的变革发言了，这无论如何应该看作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

他的诗情在胸中激荡，不断地发出自己的庄稼汉的歌唱。这样一位农民歌手，不过编唱或长或短的几句民歌，并不威胁任何人的存在，依然为极“左”的运动所不容。“四清”和“文革”的目标是整垮一切干部，贺丙丁没有当干部，是个社员，本该撞不着他的。但他写过诗，写过诗就挣了稿酬，稿酬就变成了“多吃多占”，多吃多占就应该退赔……他是个农民诗人，有几句精彩诗句得以发表，得到几块钱稿费，随手就花了，变成了碗里的油盐酱醋，变成了孩子身上的花布衫和脚上的鞋面布。可是把十几年来的零星所得累计到一起，就有二千多元，而且要一次退赔清楚，人家把这叫作“零吃瓦碴，整㞎砖头”。贺丙丁无钱退赔，于是就以物相抵，一千多斤粮食（农民只有这东西）！连同他给老父亲行孝心所置备的皮袄和寿材，一律被折价退赔了……

对于一个农民，这样的打击几乎是毁灭性的。可是，令人惊异的是贺丙丁的诗情和诗心并没有因此泯灭。一当从中国的晴空扫除了那几朵黑云以后，他的诗兴大发，又编又唱，乡村里的父老兄弟又听到了他的亲切的声音了。不仅如此，他竟而组织起一个诗社，邀请天南海北的农民歌手，对唱起来了。

贺丙丁和农民诗人王老九的情谊是感人的。他刚刚写出两首快板的时候，王老九已经是蜚声文坛的农民诗人了。他家离王老九居住的北王村只有十五里路，说去就去了。在村外的田地里，贺丙丁朝一位吆牛扶犁的农民打问王老九的住处，没有料到这位耕地的农民正是王老九。他说他想跟他学诗，王老九却问他会干庄稼活儿吗，贺丙丁接过王老九手中的犁把儿，吆了两遭，王老九笑了，说他是庄稼把式。贺丙丁很自豪地说他会双手扬种哩！

两位农民诗人坐在地头粪堆的树荫下，说起诗来了，把犁地忘记了。这两个庄稼人的心，被诗的纽带连在一起。王老九逝世以后，贺丙丁悄悄一人来到坟地，站在诗兄老九的坟前，暗暗流泪。没有花圈，也没有烧纸，他对他的感情不必用这些东西来寄托，心知啊！

“王老九诗社”，一个完全按照庄稼人自己的风格建立起来的诗社，没有任何铺排和准备，他们只约定了每人写几首诗来吟诵，就算成立了。热心的新老诗人们当即提出要办诗刊，一切都不能成为阻碍诗社办刊物的问题，只有经济发生了困难。贺丙丁当即提出捐献二十元钱，其他同志纷纷慷慨效法，油印刊物所需要的纸张解决了。

贺丙丁是个农民，种地是他谋取生活财富的主要手段，种粮食务棉花，养鸡养猪，都是他和任何一个农民一样的必须劳作的项目。晚上，他跑到几里路以外的公社文化站，那是诗刊的编辑部。他坐下来，开始审阅，选择，修改那些从四面八方寄来的诗稿。没有工分，也没有工资或补贴，更没有稿费，一切都是自觉自愿。唯其如此，这个编辑部少了许多是非和纠纷。他审定了稿子，就交给诗社一位专事刻字的诗友，照样，义务刻蜡版。然后大家一齐动手，推印的推印，装订的装订，又用自费把这些油印的诗刊寄送给诗社的社员们。

贺丙丁是社长，总要到县上或西安为诗社办一些事情，他背上布兜，装着老伴烙下的锅盔，自费乘车，办完事，随便蹲在哪家茶棚下喝一杯酽茶，吃两块锅盔，就完了。

诗社赢得了广泛的支持。《延河》发出了诗社成立的消息，吉林一位书法家挥毫致意，广西、湖北、山西的民歌手们纷纷寄来诗稿，不为挣钱，“只为八亿农民争气”！有一位农民把卖了旱烟叶子的五元钱捐寄到诗社，退回去又寄来了。有人捐赠来刻版的蜡纸，真是动人哪！

诗社在扩大，农民为主，兼容其他。在现有的六十六名会员中，就包含着中学教员，大学教授，文学刊物的编辑，都愿意加入到“王老九诗社”里来，本省一位热心的大学教授，选择了四十多首中外古今优秀民歌，给诗社社员免费授课，引得许多农民前来听讲，盛况空前。

他怎么会有孤独的感觉呢？他拥有那么强大的后盾、多么广阔的天地啊！我在和贺丙丁畅快地聊过一番之后，忽然想到了八亿农民这个不容忽视的数字，也就思索着贺丙丁和他的诗社的前景来，不必怀疑，在八亿农民普及高中和大学教育之前的这一段难能推计的时间里，民歌有广阔的天地——平原，山野，草原和戈壁——可以自由驰骋。即当整个乡村普及高等教育，又当如何呢？优美的民歌不是文化教养愈高的人愈爱听的吗?

1983年10月18日

鲁镇记行

百草园的月色

从上海到绍兴，经过八九个钟头的长途旅行，傍晚到达。安顿了下榻的处所，匆匆吃罢晚饭，赶到鲁迅先生的故园去观瞻，天色已经完全黑下来了。

一条宽阔的水泥铺就的街道，两排树荫浓密的法桐，这是“鲁迅路”，以先生名字命名的街道，路灯的亮光和两边大小铺栈窗户的灯光交相辉映。

一方黑色的木板门，已经关死，没有门楼，似乎也没有什么装饰，仅仅就是在砖墙上安着这样一方黑色的木板门，这就是鲁迅先生世代的故居了。中国现代的思想和艺术的巨人，就在这窄窄的门洞里面诞生。

宅院狭窄，颇深，门房，过庭，天井，先生住屋，鲁母住屋，再后边是闰土父亲在鲁家帮工时的住屋，屋里有一个捣米的石臼。

后院里，就是那个被先生浓笔重彩描绘过的百草园了。

灰蓝色的天幕下，有一弯细细的金钩似的月亮，洒下一片朦胧的月光。一株高大的树干，浓密的叶枝，辨不清是“高大的皂荚树”还是缀满“紫红桑葚”的桑树。草园里的花草，也辨不清哪儿是“碧绿的菜畦”，哪儿有“何首乌藤和木莲藤缠络着”的情态，更难以摘食“覆盆子”“又酸又甜”的“像小珊瑚珠”一样的果实了。

月色朦胧。我们这一帮从南方和北方聚拢到一起的先生的学生，现在都散立在月色朦胧的百草园里的草地上，听一位据说是鲁（周）家同族后裔的中年人，介绍这幢故园的今昔。他说一口绍兴的地方话，真是叫北方人大惑莫解，几乎一个字也听不懂。朦朦胧胧的夜空，朦朦胧胧的百草园，朦朦胧胧的树，朦朦胧胧的花、草，朦朦胧胧的鲁镇的地方语言……

既然听不懂，我索性不听了，一个人到园子里去转悠。我心里似乎并不迫切要求听到介绍的话，只是想到这儿来走一走，看一看，站那么一会儿，有一次心理感受就满足了。是啊，百草园，我早就熟悉了，早就背熟了《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的散文，也就熟知这儿的一切了。"鸣蝉在树叶里长吟，肥胖的黄蜂伏在菜花上。轻捷的叫天子（云雀）忽然从草间直窜向云霄里去了。"在我心中印下的这幅动人的百草园的图画，掐指已近三十年了，今天晚上才得以漫步其境了。

时值初夏，夜气温爽，听不到蝉鸣，也听不见蟋蟀的叫声。我漫步在草地上，自然地记起学习这篇课文时的情景。语文老师是一位刚从大学中文系毕业的青年，热情极高，甘肃人，一口南腔北调的普通话，却把课文朗诵得十分动人……我一边听着老师领读，脑子里却展开另一幅图画：刚刚收割过麦子的南坡上，田块层叠的坡地上，麦茬儿闪闪发亮，塄坎上和坟丘里，野蔷薇红的和白的花儿开得一片灿烂，野葡萄藤蔓一直攀缘到构树梢上去，酸枣棵子是山坡上最大的家族，那翡翠般的绿色或紫色的蚂蚱，总是藏躲在酸枣棵子最稠密的枝杈里。我和小伙伴们，头顶艳阳，脚踩枣刺，整晌整晌地捕捉那可爱的生灵儿，忘了吃饭，忘了时辰，直到渴得舌头搅不动，头上无汗可流，也顾不得到沟底去喝一口泉水……我从来没有想到过这些生活如此富于意趣。而当我从乡野跑到城市，坐在高楼明亮的教室里，听陇

音普通话朗诵《从百草园……》的时候，才一下子戳开了记忆的窗户，唤起对我的百草园——黄土高原之中的南坡——无限丰富有趣的依恋。

读先生的这篇课文的时候，尚在我的少年时期，人生的那个充满幼稚心理的时期，是极易与这篇文章的感情相吻合的。当我漫步在向往了近三十年的百草园中时，已经是个顶透而须密的中年人了，而心境却一下子回返到了童年……

哦！我的向往中的南国的先生的百草园！

哦！我的遥远的北方家乡的黄土高原之中的南坡……

在“咸亨酒店”

上午游览了东湖，下午又要到王羲之作《兰亭序》的地方去，明天一早就要返回上海了；东湖的山光水色令人赏心悦目，兰亭的幽雅景致也叫人神往。可是，没有到孔乙己曾经喝酒吃茴香豆儿的“咸亨酒店”光顾一番，怎么能算真正到过鲁镇呢?

午休时间，几位朋友相邀，正中下怀，虽然已觉腿酸眼困，仍然兴致勃勃地走出住所的大门了。

一块金字黑匾，老远就赫然入眼，上书：咸亨酒店。平房，黑色小瓦，坐落在街道旁边，夹挤在高高低低的楼房中间，自有一副古香古色的神采。门面宽约三四间，木门板全部拔除，整个酒店就完全无遮无挡地当街敞开着。依然保持着“鲁镇的酒店格局”，“当街一个曲尺形的大柜台”。那木板制的曲尺形的大柜台，油漆斑驳，木棱也已磨光，探过头去，可以看见赭红色的酒坛。我把钱递上去了。

卖酒的是一位中年女人，穿着白大褂，使人觉得有失鲁镇的格局，与那曲尺形的柜台也不协调。她用一只提斗从酒坛里提上酒来，倒入酒杯，黄酒其实是暗红色的液体。这杯子更古朴，用洋铁皮焊接而成，大到可以盛一斤酒，上端粗，下端细，状如漏斗。据说冬天喝酒时，可以把细端塞进热水里，用以温酒。鲁镇的长衫阶层或短衣帮，当年就是用这样的酒杯，孔乙己自然也用这洋铁皮酒杯。

茴香豆也不能不尝一尝。不尝一尝孔乙己津津乐道的茴香豆儿，也许不算真正地进过“咸亨酒店”呢！

“不多不多！多乎哉？不多也。”

我们刚刚在长条桌边落座，不知谁在拖长声调模仿着孔乙己的名言，摇头晃脑说起来了。木条桌长到丈余，从门口直通到墙根，实际应该算是木案子了。一切遵循孔乙己的习惯，他是穿长衫阶层中唯一站着喝酒的人，于是我们也都站着；他大约用手指捏茴香豆儿，于是我们也免去了筷子。那用精米酿成的名曰“加饭”的黄酒，说不准是一股怎样的滋味，既不似白酒那么烈，也没有葡萄酒那么甜，说不上好喝或不好喝，唯其因为孔乙己十分喜好，我拼着将那一杯全然灌下了。那茴香豆儿也没有多少特色，唯其因为孔乙己喜欢，我们嚼起来，似乎别具兴味。

酒店墙上，有一副裱饰过的题词，一副对联，题词曰：

上大人孔乙己高朋满座

化三千七十士玉壶生春

对联曰：

小店名气大

老酒醉人多

看看题款，竟是著名作家李準献辞，著名表演艺术家于是之手书。辞联极致幽默的韵味，笔墨亦遒劲潇洒，使古朴的“咸亨酒店”平添了一丝风韵。

孔乙己确实是高朋满座了。小小的酒店里，现在拥拥挤挤坐着的酒客，大都是从南方或北方来到鲁镇而落脚此店的。有穿着西装革履的学者风度的男女；也有一身正统的中山装的很有派头的干部，很难料定他们之中绝对没有县委书记或市委的部长；更有一帮一伙长发披肩紧绷牛仔裤的青年男女，一律坐着或站着喝着装在洋铁皮酒杯里的“加饭”酒，抓着茴香豆儿，笑语喧哗……解放以后，自打先生的《孔乙己》收入中学语文课本，每一个受过中等教育的新中国的一代又一代青年，不管其是否特别喜欢文学，大约没有谁会忘却孔乙己的。

孔乙己不属英雄之列，而实实在在是一个被挤扁被碾轧为尘末的迂腐的老夫子；那些主宰鲁镇风云的鲁四老爷之流早该化为污泥了，而独有上大人孔乙己获得了川流不息的朝拜者，真是得其所哉！

1984年7月8日

一九八三年秋天在灞河

秋收秋播时节，我住在丰饶的渭河平原东南边沿的原坡地区——灞河川道里，沿着河川公路走过去，穿过一个个稠密的大大小小的村庄，走到哪里都能看到，满树满墙吊挂着剥光了衣壳的黄灿灿、白生生的苞谷棒子。一座座庄稼院的檐墙和背墙上，木橛上挂着一串串苞谷；前院和后院的白杨树、榆树和椿树的树杈上，围垒着或悬吊着苞谷棒子；在临近两棵树杈间横架一根木椽，苞谷棒子像珠帘一样凌空垂吊着，构成一幅奇致的蔚为壮观的景象。

这是庄稼人储藏刚刚收获回来而尚未干透的苞谷的临时措施，倒像是搞苞谷丰收展览似的。无论如何，这种景象在我是稀罕的。农民对于粮食的珍惜之情已经远远超越了爱物的范围，而作为一种道德的规范了。一家农户储藏粮食的数量，作为一种家庭秘密，大约不亚于任何军事情报，任何人很难准确探知谁家究竟有多少粮食储存。这是以往的乡村生活给我留下的印记。一九八三年的秋末，我走进任何一个熟悉的村庄，不用打问，一家农户的苞谷储存数量，就展示在墙上和树杈上，随意去估计好了。对于粮食储存量的秘密自然地打破了，没有必要闪烁其词，用时兴的话说，农民不怕“冒富”“露富”啰！

我到原坡上的一个小村庄去。道路泥泞，砍倒的谷秆摊摆在坡地上，被雨水淋得变成灰黑色。阴雨绵绵，河口刚露出一抹云霞，又被雾云笼罩了，看来一时晴不了。

我记起这样一件事来——

我在这个公社工作的时候，有一年秋后，到了唐家村，坐在中年队长家的两间厦屋里，隔着一张方桌，坐着说话。他递给我一缸开水，并不介意地说：“没有茶叶。”我喝着开水，和他聊着冬季农田水利建设的事，无意间一抬头，看见厦屋的木楼上，架放着一堆苞谷秆。像苞谷秆子这样的柴火，庄稼人在过掰苞谷棒子以后，从地里尽快地清理干净，堆放到地头的渠沿上，摞靠在树棵周围，待到冬天干透了，再拉回场院里，当作柴火，烧饭或者煨炕，也有当作粗饲料粉碎以后喂猪的，并不是什么值得珍贵的宝物。这位队长把苞谷秆子藏在楼上，我觉得奇怪而且有点好笑了。

“这些苞谷秆子，你也把它藏到楼上，不怕劳神吗？”我笑着问。

“喂猪哩！”他挺认真地说，“放到露天，雨淋雪捂，就霉坏咧！”

“那……你这一间小楼上，能存多少嘛！”

“嗨！说起来你不信，这是我今年秋里分下的全部柴火。”他咂着旱烟袋，不好意思地笑笑，难为情地说，“就这一点儿，不敢糟蹋，才放到楼上，凭它喂猪哩……”

少得令人难以置信，我的心在微微战栗。这样的木楼，那是关中农民传统的囤放小麦的地方，并不是堆放柴火的，现在只能储存苞谷秆子了。可以料想我们的农民缸里能有多少粮食储备。

为了这个不能抹掉的记忆，我今天专门来寻访他，不巧，他赶集卖羊去了。站在他家门外的场塄上，可以看见庄前屋后的树杈上，挂满了苞谷串子；小山似的苞谷秆子，堆放在猪圈旁边。他的女人担水回来了，几年不见，自然显得老了一些，招呼打过，就说起家常来。

“吃是吃不完了，能吃多少呢？”她笑着说，“一年到头，纯一色的麦面；不吃苞谷了，只喝苞谷糁糁。”

我并不惊奇，却不由得瞅瞅那储藏过苞谷秆子的木楼，现在摆着一排瓷瓮和瓦缸，她说那里全都装着麦子。厦屋里靠墙栽着四只废旧的铁皮汽油桶，也是装着麦子。木柜、瓦瓮、铁桶，全都被麦子装满了，苞谷没有存放的器具，只好挂到墙上和树杈上去。

“一年四季，净吃麦子，咱而今比地主的生活还高咧！”

对“白馍夹油辣子”的向往，是这里的农民对理想中的生活水准的形象化描绘。这样的生活，理应在人民获得政权以后早该做到了，由于人为的或自然的诸种因素，使我们的庄稼人忍受了不该忍受的饥苦。“一年四季，净吃麦子”，就是这个地区一九八三年秋天的农民的生活水平。这个水平，不算太高，较之牛奶加面包还有相当一段距离，可是农民已经十分满意了。

我在河川里的一个较大的村子里，遇见一位熟识的队长。他神秘地问我：“你在粮店有认识的熟人没有？我想卖超购粮，粮店不收！”

超购粮比一般购粮价格高百分之四十，他想为社员多卖点钱。粮店因为储藏设备有限，不予收购，于是就出现了卖超购粮要找熟人“走后门”的现象。

“要是能成，我们队卖十万斤。”他口大气粗地说，随之嘿嘿嘿笑了，“那年为求一千斤苞谷，你跟我谈了三个晚上……”

他倒记着而且提起这件事来。那一年，上级给公社追加了超购粮任务，公社咬着牙接受了，几经商讨，给他的小队分配了一千多斤苞

谷超购任务。我找到他的时候，他蹲在初冬的田埂上，甩着手，扭着脖子，四方脸上满是为难的神色："一千来斤苞谷，论起不算啥大事，给社员不好交代咯！社员要骂我哩……"

就为这一千来斤苞谷，我跑了三次，说服，劝解，费了九牛二虎之力。

"啊哈！我现在才信了你那年说的话……"

"我说过什么话？"

"你说，在美国，人家把苞谷只当作饲料……"

噢！那一年，就是为那一千斤苞谷，我和他闲谝起在粮食已经过关的国家里，苞谷这种杂粮已经不作为人的口粮，而只当作饲料用。他带着决然不能相信的神情说："那多可惜呀！怎能这样糟蹋粮食呢？"他怎能相信呢？当时在农民之间悄悄进行着的粮食交易，苞谷价格已经涨到三毛一斤了！

"咱们村里，现在也是用苞谷喂鸡，给猪追膘，真个只当饲料咧！"他咧着大嘴笑着，很天真的一副得意的神气，"我才信了你说的话。"

生动活泼的生活现实，浅显不过地解决了理论上长期争执不休的问题。

我无法满足他的要求。他有点失望，抱怨说："国家多建几个粮库怕啥？苞谷挂在树上，雨淋老鼠咬……"

渭河平原，连续四十多天阴雨，据说是气象史上百年不遇的天气。灞河川道里，黑蒙蒙的云雾终日遮罩着南原和北岭，空气里弥漫着霉腐的气味。灞河流淌着黄色的泥水，原坡上的梯田溶水达到饱和状态，许多地方出现了滑坡，田堰垮塌了；到处冒水，糊汤一样的稠泥水从坡沟间倾泻下来，淹泡了河川里的田地，灾情严重。

麦子播不进地里去，而农时节令眼看要耽误了，连阴雨还在淅淅沥沥地下着。原坡上，河川里，在一踩一陷脚的田地里，农民在冒雨播种小麦。大小机具无法施展威力，全部变成了双手操劳。随处可以看到夫妻、父子以及放秋假回乡的中学生，家眷在农村的国家职工，一人抱一把镢头，在挖泥种麦；有牲畜的农户，勉强用铁犁在泥泞黏糊的田地里划下一道道沟渠，撒下种子。没有办法，自然灾害所致，无法讲求播种的质量了，只要不违节令农时，如期播下种子，冬里和明春加强管理，仍然可以弥补播种的粗放。劳动是沉重的，在这样糟糕的雨季里就更加沉重，但庄稼人的心劲是高涨的，把希望的种子终于埋进土地里去了。

在这条熟悉的河川里，走到哪里，我感到充实和振奋。无须只把眼光盯着为数不多的“万元户”，以为只有他们才能说明我国农村经济变革的意义，也无须因为仍有一些新出现的问题而摇头摆手。生活毕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生活前进了。

言论

突破自己

××同志：

你好。上月初的来信收读后，心里很不安。你因为坚持较长时间的业余文学创作而“一无所获”，“在一次又一次的退稿面前，不得不承认自己‘先天的基因’不足这个事实了”，因而决定罢手，再不做这样的“无效劳动”。你不是因为兴趣转移，也不是因为其他原因，恰恰是被天才的神话吓住了，怀疑了，动摇了，放弃了自己对文学事业的追求。我感到遗憾，深深的遗憾。

我不想说天才的有无，因为我至今也搞不清这个神秘而又吓人的字眼里究竟包含着怎样的意思。我只是确信我自己没有“先天的基因”，更与“天才”没有缘分；我只是深知在处女作发表之前，经受一封封退稿信的痛苦是一个较为普遍的现象，许多活跃于当代文坛的令人景慕的中青年作家都不能逃脱这种“残酷的现实”。无须举证，几乎每人“都有一本血泪账”。我想，如果这些当代文坛的健儿在一鸣惊人之作发表之前的痛苦磨炼中，突然被“天才”这个魔鬼迷了心窍，从而中止了创作，那么对于当代中国的文坛，该是一个多大的损失！相信“天才”而终于被吓倒了的，可能正是许多“天才人物”。据说有个别“天才作家”没有经受过这种痛苦，非常轻松，一写即能发表，一发表即引起震动，连本人甚至也觉得竟是意想不到的容易。这样的“天才”，我不敢说一定没有，但一定很少。既然我们都不是“天才”，都不具备“先天

的基因”，那么我们就不能循着“天才”的足迹走，宁可少看或不看“天才”们扬扬自得的面孔，免得灭了自己的志气。多读一些“先天基因”甚微乃至完全没有“天才”、在通过艰苦卓绝的奋斗中对人类有所贡献的人的事迹，对我们将是一种鼓舞，使我们受到启发，增加奋斗的志气和追求事业的韧劲。

我以为问题的要害在于，人在理想和事业的追求过程的各个阶段，对自己的实际能力应有一个认真的客观的估计。这种估计不是猜摸“天才”成分的多寡，而是自己此时或彼时对于自己所钻研的学问所实际达到的把握。自己在某几个方面强些，在某几个方面弱些。对于强的一面或几面如何进一步巩固和发挥，对于弱的一点或几点如何加强。而尤为重要的是，能在诸种因素中，找到致命的关键的薄弱环节，作为这一阶段学习和攻占的目标，作为前进的突破口。这一薄弱环节被突破，其他的薄弱环节中又有一点相对地变成新的至为关键的薄弱环节，又成为新的突破口。我以为，突破首先是打破自己的局限。

文学创作是一种复杂的劳动，甚至带有某些神秘色彩。我以为不论如何复杂，如何神秘，还是不外乎柳青生前所讲的作家要经过“三个学校”的总概括，即生活的学校、艺术的学校和政治的学校。作家为什么要深入生活，理解生活，从而达到对生活的艺术概括，创造形象的理论；作家为什么要学习政治，提高思想以强化自己对生活的现实内容和历史内容的独到而新鲜的认识，深化作品的主题；作家如何加强艺术素养而提高自己对于所了解的生活的表现能力，等等，柳青都有独到而精辟的见解。我这里所要说的正确估计自己，从而不断地找到突破口的意见，仅仅局限于艺术表现能力的学习范围之内，或者更具

体地说，就是在成为大作家之前，练习文学的基本功力的过程中应该注意的事。

即以短篇小说这种文学形式的创作来说，有主题的提炼、人物塑造、结构的形式、情节的铺展，这些大家所常说的几个方面。再进一步说，文学语言的锤炼，细节的选择和描绘，人物对话如何恰如其分而又绘声绘色，叙述语言怎样避免干巴巴的事件或过程的介绍，变成一种形象的叙述，何处适宜浓墨重彩细致描绘，何处又必须一笔带过而绝不应多写一句……这些文学表现能力的基本功夫，全部都得经过实际的练习而后才能有所提高。从优秀作品的阅读中得到启示，在自己的实际写作中得到磨炼，不断提高。而在这个过程中最害人的是某些小说作法——各种变换花样的小说作法。所有这些文学表现的基本功夫，只有在写作中——无数次失败中——去获得。

我在发过三四个短篇之后，有一次小结。这三四篇小说，篇幅都在二万字以上，好多同志都说那实际已经是中篇的架子了。在短篇的结构问题上，我不是千方百计，仅仅是一方一计，太单调太笨拙了——我找到了自己的突破口。我集中阅读了一批国内和国外的优秀短篇，最终选定了莫泊桑的短篇小说，重点学习莫氏的许多优秀短篇的结构手法。从而打破了自己的局限，从篇幅上一下子缩小了，此后的习作大多数在万字以内，多有六七千字的习作。后来一次找到自己的突破口，是语言。一批作品发表了，有的同志说我的文学语言生活气息浓，好得很；有的说那语言简直不堪一读。我觉得这些话都有可取之处。我的语言实际所达到的程度，不是至善至美，也不是不堪一读，而是有待于进一步锤炼和提高，使其更富于美感。语言的美有各种内涵，有人欣赏华丽，有人喜欢淡泊。我喜欢一种刚健而富于弹性的生动活泼的语言。一种对活泼的生活语言经过提炼的优美朴实的文

学语言，成为我追求的目标。第三次有意识地寻找到自己的艺术表现能力的突破口，是感情色彩。这是听到评论家和读者的评论和意见之后，归结出来的。写小说是写人，写人是要写这个人的典型性、形象性，这是老生常谈的话。但写人的什么？形象而逼真的肖像吗？历尽艰辛的生活道路吗？可歌可泣的英雄行为吗？是的，这些都要写。但这仍然不够，应该更进一步明确地意识到，在他或她的生活道路的艰辛历程中，英雄行为中，准确而生动地写出他或她在此时此景或彼时彼境下的感情色彩，感情波澜，以情动人。作品与读者之间是以人物的感情进行交流的，人物的感情色彩出不来，读者就觉得乏味了。某一段叙述或描写（乃至风景环境描写）一旦离开作品人物的感情的纽带，读者立即就想跳过去。在人物感情的描绘中，我觉得首先是准确。准确排斥虚假。所谓把握人物性格，在很大程度上是把握人物的感情波动的浪潮。意识到这一点，我在尔后的习作中努力争取写准确（不足或过分都不算准确）人物的感情。

这种不断地找到自己的“突破口”的办法，是我近几年间在业余创作实践中自己摸索的，我以为是切合我的实际的。要找到自己的“突破口”，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需要冷静，甚至需要对自己的近于严酷的态度。完全凭自信而觉得不必遇伯乐，不行；完全自卑而觉得“先天基因”不备，也不行。要自信而又不自信，自信——经过学习和磨炼，敢于肯定自己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文学素养；不自信——更重要的是看到自己还有许多薄弱环节需要突破。这样，我们就能始终踏实地去学习，去摸索，去积累自己失败的和成功的经验，不以误有“天才”而自喜，不以自己无“天才”而却步。扎扎实实地进行文学基本功的练习，走完处女作发表之前这一段较为漫长，较为痛苦的创作道路。

处女作发表以后又怎么样呢？仍然继续着新的痛苦。处女作发表之后而连续发了十几篇乃至几十篇作品，反应平平，评论的冷漠（不是因“风”而致的偏见），急于提高和突破的痛苦绝不轻于处女作发表之前。即令有一篇“震世”之作发表了，尔后又出现一批平庸之作，又会陷入不能突破（这种突破已不同上文所说的突破口）的痛苦深渊。我的体会是，在创作这项事业中，欢乐是短暂的，痛苦是永恒的。痛苦中有追求，有不满足现状，有新的渴盼，因此永远不会完结。痛苦没有了，希望也就没有了。

无论我们能否在文学事业中有所建树，或建树的大小如何，既然从事这个迷人而又复杂的令人痛苦的事业，首先必须打破某些玄而又玄的关于“天才”的吓人的宣传，排除一切轻易取得成果的侥幸心理，而把自己的脚跟站在艰苦奋斗、努力登攀的基地上。柳青有一句名言传世：文学是愚人的事业。

以上说了这些很肤浅的话，愿共勉。

祝进步。

致以

敬礼

陈忠实

1983年11月2日

从昨天到今天

农村已经发生了和正在发生着巨大而深刻的变化，伴随着这种变化，产生了一大批农村题材的优秀作品，及时地反映了这场发生在几亿农民中间的伟大的历史性变革。随着改革的深入发展，文学创作应当更深刻地去反映它，已经成为时代和人民对农村题材创作的迫切要求。

作家研究的主要对象是生活。生活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旧的秩序和旧的组合形式打破了，新的秩序和新的组合正在建立之中，用过去的眼光看待今天的农村生活和农民，真有点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看不大清了。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深切地感觉到自己理论的贫乏和理解生活的无力。

农村生产责任制的推行，不仅仅是一种生产管理体制的简单的变革，由此开始，价值观念、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道德观念等方面，也都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化，农民的精神世界开始呈现出多层次的心理状态。及时而迅敏地捕捉这种变化，首先要求作家的思想保持与时代发展相适应的活力。否则就很难“感光”，如同过时报废的胶片。

生活在变化。无论这种变化多么剧烈，总是与过去相联系。今天是从昨天走过来的，没有昨天就不会有今天。没有几十年农业政策当中一阵紧过一阵的自我限制的极左影响，就没有今天强烈的变革要求和如同大坝开闸般的汹涌欢腾的洪流。换得今天这样令人鼓舞的局面的代价是沉重的：八亿农民用了二十多年的艰苦奋斗和摸索，花费了整整一代人的心血和气力。从昨天到今天的变化中，有生动的生活发

展的内在联系，有深刻的历史的必然规律。相比之下，简单的图解式的公式化的作品就自然显得日见其绌了。不掌握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精神实质，不了解现代科学的普通常识，就无法打破自我束缚的思想局限，就无法理解生动活泼的生活现实，过时的报废的胶片再也不会“感光”。学习理论，改变知识结构，以强化自己透视生活的能力，保持思维系统的“胶片”的敏感性，保持思想上的活力，比较深刻地理解过去了的生活和正在变化着的生活的必然联系，已经是我极为迫切的需要了。

我在基层农村工作过较长一段时间，原以为比较熟悉农村，了解农民的。现在看，那只能说是比较熟悉昨天的农村和农民了。对于今天的处于变革时期的农村和农民，因为工作的变化，离开了旋涡的中心，缺乏直接的了解了，没有过去身在其中的那种欢欣、焦灼、忧虑和向往了，有一种雾里看花的朦胧感，有些陌生了。生活变化的时候，如流水有了跌差。有跌差才有响声，才有喧闹，才有浪花迸溅，才有在缓缓地流动中所看不到的壮观奇景。没有对一个村庄，一个农家小院的过去和现在的真实的了解，没有对一个个社员、干部、男人女人、老人青年的生活道路的具体的了解，就很难写出自己对生活的独自的发现。我迫切地需要和他们通话。之所以迫切，有一点担心：处于急剧变化着的这一段生活过去了，尔后永远再也不会重复了，这在自己对农村生活的心理感受上，将会留下一段空白，而且是无法弥补的历史性的空白。

1984年5月

关于中篇小说《初夏》的通信

忠实同志：

您好！

遵嘱拜读了您发表在《当代》第四期上的中篇近作《初夏》。杂志的编者把它放在一卷之首，它是当之无愧的。我读它，自始至终，保持着一种亲切和喜悦的心情。

首先使我感到亲切和喜悦的，是您的作品保持着陕西作家在描写农村生活，处理农村生活题材时的那种传统的现实主义风格，那种洋溢着渭河平原农村浓郁的生活气息的风格。在阅读之前，我曾问过读过这部作品的同志有什么观感。得到的回答是：像《创业史》，连一些人物都像。在我读完之后，却没有产生这种感觉，只是觉得在风格上有着上述共同之处罢了。

这种创作方法和艺术风格上的共同之处，不是互相模仿的结果，而是来自作家们同人民群众、同革命干部之间的关系的那种共同之处，是来自作家们同现实生活的关系的那种共同之处。这个共同之处就是，他们都是把自己摆在群众之中，摆在干部们之中。他们所描述的群众，是他们的父兄、姐妹，他们所描述的基层干部是他们的战友、同事，甚或就是他们自己。他们不把自己摆在生活之上，不认为自己是生活的见证人或审判官。如果有所针砭，有所干预，那他们也同时在针砭自己，或干预自己。这样一种生活态度和艺术态度，在作品中，就十分明显地表现出作家和他们所描写的人物之间那种亲密无间的气氛，特别是同他在作品中所作的某种批评的人物之间的那种既

严肃而又亲密无间的情调和气氛。您的《初夏》，正是在这一点上，使我深为感动。您对我们讲述了冯景藩老汉和他的儿子冯马驹的故事。您笔下的冯景藩，在当前描写农村题材的作品中，在一系列基层干部的形象中，可算得是一个新的人物典型。读着冯景藩的故事，只要是真正熟悉当代农村生活的人，就会一眼看出它的作者是从农村生活中走来的，是同冯景藩在农田基建大会战的工地上，或在县三级干部会议中，是在一个麦草铺垫的通铺上滚过多年的。

您来自农村，来自基层，冯景藩们既是您的父兄，而您又曾是他们的领导。您曾同他们一起在一间茅草屋顶下度过困苦的生活，又同他们一道经历过解放的喜悦。您曾仰着脸看那年轻的共产党员冯景藩们是怎样地叱咤风云地带领群众反封建，斗地主，分田地；又曾见他们是怎样意气风发地率领群众，建立起全县第一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在社会主义的大道上迅跑。尔后，您又作为他们的同事和上级领导，带领他们在兴修水库，或在平整土地的大会战工地上，同他们一道，度过多少个风雪严寒而又热气腾腾的日日夜夜。你们有过共同的理想和欢乐，也有过相同的困难和烦恼。您是深知冯景藩们的，因而您笔下的冯景藩就显得格外真实和感人。在小说中，您虽然只用了极少的笔墨做了一点回叙，却也对冯景藩的一生做了较为公允的评价。这也正表现了作者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公正的立场。如果说，要寻找什么不足之处的话，我倒是觉得，您在描写冯景藩当前的思想行为方面，用文学行话来说，即人物的性格发展方面，是不是意念性的东西稍微显得多了一点？您告诉我们，冯家滩支部书记冯景藩，二三十年来，把他能献给冯家滩的一切都献出了，特别是连出外当脱产干部的调令都拒绝了，然而到头来一事无成，联产承包使他感到幻灭，他从中做出了一个错误的结论，认为自己忠诚工作吃了大亏。他的思想发生了极度的变化，他认为现在对他来说，一是在公社养牛场给自己找个落脚

之处，更重要的是给儿子在县上谋一份好工作，他因此而同当队长的儿子马驹发生了激烈的冲突。这一切，您都写得很真实，合情合理，但这只是事物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冯景藩毕竟是当过多年支书的老共产党员，大队的老干部，受过多年党的教育，在他和一心想把队搞好的儿子的矛盾冲突过程中，他的思想必定也是十分复杂矛盾，必定也同时在经历着剧烈的内心斗争的，绝不会像一个普通的农民群众那样简单，那样毫无顾忌。所以，您是不是把景藩老汉的思想活动，行动做法，对马驹的态度和举措，都处理和描写得简单了一点？如果您同意我的看法，我便大胆地建议，您在出单行本以前，再加加工，从这个角度上，把景藩老汉好好地刻画刻画，我相信它将会带给您艺术家才能体会到的快乐。

您的其他人物：马驹、德宽、牛娃、来娃、彩彩，都写得很好。特别是马驹、德宽和来娃，形象鲜明，真实感人。而其中最突出的要数德宽了，您用您那惯常使用的朴素无华的白描手法所描写出的冯德宽，却是一个光彩夺目的人物。这儿表现出了您的艺术的功力。

还有一点我想要告诉您的，是从艺术地表现生活的广度和厚度上，在生活气氛的浓度上，同您过去的短篇小说相比，《初夏》可以说是个飞跃。您这些年来写过不少优秀的短篇小说，得到广大读者和文学界的普遍赞赏，我也是您的小说的赞赏者的一员。但您那些优秀的短篇小说，包括获奖的作品《信任》，您在艺术处理上，我这里说的是对生活的剪裁上，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是剪裁得很干净。这是长处，也是短处。剪裁得过分干净，有时就会给人一种刮得太光太薄的感觉。《初夏》则颇不相同，生活的诗情画意之味，浓郁得多了，读起来常常令人沉醉。

只读了一遍，尚未细嚼，一点感觉和印象，拉杂写来，博您一笑。

您近两年来特大丰收，顺致祝贺！

握手

王汶石

1984年10月8日

王汶石同志:

您好。十月八日信诵悉。您对《初夏》表示的热情和理解，对我是一种巨大的鼓舞和激励。我和其他作者一样，一部作品公之于世，总是希望更多地听到社会各方面的反映，尤其是倾注了自己较多的心力的作品，即使是纯批评性的意见也是好的。我将从诸多的反映里总结得失，不断地矫正自己的笔锋。因此，我对您的热情洋溢的信表示感激，我无疑从您的坦诚的意见中获得极好的教益。

近几年来，我在创作的路上经历着许多苦恼。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随着农村经济改革的开始，农村生活出现了剧烈的变化，呈现出纷繁复杂的现象。我首先感到的是自己的理论对于生活理解上的无能为力。加之慑于对于图解政策的农村题材的创作教训，我一度曾经想到写过去了的已有历史定论的生活，或者写点童年的回忆，躲避现实生活的困扰。

这种想法是徒劳的。我无法背向现实，在生活的巨大的变革声浪中保持沉默，也无法从嘈杂的实际生活中超脱出来。一九八〇年冬到

一九八二年春天，农村再也找不到一个可以潜心静气地读书和写作童年回忆的安静去处了。此时我虽然离开了农村变革的旋涡，不在公社做实际工作了，但依然被那里正在发生的事情所牵扯，所苦恼，甚至牵肠挂肚。我在文化馆里，几乎天天有文学爱好者来访；或是我所认识的农民到镇上来逛集，顺路就转到我的住处。这些人一坐下，就对刚刚开始宣传，开始实行的责任制谈兴十足，慷慨激昂的议论，无穷无尽的忧虑，使我得以了解许多村庄里正在发生的种种好的和不大好的事。星期六回家时，路经我工作过十年的人熟地熟的乡村，常常被干部或社员挡住，直截地征询我对他们困惑莫解的问题的意见，有时在路边的树荫下蹲下来，一扯就有一两个钟头，他们谈到的许多事，常常牵动我的感情。回到家中，“责任制”就更具体地缠住我了，我的祖辈以土为生的家庭，将会在新的责任制实行以后得到什么可以预料的好处，以及可能发生的困难。我又有机会参加区委的一些会议，听到队、社、区三级干部们的种种意见和争论。那些我比较熟悉的领导和同志，他们的喜悦和苦恼，和我的喜悦和苦恼纠缠在一起，我无论如何无法与乡村间突然掀起的这股汹涌的声浪隔离间断，或者至少保持一段能使自己超然物外的距离。生动活泼的生活现实，常常使我激动得难以入眠；生活里好多有趣的带着变革时期浓厚色彩的小故事，我往往忍不住讲给许多人听；我以努力理解我周围发生着的这种变化，写下了一组变革时期的农村题材的短篇小说。我没有一篇自己满意的稍好稍深刻一些的短篇，终于想通过用较大的篇幅来概括我经历过的和正在经历着的农村生活了，这就是《初夏》。

生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像流水有了跌差，有跌差就有了瀑布，有了飞溅的浪花，有了喧闹的声响，也产生了在平流无石处所看不到的壮景奇观。农村里的一切人都无法在这种关系自身切实利益的变革中保持沉默了，那些平时被人说成“一棍子也砸不出个响屁”的老好

人，在讨论土地分配方案的社员会上，当仁不让，吵得脸红耳赤；那些一直带领群众从土改干到今天的好干部，突然之间变得忧虑重重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引起了新的变化。如此等等。

我意识到有的短篇中把抵制责任制的干部的思想动机看成是怕劳动、怕失去特权，实在是太浮躁太浅薄了；尽管这种人的存在并不是个别现象，也不足以揭示这场深刻的变革中的时代印记，这类人的思想根源更多地反映出我们端正党风的必要性和迫切性。当然，更有甚者，还有违法乱纪、独霸一方的更恶劣的变质分子，更不是农村改革的特殊产物。除过这些，我更多地看到了冯景藩这一类干部，影响他们满腔热情地和社员同心同德地进行农村经济改革的心理阻力，恰恰不是害怕自己也要跟社员一样去种责任田，恰恰不是害怕自己失掉当干部时的特权。生活的发展已经证明，某些怕失掉特权的人，在责任制以后依然继续得到特权，他们在土地、机械、队办企业的承包中照捞不误，那些沾有不正之风的干部在任何时候总是有机可乘。冯景藩们的复杂的内心活动，是变革的农村现实引起而发生的，因而就打上了变革时期的印记，是这个特定的历史时期产生的独特的心理活动。冯景藩们的复杂的感情活动，使我建立起这样的自信心：我捕捉到了变革时期里一种类型的基层干部的独特的心理意识的流向，用文雅的话说，叫作“时代在人的心灵中的折光”吧？同时，冯景藩们也使我悟出一条道理：生活可以纠正作家的局限和偏见。我在作品中津津有味地讽刺他抵制分田到户是怕晒太阳的时候，冯景藩们却一笑置之，说他的思想负担比体力劳动的负担要沉重十倍，搔痒没有搔到痒处嘛！

以农村生活为创作题材的作家，我猜想他们大约都企图通过自己的作品，来概括我们几十年来农业发展走过的道路。这条道路上，走着八亿农民，南方和北方，农民和牧民，发生过多少喜剧和悲剧啊！

在他们今天开始走向新的生活的时候，与昨天的告别不会是一夜之间就可以完结的，尤其是冯景藩这样把自己的庄稼人的黄金岁月都无私地贡献出来了的人，在今天与昨天的交替中，就不会像儿子马驹那样轻松。昨天的生活在他心里留下的沉积比儿子马驹要厚重得多。三十多年来走过的艰难而又曲折的道路，造成冯景藩的心理现状，是无法避免的。我可以轻轻地嘲弄一下冯安国，却无法伤害冯景藩一词一字。我想真实地写出他们今天的心理意识，就不能不如实地回顾他们历史的功绩和光荣，有意无意的失误和自己遭到的挫折。没有这些历史，就没有今天的那种“失落”情绪。我如果不尊重他们的光荣的历史功绩，不理解他们现在的苦恼，他们就不会挡住我蹲在路旁叙述一两个钟头的衷肠的。

我写的这个冯景藩老汉，能不能得到读者的理解和认可，虽然是自己在生活中的真实体验，但是否准确？是否是一种具有代表性的人物？仍然担着一点心。三月在涿县参加农村题材创作座谈会时，听了中共中央农业改革研究室主任杜润生同志的报告，我的心里踏实了。他说，我们要尊重历史，土地改革和合作化时期那些带领群众的模范和先进人物，他们的历史功绩还是要肯定的，不能因为今天的政策的变化而否定他们（大意）。作家创作时所要依赖和研究的主要对象是生活。对生活的独特发现和独立理解，无疑是避免人云亦云或者雷同化、概念化的根本途径。

有的同志问我，是否通过马驹的塑造要写个新时期的新人形象？我只能说，这首先不是我想要不想要的主观意愿所能说得清的，同景藩老汉一样，是生活强烈地冲击的结果。

记不清是一九七九年还是一九八〇年，我到一个熟悉的村子去，和一位年轻的大队领导人闲聊。闲聊中，得知这个村子有两名青年在

统考中分别考中了高、中等院校。这两个农村青年，都是在动乱年月里读完高中的，文化程度是可以想见其差的，唯其因为天资聪明一点，在国家恢复考试制度后拼命自修；自修中常常请教的老师就是这位年轻的党支部书记。他是“老三届”高中毕业生，又是高才生。既然由他悉心辅导的那两个青年能在高考中获得成功，那么他自己去应考，就更具有考中的可能性。他为什么不参加高考呢？我随便一问，他也随随便便地说：“开头也跃跃欲试，后来……到底没去。我心里撂不下这一摊子！”他撂不下什么呢？他在大队里刚创办下一个机砖场，生产和收益都不错，一个加工厂也挺红火，还有两桩队办工副业正在筹划之中——他“撂不下这一摊子”！

他的这样一句闲聊的话，却是那样强烈地撞击着我的心，再也忘记不了了。他热情而耐心地辅导村里的青年跨进高等院校的门槛，自己却心甘情愿地与更多的不能进入高等学府的青年男女在贫穷的乡村进行另一项事业。渴求用现代科学知识武装起来投身“四化”的热血青年成千上万；企图通过考试逃离“苦海”（农村）而进入文明的城市的青年也不乏其人；死心塌地地用自己的智慧和创造性劳动改变乡村贫穷落后现状的青年也不能断言其绝对没有啊！多色彩的人才组成了多色彩的生活。“四人帮”在文艺界强制推行的“高大完美论”的结果，恰恰是人们对一切英雄的概念闻之塞耳。我常常在写一个正面人物之前首先想到：读者会不会相信？这位“撂不下”自己亲手创立的“家业”的年轻干部，终于使我无法摆脱他对我的感情的冲击，逐渐在心里孕育出一个冯马驹来。我这里想引用蒋子龙的一句话来为我仗胆。他不无感慨地写道：“与其对反映生活的文学发怒，不如去改造生活。”

生活里既然有冯景藩，就不会没有冯马驹；生活如果只有衰竭和死亡而没有新生，社会和自然界一样早该完结了。因为有沉重的昨

天，才有奋发的今天，更可以预示有光明的明天。昨天和今天——历史和现实，正在我们生活的一切领域进行交接，它不是简单的交接和替代，而是对已经意识到的新的使命的热情，是对已经廓清的历史教训的责任感，是对我们党的一切优秀传统的继承与发扬。马驹虽然生活在偏僻的冯家滩，不可避免地处于这种除旧布新的交替的矛盾之中。他不是以一位救世主的姿态进入冯家滩的生活。他为自己的所爱而不能倾心相爱所深深痛苦，也在走与留的矛盾中动摇和怀疑过。他开始时更多的是出于一种个人的屈辱所产生的义愤而崛起，经过生活的矛盾才逐渐自觉地意识到自己的使命。他在冯家滩开创新的局面的具体形式和方法，必然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调整，这不是我所太多关心的事。我所要努力揭示的，是我们的生活在发生重大变化的转折时期，从冯景藩的沉重感叹声中和冯志强的幽灵里，诞生了新的冯家滩的一代青年。他们继承了父辈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摈弃了他们的思想重负，在新的生活天地里，展示自己的丰采。我现在又不得不切实地承认，这位青年的形象仍然单薄，感情世界还揭示得很不丰富，这原因既在对生活的体验不深，也在艺术表现力上的无能。

我无意用《初夏》向读者证明实行责任制的诸多优越性。作品中故事的发生到结束，不过四五天时间，实行了责任制的冯家滩的土地还不到收获的季节，种牛场刚刚办起来，砖场才有第一批产品生产成功，雄心勃勃的冯家滩的年轻一代，也自然还无可能改变自己的穷困的物质条件。有趣的是，《初夏》从草稿到见诸刊物，经过了三年时间，生活在三年的时间里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啊！可以料就，冯家滩的青年男女现在能够照得起相片了，能够吃得起羊肉泡馍了，也许能够骑上摩托兜风了，住在二层小楼房里看电视了。——报纸和广播每天传来南方北方农村里的激动人心的新鲜事，早已使全世界的一切人都不能不承认，中国农村在突飞猛进——生活发展的脚步真是太快了。

我仅仅只是想通过冯景藩和他儿子的家庭纠葛，在农村变革刚刚掀起的激流中，留下一点生活变化中的印记。

《初夏》是我创作学习中试写的头一个中篇，感到了艰难。初稿很肤浅，几乎不是个东西，然而《当代》的编辑看了，首肯“有基础”，并对冯景藩和彩彩很感兴趣，鼓励我充分地写他们。再改后又得到老前辈秦兆阳同志的指教，再次指出冯景藩等人物身上有很大潜力可挖掘。我深受鼓舞，逐步加深了对冯景藩这个形象身上的时代特质的认识，从不自觉到比较自觉了。您在信中指出冯景藩身上“意念的东西多了点”，我就明白了，这个人物更丰富的内心世界还是没有充分地揭示出来。这个作品的不断修改和缓慢的提高以及仍然存在的明显的缺憾，使我更清楚地意识到：理论的贫乏对于理解生活的深刻性的限制；艺术魄力的过于拘谨对于形象的塑造和揭示的制约；提高理论修养和振奋艺术魄力，这两者对我来说都相当迫切。

我一直生活在美丽富饶的渭河平原的边沿地带。我十分喜欢这块土地。我能用笔描绘这块土地上的人民的生活与愿望，革命精神和淳厚的美德，不倦的进取和悠久的传统，我感到幸福。我知道，我的文学修养还不足以进行这样重要的工作，尤其是生活发生的日新月异的变化，我的理论修养，生活体验与文学修养一样准备不足。需要更努力地学习，更新知识结构，才能随着生活的发展而前进。在创作的未来的追求中，能得到您的指点和批评，无疑是十分幸运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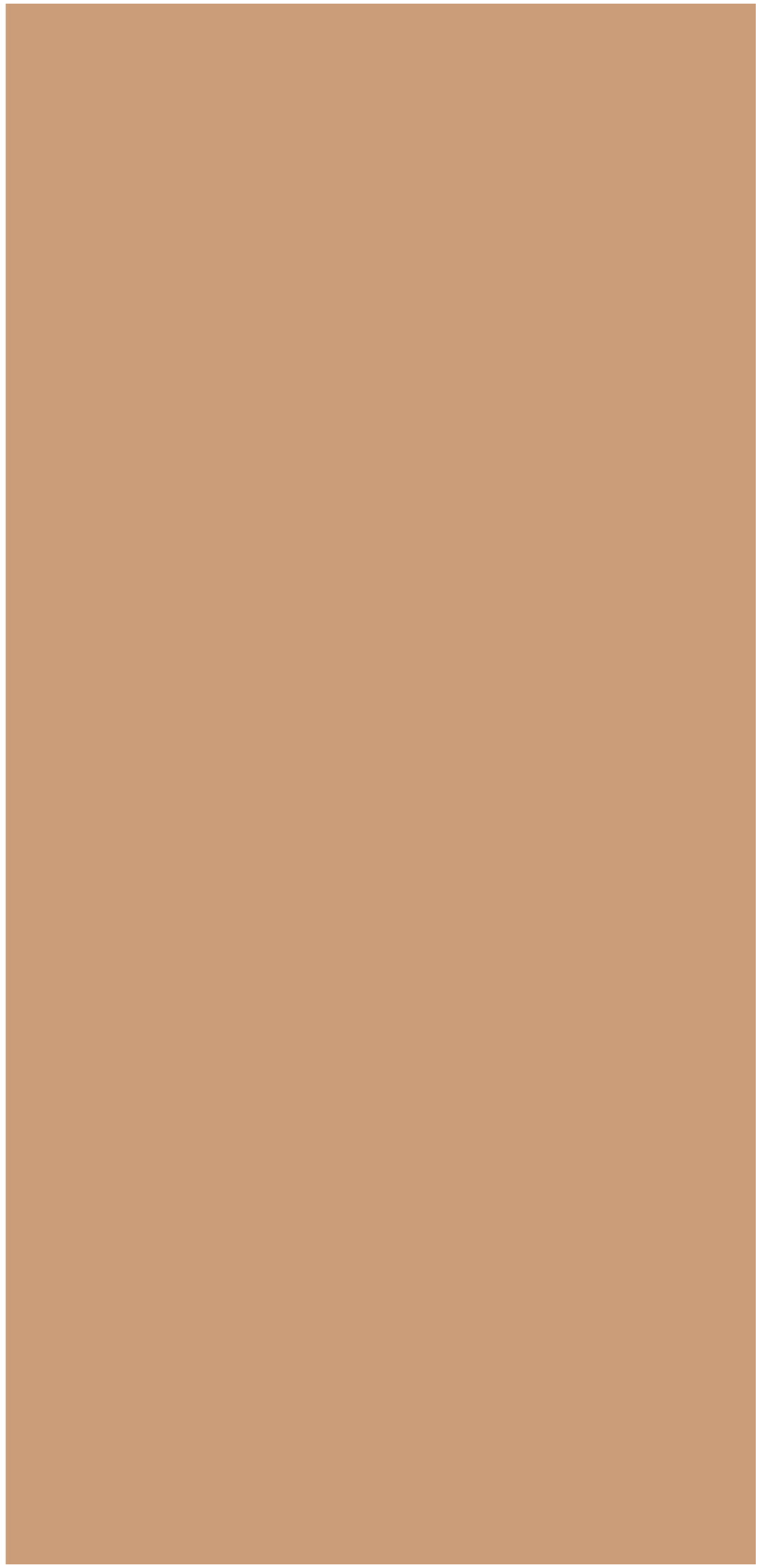
祝安健

致以

敬礼

陈忠实

1984年11月4日 西安东郊



第 1 卷　1978—1982

第 2 卷　1983—1984

第 3 卷　1985—1986

第 4 卷　白鹿原

第 5 卷　1987—1994

第 6 卷　1995—2000

第 7 卷　2001—2003

第 8 卷　2004—2006

第 9 卷　2007—2009

第 10 卷　2010—2015

第3卷

1985–1986

陈忠实文集

增订本

人民文学出版社



陈忠实文集

增订本

第

3

卷



1985—1986

人民文学出版社

文前插图



- 中篇小说
  - 最后一次收获
    - 一
    - 二
    - 三
    - 四
    - 五
    - 六
    - 七
    - 八
    - 九
    - 十
    - 十一
    - 十二
  - 蓝袍先生
    - 读耕传家
    - 蓝袍先生
    - 萌动的邪念
    - 我不会说话，也不会走路了
    - 自由多么美好
    - 还俗
    - 拳头之歌
    - 新浪潮拍击下的老农民
    - 归来已觉不是家
    - 六十年里的二十天
    - 父与子

        - 惑惶
        - 这下该信我的话了
        - 自觉进入
        - 我的那间小房子
        - 哦！故园，故园
        - 咒符
    - 四妹子
        - 上篇
        - 中篇
        - 下篇
- 短篇小说
    - 夜之随想曲
    - 广播体操乐曲算不算音乐
    - 灯笼
        - 一
        - 二
        - 三
        - 四
        - 五
    - 毛茸茸的酸杏儿
    - 失重
        - 一
        - 二
        - 三
        - 四
        - 五
        - 六

    - 桥
        - 一
        - 二
        - 三
        - 四
    - 到老白杨树背后去
    - 打字机嗒嗒响
- 散文·特写
    - 大地的精灵
        - 开拓者
        - 养女解困
        - 她这样生活着
        - 秦岭略记
        - 从一个鸡蛋的家当起步
        - 塔城之行
        - 冬天的果园
    - 迪斯科与老洞庙
    - 访泰日记
        -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 十二月二十一日
        - 十二月二十二日
        - 十月二十三日
        - 十二月二十四日
        - 十二月二十五日
        - 十二月二十六日
        - 十二月二十七日
        - 十二月二十八日

        - 十二月二十九日
        - 十二月三十日
        - 十二月三十一日
        - 一九八六年元月一日
        - 元月二日
        - 元月三日
        - 元月四日
- 言论
    - 答读者问
    - 忠诚的朋友
    - 创作感受谈
        - 观察
        - 感受
        - 痛苦
        - 寂寞
        - 忘我
        - 幸福
        - 苦闷
    - 收获与耕耘

中篇小说

最后一次收获

一

一条条沟壑，把原坡分割成七零八碎的条块。一条主沟的上下两岸，都统进好几条大大小小的支沟。远远望去，那一条条主沟和支沟，恰如一个老汉赤裸着的胸脯上的暴突经络。被主沟和支沟分裂开来的南原原坡，就呈现出奇形怪状的浮雕似的构图，有的像脱缰的奔马，有的像展翅疾飞的苍鹰，有的像静卧的老牛，有的像平滑的鸽子，有的像凶残暴戾的鳄鱼，有的像笨拙温顺的母鸡……莽莽苍苍的南原原坡，像一条无可比拟的美术画廊，展示出现代派艺术巨匠们的一幅幅变态的造型……

沟壑里陡峭的断层上，是黄色的、红色的、白色的、褐色的土壤层次；缓坡上和沟底里，是绿色的杂草、苇丛，稀稀拉拉地冒出一棵或几棵山杨或臭椿树。沟壑之间的坡地上，一台台条田，被黄熟的麦子覆盖着。现在，无论你把眼光投向东部或西部，只能看见两种颜色，大片大片地包裹着坡面的麦子的黄色，夹在大片黄色之间的沟壑里的野草的绿色。黄色与绿色交错着，却不是混杂，黄是黄，绿是绿；黄色是主宰，绿色变成点缀了；似乎这山野世界在一夜之间进行过一场自然界的翻天覆地的革命，把永恒地主宰这山野世界的绿色推翻了，变成了象征着富足的金灿灿的黄色的一统天下，绿色被挤压到狭窄的沟缝间去了。

赵鹏置身于这莽莽苍苍的金黄世界里的一个小小的山梁上，屁股下坐着一辆独轮手推木车，抽着烟，被眼前这恢宏博大的气势陶醉了。这样壮观的大自然景象，一年只能出现一次，而且时日极为短暂。三五日内，这个完整的画面，就被庄稼汉手里闪闪发亮的镰刀剔割得支离破碎了，继而完全刮光削净了，恰如老庄稼汉用剃刀剃刮得光秃秃的脑袋。这富有华贵的景象消失了，黄土高原沟壑纵横的坡面上最丑陋的本色就彻底地暴露出来了。赤裸的丑陋的面容一直要保持到秋末冬初，才能被出土显行的冬小麦的一抹嫩绿所遮掩。

多少年没有看见这壮丽的麦黄时节的景象了啊！自从他跨进西北工业大学的门槛，就再也没有机会目睹一次家乡原坡麦收的景象了，竟然有二十多年了啊！往昔的夏收时节，他不用操心收麦的事，那是生产队长和全队男女社员的事。他只是星期天回来，在家里为收割碾打麦子的父母兄妹和妻子做一点家务，后晌又骑车子去上班了。今年不同了，土地承包到户了，他不能安静地在那个热处理车间钻研“曲轴淬火”的问题了。工厂里照顾他这个家在农村的工程师，准许下十多天假期，让他回家收麦子。现在，他手里握着镰刀，推着独轮手推车，投身在这沟壑纵横的山野之中了。

一条条窄窄的小路，从沟道里曲曲拐拐地伸展到坡顶上去，这儿那儿，零零星星地有人在小路上走着，在麦田里挥动镰刀。还不到收割的洪期，人欢马叫的场面还不能出现。麦子成熟的最佳状态还欠一点火候。远远望去，一片金黄，走到地头一瞧，那麦穗上的活色还没有褪尽。在手心剥揉开来，吹去麦芒和糠皮，那手心里的新麦的麦粒，还是胀鼓鼓的。他家的一块半亩地的麦子，在坡顶的一个干梁上，又迎着风头，妻子淑琴昨日看过，已经熟透，今日开镰了。她吩

咐他早晨在屋门口收拾晒麦的场面，自己去收麦了，让他吃罢早饭去拉运。

淡蓝色的氤氲弥漫在远处的沟坡间，由近处到远处，渐渐浓厚。太阳已经升起在东原顶上碧蓝的天空，却无法驱除净尽远处麦梢上那种似雾非雾的灰蓝色的氤氲之气。气温开始骤然上升，原坡上流动着一股股热烘烘的气浪，夏虫在麦田里的叫声此落彼起，越来越密，金光闪闪的原坡似乎在夏虫动人的歌唱中抖动起来了……

他把那条皮带做成的车襻搭在肩上，双手扶着小推车的木把，腿和肩膀协同用力，把小推车一步一步沿着陡峭的小路推上去。他看着眼前原坡的景致，脑子里勾起的却是童年的记忆。真奇怪啊！那清脆的夏虫的叫声，似乎根本不是从左右两边的麦田里传进他的耳朵，倒像是从他的心里流进脑子，而又从耳朵传到空间里去了，似乎心里早就埋着一盒童年从这原坡上录下的夏虫歌唱的磁带……

屏住呼吸，两手把稠密的麦穗拨开，轻轻地抬脚，小心地落地，几乎一丝声响也没有，尖硬的麦芒儿刺得胳膊腕子痒痒的，也不敢换下另一只手来抓挠一下，尽管做到了天衣无缝般的谨慎和小心翼翼，那爬在两步远的一支麦穗上的绿色的蚂蚱，还是在他伸手猛扣的前一秒钟蹦到地上去了。一切诡秘和隐蔽顿然变得毫无价值和毫无必要，需要的是紧紧盯住在麦根上仓皇逃窜的蚂蚱。不顾一切地扑上去，踏倒一切绊手绊脚的麦秆子，双手准确地捂下去，扣住那只可爱的翡翠般的绿色蚂蚱，世界上最大的诱惑都化作那只小精灵了。就在这关键的一扣将要进行的时候，他的后领被揪住了。

那只钢铁一样硬的有劲的拳头，顶在他的后颈上，猛一提，他就被凌空提起，从麦田里给甩了出来，跌落在地边的草地上。他仰起头

一看，冷娃大叔正瞪着牛眼，高举着攥紧的升子般大小的拳头砸下来，他悲哀地缩了脖子，闭上眼睛，等待那不可躲避的一击。可是，那手却从脑袋上方绕到背后，带着一股风，落到屁股蛋上了，他疼得龇牙咧嘴地趴在草地上。

“我日你妈！我叫你个狗杂种糟践我的麦子！我今天非得把你的狗腿砸断不可……”

冷娃大叔跳着、骂着，唾沫飞溅，脸憋得像腊汁肉的黑红色……倒霉！怎么不小心碰到他的手里了呢？他并不后悔逮蚂蚱有什么过失，只是懊丧自己太大意了，应该在踏进麦地之前，先看看主人在不在近旁……

“说！还敢糟践麦子不？你碎熊给我说！”冷娃大叔揪住他的马鬃毛盖儿头发，说，“我拉上你寻你爸去——”

他慌了。打屁股，他可以忍受；揪头发，咬咬牙也就过去了；他最怯冷娃拉他去寻大人，教训已在：父亲的惩罚比冷娃要厉害十倍！他连声告饶：“冷娃叔，我再也不敢咧……”

“嗬！你碎熊还叫我的外号……”

冷娃的手一使劲，他似乎觉得头皮都要被揭掉了，疼得哭溜出声来，连忙改口，称呼起冷娃的官名：“志杰大叔……好爷哩……”

“倒是叫叔，还是叫爷？”冷娃自己却忍不住笑了，“我把你个捣蛋锤锤子！”

那只铁钳似的大手松开了，他忽地蹦起来，顺着小路跑了，跑得百十步远了，站在塄坎上，嘶吼着：“冷娃——二杆子！二杆子——冷

娃！我明日还要来逮蚂蚱……”

冷娃在下面气得挥着胳膊蹦着，朝他扔石头。那怎么能打得着呢？看着冷娃猴急的样子，他报复似的哈哈笑着、跳着……

他推着车子，想到儿时的淘气，自己也笑了。每年的麦收时节，是乡村孩子盛大欢乐的节日。镰刀一响，又硬又涩的苞谷面馍馍就从餐盘上宣告退位了，取而代之的是松软香甜的麦子面馍馍，他像盼望过年一样渴盼着开镰。顶有趣的是，孩子们用新麦的麦秆儿，编成各式各样的笼儿，有的是长方形的，中间隔开，像一排厦屋；有的是葫芦状的，用一条细绳拴在裤带上，吊在屁股后头，漫山遍野追着蚂蚱的叫声奔跑；傍晚，在碾过麦粒的麦草窝儿里翻跟头，摔跤，大人们也不禁斥，由他们尽着性子玩要嬉闹……那麦秆儿散发出醉人的清香甜腻的气味啊！

那条遛马沟里，更是乐趣无穷。沟里终年流着一股清泉，草木茂盛，是孩子们割草放牛的第一场地。沟中间夹着一道沙梁，全是红色的沙粒，光溜溜的寸草不生。他和伙伴们割满一笼青草，就爬到沙梁顶上，从上头溜下来，像箭一样快，心里忽儿忽儿直打飘，比城里幼儿园里的溜溜板惊险得多了，只是磨破了裤子，总躲不过母亲的斥骂……

现在，他是一家千余人工厂的工程师了，尤其在当今开始重视知识的社会生活里，他这样一个正当年的科技人员，在工厂里颇受注目。他在《热处理》杂志发表过三篇论文，掌握了俄、英、日三种外语，在工厂里尤其令那些被十年动乱耽误了学习的青年工人羡慕和敬佩。领导已经找他谈过话，拟定他为工厂新的“四化”干部的人选，可谓正当春风得意之时。

眼下，他的肩头上挂着牛皮做成的车襻，双手推着这辆也许是从周朝传留下来的小车，到原坡上来拉麦子。他用三种外语所获得的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无法解决麦子的运输问题，这儿只需要力气。

工程师赵鹏推着空车，走上那座干梁的时候，已经气喘吁吁，汗流如注了。他一眼瞅见，妻子淑琴正蹲在麦田里，左手拢着麦秆，右手挥动着镰刀，刚好割到地头，直起腰来，抹着脸上的汗水，朝他甜甜地笑着……

二

她坐在一捆麦子上，拢一拢被汗水黏住的头发，解开包着馍馍的毛巾，把馍掰成碎块，放到一只搪瓷缸子里，再把热水瓶里的开水倒进去。这是她天不明起来上地时，自己带到地里来的，麦地太远，回家吃饭要费好多工夫。她端起缸子要吃的时候，却发觉忘记了带一双筷子来。她从麦捆儿上站起，走到地塄上，在一丛榆树棵子上折下一根树枝，剥掉了柔韧的软皮，露出白色的木质，就有了一双干净的筷子了。

这就是他的媳妇，他的爱人，他的夫人，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她左手端着大号搪瓷缸子，右手捏着那双榆树枝做成的筷子，把泡得膨胀了的馍块送到嘴里去，几乎不用咀嚼，就从喉咙里滚下去了。她吃得很香，大口大口地喝着水，从喉咙里传出“咕咕咕”的响声；捏着筷子的指间，夹着一根生蒜薹，就着泡软的馍馍吃。

他坐在她跟前的另一捆麦子上，抽着烟，看她吃饭。她的脸上扑着麦穗上的灰尘，被汗水黏合在脸颊上，手心手背和手腕，已经被黑色的粉灰糊粘得十分肮脏了。坡梁上没有一滴水，要讲卫生就得付出

劳动，跑到深深的沟底里去洗手洗脸。她的宽阔的脊背上，汗水湿透衣衫，渗出一个不大规则的圆圈。她吃完了，脸上又淌下汗水，撩起衣襟的下摆来抹汗，露出两只奶头来，在苍苍莽莽的黄土原坡的麦田里，这一切都显得十分自然、十分和谐，不足为奇。如果是在市里某一家高级宾馆的餐桌上，这种动作未免就有失大雅了……他想。

“想不到这干梁上的麦子长得这么好！”她站起来，提着镰刀，走向麦摆，“往年给队里收麦，这块地没用过镰刀，全是用手拔——猴毛麦子搭不住刀哩！”

他也提着镰刀，走到麦地头。麦子长得真好，齐摆摆的麦穗儿金黄闪亮，棵子稠，穗子长。去年秋里分了地，她把这半亩坡地，用铁锨翻了一遍，种麦时压了五十多斤氮肥。这是她的功劳、她的成绩，从种到收，他没有到地里来过。他有点歉疚地笑了：“你的功劳呀！”

“你坐下歇着。”她制止他割麦，“这一摆麦子，我一镰就割过去了。你歇着，一会儿往回拉。”

他笑笑，在剩下的一摆麦子前蹲下身来，挥动了镰刀。他多年没有割过麦子了，他想试一试自己割麦的技术，妻子累得汗流浃背，却让他在一边歇着，怎么能行呢！他跟在她的屁股后头，割着，镰刀割断麦秆儿的“嚓嚓”声，是这样动听。在他上中学的时候，每逢麦收，学校放了忙假，他就跟社员一起收割麦子。而今技术虽不生疏，而这镰刀刈断麦秆儿的声音却生疏了。

他刚割过三五步，就觉得腰里酸酸的，不由得直起身，舒一口气。他的前头，淑琴猫着腰，左手把麦秆儿一拢，右手里的镰刀往跟前一扯，“嚓嚓嚓”的响声很有节奏地响起来，一排排麦子在她胸怀里

倒下去。即使在她脊背上扣一页瓦，也不会掉下来，她完全变成一个熟练的农民了……

高中毕业那年，他到渭河边一个同学家里去玩。那是渭河滩上一个小村庄，住着五湖四海的居民，一个百余户的村庄，竟然有十几个省份的籍贯，全是解放前逃荒（天灾、人祸、壮丁、捐税）落脚到这里的。那位同学祖籍山东，现在已经是一口地道的关中语言了。然而在生活习惯上，小村庄仍然保存下南北各地的风俗。同学的父母用山东大饼招待他，十分热情，客户人待人尤其厚道。他明显看出，全家八口人中，唯一对他表示冷淡的是同学的妹妹，一个正在中学读书的漂亮的女子，跟他连一句招呼也不打，骄傲得像个小公主似的。她不大说话，偶尔看见她开口，就发现她有一个下意识的动作：皱鼻子。当他第一次看见她皱鼻子的时候，心里忽悠一下，产生了一种强烈的欲念：我真喜欢她。

他考上大学后，从那位同学的信中得知，她在次年考上无线电技校了。他骑着车子找她去了，在宿舍里见到了她。她一愣，终于认出他来，鼻子又皱了一下。

“你来……找我？”

“对。”

“有啥事呢？”

“想看你皱一皱鼻子……”

“你……”她飞红了脸，往后退了一步，警惕地瞅他一眼，转过脸去了。

“给我一杯水喝。”他不慌，其实早已盘算好了，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她迟疑了一下，没有倒水，问:“你要是没有什么事……我要上自习去了！”

“当然有啊！”他说。

“有就说吧！”

“我要跟你恋爱！”

“胡说！”

“真的！”

“你快走吧！”

“给我一杯水……”

她的脸红得像一只鲜红的苹果，连耳根都红了，终于在迟疑间，转身从桌子上端起暖水瓶，往一只玻璃杯子里倒水。他走到她背后，抱住她的肩膀，亲了她一口。她放下暖水瓶，挣扎着，企图挣脱他的拥抱。他死死地抱住她，紧紧盯着她的眼睛，她没有叫喊，使他受到鼓舞，更加有劲地箍住她的肩膀……终于，她羞涩地向他皱了一下鼻子，就伏在他的强壮的胳膊里……一切就这样简单、直截。

她上了一年技校，学校解散了，国家进入严重的经济困难之中，一切公民都自觉承担国家的压力，她也将背着铺盖卷回到渭河边去。为了表示他的真诚，他提出立即结婚。他们原来商定在各自毕业以

后，工作安置稳当，再办婚事。现在，他还有一年就要毕业，没有必要等待了，他要和她结婚。她从渭河边的大平原上，到南原坡根的他的家里来了。

如果她在无线电学校完成学业，那么，她现在至少可以穿一身干净的白大褂，在无线电工厂做一名工人，皮肤不会变得这样粗糙，更不会折一根树枝当作筷子吃开水泡馍了！她是无数个为分担国家困难而牺牲了自己前程的青年中的一个，现在完全变成和黄土一样粗放而又质朴的农村妇女了。她的鼻子虽然还习惯于皱一皱，却仅仅只是一种下意识的习惯，公主似的高傲荡然无存了……

“赵鹏，你歇下嘛！”

她站起身，两只手在拧着一撮麦秆儿，那是绑麦子的索子。她的口气是真诚的，固执的，爱护他的。他听了有点难受。是的，她比他年龄小，然而仍叫他歇着。她的口气中包含着一层明显的意思：她是农民，应该而且能够干完这一切；他是……应该歇下来的人！她叫他赵鹏，这是在他对她实行“突然袭击”时叫出第一声之后至今没有改过的称呼，尚没有像乡村里夫妻间习惯于称对方为“娃他大”或“娃他妈”。

“我想跟你……在一摆儿割麦！”他笑着说，“咱俩……难得夫妻相随呢！”

她的鼻子皱了一下，动心地笑了：“你说啥呀？”

“我想跟你在一摆儿割麦。”他说。

“啊……你再说一遍！”

“我想跟你在一摆儿割麦。”

“再说一遍……”

“我想跟你在一摆儿……”

她扔下手里正在挽着的麦索子，三五步奔过来，抱住他的脖子，用她粘着粉灰的脸，和他的脸紧紧地挤挨在一起，战抖着声音说：“赵鹏，你说说心里话，二十年里，你真的没有后悔过吗？不嫌弃我是个农民？”

“后悔也没用！”他幸福地笑笑，依然用他惯长的诙谐的口气说：“谁让我当初像日本法西斯一样，疯狂地偷袭珍珠港呢？”

他们相依相偎着，坐在热烘烘的麦茬地里。他捉住她的手，看看手心，又看看手背，那曾经是细长的柔软的姑娘家的手指，现在又黑又粗，趼甲摞着趼甲，食指上被镰刀划破一条口子，淌过血，已经被黄土淤塞了，连一块包扎的布条儿都没有。他叹口气说：“淑琴，你真是受了苦了！”

“农村妇女，哪个能不劳动呢？”她淡淡地笑笑，似乎没有苦痛，不在意地说。

“好了，再苦一个夏收吧！完结了——”他搂着她的肩膀，“你在家里受了二十年的苦，现在总算熬到头了。收完麦，咱们马上搬家，进城。”

“我进不进城倒是意思不大咧！主要是娃娃。”淑琴说，“我已经四十岁了，到死进不了城，也没啥，反正你也不会离婚了。我高兴的是娃娃们再不推车挑担了……”

“不！我主要考虑的是你！”赵鹏说，“你搬到城里，在厂里随便找点工作干着，咱们就是一家人了，比在乡下要方便多了！”

他在年初被正式批准了工程师的职称。三月里，省人事局下了一份文件，给取得工程师和相当于工程师职称的科技人员解决后顾之忧。他正当其时，没有费多少周折，就转办完毕户口手续，把一家四口的户口和粮食关系，迁转进城市了。只待夏收一毕，把去年秋天分给他家的五亩七分四厘川地和坡地如数交回生产队，从此将用粮簿在粮店买粮了。

“最后一次收获！”

他对她说：“最后一次收获。我们从此将变成城市居民了！所以我说，我想跟你在一摆溜儿割麦，兴许我们再也不会提镰刀了呢！”

“最后一次……收获……”她喃喃地说着，站起来，拢拢头发，走到自己的麦摆上，回过头来，“赵鹏，你把刚才的话再说一遍……”

“我想跟你在一摆溜儿割麦。”他大声说，挥一下镰刀，“这是最后的一次收获呢！”

三

割掉干梁这块地的最后一撮麦子，赵鹏动手装车了，从地上抱起一捆沉甸甸的麦子，放到手推车上，再抱起一个麦捆子，一颠一倒装到车上。麦秆轻，麦穗沉，必须一颠一倒装起来，才能保持小推车两边的重量基本平衡。他过去拉过这种车子，基本的劳动技能，那是不会忘记的。

淑琴正在割过麦子的麦茬地里捡拾丢遗的麦穗。她频频地弯下腰去，从麦茬上拾起麦穗来，拧成一把儿，塞到车子上。等到他把小推车装满的时候，她已经拾净遗穗了。麦茬地里，现在看去，已经收获得干干净净了。

“老天，路也没有，可怎样下去？”

这座干梁与下边的小路之间，隔着一道陡直的斜坡，坡度看去有七十度，竟然没有一条小路，好在那斜坡上没有种麦，是一块杂草丛生的空白地，他作难了。

“这些干部呀！啥事也不管了。”淑琴也站在塄边上，察看下梁去的路径，抱怨说，“往年收麦前，先把临时小路修到地头，好拉车。今年土地一下户，干部啥心也不操了，啥神也不劳了，只顾拿补助款！”

她告诉他，土地下户以后，大队干部每天补助一块二毛钱，一月三十六块，不管多少，问题在于干部根本不管什么事，白拿钱。

村里的干部因为实行责任制不再记工分了，改成固定的工资制了。究竟是不是白拿钱，他无心理会这种事，反正自己已经不属于社员了，与自己关系不大了，要紧的是怎样把这一车麦子拉到斜坡下的小路上去，这里根本没有路。他对淑琴说：“只有从这斜坡地上往下拉。”

“没有路，你能拉下去？”她问。

“能。我在坡地上拉过车。”他相信自己年轻时在家乡的坡地上练就的拉车技术，“你放心，我本来就是山里人嘛！”

她眼里透出不大踏实的光，他也不在乎，这是唯一的办法。他把车襻挂上脖子，直起身来，小推车的两个支腿提起来了，好沉呀！从麦地里拉到塄边，被碾压的硬硬的麦茬“咔嚓咔嚓”响着。他用两只手紧紧地攥着车把，企图死死地扭住车子，保持平衡。当他从塄坎上朝斜坡跨下一步，第二步还没踩到塄下的坡地的时候，小推车朝外倾倒了。他企图用双手扭住，却没有扭住，那负重的小推车朝斜坡下倾倒的力量似乎山崖崩塌，两只胳膊的力量简直无能为力，不可逆转。他摔倒在斜坡上，小推车已经滚到斜坡下去了。

他爬起来，在几步远的地方找到了眼镜，好在没有破碎，淑琴尖叫一声之后，从塄坎上蹦下来，看他正在擦拭眼镜，才舒了一口气，脸上的紧张神色顿然消退了。

“好咧！”赵鹏对淑琴笑笑，“这下，省得我拉了，车子自动下去了！早知如此，应该把车子推滚下去，免得我翻跟头……”

“狗日尽吃冤枉！”淑琴又骂起村干部来。

他从斜坡上走下去，麦捆已经被翻滚得七长八短的了。两人把车子扶起，重新捆扎了麦捆，他又把牛皮车襻挂上脖子。

下坡拉车，根本用不着臂部一丝力气，而是要把全部力气使在腿上，撑住自动下滑的那个独轮；身体后仰，用脊背扛住麦捆；双手端平车把，不敢倾斜，沿着沟边的小路一步一步挪下去。

“你从后边拉着。”他给淑琴说，“前面要下陡坡了。”

淑琴点点头，用手揪住车头上的绳索，往后拉住，那实质是人为的活闸。

这面陡坡，直直地通到沟里，路不足二尺宽，散落着算盘珠大小的石子，一步踩不稳妥，就会翻到沟底去，如果在这儿翻车，就不像刚才在斜坡上翻车那样轻松了，沟深二十多丈呢，即使摔不死，也得断一条胳膊或坏一条腿，瞧一眼沟底，心里不由得发紧，他避开眼睛，不敢往沟里看了。

那又硬又宽的牛皮车襻，压在脖子后边，像一条铁箍子，使他的脖颈不能自由转动了。麦捆子的全部重量，都压在脊背上，不可抗拒地催压他朝下滑。汗水从脸上淌下来，侵蚀着眼睛，麻辣辣，痒瘙瘙，却腾不出手来擦擦汗，揉揉眼睛。他现在才感到自己的双腿太缺乏力量了，大腿打着战，小腿肚子又酸又疼，软软地聚不起支撑重负的力气来。脚步儿踩不稳了，这只脚还没踏实，那只脚早已不堪重负，提起来了，慌乱中踩到一颗石子上，脚下骨碌一滑，他用尽吃奶的力气把左肩一翘，车子朝山坡这边倾倒了，侧靠在崖坡上，才没有跌下左边的深沟。

“小心呀——”淑琴的声调都吓得打战了。

“好了，快到沟底了！”他安慰她。

他就势倚着倾靠在崖坡上的车子，用衣衫的下襟擦着脸上的汗水，裤兜里的那块又小又薄的手绢儿，擦汗不大顶用了，似乎非常自然地撩起衣襟来，抹到脸颊上去了。他自小就跟父亲学会了用衣襟擦汗，后来上学了，特别是上大学以后，他的裤兜里有一块叠得方方正正的小手绢了，如果在大学的课堂上撩起衣襟来擦汗，那就不大好意思了。现在，他撩起衣襟来了，虽然二十多年没有做过这种擦汗的动作，却不陌生，似乎只有这样擦起汗来才最顺手。

他再次扛起小推车的负载，移步了。脚上和小腿上刚刚积攒下来的力气，在扛起车子的一瞬间，散掉了，小腿抖得更厉害。他咬着牙。下了沟口，就是平地了，沟底淌着一股水，记忆中似乎有一个用树枝棚架的土桥，现在也没有了，必须从小水沟上蹚过去。他给淑琴打招呼：“过水沟时，猛劲一推噢！”

“噢——”她在车子后边应着。

他略停一下，聚起力气，然后拉动车子，一步从小水沟上跨过去，本该猛一用力，车子就拽过一步之宽的小水沟了。可惜，力气不足，车子在稀泥里减慢了速度，没有滚上去，却朝沟里翻倒了，他被翻倒的车把儿打倒了，跌在水沟里。

淑琴跑过来，拉起他，脸都吓白了。

他摸着右边的脸，被车把打得好疼呀！裤子溅满泥水，真有点狼狈不堪、丧魂落魄的架势。他不想在淑琴面前流露出哭相，仍然嘻嘻哈哈地嘲笑说：“哈呀，真是老了呀！腿脚不灵便喽！净翻跟头……”

他和淑琴扶起车子，挪到沟底的小路上。

“我来拉吧！”淑琴说，“换一下，你歇会儿。”

“我拉！”他使起性子。是的，很快就要进入村子了，让老婆拉重车，一个男人家倒跟在后头，够多难看！他说，“我今日付了学费，一定得拉回去！”

他重新扛起车子，从沟底往前，就是平路了，重负不能减轻一毫，却不会翻跌了。淑琴在后边使劲推着，他在前边拉着，进入村口了。

“割了？”乡亲们问。

“割了。”他笑着答。

“成色不错吧？”

“还可以。”

“鹏娃吔！你没看拉车嫽不嫽？”有人和他开玩笑。

“嫽哇！”他也自作乐地笑着回答。

“少拉点儿！路不好，哪怕多拉一回。”有人很诚恳地叮咛说。

“哦！不累……”他勉强做出不累的样子。

从村巷里拉过去，乡亲们和他打着招呼，一直拉到村子北边的大场上，第一车新麦终于上场了。

大场有三四亩地大小，是生产队历年夏收碾打麦子和秋天碾谷的场地，现在已经分成一条一绺了。各家碾压了自己的那一块场面，用灰撒在场地上。他和淑琴把麦捆卸下来，栽到自家分得的那一绺场地上，卸完之后，坐在小推车上，点燃一支烟，想到还得爬上那个干梁去拉麦捆，心里有点怯惶惶的了。

“赵鹏呀！你算给咱的娃们办下一件好事。”淑琴坐在他旁边，情真意切，倒像是她受了他的恩情似的，透出明显的感恩戴德的语气说，“要不哇！咱娃们就得在这山旮旯里拉一辈子手推车。你看受的这份罪……好了！累死累活就这一年了，咱娃再不用爬坡拉车咧！”

他看一眼她，没有说话。他和她的儿子以至将来的孙子和曾孙，都将不必在这个黄土旮旯里抓摸了，不必拉着麦捆翻跟头了！在这样贫瘠的山坡上，汽车路大约不会在十年间通到地头吧！现在的庄稼人和他们没有考上学的儿子，还得继续使用这种也许是从西周传留下来的小推车。他的父亲在这黄土原坡上拉了一辈子小推车，现在已经归于黄土中去了，装进棺材的时候，却无法把那两条罗圈腿摆直。没有办法，在这个村子里生活着的男人，十之八九都变成罗圈腿了。他们年轻的时候，也长着两条端直的腿，几十年里从坡上拉下沉重的小推车来，腿不能硬直着走路，渐渐地，在不知不觉中，长长的双腿朝外弯曲了，变形了，变成适宜在山坡上拉载重负的罗圈腿了！

他和她的儿女将一劳永逸地放下这小推车了，从他这一代开始，将要过一种城市方式的生活了，用口袋到粮店去买米、面，用网篮到街口的蔬菜副食店去买菜，烧蜂窝煤，住楼房，再也不必挑着铁桶到沟底去挑那混浊的泉水了。这将是一个永久性的告别，与小推车告别，与黄土原坡告别……

大场上，有几个男人和女人在自家的那一绺场面上碾压着，小碌碡发出吱嘎吱嘎的叫声，把撒过灰的场面碾轧得平平整整，又瓷又光，准备迎接上场的新麦。他们在悠悠地说着话，谈论着天气和川原上下各路麦子生长的成色，声调是和悦的，洋溢着即将到来的蛮有把握的丰收的喜气。他们根本没有担心在这陡峭的黄土原坡上拉车有多么辛苦，更不会惋惜自己变了形的罗圈腿有多么丑陋！是的，这坡地上的收成虽然远远不及肥沃的河川里的收成那样丰厚，却依然吸引和迷恋着他们。祖祖辈辈，子子孙孙，伏天里翻耕土地，秋后播下种子，上冻时用黄牛或灰驴驮上装满粪块的竹篓上坡，就等着夏天收获的这一天啊！

他没有说话，推起空车，准备上干梁去。

淑琴赶上来叮嘱他："这回少装点！你不常拉车，比不得人家常年拉车挑担……"

四

"喝汤吧！"淑琴把腌制的蒜薹碟儿摆上桌子，又动手到锅里去舀稀饭。家乡的人把吃晚饭叫作喝汤，淑琴爱怜地瞅着他，"拉了一天麦子，早早吃了，早早歇下。"

"甭急，让我洗一下。"他说，"身上又扎又痒，真难受。"

"哦，那我给你烧温水。"

"不啦！我到河里去洗，痛快。"

"河里水凉！"

"没事儿！"

"那我等你回来再喝汤。"淑琴温顺地说，"甭泡得太久，小心感冒！"

"咱俩一块去！"他说，"你也该洗洗。"

"我在屋里用温水洗。"她不好意思地笑了，"娃们大了，让娃们看着他大他妈一块下河……"

"老封建！"他不勉强，笑着从盆架上取下毛巾，搭在肩上，走出门去。

“你到下河里去洗！”淑琴赶出门，叮嘱说，“上河湾里女子们晚上洗哩！你别冒跑……”

一进入夏天，小河边就是天然浴场了，男人们在下河里洗，女人们在上河里洗，互不侵犯，约定成俗，习以为常，虽然男人们能听见上河里传来女人们嘻嘻哈哈的笑声，夜幕却保护着各自的领地。夫妻双方一起下河，有诸多不便，淑琴不好意思和他一块下河来。

他遵照淑琴的提醒，顺着河堤走到下河里来，蒙蒙的星光下，可以看见河湾的水道里，有一伙人影在晃动，传来嘻嘻哈哈的说话声。从声音判断，大半是些年轻后生们。他们爱干净，讲卫生，劳动一天之后，到清凉的河水里洗掉浑身的汗腥和污垢。中年以上的庄稼汉们，早早地在水盆里抹一下手脸，喝罢汤就早早躺下歇息了。他们怕水冷，只有到伏天热得不分早晚的时候，才下水来泡一泡，凉快凉快。赵鹏意识到自己已过中年，和这些后生们在一起也不好意思，就走到稍远一点的河水边，脱掉了衣裤。

河水好凉啊！他初下水的一瞬，浑身一紧，冒出鸡皮疙瘩来，挥开手臂，在深及腹部的清水里游了一圈，寒冷消失了。他用肥皂洗头发，粘着尘土的头发在河水里涮洗得干干净净，头皮顿然清爽了。他用毛巾使劲擦拭着皮肤，洗得真痛快。他摸到岸边的浅水里，枕着一块光滑的石头躺下来，清凉的河水从他胸脯上流过去，温柔地抚摸着他酸疼的胳膊和双腿。满天繁星，明明暗暗，闪闪眨眨，对岸的苇园里传来呱呱鸟的叫声。河滩，柳林，瓜园，渠岸，整个河川的角角落落里，没有一处不留着他童年的脚印。在堤坝下的石缝里摸鱼，冬天在柳林里攀折冻死的枝条烧柴火，到沙滩上的甜瓜园里去偷瓜……

他跟着老师在河那边的公路上走着，天不明爬起来，兜里装着几个黑馍，要到城里去考中学了。他只有十二岁，是班里年龄最小的一个，走过一个一个陌生的村子，太阳西沉，即将落进河滩的时候，他们走到大平原上来了。一眼望不到边沿的平地，看不见土丘，天也顿然变得无边无际开阔深远了。他第一次走出自己生活过十二年的小河川道，南原和北岭之间的那一绺蓝天，就是那么窄窄的一绺。走出小河川道，第一眼望见这开阔的苍穹，他觉得自己愈加小得不知所从了。

他第一次出远门，第一次靠双脚走过了四十华里路，脚上打泡了，腿疼难挪了，口里又干又涩，怎么也咽不下那干硬的杂面馍馍，鞋后跟已经被公路上的沙石磨透，脚后跟蹭着路面，磨得火烧火燎地疼。

猛然，一声惊天动地的呼啸从树林后边传来，伴随着“轰轰隆隆”的响声。他一仰头，一列绿色的长蛇似的列车自西向东，奔腾呼啸，从树林那边疾驰过来，又钻入远处的树林里去了，树梢上升起一团团白色的烟雾。

“火车！”

和他同行的三十多名男女学生，一齐站在路旁，向奔驰的列车行注目礼。这一帮山沟里的学生，十之八九和他一样，是第一次出山，第一眼看见火车，第一次知道有比人的双脚跑得更快的这种庞然大物。他站在那里，对着火车逝去的树林，呆愣愣地瞅着，树林上空的白烟悠悠飘散着，向远处弥漫……在他熟悉的小河川道外边，有这样广阔的世界啊！

“赵鹏——”老师喊，“走啊！”

同学们跟着领队的老师，已经走了，他的脚不疼了，腿上有劲了，跑起来，追上了同学和老师。大伙围着老师，问这问那，火车怎么会自动跑呢？两列火车对面开来怎么办？老师笑着，一一解答，他听得似懂非懂……

老师给他们介绍着沿路所看到的那一座座建筑，这是一家工厂，那是火车桥，更远处的那座最高的烟囱是发电厂的……

“国家正进入第一个五年计划，需要建设人才，你们好好念书，念了初中念高中，高中毕业念大学，给国家造火车，造飞机，造大炮，造机器……加紧走啊！小鹏鹏！”

他果然按照那位小学班主任的话，读完大学了，现在是制造机械的工厂里的工程师……

赵鹏穿上衣服，坐在河边上，点燃一支烟，静静地坐着。第一次走出黄土原坡狭窄的河川，至今仍在脑海里保持着清新的记忆。三十多年来，他在城里上学，后来在城里工作，每到周日，回到乡下，在山沟里度过一个礼拜天，又匆匆上班去了。他从山沟里飞出去了，他的父母和弟妹，还在这黄土原坡下生活着，他的妻子和儿女，也还生活在家乡的土地上。他的根哪，还是扎在这黄土地里呢！

现在，准确地说，麦收以后，他就要举家大小从这儿搬进城里去了。工厂里可能给他分配一套两室一厅的楼房，那是对他这位知识分子的照顾措施，报纸上大声疾呼抢救中年知识分子，他沾光了，父母已经先后离世，两个妹妹已经出嫁，一个弟弟也分居另过了。他一家

四口搬走之后，没有什么牵挂了；以后，也许只有在清明节时，回乡下来给逝去的双亲的坟堆祭烧一把阴纸……

“赵鹏叔哎！你也洗澡来啦？”

他一抬头，两个小伙子已经走到跟前，只穿着背心和短裤，衫子和长裤搭在胳膊弯里，嘴里咂着烟，在沙滩上坐下来。这是俩晚辈青年，模样虽然熟悉，名字却记不清了。他连忙搭话说：“身上钻进麦芒了，扎得难受，洗一洗真舒服。”

“城里可没有这样好的水！”留着长长的头发的一位说，“我一进西安的澡堂子，闷得头昏，直想吐！”

“当然，哪里有这样好的水呀！”赵鹏附和说，“城市近郊也没有这样好的水了。咱们这儿偏僻，现代工业的污染还没有延伸到这儿来……”

“叔吔！”光葫芦脑袋的另一位亲切地叫他，“你们厂里有啥活儿没？俺俩想出去干点儿。”

没等赵鹏回答，留长发的那位补充说：“俺俩都在公社建筑队干过，盖房垒墙，没麻达！建筑队给的钱太少，工资老也不加，干着没劲，俺俩想自己包活儿干！”

“我可没打听……”赵鹏心里没数，又不忍心两位可爱的青年失望，“我回厂后，问问基建科，看看有没有修房垒墙的活儿……”

“好！”光葫芦说，“赵鹏叔，你要是给咱寻下活儿了，俺可不会亏待你！”

“什么话……”

“这叫信息款——新名词。”长头发小伙并不介意，“这没啥！也是按劳付酬！”

他咂着烟，看着这两位可爱的后生，他们大约都是初中或高中毕业生，没有考上大学，现在凭自己的手艺挣钱了。他们已不满足公社建筑队比较低的工资待遇，而要靠自己的手艺去承包工程，挣大钱了。

“麦种了，秋种了，乡里没事干了。”长头发小伙说，“得自找门路挣钱呀！”

“咱们在城里没熟人。”光葫芦说，“而今没熟人，寸步难行呢！”

他们年纪不大，却好像十分精通世故，与那些中年和老年庄稼汉截然不同。在赵鹏和他们闲聊的时候，他们无所顾忌，大声说话，发表他们的新的生活观念，完全不屑于像他们的父母那样只知在黄土里扒摸，凭种夏粮和秋粮，能挣几个钱呢！他们大声地骂人，傲视一切，臭骂村里的干部，简直是土匪，拿得的敢拿，拿不得的也敢拿，在实行责任制的过程中，油水叫干部们捞了。他们随意举出例子来：拖拉机价钱合得极低，队长占下给儿子开去了；六间新库房，庄基又宽敞，会计和队长各占三间，合下的价钱连木头钱也不够云云。

“捞吧捞去！反正剩下这一回了。”长头发说，“地分了，房卖了，他再想捞油水，没啥捞了……”

“嘻嘻！真正的贪官污吏……”光葫芦骂。

赵鹏听着，不置可否。这类事，他早有风闻，在村里实行分田到户的半年时间里，单是周日回家来，淑琴愤愤然给他说过的就已经不止一件，他劝她少言，吃了亏算了。现在，听着两位青年的骂人的话，他心里激起一股不平的气浪，想想自己很快就要离开这里，没有必要争论这些事了，就默默地抽烟。

“你上班去了，给俺到基建科问问……”

“可甭忘了！叔哎……”

五

接连四天，在原坡上收割了三亩多麦子，赵鹏累垮了。

他从原坡上拉回最后一车麦子，卸在麦场上，连着舒出三口长气，走回自家的小院，就像一棵被锯断的树，倒在炕上了。

他的脸颊火辣辣地疼，那是高原上太阳的强光对汗渍的皮肤暴晒的结果；他的脖颈疼得不易转动了，那是牛皮车襻下坠造成的筋肌损伤；肩头上已经被又涩又硬的牛皮车襻磨得渗出血来了，火烧火燎地疼痛；胸廓长时间受到重负的坠压，挤得肺部不能舒畅地呼吸，隔一时半刻就要舒出一口窝聚的长气；腿和胳膊像是不属于自己这个躯体的部件，完全麻木了，只有小腿肌肉频频地抽搐，才感到那是自己的腿脚；手心和脚心，都磨出血泡了，钻心似的一跳一弹地疼着；腰椎像是从后腰那里折断了，酸酸的，上身和下身不能有机地协调地在炕上换一下睡姿；浑身上下，没有一处的肌肉和骨骼能够从紧张里放松下来。

他没有洗脸，更懒得洗脚，带着满身的尘土和麦芒，倒在炕上了。歇息——解除皮肉之苦，现在比讲究卫生要迫切一千倍，沉重而又紧张的体力劳作和讲究卫生互相对立了，后者毋庸置疑地服从于前者了，几乎是不可逆转的本能。他想，如果像这样繁重的劳动长年累月地继续下去，他会忘记刷牙的习惯的，一年半载不洗一次澡也不会感到有什么过不去，头发和手脸上积满灰尘和污垢，也不会有什么不舒服吧！在他接近老年的时候，也就自然地会拐着和许多庄稼汉老头一样丑陋的罗圈腿，来往于村巷、田间和屋院内外了。

头一天上坡拉麦的时候，他像一位诗情迸发的诗人一样在心里吟诵黄土高原麦熟时节的壮观景象，多情地回味童年时代的淘气；夜晚躺在小河的浅水里，回忆起第一次从山沟走出去，在大平原上看见奔驰的列车的情景，同样充满了浪漫的诗意。现在，他连再一次爬上坡顶的心情都没有了，那满坡被黄金缠裹的景象引不起一丝的心情，蚂蚱的叫声也显得枯燥而烦腻，更不想挪动一步躺到小河里去了。沉重的体力劳动，把一切诗情画意统统从人的心怀里排挤出去了。

过去的四天时间，他的妻子淑琴领着他，从干梁割到西坡，再到东坡，再进后坡……三亩多的麦子，竟然有八九块地，分散在原坡的角角落落里。原坡上土壤结构差异太大，为了使得优质地和劣质地搭配公平，于是就出现了这种结果。要不是淑琴引导，他无法从一条一块的麦田里辨认出自己的地块来。

头一天他和淑琴在干梁上收割的时候，原坡上远远近近只有零星的人在收割，他还可以和淑琴在麦捆上调笑亲昵一下，而不担心周围有谁窥见。第二天，这儿那儿，东原和西原，前沟和后沟，到处都有男人和女人在弯腰挥动镰刀收割了。第三天，收割达到高潮，整个原坡上，几乎每一块地里都有人头闪动，从原坡通村庄的几条小路上，

被来来往往的推车摆满了，男人女人，大人小孩，你呼他叫，变成一个喧闹的世界了。高潮延续到第四天，后晌就渐渐退潮了，大部分条田和坡地上收割一空，只有少数地块上还挺立着麦子，像劣级剃头师傅在顾客头上遗下的一撮撮长毛，原坡上几乎是被掠劫一空。

他躺在炕上，很想喝一碗酸辣的菜汤，却只能这样想着。淑琴还在麦场上，也许和孩子正在垒麦捆，也许只是出于防备心理，怕谁家顺手扯走几个麦捆去，三四天来，除了盐腌的蒜薹，他没有吃过什么菜。饿了，吃两个馍馍，喝一杯开水，半夜里才能躺下，而天不明的时候，淑琴又把他摇醒来。她不管几天不动烟火而只啃干馍他是否受得住，而只顾催他快跑，再苦也就这么一回了！

他的脑子里变成一片空白，什么曲轴淬火试验，什么学术论文，什么日语、英语或俄语，早已逃匿得无影无踪了，疲劳完全抑制了人的智慧，沉重的劳动使他的脑子顿然变得单纯而近于愚蠢了。

“爸！爸呲——”儿子喊着蹦进门，“快，要下雨了！俺妈叫你垒麦积子！”

他猛地翻身坐起，溜下炕来，咧着嘴，忍着浑身散了架似的疼痛，走出院，朝西一望，一层浓黑的云潮涌过来，盖住了下沉的落日。那乌黑的云层眼看着朝东边蹿上来，使人感到恐怖。呼啦一声，风从西边掠过，搅得麦草和黄土漫天弥漫，冷飕飕的风使人出过汗的肌肤阵阵缩紧。他一弯腰，朝麦场上奔去。

麦场上，一家一户所分得的那一条一绺场面上，全被麦捆子拥塞得满满的。男人站在麦积子上，把女人和儿女们递上来的麦捆垒堆起来，用手压，用脚踩。女人和娃娃们把栽在场间的麦捆拉到跟前，由

强壮的女人用木杈挑起来，递到麦积子上头去。乌云已漫到头顶，天黑下来了，男人粗嘎的喉咙在催女人，女人尖叫着催逼儿女，整个麦场上，像面临一场即将洗劫的战争一样，忙乱不堪。

“你死在屋里了吗？”

赵鹏刚奔到自家的场头，看见淑琴时，她迎头就骂了他一句。

“眼窝瞎了？看不见天变了呀？！”她又骂了一句。

他愣呆了一下，刷地涨红了脸，当着全村男女老少的面，她这样狠声骂他，还是第一回，他无所适从了。他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想抽身走掉，去他妈的吧！让大雨把这些鬼麦捆冲到河滩里去，算屎了！他恼恨地瞅她一眼，心软了，淑琴的脸上，汗水和着尘土，粘着麦糠，变得像一只慌急的母狼，嘴巴扭歪了，眼里布满红丝，焦急和气恨已经完全使那双活泼的眼睛变得恶煞煞的了。她的衣衫从肩头撕破了，露出了浑圆的肩头和肌肉，甚至连上胸部的乳根也暴露出来，她也不顾及什么了，只是拼命把女儿拖到跟前的麦捆压到麦积子上去。他没有抽身走掉，抓住两个麦捆，拖到她跟前来。现在，此时此地，他不是一位在热加工上有所创见的工程师，而是一个堆积麦捆的劳力。

“一点心也不操！像是我一个人的事！”淑琴还在大声发泄对他的不满。

“干叫唤啥嘛！再嚷嚷，我就……”他也火了，“我闲一会儿来没？”

旁边的一位嫂子匆匆闪过，呵斥一句：“大雨来咧！还不垒麦子，斗啥气嘛！”

淑琴咬着嘴唇不吭声了，眼泪却流下来。

风愈加猛了，刮得麦捆子在场地上乱滚，谁家遮苫麦积子的苇席被狂风抛到空中，又甩到场外的土坡上。大场旁边的树林里，一棵大叶白杨“咔嚓”一声拦腰折断了。一道闪光之后，天崩地裂似的雷声在头顶炸响，大雨“哗啦”一声倾倒下来……

男人和女人，老人和娃娃，乱纷纷从场间跑出来，丢弃下麦捆和正在垒着的麦积子，逃到附近的几户人家的房檐下避雨。赵鹏一手拽着女儿，从场间跑出来，挤在房檐下，浑身冷得直打哆嗦。没有办法，只好让雨淋了，如果冒雨垒堆麦捆，就把场面和麦穗踩踏得一塌糊涂；淋过雨的麦捆堆积在一起，两天就沤坏了，倒不如露天栽在场间。

淑琴没有到房檐下来避雨，她没有戴草帽，一任瓢泼似的大雨浇在头上和身上，缓慢而疲惫不堪地在大雨里走着，从村巷里朝回走去，暴雨从地上溅起的泥水，糊粘在裤脚上，撕破的衣衫紧粘着皮肉，依然一滑一溜地走着。几个女人呼喊她的名字，声音是亲切的，叫她赶快躲到房檐下来，出过汗的热皮热肉淋不得冷雨啊！她像没有听见，拖着沉重的双腿，朝西头走去了，在村巷的狭窄处，被雨雾和墙壁遮住了。

赵鹏心里一紧缩，有点不安了，他从房檐下跑到雨地里，一踩一滑地朝回奔去。他奔回院里，一眼瞅见，淑琴在屋里的小饭桌上倚躺

着，半眯着眼睛，嘴唇变成黑色，手脚冰冷得像冰块一样，张着哆嗦的嘴唇在喘息。他一把抱起她的软瘫的身体，眼泪涌流下来了……

他划着火柴，点燃了麦秸，塞到灶下，拉起了风箱，给她烧一盆擦身的温水。往昔里，无论冬夏，他礼拜六回到家中，她笑着把一盆冷热掺半的温水搁到木头盆架上，招呼他洗去一路骑车落下的尘灰，已经习惯而成自然了，似乎没有什么异常的意思。他现在蹲到灶下，第一次觉得应该供给她一盆洗脸擦身的温水了。他没有学会烧锅燎灶的技能，锅灶下冒出一股股浓烟，呛得他鼻涕眼泪交流，依然心地虔诚地拉着风箱。收麦以来的四五天时间里，她比他吃得少，睡得更少，而几乎是马不停蹄，半夜里蒸馍，熄了灶火又提着镰刀下地了，临到他拉着小推车走到地头的时候，她已经在微明的晨曦里割下一排排麦捆子了。他累得疲惫不堪，她也不是铁打的身骨啊。

他端着一盆温水，搁到盆架上，关了门，从她身上剥下湿漉漉的衣裤，扶她到水盆跟前，帮她擦洗起来。她忽然搂住他的脖子，感动得流起泪来，那晒得暴起一层黑皮的脸颊，那双明显下陷的眼睛，浮出一缕素有的温柔和痴情。暴雨来临时，他们在麦场上发生的口角烟消云散了，像暴雨过后夏天的夜晚一样静谧而和谐。世界上有以各种形式生活着的恩爱的夫妻，或是从事共同喜爱的职业，或是意趣相通。中年工程师赵鹏和他的农民夫人却是这样生活在一起，不能说不美满，不幸福吧？此刻，他的自我感觉：甚好！

六

一觉醒来，窗外灿红的阳光，羞怯地洒在院子里的小柿树上，赵鹏揉揉干涩的眼皮，脑里反应着一种逼真的错觉，似乎不是经过了一个短暂的夏夜，而是整整睡过了一个世纪，从昨晚躺到炕上到刚才睁

开眼睛，他没有小解，也没有梦幻，甚至连翻一翻身子也没有，睡得好深沉呀！深沉得像死掉了一样，敞开的木格窗子里，飘进一股滚油烫焯葱花的香味，刺激他的鼻膜，却撩拨不起他的食欲。

“睡着吧！”淑琴走进来，和悦地说。一夜睡起来，她又恢复了素常的麻利和勤快，欢蹦蹦地在后院喂鸡，在前院打扫柴枝和麦糠，在小灶房里烙烫面油旋饼子。她站在炕前，劝他说，“下雨了，地里场里湿溜溜的，啥活儿也干不成，你就美美儿地睡吧！饭做好了，我再叫你。”

她的声音是舒缓的，和悦的，真诚的；世界上只有自己的真诚相爱的妻子，才有这种舒缓、和悦、真诚的声音；没有矫揉造作，没有虚情假意，没有表面文章。这种声音区别于世界上一切声音，而绝不靠音色取悦对方。自从她和他在这个农家的土炕上有了第一夜同炕共枕的生活以后，二十年来，他完全习惯了这种舒缓、和悦、真诚的声音。往昔里，每逢周末，他从城里回来，亲亲热热睡过一夜，她天明时爬起来去上工，临走时总要叮嘱他：“美美儿睡一觉吧！在厂里辛苦了一星期，回来好好歇下！早饭等我放工回来做，妇女放工早半点，跟得上。你睡吧！饭做好了我叫你。”

窗户口透进湿漉漉的晨风，凉飕飕的，他这才意识到昨天傍晚下过一场暴雨，他的心里也舒缓下来，就依着她的话，躺着，却没有睡意了。她在屋子里弯着腰扫地，又用抹布擦洗桌子和椅子，几天来忙于在田间收获小麦，屋里的家什上落着一层灰尘。她换了一身干净的半新的衫裤，头上顶着一块方格帕子，防止灰尘落到头发里。她挽起的袖管下露出被太阳晒得黑红的腕子，粗壮而又粗糙，准确而又敏捷地挪动桌面上的茶盘、茶壶、镜子和瓶子，把它们擦拭得光光亮亮。她的精神很好，精力充沛，根本看不出昨天累得半死的痕迹，反倒因

为她换下了那身割麦时专门穿着的破衫烂裤而显得周正了、精神焕发了。

他躺不住了。他想到昨晚在这个小屋子里发生的事，是的，她的突然栽倒，不是疾病而是极度劳累，她现在欢欢蹦蹦地喂鸡喂猪，扫屋扫院，似乎一夜之间又恢复了。可是，她眼眶周围的黑色的圆圈却更加深了颜色，那可不是像城里的女人涂抹的美的最新标志。他忽然意识到，在这个家庭里，主要的体力劳动都是她承担的。二十年来，他明知她在体力劳动上其实根本无法跟他相比，她始终不渝地让他在周日早晨“美美儿睡一觉”！她从来不抱怨自己在这个家庭里的负重和苦累。他每月交给她三四十元钱，她已经完全满足了。现在，他的心里似乎意识到一点什么，有点不安了，平静的心朝一边倾斜了。

“睡着呀！忙着起来做啥？这几天拉麦子，还不累是不是？”

他穿上衫子，又蹬上裤子，伸胳膊蹬腿的时候，所有大小关节都变得僵硬了，又酸又疼。精神虽然恢复了，浑身的肌肉和关节的疼痛，却反而因为一夜的睡眠更加剧了。他笑笑，没有回答淑琴的话，忍着疼痛，不致脸上流露出痛苦的神色，故意装作轻松的样子，跳下炕来了。

她一边抱怨他不该“早起”，一边在脸盆里给他倒下温水，放下毛巾。他在水盆里洗手洗脸，二十年来一贯如此，今天觉得不那么自在，不那么心安理得了。她又从盆架上捞起牙具杯子，要添水，要给牙刷上挤好牙膏，这也是二十年一贯制了。他挡住她的手，仰起沾满水珠儿的脸，有点激动了，说：“我自己来。”

她一愣，有点惊疑地问：“怎么了？”

他意识到自己刚才说话太冲了，使她措手不及，想到另外的地方去了。他抱歉似的笑笑，有点伤心，却以顽皮的轻淡口气对她解释说："我已经觉悟了！从今天早晨开始，消灭咱们之间的'工农差别'！"

她笑了，释然地笑了，爱昵地斜瞅了他一眼，夺过口杯，添上水，在横架着的牙刷上挤好了牙膏，放在桌子上，只需端到手里，就可以塞进嘴里去刷牙。待他洗漱完毕，淑琴已经在木桌上摆好了饭菜，只等他拿起筷子来。

"今日消消停停地吃顿饭吧！"淑琴依然用舒缓的声音说，"几天都没有正儿八经地吃饭了！趁热吃，饼子一凉就不酥了。"

赵鹏坐下，桌上摆着一摞切成方块的烫面油旋饼子，瓤软皮酥，散发着一股诱人的香味。一盘粉白色的洋葱条儿，水灵灵的。一碟油汪汪的红辣椒，搅动人的食欲。她借雨后不能下地上场的闲暇，做下一顿正儿八经的早饭，让他饱餐一顿，弥补几天来的亏空。他却问："咱娃儿呢？"

"在场里看麦子。"淑琴说，"猪咧鸡咧，在麦场里乱踏乱拱，一时不看守也不成。你吃吧，我去换娃儿回来。"

"你坐下吃！"他加重了语气，似乎下命令，"吃完再去换娃儿回来。"

她又一愣："那娃儿不饿……"

"你不饿？"他爱怜地说，动手压着她的肩膀，让她坐在椅子上，动情地说，"咱们俩今日消消停停地吃一顿饭……我想跟你坐在一块

吃……”

“吓我一跳……”她幸福地笑了。

他慢悠悠地嚼着饼子，就着脆生生水津津的生洋葱条儿，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的脸。这张曾经像粉桃一样白里透红的脸膛，变成条形的了，黄色上透着黑色；眼睛变得更大了，眼神里有一种根深蒂固的紧迫的气色，时时准备放下手里的筷子而去捞起杈把或什么家具。眼角上密集着鱼尾纹，在略一拧眉时就更加显著了。二十年，乡村田野里夏日的骄阳，冬日的尖厉的西北风，把那张皮肤细嫩的脸颊，改变得又粗糙又老相了。

“你吃菜呀！”他把洋葱条儿夹到她的饼子上，爱抚地说，“吃饭就踏踏实实吃饭，甭三心二意的。”

“呀……”她慌忙接住他递过来的洋葱条儿，吞进嘴里，脸微微红了，眼里罩起一缕妩媚的雾一样的气色，“你今日……怎么了？”

“我今日觉悟了！咱俩应该平等……”

“咱们本来就是平等的。”

“不……不平等！”

“我可没觉着什么……不平等！”

“你对我照顾……不……简直是服侍……”

“女人就该这样嘛！”

“传统观念！”

“我听广播上说，要关心科技人员……”

“那是针对社会上蔑视知识的偏见讲的！在咱们家里，应该完全平等。”

“那好，你来烧锅燎灶，洗衣管娃儿……哈呀，像啥样儿嘛！”

“咱们搬到市里去住，下班了，谁回来早了谁做饭，星期天一块洗衣服，就该这样。你甭笑……”

“城里的男人都这样吗？”

“……”

赵鹏还没来得及回答淑琴的话，一阵咚咚的捣蒜似的脚步声响进院里，十五岁的儿子蹦进来，迟疑一下，就从淑琴手里夺下筷子，娇气里带着蛮横，不满地斜瞅着母亲说：“你们在家吃饭，叫我给你在场里吆猪吆鸡……”

淑琴不好意思地盯一眼赵鹏，从盘儿里拿起一块饼子，递给儿子，爱抚地笑着说：“妈正准备去换你哩！”

“你呀……”赵鹏笑着说，“净是培养大男子主义！”

“爸吔！”儿子毛毛这才记起他的使命，“厂里来人找你哩！”

“谁？在哪儿？”赵鹏忙问。

“我不认识。一个大胡子司机，车在村口停着。”

正说话间，门外走进一位中年人来，赵鹏一把握住他的手，正是厂里的小车司机老孟，连忙招呼他坐下吃饭。

“厂长叫我来请你赶紧回厂，”司机老孟也不客气，抓起一块饼子就吃，急火火地说，“外商十点钟到厂，洽谈订货哩！厂长怕让洋人给糊弄了，叫我赶紧来找你。厂长说，要是损失了麦子，厂里包赔……”

“什么话嘛！”赵鹏站起来，忙问，“外商怎么提前来了？原说……”

“提前来了，我也不清楚为啥。”司机说，“搞得咱杨厂长措手不及。昨天晚上接到局里电话，本想连夜来找你……”

赵鹏点点头，没有说话，要是昨晚老孟来了，那简直是紧上加紧哩！他的淑琴在暴雨中抢收麦子累得昏厥，屋里乱得一团糟。

“给我换一身干净衣服。”赵鹏说，“我要跟洋大哥谈生意，穿这身衣服，会把人家吓住的。”

“厂里已经准备下一套西装了。”司机老孟说，“昨日晚上，到西安城里买下了几套西装，工人打扫了半宿卫生……你换不换衣服没关系，倒是该刮一刮胡须了。”

赵鹏接过淑琴从箱子里取出的一套新衣服，换上，对着镜子刮脸。他这时才看出，胡须芜杂的脸腮上，留下高原烈日炙晒和汗水腌渍的明显痕迹，黑了，泛着青色。他给淑琴宽解说：“坡上收完了，河滩的麦子还没熟足，正好有三五天空当。我跟外商谈完了，回来正好跟上收割河滩的麦子……”

“你甭管。”淑琴爽直地说，“河滩里路平，我能割也能拉运，你放心干你的工作……”

赵鹏和司机走到村口，先后钻进黑色的上海牌轿车，开出村子去了。

从车窗里望出去，原坡上的麦子收获净尽了，偶尔可以看见阴沟的地边残留着一绺尚未成熟的麦子，孤零零地长在光秃秃的坡地上，像剃匠在剃过的光脑袋上恶作剧似的故意留下的一撮撮头发。沟壑纵横的南原原坡无遮无掩地暴露出来了，给人一种盛宴之后的寂寥之感。从右边的车窗望出去，河川里的麦子密密实实，由绿转黄了，有一处金黄金黄，有一处绿色正浓，呈现出青黄转换时节的多姿多色。杨柳葱郁，雍容优雅地舞摆着给暴雨冲洗得洁净的浓密的叶子。“算黄算割”的叫声在河川的这儿那儿不时响着，通身金黄的黄姑篓鸟儿从车窗外掠过，飞向河川深处去了。饱融着麦子成熟时散发的甜腻腻的香味，灌进车窗来，是这样清爽，是这样温湿宜人啊！

土石公路坑坑洼洼，道路泥泞，轿车碾过积水的小水坑，发出泥水飞溅的“噼噼啪啪”的响声。赵鹏靠在车里绿色丝绒靠背上，心里慨然感叹了：昨天，像牛一样驮载着麦捆，在坡沟间窄窄的陡峭的小路上，汗流浃背，摔一个跟头又跌一次跤，一次又一次上坡下坡，想着能空甩着双臂走路就是十分轻松的事了；今天，坐在软乎乎的坐垫上，轿车载着他朝前疾驰……对比太强烈了！

南原和北岭朝后倾倒，河川逐渐开阔，驶过土石公路，轿车在平整的柏油公路上稳稳地飞驰。离开家乡的小山沟，那翻车的强烈印象开始淡出，小推车和暴雨打湿的麦捆子也渐渐地退避到遥远的爪哇岛去了，劳累得有点憔悴的亲爱的夫人淑琴的脸颊也淡化、消失了。他

的脑子里，被一串串的试验数据占据了，他右手捏着烟卷，左手托着腮帮，使他的那些试验数据在脑海的屏幕上复活、映现。他的神情专注而自信，那是拥有充分的专业知识所给予人精神上的一种自信。他现在所集中思考的是，怎样得体、有节地接待那几位即将登门的外商，把自己设计试验成功的产品打入西欧市场，须知西欧的工业市场并不容纳稍微落伍的低能机械，而洋大哥到中国来也不完全是为着友谊……

七

小砂石碌碡滚动着，发出“吱嘎吱嘎”的叫声。淑琴推着梯子形的长柄拨架，在自家分得的这一块场地上碾压。昨晚一场暴雨，场面被雨水泡软了，被人的脚踩得坑洼不平了，必须趁着地皮晒干之前，及早碾压。往昔里，碾光场面的活儿，向来是男人们干的事儿，而今由各家各户种地打场，碾场就由各家自扫门前雪了。她的亲爱的男人赵鹏，到工厂跟洋人谈判去了，碾场自然由她来推着小碌碡。

她在软乎乎的土场上撒下一层柴灰，在被踩得有脚窝的地方垫上湿土，铲平场面，然后推起“吱嘎”作响的小砂石碌碡，挨着排儿推过去，推过来。午时的太阳像一把火悬在头顶，蒸腾起地上的水汽，空气闷热，她的脸上淌下一串串汗珠。

她心里十分高兴、骄傲，她的男人被明光锃亮的小轿车接走了，与金发碧眼的洋人坐在一张桌子前去谈判了，这是何等光荣而又伟大的事呀！小小的赵村的庄稼人且莫说起，村里那些在县城或在西安工作的一二十号干部、教师和工人，谁坐过小轿车呢？谁有本领能和洋人打交道呢？只有她的男人赵鹏！这些不言而喻的体面事，无论如何不能不使我们可爱的农村妇女姜淑琴感到脸上光彩，心里充实，从里

往外都觉得骄傲。她推着小碌碡，用袖头抹一把汗，朝前走了，脚步轻捷，居然感觉不到苦累。

“淑琴嫂子！”

淑琴扭过头，看见王秀珍提着一笼柴灰走进场来了，粗壮的腰身扭动着，肥大奶头在单薄的的良衫下抖颤着，赤红的脸膛，被过于丰腴的肌肉撑得鼓起来，眼睛也被挤扁了，总像在笑着。她忙答话：“你也光场来咧？”

“你用毕了，把碌碡借给我，”王秀珍猫下腰，撅着肥大的屁股，在临近的那一绺场面上撒灰，“成不成？”

“成啊！怎么不成哩！”淑琴快活地应着。

王秀珍撒完灰，扔下竹条笼，走过来，帮她推着碌碡。这个胖胖的弟媳，本身就像一只碌碡，和她并排走着，能感到她浑身有一股热烘烘的气息。

“嫂子哎——”王秀珍亲热地叫。

“嗯——”淑琴亲昵地应着。

“你真有福哇！”秀珍毫不掩饰羡慕之情。

“我有个‘豆腐’！”淑琴矜持地笑着说。

“鹏哥坐上卧车咧！啧啧！”

“我还是跟你一样——推碌碡。”

“听说鹏哥今日去见洋人？”

“洋人也是人喀！”

推到西头，俩人同时转过身，用一只手拉着拨架倒着走。

“淑琴嫂，收毕麦就搬进城去？”

“嗯！”

“你再不推碌碡了！”

“我还爱推哩！吱儿——嘎儿的怪好听！”

“你真有福哇！跟上鹏哥进城当居民了！”

“乡下而今也好过了……”

王秀珍猛然搂住淑琴的脖子，趴在她的耳朵根，说：“嫂子，你跟鹏哥这样的大知识人儿睡一辈子，真是福大命大！”

淑琴臊红了脸，挣脱了秀珍的搂抱，急忙瞥一眼左右，怕那些戴着草帽推着碌碡的男人们听见，轻轻在秀珍腰里捅了一拳，用眼示意再甭说这号酸话了，防备男人们听了去。

秀珍瞧瞧左右，并不在乎，更加来劲地说：“嫂子吔！知识人儿黑间搂着你，怕是你……”

“啊哈！你这烂嘴！”淑琴的脸上热臊臊的，禁斥说，“拿老嫂子开心呀！”

“你这一辈子，算没白到世上来……”

“你没有男人吗？”淑琴压低声，攻击对方，“苍娃兄弟长得像匹公马，还不够你……”

“我那个愣家伙呀！亲你的时光，简直把人的骨头都要搁断了！恼你的时光，一拳能把人掀得翻八个跟头！”秀珍数说着她男人苍娃的鲁莽，听不来是怨还是爱。她笑着对淑琴说，“我要是有鹏哥那样斯文的男人，我一天到晚把他当神儿一样敬着！”

“那好哇！我回头给你鹏哥说，你稀罕他做男人！”淑琴爽快地笑着，“让他跟你睡去！”

“要是你不干涉，”秀珍更加收拢不住嘴巴，“我才巴不得哪！哈哈哈……”

“秀珍，你真脸厚哇！呀呀呀！”淑琴自己早已脸腮烧臊，嗔骂着，“你当着你鹏哥的面说呀！”

“咦——”秀珍收敛了笑，丧气地说，“真的！咱们在一块儿胡说浪谝行，可一见着鹏哥，我连一句怪话都说不出来。他那人哪，合该咱们正儿八经敬重他！”

淑琴抹抹汗，笑着：“好了，我的场面碾好了，咱俩给你去碾吧！”

“你回吧！”秀珍说，“凭我这一身膘，推这小碌碡不值啥！”

淑琴松了手，相信这个口敞心直的弟媳的话，就把小碌碡交到她手里了。

“我的嫂子，可甭当真哟！”秀珍推着小碌碡朝她家的场面走去，回过头来说，“贵贱可不敢跟鹏哥说那些烂话！你要是一说，我日后可该怎么和鹏哥见面、说话呢？”

“哈呀！你倒怯了！”淑琴报复似的嗔笑着，“你那张厚脸，一锥子也扎不出血来，倒知道羞了！”

秀珍已经在自家的场面上推起小碌碡。淑琴坐到场头的大叶杨树下，用草帽扇着凉。秀珍的男人苍娃，在城里一家工厂干搬运工，是订着合同的临时工，割麦时也不得回家。秀珍一个人把坡地上的四五亩麦子割了，又一车一车推回来，比一般软势的男人干得还利索。她不抱怨苍娃，工厂里合同严格，要是苍娃回来割麦子，工厂里另换了人，他们家就没有一百块钱的收入了；夏收一过，苍娃闲下干啥呀！只好咬着牙，收割拉运一手干，腾出苍娃在工厂挣钱，过日子的心劲高涨得很哪！苍娃星期日回来，她给他打鸡蛋，捏饺子，单怕他身体受亏哩！她胡说什么稀罕鹏哥那样有知识的斯文男人，不过是说笑罢了！她那张敞口烂嘴，从村东头谝到村西头，连班辈高低也不管！

淑琴动手把那些堆积的麦捆拉下来，栽到场面上，刚刚捂了一夜，淋过雨的麦捆已经发热了，如果不及时拉开晒干水分，三五天就会霉坏了，一年的血汗哪！她拉着麦捆，心劲很高，秀珍一派玩笑话，却勾起她对她的亲爱的赵鹏的情思。不仅秀珍，村里多少姐妹说她命好哩！

往昔里，生产队劳动日不值钱，粮食又分得年年不够吃，没有固定收入的纯粹农业家庭，没有几家的日月过得松泛。她的赵鹏是正牌大学毕业生，虽然在工厂和工人一样在车间劳动，接受改造，属于臭知识分子，可是工资收入却很可观，每月有六十五元钱，除过生活费

用和抽烟，他每月交给她四十元钱，这在小小的赵村已经是很令人羡慕的事了。

亏了赵鹏哩！淑琴在蒸发着热气的麦积堆上拉下麦捆，热汗淋漓，渍得眼圈和脸颊烧疼烧疼的。岂止是钱！赵鹏跟她一个农村妇女生活在一起，二十多年了，没有弹嫌过她，也没有在城市的花花世界里拈花惹草，已经使她无法不处处敬重他、热心备至地关照他。

她想起她和他第一次见面的情景。哥哥把他的同学引到家里来，她看见他那一副憨呆呆的样儿，还真是不入眼哩！想不到，他却瞅上她了。她刚刚考中无线电技校，这个赵鹏找到她的学校，前后没说过十句话，就说他爱上她了，而且说从一年前见头一面时就爱上了。她觉得有点荒唐，统共只见过两面，没有说过十来句话，就要她表态，真是荒唐！小说上描写的那些恋人经过了多少次交往，才说出这句关键性的话。她跟他没有散过步，也没看过电影，甚至连一封信都没通过，真是太荒唐了！她当时有点怨恨他，不该冒失地找到学校来，堵在当面说这样难以叫人出口的话，应该先写封信来……

她答应了！荒唐也罢，轻率也罢，她只觉得脸红发热，心口几乎窒息了，喉咙被膨胀的血管挤压得不透气了，说不出话来，默默地点了点头。没有办法，她当时只有一种模糊的却又是不可违拗的感觉：不能不答应这个人！

她点了点头，还没容她抬头看他的反应，赵鹏已经从桌子那边跳过来，抱住她的肩膀，她的少女的脸颊，第一次挨着一个男子的胡楂刺扎的嘴巴，几乎晕眩了。

“放心吧！”他走时说，“我是个啥样儿的人，问问你哥就知道了！”

“我谁也不问。”她说，“我凭自己的感觉。”

在中专读过一年，国家正进入严重的经济困难年头，终于传下来一道决定，学校停办，学生各自归乡。她没有惊慌失措，此前已有几所中等技术学校停办了，不足为奇。她完全听信校党委的动员报告，写了决心书，要为国家分忧解愁，承担困难的压力，她是共青团员啊！她当时的心情，也许只有从六十年代初过来的热血青年才能理解。

她没有告诉他，怕他有不必要的负担而影响学习。她打算回到渭河边的家乡后，写信告诉他，那样更从容一些。她想主动提出解除婚约，不致使自己成为他的负担。

正当她打点好行装、准备离开学校的时候，赵鹏赶来了，也不知他从哪儿得到的消息。他一句话也不说，背着她的被子，走出学校的大门了。他们没有乘车，沿着城市南郊绿荫覆盖的宽阔的公路，走到市中心。他拉她走进一家饭店，花去近十块钱，买下四菜一汤，打下二两散酒，摆到桌子上。他不顾她的劝阻和反对，执意不惜破费买下这些饭菜来，弄得她傻愣愣地坐在桌旁。十块钱，在这样的困难日月里，对于他们两个来自乡村的穷学生，意味着什么啊！她迷惑莫解，为她送行也不该超出他们的经济力量太远了呀！

“淑琴，敬你一杯酒！”他这时才庄严地开了口，把一小杯酒送到她手中，自己端起另一杯来，“我宣布，我们今天结婚！”

“啊——”她惊得不由得喊出声来。

他一仰脖子，把满满一杯酒灌进喉咙，两只眼睛多情而又庄重地盯着她的眼睛，期待着。

她想哭，却无法张口出声。她完全明白他的用意，对他这种果决得有点突兀的举动无法预料，现在感动得热泪滚滚了。她真想扑过去，抱住他的脖子，大叫三声“鹏哥”！饭店里人多，不是她放纵感情的地方。她擎起透明的玻璃酒杯，一滴不洒地倒进口里了，平生里第一次尝到这种烈性白酒的所有醇香了。她无法抑制自己，把头歪到他的胸前，轻轻地叫了一声“鹏——哥——！”

他们坐下来吃饭、喝酒，饭菜不剩一口，烧酒不留一滴，干干净净地吃到肚里了。

“你把被子背到我们家去吧！”他说，“咱们明天到公社领一张结婚证就行了。任何仪式都甭举行了，免得两头的老人作难！亲戚问起来，就说我们在学校举行过婚礼了！”

他已经把一切都准确地设计过了，她能说什么呢？她完全信赖了这个赵鹏，把自己的行李背到赵村来了。

“我们生活在一起，你会了解我是个啥样儿的人！”他对她说，“我不大喜欢给人许愿。”

她和他走进赵村，走进赵鹏家的门楼。赵鹏向老成的父母宣布，他和她已经在学校举行过“革命的新式婚礼”了。二位老人完全听信了，挪出一间厦屋，她和他就这样走进洞房……

淑琴把麦捆全部栽起来了，夏天午时的太阳像火，晒得被雨水泡软的麦芒又支棱起来，在阳光下发出“轧轧轧”的响声。她感到口渴，

喉咙像呛进一团烟雾，又干又涩。她要回家去了，瞧一眼正在推着小碌碡碾压着场面的王秀珍，赤红的脸膛因为汗渍，因为太阳暴晒，已经变成紫黑的猪肝色了，她不时腾出右手或左手，用腰部顶着拨架推着小碌碡前进，撩起左边或右边的衣襟擦拭脸颊上的汗水，白花花的腹部就暴露出来了，丝毫不怕附近的男人们瞅见。淑琴瞧着她，心里好笑，这个活宝王秀珍，刚才说过那样酸溜溜的烂脏话，真是好笑哩！她的亲爱的男人赵鹏，那是怎样耿直而又心志专一的一个真正的男人啊！好你个活宝王秀珍，即使用钢筋，也把他捆不到你的腰里……

八

后窗玻璃上的红色霞光渐渐淡了，暗了，终于消失了。从左侧的窗孔望出去，河川里被乳白色的雾气遮掩得迷迷蒙蒙，河堤上和灌渠上的一排排杨柳，树冠和树冠黏糊成一堵庞大的城墙了，只有梢部在星空的光亮里呈现出参差不齐的波浪似的形状。

河川里呈现出一种少见的紧张和忙乱景象，极易使人联想到战争。是的，一场全民参战的战争场面，莫过于此吧！从河川里通到各个村庄的田间小路上，被一溜一串负载着麦捆的车辆拥塞着，流向村子里去。一切先进的或落后的机械全都派上用场了，大量的小推车、架子车占据了窄窄的小路。手扶拖拉机快一阵儿，又慢一阵儿，等待拉着小推车的人避一避道儿。汽车被夹在中间，无法施展威力，气得哼哼直叫。小孩在给大人推车，女人们背着麦捆。河川里，男人吼叫儿子的粗哑的声音，女人喝骂偷懒的儿女的调门，纷乱而嘈杂地组合在一起，造成一种特有的紧张忙乱的气氛。

赵鹏的心里，被这紧张的气氛搅得不安了。

按他离家时的估计，至少需得三天，河川的麦子才能熟透，才能搭镰收割。想不到，一场暴雨，反倒促进了麦子的黄熟，在他三天之后回来的时候，河川的麦子已经收过大半了，看架势，明日一天，河川里就会一扫而光了！

他的心里很沉重。天！淑琴割过多少了？她一个女人，怎么往回拉运？河川虽然是平路，进村上场时却有一道坡，她怎么能拉得动呢？产品贸易谈判的胜利所给予赵工程师的喜悦心情，完全消散了，那三位洋大哥的颇为友好的交情淡忘了；淑琴和麦捆，镰刀和小推车，现在乘虚而入，占据了脑海，充塞进胸间，担忧压迫着他的心。

轿车开进赵村，他跳下车，拉着司机老孟去喝水，大门上却吊着一把铁锁。老孟不是外人，早已被沿途所见的夏收的紧张气氛所感染，毫不介意自己没有喝到一口水，坚决地退回车旁，钻进驾驶室，赶回城里去了。

赵鹏把提兜从门道下扔进去，就往麦场上跑。打麦场上空亮着一盏大灯泡，场地被麦捆塞满了。有人拉着麦子进场。有人推着空车出场。有人在垒堆麦捆。有人在叫骂丢了两捆麦子。

赵鹏在麦捆堆积的“海滩”上，找到自己的那一绺地场，女儿倩倩正坐在一捆麦子上，十分忠诚地看守着麦子。他问：“倩倩，你妈呢？”

“拉麦去了。”倩倩说，“俺毛娃哥也去了。”

“在哪块地里？”

“北渠口。”

女儿倩倩肯定还没吃晚饭，他顾不得了，扯开长步，走出麦场，转下场塄，下了河川。他从路边匆匆走过去，来不及和拉车的乡党打一句招呼，照直朝北渠口那块责任田走去。

“赵鹏！”淑琴喊。

他站住，回头一瞧，淑琴拉着装满麦捆的车子停在路边了，越来越浓的夜色，使他竟没有认出淑琴来。他走到车旁，忙问：“还多吗？”

“多着哩！”淑琴说，“靠我一个人拉运，怕是得拉到明早。刚才，虎生和根长给咱帮忙拉哩！你没见？刚拉着车子在前头走着……”

“哦……”他心里过意不去，这样重的体力活儿，人家给自家干了一天，已经够累了，又来给自己帮忙拉车，真是叫人心里不安，“哦！人家娃娃也累呀！”

“我劝人家回去歇下，我慢慢也就拉完了。”淑琴感动地说，“俩小伙子根本不在乎，装上麦子就走了……所以说，还是乡党好，人说‘再好的亲戚一两辈儿，平淡的乡党万万年’……”

乡党情深，庄稼人过红白喜事，盖房箍窑，谁也离不得乡党帮忙。在他的淑琴割下一地麦子而不能拉运上场的时候，两位乡党自觉前来帮忙拉运了，这是要付出汗水的重体力劳动啊！他深深为之动情，猛然间，心里一动，虎生和根长不就是在河滩洗澡时聊天那俩小伙子吗？想起他俩给他说过的话，要他替他俩在工厂找一份合同工干。赵鹏心里又不安了，两三天来，他集中精力，对付着那三位从大洋彼岸来做生意的洋大哥，把这两个穷乡党提出的希求忘得干干净

净，而他俩已经不顾疲劳，自动给他帮忙来拉运麦子了。他心里过意不去，像欠下了那俩小伙的债似的，却又不好对淑琴说明原委。

赵鹏从淑琴肩上取过牛皮车襻，搭在自己肩上，没有说话。是的，拒绝那俩小伙来帮忙不合适，让人家帮下去又于心不安，随其自然吧！夏收完毕回厂后，得问问基建科，有没有修路垒墙的活儿需要找民工……

大儿子毛毛给淑琴在后边推车，现在被妈妈指使到地里去，把散摆在地里的麦捆抱到一堆，集中起来，节约下装车时满地跑着抱麦捆的时间，推车的任务由她来承担。

赵鹏扛起小推车的车辕，才体味到这车麦子的分量，虽然看去装得并不多，却死沉死沉的。河川的麦子长得比坡地的麦子成色好，又割得绿，麦秆尚未死掉干枯，分量加倍地沉重。淑琴居然能拉动这样的重负，真是不可思议！

赵鹏拉着车子，淑琴在后边推车，夫妻二人的全部力量都作用在这个小推车的独轮上，气喘吁吁，而车架上充其量不过装着十一二个麦捆子！对于一般老农民，也许习以为常，甚至觉得小推车上的轴承胶皮轮子取代了木头独轮，已经够轻松了，简直是一个伟大的技术改革哩！而对于看惯了自动化和机械化操作的赵鹏来说，不仅是体力消耗难以忍受，心里更加急得发慌！可又有什么办法？还得屈身搭上那条被汗渍淤积得又硬又涩的牛皮车襻，驮上麦捆挪步！

他刚刚从舒适的上海牌轿车里下来，肩上又搭上了牛皮车襻。昨天他坐在西安一座新建的豪华的饭店的大厅里，脚下是软茸茸的栽绒地毯，身上是厂里特意给他买下的笔挺的西装，和洋大哥一边品茶，

一边侃侃而谈；今晚却驮载着二百多斤的麦捆子走在漆黑的河川土路上，汗流浃背，气喘如牛。今天午间的庆祝洽谈成功的宴会，丰盛的程度不仅使他吃惊，连初次来到中国的洋大哥也赞不绝口，中国菜的味道简直妙不可言！今天晚上，他现在连喝一口凉开水的工夫也挤不出来，一家人连晚饭也顾不上吃哩！真是天上人间，差距相去太远了！

他如果出生在一个书香门第，或者出生于城市的任何一个最普通的家庭，就不会有这样强烈对比的差距感了。他出生于一个农民家庭，父母已经长眠在村后的原坡上的黄土里了，妻子和儿女还匍匐在父母匍匐过一生的土地上，他得帮她种地、锄草、浇水、收割，获取一家人生存下去的物质。他穿起一身西装来也是挺帅的学者派头，侃侃地谈起现代科学技术的奥秘来，风度也不错；与外商用英语交谈起来，使洋大哥不敢小看这位中国的年轻的工程师；可是，他却不能把牛皮车襻甩到大西洋里去。他在城市和乡村之间生活着。他体味着现代文明和现代愚笨的双重滋味。

他在越来越注重物质生活的人们中间，听到过一种新鲜的议题，中国实现现代化的最大负担是农村，或者更确切说是农民。他觉得这些议题不无道理。问题恰恰在于，什么造成了农村的这种进步的缓慢？有哪一位农民不愿意用汽车拉小麦而宁肯像牛一样驮着小推车？工业社会不能提供农业充足的机械化设备，而极左的农业政策又造成了农民粮缸和钱袋的空虚，他不搭上牛皮车襻，能由得他吗？他想洗一洗浑身的污垢而掏不出五毛票子，况且浴池全都建在城市里！

现在，赵鹏不得不中止脑子里这种激烈的争论了，上场的陡坡就在脚下。他在坡根歇下，缓缓气，聚足力气，要拽车上坡了，不能和那种高雅的议题辩白了。

“啊呀！赵鹏叔，你啥时间回来的？还没吃一口饭吧？”长头发虎生问。

“你回去吃饭，甭拉车子了，俺俩一会儿就拉完咧！不费啥！”光葫芦根长豪爽地说。

两个一高一矮、一粗一细的小伙热诚地对他说，赵鹏只是感激地笑着，说他其实并不饿。他们年富力强，似乎并不累，也没有痛苦不堪的神色，把拉小推车说得很轻松。赵鹏的心里却不轻松。如果俩小伙完全出于乡党情谊来帮忙，他会充分享受那种友谊的快乐；他俩如果出于一种求他办事而付出的一种代价，就使赵鹏心里不自在了。不管出于怎样的动机，他都得做出感激帮忙的笑脸。

拉车上坡，比在平地上行进时背上的分量一下子增加了几倍，待拉上场塄，他放下车子，靠在麦捆上，心脏像是要从喉咙里蹦出来，而气却急喘不赢了。一辆手扶拖拉机开到下坡路口，在赵鹏跟前停住，他以为自己的车子挡住了路道儿，正想挪一挪，驾驶员却在黑暗里说话了：“赵鹏叔！你的麦地在哪儿？”

“北渠口。”赵鹏随口说，“你家拉完了？”

“早完了。”小伙子在驾驶台上大声说，拖拉机“嘟嘟嘟”的声音很大，“俺爸叫我给你拉麦哩！”

“这……”赵鹏一愣，他听出小伙子的声音，这是支部书记的儿子，动用人家的机械、人力和机油，实在过意不去，连忙说：“不咧，再有两趟就完咧！”

“你甭用小推车受罪咧！”小伙子好心好意劝他，“我拉一回，顶你三四回哩！”

“天黑。路陡。”淑琴也担心地说，“算咧！再有三五回就拉完了。”

小伙子已经扯动闸杆，开下坡去了。

黑暗里，淑琴盯着赵鹏模糊的脸，都没有说话。

赵鹏闷了半晌，猛然站起，对淑琴说：“拉就拉吧！反正硬挡也不好。你立马回去，炒两盘菜，我的提兜里有一块熟肉，正好。看看小卖部开门没有，买一瓶好酒……”

九

赵鹏从村巷里走过去，即使到了半夜，河川里还有男人或女人相互呼唤问话的声音，村巷里仍然有满载麦捆的小推车在“刷啦刷啦”响着，紧张的抢收时节，黑夜和白天没有严格的分界了。

他照直朝村子西头走去，去请党支书的小儿子来吃饭，他受他爸的指派，用拖拉机帮他拉运完了北渠口割倒的麦子，该当领情哩！

支书家在村子西头新辟的庄基上盖起了一座青砖红瓦的新房，他走到门口，看见支书的小儿子正在院里洗手，看见赵鹏后，已经意识到他登门的目的，仗义地说：“你跑来做啥？我刚才吃过饭，就只拉了三趟麦，统前到后没用下一个钟头，肚里还实腾腾的哩！”

“去喝一口茶也好……”赵鹏劝小驾驶员。

“谁？噢！是赵鹏呀！”党支书从屋里走出来，站在台阶上，完全用蔑视的口吻说，“你请他吃饭？噢呀！狗屁不懂的娃娃，值得你请他？”

“娃儿忙了半夜，去喝口热汤。”赵鹏忙说。

“我可不给他惯这号毛病！见给乡党帮忙，就要吃要喝，啥好毛病嘛！”党支书很严格地借机训导儿子，“甭钻钱眼儿！学点好思想！”

小驾驶员只顾洗搓油污的双手，搓得肥皂沫儿“吱吱”响，对父亲的训导，不吭一句。

“娃儿给我帮了大忙……”赵鹏继续邀请。

“应该的嘛！”党支书毫不介意地说，“他给你拉几回麦子，算什么大不了的事！你是国家的重要人才，给党有大贡献哩！看见你拉小推车，我心里难受哩！党中央三令五申要重视人才，爱护知识分子，有的人总是不执行喀！像你这样的人才也要拉车运麦，实在……我才叫他赶紧去给你帮忙，咱要按中央的精神办事，爱护人才哩！”

赵鹏听着党支书这一番剖白，反倒张不开口了，党支书在他身上体现党对知识分子关怀爱护的指示精神哩！他再一次劝解党支书，放松禁令，让小儿子跟他去吃点饭。党支书手一摆，五十多岁的强壮汉子的大黑脸一甩，干脆把话说绝：“你快回去吃饭，甭洋磨时间了！你请他吃一顿饭不打紧，惯下坏毛病可不得了……”

赵鹏看看再无希望，就再三道谢，走出宽敞的院子，心里不由得想，党支书这人倒是个直杠脾气。

他又走进村子，去请那两个小青年，刚走到下坡路口，影影绰绰看见一高一矮两个人，朝坡下走。赵鹏忙喊："哎——等等！"俩人闻声站住了。

"走！到咱屋喝口热汤——"赵鹏走近说。

"不啦不啦！"长头发高个儿说。

"俺俩急着去洗澡哩！身上扎得难受。"矮个光葫芦补充说，"甭劳神了！要不，咱们一块去河里洗澡？"

"吃罢饭，我跟你俩一搭去。"赵鹏已经牵住长头发小伙的胳膊，"你俩不去，你淑琴婶子炒下那些菜，给谁吃？放到明日就坏了！"

"支书的儿子嘛！有他去吃！"长头发一仰头，"人家用拖拉机贡献大！"

"对！连他爸一块请！"光葫芦附和说，"那老家伙爱吃——嘴大吃百家！"

赵鹏看出来，在这两个青年中，起主要作用的是长头发，他死死拉住他的光胳膊不松手，轻声说："支书家娃娃不来，你俩再不去，真要把菜搁坏了。"

光葫芦侧过头，等候长头发的意见。长头发把头一摆，说："那货不在，我俩就去！"

赵鹏悟出他俩和支书的小儿子关系不睦。

小圆饭桌摆在院子中间，电灯从窗户里拉出来，吊在小柿树的横枝上，圆桌上竟然摆出四大盘菜，淑琴真是有办法哩！

“叔哎！明说吧！”长头发喝下一盅酒，畅快地说，“吃你一顿饭，我也高兴。咱之所以不想来，主要是不想和支书家的人照面。”

“有啥冤仇不能消除哇？”赵鹏笑问。

“俺俩到县上告过他！”光葫芦说。

“咱是明告，不怕支书知道是咱告。”长头发拍拍胸脯，“敲明叫响去告状！”

赵鹏没有吭声，佯装低头端酒杯，他对党支书赵生济又不是完全陌如路人。小小的赵村，既是一个大队，又是一个独立小队，属于两级核算单位。赵生济既任支书，又任大队长，同时也是生产队长。前些年实行一元化领导，他说他自当支书以来，早就一元化了。近两年实行责任制，精简农村基层干部，他说他早就符合精简精神了，从来是身兼三职，没有加重过社员负担。他是赵村的真正的当家人。他有一副生铁坯子似的坚实的身体，有一个硬如钢锨般的脑袋，他脾气执拗，坚韧不拔，断事严明，可以说六亲不认，该罚的一律就罚，直至对他的老伴。近年间，赵鹏从乡亲们口里零零星星听到的关于老支书赵生济的议论，不断地冲刷他过去的那个令人崇敬的老支书的印象。借着实行责任制的动荡，队里的小拖拉机折低价给自己买下来，处理公房也是如此，云云。

“队里每月给他开三十六块钱的补贴，实质是工资。每到公社开一次会，另外再记一个‘公务劳动日’，年终按一块钱开账。给谁家调解一回纠纷，也要记一个‘公务劳动日’，还有好多怪名堂，一年下来，

白拿多少钱啊！”光葫芦说，“俺俩到县委告状，村里好多人都签了名。”

“结果呢？”赵鹏倒关心起来，“县上解决了吗？”

“嗨！甭提！”长头发一拍大腿，“县委的干部把俺俩递上的材料一看，说：‘问题是存在的，但还不是太严重。比赵生济严重得多的违法乱纪的人，我们还调查处理不过来呢，得等一等。’这不，等了三个月了，连个音儿也没有！我们也没劲头再告了。”

这个人，当了十几年干部，也许是把过去的那一股虎气退掉了，或许有更复杂的原因。赵鹏听着，不由得感慨起来：“这人哪……丝毫也不顾及党在农村的政策条例……”

“哈哈！政策——”长头发大笑，“赵支书在村里大喊大叫，说‘政策是个红苕’！”

“啥意思？”赵鹏问。

“你猜！”长头发含笑不露。

“红苕嘛！生着是硬的，蒸熟就软了。”光葫芦笑着解释，“中央的政策下来时都是硬的，经过赵生济支书的那个‘锅’一蒸，就软了，随扁随圆由他捏！”

噢！赵鹏听着，真是哭笑不得，不由得受了两位小青年的感染，生出义愤之情了：“你俩该去公社反映，公社管的地盘小，事少。”

“去过公社了，啥也不顶。”光葫芦说。

“你甭掺和咧！”淑琴借着送汤的机会，走到圆桌跟前，说，“你又不在家，管人家队里的事做啥！”

“看看看！婶子怕了！”长头发笑着。

“不是怕不怕。”淑琴不服，“不是我说，你俩再蹦跳，也告不倒赵支书！”

“告不倒归告不倒，搔搔他的皮毛也叫他甭贪吃得安然！”一个尖尖的声音从门口传来。

赵鹏一看，却是王秀珍。这个咋咋呼呼的女人说话真痛快。他的淑琴已经有点明哲保身的气味了，过去，她知道自己的生活支柱是他可观的月薪，所以对队里搞好搞坏不大关心，虽然免去了许多口舌，落下一个贤惠媳妇的美誉，却不像初进赵村当团支书时那样生气勃勃了。人都在变。

“淑琴嫂，跟你商量一件事。”王秀珍说。

“啥事？”淑琴问。

“队里明天开脱粒机呀！队长传下令，自由结合，五户一组，包打一天。”秀珍说，“我来寻你，咱们结合一组，你愿意不？”

“好嘛！”淑琴随和地笑着，“跟你这个美劳力组合，我还怕吃亏吗？不过才两家呀！”

“你俩愿意不愿意？”王秀珍指着长头发和光葫芦，“跟婶在一组，好好干，打完麦，婶子闲下了，给你俩一人寻个好媳妇……”

长头发和光葫芦开心地笑了，答应了。

“再联一户谁吧？”王秀珍和淑琴在一堆嘟哝起来。

赵鹏给俩青年递烟，他们吃饱了，站起来，把衫子搭在肩上，问：“你还去不去河里？”

“算哩！”赵鹏笑着说，“我的腰疼……”

俩青年刚走开两步，又折转回来，长头发对赵鹏认真地说：“叔哎，那天在河滩，俺俩托你找合同工的那个事……”

“问题……不大吧！”赵鹏说，“我听说要重修围墙，回厂去我再联系确实。”

“不咧！鹏叔！”光葫芦说，“俺俩找下一个赚大钱又不贴本儿的营生了。”

“哦——”赵鹏倒省去了一件麻烦。

“前日下雨后，俺俩到县城去逛，碰见一个高中同学，他给西安一家回回开的烧鸡店铺送活鸡，一个人供不上，叫俺俩一块干。”长头发说，“一次送去七八十只公鸡，能赚三十多块哩！”

“七八毛钱一斤收下，一块钱一斤卖给回回，一斤赚两毛多，两三斤重的一只公鸡，赚五毛。”光葫芦得意地解释账理，“进山收一天，进城送一天，两天一个来回，赚三十多块。”

“好事好事！”赵鹏笑着夸赞说。

“现在嘛！要想法儿挣大钱哩！”长头发沉吟着说，“费力少而挣大钱，才能富得快。可是，鹏叔，咱可不是赵支书那样白吃白拿！”

俩人咂着烟，走进村巷里去了。

赵鹏走回院里，正碰见淑琴送王秀珍出门，他随口客气地说：“再坐坐……”

“我还要联合一户人家哩！”王秀珍说。

“秀珍，甭急走，我还有句话。”淑琴叫。

王秀珍又“咚咚咚”走过来，站到淑琴跟前，听她说什么忘记了的重要话儿。

“你把前日在麦场上咱俩说的那几句话，当面说给你鹏哥听听！”淑琴一本正经地说。

“啊呀！哈哈哈……”王秀珍听罢，大叫一声，惊慌地奔出院子去了，嘎嘎嘎的笑声一直延续到大门外的村巷里。

赵鹏不知什么话，竟会使天不怕地不怕的王秀珍——绰号“王疯子”——如此惊慌失措，好奇地问：“淑琴，她说什么话来？笑成这样！”

“好话。”淑琴佯装镇静。

“啥好话？”赵鹏愈加好奇。

“她说……”

“说啥？”

“她说她想跟你睡觉！”

“啊呀！”赵鹏猝不及防，闹了个大红脸，奔到淑琴跟前，在她腰里捅了一拳，无可奈何地说，“你们这些活宝女人呀……”

十

一场近似疯狂的劳动终于结束了。

红色的脱粒机的排泄口儿里排出最后一抱麦秸秆儿，空转了半分钟之后，轰鸣声停歇了，长头发和光葫芦俩人早已被尘灰和土气迷糊了眉眼，像是从垃圾堆里钻出来的，俊气的模样变得污脏不堪了。他俩早已等待不及，奔河里清洗去了。王秀珍一扑塌躺在新打下来的麦堆上，扯长声音叫唤，使旁人听来也能感觉到极度疲劳之后的舒坦。淑琴正在用扫帚把散溅出去的麦粒扫过来。赵鹏坐在软软的麦秸堆上喘气，看着淑琴，不由得生起气来：“你忙着扫那几颗麦粒做啥？歇一会儿扫它就飞了吗？”

“扫了就毕咧。”淑琴仍然在扫着。

“男人心疼你哩！瓜呆子！”王秀珍躺在麦子上，尽管累得要死，仍然不放过说笑的机会，“我那个死男人，见面总是嫌我把活没干好，干得少……”

淑琴扫完，扔下扫帚，坐在麦堆上，在秀珍耳边说了句什么逗趣话，俩人抱着，笑着，在麦堆上滚作一团了。

从黎明前的三点半钟拉开脱粒机线路上的闸刀，直到现在——夜里十二点钟，由王秀珍临时联合起来的五家农户，所有能拖动麦捆的老人和娃娃全都参战了，壮劳力更不消说了。手脚利索的青壮年，站在机口两边，把麦捆解开，分成小把，连续不断地塞进去。后边的排泄口里吐出脱掉了麦粒的麦秆和糠皮。金黄色的麦粒从旁侧的洞口流出来。

没有人偷懒，完全是自觉自愿的联合，谁家单独一户也无法使用这个机器。从天不明开始，打完一家的麦子，再接上打第二家的麦子，直到赵鹏家的麦子脱粒完毕，整整二十多个小时的紧张劳动，顶强的劳力也招架不住了。

“打完咧？”

赵鹏一抬头，党支书赵生济站在当面，手里掂着一尺长的旱烟袋儿，正以关心的口气说话。赵鹏坐起来，笑笑说：“完咧！总算打完咧！”

“这个机械化真是好！”赵生济端端正正站着，背不驼，腰不弯，站在那儿，透出一股强悍的气魄，“收麦前，我正发愁哩！你看呀，这么大的场面，一家一户分得一块一绺，不足三步宽，光麦捆就塞满了，怎么碾？电碌碡根本没法使用，牛拽碌碡也用不上了。咋哩？这一块一绺的窄道道儿，牛连身也转不过喀！听说渭南农械厂有新式脱粒机，我立马赶快去买，这机械可真好！占地少，脱粒快，正适合一家一户使用……”

“这个脱粒机确实不错，实用，工效也高。”赵鹏连连点头，“你给社员办了件好事。”

“说起来还得感谢你们。”赵生济说，“要不是科学人员想出来这样的窍道，咱农民今年真可得用……棒槌砸哩！”

赵鹏哑了口，没有料到，赵生济的话一转两拐，归结到对他这些科技人员的功劳上来了。

“你甭久停，回去洗洗，吃饭。”淑琴站起来说，“我先回去了。”说着，和王秀珍低声轻调儿说着什么，走向村里去了。

“中央要各级干部爱护知识分子，这政策真是英明。”赵生济发表议论，“譬如说，这个脱粒机，一天一夜打多少麦子？靠咱笨庄稼人用棒槌砸，用连枷打，一百个强劳力打一天，顶不住机器转一锅烟工夫……我信服科学！”

赞扬科学，保护科技人才，无疑是目下最时髦的口号了。这个口号在此时此地由此人慷慨激昂地喊出来，尽管说得干脆，直率，诚心诚意，却无法使赵鹏感觉出它有什么实际意义，反而有一种潜上心头的敏感：他平白无故来送给我几句好听话，是否包藏着其他意思呢？淑琴和王秀珍走出麦场之后，赵生济一曲腰，坐在麦秸垛子旁边了，看来还有长坐下去的意向。

“赵鹏，你们学习多，我是老粗看得浅，我想问你——”赵生济拨开麦秸，把未燃尽的烟灰磕在地上，用脚蹭了两下，神秘地问，“你说，国家朝这个样子往下走，怎么得了呢？”

“什么不得了呢？”赵鹏迷惑地瞧一眼赵生济，刚才他还慷慨激昂地赞扬中央注意开发人才的英明措施，表示他这个农村基层干部与中央保持着思想上的一致性儿，怎么前头的话尚未搁凉，又疑虑重重了呢？他问：“你是指哪一方面？”

“比方说农村。”赵生济猛地一摆头，不堪设想的架势，大声叹惋，“简直成了没王的蜂了嘛！”

赵鹏依然得不到谈话的要领，农村的事儿，太广泛了，他想探知赵生济所提的具体哪一方面的问题，就说：“什么事使你作难了？”

“凡事都难办！”赵生济说，“无论中央的指示，或是县上公社的指示，传达下来，没人听喀！各人想做啥就做啥，谁也管不了啦。”

“是吗？”赵鹏含含糊糊搭讪着。

“比方今天打麦吧！规定每人收两元打麦款，开电费，开管机子的技术人员的工钱，社员都交了，就他俩不交——”赵生济叙说，“他俩跟你在一组打麦，你看那俩货！一个头发长得像女人，一个像和尚。这俩捣蛋锤锤子搅得全村不安宁……”

“他俩为啥不交打麦款呢？”赵鹏问。

“要死狗嘛！有啥道理？啥道理也没！”赵生济气愤地说，“而今又不搞运动，你说，像这号捣蛋锤锤子，我咋办？”

怎么办呢？赵鹏也想不出什么好法子，却是早已从长头发和光葫芦嘴里得知，他们根本不是要赖不交用脱粒机打麦子的费用，而是要等着你赵支书交了以后才交。你赵生济不抓阄，不排队，也不和谁家联合，叫来几个社员给你脱粒，说是“试验新机器”，把你家十亩地的五六千斤麦子“试验”完了。那俩“捣蛋锤锤子”可是咬住不放，说：“试机脱粒不用电吗？”

“我听广播说，要清除‘文化革命’的流毒哩！这俩货，是标准的‘流毒’！”赵生济说，“要是搁在工厂里，非收拾他不可！农村里，没有组

织纪律性儿……”

“怕是……需要开导、教育。”赵鹏选择着合适的字眼，力图显示出与赵生济的想法的原则区别，“现在的青年，比较活跃……”

“俩东西到处告我，你听说了吧？”

“没……有。”他撒谎。

“告能怎样呢？我不怕。”赵生济口气很硬，却无法完全掩饰色厉内荏的那一点隐私，“包子是虚的，蒸馍是实的。”

“那当然。”赵鹏说，“实事求是好。”

这当儿，毛毛跑进场来，叫赵鹏回去吃饭。

赵生济站起，表示歉意，说他和他扯闲话，耽搁他吃饭了。当赵鹏站起要走的时候，赵生济却像无意间记起一件闲淡事，用不在乎的口气说：“你们工厂要是需用砖头、沙子，咱有拖拉机，包运。或是其他需要拉运的活儿，都行！弄下那个破车，没活干，净贴老本……”

赵鹏站住，木然点点头，从昨天赵生济给他支使来拖拉机拉运麦子，长头发和光葫芦疾恶如仇的嘲骂，赵支书刚才的一席话……他现在还无法把这些纷繁的现象归纳到一个准确的问题上。可是，他还是点了点头。

“闲事！小事！”赵生济大声爽气地叮嘱他，“可甭因了咱的小事，误了你的工作……”

赵鹏心里不是滋味，看来，赵生济在赵村这十多年，确实变了，那个直杠生硬的庄稼汉子，脑子上安上好多转轴了……

十一

草草地擦洗了身子，吃罢夜饭，淑琴把一条被子搁到小推车上，叫他到麦场里去过夜。明天要在场面上摊开新麦晾晒，晚上就不需把麦子搬回家里来，为了防备手脚不干净的人盗走粮食，就得各户看守自家的麦堆。

脱粒机在碾麦场的那一角轰响，人声嘈杂，尘土飞扬。已经打过麦子的农户和还轮不着今晚打麦的农户，麦堆前或堆垒的麦积子跟前，都有一个主人在小推车上睡觉。为了防止夜露的浸润，有人用杈把撑起两页苇席，罩在小推车上方。脱粒机轰然作响，丝毫不影响在小摊车上睡觉的庄稼人舒缓香酣的鼾声，人都太劳累了！

赵鹏在小推车上铺上干燥的麦秸，再铺上被子，就躺下了。刚躺下，他发觉小推车的车身太短了，两条腿没处搁。他又爬起来，把一把长柄竹条扫帚搭在车辕上，双腿可以平搁在上头了，挺舒服。

多少年没有在乡村里露天睡觉了，唤起人多少甜蜜的童年和青年时期的记忆啊！小时候，每到夏收，他就拽一片破席，和小伙伴们到麦场上来睡觉，在麦草窝里翻跟头，在粮食堆子里倒栽桩，玩到夜深了，小伙伴们挤在一窝窝睡觉。大人们在这个收获的季节里，表现出格外宽容的胸襟，一任孩子们玩闹。

现在，赵鹏又背对热烘烘的乡村土地，面向高远的星空睡觉了。他参加过许多专业性会议，住过豪华的饭店，睡过一晚要价三十多元

的床铺，那是富有弹性的一种软床，自然很舒服了。此时睡在小推车上，也觉得挺舒服。看来人的皮肉也没有定着，全看在何时与何地，可能性又如何了。

身边一阵刷刷响，他转过头，看见淑琴站在麦堆跟前，用手撩着麦粒儿，忙问："哦呀！你不看看什么时候了，还不睡！"

淑琴在麦堆上坐下，拢一拢头发，轻声说："我睡不着，想来看看麦子！"

"麦子在这儿搁着，跑不了哇！有我给你守着，谁也灌不走！"赵鹏说，"你还不放心？"

"由不得人呀，赵鹏！"淑琴动情地说，"咱们啥时候有过这么多麦子！"

是啊！过去顶好的年景里，人均夏粮从没超过二百斤，十之八九的年份里，都是百斤左右，而小河川道是号称盆子之地的哩！跟前这一堆麦粒，刚从脱粒机里流出来的时候，几个老农已经估定不在两千斤以下。这是淑琴和两个孩子的口粮，即使全年不吃一粒杂粮，放开肚皮也吃不完呀！他坐起来，屈着腿，心里也很高兴，逗笑说："是嘛！讨吃婆突然有了一瓮白面，夜里睡不着了！隔一阵儿就跳下炕，揭开瓮盖儿看一回……你呀！"

淑琴默默地听着，不恼也不笑，像是在想着什么，转过头说："赵鹏，夏收后我们真的就走吗？"

"早说了嘛！你又……"赵鹏说。

"咱们的地怎么办？"她问。

“早跟你说了，交给队里嘛！你咋……”赵鹏已经意识到，淑琴犹豫了。

“不交行不行呢？”淑琴问，“我不想进城了。”

“怎么啦？”赵鹏意料不到，淑琴果然发生变故了。

“种地有种头儿了。”淑琴说，“其实，就是收麦时忙些苦些，平时锄草施肥，我一个人全干得了。你在城里工作，让娃娃跟你上学，在灶上吃饭，不用你麻烦。我在家种地，给你爷们儿供给吃的，倒好。”

赵鹏瞅着淑琴，她不是随口说的闲话，而是经过周密考虑之后的谋划。她看见自己辛勤劳动的丰盛的成果，眷恋这块热土了，可是，这样一来，把他的计划又打乱了，就坚定地说：“不行。土地要交给队里，我们已经有国家供应粮了，你不进城，我一个粗大男人，怎样管娃娃？”

“要是能连收三年，咱们就能攒下余粮了，再不怕‘三年困难’了！”淑琴说着，大约想起她承担过国家的困难，从中技学校义无反顾地回乡的往事，“我可是饿怕了……”

赵鹏大口抽着烟，瞅着淑琴，她本该是一个技校毕业生，现在应该在某工厂里做一个不错的技术员。可是，她现在却离不开乡村的土地了，这儿有丰盈的收获强烈地吸引着她。

王秀珍神出鬼没地走过来，往麦堆上一坐，笑着说：“你两口儿好亲热，还在说悄悄话？”

“哟！你个鬼，吓我一跳！”淑琴说，“你咋到这时候还没睡？”

“娃们一天没吃热饭，净啃干馍，我给娃们弄了顿热饭，才安顿得睡下，我来场里看守麦子。”王秀珍快嘴快舌，拍着淑琴的脊背，“嫂子！说实话，前几年咱做梦也没敢想有这么多麦子！”

淑琴瞅一眼赵鹏，没有说话，对秀珍点点头。

“你记得不？”王秀珍问，“那年腊月，多亏你借给我五十块钱，掌柜的才跟鹏哥去买粮……”说着，又问赵鹏，“你也记着吧？”

赵鹏点点头，那是忘记不了的事。腊月里，差不多人家都断粮，好在赵鹏有工资，可以到渭河北岸的富裕户人家去买粮食，而秀珍家就更难受了，既没粮吃，又没钱买。秀珍朝淑琴借下五十块钱，赵鹏和她的男人苍娃搭伴到渭北去了。那时候，粮食作为一类物资，不许流通。赵鹏不熟悉地理和行情，由苍娃引着，在一个陌生的村子买下一百五十斤苞谷，在野地里躲到天黑，过渭河大桥时，被民兵抓获了，粮食全部没收了。

赵鹏再三说好话，也不顶用，可怜苍娃五尺高的小伙子，“哇”的一声哭了，给守桥的民兵跪下来，说他买粮的钱还是借下的……赵鹏的脑海里，永久地烙下了同辈弟弟那张可怜巴巴的脸。

“啥时候进城呢？”秀珍问。

“原来想……麦收完了去。”淑琴说。

“我要是想你了咋办？好嫂子！”秀珍搂住淑琴的肩膀，“我还欠着你那五十块钱哩！”

“早都说过，再不提这话嘛！”淑琴有点生气地说，“权当人家把我的粮收咧！我和你鹏哥早都给你两口子说了，你咋又啰嗦出来？”

“俺不能不还，良心难昧呀！”秀珍豪气地说，“他今年在工厂里干了半年合同工，挣下几个钱了，想着明年春天盖起房来，再还给你，反正我知道你比我手头松泛……还是非还不可。”

“再不要提这件事了！”赵鹏说，有点不耐烦，“提起这事，我心里难受。你知道不？俺俩掏大价买粮，吓得躲来躲去，跟做贼一样！”

“睡吧！天大概快明了。”淑琴说。

王秀珍站起来，朝自己的麦堆走去。

赵鹏看看表，四点钟了，北方的夏夜十分短暂，四点半钟通常就亮了，现在还睡什么觉呢。他从小推车上站到场地上，把被子卷起，抬起头来，东山群峰的上空，已经透出一缕蛋白似的亮色，第一声知更鸟儿尖锐响亮的叫声在村庄上空响起，接着就是一群同伴的此落彼起的闹嚷嚷的大合唱了……

十二

赵鹏沿着场塄下的慢坡小路来到河川里。黄熟干枯的麦穗和麦叶上，结着一层薄薄的露珠。收割过的田块里，齐刷刷的麦茬子中间，夹着一株株刚刚透出地皮的苞谷苗儿。为了提早播秋，错开收割和播种的双重任务的紧迫时间，庄稼人改变了收罢麦子才种秋的老习惯，在麦子成熟的十天里，用一种小巧的插播器具，把苞谷种子扎进麦田里去了。土地连一天空闲歇息的机会也没有，黄色的麦子刚割掉，绿色的生命已经勃勃泛起了。

一条从河岸边端直伸延到村边塄坡跟前的南北大渠，把三条东西走向的灌渠串联起来，组成了一个大灌溉网。灌渠上排列着桶粗的白

杨，庞大而紧凑的树冠已经挨挤在一起了，一阵轻微的晨风掠过，就响起“哗哗哗”的颇具威势的响声。渠岸上绣织着杂草、马鞭的长蔓、菅草的长叶、三棱子、长虫草，以及苦苣和臭蒿，织成一条厚茸茸的草毡。大珠露水在黎明的晨光里闪闪发亮，浸湿了他的脚面和腿腕，凉凉的，痒痒的。空气清凉而湿润，使人不由得想张开双臂，鼓起胸脯，吸进这富足的洁净的空气。

每一块尚未割掉的麦田里都有人在弯腰挥动镰刀，每一条通往村庄的河川小路上都有满载麦捆儿的小推车或架子车在缓缓移动，似乎昨天夜里根本就没有停止过，土地承包到户之后所迸发出来的疯狂的劳动劲头啊！

南北灌渠的渠沿高高地超出两边的田地，渠里流淌着清凌凌的河水，水草在流水中悠悠摆动，有人已经给割过麦子的田地里灌水了，促使被麦子挤夹得又细又黄的苞谷苗儿振作起来，茁壮生长。

在责任制后的第一个丰盛的夏收之后，他要永久性地从这亲爱的土地上拔脚了，竟成了最后的一次收获。

淑琴居然犹豫了，二心不定了，不想进城了，第一次获得的丰盛的劳动果实，强烈地诱惑她、吸引她，她不想进城去了。可是，那仅仅是丰盛的收获果实的诱惑吗?

雄伟的笔直的大堤，把小河河道通直了，过去被河水任意切割得弯弯曲曲的河岸，现在还看得出残缺不全的走向。他站在河堤上，一道蓝色的清水在沙滩上弯来拐去，哗哗流淌，旱季里的河滩上，河床裸露着嶙嶙的石头和沙滩。太阳即将出山，秦岭东山群峰的巍峨的巅峰，被炽红的霞光融合了，变得模糊不清了。

应该说服淑琴，不能动摇，夏收完毕以后，立即进城去，他这样想。

他不能把汗水再洒到黄土原坡上，手里也不必再握那个大约从西周或秦汉传留下来的小推车的木把儿……他无法再回到这种原始的生产状态中来，不是鄙薄故乡故土，也不是鄙视劳动吧？举家离土进城，在他们祖辈的漫长的生活史上，将划开一个历史性的标记。应该在走出赵村的村巷之前，拜访一下左邻右舍，乡亲乡党，也该给父母以至祖父祖母的坟头培一锨黄土。他要离开他们了，活着的乡亲和逝去的魂灵！不论他日后怎样都不会忘记莽莽苍苍的黄土高原之中的小河川道的天地；都不会忘记牛皮车襻和蜷卧在小推车上的滋味！为了他的乡亲和赵村的后代尽早甩掉那又硬又涩的牛皮车襻，他明白自己应该怎样……

赵鹏转过身，朝村里走去。他要立即回工厂去，让厂里给他临时凑合一间房子；家里的麦子由淑琴去晾晒，不是什么急不可待的大事了；一旦厂里把住房安排妥当，他就回来搬家，把淑琴、儿子和女儿，以及吃穿用具，全都搬进工厂家属区里去。

走上场塄，赵鹏一眼瞅见，淑琴正在用木板锨摊搅麦子，他向她走过去……

1985年春

蓝袍先生

我的启蒙老师徐慎行先生，年过花甲，早已告退，回归故里，住在乡下。他前年秋末来找我，多年不见，想不到他的身体还这样硬朗。

他住在原上的杨徐村，距我居住的小河川道的村子，少说也有二十里远，既不通汽车，也不能骑自行车。他步行二十余里坡路，远远地跑来，我的第一反应是要我帮他什么事情。他接过我递给他的茶水和卷烟，坐稳之后，首先说明他没有什么事，只是找我闲聊。他确实只是闲聊。整整一个下午过去，天色将暮时，他顶着一顶细草帽又告辞了。他说他在三个多月前埋葬了老伴，过了百日，算是守完了节，心里实在孤寂得受不了，才突然想到来找我聊聊的。我信了他的话。老伴初逝，女儿出嫁，男娃顶班在县城小学教体育，屋里就剩下他一个人，怎能不感到孤独和寂寞！我心里也有一缕悲怜的气氛了。

腊月里，入冬以来的头一场好雪，覆盖了原坡和河川，解了冬旱，大雪封锁了道路，跑小生意的农民挂起秤杆，蒙住被子睡觉了。大雪初霁的中午，奇冷奇冷，徐慎行先生又走进我的院子，令我惊叹不已。他的身上和胳膊肘上，膝头和屁股上，粘着融雪的水痕和泥巴，两只棉鞋灌满了雪粒，湿溜溜的了，可以肯定，他在坡路上跌翻过不知多少回。又是孤独和寂寞得受不了了吗?

“我有一件事，要跟你商量。”

徐慎行先生呷了一口茶，就直截了当地开了口。他的脸上泛出红光，许是跋涉艰难累得冒汗的原因，而眼里却泛出一缕羞怯神色，与

六十岁人的气色很不协调。他终于告诉我，说是别人给他介绍下一个五十多岁的老婆，他已见过一面，颇以为合宜。可是两个女儿和儿子均是一口腔反对，没法说服他们。他自己当然不好直接与儿女商议，只好托亲友给儿女做解释。他的大女儿嫁到小河川道的周村，与我的住处相距不远，人也认识，于是就想让我去给他做大女儿的解释工作。

我不假思索，一口应承下来。

第二年春天，草木发芽了，一直没有见他的面，不知他的婚事进展如何，我倒有点惦念不下。我和他的大女儿以及女婿都是熟人，话可以敞开说，我说了许多条该办的好处，譬如徐老先生的吃饭穿衣问题、生病服药问题、家务料理问题，统都解决了，对于儿女们，倒是少了许多负担。又解释了儿女们最为担心的一个问题：老汉退职薪金的使用，会不会被那个老婆子揽光卡死了？终于使他们夫妇点了头，表示不再出面干涉，我也算是给启蒙老师尽了一点心。我随之就担心他的二女儿和儿子的思想通了没有，据说主要阻力在二女儿身上，她不出面，却纵容唆使弟弟出面闹事……

徐慎行先生来了，是在河川和原坡上的桃花开得正艳的阳春三月。他一来，我从他的眼里流露出来的羞怯神色就猜出了结果。

“我想忙前把这事办了。”他说，“到时候，你能否抽空来坐坐？”

我很乐意地接受了老师的邀请。

他坐下喝茶，抽烟，说那个老婆的脾气和身世。从他的语气里可以听出来，他是很满意的。说到她的人样、她的长相，他说能看出她年轻时很俊……

我实在想不到，夏收之后，他第四次来到我家的时候，又是一脸颓唐的神色，先哀叹了三声，说那件事最后告吹了！

我很惊诧，忙问他，到底哪儿出了差错？谁又从中坏事了？

“谁也没有坏事，也没有啥差错——”他淡淡地说，“是我不办了！”

“为——啥？”我不得其解。

“唉——”他摇摇头，叹息着，不抬头，“我事到临头，又……”

既然他觉得不好开口，我也就不再强人之难，于是就聊起闲话。他轻轻摇着扇子，眯着眼，扯起他三十多年教书生涯中的往事，一阵阵哀叹，一阵阵动情……

我送他走之后，心里很不好受，感到压抑，一种被铁箍死死地封锁着的压抑，使人几乎透不过气来，而他却在那道无形的铁箍下生活了几十年，至今不能解脱……

读耕传家

南原上的村庄，不论是千儿八百户的大村，抑或是三二十家的小庄，村巷整齐，街道规矩，家家户户的街门沿街巷开设，坐北一律坐北，朝南一律朝南，这一家的东山墙紧紧贴着那一家的西山墙，而自家的西山墙又紧挨着另一家的东山墙，拥拥挤挤，不留间隙。俗话说，亲戚要好结远乡，邻居要好高打墙。家家户户在自家的庄院里筑起黄土围墙，以防鸡刨狗窜引起纠纷和口角。院墙临街的中间开门，门上很讲究地修一座漂亮的门楼。

那儿的农民十分注重修饰门楼。日子富裕的人家修建砖木门楼，多数人家则是土木门楼。无力修建门楼的人家，就只好在土围墙上凿开一个圆洞，安一个荆条编织的篱笆门，防贼亦挡狗。生人进入任何一个村庄，沿着街巷走过去，一眼溜过两边高高矮矮的各姿各式的门楼，大致就可以划出各家的家庭成分了。不过，这是解放初期的旧话。现在，门楼的规模和姿势，已经与土改时定的那个成分关系不大了；如果按着旧的习惯去猜度，准会闹出牛头不对马嘴的笑话来。

门楼正中，一般都要挂门匾，门匾上镌刻四个大字。这四个大字的选择，实际是这个门楼里的庄稼主人的立家宣言。解放后，庄稼人心劲高涨，对门楼上的门匾的选择，免不了受时风的影响，土地改革时，好多人喜欢用“发展生产”“发家致富”；合作化时又时兴“共同富裕”“康庄大道”；三年困难时期又流行起“自力更生”“勤俭持家”；及至“四清”和“文革”运动接连不断的十余年中，诸如“红日高照”“万寿无疆”“斗争为纲”“真学大寨”等政治口号，确实风靡一时。

解放前门楼题匾的内容，可就单调得多了。凡是能修建得起砖木门楼或稍微像样的土木门楼的殷实人家，题匾上的立家宣言，十之八九都选用“耕读传家”四字，其用意是显而易见的。我们杨徐村，在南原上的稠如星海的乡村里，只算个中小型村庄，二百多户农家中，门楼修葺得最阔气的是大财东杨龟年家的。水磨青砖，雕梁画栋，飞檐翘角，俨然一座富丽堂皇的四角亭子。门楼下蹲着两只青石雄狮，墙上刻着飞禽走兽。门楼正中，在象征着吉祥永久的鹤鹿图像中，刻下四个篆体“耕读传家”的题字，与团团祥云相协调。杨龟年的大儿子在咸宁县政府做官员，家里有百余亩河川水浇地，整整两槽高骡大马，真是有耕有读，宣言与实际相一致。其余那些虽然也能修得起土木门楼的殷实户，也东施效颦地题下“耕读传家”的门匾，却大都是有耕无

读，名不副实，甚至一家老少尽是些目不识丁的粗笨庄稼汉子。但作为立家宣言，自然主要是照亮后世，无读书人的缺憾，必当由后辈人来弥补。

杨徐村另一户能修得起砖木门楼而且名副其实的“耕读传家”的人家，当推我家了。

我爷爷徐敬儒，对“耕读”精神的尊崇，甚至比杨龟年家还要纯粹。杨龟年的大儿子在县府供职，主要是为官而不从读书：二儿子从军要枪杆子而鲜动笔杆子了；家里的庄稼全靠长工和短工播种和收割而无须杨龟年动手抬脚。我爷爷徐敬儒，那才是“耕读”精神的忠诚信徒和真正的实践者。

我爷爷徐敬儒，人称徐老先生，是清帝的最末一茬秀才，因为科举制度的废止而不能中举高升，就在杨徐村坐馆执教，直到鬓发霜染，仍然健坐学馆。也不知出于什么思想影响，我爷爷把门楼上那副“耕读传家”的题匾挖掉了，换上一副“读耕传家”的题匾，把“耕”和“读”的位置作了调换。字是我爷爷写的，方方正正，骨架峻嶒，一笔不苟，真柳字体，再由我父亲一笔一画凿刻下来。我父亲初看时，还以为我爷爷笔下失误，问时，爷爷一拂袖子，瞪了儿子一眼，没有回答。我父亲不敢再问，却明白了是有意调换而不属笔误，该当慢慢地去体味，低下头小心翼翼地凿刻起来。

更有一件蹊跷的事。我爷爷垂老之时，对我父亲兄弟三人做了严格分工：一人继承他坐学馆，体现“读”；二人做务庄稼，体现躬耕；世世代代，以法累推。这样的分工，兄弟三人还勉强接受得了，临到爷爷咽气时，又留下严格的家训，可以归纳为“三要三不要”的遗嘱。

其训示曰：教书的只做学问，不要求官为宦；务农的要亲身躬耕，不要雇工代劳；只要保住现有家产不失，不要置地盖房买骡马。

兄弟三个瞪大眼睛，你瞅瞅我，我瞪瞪你，不知所措了。他们三个正当成年，早就想着齐心合力一展宏图，在杨徐村与杨龟年家争一争高低。近几年间，杨家兵强马壮，置田盖房，百业兴旺，已成为方圆十里八村新兴的富户。眼看着杨家小河涨水似的暴发起来。兄弟三人对父亲拘拘谨谨的治家方针早已多所不满，又不敢说，想不到老先生活着时限制他们的手脚，临走前还要把他们死死地捆绑在这点小家业上。老先生似乎早已揣摩算计到三个儿子的心数儿，怕自己走后儿孙们有恃无恐，干脆一句话说死：不遵从父训者，孽种也！不许给他上坟烧纸。兄弟三人只好委屈隐忍，不理解的也要执行，遵循老先生的遗训，耕田的躬耕垄亩，坐馆的潜心静气研读圣贤诗书。村里人把我爷爷这种古怪的治家训诫编成顺口溜，"房要小，地要少，养个黄牛慢慢搞"，当作笑话流传。

嗬呀！到得杨徐村一解放，杨龟年家耍枪杆子的老二死在解放军的枪口之下；当县官的老大囚在人民的监牢当中；家里的深宅大院、高骡子大马以及水地旱田全部分给杨徐村的贫雇农了。我至今也忘不了那个晚上的情景，我爸兄弟三个，捧着我爷的神匣，磕头作揖，又哭又笑，简直跟疯癫了一样。夜静以后，兄弟三个又跑到村后的祖坟里，趴在我爷的坟堆上，啃啊！扒啊！恨不得掘开坟墓，把留下"三要三不要"遗训的先知先觉的老祖宗的尸骨抱在怀里亲一百次！该怎样感激老祖宗——比诸葛孔明还要神明的老祖宗啊！亏得他早已看破红尘，留下严格的治家遗训，使得儿孙后辈免遭杨家的横祸！我们家定为上中农成分，虽然不是工作组依靠的对象，却也不在被打击被孤立的剥削阶级的圈子里，这已经是万幸了！

我爷爷瞑目前五年，已经选定我父亲做他的接班人，去杨徐村的私塾坐馆执教。据说，老先生在长期的观察中，觉得我大伯父工于心计，善于谋划，带一股商人的气息。二伯父脾气拗倔，合当是一介武夫。我父亲自幼聪灵智慧，既不像大伯父那么诡，也不像二伯父那样倔，深得老先生钟爱器重，加之对我父亲的面相也满意（用我爷的话说，天庭饱满，眉高眼大，肤色滋润），于是就在他年过花甲之后，由我父亲坐上了私塾里那把黑色的令人敬慕的太师椅子。

我依稀记得，爷爷死后，父亲脱下了蓝色长袍，换上了一件藏青色布袍，一来表示给爷爷的亡灵守志守节服孝，二来标志着他已过而立之年，该当脱下青年时期的蓝色长袍了。我的印象十分深刻，爷爷死后，父亲似乎一下子变成了另一个人，那眉骨愈加隆起，像横亘在眼睛上方的一道高崖，眼神也散净了灵光宝气，纯粹变成一副冷峻威严的神气。在学堂里，他不苟言笑，在那张四方抽屉桌前，正襟危坐，腰部挺直，从早到晚，也不见疲倦，咳嗽一声，足以使那些调皮捣蛋的学生吓一大跳。来去学堂的路上，走过半截村巷，抬头挺胸，目不斜视，从不主动与任何人打招呼。别人和他搭话问候时，他只点一下头，脚不停步，就走过去了。回到家中，除了和两位伯父说话以外，与俩伯母和七八个侄儿侄女，从不搭话。除了两位伯父，没有不怯他的。父亲从学堂放学回来，一进街门，咳嗽一声，屋里院里，顿然变得鸦雀无声，侄儿侄女们停止了嬉闹，伯母和母亲烧锅拉风箱的声音也变得低匀了。我和堂兄堂弟们要是打仗吵架，一不小心，父亲站在当面时，无须动手动脚，他只用眼一瞅，我们就都不敢出声了。他倒是从来不动手打孩子，可也从来不对任何人表示哪怕是少许的亲昵，我似乎比堂哥堂弟们更怯着父亲。

我现在唯一能解释父亲这种性格变化的原因，是爷爷死后父亲在这个十五六口人的大家庭里的地位的变化。爷爷死时，意外地打破了长子主事的传统法则，把全部家事委于父亲来统领。据说爷爷怕伯伯父太诡而远伤乡邻近挫兄弟，怕二伯父脾气暴烈而招惹家祸，于是就由排行最末的父亲统领这个家庭。他要领导两个哥哥和两个嫂嫂，要处理三兄弟三妯娌以及九个侄儿侄女和亲生儿女的种种矛盾，要处理这个家庭与远远近近几十家新老亲戚的关系，要处理与杨徐村二百多户同姓和异姓的乡邻的关系，真是太复杂了！我当时尚不能体味父亲的种种难场，只觉得他的脸上，笑颜永远消失了。

尽管父亲在这个家庭里严于律己——母亲、姐姐、弟弟以及我，宽以待人——伯父、伯母以及堂兄堂妹，家庭里的摩擦总不会间断，只是没有公开闹到分家的程度。大伯本来对父亲统领家事就觉得有失面子，再加上三条遗嘱死死捆住了他的手足，终日憋气。他的大儿子已经长大，意欲送到西安去学生意，因为父亲坚持遗训而不能成行，有气无处发泄，就哄唆直杠子二伯发难。父亲一切都看得明白，只是隐忍，不理睬二伯的恶火，大伯也就无法了。

这样下去，终非久远之计，父亲不能眼看着这个以礼仪之风在全村享有最高乡誉的家庭，在自己手中闹出分崩离析的结局，令杨徐村人耻笑。他断然决定，从学堂里告退回家，统领家事。他自己在学堂执教，一心难为二用，顾了学堂顾不了家，顾了家庭又怕贻误人家子弟的学业。更重要的是，在他一天三晌坐在学堂里的时候，家里和地里，给大伯留下了毫无顾忌地唆弄是非的太大的时空环境。这样，在我刚刚交上十八岁的时候，父亲就把我推到他坐过的那把黑色的太师椅上了。

蓝袍先生

父亲选定我做他的替身去坐馆执教，其实不是临时的举措，在他统领家事以前，爷爷还活着的时候，就有意培养我作为这个“读耕”人家的“读”的继承人了。只是因为家庭内部变化的缘故，才过早地把我推到学馆里去。

我有一个姐姐，已经出嫁了。一个弟弟，脾气颇像二伯，小小年纪就显出倔拗的天性，做教书先生的人选，显然不大合适，“人情不够练达嘛”！父亲再无选择的余地，尽管我也是差强人意，也没有办法了。如果说父亲也暗藏着一份私心，此即一例，大伯父的二儿子灵聪过人，然而父亲还是选就了我。

读书练字，自不必说了，对我是双倍的严格。尤其是父亲有了告退的想法之后，对我就愈加严厉了。那柳木削成的木板，开始抽打我的手心，原因不过是我把一个字的某一画写得离失了柳体，或是背书时仅仅停磕了几秒钟。最重要的是，对我进行心理和行为的训练，目标是一个未来的先生的楷模。“为人师表”！这是他每一次训导我时的第一句话。

“为人师表——”父亲说，“坐要端正，威严自生。”

我就挺起胸，撑直腰杆，两膝并拢。这样做确实不难，难的是坚持不住。两个大字没有写完，我的腰部就酸酸的了，两膝也就分开了。猛不防，那柳木板子就拍到我的腰上和腿上，我立即坐直。几次打得我几乎从椅子上翻跌下去，回头一看，父亲毫不心疼地瞅着我。

“为人师表——”父亲说，“走有个走势。走路要稳，不急不慢。头仰得高了显得骄横，低垂则萎靡不振。两目平视，左顾右盼显得轻

佻……”

我开始注意自己走路的姿势。

“为人师表——”父亲说，“说话要恰如其分，言之成理。说话要顾及上下左右，不能只图嘴头畅快。出得自己口，要入得旁人耳……”

所有这些训导，对于我这样一个刚刚十七八岁的人来说，虽然很艰难，毕竟可以经过日渐长久的磨炼，逐步长进，最使我不能接受的，是父亲对我婚姻选择的武断和粗暴。

对于异性的严格禁忌，从我穿上浑裆裤时就开始了。岂止是“男女授受不亲”，父亲压根儿不许我和村里任何女孩子在一块玩耍，不许我听那些大人们在一起闲谝时说的男女间的酸故事。可是，在我刚刚十八岁的时候，父亲突然决定给我完婚了。他认为必须在儿子走进学堂之前做完此事，然后才能放心地让我去坐馆。一个没有妻室的人进入神圣的学堂，在他看来就潜伏着某种危险。

父亲给我娶回来多丑的一个媳妇呀！

婚后半个月，我不仅没有动过她一指头，连一句话也懒得跟她说，除了晚上必须进厢房睡觉以外，白天我连进屋的兴趣都没有。我却不敢有任何不满的表示，父母之命啊！

父亲还是看出了我的心意，有一天，把我单独叫进他住的上屋，神色庄严。

“你近日好像心里不爽？”

“没有。爸。”

“我能看出来。有啥心事，你说。”

“爸，没有。”

“那我就说了——你对内人不满意，嫌其丑相，是不是？”

“……不。”

我一直未敢抬头，眼泪已经忍不住了。

“这是我专意儿给你择下的内人。”父亲说。我没有想到。他说：“男儿立志，必先过得美人关。女色比洪水猛兽凶恶。且不说商纣王因妲己亡国，也不说唐王因贵妃乱朝，一个要成学业的人，耽于女色，溺于淫乐，终究难成大器……”

我惊讶地抬起头，看了父亲一眼，那严峻的眉棱下面，却是满眼的赤诚，坦率的诚意，使我竟然觉得自己太不懂事了。大丈夫立国安家成学业，怎能贪恋女色！我长到十八岁，从来没有听过怎样对待婚娶的道理，父亲今天第一次坦诚地对我训导，我悟出人生的道理了。

父亲当即转过头，示意母亲，母亲从柜子里取出一件蓝袍，交给我，叫我换上了。我穿上那件由母亲亲手缝的蓝洋布长袍，顿然觉得心里咯噔一声，沉重起来，似乎一下子长大成人了！服装对于人，不仅是御寒的外在之物。穿起蓝袍以后，抬足举步都有一种异样的庄重的感觉了。

父亲领着我走出上房的里间，站在外间里。靠墙的方桌上，敬着徐家祖宗的牌位，爷爷徐敬儒生前留下一张半身照，嵌镶在一只楠木镜框里，摆在桌子的正中间。父亲亲手点燃大红漆蜡，插上紫香，鞠躬作揖之后，跪伏三拜，然后站在神桌一侧，朗声道：“进香——”

我走前两步，站在神桌前头，从香筒里抽出五根紫香，轻轻地捋一捋整齐，在燃烧着的蜡烛上点燃，小心翼翼地插进香炉，抖索的手还是把两支弄断了。重插之后，我垂首恭候。

“拜——”父亲拖长声喊。

我抱起双拳，作揖。

“叩首——”

我跪在祖宗神牌前，磕了三个响头，就抬起头，等待父亲发令。

父亲从腰里掏出一片折叠着的白纸，展开，就领着我向祖宗起誓：

“不肖孙慎行，跪匍先祖灵前。矢志修业，不遗余力。不慕虚名，不求浮财，不耽淫乐。只敬圣贤，唯求通达，修身养性，光耀祖宗，乞先祖护佑……”

父亲念一句，我复诵一句，及至完毕。我呆呆地站在灵桌前，诚惶诚恐，不知现在该站还是该走开？父亲紧紧盯着我，说：

“明天，你去坐馆执教！”

由我代替父亲坐馆的仪式是在文庙里举行的。时值冬至节气。一间独屋的庙台上，端坐着中国文化的先祖孔老先生的泥塑彩像。屋梁上的蛛网和地上的老鼠屎被打扫干净了。文庙内外，被私塾的学生和热心的庄稼人围塞得水泄不通。杨徐村最重要的最体面的人物杨龟年，穿着棉袍，拄着拐杖，由学堂的执事杨步明搀扶着走进文庙来了，众人抖抖地让开一条路。

我站在父亲旁边，身上很不自在，心里却潜入一股暗暗的优越来。这儿——文庙，孔老先生的圣像前，排站着杨徐村所有的头面人物，我也站在这里了，门外的雪地上，挤着那些粗笨的却又是热心的庄稼人，他们在打扫了房屋以后，临到正式开场祭祀的时候，全都自觉地退到门外去了。

杨步明主持祭祀，首先发蜡，然后焚香，接着在杨步明拿腔捏调的诵唱中，屋里屋外的所有参与祭奠的村民，无论长幼尊卑，一律跪倒了。油炸的面点，干果，在杨步明的诵唱中摆到孔老先生面前。整个文庙里，烛光闪闪，紫香弥漫，乐鼓奏鸣，腾起一种神圣、庄严、肃穆的气氛。

执事杨步明把一条红绸递给杨龟年，由杨徐村最高统治者给我的父亲披红，奖掖他光荣引退。杨龟年双手捏着红绸，搭上父亲的右肩，斜穿过胸部和背部在左边腋下系住。我看见，父亲连忙跪伏下去，深深地磕拜再三，站起身来的时光，竟然激动得热泪盈眶。这个冷峻的人，竟然流泪了。他硬是咬着腮帮骨，不让眼泪溢出眼眶。我是第一次看见父亲流泪。往昔里，我既看不到父亲一丝笑颜，也看不到一滴泪花。那泪眼里呈现出从未见过的动人之处，令人敬服，又令人同情。这个严厉的父亲，从来也不会使人产生对他的同情和怜悯；他的脸色和眼神中永远呈现着强硬和威严，只能使人敬畏，而不容任何人产生怜悯。现在，他的脸上像彤云密布的天空扯开一道缝儿，露出了一绺蓝天，泻下来一道弱柔动人的阳光。

父亲简短地说了几句真诚的答谢之辞，执事杨步明代表所有就读的孩子的家长向父亲致谢，并对我的上任多有鼓励。杨龟年没有讲话，只是点点头，算是最高的赏赐了。

奠祭活动一结束，我随着父亲走出文庙，刚一出门，那些老庄稼人就把父亲围住了，拉他的袖子，拍他的后背，摸抚那条耀眼的红绸，说着听不清的感恩戴德的话。我站在旁边，同样接受着老庄稼汉们诚心实意的鼓励的话，心里很激动。由爷爷和父亲在杨徐村坐馆所树立起来的精神和道义上的高峰，比杨家的权势和财产要雄伟得多！我从今日开始，将接替父亲走进那个学馆，成为一个为老少所瞩目的先生了！

那把黑色的座椅，那张黑色的四方抽屉桌子，能否坐得稳？一直到将来再交给我的尚未成形的某一个后代，大约至少要二十多年吧？二十多年里不出差错，不给徐家抹黑，不给杨家留下话柄，不落到被众人撵出学堂，谈何容易！要得到一个善终的结局，就必得像父亲那样……

乡村的私塾学堂也放寒假，每年农历的冬至节气就是下学日，祭过老祖宗孔老先生之后，就放假了。

过罢正月十五，私塾又开学了，我穿上蓝布长袍，第一次去坐馆，心里怎么也稳实不下来。走出我家那幢雕刻着"读耕传家"字样的门楼，似乎这村巷一夜之间变得十分陌生了，街巷里那些大大小小的树木，一搂抱粗的古槐、端直的白杨、夏天结出像蒜薹一样的长荚的楸树，现在好像都在瞅着我，看我这个十八岁的先生会不会像先生那样走路！那些拥拥挤挤的一家一户的门楼里，有人在窥视我可笑的走路的姿势吧？唔呀！从我家的街门口到学堂去，要走到街心十字口，再拐进南巷，距离不近哩！不管怎样，我已经走出街门了，没有再退回去的余地了，只有朝前走。这时候，像面对一个十分面熟而又确实读不出字音的生字时顺手掀开字典，我想到了父亲走路的姿势。我多

少次看见父亲来去学堂时走在村巷里的身姿，而他训导我的如何走路的条文倒模糊了。

我抬起头，像父亲那样，既不仰高，也不低垂，两目平视，梗直脖根，决不左顾右盼，努力做到不紧不慢，朝前走过去。

“行娃……哦……徐先生……”杨五叔笑容可掬地和我打招呼，发觉自己不该在今天还叫我的小名，立即改口，脸上现出失误的歉疚的神色，“你坐馆去呀？”

“哦！对。”我立即站住，对他热诚的问话表示诚意的回答，站下以后，却又不知再该说什么了。我立即意识到，不该停下脚步，应该像父亲那样，对任何人的纯粹出于礼节性的见面问候之辞，只需点一下头，照直走过去，才是最得体的办法……我立即转身走了。

走进学堂的黑漆大门了，三间敞通的瓦房里，学生们已经把教室打扫得干干净净，摆满了学生自己从家里搬来的方桌和条凳，排列整齐，桌子四周围坐着年龄差别很大的学生，在哇啦哇啦背书。今日以前的七八年里，我一直坐在这个学堂的左前排的第一张桌子上，离安在窗户跟前的父亲的那张教桌只隔一个甬道。这个位置是父亲给我选定的，从第一天进入这学堂接受父亲的启蒙，直到我今天将坐在窗前教桌的位置上，一直没有变动过，我打第一天就明白，父亲要把我置于他的视力首先所能扫描到的无遮蔽地带……现在，那个位置坐上新进入学堂的启蒙生了。

除了新添的几个启蒙生，教室里坐着的全是那些春节以前和我同窗的本村的熟人、同伴、同学，有的个子比我长得还高还壮实，我今天看见他们，心里却怯了。我完全知道他们和我父亲捣蛋的故伎，尤

其是杨马娃和徐拴拴两人，念书笨得跟猪差不多，却尽有鬼点子捣蛋。我一进门就瞅见他俩的诡秘的脸相，倒有点怯场了，那些不怀好意的脸相！

我立即走向那张四方教桌，偏不注意那几个扮着怪相的脸。我在父亲坐过的那把直背黑漆木椅上坐下来，腰似乎自然地挺直了，父亲就是这样挺着身坐。我回忆父亲的工作程序，坐下，先把桌上的四宝摆整齐，抹干净桌子，再掀开书本，或者在砚台里磨墨。一当听到教室里有异常的响动，就抬起头来，逡巡一遍，待整个学堂里恢复正常的气氛，再低头看书或者练习写字。

父亲一般是先读书的，后晌上学时才写字。我也应该这样做，只是今天例外，读书是难得专注的，写字肯定对稳定情绪更好些。我在父亲用过的石砚台上滴上水，三根指头捏着墨锭，缓缓地研磨。磨墨也该像个先生磨墨的姿势，不能像下边那些学生乱磨，最好的姿势当然只有父亲磨墨的姿势了。

墨磨好了。桌子角上压着一沓打好了格子的空影格纸，那是学生们递上来的，等待我在那些空格里写上正楷字，他们再领回去，铺在仿纸下照描。我取下一张空格纸，从铜笔帽里拔出毛笔，蘸了墨，刚写下一个字，忽然听到耳边一声叫：

“行娃哥——”

我的心一扑腾，立即侧转过头去，看见本族里七伯的小儿子正站在当面，耍猴似的朝我笑着：“给我题个影格儿。”

教室里腾起一片笑声。哦！应该说学堂。

笑声里，我的脸有点发热，有点窘迫，也有点紧张。学童入学堂以后，应该一律称先生，怎能按照乡村里的辈分儿叫哥呢！可他是才入学的启蒙生，也许不懂，也许是忘记了入学前父母应有的教导吧！我就只好说：“你放下，去吧！”他回到位置上去了，笑声消失了。

我又转过头写字，刚写下两字，又一个声音在我耳边响起：

“蓝袍先生——”

我的脑子里轰然一声爆响，耳朵里传来学堂里恣意放肆的哄笑的声浪。我转过头，看见一张傻乎乎愣笑着的脸，这是村子里一个半傻的大孩子。他的嘴角吊着涎水，一只手在背后抓挠着屁股，得意地傻笑着，和我几乎一般高的个子，溜肩吊臂，像是一个不合卯窍的屋架，松松垮垮。这个老学生，念了七八年了，字认不下二百，算盘打不到“三归”，只是家底厚，又是他爸唯一的顶门立户的根，就这么在学堂里泡着。这个傻瓜蛋儿，打破他的脑袋，也不会给我起下这样一个雅号的，我立即追问：“谁叫你这么称呼我？”

教室里的笑声戛然而止，静默中潜伏着许多期待。

“他……他不叫我说他的名字。”傻子说。

“你说——他是谁？”我冷眼追问。

“我不敢说——他打我！”傻瓜怕了。

“我先打你！看你说不说！”我说。

我从桌上摸过板子，那块被父亲的手攥得把柄溜光的柳木板子，攥到我的手里了，心里微微忐忑了一下，我就毫不退让地说：“伸出手

来！”

傻子脸色立时大变，眼里掠过惊恐的阴影，把双手藏到背后去了。

我从他的背后拉过一只左手，抽了一板子，傻子当下就弯下腰去，用右手护住左手号啕起来：“马娃子，×你妈！你教我把人家叫‘蓝袍先生’，让我挨打……呜呜呜呜呜……”

我立即站起，一下子瞅住杨马娃，这个暗中专门出鬼点子捣乱的“坏头头”。不压住这个杨马娃，我日后就难得在这张椅子上坐稳。我命令：“杨马娃，到前头来！”

杨马娃虎不失威，晃一下脑袋，走到前头来了。他个子虽不高，年岁却不小了，也是个老学生。他应付差事似的朝我草草鞠了一躬，就站住了。

“是你给他教唆的吗？”我斥问。

“没有。”他平静地回答，早有准备。

“就是你！”傻子瞪着眼，“你说……”

“谁能作证呢？”杨马娃不慌不急。

“……”傻子急迫地瞪着眼。

“不要作证的人！”我早已不能忍耐这种恶作剧还在继续往下演，“伸出手——”

杨马娃伸出手来。他的眼里滑过一缕冤枉的无可奈何的神色，既不看我，也不看任何人，漫不经心地瞅着对面的墙壁。

我抽一下板子，那只手往下闪了一下，又自动闪上来，没有躲避，也听不到挨打者的呻唤。我又抽下一板子，那只手依然照直伸着，我有点气，本想经过教训他解气，想不到越打越气了。那只伸到我跟前的手，似乎是一只橡皮手，听不到挨打者的呻吟，更听不到求饶声了，我突然觉得那只手在向我示威，甚至蔑视我。教室里很静，听不到一丝声响。我感到了两方的对峙在继续，我不能有丝毫的动摇，不然就会被压倒，难得起来。我也不吭气，谁也不看，只看着那只要击中的手。我记得父亲打板子的时候就是这样，从来不看被打者的脸，更不听他们的呻唤和求饶，只是打够要打的数字。我抽下五板子了……

傻子突然跪倒在地，抱住我的板子，哭喊说："先……先先先生！马娃叫我叫你'蓝袍先生'，我说你要打手的，他说不会，你和俺俩都是在一块念下书的，不会打手的。他就叫我跟你耍玩，叫'蓝袍先生'……我往后再不……"

我似乎觉得胳膊有点沉，抬不起来了，再一想，如果马娃一直不开口，我能一直打下去吗？倒是借傻瓜求情的机会，正好下台，不失威风也不失体面。

傻瓜先爬起来，深深地鞠了一躬，跑下去了。杨马娃则不慌不忙，文质彬彬地鞠了躬，慢慢走回到座位上去了。

我重新坐好，提起毛笔，题写那张未写完的影格儿，手却在抖。我第一次执板打人，心里却没有享受打人的畅快，反倒添加了一缕说

不清的滋味……

萌动的邪念

无论如何，对杨马娃的一顿板子，彻底划开了我和同伴、同学之间的界限，那些心存侥幸企图开我的玩笑的人，那些想试试新上任的先生的脾气软硬的人，全都得出了自己应该得到的结论，学堂里的秩序按照父亲过去的模式继续下来了。

杨马娃退学了。挨打的当天后晌，他就没有再来上学，扛着镢头跟他爸上坡挖地去了。迅速地从村子各个角落反馈到我耳朵里的反应，却是绝对的一边倒。没有任何人同情杨马娃，听说连他爸也骂他不知深浅。执事杨步明当天下午跑到学校，给我撑腰："打得好！念了几年书，连个礼性儿也不懂，没有一点规矩！不打的话，明日该翻天了！"他故意用大声说话，让那些坐在学堂里的娃娃都听见。不光执事杨步明，几乎所有送子入学的庄稼人，在我来去的街巷里，一律支持我动板子的举动。不过，我心里明白，不尊师长的越轨行为是不会有人同情的，所以并不觉得意外。

对杨马娃的退学，我也不觉得遗憾。按照我爷爷在这个学堂里开创的独特的教程（后来又经过了我父亲的补充），启蒙生从一二三四五开始识字，然后学《百家姓》，中年级学《七言杂志》，大约三年时间。附加的课程是珠算，先学加减，后学"九归"。三年时间里，那些穷庄稼汉的后代，学会了日常生活惯用的杂字，会打一手算盘，就走出学堂跟他们的父兄做庄稼去了，或者到西安某个铺店、作坊当相公（学徒）去了。留下为数不多的一些富裕户的子弟，接着就开《论语》，步步深造。这一套教程，从爷爷创立，颇受庄稼人欢迎，可以说贫富皆宜，有普及也有提高，照顾了"面"又保证了"点"。杨马娃早

该退学去做庄稼或当相公去了，只是生得矮小，父母疼其体力不支，就叫他在学堂多混几年……迟早是要走的。

俩月过去了，没有发生什么意外，秩序正常，执事杨步明对我父亲几次夸赞：“栽培有方！”父亲自然很欣慰。我的自我感觉也甚好。我从村中走过去时，可以踏出缓急有致的脚步了，再不紧张了。我在教桌前端直坐一晌，看书或授课，不再觉得腰酸腿困了。人说，我活脱就是二十年前我爸的原样儿！连脾气也跟我爸一模一样了。

我也意识到我的脾性儿变了。我小时爱笑，妈说我长了一副笑面菩萨的脸儿，而且一笑脸颊上就有两个酒窝。我爸为我的爱笑没少训过我，说我长了一副没棱角的脸，尤其讨厌我脸上的那两个倒霉的酒窝……现在，我改掉爱笑的毛病了，酒窝自然也就极少出现了。我面对一伙性格各异的学生，没有威慑的力量是不行的，父亲说绝不能跟学生嘻嘻哈哈，笑了就失掉威势了。另一个不便说出口的原因，我自打媳妇一娶进门，就笑不出来了。

她是坐着轿子来的，在伴娘的搀扶下走进厢房，我一把揭开她的盖脸的红布，狂跳着的心一下子沉下去了，再也跳不起来了。我实在无法预料，父亲会给我娶回来这样一个媳妇。当然，父亲那种奇特的理论，我不敢顶撞，想想我现在在杨徐村的地位，想到徐家三代人在杨徐村所树立的威望，我觉得心里十分沉重，我不能给祖先丢脸，更不能耽于女色而使徐家的门楼上的“读耕”精神毁断于我手，这个女人的位置和比重一下子给划开了。

我从学堂放学回家，她就怯怯地招呼我：“先生，用饭。”她从来也不敢正眉正眼地看我的眼睛。当我发觉她在注视我的时候，我一回头，她立即把眼光避开了。她不会撒娇，只会烧火、洗锅、刷碗、缝

衣、做鞋。我不说话，她也不说话，大约是怕说得不合适。我见了她就没有话说了，所以小厢房里总是静悄悄的。

配偶的不甚称心和夫妻感情的不甚融洽，为新承担的教书工作的热情和兴味所冲淡，我觉得十分喜欢教学。这一方面的如愿与另一方面的不如愿掺和着，我就这么过，也没有感觉到活不下去，生活虽显得古板，却也平静。

我的平静的心境突然被打破了！

这天放学时，天下着雨，大雨点子在院子的积水上打出一片白花花的水泡。大学生们不顾雨大路滑，缩着脖子跑出学堂去了，院子里响起一阵杂乱的“扑哧扑哧”的脚步声，只有几个小娃娃躲在门口的房檐下，不敢出去。我站起来，舒展一下腰身，走到房檐下，劝那几个小娃娃再等一会，雨住了再走。这时候，一个穿着旗袍的女人走进学堂院子来了，撑起的红纸雨伞遮住了她的头脸。我却早已认出，这是杨龟年的二儿媳妇。我反身走回学堂，在椅子上坐下。

这个女人走到学堂门口，她的儿子已经扑到她的膝前，抱住了她的腰。她摸着孩子的头，笑容可掬地说：“把这把伞给你先生送去，你跟娘打一把伞行了。”

我立即从椅子上站起，推辞，要她和孩子一人打一把伞，我到雨住了再走。她的儿子把伞放到桌子上，跳出门，她牵着他的手，转身走了，在院子的泥水里，小心地挑选可以下脚的地方，走出院子去了。剩下的三五个小娃娃，大约估计到他们的父母不会送洋伞或草帽来，就冒雨跑了。

学堂里静下来。剩我一个人，看着桌子上那把红色油纸伞。我拿起伞掂掂，却嗅到一股淡淡的香味，那是脂粉一类东西的诱人的气息。我坐在椅子上，眼前浮现着两只水汪汪的眼睛，如果不是这样近距离地看见她的眼睛，我真不知道世界上有这样好看的眼睛。她穿一件紫红旗袍，披着卷发，细皮嫩肉，不过二十四五岁，旗袍紧紧包裹着丰腴的胸脯和臀部。我突然奇怪地想，如果我有这样好看的一个女人，难道真的就会荒废学业了?

雨小了，蒙蒙的雨雾从浓密的树梢笼罩下来。院子里昏暗了。我最后看了那把红伞一眼，终于没有用它，锁上门，走回家去。

大约过了十天，或者半月，她牵着孩子的手走进学堂来了。站在我的教桌前，斥说儿子想逃学，她把他亲手牵来了。我让她的儿子归座。她却不走，从腰间摸出一张纸，摊开在我眼前的桌子上，问:“徐先生，这个字怎样念? ”

我一抬头，发觉她并没有瞅字，而是瞅着我的眼睛，那眼里有一种令人动心的神色。我忙回答了那个字的读音，就把脸避开了。她笑笑，说声“劳驾”就走出门去了。

从这以后，每当我从杨龟年家门楼前走过的时候，就忍不住扭头瞥一眼那深宅大院了。往昔里，我和父亲一样，是不屑于瞅一眼这角亭式的阔绰的门楼的。瞥一眼，其实什么也没有看到。这一天，终于在门口撞见她了。我向她点一下头，就走过去了，她却又叫了一声:“徐先生——”我停住脚，转过身。

“孩子肚子疼，后晌不能上学了。”

“那好。让娃儿在家养息。”

“缺下课……”

“娃儿病好了，我给补。”

“真麻烦你了！”

“不客气。”

我回到家中，那两只水汪汪的眼睛在我跟前忽闪飘浮；我在学堂，那两只眼睛又在字行间闪眨……

这天晚上，我回到家，看见父亲脸色不悦，从地里犁地回来，把犁杖重重地磕摔在台阶上。他回到家中，已经和大伯二伯一样躬耕了。是累得心生烦躁了吗?

直到夜深人静，大伯二伯和堂兄弟们都睡定了，父亲终于把我叫进上房里屋，关了门，压住声儿，严厉得怕人:“你和那个臭婊子有啥好说的? 嗯? ”

我像当头挨了一砖，眼前都黑了，说:“她给孩子请假……”

“我不要你回话！”父亲站起身，可怕的鹰一般的眼睛，“我只想给你说一句，那个婊子再找你搭话，你甭理识！那是妖精，鬼魅！你自己该自重些！”

我低下头，简直无地自容，好像我已经和那个女人真有过什么苟且之事，其实不过就是说了两三次话，都是说的关于她的孩子念书的事，每一次也都是那么简单的几句。我想分辩，解释，不光是父亲盛怒之下，难于容纳，而是我自己感到有口难张，羞于启齿了。

“走吧！”父亲负气地一摆手。

我不知是怎样从父亲住的上房里屋回到自己的厢房的。躺下之后，怎么也睡不着，心里烧躁憋闷，脑袋“嗡嗡”响。

这个女人，是杨龟年的二儿子在河南娶下的小老婆，因为战事吃紧，送回老家来了。杨龟年压根儿不知道儿子在外已经娶下小婆娘，气得吹胡子瞪眼，无奈那女人引着一个可爱的小孙孙，毕竟是杨家的后代，才收容下来，心里却见不得这个操着异乡口音的女人。那个经明媒正娶的大婆娘对于这个妹妹，更是恨入牙根了。这个女人在杨家，没有援助也没有同情，活得没滋没味儿，村里人说她夜夜都偷着哭哩！村里人不明底细，纷纷传说，杨龟年的二儿子从河南送回来的洋婆娘，是抢霸的一位良家女子；有的却说得截然相反，说她原本是开封府里一家妓院的窑姐儿云云。

无论父亲的态度怎样生硬，叫人难以忍受，但冷静之后，我就不能不暗暗慑服父亲那洞察细微的眼睛，我虽然没有和那个洋婆娘有任何拉拉扯扯的事，可从心里反省，那双水汪汪的眼睛确实弄得我有点神不守舍。如果不是父亲警告，长此下去，即使不会发展到做出什么有损门风的丑事，也极其危险，任何一点半句风言浪语都可能毁了我，毁了父亲，毁了徐家几代人守节持仪所建树起来的家风……父亲直接砸向我脑门的这一砖头是狠的，也是及时的。

我的心在收缩，被那个洋女人搅起的一缕纷乱的云霓，消散了。我再也不理睬那个被父亲骂作妖精鬼魅的女人，甚至连村中一切年龄尚轻的女人也都一概不予搭理。我不能让桃色亵渎徐家贞节的门楼……

杨徐村解放了。人民政府给杨徐村派来三位先生，真是令我大开眼界。他们穿四个兜的短褂，戴着八角制帽，废止了我的教程，给学生发下西北军政委员会编的课本，设语文和算术课，另开音乐、体育和图画，其中一位年轻的女先生，教孩子唱歌，张着嘴唱呀唱，令我目瞪口呆。

我自动辞职了。没有办法，我不会算术，连那些阿拉伯字也没见过；语文科的新课本，虽然是浅显通俗的白话文，我却教不了。我离开了那个祖孙三代执教的学堂，让位给那三位新派来的新先生了，跟父亲去种地。我的蓝袍脱下来了，做务庄稼穿它太不方便啰！

半年后，一天后晌，我和父亲在村西的官道边的田地里翻耕靠茬地，乡政府的通信员送来一张通知，要我到城南的师范学校去进修。去不去？敢去不敢去？该去不该去？我拿不定主意，不知该怎么办。父亲也拿不定主意。自从那三位新先生进入杨徐村，父亲不止一次地讥诮说："蹦蹦跳跳，行走唱唱喝喝，男女不分，见谁都想搭话，啥好先生的样子！"现在他明白，师范学校培养出来的先生肯定都是那个样子，我将来也可能就是那个样子，他拿不定主意了。为此事，他专门走访了一回县教育科，回来后就拍了板：去！

临行的前一晚，我坐在父母住的上房里屋里，悉心听取父亲的临行教诲，怎样和先生说话，该当如何与同窗相处，远离家乡，一切都需自己检点。母亲又接着叮嘱生活上的琐屑事，忌食生冷食物，加减衣服要注意。我的那位媳妇呆呆地站在一旁，惶惶不安的样子，一直没有插嘴，这时问了一句："我该给先生准备哪件衣服出门？"

我一愣。这是一个暂时被父母连同我自己都忽略了的事，该穿短褂呢？还是长袍？我想了想，没有主意。看看母亲，母亲又瞅瞅父

亲，看来也是不知该穿哪样才合适。父亲正在桌上磨墨，沉思一下，抬起头来，对我说：“穿蓝袍。”

我有点疑惑：“爸，我看咱村来的那三个新先生，都没穿长袍。解放了，不兴穿长袍了。”

“解放了，没听说不准穿袍子！”父亲讥诮地说，“你看那三位洋先生，穿个短褂儿，又那么短！前裆后臀无遮无盖，有失大雅。为人师表，成何体统！”

结论定局了，穿蓝色长袍，我的媳妇就退出去，准备我明日的行装去了。

父亲已经磨好墨，拔开毛笔帽儿，在砚台盖儿上再三地顺着毛笔尖，然后猛然悬起手腕，在一张硬纸上写下两字：慎独。等得墨迹干涸，交到我手上，严厉而又含蕴不露地瞅着我。我双手接住那父亲题示的嘱咐，夹在那只折叠小皮夹里，装在贴身的内衣口袋里，表示一定要在远离父亲的陌生的环境里，一切都谨慎行事，尤其是独自一人，不在父亲的视觉之内的地方……

第二天晨曦中，我背着行装，上路了。走出村子好远的时候，我一回头，隐约看见村口的大路边，兀然站着父亲的高大的身影，因为背向从东山泛出的晨光，他像一截黑幢幢的古塔岿然不动……

我转过身走了，心里忐忑不安，脚步也有点慌乱，等待我的那个世界会是什么样子呢？我无法具体想象……无论如何，这次出门，成了我一生中的第一次重大的转折……

我不会说话，也不会走路了

当我站在教室的前头，班主任把我介绍给全班同学的时候，我简直都要窘死了。

班主任王先生领我走进插着“速成二班”木牌的教室的时候，整个教室里腾起一阵笑声，笑的声浪几乎把我掀倒了。我立即低下头，这个见面礼太令人难堪了。班主任挥挥手，缓声和悦地劝止大家，不要笑，然后简要地向大家介绍我的名字、年龄，希望大家和我互相帮助，搞好学习。我低着头，对班主任也不满了，面对一个生人，这些人这样狂笑乱说，太没礼仪了呀！你做先生的不予严厉训导，只是淡淡地劝止，像什么话？在你介绍的时候，教室四处仍在嘀嘀咕咕议论，这像什么话？什么教学秩序？太松懈了！

班主任介绍完毕，一位男学生站起来，表示欢迎我加入这个集体，他大约是班长。他也是随随便便的样子：“欢迎徐慎行同学到我们班学习，为速成二班争光，为祖国的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归结一句话：我代表全班同学，欢迎……蓝袍先生！”教室里立即腾起一阵喧闹的声浪，鼓掌声和笑声搅和在一起，乱极了！

我听到班主任王先生也在笑。我不能容忍他的笑，他毕竟是先生。他笑毕说：“同学们不要笑，也不要给新同学乱起绰号……”

我现在才明白大家嬉笑的原因了，笑我的蓝布长袍和头顶的礼帽。我一下子意识到我和所有同学的差异，男生女生一律穿制服或便衫，头顶八角制帽，女生留齐脖短发或双辫儿。在杨徐村，那三位新先生的装束成为众人稀奇和议论的话题，成为我父亲讥诮的怪物。在师范学校速成二班的教室里，我的装束却成为老古董怪物了！好在班主任此时指给我一个空位子，我立即从讲台上走下去，逃脱这个被众人嬉笑着的尴尬地方。我走到座位跟前，那个桌子上坐着一个女生，

她朝我笑笑，表示欢迎与我同桌。我的心里猛地一跳，这女生长得太漂亮了，又是一双水汪汪的眼睛。我不敢多看一眼，脑子里立即反射出杨龟年二儿子从河南遣返回杨徐村的那个洋婆娘来，立即反射出我的父亲的警告：妖精！鬼魅！关于这个同桌女生，这个妖精、鬼魅，却成了对我一生影响深重的人，我后头再说和她的纠葛吧！

我不看她，在自己的座位上坐下了。从书袋里取出学习用具，放在桌子抽斗里。这时，我的头皮一凉，礼帽被谁摘掉了。

我临行前刚刚剃过头，光光净净的秃头一定很难看，教室里又响起此起彼落的笑声。欺人不欺帽！我生气了，愤恨地扭过头，寻找恶作剧的人，我甚至不惜要撕破面皮，给他个对不起了，哪有这样开玩笑的？我没有找到帽子，却看见一张张开心的笑脸全都瞅着我的旁边。我一回头，看见礼帽正戴在她——我的同桌的头顶，装模作样地向大家扮着鬼脸。

我不知所从了。那顶黑呢礼帽扣在她的头顶，底下露出一排长长的黑发，似乎不觉滑稽，倒使她显得十分好看了。我聚集在心里的火气发不出来了，也不好意思从她头上动手取过来。正在我犹豫的短暂一刻里，不知后排谁从她的头顶揭去了帽子，戴在自己的头上。之后，我的礼帽就被许多手抢来夺去，轮换戴在男生和女生的头顶。我无法忍受这样的侮辱，生气地端坐在凳子上，负气地不予理睬了。

她大约终于感觉到自己的行为有点过分，离开座位，从教室的一角里抢到帽子，从背后过来，扣到我的头上，说声“对不起”，就坐下了。

我一动不动，也没看她，以无言表示我的气怒：太没教养了！一个大姑娘，刚与人见第一面，就把别人的帽子抢过去，戴到头上，像什么话？疯张野教！

还有使人难堪的事，吃饭要赶到饭堂去，端上饭碗，拿着筷子排队，依次到窗口去打饭。我站在队列里，心里很别扭。前头已经打了饭的学生，因为没有餐厅，一堆一伙蹲在院子里，一边吃饭一边说笑，女学生也夹在一堆，张着填满饭菜的嘴巴笑。我很不舒服，这些经过两年速成进修的男生女生，很快都要为人师表了，却是这样不拘礼仪。我在家时，父亲自幼就训诫我关于吃饭的规矩，等上辈人坐下后，自己才能坐；等别人都拿起筷子后，自己才能拿筷；等别人动手在菜盘里夹过头一次菜后，自己才能夹；吃饭时不能伸出舌头，嘴也不能张得太大，嚼时不能有响声；更不能在填着饭菜时张口说话。现在，瞧这些将来的先生们吃饭时的模样吧！张着嘴笑的，脸颊上撑起一个疙瘩的，满院子里是一片吃喝咀嚼的“唧唧嚓嚓”的声音，完全像乡间庄稼人在村巷里的“老碗会”，没有一点先生应有的斯文。

我打了饭，捧着碗，怎么也蹲不下去，就索性端回教室里来。走过一排排教室，我听见背后有压抑的嘻嘻的笑声，猛一回头，看见屁股后头尾随着一串同学，在模仿我走路的姿势，挺着腰，仰着头，迈着可笑的八字步……他们哄然大笑了。我真没办法，我觉得他们粗野无礼，他们却觉得我好笑，处处拿我开心哩！我回到教室，气得食欲也没有了。

我至今忘记不了我在师范学校集体宿舍里度过的第一个夜晚。

这种集体宿舍，我第一次见到。一排房子，两边开窗，钉成两排木板通铺，中间留一条走道，楼上又有一层。每个人把自己的褥子折

成窄窄的一绺，挤挤拥拥铺满了床铺。我在我们班的辖区里铺上了铺盖被褥。天气虽是深秋季节，却不见冷，一个个小伙子，脱得只穿一条裤衩，在走道上擦洗，光着身子把脏水倒到室外的渗水井里。

我心里更觉别扭，坐在床铺上，看着一个个男性特征暴露无遗的身体，很替他们难为情。我自懂事以后，就没有在外边过夜。即使夏天，父亲也不许穿短袖和短裤，连布袜布鞋也要穿戴整齐，不许不能暴露的肌肉露出来。现在，看着这么多赤裸裸的男性肌体，我更觉得难于当面脱下衣服、解开裤带了。

我悄然脱衣，迅速钻入被筒，却无法入睡，嬉笑吵闹声像戳乱了麻雀窝，好多人逞能说笑，引逗大伙发笑。

熄灯铃响过，马灯被宿舍舍长一口吹灭，宿舍里静下来。

一个细小沙哑的却是清晰的声音在宿舍里传播，像人们在夜静时听到的国外电台的播音——

“南山里有座古寺院，住着一个老和尚和一个小和尚。老和尚领着小和尚，终日念经诵道，修身养性，一心要修炼成佛。小和尚原是老和尚拾来的被人遗弃了的一个孤儿，无家无根，在老和尚膝前长大了。老和尚对他十分钟爱，管教也非常严格，每逢正月十五古寺的香火忌日，就把小和尚推到后殿，锁起来，不许他看见进香的女人，以免诱惑。小和尚长到二十岁，还没见过异性，十分纯真。老和尚非常得意自己培养出一个心灵纯净的真人，绝不会被世俗的情欲所侵染。

“为了试验这个小和尚的纯洁性儿，老和尚领他下山来，走进了繁华热闹的西安东大街。

“老和尚突然发现，小和尚不见了，一回头，小和尚站在十字路边，呆呆地盯着一个漂亮女子出神，口角的涎水吊到胸膛上。老和尚一见，气得脸都扭歪了，疾步走上去，又不好当着大街上的人发作，就狠狠地说：‘那是魔鬼！’

“小和尚傻乎乎地笑着：‘魔鬼多可爱呀！我要一个魔鬼……’”

宿舍里，楼上楼下腾起一片压抑着的笑声。我的心里一悸，似乎那个说故事的人，是专门影射我的编撰。那个沙哑的声音还在继续——

“老和尚领着小和尚回到寺院，狠狠教训了三天三夜，说那个魔鬼如何可恶、可憎。小和尚不知心里如何，嘴头上表示憎恶那个魔鬼了。老和尚平气之后，就想到自己教育方法上的缺点，只采取隔离的方法不行，应该让小和尚在女人窝儿里锻炼出铁石心肠来。

“老和尚在进香之日，让小和尚和自己一样盘腿坐在祭坛两边，合手闭目。为了试探小和尚看见进香的女人是否春心浮动，他在小和尚的腿上平放了一只鼓。为了避免小和尚的疑心，他给自己的腿上也放了一面鼓。

“进香的女人络绎不绝，老和尚微微启动眼皮，看见小和尚两眼闭得紧紧的，自己就合上眼。不一会儿，老和尚听到对面‘咚’的一声鼓响，心里一震，暗自骂道：‘这小子春心动了！算我白费了训诫的工夫！’睁眼看时，那小和尚的眼还是闭得严严的，嘴角流出涎水来了。正气恨间，又连续听到两声鼓响……

“进香完毕，游人走尽。老和尚追问：‘什么东西敲鼓？’小和尚低头不语，羞惭难当，不好说话。

“小和尚十分佩服师父练成了真功，始终未听到鼓响，就跪下请罪。请罪之后，还不见老和尚起来，他就献殷勤，去搬老和尚腿上的鼓。不料——鼓的那一面，被戳了个大窟窿……”

突然爆发的笑声，终于招来了值勤老师的禁斥。

我的脸上热臊臊的，这些没有教养的人，将来要做为人师表的教员，却在宿舍里讲这样下流的故事，太粗野了！我总疑心故事的说者，是在影射我，不，简直是侮辱我的人格！

我很苦闷，孤单。我走路，有人在背后模仿，讥笑；我说话，有人模仿，取笑；我简直无所适从，连说话也不知该怎样说了，路也不会走了。我最头疼的是音乐课和体育课。我一张口唱歌，大家就笑，说我的声音是“撇”音，连音乐老师都笑。体育课更难受，我穿着长袍接受体育老师的篮球训练时，体育老师先笑得直不起腰来……每逢上这两门课，我就请病假。

漫长的一个月过去了，我没有快乐，也没有温暖，一切习性全乱了套。为了躲避众人的讥笑，我整天待在教室里不出门，以避免外班学生讥诮的眼光。我失去学习下去的信心了，想想两年时间，真是难得磨到底。我终于下决心退学，回家当农夫务庄稼去。

早晨一进教室，我看到后墙壁的黑板前，围着好多同学在观看。这块黑板是《生活园地》，登载本班好人好事的宣传阵地，大约有什么消息了。我走到跟前一看，在《新同学介绍》栏内，写着一段取笑我的话。因为这个速成班的学生，参差不齐，不断地有从各方介绍来的学员插入，所以这儿开了一方《新同学介绍》栏。有人把介绍我的文字做了修改，变成这样:

“徐慎行，字孔五十六。男性，二十三岁。籍贯：山东孔府。人称蓝袍先生，实乃孔家店的遗少……”

整个教室里的同学都咧着大嘴朝我笑。

我不好发作，走出教室，向班主任请了病假，回来收拾了书籍用具，就向班长说一声请过病假的话，回到宿舍。

我捆了行李，在校园里静寂下来的时候，背起行装，从后门走出去。匆匆走过学校所在的山门镇的街巷，就沿着小河的低矮的河堤向东走去。我像抖落了满背的芒刺，终于从那些讨厌的讥诮的眼睛的包围中逃脱了。说真的，他们看不惯我，我还看不惯他们哪！他们容不下我，我心里也容不下他们那些粗野少教的行为！

走着走着，我听到背后有人呼叫我的名字，而且是一个女人的声音。我一回头，就惊奇地站住了，我的同桌田芳正气喘吁吁地奔上来。

“你……为啥要走？”她奔过来，站住，双手叉腰，气喘不迭，水汪汪的眼睛里，气愤、惊讶以及素有的柔情，“嗯？偷跑了？”

“我不想进修了。”我心死而气平。

“那不行，你得回去跟班主任说一声。”她放下一只手，另一只手还叉在腰里，“连纪律性儿都没有！”

“你是什么人？”我不在乎，“管我？”

“我是班干部！”她理直气壮。

我才记起，她是班里的宣传委员。我不屑地笑笑说："我要回家务庄稼去了！"

"国家刚解放，到处缺乏人民教员。"她说，"政府到处搜集有点文化的青年，集中培训，也满足不了乡村学校的需要。你倒好……当逃兵！"

我想，既然国家这样需要我，你们为什么欺侮我？我依然瞅着远处，执意要走。

"共产党毛主席领导我们闹革命，翻身了，解放了，自由了！大伙在一块学习，多高兴！"她在给我宣传，"咱们班的同学，都是些穷人家的孩子，要不是解放，能这么自由吗？你怎么能回去呢？"

这些大道理，早听惯了，然而由她一泻而出，却不是说教，有真情在。她见我还不回头，就从我的背上扯被子，说："我从山门镇看病回来，看见你从街东头走出去了，我就撵你。我不撵你，我就失掉班干部的责任心了。你要是一定要走，也该跟我回去，给班主任打个招呼……"

我只好跟她走回学校。

自由多么美好

从师范学校的操场上朝南望去，可以看见挺拔雄伟的秦岭的峰峦；从眼前慢坡逐渐增高到山根的广阔的平原上，星散着大大小小的被树木的绿叶笼罩着的村庄；小河川道里，挑着稻捆的农民从木板搭成的便桥上忽闪忽闪走过去；田间小路上，农民拉着装满苞谷棒子的小推车朝邻近的村庄走去。沉到平原西部的太阳，在落沉下去之前，

向平原上的人们投射过来热情的最后的一瞥，把瑰丽的红光洒满村庄、田野、河水和挑担拉车的农民的脸上，秦岭陡峭的崖壁上红光闪耀。

我坐在操场边角的草地上，温习算术。我的语文课似乎不成多大困难，算术就吃劲了。因为是速成班，课程相当重。要命的是那些实际并不复杂的算题，我用心算就可以得出正确的结果，可是一用算术的严格的算式计算，就全乱了套。我自然把学习的重点搁在算术上。

“呀！你找了个好清静的地方！”

是田芳，不用抬头也听得出她的声音，不过，我还是仰起头来，而且很快。我慌忙站起，看着她抿着嘴嗔笑着，倒不知该说什么了，该请她在草地上坐下呢，还是就这么站着？我对于女性有一种无法克服的惶恐感，一见着女人，尤其是单独和一个漂亮的女人在一起，我总是感到心里很紧张。

“跟你商量一件事。”她说。

“好的好的。”我诚惶诚恐。

“坐下谈吧。”她先坐下来，“这么站着多难受。”

我在离她两三步远的草地上坐下，拘束得手脚不知该怎么摆着才好。她似乎很自在，双手掬着膝头，坐得很舒服，看着我，像欣赏一只惊疑不安的小兔子。她说：“想请你给咱们的《生活园地》板报写字，你愿意服务吗？”

她是班委会的负责宣传工作的委员，编排更换教室后墙上那块《生活园地》板报。我忙说：“我……当然愿意服务。只是我的字儿写

得欠佳。”

“‘欠佳’！只是‘欠’一点。”她笑着，没有什么讥诮的意思，抠我的字眼，“我的字写得根本说不上‘佳’不‘佳’！”

“我写得不好。”我已经注意自己口头用语中那些文绉绉的词句，尽可能和大家一样用生活常用的词儿，一紧张时就又冒出一个半个生涩的词句来，“真的，我的字写得不怎么好。”

“你的字写得多漂亮！”她感叹着，流露出欣然羡慕的神色，“咱们班主任王老师都说，你的字儿比他写得好，在整个师范里，也是首屈一指。你还谦虚什么呢？”

我没有再做谦让的姿态。她真诚地对我的书法的赞扬，尤其是由她传递的班主任王老师的溢美之词，使我很受鼓舞。我的字，从五六岁时起，父亲就有计划地对我进行训练了。先照父亲写下的影格描摹，然后临帖，先柳后欧，先楷后草，常常因为我一捺一竖不像真柳真欧而训斥我。在这个速成班里，我的字是无与伦比的。我说：“我尽力为之。”

这件事已经谈妥，我想她该走了。她却坐着不动；忽然盯住我的眼，问：“你为啥一天到晚不和我说话呢？”

我的心里又一悸，这样直截了当的问话，使我措辞不及，不知怎样回答。班主任王老师指定我和她同坐在一条长凳上，共用一张桌子，至今有两个月了，我没有主动和她说过一句话。到底是什么原因呢？我自己一时也说不清楚。

“我文化水平低，”她说，“你瞧不起我吧？”

我遭到误解了，连忙说："我……没有没有！"

"那……我是老虎是魔鬼吗？"她讽讥地说，"怕我吃了你？！"

我的脸轰然发热了，不由得低下头。我想起了在宿舍里听到的那个老和尚和小和尚的故事；老和尚威吓小和尚时把女人说成是魔鬼，我似乎就是那个可怜的小和尚了。我和她坐在一条长凳上，听讲或做作业，我从来也没敢大胆地扭过头去注视她的脸。她长得太漂亮了，漂亮得使我不敢看她的那双水汪汪的眼睛。我只是在她不在意的时候，装作漫不经心地注视过她的眼睛和脸膛，其实我很想和她说话，和她对视，像她和班里的任何男生一样大大方方交谈或者开玩笑。我不行。越有这种想法，我却越要摆出一副毫不在意毫不动心的神态。我的心里有一道森严的壁垒、坚硬的外壳，对一切异性实行习惯性的排斥与反弹，我只好掩饰说："我这人……不善辞令！"

"好啊！'不善辞令'！"她笑了，"你何必那么拘拘束束呢？你自个不觉得难受吗？我呀，一天不笑几场，不唱几场，心里就憋得难受。"

"我太……古板。"我说。她的话正说到我的痛处，其实我比她说的还要痛苦。我被她拉回学校，班主任王老师在班里严肃地批评了那位恶作剧的学生，大伙也不再当面把我当作笑料了，可也没有人和我亲近，我的孤寂的心并没有得到拯救。我说："我不会交际……"

她笑着，恳切地说："咱们速成班，在一块不过两年，大家难得遇在一搭，毕业后就各自东西南北地去工作了，再见面也难了。你甭摆出那么一副老学究的样儿好不好！甭老是做出一派正儿八经的样儿好不好？走路就随随便便地走，甭迈那个八字步！说话就爽爽快快地说，甭那么斯斯文文地咬文嚼字！你看……我心里有话都端给你了！"

我难为情地笑笑。我想象不出，我斯斯文文说起话来和迈着八字步走起路来的样子究竟可笑到怎样的程度，却明白大伙对我摆出正儿八经的老学究的样子是不屑一顾的。我想告诉她，走惯了八字步倒不会随随便便走路了，咬文嚼字的说话习惯也难于一下子改过来，我的父亲苦心孤诣给我训诫下的这一套，像铁甲一样把我箍起来。我说："改是要改，一下子还是改不掉！"

"先把你的蓝布长袍脱了吧！"她说。

"那我穿什么？"我问。

"'列宁服'，而今时兴。"

"我能穿'列宁服'吗？"

"当然能。"她肯定地说，"你正年轻，身段也好，穿一身'列宁服'，保险好看。"

"有卖现成的吗？"我受到鼓舞，尤其她说我身段好，肯定在她看来，我的身材长得并不难看，"山门镇上能买到不？"

"你把长袍改一改。"她说，"山门镇上有个裁缝铺，花一点钱改成'列宁服'，还能省一点。"

"那我现在就去！"

"咱们一块去，我给你参谋。"

三天以后，吃罢晚饭，回到教室，她向我挤一挤眼，使我有一种暗中默契的喜悦。她在和我到裁缝铺去改做衣服回来时，给我说，暂

时保密，一俟“列宁服”穿到身上，让速成二班的男女同学大吃一惊吧！我知道她挤眼的意思：今天是取衣服的时限日。我早已按捺不住一种稀奇的心情，就和她走出学校的大门。

那个秃顶的老裁缝，取出改好的衣服，又取出剩余的布头，交给我。

“试试，”她说，“看看合身不？”

我有点难为情，当着她的面脱袍子，不大雅观，就说：“我回去试。”

“在这儿试试，有不合尺寸的地方，老师傅看了也好改。”她说。

“试试吧！”老师傅也这样说。

我不好推辞，就背过她，脱下蓝布长袍来，尽管我袍子下有两层衬衣衬裤，心里还是止不住惶惑，似乎这蓝袍一揭去，我的五脏六腑全部暴露无遗了。

她提起那件改制的蓝色“列宁服”，帮我穿上，又帮我结上纽扣，我感觉到了那只灵巧的手指的温柔。我一低头，胸前两排纽扣，一排是扣着的，另一排完全是装饰品。两条宽大的领条分别摆在脖子两边。

“到镜子前头去照照。”师傅说。

我站在穿衣镜前，自己看见了陌生的自己，竟然不好意思了。说真的，我在镜子里第一次发现，我的模样是很俊的，眉骨耸高了，脸上的棱角也明显了，再不是像我父亲骂我的那样一种女子气的少年

了，只是那个酒窝，在我不好意思的羞怯中又隐隐现出来。我看见她站在我背后，一眨不眨地看着镜子里头的我的脸，她发觉之后，有点惊慌地摆开头去了。

“挺好。”她说，“刚合身。”

我听到她的话，有点不满足，甚至怅然若失。她怂恿我改做衣服时，曾经热烈地赞扬过我穿上“列宁服”一定很好，因为我的身段好。我现在穿上了，自己已经觉得确实很好的时候，她却平淡地只说“挺好。刚合身。”我希望听到她热烈的欢呼，却没有了。

无论如何，我感到一种从来没有过的轻松。我像卸下了钢铸铁浇的铠甲，顿然感到浑身舒展了。天呀！走出裁缝铺的门，踏上山门镇石板铺成的街道，我居然不会走路了！脱掉蓝袍，穿上“列宁服”，那个八字步迈不开了，抬脚举步十分别扭。她刚出门，看着我走路的样子，“扑哧”一声笑了，像是压抑了许久似的，我才理会了，她在裁缝面前保持着与我谨慎的距离，不敢说出太热情的话来。

“呀！衣服换了，路也不会走了！”我也自嘲地说。

“放开走！随随便便走！想蹦就蹦起来！”她说，像是和谁赌着气，“你敢不敢蹦起来？试试你的胆子，徐老先生？”

她在激我，开我的玩笑，我心里一急，伸手在她肩上打了一下，立即就愣住了。天哪！简直不可思议，在这个栈铺拥挤的街镇上，我居然和一个女生打打闹闹！

“好啊！蓝袍先生敢动手打一个女学生了！真是进步了，解放了！”她讥诮地斜过我一眼，使人感到亲切的讥诮呀！她说，“再勇敢

一点，蹦起来！”

我鼓了鼓勇气，连着蹦起来三次，蹦起来，挥一下手臂，落到地上的时候，我脸红耳赤，索性不去看街道上那些市民的脸色。我对她说：“我今天才解放了！”

“对对对！”她连声附和，也很激动，“为啥不蹦呢？为啥不说不笑不唱呢？旧社会，尽让别人尽性儿蹦了，尽情儿笑了唱了，而今解放了，轮着我们妇女了！”

“我可不是妇女！”我分辩说。

“你比妇女还封建！”她哈哈笑着。

“我究竟是什么且不管，”我也笑着说，“反正我自由了！自由多么好哇！”

“唱歌吧！”她说，“有勇气，跟我唱着走过去！”

“我不会唱……”我不承认我没有勇气。

“跟我顺着溜吧！”她说着就唱起来。我和她并排走着，顺着她唱的音调溜唱：

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

解放区的人民好喜欢

……

临近校门的时候，她突然站住，回过头来，煞有介事地说：“你把八字步全忘了！”

我心里一惊，真的，唱着歌走过街道的时候，我的脚步从八字步里解放了，自由了！

第二天，我按照她的吩咐，在教室后边的黑板上换写《生活园地》的内容。她把一篇编成的稿子交给我，我要按照这篇稿子的内容和长短安排版面，在阅读这稿子时，我发现了一个刺眼的题目：

蓝袍先生穿上了列宁服。

我问：“谁写的？”

她说：“我。”

我不知为什么要问谁写的！如果不是她写的，我就不愿意让它公诸全班？我自己一时也说不清楚，反正我捏着粉笔走向板报了。

整个教室里，为这篇文章欢腾起来。

还俗

田芳一天没有来上课，我的心里很不自在。

她病了，躺在女生宿舍里，一整天也没有进教室的门，也没有到饭堂里去吃饭。我看见班里几个女生在一起，给她打饭，送饭。我问一个女生，田芳怎么了？要紧不要紧？她支支吾吾，只说病了，像是有意回避别人的关心，我也不好意思再问下去。

我感到孤单了。一张长条课桌，过去坐着我和她，两个已经成年的速成班的大学生，感到了拥挤，也感到桌子的面积过于狭窄。现在，我一个人坐在长条凳上，觉得这桌子太宽绰了。

她的书籍和作业本子静静地躺在桌斗里，墨盒儿寂寞地蹲在桌子的右角上，这些被她的手指抚摸、使用过的物件，全都失去了生气，使我看见时就有一种惆怅之感。我挪过那只四方形的黄铜墨盒，打开，垫着的丝绵团儿上留下她用毛笔挤压的坑凹，墨汁干了，我便把刚刚磨好的一砚台墨汁倒了进去，干瘪的丝绵团儿被墨汁泡得膨胀起来。我把墨盒合上，重新放到她自己平常搁置墨盒的固定位置上——桌子靠墙边的右角上。我忽然在桌子与墙的夹缝里发现了一根头发，就用手指轻轻儿抽出来。

头发很黑，像墨，又很柔软，这是从她的头上脱落下来的，她自己大概很不注意，更不可惜，她有那么多的黑乌乌的头发，垂在脸颊和后肩上。我忽然真切地感到了用手抚摸她的脖颈上的头发的印象，就把那根头发悄悄地夹在日记本里。

没有了田芳的速成二班教室里，也显出明显的差别来。往常上课之前，教师走进教室门之前的三分钟的等待中，田芳领大家唱歌。她在我的耳畔唱出一支歌的头一句。叫声一——二，于是教室里就腾地响起歌声来。我分明感觉到她口中掀起的轻柔的气浪对我的耳朵和脸颊的冲击，随之就跟着大家唱起来。今天，第一节课前，因为没有人领唱而默然了，第二节课开始前，由班长临时代替田芳领唱，我总觉得有点别扭，燃不起大家唱歌的热情，纵然唱起来了，歌声却死气沉沉，缺乏生气。

我坐在课堂上，眼睛瞅着在讲台上讲得满头大汗的老师，心里却想，田芳病得一定很重，她那样热情奔放的人，怕是不病到十分厉害的境况，是不会躺下的，宽大的女集体宿舍里，现在只躺着她一个人，一定很孤寂，我要是陪坐在她的床边，肯定会使她的心情宽舒一点。我也乐于坐在她的旁边的。

我决定在午休时去看她。好容易上完四节课，草草吃完午饭，我回到教室，放下碗筷，班级篮球队长拉住我，要我写几张篮球比赛的布告。我只好埋头书桌，拔开毛笔帽。

球赛是一场校际比赛。由我们速成二班对县中的校队。我们班的篮球队是师范的冠军，威震县城。我们的篮球队队长有一个雄心勃勃的计划，要征服县城里所有单位的篮球队。我已经迷上篮球运动了，虽然我的球技根本不够上场的资格，却是这支生龙活虎的球队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成员。我每次写海报，我的字是可资羸人的，即使在藏龙卧虎的古县城里，我写的海报前常常围着一堆并不喜欢篮球运动的遗老遗少，品评我的墨迹，使速成二班的篮球队也增加了半分光彩。我的主要职责是替运动员们当衣服架子，他们上场时，匆匆地脱下衣衫或裤子，甩到我的怀里，我一律搭到肩上，不会弄脏，也不会丢失。我从开场一直看到结束，从不中途退走，让运动员放心。篮球赛结束后，我替他们用网袋背球儿，和他们一边议论着刚刚结束的战斗，走到小镇街道外边的小河里，洗一洗。为此，篮球队长破例吸收我为篮球队的队员，虽然根本不是指望我上场。我穿上了一个最大号码——26号的背心，胸膛上有两个用红布轧成的大字“速成”，既是我们班的班名，又意味着在赛场上速战速决的作风，自然是我的笔迹。

写完海报，我就急忙往女生宿舍走去，下午有球赛，我不能不去，缺了我，队员们的衣服搁哪儿去！走到女生宿舍门口，我有点犹

豫起来，那个门里是女性的独立王国，即使再开通的人，甚或是冒失鬼，也会在这个门前放轻脚步，思考一下。我从来也没有进过女生宿舍，倒有点丧失勇气了。

“噢呀！慎行，快来！”我们班的王艾艾正好出门来倒水，看见我，快嘴快舌，“田芳刚才还问你哩！”

我的所有顾虑全都在王艾艾的几句话中烟飞云散了，跨上台阶，跟着王艾艾走进门，由她引着我一直走到田芳的床铺边，我却急得说不出一句话。

她倚在被子上，向我笑笑，说其实并不要紧，明天就可以上课了。我已学得稍微聪明了，知道女同学有些不便说出口来的疾病，也就只是关照她按时服药，悉心养息，不问病症。

我坐在她旁边的床边上，看见她的脸色有点黄，眼圈上有一道模糊的晕圈，头发有点散乱地压在被子上，病容的脸颊似乎更加婉丽动人，令人陡生怜惜之情。我忽然想到我早晨捡到的她的那根头发，不由得心悸了一下，竟然觉得鼻腔酸酸的，看着左右坐着的本班的几位女同学，我强忍住涌动的眼泪。

“我刚才还问你哩！”她淡淡地笑笑。

“有啥要我做的事吗？”我问。

“离元旦剩下一月时间了，校学生会要各班给元旦晚会准备节目。”她款款地说，忽然眼睛一亮，“咱们班出四个小节目，一个大节目，想排《白毛女》，让你参加演出……”

“哎呀！天爷！我……”我惊慌地摆手。

“其实，你的嗓子挺好的，只是没有训练。”她并不急，似乎早就料到我的反应，依然缓缓地说，“把嗓子练顺了，声音挺好。”

几个女同学也都附和着，说我的嗓音不错。我从来也没想到过登台演戏，很不踏实，仍然推辞。几个女同学七嘴八舌，简直说成了非我莫属的情况。王艾艾问：“派他支哪个角儿呢？”

田芳笑笑说：“黄世仁，怎么样？”

“不行不行！”我腾地红了脸。

“他不用排就会迈八字步！合适合适！”王艾艾冲着我，在走道上转起八字步，“慎行呀！演吧！”

“这次演出要评奖。”田芳说，“咱们要给速成二班争取荣誉。”

我忐忑不安地垂下头。

“我病好了咱们就开始排练。”田芳说，“你甭怕，我给你排戏！”

我支吾一声，自己也没听清说的什么。我想推辞，又怕她不高兴；接受吧，又实在觉得是笨鸭子上架，太难为了；想到在排戏时较多的课余时间里，我可以和她在一起，又觉得十分快乐，于是就算默认了。

我坐在她的床边，明显地感觉到女生宿舍的异常气氛，比男宿舍干净，整洁，飘着一丝淡淡的粉脂的气味。我诚恳地劝慰她安心养病，就告辞了。

晚自习时，我隐隐得知，田芳的家里大约出了什么事。她的父亲昨天到学校来找她，送走父亲时，有人看见她和父亲赌着气，晚上在宿舍偷偷哭过，今天早晨就起不了床了。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她没有给谁说过，属于一种猜测。

我想不出她会有什么大不了的事。

第二天早晨，她来上课了，我的心里竟是一种急切的期待之情。上早自习了，好多同学从教室里走到外头去，在庭院里的柳树下，在学校的围墙根，朗读或者背诵语文课文。我也喜欢在院子里早读，空气清爽，也不干扰别人。今天早晨，我没有出去，就坐在位子上，我在暗暗等待着田芳来上课。

她来了，走进教室时，屋里的几位同学都和她打招呼。问候她的病情。她笑笑，一律表示感激，说自己今天精神好多了，不要紧了。

她向自己的座位走来，我已经早早站起，像是迎接她归来。她走到我跟前，照例笑着，坐到靠墙的位子上。我忘了问她病况，也随之坐下，心里很踏实了。

“头不疼了吧？”

“不疼了。很好。”

她说她好了，我就再也找不出什么问候的话，不说又觉得心里别扭，很想说上一番热心的关照的话：“天气凉了，要注意冷暖变化，甭大意。”

她有那么不长不短的一会儿时间，以一种异样的目光盯着我的眼睛，听我说话，忽而眼睛一闪眨，那种异样的光消失了，又恢复了和

一般同学说话时一样普通的神色。那种异样的目光出现的时候，我的心忽闪忽闪跃动了，胸腔里阵阵发热，像一束电石的火光灼了一下，那是我有生以来从未有过的一种奇妙的心灵颤动。

“谢谢。”她说这句话时，虽然是诚恳的，却没有那种撞动我的心灵的目光。

又过了两天，晚饭后，她召开第一次排演会议，所有参与演出的演员和伴奏、服装、道具人员都参加了，四十来名学生的速成二班，几乎人人都派着了用场。伴唱组的女生、伴奏组的拉胡琴的、打大鼓的、敲锣打梆子的，人才应有尽有。那个拉头把胡琴的男同学，原先当过吹鼓手，喇叭和铙钹，全都能来两下，由他负责伴奏组的训练，缺少的人才由他教导。

我被分配演黄世仁，竟然成了真的。田芳饰演喜儿，在剧中我和她处于两个对立的阶级的地位，毫无感情上的共鸣，使我很遗憾。我甚至忌妒起班长刘建国来，他演大春，正面人物，脸上抹红，又有许多和喜儿表示特殊感情的戏剧情节。我还是服从了田芳的分派，使她不致为难，再去调整扮演角色，浪费时间。而要在一个月稍多点的时间里排出这一大本戏来，真是够紧张的。

田芳表现出她对文娱工作的非凡的组织才能。她要求在五天内全部背过唱词，一周后在一起对词，下来花十天时间排演动作，第四周结合伴奏全面排演。她精神振作，热情极高，同学们都愿意听她的吩咐。

她是够忙的了，既要指挥大家排演，又要自己支角儿，而且是贯穿全剧的主角。我们每个演员，在背会唱词以后，就给她打招呼，向

她面背一遍。然后，她一边弹风琴，一句一句给我们教唱词，一句一句纠正音韵不准的唱段。我看不到她自己背诵喜儿的唱词的时候，但我并不担心，似乎整个剧本早就扎在她的脑子里了。

黄世仁的唱词儿不多，却有点怪腔怪调儿，唱起来十分拗口。《北风吹》和《红头绳》两段，几乎每个同学都会哼会唱了，而生活中很少有谁喜欢哼一哼黄世仁的腔调的。我对扮演黄世仁这个角儿的兴味提不起来，音调更觉得唱不准了。

“甭急，慢慢来！”

她用脚踩着风琴踏板，双手按着琴键，侧过头来，对我说。大约是看出了我的不耐烦情绪，反倒不厌其烦地和着琴声，唱了一遍又一遍，给我示范，给我纠正。我一边跟着独唱，一边盯着她弹琴的动作，端庄、自然、优美，我的心情很快就稳定下来。

我的热情陡地高涨了，精神异常兴奋，心情特别舒畅，几乎每天晚饭后总是第一个走进学校的小礼堂这个临时借用的排练场，替她做些组织工作，做些零碎的杂事。由她提议增补我为剧团的副团长，大家一致拍手赞同。我和大伙相处得很好，进入我来到师范学校之后的最佳精神状态。

新年临近了，排练也进入最后的关键时刻。一场意料不及的事发生了，田芳——我们剧团的团长，《白毛女》剧中的灵魂，被什么一时搞不清的野蛮的家伙绑架了，在师范学校酿成了一场严重的“田芳事件”……

拳头之歌

上午的后两节课是作文。王老师在黑板上写下《第一场雪》的题目之后，简单地提示了几句，就走出门去了。

我正在起草稿，忽然看见一个老头走进教室门来，肩头背着褡裢，脸上冻得皱巴巴的，在教室里瞅着一个个男生和女生低垂写字的脑袋。我看他那倔倔的神气有点可笑，这是谁的家长来了呢？他瞅了半天，也没有瞅见要找的对象，就叫道："芳芳！"

田芳猛地仰起头，急忙筒了笔，显出慌慌的样子，离开座位，从走道上走到前头，把老头儿引出教室去了。

那老汉大概是她的父亲，我猜测，从他叫她名字的口气儿可以判断出来，村乡里那些老农民，叫自己的亲生儿女时都是这种神气，而且不分场合，一律像是在自家屋里呼儿唤女。他来找她，并不稀奇，班里的同学从四面八方汇拢到这个小镇上，一律住宿，一年半载不回家，常常有这个那个的家长找到学校来，少数是家里出了事，父亲或母亲病重了，需得回去看看；多数是给儿女送衣送钱，借机看看自己可爱的儿子或女儿。

田芳跟她父亲出门以后，我的心里却不安了。她的父亲找她，我有什么好说好想的呢？自己也奇怪了。她抬头看见她父亲的那一瞬间，眼里泄出一道惊恐的神光，随之转换为一种憎恶的气色了，随之一切都消失了。她的父亲，即使猛来乍到，也不应该令人那样惊恐吧？更不应该有憎恶的样子显现。我猜不出其中原因，心里却有点焦躁，有点担心。

我竟而至于不能继续描绘入冬以来第一次降雪的壮丽景色了，越想，心里越加焦躁了。人对于可能发生的祸事是不是有一种先兆性的

心理反应，我说不清，反正我心里已经毛躁得难以在作文本的小格子里写字了。

我拿起茶杯，佯装到水房里去打水，走出教室，甬道上没有田芳和她父亲的影子，一排排教室里，传出这个那个教员的讲课的声音。她大概把父亲引到宿舍里去了，我在水房里打了水，慢步朝回走，忽然看见打铃的校工刘大根跑过来，朝我说："你们班的田芳给人拉走了！"

"谁？"我大吃一惊。

"一帮人！"刘大根说，"我从街道上过来，碰见一帮人把她往马车上拉！"

"在哪儿？"我的心里腾起一股火来。

"山门镇南头……"

我甩了水杯，拔脚就跑了。我蒙了，闹不清究竟是怎么回事，那个叫她的是什么人呢？她为啥要跟他走呢？我只觉得她不能被拉走，怎么会有这种事呢？我奔出校门了。

街道上似乎有人已经在议论什么，我直朝小镇南头跑去，果然看见围着一堆人，议论纷纷。我奔到跟前，大车上站着七八条大汉，扭着田芳，田芳在挣扎，又跌倒在车帮上，几个人趁势压住她。我大喊一声："不准抢人！"田芳猛地回头，哭喊："快——慎行……"赶车的人大约感到事不宜迟，"啪"的一声甩起鞭杆，马拉着大车跑起来了。

我追着马车跑。马车跑得并不快，我追到马前头，面对奔马，毫无办法，我自小没有摸过牲畜，更不会驾车，不知怎样才能使奔驰的

马车停止下来。那个赶车的汉子，一挥长鞭，我的头顶一声响亮的鞭声，鞭鞘正抽在我的左脸上，火辣辣地疼。在我被抽得晕头转向的一瞬间，马车“哗”的一声跑过去了。

我摸一把脸，继续追，愤怒与急迫中，我从地上摸起半截烂砖头，离开马车稍远一点，跑过奔马，回过头来，照准驾辕的红马的脑袋，鼓足全力甩出砖头，一下子击中了马的鼻梁骨。那红马尖叫一声，前蹄腾空跃起，前头挂鞘的两匹马站住不动了。赶车人用鞭杆砸辕马的屁股，红马摇头摆尾，尥起蹄子乱踢，马车停下了。

我立即扑上马车，又被一个汉子推下车来。赶车人也跳下车，朝我愤怒地抡起拳头。我已经忘记了危险和孤身无援，迎着他冲上去。这是一位中年汉子，力气很大，却笨拙，我闪过他那沉重的一拳之后，就在他的脸上砸了一下，大约打中了他的眼睛，他立即丢下鞭杆，双手抱住眼睛，蹲在地上了。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打人，还真的尝到了一点打击对手的痛快。

“打这个野男人！”

听到一声吼，从车上跳下三四个汉子来，从四面包围了我。我不知该怎样对付，头上一下，腰里一下，我被打得无法防备。忽然朝车上喊“田芳！快跑！”就被打倒在地上了。

“打这个野男人！”

我被打倒在地上，有人坐压着我的脊背，我爬不起来。他们在骂谁？野男人？是谁？是把我当田芳的野男人打吗?

街巷里一阵呼喊，一阵杂乱的脚步声。坐在我背上的那个汉子蹦走了，我爬起来一看，速成二班的男女同学赶来，正在大车周围的街道上摆开了打架的阵势。力量对比一下子发生了绝对的变化，那几个汉子被学生包围住，打得乱爬乱滚。

我跑到马车跟前，看见几个女同学已经解开田芳被绑捆着的双手，扶着她从车上走下来，我看见她的泪痕斑斑的脸颊，忽然心里难过了，流下泪来，一句话没说出口，就跌倒在地上，昏迷了……

我的手被一只温柔的手攥着，紧紧地攥着，我真舍不得那只手松开，离去。我睁开眼，是田芳握着我的手，周围坐着一伙男女同学，她当着大家的面攥着我的手，似乎没有什么不好意思，我也觉得这本来没什么，就该这么攥着。

我依稀记得，我是在山门镇的医疗所里被救醒的。大夫给我包扎之后，又给我吃了几片药，说是催眠的，我就睡到天色傍晚了。

我感到口渴，张张嘴，没有说话，她就意识到了，用一只瓷匙给我嘴里喂水。我看到她从盛水的搪瓷缸里舀起一匙水，用嘴吹吹凉，就准确地喂到我的嘴里。我静静地躺着，闭上眼睛，听着那“呲呲”的吹气声，等待那挨近到嘴唇上来的匙子。我真想抱住她，把头埋在她的胸前，和她痛哭一场。

“你知道不？县公安局把狗日的逮了三个！”班长刘建国说，“我们速成二班这下打出威风啰，太不像话嘛！已经解放了，竟敢抢人！”

我心里很痛快，抓了他们三个，真是叫人痛快。我坐起来，浑身疼痛，背后垫着被子。

“哈呀！了不起，真是了不起！”篮球队长说，“咱们的蓝袍先生会打架了，真是了不起！想想你刚来时那般斯文……”

大伙瞧着我笑，我也笑了。田芳抿着嘴儿，也瞅着我笑，说：“他打什么呀！净挨了打！”

我挨了打，被打得头破血流，鼻青脸肿，可我也打了一拳，砸了一砖头。我那一砖头砸得多准！正好击中了辕马的鼻梁骨，使飞奔的马车停住不转了。我仅仅打出的一拳又何等的威风，何等的准确，一下子砸得马车把式蹲到地上，双手捂住眼睛，抡不成鞭杆了。我平生没有跟别人打过架，没有体验过打人的滋味，现在才发觉，打人也有乐趣，特别是当你出于一种卫护弱者（这弱者又是你顶要好的同学）的义愤的时候，用拳头击中对方的身体，就会产生一种无与伦比的痛快的滋味。我久久地回味着那一拳击中马车把式时的情景，而把自己得到的几倍的报复忘记了。

“他们怎么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抢人？”我问，“田芳，到底是怎么回事？”

“那是她婆家来的一帮子蛮汉，要抢田芳回去拜堂——结婚！”一个女同学代替她说，“甭问了，让田芳又难过。”

我又忍不住问：“到教室来找你的那个老汉是谁？你怎么就跟他走了？”

“那是我爸。”田芳说，“我爸在我十岁时就把我许给人家，卖了八石麦子。我而今不愿意这桩事了，他说让我拿出八石麦子还人家。我说我工作以后，逐年还，全部还清。俺爸这一关先打不通，跟人家合

在一起，要把我送给人家哩！他不单是粮食问题，还说我丢人丧德，损了他的面子……”

我大致明白了缘由，也不想再细问了，怕引她伤心。这样的婚姻状况，在我们速成二班，不仅是田芳一个人的痛苦，好多男生女生都有类似的遭遇，班里早已有几位学生解除了婚约，还有一些正在酝酿，两个速成班正在形成一股离婚和解约的风潮。

“打这个野男人！”

那个从马车上跳下来的汉子呼喊着朝我奔来，把我当野男人打，现在想起来，似乎也并不觉得有什么不好意思。当时，田芳被绑在车帮上，不知听到这句恶毒的话了没?

“田芳……”我想安慰她几句，却又不知该说什么好，临到嘴边，却说到其他事情上去，“咱们的戏还排练不？”

“今天……停了。”田芳说，“你的伤势要是到时不能恢复，就难演出了。现在想调换谁来演，来不及了！”

“你先说你怎么样？”我担心她的精神刺激太重，能不能上台，“能上台吗？”

“我能。”她说，“我才不把他们当回事儿哩！反正甭想我进他们的门！”

“我也能！”我说，“你给大家继续排演吧！我一定能上台！”

元旦晚会通宵达旦，夜半时，食堂里给全体师生准备下一顿丰盛的年饭。《白毛女》是压轴戏，排为最后一个节目，吃过年夜会餐之

后再化装也是来得及的。我就坐在大礼堂里，欣赏着各个班里的文娱节目。田芳另有一个独唱，我期待着。

终于轮到她了。她站在台上。穿一件红袄，沉静而大方。几天前，由她引起的轰动一时的打架事件，使她成为全校瞩目的人物。现在，她站在台上，让全校师生瞩目，不知出于什么心理，哄哄乱乱的大礼堂里倏地静寂下来，她唱起来了——

旧社会

好比是黑咕隆咚的枯井万丈深

井底下

压着咱们老百姓

妇女在最底层

看不见太阳看不见天

数不清的日月数不清的年

做不完的牛马受不尽的苦

谁来搭救咱

会场里十分静，静得使人感到压抑，压抑得人想喊，想叫，想蹦起来狂呼狂喊！我的眼泪流下来了。我听见有人抽泣。不知是哪个班的女同学，开始附和着田芳在台下唱起来，很快地蔓延到各个角落，男生们也唱起来，整个大礼堂里，回荡着这曲《翻身歌》——

共产党，毛泽东

他领导咱全中国走向光明

从此砸断了铁锁链

妇女就成了自由的人

……

我仰起头，张着嘴，忘情地唱着，眼泪从脸颊上流进嘴角里来了，咸涩涩的。我是个先生。我是那个小和尚！我是受压迫的人！我是一个被父亲禁锢成了没有七情六欲的木偶！我……今天成了……自由的人……了！

新浪潮拍击下的老农民

积雪覆盖着原野。乡村间的大路上。午间融雪时踩踏得稀烂的泥巴，夜间又冻结成硬块了，路面坑坑洼洼，绊绊磕磕。道路朝南，沿着慢坡而上的原野延伸，在雪地上像一条随意丢下的皮绳，曲曲弯弯。

我们三人——班长刘建国、班主任王老师和我——一行，冒着渭河平原数九隆冬的清晨时分凛冽的寒风，正沿着这条乡村大路朝南走，要赶到一个叫田家寨的村子去，找田芳的父亲田茂荣老汉。我们将交给他四百块钱，由他再交给把田芳许订给的那一方的家长，偿还他接受过的彩礼或者说聘金，从经济上彻底割断捆绑着田芳的绳索。这是怎样一件令人鼓舞的壮举！

四百块钱装在我的书包里，沉甸甸地挂在我的肩上，那无异于几百颗腾腾跳跃着的心，我怎能不感到沉重呢！

新年晚会上，我们的《白毛女》歌剧获得了极大的成功，田芳的名字销匿了，那些认识或不认识她的外班的同学，那些教她或根本没有教过她的老师，见面都亲切地叫她白毛女了，我们班的同学更不用说了。戏剧里的白毛女已经获得了新的生活的权利，获得了幸福自由的爱情，现实生活中的白毛女——田芳，笼罩在心灵上的封建的乌云还没有消散。

虽然发生过轰动小镇的抢劫田芳的事件，她的父亲仍不改口，绝不许她毁弃三媒六证确定过的与大张村的婚约。对她压力最大的不是她的父亲，她说她将永不回家，甚至断绝父女关系，也决不回到黑咕隆咚的万丈深的枯井里去了。对她压力最大的是八石麦子，她的父亲把她许订给大张村所接受下的聘礼，早已被全家老少吃掉了，变成粪土，施到田地里去了。八石麦子，一石十斗，一斗三十五市斤，整整两千八百斤，折合人民币三百多块钱哪！

一场募捐活动在师范学校掀起来了！

想起这场募捐活动的前前后后，我至今仍然激动不已。起初，只是我们篮球队几个同学的举动，想不到竟然扩大到整个学校里去了。那天与县武装部的篮球赛结束以后，我和队长何长海回校的路上，闲扯着已经过去的田芳被抢劫的事。我说，我要是有三四百块钱，我就愿意拿出来，解除她心上的债务。何长海说，咱们球队凑一凑，能不能凑够呢？十来个篮球队员在一块凑来凑去，不过几十块钱，远远不够。回到学校后，消息传给班里的男女同学，大家纷纷向我捐款。紧接着，外班的同学也赶到我的宿舍、我的教室里来捐款，甚至有十几

位老师也捐了……啊呀！短短的三四天内，我的书包里装进了五百多块钱，超过需要的数目了。我和班主任王老师商量之后，决定把多余的一百多块钱退回给那些捐款数最高的老师和学生，留下四百元足够了。

“为了砸断封建锁链！我捐三块……”

“再不能容忍我们的姐妹做封建婚姻的牺牲品！我捐一块……”

“为了解放，为了自由！我捐……”

……

那一张张男生和女生的脸在我眼前叠印，那一声声慷慨激昂的话在我耳畔响着，永生难忘！大伙不仅是同情田芳的遭遇，而且是一种共同的时代要求。刚刚获得解放和自由的新中国的第一代青年，强烈的反封建的意识是共同的要求。这些师范学校的学生，尤其是速成班的学生，来自社会底层，不单是仇恨地主资本家，尤其仇恨封建的婚姻，好多人与田芳有类似的遭遇，离婚和解除婚约，在师范学校不仅不会被人耻笑，而且会得到普遍的支持和同情。

“你离婚了？”

“离了！”

“完全弄‘零干’了？”

“‘零干’了。你呢？”

“我刚提出来，正离哩！”

“赶紧离了！重新自由去……”

这是公开的交谈，不会令人议论……田芳这样引人注目的白毛女，得到热烈的捐款就不是奇怪的事了。

我按按书包，四百块人民币正在手心，我的心止不住一阵发热，隆冬原野上清晨凛冽的寒风也不那么厉害了。

我们三人走进田家寨，几经打问，终于找到田芳家的门口。

两间厦屋，连个围墙也没有，一眼就可以看出，这是一家十分贫苦的农户。我们三人站在厦屋门口，一个女人走出来，大约四十出头，一眼就可以断定是田芳的母亲，脸形太相像了。她一看见这三个穿戴不同于庄稼人的陌生人，先愣怔了一会儿，有点惊恐地问：“寻谁？”

王老师说明了我们的身份。田芳母亲脸上的惊恐立时消失了，却更加慌乱，把我们让进屋，却无法使我们坐下来。炕上的一张破烂的被子下，围坐着四个娃子和女子，地上竟然没有一个可供人坐下的凳子。她擦擦手，闪身出了门，再进门的时候，端着一条长凳，大约是从邻家借来的。不管怎样，我们三人挨排儿在长凳上挤着坐下了。

她张罗着倒水，取烟，取来了一只装着烟末的木盒子，却找不到烟袋。王老师点燃自己的纸烟卷，劝她再甭麻烦了。她在灶锅下的木墩上坐下，却不知该说什么好。没有经见过世面，也没有和公家的干部打过交道的农家妇女，常常都是这个样子。王老师尽管很和气，问她家里的状况，她头不抬，烧着火，简短地答上一句，半天又没话了。田芳的父亲拾粪去了，她告诉我们，随之就指使坐在炕上的儿子去找。

老汉回来了，头上裹着一条黑布帕子，鼻子冻得红红的，一进门，大声说："三位先生来了！抽烟——"把那个短杆旱烟袋依次让给我们三人，随之在门槛上坐下来。

"三位有何贵干？"他仰头问。

王老师和他谈起田芳的婚事，给他解释新社会婚姻自由的道理。老汉低着头，抽着烟，做出一种耐心听着的姿态。一当王老师停住口，他仰起脸，做出深明大义的神气，说："新社会好，咱农民拥护共产党。儿女的婚嫁之事，应该由家里管，政府和学校管这些事做啥？"

王老师又耐心给他解释学校应该管的原因。

"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田芳的父亲说，"你们都是有知识的人，比我懂得多。我跟人家说下一句话，三媒六证，邻里皆知，而今一水冲了，我在田家寨还算不算人？"

我心里暗暗吃惊。这个老农民，一身黑色家织粗布棉袄棉裤，补丁摞着补丁，肘头露出变成黑色的棉花絮子，一脸皱褶，鼻尖上吊着清凌凌的水一样的鼻涕子，捉着烟袋的手指像树皮一样裂开着口子，嘴里却吐出一串一串半生不熟的词句。我早已从田芳口里得知，她的父亲是个一字不识的粗笨庄稼汉。一个大字不识的粗笨庄稼汉子，谈起话来，却要讲信义，夹杂些半通不通的古文词。如果是我的父亲这样讲话，也不足怪，而田芳的父亲却叫我奇怪了。

王老师索性问起八石麦子的事。

"有这事。"田芳的父亲一口应承，"家家的女子都卖钱，家家的儿子订媳妇都花钱。我吃了人家的麦子，我不昧良心……"

王老师又讲道理，说那根本不是昧良心的事。我也就一手掏出四百元钱来：“这是我们同学和老师的一点心意，目的只有一个，让田芳能安心读书，再甭逼她上轿了……”

老汉瞪大眼睛，瞅着我递到他眼前的一厚沓票子，愣住了。他显然没有料到我们的这个举动。愣了半天，忽然醒悟了似的，猛地伸出双手，把我的手推开，并且站了起来：“这不能，这不能呀！”

“我们是为了田芳的前途……”我说。

“为了啥也不能失信！”老汉说。

“你要是不收，我们就——”王老师看看说服不了，就使出我们路上商量好的最后的一着，“交给乡政府，由乡政府交给大张村那家人。当然，这样一来，媒人和你难免就不好看了。你知道，上次抢人，县上扣了大张村三个人，刚刚释放……”

“哎呀！”田芳的父亲颓然坐在门槛上，双手抱住头叹息。

王老师示意我把钱放下。我瞅瞅那张破烂的用麻绳绑着腿儿的小桌子，上面摆着盆盆罐罐。我把钱放下了。

“我们走了。”王老师站起来说。

田芳的父亲抬起头，看见桌子上的那一摞钱，没有推辞，脸上露出愧疚不堪的神色，张开双手，挡住门：“说啥也不能走……不吃饭了，再坐坐……”

我们又坐下了。

“唉，三位同志……”他摆摆头，一脸诚恳的又是惶愧的神色，“解放了，以往的礼性全部不合适了吗？”

王老师笑了：“也不是这么说。你，一个贫农，翻身了，扎实种你的地，把日子往好里过，顾那么多臭礼性做啥？”

“解放了好！确实好！不拉兵了，不抽税了，官人不欺百姓了，确实好！可这新社会，”田芳的父亲现在显出一个老庄稼的天真来，说，“全都没大没小了吗？男女不分了吗？不顾脸面了吗？”

王老师哈哈笑着，摇摇头。

“你看，”老汉举出例证来，“俺田家寨，有五个姓氏，田姓是主，其余是后来添进来的。人说，‘歪胡家，捣秦家，恶鬼出在刘、李家，仁义礼智大田家。’而今，田家人也不讲礼义了！你看看，那些男男女女，这个离婚呀，那个自由呀！闹得全都乱了套……当然，咱连咱的女子也没管得住！”

“你为啥要管人家哩？”王老师笑着问，“人家年轻人，听啥不听啥，自己有主意了！你拿那些老封建思想管人家，肯定管不住！”

田芳的父亲叹息：“咱们人老几辈儿没跟人胡说八道过，穷是穷，可没做下让人指脊背的事……”

“你把我压迫了一辈子！”田芳的母亲说，“而今孩子压不住了……才好！”

“你——”田芳的父亲红了脸，“我看我活不成了！”

“穷得叮当响，臭礼性倒多！”女人更加壮起胆子，“土改时，工作组分给咱一张桌子、两把椅子，他呢，晚上悄悄给人家送回去，让民兵抓住了，审了半夜，说他跟财主有勾搭，他只说……我不能白受不义之财……你们三位听听，这就是他的礼性！”

……

告别了田芳的父母，我们三人重新返回来。太阳升起在冬日灰蓝的天际，寒气消散了，道路上开始松冻，泥泞布满乡间大道。我们三人回味着刚才和田芳父亲的有趣的谈话，说着笑着，走到慢坡顶上。

眼前是渭河平原的壮丽的原野，坦坦荡荡，一望无际，一座座古代帝王、谋士、武将的大大小小的墓冢，散布在田地里，蒙着一层雪。他们长眠在地下宫殿里，少说也有千余年了，而他们创造的封建礼教却与他们宫廷里的污物一起排到宫墙外边来，渗进田地，渗进他的臣民的血液，一代一代传流下来，就造成了如我的父亲和田芳的父亲这样的礼义之民吗?

归来已觉不是家

接到父亲一封信，我才记起，离开家已经四五个月了。父亲关心我的学业、我的身体，问我是否恪守着“慎独”的嘱咐。父亲的很合规范的文言体书信，功夫独到的小草墨迹，把一个遥远的记忆勾回到我的心里来了。那么熟悉，却又那么陈旧。

班级之间的篮球比赛正在进行，我继续履行我的衣服架子的职责，父亲的信装在口袋里，赛场上激烈的竞争牵动着我的神经。有人在拉我的胳膊，我一回头，是田芳。什么事，等不到球赛结束吗？我

实在不能从这紧要关头走开。她却拉着我的袖子，硬把我从人窝里拽出来。

“告诉你一件事。”她说，“县宣传部来人通知学校，让我们的《白毛女》歌剧下乡宣传演出。”

“真的吗？”我忙问。

“真的。”田芳说，“王老师刚才告诉我，让我叫你去，商量一下。”

“什么时候演出呢？”我问。

“寒假里。”田芳说，“马上要放假了。”

我和田芳找到王老师的住处，完全证实了这件事。这无疑是一件光荣的任务，王老师也很高兴，问我有什么困难。我说什么困难也没有，只是应该回一趟家，放假后就没有时间了，王老师批给我两天假，让我考试前赶回学校，下周就要期终考试了。

“你这次回去，你爸可能要认不出你了。”王老师笑着说，“你把老先生能吓一跳！”

田芳瞅着我，抿着嘴笑。我也笑了。

从王老师房子出来，我又朝操场走去，仍然惦记着速成二班的最后的胜输。田芳狠狠拽了我一把：“那么球迷呀！我还有事儿跟你说。”

我只好站住。

“你把募捐时记下的花名单给我。”她说。

“要那做啥？”我问。

“有用。”

“干啥用？”

“你别管。”

“你不说清楚，我不给你。”

她无奈了，只好说：“我要保存下来。待我毕业以后，有了工资收入，我要加倍给每一个募捐的同学偿还！”

“噢！这样……”我说，“这样……不好。”

“为什么不好？”田芳说，“我心里实在过意不去，很不安呀！”

“那样……起码在我，就伤心了！”我说。

“你伤什么心呢？”她问。

“我们募捐，完全是出于一种对封建婚姻的反抗。”我说，“那些外班的同学，有的根本和你连一句话都没说过，你也不认识他们，他们为啥自动捐款呢？你想想……”

“我明白。”她说，“即使这样，我也应该偿还。同学们的心意我明白……”

“当然，怎么处理这件事，由你决定。”我说，“不过，你千万别给我……偿还什么钱！”

“那……好吧！”她沉吟说，“你把那个名单给我，我要保存，比什么东西都珍贵了！”

“这倒好！”我说，“我抄出一份给你，我也保存一份。过多少年，看见这名单的时候，心里会是怎样呢？啊……这是几百颗心呀！”

“你说得多好！”田芳眼里浮出动人的泪光，声音低低的，抖颤着说，“比金子还贵重的心呀！”

从学校吃罢早饭就动身，回到东原上我的老家杨徐村的时候，暮云四合了。冬日天短，又是步行，八九十里路走回来，整整用了一天时光。我的心情很好，离家几近半年，家里会是一种什么样子呢?

我站在门口，门楼兀立在寒冷的暮色里，那令整个家族引以为自豪的“读耕传家”的门匾题字，有点孤寂，也有点过时皇历的冷漠。我走进院子里去了。

院子里发生了很多变化。我和我的媳妇住的那间厢房，传出牛粪和牛尿的混合气息，我一探头，就看见一头黄牛正在槽头嚼草舔料。走进上房，父母住的房子从中间隔开了，分成两间住屋了。父亲正在小小的南间屋的火炕上坐着，抽着烟，母亲在炕的另一头坐着。天气寒冷，人都坐在炕上了。

昏黄的煤油灯焰下，父亲伸着脑袋，辨认着我。我叫了他一声。他惊喜地从炕上下来，坐在椅子上，就从头到脚打量着我。母亲也溜下炕来，走出门去，从门外领着我的媳妇进来了。

“先生，你擦擦脸。”她把洗脸水放到我面前。

她还叫我先生，这是结婚以后她对我的称呼，而今我不是先生，是师范学校的学生了，她还那么叫，听来已经恍若隔世了。

“先生，你想用啥饭？”她在身后问。

“随便做点吃的。”我说，听见她又在问母亲，究竟该做什么饭。我的答复反倒使她为难了。母亲总算点出清汤细面的食谱，她轻轻走出屋子去了。我心里清楚，她的言语和行为举措，全是结婚后到我家里养成的。请人洗脸叫“擦脸”，洗手叫“净手”，吃饭也说成“用饭”，全是我父亲的家规。这些我过去司空见惯的东西，现在听来倒有一种好笑的味道了。

父亲在灯下伸着脖子，瞅着我的衣服。我这才想到，我从家里走出去时，穿的是一件蓝袍，小包袱里装着一件备换的蓝袍，头上戴的是礼帽。父亲现在是第一眼看见我穿着的列宁服和头上的八角帽子，就那么狠看。

“你把蓝袍换了？”父亲问。

“换了。”我心里有点忐忑，父亲会生气吗？“我是用蓝袍……改的这身衣服。”

“改了好！嗯，改了好！”父亲笑着点头说，“而今先生不兴穿袍子了。”

我的心里高兴了，父亲也在随着生活的变化而变化，我坐在炕边上，和父亲聊起家常。

在我离家的半年里，家庭分化瓦解了。父亲很伤心，说人心不古了，民风不纯了，连我的两位伯父也在家庭内部捣他的鬼。土改时，兄弟三人感激涕零地抱着我爷爷的神匣儿哭笑一场之后，看看再无什么风险，政府一股劲鼓励庄稼人发展生产，二位伯父把爷爷死时留下的遗嘱统统忘记了，要买牛，要置地，要增盖房屋，再不听父亲的指挥了，把爷爷确立的我父亲的主事位置不当一回事了。争论时有发生，矛盾难以掩盖，终于分化瓦解了。

“鼠目寸光！”父亲简单地给我叙述完这种变故，不屑地说，“你大伯、二伯，全是鼠目寸光！”

我一时弄不清家庭里的谁是谁非，不好参言，也觉得没有多少意思，既然过不下去，各家过各家的日月，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

“不管怎样，你该去给大伯、二伯问安。”父亲说，“家里分家归家里，你在外边读书，全当过去在一起过那个样子，该走的路要走到，该行的礼要行全，不要跟这些人一般见识。”

我点点头，就去看大伯。

大伯住在上房东边里屋，正在吃晚饭，放下筷子，忙让我坐。一句关于家庭矛盾的话也不提，只是夸赞我出息了，完全像个新社会的干部的模样了。

“这新社会真是好！”大伯说，“国民党的官人一进村，吓得百姓鸡飞狗跳墙，躲的躲了，跑的跑了，跑得丢了鞋子也不敢拾！而今共产党的干部一进村，老百姓一呼啦就围上了，胡拉乱谝，到饭时争着往屋里拉……我的天，那天正在碾子上说闲话，老杨同志顺手从我嘴里拔下烟袋，塞到嘴里就抽！你看看而今的公家干部多亲……”

我也很感动。解放初期，受惯了国民党官匪欺压的老百姓，对共产党干部的作风最敏感，谈论也最多，我虽已不惊奇，却仍然很感动。

“好好念书，日后好好干工作。”伯父说，“你能在外边干事，咱徐家人都光彩！”

我告别大伯父，又走进二伯父的屋门。

二伯父正在给牲口拌草，扔下搅草棍子，把我引到他住的厢房里：“屋里地方窄，没处坐，你坐炕边上。”

“你走时咱是一家，回来变成三家了。”二伯父笑着。这样毫不掩饰地说出分家的现实，反倒使我觉得实在。他笑着说，“天下水朝东流，弟兄们再好难到头。我看呢，分了也好，免得好多麻烦。谁有啥本事谁就成自家的精去！”

我与二伯的想法很接近，就笑着赞同他。

“二伯一辈子说话不会拐弯。”二伯直着脖子说，“你爸过去管家还管得住。而今管不住了，咋哩？新社会了嘛！他在家里想当家做主哩，人家公家干部大讲大唱男女平等哩！所以，过去你爸在屋里说话，没人不服，而今就不服了！惹得他自己也是一肚子气……我说分了好！”

“分了好！”我附和二伯说，“我爸那些管家的规矩，肯定行不通了，越往后越行不通。”

“对！大侄子，你跟二伯看了一步棋。”二伯说，“比方说，政府派干部到咱村，成天宣传说，要发展生产哩！你爸还是按照你爷爷在世

时的主意，‘房要小，地要少，养头老牛慢慢搞。’不合党的政策嘛！我也不满意。这不，刚一分家，我就买下一头好母牛，一年生一头牛犊，就是半个家当……”

二伯是个耿直的庄稼汉子，我一向很喜欢他，对他坦诚的说话也特别觉得实在。

“做梦也想不到的太平年月！”二伯父说，“不拉兵，不收税捐，一年交屁大一点公粮，庄稼人做梦也没敢想的好世道呀！大侄子，二伯说句结实话，而今谁再过不好日月，不光得不到邻里同情，反而要被人耻笑！咋哩？肯定是懒家伙！”

我被他的憨气逗笑了，弟弟过来叫我吃饭。

我回到父亲住的上房里屋，坐下吃饭，一碗清汤细面，十分可口。吃罢饭，我向父亲汇报了师范学校的学习情况。父亲也不显出惊奇，他大约对新社会的诸多变化已经习以为常了。他淡淡地说：“人家新学堂那样教，你就那样学吧！反正，不管新学堂老学堂，总而言之一句话，还是韩愈说的，‘传道授业解惑也。’当学生，求学问，还是要记住‘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这话，新学堂不至于反对吧？”

“学校里提倡努力学习，老师抓得很紧。”我说，“我们的学习还是很紧张的。”

“紧张好。”父亲说，“要成学问，不刻苦不行。”

我问他分家后，忙得过来忙不过来。

“屋里的事都有我撑着，你弟也行了。”父亲说，“你专心念你的书。记住，要处处留心，别胡乱张狂！”

我的心一震。我在学校的生活状况，父亲显然还不了解，还在给我打预防针。

“村子里有些人好张狂！”父亲鄙夷地说，“一个大字不识，满世界跑来跑去开会！有几个年轻女人，黑天半夜跑着开会，张狂得要上天了！前日听说，那个杨发奎入党了！那么一个二杆子货，共产党居然看中那号人……”

我的心里潜入一股冷气。父亲看不惯的人和想不通的事，我却在师范学校也是有过之而无不及。他对于那些满世界跑着去开会的男人和女人的非难，令我反感，我听不顺他对这些人的讥刺。就劝他说：“农民刚刚翻了身，高兴……你可是别给人家泼冷水，别说风凉话儿……”

“我说他干什么？”父亲不屑地说，“我只看着这些人张狂，啥也不说！你——”父亲瞅着我，“在学校里，要慎行慎言！我看到村里这些人的疯张劲儿，才提示你……甭张狂！”

我低头喝水，避开了父亲的逼人的眼光。

“我给你写的那张‘慎独’的字，还记着没？”

“记着。”

“你去歇息。”父亲说。

我走向自己的住屋。原来的厢房变成牛圈了，我的住屋迁到和父亲一墙之隔的上房西屋的北间。

“先生，你喝茶。”我的媳妇说。

“我自己倒。”我说。

“先生，你洗脚。”

“我自己一会儿再洗。”

我坐下，还是接住她倒下的茶水。她坐在炕边上，又捞起鞋底儿，并不看我。我坐在椅子上，一时也没说话。我忽然想抽一支烟，尽管我从来没有尝过烟味儿，现在却很想抽一支烟。我对她说：“你以后不要叫我先生了。”

“那……”她抬起头，旋又低下，“叫什么呢？”

“叫我名字。”我说。

“那像啥话？”她惶然说。

“早就不兴叫先生了！”

“我在屋里叫。”她说。

我不再坚持了。她对我的过分尊敬，甚至带着根深蒂固的畏怯，使我很难受。她自愧貌丑，又没有文化，那种卑怯的眼光使我浑身都不自在。我忽然想到田芳，那手按琴键给我一句一句纠正唱音的姿态，那在师范学校礼堂里唱《翻身歌》的动人情景……一个念头在我脑子里像一道电光闪耀了一下，匆匆消失了，我自己也被震住了：如

果我提出和她离婚，她会怎么样？我的父亲会怎么样？这个家庭会怎么样呢？

第二天，我就离开了，而且心情是那样急切，渴求立即回到那个温暖的集体之中去。

六十年里的二十天

短短的二十天寒假里，按照县宣传部安排得满满的演出顺序和路线，我们在乡下演出歌剧《白毛女》。我记忆最深的一件事，是第一场演出，我就挨了一砖头。

那个村子叫歇驾村。传说唐朝一位皇帝打猎跑到这里，人困马乏，在此做过一段休息，进了午餐之后，就奔马追猎到终南山下去了。现在，歇驾村变成薛家村了，其实村子里连一家姓薛的人家也没有。

薛家村住着一位县委的副书记，在那儿搞互助合作的试点工作，群众觉悟高，各项工作都是县上的一面红旗，第一场演出搁在薛家村，是理所当然的。在县委副书记的眼皮下，在这样先进的村子演出第一场，我们演出时的心情是不难想象的，认真极了。

薛家村是个大村，又是一个行政村里的中心自然村。村中间有个年久历深的老戏楼，台下坐着或站着黑压压一片人，临近的房顶上、矮墙上、树杈上，全都趴着观众，这样大的场面，我心里真有点怯场。

整个演出还是顺利的，群众秩序也很好，百十名民兵在维持着哩！事情出在《娘娘庙》那场戏里。当我（黄世仁）和狗腿子穆仁智

到娘娘庙里避雨，遇见白毛女，被白毛女追打时，台下骚动起来了，像雷一样滚动着“打！打！”的吼声，我已忘记了自己是徐慎行，我像黄世仁一样胆战心惊，假戏真做了。当我逃到台角时，我听到一声怒吼：“打这狗日的！”随之，我的腿上就挨了重重的一击，跌倒了。

事态很快被民兵控制住了。我必须立即爬起来再逃，不然就给白毛女抓住了，抓住了就不好办了，剧情无法往下发展了。我看了一眼脚下的半截砖头，却没有站起来，慌急中，我用手爬着，逃进后台去了。

演出结束后，县委副书记在台上和我们一一握手，他对我说：“你挨了一砖头，说明你演得像。这一砖头，是群众对你的最高奖赏！”他的生硬的陕北口音，使我觉得亲切极了。

短短的接见之后，那些给我们管饭的社员已经拥在台前，争着领我们去吃饭，田芳被几个姑娘拉拉扯扯，争着往她们的屋里拉，发生争执了。我是一个恶霸的扮演者，自然不会是受欢迎的角色。这时间，一个小伙子挤上前，问：“谁个刚才演黄世仁来？”我一应声，他拖住我的胳膊就走。

黑暗里，我跟他走过陌生的村巷，进入一个小小的独间住屋，只有他的母亲在座。我刚一落座，老人要我把腿伸出来，在一只粗碗里倒下白酒，用火点燃，敏捷地在碗里蘸上燃烧着的酒液，在我的伤口上擦洗。她的指头上带着蓝色的火苗，一下子捂到我的挨过砖头的青疤上，灼烫得我龇牙咧嘴。

“我……”小伙子很难受地说，“我实在忍不住了……扔了一砖头！”

哦呀！原来打我的竟是他！

“你打得好！”我拍拍他的背，“这是给我的最高奖赏！”

他不好意思地笑了，就给我端上饭来。

鸡蛋臊子面，我吃得好香，也确实饿了。

母子二人看着我吃饭，说给我一个令人流泪的伤心事。他的姐姐，给村里一家财东的二少爷糟践了，跳井了！他的父亲一气之下，卧炕不起，年底也去了……他把戏台上的我当成残害得他家破人亡的薛家村的恶霸打哩！

田芳来了。

她看我的伤，用手轻轻按按，问我要不要到邻近的镇卫生所去看大夫，我说大娘已经给我治过了。她不知道这儿刚刚讲述过一个悲惨的往事，随口问：“大婶，屋里就你娘儿俩？”

“噢！”大娘应着。

“你媳妇呢？到娘家去了？”田芳问。

“还没哩……”小伙子红着脸说。

“你怎么还不给人家娶媳妇？”田芳笑着说，嗔怪的模样，“你真性凉呀！”

“正……自由哩！”大娘瞅一眼儿子，“我说他，你自由也自由快一点！慢格腾腾的，还不如老早时包办来得快……”

他羞怯地低下头，我和田芳都忍不住大笑了。屋子里洋溢着喜悦的气氛，我的心头十分轻松，田芳坐在哪儿，哪儿就特别欢乐。

“让我看看你的对象，行不行？”田芳问。

小伙子“嘿嘿”笑着说：“俺妈乱说的……”

大娘却抿不住嘴了：“刚才跟我在屋做饭，这面……就是人家闺女擀下的……”

“好哇，慎行，你真有福！”田芳冲我笑着，“你吃了那位新人的面条了，肯定香吧？我来晚了……哈哈哈！”

告别了那母子二人，我和田芳往回走。

街巷里很黑，看不见路面，坑坑洼洼的村巷里的道路，夜间走起来，低一脚高一脚，垫得我挨过砖头的腿一阵阵疼痛，我小心翼翼地迈着脚。她走到我的旁边，很自然地用手搀住了我的胳膊。

我没有拒绝，倒希望这段通到我的住处的路更长点，好让那只温柔的手多搀扶我一会儿。我反倒不想说话了，静静地走着。她也没有说话，扶着我的左臂的手抓得更紧了。

她被什么东西磕绊了一下，往前一跪，险乎跌倒，抓着我的手，把我也拽得踉跄两步，黑暗中踩到一块石头上，垫得我的腿伤钻心似的疼痛，疼得我“哦哟”一声，弯下腰去，半天站不起来。

她轻轻地惊叹一声，双手扶住我的胳膊，把我扶起来，就把我的胳膊架到她的肩膀上，另一只手搂着我的腰，几乎背着我往前走。我的腿伤不痛了，却舍不得让她松开手。我感觉到她的腰部的体温了，

温馨的气息扑到我的耳根。我的心在胸膛里狂跳，觉得热烘烘的，脚下乱踩乱踏，也不知道疼痛了。我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想法，如果就这样互相抱扶着走向断头台，我会从容得连一丝痛苦都没有。

我抬起左手，大胆地搂住了她的腰。她似乎轻微地战栗了一下，没有说话。我感到呼吸不畅，心要跳出喉咙来了。我猛然折过身，把她搂住了，在我的嘴唇碰到她的嘴唇的时候，我几乎昏厥过去……

我躺在炕上，无法入睡，身下是房主人烧得热乎乎的火炕，同炕挤着的几位演员已经拉起鼾声，油灯下，可以看见鼻尖上沁出的细密的汗珠，我吹熄灯盏上的昏黄的煤油焰火，躺在被窝里，心还在“咚咚咚”地狂跳。这就是爱情吗？这样的爱情产生的心火，简直要把我熔化了！

我的父亲按照他的家规和独创的理论，给我娶回来的那位媳妇，即使新婚之夜，我们连一句话也没有说，各人抱着各人的胳膊睡到天明，我连一丝“邪念”也没有产生。

有一个倾心的人儿，怎么可能荒废学业呢？怎么可能都变成沉溺于淫乐而失掉江山的商纣王或唐明皇呢？我现在不仅觉得父亲的理论荒谬无稽，简直令人可笑、令人憎恶了！我翻身坐起来，点着了油灯。

我穿着衬衣衬裤，也不觉得冷了，跳到炕下，打开那只小提箱，翻出那张临行时父亲写给我的嘱咐。

慎独！

看见这两个字，我的心里紧缩了一下，昏暗的灯光里，似乎隐现出父亲严峻的脸色。我最后看了一眼，就把那张书页大小的又细又薄的宣纸提起来，在灯火上点着了。

“折腾啥呀！还不睡。”同炕的王友民咕哝了一句。

“咒符！”我说，“咒符！”

他翻了个身，又呼呼睡去了。王友民早已离婚了，正在跟饰演大嫂的郑玉莲恋爱，早已谈妥了，只等两年期满，就去领结婚证。他万事如意，睡得好香。

我看看脚下，那张烧过的宣纸变成一团黑色的纸灰，在地上滚动，滚动，碎了。我的心里松懈了，束缚我的心的最后一道咒符粉碎了。

我没有心思入睡，就着煤油灯的灯火，我打开日记本，记下了这个终生难忘的日子。一个结过几年婚的人，爱情却刚刚苏醒……

我翻翻日记，查到了我寄出离婚申请的日子，正好十天了。从家里返回学校的路上，我就在八九个钟头的步行中思索着这件事，而终于下了决心了。回到学校的当天晚上，我就写下了离婚申诉，第二天就从山门镇的邮政代办所发出去，寄给县法院了。我已经得知，法院接到的此类民事案子堆积如山，最快也得两个月以后才能传审，那时候该是第二年春天了。

可怜的媳妇！我再也憋不住，心里哀叹着，要恨，你恨我爸去！要骂，你也该骂他！他不仅苦害了你，也苦害了我！他把你和我塞进一间屋子，就完事了！如果不解放，我和你就糊里糊涂过一辈子了！

解放了，兴得自由了，我的心箍不住了，我要是不享受自由的权利，就亏负了这个梦想不到的解放了！但愿你……也能找个可心的男人，俩人都好……

第二天，我们到史家坪去演出。演出结束后，我和田芳走到村后的小山坡前来了，这是我和她头一次有意的约会，而且是她约我来的。

我挨着她的肩膀坐下，搂住她的肩头。

她挣脱我的手："我给你……看样东西。"

她打开手电，从口袋里取出一沓折叠着的格子纸，写满密密麻麻的钢笔字。她只露出末尾一页的名字。我一看，是工工整整的"刘建国"三个字，心里一惊，忙问："这是什么？"

"他给我写的信。"田芳沉静地说，"这是第五次了！"

"你……怎么办？"我急忙问。

"你还用问吗？"她瞅我一眼，从口袋里掏出一匣火柴来，划着了。

刘建国的信在燃烧。

我的心也在燃烧。

我高兴得像狂了一样，抱住田芳。我能听见自己的心跳的声音，也听见了她的心跳的声音，我的手插进她的松软的头发，比丝绸还要

柔软的头发。她静静地伏在我的胸前，闭着眼睛，两只胳膊像铁箍一样搂着我的脖子，我才知道这个爱着我的人的手臂，这样有劲。

在这个县所辖属的广阔的平原上和深深的秦岭大山里，都留下我们速成二班演出队员的脚印。每一个演出点的村子里、平原上的大路边、山区的小溪旁，也都留下了我和田芳的亲吻和偎依。压抑得越久越重的心，一旦获得自由，就以加倍强烈的热情迸发出来。有几次，我吻过她的脖子上，留下了瘀血的痕，整得她给脖子上围上一条毛巾，遮掩过去，她却并不责怪我吻得太狠，照样把脸颊、脖颈和我偎贴在一起……

二十天寒假的巡回演出，太短暂了。春节也是在陌生乡村的演出中度过的，我也不觉得有什么遗憾。这是我一生中最愉快的时期。当然，你只有了解了我的后来的不幸，才会觉得这二十天时间，事实上是我一生六十年生活中活得真正像个人的二十天！

父与子

阴历四月，中午的太阳已经很有力量，我和同学们围蹲在食堂外的浓荫下吃饭，父亲来了。

他站在院子里的阳光下，四下里瞅着，我看见了，连忙跑上前。我要给他打饭，他坚决不要。我引他到宿舍里去歇息，喝水，他也不去。他要我跟他到山门镇上去。

我跟他走出校门，在山门镇的青石铺成的街道上走着，我发现他苍老了，大约刚交五十，鬓发全白了。从见面到进小镇的一家茶棚，他没有露出一丝笑颜。我的心里乱猜测着，出了什么事呢?

叫了一壶茶，他喝了一口，放下茶盅，也不看我，也不说话，直到一壶茶喝完，站起身又走。我问他要到哪里去，他说走走看吧！

走出街道，在小河边的一棵柳树下，父亲站住了脚，从肩上取下布褡裢，放在地上。我也在他旁边坐下来。

“我今日来，只问你一句话。”父亲说。

我没有话说，期待着。

“你要离婚？”父亲直截问。

“嗯。”我觉得没有必要隐瞒，同时又奇怪，法院还没有传票给我，父亲怎么知道了呢？

“不离行不行？”父亲冷静地问。

“爸，你听我说……”我想给他摊开思想。

“不，其他闲话可以不说。”父亲说，“我只要你说声‘行’或‘不行’。”

“不行。”我只好也直言相告。

“那好！”父亲伸手从口袋里摸出一把剃头刀，拉开锋利的刀刃，“你先收了我的尸首，办了白事，再去离婚，再去办红事！”说罢，就抬起了握着刀柄的手。

我大惊失色，一把抓住父亲捉刀的手，吓得魂飞魄散，连忙说：“爸，有话好说……”

他依然不动声色，冷声静气地问：“没有多余的话好说！你只说‘离’或‘不离’！”

“不……离……”我无所选择了。

“不离的话，你跟我到县法院去。”他说。

“做啥？”我问。

“撤回你的状子！”父亲说。

“我不离婚就算了，撤不撤没关系！”我说，“或者改日我写信去，销了案就完了。”

“不！”父亲说，“我要亲眼看着你把状子撤下来，交给我，我好存着。待我死的时候，好做蒙脸纸啊……”

父亲已经“哇”的一声哭了。这是我平生头一次看见父亲的哭。他哭了三声，突然收住，用手帕擦擦脸和眼，从地上背起褡裢，又恢复了素有的冷静，说：“走！”已经扯开步子走了。

如果近旁有一口水井，我可能会一扑跳下去！我的脑子里嗡嗡乱响，是绷紧的神经折裂的声音。我想到了田芳，我的心爱的人儿，我不能跳井，也不能一气之下撞死在身旁的柳树上，下来再说下一步吧！我硬着头皮，费了多大劲儿，才跨开了这屈辱的一步。

“咱们父子今日也许是最后一次见面。”父亲说，“我也不是小娃娃，我知道，今日撤回状子，明日你还会再寄，我今日给你把话说透彻，日后不管何年何月何日，一旦我在家接到法院的传票，就是我的丧期死日。我好坏是个懂点文墨的老朽，说这不是吓唬你！”

我的心沉到冰窖里去了。

他说，昨天晌午，县法院两位办案人员到家里调查时，他都要气疯了。等那俩干部一走，他给褡裢里悄悄装进一把剃头刀，就上路了。走了半天一夜，找到学校，本没打算再回去。他说我的离婚案件，把徐家几辈人积下的阴德全给羞辱了，他再没脸在杨徐村见人了！

我信父亲的话不是吓我，他是注重面子的，讲究礼义的，我提出的离婚的事，对他无异于晴天霹雳。我说服不了他，他也觉得无法再说转我，于是就只有拿出剃头刀子来。

我和父亲都搞错了，法院里欢迎自行销案，却不发还诉状，要存档的。父亲看着人家注销了案子，才咂着舌头走出门，他想死时做蒙脸的纸是得不到了。

回到学校，已经放晚学了。

田芳一眼就看出我的神色不好。晚饭后，我和她顺着小河弯曲的河岸溜达。夕阳涂金，河岸边齐膝高的麦苗，绿茸茸的稻秧，叶儿上闪着晚霞的金光。散落在麦田里的桃树，毛桃儿结得蒜瓣儿似的，招人喜欢，我的心里却泛不起诗意来。

“老人来，出了什么事呀？”她着急了，“你说呀！我也好帮你出个主意。”

我说不出口。

“你觉得不好说的事，就不要说了。”她很贤明地说，“我只是劝你一句，无论什么事，都想得开一点，不要愁眉愁眼的。新社会了，还

能有多大的事呢？”

她显然没有料到我的困难的严重性。这种局面，迟早要让她知道，再为难也不能不说清楚。我终于向她叙说了今天父亲来的举动。

“哈呀！这么点事，就压得你抬不起头来了？”她撇撇嘴笑笑，嘴角荡出一缕不在乎的神气说，“老封建家长都是这一套办法！我要跟大张村解除婚约，我爸把铡刀提起来，先往我脖子上砍，我跑了。他又砍自个，我妈一拉，他就扔下了，谁也没砍！全是这一套……”

“我的父亲，跟一般庄稼人不一样。”我向她说明我父亲的心性和脾气，“那可不是吓人的。”

“动真格的也甭怕！”田芳说，“慢慢来。没有斗争，就没有自由。我来上学时，俺爸就是挡道。他料定我一上学，订下的婚事就毕咧。我跑到我姑家，要了一床被子，就上学来了。现在，我上学了，和大张村的包办婚姻也解决了。要是我无论在哪个节口上一退让，我就被大张村圈住了。”

“我爸的思想，特顽固！”我说，“我没见过他那样顽固的人。”

“慢慢来。”田芳说，“再顽固的人，经得多了，见得广了，会慢慢开窍的。”

“我想毕业以后，咱们就结婚。”我说，“我是一天……也离不得你……”

“你给我念过一句古诗，意思说只要俩人心心相印，在不在一块，没啥关系。”她盯着我的眼睛说，“那句诗怎么说？”

“‘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我说了一遍，似乎觉得憋闷的心里透出一点松活的缝隙来，“我……像一只关在笼子里的鸟儿，好不容易飞到蓝天上去了，哪怕被雷电击死在空中，也不会自己重新钻进笼子去！”

“那你愁什么呢？”

“我只怕离开你，毕业后……”

“毕业了，分配了，都在本县，见面有多难呢？”

“我想天天见到你，永不分离！”

“你又来了……又岂在朝朝暮暮！”

……

父亲接连写来三封信，要我回家，而且要我至少每个月回一次家。我不能忍受了，我找到舅家，向我舅舅说明了原委，我已经向他作出了让步，如果他对我逼得太紧，我也可能拿起剃头刀子的；他的下一封逼我的信，可能就是我的蒙脸纸；他把我逼死了，那个媳妇也就不会在徐家门楼待下去了；把我逼死了，他可能在杨徐村更不好活人了！

舅舅是个胆小人，怕真的酿出人命来，劝了我，又立即跑到杨徐村去找我爸我妈，把我的话传过去……果然有效，父亲再没有来信催逼我回家。

僵局就这样保持着，谁也不退让，也不进攻。任何一方的进攻或退让都可能打破僵局，但谁也没有这样的表示。我相信我会撑到底

的，甚至用年龄的优势来等待对方——父亲。一直到我在师范学校修业期满，甚至在我工作了两年的时间，这种僵局一直维持不动。

毕业离校的前一晚，我和田芳难分难离。我们坐在山门镇旁边的小河边的一棵大柳树下，有多少话要说呀，临了却什么也不想说，啰唆的嘱咐显得毫无必要，彼此完全已经心知了。一切最动人的语言都显得那么不精确，也缺乏力量，都不足以确切地表述我的依恋之情，一切依恋之情都融化在无声的信任之中了。初恋时的心的探询、如山瀑一样迸发的热烈的倾慕的话、颤抖着的感情的波浪，全都归于一种生死相依的明澈的无言状态里。她依偎着我，我偎依着她，亲吻是深沉而强烈的，却不像初恋时那么疯狂和如痴如醉，心的交流要比语言的交流准确得多。

我们挽着手，在河边的沙滩上漫无目的地走着；在沙滩的草地上坐下来，仰望星空，倾听河水在夜间发出的清脆的响声；感受大地在夜幕笼罩下的均匀迷人的呼吸……直到黎明的晨曦照亮秦岭群峰当中最高的那座峰巅的时候，我把一条精心写就的纸签送给她，那上面写着她喜欢的一句古词：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她送给我的，也是那一句古词，而且是用绿色的丝线绣扎在一块白布上的。那块白布中间，两颗重叠在一起的心的图饰，用的是红色的丝线扎成的。

有这样一件信物揣在我的怀里，父亲怎么能撑持得过我呢?

我没有料到，生活急骤发展的浪潮，一下子把我冲得丧魂落魄，完全隐入灭顶之灾……父亲竟然胜利了！

惑惶

我成了“右派”。

详细告诉你我怎么当了“右派”的细枝末梢意思不大。不过，于今想起来我只觉得我当时太傻了！

仅仅只是因为一句话，我说了校长一句“好大喜功”的话，却付出了二十多年的代价——生命的代价呀！

我真是太傻了！那年暑假，县里把小学教师集中在县一中里“鸣放”时，当时报纸上已经对“右派”进行反击了，我是抱着反击“右派”的决心去参战的，结果自己被弄成了“右派”。

我们学校新提拔的校长，就是我在师范进修时的同班同学刘建国，我俩一同分配到县西的牛王砭小学，他在速成二班当班长时，已经是学校里为数不多的几个学生党员之一。毕业后工作了一年就转正为正式党员了，第二年就提拔为牛王砭小学的校长。他鼓励我要“大鸣大放”，要起带头作用。我很信任他，不仅因为他是我的老同学，重要的是他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我经他介绍，已经获得通过，正在预备期经受考验，他的话我是完全信赖不疑的。我除了猛烈地反击储安平对新社会的污蔑之外，对改进我们学校的工作也鸣放了一些意见，说校长刘建国有些好大喜功的话，就是那些意见中最尖锐的一条，祸就从此惹下了。

我现在也搞不清这是不是刘建国对我设下的圈套？他当时鼓励我“鸣放”是十分真诚的。说我们不仅是老同学，而且是在同一个岗位上战斗，应该把珍贵的礼物——意见，直言不讳地讲出来，帮助他改进牛王砭小学的领导工作，这不仅是老同学的关系，而且是对我的重要考验。我信下了。我和他在速成二班进修时，同学们对他在政治上的

坚定、工作上的积极表现，没有不佩服的，只是有点好大喜功，这影响了他在同学中的威信。到牛王砭小学工作以后，尤其是在他当了校长以后的半年中，教师们私下的议论就很明显了，主要还是这一点毛病。我曾经不止一次在和他的闲聊中给他提示过，他也不反感。可是，当我在“鸣放”大会上正式当作一条意见讲出来以后，居然变成了“攻击党的领导”！

刘建国找我谈话，说他冒着风险替我辩解，领导小组才将我定为“中右”，要是搁在其他人身上，有十个我就会定成十个“极右”了。我没有被发落到农场去劳改，而是仍回原单位接受监督改造。

我重新回到牛王砭小学的时候，这所我十分喜欢的小学对我来说变得陌生了。我的预备党员被取消了。我也不能再任高年级毕业班的班主任，而是代一些“地理”“自然常识”之类的副课。没有多久，任何课也不能代了，让我打铃，烧开水，扫院子，完全变成工友了。

世界上的许多事，都是第一次留给人的印象最深刻，三五次以至数年累月以后，就习以为常了。我第一次牵着麻绳撞击吊在学校院中那棵槐树上的铜铃的时候，看着一个个男女教师走出办公室，端着教案和粉笔盒走向教室的时候，我想应该立即去自杀！当工友还有一件重要职责，每天给校长和教务主任送三次开水，教员们的开水是自己到开水房里去打。我第一次给校长刘建国送开水的时候，提着水壶，站在门外，又想到了自杀！我硬着头皮推开门，他从办公桌上拧过头来，也有点不好意思，慌忙站起，接住我的水壶，说：“我的水……你甭送了！”我的心里感到一种被人了解的委屈，真想痛哭一场。当我再送去开水的时候，我也自然了，他也自然了，随后就一切都习以为常了，甚至我推开门，放下水壶，直到走出门，他连头都不抬起来。

小学校设备简陋，没有餐厅。我打过吃饭的铃声，教员们就到小灶房里买了饭，围成一个圆圈，蹲在院子里吃饭。这个时候，是学校里教师们之间最活跃的时刻，一边吃一边聊，尽是各班学生中的洋相和趣闻。我没有勇气再和大家蹲到一起去度过这轻松愉快的时刻，我总是等那些熟悉的说笑的声音消失以后，才拉开门，端上碗，到小灶房里去吃最后一份饭，好在炊事员杨师傅总不会忘记我。当我端着已经不那么热乎的饭菜走回自己的住屋的时候，我又想到了应该自杀！

我能得到的唯一安慰，是田芳留给我的那件信物。我晚上打过熄灯铃之后，躺在我的小住房里，趴在枕头上，就摸出那个绣扎着那句动人心魄的古词的白布，眼泪就涌流出来，滴在那两颗重叠着偎依着的心的图案上。

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是在县一中的“鸣放”会期间，那是我们毕业以后的又一次难得相聚的机会。后来，当我被宣布为“中右”时，她的惊恐并不在我之下。那天晚上，我被监护着，无法与她相会。我想立即向她诉述这一切变化的由来，心情十分迫切，却不能单独自由来去了。直到“鸣放”会结束那天，她来到我们小组住宿的地方，帮助我捆被子，却不说话，我看见一滴一滴的泪水滴在捆扎被子的白色线绳上。捆完之后，我没有勇气看她一眼，低着头，懊丧地等待她开口。她没有告别，就走了，当我抬起头来，只看见她闪出门口时的一个背影。

当我回到学校，打开被子，发现有一张小纸条：

我真想打你……你太叫人想不到了！

我永远等你！

我真希望她抽打我，不是用手，而是用皮绳或者木棍，狠狠地抽打我，我在这亲人的抽打中才能得到一点负罪的解脱。

我天不明就爬起来扫地，而且尽量不扫出声响，以免惊醒正在酣睡的教师。我一天不是三次而是不计次数地给主任和校长打水，接着给所有教师都送水到房间。我打扫了院子，又自动去打扫厕所，教员厕所和学生厕所。我捡来好多烂砖头，把小灶房和走道之间的泥路铺接起来，使教师们下雨天来打饭时不踩泥水。我烧完开水，就捡尚未烧尽的煤渣儿，节约开支。我帮炊事员杨师傅洗菜、刷锅。总之，从天不明爬起来到打过熄灯就寝的铃声，我不使自己有一刻钟的闲歇时间。我想向全校一切人，校长、教导主任、男女教员、学生以及炊事员，用我的不懈的努力，证明我改造的诚心。我的老同学刘校长给我谈过，要认真改造，争取重新做人。我要用诚恳的行为，赎回我的原罪。我渴望重新做一个人的心情越强烈，我表现出来的改造的心意就越诚恳。我甚至觉得这个六七百名师生的学校里的杂务太少了，不够我表现。

过了一年，没有人找我谈一谈我改造得怎样了，我有点急，又不敢流露出来。这天，刘建国把我叫到他的房里，对我说：

“你这一年的表现不错，同志们反映好。”

我的心怦怦直跳，做人的出头之日到来了吗？我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向他做出一个感激涕零的笑，却说不出话来。

“你的行动表现了你的决心。”刘建国说，“可你心里怎么想的呢？你应该向党表示一下。”

我的心又慌乱了，行动和内心难道不一致吗？我忙说：“什么时候表决心呢？”

我知道，这个时候，社会上已掀起一个“向党交红心”的运动，学校里早已刷上大红标语了。教师们每天下午开会，向党交心，我没有资格参加会议，只是埋头杂务。刘建国校长让我向党交心，我终于有了一个向全体教师剖白自己的机会。我一夜没有睡好觉，把那个发言稿看了一遍又一遍。我一定要把自己的错误思想深刻地自我批判，争取早日拿起象征着人的标志的教案本来。

第二天下午，当我把自己狠狠地批了一通，狠得我痛哭起来的时候，我觉得我的确轻松了一下。紧接着是大家的评议，第一个人的发言之后，我就没有眼泪可流了，随之而起的争先恐后的发言，一个比一个激烈。没有一个人提及我做了许多不属于我做的事，没有一个人说我表现过哪怕是一分的改造的诚意，而是对我说过的那句反党言论——好大喜功的话，重新进行批判，甚至比“鸣放”会上定我“中右”时的气氛还要严厉，火力还要猛烈。有人在分析我的反动言论的根源时，说我本身就是一个不纯洁分子，生活作风有问题……

我彻底垮台了。我回到自己的小房子里，一头就栽倒了。我又犯了一个错误，把自己的罪行看得太轻松了，尤其是把时间的概念完全弄错了。想重新做人，远得看不到头哩！我浑身没有一丝儿劲了。人的绝望，就产生于这种迷茫之中。我坚决自杀！

打过熄灯铃儿，我插了门，第一件事就是给田芳写信。我拔开毛笔帽儿，在红格白纸上写下一个“芳”字的时候，眼泪就糊住了眼睛。我听见敲门声，慌忙收拾了纸笔，拉开门扣儿，门外站着刘建国校长。

这是他第一次走进我的“工友室”，坐在一把椅子上，很关切地问：“思想压力很大吧？”

我抬起头，看见他很诚恳的关切人的脸色，不过，我觉得实际上已经没有压力了。当我一心想通过无休止的劳作来争得重新做人的权利的时候，我的心头压力很沉重；当我从“交红心”会上走回小房子，觉得永远也难有出头之日的时候，就绝望了；绝望了，反倒没有压力了。我苦笑一下，垂下头。

“同志们的分析，不是完全合乎实际。”刘建国说，“关键是你应该有一个正确态度，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我没有抬起头，又苦笑一下，我该怎样做到“无则加勉”这样纯正的心理修养的境界呢？我现在希望他走开，不要跟我谈话。我要处理我急切处理的事，给田芳写信。我应酬说：“我明白。”

“明白了就好，你明天继续‘向党交红心’。”他说。

“还……”我猛然仰起头，还没完呀？我只说这就完了，明天还要……我说，“我今天讲了我心里话，明天还讲什么呢？我把自己心里的话都交出来了……”

“同志们不满意啊！意见很大咧！”他用一种假借的口吻说，“比如你的婚姻问题，好多人议论纷纷，你——”

“这与我的罪有啥相干呢？”我打断他的话，“我是包办婚姻，婚姻法上规定过的不合理婚姻。我在师范进修时，你完全了解情况，你当时也支持我离婚……”

“情况在不断地发展变化嘛！”刘建国说，“同志们现在认为你不仅政治上反动，生活作风也有问题，看来任何事情都不是孤立的。生活作风的腐化，必然导致政治上的……你应该在明天‘交红心’时，深刻地挖一挖思想根子……”

“怎么能说成生活作风腐化呢？”我说，“田芳，我和她的关系好，可俺们没有……越轨的行为。再说，田芳也是贫农的女儿，她怎么会将我腐化了！我搞不清了。”

“你不了解她。”刘建国说，“这个人，有很多优点，也比较轻浮。她向我……我拒绝了！后来，在她入团时，我到她村里去了解情况，党支部介绍说，她爸旧社会在西安混荡，收拾下一个没来历的女人，有人说是……窑子！”

我的天啊！田芳的母亲有人说是窑子，田芳被刘建国看成了轻浮的女子，于是就将我腐化成反党的右派了！难道就是要我明天在“交红心”会上这样去揭根子吗？我忽然记起，田芳当着我的面，焚烧刘建国的第五封求爱信的情景。谁更可靠呢？

刘建国走了以后，我再次插上门，掀开墨盒，拿起毛笔。坚决割断和田芳的关系，越早越快越好。我无出头之日的指望，田芳不能真的等我一辈子。我知道，任何劝解她的道理都无济于事，只会招来她对我的更深的依恋。必须找到最狠毒的恶言秽语，骂她一个狗血喷头，才能遏止她朝我跳动的心。我找不出这样一个词来，我想给她安一个不好的毛病也找不到。我忽然想到刘建国刚才的话，只有他才能想到的话，此刻帮了我的忙。我咬着牙，大约把嘴唇都咬破了，血滴在信纸上，却没有感觉到疼痛，信纸上留下一行罪恶的墨迹：

“你妈是个窑姐，你把资产阶级思想传给我，将我腐化了……”

第二天，在又一次“交红心”会上，我只是机械地重复着一句话：“我没有红心。我是颗黑心，反党的狼心狗肺，请大家批判我……”我成了一截没有知觉的木桩，任凭四方的污言秽语朝我脸上泼来，而于心不惊了。

这天晚上，我用一条捆书的细绳合了几股，使它可以负起我的重量，挂上了房梁，在我把头伸进去的时候，心里竟是安详的。当田芳接到我的信时，也许同时就听到了我的死讯，她会憎恨我；憎恨我，比恋着我好；于她也好。

我没有死。当我恢复知觉时，才知道把我从另一个世界拉回这个世界的人，竟然又是刘建国。他是一个细心的人、成熟的人，早已看出我“神色反常”，悄悄地防着我了。我不想感激这位救命恩人，倒憎恶他了。

死讯惊动了几十里外的父亲，他惊慌失措地赶到牛王砭小学里来了，一来，先抽了我两个耳光……

这下该信我的话了

父亲推开门，在门口站住了。

我正坐在桌前，抬起头，看见父亲苍白的鬓发，惊急气恨的眼色，就慌忙站起来，去找椅子。我的房子，变成学校的小库房了。办公桌上堆满一摞摞教案本和剩下的课本，垒着粉笔盒子，墙角堆着一捆稻黍笤帚和葛藤编成的簸箕，地上放着两只木箱，装着篮球、杠铃、跳绳一类体育用具，那把椅子上，也搁着前几天刚购置回来的羽

毛球拍和跳棋盒儿。整个小房子里，只有我栖身的一块窄窄的床和一把坏腿椅子闲着。我想把那稍好点的椅子腾下来，刚走出一步，父亲的巴掌就抽到我的脸上了——

“啪！啪！”连续两下。

父亲第三次举起巴掌的时候，被陪着他走进门来的刘建国校长拉住了。他按着他的肩膀，使盛怒的父亲在那把坏腿儿椅子上坐下。他说了一席安慰父亲也安慰我的话，就走出门去了。

我在凌乱得像个狗窝的床铺边坐着，垂下头，挨过抽打的脸颊烧辣辣的。我没有料到父亲会以耳光和我见面，却也没有惊慌失措。我第一眼看见他从门口走进来，真慌乱得不知如何是好，该怎么向他说明白我的处境，这一切的由来？他的两巴掌打过之后，我的心反倒安静了，不必再向他做任何解释了。我的父亲，在我的记忆中，很少对我表示过亲昵，微笑都稀少得像旱季的雨星儿，更没有通常家庭里父子间的嘻嘻哈哈了。然而他也没有动过拳脚，没有像一般粗庄稼汉和儿女们亲近时没大没小，生气时又动手动脚，骂出一串串秽言污语。他不苟言笑，也不打骂，常是冷着脸教给我怎么说话和待人。今天，他抽我耳光了，两下。

我坐着，低垂着脑袋，我成了右派，成了打杂的工友，我刚刚被旁人从房梁上的绳套里救下来……我开不得口。父亲也没有开口。我能听见他很粗的喘气声。

父亲端坐在椅子上，没有问我为啥上吊，也没有劝解，用压抑着的口气说：“你把我写给你的那两字拿出来。”

慎独！我到师范学校去进修的前一晚，父亲临行时写下的嘱言，我后来当作可笑的废物焚烧了。现在想到这个嘱言，我的心猛然一震，更加抬不起头来，就支吾说：“毕业时……弄丢了……”

“丢了！哼！丢了！”父亲悻悻地自问自答，“这下你该明白那两字的意思了！”

我早就明白那两字的意思，要谨慎，尤其是单身独处时，一切都要慎重，时时刻刻都要谨慎从事，包括言，也包括行。我的名字是父亲给起的，慎行就是这意思；我弟弟的名字也是父亲给起的，叫慎言，还是这意思。我在进入师范学校进修以后，父亲自幼给我心理上设起的防护堤，被新的生活的浪潮一截一截冲垮了。我既不慎言，也不慎行了。老师和同学们都说我从封建桎梏下脱胎成一个活泼泼的新人了。现在，父亲以毫不疑惑的语气说的话，证明了他的正确和我的失败。叫我想，他此刻有更多的话可以说了。譬如说，如果在说话时慎重地考虑一番，什么话该说，什么话不该说，那么今天就不会是这样的局面了。如果在决定给新任的刘校长提意见之前，慎重地考虑一下这种行动的不好的后果，那么，今天也就不会落入这种尴尬的局面。如果……那么……父亲完全可以以胜利者的姿态教训我：如果把我的话在心里稍微当一点子事儿，那么也就不会自寻苦吃了。我想，父亲一定想这样说，也完全可以这样说，可他没有这样说，只是问他写下的“慎独”的嘱言，让我自己去想想。

“病从口入，祸从口出。”父亲沉吟着，“谁都明白这道理，谁也难身体力行。图得一时馋嘴而染病，图得一时畅快而招祸……”

我心里痛苦极了，自从遭祸以来，我耳朵里灌进的全是严厉的批判反驳的正言义辞，没有一个人解析我的提意见的真实动机。现在，

父亲用他的处世哲学来替我刨根溯源时，我仍然不能服气，心里有一个可怜的声音在叫着“冤枉”。我对父亲说：“‘鸣放’会上，县长、教育局长，都到会上来做报告，动员我们要‘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是每个党员和干部的革命责任心强不强的大问题’。我是人民教员，革命干部，又是预备党员，怎能不听党的话呢？我……”我又说不清了。

“我一辈子只求自己善处独身，不问人过。”父亲说，“我管不了别人，哪怕男盗女娼，我也无力管约。我只求自己做一个正人君子……”

“党章上批评的就是这样的思想。”我不能同意父亲的话，抱屈地说，“党要求每个党员要开展积极的思想斗争，不能只是洁身自好。我是预备党员，我听党的话……”

“这个话你该问自己，怎么回事？”父亲并不觉得我有什么委屈，反而直挖我的心底，“我不是预备党员，不懂党的规矩；你是，你也懂，你说为啥？”

我说不清为啥。我虔诚地拥护“大鸣大放”和“反右派斗争”，却没有想到自己会是一个“右派”。我自己成了“右派”，也没有丝毫的异议怀疑反右斗争的偏颇。这样，我处于痛苦之中。即使处于痛苦之中，也不能重新接受早已听得心烦耳腻的父亲的处世哲学，那已经从我心里被荡除出去的陈腐发霉的东西了。但是，不管造成我的这种结局和处境的原因如何解释，而结论却正好证明了父亲的正确。

“我也不想再说这事了，说也迟了，无用了，于事无补了。”父亲此刻平静下来，一种世故的平静，“我想过了，君子不吃后悔药。你也

甭太难过。不能做先生，那就当农夫。回乡务农，自食其力。‘人到无求品自高’哇！”

我苦笑一下，告诉他，新社会的人民教师，是有组织性儿的，不像旧社会做私塾先生，愿意受聘即去，不愿受聘就不干，一切要听从教育局的调拨安排。

“那么，现在安排你做什么事？”

“打铃，扫地……”

“打铃扫地就打铃扫地，总没判你死刑吧？”父亲倒显得不大在乎，“你愿意打铃扫地就在学校打铃扫地，不愿意打铃扫地了回家去务农。你要再想死，先给我招呼一声，让我跟你娘先死，你把俩老人埋葬了，再死不迟。让我跟你娘给你抬棺下葬，你良心上能过得去？”

我的心里阵阵发酸，终于忍不住，哭出声来。我们父子间平时很少这类骨肉情长的交谈。我看见了他的白发，他的苍老的脸，虽然像过去一样严峻而死板，毕竟因为垂暮的神色令我醒悟出自己的家庭责任了。我真想放声痛哭一场，无遮无掩，痛痛快快地放开喉咙大哭一场。

“我没有力气来搬你的尸首了。”父亲淌着泪，却说着这样凄惨绝情的话，“我也不会让杨徐村的乡亲来搬尸。你日后怎样活人，自己想想吧！我的话你不听，‘子大不由父’。我也管不上了！”

他要走，我也没有实心挽留。我在学校的这种低下的处境，他也没有脸面再待下去。我送他走上那条爬上东原的官路时，看着他拄着一根粗劣的手杖——实际是一根树枝——缓缓走去的步态，我可怜起

他来了，狠狠地捶打自己的胸脯。我落到一种怎样的地步？学校里把我当作不忠诚分子，父亲也把我当作叛逆者，我算一个什么东西呢？

晚饭以后，校园里呈现出一种松懈下来的恬静的气氛，教师们有的提着水壶，懒洋洋地迈着步子到水房里去打水，或泡茶喝，或掺成温水擦身，再不像上课时那匆匆急急的样子了。有的教师在槐树底下下象棋，有的在井台上洗衣服，谁的舒悦的笛声在一排排教室之间缭绕。我关好开水炉，就提上铁锨和扫帚，去打扫厕所，这是清除师生们排泄物的最佳时间。

“徐慎行，你出来！”

天哪！田芳在喊我！我手中正在便池里掏挖的铁锨掉在地上，眼前一黑，我差点跌到屎尿池子里去了。我跌靠在墙上，那炸雷一样轰击我耳膜的余音还在回荡，心儿慌乱不止，我几乎被震昏了。

“徐慎行，你出来——”

我无处躲，又无处逃，从再次响起的声音判断，她就堵在男厕所的门口。我自发出那封臭骂她的信以后，就没有再想过还会和她相见，偶然的相遇也许不能排除，有意找我的事，大大出乎我的预料，我捂着良心和为人的道德，向她脸上泼去了多么脏的东西！我无脸见她，也不想再作解释。我要她永远恨我，甚至鄙视我，都比依恋我要好……我惶惶然从厕所门里走出来，做好了挨耳光的精神准备。

我一走出厕所门，就看见一双愤怒的火燃烧得痛苦不堪的眼睛，我立即低下头，再不敢看了。她在看见我的最初一瞬，身子微微颤抖了一下。不容我多想，我就听见一声吓人的呵斥：

“我要批判你！到这边来……”

她的非常举动使我忐忑不安，她要批判我？我当了“右派”也有一段时间了，她现在才想起来要批判我？我机械地走到那个小花坛前头，随她站住了。这是学校里最显眼的地方，房檐下的墙壁上挂着一只大钟，下面写着四个仿宋红字：按时到校。有几个教师站在远处看着。

“徐慎行，你身为人民教师，预备党员，恶毒反党，攻击社会主义，我坚决要批判你……”

她站在那里，离我有两米远的地方，一本正经地对我进行面对面的批判。我垂下手，低着头，不做任何表示。我听见从两边纷至沓来的脚步声，好多教师围过来看热闹了。

“你想自绝于人民，愚蠢透顶！党和人民花了多大代价培养了你，你不知向人民向党报答恩情，反而反党、自杀，你的良心何在？”

我的心在颤抖，头上冒出汗来，这些司空听惯的批判语言，今天由她亲口说出来，我痛苦极了，惭愧极了！周围已经围了许多教师，凡是闻听消息的人，都来看热闹了。我不知道校长刘建国在不在场，我没有抬头的勇气。

“你不服气吗？说你反党，你不服气，用自杀来威胁别人，谁吃你那一套！你要明白，党不是抽象的存在，在学校，代表党的就是校长，你恶毒攻击校长，就是反党……”

“田芳，你啥时间来的？”我听见刘建国校长的声音，稍抬一下头，就看见他走到田芳跟前，一副老同学间热诚的口气，“你胡来啥

哩！走，快到我房里坐……”

“我是专门来批判他的坏思想的。”田芳说，“我和你是老同学，和他也是老同学。他和你分配在牛王砭小学，不协助你好好工作，反而攻击党！我看哪，他这个家伙纯粹是想往上爬！借着整党之机，攻击你，自己再爬得高些……”

我的天哪！我想爬高吗？我想借着整风弄倒别人自己往上爬吗？我明白我有许多毛病，却还没有如此恶劣！

“哦！你的心情可以理解……”刘建国说。

“你多虚伪啊！”田芳指着我说，不听刘建国的劝解，而且气更足了，“我们同学两年，我怎么当时就没有发觉呢？你假装积极，实际是想往上爬，不惜攻击同志和领导，踏着别人爬上去，你多虚伪啊！你……速成二班出了你这个右派伪君子，是全班同学的耻辱……”

“行啦行啦！田芳，”我听见刘建国的声音，似乎有点尴尬，不自然，“走吧走吧！到我房里坐坐。”

“我要赶回学校去，没时间坐了。”田芳说，“我以速成二班同学的名义警告你，老老实实交代，老老实实改造，老老实实做人！历史从来不包庇虚伪的人……”

她走了。我听见她的脚步声朝门口走去，才敢抬起头来，她又回过头，给刘建国说：“我一有空儿，就来批判他！”说罢，昂起头，走出学校大门去了。

我一回头，看见刘建国有点发黄的脸色，眼里罩着一层憎恨的气色，气呼呼地走了。那些围观的教师们，有的莫名其妙，有的在神秘

地交头接耳，不光是在嘲笑我吧?

我又走回男厕所，抓过锨把儿，心里豁然开朗，似乎此刻才完全醒悟，她是在旁敲侧击，痛骂的并不是我。骂我批判我，用不上伪君子这个名词。对这个名词更敏感的人，应该是他——刘建国校长。我竟然有一种从未有过的痛快，好像我骂了我想骂的人一样解气、痛快。我的胳膊上陡然涨起力气来，戳得那装着屎尿的便池“哐啷哐啷”响……

大约过了十天，她又来了，故伎重演。这次她来时，我正在房子里躺着。她在门外叫我的名字，大喊大叫要我“接受批判”。我慌忙跑出来，又站到挂钟下的小花园旁边。她又把我狠狠地批判一番，痛骂一番，挖苦讽刺，比第一次更尖酸了。我低着头，听着她的连挖带损的话，心里舒服极了。

刘建国这回也不客气了:“你不能随便来批判人呀！要批也得通过组织……”

“我一看见这个虚伪的家伙，眼都黑了！连组织手续也忘了……对不起！”

她走了，没有去刘建国的房子办组织手续，也没有进我的房子，径自走了。

她又来了两次，几乎所有教师都知道她举动中的真实含义，刘建国也更是恼恨。这样下去，又怎么办呢? 她第五次来的时候，我在房子里听见她叫我的声音，便从后窗跳出去，逃走了。

她再没有来。

自觉进入

我收到田芳一封信。她只字不提她几次赶到牛王砭小学来批判我的事，既不解释这种举动的真实动机，也不询问后来产生的效果，纯粹是对于我的那封恶毒地骂她的信的答复。

她在信中说，如果不是信的末尾附着我的名字，她会百分之百地判断成刘建国写的呢！在她拒绝了刘建国的求爱信以后，刘建国就说过一句类似的话。狐狸吃不着葡萄，就说葡萄是酸的，甚至说葡萄的祖宗更酸。她不计较我，是因为她认为那恶毒的信并非我的真心……

我实在忍受不了这种感情的折磨。我应该立即奔到她的面前，跪下，说明我的真心，让她抽我，打我。我抓着信纸，贴在脸上，像贴着她的手，饮泣不止。我流够了眼泪，冷静一点之后，我就给她写回信了。

我写道，我仍然坚持前信的看法，解释也没用。而且宣布，从今往后，我再也不写回信，不看来信，接到即付之一炬；我再不和她见面，一切都到此为止……

不要骂我心硬吧！我成了什么人？简直不是人了呀！我怎么能牵连着她跟着我受苦？只有用最冷酷的斧头砍断俩人的纽带，除此无法使她和我的心分开。我只能这样做。

她又来过几封信，我咬着牙扔进烧水的炉膛里，连拆也不拆开。她后来又找我两次，我仍是从后窗逃避了……我相信我的举动是为着她好。

她到牛王砭小学来批判我的行动，完全撕开了我和刘建国之间的那一层老同学的关系。即使我当了“右派”，刘建国表面上仍然是关心我的，他说，要不是他关照，我不会定为“中右”，早该定成“右派”，发落到农场去劳改了。他说，他并不在意我当众说他“好大喜功”的话，只是我的话说得不是时候，在右派猖狂向党进攻的时候，我的话正投合了右派的需要，性质上就变成右派反党大合唱的一个音符了，并不是对他刘建国本人的威信有何伤害……我最初相信这些话，也相信刘建国，即使我当了右派，我也相信他说的主要是在非常的背景下说了不合适的话。现在，自从田芳来过几次以后，刘建国再也不对我说什么了，他冷着面孔在院子里喊：“怎么搞的？院子脏成这样？”那无疑是在大庭广众中谴责我没有尽到扫地的义务。

他对我给他每天送水再也不觉得不好意思，甚至连头也不从报纸上抬起来。

每月一次的改造汇报，他都亲自主持，在全体教师面前，我把自己骂一通，让教师们再批判。尽管我觉得那些污水脏物是自己吐到自个脸上的，教师中有几位总是还嫌我吐得少。刘建国过去还要肯定我一点进步，越到后来，反倒一丁点儿也不肯定了，总是强调我思想深处的东西尚没有触动。我已经从记不清多少次的改造检查中得出一个结论，真诚的检讨和应付差事的检讨得到的实际效果是一样的。你真诚地批判自己，他说你没有“触动思想根子”；你应付差事地乱骂自己一通，他照样说你没有“触动思想深处的肮脏东西”。我索性不再伤脑筋了，居然也能做到面对众人检讨时“脸不改色心不跳”了。

我烧水，打铃，扫地，打扫厕所，替炊事员杨师傅烧火，择菜，洗锅刷碗。我与任何人都不主动说话，而当别人问我一句话时，我竟然感到一种荣幸，似乎我的身价也提高了。久而久之，我完全接受了

“右派”的既成事实，自己也没有一丝信心把自己当人看了。过去，有的学生骂我一声“右派”，我心里忐忑一下，现在已经于心不惊了，甚至莫名其妙地对喊着“右派”的学生笑一笑，讨好似的笑一笑。

和我接触得最多的是炊事员杨师傅。本来，帮他添煤看火，洗锅刷碗，是我为了表示改造的诚意而主动承担的额外的事，时日一长，他倒把我当成半个炊事员了。活儿稍一紧，他就叫我，甚至骂骂咧咧地在院子里喊：“徐慎行，你狗日的钻到老鼠窟窿去了吗？火灭扅咧！”或者是：“徐右派，没水咧！你不绞水，挠扅去了吗？”我一听见他的喊声，就去烧火，就去井台上绞水。我也不恼，也不说明我正在忙着其他活儿，好像我真躲到老鼠洞里偷闲，或者是在做下流的事——挠扅去了。

他也有对我好的时候，那往往是他受了校长的批评的时候，就会对我十分诚恳，把两倍于定量的饭菜塞到我面前，赌气地说：“吃！不吃白不吃！你不吃，指望刘建国那个杂种说你的好话吗？妄想！甭那么不顾死活地干！你指望刘建国给你说好话，摘帽子吗？妄想！那个杂种没有人的心肝！狼心狗肺！你怕他，我不怕他……”

他有时对我又十分恶劣，那往往是他受了刘校长表扬的时候，就会对我瞪起三棱子眼睛：“你狗日的一天磨磨蹭蹭的，不好好改造，你死到阴司也不是个好鬼！人家刘校长跟你是同班同学，瞧人家而今在啥位位上敬着？你而今在啥洞儿里蜷着？共产党是人民的大救星，你敢反党，真没看出，你后脑勺上长了一根反骨……”

然而更多的是他既没受到刘建国的批评也没受到表扬的时间，他就一边揉着面团，一边斜着眼儿，说着损我的话。他一个人做饭，许是太寂寞；教师们一般不屑于和他有过多的交往，没有共同的语言；他于是就把我当作开心的对象：“徐慎行，听说你的本事很大的咧！能写能画，吹拉弹唱，是个全才咧！听说你能倒背《论语》，学问深沉咧！你没事干了，挠挠屌去嘛！怎么就要长嘴长舌地提意见？这下倒好！放着人民教师的位位不能坐，跟我这号下苦人烧锅燎灶，侍候人家。本来该着我这号受苦人侍候你哩！”

他有时又显出很下流的样子：“你这家伙艳福不小哩！那个装模作样来批判你的女先生，长得多疼人哪！听说你跟她念书时，‘咕咚’在一搭？嗨！你实话说，你跟她×来没有！哈呵！甭脸红哇！只要摸她一把奶，死了也值了！”

我要是不能忍受而抽身走掉，他就会大喊大叫：“这贼驴日的右派又钻到哪达去了？不看看火都灭咧！真是顽固……”

我索性不说话。无论他骂，他损，我都权当是狗放屁。我最怯火的，是他到刘校长面前对我的揭发。刘校长经常通过他了解我的言行。祸从口出，我记下了这个千古名言。时日一长，我甚至能对着他骂我损我的脸孔傻傻地笑笑，讨好地笑笑。

我的妻子的变化更富于戏剧性。

我自那年暑假成了右派，就没有回家去过。我怕见父亲，怕见杨徐村的父老兄弟，尤其怕见我的妻子淑娥。我不知该怎么办，和田芳断绝了，我更愿意孤身独处。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最难处理的关系

是她。离婚吧，我正是政治上遭难的时候；回去与她凑合着过吧，我心里觉得自己太下贱了，连个人味儿也没有了。

寒假里，我没处去了，想在学校待着，刘建国安排了轮流护校的人员，居然没有我，更不容许我整个一个假期都待在学校了。他不放心我，怕我纵火或爆炸吧？我在寒冷的腊月里，回到了有点陌生的家乡杨徐村。

村子里的临着街巷的墙壁上，有用白灰刷写的大幅标语："社会主义好"，"保卫社会主义江山，反击右派进攻"。我几乎再不敢东张西望，低着头溜进了自己的门楼。

我踏进院子，听见小灶房里有"啪嗒啪嗒"的风箱声。我的妻子淑娥大约听见脚步响，从小灶房里探出头，看见我，站直了身子，问："你找谁？"

她装作不认识我了。我也不知该怎么对付这种局面，避开她的恶狠的眼光，径直往里走。

"噢！这是有名有望的徐老先生的好儿子呀！我这笨人笨眼，倒认不得了！"她在灶房门口拍打着手，拍打着膝盖，大嘘小叹，揶揄着说，"听说你干阔了，从左派升成右派了！真气魄呀！给徐家争下光了！"

我的心像是给扎了一锥子，疼得几乎窒息了。我走进自己的住房，瘫痪似的跌坐在椅子上，脑子里麻木了。

她又赶进房里来，手叉在腰里，站在门口，嘲弄地撇着厚厚的嘴唇："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你的白毛女呢？那个野婆娘呢？"

“你……”我的血一下子冲到脑顶，呼地站起，拳头捶在桌子上，“你再……胡说一句！”

“在我面前凶，算啥本事？”她根本不怕，反而挺挺腰，“有本事在学校里发凶去！”

我想到我在学校的屈辱，顿然软了，坐了下来。

“你的右派，也不是我给定的，在我跟前凶啥呀！”她得势了，“你压迫了我整十年，欺侮了我整十年，我低声下气跟你快十年了！够了！你而今落下个大右派，跑回老窝儿来了，要是不当右派，你还是钻在野窝儿不回来……”

“那……”我说，“你也用不着这样。你不愿意了，随你的便！”

“离婚！”她随口说，“我找个农民，他也不弹嫌我人丑没文化。我早受够了，离！”

“好，既然离婚，再甭说了。”我说，“明天去办手续，各走各的。”

“谁不离就不是娘养的。”她跳起来，更加不可抑制，“我现在就去社主任那儿开介绍信！”

她走出门去了。

屋子里很静。父母亲不知做啥去了，屋里没人，我一个人坐在屋子里，开始抱怨父亲，如果当初不是他用剃头刀威胁，何至于此！这个张淑娥，过去像个绵软的蛾子，总是怯怯地看我，从来也没有高声说过一句气话，开口总是叫我“先生”，像旧戏里的侍女一样低声下气

地服侍我。现在，她变成一只凶恶的黑蛾了！扑拉着翅膀，大喊大叫着要和我离婚，从门口沿着街巷喊过去了！我想，这下子，杨徐村人都知道我们的家丑了。

父亲和母亲走进院子，脸色惊恐，问了我和她闹仗的原因，哀叹一声，也不再说谁是谁非，只是母亲连连挥手："快去快去！把她拉回来。让她在街道里大喊大叫，打粪场上的人跟戏台下一样，真是丢尽人了……"

直到天黑，母亲也没能把她拉回来。她在粪场喊，说她坚决要离婚，随之又赶到社主任家，哭一阵子喊一阵子，说要是社主任不给她开离婚介绍信，她就不回家……

连续三天，她从早骂到晚，到社主任家要离婚介绍信。我的父亲是个好面皮的人，这下气得躺下了，茶饭不进。母亲跟前撵后，给儿媳妇说好话，劝解，急得都哭了，仍然不济事。俩老人惊叹：怎么也想不到腼腼腆腆的淑娥，一眨眼变成羞耻不顾的母老虎了。唉唉！

最后只得由我出面，去给社主任说话。我说了话，他才给她开了介绍信。

第二天一早，她洗脸梳头，催我到县法院去离婚。我心里冷冷地跟她上了路。

走进县城，走过一家饭馆，她说："给我买饭，我饿了！"

我忽然有点难受，可怜起她来了。她跟我结婚十年了，这是第一次进饭馆吃饭。我忽然觉得我过去对她太……我买好饭，炒了几个小饭馆里最好的菜，从窗口取出来，放到桌子上。她倒神气，右腿压着

左腿，二郎担山坐在桌旁，等着我端来菜又端来米饭，像是报复似的瞅着我：你来服侍一回我吧！

“给我取盐来！”她支使我。

我从另一张桌子上取来盐碟儿，给她。

吃罢饭，她率先走出去，我在后面跟着。走到县百货公司跟前，她走进去了，站在柜台前，对售货员说：“取一双雨鞋。”她试试大小，然后对我说：“开钱！”我连忙给售货员开了钱，心里不由得又酸酸地像潮起醋了，这是我跟她结婚以来第一次亲手给她买东西。

“走，你领路，”她出得门来，精神抖擞，“你认得法院的路。”

我走到法院门口，回头一看，不见她的影子。她大约是第一次进县城，该不是在大十字路口走错路了吧？我慌忙去找，跑遍了县城的东关西关，又跑了南关和北关，没见她的踪影。从午间找到午后，我的两腿酸困，只好往回走。走过十里平川，路经一条小河的时候，我在桥头上看见她冻得发紫的脸。

“你……”我站在她跟前，气呼呼地说不出话，“你……怎么在这儿？”

她缓缓地站起来：“我在这儿等你。”

我看见她的脸色不好，说话也柔气儿了，忙问：“你不是要我跟你到法院吗？”

“到法院做啥？”她装傻卖呆。

“离婚呀！”我说。

“离婚？我才不干那号傻事！”她说，“我要叫杨徐人都知道，我也敢离婚！这几年你要跟我离婚，女人们都下眼看我，说男人不要我了。现时，我也不要男人了！其实，我哪能真真儿去离婚哩！”

我一下子瘫坐在河边的枯草地上，她在村子大叫大喊，到社主任家大哭大闹，原来是为了挽回她的可怜的面子啊！

她哭了，用袖子揩揩眼泪，一甩头，就踏上了木板搭成的独木桥。

我从干枯的草地上站起，走过去，踏上小桥。冬日惨淡的夕阳的红光，在蓝色的河水里投下淡淡的血红……

我的那间小房子

牛王砭小学坐落在一道砭坡下，门前是一条小河，砭坡上排列着大大小小几十个村庄。缓坡上是纵横摆列着的极不规则的田地。陡坡上生长着一岁一枯荣的杂草酸枣棵子。那些随处可见的红石子堆砌的峁坎，一年四季都裸露着干燥的红色，令人看了难受。村庄周围那些低洼的土层厚而水分足的地方，一团团桃杏的花云，象征着这贫瘠砭坡地带四季中最轻松活泼的季节。冬天里有大雪降落的日子，这砭坡也会呈现出刚柔互济的气魄。顶入不得眼的是夏末秋初，一场旷日持久的干旱，把坡地上的草木渴死了，干枯了，树木早早落了叶子，玉米苗儿尚未抽出缨花来，就拔掉喂牛了。整个山坡上，像火烧火燎过一样，看去使人难受。

只有学校门前的这条河川，一年四季里都使人能感受到大自然的美的韵味。即使在干旱炙烤得砭坡上到处冒烟起火的焦灼时节，河川里也生机盎然。

一条条自流灌渠，把河水曲曲折折地引进玉米地、棉花田和瓜园里。一架架黄牛或青骡拉着的叮当叮当响着的解放式水车，把清凉的地下水车上来，灌进刚刚显旱的田地。

我常常打开后窗，坐在我的小房子里，看砭坡和河川四季景色的自然转换。

学校坐南向北，三排土木结构的房舍，用木椽裹打起来的黄土围墙上，春天有小草小蒿冒出来，入夏稍遇干旱，便率先枯死。校园里有粗大的洋槐，荫凉极厚，春五月的洋槐花香透校园的每一个角落，晚饭后常有教师在树荫里品茶或下棋。三排房舍，教室与教室之间夹着教师的寝室兼办公室，因为房舍欠少，皆是三人或四人一室，一人一张床、一张办公桌，中间只留一个走道出入。似乎没有谁嫌太挤，条件限制，只能如此。只有校长刘建国一人一室，因为是一校之长，负有某些秘密的工作责任的需要，大家也没有异议，也更不会说成特殊化。

我最初在后排的一间房子，因为是小学高年级的班主任，所以稍为优待，三人一室。低年级的老师和科任老师，一般是四人聚居。自从我当了右派以后，就搬出了那个三人一室的办公室，颇有点依依不舍。三人虽然拥挤点儿，因为脾气相投，处得挺和睦，早晨不怕睡过头，晚上熄灯后可以聊天听闲话，从来不觉得孤寂。

学校的东边，有一排坐东向西的小房子，不做教室，只让人住的小房间。南头两间是灶房，接着两间是水房，第五间就是我后来搬入的房子。第六间是原来的工友韩民民的住房，他因为我的替代而升为事务员了。最后一间是炊事员的住屋。

韩民民是从农村招聘的工友，只在扫盲班里粗识一些常用字，会拨算盘珠儿，人却极灵聪。除了打铃搞卫生，因为上级没有拨调专职事务员，每逢开学结业的大忙日子，常是韩民民帮助买课本以及教案、粉笔、墨水一类杂物。他最喜欢的是替校长刘建国传达开会或什么临时通知，到各个房子去说一遍。小伙子年轻，有点爱面子，常在上衣口袋里插两根钢笔，小分头，用水抿得熨熨帖帖，努力要把自己提高到一个教员的规格，而不致使人觉得他不过是勤杂工。我的落难，使他得到了做梦也想不到的天赐良机。我来打铃、烧水、扫地之后，他就成为专职事务员了。他住在隔壁，杂物却依旧堆在我住的房子里，不腾不挪，每逢给教员发教案、粉笔和笤帚，就到我住的房子里来拿。令我感到安慰的是，他尚相信我这个右派不会破坏公物，也不担心我偷盗。

“徐慎行！”他过去一直称我徐老师，说不上尊敬，这是学校里教师之间的习惯称呼。现在他直呼其名了，我也能想得通，“我在供销社把炭买好了，你去拉回来，这是票据。我还要去……”要去办的事自然很多，他很忙。

我就拉起那辆学校里甚为宝贵的架子车，从牛王砭供销社把炭拉回来。

每一次我做改造汇报的时候，第一个站起来说我交代不彻底的总是韩民民。他说某日某次我的铃儿晚打了整整一分钟，又说某日我打

扫过的厕所里把脏物遗在了站台上，还有某一回的开水没有足滚。他是看见刘校长把鸡蛋冲成了一碗糊汤得到反证的，因为足滚的开水冲出的鸡蛋是呈絮状的。他的揭发往往使刘建国显出不耐烦，大约是他的讨好太显露，又在众人面前，而且讨好讨不到点上。不管怎样，我也无法记清某日某次的铃儿是否准时，水是不是足开，厕所里是否遗落下脏物，我都一律做出诚恳接受的姿态：我一定改正，欢迎大家监督……

出门干活，闭门思过，谁的房子我也不想去，怕因此而玷污别人，于自己也惹是生非。我关住门，躺在窄窄的床铺上，看吊着蛛网的顶棚，看房子里堆得满满的杂物，废弃的粗壮的麻拧的井绳、破了口的蔫瘪的篮球、散了架的克郎球盘、缺杆少珠儿的毛算盘，都从墙壁上、地角里、桌子下朝我瞪着可笑的眼睛。我初来时的寂寞，而今觉得这堆积有用和无用物品的小库房，是我借以安身立命的最恬静的角落了。

如果韩民民推门进来取什么东西，我立即从床上翻起来，站到地上，等着他取到东西走出门去，我再闭上门。他进这间小房，从来也不打招呼，推门而入，端直而出，如入无人之境，我也不觉得他对我有什么不恭。我有一条理由可以排解这种疑惑：房子本来就是韩民民的库房，他进自己的库房，自然不必敲门或打招呼这一套麻烦手续了。

我躺在床铺上，不由得思索回味我的父亲给我起下的这个名字：慎行，由此又联想到弟弟的名字慎言，以及父亲临别时嘱咐我的座右铭：慎独。言语和行为，在一个人单身独处的时候，应该慎而又慎，就是这个意思。这个意思，我只有现在才体味到它的颠扑不破的正确性。回想在师范学校的生活，我真有点不敢相信自己，我多么轻狂

啊！想唱就唱，想说就说，想玩就玩个痛快，简直跟疯了一样啊！如果我当时起码在心里给父亲的嘱言保留下一个小小的角落，在“鸣放”会上有一点警策的作用，我就对自己的言论谨慎了，就不至于说出刘建国“好大喜功”的意见来，就不会有今天的这种蹲不下又站不直的难受处境了。

我如果彻底被打成右派，不是“中右”，跟右派们一起劳改，也许猪崽不笑老鸦黑了。唯其因为我是“中右”，比右派在性质上有轻重的差别，倒成了糟事，把我继续留在学校使用，改造，生活在许多好人中间，我就愈加顾影自怜了。我的体会是，站不直也蹲不下的这种屈腿弯腰的姿势，比站着或蹲着都更难忍受，大约是人的姿势中最难耐久的一种姿势了。

我再不能不慎言慎行了。

我取出笔和墨盒，墨盒干涸了，毛笔也干涸了，用水泡一泡。我找到一块书页大小的硬纸蘸了墨，写下了对自己的警告：慎独。我把它贴在床头，使我无论坐着或躺着都能看到。我感到了内心的惶恐，绝对需要这样一张护身护心的神符来佑护我，再甭出乱子。

过后两天，刘建国走进我的房子，一来就瞪着两只煞有介事的眼睛，在我桌边的墙上睃巡，而终于停在床头的墙上。他严肃地看一阵子，并不是欣赏我的书法，转过身说：“这个东西给我。”他未经我应诺，已经从墙上撕下来了，一句话也未说，径自走出门去了。

当天晚上，临时召开教师会，提前让我做改造汇报。没有人对我的汇报感兴趣，对“慎独”两字的批判一下子就成为会议的中心主题。

我预知，会议之前，教员们早已得到批判的目标了。其余人的分析可以略去，刘建国的分析是校长的水平，自然高了一筹，深了一层——

"'慎'什么'独'？你的错误难道是不'慎'的结果吗？如果不从思想根源、阶级立场上彻底改造，怎么'慎'得住呢？这种封建修养的方法，怎么能救得了你的反动灵魂呢？"

我的头上冒汗了。这些尖锐深刻的批判，使我连喘气的力气都没有。我回到房子，躺在床上，我父亲尊为至明的处世哲学，也不管用了，我想钻在这张护身符下求得安宁，反而招灾惹祸了，怎样才能拯救我的小命？

我清楚记得，这张座右铭贴上床头后，只有韩民民来过我的房子，一定是他报告了。为了这个座右铭，我整整交代了一个晚上……

三四年过去了。

我被通知说，可以任课，按教师对待了。

我竟然感动得热泪盈眶。

不过，半月没过，我就陷入自身的烦恼。为了体现按教师对待的精神，把我从那间小库房调出来，插入一个二人居住的教师宿舍。学校里增添了一些房舍，教员住得稍松了。我在这个宿舍里不仅黑天睡不着，白天也不自在。我总是处于一种高度的紧张状态，惶惶不可终日。莫名其妙地对人家笑，对同宿舍的老师或到这个宿舍来的老师说下的话，一律说："对对对！"其实许多话我根本就没听清内容，嘴里却不由自主地"对对对"地应诺着，惹得大伙发笑。我越发窘了，也越紧张了。

我去上课，突然觉得我不会说话了。我的脑子里的语言仓库全部关闭了，一个词儿也拿不出来，而且十分紧张。尽管我教的是地理课，也不敢讲，急得头上冒汗，只会照课本往下念，学生已经乱得像一窝雀儿了。

一按教师对待，我就要参加许多会议，这是更难受的时刻。往常，我是右派，一月里做一次改造汇报，坐在一个偏旁的角落。现在，和别人坐得近了，我很紧张；坐得远了，又显出我不太合群，会议室没有我坐的座位了。尤其是非做不可的表态性发言，我未说先流汗，总怕说错了什么……

我向校长赵永华提出要求：让我做事务工作，让我再回到我的那间兼做库房的小房子。我再三解释，不是使性儿，也不是有什么不满意见，而是事务工作更适宜我干，保证干好。

刘建国在一年多以前，调县文教局当人事干部去了。赵永华调来也一年多了，我很少跟他有什么接触，只是偶尔听见韩民民在炊事员杨师傅跟前嘟嘟哝哝新校长的什么话，我就觉得他可能在赵永华跟前不如在刘建国手下感到畅快如意。赵永华听了我的要求，很随便地说："你如果觉得事务工作更合适，你就干，别人还看不上这工作哩！"他告诉我，正好韩民民要调走，到县文教局的物资供应点上去，学校正好缺事务员。

一经赵永华允诺，我当下就把被卷行李搬回了我的那间小库房卧室。一躺下来，我闭上眼睛，浑身都舒适了。我忽然想到了蜗牛，蜗牛钻在它的壳里一定很舒适。要是打碎螺壳，把它牵出来，它可就活不了啦。我刚搬进这小库房时，感到压抑，感到杂乱，感到孤寂，常想到和高年级那两位教师同居一室的愉快时光。久而久之，我像蜗牛

一样适应了螺壳，蜷缩在螺壳式的小库房里才舒服，到别的房子里反而觉得活不了啦！

我去买煤，买了煤就亲自拉回来，绝不让从生产队里雇来的校工小朱干这些。我常常抢在小朱前一步打了铃，打罢又向小朱道歉，全是我过去打铃打下习惯了。尽管如此，我觉得十分满意，我虽不代课，却是事务员，事务员也是教职工，和教师一般对待。

有一件事伤了我的心。

大伙都去县上听报告，赵永华让我看门。看门其实正适合我的心愿，我怕开会，怕在会上遇见熟人，更怕遇见速成二班的老同学，尤其是怕碰见田芳。可是那天晚上，大伙听完报告回来，我才知道，会上有一个震动全国人民的消息，说我们国家发现了一个“大庆油田”。教师们为猜测这个油田的具体地址而争论不休，谁也说不服谁。我后来才知道，这样重要的报告，上级规定有几种人不能听，以免给帝修反泄密。我自然属于那几种不准听的人中的一种。

我暗暗警告自己，老老实实蜷在螺壳里吧！甭张狂，还是没有资格和一般教师同样对待哩！还要——慎独！

哦！故园，故园

徐慎行同学：

定于本月二十日上午在母校举行学友聚会，请您拨冗参加。

专此

致礼

我的手颤抖着，泪水模糊了眼睛，擦一擦，又涌流出来了。速成二班……速成二班……我的那个速成二班啊！像一道急骤的电闪的亮光，把我尘封的脑壳炸乱了，把我的心抖底搅翻了。

多么遥远而又亲切的记忆——速成二班！速成二班——多么温暖而又自由的天地！我的心里一闪出这个名称，几乎承受不下它带进我霉腐的心室里的清新温润的春风，要昏厥了。

田芳，一想到速成二班，第一个蹦到我面前的就是田芳。那个白毛女，那个从我身上揭掉了蓝袍礼帽的田芳，她肯定要参加这个老同学的聚会的。缺了她，该会多么令人扫兴。不会缺她的，我安慰自己，甚至猜度这个别出心裁的聚会就是她出的点子呢。

八月二十日，一年中极其普通的一天，不是新年佳节，也不是纪念性节日，我渴盼这一天的到来，比小时候盼望过年的心情还要焦急。

微明中，牛王砭小镇掠过凉飕飕的晨风。我乘头班公共汽车进了县城，又换乘去山门镇的公共汽车，终于站在师范学校的门口了。

校史悠久的师范学校已经改为师范专科学校，属于大专建制了。砖拱木顶门楼变成了四方水泥立柱的钢条大门，从大门通到教学区和宿舍楼的窄窄的砖铺甬道，已经改换成水泥路面了。迎面是一幢三层教学大楼，外观十分漂亮，原先的一排排平房大多已拆除。二十五年的时间，毕竟使我感到了惊奇的变化。

树杈上挂着一块硬纸板，画着一个箭头，把聚会的地点指向后操场。暑假里没有学生，路道上和花坛里，落着一层树叶，有点荒凉和空寂，而我的心仍然止不住激动起来了。

操场的围墙根，高大的洋槐树组成一道屏障，在草地上投下浓密的荫凉，这是我们亲手栽植的，栽时不过酒杯那么细，而今已经桶粗了。草地上，站着或坐着一堆人，在聊着天。我走到跟前，听见有人在叫我的名字，有几个人跑上来，握手，搂肩……老天爷，一个个全都变成老汉老婆了！

我止不住热泪滚滚，和伸到我面前的一双双手紧紧握着，看着一副副皱皱巴巴的脸，我无法与印象中的那些青春焕发的脸膛联系起来，流逝的岁月给我心里留下的巨大的差异无法弥合；他们的心里也是这样感受这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差的吧？我从他们一个个瞧着我的惊异的眼神里看得出来：你怎么老成这样子了？哈呀！瞧你，秃顶多厉害！

我握住了一双手，心里一震，那双细软的手也在用劲儿握着我的手。我相信，闭上眼睛，我也会准确地判断出田芳的手来。她的眼角有细密的几缕纹络，鬓角有几丝银白，而那双眼睛，似乎还是二十五年前的那双眼睛。当我们的眼光相碰的一瞬，我的心似乎一下子沉下去了，脑子里也中止了一切思维。我没有向她问好。她也没有问我好。我们竟然相对无言，默默地呆站着，手却握得粘在一起了。

我和她在草地上坐下。几位同学围住我，问我平反了没有？问我的孩子的安置状况，我也很关心他们的工作和家庭。田芳坐在我旁边，她什么也不问。我也没有问她，丈夫在哪儿工作，几个孩子，工

作或是上学。我不问不是因为我了解，其实我什么也不知底，不知底儿也不想知底儿。

“你……身体……好吧？”我终于问。

“还好。”她笑笑，“你也……好吧？”

我点点头，又流泪了。

录音机在播放着优雅的舞曲，篮球队长何长海已经和一位老太婆——二婶的饰演者跳起舞来，又有三五对儿舞伴也跳起来了。田芳对我说：“咱们跳跳吧？”

我有点慌乱！连忙摇头摆手。

有几个同学在吆喊，催促我和田芳上场，他们或多或少知道我和田芳的遭遇，催促的意思是很明显的。我涨红了脸，对田芳说：“你跟他们跳吧，我上不了场了！”

田芳跳起来，和另一个同学跳起来了。我坐在草地上，点燃一支烟，看田芳踏着舞步。

有人又出新点子，让大家每人出一个节目，或唱或说，或演或变魔术，谁也不得脱空儿。

有人提议，让田芳演唱白毛女。她不客气，跳起来，也不扭捏，有点遗憾地说：“就我一个人唱？”

我这才想到，饰演大春的刘建国没有来。他没有来，也没有谁提及，我也不想在这个场合提到这个人。这个饰演正面角色的人啊，在

生活中几十年来也一直是正面角色，而大伙现在谁也不想问他为什么不来。饰演杨白劳的人儿已经进入另一个世界，听说在七八年前患下了肺癌。大伙也不愿意提及他，因为太令人伤惨了。于是，有人提出，让我和田芳演唱《扎红头绳》一节。我又惶恐万分，连连摇手，多少年来，我连话都说不顺口了，岂能唱歌?

“唱吧? ”田芳看着我说，“你太拘束了。”

我摇摇头，又摆摆手。

田芳无奈了，也不勉强，就唱了一段。唱完，她又走回来，坐在我的旁边，说:“你太拘谨了！拘谨得……叫我又想到‘蓝袍先生’！”

我的心里一悸。我身上的蓝袍早已脱掉了，而我的心哪，又被蓝袍罩得死死的了。我苦笑一下，说不出话。

有人在接着唱，有人即兴赋诗吟诵。有人说幽默笑话。有人耍小魔术变戏法。喊啊笑啊，气氛热烈极了。轮到我，我什么也拿不出来。有人出恶招:“什么都不会，那就学熊猫儿在地上打个滚好了！”

我窘迫得六神无主。田芳也笑着，随口说:“讲句笑话吧！你真的连一句笑话也不会讲? ”她提醒了我，急迫中，我首先想到了《老和尚与小和尚》的笑话故事，那是我在刚到师范学校来的头一晚，在集体宿舍里听到的……我刚讲完，有人在哄笑中大喊:

“让老和尚永远寿终正寝！”

“小和尚们，去和‘魔鬼’拥抱哇！”

……

有几位同学尚未赶来，野炊午餐还得再等一会儿。我已得知，午餐是大伙随意带来的罐头、面包、点心、饮料和各种水果。我是空手来的，想到山门镇上去买点礼物，田芳就和我散步同去了。

我和她走进校园，不约而同地走到速成二班的教室前，那里的平房虽然没有拆除，也已经隔间垒墙，分为三室，变成教师宿舍了。门口垒着蜂窝儿煤，火炉上坐着小锅，“吱吱”响。我默默地瞅着这座房子的窗户，又想流泪。我的神经变得如此脆弱，简直不能抑制了。

田芳敲响了一间房子的门板。

门开了，一位年轻白净的小伙儿站在门口。

“这儿……原来是我们的教室。”田芳说，“我们想进去再看看……打搅您了。”

那青年初听时有点惊诧，随之就点头笑了，爽快地邀我们进屋。

我随着主人走进门。屋里一张双人床，一张双人沙发，靠墙的地方支一张桌子，桌上摆着钟表、花瓶、电视机。一个披着长发的女子从沙发上站起，礼让我们坐下。

“我们俩的那张课桌，大约就在这个位置上吧！”田芳站在那个桌子旁，回过头来问我。

“哦……就在那儿！”我应了一声。

“你过来……坐坐……”田芳说着，把一张椅子挪好，自己坐在靠墙的位置上，“让我们再回味一下……当年的学生生活……”

我走到桌前，在椅子上坐下了。我坐得端端正正，仰起头来，却看不到黑板，墙上挂着几张笔迹欠火候的条幅。我的胳臂肘碰到田芳的胳膊肘了。我不由得回过头，看到了她的一汪汪满泪花的眼睛，从遥远的天空传来了一声声动人心魄的声音——

……你为啥不跟我说话?

……你的字儿写得多好呀！

我们静静地坐了一会儿，站起来，向男女主人歉意地笑笑，就走出这间屋子。

“再不会重返……当年的情景了！”我说。

“梦……二十五年……”田芳摇摇头。

我和她踏着走道上的落叶，走出校门，进入山门镇街道了。街道依旧狭窄，沿街的破旧的木房子有的拆除了，竖起一座高楼，鹤立鸡群似的。走到一家服装店门口，我和她都停住脚。现在，无论如何比当时那个一间门面、一个裁缝师傅、一台缝纫机的小裁缝铺气派得多了。

田芳拉着我，到这个小铺店里来，把那件蓝袍脱下来，由裁缝师傅改成了列宁装。我穿上列宁式新装，戴上了八角帽，路也不会走了，八字步全乱了套。田芳和我走着，看着我的样子直笑。她说：“跳起来吧！蹦啊！你敢不敢? ”我跳起来了，蹦起来了，街巷里的行人把我当疯子看，我也不管，只觉得我轻松了，自由了，再也不用按八字步迈步了，蹦蹦跳跳起来了……

“你现在又拘谨起来了。”田芳瞅着我说，“使我又想起你穿着蓝袍时的样子……”

我悲哀地叹口气，说不出话。

“你现在还敢蹦起来不敢？”她笑着问。

我惶惶然连忙摇头。

她没有使我为难，朝前街走去。

我和田芳再回到操场草地上的时候，聚会的主持人宣布午餐开始，各式罐头打开了，糕点包子解开了，酒瓶盖子被咬开了。一切可以临时用来盛酒的瓶盖、水杯全都注上了酒，一齐举起来：速成二班万岁！

主持者向大家宣布了一个数字：

师范速成二班：四十一名学生。死亡四人，其中一人死于“文革”武斗，三人死于疾病。现在本地区工作三十人，另七人随家随夫调外省或外地。聚会通知了三十人，实到二十九人，其中三人抱病赶来。

唯一的缺席者：刘建国。

谁也没问刘建国为什么不来。

主持者在大伙的静默中提议：为死去的四位同学祭酒。

清凌凌的酒液泼在草地上，散发出一股清香。

主持者又进行下一项提议：向县委提出一项意见，请领导人把刘建国从教育局调开，随便调到县委所属的任何一个部门去，只要不在教育系统就行。他现在还在任教育局副局长，有他在那个位位上，我们会觉得心里不舒服。就是这一条要求。至于全县的中小学教师有多少人被他整了，不必计算，应该向前看，不究前账。但请把他调开，让教员们再不要听见他的令人讨厌的声音……

鼓掌。呼叫。一个个全都签上了名字。

我捉着笔的手在发抖，终于写上了我的名字。二十五年来，我第一次向这个老同学表示了愤怒……

咒符

一觉醒来，老鼠在顶棚上奔马。

一只老鼠跑起来，像野马驰过草原；一群老鼠奔跑起来，追逐起来，拼杀撕咬，就像万马奔腾。

我刚刚从梦里醒来，一身虚汗，月亮照在南窗的窗格上，屋里静得可以听见窗外大地的呼吸，老鼠的追逐和嘶叫把一切都破坏得淋漓尽致。

我在黑暗中摸到烟，摸到火柴，火柴划着的一瞬，顶棚上的老鼠收敛了。我抽着烟，闭眼躺着，等待天明……

我平反以后，孩子顶替我去工作了，女儿早已出嫁，屋里只剩下我和老伴。老伴早已不再称我为先生，看我也不再是怯怯的神色。她

手叉在粗壮的腰里，指挥我去种地，干一切过去由她自觉承揽的家务，初时有报复的意味，后来就成了习惯。

“你一天唉声叹气做啥？”她问我，“想那个野婆娘了吗？”

我说我背着右派的包袱，叹气成了习惯了。

“右派怕啥？只要给工资，啥𡱂派还不是一样叫！”她不在乎地说，“我看当个右派倒不错，你变得规矩了，再不敢跟野……”

我不能发火。我要是一张口分辩，她会大喊大叫，故意让左邻右舍都听见。

“你去洗衣服吧，”她吩咐我，“我腰疼了。”

农村里，男人洗衣服的习惯还不普遍，我抱着衣服走向井台的时候，男人女人都在拿眼睛瞟我。我硬着头皮也就过去了。

“你来擀面吧。”她说。

我学会了做饭。

我明白，她不光是为了享受，其实她倒不是懒女人。她要我洗衣，要我做饭，就会在村人尤其是女人伙儿里提高她的身份，她觉得过去的状况太叫别人瞧不起她了。

我退休回家之后，她也变得好起来了：“咱俩种那二亩地，够吃了。你领下的退休钱，够花了。只要你再不想野……我好好待你，咱欢欢乐乐过到死……”

说下这话一年，她突然死了，跌了一跤，心肌梗死。

我一个人躺在这个祖传的屋子里的炕上，听老鼠奔马。

别人给我介绍下一个女人。连子女都反对，说我快六十岁的人了，难道连面子也不顾了？娃他舅更是怒气冲天，说我败坏了徐家读书识礼的门风……

我的老姐和小妹子看我生活艰难，劝我的儿子和女子，加上你给我大女儿做工作，总算勉强同意了。

我的这件事，按说该办成了。可是，事到临头，要我办这事的时候，我又动摇了。你问为啥？我也说不清……我总觉得我还在牛王砭小学那间小库房里蜷着。那间小库房，容不得旁人进去，打破里面凝结的空气。同样，我也在离开那个小库房以外的其他地方，感到了不自在。尽管我退休回到家里，我的心，似乎还在那个小库房里蜷曲着，无法舒展了。田芳能够把我的蓝袍揭掉，现在却无法把我蜷曲的脊背捋抚舒展……

我送我的启蒙先生到山坡下。

春风吹绿了河川，也吹绿了原坡，又是杏花纷谢桃花呈艳的阳春三月。坡地上的麦苗绿色葱郁，塄坎上的杂草蓬蓬勃勃，只有沟壁间的断崖的红石土色，显露着黄土高原地区残破丑陋的面貌。

他朝坡上走去，回他的原上那个杨徐村去了。他的背脊弓起来，一步一踩，缓缓地沿着蜿蜒的坡间小路走上去。

我的心似乎也被什么东西箍住了。

1985年8—11月草改 西安东郊

四妹子

上篇

一

从延安发往西安的长途汽车黎明时分开出了车站的铁栅大门。四妹子额头贴着落了一层黄土尘屑的窗玻璃，最后看了送她出远门上长路的大大和妈妈一眼——妈跟着车跑着哭着喊着甚叮嘱的话，大也笨拙地跑了几步，用袖头擦着眼泪——脑子里却浮现出妈给她从尻子里掏屎的情景。

妈把碾过小米的谷糠再用石磨磨细，就成了黄沓沓的糠面儿，跟生长谷子的黄土的颜色一模一样。妈给糠面里儿掺上水，拍拍捏捏，弄成圆圆的饼子，在锅里烙熟的时光，四妹子趴在锅台上就闻到一股诱人的香味。待她把糠面饼儿咬到嘴里，那股香味就全然消失了，像嚼着一口细沙子，越嚼越散，越嚼越多，怎么也咽不下去。妈就耐心地教给她吃糠饼子的要领；要咬得小小一点儿，慢慢地嚼，等口里的唾液将糠面儿泡软了，再猛乍一咽。她一试，果然咽得顺当了，尽管免不了还是要伸一伸脖子。糠饼子难吃难咽倒也罢咧，顶糟的是吃下去拉不出来，憋得人眼发直，脸红青筋暴突，还是拉不下来。拉屎成了人无法克服的困难，无法卸除的负担，无法解脱的痛苦。无奈，她只好撅起屁股，让妈用一只带把儿的铁丝环儿一粒一粒掏出来，像羊羔子拉出的小粪粒。

妈妈一边给她掏着，一边叮嘱她，糠饼子一次不能吃得太多，多了就塞住了。而且一定要就着酸菜吃，酸菜性凉下火。她不相信。既然妈妈能教给她合理吃糠的办法，妈自己为啥还要大给她掏屎呢？有一次，在窑洞旁侧的茅房里，她看见妈撅着白光光的屁股，双手撑着地，大大嘴里叼着烟袋，捏着那只带把儿的铁丝环儿，一边掏着，一边说着什么怪话，逗得妈哭笑不得，狠声咒骂着大。大一看见她，忽地沉下脸，厉害地呵斥她立马滚远。又有一回，她又看见妈给大掏屎的场面，大的架势很笨，双手拄在地上，光脑袋顶着茅房矮墙上的石头，撅着黑乎乎的屁股，大声呻唤着。她已经懂得不该看大人的这种动作，未及妈发现，就悄悄躲开了。

小时候，让母亲给她掏屎倒也罢了，甚至觉得妈那双手掌抚摸着屁股蛋儿时有一种异常温暖的感觉，及至她开始懂得羞丑的时候，就在母亲面前脱不下裤子来了。她找到邻居的娥娥姐姐，俩人躲到山旮旯里，让娥娥姐给她帮忙，娥娥姐也有需要她帮忙的时候。

公共汽车在山谷中疾驰。四妹子一眼就能看出，车上的乘客大致可以分成两类，一种是穿戴干净的公家人，一种是本地庄稼人，倒不完全是服装的差异，也有几个穿四个兜干部装的农村小伙子，一搭眼就可以辨出也是吃糠的角色。那些干部或者工人，总之是公家人的那一类乘客，似乎比庄稼人这一类乘客消化能力强，从一开车不久，这类人就开始嚼食，有的嚼点心、蛋糕、面包，有的啃苹果啃梨，嚼着啃着还嘟哝着不满意的话，延安的点心没有油，是干面烧饼啦！延安的蛋糕太次毛，简直比石头还硬啦！那些和四妹子一样的庄稼汉乘客，似乎都吃得过饱，吃得太满意，不嚼食也不埋怨，只是掂着旱烟袋，吐出呛人的烟雾。

四妹子自然归属不嚼不怨的这一类。看别人吃东西是不体面的，听别人嚼蛋糕（尽管硬似石头）和苹果的声音却是一种痛苦，再听那些嘟嘟哝哝的埋怨的话简直使人要愤怒了，她就把眼睛移向窗玻璃。秃山荒梁闪过去，树蓬子闪过去，贴在地皮上的黑羊白羊也闪过去了。

她能记得的头一件事是替妈抱娃娃。娃娃总是抱不完，刚抱得弟弟会跑了，母亲又把一个妹妹塞到她手里；她刚教得妹妹会挪步，炕上又有一个猴娃娃哭出声来了，等着她再抱。生长在农民家里的老大，尤其是女孩子，谁能免得了替妈妈抱引弟弟妹妹的劳举呢！当妹妹能抱更小的弟弟的时候，大把一只小背篓套在她的肩膀上，装上灰粪上山，装着谷穗下山，晚上躺在炕上，肩膀疼得睡不下。妈说，时间长了就好了。背了两年，她的肩膀还是疼。大说，背过十年二十年就不疼了，而且亮出自己的肩膀。四妹子一看，大的两边肩膀上，隆起拳头大两个黑疙瘩，用手一摸，比石头还硬。大说，只有让背篓的套环勒出这两块死肉疙瘩来，才能背起二百多斤重的灰粪上山。四妹子很害怕，肩膀上要是长出那样两个又黑又大的死肉疙瘩真是难看死了。

她的贴身同座是一位中年女人，属于爱嚼的那一类，特别爱说话，不停地询问四妹子是哪个县哪个公社哪个村的人，又问她到西安去做什么，问得四妹子心里发怵了，会不会是派出所穿便衣的警察呢？她只说到西安找亲戚，再就支吾不语了。

在她背着妹妹在小学里念五年级的那年，家里来了一个陌生的跛子，说一口可笑的外乡话，第二天就引着二姑走了，妈叫她把跛子叫姑夫。她瞧不起那个跛子，凭那熊样就把可亲可爱的二姑引跑了。她也瞧不起二姑了，再嫁不下什么人，偏偏就要嫁给那个一条腿高一条

腿低的跛子吗？这年春节前，跛子姑夫来了，带来了满满三袋白面，四妹子平生第一次给肚子里装满了又细又韧的面条，引着跛子姑夫满山满沟去逛景，再不叫跛子了，只是亲热地叫姑夫。姑夫告诉她，他们那儿一马平川，骑自行车跑两三天也跑不到头；平川里净产麦子，麦秆儿长得齐脖高，麦穗一拃长，一年四季全吃麦子，半拃厚的锅盔，二尺长的宽面条，算是平常饭食。左邻右舍那些曾经讥笑二姑嫁了个跛子的婆姨们，纷纷串到窑里来，求妈给二姑捎话，让二姑在一年净吃麦子的关中平原地方给她们的女子找个婆家，跛子也成，地主富农成分也成。即使是两条长腿的贫农后生能咋？还不是伸长脖子咽糠，撅着尻子让人掏屎！四妹子十八九岁了，现在搭乘汽车到西安，二姑和跛子姑夫在西安的汽车站接她，然后再转乘汽车，到二姑家住的名叫杨家斜的村子去，由二姑给她在那儿的什么村子找一个婆家……为着这样一个卑微的目的，四妹子怎么好意思开口说给同座那位毫不相干的中年女干部呢？

同座的女干部不仅爱嚼食，而且爱嚼舌，听口音倒是延安本地人。她说她离开延安二十几年了，想延安呀，梦延安呀，总是没得机会回来看一看。这回回来，真是重新温习了革命传统，一辈子也忘记不了。四妹子却听得迷迷糊糊，不知这位女干部何以会有这样奇怪的心情。四妹子知道，单他们刘家峁百十户人家中，现在在外做县长以上的官儿的人就有三十多个，他们回到刘家峁的时候，也说着和这位女干部相像的话。四妹子却想，如果现在让他们吃糠饼子，撅着尻子让人给掏屎，他们就……

车过铜川以后，四妹子猛然惊叫一声——哦呀！在她眼前，豁然展开一个广阔无际的原野，麦苗返青，桃花缀红，杨柳泛绿。这就是跛子姑夫吹嘘的那个一年四季净吃麦子的关中平原吗？呀——麦苗多

稠！呀——村庄多大！呀——多高的瓦房！哦！老家那些沿着崖畔排列的一孔孔土窑，在这平川地带连个影子也寻不到了……

二

四妹子在杨家斜二姑家住下来，没出半月，相继有四家托人来提亲。

对每一位跨进门槛来的提亲说媒的男人或女人，二姑一律都笑脸相迎，热情招呼，款声软气地探问男方的家庭成分、兄弟多少、住房宽窄、身体状况，结果却没有一家中意的。四家被提起的对象中，一户地主，一户富农，成分太高。另两户倒好，都是目下农村里最吃香的贫农成分，其中一个是单眼儿，一只眼蒙着萝卜花。对前三户有着无法掩饰的缺陷的家庭，二姑当面对媒人回答清楚，不留把柄儿，然而谢绝的语言是婉转的，态度十分诚切。结亲不成人情在，用不着犯恼。第四户人家是贫农，又是独子，男娃也没有什么大缺陷，二姑动心了，专门出去到一位亲戚家打问了一下，才知那男娃是个白脸瓜呆子，顶多有八成，人叫二百五，小时害过脑膜炎。二姑回到家，当下就恼了，当着跛子姑夫的面发泄恶气："净给俺侄女提下些啥货呀？地主富农，瞎子瓜呆子，乌龟王八猴的货嘛！俺侄女这回寻不下好对象，就不嫁……"

听到这些候选者的情况，四妹子难过地哭了，太辱贱人了！二姑转过脸，换了口气，安慰四妹子说，物离乡贵，人离乡贱哪！要不是图得杨家斜村一年有夏秋两料收成，她才不愿意嫁给跛子姑夫做媳妇呢！跛子姑夫咂着旱烟袋，听着二姑毫不隐讳的奚落他的话，也不恼，反而在喉咙里冒出得意的"哼哼唧唧"的笑声，斜眼瞅着二姑笑着，那意思很明显，说啥难听话也没关系，反正是两口子了。

二姑告诉四妹子，关中这地方跟陕北山区的风俗习惯不一样，人都不愿意娶个操外乡口音的儿媳妇，也不愿意把女子嫁给一个外乡外省人，人说的关中十八怪里有一怪就是：大姑娘嫁人不对外。近年间乡村里运动接连不断，无论啥运动一开火，先把地主富农拉上台子斗一场。这样一来，地主富农家的娃子就难得找下媳妇了，人家谁家姑娘爱受那个窝囊气呀！高成分的子弟在当地寻不下媳妇，也不管乡俗了，胡乱从河南、四川、甘肃以及本省的陕北、陕南山区找那些缺粮吃的女人。这些地方的姑娘不择成分，甚至不管男方有明显的生理缺陷，全是图的关中这块风水地。四妹子听着，心里就觉得渗入一股冷气，怪道给她提亲说媒的四家，不是高成分，就是人有麻达。既然关中这地方的人有这样的风俗，她最后的落脚怕是也难得如意。想到这儿，四妹子低头伤心了。

二姑说，事情也不是死板一块，需得慢慢来。二姑表示决心说，反正绝不能把侄女随便推进那些地主富农家的火坑，也不能搡给那些缺胳膊少眼睛的残废人。有二姑做靠山，有吃有住，侄女儿尽可放心住下去，等到找下一个满意的主儿。跛子姑夫也立即表态，表示他绝不怕四妹子夺了口粮，大方地说："甭急！忙和尚赶不下好道场。这事就由你二姑给你办，没麻达！你在咱屋就跟在老家屋里一样，随随便便，咱们要紧亲戚，跟一家人一样，甭拘束……"姑夫倒是诚心实意，四妹子觉得二姑嫁给这个人，虽然腿脚不美，心肠倒还是蛮好的。

此后，又过了十来天，居然没有谁再来提亲。二姑说，村里已经传开，新来的四妹子眼头高，不嫁有麻达的人。甚至说，不单地主富农成分的人不嫁，条件不好、模样不俊的贫农后生也不嫁。这显然是以讹传讹，歪曲了二姑和四妹子的本意。二姑倒不在乎，说这样也好，免得那些乌龟王八猴的人再来攀亲，也让村人知道，陕北山区的

女子也不是贱价卖的！四妹子心里却想，再这样仨月半年拖下去，自己寻不下个主家，长期在二姑家白吃静等，即使跛子姑夫不厌弃，自个也不好受。口粮按人头分，虽然关中产粮食，也有标准定量。她却苦于说不出口。

焦急的期待中，第五个媒人走进门楼来了。

连阴雨下了三天，滴滴答答还不停歇。四妹子正跟二姑在小灶房里搭手做饭，跟二姑学着用擀面杖擀面，有人在院子里喊跛子姑夫。二姑探身从窗口一看，就跑出灶房，笑着说："刘叔，你来咧？快坐屋里。"随之就引着那人朝上房走去。四妹子低头擀面，预感到又是一个说媒的人来到，心里就咚咚咚跳起来，那擀杖也愈加不好使。在陕北老家，虽然有个擀杖，却长年闲搁着，哪里有白面擀呀！年下节下，弄得一点白面，妈怕她糟践了，总是亲手擀成面条。现在，二姑教她擀面，将来嫁给某一户人家，不会擀面是要遭人耻笑的。关中人吃面条的花样真多，干面、汤面、柳叶面、臊子面、方块面、雀舌头面、旗花面、麻食子、碱面、乒乓面、棍棍面……

四妹子擀好了面，又坐到灶锅下点火拉风箱，耳朵不由得支棱着，听着从上房里传来的听不大清楚的谈话声，耳根阵阵发烧，脸蛋儿阵阵发热，心儿咚咚咚跳，浑身都热燥燥的了。

"四妹子，你来一下下！"

四妹子脑子里"嗡"的一声，手脚慌乱了。往常有媒人来，都是二姑接来送走，过后才把情况说给侄女儿。今日把她喊到当面，够多难为情！她拉着风箱，说："锅就要开了——"

"放下！"二姑说，"等会再烧……"

她从灶锅下站起来，走出小灶房的门，拍打拍打襟前落下的柴灰，走进上房里屋了，不由得低下头，靠在炕边上。

二姑说："这是冯家滩的刘叔，费心劳神给你瞅下个对象，泥里水里跑来……你听刘叔把那娃的情况说一下，你自个的事，你自个尺谋，姑不包办……"

"我把那娃的情况给你姑说详尽了，让你姑缓后给你细细说去，我不说了。"刘叔在桌子旁边说，口气嘎巴干脆，"这是那娃的相片，你先看看是光脸还是麻子。"

四妹子略一抬头，才看见了刘叔的脸孔，不由一惊，这人的模样长得好怪，长长的个梆子脸，一双红溜溜的红边烂眼，不住地闪眨着，给人一种极不可靠的感觉，那不停地闪眨着的红眼里，尽是诡秘和慌气。她急忙低下头。

二姑把一张相片塞到她手里："你看看——"

四妹子的手里像捏着一块燃烧着的炭，眼睛也花了，她低头看看那照片，模样不难看，似乎还在笑着，五官尚端正，两条胳膊有点局促地垂在两边，两条腿一样长，不是跛子……她不敢再细看，就把那相片送到二姑手里。

"等我走了，再细细地看去！"刘叔笑着说，"就是这娃，就是这个家当，你们全家好好商量一下，隔三两天，给我一句回话。愿意了，咱们再说见面的事；不愿意了，拉倒不提，谁也不强逼谁。大叔我说媒，全是按新《婚姻法》办事，自由性儿……"

“好。刘叔，我跟娃商量一下，立马给你回话。”二姑干脆地说，“不叫你老等。”

“那好，把咱娃的相片给我一张。”刘叔说，“也得让人家男方一家看看……”

唔呀！四妹子居然没有单人全身的相片。二姑哀叹自己也太马虎了，四妹子到来的一个多月里，竟然忘记了准备下一张全身单人照片。叹息中，二姑忽然一拍手，记起来去年她回娘家时，和哥哥嫂嫂以及四妹子照的全家团圆的相片来，问媒人，能行不能行?

“行行行！”刘叔说，“只要能看清楚就成！”

二姑迅即从厦屋里的镜框中掏出相片，交给刘叔。四妹子很想看看这张相片，又不好意思再从刘叔手里要过来，记得自个傻乎乎地站在母亲旁边，笑得露出了门牙……

刘红眼吃了饭，又踩着泥水走了。

二姑这才告诉她，刘叔说的这门亲事，是下河沿吕家堡的吕克俭的老三。家庭上中农，兄弟三个，老大教书，老二农民，有点木工手艺，老三今年二十二三岁，农民。

姑婆这阵儿插言说：“吕家堡的吕老八呀，那是有名的好家好户，人也本顺。”

四妹子想听听二姑的意见。

二姑说：“上中农成分，高是高了点，在农村不是依靠对象（作者按：依靠贫农，团结中农，斗争地主富农），也不是斗争对象，不好

也不坏，只要不挨斗也就没啥好计较的了。反正，咱们也不指望好成分吃饭。这个娃嘛！从相片上看，也不难看，身体也壮气。农业社就凭壮实身体挣工分。你看咋样？”

四妹子已经听出话味儿，二姑的倾向性是明显的。她琢磨一下，这个成分和这个没有生理缺陷的青年，已经是提起过的几个对象中最好的一位，心里也就基本定下来。她说：“姑，你看行就行吧！”

“甭急。”二姑说，“待我明日到吕家堡背身处打听一下，回来再说，可甭再是个二百五！”

第二天傍晚，二姑汗流浃背地回来了，说：“我实际打问了一程，那家虽然成分稍高点，那娃他爸人缘好，德行好，确是个好主户。那娃也不瓜，听说是弟兄仨里顶灵气的一个……”

四妹子看着二姑高兴的样子，溢于眉眼和言语中的喜气，心里就踏实了几分，羞羞地说：“二姑要是说好，那就好……”

“咱先给刘叔回话，约个见面的日子。”二姑说，“见了面，谈谈话，要是看出他有甚毛病，瓜呆儿或是二愣，不愿意也不迟！”

当晚，二姑就把跛子指使到冯家滩去了，给刘红眼叔叔回话，约定见面的日子。

三

二姑说，头一回跟男方见面，叫作背见。

四妹子这才明白了关中乡村里目下通行的定亲的程序。背见是让男女双方互相看一眼，谈一谈，如果双方对对方的长相基本满意，同

意定亲，随后就举行正式的见面仪式。因为头一次见面的实际目的只是使双方能够直观一下，带有更多的试探的性质，成功的把握性不大。所以，背见时不声张，不待亲朋好友，不许左邻右舍的人来凑热闹，也不管饭招待，只是清茶一杯、香烟一包，悄悄来，悄悄去，时间一般都选择在晚上，以免谈不拢时反而造成风风雨雨，于男女双方都不好听。

背见虽然不声不响，却是顶关键的一步，一当男女双方都给介绍人说声“愿意”以后，终身大事就这样定下来了，随后的订婚和结婚的仪式，虽然热闹，终究只是履行一种形式或者说手续罢了。四妹子感到了紧张、压抑，甚至莫名的慌慌张张，和她前来见面的会是怎样一个人呢?

二姑一家人也都显出紧张和神秘的气氛。天擦黑时，二姑早早地安顿一家大小吃罢夜饭，洗了碗，刷了锅，把案板上的油瓶醋瓶擦拭得明明亮亮，给两只暖水瓶里灌满开水，就着手扫了里屋，又扫了前院。从前院到后院，从地上到案板上，全都干净爽气了，一扫平日里满地柴火、鸡屎的邋遢景象。

跛子姑夫从二姑手里接过一块票儿，摸黑到村子里的代销店买回来一盒大雁塔牌香烟，连同剩余的零票儿一齐交给二姑，就坐在木凳上吸旱烟。二姑把零票儿装进口袋，就对姑夫说：“你也要看一眼呀？”那口气是排斥的，很明显，二姑不希望跛子姑夫在这种场合绊手绊脚。跛子姑夫也不在意，憨厚地笑笑，叮嘱二姑说：“我看啥哩！只要四妹子愿意，我看啥哩！虽说婚事讲个自由，年轻人没经验，你好好给娃把握一下，甭弄得日后吃后悔药，让乡党笑话，就这话。我到饲养场去了。”二姑也意识到事情的分量，诚心诚意对跛子姑夫点点

头。姑夫掂着烟袋，低一脚高一脚走到院子里，出街门的时候，沉稳地咳嗽了两声。

姑婆也不甘心被排除在这件重要的事情之外，混浊的眼珠里闪出温柔慈爱的光来，对四妹子叮咛着，像是对自己亲孙女一样说："娃家，这是你一辈子的大事，不敢马虎。会挑女婿，不挑那些油头粉面的二流子，专挑那些实诚牢靠的后生，跟上这号后生过一辈子，稳稳当当，不惹邪事。你看哩么！实诚人和滑滑鱼儿，一眼就能看出来……"四妹子羞涩地笑笑，低下头，心中更加慌惶，一眼怎能辨出实诚人或是滑头鬼呢?

"妈吔！"二姑亲切地喊，又明显地显示出逗笑的口气，"你有这好的眼头，好呀！今黑请你给看看，是实诚人还是滑滑鱼儿……"

"看就看，当我看不来！"姑婆嘬嘬皱纹密麻麻的嘴唇，回头却叫孙子和孙女，"铁蛋儿，花儿，跟婆睡觉！没你俩的事，甭蹦来蹦去净绊搅人！让人家生人见了，说咱家娃娃没规矩……"

铁蛋和花儿正蹦得欢，不听姑婆的话。二姑在每个屁股上狠狠地扇了两下，厉声禁斥："滚！跟你婆睡去！胡蹦跶啥哩！刚扫净的地，又弄脏了！刚收拾整齐的桌面，又拉乱咧……"

姑婆把孙子和孙女牵到里屋火炕上去了。

二姑坐下来，瞅着四妹子的脸，像不认识侄女似的，愣愣地瞅着。四妹子看出，二姑眼里有一种异常沉重，甚至是担心的神色。这种神色，四妹子很少发现过。自到二姑家近俩月里，她明显地可以看出，二姑精明强干，早已熟知关中乡村的一切风俗习惯，连说话的口音也变了，夹杂着关中和陕北两地的混合话语，她在这个家庭里完全

处于支配者地位。钱在二姑手里攥着，一家人的穿衣和吃饭以及日常用度，统由二姑安排。跛子姑夫一天三晌回家来吃饭，吃罢饭就回饲养室去了，晚上也歇息在那里。姑婆一天牵着两个孙子和孙女，像母鸡引护着小鸡儿，在村子里转，任一切家务和外事，都由二姑决定，去应酬。二姑已经变成一个精明强干的家庭主妇了，许多事都是干干脆脆，很少有优柔寡断的样子。

二姑压低声儿，对侄女说："四妹子，今黑定你的大事，姑心里扑扑腾腾的，总也搁不稳定。你看，你妈你爸远在山里，把你送到姑这儿，姑想跟谁商量也没法商量。这事要是定下，日后好了瞎了，咋办？好了大家都好，瞎了我可怎样给你大你妈交代……"

"姑！"四妹子当即说，"我来时，跟俺大俺妈把啥话都说了，不会怨你的。我也不是三岁五岁的鼻涕娃娃……你放心……"

"四妹子！"二姑更加动情地说，"话说到这儿，姑就放心了。一会儿人家来了，你大大方方跟他说话，甭让人家小瞧了咱山里人。那娃我也没见过，你看姑也看，你愿意姑也就愿意，你不愿意姑也不强逼你……"

"二姑，我知道……"四妹子有点难受了，像面临着生死抉择似的，而又完全没有把握，为了不使二姑心里难受，她说，"我知道……"

"好。"二姑说，"去！把你的头发梳一梳，把那件新衫子换上，甭让人说咱山里人穷得见面也穿补丁衫子……"

四妹子有点不好意思，忸怩了一下。

“去！洗洗脸，搽点雪花膏。”二姑催促她，“怕也该来了。”

四妹子走进二姑的厦屋，洗了手脸，从一只小瓶里挖出一点儿雪花膏，搽到脸上，感觉到脸发烧。她找出化学梳子，梳刺上糊着黑乌乌的油垢，就把它擦净，化学梳子又现出绿色来。镜子上落了一层尘灰，也擦掉了，她坐在电灯下，对着这只小圆镜，看着映现在镜片里的那个姑娘，嘴角颤颤地笑着。

她像是第一次发现自己长得这样好看，眼睛大大的，双眼皮虽不那么明显，却确实是双眼皮；鼻梁秀秀的，不凹也不高，恰到好处，只是脸颊太瘦了，要是再胖一点……她不好意思地笑着，一下一下梳着头发，头发稍有点黄，却松松散散，扑在脸颊两边；她心里对镜子里那个羞涩地笑着的人儿说，啊呀！今日给你相女婿哩！也不知是光脸还是麻子……

院子里一阵脚步响，随之就听见二姑招呼说话的声音，接着听见刘叔的嘎巴干脆的搭话声，最后是一个陌生女人的声音。脚步声响到上房里屋去了，四妹子的心在胸膛里咚咚咚跳起来，放下梳子，推开镜子，双手捂住脸颊，不知该怎么办了。

她给自己倒下一杯水，喝着，企图使自己的心稳定下来，上房里传来二姑和那个陌生女人异常客气的拉话声，心儿又慌慌地跳弹起来。难挨难耐的等待中，四妹子听见二姑唤她的声音。

四妹子走出厦屋，略停一停，就朝上房里走去，踏进门槛，一眼望见电灯下坐着四五个人，她就端直盯着介绍人说：“刘叔，你来咧？”

刘红眼哈哈一笑，立即站起，指着一个坐在条凳上的小伙子说：“这是吕建峰，小名三娃子。”那小伙子也羞怯地笑笑，忙低了头。四妹子心里扑轰一下，其实根本没敢看他。刘红眼又指着一位中年女人说，“这是三娃子的大嫂子，今黑你俩要是谈好了，也就是你的大嫂子……”四妹子羞得满脸火烧，忙坐到一边的凳子上，浑身不自在，也不敢看任何人，其实心里明白，她自己才是别人相看的目标，那个吕建峰就是跟着他大嫂子来相看她的。

“一回生，二回熟，三回就不要我老刘了！”刘红眼坐在桌子边正中的位置上，对着那边的吕建峰和他的大嫂子，又转过头对着这边的四妹子和她的二姑，说着联结两边的话，“事情也不复杂。新社会，讲自由自愿，咱们谁也甭想包办，让人家四妹子和三娃子敞开谈。这样吧！四妹子、三娃子，你俩到前头厦屋去说，省得俺们在跟前碍事。俺们在上屋说话……”

二姑以主人的身份，引着客人和四妹子回到厦屋里，礼让客人在椅子上坐下，倒下一杯茶水，递上一支烟，客人接过又放下，说他不会抽。二姑看一眼侄女儿，就走出去了。

四妹子坐在炕沿上，看着自己的脚尖，不好意思抬起头来，那位坐在椅子上的客人，从压抑着的出气声判断，他也十分紧张和局促。

四妹子等待对方开口。

对方大约也在等待她开口。

小厦屋里静静的，风吹得窗户纸嘶嘶嘶响。

四妹子稍微抬起头，看一眼桌旁椅子上的客人，心中一惊，连忙低下头，是那样一个人呀！黑红脸膛，两条好黑好重的眉毛，一双黑乌乌的眼睛正盯着她的脸。她突然想到一块铁，一块刚刚从砧子上锻打过的发蓝色的铁块。她想到这人脾气一定很硬，很倔，很……

“俺屋人口多，家大，成分也不怎么好……”

四妹子终于听到了对方的一句话，实实在在，净说他家的缺短之处，人口多而家大，是女方选择对象时的弹嫌疵点，人都想小家小户吃小锅饭，成分高就更是重大障碍了。可这些问题，四妹子早就知道，已经通过了。她没有吭声，等待对方再说，第一句话就给她一个印象：这人挺实在……

一句话后，客人又沉默了。四妹子心里一转，会不会是因为自己没搭腔，没对他说的话表示态度而顿生疑窦了？要不要赶紧表白一下？

“我对你……没意见……”

四妹子想搭腔表白的想法顿时打消了。她想笑，几乎有点忍不住，就用一只手捂住嘴，不致笑出声来，令客人难堪。刚刚说了一句话，第二句就表示“没意见”了，是太性急了呢，还是太老实了呢？老实得令人可笑。啊呀！四妹子的脑子里顿然飞来一团乌云：这小子大概是个傻瓜蛋儿吧？

二姑前几天曾经给她说过一个真实的笑话。杨家斜一个姑娘跟邻近村一个小伙去背见，谁也不好意思开口，呆坐了一袋烟工夫，那小伙忍不住了，就要开口，他想拣一生中最有趣的事说给姑娘，显示一下自己的见识，想来想去，想到了他舅舅领他在西安动物园看过一回

老虎。他想，姑娘肯定没见过老虎，用老虎镇一镇她，就说：“我见过老虎，嘎！比牛犊还高还大！你见过吗？”姑娘一愣，俩人谈婚事，关老虎屁事呢！小伙子得意了，说：“咱俩一结婚，叫俺舅把咱俩引到动物园，再看一回老虎……”姑娘瞅着那个得意忘形的傻眼傻样儿，心里起疑雾了。正在姑娘心中纳闷叫苦的时候，小伙突然站起来，耸起鼻子，左嗅嗅，右闻闻，随之就释然傻笑起来：“怪事！我说这屋里今黑怎么有一股香味儿！原来是你身上香……”姑娘一听，吓得蹦出屋子，丢下媒人和陪她去的老婶子，一口气跑回杨家斜来。

四妹子听了二姑说的笑话，笑得肚子疼。现在，她似乎有一种不祥的预兆，眼前的这位小伙，活脱就是那位用老虎吓人的傻瓜蛋儿。她瞧一眼他，他低着头看着自己的手，不开口。如果他继续说话，她就可以进一步观察他的成色，如果他就这么坐下去，怎么办？四妹子拿定主意，要引逗他说话。

“你今年多大咧？”

“二十二。”

“你在哪儿念过书。”

“初中刚念了一年，就停课闹革命了。”

“后来呢？”

“后来就回吕家堡了。年龄小，队里不准去上工，我就割草挣工分，到年龄大了些，就跟社员干活。”

她不问了，他也就不说了。看来不是瓜呆子，四妹子的疑雾消散了。他是害羞呢，还是那号不爱说话的闷葫芦？她此刻倒是希望他能

问她点什么，可他依旧不开口。

“你还没说……对俺……有意见没？”

他大约只关心这一句话。四妹子心里又有点想笑，决定不立即正面回答他，逗一逗这位长得魁梧壮大的汉子，看他会怎样？她说：“我至今连你的名字都不知道，能有什么意见呢？”

“噢！我叫吕建峰。”他红了脸，解释说，“我是说……你愿意不愿意……”

“你好性急呀！”四妹子说。

客人腾地臊红了脸，更加局促不安了。

刘红眼出现在门口，把她和他又叫回上房里屋。刘红眼眨巴两下眼皮：“长话短叙，夜短，明日还都要劳动。现在，你俩见也见了，谈也谈了，三对六面，只说一句话……”

屋里静声屏息。

“我没意见。”吕建峰先说了。

四妹子立即感觉到所有人的眼睛都盯着自己了，终身大事就这样定了！一旦定了，甭说结婚后离婚，订婚后要解除婚约也不光彩哩！她对他现在说不上什么，说不上缺点也说不上优点，没有什么能促使她迫切地要求与他结合，甚至没有什么能促使她急切地说出“我没意见”的话来。她终于没有说出话，只是点点头。

“好！顺顺当当，大家欢喜。”刘红眼一拍手，从凳子上跳下来，站在屋子中间，宣布说，“扯布，定亲！”

得到了最满意的结果，刘红眼领着吕建峰和他大嫂，走出院子，消失在村口朦朦的月光里。

姑婆也很满意，兴致勃勃地拍着四妹子的脊背，发着感叹：“新社会多好！先见面，再说话，后出嫁，心里踏踏实实。俺那会……唉！只是进了人家厦子，盖头一揭，才亮宝……”

四妹子觉得，毕竟比姑婆那会儿好多了。

四

背见之后是正式见面。背见在女方家悄悄进行，正式见面仪式在男方家里举行，要待承亲戚和好友。亲朋好友来时要带礼物，一件成衣或一截布料，主家要摆席面，仪式是庄重而严肃的。

四妹子跟着二姑，到吕家去出席见面仪式。

麦苗吐穗了，齐摆摆的麦穗直打到人的胸脯上。太阳冒红，四妹子觉得身上热躁，脸上渗出细密的汗珠子。

“见了人家老人，要叫爸，要叫妈，甭学那硬嘴子，和人白搭话。”二姑叮嘱她说，“我新近得知，这家人讲究礼行，家法规矩严，甭让人家头一回见面就说咱山里人不懂礼行。”

“嗯。”四妹子应着，心里不由得毛乱起来。上回背见，她是主家，他是客人；这回她是客人了，实际是供吕家大小以及他们的亲朋好友看的，看他们的三娃子瞅下了个什么模样的媳妇。啊呀！听说吕

家人口多，家族大，亲戚朋友也不少，这种被人观赏的场面该是多么难堪……

“放稳当，甭慌！”二姑说，“人都有这一回难场，过去了也就过去了。”

三天前，按照刘红眼约定的日子，二姑陪着她，跟吕建峰和刘红眼到西安去扯布，这回由吕建峰的二嫂陪着。经过两头周旋，刘红眼告知二姑，由男方出二百块钱扯衣料，不管买多买少，质量好坏，以二百元为限额。五个人厮跟着，坐公共汽车进西安，转一座百货大楼，又转一座百货大楼，买了几件衣服之后，二姑悄悄提示她，要拣两件值钱的料子，吕家兄弟三个，妯娌们多，日后过门了，要再添件好衣服，不说大人舍不舍得花钱，单说妯娌们咬得你就受不了，这是最浅显的道理。必须在订婚扯布时，狠心买几身好衣服，男方受疼也得硬受。四妹子担心，不是说定二百块钱吗？二姑说她傻，那不过是个纸糊的围墙，你要买，他就得买，不买了，他们首先怕婚事塌了火。当然，也不能没个远近乱要。

四妹子茅塞顿开，勇敢地向毛料柜台走去，她一眼瞅中那卷毛哔叽，就站住不动了。

“走，四妹子。”刘红眼并不走上前，远远地喊。

四妹子站住不动，抚摸着毛哔叽布卷。

“四妹子，到北大街去，那儿刚修建下一座百货商场，货全好挑。”二嫂走上前来说。

四妹子故意不看她，站着不动。

四妹子听到刘红眼和二嫂在窃窃商议。她依然站着，如果她硬要买，他们会怎样继续要花招儿？二姑也悄声给她壮胆：“不去！就要这！”

刘红眼和二嫂以及吕建峰三人都围上来。轮到吕建峰说话了，他是主事人：“这太贵，不扯！”

四妹子说：“我就喜欢这布料。”

吕建峰说：“喜欢你去买，我不买了！”说罢，转过身，把皮兜往二嫂怀里一塞，走掉了。

四妹子像是受了侮辱，转过身，把二姑一拉，说：“刘叔，俺也走咧！”

刘红眼急忙拉住四妹子的胳膊。

二嫂从楼梯口把吕建峰也拽过来。

“这主意我坐了！买！”二嫂说，“四妹子喜爱这料子嘛，爱了就买么。为这点事闹别扭，划不来。买买买！”

一件哔叽料儿扯下来了。

吕建峰皱着眉头掏了钱，老大不高兴。

……

四妹子想到这里，心里觉得挺伤心。一抬头，猛然看见村口拥着一堆大姑娘小媳妇，几个小女子唱歌似的叫着四妹子的名字，她们在村口必经之地截住看她……

“抬起头走路，谁也甭搭理。”二姑说。

四妹子跟着二姑，从“叽叽咕咕”“嘻嘻哈哈”的夹道中走过去，直到刘红眼把她们引进吕家院子。

刘红眼引着四妹子，先走进上房里屋，指着一位老汉说，“这是你爸。”四妹子看也不敢看一眼，轻轻从嘴里挤出一个“爸”字。刘红眼又指着一位老婆说：“这是你妈。”四妹子又叫了一声“妈”。刘红眼又引着她到正堂客厅，这儿聚着好多人，刘红眼一一指给她：这是你大嫂、二嫂、大哥、二哥、姨妈、姨伯、大姑、大姑夫、二姑、二姑夫……她就一一叫过，那些人听着她叫，不好意思地应着。随后，刘红眼把她交给吕建峰，让他把她引到僻静的厦屋去。

他引着她，推开厦屋门，招呼她坐在椅子上。他从暖水瓶里倒下一杯水，递到她面前，说：“喝点水。”

四妹子没有抬头，接住了水杯。

他在把茶杯递到她手里时，歪一下头，悄声怨艾地说：“那晚在你家，你给我连水也没让一杯。”

四妹子一抬头，看见他佯装生气的眼睛，立即争辩道：“倒了水咧！”

“那是二姑给我倒的，不是你。”他说。

“谁倒都一样，只要没渴着你。”她说。

“不——一——样！”他拖长声调，煞有介事的郑重的口气，一板一眼地说着，随之俯下身，眼里闪射着热烈的神光，“不管咋样，我今

日完全彻底为你服务。”他对她滑稽地笑笑，就走出门去了。

四妹子坐在小厦屋里，心在咚咚地跳，这个陌生的家，就是她将来的家，她将与刘红眼刚才一一介绍过的那些爸呀妈呀哥呀嫂呀在一个大锅里搅勺把儿，在一个院子里过日月。他似乎不像背见时留给她的憨乎乎的印象，而变得有点像另一个人了。是的，在他们家里，他出出进进都活泼泼的，说话还有点滑稽，竟然记着她没有亲手给他倒茶水的事，可他那晚只会说“没意见……”

这间小小的厦屋，盘着一个土炕，炕上铺着粗家织布床单，被面也是黑白相间的花格家织布料，桌子上和桌子底下的地上，堆着两三个拆开的马达的铁壳，红紫色的漆包线、螺钉、锥子、钳子等，混合着机油和汽油的气息充斥在小厦屋里。四妹子虽然嗅不惯这股气味，却对屋子的主人顿生一种神秘的感觉。

大嫂进来了，拉她去吃饭。

早饭是臊子面，听二姑说，关中人过红白喜事，早饭全是吃臊子面。她和那些亲戚坐在一张桌子边，二姑坐在贴身的同一条长凳上。吕建峰跑前奔后，给席上送饭。他把一碗臊子面先送到坐在上首的刘红眼面前，然后送给二姑，然后送给四妹子，然后送给其他亲戚，次序明确。四妹子又想起他说的没有给他倒水的话来。他又端着空盘出去了。

大家都十分客气，彬彬有礼，互相招呼，推让，谁也不先动筷子，只有刘红眼带头发出第一声很响的吸吮面条的声音之后，随之就响起一阵此起彼落的吸食面条的声浪，声音像扯布，“嗞啦——嗞啦——”四妹子最后才捉住筷子，轻轻挑动面条，尽量不吃出声音……

刚刚吃罢饭，四妹子又被大嫂引进厦屋，背见时已经见过一面，并不陌生。大嫂长得粗壮，大鼻子大眼阔嘴巴，完全以主人的神气说话：“四妹子，你看看，你的女婿娃儿给屋里净堆了些啥？你一看就明白，我三弟是个灵巧人儿哩！”

门外腾起一阵“叽叽嘎嘎”的笑声，大嫂忙迎出去。四妹子从门里看见，一伙姑娘媳妇拥进房里，正在看那些布。那些几天前扯回来的布，现在放在上屋里的桌子上，供人欣赏。想到那天扯布时为那件毛哔叽发生的纠葛，她心中至今感到别扭，他一甩手竟走了！为了节省几十块钱，他宁愿与她吹！她就值那一件毛哔叽料子吗?

那些媳妇姑娘看够了，议论够了，就像洪水一样涌进厦屋来，欣赏她来了。她们全都用一种奇怪的眼光盯着她看，压着声儿笑着，窃窃私议着，不知谁从门口叫了一声：“多漂亮的个人儿呀！”全都“哈哈嘎嘎”笑起来。她们也不坐，互相搭着肩，拉着手，只是从头到脚盯着她看。四妹子被看得不好受，也无法回避，不过没有人调笑，二姑说，订婚时是不兴许胡说乱闹的，只许来看，看买下的衣料，看媳妇的人品，那就让人看吧！

这一拨姑娘媳妇看够了，嘻嘻笑着议论着走出门去了，另一拨媳妇姑娘又拥进来看……整整一个大晌午，川流不息，四妹子和买下的那些衣物展览在这儿，供吕家堡的女人们欣赏，品评，嘻嘻哈哈笑，直到摆上午席来，那些女人才哗然散去。四妹子又被大嫂拉上饭桌，没有食欲。她顿然悟觉出来，订婚的这种场面，是一种舆论形式，向全体吕家堡村民以及吕克俭的新老亲友宣布，吕建峰订下了这个媳妇，日后要再反悔，那就承担众人的议论吧！

午饭以后，又有人来继续观赏。四妹子实在受不了了，悄悄催促二姑："回吧！"二姑劝她耐心，说这里就是这号风俗，谁家女子都免不了这一回，尽管她们看别人，她们终有一天也要被人看，被人欣赏的。

直到日压西山，四妹子和二姑在吕建峰全家人和亲戚簇拥中走出门来。两位老人在门口停步了。几位亲戚送到街巷里也停步了。大嫂和二嫂一直陪送到村口，再再道歉，说没有招待好客人，再再叮嘱，路上慢行。出村以后，四妹子长舒一口气，身上的芒刺全都抖落干净了。她忍不住说："刘叔，你也回吧。"

刘红眼哈哈一笑："我的任务还没完成哩！"

吕建峰落在最后，胳膊上挎着一只大红包袱，说："刘叔，让她们顺手捎回去……"

"胡说！"刘红眼瞪起眼睛，"哪有让人家自己带回去的道理？这是你娃子给人家四妹子的聘礼聘物，必得由你送去才见诚意。你只图简单，连规矩也失丢了……"

……

十天没过，刘红眼又踏进二姑家门来，是一家人正在吃夜饭的当儿。刘红眼带来吕家的动议："五一"结婚。只是出于一条非常现实的考虑，赶在夏收前结了婚，可以分一份口粮，而夏季的麦子是一年的主要口粮。刘红眼设身处地地说："其实，这样也好，吕家多分一份口粮，你这儿也减少了负担。四妹子在你这儿住着，既不能分口粮，连工分也挣不成；吕老大倒是想得周到，迟早是一家人喀……"

“先让四妹子说话。”跛子姑夫倔倔地说，声明他并不嫌弃妻子的侄女吃他的口粮，“咱家不管粮多粮少，有咱吃的，就有四妹子吃的，这能见外？四妹子在咱家，就是咱家的娃嘛！”

“赶得太紧！”姑婆也发表声明，“订婚上下才几天……”

“你看呢？”二姑瞅着四妹子。

“姑……你看着办……”四妹子低着头。

“你说结就结，你说不结咱就不结。”二姑很干脆，“反正在咱家住一年半载，有你的吃，也有你的穿。你姑夫刚才说了……”

四妹子想，反正迟早都要过吕家去，在那儿名正言顺分得一份口粮，就是吕家堡一个社员了，可以上地挣工分了。住在二姑家，虽然姑婆和姑夫不会怕她吃了粮食，终非长久之计。关中这地方粮食虽则比陕北富裕，也是按人口定量分配，谁家也没有三石五石的储存。有点剩余粮食，看得宝贝似的，悄悄地都卖给粮贩子了，一斤麦子卖到五毛多，一斤苞谷也卖二毛八。她若住仨月半年，吃掉的粮食卖多少钱呢？“五一”结婚虽然紧迫了点儿，终究有这回事。她头没抬，却是很肯定地说：“就按刘叔说的办。”

刘红眼又急忙忙赶到吕家回话去了。

跛子姑夫站起来，慨然说：“既然这样，也好，早结了早安心过日月，两头都好。”他又专门说给二姑，“人家吕家不是送给三个礼吗？”二姑点点头。

四妹子不知姑夫提这礼钱干啥，一愣。那是二百四十元钱，一个是八十块，正好三个。关中订婚专门施用的单位，一个礼等于八十。

“这些礼钱，一个也甭留，全部给四妹子办成嫁妆。”姑夫说，“四妹子是咱侄女，远离二老，咱就给娃办得体体面面的，甭叫人笑话！”说罢，就朝饲养场去了。

二姑深情地望着走出门去的姑夫一拐一歪的身影，忽然流出泪来，搂住四妹子的肩膀，动情地说：“看见了没？你姑夫脚腿不好，心好。姑就是这点福分……”

五

“五一”出嫁！

一家人全都自觉地投入到四妹子出嫁的准备事项中去了。二姑把吕家买下的衣料，一包袱提到杨家斜大队缝纫组，给四妹子量了身材，把春夏秋冬四季的衣服就交给缝纫组去做了。二姑再三叮咛缝纫组会计，必定要在四月三十日以前交货。二姑又跑到大队木工房，定做下一对箱子，尺寸要大号的，颜色要油漆成红色，黄色镀铜锁扣，必须在四月三十日前漆干交货。定价五十块，二姑叮嘱会计，年终从分配中扣除。跛子姑夫毫无怨言，再三说这是应该的。吕家给的三份聘礼二百四十元，一分未动，由二姑指使姑夫到镇上邮政代办所寄回陕北老家去了，这儿终究比那儿日子好过点。每办完一件事，二姑都要掐着指头计算一下距离“五一”所剩的时日。她与一般庄稼汉男女一样，习惯用农历计时，农历和公历的时日差异弄得她糊里糊涂，说这个鬼阳历把她给弄颠倒了。她亲自到镇供销社去扯被面，选择洋布床单，不惜花费自己的库存。嫂子和哥哥离得远，照顾不上，她是四妹子的姑姑，权当是父亲和母亲，一定要按村里一般人家打发姑娘的规格打发四妹子，要尽量弄得体面。

四妹子不知自己该做什么。二姑给她说，要给吕家老人做一对枕头，给两个哥哥和两个嫂子一人做一双单鞋，还要给吕建峰做一双单鞋，作为进吕家门的见面礼，在结婚那天要供宾客欣赏，一看新人的孝心，二看新人的针线活儿手艺，马虎不得。四妹子扎鞋帮，纳鞋底，麻绳勒得掌心里麻辣辣疼。她给二姑说，眼看要到“五一”了，太紧张，干脆买塑料鞋底算了。二姑严肃地告诉她，这见面礼必须手工做，不能用机器制品代替，不然人家会说你心意不诚，还要说你不会针线哩！关中人讲究大，得入乡随俗，不能马虎。看看四妹子的难色，二姑又瞅见了跛子姑夫，把一副纳鞋底的夹板塞给跛子姑夫，叫他喂过牛闲下时赶一赶紧。跛子姑夫欣然从命，笑笑说，我纳得不好，将来怕毁了四妹子在吕家的名誉！姑婆自觉担当起做饭扫地和管娃娃的家务，她说她一生没抓养过女儿，没享过打发姑娘出嫁的福，这回算是尝到了。四妹子现在更多地体味出来，二姑嫁了多好的一户人家，跛子姑夫人厚道，姑婆待人也亲畅，再也不觉得姑夫的腿脚有什么不好了。她扎着鞋帮，心中暗暗祈愿，要是吕家的老少也像跛子姑夫一家人就好了，就算四妹子烧了香、念了佛了！

时光老人脚步不乱。“五一”国际劳动节，全世界劳动阶级的喜庆节日，姗姗而来。

四妹子被二姑叫醒，爬起来就穿衣裳，刚抓起衫子；却瞥见枕边整整齐齐搁着一摞新衣服。这是二姑昨晚特意叮咛过的，今天从里到外全部换上没上过身的新衣。她把手里的那件黄色仿军衣上衫搁下了。

她脱下了日夜不曾下身的背心，就看见了自己的赤裸的胸脯，心跳了。似乎从来也没有留意，胸脯这样高了，那两个东西什么时候长得这样大了！她捞起新背心，慌忙穿上了。

四妹子不知道自己该去干什么。她蹲到灶下去烧火，二姑把她拉起来，说一会儿就会落下满头柴灰。她去扫地，姑婆又夺了扫帚，说她今天压根儿不该动这些东西，应该去好好打扮一下，静静坐着，等着吕家迎亲的马车来。

她坐在屋子里，透过窗户，可以看见院子里的葡萄架上的叶子嫩绿得能滴下水来。天空高远，白云和蓝天相间。窗户吹进凉丝丝的晨风。她忽然想到大了，也想到妈了，连同弟弟和妹妹。大也许和妈正在窑洞里念叨着哩！他们无法来看着女儿出嫁，把自己的责任完全放心地交给二姑了，又怎么能不操心呢?

四妹子又想到妈妈给她掏屎的情景……

“怕该来了！”二姑说，“四妹子，把脸再洗洗，把头发梳梳……”

四妹子猛然倒在二姑怀里，想哭，眼泪随之就涌流下来：“姑，我想大，想妈咧！”

二姑紧紧抱着她的肩膀，也哭了：“你就哭几声吧！我的苦命的女子……”

四妹子再也忍不住，哭起来，出了声。

二姑贴着她的脸，一动不动，让她哭一场。女儿离娘，难免痛哭一场。她现在既是姑又是娘啊！看着侄女儿哭得浑身颤抖，她劝她要节制，哭红了眼睛就不雅观了。

“姑……”四妹子哭溜着声儿，“我离不得……你……”

“傻话！”二姑疼爱地说，“天下女子都要出嫁……”

“姑……”四妹子说，“我总觉得……跟梦里一样……”

“都这样。”二姑平静地说，“都这样。”

都这样。四妹子止了哭声，还在抽泣，既然都这样，她也就这样。

门外有人慌急地说，吕家迎亲的马车来了。四妹子一惊，脑子里迷蒙蒙变成一片空白。二姑把她一推，说：“快！快去洗脸梳头！拿出高高兴兴的样儿来。我去招呼人家……”

四妹子坐在马车上，周围坐着二姑家左邻右舍的姑娘们。她们被二姑拉来，陪伴她出嫁，也到吕家堡去坐一次席，吃一顿好饭。

马车在关中平原的公路上行进，马蹄铁在黑色的柏油公路上敲出清脆的有节奏的响声。沿着公路两边排列的高大的白杨树，叶子闪闪发亮。路边一望无际的麦子，麦穗摆齐了，现出灰黄的颜色。布谷鸟从头顶上掠过去，留下一串串动人的叫声。进入初夏时节的关中平原，正如待嫁的姑娘一样青春焕发，有一种天然的迷人的气韵。

快要进入吕家堡的时候，马车赶上了那些抬彩礼的小伙子。他们给吕家兴致勃勃来帮忙，抬着她的全部嫁妆头前走了。哎呀，看看，他们把被单围在腰间，花枕巾搭在头上，粉红色门帘围成裙子，花衫花袄穿在身上，打扮得妖里妖气，嘻嘻哈哈朝村里走去。陪伴她的一位嫂子说：“这是这儿的风俗，你甭恼。都这样。”二姑把隔壁一位媳妇请来陪伴她，保驾她，不懂的事由这位嫂子指导，应酬。

吕家堡村口被人围得水泄不通。四妹子低下头，听不清那些人的笑声和议论的话。马车从一街两行夹道欢迎的吕家堡男女中间一直走

过去。鞭炮声“噼噼啪啪”骤然爆响，马车停了，四妹子抬头一瞧，车正停在吕家街门口。

四妹子朝车下一看，两位已经见过面的嫂子，笑逐颜开地伸出手来，扶她下车。车下的地上，铺着一层麻袋，两位嫂子搀着她，缓缓踏过一条麻袋，又一条粗线口袋接着向大门铺过去，踏过的麻袋被陌生的汉子揭起来，又铺到前头去了。昨晚上，二姑告诉她，按照关中地方的风俗，出嫁时从娘家到婆家的路上，新鞋的鞋底是不能沾土的，从娘家屋被人背上马车，再踏着铺垫的口袋、麻袋一类东西，一直走进洞房里去。旧社会是讲究铺红毡的，而且坐轿；现在马车代替了花轿，红毡也被装粮食用的麻袋和口袋一类东西代替了。二姑特别叮嘱说，如果下车时发现没有铺垫物，那就给他们不下车，请也不下，拉也不下，直抗到主家铺好路，不然就失了身价了。四妹子沿着麻袋和口袋铺就的小道儿走到门口，往前就断了，既没有口袋，也没有麻袋，两个汉子腋窝下夹着口袋和麻袋，示威似的乜斜着眼睛，仰头抱肘望天。搀扶她的大嫂在她耳根悄悄说：“快拿出‘份儿’来！”四妹子心中顿然醒悟，从口袋里掏出两个用红纸包着五毛票儿的“份儿”，交给大嫂。大嫂给那两个汉子一人手里塞一个，在他们的头上和腰里抽一巴掌，嗔骂道：“快铺！贪货！”那俩汉子得意地把纸包塞进衣袋，就猫下去铺道儿了。当四妹子抬脚跨进大门的一瞬，心里咯噔一下，这就是自己的家了，真跟做梦一样啊！

走到厢房门口，两扇漆刷成黑色的门板关死了，几个女子在门里喊着要“份儿”。二嫂又从她手里接过两个红纸包，从启开的门缝塞进去，同时用肩膀一扛，门开了，一把把四妹子拽进去。门口呼啦一声拥进来一伙青年男女，几十双手一齐伸过来，喊着“给份儿”！喊着他们的功劳，挪了嫁妆了，挂了门帘了，抬了箱子了，打了洗脸水

了……四妹子被挤在旮旯里，动不得身，几个女子已经动手在她兜里掏，混乱中，不知哪个没出息的东西在她屁股上狠狠捏了一把……

四妹子由大嫂二嫂引到院子里，空中架着席棚，临时搭成的主席台前，他已经早站在那儿了，拘束不安地歪着身站着。席棚下的桌子边，已经坐满了亲戚友人，准备开席吃饭。婚礼是新风俗和旧礼仪的生硬的掺和。她和他先朝领袖像三鞠躬；再由主持婚礼的一位干部模样的人宣读结婚证书，更是绷平脸儿的官腔官调；再接着由她和他合声朗读贴在领袖像两侧的语录。一边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和“农业学大寨”两句，另一边是领袖赞颂“青年人是八九点钟的太阳”那段。这三段语录，四妹子早就听顺耳了，可是临到自己要一个字一个字去朗读的时候，却结结巴巴起来。她不敢不念，就嗫嚅着，蒙混过关了，好在并没有人讲认真，婚礼一项一项进行下去，也没有太难堪的事，她照着勉强都做了，没有多少意思，晕晕乎乎还是像在做梦，梦中又想起妈给她掏屎的情景……

院子里的席棚下，十张方桌上的食客全都操起竹筷，紧张地在盘里碟里抄菜，客客气气地推让着烧酒瓷壶，腾起一片杂乱的咀嚼食物和说话的声响。大嫂牵着她，二嫂牵着她，去向客人敬酒。刘红眼坐在主席台前首桌上席，得意扬扬接过四妹子斟下的一杯酒，脖子一仰，红眼眨闪几下，忙坐下吃菜去了。他撮合成了这一桩婚姻，理应受到客主宾朋的尊重，现在是最荣耀光彩的时刻。四妹子手里提着烧酒壶，吕建峰提着酒瓶，一席挨一席敬过去，大嫂和二嫂向她介绍席面上的所有重要的亲戚，大舅、大妗子、二舅、二妗子、大姑、二姑、姨妈、姨夫，一一介绍下去。四妹子一下也记不准这么多亲戚，只顾给小小的酒盅里斟了酒，再走到另一个桌子边……

四妹子被两位嫂子牵着，一一送亲戚出门，上路，到村口，把回着糕礼的竹笼或提兜交给大舅和姨妈，看着他们在村外的土路上姗姗走进落日的昏光里，再转回家来，送另一家……

天刚落黑，街门口不断走进吕家堡的男女。吕建峰和他的两个哥哥，分头到村子西头和南巷去邀请那些行过“份子礼”的乡亲乡党，他们花了一块钱的份子礼钱，作为乡亲情谊。现在悠悠走进院来，在老公公热情而毕恭毕敬的招呼声中，款款落座，说着逗笑的话。一会儿，席间坐得满盈盈的了，菜和酒都端上去了。刚开席，院子里大声笑闹起来，那些老庄稼人把老公公抱住了，压倒了，涂抹了一脸红颜色，像个关公了。老婆婆也被女人们封住了，从锅灶下摸来锅底的烟墨，抹得老婆婆满脸就像包公，院子里的笑闹的声浪简直要把席棚掀起来……吕建峰领着她，到席间又去敬酒，那些老庄稼汉友好地伸出巴掌，打吕建峰的脑袋，说些笑骂的话，他一律笑笑，缩头缩脑躲避那些来自左右的友好的袭击。待他领她逃回新房里的时候，天啊！窄小的厦屋里已经拥满了年轻人，炕上横七竖八躺着的、坐着的，炕下脚地上拥挤得没有她站脚的地方了。她站在门外，正迟疑间，被一只手猛力一拉，拽进门去了，七嘴八舌一齐朝她进攻：

“来！给我点烟。”

“唱歌唱歌！”

“哈！给我勒一下裤带，新娘子……”

她被簇拥着，和他站在人窝中间。她很紧张，无所适从，好多张嘴脸朝她嘻嘻笑着，有的嘴角叼着纸烟，噘着嘴，伸到她脸前，要她给他们点火。她不知该不该点，他立时划着火柴，要去点，被谁打掉

了。他只好把火柴塞到她手里，让她满足闹房者的要求。她划着火柴了，刚够着烟，却被叼着烟的调皮鬼吹灭，好不容易才点燃了一支支烟卷，后面又有人挤过来……

“掏长虫吧！”有人喊。

“掏雀儿吧！”又有人叫。

四妹子低下头，不好意思看任何人，心儿抖抖地跳。昨晚，姑婆给她说，关中结婚的风俗，三天不分老少辈分儿，可以说笑耍闹，特别是闹房，是新娘子最难熬的一关。顶难为的就是“掏长虫”“掏雀儿”几个花样。“掏长虫”是要新娘把一块手绢从新郎的一条腿脚塞进去，从另一条腿下拉出来。同样，“掏雀儿”却是要新郎把一块手绢从新娘的一只袖口塞进去，从另一只袖口掏出来。两只手交接手绢的部位，正是人身体最隐秘的羞耻地带。姑婆说，这是老辈子传流下来的鬼花样，而今不兴这么闹了，有些村子还在耍，得防备防备，免得临场惊慌失措，不到万不得已，决不从命。姑婆又千万嘱咐，无论如何，不准变脸也不兴恼怒，得罪下人是要伤主家面子的，这也是老辈子传流下来的规矩……现在，吕建峰被闹房的小伙子压倒了，扭胳膊的人使劲扭住他的双臂，压腿的人压死了他的双腿。有人把一块手绢塞到她的手里，推推搡搡，吆喝着要她去“掏长虫”。四妹子臊红了脸，低着头，扔掉了手绢，怎么好意思呀！这当儿，门口挤进一位干部模样的青年，说：“让她唱唱歌儿吧！甭要那些老花样了。要是传到公社去，当心挨头子！现在正在批‘回潮’哩！甭在风头上惹祸……”

厦屋里鸦雀无声了，扭着压着他的胳膊腿脚的人同时松了手，也没有人推搡她了。小伙子们互相瞅着，做着鬼脸。四妹子此刻倒真的觉得无所适从了。突然，不知谁喊了一句：“绑了！”几个人一齐动

手，不由分说，一条麻绳把她和他面对面捆绑在一起，推倒在炕上。哗的一声，小伙子们拥出门去了。那位干部模样的青年立时红了脸，悻悻地转身走去了。

她和他捆在一起。她压在他的身上，动弹不得。他羞红了脸，喘着粗气，一股陌生的男人的气息扑到她的脸上。她别过脸，不好意思看他，她的脖子又酸又疼，稍一松懈，就会碰到他的鼻子。大嫂哈哈笑着走进来，解开了绳子。她抚摸着被捆得烧疼烧疼的胳膊，不好意思说话。大嫂说："咱爸叫你俩去一下……"

里屋正堂的方桌上，一对红漆蜡闪闪发亮，墙壁上贴着一张画，是一只回头吼叫着的老虎。桌上支着两个神匣，匣子里各有一根木板主柱，写着一行黑字。老公公坐在桌旁的椅子上，庄严地说："给你爷和你婆烧一炷香，让你爷你婆在阴世知晓，他们的三孙子完婚了。"

吕建峰从香筒里抽出三支香，在漆蜡上点燃，恭恭敬敬地又显得笨拙地插到香炉里了。

四妹子也抽出三支香，在漆蜡上点烧的时候，胳膊抖抖地晃，插进香炉时，却把一支弄折了，她的心里更慌了。

她和他并排站在神桌前，鞠躬，下跪，磕头，三叩首。

做完这一切，老公公一句话也没说，就挥手示意她和他退位。

重新回到厦屋，还没坐稳，二嫂端来两碗饭，递给她和他，说："合欢馄饨，快吃。吃了睡觉。"她不饿。从早晨起来到现在，她没有一丝一毫饥饿的感觉，看着他已经端起饰有金边的小碗儿吃起来，她也挑动了筷子，刚一张嘴，"咯嘣"一声，咬出一枚一分钱的硬币来。

二嫂惊叫说：“啊呀！有福气，头一口就咬上了……”大嫂也蹦进来了，嘻嘻笑着，惊叹她是个有福气的媳妇。四妹子才明白，吃到这个硬币的人，是福气的象征，不过似乎以往并没有享过什么福，吃糠饼子不算福气吧？让妈给自己掏屎算什么福气呢？也许，从今天开始，预示着她将要享福了吧?

“吃下去！快吃！”大嫂催促着。

“这是规矩，不吃不行，日后不吉利。”二嫂说得很严重。

四妹子看见，他很为难。二嫂把她咬出来的硬币塞到他手里，要他吃到嘴里去。他不好意思把那只粘着她的口液的硬币填进嘴里去。大嫂催促他，二嫂已不耐烦，疼爱地打他的脑勺，逼他。她心里一阵发紧，偷偷盯着他，他究竟吃不吃呢？他要是不吃，就是……四妹子一侧头，看见他把硬币一下子填到嘴里，不知为什么，她的心儿忽激一闪，身上热躁躁的了。两个嫂子哈哈笑着，收拾了碗筷，走出去了。

她坐在炕上，低着头，心里有些紧张，胸脯感到憋闷，呼吸不畅。结婚仪式完了，给死去的爷和婆烧过香叩过头了，合欢馄饨也吃下了，现在，还有什么新的或老的风俗习律要她去做呢？二嫂刚才说“吃了馄饨就睡觉”，大约再没有什么事了？她坐在炕边上，瞧一眼坐在桌旁的他，他有点失神地盯着对面的墙壁，也不说话。

“咣当”一声，临街的大门关上了，院子里响过一阵沉稳的脚步声，响到上房里屋里去了，有一声威严的咳嗽，是老公公。

又接连着两声“吱扭吱扭”的门扇响，大约是大嫂和二嫂在关门。

哄闹熙攘了一天的小院，完全静息了，五月夜晚的温馨的风，送来洋槐花的香气，小院里静极了。

他站起来，转身关上门，咣当！小厦屋与小院也隔绝了。

“铺炕。”他对她说。

她没有抬头，略一迟疑，就转身上炕。炕上的被子、褥子和单子，被闹房的小伙子揉搓得乱糟糟的。她动手扯平了褥子，又铺平了床单，展开了被子，把一只绣花枕头摆平，又抱起另一只枕头的时候，作难了，两只枕头该摆在一头呢，还是该摆到炕的那一头?

她正犹豫间，越觉胸脯憋闷，呼吸不畅了，稍一回头，突然看见，他已经脱得一丝不挂，正转过身去摸电灯开关拉线，“叭”一声，电灯灭了。她随之被他抓住胳膊，压倒了。他撕她的衣服，撕她的裤带，一只粗硬的手伸到胸脯上来了，他那么有劲地搂抱住她，那么莽撞蛮横地进入她的身体了。她几乎晕昏了……

六

太阳挨近地天相接的地方，变得双倍地大起来，整个西部天空都变成了红色，远处的地面上腾起一层红色的雾障。头顶的天空，缕缕轻纱似的云似动非动。绿色的麦穗和麦叶，也变成紫色的了。顺着灌渠排列的杨柳林带，静静地在蓝天上扯开一排绿色的屏障。渭河平原初夏时节的傍晚，呈现出富丽堂皇的气度。四妹子在田间大路上走着，又想起家乡此时的情景，太阳早早被门前那座荒草丛生的黄土山峁遮住了，天却久久黑不下来。

他——吕建峰，她的女婿，现在和她并排走着，一副漫不经心的散散涣涣的神气。

按照这儿的风俗，结婚的第二天，夫妻双方要到女方的娘家去回门，带上好酒、点心等四样礼物，去看望养育过女儿的老人。丈母娘和丈人爸必定要欢天喜地地热情接待女婿和女儿，七碟子八碗不消说，临告别时的一碗荷包鸡蛋是断不能少的。四妹子的大和妈远在陕北，千里之遥，无法向心爱的女婿娃儿表一番老人的心意，也没有福分接受女婿的敬奉之情，这一切全都由二姑来代替，二姑真是跟大和妈一样亲哪！现在，她和他到二姑家回门完了，正双双赶天黑前回到吕家堡去。

她在他身边走着，尽管已经有过昨天晚上的夫妻生活的第一夜，人生最神秘的大事已经失去了神秘的色彩，她依然感到局促。从她和他背见到昨晚，不过一个月时间，统共也就说下不过十来句话。她不摸他的脾性，也没有达到那种离不得的程度。她想和他说话，仍然羞口难开，说不清的重重顾虑。

“二姑待人好哇！给我吃那么多的鸡蛋，我都要吃不进去了！”他说。

“可你……还是吃下了。”她说。

“呃！你知道不知道？”他神秘地闪着眼皮，做出一副认真的模样，“丈母娘为啥要给女婿吃鸡蛋？”

“你是新客呀！”她不在意地说。

“不对不对。”他摇摇头，诡秘地笑笑说，“那是给女婿加料，盼得女婿上膘，晚上好多来几回……”

“啊呀……”四妹子听见这样赤裸裸的丑话，立时飞红了脸，羞得蹲下去，双手捂住脸，在路边的杨树下呆住了。

他哈哈一笑，走过来拉她的胳膊，趴在她的耳边说：“话丑理端。跟庄场上给种牛加料是一回事……”

“啊呀！”四妹子听见他越说越粗鲁，忽地站起来，用手打他的脊背。他笑着跑着，她追着他打。

一条大渠横在眼前。

他一蹺脚，从大渠上飞越而过。她站在渠边，看看又看看，没有勇气跳过去。

“叫声哥，我背你。”他在对岸说。

她转过身，朝原路往回走去，她给他示威，看他怎么办。她头也不回，加快了步子，一副回娘（姑）家去的死心塌地的走势。一阵奔跑的脚步声响起来，他终于堵在她面前了，嘻嘻哈哈笑着，装出一副可怜相：“好你哩！你要是走了，我今黑可只好搂着枕头睡了。”

四妹子真是哭笑不得，那么腼腆的吕建峰，现在尽是酸溜溜的话往外冒。她用拳头打他的肩膀，他不躲避，哈哈笑着：“用劲打！真舒服啊！女人打人真舒服哟……”

她和他顺着渠沿走，柳树浓厚的荫凉里，幽暗起来。他说下一串串粗鲁的话，着实叫她羞了，却也叫她和他亲近了。她很想贴着他的

肩膀走，却不好意思，而第一次想亲近这个关中男子的心思，毕竟萌生了。

“你知道这个大渠叫什么吗？”他指着大渠里的悠悠的清水问她。见她不答，他就炫耀起来，“这是泾惠渠的一个大支渠。泾惠渠，你听说过吗？嗬！历史书和地理书上都有记载，是我们这儿的李先生修的。李先生，关中地方的农民都知道……”

“不就是一条水渠！”她故意淡淡地说。

“一条水渠？一条什么样的水渠呀！”他被她轻淡的口气反而激将起来，“多大呀！多长啊，浇多少地啊！打多少粮食啊！有了这条渠，关中地方才旱涝保收咧！你想想，这是在解放前，在清朝吧？啊呀，反正是在旧社会修起来的，容易吗？听说李先生在北京念过书，还留过洋，是大水利专家。你们那儿……有这样的水渠没有？”

四妹子哑口了。陕北家乡有一眼望不透的黄土山包，光秃秃的，旱季里连草也枯死了，哪儿有这样平的地，这样清冽冽的渠水，这样为民造福的李先生？如果有这样好的水和地，她会跑到这儿来找他吕建峰吗?

“你们陕北有‘信天游’。”他讨好她说，“真的，我在初中念书时，语文老师说‘信天游’是陕北的民歌。我听广播上唱，真好听。不过，老是只唱那五首，听多了也就烦了。”

“我们陕北的好东西多着咧！”四妹子自豪地说，“就说这信天游吧，多得谁也数不清，哪儿只是广播上唱的五首！”

“你唱一段给我听。”他很诚恳地说。

“你叫我一声……姐吧！”她有机会报复他了。不过，刚一说出口，自己先脸红了。

“姐——吔——”他大声嘶吼起来。

四妹子猛然一惊，惊慌失措地瞧瞧四面，正在引水浇地的农民正愣愣地瞧他俩。

“姐吔——”他又连着叫，而且回过头来，抱怨地说，“你为啥不应声哩？”

“啊呀！快别叫了！”四妹子恐慌地说，“旁人要把你当疯子了！”

“那……该你唱歌了。”他装出傻瓜相。

四妹子被他撩拨得真的想唱歌了，心儿忽闪闪跳，瞄一眼身旁这位关中大汉，故意装出的傻愣愣的模样，她觉得挺有趣，挺可爱。她略微镇静一下，压低声儿唱起来——

提起个家来家有名

家住在绥德三十里铺村

三哥哥爱见个四妹子

你是我的心上人

……

“啊呀！真好！”他眼里闪着奇异的光彩，感叹着，“这是你随口编的不是？”

“不是。”四妹子说，“老早就有的。”

“那怎么把咱俩都唱上了？”他问，“你是四妹子，我在俺家为老三，人都叫我三娃子，你倒亲得叫我三哥哥……”

“啊呀！我可不知道你叫啥……三娃子！”四妹子抱屈地说，“俺可只知道你叫吕建峰。”

“巧合巧合！”他大大咧咧地说，“再唱一首吧！最好……唱段更酸的。”

四妹子不由得瞟他一眼，唱起来——

你想拉我的手

我想亲你的口

拉手手呀嗨

亲口口

咱二人旮旯里走

……

他突然站住脚，抓住她的手，两只大眼里烧着火焰，痴呆呆地说，声音都抖颤着：“你唱得……真好！四妹子，我想拉你的手，也想亲你的口，咱俩好好过一辈子！”

四妹子瞧瞧四周，悄声说：“人来了。”

他丢开她的手，颤抖着声音：“四妹子，我知道你受了苦，你们陕北人日子都苦。我会好好照顾你的。”

四妹子的心忽闪忽闪跳起来，这个粗壮的关中大汉尽管说得笨拙，却很真诚，她现在真想扑过去，贴在他的宽阔的胸脯上，使自己的心儿有个牢靠的依托。在她还没有鼓起勇气的时候，他已经把她抱离地面，搂到他的怀里，那双胳膊简直要把她的腰搠断了。

天色完全暗下来。

四妹子就伏在他的怀里，双手勾着他的脖子。她的心里踏实极了，幸福极了。她达到自己那个想来确实卑微的目的——与能吃难拉的糠饼子告别——了。她找下一个可心的女婿，身体壮健，不是残疾人，而且喜欢她，这比那些众多的同乡女子（包括二姑）只能找到一个聋子或跛子的境况好出得远了。

今晚回到吕家堡，在那个已经并不陌生的小院里，明天将开始她的新的生活，不再是客人，而是吕家的一个成员了，是吕家堡大队一个正儿八经的社员了。可以想到，今晚睡在那间小厦屋里有新被褥铺盖的土炕上，将要比昨晚美妙得多……

中篇

七

乡谚说，老子少不下儿子的一个媳妇，儿子少不下老子的一副棺材。

给三娃子建峰的媳妇娶进门，游结在克俭老汉心头的疙瘩顿然消散了。三个儿子的三个媳妇现在娶齐了，作为老子应尽的义务，他已经完满地尽到了；至于儿子回报给他和老伴的棺材，凭他们的良心去办吧！他今年还不满六十，身体没见啥麻缠病症，自觉精神尚好，正当庄稼人所说的老小伙子年岁，棺材的事还不紧迫，容得娃子们日后缓缓去置备。

真不容易啊！自从这个操着陕北生硬口音的媳妇踏进门楼，成为这个三合院暂时还显得不太谐调的一个成员，五十八岁的庄稼院主人就总是禁不住慨叹，给三娃子的这个媳妇总算娶到家了，真是不容易啊！

吕家堡的吕克俭，在本族的克字辈里排行为八，人称吕老八，精明强干一世，却被一个上中农成分封住了嘴巴，不能畅畅快快在吕家堡的街巷里说话和做事。上中农，也叫富裕中农，庄稼人卑称“大肚子中农”。政府在乡村的阶级路线是依靠团结中农，打击孤立地主、富农。对上中农怎么对待呢？政府在乡村的阶级路线是依靠贫农下中农，没有明文规定，似乎是处于两大敌对阵营夹缝之中，真是说不清是什么滋味了。队里开会时，队干部在广播上高喉咙粗嗓门喊着，贫下中农站在左边，“地富反坏右”站到右边，阵势明确，不容混淆。这种时候，这种场合，吕老八就找不到自己应该站立的位置了。在这样令人难堪的时境里，吕克俭已经养成一种雍容大度的胸怀，心甘情愿地瞅到一个毫不惹人注目的旮旯蹲下去，缩着脑袋抽旱烟。

这种站不起又蹲不下的难受处境，虽然不好受，时间长了，也就习惯了。最使老汉难受的两回事，毕竟都已过去了。一九五〇年土地改革定成分，三十出头的年轻庄稼汉子吕克俭，半年时间，把一头黑乌乌的短头发熬煎得白了多一半，变成青白相杂的青丝蓝短毛兔的颜

色了。谢天谢地，土改工作组里穿灰制服的干部，真正是说到做到了实事求是，给他定下了富裕中农的成分，而终于保住了现有的土地、耕畜和三合院住房。他拍打着青丝蓝兔毛似的头发，又哭又笑，简直跟疯了一样，只要不被划为地主或富农，把这一头头发全拔光了又有啥关系！

万万没想到，十来年后又来了“四清运动”。这一回，历时半年，吕克俭的青丝蓝兔毛似的头发脱掉了一多半，每天早晨洗脸时，顺手一搓，头发楂子刷刷掉在水盆里。吕家堡原有的三户富裕中农，一户升为地主，一户升为富农，两位已经佝偻下腰的老汉，被推到那一小撮的队列里去了，作为惩罚，每天早晨清扫吕家堡的街巷。谢天谢地，吕克俭又侥幸逃脱了，仍然保持着原有的上中农成分。这一回，他没有丝毫的心思去感激那些“四清干部”的什么“实事求是”的高调了。没有把他推到地主富农那一档子里去，完全出于侥幸，出于运气，从贴近工作组的人的口里传出内幕情报，说是为了体现政策，不能把三户上中农全部升格为地主富农，必须留下一户体现政策，不然，吕家堡就没有上中农这个特殊地位的成分了。

“四清运动”结束后，吕克俭摸着脱落得秃秃光光的大脑袋，对老伴闪眨着眼皮，说出自己的新的人生经验：“你说，工作组为啥在三户上中农成分里，专选出咱来‘体现政策’？咱一没给工作组求情，二没寻人走门子，为啥？”老伴不答，她知道他实际不是问她，而是要告诉她这个神秘的问题。果然，吕老八很得意地自问自答：“我在吕家堡没有敌人！没有敌人就没有人在工作组跟前乱咬咱，工作组就说咱是诚心跟贫下中农走一条道儿的。因此嘛！就留下咱继续当上中农。”

这是吕克俭搜肠刮肚所能归结出来的唯一一条幸免落难的原因。得到这个人生经验，他无疑很振奋，甚至抑制不住这种冲动，跑到院

子里，把已经关门熄灯的儿子和媳妇以及孙子都喝叫起来，听他的训示：

“看明白了吗？甭张狂！你只要一句话不忍，得罪一个人，这个人逢着运动咬咱一口，受得！人家好成分不怕，咱怕！咱这个危险成分，稍一动弹就升到……明白了吗？咱好比挑了两筐鸡蛋上集，人敢碰咱，咱不敢碰人呀！我平常总是说你们，只干活，甭说话，干部说好说坏做错做对咱全没意见，好了大家全好，坏了大家全坏，不是咱一家受苦害，用不着咱说长道短。干部得罪不起，社员也得罪不起。咱悄悄默默过咱的日月，免遭横事。这一回，你们全明白了吧？不怪我管家管得严了吧？”

一家人全都信服老家长了。

“四清”收场，“文革”开锣，吕家堡村的工分一年年贬值，成分却日渐升价。贫农下中农的成分越来越值钱，地富成分且不说，中农也不大吃香了，上中农几乎无异于地主富农。吕克俭为三娃子的媳妇就伤透脑筋了，旁的条件且不谈，一提上中农这个成分，就使一切正常的女子和她们的家长摇头摆手。谁也拿不准，说不定明天开始的某一运动，就轻而易举地把上中农升格为富农或地主了，谁愿意睁眼走进这种遭罪的家庭？眼看着三娃子上唇的汗毛变成了黑乎乎的胡须，脸颊上日渐稠密地拥集起一片片疥子疙瘩，任何做家长的都明白孩子的身体发育到了该结婚的紧迫年龄，却只能就这么拖着……谢天谢地，杨家斜村突然来了这个陕北闺女，不弹嫌上中农成分，他抓紧时机，三下五除二，当机立断，办了。

经过对新媳妇进门来一月的观察，克俭老汉发现，这娃不错，勤苦，节俭，似乎是意料中事。从贫瘠的陕北山区到富裕的关中来的女

人，一般都显示出比本地人更能吃苦，更能下力，生活上更不讲究。四妹子已经到地里开始上工，干活泼势，不会偷懒，尤其在做计件工分时，常常挣到最大工分。这个新媳妇的缺陷也是明显的，针线活儿不强，据说陕北不种棉花，自然不会纺线织布了。灶锅上的手艺也不行，勉强能擀出厚厚的面条，吃起来又松又泡，没有筋劲儿。据说陕北以洋芋小米为主，很少吃麦子，自然学不下擀面的技术的。所有这两条，作为关中的一个家庭主妇，不能不说是两个令人遗憾的不足，不过，有精于纺织和灶事技能的老伴指教，不难学会的。最让吕老八担着心的，是这个陕北女子不太懂关中乡村甚为严格的礼行，譬如说家里来了亲戚或其他客人，应该由家长接待，媳妇们在打过招呼之后就应退避，不该唠唠叨叨。四妹子在大舅来了时，居然靠在桌子边问这问那，有失体统。譬如说在家里应该稳稳当当走路，稳稳当当说话，而四妹子居然哼着什么曲儿出出进进，有失庄重。所有这些，需得慢慢调理，使得有点疯张的山里女子，能尽快学会关中的礼行，尤其是自己这样一个上中农家庭，更容不得张狂分子！

不管怎样，吕老八的心情，相对来说是好的。在棉田里移栽棉花苗儿，工间歇息时，队长向大家宣传大寨政治评工的办法，他坐在土梁上，噙着旱烟袋，眼睛瞅着脚旁边的一个蚂蚁窝出神。蚂蚁窝很小，不过麦秆儿粗细的一个小孔，洞口有一堆细沙，证明这洞已经深及土层下的沙层了。有几只蚂蚁从洞里爬出来，钻到沟垄里的土块下去了，又有一只一只小蚂蚁衔着一粒食物钻进洞去了。他看得出神，看得津津有味，兴致十足，把队长说的什么政治评工的事撂到耳朵后边去了。

吕老八继续悉心观察蚂蚁。这一群小生灵，在宽阔的下河沿的田地里，悄悄凿下麦秆粗细的一个小洞，就忙忙碌碌地出出进进，寻找

下一粒食物，衔进洞去，养育儿女，快快乐乐的。蚂蚁没敢想到要占领整个河川，更没有想到要与飞禽争夺天空，只是悄悄地满足于一个麦秆粗细的小洞。人在犁地或锄草的时候，无意间捣毁了它们的窝洞，它们并不抱怨，也没有能力向人类发动一场复仇战争，只是重新把洞凿出来，继续生活下去。

吕老八似乎觉得自己就是一只蚂蚁了，那麦秆粗细的窝洞无异于他的那个三合院。在宽阔肥沃的下河沿的川地里，他现在占着那个仅有三分多地的三合院，每天出出进进，忙忙碌碌。随便哪一场运动，都完全可能捣毁他的窝洞，如同捣毁这小小的蚂蚁窝一样。

吕老八不易让人觉察地笑了笑，笑自己的胜利，外交和内务政策的全部胜利。他和他的近十口人的家庭成员，遵循忍事息事的外交政策，处理家门以外的一切事宜，几十年显示出来的最重要成效，就是没有在越来越复杂的吕家堡翻船。只是保住这一条，吃一点亏，忍一点气，算什么大不了的事呢?

在村子里，他是个鳖一样的人，不挣工分，骂不还口，似乎任谁都可以在他光头上摸一把。而在家里，吕老八却是神圣凛然的家长。他治家严厉，家法大，儿子媳妇以及孙子孙女没有哪个敢冒犯他的。媳妇们早晨给他倒尿盆。媳妇们一天三顿饭给他把饭双手递上来。媳妇们没有敢翻嘴顶碰他的。十口之家的经济实权牢牢地掌握在他的手中，一切大小开销合理与否由他最后定夺。这样富于尊威的家庭长者，在吕家堡数不出几个来，就说那个队长吧，讲起学大寨记工分办法来一套一套的，指挥起社员来一路一路的，可是在家里呢? 儿媳妇敢于指名道姓骂他，他却惹不下。吕老八活得不错。

他的眼睛从蚂蚁窝上移开了，漠然盯着农历四月晌午热烘烘的太阳，心里盘算已定：该当给三儿子进行一次家训，让他明白，应该怎样当好丈夫，这个小东西和媳妇刚厮混熟了，有点没大没小的样子。一个男人，一旦在女人眼里丢失了丈夫的架势，一生就甭想活得像个男人，而且后患无穷。吕家堡村里，凡是女人当家主事的庄稼院，没有不多事的。女人嘛，细心倒是细心，就是分不清大小、远近、里外。必须使这个明显缺乏严格家教的山区女子，尽快接受吕家的礼行，使她能尽快地谐调统一到这个时时潜伏着危险的庄稼院里来……训媳莫如先训子。

八

晚饭吃罢，帮大嫂洗刷了一家人的碗筷，把小灶房收拾清白，锁上门，四妹子揭开自家厦屋的洋布门帘，看见三娃子正坐在椅子上看书，她轻脚蹑步走到他背后，双手蒙住他的眼睛。三娃子从底下伸过手来，在她腰里搔了一把，她不由得放开手。他却就势把她按倒在炕上，搔她脖窝和胳肢窝，痒得她忍不住“嘎嘎嘎”笑着，在炕上打滚、讨饶。他却不饶，依旧使劲挠她搔她。这时候，屋里传来老公公呼叫“建峰”的声音，他吐一下舌头，缩一下脖子，走出门去了。

四妹子整理一下衣襟，跳下炕来，捞起纳布鞋鞋底的夹板。婆婆在把麻和抹褙子的布交给她的时候，郑重交代了，从今往后，三娃子的衣服鞋袜统由她管了，要是穿着太脏，或者穿得露出大拇指的烂鞋，村人不笑男人，而要笑话他的媳妇了，男人的穿戴是女人的面皮。婆婆又婉言替她计划，应该在新婚的头一年里，抽空做下够男人和自己穿五年的布鞋和棉鞋，以防一年后怀里抱上娃娃，就忙得捉不住夹板了。这是任何一个新媳妇都难得避免的事，趁早准备好，做得

越多日后越轻松。四妹子很感激老婆婆对她的指教，决心在孩子出现以前，先把鞋准备充足，免得日后发紧迫。

进得这个家庭以后，她和建峰很快混熟了，熟悉了，便更喜欢他了。这个关中小伙子，身体长得健壮，模样也不赖，高眉骨，高鼻梁，条形脸，很有男子汉气魄。他不大说话，尤其在村子里，从不多嘴多舌参与队里的什么纠纷。他在屋里也不大说话，尤其跟老公公说话更少。他在小厦屋里，和她枕在一只枕头上，却轻声细语说这说那，说他在中学念初中时，物理和数学总是考满分，毕业那年，刚碰上“文革”，没能参加高中和中专考试，就回家来了。他家的成分高点，自知不敢在村里参与什么活动，就在家里看闲书，竟然对电机摸出门道了，学会修理马达了。

四妹子初到这个家庭一月来的印象，没有什么不满意的事。这个家庭的生活是令她满意的，早饭一般喝苞谷糁子，午饭总要吃一顿细面条，晚饭也是喝苞谷糁子，馍馍通常是玉米面捏的，但逢年过节，总会吃到麦子面馍馍，粗粮虽然多了点，总都是正经粮食啊！不像在老家陕北，总吃糠，顶好是洋芋，而洋芋在关中人的餐桌上，是菜不是主食。

她的建峰身怀绝技，常常给队里修马达，挣一份技术工，他原来就在自己的小厦屋修理，婚后挪到大队一间空房里去了。没有马达需要修理的时候，他就去大田里出工。晚上，他从来不出去串门，也不和其他小伙子们凑热闹，只是抱着那本电工技术书看得入邪。她就坐在他旁边的小凳上，抱着夹板锥纳鞋底，轻轻哼他喜欢的陕北民歌的曲调，小两口热热火火。这个十口之家的大家庭的大事，比如用粮计划，比如经济收支，比如应该给某一家亲戚应酬的礼物，统由两位老人操心，用不着她费心。她在这个看来庞大的家庭里，其实最清闲

了，轮着她上工的时候，自有妇女队长来通知。要说当紧的事，倒是该尽快学会各种面条的擀法，以及纺线织布的技术。关中产棉花，人为了省钱，不买洋布，仍然习惯于纺线织布，穿衣做鞋或做被单。

家里的饭，是由三个媳妇轮流做的，每人一月。现在轮大嫂做饭，她有空就给大嫂帮忙，一来自己闲着，干点烧锅洗碗的活儿也累不了人，二来是跟大嫂学习擀面做饭的技术，熟悉熟悉这个家庭吃饭的习惯。轮过二嫂之后，就该轮着她了。她已大致明白，每顿饭动手之前，大嫂先请示老婆婆，做啥饭呀？老婆婆负责调节食谱。饭做熟之后，先舀出两碗，第一碗先端给老公公，第二碗再端给老婆婆，自然都需双手；然后再给孩子们舀齐，一人一碗，打发完毕，才给平辈的弟兄和妯娌们舀了。第一茬舀过，第二茬则由各人自己动手，大嫂只负责给两位老人续舀，以及给够不着锅沿的孩子舀饭，这是规矩，难也不难，四妹子渐渐就懂得了。

没有了吃的忧愁，又有一个基本可心的女婿，四妹子高兴着哩。至于这个家庭的上中农成分的高低，于她似乎没有太大的关系，入党才讲究成分，招工才论成分的好坏，这些事儿她压根想也没想过，只是希求有粮吃有衣穿有房住，有一个能得温饱的窝儿活下去，原本就是抱着这样卑微的目的从陕北深山里跑到这大平原上来的呀！

建峰被老公公叫进里屋去好久了，还没见回小厦屋来，说甚大事，要这么长时间呢？

一阵蔫踏踏的脚步响，门帘一挑，建峰进来了。四妹子一眼瞅出来，他皱眉耷眼，不大高兴，和刚才出门去的时候相比，两副模样。家里遇到甚事了吗？四妹子猜想，也有点紧张。

建峰从暖水瓶里倒下一杯水，坐在椅子上，喝了一口，叹了口气，出气声不大匀称。

四妹子忍不住，小心地问：“咋咧？”

“咱爸训了我一顿。”建峰悻悻地说。

“训你甚？”四妹子问，“你做下啥错事咧？啥活儿没干好是不是？”

“说我没家教。”建峰说。

“没家教？”四妹子听了，不由得问，“怎么没家教了？”

建峰叹口气，又喝了口水，没有解释，半晌沉默，才说：“日后，你甭唱唱喝喝的了。”

“咋哩？”四妹子睁大眼睛，突然意识到老公公一定说了自己的好多不是，忙问，“我口里哼个曲儿，犯着谁啦？”

“咱爸说咱家成分不好，唱唱喝喝，要让别个说咱张狂了。”建峰传达老家长的话说，“咱们成分不好，只顾干活，甭跟人说东道西，指长论短，也甭唱唱喝喝……”

“统共就轮着我上了三晌工，只有那天后晌放工时，我回家走在柳林里，哼了几句。”四妹子说，“咱家成分不好，连一句曲儿都不能哼呀？我在自家厦屋哼几句，旁人谁管得着呢？管得那么宽吗？”

“咱爸讨厌唱歌。”建峰说，“咱爸脾气倔，见不得谁哼哼啦啦地唱唱。”

“那好，不唱了。”四妹子叹口气，试探地问，“除了不准唱歌，咱爸还说啥来？”

“咱爸说，走路要稳稳实实地走，甭跳跳蹦蹦的。”建峰说，“让人见了说咱不稳重。”

“不准唱，不准蹦。”四妹子撇撇嘴，“还有啥呢？”

“还有……甭串门。”建峰说。

“我没串过门呀！”四妹子说，“连一家门也没串过，我跟左邻右舍不熟悉，想串也没处去。”

“咱爸说，大嫂二嫂的屋里也尽量甭串。”建峰说，“各人在各人的厦屋里做针线活儿，别没大没小的。”

“还有啥呢？”四妹子赌气似的问。

“咱爸说，男人要像个丈夫的样儿，女人要像个媳妇的样儿。”建峰说，“不准嘻嘻哈哈，没大没小的。”

四妹子不吭声了，麻绳穿过布鞋鞋底的“嗞嗞”声在小厦屋里格外清晰，不准唱歌，不准嬉笑，不许在村里和人说话，也不许在自家屋串大嫂和二嫂的门子，那么，她该怎样过日子？她在陕北家乡，上山背谷子背得腰酸肩疼，扔下谷捆子，就唱喝起来了。在娘家时，虽然吃的糠饼子，油灯下，她哼着忧伤的曲儿，哼一哼也就觉得心肠舒和了。有时候，她哼着，母亲也就随着哼起来了，父亲坐在窑外的菜园子边上，也悠悠地哼起“揽工人儿难”来了。她没有想到，哼一哼小曲儿会不合家法，甚至连说话、走路，都成了问题，是关中地方风俗不一样呢，还是老公公的家教太严厉了？

她现在才用心地思量这个家庭成员的行为举止来，才有所醒悟。老公公早晨起得早，在院子里咳嗽两声，很响地吐痰之后，大嫂和二嫂的门随着也都开了。老公公一天三晌扛着家具去出工，回家来就喂猪，垫猪圈，起猪圈里的粪肥。他噙着短烟袋，可以在猪圈里蹲上一个多钟头，给那两头克郎猪刮毛、搔痒、捉虫子。

老公公总是背着一双手进院出院，目不斜视，那双很厉害的眼睛，从不瞅哪个媳妇的开着或闭着的屋门。四妹子进得这个家一月多来，没见过老公公笑过，对大嫂和二嫂那样的老媳妇也不笑，对大嫂和二嫂的五个娃娃也不笑。娃娃们总是缠老婆婆，很怯爷爷，甚至躲着走。大哥在外村一所小学教学，周六后晌回来，和父母打过招呼，晚上和大嫂在自家的厦屋里，也是悄没声儿的，住过一天两晚，周一一早就骑着车子上班去了。二哥是个农民，有木工手艺，由队里支派到城里一家工厂去做副业工，一年半载才回来一回。二哥回来了，也是悄悄默默的，不见和二嫂说什么笑什么，只是悄没声儿地睡觉。

四妹子回想到这些，才觉得自己确是有点儿不谐调了。她曾经奇怪，一家人整天都绷着脸做啥？说是成分不好，在队里免言少语也倒罢了，在自个家里，一家人过日月，从早到晚，都板着一副脸孔多难受啊！现在，她明白了，老公公的家法大、家教严。这个上中农成分的家庭，虽然在吕家堡灰下来了，可在那座不太高的门楼里，仍然完整地甚至顽固地保全着从旧社会传流下来的习俗。她不能不尊奉老公公通过她的女婿传达给她的教诲，这是第一次，如果再这样下去，可能就会发生不愉快的事。她刚到这个家庭才一个月，不能不注意老公公对她的看法和印象……

“这有啥难的？”四妹子轻淡地说，“从明日开始，我绷着脸儿就是了。”

“咱家的规矩，凡家里来了客人，亲戚也罢，外边啥人也罢，统统都由老人接待，晚辈人打个招呼就行了，不准站在旁边问这问那。”建峰继续给她传达老公公的家法，“咱爸说，前一回二舅来了，你在旁边说这说那，太没礼行……”

四妹子臊红了脸，她想分辩，又闭了口，建峰说的是老公公的旨意，向他分辩有什么用呢？那天二舅来了，她给倒下茶水，问候了两句，本打算立即退下来，好让老公公陪二舅说话。可是，二舅问她在陕北哪个县，哪个公社，离延安多远，还问那儿的气候、物产，社员的生活。二舅在西安一家什么信箱当干部，人挺和气，不像老公公那样令人生畏。她在回答了二舅的问话以后，也问了些二舅在西安的生活情况的话，平平常常，之后就赶忙给二舅做饭去了……万万没想到，老公公对这件事上了心，说她不懂礼行了。看来，除了上工劳动和做饭吃饭以外，在这个家庭里，最好什么也甭说，什么也甭管，想到这儿，四妹子加重语气，带着明显的赌气的口吻说：“赶明日我绷紧脸儿，抿着嘴儿就是了！”

九

和老公公的一次正面冲突终于发生了。

夏收夏播的大忙时月过去了，生产队里的活儿却不见减少，只是比收麦和种秋这些节令极强的活儿不显得那么紧火罢了。天旱得地上冒火，建峰日夜轮流在河川浇灌刚刚冒出地皮的苞谷苗儿。她和两位嫂子常常同时被派到棉田里去锄草，去给棉苗“抹裤脚”“打油条”“掏耳屎”。老公公自不必说了，也是一日三晌不停歇。老婆婆坐在场院里的树荫下，看守刚刚分下的麦子，要撵偷吃的鸡或猪，要用木齿耙子搅

动，晒得一咬一声嘎嘣脆响，就可以放心地储藏起来了，不出麦蛾子也不生麦牛了，一家人的粮食啊！

这天晌午，四妹子正在棉花行子里给棉花棵子“掏耳屎”，一个回家给娃喂罢奶来到棉田的嫂子告诉她，二姑来了。四妹子给妇女队长请了假，奔回村子来。

二姑坐在街门外的香椿树下，四妹子叫了一声“二姑”，就伸手从街门上方摸出钥匙，开了锁，把二姑让进院子。屋里没有人，她引着二姑坐进自己的小厦屋。三句话没说完，她抱住二姑哭了，竟然忍不住，哭出声来了。

“是建峰……欺侮你来？”二姑问。

“呜呜呜……”她摇摇头。

“公公婆婆……骂你来？”二姑又问。

“呜呜呜……”她仍然摇摇头。

“俩嫂子……使拐心眼来？”二姑再问。

“呜呜呜……”她哭得身子颤抖着。

二姑搂住她，就不再问了，眼泪扑踏踏掉下来，滴在侄女的头发上。

四妹子想哭。一家老少，没人打她，也没人骂她，吃也是尽饱吃，没有什么能说得出口的委屈事，可她说不清为啥，只是想哭。她躺在二姑怀里，痛痛快快哭起来，倒不想说什么了。

她绷着脸上工，绷着脸在小灶房里拉风箱或擀面条，绷着脸给两位老人双手端上饭去，绷着脸跟大嫂、二嫂说一句半句应酬话，甚至和建峰在自己的小厦屋里也绷着脸儿……她觉得心胸都要憋死了。

自从那晚老公公对建峰训导之后，建峰的脸儿也绷起来了，比她还绷得紧挺得平。他不仅跟她再不嬉笑耍闹了，连话也说得少了，常摆出一副不屑于和她亲近的神气，即使晚上干那种事的时候，也是一句不吭，生怕丢了他大丈夫的架子，随后就倒过去呼呼大睡，再也不像刚结婚那阵儿搂着她说这说那了。

四妹子感到孤单，心里憋闷得慌，吃饭无味，做活儿也乏力，常常在田间歇息的时候，坐在水渠边上，痴呆呆地望着北方，平原远处的树梢和灰蒙蒙的天空融为一体。她想大了，也想妈了，只有现在，她才明显地感觉到了公公婆婆和亲生的大大妈妈的根本差别。在这宽阔无边的大平原上，远远近近数不清的大大小小的村庄里，没有她的一个亲人，除了二姑，连一个亲戚也没有。她常常看见大嫂和二嫂的娘家兄弟姐妹来看望她们和孩子，她俩也引着孩子去串娘家，令人羡慕。她们可以把自己的欢心事儿说给娘家亲人，也能把自己的委屈事儿朝父母发泄一番，得到善意的同情和劝慰，然后又在夕阳沉落时回到这个令人窒息的三合院来。四妹子无处可去，只有一个二姑家，又不能常常去走动，二姑一人操持家务，也不能经常来看她。她的心胸间聚汇起一个眼泪的水库，全部倾泻到二姑的胸前了。一家人全都出工去了，时机正好，她可以痛痛快快哭一场，而不至于被谁听见。

哭过一场，心胸间顿然觉得松泛了，头却因为哭泣而沉闷，和二姑说了会子话，问了跛子姑夫和姑婆的身体，又问了杨家斜夏收分得的口粮标准，劳动日带粮的比例，看看太阳已经移到院子中间，该做

午饭了。她要去请示婆婆，中午做什么饭，为了不使婆婆看出她哭过，就用毛巾蘸了水，擦了脸。

因为二姑的到来，因为倒出了胸间聚汇太多的泪水，她的心情舒悦了，轻盈地走过吕家堡的街巷，来到村子北边的打麦场上。刚刚经过紧张的夏收劳动的打麦场，现在清闲下来了，一页一页苇席把碾压得光光净净的场面铺满了，新麦在阳光下一片金黄。她远远望见，婆婆正和一位老婆婆在阴凉里说闲话。走到当面，她欢悦地向家庭长者报告："妈，俺二姑来咧。"

"来了好。"婆婆盯她一眼，说，"你招呼着坐在屋里。"

"妈，晌午做啥饭呀？"四妹子问。

"做糁子面。"婆婆淡淡地说。

四妹子心里一沉，忙转过身，怏怏地朝回走。屋里往常来了客人，不管是大舅二舅，或是俩嫂子的娘家亲戚，免不了总要包饺子，擀臊子面，最起码也要吃一顿方块干面片子。四妹子的二姑来了，也算得吕家的一门要紧亲戚，婆婆却让她做糁子面。糁子面，那是在糁子稀饭里下进面条，是庄稼人节约细粮的一种饭食，大约是普遍重视的中午这顿饭里最差池的饭了。

四妹子往回走，心里好不平啊！这是对她亲爱的二姑的最明显的冷淡接待了。论说二姑也不稀罕吃一顿饺子或者臊子面，人家在自家屋里也没饿着。这是带着令人难以承受的冷淡和傲慢，甚至可以说是把亲戚不当人对待的明显的轻侮。她的刚刚轻松了的胸膛，现在又憋满气了。

她重新回到屋里时，注意掩饰一下自己的愤恨，不使二姑看出来，免得使她难受，万一让二姑觉得受到怠慢而一气走掉，那就更难收拾了。她让二姑歇在屋里，自己钻进灶房去做饭。

大嫂和二嫂从棉田里放工回来了。二姑从屋里出来，和两位嫂子说话。俩嫂子见有客人来，都洗了手，到灶房里来帮忙。这也是一条家规，凡有客人到来，不管轮着谁值班做饭，大家都要插手帮忙，以表示对客人的敬重，也给任何客人造成一种三妯娌齐心协力、家事和谐的气氛。

“你咋给锅里拂下糁子了？”大嫂惊问。

四妹子低头在案板上擀面，没有吭声。

“咋能给二姑吃糁子面呢？二姑常不来。”二嫂也责怪她。

四妹子讷讷地说：“咱妈叫做的……”

俩嫂子互相看一眼，再不说话了。

四妹子切好面条，听见院子里响起熟悉的脚步声，知道公公回来了，就把下面的事交给两位嫂子，自己走出小灶房，向公公低低地说：“爸，俺二姑来……”话音未落，二姑已经从小厦屋出来，笑着搭话问候：“你放工了？”

老公公“嗯”了一声，放下手里的铁锨，没有朝里屋走，转过身说：“你歇下。”随之就走出二门，跳进猪圈里，蹲下身去了。

四妹子愣住了，老公公的冷淡与傲慢是这样毫不掩饰，甚至故意给客人难看的举动，使她无所措手足了。二姑脸上立时浮出尴尬的神

情，悻悻地笑笑，只好再转身走进小厦屋。

往常里，家里有亲朋来，老公公平时绷紧的脸上就呈现出热切的笑颜来接待，立即放下手中正在忙着的一切活儿，把客人领到上房里屋去，喝茶，抽烟，拉家常。现在，老公公蹲在猪圈里，矮墙上冒起一缕缕蓝色的烟雾，不见有出来的征兆。

直到舀好了饭，老公公才在她的催促下跳出猪圈，走回里屋，坐在他往常招待客人的桌子旁。二姑也在两位嫂嫂的谦让中走向桌子的另一侧。

“快吃。”老公公总算开口招呼客人了，“家常便饭，甭见怪。”

二姑装出毫不在意的样子，端起碗来。

大嫂提出让她去替换婆婆回来，老公公立即制止了：“算了，你给她端去一碗算了，她说她不回来了。”

四妹子心里又一沉，老婆婆连二姑的面也不见，这更是注意礼行的老婆婆所少有的举动。

别别扭扭吃罢饭，二姑就告辞了。

送走二姑，四妹子回到厦屋，趴在被子上，哭不出也吃不下饭，越想越觉得窝气，太下贱人了呀！

后晌，她在地里干了一后晌活儿，仍是想不通。晚饭后，她走进老公公的里屋，低着头：“爸，我明日想到俺姑家去……”

老公公盯她一眼，没有说话，低头点燃一袋烟，仰起头来，就佯装出毫无戒备的口气说：“好嘛！按说夏忙毕了，去散散心也对。可眼下队里正浇地，棉田管理也紧火，等忙过这一阵儿，棉花打杈过头遍，地也浇完了，你再去。”

四妹子靠在婆婆的炕边没有说话。

吕老八很满意自己对这个小媳妇的回答。今天中午，他放工回来，顺路到麦场上看看麦子晒干的程度，老伴告诉他，三媳妇的二姑来了，三媳妇和她二姑在厦屋哭成一团。她说她回家去喝水，听见人家哭，没敢惊动，悄悄又退回到晒麦场上来了。吕老八一听就火了。

吕老八心里说，你三媳妇在你二姑怀里哭，必是说俺吕家亏待了你嘛！让邻舍左右听见了，还不知猜疑什么哩！再说，你作为二姑，到俺屋来不劝自己侄女，竟陪着哭，好像俺吕家真的压迫你的侄女了！再说，亲戚来了，不先与主人打招呼，钻在自己家侄女厦屋，成啥礼行？你侄女不懂礼行，你做大人的也不懂？你既然不尊重俺屋的规矩，我就不把你当上宾待！

他很赞成老伴的举动：用糁子面招待！

作为回敬，他拒不邀她进上房里屋，躲在猪圈里，你晾着去！

吕老八盯着朝他提出走娘（姑）家要求的三媳妇，心里已经意识到，她给他示威。他慢待了她的二姑，有气说不出，要走娘（姑）家去了。他不硬性拒绝，只是说活儿忙，这在任何人听来，都是完全站得住脚的理由。让她和她二姑都想一想，为啥主家慢待了她？往后就不会乱哭一气了。

四妹子站在炕边，话从心里往上攻了几次，都卡在嘴边了，她想问，为啥慢待二姑？又不好出口。要求到二姑家去的示威性的举动，被老公公轻轻一拨，就完全粉碎了。她转过身，往出走去，决心留给他们一副不满意的样子，也让老公公想想去。

婆婆却在她出门的时候说："三娃子的棉衣棉裤该拆洗了，甭等得下雪才捉针……"

十

四妹子躺倒了。

昨天晚上，老公公婉转而又体面地拒绝了她的要走姑家的要求，她的第一次示威被悄无声息地粉碎了。她回到厦屋里，早早脱了衣裳，关了门，拉灭了电灯，躺在炕上，眼泪潸潸流下来，渗湿了枕头。

院子里很静，大嫂和二嫂，一人抱一张席箔，领着娃子到街巷里乘凉去了，老公公和婆婆也到场边乘凉去了，偌大的屋院里，现在就剩下她一个人了。三伏天，屋里闷热得像蒸笼，她的心里憋满了太多的窝囊气，更加烦闷难忍。她想放声痛哭一场，却哭不出来，如果哭声震动四邻，惊震了聚集在街巷和场边乘凉的男女老少，那么，她和老公公的矛盾就公开化了。她似乎还没有勇气使这种矛盾公开化，如果公开化了，很难有人同情她的。到这个家庭几个月来的生活，她已经大致了解到这个家庭在吕家堡是富于实际威信的。庄稼人被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和频频更换的政治口号弄得昏头晕脑，虽然不能不接受种种运动和种种口号对人们生活秩序和习惯的重大影响，可是对于绝大多数农民来说，他们依然崇尚家庭里的实际和谐。吕克俭虽然作为

大肚子中农被置于吕家堡的一个特殊显眼的位置上，时刻都潜伏着被推入敌对阵营的危险，令一般庄稼人望而心怯，自觉不自觉地被众人孤立起来了。然而，对于吕家的实际生活，却令众多的庄稼人钦敬，甚至奉为楷模，用一句时兴话说，是模范文明家庭。人都说老公公知礼识体，老婆婆是明白贤惠人，两位老人能把一个十多口人的家庭拢在一起，终年也不见吵架闹仗，更不与村人惹是生非，这在吕家堡的中老年庄稼人眼里，简直羡慕死了。这样一个在众人眼里有既定影响的家庭，如果因为自己的到来而吵架，而闹别扭，她即使有理也说不清了，她将会很自然地被人看作是搅槽鬼了。

二姑受到带有侮辱性的待遇，她说不出口，说了别人也还是要说二姑不懂礼行的，她只有眼泪，悄悄默默地淌。

四妹子听到脚步声，又听到敲门声了，是建峰。他白天黑夜在地里浇水，匆匆回家来，抱着大碗扒饭，嘴一抹就下河川去了。他负责四五眼机井上抽水泵的安全运转，发生故障及时修理，正常运行时，就躺在井台的树荫下睡觉，浇地的社员三班倒换，他是白天黑夜连轴转。听见他的脚步声，她没有拉灯，摸黑拉开了木门闩，随即爬上炕去，面向墙壁躺下了。

她听见他走进厦屋，顺手闭上门，拉亮了电灯。明亮的电灯光刺得她的眼睛睁巴不开，她用双手捂住，心里却在想：你老子今日把我二姑作践了！他也许不知道这件事，她猜不准，他的老子究竟给他说过没有？她一时又拿不定主意，要不要向他诉诉委屈？

他坐在椅子上，咕嘟咕嘟喝下了她凉在茶缸里的冷水，啪的一声关了电灯，咣当一声关上了木门闩子，她就感到了他的有劲的双臂。她依然面向墙壁，双臂拘着胸脯，拒绝那双手的侵略。

他一句不吭，铁钳一样硬的手掌把她制服了……他满足了，喘着气又勾起短裤，溜下炕，拉开门，一句话也没说，脚步声又响到街门外去了。

没有欢愉，没有温存，四妹子厌恶地再次插上门，几乎是栽倒在炕上。婚后的一月里，她对他骤然涨起的热情，像小河里暴涨的洪水一样又骤然消退了。自从那晚老公公对他训导之后，他就变成一个只对她需要发泄性欲的冷漠的大丈夫了。他不问她劳动一天累不累，也不问她身体适应不适应关中难熬的三伏酷热，更不管她吃饭习惯不习惯，总之，他对她的脸儿绷得够紧的了。她的月经早已停了，她几乎减少了一半饭量，有几次端起碗来，呕得汤水不进。他知道她怀上了，却说："怀娃都那样。听说过了半年就好了……"她想吃点酸汤面条，老婆婆没有开口做出这样的指令，她也不敢给自己做下一碗，一大家子人，怎么好意思给自己单吃另喝呢？她想吃桃儿，桃月过去了，一颗桃儿也没尝过。她想吃西红柿，这种极便宜的蔬菜，旺季里不过四五分钱一斤，老公公咬住牙也不指派谁去买半篮子回来。现在，梨瓜和西瓜相继上市了，那更是不敢想象的奢侈享受了……他从来也不问她一声，怀了娃娃是不是需要调换一回口味?

她到这个家庭快半年了，大致也可以看出来经济运转的过程，老公公把生产队里分得的粮食，统统掌管在自己手中，一家人吃饭的稀稠和粗细粮搭配，由老婆婆一日三顿严格控制。上房里屋的脚地，靠东墙摆着四个齐胸高的粗瓷大瓮，靠南墙和西墙摆着两只可墙长的大板柜，全部装着小麦，玉米则盘垒在后院的椿树和榆树的树干上。据说每天晚上脱鞋上炕以前，老公公像检阅士兵的总统一样，要揭起每一只瓷瓮的凸形盖子，打开木柜上的锁子，看看那些小麦，在后院的玉米垒成的塔下转一圈。不过她没有发现过，许是村里人的戏谑之

言。她确实看见过老公公卖粮的事，那是夏收前的青黄不接的春三二月，人睡定时光，屋里院里一阵自行车链条的杂乱响声之后，悄悄地灌了小麦，又灌了苞谷，那些陌生人的自行车货架上搭着装得圆滚滚的粮食口袋，鱼贯地从院子推出街门去了。她趴在窗台上，约略数出来，十一口袋。她明白，时下粮食交易的市价，小麦卖到六毛，苞谷卖到二毛七八，各按一半算，也有五百多块。这时候，建峰从里屋回到厦屋，头发上和肩头扑落着一层翻弄粮食的细末尘土。老公公做得诡，一次瞧准时机，把全部要卖的粮食一次卖掉，神鬼不知。不像村里一般庄稼人，见了买主就想卖，一百也卖，二百也卖，反显得惹眼。每年的这一笔重大收入，压在婆婆的箱子底儿，难得再出世。

另一笔较为重要的收入，就是养猪。政府禁止社员养羊、养牛、养蜂，视为资本主义的“尾巴”，只允许养猪。毛主席“关于养猪的一封信”，用套红的黄色道林纸印出来，家家户户屋内都贴着一份，是县上统一发下来的。老公公从地里回到屋里，扔下家具，就蹲到猪圈口的半截碌碡上，点燃旱烟袋，欣赏那头黑克郎，直到交给公社生猪收购站，装着七八十块钱回来，再愈加耐心地侍候那只两拃长的小猪崽。

第三笔重要收入，是大哥的工资。听说大哥的工资是三十九元，每月七日开支以后，必定在开支后的那个星期六回家来交给老公公，然后再由老公公返还给他十九元，作为伙食费和零用钱，抽烟，买香皂或牙膏一类零碎花销。老公公留下二十元，作为全家统筹安排的进项。老公公禁止儿子回家来买任何孝顺他老两口子的吃食，一来是家大人多，买少了吃不过来，买多了花销不起，于是在家里就形成了一种大家都能忍受的规矩，无论谁走城上镇回来，一律都不买什么吃食，大哥二哥的娃娃自然也不存任何侥幸。屋里院里从早到晚，从春到夏，都显得冷寂寂的，没有任何能掀起一点欢悦气氛的大事小事。

大嫂和二嫂，渐渐在她跟前开始互相揭短。二嫂说，这个屋里，大嫂一家顶占便宜了。大嫂一家五口，四口在吕家堡吃粮，每年的口粮款几近三百，而大嫂做不下二百个劳动日，值不到一百块，大哥交的二百来块钱，其实刚刚扣住自己家室的口粮，谁也没沾上大哥的什么好处。老公公明明知道这笔账该怎么处，还是器重大哥，心眼偏了。二嫂还说，大哥最精了，小学教员的伙食，月月没超过十块，而给老公公报说十五块，一月有九块的赚头了。二嫂说他们两口子最吃亏了，俩人一年挣五六百个劳动日，少说也值三百元，而四个人的口粮不到三百元，算来刚好扣住，而六百个劳动日秋夏两季可带的小麦和苞谷就有六百斤，六百斤小麦和苞谷黑市卖多少钱？老公公心里明白这笔账怎么算着，却不吭声，老也不记老二的好处。

二嫂这样算，大嫂却有自己的算盘。大嫂说，二哥订娶二嫂的七八百块钱，全是她的男人的钱，老二不记大哥的好处，有了媳妇就忘了拉光棍的难受，反倒算计起大哥了，跟着二嫂一坡滚！大嫂说，老二人倒老实，净是二媳妇鬼精。老二有木匠手艺，跟队里的副业组在城里十八号信箱做工，每月五十七块钱，给队里交四十块，计三十个劳动日，留十七块伙食钱，而实际上连五块钱也用不了。咋哩？民工自己起伙，粮由家里拿，自己只买点盐醋就行了，十七块钱伙食费都给自家省下了。更有叫人想不到的事，民工利用星期天或晚上加班，挣下钱就是自己的，不交队里，也没见过老二给老公公交过。二嫂搂下的私房钱谁也摸不清。净是苦了她的老大，被老公公卡得死死的，每月上交二十块，一年到头也买不起一件新衣服，她的男人是小学校里的教员中穿戴最破烂的一个……

四妹子心里反倒有了底：这个家庭里，其实最可怜的是她和男人建峰了。两位嫂嫂，都有一点使老公公无法卡死的活路钱，而她和老

三建峰真是被彻底卡死了。她和他在队里劳动，年底才决算，不管长出短欠，统由老公公盖章交办。这个家里通过各个劳动力挣来的粮食，也由老公公统一管理，卖下的余粮钱不做分配。她和老三连一分钱的支配权也没有，而俩人的劳动所得在这个家庭里却是最多的，花销却是最少的……吃亏吃得最多了。

结婚几个月了，公公和婆婆没给过她一分钱，老公公且不说，老婆婆难道不知道，起码需得买一沓卫生纸吧？总不能让人像老辈子女人那样，在潮红时给屁股上吊一条烂抹布吧？从二姑家出嫁时，二姑塞给她五块钱，就怕她新来乍到，不好张口向老人要钱，买沓纸啦，买块香皂啦。五块钱早已花光用尽，总不能再去朝二姑开口要钱吧？建峰睁开眼爬起来去上工，放工回来抱着大碗吃饭，天黑了就脱衣睡觉，从来也不问她需要不需要买一沓纸，纯是粗心吗？

他对她太正经了，甚至太冷了，他只是需要在她身上得到自己的满足，满足了就呼呼呼睡死了。她没有得到他的亲昵和疼爱，心里好委屈啊！

在老家陕北，有个放羊的山哥哥，他和她一起放羊，给她上树摘榆钱，给她爬上好高的野杏树摘杏子吃。她和他在山坡上唱歌，唱得好畅快。他突然把手伸到她的衣襟下去了，在她胸脯上捏了一把。她立时变了脸，打了他一个耳光。山哥哥也立时变了脸，难看得像个青杏儿，扭头走了。她自己突然哭了，又哭着声喊住他。他走回来，站在她面前，一副做错了事的愧羞难当的神色。她笑了，说只要他以后再不胡抓乱摸就行了。他跑到坡坎上，摘来一把野花，粉红色的和白色的野蔷薇、金黄金黄的野辣子花、紫红的野豆花，憨憨地笑着，把一枝一枝五颜六色的花儿插在她的头发上，吊在发辫上。可惜没有一

只小镜子，她看不到自己插满花枝儿的头脸，他却乐得在地上蹦着，唱着。

她想到他了，想到那个也需要旁人帮忙掏屎的山哥哥，心里格愣跳了一下。

这样过下去，她会困死的，困不死也会憋死的。没有任何经济支配权，也没有什么欢愉的夫妻关系，她真会给憋死的。

她终于决定：向老公公示威！

她睡下不起来，装病，看老公公和婆婆怎么办？看她的男人吕建峰怎么办？

窗户纸亮了，老公公沉重而又威严的咳嗽声在前院的猪圈旁响着，大嫂和二嫂几乎异口同声在院子里叮咛自己的孩子，在学校甭惹是生非，孩子蹦出门去了。院里响起竹条扫帚扫刷地面的嚓嚓声，那是二嫂，现在轮她扫地做饭了。老公公咳嗽得一家人全都起身之后，捞起铁锨（从铁锨撞碰时的一声响判断），脚步声响到院子外头去了，婆婆和大嫂也匆匆走出门上工去了，院子里骤然显得异常清静，只有二嫂扫地时那种很重很急的响声。没有人发现她的异常反应，他们大约以为她不过晚起一会儿吧？这倒使四妹子心里有点不满足，她想示威给他们看看，而他们全都粗心得没有留意，没有发觉，反倒使她有点丧气了。

“四妹子，日头爷摸你精尻子了！”二嫂拖着扫帚从前院走到她的窗前，笑着说，“快，再迟一步，队长要扣工分了。”她催她上工。

终于有人和她搭话了，不过却是不管家政的二嫂，她的主要目标不是二嫂而是老公公和老婆婆，转而一想，二嫂肯定会给两位家长传话的。她没有搭话，长长地呻唤一声，似乎痛苦不堪，简直要痛苦死了。

“噢呀！那你快去看看病。”二嫂急切的声音，她信以为真了。二嫂又说，“你现时可不敢闹病，怀着娃儿呀！”

“不咋……”她轻淡地说，却又装得有气无力的声调，“歇一晌……许就没事咧！”

“可甭耽搁了病……”二嫂关切地说，“不为咱也得为肚里的小冤家着想……”

四妹子又呻唤一声，没有吭声，心想，必须躺到两位家长前来和她搭话，才能算数。看病？空着干着两手能看病吗？二嫂即使不是落空头人情，属于实心实意的关照，也解决不了她的问题，她能给她拿出看病的钱吗？

四妹子决心躺下去，茶不喝米不进，直到这个十几口的大家庭的统治者开口……

十一

清晨的空气凉丝丝湿润润的。河川里茂密的齐胸高的苞谷苗子梢头，浮游着一层薄纱似的轻柔的水雾。渠水哗哗流淌，水泵嗡嗡嘶叫，浇地的庄稼人互相问答的声音，听起来格外清爽。这是三伏溽暑里一天中最舒服的时辰。

四妹子的示威取得了决定性胜利，老公公支使三娃子带她到县地段医院去看病。

四妹子坐在自行车后架上。她的男人吕建峰双手紧握着借来的这辆已经生锈的自行车车把，有点紧张又有点吃力地踩着脚踏子，在吕家堡通往桑树镇的土石公路上跑着。路道坑坑洼洼，两条被马车碾出的车辙深深地陷下去，铺着厚厚的被碾成粉末的黄土。自行车车轮颠颠蹦蹦，几次差点把她颠跌下来，尽管这样，四妹子的心情还是畅快的。她在打麦场上，在棉田的垄畦里，常常听见村里那些媳妇们津津有味地叙说男人带她们逛西安、浪县城的见闻，她现在就坐在三娃子的腰后，去桑树镇逛呀！想到自家去桑树镇的公开理由是看病，四妹子又有点懊丧。

前日早晨，她躺在被单下，一直躺到一家人纷纷收工回家吃早饭，也没起来。先是建峰回到厦屋，听说她病了，倒是一惊，让她到大队医疗站去看看病，她翻了个身，没有吭声。他催得紧了，她才冷冷地说：“没钱。”他说大队医疗站免费医疗，看病不收钱。她听了，更加冷声冷气地说：“要五分钱挂号费。我没有，你有没？”顶得他半天回不上话来，他身上也是常年四季不名一文。

老婆婆撩起门帘，走进来问：“害咋？”

四妹子软软地欠起身：“头疼，恶心……”

“到医疗站去看看。”

“……”

老婆婆在桌子上搁下一枚五分硬币，叮当一响，转身走出去了，尽到了老辈子人对晚辈儿媳很有节制的关怀。

她到医疗站去了，交了五分挂号费，那两位经过公社卫生院短期训练的医生，热情而又大方地给她开下不下两块钱的药片和药水，回家又躺下了。一直睡到昨天天黑，她忍着饥饿，没有吃一口饭，早饿得四肢酸软，头晕脑涨，口焦舌燥，嘴唇上爆出一层干裂的死皮，真的成了病人了。建峰惊声慌气地问："医疗站的药不投症？"她呻唤一声，不予回答，何必回答，其实那些药全都塞到炕洞里去了。老婆婆又来问过一次，随之就把建峰唤回上房里屋，终于传达下老公公的决定，让他带她到桑树镇的县地段医院去看病。

费了这么大的周折，付出了两天难耐的饥饿作代价，才争得了今日逛一逛桑树镇的机会，想来真叫人心酸。如果不是她装病，而是老公公大大方方给她几块钱，让她出去畅快一天，她大概会不停声地要叫"爸"了。无论如何，她达到目的了，尽管争得的手段不那么光明正大，她还是感到了一种报复后的舒心解气。

从土石公路转上通桑树镇的黑色柏油公路以后，车子平稳了。两天没有吃饭，心里饿得慌慌，腰也直不起来了。她觉得自己变得像一片落叶，轻飘飘的，在哪儿都站立不稳。她倚势趴在他的后背上，一只胳膊搂住他的腰，乳房抵着他的单衫下蠕蠕扭动着的脊梁骨，离开吕家堡村很远了，熟人见不到了，不怕难为情了。路面平整了，车子也平稳了，他踏得也轻松了，这才问："你难受得很吗？"

"嗯……"她恹恹病态地应着。

“再忍一下，马上到医院了。”他脚下踏得更快了，车子呼呼呼飞驰。

四妹子的脸无力地贴靠在他的宽阔的脊背上，他当她真的病下了，急慌慌带着她往桑树镇医院赶着。他虽然对她冷冷淡淡，却怕她病，更怕她死。他老实，一丝一毫也没有觉察出她的用心来。她问：“咱爸给下你多少钱？”

“五块。”他轻轻喘着气，不假思索地说。

“要是不够开药钱呢？”她问。

“那……”他略微顿一顿，“咱爸说，一般头疼脑热的病，五块够咧。咱爸说，要是麻烦病，需得再看，那他再给咱……”

“要是花不完呢？”四妹子试探着问，“剩下块儿八毛的，还要交给咱爸吗？”

“当然……按说应该交给老人。”他说，“咱屋家大人多，没有规矩不成。用时朝老人要，花过剩下的该交回去。”

“咱爸还查验药费发票吗？”她挑衅地问。

他不吭声了。似乎于此才意识到她的问话里的弦外之音，含有对他老子的某些讽刺、某些嘲弄、某些不恭，他不回答了。

她也不问了，盘算着怎样充分地使用装在他口袋里的那五块票子，如果花去一大部分买下些她并不需要的药片和药面儿，太可惜了，县地段医院不是吕家堡医疗站，每一粒药丸都要算钱的。

桑树镇逢集日，男人和女人把街道上拥塞得满满的。她跳下车子，扶着他在人窝里挤。走到医院门口，她拽住了他的车子，说：“先吃点饭，我饿了。”他说：“看完病，消消停停地吃饭，再迟，怕要挂不上号了。”她执拗地说：“不要紧。先吃点饭。”他无可奈何地调转过自行车来。

她终于逡巡到一家国营食堂，走进门口一瞅，她的胃猛地掀动起来，扭得心口儿微微地痛了——她瞧见了饸饹。在一只大瓷盘子里，堆着小山一样高的饸饹，紫红色的条子，在服务员抓起时颤悠悠地弹着，她觉得自己完全可以吃掉那一座饸饹垒成的小山。饸饹是用荞麦面压的，而荞麦正是陕北家乡的产物，在家时，过年过节总能吃上一顿。关中不产荞麦，饸饹成为食堂里的商品饭食了。大热天，吃一碗凉饸饹，她该多惬意啊！

他买下两碗，搁在桌上，诚恳地催她快吃。

她多多地调上醋，凉生生的饸饹从冒烟起火的喉咙滚进翻搅着的胃部，她噎得打起嗝来，这才抬起头，不好意思地瞧瞧他，她才发觉他自己并没有吃，手里捏着一块干得炸开口子的馍馍，啃着，看着她吃。她停住筷子，紧紧地盯着他的眼睛：“你咋不吃饸饹？”

他歉意地笑着说：“我……吃馍就行咧！”

她心里忐忑一下，他只给她买下两碗，自己啃干馍，想省下几个钱来。她心里动了一动，随之就愤怒了，从他手里夺下馍来，塞到布袋里，把那一碗饸饹推到他面前，狠狠地瞧着他，直到他端起碗，提起筷子，憨憨地笑着低头吃起来。

她看见他吃得很香很馋，一碗饸饹只挑了三五次筷子就挑光了。她伸出手不容置辩地说：“把钱给我。”他没有吭声，从口袋里掏出钱来，交到她手上。

她接过那一沓折叠整齐的整块票儿和零毛毛票子，转身就走到买票的窗口，一下子又买下四碗来，堆到桌子上，对着他惊恐的眼睛说：“你吃，我也吃。”

他小声嗫嚅说：“要是不够看病咋办？”

“吃完饭再说。”她埋头畅快地吃起来。

她吃下三碗饸饹，似乎肚子里还可以装进三碗。她没有再去买，留下空隙再吃点别的久已渴盼的东西。她走在前头，他推着自行车跟在她后面。她在一个卖西红柿的小车前停住了，问了价，又还了价，买下三斤，装进帆布袋里，等不得用水洗，只用手绢儿擦一擦，就吃起来了。她塞给他两个，他满眼疑虑，没滋没味地吃着。直到她停站在一个西瓜摊子前，而且花掉一块八毛钱买下一个整个西瓜的时候，他吓得简直要哭了：“看病咋办呢？钱花完了……”她说：“我有办法，你甭急，先吃瓜……”

她和他蹲在瓜摊前的小桌前，三下五除二，吃完了一个西瓜。

她吃饱了，浑身都恢复了力气，心满意足了，做梦时不知多少回梦见吃着杏儿、桃儿、西瓜，醒来时枕头上泌着一片口水，今日算是畅畅快快地享了口福。看着郁郁不乐的他，她觉得他太傻了，傻得令人可怜，令人憎恨。再次走到医院门口，他咕哝说：“药费肯定不够了！”

“算咧！不看病咧！”她说。

他回过头，惊疑地瞪大了眼睛。

“我的病……好咧！”她笑着说，“西瓜和饸饹，比药灵哩！”

他大概现在才明白上了她的圈套，一下子没有了力气，顺势在医院门口旁的槐树下蹲下来，深深叹了一口气，有点生气地低下头。

她也想歇一歇，就在地上坐下来，瞅着他有苦难言的样子，悄悄说：“怎么办？买吃了这些东西，没开下一张发票，回去怎么给咱爸交账呢？”

他不计较她的挖苦，反倒问：“你真个没病？”

“现在……有病也没钱看了。”她揶揄地说，“想想回去怎么交账？”

他闷下头，又不吭声了。

“这样，”她说，“你甭作难。这五块钱，算是我借咱爸的，你给他说响，我迟早给他还了。”

“不不不，”他尴尬地笑笑，“不是这个话嘛！”

“建峰，”她低低地叫，“我说的是真话，不是要笑你。我今日敢花五块钱，实在是馋得受不了了！你知道，我有了，三四个月了。我也不知道，自肚里有了这东西，嘴里馋得……”

“你该早说……”建峰说。

“早说啥？你不知道，咱妈也不知道？”她说，“可我连……”她说不下去了，委屈得想流泪。看着街道上拥拥挤挤的男男女女，她忍住了泪，说，“你不替我想，也该替自个的后代想想。我要是生下来个瘦猴猴，你就后悔了！”

建峰闷下头，轻声哀叹一声。

“我给你怀了娃娃，瞎好没人问我一句。我恶心得吃不下饭，你妈不管，你也不管。”四妹子气恨地诉说着，“你爸养的那头老母猪，怀下猪娃了，他一天三晌给喂食饮水，给搔痒痒捉虱子……我连一头母猪都不如！”

“四妹子，你听我说，”建峰急了，忙解释说，“我实在没一分钱，有心也用不上，再说……我也不懂该做啥。”

“没钱归没钱，话该有一句吧？”四妹子并不接受他的解释，“你爸封建到连一句话也不许你跟我说吗？”

建峰又低下头，难受地哀叹着，闷了半晌，委婉地说：“咱爸脾气不好，面冷，家法也大，我也没法子。可你慢慢就知道了，咱爸心好，昨黑给我说，看病剩下钱了，叫我给你买些想吃的东西。咱爸说，屋里家大人多，不好给你另喝单吃，借这回看病，想吃啥买啥……”

“啊！多大方！”四妹子冷笑一下，“就给下五块钱，真要看了病，能剩几毛？还‘想吃啥买啥’哩！”

“咱家……唉！没钱！”建峰说，“粮食卖下五百块，全给亲戚还了账，是为我娶你拉下的烂账……”

“穷也罢，富也罢，反正我进你家门楼快半年了，今日头一回花下五块钱。”四妹子淡淡地说，“你给老人说，今日我浪花的钱，算我借下的，我日后还给他。这样——你也好交账咧！”

十二

五块钱，把一个和睦贤良的十口之家搅得人仰马翻了！自信而又威严的家长吕克俭老汉，气得心口疼了，躺在炕上起不来了。

克俭老汉躺在炕上，脑子里不时浮出那不堪回味的一幕场景——他刚从地里走回村子，就瞅见自家门楼下围挤着一堆人，这是乡村里某个家庭发生了异常事件的象征。他心里一紧，外表上仍然不现出慌张，走到门楼下的时候，就听见院子里的对骂声：

“看你也是个野货！山蛮子！卖×换饭吃！从山里卖×卖到平川来咧！”二媳妇的声音。

“我卖×，你也卖×，你妈也……”三媳妇的声音。

“你×大搅得宽！把人嘴缝了！山里货！”大媳妇的声音。

吕老八气得脖颈上青筋暴突起来，走进院子，扔下手中的家具，凛然天神似的站立在院子中央，瞅着三个正搅骂成一团的儿媳妇。尽管他凝眉怒目，架势摆得凛凛然威风，三个媳妇仍然不见停歇，谁也不饶过谁一句，这就使他气上加气，火上添火。往常里，要是谁和谁犯了口角，甚至是老大和老二的孩子吵架，只要他往当面一站，眼睛冷冷一瞅，交火的双方立马屏声敛息，停口罢手。现在，三个媳妇居然当着老公公的面，嘴里争相喷出不堪入耳的秽言恶语，把老家长不当一回事。他劝又不想劝，骂又不好骂，一时又断不清谁是谁非，看

着街门口拥来更多的看热闹的婆娘女子，吕克俭家的门风扫地了，关键是应该立即停止这种辱没家风门面的臭骂。他气急中捞起一只喂鸡的瓦盆，“哗啦”一声摔碎在台阶上，随口喷出一句：“难道都不知道顾面子了哇！”

这一摔一吼，果然有效，大媳妇率先闭了口，走回自己的屋子。二媳妇也不见出声了，在案板上擀着面，使用了过多的力量，撞得案板咚咚咚响。最后收场的是三媳妇，在两位嫂嫂已经不出声的时候，还喊了一句：“想合股欺侮我，甭想！”说罢，扭转身回厦屋去了。吕克俭对三媳妇最后多骂一句的表现，留下很糟糕的印象。吵架的双方，除了是非曲直之外，总是老好的人先停口，最后占便宜的一般都是歪瓜裂枣。他对三媳妇的印象尤其反感，虽然三个媳妇都骂得不松火，但三媳妇用蛮声蛮气的山里话骂人更难听。甚至到他后来弄清了这场家务官司的直接责任并不在三媳妇的时候，仍然不能改变对她的那个不好的印象。

吕老八当晚就弄清了原委。二媳妇听村里人说，三媳妇根本就没进医院门，小两口进了馆子又坐西瓜摊子，尽吃海浪了一天，就无法忍受了，先说给大嫂，俩人说着说着就骂起来，说这“外路货不懂礼俗家规”啦！“山蛮子不会居家过日子”啦！“吕家倒霉就该倒在这小婊子身上”啦！正说得骂得热乎，四妹子下工回来，到灶房里去喝水，听见了，随之就开火了。

吕克俭老汉当着三个媳妇的面作了裁决，大媳妇和二媳妇不该私下乱骂，对谁有意见，要说给他或她们的婆婆，由家长出面解决。三媳妇花钱太大手大脚了，下不为例。老汉很开明地说，他给三娃子已经说清白了，看病交过药费，剩下块儿八毛，吃点瓜瓜果果，主要是有了身子。而把五块钱全部吃光花净，太浪费了。大媳妇和二媳妇都

不吭声，算是接受了他的裁决，三媳妇呢？居然当着他的面说："这五块钱，我给建峰说了，日后我还。"老汉对她印象更坏了，听不进道理的蛮霸货嘛！

老汉躺在炕上，一道无法摆脱的阴影悬在心中：分家。这个由他维系了几十年的家庭，一个在吕家堡难得再找出第二家来的和睦的家庭，现在出现了无法弥补的裂口。老汉明白，无论妯娌，抑或婆媳，即使夫妻之间，一旦破了口，骂了娘，翻过脸，再要制止第二次和第一百次翻脸骂娘，就不容易了，就跟第一次通过水的渠道一样顺溜了，要紧的是千万不能有翻脸破口的头一遭。这种事发生发展的最终结局，只有一条路可寻，那就是分家，兄弟们拔锅分灶，各人引着各人的婆娘娃娃过日月。吕克俭几十年来看着吕家堡百余户人家都这样一家分成两家或三家，全无例外，现在，轮到他自个主宰的这个庄稼院了。

必须采取切实的措施来堵塞这种事件重演，虽然艰难，为时尚未太晚。他在把三个媳妇当面裁判一番之后，立即采取第二步措施，让队里进城办事的会计捎话给二娃子，叫他礼拜天回来，无论如何也要回来。

星期六晚上，大儿子从学校休假回来了，二儿子天擦黑时也回来了，三娃子本身就在家里。喝罢汤后，他把三个儿子叫进里屋，瞅着三个横看竖看都十分顺眼的儿子，老汉一下子觉得不好开口了，鼻腔里潮起一股酸溃溃的东西。大儿静淑，二儿暴烈，三儿蔫不拉搭，他熟悉他们的秉性简直比对自己更清楚。不管他们在外工作或在家务农，也不管他们与外人如何交往，回到家中，他们对他一律恭敬，听说顺教，没有哪个翻嘴顶撞，这也为吕家堡的一切老庄稼人羡慕。现在，他对他们怎么说得出那句"分家"的话呢？

未等他开口，大儿子先做了自我责备，把责任揽到他的内人身上，进而推到自己对家属教育不严的根源上。二儿子效法其兄，说自己做工在外，没有能够制止自己的婆娘。只有老三蔫蔫地低垂着脑袋，没有说话。

老汉却估计出来：儿子们尚没有分家的明显征候，于是就说："我看……趁早分了，免得日后搅得稀汤寡水，倒惹人笑……"

未及说完，三个儿子一齐反对，词恳意切。克俭老汉这才使出最真实的用心："既然你们兄弟三人都不想分，那我就给你们再掌管一段家事；既然你们都不想分，那就把自家屋里人管好，再不准像前几天那样混骂混闹了……"

此后多日，这个家庭从骤然而起的僵硬的气氛中渐渐恢复过来，恢复了平素那种不淡不咸的气氛，一月之后，就看不出曾经发生过的矛盾的痕迹了。

一件意料不到的打击突然降临，把吕克俭老汉一下子打蒙了——他的三娃子的媳妇被推到吕家堡的戏楼上，斗争了一家伙！

看着三儿媳妇被民兵拉上吕家堡村当中的那幢戏楼，吕克俭老汉吓坏了，也气坏了。他很快得知，三儿媳妇偷偷贩卖鸡蛋，投机倒把，走资本主义道路，被公社里抓获了。

半月前，落了一场雨，秋田的旱象缓解了，苞谷也开始孕穗了，农活少了，除了管理棉花，再没有什么大的活路了。为了缓解家中的矛盾，他让老伴以关怀的姿态支使三媳妇去杨家斜二姑家住一住。万万没料到，她在二姑家跟着二姑偷偷干起了贩卖鸡蛋的违法的营生。

吕老汉胆战心惊，终日价一副大祸临头的不祥心理。天爷！解放二三十年来，吕老八经历了多少运动而保住了上中农的成分没有升格为富农或地主，全凭的是严谨和守法。这个陕北来的三媳妇，居然敢于冒险惹祸，势必殃及这个十口之家的老老少少的安全，怎么得了！

尤其令老汉气恨的是，斗争会后的第二天，在一家人惊魂未定的情况下，她居然天不明起来，又贩鸡蛋去了。

吕老八扶着犁把儿，吆喝一声黄牛，心里盘算着怎么办。他忽然意识到，这种灾祸的根源，全是自己铸成的大错！

自己原来想，陕北人日子过得苦，来到关中，不过是为了混一碗饱饭吃，有苞谷馍馍和白面面条，那些山里女人就觉得进了天堂了。现在看来大错特错了，这个四妹子不仅不懂关中的礼行和规矩，而且性子野，爱唱歌，花钱大手大脚，骂人比本地女人骂得更难听。老汉忽然联想到“闯王”，那个东奔西杀的李闯王就出在陕北。穷则乱世。这个自小生在吃糠咽菜的穷山沟里的三儿媳妇，自然无法养成遵规守俗的涵养了，活脱就是个失事招祸的女闯王！

这样下去，怎么得了？她自己脸皮厚，挨斗争不在乎暂且不说，由此而引起整个家庭的灾祸，怎么办？上中农这个岌岌可危的成分，说升就升高了。老汉近三十年来没有一天敢松懈过对全家成员的警告：甭张狂！咱的成分麻达！现在，这个灾星倒自己寻着祸闯……

当夕阳从原塄上消失以后，暮色渐渐浓了，他卸了牲畜，扛着犁杖下坡的时候，一个主意形成了：坚决分家。尽快尽早分开，免得一个老鼠害了一锅汤。这个山蛮子媳妇，看来压根儿就不是个顺民百姓，是一匹从小没有驯顺的野马，一个祸害庄稼院的扫帚星！

十三

满天星光，没有月亮。星星很稠很密，大的小的明的暗的，闪闪眨眨，像搅乱了的芝麻、麦子、黄豆和苞谷，大大小小的颗粒混杂掺和在一起，互相辉映又互相重叠。

人说地上有多少人，天上就有多少颗星。一个人占着一颗星，一颗星就在天上注册着一个人。一颗星儿落了，那是天爷从他的大注册簿上把一个人抹掉了，地上的那个人也就死了。四妹子抬头瞅瞅天空，哪颗星星是她的呢？无法辨认，谁也无法帮助她确认出属于自己的那一颗星来。不过，小时候听大大说过，人大了星儿也就大了亮了，人小了星儿也就小了暗了。天上那些顶大顶亮的星星，就是当今世界上那些大人物的象征，主席、总理、总统、省长们都占着一颗。庶民百姓呢？自然只能占有那些稠如牛毛缺光少亮的芝麻粒儿似的星星。四妹子究竟占有哪一颗星星无法确认，也无关紧要，总是有那么一颗吧！不亮就不亮吧！自己原本不是总统，也不是省长，怎么会指望占有一颗大而又亮的星星呢？令人心里窝气的是，老公公和婆婆在背地里咒她为扫帚星，那是一颗带着晦气的令人讨厌又令人毛骨悚然的灾星！

北岭高低起伏的曲线和南原的刀裁一样的平顶，划开了天上和人间的界线。沟坡间那些奇形怪状的峁坎沟豁，都变得模糊难辨了。川道里似乎更黑，分不清棉田和苞谷地。沿着灌渠和河堤排列的杨柳林带，像一道道雄伟的城墙巍然屹立在河川里，只能辨出树梢像锯齿一样参差不齐的轮廓。青蛙在河滩的水草里吵成一片，夜越显得静了。山坡上偶尔传来一两声狐狸的难听的叫声，在山崖上引出回声，回声倒显得柔气了。

四妹子左胳膊上挎着竹条笼儿，右手甩荡着，在河川的土石大路上急匆匆跨着步子。她刚刚卖掉一笼子鸡蛋，攥下一笔款子，走起来脚下生风。她想放开喉咙，在夜风湿润的河川里亮一亮嗓子，无疑是很惬意的，又能给自己壮一壮胆子。然而她终于没有开口，要是被躲在某个旮旯里的歹徒听到了闻声出来，反而自招麻烦。她更加有劲地迈开双脚，更加欢势地甩开右臂，急急赶路。

感谢二姑，指给她这样一条生路。

她天不明时爬起来，趁黑溜出吕家堡村子，沿着河川越来越细的土石路，一直走进去，到那些隐藏在山坡背沟里的村庄去收买鸡蛋；或者涉过小河，走过川道，爬上北岭，到老岭深处的人家去进行此类交易。越是交通阻隔的偏远的山村，鸡蛋也就越便宜，河川里一块钱买七个八个，在那儿就可以买到十个以上了。收买下一笼子鸡蛋，在夜深人静时分赶回吕家堡，睡过一觉，就爬起来，又趁着天黑溜出村子，赶到城郊去，那儿有几家聚居着工人和他们的家属的大工厂，他们需要鲜蛋。她成全了他们家需要用鲜鸡蛋补养身子的老人和孩子，她也就赚下钱了。一天收购，一天出售，两天完成一个赚钱的周期，除去风雨天和必须到生产队出工的日子，一月里总可以完成六七个这样的周期。每一个周期可以赚下十块左右，有这样的收入实在不错了。

跑路，她不在乎，忍饥受渴，也都罢了，最大的危险是被人抓住后没收了“赃物”，就会把一月辛苦的赚头全部贴赔进去了。到处都是警惕的眼睛，任何意料不到的凶兆随时都可能发生。她现在已经完全深谙此道，一次又一次成功地收买下鸡蛋，一次又一次地出手，也就一次又一次地达到赚钱的目的了。她不无得意。

她已经熟悉原坡和北岭上大大小小的百余个村庄，那些村庄大致的经济状态和人际关系。哪个村庄富裕，哪个村庄穷困，哪个村庄干部管得紧，哪个村庄干部闹矛盾，还有哪个村庄压根没人管，到收麦子时还扶不起一个队长来。在这方面，四妹子也许比县委书记或公社的头儿们还要善于用心，还要了解得多哩！那些干部强而又管得紧的村子是禁区，说不定一个什么积极分子一瞪眼就抓住她的笼子，就全完蛋了。鸡蛋是被定为统购统销的仅次于粮棉油的二类物资哩！她小心地躲开那些村庄，而放开胆子走进那些干部不大先进或根本没有干部的村子，像走亲戚一样大大方方走进某一户山民居住的小院，借喝一碗水的时间，与那户男当家或女主妇聊起家常，如果观察判断出这个家庭里没有共产党或共青团的成员，她就提出买鸡蛋的事来。一般说来，这些人是乐于把自家瓦罐里攒下的宝贝鸡蛋拣出来，装进她的笼子里的，因为她比公家收购的官价要高一些，一块钱有二至三个鸡蛋的差别。山民们除非迫不得已，是不会放过高价而低就的。尽管到处宣传说鸡蛋交售给公家光荣，是支援革命，支援亚非拉，直到她把这些宝贝鸡蛋“支援”给城里人的肚子以前，时时都潜伏着危险。供销社的人在车站和渡河的甬道口值班，专门检查偷贩鸡蛋的二道贩子。进入工厂家属区域，常有好事的工人或是居委会的干部出面拦截。很难说他们是为了支援亚非拉或是自己图得便宜，因为他们往往把拦截得到的鸡蛋就地分赃，按公家的价格给她付钱。她可就倒霉了，两天的工夫和往返二百余里的艰难全都白费了，真正是无代价地“支援”给那些比她生活更有保障的工人老大哥或老大姐了。

她被公社供销社的管理人员逮住过一次，从此就只走小路而避开大路了。她在工厂家属区被拦截过两次，从而更加小心翼翼了，对心怀不轨的家伙绝不揭开竹条笼上的蓝布巾子。一次又一次成功地冲过层层封锁堵截，她愈加老练周密，愈少出现差错。因为已经赚下了一

个令人鼓舞的数目的票子，即使偶遇不测，也不会过分伤悲，全不像刚起手时被没收了鸡蛋那样难过。权当没有这一次买卖，权当这两天在生产队出工了，权当自己被小偷割了腰包，跑路受累又算得什么了不得的事呢？权当没跑！

至于吕家堡大队批判她的投机倒把的大会，她才不在乎哩！批判一下有什么关系？站一站戏楼怕什么？批判完了，她回家照样端起大碗吃饭，掰开馍馍蘸上油泼辣子吃得有滋有味，她兜里有钱啦！那些批判她的人，尽管说得天花乱坠，却不能供给她买一沓卫生纸的票子！她的公公气得吓得吃不下饭，却照样不给她一块零用钱。两位嫂子叽叽咕咕，蹙鼻子咧嘴讥笑她，却绝不会把她们的私房钱匀出百分之一来给予这个陕北山区来的穷妹子。她不指望他们，也不想在他们跟前低声下气，她要自己去挣钱。只要不抓进监牢，批判一下算什么大事哩！脸皮算什么？就是抓进新社会的大牢，一天还要管三顿饭呢！

四妹子发觉，不仅她的公公婆婆哥哥嫂嫂胆小怕事，谨小慎微（上中农的成分压在头上，情有可原），而吕家堡的男人女人似乎都很胆小，一个个循规蹈矩，安分守己，极少有敢于冒犯干部的事。在陕北老家，学大寨没人出工，干部们早已不用批判这种温和而又文明的形式了，早已动起绳索和棍子。公社社长和县上的头头脑脑亲自下到村子里来，指挥村干部绑人打人，逼人上水利工地。四妹子虽然没受过，见的可多了。地处关中的吕家堡的村民，一听见要把某人推到戏楼上去批判，全都吓坏了，全都觉得脸皮难受了。似乎这儿的人特别爱面子，特别守规矩。

四妹子心里感激二姑。她跟二姑寻到了这个不错的挣钱的门路。二姑悄悄跟她谋算说，你甭太傻！你跟姑不一样，你姑夫兄弟一个，

打烂补囫全是我和你跛子姑夫的家当。你家里兄弟三个。俗话说，天下的水朝东流，弟兄们再好难过到头。终究是要分家的。人家老大老二都有收入，分了家不怕。你和建峰最小，没有私房，说一声分家，你连一双筷子都买不起，那时再看俩嫂子瞅你的恓惶景儿吧！你的那个公公，叫“成分”给整怯了，又摆一身臭架子，你犯不着跟他闹仗打架，免得人笑话，可也不能空着两手傻乎乎地往下混。你得给自己攒钱，以备分开家来，手头不紧，心里不慌。

二姑给她的谋划是最实际的了，比她自己所能想到的还要长远，她只不过是因为买不起一沓纸一块手绢仨桃俩枣闹气罢了。她现在完全不依赖二姑的“传帮带”了，自己独立行动，进山爬岭收买，钻进工厂家属区出售鸡蛋，而不需跟着二姑。俩人目标太大，行动不便。

说来好笑！吕家堡那个大队长组织社员开她的批判会，他的老婆却偷偷来朝她借十块钱，说是二女儿坐月子，她要买四样礼物去看望。一个慷慨激昂地念着发言稿批判她的女团员，她的母亲也来朝四妹子借过十块钱，说是最小的儿子日渐消瘦，脸皮发黄，要到大医院去检查。一般来说，她不给任何人借钱，不致造成自己有很多钱的印象。但是，这俩女人来借的时候，她很爽快地借给她们了。她暗暗地怀着一种报复的恶毒心理，把钱塞到对方手中。让你们的大队长老汉和会写批判稿子的女儿想想吧！四妹子不大光彩的赚钱行为，给你们帮上忙了！下回批判我的时光，再多用几个厉害的词儿吧！

……

四妹子走着，甩着胳膊，因为两头不见日头，往返一百余里，全是逃躲大路而专寻小径，她累了；远远眺见吕家堡村子里尚未熄灭的

一两个亮着灯光的窗户，腿越觉沉重了。她看见一个人对面走来，不由得停住脚，要不要躲避一下？是不是队长派了民兵来堵截？

四妹子正猜疑不定，却听见那人远远地呼叫她的名字，竟是建峰。他来干什么？来接她吗？从来没有过的举动呀：村里又要抓她吗？不管怎样，她走不动了，扑通一下坐在路边的青草塄坎上。

建峰走过来，站在她当面，难受地说："分……分家了！"

四妹子一愣，猛地站起："啥时候分了？"

"今黑间，"建峰说，"刚刚分毕，我就出村来找你了。你看，咱俩……咋办呀？"

四妹子不屑地盯了建峰一眼，很不满意他那难过的神情，对着黑天的旷野大声说："分了好！好得很！我就盼这一天哪！"

十四

四妹子头上包着一块布巾，避免刷墙的浆水溅到头发上，身上和脸颊上却已经溅满一片白土和成的白色泥浆了。她站在一张条桌上，桌上搁一盆白土浆水，用一把短柄糜子笤帚蘸上浆水，再漫刷到墙壁上去。已经刷过而且干涸了的黄土泥巴墙壁，闪现出一缕淡雅的白色。白色中似乎有一缕不易察觉的极淡的绿色，愈加显得素雅了。

"建峰！给盆儿里添点浆水。"

她站在桌子上，看着门外台阶上的建峰喊着。他正在那儿盘垒锅台，听见她的叫声，放下瓦刀，搓搓粘着泥巴的手，走进门来了。他

有点不大悦意地说：“你看，我也正忙着。你从桌子上下来，添了浆水，再上去刷，省得你停着我也停着。”

她斜瞅他一眼：“你不知道？我上下方便吗？”

他瞅瞅她的腹部，缩一下脖子，做出一副顿然悟觉的神气，快活地笑笑，把浆水从铁桶里舀出来，倒进桌子上的盆儿里。

“给我把头巾扎紧。”她说着蹲下身。

建峰又转过身来，笨拙地扯开她的头巾，拴着。她又喊太紧了。他笑笑，又给她再松一松。他问：“还有什么事吗？”随之压低声儿，调笑地问，“裤带儿松了没？要不要我给你拴一拴？”说罢，爱昵地在四妹子的腰里捏了一下，又把手伸到她的脸上摸着。

四妹子没有拒绝，突然惊声叫道：“你爸来咧！”

建峰立即缩回手。四妹子看着他难堪的神色，却“嘎嘎嘎”笑起来，揶揄地说：“老人家这下管不着我们了！”她又把糜子笤帚蘸上白土浆水，在墙壁上墁起来。

四妹子昨晚就弄清了分家的始末。

由老公公出面，请来了大队里的调解委员会和小队队长，作为官方代表；又依照族规，请来了本族里的长辈和婆婆的娘家弟弟——建峰的三舅，由这三方面的人共同裁决这个即将土崩瓦解的家庭的重大事宜。依照约定俗成的村规，分家时必须由家长出面约请干部和长老儿，晚辈人是无权的，也请不上场来的。

在家庭内部，老公公只允许三个儿子出席，三妯娌连列席的资格也没有。在老汉看来，分家是吕家父子兄弟间的事，商量也罢，吵闹也罢，总而言之都是一母所养，他总是比较好控制他们。妯娌们毕竟是外姓人，没有一个共同的奶头连接她们呀！不能让她们来多嘴多舌，争多论少。

在干部、长辈人和舅舅面前，吕老八外表上没有一丝沮丧和气恨的神色，而是和颜悦色，谦恭地给客人让烟递茶，像是请他们来恭贺吕家的什么喜事似的。他提出分家之事时，也不像一般庄稼人唉声叹气，悲愁满面，一开始就陈述家庭的全部矛盾，说明非分不可了，而且总是责怪儿子不孝、媳妇不贤。吕老八笑容可掬，精明练达，闭口不提儿子和媳妇的不是，反倒夸了大媳妇，又夸二媳妇，连他痛恨的三媳妇也冠冕堂皇地夸赞了几句，随后便把分家的原因统统归于“自个老了，想过几天清净日子”上头来。这是一个绝妙的中性的理由，不伤害任何人。老汉诚恳而又质朴地说：“各位！我这个家庭，现在十几口人哪！十几口人的家当不简单咧！啊呀呀！我都六十岁了，管这么大的家务，实实劳不下来喀！记性差池远了！比方说，前日上街去，一路都念叨着给老二媳妇兄弟结婚要买的被面，一进街，在猪市上转了一圈儿，背着个小猪娃回来了，把被面忘得死死的了……你看看，丢三忘四，怎么能成……”

老汉说得动情，把想分家的真实原因隐藏在心底。

三个儿子，不管心里怎样想，表面上一致反对分家，全部责备自己没有尽到应尽的家庭责任，也没有管教好妻子和儿女，让亲爱的父母费心太多了。

大队的调解委员会和小队的队长无意间相对一瞅，眼目交流着这样一种意思：人家父子如此融洽，兄弟间这般通情达理，好像咱们来故意要拆散人家……

只有三个儿子的舅舅敢于面对现实，他早已不耐烦姐夫和外甥们的虚伪唠叨，插言道：“啥话甭说了，就说分家怎么分吧！”他转过头，对吕老八说：“哥，你把你的想法说出来，合适了，就那样办！不合适了，再商量。说吧！”

克俭老汉早已谋划好了分家的方案。其实，而今分家是最简单不过的事了，没有土地，只有房屋，储存的粮食一家几斗都几斗，没什么意思。关键在于老人的赡养，必须搁到实处。经过多日的反复思谋，他终于把经过无数次修订和斟酌的方案从心里端了出来——

“咱家三间上房，四间厦子。你们兄弟三人，按说分成三份就行了。我跟你妈说了几回，你妈说：‘三个娃子都是好娃，三个媳妇都是好媳妇，跟哪个都亏不了咱俩老人。可跟着无论哪家，都要加重负担。所以说嘛，俺俩人干脆谁也不跟，在俺俩老能干动活儿的时候，不要你们侍候。’我一想，你妈说的对着哩！这样，暂时得按四家分。怎么个分法哩？三间上房，一明两暗，实际明间是走道，不能住人安铺。这两间大房，归我和你妈住，明间给老三建峰。四间厦房呢？老大老二，你俩一家占两间。这个明间说是分给老三，实际不能住咋办？老大老二，你俩每人给老三筹备一间厦房的材料，让老三朝队里申请一块新庄基地，盖两间厦子。我和你妈，活着时单吃另做，死了时由老大老二负责后事。老大管我，老二管你妈。我跟你妈下世以后，这三间上房，你俩一人一间半，算是补偿给你们的埋葬费、棺板钱……”

老汉声音颤抖，说不下去了……

四妹子听着建峰的话，对后来的结局不甚关心了。她能看出，建峰在叙述这一切的时候，除了要告诉她分家的经过和结果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诚恳地解释和劝诫，让她接受这个结果。他说：“好儿不在家当，好女不在嫁妆。全凭自己挣哩！不能指靠老人……”四妹子只是想了解一下分家的情况，而对结果却不甚重视。她嗤笑一下，说：“即就咱爸偏心眼，把三间上房和四间厦子全都给咱，又能怎样？那些房子是些什么好房呀！椽朽了，墙歪了，我还看不上眼哩！”建峰听了，惊疑地瞪起了眼睛。

“你一会儿去给咱爸说，分给咱的那间上房（明间）咱不要，也不要大哥二哥给咱准备材料。”四妹子盯着建峰说。建峰眉头拧着，越拧越紧。她说：“咱们自己盖。要紧的一件事，倒是该当立马给队里写一份申请，要求给咱拨划一院新庄基。”

“钱呢？”建峰睁大眼睛。

四妹子爬上炕。打开箱子，取出一厚沓人民币来，摔到建峰怀里：“我挨批判斗争，就换来这些钱……”

建峰捏着钱，却没有扭动指头去数它，久久地瞅着，泪花涌出来了。他的妻子，他的媳妇，他的这个四妹子，背着公家人，也背着自家屋里的老人和兄嫂，甚至背着自己，起早摸黑，做贼一样地贩卖鸡蛋，攒下了这么多钱！他不仅没有疼爱过她，而且冷言冷语地训斥她，怕她给他家惹下灾祸……现在，他捏着这摞大大小小的票子，手儿抖了，心儿也颤了。他猛然把刚刚爬下炕来的四妹子搂进怀里，贴着她的脸啜泣起来。

四妹子一早爬起来，就走进四婶家里去。四婶三女一儿，女儿出嫁了，儿子上完大学，恋爱下一位女同学，在西安居家过日子。四婶在西安住了不到一月，就跑回吕家堡来，说她住在城里，顶困难的是拉屎，在那个房屋里的小厕所蹲不下去……四婶一个人住了一院房，两间厦屋空闲着。她一张口，四婶就应承了，而且爱昵地打了四妹子一巴掌，说什么给房租的话，太小瞧她了。四婶说难得她来住，有个伴儿，也能拉闲话了。

她立马动手打扫厦屋，指使建峰盘垒锅台。当她和建峰整整忙到天黑时，所有的家当都从老屋搬迁到村子西头四婶家的厦屋里来了。一切安置停当，她最后才收拾炕面，铺上苇席，铺上褥子，单子，今黑夜就要在这里下榻了。这里，远离那位家法甚严的老公公，她可以和建峰说话，可以说甜蜜的悄悄话，可以笑，也可以唱，再不担心老公公训斥了。她从心底里感到解放了。

她在他盘垒的新锅灶上点燃了麦草，冒出一股黄烟。风箱是临时借来的，锅也是借下的。她轻轻拉着风箱，心里舒坦极了。她在老家陕北没拉过风箱，那里全是吸风灶。她在公公的眼皮下拉风箱，心里总是很紧张。现在，她悠悠地拉着风箱，火苗一扑一闪，第一次觉得作为一个家庭主妇的自豪了。建峰蹲在锅台前，看看前边，又站起看看后边，问她吹风顺不顺。她不说话，只用眼睛回答他，妩媚而柔情：很好很好！一切都好极了！

她温下一锅水，舀下一盆，让他洗一洗身子。他坐在矮凳上，吸着一支烟，说："我累死了，先歇一下。你先洗吧！瞧哇，四妹子，你浑身上下抹得像个灶王婆了！"

她关了门，与四婶隔绝了。四婶有早睡早起的习惯，已经睡下了。她脱了衫子，又脱了裤子，在电灯光亮里，脱得一丝不挂，在水盆里畅快地洗起来。

“转过来，对着我洗。”建峰说。

她依然背对着他，说：“你不怕冒犯……你爸的家法吗？”

一句话顶得建峰没法开口了。

她痛快淋漓地搓洗着身子，已经明显肥胀起来的乳房抖颤着。她听见建峰走到她背后的脚步声。他讨好地说：“我给你擦擦脊背……”

“你不怕冒犯你爸的家法……”

“不许再提说那些话！”

她听见一声吼。她被他铁钳一样硬的双手钳住了肩头。他把她猛然扳转过来，她看见他一张恼羞成怒的脸孔。她吓住了。稍一转想，她又喜了，从来没见过他的这一副凶相，倒是像个凶悍的男人！“不准再说……”他紧紧瞅着她的眼睛，依然凶悍。她意识到自己几次三番的揶揄的话，惹恼了他了。她瞬间变得缠绵而又温柔，撒娇似的噘起嘴唇，眉眼里滑出并非真心挖苦他的忏悔。在他涨红的脸上亲了一口，就把毛巾塞到他的手里，呢喃地说：“要给人家擦背，还这么凶呀！我的三哥哥……”

夏夜的温热的风，吹动四婶家院子里的梧桐的叶子嚓嚓嚓响。屋后坡崖上的蝈蝈吱吱吱叫。屋里刚刚刷过的白土浆水，散发出一股幽幽的泥土气息。

“四妹子，再甭说那些话了……”

“嗯……”

下篇

十五

在四婶家的厦屋里借住了半年时光，秋收一结束，四妹子就在生产队拨划给她的新庄基地上盖起了两间新厦屋。到阳历年底，新屋的地面还没有完全干透，她就千恩万谢过四婶，与建峰高高兴兴搬进自己的新屋。虽然四婶真心实意地挽留他们继续住下去，坚决把她塞给的房租钱再塞回她的口袋，四妹子还是毫不动摇地搬进自己的新厦屋里住下了。她已经临产了，隆起的肚子十分显眼，按医生推算的预产期已经到了。关中乡村有一大忌讳，孩子必须生在自家炕上，绝不能不自觉不知趣而惹人心里烦恼呀！也真是神差鬼使似的，刚搬过来的头一晚，黎明时分，孩子落草了。

四妹子疲倦极了，躺在炕上，一动也不想动。屋子里新鲜的泥腥味儿，混合着屋顶的新椽新檩条所散发的木头的气味。孩子有了，那个满脸黄毛的小小子就躺在身边。房子也有了，她的血就渗在这土木结构的新厦屋尚未完全干透的脚地上。她终于有了自己的窝，自己亲手筑成的窝呀！多不容易！

老婆婆在院子里那间草草搭成的小灶房里扯着风箱。一会儿，她给她端来一碗煮成豆腐脑一样软的鸡蛋。一会儿，她又给她端来熬煮得恰到好处的小米米汤，一碟用熟油泼过的咸菜，几块烤得金黄酥脆的白面馍片儿。她吃着，嚼着，看着婆婆露出在头帕下的银白的头

发，慈祥虔诚的神态，她涌出眼泪来了。她的亲爱的生母远在陕北的山旮旯里，尚不知她已经给她生下一个小外孙了。按照关中地区乡村的风俗，婆婆服侍月婆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因为儿媳给她生下了孙子，把本门里的继承人又朝前延伸了一代。四妹子礼让婆婆和她一起吃饭，婆婆拒绝了，她推说一会儿还得给老公公做饭，急匆匆地走了。婆婆够忙的了，一双解放脚要来回奔跑在老屋和新厦屋之间的村巷里，一天要做六顿饭，然而看不出她有什么厌烦情绪……一个新生命的诞生，把她和她的积怨冲淡了。

“这碎崽娃子的鼻子多棱骨呀！”

四妹子坐在炕头吃着饭。婆婆已经解开孙子的包单，重新换上一条尿布，瞅着孙子的脸儿，笑盈盈地赞赏那个鼻子。四妹子一扭头，那小子挤眯着双眼，满脸是茸茸的黄毛，鼻子也看不出有多么棱骨，甚至有点丑不堪睹。她第一次看见刚刚脱离母体的婴儿，真是不大好看，婆婆却看不够似的笑盈盈地看着。

“你爸让我看看娃儿的鼻子高不高。”婆婆动情地说，借机也巧妙地传达了老公公对这件喜事的问候。尚未出月，他一个男人家不能进入儿媳的“月子屋”。婆婆说：“你爸那人穷计较，他说自小看大哩！凹凹鼻子的人，多是苦命人，没得大出息。高鼻宽额的男娃娃，才能出脱个男子汉大丈夫！哦——这崽娃子的额颅也宽得很！”

“妈吔！你干脆说他日后能当省长算咧！”四妹子说。她也动情了。不管这孩子将来成龙成虫，老婆婆和老公公的真心疼爱已经在孩子刚刚落草的第一个早晨就表现得够充分了。她恨不起婆婆也恨不起公公了。她一把抱住婆婆的脖子，亲昵地呢喃着，“妈……妈吔……”

两位嫂嫂也拿着鸡蛋来了，礼仪性的探望。

二姑当天后晌就来了，破了俗，本该三天之后才能来。她迫不及待，带着小米、大米、红豆、鸡蛋和红糖以及上等细面馍馍，装满了两个竹条笼儿，用挑担挑来了。

建峰皱着眉头，看着儿子的脸："好难看呀！一脸黄毛！"他傻愣愣地说，"电影上那些刚生下的娃儿，又白又胖……"他又笑了，猛地贴着她的脸说，"不管怎样，咱的种嘛！"看见二姑进来，他仓皇地站起来，羞得不知所措。

二姑夜晚没有回家，和四妹子睡在一起，叮咛她怎样给孩子喂奶，换尿布，绝不能在坐月子的时日里做活儿做饭，更动不得冷水，那是要留后遗症的。其实，这些事儿婆婆早给她叮咛过了。二姑又悄悄说，不准建峰和她来那事，为了保险，让婆婆晚上和她陪睡，也好照管孩子……

这个小生命来到这间泥瓦小屋的时候，中国大地上刚刚发生过一场惊天动地的震动，"四人帮"垮台的强大冲击波，在一幢幢新墙老壁上回荡。然而这个鼻梁骨多棱骨的碎崽娃子，却无法领受他的年轻父母和备受艰辛的爷爷、奶奶心头的强烈感受。

儿子睁眼了，眼睛好大。儿子会笑了，咧开漂亮的嘴唇。黄毛早已褪净，白格生生的脸蛋子招人忍不住吻他。鼻梁隆起，像爸爸更像爷爷。儿子会翻身了，翻到炕底下，摔得额头上隆起一个疙瘩，婆婆恨声骂她不经心。儿子会坐了，会立了，会牵着大人的手挪步了……终于，他自己在新庄基前的土路上能跑步了。

整整一年半的时间里，四妹子怀里挟着娃娃，为他擦屎，给他喂奶，防备他翻跌摔倒。她出不了远门，连工分也挣不成了。她管孩子。她做饭扫院，完全成了出不了大门的家庭妇女了。她真有点急了。

吕家堡的世事全乱了套。那些在“四清”和“文革”中受整挨批的干部和社员，那些被补定为地主富农的“敌人”，白天黑夜跑上跑下，跑公社，跑县政府，在吕家堡东跑西跑更不在话下，急头急脑地要求给自家平反，甄别，赔偿损失，退还房屋。那些整过人的人终日里灰头灰脸了。那些受过整的人，自然结成了一种联盟，在一切场合里互相呼应，互相撑腰，对付那些整过他们的人还在继续玩弄的新的招数。为了扩大阵线，几次有人走进四妹子的新屋，可着嗓子骂那些还在台上的干部简直不是人，简直连六畜也不如，把他们整惨了，譬如四妹子贩鸡蛋的事，他们也斗她，没收鸡蛋，现在应该要求公开平反，退还损失。

四妹子表示热烈的响应，然而却没有实际行动。她无心。她想，斗了批了已经过去了，平反也给不了她任何实际的好处。没收过的十来块鸡蛋钱，退了也没多大意思。她已经瞅着了一笔生意，无心管尿平反不平反的事了。

她从旁人口中得知，南张村大队为了给平过反的人退赔经济损失，把库存的储备粮拿出来卖哩，每斤两毛钱，却不零售，嫌麻烦，最少起数是一千斤。好多人看着便宜，却没有现款。四妹子的心按不住了。

她把娃子塞给婆婆，说她要出远门了，娃子已经断奶，只需给他喂点羊奶和馍馍就行了。她跑到二姑家，开口借下五百块钱，当天晚

上就到南张村买下了一吨半小麦。装上了雇来的北张村大队的小拖拉机，连夜晚拉到桑树镇面粉加工厂，小麦就变成了一袋一袋摞得山高的面粉。赶天明，她站在小四轮拖拉机驾驶员的后边的连轴上，不断地叮嘱小伙子小心驾驶，在车辆行人越来越稠密的城市近郊的公路上奔驰，目的是火车西站。那儿聚居着铁路工人、搬运工人，大多是重体力劳动者，比农村人的饭量还要大，公家定量配给的粮食常常吃不到月底。她在过去卖鸡蛋的时候，曾经义务为几户搬运工在村子里偷偷买过粮食。

市场早已解冻，活跃起来，粮食也上市了，小麦降到三毛五一斤，她现在决定把面粉按小麦的价钱出售，因为她购买的小麦便宜。关键要快快出手，多拉多跑一次，比在价格上死抠要有利得多了。果然，满载面粉的小拖拉机在那些小草棚区一停下来，就有人打问，就成交了，一顿饭工夫，倾销一空了。

她脖子上挂着一只帆布包，收来的钱全都塞进去，来不及清数。直到卖完，她看着装得鼓鼓的帆布包，竟不敢动手数了，更不敢从脖子上卸下来。

她把驾驶员领到就近一家饭馆，管饱吃了一顿，又回到车上，她把一张大团结塞给驾驶员，作为对他的犒赏，至于运费，将来与北张村生产队一次结清。

她对他说：“赶回南张村，再买一吨半小麦，连夜到桑树镇加工，赶明日一早再来，我再给你十块，怎样？两天两夜不睡觉，撑住撑不住？要是撑不住，我另找拖拉机。”

“没问题，嫂子！”小伙子把钱装进腰包，恭敬地叫她嫂子，虽然以前并不认识。他说：“加工小麦的时光，我正好可以睡觉，你可是连轴转啊！只要你撑得住，我没一点儿问题。走吧！直接去南张村？”

“南张村。”四妹子说。

“你不回家去看看。”

“不回了。”

连着三天三夜，车轮子不停转，人也不停手脚。第四天清早，她卖完了面粉，照例给小驾驶员在小饭馆买了饭吃。她破例塞给他二十块钱，小驾驶员毫不客气地塞进腰包说：“感谢嫂子！我送你回家吧！”她摇摇头说：“不。到桑树镇。”他就头也不回地开到去桑树镇的路上了。四妹子坐在小拖斗里，瞅着小驾驶员落满黄尘的脑袋，心里想，她给他钱，叫他开哪儿他就开到哪儿，他开北张村生产队的拖拉机，队里给他计工分，每天有一块钱出车补贴，连工分价值合起来超不过两块钱。她给他十块，最后这回给二十块，他自然能算得来哪个多哪个少。他帮她卖面，还叫她嫂子。她扶着拖斗上的栏杆儿迷迷糊糊睡着了。

她被他摇醒，桑树镇到了。她把小麦加工后的麸皮存放在面粉加工厂的仓库里，有一千多斤哩。她给公社奶牛场打电话，依公家的价格卖给奶牛场。奶牛场场长喜悠悠骑着自行车跑来，办完了手续，把钱交给四妹子，就去提货了。四妹子把钱同样塞进帆布袋里，旋即跳上拖拉机，给小驾手说：“现在开到你们北张村，给队里交车费，一切手续全完了。”

天擦黑，四妹子脖子上挂着那只鼓鼓的帆布袋儿，走进吕家堡村子。广播上又在传人开会，大约还是给什么人平反的事。她冷漠地转过身，从一条背巷走向自己的小院。她一脚踏进门，建峰从炕上翻身跳下来，像看一个不速之客一样从头到脚打量着她，惊吓得眼里失了神："我的天啊！你干啥去了？我就差点没去监狱寻你了！你看看，你成了啥模样？"

她坐在木凳上。成了什么鬼模样呢？她从柜子上拉过小圆镜儿一照，自己也认不出自己了。她的头发像从面粉和黄土里摆拂过一般，黄里透白，污垢把鼻梁两边的洼儿都填平了。嘴唇燥起一层干黑的皮屑，而眼睛像是充了血的火球。三夜四天，她没有睡觉，也没有洗脸，卷入一种疯狂的兴奋之中，直到南张村的储备小麦处理完毕。

建峰已经端来一盆水，放在脚地，让她洗。她草草洗了脸，把脖子上的书包卸下来，扔给他，说："你数数。"自己就势倒在炕上。

建峰解开书包，吓得奔到炕边，把她猛地拉起来，搂着她的肩膀："你抢人来？"四妹子淡淡地笑笑，推开他的手，就躺下了。

建峰数完钱，码完大票小票，锁进箱子。把四妹子的鞋袜脱掉，把低垂在炕边的腿脚扶上炕去，帮她脱了棉衣、棉裤，再把被子盖严。他脱了自己的衣服，贴着她睡下来，把她搂在怀里，轻轻地捶着她的背说："我的……你呀！你……真个是个……闯王！"

四妹子睡得好死！

建峰突然想起父亲。妈妈和爸爸，一天三回跑过来，问她的确凿消息，现在还悬着心哩！他爬起来，穿好衣服，外锁上门板，急匆匆跑回老屋里，悄悄告诉两位老人，说她完完整整地回来了。从她头上

和身上落下的面粉看，她确实是做了那桩生意。建峰在四处打问媳妇的下落时，有人说在去西安的路上见到她坐在拖拉机上，车上装着面粉，而南张村处理储备粮的事无人不晓，这是很容易联想到一起的事。爸和妈都吓得什么似的，一再叮嘱说：“挣下几个钱算了。心甭太狠！目下乱世，甭看政策宽了，说不定啥时月又杀回马枪！”

妈说：“快把娃娃抱回去，跟他妈睡去。娃儿三天三夜没见妈妈的面，刚才还跟我要他妈哩！”

建峰笑笑说：“算咧！她已经睡下了。她太累了，回到家，没脱鞋就睡着了。让她好好歇一宿，甭叫这碎货捣乱……”

妈妈的嘴角撇了撇，不言而喻的眼色在说，你倒会心疼媳妇……

十六

这一年的春节，小两口过得红火，过得热闹。四妹子给自己和建峰做了一身新衣新裤，都是当时乡村里最时兴的涤卡布料，而头生儿子更不用说了。酒肉衣食的丰盛和阔绰，并不能掩盖小两口之间的分歧，从大年三十晚上包饺子时开始争论，一直到过罢小年——正月十五元宵节，这场争论仍在继续。四妹子打算办一个小型家庭养鸡场，她既可照管孩子，又能免去四处奔波，收入也不会错的。建峰则主张到桑树镇开一个电器修理铺店，让她给他记账，管孩子，做饭，根本用不着养什么鸡呀猪呀的。

“让我去当老板娘？哈呀！我这心性可服不下！早晨给你倒尿盆，一天三顿给你做饭，晚上给你数钱，这……舒服倒是舒服，可我会闷死的。”

“你养鸡能挣多少钱嘛！那些刚出壳的小鸡，买十只活不了一只，你去问问隔壁邻居的婶婶嫂子就知道了。”

“这你就甭管了。我已经把一本《养鸡知识》念得能背过了，我按科学办法养鸡。婶子和嫂子们只会老土办法……”

这种争论一直在进行。大年初一，两口子吃着肉馅饺子，互相都想说服对方；两口子抱着孩子，背着礼物去给二姑拜年的路上，又争得七高八低；眼看着过了正月十五，新年佳节的最后一个小高潮也过了，还是谁也说服不下谁；最后，双方只好互相妥协又各自独立：建峰到桑树镇去办他的电器修理门市部，四妹子在家里创办她的家庭养鸡场。她和他达成两条协议：一是在他去桑树镇之前，帮她盘垒两个火炕，作为饲养小鸡的温床，她一个人干不下来。二是她要求他每天晚上都回家睡觉。他说，那么下雨下雪呢？她说，下雨下雪也要回家来。他说，这规程定得太死了吧？稍微灵活一下行不行？她说，不能灵活。她和他结婚好几年了，吵也吵过嘴，闹也闹过别扭，晚上总是在一个炕上睡觉，成了习惯了，他要是不回来，她就会睡不踏实。他仍然希望能有百分之一的灵活性儿，或者说特殊情况。她干脆一句话说死，百分之一的机动灵活性儿都不许有，想拉野婆娘了吗？一句话噎得建峰红了脸，再不争取什么灵活性儿了。

正月十六日，一般乡村男女还都没有从新年佳节的醉意和慵惫中振作起来，欢乐的气氛还没有从乡村的街巷里消散殆尽，四妹子和建峰已经干得大汗淋漓了。

她给他供泥巴。他提一把瓦刀在盘垒火炕。他是个聪明的乡村青年，心灵手巧，她只要说出关于这个火炕的用途和想要达到的目的，他就能合理地安排火口和烟囱，而且能调节火炕的温度。看着已经初

具雏形的火炕，她是满意的。她用铁锨挖泥，送到他的手下。他需要一块瓦碴垫稳土坯，她立即递给他。他给她帮忙，她显得驯服而又殷勤。

他接住她递来的瓦碴片子，垫到土坯下，稳实了。他说：“晚上要能这么听说顺教就好啰！娃他妈，明白吗？”

她猝不及防，正在干自己一心专注的事儿，他却说起晚上的事儿。她在他脸上爱昵地拍了一巴掌，就把手上的泥巴抹在他的脸上了，随之哈哈大笑，笑他的五花脸儿的滑稽相。

四妹子一次买回来五百只小鸡，把吕家堡的男人女人都惊动了。这里的女人，虽说家家养鸡，顶多也不过十来只，全是春天用老母鸡孵化出来，小鸡借着老母鸡的温暖的翅膀渐渐长大，谁也没有把握把那些用机器孵化的小鸡抚弄长大。人们全拥进她的院子，挤进她的厦屋，伸手摸摸炕壁，瞧着炕上拥来挤去的雏鸡，出出进进，在小院里，在大门外的土场上，议论纷纷。

三间厦屋，只留一间作为她和建峰睡觉生活的用地，而把两间都辟做鸡舍了，三条大火炕，占据了两间厦屋的脚地，中间只留下一条小甬道。五百只小鸡“叽叽”叫着，吵成一片，屋里很快就出现了一股鸡屎的气味。

门前榆树上的榆钱绿了又干了，河川里的麦子绿了又黄了。紧张的夏收一过，炎热的三伏酷暑使庄稼人有空追寻荫凉的时候，那些女人们串门串到四妹子家里来，全都惊奇得大呼小叫起来。

多么可爱啊！用竹棍儿围成的鸡圈里，一片白格生生的雪一般的羽毛，在争啄食物，在追逐嬉戏，高脖红冠的大公鸡追逐着漂亮的母

鸡，不避人多人少，毫不知羞地跳到母鸡背上交媾。整个小院里，全都用竹棍围成栅栏，只留下一块小小的空地。

四妹子热情地接待一切前来观看的婶婶和嫂子们，耐心地回答她们的询问，并不在意某个心地褊狭的女人眼里流泻出来的忌妒的神色。成功本身带来的喜悦和自豪，足以使人对一切世俗采取容忍和宽让的胸怀。

刚刚交上农历八月，一声震惊人心的母鸡的叫声从后院响起，四妹子掀开栅栏门，跑进鸡圈，惊吓得母鸡刮风一样奔逃。她跑到鸡窝跟前，那窝里有一个白亮亮的鸡蛋，抓到手里，这才看见，那粉白的蛋壳上留着丝丝血痕。她的眼睛被溢出的泪水模糊了，一个无法压抑的声音在心里回荡：开产了！开产了！

不到半月，三百只母鸡相继开始产蛋，从早到晚，母鸡向她报告下蛋的叫声此落彼起，不绝于耳。她把一盆一盆搅和好了的饲料撒进食槽，捧着一篮又一篮鸡蛋走出栅栏门来。她须臾也不敢离开屋院，真是太忙了。最迫切的一件事是，鸡蛋无法推销出去，堆在家里不行呀！

她终于和建峰商量决定，请老公公和婆婆过来帮忙。虽然婆婆帮她带娃娃，收鸡蛋，然而毕竟不是靠得住的。她要跟两位老人正式交谈一番，要两位老人靠实靠稳到她的小院里来照料内务，她隔一天两天就可以出去卖掉鸡蛋了。她在村子里的代销点买了蛋糕、卷烟、茶叶和酒，一共四样礼物，让建峰用挎包装着，走进熟悉的老公公的住屋里去了。

第二天一早，四妹子挑回一担水来，看见老公公蹲在台阶上抽旱烟，她忙招呼老公公坐到屋里，老公公却磕掉烟灰，捞起她刚刚放下的挑担要去挑水。她对他说：“爸，你腿脚不便了，让我去挑，你给鸡拌食吧！”

她告诉老公公，苞谷糁子、麸皮、鱼粉、骨粉和几种微量元素的配方比例，老公公说他记不住，还是让他去挑水好了。她不让，说：“爸，我要是出门卖鸡蛋，你还得喂鸡。其实不难，我给你把配方写在墙上，掺配一两回也就记住了。”说着，她动手示范了一下，在木缸里按比例放足了各种饲料，搅拌均匀，然后让老公公把饲料端进鸡圈去。老公公刚要动手推开栅栏门，她忙喊：“爸吔！在门旁边的石灰里踩一下。”

老公公回过头来，迷茫不解：“踩石灰做啥？”

四妹子说：“消毒。”

老公公不耐烦了，放下盛满饲料的盆子，索性走回来：“嫌我有毒？你自个送进去！”

四妹子笑了。老公公心里犯了病了。她笑着解释：“爸吔！我送进去，也要踩踏一下石灰。我每一回进鸡圈，都要过这一番消毒手续的。你老甭犯心病，这是防疫要求，不敢违犯。”

老公公好像听进去了，再次走向鸡圈的栅栏门儿，在石灰堆里踩踏了一下，端起盆子，走进去了。

四妹子挑着水桶走出门，忍不住笑了。老天爷，她在指拨着老公公啊！他居然听她的话了！他是吕家堡屈指可数的几个精明强干的庄

稼把式，总是别人询问他的时候多，在乡村的庄稼行里，没有难得住他的活路或技术。他又是一位家法特别严厉的家长……然而她吩咐他要做的卫生防疫制度，他却遵守了。

四妹子再挑回一担水来。刚进街门，她听见老公公大声严厉地指使老婆婆说："在石灰堆里踩踏一下。脚上有毒。卫生防疫不敢马虎。记住，每回进鸡圈，喂食也好，收鸡蛋也好，不管我在不在跟前，都要在石灰堆里把鞋底子蹭一蹭。"

四妹子笑了。

老公公闻声扭过头，也不好意思地笑了，大声解嘲地说："你甭看我老脑筋。我信科学哩！那年，政府把化肥送来，没人敢买敢用。好些人说，咱用大车给地里送粪，麦子还长不好，撒那么几斤白面一样的东西，还能指望长麦子吗？我买了用了。嗬，那一年，就咱家的麦子长得好！我信……"

吃了一点干馍，喝了几口开水，四妹子把两个垫着麦草的鸡蛋筐子绑在自行车上，对两位老人说："十二点喂一次，五点钟再喂一次，按比例搭配饲料。鸡蛋要及时拾了，窝里堆得多了，就容易压破了。"说完，她把车子推出街门，儿子闹着要跟她去。婆婆好劝歹劝，才把那号啕大哭的小子拉扯走了。

四妹子跨上车子，清晨的风好凉爽啊！

十七

每天早晨，天刚放亮，老公公和老婆婆就前后相随着来到四妹子的鸡场，动手清理鸡场里的脏物，打扫卫生，然后挑水拌料，像工人

上班一样及时。有时候老人来的时候，她和建峰还在酣睡，听见老公公故意惊扰他们的咳嗽声，慌忙爬起，奔到院子，拉开街门门闩，把等候在门外的两位老人迎进门来，心里常常很感动。

建峰擦洗了脸，推动车子，匆匆走出街门，赶到桑树镇自己开设的电器修理铺去了。

四妹子隔上一天两天，就要赶到南工地去卖鸡蛋。这个南工地，实际是一家兵工厂，兴建之初，是建筑公司的南工地，工厂建成后，建筑工人早已撤走了，当地村民仍然不习惯叫兵工厂的名字××号信箱，仍然称作南工地。前几年，四妹子倒贩鸡蛋的时候，从来也不敢光顾这家兵工厂的家属院，宁肯多跑二十几华里路，送到人际陌生的西安东郊的工人聚居区去。南工地的大门口有警卫，而家属院的门口往往有供销社派来的干部，专门在那儿盯梢，抓获敢于偷卖鸡蛋的人……现在，南工地大门口外的水泥路两边，全是邻近村庄出售农副产品的农民，各种应时蔬菜、瓜果、鲜肉和鸡蛋，一摊紧挨一摊，沿着大路铺开下去。有人在路旁盖起小房子，出售生活用品；饭馆、理发店、酒馆，也开始营业了。四妹子到这里来出售鸡蛋，再不必担心供销社干部来没收鸡蛋了，真是感慨系之！

她隔一天顶多隔两天来卖鸡蛋，太费时了。把鸡场的繁重的劳动全都搁到两位老人肩上了。她与南工地的职工食堂的采购员认识了，达成协议，每天后晌给食堂送三十斤鸡蛋，每斤价格随着市场价格的浮跌而升降，一般低于市场一毛钱。食堂图得省事，又捡了便宜，又保证能吃到最新鲜的鸡蛋，四妹子也省去了整晌整天在那儿坐待买主的麻烦，两厢满意。她在后晌给南工地送一趟鸡蛋，早上和中午就能悉心照管鸡场了，也能使两位老人稍事歇缓了。为了确保这种关系得以持久，四妹子就用一只盒子装上三五十个鸡蛋，送给那位采购员。

四妹子养鸡获得成功，获得了令人眼热心热的经济效益，消息不胫而走，四处传扬。终于有一天，一位陌生人走进院子来了。

来人自我介绍说，他叫解侃，干脆叫他小解好了，他说他是城里报社的记者，专门采访她来了。四妹子听着介绍，把他递给她的记者证还给他，看着他白净的脸膛上，却蓄着一绺小胡须，黑茸茸的，头发披在后脖颈上，这是很时新的男青年的打扮。她突然仰起头，对正在拌料的老公公说："爸吔！这位同志寻你哩！"说着，就从老公公手里扯过木锨。老公公迷惑地瞅着那位穿戴打扮与乡村人相去太远的青年人，坐到树荫下的小桌旁，一边招呼客人喝水，一边警惕地用眼睛瞄着他在兜里掏笔记本和钢笔。四妹子装作什么也不曾留意，在木盆里翻搅饲料，心里却想，老公公在家里是一尊至高无上的神，三个儿子和三个儿媳以及孙子们，都不能违拗他，他和晚辈人之间有一道威严的台阶。然而面对这样一个小小年纪的外来人，一个记者，老公公眼里除了警惕和戒备之外，还有一缕害怕的神色，是一种在佯装的大方掩遮之下的复杂的表情。她听见老公公和小记者很不顺畅的答问——

"老同志尊姓大名？"

"吕克俭。"

"多大年龄？身子骨还好吧？"

"好好！六十多了。"

"你什么时候开始想到创办家庭鸡场！"

"哦……大概在过年那阵。"

“你不怕……‘砍尾巴’吗？”

“砍啥尾……巴？”

“资本主义尾巴。你过去受过砍尾巴的苦吗？”

“那……当然还是怕。”

“你又怎么克服的呢？”

“我……”

四妹子看见，老公公局促不安地搓弄着小烟袋，结结巴巴，鼻尖上冒出细密的汗珠子。他求救似的瞅一眼四妹子，希望她快出场，回答这个洋人的问询。四妹子偏是装作没看见，继续做自己的事。她听见，记者又问技术方面的事，怎样防疫，怎样喂食，怎样解决雏鸡死亡的困难……老公公终于不耐烦地站起来，从她手里夺过木锨，说：“你去给他说去！”

她应答了记者的提问，送走了客人。过了两天，县妇联主任和公社妇联主任乘坐吉普车来登门做调查研究，四妹子又把两三位女领导人引到老公公面前，要老公公回答她们感兴趣的一切问题，弄得老汉更加不好意思。直到妇联主任表示过关心之后，乘车离去，老公公迫不及待地责问四妹子说：“你这个娃呀！你办的鸡场，人家来了就该你应酬嘛！你把我推到人面儿上，我又不知道那些什么‘温度’‘食量’‘成活率’的事，净叫我受洋罪……”

四妹子仰起头，装出一副傻样儿说：“凡是外面有客人来，理当你老人家接待应酬，这是咱家的规矩。俺小辈人咋能多嘴多舌……”

“呃……嘿！”老公公噎住了，反而说不上话来。他现在才明白了三儿媳妇的心计，意在报复他对她的二姑的那次不礼貌接待，她可真是心眼多端。老汉又一时不好意思否认自己的家规和家风，气闷闷地抽起烟来。

四妹子怕老公公真的犯了心病，又装作毫不介意地说：“爸吔！其实我是故意让你跟那些干部多接触接触。我看你总是怯那些干部。你接触多了，也就明白，他们是干部，可也是人，没啥好害怕的……”

那位记者的文章在报纸上一发表，四妹子的小院里就更加热闹，好多有组织的代表团前来参观，从早到晚络绎不绝。县委书记和县长来了，大加赞扬，说她是他们领导下的河口县的第一个养鸡专业户，应该大大地宣传一番，她给全县的妇女蹚开了一条致富的门路，无疑是一个典型。有人要请她介绍经验。有人要总结她的最新材料。有人来说要写她的报告文学。有人要她填一张表，补选县人民代表……

她被热情的波浪包围着，冲击着。她不能离开屋院了，给南工地食堂送鸡蛋的事也办不到了，老公公主动承担了。

老公公第一次给南工地食堂送鸡蛋回来，把一根甘蔗塞给孙子，然后从内衣口袋掏出钱来，交给她。她从老公公手里接过钱的时候，突然想起刚到这个家庭以后，老公公给她五块钱并且因为她花掉了而闹出家庭纠纷的事。现在，老公公向她交钱了。

这天晚上，吃罢晚饭，一家人都在逗着小儿子取笑，四妹子从抽屉里取出五十块钱，对老公公说：“爸吔！你和俺妈给我帮忙整一月了，这是我给你们两位老人的工资，每人按二十五元一月，这是五十块。日后，养鸡场发展了我再给您增加……”

一家人全惊呆了。老公公瞅着她，半天才说：“这算啥话？啊？这算啥话！一家人，还发工——资？那我跟你妈不是成了你的长工了？”

老婆婆也附和说：“你不怕人笑话吗？失情薄意的！”

建峰却不开口。

四妹子说：“我不能让您二老白干呀！社会主义的分配原则是：按劳取酬。您干了就该有报酬，这是合情合理的事。”

“哈呀！哪有老子挣儿子的钱这号事？”老公公说，“我要钱做啥？只要你们过得好……”

四妹子却毫不动摇：“你要是不受钱，我就不好让您二老继续干下去了。我就要另外在村里雇人……”

老公公更加吃惊，睁大眼睛：“你可不敢胡来！虽说目下政策宽了。雇人可是剥削，是共产党头号反对的事！”他自解放以来，最担心的就是怕被升格为地主——剥削阶级，而乡村里作为剥削的最主要标志，就是雇工。

“我不怕。”四妹子说，“我给人家开工资。我也不知道这算不算剥削。”

“既是这话，你先甭着急雇旁人。”老公公把五十块钱接过来，“我就收下这钱，免得你再雇旁的人来。日后万一有人追究起来，我说是给儿子帮忙，也留一步退路……”

过了几天，那位解记者又来了，询问鸡场的发展。四妹子却想，记者们消息都很灵通，就探问可不可以雇工和雇工算不算剥削的事。

记者似乎还没有获得这个具体问题的权威答案，说得含含糊糊。由此却引出了四妹子给公公婆婆开工资的事，解记者大感兴趣，追根刨底，问得四妹子简直都无法回答了。几天之后，报纸上就有一条显赫的标题——

媳妇给公婆发工资

——中国农村家庭结构的质变

四妹子接到解侃寄来的报纸，看了，看得似懂非懂。她真服了这耍笔杆子的，一件在自己看来毫不起眼的小事，让他给分析出那么多的意思来，真是了不起！

这年到头，四妹子给两位老人做了一身新衣服，而且买回一台电视机。大年三十晚上，一家老少欢聚一堂，真是“春满乾坤福满门”。包完饺子，四妹子就说出了下一年的发展计划，她算了养鸡卖蛋的账，获利虽不少，还是不理想。她要买一台孵化雏鸡的机器，那利润比养鸡强多了，大多了。她说，政府现在宣传鼓励农民搞好家庭副业，好些乡村女人眼见她养鸡得了利，发了财，都眼热手痒了，来年春天的雏鸡无疑会是紧俏货。四妹子说：“这一步棋瞅准了，下手要早，单是忙前这一季，赚上万把块钱不成问题。”

老公公不由得愣愣地盯住了三儿媳妇，心里暗暗佩服。这个陕北女人对明年可能出现的小鸡热销的估计完全对头，趁此机会孵化小鸡是有眼光的。他想热烈地肯定儿媳的这“一步棋”，临到开口时，却说成了这种话：“这步棋倒是看准了。我说嘛！要那么多钱做啥？就这三百母鸡，收入的钱够吃够穿够用了，算咧！一下子抓到那么多钱，万一日后政策上有个闪失，钱多反倒成了祸害了……”

“从目下形势看，政府号召农民挣钱发家哩！广播上从早到晚都在说这号话。”建峰插言道，“至于日后会不会变卦，怕是神仙也难预料。”他说这话，用的是一种不介入的清高语调，没有明显的倾向性。

“变了卦再说变了卦的打算，现在允许咱挣钱我就要挣。”四妹子毫不动摇，“爸吔！你甭怕，万一日后把我当新地主斗争，连累不了你的，你是我雇来的长——工嘛！”

老汉扭过头笑了。

“买下孵化器，就得雇人了。”四妹子说，“需要好几个人哩！”

“不敢！”老公公坚决反对，“共产党允许农民挣钱，可不准雇长工呀！这是明摆着的道理，你甭胡来。”

“那怎么办？”四妹子也不敢坚持，“可那孵化器，一装上鸡蛋，黑天白日不能离人，要控制温度，要翻捣鸡蛋。小鸡出来了，要喂食喂水，还要检查种蛋……”

“让建峰回家来帮忙。”婆婆说。

“我正在钻研修理电视机的技术哩！”建峰说，“我见不得那些毛草货！一看见鸡呀蛋呀，就烦，一听母鸡叫唤，脑子就晕了……”

“那……这样吧，让你大嫂二嫂过来干吧，还有那几个侄儿侄女，都能干活了。”老公公想出了万全之策，“一来可以免去雇工剥削之嫌，二来也成全了你的两个哥哥。你们的日子过得好了，也帮他俩一下。你大哥教书挣那几个工资，现时看起来就不如养一窝母鸡了……”

四妹子同意了。老公公的话，她不能不同意，那毕竟是亲兄弟啊！

新年的钟声响了，悠扬，雄浑……

十八

兄弟三家联合经营的养鸡场办起来了。

一台浅蓝色的崭新的孵化器买回来了。在靠着街门一侧的土打围墙前，临时修盖起两间油毛毡苫顶的泥皮房子，作为机房。第一窝雏鸡的孵化工作从选择种蛋开始，直到小鸡破壳而出，四妹子几乎寸步不离。春节前，当她产生了随之决定了要走这一步棋的时候，她就赶到二十里远的紫坡国营养鸡场去，在那里从选择种蛋到小鸡出壳看了一个全过程，她自己掏钱在国营养鸡场的职工食堂搭伙，无代价地跟班劳动，陪着值夜班的工人一起值班。现在，她在自己家里开始第一窝小鸡的孵化工作了。

她告诉侄女雪兰和二嫂，在电灯光下，可以看到蛋壳内有一个黑点的鸡蛋是受过孕的种蛋，而没有黑点的蛋是水蛋，孵不出小鸡来的。她告诉她们怎样控制孵化机的温度，直到帮她们辨识那支温度计上的刻度。侄女雪兰毕竟有点文化，多说两遍也就记住了。而二嫂则巴眨着一双眼睛，今日刚记住一点儿，睡过一夜又忘了。这个骂大街一骂三天可以不骂重样话的愚蠢的二嫂，却是记不住机器上头那些旋钮的名称和作用，最后只好换由她的二女子小红来替代。四妹子带着两个侄女，终于孵出第一窝小鸡来，两个侄女高兴得把刚刚出壳的第一只小鸡抢来夺去，在她们的脸上抚摸，甚至用嘴亲那细茸茸的乳白色的绒毛。

对这件事最称心的要数吕克俭老汉了。

老汉从早到晚，没有闲暇的工夫。他搅拌饲料，打扫鸡圈，背上大笼到河沟里去挖水芹菜，那是母鸡最喜欢吃的青饲料了。挑满一笼青草，夕阳隐没，凉飕飕的山风吹着肌肤，老汉点燃一袋旱烟，在沟坎上美滋滋地抽着。看见自己三个儿子都成为吕家堡最富裕的家庭，至于自己要不要挣儿子们的钱，有什么意思呢？

这个三家联营的鸡场，把分裂的三兄弟三妯娌又扭结在一起了。老大在邻近的小学校教书，过去一直是食宿在校，周六才回到家中过礼拜，现在，他每天傍晚骑自行车赶回家来，匆匆吃一碗饭，就自动在鸡场寻活儿干，直到半夜。

老汉背起一笼青草，在夕阳余晖中，走下山沟来了，回去铡碎了好喂鸡啊！

四妹子却感到了一种威胁。她已得知，仅是这个不足两万人口的小小公社里，已经有三家农民办起了孵化场，看来瞅着这步棋的，不只是她一个人。竞争是明摆在眼前的。吕家堡村街巷里最显眼的墙壁上，并排贴着那三家出售小鸡的广告。而国营紫坡养鸡场的广告也派推销人员下乡来逐村张贴，什么“本场有十五年孵化小鸡的历史，经验丰富，小鸡健壮，成活率高达百分之九十八”等等。人们尊崇习惯，习惯是紫坡养鸡场的小鸡最保险了。

四妹子琢磨好久，找到大哥，把一厚扎红绿纸摊在桌上，让当教员的大哥书写广告。

她只考虑了一条：保活。凡是买四妹子家的小鸡，由四妹子负责指导饲养，负责治病，免费医疗，随叫随到。这一条，是最致命的一

条。那些不懂小鸡喂养技术的农妇们，最怯小鸡死亡，而小鸡的确是难以喂养的。

这一条，不仅打败了另外三家竞争者，而且把紫坡养鸡场也打败了。他们无法取得农村女人的信任。她们一股脑拥到四妹子的屋院里来了，小鸡供不应求。有人宁愿等到下一拨儿小鸡孵出再买，而不想在旁的什么地方买。

四妹子因此却惹下了麻烦。那些从来都是依赖老母鸡的翅膀哺养小鸡的农妇们，总是不习惯于科学喂养小鸡，控制不了温度（这是关键），也控制不了食量，弄得小鸡常常发病，甚至死亡。她只得按广告上说的去做，给人家的病鸡治病。有时候刚刚睡下，有人来敲门，说是小鸡有毛病了，她就跟来人连夜赶到人家村子里去……由于她的指导，挽救了成千上万的小鸡的生命，四妹子的名声大震，农妇们简直尊称她为“鸡大王”了。随之成正比的是，她的小鸡的销路越来越好，令人鼓舞。

四妹子太累了，她销售出去的小鸡越多，她的负累也就越重，有几次，她不得不骑上自行车赶到七八十里以外的秦岭山根下，去挽救那些从她那儿买下的小鸡的生命。她很累，却不厌烦。她自己也搞不清哪儿来的这样高的心劲。她只是确凿地意识到了，自己能挽救十只小鸡的生命，反过来就可能增加一千只小鸡的销售量。虽然治病跑路不要钱，而更大的收入却早已流进了联营鸡场的账本。她受到那些接受她施治的家庭主妇的最热情的招待，常常使她处于一种扬眉吐气的愉快心境中，听着那些推心置腹的又是啰啰唆唆感激谢恩的话，四妹子一次又一次觉得她这个异乡女人在当地人中间活得像个人了。有一次，在本村给一位妇女的小鸡治病，而那位妇女的丈夫曾经是吕家堡党支部的宣传委员，他领导过对她的贩卖鸡蛋行为的批斗，而且说话

十分尖刻。她恼恨他。她现在给他家的小鸡治病，特别用心，当她第二次专心用意询问小鸡病情的时候，那位主妇眉开眼笑，一面夸她技术高明，心肠也好，一面就数落那个男人，屁事也干不响，连人家个妇女都不如。四妹子心里十分痛快，一种得到报复的舒悦。

家庭内部的矛盾却在她东颠西跑的时日里酝酿着，像乌云在迅猛地凝聚。

这一天午后，五月的骄阳悬在头顶，火一样的阳光炙烤着已经变成了黄色的麦穗，紧如救火的夏收即将开始，应该准备镰刀了。四妹子骑着自行车，在浑如金碧辉煌的麦海里穿行。她的心情十分好。她是胜利者。她绝对压倒了三家竞争对手，出售的小鸡高过他们一倍，收入自不在话下。该当暂时告一段落了，一当开镰，庄稼汉男女就没有空闲和耐心去侍弄那些弱不禁风的小鸡了。她的孵化器里的最后一茬小鸡今天开始出售，售完了今年就该收场了。

她把车子撑在门外，防备后晌又有什么人来请她去防治鸡病，走进街门，连一口水也顾不得喝，端直向孵化房走去，不知今天售出了多少小鸡？必须在搭镰收麦之前把这一茬小鸡销售完毕。她走到小窗下时，猛地刹住匆急的脚步，那里头正传出肆无忌惮的嘲骂她的声音，她的大侄女雪兰和二侄女小红伙同她的二嫂，三个人一唱一和，正说到热火处——

“咱是长工。”二嫂的声音，“人家从早到晚骑上车子满天满地游逛，咱给人家从早到晚熬长工。”

“本来就是个野货！”雪兰的声音，“山蛮子！不懂规矩！白天黑夜骑着车子跑，谁知能跑出啥好事来……”

“能登报受表扬嘛……”小红说。

“怕是单为登报，单为卖鸡儿不会有这么大的精神吧？一个山里野女人……”二嫂说。

……

四妹子的脑子麻辣辣地疼，像接连挨了几棍。她像受到突然袭击的野兽，不假任何思索，扑进门去，一句话也说不出口，迎面就在二嫂的那张嬉笑着的胖脸上打了一拳。不等那张脸反应过来，又一拳砸上去了，鼻血涌流下来。

最先反应过来的是小红，一看妈妈挨打，立即蹦起，在四妹子第三拳还未落下之前，就把她推到一边了。小红随之扑上来，和四妹子扭打在一起。她扯着四妹子的头发。四妹子扯着小红的前襟。小红的前襟刺啦一响，两只从未见过人的小乳房亮了出来。她羞了，一狠劲，把一撮头发从四妹子的头上拽下来了。

小红的妈妈已经反应过来，母狼一样扑过来，抱住四妹子的一条腿。四妹子猝不及防，摔倒在地上的木槽里，小鸡被压死一片，她也不顾了，因为她的裤子被扯破了，一只手抓向她的下身，一阵钻心疼痛之后，就昏死了。

吕克俭正在清理铡草场地，听见声嘶力竭的叫骂声，扔下长柄竹条扫帚，颠跑过来，刚踏进孵化室的小门，就瞅见一幅惨不忍睹的景象：孙女小红被扯破了衣衫，裸露着胸膛，二媳妇被血水糊浆的脸孔，大孙女儿雪兰披散头发，嘴角淌血，三媳妇四妹子被撕光了裤子的屁股下鲜血斑斑，屁股下压着被踩踏死掉的小鸡……吕克俭不由得怒吼一声：“都不要脸了吗？”

……

克俭老汉扛着一把双刺镢头，一只手提着装满开水的瓦罐，头上戴一顶由黄变黑的蘑菇帽儿，走出街门，走过村巷，沿着吕家堡背后的山沟走上坡去了。夏收以后，吕家堡生产队的土地按照人口重新分配到户了。尽管他觉得不敢相信世事会发展变化到这种地步，还是不失时机地用牛把那两块稍微平缓的坡地犁了一遍，剩下两块陡峭的坡地，黄牛拖着犁杖是难得站立得住的，只有靠他用镢头去开挖了。挖开地表一层，曝晒整个一个伏天，杂草晒死了，生土晒成熟土了，地表松软了，秋后好播种小麦啊！

兄弟三家联营的养鸡场散伙了。成千只正在产蛋和即将开产的母鸡全部卖掉了。从早到晚不绝于耳的咯咯咯的叫声没有了。吕克俭老汉早已离开三儿子的屋院，重新回到自己的老窝，连同他的老伴。想到那鸡场的红火走运的日子，真是令人叹惋，简直不堪回首，却无论如何又忍不住回味。

挖下一镢头，翻起一块巴着草根的干硬的土疙瘩，一下一下挖下去，身后就摆满了大小各异的黄褐色的土块。即将进入三伏的太阳，像一个正在燃烧的火盆扣在背上，汗水滴在脚下刚刚挖起来的干土块上。干得累了，他提着镢头，缓缓走到沟坡边沿一棵山榆底下，扔下镢头，抱起瓦罐，咕嘟嘟灌下半罐子凉开水，坐在花花拉拉的阴凉里，掏出烟袋来。老大太诡了！诡到这种不顾乡邻口声的地步了。他在心里怨愤地咒骂大儿子。

将鸡场现存的全部母鸡卖掉的主张，是大儿子提出的，将孵化器也卖掉了。除掉归还贷款，将所有盈余的利润，全部按劳力分配。这个分配方案一提出，老二和他的女人立即表示积极拥护，三媳妇只能

少数服从多数，一个指头扭不过五个指头。按这个办法分配下来，老大的女人和女儿雪兰，老二的女人和女儿小红，自然都按两个劳力参加分配，老大本人因为每天放学回来参与鸡场劳动，也争得了半个劳力参加分配。这样，老大一家有两份半劳力，老二一家有两份，只有老三媳妇四妹子单臂独手，仅仅占了一份。每当想到这个悬殊巨大的分配结果，吕克俭老汉就十分懊恼，甚至痛恨自己，千不该万不该，不该在当初把老大老二拉扯到三媳妇的养鸡场里去。好心干下了蠢事，亏了人家三媳妇哇！人家四妹子辛苦一场，好心一场，结果把钱全让两个狠心的哥哥和嫂嫂挖去了，太不仁不义了哇！

克俭老汉现在十分厌恶自己的大儿子。在算计分配方案的家庭会议上，老汉万万没有料到，大儿子从制服口袋里掏出一个蓝皮本本来，当着弟弟、弟媳和侄女儿的面，流水般念着他在周日和每天后晌在鸡场参加劳动的时间，甚至细密到从几点几分干到几点过几分，一天不落，一分钟不差。这个突兀的举动，令弟媳、弟弟和侄女们目瞪口呆，然而最感意外的还是克俭老汉自己。老汉死瞪着眼瞅着大儿子不紧不慢地读着，翻过一页又是一页……他忽然觉得不认识这个大儿子了，与几十年来心目中那个知书识礼的先生判若两个人了。

老汉死瞪着眼睛瞅着那个蓝皮本本，压着厌恶的火气忍耐着，听大儿子像给学生念书一样念着枯燥的时间流水账，心里骂，真是爱钱不顾脸啊！怎么好意思拿出这个狗屁本本来念呢！老汉死瞪得眼花了，那蓝皮本本变幻成一只脱毛烂肉的死老鼠，多看一眼就令人心里作呕。

真是亏了三媳妇四妹子，挨了肚里疼，有苦说不出。人家娃娃辛辛苦苦创下的家业，全让哥哥嫂嫂们分赃盗包一空了！

酷伏天气，原坡沟壑间流荡着炙人的热浪。天空灰蒙蒙的，却又不见一丝云彩。草叶枯焦了，沟道里的泉水断流了。他望着河川里一绺一绺分割开来的田块，顿然悟觉到自己犯了一个深重的过错，拍打着额头，独自叹惋着——

天下之大，世事之纷，总归还是古人说的有远见，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而今正是分的趋势。地分了。牛分了。吕家堡的公有财产包括大队办公室的房子都折价分配给个人了。现在的人心是朝着分字转，分得越小越好，分得越彻底越满意。在这样大水决堤般的时势里，自己却逆时背向，把已经分了家的三兄弟联扯到一起，岂能有完美的结局？岂不愚蠢透顶！

吕克俭老汉虽然一再叹惋自己审时度势中的失误，却并不减轻对大儿子的厌恶情绪，即使“分”字下带着“刀”，你毕竟是教育人的先生呀！怎么好意思从自己亲兄弟的碗里抢肉吃呢？你自个不仁不义也罢了，反而把老人也装进口袋了，抹成五花脸儿了，让三媳妇四妹子会产生疑心，说你们爷儿们合谋算计俺……

老汉几次踅摸到三儿子的门前，没有勇气走进去，见了老三家的怎么开口说话呢？他只是叮嘱老伴，让她去多多宽慰三媳妇……可自己这样长久下去也不是办法，终究放心不下。

他瞅着原坡下的吕家堡，静静地贴在小河南岸的坡根下，浓密的树梢中露出新房旧屋的脊瓦。村子西边收割过麦子的空地上，一拨一拨人在拉车运土，那是新近划拨的庄基地。在秋收前的三个多月农闲时日里，可以修盖新房。那一片变得很小的人里头，有他的两个儿子，老大和老二，老大利用暑假，正带领全家人在挖垫地基，准备盖

造新房了。老二也辞了合同，领着老婆娃娃，和老大竞赛似的干着。他们都有钱了，都要盖置新房了……唉！

十九

四妹子躺在炕上，平心静气地养伤。她一来是养愈被嫂嫂和侄女抓破的皮伤，二来是想躺下来歇息一下。她太累，骑着自行车没黑没明地跑，跑了整整一个春天，半个夏天，真是太累了。

建峰暂时封闭了在桑树镇上开设的电器修理铺的门板，回到家里来，专意侍奉她。他笨拙地给她端水，倒水，坐在炕边上，口齿拙讷地说着宽心的话。他把他在桑树镇修理电器挣下的钱悉数交给她，企图弥补她被两位哥哥坑去的资财。她笑笑，摇摇头，示意她并不在乎那些损失。他们是他的亲哥哥，一个奶头下吊大的亲兄弟，他对他的两位见钱黑心的哥哥无可奈何，也不好在她面前过多地谴责他们的不光彩行为，只是一心一意盼她尽快康复。她不断听到他的真诚的劝慰："算咧！你为咱家受够苦了，现在该当享点福了。我在桑树镇修理电器，收入还可以，保险养得住你。你就跟我到桑树镇去，管点零碎事，免得再东颠西跑，咱们也能日日夜夜在一块……"四妹子听着，心里很舒服。

一位副县长来看望她。县长说他听到四妹子的鸡场垮台的消息，十分震惊，大为惋惜。这个全县最早出现的专业户，正是目下县政府要在全县推行的榜样，想不到竟然垮台了。县长询问垮台的原因，四妹子不想再诉冤枉，就漠然笑笑，搪塞过去，使县长终究不得其解。县长说，一定要总结经验，重搭戏台另开锣，绝不能让全县的第一个养鸡专业户垮台，影响太坏了。他征询四妹子的意见，需要什么机

械，需要什么物资，需要多少资金，他都一手包了，负责给她优先解决……她只是感激地笑笑，说她什么也不要。

县长不解地瞅着她，说因为政府刚刚开展发展专业户的工作，好多好多人都要求贷款，各级银行应接不暇，而四妹子却把送上门来的好事一概拒绝，是不是灰心丧气了？四妹子仍然笑笑，说她还要过生活，也还要做事的，只是暂时还不需要钱。

县长临走还叮嘱她："什么时候有了困难，物资的或钱款的，只需给我打个电话……"

记者解侃也闻讯赶来了。

他是个急性子，又是个热心肠，急头急脑地抹着汗，就追问起鸡场倒闭的经过。四妹子仍然轻描淡写地说说，并不掏根兜底儿。这使解记者很着急，甚至激动了，说他可以把她的委屈公之于世，动员社会舆论的强大力量，惩罚破坏专业户的人。如果需要到法院打官司，他可以出庭作证。

解记者仗义执言的热血心肠，依然没有打动四妹子的心，她还是淡淡地笑笑。她被他逼问急了，只是说："没啥！权当我没挣钱，权当我尽了义务，权当像过去偷贩鸡蛋被没收去了……"

解记者默然了，点燃一支烟抽起来，这篇文章怎么写呢？往昔里，他第一个发现了吕家堡的四妹子，把她作为一个经济变革时期的典型人物推上了报纸，成为本报宣传的第一个专业户。这个新生事物的报道，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提高他在报社的威信，那篇通讯稿在全国也算较早报道专业户的有影响的文章之一。几年里，关于四妹子的发展，他写过不下十篇通讯了。她买下电视机，他就及时写下《庄稼

人也能看电视了》。她买了一辆轻型凤凰自行车，他就写下一篇《凤凰飞进寻常百姓家》。她买了孵化器，他就写下《电母鸡》风趣十足的通讯等等。

现在，他该写她的什么呢？写她破产吗？前不久他刚发表过一篇《三兄弟联合办鸡场》的通讯，说扩大了生产的农民有自愿组织联合再生产的趋势云云。

解侃说：“你能详细地把鸡场倒闭的过程说说，自己可以总结经验教训，我也可以找出一些规律性的东西，对正在兴起的专业户都有好处……”

四妹子说：“我不想总结了。鸡场倒闭了算了。我不爱为过去的事情伤脑筋。过去了的事，我全都不管了。我只想日后的事该怎么办？”

解记者忙问：“那好，你谈谈日后的打算，也好哇！”

四妹子笑笑：“暂时保密。”停停，她有点不好意思地说，“你以后甭写我了……我是个农村妇女……你写我写多了我不好受……”

解侃不无遗憾，不无丧气，真没办法。

四妹子静静地躺了三天，伤不疼了，体力也恢复了，有点躺不住了。三天来，建峰围着她打转转，表现出一种笨拙的又是真诚的关心。她向他招招手。他顺从地走过来。她指指炕边。他顺从地坐下。她努努嘴，向他撒娇了。他抱住她，亲着她。

她说：“建峰，你不嫌怨我闯事惹事吗？”

他憨厚地笑笑，把她搂得更紧了。

她说："我想起我自小受苦，从陕北来到关中，我……真想哭，又……哭不出来。"

他听着她在他胸前嘤嘤地说着，自己倒先流出泪来了。

这当儿，院子里响起一声咳嗽，是老公公给他们打招呼，老掌柜的要进晚辈人的屋子了。她挣脱开他的搂抱，俩人端端正正坐着。

老公公走进厦屋，坐在木椅上，沉默半晌，才问："好些了？"

她说："好了。"

老公公说："噢！好了就好！"

四妹子忽然感动了。这是踏进吕家门槛几年来，第一次听到老公公知疼知冷的话。平素里，老公公摆一副家庭长者高不可及的威严架势，吝啬到从不说一句问候儿媳的话，总是由婆婆来传达他的关照。老公公终于走进她的卧室，问候病情来了。她忽然想到亲生父亲，那个比老公公更穷然而却和气得多的大大！

"过去的事，甭想了。"老公公说，"千错万错都怪我……"

"根本不怪你，爸。"四妹子忙说，"我早都不想它了。自打那天晚上分配完毕，我就不想了，吃亏也罢，占便宜也罢，就这一回了。我已经不想它了。"

"不想了就好！"老公公说，"日子怎么说也比以前好过了。"

"爸吔！"四妹子叫，"我想跟你商量一件事。"

吕克俭老汉仰起头，期待着。

“我想承包大队那个果园。”四妹子说，“需得一个看门的可靠人手……”

建峰瞪起眼：“你还不死心呀？啊呀呀！我还怕你伤心哩！你这几天躺在炕上原是盘算这号事……”

四妹子说：“我盘算了三天。那果园百十亩地，苹果、梨和葡萄刚挂果，队里管不好，现在又要承包出去。甭说现有的果树，单是利用这块地养鸡养蜂养奶牛，想想会弄出多大的世事！”

吕克俭老汉惊呆了，半天说不出话来。三天里，他沉浸在一种难言的痛苦当中，替三媳妇四妹子难受，谁料想她本人并没有伤心伤情，而是在谋划着承包大队里那百亩果园的事。哦呀呀！这个陕北女人，真厉害！

“这回——”四妹子说，“我要正儿八经地雇用工人，按月开销工资。果子未上市前，工资暂欠，果子一上市，按月照发，我要……”

“保险能赚钱吗？”吕克俭老人不无担心，“大队里决定果园承包半月了，没人敢应承，听说人都怕烂包……”

“全在自己管理哩！”四妹子说，“我这几天划算来划算去，怎么划算都划得来。爸吔！你只要答应给我看大门，旁的事就甭操心了。”

……

夏日的傍晚，夕阳涂金。

四妹子走在宽阔的柏油公路上，旁边走着她的男人建峰。他俩岔开公路，走上通往果园的土石大路。他不放心她病愈出门，陪她走

着。

苞谷苗子铺满大地，渠水欢快地流泻着。公路两旁高大的白杨迎风起舞，蓝天涂一抹艳丽的晚霞，几朵白云也染成红色了。

“你还舍不得那个电器修理部吗？”

“当然，你也是舍不得果园呀！”

“好，各人干各人的吧！”

“唉，你总是跟我合不到一条辙上！”

土石大路两边，绣织着野草、马鞭草、菅草和三棱子、香胡子，拥拥挤挤地生长在路边上，车前草却居然长到路中间来，任车碾马踏人踩，匍匐在地上，继续着自己顽强的生命。

四妹子拔起一株车前草，对建峰说：“这草叫什么名字？”

“车前草，你也不认得？”建峰不屑地说。

“这草——”四妹子说，“叫四妹子。”

建峰眨眨眼，理会了什么似的，没有开口。

四妹子走到果园的木栅门口，忽然又想起妈妈给她掏屎的痛苦情景，那令人毛骨悚然的可怕的谷糠饼子啊！

她回瞧一眼建峰，走进果园，一眼望不透的苹果树、梨树和葡萄藤蔓……她张开双臂，大声喊：

“砸不烂的四妹子，又闯世事来了……”

1986年8月草改 白鹿园

短篇小说

夜之随想曲

我陪他坐在小河边。

新月初上，沙滩上洒着一层迷蒙的月光。一条条柔软的柳枝从头顶上垂吊下来，悠悠摆动，拂抚着我和他的脸和赤裸的肩膀。

“空气多好啊！”他用手撩着水，撩起的水珠落进河水里，发出清脆的金属撞击般的声音。他仰起头，深深呼出一口气，陶醉了的声音里流露出毫不隐讳的妒羡心情，“在享受清新的空气财富方面，乡下人比城里人富有得多了！”

我很自豪。我生活在乡下，总愿意听到别人赞美乡村，尤其是城里人对乡村的赞誉之词，总使我听来很有一种自豪的滋味。

“这水多好啊！”他像一位诗人，赞美了空气，又赞美河水，赞美月色，激动得声音发颤了，“月亮，迷迷蒙蒙的河川，太好了！”

尽管这一切我已司空见惯，此刻心里受到他的感染，愈加自豪了——我们的乡村！

“唉！”他感叹着，遗憾地摇摇花白的头，“我那小孙女，长到八岁了，没有见过河水，没有摸过沙子。每到星期日，总要我领她去公园，那些假山假湖，她一进去，就没命地跑啊蹦啊！我看着真难受！

被人踏得光溜溜的假山，沤得发黑的一潭臭水……哪有这大自然的河水的美景呢？我的孙女要是到这沙滩上来，该乐死了哩！”

“那你把孙女领来呀！让孩子在乡下玩玩多好！”我热烈地邀请。

“我前日来时，孙女就要跟我来，我也想带她。”他说，“她奶奶给整好了衣服，她妈妈给装好了吃食，奶粉、白糖、蛋糕、巧克力，嗬呀，装下一大包，真够我背的。结果呢？我引着孙女要下楼了，她妈妈突然说，要是孩子病了可怎么办？乡村人没有讲卫生习惯，孩子是很难适应的。我下乡来头一个星期，就闹肚子。我也就……”

想让孩子到乡下来呼吸新鲜空气，却惧怕乡下卫生条件差而闹病，这个矛盾无法统一。我嗯了一声，相邀的热情顿然冷却了。

“孩子抵抗力差呀！”他解释说。

我点点头，这是对的。

“城里的孩子真可怜！”他敲着膝头，叹惋的口气，“吃不上任何新鲜的东西。牛奶呢？订不上，奶粉呢？加工过了，哪有鲜奶好嘛！苹果糠了！西红柿烂了！连面粉也是囤积了多年的小麦磨下的陈货！我在房东家里，看见女当家每天早晚给孙子挤羊奶，多新鲜！西红柿从地里摘下来就吃，维生素一点也不损失……我不由得想到我的那个小孙女，真可怜！啥好东西也吃不上……”

我想点头搭讪一下，却仅仅是一种心里念头，脖颈竟然不听支配，没有点一下头，不置可否地笑了笑。

我和他住在一个叫作前庄的村子里，对农民搞路线教育，他是组长，我是组员。半个多月的相处，我大体得知，他是地区的一位中层

领导干部，“四八式”干部，“文革”中结合得很早。他下乡抓点来了，住在我们公社。我有幸陪他住在前村，原是以为荣幸的——这是我有生以来直接接触的最大的一位领导。我的三十九元的工资，只抵得他的工资的零头的一半。想想吧，他要比我的资格高出多远！

我有三个孩子，还有一个农民老婆，双亲虽然健在，都是生产队的“半劳”。我们那个生产队的工值是四角。我从来也不敢用三十九元工资去孝敬父母，孩子更不在经济许可之内了。我想尽了一切可能节约的途径省下每一个镍币，再到渭北的富裕地区去买苞谷。我们队里的粮食总是欠缺，我能保证一家老少填饱肚子，就自以为是最大的尊老爱幼了。

他——我的组长，现在在美妙的夏夜的大自然的怀抱里，为他的小孙女不能呼吸新鲜空气，不能尝新鲜水果，不能喝到鲜奶而深深惋惜。我顿然悟出一条人生的哲理：人永远都在不满足中叹息。

大约看着我无端地沉默起来，他笑着说：“你能在农村工作，太好了！我就喜欢农村，所以这次下乡，是我自己提出来的。城里没什么好留恋的。你可记住我的话：甭往城里钻！”

我点点头，笑笑，说：“我即使想进城，也钻不进去。我是一个水利技术员，到城里没工作干呀！再说，我那点工资，在乡下还能凑合，到城里可就没法……”

“你工作几年了？”他关心地问。

“我六〇年从省水利学校毕业，现在工作了整整十五年了，工资一次也没涨过。”我流露出某些怨气。

“工资是低些。”他安慰我说，随之就对我进行传统教育了，“我参加革命时，没有工资，照样拼命干！解放头几年，实行供给制，也没工资，还是泼上命干工作。干革命不能讲价钱！”

我的意识里强烈地拒绝接受这些冠冕堂皇的教育。我多少知道，他早在我这个年龄的时候，已经有保姆料理家务了。他已经不需要向谁再讲价钱。他不满足的，仅仅是孙女看不见大自然的真山和真水，呼吸不上乡下新鲜的空气，尝不到从树上刚摘下的带着露珠的苹果！

“空气多好啊！”他站起来。

“空气……是好啊！”我也站起来。我陪着他，从河堤上走过去，从田间小路上随心所欲地走过去。

“我的小孙女要是跟着我，该多好！”

“你带一个保健医生来……”

“我的资格不够哟！”他哈哈一笑。

我想到了我们公社书记的话。公社书记派我陪他到前庄来的时候，给我交底说，他是主动要求下乡来抓点的，可能要提升一把手了。我就不无目的地说：“你会达到那个资格的。”

“我可不敢想……”他酸溜溜地笑了。

“……”

我想说，不敢想其实不是没有想，然而终于没有说。我的心头掠过一阵悲凉，一个月薪超过我四五倍的人，居然对我哭起穷来了，怎

么能指望得到应和呢？他一边抱怨自己亲爱的小孙女吃不上新鲜水果和牛奶，却一边教导根本连糠了的苹果也吃不到嘴的孩子的爸爸——我，要发扬延安精神，艰苦奋斗，继承传统……他自己引以为荣的精神似乎只有我才是最合适的继承者，他倒不必再发扬了……未免虚伪得过于露骨！

“我一定要说服小孙女的奶奶和妈妈，带她到乡下来，看看真山真水，呼吸新鲜空气。”他在夏夜温适的空气中沉吟着，终于下了决心，而不考虑卫生条件了。

“你把时间选择得稍晚一点，”我提示这位城里人说，“那时候，前庄大队果园里的苹果就要成熟了，很新鲜……”

“这倒对！”他高兴地点点头，居然把我的话当真了……

1985年1月12日 西安东郊

广播体操乐曲算不算音乐

关于广播体操乐曲算不算音乐的问题，在田部长家里的晚餐餐桌上提出来了。

晚餐吃完了。田部长的老伴系上围裙，开始收拾餐桌。只有在她那身藏青色的干部服外头罩上淡蓝色的围裙，田部长才觉得他的老伴更像一个女人。她的腰部和臀部早已变得一般粗了，围裙的系带在腰间一勒，那膨胀了似的腹部就愈加突出。虽然如此，收拾起桌上的残留着剩汤剩饭的碗、碟、杯、盘来，她的动作依然利索，抹过桌子，就把一杯刚沏好的酽茶递到他的手上，这是习惯了。

田部长接住茶杯，放到桌上，站起来说："不喝了，我要出去。"

"这么急？"她站在当面，"部里有事？"

"部里今晚有场舞会。"田部长兴致勃勃。

"噢哟！"她的嘴一撇，嘘叹了一声，倒自笑了，"我当是有啥紧急事情要办哩！你想跳舞了？也不想想自己的年龄！"

"谁也没规定多大年龄才能跳舞。"田部长不在意地说。

"可你毕竟六十了，和那些小青年在一起扭……"她不笑了，只是说。

"和青年们扭一扭，我倒觉得自个变得年轻了。"田部长仍然兴致勃勃地说。

“算了吧！甭赶时髦了！”老伴淡淡地一笑，嘴角露出一缕讥诮的神色。

“赶什么时髦！”田部长不听劝阻，用手握着茶杯，“那对身体是一种很好的锻炼。”

“广播体操也能锻炼身体，而且是最好的锻炼。”老伴解下围裙，扔在椅子上，“你要不要锻炼？我马上给你放磁带。”

田部长盯了老伴一眼，就扭转了头。她明知他此时根本不做体操，便自告奋勇要去替他放体操磁带。她反对他去跳舞，却不直着跟他说，反而提出这样围堵的办法。他自己也始终没有勇气告诉老伴他想跳舞的主要原因，却说什么能锻炼身体的鬼话。眼看被老伴围堵住了，仍不甘心，仰起头来，说：“舞会上的乐曲很好听，跳不跳舞在其次，我想欣赏舞曲音乐。”

“广播体操里也伴着乐曲嘛！”老伴说。

“那怎么能算音乐呢？”

“那怎么能不算音乐呢？”

“那不算。”

“算！”

“那怎么说也不能算！”

“那怎么说也得算！”

没有人能给他们做裁判。老伴已经打开收录机，塞进了磁带，广播体操的乐曲响起来了，领操员漂亮而富于弹性的喊数声也随之响起来了，一……二……三……四……

“做操吧！听乐曲吧！”老伴摊开手，笑着说，“老头子，锻炼身体，欣赏音乐，你随意挑选吧！咱们家是自由的。”

“关上吧！我不锻炼了，也不欣赏音乐了。”田部长叹一口气，端起茶杯，转过身，朝屋里走去，再转过身，一弯腰，坐在沙发上，觉得疲倦极了。

老伴再也不争论广播体操乐曲算不算音乐的问题，从椅子上捞起围裙，重新系到腰里，转身走进小厨房，随之响起杯盘在水里互相撞碰的枯燥而单调的响声。

宽敞的住屋里，又恢复了平素间的静寂……

灯笼

一

县纪委书记焦发祥一早去上班，走进县委敞开的四方水泥立柱大门，瞧见传达室旁边的绒线花树下围着一堆人，他不经意地瞥了一眼，从人头攒动的缝隙中，瞅见一只灯笼。为心头突然泛起的一阵儿好奇心所驱使，焦发祥凑上前去了。

大伙儿围观的确是一只灯笼。

那是一只用细细的竹篾编织的小灯笼，外边糊着一层红纸，里面点燃着一支小蜡烛。这种小灯笼是乡村小孩子过年时打着玩的，普普通通，屡见不鲜。

挑着这只灯笼的是一位乡下老农民，样子有点滑稽。他那张脸皱纹太多，像一片揉皱了的灰布，或者更像一只又干又蔫的茄子，没有生气；那双眼睛睁着也像闭着，浑浊而毫无光彩；嘴巴紧紧抿在一起，上唇有几根稀疏的黄胡须，微微颤抖。整个脸上，只有这几根微微颤抖的黄胡须富于生气，富于感情色彩，表明他心里憋着气。

“喂！你在这儿干什么？”焦发祥问。

那双似睁似闭的眼睛闻声睃巡过来，没有说话，似乎在掂量和估计问话人的身份。

“你出什么洋相嘛！”焦发祥说。

“寻找真理！”他的干瘪的嘴唇动了一下。

围观的干部们笑起来，真理？寻找真理？这样一句颇为高雅的台词，从一个灰不耷耷的老农民的嘴里冒出来，无疑便具备了更多的滑稽色彩。

“你要寻找什么真理？”焦发祥也笑了。

“寻找共产党的真理！”老农民执拗地说。

“你说具体点行不行？”焦发祥提醒他。

他的眼睛忽地一翻，下垂的眼皮下露出一缕难受不堪的神色，盯住焦发祥，反问：“我给你说了，你管不管呢？”

“问你就是想管。”焦发祥肯定地说。

“啊呀！我可找到包青天了，”打灯笼农民嘴里叨叨着，“我可找到包文正了……”

二

打灯笼农民的具体叙述——

我跟支部书记刘治泰家伙住一个院子。这是土改时分地主家的一院马房，三间安间房，各占一半。两家挤一院，都要垒猪圈、羊栅、鸡窝、茅厕，都要堆柴火，拥拥挤挤，谁也宽展不了。前几年手头紧巴，没力量盖房，挤也只好挤着。

这两年，手头活泛了，我想搬出去，另建一院新房，就朝队里申请另拨划一院新庄基地，让刘治泰一家住在老院里，也就宽展了。刘治泰是支书，给他自个拨划了一院新庄基地，没有批准我的要求，说他搬走了，让我住在老院里。这也行，也好，反正新庄地和老庄地都一样大，队里规定三分三，谁走谁留一回事。

没料到，刘治泰拨划了新庄基地，盖了新房，搬了家，再不提老庄基上他的房子问题了。我找他商量，一起拆掉旧房子，我要盖新房子。他说他忙，没工夫拆。过了半年，我问他该腾出手来了，他说他更忙了。又过了半年，他干脆说不拆房了，要在老屋里拴牛喂牛了。

我急慌了，说这块老庄基地已经划归我使用了。他说这事他承认，可他拆不起旧房子，也没办法呀！后来，别人给我点了窍，说让我花钱把刘治泰的房子买下来。我的天，这老房子在地主家时本是马号，老年老月的了，椽也朽了，瓦也朽了，雨天漏得像草筛。我连我那一半也要拆掉，还买他这一半朽木朽瓦做啥？这不明摆着坑人吗?

再一思量，不挨坑就下不得台呀！反正我急着他疲着。我的三个娃子一排排高，连一个媳妇也没娶回来，净等房子喀！我就托人去跟刘治泰商议价钱，支书要价的口开得多大！大得怕怕！我是买不起！

我找乡政府，不下八回，总说忙，抽不出时间解决这号鸡毛蒜皮的事。我知道这事搁政府里是小事，是鸡毛也是蒜皮，可搁我家里，就是大事。房漏墙塌，人住下害怕，娃子的媳妇娶回来没处安顿，我这一家人的日子怎么过？我实在想不下好办法，就打上灯笼来了……

三

“杨书记吗？喂！你们乡的清水湾，有个叫田成山的农民，为了庄基地的一点纠纷，居然挑着灯笼闹到县上来了。你把这件事处理一下吧！”焦发祥平静地说。他做一个县的党的纪律检查工作，比这位农民反映的要严重得多的违犯党纪的人和事，自然不在少数。所以，他并不激动，也没有激起多少义愤，不过是一桩小事，小事一桩，让乡上给解决了就完了。

“好的好的。闹成这样子，不像话。怪我们失职。”杨书记在电话里连连自责，并保证说，“焦书记放心。我一定亲自处理这件事。三天后，我给你汇报处理结果。”

焦发祥忙他该忙的更重要的事去了。

第三天早晨，焦发祥刚走进县委的四方水泥立柱大门，再走过水泥通道，再爬上二楼，再走进办公室，电话铃正在急促地响着。

焦发祥抓起电话筒，扣到耳朵上，似乎那耳机漏电，他的耳朵以至全身都颤抖了一下。电话是市纪委打来的，说是本县清水湾一个名叫田成山的农民，挑着灯笼到市委大门口名为“寻找真理”，实际是喊冤。

怎么搞的？焦发祥真有点火了。

他没有从耳朵上取下话机，就拨通了乡上的电话，点名要乡党委杨书记说话。

“已经处理了。焦书记，关于清水湾田成山的问题，我昨天已经严肃处理了，具体意见是这样——”焦发祥捺着性子听着，电话耳机里传来杨书记洋溢着工作热情的声音，“昨天，我找田成山谈了话，明确向

他指出，为个人的一点纠纷，打着灯笼大闹县委，影响了县委机关的正常工作，是无政府主义的表现。经过教育，田成山已经认识到自己的行为的严重后果，破坏了安定团结的大好形势。我已经严肃地向他指出，这是‘文革’流毒，是‘自由化’影响。经过调查，田成山‘文革’中虽然没参加派性组织，但他的老婆是个厉害手，当时在村里参加过一个组织，不能说不受影响。考虑到田成山是个普通村民，不是党员，再不好做什么处分，教育一下算了。这件事背后有没有背景，尚待进一步了解。我想，凭田成山这样的笨佬儿，怎么会想出挑灯笼这样蓄意影射的鬼招儿？怎么会说出‘寻找真理’这样高级的话语？……”

“好了好了，你真是动了脑筋了！”焦发祥真是哭笑不得，再也没有耐心继续听下去，“你对这件事处理的后果呢？”

“我开头说了，田成山承认他的行动是错误的。”杨书记的声音依然不丧失热情。

“你知道吗？”焦发祥嘲弄地说，“田成山把灯笼挑到市委大门口去了！”

“啊？”杨书记骤然变粗了声音，出气声都特响，“这家伙真不像话！”

“想想我们自己像话不像话。”焦发祥冷冷的口气，“照你这么弄下去，田成山赶明日该挑着灯笼上中南海了！”

对方似乎一下子醒悟了他并不满意他的汇报，半天还不上话来。

焦发祥生气地放下话机，对司机传话：“走一趟清水湾。”

四

清水湾三面被坡丘包围，一面出水路，坡地上多柿树、杏树和桃树，正是落叶时节，看不出一年中最好的景致，但一望而知，春天的花和夏天的果一定会是十分受看的。村前有一弯簸箕似的平川，种麦又种稻。一看便知，这个小小的村庄是本县山区一个得天独厚的角落。

七八十户村民，不用广播，村长从东到西吆喝了一遍，男男女女就聚集在村子中间的会场上来了。

焦发祥让村党支书刘治泰把县政府关于给农民划拨庄基地的××号文件宣读一下。

刘治泰高个儿，头顶谢了发，光秃秃的脑门，在秋天午后的阳光下亮闪闪地放光。他的嗓门清脆，朗读能力不错，大声宣读完文件后，一只手按在临时搬来的桌子上，一只手叉在腰间，向全体村民讲话："按照县政府文件精神，拨下新庄基，老庄基交集体统一筹划。我先做检讨，我没有及时搬迁老房子，影响了田成山同志盖房，是我的懒病致的。我总怕麻烦……"

焦发祥不由得瞧瞧这位年近六十的老支书，真是聪明剔透！他没有让他做检讨，甚至也没问这件事，但老支书立即意识到了，毫不勉强地检讨了。他原想，开起群众会来，当众查问这件事，把刘治泰的大脸伤一伤，比他对他单个说话也许效果好些。现在，刘治泰已抢先走到他前头了，他就问："这回说准日子吧！田成山的娃子等着盖房娶媳妇哩！"

"明天就下手！"刘治泰说，"只要不下雨。"

“听说有一阵子你想把朽房子卖给田成山，这话当真不？”焦发祥问，发起事端来。

“有�事。”刘治泰面不改色，满口应承，“那是成山托人说话，要买，我后来想想，不能卖，卖了成啥话了！”

焦发祥站起来，说：“治泰同志，据说这房子原是地主家的，你和田成山都是分下的胜利果实。你没卖还算好，你要是把这号都快倒塌的房子卖给成山，我说一句不大中听的话，你的心就太黑了！”

焦发祥停顿一下，侧过头瞅瞅，刘治泰的脸红了，红得像个猪肝。他继续说下去：“你想想，分地主的马号，是胜利果实，没人朝你要一分钱吧？你而今拨了一方新庄基，也没人朝你要一分钱吧？你把老房子撑在那里不拆，田成山无法盖房，你要是想借那点儿朽木朽瓦坑田成山一笔票子，你想想，不要说你够不够共产党员，你还有没有人气儿？”

刘治泰低下头，耷拉着眼皮，捉着短管旱烟袋的大手在抖索，尴尬地笑着，不搭腔。

焦发祥说到这儿，自己却无端地动情了，说：“清水湾的乡亲们，我在咱们县上工作了十年，没来过这儿，想不到咱们县竟然有这样一块好风水的地方。刘治泰同志呀！甭忘了你是共产党的干部，姓共不姓坑，要是坑群众，就跟国民党的保长一屎样了！你甭把这样好山好水好百姓的清水湾，给搅和成一个浑水湾……”

他的嗓门被清水湾村民的呼喊和掌声淹没了。

焦发祥猛然瞅见，乡党委杨书记也站在人窝里，使劲鼓掌，这家伙啥时候赶来的呢?

五

吉普车驶出清水湾，在坑坑洼洼的土石公路上疾驰。秋天的田野，秋庄稼收获净尽了，冬小麦泛起一抹新绿，田埂上和灌渠上到处堆着一垛一垛变成黑色的苞谷秆子。夕阳如金。

司机低声咒骂着这该死的道路，颠得车子哐啷啷响。

焦发祥和杨书记并排坐在后座上。

杨书记深受感动地说:“焦书记，你真是名不虚传，实打实干。我刚才在清水湾，听你讲话，深受感动！你看问题深刻，真深刻！”

焦发祥不动声色，却苦笑一下:“你甭来这号醋熘白菜好不好！我有哪一句话说深刻了? 共产党干部不准坑群众，这算什么深刻道理? 笑话！那不过是一句实话罢了！”

“清水湾群众称你为包文正，秉正无私！”杨书记仍然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

“可悲！”焦发祥自嘲地笑笑，“一个共产党的领导干部，仅仅够上封建社会一个清官的标准，还值得称道? ”

杨书记有点悻悻然了，点燃一支烟。

“还是谈谈你对田成山的处理问题吧！”焦发祥歪过头，盯着杨书记，“我给你打电话，让你处理他和刘治泰的庄基地纠纷，你怎么反倒

查起他老婆‘文革’时参加什么狗屁组织的事来？”

“哈呀！我领会错了，领会错你的意思了。”杨书记不好意思地笑了，“我以为田成山在县上胡搅蛮缠，闹得不可开交……”

“你为啥首先没有想到是刘治泰欺侮了田成山？”焦发祥问，尽量使自己的语气有亲切的气氛，“田成山找过你好几次，你按说该了解其中曲直，你不给他解决问题，反过来还要查他在‘文革’中的表现，还要进一步查他的背景，还怀疑谁教给他的‘寻找真理’这样‘高级的话语’。这样搞，他能服？”

“我对刘治泰身上反映出来的败坏党风的事，忽视了。”杨书记自责地说，“只是考虑田成山破坏了安定团结的大局。”

“出一点问题，先在田成山身上查根子，找背景，这是一种什么习惯呢？”焦发祥盯着杨书记，“实在说，刘治泰这样的作风问题并不难纠正，只要政策和群众一见面，他就收脚蜷手了。难就难在我们的这个可怕的习惯！你想想，这到底是一种什么习惯呢？”

杨书记红着脸，渗出汗水来了。

吉普车在乡政府大门口停下来。

杨书记下了车，邀请焦发祥进去喝水。

焦发祥走出车门，手里挑着一只灯笼，笑着说：“把这只灯笼送给你做个纪念。关于那个‘习惯’问题的答案，就在这只灯笼里。你若找到了，就告诉我，再把灯笼还给我。”

杨书记红着脸，接过了那只小灯笼。

焦发祥钻进吉普车。车子在柏油公路上飞驰，他却自言自语：这种习惯！可憎的习惯！这种恶习……

1985年10月

毛茸茸的酸杏儿

整整十年过去了，姜莉一想到吃过的那一次酸杏儿，嘴里就会有酸水泌出来。

十九点整，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节目准时开始。姜莉坐在沙发上，右腿压着左腿，左手握着茶几上的细瓷茶杯，看着中央台那位熟悉的男播音员开始介绍今晚的节目内容。她的儿子正趴在隔间的小桌上赶做作业，厨房里传来碗盏盘勺的碰撞声，那是她的丈夫在收拾洗刷晚饭用过的餐具。读者不要以为又是什么“妻管严”造成的家庭内部的谁怕谁的乏味的笑料，其实是爱好和兴趣造成的这种格局。姜莉每天必看不辍的是《新闻联播》，而对那些装腔作势的电影或电视剧简直不能容忍。一当《新闻联播》结束，她就回到隔间的办公桌前开始工作，批改学生作业或者备课。她的丈夫和儿子，正好相反，对国际国内的新闻时事毫无兴趣，任何低劣的故事片却可以捺着性子看到电视小姐向观众致“晚安”的时候。

这是一天里最恬静的半个钟点。电视机前静静地坐着她一个人，手握一杯清茶，看一天来在这个世界上发生的重要事件。学校和家庭，公事和私事，顺心事带来的欢乐和琐屑事惹起的忧烦，此刻都排除到心胸以外的空间里去了。

头条新闻是政协的一个首脑会议。这个会议上，集中了那么多老人。这些曾经震惊过世界、影响过中国历史进程的文才武将，现在都老了。她的父亲也老了，退休在家休养着。他原是市上的一个中层领导干部，对她生活着的这个古老而优美的城市的生活发展，也产生过

一定的影响。她每每看见一位老态龙钟的老人，就会想到成熟了的杏子。成熟了的杏子把儿松了，即使没有自然的风吹或人为的摇撼，迟早还是要从杏树枝条上落下来。成熟是胜利，也是悲哀。成熟了，生命的活力也就宣告结束了。

又一条新闻。首都机场。多漂亮的建筑物。中国正在变化，北京尤其显著。一位首长即将登机出访，正在和送行的国家领导人握手告别。电视录像机一直跟着那位首长，直到他走进飞机的舱门，然后极迅速地掠过正沿着舷梯爬上去的随行人员。这时候，她瞅见了一张熟悉的面孔，自信而又顽皮地笑了一下，电视录像机切断了。

她的心里轰然一响，闭上了眼睛。

他穿着一身粗格子布料的西装，似乎是无意间转过头来，那么顽皮地笑了一下……

灿烂的夕阳给那个黄土原坡涂上了一层绚丽的色彩，即使那些寸草不生的丑陋的断崖和石梁，此刻也现出壮丽的气势。她从公社开完知青会议，坐了三站公共汽车，在河川的一个小站下了车，把草绿色的军用挎包搭上肩头，就开始爬坡了。一条弯弯曲曲的小路在夕阳里闪晃，在山坡的秃梁和茅草间蜿蜒，把原坡上的村庄和河川里的世界联结沟通起来。

爬上山梁，又走下沟底，跨过那一道浅浅的沟底的泉水，再爬上对过那面阴坡，就可以看见她们下乡锻炼的村庄了。沟底下好凉快哟！夕阳的红光还在坡顶的树梢上闪晃，沟底已经显得有点幽暗了。同一条沟道，朝南的阳坡上只有稀稀落落的几株榆树，干焦萎靡，像贫血的半大娃子。朝北的阴坡上，却是一片茂密的山林。刺槐密密层

层，毛白杨干粗冠阔，椿树和楸树夹杂其中，竞争拔高，争取在天空占领一块更加宽大的空间，领受阳光。蓑衣草和刺蓟、野蒿，铺满了地皮。五月里，乡村最媚人的季节。她真是奇怪，这个干巴巴的黄土高原的山野之中，竟然有这样幽雅的一块绿地。

她蹲下身来，想在泉水里洗洗手脸，甚至想扒掉长衫长裤，痛痛快快洗一洗爬坡时渗出的黏汗。她刚刚撩起水来，一个人从树后蹿了出来，她吓坏了。

原来是他，正在仰头哈哈大笑。

她浑身都吓得酥软了，瘫坐在地上，流出眼泪来。开这样的玩笑，简直是恶作剧。她气恼地瞅着他，噘着嘴。

他大约意识到玩笑开得过分了，就赔着笑脸，走到她跟前，弯下腰，动手扶她站起来。

她坐在地上，一把抓住他的胳膊，在他的脊背上擂起拳头。她使足劲儿打，真打，打得那宽宽的脊背嘭嘭响。他不躲避，也不叫疼，反而哈哈哈笑着，扬着手说："打呀！砸呀！使上劲呀！看你有多大劲儿吧！打得我……好舒服哟！"

她泄气了，终于忍不住笑了，和这个活宝在一起，你永远也难憋住什么气呀！他能把人惹恼，又能把你逗乐。她停住手，泄了气儿，这才觉得膝盖上火烧火燎地疼。她低头拉起裤腿，膝盖上渗出血来了，刚才他吓得她跌扑跪倒的时候，石头蹭破了皮肤。

他看见她腿上流出血来，也愣住了，这个玩笑真是开得太冒失太过火了。

“怎么办呢？感染了会化脓的。”她有点害怕，嘴里直吸冷气。

“我有办法——”他迅即转过身，跑上坡去，在草丛里揪下几片刺蓟的嫩叶，在手心里揉烂，用三个指头捏着，直朝她膝盖的伤口上按下来。

她吓得缩回腿，挡住他的手：“那是什么东西？敢乱涂！”她自小接受的是母亲或者医生给伤口涂抹紫色或红色药水，从来也没见过用这种草汁消炎治伤。

“刺蓟，消毒良药，中药材里的药名叫小蓟。还有大蓟，乡里人叫马刺蓟。”他给她介绍，说这是正儿八经的中药，“我割草割麦时，不小心给刀刃划破了手指，用这绿汁子一涂，就消炎消毒了。好得很哪！”

“没听说过。”她疑疑惑惑。

“乡里人都知道，小娃儿也知道这窍道。”

“我可有点怕。”

“甭怕。涂上包好！”

她伸出了左腿，把伤着的膝盖弓起来，紧张地瞅着他捏着揉烂了的刺蓟叶儿的手指。他用劲一捏，一挤，绿乎乎的叶汁滴在伤口上，凉凉的，刺激得伤口更疼了，真像是涂上了碘酒一样。

他跪在她跟前，用劲地挤着叶汁，轻轻地在伤口上涂抹均匀，使绿色的液汁覆盖了红红的皮肤。尽管他努力做到小心翼翼，而整个动

作和姿势，却是笨拙的，笨拙得可爱又可笑。他抬起头来，认真地问：“还疼吗？”

她不忍心使他失望，就笑笑说：“真的不疼了呢！”

他的医术得到验证，得意地笑了，说：“要是一时找不到刺蓟，还有更方便的办法，同样也能消毒。”

“还有什么好办法呢？”她盯着他问，看着他的样子，觉得很有趣，“你能当外科大夫了。”

“要是找不到刺蓟，”他说，“那就给割伤的手指上浇一泡尿。”

她的嘴里随即“噢哟”一声，脸颊腾地红了，双手捂住脸，低下头：“真不害臊！你……”

他似乎这才意识到她是一位姑娘，一个和他有严格禁忌的异性；在他得意地向她夸耀医疗技能的时候，竟然忽视了这个重要的忌讳。小时候，他和小伙伴们在坡沟里割草，谁要是不小心割破了手指，立刻就浇上一泡尿，血就止了，日后也不会化脓，可那都是些男孩子呀！现在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位姑娘，一位从城市里来到乡下的漂亮的姑娘。他得意中说漏了嘴，羞红了她的脸，自己也难堪了，不自在了。他忽然转过身，解嘲似的哈哈哈笑着，向对面的山坡间奔去。

她听着他的笑声和脚步声远了，仰起头，看见他在对面的山坡上跑着，撞得小刺槐和小山杨的树干哗哗哗抖动，叶子刷刷刷响。他奔到一块树木稀少的草地上，跳跃起来，在空中挥一下手臂，又跌落到地上，再跳跃起来，像一头撒欢的小马驹。他奔到一棵大树下，一跃身，双手抓住一根横向的树杈，凌空吊起来，打了几个大摆，又跳到

草地上，顺势躺下，绿色的茅草遮住了他的半个身子和头脸。她看得呆了，跨过水渠，朝他走去。

“你狂了吗？”

“我可能会发狂的。”

“你——瞎得很！”她用刚刚学会的乡下话说。

“就是。”他心平气和地应承。

她坐在他旁边。软茸茸的胡须草给坡地铺上一层厚厚的绿毡，幽暗下来的树林里是一股股青草和野花的清香气味。她看见他躺在绿草丛中，闭着眼睛，胸脯一鼓一落。她想唱歌，想在树林间大声呼唤，想象他刚才那样蹦起来跳跃。她觉得胸膛里憋着什么，需得排遣一下，呼唤和跳跃也许是排遣的最好的办法。她终于没有开口，也没有蹦起来，只是双手搁着膝盖，一动不动地坐在草地上，清爽的山风掠过她的面颊，树叶在哗哗哗响。

她随意问：“你到这儿来干啥？”

他毫不含糊地答：“等你。”

她的心忽闪一下，不知该怎么说了，他连一丝弯儿也不绕。

“我一天不见你，心里就慌慌，没有办法抑制。”他说，“最好的办法，就是想法立即找到你，说几句话，哪怕从老远看一眼也好。”

她的脸上烧燥燥的，嘴里有点干涩了。她咬着嘴唇，似乎心儿要从喉咙蹦出来了。她长到十九岁了，第一次听见一个男子说他想她，

离不得她，他说得凝重，一板一眼，毫不隐讳，也不拐弯抹角，赤裸裸地说出了他对她的倾慕。她回避不得，也无法隐晦，他的话堵死了她的一切退路。

她无力回避，也不想违拗自己的心愿和感情。她想听他继续说出更多的剖白的话，他已经说透了她同样想说而没有说出口来的话。她默默地坐着。

她在东田村的村巷里，在东田村田野里的小路上，在东田村山沟间的泉水旁，在东田村青年集会上，每天都有撞见他的机会。小小的东田村，街巷短浅而天地狭窄，低头不见抬头见。她的心里不知从哪天起，萌生了一种喜欢和他待在一起的永无满足的渴望。一天不见他一面，她就有一种说不清的不自在。也真是巧得很，她去泉水边挑水了，他也挑着水桶走到小沟里来了，他帮她从水潭里提上两桶水来，说几句话，互相瞅瞅，笑笑，然后挑水回家去了。他的母亲曾经给她说过，她儿子现在最喜欢挑水了，比过去勤快多了。过去，常常是铁瓢碰得缸底沙沙沙响，他也懒得去给妈妈挑一担水，她撕着他的耳朵把他从小书桌旁拉出门，把水担架在他的肩上……她明白，他和她一样，总是寻找能凑到一块的机会。可是，她和他，从来也没向对方吐露过一句心里话，更没有传递过纸条或书信。

他今天赶到半道上来等候她，是最明白无误的一次大胆的行为。

他今天赤裸裸地说出他倾慕她的话，是最大胆的举动。

她有一种预感，一种无法摆脱的逼近了的预感：似乎今天要发生什么事了！她有点害怕，却又是一种不可抗违的希冀和渴盼。她似乎意识到某种危险，却又无法拒绝这种危险的诱惑。

他站起来，朝山沟里头走去，回过头来，向她招手。

她也从草地上站起，顺着这面沟坡走上去，离村庄就会越走越远了，她有点犹豫：“到哪儿去？”

“回家去也没事，走走，玩玩。”他说。

她走上去了。他在前头等她。他们一前一后走着。

“这是你的家乡，你还稀罕到这坡里来逛景？”她随口问。

“当然，太熟悉了。”他说着，转过身，停住脚，盯着她说，“那会儿没有你。我想和你俩人走走。”

坡路越走越陡了。她从来没有在这个没有路径的山坡上走过，脚下滑滑溜溜，歪着腰，张着手，时时都有滑倒的可能。

他抓住她的手，拉着牵着，她感到好走多了。那是一只多有劲儿的手啊！走到一面塄坎下，他一跃就跳上去了，猫下腰，伸下胳膊，几乎把她提起来了。她上了塄坎，挣脱开他牵着的手，四个细长的手指，被他攥得像一把排笔一样黏结在一起了。

山坡愈来愈陡了，光线愈来愈暗了，林子里也愈来愈静了，鸟儿的叫声愈来愈杂了。她跟着他，又走上一面土塄坎，斜插着朝沟里走着，眼前闪出一个水潭，聚着一汪清冽冽的水。她在水潭边站住，弯下腰，看见水底下有一撮细沙在微微翻滚，那儿肯定是一个极小极细的冒水的泉眼儿，这是一潭活水哩！他也在水潭边站住，弯下腰来了。

她把挎包扔到地上，想撩起水洗洗脸，面孔止不住地发烧呀！她伸手撩水的当儿，看见了水中自己的影子，就停住手，呆呆地看着。她想看看此刻自己会是一副什么鬼模样，大约傻乎乎的叫人看了好笑吧？却看不清脸色是红是白，只有一双亮闪闪的眼睛在水里闪光。

“你看什么呀？”

“鱼。小鱼。”

“嘻！哪有什么鱼儿呀！”

“不信你看——”

他挪脚站到她这一边来，弯下身来了。这个小潭的边沿的地方太窄小了，要站下两个人简直是太拥挤了。他挨着她的肩膀弯下腰，一只手扒着她左边的肩头，瞧着水潭，煞有介事地瞅寻小鱼儿的踪迹。

“鱼在哪儿？”

“在那儿。”

“我怎么看不见？”

“那根水草底下。”

“那不是小鱼。”

“那是什么？”

“是小虾。”

“山坡上哪来的小虾？”

“山坡上哪来的小鱼？”

她知道，其实谁也不在乎究竟是小鱼还是小虾，水潭里压根儿什么都没有，既没有小鱼，也没有小虾，只有她和他倒映在水中的脸，她和他其实都在瞅着对方的水里的眼睛。她看见的是一双火辣辣的眼睛，一双英武的总像是进攻着什么目标的眼睛，一双说不来好看或不好看的顽皮的眼睛，看一眼就会使人心跳不止的眼睛啊！

她的腿蹲得又酸又麻，从水潭边绕到草地上的时候，就瘫坐下来，双手撑着后边的草地，伸直双腿，真舒服，草枝戳得脚踝痒痒的。

“你饿不？”

“饿也得饿着，这儿没什么吃的。”

“我的挎包里有点心。”

他翻开她的挎包，取出点心，在草地上解开了。他取出一块，递到她手上说：“这是一块甜馅饼。”又拿起一块，填到自己嘴里，口齿不清地说，“这是一块奶酪。”

“洋奴！”她笑着说，“把点心硬要叫……”

“外国人喜欢野餐。”他说，“我们也权当正在野餐。要是再有两瓶汽水就更妙了。”

她仰头看看，天色已经昏暗了，树林里笼罩下一幕幽深的昏光：“天要黑了，回吧！”

“回吧！”他说。

“回家怎么走那边？”她说，“那边越走越远了。”

“地球是圆的，从这边走过去，再从那边转回来。”他说着，继续往前走。

“你呀……”她也抬起脚来，跟他走去。

“腿还疼吗？”

“还有点疼。”

“我扶着你。”

“我能走。”

他挽着她的胳膊，她没有拒绝。谁也不知道要走到什么地方去，她却依恋着他漫无目的地走着。他们走到一棵大树下，庞大的树冠下是一块平地，没有别的树木。她仰起头：“这是啥树？”

“杏树。”他说。

“树上那疙疙瘩瘩的东西，是杏儿吗？”

“是杏儿。”

“我们在城里买的，全是黄的。”

“没有成熟的杏是绿的，成熟了就变成黄色的了。”

“绿杏能吃吗？”

“能啊！”

“好吃吗？”

“好吃极了！”

他话音未落，已经跃身跳起，抓住一根树枝儿，一蜷腿，就翻上去站到树杈之间了，一伸手，摘下几颗绿杏儿来。

她伸出双手去接，等他把杏儿扔下来。

他却笑着，晃着手里的绿杏儿，久久不松开攥着的拳头。

“快呀！丢下来，我能逮住。”

“你张开嘴巴，我给你丢到口里去。”

“你呀！真坏！”

“那……你先叫我一声哥哥吧？”

“你……先叫我姐姐吧！”

“那……你等着吧！”他把一颗杏儿填到嘴里，咔嚓咔嚓啃起来，声音好响，故意撩逗她说，“啊呀！这杏儿多香啊！”

她急得在树下团团转，跳一跳，够不着树枝。她捡起一块石头，朝他打去，他一伸手，却从空里把石头抓住了，开心地笑起来。

“你坏！”

“我坏。”

她又从地上捡起一块石头。

他笑着说：“甭打了，我拉你上来吧！你自己从树上摘下一颗绿杏儿才好吃哪！”

她扔掉石头，扬起双手。

他一只手抓着树枝，一只手伸下来抓住她的手，她就被提起来，真不知他有多大劲儿啊！她被提起，吊在空中，却不动了，吊得她的胳膊好疼。她乞求地说：“快呀！我的胳膊要断了！”

“叫声哥哥！”他在树上说。

“你——”

“叫吧——叫一声，我就有劲拉你了。”

“哥……”

她一句未出口，自己心里先轰然发热了，眼花了。她在迷昏中被他拉上树杈，脚下直打晃，从来也没有爬过树呀！她的脸上燥热难忍，脚下又不稳当，不由得搂住他的肩膀，用一只拳头在他身上砸着。他也张开一只胳膊，搂着她的腰，一任她打他砸他，发狂似的喊：“啊呀！我即使从树上栽下去摔死，也不遗憾，有人叫我哥哥了！噢哟！我要狂了……”

她坐在树杈上，羞得想哭了：“你……欺负我！”

“我叫你……”他笑着，颤着声，“姐……”

她一扑抱住他，头枕在他的胸脯上，再也说不出话了。

他把一颗杏儿悄悄塞到她手里。

幽暗的光线里，她看看那颗杏儿，绿莹莹的皮儿上，似乎有一层毛茸茸的细绒。她咬了一口，酸得她不由得挤眯了眼睛，合不上嘴巴，牙齿也不敢再咬了，却又舍不得吐掉，那酸味里有一种无可企及的香味的诱惑。

“啊呀！真酸！”

“酸才有味儿。”

“熟了是甜的。”

“熟了倒没绿着时有味。”他说，“成熟了的杏儿，把儿松了，风一吹就落地了，风不吹也要落掉了，成熟是胜利，也是悲哀。”

“谬论！”

“真理！”

她和他争执起来。其实，她早佩服了他无意间说出的话，却故意和他争执，企图引出他的更富于诗意的话来。

他却早不计较自己说过的话是谬论还是真理了。是谬论，她也不会揭发批判；是真理，也不会被谁重视到写进哲学词典，没有任何意义，随口胡诌罢了。他对她说：“我提议——”

她抿着嘴等待着，他要说什么呢?

“看着，”他指着吊在头顶的一嘟噜绿杏儿，说，“最下边这颗，你从那边咬，我从这边咬，看谁咬过谁吧！”

“坏点子真多！”她歪一下头。

“有趣儿！你试试。”他怂恿她，“小时候，我们在山坡上割草，三四个伙伴争着咬一颗杏儿，看谁咬得准……”

她格格格笑着，和他同时站起，用嘴巴去吞咬那颗毛茸茸的绿杏儿。树枝晃着，杏子晃着，谁也咬不着。她开心地笑起来，他也哈哈笑着。

她没咬住绿杏儿，却碰到了他的嘴唇，一刹那间，那双强悍的胳膊搂住了她的肩膀，她也伸出了双手……俩人跌到树下去了。她和他全忘记了是站在树上。

跌下去了，俩人跌落在草地上还搂在一起。

绿叶如盖的杏树下，绵软软的草地上，她和他依偎在一起，感觉到了他嘴唇上的绿杏儿的酸味儿……

……

她招工回城了。一年多时间里，母亲给她介绍了七八个对象，她一律拒绝结识。母亲终于打听到她在下乡时交下一个男朋友，经过几次劝解，不得结果，父亲终于出面了。

“我们应该尊重莉莉的自主权。”父亲说，“但总得让我们知道他是谁，了解一下情况嘛！”

母亲憋气地斜眼瞅着她，到底憋不住了：“说呀！他是个什么人呢？”

“他是个农民。”她说，“你明明知道，还要问！”

“农民又怎么样呢？”父亲严肃地反问，“农民是我们国家的根基。我不反对你嫁给一个农民。”

母亲朝父亲撇着嘴角。

她一愣，瞧一眼爸爸，又低下头，看来只有母亲一个投反对票了，父亲毕竟是领导干部。

“爸爸自小就是农民，放羊的农民。”爸爸颇为动情，“解放后进了城，陕北家乡的农民来到咱家，我总是当上宾招待。我们怎能忘记农民父老！”

这是真的，姜莉多少次亲眼看见过父亲和陕北乡亲在家里畅饮畅谈的场面呀！

“问题不在他是不是农民。”父亲说，“干部、军人、医生，无论干什么的，主要要看这个人如何。你说说，你喜欢的那位青年农民是个什么样的人呢？”

她倒慌了神儿。是啊，她和他在一个村子里生活过三四年了，只觉得喜欢他，一天不见他就心烧神乱，却从来没有来得及想过他有什么优点缺点。他是个什么样儿的人呢？她也说不清白。

“他家啥成分？”母亲急了。

“贫农。”她说。

“是党员不是？”

“不是。”

“那么总该是个团员吧？”

“也……不是。”

“你看看！连个团都入不上，肯定是个落后分子。”母亲很得意，“你怎么能与这号人拉扯呢？”

“他写过申请，团支部老是怀疑他。”她说，“怀疑他想里通外国。”

“怎么会产生这样的怀疑呢？”父亲问。

“他喜欢研究国际关系。”她似乎才找到了话题，可以谈他的独特长处了，“甭看他是个农村青年，才二十出头，他到处搜罗资料，把世界各国的政治、历史、地理以及民族风俗都研究了……”

“他研究这些干什么呢？”父亲惊奇了。

“他说他将来在国家需要的时候，准备出任驻国外的外交官。”她说，“他正偷偷跟一个中学老师学英语……”

母亲早已忍俊不禁，大笑起来，胖胖的身体笑得颤抖着，掏出手帕擦眼泪。她不能忍受母亲的轻蔑的笑声，看看父亲，父亲冷漠地扭

过头去，她看不清他的脸，就急忙解释说："他对非洲最有兴趣，如果能出任到非洲某个国家，他将来要写一部研究黑人的书……"

"神经病！"母亲挥着胳膊，没有耐心再听下去，"绝对是个神经病！"

"什么'神经病'！"她顶了妈妈一句，"我觉得他……"

"起码可以看出他不成熟。"爸爸的语气虽不严厉，却是肯定无疑的，"莉莉，甭计较你妈妈的话。她说得不准确。我看呢，咱们既不嫌弃他是农民，也不要想高攀未来的大使。我觉得关键是他不成熟，二十几岁的人了，有点想入非非吧？我想看见你找一个更稳当更成熟的对象。"

"我只是说他的兴趣和爱好，我压根儿也没指望他当什么外交人员。"莉莉说，"我就是要跟他这个纯粹的农民。"

"你呀……你更不成熟。"父亲站起来，摇摇头，走出门去了。

随后……她听从了父亲的指导，与父亲的战友介绍来的一个青年结识了，这就是她现在的孩子的爸爸。

他是个医生，一个真正成熟的人。他给她做饭，洗衣，做一切家务中的琐屑的事，从来不厌其烦，而且根本无须她开口。他从来也没有和她争论过什么问题，更谈不到吵架拌嘴了。即使她偶然火了，他即刻就默然了，过一会儿又来嘘寒问暖。他从来也不说长道短，出门上班，进门做饭；他从来也不谈及医院里的任何是非，更不会像那个不成熟的乡村青年张口东南亚时局，闭口非洲大陆的干旱问题。她和他组成的这个小家庭，经济富裕，关系平静和谐，却也有点寂寞，甚

至乏味。她从来也没有过欣喜若狂的一阵儿，也没有过心儿震颤的一刻，杏树上的那种疯狂的追逐和如痴如醉的依恋，再也没有重现过。近年来，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她发觉自己也变化了，变得既不会任性，也不会撒娇了，甚至说话也细声慢气的了……她也成熟了?

他说过，杏子成熟了，把儿也就松了，风一吹就落下来了，风不吹也要落下来。倒是那未成熟的毛茸茸的酸杏儿，那酸得使人不敢合牙而又不忍吐掉的味儿啊！留在心中，永难忘怀，什么时候一想起来，嘴角就会有酸水泌出来。

他在恢复高考制度的头一年，就考进了国际关系学院，而今确实做着驻某国大使馆的秘书工作。妈妈鄙视为“绝对的神经病”的人，现在正在重要的岗位上，为祖国服务。她既没有心思和妈妈赌什么输赢，也不是遗憾自己丢掉了这样一个体面的丈夫。她现在更多地想着的，是父亲所谓的神秘的成熟的含义。

她刚才在电视里看见他在舷梯上回过头来的一笑，笑得自负，笑得顽皮，还是那一股火辣辣的进攻的精神，却依然看不出任何成熟的标志。

他大约永远都是个不会成熟的人?

她却成熟了，不可挽回地成熟了！

丈夫心平气和地走过来，坐下了。儿子也完成了作业，在小竹椅上坐下了，晚上有电视连续剧《陈真》，爷儿俩最快活的时间到来了。

她从沙发上站起来，端起茶杯，准备去备课。当她坐在桌前案头的时候，却怎么也集中不起思维来，眼前总有那么一嘟噜毛茸茸的酸杏儿……

1985年5月草成

11月小改 西安

失重

一

吴玉山老汉悄没声儿地哭了。

老汉蹲在院子围墙西角的猪圈门口的碌碡上，双手撑着花白头发的脑袋，泪水啪飒啪飒滴落到裤裆下面的青面碌碡上。

玉山老汉今日才瞅住了痛哭流泪的一个好机会。老伴到她妹子家去了，儿子和媳妇也出门去了，他可以舒心地哭一场，让多日来聚积在咽喉下面的苦水畅活地流泻出来了。想到矮矮的围墙两边的东邻和西邻，他控制住自己，不能号出声来，免得他们幸灾乐祸。

老汉太痛苦了，满眼汹涌而出的泪水和同样绵绵不断流出的鼻涕以及嘴角淌出的黏液搅和在一起，擦不干，抹不净，把一张皱纹巴巴的脸弄得十分肮脏，黏液从下巴颏上滴下来，滴在胸襟的棉袄上，也弄得湿乎乎一片，他已经无心顾及了。

两头即将出槽的大白猪，扭着笨重的身子，在圈里蹒跚，不时仰起头来，瞅着它们的主人，鼻腔里发出哼哼的响声。笨猪也通人性，他把它们从一尺长的毛崽养成这样两个庞然大物，有了感情了。可它们毕竟不能人言呀！

他老伴的妹妹的丈夫，他的“挑担”，被公安局逮了！

手铐！一双亮铮铮的钢铁家伙，套在“挑担”的手腕上，寒光凛冽！“挑担”那一双又细又嫩的手腕，怎能招架得住那钢铁家伙的箍匝

呢？听说那钢铁里头带有锯刺一般的钢刺铁牙，戴的人稍一拧扭，那锯刺就紧紧地往肉里扣呀！

玉山老汉抬起泪花模糊的老眼，就瞅见高高地耸立在小院里的二层阁楼。那被涂饰成天蓝色的门窗、天蓝色的钢棍围栏，也都嘲笑似的瞅着他。这座高高地耸立在两边低矮的庄稼院房屋之上的新式建筑，使邻人羡妒，使他自矜，多漂亮的楼房！现在对他嘲弄地瞪起眼睛了。

他突然心里一横，产生了一个十分恶毒的心计，他盼这阁楼突然坍塌，把他压死，他就再也不会痛苦了！

二

“挑担”姓郑，小名碎狗，官名建国，小河下沿郑寺村人。他和他先后娶走了小河北岸张家堡张老五的大姑娘和二姑娘，成了一副“挑担”。

姊妹俩只差一岁，个头长得相差无几，模样都俊，胖瘦几乎无差，乍看像一对双生。细看呢？妹妹比姐姐更水色一些。比较起来，吴玉山却更喜欢他娶的老大。他有种感觉，一种不易说清楚的感觉，居家过日子，老大更有心计些，也就更可靠一些。二姑娘的水色虽然浓一层，似乎性子太强，不好抚弄。

许是姊妹俩年龄相近，模样不分彼此，于是就形成谁也不服谁的局面。大姑娘能纺一把细线，织一手好布，二姑娘织出的花布和纺下的细线绝不比姐姐差一分成色。姊妹俩争强好胜，互不服气，少了一般姊妹之间大让小、小敬大的情分。这种微妙的关系，随着姊妹俩一

前一后的出嫁，就延伸到吴玉山和郑碎狗两个男人和两个家庭的关系之间来了。

吴玉山家道小康，吃穿不愁；郑碎狗家亦属小康人家。谁料婚后一年，碎狗的二弟被抓壮丁，卖地交款，避了灾难，却没了水地。祸不单行，母亲猝然而殁，一个小康家庭急骤衰败为日愁三餐的穷汉。老父亲无力挽救，把兄弟三人分开，自奔前程，免得再遭壮丁之苦。

除了一身重债，郑碎狗再没分得什么有价值的家产，他在西安一家鞋铺当学徒，学习抹褙子的手艺，只管饱肚子，没有收入。二姑娘常常在揭不开锅时，夹着小口袋来找姐姐。大姑娘同情妹妹，一升米，三升面，常有周济。时日一长，也就有点厌烦，在把米面装入妹妹张开的口袋时，忍不住数落："日子泛长了，叫人把你周济到啥时候去？"妹妹一听，倒提起口袋，把装进去的米又倒出来，甩手走掉了，从此，再也没登过姐姐家的门槛。

吴玉山说："看看看，这下把妹子和妹夫得罪下了，既然周济人，就甭说难听话，还能落下个人情。"

妻子却不后悔："在娘家时，连一声姐也没叫过我，好逞能哩！这会儿认得我这个当姐的了！吃了人家的米面，还不领情，倒是我该向她低三下四去赔情？"

姊妹俩就这样绝了情。

吴玉山心里其实倒高兴，再不担心有人来要米讨面了。她是她的亲妹子，如果自己出面干预，妻子肯定不高兴，而妻子自己出面阻断了那个关系，倒好。实在说，"挑担"那一家，真是个填不满的穷坑……

星斗移转，世事大变。没过两年，全国解放。郑碎狗从小小的学徒一下子翻身立起，成了公家干部，穿一身四个兜的蓝布服装，年节时出现在老丈人家门楼里，和吴玉山面对面称兄道弟的时候，吴玉山一下子觉得自己脸上无光，矮了半截。老丈人再不“碎狗长”“碎狗短”地奚落了，也不叫“老二”了，出前撵后叫着“建国”的名字。吴玉山很快明白，郑碎狗已经取下一个官名叫郑建国。

郑建国春风得意，满口泄出一串串新名词，叫老丈人和老农民吴玉山似懂非懂。他说新成立的市政府，已经调他当干部了。

二姑娘自然更是扬眉吐气，说话也嗲声嗲气，手也总是塞在裤兜里不往出拿，话中不断地冒出一些乡村女人难以理解的新名词，令老母亲和姐姐吃惊。自然，最尴尬的还是大姑娘，妹妹似乎早憋足了心劲，就等着这一天图得报复，那眼角总是不屑地瞟着姐姐，叫姐姐越看越不自在。

傍晚分手时，矛盾终于公开化了。二姑娘从裤兜里快快地摸出一沓票子，当着父母的面搁到桌子上，对姐姐和姐夫说：“前两年受苦时，吃过姐家二斗三升面、八升小米，我都记着，现时，折价一次还清，我也去了心里的疙瘩。”

吴玉山愣住了，连连摆手，烧臊得脸孔赤红，像挨了一记耳光：“这算说的哪儿的话……”

妻子煞白着脸，早已不能忍受，抓起票子，一把甩出去，满屋都是飞舞着的人民币：“你男人当官了，你当官太太了，俺不眼红！甭在我跟前摆阔耍烧包！我那二斗三升白面、八升小米，权当喂了狗咧！喂给了一条喂不熟的狗……”

姊妹俩当面骂了起来。

从此，姊妹俩绝了往来。遇人说起家道，吴玉山和妻子，谁也不要提起这个挑担和妹妹，他只是零零星星听说过，挑担在解放后的十几年里，官儿从小到大，不停地往上升，至于升成几品，他也搞不清。他本来就对城里政府的官职称谓模模糊糊，分不清高低。他和妻子已经有了两儿一女，虽然不易，却还保持着一个小康的状态。他人极忠厚平和，有一个中农成分，也不能在村子里当什么干部。他凭了勤谨和忠厚，人缘也好；无论谁在吴村当干部，他都是最可靠的社员，从不使奸捣蛋，人叫他“老好玉山”，他欣然领受，不管属褒属贬。一些技术性极严格的活路，譬如撒种，譬如培植稻秧，非他莫属。另有一些脏活累活，干部指派不动气壮声硬的贫下中农，往往就指派吴玉山去干。他不拨不挑，干了，干了也就挣下了大工分。无论技术性很强的农活儿或人人讨厌的脏活，都是生产队的高工分，别人也说不出意见，他的日子倒是混得严严窝窝。这样，两口子憋着气儿，从来也不去求妹妹和妹夫救助什么。

物换星移，江河改道，世事变迁——什么事都不会一成不变。

吴玉山被敲门声惊醒，再一听，确实有人敲门，一动脚，先蹭醒了睡在火炕另一头的老伴。老两口穿戴齐备，先后下炕，为了防备不测，玉山顺手捞起一根木棍，走出里屋，轻步走到街门口，由老伴先发问：“谁呀？”

门外传进一声陌生而又颤惊的声音：“是我，姐。”

“你是谁？”吴玉山摸不着头脑。

“我是建国。姐夫——”

老伴“哗啦”一声拉开门闩。

老两口拥着妹夫走过院子，进入里屋。电灯光亮里，才真正使吴玉山夫妇吃惊了，不由得同声惊叹出一声“妈呀”来。妹夫郑建国，脸上结着血痂，一条腿跛着，头发蓬乱，形容憔悴，衣服肮脏，邋遢不堪，真是三分像人七分像鬼了。

“我遭难了。”妹夫坐下来，咕咕咕喝下一碗水，才说了话，“我今黑要是逃不出来他们就把我打死了！”

无须再细问什么，老两口就知晓了七八成，乡城里外都在闹造反，妹夫在省城当官，大半也是逃不脱，老伴已洗手和面，他给妹夫打洗脸水。

妹夫在他家后院储存柴火的小房里藏下来。

他不无担心，完全深谙此种行为的可怕后果，但不能把妹夫撵出去送给那些要收拾他的人。老伴似乎已不计前嫌，尽其所有，用细面给他调养摧残得令人伤心的身子。担心是难免的，而当那些胳膊上戴着红袖章的人乘车追寻到吴玉山的门楼下来的时候，他却表现出一种异乎寻常的勇气。

“郑建国，我的挑担？不错，有这个阔亲戚。”吴玉山气呼呼地说着，骂了起来，“他当官为宦的时光，从来也没踏过我的门槛！我至今也不知人家腰有多粗，官有多大咯！人家看不上咱穷亲戚，咱也不想沾他的光。他这回成了反革命，与我何干？我是有光不沾，有害不受！你们到村里打听一下，看俺村谁见过俺一家和郑建国家有一回亲戚往来？”

郑建国从柴火堆下的红苕窖里爬出来，躲过了这一劫。他住下来了，随之又被姐夫和姐姐转移到他们的大女儿家。

灾难把相违近二十年的姊妹和挑担的关系恢复了，真是患难见得姊妹情。

三

似乎是对妹夫经受的灾难的补偿，起初官复原位，后来又升了，当着什么局长。

郑建国一出马上任，就把吴玉山的小儿子招为国家正式工人，后来在工厂恋下一个媳妇，小两口在居民楼上有一个虽不宽敞，却也安乐的小窝，避免了两个儿子分家争论家产的矛盾，令村人羡妒莫及。

两年后分田自耕自收，吴玉山真是如鱼得水，囤里攒下成吨小麦，折子上摞下一笔小小的存款。庄稼人生活中有三件大事：娶媳妇盖房置田地，解放后只余下前两件了。吴玉山是个地道庄稼人，日夜思谋的大事，也不会超脱。不过土地虽分给他耕种，却规定不许买卖；女嫁了，大儿子也娶过媳妇了，唯一的心愿，就是在闲置多年的小院里撑起三间瓦房来。在盖置新屋的问题上，儿子和他没有异议，甚至显得比他更迫不及待。只是在房子的形式上意见不一，他要盖木料瓦屋，可以搭木板楼，楼上可以扎粮囤，放置杂物，实用一些。儿子却坚持要盖楼板平房，干净，漂亮，能堵死老鼠。父亲很和悦地同意了儿子的意见，因为房子毕竟是为儿子盖的呀。

儿子在西安一家工厂做合同工，吴玉山亲自张罗建筑材料。他找到邻村一家三户联营的水泥预制品厂子，三十来岁的厂长接见了他。

“楼板多少钱一块？”

“得看你用多大尺寸的。”

吴玉山掐一掐自家的地基，厂长替他换算成公制米尺的尺码，正适宜用长度三米三的楼板。

“三米三的楼板，啥价？”

“三十块。”

吴玉山倒吸一口气，窝在肚里，好贵的价钱！他掏出烟锅，点着火，开始盘算，一间用十二块，每块宽一尺八，只有两丈一尺六寸的深度，扎两个小铺，太窄了。用十五块楼板，房子有两丈四尺的宅深，刚好可以扎开两个宽敞的小间。十五块楼板一间，三间需得四十五块，需得一千三百五十块人民币，这账好算。

“这价还能‘活动’不能？”吴玉山问。

“能嘛！怎么不能！”三十来岁的厂长仰着头，斜支着一条腿，掂着烟卷，大大咧咧地说，“谁把世事治死了？”

“咋样‘活动’呢？”吴玉山探问。

“没个一定哇！”厂长掸掸烟灰，“三十块卖哩！二十块也卖哩！十块八块还卖哩！有时候一分不要白送人哩……”

吴玉山瞪起眼，警惕地瞅着这位中年农民，他一身不土不洋的装束，头发比城里人还留得长，说话二里二气，是不是在耍笑他老汉？是不是料就他掏不出买楼板的票子？他心里十分反感这位农民，厂子

也不知办得咋样，不过能赚几个钱吧？看你神气得不知该咋样说话了！

“真的！”厂长大约看出他的疑惑，肯定地说，“你老汉要是能给我买来一吨平价钢材，我给你一块按二十块钱算账；你能买来两吨，我给你一块只算十块钱；你能买来三吨，我白送你四十五块楼板；你能再多买来，我给你找钱。咋样？你老汉这回不嫌贵了吧？也不必问我咋样‘活动’价了！”

吴玉山还是不大明白这当中的秘密，低着头，抽闷烟，思谋这桩交易之间的关系。

“道理很简单，老汉。”厂长说，“平价钢材八百多块一吨，议价钢材一千二，黑市钢材一千七。我买不到平价货，连议价货也弄不到，按黑市货价折算，一块楼板就是三十块了。你能给我寻下一吨平价货，我就省下一半本钱。你能给我寻下三吨平价货，我权当是议价货，也节约一千多块成本，把你四十五块楼板的代价就折合进去了，所以我白送你。这下明白了吧？”

“噢！噢噢噢。”吴玉山明白过来，豁然开朗，怪道他敢白送给人楼板哩！

“你想想，老叔，看看你有哪个亲戚在政府，在工厂，或者有门道儿，能弄来平价货，议价也行哩！”厂长说，“我是不会亏你的。”

倒是厂长提醒了他，他想到了挑担。他又不便一时说破，显得迫不及待，而且还没把握性儿哩！他故意装出无可奈何的神气说：“这么好的事……只可惜……咱粗笨庄稼人出门去，两眼乌黑，能认识哪位……卖钢材的公家人哩？”

“那你就掏三十块钱的价吧！”厂长说。

吴玉山站起，拍拍屁股上的尘土，慢吞吞走了。

回到家，吴玉山把这件事和老伴说了，老伴立即怂恿他去找她的亲妹夫。儿子恰好也回来了，同意母亲的意见，必须由父亲亲自出马。由儿子去找姨夫，显得不够郑重，晚辈人嘛！女人去可能说不清楚，贻误大事。

第二天，吴玉山搭车进西安去了。

真是难以想象，郑建国和妻妹表现出动人的热诚，简直使他受不了了。他听着他们争相说着热诚关照他的热言炙语；争相给他递烟沏茶；软椅子已经够软和了，两口子还是把他拉到沙发上坐下来，更软；一连端到桌子上七八盘菜，还炒；三瓶酒打开了，还在柜子里往出取……

三吨钢材，区区小事，挑担把一张亲笔写的纸条交给他，妻妹又给他的背兜里塞满了糕点、糖果、苹果和鸭梨，真是亲得不能再亲了。

他把那张纸条递给厂长。

吴玉山看见，这位腰里像固定着一根钢棍的厂长弯下腰来了，那双喜欢望着天空的眼睛对着他嘻嘻地笑，而且轻声细语地开了口，肯定地说：“老叔哎！你要是再能搞到三四吨平价货，我给你白送两层楼房的楼板。”

吴玉山摇摇头，弄两层？经济力量不行哟！

“两层楼板省多少？两千多！你只需买砖和窗门就行了。”厂长给他谋划，很诚恳，“一层平房，夏天热得撑不住哇！而今都时兴盖两层，够多气派！”

到挑担家走了一趟，拿了一张纸条，就换下三间平房的楼板，一分不花。他无论如何弄不清这里头究竟使着什么神窍，而突然得到的好处却使他高兴，也使他有点不安。他的心里确实有点不踏实，因为这价值一千三百多块钱的楼板得来太容易了、太轻松了，这使一生习惯于以沉重的劳作和廉价的汗水换取极少报酬的老庄稼汉心里失去踏实感了。想想吧！他正月里逮两头猪崽，整整侍喂一年，长得好长到二百五六十斤，卖下二百元，已经高兴得什么似的，村人邻居都说他是“猪命”哩！现在，他乘公共车只花得一块多钱车费，就赚下三间平房的楼板的价值，这样赚钱发财，自然快得叫人不敢再往下想了！拾钱也得弯弯腰哩！

儿子似乎没有这种多余的复杂的负担，一听完父亲的叙说，毫不迟疑，提出要盖两层阁楼，和水泥预制品厂厂长不谋而合。儿子在外面做合同工，经见比父亲要多要广，他说外头（指城里）的人现在都是想着方儿挣钱，抓钱，说挣大钱的人其实并不出大力，而出大力的人其实只能挣小钱，言语之间，连父亲那种笨拙的挣钱办法——譬如养猪——也不无嘲笑的意味了。

吴玉山又进了一次城，找了一回建国，讨回一张纸条……三间两层楼房的九十块楼板全有了。

隔了几天，天擦黑时，一辆半新的吉普车开到吴村来，停在吴玉山家门口，走下水泥预制品厂厂长，硬把吴玉山拉上车，一直开到城里去，一定要吴玉山给他引见郑局长。

其时，夜已黑定，家属住宅楼上一片灯火，泄出电视机和录音机杂混的音乐。厂长和另一位青年，把一台大彩电抬进建国的住房了，吴玉山引着路。

此后，水泥预制品厂厂长就直接和郑建国来往了，再没拉扯吴玉山去当媒介。他的儿子也辞了合同工，给水泥预制品厂当采购员了，和那个厂长十分亲密……

老汉似乎预感到，事情要坏，就坏在那里头。

四

吴玉山默默地淌了半天眼泪，心里松泛了，头却有点隐隐作痛，四肢软倦，心力和体力都十分疲惫，打不起精神。往昔里，薄雾迷蒙的早春清晨，他背一只破旧的竹条笼，走出村子，走过木板小桥，走进熙熙攘攘的桑树镇的猪羊市场的时候，心劲多高涨啊！为了逮到一头称心的仔猪而又能少出一块价钱，他耐心十足地和卖主磨牙。当他背着小猪崽又精神抖擞地走回自己门楼，把捆禁得麻木的小猪放进土圈的时候，一个伟大而鲜活的希望就在心里跃动了！艰难的生活反倒使他顽强地去争取，而过分轻易的摘取反倒使他失掉了那种生活的信心。他想过，如果凭他喂猪挣钱，到死也甭想撑起这样体面的楼房。现在，自家的两层楼房竖立在小院里，十分显眼，异常醒目，唯其它来得太容易、太轻易，使他没有经受这个果实奋斗过程中的艰苦，现在也就失掉了得到这个果实时的快乐，使人心里缺那么一点什么说不清的东西。

现在，当他意识到这种果实是以“挑担”郑建国手腕上那个冷冰冰的钢铁手铐换来的时候，吴玉山简直羞愧得无地自容了，无脸仰头欣

赏那楼房漂亮的外观了，甚至失去对猪们的热情了。

掩闭着的街门嘎吱一响，老伴走进来了。

吴玉山噌地站起，观察老伴的脸色，灰塌塌的，准没好结果。她昨日就去城里妹妹家了，给那个被逮走了男人的妹妹劝慰和宽解，帮助料理家务，一个富裕安乐的家庭，完全乱套了。

“建国而今咋样？”他迫不及待追进屋里。

“还坐闷庭子哩！还没……定下啥……”老伴说，“可怜死了！全是给旁人帮忙，卖给了钢材木材，这下倒把自己的手压死了！”

吴玉山闷住头，不问了，他担心，挑担的麻达不会轻松卸掉。虽说有些人是翻脸不认人的角色，可水泥预制品厂厂长给他家抬的那台大彩电，却是他亲眼经见。傻子也能估摸，凡是晚上悄悄摸到妹夫家里去的那些人，谁会空手去呢？空手能弄来钢材吗？旁人不说，自己的儿子一下子被水泥预制品厂厂长拉去，赏以重薪，当采购员，凭什么呢？

“他姨……唉……”过了半天他才吭声，他想问，他姨怎样？怕是该哭成泪人了？临了却说不出口，他觉得自己对不住建国，也对不住娃他姨，弄得人家家里七零八散，自己却住洋楼……唉！

“他姨倒是脏腑硬！”老伴说。

“噢？”吴玉山猛乍一下抬起头。

“人家他姨到底是城里人，经得多了，见得广了，遇事不乱套套儿，心里难受当然也难受，全不像咱乡下人，遇见这号事，只是没头

没脑地浪哭！人家他姨心数不乱，”老伴颇带着敬佩的口气说，“该寻谁就寻谁，叫他们现时站出来说话。我去了两天，只见了她一面，整日整夜在外头跑着，半夜回来了，天明又走了。我听她说了一句半句，找‘打劲人’哩……”

“噢噢噢！”吴玉山点点头，心里也佩服起娃他姨来了，这号事要是搁在自个身上，老伴早都吓得成了没头的苍蝇——乱扑乱飞了。娃他姨有心计，撑得住，“对对对！哭顶啥哩？哭死又能顶啥哩？倒是娃他姨有主意。”

“那女子自小就有心数……”老伴以姐姐的身份说。

“怕是这多年经见得广……”吴玉山补充说，“在人家家里出出进进的人，哪个是笨佬儿？除了我！”

院里一阵脚步声，他听出来，是儿子友年。

友年走进门，身后跟着水泥预制品厂厂长。

吴玉山急忙立起，简直有点不堪等待之苦，急于要问儿子和厂长，那场官司打得怎么样？结局如何？

五

“案子还没结。现时，全看那些作证人的态度。”儿子说，“作证人要是一口咬定说没那回事，俺姨父就没有啥啥麻达了；作证人要是不……”他不说那种可以预料的糟糕结局了。

“法庭怎样问你俩？你俩怎样应答的？”吴玉山忙问。

“他法庭甭想从俺俩嘴里掏走一个有用的字！”厂长瞪起眼，轻轻地拍一巴掌桌子，“在郑局长没出事之前，公安局来人寻我，我一口就回绝了，没有！咱没给郑局长一分钱的东西！而今是这话，没有！挑断牙筋还是没有！”

人怎样说假话？怎样把假话当真话说？就像水泥预制品厂厂长这样说。吴玉山瞧着厂长嘴硬牙硬的神气，虽然他替自己的亲戚包揽祸端，而心里却有点害怕，自己的儿子和这样的人共事，似乎潜伏着某种危险，然而他此刻还顾及不到这些。

“老叔哇！我跟你见头一面，就看出你是个实在人，讲信用。”厂长说，“我在俺村活了三十多岁，俺爸只教给我俩字的活人原则：义气。不讲义气的人，那就算不得人！郑局长给咱支援了钢材，咱的厂子才发展了，这是实情，我不昧良心的。咱的厂子办起来，买不下钢材，生产停顿了，工人工资开不出去，我急得想跳井！亏得你给我介绍认识了郑局长，才起死回生了！咱而今挣了钱，不瞒你说，今年真的挣下钱了，咱心里过意不去，给郑局长送一点东西，全是报恩哩！全是心甘情愿喀！现时，郑局长受难，咱挣下那些钱，也觉得寡味哩！要是放在那些小人身上，他才不管哩！只要自个日子过得舒坦！唉……谁要俺爸自小就教我讲义气哩……”

吴玉山老汉连连点头，这些话正投他的脾性。他一生老好，从不和人胡说八道，讲道理，重义气，最瞧不起那些红口白牙要赖的小人。他在认识厂长至今的一二年时间里，对这个人印象说不上坏，总觉得和自己是两路人，说好听些，他是老式庄稼人，厂长是新式庄稼人，距离甚远。现在，他发现了这个厂长和自己相通的一点：“义气”，觉得一下子可以通话了，接近了。

“厂长真是一条好汉！”儿子附和说，“人家法院人单独跟俺俩谈话，说厂长的贿赂行为，腐蚀了公家干部，把一些老干部都拉下水了。他不怕，比法院的人还口气硬，‘谁腐蚀谁来？公家允许农民办工厂，咱农民感激不尽政府的好政策！可只号召办厂，不给材料，咋能办好？郑局长响应党的号召，扶持农民致富，分给咱一点钢材，咱的厂子才活了！咱心里过不去，给郑局长送点点心、烧酒，这是真的！再说啥彩电啦、票子啦我敢拿头打赌！’一下子把法院的人堵住了！”

厂长听着，很神气地吐着烟圈。

“现在的情况是这样，郑局长的案子，关键有两宗事，一宗是南郊大塔区建筑公司的麻达，一宗是城里一家街道工厂的麻达。”厂长说，“俺俩跟姨姨商量好了，城里街道工厂的麻达，由她去找人解决。大塔建筑公司的麻达，我去通融。这两个疙瘩，只要能私下‘消化’掉了，郑局长就没一点事了，日后出来还是局长！万一不行，‘消化’掉一个，问题就缩小到一万以内了，也就没太大的事咧！”

吴玉山此刻才醒悟了，自己完全是个废物，大笨蛋一个。大家都在积极地替挑担“消积化食”，拯救受难的人，自己却只会蹲在猪圈边上流眼泪，真是透顶的没出息！他现在明白了大体局势：公家要把建国打入牢狱，而许多人正在想法把他救出来，都在紧张地秘密地斗着心眼。想到要把建国打入大牢的人，他感到害怕，他自小就对法院有一种畏惧心理；想到厂长和娃他姨这一帮要拯救建国的人，他觉得他们厉害；而想到自己，不仅觉得自己无能无用，实实在在也是摸不着头绪，寻不见眼隙。他一时难得判断出来，究竟谁能斗过谁?

“法院还要找你哩！”儿子说，“这是让我捎回来的传票。”

吴玉山心一抖，瞅着儿子手里那张印着几行字的纸页，竟不敢伸出手接。年近六十，他一生没动过诉讼之事，而今要接受法院的传票了！

“你啥也甭说。”儿子说，“只说不知道。”

“装糊涂。”厂长说，“你说你是个笨庄稼人，啥也不晓，任他问啥，都说不知道，叫他们来问我！”

六

天色微明中，吴玉山老汉背着一只破烂不堪的布兜，兜里装着两块锅盔，上路了。他接受法院的传票，要去城里一家法院了。

浓霜蒙地，一片冬天的萧瑟景象，干冷干冷，不见鸟雀。

往昔里，这个时光该是他扛上家伙去田地上工干活，今天却去打官司。

“啥也甭说，只说不知道。”

“装糊涂。任他问啥，只装糊涂！”

儿子和厂长的话在心里回旋，在耳畔轰响。

昨日黑夜，辗转反侧，简直要把火炕踢腾塌了，还是难得入眠，不管怎样痛苦，他最终还是做出了抉择：装糊涂，这是唯一的办法。吴玉山没旁的本事，装起糊涂来，真像个黏黏糊糊的啥也不懂的糊涂佬儿。

他走着，脚下的土石公路蒙着霜花，虽然主意已定，料也万无一失，而脚步仍然感到沉重，提不起抖擞的精神来……

1986年1月 白鹿园

桥

一

夜里落了一层雪，天明时又放晴了，一片乌蓝的天。雪下得太少了，比浓霜厚不了多少，勉强蒙住了地面、道路、河堤、沙滩，冻得僵硬的麦叶露在薄薄的雪被上面，芜芜杂杂的。河岸边的杨树和柳树的枝条也冻僵了，在清晨凛冽的寒风中抖抖索索地颤。寒冷而又干旱的北方，隆冬时节的清晨，常常就是这种景象。

河水小到不能再小，再小就不能称其为河了，再小就该断流了。河滩显得格外开阔，裸露的沙滩和密密实实的河卵石，现在都蒙上一指厚的薄雪，显得柔气了。一湾细流，在沙滩上恣意流淌，曲曲弯弯，时宽时窄，时紧时慢，淌出一条人工难以描摹的曲线。水是蓝极了，也清极了；到狭窄的水道上流得紧了，在河石上就撞击了水花；撞起的一串串水花，变成了水晶似的透亮，落下水里时，又是蓝色了。

河面上有一座小桥，木板搭成的。河心里栽着一只四条腿的木马架，往南搭一块木板，往北搭一块木板，南边的木板够不到岸上，又在浅水里摞着两只装满沙子的稻草袋子，木板就搭在沙袋上，往南再搭一小块木板，接到南岸的沙滩上，一只木马架，两长一短三块木板，架通了小河，勾连起南岸和北岸被河水阻断的交通。对于小河两岸的人来说，这座小木板桥比南京长江大桥重要得多，实用得多。

二尺宽的桥板上，也落了一层雪。一位中年男人，手握一把稻秫笤帚，弯着腰，一下一下扫着，雪粒纷纷落进桥下的水里。他扫得认

真，扫得踏实，扫得木板上不留一星雪粒，干干净净。他从南岸扫到北岸，丢下笤帚，双手抓住木板，摇摇，再摇摇，直到断定它两头都搭得稳当，才放心地松了手，提起笤帚又走回南岸来。照样，把南岸一长一短的两块木板也摇一摇，终于查看出那块短板的一头不大稳当，他用脚踢下一块冻结的沙滩上的石头，支到木板下，木板稳实了。

他拍搓一下手指，从破旧的草绿色军大衣里摸出一根纸烟，划着火柴，双手捂着小小的火苗儿，点着了，一股蓝色的烟气在他眼前飘散。看看再无事可做，他叼起烟卷，双手插进油渍渍的大衣袖筒里，在桥头的沙地上踱步，停下来脚冻哇！

天色大亮了，乌蓝的天变得蓝格莹莹的了，昨夜那一场小雪，把多日来弥漫的雾气凝结了，降到地面来，天空晴朗洁净，太阳该出山了。

河北岸，堤坝上冒出一个戴着栽绒帽子的脑袋。那人好阔气，穿一件乡间少见的灰色呢大衣，推着一辆自行车，走下河堤斜坡，急急地走过沙滩，踏上木板桥了，小心地推着车子，谨慎地挪着双脚。他猜断，这肯定是一位在西安干事儿的乡里人，派头不小，一定当着什么官儿。那人终于走过小桥，跨上南岸的沙地，轻轻舒了一口气，便推动车子，准备跨上车子赶路。

“慢——”他上前两步，站在自行车轱辘前头。

那人仰起头，脸颊皮肤细柔，眼目和善，然而不无惊疑，问：“做什么？”

“往这儿瞅！”他从袖筒里抽出右手，不慌不忙，指着桥头的旁侧，那儿立着一块木牌，不大，用毛笔写着很醒目的一行字：过桥交费壹毛。

那人一看，和善的眼睛立时变得不大和善了，泛起一缕愠怒之色：“过河……怎么还要钱？”

“过河不要钱。过桥要钱。你过的是桥。”他纠正那人语言上的混淆部分，把该强调的关键性词语强调了一下，语气却平平静静，甚至和颜悦色，耐心十足。

“几辈子过桥也没要过钱！”那人说。

“是啊！几辈子没要过，今辈子可要哩！”他仍然不急不躁，“老皇历用不上啰！”

那人脸上又泛出不屑于纠缠的鄙夷神色，想说什么而终于没有再张口，缓缓地抬起手，从呢大衣的口袋里摸出一毛票儿，塞到他手里时却带着一股劲儿，鼻腔里“哼”了一下，跨上车子走了。

见得多了！掏一毛钱，就损失掉一毛钱了，凡是掏腰包的人，大都是这种模样，这号神气。他经得多了，不生气也不在乎。他回过头，看见两个推着独轮小车的人走上木板桥。

独轮小车推过来了，推车的是个小伙子，车上装着两扇冻成冰碴的猪肉。后面跟着一位老汉，胳膊上挂着秤杆。这两位大约是爷儿俩，一早过河来，赶到南工地去卖猪肉的。村子南边，沿着山根，有一家大工厂，居住着几千名工人和他们的家属，门前那条宽阔的水泥路两边，形成了一个农贸市场。工厂兴建之初，称作南工地，工厂建

成二十多年了，当地村民仍然习惯称呼南工地而不习惯叫×××号信箱。

小伙子推着独轮小车，下了桥，一步不停，反倒加快脚步了。提秤杆的老汉，也匆匆跟上去，似乎谁也没看见桥头插着的那块牌子。

“交费！”他喊。

推车的小伙子仍然不答话，也不停步。老汉回过头来，强装笑着：“兄弟，你看，肉还没开刀哩，没钱交咯！等卖了肉，回来时交双份。”

“不行。”他说，“现时就交清白。”

“真没钱交咯！”老汉摊开双手。

“没钱？那好办。”他走前两步，冷冷地对老汉说，“把车子推回北岸去，从河里过。”

老汉迟疑了，脸色难看了。

他紧走两步，拉住小推车的车把，对小伙子说：“交费。”

小伙子鼓圆眼睛，“哗啦”一声扔下车子，从肉扇下抽出一把尖刀来。那把刀大约刚刚捅死过一头猪，刃上尚存丝丝血迹。小伙子摆开架势，准备拼命了：“要这个不要？”

他似乎早有所料，稍微向后退开半步，并不显得惊慌，嗤笑一声，豁开军大衣，从腰里拔出一把明光锃亮的攮子，阴冷地说：“小兄弟，怕你那玩意儿，就不守桥了！动手吧。”

许是这阴冷的气势镇住了那小伙子，他没有把尖尖的杀猪刀捅过来。短暂的僵持中，老汉飞奔过来，大惊失色，一把夺下小伙子手里的刀子，“噌”的一下从肉扇下削下猪尾巴，息事宁人地劝解：“兄弟！拿回去下酒吧！”

他接住了，在手里掂了掂，不少于半斤，横折竖算都绰绰有余了。他装了刀子，转身走了。背后传来小伙子一声气恨的咕哝：“比土匪还可憎！”他权当没听见，他们父子折了一个猪尾巴，当然不会彬彬有礼地辞别了。

河北岸，有一帮男女踽踽走来，七八个人拽拽扯扯走上桥头，从他们不寻常的穿戴看，大约是相亲的一伙男女吧?

太阳从东原上冒出来，河水红光闪闪。他把猪尾巴丢在木牌下，看好那一帮喜气洋洋的男女走过桥来……

二

他叫王林，小河南岸龟渡王村人。

搞不清汉朝还是唐代，一位太子因为继位问题而遭到兄弟的暗杀，仓皇逃出宫来，黑灯瞎火奔窜到此，眼见后面灯笼火把，紧追不舍，面对突暴的河水，捶胸顿足，欲逃无路了。他宁可溺水一死，也不愿落入兄弟之手，于是眼睛一闭，跳进河浪里去。这一跳不打紧，恰好跌落在河水里一块石头上，竟没有沉。太子清醒过来，不料那石头漂上水面，浮游起来，斜插过河面，掠过屋脊高的排浪，忽悠忽悠漂到北岸。太子跳上沙滩，大惑不解，低头细看，竟是一只碾盘大小的乌龟，正吃惊间，那乌龟已潜入水中，消失了。

这个美妙的传说，仅仅留下一个“龟渡王”的村庄名字供一代一代村民津津有味地咀嚼，再没有什么稍微实惠的遗物传留下来，想来那位后来继承了皇位的太子，也是个没良心的昏君吧？竟然不报神龟救命之恩，在这儿修一座“神龟庙”或是一座“龟渡桥”，至少是应该的吧？又不会花皇帝自己的钱，百姓也可以沾沾光，然而没有。如果那位后来登极的皇子真的修建下一座桥，他就不会生出桥头收费的生财之道来了。王林在无人过桥的空闲时间里，在桥头的沙滩上踱步，常常生出些莫名其妙的想法。

王林的正经营生是在沙滩上采掘沙石，出售给城里那些建筑单位，收取过桥费不过灵机一动的临时举措。春天一到，河水没了寒渗之气，过往的人就挽起裤管涉水过河了，谁也不想交给他一毛钱了。

他三十四五年纪，正当庄稼汉身强力壮的黄金年华，生就一副强悍健壮的身坯，宽肩，细腰，长胳膊长腿，一个完全能够负载任何最粗最重的体力劳动的农民。他耕种着六七亩水旱地，那是人民公社解体时按人口均等分配给他家的口粮田，一年四季，除了秋夏两季收获和播种的繁忙季节之外，有十个月都趴在沙滩上，挖掘砂石，用铁锨把沙石抛到一个分作两层的罗网上，滤出沙子，留下两种规格的石头，然后卖给那些到河滩来拉运石头的汽车司机，这是乡村里顶笨重的一条挣钱的门路了。三九的西北风在人的手上拉开一道道裂口，三伏的毒日头又烤得人脸上和身上冒油。在河滩干这个营生的村民，大都是龟渡王村里最粗笨的人，再找不到稍微轻松一点儿的挣钱门路，就只好扛起镢头和罗网走下沙滩来，用汗水换取钞票。庄稼人总不能在家里闲吃静坐呀！

捞石头这营生还不赖！王林曾经很沉迷于这个被人瞧不上眼的营生，那是从自家的实际出发的考虑。他要种地，平时也少不了一些需

他动手的家务活儿，比如买猪崽和交售肥猪、拉粪施肥等，女人家不能胜任。这样，他出不得远门，像有些人出太原走广州贩运药材挣大钱，他不能去，显然离不开。更重要的是，那种赚钱容易而赔光烂本儿也容易，说不定上当了，被人捉弄了，要冒大风险，而他没有底本钱，赚得起十回而烂不起一回呀！他脑子不笨，然而也不是环儿眼儿很多的灵鬼。他平平常常，和龟渡王十之八九的同龄人一样，没有显出太傻或太差的差别。他觉得自己靠捞石头挣钱，顶合宜了，一天捞得一立方沙石，除过必定的税款，可以净得四块钱，除过阴雨和大雪天气，一月可以落下一百多块钱。他的女人借空也来帮忙，一天就能有更多一点的收入。对于他来说，一月有一百多块钱的进项，已经心底踏实了。

在下河滩捞石头之前一年，他给一家私营的建筑队做普工，搬砖，和水泥砂浆，拉车，每月讲定六十元。他干了仨月，头一月高高兴兴领下五十二块（缺工四天），第二个月暂欠，工头说工程完毕一次开清。到工程完工后，那个黑心的家伙连夜携款逃跑坑了王林一伙普工的工资。他们四处打听，得到的那位工头的住址全是假的，至今也摸不清他是哪里人。没有办法，他懊丧地背着被卷回到家里，第二天就下河滩捞沙石了。

我的老天爷！出笨力也招祸受骗，还有笨人捣鬼赚钱的可能吗?他经历了这一次，就对纷纷乱乱的城市生活感到深深的畏怯了。那儿没得咱挣钱的机会，河滩才是咱尽其所能的场合。

他有一个与他一样强悍的老婆，也是轻重活路不避，生冷吃食不计的皮实角色。他和她结婚的时候，曾经有过不太称心的心病，觉得她腰不是腰（太粗），脸不是脸（太胖），眼不是眼（太眯），然而还是过在一起，而且超计划生下了三女一男，沉重的生活负担已不容

许他注视老婆的眉眼和腰腿的粗细了。他要挣钱，要攒钱。要积蓄尽可能多的人民币，越多越好，越快越好。土地下户耕种两三年，囤满缸流了，吃穿不愁了，可是缺钱。三个儿女都在中学和小学念书，学费成倍地增加了，儿子上了学前班，一次收费五块，而过去却是免费的。况且，女孩长大了，开始注意拣衣服的样式了，女孩比男孩更早爱好穿戴，花钱的路数多了。

他要挣钱攒钱。他要自己的女儿在学校里穿得体面。他心里还谋划着一桩更重要的大事，盖一幢砖木结构的大瓦房。想到在自家窄小破烂的厦屋院里，撑起三间青砖红瓦的大瓦房，那是怎样令人鼓舞的事啊！什么时候一想起来，就不由得攥紧镢头和铁锨的把柄，刨哇！铲哇！抛起的沙石撞击得铁丝罗网刷刷响。那镢头和铁锨的木把儿上，被他粗糙的手指攥磨得变细了，溜光了。

她的女人，扭着油葫芦似的粗腰，撅着皮鼓似的屁股，和他对面忙活在一张罗网前，挖啊刨啊，手背上摞着一道道被冷风冻裂的口子。他觉得这个皮实的女人可爱极了，比电影上那些粉脸细腰的女人实惠得多。他们起早贪黑干了一年，夫妻双方走进桑树镇的银行分行，才有了那个浸润着两口子臭汗的储蓄本本。又一年，他们在那个小小的储蓄本上再添上了一笔。再干一年，就可以动手盖置新房了！一幢新瓦房，掐紧算计也少不得三千多元哪！

就在他和女人撅着屁股发疯使狠挖沙石的时候，多少忽视了龟渡王村里发生的种种变化。

春节过罢，阳气回升，好多户庄稼人破土动工盖置新房子。破第一镢土和上梁的鞭炮声隔三错五地爆响起来，传到河滩里来，那热烈而喜庆的“噼啪”声，撩拨得中年汉子王林的心里痒痒的，随风弥漫到

沙滩里来的幽香的火药气味，刺激着他的鼻膜。终于有一天，当他从河滩里走回村子，惊奇地发现，村子西头高高竖起一幢两层平顶洋楼。再几天，村子当中也冒起一座两层楼房来。又过了几天，一座瓦顶的两层楼房又出现在村子的东头。一月时间里，龟渡王村比赛摆阔似的相继竖起三幢二层楼房，高高地超出在一片低矮的庄稼院的老式旧屋上空，格外惹人眼目。

王林手攥铁锨，在罗网上用功夫，眼睛瞪得鼓鼓圆，不时地在自己心里打问：靠自己这样笨拙地挣钱，要撑起那样一幢两层洋楼来，少说也得十年哪！他开始怀疑自己的挣钱方式是不是太笨拙，太缓慢了？

太笨了，也太慢了！和沙滩上那些同样淘沙滤石的人比起来，他可能比他们还要多挣一点，因为他比他们更壮实，起得更早也歇得最晚。然而，与村子里那三幢新式楼房的主人比起来，就不仅使人丧气，简直使他嫉妒了，尤其是在他星星点点听到人们关于三户楼屋主人光彩与不光彩的发财的传闻之后，他简直妒火中烧了。

他皱紧眉头，坐在罗网前，抽得烟锅吱啦啦响，心里发狠地想着，谋算着，发誓要找到一个挣钱多而又省力气的生财之道来。想啊谋啊！终于把眼睛死死地盯到闪闪波动着的小河河水里了。

一场西北风，把河川里杨树和柳树残存的黄叶扫荡干净了，河边的水潭里结下一层薄薄的麻冰，人们无法赤足下水了。王林早就等待这一场西北风似的，把早已准备停当的四腿马架和三块木板装上架子车，拉到小河边上来。他脱下棉裤，让热乎乎的双腿在冷风里做适应性准备，仰起脖子，把半瓶价廉的劣质烧酒灌下喉咙，就扛起马架下到刺骨钻心的河水里，架起一座稳稳实实的独木桥来……

三

太阳升起在东原平顶上空碧蓝的天际，该是乡村人吃早饭的时候了。过往木桥的人稀少了，那些急急忙忙赶到城里去上班的工人和进城做工的农民，此刻早已在自己的岗位上开始工作了，把一毛钱的过桥费忘到脑后去了。那些赶到南工地农贸市场的男人和女人，此刻大约正在撕破喉咙召唤买主，出售自己的蔬菜、猪羊鲜肉和鸡蛋。没有关系，小小一毛钱的过桥费，他们稍须掐一下秤杆儿就盈回腰包了。他们大约要到午后才能交易完毕，然后走回小河来，再交给他一毛过桥费，走回北岸的某个村庄去。

他的老婆来了，手里提着竹篮和热水瓶。他揭开竹篮的布巾，取出一只瓷盘，盘里盛着冒尖的炒鸡蛋，焦黄油亮。他不由得瞪起眼来："炒鸡蛋做啥？"

"河道里冷呀！"她说，"身体也要紧。"

她心疼他。虽然这情分使他不无感动，却毕竟消耗了几个鸡蛋。须知现时正当淡季，鸡蛋卖到五个一块，盘里至少炒下四五个鸡蛋，一块钱没有了。

"反正是自家的鸡下的，又不是掏钱买的。"老婆说，"权当鸡少下了。"

反正已经把生蛋炒成熟的了，再贵再可惜也没用了。他掰开一个热馍，夹进鸡蛋，又抹上红艳艳的辣椒，大嚼起来，瞅着正在给他从水瓶里倒水的老婆。她穿着肥厚的棉裤，头上包着紫色的头巾，愈发显得浑圆粗壮了。其实，这个腰不是腰、脸不是脸的女人心肠很好，

对他忠心不贰，过日子扎实得滴水不漏。她给他炒下一盘鸡蛋，她自己肯定连尝也没尝过一口。

他吃着，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把钱来，搁在她脚前的沙地上，尽是一毛一毛的零票儿和二分五分的镍质硬币："整一下，拿回去。"

她蹲下身来，捡着数，把一张张揉得皱巴巴的角票儿捋平，十张一折，装进腰里，然后拣拾那些硬币。

他坐在一块河石上，瞅着她粗糙的手指笨拙地码钱的动作，不慌不忙的神态，心里挺舒服。是的，每次把自己挣回来的钱交给她，看着她专心用意数钱的神态，他心里往往就涌起一股男子汉的自豪。

"这下发财啰！"

一声又冷又重的说话声，惊得两口子同时仰起头来，面前站着他的老丈人，她的亲大。

他咽下正在咀嚼的馍馍，连忙站起，招呼老丈人说："大！快吃馍，趁热。"

"我嫌恶心！"老丈人手一甩，眉眼里满是恶心得简直要呕吐的神色，"还有脸叫我吃！"

他愣住了，怎么回事呢？她也莫名其妙地闪眨着细眯的眼睛，有点生气地质问自己的亲大："咋咧？大！你有话该是明说！"

"我的脸，给你们丢尽了！"老汉撅着下巴上稀稀拉拉的山羊胡须，"收过——桥——费——！哼！"

王林终于听出老丈人发火的原因了，未及他开口，她已经说了：“收过桥费又怎么了？”

“你不听人家怎么骂哩：土匪，贼娃子！八代祖宗也贴上了！”老汉捏着烟袋的手在抖，向两个晚辈人陈述，说小河北岸的人，过桥时被他的女婿收了费，回去愣骂愣骂！爱钱不要脸啊！他被乡党们骂得损得受不了，唾沫星儿简直把他要淹死了。他气恨地训斥女儿和女婿，“这小河一带，自古至今，冬天搭桥，谁见过谁收费来？你们也不想想，怎么拉得下脸来？”

“有啥拉下拉不下脸的！俺们搭桥受了苦，挨了冻，贴赔了木板，旁人白过桥就要脸了吗？”她顶撞说：“谁不想掏钱，就去河里过，我们也没拉他过桥。”

他也插言劝说：“大呀！公家修条公路，还朝那些有汽车、拖拉机的主户收养路费哩！”

女儿和女婿振振有词，顶得老汉一时回不上话来，他避开女儿和女婿那些为自己遮掩强辩的道理，只管讲自己想说的话：“自古以来，这修桥补路，是积德行善的事。咱有心修桥了，自然好；没力量修桥，也就罢了；可不能……修下桥，收人家的过桥费……这是亏人短寿的缺德事儿……”

他听着丈人的话，简直要笑死了，如若不是他的老丈人，而是某个旁人来给他讲什么积德行善的陈年老话，他早就不耐烦了；唯其因为是老丈人，他才没敢笑出声来，以免冒犯。他不由得瞅一眼女人，她也正瞅他，大约也觉得她大的话太可笑了。

“大！你只管种你的地，过你的日子，甭管俺。”女人说。王林没有吭声，让她和她的亲生老子顶撞，比他出面更方便些。他用眼光鼓励她。

“你是我的女子！人家骂你祖先我脸烧！”老汉火了，“你们挣不下钱猴急了吗？我好心好言劝不下，还说我管闲事了。好呀！我今天来管就要管出个结果！”

老汉说时，抢前两步，抓住那根写着“过桥收费壹毛”字样的木牌的立柱，“噌”的一下从沙窝里拔了起来，一扬手，就扔到桥边的河水里。他和她慢了一步，没有挡住，眼见着那木牌随着流水，穿过桥板，漂悠悠地流走了。现在脱鞋脱袜下河去捞，显然来不及了，眼巴巴看着木牌流走了，漂远了。

他瞅着那块漂逝的木牌，在随着流水漂流了大约五六十码远的拐弯的地方，被一块露出水面的石头架住了，停止不动了。他回过头来，老丈人不见了，再一看，哦！老丈人背着双手，已经走过小桥，踏上北岸的河堤了，那只羊皮黑烟包在屁股上抖荡。看来老丈人是专程奔来劝他们的，大约真是被旁人的闲言碎语损得招架不住了，要面子的人啊！他没有说服得下女儿女婿，愤恨地拔了牌子，气倔倔地走了。他看着老丈人渐渐远去的背影，终于没有开口挽留，一任老丈人不辞而别。

她也没有挽留自己的亲大，眼角里反而泻出一道不屑于挽留的歪气斜火，嘴里咕哝着：“大今日是怎么了？一来就发火！”

“大平日性情很好嘛！”他也觉得莫名其妙，附和妻子说，“自娶回你来，十多年了，大还没说过我一句重话哩！今日……好躁哇！”

“单是为咱们收过桥费这码小事，也不该发这么大的火，失情薄意的。”她说，“大概心里还有啥不顺心的事吧？”

“难说……难说……”他说不清，沉吟半晌，才说，“好像人的脾气都坏了？一点小事就冒火……比如说今日早晨，有个家伙为交一毛钱的过桥费，居然拔出杀猪刀来……我也没客气！”

“可这是咱大呀！不比旁人……”她说。

“咱大也一样，脾气都坏了！”他说。

他说着，站起来，顺着河岸走下去，践过露在浅水里的列石，把那块木牌从水面捞起来，又扛回桥头来。

他找到被老丈人拔掉木牌时的那个沙窝儿，把木牌立柱砍削过的尖头，重新插进沙地，再用脚把周围的虚沙踩实。她走过来，用自己穿着棉鞋的肥脚踏踩着，怕他一个人踩不结实似的。浸过水的木牌，又竖立起来啰！

四

北方的冬天，天黑得早，四点钟，太阳就压着西边原坡的平顶了，一眨眼工夫，暮云四合了。河川里的风好冷啊！

王林缩着脖子，袖着手，在桥头的沙地上踱步，只有遇见要过桥的人，他才站住，伸出手，接过一毛票儿，塞进口袋，便又袖起手，踱起步来。

他的心里憋闷又别扭，想发牢骚，甚至想骂人。他的老丈人不问青红皂白，劈头盖脑训了他一顿，骂了他一场，拔掉那个木牌扔到水

里，然后一甩手走掉了。他是他的岳父大人，倚老卖老，使他开不得口，咬着牙任他奚落，真是窝囊得跟龟孙一样。更重要的是，老岳丈把小河北岸那些村子的闲言碎语传递到他的耳朵里来了，传进来就出不去了，窝在他的心里。

王林有一种直感，小河两岸的人都成了他的敌人！他们很不痛快地交给他一毛钱，他们把一毛钱的经济损失用尽可能恶毒的咒骂兑换回去了。他虽然明知那些交过钱的人会骂他，终究没有当面骂，耳不听心不烦。老丈人直接传递到他耳中的那些难听话，一下子捣乱了他的心，破坏了他的情绪，烦躁而又气恨，却又无处发泄。

一个倒霉鬼自投罗网来了。

来人叫王文涛，龟渡王村人，王林自小的同年伙伴。现在呢？实话说……不过是个乡政府跑腿的小干事。天要黑了，他到河北岸做什么？该不该收他一毛钱的过桥费？

收！王林断然决定，照收不误。收他一毛钱，叫他摆那种大人物的架势去。

“王林哥，恭喜发财！”王文涛嘻嘻笑着打招呼，走到他跟前，却不急于过桥，从口袋里掏出烟来，抽出一支递给他，自己也叼上一支，打起火来。

王林从王文涛手里接过烟，又在他的打火机上点着了。这一瞬间，王林突然改变主意，算了，不收那一毛钱了，人家奉献给自己一根上好的“金丝猴”，再难开口伸手要钱了。

王文涛点着烟，还不见上桥，叉开双腿，一只手塞进裤兜里，一只手捻着烟卷，怨怨艾艾地开口说：“王林哥，你发财，让我坐蜡！你真……没良心呀！”

“你当你的乡干部，我当我的农民。咱俩不相干！我碍着你什么路了？”王林嘲笑说。

“是啊！咱俩本来谁也没碍过谁。想不到哇——”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信封，递上来，眼里滑过一缕难为情的神色，“你先看看这封信吧！”

王林好奇地接过信封，竟是报社的公用信封，愈加奇了，连忙掏出信瓤，从头至尾读下来。他刚读完，突然仰起脖子，仰着头，哈哈大笑起来，一脸是幸灾乐祸的神气。

在他给龟渡王村前边的小河上刚刚架起这座木板小桥的时候，王文涛给市里的报社写了一篇稿子，名叫《连心桥》，很快在报纸上刊登出来了。王文涛曾经得意地往后捋着蓄留得很长的头发，把报纸摊开在他的眼前，让他看他写下的杰作。在那篇通讯里，他生动地记述了他架桥的经过，“冒着刺骨的河水”什么的；激情洋溢地赞扬他舍己为人的崇高风格；末了归结为“富裕了的农民的精神追求”等等。现在，报社给王文涛来信追查，说有人给报社写信，反映龟渡王村有人借一座便桥，坑拐群众钱财，要他澄清《连心桥》通讯里所写的事实有无编造？是否失实？如若失实或有编造成分，就要在报纸上公开检讨。这样，王文涛觉得弄下“坐洋蜡”的麻烦事了。

“怎么办呢？”王文涛被他笑得发窘了，“你挣钱，我检讨，你还笑……”

“这怪谁呢？”王林摊开双手，悠然说，“我也没让你在报纸上表扬我，是你自个胡骚情，要写。这怪谁呢？”

“你当初要是说明要收过桥费，我当然就不会写了。”王文涛懊丧地说，“我以为你老哥思想好，风格高……怎么也想不到你是想挣钱才架的桥……”

在刚架起小桥的三五天里，王林急于卖掉他堆积在沙滩上的石头，回去种挖过红苕的责任田的小麦，又到中学里参加了一次家长会，当他处理完这些缠手的家事，腾出身来要到桥头去收费的时候，王文涛的稿子已经上报了。这类稿子登得真快。王林当时看完报纸，送走王文涛，就扛着写着“过桥收费壹毛”的木牌走下河滩了。现在，王文涛抱怨他没有及早说明要收费的事，他更觉得可笑了，不无嘲讽地说：“你想不到吗？哈呀！你大概只想到写稿挣稿费吧！给老哥说说，你写的表扬老哥架桥的稿子，挣得多少钱？”

王文涛腾地红了脸，支吾说：“写稿嘛！主要是为党报反映情况……做党的宣传员……”

“好了好了好了！再甭自吹自夸了！再甭卖狗皮膏药了！想写稿还怕人说想挣钱，酸！”王林连连摆手，又突然梗梗脖子，“我搭桥就是想挣钱。不为挣钱，我才不‘冒着刺骨的河水’搭桥哩！不为挣钱，我的这三块木板能任人踩踏吗？我想挣钱，牌子撑在桥头，明码标价，想过桥的交一毛钱；舍不得一毛票儿，那就请你脱袜挽裤下水去……老哥不像你，想挣钱还怕羞了口，丢了面子！”

“你也甭这么理直气壮，好像谁都跟你一样，干什么全都是为挣钱。”王文涛被王林损得脸红耳赤，又不甘服下这种歪理，“总不能说

人都是爱钱不要脸吧？总是有很多人还是——”

“谁爱钱要脸呢？我怎么一个也没见到？”王林打断王文涛的话，赌气地说，“你为挣稿费，瞎写一通，胡吹冒撂，这回惹下麻烦了。你爱钱要脸吗？”

一个回马枪，直捣王文涛的心窝。王文涛招架不住，羞得脸皮变得煞白色了，嘴张了几张，却回不上话来。王林似乎更加不可抑制，从一旁蹦到王文涛当面，对着他的脸，恶声恶气地说：

“就说咱们龟渡王村吧！三户盖起洋楼的阔佬儿，要脸吗？要脸能盖起洋楼吗？先说西头那家，那人在县物资局干事，管着木材、钢材和水泥的供应分配。就这么一点权力，两层楼房的楼板、砖头、门窗，全是旁人免费给送到家里。人家婆娘品麻死了，白得这些材料不说，给送来砖头、门窗的汽车司机连饭也不管，可司机们照样再送。村中间那家怎么样？男人在西安一家工厂当基建科长，把两幢家属楼应承给大塔区建筑队了。就这一句话，大塔区建筑队给人家盖起一幢二层洋楼，包工包料，一分不取。你说，这号人爱钱要脸吗？还是党员干部哩！

“只有村子东头的王成才老汉盖起的二层洋楼，是凭自己下苦挣下的。老汉一年四季，挑着饸饹担子赶集，晚上压饸饹，起早晚睡，撑起了这幢洋楼，虽说不易，比一般人还是方便。咋哩？成才老汉的女婿给公家开汽车，每回去陕北出差，顺便给老丈人拉回荞麦来，价钱便宜，又不掏运费，那运费自然摊到公家账上了。尽管这样，成才老汉还算一个爱钱要脸的。

“可你怎么写的呢？你给报上写的那篇《龟渡王村庄稼人住上了小洋楼》的文章，怎么瞎吹的呢？你听没听到咱村的下苦人怎么骂你？”

一个回马枪，又一串连珠炮，直打得王文涛有口难辩，简直招架不住，彻底败阵。他有点讨饶讨好地说：“你说的都不是空话。好老哥哩！兄弟不过是爱写点小文章，怎么管得了人家行贿受贿的事呢？”

“管不了也不能瞎吹嘛！”王林余气未消，并不宽饶，“你要是敢把他们盖洋楼的底细写出来，登到报纸上，才算本事！才算你兄弟有种！你却反给他们脸上贴金……”

王文涛的脸抽搐着十分尴尬，只是大口大口吸着烟，吐着雾，悻悻地说：“好老哥，你今日怎么了？对老弟平白无故发这大火做啥？老弟跟你差不多，也是撑不起二层小洋楼……”

王林似乎受到提醒，是的，对王文涛发这一通火，有什么必要呢？他点燃已经熄灭的纸烟，吐出一口混合着浓烟的长气。

“好老哥，你还是给老弟帮忙出主意，”王文涛友好地说，根本不计较他刚刚发过的牢骚，“你说，老弟该怎么给报社回答呢？”

“你不给他回答，他能吃了你？”王林说，“豁出来日后不写稿子了。”

王文涛苦笑着摇摇头。

“要不你就把责任全推到我头上。你就说，我当初架桥的目的就跟你写的一样，后来思想变坏了，爱钱不要脸了。”

王文涛还是摇摇头，试探着说：“老哥，我有个想法，说出来供你参考，你是不是可以停止……收过桥费？”

“门儿都没有！”王林一口回绝。

“是这样，”王文涛还不死心，继续说，“乡长也接到报社转来的群众来信，说让乡上调查一下坑拐钱财的事。乡长说，让我先跟你说一下，好给报社回答。让你停止收费，是乡长的意思……”

“乡长的意思也没门儿！”王林一听他传达的是乡长的话，反而更火了，“乡长自己来也没门儿。我收过桥费又不犯法。哼！乡长，乡长也是个爱钱不要脸的货！我早听人说过他不少七长八短的事了，他的爪子也是够长够残的！让他来寻找我吧！我全都端出来亮给他，叫他吃不了兜着走……”

王文涛再没吭声，铁青着脸，眼里混合着失望、为难和羞愧之色，转过身走了。

王林也不挽留，甚至连瞅他一眼也不瞅，又在河石上坐下来，盯着悠悠的流水，吸着从自己口袋里掏出的低价纸烟。

脚步声消失了。王林站起来，还是忍不住转过身，瞧着王文涛走上河堤，在秃枝光杆的柳林里缓缓走去，缩着脖子。他心里微微一动，忽然可怜起这位龟渡王村的同辈儿兄弟来了。听说他写《连心桥》时，熬了两个晚上，写了改了好几遍，不过挣下十来八块稿费，临了还要追究。他刚才损他写稿为挣钱的话，有点太过分了吧?

王文涛已经走下河堤，他看不见他的背影了。王林又转过身来，瞧着河水，心里忽然懊恼起自己来了。今日倒是怎么了？王文涛也没

碍着自己什么事，为啥把人家劈头盖脑地连损带挖苦一通呢？村里那两家通过不正当手段盖小洋楼的事，又关王文涛的屁事呢？乡长爪子长指甲残又关王文涛的屁事呢？再回头一想，又关自己的屁事呢？

他颓然坐在那块石头上，对于自己刚才一反常态的失控的行为十分丧气，恼火！

一个女人抱着孩子走过来，暮色中看不清她的脸，脚步匆匆。她丢下一毛钱，就踏上小桥，小心翼翼地移动脚步，走向北岸。

他的脚前的沙地上，有一张一毛票的人民币，被冷风吹得翻了两个过儿，卡在一块石头根下了。他久久没有动手拾它。

他瞅着河水，河水上架着的桥，桥板下的洞眼反倒亮了。他忽然想哭，说不清为什么，却想放开喉咙，痛快淋漓地号啕大哭几声……

1986年6月27日 白鹿园

到老白杨树背后去

从二楼的阳台上，可以观赏这个城市北半边的夜色。绿的红的蓝的粉红色的窗帘，使万千个窗户呈现出五彩缤纷的色彩。夜是安静柔蜜的。夜总是夜。星光在城市的上空显得灰暗。月亮也显得冷寂无光。城市北边横亘西东的那一架山或者说是一道原坡，逶迤伸展开去，看不见峰峦，看不清豁峪，只是一道模糊的雄伟的轮廓。山就是山。夜色里看不清峰峦和豁峪的轮廓依然是不失其雄伟。

我喜欢浏览异地的夜色。这个黄土高原上的北方小城，三十万男女白天奔忙在大街小巷里，夜晚就在那一孔一孔绿的红的蓝的粉红色的窗帘里头蜗居，于是就创造出这个北方小城不同于北京和广州的独特的色彩和氛围。哦！这是金关市的夜色。

我有点寂寞。我白天里观赏了这个小城可资骄傲的古董和现代文明的标志。这儿没有秦俑，没有唐王陵墓，却有瓷窑。这儿的瓷窑不是一般随随便便的什么破窑，而是唐三彩的发祥之地。举世闻名的唐三彩马和三彩骆驼，首先从这几个坍塌淤塞的破窑里被创造成功，还是世界第一。我在这儿住着金关市最高级的一家宾馆，享受着超越了我应该享用的规格标准。我品尝了这个古老的瓷都风味奇特的传统小吃，辣得冒汗辣得舌根僵硬的荞麦饸饹。我的心里却又怎的滋生寂寞了？我希望见到一位熟人，一位生活在这个城市多年的熟人。一位朋友，一个同学，一个旧时的同志，一个同乡，聊一聊，谝一谝，或者有幸被邀到他家去坐坐，我对这个陌生之地的陌生隔膜就完全打破了。这是我每到一个新地方的最惬意的事，说来不算奢望，有几回就真的如愿了，有几回只好留下寂寞和最终也未戳透的隔膜。

同行的和在金关城新结识的几个朋友在胡聊乱谝。我转进小屋，烟雾腾腾，空气浑浊。烟把儿从烟灰缸里溢出来，落在茶几上，和橘子皮花生壳混在一起。某个作家第三次结婚了，娶了个年龄相差十多岁的舞蹈新星。某走红的女作家和男人开始分居。某男作家和某女作家公开同居。性和爱和婚姻总是在一切角落里成为最畅通的话题。没听过的总想听，听到了总想说给还没听说过的人。

咣咣咣！

有人敲门。

敲门敲得这样响。完全用不着使那么大的劲儿。要么是急了，要么是个莽撞汉子。四五个人全都转过头盯着那门板，却没有谁打算立即跑过去拉开旋钮。我是觉得那门敲得太响太用劲，反倒不急于去打开它，毕竟我坐得离门最近，最终还是我拉开门。

一位女人，中年女人。她看我一眼，旋即就放弃了我，把一双灵活的眼睛扫向屋里，把坐在屋里床上、椅子上和沙发上的每个人扫描一遍，最终又把眼光落到我的脸上。我避开脸。

“这屋有个……辛程吗？”

我立即抬起头。一双疑惑不定的眼睛，眼睛的边儿和大角儿小角儿聚着皱纹。那些皱纹又几乎抹平了，像油漆匠在刷漆之前用砂纸打掉木板的沟缝儿，光了也柔了，然而总抹不掉隐藏的沟缝儿。那双眼睛虽无灵光，却很灵活，像淘洗得洁净的两只黑色套着白色的玻璃球儿。我看她看得这样仔细，却仍然认不出她是谁。我问：“你认识辛程不？”

“认识。把他烧成灰我也认识。”

“那好。你就认吧！他肯定在这屋坐着。”

她朝前走了两步，站到屋子中间，又一次扫描起每一位在床上椅子上沙发上坐着的人来，却不显得任何难为情。她终于把眼光又集中到我的脸上，使我很不舒服，像面对一双汽车灯的强烈照射。她眼睛一眨，带着试探而又几乎肯定的口气说：“你大概就是……”

屋子里的人都笑了。

玩笑至此，也就够了，我却惶惶然问：“你是……哪位？”

“现在……该你认我了！你也好好认认吧！难道把我忘得一干二净了？真是贵人眼高……”

我简直不敢相信这就真的遇上她了……

偏斜的太阳在山坡上闪耀。酸枣棵子繁密的小叶子变黄了。胡须草的长叶晒成了灰白色。好久没有落雨了。铁刷子草顶耐旱，叶子凝聚成乌黑色。马刺蓟花儿像紫色的绣球儿缀在焦枯的满布着小刺儿的枝秆上，无精打采。蚂蚱在声嘶嗓干地叫唱。太阳太刺眼了，那焰光灼得人不敢抬头，稍微溜一眼就头晕目眩，眼前发黑。

我们躲在沟道里。沟道里有三五十株白杨树。这沟道就叫白杨沟。白杨树抖抖擞擞地冒出黄土坡沟的夹缝儿，把枝枝梢梢伸向蓝色的天空，地上就落下一大片荫凉。春天时沟里流一股水，旱季里就断流了，只有湿漉漉的沙土，津津地渗出水珠儿来。白杨独占这一方风水地。得天独厚，枝叶茂密，树干光滑滋润。沟里有小潭，水不外溢，也不见少，大约渗出来的水正好够挥发的。水潭边的软土湿泥里

留着分作两半的硕大的牛蹄印，也隐现着梅花瓣儿似的野兽的足迹，许是狐狸，也许是狼。反正旱季里山坡上的水是稀罕的，放牛娃把牛赶到这里来饮水，狼和狐狸也会嗅到水的气味的。

草笼扔在一边，磨得明光灿亮的草镰也撂在地上。等太阳绕到那道高梁背后，四面山坡上不见阳光的时候，我们才动手到塄坎上去割草。

四个人围坐在白杨树荫下，抓石子儿。七颗五色的小石子，像麻雀蛋一样，褐色的、紫红的、紫黑的、乳白的，全是从沙土里掏出来，洗净泥沙。撒开来，抛起一只，再抓起地上的，接住空中落下的那颗。有单抓，有双抓，还有一二三的抓法。四个人分作两家，对门为朋友。玩起抓石子，我们三个男孩子全敌不过薇薇。轮到薇薇抓的时候，我就一眼不眨地盯着。她抛起一颗石子，再轻巧地抓起撒在地上的两颗，然后翻过手来，接住空中即将落地的那颗石子。灵巧的手翻来覆去，一张一合，石子在手掌心撞得当当作响。那眼睛低下来又翻上去，两条小辫子有节奏地跳弹着，我常常看得忘记了轮着我抓。

玩了三回，我就兴味索然，或者说从一开始我就热情不高。我总希望和薇薇做对儿，不光图赢。刚才开始用手心手背配对家的时候，厚儿和薇薇同出手心，而我恰恰和喜娃都出了手背。我没兴趣了，提议说：“玩‘过门’吧！”

喜娃首先响应。厚儿也同意了。薇薇不吱声，却没反对，她无疑爱当新娘子。

喜娃、厚儿和我争执起来，争着要当女婿。薇薇说还是用“猜崩猜”决赛来确定轮流做女婿的先后顺序。我胜利了。我们三人爬到火样

烤晒的山坡上，选择自己喜爱的野花，准备装扮新娘子。野豆荚吊着一串串豌豆花一样的花朵，紫红发蓝，很讨人喜欢，而一想到这种野豆荚又叫狼豆荚，我就放弃了。黏草花粉红粉红，挺好看，可那枝叶上分泌出一种黏汁，碰一碰就会染上黏糊糊的东西，一定会把薇薇的头发黏结在一起。秃子草花黄澄澄的，像去了青的蛋黄，粉嘟嘟的煞是好看，唯其名字不雅，不大吉祥，我也没摘。我爬到坡顶上，在一堆乱石岗上，看见了一片野蔷薇，红的花白的花粉红的花开得一片灿烂，花团锦簇，成疙瘩结串儿。

我捏着一把野蔷薇花儿从坡上跑下来，头上冒着汗，手指被小刺扎破了，火辣辣地疼。薇薇盘腿坐在草地上，羞答答地低着头。我手足无措了。喜娃提醒我快给新娘子插花。我跪在薇薇面前，把一枝一枝红的白的粉红的野蔷薇插到她的小辫上、头顶上。我这才发现，薇薇在我们采花的时候，在水潭里洗过脸了，头发也用水抿抹得平平整整，水津津的了。

喜娃做礼宾先生："拜天地。跪好！你俩并排跪好。"

我跪在草地上，偷偷扭过头，薇薇也跪下来，有点忸怩，显出羞答答的样子。

"一拜天神——叩首！"

我双手撑地，沙土地凉适适的，点一下头，再点一下头，一共叩了三下。薇薇缀满野蔷薇花枝的头也低下去，又仰起来，磕了三下，红的白的粉红色的花朵摇摇闪闪，甩甩蹦蹦。

"二拜地神——叩首！"

我和薇薇照例认真地叩拜三回。

“三拜祖宗神灵——叩首！”

三拜之后，我挺直跪着，不知下来该怎么举动了。喜娃长我两岁，经见多些，并不慌急，扯着悠悠的嗓门（简直跟村子里的礼宾先生二太爷的调门如出一辙）喊：“奏乐——”

喜娃喊过，把双手卷成圆筒，套在嘴上，吹起喇叭唢呐调儿，呜——哇——嚓。厚儿也跟着吹起来，双奏乐。

“入洞房——”

喜娃忙里偷闲，吹着兼喊着。他喊了“入洞房”之后，我却愣着。洞房在哪儿？该往哪里走？

“到老白杨树背后去！”喜娃急嘟嘟地喊。

我还是不明白：“到老白杨树背后咋办？”

喜娃不耐烦了：“跷尿臊呀——”

我和薇薇悠悠走着，并肩齐排儿，那棵老白杨树变得陌生而又神秘了。跷尿臊，就是说要用一条腿从薇薇的头上跷过去！大人们结婚时，怕新娘子疯长，跷了尿臊就不再长了。我和薇薇走到老白杨树下，默默地站住了。

薇薇低着的头仰起来，头上的花串摇摆着，衬得那脸儿粉嘟嘟的，像一朵粉红色的野蔷薇，那双眼睛已少了羞怯，而涨出一缕难受的惊恐的神色，求饶似的说：“哥吔！你甭跷了，我还要往高长哩！”

说着，那双眼睛里潮出了泪水来，迅即溢满了眼眶，闪闪颤颤，眼看着要滴流下来。我忽然难受了，忙说：“反正是玩哩！你咋就当真了?算了算了，不跷……”

她妩媚地笑了，一甩头，就跑了。

喜娃早等着。薇薇又盘腿坐下。喜娃把他采的一把野花往她头上插，我的那些野蔷薇被取掉了，扔在地上。我站在旁边，看着被扔在草地上的红的白的粉红色的野蔷薇，有一种说不清的冷寂。看着喜娃在她的小辫上和头发里插花儿，我顿然厌恶起他的手来，那手指捏着她的有点黄的辫梢，令我十分反感。我想抢上一步，把他捏弄她小辫的丑陋难看的指头砸断。我情急中终于生出一个借口，把他插到她头发上的花儿拔了，摔到沟底里。

“你……干啥? ”喜娃气呼呼地仰起头。

“那黏草花，黏糊糊的，把薇薇的头发会粘成一窝麻！”我说，“你这个笨熊，采的这些烂脏花！”

喜娃傻乎乎地醒悟似的笑了。他自己也扔掉了黏草花，又一心一意把那些乱七八糟的野花插到薇薇头上。他对我说：“轮你当礼宾先生了，喊吧！”

我冲口而出：“我不会！”其实那几句简单的仪程是难不住我的。想到让他和薇薇拜天地做夫妻，我心里的那种别扭劲儿继续加剧。我喊不出口来。

只好由厚儿做礼宾先生。

在厚儿用双手代替喇叭唢呐的吹奏声中，喜娃和薇薇朝老白杨树走去。我没有吹。厚儿单独的吹奏显得很单调。我跟着喜娃和薇薇到老白杨树下。喜娃说：“洞房里不许来。你刚才入洞房，我就没去。”

我知道不该来，然而我要来。

喜娃辞不动我，只好忍让了，转脸对薇薇说：“你蹲下去，我要跷尿臊呀！”

薇薇为难地说：“甭跷吧！我要长高……”

喜娃说：“不跷尿臊，就不算玩‘过门’。”

他说着，就用手按压薇薇的肩膀。我早已不能容忍，跳上前去，一拳打在他的耳根上。喜娃恼了，猴急了，转过身，回击一拳，砸在我的脑门上，我眼里金花乱冒，仰八叉跌倒在地。喜娃趁势压在我身上，气呼呼地说：“你当新郎时，我给你当礼宾先生，又吹喇叭，又吹唢呐；轮我做新郎了，你啥也不干……”

我自知理亏，心里却不服气。

薇薇把我们拉开了。厚儿喊：“轮我做女婿了……”

薇薇笑着哄厚儿：“算了算了。你看，为做女婿都打起来咧！这样吧……你们仨把自个采的花儿，全都插到我头上……”

厚儿最小，也最好说话。他把他采的花就往薇薇的头发上插。喜娃也插了。我也把那些野蔷薇花儿捡起来，插到薇薇的头发上。

薇薇的头发上和小辫儿上，缀满了各色各样的花儿，红的白的粉红的野蔷薇，紫红的野豆花，黄色的秃子花，紫色的马刺蓟花儿……山坡上夏季里所有的花儿都被我们三个采来，插到她的头上了。坡地上收割过小麦的塄根下残留的几枝晚熟的麦穗儿，我也把它掐来了，吊在她的两条辫梢上。她的头上缀满了五彩六色的野花儿，像个花仙，像个花神，像个山野里的花的精灵了……

“没料到你成了作——家！我那时候咋就看不出你会当作家！”

“瞎碰……”

“我那时候只觉得你很犟。‘犟牛黄’……”

“沾了一点犟的光，也吃了不少犟的亏。”

“你小时候好强。好强得很咧！”

“沾了好强的光，吃亏也吃在好强上头。”

“犟人，好强人，都有出息，也都遭难特多。”她说，“我看电影，听广播，那些成大事的人，都是些犟人，都是些好强的人，又全都是些倒霉蛋。倒霉得要死，可还是犟……”

“哦！对……那些电影几乎千篇一律。”

“而今该你走运了。知识人儿吃香了。你的工资提了吧？”

“提了。”

“写书听说很挣钱？”

“挣是挣，也不怎么样，不及经商挣得快。”

“一个字多少钱？”

“一二分。”

“啊呀！才一二分！我听人说几毛哩！”

“……”

“家属户口进城了吗？”

“进了。”

“城里分房了没？”

“分了。”

“多少平米？”

“二十多……”

“二十多平米？还算照顾知识分子？我想你该一百多哩！那怎么住得开！”

“我还住在乡下。户口进城了，没搬家。只是不种责任田了。”

“啊呀！你这个人不知打的啥主意。住在乡下做啥？离不得那个山沟？下雨街巷里烂得像猪圈。吃的还是那股泉水，听说上边村子的女人在泉水里洗褯片子……”

“我图清净……”

“噢！对咧！你怕人打扰，这倒也是。不过，我看过你一篇小说，叫《收获》。你把那个烂山沟写得好美！我咋就看不出想不起有啥好看的好美的。我就记着那洗过褯子的泉水，一想到喝那水，吃那水做的饭，就恶心，就起鸡皮疙瘩。我从你的小说里看到，还是没屎啥进步，还是人拉独轮车，还是褯子水！不就是破白杨沟吗？你可写得诗情画意。怪道人说看景不如听景……”

我有点惭愧，有点惶惶然，有点被揭穿了西洋景后的尴尬。然而，我又有点犟起来，难道我和喜娃和厚儿给你头发上和小辫上插满的香气四溢的野花不能留在心里一点什么吗？我有所期待，希望她能记得那使我永难忘记的童年在白杨沟里的嬉戏。令我彻底失望的是，她漫不经心地把话题转移了。可见，白杨沟里她插满鲜花的花的精灵、花的神、花的仙的形象已经统统湮没了。她在嘲弄自己家乡的贫穷落后，甚至比一位异乡人还要刻薄。我有点心酸。

“那年我回去，我舅没在家，到渭北买粮去了。我等了两天，半夜里拉回几口袋苞谷来，像做贼似的。我每年都给舅家寄钱，简直是填不满的穷坑，闹得我的日子老也不得宽展。一想起来我都头疼，怎么也想不到家乡有什么可爱……我十多年没回家了，老也不想回去。”

“我这……纯粹是……文人多情……”

“你也写点城市人的小说嘛！农村小说……谁看！我反正一看见猪呀牛呀穿大襟的女人呀就烦了……”

“当然……城市总是文明……”我想把话引开，不要再说家乡的话了，“你在这儿，生活还好吧？”

“可——以。”她拖出很长的一种调门，像秦腔戏演员起唱之先的一声叫板。这声叫板的调儿，就给将要唱出的大段戏文定下了调子，或是花音慢板，或是二六板，抑或摇滚板。她说：“俩娃都工作了，可以养活自个了。老头子跟我的工资吃不清用不完，行啰！只是老头子……不大顺心……”

“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呢？”

“按说啥事也没有，全是自生的不自在。这也看不惯，那也听不顺，广播上一句新名词就听得火冒三丈，电视上一个镜头就惹得他骂爹咒娘。我说，何必呢？人家广播上说要重用知识分子，就用呗！人家电视上演那些搂搂抱抱的戏，让人家搂去抱去，干着你屁事啦！你该拿的工资拿了，该住的房住上了，就吃点好的过个安宁日子行了……”

“他做什么工作？”

“保卫科长，几千人的大厂子的科长。虽然而今时兴文凭，保卫科长的位子还稳当着哩！再说……唉！这老头子也是个犟人，死脑筋，总说自己亏了……”

“怎么会亏了呢？”

“他当兵那阵儿，在青藏高原开车。雪下得半人深，车开不过去，旁的人都钻在驾驶楼不敢出来，这个犟家伙硬是用铁锹把几十里公路铲开了。他立了功，当年国庆就上了天安门观礼台，见了毛主席，照了相。回来就提拔了干部……”

我早就听说过她的丈夫的英雄事迹了。二十多年前，这位英雄司机，因为上过北京，因为受过毛主席的接见，载誉归来，轰动了我们小河两岸的十里八村。亲戚和媒人挤得碰破了脑袋，竞相把自己熟悉的最好的姑娘的照片掏出来，展示在英雄面前。人如何贤淑，家教多么严格，模样最最疼人了。小镇上的照相馆因此骤然兴隆起来。英雄眼力不错，在纷如花瓣般的照片里，终于瞅中了薇薇。我那时正读中学，城市里的中学离我们的小河川道几十里远，周日回到家中，就听说了薇薇许配英雄的事。当晚，薇薇来到我家，喜不自胜："他在青藏高原开车。雪下得半人深……"我却张大嘴巴喘不过气来……

我崇拜英雄，尤其是那些舍生忘死慷慨激昂的悲壮人物。岳飞、牛虻、董存瑞，这些古今中外忠肝烈胆的英雄，一触及就使我心潮激荡。可是，当我听完薇薇以完全佩服倾慕的口吻述说完这位英雄的时候，心里却怪不是滋味。我闭口不语，低下头，不想看她得意的脸。

"定下阳历年结婚哩！"

"恭喜。"

"到那天，你去送我。"

"我……上学哩！"

"阳历年学校放假！"

"放假……我也不去！"

她似乎这时才意识到我的情绪不好，忽然哑了口，出气粗了。我抬头看了一眼，她的脸憋得通红，泪水涌出来，慢慢站起，转身走出门去，我没有送她。

我很快就意识到我的毛病又犯了。我想起在白杨沟里玩“过门”时和喜娃打架的事。我稍一冷静下来就想到，其实我和薇薇没有任何契约，婚姻的事连提也不曾提过，我为什么恼怨人家订婚的事呢？我的嫉妒心太强了！我真坏！我凭什么给薇薇使性子？元旦到来的时候，我决定去送她，也弥补我的无礼。

按我们乡下的风俗，女子结婚时，亲门本族的人要去送嫁女自不必说，整个村子里年龄相仿的男女青年也要去送，在男方家里参加过婚礼，吃一顿丰盛的宴席，也给出嫁的女子壮一壮声威，自然人愈多愈好。薇薇是五叔的外甥女，母亲和父亲因为什么可怕的原因，双方喝毒药死了，薇薇就在舅家抚养长大了。因为这个原因，送嫁的人特别多。

五挂马车一溜排开，马头上挽着红绸，车上坐着穿饰一新的男女。我也坐在马车上，听众人嘻嘻哈哈说笑，说薇薇命好，跟下了个好女婿，小河一川十里八村谁家姑娘能嫁一个跟毛主席照过相的女婿呢？

我却想起白杨沟里的游戏来——

“入洞房。”

“洞房在哪儿？”

“到老白杨树背后去。”

“到老白杨树背后咋办呢？”

“跷尿臊。”

英雄家住水湾村。马车一进村口，新郎和一帮男女就站在那里迎接。新郎一身军装，好不威武，关公脸，剑眉，五官端正，一派英气，自负而又谦恭地礼让着客人。我简直觉得自己太穷酸了。

院里搭着席棚，棚下摆着桌椅，我们一伙送嫁的客人坐定之后，水湾村的一位干部模样的人主持了婚礼，他喊:“新郎新娘就位——”

新郎和新娘先后站在主席台前。

“第一项，向毛主席像行鞠躬礼。”

俩人先后转过身，向毛主席像致了礼，又转过身来。英雄虽是新郎，仍然腰板挺直，保持着军人英武的姿势。薇薇却一直低头站着，脸庞红扑扑的，羞答答的样子。

“第二项，宣读结婚证书——”

我听不准那位干部念着结婚证书的干巴巴的声音。我又听见了喜娃当礼宾先生的声音。这儿进行的是革命化了的婚礼程序，喜娃却记着乡村里古老的婚典程序。新式的或旧式的程序全都无关紧要了，我的耳际只是轰响着一百个喜娃的声音:

到老白杨树背后去……

到老白杨树背后去……

到老白杨树背后去……

我忍受不住耳际的轰鸣了。我已经飞快地走出水湾村村巷了。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样溜出那个陌生的屋院的。我不敢再想“老白杨树背

后”将会发生什么事……我憎恨那个英雄。扫几十里雪有什么了不起！如果扫雪能取得和薇薇“到老白杨树背后去”的资格，我会发誓把世界上的雪扫除干净！然而毫无办法。我那年刚刚十七岁，第一次领受到了空虚的折磨。我虽然自幼备受生活的艰辛（因此取下辛程的笔名），痛苦过，难受过，委屈过，屈辱过，却从未感受过空虚的滋味，现在有了人生的第一次空虚的感受了……薇薇和那位扫雪英雄“到老白杨树背后去”了呀……

“我们这么多年里，还是可——以的。沾老头子的光，我随军当家属了，在军人服务社工作。他后来‘支左’，倒是免了灾难；要是在工厂或党政部门，就是‘走资派’，非挨斗不可。再后来就复员到工厂当保卫科长……没遭啥大灾横祸。不像你，一个乡村教员，还挨了批斗……”

我虽已过不惑之年，然而老毛病又发作了——我又嫉妒起来。几十年来，翻来覆去的名目繁杂花样翻新的政治运动，稍有作为的人乃至毫无作为的庶民百姓，有谁能完好无损呢？我几乎没有听到谁说过他几十年来活得自在。薇薇说她和她的老头子“没遭大灾横祸”而活得基本自在，我又嫉妒了！

那年冬天，大约是薇薇随军离开家乡之后第一次回归，为的是给舅舅（我的五叔）奔丧。丧事完后，她和她的老头子到我任教的乡村学校来看我。她和他正好看到了我一生最狼狈最悲凉的形态。我的屋子兼办公室里贴满了大字报，门上和窗上贴着像给死人办丧事一样的白纸对联，内容是毛主席送瘟神的诗句：“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窗角上吊着一只用白纸糊成的灯笼，那同样是乡村里给死魂野鬼照路用的丧灯。她来了，他也来了。她有点难受，眼角湿湿的。他却暗暗用眼睛瞅她，有所示意，有所警告。他对我说：“你还年轻

嘛！大风大浪中难免迷路。犯了错误不要紧嘛！斗私批修嘛！回到革命路线上来嘛……”

她和他走了。我送她和他出了门，走上公路，我连头都抬不起来。我想到了我偷偷逃脱他们的婚礼的举动。我想到我曾经嫉妒她和他“到老白杨树背后去”了。生活实际证明她和他“到老白杨树背后去”是走对了脚步。如果和我“到老白杨树背后去”的话，她会有今天的这种风光吗？我真切地感到了嫉妒薇薇的阴暗心理，我痛切地感到了我的嫉妒行为的卑劣。我真坏！坏得该当“纸船明烛照天烧”！像第一次感受空虚的滋味一样，我又第一次感受到了绝望的滋味。绝望是人生中最大的不自在。她和她的老头子却活得自在！

“我这人容易满足。房子比不上教授标准，可也够住了。吃的虽不是山珍海味，一天总要炒两菜。彩电洗衣机录音机也有了。我是满足了。我想咋也比在舅家给牛割草的日子好过了。老头子这人犟得很，对目下的新潮流扭不过弯儿，自寻烦恼，自寻的不自在……”

“他做好工厂的保卫工作就行了呀！”我劝解说，“何必……”

“我也这样说哩！”她说，“谁知他……”

她约我到她家去做客。

我谢绝了，为此而想出了许多理由，甚至谎话。

她告辞了。我送她到大门口。她很快就隐入朦胧的灯光和月色里。她一句也没提我们在白杨沟的游戏，是忘了还是根本就当作游戏而不值一顾？这样动我心魄令我空虚令我猴急更使我彻底暴露出嫉妒的恶劣天性的游戏，又怎么能完全忘记完全不值一顾啊……

哦！我的白杨沟里的老白杨树哟……

1986年11月22日 白鹿园

打字机嗒嗒响

——写给康君

自打我裤带里挂上县百货公司仓库钥匙的那一刻起，我就梦想过或者说预感到我将成为这个紧贴着渭河的躁动着现代文明气息而依然古朴的县城里的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这个梦想或者说预感果真被证实了，我今天被正式任命为县委宣传部副部长了。

这是一个庄严的时刻。在全县整党工作总结大会之后，县委书记郑重地宣读了一批干部的任免批复，批复是地委下达的。大礼堂里鸦雀无声，县委书记的关中口音缓慢中透出庄重。几百双眼睛受着那缓慢庄重的声音的操控，目光一齐朝我射来。我不由低了头，有点不自在，而心里却感到一种无与伦比的受人重视被人羡慕的愉悦。

就在我低头的那一刻，却忽然想起接过那一串钥匙的情景。

我是装着一肚子窝囊气从部队复员回来的。我在青海高原当了整整七年兵，后几年的超期服役的每一天，都可能发生我被提拔为通讯干事的事。连队把提拔我当干部的报告早已呈报上去了，只等着上级批示下来。这样的等待真是不好受。我等待整整四个三百六十五个白天和黑夜，却等来了一张复员回乡的通知书。正当的理由是战士不许在驻地内外谈恋爱，不公开的原因是营里一位年轻的参谋正在追她。这是我的猜测，无法证实。

我回到家乡了。我无法忍受难以摆脱的寂寞和孤独。从早到晚是无穷无尽的劳动，土地刚刚分到农户手中，人都像发疯一样往土地里

倾洒汗水。最难挨的是只有盐而绝少油腥的寡味的饭食，常常使我痛恨自己在部队时倒掉油腻太重的剩菜的行为。我比小时候更渴望父亲的回归。他在县百货公司土产杂货门市部当营业员，周六推着自行车爬上十里东原原坡回家来与一家老少团聚，车架上总是带着两棵白菜或一捆葱，偶尔也有一溜令人眼直的猪肉。夜晚的寂寞更使人无法排遣，我从部队带回的小收音机里播出的世界和中国各个角落里发生的大事和小事，新闻和逸闻，更使我觉得我们村庄与世界的隔膜。

父亲又回来了。他从自行车后架上取下一捆蒜苗，从车头上卸下那个拉链已经生锈而仍然可以看出一个“奖”字的黑色塑料提兜，交给母亲，接过母亲倒下的一杯水，笑着说：“主任同意了。”

我和母亲都明白，主任是指县百货公司张主任以及“同意”两字所包含的令人兴奋的内容。星期一，我就到县百货公司去了，穿着一身崭新的绿色军装，自觉很精神。张主任就把那一串叮啷作响的钥匙交到我手里。

我很快熟悉了业务，进库和出库的货物搞得一清二楚，库房里收拾得井井有条。我常常帮助营业员把领取的货物从库房搬到柜台里去，也帮助采购组从卡车上把成吨成吨的进货搬进库房去。张主任很满意，公司的干部和营业员们也满意，众口一词夸我不愧是从解放军那所大熔炉里锻炼出来的子弟兵，不愧是老黄牛老模范的儿子。张主任在我三个月的试用期一过，就指派人给我签订下一份为期五年的合同工合同，破例为我高定了一级工资。

我心里却有一种预感，我不会在这个门板很大而窗户极小的库房里干满五年的，甚至三年也不会，似乎有比这库房更明亮更体面的去

处在等待着我。我不想像父亲那样一辈子只会卖土产杂货，更不想做一辈子老黄牛。我的属相是马。

出乎张主任和县百货公司所有职工意料的事发生了。我写的一篇通讯稿在省报上见报了，表扬的是张主任亲自送货到山区水库工地的事。那些神气的营业员小姐们全用一种奇异而不乏柔情的眼光瞅我。张主任平生第一回上了报纸，反而做出不骄不躁的神情压抑内心的兴奋。他私下对我父亲说，没看出你家小子装了一肚子墨水！

在我发表过五六篇供销社的通讯报道之后，张主任已经考虑要把我从库房里抽调出来，到公司里做宣传干部。他的想法还未实施，县商业局局长一把把我从库房里提起来，安置在他的办公室旁边那个办公房里，让我专门写通讯报道，向报社反映全县商业系统的模范事迹。不过，时日稍一长，我就成为一职多能的干部了，给县委或省商业厅的工作总结汇报，还有孟局长的讲话稿，都由我写。孟局长特别喜欢我给他起草的讲话稿，我自然很受宠。孟局长下基层检查工作，总喜欢带上我和他同行。

我很敬重孟局长。他是陕北那个尽出俊汉子的绥德县人。“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他人挺好，文化不高，大约也是揽工汉或者是拦羊娃出身而后参加陕北游击队的。他有一种明显的陕北人的憨实和狡黠既矛盾又和谐的气质，这气质往往给人一种豁达而又平易的极好印象。大伙既尊敬他又喜欢接近他，甚至可以当面说他生吃元宵的故事。那是解放后，孟局长进了西安，第一声感叹是：这狗日西安这么大！他看见好多人挤在一家小饭铺门口买元宵。他也买了一盒，走到街上，摸出一个来就塞到嘴里，越嚼越腥，怎么也咽不下去，还是吐了。回到单位，见人就骂：西安人真是莫名其妙，那样难吃的元宵还抢着买，白给我也不要！

孟局长还有一个不同寻常的用人的标准：漂亮，起码也得五官端正。这是我从同志们的闲聊中得知的。我能入选，自觉十分庆幸。有一次下乡，我跟孟局长乘吉普车到秦岭深山一个供销社检查工作，长途行车，有点寂寞。我问孟局长关于用人是不是有“漂亮”这一条。他哈哈大笑，摆手否定，说是干部们瞎说，给他编派的笑话。可他笑毕，又漫不经意地说：“在我手下工作的人，要是有几个歪鼻龇牙的人，我就很不舒服。”

不管孟局长承认或否定这个传闻，而我看见的县商业局的二十几个不同年龄不同职务的男女干部，确实没有一个歪瓜裂枣，全都人模人样，或消瘦却俊气，或魁梧而不显臃肿。最漂亮的当数那位女打字员了。我打第一天进商业局大院就发现了这位出类拔萃的美人，不仅商业局二十多个本来就人模人样的人难以与之相比，整个商业系统千余名职工里也挑不出能与之媲美的姑娘，说是整个县城里的一枝花也绝不会是夸张。

她的打字室在后排最西头的那间屋子里。那间屋子最偏僻，想必是为了不让那单调的嗒嗒嗒的打字机的响声干扰其他屋子里的干部的工作。然而那屋子却最热闹，客观上是它距灶房最近，每逢开饭时好多人就端上饭碗和菜盘踅到她的打字室里去用餐，一边吃着，一边聊着，大多的话题是冲着她开玩笑、逗趣。

孟局长也喜欢和她说笑逗趣，那既是一个长辈对晚辈的亲近的神情，又是局长对下属的超然的口吻，更具有浓厚的陕北人的憨实和风趣：“小凤，我给你瞅下个好女婿。”

她笑说：“你给我瞅下个猪八戒。”

“我真的给你瞅下个好人儿了，我们陕北人。”

“陕北净出猪八戒！”

“你这娃！陕北的汉子一个个都赛吕布，女子赛貂蝉……”

我没有向小凤献过殷勤，更没有兴致和她逗趣。好多人端着饭菜到打字室去进餐去讨开心的时候，我端着饭碗和菜盘照直走进自己的办公室。我对那些搜肠刮肚想出来的逗趣话十分反感，觉得乏味无聊，根本不值得一笑，甚至觉得他们纯粹是为了笑而笑。虽然在这一点上我不大合群，与小凤的接触还是多了起来，都是纯工作性质的。

我写下汇报材料、工作总结或会议通知，一经局长或有关科室领导签过字，送回我手上，我再把这些文件稿送进打字室交给她，说清楚需要打印的份数和完成的时限。她不看我，习惯地码着页数，然后仰起脸，又认真地点点头，表示接受了。我就说声“好”，走出来。

我正在屋子里看文件或起草材料，听到敲门声，她进来了，也不坐，站在我的桌前，把我刚刚送给她的那份需要打印的材料摊开，一页一页翻过去，找出那些画上了横杠的字，问我那是什么字。我让她坐。她说她整天坐着打字，倒喜欢站着。我把那些草字一一描清楚，她噢噢噢地点头，随之就拿上材料走出门去。时隔一小会儿，后排西头那间打字室里就响起嗒嗒嗒的打字机的声音。

这样的时日一长，我和小凤的交往就多了，交往多了也就熟悉了，熟悉了也就自然一些随便一些了。她进我的房子时不再敲门打招呼了，一推开门，匆匆走进来，娇声怨艾地说：“哎呀呀康秀才，你这字儿写得越来越好了，好得叫我越来越认不得了！”我喜欢听这种调子，那是一种对人信赖的调子，那声音是极悦耳的。我照例在她用红

铅笔画了横杠的字旁边写上工工整整的楷书，甚至故意讥笑她太笨，连这种普通的草书字都不认识。她也不恼，自己也说自己笨，要是不笨就该坐到秀才的位子上而不是整天去按打字机了。

我也在写得头晕眼花手腕酸麻的时候，踱出屋子，踅到打字室里去，起初托词说要修改一句话或一个字，后来就无须这种自我遮掩，纯粹是去和她闲坐一会儿。她却并不停下手来和我闲聊。倒给我一杯茶后，她就坐到打字机前，右手按着打字机的压键，眼睛瞅着稿纸，把打字机的机头在字盘上推前移后，拉左倒右，发出嗒嗒嗒的响声，那脸上是一种安详而又妩媚的神情。那安详的神情是用来弹奏打字机的，而那妩媚的神情是用来听我说话的。

她这样不停手地忙着打字，倒给我提供了专注地看着她的机会。我可以长久地一眼不离地看她侧对着我的脸颊，又可以毫无顾忌地欣赏她细长的手指的灵巧动作。我如果会画画儿，我一定会照她的神情画下一张绝美的油画，那肯定是一幅按着打字机的……维纳斯。尽管我很讨厌浅薄之人在那些乏味的爱情小说里用维纳斯作比喻已经到了烂臭的地步，我现在还真的再找不到更美好的比喻了。真的，她按动打字机的指头像一件精美的工艺品，那眼里像是有两滴永不枯干的晶莹的露珠儿在早春清晨的草叶上滚动，那侧对着我的脸颊说不清有多大的魅力。我只觉得，如果让我从早到晚坐在这儿，我不会再向往这屋子以外更引人有趣的事。

打字机嗒嗒嗒的响声，从后排西头那间屋子敞开的窗户里飞出来，像山间湍流的泉水叮叮咚咚，敲击着我的心，又像是一支轻快舒展的小提琴独奏，奏出了青春的骚动。我打开窗户，让那动人心魄的响声全部倾泻进我的屋子。

她也不单是向我问字才到我的房子里来，在她打字打得困倦的时候，就到我的房子里来闲坐一会儿，进门的时候，常常用左手揉捏着右手的指头，无疑是向我说明她的手指很乏困了。她走到我的桌前，稚气地问:“你看什么书？这么厚！”

“《斯巴达克思》，刚出版的。”

“写的啥？有意思吗？”

“好极了！一部伟大的史诗！”我正被书里波澜壮阔的情节激动得无处发泄，需要与谁交流一下，她正好来到了，“斯巴达克思，一位奴隶起义的英雄，推翻了欧洲大陆的奴隶制度。他比一百个神圣的君王要伟大一千倍，因为他把历史推过了一个界碑。可他是一个奴隶，一个伟大的奴隶巨人！”

我突然看见，她端正地坐着，一只手撑着左腮，那是一种专注的神态，听我随口胡诌着的议论。我反倒不敢再说了，因为她太专注了。

“你说呀，再说下去呀。”

我不好意思说了，再说就是卖弄了呢。

“你读过好多书吗？”

“不多。”我说，“好书都禁死了。现在出版界刚开禁，这本书就是开禁的头一批出版物。哦，我前天刚读过《牛虻》。”

“就是刘心武在《班主任》里提到过的那本《牛虻》吗？”

“只有一本《牛虻》。”

“你这儿有吗？”

“有。”

“借我看看。”

我给她从抽屉里取出长篇小说《牛虻》来。

大约过了三四天，她把《牛虻》给我送来，又借去了《斯巴达克思》。她和我热烈地讨论《牛虻》。虽然能看出她对世界史太无知，然而她喜欢牛虻这个人物却是毫无疑义的。这个革命者形象被中国六十年代兴起的动乱隔绝了十多年，一经解禁，又以其强烈的光彩照耀着又一代青年。我和小凤差不多是刚学会写汉字就挂上了红小兵袖章的一代人，然而牛虻还是在我们心里引起强烈的回响了，毫无办法。

“我看你……有点像牛虻。”

“我怎么能比牛虻！我简直是个窝囊废！”

此后，她到我的房子里来，再不叫我老康了，大胆地叫我牛虻，像是开玩笑，我也不好反对。再后来，她又叫我亚瑟，还是像开玩笑的样子。尽管是玩笑，我看见她的神情里有某种异样的东西，令我的心一蹦一蹦。

我确实预感到一种似乎明朗又似乎朦胧的东西朝我逼近了，一伸手就可能准确无误地抓住的自己心里正在热切地期盼着的东西，然而又顾虑重重。我不能不随时提醒自己，我是一个合同工，一个农村户籍的人。我时时刻刻都有被解雇的可能，简单到只需要局长挥一下

手，咧一咧嘴角，我就得背上被卷滚回东原上那个令人窒息的毫无生气的小村庄去。想到在部队时与那位可爱的女护士恋爱的教训，我很镇静地约束着我的随时可能放纵的心潮。

“亚瑟，你这字儿草得好难认呀。”

“亚瑟，该吃饭了。”

“亚瑟……”

她这样亚瑟亚瑟地叫我，其实只是仅有她和我在一起的时候，一旦有第三个人在场，她从来也没忘记叫我老康。我愈加明晰地预感到我和她之间有某些需要回避众人的隐秘，令人心悸又令人感到甜蜜的隐秘。

商业局机关小院虽然比不得县政府机关大院深沉肃穆，也不是能让我和小凤浪漫的场所，男干部和女干部，尤其是有了一点年纪的干部，似乎于我和小凤身上特别敏感，一切全躲不过他们敏锐的眼睛。我已有所察觉。然而春天是无所不在的，春色还是把这个幽静的小院染绿了，窗外的柳树复苏了，缀满黄芽的枝条舞姿婀娜，院子里的草坪上冒出一抹嫩绿，两株桃树的花苞也肥胀起来。我打开窗户，窗口扑进微带寒意的清香的春风，后排西头那间打字室里嗒嗒嗒的声音和春风一起灌进我的窗户。

局里的二十多名干部倾巢而出，分头奔赴县属的二十一个公社去，县商业系统要召开总结表彰大会了。我留下来做内务工作准备，小凤也留下来加紧打印会议材料。

我似乎感到完全自由了。

炊事员给大家开过早饭之后，就锁了门去逛大街了，临走时给我说，午饭自理。小院里异常安静，我打水时的脚步声竟然在墙壁上引起了回声。我取下一沓红纸，准备写大会用的横幅，小凤抱着一摞子油印好的材料走进来。

“亚瑟！快帮帮忙，咱们整理一下这些材料，分成一份一份的，装订起来。”小凤唱歌似的嗓音。

我暂且搁下红纸，帮她整理装订材料。

她的手很灵巧，从一摞一摞的材料堆上拣取的动作十分敏捷，倒是我笨手笨脚，动作迟缓。我的手碰了她的手，她的手也碰了我的手，都是无意的碰撞。我有一种异样的感觉，那是一种碰一下就难以忘记而且诱惑人想再碰一下的奇异感觉。她继续拣取纸页，似乎毫不在意。我也毫不介意，似乎只是因为动作紧张而不可避免的碰撞。

“你也帮帮我的忙。”

“做什么？”

“写大字。”

“我可不会写毛笔字。”

我要写横幅，写标语，需得一个人压纸角，通常我是用东西压着的，我现在却想让她干。

她高兴地接受了，用刀子裁纸。

我调好墨汁，攥起大号毛笔，一落笔就龙飞凤舞，超水平发挥。我写字的兴致好极了。

她忠于职守，双手压着两个纸角，很认真地压着。当我写完两字，她赞叹着："你的毛笔字写得真好。你是自小练的吧？现在我们这一茬年轻人，钢笔字也没几个写得好的，毛笔就更没有人能提得起来。"

我告诉她，我刚刚在初中念了一年书，就开始了那场席卷中国的"革命"。我想革命，却站错了队，开始时批判别人，后来却被别人批判。我什么好处也没捞到，就从图书馆偷了一捆书，又偷了一捆写大字报的白纸，跑回家去了。我一边读那些"封资修"书籍，一边用偷回来的白纸练习写大字。整整有两三年，我把那些我批判过的"封资修"作品读了不知多少遍，写作能力提高了，毛笔字也练得有点功夫了。我一参军，就显得我的文化水平高。

她听着，点点头，很佩服我的毅力。她小心翼翼地端着墨汁未干的红纸摆到地面上，等待晾干。我的情绪在涌涌波动，就抽两口烟，抽烟可以稳定一下情绪。当她兴致勃勃地转到桌前来，铺开又一张红纸，我就神气活现地提起毛笔来。

我提笔在墨碗里蘸墨汁时，无意中看到了她的领口，她前倾着身子，双手压着纸的两个上角，领口的衣服就张开来，露出一块三角形的赤裸的皮肤，那皮肤很细很白，那领口里散发出一缕异样的气息。我有点神不守舍，把字儿写错了。我说："扔掉，重写。"

写完横幅和标语，她就收拾扔在地上的那些写错作废的红纸，揉成一团扔进纸篓里。纸上未干的墨汁染得她的手掌黑乎乎的。她张开

手指，说：“看看，我的手脏成啥样儿了！”

我说：“洗洗吧。”

她说：“你给我洗。”

我的心猛地一跳，似乎轰然作响。我笑着说：“那不费什么事儿。”

她已经在脸盆里倒下凉水，又从热水瓶里倒下热水，说：“你也来洗吧。”

我和她在一个脸盆里洗手。我攥住她的手指，装得若无其事地说：“我给你洗吧！”她挣了两下，我攥得更紧了，她再没有动。我看见她的耳根潮起一缕红晕，我用温热的水搓洗她的手掌和手指。我现在才可以光明正大地欣赏她的手。那手指像细嫩的水葱，柔若无骨。她一任我替她搓洗着墨痕，以一种似怨似嗔的眼神瞅着我，却根本不会使人感到她是真怨真恼了。我受到鼓舞，一把抱住她的脖子。

无言的亲吻。我的脸颊挨着她的脸颊。我把一切顾忌都忘掉了，我已被灼热的火烧烤得晕头晕脑。当我的嘴唇和她的嘴唇久久相吻的时刻，我几乎完全被熔化了。

她终于推开我，草草地擦了脸，跑走了。

我坐在椅子上，点着了一支烟。我一时反应不过来，刚才发生了什么事，真的发生了？我只觉得这房子太空旷了，空旷得一刻也待不住。我要每一分钟都和她待在一起，须臾不离。我朝打字室走去。

推开打字室的门，她趴在桌子上，双手压在额头下，直到我走到跟前，她也没抬起头来。她后悔了吗？她怨恨我了吗？我正有点不知所措，她忽地跳起来扑到我的怀里，双手搂住我的脖子，箍得我简直透不过气来……

没有月光。星星稠密，河滩上稍见朦胧的星光。我坐在河边，抽烟，等待。她来了，她穿着短袖衬衣和裙子，夜风吹得她披肩的散发一摆一摆的。我站起来，甩了烟头，奔到她跟前，抱住了她的肩。她看见我跑过去，也张开双臂朝我扑来。我们一起摔倒在沙滩上。夜色愈加使人放胆，我和她都更舒展坦然了。她伏在我的臂弯里，呢喃地说："就这样躺下去，再甭醒来，让河水把我们冲进大海，我也不悔。"

陇海路上夜行的列车隆隆驰过古老的县城，没有停步，也不见减速，只是鸣叫一声，又奔驰而去了。我感到了大地的颤动。

我搂着她的肩膀，她勾着我的腰，顺着沙滩，漫无目的地走着。夜宿在蒿草棵子底下的野兔被惊动了，刺溜一下惊恐万状地从小凤的脚下蹿过去。她吓得"啊哟"一声惊叫，紧紧地抱住了我。我意识到她对我的依赖是那样的自然。

河滩一块高出沙地的老滩上，有一个用树枝和苞谷秆子就地搭成的茅草庵子。往远处一瞅，类似这样的茅草庵子像雨后草地上的蘑菇一样遍地都是。那是到这儿来采掘沙石的山里人临时栖息的窝棚。秋收以后，河水日渐减少，冬闲无事的山里农民便搭帮结伙背着被卷赶到河滩上来，用树枝和当地农民丢弃的苞谷秆子搭成这样一个遮风避雨的窝棚，夜晚蜷缩进去。他们有的来自商洛山区，有的来自秦巴山地，也有我们东原上的农民。他们掏掘沙石，卖给正在兴建着的工

厂，挣一把来之不易的票子。到第二年初夏进入洪水季节，他们就像候鸟一样飞散了。回家去准备收割麦子，等到秋后再来。

我的心里掠过一道阴影。我刚从部队复员回来那年冬天，村里几个小伙联扯我来挖掘沙石，我没有来。我现在却和一位可心的姑娘在这儿散步，像欣赏半坡遗址里那些人类先民们留下的生活遗痕一样，而我其实完全可能就是这里某一座狗窝似的窝棚的主人。我心里的那道阴影久久不散，影响了我的迷醉的情怀。我从她的肩上松了手，点燃了一支烟，坐在一块石头上。燃着火柴的时光，光亮照出了三块被烟火熏成黑色的石头，那是主人支锅烧水或煮饭的地火灶了，真比半坡先民的灶台还要简陋。

她坐在我的旁边，头靠着我的肩，我可以嗅出她的头发里有醉人的香味儿。我抽着烟，瞅着星光闪闪的河水，要是我的父亲不在县百货公司当职工，我就无法进入那个库房，也更不会踏进商业局大院，占据一间明亮的办公室，我的功夫老到的毛笔字和孟局长喜欢的文字材料就不会有被人赏识的机会了。我将要在这儿蜷卧窝棚，在三块石头上支一口铁锅煮苞谷糁子，在寒风刺骨的雪地里掏掘沙石，挣一把钱，再去订下一个媳妇，然后养活孩子……

小凤摇摇我：“你怎么不说话？”

我说：“我想起我看过的一篇小说……”

小凤忙问：“什么小说？好看吗？”

我说：“一篇写知青下乡的小说。我很反感。我把它撕下来擦了屁股。”

小凤笑了：“呀，一篇小说也值得生这么大的气？”

我说：“狗屁小说。写知青下乡简直跟下地狱一样。那么，像我这号祖祖辈辈都在乡下的人咋办？一辈子都在地狱生活？谁替我喊苦叫冤？所以说，我最痛恨的就是那些心安理得吃商品粮还要骂我们农民的城里人。”

小凤娇嗔地问：“啊呀，那你也痛恨我了？”

我才记起她是县城居民，也是吃商品粮的城市户籍。我笑笑说：“你……另当别论。”

我努力拂去心头的阴影，别让它破坏了这难得的夜晚。我重新挽起她的手，在那些窝棚间悠悠地漫步。热烈的亲吻和拥抱，使我身上渗出一层汗，很不舒服。我一个猛子跳进河水里，真是舒适极了。她也小心翼翼地走下水来，我抱住她，她的柔软的手指搓着我的肩膀。我第一次大胆地把手伸到她的胸前。她轻轻地“哎哟”一声，就倒在我的怀里，手指抠得我的肩膀都疼了。我抱起她，从水里走出来，走过沙滩，走进窝棚……

我和她躺在麦秸上，静静地躺着。她把她最珍贵的情感毫不犹豫地奉献给了我，我把我最珍贵的情感毫不犹豫地奉献给了她。我点着烟，躺着吸着，透过窝棚的缝隙，可以看见天上的星星在闪眨。我是亚当，她是夏娃。我是掏掘沙石的山民，我是半坡遗址里复活了的先民，她是那抱着陶罐汲水的半坡姑娘。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我在必须按限定时间起草一份文字材料的时候，就关死了窗户，不致让她的打字机的响声传进屋来，那声响使我的心神不静。只有当

我画上最后一个句号，就立即撂下笔，打开窗户，让那动人心弦的嗒嗒嗒的响声倾泻进来。

商业局的小院里一切照常。人们照样端了饭碗和菜碟从灶房出来，到打字室去和小凤说笑，而我照样端着饭菜走回我的房子。只有在约定的夜晚，我和她准时钻进河滩上的窝棚。

孟局长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给我倒水、递烟，从神色上看，不像是谈公事。我坐下之后，心里有点忐忑，是我和小凤的事漏风了吗？没料到他一开口，就使我陷入痛苦之中。老天爷，他受县委组织部长之托，来给我做媒，介绍组织部韩部长的二女儿韩晓英。韩晓英我早认识了，她在县百货公司做出纳员。孟局长说，我在县百货公司管库房时，晓英就瞅中我了，看我勤快，工作负责任，人也老实，长得还魁梧云云。我却从来没有感觉到她对我有什么意思，只记得她穿戴很朴素，袖子上统着一双褐色袖套，白净的脸上有一副紫框白镜片，那样子很拘谨，又显得比一般同龄女子老练成熟，很少跟谁开玩笑，更不像一般营业员那样叽叽嘎嘎打闹浪笑。我看见她从来也不敢贸然说话。我看见她立即就在脑子里反射出一张严厉的组织部长的脸孔，其实那时我还没见过组织部长的尊容，及至后来见了，才自觉好笑，韩部长竟是一尊笑面菩萨的和善胖脸。

我看着孟局长诚心实意的神情，就说："我怕我不相称……我还是个合同工……"

"这一点不用顾虑，韩部长不在乎，晓英也不在乎。要是嫌合同工，他就不会找我提媒。"孟局长毫不介意地说着，又从座椅上站起，走到我当面，知心地说，"你有了韩部长这个老岳丈，还能当好久合同

工呢？全县招工招干的名额指标都从韩部长手下过，你还愁转不了正式干部？”他又显出陕北人的那种豪爽与狡黠混合着的神色。

我陷入痛苦的深渊。韩晓英和于小凤，整天在我脑子里翻腾，眼镜片和褐袖套，嗒嗒嗒的打字机声和那迷人的半坡遗址式的窝棚。我的脑子几乎要爆炸了。三天后，我的老黄牛父亲来找我，说是孟局长上午到百货公司检查工作时跟他谈了给我做媒的事。老黄牛父亲受宠若惊，心里搁不住这突然降临的喜讯，就来跟我商量怎么办事。他大约看出我的犹豫，就恨声训斥我：“你娃子甭错打主意！这门亲事成了，你就能转为正式干部。你若错打了主意，这县城有你的立足之地吗？”

我不要听他的赤裸裸的攀龙附凤的话。其实这其中的利害得失，我早都想过千遍万遍了。他的话只是重复了我考虑中的那些最令我痛苦的因素。

这天晚上，我和小凤相约又来到窝棚跟前，她迫不及待地问：“你这几天老皱着眉毛，有啥不顺心的事呢？”

我不敢直说，推说熬了夜，休眠不足，精神不好。她竟然信了。我的话她都信。

她依偎在我的怀里。我用一种玩笑的口吻试探她：“小凤，如果有一天我得罪了某个领导，人家解雇了我，我就得滚回东原上去，那样的情况如果发生了，我们咋办？”

小凤随口说：“我跟你回东原上去。”

我说："我冬天得下河滩来掏掘沙石挣钱，钻窝棚，过原始生活。"

小凤说："我跟你来钻窝棚，给你做饭。"

我想哭，再也说不出话来。

小凤却认真地说："我早想过了，合同工有解雇的可能。要是你真的被解雇了，也不必回东原上去，更不必钻窝棚采沙石，我们在县城开个小饭馆，或者开个杂货店，咱俩经营，我也不当打字工了。你愿意干吗？"

我苦笑着说："哦，你想得真周到……"

我在第二天见到孟局长时，他告诉我，韩部长约请我今晚到他家去坐坐。我当然明白这"坐坐"的内容。这可真是一种痛苦而又艰难的抉择。我想起了莫泊桑的《温泉》。我曾经痛恨而且鄙薄过那个骗取了遗产而抛弃了真诚的爱情的家伙，我发觉那个令人鄙薄而且痛恨的家伙在选择遗产和爱情时所经历的苦恼正在我心里发生。无论这种选择多么痛苦，而时限却正在今天晚上。我和孟局长一起去了。

后来的一切就比较简单了。不久，我被调到县委宣传部做专职通讯干部。我写的本县各个方面的通讯报道稿不断见报，县委书记和县长们以及人大常委会的主任们都很赏识我的才干和工作态度。这年年底，我被转成正式国家干部，和韩晓英的关系也正式公开了。第二年春天，我被送到地区党校去学习。县里的新老干部甚至通讯员也明白上党校意味着什么。

党校学习期满，我和韩晓英结婚了。我们过得很和谐，从来也没有吵过架，她的性格很好，思维十分周密，把家里的内务和外交都处理得井井有序，大约自幼接受过良好的家庭教育，也与她小小年纪就从事财务工作不无关系。她对我很尊重，照顾得无微不至，从服装的式样到每日的早点，都是经过认真的考虑，却从来也未显示过她的部长女儿的优越。人人都说我有一个贤内助。父亲对这个儿媳满意之至。孟局长开玩笑说："怎么样，晓英是个好媳妇吧？家教严嘛。一般城池县道的小市民太油……"我知道他说的"城池县道的小市民"所指是谁，我和小凤的眉来眼去根本不可能逃过那些商业局干部的眼睛，但谁也说不准抓不住我俩相好的一件具体事实，在河滩钻窝棚的事更是无人知晓。这宗事已无任何影响，晓英从来也没有追问过我，更谈不上吃醋闹矛盾了。然而我总觉得缺了点什么，倒不是对小凤的负心，而是我自己心里的某种渴望。渴望什么呢？窝棚里的那种被熔化的完全忘我的原始式的疯狂，再也没有产生过。

我生逢其时，县委在实行干部"四化"的工作中简直有点拉郎配，既要年轻，又要有专业知识（具体就是大专文凭），又要有工作经验。我正好入选。那张地委党校的毕业证书，使我的审查材料顺利地通过了各级组织部门的关口，我擢升为县委宣传部副部长了。孟局长退居二线，成了商业局的巡视员，我的岳丈韩部长也从组织部退出来，升了一级，成了县人大的副主任，真是各得其所，皆大欢喜，不管别人怎么说，我是觉得我的选择没有犯"方向性的错误"。倘若我和小凤而不是和晓英结婚，我现在很可能正在河滩上那窝棚前的石头上架锅煮苞谷糁糊糊，充其量和小凤在县城的某个角落卖油条豆浆或是经营日杂品小店。那么，有谁会看到我具备做一个县委的宣传部长的德和才呢？

我却无法排除那嗒嗒嗒的打字机的响声。当我和晓英举行婚礼的那天晚上，这响声震得我灵魂不安。当我坐在新落成的县委大礼堂里听县委书记郑重宣布我的任职批复的时候，那响声又在我的心里敲响了。

小凤早已远走高飞了。她的痛苦可以想见。她和一位技校毕业的工人结婚了，他在汉中的某国防工厂工作。她跟他到汉中去了，再也没有见过面。

任命我做宣传部副部长的那天晚上，晓英特意为我精心准备了一顿丰盛的晚餐，而且破例拿出一瓶“西凤”来。我喝得有点过量。

说醉不醉，说醒非醒，我的脑子里只留下一片空白。我推说要散散步，就走出家属楼，走过县城街巷，独自一人溜到河滩上来了。

又是夏日的一个热烈的傍晚。晚霞把河天相接的地方涂成一片火红，河水悠悠，红光闪闪。我走到那个熟识的高出沙滩的荒草地上，但已经找不到那架熟识的窝棚。窝棚久不住人了，倒塌了，散架了，完好的寥寥无几，再也找不到那架窝棚了。

我无法评价我自己。

我抽着烟，默默地坐着。从那杨柳林里，从那悠悠的河水里，从那涂成一片火红的河天相接的远处，又响起嗒嗒嗒的打字机的响声……

1986年12月11日 白鹿园

散文·特写

大地的精灵

开拓者

她是一位颇有气魄的农场主，年纪约三十五六岁，名叫陈秀珍，户县蒋村人。她经营的农场不算大，约一百五十多亩地。在土质肥沃而人口密集的渭河平原，人均土地不过一亩，她能经营这样规模的一个小型农场已经是令人瞩目的事了。

养女解困

当中国历史被人民愤怒的铁与血的力量掀过那腐朽不堪的一页的时候，她在终南山下的一家农舍的土炕上哭出了第一声。年轻的妈妈笑了，年轻的爸爸笑了，他们的头生女儿来到阳光明媚的秦川大地的时候，像一切普通的无以数计的农村孩子一样，在土炕的温暖和粗食淡饭的营养下长大了，上学了。她约略记得，这个时候，家里的饭总是不够吃，馍馍也取缔了，净喝稀的，再往后，越来越稀，碗里常常是以野菜为主。她长大了才知道，那时被称作三年困难时期。为了解决我们国家面临的危困，为了解决自己家庭生活的困难，她付出了以失学为代价的小小的牺牲。

她当时似乎并不以失学为痛苦，抱着孩子满村满巷玩耍也挺自在。她迷惑莫解的是，娃娃总是抱不完，刚刚把一个妹妹抱得会跑

了，母亲又会把一个弟弟塞到她怀里……没有办法，生在农民家庭的老大，有谁能避免为母亲抱引弟弟妹妹的劳举呢！农村里没有幼托组织，更不会掏钱请保姆呀！

长到十四岁，母亲给她瞅下一个女婿。

女婿姓王，户县人，农村青年，由去户县买粮的人牵线，母亲很满意地把女儿嫁到盛产小麦的户县去。

“养女解困！”母亲给十四岁的女儿说，“那儿不愁吃……”

秀珍同意了。和粮贩子介绍来的女婿见过面之后，母亲说这个比她大四岁的小伙子人老实，不是那号滑头坯。她信赖母亲，也就信赖他了。从此，她就成了他的订了约的未婚媳妇。

长到十八九岁，在“文革”的枪声中，陈秀珍告别了可爱的终南山下的引镇，到同一条山下的属于户县辖属的一个陌生的村庄里去了，和她的女婿过同样是农家生活的日月去了。

她这样生活着

人说：金周至，银户县。

户县和周至二县相毗邻，同处丰饶的渭河平原的南部，地势平坦，土壤肥沃，河渠纵横，不旱不涝，十年十收，百年才偶遇灾荒，属于我们祖先很早很早以前就开发为肥土沃田的农耕区。陈秀珍嫁到户县蒋村王家，站在土场上，晴朗的日子，可以看见终南山的山峰和峪谷，这座在平原上拔地而起的年轻的山脉的威武挺拔的雄姿，与家乡长安县内的峰峦一样亲切。但是，在这个新的家庭里，终年吃的是

小麦和苞谷，纯粹的粮食，没有掺和野菜或糠麸；也不是从粮贩子手里掏高价买来的，生产队里分得的夏粮和秋粮总是可以够一家人吃饱肚子，银户县果然名不虚传，比娘家那里的收成好多了。

然而，银户县能给她的全部好处，也只此一点。

她的新的家是一个大家庭，上有兄，下有弟，整个家庭的粮囤和金库由阿婆和阿公统管，大多农家都遵循着这样的传统习惯，不足为奇。不要很久，她也就明白，这个家庭每年夏秋两季从生产队的打谷场上分回家来的小麦和苞谷，确实比娘家每年分得的口粮要丰厚得多，可是金库呢？却和娘家差不多一样干瘪空虚。除了一把粮食，多年来几乎再无什么令人鼓舞的分配，家庭经济拮据，不仅秀珍，弟兄们和妯娌们的口袋里，终年也都是空荡荡的不名一文。

她的爱人，实诚、忠厚，是一个堂堂的男子汉。她和他相爱着，在生产队里挣取四五毛钱工价的工分，从早到晚，从春到冬，播种收获，收获播种，只有付出沉重的劳动的义务，却从来没有享受过支配劳动果实的欢乐。家庭长者实际也没有支配金钱的欢乐，而只有入不敷出的无穷无尽的忧愁。她和他，一对年轻的夫妻，难得亲亲热热厮跟着，腰里别着票子，到县城去逛一逛，看一场电影或者进一次饭馆。

后来，她的丈夫应招到宁西林场当了一名林业工人，月薪三十多块钱，除去他自个的伙食费，每月交给家庭长者的，也就可想而知了。他无疑是很讲孝道的，严格地恪守着传统的不成文的习俗，把钱交给老人，由他们统筹安排一家的吃穿用度。他的秀珍如需用钱时，则和家庭的其他成员一样，先向家庭经济的支配者说明用项的因由，由其酌情给予。他不给她私房钱，像对朋友一样恪守信义。

没有任何经济支配能力的夫妻会是怎样一种生活形态呢？人类学家、社会学家、民俗学家们是否对关中地区的这种家庭结构和家庭形态做过研究？形成这种形态和结构的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是什么？

婚后三四年，这个庞大的家庭因为种种原因而终于崩溃了，瓦解了，兄弟们分家另居了。陈秀珍和她的林业工人丈夫，带着随身穿的衣服和一只柜子出了世代居住的院落，借住了另一户社员空闲着的一间房子。房子的西山墙垮塌了，用捆扎着的苞谷秆子围堵着，遮挡着雨雪和风霜。不管怎样艰难困苦，她毕竟成为这个新分裂出来的小家庭的主妇了。

她每年大约可以挣到二百个劳动日、价值一百元，扣不住她和孩子的口粮款，需得用丈夫有限的工资去交付。她无计可施，尝到了一个处于支配地位的家庭主妇的全部艰难。她养了几只母鸡，鸡蛋不够换盐和醋。鸡蛋必须交卖给国家收购站，作为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的支援，要是贪恋多得块儿八毛钱而偷偷卖给私人，那就要冒被押上台子割“尾巴”的风险。中国农民被视为“尾巴”的营生实在太多了，养鸡、养羊、养蜂和一切家庭副业全都被判为资本主义的尾巴而割光剃净了，唯一允许留下的独根“尾巴”是猪的尾巴。因为有毛主席老人家“关于养猪的一封信”在，于是就鼓励农民大养其猪，而养成的猪卖给谁——公家收购站或者私人——也存在着“两条路线”的斗争。不管怎样，陈秀珍可以用洗锅刷碗的水，糠麸和豆蔓，名正言顺地养一二头猪了。而大养其猪是养不起来的，因为划不着，“黑市”的苞谷价格涨到三毛一斤了，养猪有多少利润可图呢？

在借住的那间小屋里住了八个月，她和丈夫盖起两间房子来，借欠下八百多块。他的月薪三十几块，她的养猪和养鸡的收入，即使一

分不花不用，需得几年还清呢？新盖的两间房子并没有给她和他带来欢乐，反倒像石头一样，日夜压着胸口了！

秦岭略记

她决定铤而走险，缩短还债的时限——进秦岭去挖药材。

秦地无闲草。稀有的贵重药材却都藏在秦岭的深山老林里，平原上常见的车前子、三棱子、半夏等草药，原是不值钱的贱货。

秦岭是一座自然药库，蕴藏着许多珍贵的中草药，菖蒲仅是其中的一种。采药向来是山民们的传统营生，平原上的人很少有人进山采集的，妇女就更是绝无仅有了。她穷急了，只想着采挖菖蒲可以卖钱还债，而把秦岭山地的艰难和危险统统压倒了；尽管有摔死和被野兽伤害的传闻令人毛骨悚然，她也毫不动摇地前行了。穷困逼着人去冒险，人却议论她胆大。

她约了两个同样是穷急无法的姐妹，每人扛着五十多斤面粉，背着被子，提着镢头以及盐巴和铁锅，终于走进黑洞洞、阴森森的秦岭山地了。一切都不必再作烦琐的描绘，读者只需稍微想一想，她们三位女性，肩扛七十余斤行李，进峪沟，翻山梁，七上八下，进入秦岭深山（浅山区没有药材），会是一股什么滋味在肩头？在心头？在脚跟？而尤为不幸的是，在跨过一根原木搭成的独木桥的时候，三个在平原上生活惯了的女人，一踩上溜滑的独木桥，发觉脚下那原木逆着水流的方向在跑着，全都晕水了，纷纷落进水中……好在是伏天！

夜晚，她们歇息在一座茅庵里。这个茅草搭成的庵棚，是山民们在苞谷结穗期驱赶害扰庄稼的野兽时的住处，茅草苫顶，苞谷秆子围

墙，仅仅可以容纳三四个人歇脚。三个大平原上来的年轻媳妇，在庵棚里铺下茅草，摊开被子，和衣躺下睡了。她们三人轮流睡觉，轮流值班，在庵棚口烧一堆火，不敢熄灭，驱吓那些藏匿在山谷里的残暴的野猪和熊豹。轮着看守的人是不能有须臾的马虎大意的，倘一打盹，篝火烧毁了庵棚，即使烧不死人，也可能因为熄火而招致凶恶的野兽的袭击。

轮着陈秀珍值班了，她认真地往篝火堆子上添加柴枝，火苗呼呼蹿起，又忽闪忽闪落下，火给人壮胆啊！她的身旁，躺着两个爬山越岭累得要死的女伴，即使野兽把她们拖出庵棚，大约也不会从酣睡中苏醒过来。她被人说成是胆子大的女人，此刻也不敢仰头看看那被奇形怪状的山峰割裂得豁豁牙牙的星空。秦岭山地的夜色也许是美丽的，她却只感到了恐怖。国外的“资产阶级”在城里住得烦了腻了，一帮一伙男女就带上罐头和咖啡，到山地去野餐，去夜宿，欣赏感受大自然的魅力。我们的公社半边天陈秀珍和她的挖药材的伙伴，此刻没有欣赏秦岭夜月的逸趣，正忐忑不安地蜷缩在庵棚里呢！忽而冒起又忽而落下的火光里，她的托人看管着的心尖宝贝儿子和女儿，大约正在梦呓中喃喃呼喊妈妈哩！她的亲爱的丈夫也许正在宁西林场的工人宿舍里辗转反侧哩！她却在秦岭深山的怀抱中吓得心儿捏得紧紧的盼望黎明的到来……

她们三位农家妇女，原本不是为了发财而丢下孩子和丈夫铤而走险呀！如若她们有买油盐酱醋的活便钱，如若她们在一家大小谁有头痛脑热时能拿出几块钱去诊治，如若过年时能有钱买几斤猪肉享享口福，如若自己在出门走亲戚时身上能罩上一件花布衫，她们就决然不会离开虽然穷困却无比温暖的家，到这十里二十里不见人烟的山地来担惊受怕了。

为着这样卑微的目的，冒着被野兽吞噬和歹人抢掠的危险，三个强悍而又软弱的乡村女人，常常心惊胆战地搂靠在一起，等候黎明的曙光照亮对面那座突兀的山峰。她们之中倘若有一位富于江水英豪情的人，此刻有一段慷慨激昂的说教，也许对其他二人战胜自己的怯弱不无好处。可惜她们都是些农家妇女，根本想象不到她们采挖的中草药将对那些正在中国造反夺权的“左”派会有何等重要的意义，更不曾想到这些中药可能漂洋过海，对亚非拉美的革命兄弟会有多大鼓舞！她们却只想到多多采药，咬住牙忍受艰难和惧怕，争取多卖哪怕是一分钱而过好自己的日月！

十分令人沮丧！当她们某一日从山顶采药归来，发现自己的老窝被劫了。她们近乎一月来忍受艰苦而采集的珍贵的菖蒲，不知被哪儿跑来的贼偷光搅净了。三个女人，一下子瘫坐在庵棚前，放声痛哭。老天如果有灵，也该为这三个可怜的乡村女人而伤情的……

从一个鸡蛋的家当起步

邓拓先生因为说过“一个鸡蛋的家当”的故事而罹难，然而看看陈秀珍的家庭状况，真是被他老先生不幸而言中。

一九八一年，陈秀珍买回来两百只雏鸡，成活率达百分之九十，除掉公鸡，净落下一百一十五只白色的纯种来杭母鸡，成为偌大的银户县数以万计的农户中第一个养鸡达到一百只的妇女，引起了轰动。这一年，她净赚六百元钱，不仅使无数的家庭主妇们震惊了，连她自己也震惊了。

春风一阵强过一阵吹拂着冻结的秦川大地，柳树先绿了，杨树也绿了，榆树、槐树和椿树就渲染出大地的一片绿色了。迎春花开了，

桃花也开了，杏花、梨花、苹果和李花，装扮出一个五彩缤纷的花的原野。

陈秀珍文化不高，小学只念了三年，不懂科学养鸡的知识，可她想增加经济收入，而党的农村经济政策鼓励她发财致富，无法安坐着继续忍受贫穷的折磨了。她买了一本《养鸡问答一百题》，以此为武器，冒险买下了两百只小雏，用洋办法指导着土设备，终于奇迹般地获得了成功，第一次打破了徘徊在乡村农妇心里的阴暗的魔影。在这里的乡村，传统的孵养小鸡的办法，是用一只老母鸡，卧够三七二十一天，孵出小鸡，再由母鸡喂养长大。人工孵养的小鸡，死亡率的高比例就几乎成为一道魔影笼罩在农妇心里。一句话，买人工孵养的小鸡，等于傻瓜把钱扔到河里，连响声也听不见。人们不能不以吃惊、好奇和羡慕的眼光看陈秀珍了。更令农妇们吃惊的是，那一百多只纯一色的可爱的母鸡，刚刚喂下六个月，就咯咯咯叫着，向主人报告它开产了。农妇们通常饲养的那几只母鸡，一般都在次年春天才下蛋。科学的方法真是神哪！

陈秀珍可忙坏了。来杭鸡喜欢草食，她就到河汊里去捞水芹菜，这种水草性凉，鸡吃了可以下火，产蛋量高。夏天倒好，一到秋冬，每天到水里捞草，就够受了，想到在秦岭深山采药的艰辛，手脚受冻似乎算不得什么了。

第二年，她有了资本，也获得了实践的宝贵经验，买下了四百只雏鸡，除掉公鸡后，净落二百只母鸡。

好多农家妇女也跃跃欲试。有一位邻居，买下二百只小鸡，抚养不得法，竟然死光了。她找到陈秀珍，哭哭啼啼，说她买小鸡的底本钱，原是粜了二百斤小麦得来的，现在全赔光了。秀珍动了同情心，

为这位邻居代养下五十只小鸡，两个月后，交给她四十四只半大鸡，次年又代其养活了七十只小鸡，分文不取。

陈秀珍名声大震，以她的成功和她的好心肠，远远超出了蒋村的村巷。那些想养鸡赚钱却又怕赔本的姑娘媳妇，络绎不绝找到她的门下，围住她的鸡舍，现场参观，亲自问询，很少有谁组织，全是自掏盘费。有的农妇养的鸡生了病，把秀珍请去诊治，她真是太忙了。

第三年，陈秀珍一下子把鸡群扩大到一千五百只，和兄、弟联合建立起家庭养鸡场、雏鸡孵化场，成了颇具规模的养鸡专业户，年利润超过万元了。

不幸得很！当她正雄心勃勃地干出点名堂的时候，当她日夜东奔西跑为东村西庄的姐妹们诊治鸡病的时候，家庭里发生了内乱。她和弟媳以及侄女联合经营的鸡场，随着母鸡纷纷乱乱的叫声，矛盾日渐加剧，由斜眼蹙鼻子发展到公开吵架，进而至于打将起来……家庭养鸡场垮台了！

一千五百多只母鸡全部卖掉了。孵化场熄火了。兄弟妯娌三家结下了冤仇。刚刚红火起来的家庭养鸡事业，完全在人为的矛盾中分崩离析了！可惜！

断理这场家庭矛盾的偶然性和必然性不无意义，探究这种刚刚出现的专业劳动组合失败的社会意义尤有必要。可以肯定，除了琐碎的表面的纠缠之外，必定有社会的和家庭的矛盾相交结，传统的和新兴的观念的冲突，为己的和为他的精神境界的对立……陈秀珍大约还没有完全自觉地意识到这一点，只是对一切人一味回避这件令她伤心的事，笔者也只好不再强求了。

塔城之行

养鸡场垮台了，陈秀珍伤了好一阵心哪！不过，她没有因此而趴下，也没有因为手里攥了一些钱而安于悠闲的农家日月，她的生产道路给予她的最直接的教训，就是不惜汗水和气力地去争取，而不能指靠别人的赐予。经历过太多的生活的艰辛的人，更富于创造的活力和狠劲。她不服气，心中在谋划更大的营生，终于瞅中了邻村东寨的果园。

这个果园，此前被别人承包过，都是承包一年，第二年又易人换主了，他们能赚钱而不致赔本，已是万幸，当然谈不到基本建设和长远打算。陈秀珍联合了另外两家农户，一次订下了为期十年的合同。消息不胫而走，人们又议论这个胆大的女人了。

从终南山峪口泄出的甘峪河，紧贴着果园朝北流去，一百五十多亩大的果园里，苹果为主，杂以桃、梨，大约有一千五百余株正当挂果旺期，另有七百余株即将挂果，这是果园原有的主要财富。自去年八月签过合同，她和她的联营者们已经新栽下十亩葡萄秧儿，约两千五百株。在果园的空场上一个可养千只鸡和百头猪的饲养栏舍已经修建起来，瓦顶砖墙的奶牛养殖棚圈，也已修建起来，计划饲养三十头乳牛。现有的五头乳牛已经牵入宽敞的新居，而且早已派人到新疆去购买乳牛了。一切都重新开始，雄心勃勃！

天有不测风云。从新疆塔城送回急讯，买牛的人被汽车撞了！

陈秀珍得知消息，吓蒙了。她一向被人看作是胆子大的女人，这下也慌乱了，人命关天哪！经济损失且没说起，人家媳妇没了男人，孩子没了亲爹，她可怎么交代?

令人心焦的是情况不明。是死是伤，说不清楚！她立即做出决断，立马上塔城。

列车驰过隆冬的渭河平原，穿过茫茫戈壁，在乌鲁木齐停下来。她奔出车站，顾不得旅途的疲劳，一踏进旅店，就向塔城某军医院挂电话。

“喂！请问你们医院住着×××病人吗？”

“没有。”

完了！她的第一反应是悲哀，大约已经……烧过了！她的拿着话筒的手索索发抖，虚汗一下子从脸膛上涌流出来。

她在极度的慌乱中积聚起一丝微弱的镇静，出远门办事，无论是怎样糟糕的结果，都应该冷静。道理她明白，然而情绪却无法控制。她几乎带着绝望的心理恳求接电话的女人。

“麻烦您查一下。他是陕西户县人，汽车撞了……”

“不用查。住院的病人我都知道，没有。”

她的心猛地一沉，似乎跌到底儿了。她由刚才的慌乱而一下子变得绝望了，浑身像凉水浇透了一样，透骨冰冷。

“我专门从西安赶来看他，请您查一下……”

“那……也行。你还不信……”

她把话筒紧紧地贴在耳轮上，等待着。话筒里隐隐响着皮鞋后跟撞击地板的响声，渐渐消失了，经过难熬的几分钟，皮鞋撞击地板的

声音又响起来，由远及近，越来越响，陈秀珍的心又忽的一下提到喉咙口，几乎窒息了……

“喂！告诉你吧！有一位户县病人……”

喔呀！陈秀珍浑身绷紧的神经一齐折断了，腿软了，手也软了，话筒摔掉了，泪水涌流下来了。

她迫不及待，又踏进开往塔城的汽车。他没有死，她已经松了一口气，现在却又更加焦虑：可甭弄成个残废人呀……

祖国西部边陲的塔城，在一个渭河农村家庭妇女的眼里，该有多少惊羡的域外风光值得欣赏。陈秀珍下了汽车，除了问路和辨别路径，无一丝心情旁顾其他，急不可耐地跨进军医院的大门，推开了那位买牛使者住着的病房的木板门——

“啊呀！秀珍，你来给我收尸吗？”

买牛人从病床上跃起，走过来，开了这样一句令人心悸的玩笑，热泪也止不住了。她看见他走路的姿势，心里一下子轻松了。

买牛人告诉她，二三十头乳牛已经买好，价格便宜，只是意外地出了车祸，拖延了时间，乳牛不能如期启运。塔城地区有个黑风口，气温已经降到零下几十摄氏度，牛是无法通过的。买好的乳牛只好雇人饲养着，草料和雇用人员的工资比内地高过几倍，经济损失惨重！

“没有关系！你只要养好伤，一切都好！”

陈秀珍显示给那位不幸遇祸的乡亲的，是一个大将的气魄和襟怀，没有一丝抱怨情绪流露出来，也没有农村女人的婆婆妈妈。她只

顾安慰他不要有什么顾虑，天灾人祸嘛！她叮嘱他吃好吃饱，把身体恢复起来，回乡与妻儿团聚。是的，这一切都不是强装做作的外在表情，现在的陈秀珍，已经不是五六年前只有一个鸡蛋的家当的陈秀珍了。那时候，她曾经为几十斤被贼偷走的菖蒲而痛心伤情，而今她已经历过世事，不仅晓以大义，而且在经济上可以承受损失带来的打击了！

“运气不顺！”

陈秀珍摊开双手，对笔者开玩笑说，不光买牛遇到意外的经济损失，现有的五头乳牛相继生下四头牛犊，竟然有三头都是公牛，令人大失所望。人都盼望媳妇生男孩，乳牛产犊却一律盼求母的。知道行情吗？眼下市场上公牛犊和母牛犊的比价是：一比二十。

冬天的果园

与陈秀珍联合承包果园的另一户农民叫李群书，四十岁，高个儿，精精干干，一双和善机敏的中年人的眼睛，闪着稳实而又聪颖的光彩。他十八岁自学木匠，干了二十多年，维持着一个可得温饱的小家庭。他读过初中，原是高才生，同是因为三年经济困难而辍学，而学木匠。现在，他负责果园管理，正在急迫地钻研果树栽培技术。

我们三人在果园里徜徉。远处，终南山的群峰隐没在冬天灰白色的雾幛里，隐隐只能看见一个模糊的轮廓，俊武而挺拔的雄姿忽然变得妩媚了。甘峪河干涸了，裸露着嶙嶙的沙石。牛拉的架子车上载着乳牛排泄的粪尿，逐株浇施在果树根上。一株株正当壮年的苹果树，在暖融融的冬日中午的阳光里，灰白色的树干上泛出紫红的颜色，枝条上的红色更深了。一条条果枝上，叶芽已经萌动，肥大了，也是紫

红颜色。那从树干到枝条到叶芽上逐渐加深的紫红颜色，很像一个血气方刚的壮汉。

李群书兴味十足地给我介绍着果园管理的科学措施，可以预想承包后的第一年收获将会不错；陈秀珍更是信心满怀地谈到果园的改造计划，这儿将被建成一个包括药材种植的多种经营的养殖场。我不怀疑。可以看到，果园的树棵间已经经过冬耕，施肥和浇灌正在进行，疏枝已经完毕。新建的鸡舍、猪圈和牛棚，也将因为有新客迁入而变得生机勃勃……我却在想着人的创造力与社会、家庭以及传统观念的关系、思索着如陈秀珍一样的农民——大地的精灵的命运。

冬天，在自然界，是一切生物积聚力量的季节；一当春风漫过秦川，这儿将要显出怎样灿烂的一个花的世界……

迪斯科与老洞庙

春节期间，我住在乡下，一位朋友来访，闲聊中告诉我一件事，说他们村子里的一帮青年，正月初一那天晌午，拥集到打麦场上，打开收录机，跳起了迪斯科。我甚为惊奇。

迪斯科，又叫摇摆舞，俗称扭屁股舞。我第一次得知世界上有这种名称的舞蹈，是十多年前听的一次政治形势和时事报告时的事，那是作为资本主义社会腐朽生活之一斑来批的。近年，迪斯科公开或半公开地在中国的一些城市里蔓延，先海滨而后内地，已不再是什么秘密。我也有机会目睹过这种舞蹈者的舞姿，而今猛乍听到"迪斯科下乡"的新闻，确实感到稀罕而又新奇。是的，在夏天碾麦而秋天打谷的打谷场上，那些年轻的农民小伙子穿着过年的新衣服，跳起迪斯科来，会是怎样一种风光呢?

这个村子叫东李村，是西安市辖属的东郊农村，距西安约四五十华里，北边隔灞河与蓝田县管辖的农村相毗邻，历来属于偏僻闭塞之角落。没想到迪斯科竟然深入到这样偏远的乡村，就使我倍觉遗憾：要是能到现场亲眼看看那些乡村青年农民跳迪斯科的舞姿，会是怎样令人快活的事呢！

这样的机会又来了。三月下旬，灞桥区文化馆的朋友告诉我，说是石家道村的青年男女，几乎天天晚上都在跳迪斯科，文化馆的舞蹈干部不辞辛苦，连续几晚到村子里去辅导。于是约我到那儿去看看。

初春的夜晚，村巷里的夜气依然寒冷。在生产队的一座腾空了的小库房里，收录机播出节奏强烈的乐曲，男青年和女青年，一对对舞

伴正在乐声中扭着腰肢，摆扭着臀部，挥舞着胳膊，这就是节奏明快的迪斯科了。

我和文化馆的几位朋友坐在一边喝茶，欣赏青年们的舞姿。我们几个人年龄大约相仿，没有一个人会跳任何舞蹈，更别说迪斯科。我们正当这些男女青年的年龄的时候，恰遇解放以来最严重的三年饥馑时期，为了减少身体热量的消耗，社会推行“劳逸结合”的临时性科学措施，体育课和晚自习都取消了，只要求撑住几节主课的课时就行了。尽管如此，仍有一部分同学和老师患了营养不足的浮肿病，哪里会想到要去跳什么舞呢！加之“阶级斗争”教育日紧，在我的意念里，舞蹈这种东西，只是新年晚会上作为表演的一种艺术，日常生活里一般人怎么可能跳什么舞呢？除非是少数民族。后来，摇摆舞更是被看作带有异端的资产阶级腐朽没落的象征，批判不迭。于是就造成了我们这一代舞盲。当然，我也终究不会因为失去了舞蹈的机会而痛心疾首。我虽不会舞蹈，却也见过一些大大小小的热烈的舞会场面，可以说司空见惯，屡见不鲜了。

然而眼前的舞蹈场面却令我激动不已。这是在远离西安的乡村，是被艺术家曾经描绘为“被爱情遗忘的角落”，是被城里的轻薄儿鄙称为“稼娃”聚居的普通村庄，是被人们习惯于看作落后愚昧的地方。现在，这儿在翩翩起舞。小小的库房收拾得干干净净，凌空交叉吊挂着用五色彩纸剪接的彩带，收录机奏出节奏明快或抑扬优雅的舞曲。女青年们穿着红红绿绿的紧身毛线衣，披散着“真由美式”的长发。男青年们穿着笔挺的西装，结着鲜艳的领带，皮鞋锃亮，一双双又一对对舞伴，在变换着节奏的乐曲里，一阵“三步”，又一阵“四步”，再来一段节奏强烈的迪斯科，即使比较复杂的“十六步”，也跳得自如而又潇

洒。有人指给我说那位穿一身西装的男子是团支部书记，看去有一米八九的个头，而且健壮，举步移足文雅而洒脱。

据说，跳舞在石家道村里刚刚兴起的时候，好多老庄稼汉们看不惯，有的连多看一眼的忍耐性儿也没有，议论纷纷，甚至说出好多不大中听的嘲笑话。也难怪！那些终生在黄土地里抓摸着吃和穿的老庄稼汉们，今天能吃饱穿暖，回家有宽敞的住屋，出门有远郊定时公共汽车代步，已经感觉活得很像个人样了。他们无法理解自己的儿辈和孙辈，说一句“吃饱了撑的”之类不屑的话，似乎也是自然的。

我不想对此类事妄加评论，以至演绎出诸如富裕了的那一部分农民的精神追求之类的概念来。我只是对我所熟悉的这块土地上发生的这种前所未见的新鲜事感兴趣，感到这块沉重的土地上的空气开始出现了轻松欢悦的气氛。是的，从石家道到东李村的近十公里长的灞河川道里，我在这儿生活过，工作过，留在我心里的诸多印象中最突出的一种感觉是沉重。不管我们的政策怎样变化，积久的民风乡俗所形成的软网般的习惯是，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农民几乎一律穿黑袄黑裤，一天三晌到村前村后的土地上去挖去耕去锄，一天三晌从村前村后坑坑洼洼的小路上走回家里去吃饭，一年半载才到集镇上去买一些急需的农器家具，唯一的娱乐是说几句笑话或唱几句小曲乱弹。单调，贫乏，寂寥而又沉重。现在，那些在责任田里干了一天活儿的青年农民，那些在乡镇工厂下了班的青年工人，洗去了身上的泥土和油污，换一身流行的时装，搽点香水脂膏，便到小库房里来跳一跳迪斯科，再也不遵循爷爷们和父亲们日入而息的生活习惯了。这块沉重的土地上的乡风有了变化，我把这种变化的气息传递给读者，由读者去评价这种变化吧！

生活本身就是一幕没有结尾的长剧。与青年们跳迪斯科这件事同时发生在同一地方的另一件有意思的事，是几位老太太在山坡上重修老洞庙了，真是相映成趣。

石家道村南大约一公里的地方，横亘着一道黄土原坡，坡势不高，又是平顶，没有多少风光，甚至因为秃秃光光而显得丑陋。这儿曾经有过一个老洞庙，十几孔窑洞里，敬着诸多的神像，始建于何年何月，不甚了了。每年农历二月二日，龙抬头，四周八方的人汇聚到这里来赶庙会。几十尊神像之中，尤以塑着娘娘神像的神洞为热门，那些婚嫁之后而不能及时开怀生育的媳妇们，那些只生女孩而得不到男孩的妇女，急头急脑地挤进洞来，烧一沓纸，点一对漆蜡，插几根紫香，虔诚地跪伏叩拜，嘟嘟囔囔许一摊心愿，然后伸出手去，忐忑不安地到娘娘神的腹下摸出一个泥塑的小人儿，名曰偷娃，悄悄塞进怀里，指望第二年能生出一个胖小子来。果真有灵验了的，第二年的二月二日又来还愿，香蜡纸表加倍地重，红绸红缎横挂竖披到娘娘神的肩头和身上……对于多数赶庙会的人来说，无非是逛热闹或做买卖，农器家具，树苗菜籽，马戏杂耍，唱戏要猴，赌博套圈，吃食茶摊，这是出西安东门的规模最大的一家庙会，远近闻名，历久不衰。只是到了“文革”前一二年，阶级斗争日紧，这里始现萧条。及至西安市机瓦厂在此选中厂址，古洞神像尽毁于东方红推土机的铁铲之下，盛大的庙会从此销声匿迹。这道原坡黄土极厚，是一个极好的制砖烧瓦的理想场地，如今聚居着千余名男女工人和家属，为西安市公用和民用的建筑事业提供砖瓦，功绩赫然。

老洞庙会断香熄火二十年后的今天，附近村庄有几位年逾花甲的老婆老汉，提起了重新修复老洞神庙的动议。老太太们办事，比我们某些可爱的官僚主义者来得干脆，来得利落，毫不拖泥带水；既不报

批，也不用“研究研究”；她们说干就干，立即付诸最切实的行动。这几位已够高龄的老太太，四处化缘，八方募捐，多少不拒，粮钱自便，竟然得到了数目可观的粮食和款子。于是，在老洞庙原址的东边，在西安市机瓦厂的东墙外的荒坡上，重新挖凿神洞的工程破土动工了。

今年春节过后，农历二月二日，尚未凿成的神洞前的山坡上，人群拥挤，社火高跷助兴，锣鼓奏乐，庙会又兴起来了。因为神洞尚未竣工，于是就把紫香溙蜡插在山坡上的荒草间，随便跪下就是了。因为赐子的娘娘尚未塑成，于是乞子不成而求药。一个个善男信女，点燃香蜡，焚过纸表，跪拜叩首，在地上支起一只用黄表折叠的三角，虔诚地等待，那黄表三角就在神不知鬼不觉中有了灰黑色的粉末，这就是神灵施舍的良药。可以包治百病，男女不育，伤风感冒，腰酸腿痛，神经错乱，哮喘气堵，消化不良，脱发掉毛，痔疮鸡眼，失眠夜游，小儿尿床……皆能治也！真乃神力无边，能不神往？乞神求药者，跪下一片，有男有女，有老有少，盛况空前！

如何？当人类已经把自己的足迹踏进太空之中，当人类的手术刀可以置换死掉的心脏，当世界进入第三次浪潮的拍击之中时，我们的这个偏僻的山坡下，却跪拜着一片乞神求药的古朴的乡民，你以为如何呢？

山坡下的村子里，第一批穿上西装革履的农村青年扭起了迪斯科；山坡上的荒草间，老太太们在凿洞塑神，乞求神药。虽然是呈两极型的不大协调的生活，却毕竟可以使我们看到今天的整个社会生活的一幅生动的缩影。

迪斯科是舶来品，是洋人的发明创造，在它进入中国海关之后甚至未进入之前，早已受到批判了，而今虽然没有公开的挞伐，歪嘴掩鼻和嘟嘟囔囔的奚落却不绝于耳。纯而又纯的和道貌岸然的孔老先生的礼仪之民，不能容纳迪斯科，似乎原不足怪；而对于敬神求子乞药的愚氓们愚蠢加愚昧的行为，却表现了素有的宽容和忍耐，这又如何呢?

比之迪斯科，敬神乞药的事，却是地地道道的国产货，是国粹。虽然我们从来也没有停止过反封建迷信的教育，而其举动和声势，较之对于“资”“修”的防范和声讨，却小得不知其只配占百分之几也！我们几十年的“左”的影响所铸就的一种可怕的习惯意识是，批右闻风而动，雷厉风行，鼻里眼里都是气，脚上手上都有劲。批“左”则诚惶诚恐，手脚软瘫，舌硬气短。对于渗透在我们心理意识之中的封建毒素，似乎麻木不仁，闻之不惊了！

我想，如果这些农村青年有勇气，下一年的农历二月二日龙抬头之日，把录音机搬到新的老洞庙会上，在那些跪拜求药的善男信女跟前，扭起迪斯科，以这个舞蹈所特有的强烈乃至疯狂的节奏，冲一冲封建迷信的香火场子，起码可以起到以毒攻毒的作用吧?如果还把迪斯科当作资产阶级毒素来评判的话！

1985年6月18日

访泰日记

一九八五年十二月二十日

北京—曼谷

海关。

一个铁栅小门的上方，挂着块木牌，白底儿，蓝字，端端正正写着“海关”二字。当我一眼瞥见这两个字同时跨进小门的时候，心儿微微震颤了一下，海关！跨过这个木牌下的窄窄的小通道，那就意味着我已经跨出祖国的大门了。

波音七〇七九时许从北京机场起飞，当我踏上舷梯，心里才强烈地反射出一种意识：我即将进入一个完全陌生的国度，一个无法具体想象的谜一样的国家。我隐约记得，在中学的世界地理课上，我第一次记下了泰国这个名字，首都是曼谷，南边有一个暹罗湾。我曾经因为把“暹”字误读成“遇”字而引起地理科任老师和同学们的哗笑，从而使我异常深刻地记住了这个海湾的名字。现在，我将有幸去那个海湾国家了，地球的那个角落里的居民，是以怎样的形态和秩序生活着?

下午六时，飞机抵达曼谷机场，当地时间五点钟，时差一小时。

欢迎仪式在机场小客厅举行。

泰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平开女士致欢迎词。她坐在沙发上，左手搁在左腿上，右手握着左手，轻声慢语的音调，亲切自然的微笑，虽然

根本听不懂一个字，我已经完全判断出她说的全是很诚挚的话了。老孙一翻译过来，果然如此，亲切平易得如道家常的话，使得我的心一下子松弛了。

平开女士看去正当中年，一头乌黑的稍有点卷的头发，一双聪智和悦的大眼睛，宽颊，下唇稍厚，加之她自然随和的轻声慢语，使第一次见到她的人就留下难以忘怀的浑然一体的印象：文雅而不自矜，亲切而不俗套。

颂吉先生是泰国作协理事，上唇的一撮黑黑的胡须特别显眼。他把一串串小花环送给中国作家代表团的八位成员。我接过那一串小花环，手心里触摸到了一种跃动着的生命。那是怎样别致的一个花环呀！白色的茉莉花朵串结在一起，绣织成一串，散发出浓郁的香气，整个小客厅里，弥漫着一股幽微的清香气味。我们不知该怎么佩戴这个花环，就捧在手心里，直到合影留念时，平开女士亲切地提示说，按照泰国的习惯，客人要把小花环套戴在右手腕上。

简短的交谈中，平开女士对我说，她在去年（一九八四年）访问中国时，去过西安，对西安印象极好。她追忆说，她在李若冰家里做过客，并当即询问李若冰夫妇的近况，她说那是两个十分热诚的西安作家。她说她在西安看过仿唐乐舞，是她在中国看到的最优美的舞蹈之一。她对西安的仿唐菜“驼蹄羹”记忆犹新，“那种汤很鲜，很鲜，十分好！”她的神情告诉我，她说的是真诚的话。古都长安的无与伦比的古代文明（秦俑、乾陵等）和优美的乐舞以及饭菜，给她留下一个不错的印象。

颂吉先生插言说，他已经在泰国介绍了三种中国名菜，写了文章，配发了他尝食时拍下的照片，其中就有“驼蹄羹”。颂吉先生很爽

快地对我说，他是泰国烹调协会会员，对许多国家的菜谱有研究，是一位“美食家”。

颂吉先生陪我们去旅馆下榻。

汽车在高速公路上行进。我第一次目睹异国城市的夜景，汽车像水一样流过去，车尾灯闪闪眨眨，听不见声音，只看到流动。一根根电线杆上，都挂着一张相同的纸牌，并排印着两个人的头像，印着文字。颂吉说：“这是今年竞选的两个人物在比好。”

颂吉很爽朗，沿路介绍着所见的建筑物，那是一个超级市场大楼，那是国家宾馆，邓小平访泰时就下榻于此楼……他说：“你们来到泰国，不要拘束，不要管那一套礼仪。我们在一起，越随便越好。你想怎么着就怎么着，想看什么就看什么。车开到路上，你们觉得对什么东西有兴趣，我就停车，就看。我们都是作家，都想了解社会，都想了解各种人的生活，尤其是不同国度的人的生活……你们想看就随时说话。”

这是知心话，我的某些顾忌开始解除了。

我们下榻于曼谷市中心的明达琳宾馆，这是一家私营旅馆。进屋先开冷气阀，一会儿就凉飕飕的了。小桌上备一壶冷开水，壶中装着冰块，喝一口直渗得牙疼。早晨，我们在黎明时分赶往北京机场的路上，白霜蒙地，草木寂寥，正进入中国北方严寒肃杀的冬天；这儿却一片葱郁，气温保持在三十摄氏度上下，我有幸在一年里赶着了两个夏季。

平开女士邀来几位访问过中国的泰国作家，和我们一起吃晚饭。第一顿泰餐。

作家蓬卡塞，留着长长的头发，棕黑色的脸上，一双聪颖的眼睛光彩四溢。他很健谈，平缓的语调带着浓郁的抒情气氛，文文雅雅，一派学士风度，却很诚挚，他说：“北京的明月比曼谷的月色更明亮。我在北京机场看到了明月，不是满月。我喜欢星空，星空没有阻隔。我们生活在同一个星空下，我们的友谊像星空一样不能阻隔。”

据旁人介绍，蓬卡塞先生曾在美国留学，学习音乐，他翻译出版了张贤亮的《灵与肉》短篇小说，根据英文翻译为泰文的，取名《牧马人》，大约是近几年翻译出版的第一本中国当代文学作品。提到这件事，蓬卡塞很动情地说：“我喜欢读小说《牧马人》。小说中的韵味使我张开了广阔的想象的翅膀，比电影画面和音乐更丰富。

“好的文学作品所表达的美好的感情，使世界各地的人民沟通了感情，达到了了解，使其他国家的人民了解这个国家的人民在想什么。”

这是一个艺术气质很强的作家。

十二月二十一日

曼谷

老远就能看见玉佛寺里佛塔的尖顶。及至进入院门，只见三座巍峨的佛塔雄踞寺里，金碧辉煌，富丽华贵，在蓝天艳阳下，金光闪耀，尖尖的塔顶直插蓝天。站在这样恢宏雍容的建筑群下面，初来乍到的人，感到眼花头晕，所有的语言都失去了光彩，不由得“哦噢”地连声感叹。

玉佛寺的大殿，亦是金碧辉煌。任何一位朝拜的男女佛教徒和参观的游人，进门前需先将鞋脱于台阶之下。我走进去，坐于殿内的地

毯上，一批一批佛教徒，不论老少男女，进得门来，立即跪拜三叩，双手合十，举至眉心，虔诚毕恭。不同信仰的异教徒们，则坐卧地毯之上，也不能不为教徒们诚心诚意的举动所感动。

殿堂上，奉祀着一尊玉佛，据说已有近两千年历史，高约二十七寸，不足一米，用一整块纯洁无瑕的绿宝石雕成。绿宝石出自印度，玉佛雕刻的完美艺术真可谓巧夺天工，成为佛教国家遐迩闻名的艺术珍品。这尊玉佛，是泰柬战争中从柬夺回来的国宝，为了保存供奉她，在曼谷王宫内修建下这座规模宏大的玉佛寺。泰人信佛，堪称佛国，这尊玉佛，每年要换两次衣服，以适应泰国雨季和旱季的气候变化。换衣服的人，你怎么也想不到，会是泰国皇上，可见对佛教的信仰和敬重多么虔诚。

殿内两边的墙壁上，全部雕刻着精美的艺术形象，内容是泰国古典史诗《拉玛坚》里的故事片段，像连环画儿一样组接在一起，一组就是一段故事，造型精美，浪漫而又逼真。栩栩如生，每一个民族，都在自己漫长的历史中创造下富于民族个性的艺术瑰宝。

史诗《拉玛坚》在泰国人眼里被当作《圣经》一样尊崇，看作泰族的民族精神财富，大约产生于泰国历史上的第二王朝——阿瑜陀耶时期。它是泰国文学史上灿烂的艺术明珠，像印度的史诗《罗摩衍那》一样，具有无可企及的地位。早上去看泰国古典剧——孔剧《拉玛坚》，我的心里就有一种神圣感，全是因为泰国朋友对史诗《拉玛坚》的崇尚情绪所感染的。

剧名《哈努曼》是规模巨大浩繁的史诗《拉玛坚》中的一个故事，只占二十分之一。这种古典剧只在曼谷的国家剧院上演，据说已经没有多少观众，主要对象是中小学学生。学校规定要求学生必看此

剧，不致使孩子忘记了本民族的优秀文化艺术传统，而语文课教科书上也收进了《拉玛坚》的章节，作为教材。据泰国朋友说，青年人现在喜欢迪斯科和流行音乐。于此，我想到了京剧和秦腔以及许多古老的地方传统剧，现在的观众也多为中老年人，青年人已经缺乏享受那种节奏缓慢的表演的耐心了。这种趋势发展的结果，我不敢妄言预测，而泰国专辟一家国家剧院和养下一个专演传统剧目的剧团，这种做法很有眼光。

我坐在剧场里，看着一个个演员，头戴假面和头盔，在说在唱，却一句也听不懂，听座位四周不时掀起一阵又一阵快活的笑声，我却无法引起共鸣。翻译告诉我，《哈努曼》的剧情大致是这样：国王的爱妻被一个神通广大的魔鬼掳去了，国王派一个白猴，打入魔鬼内部去救护。魔鬼的心在一位老人手里保存着。白猴通过自己的聪明智慧和善于应变的本领，从老人的手中骗取了魔鬼的心，把它捏碎了，魔鬼丧生，国王妻子得救，白猴就成为正义的崇高化身。

白猴是一位天女无种受孕，被天帝打下宫来，来到山中，藏身树洞，分娩却是从口中吐出一只白猴。这个白猴的诞生以及它的形象，自然使我想到孙悟空，中国人民喜爱的那个猴子的形象。这无疑是一个很有趣的文学现象。

白猴从老人手中骗取魔鬼心脏的情节过程，全部是对白，观众（多数确实是学生）的笑声，正是由白猴的一串串诙谐幽默的语言引发的。譬如老人说，××官员喜欢吸烟。白猴就说，我也很喜欢抽烟，为啥没有当官呢？类似相声的幽默情趣。

一旦需要唱词表演，演员只表演动作和舞蹈，而唱腔由专门演唱的人在舞台的一侧对着话筒唱，完全是演唱分家。

……

泰国作家协会设宴，欢迎中国作家代表团。

泰国作协现任主席通贝先生致辞欢迎，充满真挚的友好情意。他说，中国是个伟大的国家，泰国是个小国，国家有大有小，两个国家和两个民族的友谊，通过文学的交流而促进和加深了。这是中国作协派往泰国的第二批作家访问团，第一批是陈残云为团长的访问，时在一九八三年。泰国作协业已派出过两批作家访问中国，受到了难忘的热情的招待。两国作家的互访所建立的友谊，正是中泰两国人民亲密的友谊的一个组成部分。

通贝首次和我们见面，而且是一个颇为隆重的欢迎宴会，讲话亦是开诚布公，亲切自然，如同亲朋交谈。他借机向我们介绍说，泰国作协是个社会团体，一个小团体，一年始终，国家没有给予任何补助和津贴，全靠作协搞社会募捐，类似我们当今流行的赞助活动。然而泰国作协的作家们很团结，友好相处，争相分担协会的工作，当作自己的义务。

通贝先生大约五十上下年纪，一头黑发浓密，有一撮覆盖了脑门，眼睛微深，戴一副浅色眼镜，总有一缕安详和悦的微笑挂在眉间和嘴角。

通贝先生不仅是位作家，而且是泰国一位广负盛誉的律师。他为穷人辩护，不避权势。他的更大的声誉，是在印尼的一场重要国际官司中辩护获胜而饮誉东南亚诸国的。他作为泰国作协主席，却没有小轿车，而泰国的作家们大都有自己的小轿车的。六百万人口的曼谷街道上，据说有二百万辆小车，平均三个人一辆，可见普通人都有小轿

车的。泰国朋友以崇敬和爱戴的口吻给我介绍说，他们的通贝主席把自己写书和辩护所得的收入，大都周济给穷人了，自己出门时搭乘公共汽车。

通贝先生在泰国的影响，远远超出了文学艺术界，他在他的人民中间所享有的信赖和威望，使他成为一个精神财富的富翁。据说，他在搭乘出租汽车时，常常被出租车的司机辨认出来，坚决拒绝收他的车费。他出面给泰国作协搞活动经费的赞助的话，那些银行家和企业家则是愿意慷慨解囊的。

我没有机会询问通贝先生文学上的著述，泰国朋友争相告诉我的，竟然全是关于他的处世为人之道的故事。我知道，正是通贝先生的这些难能可贵的品质，团结和影响着泰国的作家们。我自己的心中，已经树起一个堂堂的泰国人的高大形象。

参加欢迎宴会的泰国作家，全都是到中国访问过的新朋老友，友好之情，溢于言表。一位诗人在赶来参加宴会的路上，搭乘公共汽车，在车上写下一首热情洋溢的诗歌，自告奋勇地在宴会上朗诵起来……

十二月二十二日

曼谷

小汽船在湄南河上划行，溯流而上，绿色的河水在船帮上溅起一串串翡翠似的浪花。太阳已经升起在蔚蓝的天空，河面上洒下金色的阳光，波光闪闪。迎面扑来清爽爽的河风，含着水汽，直透心窝。

河的两岸，是郁郁葱葱的热带丛林，高高矮矮的树冠，织成两道密密实实的绿色屏障。一眼望不透的绿色中，时不时冒出一个尖尖的白色的塔尖，那肯定是寺庙了。

陪我们观赏湄南河风光的五位泰国作家，情不自禁地唱起了《湄南河之歌》。歌声欢快，舒畅，节奏明快。虽然听不懂歌词，我已经感知到这是一首儿女歌颂母亲的歌了。

湄南河，是泰国人引以为自豪的母亲河。四条支流，发源于北部和西部山区，蜿蜿蜒蜒，流经泰国从北至南的几乎全部国土，在暹罗湾入海。河上舟楫往来，鱼虾繁衍，田地得以浇灌，像一条主动脉流贯全身。这是唯一一条发源于泰国领土而又归宿于泰国领海的大河。泰国人于湄南河的感情，有如中华民族之于黄河长江的感情一样深厚，是民族的摇篮，是母亲般的河。

又一座宏伟的塔尖兀然耸立。弃船登岸，参观拂晓寺。

寺塔高耸，挺拔，用陶瓷小碟嵌镶塔面，间之以五色玻璃小片，交错套结，图案规则。阳光下，玻璃小片和陶瓷彩碟一齐闪光，五光十色，闪闪眨眨，十分壮观。塔的中部开四孔门，东南西北，门里各有一位武士骑象的立体雕塑。这位威风八面的英雄，名叫郑信。

郑信是挽救泰国民族于危难的一位英雄。

泰国历史上的第二个封建王朝——阿瑜陀耶王朝时期，曾鼎盛一时，及至帕碧罗阁登基，国内矛盾激化，农民起义四处烽烟。缅甸封建统治集团乘虚乘危而入，不到两年工夫，缅甸军队攻克阿瑜陀耶城。历经四百多年的阿瑜陀耶王朝，宣告覆灭。缅军像一切占领军一样，把繁华的阿瑜陀耶的建筑物付之一炬，暹罗的古代文化遗产焚为

灰烬，国王和官员以及大批居民也被抢掠回缅甸。史诗《拉玛坚》的底本被掠被焚，演员也被掳回缅甸去了。占领军是毫不珍惜被蹂躏的民族的感情的，历来如此。

暹罗处于灭国灭种的危难时期，郑信揭竿而起。他号召各族各阶层的人民为驱逐侵略者、争取国家的独立而斗争。沦亡的民众，不分种族，包括华人，云集于郑信的旗帜之下，汇成万人之师，向缅甸占领军展开了殊死的战斗。

郑信终于统率起一支拥有百条战船的大军，溯湄南河而上，浩浩荡荡，所向披靡，先攻曼谷，激战中杀死了占领军头目苏基。郑信乘胜前进，一举收复阿瑜陀耶城，在缅军灭泰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又光复了领土。郑信被拥戴为王，成为泰国历史上的吞武里（首都）王朝。由于种种原因，郑信的王朝只延续了十五年，便告结束。随之而起的是曼谷王朝，一直延续到今天。

郑信的王朝是短暂的，在泰国历史上的三大王朝的漫长统治时期中，只是一个短短的插曲，一个间歇，一个转换，或者说是一种调节。然而郑信的历史功勋，长存不灭。泰国民族尊重自己的历史，自然地尊重这位于国家的完整和民族兴旺有大建树的英雄。这座拂晓寺，就是专门为了纪念郑信而修建的。地址选在湄南河的这一隅地，也是有历史情愫的。郑信受挫，率领几十个败兵逃出，于拂晓时分到达这里，然后重整旗鼓，屯田养兵；然后从此出发，一直把缅甸军队赶出泰境。拂晓寺源出于兹。

平开女士对我说，郑信在泰国是受尊敬的。泰国人尊敬姓郑的，似乎有点爱屋及乌。不管怎样，郑万隆因此而沾光，特受钟爱。

郑信是中国血统的华人，在泰的封爵为披耶，起事前在万达村做小官，于是在泰就有了一个披耶达信的名字。这个名字连泰人也不大使用，还是顺口称郑信，或称郑王，简便而又亲切。

郑王塔的旁边，有两个小塔，塔体自上而下比较匀称，上部稍细于根部，圆形。泰国作家告诉我们，这一大二小的三座塔，都是男性生殖器的象征。佛教崇尚生殖器，那是人类得以繁衍，得以旺盛不灭的最伟大的部分，所以塔的造型多仿此形，以示尊崇。

……

贴园。午餐。

饱览了湄南河的美丽风光，午时登岸，来到河边的一座美如仙境的花园别墅，得以小憩，十分舒心。

花园里亭台楼阁，曲径通幽。楼亭上吊挂宫灯，古典优雅。院内草皮覆盖。草细花小。草地上设置凉亭，木柱草顶，古朴自然。这是一家私有的花园式的别墅。

女主人看去有三十岁年纪，淡蓝色的宽短袖上装，红色泰裙，披肩的一头黑发，坐到我们面前。互相介绍之后，她很谦和地表示欢迎。她笑得自然、随和，使她很漂亮的脸颊更具有风采。应该说，这是一位美人。

当她听孙翻译介绍我来自古都西安，便接上话茬儿，说到唐都长安。她说很喜欢武则天，甚至崇拜这位举世闻名的女皇帝。她说她很想去中国观光，尤其想看看武则天墓。她在美国和法国留过学，通晓

三种语言，丰厚的知识和良好的教育与自身的天然美很协调地统一于一身。

男主人匆匆从园地中赶来，瘦高挑身材，短头发，深陷的一双黑黑的精明的眼珠，友好和善地欢迎客人到来。他屁股上的口袋里装着一只对讲机，手里拿着一只，随时回答来自后园建筑工地和厨房等处的问询，潇洒，忙而不乱。

经泰国作家介绍，我们才得知，这是泰国前总理他侬的三公子经营的一座花园别墅。

他侬是一九六三年接任泰国总理的，在任十年。其间对泰国的现代化建设和经济发展，有一些重要功绩，但对农村发展和社会经济的繁荣，远未达到经济发展计划的指标。尤其是在他统治的后期，采取追随美国的对外政策，对内实行军人专政，压制民主，解散议会，强行采取专断独裁的高压手段，终于在一九七三年的学生运动中（五十万反政府示威），垮台了。

他侬逃出泰国，在新加坡避难，后在缅甸的寺庙中当了几年和尚，真可谓“立地成佛”。这几年间，泰国由克立·巴莫任总理，恢复议会，重颁宪法，给人民以民主权利，泰国又复平静。人民宽谅了他侬，他自缅甸回到泰国养老，无谁再纠缠前怨。据说，他侬当过和尚了，而泰国人民是尊重佛教也尊敬和尚的。

他侬的三儿子在湄南河边修建此花园，主要不属营业性质，只是私人别墅，有亲朋自远方来，临时搭伙起灶，在此消遣一番，赏心悦目。他为了招待中国作家代表团，请来日本厨师，用日本饭菜招待，另有泰国饭食。

他和他的太太，分两路领着我们参观他的花园别墅。这是一块占地十英亩的花园，已经治理四英亩。园里种植芒果、椰子、香蕉，奇花异草，鲜花盛开，草皮绿郁，流水悠悠。

他侬执政时期，独裁反共反民主，和中国人民相敌视。现在，我们成了他的儿子和儿媳的客人，跟着他们在园中徜徉，听他们热心地介绍他们的园地的艺术构思，坐在草顶木亭下欣赏花木，纳凉聊天。他很自豪地对我们说，整个花园的设计，是他的太太的艺术思想的实践。我们友好相处，似乎谁都觉得挺好，我们觉得他侬的儿子和儿媳妇挺友好，他们大约也会感到共产党国家的作家也是善于和人共处的。世界上不会有永远对立的两个民族。那些在民族和国家之间设置障碍、阻塞感情的人，终究不能使这种障碍永固不倒，人民希求感情交流的心愿可以溶化一切钢铸铁浇的隔墙。

我们诚心地希望主人夫妇到中国观光。

主人热情地请求我们题字留念。

……

晚上在泰国作协前任主席查先生家做客。

一个宽敞的庭院，有几丛竹，竹中有一丛花团锦簇的花树，郁郁香气四散。木瓜树和椰子树竞相拔高，果实垂吊。石头堆成假山，小桥拱连水池。一座二层小洋楼藏在翠竹和绿树那边。

晚宴在庭院中举行。皓月当空，银光满院，晚风习习，轻松活泼，宾主交谈，随意自如。

查先生说，他的太太的哥哥，现在在北京，为外文出版公司工作，所以他今晚是招待亲戚。

我们饭后参观了他的居室，会客厅，书房，写作室。在他的客厅里，橱架上摆着他和柴泽民（第一任驻泰大使）的合影照片，摆着中国的景泰蓝和茅台酒。

他的书房里，有两个书架，全部摆着他的著作。说来令人瞠目，查先生已出版长篇小说一百零三部，另有二百多篇短篇小说结集，其中四十九部已被改编成电影或电视剧，他的写作量可以想见。

查先生介绍说，他早晨四时开始工作，一直写到傍晚，中间只吃早点和午饭，没有午休，晚上看看电视，消遣一下就休息了。泰国人没有午休的习惯，查先生更是扭紧了生命的发条。

查先生的写作室，真是富于斗室的气氛，一张宽大的桌子上，零乱地堆积着杂志和报纸。他随手拉出一份报纸给大家看，那上面有他的长篇小说连载。他有四部小说同时在报纸和周刊上连载，他每天必须为那四部连载小说续写一节，送给报社和刊物。

查先生又翻出几本杂志，那上面刊有他访问中国的观感和照片。他很高兴，急于把他的一切都告诉给客人，又翻出两部书让我们看，那是他蹲监狱出来后的收获，算是监中纪实，详尽而生动地记录了他在监狱的生活和斗争，配有照片。查先生在一九五二至一九五七年被捕入狱，五年的牢狱生活使他更坚强了。他是在争取民主和和平运动中被囚的，该算一位和平战士。这两部书，一直被当局列为禁书，不许再版，现在似乎不再提及，有出版商约他再版，但要修改某些章节，他不愿修改，当然也就不能再版了，颇有骨气。

“我把你们当亲戚待。”查先生笑着摊开双手，“什么都让你们看了，书房、写作室，以及卧室……”

通贝主席一直作陪，此时突然发现了什么，指着门边的墙壁说：“你也挂了这个……”说罢哈哈大笑。我们一看，在门板背后的墙壁上，挂着一张年历，那画儿是一个基本裸体的女子，因为挂在整个屋子的最偏僻的角落，谁也没有发现。查先生也哈哈笑了，解释了一句什么，他的太太也哈哈笑起来。

他说他的整个写作主旨是：为人民。

十月二十三日

阿瑜陀耶

清晨从曼谷出发，到阿瑜陀耶古城去参观。

汽车在湄南河平原上疾驰，眼前展开一望无垠的热带原野。一轮红日从远处的丛林背后升起来，黄熟的稻田里金光闪耀。公路笔直、平坦，车辆不多，汽车几乎不用刹车、减速，一路飞驰。

同行的泰国作家颂吉、瓦兰克娜和柏拉迪塞，不由自主地唱起了《阿瑜陀耶》之歌，旋律舒缓，节奏明朗。虽然语言不通，我还是真切地体味到一种深沉的怀念和崇敬的情感，一种民族的自豪和荣耀的心声。阿瑜陀耶是泰国历史上的第二个封建王朝，从十四世纪中期拉玛铁菩提一世在阿瑜陀耶建朝称帝，到十八世纪六十年代被缅甸占领，历经四百多年。阿瑜陀耶王朝统治的漫长历史中，曾经创造过大量的古代文明，经济出现过繁盛，贸易活跃，仅同中国明朝的使节交往的贸易活动，几乎每年都不间断，郑和二出亚非诸国时，率船队访

问过阿瑜陀耶。泰国作家的歌声所洋溢着的崇敬和自豪是很容易被人理解的，任何一个民族的优秀的子孙，总是对于他们的先祖所创建的文明视若珍宝，进而成为一种精神财富。想到我们向友人说起秦俑和万里长城的心情，自然就可以理解泰国朋友对阿瑜陀耶的感情了！

我看到的阿瑜陀耶是一片废墟！

断垣残壁。折断的石柱。造型优美的佛像，留下一堆断肢、残脚和破碎的头，数也数不清有多少佛像的残肢断体。古迹保护工作者尊重历史，也尊重现实，依然如故地保存着原物，在断垣残壁中，堆放着佛像的断头、残肢和残脚。这种惨不忍睹的现场实物，是否有一种冷峻的暗示：这就是战争？

我相信任何一位参观者站在这个现场时，都不会无动于衷的。我无法想象古代的缅甸军队攻克阿瑜陀耶城时会是一副怎样得意的神情，然而那一把大火之中的阿瑜陀耶的惨景分明映现于脑际了。火声呼啸，金瓯坠地，雕木焚毁，佛尊倒地……圆明园也是遭此惨景的啊！这是一七六七年四月七日发生的事，一座繁华的王城在大火中化为灰烬。泰人都记着这个历史的日子。

尽管如此，从那残断的砖头修筑的城墙上，可以想见阿瑜陀耶的阔大的规模：从那开阔的广场上，你可以想见一代一代国王检阅仪仗的风流，广场上现在有一个草皮覆盖的足球场子；从那王台上，那雕刻着变形人兽图案的王台的基座矮墙上，你可以想见王朝当年的升平与繁华，曾经显赫一时的王朝在一把火中化为灰烬了。据说，释迦牟尼死后，其骨灰分赐给所有佛教国家一小份，泰国分得的那一份圣灰，即藏于此。阿瑜陀耶历代君王死后的骨灰，亦藏于此。这几座专

门敬藏国王骨灰的寺塔，当然也逃不过大火的劫难。五十年前，对这几座藏着圣体骨灰的寺塔做了修复，基本完整。

……

阿瑜陀耶府尹设午宴招待，选择了湄南河上的水上餐厅。饭前，府尹让我们再游湄南河，这是一段人工开凿的河段，可称为运河吧。

河水充沛，没有一坨裸露的河床。两岸房屋，栉比鳞次，拥拥挤挤，依岸而建。许多房子，从水中立桩，然后凌空筑屋，木板地板，木板墙壁，木板屋顶。有不少极漂亮的水泥洋房，涂成白色或绿色，参差掺挤于黑色的木板屋中间，特别洋气，尤为显眼。绿树绿叶遮盖着洋房和木屋。姑娘们坐在水中的木梯上，半身没于水中，穿着裸肩裸胸的裙衫，或淘洗米菜，或洁身洗搓，不为游览者所惊，习以为常了吧。

河岸边，一座壮观的建筑群，高出于周围的所有房舍和厂房的烟囱之上。金红色的屋瓦，雪白的墙壁。这是中国航海家郑和的寺庙，是泰国人民为纪念明朝的这位友好使者修建的，郑和的船队停泊于此，与阿瑜陀耶王朝友好交往，这座辉煌的庙宇应该是人民友谊的象征。真是历史的巧合，郑和向阿瑜陀耶王朝带来了明朝的友好情谊，郑信又从亡国灭种的灾难中拯救了暹罗，两位姓郑的英雄，造成了一种对郑姓的尊敬，不无道理。

岸边有许多村落，有葡萄牙村、日本村、中国村等。那是缅军占领阿瑜陀耶王城时，侨居城中的外籍人纷纷逃避到此，建立起一个个外国人聚居的村庄。现在，那些村庄里，已经是纯一色的泰族人了，外籍侨民有的早已迁回本国，留下来的已进入大小城镇，没有人在此

种植或捕捞了。中国人几乎全部进入城市经商去了，空留一个中国村的名字。据说，在葡萄牙人聚居的村子的遗址上，挖出过八百多具骨殖，可能是一个墓葬场地。葡萄牙人是第一个进入泰国的西方的国家，随之是西班牙和荷兰人。毋庸置疑，葡萄牙人以炮舰政策威迫阿瑜陀耶王朝就范，掠夺廉价的东方财富。及至后来英法进入，阿瑜陀耶成为西方冒险家角逐的场所。

在我与泰国朋友的短短几天的接触中，在对泰国历史文物的观瞻中，有一种感觉，中国历代的封建王朝，似乎没有做过使人难以忘记的伤害两个民族的感情的事，因而泰人对华人保存着一个较为愉快的记忆，这种记忆从悠长的历史传留下来，延续至今，不能阻断。我的这种感觉不敢自信其准确的程度，仅仅是一种感觉，因为我对泰国的历史毕竟了解太少太少。对中泰两国交往历史的了解也太少太少了。我点滴知道，远在泰国由部落形式的小公国进而发展成为第一个封建王朝——素可泰王朝时期，就与中国有了友好的交往，第一代王坤南甘杏时代就邀请大量中国制陶工匠烧制出举世闻名的陶瓷，远销马来亚、新加坡、菲律宾等东南亚国家，活跃了素可泰王国的经济。中国元朝派使者两次出访素可泰王国，素可泰王国派往中国的使者竟达十余次。两国之间似乎多为经济贸易和使者往来，而幸未发生战事。及至我看到挽芭茵宫的时候，这种不大准确的感觉愈加明显了。

挽芭茵宫，完全是中国风格的古代建筑物。其构造设计，完全是模仿北京故宫的宫殿，飞檐翘角，禽兽雕刻，雕梁画栋，使我一下子仿佛置身于故宫的宫殿前边。主体是一座王宫，红墙，绿色琉璃瓦，屋脊嵌着双龙戏珠和丹凤朝阳的雕刻饰物，这是中国传统的吉祥的象征。泰国人崇尚鸟，把鸟作为一种神圣的图腾，寺庙前处处可见人面鸟身的大型雕塑。

王宫内的陈设也完全是中国宫殿里的格局：国王的龙床龙椅，陈设着地道的中国瓷器、画幅，中国历代名家的诗词条幅。墙上挂着朱拉隆功大帝头戴翎毛帽、身穿龙袍的画像，与蒙谷王并悬。

这座中国式宫殿，据介绍说，全是从中国制好构体，送往此地，建筑而成。始建于阿瑜陀耶王朝末期，完成于随后兴起的曼谷王朝的五世王朱拉隆功大帝时期。在一则保护文物的说明中称："这座宫殿，现在从艺术上计较，可称是泰国艺术史上的无价之宝。"可以想见其重要的历史价值。

中国的封建帝君，有过征服邻邦的史迹，自然不大光彩；所幸者，倒是没有与泰族有历史积怨，人民至今能够保持一个较为美好的记忆，真是弥足珍贵！

阿瑜陀耶府现任府尹在水上餐厅设宴招待来访的中国作家代表团，别具一格。餐厅全部建筑在湄南河河面上，草顶木墙，古朴风雅，室内却全是现代化设备。

府尹长得粗壮，丰腴，雍容大度，态度却极为谦恭，所以就别具一番泰国官员的优美风度。他把自己府中的幕僚和官员全部带来作陪，又从府中请来几位通晓北京话的华人做翻译，使宴会特别活跃。

他很高兴，说他喜欢接待中国使者，尤其对光临他的古府（阿瑜陀耶）的中国客人特别高兴，乐于接待。他不无荣耀之感地向我们说，他接待过中国国家元首李先念和邓小平，很自豪地出示他和李、邓两位领导人的合影，使宴会的气氛更加和谐。他曾两次访华，保留着美好的记忆。他给他的官员争取机会，使他们分批去中国参观访

问。这是一位充满友好情谊的府尹，在他的身上，我又加深了那种感觉。

……

下午回到曼谷，去中国驻泰国大使馆。文化一秘老杨向我们谈了谈泰国的一般情况，这是一位很严谨的外交官。

……

晚上拜访一位中年女作家。

一座漂亮的二层洋楼，一个花园似的庭院。

她曾经是泰国首都曼谷的公共交通董事长，相当于国家的公路交通部部长，上院议员。她的公共交通部管辖着两万辆汽车，近五万职员，然而她在可以想见其繁杂的工作之余，进行着个人喜欢的文学创作活动，该当是一位女强人了。她现在辞去了董事长职务，在家搞专业创作。泰国的专业作家为数很少，寥寥无几，因为搞专业创作没有人给他发工资，一般作家在创作之外，身兼一职或数职，这样才能保证有较为优裕的经济收入。搞专业创作其实是由自己决定的，只要自己有把握通过创作能获得较好的经济收入就行了。

她的书房里，摆着两个专门陈列自己创作作品的书柜。她已经出版过五十六部长篇小说、一百多个短篇，五十六部长篇全部被拍摄为电影或电视剧，在泰国是一位最走红运的女作家。

她很活跃，在自己的书案上翻出刊有她的作品的报刊给我们看。她正在为两家报纸写连载专栏作品，每天占有一定的版面，大约有汉字三千左右的篇幅，每天写够一节，交报纸付印。问她稿酬收入情

况，她说这样的版面可得七百铢，折人民币八十五元。她说泰国出版商给作家的稿酬标准，是按作家的知名度定的。有名的受读者欢迎的作家的作品，就多给，反之则少付，差别还是较大的。她的稿酬可以算得高标准，而一般作家所得的稿酬标准大致与我国的稿酬标准不相上下。

她说她的写作习惯是不停地走动，在屋子和小庭院里散步、思考，想好一段，就立即奔回桌子，一下子写下来。写得累了，她就躺一下，休息后精神得到恢复，爬起来再写。

她的家庭很富裕，独有一座二层楼，很漂亮，细木条拼成的地板，红漆打面，油光可鉴，全用珍贵的柚木（泰国名产）构筑，越磨越踩越光亮。她有自己的小车，有彩电和空调以及冰箱等必备的家什，她有两个儿子，留着泰国少年的短发发式，聪明知礼。她的生活也有不大如意的一面，就是她的个人生活。她独居，养着两个儿子，又雇有仆人操持家务。她的前夫是国家警士厅的要员，无法忍受她夜以继日的创作狂欲，她和他分手了。

她似乎不同于我所能接触到的几位泰国女性。我的肤浅的印象是，泰国的女人更像女人，或者说更显著地显示着女人的特点，温柔，谦和，多是轻声细语，文雅而又和悦。无论是富有知识的高层女性，抑或是侍者或店员，这些女人的特质是共有的。这位女作家呢（她有一个很难记的名字，遗憾）？豁达，爽朗，脚步和手臂都是泰国女人少有的大动作。据说泰国有一条礼俗，不许担二郎腿，坐时不许把脚尖对准旁人，那算是很不礼貌的粗鄙动作。可她担着二郎腿，谈笑风生，无拘无束，一会儿哈哈大笑，一会儿又动情地叨叨唠唠。

她很敏捷、机智，一个人被七八个中国人围住，问这问那，皆挥洒自如，一一作答，不见窘迫。她把在座的中国人一个个作了比拟，说未央像曼谷市前市长，翻译老孙则像曼谷市现任市长，肖德生像公共事业局局长，郑万隆像她欢迎的香港电影明星成龙。我们以为她不过是即兴而谈，逗逗笑话罢了。谁知她话锋一转，恳切地说："你看，我原来认识你们呀！你们全是我的熟人和朋友，怪道我和你们第一次交谈就不感觉陌生。我把你们当作老朋友接待。"至此，我才知道她不是随意作比的。

她说："一个国家怎么样，要看一个国家的文学，文学是一个国家的精神形象。我喜欢中国文学，你们看看我的书柜就知道了。"她的书柜里装着不少的中国古典文学和现代作家的作品，她自己的创作有一个总的轮廓，就是关于家庭的形态、关于女人命运的创作，或者说是生活题材作家。她拥有庞大的读者群，用她的书改编的电影和电视剧，总受观众的欢迎，所以有走红运作家之说。

未央被她的真挚之情所感染，当场赋诗，说她是"一团火，一阵风，一朵花，一首诗"。她听了高兴得双手合十，自己吟诵一遍。

我们告辞的时候，我发现她哭了。

……

我们纯粹是想看一下泰国电影院的格局，就自己闯进一家电影院去，把门的人员很客气，让我们进门而不收票，不过剩下十来分钟散场了。

偌大的电影院，舒适的座椅，武打功夫片，特大的宽银幕，声响和影像俱佳，可惜，整个座席里，不过二十来名观众在欣赏。

二三十个人来看也放映？答曰：放。三五个人来看也放映。

据说，这个电影院刚建起来的多年里，营建者依此发了财，现在已经经营其他什么实业公司去了。但这影院照样保存，照样营业，以保开始时的声誉。电影萧条，武打片也萧条。

十二月二十四日

曼谷

参观盘谷银行，见到了有“泰国的基辛格”美誉的许敦茂先生。

早已听说泰国有一家大银行，是华人经营的，今天得以目睹，其规模和金融实力确实令人震惊。

在曼谷城中心区，有一座三十二层的大楼，白色，拔地而起，引人瞩目，这是曼谷城里目下最高的一座现代化建筑物，这就是盘谷银行。

乘电梯到达最高层，凭窗远眺，整个曼谷城尽在眼下，一座座外观漂亮的形态各异的建筑物，插足于那一片低矮的灰黑色的小板房之间，而盘谷银行的大楼却鹤立鸡群，独领风骚。这个城市正在向天空伸展，竞长拔高，急切地要挣脱那一片黑色落叶似的低矮小屋，拔出新枝来，这是我的一种没有多少根据的直感。

我们参观了银行的中枢神经——电脑室。电脑室门口，一张桌子跟前坐着两名装备齐整的警士，胯间吊着短枪（这已不足为奇，街道上、旅社里所见到的警士，都是肩缠警绳，胯吊短枪，荷枪实弹值勤），这是银行自己雇来做安全工作的。

电脑室里，一人一台电子计算机，多为中青年职员，工作紧张，秩序井然。据电脑室的负责人介绍，这是整个银行的中枢神经，指挥着这个庞大机器有秩序有节奏地运转。银行设在泰国境内的任何一个分行，都受这里控制；任何一位顾客在任何一个分行储存或取出款子，这里与分行同时获得信息。负责人说，这个要害机构的门禁制度是严格的，即使本行的高级雇员，也不得进入，中国作家是贵客，相信你们不会盗窃金融情报，欢迎参观。

金库在地下室，四面密封，门禁全是电脑控制，更为严密，我们能够进去开开眼界，也是出于以上的原因吧！偌大的金库里，一排排钢皮柜子，像中药店里的药箱一样密密排列，那是金子、银子、宝石和存单的储备，站在这间屋子里，瞧着那些储金藏银的一排排钢皮柜架，我忽然想，也许这间地下室的储藏，可以买下半个曼谷！

董事长陈弼臣先生，广东潮阳人，一九四四年创办银行时，不过四百万铢（折人民币五十万元）基金，雇员三十多人，而今已发展到拥有总资产一千二百亿铢，资本金逾六十一亿铢，存款八百二十六亿铢，放款九百四十四亿铢（一九八一年统计）。截至一九八五年，盘谷银行在世界银行中跻身一百八十三位，属东南亚最大的一家银行，雇员两万，四十年间获得如此重大的发展，陈弼臣的威望是可想而知的。

陈弼臣先生正在北京。儿子陈有汉已经接替其父，统领盘谷银行的业务。他出面接见了中国作家。

盘谷银行经济实力雄厚，又慷慨资助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颇有威望。泰国作协属于小小的社会团体，没有一铢的政府津贴，这次接待我们，全凭社会赞助，而盘谷银行则是主要对象。在银行总裁许敦

茂先生致欢迎词之后，当即当众把赞助的款子交给泰作协副主席平开女士。其情景如下：许敦茂总裁一宣布，一位穿戴齐整的职员从台后走到前面，双手托一黑盘，盘内置一信封（大约装着支票吧），交给平开。平开女士即走上前，接过信封，弯腰鞠躬，道谢再三。我眼见着这样的程序，首感银行家热心中泰作家交流的慷慨之举，总觉得有点不大习惯，许是我们的作家协会用惯了国家统拨的经费，虽然总是紧张，却少了另一层感觉。泰国的作家协会自有自己国家的实际情况，这样筹措活动经费的办法由来已久，习以为常了。他们为了中泰文学的交流，要费很多我们不费的神，诸如筹款，令人感动，他们不易呀！

许敦茂先生一站到讲话台前，一张口，就使人感到这是一位豁达善断、具有政治家风度的人物。他说话干脆，毫不矫饰："你们是中国作家，中国是社会主义制度，你们有你们的立场。我觉得，你们带着你们的立场来，来看一看泰国，有好处。作家应该多跑一些地方，多到一些国家和地区去看看，对写作有好处。"

这就是泰国的基辛格——许敦茂先生。

此前，华文报纸《新中原报》记者何韵女士送给我一本她写的小册子《泰国的基辛格》，详尽地记述了中泰建交过程中许敦茂先生的重大建树，读来令人钦佩。

一九七二年八月末，身任泰国财经实业署副主任的许敦茂先生，却以泰国乒乓球顾问的身份访问中国；虽然掩饰得有点过于不伦不类，却立时成为轰动国际政坛的新闻人物。此前一二年，是为世瞩目的美国乒乓球队访问做客北京，以及美国国务卿基辛格秘密访问中国，揭开了中美关系的第一页。许敦茂先生出访中国，其形式和途径

与基辛格如出一辙，异曲同工。他是受巴博元帅的直接指使，第一个出访中国的泰国官员。这次秘密访问使许敦茂一下子成为遐迩闻名的新闻人物，甚至在泰国把一九七二年称为“许敦茂之年”！

何以会有如此强烈的冲击波？何韵女士追述了许敦茂访华前的中泰关系的现实状况是——

中国闭关自守，泰国无从了解。

泰国对中国，多年来进行防共宣传，在泰国人民心目中，共产党中国等同于可怕可憎的魔鬼。

在泰国，防共形成了事实上的恐怖。华侨连看家乡来信也要偷偷摸摸，更不须说回乡探望，一顶“红帽子”扣来，就要倒霉一辈子。商人的铺店里出卖中国货，也会被扣以共党罪名。阅读中国小说，会被关进牢狱。

在两国关系处于如此冰冻的情况下，许敦茂访华就具有很大的冒险性。此前一届政府时，曾有一位官员受托秘访中国，回国后发生政变，这位官员乖乖入瓮。

许敦茂在北京，受到周总理的接见。他回泰后，向他侬总理和巴博元帅呈交了访问中国的情况汇报，而且在机场举行了记者招待会，是第一个把中国的实际情况向泰国各界如实披露出来的人，他向那些听惯了“红色魔鬼”说的人证实：“中国决不输出共产主义。中国恪守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我看到的中国，没有盗贼，可以打开门睡觉，他们的国家很安静……”

随后，许敦茂两次访华，以国会主席的身份，继续做中泰两国建交的工作，受到朱德委员长和廖承志的接见。正当这项建交事宜不断发展的重要关头，泰国国内政局急骤动荡，学生运动促成高潮，他侬总理和巴博元帅倒台，中泰的正式邦交推迟至克立执政后得以建立。他侬在其执政的十年中，防共反共，独裁专制，自有公论，而在其倒阁前，意识到需要发展中泰关系，当然是有其国际和国内的重要因素的。不管怎样，他和巴博元帅指使许敦茂踢开了自己封堵的大墙，总是事实。

何韵女士在详述许敦茂先生为开创中泰两国人民的友谊所做的重要建树时，深情地写道:“朝着同一个方向，在千千万万人的足下，走出一条路来；那一双首先着土的足印，让千千万万人步其后尘的先行者，是值得赞赏讴歌的人！我们怀念他！”

在前总理他侬儿子的别墅花园里，我突发感慨，在两个国家和两个民族之间设置下的障碍，即使钢浇铁铸，终久要被人民的感情所融化，世界上从来没有过永远对立的国家。当我面对为沟通中泰两国人民友谊而做出过卓越贡献的许敦茂先生时，心里充满了崇敬之意；同时也相信，我正是步这位先行者后尘的千千万万人中的一个。

……

到曼谷四天来，白天的活动全都安排得满满的，多是参观古迹名胜和风景，晚上多有宴会，费时得很，回到旅馆就很晚了，也很累。我有一点不够满足，那些名胜古迹虽也迷人，却完全失去了对现实社会生活的了解的机会，譬如工厂，譬如农村，譬如市民小巷，曼谷的各个阶层的人以怎样的形态工作着、生活着?

今晚归来尚不太晚，我和几位怀有同样要求的朋友走出旅馆，自己到大街小巷去溜达。

走出下榻的宾馆不远，就拐进一条小巷。这儿和大街上显出很大的不同景象，行人拥挤，往来穿梭，欧美的不同于东方肤色的人也多了。一排排铺店，两边朝街开门，许多门楼下挂着厚布帘子，两边也不开窗。这与我在曼谷看到的铺店形成强烈的反差，那些经营布匹、服装、糕点、百货的私营铺店，尽管门面大小不同，而灯光十分充足，明亮如昼，显得豁亮爽快。在这里的一些门口，不仅看不见灯光，门窗也黑着，我被提示说，这是“红灯区”，即妓女聚居之所在。

那些挂着门帘的门口，有几个小女子倚坐椅上，或歪歪地站着；涂唇画眉，艳抹而又裸装，或半袒胸，或半裸大腿；见人走过，嘻嘻笑着，招手示意，说着什么；虽不通语言，可以想见，必是拉客之类的什么双关暗示的话；也有男子，充当拉皮条的角色，跟踪行人，纠缠不休。走在这里，顿感毛骨悚然，心里十分紧张，脚下也就匆匆起来。

一连走过相连的三条小街，全是一样情景。在一条街口，看见一家门帘吊起半边，屋里黑暗，红、绿、黄、蓝几种小小的彩色灯泡忽闪忽眨，幽幽变幻的光色下，几十个女人几乎全裸着身子，在急骤强烈的舞曲里扭着迪斯科，变幻不定的灯光，在她们身上闪着，红的、绿的、黄的、蓝的。

有点仓皇地走出小巷，来到大街上，我和一位同行的朋友才松开紧挽着的手指，胸里透出一口长气。

这无疑是曼谷最底层的一个缩影。初来四天，我惊异于曼谷的繁华，流水似的小车、干净的街道、蓬蓬拔起的高楼和令人眼花缭乱的超级市场，都呈现着曼谷的繁荣的景象。四天来接触了不少朋友，我印象深刻的是泰国朋友的素养，文质彬彬，礼仪周到，使人觉得如入礼仪之邦。更有一点，是我所感受到的服务人员的周到。所有这些甚为美好的印象，曾经使我思考过，我们多年来的一些无谓的人为的斗争，确实把我们民族的许多优秀的品质斗掉了，礼仪之邦里的不少人已经不懂礼仪了。所有这些，都是客观实际，我也不会改变在曼谷得到的这些甚好的印象，然而，妓院的那种赤裸裸的景象，也着实令人吃惊。

在今晚的招待会上，盘谷银行一位高级职员和我挨肩，他是华人，会讲普通话。他说他在北京的公园里，看到座椅上一双双搂抱的青年男女，不避游人，令他吃惊，觉得北京的“开放”超过泰国了。他告诉我，泰国法律规定，在一切公开场合，男女不许勾肩搭背，更不许搂抱接吻，如有违犯者，处以刑律。我在曼谷四天，确实没有看到过男女有搂肩勾腰的举动，可以证实这一点。

可是，“红灯区”公开卖淫的事，却似乎并不违反刑律，这至少是一个很容易提出的矛盾现象。我试图这样解释：对于整个社会施以严格的风纪要求，以保证中上层的国民有一个良好的国风。而至于下层社会呢？权且如此吧！

这样的解释连我自己也不通。因为随之又会有许多问题提出来，“红灯区”的疫病仅仅只会局限于那几条小巷？与整个社会风气没有冲突？社会本身无力解决这样的问题？抑或其他？

十二月二十五日

曼谷—清迈

一条黑色的柏油公路，笔直笔直，向北伸展。去清迈。清迈是泰国西北部的古老城市。

车窗外，是一望无际的原野，坦坦荡荡，真可谓沃野千里。这是泰国的大谷仓，四季不分，水量充足，盛产稻谷。这里有一种三收的说法，农人播种一次，可以连收三年，后两年无须播种，稻田里遗落的稻粒会自动发芽、生长，可见土质的肥沃和气候之适宜了。如此得天独厚的土地，自古就是农耕的理想之地。

木板构筑的木屋，全是平地立桩，凌空筑屋，有木板做顶，也有稻草苫顶。有独家孤院的农家，也有三五十幢木屋围成的村庄。每一户农家屋院的前后左右，都被俏拔的椰子和密密实实的香蕉的叶子所掩遮，构成热带乡村别具一格的风貌。

路边的草地上，灰黑色的和白色的水牛在蹒跚，悠悠移步，悠悠甩尾，悠悠吃草，一副漫不经意的神气。

晚稻黄熟，割收稻谷的农民，拿着弯月似的短柄镰刀，弯腰刈割，也是悠悠的样子，割两把，把稻穗扔在一堆，再弯下腰去，没有紧迫的样子。我所熟悉的我国北方夏收时节龙口夺食的紧张气氛，印象深刻，而这里的农民却悠悠缓缓，似乎不像收获的样子。

女人们也穿着花色泰裙，也是款款地动作着。男人们赤裸着膀子，黑黑的皮肤在骄阳下闪光。许是旱季无雨，也许是离下一茬庄稼的播种期为时尚远，所以不必着急，不显忙迫。终年常绿，四季属夏，全年都是生物的生长期，而只种收两茬庄稼，所以不必忙迫吧?根本就没有抢时播种的概念吧?

田野上，不时可以看到小四轮拖拉机。小伙子握着叉把，载着稻穗，正从田地上开过来，朝公路拐上来。可以看出，农民凭手工收割，而运输已为小机械所替代。

田埂上，有三五个男女农人站在一堆，正在用餐。

我真想走进那村中任何一幢木屋，或者蹲到那田埂上正在用餐的农人伙里，去聊聊，去看看，这些与中国农民极其相似的泰国农人，日月过得如何?

十二月二十六日

清迈

帕亚朴大学。

在接待室里，校长简略地向我们介绍情况。帕亚朴大学是泰国的唯一一所私立大学，属基督教教会经办的教会学校。现在在校学生二千八百人，分医学、人文学、社会服务学、理工等六个系。其中医学系已有百年历史，在原有的医学中等专业学校的基础上发展而为大学的规格，有四个系不过十年历史。

接待室的墙上挂着校旗，缀着体现办学思想的图案。泰国的大中小学校，都有校旗，各自体现着本校的治学精神。校长给我们说，他的这所大学教育的中心是学生的心灵，培养学生为社会服务的精神。这一主旨，高于知识，十分明确，毫不含糊。

副校长是一位美国人，高高的个子，银白的头发，穿一件泰式无领的短袖衫，十分安详地陪坐着。他很谦和地笑着，自我介绍说，他

已七十二岁，在清迈的帕亚朴大学任教有三十八年历史。他年轻时在上海待过几个月，后来来到泰国，定居于北方的清迈，一住就是三十八年。清迈在泰国，是一个偏远的城市，现在不过三十万人口，而在泰国经济发展较快的六十年代以前，可以想见清迈会是怎样一种落后状况，这位美国学者安于偏僻和落后的北方城市，不能说没有一点事业心吧?

许是在泰国工作时间久长了，这位美国人的言谈举止，似乎已不像西方人的神态，比较起来，显出一般泰人彬彬有礼的谦和之态，使人在感到一位宽厚长者的同时，又有点东西合一的滑稽，尤其是那一件泰式无领短袖衫。

参观罢校园，在小礼堂用午餐。校方的执事人很爽快地对我们说，按基督教学校的规矩，每顿饭前必行祈祷，中国朋友可以不受此规约束。他们静默站立，有一人领头说了一句泰话，大家都画了十字。领诵的人向我们翻译出祷词的内容：请主赐给客人一顿愉快的午餐。他们自己先笑了，我们也都笑了，似乎有点滑稽。

饭后，学校文艺队为我们演出。头一个节目，是一个舞剧的片段，一对男女争取婚姻自由的舞蹈，十分优美，男女主角穿古代泰族服装，有尖顶的头盔，典雅优美，使人想到宫廷舞蹈。次一节目由四位女生表演，四种不同的服饰，表明是泰国北部的四种民族，看上去十分眼熟，无论服装，无论舞蹈语汇，都颇类中国南部云南少数民族的舞蹈，看来格外亲切。种族的类似和风俗的类同以及肤色体形的近似，我毫无异国的陌生感觉，沉浸在一种谐调的亲切的家乡氛围中。最后一个节目是中泰友谊舞，尤为感人，表演者一男一女，男的为中国南方农民，女的为泰族妇女，他们相厮相随，男耕女织，亲密无异，一种古朴的田园诗般的韵味。这使人感到，在基督教办的大学

里，学生们也很珍视中泰人民的友谊。因为这个舞蹈显然不是临时排练的，而是他们学校文艺演出队的保留节目。

访问的内容排得紧密极了，演出一结束，不离现场，就在小演出厅里摆好桌子，开始座谈。

帕亚朴大学参加座谈的人员有十六七位，全是人文科的系主任和教授或副教授，好多人看去相当年轻，不过三十的青年，都已具有教授或副教授的头衔了。

这些人文系的教师们，对中国的文学现状了解甚少，他们的问题多是关于中国的创作自由问题，中国作家进行创作的哲学思想，中国一九四九年以前和以后的文学创作的异同，中国当代文学创作的现状，以及中国翻译外国文学的限制措施，及至中国现行的稿酬制度等等。

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而造成的现状却令人遗憾，中国当代丰富的创作以及许多颇有影响的作家，在泰国这样的高等学府里，也鲜为人知，更少（几乎没有）有当代作家的作品翻译为泰文。他们熟知诸葛亮和周瑜，也知晓巴金，而对当代活跃的作家却不大了解。从此来看，中泰文学交流仅仅只是一种交往，而更重要的交流有待进一步发展。

下午又参观了公立清迈大学。

晚餐是由清迈大学出面招待的，一位副校长从曼谷乘飞机赶回来作陪。他没有蓄发，光头，一双眼睛闪着过人的聪灵之光，一看就是个精明干练的人。他热情洋溢，致辞说，中泰两国友谊是几百年前开始建立的，可谓源远流长，与日俱增。我在北京访问时，没有陌生

感，像是串门走亲戚。文学交流是增进两国人民友好交往的重要渠道，文学打破了国界。

我相信他的话是真情实感，因为我在泰国的感觉与他在北京的感觉是一样的。

和我邻座的一位女青年，浓密的黑发，白胖胖的圆脸，讲一口比较流利的北京话。她的名字叫蒋嫦娥，华裔，父母都是华人。她刚刚从北京语言学院毕业，在清迈大学人类学系任中文教师，不过三四个月，是八月从北京的语言学院结业回泰的。

她说在北京学习四年留下难以忘怀的印象，她常常做梦，梦见北京的自行车的河流。在北京的四年学习生活，除了冬天寒冷的气候有点难撑，其余都能适应，都很愉快。她说她骑自行车在北京穿街过巷，谁也认不出她是泰国留学生，跟在自己家里一样。临近毕业，她到西安，在陕西师大做客三四天，游览了西安的古迹胜地，对师大饭堂的绿豆粥和糖醋排骨印象很深，十分可口。

十二月二十七日

清迈

清迈是泰国北部一个最大的也是最古老的城市。

清迈北部环山，气候清爽，在炎热难忍的雨季里，是人们避暑的理想城市。

仅有三十万人口的清迈，比曼谷清静优雅多了，没有曼谷大街上那流水般的小车的景象；大街上空荡荡的，没有拥塞的压抑感。街道

宽敞，街树和草地碧绿，我在这个城市的街道上漫步一阵儿，感到自由自在，浑身轻松。

参观象山。

公路盘旋着通进一座山谷。路边有许多苗族妇女和小伙子，摆一张小桌，陈列着木雕的大象、麻或布的手工织物、银制的项链等，招徕过往的客人。那些甚为精巧的织物，图案漂亮，大红大黑大绿，色彩强烈，摆在身旁的大青石上，任客人选择。

象山专门是为游客开辟的一座游玩场所。主人是一位中年妇女，穿着泰人妇女宽大的短袖衫，给我们介绍了她的象山的情况。她养了十几头象，雇了几个管理工。门票四十铢，相当于人民币五元，最多时每天接待四五百人，可收入二万二千铢。管理大象十分简单，几近无管理状态，大象自己在山上自由觅食，自由择地歇息，天明时，一个个准时回来，开始一天里应干的工作——为游人表演。

一个个泰族青年，分乘一头大象，不搭鞍架，双胯骑在象脖子上，手里拿一根树条，击打象耳，赤足踢着象的耳背，从山坡小路上下来了，看来指挥大象行动的标志是击打它的耳朵。

一头头大象从山坡上下来，进入溪流，或立或卧，恣意洗浴，赶象的小青年仍然骑在象背上，用一只吊桶从溪流里汲水，泼到象背上，洗刷得干干净净。

大象的表演只有一个节目：拖木头。木头是真木头，不过全是为表演准备的，分别藏在山坡的几个角落里，用一根绳子挂在象脖上，再用铁索穿过木头的钻孔，由小青年指挥着拖回场地中心来。卸下木头，由一只体形最大的公象做整理工作，用鼻子一下一下卷起来，堆

摞整齐。这只大象，是象族的班长，两只刚刚露出唇边的断牙，很有一股雄伟气概。女主人介绍说，这头大象，夜栖在山上，被贼用酒泡的食物麻醉后，偷锯了两只美丽珍贵的大牙。丢失大牙后，它躺在山上，不吃不喝，整整哭了一天，颇为动人。

游客来自世界各地，男女老少，都兴致勃勃地拥到象山来，看大象表演。大人和小孩，手里提着在门口买来的香蕉，扔给大象，它一摆头就吃了。从无象的国家来的游人，能给象嘴里塞一根香蕉，也是一种乐趣。这些大象每天早晨如时回归，情愿接受人们指挥着去表演一番，其原因大约在于游客手里那一串串奉献的香蕉的诱惑吧?

乘骑大象需再买票，排队。象背上置一只双人木椅，供没有坐骑技术的游客享受。我坐上去了，是一只最调皮的小象，它不耐烦像那几头老象那样慢腾腾地扭动，就超过它们，很快地走完了一下一上一段半圆的山路，那椅子的后背磕得我的后背好疼。我算是骑了象了。

轮到未央先生上象的时候，正好与一位欧洲女郎同骑同椅。那位女郎大约来自欧洲的某个无象国家，充满了好奇，一爬上大象脊背，惊喜不已，和未央拉话，可惜未央不懂英语，无法交流。泰国朋友和我们都开未央的玩笑：未央交了桃花运！天赐良机与金发女郎邂逅，不虚此行！有人给未央即兴献诗：

泰国大象雄奇无比，

驮负着欧亚两块大陆，

地球太小了，

亚细亚和欧罗巴装在一只象背上……

花园饭店，一位书店的老板设宴招待我们。

说她是老板，其实只是一位小姑娘。在初到清迈的头天晚上，清迈大学设宴座谈的饭桌上，我们已经相识了，大家对她留下一个明显的共同的印象：女强人。

她的表象没有强人外露的征象。她个子不高，瘦瘦的，平直的黑发齐着脖颈；瘦小的脸膛是白皙的，鼻梁上架着一副白色镜框的眼镜，而眼睛却是纯净而又专注的。初次接触，很容易使人发生错觉，她太像中国姑娘。在中国的大学校园里，你很容易找到这样穿着朴素干净而又纯净自尊的姑娘。

然而她已经是清迈城最大的一家书店的老板了。

清迈城议长先生在座，很自豪地向大家介绍这家书店和这位女老板。

她的父亲，过去一直是报纸推销员，一生也没有创立起太显著的家业，死后留下三个女儿，生活陷入困境。三个女儿很有志气，开办书店，创家立业，经过几年奋斗，现在已经创立下清迈城颇具规模的一家书店。

我们已经参观过这家书店，主体楼房很漂亮，一楼和二楼都是营业厅，面积不少于西安市钟楼旁的那家最大的书店。多数图书，低架两面摆置，任何顾客可以自由选择、翻阅，营业员游散在书架之间，时时照顾顾客买书。除泰文版图书外，经销英、美、法、日等国的大量书籍和杂志。她和外国出版商订有合同，在这里推销。

她介绍说，父亲死后，家道艰辛，姐妹三人创办书店的过程，始终得到议长先生的热心支持。这位议长，在清迈是很孚众望的一位人物。他自己开报馆，出版《清迈日报》，又身兼议长，做许多有益于人民的社会工作，清迈大学聘他为校委会委员。议长先生访问过中国，十分热情，自我们踏入清迈的头一天，他就陪着我们访问，一直作陪到底，不厌其烦。是一位精明而又敦厚的议长。

小姑娘留学英、美，通晓英、法语言，正在学习中文，尤其喜欢李白、王维的诗歌。她说，在世界上众多的民族语言中，华语最动听，说话像唱歌。每听华语，都有一种优美的音乐感。她觉得遗憾的是，在她的书店的书架上，没有中国的出版物，并希望日后能经销中国的图书。

十二月二十八日

清迈

环抱着清迈城的山是美丽的，清葱葱的树木，盛开的野花，看不到裸露的地皮，得天独厚的热带气候，使花草树木的族类得以自由地繁衍。

汽车在山间盘旋而上。这山叫素贴山，山顶有一佛寺，叫双龙寺。去双龙寺的路上，顺便看了一座山区的街镇，因为是苗族聚居区，我叫它苗族一条街。

苗族一条街，竟是一条难以预料的繁华的小街。

一条坑坑洼洼的公路，通到山的高处的一个洼地里，一条窄窄的小街，两边开店，有构造精致的固定的铺店，也有临时游动的华丽的

伞篷车，还有就地摆摊设点的地摊生意，拥拥挤挤，排成一条曲曲拐拐的山间小街的街道。

店铺里、篷车中和地摊上摆着的物品，多是金银首饰，宝石钻石，象牙雕刻，虎骨熊胆，玉石器玩，名贵药材，鲜花野花，铜钟摇铃，春宫画片，歌曲磁带，各色衣服（民族服装和流行服装混杂一起），展示一种只有在此处才和谐的异地风姿。

街道上涌流着各色人种，欧美的白色男女，黑色的非洲兄弟，头上包着厚重布巾的阿拉伯人，打着红色俏点的印度女人，都在这种小街上闲逛。

我们走进一家小店，铺面柜台上插着两只完整的象牙，金黄色，摸一摸，溜光。主人是一位老头，瘦瘦的脸颊，一副金丝眼镜。他把象牙放到柜台玻璃下，轻轻移动，隔着玻璃，我就看见一只小黑点在象牙上闪现。其实象牙是洁净无瑕的，老人说，这是鉴别象牙真伪的最简单的办法。

“先生从哪儿来？”

“北京。”

“我也是中国人。”老头自我介绍，“我从云南来，好几十年了。”

这条街上，有好多中国人，有汉族，也有苗族，还有藏族，他们是从云南过来的，有的是解放前来的，有的是解放后来的。这里的汉族人，有些是解放前夕国民党的逃兵游勇，而后来落脚此地，做个买卖。

这个小街，类似于三不管的僻远之地，走私贩毒，也少所忌讳。

小街顶头，连着一个苗族人居住的寨子。山洼里，散落着一幢幢木屋，铁皮盖顶，木板筑墙，全是黑色。

我们走进一家屋门，门口的泥巴火炉里燃着火，一位老汉在火堆里挑拨着，像是寻找什么煨在炉灰里的东西。一位中年男子，看见我们进门，也不招呼，就从里屋端出一个木盘，木盘里盛着抽吸鸦片的烟具。

中年人解开一个小包，小包是细薄的塑料纸，里头包着一团黏泥样的黏稠的东西，紫黑色，这就是鸦片烟。鄙人第一次看见这种东西。我的家乡陕西关中曾经是盛产鸦片的地方，小麦和谷物废弃了，乡民们种鸦片卖钱兼自抽。我所生活着的村子的老人，常在闲聊中谈起种植鸦片的景况，令中年以下的人迷惑莫解。新中国成立后，这种只具有药用价值的毒品，早已从富饶的关中平原上的田地里铲除尽了，只是限定在一些药物种植场栽培。我至今也没有见过一株罂粟的植株，更没有见过制成的鸦片烟了。

问及他的家庭，他说他只有一个老婆，父亲死了，在门口火堆里挑拨着什么东西的老人，是他的岳父，同室而居。他有三个孩子，两女一男。苗族通行一夫多妻风俗，他没有娶小。他的女人出工去了，未能见到，这儿的风俗也奇特，女人出山种地，砍柴；男人在屋做饭，管孩子，吸毒。

我们从小街上返回的时候，又撞见了中年苗族人，他从腰里掏出一只精致的小盒子，装着红的绿的宝石，问我们要不要？瞧着他黄里透黑的脸孔，我摇摇头，心里想，一个专营贩毒和吸毒的民族，会有什么出息呢？

……

沿着苗寨一条街往下走，返回时，我已没有来时那样高的兴致，姗姗地走着。

一家铺店的门口，站一个女子盯着我看，怯怯地笑了，开口问："您从哪儿来。"

我站住，答："北京。"

女子又问："你是个人旅游，还是代表团？"

我说："代表团。中国作家代表团。"

"呀！你们是作家！"小姑娘有点惊喜地笑了，笑容覆盖了那脸上的怯怯之色，这才自我介绍说，"我从台湾来。"

"噢呀！"这回轮到我惊喜了。

她告诉我，她出生在台湾，母亲是天津人，父亲是上海籍，解放前随父母到台，几十年了，总是听父母说家乡的记忆，她却只是一片想象的幻觉。她的爷爷临终时，念念不忘故乡，终未能看一眼，已成遗愿了。

"你没回过祖国吧？"

"没有，听说大陆很苦，我怕吃苦。"

"什么时候你回去看看就知道了，不会的。"

"听说'文革'中把人当'牛鬼蛇神'斗争……"

“已经过去了。现在，祖国有很大发展和变化。”

小姑娘说，她在一家公司工作，高中毕业，未能进入高等学校，随之就业了。她们一帮十来个青年男女，自费出来旅游，胸上贴一块“快活旅游”的纸牌。

“我可以与你合影吗？”她笑着问。

“好的。”我说。

她站在我旁边，向那位同行的男青年示意，男青年举起照相机。

照完相，她走到男青年跟前，却又怯怯地问：“我照相……不要紧吧？”

我的心头闪过一道阴影。

我连忙安慰她：“没关系！”自己心里也更加觉得难受。

那位男青年安慰她说：“没事。没关系。不要紧。”

她似乎稍有宽解，向我介绍那位男青年，他是他们旅游团的“团长”。

随之，他们十来个青年男女全拥过来，我们的作家也走到一堆了，在泰国的山区的一条苗族小街上，大家畅快地谈起来，不用翻译。照相，另一位小姑娘已经哭了。

我的心里也涌起一阵阵激动。

我们相逢在异国。我们毕竟是同胞。

……

晚饭是一餐别具风味儿的民族饭。

这是一家刚开张两天的饭店，甚为豪华，自然是私营的。地板上铺地毡，客人坐在地毡上就餐，饭菜连盘送来，置于地毡上。服务员一律是刚刚经过严格训练的青年男女，给客人送酒送菜，先跪后递，彬彬有礼。

我们来时，已经换上了他们赠送的民族服装，短袖，圆领，左胸一个小口袋。下襟两个大口袋，布是蓝色的家织土布。许是因为我们人多，被安置在一长排矮桌前，坐在矮凳上，每个人一只倚枕。倚枕是很大的一个软硬适度的三角形，累时可以挟在腋下，侧身倚着，歇息一会儿，颇为舒适。

纯粹的民族风味的饭菜。菜用黄釉瓷盒盛着，米饭则装在一只竹篾编织的小篓里。不备筷子，也不备刀叉，米饭要用手挖出来，捏成一团，再摊开，夹上菜吃。菜也要用手捞出来，夹进米饭团中。吃着这样的饭，自然有趣，可以亲身体验一下古远的泰族人的生活习俗。

饭厅的小舞台上，正在演出民族歌舞。

有一个击鼓的舞蹈，很有气魄，两个演员抬一面大鼓，抬鼓的杠子有两把粗细，叉开双足，站立在舞台上。一名演员，一身黑色的民族服装，短袖衫，吊裆裤，动作潇洒地击捶大鼓，一会儿用拳擂，一会儿用脚踢，时而用肘碰，时而用头撞……总之，用身体各个部位去击鼓，动作灵巧而又豪壮。

进入这个饭厅，听到的是民族乐曲，看到的是民族舞蹈，穿的是民族服装，吃的是民族风味的饭菜，使人充分感受到泰民族的气氛。

食之将毕，演员们从两边走下台来，向客人做鞠躬状，邀请客人上台跳舞。陪同我们的议长先生说，这是不能违背的。于是大家就登台了。

台子一侧，乐队正演奏优雅的泰国民间舞曲。我们模仿着演员们的手姿和脚步扭着。那些欧美白色人，早已登台扭起来了。议长先生身体魁梧，却不显笨，跳起民族舞来，竟然优雅而自豪。整个台上，食客和演员融会在亲密的气氛中。

这样别出心裁的饭店，令人难忘。

我们下榻于清迈城外圈的一家私人经营的宾馆，和在曼谷的宾馆一样，服务之周到是令人感觉特别明显的。汽车刚停在门口，男服务员就赶到车前了，从车里卸取行李，一当问清房号，拎起箱子就走了，到客人开门时，箱子已搁在门口。领取房间钥匙的值班的女服务员，总是笑容可掬，殷勤而耐心，很难看到大而化之或是冷冰无礼的脸孔，真是训练有素。

四楼之上的七楼，是营业性质的浴池。

我已经从华文报纸上多次看到过曼谷的浴池所做的广告，起初尚弄不清，后来就明白了那些赤裸裸的措辞，正因为过于赤裸裸，反倒使人一下子难以理解。说真话，我自能读得报纸，至今没见过这样的广告，所以难免吃惊。

几乎占有《中华日报》十二月二十四日整个一版的广告内容如下：“昭拍耶大浴室第三分室开幕之庆——轻摸细擦，妙在其中——即日起为顾客真诚服务，欢迎参观赐教。”整个一版的三分之一的版面，刊登着十位女郎的照片，只着三点式紧身衣，裸身袒胸，笑站一排。

就是这些妙龄女郎充当这家浴池的搓澡工。类似的广告有理发女郎的半裸照片，有伴游社里女郎的半裸照片，有些广告的语言已经具有更明显的挑逗性，以此招徕顾客。

我们几个决定上七楼浴池去看看。

电梯门启开，踏上七楼地板，一眼瞅见，营业室的半边，是全部用玻璃嵌镶的两道隔墙，与墙壁组成一座玻璃小屋。里面有三四层台阶，铺着红地毡，大约有二十几位女子坐在台阶上，身着白色裙衣，胸前印着红色号码的标记。她们有的编织着织物，有的玩扑克，有的端坐着，有的在闲聊。室内安置一排沙发，供来客休息。一位管理人员，坐在沙发上，面前一张小桌，一个登记本。那人脸皮黑色，一双鹰一样的眼睛。我在中国古戏舞台上看见过的妓院老鸨的眼睛，就是这种神色，大约世界上的老鸨都是这样气色的眼睛。

玻璃墙外，有两个男人朝里头死死瞅着，然后给那女鸨说了一句，女鸨在本上登记了，然后喊了一声，大约是叫号。这时，一位女郎从门里走出，搂着那位男人进入走道里去。

问那女鸨，说收入大约四六开成，浴女占四成，门票大约为五六十元人民币。

据说房间里设浴盆，又设一床，女郎除搓澡之外，并不拒绝浴客的其他要求。实际上，浴女是合法职业，兼营卖淫。

我坐在沙发上，心都紧缩了，看一看这个格局，我立即反射出“拍卖人肉”的感觉。这种场面，甭说看到，连想也想象不出来，竟是这样赤裸裸地拍卖人肉。我们的感官和心理都无法承受这样的强烈刺激，匆匆离开了。人的价值、人的尊严、人的个性和人格，关于这些方面所形成的我们的观念，一下子受到赤裸裸的完全相反的观念的抗战，我们的直觉很不好受，连多看一眼的力气也没有了，太可怕了。

十二月二十九日

素可泰

素可泰，是泰国历史上建立第一个封建王朝的古城，史书上称为素可泰王朝时期。素可泰，在泰语里的实际含义是：幸福开始。

从清迈出发，越过北部低矮的山地和丘陵，越过青青苍苍的常绿的丛林，到达离素可泰古城二十公里处的彭斯洛府，这是泰国的一座新兴的省城。

彭斯洛府有一所最高学府——斯那卡林大学的一个分校，称为彭斯洛大学。斯那卡林大学有十一所分校，散设于南北各地府城里，总校在曼谷。陪同我们的泰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平开女士，即在此校任教，做副教授。她的丈夫是该校的副校长。彭斯洛分校现有学生二千多名，在十一个分校中居第三，现在正筹备扩大校舍，增设农学、水利、动力等系。我们看了整个学校教学秩序的录像以及要扩建的新校址的进展的录像。之后，主人带我们去看看大学生的生活宿舍。

宿舍楼在校园一侧，按照泰国人的生活习惯，进门先脱鞋，虽然感到麻烦，还是遵守着脱了鞋。是的，我们到寺庙参观，到一些新结

识的朋友家做客，都在进门之前脱下鞋来，出门时再穿上，感到了麻烦。在泰国的宾馆和饭店里，那些训练有素的男女服务员，衣装洁净，却一律打赤脚，不穿袜子，脚指甲修剪得很齐整，一律涂成鲜艳的红色——是这里的生活习惯。

男生宿舍楼里，有一间娱乐室，坐着几十个纯一色的男孩子，自然全是赤脚。有的玩棋，棋子上标着一些动物图案，不知是什么棋类，弈者却玩得全神贯注，津津有味。有的在打扑克。多数孩子在看电视，电视上正在播放着拳击比赛的实况录像。我已从华人报纸上看到，泰国拳击大赛于日前刚刚结束，泰国的拳王击败了所有国内外对手，取得胜利，引起整个民众的强烈反响。这种激动人心的时刻已经过去，学生们依然热情未竭，兴致勃勃地收看拳击比赛的实况录像，不住发出赞叹。在和平年月里，体育竞赛是最容易激发民族热情的一个项目，在世界各民族都是这样。

男生宿舍，十人一室，门上贴着居住者的照片和姓名，便于别人寻找吧。室内置床，分上下层，铁架床，只占屋子的三分之一面积，其余地方，留下宽敞的活动场地。地上搁着正要洗的衣服，桌上和床上，衣服和书籍以及洗漱用具，看去有点零乱。男孩嘛！都这样。

正墙上贴着一张金发碧眼的白种女人的裸体照片，除了在两腿间置一丛鲜花遮掩其阴部以外，这幅裸体照片就算裸得最彻底了，一丝不挂，两只丰满的乳房现出弹性和质感。据说，泰国的出版法规定，除了男女的阴部不能裸露以外，其他都算合法的。

又一间男生宿舍，门上贴着十个白种人的照片和英文名字。问：是留学生吧？校方主人笑答：这个宿舍的学生选了各自喜欢的一位世界名人，有歌唱家，有足球明星，代替自己的相片——他们开玩笑。

宿舍楼内有室内浴池，楼后有露天冷水浴池，冷水浴池设备很简单，只有一个石棉顶棚屋，下置一个大水泥池。另有几个大缸，全注满冷水。备有几只水瓢，浴者用瓢朝自己头上身上浇水，冲涮一下，消除热暑，想必是舒心的。

校方主人很抱歉地告诉我们，他不能带我们去参观女生宿舍。他解释说，在他们学校里，规定男生不得进入女生宿舍，无论公事或私事，一律不得进入，违者算严重违反校纪。每周规定一天，女生宿舍开放，可以容忍男性学生进入。今天非开放日，他不能进去，中国客人也不能进去了。这种禁忌出于怎样的考虑，主人没有说，我们也不便问，总有自己的道理吧！

校方介绍说，这所大学是为穷人的孩子开办的学校，好多学生来自泰国东部高原和北部山区的穷乡僻壤，享受公费教育，在此就读。尽管校方的教育目的是培养为社会服务的人才，然而学生毕业后的就业率却不太高，大约只有百分之二十的学生毕业后能够找到职业，其余百分之八十的毕业生，需得等待机会和自己去寻求，究竟什么时候能找到一个稍可满意的职业，就不大好说了。

……

参观彭斯洛府的素可泰国家博物馆。

这个博物馆，向一切企图了解泰国和泰民族的人展示出这个国家最早的经济形态和文化形态，无疑是了解今天的泰国发展演变的最可靠的历史依据。

泰国第一个封建王朝——素可泰王朝——建立以前，有关泰国的历史发展只能依赖于中国史书零星点滴的记载。没有办法，那个时

期，泰国尚没有文字。

公元二四五年，即中国的三国鼎立时期，吴国官员朱寨和康泰出访扶南（今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后，在他们著述中，提到过今天的泰国地区的金陈（或金邻）等小公国，这是中国史书对泰国地区国家最早的文字记录。

公元六世纪，在今泰国中部出现了一个堕罗钵底国。南部沿海，先后出现了四五个互不来往、自行其政的小公国，无异于奴隶制统辖的小部落或公国。

十二世纪，湄南河下游出现了罗斛国家，此当中国宋朝。罗斛国于宋政和五年派使访问中国，遂开两国商贸和友好往来，并送给中国第一头泰国大象。

素可泰王国正是此一时期出现于湄南河上游的小公国。与其先后出现的小公国还有，以清迈为中心的兰那泰王国，以帕耀为中心的帕耀国。兰那泰王国是中国史书所载的“八百媳妇国”，传说国王有八百妻室，每人各占一寨，因此而名之。兰那泰国势最强，以清迈为都。素可泰当初是无法与之匹敌的一个小国。

素可泰三世王坤南甘亨时期，国势大增，不断扩展，一直伸展到湄南河流域，甚至到南部马来半岛。到十三世纪末，三世王建立了以素可泰为都城的强大王国，邻近的小公国一一被征服，建立起泰国历史上第一个统一的封建王朝。

坤南甘亨王在位四十二年，盛极一时。泰国人无不知晓这位君王。在他的诸多建树中，尤其伟大的功勋是创造了泰族的文字。公元一二八三年，坤南甘亨国王召集国内文人学士、知识贤达，将泰国地

区流行的各种文字，根据泰族语言的特点，进行吸收、改造、修订，创造出一种统一的文字来，成为泰国独特的民族文字。泰族有了自己的文字，对于泰族的发展所具有的伟大的意义，是不言而喻的。一个没有文字的民族，将是怎样一种可怕的状态！文字是火，文字是灯盏，它的出现，将把光明第一次洒向整个民族的历史和未来，将照耀着这个民族不断前进，摆脱愚昧，走向文明。一个产生了自己的文字的民族，就成为一个不可征服和消灭的民族。泰国的历史所给予坤南甘亨国王的重要地位是不言而喻的。今天的泰语与坤南甘亨王所创造的文字几乎无甚差异，可见其创造的强大的生命力和伟大的神力。人民熟知坤南甘亨，崇敬这位君王，是必然的。

展室里的第一件展品，是一块碑石，四面四棱，上面刻着密密麻麻的文字。文字的内容大约是素可泰王国的史实以及开发和征战的光荣业绩。这是泰国第一次用文字记载的历史遗物，堪为国宝，原物保存在曼谷的国家博物馆里，而文物的出土地——彭斯洛府，只能保存一个仿制品。这块碑石的发现，应该说是一个伟大的发现，它的出土，使一个民族发现了自己。

素可泰王朝盛极一时，建成了比较规范的封建制度的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和规章，创造了泰国历史上从奴隶制的诸多公国过渡到封建制的第一次文明和繁荣。这一点，从保存下来的大量佛像中表现得十分突出、鲜明。素可泰时期的佛像，一个个都塑造得丰满、从容，神态安详和悦，线条圆滑柔和，体态轻盈，面部漂亮。令人惊异的是，眼睛全都睁开，与我们所看过的后来几个王朝时期的佛像截然不同，那些佛像的眼睛，几乎全是半闭的，目光下坠。于此可以想见，素可泰时期经济繁荣，人民生活安逸，一片升平景象。尤为罕见的是，一尊举步抬足呈走动姿态的佛像，一脚着地，一脚抬起，飘然

若仙姿，面露欣然微笑。佛像见了不少，多是呆呆地坐着，或是木然地站着，亦有卧佛，都看过了。这尊飘然仙姿走动着的佛像，真是对佛门那种循规蹈矩的站坐习惯的一个反叛，佛成了人了。

在这个王朝的历史遗物中，有性生殖器的石雕造型。佛教对性生殖器的崇拜，从形成这个国家的时候就存在于祖先的意识之中，它崇敬的是人类自然属性的本能，而把一切羞羞答答的遮掩都撕掉了。这类赤裸裸地雕塑得十分形象的崇拜物，十分普遍。

当我们再去观瞻一尊被泰国朋友称为世界上最美丽的佛像时，真为这尊佛像漂亮的神态造型所感染。在这座寺庙外的广场上，我遇到两个年轻的小和尚，他俩正在买彩票。我与之交谈，其中一位高个的和尚说，他原是一个油田工人，刚刚入寺当和尚，仅有三天的时间。看看他的秃头，似乎不假，那头发剃掉后留下的印痕可以证明。他说，再有四天就结束和尚生活了，他仍回油田去当工人。另一位瘦小的和尚，看去不过十六七岁，他说他要当十年和尚，再返俗归家。泰国佛教兴盛不衰，堪称佛国，每一个男性公民，都必须过一次和尚的生活，接受佛教的训示，不过时间不限，可多可少，少则几天，多则几年以至终生，全由个人选择。未婚时可以去当和尚，结婚后仍然可以去当和尚。

和尚是受整个社会崇敬的。在曼谷和清迈，每天清早，太阳尚未露脸的微明中，这条街或那条街，都能看到身穿黄色袈裟的和尚，手托缘钵在化缘，挨着一家一铺走过去，由各家主人随意施舍钱物和食品供一天食用，每天如此，因为和尚是不动烟火也不办食堂的。

人们对和尚的施舍是慷慨的、虔诚的，那是为着积德行善，以修阴福。

我们在参观诸多的寺庙时，一位泰国女作家，见佛必拜，神态虔诚。我问她：你这样做，有什么感觉？她笑着说："我拜叩一次，心里就有了一种安全感。"

当然，我一时是无法理解和体味这种心理感受的。不过，人都乞望在每一天的生活里有一种安全感倒是真的。

十二月三十日

素可泰

这就是泰国第一个封建王朝——素可泰王朝的遗址。

断垣残壁，折断的石头立柱，石头铺垫的走道。所有这些残留的建筑物，全都是一种马蜂窝状的石头，红色上结着黑色的锈斑。据说这东西原本不是石头，是一种泥土，一种奇异的泥土，垒墙立柱之后，风吹日晒，渐渐地由稀软的泥巴而变为坚硬的石头，有如水泥。

这就是八百年前鼎盛一时的素可泰王朝的王宫遗址。这儿曾经是一座富丽堂皇的宫殿楼阙。这儿曾经有过宫女娇娥翩跹的舞姿和欢愉的歌声。这儿曾经发出过国王征服邻国的军令。这儿……现在是一片废墟！

城内有城河蜿蜒绕流。近年间，从飞机上鸟瞰，才发现了古河流的踪迹，开始挖凿已经干枯淤塞的河道，引进流水，才恢复了这一泓清流，立即使荒凉的王宫恢复了生气，恢复了活力。二十年前，国家开始修复古城，每年逐次拨款，逐渐恢复。现已遍植草皮，绿茸一片，树木已经粗壮，遮下一片绿荫。庞大的恢复工作尚待时日。任何

一个民族都珍重自己的历史遗迹，不惜破费财力物力去重现当年的盛景。

汽车沿着古城的城墙开行，可以看到城墙坍塌以后所留下的土堆，长满了杂草和藤蔓。城墙平行三道，中间夹两道城河，可谓防备森严。整个古城呈四方形，每面开城门，就有东西南北四个大城门，现在可以看到的只是一堆略呈白色的土堆。完全可以想见，古城当年的雄伟姿态。

当我徜徉在清清的水畔，绿茸茸的草地上，残垣断柱的王宫宫殿废址上，我的脑子里浮现出一幅悲壮的画面：

从中国云南的丛山峻岭中，正有一队队浩浩荡荡的傣族人，大象开路，壮男执矛捉刀，杀死侵袭的土著，砍开热带丛莽中的藤萝，辟出一条路来，保护着妇女和儿童向南前进。这就是苏联学者柯尔涅夫所描述的惊心动魄的傣族南迁的悲壮画面。这种民族大迁徙的行动从中国的唐朝时期就开始了，一直断断续续延续了几个世纪。这些傣族人在湄南河流域的肥沃土地上发展壮大，最初形成了小小的素可泰部落，最后发展成为泰国历史上的第一个封建王朝。

泰族是傣族南迁的结果，这种理论，连泰国的历史学家也是这样肯定的。只是到了近年间，考古学家在西北部的杜赫洞穴里发现了打制的砍伐工具，磨制的矩形石斧、石刀和蝇纹陶器，堆积的植物和播撒的种子，才证明了泰国境内的杜赫人存在并从中石器时代向新石器时代发展的历史。现在，泰族即傣族南迁的后裔的构想被怀疑了，动摇了。

素可泰王朝先后十二次派使前往中国的元朝政府，可见交往之密切，而中国元朝的统治只不过百年的历史。中国元朝的使者于一二九三年和一二九五年先后访问了素可泰王国，增进了了解。

素可泰王朝有整整二百年的历史，坤南甘亨之后，他的子孙腐败无能，国力大衰，终于为南方新兴的阿瑜陀耶王国所征服、吞并，泰国的历史便进入第二个阶段——阿瑜陀耶王朝。

我曾在阿瑜陀耶王朝遗址的废墟上兴叹不已。因为这个王朝的覆灭也是统治者腐败的结果，招致外族入侵，灭了国。这是一个被许多封建国家的封建统治者重复了不知多少次的教训，无法逆转。郑王在位仅仅短短的十五年，最终的教训也非此莫属。泰国进入第三个王朝——曼谷王朝——以后，又延续了数百年，为新兴的资产阶级议会所取代，现在仍然保留着王朝的形式，进入到九世王时期了。

我从曼谷到阿瑜陀耶，再到素可泰，循着历史的河流溯流而上，终于走过了八百年的历史航道，从那些残留的废墟中，看到了一个民族和国家演变的历史，粗略读完了这个民族的历史教科书。

……

素可泰现任府尹设午宴招待。他中等身材，胸前和肩膀上佩戴着绶带和肩章，一双很自尊的眼神。他对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自己的古老国土，表示出真挚欢迎的情怀，不是虚与应酬的官话。

他说：“在素可泰，没有按摩院，没有搓澡女郎的大浴池。在这个古都里，我不允许那些东西存在。”

按摩院，大浴池，实际都是卖淫的场所。在泰国，这些场所遍及大小城市。他企图保存素可泰古城的古朴遗风，大约不会太容易的。他一定更比我们深知其艰难，仍是要坚持保存一块净洁的圣地，令人钦佩。

他说：“你们在泰国看到了许多在中国看不到的现象。你们是作家，回去以后，怎么写泰国，那在你们。素可泰不允许有那些东西。”

是啊！我已经从他的语气中感知到一缕沉重的东西，他是一个极富于民族自尊的府尹。我在泰国看到了许多好的东西，领受了中泰人民之间的友好情谊，看到了十分完美的服务，也看到了诸如大浴池一类令人难以想象的现象。我是作家，以眼见耳闻为依据，客观地记述我的见闻，这并不影响什么好的东西的存在，因为我接触到的泰国朋友中，他们也为这种不好的现象忧虑，包括府尹自己，也是一样的。

他说：“泰国是个小国，中国是个大国，比起来，泰国与中国这样的大国是不能相比的。但我们是近邻，是亲戚，我们会很好地相处下去。如果世界上各个国家都像中国和泰国这样友好相处，世界就安宁了。”

府尹先生的这个概括是精确的。

我与一位华人同座。

他看去三十上下，讲一口很流利的普通话，人很腼腆、质朴。他告诉我，他是一个小学的校长。这所小学是华人小学，设华语，是素可泰的华人所办的私立小学。在泰国，小学里不开汉语课，华人办的小学准设国语（即华语），但限制在小学一至四年级，再往上，就不许开设国语课了。

因为是私立小学，校长和教员不属国家公职人员，不能享受退休金待遇，所以工薪就高些，他的月薪为四千铢，折人民币五百元，已经不算少了，教员比校长稍少一些。

十二月三十一日

北榄坡

北榄坡，是当地华人给这座北部城市起的名字，许是因为顺口，现在通用了。这座城市的泰语名字叫那空沙万，含义极美，是天堂般的城市。

去北榄坡的路上，我们访问了两户农家。

在泰国，我们已经倒循着历史车轮碾过的辙印，参观了三个王朝的国都遗址；已经访问过大学；已经参观过华人报社；已经看过诸多的庙宇佛寺；已经和泰国作家组织过座谈；唯一缺憾的是没有到农村去看看，而泰国的农民是以怎样的生活形态生活着？泰国朋友满足了我们的提议，把这项活动挤夹进排得满满的活动日程，在去北榄坡的途中，随便找一个靠近公路的村庄去看看。

岔开公路，汽车驶入一条坑坑洼洼的土石大路。路边的水潭里，有一位姑娘在洗衣服。大约二三百米处，有一幢草顶木屋。汽车在打谷场上停下来。场上堆垛着偌大一堆稻穗，金黄金黄的稻穗，等待脱粒，没有任何遮盖苫护的设施。太阳在稻穗上闪耀着金色的光，天空湛蓝如洗，不见一丝云彩。旱季里，这个临近赤道的热带国家，使人感到中国北方伏天里天旱的气象，树叶被晒得发黑发灰了，乡间道路上被车碾足踏的细灰扑扑飞扬。

一座草顶木屋，十分凌乱，到处乱挂着脱下的脏衣和脏裤，农具也乱扔一气，地上铺撒着稻秆柴叶，使人想到刚刚结束了一场繁重的收割之后，尚未来得及整理这一切。

木屋前的树荫下，坐着一位中年妇女和一位老头儿，两人都在忙着织补麻袋。她和他的手里拿着一根又粗又长的铁针，穿着绳子，把麻袋上的破洞补缀齐全。很显然，这是稻谷脱粒前必做的准备工作。女主人壮健、精干，说话很爽快。和中国的农妇一样，繁忙的收获季节是无法修饰自己的，穿着褪色的衣服，头发散乱。那位老头皮肤黝黑，松弛，灰白的头发干燥如草梗，眼睛不大好使，神态有点拘束，一种少见世面的人常有的那种拘束。

女主人回答了我们的询问，介绍了她的家庭。

这家农户七口人，她是女主人，有丈夫和四个孩子，那位老人是她的生父，农忙时节来帮忙的。孩子和丈夫都不在家，忙什么活去了。这幢木屋不是她家的居室，是收获时节临时居住的房子。她家的土地集中于此，离村庄很远，往来不便，每逢收割季节，就暂且居住在这里，收获结束以后，就返回村子里去了。

她家种着七十莱地（每莱地折合中国二亩四分，大约有一百七十亩地了），可以说是够多的了。我生活过的渭河边缘的灞河川道里，人均土地不足一亩，责任制实行以后，一般五口人的家庭不过经营五六亩旱地和水地，靠近西安市区的蔬菜专业队里，还要少，少到只有几分地。

泰国农村的过去类似于中国解放前的农村状况，土地大量集中于少数人手里，大批农民靠租地交租的形式生活着，中部地区尤为严

重，佃农和半佃农占总农户的百分之四十三，生活困苦不堪，农民问题十分尖锐。一九七五年，泰国政府实行土地改革，以政府拨款收买大土地占有者的土地的方式，把土地分配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国王曾带头向土改办公室交献出一批王室的土地。农村问题得到一定缓解。

她说每菜地可以收获三十桶。桶类似于我国农村的大斗。每桶十公斤，即每菜地可以收获三百公斤，共可以收获两万多公斤。对于一个农家来说，收获两万公斤稻谷也不算少了。可是按单位面积算起来，应该说很低，每亩地不过一百二十多公斤。我怀疑她说的是否实在?

除一家人食用外，其余的稻谷全都卖掉，国家规定每桶（十公斤）稻谷三十一铢，而他们常常不能交售给国家，收购量有限制，于是就自己找门路推销，价值往往撵不上国家规定的价格。收割季节，自己忙活不过来时，就请帮工，给帮工的工钱以稻谷抵付。

我们问:“像你这样的农家，在乡村里算富户，还是穷户？”

她立即对答说:“当然是穷人啰！”

随同的一位泰国作家撇撇嘴，悄悄告诉我们:“她根本不是穷人！她就爱哭穷！”

我想，耕种着这么多土地，一料收获两万多斤稻谷；前一料种植豆麦、红小豆、绿豆、黄豆，大约也可以收获两万多斤吧！一年有这样丰盈的收成，穷也许只是相对而言，比起曼谷那些银行家或大生意人，她是很穷很穷的了，在乡村里，起码可以算是一个中溜儿农户

了。哭穷这种心理习惯，看来不仅仅是中国农民独有的心理状态，哭穷以引起社会的同情。

在她的木屋旁边，有一片不小的芭蕉园，果实累累。我们钻进园中，地上挖着一排排小坑，四方形，坑里扔一只椰子，并不覆土，那椰子上长出一条细长的绿芽，下部伸出几条白色的幼根，扎进土壤里。这样栽种椰子，真是太容易了。主人大约在椰子成林以后，就要铲除芭蕉了，芭蕉园就会更替为一个新生的椰子园了。

芭蕉园旁边的割过稻子的田地上，搭着一排窝棚，用稻草胡乱搭着，低矮窄小，人需爬着钻进去，里面扔着被单，门口用石头支着铝锅。我们猜测，这大约是她家收割时雇下的帮工居住的地方，也不知怎么睡觉，蚊子是相当密集的、厉害的。

那位在路边洗衣服的姑娘，就是她的女儿，端着脸盆儿回来了，羞怯怯地远远站着。她受了母亲的指使，到芭蕉园里摘来一筛子芭蕉，请客人解渴，仍然怯怯地害羞，只腼腆地笑笑，不说话，使人很自然联想到中国偏僻山区的那些少见世面的姑娘，真是太像了。

我们又走进另一家农户。

我们走进这家农户的场院时，正有一台满载着稻穗的拖拉机开进来，停在院里。开车的小伙子跳下来，笑着招呼客人。问他这台拖拉机是哪儿生产的，他说是泰国货。我一看，是“泰山牌”，“中国山东省制造”。经点明，他笑了，说他不认识汉字，而泰国的好多商品都有汉字标注，华人较多的原因。

他告诉我们，这台拖拉机属中型，二十五马力，可以搞运输，亦可带上铧犁耕翻田地，性能很好，买回家来没出大毛病。他们村子里

三十户人家，先后购回二十台“泰山”。

一位老人和三四个壮汉姗姗走回院子。老人是家长，精瘦，他向我们介绍说，那几位壮汉，是他的近门兄弟，前来帮他收割的。他们一个个晒得黧黑，手里攥着一柄弯月形的短柄铁镰刀，刀刃上有一排细小的锯齿样的钢牙，赤着脚，裸着臂膀，露出紫铜色的肌肉。那位开拖拉机的小伙儿是他的长子，瘦条条的，和善而漂亮，已经娶妻生子。二儿子不在家，已经订婚了。女儿在家帮忙，尚未出嫁。那位远远地坐在地上歇息的老婆，是他的老伴儿，大约太累了，坐在那里，歪着脑袋，镰刀扔在一边。

他家耕种着八十莱地，收获两次，一料豆类，一料水稻。屋院很大，约有一莱地面积，盖起三幢房屋。南边一座是木顶木墙的传统式木屋，住着他和老伴以及儿女。北边已盖起一座两层水泥阁楼，外观十分漂亮，墙壁涂成绿色，十分秀气，那儿居住着长子和妻子。中间仍是一幢木屋，作为储藏室，保存谷物和农具，凌空而搭的地板下，拴着两头狼也似的黑猪。

老头瞅着那幢漂亮的阁楼，向我算了账，说修盖这一幢房子，大约花去了六七万铢。因为用了原有的一些旧料，所以省一些，如果全部购置新料，需得十万铢。他家除种植稻菽之外，也有一个环绕屋院的果林，产椰子、芭蕉等。另有两个不小的鱼塘，蓄养淡水鱼。这个老人似乎生活得比较自信，没有哭穷。

他的独生女儿领着我们参观旧屋和新楼，长得细高挑儿，穿着紧身的衣服和窄脚裤，已不像在前一家见过的那位羞怯的姑娘。她很大方，向客人主动介绍家庭情况。我却从她眼里看到一缕忧郁的神色。她说，她在城里读过书，中等专业学校毕业了，却找不下工作，在城

里最近一次招工中，考试落榜，未被录用，所以就在家里和父兄种地，以待机会。她还是想到城里去谋职，不想待在乡村，所以婚事也拖下来了。她已经二十五岁，在泰国农村算是稀有的大龄姑娘了。泰国风俗有忌，不许问女人的年龄，这位姑娘是自己告诉我们的，大约心里很孤寂。有了一些知识，经见了城市生活，就不能安于土地里劳作而向往城市生活，这也许是许多发展中国家的乡村青年的共性。

我有一个多余的祝愿潜上心头：愿她尽早在城里谋到一份工作，如愿以偿，退去眼眉中那一缕忧郁的神色。

……

除夕之夜。北榄坡城。

泰国的节日不少。圣诞节、元旦、春节，都要过一过的，不过色彩平淡。泰国最热烈的是民族传统的泼水节。

整个城市的除夕的气氛是平淡的，而一家咖啡厅的气氛却是热烈的。我们被邀去这个咖啡厅欣赏音乐歌舞，欢度除夕，真是别具一格。进入大厅时，翻译孙家驹碰见了这家咖啡厅的经理，这位经理在访问北京时，他给他当过翻译，熟人老友了，他一下子认出了孙翻译。因为这个关系，经理一直陪我们坐在台子右侧的座席上，吩咐侍者送来咖啡等饮料。

我们刚坐定，台下响起一片欢迎掌声。经翻译告诉说，舞台上的司仪向台下的人宣布说：热烈欢迎平开女士率领的中国作家代表团和大家一起欢度除夕。台下的座席上，男男女女，外国人和泰国本地人，掺和着坐在一起，欢度除夕之夜。

舞台上，一个个男女歌星在轮换唱着流行歌曲，一人唱歌，其他演员不用下台，就站在两边陪伴，扭着迪斯科舞步。台下的舞池里，一对对舞伴，合着乐曲，翩翩起舞。跳得累了，就坐下喝饮料，有兴致时，再上去跳。

和我坐在一起的一位华人男子告诉我，他在北榄坡做生意，兼做曼谷一家报纸驻北榄坡的记者。他回北京观光过。他问我对泰国咖啡馆、音乐厅和舞厅的这种生活有何感想？我说这也是一种生活，他直率地说：正经生意人是不逛这些地方的。他自己极少到这儿来消磨。

我记起晚饭时认识的另一位华人，他告诉我，他每年要回国两次，最近一次是八月。他跑遍了中国东西南北四方的许多地方，寻访古迹。他是一位建筑师，经营建筑业务，对中国的古文明兴趣浓厚。他说他的工余生活是研究古物，也不大去这些如夜总会一类场所去消磨。

我们正聊着，伴奏声戛然而止，大厅里一阵哗声，舞池里的人突然站定，一步不挪。这时司仪宣布，抽签开始，由一位女郎抽出一支签，宣布号数。舞男舞女们争相看自己脚下所踩定的号码。中奖者高高兴兴跑上台，领得一块衣料或一件精美的器具。这种活动不断重复，使舞池里欢声不断。是的，在除夕之夜，能得一份彩奖，于心里是一种吉祥的感受。

新年钟声敲响的时候，晚会的气氛达到高潮，乐队奏起泰国民间舞曲，坐在台下的各国游客，一齐被邀请进舞池，扭起优美文雅的泰族舞来。

去年除夕，我坐在收音机旁，静静地等待着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年钟声，心里宁静而又安详。今年除夕，我在北榄坡的咖啡厅里，看着华人、泰人，白人、黑人，拥进一个小小的舞池，在一个曲谱里起舞，颇为动情……

一九八六年元月一日

波特亚

在泰国老艺术家素越先生家做客。

第一眼看见素越先生，我就愣住了，他太像中国作家魏钢焰了。刚坐下，郑万隆悄悄对我说，你看，素越先生像不像你们的魏钢焰?我们俩都有同感，确实太像了。

素越先生六十多岁，红红的脸膛，一头短短的银白的头发，眼睛极富神采，似乎有点高傲，蔑视他觉得应该蔑视的东西；一当他笑起来，却又透出一股豪爽之气，一种高屋建瓴般的气魄；当他和我们追述友谊的时候，却透出发自肺腑的真挚之情，那眼神就显得愈加动人，愈加优美，愈加灼热，比那些爱笑的人笑起来更富于魅力。

素越先生在海滨城市波特亚设家宴招待中国作家代表团，宴席设在二楼一个十分宽敞的楼台上，楼下是一个花园式的餐厅。地上是绿茸茸的草皮。院中植栽着各种奇花异树。小径曲曲直直，把绿色的草皮分割成一块块漂亮的图案。靠墙一角，饲养着珍禽异兽。一座喷泉，喷珠吐玉，在霓虹灯光里呈现出斑斓的色彩。在草地上，散置着百余张桌椅，各方游客姗姗走来，款款落座，用餐饮酒，舒适清爽，怡心悦目。这座饭店是素越先生的干女儿经营的，她很自豪地对我们

说，这座饭店的设计构思是她一手完成的，她喜欢树，所以植了许多奇树。她的丈夫也经营着一座饭店，在山上一个旅游胜地，那是按他的喜好设计的。

泰国作协主席通贝先生特地从曼谷赶来，参加素越先生的家宴。从曼谷到波特亚，汽车大约要跑两三个钟点，通贝先生不辞辛苦，全是对素越先生的一片敬意。素越先生在泰国文学艺术界，是一位德高望重的老艺术家。

通贝先生对素越先生做了介绍，令人感动不已，素越先生早在一九五七年冒死访问中国，成为第一个撞开铁壁的友谊使者。素越先生对我们如叙家常，追怀起近三十年前的往事——

五十年代，泰国政府追随美国，对友好邻邦——新兴的中国——采取敌视政策，反共防共搞得风声鹤唳。素越先生当时为曼谷歌舞团团长，对那些把共产党中国描绘成红脸黑脸魔鬼的简单而又可笑的宣传不屑一顾，他要友谊。

一九五七年，他率领泰国国家艺术团到香港演出，飞机却从香港直接飞到北京。到达北京机场后，有几个团员当场吓得哭了起来。他对所有团员保密，一人独自决策，终于撞开了那道壁垒森严的界墙，把泰国人民的友谊带进新生的中华大地。

素越先生和他率领的泰国艺术团，受到我国政府和人民的热情友好的接待。他和他的团员们，以富于浓郁的泰族特色的表演，走遍大江南北，到处受到热情友好的欢迎。在中华大地上，整整访问演出三个月，领受了我国人民的深情厚谊，他的团员理解他的冒险举动了。

素越先生和他率领的艺术团回国了。飞机在曼谷机场着陆，等待他们的是警察和镣铐，全团六十多位男女艺术家，全部被拘捕了。

审讯进行了三个月，六十多位团员全部获释，唯有素越先生被判处五年徒刑。

回忆至此，素越先生自豪地说：“三个月的拘审期间，我的团员，没有一个背叛我。我在牢狱的几年时间里，也没有背叛一个团员。”

这真是令人自豪的。那不仅仅是一种义气、一种信任，而是一种深刻的理解。人在明白了什么之后，也就有捍卫自己明白了的东西的勇气了。当然，还有一个品质问题。

素越先生整整坐了四年监牢，国王亲自给他实行赦免，减刑一年，提前释放了。国王接见他，赐给他一个艺术金奖，又给了他的夫人一个大奖，算是一种安抚吧。

十八年后，一九七五年七月一日，中泰建立邦交。素越先生已经几次访问中国，真是感慨万千！十八年前视为头等严重的问题，现在失去了任何意义。但是，素越先生的远见和卓识，他的那一颗充满友情的心，他的那种果敢无畏得近似冒险的精神，却不会被人民忘怀，泰国人民不会忘怀，中国人民也不会忘怀，时日愈久，愈加珍贵。

素越先生提议：“让我的夫人唱一曲《黄水谣》吧！她跟我访问中国时，就唱这首歌儿，回来同我一起被拘捕。”

他的夫人已到中年，笑着站起，点头鞠躬之后，唱了起来：

黄水奔流向东方

河流万里长

……

歌声低沉，悠婉，把我带到了故乡的黄河岸边，那滚滚翻涌的壮流，一泻千里；那排山倒海的力量，掀起一堆堆排空的浊浪。在这动人的歌声里，我感到了一种被理解的真诚。

素越先生说起了笑话，把历史的记忆挥斥抛远了。他听说我是西安人，立即搭上话，说他去年带着干女儿访问中国，曾到西安，参观秦始皇兵马俑时，拍了几张照片，想不到给秦俑馆的工作人员拿出，曝光了！

我多少觉得有点遗憾，秦俑馆的纪律是不许外国人拍照，素越先生也被处罚了。我说：“那儿的工作人员，要是了解你，就不会……欢迎你再去参观，一定补偿。”

素越的干女儿笑着，说她太喜欢那些照片了。她是这家饭店的老板，又是一位艺术素质很好的女士。她还想着那些被曝光的照片。

……

波特亚海滨风光旖旎。水是绿色的，绿得像翡翠，一阵一阵朝岸边涌过来，拍击着沙滩。这儿是一个理想的浴场，吸引着各方游人，到这里来洗海水浴，游泳，晒太阳。白种人、黄种人、印度人、西亚人，全都汇集到傍晚的沙滩上来了。女人们只戴一只小乳罩和穿一件窄小的泳裤，除了不能暴露的极小部分以外，能裸露的全都裸露了。人需要用服装来扮饰美，又需要彻底撕掉服装表现自然美，真是矛盾的统一。

从沙滩走上岸，就进入波特亚城的一条主干街道了，统共不过十米，真是太方便了。从沙滩里上来，不过十米，就挨着咖啡馆的高脚圆凳了；从咖啡馆出来，不过十米，就可以跑进海水畅游一番，真是舒适方便极了。

一条街道，不宽也不窄，两边是一座连一座的咖啡馆、音乐厅、舞场。其实，咖啡馆里可以听音乐，也可以跳舞，而舞场里也可以喝到各种饮料的。少数服装铺店或食品店夹在其中，多得数也数不清的是招徕外国游客的咖啡馆。咖啡馆有一排长长的柜台，里面侍候着一位位女郎，游客们坐在柜台外的高脚凳上，一边喝饮料，一边与自己选中的女郎闲聊，到了谈得可意时，就进入里头的房间。

波特亚是一座"无烟工业"城市，卖淫是公开的、赤裸裸的、毫不掩饰的行业。

从街道上走过去，一家连一家的咖啡馆里，那些白皮肤的男人围满了柜台，和泰国女郎调笑。一家夜总会门前，外国白人男子勾搂着泰国女郎在调情。整个街道上，人群水泄不通，拥挤不堪，一个个白人男子挎搂着一个个泰国女郎招摇过市。那满胸黑毛大腹便便的六七十岁的白人老头，搂一个瘦小的不过十七八岁的泰国女孩扬扬得意地挤来挤去……

有朋友问我："感觉如何？"

我说："我感到了作为亚洲人的耻辱！"

我的心情很不好。我感到胸部压抑得喘不过气来。光怪陆离的丑行使我的神经承受不了这种强烈的刺激。人的尊严、人的价值、人的属性，所有我过去形成的关于人的命题的观念，在这儿全都翻了个过

儿，变得一钱不值了。我感到震惊。我感到愤怒。这儿兽性绝对超过人性。这儿是西方（也有东方）人挥霍金钱以排泄秽物的场所。经济落后的亚洲人啊！我第一次强烈地意识到了人类的堕落，穷人堕落，富人也堕落！

我几乎蔑视所有到这条街上来晃荡的白种人，连瞧一眼也不屑。我几乎连看一眼那些被搂着的泰国女郎嘻嘻笑着的脸的勇气也没有。

许是感受皆同，我们只遛了一段街道，就无心绪再走下去，离开了这条街道。

据说，波特亚在五十年代，还是一个荒凉的渔村。六十年代初，美国出兵越南，波特亚是休假的美国士兵登陆的地方。于是，荒凉的渔村被美国兵冲乱了，急骤发展起来一个以卖淫为主的畸形城市。越战结束了，这个畸形的波特亚却保存下来，成为吸引各地嫖客的一个纵欲排秽之地。

据说，这样的城市在泰国仅此一地。这样赤裸裸的公开而又集中的卖淫行当，泰国只允许在波特亚存在。

据说，卖淫之所以久盛不衰，原因有二，解决了一些穷人就业的问题，又是一项极可观的外汇收入。卖淫女子里，一部分是为生活所迫，一部分是为了轻松挣钱……

波特亚还有一绝：人妖。

我们去波特亚一家歌舞剧院看演出。

去看演出之前，我已听说，那些登台的女演员中，有一些实际是男人。我并不太惊奇，男扮女装的演出，我在很小的时候就在地方戏

里看过了。不过，在演出过程中，我还是不由得暗暗观察，企图判别出那几个男扮女装的人来。

演出的节目颇多彩多姿，土的为少，洋的居多，迪斯科乐曲坐庄。

一个短小的哑剧，内容大约是人类在原始状态时期的性恋和交媾。令人惊异的是，一位女原始人从台上走下来，到座厢里拉住一个白人小伙子要亲吻，而且把他拉上台去，参与演出，结局是生下一个现代白种小孩来。

一个女声独唱。女演员长得漂亮，袅袅娜娜，摇曳多姿，目光流盼，羞羞怯怯。乳房高突，细腰丰臀，滑肩细肤，真乃一位佳人也。她唱到舞台左边，左边台下一片骚动；她唱到右边舞台，右边台下一阵阵起哄捧场。她唱得优雅、含蓄。可是，这是一个男人。尽管看不见喉结，看不见雄性的一切特征，这实质是个男人。

又一个节目是一群装扮成各种可憎面目的魔鬼，龇牙咧嘴，牛头马面，令人恐怖。他们同聚一台，在强烈疾骤的迪斯科舞曲里扭起来，节奏和旋律都给人一种暴风骤雨的强烈感受，只是不知其寓意为何。真可谓群魔乱舞，有几个魔鬼又从台上下到座厅里，拉人接吻，被拉者吓得躲避不及。

如此这般的演出继续下去，直到结束，我也没有从那一群女演员中辨别出几个有男性特征的人来。我被告知：所有今晚登台的那些女演员，不管曲线多么柔和，歌喉多么婉转，全部都是男性。

这就是“人妖”。

他们是自愿做了手术，割除了男性的生殖器官，再注入一种雌性激素，男性的特征便消失了，胡须没有了，喉结隐匿了，粗声变为细嗓门了，女性的特征表现出来了，就是台上的那种从外形上完全无异于青春女郎的样子。

演出结束后，观众退出到大街上。那些人妖结伙跟到大街上，与一切对他们有兴趣的人伴陪照相，立照立取，一张相收三四十个铢。他们甚至追着观众，拉人家照相以赚钱。要与他们照相的人确不少，这些人妖便走向世界。

泰国朋友安排我们看这场演出，是让我们了解这个国家的各个方面，不无好处。

“人妖”表演在泰国，也是仅此一家。

说不清这些“人妖”把自己男性变异为女性究竟是什么心理，如果有机会询问一下，对于我们了解这个社会的奇怪现象，不会无用的，可惜没有机会和时间了。

令人惊诧不已的波特亚！

元月二日

曼谷

我们去出席泰国华人作家协会举办的欢迎宴会。

宴会在一家华人开办的甚为豪华的饭店举行。主人是华人，客人也是华人，血管里流的都是一个种族的血，同是生活在一块土地上的

炎黄子孙，从肤色上很难把主人和客人区分开来。说话省去了翻译，直接对话，直接交流，气氛自然就亲切了、活跃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已在近年间一次或多次回国观光访问，对祖国并不陌生，对祖国近年间的发展变化十分理解，交谈的范围就很广泛了。

生活在泰国的华人大约在三百万人数。这些华人有三大支：一是广东潮州人，占绝大多数；一是福建祖籍，较潮州人少；另一支称“客家人”，是在中国长期的封建统治时期，从湖北、河南逐渐迁到云南、广东的一个少数民族，后来又迁徙到泰国。华人迁居泰国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中世纪。到二十世纪初，中国的华人大量来到泰国，受雇于采矿、橡胶等行业，及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每年大约都三四万华人进入泰国，定居下来。现在，华人集中于泰国的各大城市和城镇，各行各业均有，多为经商，纯粹的农业家庭的华人甚至没有了。泰国朋友笑说，华人在泰国，现在都是有钱人了，会经营。据华人朋友说，泰国对待华人的政策，在东南亚诸国中是最宽大的，华人和泰人可以通婚，有华人血统的人数量相当可观。凡是出生于泰国的任何种族的人都必须入泰籍，而不能保存侨民的身份。这样，凡出生于泰国的华人的后代，就算做泰国人了。

众多的泰国华人之中，活跃着一大批汉文创作的作家和艺术家。

我的身旁坐着许静华女士，她是《中华日报》的编辑，负责编辑《华团》《文学》《妇女》《学生》四大专栏。编辑工作之余，她搞文学创作，以年蜡梅的笔名发表小说。她在前几日送我一本短篇小说集，名曰《花街》。我读了其中几篇小说，多是写社会中下层人民的生活内容，穷人的艰难，佃农的血泪。其中《我爱这土地》一篇，尤其感人至深。内容大致是写一位佃农妇女，租种了一位土地占有者的土地，芭蕉园刚刚培植起来，那位土地主人以更高的价值出卖给一位

城里的企业家，这个刚刚挂果的可爱的果园在企业家的机器声中被捣毁了。作品人物感情真挚，所歌所唾的几个人物形象逼真，可以看出许静华女士深刻的艺术再现能力。

许静华女士谈起她的身世，令我感佩。她出身于贫民，来自社会底层，少年时期遭历生活的万般艰辛，以至辍学，失去求学的机会。然而她不甘于就此沉没，发奋自学，终于求得一个小学教员的职业。她不满足，继续攻坚，而终于能够操笔，进行自己所喜欢的新闻和创作工作，从底层社会中站立起来。她的作品的内容里对社会下层劳动者所饱藏的深切同情和爱意，大约也是存在决定意识的一个例证。

她是一位强人，一位敢于向自己的命运挑战而且战胜了命运之神的人。我崇敬那些经过自己艰苦卓绝的奋斗而不是依靠某种“关系”达到理想圣地并对社会做出了有益的业绩的人。他们以自己的人生历程，向社会证明了，人的命运之神正是人们自己；他们以自己的充满痛苦也充满欢悦的奋斗经历，向人类显示出来一种极为可贵的精神。这种精神——奋斗精神，是人类一切优秀种族所共有的。

许静华女士脸色憔悴，衰老的程度与她的实际年岁相去甚远，使人想到一支猛烈燃烧过的蜡烛，然而她毕竟燃出过火焰，发出了光亮，照亮了自己，也照亮了别人，还在顽强地燃烧着。

岭南人是一位诗人，祖籍广东。我让他一支巴山雪茄，他再三端详着那包裹着烟支的玻璃纸，抽一口，以为质地不错。他感叹着，说他回到家乡的时候，带回去一些泰国烟卷，送给晚辈后生，他们竟然因为不是外国货（主要是英美，如“555”名牌货）而情绪不悦，使他伤心。他说不是他小气，而是对国内老家的后生们那种崇拜洋货的心理趋势不安。

何韵女士一口极好的普通话，人又谦和，娓娓谈来，使我一时无法把她与一个名记者的身份联系起来。她作为《新中原报》的记者，一九七五年曾经随克立总理访问中国，采访报道了中泰建交的重要新闻。她的文章我已读过，文笔流畅，意蕴深刻，具有独立见地。她写的《泰国的基辛格》，可以说是一篇精彩的人物特写，记下了中泰建交的详细经过，也写出了许敦茂先生对中泰友谊的卓越建树。她写的一组《访问中国剪影》，以她敏锐的观察，写出了我们司空见惯的一些不正常的社会惰性和失之平衡的社会心理。她不是像一般洋大人那样横加指责与嘲笑，而是于字里行间透渗着切肤之痛的。

泰国的作家，有三种组织形式：一是泰国作家协会，一为泰国作家合作社，一为泰国华人作家协会。前两个作家团体之间，似乎联系不多，各自活动，这两个团体都派作家访问过我国。华人作家协会正在筹备，已向有关部门报批，华人作家协会将以一个独立的社会团体存在于泰国文坛。

华人作家最主要的苦恼是，在泰国，汉语的阅读范围太小了。出一本书，不过两三千册，销量太小。许多华人的后代，已经不会讲汉语识汉字。泰国通行英语。这使华人作家常常为后事担心。

元月三日

曼谷

有关文学创作的专题座谈会，在泰国国家图书馆会议室举行。开会之前，主人邀请我们参观了这座图书馆。

国家图书馆的规模之大是可以想见的。从一间一间摆满书架的屋子走过去，真是走马观花，可以看到泰国以及世界许多国家的图书很好地保存着。

我看见了挂着“中国”牌子的书架，便疾步走过去，想看看这儿藏着多少中国版图书，都有些什么珍本。遗憾！我的陡然涨起的兴趣倏忽间又降落了，有一种遗憾或者说失望的心绪。偌大的国家图书馆，不过堆放着一些老旧的中国的历史、地理、气候之类的书籍以及介绍风土掌故的小册子。文学作品类，有《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当代中国文学作品，有巴金的《家》。别的就很难看到了。难怪中国当代文坛极其活跃的作家在泰国鲜为人知，没有书籍的交流，自然就很难有了解了。

泰国作家们比较关注中国文坛的创作自由问题。座谈会一开始，这个问题就被提出来了。

这个问题之所以被泰国作家所关注，与香港报界的某篇关于刘宾雁的访问记的文章有关系，泰国与香港的信息很灵便。以前，中国作协四次代表大会提出的“创作自由”，其影响远远超越了中国本土上的作家，“黄金时代到来”之说也影响到外域。香港报纸的那篇文章，正是在这种广泛影响之中激起较大反响的，造成了另外的一种相反的影响。

解释我们的“双百”政策其实不难。向海外一切关注中国文学发展的朋友说明实际情况也是我们的责任。无论如何，其影响确实是被夸大了，刘宾雁还不至于搁笔。

中国文坛上正兴起文学的“寻根”热潮，文学的现代化与民族文化的继承之间的关系，被我们代表团的作家提出来，座谈会上形成了一个热门话题。

泰国朋友介绍说，现代文学怎样继承民族文化传统的问题，在泰国文学界也是一个很突出的重大课题。本世纪二三十年代，泰国文学界开始出现现代小说，多是仿西方（法国为主）作品而作。泰国八百年的历史上，在封建帝制时期，有精美的诗歌，有史诗《拉玛坚》，有优美的故事集，然而没有正正经经的小说创作。小说是随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风潮于本世纪初出现的，应该说是一次文学的引进与革新，西方文学的影响对泰国现代文学是决定性的。因此，继续泰族独特的文化形态就是一个很突出的问题了。

比较趋于一致的看法是，泰国文学应该具有泰族的文化素质，这种素质所显示的特点，就区别于世界上任何地区的任何民族。然而，文坛上的流派多种多样，西方各种文学流派的影响都有司效者，并不是一下子能统一的。

这种状况，与中国文坛的现状不无相似之处。

元月四日

曼谷—广州

波音七六七航机。

机翼下，热带丛林、绿色的原野、蓝色的湄南河，渐渐模糊了。一团团白云，云的波峰、云的波谷、云的浪涛。云像层层叠叠的群山，云像无边无际的森林，云像奔马，云像卧牛，云像苍鹰，云像虎

豹，自然界的一切生物，都能在这茫茫的云海里找到毕肖生动的造型。

飞机越过泰国、缅甸和中国的云贵大山，这联结着中、缅、泰三国的莽莽大山啊！

我坐在机舱里，无法入睡。半月来有点急如星火的奔赶路程，不留间隙，从暹罗湾到中部，到西北部到南部海滨，真是够累了。虽然身体感到疲倦，精神却不疲倦，人的身体竟有这种奇妙的矛盾现象。

我靠在座椅上，眼前映现着一幅幅杂乱无序的图画：金光闪闪的尖塔，坐的卧的和飘然仙去的佛像，身披黄色袈裟神情庄重的和尚，美丽的湄南河，一张张谦和的笑脸……在机场里分手时，那噙着泪花的眼睛……

我的精神处于一种亢奋状态，四肢却很疲倦。我无法把塞得满满的脑子里的“录像”有顺序地剪接起来，更无法一下子透彻地理解我所感知的东西。

我从北京出发时，曾经想：地球的那个角落里的居民，是以怎样的社会形态和生活形态生活着？在地球的这个角落里，我生活了半个月，现在自己能回答自己最感兴趣的这个问题吗?

半个月时间，太匆促了，我似乎现在才意识到，应该了解的东西，太少太肤浅了。

然而我毕竟看到了这个角落里的点点滴滴。

然而我毕竟看到了这个角落里的社会形态和居民的生活形态，皮毛表象也罢。

然而我毕竟开阔了视野，看到了一些平生里没有看到过的东西，许多美好的和不可或缺的令人痛苦的东西。

然而我毕竟感受到一种永难忘怀的珍贵的东西，这就是：友谊！

1986年2月14日整理 西安东郊

言论

答读者问

一、你的第一篇作品发表于何时？你在开始写作的时候就想当作家吗？请谈谈你的经历。

我发表的第一篇习作是散文《夜过流沙河》，一九六五年初刊载于《西安晚报》副刊上。

我生长在一个世代农耕的家庭，听说我的一位老爷（父亲的爷爷）曾经是私塾先生，而父亲已经是一个纯粹的农民，是村子里头为数不多的几个能打算盘也能提起毛笔写字的农民。我在家乡解放后的第二年入学，直到一九六二年高中毕业回乡，之后做过乡村学校的民办教师，乡（公社）和区的干部，整整十六年。其中在公社工作时间最长，有十年。我对中国农村和农民有些了解，是这段生活给予我的。我的经历大致如此。

我在小学阶段没有接触过文学作品，尚不知世有“作家”和“小说”。初中二年级时，我对文学发生兴趣的，想来有三条客观上的因素的诱导：一是我的语文教员是一位刚刚从中文系毕业的青年，热情极高，课又讲得生动活泼，使我对语文课陡增了浓厚的兴趣。二是我的一位同桌在我对文学尚处于一片“混沌天地”的时候，他已经是自诩笔名的颇有影响（学校）的小诗人了，几乎每天都有诗歌吟诵成篇。三是五十年代中期的语文课分为文学和汉语两部分，文学课本全部选读

古今中外的名著的篇章，使我眼界大开，特别喜欢文学课而讨厌干巴巴的汉语课。

随着阅读范围的扩大和日益浓厚的写作兴趣，两周一次的作文就不能满足我的旺盛的写作要求了，自己就另外准备一个本子写……我开始做作家梦了，这似乎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及至上到高中，我一开始就确定了自己的目标——大学中文系。高考名落孙山，我的梦没有破灭，目标也没有动摇，反而因为不能进入神圣的大学的殿堂而愈加强烈地追求文学了。我暗暗定下一个自修计划，争取四年发表作品，“我的大学”就算领到毕业证了。结果呢？我经过两年的奋斗就发表作品了。当然，我忍受过许多在我的孩子这一代人难以理解的艰难和痛苦，包括饥饿以及比鼓励更多的嘲讽，甚至意料不到的折磨和打击。

一九六五年我连续发表了五六篇散文，虽然明白离一个作家的距离仍然十分遥远，可是信心却无疑地更加坚定了。不幸的是，第二年春天，我们国家发生了一场动乱，就把我的梦彻底摧毁了。我十分悲观，看不出有什么希望，甚至连生活的意义也觉得黯然无光了。我一生中最悲观的时期，就发生在这一段。我发现，为了文学这个爱好，我可以默默地忍受难以忍受的生活的艰难和心灵上的屈辱；而一旦不得不放弃文学创作的追求，我变得脆弱了、麻木了、冷漠了，甚至凑合为生了。

七年以后，我写成第一篇小说《接班以后》，引起了一定反响。但几乎与此同时，我也没有因为第一次的成功而头脑发昏，甚至伴随着冷漠。我看不出创作上会有什么前途，尤其是我很崇拜的几位当代中国作家所处的恶劣境地，无法使我消除心里的暗影。我几乎本能地想到，不能再去当作家，更不能把创作当作职业，有空暇时玩一玩罢

了。从一九七三年到“四人帮”垮台的四年间，每年一篇，写了四篇小说。

一九七八年，中国文学艺术的冻土地带开始解冻了，我的直接感受是：如果想在文学事业上干点事儿，现在正是时候。

经过了七灾八难，我总算在进入中年之际，有幸遇到了这样令人舒畅的文学艺术的春天。

二、发表作品前，你在创作上都做了哪些准备？作品发表后你有些什么感想？

发表作品前，我简直不知道作品要达到发表的水平应该做哪些准备。我没有受过高等教育，猜想在大学文科里一定会系统地学习文学理论，加深文学修养，可是我没有机会取得这样令人羡慕的条件。

这样，我几乎完全处于个人奋斗的状态。我知道我所追求的事业简直无异于冒险，几乎是在争取根本不可能做到的事。这个时期，我唯一的奋斗目标，就是在报刊上发表作品，至于应该做哪些方面的准备，没有人给我以指导，自己也茫然。我唯一能得到的启发是，从别的作家谈创作经验的文章中看到的老生常谈：多读多练。

我拼命地读书，凡是我能弄到手而没有读过的中外文学作品，都拿来读了，没有计划，对自己读到的精彩的篇章，就下决心背诵。与此同时，我就多练多写，诗歌、散文、小说，都写，几乎每天都要写点什么，包括读书笔记。后来看到一位苏联作家和初学写作者谈创作的文章，强调作者应该有一个记事本，这个记事本应该区别于日记本，要记下自己在生活中的点滴发现，譬如一种手势、一种眼神、一种表情、一副面孔肖像、一句有味儿的对话等等，总之，是那些转瞬

即逝的东西，看到听到了，在忘记之前随时记在记事本上。我接受了这个办法，到“文革”横扫时，就累积了一厚摞这样记着乱七八糟的记事本，怕招惹祸端而悄悄焚毁了。

我现在才意识到那些记事本对我后来创作的决定性好处。一是锻炼了捕捉生活的眼力，使人时时处处都会在与种种人的或长或短的接触中发现一点难以言传的表情、姿势、眼神，一句幽默的或极具性格化的生动活泼的语言，使自己从什么也看不见的朦胧状态中渐渐变得机敏起来，所谓捕捉生活的文学的慧眼吧！久而久之，生活积累的仓库就丰富了。二是练了文学语言。如果仅仅靠写作品练，就会受许多限制，在构想未成熟而不能落笔的时候，就可能闲下了。而用记事本练笔，每天都可以写上千把字，或长或短，不受限制，只要形成习惯，就变成每天非做不可的事了。明知记事本上的东西不是为了去发表，心地特别安适，无形中就去掉了矫饰和忸怩，文字也简洁了。时日一长，累年数月，笔头的文字功力就硬朗了。我自第一篇散文发表以后，接着写下的习作，虽然不具备一鸣惊人的基础，却很少有不能发表的情况，我唯一能归结的原因，就是记事本对于文字功底的锻炼。

我在公社工作了十多年，前面已经提到，我并不想把作家当作职业了，而是一心一意搞好自己分担的工作，工作的过程，无疑是了解农村的现状和过去的极好机会，虽然当时出于工作的动机，而对创作毕竟没有坏处，现在回想起来，简直就成了十分难得而又必要的一课了——生活的基础。

作品发表后，我的第一感想是对自己的信心的验证。

我一直用“不问收获，但问耕耘”的座右铭激励自己，埋头苦干。但几乎同时，自卑的阴影伴随着自信一起徘徊，似乎自信的影子就是自卑。这个时期对我威胁最大的是“天才”这个怪物，自信经过“天才”这面镜子的折射竟然变成了自卑。

我在爱上文学的同时，就知道了人类存在着天才与非天才的极大差别。这个天才搅和得我十分矛盾而又痛苦，每一次接到退稿信的第一反应，就是越来越清楚地确信自己属于非天才类型。尤其想到刘绍棠戴着红领巾时就蜚声文坛的难以理解的事实，我甚至悲哀起来了。我用鲁迅先生“天才即勤奋”的哲理与自己头脑中那个威胁极大的天才的魔影相抗衡，而终于坚持不辍。如果鲁迅先生不是欺骗，我愿意付出世界上最勤奋的人所能付出的全部苦心和苦力，以弥补先天的不足。

第一篇作品的发表，首先使我从自信与自卑的痛苦折磨中站立起来，自信第一次击败了自卑。我仍然相信我不会成为大手笔，但作为追求，我第一次可以向社会发表我的哪怕是十分微不足道的声音了。我确信契诃夫的话：“大狗小狗都要叫，就按上帝给它的嗓子叫好了。”我不敢确信自己会是一只大“狗”，但起码是一只“狗”了！反正我开始叫了！

三、你在创作道路上有过几次突破？请将此过程谈得具体一些。

在我看来，突破应该包含这样两个范围的意思：一是某一部（篇）作品在整个文学界所产生的重大影响，标志着整个文学在一个时期的创作水准的突破。如《创业史》在六十年代初中国文坛上所做的突破，或如《班主任》在七十年代后期当代文坛上所做的突破，都划开了一个文学的新的时期，这当中自然也包含着作家自己创作道路

上的阶段性的重要突破的意义。另一种意思，就是纯粹属于作家自己创作道路上的突破，所谓自我突破，或者说突破自己。我的全部习作都没有资格产生如第一种范围的含义，所以自然属于后一种含义的范畴。

第一次发表散文《夜过流沙河》，是较长时期的练笔的结果，是由无数次失败和痛苦所铺垫的道路，终于使我接近了文学殿堂的大门。

第一次发表小说《接班以后》，距第一次发表散文相隔七年之久。这篇小说是我正儿八经地写成的第一篇小说，虽然不可避免地烙上了当时“左”的印迹，然而对我来说，重要的意义并不在此。在这篇作品里，我第一次把自己对生活的观察和体验写进了小说，第一次完成了从生活到艺术的融化过程。此前发表的一些散文，也许对生活的编造的痕迹太重，对生活的描绘太浮浅了。这篇小说所写的人物和细节，全是我从生活中采撷得来的，使我跨过了这样至关重要的一步——直接从生活中掘取素材。严峻的创作现实告诉我们，一个作家成熟的重要标志，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有没有直接从生活中掘取素材的能力。有这种能力，他会不断地从生活中获得取之不竭的素材；不具备这种能力，可能就很难发展，再要硬写，就可能导致模仿。

我第一次试写的中篇是《初夏》，因为艺术上准备不足，从短篇到中篇的过程感到了困难。较长时间对短篇艺术结构的探求，带来的一个直接影响是，对所得到的题材，总是习惯于用短篇的写法去剪裁，如何写得简洁，选取一个什么样的“最佳轨道”，这对短篇的写作无疑是对的。第一次尝试中篇，就感到了结构上的铺展不开，把握不当，《初夏》就暂且放下了。

这个时候，我集中阅读了一批中外的优秀中篇，从艺术上进行探究，企图打破自己已经形成的束缚和局限。我明确地得到一点启示：充分地写生活，因为中篇的篇幅提供了这种可能。我满怀信心地写出了《康家小院》。

我自己觉得，对于生活的描绘，对于生活中蕴藏的诗意的描绘，对于一个特定地区的民族习俗中所隐含的民族心理意识的揭示，只有在《康》文的写作中才作为一种明确的追求。因为有了这个新的启迪，《初夏》的修改也就明朗了，就是要充分地写生活。

这两部中篇的创作实践，使我又一次获得了新的自信。

四、你最满意的是哪一部作品？能否谈一下创作这部作品的甘苦？这部作品倾注了你一些什么追求？

迄今为止，对我自己发表过的中短篇小说，没有一篇是满意的。相对而言，我比较喜欢《梆子老太》。这个中篇，发表在《文学家》杂志一九八四年第二期上。

梆子老太是一个复杂的形象。不正常的生活扭曲了她的灵魂，这个被扭曲的灵魂反过来又去扭曲生活。对这样一个形象的把握比较困难，分寸也难以掌握。尽管发表出来的较之初稿更多的强调了形成梆子老太特殊心理的客观因素，有的读者仍然认为作品讽刺这样一个农村老太婆有点欠公允。

我无意伤害一个受过愚弄的没有文化的乡村老太太，不过是想通过这个较为复杂的形象，挖掘一下我们的国民性。选择梆子老太，无非是因为我比较熟悉农村生活，写起来更为方便一些罢了。

乡村人对于嫉妒心特强的人有一个形象的谑称：盼人穷，实在是惟妙惟肖的绰号了。何止于仅仅在一个无识无见的乡村女人身上能看到这种反常心理呢？在一些很有权势甚至很有教养的人的眼神里，这种可笑可憎的心理状态也不是罕见的。直接诱导我产生这部小说的冲动的一件事，是我听到的一个真实的案件。两个在高中补习的十分相好的学生，食于一室，寝于一室，同苦共难，结果在高考公布结果的那一晚，落榜者把中选者杀死了。公安人员审问落榜者杀人动机时所能得到的唯一解释是：落榜者的嫉妒。

我无意中又看到华君武先生的一幅漫画，题曰："武大郎开店，高个儿的不要。"我的心里受到极大的冲击，相信揭示嫉妒这个恶劣的东西对于目前的改革，尤其对于人才的开发不无好处。如果嫉妒仅仅表现在一个普通农民、工人或者干部身上的时候，不过是属于个人品质上的瑕疵；而一旦表现在某些掌管一定权力的老兄的身上的时候，就可能危及周围的有知有识之士的存在了。

不正常的政治生活扭曲了梆子老太的灵魂，使她自身潜伏的癌细胞恶性膨胀，而且从不自觉到自觉地去扭曲生活，扭曲别人的灵魂。

另一方面，我第一次试着以人物结构小说，而打破了自己以往以事件结构小说的办法。通篇没有一个贯穿始终的事件，而是根据人物的性格和心的轨迹前进。因为写作的仓促，而妨碍了作品所应达到的深度，不能不是一个遗憾。

五、请谈一谈你的生活方式和工作方式。

我总希望在自己的心中保持一块自由的绿地。在这块绿地中，最烦突然踏进一只粗暴的大脚来。

我想通过我心中的绿地感受阳光、雨雪和气温，按着自己的天性长出自己的叶和花。突然踏进的那只大脚，往往折断自由翔飞的翅膀。能够保持创作所最可宝贵的心理氛围——自由，比一切优裕的物质条件要重要百倍。

除了粗暴的干涉之外，我以为最可怕的是毫无意义的庸人自扰。这种东西对人往往具有慢性杀伤力。会使人处于一种无休止的烦恼之中，使精力空耗了。我在公社时，争取一切可能的机会下到生产队里去，从而躲避琐碎的事务和不可或缺的叽叽咕咕。我很珍惜自己心中的这块绿地，要是被什么不干净的东西污染了，就可能枯萎，难以迎风起舞了。

我的业余爱好是观赏体育比赛，尤其是较高水平的足球比赛。那种激烈的竞争、对抗，常常使我的神经处于一种亢奋状态。

我的工作方式是随着环境的变化而改变着。过去搞业余创作，精力充沛，突击开夜车，借工作的空隙搞。现在搞专业创作，时间充裕了，一般在早晨起来写东西。

我构思一个东西的时间较长。有一个东西产生了，就在脑子里转呀转，甚至一年两年地转着。有时有几个构思同时在转着，一当某一个酝酿成熟了，就一口气写出来。

六、你是如何深入生活和积累生活的？在这方面你有哪些感受？

我主要靠用自己的感觉去感受生活，而专门的体验是很少的。

我原是一个业余文学爱好者，没有专业作家和记者们随处可去的可能，只能局限在组织和人事部门规定给我的生活位置上。工作的过

程，就是接触人的过程，了解人的过程，我既可以接触到农村里的种种人，也可以接触到上一两级的领导和干部，多是因为工作关系的牵扯。工作中常常发生矛盾，我往往也被陷入矛盾之中，无法摆脱，解决这些矛盾的过程，更会透见种种人的种种心理状态。

我从高中毕业刚回到农村时，不大安心，觉得这里的一切都太落后，太叫人窒息了。经过十年的农村工作，我才较深地了解了农村的过去和现状，关切起农民命运来了。如果一个农民在城里的商店或饭馆受到冷遇和歧视，我看见了往往会火冒三丈的。

决定一个作家气质的主要因素，我认为是作家个人的经历和他所经历过的全部生活。我个人的经历和我后来所从事的工作，给我心理上造成的直接的无法逆转的感受，是沉重。是的，我生活和工作的渭河平原的边沿地带的历史和现实，大沉重了，这种感情色彩不自觉地流露在文字之中了。

搞专业创作以后，我离开了原来的生活位置，有机会到更多的地方去走走看看了，这对我生活视野的扩大无疑是有好处的，但也容易产生浮而不深的弊病。我觉得，靠采访搞创作是困难的，因为作家对于生活的反映，不能指靠到生活里去搜寻事件，而是要靠他的全身心感受生活；不仅是看别人在新的生活浪潮里的情绪和心理反应，还有自己对新的生活浪潮的心理情绪和反应；没有后者，就很难达到对今天的互相渗透着的各个生活领域的真切的感知，也就很难深刻地理解复杂纷繁的生活现象了。

七、你是如何读书的？请举一些事例谈谈读书和创作的关系。

对文学发生浓厚兴趣的头几年，渴望读书的心情十分强烈，凡能弄到手而没有读过的，都想读。初二时读了《静静的顿河》，虽然无法理解这部名著，我还是囫囵吞下了。十年动乱期间，没有选择读书的条件，我通过一条秘密渠道得到一批禁书，已属饥不择食，岂敢选择挑选。记得此间读过的有《血与沙》《悲惨世界》《无名的裘德》等。这种无选择的读书，于今想来，有许多弊病，但有起码的一点好处，使我接受了较为充分的艺术熏陶，初步懂得了艺术的基本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开阔了艺术视野，使我对极左的文艺口号有一个较为冷静的看法。

一九七八年以后，我读书的选择性明确了。这年冬天到次年春天，我完全停笔，集中读了一批中外的短篇小说。我当时因一篇不好的小说而汗颜和内疚不已，就近于残酷地解剖自己。我躲在文化馆的一间废弃的破房子里，潜心读书，准备迎接文艺的春潮。我明白，从思想上清除极左的东西也许并不太困难，而艺术上的空虚却带有先天的不足。我企图通过一批优秀的短篇的广泛阅读，把“左”的艺术说教彻底扫荡；集中探索短篇的结构和表现艺术，包括当代的一些代表文学新潮流的作品，也都读了，企图打破自己在短篇结构上的单调手段。在泛读的基础上，我又集中研读了莫泊桑的一些代表作。到一九七九年春天，我觉得信心和气力都充实了，就连着写出了一些短篇。

近几年，我由选择作品进而到选择作家，对某一作家的作品，争取全部找来读，如果是我比较喜欢的一位作家的话。这样，可以了解一个作家成长的道路，艺术上的发展和探求，对自己将有很好的启迪。如苏联的柯切托夫和艾特玛托夫、瓦西里耶夫和利帕托夫等等，这些人的作品我搜罗得到的都读了。美国的斯坦倍克的作品我也比较喜欢，就集中读他的。

我在艺术上的学习，主要是通过阅读来进行的。

我很自信，又很自卑，几乎没有勇气去拜访求教那些艺术大家。像柳青这位我十分尊敬的作家，在他生前，我也一直没有勇气去拜访，尽管我是他的崇拜者。这样做的结果，倒使我产生了另一种考虑：一个作家，他在谈创作经验时也许能传出真谛，也许保密，但他绝不会对自己的作品保留什么，他总是倾其全力来完成他的作品。换言之，他的思想深度和艺术本领，都融化在他的作品之中了。所以，学习自己崇敬的作家的最有效的途径，就是解剖他的作品。剖析了他的作品，就得到了他的艺术的“隐秘”，所得绝不会比作家口授的少，我多年来就是用这样的笨办法学习。

八、文学创作如何适应正在发生变革的生活？请谈谈你的思考。

把变革比作一种浪潮，现在已经席卷了整个中国的乡村和城市，而且方兴未艾。我觉得，这场变革，首先是生活本身的带有不可逆转的规律性的运动，而不是靠某一位领导人号召和发动的结果。如果我们没有几十年来一阵紧似一阵的“左”的自我束缚、自我限制和自我扼杀，如果我们没有几十年来毫无意义的概念上的唇枪舌剑的论争——这种旷日持久的论争，不仅耽误了时机，以至演变到可怕的十年动乱，就不会造成整个社会进步的缓慢和民众的普遍贫穷，尤其是农民。农村首先打破了人为的束缚而掀起了变革的声浪，并且取得了惊人的成功，迫使一切尚被“左”的教条封冻着思维神经的人不能不考虑：人原来不该在一棵树上吊着，以至吊死！

农村变革的辉煌成果和给整个乡村带来的生机，必然波及城市、工业、商业、文教和卫生部门，很难继续保持僵死的局面了。由此入深，必然要涉及国家机器的中枢神经——各级政权的干部的新陈代

谢。没有用科学武装的干部是难以适应这场变革现实的。几十年来，极左的路线和政策年深日久的影响，我们造就了一批只会喊“万岁”而不会写自己发言稿的领导者。稍有常识的人都可以想到，即使封建社会里，皇帝也是通过科举制度的考试来选拔他的各级官吏，而我们却不问知识和能力，重点在“政治”，以至到七十年代，王洪文凭“打砸抢”就蹿上了国家的最高领导位置。

这场变革的实质，在我理解，就是使我们从神话世界的僵化状态中回到科学的现实世界里来，使东方巨龙瘫痪的机体赢得新生的一个过程，其历史的深意也许有待生活的进一步发展逐渐被我们更深刻地理解。

这样一场除旧布新的改革，牵连着过去和历史，几十年的过去和几千年的历史，有极左的禁锢和封建意识的沉积。传统的和陈旧的观念都将受到冲击，为新的观念所替代，这一点也不容易，也不简单。一切人都无法超脱新的观念对自己旧有观念的冲击时所产生的烦恼和不安，整个社会就呈现着一种躁动不安的气氛。

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作家必然要把这种变革的生活诉诸文字。要更敏感地感受变革的生活，要深刻地理解进而反映生活，我觉得对我来说最重要的是更新知识结构。新的观念的产生，只能在新的知识的积累中发生。没有新的知识，不可能产生新的观念。陈旧的知识或残缺不全的知识结构，肯定使人的思维局限在旧的观念上。仅靠学一点时髦的口号是不能解决观念的彻底更新的。新的知识产生新的观念，也必然带给人以新的热情，去研究生活，开掘新的意义，使自己感受生活的神经处于敏锐状态。打一个不合适的比方，过时的胶卷再也不会感光了，要拍摄动人的画面，首先要抛弃废旧的胶卷，装进新的。深知自己的知识本来就不完全，因此倍感学习的重要。

我们面临的这种变革的生活，不是每一代人都能遇到的，算我们这一代人的幸运，我们将亲眼看见一个满身伤痕的巨人怎样重新获得活力，这是怎样重要的一个历史时期。我有一种预感：这是一个产生伟大作家和伟大作品的时代！

九、可否谈谈你正在写的和将要写的作品？你在新的作品中将把什么作为追求的目标?

我的脑子里总有那么几个东西在转着，不会有空闲的时候。目前正在旋转着的，大致属于两种类型，一种是当前生活的直接反射，一种属于对过去了的生活的反嚼。因为没有酝酿成熟，所以恕我不必揭开未蒸熟的锅盖。

我最近酝酿的作品，尽管属于两种情况，但有总的一点考虑，就是探索和揭示我们的民族心理意识和心理结构。因为仅仅是一种考虑，是否能如人意，尚不敢吹。

1985年2月27日 西安东郊

忠诚的朋友

我的生活中最忠诚的朋友当数书。

我结识的第一个这样的无言的朋友是赵树理著的小说《李有才板话》。记得那是我刚进入初中读书不久，第一次接触课本以外的读物，一口气读完这本小说，我的心里有一种不可名状的奇异的感觉。书中那些生动有趣的故事、活灵活现的人物、亲切逼真的北方农村的生活图景，使我一下子和我们村里的现实生活联系起来。那个机敏聪明、多才多艺的板人李有才，活脱就像我的那个张口就能甩出一串顺口溜来的叔叔。我所经历过的家乡的乡村生活画面，经过阅读这本书而再现到我的眼前；我的有限的乡村生活的经验，第一次在铅印的文字中得到验证。

第一次在书籍中验证自己经历过的生活，使我感到亲切、愉快，甚至使我觉得是第一次从混沌朦胧的意识中睁开了眼睛，内心里有一种石破天开的惊喜。

随着阅读范围的扩大，我的兴趣就不仅仅局限于验证自己的生活印象了；实际上，我的短浅的生活道路和简单的童年生活记忆，没有更多的可供验证的东西。一本本优秀的文学作品，在我眼前展开了一幅幅见所未见、闻所未闻的画卷，顿河草原哥萨克人矫悍的身影（《静静的顿河》），使人惨不忍睹的悲惨世界（《悲惨世界》），新世界诞生过程中的铁与血交织着的壮丽的人生篇章（《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人类争取自由幸福所表现出来的顽强无畏的气概（《牛虻》）……所有这些震撼人心的书籍，使我的眼睛摆脱开家乡灞河川

道那条狭窄的天地，了解到在这个小小的黄土高原的夹缝之外，还有一个更广阔的世界；我对这个世界愈感新奇，愈想更多地知道这个世界的角角落落里的事；我的精神里似乎注入了一种强烈的激素，跃跃欲成一番事业了。父亲自幼对我的教诲，比如说人要忠诚老实啦，人要本分啦、勤俭啦，就不再具有权威的力量。我尊重人的这些美德的规范，却更崇尚一种义无反顾的进取的精神，一种为事业、为理想而奋斗的坚忍不拔和无所畏惧的品质。父亲对我的要求很实际，要我念点书，识得字儿，算得数儿不叫人哄了就行了，他劝我做个农民，回乡务庄稼，他觉得由我来继续以农为本的家业是最合适的。开始我听信父亲的话，后来就觉得可笑了，让我挖一辈子土粪而只求得一碗饱饭，我的一生的年华就算虚度了。奥斯特洛夫斯基说过，虚度年华和碌碌无为的人，在其生命完结的时候，就会感到惭愧和羞耻的。我不能过像阿尔青（保尔的哥哥）那样只求温饱而无理想追求的猪一样的生活。大约在高中二年级的时候，我想搞文学创作的理想就基本形成了。

那时候产生并基本确定下来的这样的人生理想，我自己往往也觉得狂妄。通往神圣的文学艺术的殿堂的道路太艰辛了，长途跋涉的艰难、摸不清路径时的彷徨苦闷、瞎碰瞎撞所导致的无数次失败后的自卑、冷嘲热讽的斜眼以及始料不及的天灾人祸，不知把多少追求者压扁挤碎了，我之所以能曲曲折折地从夹缝中长出一片叶茎，归结到底还是得助于书籍这个忠诚的朋友。

我读高中时，正处于我们国家的三年困难时期。我的身体正处于生理发育最活跃的时期，每天八九两定量的粮食使我经常处于一种饥饿状态，精神追求也正处于人生中的最强烈的时期，贫困不堪的家庭经济无法提供给我买一本书的开销，因而饥饿就成为双重性的了。我

与一位同是做着作家之梦的同学，天天晚饭后赶到十华里外的纺织城新华书店去读书，到晚上九点半关门才出来，晚上常常饿得睡不着，晚饭时吃下的三两饭食早已在二十华里的往返中消化殆尽了。

高中毕业名落孙山，回到家乡。夜晚，我钻在一间破旧的厦屋里，蚊虫叮咬得浑身疙瘩，冬天又冻得手脚发麻，一盏墨水瓶改做的煤油灯，照着我严格地执行我的计划：自修四年，发表作品，“我的大学”就算毕业了，第一篇作品就是我的毕业证书。我默默地进行着与那些有幸考上大学的同学对抗意识十分强烈的竞赛。不到两年的时间，我的处女作——一篇两千字的散文发表了。

伴随着我整个苦斗历程的是《我的大学》这本书。高尔基以他的自学经历写成的这本振奋人心的书，像一个忠诚的朋友一样始终不渝地给我以鼓舞，给我以支持，几次都是在失败之后而陷入绝望时，这位坚贞的朋友拍着我的肩膀而使我重新站立起来，继续往前走。

当我在生活中受到致命的一击，几乎处于难以自拔的逆境之中（其时，我们国家整个处于民族的灾难中），给我以生的坚强信念的依然是书。我永远对保尔在铁路工地的精彩篇章保持有新鲜的记忆，使我从刚进入青年时期就明白了人生应该有更高层次的精神生活。物质的贫乏可怕，而精神的贫乏更可怕。人生的漫长道路上，一个又一个岔路口的选择，一道又一道险关泥沼的跨越，是书籍这个忠诚的朋友，帮我辨别真伪，给我奋斗的力量，而终于使我没有沉溺苟活，而且继续开阔着我的视野，加深着我对世界的理解，同时也加深着我对自身的认识。

与人交友，有忠诚的，也有虚伪的，还有在关键时刻背叛的。而优秀的书籍却对人始终如一地表现着忠诚，永不背叛。与书籍交朋友

吧！书籍的朋友交得愈广泛，人的先天性智力愈会得到最大的发挥。书给人力量，也给人智慧；书使人变得充实，变得崇高；书使我们了解这个世界的过去，也使我们更深地理解这个世界正在发生着的现实。

我的生活启示是：读书，创造。

1985年10月6日 西安

创作感受谈

文学是个迷人的事业。入迷是抛开了一切利害得失的痴情。

我迷恋文学几十年，历经九死而未悔，终于有了一些自己的创作。

我写下一些创作生活中令人入迷的感受，与关心我的创作的朋友交流，也在激励自己，努力地去创造。

观察

在最初对文学发生兴趣并且产生创作欲念的时候，观察生活，无疑是我对文学领域里诸多命题中接触最早的几个基本命题之一。即使现在，在我能写出一些中短篇小说的时候，这个最早接触的命题并不因为它是文学创作领域里的老生常谈而生厌，反而愈来愈觉得它对一切初学写作者和趋向成熟的作家一样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

这种感觉，首先是在阅读优秀的文学作品中受到启发的，又是在阅读中不断加深的。

一个一个富于个性生命的细节，一段一段细微而又独特的环境描写，一幅一幅大自然的色彩的描绘，那么精确，那么逼真，那么活灵活现，使读者如身临其境。每当谈到这种文学的时候，我往往按捺不住心头的兴奋与欣喜，它给人以真的美的享受。每当阅读到此，我的心中便油然慨叹：啊呀！家伙！他观察得多么精细啊！他长着怎样敏锐的一双眼睛！

单说风景描写吧。一块俄罗斯大地，在不同作家的不同作品中，展示出一幅幅瑰丽多彩的油画，令人欣然向往，真想去观瞻一下那块美丽的土地。我喜欢阅读苏联的文学作品，我觉得苏联作家的文学作品中描写得最成功的是风景。那些风景描写的篇章，是具体的而不是浮泛的，是真切的而不是含糊的，是各呈异彩的生动图画而不是千篇一律的形容词堆砌，是隐蕴着作者感情的描绘而不是装模作样的无病呻吟。那些准确、生动、色彩斑斓的篇章，唤起读者对大自然的热爱和神往之情，使人的精神得到怡悦陶冶。

我常常掩卷揣猜，这些作家，一定不止一次观察过日出也观察过日落在他立足的那块土地上的色彩明暗的变幻，一定观察过阴晴雨雪这些最普通的自然现象在那块大地上所投下的多姿多彩的色调……不然，他们怎么会写得这般细微准确呢?

我给自己订下一条规矩，必要的自然风景的描写，必须是我曾经见过的景致，必须写出独自观察中的独特发现来，否则宁可不写。这种观察，无须花费时日，也不必正儿八经地迈着八字步专门去做，随时随地地留心一下，日积月累也就够了。

这种观察永远不会完结，也不会满足，随着作家的成熟和创作量的增多，观察生活的眼光该更加敏锐，从生活中摄取新的营养的能力应该更加提高，不然，就无法填补已经腾空了的“仓库”。

我读川端康成的《雪国》之后，他的笔下的雪的色彩，简直令人惊倒，这实在是我读过的作品中关于雪景描写的最精彩的篇章了。《雪国》里的雪，色彩变幻，有动有静，有态有情，读来令人心荡神驰。只有在这样动人的风景描写面前，我才感到了自己绘景状物时的平庸和单调，才感到了自己观察时的粗疏和迟钝。

有时候，在阅读中遇到一些风景描写的陈词滥调时，我就跳过去不读了。那些既可适之于南方而又能适之于北方的“灿烂的朝霞”“碧绿的青草”“晶莹的露珠”之类，读来使人厌倦，使人烦腻，丝毫也提不起精神。这种描写的结果等于零，甚至不如不写。因为朝霞无论在北方或南方都是灿烂的，而青草无论在中国或者在蒙古也肯定都是碧绿的，任何地方的草叶上的露珠都一样晶莹。没有对于某一特定地区的大自然景象的精心观察，没有独特的发现，就只好重复已经被无数中学生重复过了的陈词滥调，贫乏而又苍白，毫无生命活力，大自然意趣无穷的姿色全都变成了僵死的文字，这种风景描写是不能算为创作的。在描写人物的文字里，诸如“面若桃花”“樱桃小口”“十指如葱”这些从故纸堆中搜来的陈年老货，又进入描写八十年代牛仔女郎的小说篇章之中，真是让人感到啼笑皆非又无可奈何。

如果不能培养锻炼出自己直接把对生活的观察变成准确的形象的能力，那么就很难向读者提供哪怕是一句鲜活的具有生命的东西。自然风景的描写如此，较此更复杂的人物刻画和社会生活环境的描写更作不得假也容不得假的。

我恪守这样的创作规程：无论这部小说属优属劣，必须是自己对生活的独立发现，人物描写是这样，风景描绘也必须是这样。作品中人物活动的天地和环境，必须是我可以看得见的具体的东西，其前提必是我经见过也观察过的东西。我没有见过的东西，是无法写出一词一句的。迄今为止，在我所有的习作中，仅就风景描写而言，我较为满意的是中篇小说《最后一次收获》里对于渭河平原边沿地带原坡地区麦熟时节的景象的描绘，从景象到气氛，基本传达了我对这个特定地域的观察和感受。

感受

观察是一种生理心理行为，感受则完全是直接的心理行为。感受是观察的进一步发展，具有更深层次的心理情绪，甚至是一时无法说得清楚的颇为神秘的一种心理感应。

这种感受，在当初可能是朦胧的，似乎仅仅是观察留在心里的一种真切的气氛。奇妙的是，一年或者多年以后，当我的某一正在写作中的作品的人物踏进这块地域时，那种留在心里的感受便一下子活起来了，那种气氛一下子便充溢起来了，使作品人物如鱼得水，自由游动。如果没有这种感受，人物一当涉足于某个陌生的地域，怎么也无法克服那种空虚和别扭。

我生活在西北，感受过渭河平原的气氛，也感受过黄土高原的气氛，对于海洋和沙漠，只是在电影和画报上看见过，谈不上观察，更谈不上感受了。我知道戈壁和沙漠是荒凉的，也知道大海是辽阔的、蔚蓝的，但我从来也不敢把我的人物置身于沙漠或海洋的环境中去。我清楚，如果硬要我的人物进入沙漠或海洋，除了借用别的作家的作品中对沙漠或海洋的现成描绘之外，我还能有什么咒可念呢？一九八一年和一九八四年，我有机会感受海洋了。前次在黄海，后次在东海。我站在轮船的甲板上，任海风吹着，久久地站着，就是想感受一下，更多地感受海洋，使大海的气氛储进心间。去年八月，我又有机会踏进毛乌素大沙漠了。我在沙漠里奔啊，滚啊！躺在沙丘上，望着高远的天空静静地飘浮着的大团云块。感受一下沙漠，让毛乌素沙漠特有的气氛储入心间。说来好笑，我这才知道，毛乌素沙漠里的沙子竟然这样干净，干净到不仅不会给人扑灰，反而把我们鞋上带来的尘土吸吮干净了，像洗过了一样，而我的印象里，原以为沙漠是尘土和

黄沙弥漫的世界。我想，尔后如若我要写的某一个人物可能进入大海或沙漠的时候，我对他的描写就不会完全感到惶惑了，尽管可能十分浮浅，但毕竟是真实的，因为我相信那种留在心里的感受。

感受有时候又很奇妙，不仅扩大视野，感知世界，储存气氛，还使我悟觉某些生活哲理，产生创作欲念。一九八一年，我到山东孔府观瞻，看了规模宏大的中国文化始祖孔子的府第，又参观了神圣的孔庙，最后到孔林参观时，我感受到一种沉重的心理上的无形的压力。孔林，是孔氏家族的墓葬之地，从孔子的墓堆开端，历经两千多年，一直延续到现在的五十六代孙的新坟。在一二百亩墓地里，老墓和新坟，一眼难透，数也数不清的大大小小的冢堆；高高矮矮的青石墓碑，在齐胸高的荒草中兀立，重重叠叠；一株株秃枝败叶的古柏互相交参，遮天蔽日。我似乎隐隐看到荒园里有无数的幽灵在飘忽来去，出入于新坟老墓，飘忽于柏林荒草之间，令人头发直竖，毛骨悚然，胸脯上似有磐石压着，憋闷窒息。直到回到宿地，这种沉重的压力也不能完全解脱。

一年后，这种感受凝聚成一个中篇小说，这就是《康家小院》。小说脱稿后，我才觉得心里那种沉负解脱了。我想探究一下由孔老先生创立而且一直延续下来的文化，对形成我们这个民族特有的心理意识结构形态的影响，于我们今天的生活似乎并无本质的隔膜。

感受一下！已经成为我对一切陌生的生活环境的习惯要求。我在城里分到两间住房，领了钥匙，走进门去，从窗口望出去，看见的全是水泥和砖头，我感到压抑。我登过不知多少回高楼了，看见过水泥和砖头，似乎并无压抑的感觉，只有意识到我将要在这里居住下去的时候，我感到了压抑。

我至今不敢写工厂，唯一的一部以工程师为主人公的小说，也只能把他置于农村的环境来表现。其中无法回避的一节工厂生活，是凭我在灞桥工作时到临近一家工厂参观时的感受，而我正好在那个工厂里结识了一位同龄的工程师朋友，包括他介绍给我的一些技术术语。

我觉得，感受生活比体验生活更适宜我的创作生活的实际。我是凭用全身心的感受来理解生活进而反映生活的。在农村掀起改革浪潮的时候，四面八方涌来的改革的声浪和反响，使我感受到了历史在今天的深沉巨大的回声。这种对时代的感受，我在有关《初夏》的通信里已经陈述过了。

我想到一切对我还陌生的领域和环境中去感受生活，使我未来写作的人物有更广阔的天地。

痛苦

我坐在太白县招待所一间瓦顶平房里，可以眺望秦岭山系中最高的太白峰。宽敞的大院里，其实只住着连我在内的三位客人，白天是安静的，夜晚就更安静了。太白山峰高达三千多米，是三伏酷暑时节最理想的避暑消夏的好去处。我正在赶着修改《初夏》。

这样凉爽宜人的气候和安静的环境，却无法给我帮忙，我陷入痛苦之中，几乎要绝望了。

开始重写这部小说时，我是满怀信心的。写下大约三万字的时候，我写不下去了，甚至连写作兴趣也没有了，往常创作中的那种冲动和激情，更不来潮。我陷入痛苦的深渊。

痛苦中，我发觉，我正在刻画的十几个人物，全都从我的住室里不辞而别了，叛离了，把我一个人孤零零地丢弃在那间小屋里。

我试图硬写，把他们召唤回来，还是失败了。我的笔下写出的不是活的形象，而是一个个用皮毛羽翅修复起来的标本，他们的肚子里不是跳动着的五脏六腑，而是一把稻草。我的语言也失去了光彩和活力，那么干巴，那么枯涩，没有感情色彩。我没有兴趣写下去，甚至连一个字也蹦不出来，脑子里像发生了“短路”，怎么也照不亮了。

这种痛苦恶性发作，以至发展到如此严重的程度：我很害怕看见书桌，很害怕看见那一堆稿子，那张座椅简直无异于刑枷。我很讨厌冯景藩，也很讨厌冯马驹和彩彩，这些叛离而去的家伙，我连想都不愿意想他们。

这是我从事写作以来二十年间所经历的最严重的一次痛苦。写作过程中写不下去或不顺利的情况并不奇怪，而使我感到完全是一种痛苦的折磨，这却是第一次。痛苦的最可怕的心理效应是灰心丧气。我不仅觉得这部小说改不好了，甚至觉得我自己再也写不出任何作品了，甚至奇怪我过去怎么会写出那些短篇和中篇来？我处于一种严重的精神危机之中，似乎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完全榨光排净了，才能和灵气全都撒光放尽了……我要完蛋了！

夜里一点钟，我已抽完了两包雪茄，心如死灰，我感到孤独，世界只剩下我一个受苦人。寂苦中，我希望有人来救助我，哪怕说一句鼓励的话也好。于是，我想起一位苏联作家的逸事，他写了开头之后，便丧失了写下去的信心，很丧气地把这个开头拿给另一位作家去看，想不到那位同行说，这头开得多好啊！他受到鼓舞，一下子就写下去了，竟然写出一部上乘之作。我多么希望此刻有人来鼓励我几

句，使我抖擞起来。我从招待所跑到文化馆，敲开了一位同行的门。他从梦中惊醒，披衣揉眼，看罢稿子，确实说了几句不错的话。当我回到招待所的时候，却毫无改变，心里的死灰依然冒不出一点火星。过了两天，我收拾行李，毫不留恋太白山地的宜人的气候，回到西安。没有办法，自认彻底失败。

半年之后，那堆厚厚的草稿和修改稿，在柜子里整整沉寂了半年，到了冬天，我再次拿出来的时候，已有一抹细灰，纸页和字迹都变色了。这期间，编辑几次来信催问修改进度，我都没有掀开它。半年时日里，我通过阅读，参加社会活动，以及写其他作品而调节了情绪，信心又鼓起了风帆。

我总结了那次重写失败的原因，关键是在于我企图推翻第一二稿中的构想，于是就发生了作品中的全部人物集体叛离的现象，其根源实际上是我背离了他们。这样，我重新冷静下来，给各位人物作传。当几位主要角色的过去和现在的生活阅历一一摆出来的时候，我的心里燃起了热情的火花，那些叛离的人物都回归了。我第一次经受了痛苦，也第一次产生了写作前给人物作传的需要。

此后的动笔开篇，进展顺利，我又享受到创作劳动的欢乐。

寂寞

初做作家梦的时候，把作家的创作活动想象得很神圣、很神秘，也想象得很浪漫。他们可以到处去体验生活，走南逛北，行吟抒怀。虽然也能想象创作中的艰苦，那毕竟是一种强脑力劳动，需要呕心沥血，但他们的精神生活必是很充实的。及至我也过起以创作为专业的生活以后，却体味到一种始料不及的情绪：寂寞。

体验生活，采访各种人，无疑是令人愉快的事；走南逛北，看名山大川，无疑使人心旷神怡。然而，作家生活的意义在于创作，没有作品，很难称为作家。写作是一种独立的个体劳动。这种单人独立的劳动，不是三日五日，一年半载，而是长年累月，年复一年。一张书桌，一沓稿纸，从早到晚，我面对的就是这一沓方格稿纸。构思，起草，修改。构思时不好与别人商量，起草和修改也不和别人商量。一格一格填写下去，一页一页写下去，无法相信别人能提笔代劳哪怕写一个字。天长日久，寂寞就随之产生了。

哪儿有一个茶话会，可以会见许多老朋友，一叙衷情。哪儿又正放内部电影，机会难逢。某杂志社邀约去参加一个笔会，地点在中外闻名的风景胜地，熟人好友聚会，有一顿丰盛的午餐……有多少美好的享受都在诱惑勾引人离开书桌，合上稿纸，这些事简直具有令人神往的吸引力。玩也玩了，逛也逛了，吃也吃了，谝也谝得尽兴，猛然间发现日历已经翻到最后一个月份，哦，今年才写下多少字呀！年初计划要写的东西只完成了不到一半，而我又要添加一岁了！过去的一年里，足足有半年泡在名刹古庙里、茶桌餐桌上，以及毫无实际意义的应酬之中了。生命又减少了一岁，而创作却少写了一半。于是就狠下心，坐到书桌旁，托词谢绝一切没有实际价值的邀约，甚至得罪朋友，而迫使自己收心静气，面对稿纸。

我喜欢写而不喜欢改。写作一个新作品的过程，新的追求，蓄谋已久的构想，新的人物，使人跃跃欲试，兴味十足，劲头不小；人物的命运逐渐展开，有一股不衰的激情在胸口奔突，不吐不快，所有这一切都在推动着我朝前走。一当画上最后一个标点符号，顿然觉得一块石头落了地，心中的激情和热力全都排泄一空了。这时候，再回过

头来，面对厚厚一摞写得密密麻麻的稿纸，从头一字一句修改的时候，寂寞就使人难以忍受。

因为在一个新作品中的追求已变成现实，因为对新的人物的激情已经排泄净尽，这种修改在很大程度上就变成一种没有感情活动的工作。这一节写得太多了、太露了，应该删去，应该删到怎样的恰如其分的程度？这一节显然不足，人物的感情应该冲上去，现有的这个细节是不能承载的，应该找到一个更精当的细节；这一句太长了，读者读起来要烦的；这一句又……差不多是纯粹的文字的雕饰和把握。没有感情的纯文字劳作，就容易使人厌烦，寂寞，尤其是篇幅较大的作品。

我曾经想，最好由我写第一稿，然后请一位朋友给我修改，他一定比我更清楚，哪里写得啰唆，哪里写得不足，哪里又简直是废话，旁观者清呀！想仅仅这样想，事实上不可能找到一位这样的大师朋友的。而从个人写作习惯来说，我不仅不能容忍别人改稿子，而且连让别人抄稿也不习惯。我的稿子，似乎只有我用黑色墨水和不大高明的行书写下的稿纸，才是我的创作，看起来眼睛也舒服。这样，就只好忍受修改和抄写的寂寞。

窗外是绿色的田野，春风把大地吹绿了，刚刚从山寒水瘦树枯的漫长的冬天回返到春天的大地是十分迷人的，我真想搁下笔，到春风和阳光融融的田野上去遛遛。犹豫之后，又低下头来，待到傍晚吧！现在要工作，工作！不远处，有人在下棋，从棋子拍击的响声里，可以想见其攻防之激烈程度。下几盘棋多好，比在稿纸上斟词酌句有兴味多了……

长年累月忍受这种寂寞，有时甚至想，当初怎么就死心塌地地选择了这种职业？而现在又别无选择的余地了。忍受寂寞吧！只能忍受，不忍受将会前功尽弃，一事无成。忍受就是与自身的懒怠做斗争，一次一次狠下心把诱惑人的美事排开。忍受的基础是矢志，由此产生坚忍不拔的毅力和持之以恒的韧劲，逐渐养成一种能断然做出包括多种享受在内的牺牲，而甘愿寂寞。

寂寞不是永久不散的阴霾，不断地会被撕破或冲散，其动力还是来源于创作生活本身。完成一部新作之后的欢欣，会使备受寂寞的心得到最恰当的慰藉，似乎再多的寂寞都不算什么了；阅读一部好的文学作品，受到鼓舞，受到启发，产生了新的艺术追求，什么寂寞全都不予计较了；更多的是生活发展的浪潮，会把寂寞冲荡一光，在生活中受到冲击，有了颇以为新鲜的理解，感受到一种生活的哲理的时候，强烈的不可压抑的要求表现的欲念，就会把以前曾经忍受过的痛苦和寂寞全部忘记，心中洋溢着一种热情：坐下来，赶紧写……

忘我

清晨起来，洗漱完毕，喝一杯茶，就摊开稿纸。窗户里吹进五月温馨的风，有洋槐的郁香。拖拉机突突突响，庄稼汉扶着犁杖走向田野，铁犁在街巷干硬的土道上蹭磨得噹噹响。他们去耕田，我也开始耕耘我的土地。

小屋里就我一个人。稿纸摊开了，我正在写作中的那部中篇里的人物，幽灵似的飘忽而至，拥进房间。我可以看见他们熟悉的面孔，发现她今天换了一件新衣，发式也变了；可以闻到他身上那股刺鼻的旱烟味儿。

这一节轮到她出场，从她的角度去透视其他人，她就来到我的眼前离我最近的地方，旁的人就知趣地礼让到稍远一点的地方。当然，写完这一节，拉开下一节，该当调换一个人物角度的时候，她就自觉地暂且退去，他似乎迫不及待地挤上前来。有时候，他或她一同挤上前来，说：该我出场了。我思考半天，觉得她有理，于是就改变这一节由她出场的初衷。

我和他们亲密无间，情同手足。他们向我诉述自己的不幸和有幸、欢乐和悲哀、得意和挫折，笑啊哭啊唱啊。我的不足十平方米的小屋，是一个想象中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有山川河流，有风霜雨雪；四季变换极快，花草树木忽荣忽枯；有男人女人，生活旅程很短，从少年到老年，说老就老了；这个世界具有现实世界里我经见过的一切，然而又与现实世界完全绝缘。我进入这个世界，自己创造的这种境地，就把现实世界的一切忘记了，一切都不复存在；四季不分，宠辱皆忘了。我和我的世界里的人物在一起，追踪他们的脚步，倾听他们的诉述，分享他们的欢乐，甚至为他们的痛心而伤心落泪。这是使人忘却自己的一个奇妙的世界。

这个世界只能容纳我和他们，而容不得现实世界里任何人插足。一当某一位熟人或生人走进来，他们全都惊慌地逃匿了，影星儿不见了。直到来人离去，他们复又围来，甚至抱怨我和他聊得太久了，我也急得什么似的。

尤其是写到某些自己亲身经历的生活，感情更容易激荡，这个世界愈加迷人。几十年前的童年生活的片段，展开在那个想象的世界里的时候，人似乎又重度了一次童年。那些早被忘记的童年生活的情景，尤其是一两个稚拙的细节闪现出来的时候，那种心头的欣喜简直是不可名状的。似乎在此刻以前，你从来也没有想到过童年曾经有过

这样有趣的事，那个早被淡忘的细节，忽然像金子一样从心底里蹦出来，闪着动人的光彩，照亮了心灵，照亮了笔尖，令人惊喜令人心灵战栗的惊喜啊，就落在稿纸上了。哦，多妙啊！构思这个作品的时候，压根就没有想到过这个奇妙的细节，只是在写作中突然被带出来了。这种美事！

当我进入这种世界的时候，最害怕的就是突然走进一个人来，把这个世界里的幽灵吓得四下逃散。而至于我的门外和窗下，哪怕有人敲锣打鼓，也不会影响到室内世界里的生活秩序，门槛是想象世界和现实世界的“柏林墙”。

有一年，我在区文化馆里搞业余创作。一位大学中文系的朋友来了，带着他的小说稿，要借我的书桌加夜班修改出来，他们的集体宿舍里无法写作。我可以体味其甘苦，欣然应允，把唯一的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让给他用。他说让我休息，他准备干个通宵，尽量不弄出声响来。其时，我正好也酝酿着一篇小说，准备早睡，以便蓄积力气，明早起来动手。现在，我的床旁边坐着一个人在写作，我怎么也不想躺到床上去。于是，我下决心说，我陪你干。

我坐在一张小矮凳上，背对着他，用膝盖顶着一个笔记本起草我的小说。开始极不舒心，总觉得背后有某种威胁，我的人物也探头探脑，来而复去，无法形成我的世界。我努力耐心坐待，把背后的朋友忘记，两个脊背之间，筑起一道无形的墙壁，我占据的那一半空间，开始形成我想象中的世界……我进入了。

夜半时分，当我站起去小解时，发现他已经躺在床上睡着了，酣睡正浓，鼾声大作，我竟然没有听到，也没有发觉。我给他盖上被子，试图坐到空下来的椅子上去，竟然不行，我的世界在房子的那一

边，那些人物也聚集在那一边，我只好复坐矮凳，背对床铺和桌椅，继续写下去了。黎明时分，我的草稿拉出来了，这就是《猪的喜剧》。那位朋友猛然醒来，不好意思地笑着，仓皇洗了脸，跳上自行车，怕要误了上课时间了。临走时还道歉，说他影响了我的休息。我却十分感激他，他促进了我把这篇小说提早草拟出来了。

能形成这种世界，那往往是创作中最顺手的时候。经常发生这样的情况：那种理想的世界急忙形成不了，人物常闹别扭，他们不满意我，说我把他们没有写足。我如果不能及早地发现这一点，他们就闹别扭了，闹得那个世界乌烟瘴气，分崩离析，令我丧气。最为严重的是发生他们集体叛离的事件，使我想象的世界变成一个痛苦的深渊，给我以惩罚。集体叛离的事件虽不常发生，而闹别扭的事却屡见不鲜，能够顺利形成想象世界，那是最惬意的事，也是构思最充分的缘故。

幸福

幸福是有别于欢乐的一种独特的创作心境。

完成了一部新的作品，这部作品一直写得顺利，那部作品却经历了波折以至痛苦，无论怎样，一当画上最后一个标点符号，放下钢笔，搓一搓发麻的指关节，倚在椅背上，点燃一支烟，此时此刻的心境和情绪，大约类似一个刚刚分娩的产妇。

完全和一个刚刚分娩的母亲一样。那个满脸黄毛的小生命就躺在身边，而母亲已经流过血了，也使足了气力，现在疲惫不堪，连呻唤一声的力气也没有了，甚至连扭过头去看一眼那个小生命的力气都没

有了。然而，她的心境却是再踏实不过了，再安静不过了。她是幸福的，一个人类母亲的幸福。

那一沓厚厚的稿子在案头，每一页上都写得密密麻麻，像满脸黄毛的小生命一样，是一个充溢着生命活力的血肉之躯，是刚从自己的身上（说心上也许更准确）分离出来的血肉之躯啊！

毕竟诞生了，这个从自身分离出来的生命。从孕育到诞生，哦！整整两年了，母亲孕儿不过是十个月时间。漫长的孕育时间里越来越沉重的负累，临产前的不安与骚动，生产过程中的痛苦与孤独（再高明的接生婆也无法代替产妇分担那种痛苦），此刻统统忘记了，变得毫无意义了，好像那是很久以前发生在别人身上的事，自己只是沉浸在一种最踏实的幸福之中。

孕育孩子的十个月里，无论是初做母亲的人，抑或是已经做过母亲的人，都在心里嘀咕，我这回会生出怎样的一个孩子？儿子还是女子？漂亮还是丑陋？正常还是畸形？聪明还是平庸？可别生出个畸形儿或是傻瓜蛋啊！作家是不是在打腹稿的时候有这样类似的考虑？我不知旁人如何，我可是这样不止一次地想过。岂止这些最低限度的考虑，远比这些要复杂得多。

有多少次，站在书架面前，面对那些不同国籍的作家的作品集，厚的或薄的书册，使人敬畏，中国的或外国的作家们，用自己的笔，修筑起来怎样富丽堂皇的多角艺术大厦啊！那无形的光焰，简直要把我心中正在孕育的尚不成形的胎儿挤死压扁了，甚至觉得没有必要再孕育了。这是一种威逼。

现在，当我抚着那一摞刚刚脱手的稿纸，心底是这样的踏实，任何最伟大的作家的最辉煌的巨著都不能对我构成任何一丝压力。他是伟大的，他的巨著是辉煌的；我是渺小的，我的作品谈不上辉煌；但我是真诚的，这部小说稿是我在生活中独立发现和深切感受的结果。我没有胡编乱造；我没有图解某种意念；我没有像商人一样揣摩市场行情而投其所好，用编撰的故事去图解一种出现畅销苗头的观念。我写下了我对生活的真实感受，它完全具有生的权利。它是小狗，然而大狗的美妙的或洪大的叫声永远无法代替它的不大美妙也不够洪大的叫声。它按它的嗓子叫了，世界才有了丰富的声音。它是一枝最普通的野蔷薇，或是一株大荠菜，虽然无法与天姿国色的牡丹相比美，然而牡丹又无法代替野蔷薇或荠菜。它应该生长，而不该畏怯什么。

这种踏实幸福的心境，是我创作生活中的最高享受。作品发表了，有人说好了，读者来信称赞了，评奖了，这都令人高兴，甚至十分高兴，然而只是高兴而已，远不同于刚刚脱手时的那种幸福的感觉。

那只装着稿子的大信封封上了，交给邮递员手中了，不必说要用挂号邮寄，没有底稿呀！邮递员像收受一只普通的包裹一样，砸上邮戳，就扔到一只盛装邮件的大篓子里，令人心悸。砸邮戳的劲儿太大了，扔的时候太用力了，要是糨糊还没有干涸，封口给震开了就糟了。

像送孩子出远门一样，担心是难免的。与送孩子不一样的是，此后便开始淡忘。最初有一种空虚感，一种腾空了的空虚，一种脱掉负累之后的轻松式的空虚。像庭前的一株枝繁叶密的大树被伐倒了，眼前露出一片开阔的天空，这空间太大了，一时难以适应。然而被砍伐掉的大树的印象很快就淡忘了，被大树罩遮挤压的小树一下子获得了

天空和太阳，小树很快就生长起来，占据了那个空间……我感到心头的负累又沉重了，即将临产了。

这棵树长成材了，应该砍伐了。明知砍伐是极费力的事，还是要砍伐。有时候，我也产生一种奇怪的感觉，像生孩子又像育树，心中总有那么一两棵或三五棵树同时生长，有的长得快些，有的长得慢些，长得快的占据了更多的土壤和空间，霸占了水分、养料和阳光。砍伐之后，那被挤压的小树便迅速地来占领腾空了的心理空间，发展起来。

一次一次经历孕育的负累，忍受寂寞，忍受难产的痛苦，然而还是不断地孕育，不断地生产，确也像伟大母亲不因生育的痛苦而拒绝生儿育女一样，心安理得地再繁衍生命。这里头有一个人类永恒的伟大哲理在支撑着——

创造着是幸福的。

苦闷

我不止一次经历过这种情况：不想写东西。在一段为时不短的时日里，懒得动笔，对于正在构思的东西燃不起热情，没什么意思，写出来也没劲，不想写它。对已经写过的东西也失去了兴趣，当初怎么写下这东西，意思不大，搁今天压根没劲头写出来，当时竟然兴致勃勃地写了，简直可笑。我陷入一种心灰意懒的情绪里，大约就是苦闷这个词里面包含的人的那种特殊的心境。

苦闷不同于寂寞。寂寞的对立面是希图寻求欢乐，而我此时对一切欢乐的活动，诸如下棋和聊天，包括我最喜欢的球赛，统统都失去

了兴趣，不想寻求欢乐，甚至讨厌那些欢乐。苦闷又不同于痛苦，因为巨大的痛苦发生在较少的写不下去的时候，是写作中的重大挫折所造成的，是写作过程中的事。而苦闷并不在创作过程中，实际上压根儿就不想写，只是苦苦地闷住了。

苦闷在我身上发生的时候，似乎不是连续性的，而是阶段性儿的，过一个时期，就要经历一次比较厉害的苦闷。几次之后，我分析这种情绪产生的一个共同的原因，是自己对自己厌烦了。这阶段里写下的这一批作品，是些什么货色啊！再写就没写头了呀！应该变变招数了，应该怎么变呢？苦闷产生了。

认真地冷静地甚至痛切地解剖以往的既成的作品，考虑那些并不顺耳的批评意见（当时曾经觉得是没有必要考虑的意见），真有些道理呢！简直批评得太客气了，实际上要比那些意见严重得多，必须改变，必须克服，必须有更强的艺术表现来表现已经意识到的生活内容。

促进这种反省式的悟觉的最有效的办法是读书。那些优秀的作品，可以回答我此时此境里所苦恼着的最迫切的问题。于是，在阅读中，忽然体味到：应该充分地写生活！以前怎么那么傻，把生活中的诗情画意全裁删干净了，只想到短篇小说要干练简洁，裁剪干净，而干净和简洁的结果却显出了干巴和枯燥。应该充分地写生活，写生活本身所蕴藏的那种韵味、那种诗情和诗意。这样的一次悟觉，便随之产生一种强烈的要求表现的欲望，我要尝试新的创作意图了。

又一次苦闷产生了，是对一种追求由尝试到多次实践之后产生了厌烦。学习和阅读中，忽然受到启发，哦！应该充分地写人物的感情。作品和读者、影视和观众之间，是由感情交流相联结的。作品中

的人物的感情不准确，不真诚，不充分，或者过头了，都是不真实。不真实就是虚假的同义语。读者和观众可以满怀兴致地看一切荒诞不经、离奇古怪的故事情节，却无法接受哪怕是少到一个字的虚假感情的。不该哭的时候哭了，不该说的时候又说了那么多废话，亲吻简直使人感到别扭和恶心……所有这些不准确的虚假的感情，读者和观众有一种本能的排斥。感情交流的基础是准确。于是茅塞顿开，我应该在下一步的实践中努力去写人物的感情了。

文学是人学。文学是写人的。这话很对，又有点笼统，人的最重要的东西是感情，是人的七情六欲，是人的追求和向往，是追求和向往的历程中所经历的痛苦和欢乐等等复杂的感情活动。文以情动人。现在才更深一步理解到这个最普遍的道理，该是创作中的一种返璞归真现象吧？搞了十几年创作，发了一批作品，转了那么一个大圈子，现在又回到“以情动人”这个最根本的命题上来，真是有趣。

随着时间的推移，作品渐渐增多，发表了百余万字了，长长短短的作品有几十件了，不要说重复别人，要做到不重复自己就很不容易。但必须坚定信念，心肠冷酷，坚持不重复别人，也不重复自己。因为读者花时间去读任何作品时，最讨厌那种似曾相识的现象。这里就往往产生苦闷：怎么才能不重复别人也不重复自己呢？

这是要用艺术实践来回答的。

我不禁反问自己，艺术，艺术，艺术的含义到底是什么？从最初接触文学的时候起，我就接触了艺术这个名词。几十年来，除了教科书上对艺术所下的定义之外，我对艺术毕竟有了一点亲身的感知。我觉得，艺术就是自己对已经意识到的现实和历史内容所选择的最恰当的表现形式。创作实践的不断丰富，实际应该是不断地一层一层撕开

颇神秘的艺术女神的外衣的过程。真诚的作家，应该以自己的创作实践，去揭示艺术的神秘色彩，而不应该哗众取宠，给已经被披上了够多的神秘色彩的艺术宫殿再添加哪怕是一分虚幻的神秘的色彩。

苦闷是不可避免的。苦闷是自我否定的过程。自我否定是一种内在的动力，是打破自己的思维定式的一种力量。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可怕的不是苦闷而是思维中呈现的太多的定式，思维定式妨碍吸收，排斥进取，不思追求，因而导致作家思想和艺术生命的老化。苦闷过程则是酝酿着打破已成的思维定式的聚蓄力量的过程，是进取的过程，是追求新的思想和艺术的过程，是创作生活富于活力的过程。苦闷的结果，必然是对于自己的艺术实践的又一次突破。因此而可以说——

苦闷象征着新的创造。

1986年4月14日草 小寨

4月23日改定 灞桥

收获与耕耘

二十岁，人生进入成年期的标志。

这是一个令人心魄悸颤的年轮。我发觉，当一个人跨入成年的时候，许多人生的重要课题都涌集而至了，而首当其冲的最重大的问题，就是人生道路的抉择。

我二十岁那年，正好高中毕业了。摆在我面前的极为严峻的选择就是：要么进入大学继续深造，要么回到乡村去务庄稼。尽管学校对毕业生的政治思想工作做得相当周密，共青团组织为此举办过形式多样的活动，然而无法从根本上消除这两种选择结果上的巨大差别，说成天壤之别也许不算夸张。如果我们排除掉虚伪的掩饰而认真地面对现实，一个大学生和一个穷乡僻壤的农民之间的差别是有目共睹的。

我十三四岁的时候，对文学发生了兴趣。那时的中学语文课分作汉语和文学两部分，在文学课本里，那些反映当代农村生活的作品，唤醒了我心中有限的乡村生活的记忆，使我的浅薄的生活经验第一次在铅印的文字里得到验证，使我欣喜，使我惊诧，使我激动不已。是的，第一次在文学作品中验证自己的生活经验，在我无疑具有石破天惊豁然开朗的震动和发现。

我喜欢文学了，开始憧憬自己在文学上的希望了。我做过五彩缤纷的好梦，甚至想入非非，然而都不过是梦罢了，从来也没有因为梦想而感到紧迫和压力。只有跨上二十岁的时候，当这种选择像交叉十字道路摆到脚下的时候，惶惑、犹豫、自信与自卑交织着的复杂感

情，使我感到了这个人生重要关口选择时的全部艰难。人生的第一个至关重要的驿站啊！

不管怎样，生活老人的脚步不乱。当生活把我这一拨儿同龄人推过第一个驿站的时候，似乎丝毫也不理会谁得了，谁失了，谁哭了，谁笑了，谁得意甚至忘形了，谁又沮丧以至沉沦了。而我面对的现实是：高考落第，没有得也没有笑，没有得意更不可能忘形，我属于失去机会者，或者干脆透彻一点说是失败者。然而我没有哭，也没有沮丧或沉沦，深知这些情绪对我都毫无益处。我要用奋斗来改变这一切。

应该感谢生活。

生活老人的脚步不乱，脸孔也一直严峻，似乎并不有意宠爱某一个而又故意冷漠另一个，抱怨生活的不公正只能是弱者的一种本能。生活没有给我厚爱。我自小割草拾柴，直到高中毕业时为了照一张体面的毕业照片才第一次穿上了洋布制服。中学时代我一直从家里背馍上学，背一周的馍馍步行到五十多里远的西安去读书，夏天馍长毛，冬天又冻成冰疙瘩。我当时似乎并不以为太苦，而且觉得能进城念书，即使背馍，也比我的父亲幸福得多了，他压根儿没有这种进城念书的可能。因此，我十分热爱共产党，使我成为我们村子里的第一个高中毕业生。

第一个高中毕业生回乡当农民，很使一些供给孩子念书的人心里攒了劲儿。我的压力又添了许多，成为一个念书无用的活标本。

回到乡间，除了当农民种庄稼，似乎别无选择。在这种别无选择的状况下，我选择了一条文学创作的路，这实际上无异于冒险。我阅

读过中外一些作家成长道路的文章，给我的总体感觉是，在文学上有重要建树的人当中，幸运儿比不幸的人要少得多。想要比常人多所建树，多所成就，首先比常人要付出多倍的劳动，要忍受常人难以忍受的艰辛甚至是痛苦的折磨。有了这种从旁人身上得到的生活经验，我比较切实地确定了自己的道路，消除了过去太多的轻易获得成功的侥幸心理，这就是静下心来，努力自修，或者说自我奋斗。

我给自己订下了一条规程，自学四年，练习基本功，争取四年后发表第一篇作品，就算在“我的大学”领到毕业证了。

我主要在两方面进行努力，一是读书，一是练习写作。书是无选择地读，能找到什么就读什么，阅读中自己感觉特别合口味儿的就背。无选择的读书状况继续了好几年，那原因在于我既没有选择读书的可能，也没有什么人指点我读书的迷津，反正是凡能拿到手的古今中外的文学书，就读了。于今想来，这样倒有一个好处，开阔了视野，进行了艺术的初步熏陶，歪打正着罢了。另一方面，不断地写，写完整的作品较少，大量地记生活笔记，每天都有，或长或短，不受拘束，或描一景，或状一物，或写一人一相，日日不断，自由随便。

我几乎在每次换取一个新的生活记事本的时候，开篇都先要冠之一个我很喜欢的座右铭：“不问收获，但问耕耘。”这信条里所蕴含的埋头苦干实干的哲理令我信服，也适宜我的心性。这条座右铭排除人时时可能产生的侥幸心理，也抑制那种自卑心理的蔓延，这两种不好的心理情绪是对我当时威胁最大的因素。

在此信条下，我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对自己进行最基本的文学修养的锻炼。大量阅读优秀的文学作品，对我特别感兴趣的篇章进行分析和解剖，学习结构和表现的艺术手段。坚持写生活笔记已形成习

惯，一本一本写下去，锻炼了文字的表达能力也锻炼了观察现实生活的眼力。我的心境基本上稳定踏实的。

我的家庭本来就不富裕，如在三年经济困难时期，饱肚成为最大的问题。我没有电灯照明，也没有钟表计时，晚上控制不住时间，第二天就累得难以起床。我只好用一只小墨水瓶改做的煤油灯照明，烧焦了头发又熏黑了鼻孔。每晚熬干这一小瓶煤油，即上炕睡觉，大约为夜里十二点钟，控制了时间。长此而成习惯，至今竟不能早眠。

春秋时节，气候宜人，而冬夏两季，就有点难以忍耐。我常常面对冻成冰碴的笔尖而一筹莫展，也常常在夏暑的酷热当中头晕眼花，没有任何取暖和制冷的手段。蚊虫成为天敌，用臭蒿熏死一批，待烟散之后，从椽眼儿和窗孔又钻进来一批。我就在这“轮番轰炸”的伴奏下，继续我的奋斗。

三伏酷暑，蚊虫逞威，燥热难受。乡间的农民，一家人在场头迎风处铺一张苇席睡觉，我却躲在小厦屋里，只穿一条短裤，汗流浃背地写写画画。母亲怕我沤死在屋子里，硬拉我到场边去乘凉。我丢不下正在素描着的一个肖像，趁空儿又溜回小厦屋去了。

为了避免太多的讽刺和嘲笑对我平白无故带来的心理上的伤害，我使自己的学习处于秘密状态，与一般不搞文学的人绝口不谈文学创作的事，每被问及，只是淡然回避，或转移话题。即使我的父亲，也不例外。他常常忍不住问我整夜钻在屋里“成啥精”？我说“谝闲传”！于是他就不再问。

我虽然稳着心在耕耘，然而总期待收获。

我终于得到了第一次收获的喜悦。哪怕是一支又瘦又小的麦穗，毕竟是我亲手培育出来的啊！

我的第一篇散文在《西安晚报》发表了。它给我的喜悦是不言而喻的，然而更重要的是对我的信心的验证。我第一次经过自己的独立的实践使自己相信：没有天才或天分甚微的人，通过不息的奋斗，可以从偏心眼儿的上帝那儿争得他少赋予我的那一份天资。整个在此前一段漫长的苦斗期——从开始爱好到矢志钻研文学，我一直在自信与自卑的折磨中滚爬。现在，自信第一次击败了自卑，成为我心理因素和情绪中的主导方面。我验证了"不问收获，但问耕耘"这条谚语，进而愈加确信它对我是适用的。直到一九八一年，历遭劫难之后，我编完第一本短篇小说集《乡村》的时候，竟然抑制不住如潮的心绪，在《后记》里写下这样的话：

农民总是在总结了当年收成的丰歉的原因之后，又满怀希望和信心地去争取下一料庄稼的丰产与优质了，从不因一料收成的多寡而忘乎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争取在尔后的学习创作生活中，耕得匀一点、细一点、深一点，争取有更多更好的收获。

这里所流露出的情绪，仍然首先是耕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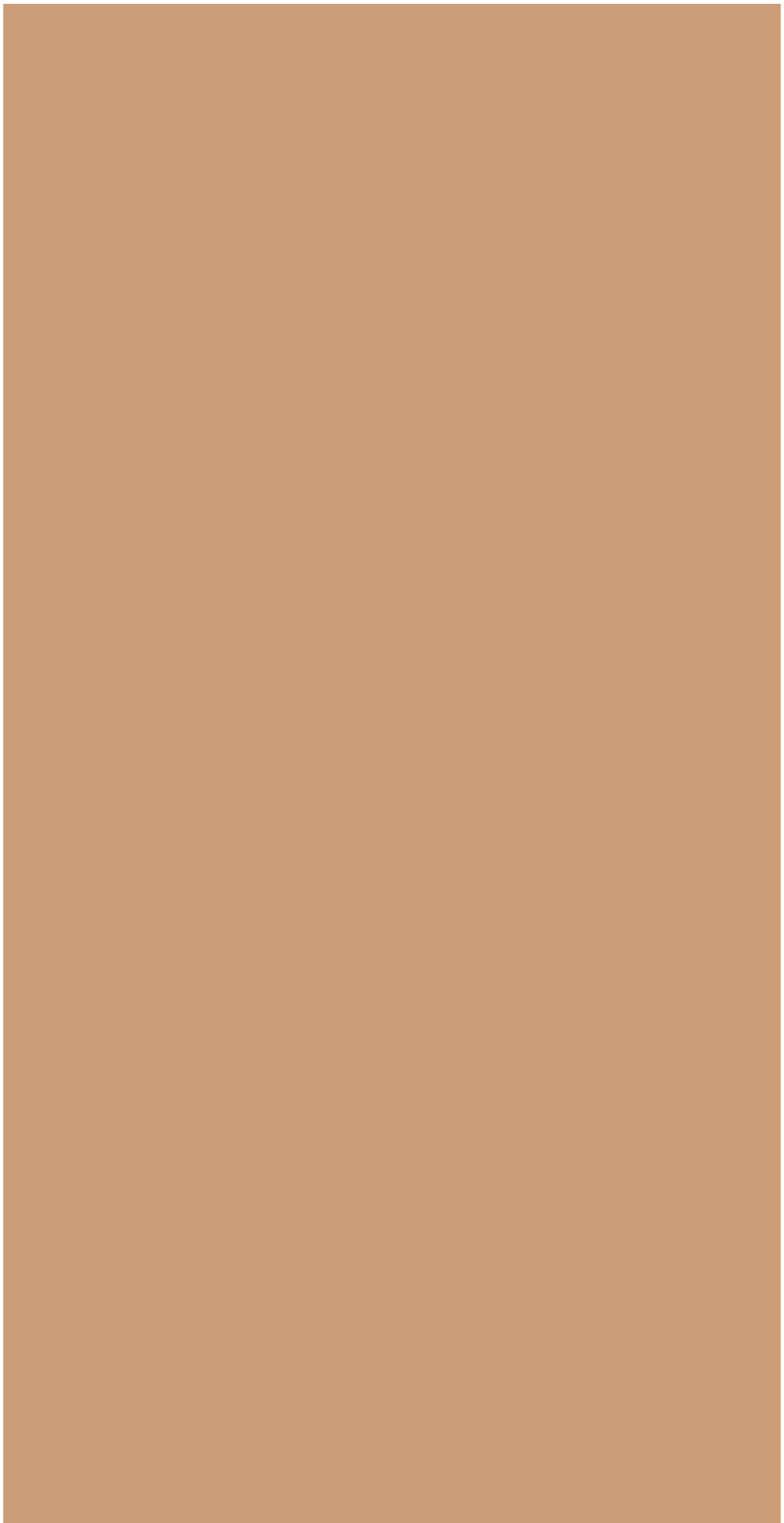
没有耕耘就没有收获。出大力气耕耘，流大汗水耕耘，用大力气和大汗水耕耘深一些，匀一些，才可能有丰裕的收获，才可能获得较大一点的创作成果。用小力气和点滴汗水所能指望得到的，必是小小的收获或是小小的作品。不想花费苦力和根本不想流汗或是没有足够的耐心进行耕耘，就不会有什么收获可指待，也就不会有创作。

现在，当我能写一点作品奉之于世，当我受到社会和喜欢我的作品的读者的较多关心的时候，心理压力反而愈来愈重了。社会正走向开放，生活也日趋复杂；旧的陈腐的一些观念被淘汰，而人对生活的一些基本的信仰却不能变。我希望在自己的心田里继续保持“不问收获，但问耕耘”这样一种情绪，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做自己尚要做下去的事；更不能张狂，一旦张牙舞爪起来，就破坏了这种情绪，就泄掉底气了。我原本就是一个农村人，生活把我造就成一个像我父亲那样只会刨挖土地以获得生命延续的农民，完全是顺理成章的事。我在新社会得到读书的机会，获得文化知识以后又使我滋生了一种想成一点文学事业的奢望，而且有了一点小小的建树，我已意识到自己的责任，社会的和生活的责任，反倒泛不起个人的太多的得意或失意的情绪了。

感谢生活磨炼了我。生活对于我，设置下太多的艰辛和波折，反而使我增加了认识生活的机会，增强了承受压力的负载能力。在这种甚为漫长的人生的第一、第二和第三驿站的艰难行程中，“不问收获，但问耕耘”这条生活哲理给了我多少好处！反过来又使我更深地理解了这个被许多人实践并且证实了的科学箴言。

世界在变化，生活在变化中发展，文学不得不变，不变就会被人民所冷漠。我也要变化，这当然是另一个命题了，然而进行这种变化的我的基本立足点，依然是重在耕耘。

1986年12月



第 1 卷　1978—1982

第 2 卷　1983—1984

第 3 卷　1985—1986

第 4 卷　白鹿原

第 5 卷　1987—1994

第 6 卷　1995—2000

第 7 卷　2001—2003

第 8 卷　2004—2006

第 9 卷　2007—2009

第 10 卷　2010—20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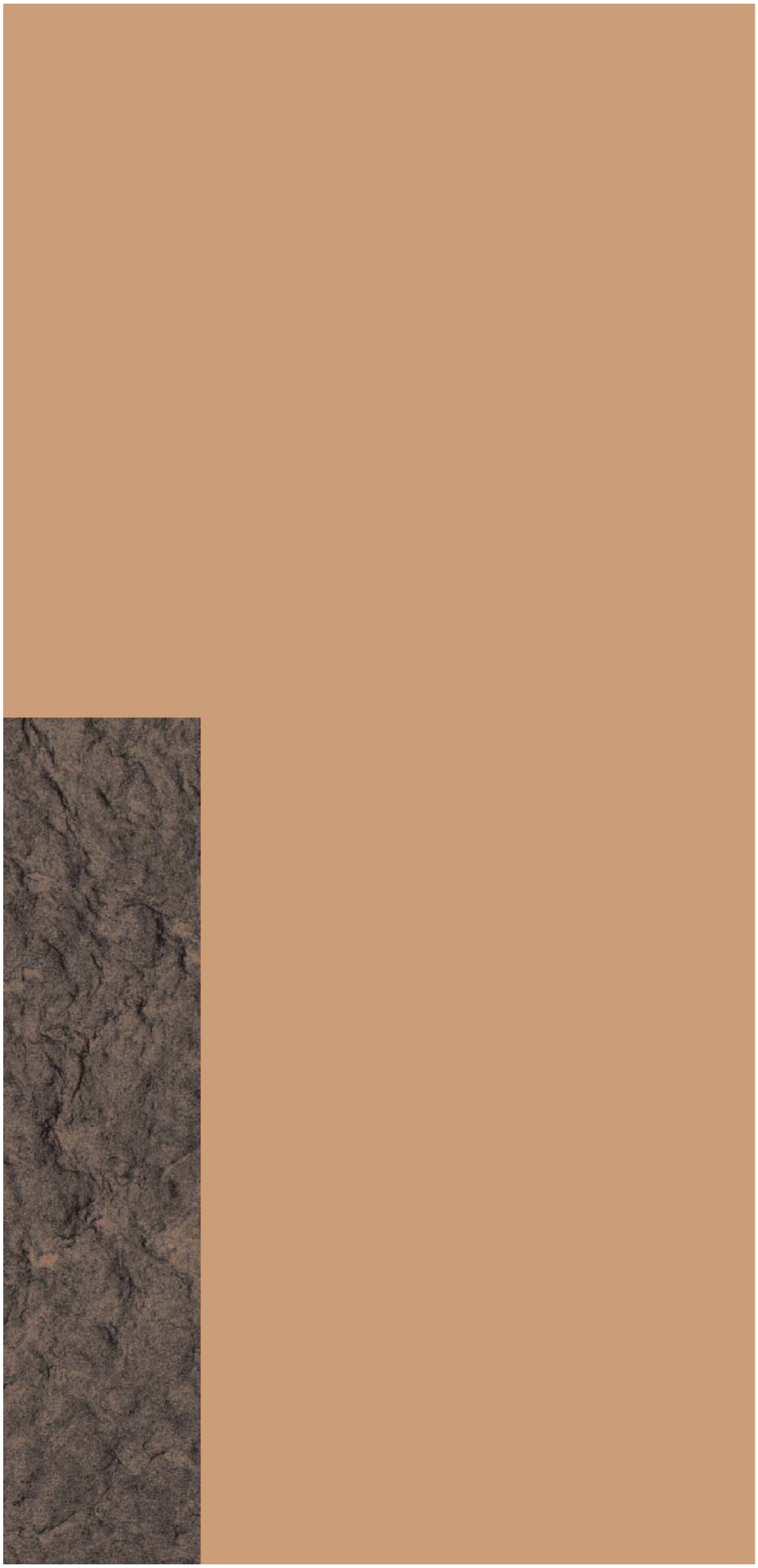
第4卷

白鹿原

陈忠实文集

增订本

人民文学出版社



陈忠实文集

增订本

第 4 卷

陈忠实

白鹿原

人民文学出版社

文前插图



- 白鹿原
  - 第一章
  - 第二章
  - 第三章
  - 第四章
  - 第五章
  - 第六章
  - 第七章
  - 第八章
  - 第九章
  - 第十章
  - 第十一章
  - 第十二章
  - 第十三章
  - 第十四章
  - 第十五章
  - 第十六章
  - 第十七章
  - 第十八章
  - 第十九章
  - 第二十章
  - 第二十一章
  - 第二十二章
  - 第二十三章
  - 第二十四章
  - 第二十五章

- 第二十六章
- 第二十七章
- 第二十八章
- 第二十九章
- 第三十章
- 第三十一章
- 第三十二章
- 第三十三章
- 第三十四章

白鹿原

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

——巴尔扎克

第一章

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

娶头房媳妇时他刚刚过十六岁生日。那是西原上巩家村大户巩增荣的头生女，比他大两岁。他在完全无知完全慌乱中度过了新婚之夜，留下了永远羞于向人道及的可笑的傻样，而自己却永生难以忘记。一年后，这个女人死于难产。

第二房娶的是南原庞家村殷实人家庞修瑞的奶干女儿。这女子又正好比他小两岁，模样俊秀眼睛忽灵儿。她完全不知道嫁人是怎么回事，而他此时已经谙熟男女之间所有的隐秘。他看着她的羞怯慌乱而想到自己第一次的傻样反倒觉得更富刺激。当他哄唆着把躲躲闪闪而又不敢违拗他的小媳妇裹入身下的时候，他听到了她的不是欢乐而是痛苦的一声哭叫。当他疲惫地歇息下来，才发觉肩膀内侧疼痛钻心，她把他咬烂了。他抚伤惜痛的时候，心里就潮起了对这个娇惯得有点任性的奶干女儿的恼火。正欲发作，她却扳过他的肩膀暗示他再来一次。一当经过男女间的第一次交欢，她就变得没有节制的任性。这个女人从下轿顶着红绸盖巾进入白家门楼到躺进一具薄板棺材抬出这个门楼，时间尚不足一年，是害痨病死的。

第三个女人是北原上樊家寨的一户同样殷实人家的头生女儿，十六岁的身体发育得像二十岁的女人一样丰满成熟，丰腴的肩膀和浑圆的臀部，又有一对大奶子。她要么是早熟，要么是婚前有过男女间的知识，一钻进被窝就把他紧紧搂住，双臂上显示着急迫与贪婪，把丰满鼓胀的奶子毫不羞怯地贴紧他的胸脯。这个像一团绒球的女人在他

怀里缠磨过一年就瘦成了一根干枯的苞谷秆子，最后吐血而死了，死了也没搞清是什么病症。

第四个女人娶的是南原靠近山根的米家堡村的。对这个女人他几乎没有留下什么记忆。她似乎对他的所有作为毫无反应。他要来她绝不推拒，他不要时她从不黏他。她从早到晚只是做她应该做的事而几乎不说一句话。她死的时候，他不在家，到镇上去了，回来时看见她的嘴死死咬着被角儿，指甲抓掉了，手上的血尚未完全干涸，炕边和炕席上凝结着发黑的血污和被指甲抓抠的印痕。说是午后突然肚子疼，父亲找他不在就去镇上请来冷先生急救。冷先生断为羊毛疔，扎针放血时血已变成黑色的稠汁放不出来。她死得十分痛苦，浑身扭蜷成一只干虾。

连着死了四个女人，嘉轩怕了，开始相信村人早就窃窃着的关于他命硬的传闻，怕是注定要打一辈子光棍了。他的老子秉德老汉为他张罗再订再娶，他劝父亲暂缓一缓再说。秉德老汉把嘬着的嘴唇对准水烟壶的烟筒，噗的一声吹出烟灰，又捻着黄亮绵软的烟丝儿装入烟筒，又嘬起嘴唇噗地一声吹着了火纸，鼻孔里喷出两股浓烟，不容置疑地说:“再卖一匹骡驹！”

第二天上午，秉德老汉就牵着骡驹上白鹿镇去了，回来时天已擦黑，扔下那条半截铁链半截皮绳的缰绳，告诉儿子说：“媳妇说成了。东原上李家村木匠卫家的三姑娘。”这个女子是一个穷家女子，门不当户不对已经无从顾及。木匠卫老三养下五个女子，正愁养活不过，只要给高金聘礼，不大注重男人命软命硬的事。这时候，远远近近的村子热烈地流传着远不止命硬的关于嘉轩的生理秘闻，说他长着一个狗的家伙，长到可以缠腰一匝，而且尖头上长着一个带毒的倒钩，女人们的肝肺肠肚全被捣碎而且注进毒汁。那些殷实人家谁也不去考虑白鹿村白秉德家淳厚的祖德和殷实的家业了，谁也不愿眼睁睁把女儿送到那个长着狗屌的怪物家里去送死；只有像木匠卫老三这种恨不得把女子踢出门去的人才吃这号明亏。当婚事按照祖传的严格程序和礼仪加紧筹办的重要关头，秉德老汉自己却突然暴死了。

那是麦子扬花油菜干荚时节，刚交农历四月，节令正到小满，脱下棉衣棉裤换上单衣单裤的庄稼人仍然不堪燥热。午饭后，秉德老汉叮嘱过长工鹿三喂好牲口后晌该种棉花了，就躺下来歇息一会儿。每天午饭后他都要歇息那么一会儿，有时短到只眨一眨眼眯盹儿一下，然后跳下炕用蘸了冷水的湿毛巾擦擦眼脸，这时候就一身轻松一身爽快，仿佛把前半天的劳累全都抖落掉了；然后坐下喝茶，吸水烟，浑身的筋骨就兴奋起来抖擞起来，像一匝一匝拧紧了发条的座钟；等得鹿三喂饱了牲口，他和他扛犁牵马走出村巷走向田野的时候，精神抖擞得像出征的将军。整个后晌，他都是精力充沛意志集中于手中的农活，往往逼得比他年轻的长工鹿三气喘吁吁汗流浃背也不敢有片刻的怠慢。他从来不骂长工更不必说动手动脚打了，说定了的身价工钱也是绝不少付一升一文。他和长工在同一个铜盆里洗脸坐一张桌子用餐。他用过的长工都给他出尽了力气而且成了交谊甚笃的朋友，满原都传诵着白鹿村白秉德的佳话好名。秉德老汉刚躺下就滋滋润润地迷

糊了。他梦见自己坐着牛车提着镰刀去割麦子，头顶忽地一个闪亮，满天流火纷纷下坠，有一团正好落到他的胸膛上烧得皮肉吱吱吱响，就从牛车上翻跌到满是黄土草屑的车辙里。惊醒后他已经跌落在炕下的砖地上，他摸摸胸脯完好无损并无流火灼烧的痕迹，而心窝里头着实火烧火燎，像有火焰呼呼喷出，灼伤了喉咙口腔和舌头，全都变硬了变僵了变得干涸了。他的女人大约听到响声跑进屋来抱他拉他都无法使他爬到炕上去，立即惊慌失措呼喊儿子嘉轩和长工鹿三。三个人把秉德老汉抬到炕上，一齐俯下身焦急而情切地询问哪儿出了毛病。可是秉德老汉已经不能说话，只是用粗硬的指头上的粗硬的指甲扒抓自己的脖颈和胸脯，嘴里发出嗷嗷嗷呜呜呜狗受委屈时一样的叫声。嘉轩和母亲全都急傻了，只有长工鹿三脑筋尚未混乱，忙喊："快去请先生！"嘉轩得到提醒随即跑出院子，奔白鹿镇请先生去了。

白鹿镇在村子西边，一条小街，一家药铺，冷先生坐堂接诊，兼营中药。冷先生听嘉轩说了病状，心里就明白了八九成，从抽屉里取出一只皮包挂到裤腰带上，急忙赶到白家来。冷先生是白鹿原上的名医，穿着做工精细的米黄色蚕丝绸衫，黑色绸裤，一抬足一摆手那绸衫绸裤就忽悠悠地抖；四十多岁年纪，头发黑如墨染油亮如同打蜡，脸色红润，双目清明，他坐堂接诊，门庭红火。冷先生看病，不管门楼高矮更不因人废诊，财东人用轿子抬他或用垫了毛毯的牛车拉他他去，穷人拉一头毛驴接他他也去，连毛驴也没有的人家请他他就步行着去了。财东人给他封金赏银他照收不拒，穷汉家给几个铜元麻钱他也坦然装入衣兜，穷得一时拿不出钱的人他不逼不索甚至连问也不问，任就诊者自己到手头活便的时候给他送来。他落下了好名望。他的父亲老冷先生过世的时光，十里八乡凡经过他救活性命的幸存者和许多纯粹是仰慕医德的乡里人送来的金字匾额和挽绸挂满了半条街。冷先生坐上那张用生漆漆得黑乌锃亮的椅子，人们发现他比老冷先生

更冷。他不多说话倒不怠慢焦急如焚的患者。他永远镇定自若成竹在胸，看好病是这副模样看不好也是这副模样看死了人仍是这副模样，他给任何患者以及比患者更焦虑急迫的家人的印象永远都是这个样子。看好了病那是因为他的医术超群此病不在话下因而不值得夸张称颂，看不好病或看死了人那本是你不幸得下了绝症而不是冷先生医术平庸，那副模样使患者和家人坚信即使再换一百个医生即使药王转世也是莫可奈何。

冷先生一进门就看见炕上麻花一样扭曲着的秉德老汉，仍然像狗似的嗷嗷嗷呜呜呜地呻唤。他不动声色，冷着脸摸了左手的脉又捏了捏肚腹，然后用双手掀开秉德老汉的嘴巴，轻轻“嗯”了一声就转过头问嘉轩：“有烧酒没有？”嘉轩的母亲白赵氏连声应着“有有有”，转身就把一整瓶烧酒取来了。冷先生又要来一只青瓷碗，把烧酒咕嘟嘟倒入碗里，用眼睛示意嘉轩将酒点燃。嘉轩满脸虚汗，颤抖的双手捏着火石火镰却打不出火花来。鹿三接过手只一下就打燃了火纸，噗地一口气就吹出了火焰，点燃了烧酒。冷先生从裤腰带上解下皮夹再揭开暗扣，露出一排刀子锥子挑钩粗针和一只闪闪发光的三角刮刀。冷先生取出一根麦秆粗的钢针和一块钢板，一齐放到烧酒燃起的蓝色火焰上烧烤，然后吩咐嘉轩压死老汉的双手，吩咐白赵氏压紧双腿，特别叮嘱鹿三夹紧主人的头和脖颈，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不能松劲。一切都严格遵照冷先生的吩咐进行。冷先生把那块钢板塞进秉德老汉的口腔，用左手食指一分就变成一个V形的撑板，把秉德老汉的嘴撬撑到极限，右手里那根正在烧酒火焰上烧得发红变黄的钢针一下戳进喉咙，旁人尚未搞清怎么一回事，钢针已经拔出，只见秉德老汉嘴里冒出一股蓝烟，散发着皮肉焦灼的奇臭气味。冷先生一边擦拭刀具一边说：“放开手。完了。”随之吹熄了烧酒碗里的火苗儿。秉德老汉像麻花一样扭曲的腿脚手臂松弛下来，散散伙伙地随意摆置在炕上一动不

动，口里开始淌出一股乌黑的黏液，看了令人恶心，嘉轩用毛巾小心翼翼地擦拭着。这时候，秉德老汉渐渐睁开眼睛。四个人同时发现了这一伟大的转机，同时发现了微启的眼睑里有一缕显示生命回归的活光，像是阴霾的云缝泻下一缕柔和的又是生机勃勃的阳光。三个人同时惊喜地“哦呀”一声，不约而同地转过溢着泪花的眼来看着冷先生。冷先生还是惯常那副模样，说：“给灌一点凉开水。”三个人手忙脚乱又是小心翼翼地给那个阔大的嘴巴灌了几匙开水，秉德老汉竟然神奇地坐了起来，抓住冷先生的手说开了笑话：“哎呀！冷侄儿！我给阎王爷的生死簿子上正打钩哩！猛乍谁一把从我手里抽夺了毛笔，照直捅进我的喉咙。我还给阎王爷说‘你看你看这可怪不了我呀’！原来是你。”三个人流着眼泪笑出了声。秉德老汉嗔怪老伴说：“还不快给先生拾掇茶饭——”白赵氏带着怠慢了恩人的歉意慌忙离去了，灶间传来很响的添水的瓢声和风箱声。

冷先生坐下也不说话，接过嘉轩递给他的秉德老汉的那把白铜水烟壶就悠悠吸起来。白赵氏端来一只金边细瓷碗，里面盛着三个洁白如玉的荷包蛋。冷先生只用一个手势就表示出不容置疑的坚决拒绝。白赵氏还想说什么体己关照的话，秉德老汉的手脚随着身子的突然仰倒又扭起了麻花，而且更加剧烈，眼里的活光很快收敛，又是一脸垂死的神色，嗷嗷呜呜狗一样的叫声又从喉咙里涌出来。已经完全解除了心理负载的女人儿子和长工大惊失色，骤然间意识到他们高兴得太早了，危机并没有根除，一下子又陷入更加沉重的二次打击之中。冷先生依然不慌不乱照前办理，重新在燃烧的烧酒的蓝色火焰里烧烤钢板和钢针。三个人不经吩咐已经分别挟制压死了秉德老汉的头手和腿脚。通红的钢针再次捅进喉咙，又是一股带着焦臭气味的蓝烟。秉德老汉又安静下来，继而眼里又泛出活光来，这回他可没说给阎王生死簿上打钩画圈的笑话。三个人的脸上和眼里的疑云凝滞不散。冷先生

收拾起那只磨搓得紫红油亮的皮夹，重新系到裤腰带上，准备告辞。嘉轩和母亲以及长工鹿三一齐拉住冷先生的胳膊，这样子你咋敢走？你走了再犯了可咋办呀？冷先生平板着脸说：“常言说，有个再一再二没有再三再四。再不发生了算是老叔命大福大，万一再三再四地发生……我夺了他打钩画圈的笔杆也不顶啥了！”说罢就走出屋门走过院子走到街门外头来。嘉轩一边送行一边问父亲得下的是啥病，冷先生说：“瞎瞎病。”嘉轩几乎无力走进门楼。“瞎瞎病”不言自明的确切含义是绝症。

白秉德老汉死了。父亲的死是嘉轩头一回经见人的死亡过程。爷爷在他尚未来到人世就死掉了，奶奶死的时光他还没有任何记忆的智能。他的四个女人相继死亡他都不能亲自目睹她们咽下最后一口气，他被母亲拖到鹿三的牲畜棚里，身上披一块红布，防止鬼魂附体。父亲的死亡给他留下了永久性的记忆，那种记忆非但不因年深日久而暗淡而磨灭，反倒像一块铜镜因不断地擦拭而愈加明光可鉴。冷先生掖着皮夹走回他在白鹿镇上的中医堂以后，嘉轩和他妈白赵氏以及长工鹿三在炕上和炕下把秉德老汉团团围定，像最忠诚的卫士监护着国王。他和母亲给病人喂了一匙糖水，提心吊胆如履薄冰似的希望度过那个可怕的间隔期而不再发作。秉德老汉用他十分柔弱十分哀婉的眼光扫视了围着他的三个人，又透过他们包围的空隙扫视了整个屋子，大约发觉冷先生不在了，迟疑一下就闭上了眼睛，再睁开时就透出一股死而无疑的沉静。他已预知到时间十分有限了，一下就把沉静的眼睛盯住儿子嘉轩，不容置疑地说：“我死了，你把木匠卫家的人赶紧娶回来。”嘉轩说：“爸……先不说那事。先给你治病，病好了再说。”秉德老汉说：“我说的就是我死了的话，你当面答应我。”嘉轩为难起来：“真要……那样，也得三年服孝满了以后。这是礼仪。”秉德老汉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你把书念到狗肚里去了？咱们白家几辈财

旺人不旺。你爷是个单崩儿守我一个单崩儿，到你还是个单崩儿。自我记得，白家的男人都短寿，你老爷活到四十八，你爷活到四十六，我算活得最长过了五十大关了。你守三年孝就是孝子了？你绝了后才是大逆不孝！”嘉轩的头上开始冒虚汗。秉德老汉说：“过了四房娶五房。凡是走了的都命定不是白家的。人存不住是欠人家的财还没还完。我只说一句，哪怕卖牛卖马卖地卖房卖光卖净……”嘉轩看见母亲给他使眼色，却急得说不出口，哪有三年孝期未过就办红事的道理？正僵持间，秉德老汉又扭动起来，眼里的活光倏忽隐退，嘴里又发出嗷嗷嗷呜呜呜的叫声，三个人全都不知如何是好了。嘉轩的一只手腕突然被父亲捉住，那指甲一阵紧似一阵直往肉里抠，垂死的眼睛放出一股凶光，嘴里的白沫不断涌出，在炕上翻滚扭动，那只手却不放松。母亲急了：“快给你爸一句话！”鹿三也急了：“你就应下嘛！”嘉轩“哇”的一声哭了：“爸……我听你的嘱咐……你放心……”秉德老汉立时松了手，往后一仰，蹬了蹬腿就气绝了。嘉轩一声嚎哭就昏死过去，被救醒时父亲已经穿上了老衣，香蜡已经在灵桌上焚烧。鹿三说：“你不能再哭了，先安顿丧事。你不做主旁人没法举动。”嘉轩当即和族里几位长辈商定丧事，先定必办不可的事：派出四个近门子的族里人，按东南西北四路分头去给亲戚友好报丧；派八个远门子的族人日夜换班去打墓，在阴阳先生未定准穴位之前先给坟地推砖做箍墓的准备事项；再派三四个帮忙的乡党到水磨上去磨面，自家的石磨太慢了。下来就议到乐人的事，这需得主家嘉轩做主，请几个乐人？闹多大场面？继续多少时日？嘉轩说：“俺爸辛苦可怜一世，按说该当在家停灵三年才能下葬。俺爸临终有话，三天下葬，不用鼓乐，一切从简。我看既不能三年守灵，也不要三天草草下葬，在家停灵‘一七’，也能箍好墓室。叔伯爷们，你们指教……”远门近门的长辈老者都知道嘉轩命运不济，至今连个骑马坠灵的女人也没有，都同意嘉轩的安排。一位伯伯朗然说：“人说‘瞻前顾后’，前后总是不能兼顾，就只能

是先瞻前而后顾后；生死不能同时顾全，那就先顾生而后顾死。”事情当即定下来，派一个人到邻近村里去找乐人班主，讲定八挂五的人数，头三天和后一天出全班乐人，中间三天只要五个人在灵前不断弦索就行了。

整个丧事都按原定的程序进行。七天后，秉德老汉就在祖坟坟地上占据了一个位置，一个新鲜的湿漉漉的黄土堆成的墓圪垯。他的坟堆按照长幼排在父亲坟堆的下首靠左的位置，右边不言而喻是留给白赵氏将来仙逝时的安居之地。这件悲凉的丧事总算过去了。屋里走了父亲一个人，屋院里顿然空寂得令人窒息。母亲一个人在上房里屋，他一个人在厦屋，长工鹿三一个人在马号里。如果母亲不咳嗽一声，这个有着三进房屋的四合院里整个晚上和白天都没有一丝声息。这天晚上母亲问他打算啥时候娶妻，他说起码得过了头周年以后。母亲说不要等了，等也是白等，家里太孤清了；况且她一个人单是扫屋扫院洗衣拆被做饭都支应不下来，再甭说纺线织布等家务了。他说：“那就过了百日再办吧。”母亲说：“百日也不要等了，‘七七’过了就办。”实际的情况是过了两月，当麦子收割碾打完毕地净场光秋田播种之后的又一个仅次于冬闲的夏闲时节里，他娶回来第五房女人——木匠卫老三家的三姑娘。新婚之夜，溽暑难耐。嘉轩插上了厦屋木门的门闩，转过身就脱下了长袖布衫和长裤。端坐在炕席上的新娘突然爬跪在炕上，对他作揖磕头，乞求他再不要脱短袖衫和短裤了。他问她怎么了？她说她生来就命苦，在穷苦人家里的三姑娘就更苦了[1]。他似乎意识到一点什么，就追问她是不是听到什么闲话了？她说她知道他娶过四房女人，都死了；她还说她听人说过他不光是命硬，而且那东西上头长着一个有毒汁的倒钩，把女人的心肺肝花全都捣得稀烂，铁打的女人也招不住捣腾。她竟然瑟瑟抖颤着身子哭起来：“俺爸图了你家的财礼不顾我的死活，逢崖遇井我都得往下跳。我不想死不想早死想

多多伺候你几年，我给你端水递茶洗脚做饭扫地缝连补缀做牛做马都不说个怨字，只是你黑间甭拿那个东西吓我就行了，好官人好大哥好大大你就容让我了吧……”嘉轩一下子愣坐在椅子上，新婚之夜的兴味荡然无存。他早已听到过这个荒诞的流言却无法辩解，又着实搞不清别人的与自己的那个东西有什么区别。他曾经在逢集赶会时的公用茅厕里佯装拉屎尿尿偷偷窥视过许多陌生的男人，全都是一个㞗样又是百㞗不一样，结果反而愈加迷惑。这个木匠卫家的三姑娘可怜兮兮地乞求饶命，不仅没有引起他的同情，反而伤害了他的自尊，也激怒了他。他从椅子上站起来，一步跨上炕去，三下五除二就扒光了衣裤，把自己的东西亮给她看，哪有什么倒钩毒汁！三姑娘又羞又怕又哭又抖。她越这样他越气恼，赌气扒下她的衣裤。事毕后他问她伤了什么内脏，却发现她已闭气。他慌忙掐住她的人中。她醒来后就躲到炕角缩作一团。他好气又好笑，亲昵她爱抚她给她宽心。无论如何，她的心病无法排除，每到夜晚，就在被窝里发疟疾似的打战发抖。半年未过，她竟然神情恍惚，变成半疯半癫，最后一次到涝池洗衣服时犯了病，栽进涝池溺死了。

埋葬木匠卫家的三姑娘时，潦草的程度比前边四位有所好转，他用杨木板割了一副棺材，穿了五件衣服，前边四个都只穿了三件。自然不请乐人，也不能再做更大的铺排，年轻女人死亡做到这一步已经算是十分宽厚仁慈了。嘉轩所以要对她稍显优厚待遇，完全是一种难以述说的心理因素。在这个女人被涝池的奇臭难闻的淤泥涂抹得脏污不堪的身子行将就木之前，他心里开始产生了一种负罪感。结婚那天，他在新房里揭去她的盖头巾的一霎，发现她不独漂亮而且壮健，红扑扑的脸膛，黑如乌珠似的两只机灵的眼睛，透着强健气魄的手臂。她的手掌上竟然有一层薄茧儿，那是木匠出门揽活挣钱，由她和母亲操持田间农活的印证。劳动练就的一副强健的体魄终究抵御不住

怪诞流言的袭击……当他又是一个人躺在厦屋炕上的每一天夜晚，都挥斥不开她在新婚之夜给他磕头哀告的情景，总是想到她在他怀里瑟瑟发抖的冰凉的手和冰凉的腿，她肯定从未得到过做爱的欢愉而只领受过恐惧，她竟然无法排除恐惧而终于积聚到崩溃的一步。他现在有点心灰意冷，从田间回来就躺到空寂冷落的土炕上。这个土炕接纳过五个姿态各异的女人，又抬走了五具同样僵硬的尸体。订娶这五个女人花费的粮食棉花骡子和银圆合计起来顶得小半个家当且在其次，关键是心绪太坏了。他躺在炕上既不唉声叹气也不难过，只是乏力和乏心。他觉得手足轻若片纸，没有一丝力气，一股轻风就可能把他扬起来抛到随便一个旮旯里无声无响，世事已经十分虚渺，与他没有任何牵涉。他躺在炕上直到天黑，听见母亲叫他吃晚饭他说不饿不想吃了。母亲又喊鹿三。鹿三不好意思独自吃饭，跑进厦屋来开导他。他劝鹿三快去吃饭不要等自己。鹿三在院里葡萄架下吞食饭菜的声音很响，吃得又急又快。他想不出世上有哪种可口的食物会使人嚼出这样香甜这样急切的响声。

　　母亲拾掇完灶间的事在院子里扑打身上的尘灰，喊他。嘉轩走进上房里屋，母亲坐在父亲在世时常坐的那把简化了的太师椅上，姿势颇似父亲的坐姿。他在桌子另一边的椅子上坐下，尽量做出不在心亦不在意的样子。母亲说她准备明天一早回娘家去，托他的舅舅们给他再踏摸媳妇。他劝母亲暂缓一缓。母亲问他为什么要缓？二十几岁的年龄了还敢缓！母亲说着就上了劲儿：“甭摆出那个阴阳丧气的架势！女人不过是糊窗子的纸，破了烂了揭掉了再糊一层新的。死了五个我准备给你再娶五个。家产花光了值得，比没儿没女断了香火给旁人占去心甘。”嘉轩再没有说什么。第五天，母亲从舅家归来，事情已有定局。南原上的一户姓胡的小康人家，赌场上掷骰子一夜之间输光了家当，赌徒们赶到家里来，上楼灌净了囤子里的粮食拉走了槽头的犍牛

和骡子，用犍牛骡子拉着装满粮食的牛车走掉了。女人气得半死，赌徒羞愧难当，解下裤带吊到后院的核桃树上幸被人发现救活。这样一来答应以女儿许人，聘礼之高足使正常人咋舌呆脑，二十石麦子二十捆棉花或按市价折成银洋也可以，但必须一次交清。这个数字使嘉轩脊梁发冷，母亲却不动声色地说她已经答应了人家，下来该由充当媒人的二舅按照订婚的惯常程序去履行手续就是了。嘉轩惊异地发现，母亲办事的干练和果决实际上已经超过父亲，更少一些瞻前顾后的忧虑，表现出认定一条路只顾往前走而不左顾右盼的专注和果断。这样，赶在父亲的头周年祭祀到来之前一个月，正当桃花三月的宜人季节，第六个媳妇在呜哇呜哇的唢呐喇叭的欢悦的喜庆曲调里走进门楼来了。

第六个女人胡氏被揭开盖头红帕的时候，嘉轩不禁一震，拥进新房来看热闹的男人和女人也都一齐被震得哑了嘻嘻哈哈的哄闹。这个女人使人立即会联想到传说中的美女，或者是戏台上的贵妇人娇女子。当嘉轩从新房挤出来到摆满坐椅饭桌的庭院里的时候，有人就开始喊胡凤莲了，那是秦腔戏《游龟山》里一位美貌无双的渔女，几乎家喻户晓人人皆知。晚上，当他和她坐在一个炕上互相瞄瞅的美好时光里，她的光彩和艳丽一下子荡涤净尽前头五个女人潜留给他的晦暗心理，也使他不再可惜二十石麦子二十捆棉花的超级聘礼。然后同衾共枕。他很快发觉事情并不美妙。他抚摸她搂抱她亲她的脸亲她的嘴她都温顺地领受了，当他的手试图拉开她的短裤的系带时她跳了起来，从枕头下迅即摸出一把剪刀执在手中。那剪刀显然经过用心的打磨，锋利的刀刃在蜡烛的红光里闪出一道道血花。她跪在炕上，裸着两只翘翘的雪白的奶子，把剪刀的刀尖对准他说：“你要是敢扯开我的裤带，我就把你的那个东西剪掉。”

他妥协了让步了依允了胡氏。他觉得有这样一个女人陪睡在身边该当满足了，却又止不住夜夜遗憾。他甚至开始真的怀疑自己那个东西里头流出的货是否有毒，偷偷把那货抖落到猪食里观察猪吃了以后的动静，猪的活动毫无异常。他把自己的心事诉说给冷先生。冷先生听了就笑了，说他早就听到闲人们说的这个闲话了，纯属子虚乌有无稽之谈。在他行医的二十多年里经见过有精无精死精水精的男人，还没见过一个生有倒钩毒精的先例。冷先生笑毕说：“兄弟！干脆来个将错就错将计就计吧！”说罢铺纸捉笔蘸墨，开下一剂滋阴壮阳温补的药方，一次取了七服，并嘱连服百日。嘉轩拎着一捆药包回家交给胡氏，说这药是除毒的。胡氏喜不自胜，每日早晚煎熬，看着男人饮下。这一晚她偎在男人怀里动情地说：“你就忍着苦喝到百日，只要除了毒，你想咋样你要咋样就咋样，我一点为难你的坏心都没有。”嘉轩大为欢心，喝那苦咧咧的药汁如同喝着蜂蜜。百日尽头，嘉轩经过药物滋补，容光焕发，胡氏解除了心头禁讳也就扯去了裤带，俩人一样热烈一样贪婪一样不觉满足也不感困乏，直到把两页炕面的土坯弄塌，俩人又嘻嘻笑着挪一个地窝儿。

胡氏放开腰禁后的狂热持续了整整三个通宵，俩人都累坏了。第四天夜里再也折腾不起，相依相偎着进入睡梦。酣睡里一声尖叫把嘉轩惊吓得不知所措，清醒后发觉胡氏紧紧缠抱着自己，浑身抖索如同筛糠，大气也不敢出。他急忙点着油灯，看见胡氏的眼睛里满是狐疑惊恐之色，目光恍惚游移不定。问她怎么了，她嘴里支支吾吾，好半天才挤出一句：“有鬼！”说罢把头埋进被窝，更加用力死抱住嘉轩。嘉轩听罢，顿觉头皮发麻后脊发冷，浑身暴起一层冷森森的鸡皮疙瘩。他问：“鬼在哪达？”胡氏颤着声说：“我不敢说，越说越害怕。”嘉轩挣脱开胡氏的手，勾上裤子光着上身赤着脚跑出厦屋爬上楼去挖来半升豌豆，一把连着一把摔打起来，从顶棚打到墙角，从炕上打到

地下，一把把豌豆密如雨下，唰唰唰的响声令人毛骨悚然，炕上桌上地上撒满了绿莹莹的豌豆粒儿。小时候父亲就这样驱鬼为他压惊。经过这一番折腾，胡氏真个缓过气来，眼里有了活色，抱住他呜呜呜哭了起来，身子不再抖颤了。他抱着她坐到天明，她才敢于开口说出昨晚梦见的鬼怪。她说她看见他前房的五个女人了。那五个女人掐她拧她抠她抓她撕她打她唾她，都争着拉他去睡觉。令嘉轩大惑不解的是，胡氏并没有见过死掉的任何一个女人，而她说出的那五个死者的相貌特征一个一个都与真人相吻合。嘉轩说给母亲，母亲当即说："今黑就去请法官，把狗日的一个一个都捉了。"

法官隐名瞒姓，人称一撮毛，左腮下一颗神秘的黑痣上缀下尺把长的一撮黑毛。嘉轩诉说了闹鬼的经过。法官只问了他的住址就催他回去，说自己随后就到。嘉轩知道法官行路坐鬼抬轿神速如风，就急急匆匆小跑回家来。法官果然随后就到了，刚到门口就把一只罗网抛到门楼上，乃天罗地网。法官进得屋来，头缠红帕腰系红带脚蹬红鞋，扑上楼去又钻到脚地。胡氏吓得蒙了被子。法官最后从二门的拐角抓住了鬼，把一个用红布蒙口扎紧了脖颈的瓷罐呈到灯下，那蒙口的红布不断弹动，像是有老鼠往外冲撞。法官吩咐说："给锅里把水添足，把狗日煮死再焙干！"鹿三和嘉轩俩人轮换拉扯风箱，锅开水滚后，一股臭气溢出来令人作呕，嘉轩先吐了，鹿三接着也吐了，吐了之后再烧，直到把那半锅水烧得一滴不剩，法官接了赏钱提了瓷罐收了天罗地网又坐鬼抬轿回岭上去了。此后果真不再闹鬼。胡氏的精神却再也没能恢复过来，日见沉郁日见寡欢日见黑瘦下去，吃了冷先生几十服中药也不见起色，直至流产下来一堆血肉，竟然卧炕不起，不久就气绝了。

嘉轩完全绝望了。冷先生开导他说：“兄弟，请个阴阳先生来看看宅基和祖坟，看看哪儿出了毛病，让阴阳先生给禳治禳治……”

---

[1] 秦腔剧《五典坡》里的王宝钏排行为三，称三姑娘，乡间就把排行为三的女子视作命苦的人。

第二章

第六房女人胡氏死去以后，娘俩发生了重大分歧。母亲白赵氏仍然坚持胡氏不过也是一张破旧了的糊窗纸，撕了就应该尽快重新糊上一张完好的。她现在表现出的固执比秉德老汉还要厉害几成。她说她进白家门的那阵儿，老阿公还在山里收购中药材，带着秉德，让老二秉义在家务农。那年秉义被人杀害，老阿公从山里赶回，路上遭了土匪，回到家连气带急吐血死去了。秉德把那两间门面的中药收购店铺租赁给一位吴姓的山里人就回到白鹿村撑持家事来了。她和他生下七女三男，只养活了两个女子和嘉轩一个娃子，另外七个有六个都是月里得下无治的四六风症，埋到牛圈里化成血水和牛粪牛尿一起抛撒到田地里去了。唯有嘉轩的哥哥拴牢长到六岁，已经可以抱住顶杆儿摇打沙果树上的果子了，搞不清得下什么病，肚子日渐胀大，胳膊腿越来越细，直到浑身通黄透亮，终于没能存活下来。嘉轩至今没有女人更说不上子嗣，说不定某一天她自己突然死掉，到阴地儿怎么向先走的秉德老汉交代？嘉轩诚心诚意说，所有母亲说到的关系利害他都想到了而且和母亲一样焦急，但这回无论如何不能贸贸然急匆匆办事了。这样下去，一辈子啥事也办不成，只忙着娶妻和埋人两件红白事了。得请个阴阳先生看看，究竟哪儿出了毛病。白赵氏同意了。

夜里落了一场大雪。庄稼人被厚厚的积雪封堵在家里，除了清扫庭院和门口的积雪再没有什么事情好做。鹿三早早起来了，已经扫除了马号院子里的积雪，晒土场也清扫了，磨房门口的雪也扫得一干二净，说不定有人要来磨面的。只等嘉轩起来开了街门，他最后再进去扫除屋院里的雪。嘉轩已经起来了，把前院后庭的积雪扫拢成几个雪堆，开了街门，给鹿三招呼一声，让他用小推车把雪推出去，自己要

出门来不及清除了。他没有给母亲之外的任何人透露此行是去请阴阳先生，免得又惹起口舌。村巷里的道路被一家一户自觉扫掉积雪接通了，村外牛车路上的雪和路两旁的麦田里的雪连成一片难以分辨。他拄着一根棍子，脚下嚓嚓嚓响着走向银白的田野。雪地里闪耀着绿色蓝色和红色的光带，眼前常常出现五彩缤纷的迷宫一样的琼楼仙阁。翻上一道土梁，他已经冒汗，解开裤带解手，热尿在厚厚的雪地上刺开一个豁豁牙牙的洞。这当儿，他漫无目的地瞧着原上的雪景，辨别着被大雪覆盖着的属于自己的麦田的垄畦，无意间看到一道慢坡地里有一坨湿土。整个原野里都是白得耀眼的雪被，那儿怎么坐不住雪？是谁在那儿撒过尿吧？筛子大的一坨湿土周围，未曾发现人的足迹或是野兽的蹄痕。他怀着好奇心走过去，裸露的褐黄的土地湿漉漉的，似乎有缕缕丝丝的热气蒸腾着。更奇怪的是地皮上匍匐着一株刺蓟的绿叶，中药谱里称为小蓟，可以止血败毒清火利尿。怪事！万木枯谢百草冻死遍山遍野也看不见一丝绿色的三九寒冬季节里，怎么会长出一株绿油油的小蓟来？他蹲下来用手挖刨湿土，猛然间出现了奇迹，土层里露出来一个粉白色的蘑菇似的叶片。他愈加小心地挖刨着泥土，又露出来同样颜色的叶片。再往深层挖，露出来一根嫩乎乎的同样粉白的秆儿，直到完全刨出来，那秆儿上缀着五片大小不一的叶片。他想连根拔起来却又转念一想，说不定这是什么宝物珍草，拔起来死了怎么办？失了药性就成废物了。他又小心翼翼地把湿土回填进去，把周围的积雪踢刮过来伪装现场，又蹲下来挣着屁股挤出一泡尿来，任何人都不会怀疑这儿的凌乱了。他用雪擦洗了手上的泥土，又回到原来的牛车路上。

　　他当即转身朝回走去，踏着他来时踩下的雪路上的脚窝儿，缓两天再去找阴阳先生不迟。回到家里，母亲和鹿三都问他怎么又回来了，他一概回答说路上雪太厚太滑爬不上那道慢坡去，他们都深信不

疑。他回到自己的厦屋，从箱子里翻出一本绘图的石印本《秦地药草大全》来，这是一本家传珍宝，爷爷和父亲在山里收购药材那阵儿凭借此书辨别真伪。现在，他耐着心一页一页翻着又薄又脆的米黄色竹质纸页，一一鉴别对照，终于没有查到类似的药名。他心里猜断，不是怪物就是宝物。要是怪物贸然挖采可能招致祸端，要是宝物一时搞不清保存炮制的方法，拔了也就毁了。他想到冷先生肯定识货，可万一是宝物说不定进贡皇帝也未免难说，当即又否定了此举。他于焦急中想到姐夫朱先生，不禁一悦。

朱先生刚刚从南方讲学归来。杭州一位先生盛情邀约，言恳意切，仰慕他的独到见解，希望此次南行交流诸家沟通南北学界，顺便游玩观赏一番南国景致。他兴致极高，乘兴南去，想着自己自幼苦读，昼夜吟诵，孤守书案，终于使学界刮目相看，此行将充分阐释自己多年苦心孤诣凿研程朱的独到见解，以期弘扬关中学派的正宗思想。再者，他自幼至今尚未走出过秦地一步，确也想去风光宜人的南方游览一番，以博见识，以开眼界。然而此行却闹得不大愉快，乘兴而去扫兴而归。到南方后，同仁们先不提讲学之事，连续几天游山玩水，开始尚赏心悦目，三天未过便烦腻不振。所到之处，无非小桥流水，楼台亭阁，古刹名寺，看去大同小异。整日吃酒游玩的生活，使他多年来形成的早读午习的生活习惯完全被打乱，心里烦闷无着，又不便开口向友人提及讲学之事。几位聚会一起的南北才子学人很快厮混熟悉，礼仪客套随之自然减免，不恭和戏谑的玩笑滋生不穷，他们不约而同把开心的目标集中到他的服饰和口语上。他一身布衣，青衫青裤青袍黑鞋布袜，皆出自贤妻的双手，棉花自种自纺自织自裁自缝，从头到脚不见一根洋线一缕丝绸。妻子用面汤浆过再用棒槌捶打得硬邦邦的衣服使他们觉得式样古笨得可笑；秦地浑重的口语与南方轻俏的声调无异于异族语言，往往也被他们讪笑取乐。他渐渐不悦他

们的轻浮。一天晚宴之后，他们领他进了一座烟花楼。当他意识到这是一个什么去处时怒不可遏，拂袖而去，对邀他南行讲学的朋友大发雷霆：“为人师表，传道授业解惑。当今世风日下人心不古，吾等责无旁贷，本应著书立论，大声疾呼，以正世风。竟然是白日里游山玩水，饮酒作乐，夜间寻花问柳，梦死醉生……”朋友再三解释，说几位同仁本是好意，见他近日情绪不佳，恐他离家日久，思念眷属，于是才……朱先生不齿地说：“君子慎独。此乃学人修身之基本。表里不一，岂能正人正世。何来如此荒唐揣测？”当即断然决定，天明即起程北归，再不逗留。朋友再三挽留说，如果一次学也不讲就匆匆离去，于他的面子上实在难以支持。朱先生于是让步，讲了一回，语言又成为大的障碍，一些轻浮子弟窃窃讥笑他的发音而无心听讲。朱先生更加懊恼，慨然叹曰：南国多才子，南国没学问。他憋着一肚子败兴气儿回到关中，一气登上华山顶峰，那一口气才吁将出来，这才叫山哪！随即吟出一首《七绝》来：

踏破白云万千重

仰天池上水溶溶

横空大气排山去

砥柱人间是此峰

朱先生自幼聪灵过人，十六岁应县考得中秀才，二十二岁赴省试又以精妙的文辞中了头名文举人。次年正当赴京会考之际，父亲病逝，朱先生为父守灵尽孝不赴公车，按规定就要取消省试的举人资格。陕西巡抚方升厚爱其才更钦佩其孝道，奏明朝廷力主推荐，皇帝竟然破例批准了省试的结果。巡抚方升委以重任，不料朱先生婉言谢

绝，公文往返六七次，仍坚辞不就。直至巡抚亲自登门，朱先生说："你视我如手足！可是你知道不知道？你害的是浑身麻痹的病症！充其量我这只手会摆或者这只脚会走也是枉然。如果我不做你的一只手或一只脚，而是为你求仙拜神乞求灵丹妙药，使你浑身自如起来，手和脚也都灵活起来，那么你是要我做你的一只手或一只脚，还是要我为你去求那一剂灵丹妙药呢？你肯定会选取后者，这样子的话你就明白了。"方巡抚再不勉强。朱先生随即住进白鹿书院。

白鹿书院坐落在县城西北方位的白鹿原原坡上，亦名四吕庵，历史悠远。宋朝年间，一位河南地方小吏调任关中，骑着骡子翻过秦岭到滋水县换乘轿子，一路流连滋水河川飘飘扬扬的柳絮和原坡上绿莹莹的麦苗，忽然看见一只雪白的小鹿凌空一跃又隐入绿色之中再不复现。小吏即唤轿夫停步，下轿注目许多时再也看不见白鹿的影子，急问轿夫对面的原叫什么原，轿夫说："白鹿原。"小吏"哦"了一声就上轿走了。半月没过，小吏亲自来此买下了那块地皮，盖房修院，把家眷迁来定居，又为自己划定了墓穴的方位。小吏的独生儿子仍为小吏。小吏的四个孙子却齐摆摆成了四位进士，其中一位官至左丞相，与司马光文彦博齐名。四进士全都有各自的著述。四兄弟全部谢世后，皇帝钦定修祠以纪念其功德，修下了高矮粗细格式完全一样的四座砖塔，不分官职只循长幼而分列祠院大门两边，御笔亲题"四吕庵"匾额于门首。吕氏的一位后代在祠内讲学，挂起了"白鹿书院"的牌子。这个带着神话色彩的真实故事千百年来被白鹿原上一代一代人津津有味地传诵着咀嚼着。朱先生初来时院子里长满了荒草，蝙蝠在大梁上像蒜瓣一样结串儿垂吊下来。朱先生用方巡抚批给他的甚为丰裕的银饷招来工匠彻底修缮了房屋，把一块由方巡抚书写的"白鹿书院"的匾牌架到原先挂着"四吕庵"的大门首上。那块御笔亲题的金匾已不知去向。大殿内不知什么朝代经什么人塑下了四位神像，朱先生令民

工扒掉，民工畏怯不前，朱先生上前亲自动手推倒了，随口说：“不读圣贤书，只知点蜡烧香，怕是越磕头头越昏了！”

然而朱先生却被当作神正在白鹿原上下神秘而又热烈地传诵着。有一年麦子刚刚碾打完毕，家家户户都在碾压得光洁平整的打麦场上晾晒新麦，日头如火，万里无云，街巷里被人和牲畜踩踏起一层厚厚的细土，朱先生穿着泥屐在村巷里叮咣叮咣走了一遭，那些躲在树荫下看守粮食的庄稼人笑他发神经了，红红的日头又不下雨穿泥屐不是出洋相么？小孩子们尾随在朱先生屁股后头嘻嘻哈哈像看把戏一样。朱先生不恼不躁不答不辩回到家里就躺下午歇了，贤妻嗔笑他书越念越呆了，连个晴天雨天都分辨不清了。正当庄稼人悠然歇晌的当儿，骤然间刮起大风，潮过一层乌云，顷刻间白雨如注，打麦场上顿时一片汪洋，好多人家的麦子给洪水冲走了。人们过后才领悟出朱先生穿泥屐的哑谜，痛骂自己一个个愚笨如猪，连朱先生的好心好意都委屈了。

有天晚上，朱先生诵读至深夜走出窑洞去活动筋骨，仰面一瞅满天星河，不由脱口而出：“今年成豆。”说罢又回窑里苦读去了。不料回娘家来的姐姐此时正在茅房里听见了，第二天回到自家屋就讲给丈夫。夫妇当年收罢麦子，把所有的土地全部种上了五色杂豆。伏天里旷日持久的干旱旱死了苞谷稻黍和谷子，耐旱的豆类却抗住了干旱而获得丰收。秋收后姐夫用毛驴驮来了各种豆子作酬谢，而且抱怨弟弟既然有这种本领，就应该把每年夏秋两季成什么庄稼败哪样田禾的天象，告诉给自家的主要亲戚，让大家都发财。朱先生却不开口。事情由此传开，庄稼人每年就等着看朱先生家往地里撒什么种子，然后就给自家地里也撒什么种子。然而像朱先生的姐姐那样得意的事再也没有出现过，朱家的庄稼和众人的庄稼一样遭灾，冷子打折了苞谷，神

虫吸干了麦粒儿，蝗虫把一切秋苗甚至树叶都啃光吃净了。但这并不等于说朱先生不是神，而是天机不可泄露，给自己的老子和亲戚也不能破了天机。后来以至发展到丢失衣物，集会上走丢小孩，都跑来找朱先生打筮问卜，他不说他们不走，哭哭啼啼诉说自己的灾难。朱先生就仔细询问孩子走丢的时间地点原因，然后作出判断，帮助愚陋的庄稼人去寻找，许多回真的应验了。朱先生开办白鹿书院以后，为了排除越来越多的求神问卜者的干扰，于是就一个连一个推倒了四座神像泥胎，对那些吓得发痴发呆的工匠们说："我不是神，我是人，我根本都不信神！"

白鹿书院开学之日，朱先生忙得不亦乐乎，却有一个青年农民汗流浃背跑进门来，说他的一头怀犊的黄牛放青跑得不知下落，询问朱先生该到何处去找。朱先生正准备开学大典，被来人纠缠住心里烦厌，然而他修养极深，为人谦和，仍然喜滋滋地说："牛在南边方向。快跑！迟了就给人拉走了。"那青年农人听罢转身就跑，沿着一条窄窄的田间小道往南端直跑去，迎面有两个姑娘手拉着手在路上并肩而行，小伙子跑得气喘如牛摇摇晃晃来不及转身，正好从两个姑娘之间穿过去，撞开了她俩拉着的手。两位姑娘拉住他骂起来，附近地里正在锄麦子的人围过来，不由分说就打，说青年农民耍骚使坏。青年农民招架不住又辩白不清拔腿就跑，那些人又紧追不舍。青年农民情急无路，就从一个高坎上跳了下去，跌得眼冒金星，抬头一看，黄牛正在坎下的土壕里，腹下正有一只紫红皮毛的小牛犊撅着尻子在吮奶，老黄牛悠然舔着牛犊。他爬起来一把抓住牛缰绳，跳着脚扬着手对站在高坎上头那些追打他的庄稼人发疯似的喊："哥们爷们，打得好啊，打得太好了！"随之把求朱先生寻牛的事述说一遍。那些哥们爷们纷纷从高坎上溜下来，再不论他在姑娘跟前耍骚的事了，更加详细地询问朱先生掐指占卜的细梢末节，大家都说真是活神仙啊！寻牛的青年农

民手舞足蹈地说：“朱先生给我念下四句秘诀，‘要得黄牛有，疾步朝南走；撞开姑娘手，老牛舔牛犊。’你看神不神哪！”这个神奇的传说自然很快传进白嘉轩的耳朵，他在后来见到姐夫时问证其虚实，姐夫笑说：“哦，看来我不想成神也不由我了！”

嘉轩一贯尊重姐夫，但他却从来也没有像一般农人把朱先生当作知晓天机的神。他第一次看见姐夫时竟有点失望。早已名噪乡里的朱才子到家里来迎娶大姐碧玉时，他才得一睹姐夫的尊容和风采，那时他才刚刚穿上浑裆裤。才子的模样普普通通，走路的姿势也普普通通，似乎与传说中那个神乎其神的神童才子无法统一起来。母亲在迎亲和送嫁的人走后问他：“你看你大姐夫咋样？”他拉下眼皮沮丧地说：“不咋样。”母亲期望从他的嘴里听到热烈赞美的话而没有得到满足，顺手就给了他一个抽脖子。

他开始敬重姐夫是在他读了书也渐渐懂事以后，但也始终无法推翻根深蒂固的第一印象。他敬重姐夫不是把他看作神，也不再看作是一个“不咋样”的凡夫俗子，而是断定那是一位圣人，而他自己不过是个凡人。圣人能看透凡人的隐情隐秘，凡人却看不透圣人的作为；凡人和圣人之间有一层永远无法沟通的天然界隔。圣人不屑于理会凡人争多嫌少的七事八事，凡人也难以遵从圣人的至理名言来过自己的日子。圣人的好多广为流传的口歌化的生活哲理，实际上只有圣人自己可以做得到，凡人是根本无法做到的。“房是招牌地是累，攒下银钱是催命鬼。”这是圣人姐夫的名言之一，乡间无论贫富的庄稼人都把这句俚语口歌当经念。当某一个财东被土匪抢劫了财宝又砍掉了脑袋的消息传开，所有听到这消息的男人和女人就会慨叹着吟诵出圣人的这句话来。人们用自家的亲身经历或是耳闻目睹的许多银钱催命的事例反复论证圣人的圣言，却没有一个人能真正身体力行。凡人们兴味十足

甚至幸灾乐祸一番之后，很快就置自己刚刚说过的血淋淋的事例于脑后，又拼命去劳作去挣钱去迎接催命的鬼去了，在可能多买一亩土地再添一座房屋的机运到来的时候绝不错失良机。凡人们绝对信服圣人的圣言而又不真心实意实行，这并不是圣人的悲剧，而是凡人永远成不了圣人的缘故。

从白鹿村朝北走，有一条被牛车碾压得车辙深陷的官路直通到白鹿原北端的原边，下了原坡涉过滋水就离滋水县城很近了。白嘉轩从原顶抄一条斜插的小路走下去，远远就瞅见笼罩书院的青苍苍的柏树。白嘉轩踩着溜滑的积雪终于下到书院门口，仰头就看见门楼嵌板上雕刻着的白鹿和白鹤的图案，耳朵里又灌入悠长的诵读经书的声音。他进门后，目不斜视，更不左顾右盼，而是端直穿过院庭，一直走到后院姐夫和姐姐的起居室来。姐姐正盘腿坐在炕上缝衣服，一边给弟弟沏茶，一边询问母亲的安宁。不用问，姐夫此刻正在讲学，他就坐着等着和姐姐聊家常。作为遐迩闻名的圣人朱先生的妻子的大姐也是一身布衣，没有绫罗绸缎着身。靛蓝色大襟衫，青布裤，小小脚上是系着带儿的家织布鞋袜，只是做工十分精细，那一颗颗布绾的纽扣和纽环，几乎看不出针线的扎脚儿。姐姐比在自家屋时白净了，也胖了点儿，不见臃肿，却更见端庄，眼里透着一种持重、一种温柔和一种严格恪守着什么的严峻。大姐嫁给朱先生以后，似乎也渐渐透出一股圣人的气色了，已经不是在家时给他梳头给他洗脸给他补缀着急了还骂他几句的那个大姐了。院里一阵杂沓的脚步声，嘉轩从门里望过去，一伙伙生员朝后院走来，一个个都显得老成持重顶天立地的神气，进入设在后院的餐室以后，院子里静下来。姐夫随后回来，打过招呼问过好之后，就和他一起坐下吃早饭。饭食很简单，红豆小米粥，掺着扁豆面的蒸馍颜色发灰，切细的萝卜丝里拌着几滴香油。吃罢以后，姐夫口中噘进一撮干茶叶，咀嚼良久又吐掉了，用以消除萝

卜的气味，免得授课或与人谈话时喷出异味来。姐夫把他领到前院的书房去说话。

五间大殿，四根明柱，涂成红色，从上到下，油光锃亮。整个殿堂里摆着一排排书架，架上搁满一摞摞书，进入后就嗅到一股清幽的书纸的气息。西边隔开形成套间，挂着厚厚的白色土布门帘，靠窗置一张宽大的书案，一只精雕细刻的玉石笔筒，一只玉石笔架和一双玉石镇纸，都是姐夫的心爱之物。滋水县以出产美玉而闻名古今，相传秦始皇的玉玺就取自这里的玉石。除了这些再不见任何摆设，不见一本书也不见一张纸，整个四面墙壁上，也不见一幅水墨画或一帧条幅，只在西山墙上贴着一张用毛笔勾画的本县地图。嘉轩每次来都禁不住想，那些字画条幅挂满墙壁的文人学士，其实多数可能都是附庸风雅的草包；像姐夫这样真有学问的人，其实才不显山露水，只是装在自己肚子里，更不必挂到墙上去唬人。两人坐在桌子两边的直背椅子上，中间是一个木炭火盆，炭火在静静地燃烧，无烟无焰，烧过留下的一层白色的炭灰，仍然明晰地显露着木炭本来的木质纹路，看不见烟火却感到了温暖。姐夫一边添加炭棒，一边支起一个三脚支架烧水沏茶。他就把怎样去请阴阳先生，怎么在雪地里撒尿，怎么发现那一坨无雪的慢坡地，怎么挖出怪物，以及拉屎伪造现场的过程详尽述说了一遍，然后问：“你听说过这号事没有？”姐夫朱先生静静地听完，眼里露出惊异的神光，不回答他的话，取来一张纸摊开在桌上，又把一支毛笔交给嘉轩说：“你画一画你见到的那个白色怪物的形状。”嘉轩捉着笔在墨盒里膏顺了笔尖，有点笨拙却是十分认真地画起来，画了五片叶子，又画了杆儿把叶子连结起来，最终还是不无遗憾地憨笑着把笔交给姐夫：“我不会画画儿。”朱先生拎起纸来看着，像是揣摩一幅八卦图，忽然嘴一噘神秘地说：“小弟，你再看看你画的是什么？”嘉轩接过纸来重新审视一番，仍然憨憨地说：“基本上就是我

挖出来的那个怪物的样子。”姐夫笑了，接过纸来对嘉轩说：“你画的是一只鹿啊！”嘉轩听了就惊诧得说不出话来，越看自己刚才画下的笨拙的图画越像是一只白鹿。

很古很古的时候（传说似乎都不注重年代的准确性），这原上出现过一只白色的鹿，白毛白腿白蹄，那鹿角更是莹亮剔透的白。白鹿跳跳蹦蹦像跑着又像飘着从东原向西原跑去，倏忽之间就消失了。庄稼汉们猛然发现白鹿飘过以后麦苗忽地蹿高了，黄不拉叽的弱苗子变成黑油油的绿苗子，整个原上和河川里全是一色绿的麦苗。白鹿跑过以后，有人在田坎间发现了僵死的狼，奄奄一息的狐狸，阴沟湿地里死成一堆的癞蛤蟆，一切毒虫害兽全都悄然毙命了。更使人惊奇不已的是，有人突然发现瘫痪在炕的老娘正潇洒地捉着擀杖在案板上擀面片，半世瞎眼的老汉睁着光亮亮的眼睛端着筛子拣取麦子里混杂的沙粒，秃子老二的瘌痢头上长出了黑乌乌的头发，歪嘴斜眼的丑女儿变得鲜若桃花……这就是白鹿原。

嘉轩刚刚能听懂大人们不太复杂的说话内容时，就听奶奶母亲父亲和村里的许多人无数次地重复讲过白鹿神奇的传说，每个人讲的都有细小的差异，然而白鹿的出现却是不容置疑的。人们一代一代津津有味地重复咀嚼着这个白鹿，尤其在战乱灾荒瘟疫和饥馑带来不堪忍受的痛苦里渴盼白鹿能神奇地再次出现，而结果自然是永远也没有发生过，然而人们仍然继续兴味十足地咀嚼着。那确是一个耐得咀嚼的故事。一只雪白的神鹿，柔若无骨，欢欢蹦蹦，舞之蹈之，从南山飘逸而出，在开阔的原野上恣意嬉戏。所过之处，万木繁荣，禾苗茁壮，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疫疠廓清，毒虫灭绝，万家乐康，那是怎样美妙的太平盛世。这样的白鹿一旦在人刚能解知人言的时候进入心间，便永远也无法忘记。嘉轩现在捏着自己刚刚画下那只白鹿的纸，

脑子里已经奔跃着一只活泼的白色神鹿了。他更加确信自己是凡人而姐夫是圣人的观点。他亲眼看见了雪地下的奇异的怪物亲手画出了它的形状，却怎么也判断不出那是一只白鹿。圣人姐夫一眼便看出了白鹿的形状，“你画的是一只鹿啊！”一句话点破了凡人眼前的那一张蒙脸纸，豁然朗然了。凡人与圣人的差别就在眼前的那一张纸，凡人投胎转世都带着前世死去时蒙在脸上的蒙脸纸，只有圣人是被天神揭去了那张纸投胎的。凡人永远也看不透眼前一步的世事，而圣人对纷纭的世事洞若观火。凡人只有在圣人揭开蒙脸纸点化时才恍悟一回，之后那纸又浑全了又变得黑瞎糊涂了。圣人姐夫说过“那是一只鹿啊”之后，就不再说多余的一句话了，而且低头避脸。嘉轩明白这是圣人在下逐客令了，就告辞回家。

一路上脑子里都浮动着那只白鹿。白鹿已经溶进白鹿原，千百年后的今天化作一只精灵显现了，而且是有意把这个吉兆显现给他白嘉轩的。如果不是死过六房女人，他就不会急迫地去找阴阳先生来观穴位；正当他要找阴阳先生的时候，偏偏就在夜里落下一场罕见的大雪；在这样铺天盖地的雪封门槛的天气里，除了死人报丧谁还会出门呢？这一切都是冥冥之中的神灵给他白嘉轩的精确绝妙的安排。再说，如果他像往常一样清早起来在后院的茅厕里撒尿，而不是一直把那泡尿憋到土岗上去撒，那么他就只会留心脚下的跌滑而注定不敢东张西望了，自然也就不会发现几十步远的慢坡下融过雪的那一坨湿漉漉的土地了。如果不是这样，他永远也不会涉足那一坨慢坡下的土地，那是人家鹿子霖家的土地。他一路思索，既然神灵把白鹿的吉兆显示给我白嘉轩，而不是显示给那块土地的主家鹿子霖，那么就可以按照神灵救助白家的旨意办事了。如何把鹿子霖的那块慢坡地买到手，倒是得花一点心计。要做到万无一失而且不露蛛丝马迹，就得把前后左右的一切都谋算得十分精当。办法都是人谋划出来的，关键是

要沉得住气，不能急急慌慌草率从事。一当把万全之策谋划出来，白嘉轩实施起来是迅猛而又果敢的。

第三章

吃罢晚饭，白嘉轩走进白鹿镇的中医堂，摆出的面孔和他的心境正好相反。他心里燃烧着炽烈的进取的欲火，脸孔上摆出的却是可怜兮兮的无奈，疲惫憔悴的神色令人望之顿生怜悯。他声音沉重凄楚地向冷先生述说家父暴亡妻子短命家道不济这些人人皆知的祸事，哀叹自己几乎是穷途末路了，命里注定祖先的家业要破落在他的手里了。这真是天灭白家，不可扭转。他走到这一步路已走绝，下一步是崖是井也得往下跳，只好卖掉祖宗的心头肉——河川里那二亩水地。把白鹿村挨家挨户捋码一遍，有力量一次买走这二亩水地的除非鹿子霖再数不出第二家来。希求冷先生老兄看在与先父交情甚笃的情分上，能出面与鹿家交涉，居中调节。说到此时潸然泪下，变卖祖先业产是不肖子孙啊！白嘉轩将在白鹿村以至白鹿原上十里八村的村民中落下败家子的可耻名声。冷先生听完冷冷地问："你再想想不卖地行不行？"白嘉轩就更进一步数落起来，前头六个女人已经花光了父亲几十年来节俭积攒的银钱，而且连着卖掉了两匹骡子。槽头现有的红马和黄牛即使全拉到集上卖了，也不够订一个媳妇的聘礼，他现在订一个女人比先前订五个女人花的钱都多，再说卖了牲畜怎么种地？他翻来覆去想过无数次，只有卖地一条路可循。冷先生的面孔似有所动："你只管托人做媒订亲娶妻，钱不够了从我这儿拿。地是不能卖。你卖二亩水地容易，再置二亩水地就难了。眼看着你卖地还要我做中人，我死了无颜去见秉德大叔呀！"嘉轩似乎更加伤情，默然不语。

冷先生的父亲老冷先生在白鹿镇开辟这个中药铺面坐堂接诊时，得助于嘉轩的爷爷的鼎力支持，要不然一个南原山根的外乡人就很难在白鹿镇扎住脚。嘉轩的爷爷用驮骡从山里运出中药材，老冷先生需

要什么就卸下什么，从中药材的交易发展成相互之间的义气相交，传到冷先生和嘉轩的父亲秉德这时候，已经成为莫逆之交了。

冷先生的义气相助，使嘉轩深受感动又心生埋怨。白嘉轩谋的是鹿家的那块风水宝地，用的是先退后进的韬略；深重义气的冷大哥尚不知底里，又不便道明。他仍然委婉地说："先生哥，借下总是要还的。按我目下的家景运气，你敢给我我还不敢拿哩！万一娶下女人再有个三长两短咋办呢？我爸在世时不止一百回给我说过，咱两家是义交而不是利交，义交才能世交。万一我穷败破产还不了账咋办？我无论如何也不能……"嘉轩诚恳的话把义气的冷先生说得改变初衷，唉叹一声终于答应了去找鹿子霖串说，又郑重声明仅此一回，以后要是再卖家业就不要来找他，他不忍心经办这号伤心的事。

这件事冷先生根本不用预测就可以料到结局。河川地是一年两季收成的金盆盆，鹿家近几年运道昌顺，早就谋划着扩大地产却苦于不能如愿，那些被厄运击倒的人宁可拉枣棍子出门讨饭也不卖地，偶尔有忍痛割爱卖地的大都是出卖原坡旱地，实在有拉不开栓的人咬牙卖掉水地，也不过是三分八厘，意思不大。冷先生出于礼仪的考虑，亲自走进了鹿家的院子。鹿子霖的父亲鹿泰恒一听白家要卖二亩水地，还以为自己的耳朵出了毛病，愣着神瞅着冷先生的冷面孔，才确信此人说话无诈无欺，脑袋一扬却说："秉德兄弟虽不在世了，我咋能去置他的地哩！嘉轩侄儿这几年运气不顺，实在不行了来给我说一声。你给嘉轩把我的话捎过去，钱呀粮食呀要是急着用，从我这儿拿，地是千万不敢卖。"鹿泰恒完全是一位善良而又义气的长辈的亲柔心怀。冷先生就再三解释嘉轩卖地的动因，而且用自己要借钱给嘉轩的事来作证。鹿泰恒仍然是凛然不为所动的神色："嘉轩侄子即当真心卖地，我也不能买。咋哩？让人说我乘人危难拾掇合茬便宜哩！我怎么对得住

走了的秉德兄弟哩！嘉轩侄儿要卖水地我挡不住，可我不能买，让他卖给旁人去。”冷先生笑着说：“好我的大叔哩！白鹿村小家小户谁能一次置起二亩水地？你心里甭含糊，其实你买下这地是给侄儿嘉轩解危救急哩！你就不要再顾虑什么了。”到此，鹿泰恒心里完全踏实下来，初听到这个喜讯时的惊喜已经变成可靠无误的真实，他的心情随之也就平缓下来。经过这一番交谈，既排除了乘人危难掠夺家产的坏名声，又考实了嘉轩卖地属于真实而不会中途变卦，至于说让旁人去买的话那是料就白鹿村论实力非他莫属。鹿泰恒做出莫可奈何的口吻说：“既是这样说，那就那么办算啦！这事嘛，你下来跟子霖去交涉好了，他和嘉轩是平辈弟兄，话好说事也好办，我一个长辈怎么和娃娃说这号话办这号事哩！再说子霖也成人了，这是给他置地哩……”

冷先生指派药铺的伙计王相，到镇上的饭铺定下八个菜，又提来一瓶烧酒。他坐在上位，让白鹿两家的主事者各坐一侧，方桌剩下的一边坐的是老秀才鹿泰和。冷先生向来言简意赅，不见寒暄就率先举起酒盅与三位碰过一饮而尽，然后直奔主题：“事情不必再说，现在只说怎么弄，有话明说，过后不说。”一切都按着各人预定的轨道推进，没有差错。嘉轩摆出的自然是败家子羞愧的面孔，呷下一盅酒后，开口说：“踢卖先人业产，愧无脸面见人，怎敢争多论少？先生哥处事公正，你说怎么弄就怎么弄，我绝无二话。”鹿子霖早已领得父教，严谨地把握着自己的情绪，把买地者的得意与激动彻底隐藏，表现出对于白家兄弟不幸遭遇的同情与体悯，慷慨地说：“先生哥你就看着办吧！既然俺们兄弟俩信得下你，谁日后再说二话还算人吗？你说咋弄就咋弄。”冷先生连着喝下几杯酒，冷冷的面孔开始红润活泛起来，更见一副耿直不阿的风采：“话怕明说。你们两家是白鹿村的大家户，二位令尊与家父都是义交。我虽无意偏袒任何一方，但话说回来，再准的尺子也都量不准布，还要二位贤弟宽谅。”说罢眼光锐利地瞅一瞅鹿子

霖，鹿子霖以同样坚定的眼光作了回答。冷先生再转过头瞅着白嘉轩，白嘉轩却一把捂住腮帮，似乎要哭出来，低下头去。冷先生紧紧追问："嘉轩似有反悔之意？如是，现在还来得及。人说泼出去的水推倒了的墙——难收难扶。现在水还没泼墙还没倒，你说了不迟。"嘉轩抬起头来，头上竟沁出一层细汗，说："反悔倒不反悔，只是畏怯子孙的愤怨和乡党的耻笑。"随之吞吞吐吐说出换地的想法来：二亩水地还是卖给鹿子霖，鹿家原坡上那二亩慢坡地转到白家，好地换劣地的差价，由鹿家付给白家。嘉轩说出这个方案后忽地站起，手抚胸膛红着脸说："全是为了顾一张面子呀！还望先生哥和子霖兄弟宽容。"此话一出，毕竟是节外生枝，冷先生不大高兴地说："既有这话，你该早说，我也好与买方早早说透。不过现在说了也好……"说完就瞅一眼鹿子霖。鹿子霖原以为嘉轩事到临头要反悔要变卦了，单怕到手的二亩水地又黄了，听明白了是换地，就作出豁达的气魄说："这倒好！只要于嘉轩兄面子上好看，就那么办。"冷先生自己当然对两厢情愿的事不再有什么话说，只是这突然的变故打乱了他事先与两方交换过的关于地价的估计，随机应变的办法很快也就形成。"既然如此小有变故，这事也不难办。"冷先生说，"嘉轩的水地是天字号地，子霖的慢坡地是人字号地，天字号地和人字号地的价码，按朝廷征粮的数目就可以兑换出来。如果二位同意这个弄法儿，事情就简单不过了。"无论白嘉轩或是鹿子霖，最熟悉的可能不是自己的手掌而是他们的土地。他们谁也搞不清自哪朝的哪一位皇帝开始，对白鹿原的土地按"天时地利人和"划分为六个等级，按照不同的等级征收交纳皇粮的数字；他们对自家每块土地所属的等级以及交纳皇粮的数目，清楚熟悉准确无误绝不亚于熟悉自己的手掌。土地的等级是官府县衙测定的，征交皇粮的数字也是官家钦定的，无厚此薄彼之嫌，自然天公地道，俩人都接受了。冷先生取来算盘，推给老秀才说："你给兑换算计一下。"老秀才噼里啪啦拨动着算盘上的珠子，连拨两遍，一亩天字号地大体可以折

合四亩人字号地。这样就推算出鹿子霖应该净给白嘉轩的银两，如果按市价折合成粮食或棉花该是多少石多少捆。冷先生就歪过头对老秀才说：“现在该你忙活了。”老秀才这时接过药铺伙计王相送来的砚台，开始研墨。他被请来的职责很单纯，那就是双方把话说到以后写买卖土地的契约。

鹿子霖看着老秀才不慌不忙研墨的动作，心里竟是抑制不住的激动。只要能把自家那二亩水地买到手，用十亩山坡地作兑换条件也值当。河川地一年两季，收了麦子种苞谷，苞谷收了种麦子，种棉花更是上好的土地；原坡旱地一季夏粮也难得保收。再说河川地势平坦，送粪收割都省力省事，牛车一套粪送到地里了。他家在河川有近二十亩水地，全是一亩半亩零星买下来的，分布在河川的各个角落。最大的一块不过二亩七分，打了一口井，两季保种保收。其余都是亩儿八分的窄小地块，打井划不来，不打井又旱得少收成。嘉轩这二亩水地正好与自家的那块一亩三分地相毗邻，合在一块就是三亩三分大的一个整块了，整个河川里也算得头一块大地块了。春闲时节就可以动手打井，麦收后如遇天旱，就可以套上骡子车水浇地不失时机地播种了。他眯着眼装作瞅着老秀才写字，心里已经有一架骡子拽着的木斗水车在嘎吱嘎吱唱着歌。

白嘉轩双手抱成一个合拳压在桌子上，避眼不看老秀才手中的毛笔，紧紧锁着眉头瞅着那个密密麻麻标着药名的中药柜子，似乎心情沉痛极了。其实他的心里也是一片翻滚的波澜，那块蕴藏着白鹿精灵的风水宝地已经属于他了，只等片刻之后老秀才写完就可以签名了，世界上再没有第二个人知道此项买卖土地当中的秘密。

老秀才写好契约，冷先生先接到手看了一遍，又交给买卖双方的主人都看了一遍。冷先生把笔交给嘉轩，嘉轩捏着毛笔稍停了一下，

似乎下了狠心才写上了自己的名字。鹿子霖接过笔很轻松地划拉了一阵。冷先生最后在中人款格下写上了自己的名字，落尾才由老秀才签名。冷先生取来印泥盒子，四个人先后用食指蘸了红色印泥，然后一齐往契约上按下去。一式两份，买方和卖方各据一份。冷先生给每人盅里斟上酒，一齐饮了。

这桩卖地或者说换地的交易完毕后的第二天早饭时，白嘉轩才把这事告知母亲。不等嘉轩说完，白赵氏扬手抽了他一个耳光，手腕上沉重的纯银镯子把嘉轩的牙床硌破了，顿时满嘴流血，无法分辩。鹿三扔下筷子，舀来一瓢凉水，让嘉轩漱口涮牙。白赵氏来到冷先生的中药铺，一进门刚吐出“那地……”两字就跌倒在地，不省人事。冷先生松开正在给一位农妇号脉的手，从皮夹里抽出一根细针，扎入白赵氏人中穴，白赵氏才“哇”的一声哭叫出来。冷先生这时才得知嘉轩根本没有同母亲商量，但木已成舟水已泼地墙已推倒，只能劝慰白赵氏，年轻人初出茅庐想事单纯该当原谅，多长几岁多经一些世事以后办事就会周到细密了。白赵氏的心病不是那二亩水地能不能卖，而是这样重大的事情儿子居然敢于自作主张瞒着她就做了，自然是根本不把她当人了。想到秉德老汉死没几年儿子就把她不当人，白赵氏简直都要气死了。白鹿村闲话骤起，说白嘉轩急着讨婆娘卖掉了天字号水地，竟然不敢给老娘说清道明，熬光棍熬得受不住了云云。鹿家父子心里庆幸，娘儿俩闹得好！闹得整个白鹿原的人都知道白家把天字号水地卖给鹿家那就更好了。白嘉轩抚着已经肿胀起来的腮帮，并不生老娘的气。除了姐夫朱先生，白鹿精灵的隐秘再不扩大给任何人，当然也包括打得他牙齿出血腮帮肿胀的母亲。母亲在家里以至到白鹿镇中药铺找冷先生闹一下其实不无好处，鹿家将会更加信以为真而不会猜疑是否有诈。

遵照契约上双方拟定的协议，收罢麦子撂地，当年的夏粮由老主人收割，算是各人在自家原有土地上的最后一次收获，秋庄稼就要易地易主去播种了。鹿家父子扛着镢头铁锨踏进新买的二亩水地时，天色微明，知更鸟在树梢上空吵成一片，在这块已经属于自己的土地上，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挖掉白家的界石。为了这件不同寻常的事，父子俩亲自来干了，却把长工刘谋儿指派干其他活儿去了。父亲用脚指着地头一坨地皮说：“照这儿挖。”儿子只挖了一镢就听到铁石撞击的刺耳的响声，界石所在的方位竟然一丝一毫都无差错。那块刻有东西南北小字的青石界石湿漉漉的晾到熹微的晨光里，底下垫着的石灰和木炭屑末依然黑白分明。鹿子霖瞅着刚刚挖出的界石问：“爸，你记不记得这界石啥时候栽下的？”鹿泰恒不假思索说：“我问过你爷，你爷也说不上来。”鹿子霖就不再问，这无疑是几代人也未变动过的祖业。现在变了，而且是由他出面涉办的事。鹿泰恒背抄着结实的双手，用脚踢着那块界石，一直把它推到地头的小路边上。沿着界石从南至北有一条永久性的庄严无犯的垄梁，长满野艾、马鞭草、菅草、薄荷、三棱子草、节儿草以及旱长虫草等杂草。垄梁两边土地的主人都不容它们长到自家地里，更容不得它们被铲除，几代人以来它们就一直像今天这样生长着。比之河川里诸多地界垄梁上发生的吵骂和斗殴，这条地界垄梁两边的主人堪称楷模。鹿家父子已经动手挖刨这道垄梁，挖出来的竟然是一团一团盘结在一起的各种杂草的黄的黑的褐的红的草根，再把那些草根在镢头上摔摔打打抖掉泥土，扔到亮闪闪的麦茬子上，只需一天就可以晒得填到灶下当柴烧了。这条坚守着延续着几代人生命的垄梁，在鹿家父子的镢头铁锨下正一尺一尺地消失，到后晌套上骡子用犁铧耕过，这条垄梁就荡然无存了，自家原有的一亩三分地和新买的白家的二亩地就完全和谐地归并成一块了。儿子鹿子霖说：“后晌先种这地的苞谷。”老子鹿泰恒说：“种！”儿子说：“种完了秋田以后就给这块地头打井。”老子说：“打！”儿子说他

已经约定了几个打井的人，而且割制木斗水车的木匠也已打过招呼，这两项大事同时进行，待井打好了就可以安装水车。老子说：“这样干给工匠管饭省事。”日头已经射出灼人的光焰，该当回家吃早饭了。儿子突然问：“听说嘉轩准备给他爸迁坟哩？”老子冷漠地说：“越折腾越糟！爱迁就迁，爱折腾就折腾去！”

原坡地上的麦子开始泛出一层亮色的一天夜里落了一场透雨。临近天明时白嘉轩醒来，放声痛哭。哭声惊动了母亲。他说他梦见父亲了。搞不清父亲怎么弄得满身满脸都是泥水，浑身衣服湿漉漉往地上滴水，不住地打着冷颤。搞不清脚下怎么会有一个泥水聚积的深潭，父亲似乎就是从水潭里爬上来的，腿脚一抖索又跌下潭里，他怎么拽也拽不上来，眼看着父亲沉下去了，只露两只大手在水上摇。他大呼救命，越急越呼叫不出，急得大哭，突然惊醒了。母亲听罢，并不惊奇，只说了一句就回自己屋去了：“你到你爸坟上去看看。”

天明了，白嘉轩叫上长工鹿三扛着锨，踩着泥泞朝坟地走去。他围着父亲的坟堆查看了一番，发现了一个可能进水的洞穴，夜里落大雨时流水进入坟墓了。他向鹿三说了那个噩梦，鹿三连连称奇。他们用锨扎断了洞穴，堵死了水路，培高了土堆。嘉轩说：“墓道里进了水，父亲的仙骨被浸泡了，得迁坟。”

麦子收碾一毕，白嘉轩请来了阴阳先生，走遍了白家分布在原上的七八块旱地，选择新的墓地。令人惊佩的是，他没有向阴阳先生作任何暗示，阴阳先生的罗盘却惊奇地定在了那块用二亩水地换来的鹿家的慢坡地上，而且坟墓的具体方位正与他发现白鹿精灵的地点相吻合。阴阳先生说：“头枕南山，足登北岭；四面环坡，皆缓坡慢道，呈优柔舒展之气；坡势走向所指，津脉尽会于此地矣！”白嘉轩听了，心中更加踏实，晌午炒了八个菜，犒劳阴阳先生。他把阴阳先生的话一

字不漏地沉在心底，逢人问起却摆出无可奈何的样子说："嗐！跑遍了七八块地，没一块有脉气的，只是这慢坡地离村子近点，地势缓点，凑合着扎坟吧！"

新的墓穴称不得豪华，只是用青砖箍砌了墓室和暗庭。这期间鹿子霖已经完成了打井的壮举。新割制的木斗水车也已安装调试完毕，崭新的白光光的木头架子在伏天的艳阳里格外耀眼，骡子拉着木轮水车踏着欢快的步子，哗哗的水声听来再悦耳不过了。鹿子霖又挖来四棵柳树埋在水井的四个角上，树大之后就能遮住从三个方向射下的阳光，人和牲畜就可以不受暴晒之苦了。

白嘉轩在动手挖掘老坟的那一天，不分门户远近请来了白鹿村每一户的家长前来参加这个隆重的迁坟仪式。吹鼓手从老坟吹唱到新坟。三官庙的和尚被请来做了道场。鹿子霖和他父亲都被请来参加了被他们父子看作的瞎折腾。晚上回到家，鹿子霖又忍不住问父亲："是不是瞎折腾？"并且说出自己的疑心：挖掘老墓时，他一直留心观察，墓室和墓道根本不见进水的痕迹，白嘉轩说他爸托梦要他迁坟，很可能是编造出来的一个幌子，这就不能不使人怀疑白嘉轩以好地换劣地的真实动机，是不是与阴阳先生取得默契之后玩了一个圈套？鹿泰恒心里赞赏儿子的分析，嘴上却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是瞎折腾。"他随之告诉儿子鹿子霖说："你爷去世时我请来了老阴阳先生，看过那块慢坡地，说是从四面坡势走向看，形同涝池，难得伸展。现在这个阴阳先生比起他爸老阴阳来，充其量只够个'二眯儿'……"

白嘉轩把亡父的尸骨安置于风水宝地让白鹿精灵去滋润，然后就背着褡裢进山去了。盘龙镇中药材收购店掌柜吴长贵接待了他，像侍奉驾临的皇帝一样殷勤周到无微不至。俩人盘腿坐在终年也不熄火的热炕上，炕上铺着地道的榆林手工毛毯，小炕桌上摆满了热腾腾的

菜，全是山地特产珍品。一盘透着一股烟味的熏野猪肉，一盘清蒸锦鸡，一盘红烧娃娃鱼，一盘费尽周折买来的熊掌，还有一盘猴头，白银耳黑木耳百合黄花等山地普通菜自然也不少。嘉轩心境很好，有意放纵自己多贪了几杯，酒酣微醉，叙说近几年来遭遇的凶事厄运，随之就直接说出了此行的目的。现在要在白鹿原上下找一个女人是很困难了，而且无法接受高出十倍十几倍的财礼要价。他说："吴叔，这事拜托您了。"吴掌柜不假思索满口应承："这不难。回去时你就把人引上。"

好多年前，嘉轩的爷爷领着嘉轩的父亲，在盘龙镇经营这个中药材收购店的时候，吴长贵只是一个经常前来出售药材的普通山民。引起他的命运开始发生转折的机缘，实际是一次不经意发生的差错。他交售了一大捆珍贵的黄芪以后，却发现多付了他钱，于是又背着背篓走回店铺对白嘉轩的父亲说："白掌柜，您把账算错了，这是多付给我的钱！"说完把一摞铜元码到柜台上就走了。不料老掌柜在后边叫住他，把他叫进中药铺店里头去。此后他就成为这个铺店的伙计了。他认识秦岭山地生长的所有药材，他很快学会了对各种零散药材的粗加工手艺，继之又学会了打算盘和写字记账。他聪明的天资和诚实温厚的品性证明了白家父子辨识人的眼力功夫，因此他深得白家父子的信赖。促成他的命运发生重大转折的机缘，却是白家连续遭受的天灾和人祸。主持家事的老二白秉义在白鹿原发生的骚乱中被点了天灯，白掌柜赶回家去的途中又遭匪劫，不久就去世了，老大白秉德只好回白鹿原主持家政，盘龙镇中药材收购店就交给吴长贵料理，说定每年交多少银子，其余的盈利全归吴长贵。几年下来，吴长贵再不是那个背着背篓来交售药材的脏兮兮的山民了，很快成了盘龙镇四大富户中的一员。秉德老汉不幸暴死，他从山里赶来参加葬礼，趴在棺材上哭得比亲生儿子嘉轩似乎还厉害。他给秉德老汉挂了一杆十丈长的白绸蟒

纸，飘飘摇摇像一条活蟒自天而降，令白鹿原上的穷人和富人震惊不已。人们见惯了用白纸和苇秆剪扎的蟒纸，尚未见过谁肯破费用白绸作蟒纸来吊唁祭奠死者，吴长贵真算得知恩知报的义气君子了。

吴长贵已经喝得满面煞白，虚汗如注，他一只手捏着酒盅，另一只手抓着条布巾。凭着这条布巾，他在盘龙镇从东头到西头挨家挨户喝过去从来还没有出过丑。他对白嘉轩说：“你把五女引走吧！”嘉轩也是绝无仅有的一次纵酒。他虽远远不是吴长贵的对手，而实际灌进的数量也令人咋舌。他的语言早已狂放，与在冷先生中医堂里和鹿子霖换地时羞愧畏怯可怜兮兮的样子判若两人。他大声说：“吴大叔那可万万使不得！我命硬克妻，我不忍心五女妹妹有个三长两短。你给我在山里随便买一个，只要能给我白家传宗接代就行了……”吴长贵说：“咱们现在只顾畅饮，婚事到明天再说。”

直到第二天晌午，白嘉轩才醒过酒来，昨晚的事已经毫无记忆。吴长贵这时才郑重其事地提出把五姑娘许给他。白嘉轩摇摇头，一再重复着与昨晚酒醉时同样的反对理由。吴长贵更加诚恳地说，他原先就想把三女儿许给他，只是想到山外人礼仪多家法严，一般大家户不娶山里女人，也就一直不好开口。既然嘉轩此次专程到山里来结亲，他原有的顾虑就消除了。吴长贵说：“只要你不弹嫌山里人浅陋……”白嘉轩再也无力拒绝了。吴长贵有二子五女，个个女子都长得细皮嫩肉，秀眉重眼，无可弹嫌。当下，白嘉轩站起打躬作揖，俩人的关系顷刻间发生了最重要的变化。

白嘉轩回到白鹿村，立即筹备结婚的大事。吴长贵用骡子驮着女儿和嫁妆赶前一天夜里进了白鹿镇，暂时住在冷先生的中医堂。冷先生被聘为媒人。结婚这天，白嘉轩跟着轿子到冷先生的中医堂迎娶了新娘，一切顺利。

这是第七个新婚之夜。嘉轩看着五女感到一阵尴尬和窘迫，这是他娶过的七个女人之中唯一在婚前见过面的一个。岂止见过面，而且熟悉如同姊妹。他每年都在农闲时光去山里一次两次，多在酷暑难耐的三伏，他一来为了照看中药材收购的生意，二来是到山里避一避暑热；吃住在吴大叔家里，与五女四女三女二女大女以及两个小弟情同兄弟姊妹，从来也不戒忌什么。现在骤然间面对一对闪闪发亮的红蜡烛，反倒拘束和不好意思了。仙草——五女的名字——已经耐不住山外伏天的酷热，从容不迫地脱去长袖衣裤，光洁细腻的胳膊和双腿裸露在他的面前，娇美的后腰里系着三个小棒槌，叽里当啷摇晃。嘉轩装作好奇去摸那小棒槌以排遣其窘迫。仙草转过身来，小腹的裤腰上也系着同样大小的三个棒槌。他问："仙草，你带这小棒槌做啥？"仙草毫不避讳地说："打鬼！"

白嘉轩猛地一颤，就呆若木鸡了。那棒槌肯定是用桃木旋下的了。桃木辟邪，鬼怕桃木橛儿。六个桃木棒槌对付六个从这个炕上抬出去的尚不甘心的鬼，可见仙草事先是做了充分准备的。他心头刚刚潮起的那种欲火又顿然熄灭了。仙草却不理会他，带着叽里当啷摇晃着的小棒槌躺下了，用一条花格单子搭在身上。他也心灰意冷地躺下来。那温馨的气息像玫瑰花香一样沁人心脾，心里的灰冷渐渐被逐出，又潮起一种难以抑制的焦渴。他鼓起勇气伸手把她揽进怀里，抚摸她的脖颈、丰腴的肩膀和最富诱惑的胸脯。她默默地接受了，没有惊慌也不反抗。她在他的怀里微微颤抖着身子，出气声变得急促起来。他受到鼓舞，就把手往腹部伸去，却触到了一只倒霉的小棒槌，心里又泛起一缕阴冷之气。她抓住了他的手告诉他，出嫁前，母亲备下酒席请来一位驱鬼除邪的法官，法官把六个小桃木棒槌留下就走了。她说："法官说，戴过百日再解裤带。"白嘉轩一听就不由得火了："又是个百日忌讳！"仙草却说："百日又不是百年。你权当百日后

才娶我。你就忍一忍，一百天很快就过去了。不为我也该为你想想，你难道真个还要娶八房十房女人呀……”他听着她友好的又是冷静的话，就抽出了被她抓着的手，把她紧紧搂住，心底却异常清醒。他坐起来，重新穿上衣服。仙草问：“你干啥呀？”嘉轩说：“我跟鹿三哥睡马号去，免得睡在一起活受罪。”仙草说：“那也好。你睡这儿我也难受。只是……你明晚去马号。今日是……头一夜。”嘉轩断然说：“算了，我今黑就去。”

嘉轩扯了一条被单夹在腋下，拉开门闩，走出门去。仙草迟疑一阵儿忽然跳下炕来：“等等。”她喊住他，又把他拽进门，反过身插上门闩，从他腋下扯走被单。嘉轩愣住了，怕她生气，反倒和颜悦色地说：“我听你的话，为我好也为你好……”仙草重新爬上炕，打断他的话：“算了！”说着，一把一个扯掉了腰带上的六个小棒槌，“哗”地一下脱去紧身背心，两只奶子像两只白鸽一样扑出窝来，又抹掉短裤，赤裸裸躺在炕上说：“哪怕我明早起来就死了也心甘！”

第四章

八月末的一天清早，白嘉轩起来洗脸漱口时，他的冒死破禁而且显出怀孕征兆的妻子仙草正坐在纺线车前嗡嗡嗡嗡地转动着车把儿，锭子上已经结下一枚茭白大小的白色线穗了。母亲也早已起来，在自个独居的里屋炕上摇转着纺车。他坐在父亲在世时常坐的那把靠背椅子上，喝着酽茶，用父亲死后留下的那把白铜水烟袋过着早瘾。父亲死后，他每天晚上在母亲落枕前和清早起床后都到里屋里坐一会儿。两架纺车嗡嗡吱吱的声音互相衔接，互相重合，此声间歇，彼声响起，把沉稳和谐的气氛弥漫到四合院的每一个角落。白嘉轩沉浸在这古老悠远而又新鲜活泼的乐曲里，浑身的筋骨和血液就鼓胀起来。

长工鹿三把犁铧套绳收拾齐备，从马号里牵出红马拴在院子里的石雕拴马桩上，扯着大步走进院庭，大声询问种子的事。嘉轩从里屋走出来："你先喝口茶。"鹿三站在院庭里说他不喝，仍然询问麦子和豌豆掺和的比例，二八还是三七？嘉轩说："这块地种药材。种子你甭管，我拿着。"说着喷出一口烟，吹净水烟筒里的烟灰，放下水烟壶，喝下最后一盅茶，就赳赳地走出街门，进入马号。鹿三解下红马牵着，套上犁杖。嘉轩扛起沉重的铁齿大耙子，腋下夹着一把镢头和一把竹条扫帚。鹿三回过头问："你拿扫帚做啥？"嘉轩也不解释："拿就是有用嘛。"鹿三就不再问。主仆二人走过街巷，出了村子，走下河滩，红马拖着空犁在田间土路上撞出喤喤喤的声响。

田野已经改换过另一种姿容，斑斓驳杂的秋天的色彩像羽毛一样脱光褪尽荡然无存了，河川里呈现出一种喧闹之后的沉静。灌渠渠沿和井台上堆积着刚刚从田地里清除出来的苞谷秆子。麦子播种几近尾

声，刚刚播种不久的田块裸露着湿漉漉的泥土，早种的田地已经泛出麦苗幼叶的嫩绿。秋天的淫雨季节已告结束，长久弥漫在河川和村庄上空的阴霾和沉闷已全部廓清。大地简洁而素雅，天空开阔而深远。清晨的冷气使人精神抖擞。

红马拽着犁杖踏进自家的地头，鹿三把犁铧插进土地，回过头问：“种啥药？我可没种过。你说咋种？”嘉轩告诉他，还是像种麦子一样要细耕，种子间隔一大犁或两小犁沟溜下，又像种苞谷一样。为了撒播均匀，需得给种子里掺上细土或细沙，因为种子太小太小了。鹿三吆喝红马耕起来，一犁紧靠一犁，耕得比麦子的垄沟更精细。嘉轩看了看翻耕过的土壤又改变了主意：“先耕一遍，再耙耱一遍，把死泥块子弄碎了，再开沟播种。现在这样子下种不行。”经过夏天和秋天大水漫灌和收获时的踩踏，黏性的黄泥土地严重板结，犁铧上翻出大块大块的死泥硬块，细小的种子顶不破泥块就捂死在土层里了。鹿三禁不住问：“啥药材吗比麦子还娇贵？”白嘉轩说：“罂粟。”白嘉轩说罂粟就跟说麦子苞谷或者豌豆一样平淡。鹿三就不再问。他不懂得罂粟，自己并不奇怪，几百种中药材里，他连十个药名也记不清，罂粟想来也就不过是一种中药，或者属贵重稀欠一点罢了。

太阳升上白鹿原顶一竿子高了，这块一亩多点的土地耕翻完了，卸下犁具再套上铁齿耙，白嘉轩扯着两条套绳指挥吆喝着红马耙耱过一遍，地面变得平整而又疏松。鹿三又解下耙来再套上犁杖，在翻耕耙耱过的土地上开沟播种了。嘉轩每隔两小犁，跟着鹿三的屁股溜下掺和着细土的种子，然后用长柄扫帚顺着溜过种子的犁沟拖拉过去，就给那些细小娇弱的罂粟种子覆盖上一层薄土了。

这时候，好多在田地里劳作的男人都立在远远近近的地方瞧着这主仆二人的奇怪举动，怎的用扫场扫院的扫帚扫到犁沟里来了？庄稼

汉对这些事兴味十足，纷纷赶过来看看白嘉轩究竟搞什么名堂。他们蹲在地边，捏捏泥土，小心翼翼地捡起几粒刚刚溜进垄沟的种子，在手心捻，用指头搓，那小小的籽粒儿被捻搓净了泥土，油光闪亮，像黑紫色的宝石。他们嘻嘻地又是好奇地问："嘉轩，你种的啥庄稼？"嘉轩平淡地说："药材。"他们还问："啥药材？"嘉轩仍然像说到麦子苞谷谷子一样的口气说："罂粟咯！"

大约过了十天，那一垄垄用扫帚漫过的犁沟里就有小小的绿色生命萌生出来，带着羞怯和娇弱的姿容呈现在主人的眼里，也使白鹿村的庄稼人见识了罂粟。"唔！罂粟就这样子？""嗯！像芥茉，也像菜子！"庄稼人的比喻总是恰当不过，罂粟的幼苗跟那呛人鼻膜的芥茉的幼苗几乎一般无二。如果白嘉轩说这是"鸦片烟"，他们准会惊得跌个跟斗，再也不会去跟什么烂货芥茉相比较了。为了防备冬天冻死，嘉轩和鹿三用牛车拉了一车麦秸草撒到垄沟里，盖住了小小的幼苗。

第二年春天，从被雨雪沤得霉朽污黑的麦秸秆下蹿出绿翠晶莹的嫩叶来；清明过后开始拔节抽秆分出枝杈，更像芥茉或者油菜的株形了；直到开花才显出与后者的本质差别来。油菜和芥茉是司空见惯的碎金似的黄花，而罂粟却开出红的白的粉红的黄的紫的各色的花，五彩缤纷，花谢之后就渐渐长成一个墨绿色的椭圆的果实。

过些时候，人们看见，白嘉轩和他家的长工鹿三，以及很少下地的母亲，甚至身体相当笨重的妻子一齐到地里来了，用粗针或三角小刀刺破那些墨绿色的椭圆形果实，收刮下从破口里流出来的黏稠的乳汁一样的浆液。他们一家四口天天清早在微明时分出村下地，到太阳出来时就一齐回到屋里，这似乎更增加了这种奇异的药材的神秘色彩。谁也搞不明白收取那种乳白的浆液能治什么病，只是互相神秘莫测地重复说："那是罂粟。罂粟就是罂粟。药嘛！"

夜晚，嘉轩按照岳父的指点要领在小铁锅里熬炼加工这些浆液的时候，一股奇异的幽幽的香气几乎使他沉醉，母亲白赵氏在里屋的炕上也沉醉了，坐在灶间拉风箱的吴氏仙草也沉醉了。幽幽的香气从四合院里弥漫开来，在四月温柔的夜风里扩散到大半个白鹿村，大人小孩都蹙着鼻孔贪婪地吸取着美好的空气，一个个都沉醉了。那是一种使人一旦闻到便不能作罢的气味，使人闻之便立即解脱一切心事沉疴而飘飘欲仙起来。第二天一早起来，在麻麻亮的街巷里，庄稼汉们似乎恍然大悟过来，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罂粟就是鸦片。"

白嘉轩把炼制加工成功的鸦片装进一只瓷罐，瓷罐装在一条褡裢里，搭在肩上，坐在牛车里进城去了。

白嘉轩从山里娶回来第七个女人吴仙草，同时带回来罂粟种子。人们窃窃议论那个十分水色的女子会不会成为白嘉轩炕头上的又一个死鬼，无论如何想不到也看不见他的蓝袍底下的口袋里装着一包罂粟种子。他的岳父吴掌柜决定把女儿嫁给他的同时，顺便把罂粟种子也交给了他。岳父说，他年初过商州下汉口时，花了黄货才弄到手这包罂粟种子。他说山里气候太冷，罂粟苗儿耐不过三九冰雪严寒，山外的白鹿原的气候正好适宜。罂粟和麦子一样秋末播种，来年麦收前后收获，凡是适宜麦子生长的土地和气候也就适宜种植罂粟。他强调说，他是专门为恩人白家买的，花黄货也花。他教给他种植管护采收尤其是熬炼加工的方法，至于销路那就根本不成问题了。无论是乡下或是城镇，有钱人或是没钱人，普通百姓或是达官贵人，都在寻找这种东西。有人吸食，有人倒卖，药铺里更不用说有多少收多少。至于种植罂粟的好处和辉煌的前景，岳父吴长贵只字不提。谁都知道这东西的分量，金子多贵鸦片就多贵。

白嘉轩背着褡裢走进康复元中药铺，这是爷爷领着父亲在盘龙镇收购中药材时建立的送货点，互相信赖的关系已年深日久。他先报了爷爷的名字，接着报了父亲的名字，最后报出岳父的名字，康复元的康掌柜专意接见了他，又指派伙计当下收购了鸦片，而且热心地指出他炼制质量不高的技术性毛病，并告诉他火候的把握至关重要。白嘉轩说这是头回试火，下回肯定就会弄得好些。他出门时心里不觉往下一坠，褡裢里头装的银圆比来时装的那罐鸦片的分量沉重得多。

连续三年，白嘉轩把河川的十多亩天字号水地全都种上了罂粟，只在旱原和原坡地里种植粮食。罂粟种植的巨大收益比鸦片的香气更具诱惑。他在一亩水地里采收炼制的鸦片所卖的银圆，可以籴回十几亩天字号水地实地所能生产的麦子，十多亩天字号水地种植的罂粟的价值足以抵得过百余亩地的麦子和苞谷了。白嘉轩当然不会愚蠢到用那些白花花当啷啷的银圆全部买成麦子。他把祖传的老式房屋进行了彻底改造，把已经苔迹斑驳的旧瓦揭掉，换上在本村窑场订购的新瓦，又把土坯垒的前檐墙拆除，安上了屏风式的雕花细格门窗，四合院的厅房和厢房就脱去了泥坯土胎而显出清雅的气氛了。春天完成了厅房和厢房的翻修改造工程，秋后冬初又接着进行了门房和门楼的改建和修整。门楼的改造最彻底，原先是青砖包皮的土坯垒成的，现在全部用青砖砌起来，门楣以上的部分全部经过手工打磨。工匠们尽着自己最大的心力和技能雕饰图案，一边有白色的鹤，另一边是白色的鹿。整个门楼只保留了原先的一件东西，就是刻着“耕读传家”四字的玉石匾额。那是姐夫得中举人那年，父亲专意请他写下的手迹。经过翻新以后，一座完整的四合院便以其惹人的雄姿稳稳地盘踞于白鹿村村巷里。

马号是在第二年春天扩建的，马号里增盖了宽敞的储存麦草和干土的一排土坯瓦房；晒土场和拴马场的周围也用木板打起来一圈围墙。红马又生下一头棕红色的骡驹，在新圈起来的晒土场上撒欢。

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三五年间，白鹿原上的平原和白鹿原下的河川已经成为罂粟的王国。滋水县令连续三任禁种罂粟，但罂粟的种植和繁衍却仍在继续。

这年春天，正当罂粟绽开头茬花蕾的季节，白鹿书院的朱先生站在妻弟新修的门楼下，欣赏那挺拔潇洒的白鹤和质朴淳厚的白鹿，以及自己题写的“耕读传家”的笔迹。白嘉轩从门里走出来，惊喜地礼让姐夫到屋里坐。朱先生却说：“你把我写的那四个字挖下来。”白嘉轩莫名其妙地愣住了。朱先生又说了一遍。白嘉轩连忙说：“哥呀，这倒是咋了？”朱先生仍不解释，第三次重复“把它挖下来”的话。白嘉轩为难地搓搓手：“哥呀，你今日专门为挖这四个字来的？”朱先生点点头。白嘉轩顿时生疑。朱先生又说：“要么你去用一块布把它蒙上。”白嘉轩预感到一种不祥之兆，就取来黑布，让鹿三搬来梯子，把“耕读传家”四个字严严实实蒙盖住了。朱先生仍不进屋，对嘉轩说：“把你的牛和马借我用一回。”嘉轩说：“这算啥事，你尽管拉去就是了。你用牲口做啥？”朱先生说：“你先把犁套好，套两犋犁。”白嘉轩不敢怠慢，引着朱先生进了马号，和鹿三分头动手，给红马和黄牛都套上了犁杖。朱先生自己从墙上取下一根鞭子，从鹿三手里接过犁把，吆喝着黄牛出了马号，让嘉轩吆喝红马拉的犁杖一起走。鹿三好心好意要从朱先生手里夺过犁杖，让朱先生捉着犁杖从村里走过去太失体统了。朱先生执意不让，说他自幼就练成了吆牛耕地的本领，多年不捉犁把儿手都痒痒了。鹿三只好替换下嘉轩。嘉轩就空着手跟着，问：“哥呀，你到底套犁做啥？朝哪边走？”朱先生说：“你跟着只管走就是

了。”村巷里有人发现了穿长袍的朱先生，而且奇怪他怎么捉着犁把儿，纷纷跑过来看才子举人朱先生耕田犁地。朱先生和谁也不搭话，一直吆着牛扶着犁走出街巷，下了河滩，走到白嘉轩最早种植罂粟的那块天字号水地边停下来。白嘉轩和鹿三看见，地头站着七八个穿黑色官服的人，才不由一惊。朱先生啥话不说吆着牛进入罂粟地，犁铧插进地里，正在开花的罂粟苗被连根撬起，埋在泥土里。白嘉轩跑到跟前，拉住缰绳："哥呀，你这算弄啥？"朱先生一手捉着犁把儿，一手从怀里掏出一张硬纸示于嘉轩："哥奉县令指示前来查禁烟苗。"白嘉轩一下愣住了，蹲在地边上，双手抱住头再也说不出话来。朱先生挥一下鞭子吆动黄牛，扶着犁杖在罂粟地里耕翻起来，地边上已经围满了吃惊的人群，远处还有人正往这儿奔跑。朱先生吆牛犁了一个来回，对白嘉轩说："你把那犋犁吆上，进地吧！"白嘉轩从地上站起来，从鹿三手中接过犁把儿也进了地。朱先生回头赞许地点点头："兄弟，你还可以。"两人一先一后，一牛一马拽着两犋犁杖，不大工夫就把那块罂粟捣毁了。朱先生喝住犁："兄弟，把犁吆到另一块烟地里去。"

田间路上和翻耕过的罂粟地里已经聚集来了白鹿村全部男女，鹿子霖和他爸鹿泰恒也挤在人群里。鹿泰恒走到朱先生跟前，拱拳作揖说："好！朱先生，好哇！"随之转过头呼叫儿子子霖和长工刘谋儿："回去套牲口吆犁，进地把烟苗犁了！"朱先生丢下犁杖，双手攥住鹿泰恒的手："请受我一拜！"朱先生随之站起，面对众人，宣读县府二十条禁烟令。最后又当着众人的面对嘉轩说："这回你明白我叫你拿黑布蒙住门楼上那四个字的用意了吧？"

朱先生所作所为，顷刻之间震动了白鹿原。十天不过，川原上下正在开花的罂粟全都犁毁。这一威震古原的壮举不久就随着先生的一

声长叹变得毫无生气。新来的滋水县令没有再聘用他，而是把这一肥缺送给了另外一个人。罂粟的红的白的粉红的黄的紫的美丽的花儿又在白鹿原开放了，而且再没有被禁绝。好多年后，即白嘉轩在自己的天字号水地里引种罂粟大获成功之后的好多年后，美国那位在中国知名度最高的冒险家记者斯诺先生来到离白鹿原不远的渭河流域古老农业开发区关中，看到了无边无际五彩缤纷的美丽的罂粟花。他在他的《西行漫记》一书里对这片使美洲人羞谈历史的古老土地上的罂粟发出喟叹：

“在这条从西安府北去的大道上，每走一里路都会勾起他对本民族丰富多彩的绚烂历史的回忆……在这个肥沃的渭河流域，孔子的祖先、肤色发黑的野蛮的人发展了他们的稻米文化，形成了今天在中国农村的民间神话里仍是一股力量的民间传说……

“在那条新修的汽车路上，沿途的罂粟摇摆着肿胀的脑袋，等待收割……陕西长期以来就以盛产鸦片闻名。几年前西北发生大饥荒，曾有三百万人丧命，美国红十字会调查人员，把造成那场惨剧的原因大部分归咎于鸦片的种植。当时贪婪的军阀强迫农民种植鸦片，最好的土地都种上了鸦片，一遇到干旱的年头，西北的主要粮食小米、麦子和玉米就会严重短缺。”

罂粟再次占据了这片古原大地，小麦却变成大片大片的罂粟之间的点缀了。人们早已不屑于再叫罂粟，也不屑于再叫鸦片，这些名字太文雅太绕口了，庄稼人更习惯称它为大烟或洋烟。大烟是与自己以往的旱烟相对而言，洋烟是与自己本土的土著烟族相对而言。丰富的汉语语言随着罂粟热潮也急骤转换组合，终于创造出最耀眼的文字：人们先前把国外输入的被林爷爷禁止的鸦片称作洋烟，现在却把从自家土地上采收，自家铁锅里熬炼的鸦片称为土烟，最后简化为一个简

洁的单音字——“土”。衡量一家农户财富多寡的标准不再是储存了多少囤粮食和多少捆（十斤）棉花，而是多少“土”！白鹿镇每逢集日，一街两行拥挤不堪的烟土市场代替了昔日的粮食市场成为全镇交易的中心。

结婚一年后，这个小厢房厦屋的土炕上传出一声婴儿尖锐的啼哭。仙草心安理得地享受了婆婆白赵氏无微不至的服侍。坐满了月子，跳下炕来的时候，她容光焕发，挺着两只饱满肥实的乳房，完全是一个动人的少妇了。

庆贺头生儿子满月的仪式隆重而又热烈。所有重要亲戚朋友都通知到了，许多年已经断绝往来的亲戚也闻讯赶来了。嘉轩杀了一头猪，满心欢喜地待承亲朋乡友。他没有费多少心思就给孩子取下马驹的乳名，正如他的父亲给他取过拴狗的乳名一样的用意，越是贵重越是值钱的娃子越取那种丑陋的名字才更吉利；一当孩子度过多灾多祸的幼儿期进入私塾读书阶段，那时才应该费点心思取一个雅而不俗的官名，供其在一切公众场合使用。嘉轩听着众人不断重复着的恭维新生儿子的套话——再没有比这些套话叫人心里更快活的事了，他只是憨笑着更加殷勤更加诚挚地递烟让茶，对所有的亲朋乡友不分彼此不管亲疏不戒远近一律平等对待。

欢庆的日子虽然热烈却毕竟短暂，令人陶醉的是更加充实的往后的日月。妻子仙草虽然是山里人，却自幼受到山里上流家庭严格的家教，待人接物十分得体，并不像一般山里穷家小户的女子那样缺规矩少教养。只是山里不种棉花只种麻，割下麻秆沤泡后揭下麻丝挑到山外来，换了山外人的粮食和家织粗布再挑回山里去。仙草开始不会纺线织布，这是一个重大缺陷，一个不会纺线织布的女人在家庭里是难以承担主妇的责任的。嘉轩在订娶头几房女人时，媒人首先向他夸奖

的总是那女子所受的家教如何严格，茶饭手艺如何利落精致，还会拿来纺下的线穗儿和织成的花格子布供人欣赏。临到娶仙草时，已经顾不了那么多，只考虑能传宗接代就行了。母亲白赵氏明白这个底里，表现得十分通达十分宽厚，一面教授一面示范给她，怎样把弹好的棉花搓成捻子，怎样把捻子接到锭尖上纺成线，纺车轮子怎么转着纺出的线才粗细均匀而且皮实。纺成的线又怎么浆了洗了再拉成经线，怎么过综上机；上机后手脚怎样配合，抛梭要快捷而准确；再进一步就是较为复杂的技术，各种颜色的纬线和经线如何交错搭配，然后就创造出各种条纹花色的格子布来。她教她十分耐心，比教自己的女儿还耐心尽力。仙草生来心灵手巧，一学即会，做出的活儿完全不像初试者的那样粗糙，这使白赵氏十分器重，嘉轩自然十分欢心。

孩子满月时，岳父从山里用骡子驮来满满两驮篓礼物，吃的穿的玩的一应俱全。一双精致的小银镯上系着一对山桃木旋成的小棒槌。百日以后，小马驹就把那小棒槌含在嘴里，像吮吸乳头一样咂得吱吱有声。嘉轩和仙草看着就会心地笑了，自然都联想到新婚头一夜系在她裤腰带上的那六个桃木棒槌。孩子刚刚过岁就断奶了，马驹双手抱着仙草的乳房却吸不出乳汁，昼夜啼哭。仙草尚无做母亲的经验，急得心神不安问婆婆怎么回事。白赵氏不仅不慌不急反而有些幸灾乐祸地说："奶汁儿怕是给另一个暗里夺了吃光了。"仙草突然红了脸，又想起夜里丈夫和她做爱时吮咂乳房的情景。后来才悟出阿婆并没有取笑的意思，暗里夺了吃光了奶汁儿的是指自己肚里又有一个了。

第二个孩子出生以后取名骡驹，这个家庭里的关系才发生了根本性变化。由罂粟引种成功骤然而起的财源兴旺和两个儿子相继出生带来的人丁兴旺，彻底扫除了白家母子心头的阴影和晦气。白赵氏已经不再过问儿子的家事和外事，完全相信嘉轩已经具备处置这一切的能

力和手段；她也不再过多地过问仙草管理家务的事，因为仙草也已锻炼得能够井井有条地处置一切应该由女人做的家务。她自觉地悄悄地从秉德死后的主宰位置开始引退。她现在抱一个孙子又引一个孙子，哄着脚下跟前的马驹又抖着怀里抱着的骡驹，在村巷里骄傲自得地转悠着，冬天寻找阳婆而夏天寻找树荫。遇到那些到村巷里来卖罐罐花馍、卖冰糖圪垯、卖花生的小贩儿，她毫不吝啬地从大襟下摸出铜元来。那些小贩儿久而久之摸熟此道，就把背着的馍篓子、挑着的糖担子停在白家门外的槐树下，高声叫着或者使劲摇着手里的铃鼓儿，直到把白赵氏唤出来买了才挑起担儿挪一个地摊。

白嘉轩把人财两旺的这种局面完全归结于迁坟。但他现在又不无遗憾。迁坟那阵儿是他最困窘的时候，只是箍砌了安置棺柩的暗庭和墓室，明庭却没能用青砖砌了。现在又不好再翻修了，灵骨不断移动万一冲撞惊扰了风水灵气，结果可能适得其反。他还是下决心采取补救措施，把坟堆周围整个儿用砖砌起来，再在墓堆上加修一座象征性的房屋，这不但可以使坟墓遮风避雨，也可以使白鹿的精灵安驻，避免割草挖柴的人到坟头滋扰。前几年植栽的柏树已很旺盛，后来，又移栽了几棵枳树，于是这墓地就成为一座最像样的坟茔了。

白嘉轩随之陷入一桩纠纷里。在给父亲修造坟墓时，一位前来帮忙搬砖和泥的鹿姓小伙，向他吐露出想卖半亩水地的意向，说他的父亲在土壕里掷骰子输光了家当就没有再进家门，如今死活都不知。白嘉轩爽快地说：“你去寻个中人就行了。你想要多少我给你多少，要粮食可以，要棉花也可以。你朝中人开个口我连回话都不讲。”这个鹿姓小伙儿自然找到冷先生做中人。冷先生向白嘉轩传递了卖主开口的要价，他听了后当即说：“再加三斗。”这种罕见的豁达被当作慈心善举在村民中受到赞颂。白鹿村的小姓李家一个寡妇也找到冷先生的中医

堂，求他做中人卖掉六分水地给白家。白嘉轩更慷慨地说：“孤儿寡母，甭说卖地，就是周济给三斗五斗也是应该的。加上五斗！”

在契约上签名画押后的第二天早晨，白嘉轩来到新买的寡妇家的六分水地里察看，老远瞅见那块地里正有人吆着高骡子大马双套牲畜在地里飞梭似的耕作。此值初夏，日头刚冒出原顶，田野一片柔媚。骡马高扬着脖颈，吆犁人扶着犁把儿疲于奔命。地头站着一个穿黑袍的人，高个儿，手叉着腰，那是鹿子霖。白嘉轩不由心头一沉就加快脚步赶到地头。鹿子霖佯装不闻不见，双手背抄在后腰里，攥着从头拖到臀部的又黑又粗的大辫子，傲然瞅视着拽犁奔驰的骡马。白嘉轩一看就火了：“子霖，你怎么在我的地里插铧跑马？”鹿子霖佯装惊讶地说：“这是我的地呀！”白嘉轩说：“这得凭契约说话，不是谁说是谁的就是谁的！”鹿子霖说：“我不管契约。是李家寡妇寻到我屋里要把地卖给我。”白嘉轩说：“那是白说。昨日黑间李家寡妇已经签字画押了。”鹿子霖拖长声调说：“谁管你们黑间做下什么事！李家寡妇借过我五斗麦子八块银圆，讲定用这块地作抵押，逾期不还，我当然就要套犁圈地了！”长工刘谋儿正吆着骡马赶到地头，鹿子霖从长工手里夺过鞭子接过犁把儿，勒回牲畜示威似的翻耕起来。白嘉轩一跃上前抓住骡马缰绳。两个年龄相仿的男人随之就厮打在一起。长工刘谋儿是外村人不敢插手，只顾去逮惊跑的牲畜。骡马拖着犁杖，在已经摆穗扬花的麦田里磕磕绊绊地奔跑着。两个男人从李家寡妇的地里扭打到地头干涸的水渠，同时跌倒在渠道的草窝里，然后爬起来继续厮打，又扯拽到刚刚翻过的土地里。这时候村子里拥来许多男女，先是鹿子霖的几个内侄儿插手上阵，接着白嘉轩的亲门近族的男子也上了手，很快席卷为白鹿两姓阵势分明的斗殴，满地都是撕破的布片和丢掉的布鞋。白赵氏和白吴氏婆媳俩颠着一双小脚跑来时，打斗刚刚罢场。

冷先生赶在白家婆媳二人之前到达出事地点，吆喝一声："住手！"有如晴天打雷，震得双方都垂手驻足。冷先生一手撩着长袍走上前去，一手拉着白嘉轩，一手拉着鹿子霖朝镇子里走去。无论鹿姓或白姓的人看见主家被拽走了，也就纷纷四散。俩人被冷先生一直拖进他的中医堂。冷先生先关了门以免围观，随之打了两盆水，让他们各自去洗自己脸上手上的血污，然后给他们抓破的伤口敷了白药，止了血。冷先生说："就此罢休的话，你俩现在都回去吃早饭；罢休不了的话，吃罢饭上县去打官司。"说罢拉开门闩，一只手作出请出门的手势。

白嘉轩随后即弄清，李家寡妇确实先把地卖给鹿子霖，而且以借的形式先灌了五斗麦子拿了八块银圆，一俟签字画押再算账结清。这当儿看到白嘉轩给那位赌徒儿子的地价比鹿子霖给她的地价高出不少，心里一转就改变主意，要把地卖给白嘉轩，用白嘉轩给她的地款还了鹿子霖的借贷。白嘉轩弄清了这个过程就骂起李家寡妇来："真正的婆娘见识！"但事已至此，他无法宽容鹿子霖。他在家里对劝解他的人说："权且李家寡妇是女人见识。你来给我说一句，我怎么也不会再要她的地！你啥话不说拉马套犁就圈地，这明显是给我脸上撒尿嘛！"他主意愈加坚定，无论李家寡妇如何妇人见识，这本身与他无关；他现在手里攥着卖地契约，走到州走到县都是有理气长的官司。他已经向县府投诉。鹿子霖也向县府投诉。

李家寡妇与白嘉轩签字画押以后，鹿子霖当晚就知道了。当双方以及中人冷先生一齐按下蘸了红色印泥的食指的时候，鹿子霖已经作出明早用骡马圈地的相对措施了。鹿子霖把整个卖地的过程向父亲鹿泰恒学说一遍。鹿泰恒问："你看咋办呢？"鹿子霖就说了他的办法，又对这办法作了注释："倒不在乎李家寡妇那六分地。这是白嘉轩给我

跷尿骚哩！”鹿泰恒说：“能看到这一点就对了。”他默许了儿子已经决定的举措。在他看来，白秉德死了以后，白嘉轩的厄运已经过去，翅膀也硬了，这是儿子鹿子霖的潜在的对手。在他尚健在的时日里，应该看到儿子起码可以成为白嘉轩的一个对手，不能让对方跷腿从头上跷了尿骚！官司一定要打，打到底。倾家荡产也要打赢这场官司。

白嘉轩从滋水县投诉回来顺便走到白鹿书院，向姐夫朱先生诉说了鹿家欺人过甚的事，意在求姐夫能给知县提示一下，使这场肯定赢的官司更有把握。据嘉轩得知，每有新县令到任，无一不登白鹿书院拜谒姐夫朱先生。朱先生说：“我昨日已听人说了你与鹿家为地闹仗的事，我已替你写了一件诉状，你下回过堂时递给衙门就行了。记住，回家后再拆看。”

白嘉轩急急回到家，在菜油灯下拆开信封，一小块宣纸上写下稀稀朗朗几行娃娃体毛笔字：

致嘉轩弟

倚势恃强压对方，

打斗诉讼两败伤；

为富思仁兼重义，

谦让一步宽十丈。

白嘉轩读罢就已泄了大半仇气，捏着这纸条找到中医堂的冷先生，连连慨叹“惭愧惭愧”。冷先生看罢纸笺，合掌拍手：“真是绝妙一出好戏！嘉轩你瞅——”说着拉开抽屉，把一页纸笺递给嘉轩。嘉轩一

看愈觉惊奇，与他交给冷先生的那一页纸笺内容一样，字迹相同，只是题目变成“致子霖兄”。

三天后的一个晚上，冷先生把白嘉轩和鹿子霖一起邀约到中医堂，摆下一桌酒席，把他们交给他的相同内容的纸笺交换送给对方，俩人同时抱拳打拱，互致歉意谦词，然后举酒连饮三杯，重归于好而且好过已往。俩人谁也不好意思再要李家寡妇那六分地了，而且都慨然提出地归原主，白家和鹿家各自周济给李家寡妇一些粮食和银圆，帮助寡妇渡过难关。冷先生当即指派药房伙计叫来李家寡妇，当面毁了契约。李家寡妇扑通跪到地上，给白嘉轩鹿子霖磕头，感动得说不出话只是流眼泪。

这件事传播的速度比白鹿两家打斗的事更快更广泛。滋水县令古德茂大为感动，批为“仁义白鹿村”，凿刻石碑一块，红绸裹了，择定吉日，由乐人吹奏升平气象的乐曲，亲自送上白鹿村。一向隐居的朱先生也参加了这一活动。碑子栽在白鹿村的祠堂院子里，从此白鹿村也被人称为仁义庄。

第五章

二月里一个平淡宁静的早晨，春寒料峭，街巷里又响起卖罐罐馍的梆子声。马驹和骡驹听见梆子声就欢叫起来，拽着奶奶的衣襟从上房里屋走出来。白赵氏被两个孙子拽得趔趔趄趄，脸上却洋溢着慈祥温厚的笑容，两只手在衣襟下掏着铜子和麻钱。嘉轩跷出厦屋门槛，在院庭里挡住了婆孙三人的去路："妈，从今日往后，给他俩的偏食断了去。"白赵氏慈和的脸顿时沉阴下来，瞅着儿子，显然是意料不及而愣住了。嘉轩解释说："不该再吃偏食了，他俩大了。人说'财东家惯骡马，穷汉家惯娃娃'。咱们家是骡马娃娃都不兴娇惯。"白赵氏似有所悟，脸上泛出活色来，低头看看偎贴在腰上的两颗可爱的脑袋，扬起脸对儿子说："今个算是尾巴巴一回。"嘉轩仍然不改口："当断就断。算了，就从今个断起。"白赵氏把已经码到手心的铜子和麻钱又塞进大襟底下的口袋，愠怒地转过身去："你的心真硬！"马驹和骡驹窝火委屈得哭丧着脸，被奶奶拽着手快快地往上房里屋走去。

街巷里的梆子声更加频繁地敲响，干散清脆的吆喝声也愈加洪亮："罐罐儿馍——兔儿馍——石榴儿馍——卖咧——"仙草从织布机上转过头说："你去把那个卖馍客撵走，甭叫他对着门楼子吆喝了，引逗得娃们尽哭。"嘉轩反而笑说："人家在街巷里吆喝，又没有钻到咱们院子里来吆喝，凭啥撵人家？吆喝着好，吆喝得马驹骡驹听见卖馍卖糖的梆子铃鼓响，就跟听见卖辣子的吆喝一样就好了。"仙草咬着嘴唇重复一遍婆婆的话："你真心硬！"

两个孩子已经长到该当入学的年龄。这两个儿子长得十分相像，像是一个木模里倒出一个窑里烧制的两块砖头；虽然年龄相差一岁，

弟弟骡驹比哥哥马驹不仅显不出低矮，而且比哥哥还要粗壮浑实。他们都像父亲嘉轩，也像死去的爷爷秉德，整个面部器官都努力鼓出来，鼓出的鼻梁儿，鼓出的嘴巴，鼓出的眼球以及鼓出的眉骨，尽管年纪小小却已显出那种以鼓出为表征的雏形底坯。随着年龄的增长，这种鼓出的脸部特征将愈来愈加突出。

白嘉轩太喜欢这两个儿子了。他往往在孩子不留意的时候专注地瞅看那器官鼓出的脸，却说不出亲热的话也做不出疼爱亲昵的表示。孩子和奶奶形影不离，日夜厮守，他几乎没有背过抱过他们，更不会像一般庄稼汉把儿子架在脖子上逛会看戏了。现在，看看儿子已经该当读书了，他就不能再撒手由奶奶给他们讲猫儿狗儿了。白嘉轩正在谋划确定给白鹿村创办一座学堂。白鹿村百余户人家，历来都是送孩子到七八里地的神禾村去念书，白嘉轩就是在那里早出晚归读了五年书。他想创办学堂不全是为了两个儿子就读方便，只是觉得现在应该由他来促成此举。学堂就设在祠堂里。那座祠堂年久失修，虽是祭祀祖宗的神圣的地方，却毕竟又是公众的官物没有谁操心，五间大厅和六间厦屋的瓦沟里落叶积垢，绿苔绣织，瓦松草长得足有二尺高；椽眼里成为麻雀产卵孵雏的理想窝巢；墙壁的泥皮剥落掉渣儿；铺地的方砖底下被老鼠掏空，砖块下陷。白嘉轩想出面把苍老的祠堂彻底翻修一新，然后在这里创办起本村的学堂来。他的名字将与祠堂和学堂一样不朽。

祠堂和村庄的历史一样悠久，却没有任何竹册片纸的典籍保存下来。搞不清这里从何年起始有人迹，说不清第一位来到这原坡挖凿头一孔窑洞或搭置第一座茅屋的始祖是谁。频频发生的灾祸不下百次把这个村庄毁灭殆尽，后来的人或是原有的幸存者重新聚合继续繁衍。灾祸摧毁村庄摧毁历史也摧毁记忆，只有荒诞不经的传说经久不衰。

泛滥的滋水河把村庄从河川一步一步推移到原坡根下，直到逼上原坡。相传有一场毁灭性的洪水发生在夜间，有幸逃到高坡上的人光着屁股坐到天亮，从红苕地里扯一把蔓子缠到腰际，遮住男女最隐秘的部位，在一片黄汤中搜摸沉入淤泥里的铁锨镢头和斧头；祠堂里那幅记载着列祖列宗显考显妣的宽大的神轴和椽子檩条，一齐被洪水冲得无影无踪，村庄的历史便形成断裂。

传说又一年三伏天降流火，大如铜盆小如豆粒的火团火球倾泻下来，房屋焚为灰烬；人和牛马猪羊鸡犬全被烧焦，无法搭救无计逃遁自然无一幸免；祠堂里的神轴和椽子檩条又一齐化为灰烬，村庄的历史又一次成为空白。至于蝗虫成精，疫疠滋漫，已经成为小灾小祸而不值一谈了。活在今天的白鹿村的老者平静地说，这个村子的住户永远超不过二百，人口冒不过一千，如果超出便有灾祸降临。

这个村庄后来出了一位很有思想的族长，他提议把原来的侯家村（有胡家村一说）改为白鹿村，同时决定换姓。侯家（或胡家）老兄弟两个要占尽白鹿的全部吉祥，商定族长老大那一条蔓的人统归白姓，老二这一系列的子子孙孙统归鹿姓；白鹿两姓合祭一个祠堂的规矩，一直把同根同种的血缘维系到现在。据说白鹿原当时掀起了一个改换村庄名称的风潮，鹿前村、鹿后村、鹿回头村、鹿鸣村、鹿卧村、鹿噙草村、鹿角村、鹿蹄村，不一而足。一位继任的县官初来乍到，被这些以鹿命名的村庄搞得脑袋发涨，命令一律恢复原来的村名，只允许保留白鹿村和白鹿镇两个与鹿有关的名字，白鹿村的村民感到风光，更加珍视自己的村名。

改为白姓的老大和改为鹿姓的老二在修建祠堂的当初就立下规矩，族长由长门白姓的子孙承袭下传。原是仿效宫廷里皇帝传位的铁的法则，属天经地义不容置疑。老族长白秉德死后，白嘉轩顺理成章

继任族长是法定的事。父亲过世后的头几年里，每逢祭日，白嘉轩跪在主祭坛位上祭祀祖宗的时候，总是由不得心里发慌尻子发松；当第七房女人仙草顺利生下头胎儿子以后，那种两头发慌发松的病症不治自愈。现在，白嘉轩怀里揣着一个修复祠堂的详细周密的计划走进了鹿子霖家的院子。

这是白鹿村乃至整个白鹿原最漂亮的一座四合院。它是鹿子霖的老太爷的杰作。那位老太爷过烂了光景讨吃要喝流逛到了西安城里，在一家饭铺先是挑水拉风箱，后来竟学成了一手烹饪绝技。一位南巡的大官路经西安吃了他烧的葫芦鸡，满心欢喜脱口赞叹："天下第一勺。"于是就发了财；于是就在白鹿村置买田地，于是就修建起白鹿原第一流的四合院。他的巨大成功启发着诱惑着一茬又一茬庄稼汉的后人，撂下镢头犁杖操起铁勺锅铲，由此掀起的学炊热历经一个世纪，白鹿原以出勺勺客闻名省城内外。然而自老太爷之后，到鹿子霖的四辈人当中，鹿家却再没有一个男人执勺弄铲，外人万万料想不到"天下第一勺"谢世时，竟然留下这样的遗嘱："我一辈子都是伺候人，顶没出息。争一口气，让人伺候你才算荣耀祖宗。中一个秀才到我坟头放一串草炮，中了举人放雷子炮，中了进士……放三声铳子。"鹿子霖的老爷爷爷爷父亲和他本人都没有实现老太爷的遗愿，除了雇来长工做务庄稼，均未成为让人伺候的人；尽管一代一代狗推磨儿似的居心专意供给子弟读书，却终究连在老太爷坟头放一串草炮的机运也不曾有过。老太爷的尸骨肯定早已化作泥土，他的遗言却似窖藏的烧酒愈久愈鲜。鹿子霖在儿子刚交七岁的那年正月就送他到神禾村学堂去启蒙，翻查了一夜字典才选定兆鹏作为儿子的学名，那寓意是十分殷切，也十分明朗的。二儿子兆海这年正月刚送去学堂，两个儿子每天麻麻亮就被他吼喊起来去上学。兆鹏兆海的脸冻皴了，手脚冻得淌黄

水。做娘的抱怨孩子太小上学太早，鹿子霖毫不动摇地鼓着劲说："我等着到老太爷的坟地放铳子哩！"

鹿子霖在厢房里听见一阵陌生的脚步声就走到庭院，看见白嘉轩进来，便忙拱手问候。白嘉轩停住脚说："我找大叔说件事。"鹿子霖回到厢房就有些被轻贱被压低了的不自在。白嘉轩走进上房的屏风门就叫了一声："叔哎！"鹿泰恒从上房里屋踱出来时左手端着一只黄铜水烟壶，右手捏着一截冒烟的火纸，摆一下手礼让白嘉轩坐到客厅的雕花椅子上。鹿泰恒坐在方桌另一边的椅子上，细长的手指在烟壶里灵巧地捻着金黄绵柔的烟丝，动作很优雅。白嘉轩说："大叔，咱们的祠堂该翻修了。"鹿泰恒吹着了火纸，愣怔了一下，燃起火焰的火纸迅速烧出一截纸灰。鹿泰恒很快从愣怔里恢复过来，优雅地把火纸按到烟嘴上，优雅地吸起来，水烟壶里的水的响声也十分优雅，直到"噗"的一声吹掉烟筒里的白色烟灰，说："早都该翻修了。"白嘉轩听了当即就品出了三种味道：应该翻修祠堂；祠堂早应该翻修而没有翻修是老族长白秉德的失职；新族长忙着娶媳妇埋死人现在才腾出手来翻修祠堂咧！白嘉轩不好解释，只是装作不大在乎，就说起翻修工程的具体方案和筹集粮款的办法。鹿泰恒听了几句就打断他的话说："这事你和子霖承办吧！我已经老了。"白嘉轩忙解释说："跑腿自然有我和子霖。你老得出面啊！"鹿泰恒说："你爸在世时，啥事不都是俺俩搭手弄的？现在该着你们弟兄搭手共事了。"随之一声唤，叫来了鹿子霖："嘉轩说要翻修祠堂了，你们弟兄俩商量着办吧。"

整个一个漫长的春天里，白鹿村洋溢着一种友好和谐欢乐的气氛。翻修祠堂的工程已经拉开。白嘉轩请来了第五房女人的父亲卫木匠和他的徒弟。整个工程由白嘉轩和鹿子霖分头负责。鹿子霖负责工程，每天按户派工。白嘉轩组织后勤。祠堂外的场院里临时搭起席

棚，盘了锅台支了案板。除了给工匠管饭，凡是轮流派来做小工拉下手的人，也一律在官灶上吃饭。厨师是本村里最干净最利落的几个女人。男人们一边围在地摊上吃饭一边和锅台边的女人调笑打诨，欢悦喜庆的气氛把白鹿两姓的人融合到一起了。

白嘉轩提出的一个大胆的方案得到了鹿子霖爽快的响应：凡是在祠堂里敬香火的白姓或鹿姓的人家，凭自己的家当随意捐赠，一升不少，一石不拒，实在拿不出一升一文的人家也不责怪。修复祠堂的宗旨要充分体现县令亲置在院里石碑上的“仁义白鹿村”的精神。不管捐赠多少，修复祠堂所需的粮款的不足部分，全由他和鹿子霖包下。白嘉轩把每家每户捐赠的粮食记了账，用红纸抄写出花名单公布于祠堂外的围墙上，每天记下花销的粮食和钱款的数字，心里总亮着一条戒尺：不能给祖宗弄下一摊糊涂账。整个预算下来，全体村民踊跃捐赠的粮食只抵全部所需的三分之二，白嘉轩和鹿子霖两家合包了三分之一。

整个工程竣工揭幕的那天，请来了南原上麻子红的戏班子，唱了三天三夜。川原上下的人都拥到白鹿村来看戏，来瞻仰白鹿村修造一新的祠堂，来观光县令亲置在祠堂院子里的石碑，来认一认白鹿村继任的族长白嘉轩。那个曾经创造下白鹿原娶妻最高记录的白嘉轩原本没长什么狗㞗毒钩，而是一位贵人，一般福薄命浅的女人怎能浮得住这样的深水呢?

这年夏收之后，学堂开学了。五间正厅供奉着白鹿两姓列宗列祖显考显妣的神位，每个死掉的男人和女人都占了指头宽的一格，整个神位占满了五间大厅的正面墙壁。西边三间厦屋，作为学堂，待日后学生人数发展多了装不下了，再移到五间正厅里去。东边三间厦屋居

中用土坯隔开来，一边作为先生的寝室，一边作为族里官人议事的官房。

白嘉轩被推举为学董，鹿子霖被推为学监。两人商定一块去白鹿书院找朱先生，让他给推荐一位知识和品德都好的先生。朱先生见了妻弟白嘉轩和鹿子霖，竟然打拱作揖跪倒在地：“二位贤弟请受愚兄一拜。”两人吃了一惊，面面相觑忙拉朱先生站起，几乎同声问：“先生这是怎么了？”朱先生突然热泪盈眶：“二位贤弟做下了功德无量的事啊！”竟然感慨万端慷慨激昂起来：“你们翻修祠堂是善事，可那仅仅是个小小的善事；你们兴办学堂才是大善事，无量功德的大善事。祖宗该敬该祭，不敬不祭是为不孝；敬了祭了也仅只尽了一份孝心，兴办学堂才是万代子孙的大事；往后的世事靠活人不靠死人呀！靠那些还在吃奶的学步的穿烂裆裤的娃儿，得教他们识字念书晓以礼义，不定那里头有治国安邦的栋梁之材呢。你们为白鹿原的子孙办了这大的善事，我替那些有机会念书的子弟向你们一拜。”白嘉轩也被姐夫感染得热泪涌流，鹿子霖也大声谦和地说：“朱先生看事深远。俺俩当初只是觉得本村娃娃上学方便……”

朱先生的同窗学友遍及关中，推荐一位先生来白鹿村执教自然不难，于是就近推荐了白鹿原东边徐家园的徐秀才。徐秀才和朱先生同窗同庚，学识渊博却屡试不中，在家一边种地一边读书，淡泊了仕途功利，只为陶冶情性。两人拿着朱先生亲笔写的信找到徐家园，徐秀才欣然出马到白鹿村坐馆执教了。

辟作学馆的西边三间厦屋里，摆满了学生从自家屋里抬来的方桌、条桌、长凳和独凳。白嘉轩的两个儿子也都起了学名，马驹叫白孝文，骡驹叫白孝武，他们自然坐在里边。鹿子霖的两个儿子鹿兆鹏

和鹿兆海也从神禾村转回本村学堂。男人们无论有没有子弟就学，却一齐都参加了学堂开馆典礼。

典礼隆重而又简朴。至圣先师孔老先生的石刻拓片侧身像贴在南山墙上，祭桌上供奉着时令水果，一盘沙果、一盘迟桃、一盘点心、一盘油炸馃子。两支红蜡由白嘉轩点亮，祠堂院庭里的鞭炮便爆响起来，他点了香就磕头。孩子们全都跪伏在桌凳之间的空地上，拥在祠堂院子里的男人们也都跪伏下来。鹿子霖和徐先生依次敬了香跪了拜，就侍立在祭台两边，关照新入学的孩子一个接一个敬香叩头，最后是村民们敬香叩首。祭祀孔子的程序完毕，白嘉轩把早已备好的一条红绸披到徐先生肩上，鞭炮又响起来。徐先生抚着从肩头斜过胸膛在腋下系住的红绸，只说了一句话作为答辞："我到白鹿村来只想教好俩字就尽职尽心了，就是院子里石碑上刻的'仁义白鹿村'里的'仁义'俩字。"

按预定的程序本该结束，院里走进了两位老汉，手里托着一只红色漆盘，盘里盘着两条红绸。俩老汉走上祭台，把一条红绸披到白嘉轩肩上，把另一条披到鹿子霖肩头。老者说："这是民意。"

傍晚，白嘉轩脱了参加学堂开馆典礼时穿的青色长袍，连长袖衫和长裤也脱了，穿着短袖衫和半截裤，一身清爽地走进了暮色四合的马号，晚饭前必须给牲畜铡好青草。鹿三用独轮小推车从晒土场往牲畜圈里推土垫圈，脸上眉毛上扑落着黄土尘屑，他见白嘉轩走来，忙扔下小推车揭起了铡刀。白嘉轩在铡墩前蹲下来，把青草一把一把扯过来，在膝头下捋码整齐再塞到铡口里去。鹿三双手按着铡把，猫腰往下一压，"咔嚓"一声，被铡断的细草散落下来，铡刀刃上和铡口的铁皮上都染上一层青草的绿汁。"应该让娃娃去念书。"白嘉轩说。"那当然。念书是正路嘛！"鹿三说。"我说黑娃应该去念书。"白嘉轩说。

“哦！你说的是黑娃？”鹿三说，“快擩草！甭只顾了说话手下停了擩草。”白嘉轩擩进青草说：“叫黑娃明早上就去上学。给徐先生的五升麦子由我这儿灌。先生的饭也由我管了。桌子不用搬，跟马驹骡驹伙一张方桌，带上一个独凳儿就行了。”鹿三嘲笑说：“那个慌慌鬼！生就的庄稼坯子，念啥书哩！”“穷汉生状元，富家多纨绔。你可不要把娃娃料就了，我看黑娃倒很灵聪哩！”白嘉轩笑着说，“日后黑娃真的把书念成了，弄个七品五品的，我也脸上光彩哩！”鹿三说：“黑娃上了学，谁来割草呢？”“你割我割，咱俩谁能腾出手谁去割。先让黑娃去上学。”白嘉轩说，“秋后把坡上不成庄稼的‘和’字地种上苜蓿，明年就不用割草了。”

黑娃天不明又被父亲吼喊起来，他正要挎笼提镰去割青草，却听鹿三说：“把草镰和草笼撂下，掮上板凳上学去。”黑娃愣在院子里，似乎不大情愿地丢下笼和镰，说：“拿啥念哩？没有书，没有笔，也没有纸。”鹿三说：“你先坐到学堂盘一盘你的野性子。笔咧纸咧书咧缓两天再买。你要是盘不下性子，还是窝不住的野鹁鸽，花钱买书买纸我就白撂钱了。”

黑娃把一只独凳掮上肩膀，走进祠堂大门。徐先生穿着褐色长袍背抄着手在院子里踱步，他看见徐先生就不知所措。鹿三拉住儿子的手说：“给先生行礼。”黑娃弯腰低头鞠躬时，肩上的凳子摔了下来，正好砸了徐先生的脚背。鹿三顺手抽了黑娃一个抹脖子，骂道：“我把你这慌慌鬼……”徐先生忍着疼不在意地说：“送进去。嘉轩给我说过了。”鹿三拉着儿子进入学堂，找到马驹和骡驹的方桌，在一侧放下凳子。马驹把一摞仿纸，一根毛笔递给黑娃：“俺爸叫我给你。”鹿三竟然心头一热，鼻腔酸酸的，又狠狠地说：“黑娃你要是再不好好念书，我把你狗日……”

黑娃捉着那支毛笔，拔下笔帽，紫红的笔头使他想到了狐狸火红的皮毛。在山坡上割草记不清多少次撞见狐狸，有一次他猛然甩出手里的草镰，偏巧挂住了狐狸的后腿。那狐狸有一条火焰似的蓬松的粗尾巴。他拼命追赶，却眼看着它从崖坎里一条狭缝中跑掉了。他总是惦念着那只狐狸的跛腿好了没好？现在，他突然想到要是抓住那只狐狸，能栽多少毛笔呀！他的左手染着青草的绿汁，指头肚儿变成紫黑色，捏着光滑的笔杆和绵软的黄色仿纸总觉得怯怯的。徐先生进来，领着学生念书。黑娃没有书本，就跟着徐先生愣念：“人——之——初，性——本——善。”

学堂里坐的全是本村的娃娃，没有同学间的陌生，只有对于念书生活的新鲜。三五天后，随着新鲜感的消失，黑娃就觉得念书不再是幸事而是活受罪。母亲几乎天天晚上都要给他敲一次警钟：“黑娃，你要是不贪念书光贪耍，甭说对不住你大你妈，单是你白家叔叔的好心都……”黑娃不耐烦地说：“干脆还是叫我去割草。”

平日在村子里割草砍柴、浮水、掏雀蛋时建立的友谊，很快又在学堂里重现，孩子们自然地围拢到猴王黑娃的周围。黑娃对这种崇拜已经没有兴趣而且失掉自信，原因是他自己也崇拜起另一个人来，那是鹿兆鹏。鹿兆鹏是从神禾村转回本村学堂的，他年龄不算最大，书却读得最高。徐先生把他叫到自己的寝室单个儿面授，已经是《中庸》了。他很随和，一双深眼睛上罩着很长很黑的眼睫毛，使人感到亲近。他的弟弟鹿兆海也是这种深眼睛和长睫毛。他爸鹿子霖，他爷鹿泰恒都是这种长条脸深眼窝长睫毛。鹿兆鹏自小在神禾村念书，黑娃难得和他接触，现在坐到相邻的两个方桌跟前，他就无法摆脱那个深眼窝里溢出的魅力。黑娃不由得在心里将鹿兆鹏兄弟和白孝文兄弟进行比较，鹿兆鹏鹿兆海兄弟使人感到亲切，甚至他们的父亲鹿子霖

也使人感到亲切。鹿子霖常常在街巷里猛不防揪住黑娃头上的毛盖儿，另一只手就抓住了他裆里的那个东西，哈哈大笑着胁逼他叫叔：“黑娃你崽娃子叫叔不叫？我把你这碎牛牛拔了去喂猫！”而白嘉轩大叔却永是一副凛然正经八百的神情，鼓出的眼泡皮儿总是使人联想到庙里的神像。黑娃知道白家对自家好却总是怯惧，他每天早晨和后晌割两笼青草，匆匆背进白家马号倒在铡墩旁边又匆匆离去，总怕看见白嘉轩那张神像似的脸。他坐在白家兄弟的方桌上，看着孝文孝武的脸还是联想到庙里那尊神像旁边的小神童的脸，一副时刻准备着接受别人叩拜的正经相。孝文孝武念书写仿很用功，人也很灵聪，背书流利得一个栗子也不磕巴，照影格描写的大字满纸都被徐先生画上了红圈儿。黑娃已经取下一个文雅的学名叫鹿兆谦，名字是父亲求白嘉轩给取的。父亲说这娃儿野，又骚（顽皮），让他改改。白嘉轩说：“他养成了谦逊的品行，就不野也不骚了。谦谦君子嘛！他在鹿姓里属兆字辈，就叫兆谦，叫起来也顺口着哩！”徐先生点名鹿兆谦背书时，黑娃竟然毫无反应，惹得娃子们哄然大笑。学生们仍然叫他黑娃，兆鹏也叫他黑娃，只有孝文孝武记住了他爸起下的名字，每唤必是兆谦。每听到孝文孝武称呼的兆谦，黑娃就觉得增加了一分对白家兄弟的敬重，正像他惧怕白嘉轩而仍不失尊敬他一样。他终于耐不住白家兄弟方桌上的寂寞，把自己的独凳挪到鹿家兄弟的方桌边去了。

他一扬手接住鹿兆鹏扔过来的东西，以为是石子，看也不看就要丢掉。鹿兆鹏喊：“甭撂甭撂！”他看见一块白生生的东西，完全像沙滩上白色的石子，放在手心凉冰冰的。他问：“啥东西？”鹿兆鹏说：“冰糖。”黑娃捏着冰糖问：“冰糖做啥用？”鹿兆鹏笑说：“吃呀！”随之伸出舌头上正在含化的冰糖块儿。黑娃把冰糖丢进嘴里，呆呆地站住连动也不敢动了，那是怎样美妙的一种感觉啊！无可比拟的甜滋滋的味道使他浑身颤抖起来，竟然哇的一声哭了。鹿兆鹏吓得扭住黑娃

的腮帮子，担心冰糖可能卡住了喉咙。黑娃悲哀地扭开脸，忽然跳起来说：“我将来挣下钱，先买狗日的一口袋冰糖。”

隔了几天鹿兆鹏又把一块点心小心翼翼地放到黑娃的手心里说：“水晶饼。比冰糖比平常的点心都好吃。”黑娃瞅着手心里的圆圆的水晶饼，酥松的白得像雪似的皮儿上缀着五个红色的俏花点儿，手心里已经落着松散的皮屑。他觉得身上又开始战栗，而且迅速传导到全身。他咬一咬牙却把那水晶饼扔到路边的草丛里去了。鹿兆鹏惊呆了，水晶饼在他也是稀罕的吃食儿，他省下一个来让给黑娃，却遭到如此野蛮的回报。他一把揪住黑娃的衣襟：“黑娃，你狗日的给我捡回来！”黑娃一伸手也揪住兆鹏的领口：“财东娃！你要是每天都能拿一块水晶饼一块冰糖来孝敬我，我就给你捡起来吃了。”他随之突然气馁了瓦解了：“我再也不吃你的什么饼儿什么糖了，免得我夜里做梦都在吃，醒来流一摊涎水……”鹿兆鹏松了手，似乎也战栗了一下，就把一只手搭到黑娃肩头拥着走了。

冰糖给黑娃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美好而又痛苦的向往和记忆，他愈来愈明晰，只有实践了他“挣钱先买一口袋冰糖”的狂言才能解除其痛苦。后来他果真得到了一个大洋铁桶装着的雪白晶亮的冰糖，那是他和他的弟兄们打劫一家杂货铺时搜到手的。弟兄们用手抓着冰糖往嘴里填往袋里装的时候，他猛然战栗了一下，喝道：“掏出来，掏出来！把吞到嘴里的吐出来！”他解开裤带掏出生殖器，往那装满冰糖的洋铁桶里浇了一泡尿。

除了兆鹏的冰糖，还有徐先生抽的一顿板子也给他留下了记忆。背不过书写错了字挨徐先生的板子已不算什么耻辱，学堂里几乎找不出一个侥幸者，兆鹏兄弟孝文兄弟虽然全是好学生，也照样被板子抽打手掌，只不过次数少些而已。那天后晌，徐先生指派黑娃到河滩柳

林里去砍一根柳树股儿。黑娃能被徐先生委以重任心里觉得很荣耀，又可以到柳絮吐黄的河滩里畅快一番。他看见兆鹏朝他挤眼儿，就向徐先生提出："让兆鹏一块去给我搭马架儿，柳树太高爬不上去。"徐先生应允了。他忽然觉得也应该让孝文分享一下这种幸运，就说："俺屋没有斧头，孝文家有一把，快得跟剃头刀一样。"徐先生又点头默许了。三个伙伴走出白鹿村村口，看见独庄庄场里围着一堆人，黑娃说："那儿给牛打犊给马配驹，看看热闹去。"

他们从围墙破缺的塌口看见，一头皮毛油光乌亮的黑驴正和一匹枣红马咬仗，咬脖子咬尻子咬嘴又不像是真咬，红马和黑驴都张着嘴露出宽扁的牙齿，又吊下一串串黏稠的涎水。庄场的主人白兴儿，伸出可笑的手把枣红马拽进围栏，拴住了缰绳，黑驴跟过来钻进围栏的敞口，就跳上了枣红马的脊背。孝文惊奇地说："看看那只手！"黑娃用眼睛禁斥了孝文一下。

白兴儿的手指，像鸭子的脚掌一样，由一层薄皮连结在一起。白兴儿的爷爷是这种手，他的儿子生下来还是这种手，人叫白连指儿。据说这连指儿最适宜做牲畜配种的事。

三个人默默地离开庄场朝河滩走去，谁也不说话。黑娃突然伸出手在兆鹏裆里抓了一把："噢呀！硬得跟驴尿一样！"兆鹏红了脸也在黑娃裆里报复了一下："你也一样！"他们不好意思动手试探孝文，孝文比他们都小，只是逼问："孝文你自个说实话，硬不硬？"孝文哇的一声哭了："硬得好难受。"

他们轻而易举地砍了一根柳树股儿，又折了一堆柔软的柳条儿，捋下皮来，用白生生的柳枝编织蚂蚱笼儿，把黑驴压着红马的令人不舒服的事忘记了。回到学堂，已经放学，徐先生又让黑娃把那根柳木

棍儿用斧头削平刮光，然后接到手掂了掂说：“你三个跪下，把手伸出来！”徐先生不偏不倚，一人一板，从左边挨个儿打到右边，再从右边挨个儿打到左边。三个人谁也不招认在去河滩以前曾经到庄场看过黑驴和红马配驹儿的事，黑娃因此佩服孝文也是个硬头货。徐先生打了每人十个板子，说：“你们啥时候说了实话再起来。”就背抄着手在庭院里悠悠然踱着方步。三个人偷偷交换一下眼色，黑娃悄悄说：“咋么也没想到砍柳树股儿是为做板子。”天擦黑时，三个人的家长不约而同找到学堂，看见了一排溜儿跪在祠堂台阶下的儿子。刚直不阿的徐先生背抄着手冷着脸说：“问问你们的娃子到啥场合去了。”白鹿村三个最珍爱面子最要脸皮的人一下子气得脸孔蜡黄，手直哆嗦。随和可亲的鹿子霖率先抽了兆鹏一记耳光。这完全出乎黑娃的意料，他想绝对应该是火暴脾气的父亲先动手揍他，或者是令人敬畏的白嘉轩大叔先教训孝文……继兆鹏被连续几个耳光击倒之后，黑娃觉得自己屁股上挨了重不可负的一击就狗吃屎似的趴下了，眼前霎时一片金光又一片黑暗。

当他醒来时，已经是一个温馨的早晨，睁开眼看见了白嘉轩大叔的脸，和蔼地笑着。这是黑娃第一次看到白嘉轩大叔的笑颜，不禁奇怪起来，这张脸原来也会笑，笑起来也十分动人。母亲破例给他煮了三个荷包蛋，催他吃下。白嘉轩笑着说：“黑娃，夹上书上学去。”父亲在旁边说：“算了算了！这东西不成器不说，倒把孝文给引坏了！”白嘉轩收了笑容说：“我说让他弄个五品七品是说笑，念些书扎到肚子里却是实情，你该明白‘知书达理’这话？知书以后才能达理。”说着就抓住黑娃的手，拽着走了。黑娃无法拒绝那只粗硬有力的手，一直把他拽进学堂。那只手给他留下了复杂的难忘的记忆。

这年冬天，兆鹏兆海兄弟俩离开白鹿村，到朱先生坐馆的白鹿书院念书去了，刘谋儿赶着青骡拉着的木轮大车，车上装着被卷和一口袋面粉，鹿子霖坐在车厢里亲自送儿子去高等学馆。徐先生也来送行。兆鹏兆海恭恭敬敬地向徐先生作揖鞠躬。兆鹏跑过来抓住黑娃的手捏了捏，就上车去了。黑娃又感到一阵痛苦的战栗，兆鹏把一块冰糖留在他的手心里了。两年之后，孝文孝武兄弟俩也坐上父亲鹿三赶着的黄牛拽着的大车到白鹿书院去了，车上照样装着铺盖卷和一口袋面粉。他送他们上路以后，就从学堂里提着独凳走出来，向徐先生深深地鞠躬，很诚恳地说：“先生啥时候要砍柳树股儿，给我捎一句话就行了。”徐先生嘴巴两边的肌肉扭动了两下，没有说话。黑娃扛起独凳就走出了祠堂的大门。

第六章

白嘉轩第三个儿子降生以后，取名为牛犊。在二儿子骡驹和三儿子牛犊之间，仙草按照每年一个或三年两个的稀稠生过三男一女，全都没有度过四六厄运就成为鹿三牛圈里的鬼。四个孩子的死亡过程一模一样，如出一辙：出生的第四天开始啼哭，日夜不断，直到嗓子嘶哑再哭不出。到第六天孩子便翻起白眼，眼仁上吊。仙草看见那翻吊的白眼仁就毛骨悚然。白赵氏冷冷地说："还是一个短命的。"其实在孩子刚刚发生尖锐的啼哭时，她就料就了这种结局。她拿一撮干艾叶在手心搓捻成短短的一炷，栽到孩子的脑门上，用火点燃。那冒着的烟和燃着的火渐渐接近头皮，可以听见脑门上的嫩皮被炙烤的吱吱声，烧焦的皮毛散发出一股刺鼻的焦臭气味。白赵氏不管抽搐扭动的孩子，硬着心肠又把同样的艾叶栽到孩子的两边脸颊上，烧出两块黑斑。这四个孩子都经过艾叶的炙烤，却没有一个能活到第七天。仙草每一次都忍不住掉泪，尤其是那个女儿。白赵氏不哭也不劝她，每次都只是一句话："注定不是阳世的人。"

白赵氏一生生过的男孩和女孩多数都死于四六风，唯一能对付的就是那一撮艾叶，大约只有十之一二的侥幸者能靠那一撮艾叶死里逃生，脑门上和嘴角边却留下圆圆的疤痕。白赵氏从炕上抱走已经断气的孩子，交给鹿三，鹿三便在牛圈的拐角里挖一个深坑，把用席子裹缠着的死孩子埋进去。以后挖起牲畜粪时，把那一坨地方留着，直到多半年乃至一年后，牛屎牛尿将幼嫩的骨肉腐蚀成粪土，然后再挖起出去，晒干捣碎，施到麦地里或棉田里。白鹿村家家的牛圈里都埋过早夭的孩子，家家的田地里都施过渗着血肉的粪肥。

牛犊注定是阳世之物。白赵氏的三炷艾叶挽住了他的小命，脑门和嘴角留下三个圆溜溜的疤痕，笑的时候倒添了一种妩媚。白赵氏据此训斥对艾叶失去信心的仙草说：“你不信，这下你信不信？老辈子人传下的办法能错了？”仙草却不无遗憾：“牛犊要是个女子就合人心上来了。”

白嘉轩有一晚站在炕下对正在给牛犊喂奶的妻子说：“你给白家立功了。白家几辈子都是单崩儿。我有三个娃子了，鹿子霖……俩。那女人这二年再不见生，大概已经腰干[1]了？”

隔了一年多点儿，仙草又坐月子了，这是她第八次坐月子。她现在对生孩子坐月子既没有恐惧也没有痛苦，甚至完全能够准确把握临产的时日。她的冷静和处之泰然的态度实际是出于一种司空见惯，跟拉屎尿尿一样用不着惊慌失措，到屎坠尿憋的时候抹下裤子排泄了就毕了，不过比拉屎尿尿稍微麻烦一点罢了。她挺着大肚子，照样站在案板前擀面条，坐在木墩上拉风箱，到井台上扯着皮绳扳动辘轳拐把绞水，腆着大肚子纺线织布，把蓝草制成的靛搅到染缸里染布。按她自身的经验，这样干着活儿分娩时倒更利索。

这天她正在木机上织布，腹部猛然一坠，她疼得几乎从织机上跌下来，当眼睛周围的黑雾消散重新复明以后，她已经感觉到裤裆里有热烘烘的东西在蠕动。她反而更镇静，双手托着裤裆下了织布机，缓缓走过庭院。临进厦屋门时，头顶有一声清脆的鸟叫，她从容地回过头瞥了一眼，一只百灵子正在庭院的梧桐树上叫着，尾巴一翘一翘的。跨过厦屋门槛，她就解开裤带坐到地上，一团血肉圪垯正在裤裆里蠕动。丈夫和鹿三下地去了，阿婆抱着牛犊串门子去了。剪刀搁在织布机上。她低下头噙住血腥的脐带狠劲咬了几下，断了。她掏了掏孩子口里的黏液，孩子随之发出“哇”的一声哭叫。刚才咬断脐带时，

她已经发现是个女子。她把女儿身上的血污用裤子擦拭干净，裹进自己的大襟里爬上炕去，用早已备置停当的小布单把孩子包裹起来，用布条捆了三匝，塞进被窝。她擦了擦自己腹上腿上和手上的血污，从容地溜进被窝，这才觉得浑身没有一丝力气了。

白嘉轩回家来取什么工具，看见厦屋脚地上一片血污一股腥气，大吃一惊。他摇醒她问怎么回事，她眼也不睁手也不抬只是说："快烧炕。"他扯来麦秸塞进炕洞点着火就烧起来。青烟弥漫，仙草呛得咳嗽起来。他问她："人好着哩？"她说："渴。"他又钻到厨房烧了一碗开水给她端来。她嘴唇不离碗沿一气饮尽，感动得流下眼泪，这是她进这个门楼以后男人第一次为她烧水端水。她缓过一口气来，就忍不住告诉他："是个女子！"嘉轩说："这回合你心上来了，也合我心上来了。稀欠稀欠！"仙草又忍不住说了孩子落草时有百灵子叫的事，嘉轩背抄着手在脚地上踱步，沉吟着："百灵……百灵……白灵……白灵……就是灵灵儿娃嘛！"

白灵顺顺当当度过了四六大关，顺顺当当出了月子，仙草绷紧的神经才松弛下来，如此顺当地躲过四六灾期反倒使她心底不大踏实。这天晚上，她将一月来反复琢磨着的一件心事提出来："给灵灵认个干大。"嘉轩听了，"嗯"了一声，随即附和，表示赞同。他现在偏爱这个女儿的心情其实不亚于仙草，单怕灵灵有个病病灾灾三长两短，认个干大就有护荫了。他说："认谁呢？"仙草说："这由你看着办。"嘉轩先提出冷先生。仙草说："你去问问咱妈，咱妈说认谁就认谁。"

吃罢晚饭，白嘉轩悠然地坐在那把楠木太师椅上，把绵软的黄色火纸搓成纸捻儿，打着火镰，点燃纸捻儿，端起白铜水烟壶，捏一撮黄亮黄亮的兰州烟丝装进烟筒，"噗"的一声吹着火纸，一口气吸进

去，水烟壶里的水咕嘟咕嘟响起来，又徐徐喷出蓝色的烟雾。他拔下烟筒，“哧”的一声吹进气去，燃过的烟灰就弹到地上粉碎了。

白赵氏已经脱了裤子，用被子偎着下半身，一只手轻轻地拍着依偎在怀里的小孙子牛犊，嘴里哼着猫儿狗儿的催眠曲儿，轻轻摇着身子，看着儿子嘉轩临睡前过着烟瘾。她时不时地把儿子就当成已经故去的丈夫，那挺直腰板端端正正的坐姿，那左手端着烟壶右手指头夹着火纸捻儿的姿势，那吸烟以及吹掉烟灰的动作和声音，鼻腔里习惯性地喷出吭吭吭的响声，简直跟他老子的声容神态一模一样。他坐在他老子生前的坐椅上用他老子留下的烟具吸烟，完全是为了尽守孝道：他白天忙得马不停蹄，只有在临睡前就着油灯陪她坐一阵儿，解除她一个人生活的孤清，夜夜如此。他一般进屋来先问安，然后就坐下吸水烟，说一些家事。她相信儿子在族里和在家里的许多方面都超过了父亲；她恪守幼时从父母出嫁从丈夫老来从儿子的古训，十分明智地由儿子处理家务和族里的事而不予干涉。嘉轩过足了烟瘾，就说起了给女儿认干大的事。白赵氏没有确认两代交好的冷先生，说：“就认鹿三好。”

嘉轩收拾了烟壶，捏灭了火纸到马号去了。鹿三正在马号里给牲畜喂食夜草。马号宽敞而又清整，槽分为两段，一边拴着红马和红马生下的青骡，一边拴着黄牛和黄牛生下的紫红色犍牛。槽头下用方砖箍成一个搅拌草料的小窖，鹿三往草窖里倒进铡碎的谷草和青草，撒下碾磨成细糁子的豌豆面儿，泼上井水，用一只木锨翻捣搅拌均匀，把粘着豌豆糁子的湿漉漉的草料添到槽里去。黄牛和犍牛舔食草料时，挂在脖子上的铜铃丁当当响着。鹿三背对门口做着这一切，放下木锨，回过头来，看见嘉轩站在身后注视着他的劳作。他没有说话，更不用惊慌，仍然按他原先的思路在槽头忙着。白嘉轩也站在槽头

前，背抄着双手看骡马用弹动的长唇吞进草料，牙齿嚼出咯噔咯噔的声音。他又挪步到牛槽边站住，看着黄牛和犍牛犊用长长的舌头卷裹草料。鹿三转身走到炕沿边坐下来，抽着旱烟，主人不说话，他也不主动说什么。嘉轩几乎每天晚上陪老娘坐过之后都要到马号来，来了就那么背抄着手站着看牛马吃草嚼料，甚至连一句话也不说，看着牲畜吃光整整一槽草料才回去睡觉。白嘉轩从槽边转过身走到鹿三当面："三哥，你看我那个小女儿灵灵心疼不心疼？"鹿三说："心疼。"白嘉轩说："给你认个干女儿你收不收？"鹿三惊奇地睁大了不大灵活的黑眼睛，随之微低了头，捏弄着烟锅，脑子里顿时紧张地转动起来，综合，对比，肯定，否定，一时拿不定主意。白嘉轩诚恳地说："我们三人商量过了，想跟你结这门干亲。当然……这是两厢情愿的事，你悦意了顶好；不悦意也没啥，咱们过去怎样，日后还是怎样。你今黑间思谋思谋，明儿个给我见个回话。"说罢就走出马号去了。

鹿三捉着短管烟袋依然吸烟，烟雾飘过脸面，像一尊香火烟气笼罩着的泥塑神像。这是一个自尊自信的长工，以自己诚实的劳动取得白家两代主人的信任，心地踏实地从白家领取议定的薪俸，每年两次，麦收后领一次麦子，秋后领一次苞谷和棉花，而白家从来也没有发生过短斤少两的事。在他看来，咱给人家干活就是为了挣人家的粮食和棉花，人家给咱粮食和棉花就是为了给人家干活，这是天经地义的又是简单不过的事。挣了人家生的，吃了人家熟的，不好好给人家干活，那人家雇你干什么？反过来有的财东想让长工干活还想勒扣长工的吃食和薪俸，那长工还有啥心劲给你干活？这样，财东想要雇一个本分的长工和长工想要择一家仁义的财东同样不容易。白家是仁义的。麦收时打下头场麦子，白秉德老汉就说："鹿三取口袋去，先给你灌。你屋里事由紧，等着吃哩！一石麦子按十一斗量，刨一斗水分。"秋后轧下头一茬棉花，白秉德还是那句话："先给你称够背回去，叫女

人看该咋样用，天冷了。”遇到好年景，年终结账时，白秉德慷慨地说：“今年收成好，加二斗麦，鹿三你回去跟娃们过个好年。”鹿三自己只有二亩旱地，每年种一季麦子，到了播种麦子的时节，白秉德就说：“鹿三，你套上犁先把你那二亩地种了。”他用白家的牲畜和犁具用不了一晌时间就种完了。春天，女人鹿张氏提着小锄去锄草，麦子不等黄透就被女人今日一坨明日一坨旋割完了，一捆一捆背回家去，在自家的小院里用棒槌一个一个捶砸干净。鹿三整个夏收期间都一心注定给白家收割碾打晾晒麦子和播种秋田。麦子成熟进入洪期，白秉德临时从白鹿镇雇来几个麦客抢时收割，鹿三自然成为麦客们的头领，引着他们辨认白家的地块，督察他们不要偷懒怠工和割麦留下太高的茬子。鹿三有时也忍不住发火：“你看你割过的麦茬像不像人割的？贼偷也留不下这么高的茬口！出门给人干活就凭这本事？掌柜的算瞎了眼叫下你这号二道毛！”鹿三的庄稼手艺在白鹿村堪称一流，他看见那些做得不入辙的活计就由不得发火。白秉德死了以后，鹿三和平辈的白嘉轩关系更加和谐。白嘉轩很真诚地称他为三哥，他对他不称主家不称掌柜的而是直呼其名，自然是官名白嘉轩。鹿三一般不参与白家家庭内部的事务，不像有些浅薄势利之徒，主家待他好了自个就掂不来轻重也沉不住气了，骚情得恨不能长出个尾巴来摇。他只恪守一条，干好自己该干的事而决不干他不该干的事。给白家宝贝女儿当干大还是不当呢？鹿三权衡了当这个干大和不当这个干大的种种利弊之后，仍然拿不定主意，最后只是反复想着一句话：嘉轩已经开了口，这个脸不能伤。

为女儿灵灵满月所举行的庆贺仪式相当隆重，热烈欢悦的喜庆气氛与头生儿子的满月不相上下。亲戚朋友带着精心制作的衣服鞋袜和各种形状的花馍来了，村里的乡党凑份子买来了红绸披风。白嘉轩杀了一头猪，做下十二件子的丰盛席面，款待亲朋好友和几乎整个村庄

里的乡党。在宴席动箸之前，点亮了香蜡，白嘉轩当众宣布了与鹿三结下干亲的决定。仙草一手抱着灵灵，跪拜三叩，代孩子向鹿三行礼。席间顿然出现了混乱，男人女人们一拥而上，把从锅底上摸来的黑灰和不知从哪儿搞来的红水一齐抹到白嘉轩的脸上，又抹到鹿三的脸上，妇人们几乎同时把仙草也抹得满脸黑红了。鹿三憨笑着挤出人群，跑回马号，用木瓢在水缸里舀水洗脸，看见儿子黑娃坐在炕上，像个大人似的用一只手撑着腮帮，眼里淌着泪花。他问儿子怎么了?黑娃不吭声。他拉黑娃到白家去坐席，黑娃斜着眼一甩手走掉了。谬种！鹿三自言自语骂着，这狗日是个谬种。

唯一的缺憾是冷先生没有到场。白嘉轩很郑重地邀约了冷先生。冷先生被一位亲戚攀扯到城里给一位亲戚去看病，顺便给灵灵买一件礼物，讲定来去三天，一定赶在满月喜庆日子的前一天回来，结果没有回来，过了十天也没有回来。这时候开始传播着一个扑朔迷离的消息：城里“反正”了！第十二天夜里冷先生回到白鹿镇的中医堂，立即指派跑堂抓药的伙计叫来了白嘉轩和鹿子霖。俩人几乎异口同声问：“先生哥，你可回来了。”冷先生坐在他的那把罗圈椅子上：“差点儿回不到咱原上来了。”

白嘉轩问：“是不是反了正了？”

冷先生答：“反了正了。”

鹿子霖又接口问：“‘反正’是咋回事？”

冷先生说：“反皇帝，反清家，就是造反哩嘛！说是反了正了，还说是革了命了。”

白嘉轩问：“那皇帝现时……”

冷先生说：“皇帝还在龙庭。料就是坐不稳了。听说是武昌那边先举事，西安也就跟着起事，湖广那边也反正了，皇帝只剩下一座龙庭了，你想想还能坐多久？”

鹿子霖问：“是要改朝换代了？”

冷先生说：“人都说是反正，革命……”

白嘉轩问：“反正了还有没有皇帝？”

冷先生说：“怕很难说。城里清家的官们跑了，上了一位张总督。”

鹿子霖问：“总督是个啥官职？”

冷先生说：“总督就是总督。管咱一个省，该是二品……”

白嘉轩说：“没有皇帝了，往后的日子咋样过哩？”

鹿子霖说：“皇粮还纳不纳呢？”

冷先生抿了一口茶，没有回答，他也不知道没有了皇帝的日子该怎么过，却神秘地讲起他在城里经历的惊心动魄的事件。

那一夜，他给亲戚看了病，早早吃了饭，亲戚家人领他去三意社看秦腔名角宋得民的《滚钉板》。木板上倒扎着一拃长的明灿灿的钉子，宋得民一身精赤，在密密麻麻的钉子上滚过去，台下一阵欢呼叫好声。此时枪声大作，爆豆似的枪声令人魂飞魄散。剧场大乱。宋得民赤着身子跑了。冷先生和亲戚已经失散，他跑上大街，被一声沉闷的爆炸吓得蹲下身子，然后慌慌张张钻进小巷。回到亲戚家里，病人

已经死掉，枪声把人活活吓死了。亲戚一家既不敢烧香点蜡摆设灵堂，连哭也不敢大声。城门已经关死，连续多日，进城的人进不去，出城的人出不来，冷先生后来随着亲戚家发丧的灵柩才出了城门。冷先生带着劫难余生的慨叹笑着说："我的天！我在大街小巷钻着跑着，枪子儿在头顶咕儿咕儿响，要是有一颗飞子撞上脑袋，咱弟兄们也就没有今日了。"

白嘉轩说："先生哥，你再甭出远门了。就坐在咱们白鹿镇上，谁想看病谁来，你甭出去。"

鹿子霖附和道："这是实实在在的话。先生哥，你大概还不知道，原上出了白狼了！"

"知道。我回来一路上听过十遍八遍了。"冷先生说，"皇帝再咋说是一条龙啊！龙一回天，世间的毒虫猛兽全出山了，这是自然的。"

城里的反正只引起了慌恐，原上的白狼却造成最直接的威胁。白狼是从南原山根一带嘈说起来的，几天工夫，白狼可怖的爪迹已经踩踏了整个白鹿原上的村庄。那是一只纯白如雪的狼，两只眼睛闪出绿幽幽的光。白狼跳进猪圈，轻无声息，一口咬住正在睡觉的猪的脖子，猪连一声也叫不出，白狼就嘬着嘴吸吮血浆，直到把猪血吸干咂尽，一溜白烟就无影无踪地去了。猪肉猪毛完好无损，只有猪脖下留着几个被白狼牙齿咬透的血眼儿。人们把猪赶出猪圈，临时关进牛棚马号里，有的人家甚至把猪拴到火炕脚地的桌腿上。可是无济于事，关在牛棚马号里的猪和拴在火炕脚地上的猪照样被白狼吮咂了血浆而死了，谁也搞不清那白狼怎样进出关死了门窗的屋子。南原桑枝村桑老八就是把猪拴在炕下的方桌腿上，装作熟睡，故意拉出牛吼似的鼾声。夜半时分，桑老八就听见炕下有吱儿吱儿的声响，像娃儿吮奶汁

的声音。桑老八悄悄偏过头，睁开眼朝脚地一瞅，一道白光穿过后墙上的木格窗户掼出。待他点上油灯，光着屁股下炕来看时，猪已断气，尚未吸吮净尽的血冒着气泡儿从猪脖下的血口子里汩汩涌出来。最有效的防范措施终于从白狼最早作孽的南原创造成功，人们在村庄四周点燃麦草，彻夜不熄。狼怕火，常见的野狼怕火白狼也怕火。白鹿原一到夜幕降临就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壮观，村村点火，处处冒烟，火光照亮了村树和街路，烟雾弥漫了星空。

白嘉轩说："咱们白鹿村只靠那个跛子老汉打更怕是不行了。堡子的围墙豁豁牙牙，甭说白狼，匪贼骑马进村也无个挡遮！"

鹿子霖说："修吧。把豁口全部补齐，晚上轮流守夜，立下罚规，不遵者见罚。"

第二天一早，白嘉轩提着大锣，从白鹿村自东至西由南到北敲过去，喊过去，宣告修补村庄围墙的事。人们丢下活计，扔下饭碗就集中到祠堂院子里。白嘉轩一宣布修补破残围墙的动议，就得到一哇声的响应。整个村子骤然形成灾祸临头的悲怆激昂的气氛，人人都热情而又紧张地跑动起来了。

按照修建祠堂的惯例，白嘉轩负责收缴各家各户的粮食，鹿子霖负责指挥工程。围墙工程经过短促的准备，当天后晌就响起石夯夯击黏土的沉闷的声音。民众的热情超过了族长和工头，一致要求日夜不停，轮换打夯，人停夯不停。白嘉轩和鹿子霖商量一下就接受了。翻修祠堂时拆掉的锅台又垒盘起来，日夜冒着火光，风箱昼夜呱嗒呱嗒响着，管晚上打夯的人吃两顿饭。五天五夜连轴转过，围绕村庄的土墙全部修补完好。白嘉轩和鹿子霖又把十六岁以上的男人以老搭少划分成组，夜夜巡逻放哨。放哨的人在围墙上点燃麦草，手执梭镖和铁

铳，在高至屋脊的围墙上严阵以待。有一夜，白嘉轩睡得正香，猛然被一声沉重的铳响惊醒。他爬起来抓起靠在炕头墙上的梭镖，拉开门就冲了出去。村巷里脚步踢踏，人影闪动，奔到围墙的出口，那儿已被手执梭镖的村民围得水泄不通。值班巡逻的人说，他看见白狼蹿上围墙，就放了一铳，一道白光又掼出围墙去了。“白狼来了！”凶讯像沉重的乌云笼罩在白鹿村的上空，村民们愈加惊恐，愈觉修复堡子围墙的举措非常英明十分及时。成功地修复围墙不仅有效地阻遏了白狼的侵扰，增加了安全感，也使白嘉轩确切地验证了自己在白鹿村作为族长的权威和号召力，从此更加自信。

白嘉轩背着褡裢朝县城的方向走去。秋末冬初的黎明像一个行动迟缓的老人凝滞不前。冬走十里不明。浓雾笼罩着的村庄仍然有驱狼的火光明明灭灭。雄鸡的啼叫没有往日的雄壮，而显得黏稠滞涩，像是鸡脖子里全都塞满了鸡毛。白狼的凶讯持续流传。后来又传闻朱先生凭一张嘴，一句话，就解除了从甘肃反扑过来的二十万清军，朱先生因此被张总督任命为第一高参。白嘉轩忙于修复围墙而不闻姐夫朱先生的种种传闻，是昨天晚上鹿子霖带着一脸惊奇询问他关于朱先生的消息时才知道的。他带着验证传闻和反正以来的种种疑惧和慌乱去找朱先生，听他断时论世。

朱先生在他的书房里接待白嘉轩，他一如往常，看不出任何异样的神态。白嘉轩脑子里顿时蹦出“处世不惊”四个字来。他忍不住说起乡间关于白狼的传言，朱先生笑笑说：“无稽之谈。今日防了白狼，明日又嘈出一条白蛇，一只白虎，一只白狐狸，一只白乌鸦，你将防不胜防。”姐夫对白狼的冷漠，使白嘉轩感到扫兴，他随之问起朱先生斥退二十万清军的事。朱先生用像冷漠白狼一样的口气说：“传言而已。”白嘉轩不好再问，却又忍不住：“哥。我想你是不会为张总督当

说客的。”朱先生却笑了：“你又猜错了，我这回乐意当了张总督的说客。”

那天清晨，朱先生正在书房里诵读。诵读已经不是习惯而是他生命的需要。世间一切佳果珍馐都经不得牙齿的反复咀嚼，咀嚼到后来就连什么味儿也没有了；只有圣贤的书是最耐得咀嚼的，同样一句话，咀嚼一次就有一回新的体味和新的领悟，不仅不觉得味尝已尽反而觉得味道深远；好饭耐不得三顿吃，好衣架不住半月穿，好书却经得住一辈子诵读。朱先生诵读圣贤书时，全神贯注如痴如醉如同进入仙界。门房老者张秀才来报告，说省府衙门有两位差人求见。朱先生头也不抬：“就说我正在晨诵。”张老秀才回到门口如实报告：“先生正在晨诵。”两位差官大为惊讶，晨诵算什么？不就是背书念书吗？念书背书算什么搁不下的紧事呢？随之就对门房张秀才上了火：“我这里有十万火急命令，是张总督的手谕，你问先生他接也不接？”张秀才再来传话，朱先生说：“我正在晨读。愿等就等，不愿等了请他们自便。”差官听了更火了，再三申明：“这是张总督的手谕，先生知道不知道张总督？”张秀才说：“皇帝来也不顶啥！张总督比皇帝还高贵？等着！先生正在晨诵。”两位差官只好等着，张秀才不失礼仪为他们沏了茶。

朱先生晨诵完毕，挽着袍子来到门房，接了差官的信，果然是张总督的亲笔手谕。张总督的信慷慨陈词，婉约动人，言简意赅地阐释了反正举事的原义，摆置出目下严峻的局势，又说反正时逃跑的清廷巡抚方升，从甘肃宁夏拢集起二十万人马反扑过来，大军已压至姑婆坟扎下营寨，离西安不过二百里路，要决一死战。张总督说他的革命军同仇敌忾，士气高昂，完全可以击败方升的乌合之众，只是战事一起，市民百姓必遭涂炭，古城必遭毁灭，于理不通于心亦不忍。因此想请朱先生前往姑婆坟，以先生之德望，以先生与方升之交谊，劝方

升退兵，这里亦不追击，由他自去陇西。如果方升情愿留住西安，张总督可以保护其颐养天年。

朱先生看罢，对两个差人说：“儒子只读圣贤书，不晓军事，又无三寸不烂之舌，哪有回天之力。回去告知张总督，免得贻误战机。”说罢就转身走了。两个差官气得脸色骤变，让司机发动了汽车，气呼呼跳上车走了。朱先生听得门口清静下来，立即告诉妻子：“快点给我收拾行李。”朱白氏担心地问：“你到哪达去？不是说不去吗？”朱先生说：“我得出去躲几天。我算定张总督还要派人来缠的。”朱白氏放下心来，给他换了一身干净衣服，朱先生夹了一把黄油布伞就出了白鹿书院。午时，两位差官果然又驾着汽车来了，而且带来了一位大官，是张总督的秘书。门房老者张秀才仍然以礼相待，如实相告：“走了。先生走了。躲走了。”

傍晚时分，在张总督的总督府门前，一位背着褡裢夹着油伞的人径直往里走。荷枪实弹的卫兵横枪挡住。那人说：“我找张总督。”卫兵只瞧了一眼就不打算再瞧一眼，嘴里连续呼出五个“去去去去去！”那人就站在门口大声呼叫起张总督的名字，而且发起牢骚：“你三番两次请我来，我来了你又不让我进门。你好不仗义！”这时候一辆汽车驶到门口停下，车上跳下两个人来，顺手抽了卫兵一记耳光，转过身就躬下腰说：“朱先生请进。”朱先生一看，正是早晨破坏他晨诵的那两位差官，便跟着差官走进总督府见了张总督。张总督挽着朱先生坐下，亲昵地怨嗔道：“先生你是腿上的肉虫儿不得死了？放着汽车不坐硬走路。”朱先生说：“我是土人，享不了洋福，闻见汽油味儿就恶心想吐。”张总督说：“我真怕你不来哩！正准备三顾茅庐，我亲自去你的书院哩。”朱先生笑说：“纵是孔明再生，看见你这身戎装，也会吓得闭气，何况我这个土人。”

第二天一早，张总督起来时，已经找不着朱先生，连连叹惋：“这个呆子书呆子！”随之带了一排士兵乘车追出城去。

朱先生已经踏上咸阳大桥，一身布衣一只褡裢一把油伞，晨光熹微中，仍然坚持着晨诵，连呜呜吼叫的汽车也充耳不闻，直到张总督跳下车来堵住去路，朱先生才从孔老先生那里回到现实中来，连连道歉：“总督大人息怒。我怕打扰你的瞌睡就独自上路了。”张总督好气又好笑说：“这十二个卫兵交给你，请放心，我已经给他们交代过了。”朱先生转过身瞅一眼站成一排溜儿的兵士，摇摇头说：“这十二个人不够。把你的兵将一满派来也不够。要是你能打过方升，你还派我做什么？回吧回吧，把你这十二个兵丁带回去护城吧。”张总督不由脸红了说：“那你总得坐上汽车呀！”朱先生不耐烦了：“我给你说过，我闻不惯汽油味儿……”说罢一甩手走了，嘴里咕咕嘟嘟又进入晨诵了。张总督追上来再次相劝，要他坐上汽车，带上十二名经过特种训练的卫士以防不测。朱先生却轻轻松松地说：“你诵一首咸阳桥的诗为我送行吧。”张总督心不在焉又无可奈何地诵道：

渭城朝雨浥轻尘，

客舍青青柳色新。

劝君更进一杯酒，

西出阳关无故人。

朱先生击掌称好之后，自己也吟诵起来：

车辚辚，马萧萧，行人弓箭各在腰。爷娘妻子走相送，尘埃不见咸阳桥……

朱先生吟诵至此，热泪涌流，转过身扯开步径自走了。

日暮时分，朱先生走到一条小河边，隔水相望，那边已是穿着清家服装的兵勇。他走过木板吊桥，就被兵勇们截住，喝问不止。朱先生放下肩头的褡裢，取出一方纸呈给兵勇们的头目，那是方升当巡抚时亲笔题赠给他的一帧条幅：学为好人。朱先生考中头名举人那年，曾经连续三次婉言辞谢了方巡抚提拔他的既定公文。方升不仅不恼，反而更加器重他的品格，就择取朱先生复信中的一句话“孺子愿学为好人”题书回赠。这帧条幅现在成了通行证，在剑拔弩张的两军对垒中显示奇效，兵勇们既不放心又不敢得罪他，于是就把他带有强迫性地弄上汽车。朱先生真的闻不得汽车的汽油味儿，一路上吐得搅肠翻肚。

方巡抚在他的行营里接见了朱先生，并备下一桌丰盛的晚餐，朱先生却远远坐着不上餐桌。方巡抚谦和地说：“先生屈就便餐。待我平定逆贼收复西安之后，再请先生。”朱先生摇摇头，仍不动身。方巡抚问得紧了，朱先生才说：“我害怕。”方巡抚问：“这里就你和我，怕什么？”朱先生嗫嚅道：“我没见过你的这身打扮。我看见你这一身戎装就好像看见了白刀子进去红刀子拔出。我害怕。我一害怕就吃不进饭。巡抚你脱下征衣穿便服吧！”方巡抚听罢哈哈大笑：“哎呀先生！不瞒你说，我从陇西起身时把便衣全都烧了。好！今日我破例一次。”说罢便脱下戎装。朱先生这才坐到桌前说：“这才像个人了。”

席间，朱先生一双筷子只拣素菜，不动荤菜更不动酒，见方巡抚刚放下筷子，便从褡裢里掏出一只瓦罐，把盘中剩下的荤菜素菜倾盘倒进瓦罐里去。方升皱了皱眉问：“先生，你……”朱先生憨憨地说：“我把这些好东西带回家去，让孩子尝尝。”方巡抚惊问：“何至于此？”朱先生说：“天下大乱，大家都忙着争权逐利，谁个体恤平民百姓？我今日专程求恩师讨活路来了。”方巡抚顿然激愤起来：“先生为

关中大儒，既已困拮如此，百姓更是苦不堪言。我正为此披挂戎装，平叛讨贼，重振朝纲，百姓正翘首以待。”朱先生模棱两可地问：“你能平定关中，我深信不疑。武昌呢？湖广各省呢？谁去平叛？”方升说：“我为清臣，誓为朝廷尽忠。我丢掉的江山，由我收回。至于武昌湖广，那非我辖地，鞭长莫及。”朱先生笑说：“一树既老且朽，根枯了，干空了，枝股枯死，只有一枝一梢荣茂，这一枝一梢还能维系多久？”方巡抚听了，警惕地打量着朱先生：“先生是……替叛贼当说客来了？”朱先生坦然地说：“我刚才已经说过，是向你讨活路来了。恕我直言，清廷犹如朽木难得生发，又如同井绳难以扶立。你纵然平复关中，无力平复武昌湖广。你一枝一梢独秀能维持多久？如再……恕我直言……再次被撵出关中，怕是难得立足之地了。”方升听到此时，脸色骤变，站起身来：“先生免言！我原以为你清高儒雅，想不到已改投门庭，为叛贼充当说客！”朱先生坐着不动，稍微提高了话音：“恩师听我坦白。张总督反正文告二十八条，我只领受三条，一为剪辫子，一为放足，一为禁烟。我仍矢守白鹿书院，月里四十不曾下山，晨诵午习，传道授业解惑；仍然恪守‘学为好人’的宗旨。”说着就掏出方升题赠的条幅。方升怒气难平：“我只要亲自腰斩了那个负义之徒，宁可肝脑涂地亦不顾及。”朱先生听了不以为然地笑了：“不义之徒自有灾池等着他，何必你兴师动众？”

张总督和朱先生是同一年经方巡抚亲自监考得中的举人，那是方巡抚到陕赴任第一年的事。次年，方巡抚力荐当时的张举人官费赴日本国留学，他在日本参加了孙中山先生的同盟会，回陕后就成为方巡抚的头号政敌，直到反正成功，方巡抚仓皇逃出关中。朱先生说：“恩师常言‘顺时利世’，在秦为政多年，颇获人心。而今挟刃领兵几十万进入关中，腰斩的岂止张某一人？目下城里城外惊慌失措，谣传恩师要洗城。战事一起，遭伤害的是百姓，你就要落千古骂名了。”说到

此，朱先生背起褡裢就告辞了。方升挽留说："天明再行。"朱先生笑说："我一身粗布衣，匪贼看不上，囊中无一文钱，谁杀我图不得财又赚不得物，划不着啊！"说罢径自去了。

朱先生是夜宿于他的老师家中。老师姓杨，名扑，字乙曲，是关中学派的最后一位传人。朱先生住了两日回到省城复命张总督。张总督一见面就跪下了："我代表免遭屠城的三秦父老向先生一拜。"朱先生这时才得到确凿消息，方巡抚已经罢兵，带领二十万大军撤离姑婆坟，回归甘肃宁夏去了。

张总督立即传令备置酒席，为朱先生接风洗尘压惊庆功。朱先生从褡裢里掏出瓦罐，抱着罐子大吃大嚼起来。张总督难为情地说："先生这不寒碜我吗？"朱先生不以为然地笑着："朋友之交，宜得删繁就简。"吃罢喝了一杯热茶，背起褡裢告辞。张总督死拉住不放："我还想请先生留下墨宝。"朱先生又放下褡裢，执笔运腕，在宣纸上写下两行稚头拙脑的娃娃体毛笔字：

脚放大，发铰短

指甲常剪兜要浅

张总督皱皱眉头不知所云。朱先生笑说："我这回去姑婆坟，一路上听到孩童诵唱歌谣，抄录两句供你玩味。"说罢又背起褡裢要走。张总督先要用汽车送，又要改用轿子，又要牵马驮送。朱先生说："不宜车马喧哗。"

白嘉轩由不得大声慨叹，姐夫的姑婆坟之行太冒险了。说罢白狼，白嘉轩就提出诸多疑问，没有了皇帝的日子怎么过？皇粮还纳不纳？是不是还按清家测定的"天时地利人和"六个等级纳粮？剪了辫子

的男人成什么样子？长着两只大肥脚片的女人还不恶心人？朱先生不置可否地听着妻弟发牢骚，从抽屉里取出一份抄写工整的文章，交给嘉轩：“发为身外之物，剪了倒省得天天耗时费事去梳理。女人的脚生来原为行路，放开了更利于行动，算得好事。唯有今后的日子怎样过才是最大最难的事。我这几天草拟了一个过日子的章法，你看可行不可行？”白嘉轩接过一看，是姐夫一笔不苟楷书的《乡约》：

一、德业相劝

德谓见善必行闻过必改能治其身能修其家能事父兄能教子弟能御童仆能敬长上能睦亲邻能择交游能守廉洁能广施惠能受寄托能救患难能规过失能为人谋事能为众集事能解斗争能决是非能兴利除害能居官举职凡有一善为众所推者皆书于籍以为善行。业谓居家则事父兄教子弟待妻妾在外则事长上结朋友教后生御僮仆至于读书治田营家济物好礼乐射御书数之类皆可为之非此之类皆为无益。

二、过失相规

犯义之过六：一曰酗酒斗讼二曰行止逾违三曰行不恭逊四曰言不忠信五曰造谣诬毁六曰营私太甚。犯约之过四：一曰德业不相劝二曰过失不相规三曰礼俗不相成四曰患难不相恤。不修之过五：一曰交非其人所交不限士庶但凶恶及游惰无形众所不齿者若与之朝夕游从则为交非其人若不得已暂往还者非二曰游戏怠惰游谓无故出入及谒见人止多闲适者戏笑无度及意在侵侮或驰马击鞠之类怠惰谓不修事业及家事不治门庭不洁者三曰动作无仪进退疏野及不恭者不当言而言当言而不言者衣冠太饰及全不完整者不衣冠而入街市者四曰临事不恪主事废妄期会后时临事怠慢者五曰用度不节不计家之有无过为侈费者不能安贫而非道营求者以上不修之过每犯皆书于籍三犯则行罚。

三、礼俗相交

…………

白嘉轩当晚回到白鹿村，把《乡约》的文本和朱先生写给徐先生的一封信一起交给学堂里的徐先生。徐先生看罢，击掌赞叹：“这是治本之道。不瞒你说，我这几天正在思量辞学农耕的事，徐某心灰意冷了；今见先生亲书，示我帮扶你在白鹿村实践《乡约》，教民以礼义，以正世风。”

白嘉轩又约请鹿子霖到祠堂议事。鹿子霖读罢《乡约》全文，感慨不止：“要是咱们白鹿村村民照《乡约》做人行事，真成礼仪之邦了。”三人当即商量拿出一个在白鹿村实践《乡约》的方案，由族长白嘉轩负责实施。当晚，徐先生把《乡约》全文用黄纸抄写出来，第二天一早张贴在祠堂门楼外的墙壁上；晚上，白鹿两姓凡十六岁以上的男人齐集学堂，由徐先生一条一款，一句一字讲解《乡约》。规定每晚必到，有病有事者须向白嘉轩请假；要求每个男人把在学堂背记的《乡约》条文再教给妻子和儿女；学生在学堂里也要学记《乡约》，恰如乡土教材。白嘉轩郑重向村民宣布：“学为用。学了就要用。谈话走路处世为人就要按《乡约》上说的做。凡是违犯《乡约》条文的事，由徐先生记载下来；犯过三回者，按其情节轻重处罚。”

处罚的条例包括罚跪，罚款，罚粮以及鞭抽板打。白鹿村的祠堂里每到晚上就传出庄稼汉们粗浑的背读《乡约》的声音。从此偷鸡摸狗摘桃掐瓜之类的事顿然绝迹，摸牌九搓麻将抹花花掷骰子等等赌博营生全踢了摊子，打架斗殴扯街骂巷的争斗事件再不发生，白鹿村人一个个都变得和颜可掬文质彬彬，连说话的声音都柔和纤细了。

白嘉轩从街巷里走过去，瞥见白满仓之妻坐在街门外的捶布石上给娃子喂奶，扯襟袒脯，两只猪尿泡一样肥大的奶子裸露出来，当晚就在众人聚集的祠堂里当作违反礼仪的事例讲了。白满仓羞得赤红着脸，当晚回去就抽了丢人现眼的女人两个耳光。从此，女人给孩子喂奶全都自觉囚在屋里。

白嘉轩又请来两位石匠，凿下两方青石板碑，把《乡约》全文镌刻下来，镶在祠堂正门的两边，与栽在院子里的“仁义白鹿村”竖碑互为映照。这镌刻工程继续多日，两个石匠叮叮咣咣凿石刻字，白嘉轩不管田间劳作多么紧张多么疲累，每天至少要到祠堂来查看一回。

这天后晌，他坐在一只小凳上看着石匠刻字，鹿子霖走进祠堂来，笑嘻嘻地告诉他：“嘉轩哥，县府任命兄弟为白鹿镇保障所乡约了。”白嘉轩问：“乡约怎的成了官名了？”鹿子霖说：“人家就这么称呼。”

---

[1] 腰干：俗说断止月经。

第七章

鹿子霖一上任乡约就施展出非凡的办事能力和组织才能。他用白鹿仓拨给他的十分有限的经费，在白鹿镇买下一院破落户的民房。房屋已经破败不堪，庭院里散发着一股酸滋滋臭烘烘的气味。他雇请来卫木匠，向所辖的十个村子摊派小工，把三间大厅和两间厢房全部翻修一新。把临街的已经歪扭的门楼彻底拆除，用蓝色的砖头垒成两个粗壮的四方门柱，用雪白的灰浆勾饰了每一条砖缝，然后安上两扇漆成黑色的宽大门板。在右首的门柱上，挂出一块白底黑字的牌子：滋水县白鹿仓第一保障所。多年来一直破败不堪的居民小院，完全焕然一新了，在灰暗衰老的白鹿镇上，立即昭示出一种奇异的气质。

皇帝在位时的行政机构齐茬儿废除了，县令改为县长；县下设仓，仓下设保障所；仓里的官员称总乡约，保障所的官员叫乡约。白鹿仓原是清廷设在白鹿原上的一个仓库，在镇子西边三里的旷野里，丰年储备粮食，灾年赈济百姓，只设一个仓正的官员，负责丰年征粮和灾年发放赈济，再不管任何事情。现在白鹿仓变成了行使革命权力的行政机构，已不可与过去的白鹿仓同日而语了。保障所更是新添的最低一级行政机构，辖管十个左右的大小村庄。

当白鹿仓的总乡约田福贤要鹿子霖出任第一保障所的乡约那阵儿，鹿子霖听着别扭的“保障所”和别扭的“乡约”这些新名称满腹狐疑，拿不定主意，推诿说自己要做庄稼，怕没时间办保障所里的事。当他从县府接受训练回来以后，就对田福贤是一种知遇恩情的感激心情了。

鹿子霖在县府接受了为期半月的任职训练。受训结束的前一天，县长史维华再一次到场训示，发给每人一身青色制服，换上了一色一式制服的各仓总乡约和各保障所的乡约们一起同史县长合影留念，这无疑是滋水县历史上别开生面的一张历史性照片。鹿子霖脱下长袍马褂，穿上新制服到大镜前一照，自己先吓了一跳，几乎认不出自己了。停了片刻，他还是相信这个穿一身青色洋布制服的鹿子霖，仍是那个穿长袍马褂的鹿子霖：长条脸，高额头，深陷的眼睛，长长的眼睫毛，统直的鼻子，俊俏的嘴角，这个鹿子霖比那个鹿子霖显得更精神了。

一天后晌，两个正在朱先生的白鹿书院念书的儿子闻讯跑到县府来看望他，看见他一身制服就惊得愣呆呆地瞅着。鹿子霖哈哈笑着搂住儿子说："爸革命咧！"大儿子兆鹏说："爸！你都革命了，还让我念古书？我想到城里的新学堂去念书。科举考试早都废止了，再念老书没一点点儿用处了。"二儿子兆海也附和哥哥说："好几个生员都走了，到城里的新学堂念书去了。我跟哥哥一块去。"鹿子霖很爽快地说："去。你俩一搭去。史县长说来，咱县上也正筹划新学堂哩！"

鹿子霖日暮时回到白鹿村，在街巷里遇见熟人，全都认不出他来了。他对这种反应已不奇怪，作出无所谓的样子回答他们的询问："在县府受训。满了。十五天满了。这衣裳……制服嘛！"走进自家院子，他的女人端着一盆泔水正往牛圈走，吓得双手失措就把盆子扣到地上了。鹿子霖走进上房向父亲请安。泰恒老汉眨巴着眼睛把他从头到脚瞅盯了半晌，惊奇地问："你的辫子呢？"鹿子霖早有准备："凡是受训的人，齐茬儿都铰了。保障所是革命政府的新设机构，咋能容留清家的辫子？"泰恒老汉闭嘴闷声了。

白鹿仓总乡约田福贤邀请鹿子霖出任第一保障所乡约的时候，鹿泰恒出于自家在白鹿村处境的考虑，支持儿子到白鹿村外边去闯世事，现在自然不能为儿子丢掉辫子再说二话。鹿子霖恭恭敬敬向父亲汇报了在县府受训的情况，泰恒老汉听了说：“甭忘了你老太爷的话。”鹿子霖说：“那忘不了。”第二天鹿子霖就着手交办买房修房创建保障所的事。他在白鹿村和白嘉轩搭手修造祠堂，创立学堂，修补堡子围墙，结果却只是增加了族长白嘉轩的功德；现在他将第一次出面独立行事，就决心要办出个样子来。在白鹿村，他的财富可以累加，却与族长的位置无缘；现在，他是保障所的乡约，下辖包括白鹿村在内的十个村庄，起码不在白嘉轩之下了吧？他按照县府规定给保障所的编员人数，物色聘请了一位书手，姓王，是大王村的一位学子，写得一手好字，人也精干。到保障所修建完成，他和王书手就在厅房里坐下来摆出办公的架势了。

第一保障所创建成功，并举行了隆重的庆祝活动。鹿子霖首先约请了顶头上司总乡约田福贤，还邀请了第一保障所所辖管的十个村子里的官人——包括白嘉轩在内的各村的族长，又邀请了白鹿仓另外八个保障所的乡约；再就是镇子上的几位头面人物，中医堂的冷先生，杂货铺的葛掌柜，粮店的崔掌柜等；本保障所辖管的十个村子的绅士和财东，也都一个没有遗漏。第一项仪式是挂牌。白鹿仓总乡约田福贤把挽着红绸的木牌挂在右首的四方门柱上，然后鞭炮齐鸣，又三声铳响，把人们震得耳鸣心跳。在乱糟糟的恭贺气氛里，鹿子霖却想起老太爷的话：“中了秀才放一串草炮，中了举人放雷子炮，中了进士放三声铳子。”他现在是保障所的乡约，草炮雷子铳子都放了，老太爷在天之灵便可得到慰藉了。

鹿子霖在镇子的饭馆包下五席饭菜，跑堂的掌着红漆木盘把菜送到保障所里。酒过三巡，鹿子霖致词欢迎，田总乡约作指示，各位同僚，各位头面人物相互祝贺恭维。白嘉轩坐在这里很难受，听这些人说话更难受，他怎么也消除不了心里的疑团：“这些人在这儿吃谁的？”他几次想把姐夫朱先生写给张总督的民谣念出来，却又几次作罢。他清楚鹿子霖不是张总督，他自己也不是朱先生，念了也没有用。他应酬着坐了一阵子，再也坐不下去，就起身告辞了。鹿子霖捏着酒盅走过来，拉他再饮：“嘉轩哥，日后还望你宽容兄弟之不周。”白嘉轩装出豁达的样子说：“这话再不能往下说，再说就见外了。我有事得先走一步。”鹿子霖热情地拉住不放：“啥事紧得要走？”白嘉轩挣脱了手臂，离开桌椅说：“黄牛寻犊子咧，我得去配种。”鹿子霖扫兴地闭了嘴，再不挽留。

白嘉轩得到通知到保障所开会，十个村的官人全都到齐后，鹿子霖传达了县府史维华县长的命令，要对本县的土地和人口进行一次彻底清查，先由保障所逐村逐户核查造册，再由白鹿仓汇总之后统一到县府加盖印章，一亩一章，一丁一章，按土地亩数和人头收缴印章税。白嘉轩还没听完，就突然想到保障所挂牌吃喝那天自己没有说出口的话：这些人在这儿吃谁的？他然后做出一副轻松的样子，对鹿子霖开玩笑说：“子霖兄弟，是不是挂牌那天吃下窟窿了？”鹿子霖正怀着上任后第一次执行公务的神圣和庄严，一时变不过脸来，虽然被这话噎得难受，却只能是玩笑且当它玩笑：“嘉轩兄谝什么闲传，这是史县长的命令。”但心里却不由懊恼起来。印章税收齐后，县府、仓和保障所按七二一比例开成，上交县府七成，仓里抽取二成，保障所留下一成，作为活动经费以及官员们的俸禄。因为没有各村官人的份儿，所以此条属内部掌握，一律不朝下传达。鹿子霖恢复平静以后，就强烈地意识到，现在不能示弱，否则以后事情就难办了，于是说：“各

位，咱们官事官办，私事私了。属于兄弟和各位私人交情的事，咋都好说好办，属于官事，就得按县府的条律执行。史县长再三说，必须服从革命法令，建立革命新秩序。”有人问：“谁要是实在没钱交咋办？”鹿子霖说：“让他们自己想办法。”又有人说：“要是想不下办法咋办？现在青黄不接，去年秋里遭了旱，村里多半人吃食接不上新麦……”鹿子霖说：“办法只要想，总是能想到的。各位回村以后，牙口得放硬点。”

白嘉轩就不再说话，领了鹿子霖散发的通告，径直走回白鹿村。

白嘉轩从皂荚树上用铁锨铲下几束皂荚刺，把署有史维华县长名字的通告扎到祠堂外的墙壁上，然后敲锣，把通告的内容归纳成最简洁的几句话，从村子里一边敲过，一边喊：“一亩一章，一人一章，按章纳税，月内交齐，抗拒不交者，以革命军法处治。”白嘉轩绕村一匝，回到祠堂放下大锣的时候，通告前已经围满了村民。大家议论纷纷，听不清楚，只听得一句粗话：“这反正倒反成个毬子了！这县长倒是个毬子县长……”

祠堂门外的嘈杂声，搅扰了徐先生的安宁。后晌放学以后，孩子们背上竹笼，提上草镰去给牲口割草，徐先生就到河边去散步。杨柳泛出新绿，麦苗铺一层绿毡，河岸上绣织着青草，河川里弥散着幽幽的清新爽朗的气息。他一边踱着步，一边就吟诵出长短句来。待回到祠堂里，就书记到纸上。现在已有一厚摞了，题为《滋水集》。

徐先生到白鹿村来坐馆执教，免除了在家时沉重的田间劳作之苦，过一种平静无扰的清闲生活。他沿着河岸悠悠漫步，眼前总是飞舞着祠堂门外那张盖着县府大印署有县长姓名的通告，耳畔又响起村民们的议论和粗鲁的谩骂，心里竟然怦怦搏响。清廷的皇帝也没有征

收过如此名目的赋税，只是缴纳皇粮就完了。“苛政猛于虎！”徐先生不觉说出口来，随之就吟出一首长短句词章。在他的吟诵山川风月的《滋水集》里，这是唯一一首讽喻时政的词作，别具一格。

徐先生保持着早睡早起的良好生活习惯。他刚刚吹灯躺下，就听到叩击祠堂大门铁环的响声。他穿戴整齐之后，又叠了被子才去开门。黑暗里听出是白嘉轩，忙引入室内。

白嘉轩说：“我想起事。”徐先生忙问：“你……起什么事？”白嘉轩说：“给那个死（史）人一点颜色瞧瞧，臊一臊他的脸皮。”徐先生急问：“咋样闹呢？造反？”“我一个笨庄稼汉，一不会耍刀，二不会弄棒，快枪连见也没见过，造啥反哩！”白嘉轩说，“按人按亩收印章税，这明明是把刀架在农人脖子上搜腰哩嘛！这庄稼还能做吗？做不成了。既是做不成庄稼了，把农器耕具交给县府去，交给那个死（史）人去，不做庄稼喽！”徐先生沉默不语。白嘉轩接着说：“你是知书识礼的读书人，你说，这样弄算不算犯上作乱？算不算不忠不孝？”“不算。”徐先生回答，“对明君要尊，对昏君要反；尊明君是忠，反昏君是大忠。”“好哇！徐先生，我还担心你怕惹事哩！”白嘉轩说，“我想请你写一封传帖。”“鸡毛传帖？写。”徐先生竟是凛然慷慨的气度，“你说怎么写？我听老人们说过鸡毛传帖的事，可没见过。”“谁也没见过。我也是听老辈子人说过那年杀贼人就用的鸡毛传帖。”白嘉轩说，“你想着写吧。只要能把百姓煽起来就行咧。怕不能太长。”

徐先生取了一张黄纸，欣然命笔，似乎早已成竹在胸，一气呵成：“苛政猛于虎。灰狼啖肉，白狼吮血……”写罢装进一个厚纸信封，交给白嘉轩。白嘉轩说：“徐先生，这事由我担承，任死任活不连累你。”徐先生说：“什么话！君子取义舍生。既敢为之，亦敢当之。”

白嘉轩未进院门，直接走进对过儿的马号。鹿三悄声问：“写好了？”白嘉轩说：“好了。”白嘉轩掏出三封同样的传帖，往开口里分别插进三根白色的公鸡翎毛，对鹿三说：“你先到神禾村，进村西头头一家，敲响门，从门缝把传帖塞进去，只给主家招呼一声‘货到了’就走，甭跟人家照面。记下了没？”鹿三说：“这好记。”白嘉轩接着吩咐：“剩下这两份，你送给贺家坊村的贺老大贺德敖，贺家村街心十字南巷西边第六家。下来你就甭管了。来回路上碰不见熟人不说，碰见熟人装作不认得低头快走。记下了没？”鹿三说：“贺家坊的贺氏兄弟我闭着眼都能摸到，你放心。”说着把三份传帖接过来，扎进蓝布腰带里，又在腰里缠了三匝，外边再套上一件夹衫，说：“我走了。你睡去。明早见话。”白嘉轩说：“我等你，就在这儿。听着，万一路上碰见熟人躲不过了，就说你给我舅送牛去了。”鹿三倒有点不耐烦：“哎呀嘉轩。你把我当成鼻嘴娃子，连个轻重也掂不出来？”说罢就走出马号去了。白嘉轩突然觉得浑身松软，像被人抽掉了筋骨，躺在鹿三的炕席上。

鹿三早已取掉了苇席下铺垫的麦草，土坯炕面上铺着被汗渍浸润得油光的苇席，散发着一股类似马尿的汗腥味儿。他枕着鹿三的被卷，被卷里也散发着类似马尿的男人的腥膻气息。他又想起老人们常说的鸡毛传帖杀贼人的事。一道插着白色翎毛的传帖在白鹿原的乡村里秘密传递，按着约定的时间，各个村庄的男人一齐拥向那几个匪贼居住的村庄，把行将就木的耄耋和褯子裹包着的婴儿全部杀死。房子烧了，牛马剥了煮了，粮食也烧了……

骡马已经卧圈，黄牛静静地扯着脖子倒沫儿，粗大的食管不断有吞下的草料返还上来，倒嚼的声音很响，像万千只脚在乡村土路上奔

跑时的踢踏声，更像是夏季里突然卷起的暴风。白嘉轩沉静下来以后，就觉得那踢踏声令人鼓舞，令人神往了。

白嘉轩后来觉得终生遗憾的是没有听到万人涌动时的踢踏声。四月初八在期待中到来。初七日夜里，白嘉轩一宿未曾合眼。他把那个白铜水烟壶端到鹿三的马号里，俩人坐着抽了一夜烟。天刚麻明，鹿子霖领着田福贤堵在门口。田福贤说："嘉轩，赶快敲锣。给大声吆喝，一律不要上县，不要听逆贼煽动。"白嘉轩冷冷地说："那锣我不敢敲。"田福贤说："你是官人又是族长，怎不敢敲？"白嘉轩说："传帖上写的明明白白，谁不去县府交农具，谁阻挠去交农具，一律砸锅烧房。我不敢。我怕砸了锅烧了房。"田福贤说："谁敢！真的有谁烧了你的房，我让谁给你赔。"白嘉轩蔑视地说："你吹啥哩！传帖连县长都敢反敢弄，谁把你个总乡约当啥。"田福贤的脸臊红了。鹿子霖也觉得被轻视了不大自在。白嘉轩说："锣和锣槌在祠堂放着，要敲你们去敲。我今日个不敲。"这当儿村里传来三声惊天动地的铳响，邻近村子也连续响起铳子的轰鸣。白鹿村一片开门关门门板磕碰的噼啪声，杂乱无章的脚步声在清晨寂静的村巷里回响，一个个扛着犁杖，夹着杈耙扫帚的男人，在蛋青色的晨光里跃进，匆匆朝村子北边的道路奔去。白嘉轩站在门外的场地上说："决堤洪水，怎么掩挡？谁这会敲锣阻挡……非把他捶成肉坨儿不可！"田福贤煞白着脸："硬挡挡不住，咱们好言相劝或许可以？走吧！"白嘉轩推诿不过，跟着鹿子霖和田福贤在村巷转着。村里已经变成女人的世界，没有一个成年男人了。没有男人的村巷就显出一种空虚和脆弱。白嘉轩心急如焚，那些被传帖煽动起来的农人肯定已经汇集到三官庙了，而煽动他们的头儿却拔不出脚来，贺家兄弟一怒之下还不带领众人来把他砸成肉坨！白嘉轩情急之下就拉下脸说："二位忙你们的公务，我失陪了。"说罢就走。田福贤跑上前来堵住说："嘉轩，实话实说吧！有人向县府告密，说你是

起事的头儿。我给史县长拍了胸膛，说你绝对不会弄这号作乱的事。既然挡不住也劝不下，让他们去吧！你可万万去不得。”鹿子霖则笑嘻嘻地说：“我根本不信嘉轩哥会跟那些人在一块闹事。走走走！嘉轩哥，到你屋里坐下，让嫂子给咱沏一壶茶。”

白嘉轩再也找不出借口，就硬着头皮回到屋里，心里只希望贺氏兄弟领头进县城交农器了。但他尚不知，贺氏兄弟跟他一样，此刻也被田福贤安排的几位官员和绅士缠住而不得出门。这原是史县长的精心安排。

时势和机运却促成了鹿三人生历程中的一次壮举。他扛着一架没有安装铁铧的犁杖，走出白鹿村就拥入从各个村子涌出的庄稼人当中，同认识的和不认识的都打起招呼。人往往就这样，一个人的时候是一种样子，好多人汇聚到一起又完全变成另一种样子。临近三官庙，从四面八方通三官庙的大道小路上，人群汇成一股股黑压压的洪流。三官庙小小的庭院早已挤得水泄不通，门外的场地上也拥挤着人群，齐腰高的麦子被踏倒在地，踩踏成烂泥的青苗散发着一股清幽幽的香气。鹿三刚停住脚就听到了一个可怖的流言，说起事的人被吓破了胆不敢出头了。又说起事的人收受了史县长的赏金被收买了。最可怕的是说不愿意收受贿赂的两个头儿被史县长抓走了，现在正捆绑在城墙上示众。谁也无法证实，因而也无法辨别其虚实，但举事的头目没有出面却是既成的事实。随之最粗野的不堪入耳的咒骂不再对着收印章税的史县长，而是集中到鸡毛传帖的起事人头上，但至今谁也搞不清究竟是哪个村的张三李四王麻子煽起了这场事件。于是，纷乱而愤怒的庄稼汉们哄哄嚷叫着要去惩治起事的人。人群开始骚乱，朝来时的大道小路上倒流。鹿三心里急得像火烧，却终究束手无策。

这时候，从三官庙的院墙里突然传出了欢呼声：“起事的人出头露面了！”消息像风一样卷过去，倒流的人又从大道小路上折回来。鹿三看见人群从三官庙的大门里流水一样涌泄出来，农具被踩断的咔嚓声，夹杂着被踩倒的人的惨叫，围墙上不断有人翻跳下来。一伙人架着一个光头秃脑的和尚从庙门里卷到场地中间。和尚踩着两个人的肩膀，左手扶着举到空中的一把木叉，右手在空中大幅度挥舞着那只插着白色翎毛的传帖：“苛政猛于虎！灰狼啖肉，白狼吮血……”和尚有一副好嗓门儿，朗诵起传帖，嗓音洪亮，抑扬顿挫，感情炽烈：“贪官不道，天怒人怨，黎民百姓无计无路，罢种罢收……”众人鸦雀无声。鹿三忽然羡慕起和尚来了。和尚诵完传帖说：“我一人孤掌难鸣。各位父老再举荐三个头儿，带领众人进城交农具去。有哪位好汉自告奋勇站出来更好……”鹿三听了大叫一声：“白鹿村鹿三算一个。”话音未落，他立即被身旁的人抬了起来。鹿三站在陌生人的肩膀上，高高地俯视着乌压压的一片黑脑袋，忽然觉得自己不是鹿三而是白嘉轩了。直到死亡，鹿三都没有想透，怎么会产生那样奇怪那样荒唐的感觉。众人又推举出两个人来，和尚随之宣布包括自己在内的四个头目为东西南北四路领头儿。和尚吼道：“东原的人进东门，西原的人进西门，南原的人进南门，北原的人进北门。史县长不收回成令，誓不回原。”嗷嗷嗷的吼声混合着咒骂，人流像洪水一样滚向县城，土路上扬起滚滚黄尘，大道两旁的麦子被踩踏得像牛嚼过的残渣。

鹿三赶到城墙下，城门已经关死，吼声震天。几十个人抱着一根木头撞击大门，门板被撞碎，却发现里头已经用砖封死了。鹿三喊着拆墙扒砖。人拥人挤，效率极低，有人把扒下的砖头掷进城墙里去，有的砖头掉下来砸破了自己人的脑袋。这时候，城墙上响起锣声，一个人敲着锣喊：“县长向大家见礼。”一伙随员簇拥着史县长出现在城墙上，县长跪下了，作揖叩头。打锣的人大声宣布：“史县长令，收盖

印章税的通令作废。请父老兄弟回乡。”砖头飞上城墙，县长的随员们耍杂技似的凌空逮住砖块，保护着县长。史县长又带着随员们跟着敲锣的人顺城墙走了。鹿三倒不知该怎么办了，憋在胸间的怒气尚未完全爆发释放出来却已宣告完结。没有经过多少周折而顺利地达到目的取得胜利，反倒使人觉得意犹未尽不大过瘾。围在城墙下的人立即把矛头回转过来，纷纷吼喊着现在该当实践传帖上的戒律，立即惩治那些没有前来交农具的人，骂他们不冒风险而分享斗争的胜利果实比死（史）人更可憎。鹿三顺从了众人的意向，回原路上所过的村庄，凡是没有参与交农的人家都受到严厉的惩罚，锅碗被砸成碎片，房子被揭瓦捣烂（本应烧掉，只是怕殃及邻舍而没有点火）。有两家乡性恶劣的财东绅士也遭到同样的惩治。鹿三回到白鹿村，白嘉轩在街门口迎接他，深深地向他鞠了一躬：“三哥！你是人！”

四月十三日，白鹿镇上贴出两张布告，一张是罢免史维华滋水县长的命令，同时任命一位叫何德治的人接任。布告是由省府张总督亲自签署的。白鹿镇逢集，围观的人津津乐道，走了一个死（史）人，换了一个活（何）人；死的到死也没维持（维华）得下，活的治得住（德治）治不住还难说。白鹿原人幽默的天性得到了一次绝好的表演机会。并贴的另一张布告的内容就不大妙了，那是逮捕拘押闹事主犯的告示，其中包括鹿三在内的领头进城的四个人，还有写传帖的徐先生，煽动起事的贺氏兄弟。围观的人看罢第二张告示的观感是，摔了一场平跤。

白嘉轩比起事以前更难受。一个最沉重的忧虑果然被传言证实了：他的起事人的身份早已不是秘密，而他幸免于坐牢的原因是他花钱买通了县府；说他一看事情不妙就把责任推到那七个人身上，还说他的姐夫朱先生的大脸面在县里楦着，等等。白嘉轩从早到晚阴沉着

脸，明知枣芽发了却不去播种棉花。他走了一趟贺家，又走了一趟徐先生家，他对他们的苦楚的家人并不表示特别的热情，只是冷冷地重复着同一句话：“我马上到县府去投案，我一定把他们换回来。”他对哭哭啼啼的鹿三的女人说：“三嫂，你甭急，我要是救不下三哥就不来见你。”

白嘉轩第二天一早就起身奔县府。县府里的一位年轻的白面书生对他说：“交农事件已经平息。余下的事由法院处理，你有事去法院说。”白嘉轩放下褡裢，掏出一条细麻绳说：“我是交农的起事人。你们搞错了人。你们把我捆了让我去坐监。”白面书生先是一愣，随之就耐心地解释：“交农事件没有错。”白嘉轩吃了一惊，又觉得抓住了对方的漏洞：“没错为啥抓人？”白面书生笑着向他解释：“而今反正了，革命了，你知道吧？而今是革命政府提倡民主自由平等，允许人民集会结社游行示威，已经不是专制独裁的封建统治了。交农事件是合乎宪法的示威游行，不犯法的。那七个人只是要对烧房子砸锅碗负责任。你明白了吗？快把麻绳装到褡裢去。你要还不明白，你去法院说吧。”白嘉轩不是不明白，而是愈加糊涂。他又去找了法院，又掏出麻绳来要法院的人绑他去坐监狱。法院的人说了与白面书生意思相同的话，宣传了一番新政府的民主精神，只是口吻严厉得多：“你开什么玩笑！快把你的麻绳收拾起来。谁犯了法抓谁，谁不犯法想坐监也进不来。快走快走！再不走就是无理取闹，破坏革命机关秩序。”白嘉轩收拾了麻绳，背起褡裢出了法院，就朝县城西边走来，决定去找姐夫朱先生想办法。

第二天微明，白嘉轩又背着褡裢走下白鹿原，胸口的内衫口袋里装着姐夫朱先生写给张总督的一封短信。总督府门前比县府严密得多，荷枪实弹的卫兵睁眼不认人。白嘉轩情急之中就掏出姐夫的信

来。卫兵们几乎无人不晓朱先生劝退二十万清军的壮举，于是放他进去。一位中年人接了信说：“张总督不在。信我给你亲交。你回吧。”白嘉轩说：“我要等见张总督。”中年人说：“你等不住。总督不在城里。你有事给我说。”白嘉轩把抓人的事说了，并带着威胁的口吻说：“要是不放人，我就碰死到大门上。”中年人笑说：“碰死你十个也不顶啥，该放的放，不该放的还得押着。你快走，我还忙着。”白嘉轩急了：“不是我姐夫劝退方巡抚，你多半都成了乱葬坟里的野鬼。你们现在官儿坐稳了，用不着人了是不是？”中年人笑了，并不反感他的措辞，反倒诚恳地说：“旁人的事权且忘了，朱先生的事怎么能忘？你回吧。要是七天里不见动静，你再来。”白嘉轩当晚就宿在皮匠二姐夫家里。

第二天傍黑回到家，看见鹿三徐先生贺家兄弟以及两个面熟却叫不上名字的人正坐在上房明间的桌子旁。六个人一见他，都齐刷刷跪下了。白嘉轩惊喜万分，一一扶起他们，才知张总督专门派人急告滋水县何德治县长放人。白嘉轩问：“和尚呢？”六个人全都默然，说不出口现在就押着和尚独独一个。白嘉轩不在意地说：“甭急甭怕。和尚下来再搭救，一个人也不能给他押着。咱们算是患难之交，今日难得相会，喝几盅为众位压惊。”说罢吩咐仙草炒菜，又回过头对鹿三说：“三哥，你先回去给三嫂报一声安，她都急死了。”鹿三笑说：“她知道我回来了。嘉轩，我这几天在号子里，你猜做梦梦见啥？夜夜梦见的是咱的牛马。我提着泔水去饮牛，醒来时才看见是号子里的尿桶……”

搭救和尚出狱费尽了周折。法院院长直言不讳地述说为难：“烧了人家房，砸了人家锅，总得有一个人背罪吧？”白嘉轩说：“办法你总比我多。”他不惜破费，抱定一个主意，用钱买也得把和尚买出来。徐先生把他的俸银捐赠出来。贺家兄弟也送来了银圆。三官庙的老和尚

胸膛上挂着“救吾弟子”的纸牌，到原上的各个村庄去化缘，把零碎小钱兑成大钱银圆，交给嘉轩。白嘉轩把当当响着的银圆送到法院院长的太太手里，院长果然想出了释放和尚的办法。和尚释放了。白嘉轩小有不悦的是，和尚获释后，既没有向搭救他出狱的他表示谢意，也没有向为他化缘集资的老和尚辞谢。他没有再回到原上的三官庙，去向不知。和尚成了一个谜。这时候，有人说和尚原先在西府犯了奸，才逃到白鹿原上来的，进三官庙不过是为了逃躲官府的追缉罢了；又有人说他原是一个无父无母的孤儿……在白嘉轩看来，这些已经无需追究，更无需核实，因为搭救他们出狱的总体目的已经达到，至于他还当不当和尚，却是微不足道的了。

第八章

“交农”事件经人们百次千次不厌其烦地议论过，终于淡漠下来了。有关白狼的嘈传中止了，却随着又传开了天狗的叫声。传说白狼原先在哪儿出现过，天狗的叫声就在哪儿响起。听到过天狗叫声的人还嘬起嘴模仿着：“溜溜溜——溜溜溜。”细细的尖尖的叫声与庄户人养的柴狗汪汪汪的叫声大相径庭，一般人即使听到“溜溜溜”的叫声，也不会与狗的叫声联系起来。而狗们是能听懂的，每当它们听到“溜溜溜”的叫声，就像听到号角，得到命令一样疯狂地咬起来，整个村子，甚至相邻的几个村子的狗都一齐咬起来，白狼就不敢进宅跳圈了。

白鹿原又恢复了素有的生活秩序。牛拉着箍着一圈生铁的大木轮子牛车嘎吱嘎吱碾过辙印深陷的土路，迈着不慌不急的步子，在田地和村庄之间悠然往还，冬天和春天载着沉重的粪肥从场院送到田里，夏天和秋天又把收下的麦捆或谷穗从田地里运回场院。白嘉轩也很快把精力转移到家事和族事的整饬中来。

在闹“交农”事件的前后一年多时间里，《乡约》的条文松弛了，村里竟出现了赌窝，窝主就是庄场的白兴儿。抽吸鸦片的人也多了，其中两个烟鬼已经吸得倾家荡产，女人引着孩子到处去乞讨。他敲响了大锣，所有男人都集中到祠堂里来，从来也没有资格进入祠堂的白兴儿和那一伙子赌徒也被专意叫来。那两个烟鬼丧魂落魄的丑态已无法掩饰，张着口流着涎水，溜肩歪胯站在人背后。白嘉轩点燃了蜡烛，插上了紫香，让徐先生念了一些《乡约》的条文和戒律。白嘉轩说：“赌钱掷骰子的人毛病害在手上，抽大烟的人毛病害在嘴上；手上有毛病的咱们来给他治手，嘴上有毛病的咱们就给他治嘴。”白嘉轩先

叫了白兴儿的名字。白兴儿“扑通”一声跪到祠堂供桌前：“我不赌了，我再不赌了。我再赌钱掷骰子就斫掉我的手腕子。”白嘉轩说：“起来起来。跟我来——”白嘉轩把白兴儿叫到祠堂院子的槐树下，“背过身子举起手。”白兴儿背靠着槐树举起双手，人们清清楚楚看见了白兴儿那手指间的鸭蹼一样的皮，白兴儿平时总是把手藏在衣襟下边羞于露丑。白嘉轩又连着点出七个人的名字，有白姓的也有鹿姓的，有年轻的也有中老年的，一律背靠槐树举起了双手。白嘉轩着人用一条麻绳把那八双手捆绑在槐树上，然后又着人用干枣刺刷子抽打，八个人的粗的细的嗓门就一齐哭叫起来。白嘉轩问：“说。各人都说出自个赢了多少输了多少。”白兴儿和那七个人都哭溜着声如实报了数。白嘉轩默默算计一番，赢的和输的数目大致吻合，可以证明他们尚未说谎，就说：“输了钱的留下，赢了钱的回去取钱。”白兴儿和另两个赢主儿被解下手，然后跑回家取了钱又跑来，按族长的眼色把银圆掏出来放到桌子上。白嘉轩说：“谁输了多少就取多少。”那五个输家被解下来，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有失财复得的事，颤巍巍地从桌子上码数了银圆，顾不得被刺刷打得血淋淋的手疼，便趴在地上叩头：“嘉轩爷（叔哥）我再也不……”白嘉轩却冷着脸呵斥道：“起来起来。你们八个人这下记住了没？记住了？谁敢信啊！把锅抬过来——”几个人把一只大铁锅抬来了，锅里是刚刚架着硬柴烧滚的开水。白嘉轩说：“谁说记下了就把手塞进去，我才信。”几个输家咬咬牙就把手插进滚水里，当即被烫得跳着脚甩着手在院子里打转转。白兴儿和两个赢家也把手插进滚水锅里，直烫得叫爸叫爷叫妈不迭。白嘉轩说：“我说一句，你们再记不下再赌的话，下回就不是滚水而是煎油。”

接着两个烟鬼被叫到众人面前，早已吓得抖索不止了。白嘉轩用十分委婉的口气问：“你俩的屋里人和娃娃呢？”俩人吭哧半晌，耷拉着脑袋嗫嗫嚅嚅地说：“回娘家去了。”“要……要饭去了。”白嘉轩皱

着眉头，痛苦不堪地说：“一个引着娃娃回娘家去了，一个引着娃娃沿街乞讨去了。你俩想想，一个出嫁的女人引着娃娃回娘家混饭吃是啥味气？一个年轻女人引着娃娃日里蹭人家门框夜里睡庙台子是啥味气？”白嘉轩说到这儿已经动心伤情，眼角润湿，声音哽咽了。众人鸦雀无声，有软心肠的人也开始抽泣抹泪。白嘉轩说：“我已经着人把你俩的女人和娃娃找回来了。你们来——”众人吃惊地看见，两个年龄相差不多的女人拖着儿女从徐先生的居室里出来了，羞愧地站在众人面前。那个讨饭的女人衣服破烂，面容憔悴，好多人架不住这种刺激就吼喊起来：“捶死这俩烟鬼！”白嘉轩说：“女人娃娃逢着这号男人这号老子就有遭不尽的罪。我想这两个女人丢的不光是自个的脸，也丢尽白鹿一村人的脸！我提议把祠堂官地的存粮给她俩一家周济几斗……大家悦意不悦意？”悦意的人先表示了悦意，随之就数落起烟鬼的无德；不悦意的人先斥责烟鬼的败家子行径，随之就表示根本不该予以同情，但究竟是人数不多。两个烟鬼羞愧难当，无地自容，跪趴在众人面前抬不起头，喊说：“族长，你用枣刺刷子抽我这号不要脸的东西。我再要是抽大烟，你就把我下油锅。”烟鬼们无以数计的丢脸丧德的传闻使白嘉轩根本不相信这些誓言，他还没听说过有哪一个烟鬼不是强迫而是自觉戒掉了这恶习的。他立时变了脸：“我刚才说了，你俩的毛病害在嘴上，得治嘴。我给你俩买下一服良药，专治大烟瘾。端来——”什么良药尚未端进门来，一股令人窒息的恶臭已经传进祠堂院庭，众人哗然，是屎啊！后来，两个烟鬼果然戒了大烟，也在白鹿村留下了久传不衰的笑柄。

一个连阴雨天的后晌，雨住天开，云缝里泻下一抹羞怯的阳光，洒在湿漉漉的屋瓦上，令人心胸舒畅了些。白嘉轩把木头泥屐绑上脚就出了街门。街巷里的泥浆埋没了泥屐的木腿，他小心地走过去，背着手，走到镇上的中医堂门口就脱下了泥屐。冷先生一见面就慨叹：

“唉！今日才见了日头。人都快发霉了。”白嘉轩说：“今年的棉花算是白种了。”坐下之后，冷先生说：“我正想去找你哩。雨下得人出不了门。有一件事要求你哩。”白嘉轩说：“只要我能办，那还有啥说的。”冷先生稍作沉思，就直言相告：“子霖想给兆鹏订亲，托人打探咱的实底儿，想订咱的大女子。你看这事办得办不得？”白嘉轩毫不含糊地说：“这有啥说的？只要八字合。”冷先生说：“八字暗里先掐了一下，倒是合。你若是觉得可办，我就得请你出马，这媒得由你来撮合。”白嘉轩礼让道：“村里有专事说媒联姻的媒婆媒汉，我可没弄过这号事。”冷先生执意道：“媒婆媒汉的溜溜嘴，我嫌烦。我就相中你合适。”白嘉轩推辞说：“为你老兄说媒联姻，兄弟机会难得哩！可这是两边的事，子霖那边好说不好说呢？”冷先生说：“实话给你说吧，让你当媒人，我还没敢想劳驾你，是子霖的意思哩！”白嘉轩再也不好意思托辞推卸，就充当了一次媒汉的角色。在秋收秋播的大忙季节到来之前的消闲时日里，这桩婚事按照通行的婚俗礼仪订成了。

秋收秋播完毕到地冻上粪前的暖融融的十月小阳春里，早播的靠茬麦子眼看着呼呼往上蹿，庄稼人便用黄牛和青骡套上光场的小石碌碡进行碾压。麦无二旺，冬旺春不旺。川原上下，在绿葱葱的麦田里，黄牛悠悠，青骡匆匆，间传着庄稼汉悠扬的“乱弹”腔儿。白嘉轩独自一人吆喝着青骡在大路南边的麦田里转圈，石碌碡底下不断发出麦苗被压折的“吱喳”声。鹿子霖从大路上折过身踩着麦苗走过来，十月行步不问路，麦子任人踩踏牲畜啃。鹿子霖站在地头。白嘉轩一圈转过来，喝住牲畜，就和鹿子霖在地头蹲下来。鹿子霖说话爽快：“嘉轩哥，我给你还礼报恩来了。”白嘉轩不失庄重地说：“我哪有礼有恩啊。”鹿子霖热情洋溢地说：“你给咱兆鹏说下一门好亲。滴水之恩，当以涌泉相报。何况这是终身大事。”白嘉轩仍然不在意地笑笑。鹿子霖接着说：“冷大哥还有个二闺女，有意许给孝文。我向冷大哥自荐想

从中撮合，八字也都掐了，没麻达。就看你老哥的意思了……”白嘉轩蹲在那里就哑了口。事情来得太突然。他说：“这事今日头一回说破，我得先给老人说了……过三五日，我给你见个回话。”

由鹿子霖做媒，把冷先生和白嘉轩联结成亲家的事也办得同样顺利。当一场凶猛的西北风带来厚可盈尺的大雪，立即结束了给冬小麦造成春天返青错觉的小阳春天气，地冻天寒，凛冽的清晨里，牛拉着粪车或牛驮着冻干的粪袋，喷着白雾往来于场院和麦田之间。冷先生的二闺女订亲给白家了，不过不是大儿子孝文，而是二儿子孝武。冷先生的大闺女订给鹿子霖的大儿子鹿兆鹏，白嘉轩觉得自己的大儿子订冷先生的二闺女有点那个，于是就提出了二儿子孝武。他回给鹿子霖的原话是：“我想给孝文订娶个大点的闺女。咱屋里急着用人（不便出口的一层意思是早抱孙子）。冷大哥的二闺女小了点儿。要是八字合，订给孝武。”鹿子霖急于联扯这门亲事，并不过多思考白嘉轩另外的意思，就说给冷先生。冷先生同意了。

冷先生十分满意两个女儿终身大事的安顿。他不是瞅中白鹿两家的财产，白鹿原上就家当来说，无论白家，无论鹿家，都算不上大富大财东；他喜欢他们的儿子，也崇敬他们的家道德行，都是正正经经的庄稼人；更重要的是出于他在白鹿镇行医久远之计，无论鹿家，无论白家，要是得罪任何一家，他都难得在这个镇子上立足；他也许不光凭他的冷峻的眼光看得出，而是凭他冷峻的神经感觉到了，“交农”事件之后白鹿两家不好愈合的裂痕。他像调配药方一样，冷峻地设计而且实施了自己的调和方案，不管白嘉轩或鹿子霖心里真恨假爱也不要紧，哪怕维持一种表面的和谐亲密也是好的。当两宗亲事完成以后，冷先生在一个冬夜，订了菜，温了酒，请来了两个亲家，以少有的热情和感慨说：“不结亲是两家，结了亲是一家。我这人话短言缺又

不会拐弯，日后咱们无论谁和谁有啥成见，都当面说清，不许窝在肚里，我是挂面调盐——有言（盐）在先。我们仨人，我长几岁，权且充个大（音读斫）货，说几句老话：我看白鹿村缺不了嘉轩弟，也缺不得子霖弟。你俩人捏合好一好百好。我是钦服你们两家人的品行，可不是图地多房宽牛高马大。白鹿原上只有一个‘仁义’村庄，甭忘了是县令亲自写的字裁的碑……”于是，由“交农”事件造成的白嘉轩和鹿子霖之间的芥蒂，不说化解，总之是被他们自觉自愿地深深地掩藏起来了。其实俩人都需要维持这种局面。

交上腊月，县长何德治骑着马上了白鹿原，专程来拜谒白嘉轩，自然由白鹿仓总乡约田福贤和第一保障所乡约鹿子霖引路作陪。田福贤对何县长说：“你坐在仓里喝茶，我让子霖把他叫来。”何县长说：“不用。我登门拜访。马拴在仓里喂着。”

县长的到来，使白嘉轩既感到突然，又深为感动，赶忙挪椅子抹桌子敬茶递烟。何县长站在祭祀白家祖宗的桌子前打躬作揖，然后坐下。这个举动使白嘉轩改变了对这个穿一身猴里猴气制服的县长的初步印象。县长戴一顶藏青色礼帽，方脸，天庭饱满，短而直的鼻梁儿，不厚不薄恰到好处的嘴唇，和蔼而又自信。白嘉轩瞅着县长心里不无遗憾，要是穿上七品官服就会更气魄，更像个县令了，可惜他却穿着一身猴里猴气的制服。何县长说：“白先生，我想聘请你出任本县参议会的议员。”白嘉轩头一回听到这个新名词，一时弄不清含义，又不好意思问，因而也不便表示同意或拒绝，但他几乎肯定猜断那是一个官衔，就说：“嘉轩愿学为好人。自种自耕而食，自纺自织而衣，不愿也不会做官。”何县长笑了说：“我正是闻听你是个好人，所以才请你作参议员。”随之点燃一支白色的烟卷，解释说：“卑职决心在滋水县推进民主政治，彻底根除封建弊政。组建本县第一届参议会，就是

让民众参与县政，监督政府，传达民众意见。参议参议，顾名思义就是……”白嘉轩还是听不明白，什么民主，什么封建，什么政治，什么民众，什么意见，这些新名词堆砌起来，他愈加含糊。何县长似乎意识到这一点，语言就注意了通俗化，而且与习惯用语相对照相注释：“一句话，就是要民众（就是黎民百姓）管理国家大事（就是朝政），不是县长说了算，而要民众，就是百姓说了算。”白嘉轩听懂了，也就不当一回事了：“百姓乱口纷纷，咋个说了算？听张三的听李四的，还是听王麻子的？张三说种稠些好，李四说种稀点儿好，王麻子说稠了稀了随便种，你说听谁的，按谁说的下种子？古人说，家有千口，主事一人嘛！”何县长很感兴趣地说：“谁说的有道理就按谁说的办。主事的家长要是个不懂种庄稼的外行，或者就是个不务正业的二流子，你还能让他主千口之家的家事吗？封建弊政的关键就在这里，登基一个开明皇帝能兴几年，传给一个昏君就失丢江山，百姓跟着遭殃。反正以后的革命政府推进民主政治的核心正在于此，上至总统总督，下至鄙人在内，民众相信你就选举你，不相信你就罢免你……”白嘉轩起先惊奇地听着，随之就又不当一回事了：“我的天！越说越远，越没个边儿了。”何县长仍然认真地说：“白先生不相信这不要紧，将来的事实会证明我的话。我只说参议员不是当官，是代表民众说话。比方说，前任史县长收印章税的事，如果议员们通不过，就不会发出通告，自然也就不会引发交农事件。”白嘉轩听到这件实际的事例，似乎听出了眉目，不由得点点头：“这倒是一句实话。”何县长说：“白先生在原上深孚众望，通达开明，品德高洁，出任参议员属众望所归，请你不必谦让。顺便告知你，你的姐夫朱先生已经应允了。”白嘉轩觉得立马答应了还不是时候，就笑着说：“何县长，你叫我当参议员是替百姓说话是不是？好，我先替百姓说一句话，看你听得下听不下——”何县长豁朗大度地说：“十句百句你尽管说。”白嘉轩就说：“把白鹿仓里那一杆子出进都抱着烧火棍子的人撤走！”

白鹿仓里自“交农”事件后，悄悄来了七八个扛枪的人，他们穿着黑制服，腰里扎着皮带，白裹腿白帽圈儿，像死了人穿的丧服孝布。这些人每逢白鹿镇集日，就扛着酷似烧火棍子式的枪在人群里晃荡，趾高气扬，横鼻子瞪眼，吓得交易自家粮食布匹的农人躲躲闪闪。白嘉轩瞅着这一杆子人在集镇上晃荡，就像指头里扎着芒刺或是眼里钻进了沙粒儿一样别扭。

田福贤一直坐在一边听县长讲民主政治，没料到白嘉轩头一条就“参议”到自己头上，有点不悦，却不紧张。民团的组建是何县长的指令，枪是县里发的，田福贤不过物色来七八个团丁。何县长笑笑问：“为啥？这些人胡作非为坑害百姓？”白嘉轩说：“倒是还没见坑害谁。白鹿原上自古还没扎过兵营。清家也没在镇上驻扎过一兵一卒。那几个人背着枪在镇上晃荡，庄稼汉们看见了由不得紧张害怕。没有战事，要这些人做啥？”何县长爽然笑起来：“白先生，看不顺眼的事看多了就习惯了，这些团丁是为加强地方治安，保护民众正常生产的。”白嘉轩心想，庄稼人自古也没叫谁保卫过倒安宁。何县长凑近他压低了声音说：“你们不知，白狼闹得厉害，不能不防。”白嘉轩吃惊地说：“白狼？白狼早给天狗咬跑了。”何县长说：“白狼是个人，是一帮子匪盗的头领，闹得河南民不聊生。据传，白狼打算西来闯进潼关……这个白狼比嘈传的白狼恶过百倍。那个白狼不过吮咂猪血，这个白狼却烧杀奸淫无恶不作，有上万号人马，全是些白狼……你说，咱们该防不该防？”白嘉轩哑了口，他不晓得上千上万的白狼正在叩击关中的大门，这样严峻的事，使他不再非议不大顺眼的白鹿仓的团丁了。他答应了何县长的聘请，腊月中旬就参加了本县第一届参议会。

白嘉轩回到白鹿村，仍然穿着长袍马褂，只是辫子没有了。他进门就听见一阵杀猪似的嚎叫，令人撕心裂肺毛骨悚然，这是女儿白灵

缠足时发出的惨叫。他紧走几步走进厦屋门就夺下仙草手里的布条，从白灵脚上轻轻地解下来，然后塞进炕洞里去了。仙草惊疑地瞅着他说：“一双丑大脚，嫁给要饭的也不要。”白嘉轩肯定地说：“将来嫁不出去的怕是小脚儿哩！”仙草不信，又从炕洞里挑出缠脚布来。白灵吓得扑进爸爸怀里。白嘉轩搂住女儿的头说：“谁再敢缠灵灵的脚，我就把谁的手砍掉。”仙草看着丈夫摘下帽子，突然睁大眼睛惊叫说：“老天爷！你的辫子呢？看看成了什么样子。”白嘉轩却说：“下来就剪到女人头上了。你能想来剪了头发的女人会是什么样子？我这回在县里可开了眼界了。”

正月里，皮匠领着妻女回乡下来拜年。嘉轩打他们一进门就闻到一股皮硝味儿，二姐碧霞已经剪了头发，仙草证实了丈夫说的女人也得剪掉发纂儿的话。二姐夫居然也穿上了一身制服，头上留着公鸡冠子似的直戳戳的硬发。白嘉轩原以为制服是革命政府发给各级官员的官服，想不到整天揉搓臭烘烘的牛皮猪皮的皮匠也堂而皇之地穿上了制服，于是这制服就在他眼里一钱不值。他心里想，你个做皮鞋的穿制服做啥？你穿上制服照样还是个皮匠，身上还是一股皮硝味儿。二姐更不入辙，人已经发胖了，却把衣服的腰身做得那么窄，胸脯上的奶子圆滚滚地鼓撑得老高，说话时不停地拨浪着剪到肩头的短发，言语间又不断冒出一些新名词，白嘉轩最反感这种烧包儿的言谈举止。

皮匠姐夫和新潮二姐虽然引着两个女儿回城了，但给这个家庭造下的影响却依然存在，孝文孝武受到上新式学堂的表妹的影响，也提出要进城念书，而且借口说：“兆鹏兆海早都进城念新书去了。书院里的生员不断减少。”白嘉轩说：“人家去城里让人家去。书院只要不关门，你就跟你姑父好好念书。”孝文孝武再不敢强求，背着被卷又去白鹿书院了。女儿白灵又大胆地提出：“爸，我也要念书。”并拿两位表

姐作榜样，而且提出要进城去念新书。白嘉轩为难了，他对稀欠的宝贝女儿的要求难以拒绝，因为他不忍心看她伤心哭闹。灵灵长得太叫人心疼了，细嫩的皮肤，聪明稚气的两只忽闪水灵的大眼，胖乎乎的手腕，有多招人喜爱。白嘉轩常常忍不住咬那手腕，咬得女儿哎哟直叫，揪他的头发，打他的脸。他把疼哭了的女儿架上脖子在院子里颠着跑着，又逗得灵灵笑起来。仙草嗔怨说：“你把事儿弄颠倒了，女子该当严管，你可是尽性儿惯她。”白嘉轩怎能不知道娃子女子都应该严加管教的道理，只是他无论如何对灵灵冷不下脸来。仙草禁斥道：“念书呀？上天呀？快坐到屋里纺线去！”白嘉轩还是哄乖了灵灵，答应她到本村徐先生的学堂去念书，并说：“你太小，进城去大人不放心，等你长大了再说。”

白嘉轩领着灵灵走进学堂的时候，村里人一街两行围住看稀罕。灵灵大模大样跟着父亲，能引起那么多男女看自己，使她觉得很得意。

徐先生把白嘉轩前一天送来的方桌安排在自己的书案跟前，以便监视，也免得男孩子骚扰。虽然一切都安排得极为周到，却忽视了一个最不应该忽视的问题，白灵的拉屎尿尿问题。徐先生因人施教，凡是不受课的学生可以自由去上祠堂西墙外边的茅房，因为全是男孩子就没有分隔男女。白灵尿憋急了，又见徐先生不在，就跑到祠堂外，看见几个男孩子在茅房口解裤子，就又跑回来。一个男孩说，祠堂后边有个小茅房，没人去，白灵又跑到祠堂后边，果然有个断砖烂瓦垒的小茅房，早早解开裤带，刚跑进茅房口就急不可待地抹下裤子。不料徐先生正蹲在里头。徐先生“哎呀”一声，就慌忙提起裤子夺路而出。白灵看见了徐先生白亮亮的屁股，看见了威严的徐先生惊慌失措的样子，忍不住嘎嘎嘎笑起来。

这件事有声有色地在村子里传播，说徐先生情急之中把未拉下来的屎橛子带进裤裆里去了。仙草得知这件事后就要中止灵灵上学：“这还了得！这样惯下去不成疯子了？”白嘉轩找来一块小木牌，钻了孔，系了绳儿，一边写个“有”字，在另一边写个“无”字，让女儿进茅房时翻到“有”字的一面，出来时翻出“无”字。白灵觉得好玩，从茅厕出来故意不翻牌儿，自己就躲在祠堂角落里看徐先生怎么办。徐先生出来走到茅房门口看到木牌上的“有”字就折回来。她回到桌前刚坐下，徐先生就走出学堂门，急慌慌走过院子，到了夹道处竟跑起来。

无论这个女子怎么不像个女子，徐先生却惊奇地发现她十分灵聪，几乎是过目不忘，一遍成诵，尤其是那毛笔字写得极好。她照徐先生起下的影格儿只描摹了半年，就临帖字儿写起来了。两年下来，单是白灵的毛笔字就超过了徐先生的水平。徐先生说：“嘉轩，这是个才女。快送她到朱先生的书院去。”

这年新年前夕的腊月三十后晌，白嘉轩研了墨，裁了红纸，让孝文孝武白灵三人各写一副对联：“谁写的好就把谁的贴到大门上。”结果自然是白灵独出风头，使两位哥哥羞愧难堪。

红纸对联贴在街门两边的门框上，白嘉轩端着水烟壶远远站着，久久赏玩，粗看似柳，细观像欧，再三品味，非柳非欧，既有柳的骨架，又有欧的柔韧，完全是自成一格的潇洒独到的天性，根本不像一个女子的手笔，字里划间，透出一股豪放不羁的气度。白嘉轩看着品着，不由地心里一悸，忽然想到了慢坡地里父亲坟头下发现的那只形似白鹿的东西。

这年春节，二姐和皮匠二姐夫照例带着两个女儿来拜年，那两个外甥女公开纵容灵灵到城里去上学。二姐和姐夫以及外甥女回城以

后，白灵说：“爸吔！我今年该进城念书了。”白嘉轩第一次对白灵冷下脸来说：“你的书已经念够了。城里不去，徐先生那儿也不去了。现在该跟你妈学针线活了。”白灵一下子愣坐在那儿，“哇”的一声哭了：“你说等我长大了就进城念书……”白嘉轩不为情动，仍然冷着脸一字一板地说：“城里现在乱得没个象况，男子娃进城我都不放心，何况你。女子无才便是德。要哭你就扯开哭。”白灵一抹眼睛：“爸。我偏不哭。”她赌气似的坐到纺车下摇动把柄，纺车嗡儿嗡儿响起来。

十天后，白灵突然失踪。白嘉轩找到城里皮匠姐夫家，白灵和两个表姐正挎着书包放学回来。白灵说：“爸！你要是逼我回去，我就死给你看。”说着就抓起皮匠铰皮子用的一把大铁剪子支到脖子上。白嘉轩一句话没说就回到原上来。

白灵到城里上学以后，这个屋里像是减少了一大半人，显得空虚和冷寂，百灵子一样清脆的笑声没有了，跑前奔后呼妈喊爸吆喝奶奶的声音也绝响了。白赵氏已经忍受不住日夜思念的煎熬，向儿子嘉轩提出要进城去看看孙女。仙草却把对女儿的思念转变为怨气，有机会就向嘉轩发泄出来：“惯呀惯呀，这下惯得收拢不住了。”甚至连白灵的干大鹿三也有话说了：“嘉轩，你这个人真是明白一世糊涂一时。”白嘉轩只是在心里惊叹：这么小的娃娃居然敢把剪子搁到脖子上。那一刻，他似乎面对的不是往昔架在脖子上颠跑的灵灵，而是一个与他有生死之仇的敌人。

家里只剩下三儿子牛犊，在徐先生膝下念了好几年书还在念着，这娃子小小年纪就显出一股执拗的性子，对于念书，对于家里的任何变故，都是一副与己无关的冷漠神气。他对妹妹出走的事无动于衷，这使母亲仙草一瞅见他就忍不住发火，她对女儿越轨行为的气恼和对

她的思念在牛犊脸上得不到任何呼应，她甚至怀疑阿婆那一撮干艾叶子烧坏了牛犊的某一道要紧的穴窍，落下了一个傻瓜呆子。

白嘉轩也留心观察牛犊的行为举止，发现这娃子对谁都不大亲近，既不任性地要什么，也不拒绝别人要他做什么。每天后晌放学回来就钻进马号里，把鹿三拌好的草料用木锨送到槽里去，扒在槽帮上看牛马吞嚼草料。鹿三牵着牲畜到村北的大涝池去饮水，他也跟着，而且不想拉牛，却要牵马牵骡子。有时他悄悄爬上大车，从鹿三手里夺过鞭子，手腕一甩，鞭子在空中飞旋起来，“啪”的一声脆响，鞭梢儿准确地抽到牲畜的耳朵尖上。当然，他不是生来就带着这一手功夫，他是常常在土场上捉着鞭子甩得叭叭响，抽击吊在房檐下的半截砖头练就的。白嘉轩几次从他手里夺下鞭子，让他回屋里去背书。他不恼也不怯，怏怏地走出马号，可第二天后晌又来了。白嘉轩气恼地说：“生就的庄稼坯子！”

牛犊对牲畜的爱抚使鹿三也对他产生了不可抗拒的亲近感，甚至想，如果不是给白灵而是给牛犊做个干大倒是不错。他讨厌那个被主人一家都宠惯着的女子，他首先发觉这个女子和这个家庭的不和谐。那女子有时跑进马号来，一扑就趴上鹿三的脊背，喊着“干大干大”。鹿三蹲在地上拣粮食里的土粒和石子儿，一任她爬着，勉强地应着。有一回下雨天，白灵圈在屋里玩得腻了，又跑进马号来，惊奇地叫起来：“干大干大，你看那是啥东西？”鹿三以为蛇呀老鼠呀青蛙跑溜进来，看来看去什么东西也没有，就问：“啥呀在哪儿？”白灵用手一指：“骡子肚子底下吊的那是啥东西？”鹿三不由地“哦”了一声，身上竟奇怪地不自在起来，瞅见骡子后裆里吊着的黑黢黢的丑陋而又无用的东西，随口就想出一句哄骗女子的话：“唔……那是尾巴。”白灵追住问：“骡子咋就长两条尾巴？”鹿三说：“就长两条，要不怎么是骡

子。”白灵仍追问不休：“骡子长那么多尾巴做啥？”鹿三已经理屈词穷：“长尾巴……是打虻蝇的。”鹿三神经紧绷，把白灵哄着扶出门：“快回屋去，干大要拣粮食上磨子哩！”白灵走了，鹿三长长嘘出一口气，头上已经冒出虚汗来了，不由得自言自语：“要是我的亲生女子，早一巴掌抽上了，叫你胡问乱问。”白灵自行进城的举动，似乎验证了鹿三早就预料着的危险，而不难卜算的更大的危险还在后头。他甚至替白嘉轩着急，直言不讳地说：“城里而今乱得没个样样儿，咋能让个女子去？”

正月十五晚上，鹿三回到自家小院，把买来的猴儿漆蜡点燃，在前门后门窗台水道口院子四角都插上了，屋里院里一片光明。女人把油炸的馃子端出来，一家四口坐在火炕上咔嚓咔嚓咬着嚼着。鹿三似乎心情很好，对儿子黑娃咬文嚼字起来：“子长十五夺父志。黑娃，你今年交上十七岁了……”黑娃打断父亲的话：“我今年出门熬活呀。我早都盼着哩。我给我妈已经说好了。”鹿三扬起头瞪了儿子一眼：“说话太快。记住，无论到哪儿，无论跟谁说话，要想一句说一句，不准抢话说，没规矩。”

黑娃早已辍学。他在徐先生门下算不得好学生，却也认下不少字，也能拨拉几下算盘珠儿了。辍学后继续给白家割草，早晨和后晌背一大笼青草送回马号。一年前他就向父亲提出不想再提草镰了，要出去给人家拉长工熬活挣钱。鹿三一来想让他再学一学耕作技能，二来也心疼儿子，想让他长得更壮实一些。现在交上十七岁了，完全可以当个人使了，他自己是十五岁就出门给财东当全套长工的。鹿三说：“黑娃，爸说你听着，你到嘉轩叔家去熬活；爸回咱家来，忙时做咱家的活儿，闲时出去打零工；即便找不下零工干，爸还有打土坯的本事……”

“爸，打土坯累死人，你不能再干了。”黑娃说，“你就在白家干你的，我出远门熬活吧。”

鹿三说：“你出远门到哪达？”

黑娃说：“到渭河北边。嘉道叔就在那边熬活。嘉道叔说那边大财东村村都有，不像咱原上尽是小财东。嘉道叔悦意给我寻个主儿家。”

“你看你……不懂规矩，这么大的事先不跟我说，就自拿主意了。犯上。”鹿三训斥说，“渭北人生地不熟。咱们给人熬活不管门楼高低，不管财东大小，要紧的是寻到一个仁义的主儿。”

黑娃说：“嘉道叔在那边人事熟套，打保票能给我寻个好主儿家。”

鹿三不耐烦了：“嘉道嘉道，你尽听嘉道的话。我给你说，像你嘉轩叔这样仁义的主儿家不好寻哩。我是眼见为信。你爷爷就在白家干了一辈子，连失牙摆嘴的事也没有一回。你就到白家去，趁我还没下世，也好经管你。”

黑娃耷下眼皮：“我不想……去白家。”

“咋咧？这话咋说？”鹿三也睁大眼，“白家没亏待我也没亏待你嘛！你割草给你麦子哩嘛！”

黑娃说：“我不是说亏待不亏待谁的事……”

鹿三追着问：“那你为啥不去白家？”

黑娃噘口不语：“……”

鹿三又耐心地交底说："自家人老几辈儿，都是仁义居家，人家的长工也不是随便雇的。"

黑娃说："我没说嘉轩叔不好不仁义。我还记着嘉轩叔给我出钱让我念书。我还记着你不要我念了，嘉轩叔拉着我的手送到学堂……"

"对对对，这就对嘛！"鹿三说，"你既是记着嘉轩叔的义举，那为啥不去？"

黑娃嗫嗫嚅嚅："我嫌……"

鹿三追着问："你嫌啥不行？"

黑娃说："我嫌……嘉轩叔的腰……挺得太硬太直……"

鹿三听了轻松地笑了："哈呀，我的娃呀！我当是什么大事不得开交，咱熬活挣咱的粮食，只要人家不克扣咱不下看咱就对咧，咱管人家腰弯腰直做啥？"

黑娃恳求说："爸，你在那儿干得好好的，就再干二年，甭打零工；我出去也顶个全挂长工。咱攒些钱买点地……"说着竟哭了。

母亲帮黑娃说话了："他大，你就依了娃吧！娃不悦意就甭去了。娃说的也还在理。"

鹿三说："也好也好。你出去闯荡二年，经见几家财东心里就有数了，不走高山不显平地嘛！到那会你就不会弹嫌……腰直腰硬的屁话了。"

黑娃跟着嘉道叔下了白鹿原，踏进一望无垠广阔恢宏的关中平原，又搭乘木船摆渡过了混浊的渭河……

不足一年，黑娃引着一个罕见的漂亮女人回到白鹿村，鹿三一下子惊呆了。鹿三从第一眼瞧见儿媳妇就疑云四起，把黑娃叫到一边严加审问："哪儿来的？搭眼一看就知道不是穷家小户女子，怎么会跟你走？三媒六证了吗？说！给老子说清白。"黑娃说得从容不迫：熬活那家主人是个年近七十的糟老头子，有一大一小两个女人。老头子死了，大女人和统领家事的儿子就把小女人视作眼中钉，托长工头儿李某做媒把她嫁给他了。

鹿三半信半疑，将此事请教于白嘉轩，同时提出进祠堂拜祖宗的礼仪之事。白鹿村的新媳妇进祠堂拜列祖列宗是一项极庄严极隆重的仪式。白嘉轩对这件婚事不置可否，只是说："你跑一步路，去问问嘉道，把事情弄清白。拜祠堂的事等你问了嘉道再说。"鹿三直叹自己是人到事中迷，把嘉道引黑娃出门的事都忽略了。第二天一早，鹿三就下了原去渭北找嘉道。当鹿三再回到白鹿村的时候，已经脸色如灰眼睛充血了，一进门就抽了黑娃一记耳光，自己同时也跌倒在地人事不省。鹿三被救醒后，断然说："你快快把这个婊子撵走！你要是舍不下她，你就不是我的儿，你就立马滚出去。永生永世都甭进我的门。"黑娃求告无用，黑娃的母亲也哀告丈夫，都不能使鹿三回心转意。黑娃连夜引着媳妇出了门，走进村子东头一孔破塌的窑洞。他随之掏五块银圆买下，安下家来。

第九章

黑娃落脚到渭北一个叫将军寨的村子里，给一家郭姓的财东熬活。将军寨坐落在一道叫做将军坡下的河川里，一马平川望不到尽头，全是平展展的水浇地。人说，下了将军坡，土地都姓郭。郭家是个大财东，一家拥有的土地比白鹿村全村的土地还多，骡马拴下三大槽，连驹儿带犊儿十几头。郭家的儿孙全都在外头干事，有的为政，有的从军，有的经商，家里没留住一个经营庄稼的。那么多的土地就租给本村和邻近村庄的佃农去耕种，每年夏秋两季收缴议定的租子。只是佃户租种不完的土地才雇长工耕种，剩下不足百亩土地，其实用不了那么多畜力，那些牲畜一年到头白吃草料，有的一年里几乎连一回使役也轮不上。财东郭老汉特别喜欢骡马，繁殖下小驹子，好的留下养，差的就卖掉了，槽头的高骡子大马全都是经过严格筛选汰劣存优的结果，一个个都像昭陵六骏。郭老汉是清朝的一位武举，会几路拳脚，也能使枪抡棍，常常在傍晚夕阳将尽大地涂金的时刻，骑了马在乡村的官路上奔驰，即使年过花甲，仍然乐此不疲。老举人很豪爽，对长工不抠小节，活儿由你干，饭由你吃，很少听见他盯在长工尻子上嘟嘟囔囔啰啰嗦嗦的声音。

黑娃来时，郭家已有两个长工，一个四十多岁的中年汉子姓李，在郭家已经熬过近十年活儿了，算是长工头儿。另一个是二十几岁姓王的小伙，还未娶妻，平素不大说话，见谁都抿嘴一笑，十分温厚。黑娃年龄最小，又极伶俐，脚快手快，常被长工头儿指使着去做许多家务杂活儿，扫庭院，掏茅厕，绞水担水，晒土收土，拉牛饮马。时日稍长，郭举人的两个女人也都很喜欢这个诚实勤快的小伙计，很放心地指使他到附近的将军镇上去买菜割肉或者抓药。郭举人本人也喜

欢黑娃，有天傍晚又要出去遛马，接过黑娃备好了鞍子的缰绳，突然问：“黑娃，你会不会骑马？”黑娃说：“我骑过猪，没骑过马。”郭举人听了乐得哈哈大笑：“你想不想骑马？”黑娃说：“想。”郭举人说：“你去把那副鞍子给红马备上，你试着骑上遛遛。”黑娃骑上了红马，陪着郭举人在官道上遛着，竟然不觉一丝害怕。郭举人一边勒缰扬鞭，一边喊着指导着黑娃控制马的要诀，两匹马在乡村官路上奔驰。

晚上，三个长工都睡在马号里的大炕上，一溜进被窝就开始说女人。这时候，沉默寡言的长工王相[1]就活跃起来：“头儿，今黑该说‘四香’了。”长工头儿李相扬扬自得地笑起来，装得一本正经地说：“不说了不说了，把鹿相教瞎了咋办？鹿相娃娃还没见过啥哩。”王相却像背书一样说起了李相昨晚或前晚讲过的内容：“李相我说说‘四硬’你看对不对？木匠的锛子铁匠的砧，小伙儿的㞗子金刚钻。还有‘四软’，姑娘的腰棉花包，火晶柿子猪尿脬。对不对？”李相这时就被逗引起来：“‘四香’嘛——你听着，头茬子苜蓿二淋子醋，姑娘的舌头腊汁的肉。香不香？都把人能香死！”王相就笑得几乎噎气，又重复诵记起来。黑娃却毫无察觉，甚至莫名其妙：“头茬苜蓿香，二淋子醋也香，腊汁肉我尝过一回，真香死人了。姑娘的舌头有啥味气？唾沫涎水还不恶心死人。”李相就对笑得失了声的王相说：“黑娃是个瓜蛋儿，咱们得给他启蒙。黑娃哎！你将来娶下媳妇了，你就尝出味儿来了，你就会明白最香的还不是腊汁肉……”长工头李相装了一肚子有关男盗女娼的酸溜溜故事，有的隐秘含蓄，有的赤裸裸毫无遮掩。黑娃有的听不明白，有的就听得浑身潮热。长工头李相煞有介事地问：“黑娃，你看咱们主儿家六十多快奔七十的人了，啥脸色？红堂堂；啥身板？硬邦邦；说话像敲钟，走路刮大风。你说人家为啥这么结实？你要是猜着了，我把一年的薪俸全给你；你要是猜不着，罚你天天晚上取尿桶，天天早起倒尿桶。”黑娃连着说出了主儿家吃白米细面，山珍

海味，鸡鸭猪羊肉，以及遛马又不干重活这些人皆能想到的原因。李相绷着脸儿连续说着不对。王相涵性不足，忍不住开口先揭出谜底来，刚开口自己倒先笑得说不成话：“郭举人吃、吃、吃泡枣儿！”黑娃不以为然地说：“泡枣有什么好？烧酒泡人参才养人哩。”王相诡气地笑着：“泡枣儿比人参酒养人多了。你听李叔说怎么泡枣儿吧——”长工头压低声说郭举人娶下那个二房女人不是为了睡觉要娃，专意儿是给他泡枣的。每天晚上给女人的那个地方塞进去三个干枣儿，浸泡一夜，第二天早上掏出来淘洗干净，送给郭举人空腹吃下。郭举人自打吃起她的泡枣儿，这二年返老还童了。黑娃听了觉得心里很难受，说不出是一种什么感觉，憋得堵得胸脯发胀。王相突然伸过手来抓住了他的下身，嘻嘻笑着向李相报告：“李叔李叔，黑娃的牛牛挺得像根竹笋！”黑娃一下子羞了。

第二天一早，黑娃起来照例扛上长柄扫帚去打扫庭院，看见郭举人的小女人提着一只瓷盆倒尿回来，进了厢房，窗子里传出撩水洗脸的声音。黑娃竟然不敢抬头，当他扫完前院直起身准备走出院子的当儿，忍不住瞧了一眼敞开窗扇的窗户，小女人正在窗前梳理头发，黑油油的头发从肩头拢到胸前，像一条闪光的黑缎。小女人举着木梳从头顶拢梳的时候，宽宽的衣袖就倒捋到肩胛处，露出粉白雪亮的胳膊。黑娃又觉得气堵胸憋，可别把泡着的枣儿掉下来，慌忙转过身就要走掉。那女人在窗户里说话了：“鹿相，扫了地，给那棵玉兰树浇桶水。树旱了。”黑娃撂下扫帚挑起木桶，到过庭的井台上绞了一桶水浇到玉兰花树下，又浇了院庭中间的玫瑰花。他对小女人指派他做活儿感到很荣幸，他还想浇什么树什么花却没有了。他提着空桶别有兴致地欣赏着玉兰树，花儿早已谢了，墨绿色的扁圆的叶子滴着露珠儿；玫瑰花正含苞待放。他又给厨房的水瓮里绞了一担水，竟然有点依依不舍地离开了。回到长工们住的马号门口，长工头李相和王相已经扛

着犁拉着牲畜要下地种棉花了。李相责问:“黑娃你碎驴日的扫地扫这长工夫?”王相蔫叽叽地说:“大概想讨一颗泡枣儿……”黑娃不由地红了脸，似乎自己真讨过泡枣儿一样，急忙解释说自己扫了院子又绞水浇花耽搁了时辰。李相说:“浇人也用不了这长工夫。”

收罢麦子进入伏天，郭举人就和他的大女人从厅房里屋搬进后院的窑洞去下榻。微明的时候，郭举人在院子里练一会拳脚，然后洗了脸喝了茶再回窑洞去睡个把时辰的套觉，此后就躺着或坐着抽烟喝茶，直到傍晚暑热减退才兴致勃勃地出去遛马。

大女人日夜厮守着老头儿，给他扇凉，给他点烟，给他沏茶，陪他说话儿，伴他睡觉。三顿饭由小女人做好，用紫红色的核桃木漆盘端进窑洞，晚上提尿盆，早上倒尿水，都是小女人的功课，除此小女人就没有什么正当理由进入凉爽的窑洞里去了。大老婆给举人订下严格的法纪，每月逢一（初一、十一、二十一）进小女人的厢房去逍遥一回，事完之后必须回到窑洞（平时在厅房）。郭举人身体好，精力充沛，往往感到不大满足，完事以后就等待着想再来一次，厢房窗外就响起大女人关怀至诚的声音:“你不要命了哇?”

自从郭举人和大女人搬进窑洞避暑以后，前边庭院就显得冷寂了，黑娃去扫院去绞水也觉得自如自在了。他同时发觉，小女人指派他做什么事的声音甜润了，脸上的神色活泛了，前院里的空气也通畅了。三个长工蹲在玉兰树的阴凉下吃饭，小女人坐在对面厨房里的小凳上，听见筷子刮响碗底的声音就走出来，用一只条盘托了碗回去，然后盛满了饭再用条盘端出来。这样的规矩是为了避免交接碗筷时男女间手指和手指接触的可能。黑娃和这个小女人的全部有幸和不幸，就是从递饭时破例废掉木盘开始的。

那天早晨，郭举人指派黑娃到十里外的潘家村去捉一对鸽子，那是老交情潘老大送给郭举人的一对棕红色的凤冠头儿，回来错过了饭时。李相和王相已经吃罢饭上地去了，黑娃一个人坐在玉兰树的阴凉下等待小女人端来馍饭。长工吃饭不准进入厨房自拿自舀，这也是郭家的规矩。小女人站在厨房门口说："鹿相，你稍微等一下下儿，饭凉了我给你热一下再吃。"黑娃有点紧张，只剩下他一个人就有一种莫名的紧张，装出无所谓的口气说："不怕不怕，不用热了不用热了。这热的天，吃凉饭才好哩！"小女人却说："天热倒是热，冷饭还是不敢吃。你甭急，稍等一下下儿……"风箱响起来，房顶的烟囱冒出一股蓝烟。黑娃坐着等着，心却无端地一阵阵跳。小女人端着木盘走到玉兰树下，把一碟辣椒和一碟蒜泥放到青石桌上，一个竹编的浅篮里垒着四五个馍馍也放到石桌上，小女人戴着镂花银镯的光洁白净的手腕就一次又一次伸到黑娃眼前。小女人转身回到厨房又端来了小米稀饭。黑娃看见她省去了条盘，双手托着走来了，黑娃连忙站起去接。四只手交接在一只黄色大碗上。黑娃的手指触到了勾在碗底上的小女人的手指。那一瞬间，黑娃的心就猛地跳弹起来，竟然不敢看她的眼睛。她似乎毫不在意，叮嘱说："鹿相，你款款吃。吃好。出门在外，饭要吃好。"黑娃吃不出饭的滋味，蒜不辣，辣子也不辣了，馍馍嚼着就像是一团泥巴。他的喉咙淤塞，胸腔憋胀，顿然没有一丝食欲了。小女人又走到玉兰树下，把一盘腌渍蒜薹放到石桌上说："你看你看，我忘了给你搁菜了。"黑娃却站起来："算咧算咧！我不吃了。"小女人眼里露出惊疑不定的神色："你只吃了一个馍？米汤也没喝，这是咋咧？"黑娃淡淡地说："我……我不饿。"小女人殷切地说："咋能不饿？早起到这会儿啥也没吃呀……"黑娃就诚实地说："肚里刚才进门时还饿得慌慌哩，不知咋弄的这阵又吃不下。"小女人温和地说："许是路上受了热。天多热！你一会儿饿了再来取馍吃噢！"黑娃盯一眼小女人，僵硬地点点头，转身就要走了。小女人却问："鹿相，俺家掌柜的说没说

你下来做啥？”黑娃说：“掌柜的说来，不叫我到地里去了，叫我照看槽上的牲口，也叫我歇歇腿儿。郭掌柜人好。”小女人就如意地笑笑：“你来回跑了二十多里路，这热的天，歇是该歇的。你给我再绞一担水，我洗衣裳呀！”黑娃就转过身走到井口上：“好好好，绞十担八担也不费啥。”黑娃双手上下控制着辘轳，啪啦啦转着绽开井绳，然后绞动拐把，辘轳吱呀响着，绷紧的井绳一圈一圈缠在辘轳上。黑娃庆幸能有单独和小女人在一起的机会，心里潮起向小女人献殷勤的强烈欲望。他绞起一桶水来，欢悦地问：“二姨把水搁哪儿？”小女人在厢房里说：“就搁在井台上，我一会儿提。”说着，一只手拎着洗衣盆，一只手提着搓板，从竹帘里出来了。下砖头台阶的当儿，小女人脚下一拐，摔倒了，木盆在院庭的砖地上滚得好远。小女人跌坐在台阶下，起了三次才勉强站起来，手扶住墙却移不开脚步，轻声呻吟着。黑娃连忙把第二桶水绞上来，跑到跟前问：“二姨，你咋咧？崴了脚腕子是不是？”“怕是岔住气了。”小女人疼痛不堪地蹙着眉头，“哎哟疼死了！”黑娃站在旁边不知所措，小女人的痛苦使他心疼心焦：“咋办呀？二姨，我去叫掌柜的。”小女人强忍着摇摇头：“你扶我进去躺一会儿就没事了。”黑娃就搀住小女人的胳膊，扶她走上台阶，揭开竹皮帘子，刚跷脚进厢房门槛，小女人又“哎哟”一声，几乎跌倒。黑娃忙搭上另一只手，揽住小女人的腰。小女人借势扒住黑娃的肩膀，双手从后肩和前胸搂住黑娃的脖子。黑娃几乎是肩背着她往炕前挪步。黑娃浑身燥热，心似乎已经跳弹到喉咙口了。他跷进这个厢房的门槛时，就紧张得腿肚发抖。那温热的胸脯贴着他的腰，那柔软的头发蹭着他的脖颈，他已经浑身痉挛。他扶她坐到炕边上刚松开手，她又“哎哟”一声，几乎从炕边上翻跌下来。他急忙抱住她，她的胸脯紧紧贴着他的胸脯，黑娃觉得简直要焚毁了。他一用劲就把她托起来，轻轻放到铺着竹篾凉席的炕面上，他感到她搂扒着的手臂依依不舍地松开了。他慌忙抹一把汗，对小女人说：“二姨，你好好歇着，我饮牛去

呀！”小女人歪过头说：“我的腰里有个老毛病，不小心就岔住气了，疼死人。你给用拳头捶几下就好了。”黑娃迟疑片刻就又走到炕边，问：“二姨，你说捶哪儿？”小女人用手指着腰肋下说：“就这儿。”黑娃就攥起拳头轻轻在她手指的地方捶击。小女人呻唤一声：“哎哟！太重了！”黑娃就更轻一点叩击。小女人怨怨艾艾地说：“黑娃你真笨！你轻轻揉一揉。”黑娃就松开拳头，用手掌抚摸起来。小女人穿着一件白色细格洋布衫，比家织的粗布衫儿绵软而光滑，温热的肌肤透过薄薄的洋布传感到黑娃粗硬的掌心，胸腔里便涨起汹涌鼓荡的潮水，他想跳上炕去把她压扁挤碎，又想一把揪起她来搂住。但他却压抑着种种念头轻轻问：“你好点了没有二姨？我该饮牛去咧。”小女人说：“好了好得多了。你再揉一下下就全好了。”黑娃就继续揉抚着。他看一眼小女人仰躺着的隆起的胸脯，小女人迷离的眼睛异样地瞅着他说：“黑娃，你日后甭叫我二姨了，你该叫我姐姐……娥儿姐。”黑娃忙说：“那不乱了辈分儿咧？你家郭举人我叫大叔，怎么能跟你叫姐呢？”小女人挖一眼他说：“你真是个瓜蛋儿！有旁人在场，你就还叫二姨；只有你跟我在一搭时，你叫娥儿姐。记下记不下？”黑娃似乎心领神会了一个信号，一个期待着的又是令人惊悸的信号，他的头发似乎倒提起来，手臂抖颤，喉咙憋得说不出话，只好点点头。小女人就悄着声说：“你试着先叫一声姐……”黑娃咬着嘴唇，自觉血已涌上脸膛，颤着声叫道：“姐吔——娥儿姐——”小女人听着一把抓住他的胳膊，从炕上翻坐起来，扑进他的怀里。黑娃双臂紧紧搂抱着小女人，那个美好的肉体在他怀里抖颤不止。他不知道怎么办，一股无法遏止的欲望催着他把她死死地箍抱到怀里，似乎要把她纳进自己的胸膛才能达到某种含混的目标。她的双臂箍住他的脖子，浑身却像一口袋粮食一样往下坠。他就这样紧紧地搂着她，不知道还应该做什么。她突然往上一蹿，咬住他的嘴唇。她痴迷地咧着嘴，示意他把她咬疼了，却又把嘴唇努着迎上来，暗示着他的嘴唇。他在这一瞬间准确无误地解开了

那个哑语式的暗示，她同时就倒下去，背倚在炕边上，把他也坠倒了，压在她的身上。这当儿，他的浑身像遭到电击一样，一股奇异的感觉从腹下潮起，迅即传到全身，他几乎承受不住那种美妙无比的感觉的冲击，几乎要融化成水了。那种美妙的感觉太短暂了，像夏天的一阵骤雨，他一身松软一身疲惫一身轻松，喉咙里通畅了，胸腔里也空寂了，燥热退去了。他有点懊悔，站起来说："二姨——噢——娥儿姐，我该饮牛饮马去了。"小女人跳起来猛地抱住他，又深深地在他的嘴上亲了两口："好兄弟……"

院庭里很静，正午的阳光从玉兰树浓密的枝叶间隙投射到砖地上。两只盛满水的木桶搁在井台上，洗衣盆扣在墙根下，显得很凌乱。黑娃把木盆拎起来放到井台下的渗坑边上，那是小女人往常洗衣服的地方。看看庭院里没有任何异常的变化，他撩起布衫下襟擦擦脸上的汗，就走出了这个空寂安谧的院子。他一走进牛棚马号，顺手掩插了门板，扑通一声仰躺在大炕上，紧张的肌肉一下子松弛下来，心似乎这会儿才稳定在原来的位置上。他躺了一下就翻起身抹下裤子，这才看见裤裆里湿了一大片。他迅即系好裤子，把湿了的地方打个褶窝到里头，然后就动手去解缰绳，拉上骡马到涝池去饮水。

他牵着马缰绳走在村巷里，从容地回味着那紧张慌乱的时刻，咀嚼着那说不清比不准却十分诱人的舌尖。头茬子苜蓿二淋子醋，姑娘的舌头腊汁的肉。他现在回味长工头李相讲过的那许多酸故事，就由朦胧进入清晰的境界了。当他往返四五趟饮完牲口以后，他觉得沉寂下去的那种诱惑又潮溢起来，那种憋闷的感觉又充斥着胸腔，一种无形的力量又催逼他再回到井台上去。

他忍着，到了午饭时，李相和王相汗流浃背地从地里回来了，根本想不到黑娃已经发生的美妙的秘密，只是带着明显不饰的忌妒说：

“黑娃，你狗崽子比郭掌柜的干儿子还牛皮！你跟掌柜的遛马耍鹁鸽……”黑娃嘿嘿嘿笑着不无得意：“这怪谁呢？掌柜的硬叫我陪他遛马，给他捉鹁鸽，我敢不去吗？”三个人就走进院子去吃午饭。黑娃瞧着小女人用木盘端来了盐碟辣碟醋碗和蒜罐儿，就不由得心跳；看见她戴着银镯的手腕，就回味到握着时的那种温柔和细腻；瞧见她颤动着的胸脯，就异常清晰地感到贴着时的痴迷和消融。小女人谁也不看，转身又用木盘托来了三只大碗，碗里盛着冒过碗沿儿的凉皮。这是暑热的天气里最可口的面食了。小女人放下碗就回厨房去了。黑娃嚼着凉凉的面皮，还是察觉到了李相和王相没有察觉出来的变化，小女人走路的步子轻盈了，两只秀溜的小脚麻利地扭着，胸脯上的那两团诱人的奶子就颤悠悠弹着，眼睛像雨后的青山一样明澈，往日里那种死气杳杳的神色已经扫荡净尽。

吃完午饭回到马号，三人就躺下来歇晌。李相贼气地说：“这个二婆娘今日个比往日不一样，大概举人昨黑个把她弄受活了，你看今日个走路都飘手飘脚的！”话说完就拉起鼾声。王相也傻笑一声就齁齁睡着了。黑娃却睡不着。

整个一个后晌，黑娃和李相王相在播种最后一块苞谷地。他有点神不守舍，吆犁犁歪了犁沟儿，点种又把不住稀稠。长工头竟破口骂起来：“黑娃，你崽娃子丢了魂了不是？”黑娃不在乎地笑笑。愈接近天黑，他愈变得不可忍耐，直到吃罢晚饭，他也找不到单独和小女人说话的机会。三人吃了晚饭，抹着嘴起身走出院子时，小女人说：“黑娃，你把泔水桶捎过去。”黑娃心里得救似的喜悦，从灶房里提了装满泔水的木桶回到马号，用泔水饮了牛，再把桶送过来，对着正在洗锅刷碗的小女人说：“娥儿姐，我黑间来。”

黑娃开始实施他后晌种苞谷时反复琢磨过的行动方案：“李大叔，我今黑到王庄寻我嘉道叔去呀。让他回家时给我捎一双鞋来。”长工头李相毫不在意地应允了。黑娃到王村找着嘉道叔叔，确实说了让他捎鞋的事，又闲谝了半夜在郭家熬活儿的事，感激嘉道叔叔给他寻下一个好主家，并说郭举人瞧得起自己，让他陪他遛马放鸽子的快活事，嘉道高兴地叮嘱说：“这就好，这就好。人家待咱好咧，咱也要知好，凡事都多长点眼色，甭叫人家先宠后恼……”黑娃应着，早已心不在焉，看看夜深人静，告别嘉道叔回到将军寨。

按照白天观察好的路线，黑娃爬上墙根的一棵椿树跨上了墙头，轻轻一跳就进入院里了。郭举人和他的大女人在后院窑洞里，前院只住着小女人一个。黑娃望一眼关死的窗户，就撩起竹帘，轻轻推一下门。门关死着，他用指头叩了三下，门闩滑动了一下就开了，黑暗里可以闻见一股奇异的纯属女人身体散发的气味。小女人一丝不挂站在门里，随手又轻轻推上门闩，转过身就吊到黑娃的脖子上，黑娃搂住她的光滑细腻的腰身的时候，几乎晕眩了。他现在急切地寻找她的嘴唇，急切地要重新品尝她的舌头。她却吝啬起来，咬紧的牙齿只露出一丁点舌尖，使他的舌头只能触接而无法咂吮，使他情急起来。她拽着他在黑暗里朝炕边移动。她的手摸着他胸脯上的纽扣一个一个解开了，脱下他的粗布衫子。他的赤裸的胸脯触接到她的胸脯以后，不由地“哎呀”叫了一声，就把她死死地拥抱在胸前，那温热柔美的奶子使他迷醉，浑身又潮起一股无法排解的燥热。她的手已经伸到他的腰际，摸着细腰带的活头儿一拉就松开了，宽腰裤子自动抹到脚面。黑娃觉得从每一根头发到脚尖的指甲都鼓胀起来，像充足了气，像要崩破炸裂了。她已经爬上炕，他也被拽上炕去。黑娃不知该怎么办了，感觉到她把他导引到一个陌生的所在，脑子里闪过一道彩虹，一下子进入了渴盼想往已久却又含混陌生的福地，这一刻，黑娃膨胀已至极

点的身体轰然爆裂，一种爆裂时的无可比拟的欢悦使他顿然觉得消融为水了。黑娃躺在光滑细密的竹皮凉席上，静静地躺在她的旁边。她也静静地偎在他的怀里，贴着他的耳朵说：“兄弟，我明日或是后日死了，也不记惦啥啥了！”

此后黑娃就陷入无法摆脱的痛苦之中。他白天和李相王相一块去翻耕麦茬地，晚上同在马号里的大炕上睡觉，难得与小女人再次重温美梦，不能再二再三撒谎去找嘉道叔呀！早晨他去扫院绞水的当儿，郭举人踢腿舞臂在院庭里晨练功夫，无法与小女人接近。唯一可钻的空子，就是晚饭后他拎了泔水饮罢牛马送还空桶的时候，在厨房里和小女人急急慌慌摸捏一下就做贼似的匆匆离去。

烦闷焦躁中，机会总是有的。麦茬地全部翻耕一遍，让三伏的毒日头曝晒，曝晒透了，如落透雨，再翻耕一遍，耙耱一遍，土地就像发酵的面团一样绵软，只等秋分开犁播种麦子了。苞谷苗子陆续冒出地皮，间苗锄草施肥还得半个月以后。财东家就给长工们暂付了半年的薪俸或实物麦子，给他们三五天假期，让长工把钱或麦子送回家去安顿一下，会一会亲人，再来复工，此后一直到收罢秋种罢麦子甚至到腊月二十三祭灶君才算完结。然后讲定下年还雇不雇或干不干，主家愿雇长工愿干的就在过罢正月十五小年以后来，一年又开始了。郭举人在他们耕完最后一块麦茬地那天晚上来到马号，摇着扇子爽朗地说：“前一阵子又收又种还要犁地，诸位都辛苦了。明日个李相王相就可以起身，今年你俩一搭走，回去把老的小的安顿好再来。目下地里没啥紧活儿，鹿相只要抚弄好牲口就行了。等你二位来了，鹿相再回家。鹿相屋里有指靠，迟回去几天没啥。”黑娃巴不得如此安排。李相和王相当晚灌好麦子，一夜竟然高兴得难以成眠，鸡叫三遍就推着木轮小车装着粮食上路了。黑娃欢跃鼓舞，也无法入睡，俟到天色微明

就去扫除绞水。吃早饭的时候，他大胆抓住小女人的手，跳起来亲了一口，小女人吓得脸都黄了："你疯了？"黑娃坐下来说："等着。今黑好机会。"他回到马号就喂马，连着喂过两槽草料，把牛马和骡子牵出来拴到树荫下，用扫帚刷掉牲畜身上的土屑粪疤，回头又给圈里垫了干土，把水缸装满，吃罢午饭就躺下睡着了。后晌更加漫长，他索性背起大笼和草镰去割苜蓿。

郭举人很赞赏他的勤快和主动性儿，也蹲下来往铡刀下撬苜蓿。黑娃压着铡刀把儿，瞅着眼皮底下郭举人银白头发的大脑袋，心里忽然懊悔起来：郭举人待他不错，早看得出他很喜欢他，让他陪他遛马，替他背上鸽子笼儿到这里那里去放鹁鸽，很放心地让他一个人侍喂骡马，他却偷偷地把人家的小女人睡了！他的漫荡着欢愉的胸腔开始冷寂，滋浮起一缕愧悔羞耻的灰败气氛……

随着深夜的到来，黑娃在马号里第一次独自一人过夜，浑身又潮起那种催逼他翻墙跳院的欲望了。他脱光了衣服，用葫芦瓢儿从头顶往身上浇水，冲洗得清清爽爽，就走出了马号的门。

走同样的路，翻同一道围墙，爬同一棵椿树，轻捷似猫儿一样钻进虚掩着门的厢房。朦胧的月光下，炕上躺着玉雕冰琢似的肉体。两张同样焦渴的嘴互相濡沫，两双都急欲捕捉对方的胳膊交缠在一起。黑娃已不再慌乱，也不陌生，小女人再不说"兄弟你瓜瓜娃"的话，痴迷地陶醉在黑娃越来越熟练的爱抚之中。他们现在跨越了羞怯慌乱和无知的障碍进入从容不迫的自由境界，接受对方的种种爱抚也把种种爱抚给予对方，愉悦地纵容对方做更进一步更大胆些的行动，第一次得到了同步销魂的最佳状态。他们已经从肉体感官越来越强烈的刺激需要进入感情抒发的需要，情切切意绵绵的呢喃自然流涌。"兄弟呀，姐疼你都要疼死了！""娥儿姐呀，兄弟想你都快想疯了！"他们一次又

一次走向峰顶，一次又一次从峰顶销魂般下落，没有满足，直到鸡啼三遍才难舍难离地分手。

继来的一夜更加完满。他们从情意缠绵的胶着状态走进了轻松欢快的又一个新的境界，开始有兴致谈笑逗趣互相开心。黑娃把在马号里听到的长工头李相讲的酸故事复述给小女人，小女人乐得笑得几乎岔气，爱抚地拧着掐着捶着黑娃，嘴里嗔骂着："黑娃你跟那些瞎熊长工学成瞎熊了。"黑娃得意地笑着问："姐呀，听说你给郭掌柜泡枣儿是不是真事？"小女人顺手抽了他一个嘴巴，抽得很重不像玩的。黑娃哑了口，后悔自己忘乎所以说错了话。小女人随之就坐起来，把那个尿盆拿到黑娃跟前。黑娃欠起身一瞅，黄蜡蜡的尿里头漂着三颗枣儿，已经浸泡得肥大起来。小女人憎恨地说，提到泡枣的事她就像挨了一锥子。大女人每天晚上来看着监视着她把三只干枣塞进下身才走掉，她后来就想出了报复的办法，把干枣儿再掏出来扔到尿盆里去。"他吃的是用我的尿泡下的枣儿。"小女人说着，又上了气，"等会儿我把你流下的㞞给他抹到枣儿上面，让他个老不死的吃去！"一提到郭举人，黑娃就有点怯。小女人气过之后就哭了："兄弟呀，姐在这屋里连只狗都不如！我看咱俩偷空跑了，跑到远远的地方，哪怕讨吃要喝我都不嫌，只要有你兄弟日夜跟我在一搭……"黑娃压根没有想过往后的事，支吾说："姐呀，你甭急……我还没想过跑……咱明黑间再说。"小女人说："兄弟你甭害怕，我也是瞎说。我能跟你相好这几回，死了也值当了。"

黑娃有点沉重地回到马号，开始思谋怎么办。翻墙跳院偷偷摸摸的相会总不是长远之计呀。这时候，马号的门板敲响了，黑娃忙问："谁？"一个沉稳平实的声音答："我。"黑娃听出郭举人的声音就有点慌，瞬即侥幸地想：他要是发现了什么蛛丝马迹肯定到当场捉奸，不

会等他回到马号的。他装出睡意惺忪的样子拉开门闩。郭举人走进来说：“点上灯。”黑娃怕自己脸色不好不想点灯，郭举人坚持要点灯，他就拼打火石点着了油灯。郭举人背抄着双手，站在对面说：“你刚才做啥去了？”黑娃慌了：“我肚子坏了上茅房……”郭举人冷冷地说：“茅房不在那边，再说也不用翻墙。”一切侥幸都被粉碎，事情完全败露了，黑娃眼前一黑，几乎跌坐下去：“掌柜的，你说咋样处治——”郭举人一摆头说：“要是想处治你，刚才我就当场把你捉住了，不会让你跑回马号来。处治你还不跟蹭死一只臭虫一样容易？这事嘛，我不全怪你，只怪她肉臭甭怪旁人用十八两秤戥。她一个烂女人死了也就死了，你爸养你这么大可不容易。门面抹了黑，怕是你娃娃一辈子也难寻个女人了。”黑娃这时完全崩溃了，抬不起头也说不出话。郭举人说：“这样吧，我把你前半年的工钱给你，你另到别处找个主家去。记住，日后再甭做这号丢脸丧德的事了。”说着从腰里摸出几块银圆搁到炕边。黑娃忙说：“你不处治我就够了我的了，钱我不敢拿。掌柜的你真是个好人，我……”黑娃腿一软就跪下了。郭举人不以为然地说：“这事全当没有发生过。再不提了都不说了。你把钱拿上走吧。现在就走。”黑娃不敢拿钱又不敢不拿，把钱拿了装进口袋，背起来时的褡裢，向郭举人深深鞠了躬就走出马号的门去。

黑娃走到村巷的转弯处不由得回头瞧瞧，马号的窗户仍然亮着灯火，郭举人今晚得亲自侍守牲畜了。他心里很难过，恨不得抽自己两个耳光：做下这种对不起主人的事，自己还算人吗？他出了村子就踏上往南去的路，忽然想到回去怎么给父亲交代？旋即又转折到往西的路上去了，走得愈远愈好，随便找一家缺人的主户熬活就行了。走到一条小河边，黑娃蹲下来脱鞋，听到后边有脚步声，回头一看，两个黑影朝他跑过来，边跑边喊着：“鹿相，等等有话说。”黑娃拎着鞋等着。星光下，黑娃辨出来人是郭举人的两个亲门侄儿，跑得气喘吁

吁，一前一后把黑娃夹在中间。一个说：“你怎么松松泛泛就走呀？”黑娃说：“掌柜的叫我走的。”另一个插嘴说：“叫你走是叫你走远点，甭臭了一个村子。”黑娃什么已不再想，只觉得走投无路了。一个骂：“你个驴日下的六畜。”另一个骂：“今黑把你狗日的皮剥下来绷鼓！”骂着就拉开了架势。黑娃被打了一拳，背后又挨了一脚。他忍着躲着，终于瞅中机会，照一个的脸上迎面砸了一拳，手感告诉他击中了对方的鼻子，那个人趔趔趄趄退了几步被河滩上的石头绊倒了。他一扬腿就踢到另一个的裆里，那人哎哟一声蹲到沙滩上了。在他们重新扑上来之前，黑娃转身扑进水里，一蹿就顺水漂走了。

黑娃爬上岸时，辨不清到了什么地方，肚子饿得咕咕叫，循着甜瓜的气味摸到沙滩岸上的一个瓜园里，摸了几个半生不熟的甜瓜，又顺着河岸上的小路往前走。他嚼着有一股草汁味儿的尚未熟透的甜瓜，皮儿瓤儿籽儿全都咽下去了。郭举人暗地里派两个侄儿来拾掇他，掐死勒死或者用石头砸死扔到水里就消除一切痕迹了。黑娃现在再不觉得对不住郭举人了，这两个蠢笨家伙的行动反倒使黑娃解除了负疚感，只是在心里叫苦：娥儿姐不知要受啥罪哩？

他漫无目的地朝西走去，天明了仍不停步，走得愈远肯定愈安全。午饭时分，估摸已经走出百余里了，黑娃就在一个不大的村子里停下来，打听谁家需要雇长工，短工也可以。有人好心告诉他，前边一个叫黄家围墙的村子，有个叫黄老五的财东，刚刚辞退了一个长工正需要雇人，不过那主儿有点啬皮，年长人罢咧，年轻人怕受不下。黑娃已是饥不择食慌不择路，只要他是个人我就能受下。

在黄家围墙黄老五家干了半个月活儿，黑娃就看出黄老五啬皮果然名不虚传。黄老五天不明就呼喊他下地，三伏天竟然不歇晌，而且理由充足：“难得这么硬的日头，锄下草一个也活不了，得抓住这好日

头晒草。”如果不是大雨浇得人睁不开眼，黄老五仍然有说词儿：“哈呀真好！下这种濛丝儿雨才凉快了，干活才不热了。”黑娃不在乎，再说黄老五本人也不歇晌也不避雨陪着他一样干。黄老五吃饭也是一天三顿陪着他，除了晌午吃一顿稀汤面全部都是杂粮，苞谷黑豆稻黍豌豆变换着蒸馍。苞谷馍倒罢了，黑豆面儿无论蒸的馍馍或是烙下锅盔，都改不了猫屎一样黑的颜色，也去不掉那股苦焦味儿；豌豆面馍馍茬口硬，咬一丁点就嚼得满口沙子似的硬粒儿，吃下以后就生屁。黑娃和黄老五上地去的路上屁声此伏彼起，黄老五自己也笑了：“黑娃你闻一闻这屁不臭。豌豆生下的屁不臭。麦子面生的屁臭得恶心人。”黑娃不久也就明白，黄老五其实也是个粗笨庄稼汉，凭着勤苦节俭一亩半亩购置土地成了个小财东，根本无法与郭举人相比。但最使他难以忍受的不是干活的劳累和吃食的粗劣，而是一种无法忍受的舔碗的习惯。在黄家吃头一顿饭时，黑娃就看见了黄老五舔碗的动作，一阵恶心，差点把吃下的饭吐出来。以后再吃饭时，他就加快速度，赶在黄老五吃毕舔碗之前放下筷子抹嘴走掉，以免听见他的长舌头舔出的吧唧吧唧的声响。这天午饭后，黄老五用筷子指点着凳子说：“鹿相你坐下，甭急忙走，我有话说。”黑娃重新坐下来。黄老五说：“把碗舔了。”黑娃瞅着自己刚刚吃完了糁子面儿的大碗，残留着稀稀拉拉的黄色的苞谷糁子，几只苍蝇在碗里嗡嗡着，说：“我不会舔。我自小也没舔过碗。”黄老五说：“自小没舔过，现在学着舔也不迟。一粒一粥当思来之不易。你不舔我教你舔。”说罢就扬起碗作示范。他伸出又长又肥的舌头，沿着碗的内沿，吧唧一声舔过去，那碗里就像抹布擦过了一样干净。一下接一下舔过去，双手转动着大粗瓷碗，发出一连串狗舔食时一样吧唧吧唧的响声，舔了碗边又扬起头舔碗底儿。黄老五把舔得干净的碗亮给他看：“这多好！一点也不糟践粮食。”黑娃说：“我在俺屋也没舔过碗。俺家比你家穷也没人舔碗。”黄老五说：“所以你才出门给人扛活儿！要是从你爷手里就舔碗，到你手里刚好三辈人，

家里按六口人说，百十年碗底上洗掉多少粮食？要是把洗掉的粮食积攒下来，你娃娃就不出门熬活反是要雇人给你熬活啰！”黑娃的胃肠早已随着黄老五的舌头伸出缩进搅动起来，一阵阵恶心，话也说不出来。黄老五说：“鹿相你这娃娃事事都好，干活泼势又不弹嫌吃食，只有不会舔碗这一样毛病。你知道不知道？顿顿饭毕你先走了，我都替你把碗舔了。你只要从今往后学着舔碗，我就雇你干三年五年，工钱还可以往上添。”黑娃说：“哪怕不要工钱，我都不舔碗。”说罢就转过身走了，走到过道转过身，黄老五抱着他的碗舔得正欢。黑娃看见别人舔自己的碗更加难以容忍，“哇”的一声吐了。随后居然成了一种毛病，他一看见黄老五的嘴唇就想呕吐，整得他干脆拿上两个馍馍躲到牛圈里单独吃了。他终于忍受不住，咬咬牙舍弃了一月的工钱，吃罢早饭借着单独上地的工夫逃走了。

他强烈地思念小女人。一月来她的日子怎么过？他沿着一条官道扯开步子再往东走，当夜静更深时分，黑娃已经站在那棵熟悉的椿树底下了。他爬上树，翻过墙，跳进院子，摸到西厢房门口，竹帘子卷在门楣上方，门上吊着一只黄铜长锁。黑娃不敢久停，沿着原路又出了院子，转身来到隔壁的马号。黑娃翻上土围墙，看见长工头李相和王相睡在马号院子里。他跳下去，摇醒了李相，吓得李相嘴里呜呜哇哇话不成串。黑娃悄声问：“李大叔，小女人呢？”李相说：“回娘家去了。”黑娃再问：“知道不知道约摸啥时候回来？”李相已完全清醒，恢复了活泼的天性：“你龟孙把人家日了，郭举人早把她休了，还回来个尿！”黑娃急问：“好叔哩！小女人娘家在啥村子？”李相说：“你还撵到人家娘家门上去日呀？”黑娃求告说：“好叔哩！啥时候呀你还尽说笑，快给我说一声。”李相说：“往北走，三十里，有个田家什字——”黑娃作个揖，亲昵地摸了一把还在酣梦中的王相，就拉开门闩出了马号院子。

第二天早饭时，黑娃踟蹰在田家什字的村巷里，打听谁家雇人熬活。人说，田秀才近日病倒，正需雇人管理棉田。黑娃找到田秀才家门口，正遇见秀才娘子：“婶呀，听说咱家想雇个人？”娘子看他一眼说：“你等一会儿，我去问问掌柜的。”娘子出来的时候就有了主意，说了工价，就引黑娃到屋里吃饭。端饭出来的果然就是那个令他牵肠挂肚的小女人，他的娥儿姐。她端着木盘走出厨房看见他的那一瞬间，脸色骤变，几乎失手丢了木盘。黑娃瞅了一眼就偏低了头，装作陌生人顺势在院子里的小木凳上坐下来。她瘦了！瘦得叫人心疼。

黑娃照例住进牛圈。田秀才家原有一个打长年的长工，姓孙，人很实受厚诚，黑娃很快就和孙相混熟了。他告诉黑娃，田秀才是个书呆子，村里人叫他“啃书虫儿”。考中秀才以后，举人屡考不得中，一直考到清家不再考了才没奈何不考了。田秀才仍然早诵午习，念书写字，只在农活紧密的季节才搭手作务庄稼。目下正是棉花生长顶费手的时节，田秀才却病倒在炕上，干不了活儿也啃不动书了。孙相悄声说：“秀才的女子跟个长工私通，给人家休了。秀才是念书人——要脸顾面子的人呀！一下就气得病倒炕上咧。”黑娃装出惊讶地“噢”了一声。孙相说：“田秀才托亲告友，要尽快尽早把这个丢脸丧德的女子打发出门，像用锨铲除拉在院庭里的一泡狗屎一样急切。可是，像样的人家谁也不要这个声名狼藉的女人，穷家小户又怕娇惯下的女子难以侍弄；人家宁可订娶一个名正言顺的寡妇，也不要一个不守贞节的财东女子。”黑娃听罢说：“孙叔，你去给田掌柜说，这女人我要哩！”孙相大惊道：“你年轻轻的小伙娃儿，要这号女人做啥？”黑娃撒谎说：“我爸穷得很，给我订不起媳妇呀！”孙相凛然说：“娃娃，拉光身汉也不要这号二茬子女人，哪怕办寡妇，实在不行哪怕到城里逛窑子，也不能收拾这号烂货！”黑娃说：“我思量过了。我家离这儿百把二百里，这女人名声再不好也吹不到俺村里，只要我日后把她看严点就行

了。”孙相看黑娃执意要娶，话儿也不无道理，就答应了：“我去给田掌柜说句话不费啥事。我估摸田秀才一听准成，肯定连聘礼全都不要的。”

田秀才的态度正如长工孙相所料，当即拍板定夺，病气当下就减去大半。田秀才随即召见黑娃，不仅不要彩礼，反倒贴给他两摞子银圆，让他回家买点地置点房好好过日月；只是有一条戒律，再不许女儿上门；待日后确实生儿育女过好了日子，到那时再说。黑娃全都答应了。第二天鸡啼时分，黑娃引着那位娥儿姐离开了田家什字，出村不远，俩人就抱在一起痛哭起来……

---

[1] 关中地区的城镇和乡村，对被雇佣的工人、店员、长工称为相公，王相是日常口头称谓。

第十章

孝文和孝武一人背一捆铺盖卷儿回到白鹿村。因为学生严重流失，纷纷投入城里新兴的学校去念书，朱先生创立的白鹿书院正式宣告关闭，滋水县也筹建起第一所新式学校——初级师范学校，朱先生勉强受聘出任教务长。看着两个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儿子归来，白嘉轩好生喜欢，有这样两个槐树苗儿一样壮健的后人顶门立柱，白家几辈受尽了单传凄苦的祖先可以告慰于九泉之下了。当晚，白嘉轩手执蜡烛，把两个儿子领到门楼下，秉烛照亮了镌刻在门楼上的四个大字“耕读传家”，又引着他们回到院庭，再次重温刻在两根明柱上的对联：耕织传家久，经书济世长。白嘉轩问儿子：“记下了？”两个儿子一齐回答：“记下了。”白嘉轩又问：“明白不明白？”两个儿子答：“明白。”白嘉轩坐在厅房的桌子旁说：“明白了就好。明日早起把旧衣裳换上，跟着你三伯到地里务庄稼去。”两个孩子都顺从地答应了。白嘉轩告诫说：“从今日起，再不要说人家到哪儿念书干什么事的话了。各家有各家的活法。咱家有咱家的活法儿。咱只管按咱的活法儿做咱要做的事，不要看也不要说这家怎个样那家咋个样的话。”

白嘉轩随后进山去了一趟，和岳父商谈了让二儿子孝武来共同经营中药材收购铺店的事。白家的后人已经成人，由岳父代管的局面应该尽快结束。孝武随后受命进山去了。大儿子孝文留在家里。白嘉轩经过长期观察和无数次对比认定，由孝文将来统领家事和继任族长是合法而且合适的。两个孩子都是神态端庄，对一切人都彬彬有礼，不苟言笑，绝无放荡不羁的举止言语，明显地有别于一般乡村青年自由随便的样子。但孝文比孝武更机敏，外表上更持重，处事更显练达。

白嘉轩把二儿子孝武打发进山以后，就带着礼物走进了媒人的院子。他郑重提出过年时给孝文完婚的意图，让媒人去和女方的父母交涉。女方比孝文大三岁，已经交上十九，父母早已着急，只是羞于面子不便催白家快娶。因为是头一桩婚事，白嘉轩办得很认真，也很体面，特意杀了一头猪做席面。婚后半个多月，饱尝口福的乡党还在回味无穷地谈说宴席的丰盛。白嘉轩以族长的名义主持了儿子和儿媳进祠堂叩拜祖宗的仪式。这种仪式要求白鹿两姓凡是已婚男女都来参加。新婚夫妇一方面叩拜已逝的列位先辈，另一方面还要叩拜活着的叔伯爷兄和婆婶嫂子们，并请他们接纳新的家族成员。

鹿三参加过无数次这种庄严隆重的仪式，万万料想不到他的黑娃引回来一个小婊子，入不得祠堂拜不得祖宗，也见不得父老乡亲的面。他曾经讥笑过鹿子霖。鹿子霖给大儿子兆鹏也是过年时完的婚。早先三媒六证订下冷先生的大女儿，兆鹏突然不愿意了，赖在城里不回家。鹿子霖赶到城里，一记耳光抽得兆鹏鼻口流血，哭丧着脸算是屈从了。新婚头一夜，兆鹏拒食合欢馄饨，更不进新房睡觉，鹿子霖又一记耳光沾了一手血，把兆鹏打到新房里去了。第三天进祠堂拜祖宗，兆鹏又不愿意去，还是鹿子霖的耳光把他扇到祠堂里去了。完成了婚娶的一系列礼仪之后，鹿子霖说："你现在愿滚到哪儿就滚到哪儿去！你想死到哪儿就死到哪儿去！你娃子记住：你屋里有个媳妇。"鹿兆鹏一句话没说就进城去了。鹿三对照了白鹿两家给儿子办婚事的过场，深深感叹白嘉轩教子治家不愧为楷模，而鹿子霖的后人成了什么式子。归根到底一句话："勺勺客毕竟祖德太浅太薄嘛！"现在黑娃根本没有资格引着媳妇进入祠堂，鹿三再也不好意思讥笑人家鹿子霖了，这件事仿佛一块无法化释的积食堆积在他的心口上。

白嘉轩对鹿三的心病表示了最真诚的关切。他走进马号对鹿三说："三哥，你一天到晚光哀叹不行。得想法儿解决。"鹿三气馁地说："我说他不听。我一镢头把那货砸死还得偿命。"白嘉轩信心十足："你去把他叫来，我跟他说。我不信他辨不来饭香屁臭。"鹿三对白嘉轩亲自出面的举动很感动，立即跑到村子东头那孔破窑洞前的坪场上，大声吼喊黑娃。黑娃跟着父亲来到白嘉轩家的马号里。白嘉轩开门见山地问："黑娃，没让你跟那个女人进祠堂拜祖，你恨我不恨？"黑娃诚实地回答："我知道族规。这不怪你。"白嘉轩朗然说："好！黑娃不糊涂。叔再问你一句，你丢开丢不开那个女人？"黑娃没有料到白嘉轩会把话说得这样不留空隙，盯一眼就低了头。白嘉轩不急于要他回答，继续冷静地说："这个女人你不能要。这女人不是居家过日子的女人。你拾掇下这号女人你要招祸。我看了一眼就看出她不是你黑娃能养得住的人。趁早丢开，免得后悔。人说前悔容易后悔难。"鹿三已经按捺不住："你嘉轩叔说的全是实话好话。搭眼一瞅那货就不是家屋里养的东西。"黑娃为难地说："我一丢开她，她肯定没活路了。"鹿三大声咂着嘴："啧啧啧！这号烂货女人死了倒干净。不看看你死命催在尻子上，还管那货。"白嘉轩依然不急不躁，保持着长者的威仪："你不要操心丢开她寻不下媳妇。你只管丢开她。你的媳妇我包了，连订带娶全由叔给你包了。"黑娃吃惊地盯着白嘉轩，已经没有不丢开她的任何托词和借口了。他突然蹲下去，圪蹴在马号的脚地上。

二十年前，白嘉轩的父亲白秉德出面掏钱为鹿三连订带娶一手承办了婚事，这件义举善行至今还被人们传诵着。黑娃的母亲也不隐讳这件事，自打黑娃能听懂话就不厌其烦地重复着："黑娃你得记住，白家是善心人。"

想起了这些，鹿三就臊红了脸："嘉轩你甭给他说那么多好话。哪怕拉光身汉也不能要那货。立马把那货撵出门，下边的事下来再说。"白嘉轩动情地说："看在咱们两三辈人交好的情义上，叔真是不忍眼睁睁看着你把一个灾星招进门。我不逼你，你再想想。"黑娃站起来点点头，表示他要认真地想了，赶忙拔腿走出马号。

黑娃离去后，白嘉轩以哲人的口气说："毕了毕了。我断定黑娃丢不开那个女人。要是能丢开，他当下就说丢开。没有法子。圣人能看一丈远的世事；咱们凡人只能看一步远，看一步走一步吧；像黑娃这号混沌弟子，一步远也看不透，眼皮底下的沟坎也看不见。你急也不顶用。让他瞎碰瞎撞几回，也许能碰撞得灵醒过来，急是没用的。"

白嘉轩真是不幸而言中。鹿三还侥幸着黑娃"想想"之后丢开那货哩，第二天晌午回家去，让女人再劝劝黑娃，不料从女人口里得知，黑娃扛着青石夯挂着木模，天不明就起身到外村给人打土坯去了。唉！

鉴于黑娃的严峻教训，白嘉轩愈加严厉地注视儿子孝文的行为规范。孝文是好样的，穿着旧衣服每天三晌跟鹿三到地里去学务庄稼，一身土一脸汗从不见叫苦叫累。只是这孩子脸色有点憔悴，断定不是农活太重的原因。白嘉轩晚上郑重地对仙草说："看来这崽娃子贪色。你得给那媳妇亮亮耳。"仙草撇撇嘴角，斜瞅丈夫一眼。娶了儿媳，仙草初享做阿婆的人生滋味，在家庭里的地位自然就发生了变化，可以稍为轻松地与丈夫对话了："管人家小两口那些事做啥？年轻时候都一样。你那会儿还不急得猴子摘桃一样。"白嘉轩仍很当真地说："我那会多大。孝文这会才多大？刚交十六，正长身体哩。甭贪色贪得嫩撅了。"仙草笑着依顺了，而且想得更加周密："这话我也不好开口。我给咱妈说一下，让她给她的孙子媳妇亮亮耳，话轻话重都不要紧。"白

嘉轩一下猜中了仙草的用心："你怕儿媳恼恨你是不是？让咱妈去说这号讨人嫌惹人恼的话？不过也没啥，会想事的人是知道为她好的。"

孝文结婚之前几乎没有接触过妈妈和奶奶以外的任何女人，结婚之后自然对女人一无所知，新婚之夜依然保持着晚读的良好习惯，气匀心静地端坐在桌前看书。一对烫金的大红蜡烛欢跃跳弹着火焰，新媳妇在炕上铺褥暖被，他感到局促不适。新媳妇暖好被褥，把一对绣着鸳鸯荷花的陪嫁枕头并排摆好，盘腿坐在炕上说："你歇下吧，今日个劳了一天了。"孝文说："你先睡。我看看书。"新媳妇忙溜下炕："你喝茶不？我给你烧水。"孝文说："不喝不喝。你睡去。"新媳妇就悄然睡下了。孝文读书累了也随之躺下了，他的光腿在被窝里撞着了她的光腿，就往一边躲了躲，很快睡着了。连着两夜都是这样。

第四天夜里，孝文夜半醒来尿尿，听到耳畔啜泣声。他忙问她："你咋了？"她背着身子啜泣得更紧了。"你哪儿不滋润？有病了？"她的啜泣变成压抑着的呜咽。孝文有点不耐烦了："你不吭声，半夜三更哭啥哩？丧模鬼气的！"她转过身来忍住了抽泣："你是不是要休我？"孝文大为惊讶："你因啥说这种没根没底儿的话？我刚刚娶你回来才三四天，干吗要休你？既然要休你，又何必娶你？"她沉静一阵之后说："你娶我做啥呀？"孝文说："这你都不懂？纺线织布缝衣做饭要娃嘛！"她问："你想叫我给你要娃不？"孝文说："咋不想？咱妈都急着抱孙子哩！"她的疑虑完全散释，语句开始缠绵羞涩起来："你不给我娃娃……我拿啥给你往出要……"孝文愣愣地说："娃娃咋能是我给你的？我能给你还不如我自己要。"她扑哧一声笑了："你见过哪个没男人的女人要下娃了？"孝文哑了。她羞羞怯怯地说："女人要下的娃都是男人给的。"孝文有所醒悟，随口轻松地说："那你怎么不早说？你快说我怎么给你？你说了我立马就给你。"她咯咯咯笑着搂住了他的脖

子，把肥实的奶子紧紧贴住他的身，她抓住他的一只手导向她的胸脯，随之示意他抚摸起来。孝文不由地“哎呀”一声呻唤，自觉血涌到脸上烧臊起来，浑身迅猛地鼓胀起来，巨大的羞耻感和洪水般涌起的骚动在胸腔里猛烈冲撞，对骚动的渴望和对羞耻的恐惧使他颤抖不止。他喘着气说：“甭这样……这不好！”她也微微喘息着说：“就这样就这样好着哩！”他慌乱地挺着，被她按到她奶子上的手僵硬地停在那儿，不忍心抽回也鼓不起勇气搓摸。她的那只手从他的胸脯轻轻地滑向他的腹部，手心似乎更加温热更加细柔；那只手在肚脐上稍作留顿，然后就继续下滑，直到把他的那个永远羞于见人的东西攥到掌心。孝文觉得支撑躯体和灵魂的大柱轰然倒掉，墙摧瓦倾，天旋地转，他已陷入灭顶之灾就死死抱住了那个救命的躯体。他已经不满足于她的搂抱而相信自己的双臂更加有力，他把那个温热的肉体拥入自己尚不宽厚的胸脯，扭动着身子用薄薄的胸肌蹭磨对方温柔而富弹性的奶子，他的双手痉挛着抚摸她的胳膊她的脊背她的肩头她的大腿她的脖颈她的肥实丰腴的尻蛋儿，十指和掌心所到之处皆是不尽的欢乐。他的手最后伸向她的腹下，就留驻在那儿，不由地惊叹起来：“妈呀！你的这儿是这个样子！”他感到她在他的抚摸下不安地扭动着，一阵紧过一阵喘着气。当他的手伸到那个地方的一瞬，她猛乍颤抖一下就把他箍住了，把她的嘴贴到他的嘴上，她的舌头递进他的嘴唇。他一经察觉到它的美好就变得极度贪婪。孝文觉得又探入一个更加美妙的境地而几乎迷醉。她的双手有力地拖拽他的腰，他立即意领神会她的意图，忙翻起身又躺下去。他急切地要寻找什么却找不到朦胧而又明晰的归宿，她的美妙无比的手指如期如愿，毅然把他导向他迫不及待要进入的理想的地域。他的腹下突然旋起一股风暴，席卷了四肢席卷了胸脯席卷了天灵盖顶，发出一阵灼伤的强光，几乎焚毁了。

孝文在盲目的慌乱和撕扯不完的羞怯中初尝了那种神奇的滋味，大为震惊，男人和女人之间原来是这么一回事哇！这种秘密一经戳破，孝文觉得正是在焚毁的那一刻长成大人了。他静静地躺着，没有多大工夫，那种初尝的诱惑又骚动起来，他再不需她的导引暗示而自行出击了。他不一而足，一次比一次更从容，一次比一次的结果更美好。他终于安静下来对她说："这样好这么嫽的事，你前三天为啥不早说哩？"她已缠绵得难以开口，只是呢喃着贴紧他的身子……第二天晚上吃罢夜饭，孝文向婆（奶奶）问了安就回到自己的厢房，脱鞋上炕。新媳妇说："你今黑不念书了？"他听出她揶揄的话味也不管了，抱住她的脖子贴着她的耳朵说："我想日你。快！"

白赵氏接受了儿媳仙草传达的儿子嘉轩要指教孙子媳妇的话竟然有点按捺不住。三个孙子一个孙女都从她的牵引下挣脱了手，从她的火炕上像出窝的鸟儿一样飞走了，只有三娃子牛犊还在靠墙的被筒里睡觉。家里的事情由嘉轩撑持她很放心，因为耳朵半聋听不清晰，因此就不去过问。每天晚上嘉轩仍然坚持睡前陪她坐一阵尽其孝道。她从早到晚坐在纺车前纺棉花，再把那一个个线穗儿拐到工字形的线拐上去，交给仙草去浆线织布。她很明白地限制自己不再过问家事，只是单纯地摇车纺线。她自己不觉察而仙草却早已感觉出来，她不说话是不说话，一说话就又直又硬，完全不像过去那么慈和婉约了。她听了仙草的话，就觉得接到了最重要的使命，当下从纺车下站起来走到孙子媳妇的窗外："马驹家的到后头来，婆给你说话。"孝文媳妇也在摇纺车，随之就跟着婆的脚后跟走进上房里屋。婆坐在太师椅上，孝文媳妇怯怯地站在当面。白赵氏说："你比马驹大。你十九他才十六。你身子披挂雄实，马驹还是个树秧。你要处处抬协他。你听下了没？"孝文媳妇满口答："婆，我知道。我过门前俺妈也教导我，说要抬协他。他比我小我知道。"白赵氏说："那你给婆说，你到屋几个月了，

你咋样抬协他来？”孝文媳妇说：“我天天早起叮咛他，做活要可自家的力气，做不动的活甭硬做，小心伤了筋骨。”白赵氏问：“你还咋样抬协他？”孝文媳妇说：“我天天黑间劝他少念会儿书少熬点儿眼，白天上地黑间熬眼身子就亏下咧！”白赵氏仍不动声色问：“还有啥呢？”孝文媳妇说：“我常问他想吃啥饭，再给婆说了，就做他可口的饭。”白赵氏再问：“还怎么抬协他来？”孝文媳妇再说不出也想不到更多的抬协的事例，一低头又有了心计：“婆呀，你说该咋样抬协你的孙子？俺小辈人不懂啥，你老多指教才好哩！”白赵氏反问：“我说了你能做到？”孝文媳妇笑脸相迎：“婆说的话我不敢不做。”白赵氏再问：“我说了你不恼？”孝文媳妇说：“我咋敢恼婆说的话？我再不懂规矩也不敢不听婆的话。”白赵氏点点头：“那我就说——”孝文媳妇诚恳地说：“婆你有啥尽管说。”白赵氏压低声一字一板说：“你黑间甭跟马驹稀得那么欢！”孝文媳妇听到时猛乍愣了一下，随之就解开了被婆强调了重音的稀，是被婆脱掉牙齿漏风泄气的嘴把那个最不堪入耳的字说转音了。她惊愕地瞪大了眼睛，刷地一下红赤了脸，羞得抬不起头来了。“话丑理端。”白赵氏不急不躁地说，“马驹十六还嫩着哩！你要是夜夜没遍没数儿地引逗他跟你稀——把他身子亏空了，嫩撅了，你就得守一辈子活寡！”孝文媳妇的头低垂得更下了：“婆……没有的事……”“看看马驹的脸色成了啥样子？还说没有。”白赵氏紧逼不放，“婆跟你实话直说，那个事跟吃饭喝汤一样，吃饱了喝够了不想吃也不想喝了，过不了一晌克化了又饿了也渴了，又急着吃急着喝了。总也没个完。”孝文媳妇咬着嘴唇硬着头皮站着恭听。白赵氏说：“我给你说，十天稀一回。记下记不下？”孝文媳妇咯咯讷讷：“记下了。”

当天夜里睡下，她一次又一次推开孝文的手。孝文先不悦意，接着就恼了，问她咋回事，她就学说了白赵氏白天的训示。孝文说：“婆怎么连这事也管？”她说：“她是婆嘛！”接着又给孝文劝说：“婆的话

说得粗鲁可是心好着哩，怕伤你的身子骨儿，你小。”孝文气躁躁地说：“既然我小，忙着给我娶你做啥？给我娶媳妇就是叫我日嘛！不叫日就不要娶。我想怎么日就怎么日，想啥时候日就啥时候日。”孝文一边气呼呼说着一边就做了起来，像是和婆赌气似的。

第二天，婆又把她唤进上房里屋。她这回有了充分准备。婆一见她就说她骗了自己。她就向婆艰难地述说孝文不听劝阻，自己也没办法：“婆呀……被窝里……又不能打墙呀……”白赵氏嘬嘬脱光了牙齿的嘴：“我来试着打这堵墙，看看打成打不成。”她不知婆将怎样给她的被窝里筑起一道隔墙。

当晚，孝文和她又进入那种欢愉销魂的时刻，窗外响起婆的僵硬的声音：“孝文，甭忘了你是个念书人噢！”随之就听见婆的小脚噔噔噔响到上房里去了。孝文突然从她身上跌滚下来，浑身憋出黏糊糊的汗液，背过身睡去了。她心里很难受，对婆憎恨在心里了。

白赵氏仍然不放心，连续十天里改变了天黑睡觉的习惯，吹了灯坐在被筒里打盹，一当发觉孙子孝文窗户纸上的灯光熄灭以后，她就溜下炕来走到庭院里，坐在孝文窗外的木马架上说：“马驹俺娃好好睡，婆给你挡狼。”这是孝文小时跟婆睡觉时的催眠曲。直到窗里传出孝文匀称的鼾声，白赵氏才回到自己的火炕上脱衣睡下。有一天早饭时，白赵氏接过孙媳侍候来的饭菜，把刚转身准备出门的孙媳叫住，很得意地问：“你说，婆给你被窝里把墙打成了没？”孙媳妇满脸绯红，低下头求饶似的喃喃说：“啊呀婆哩早都不……咧！”

尽管如此，孝文的脸色仍然发暗发灰，眼睛周围有一个晕圈儿，明显不过地呈现着纵欲过度的样子。白赵氏终于明白给被窝里打墙的做法完全失败，就变得恼羞成怒了。她再次把孙子媳妇传唤到上房里屋："小冤家，你把婆给哄了。"孙子媳妇忙说："没有没有。"白赵氏说："马驹的脸色在那儿明摆着哩。"孙子媳妇低下头无言以辩。实际上孝文并没有因为婆的干涉而有半点收敛，几乎一夜也没空过，更谈不上遵守婆规定的"十天稀一回"的法令了。她本人也很吃惊，新婚三天连碰她也不碰的书呆子，一旦尝着了男女交媾的滋味就一下子上了瘾似的永无满足了。她现在也为孝文的身体担忧，真的这样下去，孝文嫩撅了，她就要守活寡了。她在被窝里规劝孝文："细水长流好。你今黑忍一忍。等你长大了要怎样就怎样……"孝文却当作耳边风又做起自己想做的事。她对婆诚恳地说："婆呀！打死我我也不敢哄你……我劝不下你孙子……"白赵氏说："你跟他不要睡一头，两头睡下。"孙子媳妇说："试过了……不行。他在那头还能……"白赵氏说："你该给他另暖一条被筒，分开睡。"孙子媳妇说："那办法我也试了……他把被子扔到脚地，又钻进我的被筒……"白赵氏眼一瞪，呵斥着："嗬呀，说一千道一万全成我孙子的不是咧？你个碎屄就没一点错咧？你看你那俩奶！胀的像个猪尿脬！你看你那屄蛋子，肥的像酵面发喽！看你这样子就知道是爱挨㞗的身坯子！"孙子媳妇连羞辱带委屈，低头哭了。白赵氏冷着脸狠着声说："马驹的事我回头说。你先把你管住。你要是再管不住，我就拿针把你的碎屄给缝了！"

白赵氏训斥孝文媳妇的时间选择在后晌，屋里的男人都下地去了，只有仙草抱着蒲篮在院子里做针线活儿，不用回避。仙草看见儿媳妇低着头从她面前贼溜似的走回厢房，倒可怜起儿媳妇来了，阿婆白赵氏明显袒护孝文而一味怪罪媳妇，不说不公平吧总是解决不了症

结。她把听到的阿婆的话全部说给嘉轩。白嘉轩听着那些不堪入耳的粗秽的话脸红了又白了，说：“妈越老说话越不会拐弯了。”

白嘉轩当晚把孝文唤进自己的住屋，当着仙草的面训示儿子：“孝文，你说我花那么多钱财供你念书，图啥？”孝文说：“叫我明白事理懂得规矩学为好人。”白嘉轩说：“你倒是记着。做到做不到？”孝文坦诚地说：“我哪儿举止失措，礼义不规，爸你随时指教。”白嘉轩微微上火动气：“还用我指教！你婆苦心巴力为你身体着想，你听下听不下？”孝文倏然红了脸，低下头去了。白嘉轩干脆地说：“你要是连炕上那一点豪狠都使不出来，我就敢断定你一辈子成不了一件大事。你得明白，你在这院子里是——长子！”

孝文回到厢房，自甘就范钻进媳妇为他设置的那条被筒，悄然睡下。一月后，孝文脸上的气色果然好了，脸颊红润了，天庭也洁亮了，灰暗的气色完全褪尽。白赵氏不知道儿子训孙子的事，还以为是自己威胁孙子媳妇的结果，借着孙子媳妇送饭的时候，口气宽松地说：“俺娃你放心，婆不用针缝了……”

当白嘉轩闻知鹿子霖家有一本更难念的经的时光，孝文贪色的事就算不上一档子事了。

鹿子霖在一年多的时间里都打不起精神，儿子兆鹏婚后勉强在家住了三四天就进城去了，整整一年都没有回白鹿原上来，暑假和寒假也没有回来。鹿子霖不给他送钱送物，也阻挡女人给儿子捎东西，企图迫使兆鹏在没吃没穿的绝望中回到家里来。然而，当又一个新年佳节到来之际，兆鹏仍然躲在城里。鹿子霖的闷气无以诉说无处发泄，脾气也变得暴躁起来，严重地影响了他到保障所里办理公务的心思，除非一些非亲自经手亲自出面交办不可的事，其余一切大小事务都一

概推给王书手去办了。这桩家庭隐患被全家成员自觉地包裹着不向外人泄漏，唯恐冷先生知道了真情。鹿子霖曾不止一回退一步想，如果兆鹏娶的不是冷先生的头生女而是别个任何人的女子，兆鹏实在不愿意了就休了算了，但对冷先生的女儿无论如何也不能这么做。冷先生是穷人和富人的共同的救星，高尚的医德赢得了极高的威望。结亲为好反成仇，其结果，遭受众人耻笑唾骂的必定是鹿子霖自己。一年来鹿子霖害着沉重的心病，外表上却显得愈加和气愈加宽容，显着十分谦和十分客气的样子与人说话，有时还自如轻松地和同辈人打诨调笑，却把心里隐伏着的危机掩饰起来了。他隔三差五地到冷先生的中医堂去，说一些他在各个村子里执行公务时听到的传闻或笑话，逗得亲家那张冷峻的脸绷不住就畅笑起来。他说给冷先生神禾村一个脏婆娘的真实故事："狗娃妈，娃屙下，找不着褯子拿勺刮。刮不净，手巾擦。褯子撂哪达咧？咋着寻也寻不见。揭开锅盖舀饭时，一舀就捞起一串子烂褯子。你说脏不脏？脏！可那一家全都长得黑瓷圪墶样。人说不干不净吃了没病……"冷先生先是听着笑，接着发潮呕吐，吐了又忍不住笑。鹿子霖也赔着笑，笑毕就欣喜地说："亲家兄，你猜你的宝贝女婿现时弄啥哩？嘿！一边上学一边给一家报馆干事，人家挣的钱还用不完。我前日为所里的事进城顺便去看了一下，给人家钱人家还不要，还给我盘缠哩！就是忙得受不了。"这样，关于兆鹏不回乡的种种可能的猜测全都合理地掩饰起来了。女儿偶尔来到中医堂，冷先生就冷着脸训诫说："男儿志在四方。你在屋好好侍奉公婆，早起早眠。"女儿一脸忧郁，却什么也不说，问候了父亲又接受了父亲的训示就回到鹿家院子。

兆鹏媳妇对兆鹏以及公婆的隐痛毫无察觉。她被严严实实地包裹着。她不知道鹿兆鹏和她完婚是阿公三记耳光抽扇的结果，头一耳光是在城里抽的，她那时还没过门自然不知道；第二个耳光是阿公在刘

谋儿的牛圈里抽的，兆鹏新婚之夜躲到那里要和长工刘谋儿伙一条被子睡觉，鹿子霖一声不吭就给了一巴掌，那时候她正处于新婚之夜的羞怯和慌乱中，对后来走进洞房的兆鹏的脸色无所猜疑；只有第三巴掌她看见了，阿公在祖宗牌位前抽的，兆鹏再拜了自家祖宗拒绝到祠堂里去接受族长白嘉轩主持的庄严仪式，阿公毫不客气地就抡开了胳膊。那是因为兆鹏说拜祭祠堂的仪式纯属“封建礼仪”，并没有丝毫的迹象显示出他与她有什么不和。婚后一年，她再也没有见过他的面，她起初不觉得有什么，可现在却十分渴望他回到厢房里来。他和她新婚之夜仅有的一回那种事，并没有留下欢乐，也没有留下痛苦，他刚进入她的身体就发疟疾似的颤抖起来，吓了她一跳，以为他有羊痫风，甚至觉得很好笑。现在她已从无知到有知，从朦胧到明晰地思想着他的颤抖，渴望自己也一起和他颤抖。那是一个梦。梦里她和他一起厮搂着羊痫风似的颤抖，奇妙的颤抖的滋味从梦中消失以后就再也难以入眠，直到天不亮起来先给爷爷后给阿公阿婆去倒尿盆。她平时走进里屋看见阿公阿婆伙一条被子打对儿睡在两头无所反应，端了他们夜里排泄的黄蜡蜡的一盆尿就转身走了。这天早晨，当她照例去端尿盆时，看见闭着眼的阿公和阿婆，突然想到了那种颤抖，阿公和阿婆昨夜大概刚刚颤抖过了。她开始失眠，整夜睡不着，对于那种颤抖再不觉得好笑而变成一种焦灼的渴望。

她到场院的麦秸垛下去扯柴火，看见黑娃的野女人小娥提着竹条笼儿上集回来，竹条笼里装着一捆葱和一捆韭菜，小娥一双秀溜的小脚轻快地点着地，细腰扭着手臂甩着圆嘟嘟的尻蛋子摆着。她原先看见觉得恶心，现在竟然忌妒起那个婊子来了，她大概和黑娃在那孔破窑里夜夜都在发羊痫风似的颤抖。当她挎着装满麦草的大笼回到自家洁净清爽的院庭，就为刚才的邪念懊悔不迭，自己是什么人的媳妇而小娥又是什么样的烂女人，怎能眼红她。她相信丈夫是干大事的人，

更相信他是忙得抽不出时间回乡，将来衣锦还乡才更荣耀。可是过年兆鹏未归，就引起了她的失望也引起了疑心，再忙也不会连过年都不回家呀。她在极度的失望和令人恐惧的猜测中度过新年佳节，强装笑颜接待亲戚。

鹿子霖看出了儿媳的笑颜是装出来的，他走了一趟西安回到屋里就向所有人自豪地宣布："嘿呀！兆鹏到上海去了。"整个家庭里立即腾起欢乐的气氛。鹿子霖故意大声问回家来的二儿子兆海："上海的路怎么走？听说还要坐火车？"兆海很详细地告诉父亲，先骑马出潼关，再坐船过黄河，再……

她的失望和猜疑一扫而空，情绪顿然焕发起来，当晚又梦见和兆鹏发羊痫风似的颤抖起来。颤抖过后，她惊奇地发现那个从她身上扬起的脸不是兆鹏而是兆海。第二天看见兆海从她手里接饭碗时就不由脸红心跳。随后她又梦见和黑娃在一搭颤抖，那是她清扫院庭到门外倒脏土时，看见黑娃于微明中扛着木模和青石夯走过村巷……更糟的是昨夜竟然梦见和阿公鹿子霖在一搭颤抖，阿公在她身上扬起脸时一下子羞了，仓皇跑了。种种怪梦整得她心虚气弱，不敢扬起脸看任何成年男人的眼睛，而那些乱七八糟的梦境却越来越频繁地出现。

春天，白鹿镇头一所新制学校落成，是由白鹿仓总乡约田福贤出面主持筹建的。县府出资，田福贤在本仓所辖的几十个村庄摊派民工，节约了开支，把原计划只能修建十间校舍的钱充分利用，增加到十三间，又无偿派工用黄土打起高高的围墙。田福贤把建校中用款用工的大小账项用黄纸公布于白鹿镇第一保障所门外的墙壁上，得到了地方乡绅和普通乡民的极大信任，尊为重要善举。为了不受市声和附近村民的骚扰，校址选择在白鹿镇南边几个村子之间的空间地带。

青稞和大麦黄熟时节，全部校舍完全竣工，一个校长领着三四个先生迫不及待地住进潮湿的房子，开始着手招收学生和开学的准备工作。校长是鹿子霖的儿子鹿兆鹏。一切有脸面的头面人物和普普通通的百姓都向鹿子霖表示最虔诚的祝贺和恭维。“鹿家出下一位校长了！”鹿子霖起初听到这个确凿消息时兴奋难抑，痛痛快快和亲家冷先生喝了一顿。除了可以预料的令人瞩目的新学校校长的巨大荣耀之外，他的心病也终于到了解除的时候了，兆鹏既然愿意回到白鹿原上来当校长，那就再无任何借口不回家了，学校离家最远也不过三里路嘛！但是，兆鹏刚一回来就把父亲潮起的欣慰之情粉碎了。

他是头天回来的，到家就向爷爷爸爸妈妈媳妇以及长工刘谋儿请安问候，显得十分客气和亲热。他穿一身新式制服，头上留着新式头发，眉高眼大，眼睛深邃，睫毛又黑又长，把鹿家血统的特征发挥到尽好的极致。一家人都激动得失掉了控制，有点紧张地注视着兆鹏的举动。他像和家人一样彬彬有礼地与媳妇打了招呼，进了厢房。媳妇完全手足无措地坐在炕边上，怯怯地瞅着做梦都在颤抖的丈夫，却说不出话也抬不起头来。兆鹏坐了一会儿就出去到马号里问候刘谋儿去了，在那儿倒待得很长。全家人都紧张地等待着天黑。日落时，兆鹏对爷爷对爸爸对妈妈说着同一句话：“我得回学校去，晚上开会。”爷爷爸爸妈妈也都重复着同一句话：“你开毕会回来。”结果是没有回来。连续一月，兆鹏住在潮湿的房子里，一直没有回来住过一夜。

这个家庭隐患再也包裹不住了，村里也由悄悄传说变成公开议论。鹿子霖觉得没脸再从中医堂门口走过。他到学校去找过儿子不下十回，强按着想撕碎那张校长模样的怒火劝导，劝导不下乞求，乞求不下就哭，反复着一句话：“你哪怕做做样子也该回去住两天，掩一掩

众人的口声……”面对校长，鹿子霖再也无力举起手来抽出第四个耳光。

这一天，中医堂的伙计把绕道儿走着的鹿子霖叫住：“叔吔！俺伯叫你去一下有话说。”鹿子霖顿时头皮就麻了。冷先生仍然是那副冷面孔，声音却很平实，开口就不拐弯：“兄弟，你甭费心了。你给兆鹏说一句，让他写一张休书，算咧。那没啥。”鹿子霖按捺不住：“哥呀，你说哪儿的冷话！事情到这一步我也不瞒不盖。休书的事你再不要说第二回，说一回就够兄弟受一辈子了。你放心，他兆鹏甭说当校长，就是当了县长省长，想休了屋里人连门儿都没得。要是我今日说的话不顶事，我拿他的休书当蒙脸纸盖。”冷先生却仍然不动声色：“兄弟，不必。旁人觉得被休了就羞得活不成人了，我觉得没啥。咱们过去咋样往后还咋样。”鹿子霖情绪已无法控制：“不说了好冷大哥，你甭说了。我有办法，不是没办法。你先甭急。”

鹿子霖回家后就走进父亲鹿泰恒的单独住屋：“爸，现在这事包不住了也拖不下去了。我到学校再寻一回兆鹏，他再不给咱们饰脸，我就准备……”他没有说出他准备干什么。鹿泰恒能猜出他准备怎么办，很可能是揣一把剃头刀，按到脖颈上威胁，大概再没有比这更绝更厉害的办法了。鹿泰恒说：“你准备的办法搁到下一步再说，今晚我去叫一回，看看鹿校长赏脸不赏脸。”鹿子霖再三劝说，咋也不能让老父亲出面。鹿泰恒说：“该出面就得出面，咱们祖荫出了校——长——了！”

鹿泰恒拄着一根拐杖，平时只有出远门才动这根磨得紫黑光亮的拐杖。老汉走进学校院子大声吆喝：“鹿校长哎——鹿校长！”兆鹏闻声走到院子，笑着说：“爷呀，你胡喊乱喊啥哩！你怎么也叫校长？”鹿泰恒故意放大音量说：“哈呀我的天爷爷你是校长嘛！爷是平头百姓

庄稼汉嘛！是官都得尊嘛！”鹿兆鹏窘红着脸扶住爷爷往自己房子走。鹿泰恒继续说：“你那衙门公馆，我这号平头百姓敢进吗？”几个教师站在台阶上直笑。兆鹏红着脸拽着爷爷走进了房子：“爷呀你有话就说呀！甭……”鹿泰恒说：“能想到的话，你爸早都给你说了，不顶放个屁嘛！既是不顶屁用，我就免了不放屁了。我说不下你……我就求你——”说着，鹿泰恒从直背椅上就溜下去，扑通一声跪倒在砖地上了。兆鹏大惊失色赶忙拽爷爷：“爷呀快起来，有话你尽管说，我不敢不听爷的话。”鹿泰恒说：“我求你跟我回去，再没二话。”兆鹏说：“你起来坐下慢慢说。”鹿泰恒老汉跪着不动：“你愿意跟我回去我就起来。你不答应不吐核儿的话，我就跪到院子中间去。”鹿兆鹏悲哀地叹一口气：“爷呀你起来。我跟你回去。”

鹿泰恒拄着拐杖走出了学校。鹿兆鹏跟着走。进入白鹿镇，鹿泰恒突然吆喝起来：“行人回避！肃静！鹿校长鹿大人鹿兆鹏驾到——”鹿兆鹏不知所措地奔前两步抓住爷爷的手杖：“爷呀你让我明日怎么见人？”鹿泰恒说：“你当了官了，爷爷给你鸣锣开道呀！鹿校长过来了！鹿校长过来了！”鹿兆鹏不知怎么糊里糊涂跟着爷爷走过白鹿镇又走进白鹿村的村巷。走进自家门楼，鹿泰恒仍然大声吆喝：“咱们的校长回来咧！子霖哇，我把你当官的儿子求拜回来了，欢迎啊！”鹿子霖和女人走到院子里，新媳妇也走出厢房来。兆鹏尴尬不堪地站在众人面前。鹿泰恒站在院庭中间，猛然转回身抡起拐杖，只一下就把鹿兆鹏打得跌翻在地上，半天爬不起来。鹿泰恒这才用他素有的冷峻口气说：“真个还由了你了？”

第十一章

一队士兵开进白鹿原，驻进田福贤总乡约的白鹿仓里。他们大约有三十几号人，一人背一支黑不溜秋的长枪，黑鞋黑裤黑褂黑制帽，小腿上打着白色裹缠布，显得精神抖擞威武严肃。人们很快给他们取下一个形象的绰号：白腿乌鸦。这队士兵突然开进白鹿仓的大门，哗啦一声散开，把那一排房子包围起来。一个人喊道："出来出来，统都举起手出来！"屋里立即传出桌椅板凳掀翻了的嘈杂声响，夹杂着男人们惊慌失措的叫声。田福贤正和他的属下搓麻将，一下子都钻到床板底下或缩到墙角旮旯里不知所措。一阵枪声在房顶上掠过，一声蛮声蛮气的河南口音又喊："再不出来就朝屋里开枪啦！"田福贤从墙角站起来，硬充好汉抖一抖肩膀就拉开门走出去，其他属下和那几个民团团丁也走出屋子。他们都高举着双手，只有田福贤很不在乎地垂着一只手另一只手叉着腰。一个士兵喊道："把手举起来！"田福贤不失绅士风度地回话："我是这儿的总乡约，有话进屋说，举手弄啥哩？"一个戴大檐儿帽子的军官走过来，手里握着一把短盒子枪："你是总乡约？报上名字？"田福贤说了自己的名字又问："老总是哪一部分的？"军官说："镇嵩军。本人姓杨，杨排长。"随之那三十几个士兵从房前屋后全都集中过来，把田福贤的团丁的枪缴了。杨排长说："本人受刘军长命令进驻白鹿仓。自即日起，一切服从刘军长命令。田总乡约，你愿意继续当总乡约我们欢迎，不愿意干你回家给老婆去抱娃，我们另找一个人就是了。"田福贤既不折气为他们卖命又不甘心就此下台。杨排长说："你们的县长已经降服本部，愿意为刘军长效力。"田福贤随之说："杨排长屋里坐，坐下好说话。"

白嘉轩和鹿三以及孝文正在锄头遍棉花，鹿子霖急匆匆跑到地头叫他回村里去敲锣，把村民召集到祠堂外的大场上，杨排长领着士兵征粮来了。白嘉轩说：“我不敲。”说罢转身重新回到自己锄草的棉苗垄行里，蹲下身用小铁锄锄起草来了。鹿子霖急了就跑进棉花地，蹲在白嘉轩旁边求告：“嘉轩哥你不敢硬碰，那一杆子兵都背着快枪。我也是给人家枪架在脖子上逼来的。”白嘉轩仍然手不停锄：“我知道你是被逼的，田福贤也是被逼着干的。可百姓只纳皇粮，自古这样。旁的粮不纳。这个锣我不敲。”

鹿子霖回村子里去了。田福贤接着跑来了，大声憨气地说：“嘉轩你咋瓜咧？好汉不吃眼前亏。这杆子河南蛋儿全是些饿狼二㞞，杀人连眼都不眨。你是个明白人咋能硬顶硬碰自己吃亏？”白嘉轩说：“亏心事不能做，没道理的锣不能敲。就这话。”正说着，鹿子霖领着杨排长和三四个士兵走到棉花地里来了。杨排长问：“你是白鹿村的官人？叫白嘉轩是不是？”白嘉轩手里提着小锄，点点头。杨排长说：“回去敲锣，召集人到祠堂门口。”白嘉轩说：“村民的粮食我不管，这锣我不能敲。你们谁要敲谁去取锣。”白嘉轩从腰里摸出一个黄铜钩圈的钥匙，递给杨排长。杨排长用乌黑的枪管把白嘉轩的手拨开说：“马上回村给我敲锣。你再敢说半个不字，老子就打断你的腿，叫你爬着给我敲。”说着就拉开枪栓，推上子弹：“你是不是想尝尝洋花生的味儿了？”鹿三劝嘉轩。儿子孝文也劝。鹿子霖也劝。田福贤赔着笑脸劝杨排长息怒。鹿子霖鹿三和孝文推着拉着白嘉轩回村里去了。杨排长和他的士兵跟着。

白嘉轩敲了锣。白鹿村的男女老幼都被吆喝到祠堂门外的大场上。杨排长讲了话，征粮的规矩是一亩一斗，不论水地旱地更不按“天时地利人和”六个等级摊派，那样太麻烦。说罢就让村民观赏射击表

演。士兵们把从村巷和农户院子里捉来的二三十只公鸡和母鸡倒吊在树杈上，那三十来个士兵站成一排，一片推拉枪栓的声音令人不寒而栗。杨排长首先举起缀着红绸带儿的盒子枪，“叭”的一声响过，就接连响起爆豆似的密集的枪声。士兵们的乌黑的枪管口儿冒着蓝烟，槐树下腾起一片红色的血雨肉雹，漫空扬起五彩缤纷的鸡毛。没有死下的鸡嘎嘎嘎垂死哀鸣，鲜血从鸡的硬喙上滴流下来，曲曲拐拐在地上漫流，几十条蚯蚓似的血流汇集组合，槐树下变成了血红的土地，散发出强烈的热血的腥气。祠堂门外的场地上鸦雀无声，女人们大都低垂着头，男人们木雕似的瞪着眼黑着脸，孩子压抑着的啜泣十分刺耳。杨排长把盒子枪插到腰里的皮带上，一绺红绸在裆前舞摆。他插枪的动作极为潇洒：“各位父老兄弟，现在回家准备粮食，三天内交齐。”

这种别开生面的征粮仪式和射击表演，从白鹿村开头，逐村进行。三十几名士兵按三个班分头进入不同的村庄，射杀一批吊起来的公鸡母鸡白鸡黑鸡芦花鸡杏黄鸡肉红鸡帽儿鸡，腾起一片血雨肉雹，扬起一片五彩缤纷的鸡毛，留下一摊血红的土地，然后宣布：一亩一斗，三天交齐。从各个村子通向白鹿镇的官道小路上，牛拉的硬木轮车和独轮手推车全都载着装满粮食的口袋壅塞了道路，各个村子送粮的人在白鹿镇汇集，排着队往镇子西边的白鹿仓里挪动。清朝那位有名的诗文皇帝设置的赈济灾民的义仓，在他死后不久就成了一个空仓，现在却空前富裕起来了。瓦顶的大仓房里倒满了黄澄澄的麦子，院子里临时用油布铺垫在地上也倒满了麦子，门外还拥着望不见尾的交粮的大车小车。

黑娃背着一条装着一斗麦子的口袋夹在拥挤的交粮车队中间，跟着熟人或陌生人缓缓朝大门口移动。他的眼前驻留着五彩缤纷的鸡毛

和槐树下那一摊血肉的土地，鼻腔里总能闻见热血的腥气。他耐不住性子等待，背着粮袋从一架一架独轮车上跷过去，蹿进大门里去了，把口袋底儿倒提起来，麦子便刷啦一声流到麦堆上，从鹿子霖手里接过一张盖了章子的收条，就从临时挖开的后门里出来了。黑娃回到自己的窑洞，小娥问："交咧？"黑娃从口袋摸出那块写着"鹿兆谦一斗"而且盖着白鹿仓印章的纸条交给小娥说："把这条子搁好，人家日后还要查对。"小娥收了条子说："你这几天甭出门了，我心里咋就慌慌的怕怕。"黑娃点点头说："算了不出去了。看看再说。"黑娃其实比小娥更担心，那天在祠堂门外看士兵们的射击表演，他没有让小娥出门，用一把铁锁把小娥反锁在窑里。交一斗麦子固然可惜，而小娥好看的模样已经成为一种重负压在他心上。随着这队士兵的到来，关于他们种种劣迹的传闻悄悄地又是迅猛地在白鹿原上蔓延，传得最多的是他们如何如何糟践稍有几分姿色的女人的事。如果那么多的传说有一件能得到证实，那么这些打着白裹缠布穿着黑军服的士兵就无异于四条腿的畜生。

黑娃被父亲撵出门以后就住进了这孔窑洞。窑洞很破，原来的主人在里头储存饲草和柴火，夏天堆积麦糠秋天垒堆谷秆，安着一扇用柳树条子编织的栅栏门，防止猪狗进入拱刨或拉屎尿尿，窑门上方有一个透风的小小天窗。黑娃买下这孔窑洞居然激动了好一阵子，在开阔的白鹿原上，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一个窝儿一坨地儿了。黑娃借来一个石夯一架木模，在窑洞旁边的崖坎上挖土打下两摞（每摞五百块）土坯，先在窑里盘了火炕，垒下连接火炕的锅台，随之把残破不堪的窑面墙扒倒重垒了，从白鹿镇买来一扇山民割制的粗糙结实的木门安上，又将一个井字形的窗子也安上，一只铁锅和一块案板也都买来安置到窑洞里。当窑门和窗孔往外冒出炊烟的时候，俩人呛得咳嗽不止泪流满面，却又高兴得搂抱着哭了起来。他们第一次睡到已经烘

干的温热的火炕上，又一次激动得哭了。黑娃说："再瞎再烂总是咱自个的家了。"小娥呜咽着说："我不嫌瞎也不嫌烂，只要有你……我吃糠咽菜都情愿。"

黑娃买了一个石锤和一架木模就出门打土坯挣钱去了。在乡村七十二行的谋生手段里，黑娃选择既不要花费很多底本购置装备，也无须投师学习三年五载的打土坯行当是很自然的事。他在给自己打过两摞土坯以后，就无师自通了这项粗笨的手艺，信心十足地扛着石锤挑着木模出村去了，在那些熟悉而又陌生的村庄里转悠，由需要土坯换炕垒墙的主户引他到土壕里去，丢剥了衣裳，在黎明的晨曦里砸出轻重相间节奏明快的夯声。主人管三顿饭，省下些口粮，傍晚接过主人码给他的铜子和麻钱就回到窑洞交给小娥。整个一个漫长的春闲时月，除了阴雨天，黑娃都是早出晚归。临到搭镰割麦，他就提上长柄镰刀赶场割麦去了。先去原坡地带，那里的麦子因为光照直接加上坡地缺水干旱而率先黄熟；当原坡的麦子收割接近尾声，滋水川道里的麦子又搭镰收割了，最后才是白鹿原上的麦子。原上原坡和川道因为气候和土质的差异，麦子的收割期几乎持续一月。整整一个多月的麦收期间，黑娃做麦客赶场割麦差不多可以挣下平常两个多月的工钱。麦客和主家到地头按麦子的长势论价，割完以后用步量地，当面开钱。黑娃起早贪黑，专拣工价高的又厚又密的麦田下手，图得多挣几个麻钱。一年下来，除了供养小娥吃饭和必不可少的开销，他已经积攒下一笔数目可观的铜子和麻钱了。腊月里，他抓住一个村民卖地的机会，一下就置买来九分六厘山坡上的人字号缓坡地。他在窑门外垒了一个猪圈，春节后气候转暖时逮回一只猪娃。又在窑洞旁边的崖根下掏挖了一个小洞作为鸡窝，小娥也开始务弄小鸡了。黑娃在窑洞外的塄坎上栽下了一排树苗，榆树椿树楸树和槐树先后绽出叶子，窑院里鸡叫猪哼生机勃勃了，显示出一股争强好胜的居家过日月的气象。

他早晨天不明走出温暖的窑洞，晚上再迟也要回到窑洞里来，夜晚和小娥甜蜜地厮守着，从不到村子里闲转闲串。阴雨天出不了门就在窑里做一些平时顾不上手的家务活儿，即使完全没有什么好做就躺在炕上看小娥纳鞋底儿，麻绳穿过鞋底的哧哧声响是令人心地踏实的动人的乐曲。黑娃在自己不易觉察中已经成熟了，他的脸颊开始呈现出父亲鹿三的轮廓，上唇和下巴颏上的茸毛早已变黑，眉骨隆起，眼里透出沉静的豪狠气色。他的双臂变得粗壮如椽，高兴时把小娥托起来抛上窑顶，接住后再抛，吓得小娥失声惊叫。他的胸部的肌肉盘结成两大板块，走起路时就有一股赳赳的气势。他的性欲极强，几乎每天晚上都空不得一次。窑洞独居于村外，小娥毫不戒备地畅快地呻唤着，一同走向那个销魂的巅峰，然后偎贴着进入梦境。

黑娃在窑门外的场院里用镢头耧破地皮，摊平，洒了水，再撒上柴灰，用一只木拨架推着小青石碌碡碾压场面，准备收割自己的麦子。村子里跑来一个小学生说："叔哎！俺老师叫你到学校去。"黑娃停住手问："你的哪个老师叫我？"小学生说："鹿老师。鹿校长。"黑娃又问："叫我啥时间去哩？"小学生迟顿一下："啥时间没说。反正叫你去哩！"

俟到天黑以后黑娃才出窑门。黑娃走出窑门就想起鹿兆鹏把一块冰糖塞到他手里的情景。冰糖美妙的甜味儿使他痛哭。他对自己发誓说长大了挣下钱了就买一口袋冰糖。兆鹏第二回塞给他一块水晶饼他扔到草丛里去了。鹿兆鹏现在是令人瞩目的白鹿初级学校的校长，穿一身洋布制服，留着偏分头发，算是白鹿镇上的洋装洋人了。自己是个连长工也熬不成只能打短工挣零碎钱的穷汉娃，连祠堂也拜不成的黑斑头儿。他偶尔在打工归来路过学校旁侧的小路时撞见散步的兆鹏，匆匆打一声招呼就走掉了，一个堂堂的校长与一个扛活的苦工之

间已经没有任何联系。直到走进学校的大门，黑娃仍然猜不着兆鹏找他的事由。学校里很静，三四个糊着白纸的窗户亮着灯光。黑娃问了人找着了兆鹏的房子。兆鹏穿着一条短裤正在擦洗身子，说：“啊呀稀客随便坐！”兆鹏出门泼了水回来登上长裤，给黑娃倒下一杯凉茶，俩人就聊起来。

“黑娃你咋搞的？也不来我这儿谝谝闲话？”

“你忙着教书，我忙着打土坯挣钱，咱们都没闲空儿。”

“你这两年日子过得咋样？”

“凑凑合合好着哩。”

“你打短工挣的粮食够吃不够？”

“差不了多少够着哩。”

“你住的那间窑洞浑全不浑全？”

“没啥大麻达倒塌不了。”

“你百事如意哟！”兆鹏揶揄地说，随之刻意地问，“你偷回来个媳妇族长不准你进祠堂拜祖，你心里受活不受活？脸上光彩不光彩？”

“你放屁！”黑娃像遭到火烧水烫似的从椅子上弹起来，脸色骤变，“你当校长闲烦了是不是？想拿穷娃寻开心了是不是？”

“骂得好黑娃。黑娃你骂得好。使劲骂，把你小时候骂过的那些脏话丑话全骂出来，我多年没听太想听你骂人了。”兆鹏笑着催促说，“你怎么只骂一句就不骂咧？”

黑娃鼻腔里哼了一声，转身朝门口走去。兆鹏赶过来抱住他的肩头："对对对呀，这举动才像黑娃的举动。听不顺耳的话脖子一拧眼一瞪，拔脚转身就走，我记得黑娃你自小就是这号倔豆脾气。"

黑娃气躁躁地问："你到底要干啥？"

"没事就不能叫你来谝谝吗？你忘了咱们哥儿弟兄的情分了。"兆鹏反倒责怪黑娃，"到我这儿来放得畅畅快快的，甭摆出拘拘束束的熊样儿。问啥都是'好着哩''差不多'。我跟你怎么说话？"

黑娃释然笑笑："你是校长嘛！"

兆鹏不介意地说："我当校长又没当你黑娃的校长，你躲我避我见了我拘束让人难受。"

黑娃解释说："你不知道哇，我天南海北都敢走，县府衙门也敢进，独独不敢进学堂的门，我看见先生人儿就怯得慌慌。你知道，这是咱们村学堂那个徐先生给我自小种下的症。"

"你真了不起黑娃。"兆鹏转了话题，"我在咱们白鹿村只佩服一个人，你猜是谁？就是你黑娃。"

"我？"黑娃撇撇嘴角自轻自贱地说，"黑斑头一个。"

"你敢自己给自己找媳妇——"兆鹏说，"你比我强啊！"

黑娃警觉地瞪起眼："你又要笑我了？"

兆鹏从椅子上站起来，慷慨激昂地说："你——黑娃，是白鹿村头一个冲破封建枷锁实行婚姻自主的人。你不管封建礼教那一套，顶住

了宗族族法的压迫，实现了婚姻自由，太了不起太伟大了！”

黑娃却茫然不知所措：“我也辨不来你是说胡话还是耍笑我……”

“这叫自、由、恋、爱。”兆鹏继续慷慨激昂地说，“国民革命的目的就是要革除封建统治，实现民主自由，其中包括婚姻自由。将来要废除三媒六证的包办买卖婚姻，人人都要和你一样，选择自己喜欢的女子做媳妇。甭管族长让不让你进祠堂的事。屁事！不让拜祖宗你跟小娥就活不成人了？活得更好更自在。”

黑娃惊恐地瞪大眼睛听着，再不怀疑兆鹏是不是耍笑自己了，问：“你从哪儿趸来这些吓人的说词？”

“整个中国的革命青年都这么说，这么做。乡村里还很封闭，新思想的潮水还没卷过来。”兆鹏真诚而悲哀地说，“我尽管夸赞你，我自个想自由恋爱却自由不了……我都有些眼红你，佩服你。”

“噢呀——”黑娃恍然大悟，被兆鹏的真诚感动了，“你娶下媳妇不回家，就是想自……”

兆鹏说：“我还没屈服，斗争比你复杂……”

黑娃深深地受了感染，对兆鹏的真诚信赖更为感佩：“你叫我来就为说这话吗？早知这样我早就来了。村里人不管穷的富的男的女的老的少的都拿斜眼瞅我，我整天跟谁也没脸说一句话。好呀兆鹏……你日后有啥事只要兄弟能帮得上忙，尽管说好咧。”

兆鹏就直率地说：“我准备烧掉白鹿仓的粮台。你看敢不敢下手？”

黑娃不由地“啊”了一声，从椅子上弹起来，吃惊地盯着兆鹏。如果这话由白鹿村任何一个愣头庄稼人说出来，他也许不至于如此意料不及；堂堂的白鹿仓第一保障所乡约鹿子霖的儿子，白鹿镇县立初级小学的校长鹿兆鹏怎么会想到要烧驻军的粮台？他家的粮食虽然也交了，但绝不会像穷汉家为下锅之米熬煎吧？他做先生当校长挣的是县府发的硬洋与粮台屁不相干，文文雅雅的先生人儿怎么想到要干这种纵火烧粮无疑属于土匪暴动的行径？他的脑子里一时回旋不过来，瞪着吃惊的眼睛死死盯着鹿兆鹏而不知说什么。

兆鹏问：“你知道不知道征粮的这一杆子队伍是啥货吗？”

黑娃说：“听人说，城里今日来一个姓张的头儿，明日又来个姓马的把姓张的赶跑了，后日又来个姓郭的把姓马的撵走，城墙上的旗儿也是红的换蓝的，蓝的又换黄的，黄的再换成红的。我一满弄不清，庄稼汉谁也闹不清。”

“这是一帮反革命军阀。”兆鹏说，“国民革命军正从广州往北打，节节胜利。北京军阀政府纠合全国的反动派阻止革命军北来，现在围城的刘家镇嵩军就是一股反革命军队。西安守城的李虎杨虎二虎将军，都是国民革命军。”

黑娃听不懂只是“噢噢”地应着。

兆鹏说：“镇嵩军刘军长是个地痞流氓。他早先投机革命混进反正的队伍，后来又投靠奉系军阀。他不是想革命，是想在西安称王。河南连年灾害，饥民如蝇盗匪如麻，这姓刘的回河南招兵说，‘跟我当兵杀过潼关进西安。西安的锅盔一拃厚面条三尺长。西安的女子个个赛过杨贵妃……’他们是一帮兵匪不分的乌合之众。”

黑娃大致已听明白：“噢！是这么些烂货！”

兆鹏说：“把粮台给狗日烧了，你说敢不敢？”

黑娃倒显出大将风度：“烧了也就给他狗日烧咧。咋不敢。”

兆鹏说：“你要是愿意干，咱俩就放这把火。给白鹿原上的人看一场冲天大火。”

黑娃已经鼓舞起来：“烧那个粮台太容易了。那一杆子兵料就百姓给他们杀鸡的把戏儿镇住了，一个个放心地睡觉哩。一笼麦秸就把它烧光了。”

这当儿，从房子的套间走出一个人来，黑娃看出是韩裁缝，不由一惊。韩裁缝是去年迁到白鹿镇的客户，租下两间门面房，用脚踏机器给人缝衣服挣钱，谁也弄不清他是哪里人。赶集的人像看西洋景儿一样看他双脚踩动机器踏板，发出喳喳喳连续不断的响声，一支铿亮的针上下窜动，把布片缝结在一起。围观的人虽然很多而生意却十分萧条，只有学校教员和少数学生掏钱请他缝制制服，庄稼汉无论穷人富人都只是看看热闹而已。韩裁缝坦然笑笑说：“放火烧粮台，我也搭一手。”黑娃也就明白了，不需再问。三个人在煤油灯下进行具体实施方案的密谋，从哪儿翻墙进去，先烧哪里后点哪里，无论如何要把井绳给藏起来，点着了火吊不上水来。三个人约定如何用暗号联系，具体分工都经过再三斟酌。黑娃拍拍脑门说：“你这洋油（煤油）灯有一股臭味儿，熏得我头昏脑涨直想吐。”

终于等来了一个刮风的夜晚。三个人从三面的围墙上分头爬上去。大门口有一个卫兵在转悠，院子里有一个卫兵在转悠。黑娃先跳进院子，绕着院里堆积的粮食转到卫兵身后，朝他脑袋上拍了一砖，

卫兵就软软地倒下去。他从后腰里取下臭气熏人的煤油筒儿，拧开螺丝盖儿，把煤油泼在那一排房子的门板上，摸出了洋火匣。黑娃自小使用的是火镰火石拼打火星点燃煤纸，没有用过洋火。他在兆鹏屋里试着擦燃过两根黑色的洋火棒儿，比火镰火石方便多了，什么时候能买得起洋火就好了。黑娃按约定的方案划着了洋火，噗的一声冒出一股蓝色火焰，泼上煤油的木板门就腾起了火光。大门口的卫兵一声惊叫，放了一枪。黑娃已绕过房子跳上墙头，瓦顶粮仓和院中用油布苫着的粮堆几乎同时起火。黑娃爬上墙头并不急于逃走，看着那个卫兵在院子里呼喊、放枪，样子很狼狈。房子里的乌鸦兵开始嚷叫呼喊起来，率先冲出火门的兵们哇哇哭叫着在院子打滚灭火。黑娃看着迎风飞舞的火焰已经冲上仓库和那排房子的屋檐，就跳下墙走了。他跑回自己的窑洞，把正在熟睡的小娥拉起来，让她看火的壮观。小娥走出窑门就叫了一声："妈呀！"西边的天空一片通红。黑娃说："粮台烧着了。"小娥说："真有胆大的冷娃哩，敢烧粮台！"黑娃说："白狼放的火。"小娥问："白狼在哪达？"黑娃说："白狼在你尻子后头站着。"小娥惊疑地说："你是白狼？你胡说……噢呀！怪道来我看你这几天鬼鬼祟祟的……"黑娃就不吭声了。

村庄里骤然骚动起来，传出嘈嘈杂杂说话的声音，男人女人们站在街巷里观赏大火的奇观。火焰像瞬息万变的群山，时而千仞齐发，时而独峰突起；火焰像威严的森林，时而呼啸怒吼，时而缠绵呢喃；火焰像恣意狂舞着的万千猕猴万千精灵。人们幸灾乐祸地看着自己送进白鹿仓里的麦子顷刻变成了壮丽的火焰。黑娃站在窑垴的崖畔上观赏自己的杰作，小娥半倚在他的臂弯里。村里传来士兵们气急败坏的嚷嚷声，拗口聱牙的河南口音听来愈觉别扭，逼赶人们去救火。士兵们忽视了村子外头崖坎下的窑洞，只在村庄里打门叫户厉声吆喝。黑娃跑回窑洞挑起两只木桶，挣脱了小娥的阻拦："我到跟前去看看热

闹。”他从村子中间的大涝池挑了两桶水，夹在担桶和端盆的男人们中间，走过村巷走过白鹿镇街道就无法前进了，大火炙烤得人的脸皮疼痛，滚滚浓烟呛得人睁不开眼睛，于是就把水随地泼掉挑着空桶往回走。那火已经无法扑救。赤臂裸腿的人根本无法靠近火堆一步。被烧着的麦粒弹蹦起来，在空中又烧着了，像新年时节夜晚燃放的焰火。大火烧到天亮，耀丽的光焰使东原上冒起的太阳失去魅力。

随后，白鹿镇最显眼的第一保障所的四方砖砌门柱上，发现了一条标语：放火烧粮台者白狼。字迹呈赭红色，是拿当地出的一种红色黏土泡水以后用笤帚圪垯刷写的，在蓝色的砖上很醒目很显眼。鹿子霖进门时看到门口围着那么多人尚不晓得发生了什么事，及至拨开人群看见赭红色的标语时，脸色就变得蜡打了一样。他没有进门就去找杨排长报告。杨排长腰里挎着盒子枪跑来了，满脸灰乌，两眼又红又黏像刚熬化的胶锅，插在腰里的盒子枪上的红绸已经烧得只留下短短一截。杨排长拔出盒子枪照空中放了一枪，咬牙切齿地喊：“滚开滚开，都滚他娘那个臭屄！”围观的人哗的一声作鸟兽散。杨排长立即命令士兵进行搜查，搜查与标语有关的人和器物。检查谁家有红土的遗留物，泡过红土的瓦盆铜盆和瓷盆，以及用来蘸红土浆写字的笤帚圪垯。

白鹿仓的所有房子和麦子一起化为灰烬，杨排长领着他的士兵驻进白鹿镇初级小学校里，学生们全都吓得不敢来上学了。士兵们从各个村庄农户家里搜来的盆盆罐罐笤帚圪垯堆满了宽大的庭院，却没有一件能提供任何可靠的证据。这个愚蠢的破案方法无论怎样愚蠢，三十几个士兵仍然认真地照办不误，从白鹿村开始搜查一直推进到周围许多村庄里去。三个纵火的“白狼”一个也没有被列为重点怀疑对象，韩裁缝照样把裁衣案子摆在铺子门口的撑帐下，用长长的竹尺和白灰

笔画切割线，士兵们连问他的闲心都不曾有过。听到士兵们挨家挨户搜查罪证，黑娃就打发小娥躲到田地里装作挖野菜去了，他担心的不是纵火的罪证而是模样太惹眼的小娥。三个士兵趾高气扬走进窑洞翻腾完了就诈唬说：“我看你这家伙像是放火来！”黑娃嘿嘿一笑：“老总，你们又没撞我的嗓子，我伤老总弄啥？我给老总只交了一斗麦，又不是三石五石……”士兵们从鸡窝旁边拎起那个积着厚厚的一层尿垢的黑色瓦盆，摔碎了。

鹿兆鹏在杨排长头天晚上驻进学校时虽然表示了坚决拒绝，但终了还是接受了既成事实。杨排长对鹿子霖的校长儿子的不友好态度无心计较，却也不曾想到这位俊秀的校长就是纵火的“白狼”。过了两三天，鹿兆鹏晚饭后对焦躁不安的杨排长说：“杨排长，能在纸上驰车奔马，才能在沙场上运筹帷幄——杀两盘？”杨排长很快列出一串纵火者的审查名单。

白嘉轩听到传讯以后肺都要气炸了，他不是害怕牵涉火案，也不是害怕蒙受冤枉，主要是不能忍受这样的侮辱。鹿子霖用极其同情的口吻传讯他时，白嘉轩正在自家上房明厅的大方桌旁吸水烟，“咚”的一声把水烟壶蹾到桌子上：“这个河南蛋瞎眼了不是？”鹿子霖说：“你去和杨排长解说一下，我也再给他解说解说。你可别硬顶——他可是烧疼了尻子的猴儿，急了就不管谁都抓。”说着，门外走进三个端着枪的士兵：“还有白孝文，也是个会写字的，一块走。”

白家父子走出门了，陪着鹿子霖，跟着三个端枪的士兵。白嘉轩看着白鹿镇上驻足观看的行人，面子上的侮辱已使他煞白了脸，他愈加挺直了腰杆儿走着。杨排长在他的临时住屋里对白嘉轩父子说：“不要惊慌。请留下手迹就行了。”然后引着他们父子进入一间教室，桌子上放着一盆红黏土泡成的泥浆，盆里放着一只笤帚圪垯。教室的墙壁

上已经写满了字，全是“放火烧粮台者白狼”。白嘉轩气冲冲捞起蘸了泥浆的笤帚写下同样一行字，白孝文也写了。白嘉轩写罢气不可捺，问：“常言说捉贼捉赃，抓奸抓双。老总你凭啥把我糟践这一程子？”杨排长也没好气地说：“怎么糟践你了？叫你写几个字也算糟践你？”白嘉轩冷笑说：“这算写的什么字！是红事的对联还是丧事的引路幡子？”杨排长突然转过身来，紧盯着白嘉轩：“你说话嘴放干净点儿。甭说你是什么狗屁族长、官人，你敢再说半句不三不四的话，老子就一枪把你撂倒……”鹿子霖立即劝着拉着杨排长收回枪，孝文推着父亲出了教室走到院子，杨排长追到台阶上还在嚷嚷：“你发鸡毛传帖煽动闹事交农，本来就不是个好东西！”白嘉轩被翻起老账更加气恨羞恼。

大火整整烧了三天三夜，白色的粉灰漫天飞扬，家家的屋瓦和院子里都沉下厚厚的一层白色粉末儿。明火熄灭以后，未燃尽的粮堆仍然在夜里透出灼人的红光，整个村庄和田野里都弥漫着一股馍馍被烤焦了的香味儿。一场骤来的暴雨彻底浇灭了余火，洗刷了屋瓦上树叶上和秋苗嫩叶上的灰粉。天晴以后，附近的村民套着牛车推着独轮小车挑着葛条笼去装灰，那些麦子烧过的灰烬和土粪掺搅以后施到田地里是庄稼和棉花的绝好肥料，他们争着装灰的劲头和往这里交麦子一样急迫。

大约过了半月，驻守白鹿仓的杨排长又领着他的士兵来了。杨排长先叫来总乡约田福贤，召集了九个保障所的九个乡约和九十八个大小自然村的官人，在白鹿镇的学校里开会。杨排长走路有点跛，那是团长下令打了二十军棍致成的骨伤。杨排长说：“在白鹿原烧掉的军粮，还得从白鹿原上补起来。烧了再征，叫他再烧，再烧再征。这回是一亩一斗一人一斗。再烧了再加。”有人求告说：“老总，军队要吃粮这道理很明白，自古军人由民人养也都明白，粮嘛烧了自然得再

征。只是麦收后刚刚征过一茬，再连着征怕不好弄。是不是到秋收后再征？这样也好给百姓说……”杨排长一挥手就打断了他的话：“这号话再不要说。后日开始征粮，一律送到这个学校来。明日白鹿镇逢集，枪毙烧粮台的白狼。谁敢抗粮不交，不管是官人民人一律和白狼一样惩治。”

第二天，在白鹿仓围墙外的旷野里，三个被五花大绑着的人被缚在木柱上，蓬头垢面，衣服褴褛，垂头耷脑，实际已经奄奄一息了。人山人海般拥挤着看热闹的乡民。三十几个士兵排成一排，举起了枪，一片推拉枪栓的声音，架势和射鸡（击）表演一模一样。杨排长从腰里拔出盒子枪，枪把上已经换上一条新的火焰般耀眼的红绸，动作不再优雅而更显威武，朝天放了一枪，叭的一声响过，就接连响起密集的枪声。那三个“白狼”没有丝毫反应，没有哭也没有叫，看客们怀疑他们在挨枪子之前是否还活着？枪子击中他们身体的各个部位，拉出一条血流。他们连抖动一下的反应也没有，倒使围观的人觉得尚不如射杀活鸡场面热烈。

几天后，一个可怕的传言在各个村巷里不胫而走，那三个被打死的“白狼”其实是三个要饭的。

第十二章

朱先生已不再教学。生员们互相串通纷纷离开白鹿书院，到城里甚至到外省投考各种名堂的新式学校去了；朱先生镇静地接受那些生员礼仪性的告别，无一例外地送他们到白鹿书院的门口，看着他们背着行李卷儿走下原坡；后来朱先生就催促他们快些离开，及至最后剩下寥寥无几的几个中坚分子时，他索性关闭了书院。彭县长亲自招他出马，出任县立单级师范校长。干了不到半年他就向彭县长提出辞呈。彭县长大惑不解：“我听说你干得很好嘛！他们都很敬重你呀！怎么……”朱先生笑笑说：“我是谁聘的校长哇？！”彭县长连连摇头否认：“那是先生多心了。”随之就询问起辞职的真实原因，是经费不足还是有谁闹事？如果有捣蛋的害群之马，把他干脆解聘了让他另择高枝儿就是了，何必自己伤情动气辞职？朱先生朗然笑着否认了县长的猜疑，自嘲地说：“原因在我不在他人。我自知不过是一只陶钵——”彭县长一时解不开。朱先生解释说：“陶钵嘛只能鉴古，于今人已毫无用处。”彭县长诚恳地纠正说：“先生太自谦了。这样吧，你干脆到县府来任职。”朱先生摇摇头说：“我想做一件适宜我做的事，恳请县长批准。”彭县长畅快地说：“只要先生悦意做的事尽可以去做，如需卑职帮忙尽管说出来。”朱先生就说出经过深思熟虑的打算：“我想重修本县县志。”

朱先生重新回到白鹿书院，组织起来一个九人县志编撰小组，自任总撰。另八位编撰人员全是他斟酌再三筛选的才富八斗的饱学之士，有他旧时的同窗也有他后来的得意门生；他们全是关中学派至死不渝的信奉者追求者，是分布在县内各乡灿若晨星却又自甘寂寞的名士贤达，仁人君子；他们在自己的家乡躬耕垄亩以食以帛，农闲时诵

读批点自尝其味；他们品行端正与世无争童叟无欺，为邻里乡党排忧解难调解争执化干戈为玉帛，都是所在那一方乡村的人之楷模。朱先生一个一个徒步登门拜望，恳请出庐。他们对于编修县志的事十分合意，却几乎一律都要谦让自己才疏学浅，不堪如此重任，既然朱先生偏爱器重，当然是难得的学习机会，锻炼机会，也是为本县贡献微薄心力的机会。他们和朱先生聚集在白鹿书院，开始了卷帙浩繁的庞大工程。他们披阅历代旧志，质疑问难，订正谬误，删繁补缺，踏访民间，工作细密而又严谨。黄昏时分，他们漫步于原坡河川，赏春景咏冬雪；或纳凉于庭院浓荫之下，谈经论道，相得益彰。他们感激朱先生把自己从日趋混沌纷攘的世事里拉出来，得到了一个最适宜生存的环境和最可意的工作。

伏天一个溽热难熬的傍晚，树叶纹丝不动，湿热的气流从低洼的河川里膨胀起来，充溢到原坡的沟壑间，令人窒息。朱先生和他的同人们坐在院子里纳凉，书院四周和院庭里高可参天的古柏古槐和银杏树，层层叠叠的枝叶遮挡着灼人的光焰，在酷热喧嚣的伏天独辟一方清爽宜人的乐土福地。彭县长走进院子，慨然道："这大概是全中国最宜人的一坨地方啰！"朱先生和诸位同人一齐站起来，礼让彭县长坐下。朱先生说："彭县长难得闲暇……"彭县长苦笑着摇摇头，自嘲地说："卑职县长徒具虚名，实实在在只是一名粮秣官儿了！"

近日，乌鸦兵的一个团长带着百余名士兵进驻本县指挥一切领导一切，实际上是一切都不领导也不指挥，只是领导指挥为围西安城的二十万人马征集粮草，彭县长以及他的全部官员都围绕着粮秣一件事奔忙。他气愤地说："这些乌鸦兵肯定是世界上最坏的一杆子兵。他们连一年收几季庄稼都搞不清，只是没遍没数地征粮。粮秣已不是征而是硬逼，现在已经开始抢了。百姓从怨声载道到闭口缄言，怕挨枪把

子啊！”彭县长说着就激奋起来，“我为民国政府一介县长，既然无力回天，只好为虎作伥。想来无颜见诸位仁人贤达，更愧对滋水父老啊！”说时喉哽语塞，热泪涌动。在座的先生们接连发出沉痛悲怆的叹息。朱先生说：“得熬着。”彭县长说：“熬不住了哇！我的国民县府成了乌鸦窝啰！那些白腿子乌鸦从早到晚出出进进吵吵呱呱骂骂咧咧，满嘴粗话浑身匪气，叫人听着硌耳看着碍眼，我出了县府大门就不想再进去。”朱先生还是重复着一句话：“还得熬着。”彭县长苦笑着说：“朱先生，我来跟你编县志行不行？”朱先生笑着说：“我敢要你吗？”彭县长发泄一通，唠嘈一通，倾吐一通，觉得心头松弛了，又轻声问：“朱先生，乡民盛传你能打筮算卦，你给我掐算一下，乌鸦啥时候飞走？”朱先生故作神秘地说：“天机不可泄漏。”众人都笑了。彭县长又向朱先生索要一帧手迹。朱先生慨然应允，取来笔墨纸砚，在院中石桌上铺开宣纸，悬腕运笔，一气呵成四个大字：

好人难活

第二天清早，厨师从县城买菜回来告诉朱先生，县城纷传彭县长昨夜弃职逃走，下落不明。朱先生愣怔一下随之叹惋：“他熬不住了。”

末伏一个雷雨之后的傍晚，暑热驱散，天宇澄碧，朱先生和他的同人们倾巢而出到原坡上去散心，享受骤雨初霁后的山川气韵，结果一个个沾着满脚黄泥，满腿湿漉漉地回到书院。门房的徐秀才神情紧张地把一封信交给朱先生说：“两个兵送来的。”朱先生接住拆开一看，瞅着众位先生狐疑的脸色说：“唔！狼来了！”随之吩咐徐秀才说：“你到村子里去买两只狗来，买不下就借。要大狗恶狗。”徐秀才眨巴着眼问：“先生买狗做啥？”朱先生笑说：“狼来了就得狗咬嘛！”随之又吩咐厨师说：“你明日给咱做一样菜，把豆腐跟肉熬成一锅。”

厨师说：“肉耐火豆腐不耐火，熬不到一起。”朱先生说：“你就往一锅里熬。”

第二天，朱先生和他的八位编辑先生按部就班在各自的屋子里做事，院子里异常静谧。大家都在期待狗叫。两只蓝色颈羽的小鸟从银杏树枝上跳到房檐上，又飞落到院子里湿漉漉的方砖上，发出一串串金子似的叫声。第一声狗叫惊得两只小鸟箭一般射向空中。两只狗的叫声愈来愈疯狂，混沌狂乱的吠声在书院里的墙壁上碰撞回旋。狗咬了一阵就停息下来，大约来人退走离开了。突然狗又疯狂地咬起来，大约来人又踅摸到门口来了。八位先生全都站在各自的窗下瞅着大门口，又瞅瞅朱先生的书房。狗咬声又停下来。朱先生在两只狗第三次咬响的时候走出书房，疾步走过院子，左手习惯性地撩着长袍的衩口，喝退了狗，把来人领进大门，在院子里朗然宣呼：“刘军长来看望诸位，快出来迎接。”同人们纷纷走出屋子与一身戎装的刘军长打躬作揖。刘军长说：“打扰打扰。”朱先生说：“哪里哪里。机缘难得。错失今日，怕是再也难得一睹将军风采了。”刘军长爽朗地说：“待我坐定省城，一定常来拜望先生。”朱先生只顾招呼大家在院里石凳上坐下。刘军长问：“听说先生在编县志？县志里头都编些啥呀？”朱先生说：“上自三皇五帝，下至当今时下，凡本县里发生的大事统都容纳。历史沿革，疆域变更，山川地貌，物产特产，清官污吏，乡贤盗匪，节妇烈女，天灾人祸……不避官绅士民，凡善举恶迹，一并载记。”刘军长问：“我军围城肯定也要记入你的县志了？”朱先生说：“你围的是西安府不是围的滋水县，因之无权载入本志；你的士兵在白鹿原射鸡（击）征粮及粮台失火将记入本志；你的团长进驻本县吓跑县长，这在本县史迹中绝无仅有，本志肯定录记。”刘军长哈哈笑起来：“是吗？这个县长也太胆小了。”朱先生也打趣说：“县长软得像块豆腐。”

刘军长笑毕，说他今日来有三件大事求拜先生。头一件，围城成功进驻省城以后，将邀请朱先生给他做私人老师，教诲圣书习练笔墨，因他出身草莽识不下一箩筐大字。朱先生说：“我得先讲一条，你得脱了这身戎装，把枪扔了，我才敢伴君念书习字。我比彭县长的胆子更小哩！”刘军长满口答应：“一旦拿下西安，我就把枪撂到城河去，兵交给旁人去带。我只做省主席一席文官。”朱先生说：“那么这件事就等你进城以后再说。第二件呢？”刘军长说：“请先生赐赠一幅字画儿。”朱先生说：“我只会写字不会画画儿。人常说‘乘兴挥毫’，兴所至而毫生辉。待军长攻城成功，我定当挥毫庆贺。再说第三件吧！”刘军长不好强求，就说出第三件事来：“我一进关中就闻听先生大名，说先生能识天相，能辨风雨阴晦，能知吉凶灾变，能预测后事。请先生给我算一卦，何时围城成功几月进城？”朱先生不假思索一口回绝：“刘军长你进不了城。”

刘军长猛乍愣住，脸色骤变。同人们也都绷紧了脸瞪瓷了双眼气不敢出。朱先生随之款款地笑了：“我两只柴狗把门，将军尚不得入，何况二虎乎？”当作笑话说罢就哈哈大笑起来。众位先生也都轻轻吁出一口闷气。守城的两位将军的名字里都有一个虎字，人称二虎。军人尤其忌讳这个。刘军长说：“这种不吉利的玩笑，只有先生你才敢说到我当面。”朱先生接住说：“只有军长你来，我才有兴头儿开这玩笑。”

“既是玩笑，且不管它。”刘军长说，“那就请先生正儿八经给我算一卦，何时攻城成功？”朱先生扬起头闭上眼，用右手的大拇指在另外四个指头上灵巧地弹着掐着，口中念念有词：“城里守军二万不足，城外攻方二十万有余，按说是十个娃打一个娃怎么还打不过？城里被围五个月之久，缺粮断水，饿死病死战死的平民士兵摞成垛子，怎么还能坚守得住？噢噢噢，账还有另一个算法，城里市民男女老少不下五

十万，全都跟二虎的将士扭成一股坚守死守。要把那五十万军人民人全部饿毙……大约得到秋后了。对！刘军长——”朱先生睁开眼说，“秋冬之交是一大时限。见雪即见开交。”刘军长听了忽然从石凳上跳起来：“先生真是神啊！见雪即见开交。正应了我的命！我的字是雪雅。”

朱先生当即招呼他们吃饭，厨师给每人送上一碗豆腐烩肉的菜和两个蒸馍。刘军长吃了一口就咧着嘴皱起眉头：“朱先生你的厨师是不是个生手外八路？”朱先生说：“这是方圆有名的一位高手名厨。”刘军长说：“豆腐怎能跟肉一锅熬？豆腐熬得成了糊涂熬得发苦肉还是半生不熟嚼不烂。哈呀竟是名厨高手？”朱先生说：“豆腐熬肉这类蠢事往往都是名师高手弄下的。”

是年初冬，围城的军队已经换上冬装，经过整整八个月的围困，仍然未能进城。刘军长眼巴巴等待着大雪降止，不料从斜刺里杀来了国民革命军的冯部五十万人马，一交手就打得白腿子乌鸦四散奔逃。刘军长从东郊韩氏冢总指挥部逃走的时候，漆黑的夜空撒落着碎糁子一样的雪粒儿。雪粒儿在汽车顶篷上砸出密集的刷刷啦啦的响声，刘军长忽然想起朱先生为他预卜的“见雪即见开交”的卦辞来，似乎那碗熬成糊涂熬得发苦的豆腐和生硬不烂的肉块也隐喻着今天的结局，喟然慨叹：“这个老妖精！”朱先生后来在县志“历史沿革”卷的最末一编“民国纪事”里记下一行：镇嵩军残部东逃过白鹿原烧毁民房五十七间，枪杀三人，奸淫妇姑十三人，抢掠财物无计。

杨排长和他的士兵从白鹿镇初级小学校撤走时没有给田福贤打招呼。田福贤睁开眼睛时立即感觉到奇异的寂静，他穿上棉袄蹬上棉裤跳下床来，院子里落着一层薄薄的雪花。他双手系着裤带用肩头牴开隔壁教室的门板，不由地“哦”了一声就停在门槛上。士兵们已不见踪

影，靠墙并拢的一排课桌上留着铺垫的稻草帘子。那些帘子是不久前由他从滋水川道产稻区征收起来用牛车拉上白鹿原来的。被褥揭光了。桌底下扔着穿洞的破鞋、朽断的裹腿布条、破旧的烂衫子烂裤头。他转身奔到杨排长住的单间房子，床板上也只留下一张稻草帘子，桌上地上七零八落扔着征集粮草的名单和条据之类。他断定这是永远的逃离而不是暂时的撤退。他一脚踢翻了木炭盆架，炭灰里滚出几粒枣核大小的红红的炭块。他疾步赶到鹿子霖家来。“子霖，晌午到你的保障所议事。”田福贤说，“咱们当狗的日子到今日个为止。”

“咱们当狗的日子到此为止。”田福贤在晌午召集的议事会上重复了这句话，“这杆子乌鸦兵把人折腾够了。”九位乡约再也压抑不住，敞开嗓子嘲骂那一杆子河南蛋全是瞎熊，诅咒他们注定不得好死。

狗的比方虽然刺耳却很准确。杨排长和他的白腿子乌鸦飞来白鹿原的整整八个月时间里，田总乡约以及属下的九位乡约实际都成了供杨排长驱遣的狗，他带着他们认村领路，到一家一户庄稼汉门楼里去催逼粮食草料，田总乡约在杨排长眼下常常流露出狗在凶残暴戾的主人面前的那种委屈和谄媚，他们九个乡约又何尝不是无奈的狗的眼色？田福贤很理解属下的心情，让他们把当狗的委屈酸辛和愤恨宣泄出来。整个白鹿原此刻都在宣泄着愤怒。白腿子乌鸦兵逃跑的消息像风一样迅速刮过大大小小的村寨，愤怒的宣泄随之就汹涌起来，被烧的房子被残害的死者和被奸淫的女人很自然成为人们议论的话题。田福贤郑重地说：“有两件急迫的事要做：一是给遭到逃兵烧杀奸掠的人家予以照顾，二是白鹿仓被烧毁的房子该修建了。”接着讲出了对这两件事的具体构想，乌鸦兵逃走时来不及带走贮存在学校教室里的粮食，正好可以用作这两项大事的开销。“各位乡约回去发个告示，告知乡民到山里去掮木料，丈椽两根付麦一升，丈五椽一根一升，檩条一

根三升，独檩一根五升，其余大梁担子柱子按材料论麦，推土和泥搬土坯拉砖抛瓦一应打下手做小工杂活的每日工粮一升，管三顿饭。这样亏不亏下苦人？”九位乡约听罢全都惊叹咋唬起来，这样宽厚的工价无异于施舍赈济，怕只怕进山掮木料和前来做小工的人要碰破头了；有人嗔怨总乡约心太善了甚至可能要坏事，全都拥来混饭吃谁管得住？田福贤雍容大度地一挥手说：“只要大家觉得不亏待乡民就成了，旁的事甭担心。”

关于照顾灾难户的事，田福贤是在听到各乡约谈到他们那里发生的事以后才想到的。他昨晚睡在小学校里一无所知，所以一时拿不出具体方案。九位乡约经过一番商议，决定对遭到火劫的三十多户人家视其损失大小给以五至八斗不等量的补偿，而在对那十几个被奸污的妇女的家庭要不要照顾的问题上发生了意见分歧，田福贤最后出来定夺，以不予照顾为好，避免这样的丑事因为照顾而再度张扬。

白鹿原骤然掀起一股短暂的进山掮扛木料的风潮，强壮的男人赤手空拳三五成伙地赶进秦岭深山，掮着用葛藤挽缚着的松椽或檩条走出山来，在被大火烧光的白鹿仓的废墟上卸下木料，接过验收人员用毛笔草画的收条，然后赶到白鹿镇初级小学校去领取麦子。人们扛着粮袋走出学校大门时抑止不住泛到脸上的喜悦之情，心悦诚服田总乡约虽然有一双凶厉的圆轱辘眼睛却怀着一腔菩萨的善心柔肠。九位乡约全都投入到这场庞大的工程里来，各司一职或验收木料或兑付麦子或领人施工，全都忠于职守，主动积极，而且对乡民和蔼谦恭。

新任的县长已经走马上任，姓梁。县党部的牌子也正儿八经地挂在县府门口，县党部书记姓岳。田福贤经常去县里开会，就将整个工程交由鹿子霖统领。鹿子霖对又要去县府开会的田福贤说：“你走你走，你尽管放心走，误了工程你拿我的脑袋是问。”田福贤才放心地离

去。鹿子霖深眼睛里蕴含着微笑，走到正在盘垒地槽基础的乡民跟前：“干一阵就歇一会儿抽袋烟，谁要是饿了就去厨房摸俩馍咥喽！”结果惹得乡民们哈哈笑起来。大家干得更欢了，没有哪个人蹭皮搓脸好意思不到饭时去要馍吃。鹿子霖又背着双手走进学校储存粮食的教室，站在粮堆前瞅着给捐木料的乡民兑付麦子。粮食装满木斗后，发粮的人用一块木板沿着斗沿刮过去，高出斗沿的麦子被刮落到地上，这是粮食交易中最公正的“平斗”。鹿子霖说：“把刮板撂了。把斗满上。上满！”人们都轻松了许多，鹿子霖便又转身走掉了。

从射鸡（击）表演开始弥漫在白鹿原八个月之久的恐怖气氛很快消除了，田总乡约和他属下的九个乡约宽厚仁德的形象也随之明朗起来。赶在数九地冻之前，白鹿仓废址上的一排新房全部竣工，坍塌的土围墙的豁口也补修浑全，破旧低矮的大门门楼换成砖砌的四方门柱，显现出全新的景象。

白嘉轩在乌鸦兵逃离后的第五天鸡啼时分，就起身出门去看望在城里念书的宝贝女儿灵灵。

西安解围的头一天傍晚，白鹿村一个在城里做厨工的勺勺客回到村里。他一走进白鹿镇就被人们围住，纷纷向他询问被围期间城里的情况儿；他苦不堪言地应对几句就扯身走了，在白鹿村村巷里又遇到同样的围堵和同样的询问；他急慌慌走进家门，在院子撞见老娘就爬跪在地上哭得直不起身来，村民们又赶到院里来打听探望。勺勺客哭喊说：“妈呀！我只说今辈子再见不了你哩！”白嘉轩和母亲白赵氏妻子白吴氏先后三次到这个勺勺客家里来打问灵灵的消息，勺勺客的回答都是一句话：“没有见灵灵。”

接着两天，白鹿村在城里当厨工的、做相公（学徒）的、打零工的、抹袼褙的、拉洋车的，以及少数几个做生意开铺子的人，都先后回到村子来探望父母妻儿，带回并传播着围城期间大量骇人听闻的消息：战死病死饿死的市民和士兵不计其数，尸体运不出城门洞子，横一排竖一排在城墙根下叠摞起来。起初用生石灰掩盖尸首垛子，后来尸首垛子越来越多，石灰用尽就用黄土覆盖，城市里弥漫着越来越浓的恶臭。所有公用或私有的茅厕粪尿都满溢出来，城郊淘粪种菜的农人进不了城，城里人掏出粪尿送不出去就堆在街巷里。从粪堆上养育起来的蛆虫和尸首垛子爬出的蛆虫在街巷里肆无忌惮地会师，再分成小股儿朝一切开着的门户和窗口前进，被窝里锅台上桌椅上和抽屉里都有小拇指大小的蛆虫在蠕动。蛆虫常常在人睡死的时候钻进鼻孔耳孔和张着打鼾的嘴巴，无意中咬得一嘴蛆脓满口腥臭。

白嘉轩问遍了所有从城里回到村里的人，都说没有见过灵灵。那些令人起鸡皮圪塔又令人恶心呕吐的传闻，使四合院里的生机完全窒息，先是妻子白吴氏，后是老娘白赵氏，接着是白嘉轩自己，都在两天里停止了进食，灵灵的干大鹿三的饭量也减了一半，孝文和媳妇虽然还有部分食欲却不好意思去吃了。到解围的第四天，孝文媳妇向婆白赵氏请示早饭做什么？得到的是“做下谁吃？”她就没有再进灶房。

“四”是不吉祥的数字，隐含着“事”。仙草三天不进食，精神却仍然不减，一会儿去纺线，棉线却总是绷断，一会儿又去搓棉花捻子，又把棉网戳破了。白赵氏干脆站在镇子西头的路边无望地等待。可怕的期待延续到又一个天黑，仙草突然叫了一声“灵灵娃呀”，就从炕边栽跌下去，孝文和媳妇闻声奔过来扶救。白赵氏还站在镇子西边的路口等待。白嘉轩从上房明间走进厢房时，孝文抱着母亲大声呼叫，孝文媳妇正从后纂上拔针刺人中。仙草“哇”的一声哭出来，从孝文的怀

里挣脱出来扑向白嘉轩，接着被儿子和儿媳安抚着躺下来。白嘉轩说：“照看好你妈。我进城去。”

城里人吃早饭时，白嘉轩踏进皮匠二姐夫的铺面门。二姐以为来了顾客，迎到柜台边才发现是乡下弟弟，就惊呼欢叫起来。白嘉轩顿时一块石头落了地，如果灵灵儿进入尸首垛子，二姐一家肯定不会如此平静地吃早饭，也不会开铺门卖货。他坐到椅子上还是忍不住问：“灵灵呢？”

“抬死人去咧！”二姐说，像是看出了弟弟的惊诧，反而用轻淡的语调说，“大家都在抬。有的人挖坑，有的抬死人。坑在城东北墙根下，大得要装下一万多死人。”白嘉轩啊了一声，证实了回到白鹿村的那些人的话不是胡谝冒吹。“我昨个黑间挖了一夜坑，今个黑间还得去挖。”二姐夫说，“灵灵儿前两天也是挖坑，昨儿后晌又改换去抬尸首了。一边挖一边埋。好些尸首只剩下骨头架子，分不清谁的胳膊谁的腿，一混子装到架子车上拉去埋了。”白嘉轩对这些事已经麻木，只抱怨说：“二姐二姐夫你俩人也真是凉凉性子，咋就想不到叫灵灵回乡下去？她婆她妈都三四天水米不进快急疯了！”“兄弟你这人原来不糊涂会想事的嘛！你想想灵灵在我这儿能出啥事？万一出点事我还能不给你说？娃没回原上就是娃平安着哩嘛！”皮匠姐夫说，“你咋连这点窍道都翻不开？”二姐说：“开围头一天我就催灵灵回去，娃说学校里不放假，要按虎将军的紧急命令行事，挖万人坑，抬埋死人，清扫满街满巷的脏物。”白嘉轩悲苦地说：“一家人连火都不烧了。”

正说话间，白灵走进门来叫了一声“爸”就站住了，她看见了父亲一双红肿怕人的鼓出的眼睛。白嘉轩一扬手就抽到她的脸上：“为你险忽儿送了三个人的命！”白灵捂着脸分辩说：“爸你打我我不恼。可我托兆海爷爷给你捎回话去了呀？”白嘉轩这时才知道鹿泰恒早已来过城

里看望上学的孙子兆海。他这时才认出站在灵灵旁边的青年便是鹿子霖的二儿子兆海。鹿兆海有些羞怯地笑笑，证实说：“话是捎回去了。”

鹿兆海穿着一件藏青色制服，头上戴一顶圆制帽，硬质的帽舌上蒙有一层黑色光亮的面，深陷的眼珠和长长的睫毛显示着鹿家的种系特征。“灵灵跟鹿家的二小子怎么会在一起？”白嘉轩心生疑惑，随之闻见灵灵和鹿兆海身上散发出的怪味儿，那是尸首腐烂的气味，令人闻之就恶心，一下子证实了二姐夫说的“抬死人”的话。他说：“把衣服换了，把手上的死人气味洗掉，跟我回原上。”白灵说：“尸首还没抬完还在墙根下烂着，我怎么能走？”白嘉轩说：“等你把城里的死人抬完了，回家正好跟上抬你婆和你妈的尸首。”白灵说：“你回去给婆跟妈说我好好的没伤没病，她们就不急了也就放心了。”鹿兆海插嘴说：“叔吔！白灵当着运尸组的组长，她走了就乱套了。缓过一礼拜运完尸首让她回家，我也早想回咱原上，俺们俩一块回去。”白嘉轩并不理睬兆海，生硬地对灵灵说：“好哇灵灵，你敢不听我的话？”白灵说：“爸呀，我不是不听你的话。你看看那么多人战死了饿死了还在城墙根下烂着，我们受他们的保护活了下来再不管他们良心不安呀！我实话实说了吧，一礼拜也回不去，尸首抬完了埋完了，还要举行全城的安灵祭奠仪式，正在挖着的万人坑将命名为‘革命公园’，让子孙后代永远记住这些为国民革命献出生命的英灵……”白嘉轩吃力地听着这些稀里糊涂的新名词脑袋都木了。白灵说：“二姑给我取俩馍，我得走了。爸你歇一天脚明儿个回去。”白嘉轩想挡却没有再挡，看着二姐给灵灵和鹿家那个二货拿来了馍馍，俩人就出门去了。二姐说：“娃说的也对着哩！尸首不早点抬了埋了活人谁能受得了？快放寒假了，我跟灵灵还有你的俩外甥女儿一块回原上去，我也想咱妈了。”白嘉轩却直着眼珠追问：“鹿家那个二货跟着灵灵前前后后跑啥哩？”二姐猜着了他的意

思，说：“人家是同学，又是革命同志，你那些老脑筋见啥都不顺眼。”白嘉轩说：“二姐你甭跟着瞎叨叨。我挑明了说，你给她说念书就一心一意念书，甭跟鹿家二货拉拉扯扯来来往往。”

白嘉轩草草吃了早饭就告别了二姐和皮匠姐夫，天黑定时踏进了自家的门楼。四合院里已经恢复生气。他昨晚背着褡裢走后不久，鹿泰恒就把灵灵安然无恙的话捎到了。仙草和母亲解除了沉重的负担反而更加思念女儿和孙女，甚至提出俩人结伴去城里看看灵灵瘦了还是胖了。白嘉轩说：“谁也不用去。去了也是白去。咱们为她担惊受怕险忽儿把心熬干，她可是谁也不想，只忙着抬死人埋死人。我远远跑去了，那贼女子连跟我多坐一会儿的工夫都没有。那——是个海兽！”

鹿兆海和白灵在街巷里一边走着一边嚼着馍，装着尸体的架子车擦脚而过，洒下满路的脓血肉汁。他们已经闻不见腥味儿，大口嚼咽香甜的馍馍。鹿兆海说：“白灵，嘉轩伯好像讨厌我？”“那很正常。”白灵说，“他现在更讨厌我，你还看不出来吗？”鹿兆海说：“我一看见嘉轩伯就心怯。我自小好像就害怕大伯。我今日猛不防看见大伯，好像比小时候更心怯了。”白灵说：“怯处有鬼。你肯定是心怀鬼胎。”鹿兆海说：“白灵你听着，如果我壮起胆子跪到大伯脚下叫一声‘岳父大人’，你说大伯会怎么样？”白灵撇撇嘴说：“他把你咋也不咋。可他会一把把我的脖子拧断。”鹿兆海说：“那我就会再叫一声：‘岳父大人，你放开白灵，把我的脖子拧断吧。’你信不信？我肯定会这样说这样做。”白灵佯装叹口气：“那好，我们都等着拧断脖子吧！现在，革命同志，快去抬尸首。”他们走到城墙根下尸体垛子跟前时，正好吃完了两个馍馍，拍拍手就去搬尸体。

围城不久教会学校就停办了。白灵在街上碰见了鹿兆海，俩人对视了半天终于认出同是一个村子里的乡党。鹿兆海说他所在的中学也

停课了，学校里临时办起了国民革命培训班，培训军人市民学生和一切有志于革命的人。白灵跟兆海参观了他们的学校，才觉得自己所在的女子教会学校有点可怜。鹿兆海怂恿她不妨去培训班听听热闹，她就去了。鹿兆海悄声告诉她：“讲课的这位教员是我们原先的国文教员，是国民党员。”又以同样的口吻告诉她说：“这位教员原是我们的英文教员，是个共产党。”白灵问：“你说国民党和共产党哪个……”鹿兆海说：“都差不多。两党合作一致推进国民革命。”白灵从此天天来培训班听讲，有一天对兆海说：“我决定转学到你们学校。”鹿兆海说：“我已达到目的。”那天晚上兆海送白灵回家，忽然问：“白灵，你想不想参加一个党？”白灵说：“想。你想不想？或者……你早已参加了？”鹿兆海说：“我也没有。咱们商量一下，参加哪个好？”白灵说：“不。咱俩一人参加一个。”鹿兆海说：“这样好，国共团结合作，我们俩也……”白灵说：“那好，你先选择一个，剩下的一个就是我的了。”“这样吧——”鹿兆海掏出一枚铜元说，“有龙的一面是‘国’，有字的一面是‘共’，你猜中哪面算哪个。”白灵觉得很有趣，从鹿兆海手里拿过铜元看了看说：“我来抛，你先猜吧！”鹿兆海点头同意了。白灵又发觉了这个默契游戏中的漏洞：“如果咱俩都猜中了一面呢？”鹿兆海说：“那……命中注定，咱们就参加同一个党。”白灵把铜元郑重地在手心抚了抚再抛到有亮光的地面上，让鹿兆海猜。鹿兆海说：“是字。”白灵说：“我猜是龙。”两人同时蹲下去，借着店铺门里泻出的灯光观察，铜元正好显示出一条龙的图案，两人哈哈笑着跳起来。鹿兆海说：“我是‘共’你是‘国’。谁先入进去，这枚铜元就归谁保存。”白灵笑说：“现在让我先保存着，好玩的铜元。”他们一起投入到守城的斗争中去，和素不相识的市民搜集石块，就连铺地的青石条，居民宅院门口的石板，垒砌路边的沙石块，也都被挖下来撬起来抬到城墙上去，补堵被围城的军队用枪炮轰塌的城墙豁口。鹿兆海有一次抬石头上了城墙，围城的士兵打起枪来，子弹击中了右胳膊，险忽儿送命。

白灵几乎天天都到临时抢救医院去看望他。白灵问："你害怕不害怕？"鹿兆海说："不害怕。真的。"白灵说："你在我跟前吹大气，充好汉。"鹿兆海抚着绷扎的胳膊说："这一枪把我打急了，我现在告诉你，我决定从军。当然，我还是想把中学念完。我要是害怕怎么会作出这个决定呢？"白灵歉然笑笑说："我说着玩的，怎么就当真了？"鹿兆海即将出院的时候，学校的那位英文教员来看望他时正式通知他："你被接纳为中共党员了。"白灵掏出那枚铜元递给鹿兆海。鹿兆海在手里抚摸了一会儿，又交给白灵说："你保存着好。"俩人推让的当儿，英文先生转着好奇的眼睛："定情物？"鹿兆海和白灵都红了脸，却极力否定说："不是。它更有深意。"铜元最后还是留在白灵的掌心里。鹿兆海康复后就编进了由学生市民和手工业工人混成的准军事战斗队伍，接受军事训练，随时准备补充到守城的国民革命军的营垒里去，和白灵见面的机会很少了。白灵后来被抽调参加了文艺演出队，到守城的兵营和市民中间宣传鼓动，几次爬上城墙，为趴在掩体下的士兵唱歌。有一次演出给她留下最深刻的记忆，她在被慰问的民兵中看见了鹿兆海。那枚铜元装在她贴身的小口袋里，无论走到什么地方演出，跳起来舞起来的时候，那枚小铜元就轻轻撞击她刚刚隆起的小小的乳房……她没有料到那晚抛掷铜元的游戏，揭开了她和他走向各自人生历程中精神和心灵连续裂变的一个序幕。

白鹿仓的办公房如期竣工，统领监造如此庞大而又紧迫的工程显示了鹿子霖卓越的组织才能。田福贤和他的干事们迫不及待地搬进潮湿的新房。白鹿仓为重新挂牌办公举行了隆重的庆祝仪式。白鹿仓辖管的百余个村庄的官人，德高望重的绅士贤达，十几个大村的私塾先生和唯一一所新制学校的几名教员，济世粮店的丁掌柜和白鹿中医堂的冷先生等头面人物都在被邀之列。新任滋水县的梁县长和刚刚组建的国民党滋水县县党部书记岳维山亲临本仓。关中名儒朱先生更是田

总乡约特邀的贵宾，重建白鹿仓的盛事将被朱先生载入正在编纂的新本县志。梁县长首先讲话："白鹿仓的盛典标志着国民革命新秩序的完全建立。"县党部书记岳维山接着讲："胜利粉碎刘匪乌鸦兵对革命的围攻，白鹿原以及滋水县的国民革命将展开新的一页。"他随之郑重宣布："本县我党的第一个分部——白鹿区分部宣告诞生。田福贤任白鹿区分部书记。"与会者表示了热烈的祝贺而又显出惊奇，惊奇的是在四个委员中鹿家父子居然占了两位。岳维山不失时机地重点介绍了鹿兆鹏："鹿兆鹏同志不仅是白鹿区分部委员，还是县党部委员，负责农运工作。鹿兆鹏同志是共、产、党员——"嗡嗡嘤嘤的议论顿时腾起，百余双眼睛一齐射住鹿兆鹏。鹿兆鹏尽量做出坦然自若的神情却总是显得不大自然。鹿子霖迅疾地瞅了儿子一眼就微偏了头，脸色比儿子还要紧张还要尴尬，因为众人如锥的眼光纷纷移射到他的脸上。近日里，乡村里悄悄流传着共产党是红头发红眼睛的妖匪，共人家房共人家田地共人家骡马牲畜，尤其是共人家婆娘女子的危言，乡民们感到比白狼可怕多了，可是谁也没有见过一个共产党。岳维山礼让鹿兆鹏讲话，会场骤然清静下来。鹿兆鹏憨里憨气地笑着说："众位乡党，大家都多瞅我一眼，看清我跟你们以及你们的子弟一样，都是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就行了。好了，岳书记你继续讲吧，我就开这一句玩笑。"会场顿时轻松活泼了，夹杂着释然化疑的笑声。岳维山雍容大度地笑笑说："鹿兆鹏同志又是国民党员。共产党和国民党是同志是兄弟，共同推进国民革命。"说着抓住坐在旁首的鹿兆鹏的手站立起来，两只挽着的手形成一个拳头高高举过头顶停留在空中，显示着团结的真诚，象征着擎天立地的力量。这个生动的画面摄入每一个与会者的眼睛储存于他们的脑底，并为后来完全相反的结局发出历史性的感叹。

会议之后，朱先生顺理成章地跟着白嘉轩去看望老岳母。他向岳母白赵氏问了安就急说："啊呀妈吔我饿坏了，快给我熬一碗苞谷糁子

吧！你熬得那么又黏又香的糁子我再没喝过。”白赵氏亲自下到厨房，阻止了儿媳仙草又阻挡了孙媳，亲自添水烧火拂下糁子放进碱面儿，一会儿紧火，一会儿文火地熬煮起来。朱先生在庆典仪式之后的丰盛的宴席上，只是礼仪性地点了几下筷子就离开了。他不是出于清高而是他的胃肠只能接受清淡的五谷菜蔬却无法承受荤腥海味。白嘉轩满脑子都是疑问，迫不及待地问姐夫：“鹿家父子俩全是委员？鹿家兆鹏又入‘国’又入‘共’骑双头马？又是白鹿仓又是区分部，田福贤是总乡约又加个区分部书记。又是国民党又是共产党。啊呀呀！我这脑瓜子里全给搅成一锅糨子咧！”朱先生听了格格格朗声笑了：“你种你的庄稼你务你的牛犊儿骡驹儿就对了。你把那些名目那些关系捋码清了有啥用场？我都不大捋码得清，你伤那个脑筋做啥？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开宗明义要给民人办好事，‘扶助工农’。你只管放心过你的日子就是了。”白嘉轩心悦诚服地点点头，却仍然止不住发问：“哥呀，我心里总是毛乱草势的。俗话说，一个槽道拴不下两匹叫驴，一窝蜂里容不得两个蜂王。岳鹿二人挽着举到头顶的拳头分开了咋办？”朱先生听了更不经意地大笑了：“哈呀兄弟！咱妈给我把苞谷糁子端来了。我可不管闲事。无论是谁，只要不夺我一碗苞谷糁子我就不管他弄啥。”

·

鹿兆鹏不再是因为校长而是他公开的共产党身份招引得一切人注目。他仍旧住在白鹿镇小学校里，仍然身兼校长职务。学校已经恢复上课。刚开始他还不大习惯利用公开的身份进行活动。韩裁缝的身份没有公开，仍然像个手艺人那样穿着蓝布围裙手脚并用在轧轧响着的缝衣机器上，鹿兆鹏和他的工作关系不仅是秘密的而且是单线的。那是一个绝对忠诚的战友同志。鹿兆鹏充分利用合法的身份加紧工作，只是在处理需得极端保密的事情时才交给韩裁缝。

白鹿仓的庆典宴席结束后，父亲鹿子霖不大好意思地踅摸到他跟前，暗示他回家去一趟，他有话说。鹿兆鹏说：“我知道你想跟我说啥话。缓几天吧，我现在事情太忙。”鹿子霖鼓了鼓嘴就转身走了。

鹿兆鹏现在确实忙，中共陕西省委的全会刚刚开罢，党的决议亟待贯彻，今冬明春要掀起乡村革命的高潮，党的组织发展重点也要从城市知识层转向乡村农民，在农村动摇摧毁封建统治的根基。党在西安已经办起“农民运动讲习所”，每期仨月轮番培训革命骨干。他决定把分配给滋水县的十个名额全部集中到白鹿原上，正好可以从每个保障所选送一个，避免撒胡椒面似的把十个人撒到全县。

这一构想刚刚形成，黑娃黑夜里突然闯进他的校长办公房，一进门就瞪着黑乌乌的眼睛问：“老天爷呀，没看出你是个共产党？！”一下子倒把兆鹏问愣住了。黑娃现在受雇于二原子上一户人家，给人家斩崖挖土打窑洞，知道满原都在摇铃般传说着他的朋友是共产党。雇主在吃晚饭时问他：“鹿乡约的共产党后人得是红眼睛红头发的洋种？”“哈呀我说啥洋种不洋种的。他官名叫兆鹏，小名叫拴牢，跟我一个桌子念书，给我吃过冰糖，跟咱一模一样，是黑头发黑眼睛的土种。”黑娃津津有味地复述着，兆鹏听着就在黑娃腰里戳了一拳头，笑得几乎岔气：“好好好哇黑娃，你说得真好。我们都是土种，转一个音就是土著。”黑娃又瞪着眼问：“我只知道你是白狼。咱们烧粮台时你说是白狼。白狼就是共产党？那韩裁缝是不是共产党？”鹿兆鹏骤然变色嘘道：“黑娃，你记住一条儿，咱俩以后说话只说咱俩的事，旁人的事甭问也甭打听。”黑娃窝住兴儿不大欢愉了。兆鹏说：“我正想找你哩，你来了正好。”随之把物色他去参加“农讲所”的事说了。黑娃听了不感兴趣：“噢呀，我这回可不想跟你跑了。乌鸦兵跑了，进不进祠堂的事也过去了，我想蒙着头闷住声下几年苦，买二亩地再盖两间厦房，保不准过两年添个娃娃负担更重了。我已经弄下这号不要脸的事，就这么没脸没皮活着算㞞了。我将来把娃娃送到你门下好好念书，能成个人人就算争了气了。”鹿兆鹏惊奇之后就以不屑的口气说：“我跟你说话不拐弯，你这些打算全都是空中楼阁痴心妄想，拿咱土种的话说就是没向。你只要想想你爷你爸就明白了。”黑娃还不信服：“俺爸俺爷是不行。可咱村有好多人比如嘉道叔的日子就一年强过一年。”鹿兆鹏说：“这样吧，你先去参加一回。你觉得有意思你回来咱俩继续共事，你觉得没意思你就过你的小日月。你受训这仨月的损失我给你补上。”黑娃听到这话冒火了：“啥话！我就那么爱钱吗？我还顾虑我识不下几个字，又是个猪脑子，人家说啥念啥怕是解不开记不下。”鹿兆鹏说：“那不要紧，能解开多少算多少，能记下多少算多

少。要是解不开记不下一句，权当逛热闹哩！你大概还没逛过城哩？”黑娃迟迟疑疑算是答应了。鹿兆鹏却说：“黑娃，我估计你这回去了还想再去一回。”

黑娃要去城里参加“农讲所”受训的消息在白鹿镇引起很大反响。白嘉轩得知这个情况后一直保持沉默，只在一天晚上在祭桌前对孝文说：“他坐在那儿看去像个先生，但一抬脚一伸手就能看清蹄蹄爪爪了。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这就再明白不过了。”孝文说：“咋也想不到堂堂的校长能跟黑娃混搅在一搭。他选送的十个人个个都不干不净有麻达，这共产党究竟……”白嘉轩打断儿子的话：“从今往后，甭跟人说这样话。凡事看在眼里记到心里就行了。”

种种议论集中到田福贤那里。他对鹿兆鹏说：“岳书记再三给我敲过，让我注意国共合作，不要干涉兄弟党内务。我只想问问你，是不是把那十个人再慎重掂量一下？其他人有麻达还将就得过去，黑娃太那个了嘛！让人说，‘共产党咋尽挑那些龟五贼六的货？连抢夺人妻的货也要抬举到省城里去？’听听！我担心这样下去对贵党影响不好。”“他们是去城里接受培训，又不是做官。”鹿兆鹏解释说，“他们接受培训提高了觉悟，就会改掉自己的麻达。你忘了国父遗嘱说的‘扶助农工’的话吗？扶助扶助是啥意思哩？”田福贤瞪起了眼睛……

黑娃从“农讲所”培训归来，在白鹿原掀起了一场风暴。那些议论黑娃的三纲五常的白嘉轩鹿子霖田福贤以及一切或穷或富的庄稼人，全都对他刮目相看，用土著们习惯的话说：瞪起了眼睛。

第十三章

白嘉轩双肘搭在轧花机的台板上，一只肘弯里搂揽着棉花，另一只手把一团一团籽棉均匀地撒进宽大的机口里，双脚轮换踩动那块结实的槐木踏板。在咔嗒咔嗒的响声里，粗大的辊芯上翻卷着条条缕缕柔似流云的雪白的棉绒，黑色的绣着未剔净花毛的棉籽从机器的腹下流漏出来。踩踏着沉重的机器，白嘉轩的腰杆仍然挺直如椽，结实的臀部随着踏板的起落时而撅起。孝文走进轧花房，神色慌乱地说："校长领着先生学生满街上刷写大字。满墙上都是'一切权力归农协'。'农协'是弄啥哩？"白嘉轩继续往机口里扔着棉花团儿，头也不转地说："这跟咱屁不相干嘛！你该操心自己要办的事。"

白嘉轩驾着牛车从城里拉回来一架轧花机，在堆放垫圈干土的土房里扎垒起一道隔墙，隔出一间机房来安装机器，几经调试，这架透着生铁蓝光的轧花机就响起通畅和谐的咔嗒咔嗒的声音。白嘉轩下决心买回这架上海出的机器，主要是为了自家轧花方便，且不说每年轧花要花销一头牛犊的工价，单是把棉花用牛车送去拉回就太劳神了。轧花机买回以后却首先接揽了轧花生意，在没有主顾的间断时日里抽空儿给自家轧。他在轧花房的门口备下一把废旧的铁头木板锨，来人进入机房之前必须刮净鞋底的泥巴，棉花是干净东西。他算计过，只要机器一冬不停，挣下的轧花钱和自家省下的轧花钱，就可以买回半个轧花机，两个冬天过去就会把这架轧花机赚回来了。"这是一个里外账，一里一外两面算。"白嘉轩对孝文说，"过日子就得这样盘算，才能把日子过得浑全。"他时时处处不失时机地对儿子进行诸如此类的点化教育，以期他尽快具备作为这个四合院未来主人所应有的心计和独

立人格。而言传身教不可偏废，白嘉轩挺着腰杆踩踏轧花机就是最好的身教。

轧花机开转以后，他和鹿三孝文三人轮换着踩踏，活儿多的时候加班干到深夜，有时鸡叫三遍以后又爬起来再干。房檐上吊着一排尺把长的冰凌柱儿，白嘉轩脱了棉袄棉裤只穿着白衫单裤仍然热汗蒸腾。过了多日，孝文又一次忍不住大声说："黑娃把老和尚的头铡咧！"白嘉轩转过脸依然冷冷地对惊慌失措的儿子说："他又没铡你的头，你慌慌地叫唤啥哩？"孝文抑止不住慌乱："哎呀这回真个是天下大乱了！"白嘉轩停住脚，咔嗒的响声停歇下来："要乱的人巴不得大乱，不乱的人还是不乱。"他说着跳下轧花机的踩板，对儿子说："上机轧棉花。你一踏起轧花机就不慌不乱了。哪怕世事乱得翻了八个过儿，吃饭穿衣过日子还得靠这个。"他粗大的巴掌重重地拍击到轧花机的台板上，随之从棉花垛上取下棉衣棉裤穿起来……

白嘉轩刚刚平息了四合院里发生的一场小小的内乱。内乱是他的宝贝女儿灵灵制造的。原上人吃腊八粥的那天傍晚，白灵出其不意地回到家里来，这是自围城以来头一次返乡回家，奶奶白赵氏一把把孙女搂到怀里，张口咬住脸蛋子久久不放，涎水从脸腮上流灌进脖颈里去，残缺不全的牙齿在孙女粉白红润的桃花脸上留下几个奇形怪状的窝痕。母亲白吴氏禁不住热泪涌流，疼爱地斥骂着："没良心的东西把老老少少一家人都给你折磨死了！"白灵从奶奶怀里跳起来，回头又在奶奶脸上亲了一口，掏出手帕又亲昵地给母亲沾去泪水，跳到屋子中间挺身一站："我不是好好的吗？我长得高了吃得胖了，你们尽操那些心做啥！"白嘉轩不失威严地挺坐在太师椅上，瞅见女儿窄巴的衣服绷紧的胸脯上隐伏着的两个乳房的轮廓，心里悸动了一下。白灵毫无察觉父亲的心思，环顾一圈屋里所有的人，得意忘形地宣布了一个消

息，立时把屋子里亲昵的气氛扫荡净尽了：“我们把县长轰下台喽！这回大闹滋水县好痛快呀！国共两党的一条密传传下去，凡在省城的滋水籍的人无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念书的做饭的，当相公的拾破烂的，拉洋车的推菜车的，挑柿担儿的好几百人，全都拥回县城来游行示威，开会演讲，唱歌演剧，把个县府闹得翻了个过儿，把一块‘滋水县人民自决委员会’的大牌子挂到县府门口。大家正欢庆斗争胜利的时光，县府里有人密告说县长正给省警署拟报抓人名单。众人炸了营，冲进县府从县长的桌屉里搜出了那个名单。好啊，捉贼捉赃，梁县长是个口是心非的两面派。我们拿着他的赃证去找省主席告状，于大胡子一看那个黑名单就火了，说‘谁阻挡国民革命就把他踏倒’。接着一声令下把梁县长撤了……”

白嘉轩磕了磕烟灰就站起身走出去了。白吴氏怯怯的目光送着丈夫的背影消失在门外，回过头禁止女儿说：“灵灵，你在城里要念书就好好念书，甭跟着旁人疯疯癫癫乱跑。记住，在屋里再甭说刚才说的那号话了，你说话也该瞅瞅你爸的脸色。”白灵说：“我瞅见我爸的脸色，他不悦意他不爱听。我偏说给他听，冲一冲他那封建脑瓜子。”她爽快地说着，忽然醒悟似的叫起来：“噢呀！兆海上军校去了，临走托我给他家里捎话，我差点忘了。”

想起鹿兆海她的心情特别愉快。兆海已经实现了要做革命军人的志愿，围城结束不久就投身到守城的国民革命军里去了。他的热情，他的单纯，他的聪慧，尤其是他的文化素养，很快受到官长的器重，保荐他到河北省的一所军校去学习军事。兆海得到通知以后就把她约到一家照相馆门前：“你明白我约你到这儿来做什么？”白灵脸上泛起一层羞怯的红晕扭头率先走进去了。临行前，他从照相馆取出俩人的合影赶到白灵二姑家来。她和他相互签名，不约而同地都给对方写下

了“国民革命成功”的临别赠言。那是入冬后一个晴朗而寒冷的夜晚，她送他走到二姑家皮货作坊门外的台阶下，他转身离去以后却又转过身来，猛然张开双臂把她搂进怀里。她似乎期待着这个举动却仍然惊慌失措。在那双强健的胳膊一阵紧似一阵的箍抱里，她的惊恐慌乱迅即消散，坦然地把脸颊贴着那个散发着异样气息的胸脯。他松开搂抱的双手捧起她的脸颊。她感觉到他温热的嘴唇贴上她的眼睛随之吸吮起来，她不由地一阵痉挛双腿酥软；那温热的嘴唇贴着她的鼻侧缓缓蠕动，她的心脏随着也一阵紧似一阵地蹦荡起来；那个温热而奇异的嘴唇移动到她的嘴唇上便凝然不动，随之就猛烈地吮吻起来；她的身体难以自控地战栗不止，突然感到胸腔里发出一声轰响，就像在剧院里看着沉香挥斧劈开华山[1]的那一声巨响。她在经历了那一声内心轰鸣之后渐渐清醒过来，挣脱他的双臂，从内衣口袋里掏出了那枚雕饰着龙的铜元，塞进兆海的手心：“你带着好，甭忘我。”说罢伸开双臂，紧紧搂住他的肩膀，把火烧火烫的脸颊和他的脸偎贴在一起。他说：“我尝到了你的眼泪，是苦的涩的。”

白灵去了鹿兆海家，鹿子霖叔叔态度活泛，不住地向她打问城里许多有关革命的事。兆海的爷爷鹿泰恒纯粹是一种应付，言语和眉眼里对她的不屑和冷漠是明摆着的。她能原谅他也就不搁在心上。

她从这个与自己已经构成某种特殊联系的门楼下走出来，绕过自家门楼到白鹿镇小学校找鹿兆鹏去了。这是作为革命者的她和他的第一次相见。她又一次抑止不住激动的情绪向他叙述了大闹滋水县的经过，而且抱怨作为革命的领导人的鹿兆鹏怎么能不参与？鹿兆鹏呵呵笑着默认了她的抱怨，没有向她说明自己实际上是那场斗争的策划组织者之一。她和他谈论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共同点和不同点，谈论轰轰烈烈的北伐和各地的人民革命热潮。她说：“革命马上就要胜利

了。一想到胜利的那一天，我就……”鹿兆鹏也以肯定的语气说：“没有什么人能阻挡北伐军的前进，胜利指日可待。”

这次接触给她留下这样一种印象，鹿兆鹏是一件已经成型的家具而鹿兆海还是一截刚刚砍伐的原木；鹿兆鹏已经是一把锋利的斧头而鹿兆海尚是一圪垯铁坯，他在各方面都称得起一位令人钦敬的大哥哥。

白灵天黑定时回到家里，父亲和母亲还没有歇息，看来是专意等待她。白嘉轩知道她的行踪仍然问：“你到谁家去了？”白灵说：“我先到子霖叔家后来又到学校找兆鹏哥去了。我明天要走，今晚不去再没时间了。”母亲惊讶地问：“明天就走？你一年没回来，刚回来连一整天也待不下？”白灵笑着向母亲赔情：“没办法呀，妈。革命形势紧迫，同志们约定明晚开会。等胜利了我回来跟你住整整一个月。”白嘉轩忍着冲到喉咙口的火气冷静地发问：“你现时还念书不念书？”白灵说：“念呀，怎么不念？”白嘉轩问：“你念了书日后做啥呀？”白灵说：“我喜欢教书。革命胜利了我就做个先生，教书。”白嘉轩说：“你现在甭念书咧，回家来行不行？”“不行不行不行！”白灵不假思索一口回绝，“爸，我没有想到你现在会说这种话。”白嘉轩说：“那好，你现在睡觉去。”

第二天早晨，白灵起来时发觉小厦屋的门板从外头反锁上了。她还未来得及呼喊，父亲从上房里屋背着双手走下台阶，走过庭院在厦屋门前站住，对着门缝说：“王村你婆家已经托媒人来定下了日子，正月初三。”白灵嘴巴对着门缝吼：“王家要抬就来抬我的尸首。”白嘉轩已走到二门口，转过身说：“就是尸首也要王家抬走。”

白灵很快复原了活泼的天性，在小厦屋里大声演讲大声唱歌，婆呀爸呀妈呀大哥大嫂三娃子牛犊还有干大你们听我讲吧！国民党共产党领导国民革命形势大好！北伐军节节胜利，天下无敌，北洋军阀反动政府保不住驾啦！国民革命的胜利指日可待。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齐欢唱。| 5·6 54 | 31 | 5·6 54 | 31 | 25 | 1— | 25 | 1— |。妈吔快给我送俩馍来我饿了。

白赵氏踮着小脚站在庭院里斥问：“灵灵你疯了？”白吴氏仙草拿着俩馍馍走到厦屋门前，白嘉轩不失时机地赶到了，从仙草手里夺下馍说：“让她喊让她唱。她还有劲儿。”白灵从门缝里看见了院庭里发生的一切。她的腹腔里猫抓似的难受，接着口腔里开始发黏，终于喊不出也唱不出了，躺在炕上看冬日惨淡的阳光从房檐上悄然消失，冷气和黑暗一起笼罩了厦屋。

黑暗里窗户纸轻轻响了一下，什么东西滚落到肩头上，她一抓到手就毫不迟疑地吞嚼起来，两个半是麦子面半是玉米面的馍馍不经吃就完了，似乎还可以再吃下两个。她觉得胳膊和双腿顿时充满了活力，一骨碌从炕上跳下来，继续她的讲演。白嘉轩咣当一声拉开上房西屋的门闩，站在庭院里吼：“你再喊再唱，我就一镢头砸死你！”白灵对着门缝吼出于胡子的话：“谁阻挡国民革命就把他踏倒！”

直到深夜，白灵时喊时唱的声音才停止下来。天明以后，白嘉轩洗了脸喝了茶抽罢烟，吃了两个烤得焦黄酥脆的馍馍，雄赳赳地走进饲养场的轧花机房，脱了棉袄就跳上去，踩动踏板，那机器的大轮小轮就转动起来。咔嗒咔嗒的响声和谐通畅地响起来。他一口气踩得小半捆皮棉，周身发热，正要脱去笨重的棉裤，仙草急急匆匆颠着小脚走进来：“灵灵跑了。”白嘉轩披着棉袄走出轧花房，走过街道再跨进

自家门楼，厦屋的门锁已经启开，厦屋的山墙上挖开一个窟窿，白土粉刷的墙壁上用镢头尖刺刻下一行字：谁阻挡国民革命就把他踏倒！白嘉轩问仙草："这镢头怎么在这里？"仙草说："我不知道。大概是啥时候忘在柜下边了，那是个无用的废物嘛！"白嘉轩在吃早饭的时候向全家老少威严地宣布："从今往后，谁也不准再提说她。全当她死了。"此后多年，白嘉轩冷着脸对一切问及白灵的亲戚或友人都只有一句话："死了。甭再问了。"

白嘉轩丝毫也不怀疑孝文惊慌失措从外边传到轧花机房里来的消息的真实性。每天从川原上下背着棉花包前来轧花的人，也带来了四面八方各个村庄的动静，白嘉轩充分预感到了愈逼愈近的混乱，同时也愈来愈坚定地做好了应对的策略：处乱不乱。他不抢不偷，不嫖不赌，是个实实在在的庄稼人，国民党也好，共产党也好，田福贤也好，鹿兆鹏和鹿黑娃也好，难道连他这样正经庄稼人的命也要革吗?他踩踏着轧花机，汗水淋漓，热气蒸腾，愈加自信愈加心底踏实。

黑娃回到原上的那天晚上，正下着入冬以来的头一场大雪，强劲的西北风搅得棉絮似的雪花恣意旋转，扑打着夜行人的脸颊和眼睛，天空和大地迷茫一片。在踏上通往白鹿镇的岔路时，黑娃心头轰然发热，站在岔路口对另外九个同去同归的伙伴喊："弟兄们！咱们在原上刮一场风搅雪！"他们十个人相约着走进了白鹿镇小学校的大门。鹿兆鹏正在煤油罩子灯下写着什么，见他们走来，便跳起来与他们一一握手："同志们，我现在可以称你们为同志了。我掐着指头盼着你们回原哪！"黑娃代表受训的十个人表示决心："我们结拜成革命十弟兄了。我们十弟兄好比是十个风神雨神刮狂风下大雪，在原上刮起一场风搅雪！"兆鹏说："好呀风搅雪！你们十弟兄是十架风葫芦是十杆火铳，是十把唢呐喇叭，是十张鼓十面锣，到白鹿原九十八个村子吹起来敲

起来，去煽风去点火，掀起轰轰烈烈翻天覆地的乡村革命运动，迎接北伐军胜利北上。国民革命就要成功了！”

黑娃等十弟兄回到他们所在的十个村子发动群众，按照鹿兆鹏的计划积极工作，每个人在各自的村子联络十个积极分子，在白鹿镇小学校举办为期十天的“农习班”。这件工作顺利中也有不顺利，十弟兄里头有两位回家以后就趴下不动了。黑娃大为恼火，找到其中一位开口就损就骂：“你是个熊包，你是个软蛋，你是蜡枪，你是白铁矛子见碰就折了。仨月的受训白学了革命道理，不要钱的肉菜蒸馍白咥了。你不讲义气不守信用，结盟发誓跟喝凉水一样。”无论他怎么损怎么骂，那位弟兄双手搁着膝盖，脑袋夹到裆里蹲在地上一句不吭，黑娃连连吐着唾沫儿走了。他找到另一位弟兄家门口，那位弟兄的父亲蹲在门槛上抽旱烟，拒绝黑娃进门。老汉破裂开花的棉窝窝旁边搁着一把菜刀，对黑娃客客气气地说：“黑娃你听我说，俺单门独户谁也不敢得罪。你要闹腾你尽管闹腾，俺娃绝不挡路，你再甭拉扯俺娃，俺娃闹腾不起咯。”黑娃忍着火气蹲下来对老汉宣传革命道理。老汉听不下几句就拒绝再听：“你说的好着哩对着哩，俺家人老几辈都是猪都是鸡，靠嘴巴拱地用爪子刨土寻吃食儿，旁的事干不来弄不了咯！你要再拉扯俺娃，我就照脖子抹一刀——”老汉噌地站起来，把菜刀抓起来攥在手里。黑娃张了张口没有说话就转过身走了。老汉却一蹦子跑起来追到黑娃面前，伸开左手攥着的拳头，掌心里有两枚银圆，解释说：“这是饭钱。俺娃在城里仨月吃人家饭的饭钱。咱不白吃人家的。”黑娃铆劲儿朝那手心的银圆吐一口唾沫儿：“给你这老不死的胆小鬼留下买寿衣置枋[2]去！”

更使黑娃恼火的是他自己在白鹿村发动不起来，他把在“农讲所”听下的革命道理一遍又一遍地讲给人家，却引发不起宣传对象的响

应。眼看着鹿兆鹏的培训班开班时日已到，他仅仅只发动起来两个人，一个是开配种场的白兴儿，一个是他的女人田小娥。另外七个弟兄的成绩也参差不齐，有的发动下十四五个人，有的七八个，最少的四五个，反而都比黑娃成绩突出。尽管如此，弟兄们仍然尊他为大哥。鹿兆鹏宽慰他说："黑娃你甭丧气，那不怪你。咱们白鹿村是原上最顽固的封建堡垒，知县亲自给挂过'仁义白鹿村'的金匾。"

第一期"讲习班"如期开班。开班那天请来了贺家坊的锣鼓班子。贺家坊的锣鼓班子敲的是瓷豆儿家伙，也叫硬家伙，雄壮激昂震撼人心，却算不得原上最好的锣鼓班子。在白鹿原最负盛名的锣鼓班子是白鹿村的酥家伙，其声细淑婉转，听来优雅悦耳。传说唐朝一位皇帝游猎至此，听见了锣鼓点儿就驻足倚马如醉如痴，遂之钦定为宫廷锣鼓，每逢皇家祀天祭祖等隆重活动时，都要进京献技。白鹿村锣鼓班子的班头是白嘉轩，敲得一手好鼓，鼓点儿是整个锣鼓的核心是灵魂是指挥，他自然不会领着锣鼓班子前来给黑娃们凑热闹。贺家坊的瓷豆家伙班子踊跃赶来了，领头打着龙旗的是策划过"交农"运动的贺家兄弟的老大。老二已经作古。贺老大一头黑白混杂的头发，一脸白黑相搅的串脸胡须，走到学校门口插下龙旗就对黑娃说："黑娃你说敲啥？今日个由你点。"黑娃不假思索地说："敲《风搅雪》。再敲《十样锦儿》。敲了《十样锦儿》再连着敲《风搅雪》。"忙得晕头转向的鹿兆鹏从屋子里小跑着赶到学校门口，双手握住贺老大的手说："你那会儿用鸡毛传帖闹交农，咱们这回敲锣打鼓闹革命。"贺老大说："你们比我争[3]！"

鹿兆鹏特邀贺老大在开班典礼上讲话。贺老大讲了那场"交农"运动之后说："娃子们你们比我争。我不算啥。我那阵儿不过是反了一个瞎县官，你们这回要把世事翻个过儿，你们比我争。"锣鼓和鞭炮声

中，“白鹿区农协会筹备处”的牌子挂在学校门口，白地绿字，绿色是庄稼的象征。黑娃被宣布为筹备处主任。他走上讲台只讲了一句：“风搅雪！咱们穷哥儿们在原上刮一场风搅雪！”

送走黑娃等一帮子农协会筹备处的骨干已经夜深，鹿兆鹏感到很累，伸开双臂连连打着呵欠，正想关门睡觉，不料田福贤推门进来说：“杀两盘。”鹿兆鹏也突生兴致：“好好好。我这一向对下棋兴趣淡了，咱俩玩‘狼吃娃’，或者耍‘媳妇跳井’行不行？”他们玩起了“狼吃娃”的游戏。除了这两种游戏白鹿原还流行一种更复杂的类似围棋的“纠方”游戏。这三种游戏都是在地上画出方格，选用石子泥团或树枝树叶为子儿，在各个村子风行不衰，一般人在小小年纪就学会入迷了。鹿兆鹏小时候一直读书无法领会这种游戏的乐趣和技法，直到近期在各个村子跑动才学会了。田福贤自当上国民党白鹿区区分部书记以后，常常找区分部委员鹿兆鹏下棋，对乡村的“纠方”“狼吃娃”“媳妇跳井”的游戏更是乐而不疲。田福贤嘴角叼着又长又粗的什邡卷烟得意地说：“兆鹏呀，看看你又输咧！我当狼你当娃，我的三条狼把你的十五个娃吃光吃净一个不剩；你当狼我当娃，我的十五个娃你只吃了俩，剩下十三个娃打死了你三条狼；不管当狼当娃你都赢不了嘛！”鹿兆鹏输急了说：“咱们耍‘媳妇跳井’。”田福贤游刃有余地说：“行呀！就耍‘媳妇跳井’。耍几回你肯定得朝井里跳几回。不是我吹大气，论洋学问你比叔高，论新名词洋码字你比叔说得多念得利；玩起乡下这一套套耍活儿来，你还毛嫩着哩不行哩！”鹿兆鹏在地上用粉笔画好了格子说：“你先甭吓人呀，到底是我这个小媳妇跳井还是你这个老媳妇跳井，走着瞧吧！”一边走着一边聊着。田福贤问：“兆鹏呀，我有件事解不开，你让先生领着学生满村写字，那些话我都能解开，只有一句解不开，‘一切权力归农协’是啥意思？”鹿兆鹏说：“那话再明白不过，我不信你解不开。”田福贤说：“真解不开。一切权力都归了农

协，那区分部管啥哩？白鹿仓还管不管了？”鹿兆鹏说：“这个问题今日‘农习班’开班时都讲了，你干啥去了？我前几天就给你打招呼，作为区分部书记你要到会讲话，你却不来。”田福贤说：“县党部通知我去开会，没来得及给你说一声。”田福贤确实到国民党县党部去了，不过不是得到开会通知而是自己找上去的。他不知该怎么对付鹿兆鹏的“讲习班”开班之邀。就托词去了县上。县党部岳维山书记说：“你连这么简单的事都应付不了，你还能搞国民革命？”岳书记谈了许多话，归结起来说就是一句，共产党煽动农民造反完全是胡闹；但现在国共合作咱不能明说人家胡闹；作为区分部书记你心里必须认清他们是胡闹。田福贤心里有了底才来找鹿兆鹏要“狼吃娃”和“媳妇跳井”的游戏，其实他早都看到了遍抹在各个村子墙壁上的大字标语，最令他反感的就是“一切权力归农协”这一条。田福贤进一步问：“兆鹏，既然一切权力都要归农协，那我就得向农协移交手续。”鹿兆鹏说：“这个问题农协还没研究。再说农协还在筹备阶段，等正式成立以后再说。你是区分部书记，就应该跟农协站在一起，站在一起就不存在权力移交的问题而只需分工了。”田福贤不置可否，手下走出一步子儿得意地叫起来：“兆鹏呀，你又该跳井啰！跳啊往下跳！”连着要了三回，鹿兆鹏输了三回，都是被对方逼堵得走投无路而跳进了象征着水井的方格。鹿兆鹏说：“你的要活儿要得好。你甭得意噢大叔，我总有一天要赢你的，非逼得你这个老媳妇跳井不可！”

黑娃成功地在白鹿原掀起了一场旷世未闻的风搅雪。黑娃鄙夷地摈弃了那两个熊包软蛋，很快又结识了两个生冷不忌死活不顾的硬家伙，革命十弟兄又捏成拳头了。赶到为期十天的“讲习班”结束，革命十弟兄又扩大为三十六弟兄。当他们端着酒碗起誓结义的时候，便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和威慑的气氛。

第一块农民协会的牌子是贺老大在贺家坊村挂出来的，仍然是白地绿字。不出半月，第一批重点发展的十个村子有九个都召开了村级农民协会的建立大会，也挂起了白地绿字的牌子，只有白鹿村冷冷清清不曾动。黑娃气恼地说：“我在原上能刮起风搅雪，可是在白鹿村里连一根鸡毛也扇不起来。”鹿兆鹏显得胸有成竹：“我们最后再来围攻这个封建堡垒。”

革命三十六弟兄在九个村子的农民协会里分别担任重要角色，他们坐在一间教室里，听他们的领袖鹿兆鹏作第一步工作总结和第二步工作计划：“同志们，我们已经打开了局面。同志们，我们第二步肯定比第一步要走得顺利，步子也要迈得大一些，在五十个村子里建立起农协。一当这五十个村子都挂起我们白地绿字的牌子，我们就建立白鹿原农民协会总部。”革命三十六弟兄激动得从椅子上纷纷跳到桌子上，一个弟兄说：“我们建立了农协得办点大事，人家说我们农协剪纂儿拆裹脚布光能欺侮女人。”此话引起三十六弟兄热烈反响，连黑娃也忍不住说：“人家不怕我们。”鹿兆鹏纠正黑娃的话说：“我们不要人家怕。问题的关键是群众信服不信服我们。我们提倡女人剪头发放大脚是对的，禁烟砸烟枪烟盒子也得到群众拥护，我们还得进一步干出群众更需要干的事来。同志们，说说群众反映最大的问题……”又一位弟兄说：“要叫群众害怕咱或者说信服咱能干实事，先把三官庙那个老骚棒和尚给收拾了！”

腊月二十三白鹿镇逢集日，置办年货兼看热闹的人空前拥挤，古老小镇狭窄的街道几乎承受不了汹涌的人流而要爆裂了。斗争三官庙老和尚的大会第一次召开，会场选在白鹿村村中心的戏楼上，其用意是明白不过的。年逾六旬的老和尚被捆绑在戏楼后台的大柱子上，他万万没有料到自己会有如此劫数。

老和尚把三官庙的几十亩土地租给附近村庄的农民，靠收取租粮过着神仙般的日子。他私订下一个规矩，每年夏秋两季交租要男人来，而秋末议定租地之事，却要女人来而不要男人。那些前来交办租地手续的女人无论美丑都付出了相同的代价。这个老骚棒无论年轻的年老的，长得俏的长得丑的，一律不拒一律过手，这个秘密谁都明白谁也不愿说破。

白鹿村清静的村巷被各个村庄来的男人女人拥塞起来，戏楼下的广场上人山人海，后台那边不断发生骚乱，好多人搭着马架爬上后窗窥视捆在大柱上的老和尚。按照议程，先由三个租地的佃户控诉，再由白鹿区农协会筹备处主任黑娃宣布对老和尚的处置决议：撵走老和尚，把三官庙的官地分配给佃农。可是斗争会一开始就乱了套。头一个佃农的控诉还没说完，台下的人就乱吼乱叫起来，石头瓦块砖头从台下飞上戏楼，砸向站在台前的老和尚，秩序几乎无法控制。鹿兆鹏把双手握成喇叭搭在嘴上喊哑了嗓子也不抵事。黑娃和他的弟兄们也不知该怎么办，这种场面是始料不及的。台下杂乱的呐喊逐渐统一成一个单纯有力的呼喊：“铡了！把狗日铡了！”弟兄们围住黑娃吼：“铡狗日的！”黑娃对兆鹏说：“铡死也不亏他！”鹿兆鹏说：“铡！”五六个弟兄拉着早已被飞石击中血流满面的老和尚下了戏楼，人群尾随着拥向白鹿镇南通往官道的岔路口，一把铡刀同时抬到那里。老和尚已经软瘫如泥，被许多撕扯着的手塞到铡刀下。铡刀即将落下的时候人群突然四散，都怕溅沾上不吉利的血。铡刀压下去咔哧一声响，冒起一股血光。人群呼啦一声拥上前去，老和尚被铡断的身子和头颅在人窝里给踩着踢着踏着，连铡刀墩子也给踩散架了。

黑娃和他的革命三十六弟兄以及九个农协的声威大震，短短的七八天时间里，又有四五十个村子挂起了白地绿字的农民协会的牌子。

黑娃无论如何也忍不住欢欣鼓荡的心情：“风搅雪这下才真正刮起来了。兆鹏哥，革命马上就要成功了。”鹿兆鹏毫不掩饰领袖式的喜悦：“黑娃，现在立即去围攻那个最顽固的封建堡垒！”

大年正月初一被选定为白鹿原农民协会总部成立的日子，地点再一次选定了白鹿村的戏楼。

大年三十家家包饺子的除夕之夜，黑娃走进了白嘉轩家的门楼。三十六弟兄要和他一起去助威，黑娃说：“我一个人去。我想试一试我的胆子。”他穿了一件制服，是韩裁缝用机器扎成的。韩裁缝仍然摆着洋机器缝衣挣钱。黑娃走进白家门楼时不断提醒自己挺直腰板儿，一直走进门房和厢房之间的庭院，再走进上房正厅：“我代表农协筹备处告诉你，把祠堂的钥匙交出来。”白嘉轩正在香火融融的祭桌前摆置供果，转过身来说：“可以。”黑娃瞅一眼挺得笔直的白嘉轩，不由地也挺一挺自己的腰，伸出手去接钥匙。白嘉轩的手没有伸到袍子底下去掏钥匙的意向：“现时不行，得到明天早上。明早族人到祠堂拜祖先时，当着全族老少的面我再交给你。”黑娃说：“这随你。”

大年初一未明，黑娃和他的三十六弟兄就聚在祠堂门外，他手里提着一个铁锤，咣当一声，只需一下，铁锁连同大门上的铁环一起掉到地上。黑娃领头走进祠堂大门，突然触景生情想起跪在院子里挨徐先生板子的情景。他没有迟疑就走上台阶，又一锤砸下去，祠堂正厅大门上的铁锁也跌落到地上。地上扫得干干净净，供奉祖宗的大方桌上也擦拭干净了，供着用细面做成的各式果品，蜡台上凝结着烧流了的红色蜡油，香炉里落着一层香灰，说明白嘉轩在三十日夜晚刚刚烧过香火。黑娃久久站在祭桌前头，瞅着正面墙上那幅密密麻麻写着列祖列宗的神轴儿，又触生出自己和小娥被拒绝拜祖的屈辱。他说：“弟兄们快点动手，把白嘉轩的这一套玩意儿统统收拾干净，把咱们的办

公桌摆开来。”他走出正厅再来到院子，瞅着栽在庭院正中的“仁义白鹿村”的石碑说：“把这砸碎。”两声脆响，石碑断裂了。黑娃一手叉腰一手指着镶在正厅门外两边墙壁上的石刻乡约条文说：“把这也挖下来砸了。”当黑娃和他的弟兄们在祠堂里又挖又砸的时候，白鹿村的族人围在门口观看，却没有一个人敢走进去阻拦。有人早把这边的动静悄悄告诉了族长白嘉轩，他竟然平心静气地说：“噢！这下免得我交钥匙了。”

原上几十个建立起农民协会的村子敲锣打鼓从四面八方拥向白鹿村，没有建立农协的村子的男女老少也像看大戏一样赶来了。“今日铡碗客。”通往白鹿村的官路小道上涌动着人流。花边龙旗一律扯去了龙的图案，临时用绿纸或绿布剪贴上了某某村农民协会的徽标，在白鹿村的戏楼前飞扬。十多家锣鼓班子摆开场子对敲，震得鸽子高高地钻进蓝天不敢下旋，白鹿村被震得颤颤巍巍。黑娃站到戏楼当中大声宣布：“白鹿原农民协会总部成立了。一切权力从今日起归农民协会。”锣鼓与鞭炮声中，一块缩着红绸的白地绿字的牌子由两位兄弟抱扶着，从戏楼上走下梯子，穿过人群挂到祠堂大门口。具备最强烈的震撼力量的黑火药铁铳，连续发出整整六十一声沉闷的轰响，那是六十一个已经建立农民协会的村子的象征。

碗客和铡刀同时从戏楼的后台被拖到前台。铡刀摆在台子左角。碗客被五花大绑着押在台子右角。碗客仍然从扭着他胳膊的四只手里往上蹦，往起跳，骂着叫着，台下的呼吼一浪高过一浪。

碗客是南山根指甲沟口村人，姓庞，乳名圪垯娃，官名克恭，排行老三。绰号冷三冒，最普遍的称呼是碗客。他十六七岁就赶着一头毛驴到耀州去驮碗，再赶着毛驴驮着碗在白鹿原各个村子叫卖，差不多家家的案板上都摞着他驮回来的黄釉粗瓷大碗。他驮碗卖碗发了

财，毛驴换成马车，而且在白鹿镇开了一家瓷器分店，总店在他的老巢南山根的温泉镇子里。他在南原和南山根一带已成一霸，弟兄五人人称五只虎。他的诸多恶劣行径里民愤最大的是对女人的蹂躏，凡是新娶的媳妇头一夜必须请他去开苞。他对女人永无满足永无竭止的野兽一样的欲求从小小年纪就露出端倪，用两只粗瓷大碗换取那些爱占便宜的女人的身子。在好几个村子发生过这样的事：碗客装作收钱走进一家老相好的院子，村人很放心地从毛驴驮架上把大碗小碗哄抢一空，有一回竟然被谁把拴在门口榆树上的毛驴给牵走了。碗客发了财更加纵欲，常常把那些根本没有两性生活经历的新婚媳妇整得寻死觅活……碗客现在被捆押在台上毫不羞愧怯惧，不住口地叫骂着："我圪垯娃睡过数不清的婆娘媳妇，铡了杀了剐了老子，老子也值了。二十年后还是一个圪垯娃，还卖碗还睡你婆娘……"不等黑娃宣布完碗客的罪行，几个愤怒已极的汉子蹿上戏楼，把碗客从台角上踢翻下来，砖头和石块把碗客砸成了一堆肉坨子……

这一年的新年无疑将储入每一个人的记忆。白嘉轩天不明起来洗了手脸，点燃了祭桌上的两根红色蜡烛，插上了五根紫色的香，叩拜三回，然后把一捆雷子炮夹在腋下走出街门站在仍然漆黑的街巷里。他把雷子炮的火药捻子抠出来，噗的一声吹着手里的火纸点燃捻子，麻纸卷着黑火药的捻子吱吱吱响着迸发出一串串闪亮的火星，他一甩胳膊，头顶黑沉沉的夜空便发出一声痛快淋漓的爆炸。他喜欢放炮，而且只喜欢放雷子炮。他站在门楼外的街巷里，把一个个粗壮的雷子抠出捻子抛入空中，随着一声接一声的脆响，爆碎的爆竹纸屑在寒冷的夜空悠悠飘落下来，落满他的礼帽和肩头。当他尽兴放足了炮回到上房正厅的时候，儿子和媳妇们已经拜过祖宗，也向白赵氏叩过头，只等着给他拜年祝福了。

当新年祥和的微曦照出屋脊轮廓的时候，一家人围在大方桌前吃饺子，有一位族人惊慌失措跑来向他报告了黑娃在祠堂乱砸乱挖的消息。白嘉轩仍然不慌不忙地吃饺子，他今天反倒吃得特别多。与一般人相反，每当遇事他不仅不减饭量反而食欲大振。吃饱了再说！哪怕死了也不当饿死鬼。他放下筷子就在餐桌上宣布：“孝文，你把该当办的事虑一遍，别把哪个事忘了。孝武，你晌午就去请执事。孝义，你先去给你三伯拜年。”吩咐完毕以后，白嘉轩就走进了马号。长工鹿三离过年剩下三天的时候回家去了，他年年在鹿三下工之后住进马号，绝不让儿子们代劳。大年初一他让全家人歇息，自己却在祠堂祭过祖宗之后就在祠堂门口领着锣鼓班子敲个痛快。现在，他喂过牲畜丢下搅草棍子又走进轧花机房，踩得轧花机又咔嗒咔嗒欢唱起来。

正月初三准备给孝武完婚，亲朋族人都劝他缓一缓，缓过了眼下的乱世再办，甚至亲家冷先生也趋同这种意向，但他却一口咬定不改初衷：“他闹他的革命，咱办咱的婚事，两不相干咯！农协没说不准男人娶媳妇吧？”他把二儿子孝武的婚事完全交给长子孝文去经办，让其熟悉婚事中的诸多礼仪以及一些注意事项，而他自己只是在重要环节上帮助孝文出出点子。这时三儿子孝义跑进轧花机房说：“爸吔，三伯攥着矛子要去戳黑娃，三嬷嬷教我叫你去哩！”白嘉轩听了一愣，重新穿上袍子戴好礼帽走出轧花机房。

他走进鹿三土围墙上的圆洞门，正看见鹿三手里握着长柄矛子，女人爬滚在地上死死抱着他的腿，黑娃的弟弟兔娃抱着鹿三的另一条腿，鹿三仍然怒不可遏地扑跳着。白嘉轩还没来得及劝他，他倒冲着白嘉轩斥责起来：“鹿子霖不出头你也不露面，人家砸祠堂烧祖宗神轴儿，你们装瞎子？你们怕挨铡刀我不怕。八辈子祖宗造孽是我的罪过。我把那个孽子戳了……”白嘉轩却平静地说：“你该着放下矛子，

咂上烟袋儿背抄起手，到祠堂门口戏楼底下去看热闹。十几家锣鼓家伙几十杆铳子，花钱也请不到白鹿村来的。万一你不爱看热闹……”白嘉轩平和认真地说，“我托你办的事……应该再去靠实一回。”鹿三忽然记起，给孝武抬媳妇的轿子是他经手租赁的。他看见白嘉轩意味深长地撇了撇嘴摆了摆头，一把扔掉矛子，蹲在地上大声哀叹……

农协的风暴已经席卷白鹿原。白鹿村也建立了农民协会，黑娃兼任主任，白兴儿当副主任，田小娥做妇女主任。各个村子的农协组织都模仿总部成立时的做法，摆一把明晃晃的铡刀在台上，而且发生了两起铡人的事。鹿兆鹏立即让黑娃召集各农协主任开会，申明今后再不许随便铡人，也不许再把铡刀摆到会场上，需要处治某人需得总部讨论批准。各村农协可以决定斗争和游街的对象，但必须防止群众有意或失手打死人。被革命热情鼓荡着的农协头儿们都觉得窝了兴头儿，嗷嗷叫着抱怨鹿兆鹏太胆小太心善太手软了。原上那么多财东恶绅村盖子，才铡了不过三五个就不许开铡了，革命咋能彻底进行？鹿兆鹏大声警告说：“同志们，革命不是一把铡刀……”最后令黑娃和农协头儿们鼓舞的是，兆鹏终于听从他们的呼声，决定集中目标攻一攻白鹿仓总乡约田福贤，理由是，农协要求向全体乡民公布本仓自民国以来每年征集皇粮的账目。

白鹿镇随之出现了游街的新景观。头一个建立农协的贺家坊开创了游街的先头儿，把贺家坊首富贺耀祖夫妇用绳索捆着牵牛拉羊似的拉到白鹿镇上游了一周八匝，各个村子的农协便争先恐后地把他们村子的财东恶绅牵着拽着到白鹿镇游街示众，花样不断翻新，纸糊的尖顶帽子扣在被游斗者的头上，红红绿绿的寿衣强迫他们穿到身上，脸上涂抹着锅底黑灰又点缀着白色糨糊，有的别出心裁把稀粪劈头盖脑浇下去。每逢三六九集日，镇上空前热闹拥挤，人们观看那些昔日里

曾经是原上各个村子顶体面的人物的洋相和丑态。白鹿镇的游街景观随后便屡见不鲜见多不奇了，很快也就失去了观众，及至农协总部要游斗田福贤的消息传出，刚刚冷却下去的热情和新奇感又高涨起来。还有一个更富刺激的因素，就是白鹿村的鹿子霖将同时被推到台上去，共产党儿子斗老子，真个是睁眼不认六亲啦！

把田福贤推上白鹿村的戏楼是白鹿原农民运动发展的最高峰。会址仍然选在白鹿村祠堂前的戏楼。鹿兆鹏亲自主持这场非同寻常的斗争大会。陪斗的有白鹿仓下辖的九个保障所的九个乡约。已经查明，自从田福贤出任本仓总乡约以来，几乎一年不空地在征集皇粮的时候都悄悄加了码，九个乡约无一例外地参与了分赃。黑娃逐年逐条公布了他们加码的比例和多收的粮食数字，逐个公布了田福贤和九个乡约分赃的粮数。台下由可怕的静寂突然变得像狂风暴雨一样呼叫“抬铡刀来！”鹿兆鹏站到台前，吼哑了嗓子也制止不住已经沸腾起来的骚动，他迫不得已从腰里拔出一把短枪，朝空中放了一枪，台下才得以安静下来。他便抓住时机宣布让证人作揭发。

作证揭发的是白鹿仓的金书手，田福贤加码征粮的全部底细都在他的明细账上记着。黑娃和他的弟兄们在找田福贤算账之前，先把金书手叫到农协总部，同时把一把铡刀抬到门外的台阶上。金书手一瞅见沾着碗客血痕的铡刀，脸上骤然失了血色：“好黑娃，好鹿兆谦爷哩，你听我说……你问啥我实打实说啥……你把铡刀快抬走，我看见那……心里毛草得说不成话。”黑娃让人抬走了铡刀。金书手果然神色稳住了，反而爽快地说：“噢呀，你问征粮当中田总乡约搞鬼捣窍的事，我说就是了嘛！远的记不得，单是去年刚刚征过我还没忘。本仓民地原额天时地利人和六等其制共1112顷50亩。额征夏秋粮3081石1斗5升7合6勺。每石折银1两3钱1分8厘3毫5丝8忽9微6纤2尘5渺，共额征

银……”黑娃已不耐烦：“你少啰嗦！只说搞鬼捣窍弄下多少粮食和银圆。”金书手说：“我说前多年的陈账记不清，只记得去年加码多征粮食折银1200多两。本仓原额民21297丁，征银1211两4钱5分1厘2毫。加码超征200多两。以上地丁两项超征1400多两。九个乡约每人分赃100两。我本人拿了100两。下余的田总乡约独吞了。”黑娃和他的弟兄亲自跟着金书手到白鹿仓去，把他锁在抽屉里的账簿全部背到农协总部来，一年一年一笔一笔加以清算，最后发现田总乡约和他的九个保障所乡约侵吞赃物的数目令人吃惊。鹿兆鹏获得这个重大突破的消息时，激动得一拳砸在黑娃的肩上说：“黑娃，你真了不起！这下子白鹿原真个要刮一场风搅雪了！”

…………

金书手捏着一张清单念着，双腿双手也颤抖着。田福贤和九个臣僚低垂着脑袋听任他一件一件地揭发……骚棒和尚只是欺侮过佃户的女人，碗客也仅是在南原山根几个村子恃强耍歪，而田福贤和他的九个乡约面对的却是整个原上的乡民，白鹿原二万多男女现在都成了他们的对头仇敌了。金书手还未念完，台下就再次骚动起来。鹿兆鹏立即命令纠察队员把他们押到祠堂的农协总部看管起来。为了防止愤怒的乡民砸死他们，原先计划的游街示众也因此取消。鹿兆鹏大声宣布：“将田福贤等十一人交滋水县法院审判。”愤恨的乡民对这样的决定立即表示出不满，又潮水一样从戏楼下涌到祠堂门前去，把祠堂包围得水泄不通，喊着叫着要抢出田福贤来当众开铡。黑娃也失去了控制：“兆鹏同志，你现在看看咋个弄法？我早说不铡田福贤难平民愤，铡了这瞎种有个𡎴事！”鹿兆鹏也急火了，开口骂道：“黑娃你混账！我再三说田福贤不是老和尚也不是碗客，不能铡。这是牵扯国共合作的大事。你立即命令各村‘农协’头儿把会员撤走。”

田福贤在风闻“农协”查账的消息后就奔滋水县去了。他先找了岳书记又找了新任的胡县长，见了他们的头一句话就是：“我跟鹿兆鹏合作搞革命诚心实意，想不到鹿兆鹏在背后日我尻子。我这总乡约区分部书记怎么当？”说罢大哭起来……岳维山和胡县长商定召见鹿兆鹏。

鹿兆鹏走进岳维山的办公室时，还猜不透事因，懵懵懂懂大大咧咧地坐在椅子上。岳维山开门见山地问：“兆鹏同志，你怎么把矛头对准了革命同志？”胡县长接着说：“整个白鹿原的行政机构都瘫痪了。”鹿兆鹏不假思索地说：“有确凿证据证明，田福贤不是革命同志，是个贪官污吏。这个吸血鬼不仅败坏国民革命的名声，也败坏了国民党的威信。既然话已说明，我请求你们立即着手给白鹿原派一个手脚干净的区分部书记和总乡约。”岳维山避开话题说：“我也要向你进一言，县里不断收到白鹿原乡民联名具告的状子，告农协的头儿们把碗客铡了，还把人家的儿媳妇奸淫了。据说农协的头儿全都是各个村子的死皮赖娃嘛！凭这些人能推进乡村的国民革命？革命不是乱斗乱铡！贵党在物色农协头儿时也得考虑一下吧？”鹿兆鹏不服气地说：“睡碗客儿媳妇的那个农协副主任已经撤职了。田福贤一开头就说农协头儿全是死皮赖娃。清朝政府骂孙中山先生也是死皮赖娃。”岳维山制止说：“怎么能这样乱作类比，污损国父？”鹿兆鹏坚持说：“一样的道理。腐朽的统治者都把反对他们的人骂作乱臣逆党死皮赖娃。”胡县长又把话转到具体事上：“兆鹏同志，你必须保证田福贤的生命安全。农协不准随便开铡杀人，有罪恶严重的人，要交县法庭审判。”鹿兆鹏说：“我负责把田福贤交到你手上。”

…………

天黑以后，鹿兆鹏派农协纠察把田福贤押送到县上去了，然后坐下来和黑娃研究下一步的工作——分配土地，组建农民武装。黑娃因

为没有铡死田福贤而低沉的情绪又高扬起来："兆鹏哥，咱们农协要是没收了财东豪绅的田产和浮财分给穷汉们，那就彻底把他们打倒了。"

这项工作刚刚铺开，他们又搅进了田福贤的案子里。田福贤在法院待了半个来月又大摇大摆回到白鹿原，官复原职驻进了白鹿仓。黑娃领着三个农协总部的革命弟兄赶到县法院查问，法官说："查无实据。"鹿兆鹏又亲自找到胡县长的办公室："你怎么把田福贤放了？"胡县长不失幽默地说："金书手全部翻供了。看来铡刀逼出来的口供靠不住。"鹿兆鹏旋即又找到岳维山："我现在不大关心田福贤的事情，而是担心国民革命。"岳维山很不客气地说："兆鹏同志，你是共产党员，也是国民党员，兼着两个党的重任，你偏向一个歧视一个的做法太露骨了。你把本党基层干部都游了斗了铡了，国民革命只有靠贵党单独去完成？"鹿兆鹏也直言不讳地说："请你不要太多敏感。如果共产党里头也混进来田福贤这号坏分子，我们会自动把他交给法庭的。"

鹿兆鹏回到白鹿原，黑娃就说："我说把狗日的铡了，你可要交给法院，审来审去田福贤反倒没㞞事了，反倒成了农协栽赃陷害。"鹿兆鹏和黑娃一起到省农民协会筹备处汇报，又一起找到省政府，于主席听罢情况反映以后还是那句老话："谁阻挡革命就把他踏倒。"鹿兆鹏和黑娃回到白鹿原，不久就传来可靠消息，滋水县胡县长已经被省政府撤职，国民党滋水县党部书记岳维山也被调离。黑娃和他的革命弟兄再次去白鹿仓抓田福贤的时候，田福贤早已闻讯逃跑了，金书手也去向不明了。

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滋水县的县长撤换了四任，这是自秦孝公设立滋水县以来破纪录的事，乡民们搞不清他们是光脸还是麻子，甚至搞不清他们的名和姓就走马灯似的从滋水县消失了。这件事使朱先生颇伤了脑筋，他翻阅着历代县志，虽然各种版本的县志出入颇多，

但关于滋水县乡民的评价却是一贯的八个字：水深土厚，民风淳朴。朱先生想：在新修的县志上，还能作如是的结论吗?

---

[1] 神话剧《劈山救母》结尾情节。

[2] 枋，棺材。

[3] 争：厉害之意。

第十四章

鹿兆鹏经历了投身国民革命以来的头一遭危机，他险些被捕。

那是白鹿原刚刚进入三伏的一个溽热难熬的夜晚，他从井里绞上一桶水提到竹坛旁边的渗坑前，抹下了汗夹儿挂到竹枝上，用一只葫芦瓢舀满水从头顶浇下来，冰凉的井水激得他全身起一层鸡皮圪塔。这当儿有两个陌生人走到他跟前问：“鹿校长住哪个屋？”兆鹏停住搓身的手想说“我就是”，话到出口时却完全变了样：“找鹿校长呀？他跟我是隔壁，住南排第三间房子，从过道进去，朝右首拐就到了。他刚刚洗毕躺下了。”他瞧见后院的黑暗处还站着两三个人。他在那一瞬间感到脊梁骨发冷，同时意识到事情不妙，说着又舀起一瓢水浇到头上，双手在胸脯上对搓起来，搓得肌肤咯吱咯吱响着。那两个人朝过道的方向走去，后边的三个人也匆匆跟了上去。他们的举动和脚步使他联想到尚不老练的猎人。兆鹏从竹枝上扯下汗夹儿，绕过竹坛跑到围墙根下纵身扒住墙头，黄土围墙的土屑唰唰下落的声音招来了枪声。他翻过围墙以后才感到了恐惧，刚刚收获过麦子的田野无遮无掩，连一只兔子也难以隐蔽。他顺着围墙朝南跑了一段，然后灵机一动，又纵身翻过围墙进入学校。他从枪声和叫声的方向判断，那五个抓捕他的人已分成两路朝北朝东追去了。他走到竹坛跟前冲刷掉蹭在身上的黄土汗泥，把汗夹儿套到身上，这时教员们全都惊诧地围过来。“他们开始动手了。”兆鹏说，“要走的趁早快走，不要等到他们再来。”他早已作过安排，凡是公开了共产党员身份的教员全部离开白鹿镇小学校，唯一没有公开身份的龚教员将坚守阵地。他离开仍然惊疑未定的教员们回到自己的房子，把藏在书架背后墙壁窑窝里的短枪取出来，掖到腰里又披上一件制服，然后匆匆离去。几位党员教员把他

送到学校后门都不说话。“我会去找你们的。”兆鹏说罢就转过身走进黑夜中的旷野。他随后的二十多年里，又经历过无数次的被盯梢被跟踪被追捕的险恶危机，却都不像这夜的脱身记忆鲜明。这一夜正式标志着他在白鹿原进入地下工作……

事情来得并不突然。农历三月，桃红柳绿，阳光明媚，突然从南方传来了一股寒流，蒋介石策动了“四一二”政变，国共分裂了。鹿兆鹏参加了省委特别委员会议之后回到白鹿原，黑娃和他的革命三十六弟兄正热切地巴望他带回上级关于实行土地分配的具体方案，他看见黑娃时强忍着悲愤交集的沉重心情，装出一副往常的豁达：“同志们，现在必须先抓武装力量。”在只有他和黑娃俩人在场的时候，兆鹏就向农会主任交了底：“蒋介石动手杀共产党了。北伐失败了！”黑娃瞪着眼骂：“我日他妈！我们受闪了，挨黑挫了！”兆鹏说：“省委特别会议决定要抓武装。这是血的教训。我们这回吃了没有军队的大亏。”

鹿兆鹏随之就进山去了。葛条沟有一股五六十人的土匪，据山为王的是辛龙辛虎两兄弟，曾经从逃窜的白腿乌鸦兵手里缴获了二十多杆长枪，成为山里最硬手的一支土匪武装。鹿兆鹏此行就是说服辛家兄弟把土匪改建为革命军队。黑娃却从另一条路进山去找另一股土匪。

大约过了十天，兆鹏回到白鹿镇，抑止不住欢欣鼓舞的心情说：“我们有了自己的军队了。”黑娃却沮丧地说：“我说破嘴皮打尽了比方，也说不转人家。”

分配土地的大事被搁到一边了，黑娃和他的农会骨干们整天忙着组织训练农协武装。梭镖矛子和大刀绾上了红绸，看起来挺威风的三百多人的武装队伍，在白鹿镇游行了一回就散伙了，因为小麦黄了要

收要碾了。等得小麦收打完毕进入三伏，庄稼院桃树上的毛桃发白了又变红了，革命的形势却愈见险恶。国民党和共产党共同组建的国民党省党部宣布解散，共产党和国民党共同组成的省农民协会也被勒令解散停止一切活动，国民党主持陕政的省府于主席被调回国民党中央，一位姓宋的主席临陕接替。观望等待了三个月的国民革命军驻陕冯司令终于拿定主意，投蒋反共。他发表正式声明的时间是阳历七月十五日。鹿兆鹏从白鹿镇小学逃离在这个日子的前几日，国民党里的铁腕早已等不得冯将军发表公开声明而提早动手清党了。鹿兆鹏在镇子里的一个公用茅厕装作大便，观察了白鹿镇再无什么动静，便从背街溜过去敲了敲韩裁缝的后门。他一把抱住韩裁缝的肩膀就止不住痛心裂肝地哭道："我们上当了，我们受骗了。相煎何太急，相煎何太急哇！"

田福贤随之回到白鹿原，他的屁股后头跟着十一个士兵，士兵们一律黑制服挎长枪。田福贤没有直接进白鹿仓，而是绕道先进入白鹿镇。他看见那些熟悉的店铺掌柜们便率先抱拳拱手，彬彬有礼地颔首微笑着："兄弟回来了！"他从黑娃的铡刀口里逃脱至今半年之久，面色愈加红润滋和了。岳维山被调离滋水县到南边山区的宁阳小县时带去了田福贤，他在那个贫瘠闭塞却又安定的小县城里过得十分逍遥，山区的珍禽野味滋补了在白鹿原上惊吓熬煎的身体亏空。当国共分裂的消息传到这个山区小县时，小麦开始泛黄。岳维山猛然站起来对田福贤说："我们要出山了！"他们当晚吃了野鸡熊掌娃娃鱼等山区特产，喝得酩酊大醉，第二天睡醒后便打点行李骑马进省城来了。岳维山走进国民党省党部态度十分强硬："现在的事实正好证明我在滋水县没有过错。让我还回滋水。"

他们傍晚抵达县城，当夜就派出几个尚不老到的警官到白鹿原抓捕鹿兆鹏。可他们没能如愿以偿。岳维山要田福贤留在县党部，田福贤不同意说："我还是想回我的原上，这跟你想回滋水是一个道理。"岳维山只得同意："也好，你回原上去也好。白鹿原是共产党的老窝，你去了我就放心了。"岳维山采取紧急手段从县保安队抽出十一名士兵交给田福贤："这回回原上你可是够威风的了。"

田福贤回到原上的消息半天时间就传遍白鹿原的所有村庄。从他进入白鹿仓的那天后晌起，连续两天三夜都被前来拜见的人封堵在屋子里不得出门，被斗被游被整过的乡绅财东们一把眼泪一把鼻涕一口血气地哭诉自己的苦楚，好些农协积极分子或者是他们的老子却满面羞愧地向他忏悔。田福贤起初沉浸在早就渴望着的报复心理之中，很快就惊觉过来："回去回去，诸位先回去。兄弟刚回来事儿太多太忙。"他把民团士兵布在门口阻止一切前来求见的人。有人见不到他就把烧酒点心一类礼物托付民团团丁转交给他。田福贤把那些东西接到手看也不看就摔到院子里的瓦砾堆上，鼻腔里喷出一股粗浑的气浪："还不是喝酒的时候。"

田福贤召集了下属各保障所乡约的会议。乡约们凑到一起便哭诉自己所受的辱践以及黑娃们的种种劣迹，几乎全都不曾想到总乡约召集他们来干什么。"诸位，从现在起，再不许说一句自个咋么了咋么了。"田福贤不耐烦地制止了无休止的控诉，"我们上当了受骗了。我们先前诚心实意跟共产党合作，共产党却把我们塞到铡刀口里。我从铡刀口里逃脱了也就清醒了，必须实行一个党一个主义。现在好了，该我们动手了。"田福贤讲了实施动手的具体方案，用一句话概括他的雄图大略："这回我们在白鹿原一定要把共产党斩草除根。"

田福贤很快组建起一支二十七八人的民团武装，新招募来的团丁有财东乡绅子弟，也有穷汉家的子弟，他们穿上了由韩裁缝承做的黑色制服上衣，下身暂时仍然穿着家做的叠腰大裆裤。在国民党的青天白日旗帜下举行了集体宣誓之后，由田福贤从县上带回来的十一名老团丁领着他们在麦茬地里进行操练。召开白鹿仓乡民大会的事也已筹备就绪，田福贤吃罢午饭以后就决定去找白嘉轩。

白嘉轩是原上所有头面人物中唯一没有向他表示问候的一个。他走进白家的四合院，白嘉轩正在铺着凉席的炕上午歇，响着令人沉迷的鼾声。白嘉轩被仙草叫醒后，看见田福贤站在跟前也不惊奇，一边用湿毛巾擦着眼睑一边平和地说：“我知道你回原上了。我看你那儿人太多就没去凑热闹。”田福贤笑着说：“老哥，你可比不得浅薄之辈。你水多深土多厚我一概尽知。兄弟今日来跟你说两个事。头一个，你这回得出山了。”白嘉轩说：“我本来就没进山嘛。”田福贤说：“你甭装糊涂。第一保障所乡约得请你出马。”白嘉轩说：“子霖不是干得好好的吗？”田福贤说：“老兄，你尽拿明白装糊涂。他那个共产党儿子把白鹿原搅了个天昏地黑，上边正在悬赏缉拿，他还能当乡约吗？”白嘉轩说：“既是这个交葛，我想当你的乡约都不宜出马了，让子霖兄弟疑心我趁机抢了他的帽子戴哩。快说你的后一个事吧。”田福贤很遗憾地慨叹着说：“老哥，你真个拿得稳坐得住。农协那帮死狗赖娃斗了游了你，你好忍性啊！”白嘉轩说：“我权当狗咬了。人嘛，不能跟狗计较。”田福贤说：“你不计较是好忍性。这回咬了你的腿你忍了，再一回它噙住你脖子看你还忍下忍不下？”白嘉轩说：“话能这么说也不能这么说。咱不说这话了。你不是说两个事吗？”田福贤无奈就转了话题：“我想借白鹿村的戏楼用一天。”白嘉轩不以为然地说：“借戏楼？你重返故里给原上乡党演戏呀？”田福贤说：“耍猴。”白嘉轩问：“耍猴？耍猴用不着戏楼呀！在地场上围个圈子栽个杆子就成了咯！”田福

贤说："我这回耍的是大猴妖猴，不用地场耍搁到戏楼上耍。"白嘉轩听出话里套话就认真地问："你明说你用戏楼作啥用场，你不明说我不敢应承。""耍农协那几个死狗赖娃的猴。"田福贤终于忍不住变得水泄石出，"该当整治这一帮子瞎熊坏种了。"白嘉轩说："你要是演戏，那没说的。你要弄这号事'耍'这个'猴'，请你另借别个村子的戏楼去。"田福贤从桌子旁边站起来冷笑着说："我看中你的戏楼可不是你的戏楼上开着牡丹，是他们在白鹿村的戏楼上把我当猴耍了，我耍他的猴就非搁在白鹿村的戏楼上不可。叫原上的人都看看，谁耍谁的猴耍得好！"

田福贤坐在戏楼正中，两边的宾礼席上坐着九个保障所的八个乡约以及贺家坊的贺耀祖等乡绅。经过初步训练的民团团丁格外精神地分散在各自的岗位上执行任务，戏台两角各站着一个，台下站着一排七八个全都端着枪，另有七八个肩头挂着枪的团丁分布在台下广场上，指挥拥来的男女乡民按秩序站到一定的位置上去。田福贤开始讲话："乡亲们，兄弟大难不死又回原上来了！"万头攒动熙熙攘攘的广场上顿然鸦雀无声。田福贤不失绅士风度地讲了不长的一段话就退下去了，继之登台的是金书手。他在戏楼前台尚未站稳就控制不住喊起来："田总乡约，我不是人，我是吃草的畜生，是吃屎的狗。我胡踢乱咬是害怕黑娃的铡刀。乡党们，我今日对着日头赌咒，我说田总乡约加码征地丁银的话全是假的……"台下顿时响起了一阵议论。接着就有人跳上台子，把银圆从口袋里掏出来，一摞一摞码整齐，然后到桌子前说："这是分给俺们村的银圆。俺村的人托我交还给田总乡约。"接着又有两三个人相继跳上台去交了银圆。另外还有两三个人跳上台子表态说："我的村子还没交齐，交齐了再交来。"田福贤走到台前用手势制止了继续往台上跳的人，然后把交还过银圆的那几个人一一点名叫上台子说："各人把各人交的银圆都拿走，分给乡民。"那几个人谁

也不拿银圆，一齐鼓噪起来表示这种罪恶的钱决不能拿。田福贤火了：“国民革命不是弄钱嘛！再不把银圆拿走，我就把你们的手砍了！”那几个人备受感动地走向方桌，把银圆重新装入口袋。田福贤瞅着他们跳下戏楼，突然转过身吼叫一声“乡亲们”便涕泪交流：“我田某人一辈子不爱钱。黑娃抢下我的钱分给各位乡亲，分了也就分了，我不要了。只要大家明白我的心就行了。”台下又变得鸦雀无声。站在一边的金书手开始打自己的耳光，左右开弓，手掌抽击脸颊的声音从戏楼上传到台下。田福贤对金书手的举动嗤之以鼻：“你的毛病没害在脸上，是害在嘴上。”田福贤说罢退到一边，后台里就走来两个团丁，把金书手三下五除二捆绑到戏楼前的明柱上，对着那张可怜巴巴的嘴用鞋底抽起来。金书手嚎叫了几声就不再叫了。台下右侧出现了骚动，那是鞋底抽击嘴巴溅出的血浆飞到台下人的脸上和身上，有人捡起一颗飞溅到地上的断裂的门牙。

接着十个团丁押着十个被五花大绑的人从后台走出，一排溜站到台前。田福贤像数点胡桃枣儿一样不慌不忙地向台下介绍：“这位是神禾村农协副主任张志安，小名牛蹄儿，他跑到三原可没有跑脱。这位是南寨村的李民生，倒是一条好汉，没跑没躲。鹿兆鹏跟黑娃眼儿明腿儿快都跑的跑了溜的溜了，把他的革命十弟兄三十六弟兄撂下代人受过……”田福贤点到最后一个人时停顿半刻：“这一位我不用介绍大家都认识。站在台上的这一排死皮赖娃里头数他年龄最高，这个棺材瓤子前一向好疯张呀！”台下通戏楼的砖砌台阶上走来一伙男女，有老汉老婆也有小伙儿媳妇，走上戏台一下子跪倒下去，磕头作揖哭诉起来：“田总乡约饶了俺那不争气的东西吧！”“田总乡约你权当是狗咬了你一口。”田福贤倒轻淡地笑着说：“你们快都起来。你们说也是白说。得由人家自己说。”那些求饶的男女一下子扑向自己的儿子或是丈夫，训斥着呵骂着推搡着要他们说话，台上台下顿时纷乱起来。有两

个人跪下了。又有两个跪下了。田福贤说：“哈呀，你们的声儿太小了，台下人听不见。把他们四个弄到高处让大家都能听见他们说的啥。”

乡民们现在才明白戏楼下边临时栽起的一排木杆的用途了。这四个人被团丁押解到木杆下站定，接着从杆顶吊下来一条皮绳，系到他们背缚在肩后的手腕上，一声“起”，这四个人就被吊上杆顶。从他们的双脚被吊离地面的那一瞬起，直到他们升上杆顶，四个人粗的或细的妈呀爸呀爷呀婆呀的惨厉的叫声使台下人感觉自己也一阵阵变轻失去分量飘向空间。田福贤站在台口对着空中的四个人说：“你们现在有话尽管说吧！”那四个人连声求饶不迭。田福贤往下压一压手臂，团丁们放松皮绳，那四个人又从杆顶回到地上。另外六个人中有三个见了扑通跪下了。田福贤站在台口瞅着跪在脚下的三个求饶者说：“我那个碎娃子要吃辣子。我说辣子辣你不敢吃。那碎崽娃子硬要吃，你越是说不敢吃，他偏要吃。我哄不下他，就给他嘴里塞一圪垯辣子。他……再不要吃辣子了。你们光跪下不行，得上一回杆，得知道辣子辣。你不知道辣子辣，日后有个风吹草动，还会旧病复发。”这六个人依法儿被推到杆子下面，又依法儿被皮绳吊上去放下来……田福贤说：“这十个死狗赖娃当中还有三个人没有说话。这三个人是好汉。贺老大你个老家伙，爱出风头爱上高台，今儿个让你上到杆顶，你觉得受活了？碎娃子不知辣子辣，你这个棺材瓤子也不知道吗？”贺老大在高杆顶上骂：“田福贤，我把你娃子没当个啥。连我裆里的东西也没当！”贺老大从空中“呸”的一声唾向台口，人们看到一股鲜红的喷泉洒向田福贤。田福贤恼怒地撩起衣襟擦着脸上的血沫儿。台下的前头又起了骚动，乡民们看见一块血红的肉圪垯在戏台前沿蹦弹了三下，那是贺老大咬断喷吐出来的半截舌头。田福贤用脚踩住了它，狠劲转动大腿用脚蹍蹭了几下。贺老大的嘴巴已经成为血的喷泉，鲜红的血浆

流过下巴灌进脖颈，胸前的白色布衫以及捆扎在胸脯上的细麻绳都染红了；血流通过黑色的裤子显不出色彩，像是通过了一段暗道之后在赤裸的脚腕上复现了，从脚趾上滴下来的血浆在干透起尘的地皮上聚成一摊血窝儿。田福贤又恢复了他的绅士风度：“好哇，我就看中硬汉子。蹾他！”拉绳的团丁一撒手，贺老大从空中蹾到地上，两只粗大的脚在干土地上蹬着蹭着。空中又响起木轮吱吱滚动的声音，贺老大瘫软在地的躯体又被吊起来，背缚的胳膊已经抻直，那是关节全部断裂的表征。台下已经蹲下一大片男女，把眼睛盯着脚下而不敢扬头再看空中贺老大那具被血浆成红色的身躯。贺老大连续被蹾了三次，像一头被宰死的牛一样没有愤怒也没有呻唤了。这当儿，吊在空中另五个活着的农协骨干一齐发出了求饶声，每根吊杆下都跪着他们的父母兄弟和妻女。田福贤挥了挥手，这五个人被缓缓放回地面。“你们九个这回知道辣子辣了？”田福贤用教训他家那个碎崽娃子的口气说着，又瞅着瘫软在脚下的贺老大的尸首发出感慨，“白鹿原最硬的一条汉子硬不起来了！”

在戏楼后面的祠堂里，白嘉轩正在院子里辨识以前栽着“仁义白鹿村”石碑的方位。那块由滋水县令亲笔题字刻成的青石碑被黑娃以及他的农协三十六弟兄砸成三大块，扔在门外低洼的路道上，作为下雨路面积水时供人踩踏而过的垫脚石。白嘉轩让儿子孝文出面，请来了白鹿两姓里头几个擅长泥瓦技能的匠人，又有几个热心的中年人自觉前来打下手，把砸断的碑石捡回来，用水洗去泥巴和污物，又拼凑成一个完整的碑面了。有热心的族人建议说：“应该请石匠来刻一尊新的。花费由族里捐。”白嘉轩说：“就要这个断了的。”经过再三辨识，终于确定下来原先栽碑的方位。白嘉轩亲自压着木钉长尺子，看着工匠小心翼翼地撒下灰线，对孝文说：“尺码一寸也不准差。”

孝文领着工匠们开始垒砌石碑的底座。断裂成大小不等的三块石碑无法撑栽，孝文和匠人们策划出一个保护性方案，用青砖和白灰砌成一个碑堂，把断裂的石碑镶嵌进去。白嘉轩审查通过了这个不错的设计，补充建议把碑堂的青砖一律水磨成细活儿。

当白家父子和工匠们精心实施这个神圣的工程时，祠堂前头的戏楼下传来一阵阵轰鸣声，夹杂着绝望的叫声。工匠们受到那些声音的刺激提出想去看看究竟，甚至孝文也待不住了。白嘉轩反而去把祠堂的大门关子插上了，站在祠堂院子里大声说："白鹿村的戏楼这下变成烙锅盔的鏊子了。"工匠们全瞪着眼，猜不透族长把戏楼比作烙锅盔的鏊子是咋么回事，孝文也弄不清烙锅盔的鏊子与戏楼有什么联系。白嘉轩却不作任何解释，转过身做自己的事去了。及至田福贤走进祠堂说："嘉轩，你的戏楼用过了，完璧归赵啊！"他的口气轻巧而风趣，不似刚刚导演过一场还乡复仇的血腥的屠杀，倒像是真格儿欣赏了一场滑稽逗人的猴戏。白嘉轩以一种看似超然物外而内蕴不屑的讥讽口吻说："我的戏楼真成了鏊子了！"

修复乡约碑文的工作一开始就遇到麻烦。刻着全部乡约条文的石板很薄，字儿也只有指甲盖儿那么大，黑娃和他的革命弟兄从正殿两边的墙壁上往下挖时，这些石板经不住锤击就变得粉碎了，尔后就像清除垃圾一样倒在祠堂围墙外的瓦砾堆上，不仅难以拼凑，而且短缺不全难以恢复浑全。白嘉轩最初打算从山里订购一块石料再请石匠打磨重刻，他去征询姐夫朱先生的意向，看看是否需要对乡约条文再做修饰完善的工作，尤其是针对刚刚发生过的农协作乱这样的事至少应该添加一二条防范的内容。"立乡约可不是开杂货铺。"朱先生愠怒地说，"我也不是卖狗皮膏药的野大夫！"白嘉轩还没见过姐夫发脾气，小小一点愠怒已使他无所措手足。朱先生很快缓解下来，诚挚动人地

赞扬他重修乡约碑文的举动：“兄弟呀，这才是治本之策。”白嘉轩说：“黑娃把碑文砸成碎渣了，我准备用石料重刻。”朱先生摇摇头说：“不要。你就把那些砸碎的石板拼接到一起再镶到墙上。”

白嘉轩和那些热心帮忙的族人一起从杂草丛生的瓦砾堆上拣出碑文碎片，用粗眼筛子把瓦砾堆里的脏土一筛一筛筛过，把小如指盖的碑石碎块也尽可能多地收拢起来，然后开始在方桌上拼接，然后把无法弥补的十余处空缺让石匠依样凿成参差不齐的板块，然后送到白鹿书院请徐先生补写残缺的乡约文字。徐先生在白鹿村学堂关闭以后，被朱先生邀去做县志编纂工作了。他一边用毛笔在奇形怪状的石块上写字，一边慨叹：“人心还能补缀浑全么？”

白鹿村的祠堂完全按照原来的格局复原过来，农协留在祠堂里的一条标语一块纸头都被彻底清除干净，正殿里铺地的方砖也用水洗刷一遍，把那些亵渎祖宗的肮脏的脚印也洗掉了。白鹿两姓的宗族神谱重新绘制，凭借各个门族的嫡系子孙的记忆填写下来，无从记忆造成的个别位置的空缺只好如此。白嘉轩召集了一次族人的集会，只放了鞭炮召请在农协的灾火中四处逃散的列祖列宗的亡灵回归安息，而没有演戏庆祝甚至连锣鼓响器也未动。白鹿两姓的族人拥进祠堂大门，首先映入眼帘的是断裂的碑石，都大声慨叹起来，慨叹中表现出一场梦醒后的大彻大悟，白嘉轩现在才领会姐夫朱先生阻止他换用新石板重刻的深意了。他站在敬奉神灵的大方桌旁边，愈加挺直着如椽一样笔直的腰身，藏青色的长袍从脖颈统到脚面，几乎一动不动地凝神侍立。整个祭奠活动由孝文操持。在白嘉轩看来，闹事的是鹿兆鹏鹿黑娃等人，是他之下的一辈人了，他这边也应该让孝文出面而不值得自己亲自跑前颠后了。今天召集族人的锣就是孝文在村子里敲响的。

孝文第一次在全族老少面前露脸主持最隆重的祭奠仪式，战战兢兢地宣布了“发蜡”的头一项议程，鞭炮便在院子里爆响起来。白嘉轩在一片屏声静息的肃穆气氛中走到方桌正面站定，从桌沿上拈起燃烧着的火纸卷成的黄色煤头，庄重地吹一口气，煤头上便冒起柔弱的黄色火焰。他缓缓伸出手去点燃了注满清油的红色木蜡，照射得列祖列宗显考显妣的新立的神位烛光闪闪。他在木蜡上点燃了三支紫色粗香插入香炉，然后作揖磕头三叩首。孝文看着父亲从祭坛上站起走到方桌一侧，一直没有抹掉脸颊上吊着的两行泪斑。按照辈分长幼，族人们一个接一个走上祭坛，点燃一支紫香插入香炉，然后跪拜下去。香炉里的香渐渐稠密起来。最低一辈刚交十六刚获得叩拜祖宗资格的小族孙慌慌乱乱从祭坛上爬起来以后，孝文就站在祭坛上，手里拿着乡约底本面对众人领头朗诵起来。白嘉轩端直如椽般站立在众人前头的方桌一侧，跟着儿子孝文的领读复诵着，把他的浑厚凝重的声音掺进众人的合诵声中。孝文声音洪亮持重，仪态端庄，使人自然联想到曾经在这里肆无忌惮地进行过破坏的黑娃和他的弟兄们。乡约的条文也使众人联系到在这里曾经发生过的一切，祠堂里的气氛沉重而窒息。鹿三终于承受不住心头的重负，从人群里碰碰撞撞挤过去，扑通一声在孝文旁边跪下来：“我造孽呀——”痛哭三声就把脑袋在砖地上磕碰起来。孝文停止领诵却不知该怎么办，瞧一眼父亲。白嘉轩走过来，弯腰拉起鹿三：“三哥，没人怪罪你呀！”鹿三痛苦不堪地捶打着脑袋和胸脯，脸上和胸脯上满是鲜血，他在把脑袋撞击砖地时磕破了额头。众人手忙脚乱地从香炉里捏起香灰揞到他额头的伤口上止住血，随之架扶着他回家去了。孝文又瞅一眼父亲征询主意。白嘉轩平和沉稳地说：“接着往下念。”

鹿三虽然痛苦却不特别难堪。几乎无人不晓鹿三早在黑娃引回一个来路不明的媳妇的时候，就断然把他撵出家门的事实，黑娃的所有

作为不能怪罪鹿三；鹿三磕破额头真诚悔罪的行为也得到大家的理解和同情。站在祠堂里的族人当中的鹿子霖，才是既痛苦不堪又尴尬不堪的角色。按照辈分和地位，鹿子霖站在祭桌前头第一排居中，和领读乡约的孝文脸对脸站着。鹿子霖动作有点僵硬地焚香叩拜之后仍然僵硬地站着，始终没有把眼睛盯到孝文脸上，而是盯住一个什么也不存在的虚幻处。他的长睫毛覆盖着的深窝眼睛半眯着，谁也看不见他的眼珠儿。他外表平静得有点木然的脸遮饰着内心完全溃毁的自信，惶恐难耐。白鹿村所有站在祠堂正殿里和院子里的男人们，鹿子霖相信只有他才能完全准确地理解白嘉轩重修祠堂的真实用意，他太了解白嘉轩了，只有这个人能够做到拒不到戏楼下去观赏田福贤导演的猴耍，而关起门来修复乡约。白嘉轩就是这样一种人。他硬着头皮来到祠堂参加祭奠，从走出屋院就感到尴尬就开始眯起了深窝里的眼睛。

从去年腊月直到此时的漫长的大半年时月里，鹿子霖都过着一种无以诉说的苦涩的日子。他的儿子鹿兆鹏把田福贤以及他在内的十个乡约推上白鹿村的戏楼，让金书手一项一项揭露征收地丁银内幕的时候，他觉得不是金书手不是黑娃而是儿子兆鹏正朝他脸上撒尿。就是在那一瞬间，他忽然想起了岳维山和兆鹏握在一起举向空中的拳头；就是在那一瞬间，他在心里迸出一句话来：我现在才明白啥叫共产党了。鹿子霖猛然挣开押着他的农协会员扑向戏楼角上的铡刀，吼了一声“你把老子也铡了”就栽倒下去。他又被人拉起来站到原位上，那阵子台下正吼喊着要拿田福贤当众开铡，兆鹏似乎与黑娃发生了争执。他那天回家后当即辞退了长工刘谋儿。他听说下一步农协要没收土地，又愈加懒得到田头去照料，一任苞谷谷子棉花疯长。他只是迫不得已才在午间歇晌时拉着牲畜到村子里的涝池去饮水，顺便再挑回两担水来。老父鹿泰恒也说不出有力的安慰他的话，只管苦中嘲笑说：“啥叫羞了先人了？这就叫羞了先人了。把先人羞得在阴司龇牙哩！”

田福贤回原以后，那些跟着黑娃闹农协整日价像过年过节一样兴高采烈的人，突然间像霜打的红苕蔓子一夜之间就变得黢黑蔫塌了；那些在黑娃和他的革命弟兄手下遭到灭顶之灾的人，突然间还阳了又像迎来了自己的六十大寿一般兴奋；唯有鹿子霖还陷入灭顶之灾的枯井里，就连田福贤的恩光也照不到他阴冷的心上。田福贤回到原上的那天后晌，鹿子霖就跑到白鹿仓去面见上级，他在路上就想好了见到田总乡约的第一句话"你可回咱原上咧！"然后俩人交臂痛哭三声。可是完全出乎鹿子霖的意料，田总乡约嘴角咂着卷烟只欠了欠身点了点头，仅仅是出于礼节地寒暄了两句就摆手指给他一个座位，然后就转过头和其他先他到来的人说话去了，几乎再没有把他红润的脸膛转过来，鹿子霖的心里就开始潮起悔气。两天后田福贤召开了各保障所乡约会议，十个乡约参加了九个独独没有通知他，他就完全证实了面见田福贤时的预感。鹿子霖随后又听到田福贤邀白嘉轩出山上马当第一保障所乡约的事，他原先想再去和田福贤坐坐，随之也就默自取消了这个念头。鹿子霖一头蹬脱了一头抹掉了——两只船都没踩住。先是共产党儿子整了他，现在是国民党白鹿区分部再不要他当委员，连第一保障所乡约也当不成了。鹿子霖灰心丧气甚至怨恨起田福贤。在憋闷至极的夜晚只能到冷先生的药房里去泄一泄气儿。别人看他的笑话，而老亲家不会。冷先生总是诚心实意地催他执杯，劝他作退一步想。冷先生说："你一定要当那个乡约弄啥？人家嘉轩叫当还不当哩！你要是能掺三分嘉轩的性气就好了。"鹿子霖解释说："我一定要当那个乡约干屎哩！要是原先甭叫我当，现在不当那不算个啥，先当了现时又不要我当，是对我起了疑心了，这就成了大事咧！"冷先生仍然冷冷地说："哪怕他说你是共产党哩！你是不是你心里还不清楚？肚里没冷病不怕吃西瓜。我说你要是能掺和三分嘉轩的性气也就是这意思。"

鹿子霖接受了冷先生的劝说在家只待了三天，冷先生给他掺和的三分嘉轩的性气就跑光了。田福贤在白鹿村戏楼上整治农协头子的大会之后，鹿子霖再也闭门静坐不住了，跑进白鹿仓找到过去的上司发泄起来：“田总乡约，你这样待我，兄弟我想不通。兄弟跟你干了多年，你难道不清楚兄弟的秉性？我家里出了个共产党，那不由我。兆鹏把你推上戏楼，也没松饶我咯！他把我当你的一伙整，你又把我当他的一伙怀疑，兄弟我而今是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田福贤起初愣了半刻，随之就打断了鹿子霖的话：“兄弟你既然把话说到这一步，我也就敲明叫响，你家里出了那么大一个共产党，不要说把个白鹿原搅得天翻地覆，整个滋水县甚至全省都给他搅得鸡犬不宁。你是他爸，你大概还不清楚，兆鹏是共产党的省委委员，还兼着省农协副部长，你是他爸，咋能不疑心你？”鹿子霖赌气地说：“他是啥我不管，我可是我。我被众人当尻子笑了。我没法活了！你跟岳书记说干脆把我押了杀了，省得我一天人不人鬼不鬼地受洋罪……”田福贤再次打断他的话：“兄弟你疯言浪语净胡说。我为你的事跟岳书记说了不下八回。我当面给岳书记拍胸口作保举荐你，说子霖跟我同堂念书一块共事，眼窝多深睫毛多长我都清楚，连一丝共产党的气儿也没得。岳书记到底松了口，说再缓一步看看。你心里不受活说气话我不计较，你大概不知道我为你费了多少唾沫？”鹿子霖听了，竟然双手抱住脑袋哇的一声哭了：“我咋么也想不到活人活到这一步……”

鹿子霖站在祭桌前眯着眼消磨着时间，孝文领读的乡约条文没有一句能唤起他的兴趣，世事都成了啥样子了，还念这些老古董！好比人害绞肠痧[1]要闭气了你可只记着喂红糖水。但他又不能不参加。正当鹿子霖心不在焉站得难受的时候，一位民团团丁径直走进祠堂，从背后拍了拍他的肩膀：“田总乡约请你。”

一个“请”字就使鹿子霖虚空已极的心突兀地猛跳起来。鹿子霖走进白鹿仓那间小聚会室，田福贤从首席上站起来伸出胳膊和他握手，当即郑重宣布：“鹿子霖同志继续就任本仓第一保障所乡约。”在田福贤带头拍响的掌声中，鹿子霖深深地向田福贤鞠了一躬，又向另八位乡约鞠了一躬。两个黑漆方桌上摆满了酒菜，鹿子霖有点局促地坐下来。田福贤说：“今日这席面是贺老先生请诸位的。我刚回到原上，贺老先生就要给卑职接风洗尘，我说咱们国民党遵奉党规不能开这吃请风之先例。今天大局初定全赖得诸位乡约协力，又逢子霖兄弟复职喜事，我接受贺老先生的心意，借花献佛谢承诸位。”贺耀祖捋一捋雪白的胡须站起来：“我活到这岁数已经够了，足够了。黑娃跟贺老大要铡了我，我连眨眼都不眨。我只有一件事搅在心里，让黑娃贺老大这一杆子死狗赖娃在咱原上吆五喝六掐红捏绿，我躺在地底下气也不顺，甭说活着的人了。福贤回来了原上而今安宁了，我当下死了也闭上眼睛了。”鹿子霖站起来：“承蒙诸位关照，特别是田总乡约宽宏大量，明天受我一请。”立即有几位乡约笑说：“即使天天吃请也轮不到你，一个月后许是轮上……”田福贤打断说：“诸位好好吃好好喝听我说，原上大局已定，但还是不能放松。各保障所要一个村子一个寨子齐过手，凡是参加农协的不管穷汉富户，男人女人，老的小的，都要叫他说个啥！把弓上硬，把弦绷紧，把牙咬死，一个也不能松了饶了。要叫他一个个都尝一回辣子辣。如若有哪个还暗中活动或是死不改口，你把他送到我这儿来，我的这些团丁会把他教乖。再，千万留心那些跑了躲了的大小头目的影踪……”田福贤回过头对坐在旁边的鹿子霖说：“前一向你没到任，第一保障所所辖各村动静不大，你而今上任了就要迎头赶上，这下就看你的了。”田福贤说的是真心话。白鹿村在原上举足轻重的位置使他轻易不敢更换第一保障所的乡约，出于各方面的考虑，他仍然保全了鹿子霖，只有他可以对付白嘉轩。

鹿子霖经过一天准备，第二天就召开了白鹿村的集会，从白鹿仓借来八个团丁以壮声威，田福贤亲自参加以示督战。白鹿村那些当过农协头目的人被押到戏楼上，田福贤第一次在这儿开大会时栽下的十根杆子还未拔掉，正得着用场。白鹿村农协分部的大小头目甚至不算头目的蹦跶得欢的几个人也都被押到台上，正在准备如法炮制升到杆顶上去。这些人早已见过贺老大被蹾死的惨景，一看见那杆子就软瘫了，就跪倒在鹿子霖面前求饶。鹿子霖瞧也不瞧他们，只按照既定的程序进行。五六个人已经被推到木杆下，空中坠下带钩的皮绳，钩住了背缚在肩后的手腕。这当儿白嘉轩走上台子来。鹿子霖忙给白嘉轩让座位，他早晨曾请他和自己一起主持这个集会，白嘉轩辞谢了，又是那句“权当狗咬了”的话。白嘉轩端直走到田福贤的前头鞠了一躬，然后转过身面向台下跪下来：“我代他们向田总乡约和鹿乡约赔情受过。他们作乱是我的过失，我身为族长没有管教好族人理应受过。请把他们放下来，把我吊到杆上去。”乱纷纷的台下顿时鸦雀无声。田福贤坐在台上的桌子后边一时没了主意，白嘉轩出奇的举动把他搞得不知所措。鹿子霖呆愣了片刻就走到白嘉轩跟前，一边拉他的胳膊一边说：“嘉轩，你这算做啥？人家斗你游你，你反来为他们下跪？”白嘉轩端端正正跪着凛然不可动摇：“你不松口我不起来。”鹿子霖放开拉扯的手又奔到田福贤跟前，俩人低声商议了一阵，田福贤就不失绅士风度地走到台沿：“嘉轩快起来。”田福贤又对台下说，“看在嘉轩面子上，把他们饶了。”白嘉轩站起来，又向田福贤打躬作揖。田福贤说：“白兴儿和黑娃婆娘不能放。这俩人你也不容他们进祠堂。”白嘉轩没有说话就退下台去，从人群里走出去了。鹿子霖已经不耐烦地挥一挥手，白兴儿和田小娥就升上空中，许多人吼叫起来：“蹾死他！”“蹾死那个婊子！”田小娥惨叫一声就再叫不出，披头散发吊在空中，一只小巧的尖头上绣着一朵小花的鞋子掉下来……对白兴儿没有施用蹾刑，只轻轻儿从杆顶放下来，两只手高举着被绑捆到头顶的木杆上。田福

贤说："乡党们大家看看他那两只手——"人们一齐拥到白兴儿跟前，那两只鸭蹼一样连在一起的手指和手掌丑陋不堪，怪物似的被好奇的人们仔细观赏。白兴儿平时把手包藏得很严，庄场上又不准人围观，能看到他的连指手的机会几乎没有。田福贤嘲笑说："长着这种手的人还想在原上成事？！"白兴儿满面羞辱地紧闭着双眼，蜡黄的瘦长条脸上虚汗如注。一个团丁提着一把弯镰似的长刀站在木杆下，像是表演拿手绝技一样扬扬得意地扬起手臂，用刀尖一划一挑，把白兴儿食指和中指间的鸭蹼一样的薄皮割断了。白兴儿一声惨叫连着一声惨叫。一些胆小心软的人纷纷退后，一些胆大心硬的人挤上去继续观赏。团丁的刀刃和刀把都已被血浆染红，鲜血从他攥着刀把的后掌里滴落到地上，他仍然不慌不忙地扬起刀，小心翼翼地用刀尖对准两个指头之间的薄皮一划一挑，直到把两只手掌做完了事。白兴儿已经喊哑了嗓子，只见他频频张嘴却听不到一丝声音。

"行啊行啊！你行啊子霖！你今日要猴要得最绝。"田福贤说，"就这样往下要。就这么一个村子一个寨子齐摆摆儿往过要。皇上他舅来了跪下求情也不松饶。"鹿子霖说："白鹿原上怕是再也寻不出第二个白嘉轩了。你今日亲眼看见了，嘉轩这人就是个这。"田福贤说："嘉轩爱修祠堂由他修去，爱念乡约由他念去，下跪为人求情也就这一回了。你干你的事甭管他。你可甭忘了黑娃，他跑了不是死了。黑娃在你保障所辖区又在你的村里，你该时刻留心他的影踪。"鹿子霖说："怕是他有十个胆，也不敢回原上来了。"田福贤说："只要我在这原上，谅他也不敢回来。不是他回来不回来的事，咱得下工夫摸着他的踪影，把这猴儿要了才算要得好。"

---

[1] 绞肠痧：中医指腹部剧痛不吐不泻的霍乱。

第十五章

黑娃早已远走高飞。他现在穿一身青色军装制服，头戴硬壳短舌大盖帽，腰里结一根黑色皮带，缀着紫红皮穗的短枪挂在腰际，十分英武十分干练地出出进进旅部的首脑机关。这是一支国民革命军的加强旅。黑娃已经成为习旅长最可信赖的贴身警卫。

黑娃总是忘不了从白鹿原逃走时的情景。那天晚上兆鹏从城里回来就赶到设在祠堂的农协总会来，把一张纸条交给他说："你拿这条子去投奔习旅。不能再拖，今黑间就走。"黑娃接住纸条看也没看装进口袋叹了口气："狼还没来哩娃先跑光了。"他嘴角那一缕嘲弄自己的笑意下隐现着痛苦，"十弟兄三十六弟兄都是我煽乎起来的，他们闹农协没得到啥啥好处，而今连个安宁光景也过不成了。人家父母妻子这下该咋样恨我哩？"兆鹏急了："现在是啥时候，还说这种话干什么？你今晚就走。还没走的同志由我负责。"黑娃气憋憋地说："我不走，我决意不走。我就坐在这儿让田福贤把我打死。我跟农协一块完蛋。"

黑娃还是听从了兆鹏的话决定逃走。他和兆鹏在祠堂里最后瞅了一眼就走出来。他回到窑里抱住小娥就忍不住大哭，哭得伤心至极浑身瘫软。他第二天早晨起来就动手担水和泥，把坍塌的猪圈补垒起来，把窑面上脱落的泥皮重新抹糊浑全，就像和小娥刚刚住进这个窑洞时那种居家过日月的样子，其实心境全非了。无法抵挡的沮丧和灰败的情绪难以诉说，他仅仅只是悲哀地向亲爱的小娥尽最后一点男人的义务了。这天夜里，他才向小娥说透了要走的话。"你走了我咋办？你走哪儿我跟到哪儿，你不带我我就跳井……"黑娃瞪着眼不说话，这是早就料想得到的。小娥哭着叫着发疯似的把他的胸脯抓抠得流血：

“你好狠心呀，你跑了躲了叫田福贤回来拿我出气……”黑娃说：“这没有办法。”这当儿响起了两声枪声。黑娃爬起来一边穿衣服一边说：“你再不放手就没我了。他们来了。”黑娃跑出窑洞就躲在坡塄上一个塌陷的墓坑里，五六个人喘着气奔到窑洞口，砸响了窑门。他听见他们的吆喝和小娥惊吓的哭声，不久就看见那几个人吆吆喝喝又奔村子里去了。黑娃从墓坑爬出来，蹲在他的窑垴上久久不动，窑里传出小娥绝望的哭泣。他终于咬着牙离开了。

黑娃在黎明时分走进了习旅的营地。习旅驻扎在滋水县城东边的古关道口，进可以立即出击省城，败可以退入山中据关扼守。凭着兆鹏的纸条，他当即被编入一团一营一连一排，换上了一身青色军装。黑娃大约接受了半月之久的立正稍息、向右转向左转向后转、起步走正步走跑步走，一、二、三、四和一二三、四的基本操练之后，才开始持枪训练。黑娃接住排长发给他长枪的那一刻，突然想到田福贤；在他第一次领到金黄的子弹时，他又想到了田福贤。他想，金黄色的子弹从乌黑的枪管里呼啸而出，击中田福贤那颗头发稀疏头皮发亮的圆脑袋有多么舒心啊。他第一次摸到枪把儿的那一瞬间，手心里有一种奇异的感觉，完全不同于握着锨把儿镢把儿或打土坯的夯把儿的感觉，从此这感觉就伴随着他不再离去。那枝枪很快就成为他手中的一件玩物，第一次实弹演习几乎打了满靶，因此被提为一排一班班副。接着的一场实弹演练比赛中，他以单臂托枪左手叉腰的非操练姿势连打连中，习旅长观看完比赛就把他调进旅部警卫排，手里又添了一把折腰子短枪。他握住折腰子比握住任何农具都更能唤起他的激情和灵感，突然他悟觉到自己可能天生就不是抡镢捉犁的，而是玩枪的角色；好多老兵练了多年瞄准射击的动作要领仍然常常脱靶，可他无论长枪短枪尤其是短枪，都能玩得随心所欲。他的干练与机敏似乎是与生俱来，又带着某些连他自己也说不清白的神秘色彩。有一次习旅长

正对全体官兵训话，四个贴身卫士站在习旅长左右，黑娃和警卫排的其余卫士站在前排，从各种角度封住了可能射向习旅长的路径。黑娃突然预感到要发生什么事了，那种感觉像绳索一样越勒越紧，不是眼睛而是脑袋里头突然闪现出一根黑色的枪管，他猛然拔地而起，纵身一跃，像豹子一样迅疾地扑上去把习旅长压倒在地，几乎同时听到了一声枪响。站在习旅长左右面对着台下的四个卫士还愣呆在原地。子弹擦着黑娃的左肩拉开了皮肉，习旅长安全无恙。那个谋杀的士兵已经被打翻在地，随之被愤怒的士兵携溜到台上，当下就招出了他当刺客放黑枪的由来。“放开他，让他走。”习旅长说，“你回去告诉我大哥，别脸皮太薄，别抹不下脸来剿灭我，派你这号饭桶蒸馍笼子来放黑枪成不了事，即就成了事也太龌龊了嘛！”

习旅长和冯司令是结拜兄弟，他们是在莫斯科学习军事指挥时结拜的。冯司令发表投蒋反共以前以后，都没有忘记说服习旅长继续与他结盟。习旅是省内乃至西北唯一一支由共产党人按自己的思想和建制领导的正规军，现在扼守在古关道口，为刚刚转入地下的共产党保住了一条通道。黑娃随之就被习旅长调为贴身卫士。习旅长半是玩笑半是认真地说：“调你来保卫我责任重大，你明白吗？我习某并不重要，死一个死十个都不重要。可在眼下这要紧弦上我很重要，千万不能给人拿黑枪打了。没我了就没有习旅了，没习旅了，共产党就彻底成了空拳头干急没办法了。冯司令派人朝我打黑枪，不是我跟冯司令人缘不好，是他要我改姓共为姓国我不改，你、明、白吗？”黑娃一下子心血来潮：“黑娃明白。旅长你放心，我有三只眼。”习旅长畅快地大笑着拍了一下黑娃的肩膀。

习旅长待黑娃情同手足。一个重大的军事行动基本决定，部队将要撤离滋水县的古关道口进入渭河边上的时候，习旅长对黑娃说：“青

黄不接时月，你回去安置一下，也看看媳妇。”黑娃借机向习旅长请求，让白鹿原和他一起投奔习旅的四个弟兄也能回家一趟，习旅长点头同意了。黑娃一行五人全换上了便装，装作结伙出门揽活的庄稼汉，赶天擦黑时上了白鹿原。五人分道走向各自的村庄，约定在贺家坊贺老大的坟墓上集合。

黑娃走进白鹿村正值夜深人静，树园子里传出狼猫和咪猫思春的难听的叫声。黑娃敲响了窑洞的门板。小娥张皇惊咋的声音黑娃一听就心软了。他把嘴贴着门缝说：“甭害怕甭害怕，我的亲蛋蛋儿。你哥黑娃……”小娥猛然拉开门闩，把一身热气的光身子扑到他怀里，哇的一声哭了。不期而至的欢愉几乎承受不住，小娥趴在黑娃怀里哭诉鹿子霖田福贤把她吊上杆顶的痛楚；又惊慌失措地拼打火石点亮油灯，让黑娃看她胳膊上手腕上被绳索勒破的疤痕；突然又噗的一声吹灭油灯，惊恐万状地诅咒自己太马虎了，点灯无异于给田福贤的民团团丁们引路，说着就把黑娃往窑门外头推搡：“快走快跑。逮住你你就没命咧！”黑娃猛然用力把小娥揽入怀里，用一只手从背后关了门，再把光溜溜的小娥抱到炕上塞进被窝，说：“啥事都甭说了，我都知道了。”他在小娥的枕头边坐下来：“他们逮不住我，你放心，光是让你在屋受恓惶……”小娥又哇的一声哭了，从被窝里跃起来抱住黑娃的脖子：“黑娃哥呀，要是不闹农协，咱们像先前那样安安宁宁过日子，吃糠咽菜我都高兴。而今把人家惹恼了逗急了容不下咱们了，往后可怎么过呀？你躲到啥时候为止哩？”黑娃说：“甭吃后悔药，甭说后悔话。我在外头熬活挣钱，过一些时月给你送钱回来，总有扳倒田福贤的日子。我还要把他压到铡刀底下……”窗外传来鸡啼，黑娃脱了衣服溜进被窝，把在被子外头冻得冰凉抖索的小娥搂抱得紧紧的，劫难中的欢愉隐含着苦涩，虽然情渴急烈，却没有酣畅淋漓。当窑门外的鸡窝里

再次传来鸡啼的声音，黑娃就从小娥死劲的箍抱里挣脱出来，穿好衣服，把一摞银圆塞到她手里。

黑娃赶到贺家坊村北的一堆黑森森枳树坟园前学了一声狗叫，枳树那边也起了一声狗的叫声相呼应，已有三人先到，只差一位弟兄了。四个人隐伏在枳树坟园的四个方向，终于等来了最后一个弟兄，在埋着贺老大被蹾碎了骨头的尸首的坟墓前跪下来，黑娃把一绺事先写好的引魂幡挂到枳树枝上，枳树上的尖刺扎破了手指，一滴鲜血浸润到写着"铡田福贤以祭英灵——农协五弟兄"的白麻纸条上。不敢点蜡不敢焚香更不敢烧纸，五个人递传着把一瓶烧酒奠在坟头，叩首长拜之后就离开了。一个弟兄说："田福贤明日又要忙活了。"黑娃说："挠一挠田福贤的脚心，叫他也甭睡得太安逸了！"

"这是吓我哩！"田福贤看了看白麻纸上的字随手丢到桌子上说，"他们要是有本事杀我，早把我都杀了。"

挂在枳树枝上的引魂幡子是贺家坊一个早起拾粪的老汉发现的，贺耀祖揣着它亲自来见田福贤。田福贤平淡的反应让贺耀祖觉得丧气："福贤，你千万千万不可掉以轻心。斩草除根除恶务尽。黑娃那一伙逃了躲了贼心可没死哇！"田福贤仍然雍容大度地说："叔哎，你的话说的都对着哩！黑娃这一帮子死狗赖娃全是共产党煽乎起来的，共产党兴火了他们就张狂了，共产党败火了他们也就塌火了。"送走了贺耀祖，田福贤就对民团团长下令，把团丁分成四路到各个村子去，把黑娃三十六弟兄的家属带到白鹿仓来。

小娥走进白鹿仓立即感到气氛不对，叫她畏怯的团丁们一个个全都笑容可掬，不像训斥仇人而是像接待亲戚贵宾一样带着她走进一个屋子，里面摆着桌凳并要她坐下。小娥不敢坐，又不敢不坐，就在最

后边靠墙的一个拐角颤怯怯坐下来，低下头就再不敢抬起来。田福贤在台上讲第一句话她就抑制不住心的狂跳，不敢抬头看田福贤的眼睑而是把头垂得更低了。田福贤的口吻很轻松，似乎在讲一个有趣的故事：“我前几天到县上去撞见朱先生。朱先生耍笑说：‘福贤，你的白鹿原成了鏊子了。’我想起白嘉轩也对我说过这句话。我才明白嘉轩的话其实是从他姐夫那儿趸下的。嘉轩说这话时我没在意当是说耍话的。弄清了这话是朱先生的话我才在意了。朱先生是圣人，向来不说诳话，他说的话像是闲话其实另有后味。我回来想了几天几夜才解开了，鏊子是烙锅盔烙葱花大饼烙饦饦馍的，这边烙焦了再把那边翻过来，鏊子底下烧着木炭火。这下你们解开了吧？还解不开你听我说，这白鹿原好比一个鏊子，黑娃把我烙了一回，我而今翻过来再把他烙焦。”田福贤讲到这儿，一直沉默拘谨的听众纷纷噢噢噢醒悟似的有了反应。田福贤受到鼓舞，又诚恳地感慨说：“要叫鏊子凉下来不再烙烫，就得把底下的木炭火撤掉。黑娃烙我是共产党煨的火，共产党而今垮塌了给它煨不上火了，所以嘛我现在也撤火——”在座的家属全都支长耳朵听着。田福贤郑重地说：“把你们的子弟丈夫叫回来，甭再东躲西藏了。叫他们回来到仓里来走一趟，说一句‘我错了，我再不跟人家吆老鸦了’就行了。哪怕一句话不说只要来跟我见个面就算没事了。我说这话你们信下信不下？”众人不吭声。这时有人站起来证实：“我是黑娃三十六弟兄的二十一弟兄。我跑到泾阳在一家财东家熬活，团丁把我抓回来。我只说非杀了我剐了我没我的小命了。田总乡约跟我只说了一句，‘回去好好过日子，再甭跟人瞎闹了’。我而今实实后悔当初……”又一个小伙接着说：“我躲到城里一家鞋铺子给人家抹褙子，夜夜想我妈想我大。我偷偷跑回来给民团逮住了……田大叔宽容了我，我一辈子不忘恩德。”这两个人的现身说法打动了许多人，人们虽然担心软刀子的杀法，但还是愿意接受软的而畏惧硬的，当下就有几个人争相表态，相信并感激田总乡约的恩德，明天就去寻找逃躲在

外的儿子或丈夫回来悔罪。田福贤笑着向表态的人一一点头，忽然站起来睃巡会场，终于瞅中了低头坐在屋子拐角的小娥：“黑娃屋里的，你听我说，黑娃是县上缉捕的大犯。其他人我敢放手处理，对黑娃我没权处理，但我准备向县上解说，只要黑娃回来，我就出面去作保。冤仇宜解不宜结，化干戈为玉帛。”

紧接着的六七天时间里，那些逃躲在外的三十六弟兄中的许多人便由他们的父兄领着走进了白鹿仓。田福贤实践诺言，不仅没有加害这些曾经吆喝着把他压到铡刀底下的对手，反而像一个宽厚长者训导淘气的晚辈：“好咧行咧，有你一句知错改错的话就对咧！回去好好下苦，把日子往好哩过，不瞧瞧你爸都老成啥样子咧。”感动得赔罪者愧悔嗟叹，有的甚至热泪滚滚。田福贤这一下完全征服了白鹿原，街论巷议都是宽厚恩德的感叹。这种局面影响到民团团丁，由高度紧张变得松懈起来。田福贤看到了就及时训话：“把这些人宽大了，实际是把老鸦落脚搭窝的树股给它砍掉了，鹿兆鹏这号老鸦再没处落脚垒窝了。你们敢松手吗？外表上越松，内里越要抓紧盯死，一心专意地瞅住共产党。鹿兆鹏跑进城里去了，偷偷还回原上来过几回……你们啥时候能抓住他？我给诸位的赏金早都准备停当了，数目比省上悬赏的数儿还大。”

小娥回到窑里就开始了慌乱，有一半信得下田福贤的话，又有一半信不下。过了几天，听到许多黑娃的弟兄都得到田福贤的宽宥，她就开始发生了朝信的一面的决定性偏倒。她表现得很有主见，一丝也不糊涂，必须让田福贤按他的诺言行事，应该由他先给县上说妥以后再让黑娃回来，不能让黑娃回来以后再由他到县上担保；万一县上不答应，可就把黑娃害了。她几次在白鹿镇通白鹿仓的路上踅来踅去，总是下不了决心鼓不起勇气走过去。她想起把田福贤押上白鹿村戏楼

再压到铡刀口时的情景。她那会儿作为妇女代表风风光光坐在戏楼上观看对田福贤的审判，看见田福贤被绳索拘勒成紫茄子色的脖颈和脸膛，两只翻凸出来的眼球布满血丝，那眼睛里流泻出垂死的仇恨、垂死的傲气和少许的一缕胆怯。现在，那两只翻凸出来布满血丝的眼球终日价浮现在她的眼前，她执瓢舀水时那眼球在水缸里，吓得她失了手；她拉风箱烧锅时那眼球又在灶膛的麦秸火焰里，吓得她几乎折断了风箱杆儿；更为不可思议的是，她在冒着蒸气的熬得黏稠的苞谷糁子的粥锅里又看见了那双眼球——那天坐在白鹿仓会议室后排拐角，她鼓足勇气从两个脑袋的间隙里偷偷溜了田福贤一眼，滋润的方脸盘上嵌着一双明澈温厚的眼睛……她在路口装作买东西在摊贩货堆前踅摸了一阵就退回原路来，根深蒂固的自愧自卑使她不敢面对那双明澈的眼睛，就朝镇子的中街走过去，一转身拐进了第一保障所的大门。

小娥一看见鹿子霖叫了一声“大”就跪下了：“大呀，你就容饶了黑娃这一回。”鹿子霖愠怒地斥责：“起来起来。有啥话你说嘛跪下做啥？”小娥仍然低头跪着：“你不说个饶字我不起来。”“爱跪你就跪着。”鹿子霖说，“你寻错人登错门了。黑娃是县上通缉的要犯，我说一百个饶字也不顶用。那天田总乡约亲口给你说了，叫你把黑娃叫回来他再给县上作保，你该去给田总乡约回话。”小娥说：“我一个女人家不会说话，我也不敢进仓里去……”鹿子霖揶揄地说：“你不是都敢上戏楼吗？咋着连仓里的门就不敢进了呢？”小娥羞愧地垂着头：“好大哩，现时还说那些事做啥！黑娃年轻张狂了一阵子，我也张狂了几回，现在后悔得提不起了。”鹿子霖说：“你就这样去给田总乡约回话，就说你两口子张狂了后悔了再不胡成精了。”小娥说：“我求大跟田总乡约说一下。你是乡约说话顶用。黑娃好坏是你侄儿，我再不争气是你老的侄媳妇。我再没亲人……”鹿子霖不再开口，这个一进入白鹿村就被阿公鹿三撵出家门的小媳妇和他算得近门，他和鹿三同辈，

又比鹿三小几岁，她自然叫他大大，他从来也没有机缘听她叫一声大。她现在跪在他前面一句一声“大”地叫着，他有点为难了；他又一次感到自己心慈面软的天性，比不得白嘉轩那样心硬牙硬脸冷，甚至比不得鹿三。小娥继续诉说：“大呀，你再不搭手帮扶一把，我就没路走了。我一个女人家住在村外烂窑里，缺吃少穿莫要说起，黑间狼叫狐子哭把我活活都能吓死，呜呜呜……”

“唉——”鹿子霖长长地吁叹一声，“你起来坐下。我给田总乡约说说就是了。”说着点燃一根黑色卷烟，透过眼前由浓而淡缓缓飘逸弥漫着的蓝色烟雾，鹿子霖看见小娥撅了撅浑圆的尻蛋儿站立起来，怯怯地挪到墙根前歪侧着身子站着，用已经沾湿的袖头不住地擦拭着流不尽的泪水，一绺头发从卡子底下散脱出来垂在耳鬓，被泪水洗濯过的脸蛋儿温润如玉光洁照人，间或一声委屈的抽噎牵动得眉梢眼角更加楚楚动人，使人突生怜悯。鹿子霖意识到他的心思开始脱缰就板下脸来：“你叫我给田总乡约说话，也得说清黑娃到底在哪达嘛。”小娥猛乍扬起头来：“我要是知道他在哪达，我就把他死拽回来了。他只说他给人家熬活，死口不说在东在西。”鹿子霖忙问：“他啥时候给你说他给人家熬活来？他回来过？”小娥也不想隐瞒：“他半个月前回来过一回，给我撂下几个铜子叫我籴粮食度春荒，鸡叫头遍进窑门，鸡叫二遍又出了窑门。我问他在哪达，他怕我去寻他，他死活不透底儿……”鹿子霖“噢”了一声，又鼓励小娥继续说下去：“你说这话我信哩！”小娥说：“你给田总乡约把话靠实，只要能饶了他，他再回来给我送钱时，我就拉住他不叫他走……”小娥说着又轱辘辘滚下泪珠来。鹿子霖说：“好了，我立马去找田总乡约。你回吧，你放心地等我的回话。把眼泪擦了，甭叫街上人看见笑话。”鹿子霖叮嘱着，看见小娥有点张皇失措地撩起衣襟去擦眼泪，露出了一片耀眼的肚皮和那个脐窝，衣襟

下露出的两个乳头像卧在窝里探出头来的一对白鸽。他只扫瞄了一眼，小娥捋下衣襟说："大！那我就托付你了，我走了。"

鹿子霖走进白鹿仓找到田福贤直言道："贺老大坟上的引魂幡子是黑娃挂的。"他看着田福贤惊异的神色愈加自得地学说了与小娥谈话的过程，正是从小娥透露的黑娃回家的时间准确无误地推测出这个结果。田福贤问："她没说黑娃在哪达？"鹿子霖说："看来她是真不知底儿。黑娃也逛得鬼得很哩！"田福贤断然说："好啊子霖，你谈的这个情况很重要。你马上可以给她满碟子满碗地回话，只要黑娃投案回来一概不究，县上通缉的事由我包了。你千方百计把这女人抚拢住，哪怕她漏出一丝黑娃的影踪也好。那样的话你就立下大功了。"

第三天夜里，鹿子霖敲响了小娥窑洞的门板。他刚刚从贺家坊喝酒回来。贺耀祖见了挂在贺老大坟上的引魂幡怒不可遏，指挥族人把贺老大家老三辈的祖坟从贺氏坟园里挖走了，业已腐朽的骨殖和正在腐烂的尸体全都刨出来扔到沟里去了。贺耀祖置备酒席庆贺，邀集本仓的头面人物赴宴。田福贤恪守夜不出仓的戒律谢辞邀约。鹿子霖痛痛快快咥了一顿喝了一通谝了个尽兴，夜深人静时分呼吸着麦苗青草的清新气息，浑身轻松地从村子东边的慢坡道上下来，走进了小娥独居的窑院。窑里传出小娥睡意蒙眬惊恐万状的问话声。"你大。"鹿子霖说，"甭害怕。我是你大。"

木门闩哐哧滑动一声门开了一扇，鹿子霖侧身进去随手关上了木闩，窑里有一股霉味烟味和一股异香相混杂，他的鼻膜受到刺激连连打了三个喷嚏。"甭点灯了，省得招惹人眼。"鹿子霖听见黑暗中的小娥拼打火镰火石就制止了，"凳子在哪达？炕边在哪儿？我啥也看不见。""在这儿。"小娥说。鹿子霖就觉着一只软软的手抓着他的胳膊牵引他坐到一条板凳上，从那种异样的气味判断，小娥就站在他的右

侧，可以听见她有点喘急的呼吸声息。“大呀，我托你办的事咋个向？”小娥说话的气浪吹到他的耳鬓上。“说好了说妥了，全按你想的说成了。”鹿子霖爽气地说着，压低声儿变得神秘起来，“还有一句要紧话我不敢对你说。你女人家嘴不牢捅出去，不说你不说黑娃，连我也得倒灶！”小娥急切切地说：“大，你放心说。我不是鼻嘴子娃娃连个轻重也掂不来？”鹿子霖黑暗里摇摇头说：“这话太紧要太紧要了。随便说了太不保险。”小娥无奈地问：“大呀，你信不下我我咋办……那要不要我给你赌咒？”“赌咒也不顶啥。”鹿子霖从凳子上站起来，一字一板说，“这话嘛得、睡、下、说。”小娥像噎住了似的低声说：“大——”鹿子霖断然说：“这会儿甭叫大。快上炕。”

鹿子霖在黑暗如漆的窑洞里站着，对面的小娥近在咫尺鼻息可感，他没有伸出双臂把她挟裹到炕上去，而是等待小娥的举动。小娥没有叫喊，没有朝大大脸上吐唾沫，只是站着不动也不吭声。听见一声呢喃似的叹息，站在他对面的影柱儿朝炕那边移动，传来脱衣服的窸窸窣窣的响声。鹿子霖的心底已经涌潮，手臂和双腿控制不住地战栗；他丢剥了夹褂儿又褪下了夹裤，摸到炕边时抖掉了布鞋就跷上炕去；当他的屁股落到炕上时感到了一阵刺疼，破烂的炕席上的篾片儿扎刺进皮肉去了；他顾不得疼痛，揭开薄薄的被子钻进去。小娥羞怯地叫：“大——”鹿子霖嘻嘻地嗔怨：“甭叫大甭叫大，再叫大大就羞得弄不成了！”他已经把那个温热的身子紧紧裹进怀里，手忙脚乱嘴巴乱拱，这样的年纪居然像初婚一样慌乱无序，竟然在刚刚进入的一瞬便轰然一声塌倒。他躺着凝然不动，听着潮涌到心间的血液汩汩退回到身体各部位去，接着他一身轻松无比清醒地滚翻下来，搂住那个柔软的身体，凑到她的耳根说：“黑娃万万不能回来！”小娥呼地一下豁开被子坐起来：“你哄我？你把事没办妥，你哄着我睡觉……”鹿子霖欠起身说：“我说你们女人家沉不住气，你还说你赌咒哩！听我把话说完

——”他把她搂住按进被窝，“我给田福贤把你的话说了，田福贤也答应了，昨日专门到县里去寻岳书记，岳书记也答应只要黑娃回来认个错，就啥话不提了。说黑娃万万不能回来是我的主意。你听了我的话好，你要信田福贤的话就去叫黑娃回来……”小娥忙问：“大，你咋说万万不敢回来？咋哩？”鹿子霖说：“你们女人家只看脚下一步，只摸布料光的一面儿，布的背面是涩的，桌子板凳墙壁背面都是涩粗麻麻的。田福贤万一是设下笼套套黑娃咋办？”小娥倒吸一口气“噢”了一声。鹿子霖说：“田福贤跟我是老交情，我本不该说这话。我实实不想看见你钻进人家的套套儿里去。我这人心软没法子改。黑娃辱践了我，按说我该跟田福贤合伙收拾他，可你那天往保障所去给我面前一站一跪一哭，哎……”小娥完全失望地说：“那咋办呀？黑娃不回来我咋活呀？”鹿子霖说：“大给你把后头十步路都铲平了。这样吧，就让黑娃在外头熬着混着哪怕逛着，总比睁着眼钻笼套强。先躲过眼下的风头再说，说不定风头过了也就没事了，说不定田总乡约调走了也就好办了。你嘛，你就过你的日子，大给你钱你去籴粮食，日后没事了，黑娃回来了，大也就不挨你的炕边了。”说着坐起来，摸到衣服掏出几个银圆，塞到小娥手里。小娥突然缩回手：“不要不要不要！我成了啥人了嘛？”鹿子霖嗔怒地说：“你成了啥人了？你成了大的亲蛋蛋了！不是大的亲蛋蛋儿，大今黑还能给你说这一河滩体己话？”他穿上衣裤，下了炕站住斩劲地说：“谁欺侮你你给大说，大叫他狗日水漏完了还寻不见锅哪儿破了。关门来。大逢五或者逢十来，把炕上铺得软和些儿。”

隔两三日即逢五，鹿子霖耐着性子俟到逢十的日子，又一次轻轻弹响了那木板门。如果逢五那天去了，间隔太短，万一小娥厌烦反倒不好，间隔长点则能引起期待的焦渴。鹿子霖吃罢晚饭，给他的黄脸女人招呼一声，就到神禾村去了，自然说是有公事。他在那儿推牌九

手气大红，用赢下的钱在村子小铺里买了酒和牌友们干抿着喝了。他现在不需要像头一次那样繁冗的铺陈，一进门就把光裸着身子的小娥揽进怀里，腾出一只手在背后摸到木闩插死了门板，然后就把小娥托抱起来走向炕边，小娥两条绵软的胳膊箍住了他的脖子。鹿子霖得到呼应就受到鼓舞受到激发，心境中滞留的最后一缕隐忧顿然消散。他把她轻轻放到炕上，然后舒缓地脱衣解裤，提醒自己不能再像头一回那样惊慌那样急迫，致使未能完全尽兴就一泄如注。他侧着身子躺进被窝，一股浓郁的奇异的气息使他沉迷。小娥迎接他的到来，钻进他的怀里。他再次清醒地提示自己不能急迫慌乱，用他的左手轻轻地抚摸她的后颈和脊背，他感到她的手臂一阵紧过一阵地箍住他的后背，把她美好无比的奶子偎贴到他的胸脯上。她的温热的脸腮和有点凉的鼻尖偎着他的脸颊，发出使他怜悯的轻微的喘息，他控制着自己不把嘴巴贴过去，那样就可能使他完全失控。他的手掌在她细腻滑润的背脊上抚摸良久就扩展到她的尻蛋儿上，她在他怀里战栗了一下。他抽回手从她柔软的头顶抚摸下去，贴着脖颈通过腰际掠过臀部下滑到大腿小腿，一直到她穿着睡鞋的小脚，便得到了一个统一的感觉，他又从她的脸膛搭手掠过脖颈，在那对颤颤的奶子上左右旋摩之后，滑过软绵的腹部，又停留在他最终的目标之上，小娥开始呢呢喃喃扭动着腰身。他已经从头到脚一点不漏地抚遍她全身的每一寸肌肤，开始失控，于是便完全撒缰。小娥急促地扭动着腰身，渴望似的呢喃着叫了一声：“大呀……”鹿子霖一扬手掀去了被子，发疯似的摇拽扇摆起来：“大的个亲蛋蛋儿呀，娥儿娃呀，大爱你都爱死了……”鹿子霖享受了那终极的欢乐之后躺下来吸烟，卷烟头上的火光亮出小娥沉醉的眯眼和散乱的乌发，小娥又伸出胳臂箍住他的腰，在他耳根说：“大呀，我而今只有你一个亲人一个靠守了……”鹿子霖慷慨地说：“放心亲蛋蛋，你放心。你不看大咋着心疼你哩！你有啥难处就给大说。谁敢哈你一口大气大就叫他挨挫。”鹿子霖弹了烟灰坐起来穿衣服。小娥

拢住他的胳膊说："大，你甭走，你走了我害怕。"鹿子霖问："害怕啥哩？"小娥说："有人时不时地在窑垴学狼嗥，学狐子哭吓我哩！"鹿子霖呵呵一笑："你既然知道那是人不是狼，你怕啥？你关门睡你的觉甭理他。我收拾他。"他心里非常清楚，小娥虽好，窑洞毕竟不是久留之地。随后就断然走出了窑洞。

那个学狼嗥学狐子哭的人叫狗蛋儿，三十岁了仍是光棍一条，熬得有点淫疯式子。他爸叫他出去熬活挣钱给他订媳妇，他说不先给他娶媳妇他就不出门去给人下苦熬活，父子俩不得统一，老子随后气死了，狗蛋儿成了游荡鬼，更没人给他提媒说亲了。狗蛋儿在黑娃逃走以后，就把直溜溜的眼睛瞅住了小娥的窑洞。他夜里从人家菜园偷拔一捆葱拿来向小娥献殷勤，小娥隔着窑窗在里头骂，他把葱捆儿放在门槛上就走了。他偷葱偷蒜偷桃偷杏，恰如西方洋人给女人献花一样献到小娥的门槛上窗台上然后招呼一声说："小娥你尝一口我走了。"他的痴情痴心得不到报偿，就在窑垴上学狼嗥学狐子哭吓唬她，以期小娥孤身一人被吓得招架不住时开门迎他进窑。再后来，狗蛋儿居然编出一串赞美小娥的顺口溜词儿在窑窗外反复朗诵。

鹿子霖这一夜正搂着小娥亲昵的当儿听到了狗蛋的创造。狗蛋在窑窗外一字一板朗诵，还用手掌击打着节拍："小娥的头发黑油油。小娥的脸蛋赛白绸。小娥的舌头腊汁肉。小娥的脸，我想舔。小娥的奶，我想揣。我把小娥瞅一眼，三天不吃不喝不端碗；宁吃小娥屙下的，不吃地里打下的；宁喝小娥尿下的，不喝壶里倒下的……"鹿子霖贴着小娥的耳朵说："你说他唱得好，明晚再来唱。"小娥就对着窗口说："狗蛋哥，你唱得真好听。我今黑听够了想瞌睡了。你明黑再来唱多唱一阵儿。"

狗蛋第二天黑夜又在窑窗外朗诵起来，朗诵一遍还要问一句："小娥，你看我唱得好不好？"小娥就说："好听好听，你再唱一遍。"鹿子霖不失时机地走到窑门口，从背后抓住了狗蛋的后领，一串耳光左右开弓抽得密不透风："狗蛋你个瞎熊，瞎得没眉眼咧！"狗蛋已经瘫在地上求饶。鹿子霖说："你今日撞到我手里，算你命大。你要是给族长知道了，看不扒了你的皮！"狗蛋吓得浑身筛糠连连求饶。鹿子霖抓着后领的手一甩，狗蛋爬起来撒腿就跑得没有踪影了。鹿子霖仍然遵守五、十的日子到窑里来寻欢。

狗蛋好久不敢再到窑院里去献殷勤，不敢学狼嗥狐子哭更不敢朗诵赞美诗。他终于耐不住窑洞的诱惑，这夜又悄悄爬在窑窗窗台上，蹙着鼻子吸闻窗缝里流泻出来的窑洞主人的气味。他听到小娥娇声嗲气的一声呢喃，头发噌的一声立起来；又听到小娥哼哼唧唧连声的呻唤，他觉得浑身顿时坠入火海；接着他就准确无误地听到一个熟悉的男人的声音："你受活不受活？"狗蛋判断出是鹿子霖大叔的声音，一下子狂作起来，啪地一拳砸到窗扇上喊："好哇，你们日得好受活！小娥你让乡约日不叫我日，我到村里喊叫去呀！你叫我日一回我啥话不说。"咣当一声门板响，小娥站在门口朝狗蛋招手。狗蛋离开窗子迎着小娥走进窑去。鹿子霖猫下腰贴着窑壁溜出门来，吓出一身冷汗，满心的欢愉被那个不速之客破坏殆尽。

狗蛋慌手慌脚脱光了衣服，抱住小娥的腰往炕边拽。他的从未接触过异性肌肤的身体承受不住，在刚刚搂住小娥腰身的一霎之间，就"妈呀"一声蹲下身去，双手攥住下身在脚地上哆嗦抽搐成一团。小娥在黑暗里骂："滚！吃舍饭打碗的薄命鬼！"狗蛋站起来纠缠着不走。小娥哄唆说："后日黑你来。"狗蛋挨过了一夜两天盼到了又一个夜晚，他蹑手蹑脚走进窑院叩响窑门之际，就被黑影里跳出的两个团丁

击倒了，挨了一顿饱打。团丁是鹿子霖从仓里借来的，打得狗蛋拖着腿爬回他的屋里去了。

这件事不消半天，就在白鹿村风传得家喻户晓。白嘉轩在事发后的头一天早晨听到了族人的汇报，当即作出毫不含糊而又坚决的反应。在修复完备的祠堂正厅和院子里，聚集着白鹿村十六岁以上的男女，女人被破例召来的用意是清楚不过的。白孝文主持惩罚一对乱淫男女的仪式显得紧张。他发蜡之后接着焚香，领着站在正厅里和院子里的族人叩拜三遭，然后有针对性地选诵了乡约条文和族法条律，最后庄严宣判："对白狗蛋田小娥用刺刷各打四十。"孝文说毕转过头请示父亲。白嘉轩挺身如椽，脸若蒙霜，冷峻威严地站在祭桌旁边，摆了摆头对孝文说："请你子霖叔说话。"鹿子霖站在祭桌的另一边，努力挺起腰绷着脸。他被孝文请来参加族里的聚会十分勉强，借口推辞本来很容易，他沉思一下却朗然应允了。他对孝文轻轻摆摆头，不失风范地表示没有必要说话。

小娥被人从东边的厢房推出来，双手系在一根皮绳上，皮绳的另一端绕过槐树上一根粗股，几个人一抽皮绳，小娥的脚就被吊离地面。白狗蛋从西边的厢房推出来时一条腿还跛着，吊到槐树的另一根粗股上，被撕开了污脏的对襟汗褂儿露出紫红的皮肉。为了遮丑，只给小娥保留着贴身的一件裹肚儿布，两只奶子白皙的根部裸露出来。执行惩罚的是四个老年男人，每两个对付一个，每人手里握一把干酸枣棵子捆成的刺刷，侍立在受刑者旁边。白嘉轩对鹿子霖一拱手："你来开刑。"鹿子霖还拱一揖："你是族长。"白嘉轩从台阶上下来，众人屏声静息让开一条道，走到田小娥跟前，从执刑具的老人手里接过刺刷，一扬手就抽到小娥的脸上，光洁细嫩的脸颊顿时现出无数条血流。小娥撕天裂地地惨叫。白嘉轩把刺刷交给执刑者，撩起袍子走到

白狗蛋跟前，接过执刑人递来的刺刷，又一扬手，白狗蛋的脸皮和田小娥的脸皮一样被揭了，一样的鲜血模糊。白狗蛋叫驴一样干嚎起来。白嘉轩撩着袍角重新回到祠堂的台阶上站住，凛然瞅视着那两个在槐树上扭动着的躯体。鹿子霖比较轻捷地走到小娥跟前，接过刺刷抡圆胳膊，结结实实抽到小娥穿着夹裤的尻蛋上，然后把刺刷丢到地上转过身去。他再次接过刺刷抽到狗蛋的胸脯上，无数条鲜血的小溪从胸脯上流泄下来注进裤腰。鹿子霖转身要走的当儿，狗蛋儿哭叫着喊：“你睡了，我没睡你还打我！”整个庭院里变得凝结了一样。鹿子霖早已备着这一着，冷笑着说：“我知道你恨着我。团丁抓你那夜，该把你捶死在窑门口。”白嘉轩立即向族人郑重解释：“子霖早察觉了狗蛋的不轨，派团丁收拾过他，他才怀恨在心反咬一口。加打四十。”孝文先走到狗蛋跟前，推走了鹿子霖，再接过刺刷迎面抽去，狗蛋就再不敢胡咬了。他走到小娥跟前瞅了一眼那半露的胸脯，一刷抽去，那晶莹如玉的奶根上就冒出鲜红的血花，迅即弥散了整个胸脯。鹿三接过刺刷刚刚扬起来，却像一堵墙似的朝后倒去，跌在地上不省人事。鹿三的出现激起了几乎所有做父亲母亲的同情，也激起了对淫乱者的切齿愤恨，男人女人们争着挤着抢夺刺刷，呼叫着“打打打！”“打死这不要脸的婊子！”刺刷在众人的手里传递着飞舞着，小娥的嘶叫和狗蛋的长嚎激起的不是同情而是更高涨的愤怒。鹿子霖站在台阶上对身旁的白嘉轩说：“兄弟要去仓上，得先走一步。”

狗蛋被人拖回家就再没有起来。他先被团丁用枪托砸断了一条腿，接着又被刺刷抽得浑身稀烂。时值热天，无以数计的伤口三几天内就肿胀化脓汇溃成脓血，不要说医治，单是一口水也喝不到嘴里，他发高烧烧得喉咙冒火，神智迷糊，狂呼乱叫：“冤枉啊冤枉！狗蛋冤枉……我连个锅底也没刮成就……挨了黑挫……”村里人后来听不到叫

声，才走进那幢破烂厦屋去，发现他死在水缸根下，满屋飞舞的绿头苍蝇像蜂群一样嗡嗡作响。

小娥的境况好多了。她拖着浑身流血的身体挪回窑洞，鹿子霖当天晚上就来看护她。鹿子霖在炕边伏下身刚叫了一声“亲蛋蛋呀”，小娥就猛乍伸出手来抓抠他的脸。“甭抠甭抓。”鹿子霖抓住她的手腕说，“留下大这一张脸还有用场。”小娥挣脱手，还要抓要抠：“我给你害得没脸了，你还想要脸？”鹿子霖镇定地说：“你没脸了大知道。大这张脸再抓破了咱们就没有一张脸了，也就没人给你报仇了。”小娥冷笑着说：“给我报仇？凭你？你先说说让我听听你咋么着给我报仇？”鹿子霖说：“你先看病养好身子再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说罢就伏在小娥脸上哭了：“你挨了刺刷受了疼我知道。可你不知道白嘉轩整你只用三成劲，七成的劲儿是对着我……人家把你的尻子当作我的脸抽打哩！”他终于使小娥安静下来，留下一把银圆：“你明日就去看伤。甭怕人七长八短咬耳朵。人有脸时怕这怕那，既是没脸了啥也都不怕了，倒好！”

小娥第二天一早走过白鹿村村巷又走进白鹿镇的街道。她什么人也不瞅，任凭人们在她背后指指戳戳窃窃私语，真的如同鹿子霖大说的没脸了反倒不觉得胆怯了。她走进白鹿中医堂坐到冷先生的当面。冷先生瞅她一眼既不号脉也不察看伤势，开了一个方子递给抓药的相公，又对小娥说：“大包子药煎了内服。小包子药熬成汤水洗伤，一天洗三回。”

小娥关了窑门脱得精光，用布巾蘸着紫黑色的药水往脸上身上涂抹，药水浸得伤口疼痛钻心。晚上，鹿子霖虔诚地替她洗刷伤口，她又感激得想哭。三天以后，大大小小被刺刷扎破的伤口全都结了痂。七天以后，那些疤痂全部脱落。半月以后，她的脸颊和身体各部位的

皮肤又光洁如初。大约是冷先生的药物的神奇效力，她的脸膛更加红润洁净，胸脯更加细白柔腻。这一夜，她和鹿子霖倾心抚爱在一起，真有许多患难不移的动情之处。鹿子霖双手捧着她的脸说：“记得我说的话吗？白嘉轩把你的尻蛋子当作我的脸蛋子打哩刷哩！你说这仇咋报——”小娥知道他其实已经谋划好了，就静静地听着不语。鹿子霖说：“你得想法子把他那个大公子的裤子抹下来。那样嘛，就等于你尿到族长脸上了！”

第十六章

麦子收罢新粮归仓以后，原上各个村庄的“忙罢会”便接踵而至，每个村子都有自己过会的日子。太阳冒红时，白鹿原的官道小路上，庄稼汉男女穿着浆捶得平展硬挣的家织布白衫青裤，臂弯里挎着装有用新麦子面蒸成的各色花馍的竹提盒笼儿，乐颠颠地去走亲访友，吃了喝了谝了，于日落时散散悠悠回家去。今年的“忙罢会”过得尤其隆重尤其红火，稍微大点的村庄都搭台子演大戏，小村小寨再不行也要演灯影耍木偶。形成这种盛况空前的热闹景象的原因不言而喻，除了传统的庆贺丰收的原意，便是平息了黑娃的农协搅起的动乱，各个村庄的大户绅士们借机张扬一番欢庆升平的心绪。

俟到贺家坊的“忙罢会”日，贺耀祖主持请来了南原上久负盛名的麻子红戏班连演三天三夜，把在贺家坊之前演过戏的大村大户压倒了苫住了，也把原上已经形成的欢乐气氛推到高潮。这是一年里除开过年的又一个轻松欢乐的时月，即使像白嘉轩这样严谨治家的大庄稼主户，也表现出十分通达贤明的态度。日头还未落下原去，白嘉轩站在院庭里宣布：“今个喝汤[1]喝早些。喝了汤都去贺家坊看戏。我在屋看门。”他又走出大门走进牲畜圈场，对刚刚背着一笼苜蓿回来的鹿三说：“三哥今黑你去看戏。我来经管牲口。麻子红今黑出台唱的是拿手戏《葫芦峪》。”鹿三推让说：“你去你去，你也爱看戏咯！”白嘉轩说：“我跟麻子红已经说妥，给贺家坊唱毕接着到咱村唱，咱白鹿村的会日眼看也就到了嘛！咱村唱起戏来我再看。”鹿三把缀着一串串紫色花絮的苜蓿从笼里掏出来，码齐摞堆在铡墩跟前。白嘉轩揭起铡刀刃子，鹿三跪匐下一条腿，把一撮撮苜蓿拢起来喂到铡刀口里去。白嘉轩双手压下铡刀，咔哧一声，切断的苜蓿齐刷刷扑落到脚面上，散发

出一股清香的气味，从土打围墙上斜泻过来的一抹夕阳的红光照在主仆二人的身上。鹿三接着给水缸里挑满了水，然后推了几车晒干的黄土垫了圈，再把牲口牵回圈里，拌下一槽苜蓿，拍打了肩头前襟后背上的土屑到前院屋里去喝汤。鹿三是个戏迷，逢着哪个村子唱戏，甚或某户人家办理丧事请有吹鼓手为死人安堂下葬唱乱弹，他都要赶去看一场听一回过一过戏瘾。牛犊念书不开窍，整日价跟着鹿三犁地种庄稼务弄牲畜，也就跟着鹿三染上了戏瘾。喝毕汤以后，暮色苍茫里鹿三咂着烟袋，胯骨旁边跟着牛犊走出白鹿村看戏去了。

白孝文也是个戏迷。白鹿原上百分之九十以上的男人无论贫富贵贱都是秦腔戏的崇拜者爱好者。看戏是白孝文唯一的喜好唯一的娱乐。白孝文已经被确立为白鹿两姓族长的继任人，他主持修复祠堂领诵乡约族规惩罚田小娥私通的几件大事树立起威望，父亲白嘉轩只是站在后台为他撑腰仗胆。孝文出得门来从街巷里端直走过去，那些在阴凉下裸着胸膛给娃娃喂奶的女人，慌忙拉扯下衣襟来捂住了奶子躲回屋去；那些在碾道里围观公狗母狗交配的小伙子，远远瞧见孝文走过来就立即散开。白孝文开始替代族长父亲到那些弟兄们闹得不可开交的家庭里去主持分家事宜，到那些为地畔为墙根为猪拱鸡刨打得头破血流的族人家里去调解纠纷。他居中裁判力主公道敢于抑恶扬善，决不两面光溜更不会恃强凌弱。他说话不多却总是一句两句击中要害，把那些企图在弟兄伙里捞便宜的奸诡之徒或者在隔壁邻居之间要弄心术的不义之人戳得翻肠倒肚无言以对。他比老族长文墨深奥看事看人更加尖锐，在族人中的威信威望如同刚刚出山的太阳。他的形象截然区别于鹿兆鹏，更不可与黑娃同日而语。他不摸牌九不掷骰子，连十分普及的“纠方”“狼吃娃”“媳妇跳井”下棋等类乡村游戏也不染指，唯一的娱乐形式就是看戏。白孝文喝毕汤先礼让父亲去看戏，声言由自己看门兼侍弄牲口。白嘉轩朗然说：“你去看去。你叫你屋里人

也去，天热睡不下咯！”白孝文再到上房问奶奶去不去，然后又问母亲去不去，奶奶和母亲既然都不去，他就再没有去问自己的屋里人。他拿了一把竹皮扇子出门上路了。

贺家坊的戏楼前人山人海，浓烈的旱烟气儿搅和着汗酸味儿在戏台下形成一个庞大的气团，令人窒息。戏楼两边的台柱上挂着两个盛满清油的大碗，碗沿上搭着的一条粗捻上冒着滚滚油烟，炽红的灯火把台子上的演员照得忽明忽暗。本戏《葫芦峪》之前加演折子戏《走南阳》，被王莽追赶着的刘秀慌不择路饥渴交困，遇见一位到田里送饭的村姑，戏剧便在刘秀与这位村姑之间展开。刘秀此时没有了皇帝的架势纯粹是一个死皮赖娃，不仅哄唆得村姑向他奉献出篮子里的蒸馍和瓦罐里的麦仁汤，而且在吃饱喝胀有了精神之后便要骚使拐调戏起村姑来了：“今日里吃了你半个馍，我封你昭阳半个宫。”刘秀唱着许诺着就伸手去摸村姑的脸蛋儿。“今日里吃了你两个半个馍，我封你昭阳坐正宫。”刘秀唱着许诺着又撩起腰带摔打到村姑的前裆里。麻子红出演村姑，天生的娇嫩甜润的女人嗓音特富魅力，人们已经忘记了他厚厚的脂粉下打着摞儿的大小麻窝儿，被他的表演倾倒了。村姑对刘秀死乞白赖打诨骂俏动手动脚的骚情举动明着恼暗着喜噘嘴拒斜眼让半推半就实际上好的那个调调儿，麻子红把个村姑演得又稚又骚。台下一阵阵起哄叫好打唿哨，小伙子们故意拥挤着朝女人身上蹭。白孝文站在台子靠后人群稍微疏松的地方，瞧着刘秀和村姑两个活宝在戏台上打情骂俏吊膀子，觉得这样的酸戏未免有碍观瞻伤风败俗教唆学坏，到白鹿村过会时绝对不能点演这出《走南阳》。他心里这样想着，却止不住下身那东西被挑逗被撩拨得疯胀起来。做梦也意料不到的事突然发生了，黑暗里有一只手抓住了他的那个东西。白孝文恼羞成怒转过头一看，田小娥正贴着他的左臂站在旁侧，斜溜着眼睛瞅着他，那眼神准确无误明明白白告示他：你要是敢吭声我也就大喊大叫

说你在女人身上耍骚！白孝文完全清楚那样的后果不言而喻，聚集在台下的男人们当即会把他捶成肉坨子，一个在戏台下趁黑耍骚的瞎熊不会得到任何同情。白孝文慌恐无主，心在胸膛里突突狂跳双腿颤抖脑子里一片昏黑，喊不敢喊动不能动，伸着脖子僵硬地站着佯装看戏。戏台上的刘秀和村姑愈来愈不像话地调情狎昵。那只攥着他下身的手暗暗示意他离开戏场。白孝文屈从于那只手固执坚定的暗示，装作不堪沤热从人窝里挤出去，好在黑咕隆咚的戏场上没有谁认出他来。那只手牵着他离开戏场走过村边的一片树林，斜插过一畦尚未翻耕的麦茬地，便进入一个破旧废弃的砖瓦窑里。

钻进破烂的砖瓦窑白孝文才感到真正的恐惧。砖瓦窑，大土壕，猪狗猫。他和他惩罚过的白鹿村最烂脏的女人竟然钻进猪狗猫交配的龌龊角落里来了，一旦被某个拉屎尿尿的人察觉了就不堪设想其后果。他很自然地想到逃跑，逃离破砖窑一踏上大路就万事大吉了，和这个女人多在一会儿都潜伏着毁灭的危机。他转过身抬脚就跑，脑门碰撞到低矮的窑门上也顾不得疼了，刚跑出窑外几步，田小娥就在后边大叫起来："来人哟，救命呀，白孝文糟蹋我哩跑了……"白孝文吓得双腿发软急忙收住脚，立时听不见她喊叫了。跑不了了！这狗东西把人缠死了！白孝文猛地转过身又走进破砖窑的门洞，抡开胳膊抽了田小娥一记耳光。田小娥却顺势抱住他的胳膊，不还手也不反抗扬起头瞅着他的脸，低声嗔气地说："哥吔你打，你打死妹子妹子也不恼。"瓦罐似的砖窑顶口泻下朦朦的星光，田小娥的眼里透出两束亮晶晶的光点柔媚动人，一缕奇异的气息刺激他的鼻膜，凝聚在胳膊上拳头上的力量悄悄消溶，两条胳膊轻轻地垂落下来。田小娥说："哥呀，你看我活到这地步还活啥哩？我不活了我心绝了我死呀！我跳涝池我不想在人世栽了。我要你亲妹子一下妹子死了也心甘了。"白孝文的心开始颤抖，斥责道："你胡吣乱呔些啥！"田小娥说："哥呀你正经啥

哩。你不看看皇帝吃了人家女子的馍喝了人家的麦仁汤还逗人家女子哩！”说着扬起胳膊勾住孝文的脖子，把她丰盈的胸脯紧紧贴压到他的胸膛上，踮起脚尖往起一纵，准确无误地把嘴唇对住他的嘴唇。白孝文的胸间潮起一阵强大的热流。这个女人身上那种奇异的气味愈加浓郁，那温热的乳房把他胸脯上坚硬的肋条熔化了。他被强烈的欲望和无法摆脱的恐惧交织得十分痛苦。在他痛苦不堪犹豫不决的短暂僵持中，感觉到她的舌尖毫不迟疑地进入他的口中。那一刻里，白孝文听到胸腔里的肋条如铁笼的铁条折断的脆响，听见了被囚禁着的狼冲出铁笼时的一声酣畅淋漓的吼叫，双手揽住了田小娥的后腰，几乎晕昏了。

白孝文忘情地吮吻着，觉察到她的手在摸索着解开他衣襟上的布圪跶纽扣，她又抓住他的右手而且导引到她的腋下，示意他解开她腋下斜襟上的纽扣。他摸住一个个缩结的布纽圪跶解脱纽环儿，顺手揭开大襟，把她裸开的奶子搂到他同样裸开的胸膛上，几乎迷醉而跌倒下去。他已经无法控制浑身涌动着的春情，第一次主动出击伸手去解她的布条裤带，慌乱中把她拴着的活扣儿拉成了死结，干脆从裤带下把裤腰拉下去。小娥光着身子把砖窑里未燃烧的麦秸扒拢到一起，再铺垫上自己的衫子，便躺下去。星光从砖窑顶口泻到她的身上，她静静地躺着等待他。白孝文急忙解开裤带抹脱裤子，刚趴到她的身上就从心底透过一缕悲哀。小娥问：“哥你咋咧？咋是这样子？”孝文丧气地说：“我也不知道。”他无奈爬起来重新穿上裤子。小娥也坐起来摸衣服穿。白孝文挡住小娥穿衣服的手兴奋地说：“好咧好咧又好咧！”小娥摸了一把就再躺下去。白孝文刚刚解下裤带抹下裤子，就更加悲哀地说：“咋搞的咋闹着哩？又不行了。”连着反复穿了脱了三四次裤子，都是勒上裤子就好了解开裤子又不行了。小娥问：“哥呀你有毛病？”白孝文说：“没有没有，向来也没出过这情况儿。”到他再次不甘

就此失败趴上她的身时却轰然一声泄了。田小娥却柔声安慰他说："哥呀你甭难受。你逢七到我窑里来我等你。"

白孝文重新来到贺家坊戏台下。《葫芦峪》正演到热闹处，台下一片静默。白孝文小心翼翼地插进人窝里，却怎么也听不进去看不下去，哐哐唧唧的梆子声锣钹声失去了魅力令人心烦。他心不在焉地站了一会儿又退出人窝，干脆回家去了。清爽的夜风抚拂着他的脸，脑子里浮现着田小娥那光亮的胸脯和大腿，鼻腔里残留着那身体里散发的奇异的气味儿，相比之下，自己那个婆娘简直就是一堆粗糙无味的豆腐渣了。他走进白鹿村村口时开始懊悔，离家门愈近愈觉心底发虚。他硬着头皮走进街门时感到一种异样的气氛，他的豆腐渣似的女人急慌慌走到院中，看见他失声叫道："哎呀你才回来……土匪打抢了……"白孝文像当头挨了一棍差点栽倒，立即奔进上房，父亲白嘉轩躺在奶奶的炕上呼吸微弱，连呻唤都很艰难，冷先生正在桌子上的油灯下配制药膏。孝文像从火灼的热炕上跌入冰窖，眼前一黑栽倒在脚地上不省人事了。

这场洗劫干得十分干净利落，时机的选择再好不过，村子里十室九空，男人女人引着孩子看戏去了。白嘉轩给牛马拌了第二槽草料，一个人坐在圈场上摇着扇子乘凉。今年收成不错，老天爷许是有意赐惠庄稼人连下了两场好雨，麦子豌豆蓬蓬冒起来孕穗结荚。牛马吞嚼草料的优雅的声音从敞开的窗孔传出来，比戏台上弦索声美妙悦耳。堆积在铡墩前铡碎的苜蓿散发的清香在夜风中弥漫。村子里十分静谧。仙草走来了，一手端着一盘鸡蛋一手提着酒壶，放到鹿三夜晚露宿乘凉的木板上。白嘉轩舒悦地笑笑，善知人意的妻子恰到好处地送来他想吃想喝的东西，贤淑地斟下一杯酒就走出圈场去了。白嘉轩喝一杯酒浑身都活络起来，吱儿吱儿咂得酒盅响着。这当儿从背后伸过

一双手卡住他的脖子把他从木板上拽翻到地上，另一双手扭住他的双手，一块烂布塞住了嘴巴。他的双手被捆在背后，随之就被人提起来，才看见他面前站着三个人。他们拽着他走出圈场进入街门，他看见院子里还站着两三个人；他被推推搡搡拉到上房正厅，看见一根明柱上绑着妻子仙草，母亲白赵氏被一个土匪扭着手压着头按在祭祖的方桌边上，两个桌腿上绑着他的两个儿媳。他们把他的双腿捆到一起让他站着，然后就把一把明晃晃的鬼头刀横到他的脖子前，问他银圆在哪儿藏着。白嘉轩揣摩对方是纯粹要钱还是既要钱又要命？如果是前者不是后者，那他就准备折财保命，如果是后者不是前者，那么他就准备折命保财，不至于人财两空。在他准备进一步猜测土匪们的真实目的时，一个土匪用刀尖挖掉他口里的烂布又挑破了他的裤裆："你不说话我先把你阉了！"白嘉轩怒骂道："老子老命都不要了还要老二？割了拿回去敬你祖宗去！"土匪却不恼，转过身用刀尖挑破仙草的裤子，仙草羞怯地喊："他爸……"白嘉轩骂："小人才欺侮女人。"白赵氏在方桌边上招供了："在南墙上你们挖去。"土匪进入里间，铁器挖凿土坯墙壁和土块跌落的杂乱的响声使白嘉轩不忍卒听就闭上了眼睛。土匪们得手以后大摇大摆从后门出去了。他们告别之前没有忘记留给他一个永久性的纪念，用那根顶后门用的榆木杠子在他后腰上抽击了一下，他顿时眼前金星迸溅着栽倒了。

同时遭到抢劫的还有鹿家，劫难发生的过程大同小异。那阵子鹿子霖被贺耀祖邀去坐在戏楼的礼宾席上观赏麻子红的精彩表演，不无担心地算计着白孝文钻进圈套的进程。鹿子霖女人娘家在贺家坊，午饭后跟着前来叫她的侄儿回娘家看戏去了。屋里只剩下鹿泰恒以及常年守着活寡心灰意冷的兆鹏媳妇。土匪们把鹿泰恒背缚着用皮绳绕过大梁吊到空中，却对兆鹏媳妇十分客气地说："嫂子，你睡你的觉，甭害怕没有你的事。"他们用刀尖在鹿泰恒脸上划一道口子，再逼问银圆

藏在哪达？鹿泰恒叫着喊着骂着却始终不说银圆的藏处，直到老汉脸膛胳膊胸脯脊背大腿被刀尖拉成像碎布条一样稀烂。土匪们把所有墙壁都挖得坑坑洼洼，把箱子柜子都翻得乱七八糟，把铺地的方砖揭起来挖下去，仍然没有找到银圆。土匪们仿效田福贤鹿子霖整死贺老大的刑法，把鹿泰恒从屋梁上蹾下来，再拉皮绳吊起来又松开皮绳蹾下来，反复蹾了几次，直到蹾得鹿泰恒骨头断裂，尻子里涌出一堆鲜血搅和的粪便，又在当胸戳了一刀。

白鹿原刚刚潮起“忙罢会”的庆贺气氛和升平景象一下子低落了，一些准备演戏的村庄纷纷改变主意，没有心思和兴趣组织唱戏的事了。“忙罢会”开始笼罩上恐怖的气氛。白狼的传闻再度神秘地流传。遭劫后的第二天早晨，鹿家和白家的街门上都发现了土匪留下的手迹：“白狼到此”。新老亲戚见面以后没有多少兴致交谈收成，白狼的种种传闻在酒席茶桌上成为热门话题。抢劫白鹿两家的白狼和烧毁白腿乌鸦兵粮台的白狼以及只吮血不食肉的白狼被连结在一起，有人说在峪道里看见过一对脱皮掉毛的老白狼引着一大群狼子狼孙，骚扰抢劫时像两条腿的人，遇到抵抗打击时全现出四条腿逃窜了。

漩涡的中心反倒是平静的。白嘉轩已经清醒过来，接受冷先生的悉心治疗。治疗分两套措施同步进行，每天早晨空腹时和睡觉前煎服汤药，间隔一天由冷先生亲自给腰部伤位上裹缠膏药。白嘉轩不能翻身转腰，死死地仰躺在炕上接待前来看望他的亲戚友好和乡邻族人，他没有愤恨没有伤感甚至连剧烈的痛楚也不呻唤出来，平静淡漠地接受热切意诚的问候和安慰。七八天以后，腰伤刚见明显好转，背上和臀部压出的褥疮红肿化脓引起高烧，白嘉轩几次烧得昏迷。仙草整天侍候在炕边端屎端尿擦洗身子，仍然没有能够阻止褥疮的发生。冷先生重新开了药方主治高烧，给褥疮配制了外敷药面儿，白嘉轩终于从

又一次危机里缓活下来，显然变得十分虚弱了。他微微喘着气对孝文说：“你整天立在炕跟前做啥？该死的话你立在这儿也不顶啥咯！你该弄啥快弄啥去。”孝文显得忧愁而又恓惶，那个破烂砖瓦窑的景象像克化不开的积食整得他心虚神移痛苦不堪。白嘉轩以为儿子为自己煎熬操心，就问：“咱村过会的日子快到咧。给戏班子磨面买菜的事安顿停当了没？”白孝文说：“现在还演啥戏哩。我跟麻子红把戏退咧。”白嘉轩瞪着眼问：“谁叫你退戏？”孝文解释说：“咱家遭了难，子霖叔家刚刚过罢丧事，谁还有心演戏凑热闹？我跟子霖叔商量了就说算咧不演戏咧。”白嘉轩摆一下头嘲弄地笑了：“说定要演的戏就要演不能退。你把你子霖叔叫来我跟他说。”

鹿子霖头上缩着守孝的白布圈来了。白嘉轩说：“子霖，你听我一句话，这戏一定要演，底里嘛缓后我再给你说。”鹿子霖还陷在深沉的悲痛和仇恨里，对演戏仍然提不起兴趣。白嘉轩说：“土匪正是想看你我的哭丧脸儿哩！明白吗？偏给他个不在乎的笑脸儿。明白吗？”

所有亲朋好友包括田福贤前来看望的时候，白嘉轩都保持着一种不失体面的大家风范，惟有姐夫朱先生走进来时他显得难以抑制的动情。他不顾朱先生和家人的百般劝阻，硬是要坐起来，疼得他渗出一头虚汗，才在妻子仙草垫给他的被子上斜倚起来。白嘉轩开门见山地说：“哥呀，你甭听人说白狼长白狼短的混话，不是白狼是黑狼——”朱先生虽然明智，却一时解不开白狼黑狼的隐喻。白嘉轩就一语道破：“这是黑娃做的活。”朱先生不由一惊。

白嘉轩清清白白记得，土匪得手后大摇大摆走出后门时，一个土匪像记起一件未办完的事一样反身又走进后门，顺手从后门背后捞起了那根榆木杠子走到他的跟前，在抡起杠子之前，那个土匪说：“你的腰挺得太硬太直了！”对这句似乎耳熟的话来不及回忆对证，他腰里就

挨了致命的一击昏死了。白嘉轩经冷先生抢救活来后的第一个反应，就是那个土匪拦腰抽击之前的那句话，他努力追寻关于这句话的记忆，终于想到了鹿三。等到在他炕前只有鹿三一个人的时机里，白嘉轩像聊闲话那样不经意地问："三哥，你记得不记得有这回事？黑娃逃学，我给他买了笔墨纸砚叫他念书，他给你说了一句'我嫌嘉轩叔的腰挺得太硬太直'。有这话没这话？""有有有。那驴日的说过不止一回哩！"鹿三说，"我叫他来给牛割草他说过这话。我叫他替我来顶工，他硬要跟嘉道到渭北去熬活就是不上这儿来，还是那句话，'我嫌嘉轩叔腰挺得太硬太直我害怕。'你这会儿咋就想起这话了？"白嘉轩闭上眼睛似乎很疲惫地说："我躺在炕上脑子闲了乱想哩。"……白嘉轩向姐夫朱先生详细叙说了他的确凿无疑的证据："土匪白狼就是黑娃。"

黑娃确已成了土匪。

习旅从古关道口转移时做了周密的部署和最坏的打算：队伍一直沿着山根行进，在遭到围击时万不得已可以进山周旋。在开赴预定集结地点之前，习旅长在战前动员中讲述了"七步诗"的历史故事。他说："老掌柜的死了，大哥要拿家事了。大哥想到六七岁的小兄弟现时虽则撞不动他的壮腿粗腰，可小兄弟总是一年一年往大的长哩，长大了即使不跟他争掌柜的权力，也得平分一半家业呀！大哥痛恨他妈为啥要多生这个祸害……"台下的士兵腾起一片笑声，黑娃也笑了。习旅长接着说："大哥就想，干脆趁他还没长大把他掐死算㞗了！同志们，中国现在就是这个样子。我们就是那个要被黑心的哥哥掐死的小兄弟，他的手已经掐到我们的脖子了。我们能像曹植那样唱一首诗乖乖儿地送死吗？"

这支队伍到达一个原上就驻扎待命。那原和白鹿原十分相像，那里的几十个村子同样闹过农协而且现在还挂着农协白地绿字的牌子，

许多村子的农协头儿领着农协会员给部队送来了米面猪肉和蒸熟的馍馍压好了的面条。三天后的一个夜晚，中国北方最大的一次共产党领导的军事暴动发生了。

那是一场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的战争，开头的小小的胜利和接连着的彻底溃灭都是无法改易的。从打响第一枪到枪声在整个战场冷寂下来，习旅长的指挥部不断向战争的前沿推进，黑娃从只听得枪响到看见战壕，枪弹曳出的火线交织成一幅美丽的网，像阳春三月母亲在地上绷着的经线。看着倒在扬花孕穗的麦田里的各种姿势的尸体和一张张扭曲得面目全非的脸孔，黑娃没有愤怒没有悲伤也没有一丝害怕，战争原来就是这个样子。战争不过就是这个样子，直到习旅长下令让他把全部警卫一个不留带上去进入战壕时，黑娃似乎才有了知觉才感到某种难过：“习旅长，你跟前不能一个不留啊！”“我现在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是这场仗。”习旅长吼起来，“同志们，把你们的能耐用到前沿上去。黑娃你不是有三只眼吗？把三只眼都盯紧大哥的黑心窝打！打不死他也要砸断他一条腿！”黑娃就决定不再争辩，决定服从命令率领警卫排进入人手稀少的战壕。习旅长挥了挥手说：“同志们，把能耐可甭用到唱‘七步诗’上去哇！”那一刻黑娃看见习旅长眼中有一缕绝望的柔情和一缕绝望的悲哀掺和着的动人的神光；这是他最后看见习旅长的一眼，那神光就永久地留在他的记忆里。

进入战壕里头的战斗远不及他的逃亡印象深刻。进攻和溃败时都没有害怕而逃亡时却如惊弓之鸟，那原因是端枪瞄准大哥的士兵时他已经豁出去了，而逃亡时他不想豁出去了。他率领的警卫排谁死了谁活着谁伤了谁跑了习旅长死了活了撤走了到哪里去了一概不明，黑娃被露水激醒时看见满天星光，先意识到右手里攥着的折腰子短枪，随之意识到左手抓着一把湿漉漉黏糊糊的麦穗，最后才意识到肩膀挨了

枪子儿受了伤，伤口正好与上次保护习旅长时被黑枪子射的相吻合。他站起来摇摇手臂似乎还不要紧，就绕过一个个横竖摆列着的尸体朝东南方逃去，脚下是绵茸茸的被攘践倒地的麦子的青秆绿穗儿，辨不清大哥的士兵和自己战友的尸体，反正都像夏收时割倒捆束的麦个子摆在田野里。他走着跑着直到看不见尸体直到站立着的麦子挡阻脚步时才又放缓下来，从黑夜终于走到黎明。齐腰高的麦田小路上走来一位拉牛扛犁的老汉，在甜润润的晨风里唱着乱弹，兴致很好嗓门也很好。黑娃跳到老汉当面，老汉一句乱弹卡在肚里扔了肩上的犁杖软软地瘫倒了，紫红色的大犍牛扬起尾巴跑进麦田里去了。黑娃这才看到自己被血浆红了的衣裤。他从老汉身上剥下一件蓝衫留下底下的白衫，脱下老汉的青色夹裤留下里边套着的单裤，把自己的衣裤脱下来揉成一圪垯塞到麦地里，再把老汉的蓝衫青裤穿起来，把短枪掖进裤腰，一下子变成他在渭北熬活时的长工装束了。临走时，他从腰里摸出一块银圆，塞进老汉僵硬的手心就匆匆走掉了。

涉过一条河沟时，黑娃脱光衣裤洗刷了凝结在身上的血痕，晌午时分走进一个叫做侯家铺的村子，问到一户正在场上碾大麦的人家雇不雇工，主人留下他顺手把一把木叉交给他翻搅碾过的大麦秆子，午饭算是有着落了。他和主人刚刚端起麻食饭碗，两个背着枪的士兵从大门走进来，追问黑娃的来路，而且一口咬定他是暴乱的逃亡分子。黑娃装作傻愣嘎崩的神气说：“老总你说的话我连听都听不懂。我屋里青黄不接出来混口饭吃倒惹下麻达了。你们不信我也没法，我跟你们走，那也得叫我吃一碗麻食，我干了一晌活饿得……”主人是个厚道人也说起情来：“二位老总就让小伙吃一碗饭，反正他又跑不了嘛！”那当儿黑娃一只手端着自己的碗另一只手端起主人搁在桌子上的碗，准确无误地把两碗刚出锅的热烫麻食扣到两个老总脸上，转身从后门逃走了，出后门的时候他感到了极度的恐惧和害怕。

天老黑时黑娃走进秦岭峪口浅山的一个镇子，十数家人家全都关死了店门，只有两家小栈门板虚掩，门上方吊着一个油纸糊的灯笼。黑娃在镇子上溜了一遭踏查了进山出山的路径，就走进一家小栈，青石垒的柜台上铺着一块黑色光亮的生漆漆过的木板，柜台里头有幽微的烧酒的香气儿。一个佝偻着腰的瘦老汉问他吃哩还是住哩？黑娃说想吃也想住。佝偻老汉说你先住下再消停吃，随之领他走进里间，一排大炕，炕洞里的火呼呼啦啦燃烧着，屋里一股很浓的松烟气味。炕上坐着躺着的几个人，全是山民们烟熏火燎得乌秋秋的脸。佝偻栈主向他介绍有野猪肉獾肉野鸡肉，征询他的意愿要吃碗子还是吃块子。黑娃问啥叫碗子啥又叫块子，才得知削下一块蘸盐面吃叫块子，烩了汤的叫碗子。黑娃又饥又渴自然要了碗子，一只大如小盆的粗瓷碗里盛着满满一碗野猪肉，其实不过四五块，筷子夹不起来就动手抓起来撕咬，又吃了四个在炕洞里烤得焦黄酥脆的黄苞谷馍，便觉得浑身困惫不堪躺到炕上了。佝偻店主赶过来说：“客官付了账再睡。臭行道的臭礼行。”黑娃摸了摸没有零钱就交给他一枚银圆。夜半时分，黑娃醒过来时已被捆死了手脚，听见有人在黑暗里说：“客官甭惊，我认得你。你去年到咱寨上叫咱改号换旗你记得不？”

“兄弟你演了一出‘二进宫’。”土匪头子说。黑娃被放开手脚解去蒙在眼上的裤子，强烈的灯光耀得他睁不开眼睛。土匪头子说：“亏得我没跟你挂上共产党的牌号，要不咱俩而今都没有个落脚之地了。”黑娃这时才看清土匪头子的脸，比一年前没有多大变化。去年鹿兆鹏差他来这山寨企图说服这股土匪转成共产党游击队失败了，现在自己流落到此，自然心境全非了。他站在灯火通明的大厅里，咧了咧嘴角说不出话。土匪头子说：“兄弟你放心住下，没人敢碰你一指头。你好好吃好好睡先把伤养好，要革命了你下山再去革命，革命成功了穷人坐天下了我也就下山务农去呀。革命成不了功你遇难了就往老哥这儿

来，路你也熟了咯！”土匪头子唤人来给黑娃肩头的伤口敷了药面，就摆了几碗菜和一坛酒。黑娃喝得脸红耳赤，伏在桌边放声大哭起来。他痛痛快快哭了几声，猛地站起来嘲笑说：“堂堂白鹿村出下我一个土匪啰！”

土匪头子拔刀在手上刺出血滴入酒碗里，黑娃接过刀也割破中指，俩人喝了血酒，又在香案前焚香叩拜。黑娃抬头一看，香案后的崖壁上画着一只涂成白色的狼。拜叩完毕，黑娃说：“白鹿原没见出个白鹿，倒是真个出了个白狼。”土匪头子喝道：“拿宝罐子来。”有人立即送上一只半大的青釉瓷罐，土匪头子把罐儿翻过来，倒出两朵一模一样的木刻黑白牡丹花，要黑娃用手摸出一个来。黑娃问其用意，土匪头子说：“你先摸了再说。”黑娃伸手到瓷罐子里随便拈出一朵来，正是白的。土匪头子笑道：“兄弟有福。”接着告诉他，山寨里养着两朵牡丹，由弟兄们抓阄儿平等享用。这个白牡丹是用重金从城里开园寺买来的，人是绝了。那个黑牡丹的来历向一切人保密而且不许打听，只管享用就是了。黑娃皱皱眉头嘴里啰啰嗦嗦说自己还不习惯弄这号事。土匪头子笑着大声说：“兄弟呀，土匪就是土匪。土匪就享这号福，想享旁的啥福享不上。你顾虑啥哩？”

黑娃和白牡丹睡了，后来也和黑牡丹睡了；白牡丹白得好看，黑牡丹也黑得漂亮。肩伤掉痂以后黑娃参与了第一次抢劫行动，他手脚利索枪法特好脾气随伙儿，三五次抢劫后就深得弟兄们拥戴，土匪头子给他加冕为二拇指。土匪们的组织五花八门称谓也别出心裁，土匪头子被尊称为大拇指，二头目黑娃自然就是二拇指了。有一次抢劫令黑娃难忘，那是在盘龙镇抢劫一家药材收购店铺时，他从装着中药的麻包垛子里头揪出年轻的掌柜，竟是白嘉轩的老二白孝武。他掖着他的领口掐得他直翻白眼儿，随手就压到地上面朝脚地，紧接着交给一

个弟兄，自己就退到店铺门口来，对守在门口的一个弟兄说："你进去我来守门。我蹬到一条裤腿里了。"抢劫碰见熟人是土匪的忌讳，叫做蹬一条裤腿或者说撞到舅家门板了。黑娃在门口听见孝武挨打时的惨叫，忽然想起和他以及他哥哥孝文坐他家方桌念书的情景。

洗劫白鹿村白嘉轩和鹿子霖两家的具体行动方案是黑娃一手设计的，纯粹是为了报复白嘉轩在祠堂用刺刷惩治小娥的事。黑娃作了区别对待，要求他的弟兄务必处死鹿子霖，如果时间充足就蹾死他，不料鹿子霖命大侥幸逃脱了，让那个老棺材瓤子当了替身；黑娃对打劫白家的那一路弟兄说："那人的毛病出在腰里，腰杆儿挺得太硬太直。我自小看见他的腰就难受。"弟兄们一个个情绪高涨，这是替二拇指报仇雪恨的机会。黑娃向弟兄们最后叮嘱一句："弟兄们活儿做得干净点！"

黑娃随后就到贺家坊看戏去了。他戴着一顶破草帽遮住了半个脸挤在人窝里，瞧见贺耀祖和鹿子霖体体面面坐在戏楼上。他在戏楼下瞥见好多熟悉的面孔，却没有发现白孝文和田小娥。那阵儿田小娥大约正牵着白孝文走进破烂砖瓦窑。黑娃重新回到白鹿村，走进他的窑院，门板上挂着铁锁；他在鸡窝里看看鸡没有了，猪圈的栅栏门儿撇在地上没有猪了；他坐在窑院里一块石头上陷入柔情似水的回味，从腰里摸出一把银圆从门道底下塞进去；最后在窑院接村路处站住脚，回头再瞥一眼破旧的窑洞的门板和窗户，踏上慢坡的小路离去了。

白鹿村的"忙罢会"弥散着浓厚的悲怆气氛。农历七月初三是会日，麻子红的戏班初二晚上就敲响了锣鼓家伙，白孝文通前到后主持着这场非同寻常的演出，忙得奔来颠去。鹿子霖端坐在戏台前角，侧着身子对着台下，头上绾着的那一圈白色孝布，向聚集在台下来自十里八村的男人女人显示着悲怆也显示着强硬。初三的午场戏开锣以

后，白嘉轩来到戏台下，掀起了一阵喧哗。白嘉轩拒不听从家里任何人的劝阻要到戏场上来，显然不是戏瘾发了而是要到乡民聚集的场合去显示一下。孝文用独轮叫蚂蚱车子推着父亲走进戏场，屁股下垫着一方麦秸秆编织的蒲团儿。男人女人们围追着车子，想亲睹一眼从匪劫中逃生的德高望重的族长，认识的和不认识的人都向他抛出最诚挚的问候："白先生好咧？"白嘉轩平静地坐在蒲团上，双手扶在小车车头的木格上，脸色平和慈祥，眼神里漾出刚强的光彩。他不回答追逐着他的热诚的问候，端直坐着被孝文推到戏台底下，完全是想来过一过戏瘾的样子。他坐到戏台下看戏这个举动本身，已经充分显示了他的存在和他的性气，脸色和言语上再不需要任何做派了。白嘉轩看见田福贤走上戏楼坐在鹿子霖旁边，和鹿子霖说了两句什么话，俩人一起走到台口向他伸出了手，邀请他到戏楼上就座。白嘉轩说："看戏可就兴坐在台子下头才看得好。"

白嘉轩头戴一顶细辫儿草帽，进入了剧情。午场一般都是短折子戏，晚场才拉开本戏，麻子红得知白嘉轩晌午要来看戏，有意改换原先的安排出演《金沙滩》，把白鹿村悲怆的气氛推向高潮。白嘉轩特别喜好杨家将的戏，腰伤和褥疮的疼痛也为之减轻了。他的眼角扫到了台角上鹿子霖的举动，鹿子霖正向田福贤介绍一个浑身戎装的军人。那军人谦和地笑着伸出右手，田福贤也伸出右手。戏台下的庄稼人被那种新奇的握手动作所吸引，窃窃议论着那个脸色红润器宇不凡的军人。白嘉轩终于从嘈嘈的窃议声中逮住一个熟悉的名字：鹿兆海。他不由地心里一震。田福贤在演员进入后台的过场中走向台前："乡亲们，这位是鹿乡约的二子鹿兆海，刚刚从保定陆军学校毕业，在国民革命军里任排长。这是咱白鹿原上头一个国民革命军人。"鹿兆海立正之后一个举手礼，随之又弯腰连鞠三躬。这是一个真正的军人，在白鹿原乡民眼里和心中第一个留下崭新印象的军人。白腿子乌鸦兵

无异于土匪，白鹿仓保安队的团丁怎么看都更像一伙子笨手笨脚的庄稼汉。鹿兆海戎装整洁举止干练，脸色红润牙齿洁白，尤其是神态谦和彬彬有礼，就把军人和土匪明朗地划清了界线。

这个站在戏楼上向父老乡亲们敬礼又鞠躬的军人，谦和的微笑下面掩饰着难以排解的痛苦，他和白灵的婚恋发生了意料不及的裂变。鹿兆海走进皮货铺子，嗅到一股熟悉亲切的毛皮的熏臭。他的到来使皮匠夫妇惊诧愣呆。他羞怯地微笑着把手里提着的京津糕点孝敬给白灵的二姑和二姑夫，一直等到关门就寝时分，白灵才走进门来。窄巴的铺店作坊无法提供一个能使他们倾吐热烈思念的地方，俩人便向皮匠夫妇告辞出门，刚刚拐过街角躲开站在台阶上的皮匠夫妇的视角，鹿兆海就紧紧携住了白灵的手，猛然把她揽到胸前。白灵就伏在他的怀抱里，不由自主地呻唤出来："兆海哥！人想你都想死了……"

兆海和白灵偎依着踱过纵横交叉的小街小巷，在一块开阔的场地上停住步，俩人都不禁哑了口陷入回忆。这是他俩抛掷铜元的地方。白灵牵着兆海的手，示意他在砖砌的花坛上倚坐下来，贴着他的耳根说："兆海哥，我和你一样了。"兆海不经意地问："你啥和我一样了？"白灵悄悄说："我也入了共产党，和你一样了。"兆海不由地"啊"了一声就愣住了，猛然抓住白灵的双臂："我已经退出共产党入了国民党了……你怎么正好跟我弄下个反翻事儿呀？"白灵听了也愣呆在那儿说不出话。两个久久思念的情人很快清醒过来，便陷入辩论色彩浓烈的争执之中，谁一时也说服不了谁，各自低下头摁着手瞧着脚下的土地。一枚铜元当啷响了一声在地上转了一圈停下来，俩人嘻嘻笑着蹲下来猜谜。现在回忆那个朦朦月光的夜晚，不再轻松不再欢愉而令人痛苦。"这样好吗？你再想想，后日晚我们在这儿再见面。"兆海说。这一提议得到白灵的呼应："兆海哥，你也好好想想，我盼着后日晚见

你时……能得到我想得到的话……”白灵已经喉噎，猛然抱住兆海说：“我等着你的好消息啊兆海哥……”

鹿兆海按照约定的时间来到他们抛掷铜元的那块街巷空园里，没有等到白灵却等见了哥哥兆鹏。悬赏缉捕的共产党要犯一身商人打扮，浑身抖动着的绸衣绸裤，优哉游哉地摇着一把折叠扇子，走到弟弟跟前时眉毛一扬嘴唇一噘，做出一个不要惊讶的暗示，亲昵地攀着弟弟的肩膀离开了：“走吧别等了。她来不了托我来了。”兆海不悦地说：“她说好来怎么不来了？刚入了共产党就得下不守信义的毛病了！”兆鹏说：“你刚刚揣上国民党证就口大气粗起来了？告诉你，她担心你不会改变才没来。她说她来了要是俩人都不改变怎么收场？她珍惜与你的感情才不来。她要我来劝你，盼着再见到你时是一个皆大欢喜的结局。好兄弟，你有啥话跟哥说吧！”兆海痛苦地叹口气：“完了。到此为止。”兆鹏说：“兄弟，没有完。在我看，一切尚未开始，怎么就完了？你太悲观。”兆海说：“我已无法改变。我指望她作改变。她委托你来，就证明她不会改变了。她要是会改变，你也不必来找我了，你肯定是她的领导吧？”兆鹏说：“你们两个都指望对方改变，可以坐下来好好谈谈，心平气和地谈谈，暂且谈不到一块也不要紧，等三年两年也未尝不可，三两年里大家都经见得更多了，判断和认识是非的能力也提高了，也许就会发生变化。”兆海说：“那好吧！你告诉她，我后天想回乡下看看父母，只能待一天。回来后部队就要开拔了。”兆鹏说：“白灵一定要见你一面，让我跟你约定时间。既然你后日要回原上，你们明晚会面吧，你说在哪儿方便些？”兆海说：“算了不见了。既然谁也改变不了谁，见了也没个好结果，反倒叫人难受。你告诉她，我等待她的话。”

兆海从原上探视回到城里，改变了和白灵不再见面的打算，当晚又一次找到皮匠的铺子。白灵以为兆海有了转机而欣喜，当即和兆海走出二姑的铺店，俩人又转到那个抛掷铜元的园子里。白灵动情地说：“我以为再见不到你了哩！兆海哥，你也太倔了，一回谈不拢二回连面也不见了？真有点国民党翻脸不认人的通病。”兆海却火起来：“算了吧白灵！我不说远处的事，你回咱原上走走看看吧，共产党在原上搞了一场啥样的革命你去看看吧！兆鹏用下一杆子啥人你打听打听一下吧！鹿黑娃贺老大白兴儿田小娥之流尽是一帮死猫赖狗，凭这些人能完成国民革命？他们懂得革命的一分意思吗？他们趁着革命的风潮胡成乱整，充其量不过是荒年灾月饥民‘吃大户’的盲动……”白灵的那一缕温情顿然冷寂，忽闪闪蹿上一股火气，她的强盛的气性迅速恢复，迅即作出反应：“兆海哥，一年多不见，你长了身体长了知识，也长了不少的贵族口气啊！”兆海说：“你用列宁的理论判我为贵族并不过分。列宁就是把穷人煽动起来打倒富人消灭富人，结果是富人被消灭了穷人仍然受穷。兆鹏学苏俄在白鹿原上煽动穷汉打倒财东，结果呢？堂堂的农协主任鹿黑娃堕落成了土匪，领着土匪抢银圆，刀劈了俺爷又砸断了嘉轩叔的腰杆子……作为农协主任没有达到的目的，当了土匪却轻而易举地达到了。你叫我还能信还能再入共产党吗？黑娃们干不成共产党的革命可以当土匪，我可不行呀！”白灵说：“你听没听到贺老大怎么死的？你听过你见过把人从高空蹾下来的蹾刑吗？岳维山在滋水田福贤在原上的镇压和报复，你看不见那个疯狂那个血腥吗？还是不敢面对？不管你怎么看怎么想，反正国民党的嘴脸这回在原上在滋水再也遮不住羞了。共产党就要发动被压迫者推翻压迫者，建立一个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自由平等的世界。”兆海说：“我们走着瞧吧！看看谁的主义真正救中国。”俩人不欢而散。思想上的尖锐对立，减轻了他和她感情上的依恋，分手的时候远不及第一次那样沉重如焚。

[1] 关中人把晚饭通称喝汤。

第十七章

白嘉轩重新出现在白鹿村的街巷里，村民们差点认不出他来了，那挺直如椽的腰杆儿佝偻下去，从尾骨那儿折成一个九十度的弯角，屁股高高地撅了起来；他手里拄着一根截短了的拐杖，和人说话的时候就仰起脸来，活像一只狗的形体；抬头仰脸跟人说话时，那双眼睛就尽力往上翻睁，原本鼓出的眼球愈加显得突出，眼白也更加大得耀眼；两个嘴角相反地朝下扯拉，阔大的嘴巴撇成一张弯弓，更显出执著不移近乎倔拗的神气。他在街巷里用简短的语言回答着一个个关切问询着的男女，仅作短暂地驻足，几乎不停步地移动拐杖，跟着拉牛扛犁的鹿三走出村巷。

已是秋末冬初，白日短促到巧媳妇难做三顿饭的季节。太阳坠入白鹿原西部的原坡，一片羞怯的霞光腾起在西原的上空。白嘉轩双手拄着拐杖站在地头，瞅着鹿三一手捉着犁杖一手扬着鞭子悠悠地耕翻留作棉田的地块，黄褐色的泥土在犁铧上翻卷着；鹿三和牛的背影渐渐融入西边的霞光里，又远远地从霞光里迎面奔到他眼前来了。白嘉轩手心痒痒腿脚痒痒喉咙也痒痒了，想攥一攥犁杖光滑的扶把儿，想踩踏踩踏那翻卷着的泥土，想放开喉咙吆喝吆喝牲畜了。当鹿三再犁过一遭在地头回犁勒调犍牛的时候，白嘉轩扔了拐杖，一把抓住犁把儿一手夺过鞭子，说："三哥，你抽袋烟去。"鹿三嘴里大声憨气地嘀嗒着："天短𡱂得转不了几个来回就黑咧。"最后还是无奈放下了鞭子和犁杖，很不情愿地蹲下来摸烟包。他瞧着白嘉轩把犁尖插进垄沟一声吆喝，连忙奔上前抓住犁杖："嘉轩，你不敢犁地，你的腰……"白嘉轩拨开他的手，又一声吆喝："嘚儿起！"犍牛拖着犁铧朝前走了。白嘉轩转过脸对鹿三大声说："我想试火一下。"鹿三手里攥着尚未装进烟末的烟袋跟着嘉轩并排儿走着，担心万一有个闪失。白嘉轩很不喜悦地说："你跟在我旁边我不舒服。你走开你去抽你的烟。"鹿三无奈停住脚步，眼睛紧紧瞅着渐渐融进霞光里的白嘉轩，还是攥着空烟袋记不起来装烟。

白嘉轩只顾瞅着犁头前进的地皮，黄褐色的泥土在脚下翻卷，新鲜的湿土气息从犁铧底下泛漫潮溢起来，滋润着空乏焦灼的胸膛，他听见自己胳膊腿上的骨节咯吧咯吧扭响的声音。他悠然吆喝着简洁的调遣犍牛的词令，倒像是一种舒心悦意的抒情。他一直犁到棉田的尽头掉过犁头，背着霞光朝东头翻耕过来的时候，吼起了秦腔："汉苏武在北海……"三个来回犁下来，白嘉轩已经大汗淋漓气喘吁吁，身体毕竟是虚了，可那卧睡炕上三个多月的枯燥郁闷的生活也终于结束了。这天后晌收工回去，白嘉轩一扬手就把那根拐杖扔进储备柴火的草棚

子里去，站在院庭里接过仙草端来的洗脸铜盆说："我后晌试火了一下，我还行。"

晚饭后在厅房东屋老娘的住室里，白嘉轩临时决定召集一次全体家庭成员的聚会，孝文和三儿子孝义是他叫来的，老二的媳妇由仙草告知，作为这个家庭非正式的却是不可或缺的成员鹿三，是他亲自到马号里去请来的，而且被礼让到桌子那边的一张简易太师椅上，两个媳妇规规矩矩坐在婆的已经开始煨火的炕边上。白嘉轩说："我的腰好了。"他侧转头瞅着两个儿媳说："我在炕上窝蜷了整整一百零七天，你俩——大姐二姐都受了苦都尽了孝心都好。"两个儿媳得到家庭长者的夸奖却感到惶恐，争相表白这完全是做晚辈的应尽的孝道等等。白嘉轩摆摆头就打断她俩的话："你们还不知道我一辈子最怯着啥？我不怯歪人恶人也不怯土匪贼娃子，我不怯吃苦不怯出力也不怯迟睡早起，我最怯最怕的事……就是死僵僵躺在炕上，让人侍候熬汤煎药端吃端喝倒屎倒尿。"一家人默然，只有老母亲白赵氏在炕头动了感情："你是个罪人！"白嘉轩接着说："我是个罪人我也没法儿，我爱受罪我由不得出力下苦是生就的，我干着活儿浑身都痛快；我要是两天手不捉把儿不干活儿，胳膊软了腿也软了心也瞀乱烦焦了……"白嘉轩说到这里停顿一下，然后郑重地说出想要告诉每一个家庭成员的话："我说前头这些话的意思，就是说，从明天开始，你们再不要围着我转了。你们各人该做啥就去做啥，屋里人该纺线的纺线，该织布的织布，该缝棉衣的缝棉衣，外边人该做的地里活就尽着去做，孝文你跟你三叔犁完花（棉）田接着翻稻地。牛犊你喂槽上留下的牲口，叼空儿推土晒土，把冬天的垫圈土攒够，小心捂一场雪。地一上冻就赶紧套车送粪。把这些活儿开销利索，轧花机就要响动了。一句话，原先的日子咋过从明日开始还咋过。我嘛——好咧！"

白嘉轩被土匪砸断腰杆以后笼罩在庭院屋室里的悲凄慌乱的气氛已经廓清，劫难发生以前的严谨勤奋的生活和生产秩序完全恢复。不单单是恢复，家里所有成年人惊异地发现，自信“我还行”的家长发生了重大变化，他比驼背以前起得更早了，天色薄明时庭院里就响起威严的咳嗽声，常常使晚他一步开门端着尿盆倒尿的儿媳尴尬失措；他的脚步不显艰难反倒更显得敏捷，驼着背甩摆着手迈着腿脚，前院后院马号牛棚猪圈以及后院的茅厕，他都有事无事地转悠查看；除过推车挑担必须用双肩或单肩的活路以外，凡是用双手和腿脚操作的农活他都不忌讳，耕棉田翻稻地铡谷草旋筛子掌簸箕送粪吆牛车踩踏轧花机等秋冬季农活，他和儿子孝文长工鹿三一起搭手干着；他的话语更少更简练也更准确，无用的废话虚意的应酬彻底干净地从他的口里省略了。孝文和鹿三总是担心他累出毛病，迭声劝他干一干也该歇一歇，最好是一天干一晌歇息两晌，顶多每天早晚干两晌午间歇息；像这样一天三晌跟着他俩撑着干下去，迟早会出乱子的。白嘉轩充耳不闻，只顾干着手里或脚下的活儿，被他们咄咄得烦了也就急躁了：“你俩都悄着，再甭说那号话了。我不爱听。人只有闲坏了的没有干坏了的。”

整个四合院犹如那架闲置了一个夏天和秋天的轧花机，到了冬天就咔嗒咔嗒地运转起来了。这时候，一个致命的打击接踵而来，白嘉轩发觉了孝文的隐秘。这个打击几乎是摧毁性的。

那是入冬后第一场大雪降落的傍晚，白嘉轩踩踏了半晌轧花机，孝文硬把他拖下来。他揩了揩额头的汗珠儿，穿上棉衣棉裤，走出了饲养牛马的圈场，没有走进斜对门的四合院，折转方向沿着西巷走过去。大雪随下随化，巷道里一片泥泞。白嘉轩背抄着双手走进连着村巷的白鹿镇的街道，推开了冷先生中医堂虚掩着的门板。冷先生给他

斟上一盅金黄色的茶水，再把一包用乳黄色油纸包裹着的卷烟叶解开，摊放在小桌上，指着一个茶杯说：“你赶巧了，这茶叶是刚刚接下的雪花水冲泡的，尝尝。”白嘉轩呷一口茶，清香扑鼻，热流咕噜噜响着滚下喉咙，顿觉回肠荡气浑身通畅，嘴里却故意冷淡地说：“雪水还不就是水嘛！我喝着没啥两样儿。”说着捏出一段儿剪得十分规矩的烟片，优雅自如地撕开，铺展到膝头的棉裤上，再取来一段一截短的碎的烟片均匀地夹进去，然后包卷起来，在两只粗大的手掌之间反复捻搓，用舌尖给开口的烟片抿一点口水粘住，就制造出一支漂亮的雪茄。他从桌边拈起那根从早到晚默自燃烧着的散发着香气的火鞠儿，对着雪茄头儿点燃了，悠悠喷出一口浓重的蓝色烟雾来。

二儿子孝武的媳妇正月里过门以后，他和冷先生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爷们爹们的世代义交发展为儿女亲家。感激不尽亲家悉心至诚的疗治，终于使他百日之后重新走到白鹿村的街巷里，而没有变成一个死僵僵瘫痪炕头的废物。他原先从不串门现在更不串门了，只是在隔过一些日子或阴雨绵绵的憋闷时日，到亲家冷先生的中医堂来坐坐聊聊。冷先生的中医堂，成为罗锅嘉轩了知白鹿原动态的一个通风口。求医抓药的人每天都把各个村子发生的异常事件及时传递到中医堂里来，冷先生对纷繁的大小事变经过筛选，拣出那些值得一说的事说给白嘉轩，俩人接着就对此事议论评说一番。有时候俩人对坐着喝茶吸烟，夏天一人一把竹皮扇子，冬天守一盆木炭火，冷先生话语不多，白嘉轩也不好弹舌，俩人就那么坐着甚至不说一句闲话。俩人心里都明白，其实只有真正信赖无虞的关系才能达到这种去伪情而存真实的境地。白嘉轩怀着平和愉悦的心态呷着雪水冲下的茶水，发现冷先生给他格外殷切地添茶，稍微一点过分的客套反而引起不适和别扭；他留心瞄瞅着冷先生，终于发觉那双平素总透着冷气的眼睛躲躲闪闪，浮泛着一缕虚光。他直言说：“冷大哥你甭瞎张罗了。你坐下

抽你的烟吧。茶我会倒，烟我会卷咯！你像是心里有事？我在这儿不便我就走了。”冷先生看到自己弄巧成拙，急忙拉住白嘉轩的手，就再也转不过弯儿了：“兄弟你坐下，我有话跟你说……”

“咱弟兄们说话，还这么拐弯抹角呀？”

“我听到一句闲话——”

“……”

“虽则是一句闲话，可不是一般的闲话。”

“呃呀几天不见，你的直筒肠子扭成麻花了。算了你甭说了。我回去睡觉呀！”

“我怕你招不住这个闲话。兄弟你听到这闲话先不要生气。这闲话给你不说不行，说了又怕你招架不住……”

“我的黄货白货给土匪打抢了，又砸断了我的腰，我不像人样儿像条狗，我连一句气话也没骂还是踏我的轧花机；我不信世上还有啥‘闲话’能把我气死，能把我扳倒？顶大不过是想算我的伙食账（处死）罢咧！”

“嘉轩兄弟……我听人说孝文的闲话……”

“孝文？孝文能有啥闲话？”

“说是跟村口烂窑里那个货……”

“呃……”

冷先生看见白嘉轩泛红的脸色顿然变得如同一张黄表纸，佝偻的躯体猛烈地抖颤了一下，把夹在指间的卷烟挤成了弯儿，在那一霎间眼睛睁大到失神的程度。这一切都没有超过冷先生的预料，白嘉轩没有热血冲顶当下闭气已属万幸。他终于说出了这个难以启齿的闲话。白嘉轩很快恢复过来，冷着脸问："大哥依你看，这是果有实事，还是有人给我脸上抹屎？"冷先生说："我看都不是。闲话嘛你就只当闲话听。"白嘉轩又问："你听谁说的？这话是怎么嘈出来的？"冷先生轻描淡写地说："俗话说'露水没籽儿闲话没影儿'。"白嘉轩摇摇头说："凡是闲话都有影儿！"

七月末尾一个溽热蒸闷的晚上，鹿子霖头上裹着一匝守孝的白布走进冷先生的中医堂，腋下夹着一瓶太白酒。进屋后，鹿子霖把酒瓶往桌子上一蹾，顺手从头上扯下孝布挂到土墙的木橛上，大声憨气地慨叹起来："先生哥，你看邪不邪？老先生一入土，我那个院子一下就空了。空得我一进街门就恓惶得坐不住。今黑咱弟兄们喝一盅。"冷先生很能体味鹿子霖的心情，当即让相公尽快弄出三四样下酒菜来，一盘凉拌黄瓜，一盘炒鸡蛋，一盘炒莴笋，一盘油炸花生米。冷先生喝酒跟喝凉水的感觉和效果一样，喝任何名酒尝不出香味，喝再多也从来不见脸红脸黄更不会见醉，他看着旁人喝得那么有滋有味醉得丑态百出往往觉得莫名其妙。鹿子霖嗜酒成性，高兴时喝郁闷时喝冷甚了喝热过了喝，干好事要喝干坏事要喝，进小娥的窑洞之前必须喝酒以壮行；他喝酒不悦意独个品饮，必得有一伙酒伴起码得有一个人陪着，一边谝着笑着喊着，顶痛快的是猜拳行令吵得人仰马翻，渐渐进入苦不觉苦乐不觉乐的飘飘摇摇的轻松境界。"先生哥啊，我有一句为难的话……"鹿子霖眼睛里开始泛出酒的气韵，"思来想去还是跟你说了好。"冷先生没有说话，从桌上捉住酒杯邀酒，鼓励鹿子霖尽快说出他想说的话。鹿子霖仰脖灌下一盅酒，口腔里大声嘘叹着说："我听到

一句闲话，说是孝文跟窑里那个货这了那了……”冷先生不由一惊，原猜想鹿子霖可能要谈及他们之间的事，鹿兆鹏拒不归家的抗婚行动早已掩盖不住，处境最为尴尬的其实是这桩婚事双方的父亲，他和他。鹿子霖多次向他表示过深深的歉意，一次又一次给他表示将要采取的制服儿子的举措……是不是又要采取新的手段了？万万料想不到，却是孝文和黑娃女人之间发生了什么纠葛。冷先生断然地说：“兄弟你这话说给鬼鬼都不信。”鹿子霖大幅度地连连点着头：“对对对！我刚听到这话不仅不信，顺手就扇了给我报告这件事的人一个嘴巴。我说‘孝文要是跟她有这号事，那庙里的泥神神也会跟她有这事了’。那人挨了嘴巴跑了，可接着又有俩人来报告，说得有鼻子有眼，全说是他们亲眼看见孝文进出那货的窑，一个说他晚上寻猪撞见孝文进窑，一个说他半夜从亲戚家回来瞅见孝文溜出窑来，俩人不是一天晚上见的。你说信下信不下？我还能再扇这俩人的嘴巴子吗？”冷先生说：“这事若是属实，那比土匪砸断腰杆还要厉害，这是要嘉轩的命哩！”鹿子霖说：“我打发那俩报告的人出门时，一人还是给了一个嘴巴先封住口：不准胡说！我想我给嘉轩不好说这话，嘉轩哥心里头见不得我我明白；可这事不告知嘉轩哥又不行，日后事情烂包了嘉轩哥又怨我对他瞒瞒盖盖；我思来想去只有你来说这话，咱们谁都不想看着白家出丑……他跟你是亲家我跟你更早就是了，盼着大家都光光堂堂……”

冷先生第二天照旧去给白嘉轩敷药，看着忍着痛楚仍然做出平静神态的亲家，又想起前一晚自己的判断：嘉轩能挨得起土匪拦腰一击，绝对招架不住那个传言的打击。冷先生心里十分难过十分痛苦，脸上依然保持着永不改易的冷色调，像往昔一样连安慰的话也不说一句只顾经心治伤。过了难耐的三伏又过了淫雨绵绵的秋天，当白嘉轩腰伤治愈重新出现在白鹿村街巷里的时候，埋在他心底的那句可怕的

传言等到了出世的时日。他为如何把这句话传给嘉轩而伤透了脑子，似乎从来也没有过为说一句话而如此费心的情况……

冷先生瞅着佝偻在椅子上的白嘉轩说："兄弟，我看人到世上来没有享福的尽是受苦的，穷汉有穷汉的苦楚，富汉有富汉的苦楚，皇官贵人也是有难言的苦楚。这是人出世时带来的。你看，个个人都是哇哇大哭着来这世上，没听说哪个人落地头一声不是哭是笑。咋哩？人都不愿意到世上来，世上太苦情了，不及在天上清静悠闲，天爷就一脚把人蹬下来……既是人到世上来注定要受苦，明白人不论遇见啥样的灾苦都能想得开……"冷先生一次说下这么多话连他自己也颇惊诧。白嘉轩说："得先把事情弄清白。不管是真是假，都不能当闲话听。这是啥闲话？杀人的闲话！"

白嘉轩佝偻着腰走过白鹿镇的街道，又转折上进入白鹿村的丁字路，脚下已经落积下一层厚厚的雪，嚓嚓嚓响着，背抄在腰上的手和脖子感到雪花融化的冰冷，天上的雪还在下着。进入四合院的街门时，他对如何对待冷先生透露给他的闲话已经纲目明晰，处置这事并不复杂，不需要向任何人打听讯问，要是没有结果可能更糟。他相信只要若无其事而暗里留心观察一下孝文的举动就会一目了然。他做出什么事也不曾发生的随意的样子问："孝文睡了？"仙草也不在意地说："给老六家说和去了。"

白嘉轩胸膛里怦然心动，觉得有一股滚烫的东西冲上脑顶，得悉这件非同小可的闲话所激起的震惊和愤怒，现在才变得不可压抑，归来时想好了的处置这件事的纲目和步骤全部作废了。他把解开的一只裤脚带儿重新扎好，从门背后抓起仙草由柴火棚子里捡回的拐杖，强烈地预知到拐杖的重要用场。出门时，他没有忘记掩盖此时出门的真

实目的："老六的那几个后人难说话。老六让我去镇镇邪。我差点忘了……"他跷出门槛就跨出通向又一次灾难的一步。

白嘉轩来到白老六家的门口就僵住了。老六家狭窄的庄基上撑立着一排四间破旧的厦屋，没有围墙没有栅栏是个敞风院子，一切全都一目了然，四间厦屋安着的四合门板全都关死了，不见灯火不见响动，白老六滚雷一样的鼾声从南边那间厦屋冲出来，在敞风院子里起伏。白嘉轩在那一刻浑身有一种瘫软的感觉。他走出老六家的敞风院子，似乎有一千双手推着他疾步走上村子东头的慢坡，瞅见了那孔平时连正眼瞧一眼的兴致也没有的窑洞；想到把他逼到这个龌龊角落来干捉奸这种龌龊事的儿子，胸膛里的愤怒和悲哀搅和得他痛苦不堪；他从慢道跨上窑院的平场，两条腿失控地抖颤起来；他走到糊着一层黑麻纸的窑窗跟前，就听见了里头悄声低语着的狎昵声息；白嘉轩在那一瞬间走到了生命的末日走到终点，猛然狗似的朝前一纵，一脚踏到窑洞的门板上，咣当一声，自己同时也栽倒了。

咣当的响声无异于一声雪夜的雷鸣，把温暖的窑洞里火炕上的柔情蜜意震荡殆尽。孝文完全瘫痪，躺在炕上动弹不了，全身的筋骨裂碎断折，只剩一身撑不起杆子的皮肉。那一声炸雷响过便复归静寂。小娥从炕上溜下来，撅着光光的尻子贴着门缝往外瞧，朦胧的雪光里不见异常，眼睛朝下一勾才瞅见门口雪地上倒卧着一团黑圪埮。她松了一口气折回头扶住炕边，俯下身贴着孝文的耳朵说："瓜蛋儿放心，一个要饭的冻硬栽倒到门口咧！"孝文呼地一声跃起拨开被子，慌忙穿衣蹬裤，溜下炕来钩上棉窝窝，一把拉开门闩，从那个倒卧门口的人身上跳过去；下了窑院的平场跷上慢道又进入村巷，他的心似乎才重新跳荡起来。

小娥穿好衣裳走出窑门，看看倒在门口的那个倒霉鬼死了还是活着；她蹲下身摸摸那人的鼻口，刚刚触到冷硬如铁的鼻梁，突然吓得倒吸一口气跌坐在地上；从倒地者整齐的穿着和佝偻的身腰上，她辨认出族长来，哪里是那个可怜恓惶的要饭老汉！小娥爬起来退回窑里才感到了恐惧，急得在窑里打转转。她听到窑院里有一声咳嗽，立即跳出窑门奔过窑院挡住了从慢道上走下来的鹿子霖。小娥说：“糟了瞎了，族长气死……”鹿子霖朝着小娥手指的窑门口一瞅，折身跷上窑院，站在倒地的白嘉轩身旁久久不语，像欣赏被自己射中落地的一只猎物。小娥急得在他腰里戳了一下：“咋办哩咋办哩？死了人咋办呀？你还斯斯文文盯啥哩！”鹿子霖弯下腰，伸手摸一下白嘉轩的鼻口，直起腰来对小娥说：“放心放心放你一百二十条心。死不了。这人命长。”小娥急嘟嘟地说：“死不了也不得了，他倒在这儿咋办哩？”鹿子霖说：“按说我把他背上送回去也就完了，这样一背反倒叫他叫我都转不过弯子……好了，你去叫冷先生让他想办法，我应该装成不知道这码事。快去，小心时间长了真的死了就麻烦了。”小娥转身跑出场院要去找冷先生，刚跑到慢坡下，鹿子霖又喊住她：“算了算了，还是我顺路捎着背回去。”小娥又奔回窑院。鹿子霖咬咬牙在心里说：“就是要叫你转不开身躲不开脸，一丁点掩瞒的余地都不留。看你下来怎么办？我非把你逼上‘辕门’不结。”他背起白嘉轩，告别小娥说：“还记着我给你说的那句话吗？你干得在行。”小娥知道那句话指的什么：你能把孝文拉进怀里，就是尿到他爸脸上了。她现在达到报复的目的却没有产生报复后的欢悦，被预料不及的严重后果吓住了。她瞅着鹿子霖背着白嘉轩移脚转身，尚未走出窑院，跷进窑去关死了窑门，突然扑倒在炕上。

鹿子霖背着白嘉轩走过白雪覆地的村巷，用脚踢响了白家的街门，对惊慌失措的仙草说：“先甭问……我也不晓得咋回事。先救

人。”仙草的一针扎进人中，白嘉轩喉咙里咕咕响了一阵终于睁开眼睛，长叹一声又把眼睛闭上了。鹿子霖装作啥也不晓的憨相：“咋弄着哩嘉轩哥？咋着倒在黑娃的窑门口？”随之就告辞了。

白嘉轩被妻子仙草一针扎活过来长叹一声又闭上了眼睛。他固执地挥一挥手，制止了家中老少一片乱纷纷的嘘寒问暖心诚意挚的关切，“你们都回去睡觉，让我歇下。”说话时仍然闭着眼睛。屋里只剩下仙草一个清静下来，白嘉轩依然闭眼不睁静静地躺着。一切既已无法补救，必须采取最果断最斩劲的手段，洗刷孝文给他和祖宗以及整个家族所涂抹的耻辱。他相信家人围在炕前只能妨碍他的决断只能乱中添乱，因此毫不留情地挥手把他们赶开了。他就这么躺着想着一丝不动，听着公鸡叫过一遍又叫过一遍，才咳嗽一声坐了起来，对仙草说：“你把三哥叫来。”

鹿三在马号里十分纳闷，嘉轩怎么会倒在那个窑院里？他咂着旱烟袋坐在炕边，一只脚踏在地上另一只脚跷踏在炕边上，胳膊肘支在膝头上吸着烟迷惑莫解。孝文低头耷脑走进来，怯怯地靠在对面的槽帮上，他以为孝文和他一样替嘉轩担忧却不知道孝文心里有鬼。他很诚恳地劝孝文说：“甭伤心。你爸缓歇缓歇就好了。许是雪地里走迷了。”孝文靠在槽帮上低垂着头，他从小娥的窑洞溜回家中时万分庆幸自己不该倒霉，摸着黑钻进被窝，才觉得堵在喉咙眼上的心回到原处；当他听到敲门声又看见鹿子霖背着父亲走进院里时，双膝一软就跌坐在地上；这一切全都被父亲的病势暂时掩盖着。他除了死再无路途可走，已经没有力量活到天明，甚至连活到再见父亲一面的时间也挨不下去。他觉得有必要向鹿三留下最后一句悔恨的话，于是就走进马号来了。他抬起低垂到胸膛上的下巴说：“三叔，我要走呀！你日后给他说一句话，就说我说了‘我不是人’……”鹿三猛乍转过头拔出嘴里

的烟袋："你说啥？"孝文说："我做下丢脸事没脸活人了！"鹿三于是就得到了嘉轩倒在窑洞门口的疑问的注释。他从炕边上挪下腿来，一步一步走到孝文跟前，铁青着脸瞅着孝文耷拉的脑袋，猛然抡开胳膊抽了两巴掌，哆嗦着嘴唇："羞了先人了……啥叫羞了先人了？这就叫羞了先人了！黑娃羞了先人你也羞了先人了……"这当儿仙草走了进来。鹿三盛怒未消跟仙草走进上房西屋，看见嘉轩就忍不住慨叹："嘉轩哇你好苦啊！"白嘉轩忍住了泛在眼眶里的泪珠，说："你知道发生啥事了？知道了我就不用再说了。你现在收拾一下就起身，进山叫孝武回来，叫他立马回来。就说我得下急症要咽气……"

惩罚孝文的举动又一次震撼了白鹿原。惩罚的方式和格局如同前次，施刑之前重温乡约族规的程序换由孝文的弟弟孝武来执行。

白孝武的出现恰当其时。他穿一件青色棉袍，挺直的腰板和他爸腰折以前一样笔挺，体魄雄健魁伟，肩膀宽厚臀部丰满，比瘦削细俏的孝文气派得多沉稳得多了。白嘉轩仍然在台阶上安一把椅子坐着，孝武归来及时替代了不争气的孝文的位置，也及时填充了他心中的虚空。孝武领诵完乡约和族规的有关条款，走到父亲跟前请示开始执行族规。白嘉轩从椅子上下来，跷下台阶，从族人让出的夹道里走过去，双手背抄在佝偻着的腰背上。白嘉轩谁也不瞅，端直走到槐树下，从地上抓起扎捆成束的一把酸枣棵子刺刷，这当儿有三四个人在他面前扑通扑通跪倒了。白嘉轩知道他们跪下想弄啥，毫不理睬，转过身就把刺刷扬起来抽过去。孝文一声惨叫接一声惨叫，鲜血顿时漫染了脸颊。白嘉轩下手特狠，比上次抽打小娥和狗蛋还要狠过几成。这个儿子丢了他的脸亏了他的心辜负了他对他的期望，他为他丧气败兴的程度远远超过了被土匪打断腰杆的劫难，他用刺刷抽击这个孽种是泄恨是真打而不是在族人面前摆摆架势。白嘉轩咬着牙再次扬起刺

刷，忘记了每人只能打一下的戒律，他的胳膊被人捉住了，一看竟是鹿子霖。

鹿子霖是那三四个下跪求情者中的一个。这个向族长跪谏的行动其实就是鹿子霖策划的。他听到孝武给他传述的白嘉轩要惩罚孝文的决定以后，郑重其事地找到白家，大声吵着要白嘉轩取消这次施刑的举动："我敢说这根本不怪孝文。你也招不住这个折腾咯！"白嘉轩冷着脸心决如铁："锣都敲了你还说这话做啥！你后晌能到祠堂来，就算给老哥赏光了。"鹿子霖后晌去祠堂时在村巷里痛心狠气地抱怨几个老汉："你几个老者难道都是石头心眼？嘉轩要整孝文你们能忍心叫他整？为啥不劝他不阻挡他？这孝文比不得旁人咋能随便用刺刷子打？"那几个老汉被他热诚的斥责弄得又感动又愧悔，便策划了这出跪谏的插曲。

鹿子霖从白嘉轩手里夺下刺刷又扑通跪下了，说："嘉轩哥。你不饶孝文我不起来。"白嘉轩冷着脸说："我不受你的跪拜。谁的跪拜我今日都不受。谁爱跪谁就跪。孝武，往下行——"说罢，用手撩着袍衩儿走过人窝儿，重新在祠堂台阶的椅子上坐下来。白孝武从执刑具者手里接过刺刷，照哥哥孝文赤裸的胸脯抽击了一下，血流顺着胸脯一条条拉下来……

如同祠堂院子里的争执在白家庭院里也刚刚发生过。老娘白赵氏妻子白吴氏以及两个儿媳妇结成同盟，坚决反对白嘉轩惩罚孝文的毒刑。白赵氏劝不下儿子就骂起来："你害死孝文你哪像个老子？你要把孝文捆到树上我就脱光站到孝文前头，你先用刺刷刷死我再刷死孝文！"仙草则用哭谏，两个儿媳一齐求情。白嘉轩对谁也不松口，连一句话也不说，一任她们骂呀哭呀乞求呀绝不动心。直到第三天孝武和鹿三从山里回来，白嘉轩把全体家庭成员叫到上房正厅，在祭桌前发

蜡焚香，然后征求大家的意见：“有话对着先人的面说。”白赵氏白吴氏和孝文孝武的媳妇陈述了早已表明过的态度，轮到至关重要的一个人白孝武了。白孝武站在祭桌前一字一板地说：“按族规办。”奶奶白赵氏正愣着神儿，母亲白吴氏的耳光已经抽到他脸上了。孝武瞅了一眼母亲不恼也不愧，仍然面色不改。白嘉轩用恼怒的眼色制止了妻子白吴氏的轻举妄动，转过脸问孝武：“为啥？你说为啥？”白孝武沉稳地说：“这是白家的立身纲纪。爸你说的我不敢忘……”白嘉轩迫急地一拳砸在桌子上，说：“着！忘了立家立身的纲纪，毁的不是一个孝文，白家都要毁了——”

白嘉轩从父亲手里承继下来的，有原上原下的田地，有槽头的牛马，有庄基地上的房屋，有隐藏在土墙里和脚地下的用瓦罐装着的黄货和白货，还有一个看不见摸不着的财富，就是孝武复述给他的那个立家立身的纲纪。即使白嘉轩自己，对于家族最早的记忆也只能凭借传说，这个村庄和白氏家族的历史太漫长太古老了，漫长古老得令它的后代无法弄清无法记忆。由白嘉轩上溯五辈，大约是白家家道中兴的一个纪元的开始，那位先人在贫困冻馁中读书自饬考得文举，重整家业重修族规，是一个对白家近代家史族史具有决定性影响的人物，族人至今还常提起他的名字白修身。族史和家史虽然漫长，对本族和家庭具有重大影响的先人的名字还是留传下来，湮没的只是那些业绩平平的名字。好几代人以来，白家自己的家道则像棉衣里的棉花套子，装进棉衣里缩了瓷了，拆开来弹一回又胀了发了；家业发时没有发得田连阡陌屋瓦连片，家业衰时也没弄到无立锥之地；有限的记忆不可怀疑的是，地里没断过庄稼，槽头没断过畜生，囤里没断过粮食，庄基地没扩大也没缩小。白嘉轩在孝文事发后的短暂几天里除了思索这个意料不及的事件，更多地却是追思家族的历史和前贤，形成家庭这种没有大起也没有大落基本稳定状态的原因，除了天灾匪祸瘟

疫以及父母官的贪廉诸种因素之外，根本的原由在于文举人老爷爷创立的族规纲纪。他的立家立身的纲纪似乎限制着家业的洪暴，也抑止预防了家业的破败。无论家业上升或下滑，白家的族长地位没有动摇过，白家作为族长身体力行族规所建树的威望是贯穿始今的。一位族长在大旱之年领着族人打井累得吐血而死，井台上至今还可以看到被风化了的白克勤模糊的字迹。一位族长领着族人在打杀贼人中被刀劈成两截，成为白鹿原一举廓清匪患的英雄。并非所有的族长都有伟绩，悄无声息的平庸之辈也为数不少，甚至每隔一代两代就会出一个败家子族长，这是殃祸家族的大害必须尽早诛除不能手软。……

白嘉轩听到孝武的话，心里卷起一汪热流，激动得热泪盈眶，此时此地正需要听到这个话。白赵氏不甘心地反诘："先人们都是通人性的好先人，谁也没有你这样心硬。"白嘉轩沉静地说："先人们里头没出过这号瞎事。"孝文无可挽回地被推进祠堂捆到槐树上了。

白嘉轩采取的第二个断然措施是分家。白嘉轩决定只请大姐夫朱先生一个人监督分家，作为这种场合必不可缺的孩子的舅舅没有被邀请，山里距这儿太远了。如果连自己的家事都处置不妥，还怎么给族人门人村人说和了事？一切都经过周密的算计和精细的调配，分给孝文好地次地的搭配比例与全部土地优次的比例相一致。按说长子应占厅房东屋，但那需得双亲谢世以后，白嘉轩健在白赵氏也健在，白嘉轩尚不能住进厅房东屋而只能居住西屋。再考虑到生产生活的方便，白嘉轩决定把门房的东屋和西屋分给孝文，当中明间作为甬道属家庭公有。储存的黄货白货白嘉轩闭口不提，那是家庭积蓄，除非异常重大的情变不能挪动，这些蓄存的交代当在他蹬腿咽气之前，现在谁也不得过问。白孝文的脸面被药布包扎着不露真相，只是点头，伸出结着血痂的右手在契约上按下了指印。朱先生笑着重复了一句："房是招

牌地是累，攒下银钱是催命鬼。房要小，地要少，养个黄牛慢慢搞。”这几句广为流传的朱先生名言，白嘉轩和儿子们其实才头一次从创造者本人口中听到。朱先生对孝文的过失没有严词斥训，悬笔写下两个字的条幅：慎独。

鹿子霖在惩罚孝文那天晚上到神禾村喝了酒。他跪在地上为孝文求情的行动虽然失败，却获得了许多人的钦敬，也把这件花案的制造者隐蔽得更严密了。为了显示真诚，他就那么一直跪下去直到行刑结束。白嘉轩从祠堂台阶上慌慌匆匆扭动着狗一样的腰身走过来，双手扶起他，又扶起一同跪着的三个老者说：“你们的宽恩厚德我领了。”鹿子霖演完这场戏就去神禾村找几个相好喝酒去了，这一晚喝得酣畅淋漓，于午夜时分走回白鹿村，从村子东头的慢道上下来，扑腾扑腾走到窑洞口拍响了门板。小娥问谁敲门。鹿子霖大声说：“问啥哩还问啥哩？你哥你叔你大大我嘛！”他喝得太多有点失控，阴谋的完全实施所产生的欢欣得意也有点难以控制，该是他和同谋者小娥一起品味这出精彩戏曲儿的时候了。门闩滑动一声，鹿子霖迫不及待撒着酒狂推门而入，把正趴到炕边上的小娥揽住。小娥一抖一甩钻进被窝。鹿子霖笑笑才意识到小娥的棉袄是披在肩上的。鹿子霖倚在炕边上解衣脱袜，一边说：“大的亲蛋蛋呀！你给你出了气也给大饰了脸，咱俩的气儿出了，仇报了，该受活受活啦！今黑大大全都依你，你说咋着大就咋着，你要咋样儿大就咋样儿，你要骑马大就驮上你游，你要大当王八大就给你趴下……”说着剥脱了衣裳钻进被窝。小娥却问：“吃我屙下的喝我尿下的你愿意不愿意？”鹿子霖笑嘻嘻地念起狗蛋创作的赞美诗：“宁吃小娥屙下的不吃地里打下的，宁喝小娥尿下的不喝壶里倒下的……大愿意。”鹿子霖的手被挡住了。小娥说：“你刚才说今黑依我，我还没说咋样哩，你就胡骚情起来？你先安安生生睡着，我有话问你，孝文挨得重不重？”

"重。"

"头一刷子谁打的？"

"他爸嘛！还能有谁？族长嘛！"

"听说老二回来了？"

"回来了。这货看去还是个硬家伙。"

"孝文伤势咋样？"

"还用问！脸上没皮儿了。"

"孝文寻冷先生看了没看？"

"你操这些闲心弄啥？"

小娥不吭声了。惩罚孝文的那天后晌，小娥听到村巷里头的锣声和吆喝声，浑身抽筋头皮发麻双腿绵软，在窑洞里坐不住了。她达到了报复的目的却享受不到报复的快活。在她怀着恶毒的目的把孝文拖进砖瓦窑以后，惊奇地发现世上竟有孝文这种奇怪男人，勒上裤子行了解开裤带儿又不行了，当时她觉得奇异也觉得好笑；后来孝文遵照她规示的日程钻进她的窑洞来过多回，仍然是那个样子；她看着他每一次兴冲冲地又显得贼偷鬼气儿来到窑洞，回回都是败兴地离去，就忍不住同情这个可怜人儿说："算了你干脆甭来了。"孝文苦笑着说："我也想咱没本事算了甭去了，可又忍不住就来咧！"直到白嘉轩气昏死在窑洞门外雪地上的那一晚，孝文尚未进入过她的已经不再贵重的身体……她在窑洞里坐不住也立不住，装作扯柴火走到窑院边沿的麦秸垛跟前，耳朵逮着来自村中的动静，偶尔可以听见人们拥向祠堂路

上的一句对话。她现在想到孝文在她窑里炕上的那种慌乱不再觉得可笑，反而意识到他确实是个干不了坏事的好人。她努力回想孝文领着族人把她打得血肉模糊的情景，以期重新燃起仇恨，用这种一报还一报的复仇行为的合理性来稳定心态，其结果却一次又一次地在心里呻吟着：我这是真正地害了一回人啦！

鹿子霖不耐烦地说："还提孝文孝文做啥？该受的罪让他受去吧！咱们今黑热热火火弄一场。"小娥说："好呀——对呀！"说着就跃上鹿子霖的腰腹往下一蹾。鹿子霖嘻嘻笑着呻唤一声："唉哟哟！亲蛋蛋你轻一点儿……差点把大大的肠子肝花蹾烂了。"小娥又一纵蹾到他的胸脯上。鹿子霖又嘘唤着："亲蛋蛋你把大的肋条儿蹾断了！"鹿子霖正陶醉在欢愉之中，感到脸上一阵湿热，小娥把尿尿到他脸上了。鹿子霖翻身坐起，一巴掌扇到小娥脸上："婊子！你……"小娥问："你刚才不是说了今黑由我想咋样就咋样……"鹿子霖恼羞成怒："给你个笑脸你就忘了自个姓啥为老几了？给你根麦草你就当拐棍拄哩！婊子，跟我说话弄事看向着，我跟你不在一杆秤杆儿上排着！"小娥跳起来："你在佛爷殿里供着我在土地堂里蜷着；你在天上飞着我在涝池青泥里头钻着；你在保障所人五人六我在烂窑里开婊子店窑子院！你是佛爷你是天神你是人五人六的乡约，你钻到我婊子窑里来做啥？你日屄逛窑子还想成神成佛？你厉害咱俩现在就这么光溜溜到白鹿镇街道上走一回，看看人唾我还是唾你？"鹿子霖慌忙穿起衣裤连连禁斥着："你疯了你疯咧！你再喊我杀了你！"却不见小娥收敛，就慌匆匆跳下炕来夺门出窑。小娥在窑门口跟踪骂着："鹿乡约你记着我也记着，我尿到你脸上咧，我给乡约尿下一脸！"

第十八章

一场异常的年馑降临到白鹿原上。饥馑是由旱灾酿成的。干旱自古就是原上最常见最普通的灾情，或轻或重几乎年年都在发生，不足为奇。通常的旱象多发生在五六七三个月，一般到八月秋雨连绵就结束了，主要是伏旱，对于秋末播种夏初收获的青稞大麦扁豆豌豆小麦危害不大，凭着夏季这一料稳妥的收成，白鹿原才繁衍着一个个稠密的村庄和熙熙攘攘的人群。这年的干旱来得早，实际是从春末夏初就开始的，麦子上场以后，依然是一天接着一天一月连着一月炸红的天气；割过麦子的麦茬地里，土地被暴烈的日头晒得炸开镢把儿宽的口子，谷子苞谷黑豆红豆种不下去。有人怀着侥幸心理在干燥的黄土里撒下谷种，迟早一场雨，谷苗就冒出来了，早稻迟谷，谷子又耐旱；然而他们押的老宝落空了，扒开犁沟儿，捡起谷粒在手心捻搓一下，全成了酥酥的灰色粉末儿。田野里满眼都是被晒得闪闪发亮的麦茬子，犁铧插不进铁板似的地皮，钢刃铁锨也踏扎不下去，强性人狠着心聚着劲扎翻土地，却撬断了锨把儿。旱象一直延续下去，持续不降的高温热得人日夜汗流不止喘息难定。村里的涝池只剩下池心有一洼墨绿色的臭水，孩子们仍然在泥水里浆洗，不几天就完全干涸了。旱象一直僵持到八月十五中秋节日。这是播种冬小麦的节令。人们无心赏月无心吃团圆饼全都陷入慌恐之中了。白鹿原的官路上，频频轰响着伐神取水的火铳，涌过披着蓑衣戴着柳条雨帽的人流。白鹿村的乡民纷纷嚷嚷起来，白嘉轩心里也急了毛躁了，让二儿子孝武在村巷里敲锣告示：伐神取水，每户一升。

白鹿村西头有一座关帝庙俗称老爷庙，敬奉着关公关老爷。关羽升天后主动请求司管人间风雨为民赐福，村村寨寨无论大小都修建着

一座关帝庙；原上自古顺应西风雨，因之关帝庙一律坐落在村子的西首。白鹿村的老爷庙是一座五间宽的高大宽敞的大殿，东西两面墙壁上彩绘着关羽戎马倥偬光明磊落的一生中的几个光辉篇章：桃园结义单刀赴会刮骨疗毒出五关斩六将等；而正殿上坐着的司管风雨的关老爷的雕塑，面颜红润黑髯如漆明眸皓齿神态安详慈善如佛了。庙宇四周是三四亩地的一片空园，一株株合抱粗的柏树标志着庙宇的历史。庙前的那棵槐树才是村庄的历史标志，经过无数人的手臂的度量，无论手臂长短，量出的结果都是七搂八拃零三指头。槐树早已空心，里头可以同时藏住三个躲避暴雨袭击的行路人；枝叶却依然郁郁葱葱，粗大的树股伸出几十步远，巨大的树冠浓密的树荫笼罩着整个庙宇的屋脊，形成一派凝聚不散的仙气神韵。

白嘉轩跪在槐树下，眼前是常年支在槐树下废弃的青石碾盘，蜡架上插着拳头粗的大红蜡烛蹿起半尺高的火苗儿，香炉里的紫香稠如谷苗，专司烧纸的人把一张张金黄的黄表纸连连不断扔进瓦盆里，香蜡纸表燃烧的呛人的气味弥漫在燥热的庙场上；他的身后，跪倒着白鹿村十二岁往上的全部男人，有的头戴柳条雨帽身披蓑衣，有的赤裸着膀子，木雕泥塑似的跪伏在大太阳下一动不动。碾盘的一侧置放着一张方桌，另一侧临时盘起一个大火炉，三个精壮小伙只穿一件短裤，轮流扯拉着一只半人高的特大号风箱，火焰在阳光里像万千欢舞的精灵，火炉烘烧着三只铁铧和几支钢钎儿。锣鼓家伙在大殿里头敲着。一个伐马角的小伙子从庙门里奔跃而出，跃上方桌。锣鼓家伙班子也跟随出来，在方桌周围继续上劲地敲着。侍守火炉的人用铁钳夹住一只烧成金黄色的铁铧送到方桌跟前，伐马角的小伙拈来一张黄表纸衬在手心去接铁铧，那黄表纸呼啦一下就变成灰白的纸灰，小伙尖叫一声从方桌上跌滚下来，被接应的人搀扶走了。第二个马角从庙里奔到槐树下，一只脚刚跨上方桌沿儿就仰面栽倒下来。第三个马角和

头一个如出一辙，刚抓住铁铧就从方桌上跌翻下去。锣鼓家伙班子第四次从庙里送到祭台上来的马角是鹿子霖，他跳上方桌时浑身扭着，双臂也扭着舞着，大口吹出很响的气浪；他一把抓住递到脸前的铁铧，手心里的黄表纸完好无损；当他再去接一支筷子粗细的钢钎时，从桌上落马跳下了。白嘉轩霍的一声从地上站起来，膝头上沾着两坨黄土佝偻着腰走进了老爷庙的大门。

白孝武监守在大殿里，看见父亲走进门来，迎上前企图劝他出去。白嘉轩一甩手走到关公神像跟前，点燃三支香插进香炉，作揖长拜之后就跪伏下去一动不动。他的周围跪倒了一大片男人，等待神灵通传自己。锣鼓家伙更加来劲地爆响起来，在庙堂里嗡成一片，香蜡纸表的气味令人窒息。白嘉轩起初觉得鼻膜涩疼，随之变得清香扑鼻，再后来就嗅不出任何气味了；锣鼓家伙的喧嚣充耳不闻，只见那些鼓手锣手家伙手使劲地挥动着胳膊，却敲不出一丝声响来，大殿里变得异常清静；他觉得手足和身躯渐渐变得轻如一张黄表纸，脑子里一片空白，只是胸腔里残留着凡人浊气，需要张大嘴巴连续呼吐出去；那一瞬间似乎是最后一口污浊的胸气喷吐出来，他就从关公坐像前的砖地上轻轻地弹了起来，弹出了庙门。人们看见，佝偻着腰的族长从正殿大门奔跃出来时，像一只追袭兔子的狗；他奔到槐树下，双掌往桌面上一按就跳上了方桌，大吼一声："吾乃西海黑乌梢！"他拈起一张黄表纸，一把抓住递上来的刚出炉的淡黄透亮的铁铧，紧紧攥在掌心，在头顶从左向右舞摆三匝，又从右到左摆舞三匝，掷下地去，那黄表纸呼啦一下烧成粉灰。他用左手再接住一根红亮亮的钢钎儿，"啊"地大吼一声，扑哧一响，从左腮穿到右腮，冒起一股皮肉焦灼的黑烟，狗似的佝偻着的腰杆端戳戳直立起来。槐树下的庙场上，锣鼓家伙敲得震天价响，九杆火药铳子（九月）连连爆炸，跪伏在庙场土地上的男人们一齐舞扭起来，疯癫般反复吼诵着："关老爷，菩萨

心；黑乌梢，现真身，清风细雨救黎民……”侍候守护马角的人，连忙取出备当的一根两头系着小环的皮带，把两只小环套住穿通两腮的钢钎儿，吊套在头顶，恰如骡马口中的嚼铁。白嘉轩被众人扶上抬架，八个人抬着，绕在他头上身上的黄绸飘飘飏飏。火铳先导，锣鼓殿后，浩浩荡荡朝西南部的山岭奔去。所过村庄，鸣炮接应，敲锣打鼓以壮声威，腾起威武悲壮的气势。

走进秦岭峪口，沿着一条越走越窄的山路绕着山梁行进，路边的青草被络绎不绝的取水的人马踩踏倒地，拓宽了道路。天麻麻黑时，白嘉轩和他的族人村民终于走到黑龙潭了。潭约一丈见方，深不可测，蓝幽幽的潭水平静不兴，上无来水，下不泄流，黑龙潭是从地下连通东海西海南海北海的一只海眼，四海龙王每年都通过这条通道到山里来聚会。潭的四周全部是巉崖青石，西边凸出前扑的石崖上，稳稳当当蹲踞着一座铁铸的独庙，铁顶铁墙浑然一体，没有谁能解释这铁庙是在崖上就地铸成的，还是在平原上铸成以后抬上崖顶的。锣鼓家伙围着潭沿敲着，火药铳子又是九声连响，人们择地而跪，一律面对铁庙。白嘉轩早从抬架上下来走到潭边，口咬嚼钎把住上边抖下来的绳索，脚踩石壁上的凹窝爬上崖头，一步一拜一个长揖一个响头，一直磕进铁庙，点蜡烧香焚表。四面铁壁上铸塑着四条龙，白嘉轩面对西边铁壁叩拜在地：“弟子黑乌梢拜见求水。”就连叩三个响头，从腰里解下一只细脖儿瓷罐，在燃烧着的香蜡纸表里绕过三匝，退出铁庙，用细绳吊放到潭里漂着。白嘉轩背对铁庙，其余的人也都一律改换拜跪方向背向水潭。锣鼓家伙也收了场，不准说话不准咳嗽不准放屁，一片屏声敛息的肃穆气氛，等待西海龙王赐舍给西海黑乌梢珍贵的水。星全以后，交过夜半，山里梢林掀起了一阵骚啸，静跪在地的人全都冻得抖抖索索牙齿磕碰，猛然听得潭里传出“咕咚”一声水响。白嘉轩朗声诵道：“龙王爷恩德恩德恩德！”跪伏在地的人一齐跳起

来，丢弃了头上的柳条雨帽和蓑衣，把身上的衣裤鞋袜全部剥光，表示他们全都是海中水族是龙王爷的兵勇，围着龙潭跳起来蹦起来唱起来：“龙王爷，菩萨心；舍下水，救黎民……”铳声震撼静寂的山谷，铁铸独庙发出铮铮嗡嗡的回声，锣鼓家伙再次敲起来。白嘉轩抽动绳子从潭里吊起瓷罐，抱在怀中，众人把摆在铁庙里的供品，用细面做成的各种水果和油炸的麻花馓子一齐抛进潭中。

取水的人回到白鹿村已经是第二天早饭时间。白嘉轩走进关帝庙，把盛满清水的瓷罐儿双手敬献到关老爷足下，刚作完揖拜跪下一条腿就扑倒在地人事不省。众人慌忙从他腮帮上抽下钢钎儿，用香灰和黄表灰塞住穿透的两个窟窿，抬回四合院里去。用刚刚吊上来的井水擦洗了手心脚心心窝和后心，又给灌下一碗凉丝丝儿的井水，白嘉轩呼喇一下睁开眼睛，奇怪地瞅着围在炕上炕下的家人和族人，似乎刚刚从西海龙王那里归来而不晓尘世发生过什么。白嘉轩猛然瞅见站在他身子后首的鹿三：“三哥，你把牲口喂饱了没？”

直到取回来的那只细脖瓷罐里的潭水在关老爷的脚下完全干涸，雨却仍然没有下。人们再也无法忍受等待的焦虑，怀着最后的希望把麦子撒进干透的土地，犁铧翻起干裂的土层，蹿起一股股黄色尘烟。麦粒比谷粒更快地粉化了，真正出现了一亩一苗的奇观，那一棵稀罕的麦苗是在牛尿里侥幸出土的。干旱延续到腊月，落下一场多年不见的大雪，冻死了白鹿原上的柿子树，老树新树几乎无一幸免。原坡塄上和庄稼院里的柿子，有的个大如碟，有的四棱突起，更有给皇帝进贡久负盛名的火晶柿子，现在全都在一个冬天里绝杀断种了。大雪后接着是持续的冬旱和奇寒，积雪不经融化而逐渐风干了。当春天到来的时候，原野上一片精赤，不见麦禾也不见青草，满眼是枯死的柿树枝干，想种点萝卜也下不进籽儿。柿可当食，萝卜亦可救生，老天爷

连一丝儿生存的机缘都不留给白鹿原上的乡民。干旱僵持过春天又延续过夏天，当一场隔年不见的透雨降下的时候，人们已经不大关心或者无心操持秋田播种的事了，种子没有了，耕牛也没有了。旷年持久空前未遇的大旱造成了闻所未闻旷日持久的年馑，野菜野草刚挣出地皮就被人们连根挖去煮食了，树叶刚绽开来也被捋去下锅了，先是柳树杨树，接着是榆树构树椿树，随后就把一切树叶都煮食净光了，出一茬捋一茬。榆树叶是所有树族中的佼佼者，捋了树叶又扒了树皮，剔掉粗皮留下内瓤，剁成细末儿和水熬煮，就变成又黏又稠的绝佳的糊糊。白鹿原上的榆树是继柿树之后灭绝的又一个家族。饿死人已不会引起惊慌诧异，先是老人后是孩子，老人和孩子似乎更经不住饥饿。饿死老人不仅不会悲哀倒会庆幸，可以节约一份吃食延续更有用的人的生命。只有莫名其妙的流言才会引起淡弱的兴趣，一个过门一年的媳妇饿得半夜醒来，再也无法入睡，摸摸身旁已不见丈夫的踪影，怀疑丈夫和阿公阿婆在背过她偷吃，就蹑手蹑足溜到阿婆的窗根下偷听墙根儿，听见阿公阿婆和丈夫正商量着要杀她煮食。阿公说："你放心度过年馑爸再给你娶一房，要不咱爷儿们都得饿死，别说媳妇，连香火都断了。"新媳妇吓得软瘫，连夜逃回娘家告知父母。被母亲哄慰睡下，又从梦中惊醒，听见父亲和母亲正在说话："与其让人家杀了，不胜咱自家杀了吃！"这女人吓得从炕上跳下来就疯了……危言流语像乌鸦的叫声一样令人毛骨悚然。

当这场年馑刚刚注定要来的先一年初冬，白鹿村在渭北以及在当地邻村熬活儿的长工汉们纷纷回到自家屋里来，即使不大仁义的主家也都提前付给他们全年的工价，让他们在离年终之前的两个多月就下工回家了，起码可以省下一个人的口粮。鹿三在街巷里看见这些提前下工回归的兄弟哥们就想到自己。在麦子断定不能出苗以后，瞧着牲畜市场日渐下跌的行情，白嘉轩果决地卖掉了青骡和犍牛，只留下一

匹红骒马。这不算是多么聪明的举措，谁也能谋划得出来，一头牛或一匹骡子一年间吃下的精料——豌豆和麸皮，也许可以换回五头牛和五匹骡子。除了粮食集集冒涨，其余百物牲畜棉花木料布匹杂货以及土地天天往下跌价，女子订亲的聘金也跌过大半。在可怕的饥馑刚刚露出暴虐先兆的时候，各色粮食一下子就被推到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任何东西包括人本身都不得不俯首称臣不得不跌价再跌价了。小麦无苗，冬天不用上粪了；棉花旱死了，轧花机也甭想招徕弹花主顾了；牲畜卖掉了，剩下一匹马浮不住一个人专门喂养；整个一个冬天和春天都将闲适无活儿，自己闲吃静坐在人家屋里怎么好意思呢？他深信白嘉轩绝不会像村中那些长工的主家那样打发他提早下工，需得自己说话辞别而不能赖着等主家来撵出门去。晚饭后，鹿三抹了抹嘴巴点燃了旱烟袋，爽声朗气地说："嘉轩，我今黑回去呀。"白嘉轩平和地说："回你回咯。有啥事你尽管办。今年冬里没啥紧活路咯！"鹿三料定主家理会错了自己的原意，就挑明了说："我明日再不来咧。"白嘉轩依然平和地说："我刚才说了嘛。何止明日？三天五天你尽管走。"鹿三更透彻地说："从明日往后，我再不来了我下工咧。"白嘉轩这才从椅背上欠起身子："那咋么了？半路上你就走了不来了？离过年还远着哩嘛！"仙草听见了也凑到桌边问："三哥你犯了俺屋谁的心病咧？你倒是明说怎么能走哩？"鹿三连忙解释："地里没啥活儿屋里也没啥活儿了，我白吃闲坐着不自在咯！"白嘉轩说："你走了倒是自在了，可把不自在丢给我了。"鹿三愣怔一下。白嘉轩接着说："为了省一份口粮撵你出门，人会说我啥话哩？我心里还能自在吗？"鹿三忙说："不是这话。是没活干了闲下了，这谁都看得见的事，不会胡说的。明年春上要是落下透雨地里活儿开场了，我不用你叫就来了。"白嘉轩冷下脸说："三哥你听着，从今往后你再甭提这个话。有我吃的就有你吃的，我吃稠的你吃稠的，我吃稀的你也吃稀的；万一有一天断顿了揭不开锅了，咱弟兄们出门要饭搭个伙结个伴儿——"鹿三咽了一

口唾液，粗大的喉圪节猛烈地滑动了两下，没有话说了。白嘉轩随之轻俏地说：“没活儿干了你就歇着睡着，歇够了睡腻了你就逛去浪去。逢集了逛集没集时到人多的地方去谝，要‘纠方’要‘狼吃娃’要‘媳妇跳井’，谝了要了再歇再睡……你甭瞪眼！兄弟我不是给你撇凉腔是说正经话：天杀人人不能自杀。年馑大心也就要放大。年馑大心要小了就更遭罪了。”鹿三觉得眼里快要忍不住流泪，没有说话就转身出了院子进了马号。直到新年春节前的祭灶日到来时，他又一次下定决心，这回下了工明年再不来了，实在不能再进白家门白吃闲坐了。

鹿三离开白家的前一晚，孝文硬着头皮向父亲提出借粮，白嘉轩拒绝了。这件事更深地刺激着鹿三。正月十五一过，不见鹿三来上工，白嘉轩走进鹿三低矮凌乱的两间厦屋：“跟我走，三哥。甭说我，自你过年走了红马日夜叫唤，要你喂它哩。旁人添草拌料它不悦意吃咯！”鹿三的喉圪垯又猛烈地滑动了两下，跟着白嘉轩回到马号。

孝文硬着头皮走进上房东屋，啰啰嗦嗦向奶奶白赵氏诉说，分家时父亲分给他的粮食可以接上秋收，可是秋天绝收了，来年的麦子也没指望了，整个一个冬天喝稀糁子凑合到腊月，年是实在过不去了……他哀告奶奶给父亲说一句：借些粮。白赵氏正想趁机教训一下孙子，你看看你弄成啥光景了？白嘉轩从对面的西屋已经听见，大声说：“你就甭开这个口。”白孝文再没说话就从奶奶的屋里退出来回到前头门房。白赵氏对着西屋说：“你的心不是肉长的是滋水河里的石头。”白嘉轩走进门来：“妈，你明日把那俩碎崽娃子引到后头来。”

孝文向父亲借粮伤脸以后就把两亩水地卖掉了。白嘉轩得知这个消息后气得吃不下饭，指令孝武把孝文叫到后院正厅来。孝武走进前院门房东屋说：“哥，咱爸叫你。”孝文仰躺在炕上只扭了一下头：“我不去。”孝武端直站着：“咱爸叫你你也不去？”孝文说：“后院厅房我

不去，再不去了。”孝武威胁说：“那让老人求到你的门下？”孝文猛然从炕上翻起身来跳到炕下：“你甭跟我耍威风！谁爱来不来我不稀罕。我也没拿你啥没借你啥没欠着你的啥。”孝武不动声色地说：“哥你看你成了什么样子？说话处事还像不像个做兄长的？”孝文正想说出更辛辣的话，泄一泄没借着粮食的怒气，也杀一杀弟弟的神气。不料父亲在院子里呵斥：“孝文你出来。”孝文趿拉上棉窝窝走到院子，就看见漆黑的院庭里站着父亲的佝偻的形体。白嘉轩劈头问：“你把水地卖了？”

“卖了。”

“卖给谁了？”

“谁给钱多就卖给谁。”

“我听说卖给鹿子霖了？”

“子霖叔有钱也有粮食。旁人买不起。”

“这地是在你爷手里置下的，你不能卖。”

“眼下这地分给我是我的，我想活命就得换一把粮食。”

“这二亩水地你卖了多少钱？”

“正说着哩！价官还没说死撂倒哩。”

“你甭说了，这地你卖给我，我给你双价。”

“那不行。大丈夫出言驷马难追。你给我钱再多也不能收回我的话了。”

黑暗里一声啸响，白孝文应声一个趔趄跌倒在地，父亲手中的拐杖抽击到他的脸上，继之又砸到他的大腿上。白孝文却感到了一种报复的舒畅，从地上晃晃悠悠爬起来走进屋去，咣当一声插上门闩，把父亲和孝武冷晾在院子里。孝武搀扶劝慰着父亲，走回后院厅房里去了。孝文继续恢复仰躺在炕上的睡姿，一条腿架在另一条腿上，对女人说："好咧好咧！从今往后再没有谁来管我了。"

这一年的春节新年是孝文所能记得的最暗淡无趣的一个新年，白鹿原上远远近近的大村小寨，听不到锣鼓听不见喧闹只听得零三碎四的几声炮响。正月初一晌午，孝文到白鹿镇的馍铺里买了五个白生生的罐罐儿馍，蹲在馍铺的台阶上吃了，向馍铺掌柜讨了一壶酽茶喝了，算是自己给自己过了个年。孝文吃罢又挑了五个揣进怀里，绕道白鹿村后巷朝村子东头走去。村巷里男男女女拖着孩子往祠堂汇集，饥馑之年也不能少了给祖宗点一炷香叩三个响头。孝文走进小娥的窑门就嘘声嗔气地说："妹子年好，哥给你拜年来了。"小娥正在案板上揉面团回过头说："你心里想日妹子了嘴里可说是给妹子拜年。拜年拿的啥礼物？""你把哥的好心冤屈咧！"孝文从怀里掏出一个又一个点着红花的罐罐馍，摆到案板上说，"人家到祠堂拜祖宗哩！全村就剩下咱俩舍娃子天不收地不管，咱俩你拜我我拜你过个团圆年。""这么说哥你坐火炕上等着——"小娥笑了，"妹子给你擀碱面浇臊子。""臊子面香着哩等一会儿再咥。"孝文说，"我已经咥饱了。你也先咥个馍压压饥。咱先弄一回，哥想死你咧！""不成不成我手上沾着面。"小娥摇头。"又不用手……"孝文把小娥抱离案板走向火炕……

孝文对第一次在小娥身上能够做到得心应手的事记忆难泯。那是在他挨过刺刷抽打之后一个半月的一天后晌，第一次走出街门就端直走进田小娥的窑洞。小娥一惊一愣："你大白天到我这儿来不怕人看

见？”白孝文说：“过去怕人看见现在不怕了，谁爱看就看。”小娥这时候才回过神儿来问他伤势好了没有，捋起袖子看他胳膊解开胸扣儿看他的胸脯。孝文揽住她的腰凌空把她托起来放到炕上，动手解她的偏襟纽扣儿：“哥在炕上躺了个半月啥也不想，就一门儿心思想着你这一对儿白鹁鸽儿。”小娥像蛇一样紧紧缠抱着孝文，泪花婆娑口齿喃喃着：“好哥哩你到底伤得咋个像况……我不得见又不得问……妹子心疼你都快要疯了……”小娥说着，突然翻起身来，双手捧住孝文的脸颊，惊诧地问：“哥吔你今日……行了？”孝文得意地抹一抹脖子上的细汗：“这下你再不笑话我是蜡做的矛子了吧！”俩人被这个奇异的变化鼓舞着走向欢乐的峰巅。自从破烂砖瓦窑开始一直到被捆到祠堂槐树上示众，他都无法克服解开裤带不行了勒上裤子又行了的奇怪的痼疾，今天才第一回在小娥面前显示了自己的强大和雄健。小娥仍然解不开好奇：“过去到底咋么着是那个怪样子？今日个咋么着一下就行了好了？”孝文嘲笑说：“过去要脸就是那个怪样子。而今不要脸了就是这个样子，不要脸了就像个男人的样子了！”太阳光从窑垴塄坎上移到树梢上，直到窑里完全黑暗下来，俩人都没有离开火炕，一次又一次走向欢愉的峰巅，一次又一次从峰巅跌下舒悦的谷底，随之又酝酿着再一次登峰造极……

小娥从炕上下来勒好棉裤，在瓦盆里洗着手，回眸对躺在火炕上的孝文说：“哥吔今日个过年，你没忘妹子妹子也没忘你，你给妹子送了五个罐罐儿馍，你猜妹子给你留着个啥好的？”孝文不在乎地说：“肉包子肉丸子臊子面不是？不稀罕！我就稀罕捉你那一对儿白鹁鸽儿。”小娥说：“保你稀罕。搁平常我不给你，今日个过年才叫你享一回福……你等着，等我擀好面，咱俩吃了长寿面再给你。”孝文一骨碌从炕上跳下来，精光着身子抱住小娥，冻得直抖：“你倒说得我躺不住了，快拿出来让我看是啥好玩意儿？”小娥无奈又爬上炕，从窑窝里摸

出一杆烟枪来说："你今日个尝一口，保准过个好年。"孝文看见油光油亮的烟枪不禁一愣，接过那滑腻的紫黑色的烟管指尖上感到冰凉，脑子忽然浮出姑父朱先生授课时慷慨陈词的面孔，那个永远保持着平和敦厚仪容的朱先生讲到禁烟时就失了常态。小娥在他面前半倚躺着，撕开一层油纸，用细铁钎挑起一块膏状的鸦片在三个指头间揉搓，然后就按到烟枪眼儿上说："等等，我给你点灯。妹子今日个服侍你过个好年。"连着让孝文吸了三个泡儿，小娥像哄孩子一样拍着孝文的肩膀："好好睡。妹子给你擀面去。"

孝文躺着，渐渐开始幻化，手臂舒展了腿脚轻捷如燕了，心头似有一缕不尽的柔风漫过去再拂过来，头脑里除去了一切生活的负累，似有无数的鲜花绿叶露珠滚动。案板上咯噔咯噔擀面杖的响声节奏明朗，小娥伸出胳膊推着擀杖前进又弯着手臂把擀杖拉回案边的动作像是舞蹈。他轻轻一纵就坐起来穿好衣裤，自告奋勇地坐到灶下的柴墩上拉起风箱，快活地说："妹子你擀面我烧锅，咱俩今日个过个夫妻年。"小娥欢蹦蹦地在案板上玩着擀杖，偌大的面叶一会儿卷到擀杖上，一会儿又像挥舞一面旗子似的从擀杖上摊开到案板上，她勒着围裙的腰即使穿着棉裤也不显臃肿，丰满的胸脯随着擀面的动作微微颤着，浑圆的臀部也微微颤着。孝文忍不住嘻嘻地说："哎呀妹子我又想了……"小娥说："你是瓜娃子得了哪一窍？不看我正切面哩！"说着，把切好的细面拢到木盘里托起来，放到锅台上，看看锅里气儿上来了，就推出锅盖，哗啦一声把面条撒进滚水里，又伸过胳膊拉上锅盖。这当儿，她的优美干练的动作撩拨得孝文忍禁不住，一只手拉着风箱杆儿，左手从下边揪住裤脚猛力往下一抻，棉裤哗地一下褪过膝盖，伸手抱住她按倒在灶下的麦秸上。小娥急了："哎呀面闷糊到锅里咧！"孝文说："让它糊去！"小娥说："而今粮食敢糟踏？"孝文说：

“一碗面不算个啥！”小娥无意损伤孝文的兴致，仰躺在灶间麦秸上，一手抚着孝文的脸，另一只手拉着风箱杆儿……

孝文分得的三亩半水地和五亩旱地，前后分三次转卖到鹿子霖名下，那八亩半水旱地里有二亩天字地一亩半时字地三亩利字地二亩人字地。八亩半地所卖的银圆，充其量抵得上正常年景下二亩天字地的所得，临到最后卖那二亩人字地的时候，孝文已经慌急到连中人也来不及请，直接走进白鹿镇鹿子霖的保障所，开门见山地说：“子霖叔，那二亩人字地也给你吧，你就甭再推诿了。你凭良心给几个（银圆）就是几个我不说二话。”鹿子霖诚恳地说：“孝文你看，叔实在不好再要你的地了。我跟你爸一辈子仁仁义义的，你一而再再而三地箍住我要卖地，日后我实在跟你爸都不好见面说话咧。”孝文急不可待地说：“俺爸是俺爸我是我。你不要的话，咱村再没谁买得起，外村人嫌不方便也不要嘛！好叔哩我瘾发了简直活不下去了，你先借给俩银圆让我上烟馆子去……”鹿子霖从腰里摸出两枚银圆来，看着孝文急不可待地转过身，脚下打着绊腿走出保障所大门，沉吟说：“完了！这人完了！”

鹿子霖走出保障所大门在镇子上溜达，尽管年馑可怕，镇上的粮食并不少，只是价钱高得吓人。他装作关心粮市上价钱的跌浮，很有耐心地和卖粮的主家交谈着，用深陷在长睫毛丛中的眼仁儿扫瞅着人头攒动的粮市，寻找白嘉轩。根据他的判断，孝文不久就会向他提出卖房的事，于此之前必须和嘉轩打个照面，为将来的下一步扫清障碍。穷人和富人现在都关心粮价的跌浮。白嘉轩丑陋的驼背进入他的眼睛，他做出完全无心而是碰巧撞见的神态开了口：“呃呀嘉轩哥！碰见你了正好，我有句话想给你说——”白嘉轩扬起脸：“街道上能说不能说？”鹿子霖说：“能能能。也不是啥是非话嘛！我想劝你一句，你

把粮食给孝文接济上些儿嘛。总是爷儿们嘛。甭让他三番五次缠住我要卖地，我不买他缠住不丢手，我买了又觉得对不住你……”白嘉轩咬着腮帮，完全用一种事不关己的腔调说：“这没啥对不住我的。你尽管放心买地，他要踢地你要置地是你跟他的事，跟我没啥交涉。”鹿子霖更诚心地劝：“嘉轩哥你甭倔，亲亲的爷儿们，你不能撒手不管……”白嘉轩冷笑一声反问：“管？你怎么不管兆鹏？”鹿子霖噎得反不上话来。白嘉轩转过驼背就把手伸进一条粮食口袋里抓摸着麦子看起成色来了。鹿子霖不露声色地在想，你顶我顶得美顶得好。你不管了好！我就要你这句话。

孝文头一回卖了地，和小娥在窑洞里过了个好年，临走时把一摞银圆码到炕席上：“妹子你给咱拿着。”把一小半留在身上回到家里。媳妇向他要卖地的银圆：“你装在身上不保险，我给咱锁到柜里，接不上顿儿了买点粮，日子长着哩！”孝文说：“放心放心放一百二十条心。银圆我装着你甭管。你日后啥事都甭问甭管。”两个孩子由白赵氏引去吃饭，孝文成天不沾家浪逛着摸不清影踪，只有她一个人在屋里忍饥挨饿，婆婆仙草时不时背过公公塞给她一碗半勺，她饥肠辘辘却难过得吃不下去。有一晚，她鼓足勇气向孝文抗争：“地卖下的银圆不论多少，不见你买一升一斗，你把钱弄了啥了？”白孝文眼睛一翻：“你倒凶了？你倒管起我来了？”媳妇说：“我凶啥哩我管你啥来？我眼看饿死了，还不能问你买不买粮？”白孝文冷着脸说：“不买。你要死就快点死。你不知道死的路途我指给你：要跳井往马号院子去，要跳河跳崖出了村子往北走，要吊死绳子你知道在哪儿挂着……”媳妇急了：“我知道你盼我死、逼我死、往死里饿我。我偏不死偏不给你腾炕，你跟那婊子钻瓦窑滚麦秸窝儿，反正甭想进我的门上我的炕！”白孝文涎下脸说：“你管不着。你不死我也睁眼不盯你。”说罢就抽身出门去了。随后有一夜，孝文和小娥在窑里炕上一人一口交口抽着大

烟，他的媳妇找到窑门外头，跳着骂着。孝文拉开窑门，一个耳光抽得媳妇跌翻在门槛上。媳妇拼死扑进窑去，一把抓到小娥裆里，抓下一把皮毛来。孝文揪着媳妇的头发髻儿，两个嘴巴抽得她再不吼叫嘶骂了，迅即像拖死猪似的拖回家去。

孝文媳妇在白家的称呼是大姐儿。大姐儿独自一人躺在四合院门房东屋的炕上，家徒四壁，装粮食的瓷缸和板柜，早在踢地之前被孝文搬到镇子上贱卖了，屋里只剩下炕上的两条被子和炕下脚地上的一条长凳。她的通身已经黄肿发亮，隐隐能看见皮下充溢着的清亮的水，腿上和胳膊上用指头一按就陷下一个坑凹，老半天弹不起来。她的脸上留着一坨坨乌青紫黑的伤痕，那是孝文的拳头砸击的结果。她已经没有饥饿的感觉，阿婆让孝武媳妇二姐儿端来的饭冷凝在碗里。她想对阿公说一句话，却揣度阿公肯定不会进入她的屋子，于是就打定主意去找他，她准确地预感到自己即将完结。西斜的日头把后窗照得明亮如烛。大姐儿听见阿公熟悉的脚步走过门房明间走到院庭就消失了，她的心里激起一股力量，溜下炕来在镜子前拢梳一番散乱的发髻，居然不需攀扶就走进了厅房，站在阿公面前："爸，我到咱屋多年了，勤咧懒咧瞎咧好咧你都看见。我想过这想过那，独独儿没想过我会饿死……"白嘉轩似乎震颤了一下，从椅子上抬起头拔出嘴里的水烟袋，说："我跟你妈说过了，你和娃娃都到后院来吃饭。"大姐儿说："那算啥事儿呢？再说我也用不着了。"说罢就转身退出门来，在跷过门槛时后脚绊在木门槛上摔倒了，从此就再没有爬起来。白嘉轩驼着背颠过去，把儿媳的肩头扶起来，抱在臂弯里。大姐儿的眼睛转了半轮就凝滞不动，嘴角扯了一下露出一缕羞怯。白赵氏仙草和二姐儿全都闻声奔过来。孝武四处奔走，找不见孝文。

孝文刚刚办完卖房的手续，三间门房全部卖给鹿子霖，把所得的银圆顺路撂在小娥的炕头上，直到半夜回来，看见停放在烛光里的媳妇的僵尸，猛然站住脚跨不动腿了。他根本没有想到她真的会死。她结实有劲没生过大病，她胳膊上的肌肉像男人一样结块儿，大腿和小腿肚儿瓷实梆硬。他忽然想到她曾经教他做床笫上的事的情景，心里一软，这个他已经不喜欢的人现在死了。弟弟孝武走到跟前说："哥，你作孽了！"孝文没有动。弟弟又说："明日个入殓时她娘家人来闹事的话，你出面跟人家回话。"孝文仍然没有动。孝武忍不住恨声说："扎你一锥子都扎不出血了！"

持久的饥饿的大气候把包括死人这样至为重大的事都压迫得淡化了。死人早已不再引起特别的惊诧和家人的过分悲痛，而白嘉轩家里也饿死了人，在村中还是造成大哗。所幸的是大姐儿娘家的人似乎对于出门多年的姑娘感情淡漠，只派大姐儿最小的弟弟前来吊孝入殓。那个被饿得东摇西晃的弟弟干嚎过几声之后，就抓起大碗到锅里捞面浇臊子蹲在台阶上大咥起来。为了顾全影响，白嘉轩让孝武出面帮助孝文完成了丧葬之事，着眼点在乡亲族人的口声而根本不在孝文。埋葬大姐儿之后，孝文真正成了天不收地不揽的游民，早晚都泡在小娥的窑洞里，俩人吃饱了抽大烟抽过瘾了就在炕上玩开心，使这孔孤窑成为饥馑压迫着的白鹿原上的一方乐土。

"给我帮个忙。"鹿子霖邀请来了鹿姓本门十多个年轻后生，向他们吩咐了到白家去拆房的事，用软绵的馍馍和煮成糊涂的面条招待他们饱咥一顿，然后叮咛说："你们去只管拆房甭说二话。白家没人出来阻挡你们就尽管拆，要是有人出面拦挡，满仓侄儿你回来叫我。"十多个小伙梦想不到今天有机缘给肚子里填满了真正的粮食，精神顿然焕

发，甭说拆房，叫他们前去杀人也无不可。满仓领着他们出门了。鹿子霖最后叮嘱一句：“不准起哄闹事。”

鹿子霖坐在祭桌旁的椅子上抽水烟，得意中不无紧张，期待着满仓飞奔回来请他出面。可是连着抽完三袋水烟，仍不见满仓回来，难道白嘉轩父子对拆房这种揭面皮的事也无动于衷？直到街门口咚当一声木料着地的响声，他按捺不住急急走到街门口，把两个抬一根木料的侄儿叫进门来问：“白家没啥响动？”一个侄儿说：“没没没。孝武蹦出来挡将，满仓哥刚下梯子准备回来叫你，他爸出来把孝武拉回去了。满仓哥又上了梯子……”另一个侄儿补遗说：“孝武张头张脑的挺凶，他爸出来还笑着说，‘快拆快拆，拆了这房就零干了，咱一家该着谢承你子霖叔哩……’随后才拉着孝武进后院去了。”鹿子霖从街门口踱回厅房祭桌跟前，重新装上一袋水烟，吹燃火纸的时候，绷紧的心里有点泄气，难道我没尿到他的脸上尿到空沟里去了？

白嘉轩家的反应实际很难揣摩。白嘉轩的厅房上屋里聚着白赵氏白吴氏以及孝武和他媳妇二姐儿，更多的是本族近门的弟兄和侄儿们，他们义愤填膺气恨难平，众口一词再三反复强调着同一个意思：鹿子霖不是买房是揭族长的脸皮！鹿子霖揭掉的不单是族长的脸皮是在白姓人脸上尿尿！白嘉轩只顾咂着水烟袋。白赵氏说：“孝文使唤了他多少钱咱还多少，房子不能拆。”仙草悲愤地说：“我咋么要下这个踢地卖房的败家子！”孝武说：“爸我实在忍不下这口气！”族人侄儿们随着孝武哄哄起来：挡了他看他要咋？叫鹿乡约出来说话看他咋说？砸断他的腿拐儿再说！白嘉轩喝住众人：“你们生的哪路子气煽的哪门子火？子霖买房掏了钱立了契约合理合法；再说是孝文箍住人家要卖房，你们怪人家子霖的啥错儿呢？回去回去快都回去。”他毫不留情地斥退了众人，只留下自家人在周围时才说：“我难道连这事的轻重也掂

不来吗？揭我脸皮我还不知道疼不觉得羞吗？”大家都不言语了。白嘉轩问孝武：“除了拦挡除了打架，你看还有啥好办法呢？”孝武闷头不语半晌，猜摸父亲的心意，说：“爸，他今日拆了房，我明日个搭手准备盖房，把门房再盖起来，还要盖得更体面。”白嘉轩在桌子上拍了一巴掌：“这就对了。一拆一盖，人就分清了谁是孝文谁是孝武，祖宗神灵也看见谁是白家的孽子谁是顶梁柱。”白嘉轩扫视一眼白赵氏仙草二姐儿最后盯住孝武说：“人说宰相肚里能行船。我说嘛……要想在咱原上活人，心上就得插得住刀！”

直到满仓领着人把木料砖头瓦片全部拆光送走，又挖下了木格窗子和门板，白嘉轩恰当此时走到前院，瞅一眼残垣断壁和满地狼藉的土坯碎砖，把正在殿后查巡的满仓叫住，客客气气朗声问道：“满仓你们拆完了？”满仓不好意思地笑答：“完了完了……伯。”白嘉轩说：“你再看看还有啥东西没拿完？”满仓依然笑容可掬地答：“没咧没咧啥也没咧……伯。”白嘉轩却认真地说：“有哩！你细看看。”满仓干笑起来：“伯你要笑侄儿哩！不用细看……”白嘉轩加重声色喝住转身欲走的满仓：“你甭走。你把东西没拿完不能走。你蹲下仔细想想，啥时候想起来再走。”说着双手拄着拐杖，紧紧盯住满仓。满仓怯着族长伯伯真的蹲下来不敢走了。街巷里不一会儿便聚集起来一伙人看蹊跷事。白嘉轩心里却道：我看你鹿子霖还不闪面儿？

鹿子霖来了。听到满仓被白嘉轩扣留的消息就赶来了，双手打着躬抱歉地说：“嘉轩哥我本该早来给你说一声，保障所来了上头的人我脱不开身……满仓你咋搞的？说啥冲撞你伯的话啦？还不赶快赔礼……”白嘉轩把拐杖靠在肩头，腾出手来抱拳还礼：“子霖呀我真该谢承你哩！这三间门房撑在院子楦着我的眼，我早都想一脚把它踢倒。这下好了你替我把眼里的楦头挖了，把那个败家子撵出去了，算

是取掉了我心里的圪垯。”鹿子霖原以为白嘉轩抓着了满仓的什么把柄儿寻隙闹事，完全料想不及白嘉轩这一番话，悻悻地笑笑说：“孝文实在箍得我没……”白嘉轩打断他的话：“孝文箍住你踢地卖房我知道……我叫满仓甭走，是他给你把事没办完哩！”鹿子霖说：“还有啥事你跟我说，兄弟我来办。”白嘉轩说：“你把木料砖瓦都拿走了，这四堵墙还没拆哩。你买房也就买了墙嘛！你的墙你得拆下来运走，我不要一块土坯。”鹿子霖心里一沉，拆除搬走四面墙壁比不得揭椽溜瓦，这十来个人少说也得干三天，这些饿臭虫似的侄儿们三天得吃多少粮食？他瞅一眼街巷里看热闹的人，强撑着脸说：“那当然那当然……”白嘉轩仍然豁朗地说：“你明日甭停，接着就拆墙，越早越快弄完越好！咋哩？门户不紧沉咯！再说……我也搭手想重盖房哩！”

第十九章

鹿子霖刚走进保障所的小院，白鹿中医堂抓药的相公就跟进来说：“先生请你过去有话，甭耽搁。”鹿子霖在走向中医堂的街道上盘算着如何向冷先生解释买来拆掉白家门房的举动，除了这件事，他想不到还有什么紧要的事会促使冷先生一大早就着人来叫他。走进中医堂，冷先生把他引到后边的寝室，开口时一脸的惊慌：“你知道不知道？兆鹏给田总乡约逮住了。”鹿子霖大惊：“你听谁说的？啥时候出的事？我一点儿也不知晓。”冷先生说：“早起一开门来了南原上一个病人，说是昨晚夕在学校里给逮住的。”鹿子霖惊诧不已：“他还在原上？我的天老爷！通缉告示贴得满原上都是，他居然还没离原……”冷先生说：“听说他刚刚从城里回到原上，想煽动饥民起来闹事，倒没料想他的一个共党兄弟儿给田总乡约告密了。再问旁的我也说不仔细，事倒是实事，田总乡约连夜押送到县上去了……你说咋办？”鹿子霖说：“活该！死得！把这孽子拗种处治了，我倒好说话好活人了。”冷先生说：“你说的是气话。你我现在这年岁，还有多少话好说还有多少人好活呢？没有多少了。你我而今都活儿女的人哩。”鹿子霖咳了一声竟落泪了，泣不成声地说：“我一家好端端的日子全坏在这龟孙子身上。他参加共产党教我跟着背亏带灾且莫说起，单是婚事……教我总也觉得对不住你老哥呀！我说的不是气话是实心话，把他龟孙处治了倒好。仓里县里再不疑心我鹿子霖通共的事了；家里的事也好办了，让人家名正言顺再嫁去，我在你老哥面前不就好说话好活人啦吗？”冷先生说：“我今日叫你来可不是说这话的。我知道你想救他说不出口。”鹿子霖仍然坚持说：“我不救。”冷先生说：“你不救我救。我的女婿呀！”鹿子霖说：“你救也是白救。他把田总乡约押到铡刀下你也

知道，田总能饶他？上边现在对共党是‘宁错杀一千决不轻放一个’。他完了他兆鹏龟孙这回完了。你也甭劳神了，白劳神又折财……”冷先生说：“我准备倾家荡产，只要能救回我的女婿。”鹿子霖连忙接上说：“你要是真个把他救下了，他就不敢再拧拗了。他也明白他的命是你给拾回来的。”冷先生说：“你今日个留神一下，田总乡约一回来你就给我说一声。事不宜迟。听说对共党现时是快刀斩乱麻，审也不审就填了井了。”

西安当权的国民革命政府对共产党整治的手段简截了当，不作正经审讯也不屑张罗声势示众游街也很少公开枪崩，逮住后先打后问问不出什么就装进麻袋扔进废弃的苦水井里，打得问出了什么而又觉得此人不宜存留于世也同样干脆地扔进井去。鹿子霖装作若无其事的样子一日去了三次白鹿仓，直到晚夕才看见田福贤骑着马从县上回来，他抢在田福贤前头说：“我已经听说了。逮住那个龟孙也为我挖了眼中钉。总乡约你知道我的脾性，我不在心平时咥四个馍现在还咥两双。”田福贤却更富人情味儿地说：“再咋说总是你的儿嘛！他要是共党的小毛猴分子也好办，让他写一张悔过自新书，我再给岳书记说说情也就算了；你知道他属大案要犯，甭说我，岳书记也不敢擅自处治，在县上只打个过身就直接送城里了……”鹿子霖表白了一番于兆鹏被捕乃至被杀都闭眼不理的话，回来却急忙告诉冷先生：“田总乡约回来了。”

冷先生立即实施营救女婿兆鹏的谋略。他吩咐鹿子霖回家去把大车套好吆来，和相公一起动手把十只装满中草药的麻包抬上大车，声言要把这些积压的药材送到城里去卖掉，饥馑年月人命如纸没人来看病抓药了。他辞退了刘谋儿要鹿子霖亲自掌鞭吆车。他吩咐鹿子霖绕道走过白鹿仓门口：“子霖你去叫一下田总乡约，他女人病了让他跟我一路走，顺路给他女人看看病。”田福贤失急慌忙跑出仓门，深信不疑

地爬上大车，连声询问他女人得了啥病要紧不要紧。冷先生一如往常的简洁："早起你的一个亲戚来叫我我抽不开身去，大体问了一下病情给抓了两服药拿走了。你甭急也甭问，问多了我也说不上来，咱们顺路去看看，我还到城里送药哩！"青骡拉着大车在乡村间的官路上咯吱咯吱叫着，一直西进，终于停在一幢高大的门楼下，冷先生打了个呵欠从车上下来。

进入田家的深宅大院，田福贤把睡意正酣的女人问得莫名其妙，自己也莫名其妙地问冷先生："内人没有病呀，也没有让谁去请先生呀？"冷先生却说："我又给人骗了。那人冒充总乡约的亲戚，骗了我两服药……小事一桩……"说着就往门外走，鹿子霖从大车轮下钻出来丧气地说："糟了糟了！车轴颠断了走不了了。"于是，十只捆扎严密的麻包从车上卸下来送进屋里，田福贤爽气地说："明日让车木匠换个轴就是了。倒好倒好，咱兄弟仨难得聚在一起喝一盅。"酒过三巡之后，冷先生解开了堆在台阶上的麻包，又擎着灯台让田福贤看他的"宝药"。田福贤看了看麻包瞪起眼来，鹿子霖惊诧得差点叫出来，伪装成药包的麻袋心里包裹着一堆硬洋，十只麻包一个不空。田福贤说："先生你这算做啥？"转过身厉声斥责鹿子霖，"你这样弄法儿，你得跟兆鹏同罪。"鹿子霖吓得面如黄表："田大哥我真的不晓得先生葫芦里装啥药……"冷先生说："你想法子放人。我救兆鹏只认得他是我的女婿。我的女子从一而终这是门风。我再没办法就逼你想办法。"田福贤急头慌脑摊开双手："好我的先生哥哩，你这是逼着兄弟跳华山嘛！"冷先生说："你想想办法。你能想下办法。我知道你有办法可想。"田福贤苦笑说："我一个小小白鹿仓总乡约，还不就是占着一道缝的臭虱。我能有个屁办法！"冷先生说："实在没法子了也就算了嘛！这点子银货扔到你这儿，咱们得空儿来喝酒就是了。"田福贤坚持不允：

“你把麻包封严装到车上拉回去，我尽量想办法；你不拉走我就不管了。”冷先生说：“我一辈子还没弄过二回头的事。”

重新上路驶出村庄以后，鹿子霖大声嘘叹起来：“啊呀呀先生哥你真是个冷先生，你事先也该给我亮个底儿嘛！吓我一跳……先生哥，麻包里装了多少硬洋？”冷先生坐在车厢里淡淡地说：“我没点数儿。我向来不数钱。这几年攒的货全端出来了。让田总乡约慢慢儿点去。”鹿子霖叹惋起来：“恐怕你这十麻包银圆撂不响。”冷先生说：“撂响也罢撂不响也罢，反正撂出手我就不管它了。”

田福贤当夜把麻包里装的银圆腾出来，埋到院子里西墙根那棵合抱粗的香椿树底下。他也没有数数儿，用竹条担笼像揽拾石头瓦碴一样把银圆倒进香椿树下的深坑里，点数儿已经没有多少意思了。他接着在西原故居的房屋里住了三天，谢绝一切前来问安的巴结的新朋老友，只说他在外头干公事累得受不了了，需要在家里养息几天。第四天早上他骑马回到白鹿仓，后晌召集起九个保障所乡约和一些大村有影响的头面人物的联席会议，提出一条动议：“要求省府将共匪鹿兆鹏押回白鹿原正法。”得到与会者一致响应。田福贤第二天骑马进省城去，闯这个机关奔那个衙门牙硬辞坚，申述白鹿原几万乡民正当而又强烈的要求，把在白鹿原上滋生又在白鹿原上闹事作乱的共匪鹿某押回原上就地正法；三天后，以贺耀祖打头的三十多人的乡民请愿团一呼啦跪倒在省府门前，声言不答应他们的要求就永远跪下去绝不起来；国民党滋水县党部书记岳维山被省党部召回城里，他不仅不去劝退乡民而且说服省党部郑重考虑乡民要求，如此一来不仅可以达到杀一儆百的效果，而且可以让社会各界看看共匪作为是何等不得人心……鹿兆鹏被押回白鹿原来了。

杀人场地选择在县立白鹿镇初级小学校的土打围墙西边，离土墙五尺挖着一排七个深坑，七个被捆绑着的人面对墙壁，穿着最显眼的是唯一身着褐色袍衫的鹿兆鹏，他跪伏在中间，其余六个被宣布为杀人抢劫截路挡道的土匪和贼娃子。选择这儿做刑场再明白不过，这所学校是鹿兆鹏在原上煽动共党革命的老窝巢，以示震慑。执行刑法的是白鹿仓的团丁，他们自组建以来第一次得到出风头的机会，格外威武地站成一排。枪声响过，墙头上冒起一片蓝烟，七个人不见谁哼一声就毙命了，他们的上下嘴唇用铁丝串结在一起。尽管石印的杀人通告贴到每一个村庄的街巷里，仍然激不起乡民的热情和好奇，饥饿同样以无与伦比的强大权威把本来惊心动魄的杀人场景淡化为冷漠。

鹿兆鹏已经被转移到白鹿书院。田福贤玩了一个换人的把戏。在鹿兆鹏被解押回原之前，田福贤从县监提回来六个死刑犯，说是以壮声势，其实是为了鱼目混珠。鹿兆鹏被解回白鹿仓的当天晚上，只在那个临时作为监房的小屋里躺了不到一个小时，随后就被悄悄抬上他父亲亲自赶来的骡马大车，顶替他的替死鬼被强迫换上了他的长袍。冷先生故伎重演，大车上又垒堆起十个药材麻包，只不过没有装进银圆，而是掩盖着一个死刑犯人。他们把车赶到原坡头上，搀扶着兆鹏走进白鹿书院。朱先生接过人以后说：“你们走吧，再不要来了。”

鹿兆鹏躲在白鹿书院连睡三天，轮番审讯整得他精疲力竭，种种民国新刑法整得他体无完肤，睡过三天三夜才缓过精神，饭量骤增。师母朱白氏给他精心调养，早起一碗鸡蛋羹，午间是变换着花样的面食，晚上熬下红豆小米粥，他很快就调养得面色温润了。

朱先生在他来到之前被县府抽调去做赈济灾民的事，隔三差五回书院来，回来时只问问他的身体恢复状况就离开了，没有一丝与他闲谈的意向。这一晚，朱先生回来了，他走进先生的卧室去告别，也向

温柔敦厚的师母表示谢意，他看见先生和师母在昏黄的油灯下喝着一碗黑糊糊的东西，凭着气味可以辨别出黑豆的苦涩，心藏的感激的话倒说不出口来。鹿兆鹏默默地坐下来：“我要走了。”师母说：“你能走得动？”朱先生没有说话，用筷子搅着碗里的黑豆糁儿。兆鹏做出一副轻松玩笑的样子问：“先生，请你算一卦，预卜一下国共两党将来的结局如何？”朱先生莞尔一笑：“算什么卦嘛。”便径自说下去：“我观‘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大同小异，一家主张‘天下为公’，一家倡扬‘天下为共’，合起来不就是‘天下为公共’吗？为啥合不到一块反倒弄得自相戕杀？”鹿兆鹏忍不住痛心疾首：“是他们破坏国共合作……”朱先生说：“不过是‘公婆之争’。”鹿兆鹏节制一下自己的情绪，做出平静的口吻，说：“先生，‘天下为公’是孙先生的革命主张。眼前的这个民国政府，早已从里到外都变味变质了。蒋某人也撕破了伪装，露出独裁独夫的真相咧。”朱先生没有说话。他向来不与人争辩。鹿兆鹏仍然觉得言犹未尽，说：“你没看见但肯定听说过，田福贤还乡回来在原上怎样整治穷人的事了。先生你可说那是……翻鏊子。”朱先生不觉一愣，自嘲地说：“看来我倒成了是非不分的粘糨糊了。”兆鹏连忙解释：“谁敢这样说哩！日子长着哩，先生看着点就是了。”朱先生再不说话。鹿兆鹏便改换话题，说出一直窝在心里的疑问：“我爸和冷先生救我我没料到，田福贤怎么会放过我？我想见他们一面……”朱先生说：“他们不想见你只给你捎来两句话，把名字改了离开西安，不然救你的人全不得活。”鹿兆鹏说：“无须他们叮嘱我也得这样做，我在西安已难立足。还有什么话吗？”朱先生说：“田福贤让冷先生问你一句话：如若你们日后真的得势，你还能容得下他？”鹿兆鹏不禁愣住，缓过神来说：“让他好好活着。我要是能活到他说的那种时候，一定要叫他看到，我们比他们更光明磊落！”朱先生说：“冷先生本人留给你的一句话纯系家事：给女人个娃娃。给个娃儿，她女子在你屋就能活下去，她自己在白鹿镇也能撑一张人脸……”鹿兆鹏软软地坐下去，双手抱住

脑袋：“天哪！倒不如让田福贤杀了我痛快！”朱先生说：“怎么又变得如此心窄量小了？”鹿兆鹏猛然站起来：“我能豁出命，可背不起他们救命的债……先生，我走了，你老有话给我吗？”朱先生淡然一笑：“我嘛只期盼着落一场透雨……”

饥饿比世界上任何灾难都更难忍受，鸦片烟瘾发作似乎比饥饿还要难熬，孝文跌入双重渴望双重痛苦的深渊。博大纷繁的世界已经变得十分简单，简单到不过是一碗稀粥一个蒸馍或者一只乌紫油亮的烟泡儿。当小娥扫了瓦瓮又扫了瓷盆，把塞在窑壁壁洞里包裹过鸦片的乳黄色油纸刮了再刮，既扫不出一星米面也捏捻不出一颗烟泡的时候，那个冬暖夏凉的窑洞，那个使他无数次享受过人生终极欢愉的火炕，也就顿时失去了魅力。八亩半水旱地和门房，全都经过小娥灵巧的手指捻搓成一个个烟泡儿塞进烟枪小孔儿，化作青烟吸进喉咙里。孝文从火炕上溜下来趿拉上鞋，刚跨出窑洞一步，小娥在炕上喊："你走了我咋办？"孝文回过头去："我总不能引上你去要饭？等着，我要下馍给你拿回来。"他走出窑洞时没有任何依恋，胸间猛烈燃烧的饥饿之火使他眼冒金星鼻腔喷焰。孝文不假思索地往白鹿村东邻最近的神禾村走去，进了村子几乎无暇顾及那些破烂低矮的门楼，端直走到神禾村头家财东李龟年的青砖门楼下。李龟年看见他撇了撇嘴角就走进门去，支使孙子给他送来一个豌豆面搅着麦子面的混面馍馍。孝文不大在乎李龟年撇拉的嘴脸，沉浸在咀嚼混面馍馍的香甜甘美之中。他斜倚在门楼下，一只肩膀抵在门楼突前的青砖柱体上，双手掬捧着那个泛着豌豆黄色的馍馍，腮帮上鼓起一个圆圆的蠕动着的圪塔。吃完以后，他小心认真地吸食撒漏在手心和指缝间的馍渣碎屑儿，忽然记起小娥来。他顿时懊悔不迭随即又宽宥了自己："算咧算咧已经吃完了算㞞咧！等下回要到手一定给她送回去。"当他转到贺家坊贺耀祖家门楼下的当儿，正当午饭时间。贺耀祖听家人报告了孝文来讨饭的消息走出门来，亲热备至地说："啊呀孝文！你扛在门楼下做啥？进屋进屋快进屋来。"孝文跟着贺耀祖走进门楼进入院庭，心里想着，这回可以饱咥一顿了。

贺耀祖一家正围在厅房明间的方桌上吃饭，全都停住筷子惊奇地注视着他的到来。贺耀祖指示家人给他舀饭，拉过一只矮凳放到厅房台阶上说：“坐下，在这儿坐下吃。”在哪儿坐下都无关宏旨，孝文接过贺家儿媳递来的饭碗，迫不及待地开始陶醉在纯粹白面条的美好享受之中，滚烫的面条丝毫不能减缓他吞食的速度，额头上的热汗吊线似的滴流下来，当他吃光喝净期盼再舀一碗的时候，才听见背后响着贺耀祖的声音：“你们今日个看见师傅了。我专门把这个好师傅请进门来给你们开开眼界。白嘉轩在咱原上算得头一个仁义忠厚之人，还是保不定要出败家子儿。你们没见过败家子今日个就见上了，你们要学败家子他可是个好师傅……”孝文刚刚接住舀来的第二碗面条，心里猛然蹿起一股火来，想把那碗摔扣到贺家父子当面，临了却软软坐下来挑动细长的面条进入口中。他吃完之后抹抹嘴巴，回过头对贺耀祖嘻嘻地说：“你看中我当师傅，那我就住下不走了好不好？你啥时间还想让我当师傅尽管捎话，咱不要工钱只图个肚儿圆……”

孝文继续往东南走，越往南走人地越生疏，一天两天也难得讨到一口剩饭一块馍馍，却不断遭到恶狗的袭击，迫使他捡拾起一根木棍，而腿脚上被狗咬烂的伤口开始化脓，紫红的脓血从小腿肚上流过脚腕灌进鞋帮里。他随后就开始发烧，强烈的恶心使他干呕出一串串带血的黏液。那一夜他从栖息的庙台上翻跌下来，浑身像浸透了井水一样冷颤不止，脑子里却得到几天来的第一次清醒，而且意识到死亡即将临近。这一刻突然想起小娥，他放声痛哭，呼喊着小娥的名字，趔趔趄趄离开庙台……

经过两天连挪带爬殊死的行程，终于眺望得见白鹿村树木笼罩着的村庄了。他在路经熟悉的土壕时一阵情切过度的昏厥，就软软地从斜坡上翻滚下去，跌落在大土壕里。他看见小娥正朝他抿嘴勾眼嗔笑

着爬上炕来，右手伸到左腋下款款地解开一个又一个布圪墶纽扣儿，两只雪白的鹁鸽儿扑飞出来；她侧身倚躺在他的身旁，把一粒搓捻得油亮的土填进烟枪小孔，俩人便你一口我一口地对抽起来；烟劲上足了，俩人便在火炕上折腾瞎闹，破席上的一根篾扦刺得他跳起来，趴在炕上撅起光溜溜的屁股，让小娥捉着针给他从皮肉里挑出扦刺来……孝文从针刺的剧疼里跳起来，一只皮毛染着血污的白狗呜呜叫着纵起尾巴跳开了，回过头对他凝视一阵儿，便失望地叫了两声溜走了。他抱住脚一看，脚面上和脚掌上留着两排对称的洞眼儿，却没有血流出来，他猜想自己的皮肉里大概挤不出一滴血了。他的心头掠过一幅阴森恐怖的景象，那些被饿死在村道或庙台下的外乡人，村里人恐怕尸体腐烂变臭，就吆喝起几个人把尸首拖到远远的坡沟里，胡乱挖个土坑塞进去埋掉了。狗们随后跟踪而至，先是一条几条接着便拥来几十条颜色各异的大狗小狗公狗母狗，围着土坑扒挖，一当那无名死尸被扒出来，狗们就疯了似的撕扯噬咬。原上几乎所有的狗全都变成了野狗，吃人肉吃得眼睛血红皮毛上也染着血痕。白孝文几次看见过被狗们啃得白光光的人的腿骨，被撕得条条绺绺的烂衫烂裤，不由得一阵痉挛，又软软地躺倒在土壕塄坎下。一声硌耳的车轴擦磨的嘶响传来，有人赶车到土壕来取土，孝文瞅了一眼，便认出吆车的人是鹿三，不由地闭上了眼睛。

鹿三吆着马拉的木轮牛车进入土壕，拉紧木闸绾死闸绳，从车厢里取下铁锨和镢头转身走向塄坎挖土的当儿，瞅见蜷卧在旮旯里的人，他见惯了饿殍卧道所以并不太惊奇，用镢头尖头钩拉一下腿脚，探试一下是死尸还是活物。孝文就支起胳膊扬起头来，叫了一声“三叔”。鹿三扔了镢头跨前一步蹲下身来，双手扶着孝文的肩膀坐起来：“噢呀呀呀弄成这光景了？”孝文麻木许久的脑袋顿时活跃起来，他意识到自己现在的一言半语，都会经过鹿三这个媒介一字不漏地传达给父亲，丝毫的怯弱和懊悔都会使父亲得意。他不想让他得意，于是就说：“这光景不错这光景嫽得很！”鹿三撇撇嘴角儿：“想想你早先是啥光景，而今是啥光景？”孝文不假思索地说：“早先那光景再好我不想过了，而今这光景我喜悦我畅快。”鹿三听了，缓缓地站起来退后两步，和孝文之间形成一段距离，嘲弄地说：“你生装嘴硬。你后悔来不及了。你原先是人上人，而今卧蜷在土壕里成了人下人。你放着正道不走走邪路，摆着高桌低凳的席面你不坐，偏要钻到桌子底下啃骨头，你把人活成了狗你还生装嘴硬说不后悔，你现时后悔说不出口咯！”孝文气得颤颤抖抖：“嗬呀三老汉！别人训我骂我倒是罢了，你也来训我烧骚我？你算老几？”鹿三冷笑着拍拍胸口，鄙夷地瞅着孝文：“我算老——三。甭看三老汉熬一辈子长工，眼窝里把你这号败家子还拾不进去。我要是把人活到你这步光景，早拔一根㞗毛勒死了……还活啥人哩！”鹿三从地上捞起镢头，狠狠地照着塄坎挖起来，土块哗哗哗倒下来，拥堆在脚下，接着又换上铁头木锨，装满一车土块，再把镢头和铁锨架上车帮，牵着红马解开闸绳，临出土壕的时候回过头来，半是同情半是揶揄地说：“你要是没有狠劲儿勒死，快到白鹿仓里头去，那儿今日个放舍饭……”

孝文仰躺在土壕里气得半死，串村溜墙根讨饭时，熟人用白眼瞅他孩子们喝狗咬他他都能做到心平气和，料想不及鹿三竟会如此强烈

地刺激起他的羞耻感。盛怒终于冷寂下去，腹腔里似有一条蚰蜒在蠕蠕拱动，接着一条变成二条三条无以数计的蚰蜒在空荡荡的腹腔里翻搅攻掘，脑子里盘旋着鹿三走出土壕时留给他的三个字：放舍饭。饭已经十分陌生，现在又变得十分切近十分鲜活十分生动。两三天来水米不进，孝文早已没有饥饿的感觉也没有饥饿的胁迫，现在饥饿的感觉重新苏醒，饥饿的痛苦又胁迫着他站立起来，到白鹿仓去吃舍饭。他的意志集中心劲强烈，拄着打狗棍子站立起来，走出土壕爬上慢道扬起头来，弟弟孝武刚刚走到跟前。孝武是从鹿三口中得知孝文在土壕濒死的消息，他说："哥，回家吧。"

"不回。"孝文昂起头执拗地说。

"你已经走到绝路了，再没路可走了。"

"路还没绝哩——我去抢舍饭吃呀。"

"你该想想，你咋能去抢舍饭？"

"抢舍饭好。比讨饭好比回家吃你一碗饭都好。"

"你不顾脸面……也该想想祖先。"

"要脸的滚开……不要脸的吃舍饭去啰！"

…………

孝文很得意自己对鹿三和孝武的强硬态度，凭着骤然涨起的一股气力走到白鹿仓外的舍饭场上来了。白鹿仓围墙外开阔的原野上，因为干旱未能播种因而闲歇着的田地里，万头攒动，喧哗如雷，像是打开了箱盖嗡嗡作响的蜂群，更像是一个倾巢而出的庞大的蚂蚁家族，

站着的躺着的坐着的攒动着的男人女人老人和娃娃，一片褴褛的衣裤构成混浊的洪水，四面八方仍然源源不断涌动着人流朝这里汇入。孝文刚刚进入时心里一阵畏怯，很快就被一张张饥饿的脸孔和粗鲁的咒骂所激励，拄着棍子朝人流密集的地方蹭去。开阔的原野上临时垒起八九个露天灶台，支着足有五尺口径的大铁锅，锅台的两边各架着一只大风箱往灶台下送进风去，火焰从前后两个灶口呼呼呼啸叫着蹿起一丈多高。灶锅前拥挤着的尽是年轻人，密实到连一根麦草也插不进去。民团团丁挥舞着棍棒，强令人们排起三路纵队，刚刚形成的队列在团丁们转过身时又顷刻瓦解，蜂拥的程度更加激烈。孝文在这种混乱中趁机挤到前沿，看见了热气蒸腾的铁锅里翻滚着黄亮亮的米粥，顿然懊悔得哭叫起来，天哪！旁人手里都攥着一只黄碗或一只瓦盆儿，自己空着两手拿什么盛饭呢？他又挤出人窝儿，打算跑回镇子去借一只碗来，肩膀却被谁一把揪住了。他情急得愤怒地回过头，鹿子霖惊讶地笑着说：“啊呀呀老侄儿！你咋能跟这些人往一窝里挤哩嘛！”孝文挣了挣肩膀没有挣脱就急了：“哎呀快丢开手！我忘了拿碗我去借碗呀。来迟了就给旁人舀完咧！”他觉得鹿子霖的手抓得更狠更紧了，愈加气急地叫：“你再不放手我就骂呀……”鹿子霖脸上浮起一缕难过的神色，倒换了一只手又抓住他的胳膊，拨开混乱拥挤的人群，不由分说拉着他走进白鹿仓围墙上临时挖开的豁口。孝文根本没有力气与抓着他胳膊的那只手抗衡，他被拉进白鹿仓的院子又进入一间屋子，一抬头就看见姑夫朱先生坐在一张桌子旁边，哑然闭口垂下头来。

屋子里的人全都嘘叹起来。这里坐着的是临时组成的白鹿仓赈济会的成员，包括鹿子霖在内的九个保障所的乡约，各管一项分工负责向原上饥民施舍饭食，总乡约田福贤自任会长，他们构成了白鹿原上流社会。大家瞅着鹿子霖拉进门来的白孝文，衣裤肮脏邋遢，头发里

锈结着土屑灰末和草渣儿，脸颊和脖颈粘满污垢，眼角积结着的干涸的眼屎上又涌出黄蜡蜡的新鲜眼屎，令人看了作呕，挽卷着裤脚的小腿上，五花血脓散发着恶臭。从德高望重的白家门楼里逃逸出来的这个不肖之徒，使在座的白鹿原上层人物触目惊心感慨不已，争相发出真切痛心惋惜怜悯的话。孝文不仅得不到丝毫的温暖和慰藉，反而更加窘迫，透彻地领受到堕落者的羞耻，再也说不出对鹿三和孝武那些赌气的硬话了。鹿子霖端着四五个馍馍走进来，正要递给孝文，一直也没有开口的朱先生制止了鹿子霖的举动，挥手让他把馍馍拿走，沉静地说："让他多饿一阵儿好。"鹿子霖有点尴尬，在座的人无人不晓他买地拆房的事，才有点后悔不该拉扯孝文进来；原只想着把这个破落子弟推到上流社会的人们面前展览一番，却使自己受到牵扯；他忽然灵机一动，对田福贤说："总乡约，你不是说县保安大队要扩编吗？要你给他们举荐可靠的年轻人吗？让孝文去多好！咱们瞅嘉轩兄的脸面，不能看着孝文到这儿来抢舍饭呀……"众人一齐拍手称好。田福贤摇了摇手说："你不提这事我倒忘了。好好好。孝文在朱先生书院念过好几年书，文墨深。县保安大队队长特意叮咛，让我给他物色个有文墨的人哩！"说着，趴在桌上写下一纸举荐信，折叠后装入信封，走过来交给孝文说："你立马就去，晚了当心旁人顶占了位子。"孝文接过信封，感激地流出泪来："田叔子霖叔……"扑嗒一声跪下了。孝文被田福贤抻起来，转身就要出门，姑夫朱先生挡住他说："等等。你去抢一碗舍饭吃了再走。吃一碗舍饭好处匪浅……"孝文瞅了一眼姑夫就靠在门框上。朱先生对屋子里的人说："我提议，咱们赈济会同人都去舀一碗舍饭，与民同食，这个机会千载难遇。给我一个碗，你们不去我可去了……"

朱先生常常有出奇之举，成为经久不衰流传的奇事轶闻。朱先生抢舍饭顿时风传白鹿原，又传进县府，新任郝县长扼腕流泪，庆幸自

己选中了一位好人。郝县长自任滋水县赈济灾民总监，朱先生被委任为副总监，县长选中朱先生是排除了种种障碍阻力而表现了一种为民请命的凛凛气魄。这个肥缺给了谁，谁就会在半年间成为本县首富。郝县长亲临白鹿书院，请求朱先生出山，词恳意切：“不才机运不佳，刚来滋水就遇到年馑，已无任何抱负可言，惟有救灾赈济是命。诚恐宵小之徒从中克扣，对百姓犹如雪上加霜。以先生的品格和声望正堪此重任，暂且搁置县志编撰，先救民人度过饥荒，你再续修县志……”朱先生慨然击掌：“书院以外，啼饥号寒，阡陌之上，饥民如蚁，我也难得平心静气伏案执笔；我一生不堪重任，无甚作为，虚有其名矣！当此生灵毁绝之际，能予本县民人递送一口救命饭食，也算做了一件实事，平生之愿足矣！”朱先生亲自召集各仓总乡约联席会议，核对人丁数目，发放赈济粮食。他亲临本县原区山区和川道地区的三十余个仓里，监督检查发放舍饭的地点，把那几位编撰县志的文人先生分派到仓里，专司赈济粮食的数目账表，力主灾粮一定要一粒不漏地吃到饥民口中，堵塞营私舞弊的漏洞。朱先生一身布衣，到各个仓里巡查。第一次到河口仓视察时，仓里为他备下一桌饭，四碟炒菜，一盘雪白的蒸馍。朱先生看了一眼，就拿起一只碗到舍饭场上舀来一碗小米粥喝起来。仓里的总乡约和他的幕僚目瞪口呆，连声检讨自己失职。朱先生指令他们端上盘里的蒸馍和碟里的炒菜，一起走到舍饭场的大铁锅前，一起倒了进去。朱先生说：“你给民人说说这馍是用啥粮蒸出来的？”总乡约瞅了瞅拥挤着的饥民，吓得面色蜡黄不敢吭声。朱先生说：“青天白日红旗下，无须挤眉弄眼悄悄话。你敞开喉咙向民人说——”总乡约刚刚说出用赈济粮招待朱先生的原委，站在前头的饥民便跪下了，后头的人一拨一拨无声地跪下来，整个舍饭场上鸦雀无声。朱先生满脸淌流着泪珠说：“谁忍心从饥民口里叼食，谁还能算人吗？”

一月后的一个黄昏时分，孝文骑着一匹马走进白鹿镇，一身笔挺的黑色制服，腰里束着一根黑色皮带，头顶大盖白圈儿黑檐帽子，马不停蹄地走进白鹿仓，朝田福贤恭恭敬敬施了一个举手礼，然后解开挎包取出一瓶酒一包点心一包南糖一包笋干共四样礼物，诚恳地说：“不成敬意哦田叔……”他随后把同样一份礼物送到鹿子霖手中（穿过村巷路经自家门口时没有驻足停步），仍然是那句至诚的话：“不成敬意哦子霖叔……”

到滋水县保安大队仅仅一月，孝文身体复原了信心也恢复了，接受过十数天军事操练之后，他就被抽调到大队部去做文秘书手，可望将来有辉煌的发展前程。他早已谋划确定，第一次领饷之后，就去酬答指给他一条活路的恩人田福贤和鹿子霖，再把剩余的钱留给小娥，那个可怜人儿想吃舍饭怕是挤也挤不动抢也抢不到手哩！鹿子霖让家人炒下一盘鸡蛋和一盘自生的黄豆芽招待孝文。酒过三巡之后，鹿子霖好心地告诉他：“好咧好咧倒是好咧！那个货死了，你也就一心注定在县上干你的差事……”孝文直着眼问：“谁死了你说谁死了？”鹿子霖做出轻淡不屑的样子：“就是东头窑里那个货……”孝文失控地站起来：“你说她……饿死了？”鹿子霖按着他的肩膀让他坐下来才说：“不像是饿死的，像是被人害死的，炕上有血……”

一股奇异的臭气在村庄里浮游，村人们以为是野狗吃剩的死尸在腐烂，找遍了荒园坟岗土壕却不见踪迹。那股令人恶心窒息的臭气与日俱增恶臭难闻，有人终于发现臭气散发的根源在村子东头慢道旁边的窑洞，报告了族长白嘉轩。白嘉轩对二儿子孝武说：“你叫上几个人去看看，咋么回事？”白孝武和一帮族人来到慢坡道跨上窑院，恶臭熏得人不断地恶心干呕起来，臭气的确是从窑洞里散发出来的。窑门上挂着一把提盒笼形的铁锁，独扇木板门不留缝隙，窑窗的木扇也关死

着，窗扇细微的夹缝里一片黑暗。有人开始追忆，似乎有好多天这窑门就一直锁着未见开过，似乎好久未见那个婊子到集镇上去了；有人断定她肯定饿死在窑洞里了，有人立即指出铁锁锁门证明她根本不在里头，说不定她杀死了某个野汉逃跑了。无论如何，恶臭确凿是从这孔窑洞里散发出来的。孝武在乱纷纷的争议中拿下主意，吩咐两个扛着镢头的汉子说："把窗扇砸开！"两声脆响之后，两个砸烂窗扇的汉子争抢着把头伸进窗洞，同时大叫一声跌坐在窗台下，吓得妈呀爸呀直叫。孝武走上前去扒住窗台往里一瞅，立时毛骨悚然头发倒立，一个一丝不挂的女人趴伏在炕边上，一条腿脚搭吊在炕边下。孝武瞅了一眼就捂着鼻子退到窑院来。既然这个女人饿死在窑里，是谁从外边锁上了窑门？人们纷纷挤到窗台上去看究竟，又噢噢惊叫着急退到窑院里来。孝武又指使那两个汉子砸开窑门上的铁锁。俩人说啥也不再冒险了。孝武从他们一个手里拿过镢头走向窑门，咣当一声砸掉铁锁，一脚蹬开独扇门板，嗡的一声，苍蝇像蜜蜂一样在门口盘旋，恶臭一下子扑出门来。孝武又指使几个小伙子爬上椿树去采折树枝，在窑院里燃起麦草，把椿树的枝叶覆盖到火上，烧出苦味的浓烟，驱散扑到窑院里的苍蝇。他又带着三个小伙子抱着柴草和椿树枝叶进入窑洞，在窑顶头点火熏烟，火着烟起之后就奔出窑来。浓黑的烟气从窑门窑窗和天窗里流泻出来，荸荠一般大小的绿头红头苍蝇随着烟流仓皇飞窜，往人的脸上碰往人的衣服上爬，人们惊叫着脱下衣服摔打，那些妖气十足的苍蝇是鬼魅的象征。

烟气消散净尽，臭气暂得减轻，孝武和几个胆大的人走进窑门去察看究竟。小娥上身趴伏在炕上，一只胳膊压在肋下，另一只胳膊伸到头前的炕席上，一条腿压在尻子底下另一条腿吊在炕边下，通体精赤，只有一双小脚上缠着裹脚布勒着套鞋。尸体已经完全腐烂，大大小小的蛆虫结成圪垯，右肩上的肩胛骨已被蛆虫嚼透，窝成一堆的头

发里也有万千蛆虫在蠕扭攒爬，炕席上被子上脚地上和连着火炕的锅台上，到处都是蛆虫的世界。孝武弯下腰，终于发现炕边的土皮上溅着干涸的变成黑色的血迹，也就明白这女人不是饿死而是被人杀死的，杀死她的人出门以后就锁上了窑门。一件夹衫压在她的身下，从精赤的身子和脚上的套鞋判断，她被杀的时间是在夜里，因为套鞋只有夜里脱了衣服睡觉时才换穿的，这些都是很容易作出判断的生活常识。她的死因似乎更容易猜断，既然脱得一丝不挂只穿睡鞋，肯定是某个野汉子跟她闹翻脸了杀的或者是一伙野汉子争风吃醋失败了报复杀人，对于这个臭名远扬的官礓子女人，除了奸情不会再有什么更深更多的因素令人思索。孝武退出窑门到了场院上，越聚越多的白姓和鹿姓的男人们一致谴责，这个婊子死了还要使全村老少闻她的臭气，不过这下总算除了一个祸害。几个老年人倚老卖老地责备孝武：看啥哩那臭婊子有啥好看的呢？赶快取锨来把那臭肉臭骨铲出去埋了！孝武犹疑地说："万一她娘家或旁的人告官咋办？总是一条人命案子。"老者们不耐烦地说："我敢作证在场的人都能作证。总不能叫人再闻臭气嘛！"孝武说："那好。"就指使大伙回家去取工具，挖个深坑把她深埋起来。

这当儿白嘉轩佝偻着腰走上慢道，端直朝窑门走去。孝武劝他不要进去，白嘉轩仰起脸说："活的还怕死的？怪事。"白嘉轩背着手观察一番，看见被蛆虫会餐着的腐烂的躯体，也看见了溅在炕边土墙上变黑的血痕，没有久停就跷出窑门门槛，看着已有三三五五的人取来镢头铁锨，对孝武说："从窑垴土崖上放下土来，把这窑给封堵了算了。"说罢又佝偻着腰走出场院走下慢道去了。孝武着人从窑里用砸断的窗板挡住窗孔，重新闭上窑门，就让众人从窑垴土崖上挖土。土块哗啦哗啦奔泻下来，堵封了窑门窑窗窑面，最后盖封了四方形的小小

的天窗，从外表上看，黑娃和小娥的这孔不断在白鹿村惹是生非的窑洞就完全消失了……

“是谁下的这毒手？”孝文问。

“弄不清楚。”鹿子霖说，“我那天在仓里忙着向灾民发放舍饭，没在现场，是后来听人说的。人都嘈嘈说，肯定是哪个野汉子做的活。可究竟是谁，谁也猜不透。”

孝文愣愣地捏着酒杯，猛然倾杯灌了进去。

“算咧老侄儿。”鹿子霖心平气和地劝慰孝文。孝文提着礼物来谢恩的举动证明了这样一点，小娥至死也不曾给孝文泄漏过，导致孝文一系列灾难的戏台下到砖瓦窑的风流，正是他的一个计谋或者说圈套；庆幸的是凶手为自己清除了心头隐患，再不用担心小娥向孝文漏底儿的危险了，他将安然无虞地与孝文保持一种友好的叔侄关系。他说：“你而今在保安队干上了，其实她死了倒少给你添麻缠嘈口声；你和先前不一样了，而今是人头里的人哩！”

孝文连连灌着酒，一句话也不说，站起身来就走了，从马号里牵出自己的马，一出门就跨上马去，和鹿子霖连个招呼也不打。孝文纵马跑过村巷上了慢道，把马拴在一棵树上，踩着虚土爬上窑垴，凭着记忆判断出天窗的位置，就用双手扒掏起来。天窗外覆盖的虚土很薄，很快就露出来了。孝文从天窗钻进窑里，里面一片漆黑。他连着擦灭了三根火柴，在第四根火柴的亮光里找见了搁置在炕台上的油灯，油灯里残留着一丝清油，油捻儿迟迟地亮了起来。孝文站在脚地上，看见一具白骨，骨架在炕上摆放的位置和姿势，与鹿子霖叙说的情况基本吻合。孝文双膝一软就跪倒在地上，轻轻叫了一声：“亲亲呀

我来迟了……”他似乎听到窑顶空中有嗞嗞声响，看见一只雪白的蛾子在翩翩飞动，忽隐忽现，绕着油灯的火焰，飘飘闪闪，孝文哇的一声哭出声来：“你知道我回来了呀亲亲……”一阵昏厥就扑倒在炕边上了。

孝文醒过来时，油灯已经燃尽，蛾子也不见踪影儿。他划着一根火柴，眼光落到那两排精美的糯米牙齿上，他曾经永无满足地吻过亲过它们，它们现在泛着冰凉的绿光。他从伸到炕边的右臂的骨头上取下一只石镯，套在腕上，摸黑爬上天窗。他从窑垴扒下土来，重新封堵住天窗就跳下窑院，解开马缰：“我一定要把凶手杀了，割下他的脑瓜来祭你！亲亲……”

第二十章

黑娃骑着一匹乌青马朝白鹿村赶来，月亮下去了，星光昏暗。他和弟兄们刚刚做毕一件活儿，就像种罢一垄麦子或是收割完一畦水稻，弟兄们用马驮着粮食回山里去了，自己单身匹马去给小娥送一袋粮食。沿路所过的大村小寨不见一星灯火，偶尔有几声狗的叫声，饥荒使白鹿原完全陷入死般的静寂，无论大村小寨再也无法组织得起巡更护村的人手了，即使他们入室抢劫富家大户，住在东西隔壁的邻舍明知发生了什么事也懒得吭声。进入白鹿村之前，黑娃首先看见吊庄白兴儿的房舍。处于整个拥拥挤挤的白鹿村外首的这个吊庄，恰如中华版图外系的台湾或者海南岛。他对白兴儿的庄场记忆深刻，那头种牛雄健无比，牛头上的两只银灰色的牴角朝两边弯成两个半圆的圈儿，脖颈下的肉脸子一低头就垂到地上。那头灰驴和一匹骡子一样高大，浑圆的尻蛋子毛色油亮，看见母马时就蹦跶起来，尖嘎的叫声十分硌耳。最引人的还数那匹种马，赤红的鬃毛像一团盛开的石榴花。他那时候就知道，公牛压过母牛母牛生牛犊，种马压过母马母马也生马驹，而叫驴压了母马母马既不生马也不生驴却生下一头骡驹来。每年春天和秋天，白鹿原上远远近近的大庄稼户和小庄稼户牵着发情的母牛草驴或母马到吊庄来，白兴儿笑殷殷地让客户坐到凉棚下去喝茶，然后把母畜牵到一个栅栏式的木架里头去。每年夏收或秋收以后，白兴儿就牵着种牛叫驴或者种马，脖子上拴一匝红绸，红绸下系一只金黄色的铜铃，到各个村庄里转游；那些配过种而且已经得到了小牛犊小马驹小骡驹的庄户人，听见铜铃叮当叮当的响声就用木斗提出豌豆来，倒进白兴儿搭在牲畜背上的口袋，连一句多余的饶舌话也无须啰嗦；白兴儿一边是意在收账，另一边意思是夸庄。向各个村庄

凡饲养母畜的庄稼户展示种畜的英姿，名曰夸庄，吸引更多的人把发情的母畜牵到他的吊庄里去，算是一种最原始最古老的广告形式……黑娃在山寨里与白牡丹或黑牡丹干过那种事后，总是想到小时候偷看白兴儿的配种场里的秘密。

黑娃驱马从村子东头的慢道上下来不由一惊，进入窑院跳下马来，却看不见熟悉的窑门和窑窗了，坍塌的黄土覆盖着原先的窑洞。他旋即翻身上马，反身奔到吊庄白兴儿的庄场上来。昔时人欢马叫的庄场一片凄凉，专供不驯顺的母畜就范的木头栅架已经折毁，庄场大约关闭停业了，大饥馑年月，牲畜早被庄稼人卖了钱换了粮或送进杀坊卖了肉，还有鬼来配种哩！黑娃把马拴到暗处树下，敲响了白兴儿的门板，好半天才听见白兴儿在门里惊恐的问话声。黑娃说："老哥你甭害怕，我是黑娃。我只问你一句话，你不开门也行。我媳妇到哪达去咧？窑咋也塌了？"白兴儿大约犹疑了片刻还是拉开了门闩，压低声儿说："黑娃兄弟，你真个到这会儿还不知道？"黑娃也急了："咋回事你快说到底是咋回事？"白兴儿说："你媳妇给人杀咧！"黑娃大吃一惊，一把抓住白兴儿瘦削单薄的肩胛问："谁下的毒手？你给我实说你甭害怕。"白兴儿说："不知道。瞎咧好咧都没逮住一句影踪儿话柄儿。你那窑里散出臭气时，人才寻见发现的，后来就挖土把窑封了。"黑娃又问："你真个没听到一句半句影踪话把儿？"白兴儿连连摇头："没有没有……"黑娃狠着劲说："算了不麻烦你了。我把马拴在椿树上你照看一下，我一会儿来骑……"

黑娃端直找到鹿子霖的门下。白兴儿一告知小娥被杀的消息，他脑子里第一个反应出来的就是鹿子霖那张眼窝很深鼻梁细长的脸。他一纵身攀住墙头，轻轻一跃就跌落到院中，双脚着地以后就捅死了一条扑到腿前的黑狗。院子里一丝声息也没有，他用刀片插入门缝拨开

木闩，进入漆黑的上房东屋。鹿子霖睡得正香正死，他的婆娘背对着他侧身面里睡着。一刀子下去，鹿子霖可能连睁眼认人的机会也不曾得到就完结了，黑娃想着就坐在太师椅上，顺手摸过黄铜水烟壶儿，捻了一撮水烟丝儿塞进烟筒，拼打火镰火石的响声惊醒了鹿子霖。鹿子霖黏糊着嗓音说："你呀你呀烟瘾倒比我还大咧！"鹿子霖把黑娃当作他的婆娘了。黑娃吸得水烟壶儿咕噜咕噜响，吹燃火纸点燃了油灯，瞅着鹿子霖枕在玉石枕头上那颗硕长的脑袋。鹿子霖大约摸到了身旁僵睡着的女人而意识到事情不妙，一骨碌翻起身来问："你是谁？"黑娃说："我给你点上灯了你还认不清？"鹿子霖偷偷在枕下摸什么的时候，黑娃说："甭摸甭摸。"鹿子霖换一种口气问："黑娃噢我当是谁……"黑娃说："我来问你一件事，说在你，不说也在你；你要是动手动脚，你那两下子不胜我那两下子；你不信不要紧，说完话咱摆开场子明着弄。你知道我为着啥事来问你——"鹿子霖穿衣蹬裤，又推醒了身旁的女人，吩咐她去烧茶，回过头说："老侄儿！我知道你为着啥事来的。我早就料到你总有一天要来寻我的。"黑娃说："那就不要啰啰嗦嗦。"鹿子霖说："你媳妇遭害，我一听说就想到给我惹下麻烦了。咋哩？人自然会想到你游我斗我，你跑了我杀你女人出气。可人都想不到另一层，我要是想杀小娥还不如杀了兆鹏。他整我比谁整我都叫我更伤心。再说，不怕你侄儿犯心病，你逃走了，小娥几次找我哭哭啼啼，让我给田总说情宽容你。我这人心软，一见谁哭就哭得我仇也消了气儿也跑了。我虽则没有为你说成人情，田总在后总算宽饶了小娥。我看她一个女人家恓恓惶惶，周济给她一点点粮食，有人还借机胡扬脏哩！给我脸上抹屎尿哩！你想想我怎么会下毒手？"黑娃梗着脖子说："你的舌头软和我是知道的。我要是再想不来谁只想到杀小娥的就是你，你说咋办？"鹿子霖反倒挺胸睁眼说："你老侄儿要是想杀我我没办法；你因旁的事杀我我不说啥；你要是为小娥报仇杀了我，你老侄儿日后要后悔的。事情终究有弄明的一天，你明白了杀小

娥的不是我，你就后悔了；搁旁人做错事也许不后悔，你会后悔的；因你是个讲义气的直杠子脾气……”黑娃反倒心动了：“你听没听说谁下的毒手？”鹿子霖说：“这事人命关天，我没实据不敢乱说。我只管保我没做对不住你老侄儿的事。你要是有实据证明是我下的毒手，我就把脖项伸到你刀下给你割。”黑娃说：“那好嘛！你现时上炕去续着睡你的觉。我从哪儿进来再由哪儿出去，免得你开门关门。”鹿子霖抱歉地说：“那我不送你了失礼了……”

黑娃进入白嘉轩的卧室后不像在鹿子霖家那样从容，倒不全是鹿家只有鹿子霖一个男人在家而白家人手硬邦，不能不防；从纵上墙头攀住柿树落进院中的那一刻，他悲哀地发觉，儿时给白家割草那阵儿每次进入这个院子的紧张和卑怯又从心底浮泛起来，无法克制。排除了怀疑对象之一鹿子霖之后，黑娃十拿九稳地肯定杀死小娥的人非白嘉轩莫属，白嘉轩要除掉小娥的因由比鹿子霖更充分十倍，这人又是个想得出也做得出一马跑到头绝不拐弯的冷硬心肠。他一把把白嘉轩从被窝里拉出来，像拎一只鸡似的把他拎到炕下，用黑色的枪管抵住他的脑门。白嘉轩没有呼叫也没有惊慌失措，他从迷蒙状态清醒过来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以后，便梗着脖子一声不吭，只是心里揣猜这个土匪是谁。黑娃对着用被子围裹着身子的白吴氏说：“明人不做暗事。你去把灯点着，咱们明打明说。我是黑娃——”白吴氏黑暗里摸索着穿上衣裤，点燃了油灯：“黑娃你要啥就去拿啥，钱在炕头匣子里，粮食在楼上囤包里……你快把枪收了……”白嘉轩冷笑着对妻子说：“放心放心。黑娃这回来不要你的钱也不要你的粮食，专门是提我的人头来咧！这我明白。”黑娃说：“明白了好。你就明说吧，是你还是你指派谁杀了我女人？”白嘉轩说：“那我就明说吧，我没杀她也不会指派旁人去杀她。我一生没做过偷偷摸摸暗处做手脚的事，这你知道。你女人犯了族规我用刺刷刷她，是在祠堂里当着众人的面刷的，孝文犯了

族规也一样处治。”黑娃说：“我现在就认定是你下的毒手。白鹿村我再想不到谁会下这个毒手。我知道你为啥杀她——”白嘉轩说：“那你就开枪吧！反正我是活下长头儿了。你上回让人打断我的腰杆，后来我就权当活下长头了。”黑娃问：“你凭啥说是我让人打断你的腰？”白嘉轩说：“你自小就看不惯我的腰。你的弟兄动手之前说了你的那句话，‘你的腰挺得太直……’”黑娃说：“这是真的，我小时一看见你的腰就害怕就难受。你的阳寿到了，今晚跟你把这话说明了也好。”门里突然飞进一把镢头，黑娃一扬手就把它隔开了。黑娃对扑进门来的孝武说：“你要是不想当族长了，你再来。”白吴氏一把抱住孝武。孝武说：“你把俺爸放开。有话跟我说，杀呀剐呀朝我来。”黑娃冷笑说：“轮不到你哩！等你日后当了族长，看看你怎么行事再说。”孝武说：“你一定要寻个替死鬼给你那个婊子偿命，我顶上；你放开俺爸，算是我杀的她。”黑娃说：“杀了就是杀了没杀就是没杀，怎么是‘算’？是你自个要杀呢，还是你爸指派你杀的？”孝武说：“是我要杀的，谁也没指派我。”黑娃说：“我不信。我只信是你爸杀的。我就要拿他抵命。你老实点你快滚开——”说着一抖左手，把白嘉轩一下子拖到门口，迎面撞见一个人。那人说：“是我杀的。”黑娃辨出声音，是父亲鹿三站在当面，堵住了门口，恼怒而又沉静地说：“龟孙，那个婊子是我杀的。”“这——”黑娃愣怔一下，说，“你不要搅和。”“是我杀的。”鹿三愈加沉静地瞅着儿子说，“你把嘉轩放开。你跟我招嘴，杀哩剐哩枪崩哩？由你。”“你甭胡说！”白嘉轩猛然扬起头，盯住鹿三说，“你想搭救我，故意把事往你身上揽，你把屎擦不净反倒抹匀了。”鹿三没有说话，把垂在腿胯旁侧的右手扬起来，是一只烂布裹缠着的包儿，再用左手撕开一层又一层烂布，一个梭镖的钢刃赫然呈现在油灯的亮光里，他把梭镖钢刃撂到黑娃脚下，说：“拿去！这是物证。”

白嘉轩白吴氏白孝武和随后闻声赶来的白赵氏白孝义以及孝武媳妇二姐儿拥在门外，惊愕地瞅着鹿三撂到黑娃脚下的梭镖钢刃儿。黑娃松开揪着白嘉轩肩胛的左手，从地上拾起梭镖钢刃儿，眼睛忽然一黑，脑袋里轰然爆响。这个双刃尖头的梭镖钢刃并不陌生，原来安着一根丈余长的桑木棍柄，是祖传的一件兵器；钢刃上的血迹已经变成黑紫色，糊住了原本锃亮的锋刃。这是确凿无疑的物证凶器。黑娃抬起头瞅着父亲，意料不及的这个结局使他陷入慌恐，说不出一个字来。鹿三说："她害的人太多了，不能叫她再去害人了。"说着挺一挺胸脯，"我存着梭镖是准备官府查问的，你倒先来了。给——朝老子胸口上戳一刀！"黑娃的腮巴骨扭动着，又低下头，从地上捡起那块烂布，重新裹缠到梭镖刃上，塞到腰里说："大！我最后叫你一声算完了。从今日起，我就认不得你了……"鹿三说："龟孙！你甭叫我大。我早都认不得你了！"

黑娃从白嘉轩家出来，疾步赶到吊庄白兴儿破落的庄场上，从树上解下马翻身骑上。白兴儿从黑影儿里溜出来说："兄弟你快走。兄弟你可甭给人说在我这儿拴过马……"黑娃已经策马驰去了。他重新进入白鹿村，转过马头来到村子中心作过农协总部的祠堂门前，连发三枪，枪声震撼死寂的夜空。他再骑马走过村巷来到慢道上，勒马伫立在窑院里，对着天空又放了三枪，垂臂默默片刻，就猛然转过身催马奔上慢道。在他转身背向窑洞也背向村庄的一霎间，心里便涌出一句慨叹来：至死再不进白鹿村咯！

鹿三杀死儿媳妇小娥的准确时间，是在土壕里撞见白孝文的那天晚上。鹿三看着苟延残喘垂死挣扎着的白孝文的那一刻，脑子里猛然噼啪一声闪电，亮出了那把祖传的梭镖。他手里拄着镢把儿瞅着躺在土壕里的孝文竟然没有惊奇，他庆贺他出生看着他长大又看着他稳步

走上白鹿村至尊的位置，成为一个既有学识又懂礼仪而且仪表堂堂的族长；又看着他一步步滑溜下来，先是踢地接着卖房随后拉上枣棍子沿门乞讨，以至今天沦落到土壕里坐待野狗分尸。鹿三亲眼目睹了一个败家子不大长久的生命历程的全套儿，又一次验证了他的生活守则的不可冒犯；黑娃是第一个不听他的劝谕冒犯过他的生活信条的人，后果早在孝文之前摆在白鹿村人眼里了。造成黑娃和孝文堕落的直接诱因是女色，而且是同一个女人，她给他和他尊敬的白嘉轩两个家庭带来的灾难不堪回味。鹿三当时给孝文说“你去抢舍饭”，不是指给他一条生路，而是出于一种鄙夷一种嘲笑。

鹿三整个后晌都是从土壕里拉运黄土，干旱的天气使黄土从地表一直干到土壕根底，不需晾晒直接倒进土房储藏起来。天黑以后，他和往常一样沉默寡语地坐在饭桌上吃了晚饭，和嘉轩没有说话只招呼一声“你慢吃我走咧”就走出院子。进了他的马号，给唯一剩下的红马添了一槽草料，就背抄着手回家去了。

鹿三走进自家院子的时候，女人在厦屋炕上听到脚步声，问：“你回来了。等等。我给你开门。”鹿三立在院子里说：“你甭开门我不进去了。”女人就再没吭声。鹿三推开储藏杂物农具的隔扎着墙的厦屋，摸到了梭镖光滑的把柄，就着朦胧的月光，在门槛上垫住梭镖，用斧头褪下梭镖尖头儿来。叮叮当当的响声引来女人的问询：“黑麻咕咚的你砸啥哩？”鹿三说：“你睡你的觉咯！”

鹿三回到马号，从铡墩旁把磨石抱进来，支在土炕和槽帮之间的空脚地上，反身关死了马号的木门，用瓢舀上清水，支在脚地的一个洼坑上，然后坐在木马架上，蘸着清水磨起梭镖钢刃子来。久置不用的梭镖刃子锈迹斑驳，在磨石的槽面上褪下红溜溜的铁锈，嚓嚓嚓嚓的磨擦声中，钢刃在油灯光亮里显现出亮幽幽的冷光来。他用左手的

大拇指头试试锋刃，还有点钝，就去给红马再拌下一槽草料添上，坐下来继续磨着，脑子里十分沉静十分专注十分单一。他第四次拃起左手拇指试锋刃时，就感到了钢刃上的那种理想的效果，如同往常铡草前磨铡刀刃子和割麦子前磨镰刀片子一样的感觉，然后用一块烂布擦了擦钢刃上的水，压到被子底下，点燃一锅旱烟，坐在炕边上，一只脚踏在炕下的脚地上，另一只脚踩在炕边上，左手勾着弓起的膝盖，右手捉着尺把长的烟袋杆儿，雕像一般坐着。他等待鸡叫等待夜静以免撞见熟人，就像往昔里要走远路起鸡啼一样沉静。他的沉静不啻是脑子简单，主要归于他对自己的生活信条的坚信崇拜。他连着磕掉两锅黑色的烟灰又装进了烟末儿，悠悠飘浮的烟雾里，忽然想起那年“交农”的情景，在三官庙的场院里，他面对群龙无首嘈嘈纷乱的场面就跳了起来：“我算一个！”他领着众人进逼县府又被五花大绑着投进监牢，没有后悔过也没有害怕过。鹿三心里说：我就要做成我一生中的第二件大事了，去杀一个婊子去除一个祸害。

公鸡的啼声沉闷滞涩，鸡脖子里似乎塞着干稻草。鹿三磕掉烟灰，把烟袋插进腰间的蓝色带子下，用烂布裹着的锃亮的梭镖钢刃也别在腰后，吹灭油灯，走出马号，合上门板，就出了圈场的木栅栏大门，再回身把双扇栅栏门闭合，扣上链扣，背起双手，走进白鹿村村巷。月亮已经沉落，村巷一片漆黑。

鹿三背着手走过村巷，出了村口就踏上慢坡道，树木稀少了光线亮晰一些了，踏上窑院的平场，止不住一阵心跳。自从黑娃和这个来路不明的女人被他撵出家门住进这孔窑洞以后，鹿三从来也没有光顾过这个齷齪的窑院，宁可多绕两三里路也要避开窑院前头的慢坡道儿。他略一稳步压抑住胸膛里的搏动，走到窑门前，铁链儿吊垂着，门是从里头插死的，人肯定在窑里无疑。在他抬手敲叩门板时，刚刚稳沉的心又嗵嗵嗵跳起来；他稍有迟疑就拍击响了木板门；这一拍击之后，心反而沉稳不跳了。“谁呀？”窑洞里传出小娥黏涩的声音。鹿三继续拍击门板，不开口。“唉呀你个挨刀子的这几天逛哪达去咧？”小娥的嗓门顺畅了也就嗔声嗔气起来，她猜估是孝文来了，“你甭急你甭敲了我就下炕开门来咧！”鹿三头皮上呼喇呼喇直蹿火，咬着牙屏声闭息侍立在门的一侧。咣当一声门闩滑动的声音，鹿三一把推开独扇子木门板。小娥被门板猛烈地碰撞一下，怨声嗔气地骂：“挨刀子的你屎疯咧？开门鼓恁大劲。”鹿三闪身踏进窑门，顺手推上门板，呵斥说：“悄着！闭上你的臭嘴再甭吭声。”“哦哟妈吔！”小娥吓得缩成一团，双臂抱住胸脯上的奶子，顺着炕墙就势蹲下去，用上身遮住光裸着的腹部，悲悲切切抱怨说，“你来做啥嘛？”鹿三瞧着缩在炕墙根下的一团白肉，喝令说：“上炕去穿上衣裳，我有话说。”

小娥从炕墙根下颤悠悠羞怯怯直起身来，转过身去，抬起右腿搭上炕边儿，左腿刚刚跷起，背部就整个面对着鹿三。鹿三从后腰抽出梭镖钢刃，捋掉裹缠的烂布，对准小娥后心刺去，从手感上判断，刀尖已经穿透胸肋。那一瞬间，小娥猛然回过头来，双手撑住炕边，惊异而又凄婉地叫了一声：“啊……大呀……”鹿三瞧见眼前的黑暗里有两束灼亮的光，那是她的骤然闪现的眼睛；他瞪着双眼死死逼视着那两束亮光（对死人不能背过脸去，必须瞅住不放，鬼魂怯了就逃了），两束光亮渐渐细弱以至消失。她仆倒在炕边上，那只跷起的左

腿落下来吊垂到炕边下，一只胳膊压在身下，另一只胳膊抓扑到前头。鹿三这时才拔出梭镖钢刃，封堵着的血咕嘟嘟响着从前胸后心涌出来，窑里就再听不到一丝声息。他从地上捡起那块烂布，重新裹缠住梭镖钢刃，走出门来，拉上门板，锁上那把条笼形的铁锁，出了窑院，下了慢坡，走进屋墙和树木遮蔽着星光的村巷，公鸡刚刚啼鸣二遍。

白鹿村乃至整个白鹿原上最淫荡的一个女人以这样的结局终结了一生，直至她的肉体在窑洞里腐烂散发出臭气，白孝武领着白鹿两姓的族人挖崖放土封死了窑洞，除了诅咒就是唾骂，整个村子的男人女人老人娃娃没有一个人说一句这个女人的好话。鹿三完成了这个人人称快的壮举却陷入忧郁。忧郁是回到马号以后就开始了的，他把梭镖钢刃连同裹缠着浸满鲜血的烂布原样未动塞进火炕底下的炕洞里，用厚厚的柴灰掩埋起来，防备某一天官府前来查问，他就准备把自己和凶器一起交出去。藏好凶器之后，鹿三从水缸里撩出一把水搓洗手上的血污时，看见水缸里有一双惊诧凄怆的眼睛，分明是小娥在背上遭到戮杀时回过头来的那双眼睛；奇怪的是耳际同时响起"啊……大呀……"的声音。鹿三细看细听时，水缸里什么也没有，马号里只有红马的齁息声。他没有在意以为是眼花了耳邪了，拉开被子躺下以后，耳朵里又传来小娥垂死时把他叫大的声音，只是没有重现那双眼睛。从此，那个声音说不定什么时辰就在他耳边响起，有时他正在吃饭，有时他正在专心致志吆车，有时正开心地听旁人说笑谝闲话，那个"大呀"的叫声突然冒出来，使他顿时没了食欲鞭下闪失听笑话的兴致立即散失，陷入无法排解的忧郁之中……直至黑娃掐着白嘉轩的脖子要抵命，鹿三把那把窝藏在炕洞里的淤血干涸的梭镖钢刃掷到儿子脚下，心中的忧郁才得以爽脱……

黑娃气呼呼走后，白吴氏仙草哇的一声哭了，趴到地上朝鹿三磕头：“三哥呀要不是你，他爸今黑没命咧……你俩还不赶快给你干大磕头。”孝武孝义扑通扑通一齐跪下了。鹿三连忙把他们母子三人拉扶起来，对坐在太师椅上的白嘉轩说：“这回我把俺们爷儿们的圪塔算是弄零干了……这与你无干。你们母子不要给我磕头。”说罢，转过身走出门去。白嘉轩没有吭声也没有挽留鹿三，对仙草说：“快弄俩下酒菜，我想喝酒了。”

仙草和孝武媳妇二姐儿很快炒出四个菜来，一盘炒鸡蛋一盘凉拌黄瓜丝一盘干蘑菇一盘熏猪肉，后头两样菜都是山里娘家兄弟不久前来时带的山货，那块烟熏的后臀猪肉平时暗藏在地窨子里，遇着母亲白赵氏的生日或是重要亲戚来家，才用刀削下细细的一绺，算是饥馑年月里最高级的享受了。白嘉轩亲自到马号里去请鹿三。鹿三刚刚躺下，睁着眼侧卧着吸烟，听见敲门声就去开了门。白嘉轩怕鹿三推辞不就就不说喝酒，只说有几句要紧话需得劳驾他再回到四合院里去，去了才能说。鹿三二话不说披上衫子就走，进了四合院的院庭，瞅见上房明厅里方桌上的碟儿盅儿就止住步：“嘉轩你这算做啥？你太见外了我……”白嘉轩佝偻着腰扬起头说：“我给你说的要紧话，你不想听吗？这话……必得呷着酒说。”

四个人围着方桌坐定，孝武动手给每人盅里斟下酒，白嘉轩佝偻着腰站起来，刚开口叫了一声“三哥”，突然涕泪俱下，哽咽不住。鹿三惊讶地侧头瞅着不知该说什么好。孝武孝义也默然凝坐着。仙草在一边低头垂泪。白嘉轩鼓了好大劲才说出一句话来：“三哥哇你数数我遭了多少难哇？”在座的四个人一齐低头嘘叹。孝武孝义从来也没见过父亲难受哭泣过。仙草跟丈夫半辈子了也很难见到丈夫有一次忧惧一次惶惑，更不要说放声痛哭了。鹿三只是见过嘉轩在老主人过世时哭

过，后来白家经历的七灾八难，白嘉轩反倒越经越硬了。白嘉轩说："我的心也是肉长的呀……"说着竟然哭得转了喉音，手里的酒从酒盅里泼洒出来。仙草侍立在旁边双手捂脸抽泣起来。孝武也难过了。孝义还体味不到更多的东西，闷头坐着。鹿三也不由地鼻腔发酸眼眶模糊了。白嘉轩说："咱们先干了这一盅。"随之说道："我有话要给孝武孝义说，三哥你陪着我。我想把那个钱匣匣儿的故经念给后人听……"

这是白家的一个传久不衰的故经。虽然平淡无奇却被尊为家规，由谢世的家主儿严肃认真地传给下一辈人，尤其是即将接任的新的家主儿。那是一只只有入口没有出口的槐木匣子，做工粗糙，不能摆饰陈列也无法让人观赏。由白嘉轩上推大约六代的祖宗里头，继任的家主儿在三年守孝期间变成了一个五毒俱全的败家子，孝期未满就把土地牲畜房屋踢荡净尽了，还把两个妹妹的聘礼挥霍光净。母亲气死了，请不起乐人买不起棺材穿不上三件寿衣，只凑合着买了两张苇席埋了。这个恬不知羞的败家子竟然厚着脸皮吹牛说："白鹿村再有钱的人再大的财东，没见谁给他先人装个双层枋吧？我给俺妈用的是双层子寿材……"村人一想也对，两张苇席裹了双层……就回给他一句顺口溜：白家老大埋他爸，能闹多大算多大；白家老大埋他妈，能瞎尽管瞎。这个败家子领着老婆孩子出门要饭去了，再没有回来。亲自经历这个拔锅倒灶痛苦过程的老二，默默地去给村里一些家道殷实的人家割草挑水混一碗饭吃，没有事做的时候就接受村人乡邻一碗粥一个馍的施舍。这个默默不语的孩子长大了，就弄下一个木模一只石锤去打土坯了，早出夜归，和村里人几乎断了见面的机会。他从不串门更不要说闲游浪逛，雨天就躺在那间仅可容身的灶房里歇息，有人发现过他在念书。这间灶房是被激怒的族人和近门子人出面干预的结果，败家子老大才留下这一间灶屋没有卖掉，使他有一坨立足之地。

他搜罗到一块槐木板，借来了木匠的锯子刨子和凿子，割制成一只小小的木匣儿，上头刻凿下一道筷头儿宽的缝口，整个匣子的六面全都用木卯嵌死了。他每天晚上回来，把打土坯挣下的铜子麻钱塞进缝口，然后枕着匣子睡觉。三年以后，他用凿子拆下匣底，把一堆铜元和麻钱码齐数清，一下子就买回来一亩一分二厘水地，那是一块天字地。白鹿村的人这个时候才瞪大眼睛，瞅着那个无异于哑巴的老二身上条条缕缕的破衫烂裤。第二年，他用自己置买下的土地上收获的第一料新麦蒸成雪白的馍馍，给白鹿村每一家每一户都送去两个，回报他们在他处身绝境的幼年时期的馈赠之恩。这个有心数儿的孩子当时每接受一碗粥一个馍，都在灶屋土墙上刻写下了赐舍者的姓名，诸如五婆三婶七嫂二姑四姐等等。已经成年的他在实行回报时，坚决冲破了当初记账时的原本企图，给每一家乡党不管当时给予还是未给予他施舍的人家一律送上两个馍馍，结果使那些未施舍过他的人更加感动以至羞愧。又两年，他再次撬开匣底，在祖传的留给他的那一半庄基地上盖起了两间厦屋。又一年，他给自己娶回来一房媳妇……再后来的事无须赘述，倒是这个老二本人的一些怪癖流传不衰。他娶媳妇的第二天到丈人家回门回来，一进门就脱下新衣服，穿上了原先那身条条缕缕的破衫烂裤和踏断了后跟的烂鞋。媳妇说：“你还穿这——”老二说：“这咋？这叫金不换。”直到他死，尽管土地牲畜房屋已发展到哥哥败家之前的景况，被卖掉的那一半庄基用高过原价三倍的价钱再赎买回来，如愿以偿盖起三间厅房，他仍然是一身补丁摞着补丁的衣裤。白鹿原的人因他而始，把补丁称作“金不换”。白家老大败家和老二兴业发家的故事最后凝练为一个有进口无出口的木匣儿，被村村寨寨一代一代富的穷的庄稼人咀嚼着品味着删改着充实着传给自己的后代，成为本原无可企及的经典性的乡土教材……

“我看咱家只差一步就闹到重用木匣子的地步咧！”白嘉轩喝了几盅酒，感慨起来，“你们看看孝文是不是那个败家子老大？哈呀怪道人说各家坟里家里也就是那几个蔫鬼鬼子上来下去轮回转着哩！说不定哪一代转上来个败家的鬼鬼子就该败火了！孝文是不是一个？是！只是我还活着，孝武也长大了。才没给他踢踏到那一步……我把他赶出去，你（盯住仙草）还怨我心硬，怨我不给他周济一斗半斗，是我啬皮呀？周济也得周济那号好人，像他那号败家子，早饿死了早让人眼目清闲……孝武哇！今黑我就把这匣子交给你，当然用不着拿它攒钱，你常看看它就不会迷住心窍。”

听到木匣子的故经，鹿三却顿然悟出进山背粮的根由来。

在丰饶的关中平原两料庄稼因干旱绝收的年馑里，北边黄土高原的山区却获得少有的丰收，于是就形成了平原人向山里人要粮食的反常景观。山里不种棉花，白鹿原人背着一捆捆一卷卷家织土布，成群结队从各个村庄出来，汇集到几条通往进山峪口的南北向的官路上，背着口袋出山的人和背着布卷进山的人在官路上穿插交错，路面上被踩踏出半尺厚的粉状黄土。好多人趁机做起地地道道的粮食掮客，他们从山里掮背回粮食，到白鹿镇兑换成布匹或者成衣，再掮背着布匹和衣服进山去兑换山民的苞谷和谷子，用赚下的粮食养活婆娘和娃娃。白鹿镇成为整个原上一个粮食集散重镇，红火的景象旷古未见。

鹿三让他的女人把木柜里仅存的几丈纯白土布和丈余蓝格条子布一齐捆卷起来，再把大人和娃娃的新旧衣服捋码一遍，凡是当下穿不着的都叠捆起来。女人挑来拣去作难不定唉声叹气。鹿三却果断得多：“救命要紧。穿烂点没啥受点冷也不要紧，肚里没啥填不行咯！”当他估摸布匹和衣服能够换得尽他一个人背的粮食时，就给白嘉轩告假：“我明日进山背粮去呀，得走三五天。”白嘉轩不假思索地说：“你

去你去，得几天走几天，路上甭赶得太紧，当心出事，而今人都吃不上身子虚。”鹿三转身要走的当儿，白嘉轩又说：“三哥，让孝武孝义跟你一搭去。”鹿三转过身笑着问：“你叫娃去背粮不怕惹人笑话？”白嘉轩说：“谁爱笑由谁笑去。”鹿三就认真说：“孝武去行孝义去怕不行，娃太小，甭说背粮食光是跑路怕也跑不下来，来回好几百里哩！”白嘉轩冷冷地说：“要是从场里把粮袋子挪到屋里，我就不让他去了，就是图了这个远。让他跟你跑一趟有好处，他们兄弟俩也就知道粮食是个啥东西了。我说嘛……你把你那个二娃子也该引上。”鹿三感动而又钦佩，回到屋里对女人颂叹不迭：“嘿呀呀！你看嘉轩这号财东人咋样管教后人？咱们还娇贵兔娃哩不敢叫背粮去……”

鹿三领着成年的孝武和未成年的孝义以及兔娃，四个人结伙搭帮在鸡啼时分上了路，太阳西斜时进入峪口。进山和出山的人在峪口会合，有人在这儿搭下庵棚开起客栈，兼卖稀饭和苞谷面饼子。四个人歇息一会儿吃了点自带的干粮又上路了……因为带着两个孩子而延缓了行程，五天的路程走了七天才回到白鹿村。傍晚时分，孝武孝义在村口和鹿三兔娃分手后走进街门，孝义扑通坐到地上起不来了。奶奶白赵氏首先看见归来的两个孙子，捧住孝义的脸嘘叹不止，孙子的双唇燥起一层黑色的干皮，嘴角淤着干涸的血垢，眼睛深深地陷下去了，抚着血泡摞着血泡的脚片痛不可支。白嘉轩跟着仙草走到院子快活地逗儿子说：“三娃子你这下知道啥叫粮食了吗？”孝义苦笑着：“爸呀我日后掉个馍花花儿都拾起来吃……”孝武媳妇把一盆水端到院庭里，让自己的男人和弟弟孝义洗脸。白嘉轩阻止说：“先甭洗脸。把刚才背回来的粮食再背上——”白赵氏忍不住赌气地说：“再背到山里去？”白嘉轩和颜悦色地说：“给他三伯背过去。”

白嘉轩佝偻着腰，领着孝武和孝义走进鹿三家的院子朗声说：“三哥！娃们给你送粮来了。”鹿三正躺在炕上歇腿，和女人先后跷出厦屋门槛，看见孝武孝义肩头扛着从山里背回来的粮食袋子，迷惑地问：“你咋么又叫娃们背过来了？那是给你背下的咯！”白嘉轩说：“这回从山里背回来的都给你。我等下回背回来再拿。”孝武孝义放下粮食袋子，颠颠踱踱着走出院子去了。白嘉轩却幸灾乐祸似的笑说：“这回把碎崽娃子跑美咧。这回碎崽娃子就明白啥叫个粮食啰！”

鹿三歇了一夜，第二天在碾盘上碾下半斗苞谷糁子，安顿了女人和兔娃的生活，自己又回到白家来了。隔了一天，他到土壕去拉垫圈黄土时遇见了孝文；吆车出土壕时，他的脑海里闪出了梭镖钢刃……

鹿三说：“孝文要是心里有这匣子就好咧！”孝武接过匣子，庄重而又激动起来：“爸，我明年春上就把门房盖起来。”白嘉轩说：“你把门房盖起来，就把你的名字刻到墙上。把孝文卖房的年月也刻上。这话我再不说二遍。还有一件事，你爷临走时给我叮咛过一句，‘看待好老三’。这多年里，我的亲生儿子指望不住，一些朋友也指望不住，靠得住的就是你三伯哇！孝武孝义你俩听着，你三伯跟我相交不是瞅着咱家势大财大，我跟你三伯交好也不是指靠他欺人骗世，真义交咯！我今日个把话说响，你三伯要是走在我前头，不用说有我会照看好；若是我走在你三伯前头，就指望你们兄弟俩照看好你三伯了……”说着动情伤心起来。

孝武孝义还未来得及说话，鹿三噌的一声站起来，满脸红赤着说：“嘉轩你把话说到这一步，我也有话要给娃们敲明叫响：交情是交情，各人还是各人。你爸是主儿家我是长工。你爸不在了你兄弟俩是主儿家我还是长工。你爸在世时我咋样你爸不在世了我还咋样。该我做的活我做，该给我的工钱按时给我我也不客气，再说旁的啥话，都

是多余的。我这人脾气……”孝武给鹿三和父亲斟上酒，恭敬诚恳地表示说：“我把三伯不当外人，三伯也不把我当外人待就好了。”

看着孝义也向鹿三施了礼，白嘉轩对两个儿子说：“好！你俩可甭忘了自个说的话。”然后回过头，放下筷子伸出右手抓住鹿三的左手：“三哥，你不该杀黑娃媳妇……”鹿三也转过头，紧紧盯着白嘉轩：“我不害怕。我也不后悔。”白嘉轩说：“可你为啥悄悄儿杀了她？既然你不害怕，那就光明正大在白天杀？”鹿三一下子反不上话来。白嘉轩放开攥着他的手说：“可见你还是害怕。”鹿三不大服气这种说法，又是当着两个晚辈的面，就把酒盅重重地蹾到桌子上，梗着脖子说：“嘉轩你尽出奇言，杀人哪有你说的那个样子？”白嘉轩仍然沉静地说：“三哥呀！你回想一下，咱们在一搭多年，凡我做下的事，有哪一件是悄悄摸摸弄下的？我敢说你连一件也找不下。‘交农’那事咋闹的？咱把原上的百姓吆喝起来，摆开场子列下阵势跟那个贪官闹。族里的事嘛还是这样，黑娃媳妇胡来，咱把她绑到祠堂处治，也是当着众人的面光明正大地处治；孝文是我的亲儿也不例外……”鹿三听着，似乎还真的找不出一件白嘉轩偷偷摸摸干的事体来。白嘉轩镇定地说：“我一生没做过见不得人的事。凡是怕人知道的事就不该做，应该做的事就不怕人知道，甚或知道的人越多越显得这事该做……你俩记住这个分寸。”白嘉轩说到这儿瞅着两个儿子。鹿三说：“那个害人精不除，说不定还要害谁哩！她死在窑里臭在窑里，白鹿村里没听到一句说她死得可怜的话，都说死得活该……”白嘉轩插断说：“她害谁不害谁，得看谁本人咋样，打铁需得自身硬；凡是被她害了的都是自身不硬气的人。”说时又对两个儿子郑重地点一点头，再回过头来看着鹿三，“人家听你的话就是你的儿媳妇，人家不听你的话不服你的管教就不是你的儿媳妇了，你也就不是人家的阿公了，由人家混人家的世事去，你杀人家做啥？你生气你怕人戳脊梁骨吗？我不这样看。孝文活他的人

我活我的人，各人活各人的人。”鹿三发觉自己的心里有点泄气，嘴里仍然硬撑着说：“你想事想得开，我可就想不到这么圆全。反正杀了她，我也给黑娃交代清白了，我不后悔。”白嘉轩说：“后悔是坚决不能后悔。这号人死一个死十个也不值得后悔，只不过不该由你动手。你不后悔很好。你要是后悔了，那就是个大麻烦……”

刷啦一声，院子和屋瓦上骤然响起噼里啪啦的雨声。鹿三从板凳上跳开去，跑到院子里，哇的一声哭了：“老天爷呀！”白嘉轩急得从凳子上翻跌下去，两个儿子早已奔到院庭里叫着跳着，他爬到门口又从台阶上翻跌下去，跪在院子里，仰起脸来，让冰冷的雨点滴打下来。雨势愈来愈猛，一片雨的喧嚣。整个白鹿村响起了欢闹声，叫声哭声咒骂声一齐抛向天空，救命的天爷可憎的天爷坑死人的老天爷啊！你怎么记得起来世上还有未饿死的一层黎民？鹿三一身透湿，拉着跪在泥水里的白嘉轩上了台阶，雨水像倾倒似的泼洒下来，一片泥腥气味。村子里的喧哗渐渐沉没了，大雨的喧嚣覆没了天空和地面……

第二十一章

黑娃回山寨的路上遇到暴雨，人和马都被浇成丧魂失魄的落汤鸡，他把马缰交给等候他归来的大拇指，坐在石凳上就站不起来了。山寨灯灭火熄，和他一起出山做活儿的弟兄早已归来，吃饱喝足之后已经躺下睡了，大约到明天晌午才起来。山寨生活与外部世界阴阳颠倒，昼伏夜出肯定是世界上所有匪贼们共同的生活规律。每次出寨做活儿归来，大块抓肉大坛子灌酒，直吃得腹满肚胀，直喝得天昏地暗，然后倒头睡去。黑娃从送饭来的弟兄端着的木盘里抓出酒瓶，挥了挥手让他把吃食端走。大拇指在火堆前重新拢起火来，催促他朝火堆跟前挪挪，赶快把湿透的衣裤脱下来换上干的。黑娃不想动弹，他没有寒冷的感觉，拔掉瓶塞儿咕嘟嘟灌下一口烧酒，仍然坐在石凳上垂眉不语，衣裤上流淌下来的水珠浸湿了尻子底下坐着的青石凳子。大拇指双手反叉在腰里，站在火堆前瞅瞄着黑娃："有啥话就说响。还没见过你今日个摆的这个㞞势相。"

大拇指和二拇指黑娃已成为莫逆之交。每次夜出做活儿，一个人牵头，一个人看家守寨，守寨的一定要等到夜出的归来才睡觉，那是一种死生共济胜过父母兄弟的关系。如果外出的一个未能如期归山，守候的那一个就坐待到天明，或是等得他安全抵达或是凶讯传至。大拇指已经等候过两个二拇指的凶讯。姓杨的二拇指在那次截抢军火车辆时被快枪击中胸口当场死去；另有四个弟兄也赔上性命，抢来了十条快枪，等于一个弟兄换下两杆枪。从那时起直到现在，每有新的弟兄入伙发给他们枪支时，大拇指都要重复一遍第一批枪支得来时所付出的代价，姓杨的二拇指和四个弟兄的姓名以及各自死亡的过程。姓陆的二拇指死得顶不值当，在抢劫滋水川道何家村开油坊的范大头家

时，他被范大头的小媳妇迷住心窍，正当他得手得意的当儿，那个小媳妇在炕头的针线蒲篮里摸到手剪子剪断了他的命根儿。姓陆的二拇指从炕上滚到炕下，在脚地上翻滚嚎叫了半夜才死去。大拇指对这桩丑闻也不回避，讲过姓杨的二拇指以生命换来山寨第一批快枪的壮举之后，必不可缺地要给新入伙的弟兄讲述姓陆的二拇指“老二”害老大的事。黑娃是和他搭手的第三个二拇指，在选定黑娃做二拇指的欢庆宴席上，大拇指当着众弟兄的面再次重提姓杨的和姓陆的两个前任二拇指舍身亡命的事，以示警戒，然后对黑娃开玩笑说：“二字不吉利呀！前头两个二拇指都是短命鬼，黑娃你得当心咯！”在众弟兄的哄闹声中，黑娃也玩笑着说：“我无论如何得管住‘老二’……”大拇指越来越信服二拇指黑娃心眼耿直，手脚利索，做活儿放心，在山寨弟兄们中间声望极好。

他看见黑娃一反常态的神气就不自在，逼着问：“到底咋啦吗？你信不过我你可以不说，那就甭给我摆这个屌势相。”

黑娃从腰里掏出那把梭镖钢刃，撕掉裹缠着的烂布，捉住酒瓶把烧酒倒洒在钢刃上，清亮的酒液漫过钢刃，变成了一股鲜红鲜红的血流滴落到地上；梭镖钢刃骤然间变得血花闪耀。黑娃双手捧着梭镖钢刃扑通跪倒，仰起头吼叫着：“你给我明心哩……你受冤枉了……我的你呀！”大拇指也被这奇异的景象吓得发愣，跪下一只腿搂住黑娃的肩膀：“兄弟快给我说，是谁受了这大的冤屈？”黑娃紧紧盯着梭镖钢刃说：“我媳妇小娥给人害了。”话音刚落，梭镖钢刃上的血花顿时消失，锃光明亮的钢刃闪着寒光，原先淤滞的黑色血垢已不再见。大拇指从黑娃手里接过梭镖钢刃端详着，咬牙切齿地说：“我要亲手把他宰了。快说，快给我说是谁？”黑娃一手重重地捶到膝头上，痛苦地摇摆着脑袋：“是——我——大。”大拇指张大着嘴半天合不拢，咣当一声

把梭镖钢刃扔到石桌上，缓缓站起来喃喃说：“我的天哪！一个窝里的也咬起来了……”

大拇指转过身扶起黑娃，拥搀着走到火堆跟前坐下来，往火堆里添加了几块木柴，爆出噼噼啪啪的声响。他沉静地说：“兄弟，令尊鹿三叔可是个好人哪！”黑娃不大在意地问：“你认得？”大拇指叹口气：“我跟三叔在一个号子里坐了半年哩！岂止认得。”黑娃惊诧起来：“你是……三官庙里那个领着众人‘交农’的和尚？”大拇指抿着嘴算是默认，终于选定了一个向黑娃袒露自己诡秘得绝无人知的身世的时机，半自嘲弄地说：“我也是因了一个女人才落草的咯——”

大拇指是关中西府人，那地方比白鹿原更为古老更为悠久，是周人和秦人屯垦发端之地，他的那个名叫郑家村的村庄就在周原的原坡根下。他在二十四节气的芒种那天出生，父亲就给他取下一个好记好听好叫的名字：芒儿、芒娃儿、芒芒儿。父亲送他到太平镇车木匠家学手艺那年，他刚刚卸下脖子上的黄色缰绳儿。他自记得事起就记着脖子上套着一副黄布缝制的缰绳儿，有擀面杖那么粗，从脖子上套下去，在胸膛上绾结成一个寿字形状。每年二月二日，母亲领着他到菩萨庙里去烧香叩头，把一条红绸披到菩萨娘娘的肩上；再从他的脖子上卸下被鼻涕桑葚黑汁染污得五麻六道的旧缰绳儿，摆置到菩萨娘娘脚下；再把一条用槐米染得黄灿灿的新缰绳在菩萨手掌上绕过三匝，套到他的脖子上。那条黄色的缰绳儿确实拴住了他的性命，免遭在他身前的三个哥哥夭折的厄运；却又使他吃了不少苦头，上树时挂住树枝，打架时被对方揪住了就成为绞索。有一年，母亲又要他系上一条红腰带，后来才知道那是他第一个本命年。本命年之后，母亲把旧缰绳儿卸下来再没有给他套新缰绳儿，给菩萨娘娘的供桌上整整摆下八盘花馍，都是用上好的细面捏成的石榴沙果麦穗棉花兔儿猪儿等等，

是父亲用两只竹条笼挑来的，父亲和母亲从两边夹着他一起叩拜三匝就出了庙门。那天，父亲破费给他买了一碗豆腐脑儿，一个油饼和一碗饸饹……又过了三年，父亲领着他走进太平镇车木匠的铺店，让他跪下拜师；满屋子的木屑气味骚得他打了三个喷嚏，父亲便在他跪着撅起的尻蛋上踢了一脚。师傅咂着烟袋只说了一句：“我脾气不好。你得听话。”

车木匠身怀绝技做一手绝活，一架木轮子牛车打成，即使木质糟朽，轮子磨断，卯榫木楔也不会松动。他打制牛车的手艺远近闻名，虽然能置备得起大车的主户极其有限，但他的诀窍绝活的名声却把百余里外的活儿都揽来了，一年四季都有定做的牛车。芒娃儿头年进店，给师傅师母晚上提尿盆早晨倒尿盆，扫地担水，递烟盘抱娃娃，烧火洗锅诸种杂事一齐包揽，二年里连斧子刨子凿子的把儿也没摸过。第三年开始学艺，按规矩要到五年末了才算出师。两年的打杂生活使他贴切和谐地融进这个家庭，师母早已不再称他郑相，而是直呼芒娃儿芒芒了，师妹师弟们也都亲热地尊称他芒儿哥芒芒哥了。在他熬满两年的打杂期即将开始学艺时，师傅遗憾地说：“这个屋里倒离不得你了啊芒芒儿。”芒娃儿随和地说：“那我就再打二年杂，等你找下合适的徒弟了我再学手艺。”师傅摇摇头：“没有这个理儿咯！你是来当徒弟来学手艺的，不是给我熬长工当使唤娃的咯！你明日个就开始捞锛子斧头。”

芒娃儿捞起锛子，锛掉那些原木身上的圪节，用斧头砍剥干死的树皮，帮助师傅和两个师兄扯锯。最轻的活儿是拉墨斗，浸满墨汁的线绳儿拉出墨斗时，搅把儿啪啦啦响着转着，师傅提起绷紧的墨绳儿又松开手指，嘭的一声弹下去，新鲜的原木上就留下一条笔直的黑线。从那些粗活笨活开始到凿卯画线这些细活儿，芒儿已经精通。两

年下来三年未到，离出师还有一年，芒儿已经成为一个全挂把式，当然除过车轴的旋制。剩下最后一年，将主要学习旋制车轴的技术。芒儿对师傅说："让我打一副车轴试试。"师傅惊诧地眨着眼，以为耳朵出了岔儿。芒儿立即解释说："弄瞎了我赔木料。"师傅这阵已经相信他会打好一副车轴，却吓唬他说："一根轴料值半个车价。"芒儿说："行咯！满师了我给你再干一年不要工钱。"师傅就用脚踢着一根菀枣木轴坯："打好了的话，明日起给你算工价。"

芒儿打制车轴的成功造成了师傅的恐惧，他悲哀地说："我后悔收了你这个徒弟。"芒儿能听出来话味儿，师傅害怕他学成回去也开一爿车店，自家的独门生意就做不成了。芒儿说："师傅你放心，只要你不弹嫌我，我就在你这铺子干到老。"师傅说："你这娃娃不得了，你太灵了……"芒儿的成功使两位比他年长、投师时间也更早的师兄感到了难堪，他们好像商量过似的齐茬儿不理芒儿了，逢到芒儿需得他们帮忙抬木头拉墨斗的时候，大师兄倒还罢了，二师兄把所有的妒火都表现在脸上，故意摆出漫不经心的傲眉气眼，手下碰着什么就摔掼什么。芒儿只当看不见听不着。师傅却看不下去了："把劲使到正向上，把眼窝盯到卯窍上，谁都能学好手艺。"二师兄虽然表面上有所收敛，恶根却就此伏下。

这天，师傅借来一头牛，套上新打成的一架大车，这车上就安着芒儿打制的头一根车轴，师母和一家大小坐在车上去逛庙会。师傅邀芒儿一起去。芒儿想到两个师兄就说："我不去，我自小就不爱逛会。"师傅大声说："你当我叫你逛会？我让你试一下你打的车轴，听听声儿看看哪儿有毛病。"芒儿就上车去了。师傅坐在车辕上摇着鞭杆，时不时地提醒芒儿："你听这声是啥毛病？轴紧。记住，轴紧了就是这声儿。"师母坐在车箱里的麦草蒲团上，风光地挺直着腰身，水抹

的头发熨帖在鬓角。小儿小女叽叽喳喳在车箱里欢叫着猴闹着。大女儿小翠坐在车尾上，默不作声地偷偷瞄着芒儿。芒儿坐在另一边的车辕上几乎不敢回头，害怕瞧见那双眼睛。牛车到了庙会以后，芒儿就抽身回来了，他一回来就捞起家伙陪两个师兄干活儿。临近晌午饭时光，大师兄踅摸到芒儿跟前说：“兄弟，俺妈身子不美气有多日了，我给师傅说了，师傅让我后晌回去看看。我想早走一步，不想吃晌午饭了。你甭给师傅说我是晌午走的。”芒儿故意做出轻淡的口气说：“哈呀，你给师傅省下一顿饭还不好咧？再说，兄弟我就那么嘴长爱说话呀？你放心走。师傅不问我不说，要问我就说你是后晌走的。”大师兄拍打一下身上的木屑就出门回家去了。二师兄却油里吧唧地说：“兄弟我也给你告个假，我到镇上下馆子去呀！你去给师傅戳我的窝，燎我的毛，说我没干活我不怕。”芒儿停下手里的锯：“二哥，你这话咋说？我没惹你呀？我啥时候戳过你的窝，燎过你的毛，你把话说到明处——”二师兄摇晃着并不雄健的细腰走出工房去了，吱的一声吐了一口稀唾沫儿。芒儿已经习惯了二师兄的阴风邪火，也不在意，重新捉住锯把儿，一脚踩在地上，另一只脚踩踏着木板，推着扯着锯子上下运动，发出一声声柔和悦耳的吱啦吱啦的声音，粉碎的锯末儿流落到地上。工房里只剩下他一个人，清静的气氛难得逢遇，他的心境心绪十分舒悦，悠悠地扯拉着木板，耳朵里浮响着牛车在乡村官路上行进时悠扬的嘎吱声，那是他旋磨打制的第一根车轴滚动时发出的无比美妙的声响，通过耳膜留驻到心里了。这当儿，有人从背后捂住了他的眼睛。芒儿以为是二师兄下馆子回来了，不在意地说：“好咧好咧，快放开手。你在馆子咥饱了，我还得动手自造伙食哩！”身后的人仍不吭声也不松手。芒儿反手在背后那人的腰里挠抓一把，不料却听到一声清脆的女人的尖嗓门惊叫，回过头一看，竟是小翠，不觉脸红耳赤。小翠却不在意地说：“芒儿哥，我赶回来给你做饭来了。你说吃啥呀？你想吃啥我给你做啥饭。”芒儿一颗惶惶的心稳住了，笑着说：“打搅

团儿，我顶爱吃搅团鱼儿。”小翠一甩长辫子就朝灶房走去，临到厨房门口又回过头说：“搅团这饭得俩人做，一个人烧一个人搅。咋办？你得给我来拉二尺五。”芒娃说：“烧锅我是老把式了。到时候你顾不过来你喊我。”

小翠回来以后，工房里和整个庭院里一年四季极其少有的清静安谧的气氛没有了，似乎弥散着一缕神秘的令人鼓舞的气氛，往锅里倒水和瓢碗撞绊的声音从小灶房里传出来，不时传进呲呲啦啦响着锯声的木工房，令人心里鼓荡又令人惊悸。看看几乎拉偏的锯缝，芒娃儿丧气地扔下锯子，躺到工房墙角的大炕上，缓缓气儿也静静神儿。小翠风风火火跷进门来，还未等他转过身坐起来，她的手已经抽击到他的尻蛋子上，手腕上戴着的石镯硌得他疼疼的。她尖声嗔气地发着脾气：“懒兽！说的给我烧锅，倒背起炕面子来咧！要我撕你耳朵呀？”芒儿讪讪笑着揉搓着被打疼了的屁股蛋子：“我还当你没搭手点火哩！”说着就跷出门去，急火火走过院子钻进灶房。小翠随后跟进来问：“你爱吃酸辣汤浇搅团，还是臊子汤浇的？”芒娃儿随和地说：“都好，我都爱吃。”小翠说：“你这人儿好没主意，倒是吃哪样儿的？”芒娃儿说：“当然还是臊子汤浇的香。”小翠说：“你去街上买一斤豆腐，肉还有哩，再捎带一撮芫荽，有芫荽味儿香。”芒娃儿点头应着就往外走。小翠喝住他：“你不拿钱，拿脸蹭人家的豆腐呀？”芒娃儿说：“我身上有哩！”小翠说：“你有是你的，你攒着。”说着撩起衣襟，在红裹肚儿里掏钱。芒娃儿看见了小翠的绿色腰带和微微隆起的小腹，急忙转过脸眼。小翠一点不察觉也不在意，一股脑儿把钱塞到芒儿手里，攥住他的手腕叮嘱说：“可甭把钱掉了哇大大爷。”抿嘴笑着看着芒娃儿挎着篮子走出院子。

芒娃儿买豆腐和芫荽回来，把剩下的几个麻钱掏出来搁到案板上，转过身要走，小翠扬起脸说："你这人好没规矩——"芒儿惶惶地问："咋咧我又咋咧吗？"小翠头不抬，手不停地咚咚咚剁着萝卜丁，说："把钱拾起来，刚才我是咋样给你的，你也咋样还给我。撂到案上算咋回事？"芒娃儿舒口气笑着从案板上捡起麻钱，捉住她按着萝卜条儿的手，把麻钱压到手心，说："给吧！这算啥规矩？"小翠扑哧一声笑了，从左手把麻钱转到右手，迅即塞到芒娃儿的口袋里："哥儿勤，爱死人；哥儿懒，棍子撵。这算犒劳你的跑路钱。"芒儿从衫子口袋掏出麻钱："这——我不要……"小翠抓住他伸过来的手又送回衫子口袋里，嘻嘻哈哈地说："装上装上，芒儿哥你装上，上街买个糖圪垯儿油麻花儿吃；吃的时光甭忘了是妹子疼你给你钱买的。"芒儿登时红了脸，把话岔开了："你这会儿才拾掇臊子哩，烧锅拉风箱还得等一时儿，我先扯锯去。"小翠从篮子里取出芫荽扔到他怀里："坐下择菜。菜择完了掏灶灰。灰掏净了再绞水……你想吃我侍候你的省手饭？"芒儿坐在水缸旁的小凳上择菜，芫荽的香味儿直钻鼻孔。小翠坐在案板前的独凳上切完萝卜丁，抓过豆腐刚切了两刀，歪过脸抿嘴笑着："我的围腰带儿开来咧，芒儿哥你给拴一下，我的手水稀稀的。"芒儿迟疑一下从小凳上站起来，走到小翠身后轻轻把松开了的围腰带儿拴好。小翠用手捋了捋说："太松了。解开重拴，拴紧些。"芒儿解开往紧勒，尚未拴结完毕，小翠又虚张声势地叫起来："哎哟哟芒儿哥！你把人家的腰勒断咧！"芒儿停住手问："该是咋样拴着才合尺？"小翠捞着刀小心翼翼地切着豆腐，悠然自得地说："你真笨，像是八辈子也没拴过围腰带儿。拴好了你用手试试嘛。能插进去一只手就合尺咧！"芒儿重新拴结好系带儿迟疑地垂着手，已经反复拴过三次，他都是小心谨慎地用手指捏着系带儿，避免触及小翠后腰上的月白色夹衫。他现在提起右手掌，遵照小翠的指导，贴着脊梁插下去，围腰的系带儿绷在手背上，先是触到月白色布衫，随之就感触到奇异的一种温热，那一

刻他的周身一颤，愣呆住了。小翠又叫起来：“哎哟哟，试一下就对咧嘛！整晌整晌把手塞到人家腰里做啥？娃子家不害羞！”芒儿羞得满脸绯红，急忙抽手出来，嘴里咕嘟着掩饰自己的窘态：“你故意耍笑人……我不吃饭了，我走呀！”说着甩手转身就走。小翠咣当一声扔下刀蹦到门口，双手叉住门框，歪着脑袋笑着念起儿歌来：“小哥哥，脾气嘎；跟人耍，不识耍；不识耍，拿屁打；打倒地，还要耍……好咧好咧，好我的灶神爷哩！你坐下烧锅吔！”芒儿不窘了，也没气了，坐下来点火烧锅拉起了风箱。

小翠给后锅里倒下清油，锅台口的柴烟呛得她咳嗽得弯了腰，又打着喷嚏，抹着眼泪说：“芒儿哥，耍是耍笑是笑，妹子给你可是说句知心话，你得练好拉二尺五的本领，日后有了媳妇了，嫂子就不弹嫌你烧锅尽冒烟不出火……”芒儿反倒从从容容嘘叹起来：“噢呀呀！俺屋穷得炕上连席都铺不起，哪里来钱娶媳妇？我一辈子打光棍省得麻缠。”小翠把切好的红白萝卜丁儿倒进锅里，爆出一声脆响，一边用铲子搅着，一边瞅着灶下的芒儿耍笑：“芒儿哥你甭愁，我给你娶个花媳妇：红裙子，黄肚子，尻子一撅尿你一溜子。那可是个椿媳妇，不花钱，椿树上多的是，一扣手能逮好几个……”说着又笑得淌出泪来。芒儿甩下风箱杆儿站起来：“你还耍笑我这个穷娃。我是来学手艺的相公不是你的耍物儿……”小翠止住笑，吃惊地盯着芒儿，往前凑了两步，贴住盛怒的芒儿的耳朵悄声说：“你不要椿媳妇给你个真媳妇，妹子给你当媳妇你要不要？”芒儿吓得噢哟叫了一声，捂着耳朵红赤着脸又坐到灶锅下的木墩上：“你这——还是耍笑我……”小翠双手往腰里一叉，放大声说：“耍笑你？谁耍笑你？你敢要我我就跟你走。你站起来引我走——看我是不是耍笑你？”芒儿坐在木墩上仰起脸，看着小翠狠心决意的派势，自己倒妥协了，赔笑脸说：“悄着声儿啊小翠，当心杂货铺子听见了就麻缠咧！”小翠撇撇嘴角儿：“你跟我说话一说三蹦，

倒是怯着杂货铺子。”芒儿叹口气儿说：“你是人家杂货铺子的人呀！”小翠一把推开前锅的锅盖，把烧开的滚水用木瓢舀起来倒入后锅煎好的臊子里，忙里偷闲地扭过头笑着说：“妹子要是你的人就好咧！我又要笑穷娃了。你再恼？！”芒儿听了，急忙低了头拉风箱，左手慌乱地往灶台里塞进刨花柴，却忍不住想流眼泪，胸腔里憋得透不过气儿来，奇怪自己到底怎么了？

小翠没有察觉悄悄抹去眼泪的芒儿，只顾一手往锅里撒着苞谷面，右手使劲搅着勺把儿，口里还在念着歌曲儿：“狗烧锅，猫擀面，狗择葱，猫砸蒜；一家子吃顿团圆饭……”芒儿听着忍不住笑了，仰起头看着小翠，撒着面和搅着勺把儿的两只手腕上，玉石手镯随着手臂的动作抖晃着，她的腰随着搅动的勺把儿扭动着，浑圆的尻蛋儿突兀地撅起来，芒儿觉着胸腔里鼓荡起来，萌发出想摸小翠尻蛋儿的欲望，自己反而吓得愣呆住了。小翠已经撒完面粉，腾出左手来帮着右手一起搅动勺把儿，无意的一瞥间发现了芒儿愣呆的眼神儿，斥责说：“胡盯啥哩？锅凉了火灭咧！不好好烧火光卖眼。”芒儿这回着实惶恐地拉起风箱，再也发不出脾气来，烧得火焰从灶口呼啦呼啦冒出来。小翠喊：“火太大了，锅底着了，悠着烧。”说着双手抱住勺把儿在锅里使劲搅起来，发出噗噗噗的声响。小翠突然凄厉地尖叫一声，扔了勺把儿，双手捂住脸呻唤起来。芒儿慌忙站起来问：“咋咧？”小翠痛楚地说：“一团儿面糊溅到我脸上哩！”芒儿看见小翠脸膛上被面糊烫下一片红斑，忙问：“疼得很吧？”小翠哭溜溜腔儿说：“哎哟疼死了。”芒儿搓着手说：“獾油治烫伤好得很。我到镇子上问问谁家有獾油。”小翠忸怩着说：“獾油脏死了，找下我也不要。”芒儿无所措手足地说：“那咋办？要是发了化脓了更麻烦。”小翠怯怯地说：“有个单方倒是方便，就是怕……”芒儿说：“不方便也不怕，我去找。你快说啥单方？”小翠说：“听人说用唾沫儿润一润能治。”芒儿说：“那你吐点

唾沫儿用手指抹抹就行啦嘛！”小翠羞怯地扭过头说：“男的烫了用女的唾沫儿润，女的烫了得用男的唾沫……”

芒娃怀着庄严和神圣的使命往小翠跟前挪了一步，刚刚举起双手时似乎沉重千钧，双手举起以后又轻如浮草，双手搭在小翠肩头的一瞬顿然化释了庄严和神圣，他尚未把唾沫儿用舌尖润到她的烫伤处，小翠猛然转过身来，双手搂住他的脖子，把闭着眼睛的脸颊紧紧偎贴在他的脸上。他双手随即搂抱住她的双肩，有一种强烈的欲望不断膨胀，那欲望十分明晰又十分模糊，似乎是要把她的躯体纳入自己的胸膛？他不知道该做什么，除了一阵强过一阵的臂力的搂抱。芒儿感到脸颊上一阵疼痛，随之又麻木了，模糊地意识到她的牙齿咬着他脸膛上的肉，温热的嘴唇和坚硬的牙齿同样美好。小翠突然松了口侧过头，把她温柔的脸颊贴到他的嘴上，喃喃说：“芒儿哥，你也咬妹子一口……你狠劲咬，把肉咬下来我也不疼……”芒儿嘴唇紧紧贴着她的脸蛋儿，不忍心咬，只是紧紧地吮吻着。小翠突然推开他，脸色骤变……他同时也听到了院庭里的一声咳嗽。

俩人随之所做的表情伪饰全部都变得毫无用处。咳嗽声是二师兄故意警示他俩的。二师兄平素对车老板一家钟爱芒儿早已积气成仇，他在这个大车铺店整整干了七年，仍然只是劈斧扯锯刨粗坯等粗笨活儿，凿卯一类稍微细致的活儿师傅也不放心他去做，更不要说旋制车轴了。他对继续吃木工行这碗饭信心不足兴趣衰败，现在正好撞到了一个改换门庭投靠新主和报复怨敌的双重机会。他早已无法容忍小翠呼叫芒儿时那种骚情的声调骚情的眉眼和骚情的姿势，而那样骚情的声调一次也没有给予过他；他在车老板手下吃不开的处境，不是手艺技能的原因而纯粹归咎于小翠；车老板听信老板娘和女儿的好恶，想抬举谁谁就红火，想捏灭谁谁就甭想起火只能冒烟。他今天对芒儿与

师傅全家同乘一挂牛车去逛庙会十分忌妒，却说不出口，芒儿半晌回来小翠接着也回来的举动，使他从妒火烧昏中清醒过来，似乎悟出某点意思。他本打算在镇上馆子饱餐一顿，然后到杂货铺的后院里度过一天时光，那儿是一年四季也不散场的掷骰子摸牌九的场合，其实他没有赌资，仅仅是看看旁人的输赢手气。现在他站在赌桌跟前，看着赌徒们神态各异地抛掷出六颗骰子，刻印着圈圈点点的骨质骰子在敞口瓷钵里当啷啷转着，听着赌徒们欢呼和唉叹的声音，已经刺激不起他的兴趣，脑子里总是闪现着车老板的那个并不美好的铺店，而且透着一种神秘的气氛。他悄悄走进大门，立即判断出神秘的场合在厨房里，小翠骚情的笑声更加证实了他的猜测。他踅到窗外就看见了小翠咬着芒儿脸蛋儿的情景，一下子刺激得他两腿酸软，眼球憋疼。他蹑手蹑脚又踅回街门口，装作刚刚走进院子，漫不经意地咳嗽了一声……

小翠蹦出灶房，格外亲热地招呼他吃饭。他心里鄙夷地想：晚了，太晚了！你娃娃这阵儿才用骚情的眉眼跟我打招呼，太晚了……他随后就走进了杂货铺，不是去看掷骰子摸牌九，而是自信心十足地走进杂货铺接待佳宾贵客的礼房。

二师兄辞别牛车铺店到杂货铺去当店员，同时给了芒儿和小翠以毁灭性威胁；提心吊胆惶惶不安地过去了五六天，杂货铺王家没有任何异常反应，又把一丝侥幸给予他俩：二师兄根本没有瞅见他俩相搂相咬的情景。时过一月，依然风平浪静，小翠便大胆向父亲母亲提出和杂货铺退亲，而且说出了根深蒂固的忧虑：“一团子面糊儿溅到我脸上，芒儿哥帮忙给我擦，就这事。我恐怕二徒弟看见给王家胡说，那样的话，我过门后就活不起人了。不如趁早……”车店老板和老伴经过方方面面的周密考虑，作出两条措施，一是辞退芒儿，二是立即着媒

人去探询杂货铺王家娶小翠的意向。车木匠作出这两条举措是出于一种十分浅显的判断，二徒弟如果给王家说三道四，王家肯定会有强烈反应，因为王家在这镇子上向来不是平卧的人。二徒弟早有弃艺从商的心思流露，车老板把他的突然离去肯定为巧合。媒人到王家探询的结果完全证实了车木匠的判断，王家正打算着手筹备婚事，而且初步设想的规模红火而又隆重，根本没有一丝一毫的异常迹象。

车木匠对于小镇生活人际关系的盘算远远不及他对牛车各个部件卯窍设计得那么精当，直到小翠坐着花轿离开牛车铺店进入镇子南头的杂货铺，正当他悬空已久的一块石头落到实地，骤然发生的事变就把他震昏了。合欢之夜过去的第二天早晨，车木匠两口子早早起来酬办酒席，准备迎接女婿和女儿双双结伴来回门。太阳冒红时，他迎接到的是女婿的骂街声，新姑爷从镇子南头一直骂过来，在镇子中心的十字路口停住，不厌其烦地反复吼叫着一句骂人的话："咱娶回来个敞口子货嘛！敞得能吆进去一挂牛车！"常在杂货铺后院聚赌的那伙街皮二流子们跟在尻子后头起哄，投靠新主的二徒弟得意地向人们证实："早咧早咧，早都麻缠到一搭咧！早都成了敞口子货咧……"车老板脸上撑持不住，从街巷昏头晕脑跑回大车铺店，刚进街门就吐出一股鲜血，跌翻到地上。

小翠在刚刚度过一夜的新房里呆坐着，街上的骂声传进窗户，她的被惊呆的心很快集中到一点，别无选择。小翠现在完全明白了这个不露丝络的圈套已将自己套死。新婚之夜，男人在她身上做了令她完全陌生惊诧的举动之后就翻了脸，说："啊呀！你咋是个敞口子货呢？你跟谁弄过？你说实话……"她无法辩解，揩净女儿家那一缕血红之后就闭上眼睛，断定自己今生今世甭想在杂货铺王家活得起人了，那阵儿还没有料到女婿会唱扬到街上去……她关了新房的木门，很从容地

用那根结婚头一天系上的红色线织腰带绾成套环儿，挂到屋梁的一颗钉子上，毫不犹豫地把头伸了进去，连一滴眼泪也不流。

新姑爷骂完以后就去车老板家报丧，肩头还挑着回门应带的丰盛的礼品。他进入岳丈的牛车铺店时礼仪备至，放下礼品鞠过躬行过礼开口就报丧：“你女子上吊了。晌午入殓，明日安葬，二位大人过去……”又指着两笼礼品说：“这是回门礼，丈人你收下，人虽不在了礼不能缺。”车老板刚刚被人救醒，强撑着面子说：“嫁出的女子泼出的水，卖了的骡马踢过的地，由新主家摆置；我一句话没有，一个屁不放，你看着办去。”新姑爷告辞以后，车老板疯了似的指着垒堆在桌子上的大包小包回门礼物：“撂到茅坑去！快撂快撂……”

在入殓和埋葬小翠的两天里，车老板让大徒弟套上牛车，拉着一家大小躲到相距二十多里远的一个亲戚家去了。杂货铺王家用薄薄的杨木板钉成一个只能称作匣子的棺材，把小翠装了进去；为了预防凶死的年轻鬼魅报复作祟，王家暗暗用桃木削成尖扦扎进死者的两只脚心和两只手心。镇子上没有人来搬抬棺材，那不是杂货铺王家的乡情寡淡，而是谁也不愿沾惹这个失去贞操的凶死鬼的女人，末了只好用牛车拉到坟坑前草草埋掉。五六天过后，车老板一家又坐着牛车回到镇上，继续打制他的绝活儿。不出一月，可耻可憎的小翠就不再被人当作闲话，也不见凶死鬼闹什么凶事，肯定是四支桃木扦子钉死了她。百日以后，杂货铺王家以大大超过前次婚娶的派势又娶回一位贤淑的女子，连演三天三夜大戏，意在冲刷与车木匠家婚事的晦气霉运。

杂货铺王家婚娶唱戏的消息传布很远。芒儿当夜赶到戏台底下，重新回到熟悉的镇子深情难抑。他用锅墨把脸孔抹得脏污不堪，把一顶边沿耷拉的破草帽扣在头顶。他在王家杂货铺出出进进三次，虽然

没有人辨认出他来，却也找不到下手的机会。耍媳妇闹新房的年轻人宁可放弃看戏，兴致十足地拥挤在新房里和新媳妇调情耍闹，直到大戏散场、知更鸟在微熹的天空迭声欢唱的黎明。第二天晚上，芒儿故意拖迟来到戏台下，转了两圈终于在戏台右侧的人窝里瞅见了二师兄的模脑儿，瞅准了他所在的位置旋即离开了，于夏夜深沉戏剧唱到高潮处时潜入杂货铺王家。头天晚上被闹房的人耽搁了的良宵美辰现在得到补偿，新郎新妇不顾前院后院为戏班子做饭送茶帮忙打杂的人出出进进，便迫不及待吹灯合衾了。芒儿那时候正潜藏在炕头和背墙的一个窄窄的空当处，上面搭着两张木板，底下通常是夫妇放置尿盆和内物的阴暗角落。他是在新婚夫妇睡前双方到上房里屋向老人问安时溜进新房藏下来的。如果等两个人欢畅过后进入酣睡下手更加万无一失，芒儿不仅缺乏那种忍耐，而且恶毒地下了死狠心，至死也不叫你狗贼享一回新媳妇的福。他听着炕上的呢喃和羞羞的怯笑，又听见被子被豁开的声音，就从炕头那个窄狭的空当爬出来蹲在宽敞的脚地上，站起身来的时候，手里的杀猪刀就捅进刚刚翻起身来一丝不挂的新郎的后心；新娘叫了一声即被芒娃卡住脖子，一拳打得昏死。芒儿溜出门大摇大摆径直走到戏楼右侧来，挤进人窝，在黑漆漆的戏台下继续他的报仇计划。他一步一步往前挤着，终于挤到早看好了的二师兄背后，扬起左臂装作擦汗，其实是为遮住从旁边可能斜过来的眼睛，然后在左臂的掩护下，把沾着主人鲜血的杀猪刀又捅进伙计的后心。二师兄像是吃东西噎住了似的喉咙里“咯儿”一响，便朝前头站着的人身上趴下去。前头的人很讨厌地抖一下肩膀，二师兄又倒向后边站着的人，倒来倒去人们以为他打盹哩！一当发现这是一具淌着鲜血的尸体，台下顿时乱了套。芒儿已经再次走到杂货铺的青砖门楼下，听到了戏楼那儿惊慌的呼喊，眼看着王家屋里的人鱼贯奔出往戏台下去了，扬起手抖一抖门楼上挂的两只碌碡粗的红灯，蜡烛烧着了红灯的红绸和竹篾骨架，迅即燎着了房檐上的苇箔，火焰蹿上房去了。芒

儿夹在混乱的人群里并不惊慌，大家都忙于救人救火，谁也顾不得去查找杀手。芒儿亲眼瞅着杂货铺大门里抬出了僵死的新郎，又看着杂货铺变成一片火海，随后就悄然离开镇子。芒儿来到僻远的周原坡根下，站在小翠的坟丘前，把沾着杂货铺主仆二人鲜血的杀猪刀扎进坟前的土地里；为了某个明确和朦胧的目的，他把身底那件蓝布上扎绣着蛤蟆和红花的裹肚儿脱下来，拴在刀把上，就离去了。

多日以后，有人发现了小翠坟头的杀猪刀和裹肚儿，杂货铺王家拿着这两样东西报到县府。县府的警官又拿着这两样东西找到车店老板。车木匠一看就说："裹肚儿是芒儿的。"车店老板娘却不敢再添言，那蓝地儿红花蛤蟆的裹肚儿是小翠扎花缝下的。县府立即下令追捕郑芒娃……芒儿根本不知道这些过程，他已经进入周原东边几百里远的白鹿原上的三官庙，跟着老和尚开始合掌诵经了；世界上少了一个天才的车木匠，多了一个平庸乃至不轨的和尚……

"你看黑牡丹这婆娘咋样？"大拇指问黑娃，不等黑娃说话他就揭了底，"她就是杂货铺王家娶的那个新媳妇。"

黑娃不由地"噢"了一声。

"她在王家守寡。"大拇指说，"男人给我戳死了，她还为他守志，想立贞节牌坊。我才把她掳到山上来叫弟兄们享用……"

黑娃舒口气说："倒也不怪她……"

"当然不怪她。我是让杂货铺王家也难受难受。"大拇指狠毒地说，"我本该是个手艺人靠手艺安安宁宁过日子，咋也料不到要杀人要放火闹交农蹲监牢！旁人尽给咱造难受教人活得不痛快，逼得你没法

忍受就反过手也给他造难受事，把不痛快也扔到他狗日头上，咱就解气了痛快了。你黑娃走的不也是这个路数吗？”

黑娃点点头连声说：“对对的！”

“现时你还有啥想不开的呢？都弄到这一步了还计较一个女人干尿！”大拇指一甩手说，“我不说你只说我，而今活下的都是赚下的。无论是烧杀杂货铺还是交农蹲号子，要说死早该变成粪土了。我能活这些年都是赚下的，往后活得越多就赚得越多。想法儿痛痛快快地活着。说不定哪一天死了也就完了，也就够了。”

黑娃叹口气悻悻地说：“一样。一模一样。我的阳寿也是赚下的。”

“这么说就好咧！”大拇指高兴地说，“只有当土匪痛快。咱哥俩扭成一股，摊二年工夫把人马扩充到二百，每个弟兄都能掮上一杆快枪，咱就活得更痛快了。咋哩？官军而今一门心思剿灭游击队，腾不出手来招惹咱们；游击队也是急着扩充人马和官军兜圈圈，跟咱根本没啥交葛；只有葛条沟那一帮子是咱的祸害……”

黑娃一拍大腿：“把狗日连窝儿端了！”

“端是要端，得瞅好机会。”大拇指说，“葛条沟辛龙辛虎那俩货脑子里安了一个转轴儿。四乡闹农协闹得红火那阵儿，你的那个姓鹿的共产党头儿找他，三说两说他就随了共产党；农协塌火了官家追杀游击队，他扔了共产党游击队牌号儿又打出土匪的旗旗子。这种人谁敢信？这俩货而今比咱难受，游击队恨他想收拾他，他也叼空想收拾游击队；他急着想扩充力量对付游击队，拉我跟他合伙，我不干。跟这

种货谁敢共事？他就想拾掇我的摊子端我的老窝儿。一句话，这货不除终究是咱的祸害！”

黑娃还是冷冷地重复一句：“咱先把他的老窝端了。”

“好。”大拇指举起酒碗说，“咱们就开始准备这件大活儿吧。”

黑娃饮下一碗酒：“放心啊大哥。黑娃脑子里没有转轴儿，是一根杠子。”

天色透亮。大拇指说：“夜个黑间有个人来寻你，我让他先睡在你的炕上……”

黑娃忙问：“谁？谁还来寻我？”

大拇指笑笑：“你进门就知道了。”

黑娃走进自己的山洞，惊得叫起来：“哦呀兆鹏……”

第二十二章

黑娃看见坐在自己铺炕上的人，愣怔许久才辨认出兆鹏来，随之俩人就交臂呼叹起来。黑娃久久地瞅视着兆鹏，头上缠裹着一条脏兮兮的蓝布帕子；穿着一件褪色的蓝色对襟布衫，肩头缀着一块白布和一块黑布补丁，衫子的下襟过长，苫住了前裆又盖住了屁股；黑色布裤，又缀着蓝布和紫红色的补丁；脚上蹬着一双五麻六道的麻鞋，白布裹毡从脚趾一直缠扎到膝盖；从头顶的帕子到脚下的裹缠布，全都污染着草汁树液漆斑和苔藓的干涸的黑色疤痕；脸上也布满污垢，耳轮里和脖颈上积结着黑色的垢甲，鬓角露出来的头发粘成毡片，与白鹿镇小学校里那个穿一身藏青色制服的潇洒精干的鹿兆鹏无法统一到一起，完完全全变成一个地地道道的秦岭深山里的山民了。如果寻找破绽，就是那一口白色的牙齿。山民们也许生来就不懂得刷牙，也许是饮水的关系，十个有十个的门牙都是黄色，像是蒙了一层黄色的瓷釉。鹿兆鹏仍然保存着在白鹿镇小学当校长时那一口白得耀眼的牙齿。黑娃笑着说："要不是你这一口白牙，我根本就认不出你咧！"鹿兆鹏笑得牙齿更白更耀眼了："你而今人强马壮，你把世事弄大了，老哥投奔你来咧！"

黑娃从炕头的架板上取下酒瓶儿，又叫醒了管伙做饭的兄弟，端来了刚才留给他的那些饭菜，在冒着一股粗壮黑烟的吊盏油灯昏黄的光亮里，俩人举起盛着清凌凌的酒液的粗瓷碗，黑娃大声慨叹起来："哎呀兆鹏哥，咋也想不到咱兄弟俩在这儿会面咧！我常想着咱俩怕是今生今世谁也见不着谁了。兄弟而今没牵没挂，没妈没爸，没婆娘没娃，落得个光独独的土匪坯子咧！喝呀喝呀，咱兄弟俩敞开喝……"借着酒兴，黑娃把他揣着兆鹏的手条怎么寻找习旅、怎么从士兵受训到

成为习旅长的贴身警卫、怎么参加暴动及至踩着麦捆子似的尸体死里逃生、怎么落草山寨一下子倾吐出来，说完大哭："兆鹏哥，我只听你说闹农协闹革命穷汉得翻身哩，没想到把旁人没撞动，倒把自个闹光了闹净了，闹得没个落脚之地了……"兆鹏的脸膛也泛起红色，撕去了头上的帕子，大声沉稳地说："知道，我都知道。"黑娃瞪着眼狠狠地问："你都知道？你见过尸首跟麦捆子一样稠地摆在地里的情景？你看见习旅的士兵倒下一茬子拥上一茬子，再倒下一茬子再拥上一茬子的情景？你知道习旅长抱着机枪杀得两眼着火的情景？我挨枪子的时光习旅长还活着，后来就不知道他死了呢还是活着……"兆鹏仍然不动声色地说："你说的情景我都知道。策划那场暴动时我也参与了。习旅长那阵子没死，带着余部出潼关到了河南，东逃西躲一月之久，还是没有站住脚……他死的时候枕着机枪。我们唯一的一支能打仗的正规军就此完结了。"黑娃问："事情过去了，我想问你一句，你们策划暴动的时光，想没想到过这个结局？"鹿兆鹏说："想到了。"黑娃惊异地问："想到了还硬要伸着脖项去挨刀？"鹿兆鹏仍然沉稳地说："你忘了习旅长讲的'七步诗'的故事？作出诗是死，作不出诗还是死！就是这样。"黑娃叹口气："完咧。到底还是给大哥煎了。"鹿兆鹏却冲动起来："完不了，怎么能完了呢？真正的革命现在才开始了啊黑娃兄弟！"黑娃正灌下一口酒，瞟了兆鹏一眼，垂下头默默地夹起一块野猪肉咀嚼着，良久才找到一句恰当的话："革命开始了，你咋么有空儿到我这儿逛来咧？"鹿兆鹏也找到一句恰当的话："我嘛，瞅中你的好营生……入伙来了。"黑娃立即敏锐地作出反应："兆鹏哥，你甭耍笑。"兆鹏说："我没耍笑。我来了就不走了，入伙！"黑娃当即说："这话跟我再不能往下说。要说明日跟大拇指当面说。"鹿兆鹏说："那当然。你还是很义气。"黑娃说："天快明了，咱们睡觉。明日个跟大拇指当面说。"

黑娃一觉醒来，已是第二天傍晚，木杆上吊着的灯盏已经点火，在夕阳的红光里闪耀。那是一只生铁铸成的盆子，里面装着麻油，燃着一根擀面杖粗的油捻子，黑烟滚滚，空中飘浮着未燃尽的烟油絮子。这是重要宴庆的信号。伙房里接连传出煎油爆炒的脆响。弟兄们出出进进嘻嘻嚷嚷，显然是被好酒好菜鼓舞着。他找到大拇指的洞穴。大拇指兴致勃勃地说："弟兄们好久没有团圆了，今日个犒劳一顿吧；二来为你解解心烦；三来嘛，你有朋友到来，这可是你生死之交的朋友。你的朋友就是我的朋友，理应款待。"黑娃想告诉大拇指兆鹏入伙的事。大拇指仍然朗声说："先咥了饭再说。"

大吃猛喝一毕，尚未醉倒的土匪们练开了功夫，有的练拳，有的舞刀，有的练枪法，有的练爬树翻墙，有的练捆缚敌手，倒显得生龙活虎。黑娃引着兆鹏进入大拇指的洞穴。大拇指不用寒暄，不讲客套单刀直入："我的二拇指说你想入伙？"

"是的。"兆鹏点点头。

"真的？"大拇指套问。

"真的。"兆鹏平静地肯定。

"你把'真的'这话连说三遍。"大拇指盯着他说，"看你能不能说得出来？"

"好咧好咧！"兆鹏释然笑了，"说真的也算真的，说半真半假也是半真半假，可不完全是假的。"

"完全是假的。"大拇指不屑地说，充满了自信，声音的平静愈显出透里知底的决然肯定，"你是想把我的弟兄纳进你的游击队。你入啥

伙哩！”

“你比神瞎子的卦还算得准。”兆鹏也很平静，没有一丝被戳穿的尴尬，坦然笑着反问，“真要这样，你说行不行呢？”

“天爷！空里的鹰地上的狼，飞的和跑的拢不到一搭嘛！”大拇指轻俏地调侃起来，“你是堂堂共产党头儿，我是土匪，咋也拢不到一搭咯！”

“咱俩差不多。搁秤上吊一吊分量差不了多少。”兆鹏也是一腔调侃的调儿，“滋水县通缉我悬赏一千块硬洋，悬赏通缉你也是大洋一千块，咱俩值的一个价码咯！”

大拇指笑了。黑娃也忍不住笑了，心里凝结的紧张气氛顿然松弛下来；他始终没有说话，斟酌了三人之间的关系而决定自己不必开口；他只期望这两个人之间不发生冲突，无论谈判的结局如何；他很珍惜大拇指的笑，企图扩延刚刚出现的轻松气氛，就以打诨的口气说：“滋水县的‘共匪’头子和土匪头子值的一个价码，嫽哇嫽哇！”

兆鹏适时地掌握着松活了的气氛：“我了解你。你是个灵醒（聪明）的木匠。你是个不怎么样的和尚。你会成为一个有出息的红军指挥官，这一点我肯定无疑。你当山里王太屈材料，太可惜了。我是瞅中你这块材料才来找你的……”

大拇指收敛了笑，冷冷地说：“我也了解你。我在三官庙当和尚那阵子就知道你。你也是个灵醒人。但我这个寨子里不要你。我知道你跟黑娃的关系。黑娃是个可靠的义气的人。黑娃愿意跟你走我放黑娃走，还有哪些弟兄情愿跟黑娃一搭投靠游击队也都放他们走，我还让他们把家伙一起带走……”

黑娃打断大拇指的话说：“大哥你说哪里话！我跟你绝无二心，可以指天为誓……”

兆鹏坦率地表白说：“我刚才说了，我是瞅中你这块料了。我希望跟你搭手共事……”

大拇指接住自己被打断的话继续说：“我说的是真话。我明白，无论谁家当朝坐江山，都容不得土匪。而今国民党悬赏捉我，日后有一天共产党把事弄成了，还是要拾掇我。我要是能活到那一天，你兆鹏坐江山拾掇我的时光，能给我一个浑全的尸首就遂心了。”

兆鹏不由地动了情：“这又何苦哩？你一进红军队伍就会明白，你肯定比当土匪活得畅快。告诉你，我根本不是拉你去游击队，我们已经建立起来一个正儿八经的红军军团，军长是正儿八经的黄埔军校训练出来的……”

大拇指并不动心：“我刚才把话说到尽头了，黑娃愿意走就跟你走，还有哪些弟兄愿意走的话也跟你走，家伙都随手带走。我算义气了吧？旁的话你再甭说了，你日后能给我一个浑全尸首就算义气之交咧！”

黑娃再次申明：“我而今连尸首浑全不浑全都不顾虑。”

兆鹏笑笑说：“我也没想让你当下跟我走。我给你打个招呼，你慢慢思量思量；你啥时候想开了，再给我打个招呼，我来接应。”

大拇指说：“那好……日后再说吧！”

兆鹏说：“我们肯定还会见面的。”

半年以后，他们果然又见面了，鹿兆鹏作为俘虏被大拇指捉上山寨。半夜时光，探马回来报告大拇指，有一杆子来路不明的红军人马闯进山来，在离山口几十里的章坪镇安营下寨，遭到了政府军的包围，一个军的人马给连窝捂死了，剩下的分成几股逃走了。有一股逃到离他们山寨三十来里的双岔沟歇下了，大约二十来个人。双岔沟只有三五户人家，住得散散落落，这一股红军就住在沟梁上的茹姓人家里。大拇指当即叫来二拇指黑娃，让探马把这事再述说一遍，然后问：“兄弟，你看这活做得做不得？”黑娃说：“油水厚不厚？红军都是些秕谷瘦皮，谅也没多厚油水。”探马插话说：“他们都掮一杆快枪。”黑娃又问：“这一杆子红军打哪儿来的？是不是山里那几股游击队的一股儿？”探马说：“山里那几股游击队全是本地猴儿，滑得黄鳝一样。这杆子红军是从山外闯进来，人生地不熟，刚进山就给捂住了。弄不清哪达来的，反正不是南山猴儿。”黑娃说：“大哥你定点儿。你看中那二十几杆快枪的话，我带弟兄们去拿回来就是了。”大拇指却不像黑娃那样轻松：“本来嘛，咱们跟红军游击队是井水不犯河水，各吆各的车，各碾各的辙。黑娃你心里本不愿意挫红军，你是怕我疑心你跟红军有丝连才这么说。我也根本不想撞惹红军。这回不同，这杆子来路不明的红军蹬踏到黑窟窿里了，撞到舅家门板了，出山是决然出不去了。再往前走，或是再过上两天，让葛条沟那帮子扫风着了的话，非吃不结，红军手里的快枪就落到他们手里了。这样子的话，不如咱们先动手把家伙缴了……”黑娃听了就折服了：“大哥我明白了，我去吆喝弟兄们。”黑娃站在往常发号施令的石阶上，连连发出三声尖锐的唿哨，匪徒弟兄们便从各个角落拥到平场上来，作为大殿的山洞里灯盏齐发。大拇指站在大殿的台阶上部署行动：“从双岔沟两边摸上去包围姓茹的那一家，记住：只缴家伙，不准伤人，缴下枪来放人走；不许开枪，只准吓诈，实在缴不下枪来，放走算屎了。”有弟兄问：“咱不开枪，他们要是朝咱开枪咋办？”大拇指沉吟一下说：“万不得已要开

枪……只许打下三路！”在最后确定谁领头去的时候发生了争执，黑娃执意要去，大拇指毫不动摇地说：“轮我打食，轮你守窝了。”

完全是万无一失的捕捉而不是交火拼杀。天空落着夏季里不大常见的蒙蒙雾雨，山道湿滑，伸手不见五指。土匪们灵如猿猴，一直摸到双岔沟梁上站岗放哨的卫兵脚下，一个土匪蹿上去突然抱住哨兵的双腿把他撂倒，另一个土匪同时把一块烂布塞进他的嘴里，前门和后门的两个哨兵几乎同样被擒获。当土匪们准备踏门而入的时候，低矮的屋脊上响了一枪，那儿还隐伏着一个暗哨。但是为时已晚，土匪们从前门后门和树枝围成的篱笆墙踏过去，把茹姓山民的两座房子全部控制到手中。睡在炕上和脚地上以及台阶上的红军士兵疲惫不堪反应迟钝，有三五个反应迅敏的人刚摸起枪，就被土匪们缴到手了。土匪们三个人对付一个红军士兵绰绰有余，缴了枪就把他们统统逼进一间屋子。最后从山民火炕上拖出来的那个人是个伤员，腿上淌着血一步也挪不动，由一个红军士兵背着他从炕上挪到地下。大拇指命令所有俘虏转过身去面向墙壁，然后才让弟兄点着了一枝火把，拿到那个匍匐在地上的伤号面前一照，他几乎吃惊地叫起来，那是兆鹏。大拇指立即发布命令：“你们现在可以走咧！你们在这山里扎不住脚赶快出山去，记住不要结帮搭伙，要零碎单个往出走，不要开口说话，一开口就露馅了。”那些红军士兵还背对着他没有动。大拇指吩咐两个弟兄架起受伤的鹿兆鹏出了门。回到山寨，大拇指对迎上前来的黑娃说：“真是撞到舅家门板了——你的共产党大哥给我弄来了。”

黑娃在灯下一看，兆鹏昏昏迷迷不辨生人熟人，小腿肿得抹不下裤子，整个脚面和脚趾都被血浆成红紫色。大拇指唤来大先生。大先生提着药葫芦跑来，用剪子割开左腿的裤子，用水洗了伤口四周的瘀血，皱着眉对大拇指和黑娃说：“糟𡲢咧，是个瞎眼儿。”枪子穿透了

身体被土匪们称作亮眼儿，未穿透被称作瞎眼儿，弹头还留在小腿肚儿里。大先生说："有两个办法，一是将就着治好外伤，让人家出山进城到洋医院去掏枪子儿；二是我给他掏出来再治好，可咱没麻药，怕他受不住疼。你说咋治我咋治。"大拇指瞅瞅黑娃。黑娃说："干脆给他掏出来。"大拇指对大先生说："掏。"大先生解开布包，取出一只带环儿的钢钎儿，刚挨住伤口，兆鹏就惨叫起来。大先生迟疑一下说："这人没咱的弟兄皮实。"大拇指笑着对黑娃说："就这副虚气儿他还想入伙哩！咱伙里弟兄可都是断胳膊折腿不吭声。没这股子毒劲儿还想入伙当土匪？绑起！"于是七手八脚把兆鹏的身子和手脚都捆绑在木板上。大先生说："我下手了——"话音未落，一下子就把那根带环儿的钢钎子塞进伤口。兆鹏撕肝裂肺似的吼叫起来。黑娃说："把嘴给塞住，叫得人心烦。"于是又用烂布塞进嘴里。大先生捏着那根钢钎儿在腿肚里寻找弹头，一挖一拐又猛然一提，一串血肉模糊的东西带着一股热血的腥气从小腿肚里拉出来，扔到盛着清水的铜盆里，当啷一声脆响，水面上就绽开一片耀眼的血花。伤口里的血咕嘟嘟涌冒出来，大先生不慌不忙拔开药葫芦的木塞儿，把紫红色的刀箭药倒入伤口，拿一只带勺儿的钢钎往伤口里头揣塞，血流眼见着流得缓了少了，随之就止住不流了。大先生又掂起另一只药葫芦儿，往伤口四周撒上一层厚厚的黑色药面儿，然后用布条垫着麻纸缠裹起来。大先生瞅着被他折腾得完全昏死的兆鹏说："没彩没彩，这人没彩！招不住我一刀的人都没彩。"他摸摸兆鹏的额头，拔下塞在兆鹏嘴里的烂布，把两粒黑色的药丸塞进口腔，灌下一口水，迫使兆鹏咽下去，然后说："抬走。让他睡去。睡醒来就没㞞事了。"

第二天傍晚时分，兆鹏睁开眼睛嚷着要喝水。他强挣着坐起来，把伸到眼前的水碗抱住一饮而光，才瞅着递给他水碗的人惊奇地叫起来：“黑娃黑娃，怎么是你？”黑娃抿抿嘴没有开口。大拇指却说：“你忘了你说的‘咱们还会见面’的话啦？这回是我请你来入伙儿。”兆鹏猛地转过头，瞅住站在炕脚地上的大拇指：“我咋𡱂落到你手里了？”黑娃接住说：“你多亏落到大哥手里了。”兆鹏转着眼珠朝后倒下，靠在背后垫着的被卷上，悲不堪言地合住了眼睛，两个眼皮痉挛似的弹动着，眼角流出晶亮晶亮的泪珠儿……

那是一场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失败的进军。省委接到一支红军武装企图攻打西安的密讯，派鹿兆鹏化装潜入红军部队传达省委意见，要求红军指挥官做出一个详细周密的进攻方案，省委讨论之后才能作出决定，同时将西安地区守军布防的情况提供给红军指挥官，供他们斟酌自己的力量作出抉择。鹿兆鹏扮装成一个受聘赴任的教书先生，顺利地通过渭河平原，进入渭北高原之中刚刚创立的根据地茂钦。茂钦这个像遗落在山间的一粒羊粪一样默无声息的村镇，现在在北半个中国日渐显露声名。南有瑞金北有茂钦。茂钦中华苏维埃的红布旗帜在莽莽苍苍的黄土高原上看去确似一簇生动飞扬的火焰。共产党人在这里创建起来第一支农民武装，称作红三十六军。鹿兆鹏的到来使红军最高指挥员之间的争论更加激烈，争论双方的力量对比是二比二。廖军长和王副政委干脆把进攻西安说成是葬送红军的冒险行动；姜政委和权副军长力主进攻西安，理由比反对派要充足十倍。在二比二相持不下的时候，廖军长首先表现了妥协，才使进攻派占了上风。鹿兆鹏向他们传达了省委意见，唯一坚持不改初衷的王副政委重新挑起争论，理由是省委没有肯定这个行动计划。廖军长立即更改了违心的妥协又恢复了反对派的真实面目。姜政委倒很冷静地反问：“省委没有肯定也没有反对进攻呀？敌方在西安的布防情况我早已清楚不过，嫡系

和杂牌正大眼瞪小眼乌龟瞅王八，咱们趁这个空子正好得手；缓后无论乌龟吃了王八还是王八吃掉乌龟，他们就成铁板一块无缝可钻，失掉战机了。省委要我们报一个详细作战计划是多此一举，一切已经成熟。”姜政委对廖军长的摇摆不定有点生气，用一句粗话讽刺说：“尿尿去了屙下屎来——连稀稠都拿不住了。这样子的话怎么带兵打仗?你可是咱们四个人中独独上过军校的指挥员呀同志！”廖军长脸红了，不仅没有发火，诚挚的声音令人感动：“姜政委，你挖苦我两句我不在乎。我弄起这一杆人马来着实不容易，我只担心弄不好又丢光了咧……”鹿兆鹏心里颤悸了一下，这个长着四方脸盘英俊漂亮的陕北汉子，一口鼻音浓重言词笨拙的话令他感动。廖军长是黄埔生，投身国民革命战功赫赫；国共翻脸以后，他带着他拉出来的那一部分队伍参加了习旅的暴动，暴动失败后他就成了光杆司令，几年间又创建起红三十六军来。姜政委是省委派到三十六军来的，他很尊重这个前额突出有点像列宁面孔的政委，似乎也有点说不清为什么的怯惧心理。姜政委说：“军事行动上的摇摆不定反映出思想立场的动摇。”王副政委与大脑门子政委一丝也不妥协：“这仅仅是一个具体军事行动的分歧，与立场无关。”廖军长痛苦地扭曲着脸沉默了。姜政委说：“一切按原计划进行。王副政委下连当兵。鹿兆鹏同志做副政委。”鹿兆鹏说：“我必须赶回去向省委汇报。”姜政委说：“不急。打下西安咱们一起去汇报。”鹿兆鹏急了说：“我也反对这个行动。”姜政委说：“你反对我也要你做副政委。”

鹿兆鹏在根据地住了下来，发现在红军士兵里头却没有这样严峻的分歧和争论，而且洋溢着几乎是迫不及待的攻打西安的战斗热情。姜政委深入浅出的讲演特富魅力和鼓动力量：“南昌暴动失败了，广州暴动失败了，咱们这儿的暴动也失败了，国民党高兴得近乎得意忘形。我们攻下西安就向全中国的反动派敲响第一声丧钟，共产党还存

在，真正的革命刚刚开始！”姜政委洪亮激越的声音被热烈的呼喊打断了，他谦逊地低着硕大的脑袋等待欢呼声结束，然后扬起头来分析这次行动的形势：“西安的嫡系初调入陕，两眼紧盯着杂牌子地方军；杂牌子地方军收罗的都是土匪民团，属于乌合之众，十有八九都是逛窑子抽大烟的二流痞子，根本不经打。咱们红军不是一个顶仨，而是以一当十。渭北地区农协运动开展最早，地下党遍布各个村镇，我们路过之地会一呼百应。我们一举攻下西安，建立起中国革命的第一个红色政府，必将照亮整个北半个中国……为了共产主义，同志们，努力冲锋啊……”

整个红军陷入一种激战前的狂热之中，以致王副政委在下到炊事班当伙头兵时，竟然连连受到士兵们的嘲笑和鄙视。廖军长现在尽可能认真地按照在黄埔军校学习的指挥艺术设计这场进攻……队伍终于拉出山沟进入坦荡如砥的关中平原了，此时刚刚黎明。鹿兆鹏此时才弄清白，这支号称三十六军的红军部队实际上只有九百多人，不过是一个团的编制力量，心里就愈加忧虑和胆怯。在山区小镇茂钦根据地里，九百多人显得熙熙攘攘，一投身到雾雨蒙蒙的关中平原上以后，这九百多人的队伍就不再显示出浩浩荡荡的气势，反而觉得过于细瘦了点儿。他们沿途所经过的许多千户大村，无一例外地遭到了村社门族自立的保安队的偷袭和骚扰，根本不曾发生一呼百应的情况。（那些村庄里确实有共产党的地下支部秘密地活动着，他们没有得到任何指示或消息，压根儿不知道这次军事行动，甚至搞不清楚这支穿着杂七杂八衣服的军队是国军、土匪还是杂牌子地方武装。）淫雨绵绵，这是关中平原旱季里极为罕见的阴雨天气，池满河溢，遍地泥浆，找不到一坨干燥的立足之地，更拾不来一把柴火。士兵们渴急了就喝路边水坑里的泥水，好多人抱着肚子提着裤子拉稀不迭。姜政委执意选择雨天出击的理由是，反动派军队怕吃苦，怕夜战，也怕雨战，红军

战士瞅准其弱点专事夜战雨战，因为红军士兵自小就在苦水里泡大，不计苦累，不避风雨。姜政委瞅住了敌手的弱点却忽视了自己的弱点，这些自小生长在渭北以北黄土高原上的士兵全都是些旱鸭子，在黏湿滑溜的平原上行军不久就疲惫困乏，全都被淋浇得湿透了衣裤又溅满了泥巴，变成落汤鸡或更像泥猴了。渡过渭河以后，在河岸边的柳林里暂作歇息。姜政委擦拭着眼镜片上的泥巴浑纹儿，怎么也擦不干净，他发觉自己的衣襟和手指全都给泥巴弄脏了，无奈就把无法擦净的眼镜架上鼻梁，对瘫坐在湿漉漉的沙地上的士兵们鼓劲打气："同志们，再走五六十里路就进城咧！老孙家羊肉泡馍，老白家饺子馆，西安饭庄葫芦鸡尽饱咥啦……"姜政委给士兵打足气儿之后，就把另外三位领导者引到远离士兵的柳林深处，坚定不移地说："我回省委汇报情况兼作城内策应，你们继续前进，不能有丝毫的动摇情绪。咱们在滋桥北桥头会面。"姜政委连一个随身警卫也不带，只身走掉了。

姜政委临走时委托鹿兆鹏做代理政委。姜政委走过柳林进入蒿蓬茅草地带，三个站在原地未动的领导者谁也不说话，一直瞅着姜政委在蒿蓬和茅草上隐现的脑袋完全消失，他们才不约而同地面面相觑起来。鹿兆鹏心里浮起一缕惆怅一种空虚，像被抽掉了主心骨一样茫然失措。他说："我提议让王出来做代理政委。"廖军长和权副军长只碰了一眼就说："你去把王叫来。"下到炊事班的原王副政委不紧不慢走过来，冷着脸站住。廖军长说了姜政委回城向省委汇报的情况以及委托他做代理政委的意见，王副政委对此先不表态，却冷冷地说："姜要是跑到国民党省党部汇报怎么办？"鹿兆鹏噎得说不上话咽下一口唾液，廖军长显然也看出王副政委的鸡肠小肚，不客气地说："同志，你这样的态度令人失望！"权副军长从中调和："王副政委别记惦今日个以前的事了。今日个或者说目下咱们咋办？"鹿兆鹏立即附和说："对！咱们下一步的事才最要紧。"王副政委仍然冷冷地说："往回撤。

撤回茂钦还来得及。”廖军长惊诧而又生气地问：“你这意见是出于对队伍的负责，还是跟姜执气赌输赢？”王副政委说：“这怎么分得开呢？”廖军长窝气地说：“你们俩的意见呢？撤还是进？”权副军长现在变得异常耐心温柔起来：“大家都冷静才好。我觉得现在撤回去的根据不充足。”鹿兆鹏觉得权副军长的意见与自己相吻合，随即说：“我同意权副军长的看法。”又对王副政委诚恳地劝说道：“你的意见可以保留。你还是应该代理政委。”王副政委冷漠地笑笑说：“我……还是回炊事班去好。”

廖军长没有说话，连瞅一眼已转身离去的王副政委也没有，对鹿兆鹏和权副军长说：“我们还得往前走。”队伍被集结起来继续前进，近傍晚时赶到滋桥北边两个村庄之间的空阔地带。鹿兆鹏和权副军长扮装成当地农民的模样走进了滋水桥街道，在桥北头踅摸好久看不到姜政委接应的任何迹象，俩人不敢再等，又离开镇子。权说：“我们像一条出了山的狼，天地开阔却危机四伏。”兆鹏苦笑一下没有说话。俩人回到集结地，廖军长急不可待地把他俩拉到稍远一点的地方，以调侃的口吻说：“王副政委看来是吣到向上了！”廖军长问也不问接应的事，告诉他俩一个严峻的事实：姜政委没有回省委汇报。那么姜政委到哪儿去了呢？半路上出事了或是……鹿兆鹏忙问：“你的根据？”廖军长公开了一个秘密：队伍出山前，他背着姜政委派人进城向省委汇报，要求省委具体指示这次进军的方案。汇报的同志刚刚回来，让队伍赶紧撤回茂钦或先进入秦岭隐蔽。鹿兆鹏似乎顿然变得轻若一根羽毛，随便一股微风都可以掀起它来，那是一种真切的彻底灭亡的预感。他揪住自己的头发软软地蹲下去，说：“我没有阻止这个冒险我……”权副军长诚挚地说：“廖军长我对不住你我混账……”廖军长痛苦地摇摇头：“只怪我不怪你们。快不要说怪谁不怪谁的话，赶快想法挽救部队！”鹿兆鹏看见廖军长一张七色脸，痛苦惶恐，急迫悔恨，也

还有冷静。他指使鹿兆鹏叫来了王副政委，仍然用他诙谐调侃的习惯说话：“好了，现在我们按你的意见办。你甭当伙夫了，当政委吧，代理那俩字儿太啰嗦，干脆去尿了。”王政委仍然冷冷地说：“我已经改变‘撤回去’的主张了。”鹿兆鹏瞅着这个严厉得有点冷漠的王政委揶揄地说：“尿毛总是不合股儿！”王政委说：“我们撤回去，要是茂钦的老窝给人捣了咋办？”廖军长拍一下王政委的肩膀说：“好了！咱们合到一股了——进秦岭。”

撤退的命令下达以后，队伍便有点松懈，那些谋着进城吃羊肉泡馍的士兵满肚子怨气，便无缘无故地射击公路上驰过的汽车。枪声突然引发了炮声，大炮的轰击声震撼着大地，队伍加快了撤退的步伐。但鹿兆鹏尚不知晓他们已经侥幸地脱出了灭亡的境地。原来城防驻军就驻扎在桥南不过十里的草滩一带，早已发现了他们的行踪，而且报告了司令官。司令官是个土匪出身的杂牌子军长，摆摆手说：“轰走轰走！轰走算尿了！”副手建议说：“送到口边的菜就该吃。”军长说：“那个‘菜’是一罐子萝卜缨子酸菜。缴不来大炮机枪，也肯定没有黄货白货，那几杆破枪缴回来反成了累赘。咱打死他十个不抵他打死我一个，打死他十个给咱添不了一个，他打死我一个我就少下一个……”军长虽是粗人却不乱主意……这就留给了鹿兆鹏他们安全转移的机会。

进入秦岭隐蔽的行动方案很快统一确定下来，以风景和温泉驰名古今的骊山是距离最近的山地，自然成为撤离选择的最佳路线。鹿兆鹏是关中人，就被推到领头人的位置，和廖军长走在前头，领着队伍朝骊山进发，王政委和权副军长殿后督促。这支只对过往汽车打了几枪的红军队伍，完全被泥泞雨水饥饿和拉稀拖垮了，士兵当中的怪话开始冒出来，“逛平川赏景致，也该择个好日子嘛！”“咱不打人家，人家也没打咱，咱就跑𡳞了，这算哪家子的战法？”傍晚时分，部队踏进了通向骊山的一条沟壑，鹿兆鹏才顿然觉得悬提在空里的心落到实处，那是山地给人的一种安全的依托。十之八九来自陕北山区的战士对山的感觉更为敏锐，情绪活跃了，怪话俏皮话风凉话一茬一茬冒出来。鹿兆鹏忍不住悄声说：“你当初坚持不出就好了。”廖军长也悄声说：“那样的话，队伍就会掰成两半。”鹿兆鹏问：“这个队伍不是你一手弄起来的吗？”廖军长笑笑说：“他嘴巴上功夫深，我说不过他。”鹿兆鹏有点讥诮地说：“我看你好像总有点怯他？”廖军长说：“他是省委派来的呀！”说罢也讥诮地反问：“你不也一样吗？他叫你当副政委，你不当，还是拗不过他是吗？”鹿兆鹏没有说话。走出沟壑踏上一道驴脊梁似的山梁，鹿兆鹏驻足片刻朝南望去，对面的白鹿原刀裁似的平顶呈现出模糊的轮廓，自东而西逶迤横亘在眼前。那一瞬间，一只雪样儿的白鹿在暮云合垂的原顶上纵跃跳蹦了一下消失了。鹿兆鹏舔了舔干裂的嘴唇对身边的廖军长说：“看见了吗？”廖军长毫不惊奇地问：“看见什么了？”鹿兆鹏仍然抑止不住兴奋：“瞅那儿我的家乡——白鹿原。”

王政委从后头赶到前头来，拍了拍鹿兆鹏的肩膀说：“你的任务完成了。你引路引得好。进山了该我领路了。”鹿兆鹏就坠到队伍后头和权副军长殿后。王政委是山里人，他的那个村是滋水县所辖的秦岭深山最僻远的一个仓。队伍一刻也不停留，沿着山梁，又倚着崖坡朝前

走，山越来越高，路越来越细，直走到根本没有什么路，依然沿着梁或翻着沟往前走。天色完全黑下来。跌翻绊倒的人呻吟着叫骂着再爬起来往前走，战士们已经没有说俏皮话的兴趣了，正好借机以咒骂发泄心中的不满。权副军长是进攻派，他的意见被否决，怀着深沉的愧惭和羞耻的心绪一声不吭跟在队伍后头。鹿兆鹏几次和他搭话他都不吭，就忍不住玩笑式地刺了这位陕北军长一句："你权副军长难道还为羊肉泡馍憋气？"他仍然不吭不响。

临近午夜，队伍进入秦岭深处的章坪镇驻扎下来，全镇动员了十几户人家一齐点火熬烧苞谷糁子。士兵们喝罢就躺下了。鹿兆鹏刚刚睡下就被枪声惊醒，密集的枪声响成一片，像母亲在锅里炒爆苞谷花的密集的脆响。他从腰里拔出手枪冲出住屋，跌进一个长满藤蔓和青草的壕沟，趁势躲在那里观察一下阵势，随之就悲哀地发现，章坪镇四周完全被包围了，敌人像合围的网一样从南北两面的山坡和东西两边的山道围堵过来。红军战士四处奔逃，无法形成突围的力量。他贴着一条低矮的坡根往前蹿去，小腿感到了麻木和沉重，大约是在冲出屋子后门时挨上枪子了。鹿兆鹏往前蹿一截就伏下来隐蔽一会儿，看着敌人黑漆漆的身影从他头顶的缓坡上跃过去，他的头脑十分清醒，十分镇静，这使他自己也很吃惊。那一刻他心里甚至自豪地闪出一个念头：行啊我还行！他蹿过那面坡塄进入一条河沟，发现了和他同方向往前跑的人影，急中生智喊叫起来："三十六——三十六——三十六跟我走——"沟沟岔岔里就有人吆喝起来："三十六——三十六来咧——等等三十六——"鹿兆鹏拾拢起二十几个逃散的三十六军战士，沿着河沟跑过二十多里，拐弯改变方向进入双岔沟……他根本不知道，自打他们从滋水桥撤离的那一刻起，一张网早已向他们张开，当他们在章坪镇喝着甜丝丝的苞谷粥的时候，嫡系国军早已完成了四面包围的阵势，只等着他们睡觉哩……

鹿兆鹏在黑娃的洞穴里住过半月，伤口已长平愈合，始终也搞不清那个白胡须老汉葫芦里装着什么神丹丸散。大拇指芒儿在头六七天里，每天派二三十个弟兄下山，四沟八岔去寻找散失的红军士兵，塞给他们几枚银圆或一撮烟膏，然后指明出山的路径。鹿兆鹏临走时对大拇指说：“你很义气。你我有缘分儿。我不死你不死咱们还会见面的。”大拇指说：“你而今下山咋弄哩？你的队伍没有了。”鹿兆鹏说：“我得再去弄出一个军来。”

黑娃亲自护送兆鹏出山，鸡啼二遍时走出峪口，俩人便分了手。黑娃说：“啥时候需用兄弟帮忙，你尽管开口。”鹿兆鹏说：“要说嘛，我还是那句老话，你再考虑，你的山里王不能再当下去了，哪怕招安县保安队也行……”黑娃一愣。兆鹏再次肯定地点头颔首，转身大步走了。

久雨初晴的夜空洁净清爽，繁密的大大小小的星星一齐闪烁，星光给白鹿原单调平直的原顶洒下了妩媚和柔情。鹿兆鹏沿着滋水河川的小道走着，看看黎明即将临近，就斜插到通往原坡的一条小径，一直走到坐落在半坡上的白鹿书院。朱先生刚刚起来，掂着一把长柄笤帚走到院庭。鹿兆鹏说：“先生，我还得给你添麻烦。”朱先生一句话没说，拉着他走进一间屋子：“你上回住过的老地方咧！”鹿兆鹏说：“这回我只待一天，天黑夜静了我就走。”朱先生也不问他从哪儿来到哪里去，吩咐师母给他拾掇早膳。兆鹏吃了饭就倒头睡下了。

鹿兆鹏醒来时天已昏黑，知了在书院里的树杈上叫成一片，他吃了点晚饭踱到前院朱先生的书房来。朱先生抬起头，摘下花镜，搁下毛笔，神色略显紧张：“你还是待在后头屋里。”兆鹏说：“待会儿夜静时我就起身了，没事儿。”随之坐下来，顺手拈起桌边上一摞纸页看，在《民国纪事》总栏的末尾一条中写道：××年×月×日共匪三十六军覆

灭于本县章坪镇。鹿兆鹏的眼睛久久盯住那个匪字，没有说话。朱先生说："你知道不知道在章坪开的这一仗？"鹿兆鹏说："知道。"朱先生问："真的全军覆没了？"随即把一张报纸拉过来递给兆鹏："就像这报上写的一样？"鹿兆鹏接过报纸，头版有一条醒目的大号黑字标题：全歼共匪三十六军于滋水县章坪镇。鹿兆鹏说："全军覆没，是这样的。我就是从山里逃出来的。"朱先生惊愕地噢了一声，瞅着他说："你又把本蚀光了。"鹿兆鹏放下报纸平静地说："三回了。"朱先生说："你还干？"鹿兆鹏苦笑着说："啥时候连我也蚀了就不干了。"说着换出一副好强的口气："如果我的老本儿蚀不了，你老也长寿，我将来要请你老把县志上这个'匪'字改成'军'字。你看你的弟子像匪吗？"朱先生稍一愣怔，一时还不上话来。这当儿院里一阵脚步响，有两个人走进门来，竟然是国民党滋水县党部书记岳维山，后边跟着一身县保安队戎装的白孝文，双方一时都惊愣住了。

岳维山迅即清醒过来，拱手说："喔呀鹿先生，你这多年好呀？"鹿兆鹏也从惊诧中镇静下来："你是明知故问啊岳书记！"岳维山说："说的是。咱们曾经共过事嘛！我希望咱们再一次共事。"鹿兆鹏说："你先前跟我共事，而今跟孝文搭帮共事了，我插不上手了。没关系，孝文也是原上人，俺俩还是本家子兄弟。"岳维山说："咱们还是可以重新共事的呀，鹿副政委，你的姜政委已经进了省党部一块共事了！所以说你我在滋水县再次携手……"鹿兆鹏没有听清后边的话，耳朵里嗡嗡嗡响起来。姜政委果真叛变了吗？天哪！早就看到这一步的王政委倒在章坪镇那户农家的猪圈旁边再也爬不起来了，尸体也不知被扔到哪里去了。鹿兆鹏觉得自己的手指顿时冰凉如泥，冷着脸说："有人愿意当狗爬到贵党的宴桌下啃骨头，不要由此断定人都会变狗嘛！"岳维山哈哈一笑："我真是服了你了，闹农协你赔光了，策划渭北暴动输光了，好容易凑合起来一个三十六军，你又输光赔净了，连堂堂的政

委也反叛了，你老兄这么瞎折腾下去……”鹿兆鹏说：“你现在很得意我能想得到。可你说俏皮话的本领还不老到咯！你要不服咱俩比试一下，你在县城搭起戏台，咱俩摆开场子比……”岳维山嘬嘬嘴又哈哈一笑：“这个主意不错……”说着转过头对孝文说：“你回去给我把那本‘宋词’拿来，我要请教朱先生一句……”鹿兆鹏哼了一声说：“岳书记动手了，想挣一千块赏银了！你甭让孝文去搬兵，我跟你走就是了。”岳维山绷住脸解释说：“鹿先生多心了，真可谓惊弓之鸟！我真要抓你当下就可以办到。”朱先生插话调和：“误会误会。孝文你也甭去拿书了，‘宋词’我这儿有。”孝文在门口停住。岳维山说：“友人送我一块湘缎，正好可以裱一幅中堂，我想请先生写一幅中堂，让孝文回去拿来量一量大小。”鹿兆鹏讥刺地说：“岳书记，你的忘性好大啊！”朱先生看看岳维山的意图已明显不过，就扯开说：“岳先生，我知道你和兆鹏是冤家对头。到我书院来寻我的人，我一律视为君子，概不分党政派系。你们两家的冤仇你们去解，但必须等出了书院大门，打呀杀呀烧呀煮呀我不管。”岳维山讪讪地笑着：“是啊是啊，全中国就剩下先生这一方清净之地了。”朱先生说：“你还没说你寻我的事体哩！拿‘宋词’和湘缎是临时才记起来的。你说你有啥事要我效力？”岳维山其实什么正经事儿也没有。全歼红三十六军有本县提供的准确情报和保安队的紧密配合，他因此而受到省党部的特别嘉奖，心情十分愉快，于傍晚时分散心避暑，就拉着孝文来找朱先生雅谈。万万料想不到会在这里撞见鹿兆鹏，临时想出让孝文去取“宋词”和湘缎的措辞，孝文自然明白不过是一个脱身回家搬兵的借口……岳维山现在只好硬着头皮说：“真是来请先生写字。”朱先生就势应承：“行啊，咱们甭顾了斗嘴，先写完字让墨汁干着，你们再争再辩……孝文你来替姑父研墨。”孝文瞅一眼岳维山，无奈接过一柱墨锭在砚台里研磨起来。鹿兆鹏站起来说：“二位坐着，我去吃点饭。”朱先生说：“你吃了饭甭耽搁就过来陪岳先生说话儿。”鹿兆鹏已走到门外回头说：“岳维

山，咱们后——会——有——期！”说着就撒腿跑起来。岳维山霍地站起来喝道：“孝文快撵——”白孝文扔了墨锭从腰里拔出手枪，从桌子旁跃出书房时几乎把朱先生拽倒，“叭”的一声枪响，震得夜栖在院庭古树枝杈上的喜鹊乌鸦斑鸠等惊叫着飞起来。白孝文吼喊着“不准动，再跑我开枪啦”跑进庭院。岳维山也从屋里跳出门，站在环绕庭院的砖砌水渠边摇晃着右臂：“后院后院——朝后院追——”朱先生没有动身，用铁钎儿拨一拨油灯捻子，站起身背着手说：“看来都不是君子！”

第二十三章

朱先生重新开始因赈济灾荒而中断已久的县志编纂工作，一度冷寂的白鹿书院又呈现出宁静的文墨气氛。他四处奔走的劳顿和风尘早已消失，饥饿造成的恐怖阴影却依然滞留在心间，眼前时不时地映现出舍饭场粥锅前拼死拥挤的情景。尽管这样，他的心头还是潮起案头文字工作的渴望和生气。

大饥馑是随着一场透雨自然结束的，村民们迫不及待从青葱葱的苞谷秆子上掰下尚未干须的棒子，撕去嫩绿的皮衣，把一掐即破的颗粒用刀片刮削到案板上，流溢出牛奶似的白色浆汁，像捣蒜一样捣砸成糊浆，倒进锅里掺上野菜煮熟了吃。有人连同苞谷棒子的嫩芯一起搁石碾上碾碎下锅，村巷里每到饭时就弥漫起一缕嫩苞谷浆汁甜丝丝的气息。大人和小孩的脸色得了粮食的滋润开始活泛起来，交谈说话的声调也硬朗了，尽管还有那些赤贫户不得不继续拉着枣木棍子去讨饭，讨到的毕竟是真正的粮食。原野上呈现出令人惊喜的景象，无边无际密不透风的苞谷、谷子、黑豆的枝枝秆秆蔓蔓叶叶覆盖了田地，大路和小道被青葱葱的田禾遮盖淹没了，这种景象在人们的记忆里是空前仅有的。白鹿原的伏天十有九旱，农人只注重一料麦子而很少种秋，棉花也因为干旱的天象制约而几乎不种，收罢麦子以后就开始翻地，用一把二尺长镶着铁刃的木板锨扎翻土地，让土壤在伏天里充分曝晒，秋天播种小麦时，那土壤就松散绵软如同发酵的面团儿。整个广阔的原野上，男人们只穿一件短短的裤头，在强暴的烈日下挥舞锨板，地头的椿树或榆树下必定有一个装着沙果叶凉茶的瓦罐。有人耐不住寂寞就吼喊起来，四野里由近及远串连起一片“嘿……哟……哟……嘿……”只有吼声而无字词的悠扬粗浑的号子……今年的年馑打乱了白鹿原的生产秩序，农人等不及到明年夏天才能收获的麦子，谁和谁不用商量就一律种下秋粮了。苍天对生灵施行了残暴之后又显示出柔肠，连着下了两三场透雨，所有秋粮田禾都呼啦啦长高了、扬花了、孕穗结荚了，原上再不复现往年里这个时月扎翻土地吆喝号子的雄浑壮观的景象。所有土地被秋庄稼苫着，农人们无法踏进田地就在村巷树荫下乘凉，农闲时月的悠闲里便生出异事，有人忽然忆及朱先生赈济救命的恩德而发动大家纷纷捐款，敲锣打鼓把一块刻着“功德无量”的牌匾送到书院来。朱先生听到锣鼓和铳响走出大门，弄清了原委就发了一通脾气：“你们刚刚吃上嫩苞谷糊汤就瞎折腾！兴师动众搞这

些华而不实的事图的啥？再说赈济粮是上头拨下的，不是我家的，我不过是把粮食分发下去，我有何德敢受此恭维？”说罢关了大门再不出来。那些人突然改变主意，抬着金匾敲着锣鼓赶往朱先生的故里朱家圪去了。朱先生的儿子不胜荣光热情接待，把匾额端端正正挂到门楼上方。接着又有几个村子效法起来，朱先生家门口隔几天便潮起一次庙会，而且大有继续下去的势头。朱先生闻讯后赶回老家，制止了儿子们的愚蠢行为，把挂在屋里屋外的大小金字牌匾统统卸下来，塞到储存柴火的烂窑里去。

这件事多少干扰了朱先生清理赈灾账目的工作，拖延了几天才夹着一摞明细账簿走进郝县长的办公房。郝县长接过那一摞账簿很激动：“这真是‘有口皆碑’！”当即与朱先生商定时日，要为他以及参与救灾的诸位先生设宴洗尘。朱先生避而不答转身就告辞了，走到门前说：“如若发现账目上有疑问，尽管追查，朱某绝不忌讳。”郝县长拉着推着又把朱先生拽进门来说：“我还有话跟你说。”朱先生坐下来。郝县长说：“年馑已过，人心稳住了。县府新添国民教育科，我想请先生出山。”朱先生听了一笑，说：“你不知道我这个人不成器，做点文墨文字的事还可以滥竽充数，一当起官来自个心里先怯得惶惶，日里不能食夜里不得眠。生就的雀儿头戴不起王冠——你饶了我吧！”郝县长根本不信：“这话不实。单是这次赈灾，先生所作所为无论朝野有口皆碑。卑职以为滋水不乏有识之士，当今最短缺的却是清廉的人。”朱先生依然不为所动，摇摇头轻淡地申述说：“我一生不勉强人，人也不要勉强我，勉强的事是做不好的。”说着又站起来告辞。郝县长再开不得口，钦服而不无遗憾地陪朱先生出门，又提出开头的话来：“那……你还是择空儿抽一天时间咱们聚聚，我也好代饥民向诸位先生说一句谢承的话呀？”朱先生笑着却很果断：“不必了。你有这心意，把那笔款子粜成粮食，分给街头路口那些乞丐吧。他们的年馑还没过哩！”

县志编纂进入最费神的阶段，在一一找出前人所编几种版本的疑问和谬误之后，现在就要进行严格的考证，关于本县历史沿革需要大量查阅史料典籍，有关风土人情以及物产特产要到四乡去踏访询问，有关历朝百代本县所出的达官名流、文才武将、忠臣义士的生平简历需得考证，还有数以百计的烈女节妇的生卒年月和扼要事迹的查核，这么庞杂的事项都得由诸位先生分头去做。顶麻烦的是对本县山川岭原地貌的核查，一沟一峪，一峰一溪都得勘测，而这样的专门技能的测工得到省城去请。朱先生亲自出马到西安，请来了一主二副三位测工，又雇来三位年轻农人帮他们背行李扛测具，就开始钻山巡河去工作了……朱先生决计编出一部最翔实最准确的可资信赖的新县志，那无疑是滋水县的一部百科全书。大饥馑的恐怖在乡村里渐渐成为往事被活着的人回忆，朱先生偶然在睡梦里再现舍饭场上万人拥挤的情景，像是一群饿极的狼争夺一头仔猪；有时在捉筷端碗时眼前忽然现出被热粥烫得满脸水泡的女人的脸，影响他的食欲……尽管如此，毕竟只是一种阴影，他对县志的编纂工作更加专注了。

白灵的不期而至使朱先生又惊诧又喜悦。朱先生在后院吃罢午饭走到前院去阅稿，看见迎面走来一位风姿绰约的女洋学生，齐耳的短发乌黑发亮，上穿一件月白色的短袖衫，下穿一条白色的折叠裙，一双圆口青布鞋，齐眉的刘海下是一双圆圆的眼睛，笑着叫了一声“姑父”。朱先生说：“灵灵呀？你不叫姑父，姑父真不敢认你咧！”朱先生领着白灵折身又走到后院来，悄悄暗示说：“你先甭叫姑妈，看你姑妈能认得你不？”说着抢先一步跷上台阶：“有客人来了。”朱白氏掀开竹帘站在台阶上，拘谨温厚地招呼说：“请屋里坐。”举止和神态如同往常接待一切朱先生的崇拜者一样。朱先生又说：“这是从省城来的贵客。”朱白氏仍然温谦地笑笑：“哪儿来的都一样，请屋里用茶。”白灵

大叫一声：“姑妈，你真的认不得我咧？”说着跳上台阶，抱住朱白氏的肩头。朱白氏惊得合不拢嘴：“噢呀灵灵呀……”

坐下来以后，朱白氏抓着灵灵的胳膊一直不松手，温柔敦厚的性情也发生变异，连着询问侄女在哪儿住，在哪儿吃，在哪儿念书等等惦念的事。朱先生端坐在一边插不上话，对着白灵的眼睛瞅了又瞅，那双又圆又大的眼睛有点突出，尽管不像她爸白嘉轩那么突出，但仍然显示着白家人眼球外凸的特征；这种眼睛首先给人一种厉害的感觉，有某种天然的凛凛傲气；这种傲气对于统帅，对于武将，乃至对于一家之主的家长来说是宝贵的难得的，而对于任何阶层的女人来说，就未必是吉祥了；白灵的眼睛有一缕傲气，却不像父也不像兄那样流溢外露，而是作为聪慧灵秀的底气支撑主宰着那双眸子，于是就和单纯的美女或一切俗气的女人显示出差异来；纺线车下，织布机上，锅前灶后，无论如何窝不住这样一双眼睛，整个白鹿原上恐怕再也找不到这种眼睛的女子了。朱先生在心中这样想着，忽而浮出第一次看见妻子朱白氏的眼睛的情景——

那天她在涝池边上帮母亲白赵氏淘布。春天织成的白布搁到夏天，打下核桃捶下青皮，再摊到石碾上碾轧成糊涂，然后和白布一起装进瓷瓮沤窝起来；五至七天以后，再掏出来到涝池淘洗，白布已经变成褐黑色的了，这种颜色直到棉布烂朽成条条缕缕也不少色。紧紧连接的第二道工序是把着了底色的棉布塞进涝池的青泥里再度加色，黑青色的淤泥给棉布敷上黑色，然后就可以做棉袄棉裤夹衣或套裤的面料了。那时候，朱先生和媒人装作走累了也走热了的过路人，到涝池旁边卸下肩头的褡裢洗手，媒人悄悄指向涝池左边那棵半腰上结着一块树瘤的皂荚树下的那个女子。大涝池四周长满大大小小的皂荚树，那是女人们洗衣用过皂角遗下的胡核又繁衍的树族。那时候，朱

白氏跟母亲白赵氏把最后一绺经过核桃皮沤染的棉布从瓷瓮里掏出来，在涝池里摆呀淘呀搓呀拧呀。长工鹿三当时在涝池边沿挖下一个半人深的坑，坑边堆积着从涝池里捞出的沤成黑色的淤泥。朱白氏和母亲把刚刚淘洗干净的褐黑色棉布一段一段铺进坑里，鹿三挖一锨青泥覆盖上去。朱先生看见那女子挽着袖子，露出健壮白嫩的小胳膊，两只手被核桃皮染得黑紫如漆，坠着一条粗辫子的脑袋始终低垂着不抬起来。朱先生佯装找一处清水实际是想换一个角度，不料脚下踩着淤泥几乎摔倒，果然那母女听到涝池周围女人们的哗笑扬起头来。朱先生恰在那一刻瞧见了她的模样，转身就离开涝池上了官路，对媒人说："就是这个。八字不合也是这个。"

朱先生不是瞅中了她的模样而是瞅中了那双眼睛。此前他曾毫不惋惜地摈弃了四五个媒人介绍的亲事，全是她们的眼睛经不住他的一瞅。朱先生向父亲坚持一条要求，凡是媒人介绍给他的女子必须经他背看一眼。他已看过四五个媒人介绍下的七八个女子，都不是因为门第不对或相貌丑陋，在于朱先生一瞅之后发觉，有的眼睛大而无神，有的媚气太重，有的流俗。他究竟要找到一双什么样的眼睛自己也说不透彻，在涝池边瞅见白家大姑娘的眼睛时心里一颤，那种朦胧的追寻顿然明朗起来：刚柔相济！男子眼里难得一缕柔媚，而女子难得一丝刚强。朱先生从涝池边离去时断然肯定，即使自己走到人生的半路上猝然死亡，这个女人完全能够持节守志，撑立门户，抚养儿女……现在，朱白氏眼睛周围布满了细密的皱纹，愈见深沉愈见刚正，愈见慈爱了……

朱先生注视着白灵的眼睛，似乎比初次见到朱白氏的眼睛更富生气，甚至觉得这双眼睛习文可以治国安邦，习武则可能统领千军万马。他沉默专注的神情引起白灵的注意："姑父，你盯我是认不得我

了？”朱先生自失地笑笑说：“噢！姑父正给你相面哩。”白灵兴趣陡生：“姑父，你算我命大还是命苦？”朱先生说：“你的左方有个黑洞。你得时时提防，不要踩到黑洞里去。跷过了黑洞，你就一路春风了。”白灵真的当回事追问起来，黑洞意味着一般灾祸，还是彻底毁灭？是指不治之症，还是指挨黑枪上绞架，塞枯井，甚至自杀上吊跳涝池？她装出轻松的不在乎的神气：“姑父，你说明白点，我好防备着。”朱先生也笑着说：“你防备着点儿好。”白灵还想问个究竟，姑妈却插话说：“你甭听你姑父胡掐冒算。他是跟你说笑哩！”转过脸对丈夫流露出一缕责备：“年轻轻的娃嘛，你给她算啥哩掐啥哩？吓娃做啥哩！”有意岔开话题问起妹子家皮货铺子的生意。朱先生理会了妻子的眼色反而笑起来：“我知道灵灵信西学不信八卦，才跟她故意逗笑哩！”白灵坦然地说：“姑妈放心吧，我不会吓出毛病的。岂止我的左侧有黑洞？我的前头后头，左首右首，全都布满陷阱。可以说整个中国现在就是一个大黑洞，咱们全都在这黑洞里头。”

朱白氏顶关心的是侄女的婚事，现在好不容易得到了和白灵见面的机会，心诚意笃地要尽一番作为姑妈的责任，企图松动弟弟嘉轩父女之间的死结：“灵灵，你咋么今儿想起来看姑妈咧？”白灵毫不迟疑地回答，声调里颤动着真切的娇气：“我成年成月天天都在想着姑妈。好姑妈你想想，我而今有家难归只剩你一个亲人啦……”朱白氏倒真的被侄女感动了。朱先生悄然退出寝室到前院书房去了。朱白氏便斟酌了字眼探问：“你跟鹿家老二还拉扯着？”白灵做出坦荡无掩的声调说：“早先几年我俩都私订终身了哩！那阵儿都小都不懂啥。现在都大了懂得道理了，觉得不合适又拆散了，只是一般乡亲乡党有点来往，再没啥拉拉扯扯的事。”朱白氏听着就很惊诧，白灵说着私订终身这种伤风败俗悖于常情的事，跟说着今年的庄稼长得好或不好一样平淡，一样无所顾忌，便禁不住撇着嘴角鄙夷地骂：“灵灵，你的脸皮真

厚！”白灵委屈地叫起来：“姑妈，是你问我，我才跟你说的呀！你问我我能哄你吗？”朱白氏说：“你看你说这号事的神气，跟喝米汤一样，脸连红一下下都没有，你的脸皮还不厚？”白灵故意抹一下脸颊，顽皮地盯着姑妈说：“姑妈，你忘了我自小就不会脸红。”朱白氏不为所动，语意反而更加沉重铁硬：“你不脸红你爸可脸红，你脸皮厚你爸可脸皮太薄，你不要脸你爸可是要脸的人。”白灵再也撒不出娇来：“姑妈，我来看你，你倒骂我？”朱白氏依然冷着脸：“你看我做啥？你连你爸你妈都能丢舍，还在乎我？”白灵受到当头棒击，一下子无所措起来，慈爱可亲的姑妈一下子变得冷峻如铁，心里顿时产生了沉重的失望而哑口无言。朱白氏说：“你一张退婚字条儿，把你爸的脸皮揭光咧，你知道不知道？”

腊月根上，白灵托一位回原上过年的同学给王村婆家捎去一封信。信里只写着一句话：你们难道非要娶我革你们的命？白灵借此彻底勾销了那桩没有任何感情的婚姻，也想对从未照面的女婿和阿公开一个辛辣的玩笑，至于这封信捎去以后的结局，她已经无心顾及了。姑妈现在就来给她补这一课。

王家父子见信气得暴跳如雷，扔下正在筹办新年的诸多家事，父子两人拉着媒人找到白家，把那一绺信纸掷到白嘉轩的面前。白嘉轩从桌面上捡起信纸，看着白灵风流潇洒的墨迹，眼前顿时涌起一片浑黄厚重的土雾，手里捏着信纸如同攥着一条死蛇。王家儿子唱白脸耍脾气说难听话，老子则唱红脸慢条斯理讲仁义道德，论乡风民俗，父子俩一高一低，一阴一阳，挖苦酿制掸牙，要尽了威风，出完了恶气。白嘉轩始终僵硬地挺着腰，瞪着眼，一声不吭。媒人被拉来时，对白嘉轩也颇多埋怨，表面上做出居中调解不偏不倚的态度，现在突然发生了根本逆转：“够了够了，尽够你爷儿俩的了。歪话能呔下一牛

车，嘉轩一句不吭还不够吗？”白嘉轩满脸灰败，如同刮去了紫皮的茄子，硬撑着脸制止媒人：“你悄着，有话让人尽量说。”又侧过脸做出更真诚的姿态对王家父子说：“有话尽管说，有气尽管出，我都揽着，即就唾到我脸上，我都不擦。”王家父子互相瞅着交换着眼色：是不是还要继续骂下去？王老先生突然抡起拳头捶到桌面上，懊悔地自我责备起来：“嘉轩，我混账！”说罢拉着儿子的手不告而辞了。第二天，白嘉轩指使孝武和鹿三从楼上粮囤里灌出整整二十口袋麦子，又捆扎了十五捆棉花，装了满满两套牛车给王家送去。鹿三扬起落满粮食尘土的脸问：“灵灵的彩礼不是五石麦十捆棉花么？你给他退这么多？”白嘉轩平静地说：“我把利息加上了。”鹿三喉头粗大的圪节猛烈滑动了两下，闭上了毛楂楂的阔大的嘴巴。孝武缓缓转过头，猛然用力扯动皮绳抽击着黄牛的肚子，牛车嘎吱嘎吱启动了。白嘉轩瞅着两套装满粮食口袋和棉花捆子的牛车驶出巷道，转过身抱起双拳，对围聚在街巷里的族人说：“我给本族白鹿两姓的人丢了脸了。”说着扬起头来，两只粗大的手背抄在弯蜷的后腰上，沉静如铁地宣布：“白姓里没有白灵这个人了。死了。”说罢依然背抄着手走进自家街门。……

姑妈叙说过这段事，抿嘴不语，有意使自己因为重提往事而激起的情绪平静下来，陷入凝然不动的沉默里。白灵看了一眼姑妈凝重的脸色，自然地联想到父亲的脸色。她有点懊悔自己的鲁莽，捎给王家父子的信，最终像石头一样砸到父亲的鼻梁上；王家父子拿那二十口袋麦子和十五捆棉花不仅可以订娶一个媳妇，甚至连将来给孙子做满月的吃用花费也够了。姑妈平静地说：“你爸苦就苦在一张脸上。孝文揭了他脸上一层皮，你接着再揭一层。”白灵想到此行的重大使命，便从家庭的纠缠里跳出来，对姑妈说：“这样也好。权当我死了，俺爸也就再不为我伤脸蹭皮了。”姑妈还想说什么，白灵捺不住性子听她数落，便抢断说：“姑妈，我还要到县城去，我给旁人捎了一封信要

送。”姑妈到前院书房叫来姑父。姑父说：“给谁的信？放我这儿让顺路人捎进城去，免得你跑。”白灵说：“郝县长的公子是我同学，嘱我亲自交给他爸。”

白灵走进滋水县县府大院时正值午休。郝县长在他的卧室里接待白灵。白灵赶上午休时间，不是偶然，而是经过悉心的算计，所以才有听姑妈数落她的难堪。她以县长公子的同学关系说了一通编好的假话，然后就把那封信交给县长。郝县长拆了信封，看了信，双手握住白灵的手久久不语。白灵忍不住说：“如果有困难，你就甭勉强。”郝县长松开手坐下来挥一下手：“困难咋能没有嘛！可问题已经解决了。”郝县长告诉白灵，红三十六军溃散后的第三天，他就安排山区地下党在峪口和山里收容红军战士，引渡出山，不少人已经返回老窝茂钦。郝县长压低声音，惊喜万分地说：“廖军长虎归北山，让组织放心。”白灵按捺不住问：“鹿政委呢？”郝县长瞅了瞅白灵异常殷切的眼睛，反而有点矜持地说：“他也回到老窝白鹿原上。”白灵猛然站起握住郝县长的手说：“你可真是遮风挡雨的老母鸡啊！”

白灵一身轻松走出郝县长的房子时县府开始上班，院子里有小干事匆匆忙忙的身影，也有老职员含而不露城府很深的持重脸孔，她有点好笑，如果某一天郝县长突然站在院子里宣布一声：我是共产党！那么这些小干事老职员肯定会吓得跌坐到地上。白灵走过县府很深的宅院时反复考虑，要不要去会一会大哥孝文？见了会有什么影响？不见又会造成怎样的影响？最后决定还是应该去。

白孝文瞅着站在门口矜持地笑着的洋学生不禁一愣，整个滋水县城也没有这样漂亮的女子。白灵叫了一声“大哥！”白孝文僵硬狐疑的脸色顿然活泛起来：“噢呀灵灵呀！”白灵完全是一个妹妹的天真姿态：“哥呀，我要毕业了。原先还想考高等学府，没人供给只好不考

了。”白孝文说：“你考你考，我供给，你顶好考到北平去。”白灵说：“迟了迟了，我已经找下饭碗了。”白孝文问：“做啥？”白灵说：“教书。”白孝文点点头赞赏地说：“教书也不错，日子很安宁。”说着才记起问，“你今日怎么记起寻哥来了？”白灵说：“我来看看大姑妈，也看看你，我而今有家难归成了孤儿一个……”白孝文宽慰妹妹说：“咱爸那人就是个那……好了好了，你别伤心。一会儿我领你去认一下嫂子。这几天忙得要死……”白灵漫不经意地说：“大哥如今正开顺风船，当然很忙。”白孝文摇摇头说：“平时紧一阵松一阵倒也罢咧，前一向共匪三十六军窝死在山里，这一向正收拾那些散兵败丁，抓不紧可就让他们溜出山了。上边见天催报抓人的数目哩！”白灵做出好奇的样子问：“我从报上看到消息，说是‘全歼’。你们参加围剿来吗？”白孝文说：“我只负责县城防务。”这么说似乎又不过瘾，接着就不无遗憾地说：“有天晚上，我陪岳书记去看大姑父，万万没料到共匪三十六军政委就在大姑父屋里。你猜是谁？鹿兆鹏呀！碍着大姑父的面子我动手动得迟了，小子又跑了算是命大……”白灵的心早已缩成一蛋儿，想不到兆鹏差点栽到大哥手里，而大姑父居然没有向她提及这件事，姑妈肯定觉得这件事没有她的退婚信引起的反响重要。白孝文得意地笑着问：“你看悬乎不悬乎？”白灵从最初听到的惊诧里松懈下来，反而完全证实了兆鹏已经脱险的消息，证实了郝县长说的兆鹏就在老窝白鹿原上。她装作表示遗憾：“悬悬悬，真个悬乎！到手的银洋又丢了——你和岳书记一人正好分五百哩！”白孝文说：“钱算个屁！关键是让这个祸根又逃了。他是滋水的大祸根，滋水县不除鹿兆鹏甭想安宁。”白灵淡淡地笑笑说：“你要是抓住他，可就有热闹戏了，尽是咱们一个村子的人闹事。”白孝文不以为然地摇摇头：“现在亲老子也顾不上了，甭说一个村的乡党。两党争天下，你死我活地闹……”说到这里，白孝文忽然意识到作为兄长的责任：“灵灵呀，你可得注意，而今当先生了，你就好好教书，甭跟不三不四的人拉扯，共匪脸上没刻

个‘共’字，把你拉扯进去你还不晓得。”白灵笑着说：“要是那样的话，哥呀，你就带人来抓我。”白孝文半是玩笑半是认真地吓唬说：“真要那样的话，哥也没办法——我吃的就是这碗饭嘛！”白灵说：“‘这碗饭’可是拿共产党的人肉做的！”白孝文瞪起眼。白灵嘎嘎嘎笑起来伸出双手：“铐上我的手吧，大哥，我是共匪，你铐吧！”白孝文莫可奈何地笑笑，在妹妹伸过来的白手上拍打了一掌：“你长到这么大还是没正性……”

白灵以惋惜的口吻谢绝了哥哥邀她去认新嫂，说她今晚必须赶回省城，明天早晨要给学生上课，再晚就搭不上进城的牛车了。这样的理由不容变通，白孝文只好应允，热情诚挚地叮嘱妹妹得空儿就回县城来，甚至以玩笑的口吻和妹妹结成联盟：“你跟哥一样，都是有家难归哦！咱们就相依为命。”

白灵坐上回城的牛车舒出一口气来，几乎是迫不及待地想要见到兆鹏，问他在一千大洋的悬赏者岳维山和白孝文当面，究竟是怎样逃脱的？牛车粗大笨重的木头轮子悠悠滚动着，在坑坑洼洼的土石大路上颠出吭噔吭噔的响声，轮轴磨出单调尖锐的吱嘎吱嘎的叫声，渐渐远离了灰败破落的县城，进入滋水川道倒显出田园的生气，一轮硕大的太阳正好托在白鹿原西部的平顶上，恰如一只滗去了蛋清的大蛋黄。白灵双手搁着膝头，瞅着对面陡峭的原坡，顶面上平整开阔的白鹿原，其底部却是这样的残破丑陋……

从原顶到坡根的河川，整个原坡自上而下从东到西摆列着一条条沟壑和一座座峁梁，每条又大又深的沟壑统进几条十几条小沟，大沟和小沟之间被分割出一座或十几座峁梁，看去如同一具剥撕了皮肉的人体骨骼，血液当然早已流尽枯竭了。一座座峁梁千姿百态奇形怪状，有的像展翅翱翔的苍鹰，有的像平滑的鸽子；有的像昂首疾驰的

野马，有的像静卧倒嚼的老牛；有的酷似巍巍独立的雄狮，有的恰如一只匍伏着的疥蛙……它们其实更像是嵌镶在原坡表层的一幅幅动物标本，只有皮毛只具形态而失丢了生命活力。峁梁上隐约可见田堰层叠的庄稼地。沟壑里有一株株一丛丛不成气候的灌木，点缀出一抹绿色，渲染着一缕珍贵的生机。这儿那儿坐落着一个个很小的村庄，稠密的树木的绿盖无一例外地成为村庄的标志。没有谁说得清坡沟里居民们的始祖，何朝何代开始踏进人类的社会，是本地土著还是从草原戈壁迁徙而来的杂胡？抑或是土著与杂胡互相融化的结果……革命现在到了危急关头，报纸上隔不了几天就发布一条抓获党的大小负责人的消息。三十六军的溃灭和姜政委的叛变是猝不及防的灭顶之灾。兆鹏半年前临走时只告诉她一句：有一个段老师和你接头。直到报纸上登出三十六军被歼的重大消息时，她才知道鹿兆鹏半年前去了三十六军。段老师之后又来了一位薛老师，说他从今往后和她联系，因为段老师被抓捕了；前不久又有黄先生来和她接头，说薛老师也被当局抓捕和段老师一起被装进麻袋投进枯井。黄先生说，小白你所以还安全无虞，正好证明段、薛两位老师堪称真正的老师。白灵脑子里只剩下两只装着段老师薛老师的麻袋，七尺汉子塞进三尺长的麻袋扎紧袋口，被人拽着拖着扔进干枯的深井的逼真情景。她当时听罢哑然无语，最初的惊恐很快转化为无可比拟的愤怒。她对黄先生冷笑着说："多亏你给我说明了这个消息，临到我被装麻袋时我就不惧怕了。"后来她一再重现段、薛两位老师被装入麻袋扔进枯井的情景；她从来没有经见过活人被装进麻袋和投进枯井的情景，却居然能够把那种情景想象得那么逼真，那么难忘。白灵觉得正是在黄先生说出那种情景的那一刻里，最终使她成熟了，也看轻了自己：死了不算什么；一个对异党实施如此惨无人寰的杀戮手段的政权，你对它如若产生一丝一毫的幻想都是可耻的，你就应该或者说活该被装进麻袋投进枯井；必须

推翻它，打倒它，消灭它，而不需要再和它讲什么条件；她现在才能切近地理解义无返顾和视死如归这两个成语的生动之处。

黄先生隔了好久才第二次与她接头。在这段间隔里，她几乎天天都担心黄先生也被装进麻袋撂入古城某一眼枯井。这个创造过鼎盛辉煌的历史的古城，现在保存着一圈残破不堪却基本完整的城墙，数以百计的小巷道和逐年增多的枯干了的井，为古城的当权者杀戮一切反对派提供了方便，既节约了子弹又不留下血迹，自然不会给古城居民以至整个社会造成当局残忍的印象。黄先生这次来更显得心情沉重："党组织这回遭到的破坏是太惨重了。"白灵忍不住溢出泪来："你好久不来，我瞎想着……你大概也给……撂进枯井……"黄先生苦笑一下："这很难避免。我现在给腰里勒着一条红丝带，将来胜利了，你们挖掏同志们的尸骨时，可以辨认出我来。"白灵破涕笑了："我用丝绸剪一只白鹿缝到衬衫上，你将来也好辨出我……"黄先生随后就指派她到滋水县来给郝县长送信……

大蛋黄似的太阳沉落到白鹿原西边的原坡下去了，滋水川道里呈现一种不见阳光的清亮，水气和暮霭便悄然从河川弥漫起来。白鹿！一只雪白的小鹿在原坡支离破碎的沟壑峁梁上跃闪了一下，白灵沉浸在浮想联翩之中……

她进入教会女子学校第一次听到一个陌生的名字——上帝时，就同时想起了白鹿。上帝其实就是白鹿，奶奶的白鹿。奶奶坐在炕上，头顶的木楼上挂着一撮淡褐色的麻丝丝。奶奶抽下一根麻丝子加进手中正在拧着的绳子里，左手提起那只小拨架，右手使劲一拨，紫红溜光的枣木拨架儿啪啦啦转成一个圆圈，奶奶就讲起她的白鹿来。那是一只连鹿角都是白色的鹿，白得像雪，蹦着跳着，又像是飞着飘着，黄色的麦苗眨眼变成绿油油的壮苗了，浑水变成清水了，跛子不跛

了，瞎子眼亮了，秃子长出黑溜溜的头发了，丑女子变得桃花骨朵一样水灵好看了……她冷不丁问奶奶：白鹿是大脚还是小脚？白鹿她妈给白鹿缠不缠脚？白鹿脚给缠住了蹦不起来飞不起来咋办？奶奶的嘴就努得像一颗干枣，禁斥她不许乱说乱问……

教会女子学校的先生像是一个模子铸出来的，一律的女人，一律的穿着，连行为举止说话腔调都是一律的，只有模样的宽窄胖瘦黑白的差异；脸上的表情却同样是一律的，没有大悲大喜，没有慷慨激越，没有软溃无力，更没有暴戾烦躁，永远都是不恼不怒，不喜不悲，不急不躁，不爱不恨，不忧不虑的平和神色。经过多年训育的高年级女生也就修炼成这份习性和德行。古城的各级行政官员军职官长和商贾大亨等等上流社会的人们，都喜愿到这所女子学校来选择夫人或纳一个小妾，古城的市民争相把女儿送到这所学校就读的用心是不言而喻的，一夜之间就可能成为某个军政要员的老岳丈。

皮匠姑父和二姑在两个表姐身上也押着这注宝。大表姐嫁了个连长，婚后不到一月开拔到汉中。半年后，大表姐忍不住寂寞，翻山越岭赶到汉中去寻夫，那连长已经有一个皮肤细腻的水乡女子日陪夜伴。大表姐打了闹了，抓破了连长的脸和那女子的下身，随后就再也找不着那俩人的踪影了。她没有回家的路费，几乎在汉中沦为乞丐，后来被一位茶叶铺子的掌柜发现，听她口音是关中人，就把她引进铺子里询问身世。掌柜本是关中人在汉中落脚做小买卖，死了女人不愿意再娶一个汉中女人，主要是听不顺汉中人那种干涩的发音。大表姐就落脚为茶叶铺掌柜的续弦妻子。他比她大整整二十岁，正当中年，倒是知道体贴她疼她，只是经济实力并不比姑父的皮货铺子强多少。

二表姐嫁给一位报馆文人，权势说不上，薪金也不高，日子倒过得还算安宁。那位文人既不能替老岳丈的皮货生意扩张开拓，也没有

能力孝顺贵重礼品，却把皮匠丈人的苦楚编成歌谣在自己的报纸上刊登出来：皮匠苦皮匠苦，年头干到腊月二十五。麻绳勒得手腕断，锥子穿皮刺破手。双手皴裂炸千口，满身腥膻……这是他第一次拜谒老丈人时在皮货铺子的真切体验和感受。他被各种兽皮散发的腥膻味儿熏得头晕恶心，尤其在饭桌上看见岳丈捉筷子的手又加剧了这种感觉。那手背上手腕上被麻绳勒成一道道又黑又硬的茧子死皮，指头上炸开着大大小小的裂口，有的用黑色的树胶一类膏药糊着，有的新炸开的小口子渗出血丝，手心手背几乎看不到指甲大一块完整洁净的皮肤。二女婿一口饭一匙汤也咽不下去，归去后就写下这首替老岳丈鸣不平的歌谣，而且让二表姐拿着报纸念给父亲听。皮匠听了一半就把报纸拉过来又踩又唾，脸红脖子粗地咆哮起来：狗东西，把我糟践完咧！狗东西没当官的本事可有糟践人的本事。而今满城人都瞧不起皮匠行道了你还念个屁……皮匠姑父十分伤心，发誓不准二女婿再踏进他的皮货作坊。

白灵明白姑父失望的根本症结并不在此，是在于两个女儿都没有跟上一位可以光耀门庭的女婿，但他并不知道，这几乎是痴心妄想。教会女子学校是女人的世界，整个城市里各种体态的女子集中于一起，那些精华早被高职要员一个个接走了，属于这个女人世界里芸芸众生的两位表姐，只能被军队的小连排长或穷酸文人领走。皮匠姑父后来直言不讳地给白灵说：你比那俩有出息呀灵灵儿，凡团长以下的当科员跑闲腿儿打闲杂的都甭理识他，跟个有权有势的主儿你能行咯！到那阵儿，看哪个龟五贼六死皮丘八敢穿皮鞋不给钱？皮匠姑父这桩夙愿的实际可能性确实存在。无论学识无论气质，尤其是高雅不俗的眉眼，白灵在美女如簇的教会女子学校里也是出类拔萃的。白灵已经谢绝过几位求婚者，挡箭牌倒是那位从未照过面的王家小伙儿。她对求婚者说：家父在我十二岁时就许亲订婚了。在她离开教会学校

之前，校务处通知她说有一位政府要员要见她，她问什么事？如果是求婚者她就不去。校务处职员忧心忡忡地劝她说应该去，愿意不愿意都得去，此人校方得罪不起。白灵去了。她看见一位精明强干的中年人端端正正在校务处的桌前坐着，棱角分明的脸膛，聪颖执著的眼睛，从脑门中间分向脑袋两边的头发又黑又亮。白灵一进门，那人就站起来颔首微笑。校务处的先生介绍了那位中年人的身份，是省府某要员的秘书，随后就退出门去。那秘书很坦率地问："小姐，你的第一印象如何？人和人交往的第一印象很重要。"白灵天真地说："你像汪精卫。真的。我进门头一眼瞧见你就奇怪，汪精卫怎么屈尊坐在这儿？"秘书含而不露地笑笑："小姐过奖了。汪是中国第一美男子，我怎么能……"白灵笑着说："你就是中国第二。"秘书不在意地转了话题："白小姐毕业后作何打算？"白灵问："你找我究竟要问什么事？"秘书说："你愿意继续求学我可以资助，你愿意就业我可以帮助安排。"白灵问："你怎么对我这样好呢？"秘书说："这还用问吗？"白灵说："我已经嫁人了。"秘书说："难道他比汪还英俊？"白灵说："他可是世界第一。"秘书俏皮地说："怕是情人眼里出潘安吧？他在哪里？"白灵说："十七师。"秘书轻舒一口气："杂牌子。"白灵说："杂牌子军队没规矩。那可是个冷恐子。他说谁要是在我身上打主意，他就跟他拼个血罐子。"秘书说："这我倒不怕。"白灵说："我怕。"属于政府部门的人都怯着杂牌子十七师，秘书说他不怕是强撑面子。白灵再一次重复说："他会连我都杀死的。我怕。那真是个冷恐子！"

…………

白灵又想起和鹿兆海的铜元游戏，那多像小伙伴们玩过家家娶新娘。然而正是这游戏，却给他们带来不同的命运。蒋介石背叛革命以后，她每天都能听到也能从报纸上看到国民党屠杀共产党的消息，古

城笼罩在阴森和恐怖之下。那天后晌正在上课，两三个警察踏进门，把坐在第三排一个女生五花大绑起来。一位警察走出教室门才转过头向先生也向学生解释了一句：“这是共匪。”女学生们惊疑万状。女先生说：“共匪不是上帝的羔羊，让她下地狱。”白灵浑身像是被一根看不见的麻绳勒着，首先想到了鹿兆海。鹿兆海到保定军校学习去了，他能挣脱五花大绑的麻绳吗？她那时急不可待地想见到鹿兆鹏，打问一下鹿兆海的音讯，却找不到他。五六天后，一个更令人惊讶的事情发生了，那位被绑走的同学领着三个警察到学校来，由她指点着绑走了三个外班的同学。那时候整个学校乱了秩序，女生们拥挤在校园通往大门的长长的过道两边，看着三个用细麻绳串结在一起的同学被牵着走到校门口，塞进一辆黑色的囚车。

白灵已经无心上课，就断断续续请假，寻找鹿兆鹏。她回到白鹿原一位老亲戚家打听风声，说是鹿兆鹏早跑得不见踪影了，倒是听到了不少整治农协头目的种种传闻。白灵连夜离开白鹿原又回到城里皮匠姑父家。她再次回到学校时，听到女生们悄悄说，被捕的三个共产党分子全部给填了枯井，本班那个领着警察来抓捕同党的女生也一同被填进井里。白灵恶毒地说：“上帝不能容忍赎罪的羔羊。”

可是，当她找到鹿兆鹏以后，却彻底改变了她的命运。那天午间放学回来，白灵在皮匠姑父的柜台前看见了鹿兆鹏，惊讶得几乎大叫起来。鹿兆鹏迅即用一种严峻深切的眼光制止了她。鹿兆鹏穿一身半新不旧的西装，戴一顶褐色礼帽，像是一位穷酸的教员，在柜台前琢磨着柜台里的各式皮鞋。鹿兆鹏说：“你发愣干什么？我是鹿兆海的国文老师，兆海带你听过我的课你忘了？”白灵立即按照鹿兆鹏递过来的话茬儿往下演戏：“噢！老师呀屋里坐。”转脸就对二姑父喊：“姑父，

这位老师想请你定做一双皮鞋。”皮匠姑父热情地招呼说：“你快把老师引进来嘛！”鹿兆鹏悄声说：“你得让我在这儿磨蹭到天黑。”

皮匠姑父像接待任何主顾那样认真地给鹿兆鹏量了双脚的长短宽窄，又征询了皮鞋的颜色和款式，就继续忙他手中的活儿去了。白灵领着鹿兆鹏进入自己那间小小的卧室转过身问：“你害怕给塞到井里？”鹿兆鹏被突如其来的问题问得愣住片刻，紧紧盯着白灵的眼睛，企图从那眼神里判断出她问话的意图。他却看见那两只微微鼓出的眼睛周边渐渐湿润，然后就潮起两汪晶莹的泪水。鹿兆鹏点了点头。白灵眨了眨眼睛，泪水便溢流下来，颤着声说：“我要加入共产党。”鹿兆鹏用手按着白灵的肩膀让她坐下来，说：“现在全国都在剿杀共产党。”白灵说：“我看见他们剿杀才要入。”鹿兆鹏说：“我们被杀的人不计其数。”白灵说：“你们人少了，我来填补一个空缺。”鹿兆鹏猛地抓住白灵的双手，热泪哗哗流淌下来：“我而今连哭同志的地方也没有了……”白灵说：“我讨厌男人哭哭咧咧的样子。”

鹿兆鹏磨蹭到天黑定时走了。走时对白灵吩咐了两点，再不许她去找任何人申述要加入共产党的意愿，二是继续在教会女子学校念书，那儿无疑是最安全的所在。大约一月后，鹿兆鹏于傍晚时分来到皮货铺店取走了定做的紫红色皮鞋，对皮匠的手艺大加赞扬。皮匠则亲自把皮鞋给他穿到脚上，要他在作坊里走了一圈，而且叮嘱他要是夹脚或者绳子断裂可以随时来修理。鹿兆鹏肯定这是他买到过的最称心的皮鞋，发誓说比上海货好得多。皮匠很得意自己的杰作。鹿兆鹏随之把一本圣经交给皮匠，说这是白灵要他买的。白灵于傍黑时分回到皮货铺子，在那本圣经里得到一个联络地址：啰嗦巷15号。

啰嗦巷在这座古老的城市几乎无人不晓。啰嗦巷大约在明初开始成为商人的聚居地，一座一座青砖雕琢的高大门楼里头都是规格相似

的四合院，巷道里铺着平整的青石条，雨雪天可以不沾泥。这条巷道的庄基地皮在全城属最高价码。破产倒灶了的人家被挤出啰嗦巷，而暴发起来的新富很快又挤进来填补空缺；进入啰嗦巷便标志着进入本城的上流阶层。鹿兆鹏住进啰嗦巷用意正在这里，特务宪兵警察进入啰嗦巷也不敢放肆地咳嗽。白灵找到15号，见到鹿兆鹏就迫不及待地问:“你这成月天都到哪儿去咧? ”鹿兆鹏说:“在原上。”白灵问:“你还在原上? ”鹿兆鹏说:“在原上。”白灵问:“还要去原上? ”鹿兆鹏说:“那肯定。不过这回在城里得待上些日子。”白灵说:“剿杀高潮好像过去了? 报纸上登的杀人抓人捷报稀少了。”鹿兆鹏说:“能逮住的他们都逮了杀了，逮不住的也学得灵醒了不好逮了。损失太惨了，我们得一步一个脚窝从头来。”白灵问:“我上次在二姑家提的申求，你考虑得怎样? ”鹿兆鹏说:“你等着。”白灵说:“我是个急性子。”鹿兆鹏笑了:“这事可不考虑谁是急性子蔫性子。”白灵问:“很难吗? ”鹿兆鹏说:“肯定比以前更严格了。这次大屠杀我们吃亏在叛徒身上。”白灵说:“我肯定不会当叛徒。”鹿兆鹏说:“现在要进共产党的人恐怕不容易当叛徒。当叛徒我想也不容易，他们首先得自己把自己当作狗，且不说信仰理想道德良心。”白灵惊喜地说:“你这句话说得太好了。我可是没想到当叛徒还是很不容易的事。”

白灵第二次被通知到啰嗦巷15号来，鹿兆鹏以亲切庄严的态度通知她已经得到批准了，随之叫了一声:“白灵同志！”便握住白灵的手。白灵听到“同志”那声陌生而又亲切的称呼时，心头潮起一种激情，她紧紧地反握住鹿兆鹏的手，久久说不出一句话，脑子里又浮出本班那位被捕的女生领着警察到学校来抓捕同志的情景。白灵说:“请党放心，白灵只会替同志赴死，绝不会领着警察去抓捕同志。啊！你再叫我一声同——志！”鹿兆鹏松开手说:“白灵同志！我受党组织委

托，领你宣誓。”说着从箱子里翻出一面红旗挂到墙上，站正之后，举起了右手。白灵并排站好，也举起右手，心头像平静而炽烈的熔岩。

这家四合院的男女老少正集中在厅房明间客厅里欣赏唱片。他们的大公子最近从上海捎回来一架留声机，新奇得使全家兴趣十足。同时捎回的还有唱片，全是软声细气的越剧和嗲声奶气的流行音乐，只有一张“洋人大笑”的唱片使全家老少咸宜，于是每天晚上客厅里都充斥着洋人们男的女的，老的少的，粗嘎的尖细的，粗野放肆的，阴险讥讽的，温柔的，畅快的，痛切的笑声。在洋人们的笑声的掩护下，白鹿原上两个同宗同族的青年正在这里宣誓，向整个世界发出庄严坚定的挑战。

宣誓完毕坐下来之后，鹿兆鹏坦诚地说：“我又想起我入党宣誓的情景。我每一次介绍同志入党宣誓就想起我入党宣誓的情景。”白灵问：“你入党宣誓是怎样的情景？”鹿兆鹏说：“那阵儿还是公开宣誓的呢！”他怀着新鲜的却似遥远的记忆说：“我们一起宣誓的有九个人，现在连我在内只剩下三个了。三个给大哥煎了，两个随大哥走了，一个经商去了，而且发了财，咱们现在就在他屋里坐着。”白灵问：“他们没有供出你？”鹿兆鹏笑了说：“他们首先供出的就是我，算我命大。”接着又说：“大哥这回翻脸，小兄弟血流成河。大肆逮捕，公开杀害，全国一片血腥气，唯独我们这座古城弄得干净，不响枪声，不设绞架，一律塞进枯井，在全国独树一帜，体现着我们这座十代帝王古都的文明。”白灵说：“中世纪的野蛮！”鹿兆鹏说：“一切都得重新开头。白灵，你说说你这会儿想什么？”白灵说：“我想到奶奶讲下的白鹿。咱们原上的那只白鹿。我想共产主义就是那只白鹿？”鹿兆鹏惊奇地瞪起眼睛愣了一下，随之就轻轻地摆摆头笑了：“那可真是一只令人神往的白鹿！”

白灵头一次主动去找鹿兆鹏是迫于无奈。她知道这是不能允许的。鹿兆海从军校学习期满回到本城，带给她一个意料不及的难题，他已改“共”为“国”了，而她恰恰在他归来前改“国”为“共”了。她和他在热切的期待中突然发觉对方已不是记忆中的那个人，双方都窝了兴致，都陷入痛苦。她相信自己无法改辙，也肯定他不会更弦，对于第二次约见已丧失信心，于是就去啰嗦巷寻找兆鹏。他们是亲兄弟，他有责任帮助她处理这件十分为难的事。鹿兆鹏严厉地批评她来找他的冒险行为，不经通知绝不许随便找他，后来却仍然答应她前去见自己的弟弟……

鹿兆海去榆林归队前夜找到皮货铺子，对白灵说：“我们出去走走。我明天一大早就上路了。我想和你说说话。”白灵就跟他走出来，不自觉地又走到抛掷铜元游戏的地方。白灵触景生情，抓住鹿兆海的手几乎是乞求说：“兆海，你退出‘国’吧！你哪怕什么党派都不参加也好。”鹿兆海紧紧攥着白灵的手说：“我向你让步，我听你的，我退出‘国’这可以，你也退出‘共’吧！咱们俩干脆什么党派都不参加，你教你的学生，我当我的兵，免得‘国’呀‘共’呀是是非非。”白灵猛地拉出手激烈地说：“你知道不知道，你参加的那个国民党怎么杀戮异党？抓住了甚至连审问的手续也不走就塞进枯井！你参加这样的党难道不怕脸上溅血？”鹿兆海却沉静地说：“我想和你和解，你还在坚持偏见跟我争执。”白灵说：“我没办法忘记枯井里的惨景。”争论比以往更加激烈，更加深刻。鹿兆海再次妥协：“这样吧，咱们谁也改变不了谁，就等一等看吧！等过上几年，也许看得更清楚了，说不定你，也说不定我，会自动改变的。”白灵说：“好！我等着。”鹿兆海转过身说：“明天我就走了，说不定几年才能回来。我现在只有一条——”白灵问：“什么呀？”鹿兆海说：“我们再见面时，也许依然没有结果，也许有一方改变了而得到一致。我只要你答应一条，在我走后几年，在我们下

回见面之前，你甭应允任何求婚者。”说到这儿又抓住白灵的双手：“我们有那枚铜元为誓，我要是失去你，我将终生不娶。”白灵动情地说：“放心走吧！我盼着你回来时再不跟我争辩。”鹿兆海说：“每一次见面我都不会忘记。今晚的话咱们都记住。”白灵说：“你好像信不过我？好像疑虑着什么人要夺走我似的？”鹿兆海说：“我害怕把这个包袱背到榆林沙漠去。敞开说吧，你上次为啥让我哥代你出面？”白灵说：“他向你解说过了他出面的原因。”鹿兆海说：“我那晚非常憎恨他。”白灵说：“你也太……”鹿兆海激动地说：“我看见他就有一种不好的预感。也许我对你太专注了。”白灵叹口气说：“天！我做梦也想不到你会这样想……”鹿兆海说：“无论任何人，哪怕是我亲哥，谁夺走你，我就不认他是天王老子！”

白灵再见到鹿兆鹏时就觉得有点不自然，鹿兆鹏像灵敏的狐狸一样嗅出了白灵异常的神情，警觉地问：“有什么情况？”白灵说：“没什么情况。”她的神情更引起鹿兆鹏的警惕：“白灵同志，现在是非常时期，任何情况都不能隐瞒。”白灵说：“个人私事。”鹿兆鹏说：“个人私事也不能隐瞒。”白灵担心引起鹿兆鹏的隐忧，就恢复了她素来的爽朗：“你猜你兄弟怎么着？怕你把我夺走了。”鹿兆鹏大瞪两眼，骤然红了脸，摆一下手尴尬地笑了：“扯淡！”

白灵随后和鹿兆鹏也不常见面。她在豆腐巷小学校任教员，负责学生运动，刚刚成功地组织了中正中学的一场学潮。在这之前，她已经参与和组织过两所学校的学潮，接着就想在以中国最高统治者蒋的名字命名的中正学校也搞一次。中正中学在古城被政府命名为一所模范学校，教员乃至学生都逐个经过审查，绝无异党嫌疑。白灵抓住学生对伙食不满的机会，促进了一场激烈的算伙食账的学潮。结果是贪污学生伙食费的总务处长被收审，校长也被撤职。白灵兴奋鼓舞：“看

来中正的学校也不是模范！”这当儿鹿兆鹏召见她：“要不失时机地把饭馍斗争提高到反黑暗的政治斗争。”白灵说：“我有信心。”鹿兆鹏随之告诉她：“我要离开这儿。”白灵说：“我能问去哪儿吗？”鹿兆鹏笼统地说：“山里。”白灵又问：“去多久？”鹿兆鹏说：“难以估计。”白灵就不再问了。鹿兆鹏郑重地说：“兆海马上要回来了。十七师撤回来了。”

…………

白灵在豆腐巷小学校接待了鹿兆海。她瞅见他那一身下级军官服装就觉得他们的关系将要完结了。他在她的小房间里坐下，一只手攥着茶杯，另一只手夹着烟卷。他的脸色不仅没有因为北方的沙漠和严寒变得粗糙，反而红润细腻了，只是上唇的黑青色胡楂子变化明显。她笑着说：“你倒更细和了。”鹿兆海说：“那地方水好。”他笑着侃侃而谈，“那地方是一眼望不透的沙漠。走十天八天见不着人烟，见不着树木，只看见一片沙子。到那儿你才能明白，历代皇都为啥要选在咱们这个关中……可那儿有好水。那水养的娃子一律是吕布的模样，那水养的女子一路都是貂蝉的姿色。我待了这几年也沾光了……”白灵说：“你该在那儿给你引回个貂蝉。”鹿兆海说：“我还是恋着白鹿原上的……”白灵抿住嘴没有说话。鹿兆海却豁朗地说：“我这回回来有一点收获，再不逼你了。我知道我变不了，你也没变。但我再不逼你改变什么了。你可以随意嫁人。我嘛……我还是恪守誓言，非你不娶。你嫁了人我就发誓再不娶妻……你可以验证我的话。”白灵说：“这又何苦？你这样说让我怎么办？”鹿兆海说：“没有办法。我走南闯北这多年，愈是相信世上找不到我心里的你了。”白灵赌气地说：“我明天就嫁人！”

木轮牛车嘎吱嘎吱响着，终于驶出白鹿原坡下的滋水河川。回头望去，河川的出口恰如一只喇叭口；口下便是山坡的终结，眼前立刻展现出辽阔无垠的渭河原野，滋水蜿蜒着投进原野流入渭河去了。到这儿才又看见了太阳。太阳在河天相接的地方已经变得难以辨认，像一只破碎的蛋黄，金黄的稠汁流摊开来，和黑色的乌云搅和在一起。白灵的心开始紧揪，到哪儿去寻找鹿兆鹏呢?

第二十四章

白灵回到城里的第二天，就向黄先生汇报滋水之行的情况。这是她受命去滋水时就跟黄先生约定了的，地点仍然是二姑父的皮货铺子。白灵上完课没有吃午饭就走出了豆腐巷，在二姑家所在的巷口一家泡馍馆门前如期而遇黄先生，两人就走进皮货铺子。白灵对姑父喊："姑父，我又给你拉来一个买主。"皮匠见到买主像见到财神爷一样虔诚地咧嘴笑起来，妻侄女虽然至今未能攀上高枝光耀皮货铺子，但隔三差五不断给他拉来买主也算不错，于是就认真地征询买主对鞋的式样、皮子颜色的选择，然后就量脚的长短宽窄和肥瘦。白灵在一旁嗔声叮咛："这位先生是个细活人，穿衣穿鞋讲究得很，姑父，你得做细法点儿。"随后就领着黄先生坐到里屋里，把自己到滋水得到的关于三十六军的情报详细地汇报给他。黄先生说："按你姑父说的取鞋的日子再见面。"

白灵赶后晌上课又回到豆腐巷小学校，心里平静得像一泓秋水，那是圆满完成一项重大而又神秘的工作之后的心理报偿。这种情绪仅仅保持了一个后晌，当叽叽喳喳纷纷攘攘的学生放学离校之后，她在自己的房子里坐下来就又躁动不安起来。一种孤寂，一种压抑，一种渴盼，一种恨怒交织着心境，使她无法平心静气批阅学生们的作业，甚至怀疑自己不适宜做这种极端严密的工作。她至今也不能估计出这座古城里究竟有多少人和她一样在为着那个崇高的目的秘密地战斗着，她仅仅只认识鹿兆鹏和黄先生；她同样估计不来有多少同志被当局抓去了，古城的枯井里填进去多少同志的尸体。整个国家正在变成一架越来越完备也越来越强大的杀人机器，几百万军队和难以估计的宪兵警察以及特务，首要的任务不是对付已经占领华北的日本侵略军

而是剿杀共产党，连滋水这样的小县城也建立起来专门对付共产党的保安大队，培训出来像哥哥孝文这样凶残的职业性地方军人。

白灵简直忍受不了夜的静寂，在门与床铺之间的脚地上踱步，心如焚烧似的急于见到鹿兆鹏。半年之久了，啰嗦巷最后一面，他竟去了红三十六军。全军覆没之后，他又逃潜到白鹿原上，在孝文未能及时出手时，他侥幸地逃脱了。他现在仍潜在原上。她想见他，不仅是想看他半年以后是黑了瘦了伤愈了，而且有一种揪心的逼近着的亲情在挠抓她的心。她已经意识到一个重大的心理变化，从昨天到今天的两天时间里，鹿兆海在她心目中急遽地暗淡下去，而他的哥哥鹿兆鹏却急遽地在她心里充溢起来……“我要做一个真正的军人推进国民革命！”兆海的理想和抱负曾经唤起她的毫无保留的赞同，可是，当初那种国民革命变得不再是驱逐封建军阀而是屠杀人民的时候，鹿兆海的抱负和志向就令她不仅是惋惜了。鹿兆鹏在那架巨大的杀人机器里侥幸逃脱，她在孝文职业习惯的语气里才明朗地感觉到自己与那个人不可分割地联结在一起。她根本无法预测，什么时候才能见到鹿兆鹏呢?

这种情绪有增无减继续了三四天，而且形成一种规律性的循环，白天她和学生们在一起，学生们的天真不断地冲淡或者截断她的思虑；一到晚上，那种情绪便像潮汐一样覆盖过来，难以成眠。第四天后晌刚下课，门口传达室校工周老头交给她一本书，说是一位姓黄的先生捎来的。白灵扫瞄一眼是一本《古文观止》，便走回自己的房子，当即坐下翻掀起来。书的封皮上包着一层牛皮纸护面，护面里用铅笔写着一行字：我今晚得提前取回皮鞋。

白灵放晚学后就回到二姑家等候黄先生。她急不可待地出出进进于里屋和柜房之间，最后索性坐在二姑父旁边聊起家常。白灵说：“姑

父，你现在不必从早到晚刀子剪子锥子不离手地干啦！”二姑父做出莫可奈何的得意口气说：“嗨呀，没法子咯！那些熟人来定货，非得要我亲手做的嘛！”二姑父又一次叙述了老皮匠去世时留给他的遗训，即使皮货铺子发得家产万贯，也要他每月至少亲手做一双皮鞋。二姑父平和地笑着说：“闹到这阵儿我还没发起来，还敢撂下刀子剪子锥子？”这当儿，白灵瞅见黄先生戴着一顶礼帽走进来。

黄先生进门来就对二姑父说：“我要去上海办公务，鞋子得提前取。”二姑父问：“还得几天走？”黄先生说：“后日。”二姑父说：“来不及，根本来不及。”黄先生说：“这咋办？上海那鬼地方以衣帽取人，我可要丢人现眼了。”二姑父蔫蔫地说：“你明晚来取。我熬眼也要你先生在上海风风光光走一程。”白灵笑着说：“放心吧黄先生，有我姑父这句话你就放心吧！”说着就引着黄先生进入里屋。

黄先生坐下后说：“我来传达一个新的任务。”白灵庄严地期待着。黄先生说：“你去给一个同志做假太太。”白灵愣愣地瞪大眼睛叫起来：“你说啥？”黄先生强调说：“是假的。”白灵说：“可我根本没结婚。我根本不知道怎么当太太，假的更装不来！”黄先生说：“你当然得从头学起。况且嘛，得像真夫妻一样甭让人看出破绽。”白灵惊叫：“妈呀，这算什么任务呀？”黄先生说：“一种掩护。”白灵又问：“那位同志是个什么人呢？”黄先生说：“我也不知道。”黄先生接着就对这件事做了具体安排。

白灵辞去了豆腐巷小学教员的职务，提着一只小棕箱走出学校大门，门口有一辆洋车等候着。戴着一只发黄变色的细草帽的年轻车夫一句话也不说，拉起车子就逐步加速到小跑。白灵坐在车上说不清是一种什么心情，无法猜测假夫妻的生活将会是什么样子，而真正的夫妻生活她也是没有体验的。她有点新奇，甚至有点好笑，怀着冷漠的

心去履行神圣的工作使命。车子钻来绕去经过七八条或宽或窄的巷道，在一个虽然气魄却显得苍老陈旧的青砖门楼前停下来。车夫拍击着大门上的一只生锈的铁环，院里便有了一阵轻捷的脚步声。白灵的心忽然跳起来，仿佛真的要见到自己的女婿了。街门吱扭一声启开，白灵一看见来迎接她的人几乎惊叫起来，竟然是鹿兆鹏。她惊讶地张了张嘴又抿上了嘴唇，心在胸膛里便跳荡得一阵眩晕；她的双腿像抽去了筋骨绵软无力，坐在车子上动弹不得；她晕晕乎乎看着鹿兆鹏给车夫数点铜子，车夫像是多得了几枚铜子很感激地连连哈腰，十分殷勤地要帮助送箱子。鹿兆鹏接过箱子，然后扬起头对她说："到家了下车吧！"白灵的心又怦然轰响起来，血液似乎一下子涌上头顶，脸颊顿时烧骚骚热辣辣的，眼睛也模糊不清了，下车踩到地面上的双脚像踩着棉花，几乎不敢看鹿兆鹏的眼睛。走进街门，穿过过道跨进一幢厦屋。未及白灵开口，鹿兆鹏尚未放下手提的棕箱就猛然转过身，满脸变得尴尬而又紧张局促："白灵呀，我咋也没料到会是你！"

白灵顺势在一张椅子上坐下来，心情平静了许多，看见鹿兆鹏满脸尴尬紧张局促的神色，她自己反倒冷静下来。她依然没有说话，看见那尴尬局促的脸色忽然觉得他很可怜。其实她在从门缝里瞅见他的眼睛的那一瞬间，已经准确地判断出他和她一样事先互不知底。她与他记不清有多少次见面了，他的老练，他的敏捷，他留给她的总体印象里，从来也没有惊慌失措，局促不安，尴尬难堪这些神色；她甚至以为他永远都不会出现这些神色，即使被围捕被通缉，被塞进枯井，他也不会尴尬，不会惊慌，不会难堪；实际不尽然，他在她的面前像普通人一样尴尬了，难堪了，局促不安了。她的心渐渐平静下来之后，才意识到自己不能再现出惊慌难堪和局促。鹿兆鹏放下箱子以后，搓着双手在厦屋脚地转了一圈，回过头来又解释一遍："我确实事先没有料到会派你来！"白灵看见鹿兆鹏的脸上已沁出一层细汗，冷静

地说："你如果事先知道派我来会怎么样呢？"鹿兆鹏不假思索地说："我会坚决反对的。"白灵说："你讨厌我还是觉得我不保险？"鹿兆鹏更加尴尬，连忙解释："不不不，我不是这个意思。"白灵说："你反复解释你事先不知道派我来是什么意思？"鹿兆鹏更加难堪，语言也支吾起来："我怕你产生误会，以为这是我有意的……安排……"白灵却进一步追问："即使你事先知道，即使是你有意的安排，又怎么样呢？"鹿兆鹏猛然转过头说："那样的话，我就太卑鄙！"白灵不动声色地问："谁会这样说你呢？谁又了解这真真假假呢？"鹿兆鹏憋红了脸说："兆海。"白灵朗声笑了："你想证明你是个君子啊！其实卑鄙每个人或多或少都有一点儿。有一点卑鄙也可以原谅，只是不要太多。"鹿兆鹏被噎得说不上话来："你这是……"白灵说："你再三解释的时候，想没想到我的处境？我难道事先知道派我到你这儿来吗？我难道比你脸皮还厚吗？你反复解释的本身就有点卑鄙。"鹿兆鹏更加尴尬地仰起脑袋，轻声慨叹说："老天爷！在你眼里谁心中连一丝灰垢也藏不住。"白灵却一本正经地说："鹿兆鹏同志，白灵奉党的派遣来给你做假太太，你吩咐任务吧！一切不要再解释。"鹿兆鹏却使着性子咕哝说："这么厉害的太太，谁支使得了啊！"白灵调皮地笑了："你教我怎么做假太太吧！"鹿兆鹏不以为然地说："权当演戏吧！你不是戏演得挺好吗？"白灵摇摇头说："一台戏演两小时就完了，下了台子我还是我。这……长年累月做假演戏，人怎么受得了呀？"鹿兆鹏开始恢复正常情绪，不在意地说："没有外人来的时候，你我是同志又是兄妹，该咋着就咋着；有人进门时你就开始演戏，一直演到送客人出门。"白灵说："我要是忘了呢？"鹿兆鹏平缓而又郑重地说："你可不能忘。"白灵不无忧虑地问："万一我一涣神忘了咋办？"鹿兆鹏舒口气，做出无奈的手势说："那样的结果——你我就得填井。"

房东老太太这时候走进门来，先瞥一眼白灵，又瞅住鹿兆鹏问：“太太接来了？”鹿兆鹏向白灵介绍房东主人魏老太太。白灵一眼看出魏老太太是个经见过大世面，洞达世情又藐视世事的人，她的充分发胖挺前坠下的腹部，显示着臃肿，也显示着豁达大度，两只硕大无朋的乳房匍匐在宽大的胸膛上，那双眼皮下垂的眼睛透出即使地震也会镇静自若的神气。她第一眼瞥人就使白灵觉得她的眼色像看一只普通的羊一样平淡，而她已经见过成千上万只羊了。她转着脑袋打量了厦屋的摆置说：“缺啥家具就到后边去拿。”鹿兆鹏连连道着“添麻烦”一类歉词。魏老太太不就座，只站了一阵就转身出门，走出厦屋门时，回过头来撇了撇嘴角，露出一丝笑意：“你这太太脸蛋子心疼。”白灵羞羞地笑笑，表示接受了奖励，回到屋里就迫不及待地问：“兆鹏哥，你是怎样逃回来的？”鹿兆鹏愣了一下说：“狼狈逃跑。”说罢轻轻摆一下手：“这回这事不提它了，看下一回吧！”白灵很不满足，说起她到滋水县找郝县长的事，以及无意中听到孝文说的与他的遭遇。鹿兆鹏显然对已经过去了的灾难再不感兴趣，就转换了话题：“准备做晚饭吧。让咱们的烟囱先冒出烟来！”白灵听了这话顿然激动起来。原上人用“盼邻家烟囱不冒烟”的话，讥讽心术不正谋算旁人的褊狭阴毒的人。鹿兆鹏看去像是无意间撂出来的家乡话，有效地抑制或者说镇住了总在她心头蠕动着的孝文那句习惯用语，感觉到了一种心态的平衡。白灵热烈地响应道：“好啊，先让咱的烟囱冒出烟来！”

晚饭白灵做下的是长面。长面象征长寿，象征交谊长久，常常只在过年过节，或新婚嫁娶，或为长者祝寿，或为新生婴儿过满月等喜庆活动中招待亲朋友好。白灵在不无欢欣，不无庄严的心境下点燃第一把柴火时，竟然激动地跷出灶房站在庭院里呼唤鹿兆鹏，要他一起观瞻那砖砌的烟囱袅袅升起的第一缕炊烟……

白灵把一碗浇着肉丁臊子的长面递到鹿兆鹏手上时，抱歉地说："碱放多了——我今日个头一回捉擀杖。"鹿兆鹏用筷子翻搅一下，被臊子覆盖着的面条已经变成黄色，碱面儿放得过量不止一倍两倍，他猛然吸了一大口说："瑕不掩瑜。长嘛可是够长的，筋性也不错，味道嘛还是咱原上的味道。"白灵也给自己端来一碗。吃着饭的时间里，她还是忍不住再次问："你啥时候回到城里的？"鹿兆鹏沉思一下说："巧了，就是你去滋水县的那天，我是后晌进城的。"

鹿兆鹏在白鹿原上度过了一段恬静的日子。他在白鹿书院从白孝文的枪口下逃脱以后没有上原，而是斜插过北部原坡一直向西跑去。选择这条路径的唯一目的是原坡上沟梁纵横便于藏匿，因为他充分估计到岳维山会立即用兵封锁滋水河川西部出口，同时搜索整个白鹿原。他的判断完全准确。保安大队派出一个中队士兵分散到原上挨家挨户搜寻鹿兆鹏，另一个中队的士兵进入滋水河川执行同样任务。鹿兆鹏于曙色初露时赶到距离城市不过十里的另一条河流边上，在沙滩上的草丛里躺下来睡着了。一个放牛割草的老汉用脚把他踢醒来，他说耍钱输光了家产，连婆娘也输给赢家了，想跳河自杀，不料竟睡着了。放牛老汉撇着嘴角，说他有一个治疗赌症的良方。鹿兆鹏装作很迫切的样子跪地相求。放牛老汉用手里的镰刀弯柄指着河流不远处的渡口说："去背河。"鹿兆鹏装作丧气的模样说："凭背河挣那俩麻钱到死也赎不回婆娘。"放牛老汉说："能。能赎回来。"鹿兆鹏还是装作犹疑不定。放牛老汉说："娃子，你把旁人驮到脊背上那阵儿，才能明白自个该怎样活人。"

鹿兆鹏倒真的怦然心动，想去亲自试验一下放牛老汉的人生药方，也许这是他眼下隐蔽的最好手段。他挽了裤子站在水边沙地上，做出背河谋生者的架势……这条河名曰润河，自秦岭流出山来，绕着

白鹿原西部的坡根向北流去，流入滋水再投进渭河。通往古城的路上就形成一个没有渡船的渡口，也就造就了一种背人渡河的职业。不用究问，凡背河人都是些既无产业，亦无技艺的又穷又拙的笨佬儿。鹿兆鹏背起第一个人走到水中，忽然想起与朱先生辩论的事。那是离开白鹿书院进入古城培德中学念书的第一个寒假，他去拜望朱先生时就向先生宣讲共产主义。朱先生笑着问："你要消灭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制度，这话听来很是中听，可有的人甘愿叫人压迫，叫人剥削咋办？"鹿兆鹏说："世上哪有这号人呢？"朱先生举出例证说："在润河上背河的人算不算？你好心不让他受压迫，可他挣不来麻钱买不来烧饼。"鹿兆鹏说："人民政权会给背河的人安排一个比背河更好的职业。"朱先生说："要是有人背河背出瘾了，就专意想背河，不想干你安排给他的好工作，你咋办？"鹿兆鹏急了："人民政权就给河上搭一座桥，车碾人踏都不收钱，背河的人就是想背也背不成了。"朱先生笑了："你的人民政权的办法还真不少……"鹿兆鹏现在想起这件事觉得自己那阵子很可笑，不过现在背河却已成为他隐蔽的最佳选择。河边上偶尔走过一位看去是政府下级官员的人物，也花几个麻钱让人背过河去；偶尔晃荡过来一排士兵，便把包括他在内的所有背河的苦力都集中起来背他们过河，自然是谁也不敢伸出手掌企图什么的。所有经过河边的过河者和背河者，谁也不会想到政府正在追捕的红三十六军政治委员鹿兆鹏正在背着一个小脚女人过河……鹿兆鹏趁天黑时进了东城门，找了两处地下交通都失败了：一个搬迁了，另一个已被逮捕。他感到一种危机，不敢贸然再去瞎撞。他无奈间混入东城墙根下的贫民窟，在一个名是家庭客栈实是兼营卖淫的小栈通铺里挤了一夜。第二天晌午进入东关，那儿有闻名东半城的一家羊肉泡馍馆子。鹿兆鹏走进门，装作寻觅座位扫视各色就餐的人时，看见了一张熟悉的脸盘，不禁喜悦起来，那是一位同志。那位同志几乎同时也认出他来，激动地站起来叫了一声"鹿哥"，扬起的手里还攥着半个尚未掰碎的饦饦馍。鹿兆

鹏顿时毛发倒竖，急忙转过身去，几乎同时从他左边一张餐桌旁跃起两个人来；兆鹏和他们不过五六步距离，要逃脱已不可能。他急中生智，一把夺过正在翻搅着煮馍的炉头手里的铁瓢，一扬手迎面把满满一瓢羊肉汤煮泡着的滚烫的馍馍泼撒到两个大汉的脸上。鹿兆鹏只听见俩人惨厉的叫声而无暇一顾他们跌倒翻滚的惨景，拐进一条小巷才撒腿跑起来，最后还是跑到润河边继续干起背河的营生……第二天黎明时分，鹿兆鹏走进白鹿原南端秦岭脚下的大王镇高级小学……

鹿兆鹏对白灵说：“我听见他叫‘鹿哥’时，看见他眼里射出一道绿光，跟我夜里在原上碰见的狼的眼睛一样。”白灵索性放下筷子，不吃长面了，说：“我们日后成功了，决不能轻饶叛徒。”鹿兆鹏说：“一个叛徒比一千个白孝文岳维山还厉害。”

鹿兆鹏住在校长胡达林的屋子里，装作是城里来的亲戚到山脚下的温泉洗治皮肤病，每天装模作样去温泉洗一次矿泉水，夜晚宿住在胡达林校长的套间房里。学校靠近温泉，先生们无一例外都要接待安排前来洗病的亲朋友好，鹿兆鹏的到来不会引起任何猜疑。胡达林是鹿兆鹏在白鹿镇初级学校发展的头批党员，在他逃离以后隐蔽下来，又遵照他的安排进入秦岭脚下的大王镇学校。胡达林豁达而又谨慎，豪壮大气而又机敏狡黠，在大王镇镇面上已经成为一个捏事了事的人物；他在学校里发展了五个党员，建立起一个支部，把那些心眼拐曲不可信赖的人一个个挤走，把学校经营成了一个安全的据点。胡达林对鹿兆鹏说：“你现在好好洗，好好吃好好睡吧！要弄啥让我给咱去弄。”鹿兆鹏说：“必须尽快找到组织。”胡达林说：“你还是好好洗，好好吃，好好睡，把精神先养起来。找组织你说路数，我着人去找。”鹿兆鹏心急如焚，既不能好好洗，也不能好好吃，更不能好好睡，焦灼急迫的心情里渗透着一缕悲凉，这是他投身革命以来不曾有过的一

种情绪。国民党反手对共产党实行大屠杀的那一次，激起的是无以诉说的愤怒而没有悲凉；这回因党的重要首脑叛变造成的损失更为惨重，刚刚建立起来的红三十六军彻底覆灭了，苦心经营的地下组织像蛛网一样被轻而易举地捣烂了。他不过是一只侥幸逃亡的蜘蛛，在重新结网之前就有了一股悲凉。他给胡达林说了一个联络路数，胡达林派了一个党员进城去了，结果没有联系得上，接着又去了三回才找到一丝线索。鹿兆鹏在大王镇高级小学已经住下整整十天了，难得的安静生活和美好的矿泉水的滋润，使他褪去了疲惫焕发起精神，当这个游丝似的线索被他抓住以后就断然决定："让那个同志再跑一趟约他见面，我还在润河边上背河，腰里勒一条蓝布腰带。"……

鹿兆鹏对白灵沉静地说："姜政委进山去三十六军以前，已经和当局策划了这场阴谋。"白灵又重复一遍她的话："我们成功了首先要找叛徒算账，他们太卑劣了。"鹿兆鹏说："对他姓姜的账绝对不能等到成功了再算。"

严峻的气氛浓厚地笼罩着这两间厦屋，因为假夫妻这种特殊的关系而弥漫在两人心头的尴尬纷乱的云翳消散了廓清了。鹿兆鹏受命调进城来，替补被填了枯井的同志的位置；更为险恶的环境需要采取更为隐蔽的方式，与白灵结成假夫妻就是一种隐蔽方式。鹿兆鹏对白灵说："我们个人的一切都是不重要的。"他向她暗示这种特殊关系，心头已经排除了悲凉而涨起壮豪："我们现在重新来织一张新网。"白灵说："党在危机中让我来协助你，我感到骄傲。即就被填了枯井，我还是骄傲。"鹿兆鹏哼了一声："先不要想自己被填井，先织我们的网吧！把那些苍蝇蚊子网住吃掉，让我们也痛快一下。"白灵笑了说："我可不吃苍蝇不吃蚊子，我嫌恶心！"鹿兆鹏也笑了："你不吃全让给我，苍蝇蚊子毒虫猛兽我都敢吃它们。"

夜深以后应该睡觉的时候，白灵想提醒鹿兆鹏时却说不出“睡觉”那俩字，那一刻她意识到自己其实还是个女人；女人在这种特殊环境里的劣势和障碍，自己连一丝一毫也摆脱不掉。她终于没有说出“睡觉”那俩字，而是默默地抓住一只棕毛笤帚扫起床面，心儿却嘣嘣跳起来。她铺开一条被筒，接着再铺下一条被筒，心儿的跳荡已加剧到两个鬓角频频弹动；在摆下一只枕头要摆第二只枕头时，变得更加迟疑了，那枕头像炙热的物体烤烘得她脸颊烫烧。鹿兆鹏转过身，似乎看出她的窘迫，弯下腰从床底下取出一块桐油油布铺到砖地上，从床上抱起一条被卷扔到油布上，接着从她手里夺过枕头放到地铺上，悄声说：“我早都准备好了。”白灵骤然掀起的窘迫又骤然回落，心里反倒产生了一种冷寂。她说：“让我睡地铺。”鹿兆鹏用手指指门前，压低嗓门提示说：“我睡地上给你挡狼。”说罢噗嗤一声吹灭了煤油玻璃罩子灯，屋子里骤然黑暗下来。他躺倒到地铺上，还在回味着刚才随意说下的“挡狼”的话，并为自己这句双关语中所含的机智不无得意。

其实鹿兆鹏心里比白灵更窘迫，他看见白灵的羞怯，也看出她的单纯，而他已经结过婚，知道同床共枕的实际内容。他比她年长，再说她与弟弟兆海又是那种关系，说来是他的弟媳。他既要保持领导者的尊严，又要不损哥哥的脸面。他见到她的第一眼就感到窘迫，但却极力掩饰着。他掩饰内心紧张欢乐痛苦的本领是非凡的，也是老到的。

他现在依然为自己说下“挡狼”的话而得意，这既解除了自己的窘迫，也解除了白灵的窘迫，只要度过最为难的第一夜，窘迫就会从俩人的身上消失。他躺在地铺上，屋里静寂无声，凭感觉可以断定白灵依然端坐在床上。他以平淡而又真诚的语气说：“睡吧。”却听不到她的反应。久久的沉默之后，鹿兆鹏终于听见白灵脱剥衣服的窸窣声

儿；屋子里弥漫着一缕异样的温馨的气息，那是白灵的肌体辐射到空间里的一种难以名状的气息。他的脑子里突然冒出自己结婚头一夜的情景，于是又腾起了一层悲哀的浓云浊雾。

白灵则显得单纯得多。她起初为并排或是两头摆置枕头而为难，而当鹿兆鹏躺到地铺上以后，便顿然化释了。她根本说不清自己刚才骤然而起的心跳脸烧是为了什么，似乎只是一种朦胧模糊的意象，或者是女性的一种本能。在她脱衣裳时，又产生了这种本能的障碍，即使吹了灯在黑暗中脱，也仍然感到局促。她的手摸到胸前的纽扣时，又抑止不住地心跳；双手解开裤带儿的时候，甚至有一种无端的战栗。她仓皇地脱掉衣裤溜进被筒，心里才渐渐舒活起来。她又一次嘲笑自己，假娃子毕竟不是娃子啊！白灵悄无声息地躺着，闻到一股异样的诱人的气息，那是睡在地铺上的人辐射到空间里的男人的气息，心里却产生了荡秋千的那种奇妙的感觉……

白灵对原上家乡最显明最美好的记忆是清明节。家家户户提前吃了晌午饭便去上坟烧纸，然后集中到祠堂里聚族祭奠老辈子祖宗，随后就不拘一格地簇拥到碾子场上。

村子北巷有一座官伙用的青石石碾，一年四季有人在碾盘上碾除谷子的外壳，或碾碎苞谷颗粒，然后得到黄灿灿的小米和细碎的苞谷糁子。碾盘南边有两棵通直高耸的香椿树，褐色的树皮年年开裂剥落，露出紫红色的新皮；新发的叶子散发着浓郁的清香，成为理想不过的一副秋千架子。黑娃把一条擀杖粗的皮绳拴到后腰里的裤带上，猴子一样灵巧轻捷地攀爬上去，把皮绳在杈股上拴绾结实，两条皮绳在离地三尺的地方绾系着一块木板。为了让众人心地踏实而不担忧皮绳松扣，黑娃率先跳上踩板第一个荡起来。黑娃第一个就把秋千荡高到极限，人在空中呈现出脚朝上头在下的倒立姿势；脚下的踩板撞上

某一条树枝成为荡得最高的标志，随后陆续跨上秋千的人就企图打破那个纪录。黑娃的姿势也是最洒脱最优美的，秋千荡到半空时，两臂撑开和身体构成一个十字；收缩双臂时那皮绳在空中就发出啪啪啪的颤响，令胆小的人发出一阵阵欢呼又一阵阵惊叹。能够把秋千荡到黑娃那样高度的人还有几个，有年轻人也有壮年汉子。父亲白嘉轩总是在众人都试过一回之后才上架子，启动的动作有力却笨拙，他只能荡到两条皮绳在空中拉直摆平的高度，那形体像平展双翅沉稳盘旋在苍穹的一只老鹰。而鹿子霖一上秋千就引起满场喧哗。他不是以高度取胜，而是以花样见长。他一会儿坐在踩板上，一会儿又睡在上面；他敢于双足离开踩板只凭双手攥住皮绳，并将身体缩成一团；他可以腾出一只手捏住鼻子在空中擤鼻涕，故意努出一连串的响屁，惹得树下一片亲昵的叫骂。

鹿兆鹏在外上学，难得遇着清明节在家乡过，白灵只见过一次。那时候鹿兆鹏穿一身藏青色制服，一上手就企图超过黑娃创下的纪录。他的动作不大协调，技术不熟练，但他很努力。当踩到接近黑娃的标高时，树下响起一片欢呼，白鹿村又出了一个荡秋千的好手了。这当儿，发生了一件吓人的事，当踩板高过肩膀时，他竟双脚脱开了踩板，树下顿时又响起一片惊慌失声的尖叫。白灵也吓得“妈呀”尖叫了一声。鹿兆鹏凭着双臂在空中荡了两个来回才又踏住了踩板。鹿兆鹏从秋千上跳到地面时，人们正掐着鹿子霖的鼻根儿救命哩……

这是一年里唯一的轻松活泼的一天，男女老幼不分，门族尊卑不论，都可以聚到碾场上来纵情谈笑，都可以到秋千架上去表演一番，显示一回，尤其是大姑娘小媳妇，可以不受公婆以及门风家法族规的约束，把长长的辫子甩到空中，也把畅快的笑声撒向天空。白灵头回上石碾场的秋千是女娃子里最小的一个，荡的高度虽不能与大人们相

比，却也令人惊异。当她躬身屈膝把踩板推向前方的高空时，感到的是一种酣畅淋漓，而当秋千从高空倒退回来的时候，却感觉到一种恐惧，风在耳边呼呼呼啸叫，身体像一片落叶悠悠飘浮着，心儿紧紧地缩成一团，微微战栗……

白灵睡不着，奇怪自己怎么会想起秋千的往事来，忍不住说：“兆鹏哥，还记得你那回打秋千的危险吗？”鹿兆鹏也没有睡着，笑着说：“真想回原上再打一次秋千。”

第二天早晨白灵醒来时，鹿兆鹏已穿戴齐整，把被子和枕头叠好送回床上，又把油布卷起来塞到床下。白灵慌忙穿衣蹬裤跳下床来。鹿兆鹏说：“按照一般家庭的习惯，妻子应该比丈夫早起一步，打好洗脸水再清扫房间，然后做早饭。今天头一回可以原谅。”白灵伸伸舌头做个鬼脸就忙活起来。吃罢早饭，鹿兆鹏把一绺纸条交给她说：“送到八仙台的南殿北墙根下。”白灵接过纸条，整个身体里的神经都紧张亢奋起来。鹿兆鹏说：“你现在是一个虔诚的道教徒。到门口甭忘了买香蜡纸表。”

白灵从此开始了这种隐秘的工作。有一天，白灵对鹿兆鹏说：“那张网织起来了吧？”鹿兆鹏说：“还没有。咱们是两只不错的蜘蛛。”白灵问：“过了一向光景了，你看我做假太太有没有漏洞？房主老婆子很贼的。”鹿兆鹏沉吟一下说：“似乎没有什么明显的漏洞。你看有什么漏洞没有？”白灵说：“有。”鹿兆鹏忙问：“什么事？”白灵却不说。

那是她刚刚搬来五六天，鹿兆鹏出去了，白灵坐在台阶上补缀鹿兆鹏的一双线袜。房东魏老太太很友好地送来一只袜子楦头。白灵把楦头塞进袜子试一下，有楦头果然好缝，连连说着感激的话。魏老太太问：“你们晚上怎么总跑茅房？”白灵一时摸不清话意，只顾低着头

纳扎袜子。魏老太太以长者的关怀口气指导她说：“置个夜壶尿盆该多方便。往后天冷了，下雪了，跑茅房还不冻死！”白灵顿时意识到做假夫妻留下的漏洞，也判断清楚老太太并无歹意，随机应变说：“我家先生闻不惯尿臊气儿，害得我……再冷也得跑茅房。”魏老太太咂着卷烟，撇着嘴角，世故地说：“男人家毛病多，差不多个个男人都有一个怪毛病，我那老掌柜的毛病才怪哪……”

白灵一直未对鹿兆鹏提说过这件事，说了会使俩人更加难堪，于是就说：“假的总是假的。漏洞你甭问了，我已经掩盖过去了。不过……作假还真难。”白灵说完瞧着鹿兆鹏，发觉他有点不太注意自己的话题，似乎心不在焉，就问：“啥事不顺利吗？”鹿兆鹏也不抬头，低沉地说：“郝县长出事了！”白灵像是给人拦腰抽击了一棍：“啊……”鹿兆鹏说：“还是那个叛徒告的密。”

白灵承受不起这个沉重的打击，变得郁郁寡欢，沉默不语。鹿兆鹏几次提醒她“甭露出破绽来”，也不能使她完全改变过来。她的脑子里日夜都浮现着郝县长那张机智敦厚的圆脸盘儿，一次又一次重现她到滋水县见到郝县长的情景。又莫名其妙地幻化出郝县长被塞进麻袋撂进枯井的惨景。鹿兆鹏劝解不下时，竟然硬着心说：“白灵同志，在中国干共产的人，得修炼成能吞咽刀子的硬功夫，只凭一般的顽强是不行的。”白灵愣了一下，瞅了兆鹏一眼，依然缄默。鹿兆鹏说：“不然，我还敢跟你说重要事情吗？”白灵终于溢出两滴泪花：“瞧着吧兆鹏哥……我能练出这个硬功夫的！”说着扑到鹿兆鹏怀里，浑身颤抖着几乎站立不住，从牙缝里迸出一个个单个字来，“我已经……把刀子……咽下去了……”鹿兆鹏抱扶着白灵猛烈颤抖着的身体，抬起右手摩挲着她的头发，随之双手挟着白灵的肩头把她撑离开自己的身体，冷峻地盯着白灵近在咫尺的眼睛说：“郝县长今日被害了！”白灵瞪着

眼问："又给填了枯井？"鹿兆鹏说："不，这回是枪杀。岳维山专意从城里把人要回去，杀场就在白鹿原上。"白灵说："杀一儆百哦！"鹿兆鹏按着白灵的肩膀坐下来说："我们还得学会容纳仇恨。"

白灵终于从痛苦的深渊爬上岸来，变得沉静了。她继续把鹿兆鹏交给她的字纸绺儿送到某个秘密的地方，或一尊香炉下，或两块石缝里，或一块砖头底下，或某棵柏树的空心中。一次在埋着万余具尸骨的革命公园里，她取回一条纸绺，正装作游人在甬道上徜徉，猛然左肩被谁重重地拍击了一下，吓得她几乎叫出声来。她转过头，却见鹿兆海微喘着气站在面前，一只手还死死地抓着她的左臂："你让我找得快要急疯了！"白灵吁出一口气说不出话，鹿兆海拉着她的胳膊离开甬道，朝一座亭子走去。

鹿兆海告诉她，他去过皮匠铺店，也去过豆腐巷小学，问谁谁都说不出白灵的踪迹。他疑心皮匠对他保密，又买了古城名点水晶饼和腊汁羊肉孝敬给皮匠，皮匠收了礼物竟然对他赌起咒来，甚至骂起白灵是个"喂不熟的白眼狼"……

鹿兆海说："你真心硬。"白灵瞅着鹿兆海的军装，却问："你这衣裳是连长，还是营长的？"鹿兆海说："问那干啥？好不容易撞见你，难道跟我连一句知心话也没有啦？"白灵嗔怒地说："我怕你把我填了枯井！"鹿兆海说："那是特务干的事，而我是一名军人。"白灵说："特务难道不是贵党豢养下的？"鹿兆海恳切地说："难道我们一见面就非得吵这种事不行吗？你和我之间就只有'国'和'共'的争斗吗？我们那时候两小无猜，想能想到一起，说能说到一道儿，我们抬死人也是抬一副架子。我们屁股底下就埋着我们抬出来的尸骨，我们在这儿挖坑掩埋死者又修起公园。我们订了终身，而今却弄到这个局面……"鹿兆海说到这儿已经伤心了。白灵却冷淡地说："你该不是从月亮上刚下来

吧？城里的枯井几乎天天都有活人被撂进去，你却在这儿抒情。”鹿兆海说：“你能告诉我你的住处吗？”白灵说：“不能。”鹿兆海说：“你不相信我？我还不至于卑劣到向特务去密告我的……”白灵站起来说：“我要回家了。”鹿兆海说：“我们一月能不能见一面？我看看你就行了。我再说一遍，我等你，决定终生不娶。”白灵说：“我已经成家了，还能再和你约会吗？”鹿兆海说：“我不信。你不过是推托。我等你到老。”白灵发觉自己的心开始战栗，故意冷着脸说：“你到枯井里认我的尸首时，我谢你。”

白灵回到家天已擦黑。鹿兆鹏仰躺在床上闭目养神。白灵把那张取回来的纸条儿塞到他的手里。鹿兆鹏看了一眼，猛乍鱼跃似的跳到脚地上，一把抓住白灵的手臂，脸颊上的肌肉痉挛着：“灵灵，你知道不知道你取回来一个什么情报哇？”白灵沉静地说：“你不用担心，我可以吞吃刀子了。”鹿兆鹏撇一下嘴角说：“这回是把刀子插到他们嘴里了！”白灵顿然激动起来，双手抓住鹿兆鹏的胳膊急切地期待着。鹿兆鹏解气地说：“我们把那个大祸根除了——只用了一小包药面儿。”

根除叛徒的斗争刻不容缓，缓一天就意味着有更多的人被塞进枯井。处死姜的第一方案是设法炸掉汽车，姜有坐小汽车的瘾。这个方案不大切合实际未能实施，随之就有给姜家打进一个用人的方案，也没能得以实施，是因为姜的警惕性比这个方案的设计者更高一着。最后实施的第三方案，是从姜的饮食上打开的缺口。姜是关中人，早餐喜欢吃一碗羊肉泡馍；过去是自己到泡馍馆亲自掰碎馍块耐心等待，而今叛卖同志得了赏金，发了横财，摆起阔佬架子，在古城久负盛誉的老孙家泡馍馆吃订饭，由堂倌每天早晨送饭上门。老孙家雇佣着十数个专事送饭上门的堂倌，用一个竹编提盒装着两层保温棉套的饭碗，在街道上一路喊着“借光”小跑过去；不说行人，即使街痞警察看

见听见这些小厮也是赶忙躲让，唯恐不及，因为这些小猴子爬附在老虎背上——他们送饭的主户肯定是大亨要员，以及要枪杆子的军警长官。按照鹿兆鹏设计的方案，通过熟人给老孙家打进一个堂倌，又以不经意的理由和给姜送饭的堂倌调换了路数。为了使姜消除任何猜疑，直到第七次把饭碗从提盒里取出时，才把一撮砒霜溜进碗里。热气蒸腾香味扑鼻的羊肉泡馍递到姜的手里时，堂倌像往常一样哈着腰恭维一句："口味不合您老早说哎！"姜习惯性地用筷子搅一搅，把沾在筷子上的稠汁搁嘴角捋一捋，咂咂味儿点点头，不屑于和堂倌开口说话就大吃起来。堂倌依然哈着腰倒退到门口才直起身来转身出门，走过四合院过庭出了街门，便钻进一条早已窥测好了的巷道，再也不回老孙家泡馍馆去了。姜吃完泡馍以后习惯喝茶，不断地揩着额头上冒出的热汗，这是羊肉泡馍吃罢后最惬意的感受，然后就坐等在屋里接待来人议事。姜被当局委以高职却无实权，四合院门口有专司门卫的特务，说是保障他的安全，其实是提防着他。姜品罢一壶香片茶，突然听到胃里咯噔一声响，体内如同发生了地震，一阵剧疼几乎使他跌翻到椅子底下去；在他尚未坐稳时，又来了一声咯噔，像是一声闷雷在腹腔爆炸；他这时顿然悟觉到死亡的危机，一把抓过刚才吃罢泡馍的细瓷大碗瞅着，碗里残留着腥汤残渣，他满腹狐疑翻转过碗来，在碗底上发现一行铅笔写的小字：执行人鹏。姜完全证实了自己的猜测，立即用手指死劲抠抓舌头，想把毒药吐出来。然而为时已晚，他刚吐出一口膻腥的秽物就从椅子上跌翻下去……

"家里有酒吗？"鹿兆鹏述说了处死姜的简单过程之后问，"我今日才算出了一口闷气。"白灵从柜子里摸出一瓶太白酒，蹾到兆鹏面前的桌子上说："我去炒俩下酒菜。"鹿兆鹏抻住白灵的胳膊说："我喝酒是干抿不要菜。"说着用牙齿咬掉瓶塞，往酒盅里斟满了酒，端起来说："三十六军和枯井下的同志，你们的敌人今个完结了。"说罢把酒洒到

脚地上。白灵端起另一只酒盅同样洒下去，口里喃喃着："郝县长，我给你祭酒哩！"鹿兆鹏重新给自己也给白灵的杯子里斟上酒："白灵同志，你知道不知道？正是你送出去和取回来的那些小纸条，给姜叛徒缀成一杆通向黄泉的引魂幡！"白灵舒口气说："我也参与了杀人。哦！他不能算作人。"说罢主动地和鹿兆鹏碰了一下，然后一饮而尽；饮罢抓过酒瓶，给兆鹏斟上，再给自己斟上，溢出红晕的脸膛容光焕发："我今日个才知道，烧酒合我的口味。"三巡之后，鹿兆鹏从白灵手中夺下瓶子拧上瓶塞："不能醉倒……这是戒律。"白灵却双手捂着脸呜呜哭起来。鹿兆鹏抚着白灵的肩头说："不能哭——这也是戒律。"白灵猛然站起来，抓住兆鹏的手说："咱们做真夫妻啊兆鹏哥！"鹿兆鹏猛烈地战栗一下，抿嘴不语。白灵扑到他的胸前紧紧抱住了他。鹿兆鹏伸开双臂把白灵紧紧地搂抱住时，一股热血冲上头顶，猛烈颤抖起来。那洪水一样的潮头冲上头顶过后，鹿兆鹏便拽着白灵一起坐到床沿上，掰开白灵死死箍抱的手臂，强迫自己做出大哥的口吻劝喻说："你喝多了胡吣！"白灵扬起头，认真地说："我说的是心里话。我头一天进这门时就想说。""这不行。我原上屋里有媳妇。""那才是假夫妻。"鹿兆鹏痛苦地仰起脸，又缓缓垂下头来说："我根本没想过娶妻生子的事。我时时都有可能被填了枯井，如果能活到革命成功再……"白灵打断他的话说："我们做一天真夫妻，我也不亏。"鹿兆鹏愈加清醒愈加坚定地说："过几天咱们再认真谈一次。今黑后半夜我得出门上路。"白灵说："这个'假'我做不了了。兆鹏哥，你不情愿我吗？可我从你眼里看出你情愿……"鹿兆鹏臊红着脸不吭声。白灵说："有两回你半夜叫我的名字……我醒来才知道你是说梦话……"

鹿兆鹏转过身，瞅住白灵的眼睛，屏着呼吸向她逼近。白灵看见一双燃烧的眼睛，意识到火山爆突的熔岩瞬间将溅到自己的脸上，一阵逼近的幸福促使她闭上眼睛，等候那个庄严的时刻。鹿兆鹏猛然抱

住她的肩，她在那一瞬先是觉得肩头酥了熔化了，随之浑身的骨肉皮毛都酥了碎了轻飏起来了。他的嘴唇搜遍了她的衣领以上外露的全部器官和皮肤，翻来覆去吻吮她的嘴唇，她的脸颊，她的眼睛，她的耳朵，她的鼻子，她的额头和她的脖颈。他的嘴唇带着炙热的火焰，触及到哪儿哪儿就燃烧起来。她觉得自己像一叶小舟漂在水上，又像一只平滑在晴空丽日的鸽子。他的手在解她腋下的纽扣。她猛然忆及到重要的一件事而挣扎着爬起来，把他的双手控制到他的胸前，然后从柜子里取出一双红色的漆蜡点燃了，又一口吹灭了油灯。鹿兆鹏惊讶地张了张嘴。白灵说："我等待着这一天。"说罢拉着鹿兆鹏跪下来："得先拜天地。"

夜半时分，鹿兆鹏在白灵耳边说："我得起身上路。"白灵紧紧抱住他说："不能等到天亮吗？"鹿兆鹏说："我真想把这一夜睡到天亮。"俩人紧紧地偎依拥抱着不再说话。白灵问："去哪儿？"

"回原上。"

"回原上？"

"回原上。"

"得多少日子？"

"不出半个月。"

"能告诉我什么事不？"

"大事。我一生中干过的最大的事。这件事办成功了，白鹿原将载入史册。"

鹿兆鹏从被窝里坐起来穿衣服。白灵也爬起来。鹿兆鹏按住她。白灵说：“你的家法要妻子先起床呀？”鹿兆鹏已穿好上衣说：“让我给你穿戴吧！”白灵羞羞地坐起来，温顺地伸出左臂又伸出右臂，听任兆鹏给她把衣袖套上去。在扣结最后一道胸扣时，他又吻了她的乳房。鹿兆鹏抬起头来说：“哥今黑出了这门，即使再进不了这门，也不遗憾了。”白灵神色骤然惊惶起来，伸手捂住了他的嘴。鹿兆鹏挎上行李袋出门时，又回过头来：“灵灵……哥我粗……鲁……你甭……”白灵打断他的话说，“你是火山……爆发！”

鹿兆鹏出门以后，传接纸条的工作便基本中止，白灵除了照例去八仙台烧香拜道，做做样子以掩房东魏老太太的眼目以外，便有了宽裕的时间，开始为鹿兆鹏准备棉衣棉裤。她买来布面布里和棉花，专意展示在魏老太太眼前，让她品评布质的优劣和价格合算不合算。在裁剪衣服时，又恭敬地请来魏老太太，问询领子腋下裤腰裤裆等处裁剪的尺寸。魏老太太一条胳膊扶着另一只胳膊肘，弹着手里的卷烟烟灰，自豪而又不屑地说：“我一辈子没捉过剪子。连针线也没捏过。”

白灵比着兆鹏的旧衣裤剪裁完成，坐在庭院里明亮的天光下穿针引线时，就有了充裕的时间和安静的环境回味那一夜。他等不得她羞怯忸怩地解去纽扣而自己动起手来，手忙脚乱三两下就把她剥得精光；他的嘴唇，他的双手，他的胳膊和双腿上都带着火，触及到她的任何部位都能引起燃烧；他的整个躯体就是一座潜埋着千万吨岩浆的火山，震颤着呼啸着寻求爆发。她那时候突然意识到自己也是一座火山，沉积在深层的熔岩在奔突冲撞而急于找寻一个喷发的突破口；她相信那种猛烈的燃烧是以血液为燃料，比其他任何燃料都更加猛烈，更加灿烂，更为辉煌，更能使人神魂癫狂；燃烧的过程完全是熔化的过程，她的血液，她的骨骼和皮毛逐渐熔化成为灼热的浆液在缓缓流

动；她一任其销熔，任其流散而不惜焚毁。突然，真正焚毁的那一刻到来了，她的脑子里先掠过一缕饱含着桃杏花香的弱风，又铺开一片扬花吐穗的麦苗，接着便闪出一颗明亮的太阳，她在太阳里焚毁了……火山骤然掀起的爆发和焚毁迅猛而又短暂，爆发焚毁过后是温馨的灰雾在缓缓飘移，熔岩在山谷里汩汩流淌，整个世界是焚毁之后的寂静和明媚……

这是一种无法遏止的回味。白灵的眼前不断地浮现出鹿兆鹏变形的脸和颤抖的身躯。这种回忆常常被魏老太太冲断。魏老太太从屋里转磨到她跟前，常常说出一些市井哲人的话。她不在乎地问："你们白天黑间屋里老是悄没声儿的？像是住着一对老夫妻。你俩才多大嘛！"白灵也不在意地说："过日子嘛，有啥吵吵闹闹的。"魏老太太说："人跟人差远了，甭看都是个人咯！"白灵附和说："有的人性情活泛，叽叽嘎嘎。俺们俩人在一起总觉得没多少话好说。"魏老太太说："在你们前头这房里住过俩活宝，白天唱唱喝喝，晚上整夜闹腾，那女人弄到好处就嗷嗷嗷叫唤，跟狗一个式子！"白灵不觉红了脸，惊奇的是魏老太太说着这种话跟说柴米油盐一样平淡："那个男人是个军官，八辈子没沾过女人一样，黑间弄一夜还不过瘾，二天早起临走前还要弄一回……我看不惯那俩二㞞货，就把他们起发走了。"白灵不想再听，又不敢惹恼老太太，便不经意地转移话题："您老这辈子福大命大……"魏老太太听了竟慷慨起来："我命大也命硬。算卦的神瞎子摸过我的膝盖儿，说能浮住我的男人就能升官发财，浮不住我的男人就难为世上人。这卦神咧！我十六岁嫁人，到二十五岁跟现今这老头子成婚，九年嫁了七个男人，六个都是浮不住我成了阴司的鬼。那六个男人有吃粮的粮子，有经商的，有手艺人，还有一个是水利技师，啥样儿的男人我都经过。那个粮子瞎得很，前门走顺了，生着六指儿走后门，弄得我连路都走不成。那个商人是个软蛋，没本事可用舌头舔。水利技师在野外一走一月四十，回到屋来顾不得洗手洗脸先抹裤子。男人嘛，就比女人多那一泡㞞尿，把那一泡㞞尿腾了就安宁了。"白灵臊羞得满脸发烧。魏老太太却根本不理会，一味说下去："你得看透世事，女人要看透世事，先得看透男人。男人房事太勤不好，可不来房事你就得提防，肯定是在外头打野食儿。你们的房事咋样？我老也听不见你屋里的响动。"白灵愣了一下说："房事是啥事？"魏老太太撇一下嘴："你倒装得像个黄花闺女！房事嘛就是日。你俩一夜日几回？"白

灵怨艾地盯一眼魏老太太没有说话。魏老太太却依然面不改色：“你甭那样盯我。我说的是实话。我看你家先生也是个满天飞的人物，回家来黑间总是悄没声儿的，怕他走了歪路……”

鹿兆鹏于半月后的一个傍晚归来。白灵正在庭院井台上洗衣服，甩着手上的水滴迎接他进门。刚一进入厦屋，鹿兆鹏一句不吭就把她抱起来了。

鹿兆鹏回到白鹿原南端的大王镇高级小学，对胡达林交代了任务：“党决定在你的学校召开非常代表大会。”胡达林激动得不知所措。鹿兆鹏说：“你的工作给党提供了这个场所。”胡达林说：“你具体说该做什么吧！我即使明日被枪杀也不眨眼。”鹿兆鹏当即召集了学校五个党员教员的支部会，布置了每人的具体工作，关键是要保证从全省各地来的代表必须有一个万无一失的安全住处，于是就在大王镇的私栈和农户里物色……十天以后，当第一位代表装作浴客进入大王镇一家客栈的时候，当晚又召开了一次支部会，鹿兆鹏对党员们说：“同志们，一个不平凡的事件就要在这儿发生了。我们做成这件事，将使本原载入史册！”

大王镇在不知不觉中增加了许多浴客。有披绸挂缎携着太太的富商大亨，有长袍马褂的财东，也有不饰边幅一身粗布的农人，还有装得跛腿弯腰的病人。他们都是在最近一次大逮捕中尚属侥幸的共产党人，到这里参加遭到大破坏大劫难之后的党的非常代表大会来了。为了不致在大王镇引起任何异常现象，他们岔开时间到温泉去泡洗……会议只开了两天，实际只有两个晚上，是在大王镇学校最破烂的二年级教室里召开的。

两天的会议完成了任务，代表们按照严格的时间和路线悄悄离开了温泉。直到最后一位代表起身上路，鹿兆鹏抱着胡达林热泪盈眶：“达林兄弟，你的功劳和南山同在。”这件大事的完成，在本原和整个滋水县竟然没有出现一丝漏洞，这有一个客观上的原因：原上刚刚枪杀过郝县长，岳维山估计共党起码得蛰伏一阵子。鹿兆鹏正是利用了胜利者得意的心理误差而完成了自己的壮举……

鹿兆鹏紧紧地搂抱着白灵，久久地亲吻，盯着白灵的眼睛说：“你得再去上学念书。”白灵一愣。鹿兆鹏说：“党的非常代表大会做出决议，要动员全中国人抗日。你到学校去组织发动学生促进当局抗日……”白灵亲了鹿兆鹏一口说：“这比跑八仙台更合我的性子……”

第二十五章

白鹿原又一次陷入毁灭性的灾难之中。

一场空前的大瘟疫在原上所有或大或小的村庄里蔓延，像洪水漫过青葱葱的河川的田亩，像乌云弥漫湛蓝如洗的天空，没有任何遮挡没有任何防卫，一切村庄里的一切人，男人和女人，老人和孩子，穷人和富人，都在这场无法抵御的大灾难里颤抖。

瘟疫究竟是从何时传上白鹿原的哪个村子、被害致死的头一个人究竟是谁，众说纷纭。而白鹿村被瘟神吞噬的第一个人却是鹿三的女人鹿惠氏。鹿惠氏先是呕吐，随后又拉稀；呕吐时她没在意，拉稀时还不太在意，这是夏季里常常发生的不适，抗两天缓几晌就没事了；直到她两腿酸软撑不起身子，躺到炕上呻唤不止，鹿三用独轮木车垫上被褥推着她走进冷先生的中医堂时，她仍然没有太在意，只不过这回拉得猛了点，好汉抵不住三泡屎咯。

冷先生听了鹿惠氏和鹿三的叙说也不太在意，甚至在拔掉毛笔铜帽蘸墨开处方之前，还对鹿三说了一句笑话："你听过这病叫啥病吗?两头放花。"鹿三觉察出冷先生轻俏的口吻心里完全轻松无虞了。冷先生在墨盒里抹顺了笔尖，就在麻纸上走龙舞蛇一气呵成了药方，交给鹿三去药房抓药。临到鹿三扶着女人出门时，冷先生又补充叮嘱说："弄几个生柿子烧了吃几回。"鹿三回到家就去借了砂锅，找了三块砖头支在厦屋外的台阶下，扯下一笼麦草，把一包中药倾入砂锅，又添上水，架在砖头上点燃麦草煎熬起来。干燥的药片药面吃水以后渐渐膨胀，清水也渐渐变成浑黄，变成土红，又变成紫黑色；一股苦涩的

中草药味儿在小院里弥漫。小儿子兔娃偷摘下两口袋青柿子，用细竹棍儿扎了眼儿，塞到三个砖头的夹道里煨烧；青柿子被扎透的小眼儿里淌出白色的汁液，泛着气泡儿吱吱响着，青皮很快泛黄了又焦黑了。鹿惠氏躺在炕上，透过敞开的厦屋门瞅着爷儿俩蹲在麦草火堆前专心致意的情景，心里猛然泛起一个可怕的幻影，自己要是死了，那爷儿俩就要烧锅燎灶了。鹿三用一根筷子挡住砂锅里的药渣，把汤汁滗入一只土黄色的小碗，晾到温热时端给女人喝了。刚转过身就听见一声暴响，鹿惠氏伸直脖子浑身一颤，把刚刚喝下的汤汁喷吐出来。兔娃把剥去了焦皮的烧熟变软的柿子递给母亲。鹿惠氏吃下一个旋即又吐出来，只好抚一抚儿子头顶的毛盖儿放下了柿子。连着三天六晌，三服中药全都是在鹿惠氏的肚里打一个过站，就反弹一样喷泻到脚地上；满屋子从早到晚都是一股强烈的中药的苦涩气味。鹿三抱起已经轻若干柴的女人搁到独轮推车上，室外明亮的天光一下照出鹿惠氏脸上的荧荧绿色，心里顿然掠过一道不祥的黑影。冷先生指头捏着脉象，眼睛瞅着鹿惠氏的脸，就用手势示意鹿三把她的后襟撩起来。他用一根大号钢针刺入脊椎，缓缓涌出一圪垯黑紫色的黏稠的血液。他看了看，用麻纸揩掉钢针上的黏液，又执笔开了一笺药方，对鹿三说：“这三服药吃了要是还不回头，就准备后事吧。”

鹿惠氏再也吐不出泻不下什么来，肚腹里完全空秕；她用手按压自己的肚皮时，手指能清晰地触摸到脊梁骨上蒜头似的骨节。她的嘴里不断流出一种绿色的黏液，不断地朝脚地上吐着，直吐到脸颊麻木嘴唇失禁，一任绿色的黏液从嘴角浸流下来渗湿胸襟。到发病的第七天，鹿惠氏呀地叫了一声，就说她什么也看不见了。鹿三攥住她伸到空中乱扑乱抓的双手，瞅着凹陷下去的两只无神的眼窝，心如刀绞，久久地攥着她的双手，直到凉冰的指头在他手心里温热。她无力地歪着头枕在卷成捆儿的破棉裤上安静下来，俩人就这样久久地沉默着接

受了冥冥之中的鬼神施加给他们的灾难。午夜以后，鹿惠氏竟然神奇地坐了起来，黑暗中摸索着用手指拢梳散乱黏结的头发。鹿三急忙点亮油灯，心存侥幸地问："你感觉精神好点了吗？"鹿惠氏偏过头，不回答他的询问，瞪着两只失明的眼珠儿沉静地问："是你把黑娃媳妇戳死咧？"鹿三大吃一惊，愣呆在炕上。鹿惠氏不等他回答，又接着说："你拿梭镖头儿戳的，是从后心戳进去的。"她的肯定无疑的语气和沉静的神态使他无法编造出一句谎话，只是追问："你啥时候听说的？谁给你说的？"鹿惠氏的双手停止了拢梳头发，滞留在脑后的发纂儿上："小娥刚才给我说的。她让我看她后心的血窟窿。"屋里似乎噌的一声掀起一股阴风，清油灯盏的火焰猛烈地闪摆了两下差点灭掉，终于又抽直了火苗静静地燃烧。鹿三的头发直竖起来，浑身一阵紧缩，像一盆凉水顺着脊梁浇下去。鹿惠氏颓然垂下拢挽着纂儿的双臂，身子往后一仰跌倒下去。鹿三急忙伸出僵硬的手臂抱住女人。鹿惠氏在他胸前仰着脸咕咕囔囔说："你咋能狠心下手……杀咱娃的……媳妇……"

鹿惠氏倒头以后，在左邻右舍的女人们的帮助下洗了脸擦了身，换上了寿衣。里外分单的夹的棉的三件寿衣，是鹿三在听了冷先生的忠告后，背着女人粜了粮食扯下布料让门族里的女人缝制的。第二天天明着人给亲戚家去报丧，当天午时入殓，一个个穿白戴孝的男人女人在进入白鹿村时就扯开了哭声。棺材是极薄的称作十二圆的杨木板，是鹿三为自己准备停当的寿材。根据已往的和现实的经验，原上的男人比女人都寿短。在刚刚过去的大饥荒的那年，鹿三从山里背粮回来，咬咬牙用一斗苞谷在白鹿镇换下了这副棺材的板料，现在就愈加慨叹当初的谋划了。鹿三忙于丧事的全部大小事项，诸如挖掘坟墓，淘粮食磨面，买蜡买香买纸买菜等诸种巨细事务，连跪在灵前痛哭一声的机会也没有，直到压棺人手提斧头捉着柏木银钉要钉死棺盖的时候，他才被门族中两位身体强悍的弟弟捉着手臂押到棺材跟前，

让他再瞧她一眼做永久性的告别；因为怕生者丧失理智甚至要扑进棺材与死者同归阴府，所以一般都由男人或女人押着死者的直系亲属举行此项告别仪式。鹿三刚走到敞开口子的棺材跟前，一眼瞅见鹿惠氏脸上一片荧荧绿光，脊梁上又像浇下一股凉水，还没哭出声来，咣当一声就扣上了枋盖。

鹿三人缘极好，白鹿村几乎所有成年女人都在棺材出门以前的不足两天时间里结伴来到这个只有残破的土围墙的院子，在临时搭起的席棚下的灵桌前哭泣一回；几乎所有的成年男人都参与了葬埋仪式：年轻力壮的小伙子扛抬棺材，其余插不上手的男人们扛着铁锨去下葬；葬埋完毕后一齐聚到院里吃白米“捞饭”。尽管没有乐人没有响器，乡亲们却一致赞扬鹿三能做到这个地步已经不错了。当天晚上，鹿三回到白嘉轩家，对主人说：“现时……我得回去，把兔娃一个人撂在屋里不行咯。”白嘉轩早有预料：“叫兔娃过来，就住在这边吃在这边，能做动点啥活儿就做点啥活儿。”鹿三说：“这……俺爷儿俩都靠你养活……不好咯！”白嘉轩生气地说：“三哥，你咋说这种话？你吃的是你下苦挣的嘛！咋能是我养活你爷儿俩？”鹿三还在疑虑不决，白嘉轩动情地说：“而今你回去，屋里孤孤清清你咋受得了？再说……你走了我也受不了……”鹿三父子就在白家留下来。

鹿惠氏以土为安仅过三天，白鹿村东头一个中年男人和西头一个老年女人几乎同时暴发了呕吐和拉稀，差异仅仅是东头的男人“两头放花”，而西头的女人只是拉稀“一头放花”。这俩人几乎同时被家人用独轮木车推进冷先生的中医堂，这才惊异地发现中医堂门里门外以及槐树树荫下停放着许多垫着被褥的独轮木车，他们来自白鹿原上或远或近的那些村子，全都患着一头或两头放花的奇怪的病症，冷先生的门庭呈现出熙攘的气氛。这个中年男人和老年女人经历了与鹿惠氏完全

相同的治疗和发展过程很快死掉了；同样是先瞎了眼睛，随后闭气，脸上呈现出令人畏怯的荧荧绿色。在这两个人还未入土的几天时间里，白鹿村又有一个尚未婚娶的年轻小伙开始放花，发病范围一下子从中老年人扩大到青少年，任何人都不敢再存侥幸心理，整个村庄陷入恐怖之中。鹿惠氏死亡时尚有全村男女热情诚恳地为之送葬，后来就不复再现那种隆重而又依依绵绵的传统乡情了。直到后来，根本组织不起丧葬的仪式，主家只好叫来几位亲门本族的人为死者草草穿戴装殓，草草挖下一个土坑，草草抬去埋葬了事。死掉任何人都不能引起太大的震动和太多的悲哀，如同鸡瘟猪瘟牛瘟流行时死掉一只鸡一头猪一条牛，只是加重一下恐怖的气氛。冷先生的中医堂红火熙攘了一阵又归冷落，他走龙舞蛇开下的处方连一个病人也未能挽住性命，只好叹曰："再好再投症的药喝了吐了……汤水不进，神仙难抻……抻不住咯！"于是，香火骤然在原上各个村庄兴盛起来，所有村庄的所有庙宇都跳跃着香蜡纸表的火焰和遍地飘动的纸灰。香火最盛的三官庙内，观音关公和药王的泥塑神像上披挂满了求祈者奉献的红绸和黄绸，和尚每天揭掉一层接着又披上一层。

白鹿村出现了头一个死得绝门倒户的家庭，使恐怖的气氛愈加浓重。这是白姓里的一个六口人家，最后死掉的是这个家庭的内当家，她和老阿公一起埋葬了丈夫，接着她和哑巴弟弟埋葬了老阿公，又埋葬了已经订亲许人的女儿，随之又埋葬了小儿子，最后由她单独张罗邀来本族的弟兄为哑巴弟弟掘墓送葬。埋葬毕哑巴弟弟那天晚上，她一个人躺在四壁皆空的屋内的火炕上疲惫憔悴默然无语，第二天天亮以后再没有醒来……人们惊奇地发现，人原来什么病不生也是可以死掉的。人们悄悄算计的已经不是谁家死过人，而是还有谁家没有死过人。一个人也没有死过的完好家庭逐日缩减，减少到只剩下鹿子霖和白嘉轩两家的时候，人们不禁窃窃私议，是祖荫厚实的财东人旺家

盛，瘟神难以入身奈何不得呢？还是瘟神也袒护有钱人家？直到白嘉轩的女人仙草也开始两头放花，这些不无忌妒的议论才渐次消失。

瘟疫一开始流行蔓延的时候，白嘉轩就陷入极度的恐惧之中。他在参加鹿三女人鹿惠氏的葬仪时，尚如往常一样保持着族长宽厚慈爱的情绪，精心地帮助鹿三料理这件不幸的丧事；而当他随后确认鹿惠氏开了这场瘟疫先头的时候，恐惧便与日俱增。白嘉轩显得少见的恐慌无主，跑去请教冷先生："我的冷大哥，真的就没有方子治咧？"冷先生说："凡是病，没有治不了的，都有方子可治。"白嘉轩瞪着有点惊慌的眼睛想问：那你怎么连一个放花的人都止不住呢？冷先生做出达观的神态说："看去这不是病，是一股邪气，是一场劫数。药方子只能治病，可不能驱邪。"白嘉轩点点头说："我这几天也想到这话……可咋办呢？等着死？"冷先生说："方子还是有嘛！得辟邪。"说着抽出毛笔，在麻纸上写了大大的一个"桃"字，停顿一下又写了一个"艾"字。白嘉轩当晚回到家，就叫鹿三和孝武带上斧头和独轮木车，到村子北边的桃园里去砍下一捆桃树枝儿，给街门外齐刷刷扎下一排桃木桩，又在街门口的两个青石门墩根下各扎下一根，门楼上嵌着"耕读传家"匾额的地方也横绑下一根桃木棍子，两扇大门上吊着一捆艾枝儿，后门外和庭院里每一个小房门的门槛下也都扎进桃木橛子，心里顿然觉得稳妥多了。村里人发现了白嘉轩的行为举措，纷纷提着斧头走进桃园，各家的桃园很快被斧削成光秃秃的了。

正在家家扎下桃木辟邪的风潮里，鹿子霖家的长工刘谋儿驾着牛车拉回来一大堆生石灰，又挑来几担水浇在石灰堆上，块状的石灰咋咋咋爆裂成雪白的粉末儿，腾起一片呛人刺鼻的白烟。鹿子霖亲自执锨，把白灰粉末铺垫到院子里脚地上，连供奉祖宗神位的方桌下也铺上了半尺厚的白灰，街门里外一片耀眼的白色；刘谋儿经管的牛棚马

号里里外外也都撒上了白灰。村人们迷惑不解问鹿子霖，鹿子霖说："这瘟病是病菌传染的，石灰杀它哩！"人们睁着眼听着这些奇怪的名词更加迷糊，有人甚至背过身就撂出杂话儿："那咱干脆搬到石灰窑里去住！"白嘉轩又去请教冷先生："要是子霖用的办法管用，咱也去拉一车石灰回来。"冷先生说："子霖前日跟我说了，是他那个二货捎信回来给他开的方子咯！子霖这二年洋了，说洋话办洋事出洋党。"白嘉轩听出冷先生的话味暗自一惊，一向在他和鹿子霖之间保持等距离关系的冷大哥第一次毫不隐讳地讥讽他亲家，而且把他的女婿鹿兆鹏的共产党鄙称为洋党。白嘉轩忍不住也凑上一句："要是石灰能治病，冷大哥你干脆甭开药铺，开个石灰窑场好了。"俩人畅快地笑起来。嘲笑完了鹿子霖，白嘉轩心头又浮出忧虑："村里差不多家家户户都扎了桃木橛子，还是不停地死人哩……这邪气看去辟不住。"冷先生豁朗地说："辟不住了就躲。惹不起辟不住还躲不过吗？"

白嘉轩佝偻着腰走过白鹿镇的街道走进白鹿村，脑海里盘旋着一个个熟悉的面孔，这些面孔仅仅月余以前，还在村巷或者田头或者集市和他打招呼嘘寒问暖，他们现在丢下父母撂下妻子儿女进入阴界，既没有做到作为人子的孝道，也没有尽到作为人父的责任而心意未尽呀！他们的幽灵游荡在村巷田野集镇，寻找那些体质虚弱的人作为替身……白嘉轩把全家人叫到母亲白赵氏的东屋，以不容置辩的强绝口气宣布说："孝武，你跟你妈还有你屋里的到山里你舅家去，让孝义也跟着去。"他回过头对白赵氏说："妈，你引上俩孙子（孝文的孩子）到我大姐那儿去，那个书院静宁。"白赵氏说："我跟那个书呆子没缘儿，我不去。"白嘉轩想到大姐过门前后母亲一直很器重姐夫朱先生，后来渐渐有点烦了，也说不出烦的具体因由儿，只是一味地烦，于是就说："那你就到城里二姐家去，或者跟孝武到山里去。反正……明天都得起身走。"孝武问："爸，你咋办？你跟一家人进山去，我在屋看

门守家。”白嘉轩冷冷地说：“你守不住，你走。”第二天就实施了整个家庭躲避瘟神的逃亡计划。唯一违背白嘉轩计划的是妻子仙草，她不说为什么，只是不走，于是就留下来。鹿三吆着牛车送白赵氏和孝文的两个娃子出了村子西口，孝武领着弟弟孝义和妻子出了村子的东口，仙草跟丈夫走回空寂的四合院说：“我咋能撂下你走呢？我比你还贵重吗？”白嘉轩凄然心动：“那咱俩就一块抗着，看谁命大吧！”仙草轻轻摇摇头说：“要是这屋里非走一个人不可，只有我走好。”白嘉轩也摇摇头说：“论起嘛，只有我是个废物，我走了好。怕是走谁不走谁由不得自个儿，也不论谁重要谁不重要。”仙草格森打了个冷颤，扬起手捂住嘉轩的嘴。俩人默默注视着，许久都不说一句话。

把一家老少分头打发出门躲走以后的第二天，仙草就染上了瘟疫。她一天里拉了三次，她一边往后院疾走一边解裤带儿，尚未踩稳茅坑的列石就撅起屁股，一声骤响，像孩子们用竹筒射出水箭的响声；她急忙扭过头一瞅，茅坑里的柴灰上落下一片绿色的稀屎。那一刻，她的心里嘎嘣一声响，眼前潮起了一片黑雾。那一声暴响似乎发端于胸腔，又好像来自于后背；像心脏骤然爆裂，又像是脊梁骨折断了。她悲哀地从茅坑边上站立起来，两只胳膊酸软得挽结不住裤带儿，回头又瞅一眼茅坑里落着绿头苍蝇的绿色稀屎，自言自语咕哝着：“没我了，这下没我了！”

白嘉轩傍晚回来时，正好瞅见仙草在庭院台阶上伸着脖颈呕吐的情景。他一早出门到白鹿书院找姐姐和姐夫朱先生去了，既然仙草执意不愿出远门躲避瘟疫，到距家不远的白鹿书院住一段时日也好。书院处于前后左右既不挨村也不搭店的清僻之地，尚未听说有哪位编写县志的先生有两头或一头放花的事。姐姐和姐夫诚恳地表示愿意接纳弟媳来书院躲灾避难，白嘉轩马不停蹄赶回白鹿村，准备明天一早就

送仙草出门；不料，瘟神那双看不见的利爪，抢先一步抓住了仙草的头发。白嘉轩佝偻着腰跷进二门时听到“哗哧”一声响，扬起头就瞅见一道呈弧形喷射出来的绿汤，泛着从西墙上斜甩过来的残阳的红光，像一道闪着鬼气妖氛的彩虹。他的脑子里也嘎嘣响了一声，站在二门里的庭院里木然不动，背抄在佝偻着的后腰上的双手垂吊下来。

仙草倒显得很镇静。从午后拉出绿屎以后，她便断定了自己走向死亡的无可更改的结局，从最初的慌乱中很快沉静下来，及至发生第一次呕吐，看见嘉轩闪进二门时僵呆站立的佝偻的身躯，反倒愈加沉静了。她掏出蓝布帕子擦了擦嘴角的秽物，像往常一样平静温润地招呼出门归来的丈夫：“给你下面吧？”白嘉轩僵硬的身躯颤抖了一下，跌跌撞撞从庭院的砖地上奔过来，踩着了绿色的秽物差点滑倒，双手抓住仙草的胳膊呜哇一声哭了。仙草自进这个屋院以来，还没见过丈夫单独面对她伤心伤情地哭泣，这是头一回，她大为感动。白嘉轩只哭了一声就戛然而止，仰起脸像个孩子一样可怜地问：“啊呀天呀，你走了丢下我咋活呀……”仙草反倒温柔地笑笑说：“我说了我先走好。我走了就替下你了，这样子好。”

白嘉轩抹掉挂在脸颊皱褶里的泪水，拉仙草去镇上找冷先生看病。仙草挣脱丈夫有劲的大手说：“没见谁个吃药把命搭救下了。这是老天爷收生哩，在劫难逃。你甭张罗抓药煎药的事了，你瞅空儿给我把枋钉起来。我跟你一场，带你一具枋走。不要厚板，二寸的薄板就够我的了。”说完，她就洗了手拴起围裙，到面瓮里挖面，又到水缸里舀水，在面盆里给丈夫揉面做饭。白嘉轩吃惊地瞧着女人镇静的行为，转过身走出街门找冷先生去了。他随即拎着一摞药包回来，在庭院里支起三块砖头架上砂锅，几乎趴在地上吹火拨柴。一柱青烟冒过屋檐，在房顶上滞留不散。

仙草拒绝喝药："喝那啥也不顶，我不喝。让我安安宁宁死了算了，甭叫人临死还喝苦汤苦汁。"白嘉轩无奈叫来鹿三劝解。鹿三在衣襟上搓擦着手掌竟发火了："你这人明明白白的嘛，咋着忽儿就麻迷了？你喝嘛，你咋能连药也不喝！"仙草平静地瞅着鹿三诚心憨气的脸色，伸手端起碗咕嘟嘟一饮而尽；擦了擦嘴角沾着的紫色药汁，刚放下药碗就哗啦一声吐到脚地上。鹿三立时用双手捂住脸蹲下身去，瘫坐在门槛上。白嘉轩抡起拳头砸下去，桌上的药碗哗啦一声飞散落地，鲜血从他的手上滴注到地上，和紫色的药汁汇合到一起。

仙草的沉静令白家主仆二人震惊慑服。她一天比一天更加频繁地跑茅房，一次比一次拉得少，呕吐已如吐痰一样司空见惯。在跑茅房和呕吐的间歇里，她平静地捉着剪刀，咔嚓咔嚓裁剪着自己的老衣，再穿针引线把裁剪下的布块联缝成衬衫夹袄棉袄以及裙子和套裤；这是春夏冬三季最简单的服装了。在这期间，她仍然一天三晌为丈夫和鹿三做饭，饭菜的花样和味道变换频繁，使嘉轩和鹿三吃着嚼着就抽泣起来。直到她连裹脚布也缝扎齐备，那是一个夕阳如血的傍晚，她挽好线头，用牙齿咬断白线的脆响里，眼睛失明了。她对着顷刻之间变得漆黑的世界叫了一声"他爸——"，猛乍栽倒在炕下。白嘉轩正招呼木匠割制棺材，听见叫声，便急忙从前院奔进里屋，抱起跌落在脚地上的仙草，发现她失明的眼珠和瘦削的脸上蒙着一层荧荧的绿光。她摸到他的手歉疚不堪地说："谁给你跟老三做饭呀？"白嘉轩把她搂在怀里，对着那双完全失明却依然和悦的眼睛，敞开嗓子说："天杀我到这一步，受不了也得咬着牙承受。现在你说话，你要吃啥你想喝啥，你还有啥事要我办，除了摘星星我办不到，任啥事你都说出来……我也好尽一份心！"他说完以后，感觉到她的身子微微蠕扭了一下，瞪大的眼睛随即闭上，沉默许久乞求地说："你把马驹跟灵灵叫回来让我看一眼……"嘉轩接着问："还叫不叫咱娘回来？孝武呢？"仙草

摇摇头：“他们刚躲走，不叫了。孝文和灵灵，而今不知长成啥模样了？”白嘉轩说：“好！我让鹿三明日上县进城，先叫孝文再接着去叫灵灵。”

白嘉轩当晚到马号跟鹿三说了仙草的心事，鹿三当即答应鸡啼时就起身上县。白嘉轩从腰里摸出两块硬洋塞到鹿三手里说：“先上县，再进城，路数就那样走。你到县上甭见孝文，到城里也甭寻灵灵。”他料定鹿三会惊诧，随即挑明说：“这两个忤逆的东西，我说过不准再踏我的门槛儿，我再请他们回来？”鹿三张着嘴憋红了脸：“可娃他妈快咽气了呀？”白嘉轩冷着脸说：“即就是我死我咽气，也不许他俩回来。”接着缓和了口气轻松地说：“你先到县上转一圈，再到城里去，明晚上你到三意社看一场戏，想吃啥你就畅畅快快咥一顿，赶天黑回来就说两个海兽都没寻见。”

鹿三第二天傍晚回来，把两枚硬洋又交给白嘉轩，然后走近仙草的炕边，大声憨气地咒骂起来：“俩海兽一个也不在！孝文到汉口接军火去了，说是还得半个月才能回来。灵灵连踪影也问不到，她二姑说，灵灵有半年多不闪面了，猜摸不清到哪达去咧！十有八九不在西安……你呀，你而今甭想这俩海兽咧！你给够了他俩的，他俩欠着你的，你还惦念那俩海兽做啥？我就是这个主意，到死我都不提黑娃一句……”仙草听着合住了眼睛，眼角滚出一滴清亮的泪水：“我知道，我见不着那俩娃咧！”

“想见的亲人一个也见不着，不想见的人可自个闯上门来咧。”仙草噌地一下豁开被子坐了起来，口齿清晰地嘟哝着。白嘉轩闻声也坐了起来，双手搂扶着仙草，心里十分惊异，近两日她躺在炕上连身也翻不过了，怎么会一骨碌坐起来呢？他腾不出手去点灯，故意做出轻淡的口气问：“哪个讨厌鬼闯上门来咧？”仙草直着嗓子说：“小娥嘛！

黑娃那个烂脏媳妇嘛！一进咱院子就把衫子脱了让我看她的伤。前胸一个血窟窿，就在左奶根子那儿；转过身后心还有一个血窟窿。我正织布哩，吓得我把梭子扔到地上了……”白嘉轩安慰她说：“你身子虚了做噩梦哩！”随即摸到火鞡儿点着火纸，吹出火焰点着了油灯。灯亮以后，仙草“噢”了一声就软软地跌倒在炕上。白嘉轩对着油灯蹲在炕头抽烟，直到天色发亮，黎明时分，仙草咽了气。白嘉轩没有给任何远近的亲戚报丧，连躲到城里和山里的亲娘亲子以及仙草娘家的人都不告知。他找来几个门中侄儿和侄孙，打了一个墓坑就把她埋葬了。他在隆起的墓堆前奠了三遭酒，拄着拐杖说：“我要是能抗过瘟疫，我给你重修墓立石碑唱大戏。眼下我只能先顾活人哇……”

屋里是从未有过的静宁，白嘉轩却感觉不到孤寂。他走进院子以前，似乎耳朵里还响着上房明间里仙草搬动织布机的呱嗒声；他走进院子，看见织布机上白色和蓝色相间的经线上夹着梭子，坐板下叠摞着尚未剪下来的格子布，他仿佛感觉仙草是取纬线或是到后院茅房去了；他走进里屋，缠绕线筒子的小轮车停放在脚地上，后门的木闩插死着；他现在才感到一种可怕的寂寞和孤清。他拄着拐杖奔进厨房，往锅里添水，往灶下塞柴，想喝茶得自己动手拉风箱了。

他把沏好的茶壶摆到石桌上，又摆下两只茶盅，然后走出街门，走进马号院子，看见鹿三正在用长柄扫帚清除杂物。“三哥！来来来，快跟我过来！”他的声音很大很响，像是呼喊百步半里以外的人，其实鹿三就在几步远的地方背身躬腰扫地。鹿三以为有什么紧事，就扔下扫帚跟着白嘉轩走出马号，又走进街门，连着声问：“啥事啥事？有啥事你咋不说话？”白嘉轩走路时落脚很重，屋里的墙壁连续发出回声。及至走进庭院，白嘉轩横过身一摆手说：“啥事啥事，而今还有啥大不了的事？请你喝茶，就这事。品一盅哇，你坐下，看看我烧下的茶水

味道正不正？”鹿三看见摆在树下石桌上的茶壶和茶盅，惊疑的神情顿然松弛下来，明白了嘉轩大声说话大声咳嗽和加重脚步走路的用意，是与命运抗争的义无返顾的气概。他不由地受到感染，接过嘉轩递过来的茶盅，抿了一口就豪爽地大呼小叹起来：“好茶好茶！味道真个正经得很咯！没看出你还有这一手熬茶的绝活儿……”俩人坐在石桌两边，互相递让，畅声说话，全是东拉西扯的嘘叹。白嘉轩问：“老三，今黑咧吃啥饭？你想吃啥我给你做啥。哈！你再尝尝兄弟我做的饭。”鹿三也呵呵笑着朗声说：“随便。你做啥我吃啥。”白嘉轩大幅度地摇摇头：“啊呀三哥！你好大的架子啊！‘随便’倒是啥饭的名字？听起来你像是很随和好服侍，其实叫做媳妇的顶难办咧，到底做啥饭才合阿公阿婆的口味呢？”鹿三并不真的在意：“我是说随便做啥饭我都不弹嫌。我一辈子没挑过食咯！”白嘉轩接着说：“你挑食也不顶用。我最拿手的饭是夹老鸹头。”鹿三哈哈大笑：“天底下的男人都会夹老鸹头，我也会。其实老鸹头又好吃又耐饥，做起来又省事，和些面糊用筷子夹成圪垯撂到锅里就完了。咱俩轮换做，天天吃老鸹头。”

夜里，白嘉轩常常先关后门，再锁上街门，端着水烟壶走进马号，坐在鹿三的炕边上，一锅接着一锅抽水烟，看着鹿三一遍又一遍给牛马拌草撒料说：“三哥，撂出一折乱弹哇！”鹿三也不推诿，靠着槽帮就吼起来。先一折慷慨激昂的《辕门斩子》，接着又撂出一段《别窑》。嘉轩听得热了，从炕边上溜下来，端着水烟壶站在地上也唱起来，更是悲壮飞扬的《逃国》。直唱到给牲口喂过三槽草，白嘉轩才端着水烟壶走出马号回屋去睡觉。

这天晌午，白嘉轩又夹好煮熟一锅老鸹头，跑进马号，一边揩着汗水一边喊：“三哥吃饭。”鹿三没有应声，端直坐在炕边上一动不动。白嘉轩又喊了一声：“三哥吃饭呀，你聋咧？”鹿三突然歪侧一下

脑袋，斜吊着眼瞅过来，发出一种女人的尖声俏气的嗓音：“光叫你的三哥哩！咋不叫我哩？”白嘉轩一愣：“你就是三哥嘛！还要我叫谁呢？”鹿三晃晃头：“我不是你的三哥。”白嘉轩走近两步，细细瞅视着鹿三，他的尖细的声调，轻佻的眼神和歪头侧脸的忸怩动作，显然都不是鹿三的习惯做派。白嘉轩不由地打个冷颤，加重威严的声调逼问：“你不是三哥你是谁？”鹿三扭扭腰晃晃头说：“你连我都认不得吗？你仔细认一认就认得了。”白嘉轩头顶“噌”的一声头发倒竖起来，浑身像浇下一桶凉水抽紧了筋骨，鹿三现在的忸怩姿态和轻佻的声调，使他突然想起了小娥。白嘉轩猛然扬起手，抽击到鹿三的脸上，狠声骂说：“婊子！我怕你个婊子不成？”鹿三突然使出素常浑重的嗓门：“嘉轩，你打我做啥？我弄下啥瞎事了你打我？”说着跳下炕来扑到嘉轩对面，气得脸红脖子粗地吼叫。白嘉轩站在那儿不知是鹿三刚才迷了还是自己发迷了？于是再三道歉赔不是，拽着怒气不息的鹿三去吃饭。

主仆二人走进院子，鹿三径自坐在石桌旁的矮凳上，等待嘉轩给自己把饭端来。自从仙草过世以后，鹿三总是和嘉轩一起搭手做饭，怎么也不忍心脊背上像扣着一口锅的主人给自己端饭倒茶。现在他挺着腰坐在石桌旁，像一位文质彬彬的上等宾客，拘谨而又客气地接受主人的侍奉。白嘉轩佝偻着腰，一手拄着拐杖，一手端着饭碗从厨房走出来送到鹿三手上，口里叮嘱着：“吃吧吃吧快吃。”转过身又去给自己端来一碗，坐到鹿三对面，放下拐杖吃起来。鹿三吃完一碗饭，咣当一声把碗重重地蹾到石桌上，又把筷子扣到碗上，霍地一下跳起来，在白嘉轩对面哈哈大笑，直笑得前俯后仰，又一蹦蹦到厅房的台阶上喊起来：“哈呀呀，值了值了，我值得了！族长老先生给我侍候饭食哩！族长跟我平起平坐在一张桌子上吃饭哩！值了值了我值得了！我是个啥人嘛族长？我是个婊子是个烂婆娘！族长你给婊子烂婆娘端

饭送食儿，你不嫌委窝了你的高贵身份吗……”白嘉轩瞪着眼瞅着鹿三豁脚扬手的大动作，把剩下的半碗饭摔到地上，碗片和饭汤四处迸溅，随手从石桌旁捞起拐杖，追打鹿三。鹿三三闪两躲，跳着蹦着蹿出院子奔到村巷里去了。白嘉轩气喘吁吁追到门外，叫几个小伙子把鹿三强扭到马号里，把一只簸箕扣到头上，用桃树条子抽击，发出嘭嘭嘭的响声。鹿三突然掀翻簸箕跳起来大叫一声：“你们这些人折腾我做啥？”睁着疑惑不解的目光瞧着围在马号里的男女。白嘉轩从声音和神色上判断出来，真正的鹿三又活转来了。

白嘉轩回到厅房西屋躺下午歇，鹿三的怪异行为还是没有打破他的生活习惯，顶多迷糊了一袋烟工夫，跳下炕来拉了一条家织布手巾到水缸里浇了水，擦搓了脸眼，感到一身轻松，然后捞起拐杖出了门，佝偻着腰往村子南边去了。走过白鹿原漫长的牛车路，傍晚时分进入南山，赶到只有三五户人家的牛蹄窝村。白嘉轩在背沟里看见了一幢用木头垒墙的木屋，一个长着男人模样的女人坐在木屋前的丝瓜架下抽旱烟，二尺长的丝瓜从木头棚架上垂吊下来，女人寡精寡瘦，黑黢黢的脸，个子却很高，扁平的胸脯，伸直细长的手臂，往那根长烟袋里煨烟末儿。那烟管是一根紫红溜光枸杞木，留着圪圪垯垯的节疤。白嘉轩停步打拱。那女人不等他开口，冷冷地问：“哪个村？”白嘉轩回答以后，女人又问：“咋样闹呢？”白嘉轩把鹿三鬼魂附体的疯张情景学说一遍，那女人挥了挥长杆烟管说：“你快往回走。”白嘉轩转过身由原路往回走，他知道捉鬼的法官此刻正在木屋里养精蓄锐，须得鸡不叫狗不咬的静夜时分才上路，坐鬼抬轿忽儿一声就去了。

鹿三从后晌直闹到天黑夜静。他的过分灵活的眼神和忸忸怩怩的举止行为，谁一看见都会惊异不已，与往昔里那个鹿三稳诚持重的印象截然不同。他从马号蹿到晒土场上，又从晒土场上蹦回马号，向围

聚在马号里和晒土场上的男女老少发表演说：“我到白鹿村惹了谁了？我没偷掏旁人一朵棉花，没偷扯旁人一把麦秸柴火，我没骂过一个长辈人，也没搡戳过一个娃娃，白鹿村为啥容不得我住下？我不好，我不干净，说到底我是个婊子。可黑娃不嫌弃我，我跟黑娃过日月。村子里住不成，我跟黑娃搬到村外烂窑里住。族长不准俺进祠堂，俺也就不敢去了，咋么着还不容让俺呢？大呀，俺进你屋你不认，俺出你屋没拿一把米也没分一根蒿子棒棒儿，你咋么着还要拿梭镖刃子捅俺一刀？大呀，你好狠心……”白鹿村和邻近村庄赶来看热闹的人，至此才知道了小娥的死因，大为感叹。人们把簸箕扣到鹿三头上，用桃木条子抽打一番，鹿三顿时恢复到素有的稳诚持重的样子，翻着有点呆滞的眼珠，莫名其妙地问：“你们围在这儿弄啥？这儿有啥热闹好看？你们闲得没事干了？我还忙哪！”说着就推起小车去装土垫圈。当他刚刚装满一车土，扔下锨又疯张起来了。众人又扣上簸箕用桃条子抽打，几次三番直折腾到夜静，好多人看腻了都回家去了。

白嘉轩刚跨进马号，鹿三一声尖叫从脚地跳到炕上：“族长，你跑哪达去咧？你尻子松了躲跑了。你把我整得好苦你想好活着？我要叫你活得连狗也不如，连猪也不胜。”白嘉轩一手拄着拐杖，仰起头瞅着站在炕上张牙舞爪的鹿三，冷冷地说：“你是个坏东西，我处治你我不后悔。你活着是个坏种，你死了也不是个好鬼。你立马把我整死，我跟你到阴家去打官司。阎王要是说你这个婊子在阳世拉汉卖身做得对，我上刀山我下油锅我连眼都不眨！”鹿三听了忽儿变出一副油滑的腔调：“噢呀，你倒说得美！我把你弄死太便宜你了。我要叫你活不得好活，死不得好死，叫你活着像狗爬，吃人屎，喝恶水，学狗叫唤。等我看够了耍腻了，再把你推到车轱辘底下，让车碾马踏，叫狼吃狗啃……”白嘉轩震声震气地冷笑着说：“你咋么着折腾我，我都不在乎，你拿啥方子整我死，我还不在乎，不管淹死吊死摔死烧死碾死，

不过就是一死嘛！死了我就好了，我非得抻着你去找阎王爷评理，看看谁上刀山谁下油锅，谁折腾谁吧！我活着不容你进祠堂，我死了还是容不下你这个妖精。不管阳世不管阴世，有我没你，有你没我。你有啥鬼花样全使出来，我等着。”鹿三咧着嘴吊着眼说：“我要把白鹿村白鹿原的老老少少捏死干净，独独留下你和你三哥受罪……”鹿三刚说到这儿，突然尖叫起来，“呜呀不得了了！你滑头，你请法官来了，天罗地网使上了，我上当了……”鹿三从炕上跳下来朝门口扑去，又从门口折回来朝窗口扑去，再从窗口折回来潜入马圈里头；红马暴躁地踢踏起来，鹿三又钻到黄牛肚子底下缩成一团。

一个头裹红绸的人像一股旋风卷进屋来，白嘉轩看见法官左手拿一只黄布蒙着的小罗筛，右手执一根布满圪节的红色短棒，站在马号中央四处瞅瞄。法官又瘦又矮，黄脸，左腮下有一颗黑痣，黑痣上长出一撮长长的黑须，人称一撮毛先生。一撮毛先生从牛肚子底下拉出鹿三，照着嘴吹了三口气，鹿三睁开迷迷瞪瞪的眼睛问：“你是谁？你跑到我的马号来做啥？”一撮毛轻捷如鼠，蹿上炕来又跃进圈里，口中咕哝哝念着咒词，直弄得满头大汗，最后在鹿三给牲畜搅拌草料的砖窖里扑下身去，从小罗筛下拿出一只瓷罐，蒙在罐口的红布嘣嘣嘣直响，像是一只老鼠往外冲。法官说：“添半锅水，烧黄焙干。”众人看着那个瓷罐全吓白了脸。白嘉轩摸出五个硬洋塞到一撮毛先生手里，正张罗要叫人做饭，一撮毛摇摇头指指天色就走了，害怕鸡叫。

两天里相安无事，鹿三恢复了原先稳诚持重的样子，拉牛饮水推土垫圈绞着辘轳把吊水，只是眼神有点痴呆。白嘉轩心想，经过了这一番折腾，脑子肯定要受点亏，过一段自然就好了。晌午饭后，白嘉轩照旧在炕上午歇，鹿三甩荡着双手轻盈地走进来站在炕下脚地上，乜斜着眼说：“族长呀，你睡得好自在。”白嘉轩一骨碌翻起身来，瞧

着鹿三的神气不觉一愣。鹿三扬扬自得地说："你给法官封的钱太少了，法官把我压了两天又放了。你再去叫法官，我再也不会上当了。"白嘉轩气得捞起拐杖，鹿三却扭着腰肢出了门，在院子里挑战："从今往后你准备当狗当猪！"

白嘉轩拄着拐杖又到牛蹄窝找到那个长着一张男人脸孔的女人，那女人摆摆长杆烟袋说："那鬼看见你出门早溜了。"白嘉轩只好回家，果然看见鹿三正给牛槽里添草，而且问他："后晌没见你的面，你做啥去咧？"白嘉轩说他出门散心去了。话音刚落，鹿三突然把搅草棒子一摔，又变出那个烧包女人的声音："你叫法官去了，还哄我？我一看见你出门就知道你进山找法官去呀！我给——躲咧！"白嘉轩拄着拐杖气得直咬牙，转过身走了。鹿三追着喊着："你去呀，你再去找法官呀！你栽断腿跑上一百回也捉不住我了。"白嘉轩转过身，用拐杖指着鹿三的鼻梁："谁我也不找了。我豁出来跟你战！"说罢回到院里，关了前门后门，挺着身子坐在石桌旁一口连一口抿酒，一锅接一锅吸水烟。那根手杖倚靠在右胯上，夕阳从房檐退缩到厦屋高高的屋脊上，很快就消失了，屋院里愈加清静。

白嘉轩关门闭户在屋里待了一夜一天，一个惩治恶鬼的举措构思完成。又是傍晚，西斜的残阳的红光又从厦屋屋檐往屋脊上隐退，他连着喝下几盅烧酒，鼻子里忽然嗅到一股焚烧香蜡纸表的呛人的气味。他拉上拐杖，开了前门，循着香蜡的气味走过村巷，到村庄东头的出口处，看见了一派奇观：在黑娃和小娥曾经居住过的窑院前的平场上和已经坍塌了的窑洞的崖坡上，荒草野蒿之中现出一片香火世界，万千支紫香青烟升腾，密集的蜡烛的火光在夕阳里闪耀，一堆堆黄表纸钱燃起的火焰骤起骤灭，男人女人跪伏在蓬蒿中磕头作揖，走掉一批又拥来一批，川流不息。白嘉轩吃了一惊，想不到自己在屋里

关了一天一夜，白鹿村的气候竟然发生了如此重大的变化。他拄着拐杖朝慢坡走去，佝偻着腰却昂扬着头，他与任何人也不打招呼，傲视着满地的香火和跪伏在荒草中的男女，从窑院的平场到崖头上转了一圈，用拐杖打散了一堆燃过的黑色纸灰，打落了正在燃烧的一撮紫香和两根红色蜡烛，然后把拐杖甩到腰后，背抄着手走下慢坡来。跪伏在地的人看着他离去，没有谁和他招呼说话。

白嘉轩回到屋里，有三个老汉紧随其后跟进院子，他们声明自己是众人推举出来的头儿，负责向族长转告族人的一项要求。昨天后晌，小娥的鬼魂借着鹿三的嘴公开了一个秘密，眼下流漫在原上的瘟疫是她招来的……于是有人在小娥的窑院里跪下了，点燃了第一支蜡烛和第一炷紫香。半天时间不到，就形成了一个大香火场子，烧香叩拜者远不止白鹿村的男女，远远近近村庄里的人闻讯都赶来了。白嘉轩坐在石桌旁，听着三位老者的叙说不动声色，冷冷地说："好嘛，那就烧香磕头吧！谁爱烧香尽管烧，谁爱磕头尽管磕去，这跟我无关咯！"三个老汉进一步告诉他，小娥借鹿三的口提出在她的窑畔上给她修庙塑身，对她的尸骨重新装殓入棺，而且要族长白嘉轩和鹿子霖抬棺坠灵，否则就将使原上的生灵死光灭绝……村里人纷纷提出捐钱捐物，只等族长出面统领族人。白嘉轩鼻腔里冲出两声响亮的"哼哼"的声音，霍地一抡拐杖："你仨老混账……滚吧，快给我滚出去！"三个老汉料想不到族长连一丝面子也不给，面面相觑一下就一溜烟出门去了。白嘉轩站在院子里余气难消，对着溜出街门的三个老者的脊背骂道："混账混账，全是一帮子混账货！"

小娥那座窑院里的香火日夜不熄，整个原上的村民闻讯都赶来了，窑院里的荒草野蒿早被踩平，香灰纸灰落积得厚如黑毡，香火场子扩展到慢坡土道上和崖坡上的台田里，处处可以看见滚落着捏成石

榴桃果的白面供品。四方庙宇的香火却骤然疏落下来，三官庙的庙门已经关闭起来。随后，白鹿村的祠堂前又发展成一个热点，许多族人跪倒在祠堂前和戏楼之间的广场上。三个老者再次结伴壮胆走进白嘉轩的街门，而且做出一副即使族长唾到他们脸上也不擦的坚定神气："族人给你跪下了，请族长出面领众人修庙祛灾免祸。"白嘉轩这回没有骂，冷笑着说："现在是不敬神倒敬起鬼来了，还是一个不干不净的鬼。"三个老者按事先商量好的措辞说服族长："不管啥鬼，总得保住人嘛！"白嘉轩一挥手一翻眼珠："谁爱跪谁就跪，谁想跪多久就跪多久，要叫我给那个婊子修庙塑身，除非你们来杀了我。"而且指着街门的方向："你仨走吧，快走。记住再不准为这事来寻我；再来寻我，我就拿拐杖把你仨的门牙打掉！"

孝武在午饭后从山里赶回家来，探视父亲和母亲的身体。他一进门就瞧见了厅房明间里安设的灵桌，哭叫一声便踉踉跄跄跪跌下去不省人事了。白嘉轩从里屋出来慌忙丢了拐杖，抱扶起昏死在灵桌下的孝武，发现孝武额头上汩汩涌出的血流漫过半个脸孔灌进耳朵，便顺手点燃几张黄表纸，把表灰揞到伤口上止了血，再死劲掐孝武的人中。孝武醒来三次又哭得昏死过去三次，直到父亲白嘉轩也被折腾得精疲力竭瘫坐在灵桌下站不起来。孝武找了一块白孝布戴在头上，问了问母亲病亡的经过，随后就用竹笼装着阴纸到坟地去了。孝武在母亲的墓堆前又哭得昏死活来，燃烧的阴纸烧灼了手指才清醒过来。孝武回到白鹿村，被三个老者拦住，叙说了鹿三被小娥鬼魂附体的事，又把他引到祠堂前的广场上来，那些跪着的族人一下子把他围裹起来……

孝武傍晚时才脱身回到家中，开口对父亲说："爸，你总不能让族人就这样跪下去……"白嘉轩问："按你说咋办呢？"孝武说："我看救

人要紧。修庙要是能免了瘟疫，就……”孝武还没说完，嘴上就挨了一巴掌。他清楚地感触得出父亲是用手背反弹到嘴上的，粗大坚硬的指头骨节硌得嘴唇疼痛不堪，牙床上硌出的血流出嘴角。孝武抹了一把血愈加慷慨陈词起来：“爸呀，你不管自个也得想想族人，村子里一个接一个死人，难道眼盯着让村子死光死净？祠堂那儿跪着的不单是白姓鹿姓的族人，整个原上十里八村都有人来跪着求你开口。众人说只要你不挡将，修庙塑身的事由各个村子合伙搞；至于装殓入棺厚葬的事，只需你用手扶一扶灵柩的抬杠就行了，只要你屈尊举动一下，众人祛了灾免了祸，原上各个村族准备给你挂金匾哩！子霖叔顺乎人心民意，说只要众人能得安宁，他吃屎喝尿都不在乎……爸呀，我说一句晚辈人不该说的话，跪在祠堂前的人和没跪的人都恼你哩！你拄上拐杖到祠堂门前去转转，看看众人诚心实意的情景，你也许会改变主意……”白嘉轩瞅着儿子流血的嘴和慷慨激昂的姿势毫不动情，反而变得沉静如铁：“为民请命，顺乎民心，你倒是跟你的子霖叔不谋而合。只有我成了孤家寡人。岂止是恼我，众人把我看成绊脚挡路的石头，盼我死哩！”说罢竟自拄着拐杖走出街门去了。

鹿子霖不失时机地抓住了这个机会。当鹿三在稠人广众中吣出了杀死小娥的真相，他起初震惊不已，随之就忍不住击掌称好，这桩案子大白于世，无论从哪边看，无论从哪边说，对他都只有好处而没有一丝一毫的损伤；黑娃对他的猜疑和仇恨至此将一笔勾销，瘟疫造成的恐惧势必使原上的每一个还不甘死去的人，怨恨杀死小娥的鹿三以及秉承主家旨意的族长白嘉轩。他对三位在白嘉轩面前碰了钉子的老者说：“那就让众人跪到族长家门口去。”

随后，三位老者又怂恿孝武亲自去找鹿子霖，请他去和鹿子霖直接商议，又鼓动孝武越过白鹿村老族长这一关，以新族长的权力率领

原上几十个村庄联合修庙葬尸。孝武的脑子开始发热，看见从祠堂门口移动到自家门口的一片黑压压下跪的男女，他的情绪愈加亢奋，几乎没有什么犹豫就和三个老者走进了鹿子霖铺满生石灰的院子。

鹿子霖拍着孝武的肩膀说："由原上各村联合承办修庙，这办法可以倒是可以，不过得搁到最后一步。咋哩？那样一办，原上人该咋样骂白鹿村和嘉轩呢？况且，跳过嘉轩哥这一关总不好嘛！顶好的办法还是由嘉轩哥执头儿，由他承办才名正言顺。我说咱们五个人一起去跟族长说，把冷大哥也拉上，看他给不给面子。"说着又一次拍拍孝武的肩膀："娃娃，你这回领着原上人把庙修起来，你日后当族长就没说的了。"

五个人一起找到中医堂，冷先生也出人意料地表现出灵活的态度："我早说过这瘟疫是一股邪气嘛！而今啥话都该搁一边，救人要紧。只要能救生灵，修庙葬尸算啥大不了的事？人跟人较量，人跟鬼较啥量嘛！"于是收拾了案头医器墨具，意气昂昂随大伙一起出门。六个人来到孝武家，发觉白嘉轩不在，孝武也闹不清父亲到哪里去了，等到天黑也不见归来。六个人不约而同坐下，下定决心死等，孝武就一锅再一锅烧水沏茶侍候，直等到鸡叫头遍时分，白嘉轩头上结着一抹露水回来了。

"我明白众位聚在这儿的用意。"白嘉轩仰起脸说，"咱们不要在我屋里说，这不是我白某人的家事咯。这是本族本村的大事，该当搁到祠堂去议，跟本族本村的男女一块议。孝武，你去把祠堂的灯点亮，把人都召集到祠堂去。"众人面面相觑，看看白嘉轩只顾在铜盆里洗手洗脸再不说话，就都现出尴尬的模样。鹿子霖率先告别走出门去，三个老者也跟着走了，只有冷先生稳坐着说："嘉轩，你老弟比我还冷。"白嘉轩说："你既然来了就甭走，跟我到祠堂去看看热闹。"

白嘉轩走了一趟白鹿书院。“白鹿村就剩下我一个孤家寡人啰！”他向朱先生叙说了鹿三鬼魂附体以来的世态变化，不无怨恨地说，“连孝武这混账东西也咄咄着要给那婊子修庙。”朱先生饶有兴味地听着，不屑地说：“人妖颠倒，鬼神混淆，乱世多怪事。你只消问一问那些跪着要修庙的人，那鬼要是得寸进尺再提出要求，要白鹿村每一个男人从她裆下钻过去，大家怎么办？钻还是不钻？”白嘉轩再也压抑不住许久以来蓄积在胸中的怒气，把他早已构想的举措说出来：“我早都想好了，把她的尸骨从窑里挖出来，架起硬柴烧它三天三夜，烧成灰末儿，再撂到滋水河里去，叫她永久不得归附。”朱先生不失冷静地帮他完善这个举措：“把那灰末不要抛撒，当心弄脏了河海。把她的灰末装到瓷缸里封严封死，就埋在她的窑里，再给上面造一座塔。叫她永远不得出世。”白嘉轩击掌称好：“好好好好好！造塔祛鬼镇邪——好哇，好得很！”

祠堂里那盏粗捻油灯亮起来，祠堂院里和门外拥挤着男女族人，许多外村人自觉地跪在外层，把白鹿村人让到院里和前排。白嘉轩拄着拐杖从人窝里走进祠堂大门，端直走进大殿，点燃了木筒漆蜡，插上紫香，叩拜三匝之后，走出来站在台阶上，佝偻着腰昂起头说：“孝武，你念一念族规和乡约。”孝武擎着油灯，照着嵌镶在墙上的族规和乡约的条文念起来。白嘉轩等到儿子念完接着说：“我是族长，我只能按族规和乡约行事。族规和乡约哪一条哪一款说了要给婊子塑像修庙？世上只有敬神的道理，哪有敬鬼的道理？对神要敬，对鬼只有打。瘟疫死人死得人心惶惶，大家乱烧香乱磕头我能想开，可你们跪到祠堂又跪到我的门口，逼我给婊子抬灵修庙，这是逼我钻婊子的胯裆！你们还说在我修起庙来给我挂金匾，那不是金匾，是把那婊子的骑马布挂到我的门楼上。我今日把话当众说清，我不光不给她修庙，还要给她造塔，把她烧成灰压到塔底下，叫她永世不得见天日。谁要

修庙，谁尽管去修庙，我明日就动手造塔。”白嘉轩说完走下台阶，凛凛然走过人群，走出祠堂回家去了。

孝武回到家就给父亲跪下了。白嘉轩端着水烟壶，听着孝武在膝下忏悔的话。按照他的气性，早该把这个在重大事件临头时表现动摇的混账货推开，像当初废除孝文的族长继承人一样。可是推开孝武以后怎么办？三儿子孝义明显不具备族长的德行。他对孝武说：“你明白了就好。你明日就动手造塔。你能把塔造成功，你日后才能当好族长。”

一座六棱砖塔在黑娃和小娥居住过的窑垴上竖立起来。六棱喻示着白鹿原东西南北和天上地下六个方位：塔身东面雕刻着一轮太阳，塔身西面对刻着一轮月牙，取“日月正气”的意喻；塔身的南面和北面刻着两只憨态可掬的白鹿，取自白鹿原相传已久的传说。这是朱先生构思设计的方案。自从孝武领着族人挖开窑洞，掏出小娥已经发绿的骨殖，架火焚烧再压入塔底之后，鹿三果然再没有发生发疯说鬼话的事。不过他日见萎靡，两只眼睛失了神气，常常丢东忘西说三遗四，一天不吃一口饭也不觉肚饿，一旦吃起来又没饥没饱能装进七碗八碗……

第二十六章

瘟疫过后的白鹿原显示出空寂。在瘟疫流漫的几个月里，白鹿村隔三差五就有抬埋死人的响动，哭声再不能引起乡邻的同情而仅仅成为一个信号：某某人死了。瘟疫是随着冬天的到来自然中止的。九月里，当人们悲悲凄凄收完秋再种完麦子的时候，没有了往年收获和播种的欢乐与紧迫。这一年因为偏得阴雨，苞谷和谷子以及豆类收成不错，而丰收却没有给田野谷场和屋院带来欢乐的气氛。有人突然扑倒在刚刚扬除了谷糠的金灿灿的谷堆上放声痛哭死去的亲人；有人掼下正在摔打的梿枷，摸出烟袋来：人都死了，要这些粮食弄啥！秋收秋播中还在死人。播下的冬小麦在原上覆盖起一层嫩油油的绿色，刚刚交上阴历十月，突然一场铺天盖地的大雪倾泻下来，一些耐寒的树木尚未落叶，不能承受积雪的重负而咔嚓咔嚓折断了枝股。大雪以后的寒冷里，瘟疫疯张的蹄爪被冻僵了，染病和死人的频率大大缓减了。及至冬至交九以后，白鹿村恐怖的瘟疫才彻底断绝，那时候，白嘉轩坐镇指挥的六棱镇妖塔刚告竣工。村巷里的柴火堆子跟前再不复现往年寒冬腊月聚伙晒暖暖谝闲传的情景，像是古庙逢会人们一早都去赶庙会逛热闹去了，然而他们永久不会再回到白鹿村村巷里来了。

白嘉轩先叫回来山里的二儿媳和孝义，接着让孝武孝义兄弟两个去城里二姑家接回来白赵氏。白赵氏对仙草的死亡十分痛心，几乎本能地重复着一句肺腑之言："该死的不死，不该死的可死了。活着我做啥呀……"白赵氏很自然地接受了仙草死亡的事实，倒是奇怪鹿三的变异。她坐着两个孙子吆赶的牛车终于驶到自家门楼下，第一眼瞅见鹿三就发觉了异常。鹿三木木讷讷说了一句"回来了"的应酬话，转过身就去卸牛，直到晚上吃饭之前，再没有和她照面。天黑时，鹿三从圈

场过来吃晚饭，慢吞吞喝了一碗米汤，吃了一个溜软的苞谷馍馍，就起身走了，和任何人都没有打一句招呼，也没说一句闲话。鹿三扑踏扑踏缓慢沉重的脚步声消失以后，白赵氏问儿子白嘉轩："老三看去不对窍？"她还不知道鹿三被小娥妖鬼附身的事。白嘉轩淡淡地说："三哥老了！"

小娥的骨殖从窑洞里被挖掘出来已经生了一层绿苔。家家户户自愿抱来的硬柴在窑院里堆成一座小山，炽烈的火焰整整燃烧了三天三夜，最后把柴灰和骨灰一齐装进一只瓷坛埋到塔基底下。修塔的匠人请示主事的白孝武说，即可封底。白孝武一个封字刚说出口，站在一边的白嘉轩用手势示意匠人暂缓执行孝武的指令，他正出神地瞅着窑垴塄坎上的草丛，众人这才惊异地发现，雪后枯干的蓬蒿草丛里，居然有许多蝴蝶在飞舞。白嘉轩说："那是鬼蛾儿，大伙把那些鬼蛾逮住，一个也甭给飞了。"族人们脱下衣衫，摘下帽子，满坡坎上追撵扑打着，把被打死的蛾子捡起来扔到白嘉轩脚下。那是许多彩色的蝴蝶，纯白的纯黄的纯黑的以及白翅黑斑的……白嘉轩从旁人手里借过一把锨，把那些死蛾铲到塔基下的瓷坛根，然后才让匠人封底。十只青石碌碡团成一堆压在上面，取"永世不得翻身"的意思。镇妖塔落成举行了庆祝活动，锣鼓和铳子鞭炮响成一片。自此塔竖起，鹿三果然再没有发生鬼妖附身的事，然而他却完全变成另一个人了。鹿三短了言语，从早到晚常常不说一句话，默默地端坐在那儿发着痴呆；记性儿也差远了，常是赶着牲口扛着犁杖走到地头，才发现忘了给木犁戴上铁铧或是忘了拿鞭子；他用了大半辈子的旱烟袋丢了三四次，都是旁人拾了又还给他；他的素有的主动性正在消失，往日的勤劳也变得懒散了，没精打采地推着土车垫圈，懒洋洋地挖起牲畜圈粪时一干三歇，尤其是那双眼睛，所有凝聚着的忠诚刚烈和坚毅直率的灵光神韵全部消失殆尽，像烧尽了油的灯芯，又像虫子蛀蚀过的木头。白嘉轩

一发现鹿三的变化，就暗暗地想过，被鬼妖附过身的人就是这种架势，鬼妖附着人身吮咂活人的精血得到滋润才能成精。患病的人康复以后吃好东西可以弥补亏空，而被鬼妖附身的人像春天的糠心萝卜一样再也无法恢复元气了。白嘉轩有一次发现兔娃在铡墩前训斥老子鹿三，弹嫌鹿三揣到铡口里的干青草总是不整齐。白嘉轩冷着脸对兔娃提醒说："说话看向着点儿哇娃子，那是你——大。"他尚未发现孝武孝义对鹿三有什么明显的厌弃或不恭，然而轻视的眼色是无所不在的。一次在一家聚餐的晚饭桌上，白嘉轩瞅到了一个机会，对自己的两个儿子和鹿三的儿子兔娃一并嘱咐说："你们三伯你大老了。人老了就是这个样子。从明日起，孝义兔娃你俩接替三伯抚弄牲口。你三伯能做啥活想做啥活儿由他做一点，他不想做啥活儿哪怕啥活儿都不做，你们谁也不许指拨他，更不许弹嫌他，拿斜眼瞅他粗嗓子吼他都不准许。听下了没？"孝义首先抢着回答说"听下了"。他和鹿三感情甚笃，对父亲的话拥护不二。孝武不失未来族长的架道，持重地点了点头。只有兔娃闷头不吭，半晌才抬起憋得赧红的脸，两颊挂满了泪珠，懊悔自己有过对父亲的不逊言语和失礼行为。白赵氏向孙子们解注白嘉轩的话："你爸向来把你三伯当咱屋一口人待。"

土地上冻以后，白孝武统领着弟弟和兔娃开始了给麦田施冬肥的大项劳动。孝义自幼爱抚弄牲畜，更喜欢吆车，自告奋勇拉牛套车。鹿三第一次没有参加送粪劳动，白孝武安排他经管槽头的牲畜，空闲下来可以随意帮忙装车，这给孝义独立吆车提供了机会。兔娃总是随和腼腆，白孝武以和蔼的口吻征询他想干哪项活路时，他说："你叫我干啥我就干啥，你随便安置。"白孝武说："那你就跟车吧。"兔娃说："对嘛。"说着就捞起锨往车厢里装粪。跟车实际是装车和卸车，在粪场装满土粪，然后坐到车尾巴上，到地里后，再用一只铁制刨耙把粪块从车厢里刨下来。兔娃已经练成一副劳动者熟练的操锨装粪的洒脱

姿势，不慌不急一锨一锨从偌大的粪堆上铲起粪块抛进车厢，不时地给手心吐点唾沫儿搓搓手掌。车厢装满以后，兔娃用锨板把冒出车厢的虚粪拍打瓷实，防止牛车在圪圪垯垯的土路上颠簸时撒遗粪块。他把一把刨耙架到车厢旁侧，然后从车尾巴上推着车厢帮助黄牛启动。白孝武在旁边看着牛车驶出圈场大门，孝义一边摇着鞭子一边吆喝着牲口，扭着尚不雄健而有点装势作态的腰肢儿，他忍不住笑了。

白孝武回到圈场，在粪堆前捞起镢头，把积攒了一年已经板结的粪块捣碎刨松，免得把大块的死圪垯拉进麦田压死一坨麦苗。这种简单舒缓的劳动不仅不妨碍思考，倒是促进思维更趋冷静更趋活跃，为自己在修庙与修塔的重大争议中的失误懊悔不迭。

那时候，他刚刚回到家看见母亲的灵堂，只有看见母亲灵堂上的一束表帛一炷紫香，才切肤地感觉到瘟疫意味着什么。他在无以诉说的悲痛里正好遇见了跪伏在祠堂门前的一片男女，看见了一张张熟悉或陌生的脸孔，所有脸孔都带着凄楚和企盼。三个老者立即包围了他，逼真惊惶地给他述说小娥鬼魂附着鹿三的怪事，请他为民请命，率众修庙，以安置暴死的小娥的魂灵。老者说："小娥算个啥？给她修个庙就修个庙吧，现在得顾全整个原上的生灵。人说顾活人不顾死人。和鬼较啥量嘛！"老者又透露给他鹿子霖也是顺随众人的意思，只有老族长一人执拗着。白孝武架不住那种场合里形成的气氛，脑子一热就赞成老者代表众人的动议，慷慨地表态："我给俺爸说说。"……尽管他随后很快冷静下来遵从了父亲的意旨，尽管由他监工如期修起了镇邪塔，然而在重大关头的动摇和失误依然留下不散的阴影，甚至成为一块心病，他总是猜疑父亲因此看穿了他而对他感到失望。白孝武想以自己的坚定性弥补过失，终于想到一个重大的行动，再三审慎

地考虑之后，觉得肯定符合父亲的心意，便决定晚间向父亲请安时郑重提出。

冬日的太阳缓缓冒上原来，微弱的红光还是使人感到了暖意，厚重的浓霜开始变色。父亲拄着拐杖走进圈场，察看儿子们送粪的劳动来了。这当儿孝义驾着牛车，车厢里坐着兔娃进了圈场，年轻人生气勃勃的架势谁见了都不能不感动，白嘉轩破例和孩子们说了一句笑话："今日个上阵的全是娃娃兵噢！"孝义和兔娃得到这句稀罕的玩笑式奖励而更加欢势，俩人很利索地装满一车粪又吆车走出圈场了。白孝武感到父亲此刻心情不错，便决定把晚间要说的事提前说出来，在父亲拄着拐杖踱到粪堆跟前时，他拄着镢头对他说："爸，我想敬填族谱。"白嘉轩显然正在专心察看厩粪沤窝熟化的程度，没有料及儿子说出这样重要的事，不由地扬起脑袋瞅视儿子一眼，喉咙里随之"嗯"了一声。白孝武解释说："死了那么多人，该当把他们敬填到族谱上，过年时……"白嘉轩当即赞成："好。"白孝武进一步阐释更深一层的用意："做这件事八成在稳定活着的人，两成才是祭奠死者。把死者安置到族谱上祭奠一下，活人心里也就松泛了——村子里太恓惶了。"白嘉轩注视着儿子的眼睛点了点头，补充说："就是说到此为止。人死了上了族谱就为止了，活人思念死人也该到此为止。不能日日夜夜天天无止地思念死人，再思念啥也不顶了，反倒误了时辰耽搁了行程。"白孝武很受鼓舞，这件事无疑做到了父亲心上，得到父亲赞许令他情绪高扬，然后说出具体想法："你得先跟子霖叔招呼一声，我是晚辈不好跟人家说这事。"白嘉轩纠正说："你去跟他说。这不是咱家跟他家两家子的事。这是族里的事。你是族长他也知道。你出面跟他说族里的大事，他不能计较你的辈分儿。"白孝武接受了父亲的话更觉气壮，继续说出深思熟虑的举措："我想把这个仪式搞得隆重一点，好把众人的心

口儿烘热，把村子里恓恓惶惶的灰败气氛扫掉。”白嘉轩把拐杖插进粪堆赞赏这种考虑：“行啊，你会想事也会执事了。”

白孝武连着两个晚上到鹿子霖家去，都未能见着人，第三天晌午，索性走进白鹿镇鹿子霖供职的保障所，看见鹿子霖正和田福贤低声说着话，从他们和他打招呼时有点僵硬的神色和同样僵硬的语气判断，俩人可能正在说着起码不想让第三个人听到的隐秘的事，他不在意地坐下之后就敞明来意。鹿子霖听了似乎有点丧气：“噢噢，你说修填族谱这事？你跟你爸主持着办了就是了。”白孝武似乎觉得受到轻视：“头一天开启神轴儿的大祭仪式，你得到位呀？”鹿子霖毫无兴趣也缺乏热情，平淡地说：“算了，我就不参加了，保障所近日事多。”白孝武也不再恳求就告别了，临出门时谦虚地说：“我要是哪儿弄出差错惹下麻烦，你可得及时指教。”鹿子霖不在乎地摆摆手送白孝武出门，转过身走回原来的椅子，不等坐下就对田福贤说：“白嘉轩这人一天尽爱弄这些事，而今把儿子也教会了，过来过去就是在祠堂里弄事。”田福贤进一步借着鹿子霖嘲笑的口气加重嘲笑：“一族之长嘛，除了祠堂还能弄啥呢？他知道祠堂墙外头的世事吗？这人！”俩人随之继续被白孝武打断了的谈话。

鹿子霖许久以来就陷入一种精神危机当中。郝县长在白鹿原被公开枪毙震撼了原上的男女老少，包括田福贤都惊诧得大声慨叹：“我的天啊！怪道这原上的共匪剿不净挖不断根，县长原来是个共匪头子嘛！”鹿子霖作为乡约参与了这场前所未有的杀人组织工作，按县上的布置，把本保障所所辖各个村庄的男女，按照甲的组织一律排队前往杀场，观看县保安队枪毙共匪县长的现场实景。杀场选择在白鹿镇南面的小学校旁边，从东原西原南原北原各个村子集合到这里的人被严格限制在用白灰划定的区限以内，白鹿仓的保丁们负责维持秩序。小

学校周围的围墙下和大门口，由县保安队的保丁们荷枪实弹监卫着，把那些企图窜到墙根下拉屎尿尿的村民赶吆远离围墙。鹿子霖站在白鹿保障所辖属的村民的队列前头，清楚地看见了全部过程：两列全副武装的保丁们端着枪走出学校大门，押在中间被五花大绑着的穿中山装的人就是郝县长；背脊上插着一个纸牌，两臂被两个保丁挟持着走了过来。全县的头头脑脑包括各仓的总乡约都坐在临时摆置的主席台上，岳维山坐在正中间。两列保丁作扇形分开，郝县长被押到主席台下。他已经直不起筒子，脑袋低溜下去，双腿弯着无法站立，全凭两个保丁从两边提夹着。鹿子霖最初从小学校门口瞥见郝县长的一瞬间，眼前出现了一个幻觉，那被麻绳捆缚的人不是郝县长，而是儿子鹿兆鹏。随后县保安队大队长和法院院长的讲话，他一概听不进去，岳维山最后讲话也是一个字都听不进耳朵。鹿子霖的耳朵里呼呼呼刮着狂风，响成一片，不由自主地在心里猜估：郝县长站立不住究竟是吓软了，还是腿断了腰折了直不起筒子？说吓软了不见腿脚颤抖，说被打残了又看不见伤势。最后执行枪决命令时，郝县长被跑动着的保丁拖到了围墙根下，鹿子霖看见郝县长拖在地上的双腿有一只脚尖竟然朝后跷起，另一只脚尖也朝外跷着，他才弄明白双腿肯定打断了骨头。一排保丁端着枪瞄住五六步远的跪伏在地上的郝县长，然后扣响枪码子。枪声很大，却没有村民们企望的惊险。鹿子霖在杂乱的枪声里又一次出现幻觉，那个被乱枪击中而毫无反应甚至连一声呻吟也没有的人，不是郝县长，而是儿子兆鹏。

散场之后，凡乡约以上的官员被集中到学校一间教室里，岳维山对他们进行训话："我首先向诸位检讨我的失职，共匪头子郝跟我住一个县府院子，低头不见抬头见，他能在我眼皮底下稳做好几年县长，可见我麻痹到什么程度！诸位以我为鉴，认真自省是否也有麻痹大意？我们滋水县在全省是共匪作乱甚烈的地区，白鹿原又是本县的红

窝子。本县的头一个共匪就出在白鹿原上，共匪的第一个支部还是先在这原上成立的……郝作为本县的匪首总根子已被剪除，我们务必趁其慌乱之机搜挖那些毛毛根，一定要在本原乃至全县一举廓清共匪……”鹿子霖耳朵里还在断断续续刮着呼隆隆响的风声，总是猜疑岳维山瞅着他的眼神和瞅着别人的眼神迥然不同，及至散会后这预感终于被证实，田福贤截住已跷出教室门槛的他说：“岳书记要跟你谈话。”

谈话的地点改换到校长的小屋子。校长殷勤谨慎地给每人倒下一杯茶后知趣地走开了。屋子里只有田福贤作陪。岳维山直言不讳地对鹿子霖说：“你设法帮助我找找鹿兆鹏。”鹿子霖脑子里轰然一声，急忙分辩：“好多年也没和他照过面，上哪儿找去？”岳维山瞅着他涨红的脸用手势抑止住他，说：“你找见他或者偶尔得到他的消息，你给他说，我期待他回滋水跟我共事，我俩合作过一次还合得来。你给他说明叫响，我请他回滋水来做县长，把他的才学本事用到本县乡民的利益上头。我俩虽然是政治对手，可从私交上说，我们是同学也是朋友。我一向钦敬兆鹏的才魄学识，这样有用的人才如果落到郝县长的下场，太可惜了！”鹿子霖听着这些诚挚的话，耳边的风声止息了，情绪十分专注，努力捕捉这些话语之外的信息，以判断这些话的真诚程度和圈套的可能性。岳维山说：“我得回县里去了。你呀，可甭使我的一番苦心付之流水。一句话，我期待跟他再一次合作。”鹿子霖再三斟酌之后，还是委婉地申述难处：“鹿兆鹏早都不是我的儿了！好几年了我连一面也见不上……”说着瞅一眼田福贤，企图让他给作证。田福贤却摆一下圆圆的光脑袋说：“你还没领会岳书记的意思。”岳维山笑笑说：“是啊，你的话我全信，可说不定也有撞着他的机会。我都意料不到地撞见他了。你是他爸……更有机会撞见。”鹿子霖已经听说过岳维山和白孝文在朱先生的书院撞见鹿兆鹏的事，立即搭话说：“岳书记，

你应该当场把他打死！”岳维山依然笑笑说：“我不忍心。我等待着跟他二次携手合作。”

鹿子霖用三天三夜的时间反复嚼磨，企图揣透岳维山谈话的真实目的，尤其是以枪毙郝县长作为谈话的大背景，三天三夜冷静艰涩的嚼磨分析的结果仍然莫衷一是。第四天后晌，鹿子霖找到白鹿仓，想从田福贤口里再探探虚实。鹿子霖首先作出完全信赖岳维山的神气说：“岳书记这人太宽宏大量了咯！我要是能摸准兆鹏在哪达，我把他捆回来送到岳书记跟前。”田福贤平静地说：“你先到城里去碰碰，在亲戚朋友那儿走走问问，这机会可是不能丢掉。”鹿子霖作难地说：“他现在那个模脑儿敢到哪个熟人家去？”田福贤还是坚持说：“找不见没关系，还是去找找为好。将来我见了岳书记也好回话，说你尽心找来……”鹿子霖得着话茬说：“岳书记是不是要我去找？”田福贤瞪他一眼，直率地说：“子霖，你这人脑瓜太灵！太灵了就把好好的事情想到歪处。你先去找找嘛！找着了于兆鹏好，于你也好嘛！找不着也不问你罪嘛！”鹿子霖便做出决心听从的坚定的口声说：“好哇，我去找。”

鹿子霖第二天下原进城先找到二儿子鹿兆海，把岳维山亲自找他谈话的大背景和谈话内容一字不漏一句不错地复述给兆海，让兆海帮助他分析岳维山的真实用意。兆海听完就抱怨父亲说：“爸，你真糊涂！这样明明白白的话你还掂不来轻重揣不准虚实？”随之气愤地说：“这是欺侮你哩！”鹿子霖闷住头不吭声。兆海说：“岳维山毙了郝县长很得意。他明知兆鹏不会投降，故意拿这话给你亮耳，他是猜疑你跟兆鹏可能暗中还有拉扯。你连这绞绞都翻不清？”鹿子霖说：“我想到这一步，只是不敢肯定是这一步，我还想了好几步。”兆海说：“他肯定对你当乡约起了疑心。”鹿子霖说：“这一步我也想到了。”兆海生气地说：“你到哪儿找兆鹏？他再说这话你问他，‘你到处悬赏都逮不

住，我哪能撞见？’”鹿子霖苦笑一下：“我怎能这么跟人家说话。”兆海强硬地说：“你不好说我跟他说。这人贱毛病不少！”鹿子霖担心地说：“你可不敢冒冒失失惹事。”兆海说：“你既然进城来了，就在这儿住几天，吃几天羊肉泡馍看几场戏，回去就说你没找见，看他能把你吃了不成！”

鹿子霖住在兆海那儿，每天早晨到老孙家馆子去吃一碗热气蒸腾的羊肉泡馍，晚上到三意社去欣赏秦腔。他心里唯一犯疑的是，儿子兆海官至连长，军队上的连长比滋水县的岳书记还大吗？怕是未必。可是从兆海说话口气里，可以明显听出来，岳维山不算个啥咯！吃羊肉泡馍看秦腔戏无疑都是鹿子霖的喜好，这样逍遥舒悦的日子过了三天，第四天后晌儿子兆海回来了，一边解腰里的枪盒子，一边说：“今日个把那个玩意儿给耍治了一回。”鹿子霖愣眨着眼问把谁耍了，兆海轻蔑地说：“岳维山小子。”

鹿兆海拉上团长乘一辆军车奔到滋水县，径直踏进岳维山的办公房，腰里别着系溜着一截牛皮筋条的手枪，介绍说：“这位是国民革命军十七师三团冉团长。”冉团长反过来介绍鹿兆海说：“这是一连连长鹿兆海。他令尊是你的下属，白鹿保障所乡约鹿子霖。我们是专为鹿乡约的事来拜望岳书记的。”岳维山眼里流泻出一缕不易察觉的惊疑，却又不失礼节：“二位有啥事尽管说，我尽力为之。”冉团长装作直愣愣的口气问：“你跟鹿乡约谈了一回话，把老汉吓得三天三夜吃不下睡不着，跑到城里住在鹿连长那儿不敢回原上咧！”岳维山笑笑说：“误会误会，纯系误会。我不过是让令尊见到鹿兆鹏时劝劝他，我是让兆鹏回滋水做县长。令尊想到另地方去了。”鹿兆海这时候才开口说：“你悬赏一千大洋悬了好多年，那一千大洋现在还悬着没谁能碰上运气领赏。你把这难题出给家父不是难为他吗？”岳维山解释说：“卑职绝

对没有难为他的意思。令尊是本县很称职的乡约，我很信赖他。出于这一点，我才期望令兄把才能用到本县国民革命大业上来。”鹿兆海说：“你有好心也得看看实际，兆鹏自闹农协跟家父闹翻早成了仇人冤家，原上谁人不知？你要是还对他存有戒心，他就里外都不好活人了。”岳维山优雅大度地摆摆头说：“我也知道这码事。对令尊我向来信用不疑。”鹿兆海说：“原上纷纷扬扬传说，家父要是交不出兆鹏，罢免乡约事小，还要押他当人质。”岳维山轻松地笑笑：“谣言不可信。当着二位的面我说一句，本人只要在滋水，令尊的乡约就没人能替代。你回去可以给令尊说清楚，让他解除误会。”鹿兆海虚张声势说：“我爸那人看去精明强干，实际上胆子小得很，屁大一点事就吓得天要塌下来一样。我这几年耍枪杆子摔半吊子闯荡惯了，怎么也想不来他怎会越来越胆小。我说我拿这‘九斤半’（头）给你仗胆你还害怕啥呢？”岳维山听着这些威胁性的话十分恼火，却不能不继续和颜悦色：“误会纯属误会。”把握着鹿兆海说完了要说的话，并已达到示威目的的恰当火候，冉团长出来圆场子说：“岳书记把话说明了没有旁的用意，这就好了，我们也不打扰了。”俩人便告辞出来，在灰败狭窄的县城街巷里转悠了半天，故意昂首挺胸在县府门口踯躅，根本不屑一顾站岗的县保安队兵丁……

鹿子霖听了兆海的学说，哈哈大笑，畅快地嘲笑岳维山：“哎呀，我只说岳维山在滋水县顶牛皮了，他一上白鹿原跺得家家户户窗门响，没料到他也犯怯，怯那把铁狗娃子（手枪）嘛！我还当他谁也不怯哩！”鹿兆海鄙夷地说：“我说这人贱毛病多咯！”鹿子霖听从兆海的意愿继续在城里吃羊肉泡馍看秦腔戏，有意拖延回原上的时间以冷淡岳维山的谈话。半月后，鹿子霖自己都可以摸到脸颊上增加了的肉块，才决定回去。冉团长特意要派车把鹿子霖送上原。鹿子霖说：“算了算了，咱摆那个阔抖那路威风做啥？”冉团长说：“这回就要摆摆阔气，抖抖威风，看地方上哪个狗屎猫屌东西还敢给你头上垒窝？”汽车一路开进白鹿镇，又开到白鹿仓门口，田福贤以为政府要员亲临本仓，急忙奔出院子迎接，没料到是鹿子霖父子和另一个军官。他们按路上议妥的办法，由冉团长说话：“田总乡约，请多关照兆海家翁，军人也就在外安心赴死了。”田福贤僵硬地连连笑着应着，礼让他们屋里坐，冉团长和鹿兆海登上汽车就走了。

鹿子霖开始了他一生中最洒脱的日子。他对保障所的事，除了非自己亲自交涉不可的大事出面做一做，其余的事就一概交给王书手去应酬：某某村某某人的某某事你就这样办，某某村谁谁谁的那件事你就照我说的那样弄。他腾出身来到处去闲逛去喝酒。镇子上各个店铺的掌柜全是他的朋友和酒仙，白天要是错过了喝酒的机会晚上一定去补上。本保障所所辖属的各个村子以及更远些的村庄都有他的相好和朋友，他有时空荡着手一进门就吆喝：“老哥，快叫嫂子给咱取酒。”有时候进门先把怀揣的酒瓶往桌子上一蹾，就爽快地叫起来：“弄俩菜吧弟妹。万一啥菜都没有，就切一碟子萝卜丝儿。”他常常喝得似醉非醉，一身轻松地回到屋里。女人忍不住说：“我看你到城里走了一回，酒瘾越发大咧？”鹿子霖说：“你说对了。我这回才把世事看开了，酒瘾也大了！”无论什么公务和家事都不再对他构成负累，也不影响他喝

酒谝闲话的兴致。只是每天回家进门瞅见兆鹏媳妇淡漠冰冷的模样，就不由得心里一沉，他可怜儿媳在家里守活寡的尴尬处境，但又莫可奈何，如果不是冷先生的女儿，而是任何旁人的女儿，他就会打发她趁早离开这个家庭，起码不致让做阿公的他也背上心理负担，面对亲家冷先生那张冷峻的脸孔，他也无颜说出这样的话。他揣着一瓶酒走进冷先生的中医堂，懊恼地述说岳维山对他的戒忌，又得意地叙说在城里吃羊肉泡馍看秦腔戏的好光景，最后于微醉中借助酒兴吐出来心病："先生哥啊！兆鹏这狗日的把一家人把亲戚朋友都招祸带灾了，我一个好端端的家庭全给他搅得稀汤寡水……"他这样很有分寸绝不直接触及儿媳尴尬处境的慨叹，意在取得冷先生的谅解。冷先生说："英雄败在儿女手啊！"鹿子霖就要这句话，这样就可以不再因为儿女的婚事向冷先生赔情道歉，而继续保持友好往来。

鹿子霖的行为引起田福贤的警觉。田福贤到县上开会，岳维山于会后单独找他谈话，询问鹿子霖究竟跟鹿兆鹏有没有暗中牵扯，而且严肃地盯着田福贤红光满面的脸说："我相信你明白。你可别给我弄个'两面光'的家伙！"田福贤瞪着露仁眼肯定地答复："没事。鹿子霖这人我里外尽知，心眼不少，可胆量不大，还没有通匪的脏腑。"岳维山鄙夷地说起鹿兆海借助团长来县上给他示威的事："两个兵痞二尿货！他们懂个屁，居然来要挟我。"田福贤顺应着岳维山的鄙夷口气嘲弄说："是人不是人的只要腰里别一把枪，全都认不得自个姓啥为老几了。"心里却顿然悟叹起来，怪道鹿子霖从城里回来浪浪逛逛，原来是仰仗腰里别着一把盒子的二儿子的威风，未免有点太失分量了。

田福贤第二天找到白鹿镇保障所，一开口就毫无顾忌地讥刺鹿子霖："你这一程子喝得美也日得欢。"鹿子霖腾地红了脸，惊异地大声说："啊呀老哥，你咋跟兄弟这样开口？"田福贤依然不动声色地说：

“你到处喝酒，到处谝闲传，四周八方认干亲。人说凡是你认下的干娃，其实都是你的种。”鹿子霖愈加涨红了脸：“好些人把娃娃认到我膝下，是想避壮丁哩！我这人心好面软抹不开，当个干大也费不着我的啥。你甭听信那些污脏我的杂碎话！”田福贤说：“有没有那些事，只有你心里清清白白，我也不在乎；你精神大你去日，只是把保障所的正经公务耽误了，你可甭说我翻脸不认兄弟。”鹿子霖心虚气短地强撑起门面：“啥事也误不了，你放心。我爱喝一口酒，这也不碍正经公务。”田福贤这时说起鹿兆海给岳维山示威的事：“何必呢？他是个吃粮的粮子，能在这里驻扎一辈子？”鹿子霖脸上的血骤然回落，后脊发凉，这是一句致命的厉害的话。田福贤不说团长更不提鹿兆海的连长，而是把他们一律称为“吃粮的粮子”；作为不过是为了吃粮的一个粮子儿子，当然不可能永生永世驻扎在城里，他也不可能永远到儿子那里去享受羊肉泡馍和秦腔；一旦儿子撤出城里，开拔到外地，还能再指望他腰里系上盒子，乘着汽车给老子撑腰仗胆吗？而岳维山作为真正的地头蛇，却将继续盘踞在滋水县里。鹿子霖看透世事之后的今天，才发觉自己眼光短浅。于是，诚恳地对田福贤说：“年轻人不知深浅啊！老兄你再见着岳书记时，给道歉一句，甭跟二杆子计较。”田福贤却继而不松地对他实施挖心战术：“年轻人耍一回二杆子没关系，咱们有了年纪的人可得掌住稀稠不能轻狂……”俩人正说到交紧处，白孝武找鹿子霖商议增补族谱的事来了……打发走白孝武，鹿子霖对田福贤摊开双手不屑地说：“白嘉轩这人，就会弄这些闲啦啦事！”

平常的日月就像牛拉的铁箍木轮大车一样悠悠运行。灾荒瘟疫和骤然掀起的动乱，如同车轮陷进泥坑的牛车，或是窝死了轮子，或是颠断了车轴而被迫停滞不前；经过或长或短的一番折腾，或是换上一根新车轴，牛车又在辙印深凹的土路上吱嘎吱嘎缓慢地滚动起来了。白嘉轩坐在父亲以及父亲的父亲坐过的生漆木椅上，握着父亲以及父

亲的父亲握过的白铜水烟壶呼噜呼噜吸着烟的时候，这样想；他站在庭院里望着烟岚笼罩的巍峨南山也这样想；夜晚，当他过足了烟瘾喝够了茶水，躺在空寂的土炕上时尤其忍不住这样想。他已经从具体的诸如年馑、瘟疫、农协这些单一事件上超脱出来，进入一种对生活和人的规律性的思考了。死去的人不管因为怎样的灾祸死去，其实都如同跌入坑洼颠断了的车轴；活着的人不能总是惋惜那根断轴的好处，因为再好也没用了，必须换上新的车轴，让牛车爬上坑洼继续上路。他拄着拐杖，佝偻着腰，从村巷走过去，听见从某个屋院传出女人哭儿子或哭丈夫的悲戚的声音，不仅不同情她们，反而在心里骂她们混账。因为无论父亲母亲儿子女儿和丈夫，在任何人来说都不能保证绝对的完美，不可能一家人永远在一起；因为再好的父亲母亲儿子女儿和丈夫，一旦遭到死劫就不会重新聚合了，即使你不吃不喝想死想活哭断肝肠也不顶啥咯。一根断折的车轴！再好再结实的车轴总有磨细和颠断的时候，所以死人并不应该表现特别的悲哀。白嘉轩对仙草的死亡也深感悲哀，以至很长一段日子里总感觉缺了点什么；缺的肯定不单是她每晚小心地顺着他的脚腿伸溜下来的温热的肉体，也有她在屋院里走路的那种沙沙沙的声音，散发到庭院炕头灶台上的一种气息，或者是有别于影像声音气息的另一种无以名状的感觉，所有这些也都确凿不存在了。他的超人，在于他能得出仙草也是一根断裂的车轴这样非凡的结论。白嘉轩在思索人生奥秘的时候，总是想起自古流传着的一句咒语：白鹿村的人口总是冒不过一千，啥时候冒过了肯定就要发生灾难，人口一下子又得缩回到千人以下。他在自己的有生之年里，第一次经历了这个人口大回缩的过程而得以验证那句咒语，便从怀疑到认定：白鹿村上空的冥冥苍穹之中，有一双监视着的眼睛，掌握着白鹿村乃至整个白鹿原上各个村庄人口的繁衍和稀稠……

白嘉轩赞成儿子孝武增补宗谱的举措，正是他死人如断轴的结论形成的时候。

白孝武独当一面开始了补续族谱的神圣使命，从三官庙请来和尚，为每一个有资格上族谱的亡灵诵经超度。庄严而又简练的程序是，按照白鹿两姓的辈分自高至低，同辈人再按照年龄长幼排出顺序，先由死者的儿子或孙子代表全家人点燃三支紫香插入香炉，然后率死者的男女孝子长揖重叩三匝，跪在灵桌前垂首静立恭候；白孝武在砚台里膏顺毛笔尖头，悬腕将死者的名字填写进印红的方格，再放下毛笔对死者行三鞠躬礼；孝子们再三叩首后退离出祠堂；五个小班子乐人在孝子跷进祠堂大殿门槛时便奏起悠扬的乐曲，乐曲吹奏到整个仪式完毕，孝子退出祠堂才告一间歇；和尚在孝子长揖重叩三拜之后开始敲响木鱼，诵念谁也听不懂的经文；待和尚闭起嘴巴不敲木鱼时，乐人再接着吹奏。白孝武严肃恭谨地将所有死去的十六岁以上的男人和嫁到白鹿村的女人都填进一块方格，而本族里未出嫁的女子即使二十岁死了也没有资格占领一方红格。这件牵扯到家家户户的神圣的活动，没有出现任何纰漏或失误，自自然然提高了白孝武在族人里的威望。

白嘉轩只是在开头展放族谱神轴和结束后重新卷起神轴时才来到祠堂，和全体族人一起叩拜。在仪式结束时，白嘉轩从一个个男女的眉眼里看到了族人们轻松的神情，于是不无激扬地对族人们说了一句：“总不能叫牛车老窝在坑里，得让车轮子上路滚起来嘛！”

鹿子霖始终没有进入祠堂。他家没有亡灵超度不需上族谱并不是因由。白孝武在家里向父亲全面叙述这个浩繁的仪式时，没有忘记这一点：“展轴和卷轴之前，我都给他说了时日，那人还是没见露脸。”白嘉轩说：“你把他当个人，跑圆路数就行了。他来不来不算啥。我看

那人这一程子又张张狂狂到处窜。人狂没好事，狗狂一摊屎咯！轻狂的……”

白嘉轩开始着手给三儿子孝义娶妻完婚的事。他指使孝武请来了媒人，再指令孝武媳妇炒下四盘菜，温了一壶酒，说：“下来的路须得你跑。”媒人吃了喝了，就乐颠颠地跑到女方家庭说她该说的话，办她该办的事去了。白嘉轩把自家应该筹备的巨细事项，一一交代给孝武去承办。首一件事是淘粮食磨面，石磨一天顶多磨三斗麦子，须得提早动手，而且必须估计到腊月里常常不出太阳，无法淘晒粮食要耽搁磨面的可能。这件单纯的活路交给脑子不大灵活的鹿三去办，经管牲畜的事就由兔娃接替鹿三，年轻人常常耐不住石磨悠悠转动着的寂寞。白嘉轩对孝武的安排做了纠正：“让孝义磨面。他那个性子须得在磨眼里磨一磨。”

三儿子孝义对哥哥孝武的指派瞪起眼睛：“我送粪拉土轧花。哪项活儿不比磨面重？叫我磨面转磨道，我嫌瞀乱。”

当祠堂里敲磬诵经的和声停止以后，孝义和兔娃把积攒在圈场里的粪肥全部送进麦田，又从土壕里拉回七八车黄土，晾晒到腾空了粪肥的土场上，晒干后用小推车收进储藏干土的土棚。

秋天的阴雨和瘟疫耽搁了干土的储备。他和兔娃吆着牛车走向土壕，常是在浓霜蒙地的大路上碾下头一道辙印，把湿土铺开到圈场上去晾晒。俩人饥肠辘辘走进灶房咥两个烤得焦黄酥软的蒸馍，然后再跨进轧花房踩踏轧花机。在灶下烧火做饭的孝武媳妇给灶膛里烤烘着一堆馍馍，让干活干饿了的人先打个尖，也可以堵住爬出被窝就要馍吃的孩子的嘴。她对狼吞虎咽的兔娃耍笑说：“兔娃，你跟人家孝义跑那么欢做啥？孝义是想娶媳妇哩，你蹦啥哩？”兔娃明白这是说耍话，

不在意地笑笑。孝义只顾大咥大嚼，不理会嫂子的挑逗。俩人十分默契十分融洽，欢欢蹦蹦踩踏着轧花机。

孝义对孝武把他和兔娃分开的分工无法接受，就去找父亲申辩。白嘉轩说：“是我叫你转磨道的。”孝义愣了一下，瞪了瞪眼。白嘉轩依然平稳地说：“你就要成家了。成了家你就是大人，不是碎娃了。得在磨道里磨磨你的野性子。”

孝义就从早到晚日复一日囚在磨房里，跟着黄牛或红马的屁股，揽起磨台上磨碎的麦粉，再倒进箩柜，然后就摇起摇把，咣当咣当单调的声音磨得耳朵都木了。鹿三走进来，木然地攥住摇把说：“你出去耍耍。”倔拗的孝义把鹿三推出磨房门说：“我准备在磨道里把我磨成你。”

白嘉轩沉静地把握着各路准备事项的进展。在他看来，娶媳妇不过是完成一项程序，而订亲才是费心劳神的重要环节；能否给儿子娶回来一个合适的配偶，关键不在娶亲而在订亲。白嘉轩闲时研究过白鹿村同辈和晚辈的所有家庭，结论是所有男人成不成景戏的关键在女人。有精明强干的男人遇着个不会理财持家的女人，一辈子都过着烂光景；有仁义道德的男人偏配着个黏糨子女人，一辈子在人前头都撑不起筒子；更不要说像黑娃拾烂菜帮子一样拾掇下的那种货色了，黑娃要是有个规矩女人肯定不会落到土匪的境地。他给孝义订亲时偏重考虑的是儿子的脾性，得选择一个既有教养，而且要稍微活泛一点的女子，意在弥补孝义倔拗的天性。从媒人介绍的五六个对象中反复对比鉴别，白嘉轩瞒着媒人托亲借友打听探询，最终定下西康村一个女子。在这个女子用小推车推着她妈到冷先生的中医堂就诊时，白嘉轩在内室亲眼观察了她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之后，才拍了板，把粮食灌齐，把棉花捆扎成捆交给了媒人。白嘉轩心里十分满意，这是三个儿

媳中最称心最完美的一个。给孝文订亲时，主要考虑到家里急需用人，因而订下一个比孝文大两岁的壮实女子，但其余各方面很是一般；给孝武订亲，原是冷先生托人提出愿结亲家，他已经没有再选择的余地，不过这媳妇还算不大走样顾得住场面，只是不太精灵；只有给三儿子孝义订下的这个媳妇是一个无可挑剔的女子。

正月初三举行的婚礼鼓舞起整个村庄的热情。这是瘟疫结束后第一顶在村巷里闪颠的花轿，唢呐奏出的欢乐乐曲冲散了死巷僻角的凄冷，一种令人激荡的生命的旋律在每个人心头震响。因为是德高望重的族长的儿子完婚，白鹿两姓几乎一户不缺都有人来帮忙，鹿子霖成为这场婚礼的当然的执事头。他精明而又洒脱，把整个婚礼指挥得有条不紊秩序井然，他不时与当执事的男人和帮忙的女人调笑耍逗，笑声显示着热烈和轻松。白嘉轩作为主人，不宜指拨任何人，里里外外只能依赖执事头儿鹿子霖。他起始就对鹿子霖说："哥把全套交给你了。"鹿子霖说："你放心吸水烟去。我今日碰到喝一盅的好机会咧！"

这场婚娶仪式最不寻常的是朱先生偕夫人的到来。朱白氏陪着母亲白赵氏有说不完的话题，朱先生被白嘉轩迎接到上房西屋自己的寝室就座，这两个人坐到一起向来没有寒暄，也没有虚于应酬的客套和过分的谦让，一嘬茶水便开始他们想说的实事。朱先生不吸烟不喝酒，抿了一口淡茶："孝文想回原上来。"白嘉轩没有应声。

腊月根上正筹备这场婚事的最后阶段，白孝文曾指使两个保安队兵丁带来了一摞银圆，并有一封家书，说他将在正月初一回原来给奶奶和父亲拜年，顺便参加三弟的婚礼，那一摞银圆算是对小弟的一份心意。白嘉轩看罢信又把信瓤装进信封，连同那一摞银圆一起塞给来人的手里说："谁交给你的，你再交给谁。"既不问两个保安队兵丁喝

不喝水，更谈不到管饭吃，拄着拐杖走到院子，对着厦屋吆喝道：“孝武送客。”

白嘉轩吸罢一袋水烟，做出与己无关的神态说：“他回原上由他回嘛！我没挡他的路咯！”朱先生知道自己的话被钻了空子，便说得更严密准确：“他想回家里来。”白嘉轩说：“他回他的家嘛！我也没堵在他的街门口咯！”朱先生不由得自失地笑笑，白嘉轩还是钻了他的话里的空子，因为孝文已经分家另过，而他自己的家早已被鹿子霖买去拆掉了，白孝文在原上根本就没有家。朱先生说：“他想回来给你认错，也想给他妈上坟。”白嘉轩这才明白了似的悟叹：“噢呀，他是想进我的街门呀？”说着转动一下突出的眼仁装愣卖呆：“我不认识他呀！他给我认什么错？”朱先生并不惊奇，这是早就预料得到的磕绊，沉稳地说：“你不让孝文回来，说不过去，于理不通。”白嘉轩说：“我早都没有这个儿咧！”朱先生说：“可他还是你的儿。他学瞎，你不认他于理顺通，他学为好人，你再不认就是于理不通。”朱先生说到这儿就适可而止，把回旋的余地留给白嘉轩去思量，然后站起身来说：“我到村里去转转。”刚走到门口又转过身来：“我忘了告诉你，孝文升营长了。”白嘉轩扬起脑袋愣了一瞬，扭一下脖子使劲地说：“他当了皇上也甭想再进我这门。”

朱先生走出白鹿村，进入冬日淡凄的阳光照耀下的田野，薄薄的一层凝冻了的积雪覆盖着田畴，麦苗冻僵变硬的稀疏的叶子从雪层里冒出来。大片大片罂粟的幼苗匍匐在垄沟里，覆盖着一层被雨雪浸黄变黑的麦草。生长麦子的沃土照样孕育毒药。他再也没有吆一犋犁杖犁掉烟苗的凛凛威风了。政府发了加征烟苗税的政令，而不再强行禁烟了；烟田税收超过禾田十倍以至几十倍，可以增加县府的银库；百姓初始惊恐，随之便划算清白了里外账，“土”的价格随着烟苗税的暴

涨而翻筋斗似的往上翻，种烟比种麦仍然有大利可图，种烟的热情不但得不到扼制，反而高涨起来。阴历三月，原上已成为罂粟五彩缤纷的花的原野。朱先生踯躅在田间小路上独自悲叹：饮鸩止渴！他为自己的无能感到悲哀，看到那大片大片蜷伏在残雪下的烟叶无异于看到了满地蛰伏的小蛇……

新婚祥和欢乐的余音缭绕到鸡叫三遍，贪图新媳妇姣美脸蛋子的闹房的小伙子们才最后离去，静寂的村巷里传播着他们兴犹未尽的狂放的笑声。白嘉轩一家和远路未归的至亲无话找话闲磨着时间，等待最后一拨要媳妇闹新房的人离去。白孝武关了街门，把弟弟孝义和刚刚露脸的弟媳唤到上房明厅，点燃了蜡烛。白嘉轩在祭桌前的椅子上坐着。孝义上香之后就叩拜祖宗。新媳妇白康氏豁开裙子，随着孝义也跪下磕头，优雅的拜叩姿势令所有人动心。白嘉轩照例冷着脸朗诵家训，那是从《朱氏家训》里节选下来的一段精粹词章。最后由孝义领着媳妇逐个拜谒家室里的每一个成员。孝义走到白赵氏的椅子前说：“这是婆。”新媳妇爽甜地叫一声“婆”就豁开裙子磕头。白赵氏张着脱落了牙齿的嘴喜不自胜地说：“俺娃磕头的样式好看得很。”孝义又站到白嘉轩跟前：“这是咱爸。”新媳妇叫一声“爸”再次表演磕头的优美动作。及至给孝武两口分别磕了头，又给滞留家里的亲戚也叩头之后，孝武媳妇就请示婆该煮合欢馄饨了。白嘉轩猛然伸出一只手制止了散伙的家人：“快去把你三伯请来。”孝武想到自己的疏忽，立即跑去请鹿三。鹿三早已鼾声如雷，迷迷瞪瞪穿上衣裤被孝武牵着袖子拉到厅房里，在闪烁的蜡焰前眯睁着眼。孝义说：“这是三伯。”新媳妇甜甜地叫声“三伯”又叩下头去。白嘉轩又一次向家人尤其这对新人郑重提醒一句：“你三伯是咱家一口人。”

不管夜里睡得多么迟，一家人习惯自觉地恪守“黎明即起洒扫庭除”的《朱氏家训》，全都早早起来了，尽管昨天晚上大人们实际只合了合眼，脚下被窝还没有暖热。白嘉轩正在炕上穿衣服，就听见庭院里竹条扫帚扫地的声响有别于以往，就断定是新媳妇的响动。他拄着拐杖出西屋时，新媳妇撂下扫帚顶着帕子进来给他倒尿盆。白嘉轩蹲在孝义媳妇侍候来的铜盆跟前洗脸，看见三娃子孝义刚刚走出厦屋门来，那双执拗的眼睛瞅人时有了一缕羞涩和柔和，断定他昨夜已经经过了人生的那种秘密，心里便默然想道，老子给你娶下一房无可弹嫌的好媳妇。白嘉轩一边用手巾擦着脖颈，一边叮嘱孝义说：“早点拾掇齐整起身上路，回门去学得活泛一点，甭总是绷着脸窝着眼……”

孝义还陷沉在神秘的惊诧的余波之中。吃罢合欢馄饨，他已经累得精疲力竭，三两下丢剥了衣裤钻进被窝，不及摇罢一箩面的工夫便迷糊起来。他对男女之间的事几乎一无所知。白嘉轩的儿子个个都是这样纯洁，娶媳妇的新婚之夜也不懂其实际内涵，便照例倒头睡下去，只是全新的被褥和枕头反倒有一种舒适的陌生。蒙眬中他的右臂被一个细腻的肌肤抚摸了一下，竟然石磨压指似的从迷蒙中激灵了过来，便闻到一股异样的气息，似乎像母乳一样的气味，撩拨得他连连打了两个喷嚏，引发出强烈的身体震动，撞碰了身旁那个温热的肉体。那一刻他才开了迷津，喷嚏刚过就转过头搂住了媳妇，顿然觉得自己此刻以前纯粹是个只会拉车套车的傻瓜。她不仅不反感，反而依就他，这又使他大为惊奇，及至他脑子里轰然一声浑身紧抽起来，下身喷射过后，才安静下来，被窝里有一股类似公羊身上散发的腥臊味儿。这样的喷射又反复了一次。及至他第三次疯狂潮起的时候，她才把他导引到一个理想的福地。那一刻他又悟叹出来：仅仅在这一次之前自己其实还是一个傻瓜……他完成了第三次探索之后，她就披衣起身了。她穿戴整齐溜下炕沿的时候，他又潮起那种欲望，便抻住她的

胳膊示意她脱掉衣服重新躺进被窝。她噘噘嘴笑笑，猛然弯下身在他脸上亲了一口，转身拉开门闩出去了……

孝义在铜盆跟前蹲下来时已经平静下来，在父亲刚刚丢下布巾的铜盆里洗脸，对父亲说：“我先跟兔娃拉几车土，他一个人顾不过来。回门跟得上。”兔娃一个人驾着牛车已经走出了圈场。孝义跳上牛车坐下来，脑子里忽然冒出昨夜那种进入福地的颤抖。他瞅着兔娃想，兔娃肯定还跟昨晚以前的自己一样是个瓜蛋。进入土壕装土的时候，兔娃冷不丁问：“你昨黑夜跟媳妇睡一个被窝吗？”孝义一愣，这个腼腆的小兔娃大概在琢磨这个神秘的问题。兔娃连着又问：“你跟女子娃钻一个被窝害羞不害羞？”孝义骤然红了脸，俨然用大人对小孩的训诫口气说：“兔娃，娃娃家不该问的话不许问。没得一点礼行！”兔娃愣了一下就不再开口，执锨往牛车车厢里抛起土来，仅仅一夜之间，亲密无间的孝义怎么变成另外一个人了？兔娃心中掠过一缕寂凉，淡淡地说：“你去回门去吧！小心把新衣裳弄脏了。我一个人能行。”孝义瞅了瞅兔娃没有说话，看来他们幼年的友谊无可挽回地终结了……

第二十七章

白孝文终于从大姑父朱先生口里得到了父亲的允诺，准备认下他这个儿子，宽容他回原上。

白孝文开始进入人生的佳境，正春风得意。保安大队升格为保安团，原先所属的两个支队递升为一营和二营，团丁正在扩编中。孝文被直接擢升为一营营长，负责县城城墙圈内的安全防务，成为滋水县府的御林军指挥。他告别了那个书手的桌案，开始活跃在县城里的各个角落，操练团丁，检查防务，处理各种事务；他的威严的脸眼被县城的市民所注目，他的名字很快在本县大街小巷市井宅第被传说；被人注目和被人传说本身就是一种荣耀，显示出这个有一双严厉眼睛的人开始影响滋水的社会政治和生活秩序……

白孝文很精心地设计和准备回原上的历史性行程，全部目的只集中到一点，以一个营长的辉煌彻底扫荡白鹿村村巷土壕和破窑里残存着的有关他的不光彩记忆。正当他一切准备就绪即将成行的最后日子，县里发生了一件震动朝野的大事，土匪头子黑娃被保安团擒获，这是他上任营长后的第一场大捷，擒获者白孝文和被活捉者黑娃的名字在整个滋水县城乡一起沸沸扬扬地被传播着……回原上的时日当然推迟了。

营救黑娃和严惩黑娃的各种活动都循着各自的渠道隐蔽而紧张地进行，只有白嘉轩的行为属于公开。白嘉轩正在准备接待大儿子孝文的回归，突然收到孝文派人送来的一封家书，略述捕获匪首、公务紧迫、只好推迟回原的日期。白嘉轩送走送信的团丁，转回身来就把褡

裢挂到肩上准备出门。孝武走进门来问：“你背褡裢到哪达去？”白嘉轩说：“县上。”说着就把那封信交给孝武。孝武看完后舒一口气：“这下可除了个大害！”转过脸猜测着问：“你去县上做啥？”白嘉轩说：“探监。看看黑娃，给送点吃食。再问问你哥，把黑娃放了行不行？”白孝武惊讶得转不过弯儿，愣愣呆呆地问：“你说你去探监？给黑娃还送吃的？你想托人情释放那个土匪？”白嘉轩平稳地说：“就是的。”白孝武憋红了脸：“你的腰杆给他打断了你忘了？你忘了我还没忘！”白嘉轩说：“我没忘。”白孝武说：“那你还看他救他？”白嘉轩说：“孔明七擒七纵孟获那是啥肚量？我要是能救下黑娃，黑娃这回就能学好。瞎人就是在这个当口学好的。”白孝武说：“你救黑娃让原上人拿尻子笑你。”白嘉轩坚定不移地说：“谁笑我是谁水浅。”

白嘉轩赶天黑先来到白鹿书院。朱先生以少有的激情赞扬他搭救黑娃的行动：“以德报怨哦嘉轩兄弟！你救下救不下黑娃且不论，单是你有这心肠这肚量这德行，你跟白鹿原一样宽广深厚永存不死。”说到具体事，白嘉轩让姐夫朱先生设法把孝文叫到这里来，因为孝文还没有经过正经恢复父子关系的程序，所以得先搁在书院见面，如若自个找到保安团就有投拜儿子的倒茬子影响。

朱先生着一位同仁到县城给孝文送信。孝文于天黑后才匆匆赶来，一见父亲就跪下了。白孝文听到父亲要救黑娃的话咯咯咯笑起来：“爸你尽是出奇之举。你一提说黑娃，我还当是催我快快处置了那个祸害哩！没想到你……”白嘉轩又说着如同对孝武讲过的道理：“瞎人只有落到这一步才能学好。学好了就是个好人。”朱先生插话发挥着白嘉轩的思路：“杀了可就少一个人了。”白孝文不作正面拒绝，软软地说：“上边已经批示就地枪决。土匪不是共匪，不需再三审问杀了算了。你们说啥也不顶用，我根本没有杀他放他的权力。”白嘉轩急切地

说："那让我先到监里看一回总可以吗？"白孝文笑笑说："看不成。谁也不准看。十二道岗道道都是俩人把守，蝇子也飞不进去——防他的土匪弟兄劫监。"白嘉轩一下子凉下来默然无措。白孝文说："爸，你心好我知道，可这事比不得族里的事咯！你回去吧！枪决黑娃以前，我给他说知道明，你想探监还想救他。让他小子死到阴司再琢磨他对住对不住你。"

白孝文回到县城已夜深人静，让随身的团丁回团部，自己便径直回到城关东街。妻子给他拉开门闩，白孝文进门后，反过身来重新推上门闩，这当儿突然被人搂卡住脖子塞住了嘴巴。他听见了妻子在身后有同样遭遇的动静，他的眼睛先被蒙住，接着捆死了双臂，随后就被推拽到自己的寝室里。黑暗里有人说话了："我来跟你谈一笔生意。你先给你手里囤的货开个价吧！你尽量往大往高开我都能接受。"孝文明白了这是黑娃的弟兄来了，眼被蒙着，嘴被堵塞着无法交涉，依然支棱着脑袋。那人继续说："你愿意把那囤货发给我，价开再大再高都好说；你要是不愿意把囤货发给我，我给你把话说明白：当下先给你炕上的这个太太开了膛，日后你娶一个我杀一个，你娶十个我杀十个，你这辈子只能逛窑子，可甭想太太陪房；你先房女人留下两个娃，炕上这位太太肚里正怀着一个，这三个出世的和没出世的后人注定都得嫩撅，你这辈子甭想留后；原上你老窝里有七八口人，我想弄死谁谁也逃不脱；我把他们一个一个慢慢地处置掉，最后才拾掇你的老子；你的老子先前给打断了腰杆子，这回我再把他的腰杆子抻直拉平，你们白家就从原上雪消化水了；只留下你单崩儿一个受熬煎！"白孝文被陌生人描述的血腥图景吓得浑身抖颤，猛烈挣扎着还是无法表态。那人沉静地公开了自个的身份："我是大拇指郑芒。"白孝文听到这个名字更紧张了，急迫中终于想到一个唯一可能的表态方式，扑通一声跪倒到脚地上。郑芒说："给他把嘴腾了。"

随后就变成大拇指芒儿和保安团白营长共同设计营救黑娃的密谋。方案有二，由孝文在检查岗哨查巡防务时捎给黑娃一根钢钎，让他自己挖抠砖缝的石灰自行逃脱；再一个办法需大动干戈，组织一次游街示众，由郑芒领土匪相机劫持黑娃。俩人都认为第二个办法属于下策，只能作为迫不得已采取的行动。芒儿说："见不着我的二拇指都不算数，太太得跟我到山上逛几天风景，我会照顾好她的。"

第二天傍晚，白孝文就把一根细钢钎塞给了黑娃。黑娃接住钢钎时，那双死绝的眼睛烁出一道利光。白孝文当晚刚回到东街住屋，后半夜时又有人敲窗棂。他开了门，黑暗里瞅不准面孔。那人说："我给你捎来一封信。"白孝文心里紧缩起来，进屋到灯下拆开信封，原以为是土匪头子郑芒捎来的，不料却是鹿兆鹏的亲笔信，同样是求告他设法留下黑娃性命。白孝文看罢信扬起头来。送信人往灯前挪了两步，嗤的一声笑着问："你还认识我不？"白孝文惊恐地叫起来："韩裁缝？"韩裁缝说："请你给个回话。"白孝文紧张地说："你给鹿兆鹏说，让他甭胡搅和，他越搅和黑娃死得越快。韩裁缝你也是共党分子？今日要不是在我屋，我就把你扣起来。"韩裁缝沉稳地笑笑："咱俩一对一你不是我的对手，拾掇你不用枪只用一把剪子就够了。"白孝文也强撑面皮："有礼不打上门客，你走吧！下次再这样我就不客气。"韩裁缝说："鹿兆鹏也很重义气。黑娃不过跟他闹过几天农协，后来不随他了，可他还是想救他一命。你给个回话我就走。"白孝文冷静下来重复一遍刚才的话："你共党甭胡乱搅和。你越搅和黑娃死得越快。还要啥回话呢？你走吧！"

黑娃越狱逃跑的消息比缉获黑娃在县城引起的轰动还要大。那个由黑娃掏开的墙洞往幽暗的囚室里透进一个椭圆形的光圈，被各级军政长官反复察看反复琢磨，却没有一个人怀疑到白孝文身上，因为黑

娃是白孝文率领一营团丁抓获的。白孝文按照早已筹算好的办法，严厉地拷打站岗的送饭的团丁，因为只有他们才可以接近死囚室里的黑娃。道理很简单，拷问越严厉，他自己就越安全，终于打得一个送饭的团丁忍受不住而招了假供。白孝文请示了保安团张团长，就着人把奄奄一息的屈死鬼团丁拉出去埋了，这件事才渐次从记忆中消失了。

又一天夜深人静时分，白孝文猛然听到窗根下太太的隐声呼叫，他急忙开门后，又差点儿被什么东西绊了个筋斗。他把太太扶进门来，到灯下一瞅，太太完好如初，才甚为欣慰，却仍然忍不住说："你受苦了。"太太淡淡地说："他们还算义气。"送太太回归的土匪先翻墙后开街门已经走掉。白孝文去查看了一下街门木闩，回到房门口就瞅见绊过脚的一只袋子；拎起来一看，竟是一只完好的山兽皮筒子，到灯下解开扎口，里面装着满满一筒子硬洋。太太说："黑娃回去以后，他们对我恭敬得很，黑娃给我磕了三个响头。"白孝文说："黑娃要是回不去，你就回不来了。"太太说："黑娃让我捎给你一句话，说他跟你的冤仇一笔勾销。"白孝文心里一震，瞬即深深地舒一口气，捕获黑娃的昂扬和释放黑娃的紧张全部消失，更要紧的是冰释了一桩无以化解的冤结。他与小娥的那种关系，黑娃早放出口风要杀他以祭小娥。至此，白孝文弄不清在这个事件中获得多少好处了。他从柜子里拉出一瓶酒说："喝一盅为你接风压惊。"俩人干抿下一盅酒，白孝文以彻底卸除负累后的轻松舒悦的口气说："我们得准备回原上的事了。"

为了做得万无一失，白孝文于次日演出了一场辞官戏。他换了一件长袍礼帽的便装，把附有营长军阶标志的军服整整齐齐折叠起来，径直走进张团长的屋子，双手托着军服，把腰里那把短枪摘下来搁在军服上头，一齐呈放到桌子上，向张团长深深鞠了一个大躬。张团长瞅着他虔诚的举动，莫名其妙地问："你这是干啥？"白孝文说："枉费了你的栽培。严重失职——我引咎辞职。只能这样。"张团长晃一下脑袋，很不满意地说："你怎能这样？是小娃娃脾气，还是书生意气？"白孝文更加真诚："无颜面对本县百姓。"张团长说："没有人责怪你嘛！岳书记侯县长都没有说你失职嘛！"白孝文难受地摇摇头说："我自己无地自容。"张团长笑了："我刚把你提起来，等着你出力哩，你可要走？好吧，按你这说法，我也得引咎辞职。"白孝文没有料及这行动会引起张团长的敏感，于是委婉地说："说真话，我是想承担责任，旁人就不再对你说长道短……"张团长受了感动，就站立起来，把手枪拿起来，在手心抛颠了两下交给孝文，说："快把袍子脱了，把团服换上，咱俩出去散散心。这𡲰事把人搅得鸡飞狗跳墙。"白孝文涌出眼泪来了。

阴历四月中旬是原上原下一年里顶好的时月。温润的气象使人浑身都有酥软的感觉。扬花孕穗的麦子散发的气息酷似乳香味道。罂粟七彩烂漫的花朵却使人联想到菜花蛇的美丽……

白孝文携妻回原上终于成行，俩人各乘一匹马由两个团丁牵着。白孝文穿长袍戴礼帽，一派儒雅的仁者风范。太太一身质地不俗颜色素暗的衣裤，愈显得温柔敦厚高雅。在离村庄还有半里远的地方，孝文和太太先后下得马来，然后徒步走进村庄，走过村巷，走到自家门楼下，心里自然涌出"我回来了"的感叹。弟弟孝武恰好迎到门口，抱拳相揖道："哥你回来了！"白孝文才得着机会把心里那句感叹倾泻出

来："我回来了！"及至进入上房明厅，父亲没有拄拐杖，弯着腰扬着头等待他的到来，白孝文叫了一声"爸"就跪伏到父亲膝下，太太随即跪下叩头。白嘉轩扶起孝文，就坐到椅子上。白孝文又领着太太给婆白赵氏叩拜，然后便引着太太和两个弟弟、两个弟媳相见相认。白赵氏把两个重孙推到孝文跟前："这是你爸。"孩子羞怯地往后缩。白孝文伸手去抚摸孩子的头时，俩娃跑到白赵氏身后藏起来了。白嘉轩对孝武说："把饭菜端上来，咱们今日吃个团圆饭。"刚说完，又记起一件事来："孝文，你领上你屋里人，去拜一下你三伯。"

拜谒祖宗的仪式安排在午饭过后。因为长幼有序，白孝武不能主持这个仪式，只是做着具体事务，而由白嘉轩亲临祠堂主持。白鹿两姓的成年男女，一听到锣声，便早早拥进祠堂，看那个回头的浪子重归的风采，不便出口的兴趣更在他的新娘子身上。白孝文领着太太在孝武的导引陪同下走进祠堂大门，便瞅见那棵又加粗了的槐树，脑子里顿然浮现出由他主持惩罚小娥和由弟弟主持惩罚自个的情景。他心里一阵虚颤，又一股憎恶，然后移开眼睛，径直走过院子，跨上台阶，走近敬奉着白鹿宗族始祖及列代祖宗的祭桌前站定，那幅从屋梁上吊垂下来的宗谱，密密麻麻填写着逝者的名字，下面空着的红线方格等待着后来的人续填上去。白孝武点燃了两支注满清油的红色木筒子蜡烛便退到一旁。白嘉轩佝偻着腰站在祭桌前，面对众人发出洪大如钟鸣的声音："祖宗宽仁厚德。不孝男白孝文回乡祭祖，乞祖宗宽容。上香——"白孝文从香筒里抽出五根紫香在蜡烛上点燃，双手插进香炉，退后一步和太太站成齐排儿，一道长揖后跪拜下去，太太也作揖叩首三匝。白嘉轩又诵响了下一项仪式："拜乡党——"白孝文和妻子转过身面对祠堂里外拥塞得黑压压的男女乡亲，抱拳作揖，乡党们也作揖相还。

祭祖之后的又一项重要活动是上坟，仍然由孝武陪引。孝义提着装满阴纸和阴币的竹条笼也陪着大哥去祖坟祭奠。兄弟三人站在离他们最近的母亲坟前，白孝文叫了一声“妈”，就跌伏到坟头上，到这时他才动了真情。他酣畅淋漓地哭了一场，带着鼻洼里干涸的泪痕回到家里，才感觉到自己与这个家庭之间坚硬的隔壁开始拆除。母亲织布的机子和父亲坐着的老椅子，奶奶拧麻绳的拨架和那一摞摞粗瓷黄碗，老屋木梁上吊着的蜘蛛残网以及这老宅古屋所散发的气息，都使他潜藏心底的那种悠远的记忆重新复活。尤其是中午那顿臊子面的味道，那是任何高师名厨都做不出来的，只有架着麦秸棉秆柴火的大铁锅才能煮烹出这种味道。白孝文清醒地发现，这些复活的情愫仅仅只能引发怀旧的兴致，却根本不想重新再去领受，恰如一只红冠如血尾翎如帜的公鸡发现了曾经哺育自己的那只蛋壳，却再也无法重新蜷卧其中体验那蛋壳里头的全部美妙了，它还是更喜欢跳上墙头跃上柴火垛顶引颈鸣唱。白孝文让太太把带回来的礼物分送给大家，包括一大袋子各式名点。给父亲的是地道兰州水烟，给婆的是一件宁夏皮袄筒子，给两个弟弟和弟媳的是衣服料子，给鹿三的是一把四川什邡卷烟。自己却只身到白鹿仓去拜会田福贤。田福贤于他刚进家不久，便差人送来了请帖。白孝文到白鹿仓纯粹是礼节性拜访，走了走过程就告辞了。田福贤已着人在镇上饭馆订做了饭菜，白孝文还是谢绝了，他必须天黑回到县保安团。他怕田福贤心犯疑病，很爽快地说：“田总，你随便啥时候到县城，你招呼一声我就接你，我请你。”白孝文还想拜谒鹿子霖，是他把他介绍到保安团的。鹿子霖不在家，他托弟弟孝武把一把什邡卷烟捎给他。

最后要处理的一件事是房子。孝文对父亲说：“忙罢我想把门房盖起来。”白嘉轩说：“孝武把木料早备齐了。你想盖房，另置一院庄基吧。兄弟三个挤一个门楼终究不成咯！”白孝文豁达地说：“这个门房

还是由我经手盖。”门房是经他卖掉被鹿子霖拆除的，再由他盖起来就意味着他要洗雪耻辱张扬荣耀。他解释说：“这房盖起来由你安顿住人吧。我不要了。我要是想在原上立脚，我另择基盖房。”白嘉轩说：“你的用意我明白。干脆也不分谁和谁，你跟你兄弟仨人搭手把门房盖起来，这院子就浑全了。”白孝文说：“也行。”

谢辞了上至婆下至弟媳们的真诚的挽留，白孝文和太太于日头搭原时分启程回县城，他坚辞拒绝拄着拐杖的父亲送行，白嘉轩便在门楼前的街巷里止步。白孝文依然坚持步行走出村庄很远了，才和送行的弟弟们分手上马。他默默地走了一阵又回过头去，眺见村庄东头崖坡上竖着一柱高塔，耳边便有蛾子扇动翅膀的声音，那个窑洞里的记忆跟拆房卖地的记忆一样已经沉寂，也有点公鸡面对蛋壳一样的感觉。他点燃一支白色烟卷猛吸了一口，冷不丁对太太说：“谁走不出这原谁一辈子都没出息。”太太温存地一笑：“可你还是想回来。”白孝文说：“回来是另外一码事。”白孝文不再说话，催马加快了行速。太太无法体味他的心情，她没有尝过讨来的剩饭剩菜的味道，不知道发馊霉坏的饭菜是什么味道，更不知道白孝文当时活的是什么味道。在土壕里被野狗当作死尸几乎吃掉的那一刻，他几乎完全料定自己已经走到人生尽头，再也鼓不起一丝力气，燃不起一缕热情跨出那个土壕，土壕成为他生命里程的最后一个驿站。啊！鹿三一句嘲讽调侃的话——“你去吃舍饭吧”，把他推向那口沸腾着生命液汁的大铁锅前。走过了土壕到舍饭场那一段死亡之旅，随之而来的不是一碗辉煌的稀粥，而是生命的一个辉煌的开端……好好活着！活着就要记住，人生最痛苦最绝望的那一刻是最难熬的一刻，但不是生命结束的最后一刻；熬过去挣过去就会开始一个重要的转折，开始一个新的辉煌历程；心软一下熬不过去就死了，死了一切就都完了。白孝文现在以这种深刻的人生体验呼唤未来的生活，有一种对生活的无限热情和渴

望。他又一次对他的太太说：“好好活着。活着就有希望。”妻子抿嘴笑笑：“你回到老家心情很好。”白孝文依然觉得太太不能理解他的心情。

白嘉轩从族人的热烈反响里得到的不仅是一种荣耀，更是一种心理补偿。他听到人们议论说“龙种终究是龙种”，就感到过去被孝文掏空的心又被他自己给予补偿充实了，人们对族长白家的德仪门风再无非议的因由了。他依然拄着拐杖佝偻着腰走进家门走出街巷，走进畜棚走向田野，察看棉田备耕观望麦子成穗的成色，听孝义兔娃呵斥牲畜的嘎气的嫩嗓子的吼喊，或者和愈见笨拙愈显痴呆的鹿三对着烟锅吸一袋旱烟，在村巷田头和族人们聊几句庄稼的成色讨论播种或收割的时日，并不显示营长老子的傲慢或声势。决定棉花下种的那天后晌，他丢了拐杖挎起盛着经过拌灰的棉籽的竹条笼，跟在兔娃屁股后头往犁沟里抛点棉籽儿。他不是怕孝武孝义撒籽不匀，而是想在湿漉漉的田地里走一走。他不是做示范，而是一直坚持干到把那块棉田种完，才跟着儿子们一起于傍晚时分收工回家。他端起儿媳侍候上来的小米黄粥喝得起了响声，声音像扯断一幅长布。白嘉轩心情很舒活地对儿子们说：“人是个贱虫。人一天到晚坐着浑身不自在，吃饭不香，睡觉不实，总觉得慌惶兮兮。人一干活，吃饭香了，睡觉也踏实了，觉得皇帝都不怯了。”儿子们不甚理解地笑着。那一晚白嘉轩睡得很踏实，直到孝武在院子里失魂丧魄吼叫他才醒来，醒来就看见了窗户上乱闪乱射的电光。白嘉轩听到院子里惊慌压抑的哭声，那是儿媳和孙子们被吓的哭声。他断定又有土匪进屋，反倒缓缓穿戴齐备才去开门。外面的人等待不及，撞开门板将他撞翻在地，他们就在屋子里搜查起来，有人抓着他的衣领把他拎起来喝问：“人呢？”

“你寻谁？”白嘉轩问。

“还装还蒙啥哩！”

“我真不知道你们搜谁。”

“你的共匪女子白灵藏哪儿？”

“……”

全家人都被驱赶撕抻出来集中到庭院里，由一个人拿着手枪威逼着统统蹲到地上，另外大约五六个人把每一间屋子的每一件可以藏身的板柜瓷瓮面缸都统统抖翻了，柴火房也给掀倒了，各种农器家具碰撞跌碎翻倒的声音连续不断，那些人最后全都空手来到庭院里继续喝问：“快把人交出来！”白孝武壮起胆子说：“她多年都不认这个家咧！”搜查的人仍然不肯轻易放过：“我们已经得着消息，她逃回乡下老家了。”白嘉轩说：“你的消息不准。她死也不会回家。她早都不认我这个老子，我也不认她是我女了。”那一杆子人说了一通威胁恐吓的话就窜出门去。白嘉轩吩咐家人尽快收拾好被捣乱了的家具，可是儿子和儿媳们全都围聚到老祖宗白赵氏的屋子里。白赵氏放声长哭，完全丧失了理智，大声哭叫着“灵灵娃呲婆想你呀……”惹得眼软的两个孙子媳妇也都抽泣垂泪。白嘉轩对母亲丧失理智的哭叫缺乏耐心，有点生硬地说：“你还想那个海兽做啥？”白赵氏益发气急了：“都是你……把我灵灵娃……逼到这地步……”说着竟从炕上溜下来往门外走：“你不要女，我还要孙女。我到城里寻去呀！”白赵氏不是威逼白嘉轩，而是她真实的心思。她老大年纪小小尖脚凭着一门焦虑的心劲往外扑，孝武孝义和两个孙子媳妇竟然撕拉不动。白嘉轩换了妥协的口吻乞求母亲：“黑天咕咚你怎样出门？让孝武明日一早到城里去寻。”在众人劝慰下，白赵氏才重新被扶到炕上。

骤然而起的家庭内部的混乱局面暂且平息，待到天明日出时却又进一步加剧了。原上的几家亲戚先后接踵进门，报告着同样的恐怖遭际，几乎在同一时间夜半时分，都被穿黑制服的人封堵在家里翻箱倒柜进行搜查，说话的口吻和用词都是惊人的一致："把共匪白灵快交出来！"白嘉轩无法向亲戚们解释共同劫难的因由，只是加重了他对这件事的严重性的看法。最后到来的是朱先生，他的书院在昨晚也遭到搜查，天明后朱白氏就催他上原来问问究竟。朱先生拐个弯先走了一趟县城，向孝文述说了昨晚的事，白孝文说："据你说的那些人的情形判断，肯定是军统。"朱先生看见嘉轩又看见那么多惊慌失措的亲戚，料就遭遇大致相同，就说："孝文说那帮子人是军桶。"白嘉轩睁大惊疑不解的眼睛问："军桶是弄啥的？"朱先生平生第一次错上加错念了白字："军桶我也弄不清是做啥用的桶。"直到夜深人静，白孝武从城里赶回家来，才大略说清了灾变的原委：中央教育部陶部长到省里来给学生训话，遭到学生的谩骂和追打，甩出头一块砖头的就是妹子灵灵。白嘉轩全神贯注地听着，不禁失声"噢"了一下又绷紧了脸色。白赵氏惊恐地瞪着眼露出可怜巴巴的愣呆神色。白孝武叙说，二姑家的皮货铺店被砸了，二姑父被拉去拷打了三天三夜，说不清白灵的去向，却交代了咱家的亲戚。白嘉轩又"噢"了一声，问："还听到啥情况？"白孝武说："二姑父也就只说了这些情况。这回遭害最重的是二姑家。二姑父躺在床上养伤，皮货铺子给封了，说是犯了窝藏共匪罪……"白嘉轩说："真对不住你二姑父哇！"

白灵和鹿兆鹏在枣刺巷度过了一段黄金岁月。鹿兆鹏遵照省委的指示暂且留在城里做学运工作。日本侵占东北三省，中国国内局势发生重大变化，新的震荡已经显示出诸多先兆。鹿兆鹏说："太阳旗像一面镜子插到中国东北，把中国政坛上大小政客的嘴脸都暴露无遗。"白灵热烈地赞同说："日本侵略者的铁骑惊醒了中国人，分出了自己民族

的忠奸善恶。昨天，连以委员长名字命名的中正中学里，也贴出了一张要求政府收复东三省的呼吁书。”白灵已经成为省立师范学校的学生自治会主席，正在筹备建立一个大中学校抗日救国统一指挥机构，把各个学校自发分散的救亡活动统一步调一致行动。鹿兆鹏对白灵的活动能力组织才能刮目相看，在做学校工作方面白灵比他还要熟练。鹿兆鹏在白灵的帮助下，秘密会见各学校的学生领袖，把共产党的意见传输给他们，一个强烈的地震正在中国西北历史古城的地下酝酿着。这种秘密状态的生活环境使他们提心吊胆又壮怀激烈，他们沉浸于人生最美好的陶醉之中，也不敢忘记最神圣的使命和潜伏在窗外的危险。他和她已经完全融合，他隐藏在心底的那一缕歉意的畏缩已经灼干散尽，和她自然地交融在一起。他们对对方的渴望和挚爱几乎是对等的，但各人感情迸发的基础却有差异，她对他由一种钦敬到一种倾慕，再到灵魂倾倒的爱是一步一步演化到目前的谐和状态。他的果敢机敏、热情豪放的气韵洋溢在一举手、一投足、一言一笑、一怒一忧之中，他的长睫毛下的一双灵秀的眼睛，时时都喷射出一股勾魂摄魄的动人光芒。她贴着他，搂着那宽健的胸脯静宁到一动不动，用耳朵谛听生命的旋律在那胸脯里奏响。他对她的爱跨过了种种道德和心理的障碍，随后就显得热烈而更趋成熟，从而使自己心头一直亏缺着的月亮达到了满弓。她贴着他的耳根说：“兆鹏，你可能要当爸了。”鹿兆鹏猛然搂紧她，抚摸着她的腹部：“你肯定生一个最漂亮的孩子！我自信咱俩还不算丑。”日渐潮起的抗日热流，使他们共同陷入亢奋之中，反倒抑制了俩人之间的夫妻情分，俩人常常在热烈地策划一个行动之后一齐就寝，反倒觉得那种交媾变得不如以往甜蜜。

民国政府教育部陶部长亲临古城，是受到蒋委员长的指令急匆匆启程的。蒋委员长正在集中精力围剿中国南方山区的共产党红军，忽然得到中国西北有学生闹事的情报，便电示教育部：“怎么搞的？还不

快去管一下！”陶部长到来之后三天都未公开露脸，到第四天报纸上公开了省教育局局长被撤职的新闻，种种传闻随着这条消息在各个校园里传播，陶部长对这里学生的无政府行动大为光火，对容忍这种局势发展的教育局长训斥说：“麻木不仁贻误大事。”陶部长指令新任局长与军统取得联系，在教育系统建立剿共情报机构，建立健全三青团、国民党在学校的组织网络……云云。这些传闻对学校里形成的抗日热潮正好起到一个催发的酵母作用，一股强烈的反陶情绪一夜之间便形成气候。陶部长频频接触本省党政军特各方要人，促成各方合作共同消除学校里的无政府状态。到第六天，陶部长准备对西安各个学校的学生代表进行训导，以此结束他的西部之行……白灵得知这个消息以后，便和刚刚建立的西安学界抗日促进联盟的学生领袖做出决定：给陶部长一个下马威。陶部长训话的会场几经变更，给白灵他们的组织工作造成不少的麻烦，直到开会的那天早晨，才搞准确会址又挪到民乐园礼堂，她又立即对原先的布置做出相应修改……绝不能错失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民乐园顾名思义，属民众娱乐场所。这是国民革命废除皇权提倡平民意识的结果。民乐园是个快乐世界，一条条鸡肠子似的狭窄巷道七交八岔，交交岔岔里都是小铺店、小吃铺、小茶馆、小把戏、小婊子院的小门面，在这儿能看杂耍的、说书的、卖唱的、要猴的表演，也能品尝到甜的辣的酸的、荤的素的、热的冷的各种风味饭食，荟萃着饸饹粉皮、粉鱼凉粉、腊汁肉、茶鸡蛋、三原蓼花糖、乾州锅盔、富平倾锅糖等各种名特小吃。有卖人参鹿茸虎骨等名稀药材的，也有挖鸡眼、剔猴痣、割痔疮、拔倒睫毛、挖鼻息肉的各路野大夫；有西洋的转盘赌和传统的打麻将、摇宝掷骰子、摸牌九、搓花牌的各种赌博，供不同兴趣不同层次的赌徒选择。最红火的行业是妓院，有雕梁画栋两层阁楼的高级妓院，也有不饰门面的中下等卖淫场所以及一个

锅盔可以睡一回的末等婊子棚，供各色嫖客发泄，一个个挂着金缕门帘、竹皮门帘和稻草帘子的客房里，从早到晚都演出着风流。那些摸骨看相算卦的、卖水果的露水摊号，更是把本来狭窄的小巷壅塞得水泄不通……陶部长选择这样一个腌臜龌龊、藏污纳垢之地是出于安全的考虑，企图以出其不意而躲开赤党学生可能的捣乱。陶部长的汽车进入民乐园，果然没有引起任何反响，人们对坐车逛窑子的事已经司空见惯了。

白灵穿过小巷走到礼堂门口，只看见三四个卫兵守侍在那里，有两个验查入场券的便装工作人员，气氛显得轻松并不紧张。她丝毫不为这种表面的轻松气氛而松懈，情报说陶部长坚持不要造成大兵林立的局面，那样会损伤文职官员的尊仪，也显得自己更加豁达从容，但对地方官员改派便衣警戒的举措没有干预，小巷里那些游荡的闲人和坐在礼堂里的学生代表中，肯定混杂着数以百计的特务和警察。她把一张蓝色道林纸印制的听讲券交给门卫，就选择了会场中间靠右的一个位置，掏出一张报纸来等候开会。陶部长在众多的官员陪伴下走上讲台。陶部长既有一表人才，又擅长演讲，一言一行和言语中的神态都显示着南京政府官员居高临下的气魄，也显示出与地方官员的截然区别。他从国际形势到国内局势，侃侃而论蒋委员长“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方针；又从理论和道德以及治学的几重关系，阐释蒋委员长“学生应该潜心读书，抗日的事由政府管”的宗旨；陶部长不惜假传圣旨，把蒋委员长自江西“剿共”前线发来的训斥他的电示改编成对学生的柔肠寸心，“委员长让我转告他对西北学生的问候，并对学生的爱国之心表示钦敬！再次申明学生要安心读书，日后报效党国，抗日的事政府能管得好的。”他也许没有料到，经过严格审查的学生听众中，混杂着一批蓄意破坏委员长旨意的赤党分子，他们是专意儿给陶部长下巴底下支砖头、给眼睛里揉沙子、往耳朵里灌水、朝脸上泼尿来的；来就

是为了燎他的毛，搔他的皮，伤他的脸，杀他的威风的，可谓来者不善。

骚乱起初是从一张字条引发的。一绺扭成麻花的字条儿从台下传到台上，主持会议的省教育局新任局长看了条子上的字，就像看见一条长虫似的变了脸，扬起头时，却装出一副生硬紧巴的笑脸说："今天是陶部长的训导报告，不安排回答问题。回答问题将另行安排专门的会议。"台子底下没有反应，条子却一绺接一绺抛上讲台。新局长拉下脸来厉声禁斥："我刚说过，回答问询另安排时间嘛！你们会听话不会听话？"台下便激起了由零星到纷乱的回声，顷刻之间就乱成一窝蜂，有不少学生离开座位窜到讲台下的走道里质问陶部长。陶部长巍然不动也不开口，白灵也窜到讲台下的人窝里，高喊一声："打这个小日本的乏走狗！"一扬手就把半截砖头抛上台去，不偏不倚正好击中陶部长的鼻梁。陶部长惨叫一声，连同座椅一起跌翻到台子上。学生们大声呐喊着，把板凳和从脚地上揭起的砖头抛上讲台。有人把摆列在台下花池里的盆花也抛掷上去，有人跳进花池再拥上讲台。陶部长满脸血污，被人拉起来拖挟到后台，仅仅只抢先一步从窗口翻跳出去。大厅里有人撑开一条写着"还我河山"的横幅布标，学生们便自动挽起臂膀在横标的引导下冲出礼堂，踏倒了卦摊儿，撞翻了羊肉泡馍的汤锅，一路汹涌，一路吼喊着冲上大街。白灵的胳膊被左右两边的男女同学紧紧勾挽着，忽然想到自己像镶嵌在砖墙里的一块砖头。游行队伍涌流到端履门时，遭到蜂拥而至的宪兵和警察的封堵拦截和包围。冲突刚一发生，就显示出警察宪兵的强大和学生们的脆弱，游行队伍很快瓦解，学生被捕者不计其数，白灵却侥幸逃走了。

从古城最热闹最龌龊的角落向全城传播着一桩桩诙谐的笑话和演义性传闻，陶部长临跳窗之前，还在训斥搀扶他的省教育局新任局

长：“你说这儿是历朝百代的国都圣地，是民风淳厚的礼仪之邦，怎么竟是砖头瓦砾的干活？”教育局长说：“你赶快跳窗子呀！小心关中冷娃来了……”人们纷传，抡出第一块砖头而且呐喊叫打的竟是一个女生。那女生根本不是学生，而是北边过来的一个红军的神枪手云云……全城的大搜捕并不受任何传闻的影响正加紧进行，特务机关从侦察和审讯被捕学生的口供中，确认了共党插手操纵了学生，又很快确定了追缉的目标，白灵被列为首犯。

白灵穿小巷走背街逃回枣刺巷，鹿兆鹏正焦急地等待着她，屋子里的铺盖被褥和简单的行李已捆扎整齐。鹿兆鹏说：“你完全暴露了。得挪个窝儿。我估计他们顶迟到晚上就会来。”白灵说：“他们杀了我，我也不亏了。”鹿兆鹏冷静地说：“咱俩得暂时分开。我从这儿搬走，给他们制造一个逃走的假象，你仍旧留在这儿就安全了。”白灵问：“我留这儿？我留到啥时候为止？怎么跟你联系？”鹿兆鹏说：“我跟房东魏老太太说好了，你跟她住。我来找你，你等着，千万不要出门。”白灵点点头说：“我等你，你要尽早来。”鹿兆鹏说：“你现在去找魏老太太，剩下的事你不要管了。”说罢搂住白灵，抚着她的肩膀说：“你一砖头砸歪了陶部长的鼻子，也把我们的窝砸塌了。”白灵猛地吻住兆鹏的嘴，眼泪濡进她和他的嘴，有一股苦涩。院子里响起魏老太太的声音：“怎么还不走？”白灵从兆鹏的怀抱里挣脱出来，抹了抹眼睛就跳出门，跟魏老太太走进上房。魏老太太指着桌下的一个方形洞口说：“你下去待着，我不叫你别上来。”

果然当晚夜静更深时分有人到来，白灵在地窖里听到魏老太太和陌生人的对话：

“你屋住的房客呢？”

“搬走了，后晌刚搬走。”

“搬哪达去咧？”

“我不问人家这些闲事。”

“那是两个什么人？”

“说是生意人。”

“那女人呢？是不是姓白？”

“女人是姓白。”

“人呢？”

“刚才说了，两口子一搭搬走咧。”

“那是两个共匪！你窝藏……”

“她脑门子上没刻字，我能认得？”

“你老不死的，不知罪嘴还硬！”

“你嫩秧秧子吃了屎了，嘴恁臭！我掌柜的反正起事那阵儿，你还在你爸裆里打吊吊哩！你敢骂我，我拉你狗日找于胡子去……”

一阵杂沓的脚步声远去不久，魏老太太喊：“你上来吧，没事了。”白灵爬上地窖，才惊讶魏老太太竟是辛亥革命西安反正的领头人物之一的魏绍旭先生的遗孀，所以张口就是于胡子长于胡子短的。魏老太太说：“世事就瞎在这一帮子混账二尿手里了。”

白灵完全放心地住下来。魏老太太让她和她睡在一铺炕上，叙说魏绍旭先生当年东洋留学回国举事反正的壮举……白灵听得津津有味，忍不住突发奇想：“你老好好活着，等到世事太平了，我来把你先生的事迹写一本书。”

三天后的一个晚上，兆鹏来了。鹿兆鹏瞅见白灵完好如初，顿时放下心来，转过脸就对魏老太太深深鞠躬。魏老太太转身进入东边屋子，把时空留给他们去说要说的话。白灵紧紧盯着鹿兆鹏的眼睛，企盼他带来新的安排。鹿兆鹏说：“你得离开这儿，到根据地去。”白灵问：“哪儿？”鹿兆鹏说：“南梁。廖军长已经创建下一个根据地了。”白灵问：“怎么去？”鹿兆鹏说：“你先到渭北张村，地下交通一站一站把你保送到南梁。关键是头一站——走出城门。”白灵说：“怎么出去呢？”鹿兆鹏说：“明天早晨有个西北军军官来接你，你和他扮作夫妻，由他引护你到张村。”白灵说：“我们这就分手了？”鹿兆鹏压抑着波动的情绪，答非所问地说：“送你的军官可靠无疑。你尽管放心跟他走。我明天不能露面了。”白灵颤着声儿问：“你说我们啥时候能再见面？”鹿兆鹏咳了咳哽塞的嗓子，做出昂扬的样子说：“你跟廖军长打进西安，我在城门口迎接你。”白灵战栗着扑进兆鹏怀里说：“孩子快出世了，你给起个名字吧！”鹿兆鹏再也撑持不住奔涌的情感，紧紧抱着白灵哽咽低语：“叫‘天明’吧！不管男女，都取这名字。”

那一夜白灵没有睡觉，躺在炕上听着魏老太太比一般男人还雄壮的鼾声直响到窗户发亮，穿上了兆鹏昨夜捎来的丝绒旗袍和白色长勒线袜，打扮成一个富态华丽的贵妇人模样。她吃了点早点，就潜入地窖静静等候，防止临走之前些微的疏忽而铸成大错。

白灵已经从昨夜与兆鹏生离死别的情感里沉静下来，等待即将开始的冒险逃亡。屋子里有了重重的脚步声，一个浑厚的男人的声音

问："嫂子在哪里？"魏老太太这时才揭开地窖盖板叫她上来。白灵爬到窖口，探出头来，不免大为惊诧，站在窖口的军官竟是鹿兆海。鹿兆海在瞅见她的那一瞬，也凝固了脸上的表情，俩人同时陷入无言的尴尬境地。魏老太太开玩笑说："看看！一瞅见嫂子眼都瓷了。有本事自己也娶个嫂子这样心疼的媳妇。"鹿兆海僵硬地坐到椅子上，取烟和点火的手都颤抖不止。白灵爬出地窖，对魏老太太掩饰说："我换了身新衣服，就把兄弟吓住了。"鹿兆海深深吐出一口烟，没有搭茬儿回话……

昨天晌午，鹿兆鹏大模大样走进西北军驻地，多年来头一回寻找胞弟。鹿兆海对鹿兆鹏前来找他很感动，料定家里发生了重大变故，非得弟兄们协作办理不可，否则哥哥是不会登门寻他的。他有点急切地问："是不是家里出事了？"鹿兆鹏说："是的。不过事情不大，你甭紧张。"鹿兆海愈加情急："不管大事小事，你快说清。"鹿兆鹏这才以轻淡的口气说："你嫂子要回乡下坐月子，得你去护送一下。"鹿兆海顿然放下一颗悬浮的心，眉毛一扬，声调也欢畅起来："你又娶一房新媳妇？你也不给我打个招呼，你真绝情。"鹿兆鹏说："哥的苦处你又不是不知道，给谁也不敢声张。"鹿兆海同情哥哥家里那桩僵死的婚姻，完全能够理解他秘密娶妻的行动，便很爽快地应承下来："护送嫂夫人，兄弟责无旁贷哦！我正好借机瞅认一下新嫂子。你说几时动身？"鹿兆鹏说："明天。"接着交代了到什么地方接人和要送到的地点，末了不无遗憾地说："没有办法。原上老家回不去，只好到她娘家屋坐月子，这是犯忌的事。"鹿兆海能体谅哥哥的难处："我明白。你放心。"鹿兆鹏意味深长地说："我是万不得已……才托你帮忙。"鹿兆海豪爽地说："我很悦意帮这个忙。你相信兄弟，兄弟就赴死不辞了！"鹿兆鹏推托说还要做起身前的准备事宜，就告辞了……

鹿兆海坐在椅子上陷入烟雾之中，怎么也想不到哥哥兆鹏会使出这种绝招儿，当哥的夺走了弟弟的媳妇，居然涎着脸求弟弟护送她去乡下坐月子。他瞅着从地窖里爬出来的白灵嘲笑说：“鹿兆鹏肯定能成大事——脸厚咯！脸厚的人才能成大事。”白灵更加尴尬，这种安排出乎她的意料，更使人无地自容，便赌气地说：“兆海，你回去吧！我自个出城回乡下。”鹿兆海这会儿才猛然意识到某种圈套，白灵的婆家和娘家都在原上白鹿村而不在渭北，兆鹏说到渭北娘家坐月子不过是个托词，肯定有危险性的不愿实说的原因。看看房东魏老太太疑惑的眼光，便装出玩笑说：“我的使命是护嫂夫人‘过江’哇！起身吧！”白灵执拗地说：“你回吧，我不麻烦你了。”鹿兆海急了说：“我为你跑闲腿，你还使性子？”

俩人齐排坐在一辆人力车上。鹿兆海把车厢前的吊帘豁开，让一切人都可以看见他和她，遮遮掩掩反倒容易引起猜疑。白灵戴着一架金丝眼镜，披肩的秀发披散在两肩，旗袍下丰满的胸脯和隆起的腹部，很难使人把她与那个甩砖头的赤党学生联系到一起，更何况身边巍然倚坐着一位全副武装的军官。大街上游荡着的宪兵傲慢而又下流地瞅着车上的这一对男女……古城东西十里长街没有任何麻烦，直到西门口遇到了例行的盘查。鹿兆海恶劣地歪过头斜着眼骂卫兵：“你贼熊皮松了？想叫我给你挣皮是不是？”卫兵咽一口唾液，翻一翻白眼儿往后退去。车夫拉着车子又跑起来，直到出了西关狭窄的街道踏上乡间的官路，鹿兆海摸出一块银洋，拍拍车夫肩膀，车夫转过头接过钱，连连歉谢：“太多了太多了，老总你太瞧得起下苦人了哇！”鹿兆海说：“你只管拉车，可甭听我们的悄悄话。”车夫谄媚地嘿嘿嘿笑着说：“好老总，咱下苦人混饭吃，哪敢长嘴长舌。你们尽管说话，把我甭当个人，当是一头拉车的牛。”鹿兆海转过脸，对白灵说：“从今往后，我没有哥了——鹿兆鹏不配给我当哥！”白灵木然地说：“我也不

配给你当嫂子。”鹿兆海再也压抑不住，肆无忌惮地发泄起来：“我瞧不起他。瞧不起鹿兆鹏。我过去同情他，现在憎恶他！”白灵冷着脸说：“不怪他，你憎恨我吧！是我寻他要跟他过的……”鹿兆海打断她的话：“不对不对！你甭替他开脱，是他早都起了坏心。我从保定回来，咱俩约下第二回见面，你没出面，他倒是代替你来给我传话。我那会虽有点疑惑，总相信他是哥，也是个人……没料到他什么都不是！”白灵也忍不住急躁地分辩说：“你多心了。我跟他……待将来再澄清吧。你不要一门心思把他看得不是人。”鹿兆海发泄一通，又莫可奈何地说：“反正我永生永世再不见他。”

车子越过平原上大大小小的村庄，在一道慢坡前停下来。鹿兆海和白灵下了车开始步行。鹿兆海问：“你真的是到乡下坐月子？”白灵坦白地说：“不是。是逃跑。”鹿兆海问：“出麻烦了？”白灵说：“我打了陶部长一砖头。”鹿兆海猛然跳起来，转过身瞅着白灵：“我的天哪！扔砖头的原来是你哇！”白灵平静地说：“吓你一跳吧！你还敢娶我不？谁娶我谁当心挨砖头。”鹿兆海说：“你我虽然政见达不到共识，可打日本收复河山心想一处。兵营里官兵听说有人打了陶一砖头，都说打得好。凭这一砖头，我今日送你就值得，再啥委屈都不说了。”白灵心里稍觉松弛了，也兴奋起来：“还恨你哥吗？”鹿兆海又灰下脸，咬牙切齿地说：“我一点无法改变——恨！”白灵说：“那就恨吧。反正恨他的人够多了，也不在乎多你一个少你一个。”鹿兆海说：“只有我恨他恨得不可调解。”白灵说：“我明白。”走上慢坡又拐入一个坡坳。白灵注视着远处和近处的几个村庄，按照兆鹏的嘱咐辨别着环境，指着左前方的一个小村庄说：“那个就是张村。”鹿兆海瞧着一二华里处的张村，心头潮起一种路行尽头的悲凉：“坐满月子还要我接你回城不？”

“不咧。”

“你在这儿永久住下去？”

“住不了几天。”

“我还能见到你吗？”

“三五年怕不行。”

“我今日最后给你说一句，我……永生不娶。”

“这又何必，这又何必？别这样说，别这样做。你这是故意折磨你折磨我！”

“不折磨不由人啊……”

“千万别这样！我求你……”

“天下再没有谁会使我动心。我说话算话。你日后鉴证我的品行。”

“那你还不如打我骂我……”

“我想……亲你……”

白灵瞧一眼鹿兆海，闭上了眼睛，感到一种庄严的痛苦正在逼近。他的手轻轻地按住她的脊背，渐渐用力，直到把她裹进他的怀抱，轻轻地在她脸颊上吻了一下，彬彬有礼地松开手臂，说：“我更坚定了终生不娶，这就是证据。还要我送你进村吗？”白灵说：“当然。”

白灵进入张村还没住下来，当天后半夜又被转送到几十里外的雷家庄，第二天精疲力竭地睡了整整一天。夜里又走了八十多里，进入一道黄土断崖下的龙湾村。她住进窑洞后便生下了孩子，再也不能按照原定日期前进了。

这是一个六口之家，老大娘身子强健，主宰家政。家里有儿媳妇和两女一男三个孩子，儿子在邻村的一所小学校里当工友，打铃、扫地、淘公厕、烧开水，被学校里的地下党发展为党员。他对白灵说："经我手送过去二十三个了，你是第二十四个，放心吧，没一点麻达。"白灵在窑洞里的火炕上坐着月子，接受老大娘熬烧的小米粥和烤得酥脆的馍片，看着老大娘熟练地从孩子身上抽下尿湿的褯子又裹上干的，忍不住动情地对老大娘说："我就认你是亲妈。"老大娘笑着压低声儿说："你要下这娃子，怕还是个共产党吧？"白灵惊愣一下笑了……

白嘉轩沉默了大约半月光景，绝口不提及白灵的事，也不许家里人再谈论被搜家的事。这一晚，他对守候在白赵氏炕前的两个儿子说："你俩还没经过多少世事。世事你不经它，你就摸不准它。世事就是俩字：福祸。俩字半边一样，半边不一样，就是说，俩字相互牵连着。就好比罗面的箩柜，咣当摇过去是福，咣当摇过来就是祸。所以说你们得明白，凡遇好事的时光甭张狂，张狂过头了后边就有祸事；凡遇到祸事的时光也甭乱套，忍着受着，哪怕咬着牙也得忍着受着，忍过了受过了好事跟着就来了。你们日后经的世事多了就明白了。"白孝武点头领会："古书上'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就说的这道理。"白嘉轩说："咱没多少文墨，没有古人说得圆润，理儿一样。"

白赵氏的呻唤烦躁而虚弱。自得知孙女白灵的祸事后，身体骤然垮了。她哭泣不止，直到声嘶力竭；整日价不吃一口饭，只是喝水；

喝水不喝开水，专门要喝从井里刚吊上来的新鲜凉水，整碗满瓢咕嘟咕嘟灌进喉咙，还是喊说心口里烧得像着火。这几天已经喊不响也哭不出声了，躺在炕上闭着眼睛喘气。冷先生劝告白嘉轩给母亲中止服药，及早准备后事，并且安慰他说：“你已经尽了心，这就算孝。”白嘉轩仍不甘心，明明白白母亲根本没得什么病，是灵灵的劫难引发出来的。按白赵氏的气性不会是吓成这样子，多半是思念孙女积郁成疾的，于是便编造出一套假话给母亲宽心。他悄悄趴在白赵氏耳根神秘地说：“妈呀，我给你说句悄悄话，我大姐说，灵灵前日到书院看望她，浑浑全全结结实实没一点麻达……”白赵氏猛然睁开眼坐了起来：“真个？”白嘉轩神秘地说：“你想想，我大姐大姐夫一辈子说过一句虚话没？”白赵氏问：“灵灵而今在哪达？”白嘉轩说：“还在城里。那女子又鬼又胆大，谁也抓不住。她说叫屋里人甭记惦她。还说……贵贱不敢冒问乱打听她……”白赵氏突然松弛下来，对嘉轩说：“噢呀……你去把木梳篦子拿来，妈的头发揉成一窝子麻了……”

白嘉轩给冷先生叙说罢一句假话救下母亲一条命的异事，朗声笑起来：“我明日也能坐堂诊病咯……人有时候还得受哄！”

第二十八章

鹿子霖的儿媳疯了。她变疯的原因村人丝毫也不知晓。秋末冬初的一天晌午，平时很少在村巷里露脸儿的她突然从四合院轻手飘脚蹦到村巷里哈哈大笑不止，立即招引来一帮闲人围观。她哈哈大笑着又戛然停止，瞬间转换出一副羞羞怯怯、神神秘秘的眉眼，窃窃私语："俺爸跟我好……我跟俺爸好……你甭跟俺阿婆说噢！"围观的男女大为惊骇，面面相觑，谁听到这样可怕的事，不管心里如何想，脸上都不愿表现出幸灾乐祸神情，一些拘谨的人干脆扭身走开了，有几个女人拉着劝着，禁斥着，不要她胡吣。她却反而瞪大眼睛向人们证明："谁胡吣来？你去问俺爸，看他跟谁好？你们甭下看我！他娃子不上我的炕，他爸可是抢着上哩！"仁义的村人们没有被这个天大的笑话所逗笑，而是惊叹不已。白孝武要去镇上正好走到跟前，听到一句就竖起眉毛，断然斥责几个女人："还不赶紧把她拉回家！还听她胡吣乱呔？"几个女人得了指令，便下势死劲拉扯。那女人两臂一抡，把三四个拉她的女人全都甩开，撒腿端直朝镇子上跑去，一边跑着一边叫着："我到保障所寻俺爸去呀……我想俺爸了呀……"这个女人发疯的事便在村子里哗然传播。

她跑到白鹿镇上，看见了稠密的人伙儿便愈发兴奋，不断咕哝着重复着"俺爸跟我好，我跟俺爸好"的话，引得那些从四面八方赶集来的男人哄笑不止。她从街道上张张扬扬走过去，屁股后头拥着一堆看热闹的陌生人。白孝武抢先一步跨进保障所，鹿子霖正跟几个逛集顺便和他聚会的友好在屋里闲聊。白孝武神色紧张地说了发生的事，儿媳妇已经闯进院子，看热闹的人围在大门口不敢进去。鹿子霖顿然吓黄了脸，一句话没说，跨上前去抽了儿媳一记耳光。儿媳被打得趔趄

趔趔在原地转了一圈，晕头昏脑地问：“爸，你不跟我好了还打我？”鹿子霖气得脸色蜡黄，又甩出一巴掌，那女人就跌倒在院子里。鹿子霖说：“孝武，你快把这祸害拉回家去。”白孝武一把攥住那女人的胳膊，拖着拽着走出保障所院子，又禁斥那些尾追的人说：“疯子嘛，有啥好看的？”鹿子霖紧随其后赶回家来，把儿媳推进厦屋就从外边锁上了门板，喘着气送孝武出门：“孝武，你深明大义。”

鹿子霖被这件难以辩解的瞎事搞得惶惶不安。他的女人鹿贺氏却冷漠地给他撇凉腔出气：“这下你在原上的名声越发的大了！”鹿子霖吸着水烟根本不理会她。鹿贺氏在自家门楼里奚落他的话再难听也无伤大局，麻烦的事是这个疯子儿媳怎么办？她胡吣乱呔的瞎话要是传到冷先生耳朵，他还怎么和他见面说话？这件事发生得这样突然，简直是猝不及防，一下子传播到整个原上，像打碎的瓷器一样不可收拾，难以箍浑。他想去找冷先生当面说清，准定能够先入为主澄清事实，考虑到此时镇子上人群涌动被人注视的尴尬，直等到集散街空，他才走进冷先生的中医堂。冷先生一见面倒先开口：“子霖，你来了先坐下。我知道晌午发生的事了。”鹿子霖顿然觉得心头宽释，脸上也自在了。冷先生平静地说：“你不要跟小人计较。”鹿子霖真心地感动了，说：“大哥呀，我对不住你！”冷先生说：“先前的事先前的话都不说了。我给她把病治好，你让兆鹏写一张休书了事。”鹿子霖凄婉地说：“你前二年说这话，我不忍心，我总想得个圆满结局哩！没料到越等越糟。咱先不说休书，等病好了再说。”冷先生便跟着鹿子霖到家里去给女儿诊病。

冷先生走到庭院，就听见女儿的喊叫声：“爸吔，回来吔快上炕！”冷先生腮帮上的肌肉抽扭着走到窗前。女儿瞅了冷先生一眼就愣呆呆地僵住，随之哇的一声哭叫。冷先生说：“把锁子开开。”鹿贺氏

打开锁子开了门。冷先生进了厦屋瞅着女儿。女儿这时清醒过来，抹着泪招呼父亲坐到椅子上。冷先生说："你怎么了？"女儿莫名其妙："不怎么。我好好的嘛。"冷先生说："不怎了就好。你等着，我让你兄弟拉毛驴来接你回娘家住几天。"女儿说："不麻烦兄弟，我不去。眼看下雪呀，我还有两双棉窝窝没绱完哩！"女儿一切正常，没有任何异常表现，冷先生坐了一阵儿回中医堂去了，临走叮咛说："再犯病的时候你叫我。"

冷先生刚走进中医堂还没坐稳，鹿子霖又来了，不用说是儿媳的疯病又犯了。冷先生啥话不说又来到鹿子霖家，先在院子里伫立谛听。厦屋里传来女儿的声音："我有男人跟没有男人一样守活寡。我没男人我守寡还能挣个贞节牌，我有男人守活寡倒图个啥？你娃子把我瞅不进眼窝，你爸跟我好得恨不能把我吸进鼻孔儿……你不上我的炕你爸爱上……"鹿子霖站在侧后，满脸烧臊得恨不能钻进地缝儿。冷先生转过身走出门来说："你跟我去拿药。"

半年前一天深夜，鹿子霖喝得醉醺醺回家来用脚猛踢街门。街门闩子咣当一声响门扇启开，鹿子霖跷门槛时脚尖绊了一下，跌倒在门里爬不起来，大声呻唤着发脾气："你狗日……还不赶快扶我，还……立在那儿……看热闹！"他以为开门的是老伴，却料不到今晚是儿媳开的门。儿媳难为情地说："爸……是我。"鹿子霖分辨不清是谁的声音，继续发脾气："我知道是你……你不扶我，盼着跌死我？"儿媳便伸手抓住他的膀臂往起拉。鹿子霖仍然大声呻唤着，挣扎着爬起来，刚站立起来走了两步，又往前闪扑一下跌翻下去。儿媳急忙抱扶住他的肩膀帮他站稳身子。鹿子霖本能地把一只胳膊搭到儿媳肩膀上，借助着倚托往前挪步，大声慨叹着："老婆子，还是你对我实受！"儿媳满脸臊烧，低声分辩说："爸，你尽说胡话——不是俺妈是我。"鹿子

霖眼睛一瞪，站住脚："你妈咋哩，你咋哩？都一样咯！你对爸也实受着哩……也好着哩咯！"她扶着阿公走过门房进入庭院，一轮半圆的月亮贴在天上，院里弥漫着香椿树浓郁的香气。鹿子霖站在庭院里连着打了两个震撼屋院的喷嚏，变出一副柔声憨气的调子说："俺娃你……孝顺得很……"说着就伸过右臂来把儿媳抱住了，毛茸茸的嘴巴在她脸颊上急拱，喷出热骚骚的烧酒气味，几乎同时就有一只手在她只穿着一件单衫的胸脯上揉捏。她惊叫一声，浑身燥热双腿颤抖，几乎陷入昏厥的恍惚中，又本能地央告说："爸呀，这成啥话嘛……快丢手……"鹿子霖说："这怕啥嘛……俺娃身上好软和……"儿媳终于从突发的慌乱中恢复理智，猛力挣脱出来奔进厦屋将门关死。鹿子霖又摔倒在地，哼哼着爬不起来。儿媳在炕边上坐了一会，镇静一下，从小木窗朝外看去，阿公仍然躺在庭院砖地上拉起鼾声。她叹口气，断定阿公真的是喝醉了糊涂了，恻隐之心又催使她开了厦屋小门走出去，再次把阿公拉起来拖向上房砖垫台阶。阿公已经完全不省人事，任她拖着拽着架着走进上房东屋按在炕边，顺势就倒在炕上，依然呼噜打鼾。她给阿公脱掉布鞋把双腿掀上炕去，拉开一条薄被搭在阿公身上，然后就走回自己的厦屋。这一夜，她睁着眼坐到天明，听了整整一夜从上房东屋传出的忽高忽低忽粗忽细的鼾声。

鹿子霖醒过来已到早饭时辰，在穿鞋时似乎才想到昨晚根本没有脱衣服，渐渐悟觉出来昨晚可能在酒醉后有失德的行为，但他怎么也回忆不出具体过程。儿媳把一铜盆温水放在台阶上。鹿子霖一边洗脸一边朝灶房发问："你妈哩？是不是又烧香拜佛去咧？"灶房里传出一声"嗯"的回答。鹿子霖鄙夷地说："烧碌碡粗的香磕烂额颅也不顶啥！"灶房里的儿媳没有应声。鹿子霖看不出儿媳有什么异常，就放心地走到明厅方桌旁坐下吸烟。儿媳先端来辣碟儿和蒜碟儿，接着又送来馏热软透的馍馍，第三回端来一大碗黄灿灿的小米稠粥，便转过身

回灶房去了。鹿子霖操起筷子搅了搅碗里的稠粥，霎时脑子里轰然爆响气血冲顶一阵天旋地转——碗底搅翻出来一窝子铡碎喂牲畜的麦草。鹿子霖端起碗举到半空又改变了主意，没有掷到地上而是原样儿放回桌面。那一瞬间，他脑子里闪过一个惊问，摔了碗以后下来的戏怎么往下唱呢？不可改易的关键是自己昨晚肯定做下丢脸的事了；不声不响把饭端进牲畜棚圈倒进牛槽，然后甩手到保障所去，似乎也不妥，往后还进不进这个门呢？经过迅疾的分析和判断之后，鹿子霖重新捉起竹筷，埋下头大口大口喝起稠粥来，声音响亮诱人，把一根一根麦草刮拨到大碗的一边，直到碗里的米粥喝光刮净只剩下一窝麦草，然后对着灶房喊：“盛饭。”

儿媳坐在灶锅下的麦草蒲团上沉静如铁，等待着碗被摔碎的声响和阿公的咆哮谩骂。她预想的一切都没有发生，听到了呼噜呼噜喝粥的响声，自己反倒慌乱无措了，及至听到阿公像平常一样呼叫添饭的声音，心头那如铁壁一般的堡垒顿时土崩瓦解。她低着头走到明厅方桌跟前，就瞅见碗里那一撮麦草。她双手端起空碗急忙转身走回灶房，再没有勇气敢瞅阿公一眼。她掀开锅盖，捞起勺把儿又犹疑不定，把饭再舀进碗里呢，还是把碗里的麦草刮掉倒出来？她咬咬牙就把勺里的米粥倒进装着麦草的碗里，豁出来了，看他怎么办吧！

鹿子霖看出端饭来到桌前的儿媳眼里惶惑，断定她已六神无主乱了阵脚。他在等饭的间隙里，就着红艳艳的油泼辣子和醋水拌的蒜泥，吃完了一个软馍；又埋着头一如既往地把碗里的米粥喝光刮净，仍然把那一窝子麦草留在碗底，然后抹抹嘴走出街门上保障所去了。他想，你把麦草塞给我的时光，肯定不会想到这窝子麦草最终还会归还到你手里，看谁倒掉这窝子麦草吧！你倒掉了……你就输了。

儿媳洗碗时倒掉了麦草，憋在心头的那股勇气全部消失，阿公这一手软杀法使她再也鼓不起报复的勇气。她洗着碗筷洗着锅，仍然无法判断阿公的举动，难道真的是阿公承认自己是吃草的牲畜呢，还是他不与小人较量？还是另有其他什么意思？

麦草事件没有造成任何影响，阿婆从三官庙回来后也没有任何异常的察觉。阿婆自瘟疫以后更笃信神灵了，她把自家成为白鹿村唯一未死人的家庭并不看作幸运而是归功于她的香蜡纸表。阿婆每逢初一和十五到三官庙为神守夜，风雨无阻，小病不违，除非病倒躺下动不了身。儿媳发觉自己陷入一种灾难，脑子里日夜都在连续不断反复演示着给阿公开门的情景，她拉着风箱烧火做饭时，脑子里清晰地映现出阿公搂着她肩膀的样子；摇着纺车踏着织布机或是绱鞋抽动绳子的时候，在纺车的嗡嗡声、织布机的呱哒声和麻绳噝噝的响声里，突然会冒出阿公“俺娃身上好软和”的声音；尤其是晚上，她躺在床上就能感到阿公那双揉捏胸脯乳房的大手，能感觉到那急拱她脸颊的毛茸茸的嘴巴，可以嗅见阿公身上那种像骡马汗息一样的气味……她想到那些揉捏，那些醉话，那种骡马的气息，由不得害羞，又忍不住渴盼。她对那些情景十分惊异，同时也发现自己原来一窍不开，兆鹏新婚头一夜在她身上匆忙溜过，自己根本毫无感觉，老爷爷把兆鹏从学校逼回家来，他晚上和衣囚了一夜又走了，她有某种渴盼却完全是不成影像的模糊。她现在得到了具体的新鲜的被揉捏奶子时的酥麻，被毛茸茸嘴巴拱着脸颊时的奇痒难支，以及那骡马汗息一样的男人气味的浸润和刺激，如此具体，如此逼真，如此勾魂荡魄。她无力阻隔那些诱惑而又十分清楚这些全部都是罪恶。她有时瞅着阿婆松弛发黄的脸颊愣愣地想，阿公大概夜夜都用毛茸茸的嘴巴在那脸颊上拱呀蹭呀，肯定用手揉捏阿婆那两只吊垂着的奶子。阿婆突然斜着眼问：“你死盯住

我看是认不得我了？”她猛一哆嗦，从迷幻的境地灵醒过来垂头不语。阿婆半是训斥半是无意地说：“我看你像是没睡灵醒迷里迷瞪的？”

繁重而又紧张的收麦播秋持续了一月，她被地里场里和灶间头绪繁杂的活儿赶得团团转，沉重的劳作所产生的无边无际的疲倦，倒使她晚上可以睡上半宿踏实觉了。然而麦收一过，热浪滚滚的伏天到来以后，她又陷入那种奇异的境界而且更加沉迷。午歇时，她穿着短衣短裤躺在炕上，想到阿公的大手和毛茸茸的胡子嘴就浑身瘙痒，竟而忍不住呻唤起来。阿婆照例初一十五到三官庙去烧香去磕头去守夜，为她的两个都处在危险中的儿子求乞神灵。十五那天晌午饭时，她给阿公端上饭后没有即刻离开，站在桌子一角侧着身子说：“爸，你爱喝酒在自家屋喝，跑到外村在人家里喝多麻烦？”鹿子霖听到麻烦俩字不由心悸，强装笑笑说：“在家喝酒没对手咯！我喝酒跟朋友谝一谝图个爽快。”儿媳说：“俺妈不在屋时，你黑天甭出去，我一个人在屋……害怕……给你开门也……不方便……”鹿子霖腾地红了脸埋下头吃饭，待脸上的烧臊退去以后，才侧着脸说：“噢噢噢，我不出去了。”儿媳趁机说：“你想喝酒就在咱屋里喝，我给你炒俩菜。”鹿子霖张大嘴巴忘记了咽食，吃惊的程度不亚于从粥碗里搅翻出麦草那一回，竟然完全慌乱地随口应诺说：“那好……那好嘛！”

事情就是在那一夜发生的。鹿子霖坐在庭院的石桌前摇着扇子，青石矮桌上蹾着一壶酒和一只黄铜酒盅。灶房里煎油爆响的声音止歇以后，儿媳用木盘托着四碟炒菜送上来，月光下可以看出是炒鸡蛋、醋熘笋瓜、烧豆腐和凉拌绿豆芽。儿媳把菜碟摆到石桌上站在旁边问：“爸，你尝尝看咸不咸？”

“嗯！这鸡蛋不咸不淡，也嫩得很！”

“你尝尝笋瓜？”

“笋瓜也脆嘣嘣的。”

“你再尝尝熬豆腐？”

“噢呀！这豆腐又麻又辣味儿真美咯！”

她没有再问第四样菜的口味儿，便捉住酒壶往酒盅里斟满了酒：“爸，你消停喝、消停吃。”然后提起靠在石桌一侧的木盘退到灶间，刷刷啦啦洗锅刷碗。收拾清楚后，她回到厦屋用凉水洗了脸，擦了脖子上的热汗，拢一拢头发又走出厦屋门，站在门口问：“爸，你还要啥不要？”鹿子霖喝着酒夹着菜悠悠然摇着扇子，满圆的月亮从头顶洒一院子明亮的光，儿媳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语都向他证明着他的预感，尤其是嗅到儿媳新搽的粉香味儿，搞了半辈子女人还看不透这点露骨而又拙劣的伎俩吗？唯一的障碍还是那一撮麦草。给碗里塞进麦草的行为和今天发射的信号以及超常的殷勤，使他无法解释这两种截然相反的举动。他遇到过半推半就的女人，也遇到过操守贞节坚辞拒绝的女人，他在这一方面的全部经验都不能用来套解儿媳的矛盾行为。为了更进一步探到实处，他对她说：“你来坐这儿陪着爸说说话儿，爸一喝酒就想跟人说话儿。”儿媳忸怩着说：“那成啥样子，叫人笑话……”却依然挪步走过来坐到对面。鹿子霖说：“你陪爸喝一盅。”儿媳连连摇手说她嫌酒太辣，却站起身又斟满一盅酒递到阿公手中。鹿子霖接那小酒盅时无法不触及儿媳的手指，儿媳不仅不躲避，进而用左手攥住了阿公的手腕，自然是以让他把稳酒盅为借口的，这就使他的判断基本接触到矛盾行为里的真实性，同时也就横下最后决心。他对儿媳说：“你不喝酒你吃菜。你炒的菜也该你尝尝嘛！”儿媳忸怩着鼓起勇气操起筷子吃了一小口笋瓜。鹿子霖进一步鼓动说：“你再尝尝凉拌豆

芽。”儿媳这回比较自如地把筷子伸向豆芽碟子。当她把豆芽送进嘴里就呕哇一声吐了出来，吓得愣呆在石桌旁。她吃到了麦草。鹿子霖是在她回厦屋洗脸搽粉时，把麦草塞进豆芽碟子的。麦草和绿豆芽的颜色在月光下完全一致。鹿子霖哗啦一声把筷子甩到碟子上，站起身来厉声说:“学规矩点！你才是吃草的畜生！”

儿媳从最初的惊吓愣呆中清醒过来，才突然意识到豆芽里的麦草是怎么回事，羞辱得无地自容，想哭又哭不出来，听着阿公的脚步声响到上房东屋，接着就是门闩迅猛关插的响声。她不知不觉从石礅上溜跌下去，跌在地上，双手紧紧抓着胸前的衣襟，垂下无法支撑起来的头，意识到自己永远也站立不起来了。她四肢麻木，浑身冷得打战发抖，上下牙齿咯噔咯噔碰响。她感觉到脖颈上有一股温热，用手摸到一把鲜血，才知道嘴唇咬破了，开始有疼痛的感觉。她扬起脑袋乞望天宇，一轮满月偏斜到房脊西侧，依然满弓，依然明亮。她低下头，瞅见狼藉的杯碟和掺杂着碎麦草的豆芽儿，默默地收拢筷子碟子，到灶房里洗刷后又回到厦屋。她想到一根绳子和可以挂绳子的门框，取出绱鞋用的绳子把五股合为一股后却停住了挽结套环的手，说不清是丧失了勇气还是更改了主意，把绳子又塞到炕席底下……

她从这一夜起便不再说话，阿婆吩咐她做什么她就一声不吭只管去做，做完了就回厦屋脚地摇动纺车，可怕的是在纺车悠扬徐缓的嗡嗡声里，眼前依然再现阿公醉酒时搂肩捏奶的情景，身体里头同样发生那种被搂被捏被毛茸茸的胡楂嘴拱蹭时的奇异感觉，她默不作声地任凭那种感觉发生和消失，期待那种感觉驻留更久……这种哑巴式的生活持续了三四个月，进入秋末冬初时，她除了做饭以外再无事干，从早到晚盘腿坐在纺车前纺线线。那是早饭后，她纺罢五根棉花捻子刚接上第六根拉出线头儿，突然从身体的某一部位爆起一串灼亮的火

花，便有一种被熔化成水的酥软，迫使她右手丢开纺车摇把，左手也扔了棉花捻子，双臂不由自主地搁抱住胸脯，像冰块融化，像雪山崩塌一样倒在纺车前浑身抽搐战栗。她期望这种美丽的战栗永不消失直到死亡，却猛乍听见脑子里嘎嘣一声，有如棉线绷断的响声，便一跃而起跑出厦屋，跑出街门，跑到村巷，直冲进阿公供职的白鹿保障所……

鹿子霖接过抓药相公递过来的三包中药，却没有当即起身，他想给亲家冷先生进一步解释冤情，却又无法开口，怎么想也想不出一句合适的话来解脱自己的难堪。不说吧，又太冤枉，又担心冷先生把他也认定是吃草的畜生。冷先生无动于衷地启发他说："你先回去煎药。"鹿子霖终于没有张得开口，便提着药包出了门。冷先生送到门口叮咛一句："服了药有啥动静，你来给我说一下。"

儿媳拒绝服药。鹿贺氏熬煎好中药滗在小黄碗里端给儿媳，儿媳说："我没啥啥病嘛，喝那苦水水弄啥？"鹿贺氏哄她说："补养身子。"儿媳反而说那是毒药，想毒死她好给阿婆离眼。鹿子霖在上房明厅听着，就给鹿贺氏摇手示意不要硬逼，等她这一阵疯病过去了再说。看来儿媳的疯病是一阵疯一阵好，属于阵发性的。果然儿媳过了一阵安静下来，鹿贺氏把药再送去时，她就一气喝下去了，喝了没过一锅烟工夫，便酣然入睡，睡梦中大声亲昵地叫着："爸吔，把我搂紧搂紧，搂得紧紧儿的！"鹿贺氏从窗缝里往里一瞅，儿媳脱得一丝不挂，双手塞在两腿之间，在炕上扭着滚着。她走进上房东屋，对鹿子霖说："这不要脸的货得的是淫疯病。"鹿子霖心里暂得宽舒，无需再向鹿贺氏辩证自己的清白无辜了，于是说："我早就看出这病的名堂不好明说。"鹿贺氏说："得这病的女人一见男人就好了，吃药十有八九都不顶啥。"鹿子霖默认而不言语。鹿贺氏说："你去城里寻兆鹏，磕

头下跪也得把他拉回来，跟那个不要脸的货睡一夜，留个娃娃就好了。”鹿子霖说：“到哪达寻呀？”鹿贺氏说：“你悄悄去悄悄打听，问问兆海也许能摸清他哥的住处……”鹿子霖说：“等这三服药吃完再看。”

儿媳吃罢三服药，整日整夜昏睡了四天。冷先生停了两天药，想看看药劲散了以后还疯不疯。那天后晌，儿媳清醒过来，竟然捉住笤帚扫起院子。鹿贺氏从自家窗里瞧着她优雅的扫地动作心头一热。这时候鹿子霖走进院子，儿媳瞅了一眼阿公，突然张狂起来，嘎嘎嘎笑着扬起笤帚说：“爸吔，你喝醉了我来扶你上炕。”鹿子霖骤然红了脸，加快脚步走进上房东屋。第二天他就进城寻鹿兆鹏去了。

儿媳这回犯病更加严重，一天比一天疯的时候多，好的时间少。鹿贺氏不得不叫来邻居女人帮忙给她硬性灌药。儿媳不见好转，日渐疯劲更足。鹿子霖走了五天回来，完全失望地悄悄告知鹿贺氏说：“兆鹏跟白家女子过活到一搭咧！”鹿贺氏说：“大妇小妻也行嘛！你得让他回来，把这头也安抚住呀？”鹿子霖说：“根本摸不清他的影踪。”他随后对冷先生悄悄叙说了进城找兆鹏的过程，以表明他对儿媳尽了最大的努力，自然不能提及兆鹏和白灵私自成婚的事。末了他说：“你把药底子下重。”冷先生依然不动声色，交给鹿子霖一包药。这服药灌下去以后，儿媳睡醒来就哑了，只见张嘴却不出一丝声音。鹿子霖皱皱眉沉吟着问：“这服药大概底子下得太重了？”鹿贺氏白眨白眨着眼说：“药轻不治病。”鹿子霖觉得女人根本没有理解他的意思，依然沉吟着说：“只有冷大哥才敢下这样重的药底子。”

儿媳不再喊叫，不再疯张，不再纺线织布，连扫院做饭也不干，三天两天不进一口饭食，只是爬到水缸前用瓢舀凉水喝，随后日见消瘦，形同一桩骷髅，冬至交九那天夜里死在炕上。左邻右舍的女人们

在给死者脱净衣服换穿寿衣的时候，闻到一股恶臭，发现她的下身糜烂不堪，脓血浸流……

白嘉轩对鹿家这桩家丑自始至终持一种不评论态度。这桩丑闻从头一天发生就传遍白鹿原的许多村庄。白鹿村是丑闻的发源地，早就纷纷扬扬了。有的说鹿子霖和儿媳有那号事，有的却截然信不下去；说有的人是根据鹿子霖一贯喜好女色的本性判断的，证据是鹿子霖不止和田小娥有过，还和原上好多村子谁谁谁家女人都有过；鹿子霖喜好当干大，在好多村子认下十多个干娃。“娃娃的干大，娃他妈的麻达。”凡是鹿子霖认作的干娃的母亲都是有几分姿色的，挂上干大的名号，和干娃他妈来来往往就显得非常正常了。说鹿子霖不会有那种事，是坚信鹿乡约还不至于无耻到畜生的程度，关键是那女人自始至死也没呔出和鹿子霖有那种事的任何一句具体细节，仅仅只说鹿子霖跟她好，那不过是守寡熬急了急疯了的疯言浪语而已。这种事只能在背巷土壕闲扯一通，没有人做出裁决，属于自然流传。白嘉轩不仅不说，连听这类话也不听，遇见有人说这类话，他就掉头拄着拐杖走开了。平心而论，他倾向于说鹿子霖有那种事的看法。他早都认定鹿子霖在男女之事上，实际就是畜生。但他不能说。世上有许多事，尽管看得清清楚楚，却不能说出口来。有的事看见了认准了，必须说出来；有的事至死也不能说。能把握住什么事必须说，什么事不能说的人，才是真正的男人。这件丑闻之所以不能说，关键是背后有个冷先生。骂鹿子霖一句，等于骂冷先生半句；吐鹿子霖一口唾沫有一半就落到冷先生脸上。白嘉轩及时走进中医堂，达观而不无惋惜地对冷先生安慰说：“当初为了两家好，没料到把娃娃害了。不过，人都没有早知道咯！抓紧给娃看病……”

鹿子霖按照习俗为儿媳举办简单的葬仪的那天晚上落了一场大雪。白嘉轩那天晚上失眠睡不着，直熬到下半夜才入睡，这是他平生很少发生过的现象。刚睡着又被一个奇异的梦惊醒来，再也无法重新入睡，便拄着拐杖在茫茫雪原上连滚带爬朝北走去，天明时便跨进白鹿书院，让大姐夫朱先生给他解梦。那时候，朱先生正站在院子雪地里晨读。

朱先生依然保持着晨读的习惯。他开开门看见了一片白雪。原坡上一片白雪。书院的房瓦上一片白雪。大树小树的枝枝杈杈都裹着一层白雪。天阔地茫冰清玉洁万树银花。世间一切污秽和丑陋全都被覆盖得严丝不露了。雪景瞬间消除了他许久以来的郁闷。他漱了口洗罢脸，就取来书站在庭院里朗声诵读。他大声朗诵，古代哲人镂刻下来的至理名篇似金石之声在清冷的空气中颤响。朱先生听到大门被推开的响动，却没有理睬，听到叫“哥”的声音才扭过头去，一个浑身沾着雪的人正朝他走来，像从雪窝里滚过来的。那佝偻匍匐的形状，朱先生几乎误看成一条冻得无处躲藏的野狗。听见声音，看见了拐杖，才辨认出白嘉轩来。朱白氏闻声连忙给弟弟拍打身上的雪团儿，强迫他换下湿透的棉鞋棉袜。白嘉轩抿了一口茶，迫不及待地说：“我做下个怪梦——”朱先生惊讶地笑问：“就为一个梦，你黑天雪地跑来？”朱白氏斥责弟弟说：“也不怕滚到雪窖栽死冻死？”白嘉轩满脸严肃的神色，郑重地说：“这梦怪得很——

“我一辈子有一样好处，就是头一落枕就打呼噜。鹿子霖拆我门房门楼，我黑天照样睡下不醒。我只记得孝文娘死那一晚，我半宿睡不下。昨个黑怪。喝了汤跟咱娘问安时，就有些不自在，我想早点歇下。刚睡下，觉得心口憋得心慌气短，就披上皮袄坐在炕上吸烟。吸烟嘛，火镰急忙打不出火，越急越打不出，急得我冬冷寒天额头上冒

汗。总算是打着火了，可刚吸了一口，就把水烟壶里的苦水水吸进喉咙，整得我呕了一阵子，吐了一阵子，还是烧躁瞀乱坐不住睡不下。我想我一辈子没害过人，没亏过人，没做邪事恶事，这是咋么了？噢噢噢，大概我白嘉轩阳寿到头了，阎王爷催我起程去阴家哩！这也好嘛，该去就去，我也活够数了，总不能挂在枝上不落咯……折腾到后半夜才睡着。刚睡着，就看见咱原上飘过来一只白鹿，白毛白蹄，连茸角都是白的，端直直从远处朝我飘过来，待飘到我眼前时，我清清楚楚看见白鹿眼窝里流水水哩，哭着哩，委屈地流眼泪哩！在我眼前没停一下下，又掉头朝西飘走了。刚掉头那阵子，我看见那白鹿的脸变成灵灵的脸蛋，还委屈哭着叫了一声‘爸’。我答应了一声，就惊醒来了……

“我越加睡不着，听见咱娘在屋里呻唤。我穿了衣服过去看咱娘咋么了。咱娘说她做了个梦……那梦跟我的梦一模一样！我的老天爷，天下竟有这等奇事？我没敢给咱娘说我的梦，怕她更加犯心病，只安抚了她几句……

“我起初想，是不是鹿子霖儿媳死得冤苦给我托梦？昨日晌午刚把那可怜媳妇埋了。她是不是要向我鸣冤？可怎么又变成灵灵的模样呢？我睡不住，我就寻你来了。”

朱先生听罢，没有立即解析。

朱白氏惊讶地说：“天哪！我昨个黑也梦见白鹿了，可没有看出灵灵的模样。白鹿飘着飘着忽儿栽进一道地缝里……”

白嘉轩更加惊讶地盯着朱先生。

朱先生心里说：白灵完了，昨夜完的。他不能给妻弟白嘉轩说这种凶兆，便不经意地说：“是雪的影响。干燥一冬始得瑞雪。瑞雪滋润天地万物也滋润人。人就发生异常心情，自然免不了做怪梦。白雪白鹿都是白的嘛！”

白嘉轩对这个解析不甚折服，来时蒙结在心头的紧张怯惧情绪却松弛下来，但愿如此更好。这时候他才感到浑身像散了架似的疲惫不堪，两条腿已经僵硬，须得用手扳着挪到炕边上。姐姐和言劝导他现在应该什么事情都不要管，家里族里的事都交给儿子们去办，这样年龄和这样身体（佝偻）的人只图心情宽畅就够了。白嘉轩说：“我早都不理事了咯！”朱白氏反驳说：“为一个梦，你黑天雪地跑几十里，还说不理事不操心哩！”朱先生要到前院书房去做文墨事，叮嘱白嘉轩说：“不过你要记住昨天的日子。”

朱先生绝妙而诡秘的掐算不幸而言中，白灵正是在这一夜走向她的生命尽头的。

在这个奇异的梦后十几年不到二十年的一个春天，五个穿四兜制服的干部和一个穿灰色军装的军人来到白鹿村，寻问白灵的家。村人把那六个人引导到白嘉轩门口，指着那个在台阶上晒太阳的像狗一样蜷弯着腰的老人说：“这是白灵她爸。”六个人接连和老汉握手。白嘉轩很不习惯握手拉胳膊的亲昵动作，甚至有点反感地说：“要说啥要问啥尽管说尽管问，捏我老汉的鸡爪子做啥？”六个人中的一个说：“老人家，我给你说件使你老伤心的事，你可得挺住——”白嘉轩不屑地笑笑：“你们小瞧老汉了！”那人就说：“白灵同志牺牲了……”白嘉轩“噢”了一声，微微扬起脱光了头发的脑袋，用只剩下一只明亮的眼睛瞅着蓝天上的太阳没有说话，有关女儿白灵的记忆开始复活。那人从提包里取出一块黄底上刻着“革命烈士”红字的牌子交给他，他接到手

里看了看，依然没有说话。那六个人在他面前站成一排，向他行鞠躬礼。白嘉轩这时才问：“灵灵怎样死的？”六个人商量好了似的，全都不说死亡的具体情况，只是笼统地说共产党领导劳苦大众进行革命牺牲的先烈成千上万，赞扬白灵是个忠诚于党忠诚于人民的好同志。白嘉轩接着又问死亡的具体时间。军人还是笼统地说：“十二月。”白嘉轩问：“你拿庄稼人的历法说。”军人抱歉地笑着：“拿农历说大概在十一月……”白嘉轩突然把靠在腿旁的拐杖提起来，往地上一拄，斩钉截铁地说：“阴历十一月初七！”六个人惊讶地面面相觑，问他怎么知道的？白嘉轩以不可动摇的固执和自豪大声说：“我灵灵死时给我托梦哩……世上只有亲骨肉才是真的……啊嗨嗨嗨……”浑身猛烈颤抖着哭出声来……

最终弄清白灵死亡过程的人是作家鹿鸣。这已经到了本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白嘉轩也死掉了，自然至死也不清楚女儿灵灵死亡的具体情况。鹿鸣翻阅一本专事追述死亡英雄的《革命英烈》杂志时发现了白灵。

鹿鸣五十年代中期在白鹿村搞农业合作化时结识了白嘉轩，在白嘉轩的门框上看到过那块“革命烈士”的牌子。他写过一本反映农民走集体化道路的长篇小说《春风化雨》而轰动文坛，白嘉轩被作为小说中顽固落后势力的一个典型人物的生活原型给他很深印象。鹿鸣读了那篇追忆白灵生平死亡的文章，竟然激动不已，连着一周东奔西颠终于找到了文章作者。作者是一位满头白发的革命老太。老太太说她和白灵曾是同学，她和白灵一前一后被地下党转送到南梁根据地。白灵在根据地清党肃反中被活埋时，她正在接受审查，就住在关过白灵的囚窑里等待活埋。此时，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周恩来代表党中央毛泽

东亲赴南梁制止了那场内戕，她才幸免于难。那时候，白灵刚刚被活埋三天……

鹿鸣没有惊诧而陷入深沉的思考，更令他悲哀的是，在他年过五十的今天，他才弄清楚，白灵是他的亲生母亲……

白灵一进入红军在南梁的根据地，就有一种受虐待的小媳妇回到娘家的舒展和放松的畅快感觉。她一看见那些在坪场上操练的战士，就忍不住笑得弯下了腰。令她发笑的是红军战士五花八门的服装，有的是当地拦羊汉常穿的黑袄黑裤；有的上身穿一件有垫肩的国军军官呢子制服，下身却是一条手工缝制的大裆折腰棉裤；有的上衣是已经开花露絮的破袄，下身却穿着乡村土财主才穿的暗花条纹绸裤。帽子和鞋更不讲究了，有的戴瓜皮红顶小帽，有的戴黑呢礼帽，有的戴狗皮毛帽，有的戴国军士兵制帽，有的裹一块白布或蓝布帕子。脚上蹬着的有布鞋皮鞋棉窝窝麻鞋和草鞋。服装已经不能看出主人的身份，吃饭也是一样的。无论士兵，无论大队长支队长乃至最高统帅廖军长，都在一个锅里舀取同样的饭食。没有椅凳，更没有饭桌，大家一律蹲在地上，围成一圈边吃边聊，为数不多的几位女队员，也习惯了和男队员一样蹲在一堆吃饭。白灵第一次端着打上了洋芋丝小米干饭的碗蹲下去时，忍不住又笑得差点跌倒。

白灵被安排做文化教员。一孔窑洞里摆着石头树根和顺地放着的木头，战士和军官轮流上课，轮流进出窑洞，轮流坐石头和木头。她的黑板是一扇用锅底黑墨染制过的门板，粉笔是用黄土泥巴搓成指头粗细的泥条；后来有热心的战士在山坡上发现了一种质地酥软的灰白色料礓石，写出字来跟标准的粉笔锭儿相差无几，从而代替泥条。战士们则一人一根树枝在地上练写。白灵在黑板上写一划，战士用树枝在地上划一划，给战士教会了“共产党红军为人民打日本救中国”这些

字，而每个人的名字就得分别施教了。白灵面对那些稚气未脱的小战士，感到一种庄严和神圣，这些穿着五花八门连自个名字也不会写的大孩子，注定是中国腐朽政权的掘墓人，是理想中的新中国的奠基者，他们将永远不会忘记在这孔土窑里跟她学会了读写自己的名字。她得到上至廖军长下至小队长的表彰，也得到游击队员们的拥戴，一方面是她出色的工作，另方面则由于她活泼开朗的性格。她给游击队员教字学文化，也帮他们缝补撕裂磨损的衣裤鞋袜，报酬往往是要求他们给她唱一支家乡民歌。这些大都来自黄土高原沟沟岔岔里的娃子，操着浓重的鼻音唱出一曲又一曲悠扬哀婉的山歌，令人心驰神荡。他们生硬怪异的发音，使她听不懂歌词的意思，常常一句一句、一字一字订正后才翻译成长安官用语言。她每得到一首便抄摘到小本上，居然收集汇拢了厚厚一本。她把那些酸溜溜的倾泻爱的焦渴的词儿改掉，调换成以革命为内容的唱词，只需套进原有的曲调里，便在干部和队员中间很快流行起来，有一首居然成为这支红军游击队的军歌。

白灵半年后调到军部做秘书。军部也是一孔窑洞，有五六个男女工作人员。她对他们包括廖军长都不陌生，不过现在接触的机会更多了。她第一次见廖军长是听他给队员们讲军事课。廖军长的面貌似乎就是一个军长应该有的面相：四方脸，短而直的鼻梁，方形的下巴，突出却不显“奔”儿的额头，那双镶嵌在眉骨下的眼睛，很容易使人联想到石崖下的深涧。白灵一下子意识到游击队员中有许多张和廖军长极其相似的脸型，这是黄土高原北部俊男子的标准脸框，肯定是匈奴蒙古人的后裔，或是与汉人杂居通婚的后代，集豪勇精悍智慧谦诚于一身，便有完全迥异于关中平原人的特点而独具魅力。他是整个游击队里文化最高的人，也是军事知识最丰富的人。他毕业于黄埔军校，参加过北伐战争，随后被迫退到关中拉起一杆共产党军队举行暴动。

暴动失败，又退回北部高原再次组军，直到把那支红三十六军又葬送到滋水县的秦岭山中。现在的红军仍沿用三十六军的番号，他已变得聪明，变得老练，再不贸然出击了。廖军长刚登上讲台（土台子），突然指着白灵佯装愣呆呆地问：“这个同志哥儿啥时候溜进来的，我咋认不得？”白灵豁朗地站起来：“报告廖军长，战士白灵向你报到，我从西安逃来的，半个月了。”廖军长愈加显出愣呆莫名的神色问：“你是关中人？关中也有你这么漂亮的同志哥儿？”窑洞里骤然爆发出哄然大笑，白灵也不由地脸红了。廖军长恍然大悟地自语道：“我还以为漂亮的同志哥儿、同志妹儿，都出在咱们陕北哩……”然后仰起头纵声朗笑……

白灵到廖军长的窑洞去送一份密件。廖军长突然问：“大地方娃娃到沟岔里来，习惯不习惯？”廖军长总是开玩笑称她为大地方来的娃娃或同志哥儿，却从来不称她为同志妹儿或直呼其名。她说：“挺好。”廖军长皱皱眉，摇摇头说：“不好不好，你说有什么好？这儿的人除了放羊再弄不了啥。没文化，没麦子，没棉花，连水也缺得要命——你没说真话。”白灵笑说：“这儿有好听的曲儿。”廖军长赞成地点点头说：“这倒说对了，曲儿可以称得上再好没有了。我走过好多地方，包括你们大地方关中，都听不到这么好的曲儿。你说还有啥好哩？”白灵笑说：“男娃子一个个都漂亮俊俏！”廖军长突然说：“给你找个女婿怎么样？”白灵就在那一刻，从身底的暗袋里摸出一条纸绺交给廖军长。那是临行前兆鹏让她交给廖军长的。她进根据地时，没有交给廖军长，现在觉得有必要交出来了。廖军长看罢字条儿，缓缓站起来，久久地瞅着她，然后庄重地伸出右手。白灵和廖军长的手握在一起。廖军长说：“白灵同志！”白灵激动地说：“鹿兆鹏同志让我代他向你致敬！”廖军长说：“可是你……为啥到现在……才说呢？”白灵说：“我

怕你太照顾我……”廖军长说：“好啦！只要我活着，就保你无事。以鹿兆鹏同志的名义……”

后来部队发生了揭露国民党潜伏特务事件，并因此而导致了一场内乱，使这支刚刚蓬勃起来刚刚形成气候的红军游击队又急骤直下陷入灭顶之灾。那个特务以投奔革命的名义潜入根据地时，也带着西安地下党的路条；他比白灵晚半年来到南梁，被分配给一位游击大队长做随身秘书。他在前几天突然逃亡，游击队的情报小组从获得的证据最终鉴定出这个人可怕的身份。紧接着举行了廖军长和毕政委的最高层密谈，内容不得而知。又紧锣密鼓似的在当晚举行了支队长以上的干部大会，内容依然不得而知。白灵开始预感到自己已跌入一种危险的境地。这并不是她过于敏感，而是凭她的常识。她平时能旁听各种重要会议，包括廖、毕二人的最高决策。凡这些会议或决策，都由他们两三个机要人员作出记录，形成文字，写成决议，整个根据地的重大决策和军政大事都对她不存在保密的问题。她没有被通知旁听廖、毕的最高会议尚可自慰，而支队长以上指挥官会议也回避她参加，她就感到了不正常，一种被猜疑、不被信任的焦虑开始困扰着她；尤其是支队长以上指挥员会议之后，整个根据地里陡然笼罩着一片沉默紧张的严峻气氛，白灵从那些指挥员熟悉的脸上摆列的生硬狐疑的表情更证实了某种预感。她晚上失眠了，这是进入根据地一年多来的第一次困扰。第二天晌午，她被通知参加全军大会，会议由毕政委做肃反动员报告，宣布组成肃反小组名单，紧接着就对十一个游击队员当场实施逮捕。白灵在惊恐里猛然发现，十一个被宣布为潜伏特务的游击队员全部是由西安投奔红军的男女学生，禁不住一阵哆嗦。

白灵被调出军部编入游击支队。游击队员们不再跟她学写名字，不再求她补缀衣服，更不给她唱动听的信天游曲儿，全都用一种狐

疑，一种警惕戒备的眼光瞅她。白灵很痛苦却无法摆脱，整个根据地里迅速掀起一股强大的仇恨风暴，甚至比对国民党当局的仇恨还要强烈。这是对内奸的，她可以理解，却忍受不住被怀疑被仇恨的压迫和冤屈。她终于决定要找廖军长去说明自己，突然被两个女队员扯回窑洞，正告她不许乱跑乱找，这时她才意识到自己早已被专人监控着。七八天后，又实施了第二次逮捕，被拘捕的七个人仍然是从西安来的学生。白灵心里稍一盘算，全部从西安陆续来到根据地的二十一名学生，只剩下连她在内的二女一男了，这时她又感觉到，同样的下场已不可逃脱，而且已经为时不远。

第二次逮捕发生的前一天晚上，第一批被逮捕的十一个人中的五个被活埋。第二天，就有一张布告贴在各大队聚会的窑洞门口。白灵是在她做文化教员经常进出的那个窑洞门口看到的，五个人全部被判定为特务。到离第一次逮捕刚刚半月时间，头批被逮的十一个中余下的六个和二次被逮的七个中的两个又被处死，同样采取的是挖坑活埋的刑罚。这种处死的办法并不被队员们看为残忍，因为子弹太珍贵了。游击队员手中的枪和枪膛里的每一颗子弹都是从敌人手里夺来的，为此有许多游击队员牺牲了性命。这个时候，在根据地发生了更严重的一件事，第一大队的大队长被肃反小组下令逮捕。大队长在一次高层会议上拍着胸脯对毕政委喊：“我敢拿脑袋担保那些西安学生绝对不会全部是特务。你把他们一个个活埋了等于自己消灭自己！往后谁还敢投奔到咱们这杆军旗下……”会议结束的当天晚上，逮捕这位大队长的命令就形成了文字也形成事实。分歧一下子从高层逐级扩散一直到游击队员中间，裂缝在迅猛地扩大延长着。廖军长在惊悉他的爱将第一大队长被捆绑押进囚窑时，终于失去了最后的忍耐，直接找到毕政委住的窑洞立逼他放人。毕政委毫不妥协：“拘押大队长是为了禁绝右倾思潮的蔓延，与潜伏特务有区别。不拘押大队长就会影响肃反

进一步深入。”肃反小组被赋予绝对权力，可以审查一切人，廖军长实际只剩下对敌作战这一项军事指挥权。毕政委说：“你也防止右倾思潮冒头。”

接着发生了一部分指挥员联名写血书要求停止杀人，停止肃反的请愿活动，毕政委毫不手软把那七八个政治异己全部逮捕，而且由肃反进一步发展到揭发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斗争，一批又一批指挥员和游击队员被拘捕扣押起来，他们可能只说过一句对肃反态度不甚坚决的话。肃反早已超过了原先的对象范围，也不管你是不是从西安来的那条路数了。廖军长和毕政委的分歧终于发展到表面化公开化，廖军长说：“你这是……”他气急如焚却不知给毕政委扣什么主义的帽子合适，急迫中联想到那个叛变投敌的姜政委：“你跟那个叛徒是一路子货！”毕政委没有再继续争辩，而是签发了逮捕廖军长的命令。毕政委召集全体将士会议，宣布肃反取得彻底胜利，不仅挖出了潜伏到根据地来的一小帮特务，重要的是挖出了一条隐伏在红军里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其中的骨干分子结成了一个反党集团……

白灵是在这个大会上被逮捕的，她是西安来的二十一个人中最后被抓的一个，那是廖军长下了死令保护的结果；廖军长自己已被打入囚窑，白灵的保护伞自然没有了。

白灵被抓得最迟，却被处死得最快，这可能主要是她与廖军长的过密关系被看作死党，也可能是她的野性子招致的结果。她被关进囚窑，日夜呼叫不止，先是呼叫毕政委：“我要跟你说话！”接着呼叫毕政委的尊姓大名，随后就带有侮辱性挑衅性地呼叫毕政委的外号：毕——眼——镜——毕瞎子！看守囚窑的游击队员汇报给肃反小组，便决定提前审问她。白灵的嗓子堪称天生的铁嗓子金嗓子，在囚窑里像

母狼一样嗥叫了三天三夜，嗓子依然洪亮，精神亢奋，双眼如炬。她看了一眼审讯她的肃反小组成员说：“叫毕政委来，我有重要话说。”

毕政委进来时踌躇满志地扶扶眼镜。白灵已无法控制腾起的激情，便抛出砖头一样的话：“听说你也是‘关中大地方人’？”她引用了廖军长和她说笑时的用语，“我因为跟你同是关中人感到耻辱！”毕政委当即变了脸色：“你是最狡猾，也是隐藏最深的一个。你已经打入我们的心脏！”白灵已不在意毕政委说她是什么，说她是什么不是什么都不重要了，最重要的是时间，是她不可能再争取得到的和他直接说话的时间。她像一头拼死的母狮凶猛而又沉静地咆哮起来：“你的所作所为，根本用不着争辩。我现在怀疑你是敌人派遣的高级特务，只有经过高级训练的特务，才能做到如此残害革命而又一丝不露，而且那么冠冕堂皇！如果不是的话，那么你就是一个野心家阴谋家，你现在就可以取代廖军长而坐地为王了。如果以上两点都不是，那么你就是一个纯粹的蠢货，一个穷凶极恶的无赖，一个狗屁不通的混蛋！你有破坏革命的十分才略，却连一分建树革命的本领也不具备！我过去最憎恨的是那些软骨头叛徒，现在最瞧不上眼的就是你这号难以形容的人……”毕政委烧臊得坐不住了，拍响了桌子：“廖军长庇护你，你迷惑了他！我早看穿了你，你骂我不在乎，这是反革命垂死的疯狂……”白灵冷笑一声说：“我早已不考虑我的下场了。我的下场早都摆在那儿了。我今天死比前半月前一月死没有两样，唯一的好处是我把骂你的机会等到了！你处死我，你也同时记住：你比我渺小一百倍！”

…………

白灵被活埋就在那天晚上，天上下着雪。其余有关活埋她的细节和情节都无法查证。执行活埋她的两个游击队员后来牺牲在山西抗日阵地上。廖军长被周恩来下令释出囚窑后又当了正规红军师长，也牺

牲在黄河东边的抗日前线指挥堑壕里，是被日军飞机抛掷的炸弹击中的。毕政委后来也到了延安，向毛泽东周恩来检讨了错误之后，改换了姓名，业已无从查找……

作家鹿鸣也不执意要找到毕某问询什么。他觉得重要的已不是烈士的死亡细节和具体过程，那仅仅只是对未来的创作有用；重要的是对发生这一幕历史悲剧的根源的反省。

第二十九章

朱先生的县志编纂工程已经接近尾期，经费的拮据使他一筹莫展，那位支持他做这件事的有识之士早已离开滋水，继任的几茬子县长都不再对县志发生兴趣，为讨要经费跑得朱先生头皮发麻，竟然忍不住撂出一句粗话来：“办正经事要俩钱比㞗上割筋还难！”引发起他的那一班舞文弄墨的先生们一片欢呼，说是能惹得朱先生发火骂人的县长，肯定是中国最伟大的县长。朱先生继续执笔批阅修改业已编成的部分书稿。孝文走进屋来，神色庄重地叫了一声：“姑父。”把一张讣告呈到面前。朱先生接住一看，脸色骤然变得苍白如纸，两眼迷茫地瞅住孝文，又颓然低垂下去。这是鹿兆海在中条山阵亡的讣告。讣告是由兆海所在的十七师师部发出的，吊唁公祭和殓葬仪式将在白鹿原举行，死者临终时唯一一条遗愿就是要躺在家乡的土地上。白孝文告诉姑父，十七师派员来县上联系，军队和县府联合主持召开公祭大会。白孝文说：“姑父，十七师师长捎话来，专意提出要你到场，还要你说几句话。”朱先生问：“兆海的灵柩啥时间运回原上？”白孝文说：“明天。先由全县各界吊唁三天，最后召开公祭大会，之后安葬。”朱先生说：“我明天一早就上原迎灵车，我为兆海守灵。”白孝文提醒说：“姑父，兆海是晚辈……”朱先生说：“民族英魂是不论辈分的……兆海呀……”朱先生双手掩脸哭出声来……

那是前年深秋时节的一天后晌，朱先生在书院背后的原坡上散步，金黄色的野菊花开得一片灿烂，坡沟间弥漫着馥郁的清香，遍坡漫沟热烈灿烂的菊花掩盖不住肃杀的悲凉。朱先生久久凝视着原坡坡地上拔除棉秆的乡民，又转过身眺望着河川里执犁播种回茬麦子的庄稼人的身影，忽然心生奇想，如果此刻有一队倭寇士兵闯进河川或者

原坡，如果有一颗炸弹在村庄或者堆满禾秆的垄亩上爆炸，那拔花秆的扶犁的撒种的以及走出村口提篮携罐送饭的乡民，该会是怎样一番情景……心头泛起一层“空有一番黄花开”的凄凉。他看见一辆汽车在河川公路上自西向东疾驶，搅扇起来的滚滚黄尘骤起四散，汽车开到书院对面时却放缓速度，然后岔开公路驶上朝南通向原根的官道，在滋水河边上停下来，一个人站在河岸上指指点点，另一个脱了鞋袜，挽起裤子涉水过河，沿着通往书院的弯弯小路走上来，朱先生看清他的衣着原是一位军人，便转过身依然瞅着山坡和河川深秋时节的田园景致。这里宁静安谧的田园景致与整个即将沦陷的中国是如此不协调，他怨愤以至蔑视中国的军人，无法理解如此泱泱大国如此庞大的军队怎么就打不过一个弹丸之地的倭寇？朱先生看见看门的张秀才在书院围墙外的坡田上呼叫他：“你的学生鹿兆海来咧——”朱先生撩起袍襟疾步走下坡来。

朱先生在书院门口看见了一身戎装的鹿兆海。鹿兆海举手敬礼，脚下的马靴碰得嘎哧一声响。朱先生点点头礼让兆海到屋里坐。走进书房，鹿兆海神情激动地说：“先生，我想请你给我写一张字儿——”朱先生轻淡地问：“你大老远从城里开上汽车来，就为要一张字儿？”鹿兆海诚挚地说：“是的，是专意儿来的。”朱先生调侃地笑笑：“你不觉得划不着吗？为我的那俩烂字值得吗？”鹿兆海并不觉察朱先生的情绪，还以为是先生素常的伟大谦虚，于是倍加真诚地说：“我马上要出潼关打日本去了，临走只想得到先生一幅墨宝。”朱先生“噢”了一声扬起头来，急不可待地问：“你们开到啥地方去？”鹿兆海说：“中条山。”

朱先生从椅子上站起来，满脸满眼都袒露出自责的赧颜：“兆海，请宽容我的过失。我以为你们在城里闲得无事把玩字画。”鹿兆海连忙

站起扶朱先生坐下："我怎么敢怪先生呢！我们师长听说我要来寻先生，再三叮嘱我，请先生给他也写一幅。他说他要挂到军帐里头……"朱先生的脸颊抽搐着，连连"哦哦哦"地感叹着，如此受宠若惊的现象在他身上还未发生过。朱先生近来常常为自己变化无常的情绪事后懊悔，然而现在又进入一种无法抑制的激昂状态中，似乎从脚心不断激起一股强大的血流和火流，通过膝盖穿过丹田冲击五脏六腑再冲上头顶，双臂也给热烘烘的血流和火流冲撞得颤抖起来，双手颤巍巍地抓住兆海的双肩："中条山，那可是潼关的最后一道门扇了！"鹿兆海也激昂起来："要是守不住中条山，让日本兵进入潼关践踏关中，我就不回来见先生，也无颜见关中父老。"

朱先生滴水入砚亲自研墨，鹿兆海要替朱先生研墨遭到他无声而又坚决的拒绝。朱先生控制不住手劲，把渐渐变浓的墨汁研碾出砚台。朱先生亲自裁纸，裁纸刀在手中啪啪颤着；从笔架上提起毛笔在砚台里蘸墨，手腕和毛笔依然颤抖不止。朱先生挽起右臂的袖子，一直捋到肘弯以上，把赤裸的下臂塞进桌下的水桶，久久地浸泡着，冰凉的井水起到了镇静作用，他用布巾擦擦小臂，旋即提笔，果然不再颤抖，一气连笔写下七个遒劲飞扬的草体大字：

砥柱人间是此峰 朱先生停住笔说："这是我写的一首七绝中的一句。我刚中举那阵儿年轻气盛，南行回来登临华山诵成的。现在我才明白，我连一根麦秸秆儿的撑劲都没有，倒是给你的师长用得上。"鹿兆海也情绪波动，泪花涌出。朱先生重新铺就一张横幅，蘸饱墨汁再次毅然落笔：

白鹿精魂 朱先生写完放下毛笔，猛然抬起手咬破中指，在条幅和横幅左下方按盖印章的部位，重重地按上了血印。鹿兆海吃惊地看见朱先生中指上滴滴答答掉到字画上的血花儿，扑通一声跪下去："先生

放心，我一定要拿小日本一桶血赔偿先生……”朱先生怆然吟诵：“王师北定中原日，捷报勿忘告先生哦！”

朱先生撕一块废纸裹住中指，坐下来时显得极为平静，温厚慈祥如同父亲：“兆海呀！临走还有啥事须得我办，你就说，只要我能办到……”鹿兆海也坐下来：“没有没有，没有啥事要劳烦先生的。我决定不回原上，免得俺爸俺妈操心。日后要是他们问到你，就说我们开拔到陕南去了。”朱先生说：“我会说好这事的，放心。”鹿兆海说：“只有一件小事要给先生添麻烦——”说着把手塞进胸襟，从内衣口袋里摸出一枚铜元，腼腆地笑笑：“先生，你日后见到白灵时，把这铜元亲手交给她。”朱先生奇异地问：“一个铜子？你欠她一个铜子？也太当真了。”鹿兆海说：“半个。这铜元有她半个，有我半个，谁拿着就欠对方半个。”朱先生笑问：“那白灵拿着不是又欠你半个了？”鹿兆海说：“她欠我比我欠她好。”朱先生从兆海的眼睛里窥见了一缕深沉的隐情，便问：“不单是一枚铜子吧？”鹿兆海坦然叙说了这枚铜元的游戏所引起的俩人的衷情。“噢！天！”朱先生叹惋着，“那后来咋办呢？”

“后来……她成了我的嫂子了。”鹿兆海嘲笑着说，“她跟我哥兆鹏都姓‘共’噢！”

“这么说这铜元比金元还贵重啰！”朱先生看了看龙的图案，又翻过来看了看字面，交还鹿兆海手上，“你应该带着。”

“我一直装在内衣口袋带着。我也从来没给任何人说过这个铜元的事。”鹿兆海平静地说，“我要上战场了。我怕这铜子落到鬼子手里就污脏咧……”说着就又把铜元递过去。

朱先生心里猛乍一沉，把铜元紧紧攥到手心，把铜元交给他而且讲述凝结在铜元上头的两颗年轻男女的情意，这行为本身，原来注释着鹿兆海战死不归的信念啊！朱先生说：“我会保存好的，等你回来再完璧归赵，还是由你送给灵灵好。”

鹿兆海站起来辞行。朱先生把编纂县志的同人先生一一呼叫出来为鹿兆海送行。十余个老先生一再拱拳，直送到书院门口。鹿兆海已经重新焕发起精神来，问：“先生还有啥话要说吗？”朱先生冷冷地说：“回来时给我带一样念物：一撮倭寇的毛发。”鹿兆海嘎哧一声敬了个军礼：“这不难！这太容易办到了。”朱先生更冷下脸说：“要你亲手打死的倭寇一撮毛发。”

这是白鹿原绝无仅有的一次隆重的葬礼。整个葬礼仪程由一个称作“鹿兆海治丧委员会”的权威机构主持，十七师茹师长为主任委员，滋水县党部书记岳维山和侯县长为副主任委员，社会军队各界代表和绅士贤达共有二十一人列为委员，名儒朱先生和白鹿村白嘉轩，以及田福贤都被郑重地列入。所有具体的事务，诸如打墓箍墓，搭棚借桌椅板凳，淘粮食磨面垒灶等项杂事，都由白鹿家族的人承担。白嘉轩在祠堂里接待了十七师和县府派来安置这场葬礼的官员，表现出来少见的宽厚和随和，对他们提出的新式葬礼的各项议程全部接受，只是稍微申述了一点：“你们按你们的新规矩做，族里人嘛，还按族里的规矩行事。”他转过身就指使陪坐在一边的孝武去敲锣，又对官员们说：“下来的事你们就放心。”

咣－咣－咣－咣，宏大的锣声在村巷里刚刚响起，接着就有族人走进祠堂大门，紧接着便见男人们成溜结串拥进院子；锣声还在村子最深的南巷嗡嗡回响，族人几乎无一缺空齐集于祠堂里头了，显然大家都已风闻发生了什么事情，以及知道了它的不同寻常的意义。白嘉

轩拄着拐杖，从祠堂大殿里走出来站在台阶上，双手把拐杖撑到前头，佝偻着的腰颤抖一下，扬起头来说：“咱们族里一个娃娃死了！”聚集在祠堂庭院里的老少族人一片沉默。白嘉轩扬起的脖颈上那颗硕大的喉圪垯滞涩地滑动了一下，肿胀的下眼泡上滚下一串热泪。眼泪从这样的老人脸上滚落下来，使在场的族人简直不忍一睹，沉默的庭院里响起一片呜咽。白嘉轩的喉咙有点哽咽：“兆海是子霖的娃娃，也是咱全族全村的娃娃。大家务必给娃娃把后事……办好……”有人迫不及待地催促：“你说咋办？快安顿人办吧！”白嘉轩提出两条动议：“用祠堂攒存的官款，给兆海挂一杆白绸蟒纸、一杆黑绸蟒纸；用祠堂官地攒下的官粮招待各方宾客，减除子霖的支应和负担。”族人一哇声通过了。谁都能想到两条动议的含义，尤其是后一条，鹿子霖家里除了一个长工刘谋儿再没人咧呀！老族长白嘉轩这两条动议情深义朗深得众望。白嘉轩接着具体分工，他一口气点出十三个族人的名字：“你们十三个人打墓箍墓，一半人先打土墓，另一半人到窑场拉砖。拉多少砖把数儿记清就行了。墓道打成，砖也拉了来，你们再合手把墓箍起来。”白嘉轩又点出十一个人去搭灵棚：“灵棚咋个搭法？你们按队伍上和县府官员说的法子弄。顶迟赶明个早饭时搭好，灵车晌午就回原上。”白嘉轩又一一点名分派了垒灶台淘麦子磨面的人，连挂蟒纸的木杆栽在何地由谁来栽也指定了。族人无不惊诧，近几年族里的大小事体都由孝武出头安顿，老族长很少露面了，今日亲自出头安排，竟然一丝不乱井井有条，而且能记得全族成年男人的官名，心底清亮得很着哩！白嘉轩最后转过脸，对侍立在旁边的儿子说：“孝武，你把各个场合的事都精心办好。”

一切都在悲怆的气氛下紧张地进行着。白孝武实际操持着巨细事项，一阵儿到墓地上主持破土仪式，一阵儿又在祠堂前戏楼下和族人议定灵棚的具体方位，不断回答各项活路办事人的问询，不断接待邻

近村庄的官人和亲戚，他把各项主要工程的进程主动汇报给队伍和县府的官员，更不忘给这场不寻常的丧事的主人子霖叔说清道明。鹿子霖像个重病未愈的人坐在椅子上，哭肿的眼泡挤住了眼仁，似乎对如何安葬的事毫无兴味："孝武，你就看着办吧！你觉得合适，叔也就合适了……你放心办去。"

朱先生刚刚赶上迎接灵车。灵柩从汽车上抬下来，一边是胸戴白花臂缠黑纱的士兵，另一边是头裹白布身穿白褂的白鹿村的年轻族人，合伙抬着灵柩从村口进入白鹿村村巷。灵柩前头是军乐队低沉哀婉的乐曲，灵柩后头是一班本原乐人喇叭唢呐悠扬忧伤的祭灵曲。心软眼也软的女人们自从汽车停稳看见了漆成黑色的棺枋就扯开嗓子哭嚎起来，引得许多男人也嚎哭了，声震村巷。灵柩进入灵棚，三声震天撼地的火铳连续爆响，两条黑白蟒纸徐徐升上高杆，在空中迎风舞摆。军方和县府各界代表把早已备好的花圈挽联敬挂起来。邻近村庄也纷纷送来纸扎的或绸扎的蟒纸，一个英雄的魂灵震撼着古原的土地和天空。朱先生在白嘉轩的陪伴下走在灵柩后头的前排，他没有哭泣，也没有说话，默默地进入灵棚，跪倒在灵台两侧装着碎麦草的口袋上，默默地为他的学子守灵。白嘉轩劝他尽了心意就行了，到祠堂或者到自己屋里去歇息。朱先生木然跪着不言不语。白孝武进来弯下腰在他耳边悄声说："姑父，队伍上的马营长在祠堂等你，说兆海托他给你捎来一样东西……"

朱先生进入祠堂，马营长把一只铁皮罐头盒子交给他说："鹿团长临终前托我交给你。我一直没敢打开。"朱先生把那个铁盒子在手里转了转掂了掂，又交给马营长说："你把它撬开。"马营长用手抠了抠盖子抠不开，就歪着脖子打算用牙齿咬开。朱先生连忙制止了他："不要用嘴碰它——太脏。"马营长愣怔一下。朱先生说："那里头装着一撮

死人的头发。”马营长眨眨眼问：“先生，你算卦算的？”朱先生说：“是他上中条山之前，我朝他要的，要一撮倭寇的毛发。”马营长惊讶地瞪起眼睛，接着就噢噢噢干呕起来。祠堂里的人纷纷围过来看那只铁皮盒子，手劲大的人把盖子抠起来了，里头果然是一堆头发。倒在地上，才发现不是一撮，而是四十三撮，每一撮都用一根细铁丝拦腰扎死。众人一齐瞪起眼睛。朱先生说：“兆海呀，我明白了，你杀死四十三个倭寇。你……”说着一把抓住马营长的胳膊问：“你跟兆海都上了中条山，你说得准这四十三个野兽残害了多少中原同胞？”马营长“哇”的一声哭了：“谁算得清啊……”

一项事先未作安排的祭礼被朱先生提出来，在刚刚安置下灵柩的灵棚前，焚烧四十三撮野兽的毛发，以祭奠兆海的灵魂。这件撼动人心的事已经纷纷传开，人们拥挤到祠堂里来，争着看那些毛发，究竟是人的头发，还是狼虫虎豹的皮毛？好多人看罢就丧气了，说那些毛发跟本原上人的头发一模一样，都是黑色的直发，却怎么就要到中国来作恶呢？那些毛发被人拿到灵棚前的场地上焚烧，一股焦臭的气味弥散开来，引起好多围在跟前的人呕吐不止……

朱先生在白嘉轩的陪引下去看望鹿子霖。鹿子霖瞧见朱先生就哭了，嗓子完全嘶哑，一声没哭出来就从椅子上软软地跌到地上昏迷了。亲家冷先生一直守候在身边，对轮番昏迷的鹿子霖和鹿贺氏施扎冷针。朱先生扶起苏醒过来的鹿子霖说：“白鹿原上顶好的一个子孙战死了……他是你养的；你不要光是难过，还应该豪气一些！”

朱先生突然改变主意，不再继续参与祭奠活动，在嘉轩家吃了点饭就下原去了，天黑严时回到白鹿书院。他一回来就开始整理书院珍藏的图书，弄得头发上落着一层尘灰。接着就清理书院的财产和粮款账目，包括书院出租土地历年收回租粮的数字，租粮的开销以及剩余的数字，历届县长批拨给编纂县志的经费和开销情况。这些事整整忙了两天，他才于夕阳残照的傍晚时分走出书院，独自一人又转到书院背后的原坡上来，还是秋风萧瑟菊黄如金的深秋时节。三架黑色的飞机轰隆隆响着从原顶上飞过去，这是飞往西安城投掷炸弹的倭寇飞机。倭寇的队伍尚未进入潼关，倭寇的飞机早已从空中对西安进行了轰炸。据说是十七师在中条山连连重创倭寇，他们能占北平却进不了西安，于是就派遣飞机进行报复。最初的轰炸造成了西安城居民的大逃亡，古都突然变成了一个死亡之地，在乡村保存着祖籍的或是沾亲带故的城里人，扶老携幼仓皇逃往乡间，带着七分惊惧三分卖弄的神气，向乡下人绘声绘色叙说炸弹爆炸的恐怖情景。朱先生的妻妹带着一身皮硝味儿逃到白鹿书院，只带着最小的儿子和一个包袱。皮匠既害怕挨炸弹，又丢心不下皮货作坊，说好了一起逃躲，临行时又坐在牛皮上拔不开脚。妻妹在书院刚住下两天，朱先生就发现了这个相貌酷似妻子的女人的全部缺点和令人讨厌的习性：爱说话爱逞能，爱炫耀爱虚张声势，尤其令朱先生不能容忍的是她那种城市人的优越感。朱先生从第二天晌午就不再正眼瞅她，对她的所有表现视而不见，匆匆吃罢饭放下筷子就到前院书房里去；他心里开始起了熬煎，这女人要是住下半年几个月，自己非得被厌烦致死。妻妹也发觉了姐夫的眉眼嘴脸不大谐调。朱白氏给妹妹解释说："你甭在心。你姐夫平常也就是那个眉眼，顶多……那是独槽拴惯了的。"妻妹在白鹿书院躲过月里时光，皮匠丈夫把她又接回城去。西安城已经从最初挨炸的慌恐和混乱中镇静下来，钟楼和四个城门楼上安设了报警器，还听不到飞机的嗡声就响起警报声，人们纷纷钻进城墙根下的防空洞里，屋院宽敞的

人家也完成了自掘地道的工程。皮匠老练地说：“屎咧，没啥害怕的咯！人说钟鼓楼上的鸟儿震惯了胆大，我三天听不见飞机响耳根子还闲得慌慌。”

朱先生瞅着三架黑色的飞机消失在西边的天空，想到皮匠大概正拽着妻儿挤进城墙根下的洞里，忽然生出一个恶毒的想法，炸弹最好撂在皮匠这号中国人的头上。

朱先生从原坡上回到书院天已擦黑，编纂县志的先生们刚刚吊唁鹿兆海回来，在院子里慷慨激昂地谈论着。徐老先生看见朱先生说：“明日是公祭日，十七师师长和县上的头头脑脑都要出面，主事的人让我带话给你，要你明日在公祭会上讲话。”朱先生说：“我不去了。”徐先生惊讶：“你不去咋办？”朱先生说：“坟场我不去了，我要去战场。”老先生们全都惊诧得面面相觑。朱先生沉静地说：“祭奠死者吓不跑倭寇。这样年轻的娃娃都战死了，我还惜耐这把老骨头干啥？徐先生，我走了你来主事，县志还是要编完。书院的各项账目我都开了清单，再也没啥事交代了。”徐老先生说：“你甭给我交代这些手续。我跟你上战场去。”老先生们随之一齐要求跟朱先生上战场，一个比一个情绪慷慨激愤、义无返顾、视死如归。朱先生再三劝解也不顶用，最后说服了一位膝关节有毛病的老先生和门卫张秀才俩人留下。朱先生霍地从石凳上站起：“这样也好。咱们明日一起上原参加公祭大会，我代表咱们几个老朽发表抗击倭寇的宣言。”

朱先生的讲话成为公祭仪式的高潮，甚至完全形成喧宾夺主的局面，也超过了他过去禁烟和赈济的影响，八个老先生的民族正气震动了白鹿原。第二天出版的《三秦日报》在头版显著位置标出了题为《白鹿原八君子抗战宣言》的新闻，震动了城市上下朝野。三天后，上海《文汇报》全文转载这条消息，标题改为《关学大儒投笔从

戎》，影响扩大到南方。一时间，响应朱先生的理学同仁纷纷投书报刊要求取义成仁者超过千人。朱先生对七位先生说："报纸把咱们的后路堵死了，谁想反悔也难了。"

朱先生给另外七位先生放了六天假，让他们回去与家人团聚团聚，安排一下家事也走一走亲戚，此行无疑等于永诀。约定第六天晚上在书院集中，七人竟然无一人缺空。除了朱先生，他们无一例外地遭到儿孙亲朋和乡党们的劝解，甚至大声嚎哭拉胳膊抱腿，然而他们全都冲破了围堵，背着包袱卷儿赶到白鹿书院准时向朱先生报到。朱先生对每一个能够践约前来集中的同仁都是深躬长揖相迎，愈加珍重他们的品格。朱先生特意让朱白氏备置下八碗菜肴为大家壮行，今日自己也开了酒戒，举起杯来说："这杯酒叫做'不回头'。"先生们酒兴泛涨，诗兴大发，争先恐后吟诵诗词抒发豪情。朱先生离席进入寝室，把妻子朱白氏牵着手臂扶坐到席上，然后斟满一杯酒，自己也端起酒盅："咱们结发以来还没喝过酒。你跟我一辈子缝联补袟烧锅燎灶一辈子。我是雷声大雨点小，屁事未成，空受你服侍。我一生不说悄悄话，今日把我谢恩的话当着同仁们说出来：你要是不嫌弃我，我下辈子还寻你……"朱白氏温厚的脸颊上泛起一缕羞悦的云霓，眼里涌出泪花："我下辈子要托生个先生。"朱先生笑说："那我就托生个女人服侍你。"先生们哄笑着，争先给朱白氏敬酒。朱白氏竟然毫不推辞，也不扭捏，连着喝下八盅酒，脸上泛着红晕，反过手给众位先生一一斟上酒，沉静地举起酒盅说："你们八个打死一个倭寇都划得来！"

朱先生回到寝室，带着酒后的轻松感说："你刚才那一句祝辞说得真好。"朱白氏还未答话，门帘忽然挑起，鹿兆鹏站在门口。朱先生和朱白氏都惊愣一下："你……兆鹏？"鹿兆鹏坐下来，直言不讳："先生，我来给你说……"朱先生很敏感："你啥也甭说。我下半夜就走

了，你说啥事我也顾不了了，帮不上了。”鹿兆鹏却扬起脸：“给我吃俩馍，我饿了。”朱白氏取来馍和菜，又端着一壶酒：“你运气好兆鹏，正赶上喝一盅。”鹿兆鹏三五口吃下一个软馍，对朱先生说：“先生你们甭去了！”

“你只管吃馍吧。”朱先生说。

“先生！这不是我劝你，是我们党派我来劝你，出于对先生的敬重和爱护。”

“我还是我。我只做我想做的事。我不沾这党那党。你们也甭干预我。”

鹿兆鹏听出朱先生的口气很硬，继续吃馍吃菜喝酒，以缓慢的口吻说：“先生，你的宣言委实是撼天动地。可也是件令人悲戚的事。蒋委员长有几百万武装精良的军队不打日本打内战，倒叫八个老先生……”

“倭寇杀到窝口了，还在窝里咬！”朱先生嘲笑说，“是中国人，到窝子外头去咬，谁能咬死倭寇谁才……”

“先生你得看出谁咬谁？”鹿兆鹏辩解说，“他咬得我们出不了窝儿，他要把我们全咬死在窝里，根本就是……”

“甭说了兆鹏。我看清了谁咬谁也不顶用！”朱先生说，“我碰死到倭寇的炮筒子上头，也叫倭寇看看还有要咬他们的中国人。”

鹿兆鹏抿下嘴停止了争论，扬起头时转换了话题：“先生，你们到哪儿去打日本？总得投到队伍里吧？”

朱先生说：“到中条山投十七师。”

“先生——”鹿兆鹏缓缓站起来说，“十七师早已撤离中条山回潼关……”

“谁说的？”朱先生惊诧地问，“撤回潼关干什么？撤到哪里去了？”

“撤到渭北去了。”鹿兆鹏也嘲笑说，“按先生的话说嘛，就是撤回来窝里咬！我们叫做打内战。是蒋某人亲自下令撤回十七师攻打陕北红军……”

“你……说的可是真的？”朱先生惊疑地问，“兆海的尸首刚刚从中条山搬回来……”

“兆海……不是日本人打死的，是他进犯边区给红军打死了！”鹿兆鹏痛苦地皱皱眉头，“不过，这消息还未经证实……”

“没有证实的话不要说。”朱先生有点愠怒，“兆海是你的亲兄弟，你说这种话我不爱听。”兆鹏动情地说：“这不是我兄弟兆海的事。”朱先生站起来走到门口，回过头说，“我不信你的话。你说十七师撤离的消息我没听说过。”说罢丢下兆鹏走出屋子。丈夫拂袖而去的唐突行为使朱白氏难为情起来。鹿兆鹏却不显得尴尬，反倒安慰起朱白氏来，没有再多停留就告辞了。

朱先生一行八人鸡啼时分走出了白鹿书院大门，在门前的平场上不约而同转过身来，面对黑黝黝的白鹿原弯下腰去鞠躬三匝，然后默默地走下原坡去了。他们在星光下涉过滋水，翻上北岭，登上北岭峰巅时正好赶上一个难得的时辰，一团颤悠悠的熔岩似的火球从远方大

地里浮冒出来，炽红的橘黄的烈焰把大地和天空熔为一体。沿着山道走到岭下，便是气势恢宏的渭河平原，一条一绺或宽或窄的垄亩纵横联结着，铺展着，一望无际的麦苗在温柔的晨光下泛着羞怯的嫩绿。八个一律长袍短褂的老先生一步一步踏过关中平原的田野和村庄，天色暮黑时终于赶到渭河渡口。

渡船已经停止摆渡。朱先生领着七位老先生央求船公解开缆绳，在天色完全黑严下来还可以摆渡一次。船公闷着头连瞅也不瞅他们，被缠磨久了就冷硬地撂出一句话来："这是军事命令。你求我不顶用，你去求老总吧！"这当儿正好有三个士兵走过来，声色俱厉地盘问起来。朱先生瞧着他们笑着说："小兄弟一个个都很精神噢！给老汉们耍歪可惜了小兄弟们的这精神儿。有这精神到潼关外头给倭寇耍歪去，在那儿能耍出歪来才是真精神……"三个士兵哗啦一声拉开枪栓，对峙着八个老先生，然后连推带搡逼他们到一间草屋里去。朱先生对他的同仁们笑笑说："好！咱们还没过渭河，就在自家窝子里当了俘虏。"又转过头问一个士兵，"要不要我们举起手来？"

一摆溜儿八个老先生真的举着双手，被三个士兵押送到一座草顶屋子，这也许是摆渡的船工烧水煮食和睡觉的地方。屋子里站起来一位军官，竟然是护送鹿兆海灵柩的那位马营长。朱先生一见就揶揄说："你看看老夫举手投降这姿势对不对？"马营长瞪了三个士兵一眼，斥骂一声："眼瞎了吗？"急忙搀扶朱先生坐到屋里一条木凳上，随之豁朗地说："朱先生和诸位先生的抗战宣言我们师长看到了，特派我到这儿来恭候先生。师长命令：绝不能把先生放过河去。这道理很清楚……"朱先生和他的同仁们一齐吵嚷起来。马营长丝毫不为所动："先生跟我说什么都无用，我得执行师长的命令。诸位今晚先到五里镇歇下，明天我再请示师长。"先生们还在嚷嚷不休。马营长说："我还

有军务，不能陪诸位了。我派士兵送诸位到镇子上去……”朱先生一句不吭，率先走出草屋。七位先生愤愤然也走出来。朱先生说：“我明日早起一定要过河。我不管谁的命令。你让你的士兵把我打死在渭河里。”说着就坐在沙滩上：“咱们就坐在这儿等天明吧！”七位先生纷纷扔下肩头的背包，示威似的坐下来。马营长说：“这儿不能有闲杂人。我在执行命令。诸位到镇子上去吧！”朱先生问：“你不是说专意恭候我吗？看来此话属虚。”马营长说：“不要多问，你们快去镇子上。”

朱先生一行八人在五里镇的一家客店里歇息下来，老先生们经过长途跋涉已疲累不堪，一倒下就酣然入睡了。夜半时分，一阵紧急的敲门声，惊得老先生们披衣蹬裤惊疑慌乱。朱先生拉开门闩，马营长和两位侍从站在门口说：“请先生跟我走。”先生们纷纷收拾背包。马营长说：“诸位接着睡觉，只请朱先生一人。”

朱先生跟着马营长走进镇子背后的村庄，又走进一家四合院，进入上房客厅，一位微服便装的中年人迎出来打躬作揖。马营长介绍说：“朱先生，这是我们茹师长。”朱先生惊愣片刻，作揖还礼之后：“真的劳驾将军了。”俩人没有几句寒暄便进入争论：

“先生，你投十七师我欢迎，但你不能去战场。你留在师部给我和我的军官当先生。”

“我把砚台砸了，毛笔也烧了，现在只有一个目标——中条山。”

“那地方你去不得。”

“任啥艰难我都想过了，大不了是死。我就是到中条山寻死去呀！”

“嗬呀朱先生！你到战场帮不上忙倒给我添上累赘了。我可不能睁眼背你这个累赘。”

“我不是累赘。我打死一个倭寇我够本，我打不死倭寇反被倭寇打死我心甘。退一步说，上不了战场还可以给伙夫淘米烧锅，还可以替士兵磨刀喂马……我累死病死战死了也不给你添累赘，我的尸首也不必劳神费事往回搬。”

“先生呵，好我的朱先生呵……”

“现在我不是先生，是你的伙夫马夫……”

“我都去不了中条山了，你怎能去呢？”

“你打败了？”

“我打胜了，又撤了！”

“打胜了为啥要撤？”

“就因打胜了才撤。”

“谁叫你撤兵？”

“还能有谁呢？中国能下令叫我撤兵的只有一个人！”

朱先生默默地闭上口，不再争执要当伙夫或马夫的话了。

“我茹某愧对关中父老啊……”

这是一支真正的关中军。从前任创建者到茹师长都是关中人，一个是祖籍西府，一个是东府土著。从师部一直到连排长也都是关中人，士兵几乎是清一色的三秦子弟，只有个别军官和少数士兵属河南籍的关中人，他们是逃荒流落到关中的河南人后裔。乡谚说“关中冷娃”，而诗圣杜甫曾有“况复秦兵耐苦战”的褒奖。茹师长率领十七师的三秦子弟开出潼关进入中条山，那个中条山随之成为关中父老心目中知名度最高的山脉。出关头一仗打下来，就把茹师长的玉照打到日本侵华司令部长官的桌案上；这支地方色彩甚浓，但在中国武装力量中只能算作杂牌子的军队，竟然使受命进入潼关的大日本王牌师团不敢越雷池一步；茹师长的照片以及他祖宗三代的资料也被搜集出来研究，结果不甚了了。无论日本人起初轻视也罢，吃了一场败仗之后又倍加重视也罢，这支在中国抗战武装力量中确实挂不上号的地方杂牌军，在近二年的中条山阻击战中，使大日本小鬼子不能前进一步吃尽了苦头。中条山之战是日本侵略军在中国土地上遇到的最有力的抵抗之一，终于保持住了中国西北这一方黄土不受铁蹄践踏。

茹师长说：“先生呀！十七师不是亲生娃，是后娘带来的娃咯！把我调出潼关到中条山打日本，我拿的是‘汉阳造’；把亲生娃调到西安来驻防，扛的用的全是美式装备的洋家伙！把我调到中条山，名义上他能得到抗日的赞誉，实际是借日本人之手替他杀死‘后娘带来的娃’！甭说日本人没料到十七师会站住中条山，连他派我出关也根本没想到我会挡住日本人……我在中条山没退一步，得不到奖赏，连军饷也断了；逼我撤军，还冠冕堂皇地说是让我回关内休整……”

朱先生问：“你……这么说你真撤兵了？撤到哪里去了？”

茹师长说：“撤到北山。十七师撤进潼关，他就忘了给我说过的‘休整’的话，立即命令我进北山围剿红军。这回耍的还是一个把

戏：好哇，你能打过日本人，你再去打红军，你打败了红军我高兴，你被红军消灭了同样高兴……”

朱先生悲哀地说：“完了完了，中国完了。鹿兆鹏给我说这话我不信，还训了他，可没料到竟是真的！茹师长……兆海是倭寇打死的，还是红军打死的？”

茹师长突然低下头：“先生别问了呵先生……”

朱先生悲哀地仰起头来：“天哪！天哪……我再不问你啥了……我听够了。我明日早起回我的白鹿原，我等着倭寇来把我杀死好了……”

茹师长说：“先生甭这么悲伤吧！你知道我此行何处？”

朱先生说：“我刚说过任啥事都不想问了。”

茹师长说：“我刚从北边[1]回来，马营长在河边布防怕人暗算我，正好遇见先生。我而今看透了，特别是鹿兆海团长牺牲以后，我才下决心走这一步。好咧好咧，我跟北边谈好了，谁也不打谁……”

朱先生说：“你的这个窝里总算不咬了……我想回店里睡觉去。”

朱先生又回到白鹿书院，给门卫张秀才加立下一条规矩，除了编县志的诸位先生的亲戚，其他任何人都不许放进门来，从此日起，关门谢客。他自己也不再读书，更不为任何人题写字画，早晨开始晚起，草草漱洗之后，就走上书院背后的原坡，傍晚时分仍然在山坡上度过。唯一的一件事，就是批阅修改八位同仁分头编成的县志各部分的手稿，终日几乎不说一句话。他决定不再朝县府讨要经费，用书院官地的租粮来维持县志最后的编写工作。前十卷已经就绪，先送石印

馆付印，后十二卷也即将编完。许多涉外的事，他指靠徐先生办理；后十二卷的通改也由徐先生来做，由他最后再顺一遍。

有一天，徐先生对“民国纪事”一栏提出疑问：“朱先生，‘共军徐海东部过滋水县东山’这一条里的‘军’字是不是笔误？”朱先生说：“不是。”徐先生说：“前边几条里都用的是‘匪’字，改不改？”朱先生说：“不改。”徐先生说：“同在‘民国纪事’卷里，前边用‘匪’字，后边用‘军’字，用字不统一会给后人造成漏洞。”朱先生说：“不统一就不统一吧！留下一点漏洞让后人指责也好咯……”徐先生大惑不解。

鹿兆鹏又一次走进山来，见到芒儿就拱拳作揖：“我来谢你救命之恩，只是太迟了点。”芒儿直戳戳地笑说：“还劝不劝我投奔你们的游击队？”鹿兆鹏也坦然相告：“我劝不下就等着。”芒儿说：“你甭等我，你等黑娃吧。”鹿兆鹏听出话味儿忙问：“这话咋说？”芒儿坦诚地解释说：“我不会改变主意，你等不着。你等黑娃改变主意吧。我早给黑娃说过了，想投游击队，想归顺县保安队都行，弟兄们凡愿意跟他走的都可以走。哪怕剩下我光杆司令，我就夹着麻袋满世界游逛去呀！游到哪儿死到哪儿到哪儿为止。”鹿兆鹏笑了：“等不住你也甭想等住黑娃，他跟你一条辙。”芒儿更加真诚地说：“我倒是盼你能劝下黑娃，让他把弟兄们领走，或保安团或共产党游击队，愿意投哪家子我都不干涉。”鹿兆鹏疑惑地问：“芒儿，你这话越说越离谱儿了。你咋能这样猜估我？”芒儿说：“我说的是真心话。黑娃不信，你也不信？我当土匪当腻了，也累了，我想一个人浪逛四方。”黑娃揉着眼睛走进来，看见兆鹏时惊愣一下。芒儿接着说：“你不信问问黑娃，这话我跟他也说过。”说着走出去：“我去看看把菜弄好了没？兆鹏算你有福，正赶上犒劳酒。”

黑娃有点心神不定地说："兆鹏哥，你再甭提投游击队的事。"鹿兆鹏说："我刚才跟大拇指已经提说了。"黑娃说："提说得不好。你三番几次说服投游击队，孝文也来说服归顺保安团。你想想，我怎么跟大拇指共事？"鹿兆鹏不以为然："不！我刚才听大拇指的口气……倒是有变化。"黑娃摇摇头："你甭上当！"鹿兆鹏就摊开底儿问："先不说大拇指，我只问你，你到底打的啥主意？你想投游击队还是想投保安团？还是哪家也不投，继续当土匪？我再说一遍，你撇开大拇指，单说你心里到底怎么打算的？"黑娃瞅了兆鹏一眼，低下头陷入沉默。鹿兆鹏瞅了瞅黑娃的架势说："好咧，你甭回答了，我明白了。"黑娃扬起头说："你啥也不明白！大拇指不投游击队，我也不投游击队。"鹿兆鹏突然说："那你们就去归顺保安团。"黑娃咧了咧嘴嘲笑说："你说气话吧？"鹿兆鹏点点头说："是真话。归顺保安团。"黑娃迷惑地眨眨眼："你来替孝文活动？"鹿兆鹏笑笑说："各为其主嘛！"

大约半月后的一天夜里，黑娃正睡着，被一阵女人的惊叫声吵醒，拉开门一看，黑牡丹一丝不挂，披头散发，抖抖索索站在月亮下，说大拇指死在她的炕上了。黑娃一把推开黑牡丹跑进她的窑穴，大拇指芒儿趴在炕上，两只胳膊一只压在腹下，一只抠进苇席里头；一条腿蜷在炕席上，一条腿吊在炕墙下，满炕都是污血。土匪弟兄们全都拥来乱哭乱叫。大先生走过来，先摸了一下脉，又翻起大拇指的脸看了看，对黑娃说："五倍子。"

黑娃黑着脸，把吓得软瘫在院子里的黑牡丹揪着头发拖到油灯下。这是黑娃首先想到的第一个凶手。黑牡丹虽然吓得傻愣，却仍然本能地替自己辩解。她的话语黏滞结巴，前言不接后语，却向黑娃以及众土匪基本叙述清楚了大拇指死亡的情景：大拇指提着酒葫芦进了她的窑洞。大拇指每次进她的窑洞都提着酒葫芦，自己喝着也给她灌

着。大拇指仍然和往常一样喝着酒，和她耍着，也给她灌着酒，喝得他半醉她也半醉的时候，他才和她弄那事。他刚进入她的身体，就浑身打战，一下子泄了，接住“哇啦”一声喷出一股血来，喷得她满脸满脖子都是。她吓得爬起来，看见大拇指在炕上一扭一拧地喷吐着血水……黑娃问：“你把五倍子给倒进酒葫芦了？”黑牡丹反辩说：“那不连我也毒死了？他也给我灌酒！”黑娃尚未开口，几个土匪弟兄已经揍起来了，打得黑牡丹在地上滚着叫着，直到不滚也不叫，黑娃才制止了众弟兄。

清除凶手的内乱持续了几乎一个月。先头侧重于出事那天晚上谁到大拇指窑里去过，聚宴时谁和谁都给大拇指倒过酒敬过酒，谁跟大拇指挨近坐着等等细节，被牵涉被怀疑的土匪一一领受了杖责和捆绑，却没有一个人招认。随后又从人际关系上搜寻线索，某人曾对大拇指说过二话，某人对大拇指处罚他的事怀恨在心……如此等等，又有一批弟兄遭到皮肉之苦，却仍然没有抓获真正的凶手。黑娃被这场暗杀事件搞得疑神疑鬼，既怀疑弟兄，也担心弟兄们怀疑自己，他敞开亮明地宣布：“敢毒死大拇指，也就敢毒死二拇指我。再说，要是查不出个水落石出，有弟兄还疑心是我下的毒手，说我想当寨主了……”黑娃随之决定重赏揭发下毒的人，直至抛出“谁揭露出内奸，就推谁为大拇指”的动议。土匪窝子里很快出现互相怀疑，互相告密，胡踢乱咬的局面。有人被揭发被杖责之后，拖着两腿鲜血，爬到黑娃窑里又去揭发旁的弟兄，几乎所有弟兄都揭发过别人，又被别人揭发过，因此几乎所有弟兄无一例外地都挨了棍杖，打了屁股。后来发生了这样一种情况，好多人重新回过头来一齐咬住黑牡丹，众口一词咬定毒死大拇指的内奸非她莫属。道理很简单，百余号弟兄里只有她一个是被迫掳上山来的，只有她对大拇指怀着深仇，才下得了这种毒手。黑娃也能想到这一层，于是又把黑牡丹拉出来杖责。黑牡丹尚未从头一回的

酷刑伤疼里恢复元气，招不住几棍就咽了气。弟兄们咋呼着把黑牡丹扔到沟底，咋呼着给大拇指报了仇，咋呼着应该结束这场事件了，也该出去“做活”了。黑娃冷笑一声说：“黑牡丹不是内奸，我从她死时的眼睛里能看出来。真正歹毒的家伙还没抓住……”追查内奸的事继续着，山寨里的危机发展到白热化。一个被揭发被杖责的弟兄开枪打死了告密的弟兄，接着就朝自己的脑袋开了枪。弟兄们纷纷哭劝黑娃暂停追查，或者改变一下追查的方式方法。黑娃拒不理睬他们，更加坚硬地说：“抓不出那个内奸，咱们就散伙！”接二连三又发生了弟兄逃离事件，先是一个，接着两个，跟着又有两个，相继不辞而别，山寨里处于人心涣散，分崩离析的局面……黑娃已无力扭转。

白孝文适得其时来到山寨。

白孝文一句话立即制止住土匪窝子里的内乱：“黑娃，你再追查下去就要挨黑枪。”黑娃焦躁地说：“那样倒好，我也可以对弟兄们明心了。”白孝文并不赞赏这种义气到死的愚忠，以轻俏的口气说：“你甭查了。凶手跑了。”黑娃将信将疑，逃走的五个弟兄不仅与他没有私怨，和大拇指也没有什么隔卡蒂隙。白孝文意味深长地说：“听说兆鹏前不久来过？”黑娃说：“这跟他有啥屎关系？”白孝文笑笑说：“你敢肯定你的窝子里没有他的人？堂堂县府里都被他砸进楔子了。共产党搞这一套可真是无孔也能入哩！”黑娃摇摇头说：“我至今还没查出一点线索。”白孝文就亮出底牌：“我的情报已经获悉，你这儿有两个弟兄逃出去投了游击队，这俩人就是兆鹏安插进山寨的底线儿。”黑娃惊疑地瞪大了眼睛：“这要是真的，兆鹏也就太不仗义了！”黑娃终于在烦躁的思考中松了口：“好吧！我得看弟兄们下不下山。”

决定去留的重要会议在山寨议事大厅（洞）召集。白孝文有一种瓜熟蒂落的预感，十分自信地向土匪们讲述了滋水县最新的局势：“这

是一个机会。千载难逢的一个机会。根据国家局势，县府决定扩大保安团编制，新增一个炮营。我跟张团长说妥了，弟兄们下山后，连窝端进炮营不拆伴儿。鹿兆谦当炮营营长。”土匪们被内乱搞得灰心丧气，精疲力竭，好多人对归顺保安团颇为动心，只是谁也不敢挑梢露头。黑娃尽管再一次强调“由弟兄们决断”，却仍然没有人吭声。白孝文很真诚也很洒脱地说：“日本人在中国撑不了几天了。打完日本，政府就要收拾共匪。收拾共匪，那仅是小菜一碟、猴毛一撮。收拾了共匪之后，自自然然该剿灭土匪了。弟兄们现在不愁吃不愁穿，天不收地不管，自由自在，等到那时候就麻烦了。所以我说这是一个机会……”在众人的沉默中，那位刀箭药先生站起来说话了：“我老了，啥也不图了，只求死了能归祖坟。”土匪们随之纷纷喊起来：“归顺保安团……”黑娃抱起双拳，跪倒在众人面前：“我跟众弟兄走，是崖是井也跳咧！”

滋水县境内最大的一股土匪归服保安团的消息轰动了县城。鹿黑娃的大名鹿兆谦在全县第一次公开飞扬。这股土匪从匪首到匪徒，全部隐姓瞒名使用奇怪的代号，谁也搞不清他们的真实姓名。白孝文和鹿黑娃领着百十名土匪走进滋水县城的南北大街，两边店铺里的市民放起了鞭炮。在县城南边保安团的营地举行了受降仪式，县党部书记岳维山、侯县长和保安团张团长亲临欢迎。黑娃和岳维山握手时感到极大的不自在。岳维山攥住黑娃的手说：“咱们是老朋友了，我欢迎你。”黑娃满脸尴尬地苦笑了一下。

黑娃和弟兄们从一开始决定受降招安就潜藏在心底的疑虑很快得以化释，弟兄们全部编为新成立的炮营，黑娃被任命为营长。白孝文因功劳卓著，受到县府嘉奖。白孝文终于有了对黑娃推心置腹的机会：“兆谦兄，我欠你的……到此不再索赔了吧？”

[1] 北边：即共产党中央所在地延安。

第三十章

某天早晨，中华民国政府对设在白鹿原的行政机构的名称进行了一次更换，白鹿仓改为白鹿联保所，田福贤总乡约的官职名称改为联保主任；下辖的九个保障所一律改为保公所，鹿子霖等九个乡约的官职称谓也改为保长；最底层的村子里的行政建制变化最大，每二十至三十户人家划为一甲，设甲长一人；一些人多户众的大村庄设总甲长一人；这种新的乡村行政管理制度简称为保甲制。这不仅仅是名称的更易，重要的是在于防止和堵塞共产党势力在乡村的滋生和蔓延。在整个原上的所有村寨完成新的建制，而且任命了全部甲长总甲长和保长以后，田福贤第一次以联保主任的新面貌召集了一次联、保、甲三级官员会议。田福贤开宗明义地说："日本投降了就剩下共产党一个对手了，现在从上到下要集中目标，一门心思收拾共匪。中华民国的内忧外患将一扫而光，天下即可太平。甲长要保证你管辖的那二三十户里头不出共匪，不通共匪；总甲长要保证你那个村子不出共匪，不通共匪；保长要保证你属下的大村小庄不出共匪，不通共匪；我田某嘛，也向县上具保，在白鹿联保所辖属的区域彻底剿灭共匪。哪个保哪个村哪一甲出了共匪通了共匪，就先拿哪一甲甲长是问，再拿总甲长和保长是问，当然嘛，县上也要拿我是问。诸位，这回可得眼放亮点儿。剿共比不得打日本，日本占了大半个中国，终究没能打进潼关，抗战八年咱们原上人连小日本一个影子也没见过；共产党比不得日本鬼子，这是土生土长的内匪家贼，他额颅上没刻共字，站在跟前你也认不出来，所以嘛，我说诸位得多长个心眼儿，眼睛也得放亮点儿。白鹿原是共匪的老窝儿，全县的第一个共匪党员就出在原上，全

县的头一个共党支部也建在咱这原上，而且就在白鹿联保所辖地以内，在县上在省上咱们白鹿联这回都划入重点查剿地区……”

田福贤接着布置征丁和征粮任务。二丁抽一是原则，也是具体实施准则；新增的军粮是官粮以外的项目，两者都属于非常时期的军事性质的举措，同样是为了剿灭共匪祸患的需要。田福贤宣布了各个保公所征丁和征粮的数目以后，看见好多甲长们瞠目结舌的表情，这是他事先预料得到的，他用惯常那种简捷明朗的语言说：“县长说明白了，这回不怕谁再闹‘交农’，谁抗粮不交有丁不出，还搞什么鸡毛传帖惑众闹事，一律按通共格杀勿论。丁征不齐粮征不够，先甲长后总甲长再后是保长层层追查，到时候可甭怪我田某人睁眼不认人……”

保甲制度实施以后所干的头两件事——剿共和征丁征粮，立即在原上引起了恐慌。原上现存的年龄最长的老者开启记忆，说从来没见过这样普遍的征丁和这么大数目的军粮，即使清朝也没在原上公开征召过一兵一卒，除了给皇上交纳皇粮外，也再没增收过任何名堂的军粮。民国出来的第一任滋水县史县长征收印章税引发“交农”事件挨了砖头，乌鸦兵射鸡唬众一亩一斗，时日终不到一年就从原上滚蛋了。而今保甲制度征丁征粮的做法从一开始就遭到所有人的诅咒。白鹿镇的三六九集日骤然萧条冷落下来，买家和卖家都不再上市。白鹿保公所保长鹿子霖突然被捕收监的意外事件，一下子把刚刚嗓起的慌乱和怨愤气氛从一切公开场合抑压下去了。

那天早饭后，鹿子霖在保公所里跟下辖的各甲长总甲长们正在开会，逐村逐户核查每家的男人和他们的年龄，最后确定谁家该当抽丁。

第一次的初查登记遇到无穷无尽的麻缠，几乎所有父母都找到甲长总甲长家里去说明儿子年龄不够，好多甲长碍于左邻右舍或同族同宗的面皮，就将矛盾上交给保长鹿子霖。鹿子霖不得不与甲长们掐着指头核对他们的属相，该征的壮丁名单很早拟定下来，但由于种种搅缠而不能下达……

“先把已经查实的壮丁名单公布下去，胡搅蛮缠的逐个再核。”鹿子霖对甲长们说，“要是查出来仨俩隐瞒岁数的人，拉来砸一顿军棍做个样子。要不嘛，这个保长我就没法子干咧！”甲长们赞成这个办法，因为他们比保长的处境更加为难。鹿子霖说完这个办法之后，就瞅见门里一溜儿拥进来五六个戴黑盖帽的保安团团丁，起初还以为他们是来督查征丁军务的，便站起身来招呼他们坐屋里喝茶。领头的一个问：“你是鹿子霖不是？”鹿子霖刚点了一下头，还没答上是与不是的话来，后边的四五个团丁一拥而上，就把他给结结实实捆起来了。在座的甲长总甲长们大惊失色，鹿子霖急得煞白着脸喊：“咋回事咋回事？我是保长，你们凭啥绑我？”领头的团丁只是出于职业习惯回答说：“到县里你再问头儿去，子丑寅卯由头儿给你说。我只管绑人逮人，头儿叫逮谁我就逮谁。”鹿子霖在被推出房门时差点栽倒，气得浑身直打哆嗦：“我要当着岳书记的面把事弄明，是谁在背后用尾巴蜇我？”

白鹿村对鹿子霖的被逮噪起种种猜测，有的说是鹿子霖隐瞒本保的土地面积和壮丁的数目，违抗了民国法令；又有人说是冷先生将亲家鹿子霖告下了，犯了逼死儿媳罪，又伤风败俗；有的人说鹿子霖招祸招在儿子鹿兆鹏身上，县府抓不到共产党儿子就抓老子，正应验了“逮不住雀儿掏蛋，摘不下瓜来拔蔓”的俗话。种种猜测自生自灭，哪种说法都得不到确凿的证实。过不多久，猜测性的议论又进一步朝深

层发展，推演到鹿子霖的人际关系上头来。鹿子霖和黑娃的女人小娥有过那种事，黑娃而今是县保安团三营营长，有权有势更要有面子，势必要拾掇鹿子霖；再说孝文早在黑娃之先就已经在保安团干红火了，自然不会忘记鹿子霖拆房的耻辱，真是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谁会料到浪子孝文、土匪黑娃会有这般光景，这番天地？鹿子霖遇到这两个对头哪能有好果子吃。

白鹿村对此事最冷静的人自然还是白嘉轩。孝武被任命为白鹿村的总甲长，亲眼目睹了鹿子霖被抓被绑的全过程，带着最确凿消息回到家中，惊魂未定地告诉了父亲。白嘉轩初听时猛乍歪过头“噢”了一声，随之又恢复了常态，很平静地听完儿子甚为详细的述说，轻轻摆一摆脑袋说：“他……那种人……”孝武又把在村巷里听到的种种议论转述给父亲，白嘉轩听了既不惊奇也不置可否。他双手拄着拐杖站在庭院里，仰起头瞅着屋脊背后雄巍的南山群峰，那架势很像一位哲人，感慨说：“人行事不在旁人知道不知道，而在自家知道不知道；自家做下好事刻在自家心里，做下瞎事也刻在自家心里，都抹不掉；其实天知道地也知道，记在天上刻在地上，也是抹不掉的。鹿子霖这回怕是把路走到头了。”白嘉轩说着转过身来，对聆听他的教诲的儿子说：“你明天到县上去找你哥，让他搭救子霖叔出狱。你给你哥说清白，要尽心尽力救。”

鹿子霖的女人鹿贺氏走进来，黄肿发胀的脸颊和眼泡儿上都流露着焦虑。白嘉轩以少见的热切口吻招呼她屋里坐，不等鹿贺氏开口，就赶忙询问鹿子霖的情况。“啥啥儿情况连一丝丝儿也摸不到。”鹿贺氏说，“我跑了两天，冷先生哥也专程到县里去了一回，甭说见不到人，连一句实情都问不出来。”白嘉轩替她宽心：“你甭急也甭乱跑了。我跟孝武刚刚说过，让他明早到县上找孝文先打探一下，看看到

底是因为啥事由。问清了事由儿，才能对症下药想办法。”鹿贺氏翻起沉重的眼泡儿感激地说：“我来寻你就为这事。哥呀，我知道你为人心长。”白嘉轩鼻腔里不在意地吭了一声，摆摆头说：“在一尊香炉里烧香哩！再心短的人也不能不管。”鹿贺氏说她昨日找过鹿三，求他到县上跟黑娃打探一下，鹿三脖子一扭说，我为我的大事小事也没寻过他。我不是他爸，他不是我儿，你还不知道？你叫我求拜他是糟践我哩！白嘉轩笑笑说：“三哥那人你明白，是个倔豆儿咯！”鹿贺氏临到从椅子上站起身来告辞时，颤着声说：“我这阵儿倒再指靠谁呀？”

白嘉轩听了这话心里一沉，默然瞅着鹿贺氏走出院子。鹿家眼下已经走到独木桥上，而河中心的那块桥板偏偏折断了，鹿兆鹏闹共产，四海闯荡，多年不见音信，鹿子霖有这个儿子跟没这个儿子是一回事；鹿兆海死了。在原上举行过一次绝无仅有的隆重葬礼，坟头的蒿草冒过了那块一人高的石碑，完全荒寂了；鹿子霖家修筑讲究的四合院里，现在只剩下一个黄脸老婆子鹿贺氏楦在里头。白嘉轩拄着拐杖站在庭院里，眼前忽然浮起小他两岁的鹿子霖幼年的形象，前胸吊着一个银牌儿，后心挂着一只银锁，银牌和银锁上各系着两只小银铃，凭银铃的响声可以判断鹿子霖是平步走着还是欢蹦蹦地颠跑着……鹿子霖他大鹿泰恒对儿子所犯的致命性错误，鹿子霖自己又在他的后人兆鹏兆海身上重犯了。家风不正，教子不严，是白鹿家族里鹿氏这一股儿的根深蒂固的弱点，根源自然要追溯到那位靠尻子发起家来的老勺勺客身上，原本就是根子不正身子不直修行太差。“这是无法违抗的。”白嘉轩拄着拐杖，泥塑一般站在庭院里思虑和总结人生，脑子里异常活跃，十分敏锐，他所崇奉的处世治家的信条，被自家经历的和别家发生的诸多事件一次又一次验证和锤炼，愈加显得颠扑不破。白嘉轩让孝武到县上去做搭救鹿子霖的举措，正好发生在鹿贺氏登门之前，完全体现了他“以德报怨以正祛邪”的法则。他在得悉鹿子

霖被逮的最初一瞬间，脑子里忽然腾起鹿子霖差人拆房的尘雾。他早已弄清了儿子孝文堕落的原因。他一半憎恨鹿子霖的卑劣，又一半谴责自己的失误。现在他无疑等到了笑傲鹿子霖身败名裂的最好时机。他没有幸灾乐祸，反而当即做出搭救鹿子霖的举措，就是要在白鹿村乃至整个原上树立一种精神。他几乎立即可以想见鹿子霖在狱中得悉他搭救自己时该会是怎样一种心态，难道鹿子霖还会继续得意于自己在孝文身上的杰作吗？对心术不正的人难道还有比这更厉害的心理征服办法吗？让所有人都看看，真正的人是怎样为人处世，怎样待人律己的。

白嘉轩听到一阵急促的脚步声，回头看见孝武神色紧张地走到跟前，他告诉父亲一个意料不到的消息："爸！田主任让我顶上一保保长的空缺！""唔？当保长？"白嘉轩说，"你先到县上去办那事，你子霖叔家婶子刚才来过……你明早就起身。"

鹿子霖已经沉静下来。从保安团团丁把一条细麻绳缠到他的两条胳膊上算起，直到拽着他走过原上的官路，走进滋水县城，然后推进只有一个小孔的牢门，在散发着一股腐臭气味的牢房里刚度过了一个后晌和一个夜晚，盼来了监牢里陌生的第一个黎明时分，他都一直处于愤怒到癫狂的情绪里。从小孔里接过第一餐囚犯的黄碗时，他更加狂怒，扬手就摔砸在墙壁上。当他接受了第一次讯问之后，又立即安静下来，安静地坐在靠墙的床板上，呼气吸气都很匀称。当他从小孔里接过一碗蒸腾着焦煳味儿的苞谷糁子时，对送饭的狱卒说了一句调皮话："兄弟，你烧熬糁子的时候，是不是在耍㞞？糁子烧焦了，你喂我家的狗狗也不喝！"鹿子霖还是喝了那碗散发着焦煳苦味儿的苞谷糁子，而且喝得一滴不剩，用筷子头儿越来越欢快地刮刨着黏滞在黄碗碗壁上的糁子粒儿，仍然不忍心放弃，干脆扔了筷子伸出舌头舔起来。他现在才回忆起前一顿饭是在自家屋里吃的，这一碗饭正好与前一顿饭间隔两天一夜。

第一次审讯十分简单："你把你的共匪儿子的行踪供出来，就放你回去。你啥时候想通了，就随时说话。我们有充分的证据，证明你知道你儿子的底细。"鹿子霖听明白了，也就不再慌乱，不再生气，更不会摔碗掷箸与饭食为仇了。他当即做好了死在这张硬板床上的准备。他在审讯时只问了一句话："要是我说不出兆鹏的影踪，大概就得在这不刮风不淋雨的屋子里蹲到死吧？"审判官抿了抿嘴，没有回答他的挑衅。鹿子霖吃完以后，就仰躺在床板上，高高跷起一条腿，心里想：修下监狱就是装人哩咯！能享福也能受罪，能人前也能人后，能站起也能圪蹴得下，才活得坦然，要不就只有碰死到墙上一条路可行了。鹿子霖唯一感觉难受的是没有烟抽。他狠狠抽了自己一巴掌，嘴唇垫硌在牙齿上一阵刺疼抑制住烟瘾。厚重的木板门吱扭一声，白孝文一脚跨进门来。鹿子霖从木板床上骨碌一翻跳下地："孝文，快给叔掏一

根烟。”白孝文从口袋里摸出烟盒递给他。鹿子霖急不可待地抽出一支，颤抖着手指在孝文划着的火柴上点燃了，闷着头猛吸了一阵，随之放出一口浓浓的烟雾，呛得他大声咳嗽流出眼泪，天真如孩子一般笑了说：“饿咧渴咧都能忍得住，就是烟瘾发咧忍受不住。”

白孝文一身笔挺的戎装，显示出一个儒将的优雅风姿。鹿子霖的烟瘾得到缓解，情绪也安静下来，瞅着站在眼前的孝文，想起舍饭场上与死亡只有半步之隔的那个败家子的形象。他做出满不在乎豁然朗然的轻松姿态，爽快地承受着孝文的关心和安慰：“老侄儿，你放心，叔把世事看得开，这事嘛，也想得开。你今日能来看叔一回，这就够了。你给你婶捎话，让她给我买二斤旱烟叶子捎来，再啥我都不在乎。”白孝文说：“后晌我就差人给你送一把烟叶子。”随之告诉他：“岳书记在省上挨了‘头子’，回到县上大发脾气……亲自拍板叫抓你。有人说你曾经找过兆鹏，岳书记推测你肯定知道兆鹏的底细。岳书记抓你朝你要兆鹏，谁也不好开口给他说话……”鹿子霖一听就呵地笑了：“岳书记听信那些闲传，真是挨‘头子’挨昏了！老侄儿，你管不了这事我知道，你只要给叔把烟叶子送来就行了。”

第二天，卫兵又押鹿子霖出门。鹿子霖对审问有一种家常便饭不再新鲜的感觉。走出大门时，发觉与头次审讯走过的路方向相背，猛然想到该不会就这么快、就这么糊里糊涂给枪崩了吧？及至被押进县府大门，他仍然疑虑难释。鹿子霖被押进一间窄小的房子，想不到岳维山书记从套间里走出来，动手就解他胳膊上的绳子。鹿子霖拧扭一下臂膀，拒绝岳维山的虚情假意："甭解甭解！就这样绑着倒好。"他眯缝着深陷的眼睛瞧着窗户。岳维山收起了脸上的笑容，挺坐在一张椅子上开了腔："你不要想不开。省上剋我姑息养奸。你还要什么脾气，使什么性子？"鹿子霖硬顶："要说姑息养奸，那不能问罪于我鹿某。是谁出口闭口国共合作？是谁在白鹿区分部成立大会上跟共匪兆鹏肩并肩坐在主席台上？是谁讲话时挽着兆鹏的手举到头顶哝？我那阵子就不赞成兆鹏闹共产。这阵子倒好，你们翻脸了把我下牢！"岳维山平淡地笑着说："这就叫此一时彼一时也。我听说你领着儿媳到城里找兆鹏，有这事没有？"鹿子霖扬起头："有！"洪亮的嗓音显示着诚恳，也喻示着这事情并不重要。然后以坦然的口气解释说："儿媳有病，是女人家的内症。她爸是先生，专门给人治病，可不好问女儿那些病症，我就引她到城里去看病。村里有人糟践我，说我给儿媳种上了，去找儿子接茬……你堂堂滋水县岳书记听凭几句闲传，就把我绑了下牢，正好把这瞎话搁实了。甭说我通共不通共，单是这瞎话，就把我的脸皮揭光了剥净了。我没脸活人了，我准备死到你的牢里，啥也不想了。"岳维山对他与儿媳有没有那种事不感兴趣，倒是对他毫不忌讳地说出这件事感到惊奇，就冷着脸狠狠戳他一锥子："鹿子霖，你的脸真厚！你甭跟我死呀活呀耍无赖，监狱里死人，你想想会算个啥事？你引儿媳究竟是看病，还是找兆鹏？我没有一点把握就能绑你？你不要自作聪明，也甭耍无赖，说实话为好。你好好想想，再掂量掂量，你想通了说了实话，就放你回家。你早晨说了，晌午就放你走。你的事情不复杂，就这一条。"鹿子霖说："没有啥想的。我早都活得

没劲咧。我一个娃为国为民牺牲了性命，一个娃当共匪，跟没有他一样。独独儿剩下我栽在世上，还不及死了好！”岳维山说：“你甭耍无赖，也甭耍小聪明，我认识你。”

白孝武从县上回到白鹿村，详细向父亲叙说了搭救鹿子霖的经过，最后说：“岳维山亲手掐着子霖叔的脖子朝他要兆鹏，谁眼下也不敢求他松开手。”白嘉轩缓缓地吸着水烟听着，噗的一声吹出水烟铜管里的烟灰，平静地说：“你去给你子霖婶回个话。我们算是尽了心了。”孝武却转了话题说：“爸，黑娃说要回来到祠堂祭祖。”白嘉轩不禁一愣。

孝武又接着叙说这件事：他在孝文哥那儿吃晚饭，黑娃来找孝文商量事情，还说了鹿子霖被下牢的事，随后对他说：“孝武，你回去给嘉轩叔捎句话，我想回原上祭祖。”孝武对这个突如其来的要求拿不定主意，恐怕父亲不会应允这个要求，就说：“我保险把你的话捎到。”孝武第二天回来时，绕道到白鹿书院看望大姑和姑父朱先生。朱先生郑重其事地说：“鹿兆谦想回原上祭祖，你给你爸捎句话，我跟他一搭陪他回原上去。”

白嘉轩听到这里忙问：“你给你姑父咋回话来？”孝武说：“我说这事事关重大，我一定把话原封不动捎回来。”白嘉轩把水烟壶往桌子上一蹾：“蠢货！你连这样的事都分辨不清，你真蠢！”孝武的情绪顿时受挫：“我想黑娃那样的人，咋能再进祠堂？”白嘉轩凛然站起：“你明天就找几个人，把祠堂清扫一下，香蜡纸表都备齐整。后日你就到县上去迎接鹿、兆、谦。”

遵照归顺谈判达成的协议，近百号土匪弟兄全盘端进第三营，即炮营。黑娃接受了张团长对炮营进行整训的命令。三个军事教官来到炮营，对刚刚征召进来的年轻后生和土匪进行基本的军事操练，仅仅队列操练就搞了整整半个月，才勉强可以踏出整齐的步伐。土匪弟兄对这种机械而单调的训练从一开始就不大在乎，说这种纯粹摆设性的动作不顶屎用，打起仗来根本不靠这些花架子。黑娃在习旅接受过正规军事训练，对弟兄们吊儿郎当的行为很生气，当众杖责了两个敢于顶撞军事教官的弟兄，然后铁着脸说："弟兄们，咱们现在是正规军队了，得有军队的规矩。"随后才进行持枪操练。土匪们原有的乱七八糟的枪一律入库，每人配发一支蓝光熠熠的新枪。土匪弟兄们这时候出尽风头，实弹射击的命中率令三位教官大为吃惊。最后进行大炮射击操练，按规定应该将步枪重新收回。黑娃拒绝执行这道命令。张团长解释说："炮营不配发步枪，在正规军队里也是这样。"黑娃说："规矩我明白。步枪得给我配备，要不然让二营干炮活儿。"张团长眨了眨眼睛，释然笑了："好了，我明白了，步枪不收了。"

到张团长家赴宴是黑娃归顺以后的重要一步。黑娃进屋时，一营长白孝文、二营长焦振国已经在座。团长和他打招呼之后，又唤来太太和他见面认识。张团长专意请来了县城里头把勺子冯师做菜，黑娃面对一盘又一盘精细的菜肴不忍动箸。酒过三巡，张团长直戳戳对黑娃说："兆谦，你晚上再不闭着眼睛睡觉，我就请你回山上再当你的山大王。"白孝文和焦振国都哈哈大笑。保安团里神秘地传说着三营长鹿兆谦晚上有睁着眼睛睡觉的习惯。黑娃不好解释什么，因为团长说的不过是一句笑闻，也就不在意地笑笑："甭听那伙人给我胡咧咧。"张团长却认真起来："我看不是胡咧咧。你自下山以来，没在城圈里睡过一夜，是不是？"黑娃的炮营驻扎在古关峪口，他一直坚持住在营部里，就点头说："官不离兵，这是领兵规矩。"张团长摇摇头说："规矩

不是坏规矩。可你这是不放心我，你怕我单个收拾你。你甭朝我瞪眼。你硬要给炮营士兵配发步枪合不合规矩？说透了还是为着防备我。对不对？”黑娃在这样突如其来的追问下，有点无措。白孝文和焦振国也始料不及而局促起来。张团长又进一步说：“你还信不下我。你信不过我，怎样跟我共事？我当团长，连我手下的营长都信不过我，这咋弄？我是个外路人，出门全靠朋友，你信不过我，我可是实打实相信你。”

于是便喝血酒。四个人由张团长率先割破指头，将血滴入酒壶里，其他人一一仿效，然后从酒壶里把混合着四个人血浆的红色酒液斟满四个酒盅，一齐端起来饮下。黑娃猛然想起头一次和大拇指芒儿饮血酒的情景。他对另外三位说：“张团长，白营长，焦营长，鹿某只有一条可以夸口：从不负人。”张团长擂一下桌子：“我一生就凭这一条活人！”

黑娃随后完成了他的第二回婚事。白孝文先给他介绍了一位老秀才的女儿，张团长又给他瞅下县城一家布店老板的女儿，张团长和白孝文为此而发生了友好的争执。白孝文坚持认为老秀才的女儿知书达理，对黑娃所缺乏的东西正好是一个补充；那女子聪明过人，没上过一天学却能熟背四书，全是听老秀才诵读时记下的。张团长认为这种女子对黑娃来说，是丝线缝麻袋——太细了倒糟糕；黑娃需得一个飒爽利落的女人操持家务，应酬必不可少的社交场面。俩人争论的结果，还是让黑娃抉择。焦振国打哈哈说，干脆让黑娃抓阄，抓着谁算谁命大。在他眼里，无论哪个都不过是个女人。黑娃终于选定了高老秀才的女儿玉凤，诚挚地说：“团长，我需得寻个知书达理的人来管管我。”

临到白孝文正式做媒向老秀才求婚时，高老秀才只提出一个先决条件，要求未来的女婿必先戒掉吸“土”的毛病，并且申明这是他女儿玉凤的要求，否则将以死抗婚。黑娃对孝文说：“好办。”他在猛吃硬塞下六个饦饦一碗的羊肉泡馍后，命令他的弟兄说：“把我捆到大炮筒子上，绳头拴成死结。”黑娃在炮筒上被捆绑了整整五天五夜，汤水未进；第三天时下了一场瓢泼大雨，他骂走了企图割断绳索的团丁……黑娃戒烟成功，不仅娶回了老秀才的小女儿，而且使他的威名震撼了县城各个阶层，这人真是个冷家伙。

黑娃在县城买下一院房子，雇请工匠进行了一次彻底的修缮，出脱成一院漂亮的新房了。红火的婚礼仪式就在这儿举行。婚礼这部繁缛冗长的大书的每一章每一节的实施，都给黑娃一次又一次带来欢乐又招来痛苦。他戴着红花跨上红马，随着呜哇吹响的喇叭乐队出发迎亲的时候心跳如兔蹦，以至看见岳丈老秀才斯文的举止，忽然想起小娥父亲羞于见人的面孔，那也是一位知书达理的老秀才；黑娃跟着彩饰的花轿在欢乐悠扬的乐曲中回程的时候，忽然想到在渭北那个武举人家攀树翻墙与小娥偷情的情景；黑娃领着新娘走进大门又走进洞房的时候，猛烈爆炸的雷子炮和串子炮使他血液沸腾，即使在这样热烈嘈杂的场合里，脑子里仍然闪出和小娥走进村头窑洞时的情景；黑娃揭开新娘子蒙在脸上的红绸盖巾，屏声静息地看见一张羞怯掩盖下的沉静自若的面孔时，眼前又一下子闪现出小娥那张眉目活泛生动多情的模样……及至婚礼大书翻到最后一页，酒席收盘、宾客散去、庭院沉寂、红烛高照时，这种现实的欢乐和回忆的痛苦互相扭缠互相侵犯的心境仍然不能止息。洞房的门闩插上以后，黑娃的心情变得更加糟糕，他觉得自己十分别扭，十分空虚，十分畏怯，十分卑劣，而对面椅子上坐着的不过是一个柔弱的女子，两支红烛跃动的火焰在新娘脸上闪烁；他想不起已往任何一件壮举能使自己心头树起自信与骄傲，而潮水般一波又一波漫过的尽是污血与浊水，与小娥见不得人的偷情以及在山寨与黑白牡丹的龌龊勾当，完全使他陷入自责和懊悔的境地。她端坐在方桌的那一边，墨绿色的褶裙散拖在地上，罩住并拢着的膝盖和腿脚；两只平平的肩头透出棱角；红色缎面夹袄隐约透出两个紧撺成团的乳房的轮廓；乌黑的头发绾成一个硕大的发髻，上面插着一枚绿色翡翠骨朵；单薄的眼皮下是一双沉静的黑眼珠；挺直而秀气的鼻梁；薄厚适度的嘴唇更显示出自信沉稳。黑娃久久地坐着抽烟，看到炕头并摆着的一双鸳鸯枕头，更加卑怯到无力自持的地步。

红烛相继燃尽。蜡捻残余的火星延续了短暂的一会儿也灭绝了。屋子里一片漆黑。黑娃在黑暗里感到稍许自如舒展了，鼓起勇气说："娘子，你知道不知道我以前不是人，是个……"方桌对面的新娘子以急促而冷静的声音截住了他的话："我只说从今往后，不说今日以前。"黑娃听了浑身颤抖，呜地哭出一声，随之感觉有一只手抚在肩头，又有一只手帕在他脸上眼上轻轻抚擦。黑娃猛然抱住她的身子，偎在她胸前呜咽说："你不下眼瞧我，我就有了贴心人了。"新娘子却笑着说："你把我抱到炕上去……"

完全是和平宁静的温馨，令人摇魂动魄，却不至于疯狂。黑娃不知不觉地变得温柔斯文谨慎起来，像一个粗莽大汉掬着一只丝线荷包，爱不释手又怕揉皱了。新娘倒比他坦然，似乎没有太多的忸怩，也没有疯张痴迷或者迫不及待，她接受他谨慎的抚爱，也很有分寸地还报他以抚爱。她温柔庄重刚柔相济恰到好处，使他在领受全部美好的同时也感到了可靠和安全。

第二天早晨，黑娃起来时已不见新娘，走到厨房门口，看见她一手拉着风箱，一边在膝头上摊开着书本。黑娃洗脸一毕时，她先给他递上一杯酽茶，接着端给他一碗鸡蛋。黑娃喝了口茶又捉起筷子，夹住一个鸡蛋随即又沉入碗中，扬起头说："我从今日开始念书。"

玉凤说："你想念就念。"

黑娃问："晚不晚？现在才想起念书怕是迟了？"

玉凤说："圣人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念书没有晚不晚迟不迟的事。"

黑娃说："那我就拜你为师咧！"

玉凤摇摇头：“你要是真想念书，应该正经拜师。我不能够做这样事。”

黑娃问：“为啥？”

玉凤说：“甭忘了你是丈夫，我要是当了你的先生就没有丈夫了。你在外边拜师去。”

黑娃怀着虔诚之心走进白鹿书院，看守门户的张秀才拒绝他进入：“不管谁不论啥事，朱先生一律谢客。”黑娃说：“你去传话，就说土匪头子鹿黑娃求见先生。”

朱先生正在庭院树荫下闭目养神。他送走了编纂县志的几位同仁，不仅身俸无法支付，连三顿饭也管不起了。朱先生最后一次找到县府申述县志编纂工程的重要，管钱的主任摸摸硕大的光头，就呵呵笑起来：“好朱先生哩！剿共重要不重要？岳书记手谕拨款给保安团买大炮重要不重要？”朱先生被呛得噎住，分辩说：“现在只要一笔石印的钱，县志已经编成了。”主任说：“编成了先放下，等剿灭了共匪国泰民安那阵儿，我给你拨款，多拨些也印得漂亮……”朱先生早已不再晨诵午习，常常坐在那把破藤椅上闭目养神。听见张秀才传报，朱先生睁开眼睛：“噢！我这辈子就缺少看见土匪的模样。让他进来。”

黑娃进门再进入庭院，看见一把破旧藤椅上坐着一位头发银白的老者，恰如一座斜立着的山峰，紧走几步就扑通一声跪倒了：“鹿兆谦求见先生。”

“你是何人？求我有啥事体？”

“鄙人鹿兆谦，先前为匪，现在是保安团炮营营长。想拜先生为师念书。”

“我都不念书了，你还想念书？”

“兆谦闯荡半生，混账半生，糊涂半生，现在想念书求知活得明白，做个好人。”

“你坐下说。”

黑娃站起来坐到石凳上。朱先生自嘲地说：“我的弟子有经商的，有居官的，有闹红的，有务农的，独独没有当土匪的。我收下你，我的弟子就行行俱全了。”说着回屋取来纸笔，拔下笔帽；笔头儿已经干涸，经水泡开又磨了墨汁，给黑娃写下“学为好人”四字，说：“你是我最后一个弟子。这是我最后一幅题字。”

黑娃每日早起借着蒙蒙的晨曦舞剑，然后坐下诵读《论语》，自然常常求问于高氏玉凤；每隔十天半月去一趟白鹿书院，向朱先生诵背之后再说自己体味的道理。朱先生深为惊讶，开始认真地和他交谈，而且感慨不已：“别人是先趸下学问再出去闯世事，你是闯过了世事才来求学问；别人趸下学问为发财为升官，你才是真个求学问为修身为做人的。”黑娃谦然地说：“我学一点就做到一点，为的再不做混账事。”朱先生仰起脖子慨叹道：“想不到我的弟子中真求学问的竟是个土匪坯子！”

黑娃言谈中开始出现雅致，举手投足也显现出一种儒雅气度。玉凤更加钟爱黑娃。团长以及同僚们也都觉察到这种变化。黑娃再一次走进白鹿书院时，就不无激动地说：“先生，我想回原上去祭祖。”朱

先生久久凝视着黑娃，竟然颤抖着嘴唇说："好哇兆谦，我陪你回原上祭祖。"

黑娃真正开始了自觉的脱胎换骨的修身，几近残忍地摈弃了原来的一些坏习气，强硬地迫使自己接受并养成一个好人所应具备的素质，中国古代先圣先贤们的镂骨铭心的哲理，一层一层自外至里陶冶着这个桀骜不驯的土匪坯子。黑娃同时更加严厉地整饬炮营，把一批又一批大烟鬼绑捆到大炮筒子上，土匪弟兄们的体质首先明显地发生变化；他把一个在街道上摸女人屁股的团丁扒光衣服捆绑到树上，让炮营二百多号团丁每人抽击一棍；过去的保安团丁在县城是人人害怕的老虎，又是人人讨厌的老鼠，人们把保安团叫捣蛋团；黑娃整饬三营的做法得到张团长的奖赏，一营和二营也开展了整顿活动；保安团在县城居民中的形象从此发生变化，黑娃在整个保安团里和县城里威名大震。

黑娃回乡祭祖的举动在原上引起震动。曙色微明，黑娃携着妻子高玉凤从县城起身，绕道走到原坡上的白鹿书院，朱先生早已收拾停当等候多时。三个人一行沿着坡沟间的小路走着，天色愈来愈亮。黑娃脱了戎装，也没有一片绫罗绸缎，而是专门选买了家织土布，声明不许用机器轧制，由妻子玉凤亲手裁了缝了，只有头顶的礼帽是呢料的，完全成了一个拘谨谦恭的布衣学士了。他不骑马，也不带卫士随从，为此与张团长和白孝文都发生了争执。张团长说："带个随从替你跑腿。"孝文则指明说："你先前在原上有对手，以防不测。"黑娃说："有朱先生领路引导强过一个师的人马。"午后时分，黑娃一行走到白鹿村口，见白孝武领着十数人伺候在那儿迎接，连忙打躬作揖。从村口进入村庄，街道清扫得干干净净，土道上还留着扫帚划过的印痕，村巷里除了乱跑乱窜的小孩不见大人。黑娃走进村巷，就抑止不住心

潮起伏，一幢幢破残的门楼和土打围墙，一棵棵粗的细的榆树椿树和楸树，都幻化成活物令他心情激荡。及至走到祠堂门口，看见鞭炮炸响的硝烟中站立着白嘉轩佝偻的身躯，一支拐杖撑在身前。黑娃紧走几步扑通一声跪下了，高玉凤也随着跪下去，只有朱先生抱拳向迎候在门口的乡亲作揖致礼。这是白鹿村最高规格的迎宾仪式，白嘉轩向来是在祠堂里处理本族的事务，在门口亲自迎接什么人几乎没有先例。

白嘉轩把拐杖靠在门框上，双手扶起匍匐在膝下的黑娃。黑娃站起来时已满含热泪："黑娃知罪了！"白嘉轩只有一个豁朗慈祥的表情，用手做出一个请君先行的手势，把黑娃和朱先生以及高玉凤让到前头，自己拄着拐杖陪在右侧，走过祠堂庭院砖铺的甬道，侍立在两旁和台阶上的族人们拥挤着伸头踮脚。两支木蜡已经点燃，孝武侍立在香案旁边，把紫香分送给每人三支。白嘉轩点燃香支插入香炉就叩拜下去："列祖列宗，鹿姓兆谦前来祭奠，求祖宗宽恕。"黑娃在木蜡上点香时手臂颤抖，跪下去时就哭喊起来，声泪俱下："不孝男兆谦跪拜祖宗膝下，洗心革面学为好人，乞祖宗宽容……"朱先生也禁不住泪花盈眶，进香叩拜之后站在白嘉轩身边。高玉凤最后跪下去，黑娃跪伏不起，她也一直陪跪着。白嘉轩声音威严地说："鹿姓兆谦已经幡然悔悟悔过自新，祖宗宽仁厚德不计前嫌。兆谦领军军纪严明已有公论，也为本族祖宗争气争光，为表族人心意，披红——"白孝武把一条红绸递到父亲手上，白嘉轩亲手把红绸披挂到黑娃肩头。黑娃叩拜再三，又转过身向全体族人叩拜。他从妻子玉凤手里接过一个红绸包裹的赠封，交给白嘉轩说："我的一点薄意，给祖宗添点香蜡。"他把赠封的银圆递到白嘉轩手里，面对着那个佝偻如狗一样的身躯不禁一颤，耳际又浮起许多年前自己狂放的声音：那人的腰挺得太直……

族人纷纷散去，黑娃在白嘉轩的陪同下款步走在院子里，一回身瞅见墙上嵌镶的乡约碑石的残迹，顿然想起作为农协总部的这个祠堂里所发生过的一切，愧疚得难以抬头。他想请求白嘉轩，由自己出资重新雕刻一套完整的乡约石碑，却终于没有说出口来，缓些时候再说吧，那断裂拼凑的碑文铸就了他的羞耻。

黑娃问："怎么没见我大？"白嘉轩笑笑说："你大在屋里等你，在我屋里。"鹿三得知儿子黑娃要回原上祭祖的消息，表示出令白嘉轩吃惊的态度："晚了，迟了，太迟了！"他冷漠地咕哝着。白嘉轩叮嘱鹿三应该回家去收拾一下屋子，黑娃引着媳妇回来必定要回家看看的。自妻子去世以后，鹿三领着二儿子兔娃住在马号里，黑明都不回家了。鹿三摇摇头："他要回家他就去。我不管。我也不见他。我只有兔娃一个儿。"白嘉轩甚至在劝说不下时发了大火："人家学好你还不认账？你这样子的话就不通情理了。你要是不认黑娃，我就不认你了……"鹿三依然不动声色："那好，那行，我权当给你饰面子。"白嘉轩就把鹿三和黑娃的会面安排在自己家里，因为鹿三坚决拒绝在祠堂里的族人面前和黑娃相见。

黑娃走进白嘉轩家那条街巷，没有进入门楼而拐进了对面的马号，把陪同的一行人扔在身后。走过马号的门道进入拴马场，黑娃一眼瞅见一老一少正在那儿铡草，老人一条腿跪在地上往铡口里撂塞草束，半大小伙子趄趄地叉开双腿一压一揭宽刃铡刀。西斜的夕阳把一缕血红投抹过来。空气中弥漫着青草清香的气味。黑娃走到铡墩跟前跪下去，叫了一声"大"，泪如泉涌。鹿三停止了撂塞青草，痴呆呆地盯着儿子："噢！你回来了……回来了好……"黑娃扶起父亲坐在铡墩上，转过身搂住弟弟兔娃的肩膀："你还认得哥不？"兔娃扭一下头，羞涩地笑笑。白嘉轩指使儿子孝武陪引朱先生先到屋里坐着，自己引

着黑娃媳妇高玉凤进了马号，朗声吆喝道：“三哥，你看媳妇也来看你了。”高玉凤叫了一声“大”，就在草垛跟前跪拜下去。鹿三木然地瞅着儿媳妇玉凤优雅的叩头动作，眼里忽然掠过一缕惊骇，小娥被他刺中背部回过头来叫“大”的声音又再现了……白嘉轩强令鹿三父子撂下活儿回屋吃饭，鹿三没有拒绝也没有热情，只是木然地跟着白嘉轩走。黑娃忍不住问：“嘉轩叔，俺大看去晃晃悠悠的？”白嘉轩不在意地说：“老了，你大老了。”自从鬼魂附体的折腾以后，鹿三就成了这个样子。白嘉轩不想提及那个小娥，就进一步证实说：“人老了都是这样子。你看我嘛，也变得迟手笨脚瓜不愣愣的了嘛！”

一次难忘的晚餐在白嘉轩厅房明间里开筵。气氛由拘谨逐渐活跃起来，只有鹿三表情依然木愣。孝义被过来过去的祝辞和应酬的套话搞得不大耐烦，提出一个新鲜的话头儿：“黑娃哥，你在县里干大事，经的多见的广，而今朝民人又征粮又征丁，这日子咋过哩？”黑娃还没开口，白嘉轩瞪了孝义一眼：“咱今日个只跟你姑父你黑娃哥说家常话，旁的事一概不论。”朱先生接住话茬：“征粮征丁牵扯家家户户，也是家常事家常话呀！”白嘉轩点点头，慨然说道：“我是怕这些恼人的事说起来冲了兆谦的兴头儿。征这么多的粮和丁，我没经过也没见过，清家皇上对民人也没有这样心狠……”朱先生向来说话以近喻远：“买卖人有一句话说：心狠蚀本。”

饭后暮色苍茫。兔娃用笼提着阴纸，引着哥哥黑娃和嫂嫂玉凤去给母亲上坟，他悄悄说：“哥呀，我想跟你到保安团去？”黑娃沉思半晌，断然拒绝说：“兄弟你甭去。你还不懂。再说你走了谁给咱家顶门立户呢？”兔娃再不强求。慢坡地根一堆青草叶蔓覆盖着母亲的坟丘，黑娃痛哭一声几乎昏迷过去。他久久地跪在坟前默默不语。

黑娃回到村子天已擦黑。他领着妻子玉凤从东到西逐家逐户拜望乡亲，直到深夜才走过一半人家，几乎家家户户男人女人都不大在意他的歉词，而是众口一词诉述征粮征丁的巨大灾难，试探鹿营长能不能帮忙说情让娃娃免过征丁。黑娃自知既无普度众生之术，也无回天之力，只好表面应承着，却破坏了他回原祭祖的虔诚心情。

回到白家，黑娃谢绝了白嘉轩为他备好的炕铺，引着妻子走进自家那个残破的敞院，在尘土和老鼠屎成堆的厦屋炕上拉开了铺盖，那是一堆破布搅缠着棉絮的被子，深情地对高玉凤说："咱们在妈妈的炕上睡一夜吧！"妻子欣然点头。黑娃鼻腔酸酸地说："我就生在这炕上……我怕在这炕上再睡不了几回了……"玉凤温厚地帮他解纽扣脱衣服，然后躺进破棉絮里。黑娃闻到一股烟熏和汗腥气味，一股幽幽的母乳的气味，颤着声羞怯怯地说："我这会儿真想叫一声'妈'……"玉凤浑身一颤，把黑娃紧紧搂住。黑娃静静地枕着玉凤的臂弯贴着她的胸脯沉静下来……

天明以后，黑娃领着玉凤继续拜望了白鹿村剩下的所有人家，最后回到白嘉轩的马号里，对父亲说："再盖一座房子，该给兔娃张罗婚事了。"鹿三说："兔娃还小。"闷了半晌又续着说，"房子嘛……等兔娃长大咧由他去盖。"黑娃说："你跟兔娃搭手买木料买砖，先盖下房再张罗媳妇，厦屋快倒塌咧，人家谁敢把女子……"鹿三说："我没劲头，不想张罗这些事。"黑娃把一摞银圆递到鹿三的手里，退一步说："你先拿这钱日常用着，盖房的事缓缓也好。"鹿三把银圆再倾入黑娃手中，漠然地说："要给钱你给兔娃。我不用钱。"黑娃迟疑一下把钱交给兔娃了。后晌，他和玉凤起程回县城，朱先生一早先头走了。有些人怀着浓厚的兴趣等待，看黑娃去不去村子东头慢道上和小娥住过的那孔窑洞。他们终究得到一个不尽满足的结局，黑娃没有去。但有

人仍然悄悄议论，黑娃在村子东头拜访乡亲时，肯定能瞅见崖头上那座镇压着小娥的六棱塔。

黑娃离开白鹿村的当天晚上，白嘉轩在上房里对孝武说："凡是生在白鹿村炕脚地上的任何人，只要是人，迟早都要跪倒到祠堂里头的。"白孝武恭立听着。白嘉轩吸过一锅水烟之后，突然转了话题说："我看你还得进山。"白孝武一时反应不过来，疑惑地瞅着父亲。白嘉轩说："你前几天不是说人家让你当保长吗？"白孝武连连点头说："这几天忙着迎接姑父和兆谦哥回乡的事。今日个后晌，田主任在镇上撞见我，还催问哩！这事倒咋办呀？推是推不掉，当又当不成。现在当保长，刚跟上催粮要款征丁，尽是恶恨乡党族人的事，再说又顶的是子霖叔的空缺，更糟……"白嘉轩点头赞许孝武说："哦！你也会方方面面想事了。我刚才说了，再进山去。"白孝武说："躲？躲了好。"白嘉轩说："甭说保长，咱连那个总甲长也不给他当咧。谁爱当谁当去。他愿意叫谁当就叫谁当，咱们不当。赶紧避远！田福贤再来问你，我就说山里药店烂包了，你去收拢摊子……"白孝武连连应承着："对对对，这样好。那我明天一早就撤滑了，免得节外生枝。"白嘉轩站起来说："你去收拾一下，早歇早起身。我还想跟你三伯说说话儿去。"

白嘉轩夹着一瓶酒走进马号："三哥，咱俩干抿一口。"说着把酒瓶往炕头一蹾，又对兔娃说，"兔娃，你去拌草，把你爸换下来。"鹿三无动于衷地走到炕前，对着瓶嘴抿了一口。白嘉轩直言不讳说："三哥呀，你这回对黑娃太淡。"鹿三没有吭声。白嘉轩说："前多年黑娃不务正道，你见不得他我赞成，黑娃而今学好了，你就不该再拗着。你而今应该打起精神过光景，先盖房再置几亩好地，下来给兔娃张罗媳妇，明年你就该回家当个好庄稼主户了。"鹿三头也不抬，又呷下一口酒。三杯酒下肚之后，终于开了口："嘉轩，你的话对对的，我也能

想到。我想打起精神，可精神就是冒不出来嘛！”白嘉轩说：“我知道黑娃亏了你的心，丢了你的脸，可而今黑娃给你补心了，也给你争气饰脸了嘛！”鹿三听了感慨起来：“跟你说的恰恰儿是个反反子。那劣种跟我咬筋的时光，我的心劲倒足，这崽娃子回心转意了，我反倒觉得心劲跑丢了，气也撒光咧……”白嘉轩甚为奇异地说：“三哥，你这人大概只会一顺顺想事……你回头再想想，也许会涨起心劲打起精神……”鹿三说：“怕是难咧！”

过了十来天，鹿三不仅涨不起心劲打不起精神，反倒愈觉灰冷。白嘉轩也发现鹿三继续退坡，动作越显迟疑和委顿，常常在原地打转转寻找手里拿着的搅料棍子或是水瓢。黑娃归来不仅没有使鹿三精神振作，反倒更加萎缩迟钝了，这是他没有想到也没有想透的怪事。又过了两天，白嘉轩一个人正在屋里吸烟，兔娃进门来说：“叔哎，俺大叫你去喝酒，他有好酒。”白嘉轩立即起身跟着兔娃来到马号。鹿三邀他喝酒，是破天荒的头一回，大约三哥的心劲涨溢起来了哇？鹿三从炕头的一只小匣子里拽出一瓶酒，晃一晃：“嘉轩，你抿一口这好酒——西凤。”声音和动作都完全回复成原来的那个鹿三。白嘉轩兴致顿高：“好嘛三哥，我说你会打起精神来的，看咋着！”鹿三确真一反许久以来痴呆木讷的表情，洋溢着刚强自信的神气，眼睛里重新透出专注真诚的光彩。白嘉轩一下子受到鼓舞：“三哥哇，我一个人你一个人都孤清，我今黑跟你合套睡马号。”鹿三哈哈一笑：“你不嫌我这炕上失脏？有你这句话我就够了。咱喝一口。”俩人喝着说着，直到深夜都醉了，胡乱拽着被子躺在鹿三的炕上睡去了。

天色微明中，白嘉轩醒来一看，鹿三翻跌在炕下的脚地上，身体已经僵硬，摸摸鼻根，早已闭气了。白嘉轩双膝一软，扑到鹿三身上，涕泪横流：

“白鹿原上最好的一个长工去世了！”

第三十一章

黑娃卖掉了娶妻时在县城买下的那幢房子，在西安城学仁巷买下一院三合院旧房，把妻子高玉凤搬到远离县城的省城里去了。黑娃这样做的用意仅仅出于一种心理因素。他在县保安团，妻子就住在县城里，距娘家只隔一道拐巷，他和妻子的一举一动，一点响声，不消一时半刻就传到娘家屋里，甚至传进炮营士兵中间；作为保安团炮营营长的太太在娘家门口处人处世更是左右为难，稍有不慎就会引起市民们的议论，说她跟上营长眼高了，品麻了，肉贵重了，烧包了。黑娃把这个想法告知老岳丈，高老先生情通理达："亲戚要好结远方，邻居要好高打墙。"黑娃和妻子玉凤搬进城里学仁巷的头一天晚上，在完全陌生的环境和完全陌生的人群中间，黑娃和玉凤都觉得小县城里被盯视被注目的芒刺全部抖落掉了。那天晚上，玉凤在新居的灶锅上第一次点燃炊火，炒下四样菜，俩人在小炕桌上吃着饮着。黑娃说："你猜我这阵儿心里盘思啥哩？"玉凤瞅着黑娃熠熠闪光的眼睛，恬然地摇摇头。黑娃谦谦地笑笑说："我想当个先生。我想到哪个僻远点儿的村子去，当个私塾学堂的先生，给那些鼻嘴娃们启蒙'人之初性本善'……我不想和大人们在一个窝里搅咧！"高玉凤稍感意外，说："朱先生把你的气性也改换咧。"黑娃摇摇头说："不是朱先生。我自下山到现在，总是提不起精神。"高玉凤瞅了瞅丈夫没有说话。黑娃喝下一盅酒说："我老早闹农协跟人家作对，搞暴动跟人家作对，后来当土匪还是跟人家作对，而今跟人家顺溜了不作对了，心里没劲儿咧，提不起精神咧……所以说想当个私塾先生。"高玉凤点点头说："先走一步再看吧！要是时势不好，我看退出来当先生倒安宁。"黑娃慨叹着："我乏

了，也烦了。”他们在新居睡下以后，黑娃紧紧搂抱着温柔的妻子动情地说：“甭看我有那么多称兄道弟的朋友，贴心人儿还是你一个。”

黑娃每隔十天半月回到学仁巷与妻子相聚，没有紧急军务时，就住上三五天。每次回城时，他都脱下保安团的军服，换上一身长袍，学仁巷的居民谁也搞不清他的真实身份。这天晚上，黑娃兴致勃勃回到家里，妻子照例问：“你想吃啥饭？”黑娃说：“水饭。”妻子作难地笑笑：“可这会儿黑灯瞎火到哪儿去挖荠荠菜？”黑娃把一只布兜翻倒过来，倒出一堆绿莹莹的荠荠菜。玉凤拣出一个嫩生生的勺儿菜，没有涮洗就塞到嘴里咯噌咯噌嚼起来，歪过头羞羞地说：“我有了。”黑娃听了就把玉凤抱起来：“我可没想到这些荠菜挖对了！”

玉凤做成了水饭，稀溜溜的苞谷糁子里煮着绿乎乎的荠荠菜，这是春二三月里度春荒的饭食。玉凤在怀了娃娃以后就腻味油腥，这种连盐也不调的甜淡水饭可口极了，喝得额头上冒出细汗来。黑娃喝得也很香，香甜里有一缕深长的怀旧心绪。小时候，二三月的每一顿午饭，几乎都是这种粥少菜多的水饭，喝得人看见荠菜就头晕。自从走出白鹿原的多年里，他再也没有机缘喝一顿水饭。晌午他在炮营驻扎的古关峪口骑马时，看着绿色如毡的麦田，顿时想起小时候挖荠菜的情景。他把马拴到一棵树上，就在麦地里挖起荠菜来，后晌就赶回城里来了。黑娃喝下一碗又喝一碗，半是遗憾地说：“你把菜切得太碎。”妻子说：“我娘就是这么切的。”黑娃说：“你们城池县里饭食细做。俺娘做的水饭，荠菜根本不用刀切，筷子一挑就是一串，那更有味儿。”一阵敲门声传进来，黑娃放下碗走到大门跟前问：“谁？”门外传来熟悉的声音：“原上乡党。”黑娃听出是兆鹏的声音，立即拉开门：“你怎么摸到这儿来？”兆鹏走进门笑着说：“只要你跑不出地球，我就能找见你。”

黑娃引着兆鹏走进三合院上房，对站在桌边迎候客人的妻子介绍说：“这是咱兆鹏哥，在城里当教书先生。”鹿兆鹏瞧瞧黑娃，又盯住高玉凤说：“不要哄她。我是共产党。”高玉凤愣怔一下，恍然大悟：“噢呀天哪！我小时候在县城还见过通缉你的布告……”鹿兆鹏对多年以前的事不再有兴趣，瞅着桌上黑娃的饭碗欢声叫起来：“哦呀，你们吃的荠菜水饭呀！给我舀一碗，我都馋死咧！”高玉凤转身就去舀来了。鹿兆鹏接过碗来，挑起一团绿乎乎的荠菜送进嘴里：“世上再没有比荠菜更好吃的东西了。”黑娃对妻子说：“弄俩菜，让俺弟兄喝一盅。”鹿兆鹏连连摆手说：“我是来向你告别的。我马上要起身出远门了。”黑娃动情地说：“我办喜事时没法子邀请你，今黑间难得你来，咋能不喝两盅？”鹿兆鹏说：“我也真想喝你一杯喜酒哩，只是时间不允许咯！”黑娃会意地点点头：“你干的那种事不敢马虎，这我清白。你到哪达去？”鹿兆鹏说：“延安。”黑娃惊奇地张了张嘴没有说话。他的宁静的心翻腾了一下，不由地问：“你要走了，我才敢问一句，你这多年都在哪达呀？”鹿兆鹏笑了：“在原上。我没离开过咱们白鹿原。他们逮不住我。我这些年在原上发展的党员比你那个炮营的人数还多。”黑娃苦笑一下说：“我们弟兄却成了两路人。”鹿兆鹏把一只手搭到黑娃肩头：“既是弟兄就不说这号话。你占住炮营营长比谁占那个位位都好。万一到了交紧时，还要你帮忙，有人会去找你的。”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本小册子送给黑娃。黑娃看着封面上印着一个人的头像，很模糊，只能看出大致的轮廓，惊奇地叫起来：“毛？”鹿兆鹏点点头：“记得咱们在原上闹农协吗？那时候毛泽东在湖南也闹农协。”黑娃久久地瞅着那幅墨印的头像：“这是毛写的书？”鹿兆鹏说：“你看看就明白。革命胜利的日子不远了，扫荡中国反动派的‘风搅雪’真正要刮起来了。”黑娃听到“风搅雪”的话又哑了口。鹿兆鹏说：“你看罢了送给朱先生，听说老先生现在心境不好。你把我去北边的话捎给他，我来不及去看老先生了。”黑娃点点头表示肯定办到。鹿兆鹏临走时叮

咛说："小心咱们乡党！"黑娃明白那个乡党所指是白孝文，朗然说："放心。"鹿兆鹏告辞走到大门口，忽然转过身连连咂着舌深表遗憾："哦呀呀黑娃兄弟呀……你怎能跑回原上跪倒在那个祠堂里？你呀你呀……"未及黑娃回话，鹿兆鹏已经转身出了大门进入巷子了。

白鹿原出现了一个前所未闻的卖壮丁的职业。这种纯粹以自身性命为赌注的买卖派生于国民政府的大征兵。二丁抽一的征丁法令很快被废弃，因为那样征集的兵丁远远满足不了政府扩军的需要，随之就把征丁变通为壮丁捐款分摊到每一家农户，无论你有丁无丁，一律交纳壮丁捐款，田福贤用收缴起来的这一笔数目庞大的款子再去购买壮丁。凡是不能按期交纳壮丁捐款的农户，就留下一个违抗民国法令的口实，田福贤的联保所里的保丁就可以理直气壮地去抓他们家里不算壮丁的任何一个男女。壮丁四处逃跑隐匿躲避。联保所的保丁便多方打听，到处追捕，往往却是无果而返。田福贤随机应变出相应的对策："弟兄们，你们这样东捕西抓太费劲，太劳神了。壮丁逃了就把壮丁他爸抓来，他爸跑了就把他妈抓住，不管他爸他妈他娃他姐他妹子哪怕是他爷他婆，抓一个押到联上，看他狗日回来不回来？"这个办法很有实效，好多逃走的壮丁果然自动投入联保所，换下被捆被吊被雨淋着被毒日头晒着的大大妈妈或者奶奶，有的就咬牙卖掉牲畜卖掉土地，把壮丁捐款自动送进联保所赎回被扣押的人质……联系政府和百姓之间的唯一一条纽带只剩下了仇恨。

民国政府在白鹿原征收的十余种捐税的名目创造了历史之最。那些捐税不是一次性的，而是由一年一次增加到一年两次甚至三次；不要说一般农户倾家荡产了也无法抵交，即使富裕农户也招架不住。百姓们根本不再相信有关这些捐税的必要性紧迫性和合法性的说词，由最初的窃窃私怨到聚众公开谩骂。有人在白鹿镇十字街道上发现一个

画写着田福贤模样和名字的煮熟的鸡蛋，眼睛鼻子嘴巴和耳朵里都扎着钢针，很快被往来的人踩成粉末。诅咒的对象由本原的田福贤逐渐升级到滋水县县长和县党部书记岳维山，随后一下子就上升到中国最高统治者头上，白鹿镇街心十字又一次发现画着蒋介石脸谱的煮熟的鸡蛋，眼睛鼻子嘴巴和耳朵同样扎着一支支钢针……

卖壮丁这个职业便应运而生。最早被抽丁当兵的壮丁，根本不以为进行这场战争对自个有任何好处，尤其是目睹了同伴僵死的尸首就纷纷开了小差回到原上；有的回来后被田福贤的保丁抓住又捆缚送入军队。他们已经有了进出军队的经验，往往在开赴战场的半路上就寻机逃走了；一来二去，他们已经精通此路，于是就自告奋勇卖起自身来了。他们把卖得的现洋交给父母或妻子，让他们去籴粮食，自己就走进联保所准备开拔，多则十天半月，少则三五天，他们毫发未损，又重新出现在村巷里。他们越卖越精，越卖越滑，迫使押解他们的军人不得不动用绳索把他们一个个串结起来押上战场。这无疑是自欺欺人的更加愚蠢的措施，被捆缚了手臂的士兵无法捉枪打仗，一旦解开绳索，他们逃跑的自由和机会就同时到来。一个靠绳索捆绑的士兵所支撑的政权无疑是世界上最残暴的政权，也是最虚弱无能的政权……

鹿子霖被释放出狱回到白鹿村。他走过村巷时没有遇见一个族人乡党，径直走到自家屋院门前时，几乎认不出来了。那座漂亮的在白鹿村独一无二的门楼没有了，从白孝文手里买下来从白嘉轩房址上拆迁搬来的门房也没有了，作为门楼门墩的两个青石雕刻的狮子歪倒在厦屋的山墙根下，拆除房屋的地址上冒出来的椿树苗子已经蹿过围墙了。鹿子霖垂手驻足站在打碎的瓦片和残断的苇箔地上，想到了从白嘉轩家拆除房屋的情景。女人鹿贺氏从上房里屋出来，走到台阶上瞅见了站在废墟上的男人，颠着一双小脚跑出二门时几乎栽倒，重新站

稳之后就说：“他爸，你甭难受，门楼门房是我为救你卖的。”鹿子霖朗声说：“你卖得对，卖得好！这房嘛，不就是买来卖去的一码小事咯！”

“你不记得朱先生说的一句话了？‘房是招牌地是累，攒下银钱是催命鬼！’咱而今没招牌没累也没催命鬼了，只要你浑浑全全回来就好。”鹿贺氏一边倒茶递烟，一边给男人解心宽。鹿子霖在家主事的那么些年月里，这个家庭的内务和外事都不容她添言，她的职能只是抚养两个儿子。兆鹏和兆海小小年纪被丈夫送到远离家屋的白鹿书院去念书，她就于惶寂中跪倒在佛龛面前了，早晚一炉香。后来她的兴致又集中到赶庙会上，方圆几十里内的大寺小庙的会日她都记得准确无误，不论刮风下雨都要把一份香蜡纸表送到各路神主面前。她起初不过是出于自己的兴趣，不无逛热闹寻开心的成分，后来就变成一种迫切的心理需要而十分虔诚了。她默默地跪倒在佛爷观音菩萨药王爷关帝爷马王爷面前，祈祷各路神主护佑两个时刻都处在生死交界处的儿子……鹿子霖被押监，须得她自作主张的时候，鹿贺氏表现出了一般男人也少有的果决和干练，她不与任何亲戚朋友商量，就把老阿公和鹿子霖藏在牛槽底下墙壁夹缝和香椿树根下的黄货白货挖掏出来，把拭净了绿斑的银圆和依然黄亮的金条送给那些掐着丈夫生死八字的人，她不仅没有唉声叹气痛心疾首，反而独自开心说：“我说嘛，把这些东西老藏着还不跟砖头瓦碴一样？而今倒派着用场了。”她接着卖牲畜卖田地，又卖了门楼和门房，辞退了长工刘谋儿，把所有钱财一次又一次间接或直接送给法院法官，县府的县长以及狱卒，只有送给县党部书记岳维山的一块金砖反弹了回来。只要鹿子霖一天还蹲在县监狱的黑屋子里，她就准备把这份家产卖光踢净，直到连一根蒿草棒子也不剩的地步。“我只要人。”她的主意既坚定又单纯，丝毫也不瞻前顾后左顾右盼，尽管这个男人有过最令女人妒恨的风流勾当，但这个

家庭里不能没有鹿子霖。她的小儿子已经战死，大儿子寻不见踪影，要是再没有鹿子霖，她还有什么活头儿？无论在白鹿村乃至整个白鹿原上，她相信鹿子霖的半拉屁股比她的整个脸面还要顶用。她像往昔里四处求神拜佛一样，终于感动了民国政府的诸路神主，救回了男人鹿子霖。四处奔走搭救男人的社交活动开阔了她的眼界，也改变了她的气性，她甚至使鹿子霖吃惊地说："整个滋水县凡我求拜过的神神儿，只有岳书记是一尊吃素不吃荤的真神。"

鹿子霖对于妻子的解释不感惊奇，淡淡地问："你把门房和门楼卖给谁家了？"鹿贺氏说："反正是卖，卖给谁家都一样。"鹿子霖说："那倒是。我不过想知道谁买了我的房就是了。"鹿贺氏说："还能有谁买得起？白家孝文在保安团干阔了，正好……"鹿子霖听了不仅不恼，反而哧的一声笑了："我说嘛，这房子买来卖去搬来了又给拆走了……就那一码子事咯！"他想起当初从白家宅基上拆房的壮举，又觉得可笑了，对于白家重新把这幢房子迁回而现显的报复意味也觉得可笑了。"不就是迁来搬去那一码子事咯！"鹿子霖在监狱蹲了两年多，对一切国事家事的兴头儿都丧失殆尽了。两个儿子一个死了，一个飞了，连一个后人也没有了，纵有万贯家财又有何益？如果自己闷死在这长年不见天日的号子里，鹿家当即就彻底倒灶了。他对妻子说："你还留下二亩地没有？"鹿贺氏说："就留下水车井那块地没卖，我不忍心卖了你安的水车。"鹿子霖的心猛地跳弹起来："噢哟，好好好！留下这几亩水地够你我吃一碗饭就成咯！"

到天黑时，开始有本族本村的族人乡党来看望鹿子霖。他们多是一些年长的老者，零零散散地走来问一声安，接着便悲戚地诉说起抓丁派捐的苦楚，大声咒骂本保继任的保长、本联的联保主任以至蒋委员长全是一杆子不通人性的畜生；比对起来，鹿子霖当乡约和后来当

保长的那些年月真是太好了。鹿子霖得悉了自己离开白鹿村以后的重大变化，也得到了一些心理安慰。这种乡亲情谊的看望持续了三天，包括鹿家在原上的新老亲戚也都相继来看望过了，鹿子霖已经不耐烦一次再一次向他们复述自己的冤情。到第三天晚上，白嘉轩拄着拐杖来了，他进门就扔掉拐杖抱起双拳："子霖兄弟，我向你赔情谢罪，不该乘人之危买房拆房。"鹿子霖仍然淡漠地笑笑："世上的房子就是我搬来你再迁去那一码小事咯！"鹿贺氏说："哥呀，你快坐下。卖房的事是我寻你要卖，不是你寻我要买嘛。你买了房，我得了钱才救下人来，我该感你的恩哩。"白嘉轩坐下来说："按我的法程，咋也不能买你的房。孝文插手要买，我挡不住人家了，子大不由父咯。再说——"白嘉轩坦诚地说："孝文那年把房卖给你，而今是想捞回面子哩！虽说他是我的儿，我也要向你戳破这一层。"鹿子霖对这幢房子已不大感兴趣："嘉轩哥，我坐了一回监，才明白了世事，再没争强好胜的意思了。我把孝文的房买来伤了白家的面子，孝文再买回去伤一伤鹿家面子，咱们一报还一报也就顶光了。"白嘉轩慨叹说："现时还提那些陈谷子烂米弄啥嘛！而今这世事瞎到不能再瞎的地步了……"鹿子霖说："瞎也罢好也罢，我都不管它了，种二亩地有一碗糁子喝就对哩！"白嘉轩看着鹿子霖完全是一副看透世事的平淡神情，心里倒真诚地同情起来，处于鹿子霖这种孤单无后的家庭境地，再心强的人也鼓不起精神来。他告辞出门的时候说："甭光闷在屋里，闲了到我那儿去坐坐。"

直到他回家来的第六天，仍然不见田福贤来看他，鹿子霖自言自语地嘲笑说："世上除了自个还是自个，根本就没有能靠得住的一个人。"田福贤是他许多年来的莫逆之交，居然在他蹲了两年多监狱回来后不来看一看，未免太绝情了。然而他也不太上气，种二亩地喝苞谷糁子的光景，与田福贤来往与不来往关系不大咯。

打破鹿子霖这种平淡心境的是一个绝对意料不到的人，一个穿着旗袍的年轻女人引着个男娃子，走进院子问了一声：“这是鹿兆海的家吗？”鹿子霖站在台阶上回话说：“就是的。”那女人问：“你是兆海的——”鹿子霖说：“我是他爸。”那女人便扑通一声跪倒在庭院湿漉漉的方砖上：“爸呀，媳妇给你磕头。”鹿子霖惊诧地问：“你是谁的媳妇？”那女人扬起泪花浸湿的脸说：“我是兆海媳妇。这是你的孙子。”鹿子霖“噢呀”一声惊叫，端在手里的水烟壶撇开了，跳下台阶时又踢飞了一只趿拉着后跟的布鞋，连忙把那个躲躲闪闪的孩子抱到怀里，“哇”的一声哭了：“爷的亲蛋蛋，亲孙孙呀……”

鹿贺氏从门外回来，鹿子霖对儿媳妇说：“这是你妈。”兆海媳妇又跪下磕头。鹿子霖哭着又像笑着说：“这是咱兆海的媳妇……这是你的亲蛋蛋孙子……”鹿贺氏愣呆一下丢开了挎在胳膊上的柴笼，扑上前把儿媳抱在怀里失声痛哭起来。

儿媳操一口河南陕西混杂的口音向阿公阿婆诉说她的经历。她家住北边的金关城，父亲是个挖煤工。她到菜市买菜回家的路上遇见过队伍，鹿兆海就在那会儿瞧见了她。她往家走去，鹿兆海派了一个卫兵跟住她，跟到家门口又转身走了。后晌，鹿兆海便跟着卫兵来到她家的窑洞口，向她的父母提出求婚，聘礼由他们随意开口，要多少就给多少。她爸看见是个军官，根本不敢要一文钱，只是提出一句：“长官，我不要钱，只要你甭在半路上把俺娃蹬了。”鹿兆海在金关城买下一幢民房，她就跟他合婚了。她问他当着团长那么大的官，为啥不娶一个门当户对的千金小姐，偏要娶个穷窑户的女子？鹿兆海说：“我一眼瞅见你跟我原先订下的媳妇像神了。”

鹿子霖听着这个编排得过于离奇的故事，反倒怀疑她八成是个婊子。为围剿延安的共产党，政府不断往北边增派军队，金关城的卖淫

业也随之急骤发展兴旺起来。鹿子霖以不在意的口吻探问：“兆海……原本没订过婚咯！”说罢装出迷愣愣的神情瞅着妻子。鹿贺氏当即证实丈夫的话说：“兆海自小出门念书，人家不要家里给他订亲。”儿媳也瞪起眼迷惑地说：“可他说他订过亲，女方叫……灵灵？”鹿子霖愣怔一下，又转过头瞅了鹿贺氏一眼，继续装出愣实实的样子说：“没有。”旋即又换作一种思虑的口吻，“那也许是他……在外边私订终身……”儿媳没有再开口。鹿子霖再留心观察一下儿媳的眉眼，这才惊奇地发觉她和白嘉轩的那个叫做灵灵的女子确实相像，因此倒相信她刚才叙说的与兆海成婚的经过不是编排的谎话。

儿媳提出要给兆海去上坟。鹿子霖被络绎不绝的亲戚乡党缠住了，回家好几天也未能抽出身来去祭奠祖坟，于是就领着儿媳抱着孙儿到坟园里去了。两年多未上祖坟，几株冬夏常青的柏树似乎变化不大，泼势的枳树和柞树组成了一个密密匝匝的堡垒。在树丛外围的草丛里，已经干涸的和散发着臭气的新鲜大便使人无法插脚。很显然，这堆密不透风的树丛给过路的行人和在田间干活的男女提供了方便，抹下裤子拉屎时，既可以遮丑，又可以乘凉。鹿子霖的鼻子里早钻进一股屎尿臊臭气息，一下子气得脸都黄了。“妈的！我在村子里的时光，狗也不敢到这儿拉一泡屎；我鹿子霖倒霉了坐牢了，祖坟倒成了原上人的一个官茅房了。”想到身边跟着刚刚回家的儿媳，鹿子霖压住一阵又一阵从心底蹿上来的火气和愤怒，努力做出宽厚的长者姿态向儿媳和孙孙介绍，那个是你爷爷的坟头，这个是你老爷爷的坟堆。他领着她从坟园的东边款款转到西边，在老祖宗的一片老坟堆下首的一座孤零零的坟堆前站住了，这是兆海的坟墓。墓前那块半人高的青石碑面上拉着一泡稀屎，业已干涸的稀屎从碑石顶端漫流下来，糊住了半边碑面，可以看出恶作剧的人是不惜冒险爬上碑石顶端拉屎撒尿的。鹿子霖再也压抑不住愤怒，把抱在怀里的孙子撂到地上就跑到官

路上跳骂起来了："让日本人打进潼关，开上白鹿原，把原上的女人全都奸了，把男人全都杀了！这白鹿原上的男人女人一个个全都不知廉耻，没长人的心肝，该当杀尽灭绝！我的儿呵，你舍生忘死出潼关打日本，保卫的竟是一伙给你脸上拉屎尿尿的流氓无赖死狗坯子……"儿媳从官路上把疯癫了一样的阿公扯回到坟园。鹿子霖气得坐在坟堆前喘着粗气。儿媳蹲在兆海的石碑前，用一根树枝刮掉碑面上干涸的屎屉屉，然后从笼里取出一瓶烧酒洗刷污痕，字迹重新显亮起来。她在坟前清理出一块干净的场地，从笼里取出蜡烛和紫香点燃，然后插在土地上，接着烧着了阴纸，她就跪趴在地上，把瓶子里剩下的烧酒奠洒在墓前，便扯开喉咙痛哭起来。鹿子霖看着儿媳虔诚的举动，把孙子按倒在地上："俺娃，给你爸磕头。"孙子"哇"的一声哭了。鹿子霖紧紧把孙子抱在怀里，涕泪纵横着大声说："人还是不能装鳖哇！装了鳖狗都敢在你头上拉屎……"

儿媳在家住了三天，一天三顿帮着婆婆做饭，第一碗从锅里舀出来的饭敬奉给阿公。她每天傍晚都要到坟园里为兆海烧一堆纸，哭上一场。直到第三天晚上，她才向阿公和阿婆说出她的心思，她已经决定改嫁，男方是个生意人；她在决定嫁给这个生意人之前，已经拒绝了不下十数家提媒说亲的亲友；她恪守替死去的丈夫尽到唯一能尽的责任：抚养孩子，不能让兆海的孩子接受任何继父坏的哪怕是好的印象。她把一摞银圆和一大堆纸票掏出来交给阿公说："兆海生前留下的和死后队伍上给我的抚恤金，这几年俺娘儿俩花了不少，就剩下这些……"鹿子霖拒绝接受，鹿贺氏动手硬塞回儿媳的提兜。儿媳说："兆海的钱都花在他的独苗儿身上……"儿媳第二天早晨就走了，走时孩子尚在酣睡中。鹿子霖叮嘱妻子看护酣睡中的孙子，自己送儿媳走到村口的大路上，竟有点舍不得放走这个好媳妇了。

鹿子霖回到家门口，就听见了孩子的哭声。那哭声完全是愤怒的反抗和绝望的嚎叫，震撼着整个屋院。这给了他一缕伤情，也给了他一份生机；这个拆掉了门房门楼的屋院所呈现的荒寂颓败的气氛，一下被幼稚的满是生机的哭声冲淡了。他无法保持出狱回家以来那种慢条斯理的散淡的脚步，急匆匆起脚跑进上房里屋，从鹿贺氏怀里接过乱扑乱抓的孙子，用一种本能的温柔亲近着哄宠着孙子。孙子拒绝一切温柔的亲昵的话，拒绝奶奶也拒绝爷爷一丝一缕的温情接近，只是鼓足力气哭着嚎着“妈呀——”。老两口把孙子换来抱去都无可奈何，死了父亲又走了母亲的孙孙，将从今日开始他无父无母的苦命的人生历程。鹿子霖瞅着孙子哭得发直发呆的眼睛，突然连孙子和鹿贺氏一起抱住哭了：“我的可怜的孙娃子呀……”鹿贺氏早已泪流满面，现在也忍不住放声大哭起来。孙子在两个老人的哭声中反倒逐渐减缓了哭叫，终于无奈地停止下来，只是倒噎着气。

随后就开始了隔代的老人和孩子的感情接近和靠拢，由浅入深由僵硬到自然。鹿子霖站着时就把孙子架在脖子上颠着，躺下时就拉着孙子骑在自己的肚子上，把自己记忆深处的童谣一句一句回忆起来教给孙子，常常为孩子念走音的句子而惹得笑出眼泪。孙子有时玩得正开心，突然冒问一句：“妈呢？”鹿子霖认真而又漫不经心地说：“你妈个海兽跳了海了。”孙子渐渐表现出对爷爷和奶奶踏实的依恋与信赖，鹿子霖对鹿贺氏说：“你瞅这碎熊的眼睛，真是鹿家的种系，连一丝假都没掺。”鹿贺氏挖了鹿子霖一眼，就用嘴巴亲吻孙子睫毛很长的深凹凹眼睛，咕哝说：“俺娃不听你爷烂尻子嘴吣道的瞎话。”鹿子霖转身要出门去，孙子扑过来要爷爷引他去耍。鹿子霖哄宠孩子说：“爷不是去逛，不能引你，是办正经事，给俺娃去——要馍馍吃！”

鹿子霖走进白鹿联保所。因为过去对这里太熟悉，现在反倒就显得陌生了。他径直走到田福贤办公房的门口，矜持地推开门板，停住脚步，瞅见田福贤低头在桌子上写着什么。田福贤抬起光亮的脑袋，那双露仁大眼睛掠过一缕惊奇，随之就笑了：“子霖兄弟，你回来了我知道。”鹿子霖气嗔嗔地应着：“算我命大，还能来拜见你。”田福贤连忙道歉：“我天天想去看你，天天都没去了。这一茬壮丁交不利手，真把人整住咧！”鹿子霖阴阳怪气地说：“当然嘛，老兄公务繁忙咯！”田福贤毫不介意地笑笑，拉着站在门口的鹿子霖走进里间：“有话好好说。你回来准备咋办？”鹿子霖赖腔赖调地说：“我而今家破了，人亡了，家产踢卖光净了，还能咋样？早晚混得有一碗稀糁子喝就不错啰！”田福贤说：“我在你还没回来时，就给你把立脚的台窝挖好了。我想用你，你可尽给我撇凉腔。”鹿子霖心里一动，立即回话说：“我现时龟头龟脑的这架势，能干啥嘛！”田福贤说：“你就到联保所来，给老哥帮忙。”鹿子霖没有吭声……

鹿子霖今天走进联保所可以说是来者不善。从他被搡进囚室的头一天起，首先想到能够救他的只有田福贤一个人，只要田福贤出马到岳维山面前死保，他肯定不出半月就可以回家。他整整蹲了两年零八个月，才磨灭了对田福贤的期望。回来后又得知，全部家当的半数都是鹿贺氏通过田福贤之手送给受贿人的……这就成为一个无法揣测验证的良心账了。他苦笑着对鹿贺氏说：“你把黄货白货塞给这个塞给那个，倒不及全都塞给田福贤。田福贤到岳维山那儿说一句话，也许比省主席说十句还顶话哩！”鹿子霖今天来找田福贤，就看他怎样说话；说好了，他也就好说；说的不好了，他就准备耍无赖，宁可耍无赖也不装出可怜巴巴的样子乞求田福贤；田福贤够哥们儿弟兄，鹿子霖也就是弟兄哥们儿；田福贤不讲义气的话，鹿子霖就要死狗无赖，尿田福贤一身臊水让他见识见识。看着田福贤诚挚的举动，鹿子霖舍弃了

耍无赖装死狗的想法，开始注意自己的言语：“啊呀！我再不想当官了，再不想到人前蹦跶了……”田福贤从抽屉里取出一只红绸包，郑重地搁到鹿子霖面前：“你走了，弟妹急傻了，要我给别人塞黑食，也给我塞。我不接，她不信。好，我今天完璧归赵。”鹿子霖用手抓起来，触摸出那红绸包里既有白货也有黄货，“咚”的一声又蹾到田福贤面前的桌子上：“老哥，不是小瞧我了吗？”田福贤沉稳而又平淡地说：“我要是图你的黑食，我还有脸见你吗？快拿回去，算我给你保存了一点家产。”鹿子霖开始为自己刚才进门时怀揣的小人之见懊悔，庆幸没有耍出无赖相装出死狗来。田福贤说：“你明日个就来联上吧。我忙得招架不住了，急需个得力人手来帮忙呢！”鹿子霖点点头应承下来，心里自然想到了那个小孙孙，爷给孙娃讨到白馍馍吃了。

鹿子霖以高涨的气势到联保所供职来了。不过，他没有按照田福贤说的第二天来，而是推迟了两天。这两天里，鹿子霖进了一趟省城西安，买了一件地道宁夏九道弯皮袄，真正的狐尾围领，又买了一副镀金的硬腿石头眼镜，一顶黑色的呢质礼帽。他原先的这套行头被鹿贺氏送进典当铺子了。鹿子霖这身装束一下子改变了两年狱牢生活扑稀邋遢的倒霉相，变得精神抖擞起来。鹿子霖到联保所去时经过白鹿镇，正好撞见白嘉轩。白嘉轩拄着拐杖正从冷先生的中医堂出来，扬起脸问：“子霖，你穿这么排场做啥去？”鹿子霖矜持起来：“田主任硬拉我到联上替他干事，我推辞不掉咯！”白嘉轩瞅着鹿子霖远去的脊背说：“官饭吃着香咯！”

白嘉轩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谨慎地经营着这个家庭。大征丁大征捐的头一年，他让孝武躲到山里去经营中药收购店，不是为了躲避自己被征，而是为了躲避总甲长和保长的差使。后来事情的演变完全证实了他的预测。甲长和总甲长成为风箱里两头受气的老鼠，本村本

族的乡邻脸对脸臭骂他们害人，征不齐壮丁收不够捐款又被联保所的保丁训斥以至挨柳木棍子。一茬壮丁和一茬捐税派下来，最先逃亡的往往是各村的甲长和总甲长……最后原上各村普遍实行挨家挨户轮流担当甲长和总甲长的现象。白嘉轩那时候有兴致开一句玩笑：“全中国上下大小百官只有甲长是推来让去的君子官。”

白嘉轩交了捐税又出了一丁，三儿子孝义是大征兵的头一茬壮丁。他随着队伍开到河南打了一仗，既幸免于死而且未伤一根毫毛，打掉的只是他对战争的恐惧和稀奇，心里顿时派生出对战争根深蒂固的厌恶。他看见那么多死人，己方的和敌方的尸首交错叠压在一起，使他联想到麦收时原上田地里的麦捆子。他与生俱来的那一股拗劲儿从心底冲荡起来：这都是图个啥为个啥嘛？刚刚长成小伙子还没出过大力，“嘎嘣”一声倒下就把伙食账结了！我不想算别人的伙食账，也甭让旁人把我的伙食账算了。我不想变成麦捆子，也不想把别人变成麦捆子，我还是回去种庄稼喂牲畜吆牛车踩踏轧花机子好些。他趁一个黑夜逃跑了，逃奔了近两个月才回到家乡。他没有回原上，而是找到县保安团的大哥孝文。孝文让随从拿来一套团丁服装叫他换上。孝义说：“耍枪杆子这碗饭我吃不了。哥你给我另寻个活儿吧！”孝文说：“那你去喂马。”孝义说：“喂马这活儿好。我跟三伯自小就学会了。”孝义在保安团喂了半个多月马，被闻讯赶来的父亲叫回家去了：“咱们家的人全都成了保安团啦？”随后几茬子壮丁派下来时，甲长和保长都绕着白嘉轩的门楼走，令白嘉轩疑惑莫解，故意在村巷拦住保长问：“这回给我派下多少？”保长竟然睁大眼睛讨好地说：“白先生，你怎么糊涂了？你是免征户。”白嘉轩真的糊涂了：“免征户？”保长说：“是呀是呀！联上给我专门说了，你属免征户。孝文兄弟给联上田主任打过招呼，说他在保安团任职顶得一丁。还有兔娃……他哥黑娃

跟孝文兄弟属同一情况也免征，你就叫兔娃甭跑甭躲了，没人敢撞你们两家……”

白嘉轩起初有点尴尬，免征户无疑是依赖孝文的权势得到的特殊保护，这将使他在族人面前以至原上都处于一种特殊的地位。他把这个意料不到的好事说给冷先生：“做官还是好啊！有儿当朝做官，老子就是免——征——户。”冷先生说：“这你又何乐而不为呢？你交了和不交不都是屁事不顶咯。你交得再多也还是把银钱往茅坑撂。这个熊国家成了熊了……”这几句冷言冷语镇静了白嘉轩的心绪。第二天，他把在家未逃的族人召集到祠堂里：“各位父老兄弟！从今日起，除了大年初一敬奉祖宗之外，任啥事都甭寻孝武也甭寻我了。道理不必解说，目下这兵荒马乱的世事我无力回天，诸位好自为之……”

孝文接着买来了鹿子霖家的门房和门楼。这件事白嘉轩持坚定的反对态度。白孝文找到冷先生：“先生伯，这房是我经你做中人卖给鹿家的，现在还需要你做中人再赎回来。我把被鹿家拆迁走的房子再拆迁回来……你能明白我的意思。”冷先生爽朗地说：“你也就圆了面子了。有种哇小伙子！”

孝文从保安团回到原上住了半月，先议妥了买房，然后再说服父亲允许他在原宅基地上盖房。白嘉轩仍然坚持原先的主意：“你要买房我挡不住你。你要盖房嘛……我还是老话一句，你另置庄基另立门户，兄弟仨挤一个门楼终究不行咯！”白孝文就彻底袒露出他的思路：“爸，你的话对着哩！弟兄仨挤一个院子谁也伸不开手脚。我另置庄基盖房得缓二年，眼下太忙，等剿灭共匪天下太平时，我打算用心修一座四合院，老来告老还乡有个窝儿。这回我执意把我卖了的房子买回来重新盖上，算是对祖宗赎罪。房子嘛，给你和孝武孝义用，我是不要的……”

直到鹿子霖的三间门房和那座漂亮的门楼移置到白家的宅基上重新竖起昔日的格局，三合院又变成一座密不透风四围完整的四合院了。孝文接走了前妻生育的两个儿子。小儿子在县城继续上学，大儿子进了保安团当团丁。他与年轻的继母见第一面就产生了无法消除的仇恨。他在保安团里成为一个比连排长还牛皮烘烘的特殊团丁，在县城赌钱搞女人吸大烟，偷保安团的面粉枪支换得“泡儿”过瘾，接着就偷父亲和继母的私藏。白孝文是在被偷了家私才发觉儿子的毛病的，一顿饱打之后，儿子携着一支短枪逃走了。这个儿子诞生以后，孝文正处于和小娥如胶似漆之中，几乎没有抱过他。女人饿死以后，儿子由祖母抚养长大，和孝文陌生如同路人。在儿子逃走了以后，孝文连寻也不寻，对同僚们轻松地说：“兴许再见面时他当师长了哩！”

白嘉轩无力再去管孙子的事。四合院在兵荒马乱的白鹿原上维持着一坨安宁之地，不仅壮丁免了，各种捐税也都免了。原上许多村子里都有一户或几户这样的免征户。有钱有势的家庭通过种种渠道种种手段弄得了免征户，不仅免去了人财损失，而且成为一种特殊的荣耀。白嘉轩脑子很清醒，对孝义和鹿三的儿子兔娃说："免征是好事也是瞎事，懂吗不懂？甭在人前张狂。这世道能保住自己一条命就成了。"他开始形成一种忆旧的癖好，对孩子们教管起来总是忆及往事："年馑厉害不厉害？饿死了多少人？可那光景只不过一年多时间就过去了。两头放花的瘟疫厉害不厉害？又死了多少人？可那不过半年不到也就过去了。再往前推，乌鸦兵厉害不厉害？还是没在原上停下一年就跑屎了。这些子灾祸比起眼下这世事都不算厉害。你看，自那年大征丁征捐到现在，咱村有多少后生出去再没回来？卖地卖房倒灶闭户的人家还在增加，要命的是这种日子根本看不到尽头哩！"孝义在家里自觉承担起责任，一是哥哥们都不在家该轮到他了，二是他已经娶过妻子成了大人了。他的执拗的天性和耿直的脾气相结合，既体现了白家的传统家风，又不免往往走极端，把许多事情搞僵了。在这方面，他既不及孝武也不及孝文，但在管理庄稼和牲畜事务上，他绝对精明。他为多种什么少种什么常与父亲发生争执，结果往往证明他盘算合理。他有一个致命的缺陷而他自己尚不曾察觉，就是婚后多年妻子仍没有生养娃娃。白嘉轩早已为此事担着心。

白赵氏领着孙媳妇求遍了原上各个寺庙的神灵乞求生子，却毫无结果。白赵氏从来也不赶庙会。白家从来都是只祭祀祖宗而不许女人到处胡乱求神烧香叩头。白赵氏起初领着孙媳妇到原西的仙人洞祈祷舍子娘娘，烧一对红色漆蜡再插一撮紫香，然后跪下磕头。孙媳妇照样做完这一切拜谒礼仪之后，就羞怯怯地伸手到舍子娘娘屁股下的泥墩里头去摸，泥捏的梳小辫的女孩或留着马鬃头发的男孩都摸到过，每天晚上睡觉时夹到阴部。那泥娃娃蹭得她难以入眠，夜夜在炕上撵着拗熊孝义交欢，但终究不见怀娃的任何征兆。拗熊孝义没了耐心骂："你狗日是个漏勺子不盛㞞。"媳妇羞惭得连哭也不敢。白赵氏又领着孙媳妇去求冷先生。冷先生先看气色，然后号脉，询问饮食睡眠经血来潮一类现象，先用祖传秘方，后来换了偏方单方，药引子尽是刚会叫鸣的红公鸡和刚刚阉割下来的猪蛋牛蛋之类活物，为找这些稀欠东西一家人费了好多周折，结果孙媳妇依然故我。白嘉轩于绝望中对冷先生说："看去不休她不行了。"他绝对不能容忍三儿子孝义这一股儿到此为止而绝门。冷先生笑着问："要是毛病出在咱娃身上咋办？你休了这个，重娶一个还是留不下后……"白嘉轩吃惊地问："毛病咋能出在男人身上？"冷先生把这个神秘难解的生育之谜演化为通俗易懂的比拟："你看倭瓜蔓上，有的花坐瓜，有的花不坐瓜。只开花不坐瓜的花人叫诳花。有的男人就是只开花不坐瓜的诳花。先得弄清他俩谁是诳花，那会儿休不休她就好说了。"白嘉轩问："可怎么弄清谁坐瓜谁不坐瓜呢？"冷先生说："上一回棒槌会。"

在白鹿原东南方向的秦岭山地有一座孤峰，圆溜的峰体通体匀称，形状酷似女人捶打衣服的棒槌。孤峰基座的山梁上有一座孤零零的小庙，里头坐着一尊怪神。那神的脑袋上一半是女人的发髻，另一半是男人披肩的乱发；一只眼睛如杏仁顾盼多情，另一只眼睛是豹眼怒睖；一只细柔精巧的耳朵坠着耳环，另一只耳朵直垂到肩上；半边

嘴唇下巴和半边脸颊细腻光洁，另半边嘴唇下巴和脸颊则须毛如蓑草；半边胸脯有一只浑实翘起的乳房，另半边肌肉棱凸的胸脯上有一粒皂角核儿似的黑色乳头；一只脚上穿着粉红色绣鞋小到不过三寸，另一只脚赤裸裸绑着麻鞋；只在臀部裹着一条布巾，把最隐秘的部分掩盖起来；一条光滑丰腴的手臂托着一只微微启开的河蚌，另一条肌腱累摞的手臂高擎着一把铁铸的棒槌。这就是男女合一的棒槌神了（棒蚌谐音）。每年六月三日到六日为棒槌神会日，会的时间不在白天而在夜晚，半夜时分达到盛期。近处的人一般在家喝过汤去赶会，远处的人早早动身赶天黑时进入山中。一般都是由婆婆引着不孕的媳妇装作走亲戚出门，竹条笼儿里装着供品和自食的干粮，上边用一条布巾严严地遮盖起来。先由阿婆把供品敬奉上去，然后婆媳俩人在棒槌神前点蜡焚香叩拜一毕，再挤出庙门时，婆婆给媳妇从头顶罩下一幅盖脸的纱布，俩人约好会面的地点，婆婆就匆匆走开了。这时候，藏在树干和石头背后的男人就把盖着脸的女人拉过去，引到一个僻静的旮旯里，谁也不许问谁一句话，就开始调逗交媾。这些男人多是邻近村庄爱占便宜的年轻人。完事以后，媳妇找到婆婆立即回家。有些婆婆还不放心，引着媳妇再烧一回香再叩拜一回，再次把媳妇推到黑暗里去，而且说："咱们远远地跑来好不容易，再去一回更把稳些。"第二年，得了孩子的媳妇仍由婆婆领着来谢神。那时候，婆婆牵着媳妇的手绝不松开，谢罢棒槌神就早早归去了。白鹿原流行着许多以此为题的骂人的话，俩人发生纠纷对天赌咒时说：谁昧良心谁就是棒槌会上拾下的……

白嘉轩听了冷先生出的主意闷声不语。搁任何人说出这种恶毒的侮辱性的话来，白嘉轩的枣木拐杖早抡到他的鼻梁上去了。白嘉轩说："冷大哥，你的话越说越冷。"冷先生却不以为然地摆摆头："话丑理通。让她去一回，怀上了就能断定是三娃子有毛病；她再空怀，你

就休她。再说回来，万一是三娃子的毛病，她怀上了也就有了后了，总比抱养下的亲些。谁能知道这个底哩？”白嘉轩只顾着一袋接一袋吸闷烟，许久才瓮声瓮气地说：“那一条路先搁下甭走。你先给三娃子治病，全当毛病就在三娃子身上，万一治不好再说……”这时候，他在心里构思完成了一个比冷先生说的更周密的方案，然后交给母亲白赵氏去实施。

那天晚上，白赵氏把馍馍切成薄片下油锅炸了，又打下五个荷包蛋，亲自到马号里去叫兔娃吃晚饭。兔娃看着黄亮酥脆的油炸馍片和白晶如玉的鸡蛋傻愣愣不敢动手，问：“俺叔哩？”白赵氏说：“你叔吃过了，寻冷先生下棋去了。你快吃啊兔娃。你吃罢咧，给婆帮个忙。”兔娃嘿嘿嘿笑起来：“婆叫我做啥只管吩咐就是了，还做这些好吃喝做啥？”白赵氏说：“干重活就得咥饱啊兔娃。”兔娃就风卷残云似的吃喝起来，直吃得热汗腾腾连连打着饱嗝：“婆你说干啥重活，我去干。”白赵氏说：“你三嫂得下病了，神说要个童男陪睡做伴驱邪，你就给你三嫂做两夜伴儿。”兔娃自幼受到鹿三严厉的管束，对男女间的隐秘浑然不通，天真地笑了：“这有啥哩嘛！这咋能算是重活哩嘛！”白赵氏说：“婆跟你说笑哩！牲口喂饱了没？”兔娃说：“再拌一槽草料，等牲口吃完我就去。”白赵氏淡淡地说：“也甭急。神说了要等星全再去做伴儿。”兔娃说：“等牲口吃完一槽草，星也就出全了咯。”白赵氏压低声音告诫兔娃：“陪你三嫂睡觉做伴儿的事，对谁都不敢说一个字儿，说了神拔你舌头！”

一切都设计得天衣无缝不留间隙。时间的选择是最关键的事情，白赵氏早探准了孝义媳妇“骑马”和“撤鞍”的规律性时间，直等到二媳妇要去娘家参加小弟弟婚礼的时日。孝义被白嘉轩打发到山里去找哥哥孝武，让他跟上驮骡把药材发回西安，家里需得钱用。孝义就带着

冷先生为他焙制的药丸药面儿进山去了。白嘉轩早早躲到中医堂去下棋，冷先生回老家给小儿子完婚，他和抓药的相公对弈，下棋是他唯一的经常性娱乐。整个四合院里就剩下三媳妇和白赵氏。白赵氏在兔娃吃饱出门以后，突然感到心口里头憋闷难忍，捞起桌上那把白铜水烟壶抽起来。难挨的沉闷等待中，终于听见院里响起兔娃欢蹦蹦的脚步声。三媳妇厦屋门板吱扭一声响，白赵氏的心猛然跳弹起来。她走出屋子在院子里咳嗽一声关了街门，返回来经过厦屋门外时说："天不早了，快睡觉，明早还要起早干活哩！"说罢，佯装回上房去睡觉，又踅过来猫儿似的扶在窗台上屏气静听。她不能安心去睡觉，那傻愣愣的兔娃万一不从叫喊起来怎么办？她要准备采用紧急措施以防止把事情弄糟。

"三嫂我睡哪达？"

"你顺势就睡炕边那达。"

"三嫂吔，你害啥病还要人做伴儿？"

"不兴问，问了神拔舌头！"

一阵窸窸窣窣脱衣的声音，之后便是一片沉静。兔娃突然嘎气地叫起来："哈呀，我不吃奶！我都长大了你还给我吃奶……"三媳妇禁斥说："瓜熊，再喊神拔你舌头！"兔娃忍俊不禁压低声儿又说："啊呀，三嫂你甭捏我……"三媳妇大约捂住了兔娃的嘴，兔娃呜呜哇哇地还在说："三嫂，你咋这样子……哎哟妈呀！三嫂呀……这样子嫽得很呀……"

白赵氏松了一口气离开厦屋窗户，脸孔烧辣辣的轻脚走了，不小心撞倒一把笤帚。兔娃惊讶地问："啥响哩？"三媳妇说："猫。"白赵

氏走回上房里屋忍不住骂:“你妈才是猫!”

三个月后，三媳妇出现呕吐现象。白嘉轩送给冷先生一件上好的皮袄:“你的医术好。”他要使冷先生接受奉承和谢酬的同时，也接受一个弄虚当真的事实，以便把冷先生的口也封起来。六月三的棒槌会还遥遥未到，三娃子媳妇怀孕的事实只能归功于冷先生的药方，至于毛病在谁身上就不大重要了。白嘉轩第二件处理的善后事，就是兔娃的婚事。他在饭桌上很亲肠地对兔娃说:“兔娃，你不小了，该娶媳妇了。房子是拆烂补浑呀，还是重盖?”兔娃说:“俺爸给我说过，不准朝俺黑娃哥要一文钱，他给也不要，不准俺哥在老屋盖房。”白嘉轩说:“噢!我明白了，你是钱不够。你说你有多少钱，让叔给你盘算一下。”兔娃说了他爸死时留给他的钱数。白嘉轩笑说:“这点子钱嘛，只能逮个椿媳妇。”兔娃羞羞地笑了。白嘉轩说:“先订媳妇，再拾掇房屋，过年就把媳妇娶回来。钱嘛，叔给你包了，也算是补你爸的情。”

当三媳妇的肚子一天天隆起时，白赵氏对她的厌恶也一天天增长，几乎不用正眼瞅那肚子，更不瞅她脸，甚至发展到一看见三媳妇端来的饭食就恶心，却又说不出口骂不出声。白赵氏日渐消瘦，到麦收后三伏酷暑的闷热气浪里，终于咽了气。白嘉轩本想隆重埋葬劳苦功高的母亲，可是愈来愈可怕的兵荒马乱不容许他尽孝心，村里的年轻人跑躲一空，连几个得力的帮手也找不到。白嘉轩在母亲灵前祷告说:“过三年时世太平了，儿再给你唱戏……”

第二年春天，孝义媳妇生下一个娃子。那时候，兔娃已经和新娶的媳妇在自家厦屋里过日月了，也不再去白家熬活。白嘉轩给兔娃拨过二亩“利”字号坡地，让他和媳妇去过自家日月，在原上又传为义举。白嘉轩再没有雇用长工，只在收麦时叫几个麦客来打打短工。

在为母亲举办葬礼时，朱先生来吊孝，临走时点了一句：“辞掉长工自耕自食。”他揣摩不清：“我种不过来咋办？”朱先生笑说：“好办！撂给穷人就完了。”白嘉轩只听从了姐夫的一半话，辞退了兔娃，撂给兔娃二亩地，其余的土地怎么也舍不得撂给旁人……

直到解放后，土地改革查田定产划定成分时，他才猛然醒悟了姐夫朱先生的话，不禁感佩万端：“圣人圣人，真正的圣人！”因为他恰好在解放前三年没有雇用长工，按土改政策匡算下来，才幸免被划成地主。

第三十二章

正当午歇时候，黑娃刚刚迷糊就被一阵吵吵嚷嚷的声音惊醒，听见卫兵和一个陌生人在争执不休，卫兵咬住营长正在休息决不许干扰；来人自称是黑娃的五舅，以一种皇亲国戚倚老卖老的口气说："当了营长难道就不认他五舅了吗？我跑几十里路寻他，还得等他睡醒来？他架子再大官职再高还给他舅要品麻吗？甭忘了他小时候偷刨我的红苕给我撕着耳朵……"卫兵仍然不松口不放行，说即就是营长的五舅，也不能午歇时间进去。黑娃听着那声音有点耳熟，却决不是什么五舅八舅，舅家门族里的五舅是个傻子，长到十三四岁就夭折了。黑娃走到窗口朝外一看，竟是多年不见的韩裁缝，穿一件蓝色粗布夹袄，头上戴一顶被雨淋得变成黑色的蘑菇草帽，串脸胡须芜芜杂杂留得老长，嘴里溅着唾沫星子和卫兵争吵，一件一件抖出黑娃小时候的劣迹来。黑娃走到门口隔着竹帘喊："五舅你进来。"

韩裁缝仍然嘎声嘎气地嘟囔着走进黑娃的门，全部表演显然都是给卫兵看的。他进门以后更加放大喉咙责怪起来："我说你崽娃子真个当了官不认五舅这穷老汉了吗？"黑娃笑笑说："行咧行咧，快坐下韩裁缝。你下回再来该给我当老太爷了。"韩裁缝摘掉草帽甜蜜蜜地笑了。黑娃问："多年不见，你这一脸毛长得够我五舅的资格。弄啥哩？还当裁缝？在哪达做活？"韩裁缝说："改不了行啰！在山里混一碗饭吃。"黑娃根本信不过："山里有几个人能请得起你扎衣裳？你哄鬼去吧！"韩裁缝说："我咋能哄你哩？真的，不过我不是挣山里人的钱，我是给我的弟兄缝补衣服。"黑娃说："我明白了，你从来就不是个裁缝。敢问你……"韩裁缝抢白说："黑娃，你甭这么斯斯文文说话。我是秦岭游击大队政委。那年农协垮了，我就进山了。兆鹏三顾茅庐，

就是要你合到我的股上。”黑娃沉吟说：“我在白鹿镇见你头一面，就觉得你是个神秘人儿。你说吧，找我肯定是有要紧事。”韩裁缝直言直语说：“借路。”于是俩人便达成一种默契捏就一个活码儿，在从明天起数的未来五天里，游击队将通过古关峪口转移到北边。韩裁缝说：“我这回走了，再见你时，我肯定不必再给你装五舅了。等着吧，不用太久了。”黑娃忍不住说：“兆鹏走的时候也说的是这话。”

韩裁缝走后的第三天后晌，一个头上缠着蓝布帕子，腿上打着裹缠，脚上穿着麻鞋的山民又纠缠着卫兵要亲见鹿营长。黑娃正在焦急地期待着韩裁缝路过的消息，以为此人带来了韩裁缝新的指令，于是就亲自接见那位山民。他一眼就瞅出来，这是在山寨里追查谋杀大拇指芒儿大哥凶手时逃走的陈舍娃。陈舍娃一进门就开口喊：“鹿营长，你还认得兄弟不？”黑娃说：“认得认得，你是舍娃子嘛！你后来跑尿到哪里去了？”陈舍娃瞧瞧门口压低声音说：“游击队。”黑娃几乎完全断定他带来了韩裁缝的口讯，差点问出“韩裁缝派你来的吗”的话来。未等到他开口，陈舍娃迫不及待地谄媚说：“鹿营长，你立功领赏的机会我给你送来咧！”黑娃问：“啥事？你说清白。”陈舍娃又扭头瞧瞧门口：“明黑间游击队从古关峪口路过，送到下巴底下的肥肉你还不吃吗？你收拾了游击队还不升官呀！”黑娃倒吸一口气，吓得心直往下沉，闷了半天才问：“你怎么知道？”陈舍娃得意地说：“我偷听见的。我一听到就想着把这块肥肉送给你吃。兄弟在山上顶佩服你的为人，我投了游击队就后悔了，总想再投你又没个机会，这回我是捎着个大贡品投你来咧！”说罢嘿嘿嘿笑起来。黑娃渐渐缓过气来：“噢呀，我听明白了，你是叛了游击队投我来咧呀兄弟。你给我透露了个好消息，送来个大礼糕呀舍娃兄弟！快坐下喝茶。你既然相信我，就不敢再对旁人说这话，小心旁人抢了机会咥了大礼糕。”陈舍娃得意而又得宠地撇撇嘴角：“你放一万个心。”黑娃一生经历了多少生死危险，也没有像现在这样内心惊慌。他要稳住了这个危险分子，然后设法进一步把他诱向陷阱：“嗬呀舍娃兄弟，你给我送了这么大的礼糕，我该给你回送啥礼呢？说吧敞开说，你想要啥哩？官还是钱？”陈舍娃羞涩地笑笑，咳嗽一声壮了壮勇气：“兄弟跟你在山上是个毛毛土匪，投了游击队还是个小毛卒儿，尽听人指拨，像人不像人的家伙都来训斥咱。这回你随便给兄弟戴顶官帽，让兄弟在人前也能说几句话，死了也值了！”黑娃爽快地说：“呃！要封就封个大官，抖起威风来才有个抖头

儿。等咱们大功告成，我再把你推出来，吓大伙儿一跳，还愁没官当？现在你就悄悄待到我的这儿睡觉，等你睡醒来，就有好运气等着了。”

等到夜里，黑娃把陈舍娃交给两个团丁，明说是要踏察一下游击队转移的具体路线，暗里给卫兵交代说：“快把这瘟神送走，送得越远越好。”陈舍娃的好梦还没做完，就给两个团丁处死了。

韩裁缝故技重演，于黎明时分又和卫兵纠缠不休。黑娃掐着衣服走到门口调侃起来：“五舅，你又来要钱抓药吗？你到底是抓药还是抓‘泡儿’？还是夜个黑间把钱孝顺给轱辘子客啦？”韩裁缝大声嘟囔着走过来：“黑娃，你咋能这样跟你舅说话？嗯？你舅再穷还是你舅……”韩裁缝进门以后就露出急切的神情：“黑娃，我丢了一只公鸡。”

“你怎么不小心呢？”

“问题复杂了！原先说的事得变。”

“你的公鸡我逮住了，已经宰了咥了。”

“噢呀好！”

韩裁缝顿时松了一口气，向黑娃说起陈舍娃叛逃的事。陈舍娃枪法好，毛病也多，最要命的是乱搞女人败坏游击队声誉，屡受处分。韩裁缝说："我估计他会投奔你来。亏得他投奔你了。他要是投到旁人手里就麻达咧！"黑娃说："我可没有得到你的同意，就把你的鸡给宰了。"韩裁缝说："要是没有啥影响，咱们还按原计划行事。"黑娃说："事不宜迟。"韩裁缝出门时又嘟囔起来："舅跟你要俩钱，比㞗上割筋还疼！五舅明日哪怕病死饿死也不寻你了。"黑娃冷笑着调侃："我开个银行也招不住你吸大烟耍轱辘儿，你不来我烧香哩！"

一切都设计得准确无误。这天夜里，哨兵报告发现游击队，黑娃问："是不是进攻？"哨兵说："看样子像是路过。"黑娃当即命令："用炮轰。"热烈的大炮的轰鸣无异于礼炮。黑娃当即驰马禀告团长，不料一营长白孝文和二营长焦振国闻听炮声之后已赶到团部，立即报告了开炮的原因，而且极力鼓动团长调一营二营步兵去追击。张团长丧气地说："长八条腿也撵不上了！"

大约过了十来天，在保安团最高的军务会议上，张团长传达了省上关于全面彻底剿灭共匪的紧急军事命令，县保安团要由守城转入大进攻。县党部书记岳维山亲自到会动员：全国已经开始了对共匪的总体战，三个重点进攻区，本省就占一个，而且是共匪的司令部。本县保安团要进山剿灭游击队，还要加紧清除各村各寨的共匪地下组织，白鹿原仍是重点窝子。岳维山最后说："现在到了彻底剿灭共匪的时候了。诸位为党国立功的时候到了。"

当动员会进行到尾声的时候，白孝文装作漫不经心地问："鹿营长，我听说有个共匪游击分子投奔你来了？"黑娃先是一愣，迅即满不在乎地说："我把他给崩咧。"白孝文说："你该问问清楚。他来投你，肯定肚里装着情报。"黑娃轻淡地笑笑："咋能不问呢？这货是乱摸女

人给游击队处治后逃来的。一问三不知，是个废物。我还担心他是游击队放出来的诱饵哩！”白孝文仍不甘罢休：“按咱们各营的职责，这事该着我管。”黑娃笑着：“那好，下回再有投来的游击队分子，就交你发落，我倒省了事。”张团长说：“事情的职责弄清就行了。”岳维山说：“非常时期，大家务必精诚团结，齐心剿共。”

按照各营原先的职责，结合新的剿共任务，张团长重新调整了兵力部署，二营被抽调出来进山剿灭秦岭里的游击队，再由一营白孝文的属下抽出一个排，加强到二营，交焦振国指挥，组成一个加强营；一营再招募一排团丁补充齐全，不仅要守护县府安全，而且要主动出击配合各个联保所清剿地下共匪组织；只有三营黑娃没有太大变动，仍然坚守古关峪口，以防止游击队偷袭县城，因为大炮暂时派不上用场……

黑娃仍然坚持已经形成规律的生活习惯，清早起来，先舞剑，后练太极软功，然后诵读。好久没有领教朱先生了，在二营长焦振国领着团丁进山以后，黑娃于傍晚时分骑马去找朱先生。

黑娃把马拴在书院门外的树上，走进门去。看见朱先生坐在庭院当中，背向大门，面向原坡，破旧的高背藤椅上方露出一颗雪白银亮的脑袋。黑娃打躬作揖之后坐下来。朱先生把倚靠在藤椅上的腰身端直支起来，笑着问：“你还有闲心到这儿来？不是一家老少都忙活起来杀猪逮猫哩吗？”黑娃听不懂解不开就随口支应说：“我还是原马原鞍原样未变咯！”朱先生又说：“你怎么就能轻松呢？不看看这回这风刮得多凶。”黑娃琢磨一阵儿，才解开了朱先生的话，先生把政府对共产党的全面进攻称为刮大风，“一家老少忙活起来”隐喻上自蒋介石下至地方联保大小官员都动员起来，“杀猪逮猫”则清楚不过是指共产党的

两位领袖朱德和毛泽东了。黑娃惊奇地问："先生足不出院，对时局怎么知晓？"朱先生说："风刮到我耳朵了。"

不久前，发生过一件不寻常的事。也是一个夕阳惨淡的傍晚，国民党滋水县县党部书记岳维山由白孝文陪引着登门造访朱先生。岳维山对朱先生克服包括经费在内的种种困难表示钦佩，一再说明自己是刚刚得知编印县志发生了经费问题，以弥补过失的口吻问："先生，你说还得多少钱？"白孝文接着说："岳书记也是文墨人，很关心县志编印的事，只是党务太忙。昨日一听说经费困难，今日就来解决问题。姑父你敞开说吧，岳书记一句话，啥问题都解决了。"朱先生说："不过是买一两支枪的钱。"岳维山说："明日就给你送来。"朱先生笑笑说："不用了。我卖了书院的两棵柏树，石印款交齐了。还是留下钱买枪吧！枪炮当紧。"岳维山还是坚持要把款子送来："那就把这钱发给诸位先生，先生们编县志劳苦功高啊！"朱先生摇摇头："先生们早都各回各家了。"岳维山听罢换了话题，大声重气地称赞朱先生发表"抗日宣言"的事，在三秦以至在全国造成了巨大感召力："先生身上体现着我中华民族的正气。"朱先生却像被人揭了疮疤一样难受："唔！你怎么又提出一壶没烧开的水来！"岳维山说："关键不在你去成去不成前线，在于你那一纸声明，胜过千军万马。"朱先生自嘲地说："连个屁也不顶。我在国人面前发了宣言而不能践行，这张脸可是丢远了丢光了。"白孝文插言解释说："姑父从来是言行一致的，没有人这样看。"岳维山接着向朱先生讲述了国共两党斗争的局势，说是三个月即可在全国彻底消灭共产党，一个完整的中国和一个政党的大统一局面即将到来。岳维山说："为了促进全国民众团结反共的大局形成，请先生再一次发表声明——"

"你绕了那么多弯路才归到正宗上。你叫我发表什么声明呢？"

“就像你发表的抗日宣言一样嘛！”

“可倭寇已经投降了。”

“当然，这个声明是支持委员长的剿共声明。”

“我写这样的声明能顶啥用呢？”

“我刚才说了，以先生在学界的声望和先生的品行，将会影响一大批学人团结起来消除内患。”

“我现在才弄清白这是一宗买卖：我写一纸反共声明，你拨一笔经费给我和诸位先生当犒劳……”

“先生过敏了。这是两码事，不能串结一起。”

“可我还没征询八位同仁的意向，不知他们愿意不愿意跟我再一次联合声明？”

“先生起草一份底稿，我让孝文骑马去找各位先生，签上个名字就行了。”

“那好吧！既然是一宗买卖，我得先看看岳书记出多大价钱，你让孝文把钱拿来，咱们是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先生把话说白了嘛……”

第二天早饭后，白孝文竟然真的来到书院。朱先生说：“谁说岳维山说话不算话？这回这事办得好利落。孝文，你把钱掏出来数一数。”白孝文恭敬地从布袋里掏出一摞摞用纸封裹着的银圆：“一摞五十，一共十摞，统共五百块。”朱先生做出贪婪的财迷口气说：“你把那些摞

子都拆开，给我一个一个当面数清白。我要一个一个检验是不是假货。而今假货比真货还多。”白孝文殷勤小心地解开一摞摞银圆的封皮纸，在两只手掌里码数着，银圆互相碰撞的声音清亮纯真。白孝文说：“姑父，没错儿，整五百数儿。”朱先生盯着孝文说：“你们那位岳书记是个傻瓜不是？”白孝文笑说：“岳书记精明得很。姑父你在说笑话？”朱先生说：“他掏这么大价钱买我一纸空文，不觉得蚀本？”孝文说：“岳书记很看重姑父的声望。”朱先生又摇头了：“我要是真有声望，那他出的这价码又太小了，五百块现洋能买下我这个大先生的大声望吗？”白孝文连忙说：“我也觉其太少。我回去再给岳书记说说。”朱先生突然歪过头：“其实我连一个麻钱也不值。岳书记的买卖烂包了。”白孝文说：“姑父尽说笑话。你把声明底稿给我吧，岳书记对这事抓得很紧。”朱先生仰起脖子淡淡地说：“我还没写哩！”白孝文说：“姑父，你说个确切时间，啥时候能写成，我再来取。”朱先生说：“你来时再带两个团丁，甭忘了拿一条麻绳。”白孝文不解地问：“带那弄啥？”朱先生两眼如剑，紧紧盯住白孝文说：“你把我绑给岳维山！”白孝文猛然煞黄了脸：“姑父这话说……哪儿去了。”朱先生平静地说：“你快装上现洋走吧！你给岳书记说，五百大洋买我这根老筒子枪的买卖烂包啰……”

朱先生对黑娃叙说完这件不寻常的事，接着说：“我把看守大门的张秀才也打发回去了，只剩下我光独一个了。我从早到晚坐在院子里等着人家来绑我，大门都不上关子。你刚才进来，我还以为孝文领着团丁绑我来了呢！”黑娃默然无语地摇摇头，随后把话题岔开：“先生请你再给我指点一本书。”朱先生说：“噢！你还要念书？算了，甭念了。你已经念够了。”黑娃谦恭地笑着：“先生不是说学无止境吗？况且我才刚刚入门儿。”朱先生说：“我已经不读书不写字了。我劝你也再甭念书了。”黑娃疑惑地皱起眉头。朱先生接着说：“读了无用。你

读得多了名声大了，有人就来拉你写这个宣言那个声明。”黑娃悲哀地说：“我只知你总是向人劝学，没想到你劝人罢读。”朱先生说：“读书原为修身，正己才能正人正世；不修身不正己而去正人正世者，无一不是盗名欺世；你把念过的书能用上十之一二，就是很了不得的人了。读多了反而累人。”黑娃不再勉强先生，又把话题转移：“有一句话要转告先生，兆鹏走了。”朱先生表现出诧异的神情：“到哪里去了？”黑娃说：“延安。”朱先生随口说：“唔！归窝儿去了。”

黑娃从坐着的青石凳上站起来，从腰里衬衣口袋掏出一本书来说：“兆鹏走时让我送给你，是毛泽东写的。”朱先生瞅了一眼就摆摆头：“我刚才说过，不读书不写字了，谁的书我都不读了。”黑娃说：“这书我看了，写得好。先生可以了解毛家的治国策略。”朱先生说：“毛的书我看过，书是写得好，人也有才。可孙先生也有才气，书同样写得好，他们都是治国兴邦的领袖。可你瞅瞅而今这个鸡飞狗跳墙的世道，跟三民主义对不上号嘛！文章里的主义是主义，世道还是兵荒马乱鸡飞狗跳……”黑娃悄声说：“听说延安那边清正廉洁，民众爱戴。”朱先生说：“得了天下以后会怎样，还得看。我看不到了，你能看到。”黑娃斗起胆子问：“先生依你看，他们能得天下不能？”万万料想不到，朱先生断然肯定：“天下注定是朱毛的。”在黑娃的印象里，朱先生掐指算卦总是用一种隐晦朦胧的言辞，须得问卜者挖空心思去揣测，从来也不给人直接做出有与无是或否的明确判断，何况如此重大的国家未来局势的预测？于是陡增了兴趣和勇气：“先生的凭证？”朱先生轻松地说：“凭证摆在人人面前，谁都看见过，就是国旗。”黑娃奇怪地问：“国旗？”朱先生爽朗地说：“国旗上的青天白日是国民党不是？是。可他们只是在空中，满地可是红嘛！”黑娃醒悟后惊奇地叫起来：“这个国旗我看了多少回却想不到这个……”朱先生也哈哈笑起来：“兆谦呀，你只当作耍笑罢了。这是我今生算的最后一卦。”

黑娃仰慕地瞅着朱先生，老人的头发全部变白，像一顶雪帽顶在头上；眉目豁朗透亮，两只眼睛澄如秋水平静碧澈；瘦削的脸颊上，通直的鼻梁更加突兀高耸；鼻翼和嘴角两边的弧形皱褶从长到短依次递减，恰如以口为中心往两边荡开的水纹；两只耳轮也变得透亮，可以看见纤细的血管；整个面部的肤色显现出白皙透亮的奇异色泽，像是一条排泄净尽秽物正要上蔟吐丝网茧的老蚕。黑娃诚恳地说："先生的头发白完了，白得奇快。我上次来还没有……"朱先生柔和地笑了："蚕老一时嘛。"黑娃再三叮嘱朱先生保重："我过一段再来看先生。"朱先生半是认真半是玩笑地嗔怒说："免了吧，你甭来了。你再来我就不理识你，不跟你说话了。"

第二天午饭后，石印馆老板送来十套刚刚印出的《滋水县志》。蓝色硬质纸封皮，二十九卷分装成五册。朱先生接住散发着墨香气味的志书，折膝跪拜在地："请受愚夫一拜。"石印馆老板慌忙搀扶起朱先生，吓得脸都黄了："天爷爷，我这号俗家弟子咋受得起！"朱先生潸然泪下："我在这世上的最末一件事办成了，我就等着书出来哩！"

那一天，朱先生走进县府，新任的县长认不得朱先生，朱先生也不认识县长。因为国事频仍，新来滋水的大官小吏多已不再拜望本县贤达绅士，一来就投入急如星火的征粮征捐征丁的军务大事当中。新任县长姓巩，脸上有稀稀拉拉几粒麻点，一看见朱先生，劈头就问："你是哪个联保所的？壮丁征齐了没？"朱先生笑笑说："我不在联上，也没在保上，我在书院编县志。"巩县长自觉闹下误会："那你去编你的县志，到这儿乱串啥哩！"朱先生说："县志编完了要付印，给编纂先生的工钱也该清了，请你给拨一点经费。"巩县长脖子一仰："哪里有钱呀？"朱先生说："用不了多少钱，少买两杆枪就足够了。"巩县长瞪大眼睛问："你说这话味气怪怪的，倒像是共匪的口气？"朱先生笑

着说："巩县长快甭说傻话，共党要是听见你这话该兴蹦了！"随之用求乞的声调说："你指缝松一下漏几个零钱给我印书，不过少买两杆枪嘛！"巩县长已不耐烦："你闲得没事干啦，编什么县志！也不睁眼看看时势？你快走吧，我还忙着。"朱先生红着脸说："你把我轰出房子，你真是个好县长。我还没给人撵过，今日真是万幸。"

朱先生还不死心，于无奈中找到石印馆，对老板说："你算一下得多少钱？"老板说："我印先生的书不赚钱，过去印过几回不赚，这回还不赚。可当今纸张油墨都涨得翻了几个筋斗了。"朱先生说："我只印十本，你算算吧。"老板仍然不摸算盘不算账："印的越少越赔钱。"朱先生便向老板学说了被巩麻子轰撵出来的耻辱，特意说明此稿凝聚着九位先生多年的心血，是一部滋水县最新资料的集结，生怕火烧水淹雨淋鼠啃失传了，现在印出十本留下底本，等到太平盛世时再扩印。朱先生说："你不算账也好。你算了也是白算。我手里没钱。我伐书院一棵柏树送你百年之后作枋板，在我算是顶账，在你算是义举。"老板左手一挥，就显得干脆豪爽："不说了，啥话也不说了，我印。"

朱先生花了五天时间，亲自把八套县志分头送给编纂过它的八位先生，终于了却了一件心事。八位先生散居在滋水县的山区河川和原上，朱先生趁送书的机会又一次游览了滋水故地，感受愈加深刻：滋水县境的秦岭是真正的山，挺拔陡峭巍然耸立是山中的伟丈夫；滋水县辖的白鹿原是典型的原，平实敦厚，坦荡如砥，是大丈夫的胸襟；滋水县的滋水川道刚柔相济，是自信自尊的女子。川山依旧，而世事已经陌生，既不像他慷慨陈词、扫荡满川满原罂粟的世态，也不似他铁心柔肠赈济饥荒的年月了。荒芜的田畴、凋敝的村舍、死灰似的脸色，鲜明地预示着：如果不是白鹿原走到了毁灭的尽头，那就是主宰原上生灵的王朝将陷入死辙末路。这一切摆在那里明明白白、清清楚

楚，根本无需掐算卜卦。然而朱先生自己再不能有一丝作为了，这毕竟不是犁毁罂粟，更不是放粮赈济那种事。朱先生把第九套县志托人转送给那位“好人难活”的县长，剩下最后一套留给自己。做完这些事，朱先生顿时觉得自己变轻了，对妻子朱白氏说：“我的事办完了。把怀仁怀义和媳妇叫来，咱们一家子在这儿吃顿团圆饭。咱们都该离开书院了。”

朱白氏托人捎话叫来了两个儿子和大儿子的媳妇。媳妇怀里抱着个满身都是乳香的男孩。朱先生把孙子接到手时举到脸前，像是鉴赏一件贵重物品，随后就对着哇哇哭叫的孙子朗声说：“爷爷重见天日就靠你啰！”朱白氏不在意地接过孩子咕哝说：“你对奶娃儿也说些不着天不着地的话。”大儿子怀仁以为父亲对孙子寄予厚望而满心欢悦。二儿子怀义站在后头，不太关注父亲对侄儿的评头论足，有点冷漠地瞅着侄儿被传来接去，又回到嫂子怀里吸吮奶子。午饭时，朱白氏破例炒下四盘菜，两荤两素，主食是黄澄澄的小米干饭，喝的是煮过小米的稠汁汤。朱先生的心情特别好，把盘里的菜先抄给朱白氏又抄给儿媳妇，接着再给大儿子小儿子碗里抄，温情厚爱尽在那双竹筷子上流动。儿媳竟然被公公的举动感动得热泪盈眶。

午饭后的阳光温暖柔和，朱先生和妻儿老少坐在阳坡下晒暖暖，这是难得的一次合家欢聚的机会。大儿子怀仁长到十六岁，朱先生就把他送回老家去操持家务，过二年给他娶下一个媳妇。二儿子怀义也是长到十六岁送回家去，让他和哥哥搭手耕作土地管理牲畜。他让他们在他膝下读书以识礼义，然后送他们回老家去独立生活，做一个自尊自重自食其力的农人，绝不许他们从政从军甚至经商。在大征丁和大征捐税的起始，朱先生只暗示儿子如数交纳粮捐，却把小儿子怀义隐匿在书院里。田福贤的保丁寻到书院，朱先生说：“我那年为打倭寇

要当兵，闹得满城风雨沸沸扬扬，结果呢，泡儿闪了去不成了，在国人面前放了空炮，说了假话，丢光了面子，我那阵儿就发誓，我再不当兵，子子孙孙都不当兵了。你去把我的原话端给田福贤，再端给县长书记，我的娃娃不当兵。”怀义果然因此躲避过去，但只能算个半免征户。频频加派的各种捐税，整得怀仁卖牛又卖地，几乎濒临破产。朱先生对儿子说：“够了。咱们一年把往昔十年的皇粮都纳上了，纳够了。咱们对国家仁仁义义纳粮交款，可而今这国家对百姓既不仁也不义了。他们谁再催粮催款时，你叫他到书院来朝我要。”果然再没有人朝怀仁死催硬逼了。怀仁后来把这种变化说给父亲时，不无庆幸和窃喜。朱先生听罢，却满脸愧疚：“爸用面皮给你蹭掉了丁捐，乡党乡亲该用白眼翻我了……”无论如何，怀仁总算保住了最后五亩土地而没有完全破产，靠精打细算又给空闲许久的牛圈里添进一头小牛犊……现在，静谧的白鹿书院里温柔的阳婆下，坐着一个在兵荒马乱的世事里有幸保存完整的家庭的全部成员。朱先生转过头对妻子说：“你再给我剃一回头。”朱白氏撇撇嘴：“剃就剃嘛，咋说‘再剃一回’？这回剃了下回不要我剃了？”朱先生笑说：“了不得了不得！你也学会抠字眼了。”儿媳急忙把孩子塞到婆婆朱白氏怀里，钻进灶房替公公烧热水去了。怀仁说：“爸，让我妈歇着，我来给你剃头。”朱先生温厚地笑笑：“你想在我头上学手艺吗？”怀义争着替哥哥作证：“俺哥剃头一点也不疼，村里人老老少少都焖了头求拜他给剃哩！”朱先生惊讶地说：“这倒不错，给乡亲剃头总比在他们头上‘割韭菜’好哇！怀仁你啥时候学成剃头手艺了？”怀义又抢嘴抱屈地说：“俺哥在我头上练刀子练出师了。头一回割下我五道口子，割一个口子沾一撮棉花。我说，哥呀，你甭剃那半边了，留下明年种芝麻……”朱先生放声大笑，笑得前俯后仰眼泪溢出。怀仁厚诚地说：“爸，你这下相信了吧？我来给你剃。”朱先生仍然忍不住笑：“你也想给你爸头上种棉花呀？你把棉花地卖了交了捐款没处种棉花了不是？”怀仁仍然温厚地说：“甭听怀义

尽糟践我的手艺。我一搭剃刀你就知道了。”朱先生轻轻摇摇头：“我还是信服你妈的手艺。你妈给我剃了一辈子头，我头上哪儿高哪儿低哪儿有条沟哪儿有道坎，你妈都心里有底儿，闭着眼也能剃干净。”朱白氏用脸偎着孙儿的脸蛋儿，斜过眼丢给朱先生一个慈爱嗔怪的眼色。儿媳端着铜盆放到太阳下说：“爸，你趁水热快来焖头发。”

朱先生走到铜盆跟前低下头去，正要撩水，朱白氏喊了声“等一下甭急”，把孙子交给儿媳，一边挪着小脚一边从腰后解开围裙系带儿，把那条蓝色印花围腰布巾围到朱先生脖子上，一只手按着朱先生的头，一只手伸进脸盆撩起水来。朱先生猛乍扬起被妻子按压着的脑袋问：“你看看我还有几根黑头发？”

“没有黑的了，尽是白的。”

“你仔细看看还有没有黑的？”

“我连一根黑头发也寻不见。”

“你没仔细寻嘛！去，把老花镜戴上仔细寻。”

朱白氏从台阶上的针线蒲篮里取来花镜套到眼上，一只手按着丈夫的头，另一只手拨拉着头发，从前额搜寻到后脑勺，再从左耳根搜上头顶搜到右耳根。朱先生把额头牴搭在妻子的大腿面上，乖觉温顺地听任她的手指翻转他的脑袋拨拉他的发根，忽然回想起小时候母亲给他在头发里捉虱子的情景。母亲把他的头按压在大腿上，分开马鬃毛似的头发寻逮蠕蠕窜逃的虱子，嘴里不住地嘟囔着，啊呀呀，头发上的虮子跟稻穗子一样稠咧……朱先生的脸颊贴着妻子温热的大腿，忍不住说：“我想叫你一声妈——”朱白氏惊讶地停住了双手：“你老了，老糊涂了不是？”怀仁尴尬地垂下头，怀义红着脸扭过头去瞅着别

处，大儿媳佯装喂奶按着孩子的头。朱先生扬起头诚恳地说：“我心里孤清得受不了，就盼有个妈！”说罢竟然紧紧盯瞅着朱白氏的眼睛叫了一声，“妈——”两行泪珠滚滚而下。朱白氏身子一颤，不再觉得难为情，真如慈母似的盯着有些可怜的丈夫，然后再把他的脑袋按压到弓曲着的大腿上，继续拨拉发根搜寻黑色的头发。朱先生安静下来了。两个儿子和儿媳准备躲开离去的时候，朱白氏拍了一下巴掌，惊奇地宣布道：

“只剩下半根黑的啦！上半截变白了，下半截还是黑的——你成了一只白毛鹿了……”

朱先生听见，扬起头来，没有说话，沉静片刻就把头低垂下去，抵近铜盆。朱白氏一手按头，一手撩水焖洗头发……剃完以后，朱先生站起来问：“剃完了？”朱白氏欣慰地舒口气，在衣襟上擦拭着剃刀刃子说：“你这头发白是全白了，可还是那么硬。”朱先生意味深长地说：“剃完了我就该走了。”朱白氏并不理会也不在意：“剃完了你不走还等着再剃一回吗？”朱先生已转身扯动脚步走了，回过头说：“再剃一回……那肯定……等不及了！”

朱白氏对儿媳说：“等断了奶，你就把娃儿给我。”婆媳俩坐在阳婆下叙叨起家常，怀仁和怀义坐在一边时不时地插上一句，时光在悠长的温馨的家庭气氛里悄悄流逝。冬日一抹柔弱的阳光从院子里收束起来，墙头树梢和屋瓦上还有夕阳在闪耀。朱白氏正打算让儿媳把孩子抱进屋子坐到火炕上去，忽然看见前院里腾起一只白鹿，掠上房檐飘过屋脊便在原坡上消失了。那一刻，她忽然想到了丈夫朱先生，脸色骤变，心跳不住，失声喊起来：“怀仁怀义快去看你爸——”怀仁怀义相跟着跑到前院去了。朱白氏惊魂不定心跳仍然不止，接着就听见前院传来怀仁怀义丧魂落魄的哭吼。她的心猛地往下一沉，倒不慌跳

了，对惊诧不安的儿媳说："你爸走了。他刚才说'剃完了我就该走了'。我们都没解开他的话。"

朱先生死了。怀仁率先跑到前院，看见父亲坐在庭院里的那把破旧藤椅上，两臂搭倚在藤椅两边的扶栏上，刚刚剃光的脑袋倚枕在藤椅靠背上，面对白鹿原坡。他叫了一声"爸"，父亲没有搭理。怀义紧跟着赶到时也叫了一声"爸"，父亲仍然没有应声。兄弟俩的手同时抓住父亲的手，那手已经冰凉变硬，便哇啦一声哭吼起来。朱白氏和儿媳急匆匆走来，制止了两个跪伏在父亲脚下哭吼的儿子和刚刚拉开哭腔的儿媳："这阵儿还能哭？快去搭灵堂。"

灵堂搭在朱先生平日讲学的书堂里，并拢了三张方桌，朱白氏就指点儿子们把朱先生抬进去。两个儿子从两边抓住藤椅的四条腿，就把父亲抬走了，然后小心翼翼地扶上方桌躺下。朱白氏抱来了早已备置停当的寿衣，立即抓紧时间给朱先生换穿；一当通体冰凉下来，变硬的胳膊和腿脚不仅褪不下旧衣裤，寿衣也套不上去。书院远离村舍，没有乡亲族人帮忙。脱掉棉衣和衬衣，儿媳看见阿公赤裸的胸脯上一条一条肋骨暴突出来，似乎连一丝肌肉也看不见，骨肋上就蒙着一层黄白透亮的皮；棉裤和衬裤抹下来，两条腿也是透亮的皮层包裹着的骨头，人居然会瘦到这种地步，血肉已经完全消耗煎熬殆尽了。儿媳瞥见阿公腹下垂吊的生殖器不觉羞怯起来，移开眼睛去给阿公脚上穿袜子，心里却惊异阿公的那个器物竟然那么粗那么长，似乎听人传说"本钱"大的男人都是有血性的硬汉子，而那些"本钱"小的男人大都是些软鼻脓包。朱白氏察觉到了儿媳的回避举动，平稳而又豁朗地说："你先把腿给抬起来穿裤子，袜子最后再穿。"儿媳得到鼓励，就抬起阿公的腿脚，朱白氏麻利地把衬裤和棉裤给穿上去了……从头到脚一切穿戴齐整，朱白氏用一条染成红色的线绳拴束双脚时，发现朱

先生的两条小腿微微打弯而不平展。她使劲揉搓两只膝盖，以为是在藤椅上闭气时双腿弯曲的缘由，结果怎么也揉抚不下去。朱白氏猛乍恍然大悟，对儿媳叫起来："啊呀呀，给你爸把袜子穿错了！"随之颠跑着到后院居屋取来一双家织布缝下的统套袜子，让儿媳脱下错穿的那双白线袜，换上统套布袜，朱先生的双膝立时不再打弯，平展展地自动放平了。朱白氏对儿媳说："你爸一辈子没挂过一根丝绸洋线，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是我纺线织布做下的土布衣裤。这双白洋线袜子，是灵灵那年来看姑父给他买的，你爸连一回也没上脚。刚才咱们慌慌乱乱拉错了，他还是……"儿媳听罢大为惊异。

怀仁支使弟弟怀义到县城去购置香蜡阴纸和供果，自个这才抽出身来走进父亲的书房，果然看见桌面上用玉石镇纸压着的一纸遗嘱，下附的日子却在此前七日。怀仁看了遗嘱的内容更加惊诧：

不蒙蒙脸纸，不用棺材，不要吹鼓手，不向亲友报丧，不接待任何吊孝者，不用砖箍墓，总而言之，不要铺张，不要喧嚷，尽早入土。

怀仁拿着这张遗嘱，又奔进灵堂呈给母亲："我的天呀，俺爸咋给我出下这难题！"朱白氏看了遗嘱却不惊奇："你爸图简哩，你可觉得难？"她看了遗嘱下端附注的时间，正是丈夫给八位同仁送完县志的那一天。那天晚上，朱先生睡下以后就对她说起了自己死后安置的事情，不要吹鼓手，是他一生喜欢清静而忍受不了吵吵闹闹；不要装棺木不要蒙脸纸，是他出于自在自然豁亮畅快的习性而难以忍受拘盖的限制。朱先生向妻子描述出来为自己设计的墓室，不用砖，只用未经烘烧的砖坯箍砌墓室；墓室里盘垒一个土炕，把他一生写下的十部专著捆成枕头，还有他雕刻的一块砖头，不准任何人撕开包裹的牛皮纸，连纸一起嵌到墓室的暗室小洞口。朱白氏当时并不在意："没灾没

病活得好好的，却唠叨这些出奇事！你大概闲得没啥好想了，尽想这些出奇事！”朱先生笑而不答。朱白氏看见遗嘱就印证了那晚的唠叨在朱先生不是闲话，而是有心专意的叮咛，包括和黑娃的谈话，包括叫来儿子儿媳吃团圆饭，包括剃头，包括寻找黑发，甚至当着儿子儿媳的面把她叫妈……全都证实丈夫对自己的死期早已有预测。朱白氏对儿子怀仁说：“就按你爸给你的遗嘱去办。”

怀义买回了祭物，兄弟俩把点心石榴等供品依样摆置到灵桌上，然后由怀仁发蜡焚香。怀义在瓦盆里点着了阴纸，最后就迫不及待地跪伏到灵桌下尽情放开喉咙吼哭起来。儿媳上罢一炷香后叩拜三匝，坐在灵桌旁侧的条凳上抑扬顿挫地拉开了悠长的哭腔。小孙子在大人们的忙乱中被丢弃在火炕上，已经哭叫得嗓音嘶哑，朱白氏从后院火炕上抱起来重新走回灵前，孩子仍然在委屈地呜咽着。朱白氏偎贴着小孙子的脸，泪珠滚滚却哭不出声，待儿子们哭过一阵子，她就坚决地制止了他们继续哭下去，指令二儿子怀义在书院守灵，让老大怀仁和媳妇回朱家圪去安排丧葬事项。打墓自然是繁杂诸事中最当紧的事情，需得明日一早就动手破土；灵柩也得及早发落回家，下葬之前必须让朱先生的灵魂在祖居的屋院里得到安息。其余诸事须得一一相机安排，总的原则是遵照朱先生的遗嘱行事。怀仁和媳妇抱着孩子即刻起程回老家去了。

朱白氏和儿子们严格恪守朱先生的嘱言，尽管未向任何亲戚朋友报丧，朱先生的死讯仍然很快传开。首先是怀义到县城购买祭物传到县城，随后是怀仁头上的一条白孝布作了昭示。从当天晚上起，白鹿书院就开始有人来吊孝。朱白氏让儿子怀义守在灵前，自己走出书院大门，让怀义从里头插死门闩，对一切前来吊孝的人都一律谢绝，并不断地申述丈夫的嘱言。吊孝者的悲痛得不到宣泄，甚至对朱白氏不

近人情的行为激愤起来；人们不愿轻易离去便聚集起来，形成一种巨大的汹涌的气势。朱白氏在感到支撑不住时，扑通跪下去向众人告饶。人们再不好勉强，纷纷抚着大门、抚着墙壁、抚着柏树放声痛哭。

重要亲属中头一个闻讯赶来的是白孝文。他向姑母问讯了姑父的死亡过程后，表示了诚挚的安慰和关切。姑母依然铁硬着心肠不放他进门，孝文只好含着眼泪离开。白嘉轩到来时天已傍晚，看见围聚在书院大门口的人群莫名其妙，随之就对姐姐不近人情的举动大发雷霆，哭着吼着扑上去用头撞击大门门扇，见不到姐夫的遗容就准备碰死。朱白氏对弟弟的行为表示愤恨：“你跟你姐夫往来了一辈子，还不清楚他的脾性？你不遵他的嘱言倒给我在这儿胡来！你撞去，你碰去！你撞死碰死我也不拉你……”白嘉轩冷静下来也软下来，趁势在众人的拉扯劝解下不再扑撞，双手撑住大门门扇放开悲声。黑娃闻讯赶来时天已黑定，他驻守在远离县城的古关峪口，炮营驻地与百姓基本隔绝，两个到县城采买菜蔬的伙夫才把消息带进炮营。黑娃跪伏在朱白氏面前叫了一声“师母”就泪如泉涌。得悉了先生的遗嘱后也不强求，默默地点头并开始劝说众人离开。天上开始飘落雪粒儿，小米似的雪粒击打得枯枝干叶刷刷啦啦响着，许多人开始离去，许多人依然坚持在书院门外为恩师守灵。寒冷和饥饿的威胁终于使朱白氏听从了黑娃的变通办法，由黑娃向众人公布朱先生搬尸移灵的日子就在明天，到明日朱先生的尸首移出书院时可以一睹遗容。这样一说，众人才纷纷离开书院到县城投宿去了，只剩下白嘉轩和黑娃俩人。朱白氏说：“你俩人路远甭走了，歇到书院。”黑娃却摇摇头：“学生不敢违拗先生的遗言。”朱白氏说：“他说过，你是他最好的一个弟子。你去见他，他不会责怪。”黑娃说：“师母，你记错了，先生说过我是他最后一个弟子，没说最好。”朱白氏肯定说：“他对我说过，‘没料想我最好

的弟子原是个土匪。’”黑娃说：“可先生没有准许我破他的遗言呀！我还是遵守先生的遗言为好。”说罢就谢辞了。只留下白嘉轩和姐姐朱白氏，便叫开了门走进书院。白嘉轩拄着拐杖佝偻着腰在庭院里急匆匆走着，几次跌滑倒地，爬起来奔到灵堂前，顾不得上香，就跌扑在灵桌下，巨大的哭吼声震得房上的屑土纷纷洒落下来，口齿不清地悲叫着：

“白鹿原最好的一个先生谢世了……世上再也出不了这样好的先生了！”

夜里捂了一场大雪，白鹿原坡和滋水河川一色素服。怀仁领着朱家圪的乡亲搬尸移灵时已到正午，牛车停在坡根下。书院门外的场地上和山坡上聚集着黑压压一片人群。怀仁和乡亲族人用一块宽板抬着朱先生遗体走出书院大门，聚集在门外的人群爆发起洪水咆哮似的哭声，拍击着白鹿原坡的沟崖和峁梁。人们跟在后头下到坡根，在移尸到牛车上的时刻人们才先后瞻仰了朱先生的遗容。遵照朱先生的遗嘱，不装棺材也不加盖蒙脸纸，朱先生仰面躺着，依然白皙透亮的脸面对着天空，雪霁后的天空洁净如洗，阳光在雪地上闪射出五彩缤纷的光环。

黄牛拽着硬轮木车在河川公路上悠悠前行，木轮在坑坑洼洼的土石路上吱嘎吱嘎叫着，黄的和白的纸钱在雪地上飘落，没有乐器鸣奏，也没有炮声，灵车在肃杀的冰天雪地里默默地移动，灵车后跟随着无以数计的人群。朱先生的死讯和他留下的遗言不胫而走，这样的遗言愈加激起崇拜者的情绪，以不可抑制的激情要表示衷心的崇拜。从白鹿书院到朱家圪，牛车经过五十多里的滋水河川沿路的所有村庄，村民们早在灵车到来之前就守候在路旁村口，家家户户扶老携幼倾巢而出跪在雪地里，香蜡就插在雪下的干土堆上，阴纸就在雪地上燃烧。临到灵车过来时，人们便拥上前去一睹朱先生的遗容。红日蓝天之下，皑皑雪野之上，五十多里路途之中几十个大村小庄，烛光纸焰连成一片河溪，这是原上原下亘古未见的送灵仪式。

灵车后的人群在不断地续接，不断有人加入到凌乱不齐的送灵人群后头默默前行，无以数计的黑色白色的挽联挽幛撑在空中。黑娃从书院起就跟着灵车走，默默地夹在陌生的和熟悉的人流中间。他昨晚回炮营路经县城时买了两丈白绸，回到炮营驻地，就把一路琢磨好了的挽词写上白绸:

自信平生无愧事

死后方敢对青天

牛拉的木轮灵车进入朱家圪，除了帮忙搬尸的人，其他吊孝者仍然不准进入屋子。吊孝的人就把挽联钉在墙上，把挽幛撑挂到树枝上或绳索上；整个小小的朱家圪村的街巷里，是一片黑色和白色的幡幛。许多在省城做官的经商的朱先生的弟子都赶来了，一些远在关中东府西府的弟子也风尘仆仆赶来了，把他们的崇敬挚爱和才华智慧凝

结而成的诗词赋文，一齐献给朱先生，直到第七天下葬时形成高潮……而传诵最快也传诵最久的却是土匪黑娃的那一阕挽词。

白嘉轩一直住守在大姐家，直到朱先生下葬。他拄着拐杖，扬起硕大的脑袋，努力用不大聪敏的耳朵捕捉人们的议论。人们在一遍一遍咀嚼朱先生禁烟犁毁罂粟的故事，咀嚼朱先生只身赴乾州劝退清兵总督的冒险经历，咀嚼朱先生在门口拴狗咬走乌鸦兵司令的笑话，咀嚼放粮赈灾时朱先生为自己背着干粮的那只褡裢，咀嚼朱先生为丢牛遗猪的乡人掐时间卜的趣事，咀嚼朱先生只穿土布不着洋线的怪僻脾性……这个人一生留下了数不清的奇事逸闻，全都是与人为善的事，竟而找不出一件害人利己的事来。

白嘉轩亲自目睹了姐夫下葬的过程：躺在木板上，木板两边套着吊绳，徐徐送入墓道；四个年轻人恭候在墓道里，把僵硬的姐夫尸体抬起来进入暗室；暗室里有窄窄一盘土炕，铺着苇席和被褥，姐夫朱先生终于躺在土炕上了，头下枕垫着生前著写的一捆书……无数张铁锨往墓道里丢土，墓坑很快被填平了，培起一个高高的大头细尾的墓堆，最后插上了引魂幡。白嘉轩这时忍不住对众人又一次大声慨叹：“世上肯定再也出不了这样的先生啰！”

几十年以后，一群臂缠红色袖章的中学生打着红旗，红旗上用黄漆标写着他们这支造反队伍的徽号，冲进白鹿书院时呼喊着愤怒的口号，震撼着老宅朽屋。他们是来破除“四旧”的，主要目标是袭击图书，据说这儿藏着一大批历朝百代的封建糟粕。他们扑空了，这儿的图书早在解放初期就被县图书馆收藏了。怒火满胸的红卫兵得不到发泄，于是就把大门上那块字迹斑驳漆皮剥落的“白鹿书院”的匾牌打落下来，架火在院中烧了。

他们过火的举动受到种猪场职工的干预。书院早在此前的大跃进年代挂起了种猪场的牌子，场长是白鹿村白兴儿的后人。那时候国家主席号召发展养猪事业，白兴儿的后人小白连指敢想敢干敢放卫星，就在这儿创办起一座养猪场，这个废墟般的书院是县长亲自拨给小白连指的。小白连指上过初中，又兼着祖传的配种秘诀，真的把种猪场办起来了。那年同时暴起的小钢炉很快就熄火了，公共食堂也不冒烟了，而小白连指儿的种猪场却坚持下来，而且卓有功绩。他用白鹿原上土著黑猪和苏联的一种黑猪交配，经过几代选优去劣的筛选淘汰，培育出一种全黑型的新种系。此猪既吃饲料也吃百草，成为集体和社员个人都喜欢饲养的抢手货，由县长亲自命名为“黑鹿”。小白连指曾被邀到省城上了钟楼参加国庆典礼。

小白连指对围着火堆欢呼狂叫的红卫兵说：“红卫兵小将们，你们的革命行动好得很！我们种猪场全体职工举双手拥护。你们也要相信我们，这儿余下的四旧由我们革命职工彻底来破它。”红卫兵终于走了。

不久，书院住进来滋水县一派造反队，这儿被命名为司令部，猪圈里的猪们不分肉猪或种猪、公猪或母猪、大猪或小猪一头接一头被杀掉吃了，小白连指儿抖着丑陋的手掌，连对红卫兵小将那样的话也不敢说。这一派被认为是保守派，进不了县城夺不上权，却依然雄心勃勃高喊着“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和“农村包围城市夺取城市”的口号继续与县城里夺得大权的造反派对峙。一天深夜，县城里的那个响当当硬邦邦的造反派从四面包围了白鹿书院——种猪场，机枪步枪和手榴弹以及自制的燃烧瓶一齐打响，夺取了保守派的老窝，死了八个男女，带伤的无法计算，烧毁了昔日朱先生讲学的正殿房屋，吓跑了种

猪场场长小白连指儿和十几个职工。打死的猪当即被开膛入锅犒劳造反派战士，逃窜的活猪被当地农民拾去发了洋财。

大约又过了七八年，又有一群红卫兵打着红旗从白鹿原上走下原坡，一直走到坡根下的朱家圪。他们和先前那一群红卫兵都出自一个中学，就是白鹿镇南边鹿兆鹏做第一任校长的那所初级小学，现在已经变革成为一所十年制中小学统一的新型学校了。中国又掀起了一个批判林彪加批判孔子的批判运动，因为野心家林彪信奉孔子“克己复礼”的思想体系。这一群红卫兵比冲击白鹿书院的那一群红卫兵注重纪律，他们实际只是十年级的一个班，在班主任带领下，寻找本原最大的孔老二的活靶子朱先生来了。班主任出面和生产队长交涉，他们打算挖墓刨根鞭挞死尸。生产队长满口答应，心里谋算着挖出墓砖来正好可以箍砌水井。

四五十个男女学生从早晨挖到傍晚，终于挖开了朱先生的墓室，把泛着磷光的骨架用铁锨端上来曝光，一堆书籍已变成泥浆。整个墓室确系砖坯砌成，村里的年轻人此时才信服了老人们的传说。老人们的说法又有了新的发展：唔！朱先生死前就算定了要被人揭墓，所以不装棺木，也不用砖箍砌墓室。整个墓道里只搜出一块经过烧制和打磨的砖头，就是封暗室小孔的那一块，两面都刻着字。十年级学生认不全更理解不开刻文的含义，只好把砖头交给了带队的班主任老师。老师终于辨认出来，一面上刻着六个字：

天作孽 犹可违

另一面也是刻着六个字：

人作孽 不可活

班主任欣喜庆幸又愤怒满腔，欣喜庆幸终于得到了批判的证据，而对刻文隐含的反动思想又愤怒满腔。批判会就在揭开的墓地边召开。班主任不得不先向学生们解释这十二个字的意思，归结为一句，就是“阶级斗争熄灭论”，批判会就热烈地开始了。

第三十三章

鹿子霖重新雇回了长工刘谋儿，又一块一块赎回坐监期间被女人卖掉的土地，干涸的牲畜棚圈里重新弥漫起牛马粪尿和草料的混合气味，一只金黄毛色的伢狗在屋院里窜出窜进，屋里院里和牲畜棚里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鹿子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迫切地要振兴这个屋院。现在又是一个极好的机会，土地牲畜木料砖瓦直至订亲的彩礼都在掉价，只有壮丁这个特殊的时兴的商品一茬涨过一茬，鹿子霖无须算计就抓住了这个机会。拆掉的门房和门楼也一定要重新建筑，而且要比被白家拆迁走了的原有规格和样式更讲究更漂亮，只是得往后拖一拖，得把腾空了的家底垫实起来。

鹿子霖在联上干着一门无异于钦差大臣的工作。田福贤没有给他具体分工，也没有给他封官，对他说："给你加上个股长没啥意思，给你封个联保主任那不能由我，你权当你是主任一满都管上。"田福贤又在保长甲长会上宣布："鹿子霖代我行事，无论到了哪一保哪一村哪一甲，他说的话就是我的话，他要你们做的事就是我要你们做的，诸位都掂掂这个轻重。"鹿子霖成了真正的钦差大臣本原上的无冕王，他每到一个保公所去，果然受到所有保长们的殷勤招待，甚至比对田福贤本人还要殷勤。保长们都很灵醒，在田福贤面前哪怕挨夯受威遭斥责，毕竟是脸对脸眼对眼，而鹿子霖回去给田福贤戳弄起来就摸不清底细也探不来深浅了。鹿子霖天天像过年，保长们见到他就摆宴置酒，都知道鹿子霖爱抿两口；抿了两口以后的鹿子霖回到联上就会把一切不满意的事都化释了。摆宴喝酒请客送礼在联上和保上早已超越了风气而成为习惯，关键在于一茬接一茬的捐税客观上提供了财源，

联上和保上的头儿以及干事们都在发财。鹿子霖在牢狱腾空了的皮囊开始充填起来，脑门上泛着亮光，脸颊上也呈现出滋润的气色。

鹿子霖起初却不大满意田福贤对他的安置，窃以为是田某人不放心自己因而不给实权，后来就感觉到这样安排反而倒是好极了。他无职无权却威震原上各个保各个甲，不能如期交付壮丁和捐款他可以不担责任，任何弄坏了搞糟了的事情也追查不到自己，又可以自由地接受这个保那个保的保长们在完成一茬丁或捐的征集任务之后的“分红”。他很快就看透了当今的世态变化和其中的奥秘。鹿子霖的职责是以田主任的名义到各个保上催丁催捐。他给自己划了一个严格的界线，只到保上催促保长，绝不到任何村子去催促甲长，更不会具体揪住某一家农户的领口要粮要钱。无论什么捐什么款最终要由一户一家百姓掏出来，而不是由保长们掏腰包，鹿子霖只催保长，把翻箱倒柜鞭打绳缚的害人差使由保长们去完成。鹿子霖吃了喝了对保长们耍了威风之后回联上去，走在路上就忍不住得意起来：田主任你逛得灵，我比你逛得还灵。你想叫我替你挨骂，还不放心我，我不当你的官只受你的禄真是嫽扎咧！

鹿子霖又雇下一个年轻的长工和刘谋儿搭伙儿替他经营土地和牲畜，从屋院到畜棚再到田地里，开始呈现出一种人欢马叫的蒸腾欢悦的气氛，与整个村巷和阔大的田野上的清冷孤凄的气氛形成明显差异。鹿子霖一想到刚从监牢回到家时的那种日月就不寒而栗，除了女人鹿贺氏扑沙扑沙走路的声音，这个屋院里从早到晚便是空庙古寺一般的沉寂，衰败破落的家户是怎样一副架势？就是自家眼下这种架势。鹿子霖一次又一次在心里凝练这种痛哭的感觉。小孙孙不期而至，一下子给衰败的屋院注入了活力，使情绪跌到谷底的鹿子霖的心里开始荡起一股暖气。鹿子霖大声憨气地对女人说：“你说啥最珍贵？

钱吗地吗家产吗还是势吗？都不是。顶珍贵的是——人。”鹿贺氏一时揣不透他的真实心思，默默地应付似的点点头。鹿子霖进一步阐释他新近领悟的生活哲理：“钱再多家产再厚势威再大，没有人都是空的。有人才有盼头，人多才热热闹闹；我能受狱牢之苦，可受不了自家屋院里的孤清！”

鹿子霖雇回来刘谋儿不久，又雇来一个年轻长工就有图得几分热闹的意愿，因为刘谋儿毕竟老了，寡言默语手脚迟钝而掀不起热闹欢蹦的气氛来。新雇佣的年轻长工正好弥补了这种缺陷。鹿子霖对小长工说：“地里活儿紧了你给刘叔帮帮忙，没啥紧活儿你就引上娃娃耍，甭把娃娃跌了摔了就行了。”小长工就引着鹿子霖的宝贝蛋儿孙子玩耍。鹿子霖从联上回到屋里，往往跟小孙子和小长工玩得忘了长幼主仆。小长工是渭北高原上的人，一口奇怪的发音让鹿子霖听来十分开心，小长工把“重”说成“冲”，把“读书”说成“头失”；更使他莫名其妙的是，小长工把“狼”叫做“骡”，而又把真正的“骡”叫成“却”等等等等。鹿子霖一个一个名词跟着小长工学着念着，常常笑得前俯后仰，像跟着洋人学洋话一样，傍晚时屋院里就掀起活跃的声浪。鹿子霖对小长工唯一不满意的一点，是这个小家伙时时处处对他表现的那种巴结讨好，以至自作自践的神气，于是正言厉色说：“该做活你做活，该吃饭你咥饱，该哭你就哭，该笑你就笑，该骂你就畅快骂，从今往后不准你尽给我说骚情话！”小长工反而愣呆住了，不知如何是好了。

这个小长工是鹿子霖拾来的。

那天晚上，鹿子霖从南原催捐回来时，月亮很好，带着七分酒醉三分清醒甩甩荡荡在牛车路上走着，一路乱弹吼唱过来，引逗得沿路村庄里的大狗小狗汪汪汪乱咬。路过自家的坟园时，从黑森森的墓地树丛里蹿出一个人来，吓得鹿子霖哑了口愣了神。那个人蹿到他跟

前，扑通一声跪倒了，一口一声大爷大伯地恳求要给他当长工，声明不要一个麻钱也不要一升粮食，只要给吃黑馍就心满意足了。鹿子霖松了口气，踢了那人一脚又骂了一句，说他把他差点吓死了。跪在地上的人继续乞求雇他当长工，情愿大伯大爷再踢他两脚压惊消气。鹿子霖从稚声嫩气的嗓音判断出这是一个半大小伙儿。他让他再踢两脚的话似乎触动了心头的某一根弦索，就问："你为啥偏偏缠住我要给我熬活？"小伙子说："我看你是个好人。"鹿子霖对这种露骨的讨好和巴结很反感："你凭啥看我是好人？"小伙子说他在这个坟园里躲了三天三夜了，几次看见鹿子霖从这条路上走过。"你娃子鬼得很咧！"鹿子霖说，"你是看我穿得阔，断定我能雇得起你；你是看我像个官人，给我当长工没人敢拉你壮丁，你说是不是龟孙？你不说实话我就把你掐死！"小伙子连连在地上叩头："是的是的爷！你说的着着的对对的。"鹿子霖又问："你小小年纪逃出来是因了啥事？偷了人家闺女抢了人家粮食还是逃壮丁？"小伙子哇地哭了："爷呀，我是逃壮丁哩！俺兄弟三个有两个都给抓壮丁没回来，俺爸叫我逃出来寻个活命……你收下我全当积德行善哩！"鹿子霖大体信下了小伙子的话，他的笨拙的渭北口语可以使人产生信赖，问："你叫啥名字？"小伙子说："我叫三娃。"鹿子霖说："三娃，你起来跟我走。"

鹿子霖把自称三娃的小伙让到前头走，自己在后面和他保持着三五步的间距。小伙子不时回过头来说着讨好巴结谄媚的话。鹿子霖心头的某一根弦索似乎又被撞击了一下，忍不住直言相告说："你娃子跟谁学的这张糜子面儿乖嘴？你知道不知道我顶讨厌溜尻子的小人？你要是再说这些舔尻子挠脚心的话，我把你马上扭到联保所去，这儿正征一茬壮丁哩！"三娃吓得转过身又跪下了，声音都抖颤着："好爷哩我没啥瞎心。俺爸俺妈教我出门嘴学乖点……"鹿子霖说："我的长工可不要乖嘴软舌头。你的嘴能不能学硬？能学硬了跟我走，硬不了

嘛，你就滚蛋！”三娃连连应诺：“学乖不容易学硬好办，我再不说骚情话了。”鹿子霖说：“你先站起来。我想当场试验你一回。”三娃站了起来侍候着。鹿子霖说：“你骂我一句。你拣最难听的话骂。你想怎么骂就怎么骂。骂吧——”三娃一听就愣住了：“大伯，我咋能平白无故骂你哩？”鹿子霖脖子一仰朗然笑了：“我一天从早到晚尽听奉承话骚情话，耳朵里像塞满了猪毛，倒想听人当面骂我一句哩。骂吧三娃——”三娃嗅到一股酒气，想到这人肯定喝醉了，我要是当真骂了他，他酒醒后还不把我捶死？于是说：“大伯，你另换一样试验我的方子吧，我一定做到。”鹿子霖往前走了两步躬下身来，把脸拱到三娃胸前：“你抽我两个耳光子。”三娃大惊失色，不由往后退了两步，心想这人不是疯子就是魔鬼，几乎吓得魂不附体，下意识地往后瞅瞅，寻找逃跑的路径，盘算逃跑的机会。鹿子霖却哈哈大笑着仰起头来：“还是不敢吧？那好，我再说第三件，掏出你的家伙来给我脸上尿一泡——”三娃子听罢“妈呀”叫了一声扯腿就跑，鹿子霖跃起一步就拽住了他的后领：“我费了这么些唾沫跟你磨牙，你连我一件事都做不到还想逃跑？我马上把你送到联保所去。”三娃子蹲下身双手捂着脸悲哀地哭起来。鹿子霖急了就骂起来：“你哭你妈个屄！我没打你骂你，叫你骂我打我尿我净占便宜你还哭！凭你这号痴熊闷种鳖蛋贱坯还想给我当长工？”三娃子哭丧着声儿哀求：“大爷，我不敢缠你了，你放我走。”鹿子霖眼一瞪冷笑着：“要来要走都由你了？没有那么容易。我今日个要把你变成个歪熊灵种硬蛋高贵坯子。就是骂、打、尿那三样儿，你任选一样。站起来——”三娃抖抖索索站起来说：“大伯，你先骂我打我尿我吧。”鹿子霖说：“甭啰嗦！我让一步，我闭上眼。我知道我睁着眼阎王也不敢骂我。”三娃子豁出来了，聚足了气跳起来，“啪”的一声抽了鹿子霖一记耳光，双脚落地时骂出一句：“我日你妈！”随之就凝固在地上等待自己的末日。鹿子霖睁开眼睛笑了：“打得好也骂得好哇三娃！好舒服呀！再来一下，让我那边脸也舒服一下。”说着闭上眼

睛把那边脸转到三娃迎面。三娃想着反正已经豁出去了，抡开巴掌又抽了一下，跳起来骂："我日你婆！"鹿子霖猛然扑上来把三娃拦腰抱起来，在原地转了一圈哈哈哈笑着又扔到地上，说："小伙子有种！"三娃子懵懵地站着。鹿子霖一只胳膊搂住三娃的脖子往前走，竟然哭了说："三娃，你不知道哩！俺祖先就是挨打受气的角色。我咋也尝不来挨打挨骂是个啥滋味儿，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三娃怎么也解不开这个疯子这个醉鬼的意思，却应酬道："明白，我明白。"鹿子霖并不相信地瞪起眼睛："你明白个肢子！我活到这岁数还没全明白，你牙没扎齐的小犊羔子明白个啥……"

从鹿子霖往上数五辈，鹿家的日月已经破落到难以为继的谷底，兄弟三个有两个都出门给财东熬长工去了，刚刚十五六岁的老三是靠讨吃要喝长大起来的，原上远近的大村小庄的男人女人几乎没有不认识这个孩子的。他没学会走路是由母亲抱着讨饭的，学会了走路就自己去讨饭了。他裤带上系着一只铁马勺用来接受施舍，吃完了在水渠涮一涮又系到裤带上，人们不记得他的名字，就叫他马勺娃或勺儿娃。有一晚，长年累月瘫在炕上不能翻身也不能动腿的父亲对他说："你现在不能要饭吃了。你小着要饭人家可怜你给你吃，你而今长大了再要饭人家就骂你哩！去——自己挣饭吃去。"自己挣饭吃就是像大哥二哥一样去熬长工。马勺娃听了点点头，第二天天未明出了门再没回家，原上人谁也看不到那个倚着街门攥着马勺的孩子了。

马勺娃避开熟悉的村庄和熟悉的原上人下了北边原坡，在滋水川道陌生的村庄陌生的人家继续倚靠陌生的门板，沿着滋水弯弯曲曲的河道走下去。有一天走进城门楼子就惊奇地大叫起来："城里比原上好多了！"他不需再哀求任何人，只需瞄准饭馆里进餐的对象，把他们吃剩的面条包子或肉菜扒进马勺就是了。他随后被一家饭馆雇用烧火拉

风箱洗碗刷盘子。坐在灶锅下拉风箱时，炉头却一边炒菜一边又用蘸着油花调料的小铁勺子敲他刚刚扬起的脑袋；开头用勺背敲，后来就用勺沿子敲，有两次就敲出了血来。他咋也不明白烧火拉风箱为啥不准抬头扬脸？还以为是炊饮熟食行道的规矩，于是终于记住了就只顾闷住头烧火，在炉头喊了“熄火”的间隙里仍然低垂着脑袋。有一天，他突然茅塞顿开终于想明白了，炉头是怕他得了手艺才不准他扬头看各种炒菜的操作过程。

勺娃弄明白了这个隐秘，反倒滋长起野心来了。妈的，你不敲我脑袋我还没想到学手艺哩！于是他就变得殷勤了：早上给炉头打洗脸水倒尿盆，晚上又打洗脚水提回尿盆；给炉头洗衣裳逮虱子捶背揉大腿；刚一瞅见炉头摸烟袋，就把火鞫儿吹旺递到他脸前。炉头一声不吭接受他所有殷勤周到的侍奉，依然用勺子毫不手软地敲他从灶锅下扬起的脑袋，绝不允许他偷瞅一眼炒锅里的菜馔由生变熟的奥秘。这样的打杂活儿干了一年多，为炉头无偿服侍了一年多，马勺娃烧火抹桌子端盘刷碗的技艺完全精通，炒菜的手艺却仍然等于零。

一天晚上，照例在掌柜家楼上睡下后，炉头说：“勺娃子，你给我再骚情也不顶啥。你凭你骚情那两下子就想学手艺，门都没有。你知道我学这手艺花了多大血本？”勺娃说：“肯定是你花好多钱才学下一手绝活儿。我没钱。等我把钱攒多了再拜你为师。”炉头不屑地笑起来：“凭你一月挣那俩铜子，攒到胡子白了也不得够。”勺娃悲哀地说：“那我就洗一辈子碟子烧一辈子火。”炉头换一种同情的口吻：“看你这娃娃是个灵醒娃，也是个好娃。我不要你钱，你答应我三件事，我就教你手艺。”勺娃忙说：“甭说三件，三十件我都答应，只要你肯教我学手艺。”炉头压低声音说：“我骂你一句你不许恼。”勺娃以为炉头要他给他出力帮忙，怎么也料不到是这种事，就沉默不语；想想也

不算太难接受，骂一句风刮跑了也没有任何实际损失，于是就“嗯”一声算是接受了。炉头把脑袋凑到勺娃耳旁悄悄骂：“勺娃，我操你妈。”勺娃耳朵里像浇了一勺子滚油，气得浑身都颤抖起来，还是咬牙忍住了。炉头问：“你咋不吭声？”勺娃不无气恨地说：“你骂我我听见了，我没恼嘛！”炉头说：“呃！我骂了你，你得应声愿意不愿意。你不应声，我不操到空里去了吗？”勺娃的手在被窝里攥得嘎巴响，一拳就能把那张喷着烟臭的油嘴打哑，然而他忍着说：“我应声。”炉头嘻嘻骂：“勺娃，我操你奶！”勺娃答：“你操去。”炉头兴奋地连着骂：“勺娃子，我操你姐。”勺娃答：“你操去。”炉头兴奋得格格格笑起来，直至睡在楼下堂屋的饭馆掌柜干涉起来：“还说啥哩笑啥哩？早点歇下明早起早点。”炉头兴犹未尽地收拢嘴巴睡去了。此后许久，几乎每晚入眠以前，炉头都像温习功课一样把勺娃的妈妈奶奶姐姐以至扩大到姑姑姨姨齐操一遍，勺娃已不在意，也无羞辱，只是例行公事似的应着“你操去”的口诀。炉头的“操”瘾很大，不仅晚上入睡以前要操，白天支着一条腿站在锅台前，抓住吃客间断的空闲时间，一双淫气四溢的肉泡眼斜瞅着坐在灶锅下的勺娃说：“啊呀勺娃，我又想操你娘了。”有一天早晨，刚搭着炉火，炉头一边在锅里哧啦哧啦煎油，一边乐不可支地说：“勺娃子，我昨个黑间做梦把你姐操了！你姐模样跟你一样，只是头发辫子很长，也是两只黑窝深眼长眼睫毛。你说你姐是不是跟你相像？”勺娃半恼地说：“我姐俩眼长了一双萝卜花……”

直到炉头再生不出什么骂人的新招儿，他才向勺娃提出第二件事。那是在午饭过后的消闲时间提出的。勺娃渴盼着尽早实施新的折磨，以期实现捉摸炒勺儿的心愿，就说：“你说吧，我听着。”炉头笑说：“第二件事很简单。看镖——”说时已抡出巴掌抽到勺娃脸上，接着问：“好不好？”勺娃被打得晕头转向，清醒过来时就明白第二件事是挨打，于是不假思索说：“好。”炉头又抽那边脸一个耳光，而且给

手心吐了唾沫儿，抽击的声音异常响亮，问：“受活不受活？”勺娃已忍不住泪花溢出，仍然硬着头皮答：“受活。”掌柜的在屋里问：“你俩弄啥哩，啪唧啪唧响？”炉头哈哈笑着说：“我跟勺娃子耍哩！”炉头打勺娃的花样也是挖空心思地变换着，抽耳光、顶胸捶、踢屁股属家常便饭，撕耳朵、捏鼻子、拧脸蛋是兴之所至，顶使勺娃难以忍受的是正当睡得极香时，炉头猛然在他脸上咬一口，疼得他合着被子蹦起来时，炉头刚刚撒完尿又钻进被窝。饭馆掌柜终于察觉了勺娃受虐待的事，暗中窥到炉头正在拧勺娃耳朵的时候，便走到他们当面，貌似平和的口气下隐含着愤怒：“你不能打人家勺娃。你看看勺娃给你打成啥样子了？满脸满身都是青疤。”炉头嘻嘻笑着还是那句话：“我是跟勺娃耍哩！”掌柜的再也不相信什么耍的鬼话：“哪有这么耍的？勺娃的红伤青疤给人看见了，还说我手脚残狠哩！我也不是没打过勺娃，他是我雇的相公，我打他他妈他爸没话说。你打不着人家娃娃嘛！”炉头有点尴尬地笑着：“算哩算咧，我往后跟勺娃再不耍了。”掌柜的仍不放松：“你还把打人说成耍？”转过脸问勺娃，“是不是跟你耍哩？”勺娃嗫嚅半天垂下眉：“是……耍哩……”掌柜的转身拂袖而去：“该当挨打……贱坯子！”

这天晚上睡下以后，炉头用胖滚滚的手掌抚摸着勺娃的伤处，绵声细语说：“勺娃，我真的是跟你耍哩！我说操你妈操你奶操你姐全是说着耍的，谁倒真操来？我打你拧你是看你娃子脸蛋奶嘟嘟的好看，打你骂你都是亲着你疼着你。既然掌柜的犯病了咱就不耍了。我看就剩下一件事，你做了就开始学手艺。”勺娃忙说：“你快说吧，我也该熬到头了。”炉头贴着勺娃耳朵说：“我走你的后门。”勺娃愣愣地说：“俺家里只有单摆溜三间厦屋，没有围墙哪有后门？你老远跑到原上走那个后门做啥？”炉头咻咻咻笑着说：“瓜蛋儿娃，是这样子……”勺娃惊诧地打个挺坐起来，沉闷半天说：“我把我的工钱全给你，你去逛窑

子吧？”炉头说：“要逛窑子我有的是钱，哪在乎你那俩小钱。”勺娃自作自践地求饶：“那是个屎罐子，有啥好……”接着又可怜地乞求：“你另换一件，哪怕是上刀山下油锅我都替你卖命……”炉头当即表示失望地说：“那就不说了，咱俩谁也不勉强谁。”勺娃想到前头的打骂可能白受了，立即顺着炉头的心思讨好地说：“你甭急甭躁呀……”

五年后，鹿马勺学成了一个真正的炉头，技艺已经超过了师傅。这个小小的一间门面的饭馆生意日见兴隆，掌柜的不失时机地停断了面条油条一类便饭，改为专营各色炒菜的菜馆。城里两三家大门面饭庄菜馆私下出高薪想挖走鹿马勺，掌柜的闻讯十分担心，先自给马勺提了身价。马勺很坦然地对掌柜的说：“放心吧，马勺不是贪财无义的小人。凭你对炉头打我时说的那几句话，我不要一分一文身俸至少给你干五年。”掌柜的听了竟然感动得涌出眼泪，又气愤地说：“把那个狗东西撵走。”马勺却说：“不，就叫他在这儿。”

马勺真是春风得意时来运至。一位清廷大员巡视关中，微服混杂于市民之中，漫步于大街小巷体察民情，看见这家小小门面的菜馆吃客盈门，便走进去点了四样菜要了一壶酒，正吃着就忍不住惊叫：“天下第一勺。”随即唤来菜馆掌柜要来笔墨，把“天下第一勺”的感叹书于纸上。吃客中有人看见题辞下款的题名就跪下来，连呼大人。众吃客闻听此人大名，纷纷跪下一片，大员微微笑着走出门去。掌柜的捧着题辞又惊又喜，随后花重金做了匾牌，门楣上挂起“天下第一勺”的金字招牌，生意红火兴盛极了。

鹿马勺扬名古城，达官贵人富商巨头每遇红白喜事，祝寿过生日或为孩子做满月宴请宾客，都以请去“天下第一勺”为荣耀。官府衙门清兵标营遇有重大庆典活动犒劳会餐，也必是请鹿马勺去做菜。勺娃子不仅得到分量沉甸的红包赏银，而且与古城上流社会的人物有了私

交。“鹿师傅有啥事用得着时就开口。”有钱的有权的有势的包括死狗赖皮街楦子都这样许诺……勺娃终于有了出气报复的机会。

炉头刚刚洗了手脸准备就寝，两个标营兵勇来传话说，请他去给鹿师傅帮帮忙做菜。炉头丝毫也不敢怠慢，掂上烟袋就走了。炉头跟着兵卒走进军营，又走进一间拐角的屋子，看去像是垒堆马料的一个仓库，里面独自坐着勺娃一人在消停地抽烟，他就奇怪地问：“不是说叫我来给你帮忙吗？”勺娃说：“你先抽袋烟缓缓气儿。”炉头刚坐下装烟点火，勺娃矜持地问：“你还想让我给你做‘骂打操’那三件事不？”炉头从嘴里拔出烟袋，从椅子上溜下来就双膝跪倒了，连连求告宽恕。勺娃阴冷地笑笑：“你这膝盖儿很软和，说弯就弯到地上了？”炉头说：“好鹿师，我叫你碎爷！你现在咋样酿制我，我都不吭一声。”勺娃说：“我骂你嫌臭了我的嘴，打你还怕脏了我的手，用你们河南的话不说日说操，操你尻子会贱了我的屌！”炉头虚汗直冒：“我不是人，是猪是狗是王八是畜生……”勺娃说：“你先前怎样骂我，现在就怎样骂你自个；先前怎样打我，现在你就照那样打你。站起来开始——”炉头站起来，左手抽左边耳光，右手抽右边耳光，自己撕自己耳朵，拧自己脸皮，口里连续不断地骂着自己：“我操我妈，操我奶，操我姐，操……”勺娃抽着烟靠坐在椅背上欣赏这个怪物自打自骂，一边说：“使劲骂使劲打，不准停下……”直到炉头抡不动胳膊骂不出声来死猪一样瘫倒在砖地上为止。勺娃说：“好嘛，你就歇一阵儿起来再干。”炉头缓过气歇出了劲，又爬起来重新表演，一直反复表演到后半夜，抽打撕拧得脸皮青红绿紫耳朵淌血，瘫在砖地上再也爬不起来了。勺娃说：“算咧，到这儿为止。现在该做第三件事了。”

勺娃走到门口拉开门，在门前台阶上拍了三下手掌，停不大会儿走进五个人来，全是勺娃托街楦子在城里找来的要饭的，个个都是精

壮小伙子。炉头已经吓得蜷在墙拐角。勺娃说：“弟兄们，明白到这儿来做啥不？”五个人都面面相觑摇头不晓。勺娃说：“我跟弟兄们一样，也是讨吃要喝进城的。墙拐角那个人，见了叫花子就拿勺子砍砸脑袋。弟兄们，今日个出口气吧！”五个人嗷嗷叫着挽袖子伸胳膊。勺娃说：“这个人是个尻子客贱种，明白吗？”说罢就把一摞子白光光的银圆堆到桌子上。五个人瞪大了眼睛瞅着银圆，眉里眼里都活泛起来了，竟然为争先拿到头一块银圆而争执起来。勺娃把五个人按个头从高到低排了顺序，说：“弟兄们甭争甭抢，银圆你们挣不完，我还怕你们挣不完咧。”说罢就退到里间套房里去了……过了许久，勺娃走出套间，桌子上的银圆摞子还没消下去一半，炉头已经像死猪一样趴在地上一动不动。勺娃说：“弟兄们，把剩下的银圆分了，顺手把这人抬出去撂到城墙根完事。”

鹿马勺随后回到原上。他雇了一辆双套马车，车上装着整袋整袋的面粉蔬菜牛羊肉和炒锅炒瓢勺子等等。他请大哥二哥帮忙在豁敞的院子里垒起锅台安上风箱，晚上煮烂了牛羊肉，第二天就到村子里请那些过去给他施舍过饭食的大爷大伯婆婶嫂子来吃一碗羊肉或牛肉泡馍。白鹿村里的施主吃过以后，再邀请到邻近的村庄，随后就成为整个原上所有施主自动赶来享受了。马勺在半个多月的时间里，从早到晚侍立在灶锅旁亲手掌勺，把一碗又一碗煮熟的泡馍送到恩人手里，他们就蹲在院子里吃。马勺没有空闲和人们说话，许多人看着累得皮松眼红的小伙子滴下了眼泪，这个讨饭娃子是个情深义重的君子哩！有个没有施舍过的人也混杂进来捞一碗泡馍吃，用筷子一搅搅出一窝麦草，悄悄放下碗溜了。原来这个人非但没给马勺一块馍，反吆喝狗咬烂了马勺的腿……马勺报答了所有有恩于自己的人，也报复了伤害过自己的人，那个临时垒砌的灶锅才宣告熄火。

随之，马勺便开始置田买地修筑房屋，骤然间成为白鹿村的首富。两个哥哥不再出门去熬长工，反而雇用起长工来了。马勺仍然到城里去继续耍勺子，然后把银圆不断送回原上，交给两个哥哥扩大耕地、增添牲畜、建筑房舍……那时候，白嘉轩的祖先还在往那只只有进口而无出口的木匣里塞着一枚铜元或两只麻钱。马勺发财的事强烈刺激着原上人，随之出现了一个进城学炊的热潮。穷汉家娃子长到十四五，不再像以往那样全都出门去给人家熬长工打短工，而是背上薄薄的被卷进城学烹调手艺去了，鹿马勺获得的成功成为他们忍受艰辛和凌辱以图出人头地的强大动力。人们尊称开创这条生活新路的鹿马勺为勺勺爷，而后来不断加入到这个行业里的人被称为勺勺客。从此开端一直延续到百余年后的今天，烹调手艺仍然在六十四行谋生手艺中占有主体位置，白鹿原以出勺勺客闻名省内外。

鹿马勺无可置疑地成为鹿姓这一门族里产生了巨大影响的一个人。不仅仅是把濒临倒灶的家业振兴起来，重要的是他具有自己的思想和理论，深深地影响着鹿家门族里一代又一代的子孙，显示着与白家迥然相异的家风和气性。鹿马勺用他抡勺子挣来的薪金和赏银在白鹿村置地盖房，仅仅控制到土地房屋牲畜可以在村子里数上头家的程度就适可而止，然后把心力转到孩子的读书上头。马勺靠一把勺子出入官府和上流社会的各种场合，经见的大世面大人物在整个家族的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大世面的气魄豪华和大人物的威仪举止，深刻地烙刻到心头，在他感到幸运的同时又伴随着自卑。那种不断重复的生活经历和越烙越深的印象终于凝结出一个结论，要供孩子念书，通过科举考试进入上流社会坐一把椅子占一个席位，那才是家族真正的荣耀；至于自己嘛，说到底还是个勺勺客，是把一碟一盘精美的菜馔烩炒出来供大人阔人们享用的下人，只能在灶锅前舞蹈而绝对不能进入自己创造的宴席。马勺娶妻生子以后就开始实现这个目标。为此他一

胎赶着一胎让女人为他生育后代。女人确也像个爱生蛋的母鸡一共生过十五胎，直到红绝腰干不来经血。他的命里注定儿少女多，十五胎里有十一个女子四个娃子，最后只有五女二男成人。他在孩子启蒙的头一天，就对孩子说：“好好念书。中秀才爸给你放草炮，中举人就放铳子演大戏。”两个儿子许是智力平庸，也许是运气不佳，只有老二考中秀才，此后连连再考都不能中举。马勺死时就把遗愿留给后代：“记住，孙子曾孙子谁中秀才中举人或者进士，就到我坟上放炮响铳子，我就知道鹿家出了人了。”这个奋斗目标一代一代传下来，竟然连在老马勺坟头放草炮的机会都不再有。鹿子霖对两个儿子兆鹏兆海十分看重，瞅定有实现祖宗遗愿的寄托了，不料中途而废。

鹿马勺艰难曲折的人生经验是留给鹿姓门族的第二大理论思想。他对两个刚刚懂事的儿子简明扼要地灌输这种思想：无论你将来成龙或是成虫，无论是居官还是为民，无论你是做庄稼还是经商以至学艺，只要居于人下就不可避免要受制于人，就要受欺，你必须忍受，哪怕是辱践也要忍受；但是，你如果只是忍受而不思报复永远忍受下去，那你注定是个没出息的软蛋狗熊窝囊废；你在心里忍着，又必须在心里记着，有朝一日一定要跷到他头上，让他也尝尝辱践的味道……越王勾践就是这样子。“娃子哇，你大我就是原上的勾践。”鹿马勺一句话概括了自己，把一个千古传诵的卧薪尝胆以图复国的越王勾践个性化具体化了。为了加深娃子们的记忆和理解，他把自己酸辛的经历经过适当的改编讲给他们，特别把自己冬天穿着单裤携着讨饭马勺走进省城的经过讲得格外详细，在哪个村子被狗咬，在哪个村子的庙台上过夜都讲得一丝不乱；到饭馆被炉头用勺背勺沿儿敲脑袋打耳光撕耳朵拧脸蛋也都一件不漏地讲了，只是把炉头走自己“后门”的丑事做了重大修改，说那个老畜生把尿撒到他的脸上，那时候他就是卧薪尝胆的勾践。他对后来报复那个老畜生的情节也做了重大修改，

说成了皇城里的兵卒成百人一拨接一拨往那个老畜生脸上撒尿，直到淹得半死……那时候，他就是重新复国凌迟吴王的勾践。这个个性化了的勾践精神就一代一代传流下来，成为鹿家在白鹿原撑门立户的精神财富。

鹿子霖在坟园路上拾到小长工时的一番作派是对祖宗精神的一次演示，一种体验，一种发泄或者是一种心灵感应。小长工三娃子乖觉伶俐而又善解人意，使鹿子霖屋院里孤清冷寂的景象有很大改变。鹿子霖很满意这个小长工却仍然不大满足，因为这个古老屋院里的孤清气氛只有外表上的改变而没有根本上的变化。尤其是到了晚上，三娃子和刘谋儿在牲畜棚里就寝以后，鹿子霖躺在炕上久久难以入眠，屋梁上什么地方吱嘎响了一声，前院厦屋什么地方似乎有圬土刷刷溜跌下来，他就有一种天毁地灭的恐惧。那种短暂的恐惧感从心头缓缓退净以后，便是无尽的孤清冷寂。那时候，他的心里连一丝力气也焕发不出来，觉得整个世界整个白鹿原整个白鹿村都没有一处令人留恋，整个熟人生人包括白嘉轩父子、田福贤和岳维山等等，也都一下子变得十分可笑十分没意思了，和这些人争斗或交好都变得没有必要了。在那种心绪里，他甚至安静地企盼，今夕睡着以后，明早最好不要醒来。

每天早晨他都醒来。醒来以后的心境就决然不一样了。冬天披上二毛皮袄，夏天穿上蚕丝黄衫，到联上所辖的各个保去督查丁捐官事。有一天，他路过南桑村时，听见一个妇人叫“叔吔”，声音听去很熟悉，却一时记不起来，转过身就看见一个茅厕墙头露出来一个女人的脸，正朝他笑着。他想起来这是一个老相好，多年再未和她重温旧情了。鹿子霖对男女之事已经厌倦，发生这种心性转折的关键是大儿媳的死亡，以及引起与冷先生的关系淡泊。他对那个系好裤腰带走出

茅厕的女人支应一声就重新扯开步子，那女人紧走几步挡到路口对他仰起脸噘起嘴唇。鹿子霖还是无法违反众人给他的“见了女人就走不动”的评语。这个女人给他留下永久记念的是那张嘴唇。她的红润的嘴唇薄厚适当细腻光洁，一张一合一努一嘬都充满千般柔情万般妩媚，撩逗得他神不守舍心旌摇荡。他看见她已经变得灰白的嘴唇虽然有点失望，然而那种最令人神往的记忆却被勾动起来。鹿子霖无力拒绝那个嘴唇里发出的“到咱屋坐坐嘛”的邀请，于是就跟上她走到院子门口。看见这个熟悉的院子和依旧的鞍间房屋，鹿子霖心里就产生一股燥热，过去出入这个院子和屋子的惊吓和甜蜜一齐活现出来。进屋坐下后，他想向这个女人表示一下关切之情，不料这女人嗔怨中夹着怒气发泄起来：“你日出娃来就不管娃的死活了！”鹿子霖吓得脸色灰白，瞧瞧屋里似乎没有人，当即后悔不该进这个院子，心里也开始鄙视这个女人。他坐监以前，隔三差四地总给她接济一些钱，并没忘记嘛！凡是跟他相好过的女人，都可以证明他不是负义之人。鹿子霖正打算掏俩银圆出来了事，那女人接着告诉他，他的娃都过十五岁生日了，常年躲在外边不敢回家，开始躲原上，后来躲到山里，越躲越远，她的男人不放心昨日进山去看娃娃了。鹿子霖一听就噢呀一声慨叹：“噢呀呀，你咋不早说？”女人撩起下襟擦眼泪。鹿子霖断然说：“叫娃回来！回来回来，回来！”女人说：“你光说叫回来。回来了抓壮丁咋办？”鹿子霖斥责说：“我说叫娃回来，就是敢保险嘛！原上的壮丁一个个都从我的手里过，我还没这点把握。”女人说：“我想把娃认到你膝下……给你……做干娃……”鹿子霖惊喜地笑了，把立在旁边的女人揽到怀里说：“这主意好。本来就是我的娃嘛！”他无法控制重新膨胀起来的那种诱惑，紧紧贴住了那张依然柔媚的嘴唇……

鹿子霖从这个女人身上得到了一个重要启示，逐个在原上村庄搜寻干娃，把一个个老相好和他生的娃子都认成干亲，几乎可以坐三四

席。干娃们到家里来给他拜年，给他祝寿，自己也得到绝对保护而逃避了壮丁。鹿子霖十分欢喜，一个个干娃长得都很漂亮，浓眉深眼，五官端正。因为和他相好的女人都是原上各村的俏丽女人，孩子自然不会有歪瓜裂枣了。鹿子霖瞧着那些以深眼窝长睫毛为标记的鹿家种系，由不得慨叹："我俩儿没有了，可有几十个干娃。可惜不能戳破一个'干'字……"他对干娃们说："有啥困难要办啥事，尽管开口。干爸而今不为自己就为你们活人哩！"干娃们说："干爸，你有啥事要帮忙也只管说，俺们出力跑腿都高兴。"鹿子霖感动得泪花直涌："爸没啥事咯。爸而今老了还有多少事嘛！爸只是害怕孤清喜欢热闹，你们常来爸屋里走走，爸见了你们就不觉得孤清，就满足咧……"

白鹿联保所遭到一次沉重的洗劫，田福贤幸免被杀。事后从种种迹象分析，洗劫的重点目标在田福贤，仅田福贤住的那个套间屋子就扔进去三颗手榴弹，然而田福贤却没有睡在里头。田福贤逛得诡，他在套间里安着床铺着被子，只是午间歇息用，晚上就出其不意地敲开某个干事的门挤到一张床上，像皇帝随心所欲进入某一宫院一样，他许久以来就不单独在自己屋子过夜。

洗劫是土匪干的还是游击队干的，众说纷纭。县保安团一营营长白孝文亲自上原来侦察追踪，没有抓到任何确凿的证据，判断不出究竟是什么人干的。联上储存的捐款没有来得及上交被抢掠一空，联上的保丁被打死五个伤了三个，白孝文据此判断保丁们多数都躲起来根本未作抵抗。出于种种利害关系，权衡各方得失，白孝文终于给岳维山汇报说："土匪干的。"这样做主要是出于安定人心，以免为共党张扬的顾虑。

田福贤对白孝文的结论完全接受，心里却不无疑虑。他装作看病走进镇上的中医堂，接受冷先生号脉望诊时，不在意地问："这几天有

没有谁到你这儿来买刀箭药？”冷先生先愣了一下，随之以素常的冷冷的口气回答：“没有。”田福贤从洒在联保所门外的一摊血判断，洗劫者有人负伤，肯定隐匿在某个村子里。他想从冷先生这儿找到一丝线索，却没有成功。

冷先生被这个询问惊扰得心神不宁，恰恰是白嘉轩来向他要了一包刀箭药。天亮后，白鹿镇上聚集着一堆堆人议论昨晚发生的事情，本原上第一次发生交战的骚乱震惊了从未经历过枪炮的乡民。白嘉轩拄着拐杖佝偻着腰走进来，向他讨要一包刀箭药。冷先生随口问：“谁有伤了？”白嘉轩接过药包揣到怀里说：“甭给谁说我要过这药。”冷先生现在急于想告诉白嘉轩，田福贤追问哩！他在镇子上碰见一个匆匆走过的女人，说：“捎话叫你嘉轩伯来下两盘棋。”

白嘉轩一边下着棋，一边给冷先生叙说刀箭药的来龙去脉。那天晚上，听见有人敲后门，他就起来了。没料到进来的是自己一个已不来往的老亲戚的儿子，他叫他声“老舅爷”，就说打劫联保所的事是他干的，他是做游击队的底线儿，因为没打仗经验恰好负了伤。白嘉轩大为震惊之后，就压着声训斥：“你家人老几辈都是仁义百姓，你也是老老诚诚的庄稼人嘛！都四十上下的人了，你咋弄这号出圈子的事？”他却笑着说：“老舅爷，你甭害怕。日子过不成了。不单是我，原上现时暗里进共产党的人多着哩！”白嘉轩暗暗吃惊，连这么老诚的庄稼汉子都随了共产党，怎么辨得出谁在暗里都是共产党呢？他不再过多询问，就把他藏起来，给弄了一包刀箭药……白嘉轩对冷先生说：“像这个亲戚一样的庄稼汉，直戳戳走到联保所，谁也认不出他是个共产党。据此你就根本估摸不清，这原上究竟有多少共产党……”冷先生说：“这谁能说清。田福贤成天剿共也摸不清……要是有一天共产党真

个成了事得了天下，你再看吧，原上各个村子的共产党一下子就蹦出来了，把你把我能吓一跳！”

俩人随之把话题转移到鹿子霖身上，而且收了棋摊儿专门议论起来。白嘉轩说：“原上而今只有一个人活得顶滋润。”冷先生说：“你说田福贤？”白嘉轩说：“他才最不滋润哩！他在原上是老虎，到了县上就变成狗了，黑间还得提防挨炸弹。”冷先生说：“那你是说你？”白嘉轩摇头笑了：“我啥时候也没滋润过。”冷先生又猜：“那么你说是我？”白嘉轩也摇摇头：“你还是老样子，没啥变化咯！”冷先生闷住头认真猜想起来。白嘉轩不屑地说：“鹿、子、霖嘛！”冷先生反感地说：“这人早都从我眼里刮出去了。我早都不说这人的三纲五常了，不值得说。”白嘉轩却说：“你看看这人，当着田福贤的官，挣着田福贤的俸禄，可不替他操心，只顾自个认干娃结干亲哩……”冷先生说：“我只说从监狱回来，该当蜷下了，没料想在屋蜷了没几天，又在原上蹦跶开了。这人哪……官瘾比烟瘾还难戒。”白嘉轩说：“这是祖传家风。鹿家人辈辈都是这式子。”冷先生说：“我在这镇子上几十年，没听谁说你老弟一句闲话，这……太难了。”白嘉轩做出自轻自薄的口吻，又很恶毒地说：“咱们祖先一个铜子一个麻钱攒钱哩！人家凭卖尻子一夜就发财了嘛！”

第三十四章

农历四月，急骤升高的气温宣告结束了白鹿原本来就短暂的春天，进入初夏季节。满原的麦子从墨绿中泛出一抹蛋白色，一方一绺已经黄熟的大麦和青稞夹缀在大片的麦田中间，大地呈现出类似孕妇临产前的神圣和安谧。从气象和节令上判断，似乎与已往无数个春夏之交时节的景致没有什么大的差异，无论穷的或富的庄稼人，只是习惯性地比较着今年的节令比去年提早了几天或者是推迟了小半月。穷庄稼人总是比富裕庄稼人更多一些念叨和嘟囔罢了，也是因为他们更加迫不及待地要收获小麦，以减少借贷的次数和数量。迎接果实成熟的期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迫切。眼巴巴瞅着麦子一天天由绿变黄，急性子的庄稼人提着镰刀拉着独轮小车走到田头，捉住麦穗捏一捏瞅一瞅，麦粒还是鼓胀的小豆儿，惋叹一声“外黄里不黄咯”，于是就提上镰刀拉上小推车回家去了。突然一场温腾腾热燥燥的南风持续了一夜半天，麦子竟然干得断穗掉粒了，于是千家万户的男人女人大声叹诵着“麦黄一晌蚕老一时”的古训拥向田野，刷刷嚓嚓镰刀刈断麦秆的声浪就喧哗起来。就在那神秘的短促的一晌里，麦子熟透了；就在那神秘的一时里，蚕儿上蔟网茧了……

公元一九四九年五月二十日，成为白鹿原社会气候里神秘短促的一晌或一时，永久性地改变了本原的历史。

黑娃听到电话铃响，心里一跳；每一次电话铃声响，都好像首先撞击的不是耳膜而是心脏。黑娃抓起话机扣到耳朵上，方知是县西四十里处的麻坊镇哨卡打来的。哨兵的嗓门有点黏涩：“一位少校军官要过哨卡，要到县里找你。鹿营长，你说放不放他过卡子？他不说他的

姓名，也不报他的来处，却是叫我问你鹿营长还喜欢不喜欢吃冰糖……”

黑娃搞不清有多长时间自己都处于一种无知觉状态，灵醒过来后，发现话机还扣在左耳朵上，汗水顺着话机的下端滴流到手心里。他已经忘记刚才是怎么回答哨兵的，耳机里早已变成一片冷寂的忙音。他判断不出自己现在比接电话以前更加慌乱，还是更加沉静，却努力回想刚才在电话里自己是怎样回答哨兵问询的，或者根本就没有作任何回答？他颤抖着手摇起搅把儿，直摇得黑色的电话机在桌子上发摆子似的颤抖，终于听到那个不再黏涩的嗓门讨封似的说：“放心吧鹿营长，早已放过了。我给少校挡了一辆道奇卡车，坐上走了半晌了，说不定这阵儿都跷进你的门槛咧！”黑娃放下电话跨出门去，门外一片静寂。旋即又走进屋子，扯下毛巾直接塞进盆架下边的水桶里蘸了水，使劲擦拭汗腻腻的脸颊和脖颈，然后又脱了上衣和长裤，用马勺舀起凉水往身上泼浇。水流在砖地上，流不出多远就渗进蓝色的砖头，发出干燥焦渴已极的吱吱声。这当儿，门外响起卫士的问话声，一个熟悉的声音说：“你甭盘问我，我来盘问你。你只知你们鹿营长官名叫鹿兆谦，你知不知道他的小名叫黑娃？知不知道他敲家伙爱敲‘风搅雪’？”黑娃穿着裤衩，急忙跷出门喊道：“我也记着你的小名，我不好意思再叫！”

通身水淋淋的鹿黑娃只穿着一条水淋淋的裤衩，和佩戴着少校肩章一身伪装的鹿兆鹏紧紧搂抱在一起，两个荷枪实弹的卫士看见俩人的真挚和滑稽，却无法体味这两个朋友此刻里的心境。还是黑娃首先松开手臂，拽着兆鹏的胳膊走进门去。他从里头插死了门闩，想想不妥又拉开，只对卫士说了一句：“谁来也不许打扰。”然后又插上门闩，急忙蹬裤穿衣服，转过脸问：“我的你呀，你咋么着蹦到这儿来

咧？”鹿兆鹏从桌子上的烟盒里抽出香烟点火抽起来，说：“你甭问，你先给人弄俩蒸馍咥，我大概还是昨个晚上过渭河时吃的饭……”

鹿兆鹏身为十五师联络科长，是和首批强渡渭河的四十八团士兵一起涉过古都西安的最后一道天然水障的。出发前一刻，他肚子里填塞了整整一个小锅盔，这使他联想起锅盔这种秦人食品的古老的传说。这种形似帽盔的食品，正是适应古代秦军远征的需要产生的，后来才普及到普通老百姓的日常生活里。它产生于远古的战争，依然适应于今天的战争。渭北原地无以数计的村庄里数以千万计的柴火锅灶里，巧妇和蠢妇一齐悉心尽智在烙锅盔，村村寨寨的街巷里弥漫着浓郁的烙熟面食的香味。分到鹿兆鹏手里的锅盔已经切成细长条，完全是为了适应战士装炒面的细长布袋；而这种食品的传统刀法是切成大方块，可以想见老百姓的细心。那些细长的锅盔条上，有的用木梳扎下许多几何图案，有的点缀着洋红的俏饰，有的好像刻着字迹，不过都因切得太细太碎而难以辨识。鹿兆鹏搁着分发到手的锅盔细条时，深为惋惜，完整的锅盔和美丽的图案被切碎了，脑子里浮现出母亲在案板上放下刚刚出锅的锅盔的甜蜜的情景。

鹿兆鹏是微明时分涉过渭河的。先遣支队在河里插下好多道芦苇秆儿，作为过河路线的标记，最深处的水淹到胸脯，枪支和干粮袋托到头顶。渡河遇到并不强硬的阻击，掩护他们的火炮和机枪压得对岸的守军喘不过气来。跨上对岸的沙地，才发现守军单薄得根本不像守备的样子，士兵早趁着黑夜潜逃了，统共只抓到三个俘虏，又看不到太多的尸体，机枪和步枪扔得遍地，一个强大的王朝临到覆灭时竟然如此不堪一击。

鹿兆鹏和他的十数个联络科的战士和干部，极力鼓动渡河的营长长驱直入，而违背了到三桥集结的命令，一直闯进西门外的飞机场。

守军的阻击不过像一道木桩腐朽的篱笆，很快被攻破。机场上停着几架飞机，全都是残破报废的老鹰似的僵尸。鹿兆鹏用短枪敲一敲铝壳说：“胡长官总是撂下伤兵。”这时候，有战士引着一位穿商人服装的人走过来，说他是西安地下党派来的，接应解放大军来了。鹿兆鹏用枪管又敲了敲机壳，郑重地纠正说：“老王同志，你务必记住，从现在起，我们从地下走到地上，成为地上党啰！”

老王同志把西安市区地图和国民党守备部队布防情况资料交给他，又把敌人逃亡前夕破坏炸毁电厂面粉厂和屈指可数的几家新兴工厂的计划透露给他。鹿兆鹏和营长只说了一句，就统一了看法：立即进城！老王同志帮他们找来了一位鬓发霜白的火车司机，全营士兵爬上了火车。火车呼啸着开进火车站时，头一次乘坐火车的土八路们惊叫，一支纸卷的喇叭牌香烟才抽掉半截。这营士兵被分成若干小组，赶赴电厂面粉厂和纱厂等要害工厂去了。据说奔到电厂的士兵冲进厂房时，敌特工人员正在垒堆美制炸药铁箱。鹿兆鹏走出火车站的时候，听到西城方向传来一声巨响，等他穿过小巷赶到钟楼时，恰好看见一队冲上钟楼的战士矫健的姿态，领头的战士擎着一面红旗，沿着这座城市中心的明代建筑的四方围栏奔跑着呼叫着，那一刻兆鹏直后悔没有一架照相机。他随之得知，刚才的那一声巨响是本师本团另一个营的士兵攻进西门时放的炮。西门的门洞被砖头堵死了，不得不动用炸药以满足情急的战士的心理。他终于亲自迎接了五月二十日这个早晨，亲眼目睹了一个旧政权的灭亡和一个新政权诞生的最初过程。面对钟楼上迎风招展的红旗，他流下一行热泪，这正是祭奠无数烈士的最珍贵的东西。

他回到飞机场时已是后晌，把一大堆情报交给师首长。师长的奖励是：“你吃口东西快来。”这时，他才记起渡河的时候身边一个不知

姓名的战士被枪弹击中扑跌进水里，他扶他的时候弄湿了干粮袋，那些刻扎着图案和俏饰的锅盔全泡成一堆糊糊。他已经忘记饥饿，巨大的欢愉和紧绷的心弦使他的胃肠全部处于一种休眠状态。直到天黑，鹿兆鹏被师长亲自召见分配新的任务："回你的老家去，策动滋水保安团起义。"

鹿兆鹏穿上了师长为他准备好的一身国民党军少校军服，只是为缺一双皮鞋而遗憾，随之有人从俘虏的机场守军脚上搜出一双皮鞋送来，稍微显小而夹脚。鹿兆鹏说："恐怕得有一部汽车。"师长说："我给你准备了一辆自行车，气儿已经打饱了。你现在就上路。"鹿兆鹏跨上车子就走了。

这是令人舒心的一个难得的夜游的机会。田野里静悄悄，夜风中饱含着成熟期的麦子散发出来的母乳一样令人贪婪的气息。兆鹏可以准确地辨别出麦子和豌豆地里散发的不同气息，借着整修链条的时机，他摸到豌豆地里捋了一把豆荚和蔓梢，连荚儿带叶一起塞到嘴里咀嚼起来。沿途所过的大小村庄几乎看不见一点灯火，只有零星的几声装模作样的狗吠，听起来反倒使人感到安全感到松弛。驱车进入滋水河川，瞅见星光下横亘着白鹿原刀切一样的平顶，心中便跃出了那个尚在识字以前就铸入了的白鹿。这辆破自行车总是掉链儿，迫使他一次又一次跳下来摸黑把链条挂到齿轮上，中断了他诸多的回忆和回忆的情绪。

赶到离县城还有四十里的麻坊镇时，遇到了唯一一次盘查。土石公路上横架着一根粗大的木头，两边站着几个地方武装的团丁，有一间小房子。鹿兆鹏从一个哨兵盘问的口音里听出他是当地人，他把"三"的发音说成"桑"，把"伯"的称呼叫做"贝"，这是麻坊镇周围十数个村子居民的一种奇特的发音。鹿兆鹏看着这个麻坊镇土著团丁过分

认真的态度，反而更加轻视他，小娃娃你正在认真防务的那个政权已经在我手下覆灭，你瓜蛋儿你笨熊还被蒙在鼓里。他轻淡地说："你给鹿兆谦营长挂电话，他是我表弟，他大我叫桑（三）贝（伯）。"哨兵眼睛一亮，就透出他的全部纯朴和可爱的本性："哎呀长官，听口音你是咱麻坊镇方圆人？哪个村子的？"鹿兆鹏笑着拍了拍他的肩膀说："先甭拉扯乡党，快挂电话。你只消问问鹿营长还喜不喜欢吃冰糖？"哨兵问完这句话后，脸色一变举手敬礼，慌急中把电话筒拽掉到地上……整个哨卡的哨兵都忙碌起来，一齐出动挡住一辆道奇卡车，把自行车架到车厢里，把兆鹏搀扶到驾驶楼里以后，那位土著团丁用枪点着司机说："你要是路上捣乱怠慢了长官，你再回来路过时，我把你舌头拔了喂狗。"

鹿兆鹏吃了黑娃临时凑合的饭菜，很简单地介绍了西安解放的消息。黑娃似乎并不惊奇，只是淡淡地说："你不来我还不知道哩！这儿离西安不到百里，居然没人给我们通报，许是自顾自个跑了。"鹿兆鹏坦率地说："黑娃起义吧！"

黑娃几乎没有思索就重复了一句"起义"。他的口气显得平静，既没有热烈奔放的张力，也不是畏畏缩缩的无可奈何。鹿兆鹏在感情上很不满足，煽动说："你老早就喊在原上刮起一场'风搅雪'，而今到了刮这场'风搅雪'的日子了，我听你的口气怎么不斩劲？"黑娃仍然平静地说："斩劲不斩劲甭看嘴头子上的功夫。"接着就给鹿兆鹏介绍了保安团的布防情况。黑娃自己的三营是个炮营，驻扎在最远的县东方向的古关峪口，原是为堵截共军从峪口出山进击县城的。二营是步兵营，驻守在县城东边与古关峪口两交界的地方，是防备共军进攻县城的第二道防线。一营驻扎在县城城墙里外，是保护县府的御林军，也是最后一道防线。黑娃进一步深层地介绍了保安团里的关系：二营长

焦振国和他也是结拜弟兄，人好，估计有七成的把握，即就他不愿意起事也不会烂事；一营御林军营长白孝文，和他虽说也有过结拜的交情，却是张团长的打心锤儿心腹，恐怕只有四成起事的可能性。鹿兆鹏迫不及待地问：“张团长那人的把握性有几成？”黑娃坦率地说：“团长那人难估。”

在策动保安团起义的具体办法上，俩人不谋而合，其实这是根据黑娃介绍的情况所能做出的自然的也很简单的选择。鹿兆鹏说：“咱俩先跟二营长接触，二营长愿意起事的话，剩下一营的孝文就好办了。他愿意了一搭干，不愿意的话，就把他的御林军拾掇了。”黑娃对这个策划做了小小的补充：“孝文愿意起事的话，张团长就不再成为一个问题；孝文要是说不通，把他和张团长先拾掇了。掐了谷穗子，谷秆子还不好砍吗？”鹿兆鹏已经吃饱喝足，忙问：“咱们去找二营长吧，事不宜迟。”黑娃稳稳地说：“和二营长交涉你不用去了，等到和孝文摊牌的时候，你再出马。我骑马去二营，你这会儿可以迷糊一会儿解解乏。”

完全是一路凯歌。今日的胜利与十几二十几年的艰难曲折悲壮凄凉一样合情合理。鹿兆鹏听从黑娃的关照躺上床，头一挨枕头就拉起了鼾声，几十年来经历的大大小小的冒险事件磨练了他的性气，可以抓住一切短暂的时机进入睡眠。他听见马靴咯地的声音睁开眼睛，瞧见黑娃旁边站着一位同样装束的汉子，断定策划二营的目的已经达到，从床上翻身跳下来就与那人握手："焦振国同志，我肯定可以这样称呼你了。"恰在这时电话铃声响起来，黑娃接上电话正好是孝文打来的，询问黑娃西安城里有没有响动？黑娃迟疑一下瞅瞅鹿兆鹏。鹿兆鹏悄声暗示说："正好把他诱过来。"黑娃对着话筒神秘地说："准不准的消息我听到了，你过来一下咱俩当面说。"黑娃放下话筒神色紧张起来："这一锤子砸得响砸不响，我不敢保险。"焦振国说："你和他先好说好劝，万一说不成，我就把他拾掇了。"鹿兆鹏点点头说："就这么办。我和焦营长先避开。"黑娃说："不。咱三人都坐在当面。那人灵得很，一眼瞅见咱仨摆的这个架势肯定就明白了，说不定话倒好说。"焦振国很冷静也很简练："㞞！只要他进这个门，同意不同意起事都好办。"

咯噔咯噔的马靴声响到开门的那一瞬间，便戛然而止。白孝文推门进来，站在门里就再抬不起脚来，脸色刷地一下变黄了。事情的发展正应了黑娃的估计，在最好和最坏的估计中轻而易举地选择了最好的结局。白孝文先瞅见二营长焦振国就顿生疑虑，黑娃没有在电话里提及二营长，二营长在这里就预示着某种阴谋；及至他瞅瞄到坐在黑娃另一边的陌生军官而且迅即辨认出鹿兆鹏的时候，就定格在门口。鹿兆鹏站起来走向门口："还记得咱们三个给徐先生到柳林里砍柳木棍子的蠢事吗？咱们砍的棍子头一遭就打到咱们三个的头上。"白孝文笑了笑伸出手说："我明白你来干什么。"随之握住兆鹏的手，"我心里正在盘算这事哩！真没料到你会回咱县来。你来得好！"白孝文进一步证

实说："我给黑娃打电话，就是想商量这事，咱不能一条黑路走到底嘛！"黑娃和焦振国先后站起来，四个人的胳膊互相箍抱着肩膀达成默契。

白孝文说："我把话敞明了说，兆谦你我跟振国是结拜弟兄，你先跟振国叫通了才跟我说，不说你对我心里有没有隔卡，总是把我看扁了。"黑娃一时反不上话来。焦振国掩饰说："起事的话是我先对兆谦捅破的。"鹿兆鹏说："话总有个先说后说的问题，要是最后一个跟焦振国说，他也会觉得把他看扁了吧？现在商量起义的事吧！"白孝文说："这事万无一失。我派兵先把团长县长书记抓起来就完了。"鹿兆鹏说："让你的部下卡死城门，甭让他们跑了就行。关键是保安团长。孝文和振国去办，先礼后兵，先动员他一块起义，话说不通再动手抓不迟。岳维山是我的老朋友，我想见他了，让黑娃领我去拜望。"黑娃说："你甭出去，你在这儿等着，免得出个差错划不着。"

鹿兆鹏坐在椅子上等着，心里难以抑制的激动却又神智不乱，脑子里开始构思选择见到岳维山时说什么话最好。一声枪响又连着一声枪响，接着就再无声息，他难以捉摸枪声里是否隐藏着恶祸？他迅即跳出屋门，问站岗的团丁发生了什么事，团丁惊恐地摇头说搞不清，猜不准。鹿兆鹏突然意识到刚才策划的方案过于简单，甚至不无严重疏漏，完全可能导致另外的糟糕结局；孝文出门以后如果不是去对付团长，而是对黑娃和焦振国突施袭击呢？刚才的枪声又恰恰响了两下。他转到屋子墙侧的隐蔽处装作尿尿，做好了应变的最坏准备。几个团丁急匆匆杂沓沓走来，似乎还拖拽着一个人，咚的一声扔下了。鹿兆鹏看见白孝文和焦振国走到门口，才放下心走过去，看到门口砖台阶下扔着一具死尸。白孝文说："我把他拾掇了。"鹿兆鹏问："你把谁拾掇了？"白孝文说："团长嘛，还能拾掇谁？"鹿兆鹏问："他拒不

接受起义还是反抗？”白孝文不耐烦地说：“他咯咯囔囔拿不定主意。谁这阵儿还有心跟他磨缠！”鹿兆鹏说：“打死了算了，你把尸首拖来弄啥？”孝文轻巧地说：“请你验明正身呀！”

三个人重新在屋子里坐下，焦振国说起和张团长谈话的经过。张团长一看见他和白孝文进门就眏眨起眼睛，狐疑满面地问：“有啥重要情况，你俩一搭来？”按说他俩此时谁也不该来，应该驻守在阵地上。白孝文说：“西安已经解放了，咱们起义吧！”张团长张了张嘴没说出话，虚汗一下布满脸孔，更加频繁地眏眨着眼睛，终于咯咯囔囔说：“你们要起事，我不阻挡。看在多年的交情上，让我归还故乡解甲务农。”焦振国还没说上一句话，白孝文的枪声已经响了，正击中张团长的左胸。张团长猛然弯了腰，双手捂住胸口，好久才扬起头来紧紧盯着白孝文。白孝文对着张团长的脸又射了一枪，张团长迅即像一堵孤墙倒下去……

这时，黑娃押着岳维山进来了。

鹿兆鹏脑子里还在想着张团长被孝文迎面击中的脸孔会是怎样扒皮撕裂的景象，还在想着有无必要迎面放这一枪的事，突然看见了岳维山背缚着双臂站在屋子里的敞亮处。岳维山也显得老了，眼角和额头的皱纹不再细密而变得粗深了，藏青色中山服被麻绳抽拽得再不周正，偏分的头发已经疏朗，也呈现出紊乱，唯有那双眼睛略现懊丧，却绝无一缕畏怯。他很安静地站在屋子中间，沉静的眼神和平静的脸色显示着他的自信。鹿兆鹏依然稳稳坐在椅子上，两只胳膊架在椅子左右两边的扶栏上，十指交叉着一动不动。在岳维山最初进门时，他翻眼瞅了一下，然后就这么坐着不动。对这个人说什么傲慢和蔑视的话，已经没有意义，实施怎样的报复也难使人产生报复的痛快，这个人与他效忠的那个政权已经不可挽回地完蛋了，但不说一句什么话，

也难以平复情感，他和他毕竟交手争斗了二十多年哪！鹿兆鹏从椅子上站起来，缓缓走到岳维山当面，紧紧盯住那双眼睛。岳维山并不畏怯也不躲避，沉静地盯着兆鹏，两双眼睛就那么对峙着。鹿兆鹏嘬了嘬嘴唇说：“我过去在你手里标价是一千块大洋，你而今在我手里连一个麻钱都不值。”岳维山脸颊上的肌肉抽搐了一下。鹿兆鹏一转身重重地甩出一句：“你比我贱！”

黑娃请示说：“我把他先关起来吧？”岳维山这时才开了口：“给我一枪，你们也少了麻烦。”鹿兆鹏摆摆手，招呼黑娃说：“咱们先坐下开会。”随之走到岳维山跟前，解下捆绑着胳膊的细麻绳，拍拍他的肩膀：“你也坐下来旁听。我们要商量滋水县保安团起义的备细事项，你看看你听听，看看我们将怎样摧毁你二十多年来在滋水惨淡经营的那个反动政权吧！”岳维山被鹿兆鹏强按在肩膀上的那只手压坐到一只椅子上，支撑着他身心的那根柱子折断了，歪侧着脑袋闭上了眼睛。鹿兆鹏看了看表，扬起头说：“同志们，我们抓紧开会。现在差三分就到零点，滋水县事实上已经属于人民了……”

多半年后，即滋水县解放后的头一个新年刚刚过罢，副县长鹿兆谦在他的办公室里被逮捕。黑娃那阵子正在起草一份申请恢复自己党籍的申请报告，屋子里走进两个人来，他没抬头，直到来人夺抽手中的毛笔时，他才发觉来人不是向他请示工作。他尚来不及思索，已经被细麻绳捆死了胳膊。黑娃跳起来喊：“为啥为啥！谁派你们来的？”俩人啥话不说，只推着他往门外走。

黑娃被囚进县城西角那座监狱。他向送饭的人和看守的人千遍万遍请求：“我要见县长，我要见白孝文，我要见白县长。”他最后忍不住大声嚎叫：“我要见白孝文白县长！”直到嗓子吼出血，连一丝声音

也发不出来，突然躺在床板上，把一些不连贯的往事想过一遍再想一遍。

起义的仪式是第二天午时举行的，他的炮营打响了起义的礼炮。鹿兆鹏没有参加那个激动人心的起义，他把一切安排妥当，于黎明时分骑着那辆破自行车就回城里去了，说是师部的工作更加紧迫。听说兆鹏回到西安只待了两天，又随着部队一路朝西打去，一直追打到新疆。他没有给他来信，也没有捎过一句话，现在他在哪里，活着还是死了，都搞不清，据说扶眉战役伤亡很大。如果能搞清兆鹏的下落，一切都会烟消云散。

白孝文县长不点头，谁敢逮捕鹿兆谦副县长呢？黑娃就拼命吼嚎白孝文，也许他在县政府里能听见他的叫声。他记得起义后的第三天，原保安团二营长焦振国把一张《群众日报》摔到桌上：“你看看。”黑娃看到西北军政委员会主任贺龙签名的一则电讯，是表彰滋水县保安团起义的。电文的称呼为“滋水县保安团一营营长白孝文同志”。黑娃看罢说：“贺龙弄错了，咱们是整个保安团三个营千十个官兵全部参加起义了，不是一营三百多人单独起义的。”焦振国说：“你再看看下面的文章——”黑娃就看到白孝文写给贺龙关于率领一营起义的致敬信。黑娃咂了咂舌头说：“孝文这熊弄事光顾自个，你把咱们全团三个营一同起义的事全都报告给贺主任，贺主任肯定更高兴。”焦振国说：“给贺主任写这个报告也轮不到他嘛！你是起义的发起人，又是大家公推的起义的头儿，这是跟鹿兆鹏当面说定的事，他凭啥先给贺主任报头功？”黑娃不满意地瞅了焦振国一眼：“兄弟，不是我说你，你这人心眼儿太窄。这算个啥大不了的事？孝文报了也就报了，他没写上二营三营，难道你我就不算起义？”焦振国撇着嘴角说：“黑娃老哥，你给我开一张起义证明条子，我告老还乡务农去呀！”黑娃火了：

“你这算做啥？咱们刚起义刚解放忙得恨不能长出三个脑袋八双手，你倒要走了？你走了革命工作撂给谁？我能架得住？”焦振国毫无所动地坚持要走。黑娃急了说：“你不说清道明，我不开证明，你是不是对我不满？”焦振国说：“我总怯着孝文补打到团长脸上的那一枪。”黑娃仍然没有放手焦振国归乡。半月后，中共滋水县县委第一任书记秦继贤同志赴任，焦振国从他手里磨缠到一张起义证明件，终于回陕南那个闭塞的小县去了。临行时，黑娃只是简单地和他握了握手，很不满意甚至瞧不起这个结拜兄弟的狭隘心胸。

黑娃在监狱里蹲了不足一月，任何人都没有前来探望，这是有令禁绝的。他只被提审过两次，罪状有三条：一、土匪匪首残害群众；二、围剿红三十六军；三、杀害共产党员。黑娃对自个在土匪山寨做二拇指的罪行全部供认不讳，只是对人民法官提示一句：“我后来就学为好人了呀？”关于剿灭红三十六军的罪状，黑娃做了充分的辩解，那是大拇指领人干的，只伤害了房顶的一个哨兵，随后又给其他红军战士分发了银圆和烟土作为盘缠出山，而且把政委鹿兆鹏接上山去治好了枪伤……年轻的人民法官没有听完黑娃的辩解就笑得不屑再听，讥笑鹿兆谦的为人处事与名字不符，编排功劳跟编故事一样离奇，未免太不谦虚。至于杀害共产党员陈舍娃的事，黑娃已怒不可遏：“那不是共产党员，是游击队的叛徒！他在秦岭游击队里偷偷摸摸侮辱山里女人，事发后害怕受处治逃跑出山，找到我的门下。他并不知道我跟秦岭游击队政委韩裁缝是老交情，后来我问韩政委还要不要这个队员，韩政委说‘人家投奔你了，就由你打发吧’！我知道打发的意思。我让部下把他崩咧！”只有这件事法官认真听了他的辩解，而且说：“我们再查查。”

黑娃回到号子里就又想起一件事，知道处治叛徒陈舍娃的人范围很小，事过几天之后，在团部开会时只有白孝文问过他。想到这件事，黑娃心里就疑窦顿生，这条罪状难道是白孝文提供的？但又无法对质，更无法肯定，知道这件事的毕竟不是白孝文一个人。

第二次审判仍是那三条罪状的又一次复核，这一次黑娃激烈而坚决地拒绝第二条和第三条罪状，只对第一条中所列举的土匪行径部分承认。他毫不含糊地向法官申明："滋水县保安团的起义是鹿兆鹏策划的，由我发起实施的，从提出起义到起义获得胜利的整个过程，都是由我领导的；西安四周距城最近的七八个县里头，滋水县是唯一一个没有动刀动枪成功举行起义的一个县，我从来也没敢说过我对革命有过功劳，我现在提说这件事是想请你们问一问秦书记和白县长，我的起义能不能折掉当土匪的罪过？至于第二第三条列举的罪状，完全是误会……"

黑娃的这一席申辩，事实上加速了他的案子的归结。三天后接连的第三次审讯，只是履行了一个宣判审讯结果的简单程序，三条罪状全部取证充分，黑娃的辩解反而成为可笑的抵赖。黑娃在听到判处死刑的宣判时哑然闭口，法官问他还有什么话说，他摇了摇头。黑娃再被押回监狱后换了一间房子，密闭的墙壁上只开了一个可以塞进一只中号黄碗的洞，脚腕上被砸上了生铁铸成的铁镣。两天后，他的妻子高玉凤领着独生儿子前来探望，这是自他被囚二十多天以来见到的唯一一位探监的人。他透过那个递进取出饭碗的洞孔，只能看见妻子大半个脸孔，脸面上一满是泪水和清涕，嘴巴说不出话，只是张了又合，合了又张，像从水里捞出来扔到沙滩上的鲇鱼的嘴。黑娃说："你要去寻兆鹏。你寻不着，你死了的话，由儿子接着寻。"高玉凤这时才哇的一声哭出来，随之把儿子抱扶起来。他看见洞孔里嵌着儿子的小

脸蛋，叫出了一声“爸爸”。黑娃突然转过身，他不忍心看见那张酷似自己的眉眼，便像一棵被齐根锯断的树干一样栽倒下去。

白嘉轩得悉黑娃被囚禁的消息，竟然惊慌失措起来。第二天鸡啼起身，背着褡裢下了白鹿原。佝偻着腰小心翼翼踏上滋水河上的木板桥时，有人认出他是解放后第一任滋水县县长的父亲，恭敬地伸出双手搀扶他过桥。白嘉轩挥动手杖，打开了那双搀扶的手，头也不抬踏上了吱扭作响的独木桥。他走进儿子白孝文的办公室时，扬起脑袋，满脸肃杀，语言端出直入：“我愿意担保黑娃！”白孝文愣怔了一下，又释然笑了。从父亲肩头卸下粗线织成的“白记”褡裢，扶着父亲在椅子上坐下，倒下一杯茶。这是他荣任县长以来第一次在县城接待父亲，倍觉欢悦。正月十五县城用传统的焰火放花欢度新中国第一个元宵节的时候，他曾邀请父亲和弟弟以及弟媳们到县城去观赏，结果父亲没来，也禁住了弟弟和弟媳。白嘉轩捏着茶杯又重复一遍：“我今日专意担保黑娃来咧。”白孝文却哈哈一笑：“新政府不瞅人情面子，该判的就判，不该判的一个也不冤枉，你说的哪朝哪代的老话呀！”白嘉轩很反感儿子的笑声和轻淡的态度：“黑娃不是跟你一搭起事来吗？容不下他当县长，还不能容他回原上种地务庄稼？”白孝文突地变脸：“爸！你再不敢乱说乱问，你不懂人民政府的新政策。你乱说乱问违反政策。”屋子里的干部出出进进，忙忙碌碌向白县长汇报请示。白嘉轩还是忍不住说：“这黑娃学好了。人学好了就该容得。”白孝文对父亲说：“你先到我宿舍歇下，我下班以后再陪你啊爸！”

镇压黑娃的集会是白鹿原上乡民现存记忆中最浩大的一次。时间选择在农历二月二龙抬头白鹿镇传统的古会日。消息早在三天之前，就从滋水县人民政府发出，通过刚刚成立的白鹿乡人民政府传达到各个村庄，乡民们迫不及待地掐算着古会会日。遵照县政府的指示，乡

政府的几个干部夜以继日奔跑在各个村庄，通知各村的男女老少一律不许自由行动，擅自逛会，要由村干部和民兵队长召集排队前往。村民们从来也没有列队行进过，不是挤成圪垯就是断了序列。胳膊上扎着红袖筒的民兵推推搡搡，把那些扭七趔八站着蹲着的男女推到应该站的位置上去。好多村子还没有置备下红旗，于是仍然把往年给三官庙送香火时用的花边龙旗撑出来，只是撕掉了龙的图形贴上了村庄的名字。会场设在白鹿镇南边与小学校之间的空场上，各个村子的队伍按照灰线划定的区域安顿下来。当一队全副武装的解放军战士押着三个死刑犯登上临时搭成的戏台以后，整个会场便潮涌起来，此前为整顿秩序的一切努力都宣告白费。

黑娃在被押到台上的时候，才知道和他一起被处决的还有岳维山和田福贤。他被卸下脚镣，推出那间只有一个洞孔的囚室时，就想到了生之即止。随之又被反缚了胳膊，推上一挂马车，由四个解放军押着半夜里上路。马车驶上白鹿原时，天色微曙。凭感觉，他准确地判断出回到原上了，忍不住说："能让我躺到我的原上算万幸了！"他站在台口，微微低垂着头，胸腑里憋闷难抑，转过身急嘟嘟地对坐在主席台正中的白孝文说："我不能跟他俩一路挨枪，请你把我单独执行，我只求你这一件事！"没有人搭理他。他被押解的战士使劲扭过来。黑娃就深深地低下头去。

白孝文县长发表了讲话。四名各界代表人物做了控诉发言。最后由军事法庭宣布了死刑判决和立即执行的命令。

白嘉轩一反常态地参加了这个声势浩大的集会。他对这类热闹事从来缺乏热情和好奇，宁可丢剥了衣服热汗蒸腾地踩踏轧花机，也不想挤到人窝里去看耍猴的卖大力丸的表演，即使是几十年不遇的杀人场合。镇嵩军枪杀纵火犯时，他没有去；田福贤在小学校西围墙外枪

崩鹿兆鹏的那回，他也没有去；这回镇压反革命岳维山田福贤和鹿黑娃的集会他参加了。这个重大活动的地点选择在白鹿原的用意十分明显，被镇压的三个罪犯有两个都是原上的人，只有岳维山是个外乡客；主持这场重大活动的白县长也是原上人。白嘉轩尾随在白鹿村队列最后，因为腰背驼得太厉害，行动迟缓赶不上脚步。他背抄着双手走进会场，依然站在队列后头，远远瞅见高台正中位置就座的儿子孝文，忽然想起在那个大雪的早晨，发现慢坡地里白鹿精灵的情景。在解放军战士押着死刑犯走向戏台的混乱中，他浑身涌起巨大的力量，一下子挤到台前，头一眼就瞅见黑娃焦燥干裂的嘴唇和布满血丝的眼睛。黑娃瞅见他的一瞬，垂下头去，一滴一滴清亮的泪珠儿掉下来。白嘉轩没有再看，转身走掉了。他没有瞧和黑娃站成一排的田福贤和岳维山究竟是何种面目，他跟这俩人没有干系。白嘉轩退出人窝，又听到台上传呼起鹿子霖的声音，白鹿原九个保长被传来陪斗接受教育。他背抄起双手离开会场，走进关门闭店的白鹿镇，似乎脚腕上拴着一根绳子，绳子的那一头不知是攥在黑娃手里，还是在孝文手上？他摇摇摆摆，走走停停，磨蹭到冷先生的中医堂门口，听到了一串枪响，眼前一黑就栽倒在门槛上。

白嘉轩醒来时发觉躺在自家炕上，看见许多亲人的面孔十分诧异，这么多人围在炕头炕下的脚地干什么？他很快发觉这些人的脸色瞧起来很别扭，便用手摸一下自己的脸，才发觉左眼被蒙住了，别扭的感觉是用一只眼睛看人瞅物的结果。白孝文俯下身叫了一声“爸”。白嘉轩睁着右眼问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孝文只是安慰他静心养息，先不要问。白嘉轩侧过头瞅见坐在椅子上的冷先生：“难道你也瞒哄兄弟？”冷先生说：“兄弟，你的病是‘气血蒙目’。你甭怨我手狠。”白嘉轩还不能完全明白：“你把话说透。”冷先生这才告诉他，倒在中医堂门槛上那阵儿，手指捏得掰不开，双腿像两条硬棍子弯不回来，左眼

眼球像铃铛儿一样鼓出眼眶，完全是一包滴溜溜儿的血。这病他一生里只见过一例，那是南原桑枝村一个老寡妇得的。她守寡半世，把两个儿子拉扯成人，兄弟俩分家时，为财产打得头破血流，断胳膊坏腿，老寡妇气得栽倒在地气血蒙眼。冷先生被请去时已为时太晚，眼球上薄如蝉翼的血泡儿业已破裂，血水从眼窟窿里汩汩流出来，直到老寡妇气绝。冷先生说："我来不及跟谁商量就动了刀子。这病单怕血泡儿破了就收拾不住了。"白嘉轩摸了摸左眼上蒙着的布条儿，冷漠地笑笑："你当初就该让它破了去！"众人纷纷劝慰白嘉轩。白孝文压低声儿提醒冷先生说："大伯，这件事日后再甭说了，传出去怕影响不大好。"

一月后，白嘉轩重新出现在白鹿村村巷里，鼻梁上架起了一副眼镜。这是祖传的一副水晶石头眼镜，两条黄铜硬腿儿，用一根黑色丝带儿套在头顶，以防止掉下来碎了。白嘉轩不是鼓不起往昔里强盛凛然的气势，而是觉得完全没有必要，尤其是作为白县长的父亲，应该表现出一种善居乡里的伟大谦虚来，这是他躺在炕上养息眼伤的一月里反反复复反思的最终结果。微显茶色的镜片保护着右边的好眼，也遮掩着左边被冷先生的刀子挖掉了眼球的瞎眼，左眼已经凹陷成一个丑陋的坑洼。他的气色滋润柔和，脸上的皮肤和所有器官不再绷紧，全都现出世事洞达者的平和与超脱，骤然增多的白发和那副眼镜更添加了哲人的气度。他自己一手拄着拐杖，一手拉着黄牛到原坡上去放青，站在坡坎上久久凝视远处暮霭中南山的峰峦。

白嘉轩牵着牛悠悠回家，在村外路边撞见鹿子霖就驻足伫立。在一道高及膝头的台田塄坎上，鹿子霖趴在已经返青的麦田里，用一只废弃的镰刀片子，在塄坎的草丛中专心致意地掏挖着羊奶奶的块状根茎。他的棉衣棉裤到处线断缝开，吊着一缕缕一串串污脏的棉花套

儿，满头的灰色头发像丢弃的破毡片子苫住了耳朵和脖颈，黄里透青的脸上涂抹着眼屎鼻涕和灰垢，两只手完全变成乌鸦爪子了。他匍匐在地上扭动着腰腿，使着劲儿从草丛中刨挖出一颗鲜嫩嫩的羊奶奶，捡起来擦也不擦，连同泥土一起塞进嘴里，整个脸颊上的皮肉都随着嘴巴香甜的咀嚼而欢快地运动起来，嘴角淤结着泥土和羊奶奶白色的液汁。鹿子霖抬头盯了白嘉轩一眼，又急忙低下头去，用左胳膊圈盖了一片羊奶奶的茎蔓，而且咕哝着："你想吃你自个找去，这是我寻见的，我全占下咧！"白嘉轩往前凑了凑问："子霖，你真个认不得我咧？"鹿子霖头也不抬，只忙于挖刨："认得认得，我在原上就没有生人咯！你快放你的牛，我忙着哩！"白嘉轩判断出这人确实已经丧失了全部生活记忆时，就不再开口。

鹿子霖被民兵押到台下去陪斗，瞧见了即将被处死的岳维山、田福贤和鹿黑娃，觉得那出膛的快枪子弹将擦着自己的耳梢射进那三人的脑袋。耳梢和脑袋可就只差着半寸。他瞅见主持这场镇压反革命集会的白孝文，就在心里喊着："天爷爷，鹿家还是弄不过白家！"当他与另外九个保长一排溜面对拥挤的乡民低头端立在台子前头时，就听着一个又一个人跳上台子控诉岳、田和黑娃的罪恶，台下一阵高过一阵要求处死这三个人的口号声浪。鹿子霖感到不堪负载，双腿打软几次差点跌跪下去。突然脑子里嘣嘣一响，似乎肩上负压的重物被谁卸去，浑身轻若纸灰。拥挤在鹿子霖近前的人嗅到一股臭气，有人惊奇地嬉笑着叫起来："鹿子霖吓得屙到裤裆了！"许多人捂鼻掩口，却争着瞧鹿子霖。屎尿顺着棉裤裤筒流下来，灌进鞋袜，流溢到脚下的地上，恶臭迅速扩散到会场。民兵发现后，请示过白孝文，得到允许就把鹿子霖推着搡着弄出会场去了。

冷先生的中药和针灸对鹿子霖全部无能为力，他被家人捆在树上灌进一碗又一碗汤药，仍然在裤裆里尿尿屙屎。他的有灵性的生命已经宣告结束，没有一丝灵性的生命继续延缓下来。女人鹿贺氏也不再给他换衣换裤，只在饭时塞给他一碗饭或一个馍，就把他推出后门，他身上的新屎陈尿足以使一切人窒息。夜晚他和那条黄狗蜷卧在一起，常常从狗食盆里抓起剩饭塞进嘴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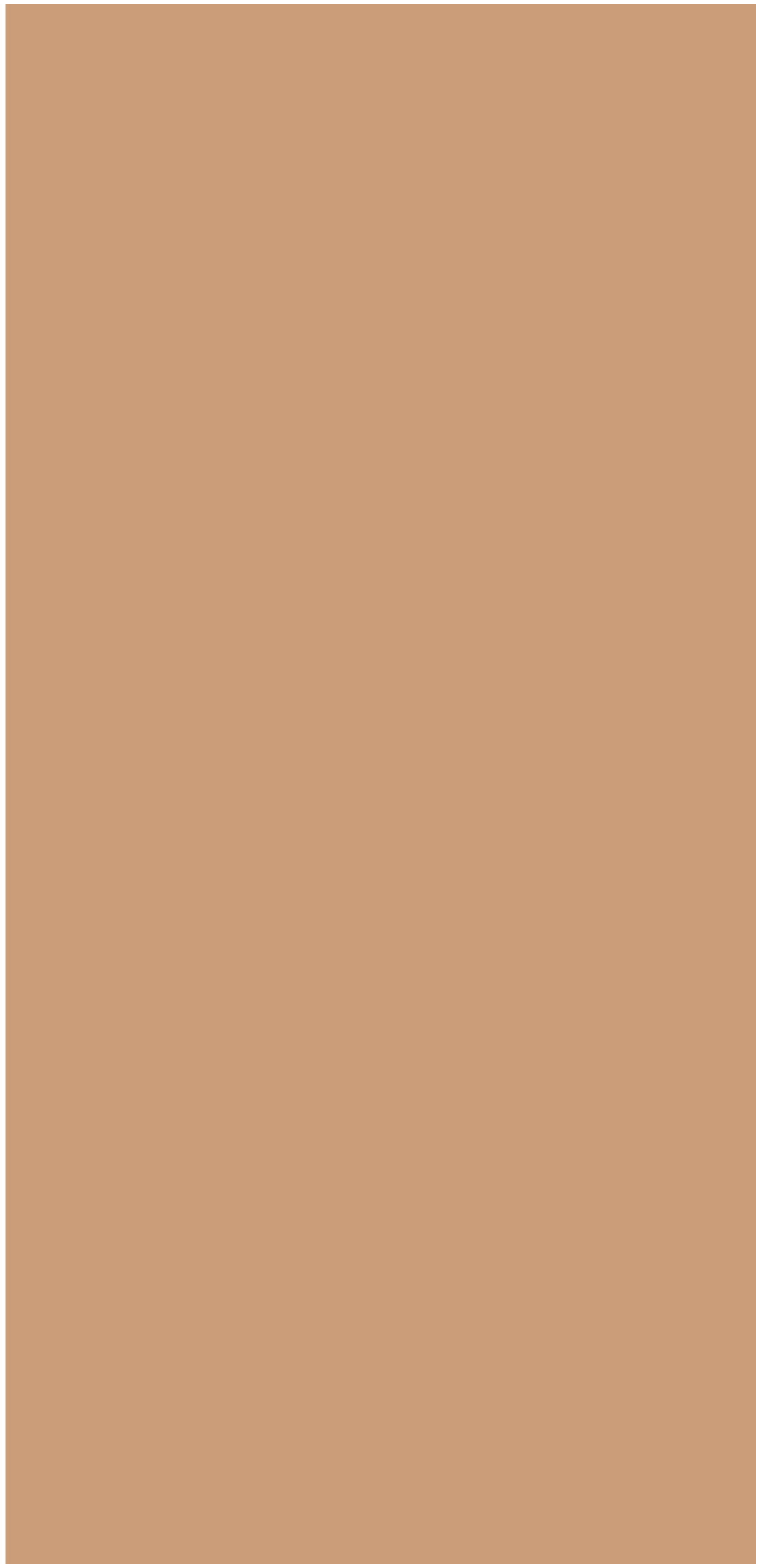
白嘉轩看着鹿子霖挖出一大片湿土，被割断的羊奶奶蔓子扔了一堆，忽然想起以卖地形式作掩饰巧取鹿子霖慢坡地做坟园的事来，儿子孝文的县长，也许正是这块风水宝地荫育的结果。他俯下身去，双手拄着拐杖，盯着鹿子霖的眼睛说："子霖，我对不住你。我一辈子就做下这一件见不得人的事，我来生再世给你还债补心。"鹿子霖却把一颗鲜灵灵的羊奶奶递到他眼前："给你吃，你吃吧，咱俩好！"白嘉轩轻轻摇摇头，转过身时忍不住流下泪来。

农历四月以后，气温骤升，鹿子霖常常脱得一丝不挂满村乱跑。鹿贺氏把他锁在柴火房里，整整锁了半年之久。他每到晚上，便嚎着叫着哭着唱着，村里人已经习以为常。入冬后第一次寒潮侵袭白鹿原的那天夜里，前半夜还听见鹿子霖的嚎叫声，后半夜却屏声静气了。天明时，他的女人鹿贺氏才发现他已经僵硬，刚穿上身的棉裤里屎尿结成黄蜡蜡的冰块……

1988年4月—1989年1月草拟

1989年4月—1992年3月成稿

1997年11月修订 长安



第 1 卷　1978—1982

第 2 卷　1983—1984

第 3 卷　1985—1986

第 4 卷　白鹿原

第 5 卷　1987—1994

第 6 卷　1995—2000

第 7 卷　2001—2003

第 8 卷　2004—2006

第 9 卷　2007—2009

第 10 卷　2010—2015

第5卷
1987—1994

陈忠实文集

增订本

人民文学出版社



陈忠实文集

增订本

第

5

卷

1987—1994

人民文学出版社

文前插圖



- 中篇小说
  - 地窖
    - 一
    - 二
    - 三
    - 四
    - 五
    - 六
    - 七
    - 八
    - 九
    - 十
    - 十一
- 短篇小说
  - 兔老汉
    - 一
    - 二
    - 三
    - 四
  - 山洪
  - 石狮子
  - 钻辘子客
  - 害羞
    - 一
    - 二
    - 三

        - 四
        - 五
        - 六
    - 两个朋友
        - 一
        - 二
        - 三
        - 四
        - 五
        - 六
    - 舔碗
        - 一
        - 二
        - 三
        - 四
        - 五
- 散文·报告文学
    - 第一次投稿
    - 敬上一杯酒
    - 默默此情谁诉
    - 又见鹭鸶
    - 汽笛·布鞋·红腰带
    - 猜想死亡
    - 晶莹的泪珠
    - 毛泽东的人格力量
    - 寓言两则
        - 老母鸡和小公鸡的故事

        - 关于人脸的争论
    - 秦人白烨
    - 足球与古典式
    - 上帝之手
    - 生命之雨
    - 拥有一方绿荫
    - 绿蜘蛛，褐蜘蛛
    - 绿风
    - 皮实
        - 一
        - 二
        - 三
        - 四
    - 最珍贵的记忆
        - 一九八七年十月二十五日
        - 十月二十六日
        - 十月二十七日
        - 十月二十九日
        - 十一月一日
    - 山里有黄金
        - 阳平关——嘉陵江一组英姿纷呈的群雕
        - 定军山——汉江一个负重的灵魂
        - 拜将台——汉中一个爱将若渴的黄金经理
    - 渭北高原，关于一个人的记忆
        - “演一场印度大篷车”
        - 写在大地上的论文
        - 一首民谣的诞生

        - 死亡之谷的日日夜夜
        - 大地的回报
    - 腼腆
    - 生命礼赞
        - 一
        - 二
        - 三
        - 四
    - 忠诚与潇洒
        - 一
        - 二
        - 三
        - 四
- 言论
    - 中篇小说集《四妹子》后记
    - 刀声
    - 关于《四妹子》的附言
    - 美玉出蓝田
    - 我说关中人
    - 篇篇珠玑说《泥神》
    - 唯有真情才动人
    - 巨人与矮子
    - 《风雪娘子关》阅读笔记
        - 一
        - 二
        - 三
        - 四

        - 五
        - 六
        - 七
        - 八
        - 九
        - 十
        - 十一
    - 天下谁人不识君
    - 别路遥
    - 渭南有个李康美
    - 关于《白鹿原》与李星的对话
        - 一、过了四十四岁，我突然意识到五十岁这个年龄大关的恐惧
        - 二、最恰当的结构便是能负载全部思考和所有人物的那个形式
        - 三、所有的悲剧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但是历史的细节却常常被人忽视
        - 四、抽雪茄，喝酽茶，下象棋，听秦腔，我像个秦腔老艺人
        - 五、文学作品所能达到的对一个民族的理解，任何其他读物都难以相比
        - 六、我和当代所有作家一样，也是想通过自己的笔画出这个民族的灵魂
        - 七、长大了的孩子还牵着大人的手走路是不可思议的
        - 八、我在传统的性封闭和西方性解放中间无法回避
        - 九、我永远不会上那个原了
    - 黑色的一九九二

- 陕西作家应对中国当代文学做出无愧贡献
- 选萃自序
- 文学这个魔鬼
- 大将林立，佳作纷呈
  - 一
  - 二
  - 三
  - 四
  - 五
- 故乡，心灵中最温馨的一隅
- 小说最是有情物
  - 一
  - 二
  - 三
  - 四
- 沟通，我的期待
- 虽九死其犹未悔
- 铁骨柔肠赋华章
- 文学是一种沟通
- 文学依然神圣
- 《梆子老太》后话
- 最好的纪念
- 不妨极端，自成气候

中篇小说

地窖

一

从公社大院的蓝砖围墙上翻过去，就跳进派出所的小院；从派出所用红砖砌成不久的新围墙上再翻过去，扑通一声跌进供销社的杂院；从供销社的土打墙上翻过去，他就钻进河西村鸡肠子似的村巷了。

他连续翻越三道围墙，不敢怠慢，甚至连喘一口大气的时间也不敢耽误，拔脚就跑。黑暗里瞅不清路面，他脚下一滑，跌了一跤，大概是踩到一泡猪屎或是一洼牛尿上头了。他不敢抚伤惜疼，爬起来挣扎着再往前跑，一直跑过河西村肮脏的村巷，跑下村北的河滩稻地里来了。

复种过冬小麦的一畦一畦稻田里，秋天收割稻子时留下的太高的稻茬子冻得梆啷啷硬，他磕磕绊绊抬高脚步，免得再次绊倒，跑过三四畦稻地，就遇到一条宽大的水渠。水渠干涸了。水草枯死了。渠岸可以隐蔽下半截腿脚，渠岸上两排稠密的杨树和柳树粗大的树干正是最好的遮掩，他顺着水渠跑啊跑，踩踏得渠底的枯草和落叶嚓嚓嚓响。他感到上气接不住下气，头晕眼花，喉咙里直想呕吐，脚下被干草的枝蔓缠绊了一下，又摔倒了，再也爬不起来了。

他躺在水渠里的枯叶干草上，大口大口喘气。心头却泛起一个甚为得意的胜利，无论我怎么狼狈，狗日的终究还是没逮住我！

他忽然觉得自己很好笑。他是河西人民公社社长，官儿虽然串不上几品，手下也领导着这个公社河川和原坡地区的一万八千多社员哩。他在这里是受敬重的人物，谁也不敢放肆地跟他说话。现在倒好！被人追着，翻墙跳院，完全像一个逃犯一样惊慌失措，狼狈不堪，裤腿上沾着猪屎和牛粪，膝盖上的裤子也撕破了，躺在这冬天夜晚的河滩里，真是昔日的威风彻底扫地了。

大喇叭的响声从河西村上空传到静寂的河滩上来。声音激越昂扬，战报！河口县造反司令部彻底解放河西镇！联合司令部的保皇儿孙狼狈逃窜！

他从渠底里站起来，借着烟头的火光看看表，正是子夜一时，该到哪里去呢?

寒星闪眨。没有月光。河滩远处有一声声冻僵了似的无名水鸟的叫声。这种水鸟只在夜静更深时叫，叫声说不上忧惋，也说不上凄凉，只是十分难听，难听到使人一听到这种叫声就想到它的样子绝对丑陋不堪，甚至会想到那是一种安着两只秃翅的癞蛤蟆，而河边上的人从来没有谁在白天发现过这种水鸟的踪迹。他忍受着这种声音的折磨，跛着一条腿，沿着渠岸往上走，躲到谁家去安全呢?

二

他站在一座门楼下。

他静一静气儿，叩响了吊在门板上的铁环儿。他的手劲儿慎重而又准确，使铁环碰撞木门的声响只能惊醒院子里头的主人，绝不能使左邻右舍闻声惊动。他在等待的时刻，瞧一眼这幢普普通通的门楼，土坯立柱，碎瓦掺顶，夹在两边的土打围墙之间，安一副粗糙的木头门板，死死关着。这就是目下整个河口县几乎家喻户晓的造反司令唐生法的家。

院里由远及近响着一阵沙沙沙的脚步声。门闩子滑动了一下。门吱扭一声拉开了。

“到这时候才回来！”女人怨怨艾艾的声音，大约把他当成她的丈夫唐生法了。他没吭声。她立即发觉站在门口的是一位生人，用一种警惕的声调问：“你是谁？”

“我是关社长。”他直接通报出来，免得她把他当成是歹徒或是什么不速之客，“关志雄关社长。”

“噢……关社长。”她的口气放松了，随即问，“深更半夜，你来做啥？”

“让我先进门再说。”他说，“我有话非跟你说不行。甭张扬，甭惊动家里任何人……”

她往旁边移了移身。他走进开着的一扇门的门道。她随手就轻轻关上门。

“关社长……你有啥事？深更半夜找我说？”她在院子里站住，又疑虑重重地问。

“到屋里头再说。”他得寸进尺，“屋里都有什么人？”

“能有谁呢？就一个吃奶娃儿，大女子跟她奶奶睡着。”她说着，转身朝院里走去。

他放下心来。她的公公和婆婆在原来的老庄屋住，离她的这个小院很远。他跟她走进厦屋。

她一进厦屋门，就把脚地上一只瓦盆移到旮旯里去，那瓦盆里有半盆黄黄的尿。

屋里，正面墙根有一张方桌，堆放着醋瓶盐碟辣子盒，还有一只帽子大小的瓦盆里盛着剁碎的酸渍红苕秆儿。厦屋南头是一张放得很宽的土坯火炕，炕上真有一个小娃儿钻在被窝里，露出被头的半个脸蛋儿红扑扑的，睡得正香。厦屋北头堆放着米缸面瓮等杂物杂器。一般农家都是这种简单零乱的格局，赫赫有名当当震响的唐司令的家也不过如此简陋。他一转眼珠儿就把这幢三间宽的厦屋扫瞄了一遍，又溜一眼屋顶，架着木椽木板和晒粮食的苇席，万一发生紧急情况，可以爬上去临时躲藏在那里。

她用一根针把煤油灯芯挑了挑，屋子里稍微亮了，又把那苗针插到墙上的一撮麦秆上，就靠住炕边站着，双手搭在棉袄前襟下边。那棉袄的边角上露出陈旧发黑的棉花絮套儿来。她显得很拘束，又有几分不安，问道：“你到底有啥急事？”

“你男人带着人马到公社抓我……”

“呀……”

“他抓住我，就把我杀了！”

“啊呀……”

“我逃脱他的手了！”

“噢……”

她紧张得眉头紧皱，两道细细的淡淡的眉毛之间出现了一个深深的竖置着的等式号。她说：“你真糊涂！你是给吓傻了吧？他要抓你杀你，你不给远处跑，咋给跑到我屋来咧？”

“我没吓傻。”他说，“我想来想去，只有你这儿最安全。”

她瞪大眼睛：“我这儿……咋会安全？”

他说：“他可能追寻到我家去，也可能搜到我的亲戚朋友家里，可他绝对不会想到，我会躲在他自己的屋里……”

“噢呀……”她似乎明白了。

“再说，我相信，你不会让他干出杀人的事。”他说，“不管怎样革命，杀了人总是麻烦事。他现在头脑发热，什么事都可能闯出来。你会替他日后着想，就不能让他惹祸。我想来想去，只有你会真心实意救我。”

“啊！这话对对的。”她的脸上泛出一缕温和的神色，看看屋里的旮旯拐角，为难地说：“可这屋里……连个隔墙……也没有……”

“这厦屋里……当然不能住。”他说。这屋里只住着她和炕上的那个奶娃儿，夜晚是无法回避的，“你想想办法。反正我是走投无路了。你们后院有窑洞吗？有储备柴火的小草棚没有？”

“有个窑，里头塌顶了，现时只在窑口放些柴火。”她说，又连连摇摇头，“不成不成。你要给塌死在里头才冤枉哩！”

“我不怕。”他说，“或者让我先看看。”

“甭看甭看。”她说，“我再想想……”

这当儿，前院的街门“咣咣咣咣”响起来。

“呀！那个鬼回来咧！”她从炕边跳到屋子中间，脸色骤变，“这可咋办呀？”

他急忙捏灭了烟头：“我从后门走！”

“来不及了。”她说着，弯下腰，钻到方桌底下，一把拉起一块水泥盖板，说，“快下红苕窖去。窖壁儿上有脚踏的台窝儿，一摸就摸着了，摸着往下溜。快！”

他不再犹豫，钻到方桌下，就溜下黑咕隆咚的地窖口子。

“咣——咣——咣！”敲门声变得很重很响。

“听见了。甭敲了。”她捏着嗓子，装得睡意惺忪的调门儿，朝着院里喊，“我正穿衣裳哪！”

敲门声果然停歇了。

他在溜进窖口并且用脚摸着了第一个台窝，又摸准了第二个台窝以后，看见她弯下腰把他扔在地上的一只烟头把儿捡起来，扔到炕洞里。他就继续往下溜。这个女人真细心。女人比男人都更细心。女人

哄男人总是天衣无缝。他下到地窖里头了，统共不过七八个台窝就下到底了。

“甭咳嗽，也甭打喷嚏！”她对着地窖警告他说。“咣当”一声就把地窖口盖上了。

他划着一根火柴，地窖里有两个拐洞，一大一小，都垒堆着红苕。东边那个大点的拐洞里，靠窖壁有一个窄窄的通道，可以凑凑合合坐下一个人。

头顶的脚地上有一阵儿咚咚咚的脚步声。他不假思索就明白厦屋的主人回来了。他屏声敛息坐下来，用一只手卡着两腮。

三

他用左手紧紧地掐着两腮，聆听地窖上面的动静，厦屋主人踏进门时很急很重的脚步声消失以后，随之就响起一连声的惊喜和吁叹：

“噢哟哟！大的个亲蛋蛋娃哟！噢哟哟！这脸蛋红嘟嘟粉嘟嘟的！大都要想死你了！噢哟哟！”

这简直是王母娘娘的声音，太真挚了，太富于感染力了，太富于诱惑力了。他想到了舐犊的母畜。他想到了以喙哺食的燕子。他的心底潜入一丝温柔的春风，屏敛的声息开始松懈，绷紧的神经也稍微松泛开来，而且诱发起对亲爱的妻子和儿女的思念了，半年之久没有照过面了，她和孩子也不知怎么混着日子……

“噢哟哟！大的个亲蛋蛋！让大看看，小牛牛长大了没？哈呀！长大了！大了！大的个牛牛娃哟！你长得好疼人哟！大走南闯北，没得

时间亲你咬你，今日叫大美美地亲上一口……”

他心里的森严壁垒哗哗哗土崩瓦解，烦乱毛躁起来。他听惯了这个人的令他脑皮发麻心慌意乱六神无主的训斥声，也受够了这个人使他毛发倒竖汗不敢出叫尿一滴绝不敢尿下两滴的吆喝声。现在，他听到的是一曲人伦人性人的动物本能似的最优美最动人最真实最自然的声音。这些声音都是从造反司令唐生法的嗓眼里发出来的，都是真实的。

“你吃饭不吃？”

“刚吃过了。”

“要喝水壶里有。”

“不喝了。睡吧！不早了。”

“你又喝酒来？我闻见酒气了，熏死人！”

“今日不喝不成哇！我们把狗日的‘老保’的老窝儿给捣了！可惜……让关志雄那个老狐狸跑他妈的了！”

他不由得又掐住了两腮。唐生法和他女人说话的声音一丝不漏地传到地窖里来，甚至那孩子吸吮母乳的吧唧声也能听见。唐生法大约刚刚喝罢庆祝攻克河西镇的胜利酒，顺路回到老窝来与孩子和女人欢聚。

“你抓人家关社长做啥嘛！”

“关社长！死不改悔的走资派！你还叫他社长！关社长！我抓住他……”

“他都垮台了，还碍着你们啥事？”

“他妈的！这老狐狸又臭又硬！他‘亮’他妈的个屎‘相’，竟敢‘亮’到‘老保’那边！我不拔了这颗钉子……”

“气也没用——他给跑了！”

“能跑到台湾去？！哼！”

“你想逮住他，又逮不着，猴急了吧？你今黑不该回来，该是连夜去查问，看他藏在谁家。”

“查个屁！不用查也知道，他肯定到保皇狗家藏起来了。”

“那不一定——”

“嘿嘿！听口气儿，好像你倒知道下落？”

“那也说不定。”

“在哪儿？”

“在咱家这厦屋里。”

“净说梦话！”

“在红苕窖里藏着。你下去逮去！”

“耍笑我哩！哎！你这婆娘……”

他听见唐生法吹灭煤油灯的声音，地窖口那个圆水泥盖板没有合严的缝隙透着的亮光消失了，灯灭了。脱衣服的窸窸窣窣的响声。唐生法躺下身去时的一声呻唤。他揉一揉掐得僵麻的脸腮，终于松了心，缓缓嘘出聚压在胸膛里的闷气，捂着嘴巴无声地打个哑巴呵欠，想瞌睡了，几乎折腾了大半夜了。那头顶的厦屋的说话声还是传到地窖来，虽然细弱，仍然清晰——

“甭胡骚情……甭……”

“我早想你哩！想得很哩！”

“天知道你心里想着谁！哄我……”

“别冤枉人噢！不论走到天南海北，我都想着你，还有咱的亲蛋蛋娃。”

“我可不是呆瓜儿！村里娃儿们唱说，‘造反队，造反队，公猴母猴一炕睡。’你和母猴睡来没？”

“那是保皇狗侮蔑俺们造反派哩！你咋能当真？跟上他们瞎哄哄，乱叨叨。”

“你看看你那东西，软不拉叽的！还说人家侮蔑你哩！”

“我半个多月没回来……夜格黑间……跑佯了……”

“倒是跑马了！你的羊跑到谁的大腿弯子去了？我早都知道！”

“净瞎胡说……”

“你跟那个女政委，那个婊子，村里都摇了铃！你还哄我——”

“那是保皇狗给我造谣！”

……

他已经用指头塞住了两只耳朵孔，再不想听下去了。他已经半年没有挨过自己老婆那温热的胸脯了。他受到这种炕头枕边的口角的刺激，心里潮起一股燥热。他闭了眼，塞实了耳孔，努力想这地窖，这是地窖而不是他和老婆的软床，使自己的情绪渐趋平静。他想到自己听人说过的唐生法和造反司令部那个女政委的风流传言，简直跟真的一模一样。甚至传说，有一晚，一个造反队员想吃鲜物，溜到农民的苞谷地里去掰棒子，一脚踩住个软囊囊的东西，吓得跳起来，用手电一照，唐生法和女政委光溜溜地摞在地上，身下铺着一件旧军衣。他现在蜷卧在唐司令和他女人睡觉的火炕旁边不过五尺远的浅浅的地窖里，听他们的房话，真是太难为情了。难为情不可躲避，他却断然料定，唐司令现在不会再去考虑抓他逮他的事，因为他无法向女人辩解那个家伙为什么会蔫软……他已经很累了，心里的危机刚一缓解，就感到累死了，瞌睡一下子袭上来，靠着窖壁睡着了。

四

噗噗噗……噗噗噗……

他惊醒了，头顶的水泥板盖还在噗噗噗响。

他咳嗽一声，示意他已听见了，随之就听见她叫他：“上来吃饭。”盖板揭掉了，地窖里透进亮光来。哦！已经到了吃早饭的时辰了，他站起来，腰脊酸疼，挣着忍着爬上地窖来。

屋里真亮啊！冬日温柔的阳光洒在庭院的地面上，看一眼也能感到温暖的滋味。他不由得舒展活动一下腰身，蜷卧太久的腰舒活了许多。厦屋的脚地上放着半盆温水，冒着热气，他洗了手脸，看着方桌上已经摆好的饭菜，对她说：“还是让我到地窖里去吃饭。大白天，说不定有人来……”

“放心吃吧！”她说，“大门我关着。”

他放下心来，走到方桌旁坐下，端起碗来。熬煮得又稠又黏的苞谷糁糊糊，香甜可口，有一股油腻腻的粮食本身的香味。一碟冰凉沁人的酸渍红苕秆儿，绿茵茵的，调着红艳艳的辣椒星沫儿，酸辣味长。竹篾编成的空心小篮里，垒堆着三四个烤得焦黄酥脆的苞谷面馍馍，似乎比白面馍馍甚至比面包还要香甜。他吃得很香，确是饿急了。

他转过脸，看见女主人坐在炕边上，怀里搂着那个亲蛋蛋娃。那孩子偎在她的解开了衣襟的胸脯上，吸吮着乳汁，两只脚还在不安生地乱蹬乱踏。她一任儿子吃奶，一任儿子用手抓那露出衣襟的肥实的乳房。她低头看着儿子吃奶，一绺头发从鬓角垂吊下来，遮住了侧对着他的半边脸颊。他说：“你也吃饭呀。”

“我等会儿再吃。”她仰起头来，宽厚地笑笑，问他说，“你夜个黑受罪了，那地窖里潮湿得很哩！”

“没事儿。”他说，一边抬起头来，漫不经意地打量着她。她比他昨晚第一面见到时要年轻些，不会超过三十岁。她露出的胸脯皮肤很细很白。她的脸颊显得干燥，尤其是一双手，手背和食指上炸开一个个黑色的小裂口。他想，她的手和脸要是稍微做一点保护，甭说香脂

之类，即使有一点凡士林膏或者甘油，那手指就不会裂了，脸色就会滋润柔和了。尽管这样，她的模样还是很好看的，一双灵活的眼睛似乎总怕羞，显得秀气的直直的鼻子，使人可以想到她年少时一定很可爱。

“那墙上有一张生狗皮，铺上可以隔潮气。再下去时拿上，铺着，能坐也能睡。”她说。

他往门扇后面的墙上瞅瞅，那儿确实挂着一张狗皮，纯黑色，黑得油光闪亮，像一块黑缎。他点点头，笑着说：“有这样的好褥子，享福了。”

“享什么福哇！”她撇撇嘴。她撇嘴的样子很好看，也很自然，显示着她的真诚。她说：“那地窖湿溜溜的，站不起又躺不下，够受罪咧！还享啥福！享‘豆腐’——”

街门响了！有人要来。

他紧张地站起，碗里还剩下半碗糊糊没有喝完，放下碗，就慌忙往方桌底下钻。她挡住他，用嘴努努墙上。他记起了生狗皮。他从墙上拉下狗皮，回身走到方桌跟前，看见她已把孩子用被子围在炕上，端起他喝剩的半碗苞谷糁糊糊，摆出一副正在吃饭的架势，心里不由颤了一下，就溜下地窖去。

他在地窖里听见有人走进屋来，尖尖的嗓音十分响亮。

“大白天把门关得严严的，做啥哩？”

“猪呀狗呀，钻进院来乱拱乱拉……”

“噢！我还当是你在屋里窝着……野汉！”

“你有老经验了！你窝野汉窝惯了！我可没那个本事！”

“这本事好学。你要愿意，嫂子给你引个野汉子，比法法那货漂亮多了！”

随之是两个女人畅快的笑声。

“我的那个鬼，成天怕我拉野汉，一见我跟旁的男人说句话，他也起贼心。即就是七十岁的老柴火棒子，他也不放心。”

“谁要你的脸蛋子长得那么好看哩！”

“他成天贼头贼脑地防着我。我说，我要是真心想拉野汉，你怎么防也是防不住的，除非你用铁链子把我的腿捆在炕边上。他说那不行，还要我挣工分哩。他说要是能给我那个地方安一把锁子就好了，钥匙装在他怀里。我说，你甭安什么锁子，你把你的章子盖上吧……”

俩人又是一阵疯狂了的死笑。

他一把捂住嘴，差点忍俊不禁，笑出声来。

“说正经事儿吧！玉芹，借我些毛票儿，我要买一扎卫生纸……”

……

他静静地坐着。狗皮毛茸茸的，光溜溜的，暖柔柔的。这黑狗活着时肯定是一只极漂亮的狗。它奔跃起来，黑色的皮毛一定会闪闪发光。它叫起来，声音一定洪亮。它肯定是村子里狗群的领袖……他现在无异于那只有闪亮的皮毛而丢失了生命活力的黑狗！

即使像这黑狗的命运，他也只是觉得自己好笑而不觉得难受或痛苦。

难受和痛苦是他刚刚被揪出来批判斗争的事，那时真是有十万个为什么结在心头而一无答案。后来，刘少奇主席的名字打上了红×，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和陕西省委书记霍士廉被押到汽车上游遍西安东西南北四条大街，他的顶头上司河口县委杨书记和汤县长也被打倒斗臭了，反而全都想通全然没有痛苦心情了。他们比他垮得更惨，因为他们比他官儿大，官儿越大地位越高，跌下来时响声自然就越大，摔得也就越重越疼。他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公社社长，出了河西公社的辖区就很少有人知道他的名字叫关志雄了，不出河西公社也不是所有人都认识他的黑方脸儿，大多乡民只知道关社长而不清楚他的名字。他能不垮台吗？他能不狼狈吗？他能不威风扫地吗？这样一比一照一想，他心里那十万个为什么全都不释自消了。

造反派们要他交代“三反”罪行，他就把自己臭骂一顿。造反派们要他手敲铜锣胸挂纸牌走村串巷去游村，他就一个一个村子往过游，铜锣敲得像耍猴。造反派们要怎样他就怎样。这种日子虽然不大体面也不大好过，又毕竟也是一种日子，一种过法儿。事情坏就坏在那个“亮相”上头。

“亮相”是戏里演员出场后的一个动作名词。《人民日报》的一篇社论借用了它，一下子普及到各个角落里来。其实就是要被打倒的领导干部表一表态，是谓“亮相”。他把那篇社论看了又看，读了又读，黑笔勾了，红笔又圈，勾得圈得满篇社论都是点点圈圈和杠杠道道，几乎要倒背如流了，脑子里却愈来愈坚定：不敢“亮相”！千万不敢！公社里的两派势不两立，自己“亮”到任何一派去，就会使另一派火上添油，必置自己于死地不结。他就拖着，继续在那社论上头下功夫，

点点圈圈和杠杠道道已经把那篇社论涂得旁人无法辨认字迹。直到全县三十二个公社的头儿们大都“亮相”，他拖不下去了，就咬咬牙，终于豁出去了，写下一张“亮相”大字报：

我要和联合司令部的革命派一起执行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

关志雄×月×日

这下糟了，比他所能预料的还要糟糕。

“造”字号果然被激怒了。全县三十二个公社的头儿们大都“亮”到他们一边了，小小的河西公社关志雄竟然敢于公开声明站到“联”字号一边，气得“造”字号的头头唐生法火冒三丈，亲自带领人马来捣河西公社“联”字号的老窝，来抓他这个冥顽不化的“黑手”。声言要砸烂他的狗头。要踩上千万只脚。要他不投降就灭亡。要火烧水煮油煎活拔毛。要千刀万剐掏心扒肺斫指挖眼剥下皮来绷鼓敲……

他在心里怨恨《人民日报》那篇社论。他讥笑炮制社论的理论家鼠目寸光，连他都能预计到的后果而比他高明几十倍的他们却预计不到。他“亮相”的后果证明了他的预计的正确和他们的社论的破产。公社社长心目中神圣至上的党报的声音，也不过如此水平！

他无可奈何，坐在生狗皮上，昏昏睡过去了。

五

“关社长，上来！”

听见她的坦然的叫声，他睁开眼，地窖口有微弱的亮光，水泥盖板已经揭掉了。他本打算合目睡觉了，尽管睡不着。白天几次昏睡，打发过了一天，晚上倒没瞌睡了，他就侧棱着身子，蜷卧在狗皮上，合目养神。她叫他，肯定有什么事，或者有什么话要说。天已黑了，冬夜很长，和她说说闲话拉拉家常，未尝不是打发漫长的冬夜时光的一种办法。他爬出地窖来。

孩子已经睡着了。她坐在炕边的小凳上，怀里抱着一只夹板，夹板间夹着一只厚厚的毛边鞋底。她用一只铁锥在鞋底戳一个眼儿，就把两根穿着麻绳的大号长针对穿过去，两只手同时朝两边扯拉长长的麻绳，鞋底上就留下一个褐色的麻绳疙结。她纳扎得很熟练，不慌不忙，间或把明光灿亮的锥尖在头发上擦一擦，麻绳穿过鞋底发出嗞嗞——嗞嗞的响声，虽不很好听，却也使人顿然感到安静和舒坦。他坐在方桌旁的木椅上，悠悠地吸着烟，看着她低头纳扎鞋底。

烟雾缭绕的眼前浮现出奶奶。一撮浅红的麻丝吊在空中，奶奶抽下一根，加到手里正在拧着的绳子里，右手提起来，左手啪啦一下转动麻绳下吊着的小拨架儿，手中那一束麻皮儿就拧成一条绳子。他常常坐在奶奶膝前，看那枣红溜光的小拨架儿啪啦啦打转，连同奶奶忧伤的吟唱一同拧进麻绳里。可奶奶已经死了，是饿死的。这枣木拨架传给妈妈，妈妈又啪啦啦转着它拧着麻绳，用麻绳缀纳布鞋鞋底。他是穿着这样的布鞋走进朝鲜的。妈妈也老死了，三年已经过了，家乡的沙土地上的那个小墓堆已长满了蒿草。那只枣木小拨架被姐姐拿去了，也还在拧着麻绳。他的妻子是纺织女工，用机器纺纱织布，再也不会使用那只小拨架儿了。

那拧着奶奶妈妈姐姐忧伤的歌儿的枣红拨架啊……

“今黑你甭下地窖去了。”她说。

“那……我……”他不知怎么回答。

“今黑你睡炕上吧。”她平静地说。

“不……我还是……到地窖去睡。”他显得意料不及，有点慌乱。

“地窖太潮湿，待的时间长了，会生风湿症的，腰腿要疼的。”

“不要紧，狗皮隔潮气。”

“白天黑夜蜷窝在地窖里，不行……”

“没事儿……”

“你甭犟，落下腰腿病，日后不好治。”她的话很平静，却坚定不移，“被子我都暖好了，你甭再犟了。”

他一看，火炕上铺着两道被子。靠炕里头的棉被里，那可爱的孩子已经睡得很香。炕边铺着的一条棉被，像是久置未用的半新的被子，很干净，大约是从柜子里刚刚取出来的。他犹豫了一阵，终于不好再拒绝了。

她继续纳扎鞋底，也不说话，许是生分，许是她生性不爱说话。他也不敢贸然问她什么，这毕竟是他的头号敌人唐生法的妻子。他悠悠吸着烟，心里却想，唐生法从东唐村杀出来，闹到公社，不久就在县上当起全县“造反司令部”的副司令了，声名赫赫。他的女人似乎与他没有关系，住在昏暗的厦屋里，就着煤油灯昏暗的灯光纳扎鞋底。她至少对他来说还是一个谜。

"睡吧。"

她已经纳扎完一只鞋底，取下夹板，用剪刀剔剪了绳头，把那布满褐色麻绳疙结的鞋底折了折，又用斧子镇了镇，就放到炕头边的那个蒲篮里，平静地对他招呼说："时候不早了，你在地窖里窝蜷了一天一夜，早点歇息下。"

他支支吾吾应着，却不动身站起来，他觉得难为情，怎么好意思爬上她的火炕去呢！

她绷着脸儿，像对长辈人那样自然，说着就脱了棉鞋，爬上炕，一口吹灭了火炕头土盘栏台上的煤油灯。厦屋里黑得伸手不见五指。他听见她在黑暗里窸窸窣窣的脱衣服的响声和溜进被窝时的一声解脱劳作的舒服的呻唤。

他借着烟头的火光走到炕边，并且在心里骂自己，她对他这样信赖，自己反而忸怩，不是说明自己的正派，反倒显出自己疑神疑鬼了。她很周到地考虑过一切，黑暗里脱衣服，她和他都要方便些。他爬上炕，脱去棉衣棉裤，留下衬衣衬裤躺下了。

被窝里好热，热得发烫，炕烧得好美呀！他的蜷窝太久的腰腿一挨着热烘烘的火炕，不由得舒坦地呻唤了一声。

真是不可思议。他，一个正儿八经的人民公社社长，现在和一个比他年轻近十岁的女社员睡在一个火炕上。她和孩子睡在炕那头，他睡在炕的这头，一颠一倒，正像乡村里的农民夫妻那样睡觉。真是不可思议。

他一时无法入睡，不单是白天在地窖里睡掉了瞌睡。他想，自己虽然有好多缺点和毛病，却在男女关系问题上自认干干净净，梆正硬气。他虽然也常与女同志和女干部们开开玩笑，却从来也没有过任何不光明正大的行为。他十六岁从家乡河南参军，正好跟上到朝鲜和美国佬打仗，战争把一个贫苦的乡村少年锤炼成一个优秀的中国军人。他是最后一批撤回祖国的，回来时两腮已经挂满黑森森的络腮胡须了，一个战功赫赫的连长。严格的军纪使他顺利地通过了人生的青春期的骚动，归来后在西安与一位纺织女工结合了，一个河南籍的漂亮姑娘，一个生活习惯完全吻同的不错的老婆。无论在部队或转业地方当社长，人们可以任意评价他的功过和为人，独独没有令上级领导也令一般人讨厌的男女作风问题，这使他走到任何场合都很自豪。现在，他和一个女人一颠一倒睡在火炕上，如若传出风声，纵然长一万张嘴也说不清白了。

“乖乖，吃奶！”

孩子吸吮乳汁的咂舌的声音很响。尖厉的北风在房脊屋檐上嘶叫。小厦屋暖融融的，木格窗户外面挂着稻草帘子。门关死了。椽眼也用麦秸塞得实实的。淡淡的乳香和火炕的热气混合着，弥漫在小厦屋里。他感到一种诱惑。他的鼻孔痒痒，忍住了没有打喷嚏。他闭上眼，努力把那种隐隐约约的诱惑挥斥开去，只要一进入睡眠，就什么感觉什么诱惑都不存在了。

他终于迷糊了。仅仅只是迷糊，而不是熟睡和酣眠。也不知迷迷糊糊睡了多少时辰，又被一阵响声惊醒，哗哗哗的水声。他一时搞不清哪儿来的水声。灵醒过来后，他就判断出那是她在撒尿。他拉拉被头蒙住头脸，企图阻拦那种声音，却无济于事，还是遮挡不住那很响的声音。他的心里毛躁起来，如果一伸手从炕下边拉住她的胳膊，她

大约会自然地钻进他的被窝。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原也不是圣人，竟也产生这种淫邪的念头。他终于控制住自己跃跃欲动的手脚，故意拉出鼾息声，佯装睡得很死，似乎什么也不曾察觉。他的耳朵却异常敏感，听见她爬上炕来。黑暗中踩了他的脚，又钻进靠墙的那条被窝里去了。

西北风依旧在房檐和屋脊吹出哨子一样的唑啦声。窗上的稻草苫子也有风吹动的吱吱声。热尿的气息渐渐散掉，屋里依然是火炕热烘烘的气息，淡淡的乳香。

他努力使自己再度入眠，用数数儿来净化心灵。他自己告诫自己：无论现在是黑帮是走资派或是刘少奇路线的罪人，组织上还没有正式行文开除党籍和撤销他的社长职务，他还是共产党员，还是前志愿军侦察连连长，绝对不能和人家女人钻到一条被筒里去。这样反复告诫还真管用，他心头潮起的那种骚乱渐渐平息了，终于又迷糊了。

一觉醒来，天已大亮，他爬起来，穿戴整齐，站在火炕下的脚地上，从厦屋门里望出去，小院旁侧的小灶房里，传来扑嗒扑嗒的风箱拉动的响声，她正在烧锅。他看着她随着风箱扭动着的后背，不由得在心里慨叹：我到底还是拯救了自己的灵魂！

六

她说："地窖里又潮又闷，多难受。没人来时，你就上来坐着；有人来了，你再下去。"

他确也不想再下到黑暗憋闷而又潮湿的地窖去，可屋里总有人来，有人来借一只木斗或是一杆秤，有人纯粹是抱着孩子来串门儿。

她的女儿在老奶奶跟前玩腻了，不时跑回来，玩一阵，闹一阵，又回奶奶家去了。他因此总也不得安生，出了地窖屁股没坐稳，街门又响起来，慌慌乱乱又钻进地窖去。

他索性就待在地窖里，坐在生狗皮铺垫上，静静地闭目养神。他努力抑制自己的瞌睡，以免到晚上又再度失眠，以免失眠时再听到那热尿在瓦盆里冲击出的哗哗哗的响声和闻见那股新鲜的尿臊气味儿。

他回想朝鲜战场那些亲身经历的往事：那冷炒面就着雪团的滋味，那坑道里滴滴答答的永不止歇的滴水声，那炮弹轰击时迎面扑来的热浪，那抱着冲锋枪跃出战壕时义无反顾的追击，那扑倒在脚下的亲爱的战友的尸体……

他们的侦察连经历了多少次惊心动魄的战斗啊！整个两军对垒的封锁森严的战场，他们侦察连的战士却几乎无所不至，一次又一次摸到敌人的心腹里，使敌人毁于一旦！哦！那个像姑娘一样秀气却又沉静勇敢出奇的“小江苏蛋子”啊！那个像周仓一样疾恶如仇秉性刚强的“河北老虎”啊！那个纯厚诚挚的“关中牛”啊！他们都长眠在那对国人陌生而对他熟悉如掌的异国山沟里了！他们没有像黄继光或邱少云那样留下闪闪发光的名字，他们的名字只有他们的亲人和他永难忘记。啊！那一次深入到敌人下巴底下的侦察，是损失最惨重的一次，侦察排牺牲了一半勇士，换来了那个结果……那就是战争！那就是革命！而眼前的这种摸不透吃不准跟不上的运动，算他妈的什么熊革命啊！老子十七八岁的时候，已经是出入敌阵的老练的侦察老虎了，而眼前那些熊男女胳膊上挽一条红袖章却来压老子的脑袋……

应该写一本回忆录了，早该写了，那些淤塞在心口儿的战友的血啊！他现在窝藏在这个类似战场坑道的红苕窖里，既不能写回忆战争

出生入死的文字，也不能履行一个公社社长的职责；那些在战场上硬练出来的侦察技能，却派上用场了，敏捷地翻越障碍物，出其不意潜入敌人最意想不到的最危险也最安全的地方……晚上却不得不听人家一个年轻女人在瓦盆里尿尿的声音……他一阵儿想得壮怀激烈，一阵儿忧愤压抑，一阵儿沮丧灰心，无论怎样难挨，却是排除了瞌睡的袭扰，又一个白天过去了！

七

喝罢汤，他没有下地窖去。她已经在火炕上铺好了被子，照例是两条。有了昨晚的第一回，今晚似乎就成为自自然然的事了，不再觉得太难为情了，心里的障碍早已倒塌了。她似乎也比昨晚随便自然一些了，没有吹灭煤油灯，就脱下了厚重的棉裤，和着棉袄坐在火炕里头那条被子里。他毕竟在地窖里蜷曲得太久，渴望早点躺到热烘烘的火炕上展一展酸麻的腰身，就不再忸怩，脱下了棉衣棉裤，躺下来。

煤油灯小小的火苗一闪一闪，小厦屋的炕墙上有一层昏黄的光亮。那小娃儿还没睡着，从炕那头的被窝爬过来，爬到他的枕头旁边停住了，瞪着一双黑乌乌的圆眼珠儿辨认着他，似乎把他当作大大了。他支起身，想把小家伙拖进自己的被窝。那小家伙却往后缩，不肯就服。他搂住他的头，在那红扑扑的脸蛋上亲了一口，那温热的脸蛋和嘴巴上有一股幽幽的乳香味。他的太长的络腮胡须扎疼了他，小家伙哇的一声哭了。她咯咯咯笑着把儿子拽进怀里，把奶头塞进娃儿的嘴里，吹灭了煤油灯，搂着孩子睡下了。

小厦屋骤然黑下来。老鼠立即出动了，桌上的什么东西碰翻了，“咣当”一声响。

“你是个好人，好社长。”她在炕那头说。

“你咋个知道我瞎我好呢？”他问。

“我听村里人说，你是个直杠人。”她说，像是和他拉家常，“人都说你好……你给俺村减了‘光荣粮’，老人碎娃都夸你实在。”

“唔……”他应着，唤起一件沉寂了的记忆。

他初到河西公社头一年秋天，这个东唐村刚刚上任的支部书记为了显示自己的政绩，报“光荣粮”报得出格的高，他没有表扬他的积极行为，反而压缩了那个不切实际的数字。就是这么件小事，她和东唐村的人至今念念不忘，直说他好啊直杠脾气啊……

“原先那个苟社长，总是嫌干部报‘光荣粮’报得少，总要往上加哩！你倒好，往下抹！”

“社员也得吃饭嘛！”他平淡地说。

“那个苟社长可不管社员锅里有没有米下，只管叫多交‘光荣粮’。人一比，当然就说你好。”她实实在在地和他说话，不是恭维，“其实我也不知情，只是听人说你好。”

他颇得意，心里挺受活。好久以来，他已经受够了呵斥和谩骂，而根本听不到谁说他的一句好话了。这个女人毫不矫饰的话，陡地唤起他一种自信与自尊，一股做人的力量。

“俺屋里的人可没谁说你好。”她说。

“为啥？”他问。

“你还不知道吗？”她问，随之又自作解答，“你把俺阿公给撤职了，他成了‘四不清’下台干部，抬不起头，一家人恨你恨得咬牙！”

他默不作声，说不出话来。

他是以“四清”工作团长的名义进入河西公社的。他坚定不移地按照“四清”运动的工作条例领导了运动。“四清”运动进行了整整半年时间，春天开始，夏收后结束。有一批大小队的干部或因政治或因经济问题被撤职下台了，个别人受到了法律的惩处。她的阿公——东唐村前支部书记的倒台即属此例。他怎么能忘记呢？她不说，他心里也清楚她的阿公恨他恨得要死。

“我家那个鬼扯旗造反，就是替他老子申冤出气……”她很坦率。

“我明白。”他说，他早已明白这种关系。整个河西公社甚至河口县里以唐生法为首的造反司令部下纠集的人马，几乎纯一色是“四清”运动时受到冲击的干部或者是他们的亲属和族里人。他“亮相”怎么能“亮”到他们一边呢？他对她说：“那么你呢？你恨我不恨？”

“你整了俺阿公，又没收了俺家粮食，还赔了五百块，我自然也该咬着牙恨你才对。可我……恨不起来。”她依然说得很冷静。

“为啥？”他也奇怪，不明其中原因。

“唉！”她叹口气，“我娘家爸是贫协主任哪！他在‘四清’中当了贫协主任，又入了党，是你的工作组的积极分子。这下复杂了，两亲家分成两派了，自‘四清’以后就不来往了，见了面说不到一搭嘛！‘文化大革命’开火了，娃他爸扯旗造反当司令了，俺娘家一家人都参加了‘联合’那一派。你说，我该咋办？”

“唔！”他顿然明白了，却无法回答她该怎么办的问题。

“我啥也不管，啥也管不清。”她说，“谁爱怎么闹就怎么闹去！我只管跟俺娃娃混日月……”

“噢……”他沉吟了一声，表示明白了她两边为难的处境，却依然无法帮她谋划一个更为高明的办法，只好沉默不言。

“混吧！往前混吧！谁知道谁错谁对呢？”她漠然地说，“睡吧！”

小厦屋沉寂下来，没有一丝声响。整个村庄沉寂下来，没有一丝声响。这个躺在原坡根下的像个簸箕掌一样的东唐村，再也听不到一丝声响。没有车鸣，没有人声，偶尔有三两声骤起骤落的狗吠声。躺在这样安静的乡村里的一个热烘烘的火炕上，使人会时时产生一种错觉：那外部世界正闹得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是不是真的发生过？堂堂的关志雄社长真的被压过“喷气式”？真的会像被追赶的强盗一样仓皇翻过三道围墙？

她在混日月。她的男人一家子都受到“四清”运动的整治，唐生法正是以此为动力而扯起了造反的旗帜。她的亲生父亲恰恰是“四清”运动的积极分子，如今正为维护那场运动而参加到与女婿决然对立的另一派群众组织里。“这场运动，真正把群众发动起来了。”他们现在不仅是为自己的柴米油盐而劳心费神，确确实实在为政治争斗哩！她倒好！一边是阿公和丈夫，一边是亲生父母兄弟，她只好和她的儿子混日月！她不混怎么办呢？

他自己又能怎样？他其实也只是另一种混日月的人罢了。他是怀里揣着“四清”运动的红头文件踏进这个陌生的河西公社的，从那一天起，他就和唐生法以及他下台的父亲站在了对立面，和她的亲生父亲

（那位贫协主任）结成了同盟。他现在首当其冲，成为唐生法们的眼中钉，真是无法回避。那些和他一起分乘着十辆卡车浩浩荡荡开进河西公社的几百名“四清”大军，早在四年前全部撤离了，回到省城里纷如烟花的工厂、机关或企事业单位去了，独独留下他来承受那些被他们整治过的人的恶气和仇恨。他怎么办？混吧！像她一样混吧！

在地窖里蜷卧了一天，硬是支撑着没有睡觉，留下瞌睡到夜里，他果然很快就睡着了。那热烘烘的火炕所散发出来的淡淡的柴烟气息，万无一失的环境给他惶惶不可终日的心所带来的松懈和踏实感，使他睡得好舒坦啊！直到他感到憋闷，感到鼻孔被堵而不能透气，他被憋醒过来了。

他其实没有完全清醒，从沉沉死睡里刚刚被憋醒过来时还是迷迷糊糊，本能地伸出手，推开堵塞窒息鼻孔呼气吸气的东西，却触到了乳房。

他顿时灵醒过来，立即明白发生了什么事。他立即缩回手，并为自己刚才在半醒半睡状态下的行为暗暗难为情。他不知该怎么办。他的左侧贴着一个温热诱人的肉体，柔软的腹部偎着他，两只肥实饱满的乳房贴压着他的脸，几乎把他的眼鼻和嘴巴全盖压住了。那双正在哺育婴儿的饱胀的乳房，乳汁挤压出来，流进他的眼眶，热乎乎黏糊糊的乳汁从鼻翼流进嘴角。被窝里热烘烘的气息，甜腻腻的乳香，以及这个温热的肌体里散发的诱人的气息，使他刚从梦中苏醒过来，立即又沉迷了。他一把搂住她的腰，紧紧贴着那柔软的胸脯，翻过身来……

他闭上眼睛，静静地躺着，心里暗暗滋浮起一缕幽幽的懊悔。她也静静地躺着，鼻头顶着他的耳根，呼出的热气吹得他的脖颈搔痒痒

的。她快快地给他说，她和唐生法刚结婚时还罢了。婚后半年，唐生法到镇上的小学校当了民办教师，一月才挣十块钱生活补贴，就开始瞧她不入眼了。加之她连续生下两个女娃，就更加抬不起头了。唐生法说她是个净下软蛋的瘟鸡，从早到晚没个笑眉眼。她的阿公当着党支书，开会常讲男女平等哩，实际上恼恨她没生下个男娃来。阿公进出院子从来没有正眼瞅过她，像是这屋里根本就不存在她这个儿媳妇。阿婆倒是从早到晚睁着一双气鼓鼓的烂边红眼瞅着她，咒她说，唐家的烟火就要灭在她的手上了。到她生下这个男娃，情况刚刚好转，唐生法又扯旗造反去了，又和那个女政委日戳在一起……

她流泪了。热乎乎的泪水在他脖颈上流下去。她说："我吃粗粮酸菜，不觉得恓惶，早晚没个知心人儿，我恓惶死了。你是个好人。我跟你把心贴在一搭，哪怕一会会儿，哪怕一时时儿，我都值得了……"

他的那种懊悔情绪飘散了，搂住她的发抖的身子没有说话。

她说："我以为你夜格黑会逗我，可你睡死了。我……你可甭骂我是个烂女人……"

他不由得淌下眼泪。他记得自己很少淌眼泪。在战场上执行侦察任务时从一道高崖上跌下去，跌得左腿的脚尖朝后而脚后跟朝前了，黑暗里，他抱住左腿狠劲一拧一扭，又把脚尖扭拧到前头，爬起来又跑了，疼得汗如雨浇而独独没淌眼泪。他唯一记得的是亲爱的侦察排长在铰剪敌方的铁丝网时不幸中弹，连尸首也未能拖回来，回到营地后，他才抱着排长与他紧挨着的空被子和枕头大哭一场。他再记不得自己什么时候还淌过眼泪。挂在脖子上十多公斤的木牌只用一根细铁丝吊着，勒到肉里去了，他仍是只淌虚汗而不淌眼泪。这个女人本来也没有什么特别伤情的大事，然而却使他流泪了。

她寻求安慰。她寻求寄托。她寻求真诚。她寻求别人尤其是亲人的起码的尊重和爱护。可她所寻求的一样也得不到。阿公永不瞧她的蔑视的眼神和阿婆盯得太紧的红边烂眼里透出的厌恶的眼神，都使她无法忍受，而丈夫唐生法却是只爱“亲蛋蛋娃”而不知想她的人。她的心里淡泊而冷寂，这从他见她第一面就能感觉出来。一个年龄尚轻的挺好看的乡村女人，怎么能年年月月忍受这种无所寄托的光景呢？他大约是可怜她，也可怜自己目下孤苦无援的境况，不由得热泪长流了。他一时找不到安慰她的合宜的话，只是紧紧地把她微微颤抖着的身子搂在怀里，自己也感到某种暂时的切实的寄托了……

第二天，一早醒来，他又听见小灶房的风箱扑嗒扑嗒响。她端着半盆温水走进来，对他笑笑，也不说话，就从悬在空中的竹竿上拉下毛巾，投进脸盆里，又提着热水瓶出去灌水了。她的一笑，含着羞涩，含着默契，含着一种踏实的真诚，久久地留在他的记忆里。她的眼里褪去了忧郁，闪着光彩，那闪着光彩的眼睛使他的心里滋浮起一缕温暖和福气。她照顾他的生活殷勤而不浮躁，完全像是对她的心爱的男人那样实心实意，朴实无华。

往后的夜晚，她照例铺下两条被子，一条里裹着宝贝男孩。她在哄得孩子吃饱睡熟后，就贴着他睡下来。有时候，她对他说：“老关，你先上炕歇下，我把这裤子洗了就来。”他也不再别扭，对她说：“玉芹，把桌子上那盒烟递给我……”

他就脱了裤子，坐在被筒里抽烟，看她在脚地上洗涮裤子。

八

大约是刚满十天的那天晚上，敲门声立即使他紧张起来，立时意识到自己成了乐而忘蜀的刘皇叔。他穿了衣服，装好烟盒，挟了晒干的狗皮，又钻到方桌下，准备潜入地窖，回头一看，她已叠好被子，用笤帚扫了他扔在地上的烟把烟灰，对他微微一笑。在她要盖上盖板的时候，弯腰亲了他一口。

他很熟练地下到地窖里，坐在狗皮上，听着上面厦屋的动静，果然是唐生法回来了。

“妈的巴子！给我弄点吃的。”

“你要吃啥哩？吃面还是吃馍？”

“日他祖宗！先给我喝口水。”

“你今日咋咧？一进门就气儿不顺！”

“日他婆！唉嘘……”

“咋啦？没得抓摸上那个婊子吗？”

“胡说啥！你净操他妈的那些毛呀㞗呀的闲心！革命遇到困难了……唉嗨！”

“给人家斗垮了吗？”

“㞗！凭他们要斗垮我？”

“那你回来胡嘀嗒啥哩？”

“唉唉……我说老人家呀老人家，你怎么给你的造反派也泼凉水嘛！你把俺们轰起来跟上你造反，你咋又给俺头上泼凉水嘛！”

“谁敢给你泼凉水呀！”

“老人家又发下最高指示了，要保卫‘四清’成果哩！凡是最新最高指示传下来，对咱都有利，咱都游行欢呼庆祝哩！唯有今黑间庆祝会开得窝囊！明明知道这个指示是给咱泼凉水，给保皇狗们撑了腰，咱还得开会庆祝，敲锣打鼓放鞭炮……我都憋死了！”

“噢哟！毛主席叫保卫‘四清’成果？”

“唉唉唉！老人家啊老人家，你说刘少奇搞了‘四清’扩大化，搞了‘经济路线’，俺们批刘少奇批得正上劲，冷不丁你又指示说要保卫‘四清’成果！既然是刘少奇路线搞下的‘四清’，这‘成果’咋能保卫它？唉唉唉……你老人家净是给糨糊缸里添胶哩嘛！越弄越黏糊！我看哪……莫非你老人家真个……老糊涂咧！”

“啊呀呀！你快悄声些！要是给人听见你抱怨伟大领袖，我看你怎么办？只死甭想活了！”

“我心里简直要憋炸了！你看，我又不敢跟旁人说，气得肚子胀胀的……你不会揭发我。”

“那可难说。我也忠于毛主席。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

“嘀哟！你去告发去！我不在乎。不是我吹，你就是说我攻击毛主席，也没人信。我说话人就信了。我说老鼠逮猫有人信，你说猫逮老鼠反没人信……”

“你……反正我可知道你的箱子底儿……”

变成俩人不冷不热不恼不亲的口角了。

他坐在生狗皮上，几乎要蹦起来了。老天爷啊！毛主席发下最新最高指示，要保卫“四清”运动的成果哩！啊啊！你老人家终于开了口了，终于发下一条有利于我关志雄的指示了！毛主席啊北斗星，我可真望见北斗星灿烂的光辉了！他一刻钟也坐不住了，那柔软光滑的狗皮上的黑色狗毛，顿时变成一撮撮钢针了，扎得他不能安生。

他还是坐下来，心里在叫，“四清”的成果早就应该保卫嘛！你老人家叫我们搞了“四清”，我们怀里揣的就是“二十三条”嘛！你说那是刘少奇路线，我们这些“四清”队员可怎么办？你老人家不说保卫成果谁能保卫得住？哈哈！唐司令沮丧了，憋得肚子要爆炸了，哭爹咒娘日祖宗了！自从造反以来记不清发下多少回最高指示了，几乎都是使唐司令心花怒放而使他沮丧，唯有这回唐司令不高兴而使他抑制不住兴奋鼓舞扬眉吐气的痛快心情了。他不由得在心里诵读着《毛主席语录》：被敌人反对是好事不是坏事。真是颠扑不破，透彻精辟。

他再也无意去偷听炕上的房话了，兴奋的心情使他顿然觉得这地窖难以忍受，一刻钟也难挨下去。他要出去。他想放炮。他想欢呼。他要真心实意表示对最新指示的拥护……他终于累了，过度兴奋之后无处发泄的累呀！他颓然倚在地窖的窖壁上，睡着了。他心里很踏实，相信当他熬过这一夜再睁开眼睛的时候，必是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

“我要走了。”

“满村满地都是人，咋么走？”

“那……黑天走。”

“今日黑间？”

“今日黑间。”

“你走吧！你在这儿总不能长久住下……”

她的眼里又隐隐浮出那一缕郁郁之色，把明亮可爱的眼睛罩住了。唐司令一早爬起来就蹬上自行车走了。她有点慌乱地招呼他吃完饭，收拾了碗碟，猛地扑到他的怀里，喃喃说：“我真想把你在这地窖里永久藏下去……”

有人敲门。

他又潜入地窖。

她在地窖口叮咛：“妇女队长派我上工，在饲养场捣粪。我在外头把门锁上了，你干脆上来歇着吧。”

他想，再难挨也就只剩一天时光了，万万出不得意外，就对她说：“你不在家，万一有个变故，没法遮掩，还是地窖里头保险……”

她也不再坚持，上工去了。

他坐在生狗皮上，心里很踏实，再难挨也就只有一天了，天黑以后就可以走了。救命的地窖！柔软的生狗皮！热烘烘的火炕！温馨的饱满的奶子！竟然使他有一股难以割舍的留恋。

她放工回来了，熟悉的脚步声比以往急些也重些，随之就唤他出窖。

“我在村里听到个消息……”

“快说——”

“公社里驻扎下军队了！”

“真的？”

“满村满街人都说哩！说公社里驻下整整一个连的解放军，一百多号人哩！听说往各村各队分派哩！叫社员搞生产哩……”

“这就好了！”他长嘘一口气。

他在来这儿之前，已听到军区要派解放军下乡“支左”，“抓革命，促生产”。现在解放军真的来了，来了就好了。他心里有数儿，军区的观点和倾向正是他所“亮相”的那一派……“不管咋说，解放军来了，我就可以回公社了。谁就再也不敢杀我剐我了，批批斗斗倒不怕！”他说。

“后晌我不上工去咧！”她对他说，“你要走了……再见就不容易了。”

他心里觉得酸酸的。他一阵企盼天快点黑下来，黑下来就可以走了；一阵又企盼天甭那么快就黑了，黑了就该和她永久性地告别了。

她照例关了街门，陪他坐着，她似乎手足无措，闲坐着就显得惶惑，又把一只鞋底夹进夹板，纳扎起来。麻绳拉过鞋底嗞嗞嗞的响声，使他的心微微颤抖，隐隐作痛，好像麻绳是从他心上穿过去的。他坐在方桌旁的椅子上，抽着烟，一眼不眨地瞅着她。她一锥扎过去，扎着了食指尖，鲜血染红了鞋底。她忙用右手攥住了食指，抬头

看他一眼，疼痛使那张忧郁的脸愈加显得楚楚动人。她心不在焉。她怎么会扎了手哩？心不在焉！他立即奔到她跟前，看那受伤的手指。她撇撇嘴角，温柔地一笑。他低下头，把那食指含进嘴里，吮着那带腥味的血。她丢了夹板，搂住他的脖子，眼泪顺着脖颈流下去。

冬天北方的天气很短，转眼就黑了。

她早早哄得孩子睡下，甚至不惜在宝贝儿子的屁股上抽了两巴掌，强制那不安生的孩子安宁下来，带着委屈的哽咽进入梦乡。

她钻进小灶房去了，风箱扑嗒扑嗒又响起来，大概是做晚饭。他走出厦屋，走进小灶房，对她说："我帮你烧锅吧。"

"你快坐到屋里去。你一来我就乱套了。你坐在屋里，我心里就稳稳当当的。去！坐到屋里，让我再服侍你一顿饭。"她说。

他走回小厦屋，又一次用心打量起来，一张方桌，一个土坯火炕，一只没有油漆的板柜，剩下就是些提不上串的瓦盆瓦瓮旧棉套破席片之类的物什了。他看着这一切，像是要把这些东西永久地储入记忆似的。

她走进厦屋，端着一只粗糙的瓷碟，那碟子里盛着炒得焦黄油亮的鸡蛋，另一只手里端着一盘烙黄的锅盔。锅盔是用麦子面烙的，无疑是乡间的高级食物了。她又给他倒下一杯茶水，对他说："你这些日子受委屈了，没得好吃食。"

他忙说："这些东西……该当留给娃娃。"

她笑笑说："你吃吧！我再也拿不出啥来。"

他坐下来，操动筷子，那鸡蛋很香，锅盔也十分香甜可口。他吃得很慢，细细地咀嚼着，却难以下咽，喉咙里似乎有什么东西堵住了通道，却又不能不吃，不吃会使她伤心的。

他说：“玉芹……我要走了。”

他想说几句感谢她救护的话，却又觉得没有必要。

她把那条干净的半新的被子又铺开了，默默地低着头，靠在炕边上。

他说：“你明白……我得……走。”

她说：“你得到后半夜走。天刚黑，人没睡定。”

他和她躺进被窝，反倒没有那种欲望了。他搂着她。她静静地贴着他。俩人都不说话，一切话语都显得轻薄而难尽人意。似乎那种永远使人沉迷的人伦之乐顿然失去了任何意义……

九

一晃多年过去了。

他正在翻阅一件材料，门被推开，有人走进寝室兼办公室的房子。他急于把一页的最后几个字看完，没有抬头，也没有招呼来人，凭着脚步的响声觉察得出来人小心谨慎，必是下级干部，大约要向他请示什么或汇报什么。他放下笔，从椅子上转过身来。

来人竟是唐生法。

他站在房子中间，两只手互相勾着吊在裆前，这姿势首先使人想到他很善良，有点可怜，有点拘谨，有点诚恳的意味。他指指另一张椅子，示意他坐下。他就在那把椅子上坐下来，腰挺得很直，使人看着他坐得很不舒服。

唐生法从口袋里摸出一支烟点燃了。他吸得很狠，吐出烟雾的时候，明显瘦削了的脸颊上的皮鼓起来了。他的胡须和头发串联在一起，眼角粘着干涸的眼屎，眼白血丝如网，真可谓疲惫憔悴，形容枯槁。他忽然产生一种幻觉，这是一只被打断了脊骨的狼。

他等待他开口。

他还在狠命抽烟。

这是一九七七年的春天。在他的主持下，河西公社举办了“说清楚”学习班。唐生法自然是河西公社必须“说清楚”的头号角色了。

唐生法扔掉已掐捏不住的极短的烟把，猛然抬起头来，对他说：“关书记，我想跟你说一件心事……”

他很诚恳地称他“关书记”。他再不敢称他为“死不改悔的走资派”或“三反分子”了。他不知是否忘记他曾这样喊过千遍万遍？他过去是公社社长，后来并为革命委员会主任，稍后又是党委书记兼革委会主任，一元化领导体现于一身。他说：“说吧！你要相信我，就甭顾虑啥。”

“我相信你才找你……”

“说吧！”

“我跟女政委……那个麻哈事……再甭追究了……”

关书记没有开口。

“实在不行的话，你可以按有这事定罪。”唐生法说，“我只求你……甭张扬出去。我的女子都长大了……”

“就这件事？”

“就这件事。”

“这件事可以不再追究。”关书记豁朗地说，“我答应你。”

唐生法愣了一下，对他如此爽快的应诺有点意料不足，一时反应不过来，倒无话可说了。唐生法只愣呆了极短一会儿，就现出某些难言的愧疚低下头去，又在口袋摸烟。

关书记很满意自己的回答。这种干脆爽快的应诺使对方愈加显得低微和猥琐，反过来也使自己更有味地咀嚼胜利者的宽容和豁达。生活以曲折复杂的流向终归确定了他的胜利和他的破灭。他坐在讲台上而他坐在台下的一个旮旯里的不可倒转的位置，就充分地显示出胜利者和失败者的区别。他在台上宣讲上级党组织关于彻底清查与“四人帮”有牵连的人和事的文件。他在台下的旮旯里低垂着脑袋抽闷烟。

然而他严格地把握自己，或者说其实根本不用什么把握而已养成习惯，就是决不显示自己的胜利者的昂扬。他不像有些同僚在胜利的时刻按捺不住，对整过他们的人表现出毫不掩饰的报复心理。他对唐生法他们除了原原本本地宣讲上级政策，而绝口不提他们对他个人的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他甚至在适当的场合能够心平气和地替对方讲出一些不失原则的开脱之辞，甚至引起一些心胸狭隘的干部的非议，

然而他继续毫不动摇地按自己的主张处理唐生法们的问题。这样，在敌手唐生法们和众多的干部心中，就造成一种关书记客观、宽厚的印象，这正是他一贯追求的修养目标。他以为，这样做的结果会使唐生法们彻底从精神上垮台而不会引起哪怕是一个人的同情；反过来，如使众人感到关书记有挟嫌报复的阴私夹杂在这场严肃的政治斗争之中，情况就会不同了；可能会使唐生法们有了社会同情，也肯定使许多人对他敬而远之。他不仅要征服唐生法们这一伙对手，更重要的是征服所有他的下级和同僚们的心。唐生法今天来找他，提出要他不再追究自己和女政委的事，就部分地证明了这一点。他爽快地答应了他，是他这种征服的继续。

“唉！”唐生法比较轻松地喷出一口烟，“那件麻哈事，这几年已经没人说了，要是再扬播起来，不是我受不了，主要是我的……女子和娃子都有……一张脸了……”

关书记不动声色，抽着烟，心里却在叫，你让我敲铜锣游街示众把我当猴耍的时候，你向我脸上吐唾沫擤鼻涕踢屁股的时候，从来没有想到过我这个一社之长的脸还是不是一张人脸吧？更没有想到我的儿子和女子比你的儿子和女子年龄更大。他瞅着唐生法穿在身上的皱皱巴巴肮脏邋遢的蓝制服，依然不动声色地说：“当然……孩子最厌恶听到父母的这一类闲话……我可以理解。”

“至于我在‘文革’中的问题，我说过的，我承认过的，我不反悔。我没有说清楚的问题，我再进一步往清楚说。”唐生法向他表示，诚恳的言辞使人想到他已经做好最坏的准备。他随之现出某种焦灼神色，“你这几天能看出来吧？有些人现在把所有问题都朝我头上摺。狗屙下的都赖说是我屙下的。我是裤裆里抹黄泥，说不明也辨不清是泥是屎了……”

“这种现象是存在的。”关书记肯定他的话，“你自己应该怎样做，我想你应该是明白的。”

“那当然，那当然。”唐生法连连说。

关书记想，即使对唐生法这样已被整个社会潮流推到旮旯里去的角色，也不能不承认他说的实际情况，不承认就使他彻底失望，以为说清说不清都是同样的结局。他承认他说的那种情况，正是为了从他心里排除这种情况对他进一步“说清楚”的干扰。他说：“你该当实事求是，把自己在‘文革’中的问题说个一清二楚，相信组织会辨别清白什么是狗屙的什么是你屙的，哪个是黄泥哪个是臭屎……”

“我一定往清楚说。”唐生法说，表示出很大的诚意，随之又微微摇摇头，苦笑一下，“有些话，怎么说也说不清楚……”

“事实总是事实。”关书记说，含有明显的批驳意味。原则的问题绝不含糊，“说清楚”学习班怎么能存在“怎么说也说不清楚”的问题。他对他批评说，“你首先应该考虑把问题‘说清楚’，而不是‘说不清楚’。”

他勉强点点头，表示接受。

“对你在‘文革’中受到的迫害，我向你赔情认错，请你处罚。”唐生法说，“我现在恰好认识到你是个好领导。”

关书记一下子不自在了。这个曾经恨不得把他踹成粉末的唐生法，当面恭维起他来了，实在有点别扭，有点滑稽。他似乎充耳不闻，无动于衷。对他说：“你还有啥事吗？”

“没有了。”唐生法说，“我越想越害怕！那天晚上，你要是不逃掉，我就犯下大罪了。我这几天总在想，那晚亏得你跑了，救了你也救了我！我当时真是一条疯狗……”

“你去休息吧！”关书记说，“该‘说清楚’的问题继续往清楚里说。那件……麻哈事嘛，我答应你的要求，不再追究了！”

唐生法站起来，蔫蔫地走出去。

关志雄书记闭上门，在屋子里踱起步来。他突然想起那潮湿憋闷的地窖，那黑缎似的柔软光滑的生狗皮，那干净的半新的被子，那热烘烘的烫人皮肉的火炕，那压得他透不过气来的饱满的乳房和挤压出来从眼眶流过鼻翼流进嘴角的奶汁……这地窖里的隐秘至今尚不为第三个人知晓，如果要他说清楚，他能说得清楚吗？关志雄书记的心绪波动了一阵儿，就恢复了常态，并不影响他继续以胜利者的宽容去批阅那卷宗里有关唐生法“文革”作乱的材料……

学习班结束了。唐生法“说清楚”了一些应该说清楚的问题，还有一些必须“说清楚”而怎么也说不清楚的问题，按照惯例先“挂起来”。唐生法的公社革委会副主任的职务被撤了。他是以造反派代表的身份进入“三结合”革委会的。后来老人家指示说“群众代表”不要脱离生产，关志雄立即执行照办不误，把唐生法给支使回东唐村去了，他不满意也叫他说不出口。到一九七五年“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时，唐生法闻风而动，一长排列举关志雄排挤打击造反派的大字报就贴在公社大门两边临着大街的围墙上。关志雄迫于形势，又把唐生法从东唐村请出来，安排到公社农具厂任厂长，他满意与不满意参半。关志雄也是颇伤了脑筋，无论如何不情愿给自己屁股后边安插一双挑剔的眼睛，塞到农具厂总比他撑在公社大院要好些。现在，唐生法的厂长职

务也给撤了，一切职务都给撤光了，让他也尝一尝“从哪里来再回到哪里去”的滋味儿。

唐生法得到处理决定后，胡须芜杂的脸色不仅没有羞愧，反而缓和松弛下来。他原先估计自己多半得坐牢，而实际只是撤职回家。不过，他并没有表示感激，只是说他完全接受组织处分。关志雄看得出来，唐生法内心并不服气，只是再无丝毫的能力和热量反抗罢了。

对唐生法的处理也出乎许多人的意料，人们几乎一律肯定他最少也得“坐两年”。人们又反过来说关志雄宽宏大量。其实关志雄心里清楚，新的政权所实施的新政策和政治策略，努力使自己区别于“四人帮”的极左路线，缩小打击面，对“文革”中作乱的人也决不以“四人帮”的残酷办法整治，只是择其罪大恶极者予以惩处，一般人“说清楚”错误就完事了。

唐生法悄悄默默回东唐村去了。

关志雄在河西公社继续担任党委书记，工作自然很忙，他却精力充沛，心劲十足。两年之后，到一九七九年的春天，他与唐生法又一次交手，竟然陷入深重的尴尬境地……

十

关志雄收到一封经别人捎来的信。信封是用普普通通的牛皮纸糊成的，没有经过邮局自然也就没有邮票和邮戳，里面却装得鼓鼓的，拿在手里掂掂，很有点分量。他撕开信封，先看末尾，赫赫然署着“唐生法”的名字，心头不由一紧，就从头至尾读下去——

关书记：

你好，一定很忙。

我本想找你谈一次，一是考虑到你十分忙，不便打搅；二来我怕见了你反而把想说的话说不清楚，因此写这封长信。

你给我爸平反了。我爸经你重新安排为东唐村的支部书记了。“四清”运动中没收我们家的房屋和粮食以及钱款也都退赔了。我们一家老少，尤其是我父亲，对你十分感恩。我却没有这种感激你的心情。

我爸的三条罪状，走资本主义道路，走地富路线以及多吃多占的经济问题全部推倒了，一分钱的问题也不存在了。当你今天以公社党委书记的身份宣布给他平反的时候，是否想到当初你作为“四清”工作团团长给他整治下这些莫须有的罪状的做法有点荒唐?

我爸是东唐村农会主任，是东唐村第一个加入共产党的党员，自建立起农业社自然是第一任农业社社长，后来就是中共东唐村支部书记了。他是怎样一个人，作为儿子我不能替他吹捧，相信你在东唐村的平反大会上看到的社员的情绪就明白八九了。你作为“四清”工作团团长把这样一个死心塌地跟共产党跑的老农民打倒，而且没收财产残忍到连水缸也拔走的程度，你而今能无动于衷吗?

在整个河西公社，大队和小队的干部以及普通社员，在你领导的“四清”运动中遭受和我父亲一样冤情的人有多少？你会比我知道得准确；而我只知道大约是百分之九十的前任干部全都变成了“四不清”，有的甚至变成了“地富反坏”敌对分子，你稍微想想就可以体味他们十四五年来过的是一种什么日子！你面对这些无辜农民，心情能不感到一点愧疚吗?

我当时高中毕业回乡，受聘为小学民办教师，一月十块钱补贴费，其余和社员一样挣工分。我父亲亲自指示生产队给我只记相当于中上等水平的工分，理由是我干的“轻省活”。我在两年任教期内的工作如何，有当时的校长和教员现在都活着，可以了解。而我因父亲的倒台也被从学校清除回家，替换我的竟是一个初中毕业生。你想想和我一样受歧视的那许多被整治的干部的亲属和子女，他们心里是怎样地不受活。

“文革”开火了，我豁出去了。反正我已经人鬼莫辨了，造你关书记的反，出一口气，让你也甭那么自在地过日子，我就泄了恶气了。我在“文革”中的作为和结局，我不会后悔。我被撤职回来的时候，也没有后悔。只是你总要我“说清楚”，我怎么能说得清楚呢？现在我一句话就可以说清楚了，“四人帮”们大闹“文化大革命”究竟是什么原因，早已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而我借“文化大革命”之风，就是为了报仇。

当你急急忙忙赶到河西公社一个又一个村庄去为那些被你打倒又被你扶起的农民平反的时候，你是否也会自问：这是怎么回事？自己到河西公社十余年干了怎么一回蠢事？而你能把这蠢事的来龙去脉以及你当初那么卖力地干这件蠢事的客观和主观的原因“说清楚”吗？我以为你现在说不清楚。其实，现在根本没有人要求你“说清楚”。

我现在想和你讨论一个问题，我做下了你认为尚未完全“说清楚”的错误。你也做下了你根本说不清楚的错事，你我十几年来的仇视和互相伤害，究竟是为了什么？你怎么看这个问题我不知道。

同是一个我，既可以做一个合格的人民教师（我曾被推选为模范教师），又可以是一个凶恶的迫害革命干部的打砸抢分子（譬如对你

的种种凌辱和迫害）。同是一个你，既可以以“团长”的名义把全公社上至支书下至会计出纳的百分之九十的干部一齐扫荡，然而你又可以以党委书记的名义给他们一个一个平反，你不觉得是一场真正的悲剧么?

这场悲剧的痛切之处还在于它是以人民的名义发生和演化着。譬如我，是以反修防修“不吃二茬苦不受二遍罪”的堂皇的名义去造反的。譬如你，也是以同样堂皇的名义进行“四清”运动的。而这两场运动的共同的结局，恰恰都使人民包括我也包括你吃了二遍苦也受了二茬罪。

我感到现在普遍滋生起一种厌恶政治的社会心理和社会情绪。出现这样情况的原因不难理解。政治在多年来变幻莫测的动乱中最终失去了它最基本最正常的含义，变得不是于人民有利而是有害了，令人听之闻之就顿生厌恶之情了。说句难听话，当人民最关心最崇拜的政治最后使人民终于发觉它不过是一块抹布的时候，哪儿脏就朝哪儿抹而结果是越抹越脏的时候，自然就明白这块抹布本身原来就是肮脏污秽的一块布，那么它就只能使人失望以至厌恶了！

听说你正在与教育部门的负责人做工作，想给我恢复民办教师的工作。你的好意我可以理解，但我现在恰恰不宜去做教师的工作。我在“文革”中的作为可以说是臭名远扬。我现在为自己的恶劣行为懊悔不迭。我无法站在讲台上向幼稚的孩童去做“传道授业解惑”的神圣的事。一句话，我现在还不能恢复面对那一双双纯洁天真的孩子的眼睛时自尊自信的勇气。我作过乱。我骂过人，使用的是最肮脏的语言。我打过人，拳头和脚都使用上了。我造过谣，不惜颠倒黑白，无中生有，以置对方于死地而为目的。我搞过阴谋，用最不光彩的手段去达到最堂皇的目标。我尚未从自己的心里彻底扫荡这一切人类最坏最恶

劣的品质，尚未恢复到我六十年代初刚刚开始做教师工作时的那种纯洁的心理状态。我怎么能去做教育后一代人的神圣的工作呢？

我将认真地对自己讲求一下“心理卫生”。基于如上认识，我现在首先向你做真诚的忏悔。我不是一般地遵循“向前看”的说教，而是真心实意地希望自己从懊悔中获得解脱。我也想向一切被我伤害过的人忏悔。既然我明白了这场悲剧的实质，同时也就觉得它十分好笑，也就觉得没有必要使你我在心里互相憎恨，因为这些东西，本不属于我们应该有的东西。

致以

敬礼

唐生法

1979年5月20日

关书记读完这封长信，抬起头来。窗外是一排白杨，枝叶绿郁葱茏，在温柔的阳光和微风里舞摆。他的眼光有点呆滞，一下子难以从这封信的震撼里清醒过来。他点燃一支烟，在屋子里踱起步来。

他踱着步，渐渐加快，脑子里开始烦躁不安。他猛然刹住脚，拉开门，吼叫起通信员小马来，过大的声音在公社院子里回荡。

小马闻声奔来，机灵的眼睛瞅着公社的最高领导者的脸色，有点惊慌。他对小马吩咐说，立即给公社派驻到所有村庄的干部打电话，紧急通知，让他们今晚回公社机关来，汇报各个村庄纠正“四清”运动“冤假错”案的进度和状况。小马不敢表示出任何异议，转过身就走，钻进电话房里去了。

他忽然想：要不要把唐生法给他的长信向全体公社干部读一读呢？这封信对加快复查“四清”中大量案件的进度不无推动力吧？当然，拿出这封信来公之于众……这需要勇气！

关志雄转过身，一拳砸在那信纸上，自言自语吼道：

“奶奶个熊！老子豁出去了！”

十一

这是在市人民代表大会期间，我与关志雄的一次相遇。我过去只知道他在“文革”中受过折腾，并不在意，因为几乎所有大小领导干部都受过类似的折腾，只是程度上的差别，并无幸免者。今天晚上，他却向我道出了这一段“地窖”里的奇特经历，使我难以忘记。

“你看，我把我一生中最见不得人的事都告诉你了。今晚以前，世界上没有第三个人知道我躲地窖的事。可我心里很憋，我说给你，你骂我也好，瞧不起我也好，反正我心里松泛了一些。你们作家可以把自己心里的事儿变个法儿写出去，我没这个本事。你觉得我的这段经历有意思的话，你可以写小说，只是……甭胡logo编！现时有些小说、电影编得太虚了！”

这就给我日后的小说定下了调子。当我今天打算写这个故事的时候，已经少了顾虑，文学园地早已出现了一种类似于小说也类似于报告文学的新形式，叫做报告小说或纪实小说。不过我觉得我的《地窖》还是小说，不仅仅是因为主人公的名字是我随意改换的，我的朋友自然不叫关志雄。

那一晚，我们在一块多喝了几杯，关志雄脸膛泛红，眼珠熠熠生辉，兴奋难抑。我问他后来还见过那位救他命的地窖女主人没有？他笑着说：“见过一次，是她和唐生法开着汽车把我请去的。他妈的，唐生法这小子有文化知识，又有在公社农具厂当厂长时拉下的熟人‘关系’，在东唐村开办了个小加工厂，挣了大钱。他和女人开着大卡车到县上来把我拉去，备下家宴，把他父亲也请过来。

“那家伙真不得了，挣下几十万了。他给东唐村小学捐献了一座二层教学楼，又给东唐村修建了自来水塔。他说……他做这些事是要讲一讲‘心理卫生’……

“我在他家里，再也找不到那个地窖了。他们盖下了小洋楼，厦屋拆掉了，地窖早已填平夯实了。我竟有点惆怅。

“那玉芹也容光焕发，发胖了，还烫了发，是那个小加工厂的会计，走起路来脚下叮咚响。进门时一见面，她的脸一下子红到脖颈，唐生法大瓜熊不知底细，还对着我开她的玩笑，‘都老㞗了，见人还脸红哩！’……”

我不禁畅怀大笑。

关志雄却没有笑，从沙发上站起，走到窗前，推开窗户。这座十层楼的宾馆下面，是灰蒙蒙的低矮平房的瓦顶，灯光大都熄灭，临街公路上的路灯放出一种紫色的柔光。这座饭店的多数窗户也都黑下来。夜正深沉。

关志雄站在窗前，抽着烟。他现在是河口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他对着黑沉沉的夜空，站了很长时间。

后来，我们就睡觉了。

短篇小说

兔老汉

一

善民老汉一觉醒来，伸手到火炕下边的小凳上去摸瓦盆。此刻，不用看钟表，准是午夜子时。他尿完尿，小心翼翼地把瓦盆放回到凳上，又溜进热乎乎的被窝里。西北风在屋脊上划出令人心寒的嘶鸣，电线也呜呜呜响，正三九隆冬季节。老汉愈贪恋那热烘烘的电热褥，伸手到枕头边又摸来烟袋，装上一袋旱烟，黑暗里划着火柴，美美地吸了一口，简直觉得自个儿就是神仙皇帝了。儿娶了，女嫁了，老汉再没有操心劳神的大事了；有粮吃，有钱花，老汉再不为日月生计发忙熬煎了，可不就是神仙皇帝过的日子！抽完这锅旱烟，过足了烟瘾，后半夜会睡得更舒服。

这当儿，老汉似乎听到前院厦屋的门轻轻响了一声，是木门被碰撞的声响。他支棱起脑袋，细一听，似乎有极轻的脚步声。他丢下烟袋，再一听，好像听见兔子的蹄腿胡乱蹬踏的声音。他心里当即断定，贼娃子偷兔哩！他一脚蹬过去，把老伴蹬醒来，压低声儿告诉她，有贼！他已穿好棉袄棉裤，溜下火炕，勾上棉窝窝，随手从门背后摸起劈柴的斧头，“咣当”一声拉开门闩，蹦到门外。

善民老汉提着斧头蹦出门来，立即听到前院一阵慌乱的脚步声，他大喝一声：“好个狗日贼娃子！”一声吆喝之后，那院里的脚步声更

加慌急杂乱，跑起来了，夹杂着自行车链条的响声，那响声瞬即消失到大门外去了。

老伴也穿戴整齐，拉亮电灯，走出门来，站在他的旁边问：“贼娃子呢？”

善民老汉答：“跑㞞子咧！”

老伴问：“你不撵贼，站在门口做啥？”

善民老汉这才意识到自己根本没有撵贼，更不要说抓住贼娃子了。他笑笑说：“吓得贼娃子跑了算了，我个老汉还能撵上？”

老伴讥笑说：“亏你手里还提把斧头！”

善民老汉听罢，把斧头扔在墙脚下，不再理会老伴的讥笑，走到前院去，厦屋里养着百余只兔子哩！

厦屋敞开着。老汉拉亮电灯，就看见一排排木条钉成的兔笼上的小木门打开了，几只长毛白兔在脚地上惊恐地跳弹，有两只大约被捏死了，扔在兔笼下，身上还有热气。老汉一数，整整差了二十五只，就在心里骂，狗日的贼娃子，简直成了土匪了！偷钱偷马达割电线，居然连兔子也偷！他骂着，把死掉的两只兔子抚弄一番，看看再无法挽救（那毛皮的热气越来越少），就哀叹一声丢到门外的台阶上。他把兔笼一一关好，又反身出来，锁了厦屋的门，听见老伴在街门口呼叫他。

他紧走几步，赶到大门口，老伴指着木门槛，似乎那儿有个不祥的死蛇。借着蒙蒙的星光，善民老汉看见，那木门槛上丢着一只小小的布兜儿。他顺手捡起来，看见布兜的两根系带儿全断了。他断定，

一定是贼逃出门时，大门的闩子挂住了布兜的系带，拽断了，掉在木门槛上了。他一把抓起布兜儿，回到上房里屋，在明亮的电灯下，善民老汉把手伸进布兜儿，一把掏出一摞硬硬的东西来，眼睛就瞪起来了，老天爷，竟然是一厚扎人民币！老伴数一数，是五百元。

老伴说："你丢的那二十三个兔，连带捏死的那两个，总共二十五个，能卖多少钱？总也卖不下这五百块吧？这下好！老天爷有眼，神灵有眼，总不会亏待善人，总不宽容恶鬼！"

善民老汉咂着旱烟袋，没有说话，瞅着那一厚扎人民币，扭过头来，又瞅着案板上方的墙壁。

案板上方的墙壁上，贴着一张灶王爷的神像。那灶王爷在人间所司的差使，就是监督黎民百姓锅前炕头的一言一行，是否违犯天纪，每到农历年尽，回天宫汇报一次。黎民百姓对灶王爷真是怯畏异常，就在神像两边贴一副对联：上天言好事，下地降吉祥。善民老汉笃信灶王爷，从来不在灶君面前说出任何贪心贪欲谋计他人的话来。

他脑子里筹思：这五百块钱怎么办？这不是在大路上拾下的，而是贼娃子丢下的。贼娃子丢下的钱敢拿吗？

二

一早起来，善民老汉洗罢手脸，就划着火柴，点燃了三根紫香，又点燃了一对蜡烛，供奉在灶王爷的像前，打躬作揖，跪拜在灶君面前了。他很虔诚地仰起头，盯着灶君的面孔，嘴里嘟嘟囔囔，向灶君明心，你老看得清白，恶人偷了我的兔，把钱兜丢在我屋里了。我可没有见钱黑心，没有财迷心窍，我等那丢钱的人来取，五百块一扎子

整整齐齐照原样放着。你把事情的过场看得清清楚楚，我跟俺老伴都没贪财的心思……他想叮嘱灶君，年底回天宫去的时候，你可甭胡乱汇报我呀！

没有亲眼见过善民老汉敬奉灶君的人，一定不相信如今世上尚有这等迂腐的百姓，可姚店村的人都相信，因为他们看见过。

姚店村的姚善民老汉，信了大半辈子神了。他敬奉的神，一是灶君，二是土地爷，全是神幻世界里的末等芝麻官。他年轻时，也不信神，他爸却是一切神灵的忠诚信徒，进庙就跪拜，见神就上香，每月初一敬奉灶王爷和土地爷的一炷紫香是断然不能马虎的。善民老汉当时对他爸的行为十分厌恶，常用白眼斜瞅跪拜在灶膛里和土地堂前的父亲，说出一串串亵渎神灵的话。哼！穷得锅里没米下，倒是把钱买了香蜡纸表，烧给这两个窝囊废，顶屁哩！早该把它扔茅坑去了，还月月敬它？他父亲蹦起来，甩手就给了他两个响亮的嘴巴，又跪下去了。

事有凑巧，这年秋天，善民被拉壮丁了，同遭劫难的还有本村的姚兴娃。俩人一下子被拉到河南，开拔到一座不知名字的大山里，就到战场上了。俩人只领得一身军衣，兴娃穿衫子，善民穿裤子，刚刚学会放枪，打了一仗，倒下一片死尸，像夏收时横七竖八摆在田地里的麦捆子一样稠。俩人商量说，再打一仗，咱俩也就变成麦捆子了，得跑！就在队伍转移的极好机会里，趁着天黑，俩人就偷跑了。可怜兴娃被追来的子弹击中脑壳，变成了一个孤零零的麦捆子，他却逃脱了，一颗子弹劈掉了半拉子耳朵，却不影响他没命地跑。辗转月余，善民老汉一路讨吃要喝，有时住下来打几天短工，挣来十数个黑馍，背上再走，终于回到渭河平原东部原坡下的姚店村。当他呜呜哭着叙述了兴娃变麦捆子而自己丢了半拉子耳朵的经历以后，他爸顾不得安

慰他的伤痛疲劳，立即点燃了香蜡纸表，拉着他先拜灶君，再拜土地爷。教训他说，你这下该信了吧！要不是我烧香敬神，你娃子也变麦捆摆到河南的沙土里了！你看看，神灵保佑着你，那枪子儿就只能挂住耳朵，耳朵离脑袋可没隔五尺一丈！善民从此也服了，月月初一跟他大一同跪拜灶君和土地爷，甚至比他大还虔诚几分。

“文革”闹到偏僻的姚店村的时候，乡村小学的娃娃在先生带领下，首先挖掉了善民老汉的土地堂，厦屋北山墙的墙壁上就留下一个豁豁牙牙的洞，洞上面留下一行黑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灶君被烟熏火烤变得黑苍苍的面目也被撕掉烧了。

近两年间，政策松活了，好些村子把毁掉的大寺小庙都修复起来了，善民老汉就在厦屋北山墙上又修复了土地堂，用青砖水泥砌成，倒排场了，一位捏面人的老艺人给他塑了土地神，他掏了五十块钱，心甘情愿。灶君的纸像也买到了。

善民老汉而今活得最滋润了。大儿子早已分家另过，在村子西头的新庄基上盖起一幢新屋，已经娶下孙子媳妇了，儿子和孙子常帮他犁地收割，倒也孝顺。二儿子从部队复员回西安，两口子都是吃公粮的人，年下节下回姚店看望老汉，一兜一袋尽是好吃好喝的东西。善民老汉和老伴农闲无事，清闲过余，反倒乏味，就养下一群兔子，剪兔毛卖给收购站，倒也不少收入。他的闲置的厦屋里，摆着一排排木格兔笼，多是长毛白兔，也有红兔和青紫蓝兔，他只剪毛而不食肉，认为食肉是作孽。姚店人除了叫他善民老汉之外，又叫他兔老汉，也有叫善兔老汉的，村长给乡政府汇报的登记表上，却命名他为养兔专业户。

善老汉也罢，兔老汉也罢，养兔专业户也罢，善民老汉不管这些称呼里包含着几分真诚又几分嘲笑，依然照例是每月初一敬奉灶君和土地爷一炉紫香。在他看来，贼娃子丢在街门木门槛上的布兜儿，那其实是土地爷给拽断的。

谁说神不灵？神无时无处不在！神无时不在保护善良百姓，无处不在惩罚恶人奸徒！

“你看，咱们都睡得死死的，土地爷给咱放哨着哩！”善民老汉得意地说，“土地爷看着贼娃子偷兔哩，把我给摇醒来；土地爷看贼娃子背着兔子跑了，就把狗日的钱布兜给拽断了……你看灵不灵？”

“灵！”老伴说，“贼娃子偷了二十几个兔，卖不上一百块，倒丢了五百元。老头子，我怕那伙贼不甘心……”

“甘心也罢，不甘心也罢，咱都不能拿这五百块钱。咋说哩？不是咱的钱嘛！”善民老汉说，“咱挣一个，花一个，挣俩，花俩，即使挣不下一毛钱，也不能收下不义之财。”

“你刚才说，这是土地爷给咱从贼娃子手里夺回来的嘛！”老伴说，“既是爷给的……”

“土地爷给的也不能拿。你忘了？灶君把一切都看得清白，要是汇报到天宫，咋了？”善民老汉说，“我想，那些贼娃子，大概是穷急了，看看要过年了，没钱办年货，猴急了，就想偷人，饥寒生盗贼嘛！咱还是把这布兜跟钱……还给主家。”

“还给谁呢？主家是谁？那些贼娃子还敢来取布兜儿？”老伴提出一串串疑问。

善民老汉一时也回答不了，没有开口，在想着万全之策。

“要不，交给乡政府去，或是交给派出所。”老伴说，“让乡政府或派出所——”

“不行不行不行。”善民老汉打断老伴的话，“贼娃子躲派出所，跟老鼠躲猫一样，怎敢到乡政府、派出所领布兜？那不自投罗网！”

“那……咋办？”老伴说，“交又不能交，搁又不能搁，这五百块钱倒该咋着办？”

“我看哪！那贼娃子既能偷兔，必是舍不得丢下的票子，十有九要来取。他来了，说几句好话，认个错，咱把钱跟布兜还给他不就完了！”

老伴点点头。

善民老汉照例去抚弄他的兔。老两口很坦然，也很从容，像什么事也不曾发生过。

三

善民老汉正睡得沉，正在做着好梦，就觉着一个人一手掐着他的喉咙，一手捉着明晃晃的攮子，那人的脸上全用黑墨涂得一满模糊，一条黑布蒙住了鼻子和脸颊，只留一对白仁多黑仁欠的眼睛珠子在外头。他想说话，喉咙被掐着，舌头转不动了。

那人把一块烂布塞进他的嘴里，松开了手，一把把他从被窝里拽起来。善民老汉一看，老伴的嘴也被一只臭袜子塞住了，被另一个人拽起来，那人也是把脸涂得一塌模糊，只留两只牛眼在外头。老汉再

一转脸，就看见脚地的桌子旁边还坐着两个同样打扮的人，手里玩着攮子，嘴角咂着烟卷。

“拽下来！”坐在桌子正中的那人命令，他大概是这一伙恶鬼的头儿，“把这两个老熊拽到地上来！”

善民老汉被那小子一把拽下炕来，几乎栽了一跤。他从不习惯穿内裤睡觉，光溜溜赤条条被拽到脚地上，连忙用双手捂住下身。他一看，老伴也被赤裸着拽下来，和他站在一排，老伴羞得蹲下身去，又被拽起来。

“听着，谁要是敢把嘴里的东西掏出来，就挨一刀！”那头儿把手里的刀子抛起来，电灯下寒光闪闪，落下来又接在手里，命令说，“你俩老熊听着：学着兔子蹦吧！让哥儿们开开心，你不是兔老汉吗？就学兔子蹦吧！”

那个一直厮守着他的家伙一把把他按倒在地，在他屁股上踢了一脚，逼他学兔子蹦跳……

善民老汉冻得浑身像筛糠一般抖，简直支撑不住了。老伴已经倒在地上，爬不起来了。他在脚地上来来回回爬行的时候，早已猜断出来，这四个家伙肯定是偷兔子而丢了钱兜的恶鬼，“二返长安”来了。

“你老熊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吗？”那头儿撇声窝腔地问，“你说，明白了吗？”

善民老汉早已苦不堪言，实际上也不能言，嘴被堵着。他心里骂，我早把钱照原样装在兜里，只等着你们来拿，早知如此，该是交给派出所才好，或者塞到灶膛里烧了。他实在想不到，这些贼会采取

这样的手段来讨钱，委实跟土匪一样暗偷强掠。他只好点点头，表示他明白他们的意图。

“明白了好！”头儿说，“既然你明白了哥儿们今日黑来做啥，你就自己拿出来，甭劳哥儿们翻箱倒柜。让他站起来。”

善民老汉站起来，从炕头的木箱里一把拽出布兜儿。那头儿一伸手就抢过去，掏出那一厚扎票子，自言自语说：“倒是没动！”

善民老汉心里不屑地说，我可不吃昧心食。

那头儿朝另外三个蒙面人努努嘴，其中一个把刀子拔出来，逼着善民老汉和老伴蹲在地上，那刀子尖就顶着他的后心。另两个家伙已经跳上炕，那张千把元的存折和三百多元的现金自然不能幸免。老汉动也不敢动，只怕那刀尖刺进肉里去。一千多块钱虽然可惜，而他和老伴的性命怎么也不能丢在这伙强盗手下。他悄悄捏住老伴的手腕，怕她一时沉不住气而跳起来护钱，事情完全就糟了。

那头儿再努努嘴，另三个蒙面人就动手把善民老汉和老伴的手脚捆起来，扔到炕上，用被子盖住，然后走了。

“拜拜！”一个说。

脚步声响到前院去了，消失了。

老汉把嘴在炕沿上搓擦，终于弄掉了毛巾，又用牙齿扯开了手腕上的绳子，再解开脚腕上的绳索，拉亮电灯，给老伴拔了嘴里的烂布袜子，解开手脚，老伴几乎被折腾得半死了。

他搂住老伴，“呜”的一声哭了。

深更半夜的哭声，惊动四邻，邻家的男人女人闻声赶来，惊恐地听着善民老汉的叙说。本族的侄儿姚天喜气得脸色铁青，直抱怨堂伯太糊涂，你昨日一整天为啥不吭一声？人家前天晚上偷了兔，丢了钱，你倒好心肠等人家来取！天下哪有这样愚昧的善人！你昨日要是透一点风，我们几个小伙子就有了防备，非把狗日砸成肉……发了一通牢骚，就骑上车子出了门，奔派出所报案去了。

四

侄儿领着派出所的两位年轻警官到来时，天已微明。两位警官详细询问了经过，又拍了照片，又捡拾了几个蒙面人丢在地上的烟巴子，又带走了捆绑善民老汉和老伴的塑料纸绳儿，就告别了。

临走时，一位警官说："大伯，你这人真是……不可思议！贼偷了你的兔，你反而等着贼来取他们丢下的钱！还怕贼不敢去派出所，因此就不交给我们。真是不可思议！像你老儿这样的善人……我还没见过哪！"

另一位警官站在旁边摇着头笑。

二儿子接到族里弟弟天喜打去的电话，早饭时间就急急忙忙从城里赶回乡下来，问清了遭窃的经过，也数落起父母来："太糊涂了！糊涂得叫人无法理解！简直成了天方夜谭！而今社会发展到啥样的地步了，你还说'人心都是肉长的'！这下你看看，人心到底是不是肉长的？未必都是！你行善……他偏作恶……真是糊涂透顶！"

他在等待，等待派出所的警官来向他报信，贼娃子抓住了！可是等了五天，还不见音讯。老汉越等越烦，等不住了，也烦得躺不住了，一骨碌爬起来，一把撕了灶君的像，塞到灶膛里，又奔出里屋，捞起双刺镢头，把土地爷的坐像一镢头就挖了出来。他在嘟嘟囔囔地骂：“你这个废物！恶人糟践我老汉的时光，你做屎去了！我给你烧了一辈子香，你……”

善民老汉瞪着血丝斑驳的眼珠，抡着镢头，甩开老伴拉扯的手，捶砸着倒在地上的土地爷的泥坯身躯，口里骂着：“我不行善了！善人善行尽吃亏！我也作恶呀！我也学歪人的样儿呀！哪怕死了下地狱，活着再甭受恶气！”

老汉把土地爷砸得粉碎，扔了镢头，又奔进厦屋，从兔笼里抓出两只长毛白兔，走到院庭里，往砖石台阶上猛磕两下，活蹦乱跳的兔子顿时耷拉下脑袋，在地上蹬着后腿。

老伴惊慌地喊：“你疯了？”

老汉强硬地答：“我没疯！”

“今晌午吃兔肉！”善民老汉动手剥皮，双手已染得鲜血淋淋，“咱不能当兔子，当兔子太软绵了，我要吃兔，狼才吃兔。人都怕狼。我也学狼呀！”

“疯了疯了！”老伴又气又急，“我看你八成是疯了！”

一辆吉普车停在门口，一位警官走进屋来，笑说：“姚大叔，听人说，你养兔不吃兔，也不杀生，今日倒开杀戒了！”

善民老汉头一甩：“我学手哩！”

警官要他上车，到派出所去一趟，却不说做什么。善民老汉洗了洗手，就上车走了。

走进一间房子，警官打着手势，示意他不要说话，可以抽烟，也可以喝茶，只是不要说话，说是让他等一等，所长一会儿要和他说话，现在需得等一等。

善民老汉端起茶杯，喝了一口，就摸出烟袋来，一边吸烟，一边打量这间房子。房子很小，用一道黄布隔成两半，可以看见那一半的苇席顶棚。稍坐一阵儿，就见那边房子有人在说话，他听得十分真切。

“你说一遍：你俩老熊学兔子蹦吧！让哥儿们开开心！”

“你俩老熊学兔子蹦吧！让哥儿们……”

善民老汉还没听完，脑子里“嗡”的一响，呼地蹦了起来，手里攥着烟袋，骂了一句：“好个狗日的！”就一把拉开黄布帐子，奔到房子那边。

一位警官坐在椅子上，一个小伙站在房子中间。善民老汉走到小伙面前，死死盯着那小子的眼睛，白仁多而黑仁欠，就是那个发号施令让他光屁股学兔子蹦的家伙！他一巴掌扇过去，那小子打个趔趄，又站直了。那位警官忙拉住他的胳膊，问：“大叔，口音听准了？”

“听准了！”

“模样子能辨认出来不？”

“我辨得出他的眼睛！白仁多黑仁少，狠毒的坏种全是这一号眼睛！”

善民老汉使劲挣脱警官拉他的手，却挣不脱，急得气喘吁吁，双脚跳弹……警官劝：“姚大叔，你只要把人认准，有法律收拾他，你可不能动手打！”说着便把他拉出门去，推上吉普车，送他回家。他问警官，这贼是哪里人？谁家老子就养下这样一个孽种？警官说，这贼是姚店村西边韩寨子的，他爸叫韩豆腐，磨了一辈子豆腐。善民老汉张大嘴巴，“噢噢”了半天，大为惊诧：“啊呀呀！韩豆腐跟我一样，也是顺民百姓，善得跟菩萨一般样儿，怎么养下这号东西？”警官笑着说：“他爸善良不等于儿子都善良，这问题嘛……复杂啰！”

他又问警官，另外三个贼抓住了吗？

警官告诉他，这一伙贼共有八个人，这次全抓起来了，另有一个外逃，正在追捕。

老汉大兴感叹：“那东西穿得也不错，脸上红堂堂的，不像是没钱花没饭吃喀！”

警官说：“根本不是！”

善民老汉不说话了，抽起旱烟，心里纳闷，吃得好又穿得阔，怎么还做贼抢人呢？并非是饥寒才生盗贼，并非是得温饱而能修礼仪吧？

吉普车在秋天的原野上奔驰……

1987年2月 白鹿园

山洪

这条小河年年都要发几场洪水；年年都有什么人被洪水溺死的凶讯；凶讯和洪水一样暴起暴落。

小河确实小，在省级地图上不见踪迹，在县级地图上可就威风地逶迤着，似乎比全国地图上的黄河长江还要活现神气。不管怎么说，小河总是一个存在。夏天旱季里，那一湾细流就显出百般妩媚，千般柔情。男人们从沤热的田禾地里奔到河边，脱下短裤，把臭汗和燥热丢给清凉的河水，落得个神清气爽，好不痛快。女人们提一笼合家老少脱换的脏衣，在水里洗，在石上捶，棒槌声和着嬉笑声，也算得怡然天趣。男人和女人都亲近这河，亲近这水。

一当阴雨连绵，千沟万壑的溪流汇于小河，这小河顿然变得凶恶狰狞，面目全非，黄汤涌着黄汤，排浪推着排浪，呼着吼着，左冲右突，气势相当怕人。也有水性好不怕水而借着洪水暴发之际发洋财的人，此时就很活跃。上游漂下来一棵树、一根椽子或一块木板，他们便跃入水中，起伏于波浪之上，捞得这些洋财，做盖房的木料，令那些不习水性的人眼红。然而也有失马丢了性命的人。这种水一般不会造成太大的损失，因为它来得缓，涨得慢，人皆防备着。可怕的是突然暴发的山洪，那时山里头突降暴雨，而平原上日红如炙，人们往来于河道之中，毫无戒备，突然一河铺天盖地的洪水涌将下来，跑躲无计，就成了这小河的溺死鬼。

供电局的老李就挨了这个挫。

老李本当年龄不大，才三十冒头，乡下人对一切公家人都称老某，算是尊敬。老李从河北岸过了河，催收了几个村子电费，后晌又推着自行车过北岸去，赶到天黑前回县，与妻子儿女相会。他的自行车后架上装着一袋西瓜，车头上挂着的网袋里装着大蒜辣椒之类鲜菜，全是那些村子里的个体户农民顺手馈赠的时鲜果蔬。他在这条线路上跑了几年了，人都熟了，进得任何村子，干部和村民都认识他，都热情招呼，都愿意送他一点土特产。他走过烤热的沙滩，来到水边，穿着塑料凉鞋，也就不用脱鞋，推着自行车从水里往过蹚。水很清，很浅，只埋住半个车轱辘，水流又很窄，不消五分钟就蹚过去了。他撑起自行车，脱了长裤，脱了背心，只穿一件衬裤，就扑通一声钻进水里，洗呀，游呀，舒服得简直就跟神仙一样了。如果不是瞅见河下游有女人在洗衣服，他就要脱光脱净下水了。

老李躺在水中，任清凉的河水从胸脯滑过去，像有千万只柔软的手掌在抚摸着。他枕着一块河石，望着蓝天，几缕白云，如烟如丝，如薄纱如蝉翼，悠悠袅袅，陡然涨起一种愉悦之情。猛然间，他听见一种奇怪的声音，像是从大地里头发泄出来的一种沉闷的嗡隆声，又像是从天边传来的。初听时并不在意，错以为是飞机从远处飞过在河川两边原坡上的回声。不大工夫，那嗡隆声愈来愈响，像千军万马驰过荒原，突然变成一种吼声。他心里顿然感到一种恐怖，一种战栗，就从水里蹦起来，往上往下一瞧，只见上滩和下滩有几个人如逃命的兔子似的奔跑；再往上一瞅，天哪，一片黄汤，裹着一片浑雾正扑将下来。他顾不得穿衣，推起车子就跑。沙滩上软沙如泥；不能骑车，又离对岸河堤那么远，他心急如焚，眼看着吼声和浑雾越逼越近，一阵冷风直透胸窝。他撒手扔了车子，甩开双手，没命地奔跑……就在老李奔到离河堤仅有三两米远的时候，黄汤和浑雾就把他吞没了，裹挟而去了，简直轻若弹须。

老李霎时间就没有任何知觉了，没有欢乐也没有痛苦，奔逃时的恐惧和慌乱都在那一瞬间结束了。

水火无情！无情的水火！

老李完了。他才三十冒头就完了。他如果不贪着那一湾百般妩媚千般柔情的清水而早早推车走上北岸的河堤，他不仅不会完而且可以站在河堤上看水涨河塌，观赏这突然勃发起来暴怒起来的小媳妇一样妩媚柔情的小河。然而他毕竟完了，把万千悔恨留给河岸边的熟人或生人日后去传说去咀嚼。

可是老李竟然没有完。

老李遇着了救命的恩人。距老李出事地点三里之远的贺家村村民们把老李搭救起来了。

贺家村紧系小河。村民中不少爱发洋财的人。每当河水暴涨，一些水性好的年轻人就奔上河堤来，见木头漂下就想捞。当然，年轻人争强好胜，借此机会也想露一手，赛一赛水性。这一回，他们没发着洋财，却捞上来个死人。

头一个发现落水者而且率先跳下河的是三十岁的村民贺冷娃。冷娃在贺家村算得一条水中白条，在村里也数得一条汉子，膀宽腰细，双臂如猿，在县上的农民运动会上夺得自由泳冠军，只是姿势不大规矩，是自小在小河里狗刨式游泳的底功。他一眼瞅见上游漂下一个人头，倏忽又沉没了，转瞬又看见一条胳膊，冷娃就扑下水去了。随着冷娃下水，扑通扑通又跳进三四个后生，都是贺家村有好水性的青年。一前一后，直向河心冲去。

四个人围着，推着，拽着，终于把落水者拉上岸来，看热闹的村民们一摸鼻子，都丧气了：“死尿了！死尿了！”

有老者颇富经验，说死也许是假死，救一救兴许能转活来。于是就把近旁放牛的孩子唤过来。拉来一条黄牛，把落水者扶上牛背，横搭上去，把鼓胀的肚子压在牛背上，让放牛娃牵着黄牛在河堤上转悠。

孩子走着。黄牛也走着。落水者突然哗啦一声吐出大股大股的黄泥汤来，臭气四溢。老者扶住双脚，命孩子继续牵牛转悠。放牛娃捂着鼻子，直嚷嚷腥臭不堪，仍是牵牛走着。落水者又吐了，这回吐出来的饭食，肉末菜屑，更是臭气熏人。放牛娃娃扔下缰绳跑了。黄牛一蹿，落水者从牛背上跌下来，竟然哼了一声，证明他确实还活着，并没有完。

村民们全都围过来，直呼此人命大。

有人嬉笑说，冷娃该上广播该上报纸该领舍己救人的奖金了。

老者把落水者翻过身来，那脸色像敷了一层黑土，怪怕人的，忽然眼皮一翻，眼珠转了，旋即又合上。这当儿，有人认出落水者是收电费的老李，大喊：“啊呀！怎么把这驴日的救上来了？”

“怎么救上来的是这狗东西？”

“救这货干啥？救上来再来害人！”

于是，老者停了手。他已经扒拉到一堆干草干树枝，取出火柴，想燃烧一堆火来烘烘热气，听到众人说是收电费的那个驴日的老李，就把抽出来的火柴又装进匣子里。

于是，冷娃顿然变得暗淡无光。他第一个发现落水者，不容分说第一个跳下水去拉住了落水者，正受到贺家村村民们的崇敬和赞扬，有人还说他应该上广播登报纸得到表扬，现在变得不那么伟大了。他捞上来一个叫贺家村村民讨厌甚至憎恨的人，连他的英雄行为也失去了光彩。这情况恰如你救上来的不是个人而是一只耗子……想想人们还会敬重你吗?

一直表现着慈悲心肠的老者，撅着花白的胡须，失望地从老李身旁站起来，用火柴点燃了烟锅，抽起旱烟来，扫兴地说:“我还以为咱救的……是个人哩！谁料想不是……”

一切人——贺家村围在河堤上的男人们，老的少的和放牛娃娃，现在都揣着手，像看一条死鱼或一条死长虫一样看着老李，议论纷纷:

“这驴日的今日遭了洪水，真是老天有眼！”

“老天爷可真是有眼哩！看这驴日的坑人坑得太残火了！不容情了。”

“冷娃瓜不唧唧的只知下河捞人，捞上来个啥玩意儿！”

冷娃自始至终都没说一句话。人家说他该上广播该登报纸该拿奖金的时候，他可只是扬扬自得，自己能从这样凶猛的河水里救人，露了一手。现在，他懊丧地听着众人的牢骚，忽然恼了，一把抓住那人的胳膊，一把抓住那人的脚腕，嗨哟一声吼，把老李举起来，扔到河里去了。

众人大惊。真是个冷娃！冷熊！

老者慌了："冷娃你这算弄啥？"

冷娃："他从哪里来再回哪里去。"

老者："你不救归不救，救了人又把人扔到河里，这等于杀人害命！"

冷娃又慌了，嘴里骂着："妈的！救也不是，扔也不是，倒该咋着才对？"

老者："快去捞上来！"

冷娃又跳下水去了。

好在岸边有石坝，水流打着漩涡儿，流速却极缓。冷娃跳下水，又把老李拉上来。老李的肚子又圆鼓鼓地灌满了泥汤浊水。

老者又唤来放牛娃。

放牛娃牵来黄牛。

老李又被驮上黄牛背，转悠，又吐，又是臭腥熏人。

众人却因此而哗哗大笑。

众人都开心了。

"叫驴日的吐！把这几年吃咱喝咱的昧心食全吐光吐净！"

"这驴日爱吃！凡是咱们地里长的，树上结的，圈里养的，他都爱吃爱拿！好！这回叫驴日的吐光！"

老李躺在河堤边的草地上，挣扎着睁开眼，似乎已经初步恢复听觉，双臂挣着撑住地面，坐了起来，忽然趴下，口齿不清地说:“乡党爷们……我不是人……”

“你是……电霸王。”

“你是电老虎！”

“你是电——狼！”

老李趴在地上，呜呜地哭。

老者此时动了恻隐之心，蹲下身来，划着火柴，点燃了柴草，冒起火焰，烤着那瑟瑟抖索的老李，奚落说:“老李哇！你以往做事也太绝情哇！你想想，那年我们正打麦子，你断了电，打麦机当下不转了。而今家家户户都要轮流打麦，你欺侮的是全贺家村农人……”

“你还给他烤火！”

“把驴日的扔到水里去！”

说时迟，那时快，冷娃拉住老李的双手，旁个青年抓住老李的双脚，从草地上提将起来，叫声一二，老李又回到河水里去了。

众人在岸上哗笑，取乐，看老李在水里没死没活地乱扑乱打乱刨。

冷娃又跃下水去，把老李又拉上来。

老李又灌满一肚子水。又被驮上牛背。又把黄汤吐出来。又是在草地上挣扎呻吟翻白眼。

众人很开心地笑着。爱说调皮话风凉话的人，此刻有了显露本领的机会。不爱说话的人甚至老好人，嘴里虽然不说而心里也很受活。大家都出了气了。这个屁股上挂个工具袋提兜里装着个账本的老李，往日里比省长比皇上还厉害，干部和村民一律没人敢惹，说不顺溜就断电！现在，这个电霸王电老虎电——狼，正被洪水折磨得半死，向他们感恩戴德。他落到他们手里了，真是上苍有眼！

小伙子们又哄闹起来："把驴日的再撂到河里灌一肚子黄汤！"

老李本能地抱住了老者的腿，死死不放。

老者这回急了："难道说……日后不用电了吗？"

话不在多，全看说到说不到点子上。老者这一句话，一下子把在场的人镇住了。大伙似乎突然从快活的开心境况里清醒过来：既然冷娃救下了老李，日后老李还要来负责贺家村的供电工作；如果冷娃不救他，让洪水把他冲到海里渺无踪迹，还可以指望县电管局另派一个好电管员来。老李没死还管他们用电。老李还是活生生的电霸王电老虎电——狼！

好几位村民蹲下身来拢火，给老李烘烤。有几位帮老李擦干净身上脸上的泥污，表示对刚才的不敬行为的忏悔。有的人咕咕哝哝抱怨冷娃太冷，既然把人救上来，就不该三番五次扔到水里瞎折腾……

冷娃突然往地上啐了一口，冷冷地说："我准备用牛碾麦子用石磨磨面用煤油点灯豁出来不用电了，看他电狼电老虎电霸王还能把我坑死？"说着唾着，转身走了。

众人却忙活着救老李。

老李已经有气无力，浑身绵软，筋疲力尽了。他听见了这些人的全部议论，感觉到了贺家村村民现在对他的全部关心和救助：忙乱的手和热气灼人的火，然而心里却十分冷寂。

这些人还是怕他才……

1987年10月20日

石狮子

东堡子住着个王二和张三，左右为邻，一墙之隔，进门不见出门见，低头不见抬头见。几十年来，两家人虽然免不了为些鸡刨狗啄娃打捶的小事犯点口角，却也没有发生过大的干戈，更没有动过诉讼的事，基本上能够和睦相处。

王二这人长了一个特别灵的脑瓜，五十年代的初中毕业生，因为家穷，早早毕业回乡务农，本是乡村里不能多得的知识人才，当过团支书，也当过出纳、会计，还当过两任队长，但无论当啥干部，都弄不长时间，就惹得意见满村流。究其原因，主要是心眼太灵了，灵过头了，经常搞些小手小脚的事，渐渐失去了群众信赖，后来也就当个普通社员，人称他灵虫。张三和王二年纪相仿，小学毕业，文化低了一大截子，生性又木讷，缺言短语，从来也没当过干部，人称张三直杠，或简称三直杠，或谑称三杠子，无论你称呼什么，他都一概应承。

近几年来，乡村政策放宽了，经济搞活了，王二灵虫顺应时代潮流，灵虫早飞，养了两年鸡，挣下半万块钱，自然得意扬扬。三杠子看邻家养鸡发了家，也照猫画虎在后院围起栅栏，养起鸡来。这一年，乡村养鸡大发展，鸡蛋一多，价格下降。三杠子哀叹连声，抱怨轮着自己烧香时偏关了庙门，笨人真是不兴时了。王二灵虫早有所料，把五百只母鸡全部卖掉，等到三杠子哀叹的时光，他的鸡舍早已变成了貂场。几十只毛色油光黑亮的母貂已经怀胎待产，只要幼貂一长成，一出手，又是以千为单位的进项。这灵虫看着蔫不拉唧的三直杠，以先生开导学生的口气说：“杠子！老人有言，做生意要‘撵迟不

撵快’，啥正兴时，不敢撵啥！啥还没兴时，赶紧撵！这是符合现代经济规律的。”

三杠子一听，很有道理，养鸡兴起来，蛋多了，自然就便宜了，于是就想把鸡卖了。恰在这时候，好多养鸡户好像都看出了门道，纷纷卖鸡倒圈，另谋营生。三杠子转而一想，大家都卖鸡了，明年鸡就少了，咱不能卖，这才是王二灵虫说的生意经：撵迟不撵快。于是就把这一批母鸡继续饲养，第二年一开春又养了一批小鸡。果然蛋价上涨，三杠子赚了大钱，喜不自胜。

再说王二灵虫却运气不佳，等到幼貂生下来时，貂价已经大跌，成倍成倍下跌，灵虫气得吹胡子瞪眼，也莫可奈何。无奈之中，王二灵虫又得着獭兔毛皮昂贵的信息，于是就孤注一掷把貂卖掉，掏四五百元的高价买回几只优种獭兔。因为过于娇惯，过于精心，反而适得其反，四只獭兔死了一半，待到剩下的两只怀胎下仔，獭兔价又跌落千丈。王二灵虫气得跺脚骂娘，自认倒霉，把头两年养鸡赚下的半万块钱赔光蚀尽。再看隔壁三杠子，稳打稳扎，已经摸熟了养鸡经验，不断改进饲养方法，逐步更新设备，两年间把圈养蛋鸡全部改造为笼养，早已成了万元户了。王二灵虫被村人耻笑，说灵虫七倒八捣，袍子倒成夹袄。王二越听越气，怄气难出，两腿生疮，脓水不断，行走不便，生财无力，只好自认倒霉。

生意倒闭，灾病接连，王二灵虫抚摸着晶亮发光的脑门，终于听信了乡人的劝告：去请一位神汉，看看究竟是冲了哪门子的神，撞了哪路子的鬼。

神汉高个，黑脸，精瘦，左腮上有颗赤痣，痣上长一撮黑毛，一直吊到脖颈上，人称一撮毛先生。一撮毛先生家居后岭，深居简出，

白天蛰伏，夜间捉神弄鬼。传说他出门便坐鬼抬轿，再远的路程，眨眼便到，比直升机方便又快速，但天明鸡啼前必须赶回家中。

一撮毛先生进得王二灵虫家门，先吃了四菜一汤，喝了半瓶太白酒，然后吩咐王二两口子跪在当院，点蜡焚香。一撮毛先生掐诀念咒，阴森恐怖，吓得王二灵虫抖如筛糠，后脊梁上似有长虫蠕动。再看一撮毛先生挥拳抖臂，做跨马状起伏于庭院的各个角落，又直蹿后门而出，大喝一声:“邪气在此！”

等得王二灵虫抬起头时，一撮毛先生已经走到当面，把手中提着的一块石头扔到脚下。王二灵虫夫妇两个对视片刻，不知所措，难道这石头上出了什么毛病?

一撮毛先生说:“你细看看，这不是一块石头，是个石狮娃，它龇牙咧嘴正对你家后门，你一家人能安生吗? 如不早早除此妖石，后头还有大祸！”

王二灵虫这时才记起来，这石头是垒在后院茅房（厕所）的土墙上的，还是那年学大寨平整土地时，从一堆乱石窝里挖出来的，他扛了回来，用它做茅房的围墙，没想到竟然招此大祸。

王二灵虫早吓得魂魄分离，发如手提，结结巴巴，话不成串儿:“先生高明……高明……你快说……该咋办哩? ”

“咋办哩? ”一撮毛先生眼珠一转，“办法有的是，怎能叫鬼把法官缠住！这办法多种多样，有临时性措施，也有根治久安的办法，你看你愿意采用哪种办法? ”

“当然是根治！根治！”王二灵虫忙说。

“那……你是明白人——”一撮毛先生说，“根治就要你破大费了……”

王二灵虫掏出早已准备好的五十块钱，递上去。

一撮毛先生说：“这只够临时措施的。”

王二灵虫赶快捅捅女人，女人回到屋里，又取来五十，交给一撮毛。一撮毛这才吐着烟雾，捻着那一撮黑毛说：“三天后，择一单日，避过三六九，夜黑星全时，扔到河滩里去。记住，要撂到最高的那个石坝根下，最好择在七日。”

王二和他婆娘连声应诺。

一撮毛走出街门，就决然不让王二灵虫再送，说他要召唤抬轿的小鬼了。

王二灵虫回到屋里，拉亮电灯，把那块石头仔细看看，真是一头石狮子，不留神还真看不出来，越看倒越害怕，恨不得当晚就把它扔到河滩去。好容易挨过三天，遇到七日，王二灵虫心里“咕儿”翻起一个怪念头来。

他忽然想到了三杠子，心里就扑扑扑往外冒气：我王二这两年连倒大霉，你他妈真是福星高照；我养貂烂本儿养兔死兔，你他妈养鸡发财，鸟枪换成大炮了；我害下了连疮腿越活越瘦，你他妈越吃越肥连个痢疾也不拉，凭心眼凭学问，我王二哪一样比不过你个又闷又笨的三杠子？这么想着，王二灵虫就把那个石狮娃搁到三杠子街门外的猪圈围墙上头了。三杠子的猪圈围墙是用杂石垒成的，这尊石狮子撂在墙上，无甚异样，谁也不会留心这儿什么时候添多了一块石头。

事有凑巧，祸中生福。第二天，两位文物普查工作者来到东堡子，无意有意之间，发现了那尊石狮子，忙问：“这是谁家的猪圈？”村人告之，于是把三杠子传了出来。文物普查工作者说：“这个石狮子，我们想把它带回去，需要鉴定一下，看看是不是有价值的文物。”说着，就给三杠子打了一张借条。三杠子憨憨地笑着，说：“同志，尽管拿，尽管检验，尽管……”

王二听见门口人声喧哗，以为石狮子显灵了，三杠子招下祸了，急忙跛着腿走出来，一问明缘由，急得一拍大腿，脸黄眼红脖子硬，拉住那位同志的手不放。

“石狮子是我的！”王二灵虫喊。

“胡赖！”三杠子也火了，“半路上杀出个程咬金，你胡咬胡赖，猴急咧吗？”

围观的村民们交头接耳，窃窃议论，说王二猴精了，精到爱钱不顾场面不要脸皮的地步了。石狮子明明在三杠子家的猪圈围墙上头嘛！王二灵虫心里有鬼，在众人面前不敢把石狮子的来龙去脉说出来，只是缠住两位文物工作者不放，不让人家拿走。这时，村长闻听吵闹声走来，把俩人和两位文物工作者一齐叫到办公室，坐下来。

“怎么回事？”村长问，“王二哥，你说石狮子是你的，有啥凭证？”

三杠子坐在旁边，一看村长开口先问王二，也就听出了村长的倾向性，心里踏实地吸着烟。

王二灵虫低着头，吸着烟，急得头上冒出一层虚汗。犹豫再三，终于把心一横，还是先抓票子，甭顾脸面。这样，王二灵虫就把怎样请一撮毛来要神弄鬼，怎样发现了石狮子的邪光阴气，怎样清除这不祥妖物的经过一一叙述出来，末了说："不信，你去找一撮毛先生调查，我要是胡说一句，让我这连疮腿再流十年脓！"

王二灵虫不说还罢，一说这个过程，把在场的四个人全惊呆了。那两位文质彬彬的文物工作者相对一瞧，推推眼镜，撇撇嘴，摆摆头，做出一副万万料想不到的惊奇的讥笑。三杠子惊得像做了一场噩梦，脸都气黄了，双手打战，嘴里却说不出一句话来。村长也惊奇地睁大了眼睛，说："王二哥，你这人心眼太不端正呀！这事做得太缺德了嘛！要是传出去，乡党们非把你笑臭不可！"

"你批评我接受，全部接受，村长。"王二低头不敢抬起来，"那石狮子确确实实是我的。"

"你说的这些鬼事我不管！反正石狮子在我家墙上就是我的。"三杠子寸步不让，反而更加执拗，"是害，你塞到俺家门口来祸害我；是利，你又打上门来抢了！你这回错打算盘了——没门！"

"好了好了，不要吵了。这样——"村长摆摆手，制止了王二和张三，一刀两劈，"要是文物部门鉴定真是有用的文物，政府收买的钱，你俩人二一添作五。你们谁不服谁上告去，先让两位同志把石狮子带走。"

三杠子闷了一会儿，想着，看来这石狮子是王二灵虫的，自己能得一半，也够了，于是便说："算了算了！我同意村长的意见！我不在乎那几个钱，倒是把他的坏心眼看透了！"

王二灵虫眼看着飞走的人民币又捞回来一半，也就只好自作自受，忙点头说：“算了算了，按村长说的办。”

两位文物工作者告辞了。

王二灵虫回到家，老婆子指着鼻子，对着脸骂：“你也太多事了！人家一撮毛说叫你把石狮子撂到河滩，撂了也就撂了！咱损失了，他三杠子也甭想得意外财。咱也不会丢人现眼，让乡党指脊背骂祖先。你可倒好，把石狮子搁到人家墙上，把钱给人家口袋塞，自己还落下个瞎心眼坏心肝！你能你灵你鬼你能把你先人羞死！”

王二灵虫自知理亏，又惹不下婆娘，干脆蒙头睡了。

这天晚上，王二听见敲门声，一拉开门闩，又吃一惊，一撮毛先生神不知鬼不觉又来了。王二正有气没处发泄，这下遇到对手了。他想立马发作，又怕惹动左邻右舍，就假装啥事也不曾发生，把一撮毛礼让到厦屋里，看他还会耍什么把戏！

一撮毛在椅子上坐下，捋一捋左腮上那一撮长毛，悠悠哉问：“王二，你可按我吩咐的事情办过了？”

王二也佯装着说：“办了办了！”

一撮毛问：“那个石狮子扔到哪里了？”

王二不假思索：“扔到河滩的水里头了。”

一撮毛生气地说：“我叫你扔在哪里？”

王二假装失误地说：“噢噢噢！你叫我扔在最高那个石坝根下。我当时想，扔在河水里，叫水把它冲远，叫沙石把它埋深，叫它永世不得见天日，再也不能祸害人了！”

一撮毛双手一拍，眼露阴光：“糟了糟了糟糕透了！你想那狮子本是旱兽，怎奈得水淹？必是对你仇恨万分！一旦河水改道，那石狮子有了重见天日的一天，必是你大祸临头的灾日！”说罢，紧盯着王二，看他害怕不害怕。

王二却一拳捶在桌子上，气得浑身打战。他早已不能忍耐这个家伙继续哄骗自己：“你狗东西骗了我一百块钱，吃了我的饭，喝了我的酒，还害得我在乡党面前丢人现眼，还叫我把无价之宝扔给旁人……你今日来甭想走了！娃他妈，快去叫村长！”

“吱——哇——”

王二婆娘刚站起身，还没转过身，却见一撮毛呼的一声跳到门口，喉咙里发出“吱——哇”一声怪叫，像鬼哭狼嚎，阴森逼人。一撮毛把那撮黑毛咬在嘴里，从腰里摸出一把尖刀，压低声说：“跟我走，到河滩，把扔石狮子的地方指给我。不然的话，我这把专门指挥鬼的刀子，把阴间的大鬼小鬼恶鬼泼鬼全给你引来，闹得你死不下也活不旺！”

王二婆娘吓得背靠墙站着，大气不敢出，脚不敢移，直翻白眼。王二毕竟是个男人，早已不信什么大鬼小鬼的事，倒是那把寒光闪闪的刀子令他胆颤。他忽然想，这一撮毛为啥要去扔石狮子的地方？莫非他要下水打捞？他说：“先生！我是黑天撂下河的，现在也记不清具

体地点了。那石狮子有朝一日出来了，祸害我王二就祸害吧！我不怪你，也不怪你的神术不灵！你走吧！”

那一撮毛见王二口气软了，也就收起刀子，重新坐下，点燃一根黑色雪茄，说：“王二，咱干脆挑明了说吧！你那个石狮子，我看像是个‘古董’，叫你扔在石坝上，今黑来取，不料你个闷熊给撂到河水里去了。这样吧，你引我去捞，捞出来卖下钱，咱俩二一添作五。”

王二这下才暗暗叫苦，暗暗吃惊，没料到这个一撮毛先生也在石狮子上头捣鬼。自己捣三杠子的鬼，岂不知一撮毛正捣自己的鬼。

这一撮毛以耍神弄鬼为名，骗取钱财，深入人家，以杀鬼捉鬼为由，前院后院，屋里楼上，旮旯拐角，到处钻营，一旦发现“古董”，就想着法儿骗走，说是不祥之物，吓得主人不敢吭声。他转手卖给文物投机商，赚得不少钱财。现在，眼看一尊石雕狮子到手，却被王二扔到河里，只好实话明说，等把石狮子捞出水来，再作主意。

王二这边一听，完全明白了，再也隐瞒不住，也只好实话实说，把今天发生的事叙说一遍，唉声叹气：“好我的先生哥哩！你那晚要是把话说明白，这石狮子由你卖，卖下钱咱俩二一添作五，哪有后来这些麻烦。现在让我丢了财，丢了脸，你也得不到钱了，单给三杠子弄下好事！你看，我没办法了！”

一撮毛一听，忽然又跳起来，“吱嘎”一声鬼叫，用刀尖指着王二说：“一块到口的肥肉，硬叫你他妈给旁人塞到碗里了！也罢！此事就此了结。你不许再给人说我来找过你，要是说了，我就不客气了！”

王二连连点头，发誓赌咒，绝不漏风。王二婆娘吓得软倒在地。一撮毛忽地一跳，蹿出门去，跑了。

三天之后，一辆吉普车开进东堡子，一直开到村长家门口，走下那两位文物普查工作者。村长随之传呼王二和张三到他家去。

王二灵虫一进门，向两位文物普查工作者点点头，看看这个，瞅瞅那个，想从他们的眼色里得到某些兆头：石狮子到底值钱不值钱?却看不出来，人家俩人只抽烟，脸孔挺平着。不过两分钟，三杠子也进来了。

一位戴眼镜的同志说："一般人认为这石狮子是明末清初的石刻，大约是乡村的财主在祖先坟上敬奉的石兽，没啥价值，刻工也平常，和一块普通石头没啥差别，是谁的让谁抱走……"

王二浑身都松了劲儿，像上紧的发条一下子啪啦啦绽开来。他转而一想，翻来倒去，钱没捞上一个，倒是给村里人留下笑柄，留下一个瞎心眼的坏名声，灵机一动，计上心来，忙笑着说："这石头不是我的。我给村长坦白，请一撮毛捉鬼的事是我临时编的，没那事。"

三杠子倒莫名其妙了。他确实记得，自家猪圈墙上就没有这个石狮子嘛！王二弄得他真真假假糊里糊涂自己也搞不清了，就笨嘴笨舌地说："算屎了！这石狮子虽不值钱，当块石头垒猪圈还能派上用场，我抱走了。我不怕鬼！"说着就抱起石狮子出门去了。王二也跟着走出去。

村长撵到门口，把俩人又唤回来。

那个戴眼镜的文物工作者郑重宣布："但是经过专家鉴定，这是一尊汉雕石狮，造型朴拙，浑厚，正是汉时的艺术风格。张三同志，政府奖给你五百元人民币。请你签字。"

三杠子把石狮子放到桌子上，接过一厚扎人民币，怔住了，再接过那戴眼镜同志递过来的钢笔，呆呆地站着。

王二灵虫“唉”了一声，蹲在地上，双手抱头，再也说不出一句话来。半天，他瞅瞅这个，望望那个，站起身，朝门口走去。

三杠子忽地转过身，拉住正要出门的王二，一把把钱塞到他手里，再把钢笔也递上去：“这石狮子是你的，我心里有数！钱你拿上，字由你签。这不含糊！”

王二灵虫眼睛睁得像个鸡蛋，不敢接钱，也不敢接钢笔，羞愧地低下头，喃喃地说：“老三，三杠子，不管咋说，这钱我没脸拿了！”

村长明人快语：“还是按那天的口头协议办吧！二一添作五，王八一半俺一半，王八填字俺也填字！哈哈哈！”

三杠子倒认真起来：“村长，这石狮子确实是王二的，只是他捣来捣去，把他自己的石狮子反而倒给我了，我可不能白拿旁人的钱财。再说，王二这几年家事不顺，营生也不顺，经济紧张。我嘛——实说并不在乎这三百五百……”说罢，把五百元一扎人民币硬塞进王二口袋，出门走了。

王二愣愣地盯着三杠子的背影，眼泪涌出来了，捏着钢笔，手竟然抖得写不出自己的名字……

轱辘子客

轱辘子客给派出所民警逮走了。

消息和黎明一起来到龟渡王村。村民们并不分辨消息的真伪更不惊诧。

轱辘子客是乡间对那些赌博成性的赌徒的通称。龟渡王村的人把做豆腐营生的人叫豆腐客，把做风箱绝活儿的人叫风箱客，把那些在集镇上做买主与卖主中间协调的人叫牙客，把作风不好的男人叫嫖客，又把那样的女人叫窑客。把赌徒叫轱辘子客是起源于一种甚为古老的赌具。在龟渡王村当代村民的意识里，轱辘子客是专指王甲六的，谁一说轱辘子客大家就明白那是指的王甲六。

王甲六赌博的名声远近皆知。解放后禁绝多年以致后来出生的男女村民像看工艺品一样看见的麻将，就是王甲六不知从哪里弄回来的。米黄色，骨质，小巧玲珑，印着点点花花杠杠圈圈。那形状像缩小了百余倍的一页一页砖头。所以赌徒们根本不说打麻将而用行话说“搬几把砖头”。王甲六弄回麻将来又找不下对手，于是叫来几位对劲儿朋友，不厌其烦地教给他们麻将的玩法儿，然后就围坐在火炕上玩起来。王甲六的女人起初也没料到这东西会那么邪乎，不过跟扑克牌象棋一样玩玩而已，她还热情地给那些前来凑兴赏光的乡党沏茶递烟招待哩！他们开始从一支劣质纸烟赌起，然后是一分二分的硬币，再往后就从角票发展到块票以至十块一疙瘩的票子像柿树叶子一样飘落。王甲六的女人早已懊悔不迭，满村追寻王甲六的踪迹。王甲六有

时三天五天不沾家不露面，她提着菜刀满村满街寻找，声言要把狗日的手剁了。

轱辘子客王甲六打麻将已修炼成一身真功夫。一摆开麻将，如果没有派出所的民警和提着菜刀的女人的惊扰，他可以一直打下去，不吃一口饭也不喝一口水更不会丢盹打瞌睡，最高的纪录是五天六夜。那一晚记忆深刻，进入地道（备战年代修的）时小麦才现黄色，而当出地道时满川满原的麦子已收割过大半。他的女人扬着割麦的镰刀照他脖子砍来的时候，他巧妙地抓住她的手腕，而且把那手腕扭到背后，一直把她推进大门，然后从腰里摸出一厚扎票子塞到女人怀里说，看看能不能补上被风摇落的麦子。女人还是被那一扎砖头厚的票子镇住了，气自消了大半。王甲六赌博功夫深厚，赌技却也一般，据说根本不靠赌技而全凭运气。他有输有赢，自然也就有痛快淋漓和沮丧不堪。他赢了想赌输了更想赌。无论村人的鄙视亲友的苦劝、警长的训斥以及最难对付的女人的混闹，一当看见赌友的眼色时全部烟飞云开忘记得干干净净。他的正当营生是杀猪卖肉，从农户手里买得生猪然后自宰自销，累计下来至少也有三几万元的收入了，可大都孝敬给赌徒了。他把自个手中的钱赌了输了又把女人的存折搜出来赌了也输了。

女人终于逮住了一回，撕着耳朵把他拖回家里，问今晚输了多少？他态度和蔼满脸堆笑，没输也没赢。女人追问说，去了赌场身上自然装着钱，既然没输没赢那钱也就原数未动就该立马交出来。他依然笑着说他根本没有一块钱只是看看热闹。于是她就扒光他的衣服，搜了里子又搜夹层，果然只搜罗到几张烂糟糟的毛票。她肯定他输光了。打得男人王甲六跑到炕上又钻到桌子底下，她依然不停不饶地追着打着。王甲六的头上脸上隆起一个个鸡蛋似的疙瘩身上横竖交错着

红血印子。王甲六实在撑不住招不起猛地拉开门闩往外逃。女人急了赶上两步一家伙砸在他的未跨过门槛的那条腿腕上。王甲六扑通一声栽倒在门外，挨打的那条腿慌急中甩脱了棉鞋，那鞋窝里哗啦啦飞出一张张十块面额的人民币，少说也有七八十张。她顾不得他摔得是死是活赶紧扔下擀面杖捡拾票子。这当儿王甲六已经金蝉脱壳似的逃走了。他并不十分难受，另一只棉鞋里还藏着五六百块，总算保存下来已属万幸。他又赶往赌场里去了。

轱辘子客刚临不惑之年。他的老子是个笑弥陀佛的屠夫杀手，生就一张笑眉笑脸，却成就了一辈子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的行当。无论他怎样和善，毕竟是杀生的刀子手，下九流，入不得王氏家族的祠堂。那些吃猪肉喝猪血的族长族子族孙们入得而杀猪的他入不得，他也不曾认真地想过，不准入就不入了。王甲六生就一副俊相，俊俏的腰身俊俏的肩膀，俊俏的眉眼俊俏的脸庞，开口自带三分笑，谁见了都愿拉上几句闲话儿。人说这娃子承继了老屠夫的全部优长而又排除了老屠夫的缺陷，譬如老子的那双水眼泡儿绝无痕迹。老子入不得祠堂而王甲六根本不用顾虑入不入祠堂的问题，祠堂早已改建成龟渡王大队的办公室了。

王甲六长得俊俏而命运不济。他高中刚念了一年却推迟了几年毕业，这其中正好遇着没完没了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他回到龟渡王村就参加“农业学大寨”运动。他有文化会写又能画常常帮助党团支部搞宣传工作，满村满街的墙壁上都是他写的画的标语口号和图画。他的俊俏眉眼不仅吸引男青年更吸引女青年。他很快成为青年们的领袖，很快取代了已经超龄的团支部书记而成为龟渡王村的重要角色。尽管免不了一些闲言碎语，说入不得祠堂的人的后代居然也在人前吆五喝六，但终因其霉味太重而放不到桌面子上来议。况且年过六旬的党支

部王支书特别器重王甲六，明显表示出要把甲六培养成接班人的意向。王支书与刘大队长几十年来貌合神离，谁把谁也搞不掉，谁对谁也服不下，形成这种局面的根本原因在于两人所代表的龟渡王村的两大姓氏。老支书因为比大队长年龄大过十余岁而率先感到了威胁，想在王姓姓氏里培养出一个年轻人来接班，以免大权旁落，王甲六应运而至。刘耀明大队长早已明白这个底里，却不动声色。老支书说要着手培养接班人的工作，他立即表示拥护，而且由他提出培养对象王甲六。

刘耀明既厌恶老支书的狡猾又蔑视他的愚蠢。如果把王甲六安排为一个副书记，那么他就由二分之一变成三分之一了。然而目下从中央到地方都在大喊大叫培养革命接班人，自己根本不能愚蠢地表示抵制；况且王甲六的表现有口皆碑，表示异议同样是愚蠢的。他如果连这点路数都回旋不开岂能与王支书共事到今天?

他早已观察到王甲六和女青年王小妮眉来眼去意意思思。他最初一直不大在意，认为那是年轻人的事而现在却觉得有机可乘。王小妮很活泼很积极很泼辣也很漂亮，是龟渡王村学大寨运动中的“铁姑娘”。她老子王骡子却是个吃生米甚至连谷穗也嚼食的冥顽不化的拗熊，他与王甲六的屠夫老子有旧仇，尽管是解放前为地畔争执早已不复存在况且屠夫已经谢世，而他仍然记着死仇。他早已向女子小妮警告过，除非王甲六当了接班人倚权借势杀了他才能成婚云云。大队长刘耀明把这一切算计得准确无误，然后就找寻一个合适的机会或者说创造那个想要得到预期目的的机会。机会总是有的。

老支书到县上开会去了，会议专题学习中央关于加速培养各级革命接班人的指示精神，会期三天。大队的工作自然由刘耀明主持，大队办公室也自然由他值班睡觉。他第一夜睡在办公室的土炕上，想着

三天后王支书回来就会理由更充足地着手王甲六的任职问题的实施了。第二天晚上他照例坐在办公室里翻报纸，满纸都是有关接班人的论述和报道。王甲六来了，和他商量青年突击队加班夜干修水库的问题，而且提出青年们要添置一个新篮球而必须经大队长批准才能开支。他大大赞扬了青年突击队学大寨的热情而且顺手就在申请买篮球的纸头上签了字。他很爽快果断而不像老支书那么啰啰唆唆。他答应了王甲六的要求之后又连连咂舌皱眉。王甲六以为他反悔了忙问究竟。他说他老舅要盖新房是夜夯地基理应去帮忙去庆贺而恰恰不能脱身。王甲六自告奋勇代替他值班。结果是刘耀明披上夹衣上原给老舅父夯地基去了，王甲六睡在大队办公室里值班。

夜半时分。大队办公室里，那个铺着公用被褥的土炕上，王甲六和王小妮正在如愿以偿初试云雨，而且不一而足。春夜里弥漫着春花春草气息的春风从纱窗吹进屋子，两个十分要好十分钟情的青春男女狂热地在那个公用土炕上没完没了地爱抚。他们庆幸得到了一个难得的机会而丝毫不知这是刘耀明设下的陷阱。

后来的事情就完全按刘耀明大队长的准确设计一步一步演进着。王骡子正睡着听见一个陌生的声音在窗外喊：老骡子你狗日还睡！你女子在办公室炕上……老骡子手提板斧，奔出大门时，后襟被老伴扯断了，光着脚一气奔到昔日的老祠堂现今的大队办公室窗根下，一斧头就劈断了纱窗，吓得两个正在柔情蜜意中的男女魂飞魄散，抱头鼠窜。而老骡子未能跳进窗子就差点气死在窗台上。看热闹的人围来的时候只看见办公室大炕上遗丢着王甲六和王小妮的衣裤鞋袜和擦过排遗物的烂纸……局面像打碎的瓷器一样不可收拾。

当老支书带着自信的微笑走回龟渡王村的时候，他在县上学到的理论以及深思熟虑的决策全部宣告破灭。刘耀明冷静而又谦卑地连连

检讨自责，说他失职。王支书只好硬着头皮给自己圆面子，说根本不是失职不失职的问题而是王甲六的自我爆炸。自我爆炸是自林彪死于温都尔汗之后的一个时兴名词。

最惨的是王小妮。有多少个条件优越的求婚者像过眼烟云一样被她拒绝了。现在，王骡子以不顾一切的急躁情绪托亲告友为丢尽了脸面的女儿觅寻落脚之地，不管贫富不论长相瞎子跛子都不在意只要求愈远愈好，而且声言一旦嫁出就不再往来全当女儿死了没那个女儿了。龟渡王村最漂亮最活泼最积极最泼辣的“铁姑娘”终于被嫁到山里去，谁也没见过她的女婿是什么模样，据说不见比见了要好些。

其次是王甲六。他的能写会画不仅不再是一个令人羡慕的优长，而成为令人厌恶的诱人干坏事的手段，他的俊眉俊眼也变成令人恶心的流氓的标志表征。他长过二十五岁又长过二十八岁还没见任何媒婆媒汉为他提亲做媒。他完了。他灰得比龟孙子还灰。他比龟渡王村揪出来的“地富反坏”分子还灰。这原因在于，龟渡王村历史悠久，民风淳厚，仁义之乡也！他在村里实在活得太窝囊了。有一天，刘耀明大队长悄悄给他说了一桩亲事。

那个女人其实跟王小妮的遭遇大同小异。离这儿百余里的田家庄的一个女青年和下乡来帮助搞路线教育的一位干部发生了关系，名声倒了，难得出嫁，亦是托人远嫁。刘耀明当干部眼宽路熟，得到这消息，就想到了王甲六。他觉得对王甲六有一种说不出的负疚，这未尝不是一种心理慰藉。王甲六早已失了婚配选择的基本条件，饥不择食地娶回了那个失过身的女青年，就是现在拿着切面刀满村撵着要剁他手腕的女人。

多年以后，当王甲六搂着这个女人睡觉并且有了儿子又有了女儿的时候，他不止一次地想到刘耀明这个人。这个人令他憎恨得咬牙切齿又令他折服得五体投地。和王小妮的风流韵事酿成的灭顶之灾过后不久，他就知道了刘耀明在其中所做的手脚。恨不得用他爸留下的杀猪尖刀捅了那个刀条脸的家伙，然后再一刀结束了自己，免得一想到可爱的王小妮如今的下落心头刀绞般的痛楚。这个并不令他留恋的龟渡王村之所以还使他留恋，仅仅只是看着老屠夫留下的比他还小的两个妹妹和一个弟弟都未成人。当刘耀明给他又介绍下这个女人的时候，他除了平复仇恨更多地折服刘耀明的为人。天哪！相比之下，凭他自己的无知和浅浅的涉世能主宰龟渡王村的大权吗？差得太远了！令他安慰的是，刘耀明介绍的这个女人长得虽不及小妮，可也算得女人中的上梢人品，至于婚前跟某下乡干部的勾当根本不必计较，说穿了与自己是殊途同归。平静的生活使他得到满足，这个女人诱人的身体也使他的感情渐渐平复。后来发生的事却使王甲六又一次体味到人生的另一种痛苦和开心。

无论如何，王甲六做梦也想不到刘耀明还会在他的女人身上打主意。在他看来，刘耀明是龟渡王村最厉害的一个人，他的心计和心数儿在龟渡王村可以说空前绝后，老支书根本不是他的对手。可王甲六从来不会想到刘耀明还会搞他婆娘之外的旁的女人。那人的刀条脸上永远没有大喜大怨的时候，那刀条脸永远也看不到谄媚什么人或厌恶什么人，那刀条脸对龟渡王村的男女老少永远是帮你解决一切最困难最琐屑的愁怅事的认真诚恳的态度，你只能完全信赖而不会产生一丝猜忌。

那一年刘耀明承包了大队的砖厂，雇用了一些龟渡王村的男女青年。王甲六一时找不到挣钱的营生，又不愿意下气到刘耀明手下去挣

钱。刘耀明大约看出什么而邀请他去当推销员，又请他的女人去做会计和给雇工计工计时。事情就从那时候开始起变化。

那一晚他从西安一家建筑单位回来是偶然的机遇，原先说好不回来因为事情的变化而又回来了。回来了就在砖厂刘耀明的卧室的小窗户外听到了他不想听到的那种动静和声音。他在像老骡子一样砸碎窗框的时候却比老骡子多了一副心计也多了一份节制力。他悄悄离开了。

他离开砖厂就跑起来，奔回家门，没有惊动正在熟睡的孩子和老娘，悄悄摸出老屠夫弃置已久锈迹斑斑的杀猪刀，直奔刘耀明家。他叫开了门而且悄悄告诉那个半老女人说，刘耀明喝醉了，呕吐出血来了，要她去关照男人。他拉着惊慌失措的半老女人走出村子以后，就把尖刀的锈痕斑驳的刃子横在她的鼻尖上，威胁她跟他走绝不许胡拧呲，无论她看到什么听到什么而没有得到他的指示绝不许说话或轻举妄动……他把她像吓傻的猪一样拖到砖厂的窗户下。

她听到了窗户里头床上的令人噎死的淫荡的声音，又看见鼻尖上横着的刀刃，一下子气死过去了。王甲六一刀割断她的腰带，就在窗下的台阶上抹下了她的裤子。她迅即醒转来就再也忍不住了，叫起来喊起来撕扭起来。王甲六死死压着她扬扬得意地说，现在你喊吧你叫吧声音越大越好……

紧锣密鼓似的过了一天，刘耀明在砖厂摆弄下一盘腊羊肉和一盘腊牛肉，两瓶西凤酒，邀请王甲六。王甲六和刘耀明坐在当面，心情竟是从未有过的沉静。他侮辱了刘耀明比刘耀明欺侮了他更使他觉得划算得多。他已经无所顾忌而刘耀明却顾忌甚多。他冷眼瞅着刘耀明掏出来的一厚扎票子迫使刘耀明又缩手装回口袋。刘耀明对他再不是

一个可怕的蝙蝠翅膀而不过是一只癞蛤蟆。他解除了多年以来那有形无形的蝙蝠翅膀投射在心里的阴影。他报复了他想报复的一切而酣畅淋漓。他根本不计自己付出的代价因为他的代价早已付出得太多。他第一次觉得和刘耀明坐在对面没有畏怯之感了。

酒后的默契是各行其是和忘却前嫌。刘耀明继续承包砖厂一年比一年挣得多。王甲六把老屠夫杀猪刀上的锈痕磨光擦亮，无师自通地干起了白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的祖传营生。那个女人经过一番风流二番惊吓之后也收缰拘心，跟着王甲六压猪腿拔猪毛卖猪肉。两个身上和手上都沾着猪毛油腥气息的肉体互相不能嗅觉，倒显出相对的安静和和谐。

王甲六日子好过了，钱多了，老娘突然仙逝，高血压致使一跤而毙命。王甲六大动响器，八挂五的乐人外加一台木偶戏，公社电影队的电影连放三晚，七寸厚的松木棺材是龟渡王村死过的老人中的最高级享受。他的两个妹妹早已出嫁不提。唯一令人惋惜的是弟弟入赘过继到县城跟前一个无男娃的人家里去了，那时候王甲六正背霉正困顿正活得人不人鬼不鬼毫无办法挽留亲爱的同胞弟弟。现在，当他久久地跪在新堆成的母亲的坟堆前，茫然瞅着和新坟并列的荒草萋萋的老屠夫的旧墓堆时，心里忽然幻起一股黄烟，弥漫过头顶又迷蒙了眼睛。他久久处于一种茫然的无知觉状态。

王甲六醒过来时，看见缀满天幕的星星。星际那么浩渺又那么虚幻，离他那么近又那么远，看去什么都清清楚楚又什么都朦朦胧胧……他觉得自己可怜可笑又十分可憎。他觉得刘耀明可憎可笑又十分可怜。

第二天早晨，他从帽子上摘下了孝布扔在炕角里，觉得为母亲守孝白布要戴过百日的仪礼也十分可笑。他没有踏上自行车走村串庄去收买肥猪。他想散心了。他想逛他妈的一逛了。他把千余元现钞塞进腰里就搭乘远郊公共汽车进西安逛去了。其实他在西安只逗留了半天，看见那些穿着时髦新装的年轻男女在大街上勾腰搭背的亲昵动作，忽然想到了小妮！哦！恍若隔世啊仅仅只不过十来年光景。他找到山里去，没有找到王小妮而终于弄清了可爱的小妮的下落，她在新婚之夜就走进了自己的坟墓。他在山里小镇上逛了两三天，竟然绵绵思想与小妮的魂灵陪伴……他再次回到西安城里，进电影院看不完最叫座的时髦电影而提前退场，进豪华餐厅叫来一桌酒菜拨拉不了几筷子又惶然离去……他终于如愿以偿带着一副米黄色骨质麻将回到龟渡王村里来……

王甲六现在给派出所淘厕所。派出所的一切杂事脏活都留给那些被抓进去的倒霉鬼干了。轱辘子客王甲六用铁勺舀挖腥臭不堪的秽物的时候，忽然想到自己四十年来的这许多劣迹，而又无可奈何，正像人总想走一条笔直的路而其实每一步都歪着一样无可奈何。他现在等待县公安局拘捕车来载他进拘留所。警长正忙着办理拘捕他的手续。午后，警长回到所里时突然通知他，尽管他属屡教不改早该收监劳改仍然再给他一次机会，今晚在龟渡王村召开村民大会，让轱辘子客王甲六和那一帮轱辘子客向村民坦白检讨保证。

轱辘子客王甲六却竟然感到小小的意外。

坐乘供销社的运货卡车，王甲六回到龟渡王村昔日的祠堂前多年的大队革委会如今的村民委员会办公室。一进院子再一进屋子，那个土炕依然盘踞在那儿。那个留下他和王小妮半宿风流一生悔恨的土炕啊！

他听见了那个熟悉的昔日曾令他毛骨悚然而今又令他恶心的声音。嘿！刘耀明。刘耀明老了也更老到了，刀条脸上的表情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趋成熟了。刘耀明和警长又和乡长安排着今晚的大会议程。刘耀明推托让别人主持会议说自己老了不行了。警长和乡长一致说他是村长不出面主持这样的大会太不像话。刘耀明根本无法推托就勉强接受下来了。王甲六蹲在墙角旮旯里，心里呼呼呼往上蹿火，刘耀明有什么资格主持批评教育我王甲六的大会。他龟孙子给我回话求和还来不及哩！他忽然从地上蹿起来一蹦蹦到警长当面：

“警长乡长乡长警长……我有一句话要说，龟渡王村任何一个安着鼻子安着眼睛的人主持这个大会我都诚心实意作坦白作交代作检讨，只有这个……刘耀明……没资格主持批判我的会……”

警长和乡长一齐瞪起眼睛。

乡长说：“这事你管不着你只顾做检讨！”

警长说：“啥时候了你还不老实！”

轱辘子客王甲六急了也豁出来了：“我宁愿去坐监去劳改，你们现在立即送我去县拘留所，可我绝对不愿意再听见刘耀明在我面前说三道四！”

乡长似乎听出什么蹊跷，对警长示一个眼色就做出和蔼耐心状：“你甭急你甭躁你说说到底有什么问题？”

轱辘子客想把刘耀明从根到底连兜子翻一遍，忽然想到自己曾经用锈痕斑驳的杀猪尖刀割断刘耀明婆娘裤腰带的犯法的事，他咬着嘴唇瞪着眼睛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再闷下去就会给乡长和警长造成无

理取闹的印象，轱辘子客王甲六脑子一转就改口说：“刘耀明倚仗职权承包龟渡王村集体砖厂，承包租金少得跟白占一样，你是乡长你是警长为什么不管他只抓我王甲六赌博？”

乡长骤然变色训斥说：“刘耀明的问题归刘耀明，砖厂承包合理不合理也不是你一个人说了算，你赌博成性屡教不改至今仍混闹不休看来真是无可救药了……开会开会立即召集村民开会！”

警长也厉色道：“看来你是不想珍惜我给你的这个最后机会了？”

轱辘子客想说什么却说了风马牛不相及的话已经颓然闭起了眼睛，扑通一声跌坐在地上，嘴里嗫嚅咕哝着什么话，谁也听不清，谁也不再想听他胡说什么，只顾忙活召集村民开会。

龟渡王村几年来甚为稀罕的村民大会，说定了最终还是由刘耀明主持。

1988年2月13日 白鹿园

害羞

一

轮到王老师卖冰棍儿。

小学校大门口的四方水泥门柱内侧，并排支着两只长凳，白色的冰棍儿箱子架在长凳上，王老师在另一边的门柱下悠悠踱步。他习惯了在讲台上的一边讲课一边踱步，抑扬顿挫的讲授使他的踱步显得自信而又优雅。他现在不是面对男女学生的眼睛而是面对一只装满白糖豆沙冰棍儿的木箱，踱步的姿势怎么也优雅不起来自信不起来。

王老师是位老教师，今年五十九岁明年满六十就可以光荣退休。王老师站了一辈子讲台却没有陪着冰棍箱子站过。他在讲台上连续站三个课时不觉得累，在冰棍儿箱子旁边站了不足半点钟就腰酸腿疼了。他站讲台时从容自若有条不紊心底踏实，他站在冰棍箱子旁边可就觉得心乱意纷左顾右盼拘前谨后了。他不住地在心里嘲笑自己，真是莫名其妙其妙莫名，教了一辈子书眼看该告老还乡了却卖起冰棍儿来了！

临近校门也临近公路的头一排教室是低年级学生，从一边的教室里骤然暴起合读拼音文字的声浪，琅琅的嫩声稚气的童音听起来十分悦耳。听到这声音使人会联想到雨后空谷的草地，青日蓝天上悠悠飘浮的白云；听到这声音使人会化释积郁的心境，变得宽宏仁慈心地和善。每个男女都曾经发出过这样优美这样纯净这样动人的声音，后来永远发不出这样动人这样优美这样纯净的声音了。年岁递增随之使他们的嗓音一律变化了，有的变得粗暴狂放了，有的变得气使颐指了，

有的变得深沉忧郁了，有的变得油腔滑调了，有的变得奴性十足酸味十足了。王老师天天都能听到这种嫩声稚气的童音合读或合唱，几十年来的每一天都在这种纯净的声音里滋养。他的面色柔和，纹路和善，明眸皓齿，鹤发银亮，全是稚气童音长期滋润的结果。直到今天轮他卖冰棍儿，王老师就有点惶惶不可终日似的踱起步来。

“王老师好运气！今日轮到你卖冰棍儿天公也凑趣儿！预报37°C，该当发财！”

历史科任老师刘伟正从大门进来，手里捏着几盒烟，穿一件罗筛眼儿背心，两颗男性的黑色乳头隐约可见，脚尖上挑着厚底儿泡沫拖鞋。一副悠然自在的神气，瞧着王老师说话。

王老师嘿嘿嘿笑着，表示领受了慕雅，明知刘伟从外边买烟回来，也明知历史课排不到头一节，还是要搭讪着问：“噢噢！刘老师，你出去买烟了？你这节没课？”问完了立即就意识到全部是废话。

刘伟大约也知道这是废话，可以根本不回答，只顾瞧着他的冰棍箱子，然后摇摇头，哧地笑了：“啊呀我说王老师呀！你把冰棍儿箱子藏在大门柱里头，外边过路人瞅不见，学生又没下课，你的冰棍儿卖给鬼呀？”

王老师说：“没关系没关系。学生下课了就来买哩！”

“把冰棍箱子摆到大门外头，学生下课了卖给学生，学生上课了卖给过路的人，你把箱子摆在大门里头损失太大了。”刘伟瞅着他，端详着，忽儿一笑，“噢呀！王老师，你是害羞呀？”

王老师一下子红了脸，有点窘迫，却装出根本不是害羞的样子说：“我老脸老皮了还害什么羞！”

“不害羞就好！”刘伟说，“而今可不兴害羞。你要害羞啥事也弄不成。不害羞才能挣钱升官发洋财。凡要成大事发大财者必须先接受一项心理素质训练：排除羞怯。”

王老师已经品出刘伟话里是含沙射影，机锋毕露，这种谈话已经超出他的素有的习惯，就哑了口，不去迎合。他的职能范围是六年级甲班班主任，教授语文课，外兼六乙班语文，扩大到头他的职责只有两个毕业班的一百零三名学生。他搪塞说：“啊呀！刘老师，今日轮我卖冰棍儿，班里的事你多照应一下。”刘伟是他的助手，六甲班的副班主任。

“班里没事，你放心卖你的冰棍儿。”刘伟说，“我倒是担心你的冰棍儿卖不完，化成水，你赚不了钱还得把老本贴进去。我来帮你把箱子挪到大门外首去，躲在门里不行哇！”说着，他把纸烟放到箱盖儿上，腾出手来背起箱子，又招呼王老师挪凳子。王老师一手提一个长凳，挪到大门外头，并排放好。刘伟搁稳箱子，给王老师做起卖冰棍儿的规范动作来：“王老师你瞅着，一只手搭在箱子盖上，这一只手防护住钱袋，钱袋要挂在脖子上。一只脚站着另一只脚歇着，这只脚站累了再换那只脚。眼睛瞅住过往的人，老远就吆唤一声‘冰——棍儿——’。弄啥就得像啥，教书你得像个先生，卖冰棍儿就得像个卖冰棍儿的架势……”

王老师被逗笑了：“好好好！刘老师，我多谢你启蒙开导，我会了。”

刘伟滑稽地笑笑，摇摇摆摆走进门去了。

刘伟走了，他还是没有勇气按刘伟示范的架势去做，还是在离冰棍箱子一二米远的路边踱步，却不由得在心里品评起刘伟来了。

三十几岁的刘伟是恢复考试制度头二年考中师范学校的，七八年来在本乡所属的几所小学校转来转去最后算是在本校扎住了脚。他有一颗聪明透顶的脑瓜唯独缺少了一点毅力，他多才多艺学啥会啥结果却是样样精通样样稀松。他教高年级语文嫌其浅显无味教数学又讨厌其枯燥，最终他选择了历史科目主要是可以不负太多的责任，升学考试或本乡统考不考历史他就没有任何压力。他已经放弃了写小说弹电子琴而对围棋兴趣正浓。他的性格有时可爱有时又执拗得不近人情。他走过的学校没有一个领导喜欢他，但事后却说那小伙子其实不错。他读过不少古今中外的野史，对一切人和事都用历史典故来佐证他的看法属天经地义。他不巴结谁也不故意伤害谁，谁要是惹下他他会把中外历史上一切奸党逆臣引来证明你与他们属一丘之貉。领导害怕他又藐视他。他在本校唯一没有犯过交葛的人就是王老师，所以让他做王老师的副手当六甲班副班主任。王老师有时觉得这人正直得可爱聪明得可爱有时候又觉得这人不成景戏！穿那样裸身露肉的衣服满镇子上跑，老师总得注意点仪容仪表嘛！然而他只顾结紧自己的风纪扣而绝不会去指责刘伟的涣散。

一个牵着孩子的女人买了一支冰棍走了，留下一枚五分硬币。王老师接过那五分硬币时手掌里竟有一种异样的感觉，无论如何，第一个买主已经光顾了，冰棍生意开张了。

二

入夏之前，学校买回来一套冰棍儿生产机器，这是春节后开始新学期一直吵吵嚷嚷的结果。开学后，教师们议论最多是春节期间的见闻，见闻中共同强烈的感觉是在本校教书最可怜了。张老师说他弟弟所在的工厂除了发年终奖金还发了过年所需的一切，鸡鱼油菜粉丝黄花木耳猪和牛羊肉以及烹调所需的大料都每人一份发齐了，连卫生纸也发了一大捆。胡老师说他姐所在的公司除了发上述吃食外还发了电热毯电热杯气压热水瓶。大家觉得学校毕竟比不得企业，于是就与本乡的学校横向比较，这个学校办个皮鞋加工厂给每个老师发了一双毛皮鞋价值三十多块，那个学校买了豆芽机卖豆芽老师们分了说不清多少钱，唯独本校什么也给老师发不出……议论从私下发展到公开，终于进入本校校务会议议事日程，冰棍机器买回来了。

原先勤工俭学让学生“学工”的两间房子彻底进行了清除，墙壁刷新了，冰棍机器安装好了。因为一开始就明确是利润性生产，自然不能指靠学生来担承，于是就得雇民工，于是就有几位以至大部分老师向校长成斌申述自己的种种艰难，要求把自己的儿子或闲在农村的妻子招来做冰棍工人。成斌校长的爱人也在农村，春闲无事，他想把身强力壮的中年爱人弄来挣一点收入，面对好多老师的申求而终于没说出口。他对所有申求者都一律说“好好好，统一研究之后再说”。成校长和吴主任研究出一个最公道的办法，让所有申求者抓阄。抓阄的结果自然是抓中的高兴抓空的也对校长没有意见，因为校长自己也抓空了。没有后门。王老师没有参加抓阄，他的三个女儿早已出嫁，一个独生儿子正在交通大学读书，令好多老师羡慕。

冰棍生产顺利而且质量不错，招来了附近村镇一些男女青年趸取冰棍儿。没过几天，几个教师向校长成斌提出建议，咱们生产冰棍却让旁人把钱赚了，倒不如让老师们自己赚。在成校长和吴主任进一步

研究的时候，体育教员杨小光已经等待不及勇敢地闯过禁区，率先在冰棍厂趸了一箱冰棍儿，放在操场上的树底下，让学生们在炎炎烈日下打篮球踢足球跳绳翻杠子，然后宣布休息五分钟："每人至少一根冰棍儿，有现钱的交现钱，没现钱的跟同村同学借下，借不下的先欠着后晌来校时带上就是了。"他每天有四五节体育课，销售的冰棍可以赚七八块钱。有人立即向校长成斌反映了杨小光向学生兜售冰棍儿的问题。成校长找杨小光谈话，想不到杨小光比校长更理直气壮："你生产冰棍儿是不是给人吃的？是不是只许外人吃而不许本校学生吃？你看不见那些小贩趸了冰棍就在学校门口卖给学生？这样热的天学生上体育课热得要命渴得要死，纷纷奔大门口去买冰棍儿，我这体育课还能不能上下去？我为学生服务关心学生健康给学生供应冰棍儿有什么不对？我赚了几个烟钱你就有意见了是不是？你没意见谁有意见叫谁当面给我提出来，让他来教体育课好了！我三伏能热死三九能冻死教体育算是倒八辈子霉了，你们当领导的谁说一句公道话来？"

校长成斌在连珠炮下首先乱了阵脚，立即转了笑脸换了口气对杨小光解释起来，要正确对待群众意见，有则改之无则加勉云云。好像他不是找杨小光谈问题而是做劝慰安抚工作来了。不是成斌校长软弱无能而是杨小光的一技之长教他硬不起来。他已经预感到杨小光接下来就要说出那句半是高傲半是骂人的话来："此处不养爷自有养爷处。"体育教师奇缺。过去的老体育教师因为上了年纪大都搞了后勤事务，年轻的体育教师多年来连一个也分配不到本乡的学校来。杨小光原也不是体育专业教师，他在本县参加市里的农民运动会上夺了跳高金牌，县体委珍爱这个为本县夺得荣誉的小伙，推荐到本校来做民办体育教师，而且因一技之长优先转为吃皇粮的公办教师，比那些教政治教语文教数学的教师牛皮一百倍。成校长说："你教体育辛苦这一点我表扬过多次了，问题在于卖冰棍得由学校统一研究。你该晓得一句

古话，‘天下不患寡而患不均’。你卖冰棍别人要不要卖？所以你不必动肝火而应该心平气和地考虑一下……”

“我根本不考虑，也没法心平气和。”杨小光根本不认账，态度更硬了，“你……干脆给我的申调报告上签个字，让我走好了。你签了字我立马就走。县体委早就要我去哩……”

成斌校长连下台的余地都没有，只好尴尬地摊开手，不知所云地说：“你看你，说到哪儿去了！我说的是卖冰棍的问题，你却扯起调动工作……”

王老师的宿舍与杨小光是一墙之隔，苇席顶棚不隔音响，他全部聆听了成校长和杨小光的谈话。他尚未听完就气得双手哆嗦不得不中止备课。他想象校长成斌大概都要气死了。他想象如果自己是校长就会说“杨小光你想上天你想入地你想去县体委哪怕去奥林匹克运动会，你要去你就快点滚吧！本校哪怕取消体育课也不要你这号缺德的东西！”他想指着那个满头乱发牛皮烘烘不知深浅的家伙呵斥一声，“你这样说话这样做事根本不像个人民教师……”然而他什么也没有说，只是实在听不下去了，走出门来，在操场上转了一圈，又自嘲自笑了，我教了一辈子书，啥时候也没在人前说过两句厉害话，老都老屎了，倒肝火盛起来了，还想训人哩！没这个必要啰！

当晚召开全体教师会，专题研究如何卖冰棍的问题。王老师又吃惊了，没一个人反对杨小光卖冰棍，连校长主任也不是反对的意思，而是要大家讨论怎么卖的问题，既可以使大家都能“赚几个烟钱”，又不致出现“不患寡而患不均”的问题。讨论的场面异常活跃，直到子夜一时，终于讨论出一个皆大欢喜的方案来：教师轮流卖冰棍儿。

三

大门离公路不过十米远，载重汽车和手扶拖拉机不断开过去，留下旋起的灰尘和令人心烦的噪响。骑自行车的男女一溜带串驶过去，驶过来，铃儿叮当当响。他低了头或者偏转了头，想招呼行人来买冰棍儿又怕熟人认出自己来。“王老师卖冰棍儿！”不断地有人和他打招呼。打招呼的人认识他而他却一时认不出人家，看去面熟听来耳熟偏偏想不出人家的名字，凭感觉他们都是他的学生，或者是学生的父亲抑或是爷爷。他教过的学生有的已经抱上孙子当了外公了，他教了他们又教他们的儿子甚至他们的孙子。他们匆匆忙忙喊一句“王老师卖冰棍儿”就不见身影了。似乎从话音里听不出讽刺讥笑的意思，也听不出惊奇的意思。王老师卖冰棍其实平平常常，不必大惊小怪。外界人对王老师卖冰棍儿的反应并不强烈，起码不像王老师自己心里想的那么沉重。他开始感到一缕轻松，一丝寂寞。

“王老师卖冰棍儿？”

又一个人打招呼。王老师眯了眼聚了光，还是没有认出来，这人眼睛上扣着一副大坨子墨镜，身上穿一件暗紫色的花格衫子，牛仔裤，屁股下的摩托车虽然停了却还在咚咚咚响着。王老师还是认不出这人是谁。来人从摩托上慢腾腾下来，摘下墨镜，挂在胸前的扣眼上，腰里插着一只手，有点奇怪地问：“王老师你怎么卖起冰棍儿来了？”

王老师看着中年人黑森森的串腮胡须，浓眉下一双深窝子眼睛，好面熟，却想不起名字：“唔！学校搞勤工俭学……”说了愈觉心里别扭了，明明是为了自个赚钱，却不好说出口。

“勤工俭学……也不该让你来卖冰棍儿。这样的年龄了，学校领导真混！”中年人说着，又反来问，“是派给每个老师的任务吗？”

“不是不是。”王老师狠狠心，再不能说谎，让人骂领导，“是老师们自己要卖的。”

中年人张了张嘴，把要说的话或者是要问的问题咽了下去，转而笑笑：“王老师你大概不认识我了，我是何社仓，何家营的。”

“噢噢噢，你是何社仓。”王老师记起来了。他教他的时候，他还是个细条条的小白脸哩，一双睫毛很长的眼睛总是现出羞怯的样子。他的学习和品行都是班里挑梢的，连年评为“三好”，而上台领奖时却羞怯得不敢朝台子底下去看。站在面前的中年人的睫毛依然很长，眼睛更深陷了，没有了羞怯，却有一股咄咄逼人的直往人心里钻的力量。他随意问：“社仓你而今做什么工作？”

“我在家办了个鞋厂。”何社仓说，“王老师你不晓得，我把出外工作的机会耽搁了。那年给大学推荐学生，社员推荐了我，支书却把他侄儿报到公社，人家上了大学现在在西安工作哩！当时社员们撺掇我到公社去闹，我鼓足勇气在公社门口转了三匝又回来了。咱自个首先羞得开不了口喀！”

王老师不无诧异：“还有这码事！”

何社仓把话又转到冰棍箱子上来：“王老师，我刚才一看见你卖冰棍儿，心里不知怎么就不自在，凭您老儿这一头白发，怎么能站在学校门口卖冰棍儿呢？失了体统了嘛！这样吧，你这一箱冰棍全卖给我了，我给工人降降温。我去打个电话，让家里来个人把冰棍带回去。你也甭站在学校门口受罪了。”说着，不管王老师分辩，径自走进学校

大门打电话去了，旋即又出来，说："说好了，人马上来。"何社仓蹲下来，掏出印有三个"5"字的香烟。

王老师谢了烟，仍然咕哝着："你要给工人降温也好，你到学校冰棍厂去趸货，便宜。我还是在这儿慢慢卖。"

"王老师你甭不好意思。"何社仓说，"我在你跟前念书时，老是怕别人笑话自己。而今我练得胆子大了哩！不瞒王老师说，我这鞋厂，要是按我过去那性子一万年也办不起来。我听说原先在俺村下放的那个老吕而今是鞋厂厂长，我找他去了，想办个为他们加工的鞋厂。他答应了。二回我去他又说不好弄了。回来后旁人给我说'那是要货哩！'我咬了咬牙给老吕送了一千块，而且答应鞋厂办起来三七分红，就是说老吕屁事不管只拿钱。三年来我给老吕的钱数你听了能吓得跌一跤！"

王老师噢噢噢地惊叹着。此类事他虽听到不少，仍是由不得惊叹。

"王老师，而今……唉！"何社仓摇摇头，"我而今常常想到你给我们讲的那些做人的道理，人的品行，现在还觉得对对的，没有错。可是……行不通了！"

王老师心里一沉，说不出话。对对的道理却行不通用不上了。可他现在仍然对他执教的六年级甲班学生进行着那样的道德和品行的教育，这种教育对学生是有益的还是有妨碍?

又一辆摩托车驰来，一个急转弯就拐上了学校门前的水泥路，在何社仓跟前停住。何社仓吩咐说："把王老师的冰棍儿箱子带走。把冰棍分给大家吃，然后把钱和箱子一起送过来。"

来人是位长得壮实而精悍的青年，对何社仓说的每一句话都要点两下头，一副俯首帖耳唯命是从的神气。他把冰棍箱子抱起来往摩托车的后架上捆绑，连连应着：“厂长你放心，这点小事我还能办差错了？”

何社仓转而对王老师说：“王老师你回去休息，我该进城办事去了。我过几天请你到家里坐坐，我有好多话想跟你说哩！你是个好人，好老师。”

那位带着冰棍箱子的小伙驱车走了。

何社仓重新架上大坨子墨镜，朝西驱车驰去了，留下一股刺鼻的油烟气味。

王老师望望消失了的人和车，竟有点怅然，心里似乎空荡荡的，脑子也有点木了。

四

中午放学以后，王老师卖了半箱冰棍儿。学生们出校门的时候早已摸出五分币，吵吵闹闹围过来。“王老师卖给我一根冰棍儿”的叫声像刚刚出壳的小鸡一样熙攘不休。他忙不迭地收钱付货，弄得应接不暇。往日里放学时他站在校门口，检查出门学生的衣装风纪，歪戴帽儿的，敞着衣服挽着裤脚的，一一被纠正过来，他往往有一种神圣的感觉，自幼培育孩子养成文明的生活习惯是小学教师重大的社会责任。现在，他已经无暇顾及这些了，收钱付货已经搞得他脑子里乱哄哄的，而且从每一个小手里接过硬币时心里总有点不受活，我在挣我的学生的钱！因为心里不专，往往找错钱或付错了货。这时候，他的

六甲班班长何小毛跑过来："王老师，你收钱，我取冰棍儿。"王老师忙说："放学了你快回家吃饭吧！"何小毛执意不走，帮他卖起冰棍来。放学后的洪峰很快就要流过去，何小毛突然抓住一个男孩的肩膀，拽到王老师面前："你怎么偷冰棍儿？"

王老师猛然一惊，被抓住的男孩不是他的六甲班的学生，他叫不上名字。男孩强辩说："我交过钱了，交给王老师了。"小毛不松不饶："你根本没交！我看着王老师收谁的钱，我就给谁冰棍儿，你根本没交。王老师，他交了没？"

王老师瞅着那个男孩眼底透出一缕畏怯的羞色，就证明了这男孩交没交钱了。他说："交了。"那男孩的眼里透出一缕亮光，深深地又是慌匆地鞠了一躬，反身跑走了，刚跑上公路，就把冰棍儿扔到路下的荒草丛中去了。何小毛却努嘟起嘴，脸色气得紫红："王老师，他没交钱。"王老师说："我知道没交。"何小毛激烈地问："那你为什么要放走他？你不是说自小要养成诚实的品行吗？你怎么也说谎？"王老师说："是的。有时候……需要宽容别人。你还不懂。"

何小毛怏怏不乐地走了。

杨小光背着冰棍箱子来了，笑嘻嘻地说："王老师，换地方了，该我站前门了。"

王老师点点头，背了箱子进校门去了。回头一看，杨小光把板凳已经挪到公路边上，而且响亮地吆喝起来："冰棍儿——白糖豆沙冰——棍儿——"他才意识到，自己在整整一个上午的时间里，连一声也未吆喝过。他匆匆回到宿舍，放下箱子，肚里空空慌慌却不想进食。他喝了一杯冷茶，躺倒就睡了。

王老师正在恍惚迷离中被人摇醒，睁开眼睛，原来是何小毛站在床前。何小毛急嘟嘟地说：“王老师快起来，同学们都上学来了，趁着没上课正好卖一茬冰棍儿！”王老师听了却有点反感，这么小年纪的学生热衷于冰棍买卖之道，叫人反感。他又不好伤了学生的热情，只好说：“噢……好……我这就去。”

何小毛更加来劲：“王老师你要是累了，我去替你卖一会儿，赶上课时你再来。”

王老师摇摇头：“你去做课前准备吧！我这就去卖。我不累。”

何小毛走到正在脸盆架前洗脸的王老师跟前，说：“王老师，我爸叫我后晌回去时再带一箱冰棍儿，你取来，我带走，你又可以多卖一箱。”

王老师似乎此时才把何小毛与何社仓联系到一起，他说：“你爸要买就到学校冰棍厂去买好了，又便宜。”

何小毛说：“俺爸说要从你手里买，让你多赚钱。”

王老师听了皱皱眉，闭了口，心里泛起一股甚为强烈的反感。这个自己执教的六甲班班长热情帮忙的举动恰恰激起的是他反感的情绪，这个年仅十二岁的孩子对于经营以及人际关系的热衷反而使他觉得讨厌，然而他又不忍心挫伤孩子，于是装出若无其事的口气再次劝说：“你去做课前准备吧！”

何小毛的热情没有得到发挥，有点扫兴地走出房子去了。临出房子门的时候，何小毛又不甘心地回过头来：“人家体育杨老师已经卖掉三箱了。王老师……你太……”

王老师冷冷地说：“你去备课吧！小孩子管这些事干什么？”

何小毛走了。王老师背着箱子朝后门口走去。后门口有一排粗大的洋槐树，浓密的叶子罩住了一片阴凉，清爽凉快。王老师坐在石凳上，用手帕儿扇着凉，脑子里却浮着何小毛父子的影像。这何小毛活脱就是多年前的何社仓，细条条的个头，白嫩嫩的脸儿，比一般孩子长得多的睫毛和深一点的眼睛，显得聪慧乖觉而又漂亮。他与他父亲一样聪明，反应迅速，接受能力强，在班里一直挑梢儿，老师们一直看好他将来会有大发展。现在，王老师才明显地感觉到何小毛和他父亲何社仓的显著差异来，他父亲何社仓眼里那种总是害羞的神光在何小毛眼里已经荡然无存了，反倒是有一缕比一般孩子精明也与他的年龄不大合拍的通晓世事的庸俗之气色……

“王老师，给我买冰棍儿！”

四五个小女孩儿已经围在跟前，伸向他的手里捏着钱。王老师中断了思想立即收钱付货。他从后门朝校园里一瞅，一串一溜的男女学生朝后门涌来，他的生意顿时红火起来。骤然升起高温的午休时分，正是冰棍以及冷饮走俏的黄金时间，孩子们趁着课前的自由活动时间来消费一支冰棍儿，是很惬意的。王老师忙不迭地收钱付货，头上脸上冒出豆大的汗珠来，也顾不得擦擦，眼看一箱冰棍儿就要卖完了。

“王老师生意好红火！”

王老师仰起汗津津的脸，看见杨小光站在一边，体育教员结实柔韧的身体有一种天然美感，然而王老师听着那话里带有一股馊味儿，透过那眼里强装的笑容，王老师看到了底蕴的敌意。他无法猜测其来意，只是应答说：“唔！这会儿天气热，孩子们……”

杨小光却神秘地眨眨眼：“王老师，我引你看场西洋景儿——”说着就来拉王老师的手。

王老师莫名其妙：“有什么好看的！别开玩笑。”

杨小光执意拉住他的手：“你去看看就明白了，可有趣儿了！”

王老师已不能拒绝，那双体育教师的有劲的胳膊拉着拽着他，朝校园里走去。

当王老师站在一个教室窗外，看到教室里的一幕时，几乎气得羞得昏厥过去——

五

三年级丙班教室里的讲台上，站着六年级甲班班长何小毛，正在给三年级小学生做动员：“同学们要买冰棍儿快到后门去！后门那儿是我们班主任王老师卖冰棍儿。王老师有教学经验，年年都带毕业班，你们将来上六年级还是王老师给你们当班主任，教语文。现在王老师卖冰棍儿，大家都帮帮忙，行行好，让王老师多卖冰棍儿多赚钱……”

王老师吃惊地瞅着何小毛，眼前忽然一黑，几乎栽倒，这个学生的拙劣表演使他陷入一种卑污的境地。杨小光现在变了脸，露出本色本意：“王老师，你要是有兴趣，到各班教室都去看看，你们六甲班的班干部现在都给你当推销员广告员了……”

王老师手打哆嗦，嘴里说不清话：“杨老师……我不知……这些娃娃……竟这样……”

杨小光撇撇嘴：“王老师，我可想不到你有这一手哩！往日里我很尊敬你，你德高望重，修养高雅，想不到你竟是个……巧伪人！”

王老师立时煞白了脸，说不出话来。这时候何小毛已经跑出来，站在两个老师面前，毫不胆怯地说：“我当推销员有什么不好不对？你上体育课硬把冰棍摊派给我们，一人一根不吃不行。你昨日上体育给同学们说今日轮你卖冰棍儿，要大家都一律买你的……”王老师听着就扬起了手，“啪”的一声响，打了何小毛一记耳光。何小毛冤枉委屈地瞪他一眼，捂着脸跑了。

杨小光愈加恼怒，大声吵嚷起来：“太虚伪了嘛！王老师！学校开会讨论卖冰棍问题时，你说教师卖冰棍影响不好啦！不能向钱看啦！我以为你真是品格高尚哩！想不到你比我更爱钱，而且不择手段，发动学生搞阴谋活动……”

王老师看见已经有不少学生和教师围观，窘迫地张口结舌，有口难辩，恨不得一头碰到砖墙上去。杨小光更加得意地向围观的学生和教师羞辱他：“我杨小光爱钱，可我赚钱光明正大。我心里想赚钱嘴里就说想赚钱，不像有些人心里想赚钱嘴里可说的是这影响不好那影响不佳，虚——伪！”

王老师再也支持不住，从人窝里出来，干脆回屋子里去。历史课教师刘伟一手摇着竹扇，脚尖上仍然挑着拖鞋走过来，挡住王老师不让他退场，然后懒洋洋仰起脸对杨小光说：“杨小光你骂谁哩？六甲班的学生干部是我组织起来行动起来的，你有什么意见朝我提好了。”

杨小光忽然一愣：“我……关你什么事？”

“我说过了是我组织六甲班干部动员学生买王老师的冰棍儿。”刘伟说，“你骂错了人，先向被你错骂的王老师赔礼道歉。然后你再来骂我。”

杨小光反而被制住了。

刘伟不紧不慢地重复：“你先向王老师道歉，然后再跟我说你有什么想不通的！”

杨小光终于从突然的打击里恢复过来：“你刘伟甭充什么硬汉！谁使的花招谁做的手脚我完全清楚，你甭在这儿胡搅和……”

刘伟眼睛一翻也上了硬的：“我是不是充得上硬汉搁一边儿。我倒是真想搅和搅和。你杨小光牛什么？不就是蹦了一下得了一块没有金子的金牌才混上个体育教师！你整日里骂这个训那个你凭什么要厉害？领导怕你我也怕你不成？”

杨小光被讽刺嘲笑得急了，拳头自然就攥紧了，朝刘伟走过去：“就这我还不想当这破教师哩！你不怕我我什么时候怕过你？甭说这小小学校即就是本县我还没怕过谁哩！”

校长成斌正在睡午觉，最后被叫醒来到现场，先拉走了刘伟，再推走了杨小光，学生和教师们也各自散了。成斌只是嘟哝着：“刘老师快回房子里去，让学生围观像什么话！杨老师快去大门口卖你的冰棍儿，在学生面前吵架总是影响不好嘛！再有理也不该在学生场合吵嘛！”

王老师早在成斌到来之前已经逃回房子。

王老师坐在办公桌前，脑子里乱成一窝麻，那总是梳理得很好的银白头发有点散乱了。他没有料到卖冰棍儿会卖出这种不堪收拾的局面。他想到校务会讨论卖冰棍儿时自己说过影响不好的话，但没有坚持而放弃了，他随着教师们一样参加了轮流卖冰棍儿。他怕别的教师骂他不合群，清高，僵化，都什么时候了还拉不下面子……明年满六十本可以光荣退休了，最后一个毕业班毕业了他就该告老还乡了，临走却被一个年轻的体育教师骂成“巧伪人”！他已灰心至极，再三思虑，终于拔笔摊纸写下了“退休申请”几个字，心里铁定：提早退休！

放晚学的自由活动时间，校长成斌来了。成斌说问题全部调查清楚，何小毛和六甲班学生干部到各班动员学生买王老师冰棍儿的举动，完全属于何小毛的个人行为，既不是王老师策划的，也不是刘伟策划的。所以杨小光辱骂王老师是错误的。如果仅仅是这件事就简单极了，由杨小光向王老师赔礼道歉。问题复杂在王老师失手打了何小毛一个耳光，打骂体罚学生是绝对不允许的。成斌说他和吴主任研究过了，做出两条决定，王老师向被打学生家长赔情，争取何小毛的乡村企业家的父亲的谅解，然后再在本校教师会上检讨一下。如果上级不查则罢，要是查问起来，咱们也好交代，王老师也好解脱了。为此，成斌征求王老师的意见。

王老师把抽屉拉了两次又关上，终于没有把“申请退休”的报告呈给成斌校长，担心会造成要挟的错觉。对于成校长研究下的两条措施，他都接受了，而且说：“你和吴主任处理及时，本来我自己打算今晚去何小毛家，向家长赔情哩！”

六

成斌校长不放心，执意要陪着王老师一起去何小毛家，向那位在本乡颇具影响的企业家赔情，听说那人财大气粗，一个老夫子样儿的王老师单人去了下不来台怎么办？刘伟也执意要去，理由是与自己有关，六甲班他任副班主任，责无旁贷，另外也怀着为王老师当保镖的义勇之气。王老师再三说不必去那么多人，何小毛的父亲何社仓其实还是他的学生，难道会打他骂他不成！结果仍然是三个人一起去了。

这是乡村里依然并不常见的大庄户院。一家占了普通农家按规定划拨的三倍大的庄基，盖起了一座二层楼房，院子里停着一辆客货两用小汽车，散发着一股汽油味儿，院里堆积的杂物和废物已不具一般庄稼院的色彩，全是些废旧轮胎，汽油桶子，大堆的块煤以及裁剪无用的各色布头堆在墙角。何社仓闻声迎出来，大声喧哗着“欢迎欢迎”的话，把三位老师引进底层东头套间会客室，质地不错的沙发，已经适应时令的变化铺上了编织的透风垫子，落地扇呜呜呜转着。何社仓打开冷藏柜，取出几瓶汽水，揭了盖儿，送给三位老师一人一瓶。

成斌校长摇着瓶子没有喝，刚开口说了句“何厂长我们来……”就被何社仓挥手打断了，何社仓豪气爽朗：“成校长、王老师、刘老师，你们来不说我也知道为啥事。此事不提了，我已经知道了。我那个小毛不是东西。我刚刚训过他。咱们‘只叙友情，不谈其他’。”他最后恰当不恰当地引用了《红灯记》里鸠山的一句台词，随后就吩咐刚刚走进门来的女人说：“咱们小毛的老师也是我的老师，难得遇合，你弄几样菜，我跟我老师喝一点。”女人大约不放心孩子的事，只是开不了口，转身走出去了。

成校长企图再次引入道歉的话题，何社仓反而有点烦：“总是小毛不是东西。这小子太胆大，宠得什么事也敢做什么话也敢说。我像他那么大的时候，胆小得很，一到人多的地方就吓得像个小老鼠，一见

生人就害羞——王老师一概尽知。这小子根本不知道害怕害羞……咱们不提他了，好好……”

王老师愈觉心里憋得慌，终于把自己要说的话说出来：“社仓，我打了小毛一个耳光，我来……”

何社仓腾地红了脸：“王老师，打了就打了嘛！我也常是赏他耳光吃。这孩子令人讨厌我知道。我在你的班上念了两年书，你可是没有重气呵过我……好了好了不提此事了。大家要么去参观参观我的鞋厂。”

何社仓领着三位教师去一楼的生产车间参观，房子里安着一排排专用缝纫机，轧制鞋帮，另一间屋子里是裁剪鞋帮的。夜班已经开始，雇来的农村姑娘一人一台机子，专心地轧着鞋帮头也不抬。

何小毛的母亲已弄好了菜，何社仓把三位老师重新领进会客室里，斟了酒，全是五星牌啤酒，而且再三说叨谦让的话，青岛牌啤酒刚刚喝完。然后把筷子一一送到三位老师手里，敦促他们吃呀喝呀。

王老师喝了两杯啤酒，不大会儿就红了脸，头也晕了，脚也轻了，他今天只是吃了一顿早餐，空荡荡的肚子经不住优质名牌啤酒的刺激，有点失控了。

何社仓大杯大杯饮着酒，发着慨叹：“我只有跟三位老师喝酒心里是坦诚的，哎哎哎！”

刘伟听不出其中的隐意，傻愣愣眨着眼。

何社仓说：“王老师，我现在有时还梦见在你跟前念书的情景……怪不怪？多少年了还是梦见！我小时候那么怕羞！我而今不怕羞了胆

子大了。我那个小子小毛根本不知道害怕害羞！我倒是觉得小孩子害点羞更可爱……”

王老师似乎被电火花击中，猛地饮干杯中黄澄澄的啤酒，扔下筷子，大声响应附和着说：“对对对！何社仓，小孩子有点害羞更可爱！我讨厌小小年纪变得油头滑脑的小油条。”说着竟站了起来，左手拍了校长成斌一巴掌，右手在刘伟肩上重重拍了一下，然后瞅瞅这个，又瞅瞅那个，忽然鼻子一抽，两行老泪潸然而下，伸出哆哆嗦嗦的手，像是发表演说一样：“其实何止小孩子！难道在我，在你们，在我们学校，在我们整个社会生活里，不是应该保存一点可爱的害羞心理吗？”

三个人都有点愣，怀疑王老师可能醉了。

1988年6月27日 白鹿园

两个朋友

一

王育才和媳妇秋蝉的离婚案还在民事法庭赵法官的卷宗里悬着。这场旷日持久的案件连头带尾已经持续了五个年头。王育才和秋蝉以及双方的亲戚朋友都被这场官司拖得精疲力竭身心交瘁却又欲罢不能。

五年里王育才三次起诉，三次均被赵法官判为不予离婚。按照民事法庭现行的规矩，一经裁决为不予离婚后要再次起诉，必须有新的理由而且要在半年之后。理由总是可以找到的，唯有时间无法通融，再难熬也得熬过半年六个月一百八十多个日日夜夜。民事法庭还规定，离婚双方或一方如果不服判决进而提起上诉又被上级法院驳回维持原判，那么要再起诉除了更充分的理由之外，时间的规定要在一年之后。王育才第二次起诉就发生了这种情况，硬硬地熬了整整一年才得以第三次向民事法庭重提旧案。现在，他已经做好了第四次起诉的一切准备，主要当然是状子，另外花在排除亲戚朋友苦口婆心劝解上头的力气也比上三次更多。

王育才挟着装有离婚申诉的黑色皮包走进桑树镇民事法庭的小院时，正好碰见急匆匆去上厕所的赵法官。赵法官只是减慢了脚步而并不驻足说：“老主顾又来了。”王育才苦笑一下说：“我不来过不成日子。”随之装出大不咧咧的样子说：“你要是烦了，干脆给我判个离婚算尿了，我也就再不麻缠你了。”赵法官已经走到小院墙角的厕所门口，一只手下意识地去解裤扣，回过头来笑笑：“不烦不烦我不烦。我吃的就是这碗麻烦饭嘛！你才起诉了四回这不算个啥，经我手判的一个离婚案男方起诉了十一回，前后经过十七年。你这四五回只是一般纪录。”

王育才听了就哑了口，像是中了一位法咒无边的禅师点来的定身法，立在那儿僵住了手脚。

二

秋蝉用独轮小推车刚刚拉回一车苞谷秆子，满脸淌着汗，解开捆绑的皮绳，再把干透的苞谷秆子垒堆在场院里。邻居一位抱着奶娃的小媳妇半裸着胸脯，一边给孩子喂奶一边说：“嫂子你而今还拉那苞谷秆子做啥？我要是你连麦子都不种了。”秋蝉笑笑，继续卸下车上的苞谷秆子。这种话她已经听得太多不屑解释。她去鸡场买小鸡，女人们甚或男人们见了也说：“秋蝉你今还买那些毛草子货做啥？”她去卖鸡蛋，人见了又说：“秋蝉你而今咋还卖鸡蛋？你该吃鸡蛋才对哩！”她干啥人都说她不该干啥；应该吃好的，应该睡，应该逛，应该好吃好睡好逛好好享福。这其中不言自明的原因是她的男人而今挣了大钱了，钱多得乡党邻里无法猜清估准其数目，总而言之多得很。秋蝉何苦还要一篮一篮卖鸡蛋一车一车拉苞谷秆子呢？秋蝉虽然最清楚自己究竟存下多少货，绝对不像人们纷传得那么厉害，倒是确也攒下了万

儿八千的存款。无论如何，她在感到虚名徒有的压力的同时也感到许多被人羡慕的愉悦。截至现在，她还不曾打算好吃好睡好逛。她继续精心养鸡继续咬紧牙关卖鸡蛋，继续拉苞谷秆子当柴烧既节省了买煤的开支又烧热了火炕。育才给她买下电褥子她锁在箱子里不用。对人说是怕触电怕睡不踏实。其实是怕花了电费。电费公家收二毛二，本村电管员收三毛五。电管员私抬电费而且理直气壮："而今小至一根针大至彩电哪一样价钱没翻几个筋斗？要说没涨价只剩下良心反倒掉价了。我管电电不涨价难道叫我喝风吃屁不成？"秋蝉就憋足劲儿拉苞谷秆子，省了煤又省了电，你涨得再贵总不抵我不用不买。

车上还剩下一抱苞谷秆子没有卸下来，她的大儿子小强骑着自行车放学回来，把一只黄皮信封塞到她手里。她看看落款竟是"桑树镇民事法庭"几个红字就不由蹙紧了眉头，一道不祥的阴影立即弥漫过心头，她撕拆信封的手指紧张得发抖。信瓤是一页铅印的传讯通知，要她后日到桑树镇法庭过堂，她的男人王育才提出要和她离婚，已经申诉到桑树镇民事法庭了。

说是晴天霹雳一点也不过分。秋蝉看罢传讯通知，眼前一黑险乎栽倒，一股恶心的浊气从腹腔蹿起冲到喉咙口就堵在那里。她的儿子小强一手扶住车子一手搀住母亲，吓得惊叫起来。那个给娃子喂奶的小媳妇跑过来，一边搀扶她一边瞅着掉在地上的信皮和信瓤儿，再也不说嫂子不该拉苞谷秆子的玩笑话了。秋蝉已经没有力气卸下小推车上最后一抱苞谷秆子，强挣着走回家去，扑倒在炕上就号啕起来。她感到羞辱又感到委屈。她没有丝毫的精神准备，无法承受这晴天霹雳般的打击。她被最不幸的家庭灾难只一下就击昏了。她现在根本无法理清这突发的灾难的来龙去脉只觉得自己活到了尽头，照耀她的九十九个太阳和九十九个月亮全都在一瞬间熄灭了，眼前是永不复明的黑

夜。她的脑子里一片昏天黑地一片混沌。她的胸腔里骤然聚满了恶气又排泄不出，整得她几次哭得闭气，亏得隔壁邻里的女人们用针尖戳她冰凉的手指扎她冒着冷汗的鼻根，她才还过阳气来。一霎时间，这个令人羡慕的家庭的里屋和庭院，就弥漫起混乱和破败的灰暗气氛。

阿公和阿婆是在天麻麻黑的时候走进儿媳的小院的。老两口后晌上磨麦子，轰隆作响的磨面机房里没有闲人来传递消息。当阿公头发和衣服上扑着一层白茸茸的面粉推着面袋走回家时，立即就有好心的乡邻向他通报了儿媳秋蝉家里发生的变故，老汉顾不得掸去面粉就跑来了，女人颠着一双稀世的小脚也急火火赶来。阿婆倒是有主意："甭哭！秋蝉。他想离婚就离了？这事全由他了？他想离婚得先埋葬了我！过堂时你甭去叫我去，让他跟我说这婚咋个离法儿……"阿公坐在椅子上吸着烟，不劝也不叹。女人们纷纷离去后，阿公才说："你先甭慌，事情嘛总有个了了。明日我去把他叫回来，叫他先跟我说个张王李赵。"说到这儿，老汉才忽然想到，儿子育才住在什么地方自己根本不知道。他问儿媳，秋蝉也不知道。他的儿子在西安发了大财，他们却从来也没有被儿子邀去做客，临到有了急事需要找他时却弄不清儿子的单位和地址。这一瞬间婆媳和阿公三人几乎同时想到一个人——王益民。王益民是儿子育才的好朋友，育才的情况他知道得比做父母和妻子的要多得多。于是翁婆媳三人立即统一了举措：立即去找王益民。

王益民是本村小学校教导主任，晚上宿在学校里，王子杰老汉找到家里又找到学校，堵在心里的火气就再也无法忍住不发了："益民呀！你看育才这狗日的咋么就生出六指儿来了？好端端的安宁日子一下就给搅得云天雾障！你明日领我去寻他，我只说一句话叫他先杀了我再去离婚。法院传票后日过堂只有明日一天时间了，益民你无论咋

说也得抽空请假领我去寻那个狗日的东西……”王益民也很震惊，只是远远不及子杰老汉那么强烈罢了。他其实早有预感或者说精神准备，今天发生的事实不过是对于以前的某种预感的证实而已。然而他还是自然地表现出一种震惊。他首先安慰盛怒不息的老伯，然后立即答应明天去找育才，无论育才干什么忙事紧事都非得拉他回来见父亲说清道明；再下来就劝老伯不要亲自去，一旦说得不好育才拉起硬弓不回家反而更糟……子杰老汉完全信任地听取了益民冷静入理的劝告，把至关重要的切肤切心的事交给益民去办理。

三

王益民第二天一早就出了校门。他做好了找人的准备所以骑自行车不乘公共汽车进城。初冬的田野已显示出冬天的肃杀和冷峻。一切变故的根源也许是从育才离开学校开始发生的。育才被一位高中同学拉去搞什么公司，他给乡政府写了停薪留职报告就去老同学兴办的一家公司做了会计。那年寒假，王育才半夜来敲他的门，说妻妹来了屋里住不开，要他学校办公室的钥匙。第二天他到学校去找他闲聊却已不见踪迹，钥匙也未留下来。他又找到育才家里，秋蝉睁大眼睛说不仅没有妹子来家更没有见育才的影子。王益民开始心生疑窦。他想见不着育才得不到钥匙又轮着他护校日子，于是就砸了锁子进了门。他看见满地都是带把儿的烟蒂以及糖纸糕点盒子和饮料罐子；揉皱的床单上有一坨污痕，那是男人的排遗物令人一见就恶心顿起；从地上尚未干涸的一堆痰迹判断，王育才昨晚还睡在这里。于是，他就完全肯定育才借他的房子干什么勾当了。直到这个春节王育才回到龟渡王村把钥匙交给他的时候，他不无生气地揶揄老同学说：“这把钥匙留给你作纪念吧！锁子已经砸了扔了还要钥匙干什么？”王育才连连道歉，说他忘了交还钥匙，万万料想不到第二天就乘飞机去广州出了急差。王

益民想戳穿这个急就的谎话却又碍于面子上拉不下来，只好以明白装糊涂听他大谈特谈广州的新潮新景儿。春节后新学期开始，一位老教师向王益民彻底揭开了发生在他的办公室里的秘密——

那天晚上轮着我和小刘老师护校。王主任你知道俺俩是老对手，下棋下到三点还落马不下来，我想拉屎就急匆匆往厕所跑。从厕所出来经过你的办公室门口时，我听见里面有打鼾声心里就奇了，王主任你啥时候悄没声儿睡到里头的？回到房子跟小刘老师一说，小刘老师说王主任也是个棋迷咋能不来观战悄悄就睡了呢？他拉着我去看个究竟，在门口窗根下听了半晌又听出一个女人睡梦中的一声呻唤。我吓得跑了，心想，王主任怎么跟老婆放着热炕不睡跑到学校来过夜？小刘老师又跑过来对我说，肯定不是王主任。咱们必须弄清楚谁睡在里头，这是护校的责任。于是，我俩敲响了门板。好久才应了声。好久都没拉电灯。灯亮门开之后，万万想不到是王育才老师和一个女的。那女人你猜是谁？是吕红。我已经羞得难以和王育才老师说话。王育才老师到底是熟人，有点尴尬，可人家而今到底经见了大世面，比不得咱们这些四堵墙里圈定的“小教儿”孤陋寡闻，不开化，一会儿就没事人一样掏出把纸烟来让俺俩抽，大谈神谈他出门不是飞机就是软卧，一桌饭吃掉两千多块把老广都镇住了。俺俩穷“小教儿”倒给他吹得忘了自己干什么来了……

王益民先是叮嘱白发已现的老教师后来又叮嘱小刘老师到此为止，再不要扩大宣扬。他随之就为自己调换了办公房子。他在那间房子里莫名其妙地瞅着那天发现痰迹的地方出神，瞅着自己床单上那已经洗得绝无痕迹的地方，心里仍止不住恶心。他换了房子。他把那件床单撕成布条扎了拖把。他把被子洗了烫了仍觉得心里毛森森的，于是破费买了一条被罩把被子罩起来。自从老教师彻底揭开这桩秘事一

直到他完成那一系列净化工作，心里总是叽咕着一句话：这人怎么就没羞了呢?

王益民和王育才自幼交好，从小学一直念到初中毕业，王益民被保送到师范学校而王育才考取了高中。王益民曾经后悔自己上了师范只能去教小学而失去了争取高等教育的机会，后来的生活演变却使他庆幸不已，“文革”后他被分回本乡小学有工资有商品粮，王育才返乡回家当了农民。王育才的父亲解放前当过两年保长列入专政对象，自然成了村子里最倒霉的青年。为王益民说媒提亲的人踏细了门槛，王育才家却门可罗雀无人光顾，直到王益民喜添贵子而王育才依然孑然一身。

王益民每每看见王育才低头耷脑的样子心里就十分难受。他越来越明确地意识到，如果他再不给他帮忙想办法，王育才一辈子就完蛋了。适逢王益民被提拔为教务主任有了说话的身份也有了说话的机会，他便大胆地向公社举荐王育才到自己的学校来当民办教师。公社竟然同意了。当他把这个喜讯告知王育才时，王育才却连连摇手说自己根本不适宜做老师。

看来不是谦虚，也不完全是背着保长父亲的政治压力，主要障碍来自王育才的内向性格。王育才怕羞。这个人已经长到二十大几仍然羞羞怯怯。他从来不在任何人面前抢说一句话。几个人围在一起闲谈，他总是悄悄默默站在外围或坐在人背后静静地听着，笑也是羞怯怯的样子。像他那样羞怯的神气别说男子汉很少有，在造反精神激励下的女学生女青年也无法与他相比。他的羞怯不是强装的而是真实的，课堂上猛乍被老师点名回答问题，他未站起先兀自脸红了，脸一红眼里就潮起一缕羞怯的雾气，说话也就磕磕巴巴了。从小学启蒙一直到高中毕业的漫长的读书生活中，他从一个纤细的少年变成了一个

体魄强健的男子汉自然发生了许多重大变化，唯其害羞的样子有增无减。他在整个高中阶段的学习是他认识自己的重要阶段。他的数学和理化科目总是列全年级的前茅，他对这些学科的兴味愈来愈浓。他相信自己肯定会进入名牌大学。即使这样，他在被老师表扬被同学欣羡以至嫉妒时，仍然羞羞怯怯地抬不起头来。相比之下，那些学得好同时也骄傲到蛮横的学生与他就形成了截然不同的对比，同学和老师更喜欢他爱戴他亲近他，觉得王育才那根深蒂固的羞怯里蕴藏着迷人的色彩。

王益民和王育才自小玩耍长大，村子背后的山坡和村子前面的河川处处留着他们相依相伴的足迹。他们春天背着草笼提着草镰到坡沟到河岸去割青草，冬天里像大人们一样腰缠绳索肩扛镢头到山坡上去挖柴火。他们夏天在刺丛中搜捕绿色的蝈蝈秋天又兴味更足地逮捉蛐蛐，为此几乎踏平了山坡上的每一丛刺棵翻遍了村子里的每一堆砖石瓦砾。他们背着母亲多掺了白面的馍馍第一次走出偏僻的小村龟渡王村到桑树镇读中学的时候，几乎同时第一次意识到了友谊而且产生了继续加深这种友谊的要求。他们之间可以说完全平等完全信赖。他们能玩在一块说在一搭而不是其他。他们一个是一个的影子，一个是一个的寄托，他们之间如果有一个是异性，那么他们就完全可能是龟渡王村的梁祝而且会有一个最完美最浪漫的结局。王益民的母亲曾经对王育才的妈妈说过：“他俩要是有一个生来时少带一件行李就好了。”他们俩谁也不明白那行李的真实含义，及至后来知道了其中的意味的时候，连王益民都有点羞了，王育才更是羞得连脖子都红了。

王益民曾经不止一次有意无意地思索过王育才的羞怯。育才的母亲敦厚朴实并不多见羞怯。他的父亲解放前当过两年保长，解放后自然就成了黑斑头儿。王益民对保长大叔解放前一无记忆也一无印象，

打有记忆起就只记得保长大叔那张讨好巴结的笑脸。他曾经十分讨厌那张笑脸，小孩子的王益民也能觉察到那笑脸里十有九分都是虚假的强装的，只有那脸上的笑容收敛散尽的时候才现出一分真实来。印象太深了，那令人讨厌的笑脸，这位体格雄壮的中年汉子见到任何人都是柔声细气讨好巴结的口吻和神色，哪怕不是龟渡王的干部而是一位红边烂眼的麻糊婆媳甚至是一个不懂饭香屁臭的小孩，他见了都会堆出一脸笑来，老远就与人打招呼，一天到晚都关心别人的生活起居似的问人家“吃了吗？”那笑容好像孙悟空的金箍棒装在耳朵里随时都能顺手扯出来布满整个眉眼和嘴脸。可是在他们家里，保长大叔对他的妻子儿女却非但不见笑颜，从早到晚从春到冬永远是一副冷冰冰的严厉的脸孔，一家人悄悄默默地做事，悄悄默默地吃饭，悄悄默默地睡觉。很少有什么人到这个终年弥漫着肃穆冷清气氛的小院来串门。孩子们说话声高了，保长大叔就会冷冷地呵斥一声“张狂啥哩？”孩子们全都惊慌地缩了脖子哑了声息。王益民很不习惯这种压抑的家庭气氛，总是站在王育才家院墙外学几声狗叫或鸟鸣，把育才勾引出来，那是他们约定的暗号。暗号不得不时常变换，防止保长大叔识出破绽来。

记得王育才被他推荐来学校上第一节课的时候，这个老三届誉满全校的高才生面对几十个刚刚进入戴帽中学班的乡村孩子，竟然比学生紧张十倍，满脸臊红地站在讲台上，两只手不知该放在讲桌上还是该贴紧裤缝，头上的汗粒由小聚大，纷纷滚落下来。他的羞怯和紧张被学校师生们传为笑话，校长不无担心地对王益民说：“王主任，你推荐来的人纵然有一肚子蝴蝶，可飞不出来也是枉然！”王益民信心很足：“没关系。疏通了堵塞喉咙的障碍，蝴蝶自然就飞出来了。关键的问题是，我们明知他肚子里有蝴蝶，总比那些满肚子稻草甚至连稻草也没吃下多少的人靠得住。”校长再不坚持什么。王育才由紧张到不大

紧张再到完全不紧张，他的满腹经纶满肚子的蝴蝶就随心所欲恣意舞蹈，成为小学校戴帽中学班里的权威教师。许多只能教小学而硬着头皮提到中学班任教的教师，常常是先由王育才那里趸下货第二天再到课堂上热蒸现卖。王育才的人品极好，他很少是非，只埋头于备课授课，逢有劳动他也积极踏实，甚得领导师生的尊重。王益民也因此而放心。

大约不到一年时间，王育才陷入了初恋的情网。女方是一位刚刚从师范学校毕业的年轻姑娘，一分配到龟渡王村学校就安排到中学班任教。如果这位姑娘稍少一点虚荣心不要到中学班而是到小学班任教，那么后来的事情就不会发生，至少可以推迟发生。姑娘叫吕红，初中一年级尚未读完就发生了“文化大革命”，后来从乡村推荐到师范读了两年书其实有一年多的时间都是搞革命大批判，切实说仍然是初一水平充其量不会超过初二，如今要给初中班任教自然不可避免洋相百出破绽百出。她就去找王育才请教，先趸来再卖出去。王育才待人极平和，从来恪守待同志一视同仁，从来恪守不参与校内派系斗争的生活原则，更不会挑肥拣瘦瞅红蔑黑，他给吕红辅导讲解就像对其他老师一样耐心认真而绝不显示自己的能耐气儿。时日一长，吕红随着知识的增长感情也开始膨胀，为了报答他为自己补习而花费的时间，几乎本能地甘心情愿地代他洗扔在床下的脏衣服，她从家里来时带点好吃的东西也往往首先想到应该送给王育才。除了补习之外她和他开始谈一些无关教学的事甚至笑话，她待在王育才房子的时间越来越多，一当有空儿就想往那个房子跑。王育才虽然害羞但不是木头，他已远远超过晚婚年龄对男女之情更灼热却也更冷静。有一天晚上，吕红买了两斤月饼送到王育才屋子，说明晚是中秋之夜她提前向他谢恩。王育才一下子急了连连摇头说：“这算干什么？我怎敢图老师们的报答呢？革命同志互相学习互相提高，怎么能送月饼呢？”说着就把吕

红往门外推。在即将推出门的一瞬，吕红忽然一扑跑进来，一下子抱住王育才的脖子就止不住哭起来了。王育才呆呆地垂着手，脖子被吕红搂得喘不过气，却没有勇气举起自己的双手拥抱对方。

这之后俩人就进入热恋。吕红的红红的丰腴的面颊和他的已现青色的腮帮久久厮磨，难分难解。这桩甚为美满的婚事却被吕红的父亲给彻底破坏了。吕红的父亲是村党支书，已经听到一些风言，就找女儿吕红正儿八经训导："爸是支书你相信不会给你搞封建婚姻。你自由恋爱爸坚决支持。你选下个王育才爸也觉得那小伙子不错。可是王育才他老子是伪保长专政对象。你已经是共产党员，王育才连个团员也没当过。你已经是公办教师王育才是个民办，他老子要不是伪保长还有转为公办的希望。你跟育才结了婚以后咋办？将来有了孩子也就沾上了黑斑，爷爷是伪保长你看看还能有什么出息？婚姻是一辈子的事，你自个冷静想想去。"

吕红陷入了痛苦而终于做出了与父亲一致的选择。王育才很快由痛苦转变为懊悔。他悔愧万分地对王益民说："我真是个十足的混蛋！我怎么刚刚活出了一点眉眼就忘记自己的小名叫个啥嘛！要不是你帮助我而今还在队里淘稀粪哩！我怎么一下子就忘乎所以了？怎么敢跟党支书的女子恋……"这些话都出自肺腑，王育才很快又冷静下来，再三向吕红表白并不责怪她。于是俩人和平分手。到下一学期开始以后，吕红已经调到另一个小学去了，而且结了婚。之后不久，王育才也心平气和地完成了一桩重要的事，结婚了。王益民和他女人齐心协力把她的一个远房表妹介绍给育才，就是秋蝉。

王益民现在怀着沉重的使命和甚为急切的心情，骑车来到这座古城饭店的大门口，不禁被那堂皇的高大建筑物镇住了。天哪！那一根用大理石砌成的明柱，肯定把戴帽中学的全部家当都折掉了。

四

王育才拿出最好的香烟糖果糕点饮料招待王益民，又是随随便便的样子，正是那随便到漫不经意的样子才显出一种阔人阔气的气魄。那些好吃的好喝的好抽的高档次消费品对王育才已是家常便饭，而对王益民这样的小学教育主任就成为超级超常超前享受了。他对享受这些高档消费品感到的不是愉悦而是痛苦，那一罐铝皮饮料的价值就把他一天的工资全喝掉了。尽管花掉的是王育才的钱他仍然觉得太可惜了。王育才不等他开口就猜中了他来找他的事端，而且直言不讳地袒露了事情的全部真相："我要离婚。我要和吕红结婚。我和吕红的婚姻才是最符合道德的。我和秋蝉的婚姻是一种没有感情的死亡的婚姻。尽管我至今仍感谢你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帮助我娶下一个女人，但我的感情无法从吕红身上移到秋蝉身上。我在做出离婚决定时首先想到的是你，其次才是我的父母，我知道离婚的结果首先伤害的是咱俩的友情，至于断绝父子关系我都没有什么包袱。你和俺爸俺妈骂我的话我都能猜到，但我还是决定离婚。"

王益民倒没有话说了。他一路上组织起说服王育才不该离婚的语言大军全部溃散了。王育才的坦率反倒感动了他。他知道王育才和吕红感情甚笃旧情难逝。他现在只能提出一些具体的困难来让王育才考虑："孩子怎么办？三个孩子正处于幼学阶段，既要人抚养更需要心灵上的温暖。你想想你离了婚争得了自己的幸福，其实把痛苦不是摆脱掉了而是转嫁到孩子身心上了。与其这样不如将就着全当为了孩子。"

提到孩子以后王育才就哑了口，只顾抽闷烟，随之就哭了："只有孩子是无辜的。对孩子来说我是十恶不赦的罪人。我在决定离婚的过程中百分之九十九的脑筋都伤在这上头。我只能从财力上保证他们求

学读书，从生活上满足他们的一切需求。当然，如果秋蝉能明白一点，我会毫不吝啬地给孩子以父爱的，只是担心秋蝉不会给我这机会。没有办法，我与吕红已经不可分割了。她也和丈夫闹翻了。我无法回头也不想回头了。我已经觉得没有吕红一天都活不下去，父母以及老朋友你根本体味不来我的这种感情。我只希望你给秋蝉多做点解释工作，一来秋蝉是你的亲戚，二来这件事是你好心促成的。你就再不必管其他事了。”

王益民再无话可说。他感到劝解毫无作用，所以就不想多费唇舌。他想骂他又骂不出来。王育才而今比过去坦率了。王育才眼里的那种羞怯已经褪净，一种冷漠，一种淡泊，一种成熟的冷峻，一种经见了大世面后的遇事不惊的老练，所有这些神色把原有的那种根深蒂固的羞怯之色覆盖了或者说排除了。他抽着育才的高级香烟，一支值二毛五分钱，相当于一斤苞谷的市场价格。他一面当教育主任一面种责任田，大脑的一半装着龟渡王戴帽中学的全部教务，另一半装着肥料种子以及各种粮食蔬菜的市场价格。他已经充分感觉到王育才已经不是过去的保长狗崽子也不是龟渡王学校的“穷小教”了，无疑已经是当代社会中最活跃最气魄最会生活的人了。他想，如果王育才不来这个公司而继续在龟渡王教书，那么他会怎么样呢？他会提出与秋蝉离婚与吕红追求真正的“符合道德的婚姻”吗？再退一步说他如果继续背着保长儿子的政治压力呢？想到这儿王益民又自责起来，这种想法本身就是不好的，好像他倒希望王育才继续当狗崽子似的。

记得吕红与别人订婚以后，王育才曾经懊悔不迭地痛骂自己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他劝了他安慰了他。他做到了一个朋友仁至义尽的义务。他亲自跑到秋蝉家，说服了秋蝉又说服了秋蝉的父母，说王育才是个绝对的好青年，保长父亲属保长父亲，王育才本人是最可靠

的。直说得秋蝉父亲下了决心，说他完全相信了，权当秋蝉不是嫁给民办教师王育才而是嫁给农民王育才，只要人可靠就行了。王育才当时很感激他们夫妇，保长两口子更是感激不尽。王益民曾经因为他对朋友至诚的帮助而心底踏实。现在，他不仅不能说服王育才反而使自己陷入为难的境地，该怎么对秋蝉说话？怎么去见秋蝉的父母？

记得王育才和秋蝉结婚的时候，他去参加乡间的婚礼，王育才邀他做伴郎，他欣然应允，把秋蝉引回来。王育才在过了一周新婚生活之后，情不自禁地对王益民说："秋蝉不错。勤快俭省，脾性也好，正适合咱这样的家庭，人家这样清白的贫农女子能嫁到咱家，我已经够了。"王益民想把这话重新说给王育才听，想想又觉得没有必要，就告辞了。

临走时，王育才叮嘱他："益民哥，你甭费心了。我知道你是个好心人。你对我的恩情我永远不忘。你在我最困难的时候给了我最大的帮助。即使我要离婚，仍然感激你给我介绍下秋蝉。你的动机百分之百是好的。现在我求你再甭跑冤枉路了，无论俺爹俺妈或是秋蝉找你，你都推开甭管，让他们找我说话。"

王益民说："这事不用你叮嘱我也不再来了。你的事你自己处理吧！"

五

王益民回到龟渡王村时，王育才的父亲王子杰老汉在村口佯装割草，实际是等待王益民。王益民说了他找育才的经过，子杰老汉听得心里松不滋滋凉不唧唧软不哝哝，气急败坏地说："益民呀你怎么糊涂了？我叫你无论如何把那狗日的拉回来，你……"王益民苦笑一下说：

“好叔哩！那么个大活人儿，我怎么拉得回来？”而且做出一副无可奈何的神气。王子杰老汉问清了地址，迫不及待地当晚就搭末班车进城去了。

王子杰老汉一踏上豪华的古都饭店的廊沿几乎滑了一跤，那地板太光滑了。站在门口的一男一女两个侍者看着粗手笨脚的乡村老汉爬起来不搀不扶而且嗤笑着问找谁。王子杰老汉说他找儿子王育才。他得到放行，开始爬楼梯。他敲响了二楼十九号房间，看见门缝开处露出儿子的脸，气血呼啦一下冲到脑顶，及至他跨进门去看见长沙发上斜倚着一个女人，凭感觉老汉就知道那是吕红，一下子失去控制，一甩手就抽到儿子的脸上。那女人从沙发上跳起来，拉他的胳膊，叫着：“大伯有话慢慢说……”子杰老汉嗅到一股浓郁的香气，“呸”地一口吐出去，骂道：“婊子！”那女人一甩手走出门去。

子杰老汉已经完全失控。他一抡手，把茶几上的香烟饮料糖果全都扫荡到地上，杯子瓶子罐子在地板上乱滚。他又一把揪住儿子系在脖颈下的紫红领带，扯着拽着往门外拉。儿子育才被勒得直翻白眼，狼狈不堪地挣扎着，以求饶讨好的口气劝父亲坐下说话。子杰老汉说：“回家说！这地方我不坐！这是什么地方？婊子院！”这当儿走过来两个服务员，威胁老汉说再不停手就打电话叫警察来，子杰老汉才坐下来。

子杰老汉坐下来仍然盛怒不息地嘲骂：“我以为你在城里干什么体面工作，原来是逛窑子！瞅瞅楼上楼下站的跑的都是些啥货，脸上搽的嘴唇涂的耳朵上吊的都是啥？旧社会窑子院也没有这么厉害！你住在这儿能学好？你狗日的跟我回家种地去！”

王育才只是小声劝：“爸你骂我尽管骂，你甭胡乱骂人家服务员……”

“屎！啥屎服务员！”王子杰不买账，“我当过保长，解放了共产党把我教育好了，没料到你小子倒学坏学瞎了。我当保长也没住过这么阔气的房子！你看你龟孙子穿洋服打领带装贼更像绺娃子！你今日不回家我就死在你面前。”

王育才已经没有任何招架之力。他佯装尿尿就走出房子躲进另一间屋子，让他的公司的同志去打发丧失了理智的父亲。同时叫来一辆出租汽车连拉带哄把子杰老汉送回近郊乡村龟渡王，王育才才得以从尴尬中解脱。

解脱是暂时的。第二天，当王育才坐在桑树镇民事法庭里向赵法官申诉一条一条离婚理由的当儿，他父亲王子杰老汉正站在民事法庭大门口的街道上向赶集上街的男女揭露儿子离婚的内幕，针锋相对。王育才真诚地列出好几条足以说明他和秋蝉没有感情因而是不道德的婚姻的理由，赵法官冷静地甚至无动于衷地问了一句：“既然没有丝毫的感情，那么三个孩子是怎样出来的？”一句话问得王育才张口结舌，虚汗交流。与此情此景形成强烈对比的王子杰老汉获得了完全的成功。他慷慨陈词，言真意切，一件件一桩桩历数自己在前多年顶着黑斑头的困难日月里，王育才的龟孙相可怜样儿，秋蝉怎么来到这个家，怎么贤惠，怎么勤俭，根本不多嫌这个倒霉的家庭，一下子把听他演说的男女感动了，一齐骂王育才忘恩负义不是个东西。王子杰老汉得到众人的呼应，更加来劲地斥责儿子的背叛行为，骂儿子是无情无义没有人性的畜牲，是豺狼是混蛋是陈世美是杂种。人们纷纷议论，像王育才那样的儿子如今并不少见而像王子杰这样知情仗义的老

子倒是少有的。消息从桑树镇反馈回龟渡王，子杰老汉的威望空前高涨。

王益民听到这一切时很平静。他是教育主任经常读书看报，一知半解当今社会潮流总的趋向是有利于王育才追求“真正的符合道德的婚姻”的，然而乡村人依然敬佩王子杰这种重情义的侠贤心肠。他无法确定自己站在哪一边去反对另一边。只觉得自己已无能为力只好任其自然发展。

王子杰老汉时常来找他，不断把这桩离婚案的进展情况汇报给他。“法官判了不准离。”王子杰得胜似的告诉他，“看那狗日的还要咋样？”过了半年，王子杰又神色紧张地说：“益民，那狗日的又告到法院了。”随之又大惑不解地问：“头回告了判下不准离就完了嘛，怎么还容得再告？没完没了了？”他显然不懂得关于离婚法律的特殊规定。过了半年老汉又得意地说：“再告也是白告，赵法官还是判下个不准离婚。狗日的爱告尽管告，赵法官是个好法官，再告一百次也是白告。”这场离婚官司便旷日持久旷年持久地拖延下来，以至王子杰老汉自己也磨得发不起火来。对王益民报告案件进展时的口吻也像说别人的闲话一样：“又告了……爱告告去！”

王益民甚至同情起王育才来。当离婚事件发生时他同情秋蝉是自然的事。现在他依然同情秋蝉也同情王育才。秋蝉虽然得到阿公阿婆的诚心相待全力袒护，毕竟代替不了丈夫。育才和吕红虽然感情呼应仍然摆脱不了偷偷摸摸的被动局面，理想的“符合道德的婚姻”好梦难圆。王益民的同情心产生不久，又被突如其来的一件事冲淡了，这就是吕红丈夫的来访。

吕红的丈夫是个工人，他给王益民第一眼的印象正与他的职业完全吻合。他很率直，衣服穿着很随便，上衣是一件新潮夹克，肩上和臂上以及胸部附加了许多带儿和扣儿，衬衣的领子在脖子里窝叠着；人长得粗壮，一颗硕大的头。他开宗明义说：“我来找你是听说你既与王育才交好也认识吕红，希望你劝一劝王育才也劝一劝吕红。”他声明他之所以不愿意离婚并不是离了吕红就再找不到媳妇，完全是咽不下这口气，王育才太欺侮人了。他警告说他的工友哥儿们早已不能忍受暴发户欺侮已不吃香的工人阶级，要砸断暴发户王育才的狗腿，要把王育才的眼珠挖出来当泡儿踩，只是因为他觉得为了一个吕红臭婊子犯不着让哥儿们受牵连吃官司。

自称已不吃香的“工人阶级”向王益民诉述了他和吕红成亲的经过。那时候他在省建筑三公司当工人，有三个和他同时进厂的女工追求他，只是因为全是外省籍而遭到父亲反对。父母坚决要给他找一个本乡本土的媳妇，最不行也得是个陕西人，于是吕红大得父母的欢心。他也承认他父母喜欢吕红，见了一面就喜欢上了。他不知道吕红曾经与王育才有过恋爱史，后来知道了也宽容了她。问题在于已经有了一女一男两个孩子了，吕红仍然旧情萌发，把他闪到半路地里真是哭笑两难。他让王益民给王育才捎话过去：暴发户王育才欺侮已不吃香的工人阶级是没有好下场的。

王益民又为王育才深深地担心了。他整日提心吊胆，似乎随时都可能飞来一个王育才被打残的噩讯。他想提醒他警告他又见不着王育才。他又一次找到古都饭店二楼十九号，房子早已换主儿，再也打听不到王育才的下落了。他仍然忧心忡忡。

吕红的父亲接着来访。这位已退位的吕家村的老支书本该休养生息，安度晚年，却被女儿的婚变搅得焦头烂额。他一面痛斥女儿不检

点的行为，一面又对自己过去在女儿婚事上的自作主张后悔不及。他说他完全是为了女儿吕红好而想不到弄了窝囊事。他说在当时的情况下，眼瞅着女儿与一个保长儿子结婚，不仅他做党支书的父亲通不过，亲戚朋友也没一个通得过。怎么也想不到而今世事会变成这样。老支书恳切地说："益民呀！你和叔认识也不是一天两天了，你就好心好意劝一下育才，甭瞎折腾了。都四十的人了，还能再活四十呀！四十岁的人为儿女活着，甭伤了儿女，俩人都有儿有女，折腾不起呀！只要他一收心，我收拾红红也好办了。人到事中迷，需得朋友点明要害……你全当为叔除去心病，好生劝一劝育才。"

王益民被感动了，他送走老支书，心情愈加沉重。我的天爷呀！育才要追求理想的"符合道德的婚姻"的背后，连结着多少人的焦虑忧愁的痛苦。只剩下吕红没有来找他了，所有与这桩离婚案有牵连的人都一次或多次找过他了。王子杰老汉不必说。王育才的母亲不必说。秋蝉自然也不必说。秋蝉的娘家父母找他使他十分难堪地无言以对。吕红的丈夫和吕红的父亲现在也都找过他了。两个家庭的几十个成员都被搅得吃饭不香睡觉不酣。他们都知道他和王育才是朋友，是可以解除他们苦恼的人。然而王益民却毫无办法，他根本说服不了王育才。

吕红最终也来找王益民了。这位女性的到来，才真正摇撼了王益民的心，使他大吃一惊大睁双眼惊骇不已……

六

又一个灵魂在王益民面前痛苦地颤抖。

当吕红走进龟渡王学校的大门的时候，那些认识她的老师和不认识她的新教师全都像看珍禽异兽一样瞪起了好奇的眼睛。她在龟渡王学校任教时和王育才的恋爱产生过轰动本校的效应。她停薪留职跟上王育才到某公司去挣大钱在全乡教职员中产生了轰动效应。她和王育才在某公司旧情复发的桃色事件的轰动效应扩及全县的教职工。她和王育才偷偷在教育主任王益民的房子做爱的事更使龟渡王的新老职员无人不晓。她现在敢于硬着头皮再次走进龟渡王学校的校园其实已谈不上勇气，王益民第一眼就发现这位女教师的神经有点不大正常。

吕红显然已不是当年在龟渡王学校任教时的吕红了。姑娘的特有的红色从脸上褪失净尽，脸色呈一种非自然的白色，那是过多施用脂粉的结果。无论什么现代化妆品都无法挽回已失去的青春。王益民首先感到的不是这些浅显的变化而是吕红的眼睛。吕红的眼睛里是绝望和恐惧，恰如一个人得知了自己的生死簿上的秘密，吕红一坐下就说："王老师，我是实在无路可走了才来求你，现在只有你能救我了……"

王益民搞不清何以这样。就问："怎么回事？吕红，你慢慢说。"他顺手闭了门。

"你的朋友王育才……是个野兽！"吕红咬着牙说，"是个吃人不吐骨头的豺狼！"

王益民惊奇地问："你怎么也骂他？"

"他把我害得好苦！"吕红说，"我一直觉察不出他对我设着圈套……"

王益民更迷惑不解："他怎么会对你设圈套？"

吕红这才告诉他，王育才和她私下里已说好约定：他和秋蝉离婚，她和丈夫离婚。现在，自己已和建筑工人的丈夫离了婚，王育才却突然从桑树镇民事法庭抽回了起诉，不离了……

王益民愈加迷惑：“那为啥？”

“报复！报复报复报复！”吕红癫狂了似的喊，“他要报复我！恶毒的报复！”

“他怎么会报复你？”王益民问，“他和秋蝉的离婚案闹了四五年了，怎么会报复你？”

“全是假的！”吕红说，“他一次一次上诉，又一次一次托人暗里给赵法官塞钱，不要判决离婚。他一直把这场假戏演到我离婚才……”

“啊呀！我的天……”王益民半信半疑。

吕红哭了：“我怎么办？我已离婚了。他在耍我。他记着旧仇。他说他才出了一口气。他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他说我当初欺侮了他，我丈夫也欺侮了他，我父亲欺侮了他，全都是欺侮了他有个政治黑疤……现在全都报复了！”

“我信不下！”王益民说，“我信不下去！王育才真会这样歹毒？你们恋爱失败时，他亲口给我说‘并不怪责’你吕红嘛！”

吕红苦笑着摇摇头：“王老师，我唯一求你一件事，你去找找王育才，说我死了。他如果还记得我对他全是一片真心，如果还能原谅我当初的动摇，权当说的‘势利眼’也行，我只有一丝希望了……”

王益民突然涌起一股强大的责任感，大声肯定说："吕红你千万别急，绝对不能走绝路，也千万不敢急出毛病来。我明天就去找王育才，你一定等我见了他以后咱们再面谈……"

王益民虽然热诚有余，心中却不免打鼓，如果真如吕红所述，他能扭转王育才吗？他已经比较切实地想另一条路，设法使吕红与那个建筑工人复婚。他说："万一不行，我去找你丈夫，争取和解……"

吕红冷笑一声："那样的路我还能走吗？那比死艰难十倍！"

未等第二天王益民去找王育才，王育才当晚打电话找王益民来了。

王益民一接上电话就迫不及待："育才育才你说你现在在哪里？我有话要找你说。"

王育才却冷静地说："我们永远不会再见面了我的好朋友。你不要再问我的住址，我们抓紧时间说几句话。"

王益民有点激动，一时找不到说话的头绪。

王育才问："吕红是不是找你了？"

王益民答："是的是的。到底怎么回事？"

王育才说："吕红说给你的事是真的。我已经抽回了离婚诉状，但并不是说我要回龟渡王了。请你告诉父母和秋蝉以及孩子，请他们忘掉我，权当这世界上压根就没有过我。"

王益民急了："这到底为什么？"

王育才说："不要问'为什么'。我只告诉你，吕红已经离婚了，这是我的圈套。我要报复。我已经报复了。我和吕红恋爱失败时就等着这一天。这一天终于等到了。我当时太痛苦了，她和她父亲完全想不到被扔掉的女婿会是怎样的痛苦，我现在叫他们亲自感受一下。她的那个丈夫当时比我优越的唯一一条是家庭出身好，而吕红选择了他却舍弃了我。让他现在尝一尝此中滋味，也就理解当初我的苦处了……"

王益民实在忍不住了："你是个毒虫！王育才——你是个歹毒的家伙！"

王育才说："我曾经是个羞怯的青年……"

王益民说："假的！你的羞怯是假装的！你的骨子里是歹毒残忍惨无人道！"

王育才却依然冷静："朋友你说错了。我的羞怯是真实的。我的太多羞怯使我苦恼。我现在又因为那种羞怯丧失殆尽而惋惜。"

王益民骂："你害了多少人……"

王育才说："首先是这些人先伤害了我。"

王益民回转了口吻："育才，我们甭辩嘴了。我需要冷静，你更需要冷静，你无论如何告诉我你的住址，咱们见上一面，想想挽回残局的办法，一切还不是完全无望的。"

王育才说："不必了，我明天就要走了。"

王益民又急了："你到哪里去？我敢说世界上没有容你的地方！你的良心也宽容不得……"

王育才说:“我要找一个恰恰能容我的地方。我已经不想再挣钱了。顺便告诉你，我所在的这个公司纯粹是个不摊本只赚钱或者说是光骗钱的公司。我对骗钱也觉得腻了。”

王益民:“你到底要干什么? ”

王育才:“我要找一个能使我恢复羞怯的地方去。你想想，还不明白吗? ”

王益民一时转不过弯:“我想不来！你干脆回学校来吧? ”

王育才轻轻叹口气:“我已经不可能再回到讲台上去训导别人子弟了，那地方太神圣，我不配。我正在钻营的这种公司也不干了，越干我越无耻。我又不想自杀，我想在我恢复了人应有的那一点羞怯之后，再论死生之事吧！”

王益民沉默了。

舔碗

一

黑娃在主家吃头一顿饭时有点拘束。黄灿灿的小米粥里下着细匀如丝的白面条儿，调着清油爆炒的葱花，喷香喷香的，黑娃刻意节制自己不敢吃得太快太猛，免得给主家留下馋极饿狼的第一印象。倒是主家黄掌柜真诚地催促他说：“吃快！小伙子吃饭斯斯文文的弄啥？吃快吃快！”黑娃吃完一老碗又要了半碗，本来完全可以再吃下一满碗这种金银面的，同样是出于第一印象的考虑只要了半碗。在两碗饭之间，黑娃从桌子上的竹篾浅篮里拈起一个馍来。馍是淡黄色的豌豆仁馍馍，茬口很硬也很耐得咀嚼，嚼半天满嘴里仍然是细小的沙粒似的疙瘩，唾液急忙把紧硬的馍块浸润不软。这样，黑娃吃饭的速度就是真实地而不是做作地慢了下来，直到主家黄掌柜连着吃完两老碗饭，他还有半个豌豆面儿馍馍拈在手里；这样，黑娃就瞅见了主家黄掌柜的舔碗的动作。

黄掌柜放下竹筷子右手撑着小饭桌的边沿，左手四指勾着碗底儿大拇指掐着碗沿儿，仰起脸伸出舌头，先沿着黄釉粗瓷大老碗的碗沿舔了一圈，左手粗壮如算盘珠儿的指关节却灵便自如地转动着碗；吧唧一声脆响，舌头在碗的内壁舔过去，那一坨儿碗壁上残留的小米粒儿葱花屑儿全部扫荡净尽，比水洗过比抹布擦过还要干净；吧唧吧唧的脆响连住响着，大老碗在左手间均匀地转过一周，碗内壁所有的残滞物尽皆舔光揽净，只留下碗底儿上的残汤米屑；舔除碗底的滞留物才显出黄掌柜有一条出众出色的舌头，在碗底儿只旋转了一下便一览无余，鼻尖和脸颊并不挨碗沿儿，一般人的舌头不可能有那么长也没

有那么灵巧；黄掌柜放下碗在口袋里摸烟袋时，那只奇妙的舌头伸出来从下唇到左嘴角再到上唇和右嘴角齐齐儿扫荡了一圈，嘴唇嘴角干干净净湿润润地柔和起来。黑娃的眼光瞅着黄掌柜缩进口腔的舌头最后落在下唇上，那个下唇又厚又长，一合拢就把上唇严严地包裹起来几乎挨着鼻头，这种地包天式的嘴唇成为黄掌柜面部器官最突出的特征，见一面隔十年八年肯定还能认出他来，因为世界上恐怕再不会有这样出众的地包天式的嘴唇了。黑娃吃完了手里的豌豆麦馍也吃光刮净了碗里的金银面，放下碗再放下筷子，用手掌抹抹嘴唇站起身来准备去喂牛。黄掌柜从地包天嘴唇里拔出短杆儿烟袋说："你把碗舔了。"

黑娃停住脚转过身迟疑一下说："我不会舔碗。"

黄掌柜说："不会就学嘛！"

黑娃仍迟迟畏畏说："我怕学不会。"

黄掌柜说："这活儿不难一学就会了。"

黑娃找出一条理由："我舌头太短舔不上碗底儿，连碗壁儿也够不着。"

黄掌柜耐心地教导说："舌头这东西跟橡皮松紧带儿一样，越抻越长不抻它就缩短了。你学着舔吧越舔舌头就越长。"

黑娃愣愣地站着不动，再找不出什么理由来拒绝舔碗。

黄掌柜说："你坐下。"

黑娃在小马扎上又坐下来。

黄掌柜说：“快舔。这不算啥难为事嘛！”

黑娃垂着手低着头不动。

黄掌柜笑呵呵地说：“舔个碗比上轿还难吗？”

黑娃终于下定决心说：“掌柜的，任啥活儿你咋指派我咋做，做不完做不好你打你骂我都受哩！舔碗么……我不……”

黄掌柜短粗的胳膊一抡，短小的指掌里攥着的短杆烟袋在饭桌上空抡成一个半圆，站起身来说：“今日这回不舔了算了，碗也凉了难舔了，下顿饭我教你舔……好学着咧！”

二

黄掌柜在第二天早饭时对长工黑娃进行舔碗的启蒙教育。这种启蒙本该在昨晚的第二顿饭进行，无奈晚饭一般都是吃馍喝开水，碗是无物可舔的。早饭是黄澄澄的苞谷糁子熬烧的稠粥，碗壁儿上残滞的糁子粒密度很大。黄掌柜突兀地问：“你知道不知道我这家业是咋么着发起来的？”

黑娃摇摇头说：“不知道。”

黄掌柜神秘地说：“你估你猜——”

黑娃说：“是你勤勤谨谨发起来的。”

黄掌柜眯着小眼珠儿撇撇厚厚的下唇：

“不对。”

黑娃说："掌柜的你德行好积下的。"

黄掌柜依然摇摇头。

黑娃说："你祖荫厚实留下的？"

黄掌柜喝着糁子粥头也没抬。

黑娃便大胆问："你发过一回横财？"

黄掌柜笑着摆了摆头，用筷子指定端在左手里的黄釉粗瓷大老碗说："舔碗舔下的。"

黑娃眨眨眼没有吱声儿。

黄掌柜咚的一声把碗蹾到矮腿饭桌上，扬起右手里的竹筷子指着头顶的高大厅房，又指着院子两边对峙的四间厦屋说："我这个三合院是舔出来的。一瓦一砖一页土坯一根椽一根檩条一根柱子都是我一口一口从碗壁儿上舔下来的！"黑娃瞅着黄掌柜凛凛然神圣的脸色，不敢贸然乱问乱说。黄掌柜也没有让黑娃插话添言的意思，继续着刚刚引出的话题，站起来用手里的筷子指着街门外头："圈里的犍牛母牛是我从碗里舔下来的，坡上的旱地川里的水地一块一块一亩一分都是我舔下来的。你明白吗？"黑娃勉强点点头不敢说不明白。黄掌柜缓和一下情绪说："当然，也不是我一个人舔下来的，我爸我妈我爷我婆我老爷和老太人老五辈就舔碗，才舔出来这份家业……这下你信了吧？"黑娃连忙点点头。黄掌柜接住说："这下你明白我为啥叫你舔碗的道理了吗？"黑娃说："明白。"黄掌柜却摇摇头说："你娃子还没明白。"

黄掌柜对黑娃讲解："庄稼人过日月就凭俩字，一个是勤，一个是俭。勤开财源，俭聚少成多积小到大。一般人做到勤容易，俭字上就

分开了彼此。钱挣得再多花掉了等于没挣，粮食打得再多糟蹋光了跟没打粮一样。你打下八石麦吃光吃净你明年还得受穷，我打下八石俭省下一石我明年就比你好过了。一家大小一顿从碗里舔下一两，一天按两顿算就俭省二两，十天俭省二斤一月六斤一年就有七十斤正好二斗，十年两石一百年二十石。二十石粮食能置买多少地多少砖瓦木料？再甭算从其他路途省下的粮款。你家人老几辈要是养成舔碗的好习性，你娃子而今就不会出门给人熬活了，倒是要雇旁人给你熬长工哩！这下你明白了吧？”

黑娃反倒不服气这笔账：“洗了碗洗了锅，稠泔水喂牛喂猪还是没糟践嘛！反正喂牛喂猪还得搭配精料喀！”

黄掌柜说：“你说的恰好是一般庄稼汉们的想法儿，可见你还是不明白。该给牲畜搭配的麸料不能减，可人吃的饭食还是应该舔进人肚里。人一日舔两三回碗，人就一天从早到晚都记着俭省，这跟孔老先生说‘吾日三省吾身’是一样道理。你娃子不信就试试舔一回，舔一回碗该花俩钱你就只花一个或是不花，舔过一月你手里攥钱攥得比死人的手还紧，一个麻钱都舍不得花了。你不信先试着舔一回……”

黑娃说：“我情愿受穷情愿出门给人熬活儿，我压根儿没敢想雇旁人给我熬长工的事，掌柜的我不试那舔碗。”

黄掌柜问：“我刚才说下一河滩话儿，你听进耳朵没？”

“听进去了。”

“你说我说的话有道理没？”

“有有。”

“我说的道理是教你学好还是学坏？”

“是为我好。”

“对呀！既是为你好你为啥不听不做？”

黑娃被迫逼得无言以对，沉默半晌才想出一个办法：“黄掌柜……这样吧！我每顿少吃半个馍或者少吃半碗饭，算是赔了我不舔碗糟践的粮食，你甭让我舔碗了——”

“啥话嘛你倒胡吣的啥话！”黄掌柜打断他的话，“我是为你好盼你能过上滋润日子，才教给你娃娃这个诀窍，哪里是要你少吃欠喝？你不吃饱咋推得动车子咋抡得起镢头？”

黑娃再想不出搪塞的主意，便硬着头皮说：“掌柜的反正我不想舔碗。就是能舔出金能舔出银我也不舔。再说当初议定工价时你也没说舔碗这家法……”

“话说到哪儿去了哇？”黄掌柜摊开两手委屈地说，“我为你好倒惹你恼了！你今儿不舔算咧！可你得弄清我是好心不是恶意。”

“我知道你是好心没有恶意。我领受不了这个好心。”黑娃说，“要不你另换个会舔碗的来，反正长工多的是喀！”

“算咧算咧不说咧！”黄掌柜看看黑娃弓已拉硬，便暂且妥协，“日后你兴许会明白舔碗的好习性……”

三

连着三天，黄掌柜再没提舔碗的要求，黑娃以为这件事也就过去了不再成为一个矛盾的事，抗争虽然取得了胜利，心里总有一缕违拗主家伤了主家脸皮的歉疚，于是便更用心地经管牲畜，更主动更卖力地干活儿，企图以此弥补那件事上的缺憾。黄掌柜似乎也没有苛待和报复的举动，只是不和他说话，饭桌上默默地吃馍喝粥，然后扛着工具到田地里去。一路上无话，整晌整晌俩人都自顾干活儿不说一句话，只是屁声连绵不断。自离开家门从村庄走向田头，主仆二人一前一后此起彼伏着屁声，谁不奇怪谁谁也不笑话谁，豌豆仁馍馍吃下以后尤爱生屁，这是无法抗拒的。黑娃双手攥着刨耙给棉田打圪梁，心里逐渐有了对主家的初步评判，黄掌柜人不错，活儿尽着做饭馍尽着吃，偶尔某项农活做得不合辙，也是和和顺顺地指出来让黑娃重新做好，没有打没有骂甚至连呵斥也很少有过。黑娃猜忖，黄掌柜确实是几辈人靠吃苦耐劳节俭省用积攒下一份家业，不是为官发财也不是挖土挖出金条银锞发的横财；黄掌柜没有大财东家严厉的家法也没有大财东人的架子，一天三晌出工干活不避重不图轻，黑娃推车翻地挑担他也推车翻地挑担，尚无完全指靠长工做务庄稼自己抽水烟品香片茶叶的架子。头两天黄掌柜和黑娃一边干着活儿一边扯闲话，近三天来却抿着厚厚的地包天嘴唇一句不吭，脸上的气色愈来愈不柔顺，说不上是憋气还是忧郁难受。到第四天晌午，黄掌柜躺下起不来了，说是心口疼得厉害。

午饭前，黑娃走进三合院上房东屋去问候黄掌柜，屋里光线晦暗，飘浮着一股苦冽冽的中草药气味。黄掌柜侧身躺在炕上，轻声呻唤着，下唇愈加显得更厚更长地咧开着。黑娃问：“掌柜的你哪儿害难受？”

“心口憋，还疼。”

“服药后好点吗？”

“药不顶啥。”

“你甭急，药吃三遍就显效了。”

“啥药也不顶用，我的病我知底儿。”

“那你就说嘛！该咋治就咋治嘛！”

“我的病除非你治——”

“我？我能帮上忙的话，你只管说。”

“你把碗舔了。”

“这跟舔碗有啥关系？”

“你不舔碗糟践粮食，我顿顿饭后看见你那碗心里就难受，整日整夜都难受，黑间睡不稳，白天胸口憋得闷得出不来气儿。你不舔碗我可受不了哇……”

黑娃大为惊诧，想不到自己不舔碗竟然把主家气下病了，却又信不下去这个事实，便支支吾吾说：“要是舔了碗能除你的病，那我就……舔。”

黄掌柜一骨碌翻身坐起来，双手抓住站在炕边的黑娃的胳膊，抖颤着厚长的下嘴唇说：“黑娃你要是舔碗就把我救下了！”说着溜下炕来，呼唤女人上饭。女人端上来的是麻食，这是春三月里的好饭食了。

吃罢以后，黑娃放下筷子，照着黄掌柜的姿势右手扶住桌沿，左手掐着黄色釉子的粗瓷老碗，先沿着碗沿舔了一圈，舌头摩擦瓷碗时浑身一阵痉挛，差点把碗掉到地上。黑娃舔碗壁儿时才觉得舌头太短，鼻头倒先舌头一步蹭到了碗壁，粘上了麻食饭的残汁，他用手擦了擦鼻子，低头再舔，又是先给鼻尖碰上了，便索性子不擦了，待舔完后再擦。

黄掌柜鼓励说："对着哩对着哩就这样舔法儿，一回生二回熟喀！"

黑娃舔完碗壁，虽不及黄掌柜舔得净，总是舔出了个大致干净的效果，碗上还留着一绺一道残痕，像是没扫干净的地面。黑娃觉得腹腔里开始翻搅，有点恶心，想到只剩下一个碗底儿，便低下头伸长舌头去舔，舌头触及碗底儿已经冰凉的残汤，即告第一次舔碗成功。

黄掌柜双手一拍说："好！舔得还好！"

黑娃从碗底仰起头来，呜哇一声从喉腔里爆发出来，连忙放下刚刚舔过的碗，三两步抢到台阶上，嘴里便喷发出一股浊流，肚腹里翻江倒海似的扭结翻搅，连续喷泻出一股又一股浊流，刚刚吃进肚里的麻食全部呕吐出来，在院庭的湿地上滑动蠕流。黑娃停止呕吐心腹平静之后，用手掌抹擦了噎出的眼泪，没有说话。他想，这下黄掌柜亲眼看见了，他的舌头是不能适应舔碗的良好习性的，这下再不会强逼他接受舔碗的习性了。不料，黄掌柜对他的呕吐无动于衷，更不惊奇，缓缓地从地包天嘴唇里拔出石头烟嘴儿，平淡无奇地说："吐不要紧。再舔几回就习惯了，习惯了自然也就不吐了。"

连着两三天，早饭和午饭，黑娃默不作声地吃饭，默不作声地舔碗，舔着舔着就呕吐起来，头一天尚可舔到碗底，一天比一天一顿比一顿舔的面积更小，就吐，直到最近一次舌头刚挨着碗沿儿，腹腔里便猛烈一震，把吃下的饭馍反弹出来。黑娃想，舔碗不仅没有进步，反而一天比一天退步，再一次对自己修炼这个良好习性产生了动摇，求饶似的对黄掌柜说："我怕是学不会舔碗了。"

黄掌柜毫不动摇继续鼓励他说："能学会。我能学会你也就能学会。人都能学会，因为人的舌头都是肉长的。"

黑娃说："我一舔就吐。舌头一挨着碗沿就恶心……"

黄掌柜说："吐到不吐得个过程。这跟修炼功夫一样。我娃他妈刚过门时也不会舔碗，也是一舔就吐，舔了半年吐了半年，后来就不吐了，而今舔得比我还老到。"

黑娃心里猛地一沉，要是舔半年碗吐半年饭，自己还能活不能活?

四

吃了舔舔了吐的日子强撑硬挣着又过了半月，黑娃的身体彻底垮下来。吐了以后他就重新吃个豌豆面馍，吃馍无须再舔碗，自然不会再吐。这种豌豆面馍不单爱生屁，石头一样硬的茬口令人望而生畏，一天三顿嚼食的结果是口腔糜烂，坚硬的馍茬子蹭得口腔内皮脱落出血溃烂，连舌头都被感染生出一层密密麻麻的小脓疱儿，他无法进食了。他空着肚子扛着工具到了地头，已经强烈的日光晒得头脑发昏，眼睛一阵阵发黑，浑身酸软无力心慌气短，满脸虚汗涌流不止，强撑

到吃午饭时收工回家，他没有去吃饭，径直走进牛圈撂下工具躺到炕上一动不动。

黄掌柜走进牛圈来叫他吃饭，见状哈哈大笑："撑不住了哇？哈呀这是一道关，撑过这道难关就没事了。走！吃饭去，越吐越吃越吐越舔，人就把自己的坏毛病改掉了，就把好习性养成咧！"

黑娃有气无力地坐起来："掌柜的你快吃饭吧！我嘴里生疮了吃不成饭。"

黄掌柜说："把饭晾凉就能吃，不怎。"

黑娃又重新提出最初的打算："黄掌柜你甭让我舔碗，我情愿年底少开二斗工钱粮，全当我不舔碗糟践的粮食……"

"不不不不不！"黄掌柜说，"我跟你想的正好相反，只要你舔碗，我不光不扣你二斗，年底给你再加上二斗。你这下明白我的好心了吧？"

外加二斗粮食的奖赏已不能使黑娃动心，而是担忧这种日子难以为继，终于再次说出自己只好离去的打算，态度坚决而话语却很委婉："黄掌柜你是个好主家。你让我舔碗也是为我好。我试着舔了学不会这好习惯，我硬撑了一月时光还是学不会。我而今弄成这病恹恹的式子给你干不动活儿，我白吃饭不干活儿咋能成？"

黄掌柜说："抗两天没啥事咧！"

黑娃依然诚恳地说："我不舔碗你受不了，你都难受得憋下病了；硬叫我舔碗我也受不住，吃了舔舔了吐我身子撑不住，给你干不动活

我心里难为情；我想来想去，你另找个舔碗的长工，我另找个不叫长工舔碗的主家，都好受些。”

黄掌柜短胳膊一挥：“算咧算咧！从今日起你甭舔碗了。”

黑娃尚不知道，去年黄掌柜雇下一个长工，因为无法学成舔碗的好习惯而中途辞职。黄掌柜半路上不好再雇长工，只好临时叫短工帮忙做务庄稼。如果黑娃今年再辞职，下一年雇工都可能困难。黄掌柜便妥协了。

黑娃便感激地说：“黄掌柜你看见，我不是不学好不舔碗，确确实实是我生下一条贱舌头，学不会这好习性；而今你不要我舔碗，我就按我刚才说过的少拿二斗粮……”

黄掌柜决然说：“不行。年初说下多少我年底还给你多少，一颗粮食也不少。”

黑娃说：“那我拼死拼活给你干，报答你的好处恩情……”

主仆二人终于得到了和解。

五

得到黄掌柜的宽容和关怀，黑娃在家歇息了两天，不到田地里去做活儿，只在家里喂牛垫圈，这使他很感动。口疮稍微收敛之后，他强迫自己多吃饭，以期尽快恢复体力尽早到田间去干活儿，吃人家熟的挣人家生的不给人家干活算什么长工呢！好在黑娃并没有其他毛病，进食以后身体恢复很快，三五天后就又是浑身抖擞生龙活虎的原

姿原样了，提犁扯耙挖土翻地起圈推土全部能够承担起来。不过几天，却又发生了一件意料不到的不大美妙的事——

这天早饭桌上，黄掌柜给黑娃吩咐下来几天内的几项重大农事活路的安排，先干什么后干什么中间穿插捎带着再干什么，安排得井井有条纹丝不乱，可以看出主家完全是一位精明细致的庄稼人。黑娃一一应诺一再表示遵从吩咐保证按时按质做完做好，绝对不会迟误农时耽搁时机，而且主动大胆到甚至不无讨好地向主家提出建议，给棉田压施的底肥应该从每亩五十车增加到八十车至一百车，因为棉花施足底肥比追施明肥的效果要显著得多。主家黄掌柜全面谋算过自家有限的粪肥，指令他每亩压施五十车，留下一部分给麦收后的苞谷追施。黑娃说："你甭愁给苞谷没粪上，我给牛圈每天多垫一两回土就有了；我抽空打几摞土坯给你把三个火炕换了，炕土坯上苞谷再美不过了。"且不说黑娃的主意的合理性与可行性究竟如何，单是这种主动精神就使黄掌柜深为感动，最难得长工和主家合成一股的心劲儿。黄掌柜咧开厚厚的下嘴唇只是嗯嗯嗯地点头笑着，没有当即明朗地表示行与否，仰起脸舔起碗来。黑娃进一步解释自己的意见，企图证明这意见属于万无一失而不必担心什么。这时候，黑娃突然看见，黄掌柜放下自己的已经舔净了的碗，伸手又把他的饭碗抓起来，伸出黄牛一样的长舌头舔起来。黑娃愣呆了，哑然闭口说不出话了，几乎闭了气，看到黄掌柜舔他吃过饭的碗，似乎比自个舔它更难以忍受，胃里头猛然痉挛了一下，呜哇一声又呕吐起来，整个腹部像簸箕簸着又像筛子旋着，直到把吃进去的饭食吐光吐净。

黄掌柜问："咋的又吐？"

黑娃嗫嚅说："你舔我的碗……"

黄掌柜更奇怪了："你舔你的碗，吐，我不叫你舔了；我舔你的碗与你屁不相干嘛，你咋的还吐？"

黑娃依然歉疚地嗫嚅着："我也说不上来这究竟咋的了，看见你舔我的碗就吐了……"

黄掌柜不满地撇撇嘴，忍了忍说："那好……下回我舔碗时你先离开。"

黑娃点点头。

然而糟糕的是，晌午饭时情况更加恶化，不说舔不舔碗，也不说避不避开黄掌柜舔碗，黑娃瞧见黄掌柜吃饭时伸出唇来的舌头就反胃就恶心就发潮就想吐。黄掌柜吃饭时与众不同，筷子挑起碗里的面条儿时，嘴里的舌头同时就伸出嘴来，迎接送到口边的食物，而一般人只张嘴不伸舌头的。黑娃看见那长舌头接到筷头上的食物便卷进嘴去，舌头的边沿赤红而舌心里有一片黄斑。他低下头不敢仰起来闷着头吃饭，仍然抑制不住阵阵恶心，一口饭也咽不下去，便悄然离开了饭桌。

随后发展到更为严重的程度，黑娃一瞅见饭碗就恶心，他想到这碗也是黄掌柜的舌头舔过的，舌心里有一片尿垢似的黄斑。

及至后来，黑娃瞧见主家黄掌柜又厚又长的下唇也忍不住恶心反胃。

黑娃又犯了口疮，身体迅即垮下来。

黄掌柜终于火了："我说舔碗舔下家当，是想让你小伙往后学下好习性过好日子哩！你舔了吐我舔你也吐，我再没法容让你了嘛！我说

干脆还是你再舔碗，舔了吐吐了再舔，直到把你这坏毛病舔掉吐掉，像我娃他妈一样学会舔碗。这叫以毒攻毒！”

黑娃根本谈不上实施以毒攻毒的新方案，因为他看见黄掌柜说话时闪动的下唇就又作起呕来。黄掌柜觉得受了侮辱，骂道:“穷小子穷命鬼贱毛病倒不少！”

黑夜，黑娃给牲畜添过最后一槽草料，便逃走了，俩月的工价粮食自然是不敢索要的。

散文·报告文学

第一次投稿

背着一周的粗粮馍馍，我从乡下跑到几十里远的城里去念书，一日三餐，都是开水泡馍，不见油星儿，顶奢侈的时候是买一点杂拌咸菜；穿衣自然更无从讲究了，从夏到冬，单棉衣裤以及鞋袜，全部出自母亲的双手，唯有冬来防寒的一顶单帽，是出自现代化纺织机械的棉布制品。在乡村读小学的时候，似乎于此并没有什么不大良好的感觉；现在面对穿着艳丽、别致的城市学生，我无法不“顾影自卑”。说实话，由此引起的心理压抑，甚至比难以下咽的粗粮以及单薄的棉衣遮御不住的寒冷更使我难以忍受。

在这种处处使人感到困窘的生活里，我却喜欢文学了；而喜欢文学，在一般同学的眼睛里，往往是被看作极浪漫的人的极富浪漫色彩的事。

新来了一位语文老师，姓车，刚刚从师范学院毕业。第一次作文课，他让学生们自拟题目，想写什么就写什么。这是我以前所未遇过的新鲜事。我喜欢文学，却讨厌作文。诸如《我的家庭》《寒假（或暑假）里有意义的一件事》这些题目，从小学作到中学，我是越作越烦了，越作越找不出“有意义的一天”了。新来的车老师让我们想写什么就写什么，我有兴趣了，来劲了，就把过去写在小本上的两首诗翻出来，修改一番，抄到作文本上。我第一次感到了作文的兴趣而不再是活受罪。

我萌生了企盼，企盼尽快发回作文本来，我自以为那两首诗是杰出的，会震一下的。我的作文从来没有受过老师的表彰，更没有被当作范文在全班宣读的机会。我企盼有这样的一次机会，而且正朝我走来了。

车老师抱着厚厚一摞作文本走上讲台，我的心无端地慌跳起来。然而四十五分钟过去，要宣读的范文宣读了，甚至连某个同学作文里一两句生动的句子也被摘引出来表扬了，那些令人发笑的错句病句以及因为一个错别字而致使语句含义全变的笑料也被点出来，终究没有提及我的那两首诗，我的心里寂寒起来。离下课只剩下几分钟时，作文本发到我的手中。我迫不及待地翻看了车老师用红墨水写下的评语，倒有不少好话，而末尾却悬下一句："以后要自己独立写作。"

我愈想愈觉得不是味儿，愈觉不是味儿愈不能忍受。况且，车老师给我的作文没有打分！我觉得受了屈辱。我拒绝了同桌以及其他同学伸手要交换作文的要求。好容易挨到下课，我拿着作文本赶到车老师的房子门口，喊了一声："报告——"

获准进屋后，我看见车老师正在木架上的脸盆里洗手。他偏过头问："什么事？"

我扬起作文本："我想问问，你给我的评语是什么意思？"

车老师扔下毛巾，坐在椅子上，点燃一支烟，说："那意思很明白。"

我把作文本摊开在桌子上，指着评语末尾的那句话："这'要自己独立写作'我不明白，请你解释一下。"

“那意思很明白，就是要自己独立写作。”

“那……这诗不是我写的？是抄别人的？”

“我没有这样说。”

“可你的评语这样子写了！”

他冷峻地瞅着我。冷峻的眼里有自以为是的得意，也有对我的轻蔑的嘲弄，更混含着被冒犯了的愠怒。他喷出一口烟，终于下定决心说：“也可以这么看。”

我急了：“凭什么说我抄别人的？”

他冷静地说：“不需要凭证。”

我气得说不出话……

他悠悠抽烟：“我不要凭证就可以这样说。你不可能写出这样的诗歌……”

于是，我突然想到我的粗布衣裤的丑笨，想到我和那些上不起伙的乡村学生围蹲在开水龙头旁边时的窝囊，就凭这些瞧不起我吗？就凭这些判断我不能写出两首诗来吗？我失控了，一把从作文本上撕下那两首诗，再撕下他用红色墨水写下的评语。在朝他摔出去的一刹那，我看见一双震怒得可怕的眼睛。我的心猛烈一颤，就把那些字纸用双手一揉，塞到衣袋里去了，然后一转身，不辞而别。

我躺在集体宿舍的床板上，属于我的那一绺床板是光的，没有褥子也没有床单，唯一不可或缺的是头下枕着的这一卷被子，晚上，我

是铺一半再盖一半。我已经做好了接受开除的思想准备。这样受罪的念书生活还要再加上屈辱，我已不再留恋。

晚自习开始了，我摊开了书本和作业本，却做不出一道习题来，捏着笔，盯着桌面，我不知做这些习题还有什么用。由于这件事，期末我的操行等级降到了“乙”。

打这以后，车老师的语文课上，我对于他的提问从不举手，他也不点我的名要我回答问题，校园里或校外碰见时，我就远远地避开。

又一次作文课，又一次自选作文。我写下一篇小说，名曰《桃园风波》，竟有三四千字，这是我平生写下的第一篇小说，取材于我们村子里果园入社时发生的一些事。随之又是作文评讲，车老师仍然没有提到我的作文，于好于劣都不曾提及，我心里的底火又死灰复燃。作文本发下来，揭到末尾的评语栏，连篇的好话竟然写下两页作文纸，最后的得分栏里，有一个神采飞扬的“5”字，在“5”字的右上方，又加了一个“+”号，这就是说，比满分还要满了！

既然有如此好的评语和“5^+”的高分，为什么评讲时不提我一句呢？他大约意识到小视“乡下人”的难堪了，我猜想，心里也就膨胀了愉悦和报复，这下该有凭证证明前头那场说不清的冤案了吧?

僵局继续着。

入冬后的第一场大雪是夜间降落的，校园里一片白。早操临时取消，改为扫雪，我们班清扫西边的篮球场，雪下竟是干燥的沙土。我正扫着，有人拍我的肩膀，一仰头，是车老师。他笑着。在我看来，他笑得很不自然。他说：“跟我到语文教研室去一下。”我心里疑虑重重，又有什么麻烦了?

走出篮球场，车老师的一只胳膊搭到我肩上了，我的心猛地一震，慌得手足无措了。那只胳膊从我的右肩绕过脖颈，就搂住我的左肩。这样一个超级亲昵友好的举动，顿然冰释了我心头的疑虑，却更使我局促不安。

走进教研室的门，里面坐着两位老师，一男一女。车老师说："'二两壶''钱串子'来了。"两位老师看看我，哈哈笑了。我不知所以，脸上发烧。"二两壶"和"钱串子"是最近一次作文里我的又一篇小说的两个人物的绰号。我当时顶崇拜赵树理，他的小说的人物都有外号，极有趣，我总是记不住人物的名字而能记住外号。我也给我的人物用上外号了。

车老师从他的抽屉里取出我的作文本，告诉我，市里要搞中学生作文比赛，每个中学要选送两篇。本校已评选出两篇来，一篇是议论文，初三一位同学写的，另一篇就是我的作文《堤》了。

啊！真是大喜过望，我不知该说什么了。

"我已经把错别字改正了，有些句子也修改了。"车老师说，"你看看，修改得合适不合适？"说着又搂住我的肩头，搂得离他更近了，指着被他修改过的字句一一征询我的意见。我连忙点头，说修改得都很合适。其实，我连一句也没听清楚。

他说："你如果同意我的修改，就把它另外抄写一遍，周六以前交给我。"

我点点头，准备走了。

他又说："我想把这篇作品投给《延河》。你知道吗？《延河》杂志？我看你的字儿不太硬气，学习也忙，就由我来抄写投寄。"

我那时还不知道投稿，第一次听说了《延河》。多年以后，当我走进《延河》编辑部的大门深宅以及在《延河》上发表作品的时候，我都情不自禁地想到过车老师曾为我抄写投寄的第一篇稿。

这天傍晚，住宿的同学有的活跃在操场上，有的遛大街去了，教室里只有三五个死贪学习的女生。我破例坐在书桌前，摊开了作文本和车老师送给我的一扎稿纸，心里怎么也稳定不下来。我感到愧悔，想哭，却又说不清是什么情绪。

第二天的语文课，车老师的课前提问一提出，我就举起了左手，为了我的可憎的狭隘而举起了忏悔的手，向车老师投诚……他一眼就看见了，欣喜地指定我回答。我站起来后，却说不出话来，喉头哽塞了棉花似的。自动举手而又回答不出来，后排的同学哄笑起来。我窘急中又涌出眼泪来……

我上到初三时，转学了，暑假办理转学手续时，车老师探家尚未回校。后来，当我再探问车老师的所在时，只说早调回甘肃了。当我第一次在报刊上发表处女作的时候，我想到了车老师，应该寄一份报纸去，去慰藉被我冒犯过的那颗美好的心！当我的第一本小说集出版时，我在开着给朋友们赠书的名单时又想到车老师，终不得音讯，这债就依然拖欠着。

经过多少年的动乱，我的车老师不知尚在人间否？我却忘不了那淳厚的陇东口音……

1987年8月13日

敬上一杯酒

一九八七年十一月一日下午，我赶往北京新桥饭店，参加中国作协书记处召集的十三大的作家代表座谈会。上午刚刚结束的党的十三大代表大会着实令人欢欣鼓舞。所有邀约的作家代表无一缺席，每个人都滔滔不绝，喜形于色。张光年同志在发言中，说他度过了一生里最愉快的一个生日。十一月一日是他的生日，欣逢党的里程碑式的十三大闭幕。与会者闻听此讯，一齐鼓掌，祝贺光年同志幸福。

我的心里很不平静。我不认识张光年同志。张光年同志也不认识我。然而我祝贺他生日的鼓掌是真挚虔诚的，他可能意识不到。

一九七九年六月，我发表在《陕西日报》的一篇小说《信任》在《人民文学》第七期转载。不久，编辑部来信告诉我。主编张光年同志正住院诊疾，在病床上看了刊物，尤其赞赏《信任》的艺术构架。作为一个作者，自然关注自己的作品公之于世之后的种种反应，但也不至于因为听到几句赞扬的话而忘乎所以。问题在于，那时候我的心境不佳，真是想听到几句赞扬的话以壮阳哩！

三年前我曾因一篇不好的小说而汗颜和内疚不已。作为新时期文艺复兴的第一声潮音是刘心武的《班主任》，我读这篇小说是在一个水利工地的大工棚里。我感到了中国文学艺术的春天到来的气息，与我内疚的心境形成愈大的反差。此前《人民文学》一位编辑从北京赶到西安又找到我下乡的偏僻山村，要我写一篇小说，哪怕写一篇散文在报刊上先亮一亮相。因为据说编辑部收到不少读者来信，询问陈忠实是否趴下了？我听了说不出话，感动得热泪滚滚。然而我仍然拒绝

了约稿，怀着使他千里迢迢而来失望而去的沉重负担，我仍然咬牙谢绝了。我说我现在不是亮不亮相的问题，趴不趴下也全在我自己。我不要亮相。我要以自己创作的进步告慰那些关心爱护着我的读者和编辑们。

这年冬天我调到文化馆。我躲在一间废弃的房子里读书，整整读了一个冬天又一个春天。我需要充实是因为深知自己艺术功底的浅薄。这个时期中国文坛新刊物如雨后春笋，几乎每个月都有热门作品爆响，有新的作家跃上文坛。我心里十分鼓舞，却依然冷下心来读我的书。到一九七九年五月末，我觉得心力和气力都已充实才开始动笔，写下了《信任》。

我第一次渴望别人的鼓励。我如愿以偿得到了十分及时的热诚的鼓励。作品见报的第二天我在一个座谈会上碰到杜鹏程同志，一见面就转达了他和王汶石同志鼓励的话。十天后接到责任编辑吕震岳的电话，要我去报社看读者来信。我一封一封仔细翻阅那一摞热情洋溢的读者来信的时候，我的鼻腔连连发酸。我此刻才发觉自己精神世界里十分脆弱的另一面……大约过了一月，我又从《人民文学》编辑朋友的来信中得知光年同志的热切关怀和鼓励。

八年过去了，《信任》荣幸获奖，又被翻译成英文和日文在美国和日本出版，每一次有关该篇小说的反响到来的时候，我总是首先忆及关心过她也鼓励过我的读者、编辑和老前辈。然而我至今也没有向张光年同志写过一封感谢的信，更没有一次机会能与他相识。机会终于在我们欢庆党的十三大胜利闭幕的时刻到来了。

吃便宴时，作家们互相频频举杯开怀畅饮，为了自己欢愉之心情，更为了党和国家的里程碑式的胜利。我与同桌的金河提议，向光

年同志敬一杯生日喜酒，金河欣然，同桌的李希凡也响应了，我们三人走到张光年同志的桌前，说一声：“光年同志，祝您生日愉快。”张光年同志举起杯来，喜不自胜。他大约从口音上听出了陕西关中的古调，笑问：“你是忠实同志吧？”我点头称是。

再没有多说一句话。再多说什么都多余。对于一个宽厚老者来说，他一生爱护关心鼓励过多少后来者，我想他并不要听被鼓励被关心者的什么感谢的话。

然而我毕竟偿还了一宗积沉八年的夙愿，向德高望重的文学前辈，敬一杯生日欢庆的酒，祝这样的宽厚长者在中国长寿。我也同时想到步入中年的自己，文学创作的进展和拓宽自然全得靠自己埋头苦干，不论所得属大属小属高能属低能，那仅仅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全部；另一方面也许是很重要的一面，得修一副宽厚的心胸，与同人们共同前进，共同开创文学艺术欣欣向荣的新局面。

1988年1月6日

默默此情谁诉

十一月三日，我从乡下住处回到作协已是十二点钟了。我匆匆赶到西安晚报社张月赓家里，交给他一件捎带的东西。闲聊间月赓说，好久没见老蒙了，我想请你和老蒙到家里来喝一杯，我们三个还没在一起喝过酒哩！我就告诉他，老蒙给我说过至少两三次：约月赓来，咱们三个喝一杯。于是，我就让他约人定时间。我期待着这样的一次聚会……可是，谁料想，就在这一天清晨，蒙老师突然离开我们到另一个世界去了。

他走得那么匆忙，没来得及给他的亲人和朋友们留一句话，这是令人多么痛心的事啊！

此前四个月的七月中旬，作协在太白县召开“陕西长篇小说创作讨论会”，蒙老师作为陕西文学界活跃的评论家被邀参加。他是从宝鸡来到太白县的。他在宝鸡为西大作家班的青年作家联系洽谈写报告文学集子的事，忙得不亦乐乎，终于完满地解决了问题。这是暑假，没有了教学的负担而可以潜心著书立论的宝贵时间，他毅然放弃了，冒着关中三伏的酷热到宝鸡奔走，为青年作家创造创作实习的条件。

在太白一见面，他就说，太白好凉快；我是到这儿乘凉来了。完全是一种逛会的宣言。我已经了知他的这种习性，其实他是最认真的会员。他一次不拉地参加讨论会，听取发言者的或是长篇宏论或是一言半语的插话。他一直没有说话，直到最后一个下午才说了大约不到一刻钟的话。他的发言不是所有的人都会赞同，这是极正常也是极普通的事，而他的坦率诚恳的用心却几乎使所有的人都为之感动。他是

那样严肃认真热情地关注着长篇小说创作的发展以及陕西中青年作家的创作的现状。评论家刘建军和畅广元随之借着他的话题即兴发挥，讨论由此而逐渐深入并且形成热点。他在认真地思考问题，他却说他是来乘凉的。

我因此而想到八年前在太白的相聚。那是粉碎“四人帮”后文艺复兴初期作协召开的一次很成功的会议。当时陕西开始涌现出一批中青年作家，会议讨论这批作家的优长和发展。我和蒙万夫老师被会议的组织者安排在一个屋子。我当时和他认识不久，交往不多，有点怯生或者说陌生。我想，我是来自乡间的草莽，他是高等学府的教师，我总觉得无法掩饰自己的浅陋。但他待人随和的态度和那种随意的习性使我很快消除了拘谨。那时候我的短篇《信任》刚刚获得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我说到从这篇小说引起的惶惑。他说，你就写你的，你按你的兴趣写。《信任》好得很！有个性。没有个性的作品就跟没有个性的人一样让人难受。短短几天的相处，我感受到了一个可信赖的良师益友的脾性正与我合拍，从此就开始了我们愈来愈真挚的感情的交汇和友情的发展。此后八年之久以至到第二次相聚在太白，我们的友谊可以说像夏天一样成熟了。

我那时在灞桥区文化馆工作，馆里举办了一期创作讲习班，灞桥地区的农村、工厂、学校等单位的五六十名文学爱好者参加了。我去西大约请蒙老师讲课，他满口应承，这就一下消除了我来时心存的“庙小难安大神”的顾虑。我随之就抱歉地说明，文化馆无车，我也借不来车，只好委屈你坐公共汽车了。他反而怨我说，你这人，作那个难干啥哩！你给我说清去灞桥该坐哪路车，在哪儿乘车、换车就行了，再就甭管了，保证误不了讲课。

果然，我早晨起来还未来得及吃早点，蒙老师已经走进我的屋子。一进门就轻松地说，汽车方便得很嘛！路也不远。我就感到他是继续以轻松的话来解除我的窘迫。金钱和利害可以使人结成铁哥儿死党，而真诚却使人更觉得可靠和信赖，也更耐人回味和珍惜。

他的讲演大获成功——我是第一次听他正儿八经拉开场子讲文学创作。他没有讲义，一直站着而拒绝坐椅子。他一口气讲了三个多小时，讲到托尔斯泰、巴尔扎克、雨果和柳青，又讲到中国一九八〇年那时候活跃于文坛的中青年作家以及陕西的中青年作家和他们的作品。他纵古横今旁征博引深入浅出，把比较干巴的文学理论讲得生趣盎然，偶尔挟带的轶事趣闻引起哗笑，而又紧紧围绕他讲话的命题。课后几个学员直后悔没带录音机来，说把这场讲课录下来再整理出来就是一篇严密的论文。我有同感。他讲课时的选词用语十分严密，似乎是在念讲义，而他手里什么也没拿。这是我第一次见识作为学者的蒙万夫的硬功夫、真本领以及演讲的风采。

作为学者的蒙老师身上又保存着明显的农民的生活习性。他对农村的事特别有兴趣，我们见面时，他就问农村的收成，责任制实行过程中的农民情绪。他第一次到我乡下的住处来，我正在完成新屋建筑的最后工作，几个农民青年工匠正吃饭，他就和他们坐到一张小桌上，拒绝我为他另外置饭的考虑，而且很快就和那些青年工匠聊得嘻嘻哈哈。

那天饭后我领他到灞河川道里散步，春夏相交时节的河川正是最丰满的景色，麦子孕穗，豌豆结荚，河水清冽，水鸟恋情于水上沙滩。我和张月赓在水边说话，蒙老师已脱了鞋袜，涉水到河心露出水面的大石头上，掬膝而坐，环顾四野。老张对我说，看看，老蒙陶醉于大自然的韵味里去了。我却想到他说过他也是来自农村，考上大学

才进入西安，他也许沉入童年农村生活的回味，那是对一种熟悉的却又久违了的生活的回嚼。老张说，我们还是不要扰乱老蒙的情绪。于是，我俩就顺着水边走下去，走过半里多远，回头望过去，蒙老师仍然坐在那块露出河心的大石头上凝神不动，像一尊石雕。当我们终于涉过河水，走上对岸的沙堤会面以后，蒙老师第一句话就是：现在才最清醒地感觉到城市单元楼的全部可怕了！

认识蒙老师不久，他即向我提出，你以后在什么地方发表东西，告诉我一声，说清报纸杂志的名字和期号，我一定会找到的。如果你有多余的寄给我一份更好了。他没有说要这些东西作何用。我也没有问，以为他想看看我的创作发展罢了。自此以后，我就如约把我在一些杂志和报刊发的东西寄给或送给他。他看罢后，往往就成为我们再见面时的话题。此后他又提出，让我把此前发表过的全部作品送给他一览，包括"文革"前的几篇很难称为作品的习作以及"文革"当中曾使我汗颜的几篇小说，我把存留下来的全都背去给他看了。当他后来送还给我的时候，已经替我编了码，整理得有条有理了。

后来，他约我认真谈一次，不仅是创作，还有生活的历程。那天在一间储藏杂物的屋子里我们谈开了，有他的三四个学生一起谈，整整谈了一天，从家庭谈到读书和工作的整个历程，谈到第一次对文学感兴趣以及后来走过的坎坷的创作之路。谈话虽然杂乱无章，却也是我自己一次较为认真的回顾。不久他和学生把我的谈话整理成文，打印成册，并送给我几份。我仍然搞不清他费这么大的力气的用意，只是以为他想了解我的生活和文学经历而已。但有一天他告诉我，《笔耕》文学评论组拟出版一本评论西北五省活跃的中青年作家的评论集，《笔耕》的主要评论家每人写一个作家，我的评论由他写。他说，我现在才觉得可以给你说这个话了，关于你的评论我可以写了。

又过了好些日子，有一天收到他的信，说文章已写完，让我去看看。我一看就愣住了，洋洋三万言，已经誊写清楚，名曰《陈忠实论》。那本书规定只能容纳一万字，他就节选出一万字编入了，整个文章后来发表在《文学家》杂志上。看罢文章我才明白，此间我们几次见面，几次交谈，都是他对我的创作的一些思考，和我交换看法。那些看法成为他的评论文章的重要论点。我无意评说这篇文章。我对这篇文章的看法早已与他谈过，尤其使我感动的是他做学问的那种认真精神，为了这篇文章，他间接和直接摊了多少工夫啊！

大概正在他酝酿写作这篇文章的时间里，我在《延河》上发了一篇《答读者问》的创作谈。他看罢即写信给我，说他想不到我说的"最喜欢的作品是《梆子老太》"的话，约我谈一下。此前他曾谈过他不大欣赏《梆子老太》，认为与其他中篇相比是次一些的。我说，我不是觉得这部中篇写得好与不好的问题，我喜欢这部中篇只是因为《梆子老太》改变了以往以故事和情节结构作品的手法，是以人物结构的，是创作试验。他仍然申述这篇作品不好的原因，而且有点激动。于是，我们第一次发生了争论。争论的结果是他仍然把自己的观点写进了评论。我因此反而更敬重他：一个认真做学问的人的品格本该如此。

今天离蒙老师去世已近百日，回忆我和他从相识到相知的十个年头里，我们已经有过多少次倾心的交谈：他催我奋进，给我安慰。可如今，天上人间，何处话衷肠……

1989年1月28日 白鹿园

又见鹭鸶

那是春天的一个惯常的傍晚，我沿着水边的沙滩漫不经意地悠步。旱草和水草都已经蓬勃起来，河川里满眼都是盎然生机，野艾苦蒿薄荷和鱼腥草的气味混合着弥漫在空气里，风轻柔而又湿润。在桌椅间窝蜷了一天的四肢和绷紧的神经，渐渐舒展开来松弛开来。

绕过一道河石垒堆的防洪坝，我突然瞅见了鹭鸶，两只，当下竟不敢再挪动一步，生怕冲撞了它惊飞了它，便蹑手蹑脚悄悄默默在沙地上坐下来，压抑着冲到唇边的惊叹，哦！鹭鸶又飞回来了！

在顺流而下大约三十米外，河水从那儿朝南拐了个大弯儿，弯儿拐得不急不直随心所欲，便拐出一大片生动的绿洲，贴近水流的沙滩上水草尤其茂密。两只雪白的鹭鸶就在那个弯头上踯躅，在那一片生机盎然的绿草中悠然漫步；曲线优美到无与伦比的脖颈迅捷地探入水中，倏忽又在草丛里仰起头来；两条峭拔的长腿淹没在水里，举趾移步优然雅然；一会儿此前彼后，此左彼右，一会儿又此后彼前此右彼左；断定是一对儿没有雄尊雌卑或阴盛阳衰的纯粹感情维系的平等夫妻……

于是，小河的这一方便呈现出别开生面令人陶醉的风景，清澈透碧的河水哗哗吟唱着在河滩里蜿蜒，两个穿着艳丽的女子在对岸的水边倚石搓洗衣裳，三头紫红毛色的牛和一头乳毛嫩黄的牛犊在沙滩草地上吃草，三个放牛娃三对角坐在草地上玩扑克，蓝天上只有一缕游丝似的白云凝而不动，落日正渲染出即将告别时的热烈和辉煌……这些时常见惯的景致，全都因为一双鹭鸶的出现而生动起来。

不见鹭鸶，少说也有二十多年了。小时候在河里耍水在河边割草，鹭鸶就在头前或身后的浅水里，有时竟在草笼旁边停立；上学和下学涉过河水时，鹭鸶在头顶翩翩飞翔，我曾经妄想把一只鸽哨儿戴到它的尾毛上；大了时在稻田里插秧或是给稻畦里放水，鹭鸶又在稻田圪梁上悠然踱步，丝毫也不戒备我手中的铁锨……难得泯灭的永远鲜活的鹭鸶的倩影，现在就从心里扑飞出来，化成活泼的生灵在眼前的河湾里。

至今我也搞不清鹭鸶突然离去突然绝迹的因由，鸟类神秘的生活习性和生存选择难以揣摩。岂止鹭鸶这样的小河流域鸟类中的贵族，乡民们视作报喜的喜鹊也绝迹了，张着大翅盘旋在村庄上空窥伺母鸡的恶老鹰彻底销踪匿迹了，连丑陋不堪猥琐笨拙的斑鸠也再不复现了，甚至连飞起来遮天蔽日的丧婆儿黑乌鸦都见不着一只，只有麻雀种族旺盛，村庄和田野处处都只能听到麻雀的叽叽喳喳。到底发生了什么灾变，使鸟类王国土崩瓦解灭族灭种留下一片大地静悄悄?

单说鹭鸶。许是水流逐年衰枯稻田消失绿地锐减，这鸟儿瞧不上越来越僵硬的小河川道了？许是乡民滥施化肥农药污染了流水也污浊了空气，鹭鸶感到窒息而逃逸了？许是沿河两岸频频敲打的庆贺“指示”发表的锣鼓和震天撼地的炮铳，使这喜欢悠闲的贵族阶级心惊肉跳恐惧不安，抑或是不屑于这一方地域上人类的愚蠢可笑拂尾而去？许是那些隐蔽在树后的猎手暗施的冷枪，击中了鹭鸶夫妻双方中的雌的或雄的，剩下的一个鳏夫或寡妇悲怆遁逃?

又见鹭鸶！又见鹭鸶！

落日已尽红霞隐退暮霭渐合。两只鹭鸶悠然腾起，翩然闪动着洁白的翅膀逐渐升高，没有顺河而下也没见逆流而上，偏是掠过小河朝

北岸树木葱茏的村庄飞去了。我顿然悟觉，鹭鸶原是在村庄里的大树上筑巢育雏的。我的小学校所在的村庄面临河岸的一片白杨林子里，枝枝杈杈间竟有二十多个鹭鸶搭筑的窝巢，乡民们无论男女无论老幼引为荣耀视为吉祥。一只刚刚生出羽毛的雏儿掉到地上，竟然惊动了整个村庄的男女老少，合议着公推一位爬树利落的姑娘把它送回窝儿里。更不必担心伤害鹭鸶的事了，那是被视为作孽短寿的事。鹭鸶和人类同居一处无疑是一种天然和谐，是鸟类对人类善良天性的信赖和依傍。这两只鹭鸶飞到北岸的哪个村庄里去了呢？在谁家门前或屋后的树上筑巢育雏呢，谁家有幸得此吉兆得此可贵的信赖情愫呢?

我便天天傍晚到河湾里来，等待鹭鸶。连续五六天，不见踪影，我才发现没有鹭鸶的小河黯然失色。我明白自己实际是在重演那个可笑的“守株待兔”的寓言故事，然而还是忍不住要来。鹭鸶的倩影太富于诱惑了。那姿容端的是一种仙骨神韵，一种优雅一种大度一种自然；起飞时悠然翩然，落水里也悠然翩然，看不出得意时的昂扬恣肆，也看不出失意下的气急败坏；即使在水里啄食小虫小虾青叶草芽儿，也不似鸡们鸭们雀们饿不及待的贪馋和贪婪相。二三十年不见鹭鸶，早已不存再见的期冀和奢望，一见便不能抑制和罢休。我随之改变守候而为寻找，隔天沿着河流朝下，隔天又溯流而上，竟是一周的寻寻觅觅而终不得见。

我又决定改变寻找的时间，于是舍弃了一个美好的出活儿的早晨，在黎明的熹微中沿着河水朝上走。大约走出五华里路程，河川骤然开阔起来，河对岸有一大片齐肩高的芦苇，临着流水的芦苇幼林边，那两只鹭鸶正在悠然漫步，刚出山顶的霞光把白色的羽毛染成霓虹。

哦！鹭鸶还在这小河川道里。

哦！鹭鸶对人类的信赖毕竟是可以重新建立的。

我在一块河石上悄然坐下来，隔水眺望那一对圣物，心头便涌出一首脍炙人口的诗歌来：

蒹葭苍苍

白露为霜

所谓伊人

在水一方

1992年8月西安

汽笛·布鞋·红腰带

一个年过五十的人，依然清晰地记得平生听到第一声火车汽笛时的情景。

他当时刚刚勒上了头一条红腰带。这是家乡人遇到本命年时避灾禳祸乞求平安福祉的吉祥物，无论男女无论长幼无论尊卑都要在本命年到来的头一天早晨穿裤子时勒上腰的。那是母亲用自纺的棉线四股合成一股，经过浆洗经过大红颜色的煮染再经过蜂蜡的打磨，然后把经线绷在两个膝盖之间织成的。早在母亲搓棉花捻子和纺线的时候就不断念叨："娃的本命年快到了，得织一条红腰带。"在标志着一年将尽的最后一个月份——腊月——到来之前，母亲已经织好了一条红腰带，只让他试着勒了一下就藏进木板柜里，直到大年三十晚上才取出来放到枕头旁边，叮嘱他天明起来换穿新衣新裤时结上那根红腰带。他那时只是为了那条鲜红的线织腰带感到新奇而激动不已，却不能意识到生命历程的第二个十二年将从明天早晨开始……

半年以后，他勒在腰里的红带已经变成了紫黑色的了，鲜艳的红色被汗渍尿垢以及褪色的黑裤污染得失去了原本的颜色。他依旧勒着这条保命带走出了家乡小学所在的小镇，到三十里外的历史名镇灞桥去投考中学。领着他的是一位四十多岁的班主任老师，姓杜；和他一起去投考的有二十多个同学，这些小学同学中有的已经结婚，那是他们在新中国成立后才迟迟获得读书机会的缘故，他是他们当中年龄最小个头最矮的一个。

这是一次真正的人生之旅。

从小镇小学校后门走出来便踏上了公路。这是一条国道，西起西安沿着灞河川道再进入秦岭，在秦岭山岩中盘旋蜿蜒一直通到湖北省内。这是他第一次走出家门三公里以外的旅行。他昨夜激动惶惧得几乎不能成眠；他肩头挎着一只书包，包里装着课本，一支毛笔和一只墨盒，还有几个学生灶发给的混面馍馍，还有一块洗脸擦脸用的布巾，同样是母亲用织布机织下的手工布巾……口袋里却连一分钱也没有。

开始上路他和老师、同学相跟着走，大约走出十多里路也不觉得累，同学们大都是来自小镇附近村庄，谁也没出过远门，兴致很高心劲十足一路说说笑笑叽叽嘎嘎。后来的悲剧是从脚下发生的。他感觉脚后跟有点疼，脱下鞋来看了看，鞋底磨透了，脚后跟上磨出红色的肉丝淌着血，血浆渗湿了鞋底和鞋帮。他首先诅咒的便是砂石铺垫的国道上的砂子，全然想不到母亲纳扎的布鞋鞋底经不住砂石的磨砺，随后才意识到是一双早已磨薄了的旧布鞋的鞋底。在他没有发现鞋破脚破之前还能撑持住往前走，而当他看到脚后跟上的血肉时便怯了，步子也慢了。

似乎不单是脚后跟上出了毛病，全身都变得困倦无力，双腿连往前挪一步的勇气都没有了，每一次抬脚举步都畏怯落地之后所产生的血肉之苦。他看见杜老师在向他招手。他听见同学在前头呼叫他。他流下眼泪来，觉得再也撵不上他们了。他企望能撞见一位熟人吆赶的马车，瞬间又悲哀地想到，自己其实原来就不认识任何一位车把式。

他看见杜老师和一位结过婚的小学生大同学倒追过来，立即擦干了眼泪。老师和同学的关心鼓励丝毫也不能减轻脚下的痛楚和抬脚触地时引发的内心的畏怯。老师和大同学不能只等他一人而往前走了。他没有说明鞋底磨透脚跟磨烂的事，不是出于坚强而纯粹是因为爱面

子，他怕那些能穿起耐磨的胶质球鞋的同学笑自己穷酸。这种爱面子的心理不知何时形成的，以至影响到他后来的全部生活历程，不愿意在任何人面前哭穷。老师和大同学临走时留给他的一句话是：“往前走不敢停。慢点儿不要紧只是不敢停下。我们在前头等你。”

他已经看不见杜老师率领着的那支小小的赶考队伍了。他期望在路上捡到一块烂布包住脚后跟，终于没有发现哪怕是巴掌大的一块碎布而失望了。他从路边的杨树上捋下一把树叶塞进鞋窝儿，大约只舒服了两分钟走出不过十几米就结束了暂短的美好和幼稚。他终于下狠心从书包里摸出那块擦脸用的布巾，相当于课本的两倍大小，只能包住一只脚。洗脸擦脸已经不大重要了，撩起衣襟就可以代替布巾来使用。用布巾包住的一只脚不再直接遭受砂石的蹭磨减轻了疼痛，况且可以使另一只脚踮起脚尖而避免脚后跟着地。他踮着一只脚尖就跛着往前赶，果然加快了行速。走过不知有多少路程，布巾很快又磨透了，他把布巾倒过来再包到脚上，直到那块布巾被踩磨得稀烂而毫无用处。他最后从书包拿出了课本，先是算术，后是语文，一扎一扎撕下来塞进鞋窝……只要能走进考场，他自信可以不需要翻动它们就能考中；如果万一名落孙山，这些课本无论语文或是算术就都变成毫无用处的废物了。那些课本的纸张更经不住砂石的蹭磨，很快被踩踏成碎片从鞋窝里泛出来撒落到砂石国道上，像埋葬死人时沿路抛撒的纸钱。直到课本被撕光，他几乎完全绝望了，脚跟的疼痛逐渐加剧到每一抬足都会心惊肉跳，走进考场的最后一丝勇气终于断灭了。他站下随之又坐下来，等待有一挂回程的马车，即使陌生的车夫也要乞求。他对念中学似乎也没有太明晰的目标，回家去割草拾柴也未必不好……伟大的转机就在他完全崩溃刚刚坐下的时候发生了，他听到了一声火车汽笛的嘶鸣。

他被震得从路边的土地上弹跳起来。他被惊吓得几乎又软瘫坐下。他的耳膜长久地处于一种无知觉的空白。他的胸腔随着铿锵铿锵的轮声起伏着战栗着。他惊惧慌乱不知所措而茫然四顾，终于看见一股射向蓝天的白烟和一列呼啸奔驰过来的火车。他能辨识出火车凭借的是语文课本上的一幅拙劣的插图。这是他平生第一次看见火车。第一次听见火车汽笛的鸣叫。隐蔽在原坡皱褶里的家乡村庄，一年四季只有人声牛哞狗吠鸡鸣和鸟叫。列车从他眼前的原野上飞驰过去，绿色的车厢绿色的窗帘和白色的玻璃，启开的窗户晃过模糊的男人或女人的脸，还有一个把手伸出窗口的男孩的脸……直到火车消失在柳林丛中，直到柳树梢头的蓝烟渐渐淡化为乌有，直到远处传来不再那么震慑而显得悠扬的汽笛声响，他仍然无法理解火车以及坐在火车车厢里的人会是一种什么滋味儿？坐在飞驰的火车上透过敞开的窗口看见的田野会是怎样的情景？坐在火车上的人瞧见一个穿着磨透了鞋底磨烂了脚后跟的乡村娃子会是怎样的眼光？尤其是那个和他年岁相仿已经坐着火车旅行的男孩？

天哪！这世界上有那么多人坐着火车跑哩而根本不用双腿走路！他用双脚赶路却穿着一双磨穿了鞋底磨烂了脚后跟的布鞋一步一蹭血地踯躅！似乎有一股无形的神力从生命的那个象征部位腾起，穿过勒着红腰带的腹部冲进胸腔又冲上脑顶，他无端地愤怒了，一切朦胧的或明晰的感觉凝结成一句，不能永远穿着没后底的破布鞋走路……他把残留在鞋窝里的烂布绺烂树叶烂纸屑腾光倒净，咬着牙在砂石国道上重新举步，腿上有劲了，脚后跟也还在淌血还疼，走过一阵儿竟然奇迹般地不疼了，似乎那越磨越烂得深的脚后跟不是属于他的，而是属于另一个怯弱者懦弱鬼王八蛋的……在离考场的学校还有一二里远的地方，他终于追赶上了老师和同学，却依然不让他们看他惨不堪睹的两只脚后跟。

……

在那场历时十年的大浩劫发生时，他虽未被完全打翻却感到已经走到生命的尽头。那一年又正好是他勒上第二条红腰带开始第三轮十二年的时候。他被划进刘少奇路线而注定了政治生命的完结，他所钟情的文学在刚刚发出处女作便夭折了，家庭的灾难也接踵而至，不是祸不单行而是三面伏击四面楚歌。他步入社会尚无任何生活经验也无丝毫的防卫能力，很快便觉得进入绝境而看不出任何希望，不止一次于深夜走到一口水井边企图结束完全变成行尸走肉的自己。没有促成他纵身一投的缘由，便是他在那最后一刻听到了发自生命内部的那一声汽笛的鸣叫……

在他勒上第三条红腰带开始生命年轮的第四个十二年的时候，恰好又遭遇到一次重大的挫折。如果说上一次的遭遇与红腰带有无什么联系尚无意识，这一次就令他暗暗惊诧了，人类生命本身是否存在着一种神秘的周期性灾变？他不再以一个简单的无神论者的简单态度轻易去判断其有无了。这一次挫折纯粹是自作自受，不能怨天不能怨地更不能怨天下任何人，自己写下一篇对生活做出简单谬误判断的小说而声名狼藉。他曾想告别政坛也告别文学，重新回到学校做一名乡村教师，与农村孩子去交朋友。在那个人生重大抉择的重要关头，他不仅又一次听到了那声汽笛，而且想到了那双磨透了鞋底磨烂了脚跟的布鞋。有什么可畏惧的呢？本来就是穿着磨透鞋底的布鞋走进社会的，最终最糟失掉的大不了也就是又一双破烂布鞋……他走进图书馆，把莫泊桑和契诃夫的小说抱回住屋，昼夜与这两个欧洲人拥抱在一起。

他后来成为一个作家，但不是著名的，却终归算一个作家。这个作家已过“知天命”的年岁，回顾整个生命历程的时候，所有经过的欢

乐已不再成为欢乐，所有经历的灾难挫折引起的痛苦也不再是痛苦，变成了只有自己可以理解的生命体验，剩下的还有一声储存于生命磁带上的汽笛鸣叫和一双破了鞋底的布鞋。

他想给进入花季刚刚勒上头一条或第二条红腰带的朋友致以祝贺，无论往后的生命历程中遇到怎样的挫折怎样的委屈怎样的龌龊，不要动摇也不必辩解，走你认定了的路吧！因为任何动摇包括辩解，都会耗费心力耗费时间耗费生命，不要耽搁了自己的行程。

1993年6月18日草 小寨

6月21日改定

猜想死亡

天宇里

有一颗专司死亡的星星

是有意还是无意

是选择还是冒碰

一旦砸下来

便要击中一个天灵盖

这人便死了

无论是元首还是将军

抑或只是一个平民

它不辨善也不择恶

不分贵也不分贱

更没有公平可论

撞上谁

算谁倒霉

这个猜想如果成立

我们反而坦然

被砸中了便走向死亡

砸不上便继续做自己的事

总统继续竞选连任

将军继续操练士兵

平民继续忙油盐酱醋的日子

担忧根本无用

躲藏更属徒劳

运气仅仅在于

一个迟些……一个早些

1992年11月26日草

1993年9月16日改

晶莹的泪珠

我手里捏着一张休学申请书朝教务处走着。

我要求休学一年。我写了一张要求休学的申请书。我在把书面申请交给班主任的同时，又口头申述了休学的因由，发觉口头申述因为穷而休学的理由比书面申述更加难堪。好在班主任对我口头和书面申述的同一因由表示理解，没有经历太多的询问便在申请书下边空白的地方签写了“同意该生休学一年”的意见，自然也签上了他的名字和时间。他随之让我等一等，就拿着我写的申请书出门去了，回来时那申请书上就增加了校长的一行签字，比班主任的字签得少自然也更简洁，只有“同意”二字，连姓名也简洁到只有一个姓，名字略去了。班主任对我说：“你现在到教务处去办手续，开一张休学证书。”

我敲响了教务处的门板。获准以后便推开了门，一位年轻的女先生正伏在米黄色的办公桌上，手里提着长杆蘸水笔在一厚本表册上填写着什么，并不抬头。我知道开学报名时教务处最忙，忙就忙在许多要填写的各式表格上。我走到她的办公桌前鞠了一躬：“老师，给我开一张休学证书。”然后就把那张签着班主任和校长姓名和他们意见的申请递放到桌子上。

她抬起头来，诧异地瞅了我一眼，拎起我的申请书来看着，长杆蘸水笔还夹在指缝之间。她很快看完了，又专注地把目光留滞在纸页下端班主任签写的一行意见和校长更为简洁的意见上面，似乎两个人连姓名在内的十来个字的意见批示，看去比我大半页的申请书还要费时更多。她终于抬起头来问：

“就是你写的这些理由吗？”

“就是的。”

“不休学不行吗？”

“不行。”

“亲戚全都帮不上忙吗？”

“亲戚……也都穷。”

“可是……你休学一年，家里的经济状况也不见得能改变，一年后你怎么能保证复学呢？”

于是我就信心十足地告诉她我父亲的精确安排计划：待到明年我哥哥初中毕业，父亲谋划着让他投考师范学校，师范生的学杂费和伙食费全由国家供给，据说还发三块钱零花钱。那时候我就可以复学接着念初中了。我拿父亲的话给她解释，企图消除她对我能否复学的疑虑：“我伯伯说来，他只能供得住一个中学生；俺兄弟俩同时念中学，他供不住。”

我没有做更多的解释。我的爱面子的弱点早在此前已经形成。我不想再向任何人重复叙述我们家庭的困窘。父亲是个纯粹的农民，供着两个同时在中学念书的儿子。哥哥在距家四十多里远的县城中学，我在离家五十多里的西安一所新建的中学就读。在家里，我和哥哥可以合盖一条被子，破点旧点也关系不大。先是哥哥接着是我要离家到县城和省城的寄宿学校去念中学。每人就得有一套被褥行头，学费杂费伙食费和种种花销都空前增加了。实际上轮到我考上初中时已不再是考中秀才般的荣耀和喜庆，反而变成了一团浓厚的愁云忧雾笼罩在

家室屋院的上空。我的行装已不能像哥哥那样有一套新被子新褥子和新床单，被简化到只能有一条旧被子卷成小卷儿背进城市里的学校。我的那一绺床板终日裸露着缝隙宽大的木质板面，晚上就把被子铺一半再盖上一半。我也不能像哥哥那样由父亲把一整袋面粉送交给学生灶，而只能是每周六回家来背一袋杂面馍馍到学校去，因为学校灶上的管理制度规定一律交麦子面，而我们家总是短缺麦子而苞谷面还算宽裕。这样的生活我并未意识到有什么不好，因为背馍上学的学生远远超过能搭得起灶的学生人数，每到三顿饭时，背馍的学生便在开水灶的一排供水龙头前排起五六列长队，把掰碎的各色馍块装进各自的大号搪瓷缸子里，用开水浸泡后，便三人一堆五人一伙围在乒乓球台的周围进餐，佐菜大都是花钱买的竹篓咸菜或家制的腌辣椒，说笑和争论的声浪甚至压倒了那些从灶房领取炒菜和热饭的“贵族阶层”。

这样的念书生活终于难以为继。父亲供给两个中学生的经济支柱，一是卖粮，一是卖树，而我印象最深的还是卖树。父亲自青年时就喜欢栽树，我们家四五块滩地地头的灌渠渠沿上，是纯一色的生长最快的小叶杨树，稠密到不足一步就是一棵，粗的可作檩条，细的能当椽子。父亲卖树早已打破了先大后小先粗后细的普通法则，一切都是随买家的需要而定，需要檩条就任其选择粗的，需要椽子就让他们砍伐细的。所得的票子全都经由哥哥和我的手交给了学校，或是换来书籍课本和作业本以及哥哥的菜票我的开水费。树卖掉后，父亲便迫不及待地刨挖树根，指头粗细的毛根也不轻易舍弃，把树根劈成小块晒干，然后装到两只大竹条笼里挑起来去赶集，卖给集镇上那些饭馆药铺或供销社单位。一百斤劈柴的最高时价为一点五元，得来的块把钱也都经由上述的相同渠道花掉了。直到滩地上的小叶杨树在短短的三四年间全部砍伐一空，地下的树根也掏挖干净，渠岸上留下一排新插的白杨枝条或手腕粗细的小树……

我上完初一第一学期，寒假回到家中便预感到要发生重要变故了。新年佳节弥漫在整个村巷里的喜庆气氛与我父亲眉宇间的那种根深蒂固的忧虑形成强烈的反差，直到大年初一刚刚过去的当天晚上，父亲便说出来谋划已久的决策：“你得休一年学，一年。”他强调了一年这个时限。我没有感到太大的惊讶。在整个一个学期里，我渴盼星期六回家又惧怕星期六回家。我那年刚交十三岁，从未出过远门，而一旦出门便是五十多里远的陌生的城市，只有星期六才能回家一趟去背馍，且不要说一周里一天三顿开水泡馍所造成的对一碗面条的迫切渴望了。然而每个周六在吃罢一碗香喷喷的面条后便进入感情危机，我必须说出明天返校时要拿的钱数儿，一元班会费或五毛集体买理发工具的款项。我知道一根丈五长的椽子只能卖到一点五元钱，一丈长的椽子只有八角到一块的浮动区。我往往在提出要钱数目之前就折合出来这回要扛走父亲一根或两根椽子，或者是多少斤树根劈柴。我必须在周六晚上提前提出钱数，以便父亲可以从容地去借款。每当这时我就看见父亲顿时阴沉下来的脸色和眼神，同时，夹杂着短促的叹息。我便低了头或扭开脸不看父亲的脸。母亲的脸色同样忧愁，我似乎可以看；而父亲的脸眼一旦成了那种样子，我就不忍对看或者不敢对看。父亲生就的是一脸的豪壮气色，高眉骨大眼睛统直的高鼻梁和鼻翼两边很有力度的两道弯沟，忧愁蒙结在这样一张脸上似乎就不堪一睹……我曾经不止一次地产生过这样的念头，为什么一定要念中学呢？村子里不是有许多同龄伙伴没有考取初中仍然高高兴兴地给牛割草给灶里拾柴吗？我为什么要给父亲那张脸上周期性地制造忧愁呢……父亲接着就讲述了他得让哥哥一年后投考师范的谋略，然后可以供我复学念初中了。他怕影响一家人过年的兴头儿，所以压在心里直到过了初一才说出来。我说：“休学。”父亲安慰我说：“休学一年不要紧，你年龄小。”我也不以为休学一年有多么严重，因为同班的五十多名男女同学中有不少人都结过婚，既有孩子的爸爸，也有做了妈妈

的，这在五十年代初并不奇怪，解放后才获得上学机会的乡村青年不限年龄。我是班里年龄最小个头最矮的一个，座位排在头一张课桌上。我轻松地说：“过一年个子长高了，我就不坐头排头一张桌子咧——上课扭得人脖子疼……”父亲依然无奈地说：

“钱的来路断咧！树卖完了——”

她放下夹在指缝间的木质长杆蘸水笔，合上一本很厚很长的登记簿，站起来说：“你等等，我就来。”我就坐在一张椅子上等待，总是止不住她出去干什么的猜想。过了一阵儿她回来了，情绪有些亢奋也有点激动，一坐到她的椅子上就说：“我去找校长了……”我明白了她的去处，似乎验证了我刚才的几种猜想中的一种，心里也怦然动了一下，她没有谈她找校长说了什么，也没有说校长给她说了什么。她现在双手扶在桌沿上低垂着眼，久久不说一句话。她轻轻舒了一口气，仰起头来时我就发现，亢奋的情绪已经隐退，温柔妩媚的气色渐渐回归到眼角和眉宇里来了，似乎有一缕淡淡的无能为力的无奈。

她又轻轻舒了口气，拉开抽屉取出一本公文本在桌子上翻开，从笔筒里抽出那支木杆蘸水笔，在墨水瓶里蘸上墨水后又停下手，问：“你家里就再想不下办法了？”我看着那双滋浮着忧郁气色的眼睛，忽然联想到姐姐的眼神。这种眼神足以使任何被痛苦折磨着的心平静下来，足以使任何被痛苦折磨得心力交瘁的灵魂得到抚慰，足以使人沉静地忍受痛苦和劫难而不至于沉沦。我突然意识到因为我的休学致使她心情不好这个最简单的推理。而在校长班主任和她中间，她恰好是最不应该产生这种心情的。她是教务处的一位年轻职员，平时就是在教务处做些抄抄写写的事，在黑板上写一些诸如打扫卫生的通知之类的事，我和她几乎没有说过话，甚至至今也记不住她的姓名。我便说：“老师，没关系。休学一年没啥关系，我年龄小。”她说：“白白耽

搁一年多可惜！”随之又换了一种口吻说：“我知道你的名字也认得你。每个班前三名的学生我都认识。”我的心情突然灰暗起来而没有再开口。

她终于落笔填写了公文函，取出公章在下方盖了，又在切割线上盖上一枚合缝印章，吱吱吱撕下并不交给我，放在桌子上，然后把我的休学申请书抹上糨糊后贴在公文存根上。她做完这一切才重新拿起休学证书交给我说：“装好。明年复学时拿着来找我。”我把那张硬质纸印制的休学证书折叠了两番装进口袋。她从桌子那边绕过来，又从我的口袋里掏出来塞进我的书包里，说：“明年这阵儿你一定要来复学。”

我向她深深地鞠了躬就走出门去。我听到背后咣当一声闭门的声音，同时也听到一声“等等”。她拢了拢齐肩的整齐的头发朝我走来，和我并排在廊檐下的台阶上走着，两只手插在外套的口袋里。走过一个又一个窗户，走过一个又一个教室的前门和后门，校园里和教室里出出进进着男女同学，有的忙着去注册去交费，有的已经抱着一摞摞新课本新作业本走进教室，还有从校门口刚刚进来的背着被卷馍袋的迟来者。我忽然心情很不好受，在争取得到了休学证后心劲松了吗?我很不愿意看见同班同学的熟悉的脸孔，便低了头匆匆走起来，凭感觉可以知道她也加快了脚步，几乎和我同时走出学校大门。

学校门口又涌来一拨偏远地区的学生，熟悉的同学便连连问我：“你来得早！报过名了吧？”我含糊地笑笑就走过去了，想尽快远离正在迎接新学期的洋溢着欢跃气浪的学校大门。她又喊了一声“等等”。我停住脚步。她走过来拍了拍我的书包：“甭把休学证弄丢了。”我点点头。她这时才有一句安慰我的话：“我同意你的打算，休学一年不要紧，你年龄小。”

我抬头看她，猛然看见那双眼睫毛很长的眼眶里溢出泪水来，像雨雾中正在涨溢的湖水，泪珠在眼里打着旋儿，晶莹透亮。我瞬即垂下头避开目光。要是再在她的眼睛里多驻留一秒，我肯定就会号啕大哭。我低着头咬着嘴唇，脚下盲目地拨弄着一颗碎瓦片来抑制情绪，感觉到有一股热辣辣的酸流从鼻腔倒灌进喉咙里去。我后来的整个生命历程中发生过多少这种酸水倒流的事，而倒流的渠道却是从十四岁刚来到的这个生命年轮上第一次疏通的。第一次疏通的倒流的酸水的渠道肯定狭窄，承受不下那么多的酸水，因而还是有一小股从眼睛里冒出来，模糊了双眼，顺手就用袖头揩掉了。我终于仰起头鼓起劲儿说：“老师……我走咧……”

她的手轻轻搭上我的肩头：“记住，明年的今天来报到复学。”

我看见两滴晶莹的泪珠从眼睫毛上滑落下来，掉在脸鼻之间的谷地上，缓缓流过一段就在鼻翼两边挂住。我再一次虔诚地深深鞠躬，然后就转过身走掉了。

二十五年后，卖树卖树根（劈柴）供我念书的父亲在癌病弥留之际，对坐在他身边的我说：“我有一件事对不住你……”

我惊讶得不知所措。

“我不该让你休那一年学！”

我浑身战栗，久久无言。我像被一吨烈性“梯恩梯”炸成碎块细末儿飞向天空，又似乎跌入千年冰窖而冻僵四肢冻僵躯体也冻僵了心脏。在我高中毕业名落孙山回到乡村的无边无际的彷徨苦闷中，我曾经猴急似的怨天尤人：“全都倒霉在休那一年学……”我一九六二年毕业恰逢中国经济最困难的年月，高校招生任务大大缩小，我们班里剩

了光头，四个班也仅仅只考取了一个个位数，而在上一年的毕业生里我们这所不属重点的学校也有百分之五十的学生考取了大学。我如果不是休学一年当是一九六一年毕业……父亲说：“错过一年……让你错过了二十年……而今你还算熬出点名堂了……”

我感觉到炸飞的碎块细末儿又归结成了原来的我，冻僵的四肢自如了冻僵的躯体灵便了冻僵的心又噎噎噎跳起来的时候，猛然想起休学出门时那位女老师溢满眼眶又流挂在鼻翼上的晶莹的泪珠儿。我对已经跨进黄泉路上半步的依然向我忏悔的父亲讲了那一串泪珠的经历，我称呼伯伯的父亲便安然合上了眼睛，喃喃地说：“可你……怎么……不早点给我……说这女先生哩……”

我今天终于把几近四十年前的这一段经历写出来的时候，对自己算是一种虔诚祈祷，当各种欲望膨胀成一股强大的浊流冲击所有大门窗户和每一个心扉的当今，我便企望自己如女老师那种泪珠的泪泉不致堵塞更不敢枯竭，那是滋养生命灵魂的泉源，也是滋润民族精神的泉源哦……

1993年11月22日 渭南

毛泽东的人格力量

我想引用一段小插曲作为这篇祝辞的开头。这是今年十月我随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意大利的一朵花絮。在一家皮货商店里，一位年轻店员突然对着作家张锲惊叫起来：“毛——毛——”张锲是中国作家，兼着中华文学基金会总干事长。他长得酷似毛泽东的面容，脸形眼睛鼻子和嘴巴都像极了，只是下巴上少一颗痣。加上超出一点八米的个头和魁梧的块头，挺气魄的。那位店员接着就要与张锲合影。张锲有点不好意思冒充伟人，在大伙嘻嘻哈哈的敦促下就当了一回毛泽东。这种情景在我已不觉新鲜，因为自进入意大利以来已经发生过三次，在宾馆，在饭店，常有人走上前来拉住张锲的手惊喜地呼叫着“毛——毛——”。

这是在亚平宁半岛。这个半岛上的许多普通人，甚至可以说是社会最底层的人，至今还记得一位业已逝去十七年的中国人的领袖毛泽东的音容笑貌，我在那一刻确实感到了作为一个中国人的自豪。因为，在我来说，恐怕根本无法在人群里辨别出与任何一届意大利总统相像的人来。

毛泽东至今依然被这个半岛上的普通人记着，肯定不单是他作为一个大国大党的领袖；他的思想他的智慧他创立的伟业，甚至包括他晚年的错误，都证明他起码不是一个平庸的领袖。因为在他谢世后，世界上有些政客朝他泼去了够多的污水，这种泼污水的举动与中国共产党严肃地纠正错误不在一个思维档次，也不在同一人格品位上。亚平宁半岛的普通人似乎并没有把泼给毛泽东的污水当回事，依然崇敬他，以至惊呼着要与一位和毛泽东相像的中国作家照相留念。

我现在更深地感受到毛泽东的人格力量，他不单具备一个大国大党领袖的崇高人格，而且代表着一切普通中国人的独立人格。除了他的思想他的文采，现在更能唤起我们心灵呼应的就是这种人格力量。我们在阅读许多追忆毛泽东往事的资料时，恰恰是他一顿简单的午餐，一双破烂的皮鞋或拖鞋，一串自然泄出的风趣幽默的话语，一个有力的手势或是一个由激奋过渡到微笑的表情，常常引起我灵魂的战栗。尤其在看到他与政治经济大国首脑接触谈话时毫不做作的自然举动中的自信，维护国家和民族独立的坚定与凛然，便自然引发起心灵的震撼……这是所有演技演员所无法模拟的。

相信随着社会的进步、繁荣和多样化，我们将更崇尚这种独立人格作为灵魂的支撑，因为这毕竟是一个具有五千年文明史的伟大的民族。聚在这里的年轻人，对自己逝去的领袖所洋溢着的巨大热情，使直接经受过毛泽东时代的我感到欣慰，这是我们在争取新生活的历程中所最可珍贵的情怀。

1993年12月

寓言两则

老母鸡和小公鸡的故事

一只老母鸡在一堆垃圾里刨食。这自然是乡村里的垃圾堆而不是城市里的垃圾桶。老母鸡刨得专心致志全身心投入，不时有所收获，一颗谷粒麦粒一片菜叶菜根，甚或一条肥嫩的蛆虫，她每遇此等美事便情不自禁地咕咕咕吟唱起来。

她突然刨出来一只蛋壳。这只蛋壳顶部有个圆洞，其余部分都十分完整，虽然表皮上粘着灰屑和泥痕，仍然可以辨别出原来的黄色。老母鸡正想啄食蛋壳，猛然间觉得眼熟，似曾相识，终于确认出这只蛋壳是她春天孵育过鸡雏的一只空壳，便停止了企图啄食的欲望，而且思绪浮动起来，这毕竟是她翅膀和肚皮温暖过整整二十一个日日夜夜的一只蛋壳。

这只黄色蛋壳育出过一只小公鸡。她清楚地记得这只小公鸡是第一个啄破蛋壳出世的，红褐色的绒毛，而且一直是那一群姊妹兄弟中最健壮也最好强的一个。他已经出脱为一只健美漂亮的血冠如帜的红公鸡了。老母鸡仰头四顾，想找到儿子，让他来看看曾经养育过他的这只了不起的蛋壳。

红公鸡正在不远处的一个柴火垛子上引颈啼鸣，向人们报告午时已到的时辰。阳光灿烂，暑热如炙。他刚刚学会叫鸣啼唱，声音还不雄浑，还不嘹亮，还不大自如自然，甚至有些引人发笑的稚声奶气，然而他依然站立在柴火垛子上，或是跳上树枝，或是跃上农家围墙，

毫不羞怯地朝着太阳啼鸣高唱……老母鸡拍打着翅膀呼叫自己的儿子。

红公鸡跳下棉花秆儿垛子，飞跑着来到母鸡刨食的垃圾堆上。

“亲爱的大儿子，你认识它吗！”

“一只蛋壳嘛！”

“瞧你轻淡的口气儿——‘一只蛋壳嘛’！你仔细瞧瞧——”

“我再看一百遍也还是一只普普通通的蛋壳。你说吧妈妈，它有什么好贵重的？”

“它是你出生的那只蛋壳！”

“哦——是吗？让我好好瞧瞧……”

老母鸡便情不自禁地向儿子叙说这只蛋壳的全部美妙：“那时候你睡在这只蛋壳里，我用翅膀把你抱在肚子底下，不论外头刮风、下雨、闪电、打雷，不论白天黑夜，你都不用担心受冷受冻，也不担惊受怕，更不用担心老鼠和狗猫伤害你……”

红公鸡感恩戴德地说：“不敢忘妈妈养育之恩。”

老母鸡说：“孩子，你那次偷吃人家晾晒的苞谷，差点给主人一鞭子抽死；有一晚鼠狼子钻过窝里叼走了你三弟，你吓得大病一场；前天那场暴风骤雨，差点儿把你拍击死了……这世界时时处处充满凶险！”

红公鸡说：“是的，凶险不少。”

老母鸡说：“孩子，你还是回到这个蛋壳里头去，那里头又安全又温馨。”

红公鸡瞅着蛋壳愣住了。

老母鸡说：“在你们兄弟姊妹伙里，我最喜欢你了，总怕你有个三长两短灾祸闪失。”

红公鸡瞅着那只被污泥烂物沾染得脏兮兮的蛋壳说：“危险确实不少，但这世界还是美好的。我受不了壳子里那种永久的黑暗。”

老母鸡嗔怪：“黑暗怕什么？只要你安全。再说你过去不是一直就在那里头吗？”

红公鸡说：“我在那个壳子里头没见过阳光没见过绿草没见过春风鲜花倒也罢了，现在见到了光明和鲜花就再也无法忍受黑暗了。”

老母鸡依然苦苦规劝：“孩子，妈为你安全为你好……”

“好吧妈妈，我来试试。”红公鸡跷起一只爪子伸向蛋壳，蛋壳顷刻便粉碎了。他对妈妈说：“你看，它连我的一只脚也盛不下啰！”

老母鸡无奈地摆摆脑袋。

红公鸡却信心十足地宽慰母亲：“放心吧妈妈。退回庇护我的黑暗的壳子是不可能的了，暴风雨和狐狸猛兽还会有，光明的阳光永恒。我小心着点就是了。”

关于人脸的争论

这个人很不幸，出生时先天失明双眼都是瞎子，而且害过一场天花，落下一脸麻坑儿。再没有这么厉害的麻脸了，大麻坑摞着小麻坑儿，小麻坑套结着大麻坑儿，整个面部几乎没有指甲盖儿大一块儿光滑平整的皮肤，一脸都是层层叠叠大大小小的麻坑儿麻花儿麻点儿麻兄麻弟麻姊麻妹儿。

他很不幸，却很聪慧机敏，尤其对音乐具有出神入化的敏感，任何外界传来的曲子只需听到一次，他便能用口哨吹得惟妙惟肖。他的父亲便给他买来一把胡琴。他的手指更具音乐天赋，无师自通便把一把胡琴拉得入丝入扣。他的手指细腻如葱白儿，许是生来就没有接触过任何粗糙的劳动工具的磨砺，手指十分灵巧也十分敏锐。他除了摸二胡的弦常就是摸自己的手脸，自从有记忆能力的年岁起，他没有摸过别人的脸，当然也无法看见旁人的脸。他在拉胡琴拉得双手酸麻时就搓一搓手指，再搓搓自己的脸颊，那脸上波浪起伏，搓摸起来也挺舒服。

他拉胡琴出了名，到一家县剧团去当头把二胡演奏师，因而收入可观，因而被一位挺漂亮的姑娘所钟情，自然而然结了婚。

新婚头一夜，他怀着激动不安的爱心伸手摸了摸新媳妇的脸，惊吓得触电似的跳起来又翻跌到床下，哆嗦成一团。

媳妇正进入羞怯的柔情蜜意之中，以为他有什么毛病，连忙扶他上床，问：“你怎么了？”

他不说话，伸手又去摸了一把媳妇的脸，又惊恐地抽回手差点跌倒。媳妇这回有了准备，双手扶住了他：“亲爱的，你到底怎么了？”

他惊惊咋咋地说：“你是个……怪物！”

媳妇莫名其妙："我……怪物？我怎么是个怪物了？你摸到了什么了？"

他说："你长的不是一张人脸！"

媳妇气红了脸追问："我怎么不是人脸呢？"

他振振有词："人的脸就像我的脸，坑坑洼洼的大坑连着小坑小坑套着大坑，我摸了我的脸二十年有余，难道还会有错吗？你的脸竟然平整整光溜溜的。光溜溜平整整的脸怎么能算人脸呢？"

媳妇顿然明白了原委。她想给他解释，光溜溜平整整的脸是人脸，有麻坑的脸也是人脸；平的光的脸是绝大多数人的脸，有麻坑的脸只是极少数人的脸；在基本消灭了天花的当今，麻坑脸尤其少见。她后来没有做任何解释，反倒是怕伤害了他的自信，尽管这种自信是偏见是狭隘；悲哀在于他根本无法了知博大纷彩的世界，一旦戳破他的那种偏狭的自信，他可能会陷入一种心理灾难。

他依然咄咄逼人："我敢拿脑袋作赌，你的脸绝对不是一张人脸！"

她宽厚地笑笑说："我要是有法力让你睁开眼睛就好了。"

他更强硬地说："我不用睁眼也敢断定你长的不是人脸。"

她只好沉默缄言。

1993年冬

秦人白烨

从意大利回到北京的第一件事便想到吃，吃一顿涮羊肉。不足半月的亚平宁半岛之行，且不说花样单调的西餐如何使人腻味，即使享誉世界的意大利面条，无论宽的细的长的短的实心的空心的，都让人连回味的勇气也没有。想想一盘橡皮筋儿似的面条里，再浇上一勺子奶酪的那种甜腻腻的滋味，看看怎么入口下肚。涮羊肉便成为一种企盼。其实早在回国的飞机上就谋算定了回京后头一顿饭的目标。

到旅馆办完手续住下，想到立即可以去开涮，心里竟然是如同雀跃的激动。突然又想到一个人太高兴，有位朋友作陪，面对热气蒸腾的涮锅，俩人对饮扎啤又在火锅里乱涮乱戳才开心，便立即打电话给白烨。

恰好白烨没有出远门，人在。

于是，在北沙滩一条小街的小饭馆里，我们便面对一只红铜涮锅而心意融融。他还是那么和悦地笑着，说着文化界的一些新鲜事，声音柔和悦耳。他的悦耳的语音在陕西关中人中也应属个别，听起来特别和谐。他的模样也属于关中人中那种“细活人”，细眉细眼，平头整脸，少了粗犷而多了“细活”，倒更像江南那种才子佳人的眉眼。这些我当然都很熟悉，也无多少变化，却都不是他的主要魅力所在。他的魅力在哪儿？我似乎也很难说清楚一二，交识了十余年，依然无法归纳，倒是常常想起李星对他的一句形象概括：“白烨这熊是老少皆宜，男女皆宜！”

我们吃得很畅快，而我似乎确凿有点贪馋，喉咙底下好像有一只手在往里拽着。而我们的无边际的闲谝（北京人说侃），真正是东拉西扯域内海外过去时现在时，现在留下记忆的却只有一件事。似乎是谝起我们过去的旧交时，白烨突然冒出一句话：“你知道我写你那篇文章是在哪儿写下的？”我当然不知道他在西安或在北京或在办公室或在家里甚或在出差的火车上……他断定我猜不中，这是我从他紧紧盯着我的眼神里判断出来的。他紧紧盯着我的眼神有少许神秘多几分认真，却绝无卖关子的意思，在即将开口道破那个神秘而庄重的写作处所时，先释然一笑，眼角眉梢都是释然的轻松：“我在家门口的路灯下写成的！”

大约是一九八〇年春天，我从区文化馆赶到省作协去开会，或者可能是听《延河》编辑部谈对我某一篇小说稿的处理意见，反正除了这两种可能再不会有其他事。那天中午在前院碰见白烨。是他先叫住我，因为我不认识他，他大约是问了门卫之后冲我走过来的。

那时候我尚未听说过这个名字。他便简单作了自我介绍，说他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文学编辑室做编辑，兼做业余文学评论。他说他原在陕西师范大学教学，刚刚调到北京不足一年。他那一口纯正的关中北部口音，顿然化释了初识时的诸多陌生与隔膜，我和他便在鱼池的水泥围栏上坐下谝起来——他说他要和我说事。

他受《文学评论》杂志之约，要写一篇关于我的小说创作的评论，要我提供已经发表过的小说清单、篇名以及所发表的杂志的刊号；还要交谈这些小说创作前后的有关和相关和不沾边的情况。

这是中国进入划时代的八十年代的头一个春天。文学正在复苏。伤痕文学和反思文学正以其可以理解的特殊社会因素而影响社会影响

人心，一篇万把字甚至几千字的短篇小说可以轰动全国，影响普通公民的生活秩序和心理秩序，真可谓文学的“特异功能”，然而我们只要稍微回顾一下此前多年文学被“左”棍子们闹成什么样子，便觉得这种奇异的现象在当时的中国合情合理。文学新作和文学新人都如雨后春笋，各种文学期刊和报纸都在为文学新人和文学杰作张扬。《文学评论》杂志似乎已经不能适应那种局面，在刊物之外又编了一种不定期的评论专集《当代作家评论》，把一拨一拨在文坛初具影响的中青年作家的创作予以概括性评述，推向社会。我有幸被列入某一辑中，由白烨来写这篇评论文章。他便是奔这件事来找我的，而且再三郑重强调：“这是我这回回西安最重要的事。”

后来我就再没有见到他。大约到年底，他寄来两本《当代作家评论专辑》。我读了他写的关于我的七八篇短篇小说的综合评论，近乎一万字。我的感觉是贴合初发阶段的那几篇小说的实际，多是方方面面的分析，没有大而不当的溢美，也没有生拉硬扯与什么流派什么主义攀附，纯粹是就作品实际的分析，很中肯，予长处的肯定时也明朗着弱点和希望。

这便是我们的第一面认识和头一回交手。再次见面是相隔四年以后的一九八三年五月，我到《当代》编辑部住下修改中篇小说《初夏》，我们才得此机缘第二次握手。那天中午我们在朝内大街一个饭馆吃了一顿烧卖，喝着散啤酒，说着家乡事以及个人的粗略经历，情感渐渐交融了。之后又是几年，我一直住在乡下，他偶尔回到西安，匆匆来去，很难遇合到一起。大约是一九八九年三伏，我为安顿孩子的读书在西安住着，晚上热得睡不下，大家都习惯聚在编辑部四合院里乘凉闲谝。蒙蒙月光下，白烨幽灵似的悄没声儿走进人窝来，大家认出后就惊呼起来。他从黄陵老家探亲回来，到作协熟人处找床来

了。那一夜，大家谝得很开心，谝什么都一概记不得了，反正就是文学上的一些活动，文坛信息和动向，某位作家某部新作的成败得失，而很少涉及人事纠葛之类。他似乎对于人际间尤其是文艺人士间的亲疏好恶不感兴趣，常扯到一些文人纠纷时便讷言拗口起来。直到去年我三次去北京，才多了几次接触，然而他都没有提及十三年前的那篇文章在什么地方写的。我可真的想不到，他当时竟然如此困窘……

白烨是陕西黄陵县人，黄帝的陵墓在那儿，那儿便得此县名。他的家在山地在平川我至今也不甚了了，距黄帝陵有多远也搞不清，只知道他和我一样是一个纯粹的农民家庭，父母都是以抚弄庄稼获取生存能力的农民。

白烨很聪明，记忆力超人，念书总是受老师的器重。聪明的脑瓜又兼着一个好性情，在家在校在村子走亲戚，到哪儿都招人喜欢。确凿，他不属于那种在一切场合都张扬自己突出自己的人，也不是另一种阴冷诡谲的人；他热情开朗坦诚，在重要和不重要的场合随意找个空位就座，只是坦诚地说出自己的意见，而不期望压倒所有意见，不见霸道而多了些文质彬彬，不想成为话题中心反而容易让人回味他的观点。

他的人缘好，主要因了他的性格好。讨大人喜欢也得同伴们喜欢，也讨一个洋娃娃女子的喜欢。这女子是当时上山下乡插队锻炼到黄陵的北京知青，由一般喜欢到二般三般深深钟情，再到爱死爱活非白烨不嫁的如痴如傻的程度……

她后来成为他的妻子。

白烨后来到陕西师范大学念书，毕业后留校任教。她后来招工到了西安的铁路系统，随后调到北京附近。白烨随后也调进北京，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做编辑。我们的生活里很快排除了婚恋中必须以政治流行语作表达方式的假大空，她和他留存下来的就只剩下真诚。她骄傲自信自己比伯乐还眼尖手快，认准了白烨也抓住了白烨无怨无悔，白烨总是陶醉于她过去的温情和现在的贤惠，而且温情不减。

初到北京，白烨除妻子一家人外再没有亲朋好友。住就凑合在岳父母家里，那是一个胡同里的小杂院内的小屋子，住着一大家人。拥挤到什么程度无法细述，反正给他连支一张小茶几铺稿纸的地方也没有，于是就把书桌摆到街巷里。书桌其实只是一个四方形的杌凳，座椅便只能是一只小马扎，这套行头简单轻便，易于搬出来也易于搬回去。照明设备是高悬在电杆上的昏黄的路灯。关键是得耐心等待时机，等到巷道胡同里那些纳凉的大爷大娘侃够了闲话抱着茶壶瓷缸走回各自的小院，奔跑耍闹的孩子疯够了闹够了像鸟雀一样回归窝巢，骑车往来的过路人由稠到稀再到零三稀四，白烨才能搬出杌凳马扎在电杆下摆置开来，摆开舞文弄墨作文作论的架势。其时，夜已深沉，五月的温馨的风抚摸他的脸颊和肌肤，而他已经进入一种艺术的思辨之中。

五月北京深夜的电杆路灯下，坐着一位未来的文学评论家白烨，在做文章。

白烨是黄帝陵墓下的古老臣民的后裔，是北京的女婿。按陕西关中乡俗，娶了这个村的媳妇，便是整个村子的女婿。白烨是整个北京的女婿。

一篇万言的评论文章在电杆下起草，修改，直到抄写整齐，我不知道他在电杆下持续了多少个夜晚，而且肯定要受到譬如刮风下雨，譬如突发事件的干扰，也真是难为他了。直到现在，作家和社会都在呼吁给知识分子以较好的工作和生存条件，譬如白烨不能永远在电杆路灯下写文章。我的一位朋友的二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草稿和修改稿都是在两三平米的厕所里干完的，同样是住室容不得他安一张书桌。然而我又反过来想，关键还是肚里得有货。蚕儿没有簇可上时便把茧子结到墙上，母鸡下蛋找不到窝时可以随便下到地上，作家肚里有文章找不到桌子便扑马路进厕所，是肚里有货要倒出来。肚里没货的蚕和鸡和作家，即使安置到五星级宾馆即使坐进金銮殿，照样拉不出丝屙不下蛋写不出文章来。

无论如何，电杆路灯下奋笔疾书的白烨，算得古老而又现代的北京熙熙攘攘花花绿绿的一种风景。

这是年轻白烨的一段小小的鲜为人知的插曲，而更具一种学人奋斗精神风貌的事，便是在这更困窘的一年里，他除去上班完成自己的工作任务外，利用一切休息和空暇时间奔图书馆。他所工作的单位从调入的头一天起就给他形成一种威压，中国社会科学院这样的大学府，无疑是各路学问大家聚集之地，他立即意识到自己需要进行基础工程建设。其实何止高等学府，在任何单位任何场合，都是容不得浅薄者半瓶子醋的。问题在于个人自学的迟早和程度，我们并不少见那种到处夸夸其谈的半瓶子醋式的人。有了这种自觉便获得了最原始的攀缘的策动力。白烨读过多少书已经很难算计了，最具意义的是，他把马、恩、列、斯的全部著作研读完毕，而且作了十几万字的笔记。他的记性之好令人惊异也令人妒羡，一些专搞马列理论研究的人常常为一个论点或一句“语录”而找不到出处，或者搞不清记不全原文，便

问询白烨。白烨便一口报出在某一卷的某一篇文章里，如翻查一下卡片，连页码也准确无误地报将出来。他可以说是一部马列著作的“活字典”。

十余年里，常常在报纸刊物上看到他的名字，虽然不能见面，读到他的文章，便有一层了知，知道他又读了一本什么好书，研究过某个作家的作品或某一种文学现象。看到他的论述和观点，也常常受到启示。就整个印象而言，他似乎没有极端的言语，没有在赞赏某种流派的同时，就以不同流派或主义的作品为牺牲对象，甚至连生存一刻的宽限也不给。我常常想到他对各种文学现象文学样式的冷静和宽容，便想到这可能不只是他的性情好或人格修养好，恐怕主要出于他对艺术创造的深刻理解，而这种理解又得之于艺术眼界的宽泛开阔。一个艺术视野狭窄到只能看见自己的笔尖所画的那几条墨痕的人，自然很难容纳别一根钢笔所画的墨痕。艺术视野的开阔首先得之于阅读的广泛，对于近代、当代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学的了解，才可能使人悟觉，自己的笔所划拉的墨痕值得一赏，前人和今人也同样画出了诸多有赏析价值的墨痕。白烨对许多文学现象的评价和前景观瞻，多数都被急骤变幻发展的文坛现实所证实。这可不是算卦问卜。

虽然相识多年，直到去年九月我才第一次到白烨家里去。我一般不大愿意去朋友家里，扰乱了一家人的生活秩序。然而这一次却是我主动要去的，儿子刚刚到陌生的北京上学，总怕出点什么事而鞭长莫及，让儿子认下他的家门，万一有什么急事也好有个大人给出出主意帮帮忙。

按照他在电话里的指点，倒是顺利地找到那条胡同和那个院子的大门，进大门以后反倒六神无主了。那么一个深宅大院，那么多曲里拐弯的岔口岔道，每走一个岔口就得问人：找白烨该当向左还是向

右，好笑竟是一路向右拐，好笑如搁“文革”该打右派了！直到走到他家门口还在问路，倒是他在屋里听见我的声音便蹦了出来。我却释然慨叹：“下次来下下次来照样还得问路！”

两小间平房。房子很低矮，扬起手就可以摸到檐瓦，然而墙是水泥和砖头砌成的，成色还有几成新，算不得古老。整个屋子里，三面墙壁都摆置着书架，中间仅留一条小甬道，俩人并肩走过去就摩肩接踵。只在靠着门口的两扇小窗下摆着一张小书桌。我马上猜想到这张恰尺等寸的小书桌，肯定是事先量过剩余的地方让木工师傅制作的。

这就是文人学士们所习惯戏称的“斗室”。他就在这张小桌上抒写一篇又一篇论文。我忽然又想起肚里有货无货的蚕和母鸡来，有货便可以就着这张小桌如行云流水般倾泻笔端，无货则干瞪眼，任什么房子摆怎么阔的桌椅都帮不上屁忙。白烨却是一副上中农自满自足的笑脸：“不错了不错了，能有一张桌子一个窝铺真不错了！”而且补充说，单位正在盖住宅新楼，可望分到一套。由此又忆及刚到北京时挤住岳丈家的困窘：“现在真是不错不错了！”

不单是他工作在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北京，他的阅读之广泛视野之开阔信息之敏锐是大家公认的，所以见面时总想听他说点新鲜话题。我常玩笑问他，文坛又插出什么新旗帜了？或者说，哪个主义领着风骚了？他便侃侃而谈。这回坐下喝茶，我便问起刚刚公布的一九九三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莫瑞森。除了报纸上简单到可谓勤俭节约楷模的片言只语的介绍，我对托尼·莫瑞森一无所知，似乎以往对她的著作评价介绍的本来就相当少，更不要说阅读她的作品了，白烨便介绍莫瑞森的生平著作略要，顺手从书架上抽出一本薄薄的小册子，是托尼·莫瑞森的长篇小说《秀拉》中译本。这是一部十三万字的长篇小说，就是白烨供职的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的书。

这天中午我们在他家吃的素包，喝的小米稀饭，这是我事先预约好了的。北京沙滩小巷道里的小米粥五毛钱一小碗，贵且不说，西北主产的小米卖上好价钱，心里竟有一种阿Q式的自豪。关键在于那些小铺店的脏乱，一瞅就令人心悸，所以便跃跃然要求一碗小米粥喝。白烨夫人许是在黄土高原插队时学下了手艺，烧熬的小米稀饭是再好不过了，稀稠合宜软硬适度，一种纯属于粮食自身的香味特别可口，素包也好吃极了……白烨便大笑：穷命薄命，吃家常饭比吃国宴还来劲！

从小居出来，我就有一种酒足饭饱的慵懒，在异国被洋餐搞倒弄败了的胃口一下子复原了。我们到旅馆坐下喝茶，他因酒力而脸泛红光，侃侃而谈，腰里的BP机不时鸣响。他便不厌其烦地去回电话。他精力充沛，善与人交善与人处，思维敏捷，也很精明，许多文学朋友的麻烦事都乐于和他商量，他往往能做出最清醒的判断，能找到最恰当最妥帖的处理办法……相交既久，便见善心。文章写到这里，依然觉得是有感有觉而难下结论概括白烨，似乎还是评论家李星的概括形象准确：白烨这熊是老少皆宜男女皆宜……

1994年3月15日 小寨

足球与古典式

——《歪看足球》之一

看足球比赛便联想到战争，且为古典式。

绿色草坪是球场也是战场，挑战和应战，一齐出兵，两军列阵，甲胄区分颜色，旗鼓相对，对面摆开架势。兵对兵，将对将，头对头，脚对脚。一方要陷另一方城堡，另一方要夺一方城池，进一球就说“下一城”。足球世界里的习惯用语、技术战术用语全部都是军事语言，恕不一一。只要看看近日《三秦》《西安》两家晚报体育版，你会误以为整个世界已经笼罩在世界大战的烟火硝尘之中。

现代战争不是足球比赛所可比拟的。现代战争已经拉开了士兵与士兵的距离，天上地下，海这边和海那边，对手看不见对手，只是盯着仪表刻度按电钮，胜利者看不到战败者的尸体和鲜血，失败者也免去了目睹胜利者的骄妄狰狞的痛苦。如果丢开正义与非正义，仅就战争直观来说，现代战争不如古典式战争好看，拍现代战争的影片前途堪忧。

如果把足球之战也变成现代战争会怎么样呢？双方前锋前卫后卫和守门员把着咖啡杯，抽着香烟，然后在电盘上按动电钮去控制足球，世界杯可能到此终结，足球运动就成为电子游戏。看来足球这种纯粹的“体力劳动”或战争的古典形式搞不成现代化，原始形式将继续。

如果世界有一天终于警悟：打球啥仗嘛！把所有战争都转化为足球战争，把血肉横飞的战场变成绿草茸茸的足球场，人类从此可能真正进入认识人本身价值的一个时代。

不过，参考足球规则，恐怕那时的世界起码得有一个如同黑衣法官那样的联合国秘书长。这秘书长不应看经济大国的眼色，也不要轻视经济弱国。这样的联合国秘书长至少现在还没有受孕，更谈不到诞生。所以那个美好的世界还相当遥远，且到足球场边去愉悦去歪思去遐想。

1994年6月22日

上帝之手

——《歪看足球》之二

足球场是竞技场。靠一颗脑袋去顶，凭一双脚去踢。脚都是大同小异的脚，脑袋也都是一样的脑袋，关键是看谁的脑袋和双脚功夫更老到。一般正常的公平的竞争结果，总是劣汰优胜，与人类在任何其他领域的竞争无本质差异。一般不正常的不公平的竞争结果，可能就是劣胜优汰了。比如除脑袋双脚之外，有的球员还有一只手。手球是会犯规的，但仍消灭不了手球。意外的和意内的情况都发生过，手球不仅没有犯规，而且把球拨进对方球门，且是制胜也致命的一球，致命当然是指凭这一球置对方于死地了。最著名的手球是超级球星马拉多纳在上届世界杯的那个闻名足坛的手球，被誉为“上帝之手”。

其实誉中多含讥诮，西方人信上帝的多，也常常用上帝来作讽喻。中国人的幽默有中国特色，把这种手叫“第三只手”。譬如对贼不说贼而说“那人是三只手”。意指与正常人两只做工干活的手之外，还有一只带贼气的隐蔽的不光明正大的手。这丝毫不亚于西方人说的“上帝之手”，因其内涵完全相同。

其实，无论说“上帝之手”也罢，说“第三只手”也罢，都是足球场上不能容许的手。手在足球场上变成了非足球因素，即非正当竞争手段。靠非足球因素而获取足球荣誉和地位，即使捧起那个金杯，于人于己都是一种不光彩。

靠非足球因素弄足球，绿色球场就脏了。

足球的发展和永久不衰的魅力在足球本身，即一颗脑袋和两只脚。这回败了，回家去卧薪尝胆，再练脑袋再练双脚，四年后再来报一球（箭）之仇来雪被淘汰之耻，是为足球正道。

让“上帝之手”或曰“第三只手”不仅从足球场，而是从社会的各个领域停止犯规。

1994年6月22日

生命之雨

一个年过五十的人，某天傍晚突然警悟，他的生命中最敏感的竟然是雨。

秋日。傍晚。

细雨如丝如缕如烟，无穷无尽的前方和已经穷尽的身后都是这种雨丝，飘飘洒洒却无声无息。他沿着家乡的河水在沙滩上走着。一旦有雨或雪降下，他就有一种迎接雨雪的骚动而必须刻不容缓地走向雨雪迷蒙的田野。他的腋下挟着一把黑色雨伞，除非雨点变得粗疾起来才准备打开。

沙滩上的野苇子的茸毛已经飘落，蒿草和绿色无可挽救地变得灰黑而苍老了。他看见河的远处有人在涉水过河，辨不清过河的是男人还是女人，雨雾把雄性和雌性的外部特征模糊起来了。走过滩柳丛生的一道沙梁，一个看去和他年龄相仿的女人伫立在沙地上，看守着七八只羊。女人的右手攥着一根新鲜的柳枝儿，无疑是用来警示她的羊的武器；她的左腋下挟着一只金黄色的草帽，而让头发也淋着雨。她的生命中也敏感雨而渴盼细雨的浇灌和滋润么?

女人满脸皱纹，皮肤皴黑而粗糙，骨骼粗硬而显示着棱角；她挽着黑色的裤脚，露出小腿如同庄稼汉一样坚硬的筋骨的轮廓。他瞅着她，又瞅着她的羊，瞅过去是七只，倒瞅过来却成了八只；数过了羊又瞅她。他瞅着数着羊是潜意识的行为，避免死呆呆瞅着她而引起反感。瞅了瞅她又去数羊，这回数过去是八只，再数过来又成了七只。

她却只瞅着她的羊，或者根本就没有瞅羊。她也不瞅他。他想，在她说不清是呆滞或是不屑的眼神里，他不过也是一只羊吧？他便走开了，踏上高踞沙滩的河堤。

母亲说生他的时候正是三伏天。母亲强调说他落地的时辰是三伏天的午时。母亲对他落地后的记忆十分清晰，落地后不过半个时辰全身就潮起了痱子，从头顶到每一根脚指头，都覆盖着一层密密麻麻的热痱子。只有两片嘴唇例外地侥幸，却暴起苞谷粒大的燎泡。母亲说整整一个夏天里，他身上的热痱子一茬尚未完全干壳，新的一茬便迫不及待地又冒了出来，褪掉的干皮每天都可以撕下小半碗。母亲说她在月子里就只是替他从头到脚撕揭干壳了的痱子皮……母亲对已经成年了的他遭遇灾难时便说："你落生的时辰太焦躁了。那天能遇着下雨就好了。"

他后来得知，他与父亲同一个属相：马。这根本不用奇怪，家族中两代人和两代人之中同一属相的现象屡见不鲜完全正常。奇异的是，他和父亲同月同日生，而且时辰都是午时。只是没有人说得清，父亲出生时潮没潮起那么厉害的热痱子，父亲出生时是否侥幸遇到了三伏天的雨。

他便猜疑，在他来到这个世界时便领受到的如煎如煮的酷热焦躁，在父亲来说早已领受过了，从而并不以为什么了不起。

关于他的父亲，他想写篇小文章来悼念那位如草芥一样无声无响度过一生又悄然死去的农民，然而终于没有形成文字。原因在于，那个念头刚一产生，如潮的记忆便把他齐头盖脑淹没了。他喘息着又合上了钢笔。父亲是一本书，不是一篇小文章。

现在，他只能说一句话，在这个世界上，他最熟悉最了解的是他的父亲，而最难理解的也是他的父亲。他深深地懊悔，直到父亲离开这个世界时，才发觉自己从来也没有太在意过父亲。起初他剖析造成这种懊悔心理的因素，是他既不可能对父亲寄托稍大点儿的依赖，更不可能发现以至研究他有什么伟大和不平凡之处；后来随着生命体验的不断加深，终于有一天醒悟过来，便是从来也没有想到过对父亲的心理设防，是一种绝对的心理安全的天然依赖，反倒不太在意了。

父亲死亡的情景永难忘记。一个自身生长的异物堵死了食道，直到连一滴水也不能通过，那具庞大的躯体日渐一日萎缩成一株干枯的死树……哦！生命中的雨啊！

他一个人坐在家乡的河边，天上洒下旱季里少见的蒙蒙细雨。他刚刚二十岁，开始了永远的没有限期的暑假，从学校走向社会了。他半是豪勇半是惶惑，怀着宏大的文学梦却又怀疑自己是否具备文学的天赋，自信与自卑五十对五十折磨着他，便有了一种孤自散步的欲望，尤其是在雨雾迷茫之中。

这条河不大却闻名于遥远悠久的历史，河有多长，河边的柳林就有多长。骚客文人折柳赠别也抛洒离愁思怨的诗句，成为一代又一代文化人寄托情怀的佳作。他坐在水边，一个琴瑟般的声音不期而至："大哥哥你饿吗？"他转过头就看见了一只小仙鹤，是的，这个大约不过十岁的女孩像河滩草地上偶然降至的仙鹤。他苦笑一下摇摇头。处于整个民族的大饥饿年代，小孩子看世界的眼睛也是饥饿。他笑笑说："我渴。"河堤上传下来一声笑，他看见那儿站着一位干部，这是一家大企业的党的领导干部，据说是一位出身富贾而又背叛了自己阶级的老革命，革命胜利了他已成为企业领导，却依然需要下放乡村锻

炼改造……他很忠诚，不仅自己老老实实在农民中间生活，而且还利用暑假把小女儿也领到这炼狱里来改造了。

几十年后，在一次全国性的文学集会上，有一位中年女人向他走来：“你现在是饿还是渴？”

“还是渴。”

“还是渴？”

“是渴……生命之雨。”

她说她后来随父亲到北方一个城市，又转过四五个城市。她现在在一家报纸主持着一个《婚姻与家庭》的专栏。她在年轻男女中名声显赫，几乎家喻户晓，当然是她坦率而又真诚地解答过来自全国各地青年男女关于爱的困惑，并因此而很自信：“你比我写的书多，我比你写的信多；你只是在文学圈子里有名声，而我却在青年人心中是知音。”她的佐证是多年来收到和回复青年人的书信数以万计。她说她读过他的全部作品，当然不是因为作品好不好，亦不是要研究他的创作，主要是因为在他未成名之前她见过他一面，那时她不足十岁。她说：“我至少给青年朋友写过两万多封信，而你的小说最多发行五千册。”

他很尴尬，随之反诘：“我也来请你解答一下过去的问题，有一对年轻夫妇在‘文革’中分属对立的两派组织，妻子向自己一派的造反队司令报告了丈夫的行踪，丈夫被抓去打断了一条腿。这位现在走路还颠着跛着的丈夫仍然和那位告密的妻子生活在一起。他向你写过信没有？如果他有一天写信给你要求解释困惑，你怎么回答他？”她张了张口却摇摇头笑了，竟是一副不屑回答的神气。

半年以后，他接到她从千里之外的城市打来的长途电话，说她今天收到一封信，信中所表述的精神痛苦使她陷入深沉的无言以对的心境之中，那人的遭遇与他所说的“文革”夫妇的故事大同小异，关键在于他们的故事一直延续到今天而且还有发展，类似于被打断腿的这个跛子丈夫，居然投靠那个抓他施刑的造反队头儿的门庭挣钱去了。造反队头儿受过几年冷落之后，现在是一位腰里别着大哥大的公司老板了……现在反倒是类似于那个告密妻子的陷入痛苦境地，据说是丈夫现在跟着那个不计前嫌的老板北上南下东闯西骗，出入星级宾馆酒楼歌舞厅，既卡拉OK又KTV还桑拿浴……她在电话中向他复述了这个故事，情绪很沉静，似乎没有了她写过两万余封回信的那种自信与得意，很真诚地说：“上次你讲的那对‘文革’夫妇的故事我没有回答，我觉得那是你们上一代人的故事和困惑；你们上一代人所处的那个时代是一个不正常的时代，用今天正常人的思维是无法理解也无法解释的，因为他和她都是不正常生活里的不正常的人所演绎的不正常故事。现在，当他和她在今天正常的社会里继续演绎不正常的故事时，我竟然第一次感觉到我的肤浅，无法回答那个类似告密妻子的新的苦恼……”他反而宽厚地安慰她说：“是的，你不可能解除所有痛苦着的心灵的痛苦，也不可能拯救所有沉沦的灵魂。”她说：“我总得给她回信呀！情急之下，我用了你的一句话回复了她，就是‘生命之雨’。”

他说：“这话太……”

她说：“我就想起你的这句话……恰不恰当都不管了，上帝！”

蒙蒙细雨依然。依然是如丝如缕如烟。依然是飘飘洒洒无声无响。他已经走到这一段河堤的尽头，河堤朝南拐弯伸展过去，顶头和南岸的山崖接住了；那一段河堤从山崖下开始延伸到雨雾迷茫的无穷

无尽的上游。人生其实也类似这河堤，分作一段一段的，这一段到头了，下段又从这儿开始，一直延伸成为一个生命的河流。

河堤拐弯的内堤里，就圈住了好大一片滩地。滩地里有一幢孤零零的土坯房，房子的南墙和西墙上苫着一层长长的稻草，那是防止西风和南边的下山风卷来的骤雨对泥皮土坯的冲刷的，就像一位插秧的农夫身披的蓑衣。房前有一片偌大的打谷场，场角靠近房子的地方有一个黄色的麦秸垛。他猜测这是一个土地承包经营者仓促建筑的房子，从那简陋的建筑判断，主人完全是出于一种临时的考虑，不愿投注更多的钱财给这幢远离村庄的建筑。

一个男人吆着牛拽着犁在翻耕打谷场。打谷场已经完成了夏季打麦秋季打谷的用场，现在翻耕以恢复土地的疏松和绵软，然后撒下早熟的青稞或者油菜籽，赶明年收割小麦之前先收获了青稞或油菜，再把这块土地碾压瓷实做打谷场。男人悠悠地吆着牛扶着犁，没有戴草帽，一任细雨淋着。一个女人站在麦秸垛下撕扯麦草，撕下一把便弯下腰纳到一只大竹条笼里，动作也是悠悠的不急不忙的样子。只是那一件红色的衣衫像一簇火焰在迷茫的河滩上闪耀。

一男一女一低一高两个小孩在场地上追逐，他们从土屋里奔出来时就是互相追逐着的，大约是男孩抢走了霸占了女孩的吃食或玩具，争执便发生了。女孩追着男孩显然力不从心，在溜滑的打谷场上摔倒了，顺势在场地上打滚而且号啕起来。那女人扔下柴火笼飞跑过去，在滑溜的打麦场上跑起来闪动着两只胳膊，像是一种舞蹈。她没有扶起倒地打滚的女孩，一直冲到男孩跟前，一巴掌抽过去就把男孩打翻在地了。她随后转身走过来抱起女孩，另一胳膊挎上柴火笼走进土屋里去了。

他竟然大声喊起来，愚蠢你愚蠢！你是个愚蠢的妈妈！

男人喝住牛插住犁，慢腾腾走过去抱起男孩，也走进那间土屋里去了。

一头在套的牛站在打麦场上甩着尾巴。

土屋房顶的烟囱有灰色的烟冒出来。

他依然站在河堤上。几十年后，那个扯柴火打男孩抱女孩的愚蠢的女人肯定就变成那个放牧着七八只羊的粗硬的老女人了吧？那个受宠的女孩会不会成长为如那个写过两万多封回信的专栏主持人?

那土屋里暴起激烈的吵闹声，浑厚的男声和尖锐的女声。肯定那是关于应不应该打倒男孩的争执。他忽然想到她，如果把这幢远离人群的河滩土屋里的争论提到她的专栏上，她还会用他的“生命中的雨”这话来解释给这一对乡野夫妻吗?

拥有一方绿荫

——《我的树》之一

农历十月初一是家乡的鬼节，活着的人要给死去的亲人烧纸送钱，好让他们在冬季到来之前备置防寒的衣物。在这种事情上我一直是处于理智和情感的分离状态，结果却是一次又一次顺从了情感的驱使，便匆匆赶回乡下老家，去为我的那位终身都在为吃饭穿衣愁肠百结的父亲烧一匝纸钱，让他在冥冥之域不再饥寒交困。

转过村里那座濒临倒塌的关帝庙，便瞅见我的家园。那株法桐撑开偌大的三角形树冠，昂昂扬扬侍立在大门前不过十米的街路边。我的树——每一次回归家园第一眼瞅见这株法桐，我的心里就会涌出"我的树"的欣然浩叹。原因再简单不过，这株法桐是我栽的。父亲在世时喜欢栽树，我们家的房前屋后现在还蓬勃着他老先生栽植的树群，场塄上的那株白椿树已经有一搂粗了。然而我每一次回乡看见自己栽下的树都要比看见父亲栽的树更亲切，说穿了不过是栽树的人对那株幼苗当初所寄托的希冀将实现。是的，当我看见自己掘坑栽下的那株不过指头粗细的幼苗终于雄壮起来，倚立在村巷里，在浩渺的天空撑起一片绿盖的时候，我的那种感觉颇近似阅读自己刚刚写完的一部小说。

十二年前的这个月，我调进陕西作协专业创作组。我那时的唯一感觉便是开始进入最理想的人生状态；专业创作对我来说它的实质性含义只有一点，所有时间可以由我自由支配，再不要听命于谁对我的

指派了。压力也同时俱来，生活、学习、创作既然全由自己支配，那么再写不出像样的作品，也就没有任何托词可以替自己遮羞了。

我几乎同时决定回归老巢。回归我父亲我爷爷我老太爷一脉相承的家园。不是因为他们都死了需要由我来承继，纯粹是为了图得一个耳根清净的环境，可以平心静气地坐下来读书，思考一些不单是艺术也包括艺术的问题。深知自己知识残缺不全，而生活演进的步伐又如此急骤，好多好多问题太需要沉心静气地想一想了。

住在乡间真是令人心旷神怡，所有的骚扰和诱惑都自然排除。每每在清静到令人寂寞的时候我便走出大门，和村巷里随意相遇的任何一个人拉拉闲话，哪怕逗小孩玩玩也觉得十分快活。夏天暴日当头时，走出门来就招架不住炎炎烈日的烤炙，暴晒后我的头顶和赤臂就生出一层红红的小米粒似的斑点，奇痒难支，医生说那叫日光性皮炎。我便畏惧已构成暴力的太阳，于是便想到应该有一方绿荫做庇护。出得大门站在浓厚而清凉的树荫下和农人闲谝、抽烟那真是太惬意了……便想到栽两株树。

首先是树种的选择。我要栽两株法桐。几近四十年前我读初中，看过一场中国和法国合拍的儿童电影《风筝》，巴黎街道上那高大的街树令我记忆特深，我在家乡没有见过这种树。又过二十年我才知道这种树叫法桐，中国的许多城市的公路两边已经形成风景，家乡的一些农家屋院也栽植起来。

是我动手那部长篇小说写作那年的早春，我托村子里一位青年从庙会上买回两株法桐，一株一块钱。树买到了自然很遂心愿，只是遗憾着它太小太细了，仅仅只有食指那么粗。天哪！想要乘它的荫凉，想要拥有一方绿荫，得等多少年啊！

我仍然毫不犹豫地挖了坑，给坑底垫下土肥，把它栽下了；栽下了它，也就把一种对绿荫的期盼坚定地埋下了。我拄着铁锨把儿抹着脸上的汗水，欣赏着只及我胸脯高的幼株，一缕忧虑产生了，猪可以拱断它，小孩随手可以掐折它，它太弱小了嘛！于是我便扛着镢头上山坡，挖回一捆酸枣棵子，插在幼株周围，把它严严密密地保护起来。

令我失望的是，几乎所有树木的嫩叶都变成了绿叶，我的两株法桐依然叶苞不动。我拨开酸枣棵子在那树干上掐破表皮，发现已经是干死的褐色。我想把它拔起来扔掉，就在我拽住树干准备用力的一瞬，奇迹发生了，挨近地皮露出来一点嫩黄的幼芽，我的心就由惊喜而微微颤抖了。

这是从法桐的根部冒出的新芽，证明树根还活着。树根活着就会发出新的幼芽，生命多么顽强又多么伟大啊！那是一个尚看不出叶形的粗壮的锥形幼芽，刚刚拱破地皮而崭露头角，嫩黄中有淡淡的嫩绿，估计也不只经受过一两回春天阳光的沐浴吧。我久久地蹲在那里而舍不得离开，庆祝一个新的生命的诞生。我把扒掉的酸枣棵子重新插好，这幼芽不仅经不起车碾马踏人踩猪拱，鸡爪子只要一下就会轻而易举地把它刨断把它摧毁。

我一日不下八次地看那幼芽。它蹿起来了。它由嫩黄变成嫩绿了。它终于伸出一片绿叶了。它又抽出一片新叶了。它终于冒过围护着它的酸枣棵子，以一身勃勃的绿叶挺立起来，那么欢实，那么挺拔地向着天空……唯其丝毫不敢松懈，每年春天挖一捆酸枣棵子加固防护的围障，它依然还弱小，依然经不起意外的或有意的伤害。

它长到我的胳膊粗的时候，我终于享受到它的绿荫了。那树荫投射到地面上，有筛子般大小，我站在我的树的荫凉下，接受它的庇护。它的尚不雄壮的枝干和尚不宽厚的绿叶，毕竟具备遮挡烈日烈焰的能力，我想拥有的一方绿荫的愿望实现了。那一年年底，我也终于完成了历时四年的长篇小说写作工程，回城里去了。临走之前，我仍然给它的周围加固一层酸枣棵子。

去年夏天我回去，发现那树干已经长到小碗那么粗了。不知哪家的孩子用小刀在树干刻写下我的名字，刻刀的印迹已经愈合，颜色却是褐红色的，在树皮的灰白色中十分显朗。从去年到这次回归，我发现那树干急骤加粗，刻着我名字的那俩字也在长大。树下已经有偌大一片绿荫了。

法桐已经成为一株真正的树挺立在那里，巨大的伞状树冠撑持在天空。父亲在世时给我说过，树冠在天空有多大，树根在地下就会伸延多么远；树干有多粗，树的主根也就有多粗；树枝在空中往上往前伸长一尺一寸，树根在地下也就往下往周围延伸一尺一寸。我至今无法判断父亲这话有多少科学的可靠性，但确凿相信，这树的根已经扎得很深了，即使往坏处想到极点，譬如说突然被过往的汽车撞断了，或者被几十年不遇而在某一天却遇到了雷劈电击，这自然都无法预防，但这根是不会被撞毁劈断的。它会重新冒出新芽，它的生命还会重新开始。真的发生这种情况，我将无怨无悔地再去挖酸枣棵子，重新开始对我的法桐新芽的围护。

我久久伫立在我的法桐树旁，欣赏着那已经变形却依然清晰可辨的我的名字，那刻下我名字的淘气鬼也该和这树一样长高长壮了吧?天空飘落着零星小雨，日头隐没了，虽然看不到树荫，却也毫无遗

憾。到明年三伏那燥热难熬的时候，我就回家园，享受暴日烈焰下的我的那一方绿荫。

绿蜘蛛，褐蜘蛛

——《我的树》之二

记不清究竟是临近清明前的哪一天早晨，我洗罢脸走出房门便惊得站住了脚，小院围墙根下的梨开花了，一嘟噜一嘟噜粉嫩嫩的白花，疏疏朗朗点缀在嫩绿的枝叶之间，密集的花朵绣结成团，稀疏的花朵独秀一枝。在我最初瞧见的一瞬顿然幻化出一位白衣天使的绰约风姿。

我走到梨树下，竟然是潜意识的轻脚慢步，似乎单怕惊飞了这位白衣仙女。树干上湿漉漉的，夜气和露水浸润着的褐色的树干像刚刚出浴的小腿。嫩绿的叶片也湿漉漉的，像仙女濯洗过后随意披散的长发。花是一簇一簇的，一根花梗里多则生出七八朵，少则四五朵，团成一簇；白如雪的花瓣，暗黄的花蕊，绿色的花柄儿，团团簇簇有如凝脂，装扮得这梨树恰如一位冰清玉澈神采仙风的白衣天女了。

记得是五年前秋末冬初的一天傍晚，邻村的一位青年时期的农民朋友到我家来，腋下挟着一捆果树苗，有几株桃树，有几株杏树，有几株李树，还有几株梨树，都是刚刚嫁接一年的幼株，说是特意送给我的。我解开捆扎的草绳儿，捏着看着那一株株细如小指的树苗，竟然激动起来了。他说他知道我盖起一年多的新房前有一块小院，他说他知道我喜欢栽树，他说他觉得给围墙内的小院栽几株各色果树最好。我也知道他现在在责任田里侍弄各种果树苗，嫁接树苗和管理果树的本领在本地区小有名气，常常被一些果树专业户请去指导。他虽然只有小学文化，生性却极聪慧，闲暇时总是对果树栽培专业书籍乐

而不疲。他和我坐下喝茶，头头是道娓娓述说各类果树管理的尖端新潮技术，美国怎么怎么了，日本又怎么怎么了，令我大开眼界。

送他走后我就作难了，小院里已经栽下两株樱桃和一株小柿树，剩下的空间无论如何也容纳不下这一捆树苗生存发展的，于是我就开始了甚为困难的抉择。首先淘汰的是桃树，原因是农业合作化前我家拥有一方桃园，那几种美好的桃子的味道至今想起来依然馋涎欲滴，对如今种种好听的新品种实在不敢恭维。杏树随之也被否决了，原因是我家后坡上长过一抱粗的一棵杏树，杏子又是我们这里的土著果品已无新鲜感觉。最后割舍的是那李子树，这水果红里透紫十分好看，味道却不怎么可口，耐看而耐不得嚼。这样，便留下来四株梨树苗了，我没有种过梨树，我父亲似乎也没有栽过梨树。幼年时记得我们家有一小块地叫作梨园，父亲总是说“后晌割梨园地里的麦子”，或者说“梨园那儿的苞谷旱得撑持不住了水还轮不上浇”。我问过父亲梨园地里为啥没有一株梨树，没有一株梨树为啥把这块地又叫作梨园。父亲说他也不知道其中的缘由，说他从爷爷手里继承下来家业时这块地就称作梨园，爷爷这么称梨园他也就跟着叫梨园，我在跟着父亲称梨园的同时却多了一份期望，这梨园真要是有几株梨树会多好啊！我们村子里压根儿就没见过谁家种过一棵梨树，我那时候尚不知梨树的叶子是圆的还是长条的。

赶在天黑之前，我便把三株小小的梨树栽在小院里，剩下一株左看右看再也无法插足，便只好栽到围墙外边靠近大路的空地里。遭到淘汰的桃、杏、李子树毅然分送给邻居的小伙子，他们有责任田有果园。我顿然产生了失丢田地以后的某种失落感和生存的狭窄感。

这时候我基本完成了一部长篇小说的构思和准备工作，就要开始草拟，不料母亲却大病始发，整整一个冬天都奔波在医院和家园之

间，难得进入创作的沉心静气状态，便推后到次年春季。

草稿本子上记下的草拟开工的日子是四月一日，其时梨树苗儿已经绽出新叶，四株全部成活，显示出勃勃的生命的茁壮气势。我便在写作困倦想抽一口烟时走到小院里，在这一株旁边蹲一会儿了，在那一株跟前站一站，数一数叶子增加了几片，心头恬静得如同抚摸着小儿头上的黄毛。梨树周围是坚决不能容忍一株杂草的，几乎每天早晨都能发现刚刚拱出地皮的草芽，我随手便用一把锋利的挖铲连根刨出来……到了秋天落叶时，我竟然有一缕不忍落去的依恋，然而看着这梨树由小拇指加粗到大拇指粗，从齐我胸高一下子冒过我的头顶，一年里长高了一米多，而且四周抽出几条旁枝，初具树形了，我就真切地惊叹这绿色生命的伟力了。

当春风又一次吹绿万物，我的梨树也应时发出新芽绽出绿叶。我已不再惊讶和好奇，而是以一种沉稳踏实的心境开始盘算，到今年秋天它肯定要冒过围墙了，树干也会加粗到擀面杖一般了。去年冬天到来时，我给它们的根部埋下了充足的有机肥料，整年生长发育的养分都会绰绰有余。

意外的挫折使我心疼不已。那天我写累了又抽着烟转悠到梨树跟前，发现地上掉下来几片嫩叶，还有两个小芽尖儿。往树上一看，发现主干刚刚冒出半尺长的新芽尖儿被掐断了，一根朝西的小小分枝的芽尖也被掐断了，还有一些嫩叶梗被折断。我大为惊诧，甚为惋惜心疼，便猜想是谁家小孩子弄坏的。可是大门一直关着，孩子不可能翻墙来干这种事的。我就在这幼树上一枝一叶逐渐查证，突然在一片稍大点儿的叶子的背面发现了一只怪物，它不过像一颗扁豆粒儿那么大小，通体绿色，绿得嫩亮亮的，六只左右对称着的复足也是绿色，纹丝不动趴伏着。我在看见它的一瞬心头掠过一阵儿恐惧，皮肉收缩而

悸颤起来。它的绿色不像梨树的嫩绿唤起人对于生命的礼赞，而切实让我感到了阴冷鬼祟和毛骨悚然。我虽然自小生长在农村，自以为天上飞的地上跑的飞禽走兽都可以按家乡习惯叫出名字，这个绿色的怪物却系头一遭发现。我便斗胆用手去捉它，刚刚触及树叶，那怪物便自动掉下来，在地上跑得好快，我一脚便把它踩得灰飞烟灭了。在它从树上自动坠地时，我发现了它吐出一道细丝，大约是一种自卫的安全坠地的本能，这倒启示我把它与吐丝作网的蜘蛛联系起来：绿蜘蛛。

一场你死我活惊心动魄的人蛛大战便由此启幕。我逐树逐枝逐叶一一检查，发现了绿蜘蛛，便用一根树棍儿轻轻敲击一下树叶儿，那怪物故伎重演坠到地上，我便跟上一脚将它消灭。我得意于我对它的战略战术的成功。却不料发生了问题，在东墙角的梨树上一敲，那怪物没有弹到地上而是弹到另一片树叶上，然后就在绿叶中哧溜哧溜逃窜，搞得我眼花缭乱而终于丢掉了目标。好在就这么一棵小树，没有几根分枝，从头再侦察起来。到我终于再发现它的诡秘的行踪，便忘记了它可能身蕴毒汁，一把抓上去，连同那片绿叶都揉碎在掌心了。

整死了绿蜘蛛我也陷入老大的不自在，这右手的手心总是感到别扭和不舒服。我已经用肥皂洗过三回，没有发红也没有发肿，证明那怪物体内尚无蝎子和蛇一群的毒汁。然而我仍然感到极大的不自在，我便坐在小院里抽烟。这绿蜘蛛其实既不食枝也不噬叶，它是咬断芽尖和嫩叶叶梗吸吮树的汁液来养活那绿色肉体的，这未免有点太可恶。我又想了，我未栽梨树的时候，这种怪诞的昆虫从未发现过，梨树刚刚栽下一年，它就出现了，或者说它就来了。那么，它是打哪儿来的？也许它的卵在我朋友的苗圃里就附着在小杆上或根部，而它是专门以梨树汁液为生的寄生虫却确定无疑。我也就明白了，世上有多

少种禾苗多少种花草多少种树木，就会有多少种专门以各种禾苗各种花草各种树木的叶、汁甚至于为生存依托的寄生物，不必惊诧。

我后来便不再愤愤更不惊诧了，便在写作间隙里转到小院来捕杀绿蜘蛛，常常使我疲惫的神经亢奋起来，然后又沉心静气地拔出钢笔写作。整个一个春天和夏天都在进行着这种习以为常的间断性的战争，四株梨树在我的游戏似的战斗保护下蓬蓬勃勃生长起来，四棵中生长最慢的一棵也有擀面杖那么粗了。

到第三个年头的春天到来时，门外的那一株成熟了，当嫩芽开始在枝上逐渐膨胀肥大起来的时候，我发现有四五个芽苞儿几倍于普通的芽苞，我突然想到这是花苞儿而不是芽苞儿。果然，那包裹着花苗的胞衣在那天夜里自然破裂了，蹦出一束花蕾来。我更加警惕地监视绿蜘蛛的出现，绝不能让它危害第一茬花朵。花儿绽开了，是在夜里。早晨我推开大门时就瞅见绿叶之间点缀的那几束白花，心都微微悸颤了。

绿蜘蛛果然出现了，而且又多出了一种灰褐色的蜘蛛。比起绿蜘蛛来，这种灰褐色的蜘蛛就显得太平常太土老帽了，它与普通的蜘蛛似乎无大的差异，只是个儿很小；普通的常见的蜘蛛凭自己天才的织网本领捕捉昆虫以为生存手段，而这种灰褐色的蜘蛛却和那种绿蜘蛛一样，以吸吮梨树汁液来养肥壮大自身，它吐出的丝不是为织网而是作为潜逃保命的护身宝器，本质的差异就在这里，人类的我们判定它们为益虫或害虫的分界也在这里，绿蜘蛛褐蜘蛛的生存和发展是以残害梨树为生存条件的，而且是一种无可改变的生性本能。

在我严密的监视下，七束梨花完成了授粉而终于凋谢了，花芯里托出一枚小小的豆粒大小的青色小梨。我竟然一时不敢相信，这小不

点儿日后果真能长成一只拳头大的黄灿灿的梨子？在我的疑惑尚未解除的时候，突然发现，那些小青果的果梗全部被咬伤而干死了。我搞不清是绿蜘蛛咬的，还是褐蜘蛛咬的，反正是咬了，却又没把那梗咬断，依然支撑着，可能是那梗把儿比嫩芽坚硬吧？它把梗咬破吮咂了汁液就达到目的了。我一枚一枚揪下已经干死的豆粒大的小梨，心头涌出的不单是愤怒，还有对自己过失的内疚。反省之后的重大举措就是动用化学武器。我向邻居借来喷洒农药的器械，10CC灭虫剂就把四棵梨树喷洒得药水嘀嗒，蜘蛛们无论绿的还是褐色的全都毙命——树大叶密了，凭眼睛瞅瞄凭手抓脚踩已经是费力而难以收效的笨事了。

终于又等到梨开花！

靠近北边围墙的那一棵长得最健壮的梨树，花儿开得好繁，头一次开花就如此繁盛却是出乎意料。金色的蜜蜂在花朵上嗡嗡缭着绕着亲吻着，在白色的花瓣上起落蠕扭，我居然嫉妒起那小精灵如此亲近我的梨花仙子的举动了。我在放下笔点燃烟以后，便走出房间在这棵梨树下站一站，又转到那一棵梨树下站一站，尽管这棵只开了一束五朵花，也值得看，然后又走出大门站在第二次开花的这棵梨树旁边，她也是满树雪片一样的白花。悠悠的花香沁人心脾，嗡嗡的蜂声柔声蜜语，我忽然从心头飘出一句悠扬的歌：每当梨花开遍了原野……

我时刻也不敢忘记那绿的褐的蜘蛛。我按捺着不敢动用化学武器，唯恐杀伤采花酿蜜同时也替我的梨树完成授粉的蜜蜂。待到花色呈现衰败花心已现出麦粒大小的梨子的时候，我便又动用了化学武器。而且根据去年积累的经验，二十天喷洒一次，不等前次喷洒的药力消失，这一次又喷上树叶了。这一年，狡猾而阴毒的绿蜘蛛褐蜘蛛都没有构成大的危害。我胜利了。

这一年难以忘记，就在梨花开放的前一周，我把那部长篇小说的手稿交给了北京来的高、洪两位先生。交给他们的时候，我心里涌到唇边一句话：我连生命一起交给你们了。考虑这话会对他们构成心理压迫，我终于忍住不说。

我真正进入一种闲适的轻松状态，像负重远行走到尽头卸下了负载，而这负载又是精神的。我在小院里铺就一方砖地，垒起一个小小的石桌，砖地上可以放置一把竹编躺椅和一只竹编矮凳。天气渐渐热起来，我早晨喜欢躺在竹躺椅上喝茶，晚上更喜欢躺在这里独斟独饮“西凤”。太阳从东边移向西边，月亮也随其后从东边的原顶沉入西边的原坡，灞河里涨起的湿润的水汽则不管阴阳转换一直滋润人的肺腑。我躺在竹椅上，看着那从花瓣里分离出来的小梨渐渐膨胀，栗子大了，核桃大了，鸡蛋大了，又渐渐呈现出大头细尾的形状了。这么小小的一棵树上，居然长成了近五十个梨子，果梗终于承受不住不断长大的梨子的重负而变弯了，梨子便一个个头颅下垂吊在树上。乡邻们发现了我的梨树上的奇观，接二连三来参观，纷纷感叹“咱们这地方还是可以种梨树的嘛！”

梨子的颜色由深绿渐渐褪色为浅绿，而终于透出淡黄来，我知道它成熟了，怎么也舍不得把它摘下来，破坏了这一方风景。我总是想，如若摘去了梨，我躺在竹椅上看到的将会是怎样空落的梨树？每当村里有乡邻来看稀罕，我就只摘下一两个，用刀切了让大伙品尝，都说是酥脆水大甜香……直到剩下的梨子成熟过度而自己往下掉时，我才把它们摘了。我的那位送来梨树苗的朋友教导我说，梨子熟了就要摘，摘了好让梨树歇息下来，要不就会影响明年收成，我大为惊讶。

这年冬天我进城住了，小院的大门便永久性地锁上了，连同我的家园和我的梨树。我一去便陷入了一种无序的忙乱之中，常常几个月不能回乡下的家。到我夏天终于抽暇回家打开大门时，天哪，擀杖粗的蒿子被风吹倒匍匐在院子里，过道也被堵得走不过去。最悲哀的是梨树，不要说挂果了，芽芽叶叶被咬断得七零八落，真个是疮痍满身，可见绿蜘蛛褐蜘蛛以怎样的疯狂和得意对我进行了报复。

今年初春，我依然搅缠在纷纷纭纭的杂事之中而不能脱身，看到城市街树绿了，便想着家园里的梨树也该绿了，花苞也该开绽了，何时再能得到早晨起来看见袅袅娜娜的白衣仙女的惊喜？遂成一阕拙词：《阳关引·梨花》——

春风撩拨久，梨花一夜开。露珠如银，纤尘绝。晨光里，看团团凝脂，恰冰清玉澈。四年矣，终究等到清明节。 便手舞足蹈，歌一阕，自信千古，有耕耘，就收获。依旧谢浮华，还过愚人节。花无言，魂系沃土香益烈。

1994年12月9日 西安

绿风

——《我的树》之三

大约是十年前的那个夏天的末尾，即我下决心从都市返归故居的那一年，据说是关中几十年不遇的一个湿夏。这一年的麦子被连绵不断的淫雨浸泡得在麦穗上又发出绿芽来，稀泡泥泞的麦田里，农人无法挥动镰刀收割已经熟透已经发霉已经出芽的麦子。阴雨持续到夏末，满川已是一片绿色的苞谷、谷子和棉花，阴雨还在持续着，往常的百日大旱变成了百日阴雨，农家用石头和土坯垒筑的猪舍和茅厕十有八九都倒塌了，猪们便满村满地乱跑乱拱……

那天晚上交过子夜睡得最酣的时刻，一声天崩地裂似的响声震得我从被窝里蹦起来，坐在炕上足足昏厥了五分钟。天塌了？地震了？我是否还活着？当我肯定并没有发生这样的灾难的时候，也就判断出来后院里可能有小的灾变发生。我打着手电筒出了后门，后坡上滑坡了，幸亏滑塌的泥浆土方不大，否则我早已在酣睡中被泥浆葬埋了——我祖居的房根距后坡充其量不过十米。

我吓得再也无法入睡，坐等到天明一看，才真正地惊恐了。绿草和树木全部倾覆在后院里，和泥浆石头搅缠在一起。坡上竟是一片白花花的沙石鹅卵石堆积起来的沙坡。我从有智能的年岁起，就记得这后坡上长满了迎春花，每年春天便率先把一片金黄的花色呈现给世界也呈现给父亲。父亲年年都要说一句：迎春花开了！然而父亲也说不清是我们家族的哪一位祖宗栽植的，反正整个后坡上都覆盖着迎春花的厚茸茸的枝条，花丛中长着一些不能成材的构树榆树和酸枣棵子。

现在完了，整个都完了，什么树什么花什么草全都滑塌下来，和泥浆沙砾搅缠堆积在坡根下捂死了。陡坡上也不知被掩盖了几千年乃至几万年的沙砾重新裸露出来，某种史前的原生原始的气韵瞬间使我感觉到一种莫名的畏怯。我联想到被剥掉了衣服刮光了皮肉的一架骷髅，这骷髅确凿又是我们祖先我们家族里男人的骷髅……一种从家族墓穴里透出的幽冷之气直透我的骨髓。

我在那一刻便想到了覆盖，似乎不单是覆盖那一片史前的沙砾，而是把家族的早已腐蚀净尽血肉的骷髅覆盖起来。我要栽树，植草，然而须得等到秋后。

树叶落光白露成霜的秋末冬初是植树的好时节。我到山坡上挖了十余株野生的洋槐树，很随意地栽下了。所以随意，是我深知洋槐树生存能力特别强，一般树难存活的贫瘠干旱的石山河滩都能繁衍它的族类。然而我也不能太随意，在那很陡峭的沙坡上挖下坑，再给坑里回填上肥沃的一筐黄土，以便它能扎根。我相信，在这一堆黄土里扎下根来，它就可能再把它的根一寸一寸一尺一尺地伸向砂层。

当这一批指头粗细的小洋槐绽出绿叶的时候，我又忍不住浮想联翩。一束一束鲜嫩的绿枝绿叶婷婷于沙坡上，一种最悠远的古老和新近的现实联结起来了，骷髅和新生的血脉勾连起来了，生命的苍老和生命的鲜嫩融合起来了……无法推演无法判断家族悠远的历史，是一个从哪儿来的什么样的人在这里落脚或者可能是落草？最先是在山坡上挖洞藏身还是在河滩上搭置茅草棚？活着的最老的一位老汉只记得这个家族出过一位私塾先生，“字写得跟印出来的一样”。这位先生可能是近代以来家族中最伟大的一位，因为后人只记着他和他的字并引以为骄傲……整个家族的历史和记忆全部湮没了，只有一位先生和他

写的一手好毛笔字的印象留传，家族没有湮没的竟然只是一个会写字的先生。

洋槐很快就显出了差异，栽在坡根下有黄土的一株独占优势水肥，越往高处的树苗就逐渐生长缓滞了，尤其是最顶头的那一株，在抽出最初的几片叶子之后便停止生长了。直到随之而来的伏旱，我终于惊讶地发现它的叶子蔫了。我想如果再旱下去，不过三五天它就会残废，便提了半桶水爬上坡顶，那次水倒下去像倒入一个坑洞，然而那叶子就在眼皮下重新支棱起来了……这株长在最高处也是沙层最厚的地方的洋槐苗子，终究无法蓬勃起来。几年过去，最下边的那棵已经粗到可以做椽子了，而它却仍然只有指头粗细。那里没有水，它完全处于饥渴之中。在濒临旱死的危亡时刻，我才浇给它半桶水，而且每次都要累出我一身汗。然而它毕竟活下来了。

活下来就是胜利。它和其他十余棵洋槐苗子并无任何差异，在我从山野把它们挖出来移栽到我家后坡上的时候，它们自身仍然没有任何差异，只是我移栽的生存条件发生了巨大的差别，它们的命运才有了天壤之别。最下边的坡根下完全植根于肥沃土壤的那一株自然很欢实，我也最省事，从来也没给它浇过一滴水。而最上边的那一棵生存最艰难，我甚至感伤无意或者说随意选中它植于这块缺水缺肥几乎没有生存条件的地方真是亏待了它，把它给毁了，它未来也应该有长成一棵大树的生存权利的。然而它也给我以启迪，使我理解到一种生命的不甘灭亡的伟大的顽强。

这个启示是前年初夏又加深了的。那些洋槐已经成为一片林子，它们的各种形态的树冠在空中互相交接，形成一个巨大的绿盖，把那史前沉沙严密地覆盖起来，那沉沙上也逐年落积了一层或薄或厚的黄土，各种耐旱的野草已形成植被，只有少许几坨地方像秃疤裸露。五

月初，我的后坡上便爆出一片白雪似的槐花，一串串垂吊着，蜜蜂从早到晚都嗡嗡嘤嘤如同节日庆典。那悠悠的清香随着微微的山风灌进我的旧宅和新屋，灌进大门和窗户，弥漫在枕头床被和书架书桌纸笔以及书卷里。我不想说沉醉。我发觉这种美好的洋槐花的香气可以改变人的心境，使人从一种烦躁进入平和，从一种浮躁进入沉静，从一种黑暗进入光明，从一种龌龊进入洁净，从一种小肚鸡肠的醋意妒气引发的不平衡而进入一种绿野绿山清流的和谐和微笑……尤其是我每每想到这槐香是我栽植培育出来的。

最上边的那一棵没有开花。我根本没有对它寄托花的期望，它能保住生命就很不容易了，它保存生命所付出的艰辛比所有花串儿繁密的同族都要多许多。前年春天我回家去，我惊喜地发现它的朝着东边的那根枝条上缀着两朵白花，两朵距离很大而不能串结成串儿的花。我的心不由得微微悸动了，为了这两朵小小的洋槐花而悸颤不止。它终于完成了作为一种洋槐树的生命的全过程，扎根，绿叶，青枝和开花，一种生命体验的全过程，而且对生存的艰难生存的痛苦的体验最为深刻。我俯身低头亲吻了这两朵小花，香气不逊于任何别的一树。

每有风起，这片洋槐组成的小森林便欢腾起来，绿色的树冠在空中舞摆，使我总是和那海波海涛联系起来。是的，绿色的波涛汹涌回旋千姿百态风情万种，发出低吟响起长啸以至呐喊，都使我陷入一种温馨一种激励一种亢奋。每有骤雨声，和整个村庄的树木群族不可分割地融会在一起。每当风和日丽，我在写作疲惫时便走出后院爬上后坡，手抚着那已经粗糙起来的树干倚靠一会儿，或者背靠大树坐在石头上抽一支烟，便有一种置身森林的气息。旱薄荷依然有薄荷的清香，腐烂的落叶有一股腐霉的气味。我的小森林所形成的绿色的风，给我以生理和心理的调节。而这种调节却是最初的目的里所没有的。

1995年元旦 西安

皮实

一

确实有点不可思议，胡兴汉创办乡村工业竟然是受一个“历史反革命”诱发的。

岳家沟一位老女婿，“文革”中被打成“历史反革命”，从西安遣送原籍山东农村改造。那一年，老女婿从山东来岳家沟探亲，闲逛闲遛到大队试验站，和党支部书记胡兴汉闲聊起来。他说他们那儿的农村，办了不少企业，比单纯的种庄稼收入大多了。他不理解：你们岳家沟离西安不过三十来里地，西安有那么多厂矿单位，你们搞点附件加工还不容易吗?

此话正中胡兴汉下怀。他在岳家沟担任大小队干部、做配角或唱主角，近三十年了，仍然无法向亲爱的社员们兑现当初实行农业合作化时提出的美好而又浪漫的口号，反倒越搞越穷了。社员们普遍缺粮。七个生产队的劳动日价值，好的不过三毛五，差的只有几分钱。能使的方儿都使过了，就是无法让社员的粮缸冒起来，钱兜肥起来。他仔细询问老女婿，得知那些生产队办的企业其实并不都是难弄的，譬如那里生产一种木工凿子，盘一台小烘炉，收集生产队扔掉的那些破铧做钢料就可以生产了。他当即决定，托这位老女婿回去与他那个生产队联系，派一位或几位师傅来，收入对半分。

这个“老反革命”还真顶用，回去不久就来信说一切均告谈妥。四位制凿师傅千里迢迢从山东来到了岳家沟村。

没有厂房，没有工具，没有材料，关键是岳家沟大队根本没有资金。胡兴汉唯一能够想出的办法是：凑合。在沟底一孔废弃的破窑里，第一台烘炉盘起来了。废铁破铧也收来了。

点火了。土窑里火光闪闪，铁锤叮当。大锤小锤相间，砸出轻重有致的节拍。这单调却又响亮的锤声，震荡着岳家沟那些蜗居在土窑里的庄稼汉的胸膛，首当其震的自然莫过于胡兴汉。他兴奋得精神反常，常常感到很累却又没有瞌睡。

历史上只生产过小麦、玉米、棉花和豆类的岳家沟的原野上，破天荒生产出来了第一件工业品——钢凿。销路甚好，令人鼓舞。几年以后，当胡兴汉连续创办起十个工厂和作坊的村办企业，年收入达到二百七十六万元的光景的时候，常常忘不了第一台烘炉打制出第一把钢凿时的兴奋心情。

矛盾随之发生。山东师傅提出来要给自个儿提成，把胡兴汉难住了。协议是以岳家沟大队和山东师傅所在的生产队签订的，公对公，对半开成，毫不含糊；山东师傅的所得由他们所在的生产队解决，与岳家沟大队无涉。很显然，师傅想给自己掏腾个一半成，自然得从岳家沟那对半里提取。胡兴汉颇伤脑筋，不给吧，师傅在技术上留下一手或消极怠工，损失更大了；给吧，路数不正，倒不在乎那几个钱。那时候，胡兴汉还不开窍，还不通晓人际关系中的奥秘，还要坚持党的秉公办事的原则，不想开也不敢开这一辙。于是，结局比预料的更惨更糟，那四位师傅毫不留恋地背上行李卷告别了岳家沟的小窑洞而怒返山东。刚刚红火了一阵儿的土窑洞又沉寂了。火灭了。烘炉成了死炉。叮当作响的优美旋律从山沟里消失了。岳家沟深而又狭长的沟壑里又复原了数百年来的沉寂与和谐。

胡兴汉的心却怎么也沉寂不下来，用乡里话说叫凉不下。他紧跟尻子追到山东去，心头火急火燎，不光是要想法重新点燃小烘炉；更迫急的是，那位“老反革命”女婿因为给两个生产队牵线搭桥而招来了横祸，作为资本主义倾向的阶级根源，正好切入，正好被推上台子斗争。胡兴汉于心不忍。

他找到山东师傅所在的大队，并不解释协议破裂的内部秘密，只是一味向党支部解释责任并不在那个“历史反革命”，是自己要他牵线介绍的，一切责任由自个承担。“老反革命”遂得解脱，感激不尽。关中人的义气使山东大汉完全折服，冒着更大的风险，悄悄引着胡兴汉到邻近的七八个村子去观看村办企业的派势。

胡兴汉真是大开眼界。时在一九七七年，中国刚刚除掉“四害”，社会刚刚出现转机，仍然贯彻着“阶级斗争为纲”的既定方针，农业学大寨高潮迭起，资本主义尾巴照砍不误。胡兴汉发现，山东那儿农村也批也砍“尾巴”，而队办企业却照办不停。他在观看了名目繁多的队办企业之后，对一家纺织配件厂大感兴趣。这个小小的村子，从西安进料，又把制成的配件返还给西安的棉纺织厂。他虽不懂技术，看去也不甚复杂，最简单的卡扣不过是一根粗铁丝压扁转弯就行了，每件卖一毛多钱，值一斤小麦价。他当即拍定，办一个纺织配件厂，为西安、咸阳、郑州的棉织厂生产配件。仅西安一地就有多少台纺织机械呀？而西安却没有一家配件厂。他与那个村子签了协议，请来师傅，当年建成投产，一九七八年正式生产，搞了七万元产值，净赚二万。老天爷，岳家沟大队什么时候有过两万块钱呀！往常要办一件大事小事，先得与生产队队长商量个没完没了，大队有权没钱是个实实在在的空架子，生产小队长才是实权实钱派。大队有钱了，腰粗气壮了。到一九七九年，产值翻番达到十六万元。一九八〇年再翻番上到三十

万元，获利十万元。胡兴汉手里有十万元了，这个书记才当得有滋有味胆壮气昂了，三十万元的产值和十万元的纯利润不过投入了五十几个劳力，却相当于岳家沟最好年景里全大队农业总收入。到一九八六年年底，工副业总产值达到二百七十六万元，占全村工农业总收入的百分之九十，纯农业收入被挤缩为百分之十。

二

已近花甲之年的胡兴汉，向一切对他饶有兴趣的来访者叙述自己的人生历程的时候，显示出一个诚实的关中人的天真和坦率。那些昨天发生过的事，都是自己的双足踏踩下的笔直或者扭歪的脚印，留在岳家沟的沟道里和原野上，无法更改了。那些自己说过的对的错的似是而非的话，留在同代乡亲的心里，抹也抹不掉掏也掏不出来了。那是昨天的事，已经变成历史。既是胡兴汉的光彩混掺着不光彩的历史，也是岳家沟的历史，也是我们国家的历史。

多年后的今天，在他回顾几十年的历程的时候，他的诚实坦率的品格令我钦佩。他说他一生里有过四次最来劲的事。第一次是上骊山南麓的洪庆山区植树造林。他是团支书，领着本村的男女青年向荒山秃岭进军，挖修鱼鳞坑，植树播种，绿化祖国，成绩显著，被评为先进团支部，出席了一九五六年在绥德召开的团省委的表彰会。他说那时候根本不知道累，真来劲！第二次是六十年代初他给岳家沟办电器化。一无资金，二无材料，他东奔西颠，背着干馍跑机关又跑供电局，硬是把电通进了岳家沟的沟道，结束了煤油和豆油照明的历史，成为原坡和山区第一个通电的村子。想着明亮的电灯的种种美妙，想着电动石磨的风采，他很来劲。第三件事是七十年代初的打井工程。这是在“农业学大寨”的风潮里完成的壮举。无论当今怎样评价学大寨

运动，都不能改变他高原打井给自己也给村民以及子孙带来的福荫。同样是缺资金又缺材料，硬是在高原上打成了七眼深井，安装了水管，解决了人畜用水的头道难题，结束了自古旱原吃水比油难的恓惶历史。最来劲的是他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初雄心勃勃兴办村办企业的那阵儿……

胡兴汉说他最不来劲最窝劲的时期是一九六五年的“四清”运动。

那年初夏，半百名操着中国南北西东各地口音的“四清”队员拥进狭长高深的岳家沟来。他们不像解放以来多次进入岳家沟的那些区、乡干部，进村先找干部，了解情况，布置工作，开展积肥、扫盲或者是捕杀老鼠麻雀的突击运动；土地改革、合作化和公社化这几个大的运动中下乡来的干部也是这样。“四清”运动派来的干部却一反往常的做法，男女队员们直接进入这家那家的窑洞，直接用自己蛮声蛮调的口音和岳家沟的土著通话，直接串联，直接扎根，直接发动群众，直接培养自己发现的积极分子，直接搜集材料，直接面对面地批斗所有的大小队干部。

胡兴汉在以往的所有运动中都来劲过，这回来不上劲了。他被限定在一孔窑里，由工作队员监视着交代问题，不许与外人接触，也不许与家人碰面，饭食要在监视下送交。且不评这算不算软禁，运动中新创造的专用名词叫“上楼”，交代清楚问题被释软禁叫“下楼”。岳家沟有窑而无楼，说“上楼”“下楼”实际不如说“进窑”“出窑”更切合乡土实际。有问题没问题谁也难担保，难担保就请你“进窑”。火烧一番。真金不怕火炼。真革命就不怕“进窑”火烧。

胡兴汉委屈难受。他受不了亲爱的党派来的干部对他的冷漠，对他的鄙夷，对他的敌意。他的母亲对他的担忧甚至暗暗施行的防范更

使他加重了难受的程度。他母亲只怕他一时转不过弯来，而把裤带错勒到脖子上。岳家沟村民悄悄传递着可怖的谣言：××村的×××和×××村的××她男人，一个就是把裤带系错了位置，一个却把指头塞进电灯接口里，统统都变成“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了。

胡兴汉还有一次来劲而办失塌了的事：学习小靳庄。

现在的年轻人也许对小靳庄感到陌生。这是天津市郊的一个小村庄，是江青亲手培育出来的一个样板，以农民唱歌跳舞诵诗练拳评法批儒活动而红极一时。胡兴汉起初只是响应号召学大寨平整坡地和打井，后来市上把这个山沟瞅中而作为学小靳庄的“点”来抓。驻队干部抓得紧，胡兴汉也配合得好，很来劲。岳家沟的农民也唱歌了，跳舞了，作诗诵诗了，唱样板戏了，武术队也组织起来了，坑头地头的批判会和高台大会相互掺和补充，日日夜夜窑里院里村巷田间都弥漫着批儒评法的火药味儿，岳家沟七华里长的沟道成了个火药库。岳家沟很快成为西安市的小靳庄。来岳家沟学习经验参观取经的人络绎于山道，岳家沟被邀去做报告传经送宝的人活跃于机关、工厂、学校、农村的讲台上……

十年后胡兴汉向我叙说这一次来劲的蠢事的时候，自嘲地笑笑：“那阵子简直是胡㞞闹哩！麦子摊在场上要碾要扬，学习班的人雷打不动坐在窑里批孔老二。咱自己全当没文化没脑筋胡㞞闹哩，那些驻队的市上干部也……真是胡㞞闹还当真个的闹哩！”

胡㞞闹的事，其实不只学小靳庄。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放卫星，胡兴汉记忆犹深。岳家沟一夜间变成了军事组织，队长成了排长，大队长变为连长。上级团长一声军令，军令如山倒，连排长们带着穿黑袄红衫的男女兵士赶到一二十里外的平原上去帮那些村子收秋，掰苞

谷棒子又掐谷穗子，那些平原上的同类士兵又跑上坡原地带帮岳家沟的人挖红苕。挖下的红苕胡乱堆放在几个大窑里，没等得分给社员就烂成一堆黄面酱了，臭了一条沟……胡㞎闹也不是？不过，那时候胡兴汉在营部当一名秘书的角色，并不负主要责任。而学小靳庄的事，他是党支部书记，挂帅的人，带头的火车头。

胡兴汉坦率地陈述他出五关斩六将的来劲的事，也不文过饰非，毫不隐瞒他来劲地学习小靳庄而弄失塌了的事。“胡㞎闹的事”是农民式的严格的自我审判。

三

胡兴汉穿一身质地不错的蓝中山装，玳瑁眼镜，蓄大背头，裸露着宽大的额头。这身装备，很像区或乡的中老年干部的派头。然而稍加留意，我就发现他的关中农民的习性仍然浓厚。一根短柄旱烟袋，一个黑布烟荷包，不停地挖着，多是一种习惯动作而不是要挖出烟来抽。尽管他现在可以不计较吸烟的花费，仍然宁舍雪茄而取旱烟，旱烟比一切国产或进口的洋烟都好得远，味绝，味正，味硬，过瘾。

胡兴汉向我侃侃而谈他创办十个企业的艰难经过，也谈他更为艰难曲折的人生历程。刚一解放，胡兴汉就投入到新政权的建设中来。他做过团支书，农业社主任，公社某管理区文书，生产队以及党支部书记。他在岳家沟以一个基层干部的身份经历了土改，查田定产，合作化，公社化，三年因自然和人为造成的困难时月，“四清”以及“文革”运动，学大寨加学小靳庄，一直到一九七六年十月“四害”被粉碎。这一年，胡兴汉四十六岁，已经逼近习惯上的老年人的界限。他面对着一沟两旁依然破旧的一孔孔窑洞以及窑洞里那些依然为塞饱肚皮而发熬煎的社员和乡亲，虽然尚不完全明朗但确已意识到自己近三十年

来花费的身力和心力没有给他们带来多少好处，多年来以一双胶鞋或一只热水瓶而喋喋嘤嘤忆苦思甜似乎已变成一种嘲讽而不再构成自己的功绩，他的心痛苦地翻腾，自己还能再这么折腾三十年吗？三十年后还有脸面继续炫耀一只热水瓶和一双胶鞋吗?

从山东来岳家沟探亲的“历史反革命”老女婿，向他建议搞点工业和副业的时候，正当他思索而找不到新的出路的当儿。他毫不犹豫地干了起来，终于走出了一条新的路子。

我看着他的短柄旱烟袋在他紫红的脸前冒出一缕缕蓝烟，听着他的谈叙，隔着烟雾瞧着他的熠熠闪光的眼睛，我的心里忽然冒出来这两个字：皮实。

这人真皮实。这是乡下人的用语。大约包含着顽强泼辣吃苦耐磨百折不回诸种意思，而反意就是怯懦脆弱经不起风也经不得雨或者是一蹶不振一触即溃的人。如果没有这种皮实的品格和内在气质，他能在几十年来频繁不断的运动里撑持下来吗？他能从一会儿学“大”一会儿学“小”一会儿说学“小”不对学“大”对随之学“大”学“小”都学错了的莫测风云中透过一口活气来吗？还能有心思还会来劲地寻找他自己的和岳家沟乡亲的新的出路吗?

一九八一年的初夏时节，给我心头留下了永难忘怀的历史性印记。农业责任制在关中农村由风传变为付诸实施，且不说社员群众的情绪如何，我接触到的许多农村基层干部都处于一种思想上的混乱和心理上的惶惑，诸如“辛辛苦苦二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的顺口溜就是这种混乱和惶惑的真实写照。有的人分完地分完牛就无事可做而一蹶不振了，有的人一心一意经营自己的麦田菜园和母牛去了，有的人利用过去当干部熟人多关系稠找自己发财致富的门路去了。农民群众

生产热情的突然暴涨和农村基层组织的骤然瘫痪形成了峰巅和谷底。我问胡兴汉，在这个乡村历史的转折时期，你怎样想和做着什么?

“嘿！我那阵心里畅快得很，政策才正顺我的心来咧！”

“为什么？”

“我从一九七七年建成纺织配件厂，到一九八一年又建成了两个厂，收入大增。我感到农业生产成为包袱了，碍着我办企业。责任制一推行，土地由各家各户去操心经营，我就不花费多少精力了，正好腾出手来抓村办工业……这当儿，我的劲儿大得很！”

我信他的话。

“土地牲畜一下户，一九八二年我到南方走了一趟，南京、无锡、上海，又转到青岛和北京，专门找乡镇企业学习。一看，妈呀！咱的那点小家当差得‘核’大！回来就重整旗鼓，对旧有厂子改造设备，长远打算，又一股气促成了三个新厂，砖厂、鞋厂和建筑队。一九八三年巩固了一年，一九八四年又促建了四个厂子，这一年产值过了百万大关，区政府给我们挂了旗。一九八五年做了一年巩固完善的工作，一九八六年又促上来两个厂子，去年年底产值达到二百七十六万元……”

“发展真快！”我有点眼花缭乱了。

“土地一下户，农业劳力闲下了，一家分那么几亩地，只忙收种俩月，一年有成十个月没活儿干。再加上一拨一拨的中学生毕业回村，地不够他爸种，小青年做啥呀？我加紧办厂，就是给农村青年找活儿干。现在，村办企业有五百六十人，占全村劳力的百分之六十。”

这个人在许多同类基层干部惶惑的时候却特别来劲。这人皮实，我愈加重了这个感觉。

这个皮实的人的品质令人折服。

一位因某些历史积怨尚不和他“招嘴”的村民，有个儿子学识颇佳，干部们聚会研究确定一位民办教师时，胡兴汉就把此人的儿子提出来，得以通过。不仅干部们钦佩，村民更称颂他的胸怀。

有一位和他一起工作的干部，负责一个工厂，生产搞得不错。这位干部向他提出，想辞去职务，自己另办一个工厂，征询他的意见。胡兴汉很坦诚地劝说，私人办厂，符合政策，我不阻挡，还要支持。你办个工厂，富得肯定快，也是好事。可村子里的村民呢？咱们办企业，吸引本村村民，家家增加收入，我们也增加收入，当然比自个办厂要少。我还是希望你留在村办厂里，咱们合伙把村办企业搞好。谁让咱们都是共产党员呢！这位干部留下来，继续为村办厂效劳，工作挺好。

其实岳家沟的任何人都能解开这个简单的问题：既然胡兴汉有能耐给村里办起十个厂子，年产值二百多万，他何愁给自己办不起一个厂子来？他的收入会几十倍于当今的干部补贴。他为啥不干呢？

这问题既简单又复杂。简单的问题在复杂化了的社会生活里就不简单而复杂了。胡兴汉想，生活在变化，社会在前进，人不能抱残守缺冥顽不化，要开眼界，要接受新观念，要甩开一切陈腐的东西而随着社会潮流一起汹涌。但，不是一切观念都得改变，一些生活的基本观念不能改变。比如说，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这个观念能改变吗？能变或改换了，就不是共产党了！

四

从沟坳看下去，一条时宽时窄弯弯曲曲的壑沟，从骊山南麓的浅坡地带延伸下去，一直延伸到国营工厂巨大的厂房和高耸的烟囱拥挤的平原上。如果从南面或北面望过去，只能看见宽阔的原坡上有一条缝缝，那是从沟里冒出的树梢。如果不是沟南沟北刚刚簇起的一座座新房和小洋楼，谁也不会想到那里有一条沟，那沟里还有一个二千余人的世界。沿着七华里长的沟道，岳家沟所辖的柿园、沟南、任东、沟北、于家、西胡和庙沟七个自然村自东至西依次窝藏在这个深沉的黄土沟壑里。

记不清这条沟壑从何年始有人迹。记不清第一位来这个沟壑打凿第一孔窑洞的开沟祖宗。记不清七个自然村里哪个村子首先形成村落。现成的事实是：到本世纪进入八十年代的时候，这个沟壑里的二千多村民与他们的无以名记的开沟祖宗一样，依然是倚穴而居。

沟底阴湿。沟坡陡峭。树木茂盛，窑洞却因之晦暗。这条被风雨无情剥蚀得残破不堪的沟壑里的一代一代居民，经历了中国远古和近代史上无数次改朝换代兵荒马乱的洗劫，遭遇过魔幻般的奇寒奇旱奇涝奇热大蝗虫冷子虎列拉瘟疫的轮番劫难，而终于没有灭绝，而且人满人稠超计划生育成为大患。解放后欣欣鼓舞过自由的天和自由的地，敲响过合作化公社化奔天堂的阵阵锣鼓，发疯的“文革”发疯地学大寨发疯地学小靳庄跳舞唱歌演样板戏批孔老二。无论什么运动以怎样崇高的目的发动起来又以不大崇高的结局告终，这个沟道里的居民依然还是以窑洞为生为窝为快。这沟壑里的一个个人都皮实！

现在，来到岳家沟的工作干部采访记者和走亲访友的亲戚，远远就可以看见沟南沟北已经形成了几个居民点或者说新村，一色的红砖

红瓦，或瓦房或平顶屋或镶瓷片贴玻璃马赛克的二层小洋楼，比窑洞漂亮比窑洞美观比窑洞阳光充足比窑洞风光风流。

从洞顶看下去，一孔孔被遗弃的破窑洞在初夏的艳阳下更显得荒寂，围墙坍塌。猪圈鸡埘倒塌。流水的淤泥漫过烟熏变黑的窑面。拆除了门窗的窑面下堆着破碎的土坯和瓦砾。没有发生洪荒或地震或水灾，不必为之悲怆！窑洞的主人已经迁居到光也充足风也爽利交通更方便的沟顶上的新村里去了，毫不留恋地告别了祖居几百年的沟壑里的土窑洞。一个皮实的农村干部领着他的二千余名皮实的乡亲终于从沟壑地缝里站立到开阔的原坡上，值得欢呼。

历史性的告别！

1987年5月

最珍贵的记忆

——日记五则

一九八七年十月二十五日

北京，秋末冬初，一个难得的无风无沙阳光和煦如春的早晨。中国共产党第十三次代表大会今天召开。今天，将因为发生这样重要的事情而在我的心里不胜负载。汽车在天安门广场停下，走过这阳光绚烂的广场，踏上通向大会堂的石阶，我的心里像绚烂的太阳一样热烈。

人生道路上的台阶，不似通向大会堂的台阶这样平整。那是六十年代初，我忍受着瓜菜代粮的饥饿，坐在学校操场的浓密的柳荫下，听一位戎马疆场的人民解放战争的英雄慷慨激昂的演讲。“我一生无他求，高官嘛，没意思；金钱嘛，太乏味！我唯一的人生目标，就是做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这段话，一字一句浮雕般地铭刻我心头……

在开阔的大会堂里，我找到了自己的座位。静静地坐下来等待，等待那个重要时刻的到来。我一向缺乏等候的耐心，而今天却异乎寻常。我瞅着拥进会场戴着代表证急急寻找座位的男女各族代表，瞅着大会主席台上十面红旗簇拥着的金色的由铁锤镰刀构成的党徽，我的心里是如此安详却又思潮澎湃。

那是二十一年前的一个冬天的早晨，在公社一个简陋狭小的房间里，我羞怯不安地坐在一个角落里，听那些比我年长的共产党员们对我的评价，听介绍人向支部汇报对我的考察结果……我被接收了。我

走出那个狭小房间的时候，看见灿烂的太阳，几乎流下眼泪来，同时又想到了在学校听战斗英雄演讲的情景，特别是那段话。我那时是一个社办农业中学的教员，民办的，这似乎并不影响我当时圣洁的心境……整整二十一年过去了。

我没有奢望过能有参加党的代表大会这样的机会。我知道，我是坐在整个中国和世界都在翘望着的北京人民大会堂啊！我感到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幸福！二十一年过去了，而且是人生的最重要的二十一个年头，我现在竟然如此冷静地回首这一切。有几步走得顺畅，可也有几步摔得鼻青脸肿，唯一所幸者，我知道路很长，我依然往前走着。我没有因为些微的成就而忘记了目标，忘记了赶路。此刻，既往的那些曾经确也令人激动的赞誉和荣耀顿然失去了光彩，那些曾经使人焦灼愧悔甚至痛苦不堪的失误也变得冷寂了，我在面对着主席台上那庄严的党徽的此刻，心里只剩下了必须继续往前走这一个单纯而坚定的信念了。

那个重要的时刻，正在分针、秒针的运转中逼近。

八点五十分，大会堂骤然沉静下来，不闻一丝声息。主席台前聚集的中外记者，也安静不动。

一种自然的沉静。

一种重要企盼的沉静。

八点五十五分，大会堂主席台的出口处，走出来那位全国和全世界都十分熟悉的矮矮的巨人，暴风雨般的掌声骤然掀起来。

邓小平以他稳健的步履走向主席台。他微笑着回报代表们的鼓掌。

陈云同志在赵紫阳的搀扶下缓慢地移着小步，那是一种强烈的意志力支配下的步履。那搀扶与被搀扶，正是中国两代人的形象。

邓小平同志以他沉稳雄浑的四川口音宣布大会开幕，暴风雨般的掌声经久不息……

企盼已久的那个重要时刻到来了！

十月二十六日

讨论学习赵紫阳的报告：《沿着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报告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重大理论。立论根据有三：一是对百余年来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国情的客观剖析，二是对三十余年来社会主义在我国初步形成的经济状况的客观分析，三是对五十年代后期开始的犯“左”倾错误主要根源的分析，在于对社会主义初期阶段的主要矛盾认识的偏差上。这样从正反两方面深刻地论证了在中国这样的具体国情里只能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而且要延续上百年时间；这个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而不是以阶级斗争为纲，更不可能“跑步进入共产主义”。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提出的党的基本路线是实际的。

我们为今天得到的这个科学理论付出了血的代价。

世界上的社会主义国家在对自己国家的认识和发展中也不是一条坦途。赫鲁晓夫五十年代末就提出“全面建设共产主义”的口号，他又被苏联的历史证明失败了；勃列日涅夫提出“建设发达的社会主义”的口号显然是比赫鲁晓夫在理论上后退了一步，也没有得到他想得到的成功；戈尔巴乔夫不仅在理论上比他的前任又后退了一步，而且提出改革。可见，对世界各国共产党人来说，对社会主义的认识仍然是一个没有先例的新鲜的课题。关键不在于仿效哪种模式，而在于对于自己的国情的科学分析。

三中全会以来生动活泼的生活现实使人想到了理论的贫困，人们需要强有力的理论辨识急骤变化着的生活，立志改革的先锋之子渴望科学的理论指导自己的实践，被极左的条律捆绑着的心灵也希冀科学的理论去解开绳索……正在改革浪潮中的中国和在改革生活中奋进以及彷徨的种种人都在呼唤科学理论的诞生。

初级阶段的理论为中国的深入改革提供了一个科学的理论基础，为今后从我们的政治生活里彻底排除“左”或“右”的干扰廓出一条准绳，为中国实现伟大的第二次腾飞找到了一条自己的切实的道路。

说我们党是伟大光荣正确的党，最重要之点就体现在她是以科学的理论指导中国的革命和建设的实践。

“上百年”的初级阶段，将以其波澜壮阔的发展过程不断丰富这个理论，为马克思主义理论增添新的光彩！

重大真理的发现，总是要耸立一座丰碑，划开一个时代。

十月二十七日

我必须把昨晚看电视中激动人心的时刻记述下来。

十月二十六日下午六时。中国和日本的足球队为争夺进军一九八八年汉城奥运会资格的最后决战，准时拉开战幕。随着主裁判一声哨响，我的心就绷紧了，许多党代表的心也绷紧了，我相信，全中国有数以千百万的球迷此刻正守坐在电视机旁，比我们的心绷得更紧。

此役对中国队是背水一战。用主教练高丰文的话说是“自古华山一条路”。非胜即亡，别无选择。

贺龙元帅生前为中国三大球走向世界呕心沥血，而终于壮志未酬。中国的足球发展步履维艰。苏永舜教练在上届奥运会争夺出线权的关键一役中饮恨绿茵。曾雪麟主持的国家队静水翻船，“五一九”的阴影笼罩着岂止是曾教练一人苦难的心？高丰文教练操导下的东京决战，远远超出了一场足球胜负的狭隘的意义。

足球象征着我们的国家，象征着我们的民族。中国要走向世界，中华民族要跻身世界民族之林。足球的低水平与经济的落后一样不能使任何一个炎黄子孙安于现状。中国要第二次腾飞，足球也要腾飞。作为世界第一运动的足球竞技场，往往是一个民族意志力的象征。

中国队踢得相当有气势，传接球迅速准确，左冲右突，射门果断，开赛二十分钟里，已有几次威胁极大的射门，日队门前，已是风声鹤唳，防不胜防。终于在三十七分钟，柳海光头槌破门，立下了头功。下半场唐尧东一记冷射，可以说是气壮山河，彻底打碎了日方的梦想。我的绷紧的心完全松弛，被难以容纳的太多的欢乐和激情所充斥。

电视机转播刚结束，我就听到了爆豆般的鞭炮声。幽幽的火药味儿弥漫在清凉的夜风里。我走到大街上，行人如鲫，热情洋溢的青年们不断高呼：“中国万岁！”四面的楼房上，从一个个窗户里冒出爆竹的火光！炎黄子孙们自豪地庆贺中国足球第一次冲出亚洲，第一次获得参加世界比赛的资格。它标志着我们民族的雄劲，兴旺，勇往直前。

中国必将走向世界，以自己的信念和姿容。

十月二十九日

讨论中委、纪委候选人。

邓小平同志提出全退，中委都不进，令代表们震惊。

人们依据自己对这位领袖的不同程度的了解而得出一致的结论：他以他远见卓识的政治眼光和实事求是的务实精神而使他与中国当代史融为一体；他以他坚定顽强的品格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重要关头于个人安危而不顾力挽狂澜于既倒，从而展示出一个少有的颇富戏剧性的领袖人物的生命历程；无论民主革命或社会主义建设尤其是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卓著功勋，使他和每一个中国人都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他无论如何不喜欢对他歌功颂德，而我们只是以一个党员的感知来客观地理解他。

邓小平同志的断然举措，表现出一位无产阶级领袖人物高瞻远瞩的政治眼光。“中央就那么些位子，我们不退，年轻同志就上不来

嘛！”这样听来并不复杂的道理，却只有他做到了。共产主义运动中诸多的党的领袖人物，单从这一点上来说，首先做到的是邓小平同志。

他带了怎样了不起的一个头啊！

十一月一日

北京初雪。银装素裹。阳光柔媚。

大会堂里春意盎然。今天举行选举和闭幕式。人们抓住会前的时间，在一切都值得留恋的地方摄影留念。坐在自己的座位上，背景是大会主席台，那红旗簇拥的党徽，那十三大的会标，连同幸福自豪的微笑一同摄进镜头，留作也许是一个普通党员个人生命中最珍贵的记忆。

下午，中国作协书记处召集参加十三大的作家代表座谈。这是我参加过的作家们发言最踊跃的座谈会。作家们为赵紫阳的报告欢欣鼓舞，任何一个作家都能在这个报告里找到自己的位置。作家们为党的代表大会所体现的民主精神欢欣鼓舞，这无疑是中国政治生活的重要演进。作家们为选出全党全国人民拥戴的新的党中央领导人而欢欣鼓舞，这是中国人民的福气！

赵紫阳的报告里论述文化艺术事业的发展时用语是“欣欣向荣”。这是对新时期以来文学艺术整个风貌的极准确的概括。

文学将继续欣欣向荣，我满怀信心。

山里有黄金

黄金贵重。采金淘金这活儿总是笼罩着神秘和冒险的色彩。

黄金又很稀少，似乎总是埋藏在人迹罕至的深山莽林或冰雪覆盖的荒原之中，那里险恶的自然环境更加渲染了神秘和冒险的气氛。这些印象是我从许多传说里自幼便铸就了的，后来阅读和观看了一些中外以淘金为题材的小说电影，验证了也加深了这神秘冒险的印象。

新年佳节的气氛日渐浓郁，街巷里频频爆响的鞭炮催促着新年的脚步。我日渐一日地感到火药气味的压迫，莫名地陷入一种惶惶一种烦腻一种紊乱交织的心境。徐岳约我走一趟汉中，看看那里已经形成气候的采金淘金业，我便怀着逃亡的目的跟他上路了……我们踏上了庞然大物蔚为壮观的采金船。我们看到了翻搗过滤过的砂石的山。我们看到了刚刚从泥沙里披拣分离出来带着羞怯之色的原生状态的黄金。我有点失望，因为那些神秘冒险的印象不仅没有得到验证，反而轻易地粉碎了。不过，我的那种惶惶烦腻紊乱的心绪已经平静下来，那些刚刚结识的朋友给我以深刻的影响，他们才是人生真实意义上闪闪发光的金子。

阳平关——嘉陵江一组英姿纷呈的群雕

阳平关紧紧贴着嘉陵江，静静地偎依在大巴山的怀抱之中，四面巍峨的群峰安谧的气韵滋润着这个古老陈旧的名镇。我在中学读《在和平的日子里》时留下了嘉陵江暴戾不羁的强烈印记，眼下的嘉陵江

却像被阉割了的牡马一样温顺，蓝色的江水在沙滩上蜿蜒着毫无生气的行程。

嘉陵江在一个称作燕子砭的山包前拐了一个大弯儿，这里就留下一片在大巴山里甚为稀罕的平川和一方开阔的沙滩，一艘刚刚竣工的采金船像一只燕子样儿栖泊在沙滩上。这条船的船长、技工以及工人将在这里度过他们生命的七八分之一。

我第一眼看见阳平关金矿矿长于洪祥的脸孔，想起某年春节晚会上出演《双簧》的那位台前表演的演员。他的长条脸上有一双喜盈盈的眼睛，那眼里的喜悦和善的光气不是做出来的而是与生俱来，我相信任何人任何时间看见这双眼睛都会心灵为之一亮。他穿着四兜蓝衫披着黄色仿军用大衣，坐下来就津津乐道他的金矿和他的采金船；挨着个儿介绍他的好船长、好工程师、好工人、好司机；甚至连这些人的家属娃娃也是令人感动之好，他们在洪水威胁的紧要时刻也上阵助战了。好人都类聚到他的麾下了？我突然发觉上当，把商定的谈话时间全部占用了，我们对他本人的了解几乎没有任何进展。

于洪祥在采金行业可以说是一位全挂把式。他干过机修干过采金干过后勤当过科长还当过金矿子弟中学的校长，他原本是东北师范大学中文系的本科毕业生，文化修养文字能力都是高能的。他在东北二道甸子金矿工作时，金矿子弟中学高考中连续多年不中一员，引起校内校外上下朝野怨声载道，矿上领导被这怨声强烈地震动，遂派于洪祥出任校长。于洪祥在学校整了一年，就考中了六七个大学生，第二年上升到十四五个，第三年一跃成为所在地区第一名。他的声名大振名噪一时誉满全矿，他却打起铺盖卷悄然告退，只有这一次向组织申述了一下个人的兴趣：我觉得我还是干采金痛快。

他来到汉中黄金公司就被派往刚刚规划建设的阳平关金矿。他看到的是与东北风光迥然不同的亚热带的自然风貌，一片被崇山峻岭围抱着的静寂的沙漠。一想到金子他就来劲了，荒凉是天经地义的，东北的金矿也是在黑龙江上和远离村落的大草甸子里，似乎繁华的都市迄今还未发现那里探测到金矿的信息。

他在尘土飞扬的阳平关古镇上转悠，终于把眼睛瞅死了一个下马停建的磷肥厂，随之就把这个已经宣布死亡的厂子的厂房买了下来，连那二十几名留守人员也转归金矿。他对原有的厂房进行了修复和改造，很快弄起办公机关，仅此一项就节约下五十多万元。办公和生活设施自然简陋了点，在奢侈风潮漫卷贫穷的中国乡村和城市的异常现象当中，要做到这一点，还真需有点精神的人。

这个人的成功有许多可供人们思考的东西。他不仅依赖他的熟悉的专业技术统率这个新建的金矿，重要的是以他的严格的办事作风和生活作风。他没有上下班的时间观念，习惯于四五点钟起床即开始工作，直到夜深总是最后一个熄灯。他患有萎缩性胃病，早早起来，洗漱一毕，就在火炉上给自己熬点米粥，小米在锅里咕嘟咕嘟熬着，他伏在桌上做他的事。午饭和晚饭，挟上碗筷到职工食堂排队打饭，默默地站在队尾，默默地移向窗口，拒绝了一切人的谦让和优待，后来就成为自然了。

矿长的家安在汉中，两地相距二百多公里，常是一两个月不沾家，有时回到汉中开会或办事，也是开完会办妥事径直驱车再回阳平关，偶尔去家里和夫人见个面道一声安就走了，他大约远远不止三过而是几十次过家门而不入了。敏感的读者也许会猜疑于矿长的家庭生活是否和谐？他的妻子贤惠儿女可爱气氛温馨，妻子已经习惯矿长的脾性毫不足怪。地区黄金公司经理景雪勇得悉这个东北汉子不是一般

地工作而是拼命的种种事迹后，不得不在劝解无效的无奈中动用行政命令，勒令他停止工作，把他“押解”回汉中，而且从外边把门锁了，坐禁闭式地强迫他休息。景经理说到此事时很动感情。矿上的人给我讲到这些事时也很动情，这也许是比黄金更为贵重的一种感情。从景经理到船上的工人都心同一理，这个似乎带有工作狂症的矿长已经因疲劳过度晕倒过四回，生命的警钟还需要再敲响几次?

于矿长成功的诸因素中的一条重要之点在于他的不合潮流。当金钱被摘掉魔鬼的帽子又被推崇为倾国上下的第一美女的时候，堂皇的理论和市井的嘈嘈声浪一致和谐地把它颂为撬动整个社会各个部件运转的唯一有效的杠杆的当代生活里，奖金红包回扣实物等等名目迭翻的花样走马灯似的涌现在潮头上，阳平关金矿居然没有奖金，甚至连超工时的加班费也没有。从高级工程师到刚刚接受过专业技术培训的工人，没有享受现代文明没有领到奖金，不仅没有怨言，反而众口一词地称颂他们的矿长。作为一个矿长不是用奖金或毛毯等物质刺激而能得到麾下的拥戴和称赞，这在当今的领导者人员中尤其珍贵。其实，他的那个法宝，不过是用自己的实践把一个旧有的真理擦拭得闪闪发光罢了。这个不言自明的真理，在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中，这几年正在暗淡以至尘封下去。

阳平关金矿有一位高级工程师，姓陈，五十年代初的大学毕业生，通晓英、法、日、德四国语言。他的“竖井定向”测量公认为西北第一人，他的足迹踏遍了中国东南西北的山地和戈壁，在勘探测量专业上有几手绝活儿，属“稀有金属”。这个有真知识的人没有西装革履，仍然穿着破旧得有点寒酸的中式衣裤，面孔平凡得毫不起眼，没有丝毫的创造奇迹者的趾高气扬的派势。他完成了一系列金矿勘测数据，近六十岁的老头子常常背着行李和测具爬山下滩，感动得给他做

帮手的年轻人不知怎么说好。他的伟大和他的笑料一起流传，从吸九分钱一包“羊群”逐步升格“黄公主”，大致就可以标示出这位高工生活改善的过程。他时常穿不同颜色的两只袜子，那是烂一只换一只而不是两只一齐换。他一年三季穿一双不用擦油的翻毛皮鞋，夏天竟然把两只塑料凉鞋左右翻穿着。同志们以为他疏忽了应该把它调换过来。他说两只鞋后跟外沿磨薄了不平了，反过来穿着再把内沿磨下去以达到新的平衡。他给一双不过价值四五块钱的凉塑料鞋钉上后掌，使它继续为他效力。这个精通高级测绘技术的人却一再违反最普通的生活法则，从来也没打算去平衡贡献与享受之间的天平。他的精神世界恰如一块削除了杂质的高纯度的金子。

还有一对年轻的工程师，夫妇两人从东北奔到西北，又从西安奔到阳平关，一直奔到金子生产的第一线。他们是学采金专业的，一切都服从于采金工作来安排。男的叫王义坤，一副白净的脸膛和一双聪慧的大眼睛，十分谦和。他搞过的一项设计获全国奖，不计报酬设计了沮水、白龙溏金矿。无论老一代知识分子或年轻的工程师，在这里都表现出一种拥有知识者的谦和，而不是自负与盛气。

刚刚试车的采金船船长付玉新，是一位清秀的东北人，在吉林珲春矿工作时获得全国红旗船号的殊荣。这是一位从工人成长起来的船长，一位采金能手。我看见他时，首先发现的是他眼里的一缕羞怯之色，这种如朝露般纯洁的羞怯神色，在大都市闹市区的红男绿女的眼睛和脸色上已经被太厚的脂粉掩饰不见了。他的内秀和内刚完美地结合在一起。他对自己的所有成就的反映是平淡。不属于伟大谦虚而纯粹是性格使然。他也没有礼拜和八小时的观念，只是在去汉中办事时顺便回家观照一下老婆和孩子，如果时间紧张也就免了。他把全部身心都倾注到那条已经刷饰一新的采金船上。这个人也有不愉快的事，

在一次节日聚会席上，一位工程师提议说：“让我们有职称的人干一杯！”桌子四边坐的评上了中级高级职称的工程师们都端着酒杯站起来。付玉新坐着未动，只有他一个人站不起来，这位功绩显赫的红旗船长没有技术职称。坐着的和站着的一下子就显出了高低。他坐在那儿，听着当当当酒杯碰击的欢乐的响声，酒液灌进喉咙畅快地滚动和甘美地咂舌舔唇的声响，强撑着笑脸掩饰着难堪。他愿意把这个提议完全看作是无意而为之。在宴会结束后他回到屋子关起门来，再也控制不住心头的侮辱和损伤，淌下眼泪来，愤怒化作默默流淌的泪珠释放了。他的工人生涯培养了许多可贵的品德，重要的一条就是宽容。凭着这一难能可贵的品德他才团结了在他周围工作的人。他在一次抢险中动手抽了一个人的耳光，令许多人震惊，这个腼腼腆腆羞羞怯怯的人竟然会动拳头？那个人在洪水威胁之下消极怠工使他愤怒难容。那不是损害他个人的污言秽语而是损失国家财产。

我不能一一列举更多的人了。那个原先给磷矿看门的年轻人，自修完成了无线电高等教材，又完成了会计财会专业课的自修，已经成为全矿不可多得的中坚力量。那一帮刚刚分配到矿上船上的大学生和工人，一进入社会就进入这深山，开始了他们的事业也开始了人生之旅，似乎没有夸夸其谈，也没有抱怨这大山环绕的山窝子天地太狭隘了些？

那天晚上的采访座谈搞到深夜。我和徐岳都失眠了。这个金矿的人际关系生活氛围勾起了诸多美好的记忆，我俩自然地回味起五十年代那种奋进的社会精神和纯正的人际关系。阳平关金矿给我最大的启示就在这里，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就应该是这个样子。金钱和权欲支配下的种种灵魂所表演的丑闻太多地充斥于我们的社会生活之中，自然无法组成一个生气勃勃舒畅和谐的群体；人们反而渴望一种

精神的崇高和文明，一块绿地或者说一方净土。阳平关正是在这一点上组成一个英雄的群体雕像，每一颗钉每一个部件都紧紧地拧着不松，使这条庞大的船体和谐而热烈地向大山江河发出奏鸣。

定军山——汉江一个负重的灵魂

这里有必要渲染一下勉县。诸葛亮死后葬于勉县的定军山下，就在县城西边不过二公里处。这个埋着圣人骨殖的勉县也就远近闻名。勉县于一九八四年成立黄金公司，一九八五年开始机械化采金。汉江上的第一条采金船就是在勉县城内的汉江上首先竖立起来的。

中国乡民淘金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古远。但勉县在汉江上建造采金船成功的事实，开创了秦岭以南大半个中国机械采金的先河，把采金船从东北三省一下子扩展到秦岭南边广阔的江流之中。从五十年代黑龙江第一条采金船到勉县的第一条采金船，应该是中国黄金开发史中的两块里程碑。

刘企副总工程师任勉县黄金公司副经理，公司没有经理，他现在统领公司的实际工作。他是一九八五年来到汉中随之到勉县的，也是东北人，一个在人的印象中魅力与气质都更像个东北汉子的知识分子，方脸，一双沉毅而略显忧郁的眼睛，胡楂和疏朗的头发几乎全白了，据说是在一次防汛当中的急骤变化。他在向我们介绍他的金矿的情况时慨叹说：干啥把头发全弄白了？良心！

他到勉县的时候，似乎正赶上了一场盛大热烈高潮迭出的焰火晚会的尾声，勉县采金事业最辉煌的时期即将过去，矿藏贫乏的致命性威胁开始暴露出来。勉县走出那开创意义的第一步之后着实红火了两年，黄金产量骤增，随之就陷入矿藏枯竭的困境。原先由探矿部门勘

测的金矿报告大部分落空，原来探测资料提供的大矿经过实际采掘变成了小矿，富矿变成了贫矿，矿区越缩越小。这局面如同第一个吃了螃蟹的英雄眼看着别人大吃大嚼其美味，而自己却再没有螃蟹可捉了。即使外行人也不难理解，黄金生产的要害是资源，没有金子资源你纵有三头六臂也莫可奈何。现有的两条船只好在贫矿地带继续作业，他们以同等的机械同样的人力花同等的成本，所得黄金只能达到头二年在富矿上所得的一半左右。毫无办法，令人眼热的盈利户就这样不可逆转地变成了亏损户。

刘企所遇到的麻烦已不是第一次，在东北二道甸子金矿时，也是在该矿采掘竭尽之际，金矿的领导责任落到他的肩上，到勉县遇到的情况是一次重复。他没有抱怨来不逢时而是面对实际，也许正是他具备这种素质，所以才有两次类同的机遇。作为一个老矿山，他一来就觉得这里没有一个矿山建设开发的总体规划是太不该了，想到这个地区从来也没搞过矿山，他们一批东北人正是在此情况下才进入汉水流域的，于是就动手干起来，设计制定出一个全面系统的规划来。他发觉了沙金资源的不大景气，就把眼光盯住了山里的脉金矿，设计完善了“全泥氰化探浆法”新工艺，以解决含泥量大的脉金矿的关键课题。这项工艺国际上七十年代刚获得解决，国内的河南灵湖金矿第一次试验，刘企是第二个成功者。

刘企五十年代毕业于沈阳金属工业学校（今黄金学院），现已年近六旬，一生的主要精力都花费在黄金生产的事业上了。他好像不属于那种会生活的类型，他接受的良好教育铸就了事业的进取心，却不懂得如何把个人生活调解得有条有理舒适安乐；如果工作有进展他就活得舒服，而当金矿生产上不去他也就难得舒悦。他现在负重生活，一个无法解除重负的沉重的灵魂。

资源的枯萎本来就够他忧虑的了，复杂的社会关系人际关系更加剧了忧患。他是副总工兼任副经理（公司没有经理）负责全面工作，是事实上的一把手主事人。搞不清来路摸不来底细的非生产因素搅和得他不能不空耗精力，不是他的构想是否合理以及可行性的判断上的争论。他在那儿绞尽脑汁谋求金矿的发展和出路，如何把技术人员团结起来共闯难关，有人却散布诸如此类的话：“你咋给刘头儿卖命？”“你也卖给东北人了外国人了？”地域观念狭隘到连东北也要划到域外去！领导班子四五年间调整了四次，目前的状况仍不能达到步调一致。一件小事就足以窥其内景了：一九八七年公司经济效益不错，上级给公司发了奖金，一份分配奖金的具体方案送给他看，他发现没有工段长的名字，就提出应该考虑给第一线的干部也有一份。究竟应该不应该给工段长发奖金，正常的程序自然是大家磋商一下，即使他的意见被否决也不足为奇。奇怪的是他提出意见之后，没有人说对也没有人说不对，奖金就此压下不发了。当他从西安开了几天会回来，奖金发下去了。他是被列在名单之上的。他至今也没有领那钱，又不敢声言出来，他还在顾全大局考虑影响以及由此产生的难以料及的后果。

去年的防汛熬白了他的头发。按照既定的工作规程，进入汛期，采金船撤离出河道进入堤内，要破堤要复修堤段，待到汛期过了再进入河道重新开始工作。要花钱要费时费事，当地农民揪住这个要害向他们施加各种要钱的手法儿。刘企便寻求一种在河道里固定船体的新途径，为此他查阅了汉江的水文资料和气象资料，设计出一个能够承受历史记载的最大流量冲力的固船方案，这个冒险性的试验如果获得成功，将解决南方北方河流采金的重大课题；如果设计失算，等待他的唯一去处就是监狱。

他被各种紧急会议包围着。他随之被一道道口头命令电话命令加急电报命令包围着。所有会议电话电报都重申着一个意思：采金船撤出河道。他再三解释采金船在河道上并不构成防汛的障碍，反正没人听，你有数据也没人听。刘企是一个勉县下属的黄金公司的副经理，面对的是从省到乡的各级防汛部门一层一层的命令和催逼，他能理解这些部门干部对国家和人民生命财产而负的重大使命，因而无论措辞多么激烈都心安意会地接纳了，却仍然坚持着不撤的数据。直到洪水即将到来的紧急关头，他又一次接到上级拍来的命令撤离的电报，他考虑的不再是电报的简短文字而是那几个汉字背后所隐含的危机。发电令的人明明知道采金船要从河道撤进堤内，需要的不是一小时一天而是近乎一月时间，毁掉的河堤在河水到来之前又意味着安全还是什么呢？这样的电令是明白无误地告诉他，一旦在汛期发生问题，只能是你刘企兜上，因为上级有电文可作凭证。

他再一次验证自己的设计，再一次严格地检查固船设施的每一个部件，最终使他战胜电报也战胜自己的怯弱的是科学，他坚信设计的完美无虞和设备的符合要求。尽管如此，洪水猛兽到来时的种种意外都是可能的，他几天几夜睡不着觉，他妻子儿女也睡不下，陪着他等候洪水飞来时的种种凶讯。他们心里明白，刘企出了这个家门，不是成为英雄就是成为囚犯。

洪水到来时，刘企守在江边，观察测试他的固船设计的数据。一切都安全无误，价值几百万的采金船稳稳当当竖立在洪水恶浪之中，蔚为奇观。地区黄金公司景雪勇经理知道他的压力，赶来看望他和他的试验。刘企兴致颇高地幽默了一下：“哎呀！你来晚了，我们刚刚吃掉一只大鳖！”他后来有所遗憾：那次洪水的流量没有达到历史最高记载，而他的固船设计是按最大流量搞下的，试验和冒险并没有完。

他成功了，自然不会进监狱却也没有成为英雄。留给他作为永久性纪念的，是骤然变白了的满头银丝。

拜将台——汉中一个爱将若渴的黄金经理

采访结束离开汉中的那天早晨，握手道别之后的最后一句话，他还在叮咛说："不要写我。"

从我认识他直到采访结束，他都坚持申明不要写他，而且回避一切有关自己的情况。在采访的整个过程中，干部技工和工人争相谈到他，所有关于他的事，我都是间接得到的。我不能不写他一点东西。他就是汉中地区黄金公司经理景雪勇。

他能写一手漂亮的毛笔字。他会几路拳脚。他喜欢体育运动，有几个项目取得过一定地域的名次。他喜欢文学写下不少诗歌。他是一个正儿八经的大学生，毕业于西安冶金建筑学院。他放弃了留校任教又放弃了好多人求之不得的在西安工作的机会，词坚意绝回到汉中。

不完全是为了心中的那棵橄榄树。他在汉中长大，故乡留给他的有温馨也有痛苦。景雪勇读到小学四年级时"文革"开锣，母亲被打成特务投入监狱，罪证是她有海外亲属关系又有一架电唱机，电唱机被当作电台、发报机成为特务活动的罪证实物。恐怕再没有亲眼目睹母亲受虐待受凌辱受打骂更痛苦的事了！景雪勇要去卸掉母亲脖子上的一只大钟，遭到毒打，打得他情急跳墙逃去了……我已经对"文革"中太多的暴行神经麻木不想多写。

已经失学的景雪勇却没有中止学习，在恢复高考制度以后他考上了大学。现在景雪勇的境况正好与那时翻了个过儿，海外的亲属关系

不仅不是罪恶，而且成为目下社会生活中可以炫耀的资本；这个关系敢打保票给他在美国提供工作的机会，可以给他提供美金，至于装备现代家庭的几大件根本不值一提。那时的不幸和现时的有幸都提供给他一千条堕落的途径，他却独独选择了一条奋斗的艰难历程。社会生活就是这样奇怪，贫穷使人堕落富贵也会使人堕落：堕落的人能找出一千条造成自己堕落的家庭的和社会的理由，而奋进的人只要有半条生路就要奋进；总是抱怨社会抱怨命运的人永远摆脱不掉命运的戏弄，相信自己的人则可能一次再一次实现自我完成自我。我从景雪勇身上再次看到了一个真正的人的独立品格。

一九八三年汉中地区成立黄金公司，景雪勇被任命为经理。编制五人，由他领导着四个干部，统属于乡镇企业局下。他们只有一项任务，管理群众采金的事。现在的汉中地区黄金公司已经成为一个独立的行政管理和经济实体，编制三十四人，高工三人，中工十七人，下属八个黄金公司，上了八条采金船，开了七个脉金矿，公司自己也开了两个金矿。

景经理面临的许多困难中的头件大事是人才。汉中历史上和现在都没有矿山，搞金矿的人更是绝无仅有。他必须采取应急措施，招来一批精兵强将实现他的抱负。他四处探听，他亲自到东北去联系，全国的红旗采金船船长付玉新原在吉林珲春金矿，寒假期间他到汉中来，看了看，在踏上归去的火车之前，终于忍不住对景经理说："我现在就给你回话，冲着你这儿的黄金，冲着你这个人，我来。"付玉新合家来到汉中的时候，住处吃的烧的和孩子的上学读书全部安顿停当，而且是景雪勇亲自去办理，使他们一进门就可以拉开炉子做饭吃。于矿长的到来不大顺利。景经理把此人的情况写了报告送到人事局，请示批准然后调动。人事部门负责人看到于洪祥是文科毕业生，又是师

范学院的，对于采金来说就不一定急需，于是在请示报告上批示了意为此人属于“软件”的婉转的话。景经理急了就找地区分管此项工作的杨吉荣专员说明情况。杨专员同样婉转地批示说：硬件是科学软件也是科学。这样于洪祥就调来了。

景雪勇自己也是个拚命三郎。嘉陵江洪水暴涨的危急时刻，他驱车赶往正在建造的采金船的河段，泥泞的山路无法行车，他弃车步行几十华里赶到现场，和他的船长矿长工人们共同抢险。阳平关那个经常反穿袜子凉鞋的高工陈昌华，在原单位时胃切除大半，又伴有高血压等病症，且已年近六旬，谁都看定他下一步的选择只能是退休养息。景经理了解了这个陈工的实底以后，赶到医院拜望了刚刚手术过的陈工，并确凿地告诉他，想调他到汉中。陈总工程师感动得说不出话，想不到这个年轻人还愿意背自己这个包袱。调动陈工的事倒很顺利。陈工到汉中后，景雪勇明言告诉他：你不要干。我只要你看住年轻人干就行了。你指导他们干就行了。实际正好相反，陈工的身体奇迹般地恢复了，许是与心情舒畅有关系，他不仅指导年轻人干，自己也带头干，甚至和年轻人一样背杆子提箱子。晚上替同志们义务修理手表。别人的包袱在他的部门里成了宝贝。

无须再列举诸多上述的事例，倒是应该补一笔黄金专员的事。在我们采访汉中地区已经形成气候的黄金开发业的匆匆行程中，几乎处处听到一个奇特的称呼：“黄金专员”。这是指原汉中行署副专员杨吉荣同志。他分管地区的工业自然包括黄金生产，他把汉中地区经济发展的各个行业排出了十条龙，而第一条龙就是黄金。要做出这样的排列顺序，不仅需要经济眼光而且需要战略家的魄力。你可以说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等等更多更多的理由，他却看到没有资金给予农业投入排个基础也不顶啥。黄金生产不太复杂见效快，有了黄金还愁农业

和其他行业发展不起来吗？他亲临现场解决新建矿的具体问题，亲自批准成立黄金公司。他对刚刚任命的公司经理景雪勇说：“我没有钱也没有人。给你一面大旗，你去招兵买马干起来。”

景雪勇就从那时候干起来了。

汉中市区内最闻名的文物古迹是拜将台，刘邦拜韩信为大将军的故事流传不衰。无论人们从哪个角度评判这个真实的历史故事都无关宏旨，倒是爱惜人才以成宏图大业这一点，对负有领导责任的人来说不可或缺。没有事业上的强烈责任心，也就没有宽阔的胸襟也就难以容纳人才爱护人才，事业的兴旺只能是一句口号。汉中黄金公司目下正蓬勃生机，这个局面的得来和形成令人鼓舞也值得深思，景雪勇的成功其实也没有太多的新花招，只不过真诚地而不是虚伪地做到了一个领导者的最重要也最基本的一点。

陕西是新近几年崛起的黄金采掘的省份之一，在全国的名次不断升迁，正朝着黄金生产的大省迈进。这里发展的是现代化机械采掘，没有出现某些地区那种群采乱掘破坏资源又造成诸多社会问题的混乱。前景是十分令人鼓舞的。

山里有黄金，有金子般纯朴的事业型的人。

1990年春

渭北高原，关于一个人的记忆

因为面部手术后说话困难，采访李立科的事迹主要依赖他的同志，依赖他蹲点的县、乡、村的干部和村民来提供；当我们不止一次地面对人们泣不成声的场面时，我们握笔的手和心就止不住地颤抖……

“演一场印度大篷车”

一九八二年五月。渭北高原。一望无际的麦田，在艳阳下呈现出一派丰收在望的景象。开镰收割已是指日可待了，谁都看得出今年的麦子长得出奇的好。

在甘井乡庄子村东南边的一块麦田里，一群村民十分好奇地观看一场挖麦根的稀罕事。地里挖开一道沟，十米长，二米宽，三米深。一位中年的当地农民，从二里远的涝池用架子车拉来水，再装进手压式喷雾器里，把喷头对着坑道的土壁喷洒起来，泥浆浊流流到坑底，麦根一条一缕逐渐显露出来。喷溅的泥水落到人们的头上脸上身上，坑里的泥浆没过脚腕，所有从事这项发掘劳动的人几乎全都成了泥猴儿。这场笨拙的工程整整进行了半个多月，指挥者自己寸步不离，始终和大家一起干在这条坑道里，连吃饭也不离开，唯恐粗心的人或急性子的人简化操作规程而损伤一根毫毛纤丝。这位连裤裆也被泥浆弄湿了半个多月的人，终于如愿以偿，得到了一组完整的小麦根系标本。结果表明，三株施过磷肥的小麦根系全都长到二点七〇米以上，平均值为二点七四米；只施过氮肥而未施磷肥的小麦植株，其根系系

度只有一点四〇米。正是这一组呈现出巨大差异的小麦根系标本，在渭北高原掀起了一起波澜壮阔的绿色革命。

获取这组标本的人，名字叫李立科，陕西省农业科学院前副院长，现为高级农艺师。

一九八〇年，省农牧厅在武功县召开农业专家学者的专题论证会，论证建设渭北高原第二粮仓的战略性动议。专家们各抒已见，虽然观点和措施不完全一致，却对开发渭北高原的宏图大略一样情绪亢奋。会议的主持者征询李立科的意见时，他把凝思已久的意见浓缩成一句结实话，朗声喊出来："在渭北高原演一场印度大篷车！拉上肥料，每走一个里程碑，分别施上氮肥和磷肥，做出示范，施磷肥的田块保证增产百分之三十。"李立科后来对人说到这个发言是"放了一炮"。此前他在武功县皇中大队蹲点期间，对土壤缺肥尤其是严重缺磷有深刻认识。尽管人们戏称他为"磷派"，他也不予否定，而且着实开始了吉卜赛式的大篷车的行程。

武功论证会之后，省农牧厅负责人点将点到李立科，要他到渭北高原的合阳县蹲点。

李立科立即赴命。行前，他给当时主管农业的省府领导人写信立下军令状：给十五万元投资款，我给省上弄回粮食四亿五；如不能兑现，愿以工资抵扣十年。信发出后不久，他就赴合阳实际考察去了。

古老干旱的渭北高原，古老干旱的合阳，世世代代出于对水的殷切渴盼，就有了许多以水命名的村庄，甘井，路井，井溢，黑池……这些村名都蕴含着一个美丽的神话故事。民谣戏谑道："秦城和家庄，马尿泡馍馍。"干旱，制约着绿色生命的生存和繁衍，人类在这里唯一

能采取的对策是广种薄收。直到一九八〇年甘井乡的小麦平均亩产只有四十八点五公斤。甘井乡在合阳县被称为“西伯利亚”。李立科考察土壤和作物的生长状况，也吃惊地发现农民生活的极度贫穷。在一个一个村庄里，他看见农户在土围墙上挂一块荆笆编成的栅栏当作门板，低矮破旧的厦屋里空空荡荡；他看见过一丝不挂的孩子，在阳坡里晒暖暖时凉得瑟瑟发抖的身体；他在田间小道上碰见一位衣裤褴褛的老大娘，她悲凄地苦诉着：“我自嫁到这儿几十年，还没吃饱过。”他在甘井镇逢集时看见一对年轻夫妇，用架子车拉着父亲到镇上来看病，买下五个油糕给老人吃，以尽孝心……事隔十年之后，李立科向人谈及这些情景时，仍然止不住热泪长流。那时候，他的心里无法保持平衡，总是责备自己：解放这么些年了，这儿的农民还是这样！我是共产党的干部，是学农的……

这样，李立科就把“点”选定在甘井乡。甘井最穷，这儿更需要他；甘井产量在全县最低，试验最具有说服力；甘井人稀地广，一个乡就有十万亩耕地，有个干头。有好心人劝他：“渭北那个地方难弄。别人没有啃动的硬骨头，你能啃得动？当心把你前半生的名声赔光了！”作为共产党员的李立科，脑子里尽是那些荆笆门，瑟瑟发抖的裸体小孩，尽孝心的五个油糕，已经顾及不到失败给自己带来的名誉损失了。

这样，一九八一年五月，李立科背着行李卷儿离开农科院，踏上了北上合阳的火车。出发的前一天，他刚刚办完了家属“农转非”手续，把爱人和孩子从农村搬迁到农科城，一家人只团聚了一夜半天，他就急如星火地走了。十年后，李立科的爱人提到这件事，无可奈何地说：“俺们娘儿仨刚从乡下搬到城里还不到一整天，人生地不熟，他说走就走了。这人……心硬得很！”

李立科何尝不想帮助妻子儿女熟悉新的环境，到哪儿买煤，再到哪儿去买粮。他确实耐不住心再耽搁一天，节令不等人啊！渭北高原即将进入小麦收获期，这是观察麦子生长状况最好的也是最后的一个机会。他到了甘井就开始了紧张的考察，麦子的长势普遍不好。在休里村的一块麦田里，他看见一小片麦子，秆粗穗大，颗粒饱满，尤其是麦穗的颜色，金黄发亮。他对同行的人说："这块地肯定施过磷肥。"那人不信。他就在地里刨挖，果然刨出了磷肥疙瘩。他随之跟踪调查，村里人告诉他说，保管员打扫仓库时，把搁置多年不用的"炭灰面面"倒在这块地里了。李立科随即拿来土钻，取出的土样清楚地表明，施过磷肥的小麦对地下深层水的利用，明显优于未施磷肥的麦子。

完全类同的现象在店头村一块壕地和烟校南边一块地里发现了，而且都刨出了磷肥疙瘩。李立科再次用土钻取出土样，未施过磷的田块一米四深处仍有可供麦子吸取的有效水，而施过磷肥的田块深到一米八至二米，已经没有有效水了。这就清楚地证明：增施磷肥促进小麦根系生长，调动深层土壤里的有效水，以抵御天旱缺雨的自然条件，这也许是解决北方旱原小麦生长的一条新途径！

李立科把这个设想立即付诸实施，他和甘井乡的领导者做出购买磷肥的重大决策。李立科个人承担风险贷款十五万元，购回八百七十吨化肥，全部分发到生产队里。秋播到来之前，他逐村逐队奔走，向社员干部讲解增施磷肥的道理和方法，佐证便是休里、烟校、店头三块施磷的小麦。就在这一年秋播时，李立科借用庄子村的一块麦田，种下了施磷和施氮的小麦对比试验田，于是就有了本文开头冲刷小麦根系的场景。

一九八二年夏收，丰收的大田也证明了磷肥的神奇作用，甘井乡的小麦亩产由原先的四十八点五公斤猛增到一百三十六公斤，这在甘井农业发展的历史上是破天荒的！村头田间到处可以听到老农民的惊喜慨叹。李立科承担风险的十五万元贷款，夏收后农民自觉全部还清。

这年秋播时，李立科果然实现了“演一场大篷车”的话，拉了一卡车化肥，沿着公路开，每到一个里程碑时，分别做出施磷和施氮的小麦对比试验，做下标志，让每一个路过这里的人观察对照，以唤起农民对磷肥的再认识。

李立科充满信心地预感到，增施磷肥的措施一旦推开，将等于在干旱的渭北高原修建起一座看不见的超级水库……“磷派”的称谓，真是不胜光荣之至！

写在大地上的论文

和纯粹用作展览的标本不完全相同，李立科制作的小麦根系标本，完全当作向农民普及科学知识的活教材。

一九八二年夏收后到秋播前的一百多天时间里，冒着高原的三伏酷暑，李立科带着他在泥水里冲刷了半个多月获得的小麦根系标本，奔走宣讲到合阳县的二十一个乡镇。活生生的现实标本一下子就冲破了落后愚昧的藩篱，农民终于接受了磷肥。为了便于农民掌握化肥的配比，李立科把繁冗难记的比例编成顺口溜：一袋黑，一袋白，深埋底肥一炮轰，来年保收五百斤。这一年，合阳县增施磷肥超过一万吨！到一九八三年，合阳县小麦的单产和总产大幅度提高。甘井乡小

麦产量提高的幅度更大，亩产达到一百五十三公斤，总产从二千二百二十吨猛增至七千五百零三吨，获得了空前的大丰收。

磷肥的名声大振。李立科的名声大振。李立科总结的“以磷促根，以根调水”的理论像歌谣一样，在甘井乡在合阳县流行。这一年，合阳实行了“责任制”，得到了土地的农民，更迫切地需要科学。李立科走在路上和甘井街道上，常常被庄稼汉挡住询问，有的农民专程赶到他的住处求教。他有问必答，只要有人上门，正写着论文就停下笔，正吃着饭就放下碗筷，红火得门庭若市。

李立科的讲课，已经成为合阳县每年的保留节目，县上召开秋播会、夏田观摩会，都由李立科在技术上唱主角。他的理论在合阳创造的奇迹风传渭北，蒲城、白水、大荔、麟游、淳化、长武等县都纷纷请他去讲课，他的足迹踏遍渭北高原的山山水水。

临近秋播前一个月，李立科总是马不停蹄连轴转，常常讲得嗓子沙哑。在甘井乡平原和山区的一百一十平方公里的辖区内，星散着二十四个村委会的七十六个村民小组，每一个村子都有他讲课的场所，或是一座戏楼，或是人群聚集的碾道，或是一块场院，不要桌椅摆设，随处开讲。伴随他的是一辆自行车，下了雨就拄着拐杖前往。

一九八七年八月，有一天李立科在两个村子讲过两场，天已黑了，事先和他约定的一个村子来人请他，众人劝他改天再去。李立科从来人口中得知，那儿已经把村民召集起来了，怎么能让群众又散伙呢？他推上自行车赶去了。农科院甘井基地的领导和同志直等到深夜，派人出去寻找，还以为他跌进了深沟。等他回到家时，已是深夜二点多。一九八八年八月的一天，李立科在何家庄乡讲完课，同家庄又来接他，他顾不得吃饭，坐上车就走。赶了五十多里，他一下车马

上开讲，一直讲到下午四点钟，讲完之后就晕倒了，被立即送往县医院抢救。这样疲劳过度的晕倒发生过两次，合阳县政府明令做出规定，任何乡镇请李立科讲课，一天只准讲一场。这个规定挡不住渴望听讲的群众，李立科自己就根本做不到。

十年来，李立科讲过多少场，多少课时，接受过多少人次的技术询问，没有人统计过，他自己也没有计数儿，总之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吧！如果按规定的授课费和咨询费付酬，李立科当有一笔可观的经济收入。李立科自己分文未取，却发现有人以他的名义在向农民收取讲课费。李立科不能容忍，找到甘井乡党委王书记，生气地说："农民刚刚吃饱肚子，我们咋能挣农民的钱呢？"王书记立即追查这件事，发现是乡农技站干的，已经收到五千多元，责令把钱全部退了回去。

李立科以磷促根的理论不断完善，总结出一整套旱原小麦增产措施。他发现牛蹄印和播种机辙印里的麦苗长势特别好，于是总结出碾压提墒的技术措施。他发现一块未挖掉苞谷秆的田块墒情特别好，就在自己的试验田里有意留下苞谷秆做试验。一九八八年冬的一天，夜里落了一场大雪。天刚亮，李立科跑到地里观察，发现试验田里的积雪果然很厚。他旋即跑回基地，叫起马天民等其他同志，带着标尺和摄影机赶到这里，亲自捉着标尺，插进雪里，拍下照片做资料，积雪厚达七十厘米，而未留高秆的田块，有些地方竟然寸雪不留。李立科兴奋不已，又跑到乡政府，叫干部们来观察高秆挡雪的效果。第二天，李立科和同志们背着标尺，跑了店头、休里、杨村，同堤坊和甘井五个村子，走了二十多华里，观察不同植被挡雪的效果，发现禾秆越高挡雪效果越好。马天民说："那么厚的雪，那么冷的天，李院长穿着一双解放鞋在雪里……"

又是一个夏田观摩活动开始了。这是李立科来到甘井的第四个夏天。他到路井镇农技站的试验田里，发现了一种名叫“丰抗13”的小麦品种，秆高穗大，颗粒饱满。“这麦不错！”李立科大声称赞。

李立科早就有为渭北旱原引进良种的考虑。合阳县坐庄的“陕合六号”已经连续种过十三年而退化了。甘井地区的小麦品种十分混杂，群众盲目引进的品种反倒造成减产。他首肯这里必须引进高秆小麦，矮秆小麦根系短调不上水来。他发现“丰抗13”以后，先在自己的试验田里试种。一九八五年夏收前，他和县农业局的同志坐飞机到北京郊区和河北平原进行大田考察，这儿是“丰抗13”的推广地。观察的结果十分满意，他拍板引进。县农业局负责人也胆正气壮，一次引进五万公斤。经过一年试种，“丰抗13”经受了渭北高原严寒、干旱和病虫害的考验，获得大面积丰收；再一年，“丰抗13”就成为全县坐庄的小麦品种了。为引进良种捏着一把汗的县农业局长，事后对人说：“引进不引进，是李院长拍的板！我不怕，瞎了有他哩！李院长拍板的事瞎不了喀！”

李立科从来也不敢贸然拍板，一切有效的措施都是经过试验之后才推广给农民的。李立科敢于拍板引进的良种和推广的技术措施，都经过他反复的试验。他的胆识、勇气和决心，是从实践中来的，是唯物论为他撑腰！李立科也曾被评职称所困扰。一边是接连不断前来邀约讲课的村干部和县干部，一边是搁置了几十年几乎忘光了的外语课本。李立科没有太多的犹豫而选择了前者，他断定自己无论如何是耐不住性子背记外语单词的。他的论文已经写在渭北高原广阔的大地上，蘸着他的汗水和心血，注入了他的大气和壮气，成长起丰收的果实和农民的笑颜。

省农科院客观评价李立科的卓越贡献，给他评为高级农艺师。后来，他又被评为陕西省“十佳职工”和全国农业劳动模范。

一首民谣的诞生

在合阳，尤其在甘井乡，广泛流传着一首民谣：

甘井面貌变，多亏农科院；

群众把福享，多亏李院长。

李立科一九八一年来到甘井乡，经过考察，又与甘井乡的干部几经琢磨，提出一个彻底改变甘井穷困面貌的计划方案，简称“三步走”，即：第一步，提高旱地小麦产量，解决群众温饱；第二步，调整作物布局，增加群众收入；第三步，种草养畜，形成良性循环。到一九八四年，第一步的目的已经完全达到，正当李立科和甘井乡的干部跨入第二步的时候，陕西省农科院做出决定，在甘井乡建立实验基地，而且派来了包括农林牧等各方面的专家，形成了一个多学科的实验研究体系。各科专家集思广益，又将李立科提出的“三步走”进一步丰富和完善，形成一个令人鼓舞的“甘井模式”。为了群众便于理解接受，李立科把这个模式的详细内容，归纳成一句话：“一个二亩五个半亩。”即：第一家农户按五人计算，每人种二亩麦子半亩苞谷，可以收到一千斤小麦和五百斤苞谷，每人种半亩烤烟半亩苹果半亩花生半亩苜蓿（养牛），就可以实现人均粮食一千五百斤、户均经济收入一万元了。

为了实现“甘井模式”，李立科把他身心都投入进去了。他从农科院请来烤烟、油菜、花生专家，帮助当地农民改变作物布局，从单一

的粮食作物发展为种植经济作物。在专家们的帮助下，烤烟、油菜和花生试种成功，在甘井和合阳大面积种植，他和基地里搞果林的同志密切配合，协助甘井乡推广苹果栽培，面积已经扩大到一万多亩，一九八六年栽下的第一批三千亩果树已经挂果，优秀的品质显示出优势，远销到四川、武汉和深圳。现在，走在甘井的大地上，到处可见大片大片生长壮健的果园，随处可以看到正在挖坑栽苗的景象。

甘井人说，李立科爱穷人，谁越穷，他越爱找谁；哪个村子穷，他往哪个村子跑得最勤最欢。同堤坊村委会所属的庄子村，大概在甘井乡也是最穷最烂的几个村子之一。李立科初次来到合阳考察的时候，就是这个村子的破败穷困的景象使他大为伤心动情。他到这儿来的次数最多。一九八二年秋播时，他帮助十户最穷的人家争取到了无息贷款，使他们能够购回肥料，实施他的"磷派"的丰产措施。这个村子最穷的赵俊保和焦增基，他帮他们贷款发展养畜，种植苜蓿，头年买牛，第二年就发展到四头秦川牛，收入可观。焦增基兄弟三人，现在盖起三院瓦房，修起了漂亮的砖木门楼，电视机、缝纫机、自行车全部置买下了。整个庄子村，一九八〇年时只有六头黄牛，只能套三具犁，现在发展到四十多头，年年都有肉牛和役畜卖出去。

李立科到下坊村去，发现一家农户光炕上只有一条破被子，令人寒心。他就指导他们种小麦。而且责备自己："我在甘井住了几年了，还有这么穷的户。"主人让他吃饭，他再三推辞说："你按我说的办法种，明年打下麦子我再来吃干面！"

李立科掏一百元给一个困难户买下四只小猪。

李立科给一家困难户买下两袋化肥。

李立科的同情心也引来了一个骗子。这个人找到李立科就跪下了，说他既没吃的又没钱买肥料。李立科很中肯地教他种麦子的技术要点，接着就把身上仅有的十多元钱全部掏出来了。这个人拿着他的钱却流窜去了。

李立科在甘井的粮食过关以后，和搞畜牧的同志组织贷款四十万元，发展秦川牛和细毛羊，苜蓿一下子种到万亩，买回五百头牛。现在，畜牧业的产值由原先的百分之二上升到百分之十三，羊已经突破万只。他在沿山一带的村子发现柿子长得好，就和基地的同志商议，扶助山区发展柿树，拿出八千元经费作投资，给群众买柿树苗。

在省农科院甘井基地的科学家们多年的艰苦奋斗下，甘井模式已粗具规模，广大农户已经摆脱穷困，开始走上富裕之路，城后村在一九八五年确定需要帮扶的十八家困难户，已有十五户跨过当地的贫困线，剩下的三户多是因为低能造成的……民谣，就在整个甘井开始呈现富足升平的气象中流传开来。

农科院甘井基地所取得的科研成果，吸引了省内外的三十多个旱作农业县市前来参观，接待了尼日利亚、埃及等国的农业科学家。合阳县把这个基地视为“参谋部”“智囊团”。县委和政府的重要生产会议肯定留给专家们一席，重要的生产指令必先征询专家的高见。县上的主要领导人经常光顾基地，既是求教，又是关切。基地专家们的下乡费由县政府发给；房子也是县上投资修造的，而且越盖越漂亮；每年春节，必定要到各位专家设在农科城的家里慰问一次，送一份土特产品以表示合阳人民对专家们辛劳的一点心意；尊重专家尊重科学，在合阳从村民到县长和书记，已经不再是出于礼节性的口语，而是发自肺腑——

县委书记曾经在某次会议上响亮地说："在合阳，我是书记，我没有李立科的知名度高！"

县长也在一次公开场合说了同一意思的话，仅仅一字之差："在合阳，我当县长没有李立科知名度大！"

中共甘井乡党委书记王均海，现年四十八岁，从六十年代中期当人民公社书记至今，有二十多年了。县上早已调他回县政府工作，让更年轻的同志下基层去。王均海向组织解释，他必须留在甘井，他要陪着基地的专家，他也丢心不下那个不顾身体的李院长。王均海的佐证更有说服力：基地的好几位专家都六十出头了，李院长也比我大八岁……王均海在甘井留下来，破费买下一辆吉普车，叮嘱司机说："这车，首先保证基地专家用，保证李院长用，把油备足！"

李立科却不甚喜欢坐小车。他到县上去办事，搭上当地人称作"蹦蹦车"的机动三轮就走了。他到白水去观察自己的试验点，仍然搭的这种中国当今最低档次的"蹦蹦车"。他从西安医院请假回到甘井，到县上去看望几位领导时，还是搭的"蹦蹦车"，使真心关怀他的同志无可奈何！

一九八八年五月，李立科发现小麦出现了枯黄蔫萎的病症，怀疑是危害极大的黄萎病，立即骑上自行车到各处去检查，乡政府的两个农业干部跟着他查看病情，整整跑了七天，把全乡各村的主要田块都检查了。两个年轻的干部跑得腿疼发胀，晚上歇下用白酒擦洗。李立科坚辞拒绝王均海书记给他派车，一直跑到最后的一个检查点，梁山脚下战国时期的古长城遗址旁的一块麦田时，他实在支持不住了，双膝跪趴在地上检查……

甘井镇春节将临的一次集日，有一对赶集的老夫妻采购年货。老大娘说：“再请一幅灶王爷像吧！”老头子拒绝说：“灶王爷你年年请，咱穷了一辈子。还不及蒸个大花馍送给李院长呢！”这对老夫妇的对话，被人听见，当作笑话流传，传着传着就把李立科传说成治穷致富的“活财神”了，有人甚至提出要给他在梁山上塑像修庙。

是的，十年来李立科在渭北高原创造的财富数以亿计！

死亡之谷的日日夜夜

李立科病了，癌细胞在他丝毫也不戒备的体内早已悄悄滋生。

去年九月上旬的一天，李立科又接连在甘井乡讲了三场。最后一场在万年村讲完时，已是深夜，电闪雷鸣，大雨滂沱。村干部找来一辆手扶拖拉机送他回基地。他人站在车厢里，手扶着自行车，头上浇着大雨，又迎着拖拉机前轮甩上来的泥水，浑身湿透。回来后，他左眼不时流泪，左上颊有痛感。他以为是泥沙钻进了眼睛，没有在意。

小病小灾，李立科从不放在心上。有一天晚上他还发高烧，早上一起床又赶去讲课。李立科是“老肝炎”了，有时劳累过度也犯肝疼的毛病，但他从不愿躺倒。左眼流水，小事一桩，更何况是秋播大忙季节。

他亲自动手，坚持分门别类，种完了自己的二百一十个试验小区，共五亩多地，忙得常常顾不得回家吃饭。他不时地擦着流水的左眼，左颊疼得厉害时，就吃些止疼药。

九月十八日下午，他和同志们为计划亩产八百斤的试验田准备了两千多斤混合肥料，等到搅拌均匀时，天已经完全黑下来。气象预报

有雨，肥料必须撒进地里。他怕助手们撒不均匀，硬是自己摸黑把一吨多重的肥料一把一把撒到六亩地里，汗水湿透了衣衫。

九月二十日左右，他又赶到麟游县，坚持种完设在这里的一块试验田。此时他的左眼发展到流泪不止，左颊疼起来时疼得他直捶墙。基地的同志们多次催他，甘井乡的干部和合阳县的有关领导多次催他，要他去看病，他仍然丢心不下要干的活儿，一直拖到十月十日才到合阳县医院去检查。

“哎呀，你这老汉咋得下这病……”医生在底片上看到了癌肿的阴影。李立科再三追问时，医生又不说了。李立科耳聋听不清医生的话。一九七九年，他在赴陕北考察途中出了车祸，侥幸不死却落下耳聋的后遗症。

十月十三日李立科住进了县医院，那么多领导的深重关切，反而使他疑虑丛生，难道自己得了不治之症?

李立科几次追问陪他的同志，自己究竟得了什么病? 他断然说：“如果是癌症，就不要花国家的钱了！”他知道，前几年农科院畜牧所的一位同志，得了癌症，花了八万多块钱的医疗费，人没有救下，结果使所上的同志连工资都发不出去了。另有说不出口的原因是，工作三十多年了，他了无积蓄，还欠着几千元的外债，住院势必增加欠债的数目。他怕自己死后，给老伴留下一屁股烂账！

李立科不想看病了。他对合阳县的领导和基地的同志说，我的病如果是癌症，只要能让我活到明年七月份就行了。我死了，你们把我埋在我的试验田里，上面立个牌子，写上：“李立科在这块地里种的小麦亩产打到八百斤。望大家努力！”就这样，躺在病床上，他心里仍然

惦记着那块雄心勃勃的试验田，他一把一把摸黑撒完一吨多肥料的高产田！

合阳县委县政府做出决定，农科院如果经济拮据，李立科的医疗费由合阳包了，花十万八万也要保住李立科，不然就对不住合阳人民。大家轮番给李立科做工作，他终于同意去西安看病了。但他要求在去西安之前，让他再回一次甘井，看一眼他的试验田。他预感到，这可能是最后的一眼。

十月二十二日下午五点，李立科从县医院回到甘井。小麦的苗已经出齐，秋阳下一派嫩绿。汽车走到岔道上，他让司机把车开到基地去，捎话给他的助手，让他把小铲带到试验田里去。李立科走下汽车就朝试验田走去。助手带着小铲来了，基地的同志来了，周围的群众来了，他接过小铲，挖出不同试验区的几棵麦，观察对比根系发育的情况，让大家看，叮咛着应该采取的麦田管理措施。他又走到基地的试验果园。园里的果子已经卸了，正在搞入冬管理。他向同志们谈了几点果园入冬管理的意见，并叮咛一定要更新引进新的苹果品种。天黑下来时，李立科步行回到基地，他找了一大堆资料准备带走，又为同志们该报销的发票一一签字。近处村里的群众听说他回来了，一拨一拨地来看望他，他一再叮嘱他们搞好小麦的入冬管理。

十月二十三日，李立科离开合阳去西安看病，这个具体时间，县上领导严密封锁。他们担心，消息一旦传出去，前来看望和送行的人会堵塞县城交通，增加李立科的负担，延误出车时间。李立科悄然离开了合阳。

“左上颌癌，中晚期。”省人民医院终于做出确切诊断。

省医院和四医大派出最好的大夫组成医疗手术小组。今年元月六日，切除手术进行了六个多小时。李立科又一次从死神手中逃脱了。

在手术前急切而又漫长的等待中，李立科忽然有了“良心发现”。参加工作以后的三十二年中，他有二十九年在农村蹲点，孩子的教育管不上，和他的老伴在一起的机会也很少，整个家务都压在老伴一个人身上。到甘井蹲点后，他干脆把老伴和孩子也搬来了。他现在想起了女儿以玩笑的口吻说的一句话：“爸爸是国家的好干部，不是我的好爸爸！”李立科觉得他确实对不住老伴，对不起孩子。当他怀着歉疚的心情对老伴说“我对不起你”时，老伴放声大哭，李立科也哭了，夫妻俩抱头痛哭！

手术的成功，又唤起了生命的热情，他把与老伴抱头痛哭的事忘记了，背着医生又开始翻阅资料，老伴劝他根本不顶用，他以惊人的毅力写下三篇关于渭北旱作农业的论文。

“白露高山麦”。“白露”一过，渭北高原又要开始秋播了。李立科每天都要看电视里的“天气预报”。时间一长，左眼又流泪，老伴再劝，他就闭着眼睛听。“天气预报”带给他的是“渭北没有雨情”的消息。李立科着急得又睡不着了。

白水一位老农民到医院来看一个病人，他与他谈起干旱年份怎么播种小麦，一直谈到一九二九年的大旱……

县上、乡上的同志来探望，他总是问下雨了没有，麦子秋播准备得咋样。

他惦念着甘井，惦念着合阳。他四次写信给甘井乡的王均海书记，并让人捎话让他来一趟，他要当面给他谈小麦抗旱播种的办法。

甘井乡的贺乡长调到黑池去了，他没有忘记给他寄去了四条播种小麦的技术措施。

他惦念着整个渭北高原。他给省农牧厅写信，给渭南地区主管农业的负责同志写信，提出抗旱播种小麦的意见。

旱象持续发展。李立科焦灼不安，播种的措施得进一步完善。九月六日晚，他几乎一夜未眠，在病房里写成了关于今年渭北旱原秋播工作的十点意见。节令紧迫，他必须立即送到渭南地区行署去。

九月七日早晨，医生查完房，李立科向护士撒了个谎，在老伴的护佑下走出医院大门，花一百二十元钱雇了一辆出租车，直奔渭南。十二点多赶到时，行署下班了。李立科便和老伴坐在行署门口等着。

行署办公室的一位干部上班时发现了等在门口的李立科，立即把他送到张宗良副专员办公室。李立科把写好的关于今年渭北旱原小麦播种的十条意见交给他，并且做了解释。张宗良早已感动得热泪盈眶，埋怨他不该自己跑来，只要捎个话或打个电话就行了……随即十条意见被转发各县。

大地的回报

李立科病倒的凶讯震惊了合阳县的村村镇镇。人们难以接受这个残酷的事实：这么好的人，咋能得下这种病？李立科在县医院住着的十多天里，四乡八村的干部和群众，赶来看望他，千叮咛万嘱咐：要抓紧治病，治病要紧……

李立科转院去西安以后，干部和群众纷纷打听他住在哪个医院，他们要去看望。最难的是合阳县和甘井乡的领导人，既怕频繁地看望

会打扰李立科养病，又怕伤了群众的心。尽管这样，一些人硬是搭车闯到西安，打听到了李立科住的省人民医院，好多人一看见李立科就说不出话先哭了。

为了减轻李立科接待看望群众的劳累，也为了让干部群众有表达自己心意的机会，甘井乡党委和政府决定，各村推举出两个代表，带着父老乡亲的心意，集体去探望李院长。

乡上的决定深得民心。去西安的前一天晚上，在甘井乡的好多村子里，村民们聚集到代表家里，提着活鸡、鸡蛋、小米、红苕、核桃、芝麻、绿豆、蜂蜜，还有李院长爱吃的苞谷糁，让代表们给李院长捎去。群众再三托付代表们给李院长捎话：不要操心咱们咧，好好养病，要啥尽管说，咱们就盼着他回来哩！

该拿的东西太多了，代表们拿不上。汽车上又不允许带活鸡。同堤坊的代表便分头把七只鸡揣在怀里，悄悄带上汽车。想去的人太多了，车里坐不下，原来商定去四十八个代表的汽车上，密密匝匝地挤进了八十七个人。今年元旦，李立科动手术的前六天，满载着甘井乡群众一片深情的汽车，从渭北高原驶向西安。

甘井乡的干部群众代表相约在医院附近一家旅社的通铺大间里，和李立科见面。大伙挤在通铺上和一切空间，等候着，李立科从医院赶来，进门后就抱起双拳，感激乡亲们的深情厚谊。大伙又看见了李院长。他瘦是瘦了，精神还好！还是平常那种热情随和的样子。代表们争相问好，屋子里随即便是一片哭声。孟村的党西生流着泪说："李院长，你好好养病。大伙让我告诉你，你需要啥尽管说，要啥咱都能办到。而今大家的日子过好了，可你……"他没说完就哭出声来，李立科自己也忍不住流下了热泪。原定半个小时的见面，持续了两个小

时，代表们仍然舍不得离开，舍不得放李立科回到医院那种地方去，他应该跟他们一起回到甘井去……

干部和群众把一块桌面大的匾额送给李立科，那上面写着两句古诗——

但得众生皆温饱，

不辞羸病卧残阳。

正是这块匾，激励着李立科度过了生命历程中最痛苦最严重的时刻。手术是在左眼下的脸部进行的。半个颧骨取掉了，再加上放疗，使他饭吃不下，水喝不进。巨大的难以忍受的疼痛折磨得他精疲力竭，整整四十八天里，他只睡过六个晚上。他撑持不住时，也曾产生过轻生的念头。正是在那个生死关头，他瞅见了这块匾，生的欲望又强烈起来。他让老伴把匾挪到床前，一睁眼就可以看见，那匾上刻着甘井乡亲一个个热切的面容。

合阳县、渭南地区、农科院和省上的领导们，多次到医院关心询问李立科的病情，鼓励他拿出和干旱做斗争的勇气和毅力，与疾病斗争！

李立科得病的消息传到武功县河道乡皇中村，有几位农村老婆相约去城隍庙，为李立科求神问卜，问到的卜辞十分吉祥，——神说了，李院长能活到八十岁！老太太让孩子专门赶来，把这个吉祥的话告诉李立科，叫他放心。

甘井乡的一些群众干部，听说吃鳖肉可以治癌，有人下河捉鳖，有人四处寻找买鳖，几次把活鳖送到医院，叫陪护的同志给李院长做

了吃……

李立科终于战胜了死神的威胁，跨越了死亡之谷，踏上了生命历程中新的里程。

随着病情的好转和身体的逐渐恢复，李立科在医院再也待不住了，他急切地想回合阳看看。

十月六日，李立科得到医生批的五天假，带着药和老伴一起坐火车，下午五点回到甘井。当晚，他的屋子又拥来看望他的群众，苹果、鸡蛋又送了过来。大伙都知道，李院长需要休息，问一声，说两句话，就离开了。尽管这样李立科还是到很晚才睡觉。

第二天早饭后，他想去试验田看看他的麦子，也试试自己还能不能骑自行车。在一个小小的土坡上，他摔倒了，车子压在身上，一阵昏迷，半天爬不起来。看来，这场大病亏损得太厉害，他想到甘井各个村庄转转，看看群众，眼下是去不成了。

十月十日，甘井乡借用上党课的机会，让党员干部和他见见面。这天到会的约有四百人。李立科一进门，立即响起热烈的掌声；有人痛哭失声，会场里一片呜咽。李立科站在台上，掏出手绢擦眼泪，口腔里填垫的牙托，使他说话已不如以前灵便，助听器还戴在耳朵里，拿在手上，他动情地说："我的命是合阳人民给的，甘井人民给的！我欠合阳人民的债太多了！"他诚挚地表示，要将重新获得的生命，奉献给合阳的土地和人民。他动情地告诉大家说："我在病床上吃到了没有吃过的好东西，都是咱合阳的乡亲们送的！"

在陕北、关中和陕南，分布着科技兴农的数百个试验基地，数以千计的农业科学家，长年累月躬耕在山地、平川和高原，为祖国，为

人民做着默默地奉献，他们洒下血汗的土地，将永远记住这一切。李立科就是他们之中的一员。

当我们把李立科的事迹写到这里时，依然抑制不住心灵的颤抖……

1990年10月（与田长山合著）

腼腆

那是关中平原交九后一个阴冷的早晨。我和余长庚初见头一眼就看见他含着羞涩的腼腆；及至谈叙完毕以及多日后再次交谈，我仍然发觉他的腼腆之色丝毫不褪；这腼腆令我惊异。我这几年里经见过一些企业家，无论中国当今一流的大企业无论一个村子办的作坊式的小企业，凡是办出点名堂的厂长或者经理们，大都是满腹经纶满口新词汇尽是开拓者的自信与昂扬，给人一种新时代的骄子闯世界打天下的强大气势，确实令人鼓舞。然而余长庚一副羞怯的腼腆情态，自然就使我诧异了。他的工厂名为“陕西高校木器厂”，这牌子级别是省级已经够排场了，行人看见这牌子恐怕很难想到它是一个村办企业，事实上它确是雁塔区长延堡村的企业。一个村办企业挂上了省高校的牌子，而且戴上了省级“先进企业”的桂冠，更令人刮目相看。然而这个企业的厂长余长庚没有慷慨激昂的关于现代企业的理论阐发，也没有大悲大喜的艰难与成功的经历和叙述；他被问一句才回答一句，语言滞涩，常常令我着急；似乎不是我来采访他的成功，倒像是他出了毛病接受调查盘问似的。我看见他穿一身浅色西装，有点皱，没有领结，短短的头发没有任何加工的痕迹，一张胖胖的红扑扑的脸，似乎刚刚喝过酒，皮肉很细也很圆润，永久性地覆着一层羞涩和腼腆。我不得不把谈话的对象转移到他的同事和职工。

他的红润光洁的脸膛容易给人造成错觉，以为他可能自幼生活在一个优裕的家庭。恰恰相反，他是在一个普通的艰难的农家长大。他的家在西安南郊，村庄名字叫长延堡也叫吴家坟。这儿曾有过一个美丽的神话传说，一个客居此地的吴姓外籍商贩，夜里看见旷野里浮出一朵金莲花，于是，买下那块地皮，随后就把祖宗的骨殖千里迢迢迁

来，重新安葬于这块风水宝地，于是生意大发暴升为巨富，此地便因此而得名吴家坟，后改为长延堡。往事越千年。现在，村庄旁边耸立着一个高入云天的电视发射塔，成为村庄的新的标志。村庄的四周是一所接一所的高等学府，村子周围越来越圈小了的菜田田埂上，于傍晚夕阳涂金时分便有一对对男女大学生散步悠转。余长庚自小就熟悉这方风景，瞅着那些戴着“政法”“师大”“外院”“邮电”等校徽的大学生不无妒羡之情。那么多学院围着村庄，他读罢初中却不能继续再念书了。

他读初中正值十年动乱，上大学不凭考试靠推荐，他觉得自己靠这条路子进入某所大学的可能性等于零。村子里可耕地面积被学院和单位挤得越来越狭窄，人均菜田不足二分，无论怎样精巧经营也难得有大的作为，他就自觉地逃离了过分窄巴的菜田，背起锯子刨子凿子去谋自己的生路。认真算计起来，他当时只能算是一个大少年。他的智力不错心志专一，很快精通了窍窍卯卯的木工活计，成为一个相当在行的木工师傅了，他心里挺得意，吃饱了肚子又落下了工钱。

默默地干到一九七八年，这年他二十二岁，成为他生活道路上难以忘记的一年。村子里发生了一件令人震惊的大事，上级为老支书纠正了地主成分重新委任中共长延堡村党支部书记。老支书从土改干革命干到一九六四年的“四清”运动，突然被扣上地主成分被赶下台了；十四年以后，他又当起支部书记来。老支书重新上台以后居然不计前嫌不挟恩怨，心劲十足地为村子里办起了两个工厂，一个印刷厂，再一个就是木材加工厂。余长庚就在这时候被老支书招为木器厂工人，老支书复出后所表现的那种品德，深深地影响了一个刚刚步入生活进入社会的年轻人的心。余长庚说，正是在这个当口，他才认识了一个真正的人。

木材加工厂以粗加工为主，产品是为一些厂家打制包装箱，余长庚的手艺绰绰有余。木器厂后来发展了一步，制作瓦架，那时，瓦架走俏。这个小高潮来得猛也去得快，瓦架生产出来垒堆成山推销不出去，于是就当作围墙使用。及至我采访时，仍然可以看到作为围墙使用的瓦架。到一九八三年，老支书已经无力挽救这个濒临倒闭的厂子，却又不甘心它垮台收摊，于是自己退下来，把余长庚推出来当厂长。

余长庚一夜之间从一个工人跃居厂长。那年他二十七岁。职工们担心，那种腼腼腆腆的样子怎么镇得住？俗话说“宁领千兵不领一工”哩！余长庚没有在一夜之间变得声色俱厉，依旧是腼腼腆腆的样子，开了干部会又开职工会，把他的想法变成众人的行动。改产成为刻不容缓的事。生产什么？余长庚最终瞅中了村周围的那些高等院校。无论修建什么名堂的楼房都得安置窗户和门板，给这些院校新建的房屋供应门窗，将是一笔持久性大生意。这确定了改产项目的同时也确定了整个企业本身，余长庚把当工人时所看到的弊病以及作为一个厂长所了解的情况综合起来，与各方干部琢磨出一套新的管理制度，定岗定产定质量定消耗都有具体的指标系数；而且与工资和奖金挂钩，奖罚的尺码和限度也十分具体；所有这些措施的一个十分明确的目标就是保证产品质量。以质量求生存求发展求竞争中的胜利。腼腆的年轻的厂长先在自家身上试法以显示严肃，侄女把一小块可用的木板砍削成了楔子，大材小用超过了消耗指标，当罚，当月被扣发奖金三十元，而且责成书面检讨张贴在工厂门口示众，班组长也因此而被扣了奖金若干。其实那块小木板价值不足一元。新管理制度树起了权威，也逐渐成为工人自觉的习惯。余长庚又紧紧抓住本厂生产中的关键环节，带锯和烘干是两个要害部位。他请来了一个掌握调谐带锯有一手绝活的把式，保证了扯板的质量也节约了木材。更容易看出成效的是

烘干窑的改造，由煤炭烘干改为锯末烘干，一下子使每立方米板材的烘干成本从四十元降到五元，想想每年加工五千立方米木板，仅此一项就节约成本多少钱?

余长庚作为一个手艺人谋生的基本信条就是诚实。他同样以这个生活信条来构建自己的厂子。在给师大留学生楼加工门窗时发生了一件意外的事，送到建筑工地的门窗因为地面潮湿而有三十多副变形，责任自然不在生产厂家。余长庚得知后决定将变形门窗拉回，重新制作。用户满心欢悦自然增加了信赖。几年以后，余长庚的厂子与陕西二十多所高等院校建立了基建供需的牢固关系。

余长庚今年三十五岁，当了八年厂长了。不仅仅是他把一个厂子办得红火了的原因，而是这个人的全部品行，被长延堡的乡亲所看重，推举他为村长。他当村长的头一件事是对自己实施降薪。当厂长的月薪为三百元，上级给村长工资定为一百八十元，他从当村长的第一个月开始就去领取村长的薪金，放弃了厂长的标准，而他实际仍然兼着工厂的厂长，继续管理着工厂，继续领取原来的厂长标准无可非议。他说:“咱还是就低不就高好！”

八年前余长庚上任厂长时，也是先对自己家庭约法三章：不准用车，不准往厂里打电话，甚至不准家属到厂里找他。

最近，余长庚被评为西安市优秀企业家。我问余长庚，你们对产品推销做过怎样的宣传？回答令我吃惊，他们至今尚未做过一次广告，倒怕更加剧供不应求的紧张局面。这样一个厂和这样一个厂长，至今亦未被宣传过报道过。我又回到本文的正题：这是因为共产党员余长庚过于腼腆么?

1992年1月6日

生命礼赞

——神针赵步长

一

唐山。一九九一年七月。

在这个曾经被强烈地震毁灭过一次的中国北方城市里，“国际脑血管病学术研讨会”正在这里召开。来自世界各地的几百位脑血管病专家教授博士济济一堂，共同交流各自在脑血管病研究和治疗上所取得的积极成果和最新进展。黄皮肤的东方人和白皮肤的西方人，一个接一个走上讲坛，用不同的语言论述的是人类生命中的一个共同的议题，即如何对付脑血管发生的麻烦。

据统计数字表明，脑血管病发病率已经成为各种疾病的排头兵，构成威胁人类生存尤其是中老年人生命的灾星，致死致残率极高，被称作第一杀手或者说头号瘟神。脑血管一旦发生问题，出现的麻烦就不是小麻烦，重则猝死，轻则瘫痪，很少有谁能恢复如初。中国每年发病约二百万人，美国五十万，中国和美国的人口比例与脑血管病发病率的比例大致相当。可见，大洋彼岸的美国人和此岸的中国人虽系不同种族，生活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之中，生活的富裕程度差异甚大，而脑血管病却以大致相当的比例发生着。面对死亡的威胁，人类最易于摒弃种种成见（政治的或经济的、集团的或种族的）而率先合作。因为瘟神并不特意宽宥经济发达财大气粗的美国人或日本人。中国唐

山的“国际脑血管病学术研讨会”，无疑是造福人类的一次携手和合作。

参会的中国专家赵步长走上讲台来。

他的论文题目是：《针刺加中药帽治疗偏瘫一百○七例》。论文依据中医经络学的理论，阐释的是他对脑血管病独辟蹊径的治疗探索，用一根针灸用的极普通的针和一顶装着中草药的布帽，治愈数以千计的脑血栓病患者的报告，一百○七例不过是其中各种职业、各个年龄档次和各种症状的较为典型的患者。

赵步长的论文刚一宣读完毕便引起一片哗然。不是他一点八五米的中国人的超常个头，不是他宽肩阔背依然潇洒自如的仪容，而是他的那根针和那顶中药帽子太神秘了。一根银制的细针在肌肉里头捅几下捻几下居然就能治愈脑血栓，倒不如说那是神话传说里头无所不能的魔杖；用几味或者十几味中草药制成帽子戴在头顶也能治病的话，这无异于魔术家手里那顶能掏出金币又能掏出鸽子的魔帽儿！“不可思议！”这是一句文质彬彬不失风度的表示否定的礼貌用语。尽管赵步长先生向与会专家散发了用中英文印刷的资料，苦心孤诣地向与会代表展示了治疗过程的录像带，一个个半边僵硬的男人和女人被扭抬着或背着送进治疗室，戴上了中药帽儿，赵步长用一根针在患者身体上扎了三个穴位，那一个个男女患者当即抬起僵硬的腿来，有的竟下床自个走出治疗室去……可是，尽管录像演示得那么逼真也不顶用，甚至愈逼真愈不顶用，会场里依然窃议着的是：不可思议！

赵步长已经无计可施无可奈何，却仍然想向东方和西方的专家证明他的那根针和那顶药帽儿，既不是孙悟空手里那根可粗可细随心所欲的魔棒，也不是魔术家玩于股掌之上变幻无穷的魔帽儿，它是被中

国人使用了几千年的针和药，这针和这药帽的神奇效力远没有挖掘到尽头，他用它来治疗脑血栓（中医称中风偏瘫）就是一次挖掘，是中华医学的一个新的探索。于是，赵步长便使出最后一招儿，现场演示。他和唐山市有关方面取得联系，从当地医院选送一男一女两位中风偏瘫患者，现场扎针治疗。他对病人没有什么要求，由他们随意选送，只是有一条，发病时间不能超过一周。发病已久已留下偏瘫后遗症的患者，效果不甚显著。

治疗室就设在赵步长下榻的宾馆房间里，专家和学者们聚在门外的走廊里，因为技术保密，不得不使兴趣甚浓的朋友们屈尊。先是一位男偏瘫病人被护士抬进房间，不久便自个走出来了。接着是一位女性患者被抬进赵步长的治疗室，随后也自个走出来，不同的是她是扶着墙走出房间又走出楼道的。站在楼道上的专家学者们亲眼看着两位患者被抬进去，他和她僵硬的腿和胳膊且不说吧，单是半边脸上僵硬的神情便可断定是两个真实的不幸者。他和她居然就那么走出来了，尽管她扶着墙，也是难以想象的神奇的效果。楼道上等候观看结局的同行们又掀起一阵惊诧和喧哗，依然是不可思议！太不可思议了！

不可思议其实是正常的。赵步长后来也就想通了。不仅这根针这顶中药帽子，整个中医理论和针灸学对西医来说都是东方的“天方夜谭”。关键在于脑血栓这病太难治了，不仅西医没有有效的治疗手段，中医也没有固定的成方。那样折磨患者也长期困扰着医学专家的顽症，过于简单地解决和神奇的效果，反倒容易引起怀疑，这也许是很正常的事。只有一位东方人没有卷入“不可思议”的喧哗，他是日本脑血管学博士津岛邦男先生。他找到赵步长，想把那个录像带带回日本去；他邀请赵步长去吃一顿饭，自然是为了友谊；他询问赵步长在中国挣多少钱，有几部车？赵步长笑着答：“车子有两部。”津岛先生信

以为真，因为这并不多，医生在任何国家都是收入丰裕的职业，何况赵先生有这一手妙手回春的绝技。然而，赵步长其实是说他家有两部自行车。自行车也是车，代步用的，比汽车慢，但还是车。赵步长没有欺骗日本同行的意思，倒是为了替中国人撑脸面而搞了一点语言游戏，不乏中国知识分子的清高和机智。津岛邦男先生却是极其认真地说："这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是医学史上的奇迹。"

说是"奇迹"也罢，嗟叹"不可思议"也罢。赵步长治愈的数以千计的中风偏瘫病人在中国的土地上重新站立起来，重新在他们的工作岗位上执着于自己的劳动，愉快地生活着继续着他们的生命年华，也向远远近近的同志亲戚朋友和乡邻宣传着证实着那一根针和那一顶药帽儿。

礼泉县仓房巷小学教师丁卓亚的父亲，在农历腊月二十七日晚饭时突然不会说话了，到正月初一中国传统的新年这天，病情急转恶化，右上肢和右下肢完全瘫痪，一家人都笼罩在悲凄的气氛中，突发的灾难把整个家庭的欢乐破坏殆尽。正月初二日，丁卓亚送父亲进了赵步长供职的医院，经CT检查后确诊为脑血栓。赵步长当即施治，先给患者戴上那顶中药帽儿，由助手揉抚药帽，自己亲自施针。第一针扎下去，患者右下肢抬起五十度。隔了三天到正月初六第二次针灸，患者的右腿可以抬高到八十度，而且可以自由屈伸。到正月初八第三次针灸完毕，患者在其女儿丁卓亚的扶助下走下床来，一步步走出治疗室去。丁卓亚是乡村里的知识分子，在用书面语言详细叙述其父发病和治疗的甚为生动的过程时，充溢着对亲人病痛的焦灼和苦痛，洋溢着解除沉疴负累的欢欣之情。作为一个中国人，丁卓亚对中医和针灸不应该陌生，然而当她看到父亲在第一次扎针后抬起右腿时有一句

用语：不可置信！连中国人自己都感到不可置信的事，在西方人看成不可思议也就不足为奇了。

一位名叫贾美英的老年妇女，不幸突发中风偏瘫，就诊的某医院当即给其远在香港的弟弟贾云发去病危电报。贾云急如星火从香港赶来咸阳，看到姐姐的病势焦虑恐慌，得悉相距不远的本市老年病医院赵大夫有良方，先来询问。赵步长问了病情，便和贾云商议了一个施治方案。贾云当即将姐姐转送到赵步长门下。鉴于贾云公务急迫，赵步长当即施治，第一次扎针就立即见效，贾美英不仅能抬起腿来，并且在搀扶下走回病房。贾云惊喜万分，连连慨叹："真是奇迹，不愧为神针。"并且咏出一句诗来：春风回归患者面，喜悦充满我心间。贾云随后就把这个亲历的奇迹写成文章，在国内的《健康报》发表。新华社记者王世焕又把此事写给新加坡《联合早报》。一石激起千层浪。那些被偏瘫沉疴捆缚在床上或轮椅上的不幸者，纷纷投书到咸阳，向赵步长发出了求救的呼唤。赵步长接到一摞一摞印贴着中国和东南亚的诸国邮戳的信，就止不住心潮激荡。也许只有大夫和患者本人，才能体味几年十几年甚至几十年躺在床上接受家人侍奉的那种深不可言的痛苦？才能体味重新在大地上站立起来蹦跳起来的巨大欢欣吧？

二

咸阳。一九八六年。

赵步长在新疆阿尔泰地区工作十八年后，于一九八一年调回陕西关中，在咸阳二一五医院（后改老年病医院）干了五年医务科长，一九八六年从医院行政系统调换到业务系统，做内科主任。这次调动，成为他医学生涯中的一个关键性转折。

内科是各个科室中包容量最大的一个科室，各种杂症疑难病都汇集到这里来。赵步长发现，偏瘫的病人不少。偏瘫是症状，西医称脑血栓和脑血管出血，中医称中风。积多年教学和临床经验，赵步长深知这种病致死致残率很高，一个活泼泼的生命一旦不幸发生脑血栓或者中风病变，即可宣布这个个体生命的结束，不死即残，将在床上或轮椅上磨完生命的残年余月，能够恢复到完好如初者微乎其微，任你怀有怎样的宏图大略雄心壮志满腹经纶一手绝活儿，都只好僵卧病榻嗟叹休矣！迄今为止，即使装备有最先进设备的医院也没有理想的医治手段，国际医学界大约也处于这个发展水准。这就意味着一种对患者来说是如何如何的残忍，意味着整个社会和成千上万个家庭将不堪负累。赵步长每每看到那些被急慌慌抬进医院的瘫痪病人僵硬的躯体、歪斜的眼鼻和完全封闭了的嘴巴，听着他们发出的连亲人家属也翻译不出的话语，便陷入一种对生命的深沉的惋叹之中；再看着亲属满脸绝望地抬着患者走出医院，心中愈加沉重。天呀！好端端一个人，脑血管里形成一个“栓子”，无疑给一个家庭和社会也结下一个“栓子”，我们的社会生活能这样日渐一日地增加那个可怕的“栓子”吗?

赵步长攻克中风偏瘫的念头就是这样产生的。他在这方面并不具备专门知识，但对自己较为扎实的医学基础理论充满自信，有过多年的临床经验，也有多年的医学专科学校的教学理论，中医知识经过专业培训，还算通窍；而更为有利的是他的妻子伍海勤长期从事神经内科的钻研，曾到吉林长春白求恩医科大学进修过一年，理论和临床经验扎实而又丰富。于是他便伙同妻子伍海勤开始了攻克脑血管病的艰巨历程。

一开始，赵步长先了解当今中国治疗中风偏瘫的新招儿，常规的治疗办法无论西医或是中医他都心中有数，他渴盼了解最新成果最新

方法和最新途径。他一九八七年十月赶赴沈阳，那里有个脑血栓病治疗中心，把一个脑血管中的小小栓子作为单项治疗的中心，全国仅此一家。这个中心打破西医和中医传统的常规疗法，另辟蹊径，静脉注射蛇毒，通过血液循环，使蛇毒到达栓子形成的部位，逐渐软化以至摧毁它。赵步长在这儿观察学习了整整一周，不仅掌握了一项打通脑血管栓子的新手段，也给自己心里加上了更重的负荷。这个脑血栓治疗中心已有不小名气，全国各地投奔前去求医者蜂拥而至，那些操着中国四面八方各地方言的人，扶携着患病的亲人赶到中国东北这个寒冷的城市来，脸色是一样的焦虑，心情是一样的沉重……赵步长更加坚定了自己的选择。

赵步长从东北直驱首都北京，到中日友好医院、协和医院继续考察学习，接着又赶到石家庄、邢台和保定。保定一家医院通过颈动脉注射蛇毒的疗法引起他的极大关注。静脉注射蛇毒，通过血液循环先进入心脏，从心脏再循环到脑血管时，蛇毒含量就很有限了。从颈部动脉注射，蛇毒不需经过心脏而是直接进入脑血管，药物不分散流失，对刚刚形成的栓子的摧毁力量比静脉注射就要大过不知多少倍。但颈动脉注射难度很大危险亦很大：动脉只能触摸得到而无法用肉眼看清；动脉压力大。一旦出血就难以制止，对岌岌可危的患者无异于雪上加霜；注射技术稍不恰当，便会引起脑血管迸裂出血或脑部感染；更要命的是颈动脉注射部位旁边有个颈动脉窦，十分敏感不容触及，任何最轻微的触及即致心脏不再跳动；说成危机四伏，险象环生似不过分。其时，偌大的西安几十家大中小医院，没有一家敢于涉猎此项手术的，全国开展颈动脉注射蛇毒手术也是寥若晨星。尽管如此，颈动脉注射蛇毒所产生的显著疗效，对他来说太具有诱惑力了。关键在于疗效的显著，不正是他苦苦寻觅的那个效果吗？而盘绕在这个理想效果四周的困难毕竟是另外的问题。赵步长向院方提出申请，

想学习这项技术。答复令他为难。赵步长最后申请只看一眼，看看医护人员怎样把针尖刺进那根肉眼看不见的颈动脉。答复是“可以”，需得交一千元。一千元作为看一眼的学费，赵步长心里完全能接受，但是无论他自己或在单位暂且都拿不出来，终究没能看上一眼。

赵步长考察学习归来，便和医院领导商定将二一五医院改名为老年病医院，关键性的变化在于将内科一分为二，分出一个脑血栓病科，赵步长做第一任科长，主攻的决心和目标再没有任何游移的余地了。他先采用静脉注射蛇毒的手术，好长一段时间，病人维持在二三十个左右，因为效果虽有，但不显著。

赵步长要的是那个显著的疗效。

他早已默不作声地开始触摸颈下那根动脉了。不就是根颈动脉吗？保定的同行既然能获得成功，证明它虽然潜伏着危险，毕竟还不是死亡之谷，重重危险的夹缝中存在一条安全的通道；关键在于如何准确地找到那条通道，准确无误地把握住它，把注射器的针尖丝毫不差地插进去而不撞触那个置人于死地的“窦”；如何使蛇毒平安地通过颈动脉冲上脑顶，撞击那个祸根之所在——栓子，而不至于破坏血管……为此，他重新温习解剖学，和他的夫人伍海勤以及护士长陈润香一起到解剖室确定部位……赵步长终于觉得自己完全有把握通过那条安全通道，便决定施行第一例病人。

接受第一例颈动脉灌注的患者是位关中农民，六十岁了，左半边完全瘫痪。赵步长亲手做了第一例灌注，完全成功。不能说他不紧张，但他确实够镇静的；镇静不仅是多年行医修炼成的习惯，也是良好的心理素质所决定。奇迹出现了，患者的左腿居然可以抬起来了；接着又灌注了五次，这个农民就痊愈了。赵步长随之帮助妻子伍海勤

和护士长陈润香掌握了颈动脉灌注的手术，医院里可以全面开展这项难度极大的手术了。从一九八八年三月赵步长做第一例灌注到现在，三个人已经做到四千人次，无一例发生意外，血肿和感染均没有发生过。一九八八年七月，在西安召开的蛇毒应用会上，赵步长做了《颈动脉灌注蛇毒四十例》的临床报告，引起轰动效应，许多同行和德高望重的导师钦佩他敢闯禁区的探索精神，依然再三劝他“注意安全”。因为在西安医疗界，他毕竟是第一个把蛇毒灌注进颈动脉的人。赵步长和伍海勤以及陈润香，对技术精益求精，从过去一天只能做一例，偶尔一例要花近十个小时，到现在一天能做十例，可以说完全熟练完全把握住了那条狭窄的生之通道。

四千余人次的安全灌注，只能证明他们医术精湛，并不能证明这项手术本身不存在危险。事实是，在每一次实施手术之先，需得向患者亲属讲清可能出现的危险，晓以利害，必须在亲属签字画押之后才敢进行。有些患者的家属闻之生畏，提心吊胆。关键在于，这项手术确实不易掌握，因而不易普及。凭他们的三双手，即使不吃不喝不休息，又能给多少人做手术呢？赵步长掌握了它又不满足于它，继续探寻一条更安全更可靠更显著的途径和医治手段。

时序推到一九八九年。

赵步长终于探索出一条既有显著疗效，又安全可靠的治疗方法，这就是被患者称为“神针”的药气针，以及他研制的一顶装着中草药的药帽儿。这个药帽儿最初的诱因，是他在阿勒泰哈萨克族聚居区行医时，发现哈族人患某些病时戴一顶自制的装着中草药的帽子，还真有治疗效果。他研制的药帽儿其理论依据在于，通过皮肤渗透，中药直接作用到血栓部位，促进脑细胞功能的恢复。药帽儿里的中药配方，经过临床的配方而初步固定下来。至于针灸，赵步长吃的苦头就一言

难尽了，为了找到理想的穴位和理想的针感，他在自己身体上戳过多少针眼是难以数计的，终于找到并确定下来三个最理想的穴位，也找到了最有效的针刺方法。详细叙述那个艰辛的历程非此短文所可胜任，而且受到专利技术保密的限制，我只能告诉读者，赵步长找到的那三个穴位是超常的穴位，他的针法也是超乎常规的刺扎方法，因而才取得超常的显著的疗效。

他的理论依据是：人体十二经脉，三百六十经络的气血皆聚于头部，而且五脏精华之血，六腑精阳之气，亦皆聚于头部。百会穴又名三阳五会，是督脉的要穴，督脉总管一身之阳，其脉上终于脑，下连足太阳膀胱经，故百会穴有醒脑开窍之功。中药接触头部，药物通过渗透方式进入百会穴及头部皮肤，全身经络气血运行通畅。因此，中药帽有疏导经络的作用。在临床观察中，经CT复查证实，中风偏瘫患者除临床症状体征改善外，脑血栓患者可见原栓塞灶缩小或消失，出血区血肿吸收，可以推测中药帽加针刺可使闭塞的脑血管再通，改善微循环，血肿迅速吸收减少脑细胞受损，使受损之脑细胞复醒，相应瘫痪肢体功能恢复。

有一次，赵步长在给一位患者扎针时，患者照例向他叙述感觉，说有一股气先从上到下直冲脚尖，又回转过去沿着腿部往上直冲脑顶。赵步长很满意这个效果，追求的就是这个效果。这个效果已经被许多患者感受到了，感受到这种气贯全身直冲脑顶的患者都一身轻松地走出医院了。那位患者突然说：“赵大夫，你扎的是气针吗？”赵步长惊喜地笑起来。这位患者启发了他，正好给自己的针法命名，他还没有给自己的针法找到一个合适的名字。从此便正式命名为：药气针。

截至目前，赵步长创建的脑血栓科接治中风偏瘫患者五千余例，有效率达百分之九十八，治愈率在百分之八十以上，患者已经传扬到四面八方，却是说咸阳出了一个“神针”大夫……

三

被人们传播得神乎其神的“神针”，既不是祖传秘方，也不是得仙翁点化，而是副主任医师赵步长苦心孤诣呕心沥血钻研探索的科学成果。

赵步长祖籍陕西长安，一九三八年生于终南山下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村庄张寨沟。村庄距离引镇不远。从小就听过有关镇子的一个神奇的传说。唐朝一位少年天子游猎到此迷失方向，急坏了也吓坏了长安城里的文武百官，四处寻找，终于在这里找到了疲惫不堪的皇帝并将其引回城去，这里便得名引驾回，简称引镇。赵步长出身农家，祖辈务弄庄稼，家道清贫。九岁入私塾读书，解放后入人民政府办的新式小学，只读了三年便小学毕业了，考入西安省立二中。一直读到高中毕业被保送进入西安医学院，看去一路顺风实际却艰辛坎坷。

赵步长至今还感激伯父的那根板子。他接受启蒙的私塾先生是一位远房伯父，白天受教于伯父膝下，晚上和伯父睡一个火炕。他半夜三更爬起来读书，到天明正好烧完一根蜡烛。一旦他打盹儿了瞌睡了停止了背书，伯父的板子就会及时地准确无误地敲到头顶上。伯父考他背书的熟练程度，不是由他按照文本的顺序往下背，而是由伯父随心所欲起段，或前或后或中。两三年下来，他扎扎实实背下了一肚子精美典范的古文，这对他后来钻研中华医学的古文经典著作受益匪浅。

赵步长在引镇小学读高年级时，认识了比他低一级的伍海勤。伍后来成为他的妻子和精诚的事业上的合作者。那时候她比他的生活更窘迫，姊妹三个，她读书得不到家庭的重视，除了旧中国农村轻视女孩子的习惯因素外，家庭的极端贫穷也是实际的困难，父亲更指望她到地里去给猪拔一笼草。伍海勤贪恋读书，主要是她的天资聪慧，也有一个女教师无形中给她很大影响。她在学校里或者在古镇街巷里，看见那位女教师穿一身干净的列宁服，腋下挟一本书走过去就很羡慕，这无疑是她对生命价值生命意义的第一次觉醒。她坚持读完小学，以优异的成绩考入西安市第九中学，进入城市读书了。引镇离西安五十华里，她每周回家去背一次馍馍，有时候，父亲托那些引镇拉货送货的马车夫给她把馍捎进城去。父亲在农闲时粜麦卖馍，上好的白面粉蒸成馍馍卖掉了，留下掺着麸子的黑面自家吃，伍海勤背到学校的就是这种搅着麸子的黑馍。开水泡软的黑馍整整吃了五六年，伍海勤紧紧踩着赵步长的脚步昂扬地考进大学——西安第二医学院。

还是在家乡引镇小学念书的时候，双方的父母做主经媒人给他俩订下终身。这在当时的关中农村是很正常的事情。他俩似乎朦朦胧胧知道这回事，没有反对而默默地接受了，童心里互相都保存着对对方甚为崇拜的美好印象，说是青梅竹马也很恰当。她始终比他低一年级，他在前头闯着，她在后头紧紧催逼着，谁也怠懈不得；他总是学习尖子，她在学校也总是名列前茅；他比她年龄大些也比她家境稍微强一点，他买下的参考书籍用过了学罢了再交给她使用，她学习中遇到的难题难点可以求教于他……友谊在他们六年的中学生活中完全交融。

上高中时，母亲两次逼令伍海勤结婚，尽管她当时只有十八九岁，却是大大超出了母亲传统观念里所能容忍的年龄极限了。伍海勤

求助于赵步长。赵步长便回家说服自己的父亲，主动权毕竟在赵家。伍海勤更加敬重赵步长。直到伍海勤高中毕业，母亲说什么也不容她推托了。她和他在家乡办理了结婚手续，那时候赵步长已经在西安医学院读过一年书了。家里交给他俩的结婚费用是一百元，俩人反复合计反复推敲花掉了三十二元，留下六十八元带到学校里去了。伍海勤已经接到大学录取通知书了。这两个清贫农家出身的大学生，崇高的理想，孕育了崇高的人生境界，没有丝毫的庸俗习气了。他们专意于学业，反倒更能体贴老人们的艰难和国家的恩惠，俩人都是靠助学金读完中学又接着读大学，父母的钱和国家的钱都不忍心浪费。

赵步长经学校保送进入西安医学院后又很后悔，甚至想退学重新报考某所理工学院，他向往当一名工程师。工程师在五六十年代是一个很响亮很具诱惑力的职称。伍海勤帮助他安下心来继续学习，而且发誓自己毕业后报考医学院。促进赵步长安下心来的又一个因素是母亲的死。他在上小学时，书包里常常装着医生给母亲开下的中药方子，到镇子上给母亲抓药。母亲患的是心脏病，在他初中毕业的那一年离开人世。当赵步长在医学院的课堂上和解剖室里了解人体的秘密时，眼前不时浮起母亲悲凄的病恹恹的面容，学习的劲头愈加旺盛了。

在大学读书的几年里，适逢国家经济困难时期，饥荒威胁着城市。一米八五个头的赵步长经常处于饥肠辘辘的状态中，常用一碗盐水镇压饥饿。每到周日，他到第二医学院去和伍海勤相聚，她给他早早准备了可以饱餐一顿的食物，一般都是苞谷面蒸糕和少量白面馍馍。她的饭量小点，一周节约下来正好可以让他过一个饱肚的礼拜天，临走时带上剩余的食物，其实她也忍受着饥饿，也是用喝盐水节约下的饭票供他特大体形的超常需要的。她给他洗换衣服，这在高中

念书时就成习惯了，他已经失去母亲。他给她的帮助主要在学业上，因为比她高一个年级正好可以做她的辅导教师。他们建立的既是青梅竹马的友谊，又是新型的知识型青年的崇高爱情，终于走进了广阔的生活天地。他们大学毕业了。

党和国家号召大学生到祖国最需要的也是最艰苦的地方去，赵步长自告奋勇到新疆位于中苏中蒙交界处的阿勒泰去了，没有任何个人算计；也就没有任何瞻前顾后患得患失，祖国的需要高于一切。伍海勤全力支持他的选择，并且告诉他："你先去，明年我毕业了，也去阿勒泰。"第二年，伍海勤果然实践自己的诺言，而且为去阿勒泰费了点周折，第二医学院是西安市为地方培养医务人才创办的大学，学成后自然分配到市内各大医院，伍海勤经过多方申求，抱定去远方边疆的决心不动摇，学院和市政府支持她的崇高行动，她达到和赵步长比翼齐飞广阔天地的目的了。阿勒泰自治州派赵步长回西安来接伍海勤北飞。当她和他搭乘上西去的列车时，竟然没有西出阳关的离愁反而心潮澎湃，巍峨的南山锦绣的渭河平原，古老的富于传奇色彩的引镇，伯父的板子，爸爸的卖馍篓子和装满猪草的篾条笼……从艰辛泥泞的乡村小道上起飞了一对比翼大鸟。

赵步长夫妇在边陲阿勒泰十七八年的生活历程，可以写成一部生动丰富的长篇纪实作品，这是本篇短文所难以承载的。赵步长一到岗位就随社教工作队下乡，彻底沉到最底层的哈萨克族人之间。医生是一种最容易达到感情交流的职业，赵步长很快就成为哈萨克兄弟最熟悉最受欢迎的人。他很快学会了哈族语言，熟悉了哈族的习俗习惯和忌讳。然而边疆偏远地区缺医少药和落后的医疗条件也令人吃惊，赵步长看见一位产妇蹲在铺着柴灰的帐篷里，双手抓着绷在空中的绳子呻唤不止，家人却邀约了亲友在帐篷口喝酒抓肉，以庆贺新生命的诞

生。他把痛苦不堪的产妇扶躺下去，安全地为其接生下一个健壮的小哈萨克。哈萨克兄弟十分感激，完全接受了新的接生法。他和后一年到来的伍海勤在下乡社教的几年里，接生的哈萨克孩子不下二百。伍海勤说：“他比我接的多。”因为生产往往是在夜间，几十里百余里的路程要骑马上山跨河，赵步长便只身前往了。伍海勤很快也学会了哈萨克语言，会话能力甚至超过了赵步长。他们夫妇一起工作在最基层，往往各骑一匹大马赶到草原的某个帐篷去救治病人。

赵步长在医学院学的是医学系，伍海勤学的专业也是医学系，然而到基层牧区是无法分科的。几年下来，他们对内外妇产科耳鼻喉科泌尿科等各类疾病都诊治过了，甚至在极端简陋的条件下开展了手术，抢救危急病人二三百例。有一次在严峻而又迫于无奈的情势下，他俩为一位阑尾炎患者开刀，连一双手术用的手套也不具备，只好把刀片剪子和双手在酒精里泡泡消毒。

阿勒泰是哈萨克族的聚居地，另有维吾尔族、蒙古族、回族和少数俄罗斯族，这儿天高地阔出门便以马代步。赵步长学会了骑马，有次出诊连人带马陷入河沟的一片沼泽，浑身泥浆几乎丧命，然而他依然喜欢骑马，纵马在辽阔的草原上驰骋，那是任何高级轿车所不能比拟的。伍海勤的骑马技术也完全熟练，自始至终都是哈萨克兄弟教会她的，包括一次意外的摔跤，也是两位哈萨克人救护的。她急于出诊骑上了一匹未经喂草料的饿马，一跨上马背，那马就在县城里疯跑起来。她已经有了少许经验，便瞅中一堆沙子跳了下去，幸未跌成重伤只摔疼了屁股，两位哈族人立即把她救护起来。艰苦条件下的生活内涵不完全是艰苦，充实的人生构筑着崇高理想的基础，与兄弟民族的情谊则滋润着两个年轻医生的精神世界。他们的头生儿子，满月后就

交给哈萨克妇女去养育了，直到孩子上学，他们要四处奔波去救死扶伤。

伍海勤直到临产前八天才从社教工作队所在的乡下牧区回到县城医院（工作单位），单位却苦于腾不出一间房子让她坐月子，最后只好把马圈的一角搭顶封墙，给她造出一间产房来。那屋子低矮到容不得赵步长站立，只能弯着腰替伍海勤送饭洗尿布。后来终于想出一个办法，在床下脚地上往下挖，整出来一块筛子大的地盘，赵步长可以站直腰板了。他们没有抱怨，赵步长在给她备足了柴火和粮食之后，就匆匆下乡去了。她本人没有度完规定的产假日期，也把孩子托付给哈萨克保姆，也赶赴牧区去了。

赵步长后来受命创办阿勒泰地区卫生学校。他八月上任，九月便招来了第一批两个班学生，只有几间旧房子。他身兼教务主任和班主任，一边搞基建一边编教材还要讲课：解剖、生理、病理、药理、拉丁语、内科、外科、儿科都开设了……这得益于他扎实的基础和勤奋的自修。伍海勤第二年也被调到地区卫校来任教，成为赵步长的助手，他俩一生都如影随形。伍海勤说："我总是给他帮忙。"其实根本说不清谁给谁帮忙。到今天，他们一起感到自豪的是：他是阿勒泰第一个大学生，她是第二个。他们创建了阿勒泰地区第一所卫生专业学校，培养了一千二百名学生（截至一九八一年离开时），分布在阿勒泰草原上，这些人大部分是兄弟民族子弟。更令人自豪的是，他们组织编写并出版了第一部哈萨克文医学教材，这也许是无法用教材本身的价值可估计的。

他和她的青年年华留在阿勒泰草原。十七八年后，他们调回家乡关中，在咸阳二一五医院继续救死扶伤的工作。在完全变化了的新的

环境和新的条件下，当一种新的机遇到来的时候，他们便向更深的层面挺进了……

四

整个八十年代的十年里，在社会环境、工作条件和生活节律完全不同于六七十年代阿勒泰的关中咸阳，赵步长在钻研探索脑血管病的艰难历程中所持的顽强进取精神，与他驰马阿勒泰十八年的那种青春无悔的精神一脉相袭；他在攻克中风偏瘫顽症中所取得的突破性进展，与他为兄弟民族行医疗疾一样辉煌；工作对象各异而目的却完全一致，那就是让每一个平凡而神圣的生命都欢跃起来。

一个僵死床榻的重新欢跃起来的生命是十分动人的。

我在赵步长的办公室里就看到这样一种情景。赵步长穿一件特大号白袍儿，正在接受我的问询，房间连背椅上坐着好多求诊的患者和搀扶他们的家属。一位六十多岁的老先生抢到我面前，用纯粹的东北话语述说他“重活一世”！老先生姓梁，吉林省一位退休公务员。梁老头只说退休了该好好享点清福了，想到祖国各地去转转，不料“嘎哧”一声就躺倒了，不能动也不能谈话。梁老头的痛苦心境无以言传，儿女们觉得病魔太残忍了，竟然不给一个忙碌了一辈子的老职员一点快活，跑出跑进吉林几家医院均无良方，焦虑中在一张报纸上看到有关赵步长“神针”的报道，当即乘车从二千里外赶到咸阳来了。那时候赵步长也深为感动，立即对这位远道来客施治，中药帽戴上了，连着在三个神秘的穴位扎了针，奇迹出现了，梁老头下了病床走起来，走着走着便跑起来，一边跑着一边笑着最后哭起来。赵步长让他回病房休息，梁老头竟然不可抑制，继续给赵步长表演他的跑的姿势……梁老头的儿子插话告诉我，当父亲启动脚步走路的那一刻，他简直愣住了

说不出话来了，甚至怀疑是不是在梦中？梁氏父子给我述说这一切时，我发觉自己的某一根神经战栗起来。梁老头又跑起来，当着赵步长和一屋子求诊者的面给我表演他的跑步的姿势，那姿势和速度自然无法与刘易斯媲美，我却感到了一种生命跃动的极大欢乐。梁老头和儿子述说完毕便作告别，再过两小时便要登上回东北的列车。

用药气针治疗脑血栓显示奇效，被广泛传播为“神针”，却对付不了脑血管破裂出血造成的死亡或瘫痪，而此类病人的死亡率更高，为百分之八十。赵步长和妻子伍海勤经过钻研，便掌握了钻颅抽血手术，这是一九九〇年开始的。能开展这项手术的医院，当时西安尚数不出几家，赵步长在这个小小的二一五医院获得了成功。黄陵县一位二十二岁的青年农民郭怀发，睡了一夜便起不来了，语言模糊，家人求算卦先生问吉凶，卦曰：救命恩人在西南方。家人便循此方向一路打问走到咸阳，果然打听到这儿有个“神针”赵大夫。赵步长先给郭做了CT检查，判断为动脉畸形出血，出血量四十五毫升，郭母给赵步长跪下了：“他二十二岁，我把他服侍养活到何时？”郭怀发出家门时已经给新婚媳妇交代了后事，不抱什么生的希望了。当晚十时做了钻颅抽血，腿当即便能动了。随后再辅之以药气针治疗，郭怀发住了二十天医院，适逢正月十五，和陪伴的家人欢蹦着看花灯去了。

这样，赵步长便有了一整套对付脑血管病的手术手段：静脉注射和颈动脉注射药物，药气针加药帽儿，钻颅抽血。用这四种办法分别对付脑血栓不同类型的病人，凡是脑血管出现问题，皆可以接收治疗。在有效治疗的同时，进一步向主动预防的方向前进，为此研制出四种配合治疗和预防发病的有奇特效果的产品：一、由药帽发展定型的健脑益寿帽儿。二、防风胶囊，以上两个研究成果对预防脑血管发病和复发病均有良好效果。三、中风通脉胶囊。四、中风膏。这两种

药物是配合治疗用的，亦可用作预防，前者口服，后者贴敷肚脐等穴位，大量临床应用显示出奇特的效果。

我一个挨一个病房看下去，听着男的女的高龄的和年轻的患者或他们的家属向我诉述病患之痛苦和诊治的疗效，赞美赵步长的话语千篇一律却又个性鲜明。人说：偏瘫病房无偏瘫。这话算是验证了。在女病房我看到一个二十出头的年轻女人。她因分娩而突发脑出血，昨天来时昏迷不醒，连夜做了钻颅抽血术，现在安然地坐在病床上，跟着两位看护的老人在学习数数儿，练习恢复语言能力。她的半边瘫痪的身子开始恢复知觉。赵步长告诉我说，手术后得休息几天，然后再扎药气针治疗，这个年轻女性是有把握恢复活力的。

我因没有见到三位新加坡患者而遗憾，一个叫黄宪章，一个叫钟应华，一个叫张景壹，三人都是看到新华社记者王世焕发在《联合早报》上的消息后，不约而同从南洋赶到咸阳来求医的。他们已经完全康复归国，我只能从他们留下的康复自述中感受重新欢跃起来的生命的意义。

钟应华自述：我是一名中医药师，一九八九年一边中风，一九九〇年十月双边中风，完全不能移动，四肢无力，全身软绵绵，连转个头都不能。某公立医院没法给我治病，把我送回家去。我住进了私立医院，进行了一些基本的物理治疗。我在家躺了二十个月，一切起居都必须靠家人，度日如年，一向忙惯的人忽然间一切活动都停止……（略去来求医经历）我今天第一次接受治疗，中风三次，两手不能动，两腿虽能动，但不能站立。下午三时二十分，戴上药帽儿。我马上觉得药气在头脑里面缓和地循环，有股气流从头到脚。用了药气针之后，我的两腿能合着在床上抬高，四点钟我便能站立起来。已经二十个月没走动，我感动得流眼泪。我感谢赵步长医生给我新的希望，

让我能够享受晚年；如果不是从遥远的新加坡来，我不敢想象以后的日子怎么过……

黄宪章自述：本人六十四岁，新加坡男性公民，早期患高血压、糖尿病，未引起注意，一九八八年元月第一次引起脑血栓病，左半身瘫痪，经新加坡伊丽莎白医院治疗，百分之九十痊愈，饮食起居均称自如，岂料一九九〇年元月二次发生，仍在伊丽莎白医院就医，虽将病情稳住，但形成严重后遗症，扶四脚拐杖勉强行走，但需有人在旁保护，给家庭造成一大负担，生活觉得痛苦……（略去求医经过）赵医生热情接待来自国外病人，并偕夫人副主任伍海勤大夫、护士长陈润香女士，进行药气针治疗，静脉注射高效药品，并施以先进的颈动脉注射药物，经短期（三十五天）治疗，肌体明显改善，现在不靠拐杖走路，精神焕发，本人认为是赵大夫神针给我生机，仁慈心术送我活力。感谢感谢真感谢！

黄宪章把来咸阳时坐的轮椅和四脚拐杖留下了，作为他对赵步长以及医护人员的纪念，他和张景壹（自述略去）联名送给赵步长一块匾牌，刻着四个大字：仁心仁术。他们一身轻松地回到新加坡去了……

我在走出这家医院时思绪紊乱，耳际依然是那些千篇一律却又个性鲜明的患者的赞叹之辞，激动得见人就表演跑步的吉林梁老先生，那个把轮椅和拐杖扔下的黄宪章先生，那位正在跟父母练习数数儿的年轻产妇，那些抬着进来蹦着出去的数以千计的脑血管病患者，还有那一摞摞来自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尼、菲律宾、泰国和港澳台地区的求医信……给予他们新的生命的赵步长和获得了生命欢跃的人们，他们互致的都是关于生命的礼赞。

1992年6月

忠诚与潇洒

——我理解的王福禄

一

采访中国物资储运西安集团公司三十年发展史，我便自然地走回过去，重新经历了一次共和国成立以来近半个世纪的我们的昨天。昨天的美好和昨天的灾难，以及至今重温时仍然抑制不住扼腕慨叹的那些很不美好的东西。

西储公司是一九六三年按照已故国家主席刘少奇的构思建立起来的，意在把国务院各部分管的物资仓库交给国家物资部统管，总体构思就是搞物资储运业托拉斯，在整个中国西北所设的一个“点”就定在西安。且不论刘少奇主席的这种构思在“文革”中遭到怎样的批判，也不论我们站在今天的理论与实践的高度如何评价这个构思，我却只对西储三十年的风雨历程感慨不已：从一九六三年到一九八四年的二十一年间，西储总收入为一点零七亿元，而从一九八五年到一九九二年的七年间，总收入竟然达到一点二亿元，一九九三年上半年借以腾飞之势，总收入已越过四千万元大关。面对这组悬殊的数字，读者很容易卷入关于一个企业发展得快与慢的速度问题的思考。我要提醒读者的是这两个数字所标示的时间，不是按人们通常习惯于一九八一年即改革开放前后来划分的，而是按一个人——西储现任总裁王福禄的工作历程划分的，相信读者不会以为是“以人划线”。

一九八五年，王福禄调任西储公司副总经理，主持工作。

二

王福禄和我交谈中常有警人的言论：西储“文革”二十年。“文革”通常是说十年，即从这场灾难发动的一九六六年到“四人帮”下狱的一九七六年。王福禄出任公司副总经理主持工作的一九八五年，所面临的成堆问题里，主要的还是“文革”的遗留问题，帮与派，权与利，大震小震频仍，使班子无法工作。王福禄以军人的胆量企业家的魄力，不管怎么吵怎么骂怎么闹，他都顶死不留回旋余地，凡是结帮拉伙闹官闹权的，一刀切；先切下去斩断震源，不然，西储将陷入更深的灾难。

到一九八七年六月，关于“文革”的遗留问题才相继处理完毕，王福禄正式宣布：西储“文革”结束。整整二十年时间，我们稍作一下回顾和掐算，从一九六三年成立到一九六六年“文革”，仅仅三年，然后就是延续了二十年的“文革”，这个由国家主席钦定的企业，根本没有获得发展的时间体现国家主席为民族为国家复兴的良苦用心。难道仅仅只是这一家企业的悲哀，难道仅仅只是刘少奇主席死不瞑目的悲哀？西储难道不是整个工业企业界的一个缩影？映现着国家和民族的灾难史？

结束了二十年“文革”的西储，到一九九二年的短短几年间所获得的长足发展，便向我们启示了一个经济发展的常识性ABC：经济只能运用经济规律经济手段来求其发展，用大轰大嗡阶级斗争的杠杆是无法撬动的，撬不动反而把锅砸了。详细描述西储近几年的发展，如何改革机制，调顺机构，有十分动人的细节和情节可供我使用，但我对于这种写法表示怀疑，以为不完全适合王福禄这个具体对象，我已经从西储感兴趣转移到对王福禄个人的浓厚兴趣上。

三

五十五岁的王福禄有三十九年中共党龄，十六岁那年入党，十七岁当兵。做过侦察员和师团文秘。在军校学习了三年后又做了八年技术员，之后又任战勤科长、计划科长、仓库主任，一九八三年转业到西储下属的大兴路仓库当主任，一九八五年八月提到公司做副经理主持全面工作，四年后当经理，再一年度后任总经理，现为西储集团公司总裁兼党委书记。

我们便看到一个农村孩子的成长历程。

具有三十九年党龄的王福禄称作老革命不知是否恰当？而称作老党员显然毫无疑义。这样一个老革命老党员一旦冲破了思想牢笼，他所焕发出来的活力便无法估量。王福禄属于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倡导的思想解放大讨论中最早摒弃枷锁而获得解放的一个老党员，这主要恐怕得益于他一直处于非常实际的工作岗位。他面对的是极左理论极左口号对自己所在岗位的企业的严重破坏，这是任何“左”得可爱的理论和口号都无法回避的事实。当如他一样有可以称为老党员资历的一大批老革命在思想解放运动中迷惘掂量的时候，王福禄却义无反顾地跨进一个新的时代的大门。

丝毫不怀疑他对革命的忠诚，倒是因为那个忠诚，才使他长期面对经济惨不忍睹的现状痛心疾首。他的可贵之处在于，作为一个老党员长期形成的对事业的忠诚、素养和经验，搁年轻干部还得多年摸索积累和磨砺。一切从革命的原则出发，从国家利益出发，无论企业管理制度或是人事制度的改革和调整，都是以这个为准绳的，而这一点正好是改革进程中所最可宝贵的品质。王福禄把那些帮派一刀切除的

原因和魄力都来源于此。然而他后来在整个启动西储的全部工作中又坚决摒弃一刀切。

一刀切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已经成为一种最具权威的化解矛盾堵塞口舌的刀法。几乎没有人赞成这种愚蠢的刀法，但实际生活中通常使用的仍然是这种刀法，这便是生活的复杂性和人的思维的简单化而形成的统一。王福禄敢于向这个通行的刀法挑战，便显示他的独立思维和独立人格。在当今，能把一个六十五岁的老人委以重任而不是“顾问”“名誉××”的企业家恐怕稀有。这个六十五岁的老人叫焦振亮，六十岁才提正处级。他创办的六维金属材料配件中心把生意做得活到家了，卖钢材大至数吨，小到论尺论斤，经过七年的奋斗已发展成为年销售额过三亿元的省内外闻名大企业……这样善于经营的人才按年龄切掉不是太可惜了么？然而敢于把他留下来并且提级升职的却只有王福禄。因为，这个人是难得的人才，对西储做出了突出贡献。

四

强烈的事业心不仅表现在王福禄的工作作风上，而且业已形成了一种工作癖，从早晨睁开眼再到晚上上床，他都处于一种连续性的工作状态。多年已经没有了上班和下班的时间概念。他的办公室就是他的生存场，他走出办公室到任何一个下属单位去视察，就把这生存场带到那里。他不会消遣也缺乏游逛的雅兴，离开了工作便离开了生存场，似乎缺氧而感到不适情绪灰败，便觉得浑身从里到外都不自在，一进入工作同时就获得了生存场，便亢奋起来高昂起来，即便是短暂的吃饭和休息也是在办公室里更自在些。

社会通行一种潇洒走一回的人生观。对于大多数普通人来说这很具有诱惑，也不为错。但对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如果他的子孙和公

民都图得潇洒，这个国家和民族便很难发展和前进，其结果不仅是谁也潇洒不起来，甚至会落入屈辱。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都有一批把自己的命运和国家民族复兴壮大的前途自觉捆绑在一起的人。他们对于整个民族来说永远都是少数人，然而他们是脊梁，是国家前进的内燃机，是民族强大复兴的火光。远的不说了，当代的罗健夫、蒋筑英堪称代表，活着的为众人口碑的陈景润……王福禄属于这一小部分人中的一分子。

关键在于对生命价值的理解和人生意义的价值取向。王福禄十六岁入党，十七岁进兵营也是一种潇洒，王福禄把一个派系闹得人心涣散停滞不前的国有企业启动起来，这个只守着几个仓库死等死靠的企业，在他手里仅仅七年，便成为一个内向加外向型的充满活力的企业，七年间产值增加了五点三倍，作为一个生命个体的王福禄潇洒不潇洒？潇洒不应该只包含歌舞厅麻将场里的无忧无虑，潇洒更应该包括成就大事业的雄心与英姿，经过苦思冥想经过百般艰难千般辛苦而使自己所钟情的事业冲出困境踏入光明，奋斗者自己从肉体到精神的愉悦才是真正的潇洒。

我们这个国家之所以在近一个世纪的外患内忧中不灭，靠的就是这一类人。

这个民族之所以在近一个世纪的变革中能化腐朽为神奇不断地嬗变而复兴复壮，靠的也是这一类人。

这一类人是国家的栋梁，民族的精魂。

我所理解的王福禄，无愧于此。

1993年春

言论

中篇小说集《四妹子》后记

想到刚刚编成的这部小说集将交由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我的心情尤其舒悦。一个以八亿农民为读者对象而专门出版农村题材文学作品的出版社，首先在感情上使我有一种亲近感，其魄力和眼光更使我钦敬。

农民在当代中国依然构成一个庞大的世界。

我是从这个世界里滚过来的。我出生于一个世代农耕的农民家庭。进入社会后，我一直在农村做工作。教书时，我当的是农村学校的民办教师，学生几乎是清一色的农民子弟。做干部时，我又一直在区和乡政府工作，工作对象自然还是农民，除了农民就是和我一样做农村工作的干部。这样的生活阅历铸就了我的创作必然归属于农村题材。我自觉至今仍然从属于这个世界。我能把自己在这个世界里的生活感受诉诸文字，再回传给这个世界，自以为是十分荣幸的事。

农民世界是一个伟大的世界。尽管人们以现代眼光看取这个世界时，发觉它存在着落后、愚昧、闭塞、保守、封建、迷信以及不讲卫生等弊端，然而它依然不失其伟大。在几千年来的缓慢演进和痛苦折腾中而能保持独立的民族个性，仅此一点，就够伟大的了。

当我把这本小书回传给这个庞大世界里的人们时，心里不无担忧，他们会认可么？我常常恐惧这样一点：遭到这个世界里的人们的

唾弃；被这个世界的人所唾弃，可真受不了。我仅仅也只惧怕这一点。

作家研究的主要对象是社会生活。

我关注的是农民世界的生活运动。

我曾经甚为自信我对农村生活的了解和感受。我今年春季以来就又不甚自信了。我对我生活着的地域内的几个县和区的历史沿革的进一步了解，使我打破了以往的自信。这块土地上千百年来缓慢演进的脚步愈使我加深了以往的那种沉重感；这块土地上近年间发生的急骤变化甚至使人瞠目。我对这个世界的昨天和今天知道得太少了。

我愈加信服巴尔扎克的一句话："既然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那么，要成为真正的小说家就必须对社会生活进行调查。"从这个意义上说，要了解一个民族，最好是阅读那个民族的优秀的文学作品。从这个意义上说，作家要获得创作的进展，首当依赖自己对这个民族的昨天和今天——历史和现实的广泛了解和理解的深刻程度。

我截至目前的全部作品（包括本集），都做不到这一点。但我已经意识到了。意识到了，我就有了进一步努力争取新的目标的力量和勇气了。

1987年6月6日 白鹿园

刀声

一把刻刀，一块梨木板，构成他简约而又富有的人生。

钢刀既下，切入梨木，噌噌嚓嚓，构成他单调而又喧闹的生命之歌的主旋律。

作家协会小院北排的这间小屋，充其量不足十平方米，他在南窗前和西山墙下都支着两块宽大的画案，背墙根下支一张窄窄的单人床，东山墙竖栽着一张画板，上面钉着刚刚完成的一幅黑白木刻画。床上和书案上全都堆着书，堆着画卷，偷着空隙还在桌下养着几盆花。于是，任何人进了这间屋子，便不能放肆，只能在屋子中间那块仅可转身的地方站一站，欣赏一番墙上贴着的名家的画和名人写给他的字，然后就拘谨地坐在他给你临时挪腾出来的椅子或床上喝茶说画儿。

青年版画家郑文华主宰着这个看来多少有点狭窄的领地。

就在这间狭窄的小屋里，刀木切磋，一幅幅好画儿被创造出来，《黄陵雪晨》《边疆月夜》《黄土地》《三边九月》等。或以其深沉的意韵，或以其强烈的实感，或以其蓬勃的生机，进入千百万人的视觉和内心。狭窄的小屋无疑又是一个丰富的小世界。

文华的《黄陵雪晨》堪称一幅佳作。那一株株被夸张了的古柏，粗壮雄浑，如盘如柱，顶天立地，一个个扎实遒劲，正是一个古老民族生命的象征。如丝如缕的纹络，时见清晰，时见含混，似可当作一个古老民族的历史去读。四季常青的柏叶上压一层皑皑白雪，给粗犷

刚毅糅进了妩媚，浑然一体，似可体味一个成熟了的民族刚柔相济的精神品格。在层层叠叠的古柏林中，幽深处可见黄帝陵阙。看过同类题材的画儿，多把黄帝陵突兀于高山之巅或画面之显眼位置，自然也不乏意韵。然而文华之处理意蕴则深矣！黄帝虽被奉为神祖，但他毕竟是人，与他的数以亿计的炎黄子孙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不要有俯视和仰视的隔膜，使黄帝回到他的子孙们中间，也应该是这个伟大民族始祖的本意。然而那幽深的柏林，又确实拉开了始祖与子孙们的距离，不能忘记几千年的历史。画界行家赞赏其构思脱俗，或曰深了一个层次，或曰贯穿着人文主义的历史意识，等等。故而奖掖年轻画家的创造精神，给他一个陕西画展一等奖。

世界上的杰出人物的杰出创造，固然不能排除有偶然的机运存在，然而毕竟为数甚微。郑文华的全部创造以至学画儿的整个过程，都不属于撞机会碰运气之类，那是一个如同北方农夫辛苦耕作所获得的果实一样步履沉重，是用智慧和汗水浇灌的果实。

文华生逢盛世，呱呱坠地时，毛泽东以动人心魄的湘音宣告：“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他用生命的第一声哭叫表示了欢呼，欢呼自身和自己将要立足的这块土地的新生。一个北方海湾的小城镇，古老的市井，土屑和脏物充塞着的狭窄的街巷，是他的乐园。

读小学时，他读了王冕学画的故事。这个极富传奇色彩的中国元代画家苦行苦练的故事，使一个离他近千年的新中国的红领巾少年激动不已，而且捉起铅笔练习画画了。他悄悄地与元代这位画家作比：他当牧童而他是新中国小学校的学生；他要时时提防主人的斥责而他学画儿却受到老师的鼓励与器重；他在地上以树枝作画而他有纸也有笔了……他能成为画家而他也就一定能画出好画来。

于是就开始了一个漫长而又艰难的历程。

一块小小的滑石粉笔总不离手，见到什么就画什么，画牛画鸡画羊画狗画猪，尤其爱画马。画山画水画树画房子，尤其爱画同学的肖像。这个时期，中国发生过一次解放以来最大的饥馑，习惯称作“三年困难时期”。

他辍学了。辍学后的生活还挺浪漫，他因此而有机缘下到农村，与乡村孩子一起放牛放猪放羊牧马，上树捉鸟下河抓螃蟹。课业中断了，文化学习停止了，唯独那滑石粉笔总揣在兜儿里，乡村小路和河边卵石上就留下许多牛羊马猪和小伙伴们的各种姿态的画儿。

困难的局势初得缓和，一九六三年随父亲工作调动来到关中耀县，他就上学了。中学毕业，他考中了艺术学校，当他捏着那张入学通知书而恣意天真烂漫地想象那所艺术殿堂的种种美妙的时候，“文革”的飓风轻而易举地使他手中的那张视为通向理想之门的通行证书幻化为一张废纸。他不仅未能进入艺术宫殿，反而落入炼狱。

中国的农村是一座炼狱。那里充塞着穿着破烂衣衫的农民，饥饿困扰着一家一户一村一社；充塞着一座座破旧的房舍和土窑洞，肮脏泥泞的村巷和道路，原始式的繁重的劳动和最“左”的革命口号以及极严厉的处罚措施统一在一起。那些城市学生第一天来到这里就感觉到了贫穷落后愚昧和不讲卫生。然而，谁知道如果在这座炼狱里炼过三四年而仅仅只是感觉到贫穷落后不讲卫生和愚昧，那么他精神之肤浅也无异于贫穷和愚昧。

郑文华自然从进入炼狱的第一天起就充分地体味这贫穷落后不讲卫生和愚昧的滋味，好在他并没有仅仅哀叹如此。他在繁重的劳作之

后，捏起画笔，画山画水，画村树和村巷，画破旧的房舍和残缺的窑洞，画猪圈羊栏鸡埘；画筋肉暴突的关中大汉和皮肉松弛目光混浊的老汉，画被太阳晒红的姑娘的脸庞，也画裸着胸脯为孩子哺乳的村妇；画太阳升起时抹给大地和大地的精灵们的那一层嫩光，也画夕阳沉入长河时大地山川河流禾树的斑斓色彩。他在用双手和肩膀感受这炼狱的种种筋肉之苦的同时，也在用一支铅笔探索着感受着这炼狱世界的博大深厚和沉重。多年以后，当他把一幅题为《黄土地》的木刻画推出来的时候，我们透过那舒展的大地上的犁沟，那躬身压犁恨不能连拳头和犁铧一起插进黄土的北方农民的身躯，感受到的东西就很难用一句简单准确的话来概括了。炼狱里的全部生活所给予他肌体和身心的感受，也许正是一个企望用画笔来探索这块土地的过去和现在的青春少年的不可或缺的补给，一次痛苦的大补给。

进入县城后，他做临时工，搬运工，统计员，似乎与画画相去甚远，最粗笨的体力劳动与最缜密的艺术构想同时集于一身，是矛盾的统一。王冕吆的是一群牛，而心里绽开的却是一朵朵露珠晶莹的荷花，也是矛盾的统一。

王冕的影子总是在他感到最困难的时刻飘然而至。“人不光是靠他生来就有一切，而是靠他从学习中得到的一切来造就自己。”他信歌德的话，这位洋人所概括的人生哲理首先使他加深了对王冕的再理解。王冕就是靠他从不倦的学习中得到自己想要得到的东西而造就了全新的自己，如果不是这样，王冕充其量只是一个小牛倌而已，而小牛倌在中国的乡村又何止万千。他从古人和洋人的创造过程里，看到一个共同的相通的东西，那就是必须用不懈的学习精神去获得自己的企望，去造就自己。他除了写生，就仿摹古山水画，古人物画儿，洋山

水画儿，洋人物画儿，能搜罗到的都临摹几遍，揣摩体味古老师和洋老师的笔法，取其所长以充实自己。这是一个漫长而又艰辛的过程。

他的画儿在小县城有了大名气，常被一些单位邀去画“红海洋”或“万里山河一片红”之类的宣传画儿。这些千篇一律万变不离其“忠”的模式画使他无法长进，却不能不画，那是“忠不忠的态度问题”。他没有满足于此，悄悄地甚至是偷偷地观赏临摹那些难得到手的名画的技法。有趣的是，有一次他和一位青年正在欣赏一位法国画家的名画，一位小头目突然闯进门来，掩盖不及，小头目的眼睛又极尖，一下子就瞄住了这幅洋画，而且瞄住了画片下面署名的作者姓名前头有一个〔 〕，那括号里有一个“法”字。小头目问：“这‘法’字是什么意思？”他给解释说：那“法”字标明了画儿作者的国籍，没有其他什么意思。这位小头目不仅不为自己的无知不好意思，反而变了脸色质问：“你怎么能看外国的东西？”这种问话搁十多年后的今天使人听来莫名其妙，甚至让没有经历过那种年代的人要怀疑其神经是否正常。然而在六十年代中期到七十年代中期的整整十年间，不仅最敏感的人即使极迟钝的人对一切古今中外的艺术成果都讳莫如深，噤若寒蝉。文华确被惊呆了，一时反应不过来，倒是那位青年机灵：“你桌上摆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的书，他们不都是外国人吗？”好在那小头目被呛回后，没有揭发也没有上报，还算省事。

一九七二年，陕西画界大家修军也到耀县炼狱里去改造世界观。郑文华去拜望，去投师，一老一少很快就成了忘年交。得名师指点，迷津顿开，他甚至决然放弃多年苦练的国画而改学木刻，成为他艺术追求道路上的一次重大改变。也许，他找到了最适宜和最喜欢的艺术表现形式，正如目下时髦的说法曰：找到了自我。

找到自我就极力要表现自我。

表现自我不应该是仅仅只局限于个人那个小小心胸里的恩恩怨怨卿卿我我吧？应该是作者或画者自我心灵对世界对生活对历史的综合思考和痛切感受吧？我不敢断言。然而我从文华的艺术实践里却看到了后者。

现在，文华是《延河》月刊和《小说评论》两家杂志的美术编辑，要设计封面，要安排插图，要安置版样，工作是可以想象其忙的，且不说他与所有人一样不能脱开琐屑的生活杂事。然而，他在那间小屋里继续着新的创造。连连获奖的作品已成为过去。出洋展览而且出版的佳作也不能使他停下来津津自赏。他总是盯住今天的实践和明天的构想。那钢刀切断梨木的声响，冷峻地切断了过去的成就而洋溢着切向明天的热情……

1987年10月8日 白鹿园

关于《四妹子》的附言

陕西关中（渭河平原）人把说闲话聊大天叫谝闲传。

《现代人》编辑部电告《中篇小说选刊》拟选载《四妹子》，并要求写一点创作谈之类的短文。我欣喜之余又有点惶然，写成《四妹子》至今已一年多了，早已淡漠了她，一时竟不知说什么好。

刚刚从报纸上看到一则消息，说几位跑到美国定居的中国工程师主治医师研究员不被美国社会承认其职称，只好到餐馆洗碗端盘子或做清洁工扫马路云云。登这种消息是什么意思？美国社会不尊重知识分子不重视人才？美国人不平等待我民族？国人再不要出国，出国本没有好果子吃是不是?

我却由此联想到《四妹子》。

四妹子生长在陕北黄土高原，尽吃糠。她不愿再吃糠想吃白面馍馍，于是就凭借女性的优势跑到盛产小麦玉米的关中来嫁人。关中自古帝王都，周秦汉唐等十一个或大或小或长或短的王朝都瞅中关中这块风水宝地建立国都，可见其是个很不错的地方。四妹子没念过书自然不懂得关中有如此辉煌的历史，只知道关中比黄土沟壑区交通方便，生活富裕，不吃糠面饼子，尽吃白面馍馍细面条。她奔着白面馍馍义无反顾地到关中来，思维十分简单也十分卑微。

由于自然的和社会的、历史的和现实的、客观的和主观的诸多因素，造成了中国乡村发展的缓慢和农民的普遍贫穷。普遍的贫穷之中又相对地显示着黄土高原和渭河平原的巨大差别，这多半是由于自然

环境形成的。白面馍馍与糠面饼子在滋味上的差异，对四妹子来说无异于天上人间。这样，她要奔关中吃白面馍馍的热情大约无异于一些中国人奔华盛顿、汉堡、东京的热情吧？在世界上存在着发达与不发达国家，在一个国家里也有地域性的巨大差别的情况下，如四妹子如上述消息所说的定居美国的那些中国人奔着白面馍馍的趋势都是很难阻遏的。

至于究竟在中国当工程师主治医师研究员好，还是在美国洗碗端盘子扫街道好，这就不能一概而论了。如果说为了在美国更好地发挥专业特长以期有重大建树或者为了深造、为了追寻知识、为了人生奋斗的更大突破，而暂时无奈去洗碗端盘子扫马路，固然不如原先想象的那么浪漫，但总是有个向往和追求吧，有个高的境界吧？如果只是如四妹子一样目标，只为了奔向白面馍馍，那就无所谓了。因为谁都晓得在美国即使扫街道洗碗端盘子这一类腌臜活计的收入，比中国的工程师主治医师研究员的报酬要好得多。人有时候为了生计为了吃白面馍馍，其实是不计较做什么事的。

四妹子到关中如愿以偿嫁了人也吃上了白面馍馍，然而她在那块具有辉煌历史的皇天后土的地方生活得并不自在。《四妹子》就是写她的人生的不自在的。

我想细心的读者绝不会被作者唬住的。难道仅仅为了写“奔白面馍馍”来的么？古语都说过，衣食足而后知礼仪。从糠饼到白面馍馍这个问题都还没有解决，还谈得上爱情、婚姻、家庭吗？四妹子要吃白面馍馍，就得牺牲爱情、婚姻、家庭上的追求，就得放弃做人的起码权利和尊严。

人的解放，不完全是经济上的解放。折腾了三十多年，现在已经意识到了。这场开放改革，它在中国社会上引起的震动，或者说冲击波，在各个领域，恐怕远比经济上的变革，要广阔得多，深刻得多。

1988年1月8日 西安枣园

美玉出蓝田

七八年前结识李建邦，见他瘦高挑个儿，头发和双鬓都开始花白，衣裤有点皱，似乎那头发上脸颊上和衣褶里总是扑落着一层粉笔末儿。我以后又见过他几次，每次都重复着也加深着这个印象。直到前不久相见时，他说：“我送你一本书。”这是一本刚刚出版的散文诗集子。他随之又告诉我，即将再出一本，仍然是散文诗集，名曰《爱的寄语》，并要我作序。我不禁感慨系之！

我知道建邦一直专注地写着散文诗，已有二十多年，现在结集出版的两本集子中的篇章，是他精选出来的，未纳入的自然还不少。选入集子的篇章，多不过千字，少则三五百字，一本近十万字的规模并不算大的书里将包纳多少条篇目？我读过他已出版的那一本《异彩·灵音》和即将出版的这一本《爱的寄语》的书稿，便沉浸在一种美的艺术氛围之中，深切地感受到作家的苦苦思索和艺术创造的严谨。建邦目光所及，耳力所闻，心之所感，情之所动，山川河流，平原沙滩，大道小径，蓝天白云，冬雪夏雨，春华秋实，禾苗花卉，虫鱼鸟兽，日出月落，朝霞黄昏，在我们司空见惯的诸物诸景中，开掘出宜人的诗意和别开生面的哲理。我钦佩他的一双慧眼更钦佩他追求的执着。

这几年的文坛，一拨一拨作家冒出来，有的写小说得大奖了，有的编电影打响了，有的诗歌创出新流派了，有的正门里闯不进神圣的艺术殿堂便从斜门里筋斗趔子翻进去，有的胡编乱凑出凶杀色情歪文虽然出不了名却捞到了实惠。建邦却一直默默地写着他的散文诗，不以物喜不以己悲不以魅力无边的孔方兄所诱，白日里于中学讲台上站过一个又一个四十五分钟，夜来钻进那个团聚着九口之家的低矮小屋

的一隅，潜心于一词一句一章一韵的吟诵，也算得千姿百态的文坛上的一种作家的一种生存状态。

在建邦这两本篇目浩繁的散文诗集里，不见“一无所有”那样急猴似的哀号，不见“我不知道”那样空虚迷茫的呻唤，不见忸怩作态的缠绵，也不见强打精神伪装出来的男子汉的野性。他开掘出来抒发出来的是一种壮美的情怀，昂扬而又和谐的声调，雄浑而又清秀的气韵。即使落日，在建邦眼里和心中也是“一生燃烧的总结”。我不禁想到，年过五十不修边幅的李建邦先生，何以会澎湃着如此强烈的激情？这激情似乎更应该属于年轻人，恰恰是许多年轻人沉吟于朦胧里去了，倒是一个老之将至的李建邦迸发着属于年轻人的热情和奔放。

李建邦是蓝田县人。蓝田有猿人头骨化石闻名于世。蓝田出美玉。蓝田勺勺客遍布全国。蓝田有王维隐居的辋川和他的银杏树。蓝田二十年代初建立共产党的第一个支部锤炼出一大批卓越的革命活动家。蓝田于秦设县县名一直沿用至今可谓历史悠远。蓝田境内的秦岭是真正的山；蓝田西部的白鹿原是典型的原，蓝田的辋川灞川是刚柔互济的川道，石之坚玉之柔土之厚水之深民之勤朴风之淳厚融为一体，滋润着一代一代乡民，哺育出无以数计的民族英雄。感谢这块灵秀的土地，也哺育出李建邦这样自信充实的诗家词人。

我说关中人

——《灞桥区民间文学集成》序

编委会的同志把一部《灞桥区民间文学集成》的书稿端给我，使我十分惊讶。面对这一部规模宏大厚可盈尺的书稿，我当即想起我曾经说过关中人只会吼秦腔而不会唱民歌的话，直觉得对故乡有妄自菲薄的不大恭了。

读着书稿，油然唤起我童年诸多的记忆，美好而又亲切。我是灞桥辖区人，书稿里好多传说神话故事笑话民歌民谣童谣以及地子词儿，在我混沌未开时就听过和说过的，尤其是跳地子的情景，犹觉历历在目。

戏是演的秧歌是扭的地子却是跳的。跳地子，正月新年破五待客一过，村里跳地子的能手脚也痒痒手也痒痒喉咙更加痒痒了，从祠堂木楼上取下用竹竿苇秆木棍儿绑扎的马架驴架船骨架，用彩纸糊了用白布围了用巧妇剪下的花儿草儿图案装饰一新，就成了漂亮的道具。那些新老演员聚在融融的阳光下演练唱腔的台架。在祠堂外的官场上，吊起官油粗稔的灯盏，锣鼓家伙把整个村子都震得颠颠蹦蹦沸沸扬扬。演员一跳进场子，男人女人便嘻嘻哈哈争相辨认其本来面目，他们用墨汁或是锅底黑涂抹加重了眉毛，用红色颜料或是用唾液浸湿了红纸染到脸膛上，用上好的细面涂抹鼻子，棉花粘在下巴上是最好的胡须，衣服全是借新媳妇们的红裙绿袄。女人们嘻嘻说：“这是你阿公个老东西嘛！打扮成个妖婆子了！”男人们则肆无忌惮地嚷嚷：“牵驴的是狗旦个狗日的嘛！”一出情趣横生的《小喜接妹》，一出引人捧

腹的《秃娃尿床》和《脏婆娘》，一出慷慨悲壮的《祭灵》，一出令人肝肠寸断摄魂动魄的《断桥》，接连演下去跳下去。有时候几个村子联合跳地子互相比赛互相交流，有时候被邀到附近的村子去跳，热情的村子在跳完以后招待一顿臊子面，冷淡的村庄连一壶茶水也不给喝，演员们回家的路上就骂出一句双关的话："咱给狗日的白跳了。"

地子是我最早接受过的表演艺术。

我之所以妄言关中人只会吼秦腔而不会唱民歌，主要是有感于陕北的信天游和陕南的山歌。我很小就从课本上广播上领略过陕北民歌信天游的魅力，及至去了陕北接触到了一些未经艺术家加工改造的原生状态的民歌，首先惊异其直率和泼辣。尤其是无以数计的表现情爱的情歌，把男女间的痴情挚爱甚至相爱的形式都唱得赤裸裸的。我之后在陕南有幸听过一位来自民间的真正的民歌手未经驯化的嗓子的吟唱，虽然格调曲律与信天游相去甚远可谓南辕北辙，但就表现情爱的直率而言，也是情切切火辣辣赤裸裸无遮无掩。我于是很遗憾我的关中人只会吼而不会唱……

关中有如此丰厚的民间文学的蕴藏，其中民歌民谣和情歌有许多传诵甚远的佳作，只是关中的情歌歌词含蓄腼腼腆腆羞羞答答，不似陕北陕南的情歌那么大胆那么坦率那么爱死爱活。那种十分普及的地子实际上已经算是一种初级的舞台表演艺术。许多地子节目是从正本秦腔里拆卸下来的精彩片段，只是语言唱词更加通俗易懂更加口语化，情节也经过删繁就简更加集中，唱腔则完全套用地子较为生动活泼的小曲小调而摆脱了秦腔严格的曲牌。地子作为一种简便易演的娱乐形式得以普遍流行，成为文化生活极度贫困的乡民们的一种精神滋润。形成灞桥民歌以及民间文学种种特质的因素可能很多，我主要想到的是生活在这块特殊方位上的乡民们的文化心理因素。

灞桥地区占有历史上咸宁县的大部疆域。咸宁早属古雍州地，名称屡易，曰芷阳曰灞陵曰南陵曰杜陵曰万年曰大兴。唐天宝年间始改为咸宁，辛亥革命后废咸宁而统归长安县。在汉唐时咸宁为京畿之地，其后一直作为关中第一邑直到封建制度彻底瓦解。作为京畿第一邑的咸宁，随着一个个封建王朝的兴盛走向自己的历史峰巅，自然也不可避免随着一个个王朝的垮台而跌进衰败的谷底；一次又一次王朝更迭，一次又一次老帝驾崩新帝登基，这块京畿之地有幸反复沐浴真龙天子们的徽光，也难免承受王朝末日的悲凉。难以数计的封建王朝的封建帝君们无论谁个贤明谁个残暴，却无一不是期图江山永铸万寿无疆，无一不是首当在他们宫墙周围造就一代又一代忠勇礼仪之民，所谓京门脸面。封建文化封建文明与皇族贵妃们的胭脂水洗脚水一起排泄到宫墙外的土地上，这块土地既接受文明也容纳污浊。缓慢的历史演进中，封建思想封建文化封建道德衍化成为乡约族规家法民俗，渗透到每一个乡社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家族，渗透进一代又一代平民的血液，形成这一方地域上的人的特有文化心理结构。在严过刑法繁似鬃毛的乡约族规家法的桎梏之下，岂容哪个敢于肆无忌惮地呼哥唤妹倾吐爱死爱活的情爱呢？即使有某个情种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唱出一首赤裸裸的恋歌，不得流传便会被掐死；何况禁锢了的心灵，怕是极难产生那种如远山僻壤的赤裸裸的情歌的。

然而，灞桥地区广泛流传的民间文学仍然显示了丰厚的蕴藏。毕竟是平民的文学创作，其本性仍属于人民，这与陕北陕南以及各地的民间文学毫无二致。因为所禁太严所缚太紧而不能痛痛快快地作赤裸裸的表述，因而更见淳厚更见幽默更见机智更显深沉，更是我们探究关中人文化心理结构的一条途径。如此大量的传说故事歌儿曲儿的作者们无一留名，他们不是为了发表成名更不是为了获得诺贝尔奖走向世界，充其量不过是为了发泄一点情绪倾吐一缕思恋，因而从本体上

就铸就了这些作品的可贵的人民性，也是这些作品得以广泛流传民间历经沧桑而不泯灭的根本所在。

作为灞桥土著，我对本乡本土产生流传的民间文学虽未专门研究，却兴趣甚浓。我无疑接受过这些优秀作品有益的滋润，以致今天重温这些故事歌谣时，那种对于儿时记忆的印证所产生的亲切感是难以表述的。我因此非常感激和敬重编撰这部书稿的同志，以及一切参与组织这项抢救民间文学遗产工作的同志，做成了一件了不起的大好事。

1990年1月6日

篇篇珠玑说《泥神》

在一次会议上认识陈军，说他舅家在西安东郊的古镇新筑，小时候在那里的农村生活过好几年，于是和我便有了乡党的缘分儿，倍觉亲切。闲聊中说到他的生活历程，得知他是西安市人，生在一个贫寒的属于社会底层的家庭，高中毕业以后自然无法选择职业，就去做投递员和小学教师的工作。他没有因位卑薪微怨天尤人，而是自强不息地自修自学，不断地在“社会大学”里获得一个勤奋耕耘者应有的硕果。他现在在省政府的某个部门工作，而且担任着职责。他说他青年时期也迷恋过文学。我并不在意。爱过一段时间文学而终于没有做专门文学工作是很正常的事，有这类经历的同代人我接触的也不少，所以并不太在意。之后不久，我收到他寄来的一本书，名曰《泥神》，是一本寓言集。我才惊悟他现在仍然于繁重的工作之余进行着创作，而且是比较冷门的寓言；而且已经很有成就，多次获奖，在寓言创作界颇具影响，我就很为这位乡党自豪起来了。

《泥神》集里收集了七十二篇寓言，都很精短，不需太久便读完了，读罢竟不忍释手，顿然涌出“篇篇珠玑”的慨叹来。

强大的哲理力度是我读后的最强烈的感觉，也是构成陈军寓言创作的支柱。一本《泥神》，其哲理的闪光无处不见，关于不朽与速朽的真理的《石碑》，揭示理论与实践关系的《杀牛》，有关进与退的辩证统一的《不能退》，喻示整体与局部或个人与集体关系的《弓与箭》《电灯与开头》，讽喻那些总是看旁人豆腐渣看自己一朵花的人的可笑可悲结局的《泥神》，等等，不胜类举。这些形象生动地揭示生活哲理的篇章令人警策，给人启迪，使人受益，不啻对成长中的青

少年有教益，对资深历久的中老年读者也不无裨益。有一篇《舌头与耳朵》的精彩对话：

舌头问耳朵说："我只有一个，你为什么有两个呢？"

耳朵回答说："因为一个人的听须是说的两倍。"

我们也许已经熟知广开言路兼听则明偏听则暗的历史典故，然而还是乐于接受这种形象通俗而又机智幽默的喻戒。

陈军寓言的生命活力得力于幽默。幽默大约是古今中外一切优秀寓言艺术生命的水，没有幽默恐怕很难构成高品位的寓言。陈军寓言的幽默是自然的得体的也是含蓄不露的。难得自然。其实不单是寓言，其他文学形式诸如小说诗歌散文戏剧，也是难得自然。作为正常人的读者的接受心理总是排斥忸怩和伪情，忸怩作态搔首弄姿轻嘴淡舌不是幽默，而是小市民的饶舌和低级趣味。《泥神》集里的寓言，其幽默机智渗透在每一个描写对象的血肉之中，尤其在关键的地方突兀拔起，集中释放，令人击掌称绝。有一篇《不吃》："一个人因为吃元宵烧了心，发誓再不吃元宵了。后来到一家饭馆就餐，看见锅里下着饺子，便说：'几天不见，你长了耳朵。长了耳朵我也能认得你。'说完就饿着肚子走开了。"读来令人哑然失笑。

陈军的机智幽默除了天性之外，应该是民间文学的滋润和哺养，不仅是《不吃》，类似的诸多篇章都可以看到源于民间的那种淳厚自然的幽默的气质，这是完全区别于书卷气味和小市民油嘴滑舌的一种特质的东西。由此我想到一种断言"中国人是一个没有幽默的民族"的阔论。我不把这种阔论看成是狂妄而看作无知。中国民间无以数计的故事笑话民歌俚语里令人捧腹令人舒心悦目的幽默，任何一个不属高

第深闺的平民出身的人绝不会绝听于耳，更不要说作为演出的相声快书以及戏曲里丑角们的幽默了。作为一个有自己特定历史特定文化特定生活习性的民族，自然也有与其他民族不尽相同的表达幽默的形式，形式的不同并不能断言其有无。陈军汲取民间文学的幽默营养是丰厚的，也得到巨大的成功。

《泥神》语言的简洁堪称典范。七十二篇寓言的总字数为三万一千，平均每篇不过四百字。有好多篇章短到只有两行，有几篇仅只是几行对话，不过几十个字。在这样短小的篇幅里要完成一个哲理的揭示，一个形象的生动塑造，并非易事。首先要有精妙的构思，殚精竭虑的设计，一丝不苟的反复推敲，以达到文字锤炼的极致，我们才看到这些耐得琢磨的精彩的篇章。

陈军默默地进行着寓言艺术的不倦追求，已有数年，而且取得了重大成就。他的已经形成个人显著个性的新寓言，有多篇被选入《中国现代寓言选集》和《中国现代寓言精选》等书中。陈军亦受命主持编选出版了《寓言百家》。一九八八年中国作协首届儿童文学奖公布时，陈军的《寓言十则》光荣入选。寓言创作的主要对象是青少年。青少年时期所接受的健全健康的影响对一个人后来的人格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近年间的街头巷尾的书报摊上，堆积着大量吞噬青少年灵魂的垃圾，已经酿成的威胁有目共睹。陈军严肃高雅的寓言创作就显得尤为可贵，理应受到社会的尊重和关照。

陈军无疑将继续他的艰辛而又崇高的创造，我一点儿也不怀疑他将一步一步前进，取得更丰硕的艺术成果。

1990年2月23日 白鹿园

唯有真情才动人

——读《肖重声散文选》

新年的喧嚣常常使人陷入一种烦腻的深渊里，我甚至很畏怯这个持续时间最长的节日。当于此际，翻开友人肖重声送我的《肖重声散文选》，诵读品尝一篇散文，窝聚在心头的那种莫名的阴霾便于不知不觉中散释净尽，空寂烦腻的心绪渐渐稳定下来充实起来。这本洋溢着美好感情的书陪伴我度过了漫长的“年”。

在这本装帧朴实而精美的书里，我感受最深的是作者的真诚，那种真切美好的感情像春雨一样浸润着读者的心扉。这种真挚的感情贯穿在整个集子的三十篇作品里，尽管每一篇作品的手法各异，语言冷暖色彩迥然，写作年代前后拉了十多年，唯有作者真挚的感情的潮水流贯始终。我在阅读《俺婆》时，心里顿然潮起难以自控的波澜，那位备受艰辛的刚强慈爱的老奶奶的形象，与我记忆中的祖母重叠了混淆了或者说融合了。她的形象唤醒了也印证了人对一切善良的作为普通人的亲人的记忆。作者完全沉浸在虔诚的奠祭气氛里，宣泄对亲人的思念之情，语言的选择自然归于朴实无华的自然状态，甚至连形容词也附加不进去。真实的感情需要宣泄的时候就只想着如何宣泄，容不得丝毫的矫饰和忸怩，这些东西破坏奠祭者心灵里的神圣气氛。

与《俺婆》一样同是写作者自己生活记事的《鸟枪换炮的时候》和《移山前奏曲》，读来更使人触景感世。以与作者同代的知识分子坎坷人生为题材的作品可以说稠如烟海，具体到诸如住房的困窘和著作出版的难这些普遍性的问题，更是屡见不鲜虱多不痒账多不愁。肖

重声在这两篇散文里，用调侃幽默的笔触写出了无房的难场和分到新房的雀跃般的欢悦，写了结集出书的欣慰和自销著作的尴尬之状，这些方面都写得逼真逼肖。如果仅仅如此，肖重声不可避免地也要落入同类题材的窠臼而不值得特别称道。他的不同凡响正在于他的真诚。真诚的难场与真诚的欢悦，真诚的欣慰与真诚的尴尬，这些揭示人的心理中矛盾对立的情绪，奇妙地和谐地统一于他的宽厚的胸怀里。在得到新房后作者有一段慨叹：我清楚地知道，在这人口暴溢的大城市里，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年知识分子，既没有深长的资历，也没有重大的贡献，而终于能有这么一套住房——一个能够安身立命的窝儿，真可谓“天已降大福于斯人也”！我能不庆幸……我们不至于把这直率流露的欣喜理会为作者的容易满足吧？真真切切隐含着作者的宽厚胸襟和达观的生活态度。这里显然不具备杜甫“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的博大胸襟，却也确实显示出这一代知识分子高尚的道德良心。这是一种人格的力量。这种显示着人格力量的咏叹同样体现在《移山前奏曲》里。

与以上这些牵涉作者自己家境生计的篇章比较起来，其他那些游记式的散文，同样是以其真诚贯穿经脉的血肉之躯。《在咸亨酒店》对鲁迅笔下的孔乙己的回嚼，《越王台上的疑问》里对几乎家喻户晓的卧薪尝胆的历史故事的严峻思考，在陆游终生梦牵魂系的《沈园的残角》的吟惋，作者无论是调侃，无论是深刻的诘问，抑或是情意绵绵的吟惋，都是以坦诚的真情感染读者。《牧麝记》在这本集子里算是风格迥异的篇章，写尽了野生麝到人工饲养过程的全部艰难，却写得入情入理妙趣横生引人入胜，我以为这是极见功夫的一篇。

以情动人是艺术创造中的真谛，是基本点也是致命点，这是很不容易做到的。作家通过自己的作品体现他对生活的感知，也是通过作

品达到与读者的交流的。读者阅读文学作品观众看戏看电影，也是通过艺术家创造的人物来交流的。维系艺术家和读者（观众）之间达到感情交流的唯一的东西是真情，是作家艺术家的真诚和他创造的形象的真实。形象的真实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感情的真实，人物的喜怒哀乐在情节进展中的分寸的准确把握，可以说严格到一丝一毫不能夸张也不能不及的程度，过或不及都不是准确，都会造成不真实的伪情。须知读者（观众）可以接受离奇的情节乃至荒诞不经的故事，也能够从不习惯到习惯逐渐接受各种艺术流派的艺术形式，唯一不能接受的是虚假感情的人物。道理很简单，虚假的感情与读者（观众）达不到交流的效果。心理健全的人既然不能容忍实际生活中的虚伪，更难接受艺术作品中的伪情，书籍在人的意向里总带着圣光。近年来读者对某些忸怩作态搔首弄姿油腔滑调嗲声嗲气的作品的冷漠，恐怕根本的毛病就出在这里。我对肖重声散文的喜爱，最起码的一条就是：我在直觉上没有受骗没有被愚弄被耍笑的感觉。我以为他严格恪守着奉献真情尊重读者这至关重要的一条，于今已经很了不起很值得我敬重了。

十几年前我在报刊上频频见到肖重声的名字，觉得这名字极富诗意。及至见到他时已是略显臃肿的中年人了。他是长安人，自幼聪灵，上小学高年级时就有诗歌发表，而且极富孝道，用第一次得到的一点五元稿费为祖母买了一包点心，看来爱心在他幼稚时期已铭骨刻心。他现在愉快地做着编辑工作，工余写着散文。我殷切地企盼于他的是，如同这本集子里的质朴真诚的散文，能够更多地创造出来。

1990年3月9日 白鹿园

巨人与矮子

——《长安风》序

这是一部令人浮想联翩的书。

读着这部书里的篇章，眼前自然就呈现出一幅幅生动的图画，黎明时分草地上滚动着的晶莹的露珠，初春时节河边杨柳枝条上绽开的鹅黄的叶片，刚刚嚼破蛋壳向光明世界发出第一声啼叫的幼雏，从花萼里鼓胀起来蒙着一层羞怯的茸毛的青杏儿……

这是一部充满勃勃生机的书。

书里两百篇诗文的百余名作者，大都是一些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他们接受过中等或高等教育，进入社会步入生活以后，显示出敏锐的感受能力和强烈的表现欲望，于是就把自己对社会对生活对人生的感受和理解诉诸文字，于是就呈现出一片晶莹的露珠，鹅黄的新叶，羞怯的青杏儿，惊奇的第一声啼叫。能叫出第一声就是一个伟大的胜利。以我自己的体会说来，在处女作发表之前较为漫长的苦斗期里，在诸多的困扰中，自卑是最可怕的一种心理情绪。自卑总是和自信一起徘徊，总是怀疑自己是否具备文学天才或者说文学的基因。自信经过天才这面神秘的镜子的折射就变成了自卑。第一次发表作品，无疑意味着自信第一次战胜了自卑，使许久被自卑困扰以至折磨着的人站立起来，扬眉吐气地说，我还行！

至于这第一声叫得是否洪亮是否婉转是否和谐是否艺术，我以为不必太看重，重要的是终于叫出第一声来了。稚气是难免的，如果因

此而轻视他们，恰如笑傲嫩叶和幼雏一样浅薄。他们的无限生机和无限的希望，正是孕育在稚气之中。他们之中肯定有参天的壮树长成，肯定有鹏程万里的大鸟腾上长空，谁敢断定他们之中就不会产生二十一世纪的马尔克斯、艾特玛托夫和巴金?

这是一本令人欢欣鼓舞的书。

书里的百余名作者，大多是生活和工作在长安大地上的工人、农民、干部和学生。一个县的范围内，能有这么多人发表文学作品，无论如何都是令人鼓舞的事，确也可以看出整个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无须牵涉太远，仅仅往前推过十年、二十年，那时候一个县能有几个发表著述的作者呢？据此书的编者之一李下叔介绍说，在他们编辑的《长安报》副刊上，大约有二百多名作者发表过上千件的诗文，实在是蔚为壮观的。由此我想到赵树理创造的一个民间艺人形象李有才。在乡间，差不多每个村子里都有一两个如同李有才一样心性灵聪天资丰厚的多才多艺的人物，他们头脑机敏妙语连珠出口成诵，终因没有文化而既不能创作古体诗词，也不能创作自由诗、叙事诗或朦胧诗，只能随心所欲编唱民歌快板和顺口溜等一类民间文学，终而不能登上神圣的文学殿堂。必要的文化基础给一切文学爱好者插上了翅膀，使他们可以自由飞翔。更使我感到鼓舞的是，近年来商品涨价涨得发热，唯独文学却在掉价，作家也莫可奈何地贬值，许多颇具声望的作家奔深圳下海南经商办实业去了，而这里还有数以百计的追求者在为文学而孜孜不倦地苦斗着。文学还具有这样强大的吸引力，文学毕竟是有希望的。

作为一个县报的编辑，李下叔把这么多作者推出来，令人钦佩，这首先需要热情和对文学的挚爱。李下叔是个非常勤奋而又机敏的人，著述颇丰，在《长安报》这一方绿地上，他和他众多的文学朋友

一起恣意舞蹈，自有一番快活一番忘情的陶醉。他让我为这本书作序，说明了是因为我原是长安县辖属的公民。作为乡谊，我愿以欧文·斯通评价杰克·伦敦的一句话赠答朋友们：“他应当把手放在人生内在的脉搏上，他的工作知识的总和会成为他用来量度和说明世界的工作哲学。”在欧文·斯通看来，杰克·伦敦一直把笔锋对准着社会和人生内在的本质的矛盾上，这就划开了巨人和矮子的根本区别。对那些矮子即无聊文人，斯通的讽刺更为辛辣，他们不具备人类的感情，不敢直面人生，他们也许无意也许无能关注生活变迁的巨大欢乐和巨大痛苦，而只是一味编撰那些诱惑和虚假的公式化传奇。只有巨人才敢同真正的文学交锋，文学的真正价值和作家的神圣使命就在这里——人生内在脉搏的探摸。

愿与长安大地上的新朋老友共勉。

1990年9月19日 白鹿园

《风雪娘子关》阅读笔记

大约是一九八四年冬天，我去户县采访，有朋友向我介绍一位中年人说，这是段景礼。乍一听到这名字觉得耳熟，记忆之门肯定接纳过这个符号，然而越急越记不起来。追忆许久才想出来，我在《飞天》杂志上读过他的一个短篇小说，作品中充溢着的浓郁的渭河平原的生活情韵，曾经使我动情，便猜测作者段景礼可能甚至肯定是关中乡党……现在可就真的有缘握手了。

那时候的印象，段景礼穿一身半新显旧的中山服，完全是我所十分熟悉的县、乡普通干部的几乎一律的装束。之后几年，我和他有几次见面，服饰似无大的变化，依旧是不善辞令诚恳憨厚的样子，丝毫捕捉不到一缕浪漫文人的色彩。而这七八年间，中国社会各阶层人的服饰都发生了绚烂多彩的变化，我甚至觉得段景礼是否太古板了点？而我自己已经够古板以至死板了。这种服饰的古板是否标志着思维的特征？

今年秋末，段景礼把一摞即将付印的中篇小说集的校样送给我，要我写序。我不胜惴惴，以为自己的学识尚不足以为人作序的自信，又不好坚辞拒绝，于是便先读作品。头一部中篇小说《栅栏门》读完，情绪很激动，而这种激动的情绪许久以来在阅读诸多的文学杂志时已不曾发生过；及至五部中篇全部看完，我陷入一种渴望与人谈说的情绪中。于是便把阅读中的一些随时感受的笔记整理出来。不说序吧，权且当作与这本书未来的读者交流阅读感想，也许不无裨益。

一

从时序上分归，《栅栏门》《窑场有个马书记》和《沉睡的岩石》是以现实生活为题材的。前两部又是农村题材，写了乡和村两级的一群干部和村民，可以真切地揣摩到生活正在涌流着的脉搏；后一篇是以隧道工人的生活为题材的，而且写得那么逼真，不仅使我对其生活场景的描绘能力大为感服，而且觉得这人（段）的生活面相当宽。及至读过《风雪娘子关》和《孙国镇之死》，我惊诧而又钦佩，直觉得对那个穿中山服的段景礼必须刮目相看。这是以户县三十年代的历史人物为题材的纪实小说，那个已经成为历史的时代的生活氛围，县府、村镇、市井以及战场，都使人感到一种逼近鼻息的真切。这个看去憨厚古板的关中汉子，内秀聪慧，而且有一个囤积丰实的大脑和机敏的思维……

二

《栅栏门》所描写的刘佩秀家的栅栏门，无疑是一个象征。企图跳出栅栏门的农村妇女刘佩秀和渴望踏进栅栏门的乡长严光明，心灵上都被一座无形的栅栏封堵着，那无异于一个无比沉重的十字架。

三

在纷如烟花的农村题材文学作品中，段景礼创造的《栅栏门》里的严光明的形象，是一个别具一格尚为罕见的人物。不正常的社会生活使他受尽折腾之苦，又因为生活变迁的机遇而受到重视当了一乡之长，他强烈的事业心和他渴望得到实施的学识，却毁于他对爱的追求。这种爱十分真挚十分符合理想婚姻，然而他却不能不付出以毁灭为代价的牺牲。问题既在于他的四围都有栅栏门封堵，也在于他自己心里本来就有一座栅栏。

这个小说难得的一笔在其篇末。严光明和刘佩秀这两个敢于藐视封建的、世俗的以及种种居心叵测者非难的情种，踏倒了栅栏门而终于争取到爱的完美。这类故事早已千篇一律万变不离其框，而严光明和刘佩秀在争取到完美的理想婚姻之后，却悲哀地发现更沉重的栅栏还横在他们的脚前，这栅栏原来在他们各自的心里都有一架。读到这里，我才更加感到了生活的沉重。

四

《窑场有个马书记》里的马斌，可以看作是刚刚经历过的整个一个时代的典型形象。

马斌作为学生领袖作为高才生毅然放弃高考，义无反顾地回乡建设新农村，并因此而与恋人发生思想分歧终于走上了两条人生道路。马斌的行动很容易使人联想到那个时代的青年典型人物邢燕子、侯隽等。二三十年过去，当年的热血青年马斌在乡村垮台破灭之后，与同样年过半百的恋人在北京重新聚首回顾往事的时候，我感到的就不啻是一缕柔情而是一种历史的沧桑，使人自然地思索生活、岁月和人生这部永远解不透的大书。

五

马斌承包的窑场输光了，恐怕不仅只是经济意义上的成功或失败，我以为作者在此隐伏着更宏大更深刻的意旨，喻示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一代风云人物被赶出政坛的生活的必然，尽管导致他如此结局的政敌使用的手段可以称作阴谋伎俩。

根本的原因还在马斌自己。垮台时的马斌已不是当年的热血青年马斌。在非正常运转的乡村社会生活里，马斌的灵魂也自觉不自觉地被涂抹成一块红蓝黄白式的七彩布了。他在“文革”中被人整了，而他也学会了运筹权术这种与初始目的绝不相容的东西。更为可哀又使人深省的是，作为生气蓬勃的一代知识青年投身乡村革命，不仅未能创造出一个理想的生活天地，自己反倒被污染上了封建的意识。马斌的深刻也许正在这里，他不像一般常见的那种漫画式的讽喻“文革”的作品，也不似那些简单地揭露乡村干部腐败无能可憎可笑的作品，而是用马斌的活生生的生活历程，向我们展示出了乡村的真实生活状态，我们看到一个人是怎样合情合理地被这块土地熏染成了如此模样。

六

关中这方土地太古老也太深沉。生活在这方土地上的关中人心理负累太沉重了。透过严光明和马斌、袁蹲蹲和何古屯、刘佩秀和潘兰芝等，我们就看到一群在这块土地上背负着因袭栅栏的当代关中人的活的灵魂。这些灵魂映现着的，似乎可见秦汉唐人的豪勇，更多的则是作为当代关中人的沉重慨叹；似乎尚有先祖们创造的辉煌灿烂的圣殿的徽光，更切实的却看到那些残砖碎瓦的灰暗和冷凄。我曾在一篇探索关中地域文化的短文中看到一段妄言：

作为京畿之地的关中……封建文化封建文明与皇族贵妃们的胭脂水洗脚水一起排泄到宫墙外的土地上，这块土地既接受文明也容纳污浊。缓慢的历史演进中，封建思想封建文化封建道德衍化成为乡约族规家法民俗，渗透到每一个乡社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家族，渗透进一代又一代平民的血液，形成这一方地域上的人的特有文化心理结构。

我尚不知段景礼是否赞同我的看法，但他的马斌尤其是严光明和刘佩秀，却使我看到了这个事实。我也不敢断定段景礼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在做着这种探索，事实是他已经较深地触及关中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命题，这无疑是使我感到鼓舞的。我期望段景礼能更进一步在这个命题上开掘，创造出更典型的关中人形象来。

我之所以如此期冀，以为这也许是创作进入更深一个层面的重要途径。许久以来及至现在，许多人总是以地方方言地方习俗来体现地域特色，这当然无可厚非。但那方言和习俗的根络，却发端于那个地域的特定文化。以此为契机挖掘进去，我以为，这可能是打破由图解政策到图解意念的简单化创作的一条途径。生活呈现的某些支离破碎以及作家创作意识的支离破碎，作品看去五花八门实际也有点支离破碎。从这个意义上说，段景礼的创作是别具一格的，也是可以寄托厚望的。

七

两部历史题材的纪实小说，使我惊诧。

《风雪娘子关》写的是赵寿山将军率师娘子关抗击日寇的史实。赵寿山大概是户县近当代出现的一位最具影响的人物。作者只截取他兵败娘子关这一段故事显得十分集中，正是赵寿山革命生涯中的关键性转折，即人物命运发生根本变化的历史性契机。切入口选择得精确无二，短短的篇幅写活了一个大将军。

这部小说从整体结构艺术上说来，我以为是本书五部中篇中最富于小说结构艺术的佳作。作品的大背景是抗日，而直接的对手日寇却没有具体人物；作者着力于国内的小背景，即蒋先生的嫡系杂牌这种

中国特色的复杂局势，造就了赵寿山一代血肉之躯的中国军人的历史性悲剧。他努力要向世界要向日寇要向蒋先生的鸡肠小肚显示一个堂堂中国人的正义与正气，他反而显示不出一丝一缕而只能落得惨败无立足之地，残酷无情的大背景和中国的小背景，就逼使他最终地觉醒。

段景礼在这篇篇幅不大的小说里，把纵的横的外部的以及自己内部的种种关系摆置得纷繁复杂而又条理清晰，使人没有任何讲解军事地图的干枯，可见段景礼叙事状物的本领确实不俗。

八

《孙国镇之死》写了一个国民党知识分子县长，怀有一番治国安邦的图略，终而沦为历史罪人人民公害的可悲结局。

这部小说里更令人感兴趣的是另一个人物白老二。

就性格塑造而言，白老二的艺术光亮远远超过了孙国镇。白老二可以说是呼之欲出。户县里民局局长白老二，可以称得起性格化了的一个典型。他作为地方官有护卫乡民利益的一面，又有玩弄权术于掌股之上的游刃有余的娴熟技巧；他有地头蛇黑豆虫阴冷毒辣的一面，又有为伸张地方利益赴死不辞的慷慨激昂……段景礼写的这个白老二，是我最钦佩的一个人物。

九

两部地方历史纪实小说，亦渗透着更为浓郁的地域文化色素。赵寿山将军的形象里，我们看到了作为关中人优秀代表的精神特质，正

义豪勇和忍辱负重。尤其是《孙国镇之死》一篇，写尽了旧中国户县的村里市井的习俗和风貌，同样可以透视关中人的文化心理结构。

十

段景礼语言的思辨特色十分明显。

在人物行为的心理剖析中，这种思辨准确而又精细，使人对人物行为的合理性有了依据，也是推进情节进展的重要手段。有些思辨是作家自己的议论，其锋芒的透彻和深刻性，也有使人感到恰当其时恰如其分寸的精彩绝妙之笔，这是段景礼的优长。

优长的影子就是弊端。小说毕竟主要依赖叙述。议论和思辨不可或缺，但似乎不宜太多，至少我是这样看法。议论太多思辨太多的直接副作用是阻碍读者的阅读情绪，尤其是一些一般化议论。再者，过多的人物行为分析思辨，掌握不当就成为人物行为的注释，一方面轻视了读者对作品人物的理解和再创造余地；另一方面也可能给人造成错觉，以为作者叙述无能所招致。

十一

这是一本沉甸甸的著作。

这本书摆列到当代作家著作的庞大的书群里是毫不逊色的。

我这样认为，段景礼也完全应该树立这样的自信。

我以上的这些零碎的读书感言，多是从创作角度说的。不当和偏见是肯定的，恕如文头所述，与作者段景礼以及本书的读者交换看

法，也可以相得益彰。

1991年11月17日 白鹿园

天下谁人不识君

——肖重声《珍蔬佳话》序

我真想尽快拥有这本书。

这是我读完《珍蔬佳话》书稿后想说的头一句话。在我读过本书开头第一篇《荠菜——虽至贫亦可长享也》后，心里就产生了想拥有这本书的欲念；及至读完全稿，这个欲念便膨胀到一种迫不及待的渴盼。

这是一本什么书呢？名曰《珍蔬佳话》很容易使人产生错觉，以为是介绍蔬菜种植改良的农业科技书籍，而我恰恰就在阅读之先顾名思义一般推理犯了判断上的失误。这种错觉和失误，其实早在两年前就发生了。那时我到肖重声的寓所去送一本小书的清样，见他桌上床上摆置着许多资料，肘下压着一沓稿纸，笑眯眯地告诉我，他想写一本有关蔬菜的书。我大为惊诧，以为耳朵出了毛病。我知道他善于写诗歌和散文，已经出过几本诗歌集和散文集，在中国这个传统的诗歌和散文大国的当今文坛上，自成一家独立风范颇具影响，以文字的清秀和意蕴的隽永而为评家读者所称道。他怎么写起蔬菜专著来了？他既非农业专家，又与蔬菜的栽培种植和科研以及流通都不沾边，这个念头这种兴趣缘何而萌发？我把这些疑问提出来，肖重声淡淡地笑说："我胡闹哩！"这是关中人自谦的一句口头禅，不无"无可奉告"的外交辞令的含义。我便不再细问。长久以来我已养成一个习惯，决不贸然询问文兄文弟的创作谋略或正在写什么书，除非朋友主动告诉我。我恪守这样的准则也说不清究竟为什么，却还是继续恪守着……

两年后的今年夏天，肖重声托李星把书稿交给我，读罢不禁释然，更对肖刮目相看。

这部书的写法属于上乘属于高难度动作。书中对我国南方北方四十余种蔬菜的阐释，自然包括栽培演进的历史，播种时日生长形态收获时间，口味口感生食熟煮烹饪技法要诀，其性属热属凉属温补脾益肝明目润肤利尿化滞滋阴壮阳，都有精确的考证和论述。这些内容似乎并不难办到，难的是他根本不像一般科技书籍所常见的平铺直叙的介绍和阐释，而是引用大量翔实的史料，生动迷人的民间传说，从人文始祖到浩如烟海的典籍史册，从赫赫垂名于历史的皇帝名相战将军师到哲学家史学家自然科学家文学家以及诗家词人，关于各类蔬菜有趣的记叙轶事和美妙绝顶的诗词赋谣，当然不可或缺历代医学家关于这些蔬菜性味和医用功能的论证，更兼及当代医学科学研究再发现的最新成果。真所谓含知识性趣味性科学性实用性为一体，熔历史考古地理自然气候园艺医理哲学文学古今为一炉，一时令人眼花缭乱，难以划界其归属的一部奇书。

我每读一篇都忍不住惊奇的情绪一再发生，我只知道屈原杜甫陆游苏轼写过千载辉煌的诗篇词章，却没有料及他们个个都是美食家，都写过许多关于诸种蔬菜的绝唱。仅以开篇的《荠菜》为例，肖重声对这种普通不过的野菜，以家喻户晓的王宝钏挖荠菜的民间故事开头，引据晋代夏侯湛的《荠赋》，对荠菜凌冬而生斗雪傲霜的品质作生动写照；《清异灵》则推为“百岁羹”，贫人和富人一样可以享用；《诗经·邶风·谷风》里的吟诵；屈原《九章·悲回风》中的描述；《无元天宝遗事》记载的“盘装荠菜迎春饼”的流风村俗；连风流皇帝唐玄宗的宠臣高力士在马嵬坡兵变后被流放巫山，竟以荠菜为题作诗自喻其忠贞；南宋诗人陆游一而再再而三地赞美荠菜，写下《食荠十韵》

《食荠三首》和《食荠甚美盖蜀人所谓东坡羹也》等诗章；苏轼喜食荠菜而命名为“东坡羹”；李时珍关于荠菜医理药性的论证……仅仅两千字的一篇短文，包容了何其丰富的知识量，令人耳目一新顿开茅塞拍案称奇击掌叫绝。我总是忍不住猜想，他从哪儿搜罗到这么多稀奇珍贵的资料？搜集这样丰富的史料又要耗费多少时间和精力？折服便是很自然的事。

这是一本平等待人的书。作者肖重声以读者为朋友，像是说闲话聊大天道故经，道出了那么多史籍资料奇文轶事，整体都保持着平实质朴的文风，不见一丝卖弄夸耀的神色。我之所以对此感触尤深，确是见惯见腻了时下许多卖弄的各色文章，大而不当的和繁而不精的论说或描述，故作深沉的哲人神气哲人口吻，却总是缺乏哲人的哪怕是一句有深度的哲理，这类文章人一读就能发现半瓶子醋的白日鬼模样。肖重声的这部著作，纵古述今，发端演变，娓娓道来，温厚淳朴，趣味迭生，这首先得之于作者著书的基本用心，向人们传播知识，而不是卖弄夸耀哗众取宠。著作者的每一行文字都注释着著作的气质和性情……肖的为文为人的作风更令我折服。

这是一本适宜各个阶层各种职业和各个年龄的人阅读的书，因为任何人都不会拒食蔬菜，尤其在已经注重营养科学的现在，可以说对任何人都是开卷有益的。不单如此，我甚至突发奇想，那些只会给儿子孙子讲狐狸或大灰狼故事的爸爸妈妈爷爷奶奶们，有《珍蔬佳话》一册在手，闲暇时于餐桌上给儿子孙子讲一讲盘子里的蔬菜的起源、演变，历代史家词人的诗句，不是挺有意思的吗?

肖重声是长安县人，六十年代的大学文科毕业生；生于农家长于农村，这并不影响他的天资，少时聪慧，于艰难困顿中从小学一路读到大学，没有磕绊；在秦岭南边工作十多年，孜孜不倦诵诗作文，终

成功夫老到内蓄丰厚的学者型作家；肖清淡处世，平时很少在文人场合蹦跶，好像也不执意用心争逐什么；默默地在出版社为他人做着嫁衣裳，空闲里写着自己的诗自己的文；出人意料地“胡闹”出这样一部奇书，真是得其所哉！

我愈是渴盼早日拥有这样一本书，便期望《珍蔬佳话》及早面世，以飨如我一样知识贫乏的读者。以我的心理推测，这本书发行看好。肖重声肯定将走进千家万户，成为各种人的朋友，因之才有拙序的题目：天下谁人不识君。

1992年夏

别路遥

我们不得不接受这样的事实，无论这个事实多么残酷以至至今仍不能被理智所接纳，这就是：

一颗璀璨的星从中国文学的天宇陨落了！

一颗智慧的头颅中止了异常活跃、异常深刻也异常痛苦的思维。

这是路遥。

他曾经是我们引以为自豪的文学大省里的一员主将，又是我们这个号称陕西作家群的群体中的小兄弟；他的猝然离队将使这个整齐的队列出现一个大位置的空缺，也使这个生机勃勃的群体呈现寂寞。当我们，比他小的小弟和比他年长点的大哥以及更多的关注他成长的文学前辈们看着他突然离队并为他送行，诸多痛楚因素中，最难以承受的是物伤其类的本能的悲哀。

路遥从中国西北的一个自然环境最恶劣也最贫穷的县的山村走出来，为中国当代文学的繁荣创造了绚烂的篇章。这不单是路遥个人的凯歌。它至少给我们以这样的启迪，我们这个民族所潜存的义无反顾的进取精神和旺盛而又强大的艺术创造力量，路遥已经形成开阔宏大的视野，深沉睿智的穿射历史和现实的思想，成就大事业者的强大的气魄，朝着创造的目标，实现创造理想时必备的坚韧不拔的意志和艰苦卓绝的耐力，充分显示出这个古老而又优秀的民族的最优秀的品质。

路遥热切地关注着生活演进的艰难的进程，热切地关注着整个民族摆脱沉疴复兴复壮的历史性变迁，以及由此而产生的巨大痛苦和巨大欢乐。路遥并不在意个人的有幸与不幸，得了或失了，甚至包括伴随着他的整个童年时期的饥饿在内的艰辛历程。这是作为一个深刻的作家的路遥与平庸文人的最本质区别。正是在这一点上，路遥才成为具有独立思维和艺术品格的路遥。

路遥短暂的“人生”历程中，躁动着炽烈的追求光明追求美好健全社会的愿望，他没有一味地沉默也不屑于呻吟，而是挤在同代人们中间又高瞻于他们之上，向整个社会和整个世界揭示这块古老土地上的青春男女的心灵的期待，因此而获得了无以数计的青春男女的欢呼和信赖。他走进他们心中。

路遥的精神世界是由普通劳动者构建的“平凡的世界”。他在中国当代作家中最能深刻地理解这个平凡世界里的人们对中国意味着什么。他本身就是这个平凡世界里并不特别经意而产生的一个，却成了这个世界人们的精神上的执言者。他的智慧集合了这个世界里的全部精华，又剔除了母胎带给他的所有腥秽，从而使他的精神一次又一次裂变和升华。他的情感却是与之无法剥离的血肉情感。这样，我们才能破译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里那深刻的现代理性和动人心魄的真血真情。路遥在创造那些普通人生存形态的平凡世界里，不仅不能容忍任何对这个世界的过去和现在、历史和现实的解释的随意性，甚至连一句一词的描绘中的矫情娇气也绝不容忍。他有深切的感知和清醒的理智，以为那些随意的解释和矫情娇气的描绘，不过是作家自身心理不健全的表现，并不属于那个平凡世界里的人们。路遥因此获得了这个平凡世界里数以亿计的普通人的尊敬和崇拜，他沟通了这个世界

里的人们和地球人类的情感。这是作为独立思维的作家路遥最难仿效的本领。

我们无以排解的悲痛发自最深切的惋惜。四十三岁，一个刚刚走向成熟的作家的死亡意味着什么。本来，我们完全可以自信地期待，属于路遥的真正辉煌的历程才刚刚开始。我们深沉的惋惜正是出自对一个文学大省、一个国家和民族的文学事业的无法弥补的损失。

一切已不能挽回于万一。所有期待即使是自信的有把握的，也都在五天前的那个早晨被彻底粉碎了。然而我们就路遥截止到一九九二年十一月十七日早晨八时二十分的整个生命历程来估价，完全可以说，他不仅是我们这个群体在更广泛的中国当代青年作家中，也是相当出色相当杰出的一个。就生命的历程而言，路遥是短暂的；就生命的质量而言，路遥是辉煌的。能在如此短暂的生命历程中创造出如此辉煌如此有声有色的生命的高质量，路遥是无愧于他的整个人生的，无愧于哺育他的土地和人民的。

以路遥的名义，陕西作协寄望于这个群体的每一个年轻或年长的弟兄，努力创造，为中国文学的全面繁荣而奋争。只是在奋争的同时，千万不可太马虎了自己，这肯定也是路遥的遗训。

路遥同志，你走完了短暂而又光辉的“人生”之旅，愿你的灵魂在“平凡的世界”里的普通劳动者中间和他们赖以生存的土地上得到安息！

1992年11月21日

渭南有个李康美

新时期以来的陕西文坛，不断地冒出一拨又一拨引人注目的中青年作家。八十年代初期，在我的大致印象里，关中西府的作家人数最多，真乃人文荟萃之灵地。陕北陕南也有几员大将抱笔挺立，似乎形成了东府乏人的残缺。从一九八二年末开始，《延河》杂志连续在头条位置发表了李康美的几个短篇小说，如《寻找》《在阳台上》，作者出手不凡，起步甚高，很快在编辑部以至在陕西文坛引起欢呼。除了对作品的质量大加赞许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作者李康美，渭南人氏，终于“千呼万唤始出来”，弥补了东府残缺的遗憾。人说：渭南有个李康美。

虽然这些作品都是康美涉入文坛初期的作品，但是在评论界和读者中却产生了一定的影响。编辑部和作者都收到不少评论文章和读者来信，赞赏李康美的小说“完全是从当前的现实生活出发，相当敏锐地显示出农村生活新变化的深远意义”。作者状景状物，使作品的内涵和人物性格在场面和情节中自然流露出来，蕴藉自然，很值得人们玩味，写出了处于农村重大变革时期农民精神世界的变化。

接着，他一发而不可收，其作品又打出潼关走向中国当代文坛，在全国几十家报刊上频频发表新作，诸如《陷车纪事》《出山第一炮》等力作接连在某些权威性的刊物上转载，引起好评也引出了争鸣，并连续获奖。我以为，康美的创作道路看起来似乎比较顺利，实际上，却反映了他个人坎坷的经历和厚实积累。

我识李康美，是他在省作协参加一九八四年青年作家读书班期间。一位朋友向我介绍说：“这就是李康美。”一阵闲聊，我从此就认下了记住了一张不易混淆也难以忘记的脸。那是一张矛盾的脸。那俊气的眼睛俏气的嘴唇透出精细敏锐之气质与那略显粗糙的皮肤所聚成的粗犷豪勇之气色统一于一张面孔之中。在这张脸孔上，你看到自信的同时又会看到自卑，发觉得意的时候就发觉了忧郁。那时候他刚进而立之年，自然使人感受到青春活力的同时，又感受到生命运动的沉重和痛苦。

也许是我们生活在同一个地域的缘故，也许是我们的情感世界有着更多的相通的体验，那一次见面和闲聊，就奠定了我们情谊的基础。

两年之后，我们俩在秦岭山中客居于一家幽静的招待所，这就有了一次倾吐胸臆的机会。三天两夜之中，我们几乎忘记了睡眠，我这才从他那坦率的谈叙里解开了那张矛盾的脸。李康美的出生地是秦岭山根一个四面环沟的穷乡僻壤，深深的沟壑可见风雨剥蚀年深历久的功夫，村子因此而形成孤岛。他念书颇聪慧，可惜未完成初中的学业就遇上了“文革”，失学后于孤寂无聊中踏上了军旅的生涯。地处大沙漠的军营，常年干枯的环境，使十七八岁的他很快失去了肌肤的滋润，同时又磨砺了他坚韧不拔的意志。五年之后，他复归原籍，在一个商业公司做了临时工。虽然叫作临时工，但他却一直干着文书秘书写材料的活计，一干就十年。在他的生命历程中，开始学会了忍耐和期待。

八十年代初期，他突然对小说创作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横下心弄了几篇，居然就取得了预料不到的成功。一九八一年在《陕西日报》发了处女作之后，接着就向省级文学杂志跨越……

他的小说接踵而出，关中东府渭南便在文学界跃出一条汉子；短短几年中，便有几十万字的作品相继问世，成为一位令人瞩目的青年作家。他的成果被瞩目被关注之后，他却感到了艰难感到了困惑，感到了辉煌感到了神圣，也感到了艺术殿堂的扑朔迷离。其实，这正是每一个真诚的作家必然经历的心理体验，是艺术实践中初试心理欢悦的冷却和更深的一层反省。没有这种冷却和反思，就不可能向更高度腾跃。康美开始了新的蕴聚和探求，力图以更充分、更自由、更和谐的艺术形式披载自己的心志。

综观康美的全部作品，他的创作路子是比较宽泛的，有乡村的生活，有城市的体验，还有机关和校园的众生相。而这部短篇小说集，只是汇聚了前一个时期的作品。透过这些作品，我们完全可以清晰地看出他的艺术探索和艺术追求的历程。李康美的小说惯于从一开始就埋下伏笔，或者叫作设下悬念，然后又冷静地铺陈开来，从而紧紧抓住了读者的兴趣。但他从不故弄玄虚，即使出现象征寓意，也让人觉得入情入理。

迄今为止，康美已发表了一百多万字的作品，把主要精力放在了中篇小说的创作上，且有长篇小说的出版和获奖。所以，仅以这个集子的作品来评价他的艺术实践是很不够的。实际上，他后一个阶段的作品更显得凝重，艺术创造的功力也日臻成熟了。这是后话，在此不提。作为朋友，我满怀自信地期望他将不断实现新的自我突破。

1992年冬 白鹿园

关于《白鹿原》与李星的对话

一、过了四十四岁，我突然意识到五十岁这个年龄大关的恐惧

问：忠实，想请你回答一些问题，一是为了满足读者的要求，二是为对这部作品的评论研究提供背景材料，你能同意吗?

答：我很高兴能和你交谈。作为我习作生活中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的尝试，我曾经做了尽可能多的准备，自然包括艺术上的诸多考虑，写作实践中又有许多创作感受，当初不完全自信也不完全有把握，而当实践之后，无论成功的方面或失败的方面，我都有了实际操作的感受了，我想补充一个原因，就是与评论家交流一下这种感受，以验证我的那些艺术思考的合理性与错觉发生在什么地方，以期达到交流，接受理论审视，对我今后的艺术探索无疑是很有益处的。

问：长篇小说《白鹿原》在《当代》连载以后，很快产生了热烈的社会反响，这些反响当然都是肯定的，有的评价还甚高。这都是你意料之中的吗?

答：作品写完以后，我有两种估计，一个是这个作品可能被彻底否定，根本不能面世。另一种估计就是得到肯定，而一旦得到面世的机会，我估计它会引起一些反响，甚至争论，不会是悄无声息的，因为作家自己最清楚他弄下一部什么样的作品。

问：《白鹿原》是你的第一部长篇吗？在此以前你有无胎死腹中的长篇构思？你从什么时候，或是什么契机，触发了你写作长篇的欲

望?

答：这是我的第一次长篇小说创作尝试。此前我没有过任何长篇的构思。而关于要写长篇小说的愿望几乎在很早的时候就产生了，但具体实施却是无法预定的事。我对长篇的写作一直持十分谨慎的态度，甚至不无畏怯和神秘感。我的这种态度和感觉主要是阅读那些大家们的长篇所造成的，长篇对于作家是一个综合能力的考验，单是语言也是不容轻视的。我知道我尚不具备写作长篇的能力，所以一直通过写中短篇来练习这种能力作为基础准备，记得当初有朋友问及长篇写作的考虑时，我说要写出十个中篇以后再具体考虑长篇试验。实际的情形是截止到长篇《白鹿原》动手，我已经写出了九部中篇，那时候我再也耐不住性子继续实践那个要写够十个中篇的计划了，原因是一个重大的命题由开始产生到日趋激烈日趋深入，就是关于我们这个民族命运的思考。这是中篇小说《蓝袍先生》的酝酿和写作过程中所触发起来的。以往，某一个短篇或中篇完成了，关于某种思考也就随之终结。《蓝袍先生》的创作却出现了反常现象，小说写完了，那种思考非但没有中止反而继续引申，关键是把我的某些从未触动过的生活库存触发了、点燃了，那情景回想起来简直是一种连续性爆炸，无法扑灭也无法中止。这大致是一九八六年的事情，那时候我的思想十分活跃。

问：省内、国内与你同龄或同时期走上中国文坛的一些作家前些年纷纷推出了自己的长篇，有些还产生了重大影响，对你有无压力？这压力是什么?

答：回想起来，似乎没有对我构成什么压力，这不是我的境界超脱也不是我的孤傲或鸵鸟式的愚蠢，主要是出于我对创作这种劳动的理解。创作是作家的生命体验和艺术体验的一种展示。一百个作家就

有一百种独特的体验，所以文坛才呈现多种流派多种主义的姹紫嫣红的景象。我也只能按我的这个独特体验来写我的小说，所以还能保持一种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写作心境。当然，上述那个双重体验不断变化不断更新也不断深化，所以作家的创作风貌也就不断变化着。不仅在我，恐怕谁也难以跨越这个创作法规的制约。当你的双重体验不能达到某种高度的时候，你的创作也就不能达到某种期望的高度，如果视文友们的辉煌成果而压力在顶，可能倒使自己处于某种焦灼和某种心理的不平衡状态，反倒可能对自己的创作造成危害，甚至会把人压死。

我的强大的压力来自生命本身。我在进入四十四岁这一年时很清晰地听到了生命的警钟。我从初中二年级起迷恋文学一直到此，尽管获了几次奖也出了几本书，总是在自信与自卑的矛盾中踟蹰。我突然强烈地意识到五十岁这年龄大关的恐惧。如果我只能写写发发如那时的那些中短篇，到死时肯定连一本可以当枕头的书也没有，五十岁以后的日子不敢想象将怎么过。恰在此时由《蓝》文写作而引发的关于这个民族命运的大命题的思考日趋激烈，同时，也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创作理想，必须充分地利用和珍惜五十岁前这五六年的黄金般的生命区段，把这个大命题的思考完成，而且必须在艺术上大跨度地超越自己。我的自信又一次压倒了自卑，感觉告诉我，这种状况往往是我创作进步的一种心理征兆。

二、最恰当的结构便是能负载全部思考和所有人物的那个形式

问：你为写作《白鹿原》做了哪些准备工作？在这些准备中最难的是什么？

答：主要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一是历史资料和生活素材。我查阅了西安周围三个县的县志、地方党史和文史资料，也做了一些社会调查，大约花费了半年时间，收获太丰厚了，某些东西在查阅中一经发现，简直令人惊讶、激动不已，有些东西在当时几乎就肯定要进入正在构思中的那个还十分模糊的作品。二是温习中国近代史。我想重新了解一下我所选定的这个历史背景的总体趋向和总体脉络，当然我更关注关中这块土地的兴衰史，记得正当此时，国平给我说他有一本研究关中的名叫《兴起和衰落》的新书，他知道我是关中人，也素以关中生活为写作题材。我读了这本书确实觉得新鲜觉得有理论深度，对我当时正在激烈思考着的关于关中这块土地的认识起到了一种启示和验证的良好作用。还有一本美国人（日本通）写的《日本人》的书，对于近代日本的了解正好作为一个参照，使我对我们这个民族的认识更深化了。三是艺术准备。我选读了一批长篇小说，有新时期以来声誉较高的几部，其余主要是国外作家的代表作。目的在于了解当今世界和中国文坛上长篇写作的各种流派，见识见识长篇小说的各种结构方法。因为当时在我来说感到最难的便是结构，这不单是因为第一次尝试，主要是人物多，时间跨度长，重大的生活事件也多，结构确实成为首当其冲的一个重大难题。阅读的结果是扩展了艺术视野。“文无定法”，长篇小说也无定法，各个作家在自己的长篇里创造出各种结构架势，同一个作家在不同的几部长篇里也呈现出各异的结构框架。最恰当的结构便是能负载全部思考和所有人物的那个形式，需得自己去设计，这便是创造。

问：你认为这些准备工作在长篇创作中具有普遍性吗?

答：我越来越相信创作是生命体验和艺术体验的过程。每个作家对正在经历着的生活（现实）和已经过去了的生活（即历史）的生命

体验和对艺术不断扩展着的体验，便构成了他的创作历程。这种体验完全是个人的独特的体验，所以文坛才呈现千姿百态。所以从本质上来说，恐怕就不存在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即使我自己，也只是在这部长篇写作前感到需要做这些准备工作，而在以往的中篇写作中根本没有这样做过。我以后再写长篇，也许不一定都要做如上述几个方面的准备；如果那种双重的体验十分有把握，肯定就不要那些耗时费事的准备了。

问：在你所精读的作家、作品中，哪个作家、哪部作品对你的长篇写作影响最大?

答：中国当代作家王蒙的《活动变人形》、张炜的《古船》，哥伦比亚的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和《霍乱时期的爱情》，意大利的莫拉维亚的《罗马女人》以及美国的谢尔顿的几部长篇。还有劳伦斯的刚刚被解冻了的那本书。很难说哪一本书影响最大，所有这些作家创造的这些优秀的艺术成果都在不同的某一方面给过我长篇艺术的良好启示，譬如说上述两位中国当代作家的那两部作品，一本写旧北京，一本写农村，都对我当时正在思考着的关于这个民族的昨天有过启迪。谢尔顿的作品启发我必须认真解决和如何解决作品可读性。而马尔克斯的两部作品则使我的整个艺术世界发生震撼。

问：陕西一些作家，包括你过去的创作向以实和土见长，思想、理论的穿透力不强，视野不够开阔，从《白鹿原》中却看不到作家主观认识能力和认识视野的明显限制。请问：除了作家作品以外，你有没有思想的理论的准备？重点读过哪些理论著作?

答：读书范围缺乏系统，基本是实用主义的，内容庞杂，但目的很明确，《中国近代史》《兴起与衰落》《日本人》《心理学》《犯

罪心理学》《梦的解析》《美的历程》《艺术创造工程》等。

阅读的目的完全是为了正在构思的这部长篇小说的写作，所以说纯粹是实用主义的，所有这些关于历史关于心理关于艺术的理论著作，都对我的那种双重体验有过很大的启迪。

三、所有的悲剧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但是历史的细节却常常被人忽视

问：小说涉及本世纪初到本世纪中叶发生在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土地上的许多政治、经济、社会、自然、瘟疫事件，如西安的辛亥革命、民国十八年的大饥荒、刘镇华围西安等，你是否有意要使它成为近现代中国农村，包括关中农村的历史？你是怎样认识和评价这五十年中国社会的历史及中国农民在其中的处境和地位的?

答：近当代关中发生的许多大事件，在我还是孩提时代就听老人们讲过，诸如“围城”“年馑”“虎烈拉瘟疫”“反正”等，那时候只当热闹听，即使后来从事写作许多年也没有想到过要写这些，或者说这些东西还可以进入创作。回想起来，那几年我似乎忙于写现实生活正在发生的变化，诸如农村改革所带来的变化。直到八十年代中期，首先是我对此前的创作甚为不满意，这种自我否定的前提使我已经开始重新思索这块土地的昨天和今天，这种思索越深入，我便对以往的创作否定得愈彻底，而这种思索的结果便是一种强烈的实现新的创造理想和创造目的的形成。当然，这个由思索引起的自我否定和新的创造理想的产生过程，其根本动因是那种独特的生命体验的深化。我发觉那种思索刚一发生，首先照亮的便是心灵库存中已经尘封的记忆，随之就产生了一种迫不及待地详细了解那些儿时听到的大事件的要求。当我第一次系统审视近一个世纪以来这块土地上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

时，又促进了起初的那种思索进一步深化而且渐入理性境界，甚至连“反右”“文革”都不觉得是某一个人的偶然的判断的失误或是失误的举措了。所有悲剧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都是这个民族从衰败走向复兴、复壮过程中的必然。这是一个生活演变的过程，也是历史演进的过程。“史”的含义和这个字眼本身在文学领域令人畏怯，我们还是不谈它会自在一些。我不过是竭尽截止到一九八七年时的全部艺术体验和艺术能力来展示我上述的关于这个民族生存、历史和人的这种生命体验的。

世界史中有一个细节可能被许多人忽视了，而《日本人》一书的作者号称日本通的赖肖尔却抓住这个情节解释了一个重大的历史过程：西方洋人的炮舰在第一次轰击我们这个封建帝国用土石和刀矛垒筑的门户的同时，也轰击了海上弹丸国日本的门户，那门户的防御工事也是靠土石和刀矛垒筑的，那个不堪一击的防御工事所保护着的也是一个封建小帝国，而且这个封建小帝国的政治和经济制度几乎是依样画葫芦照我们这个大帝国仿建的。洋枪洋舰轰击的结果却大相径庭：日本很快完成了从封建帝制到资本主义的议会制的“维新”，而且可以说是和平的革命，既保存了天皇的象征又使日本社会开始了脱胎换骨式的彻底变革；中国却相反，先是戊戌六君子走上断头台，接着便开始了军阀大混战，直至我们这个泱泱大帝国的“学生”（日本自唐就以中国为师）占领了大半个中国。

我只能看作是老师比学生的封建文明封建制度更丰富，因而背负的封建腐朽的尘灰也更厚重，学生反倒容易解脱而先生自己反倒难了。绵延了两千年的一个封建大帝国的解体绝不会轻而易举。六君子的臂力和孙中山先生的臂力显然力不从心，推倒了封建大墙也塌死了自己。从清末一直到一九四九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所有发生过的

重大事件都是这个民族不可逃避的必须要经历的一个历史过程，所以我便从以往的那种为着某个灾难而惋惜的心境或企望不再发生的侥幸心理中跳了出来。

问：西安周围有没有一个叫白鹿原的地方或村庄？滋水河是否就是你家门前的灞河？

答：西安东郊确有一道原叫白鹿原，这道原东西长七八十华里，南北宽四五十华里，北面坡下有一道灞河，西部原坡下也有一条河叫浐河，这两条河水围绕着也滋润着这道古原，所以我写的《白鹿原》里就有一条滋水和润河。这道原的南部便是终南山，即秦岭。地理上的白鹿原在辛亥革命前分属蓝田、长安和咸宁三县分割辖管，其中蓝田辖管的面积最大，现在仍然分属于蓝田、长安和灞桥三县（区）。我在蓝田、长安和咸宁县志上都查到了这个原和那个神奇的关于“白鹿”的传说。蓝田县志记载：“有白鹿游于西原。”白鹿原在县城的西边所以称西原，时间在周。取于《竹书记年》史料。

四、抽雪茄，喝酽茶，下象棋，听秦腔，我像个秦腔老艺人

问：据我们所知，早在一九八八年夏天你就拿出了长篇的结构提纲，当时它有没有名字？“白鹿原”这三个字是什么时候出现在你的意识中的？当你将你的长篇起名《白鹿原》时是怎么想的？

答：这部书的构思和结构是在一九八七年完成的，原计划在这年冬天动手起草，后来因为母亲住院，我不得不陪住医院两月而推迟到次年春天。在一九八九年结束这部长篇时就确立下《白鹿原》这个书名，但未做最后确定。如果写作过程中随着构思的具体实施和进一步

深化，也许还能找到更好的名字，结果却没有找到更恰当的名字，还是觉得这个书名好些。譬如说也想到过《古原》，斟酌之后觉得这名字把作家的主观意识泄露得太明朗，一个古字便是一种倾向。所以还是觉得最初选用的这个名字更恰当些。

地理上的白鹿原在我很小的时候就知道了。这部书里的白鹿原最早何时出现于意识中已无从辨识，反正一九八六年已经作为一个原而时时旋转在心中，到一九八七年，这个艺术形态的白鹿原便日臻丰富和生动起来。

问：《白鹿原》是不是一九九二年四月我看到复印稿时完稿的？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案头工作的？初稿用了多长时间？复稿用了多长时间？

答：这是个很具体的问题。草稿是一九八八年四月初搭笔的，到一九八九年元月写完。其间在七、八两月停止写作，实际写作时间是八个月。这只能算是一个草拟的框架式的草稿，约四十万字。复稿是一九八九年四月开始的，到一九九二年元月二十九日（农历腊月二十五）写完，后来又查阅了一遍，到三月下旬彻底结束。历时约三个年头，其间因故中断过几次，最长的一次是一九八九年秋冬，长达四个月，所以实际写作时间要打折扣。

问：从一九八五年你就担任陕西作协的副主席和党组成员，但是谁都知道，这些年你基本住在家乡，地方偏僻，交通不便。请问：五十万字的《白鹿原》是否全部在西蒋村你的祖屋中完成的？你的写作生活是怎样安排的？

答：草稿和复稿近百万字都是在祖居的乡村家里完成的，只有复稿的其中一章是在一个朋友家里写的。我家所在的那个村子相当闭塞，因为村子里的房屋紧靠着地理上的白鹿原北坡坡根，电视信号被挡住了，我买了电视机却无法收看，只能当作收音机收听《新闻联播》，有七八华里的土石公路通到汽车站，一旦下雨下雪，我几乎就出不了门。

写作《白鹿原》时，我觉得必须躲开现代文明和城市生活的喧嚣，需要这样一个寂寞乃至闭塞环境，才能沉心静气完成这个较大规模的工程。关键在于每天写作之后的排遣，我充分估计到这个工程的实现将是一个漫长的过程，不能靠短促突击来完成，所以就有意调整改变了原先在晚上写作的积习为早晨，我担心长达几年的昼伏夜出造成的与日月和大自然气象处于一种阴阳颠倒的对抗状态，可能会引起身体的不适乃至灾变。

一般在下午三四点钟以后终止工作，主要是为了保证明天能连续写作。开始的两个月没有经验，写得顺利时就延续到晚上，第二天起来就感觉心神疲惫，思维迟钝，便决定提早一点结束以便脑子得以休整，停止写作后那些人物还在脑子里聚集不散，故事情节还在连续发展，仍然不能达到休息的目的，依然给大脑造成灾难。于是就采取一些五花八门的办法把那些人物和故事尽快从脑子里驱逐出去，尽快清静下来。我就离开书桌坐到院子里喝茶听秦腔，把录音机的音量开到最大，让那种强烈的音乐和唱腔把脑子里的人物和故事彻底驱逐干净。也常常到河边散步，总在傍晚时分，无论冬夏都乐于此道。这些办法有时候不起作用，我就做点体力劳动，给院子里的果树和花木剪枝，施肥，浇水，喷洒药剂，一旦专注于某项劳动，效果最好。夏天的夜晚爬上山坡，用手电筒在刺丛中捉蚂蚱，冬天可以放一把野火烧

荒，心境和情绪很快便得到调节，完全进入休养生息状态，可以预感到明天早晨的写作将有一个良好的开端，几乎每天晚上临睡前都喝几盅白酒，便会进入一种很踏实的睡眠。

早晨起来习惯喝茶，基本是一种茶：陕青。这种喝茶的习惯很厉害，连着喝掉几乎一热水瓶水，抽掉两支雪茄，这个过程便渐渐进入半个世纪前的生活氛围，那些人物也被呼唤回来，整个写作情绪便酝酿起来，然后进入了写作。

我那时候已发觉我的这些习惯颇像那些老秦腔艺人，抽雪茄，喝酽茶，下象棋，听秦腔，喝西凤酒，全都是强烈型的刺激。

问：你是否有“山重水复疑无路”，写不下去的创作中的苦恼？你是怎么解决一个个难题的？

答：整个创作过程中遇到过两次大障碍，几乎是同一性质的，就是人物的纵的和横的关系与历史进程的摆置问题。第一次发生在写过三分之一篇章时出现的，使我大约停笔半月之久而一筹莫展，搞得我情绪一阵烦躁一阵灰败，越是焦急越是无计可施。那时正进入伏天，高温天气下的情绪更加糟糕，恰好一位文友约我到他家去避暑，他的家住在海拔较高的山岭上，又有两孔土窑洞，凉爽宜人，也许是换了一个环境吧，忽然觉得茅塞顿开，一步就跨过了那道障碍。这件事记忆犹新。

第二次发生在写过三分之二的篇章以后，类似的情况又出现了，这回我有了经验，便索性放下，倒过去先写后边的篇章，然后回过头去，却觉得根本不成为问题，似乎倒是当时脑子里短了路。

问：你感到写得最愉快的是哪些章节？为什么？

答：整个写作过程都很平静，都比较愉快，具体已记不清哪一章了。我只记得写得最难受的一章，便是朱先生的出场，尤其是他的生活历程的那一段较长的介绍性的文字，似乎不如我写其他人物出场那样自如，总觉得难以进入一种形象性的叙述。

问：你感到从事大部头的长篇写作对作家的心理、生理状况，都有哪些要求？

答：适宜于所有作家的标准答案恐怕没有。我只能回忆当初我所能意识到的需要做的心理准备，便是沉静。为此而立下三条约律，不再接受采访，不再关注对以往作品的评论，一般不参加那些应酬性的集会和活动。在我当时看来，此前的一切创作到此为止，对我的宣传和对作品的评介已经够了，也应该到此截住。我在长篇将开始一种新的艺术体验的试验性实践，比以往任何创作阶段上都更清醒地需要一种沉静的心态；甚至觉得如不能完全进入沉静，这个作品的试验便难以成功甚至彻底砸锅。

三条约律也是保障整个写作期间能聚住一锅气，不至于零散泄漏零散释放，才能把这一锅馒头蒸熟。做到这三条其实是给自己讲心理卫生的，既排除种种干扰也排除种种诱惑，甚至要冷着心肠咬紧牙关才能聚住那锅气，才能进入非此勿视的沉静心态。当我完成这部书稿以后，便感谢当初的三条约律拯救了我的长篇，也拯救了我的灵魂。

五、文学作品所能达到的对一个民族的理解，任何其他读物都难以相比

问：有人评价说，《白鹿原》不仅以空前规模深刻准确地表现和把握了中国农业社会的基本特点，而且在历史和人的结合中塑造了庄

严饱满的中国农民形象，展示了民族的精神和灵魂，它的出现将给外界（包括世界）提供许多关于我们民族的新的认识，你是怎么想的?

答：但愿这是我的文学理想的实现。我的理解是这样，民族间的最广泛也最深刻的交流的最好手段，便是文学。我所知道的苏联的第一个少数民族是哥萨克，便是因为少年时期阅读了《静静的顿河》。除了文学的因素外，阅读文学作品所达到的对一个民族的了解和理解的深度，任何历史的政治的经济的读物都难以相比。

问：白嘉轩、鹿子霖是作品中的族长或家长，他们的性格、心理、思想和智慧可以说是老一代中国农民中两种最基本的类型，从一定意义上说，他们也是我们民族精神、民族灵魂中的两种基本原型，他们的结局和下场，也是充满神秘的宿命感。请问：你创作他们有无生活原型？对于这两类农民及其未来处境你有何评价?

答：这两个人恰好都没有生活原型。

白嘉轩这个人物确实得到过一句启示。正在酝酿这部书的时候，一位老人向我粗略地讲述了一个家族的序列。其中说到一位族长式的人时，他说这人高个子，腰总是挺得端直直的，从村子里走过去，那些在街巷里袒胸裸怀给娃喂奶的女人，全都吓得跑回房门里头去了。当时我脑子已有白嘉轩的雏形，这几句话点出了一个人的精髓，我几乎一下子就抓住了这个人物的全部气性，顿然感到有把握也有信心写好这个人物了。至于他（白）的所有故事当然全是编出来的，关键是这位老人所说的简单到不过一百个字的介绍，给我正在构思中的族长注入了骨髓。

这两类农民是一种文化底蕴之中的两种类型，他们的全部作为和最终结局不是我的评价，而是我所能理解到的历史和生活的必然。

问：长篇中的几乎每个人物都是立体的，他们的命运始终牵动着读者的心，最绝的，也可说神来之笔是朱先生、小娥、黑娃的激动人心的死，这些死是你刻意的设计，还是来自生活的启示?

答：我对每一个重要人物在书中的出场和在生活的每一步演进中的命运转折，竭尽所能地斟酌只能属于他们这一个人的行动，包括一句对话。我过去遵从塑造性格说，我后来很信服心理结构说；我以为解析透一个人物的文化心理结构而且抓住不放，便会较为准确真实地抓住一个人物的生命轨迹；这与性格说不仅不对立也不矛盾，反而比性格说更深刻了一层，这就是我所理解的心理真实。我同样不敢轻视任何一个重要人物的结局。他们任何一个的结局都是一个伟大生命的终结，他们背负着那么沉重的压力经历了那么多的欢乐或灾难而未能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死亡的悲哀远远超过了诞生的无意识哭叫。这几个人物的死亡既有生活的启示，也是刻意的设计，设计的宗旨便是人物本身——那个人的心理结构形态。

问：白孝文以良家子弟始，中间经过了叛逆，流浪要饭，后来又当兵从政，先是反共反人民，后来又摇身一变成为人民政府的县长，这种命运的大起大落，而又能合情合理，不是一般虚构可以完成的，请问：他有无生活原型？你有无关于他未来的预感或设想?

答：白孝文完全是一个虚构的人物。类似这种人的故事，恐怕任谁都能讲出一两桩来。我所能依托的唯一素材就是广闻。你的最后一问我不便回答，这可能有解释人物之嫌。让作家具体解释作品情节和作品人物，我觉得比创造这些人物还难。

六、我和当代所有作家一样，也是想通过自己的笔画出这个民族的灵魂

问：你如何看待关于《白鹿原》“成为中华民族生活的缩影”的评价的？也就是说，你怎么理解这个可以说很高的评价？

答：你是搞当代文学评论的，你阅读过的当代中国作家的作品肯定比我多得多，对一些具有代表性的流派的作家的作品的了解肯定比我更全面更广泛更深刻。我凭印象说，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创作，无论什么流派，现实主义、后现实主义、新写实派、意识流、寻根主义以及数量不大的荒诞派，无论艺术形式上有多大差异，但其主旨无一不是为了写出这个民族的灵魂，差异仅仅在于艺术形式的不同。

至于这个灵魂揭示得深与浅，那不是艺术形式造成的，因为我们从某些主义和流派的发源地确实看到过辉煌的巨制。揭示浅与揭示深的关键在作家自身的独特的体验。我甚至以为这是创作中起主导作用的生命体验。作家对历史和生活的独特体验决定着他的作品的深度，鲁迅的《阿Q正传》和巴金的《家》，都是两位巨匠独特的生命体验的结果。

我和当代所有作家一样，也是想通过自己的笔画出这个民族的灵魂。我以前的某些中短篇小说也是这种目的，但我的体验限制了这些中短篇小说的深度。此次《白》书的写作意图也是这样。你说的这样高的评价可以看作是对我的鼓励，但在我来说就是想充分展示我的独特的生命体验，即截止到一九八七年前后我已经体验到了的。

问：有评论家说，有的小说包括长篇可以用一句话，可以从一个角度，用一种思想概括，《白鹿原》多层次、多方面的内涵，多样的

生活和人物，似乎不能用一句话、一个观点概括。你能吗?

答：我一开始就把这部小说概括了，甚至在未开始之前的酝酿阶段就有一个总体概括，就是卷首语里引用的巴尔扎克那句话：“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

问：《白鹿原》既有丰富的内蕴，又有很强的可读性。虽然很长，许多读者还是一气读完的，甚至出现了一家丈夫、妻子、孩子争相阅读一本书的情况，这在纯文学阅读中是很少见的。你在写作中是否考虑到长篇的可读性问题?

答：可读性的问题是我所认真考虑过的几个最重要的问题中的一个。构思这部作品时，文坛上有一种“淡化情节”的说辞，以为要彻底否定现实主义的过时传统，其中的重要一点就是要“淡化情节”，写一种情绪或一种感觉，我至今也不敢否定那些相当有道理也相当新鲜的说辞，因为实践这种说辞所阐述的创作理想。尽管现在未能实现，而将来也可能会实现的。但我必须面对现实。

现实的情况是文学作品已经开始出现滞销的不景气现象。文学圈里包括我在内的许多人都惊呼纯文学出现危机，俗文学的冲击第一次伤了纯文学高贵尊严的脸孔，这是谁都能够感到威胁的，书籍出版没有订数的致命性威胁。在分析形成这种威胁的诸多因素和企图摆脱困境的出路时，我觉得除了商潮和俗文学冲击之外，恐怕不能不正视我们本身；我们的作品不被读者欣赏，恐怕更不能完全责怪读者档次太低，而在于我们自我欣赏从而囿于死谷。必须解决可读性问题，只有使读者在对作品产生阅读兴趣并迫使他读完，其次才可能谈及接受的问题。我当时感到的一个重大压力是，我可以有毅力有耐心写完这部

四五十万字的长篇，读者如果没有兴趣也没有耐心读完，这将是我的悲剧。

为此，我专门选读了谢尔顿几部长篇，谢尔顿的十几部小说总是畅销，列为美国十大畅销书的作家。这个人的作品总是几十万成百万地印刷，而且被翻译成多种文字，依然畅销。谢尔顿的作品不能称作俗文学，起码与中国当今那些俗文学不可同日而语，我读的几部不仅可读性强，而且揭示相当深刻。所以抱怨当代人被电视或其他娱乐形式从小说前拉走的说辞也不尽准确，因为欧美那样的国家娱乐场合、娱乐手段比我们丰富得多，而纯文学的作品仍然可以几十万几百万册地出版印刷。我们需要一点否定自己的勇气，不要一味地抱怨市场轻视读者，才能从文学自身寻找出路。

问：蔡葵同志在信中告诉我："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这第一句话就将他吸引住了。整个《白鹿原》的语言也是很特殊的，具有特别的节奏和特别的韵致，请问：你在写作中对自己的语言有什么考虑和追求?

答：关于语言，也和整个作品一样不可分割地要接受读者的审视，不同层面的读者肯定会有不同的感觉，我不想做任何解释，我只想说动笔之前关于语言的考虑也是重要的问题之一，甚至可以说是首当其冲的头一件难事。关于语言的重要性无须阐释，对我来说最现实的困难是，如何把半个多世纪里发生的较为错综复杂的故事和较多的人物既能淋漓尽致地表达出来，又不致弄得太长，为此必须找到一种适宜的语言形式和语言感觉。关于形式我试着写了两三个短篇，做那种语言形式的探索和实验，其中我比较满意的是《轱辘子客》。这个短篇在《延河》发表出来后，几位看过的朋友首先看到了语言的变化和陌生，还是比较赞赏，于是我就心里有数了，把这种高密度的语言

形式确定下来了。关于语言感觉，似乎不大说得清楚，它蕴含当时的社会气氛和不同人物的生活形态，而且蕴含着作家的情绪、气质和理智等。

我写下头一句“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时，似乎没有经过特别的用心刻意，而是很自然地写下来的。当然从表面看是这样，其实，整个作品大的脉络大的框架和主要人物的重大人生转折都已基本酝酿成熟，重要人物的生命历程已经在心中搏动，只是把酝酿已久的构思找到一个“线头”就是了。当我打开大日记本写下草稿中这一句开头的时候，似乎找到了那种理想的语言感觉，而且自信这种感觉可以统领到文章结束。草拟时开头用的是“锅锅嘉轩……”写正式稿时把绰号“锅锅”改成了他的姓“白”。因为后来在整个作品的实际写作中几乎没有用这个绰号，改成姓氏开头更符合作品气韵也符合白嘉轩的气质。我自己是这样判断的。

七、长大了的孩子还牵着大人的手走路是不可思议的

问：在《白鹿原》开始构思写作的时候，中国文坛上正热烈地进行着关于写作方法的争论，你考虑没有考虑诸如现实主义还是现代主义这些问题?

答：在《白》动笔之前的几年里，我一直关注着中国当代文坛上关于写作方法的种种争论，也注意阅读当代作家许多标示着新面貌的作品，我从那些争论和标新之作中得到过有益的启示，这对《白》书的构思和写作有着决定性影响。尽管我没有参与争论，这主要是害怕陷入争论不能摆脱耗费生命；但我在别人的争论中得到的艺术启示是肯定的，可能比争论者双方获得的好处还要多；争论者忙于争论甚至

不惜把一种意见推向极端，我从争论双方那里都看到了也学到了长处。

问：你认为《白鹿原》是现实主义范畴的作品吗？它同柳青，包括法、俄现实主义有何不同？

答：《白鹿原》是现实主义的创作。在我来说，不可能一夜之间从现实主义一步跳到现代主义的宇航器上。但我对自己原先所遵循的现实主义原则，起码可以说已经不再完全忠诚。我觉得现实主义原有的模式或范本不应该框死后来的作家，现实主义必须发展，以一种新的叙事形式来展示作家所能意识到的历史内容和现实内容，或者说独特的生命体验。

柳青是我最崇拜的作家之一，我受柳青的影响是重大的。在我进行小说创作的初始阶段，许多读者认为我的创作有柳青味儿，我那时以此为荣耀，因为柳青在当代文学上是一个公认的高峰。到八十年代中期我的艺术思维十分活跃，这种活跃思维的直接结果，就是必须摆脱老师柳青，摆脱得越早越能取得主动，摆脱得越彻底越能完全自立。我开始意识到这样致命的一点：一个在艺术上亦步亦趋地跟着别人走的人永远走不出自己的风姿，永远不能形成独立的艺术个性，永远走不出被崇拜者的巨大的阴影。譬如孩子学步，在自己没有能力独立行走的时候需要大人引导，而一旦自己能站起来的时候就必须甩开大人的手，一个长到十岁的正常的孩子还牵着大人的手走路是不可思议的。艺术创作更是这样，必须尽早甩开被崇拜者的那只无形的手，去走自己的路。这一方面的教训有目共睹，不仅柳青的崇拜者没有在艺术上超出柳青的，荷花淀派的创始者孙犁的崇拜者也没有超出孙犁的。沈从文的学生们也没有弄出超过沈先生的作品。这是一个悲剧也是一个误区。可是背叛了被崇拜者的人倒是有不少人成了气候成了大

家。这应该是一个很简单也很正常的现象，艺术的要害在于“创”新而忌讳模仿。

我决心彻底摆脱作为老师的柳青的阴影，彻底到连语言形式也必须摆脱，努力建立自己的语言结构形式。我当时有一种自我估计，什么时候彻底摆脱了柳青，属于我自己的真正意义上的创作才可能产生，决心进行彻底摆脱的实验就是《白鹿原》。但无论如何，我的《白》书仍然属于现实主义范畴。现实主义者也应该放开艺术视野，博采各种流派之长，创造出色彩斑斓的现实主义；现实主义者更应该放宽胸襟，容纳各种风貌的现实主义。

八、我在传统的性封闭和西方性解放中间无法回避

问：《白鹿原》中有很多性描写，有人说你成功地将人的自然性和社会性、历史性结合起来。你是怎么认识性，即人的自然性在历史的社会的人性中的地位的？在性描写中你把握了什么原则？

答：正面回答这个问题很不容易摆脱说教。我在查阅三县县志的时候，面对无以数计长篇累牍的节妇烈女们的名字无言以对，常常影响到我的情绪。那时候刚刚有了性解放说，这无疑是现代西方输入的一种关于人的自然性与社会性的说法。我在那些密密麻麻书写着的节妇烈女的名字与现代西方性解放说之间无法逃避，自然陷入一种人的性的合理性思考。我把这种思考已经诉诸形象，我想读者是会理会的，由我出面解说反而别扭。

我决定在这部长篇中把性撕开来写。这在我不单是一个勇气的问题，而是清醒地为此确定两条准则，一是作家自己必须摆脱对性的神秘感羞怯感和那种因不健全心理所产生的偷窥眼光，用一种理性的健

全心理来解析和叙述作品人物的性形态、性文化心理和性心理结构。二是把握住一个分寸，即不以性作为诱饵诱惑读者。

问：性与文化，性心理与文化心理，性行为与社会关系、社会背景，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弄不好就会出偏，引起社会的过敏反应，《白鹿原》的处理可以看作是一个成功的范例，正因为正视了性，没有回避性，小说才达到了“民族秘史”的境界，你在这方面是否自觉?

答：前一个问题已基本说清了这一点，首先是敢于正视，不再回避，我觉得是我艺术体验的一次跨越。其实，古今中外的优秀作品都没有回避，包括《红楼梦》和《水浒传》。如何把握其分寸不能说不重要，而关键在于所有对性的描写是否属于必须，这虽然是揭示人物文化心理结构的一个主要途径，但不是每一个人物都必须写性交。在必要性确定以后，如何把握恰当的分寸才成为重要的一环。

因为这个问题容易敏感，弄不好会有贩黄之虞，所以在构思这部小说时所重点考虑的几个问题中，这个问题也成为其中之一，因此就定下“不回避、撕开写，不是诱饵”这两条准则。

问：《白鹿原》在性描写方面如此大胆（杂志发表时删了一些，据说出书时将恢复），甚至没有回避最肮脏最丑恶的性生活。请问：在写到这些时，你有无心理障碍？是如何克服的?

答：坦率地说，我作为一个真实的人，在写作这个作品的一开始就有重重心理障碍，这种障碍甚至一直延续到我回答这个问题的当下还未完全解除。一是担心文化检查官能否容忍？要是不分青红皂白，不管作品实际不辨必要性与诱惑性之间的界线，而一下子打到扫黄之

列怎么办？二是怕读者，这是更关键或者说更大的一种心理障碍，即改变我在读者中的印象，尤其是那些过去比较关注也比较喜欢我的作品的读者。前面的问题中涉及一点，即我的初期创作中不仅不涉及性，单是人物系列也多是男性，有人说我刻画得最好的形象是乡村的各色老汉，后来的一些涉及婚姻家庭的作品也写得比较含蓄，读者一般印象里，我是严肃作家，其中重要一条是写性比较严肃。如此撕开性面纱，而展示种种性形态性心理的作品，可以预料肯定会引起那些熟悉关注我的读者的惊讶，陈忠实怎么也弄这种东西？对我的印象随之就将发生彻底改变。这是我最担心的。及至现在作品发表，这种意见果然听到了，不过不大强烈普遍，读者的鉴赏水平令我欣慰。

克服这种心理障碍，坚持按原先构想写完作品的主导因素便是这部作品的主旨，这是重要的一个部分而不可或缺，另外，就是前述的那些县志上数以千计的贞妇烈女。中国在走向现代文明的同时，其中也仍然有一个性文明的问题。这样，我就获得了撕开写的勇气。

问：你有长期的农村生活经历，对农村、农民相当熟悉，根据你对农村生活的了解，农民的性观念的核心是什么？他们与城里人、文明人、文化人有什么不同？这里有无特殊的文化生活渊源？

答：我有一个未与人交流的看法，就是尚不存在一个农民的关于性的观念，或者城里人的关于性的观念，或者是还有一个城市里的具有较高文化的文明人的关于性的观念。

中国人或者更准确一点说我们民族，几千年来读着一本大书，城里人读这本书，乡里人能出资读得起书的人也读的是这本大书，城里的文化层次高的知识人还是读这本大书长大的，所有人接受的是一个老师的关于修身做人关于治国安邦的教诲。他们从小小年纪就开始背

诵那些不完全能理解得了的深奥的古汉语文字，接受熏陶，关于性文化的心理结构便开始形成。

更有一本无形的大书，从一代一代识字和不识字的父母亲友以及无所不在的社会群体中的人那里对下一代人进行自然的传输和熏陶，这个幼小的心灵从他对世界有智能感应的时候起，便开始接受诸如“仁义礼智信”“男女有别，授受不亲”的性羞耻教导、制约和熏陶，他的心灵就在这样的甚至没有文化的社会文化氛围中形成一种特殊结构。及至他们有了儿女的时候，又用这种心理结构制约下的关于男女关系的观念进行熏陶。于是便有了一个共同的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特征，它既区别于西方欧美人的心理结构，又不同于伊斯兰世界虔诚教徒的心理结构。

我在查阅县志时发现了一份“乡约”，那是一份由宋代名儒编撰的治理乡民的条约准则，是由那本大书衍化成的通俗易记的对乡民实行教化的乡土教材，而且身体力行付诸实施在许多村庄试点推广。这本乡约我后来才知道是中国的第一本乡约，作为范本被南方数省的儒学学士改编修订，在他们所在的那一方地域推广。

城里人文化层次比乡里人高，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也相对要高一些，性文明自然也会高一阶，但这仅仅只是程度的差异，而无本质差别。城里人的心理结构依然是传统的中国人的心理结构，与西方欧美人的心理结构的本质的差别没有改变。虽然解放后不读那本大书了且受到批判，但那本书依然以无形的形态影响着乡里人，也影响着城里人。要彻底摆脱那本书的影响，恐怕不是一代两代人的事，一旦彻底摆脱了那本大书的影响和阴影，中国人的心理结构可能便会发生质的变化，性只是那变化中的一个组成部分。

九、我永远不会上那个原了

问：人说电影是遗憾的艺术，拍成了才发现许多缺点、不足，但想改却来不及了。你的《白鹿原》现已发表了，印成铅字以后，你有遗憾吗？再版时准备修改吗？

答：大的遗憾没有，小的遗憾无法避免。遗憾主要是文字。如果能再过一遍手，起码可以把文字锤炼得更好些。我交出手稿时就一直有再过一遍手的思想准备，因为这是作为正式稿的头一遍稿。我一次性地拉出五十万字，基本保持着卷面清整的稿子。唯一可以自信的是文字语言，唯一遗憾的也是文字语言。本来应该再过一遍手，而未能做此事，编辑同志说可以了你不必再来北京修改了。我那时刚刚弄完，有点疲累，加之已入暑天，畏怯炎夏，也就偷懒省事了。

如果有再版的机会，到时候再视具体情况而定。

问：小说的许多人物的命运里程都延伸到解放（一九四九年）以后，请问你有无写《白鹿原》第二部的打算？写第二部需要什么条件？

答：我去年初已经下了白鹿原。作为一部长篇小说的全部构想已经完成。基本可以肯定，我永远再不会上那个原了。

问：如果现在你还不准备动手写《白鹿原》续篇，你对你今后几年的创作生活有什么设想？

答：前边刚刚说过，我的所有创作都是生命体验的一种展示。《白》书就是一九八七年前后的那一段时间里的生命体验。那种体验已经比较充分地宣泄出来了，或者说已经完成了那个宣泄，所以不存

在续篇或二部三部什么的。这一点从一开始构思就很明确，《白》书是单部长篇，就此完结。唯一的与初始设想的变化是篇幅，原计划不超过四十万字，结果写到五十万字。

未来的创作很难说具体内容，这有待或者说要看我会产生怎样的体验。但有两点可以肯定。

一、未来——起码截止到六十岁这十年里，我将以长篇写作为主。原因有二，我刚刚试写了第一部长篇，对这种艺术形式兴趣正浓，我在出过一本短篇集之后便转入中篇写作，后来以中篇为主写了几年，写过九部中篇出了三本中篇集子，对中篇的结构艺术进行了一些探索。现在写成头一部长篇，心情颇类似当初写成头一部中篇的情景，对长篇的结构艺术进行各种探索的兴趣颇盛；在五十到六十岁这一年龄区段里，如若身体不发生大的灾变，其精力还是可以做长篇小说创作的寄托的，所以得充分利用这个年龄区段间的十年，这无疑是我生命历程中所可寄托的最有效的也最珍贵的一个十年了。所以打算在这十年里以写长篇为主。之后的生命的保险系数很难确定，到十年后再视情况而定，写到此就有一缕人生的悲怆悄然浮上心头。

二、我可能再不会弄这么大篇幅的长篇了，不单是写起来累人的问题，恐怕仍然是概括能力的问题，我想在艺术形式和手法上做各种探试，把长篇的篇幅写小也是作为一个重要目标。至于未来作品的内容，这是现在所难以把握的。

1993年3月15日

*李星为《小说评论》主编。

黑色的一九九二

素凤同志：

您好。

您二月初的信拖到现在才回复，主要是一种心理因素。您信中所陈述的对路遥早逝的深切痛苦，令人感动。然而您肯定还不了解二月初那时我的心境，几乎无法捉笔向您倾诉关于路遥死亡的悲哀。又一个年富力强才华横溢的中年作家邹志安在路遥去世后刚刚两个月也谢世了。路遥死亡的巨大阴影还没有散去，邹志安逝去的悲怆的浓云又覆盖过来，我的心完全被笼罩在一片悲凄之中而无法解脱。您和路、邹仅仅见过一次面而流泪不止，我们几十年在一起该是何等心境……仍然乞望您宽容拖迟复信。

一九九二，在陕西作家协会是黑色的一九九二。

一九九二年春节刚过，邹志安从乡下过完春节回到作协便感到很大不适，到医院检查后怀疑肺上有异物。记得当时在见面时他很不以为然，以为自己根本不会生这种病，我和朋友们都劝他认真查一查。我当时住在乡下，隔一段时间回作协一次，再见到他时已经住院。我劝他到医疗条件好些的省人民医院或医学院附属医院去，他大约考虑到所住医院离作协院子近点，所以固执不去。他的癌变的位置不能手术，据医生说是肺癌中最坏的一种。经过化疗等手段，及至后来转到医学院，都不能达到抑制癌变的预想效果。眼睁睁看着他被冥冥之中的那只无形的黑手扼杀了。

邹志安从一查出病症就令我和朋友们忧虑，谁都知道这种病意味着什么。路遥却是完全出乎意料的，甚至在他垮倒之前，几乎无人知道他患有肝病。我只知道他有胃病，那是一九八八年夏天，我在作协住过俩月，见他从脖颈一直到勒腰带的地方都涂着一层黏稠的黑色膏药，他说是求一位中医弄的祖传秘方，专治胃病的。我对胃病也不太在意，到秋天他说已经好了。后来我才知道那种膏药是治肝炎的。直到现在，据他的亲人回忆，除了求中医之外，从来没有经西医的仪器检查过。他的亲人解释的理由是，他怕查出肝上的大麻烦就要住院，《平凡的世界》就不能按时完成了！

这可能是理解路遥——一个从饥饿里成长起来的中国当代作家的一条注释。而各种人都会做出不同的注释，然而路遥就是这样的路遥。

路遥八月病倒延安转回西安就医直到去世，大消息小消息已经披露不少，我无须向您赘述。文学界的巨大震惊且不论，读者向路遥所表达的深沉真挚的痛惜之情尤为感人。这可能是胜过死者生前所得到的所有荣誉中最可珍贵最富价值的东西，因为从根本上说来，任何作品的最初动因和最终目标便是读者，而不是某种奖。活在读者心目中的作家才是真正的作家，路遥因此是一个精神富翁。

读者和文学界朋友在关注路遥早逝的损失的同时，也关注他的不规整的生活习律，甚至包括作家的婚姻和家庭，这都是很正常的事情。然而传言中免不了少许误差。路遥病倒之前，几乎没有人知道他们的家庭已濒临危机，病倒之后，婚变和病变便一起汹涌。我后来所知道的情况是，俩人闹矛盾已有一些时日，大约到七月份达成分手的协议。之后其妻办理调回北京的手续，路遥在家装修房子，以给予女儿因离异后心理上的某些安慰。大约到了两人实施协议的时候，路遥

想回陕北休息几天，答应再回到西安即办手续，不料竟病倒在延安。俩人原先达成的协议就此搁下再不提说，直到路遥不幸逝亡，没有诉诸公堂自然也不会有判决离婚的事。尽管谁都不否定这已是一桩死亡的婚姻，但并无许多传闻中所说的那些枝枝蔓蔓的细节。

我和陕西的文学朋友们与广大读者一样深沉悲哀。但婚姻和家庭毕竟是他们两个人的事，他们过去有过如诗的恋爱季节，也有过很长一段的和睦温馨的夫妻生活，他们后来的婚变是他们双方的共同选择，我们似乎以不干预为好，因为不单是我们无法了解其中的因由，重要的是这应该由他们自己做出抉择。把他们之间的婚姻变异搅和在死亡的巨大悲痛之中，不一定符合路遥的心意，因为我感觉路遥在这种事情上是个不愿张扬的很内向的人。

活着的我们所能唯一做的事，就是替两位年轻的作家料理后事。他们都是从农村（一个陕北，一个关中）最底层里闯出来，以艰苦卓绝的奋斗精神走上文坛，然而他们从来也没有走向富裕达到小康，常为经济拮据而困扰而自嘲，然而对文学却也从来没有动摇过其坚贞的爱心。路遥无须说了，志安在生前写给《陕西日报》的一篇短文中表示了“不悔”的强硬心愿。他们代表着的是陕西一帮作家的共同心愿。我在写给《文学报》主编郦国义同志的一封长信中已详细叙说了关于他们后事安排的情况。他们都有农民父母和兄弟姊妹，我们向省政府专题打了报告，省委都以超出平常文件范围的特批予以解决。我们既不能挽留他们于人世，只得尽力做好后事安排聊表心意，也在于抚慰自己的灵魂。

陕西文坛黑色的一九九二已经过去。平凹说作协倒霉在前院的招待所那幢建筑，正建在作协的“胸部”部位，压住了心脏；又说那建筑的造型类似一具棺材。我们被两桩死人的事整得有点心怯，甚至迷

乱，大年夜弄了两串三万头的长鞭，在前门和后门都放了，意在驱逐霉气、死气和邪气。

早逝的不幸逝去，活着的还在想着文学。

文学这个魔鬼啊！

请您向编辑部诸位关心陕西作家的朋友致意，我深深地代死者感谢你们的爱心。

祝愉快。

此致

敬礼

陈忠实

1993年4月2日

*高素凤为《文学自由谈》编辑。

陕西作家应对中国当代文学做出无愧贡献

——陕西作协第四次会员代表大会闭幕词

对于陕西作家和整个陕西文学界具有重大意义的第四届作代会，圆满完成了既定的程序，胜利闭幕了！我们可以说，陕西文学界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关于新时期以来陕西文学的成就和未来的目标，胡采主席已经在他的报告中做了充分的阐述，我这里仅就为实现这个目标表示一下本届理事会和主席团的初步思路。

我们的思路是出于这样的一种基本认识，即对陕西作家群的现状分析。

在“文革”造成的陕西文坛一片荒芜的废墟上，从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随着整个国家和民族的一个新时代的开始，陕西文学界同时开始涌现出一批青年作家，这是最早在中国当代文坛形成影响形成气候形成群体并引起瞩目的一代作家，他们对新时期以来的中国当代文学的贡献是显著的。这一代青年作家经历了解放以来社会的政治的以及文学在内的生活演变的全过程，生命体验日趋深刻开始进入理性境界，艺术实践艺术体验也逐渐趋向成熟阶段，然而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也年届五十这个生命大关，从现在起到本世纪末下世纪初的十年，将是他们人生历程和艺术创造的最重要的十年，甚或可以说是最后一个黄金般的艺术生命的十年。

我们满怀信心地期待着，这一代作家更为杰出的丰收喜讯，必有对陕西文学和中国文学重大建树的精品出世。

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涌现的一批更为年轻的作家，其中的大多数人已经走过了他们的艺术体验的初试阶段，初尝艺术创造成果的兴奋和欢悦逐渐沉寂，正在进入形成属于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和艺术体验的关键性阶段，他们正处于人生历程中最富于创造活力的年华，处于艺术创造最活跃的黄金时期，他们中间的一些人已经进行了大量的艺术实践而趋向成熟，开始形成独立的艺术个性和较为鲜明的艺术风格，而且开始在中国当代文坛产生影响并脱颖而出。

未来十年对于无论哪一个年龄档次的陕西作家都是至关重要的，而最重要的一点是任何一个都耗费不起有限的生命。本届代表大会产生的主席团，将清醒地认识并理解这一基本的现实，将坚定不移地围绕保证作家进行艺术创造尽最大可能释放各自的艺术能量这个中心而开展工作。

朋友们，我们面临的社会现实是，处于全面深入改革开放的祖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在发生着重大的根本性的合理性转换和适应性调节，这种转换和调节的过程，就其实质来说，无疑是一个民族从僵化停滞状态恢复发展进步的一个历史性过程，这个过程无疑又是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社会结构生活秩序必然要重新打乱重新调整重新安排，而最深刻最敏感的当然又是人的心理结构和适应性调整和重新安排的一个过程，必然会带来某种紊乱某种不适某种惶惑乃至某种痛苦某种欢乐，所有关于文学贬值艺术掉价作家处境尴尬的现象，就其实际来说也是属于这个过程中的必然。所幸的是，陕西作家在这个过程中基本保持着依然整齐的队列，这是最值得庆幸最值得骄傲的事情。本届主席团受命于五百多名会员代表的委托和信

赖，首要的职责就是巩固发展壮大这个群体，我们不屑于堂吉诃德式的与市场经济所引起的重大社会进步相挑战，也不屑于中国旧文人安贫乐道道士式的清贫，更不能再继续那种随便抓一个馒头进行长篇小说创作的状况。我们将把改善作家创作条件和生活条件作为最现实最迫切的一件工作提上议程，虽然我们不具备使每个作家都变成大富豪的谋略，但对改变馒头加大葱的困境充满信心。这里必须申述清楚，作这种努力的初始目的和最终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保证现存创作队伍的完整并使其更加雄壮，使这个群体中的每一个个人都能有进入沉静的艺术创造的状态。

我们将努力倡导另外一种有利于作家进行创作的环境和氛围，即和谐。我们已经经历了太多的社会动乱和极“左”运动的灾难，我们也看到了这个队伍之间某些门户之见文人相轻所造成的心灵伤害。罗曼·罗兰说过，在文艺团体中，作为领导者的一个重要责任，就是防止作家艺术家互相伤害。本届主席团将毫不动摇实践大会的主旨，大胸怀大视野大气魄即包含艺术创造也包含作家自身人格建设，在这个群体中倡导互相尊重互相友好，既尊重他人人格也尊重他人的艺术兴趣。只有培养自己的博大胸怀才能达到这个群体的大团结，道理很简单，既然商潮已经迫使作家进入尴尬境地，作家们自己如果互相摩擦互相伤害将更加难以生存。我代表主席团坦诚地向全体朋友郑重宣布，我们自己首先身体力行做出表率，无论陕南陕北关中，无论老年中年青年男人女人，尊重所有作家的艺术追求艺术兴趣艺术探索，不遗余力地为创造形成一个团结和谐友好的大团结的创作氛围而努力。

陕西以胡柳王杜李魏为代表的新中国第一代作家曾经辉煌于五六十年代的中国文坛，对新中国的文学做出了永不磨灭的贡献，他们的名字将和这个民族一样不朽。我们这一代人中，也有几位兄长和小弟

燃烧出灿烂的光芒，他们对文学的不悔精神将成为我们这个群体的财富。

我们倡导这个群体的每一个成员，有勇气有锐气有志气有才气有骨气。

我们相信在这个群体里会形成大胸怀大气魄大视野，出现大作品大作家。

我们的目的是一致的，陕西作家应该而且能够对中国当代文学做出无愧贡献！

1993年6月10日

选萃自序

我很喜欢我的这两本作品“选萃”。

我早就期望有一天能由自己选编两本中篇和短篇小说的书出版。

原因很简单，对于小说创作的几种形式，我都很有兴趣，短篇小说中篇小说长篇小说以及小小说，我现在都有了实际操作的具体实践了，在小说创作的形式领域里，我可以说已经不再陌生。学习创作的初始阶段，我以短篇小说为主，集中精力探索短篇小说的各种结构形式；到一九八一年编辑出版头一本短篇集《乡村》以后，我就转入以中篇小说这种形式的探索与实践了；到一九八八年年初，写过九部中篇小说之后便动手写平生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直到一九九二年初完成。在未来的十年里，可以说是属于我的最后一个黄金般的年龄区段里，肯定将以长篇创作为主，也肯定不会放弃适宜写作中篇或短篇的素材，但毕竟对长篇小说创作的兴趣更浓。因此，编选这两本集子实际就是对此前创作道路的一个重要的小结。因为对于任何一个作家来说，创作永远都只能是一个学习、探索的过程，各个作品的水平不会整齐划一，而且风格也差异甚大。我想把自认为较强的作品抽出来，把能代表各种风貌的作品集中起来，作为送人赠友的礼物也好拿出手了；对于那些喜欢我作品的读者，也提供了一个节省时间而了知全貌的机会。

因此而由衷地感激刚刚成立的西安人民出版社。

1993年6月17日 小寨

文学这个魔鬼

我已经记不起多少回慨叹过文学是个魔鬼的事了。在我自己的创作遭遇挫折或陷入苦闷被折磨得左右不是的时候，便发出这样的喟叹；在我接触一些文学的幸运儿和不幸者的时候，也是常常油然而生出这个慨叹来。

有这样的情形发生，一个昨天还拿着稿子猥琐卑怯地到处投稿拜师的乡村青年，突然因为一首诗一篇散文或一篇小说的发表而产生影响，今天便直起腰仰起脸骂所有的人都不抵他的一根脚趾，甚至托尔斯泰也不过是一个过时的天才。而对这情景，我心里忍不住便冒出文学是个魔鬼的话来，只是不想说出口。这个魔鬼能把一个质朴自尊的乡村青年折磨得猥琐卑怯，又能把他调戏耍弄得疯疯癫癫。

更多的却是那些不幸者的情景。我不下十次接待过两鬓苍苍而仍然发不出一篇小说的文学追求者，他们中间有工人有农民有干部有教师还有搞技术的工程师，面对他们仍然痴情于所爱的追求而无言以对，我既怕伤了他们的心又怕贻误了他们的年华，便认定文学对某些人来说是灰姑娘，而对这些不幸者就是一个十足的魔鬼了。一位年过五旬的人找到我家里，拿出一部六十万字的长篇小说稿子，我翻了几章便产生了一个可怕的念头，这个人肯定是被魔鬼缠扎到死而不能摆脱了。

面对这部书的作者、老朋友孙兴盛，我又想到这个文学魔鬼的话来，然而却不是属于如上所述的几种情况。孙兴盛无疑是被文学这个魔鬼迷住而又被其钟情的一个。

孙兴盛把这部小说手稿拿给我读并嘱我作序，令我惊诧得说不出话来。瞅着他笑眯眯的眼睛，我似乎想看出他眼里是否有被魔鬼缠住的妖氛鬼气。自然还说不到对这部长篇小说的评判，纯粹是他还在搞文学创作这件事本身使我惊诧不已。因为我确切知道我的朋友孙兴盛早在十年前就弃文经商了，用目下的时令新潮用语称作“下海”，而且发了不敢说大也不算小的一笔财。已经发了财的孙先生兴盛兄还在搞创作，而且写出了一部长篇小说，我便在惊诧之后又一次验证了文学这个魔鬼法力无边也魅力无限的感慨。

孙兴盛是陕西蓝田人。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在报刊上发表过不少散文和小说。他自中学念书就喜欢文学而且长期练笔不止，为此而忍受了生活的难以叙说的艰难困苦。他在中国经济刚刚开始“搞活”的初期首先投入，大约是最早“下海”的文人。他的名气不大，自然比不得当代中国文坛几位骁将“下海”引起轰动效应；同样因为他的名气不大，所以想“下海”一纵身就投入了，不像那些大名家们先发“下海”宣言，然后再从马克思那里寻找“语录”以解释自己“下海”的行为不仅完全符合时代精神，也是对某种主义的创造性发展。孙兴盛“下海”那时候不仅缺乏理论准备，而且脸皮也还没有磨厚，显得薄了些，所以任啥话都不说就去做他的小本生意了，比今天才发“下海”宣言才做理论阐释的名家整整早了十年。十多年里他依然做着小本生意，攒下钱盖了小楼，给三个儿子娶了媳妇又嫁了女儿，钱花没了也解除了子女多的负累，一身轻松地又弄起小说创作来。我原以为他发了小财就该再谋着发大财，财迷心窍已经在现代生活中改变了原先的贬义而质变为褒义。我发现孙先生兴盛兄发了财却没有迷住心窍，迷着他心窍的依然是文学这个灰姑娘的眼睛，或者说文学这个魔鬼。

读罢《女人啊，女人》这部长篇手稿，我的直感可以概括为一句话，便是孙兴盛十年“下海”的生活体验的结晶。

今天以前的十年，是中国社会生活社会秩序经济结构发生急骤变化的十年，生活的各个领域都在发生着令人欢欣令人不适令人迷乱甚至令人痛苦的变化。孙兴盛从封闭的山区小镇进入剧烈冲撞着的大都市，闯荡其中，沉浮其中，体验到幽静的山乡所难以感受得到的生活变迁的声浪，经得多了见得广了所闻也复杂了，幸运者和不幸者，胜利者和失败者，成功者和沉海者，笑的和哭的种种人的生活，使他强烈地感受到变革中的生活的全部复杂性，终于凝结成这部动人心魄的长篇小说。

我首先被这部作品的强烈的真实感和生活的真切感所征服，这种真实真切的生活气息的感觉在许多文学作品中已经十分稀罕了。那些被称作塑料花似的作品，我们首先看到的是它的精美和逼真，然而却闻不到花香，一旦辨出它不过是涂了颜色的塑料的时候，便不止于失望而且作呕。读者能够容忍作家艺术功力的稚拙，但绝不能容忍作家感情的虚假，前者是技能问题而后者则是对读者的欺骗和不尊重。

孙先生兴盛兄的生意仍为小本生意。孙先生兴盛兄的创作却弄大了，从小散文短篇小说发展到长篇制作，而且获得了成功。这部小说的曲折的情节和人物命运的浮沉令人揪心，具有很强烈的可读性，这同样是目下被许多纯文学作家所不屑或忽视的问题。小说作品的可读性被忽视甚至被嗤笑，无异于自绝于读者。因为一切艺术品的创造的初始目的和最终目的，都是为着读者的。取悦读者为读者欣赏是最基本的目的，之后才能说到其余较为深层的话题。我以为孙兴盛已经突破了时下某些扭捏作态的小说的传染病，从而使自己和读者直接发生心之交流。

孙兴盛为了生存还在经营小本生意，而生存的目的依然是为着文学。看来他也和我一样，注定是不会也不想摆脱文学这个魔鬼的诱惑了。

1993年6月18日 小寨

大将林立，佳作纷呈

——编稿絮语

一

本期《延河》为陕西作家小说专号。

这里呈献给读者的十二个中短篇小说，是当今陕西文坛最富于创造活力的十位作家的最新创作成果。

本期目录栏里，展示出阵容整齐、大将林立、百花齐放、佳作纷呈的局面，令编稿人心血潮涌，自信而又鼓舞。

二

新时期以来陕西形成了一个人数众多的作家群。按一般推理，组织一期小说专号不应看作难事。而实际的内情却往往有异。陕西确有一帮优秀的中青年作家，他们从黄土高原、关中平原、秦岭和巴山山地冒出来，浴着新时期的时代祥光走进文坛；他们大都出身低微，经历和体验过较多的生活的艰难，真切地感受过生活演进的巨大痛苦和巨大欢乐；他们钟情于文学而且痴情不移，经过了大量的艺术实践和不倦的艺术探索；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在年龄上属于五十上下，进入对生活和艺术体验的成熟阶段，也就进入艺术创造的大释放阶段，这恐怕是他们几乎不约而同地进入长篇宏制的创作现象的最根本的原因。

这样，这个群体的作家在一九九三年出版了大约十二部长篇小说。至于这些长篇小说在中国文学界的褒贬毁誉，都是很正常的现象。他们自己则更注重于总结得失，以便调整自己的笔锋。少几句赞美多几句杂话都不做辩白，他们深感再也浪费不起生命；即使连某个把他们幼时的艰苦生活细节也作为讽刺口实的纨绔口吻也不过付之一笑。

这种大释放的群体性创作态势还将持续下去，可以期待今后的几年里，每年至少都会有五六部长篇问世。在这种情况下，约请他们分出心来写短篇小说，在策划本期专号之初的担心，确实不无道理……无须赘述过程，终于较为顺利地编成这个专号，我们唯一要说的一句话：感谢朋友。

三

说来惭愧，作为《延河》主编，还是第一次阅读一期刊物的全部手稿。徐岳病了，为了给作协节约经费，自己投靠朋友实施医治疗养去了，便由我来编这个专号。他在病中依然牵挂着这期刊物的进展状况，不完全是因为专号的主意最早是他提出来的，而是一个事业型文化人的职业习惯。我终于可以回答他电话和书信里表示的严重关注了。

这就使我得了一次做编辑的机会。我发觉阅读作家们的手稿完全是一种愉悦一种享受。且不说各位作家在作品中的刻意和用心，因为这在作品发表以后同样可以体味。兴趣首先发生在那些五花八门的手迹上，我可以从他们或是规矩到一丝不苟、或是狂飙大草、或是娟秀细小、或是刚柔相济的钢笔字体里，往往能够透见我熟悉的朋友的眼

睛，就在字里行间闪烁跳跃，或豪放，或诡谲，或坦实，或灵秀，或不屑，或桀骜不驯……

更有使我兴趣盎然的兴奋点，便是各个作家手稿上那些删改过的地方。据此我可以猜想他们最初选择的句式字词的用心，又进而看出他们涂抹删节以后改换或添加的新的句式或字词所产生的新的意蕴。这些地方往往可以看出我的朋友思绪中的浪花飞溅，智慧之星的闪光……阅读者自己也屡屡感到了智慧之门被叩击，被启示的欣喜。

四

我读的头一篇作品是杨争光的《蓝鱼儿》。蓝鱼儿是双美丽得令人好奇，令人恶心呕吐，令人畏怯到无法防范无计逃遁只有上吊跳河喝敌敌畏的手指，读罢好久好久都使我陷入一种惶惶不宁的情绪而不能复归平静，直觉是那双手指搔到腋下来了。我读的最后一部稿子是本期篇幅最长的中篇小说《狼情》，程海先生让绰号“狼剩饭”的主人公在篇末放的那一声枪响，又一次震撼搅乱了我的心绪……

一般来说，编者没有多少必要评价本期刊物内容，更不宜三流广告似的瞎吹。最基本的常识是，这样做会给读者造成先入为主的诱导，破坏读者直接阅读的那种陌生化的兴致和情绪。尽管编辑部嘱咐我好生写一点卷首语，斟酌之后还是决定不涉及作品的评价，让读者自己去欣赏去判断为佳。我忍不住说了几句阅读第一篇和最后一篇作品的直接感受，仅出于对那双鬼魅似的手指和那一声枪响的难以承受。好在只是感受而不是评介，还请读者宽恕。

五

《延河》到今年已经流过四十个春秋，这是新中国成立后最早创办的几家纯文学月刊之一。中国当代文学的全部辉煌和所有灾难，《延河》与其他兄弟刊物一样都经历过有幸与不幸。灾难的不幸虽然沉重，终究被翻了过去而成为历史，唯有她曾经闪耀过的辉煌给后来的继承者带来自豪，更多的却是压迫。

《延河》的创始者和一茬又一茬编辑工作人员，以他们的心血在这条既富于革命象征意义又富于诗意的河流里扬波掀浪，以他们的卓越的艺术魄力铸成永久的魅力，为新中国的文学事业做到了一个地方刊物所能达到的极其难能的贡献。《红日》和《创业史》都是在《延河》首先选载或连载而推向全国读者。张贤亮先生的发轫之作《大风歌》在这里刮起，并因此而罹难。茹志鹃的脍炙人口的短篇《百合花》也是在《延河》面世，然后走向千千万万的读者，又通过中学语文课本而陶冶了一代又一代青少年……须知这些作品最初问世的文艺界的气候乍阴乍晴，其风险远非今天的人所能理喻。那些甘愿付出心血承受风险的编辑们现在都老了，退离了这条“河”，有的已经作古，留下的是一摞一摞的杂志和他们亲笔润饰过的业余作者的稿件。

面对当今中国文坛以“四大名旦”“四小名旦”为标志的五彩缤纷的文学刊物，我们久久汗颜；面对《延河》五六十年代的辉煌，我们更加惴惴不安。

压力是最原始的策动力。《延河》将继续流淌，继续前行，终归汇入的自然是中国当代文学的汪洋，为中国当代文学的健康发展和持续繁荣而发出自己的热和光。陕西作家的全部创造活动，也终归是中国当代文苑里的一种或几种花，或者说是这个汪洋里的一滴或几滴水。

《延河》仰仗于陕西中青年作家的支持，并不遗余力地为陕西作家的发展和陕西文学的繁荣而虔诚服务。

《延河》同样仰仗于全国各地作家的支持，迎接八面来风，甘愿为各种艺术风格的作家的创造活动至诚服务。

1994年2月

故乡，心灵中最温馨的一隅

看到编撰整齐的《历代诗人咏灞桥》书稿，心灵深处的某一根最灵敏也最绵软的神经便发出颤音来。及至读完，依然不肯释手，稍有闲适，便由不得拿起来吟咏品咂。有贵人来要我的拙笨的字儿，便把其中我最喜欢的诗句写下来，竟然觉得是一种情感释放而很愉悦，很自豪。

这种情绪说来十分简单十分单纯，这是一本汇集了历代诗家词人吟咏灞桥风物的诗集，灞桥是我的家乡。这种单纯甚至幼稚的儿童心理情感，不应看作是某种自私或狭窄心理吧？窃以为是最纯净最虔诚也最令人心动的情愫。无论普通人乃至将军总统，无论操哪种语言着哪一种肤色的种族，无论他在人类社会哪个领域做出过怎样杰出的贡献，对于故乡的虔诚的情怀都是一脉相通的，可谓人类共性之一。这是一个人的“根”，是一个人丰富的感情世界里的带共性的“结”。我以为故乡情结这个词是生动准确极了，反过来说情结故乡也更具意味。即使那些在故乡受过苦甚至遭过罪的人，可能在他贫困潦倒不堪罪罚的困境里诅咒过故乡，然而多年以后，仍会发觉心灵深处最温馨的一隅，依然还是自己的家园自己的故乡。

去年和今年的陕西电视台的春节晚会节目很精彩，然而留下深刻记忆的却是两个回归故土的老汉。一个是去年春季从台湾回到西安的吼过秦腔的黑发瘦老汉，开口一句“我是长安人”，便把几十年的离苦离情倾泻出来。另一个是今年从吉尔吉斯陕西村归来的白头发老汉，堪称一绝的关中小曲儿，令人倾倒也令人热泪滂沱。

往昔里，我也零星获得过一些古代文人歌咏灞桥的诗词，尤其是关于灞桥柳色的词章，从来也没有机缘读到如此集中的关于家乡灞桥的华簇锦章。与那些介绍灞桥历史沿革人文地理物产的史志不同，这些历代诗家词人留下的诗词所展示给我们的，完全是一幅幅灞桥风光的立体图画，能够让今天的灞桥人了解一二千年前的家乡的风物人情世态，心灵中那根结着故乡情愫的神经便颤颤发音了。

“山开灞水北，雨过杜陵西。”以边塞诗称著的唐代诗人岑参眼里笔下的灞桥河水山原自然气象，恰如大写意的泼墨画。唐明皇李隆基以风流天子的眼光看取这块皇天后土时，更是一片明媚：“洛阳芳树映天津，灞岸垂杨窣地新。”这位留下千古传诵的爱情悲剧的皇帝，在他处于王权鼎盛和爱的胶漆状态时，自然免不了对于贵妃池的迷恋：“远看骊岫入云霄，预想汤池起烟雾。”而更多的文人墨客都以各自的心态和独特的艺术感觉，写下了这块美丽的土地在昔日的万种风情。王昌龄在白鹿原故居安贫乐道凭吊孔子的弟子颜回和原宽，“偃卧滋阳村”时，所透见的便是“空林网夕阳，寒鸟赴荒园”的清淡到几近凄凉的景象。而杜甫的笔端反倒流泻出少见的柔情：“紫燕时翻飞，黄鹏不露身。”勾出来灞河两岸柳林田畴一幅动静有致的生动活跃的图景。“芳秀惬春目，高闲适远心。”（严雅）“读书三径草，沽酒一篱花。”（许浑）“鸭卧溪沙暖，鸠鸣社树春。”（温庭筠）“和烟和雨遮敷水，映竹映村连灞桥。撩乱春风耐寒冷，到头赢得杏花娇。”（郑谷）“一条灞水清如剑，不为离人割断愁。”（沈彬）且不说这些诗的美好含蕴，单是诗中所描绘的令人向往的美好境界，就可以了知作为王都的京畿之地灞桥的生态环境多么可人。灞桥在汉属于上林苑——御家自然公园的腹地，严维笔下灞陵地区“坐鸣松下琴”的环境已无法想象。我自小所见的灞陵山便是秃的。我现在可以以诗索图，灞陵山上，古松参

天，溪流潺潺，灞水浐河，杨柳依依，紫燕呢喃，黄鹏隐现，鸟唱于林梢，鹿鸣于原畔。这是多么让人神往的生存佳境。

然而，建安七君子之一的王粲的诗，却给我们留下了一幅惨景："西京乱无象，豺虎方遘乱。""出门无所见，白骨蔽中原。""路有饥妇人，抱子弃草间。""驱马弃之去，不忍听此言，南登灞陵岸"，"喟然伤心肝"。这是汉献帝时董卓部将在长安作乱时制造的恐怖景象。灞陵是我的家乡，即现今的灞陵乡。而西汉司马相如所描绘的上林苑内八水绕长安的气象却是：纡馀委蛇经营平其内，荡荡兮八川分流，相背而异态。到东汉末年那种恢宏壮阔的景象已不复现，而是遍地哀鸿白骨蔽野的悲惨世界了。战乱毁灭一切生灵，包括人也包括大自然。

这些诗词里提供了许多与灞桥相关的历史典故和美好传说。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坑就在铜人原上，邵平店有关东陵瓜的美丽传说，灞水浐河初春三月水边采兰的动人情景。尤其是灞陵乡韩康，避官避名隐居灞陵山采药救治平民的传说，委实令人感佩。一句"卖药不二价，有名反深耻"的诗，把一个秉正刚直的形象活托出来，成为灞桥人形象的传统典型，真可谓山好水好人亦好。

灞桥是我家乡，生我，养我，培育滋润了我。我有幸在家乡工作二十年，服务不够，却得益匪浅。正是那里的如韩康一样"卖药不二价"的父老乡亲，给我以深刻的影响；在那二十年的乡村基层工作中，我才逐渐加深了对社会和人生的了解和体验；完全可以这样来概括，如果没有那二十年的乡村工作实践，我的全部文学创作都是不可想象的，或者说完全会是另外一种面貌。基于这样一种情怀，我向你们鞠躬了，故乡的父老乡亲。

祝愿家乡灞桥再铸辉煌。

1994年3月21日

小说最是有情物

一

春节前夕，党益民来找我，一张泛红的娃娃脸笑眯眯的，谦恭而又含蓄着羞羞的神色，我一见便有点动情，因为这样淳朴纯洁的眼神在我看起来，恰如原野上的一株未曾污染的树或者更像山间一潭清水。

我看党益民像个工厂或企业的青年职员，问了才知道他已过而立之年，况且是一个有十二年军龄的现役军人了。他拿出一部长篇小说稿，要我作序，我想推辞却怎么也说不出口，尽管此前已经推谢过好几个。主要是那双淳朴纯洁的眼睛，我似乎无力拒绝这双眼睛；如使这样的眼神瞬间转换出一缕失望，那失望肯定会变成一种歉疚印于我的心上，任何时候再见到他都会引起心理反应，负疚的反倒是我了。

我由此而发现，自己其实一直是在期盼如益民这种眼神的。无论为官谋政的舞文弄墨的经营企业的倒腾商品的大腕大款们，无论做工务农行医唱歌跳舞擦皮鞋扫街道拾破烂的芸芸众生们，多有一些如党益民那样的淳朴如绿树纯洁如山泉的眼神，我们的大街上汹涌的人流就会是另一番景致，我们的生活情调就会是一种真正的和谐，我们生存的环境肯定有利于每一个生命的心理卫生。

稀罕而又珍重这一双眼睛，我决定作序。

二

党益民是陕西关中富平县人，父母都是初识汉字的农民，由此上溯几代，也都是初识或根本不识字的农民。党益民很为自己成为这样的家庭的第一位大学士（生）而自豪。在他之前只能用嘴巴和人交流情感的几代父老，看到他们的一位子孙可以用长篇小说和整个世界对话的事实发生时，该当是怎样一种情感淋漓的感慨！

常常可以看到这样的现象，某些书香门第出来的子弟，在某一项事业上有了超越他们父辈的重要建树，有的是他们自己更多的则是社会便把他们成事的因由归结于那种门第里头书香熏陶的结果，甚至更甚者干脆说成是血统的高贵。这是否又走到“文革”中“血统论”的另一个极端且不辩。如果不是抬杠执拗的话，那么，那些书香门第里头更多的平庸之辈乃至不肖子孙又该做出怎样的解释？随着社会的开放和生活的多样化，庸俗社会浅薄的市侩观念也浮掠其中，不以其陈旧肤浅和庸俗不堪，反而标以新潮新鲜确令人缄口默语。其实，无论书香门第、官香门第、富贾门第和平民茅屋破窑里养育的子弟，成事不成事，成小事成大事，做官为民，习文习武或挨枪子，主要还是子弟们自己的事，既有赖于子弟们某些说不大清的先天性智商，更有赖于后天不懈的努力和奋斗。用毛泽东的哲学观称作“内因是变化的依据”。那些愚蠢和顽劣子弟即使泡在墨红和官印盒里也无济于事。

党益民自小接受的是黄土、绿草、牛粪、马尿和酸菜缸的熏陶。他成为一个作家我就尤其高兴。我也许和他熏陶的环境条件差不多，所以我尤其为那些从平民茅屋破窑里走出来并对国家和民族有所贡献的人而钦敬，因为他们几乎无一例外地经历过更多的艰辛。

三

党益民从事文学而且年纪轻轻便卓有成效，又一次验证了我关于文学创作纯粹属于个人兴趣的观点，于此我甚以为得意。

党益民十八岁参军以前是个农村小青年，那里的环境百分之百会把他造就成为如其父兄一样勤苦质朴的农民，在后来农民进入改革大潮的新形势下，也可能造就成为一个优秀的农民企业家或养鸡专业户或跑单帮的生意人。十八岁参军后，百分之百地可以相信他会成长为一位优秀的战士或指挥员。然而他却成了一位优秀的青年作家，按他的生活环境来说这似乎都是不可思议的事。

我只能归之为个人兴趣。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好和兴趣，有人于机械一点即通，于数字的运算十分灵敏，有的人于文学就一触钟情而且痴心不改，甚至历经九死而未悔。这是什么在起作用？恐怕不能用任何功利的因素做出注解，我把它归之为纯粹的兴趣。

这里就涉及文坛当今的一个热门话题。即商潮滚滚的中国还会不会有文学的前途？还容忍不容忍作家文人继续操练小说和诗歌？我不仅从口头听到而且从报章上看到，在深圳在海南这些当今经济最活跃的地区，谁要说文学说诗歌小说，会被人看成神经病。并由此而结论，未来中国经济发展的下一步是容不得文学和作家的。

我不敢否定这些时髦新潮式的预测，但我多少还了解一点世界文学发展的情况，欧美日本这些当今属于经济发达地区的国家，好像文学还在不断发展着，新的流派正是在这些经济最发达的国家创造出来，一部又一部形成世界性影响的杰作也不断创造出来，作家队伍并未削弱更没有消亡的情况发生。属于发展中国家的我们，怎么会刚刚

搞热搞活了经济，就不容忍作家也不需要文学作品了呢？我便大胆妄言，即使有这种情况发生，只能看作是畸形的社会心理和暂时的社会现象，一旦经济得到更充分发展，社会各个层面的人的文化素质进一步提高，整个国民的心理素质普遍健全健康起来，真正的文学更会获得愈加广阔的心理空间。

说到这个话题的另一面，便是对创作这项劳动的理解。创作活动完全是一个人的兴趣所致，所谓爱好，而作品乃是作家的生命体验和艺术体验的一种宣泄或者说展示。那种双重体验一旦产生，一旦强烈，一旦成熟，宣泄和展示的欲望便是无法阻截无法窝死的，比如鸡要生蛋、女人要养育孩子，除非你杀了她。这种创造欲望更不是金钱官位所能改移的，当然这里是指那些对文学痴迷到如生命的作家而言。

所以在我看来，文人“下海”的讨论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对文学没有了兴趣或者说兴趣已转移到经商炒房地产炒股票者，就应该让他到商海中去大显身手，这是很正常的事，因为他已经不喜欢文学也无创作兴趣了。对于那些依然对文学创作兴趣不衰的作家来说，也应该让他充分地展示他的独特体验，大可不必嘲笑他的痴呆他的寒酸，作家自己也没有在款爷面前低三辈的必要。

党益民进入文学领域，便是一种个人爱好和兴趣，他写的长篇小说，便是他在边陲军旅里的生命体验。

四

绕了一个大弯，最后我才回到这篇文章的命题，作家是情种，小说最是有情物。

这个情显然不是单指情爱。

党益民从小小年纪直到而立之年的十余年间，多在祖国大西南的边陲之地驱车驰马，那块对我们来说既感陌生又感到豪迈的高原巍峰，他是千遍万遍看过踏过也拥抱过，汗和血都洒在那里了，情系高原魂系高原是真情实感而不是矫情伪饰。我读这部长篇小说时便感到了人物的鼻息和汗腥，那是一种关于高原和人生的生命体验，这体验里喷薄着炙人的真情。

读者不妨先读“后记”。后记里记述了党益民所亲历的两个战士，两个伟大生命的牺牲过程，催人泪下，揪人心肝。我便完全理解了这部小说产生的因由，那两颗赤诚忠贞的战士的心，不把他们的伟大和美好展示给社会，党益民会长久地寝食不安的。真情要宣泄，生命的体验要展示，而滚滚的商潮和庸俗的喧嚣能卷走吗?

作家是情种。这情就产生于对祖国大地天空和海洋的一种爱，产生于对国家和民族的根深蒂固的爱，产生于对国家和民族的每一个灾难的刻骨铭心的痛心和对每一项成就的由衷的礼赞，产生于对这个民族的每一个优秀分子的崇敬，产生于对国家和民族明天的发展前景的美好期待。作家的灵魂世界是一片绿地，不受包括铜臭在内的污染，才能迎风起舞，才能感受阳光和风的抚育而情生万态。

小说便是作家那种情的宣泄。

党益民的这部长篇小说我以为便是此属。

沟通，我的期待

——《白鹿原》韩文版序

人对自己生命历程中发生过的许多“第一次”的事情总是难以忘怀。

对于以文学创作构成生活主要内容的我来说，第一次发表处女作，第一次出版小说集子，第一次获奖，第一次写长篇小说《白鹿原》，如此等等，尤其记忆犹新，也尤其珍重。现在，韩文《白鹿原》作为第一种以外文翻译的版本在韩国率先出版，无疑将储入属于我难忘的“第一次”的记忆序列之中。

之所以如此，概出于我对创作这种劳动的理解。作家创作的初始目的和终极目的，其实都是为了与读者达到一种心灵的沟通和情感的交流；作品是作家生命体验和艺术体验的一种结晶或者说一种展示，是实现与读者沟通和交流的媒体罢了；能够达到这种交流和沟通的读者愈广泛，无疑是最令作家感到欣慰的事，比得到任何文学奖都珍贵。《白鹿原》以韩文在韩国出版，意味着我将与朝鲜族韩国读者可以进行交流和沟通了。我很看重这件事，也仅仅只珍重这一点。

金成奎先生拖着一条病腿，冒着严寒从韩国到北京再到西安，与我商谈翻译出版《白鹿原》的事，很使我感动。在此书即将于韩国面世之际，我向金成奎先生表示钦敬和谢意，是他的真挚的热情和不懈的工作，才促成了我与韩国读者能够实现如上述的那种心灵的沟通和情感的交流，而且是在两个相邻的民族之间……愿他的腿疾早日康复。

虔诚地期待韩国读者朋友的回声。

1994年4月8日 西安

虽九死其犹未悔

早就想写一点有关志安的文字，从他离开当代文坛的时候，就产生过这个念头，直到他周年已过，我依然提不起笔来。我后来很清醒地意识到自己情感的脆弱畏怯，因而无力触动情感世界里的那一潭水。我推着未写，实际是一种逃避。这种逃避痛苦的情况已不是头一次发生，六年前，我的尊师挚友蒙万夫刚交五十猝然谢世，那时志安还写过一篇心情沉痛而又激越的悼文，而我却是一周年后才写了一篇回忆与蒙交谊的文章。路遥逝去后，我除了在告别仪式上那篇极简短的悼词，后来也未再写什么文章，其实有许多往事至今依然难以忘怀。志安的死亡更加深了我的心理畏怯，以致那情感脆弱到不堪一击了。

我已经不再单纯把疾病看作是病魔，无论是蒙万夫先生的心肌梗死，无论是路遥的肝硬化腹水，抑或是志安的肺癌，不单是病魔，简直可以说是一个专门谋杀天才的阴毒的鬼魅。鬼魅无形，残害天才和善良却绝不放手松口。然而我终于获得了掀动那一潭情感水波的勇气，这就是陕西人民出版社要出版六本志安的以爱情为主题的系列探索性长篇小说，并要我作序。我欣然应诺，连自己适宜不适宜作这个序都不顾及了，这勇气显然不单是来自于个人情感，而是来自于读者。读者在作家邹志安去世后所触发的巨大的社会同情，《文学报》发起的募捐活动响应者二千余人，作家和文化团体惺惺惜惺惺且不说，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募捐者几乎包括了社会分工中的所有职业层，尤其是那些退休干部工人和中小学生。我曾经在接过《文学报》主编郦国义先生送交的捐助者名单时心里一沉：鬼魅无形，读者有情。

去年以来，邹志安有三部长篇小说遗稿在他谢世后相继出版，引起读者更大的兴趣和热情，书的销量可观。欣慰的同时我也惊讶不已，我清楚这三部长篇是进入九十年代的新作，陕西人民出版社这次重新出版的六部爱情探索系列长篇均为八十年代后几年的作品，此前他曾写过二百多篇短篇小说和十几部中篇小说，且不说文字总量究竟有几百万，单是几部长篇的数量起码在陕西当代中青年作家中是遥遥领先于所有生者和死者的。所有这些创造性劳动成果全部是在新时期以来的十三四年间完成的，是在他三十二至四十六岁这个黄金般的年龄区段里创造出来的。我惊讶一个人竟有如此巨大的艺术创造能量，也钦佩他如此巨大的创造热情，智慧和天才且不论它。

在我看来，作家的全部创造理想和生存欲望，概莫能大于读者对其作品的理解和接受，作家从事创作劳动的全部意义或者悲剧都在这里。这里就触及对创作这项劳动的理解，不过是作家艺术家把自己对社会历史和现实的生活体验进而到生命体验所形成的各个迥异的独特体验宣泄出来，凝成一部小说、一首诗歌、一出戏剧、一幅绘画、一曲交响乐，以期与读者或观者听者进行心灵的沟通和交流，文学和艺术作品不过是实现两颗心灵交流沟通的媒体。文学艺术沟通古人和当代人，沟通各种肤色各种语系的人，沟通心灵，这才是从事文学艺术工作的人痴情矢志九死不悔以致不惜生命而进行创造活动的全部缘由。这样，我才能更贴近杜鹏程创作《保卫延安》和柳青创作《创业史》的本体实质；这样，我也才能更贴近邹志安十数年间创造出五百多万字的文学作品两次获得全国大奖的本质性内容。

又有谁能理解，进行着如此巨大劳动的志安，是嚼着酸菜喝着苞谷糁子进行这样沉重的劳作的呢?

我和志安大约是先后一年为妻儿转办了城市户口，因为我在西安郊区办事较方便，户口虽进城了我依然住在乡下，图得个耳根清净。志安把妻小户籍转入城市随即举家由礼泉老家搬到西安。他搬来老母妻子儿女和侄儿的同时也搬来了酸菜缸。乡村人腌制酸菜的粗瓷大缸便堂而皇之搬进省作家协会的家属楼。这个时候初获经济改革实惠的城市居民悄然兴起了新“五大件”取代旧“五小件”的家庭革命。然而作家邹志安此时还不能废置或淘汰酸菜缸。凭他不足百元的工资和低微的稿酬，要维持一个六口之家和接济残疾弟弟两口的生活，就只能继续乡村农民苞谷糁子就酸菜的水平。鲁迅先生“吃的是草挤出的是奶”，志安吃的是西北人用萝卜缨子红苕叶子腌制的酸黄菜，挤着大量的奶。

即使这样，在他身患绝症的一九九二年春天，他依然应《文学报》和《陕西日报》联合征文写下了那篇《不悔》的短文。那时候，中国文坛正七嘴八舌讨论“文人下海”的新兴话题，原因是商潮滚滚的现实使文人们感到了生存危机和某些心理上的不平衡、不自在。那时候，陕西文坛与志安先后起步的作家哥们弟们，对他不幸被无形的鬼魅擒获而扼腕长叹，动心的叹惋里也包含着善良的抱怨，抱怨他写得太急、太猛、太不注意劳逸适度了。我也在第一次去医院看他时这样抱怨过。当我读到短文《不悔》时便哑然，那种痴情于文学的专注和强悍的精神，使我的心受到强烈的震撼。那是对生命意义的一种更高境界里的独立理解，绝不混同某些庸俗和市侩的患得患失斤斤争逐。这个《不悔》支撑着他原本并不雄健、当时已经开始憔悴的身体，而那躯体里依然灌注着某种魔力，我看得出来还是文学这个魔鬼。他要把自己对这个世界的体验宣泄出来展示出来，把他体验到的这个世界里的全部美好和卑鄙、欢乐与痛苦、崇高与龌龊、鲜花与蛆虫，展示给他热切关注着的父老乡亲兄弟姊妹，与他们交流和沟通。

在生与死的阴阳交界处，他沉静如铁地宣布：不悔！

庸俗的我还能再抱怨他什么呢?

写到这里，我的眼前便变幻着志安的种种眼神，有激烈辩论时生气逼人的灼灼之光，有慷慨陈述艺术主张时的睿智，有沉醉忘情于乡野逸闻笑话的顽皮，有搞点小动作捉弄某个可笑角色的诡谲，有倾心谈叙心事情曲儿的忧伤。然而留给我最难磨灭的却是两种眼神。大约是他写这六部爱情系列长篇那几年间，记得某天早晨我从乡下蛰居处回到作协大院，在门房取信时见到志安，两只布满红丝的眼睛像是传染了红眼病，我问他是否感染了，他摇头坦然地笑笑说没有。我便肯定他是夜里熬得太久了。我知道他的写作习惯，常是夜里三点钟爬起来写东西，在任何场合都可以干活，一直写到次日上午。几次出外开会同住一室，天亮时我就睁眼看见他伏案疾书的背影。那时候他的爱情探索系列大约正写到欢处，一本又一本抛出来，熬红眼睛似乎已习以为常毫不在意。

难以忘却的第二种眼神一想起来就令我凄凉，在他垂危之际我去看他，把我们能想到的让他揪心的四件事一一明确告诉他，让他放心。他已处于半昏厥状态，一阵清醒一阵昏迷，口腔已不能发出一丝声音，判断他清醒或昏迷的标志便是他的眼神。那眼神已经失去光泽而笼罩着一片昏暗，当黑色的眼球基本可以固定在眼眶中央时，他是清醒的，我便抓住短暂的机会说出关于对他老母亲的生活安排，他便点一下头。当那黑色眼球翻转上去隐没起来时，我说的事就毫无反应，他又昏厥了。他已走到生命的最后一步，微弱到连眼球都不能自控了。四件关于老人妻子儿女等生活工作安排的事间断了几次等待了好久好久才交代完毕，也包括我的几次哽咽说不出话而耽误了他清醒转来时的机会。

垂死者留下的凄凉是我的。

生的欲望直到垂死的最后一刻依然在那眼神中忽游闪现，并因其不可逃躲最后的破灭而更显得凄楚动人，那是一种不息的强烈创造欲望破灭时的依然顽强的信念：不悔！

文学这个魔鬼啊！

我不想再多回忆几十年来的相识和相交，可资回忆的往事太多了。七十年代初，我们几乎同时在陕西地方文学杂志上发表图释“阶级斗争”的小说处女作，我们共同欢呼中国文学艺术的春天的到来，我们又是几乎同时进入陕西作协专业作家的队列，我们无数次一起去参加种种文学集会且同居一室。我们友谊甚笃也免不了争执，我们互相信赖也发生过猜忌，然而终究都化解冰释了。在他逝后一年，他生前的一位好朋友赵润民找到我，谈志安病危时他去看他，志安向他说了几句关于我的话。赵润民刚说了一句我便潸然泪下，并制止他再继续说下去。这样的话听一句就够我受用一辈子了，多听一句就觉得心灵承载不起。赵润民说他想看到我写志安的悼念文章。越是这样，我越发不敢触及如本文开头所说的那一泓情感的潭水。我又想了，写了又能如何？不过是给活人看的，对于失去至亲也失去精神和生活依托的老人妻子儿女来说，现在最需要最难为的自然是生计问题。为了不能忘怀的那两种眼光，我是想尽到一个同志、同行、朋友的心意去做一些事。

往事如烟、如潮、如泪、如血。这篇序文显然不是我倾泻那种交织着血雾泪潮的地方，依然潜存心底。但有一件事却忍不住要写。我的母亲陪女儿念书先我住进城市，母亲住不惯是可以理解的。她和邹志安母亲在同一条巷道里也不知怎么就认识了，彼此谁也不知道她们

的儿子是交谊可以的朋友。她们是在视对方肯定来自乡下可以说话时自然认识的，因为她们两位老人的穿戴包括说话的神气和走路的姿势都保存着乡村风姿，与那些城市老太太在一切方面都迥然各异，像动物可以嗅到同类的气味一样互相靠近而结伙成帮了。她们成了朋友并开始频繁地互访活动，她操着礼泉口语，我母亲则是灞桥土著，些小的方言差异不能构成阻碍。有一次，我发现案上有一包苞谷糁，母亲说是“志安妈拿来的，今年的新苞谷糁”。我大为感动，一包苞谷糁竟然令人动情。

志安去后，我多次去其家看望那位老人，每一次都向她发出邀请，请她到我们家去和我母亲聊天拉闲话，用意是不言自明的，而且说明我母亲因高血压腿脚不灵了，况且我的楼层低。这位老人一次也未登过我的家门。去年中秋节时我又发出邀请，不料老人家哭出声，说：“我想去哩我想去哩我咋不想去吗！我去看见你跟你妈在一搭，就想起我娃。我娃这阵儿在哪搭哩……”我听了几乎心肝碎裂，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作为志安的朋友，我虔诚地感谢陕西人民出版社，你们为志安终其一生而不悔的事业的血泪结晶提供了重新走向读者的机会，这些作品我已无意评说，让它们走向广阔的心理空间吧；作为志安生活体验、生命体验、艺术体验的一次排炮般的展示，相信会沟通无以数计的男女的心灵。这样，我在面对他的眼神和那位老妈妈的眼睛时，自觉可以能够既不虚伪于艺术也不虚伪于人生。

1994年6月14日 小寨

铁骨柔肠赋华章

读罢朋友送来的刘广明同志的《春晖集》诗稿，我很惊讶，作为一个省的高级人民法院院长的刘广明同志，他肩头扛着的天平上累摞着怎样沉重的负荷，怎么会有闲情逸致吟诗赋词呢？而且不属于那种一时兴之所至的偶然所得，而是赫赫然有这么厚一大本。我便想到，这位肩负天平手执利剑的院长，确是常怀诗心的一种高尚而又浪漫的生命境界了。

《春晖集》所收录的诗，概括起来，可以说涉及作者工作和生活的一切领域，是一种情怀的自然泄露，是一个人的坦坦荡荡的心境的折光。

在这本诗集里，抒写作为一个省高级法院院长的工作中所包含的神圣职责的独特体验的诗篇，占有很突出的位置。显然不完全是一个省只有一个高级法院院长的缘故，而且更关键的是怎样的一个院长，而且还要有一颗诗心，才能产生出那种作为一个高级法院院长的独特体验。《办案一日行》：

日出驱车三百里，

听取汇报在旋即。

勘察鞫讯过正午，

座谈询问至日夕。

月下敲门访群众，

灯前研析邀同知。

未抖征尘坐睡去，

梦中忽报好消息。

这是一首忠于职守的诗，案情突发，催马扬鞭，踏勘现场，走访群众，废寝忘食，直至一句“未抖征尘坐睡去……”读来真是见景而动情了。作者写下许多此类诗篇，有的是为复杂案情绞尽脑汁，有的是抒发获得重大突破后如柳暗花明的心境，有的是对犯罪分子惨无人性的罪恶的切肤仇恨，有的篇章直抒镇压顽凶的凛然正气。单是这些诗篇的名字就是很突出，《阅卷入境》《除霸吟》《除害》等。阅读者不仅每每被作者的真实情感所激发，自然也对法律工作者忠于肩头天平的崇高精神而钦敬。这些诗中宣泄的那种“严惩罪魁彰国法，不负百姓推举情”的凛凛威严之气，正是因为“国徽庄严悬心中”，“人间正气荡乾坤”。

另有一批写同志情战友爱以及家庭儿女情长的诗篇，相当动人，让我一下子就透视到了这位铁面铁骨的法官的柔肠慈心了。在写给同乡同窗好友的一首诗中，“畅饮长叙至夤夜，支床展被抵足眠。”久别重逢的同志朋友，何等亲密无间，又是何等生动的友情写照。一个对国家对人民承载着重大责任的人，对威胁人民生存生活的顽冥不化分子，必须冷面铁骨毫不手软，另一面就是对同志对人民的自然流畅朴实无华的真情，没有至爱就没有至恨，没有对人民的慈心柔肠就没有对危害国家和人民利益的顽劣之徒的冷面铁骨。

儿女亲情更能透视作者的胸怀。这类诗中有祭奠父母亲的，有的类似于陆游《示儿》的篇章。一个有重大社会责任感的人，自然最清

楚应该培养自己的子女成为怎样的人。“松柏青翠话雷锋，碑前鞠躬叩英灵。今携子女同瞻仰，愿犊鹏程慰同庚。”刘广明同志与雷锋同龄，切切期盼儿女继承雷锋精神，成为雷锋那样情操高尚的人。有一首写给女儿生日的诗和旅程归来，儿子女儿乱翻提兜的动人情景，真是写活也写透了儿女情。一句“谢客摔盆棺木头，披麻戴孝扶灵走”。蕴含着乡村丧葬风俗，也蕴含着这位大法官对父亲的巨大悲恸之情。这里使人自然联想到鲁迅先生的名句：“怜子如何不丈夫。”刘广明同志与所有同代人一样，扶老携幼，抚育子女成人成才成为对国家和民族有用的栋梁，也要侍奉苦累一生享受甚少的父母，这不仅是我们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任何一个未失去爱心的丈夫的最动人的如水柔肠。

更有大量的篇章写他行旅祖国东西南北中的大山高原莽川和大江长河的即景即兴之作，依然是对祖国山河的赤子之情和对未来的坚定信念。

中国历来主张“诗言志”。现在一些流派似乎以不言为时尚。我以为这是对诗的理解上的分歧，不愿意以诗言志者可以去朦胧，想以诗言志者也应容忍他们酣畅淋漓地抒发情怀，谁也不要勉强谁，诗坛才能百花齐放，姹紫嫣红。

文学在我看来是一种兴趣，仅此而已。诗是文学的一种体裁形式，自然也是一种兴趣。有人兴趣大到非诗非文学便难以生存，他们便痴心不悔创作小说、诗歌、戏剧等。中国文学需要这样一批文学的殉道者。然而更有大量的无以数计的爱好文学的人，他们有自己报效国家的神圣的职业，在业余搞点不完全是为发表的文学作品，首在抒发一种情怀，次在陶冶情操，使自己高尚起来。如刘广明同志者，即属其例，我很钦佩他的为政为文的品格。

1994年6月13日 小寨

文学是一种沟通

——与莫斯科大学留学生汪健的通信

尊敬的陈忠实先生：

我是一个公派的留学生，现在莫斯科大学攻读语言文学硕士学位。我一直是您的一个忠实读者，您的每一部作品几乎都拜读过，其中尤以《白鹿原》为把玩之最。当我把您的《白鹿原》的大致情节译给我的论文导师后，他也极为感兴趣，并建议我与您联系，写一篇关于《白鹿原》与肖洛霍夫《静静的顿河》相比较的论文。这的确是一个很有趣的题目，两部作品之间有着极为相似的轮廓，又各具民族性和民俗性。

现在有几个问题需要向您请教：

一、您是怎样看待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的？《白鹿原》中“黑娃”这个人物与《静静的顿河》中的格利高利·麦列霍夫是很类似的，您在创作中是怎样选择这样一个主人公的？

二、在您的文学创作过程中，有哪个作家对您的影响最大？

三、“格利高利”是肖洛霍夫作品中的“唯一”（他没有再写过类似的主人公），那么，您是否在以后的作品中再现另一个“黑娃”呢？

四、您的作品是否翻译成其他语言？

殷切地盼望着您的回信。

汪健

1994年7月13日 莫斯科

汪健：

您好。七月十三日的信诵悉，请释念。并致以遥远的问候。

您我素不相识并不重要。您“几乎读过”我的“每一部作品”尤其令我感动。这主要是出于我对创作这项劳动的理解，即：对于作家来说，他是用作品和这个世界对话的，作品其实就是他的从生活体验进而到生命体验的一种展示，而展示的最初的和终极的目的都是为了与读者进行交流和沟通，能与读者完成这种沟通和交流才是作家劳动的全部意义所在。进一步说，文学沟通古人和当代人，沟通着不同肤色操不同语言的人，沟通心灵，这才是从事文学创作的人痴情、矢志九死不悔的根本缘由。从这个意义说，您我早已是知心朋友了。谢谢您对《白》书的理解。现在就您提出的几个问题逐条答卷。

一、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是我阅读的第一部外国作家的翻译作品，这是我在读完初中二年级那年暑假里读过的。从此我便不能忘记一个叫作哥萨克的民族，顿河也就成为我除黄河长江之外记忆最深的一条河流；一个十六岁的乡村少年竟然感觉到了自己并不复杂的生活阅历与顿河上的哥萨克有诸多相近相似之处，自然包括风俗文化以及生活的痛苦和生活的欢乐。我的眼界也一下子从家乡门口的灞河扩展到连方位也难以确定的顿河草原。我不必赘述这部史诗如何如何，只是简单地告诉您我当时的阅读直感。我对俄国和苏联文学的浓厚兴趣也是从阅读《静》书引发的。这部小说大约是一九六二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我的阅读在获奖之先四年。之后直到现在，我没有再

读第二遍，主要是我把有限的阅读时间和热情投向世界上较为陌生的新作品。

黑娃是《白》书中的几个主要人物之一。算不得第一号，而葛利高里（格利高利）却是头一号人物。我只是按这部书的总体构思来设计各色类型的人物，黑娃是我所理解的白鹿原上的一种类型。他的最基本的诱因当然是我长期生活体验和生活积累的结果，直接的诱因得之于我对家乡周围三县蓝田、长安、咸宁地方党史文史资料的整理收集。

最初的构思和后来的整个写作过程中，似乎没有想到过葛利高里。书出后，国内有个别评论家提到过黑娃曲折的人生道路与葛利高里的某些相通之处，还有人把他与《百年孤独》作类比。我没有太多去思考这种现象，主要是觉得，作家尽心竭智所要塑造的某个民族的富于典型意义的人物，可能总有某些相通之处，因为人类无论哪个种族何样肤色，其作为人的本性是相通的，对美的追求和对恶的奋争，各个民族争取合理的生存状态的斗争历程，也有其本质的相通之处，形式和色彩的差异而已。

二、我所崇拜的作家随着我创作实践的发展不断变化。初中二年级对文学发生兴趣时，我顶崇拜赵树理，这一年里我从学校图书馆借阅了赵树理截至那时所出版的全部长、中、短篇小说，以为这就是世界上最可尊敬的最伟大的作家了。到当年暑假读过《静静的顿河》，肖洛霍夫又成为我崇拜的第一位外国作家。从六十年代初到八十年代初，我因为对《创业史》的钦佩自然联系到对柳青的崇拜，这是我们陕西籍的一位当代作家，也是我崇拜时间最长的一位。我崇拜柳青，却从来也没有拜访过他，只是在两次文学集会上听过他的演说。我以为，崇敬乃至崇拜一位作家的最虔诚的行为便是研读他的作品，他的

全部思考和艺术理想全都灌注在他的作品里，尤其是作为他艺术成熟象征的代表作，研究他的作品便可以获得他的艺术精髓。至于登门拜访仅仅只是一个感情联系的形式，所以绝对不会超过对其作品的研究。

关于崇拜，我更深的体会便是，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在你对某人发生崇拜的时候，同时也就要准备尽快走出被崇拜者的巨大阴影。崇拜是一种学习，在获得了被崇拜者的精神和艺术精髓以后，融会为自己的新的艺术启示，就要尽快走出被崇拜者的阴影，摆脱被崇拜者的巨大吸盘，去走自己的路，去开拓只能属于自己的艺术天地，去实现自己的艺术理想。如果不是这样，而是长期蜷伏在被崇拜者的巨大艺术阴影底下，你所能做的便是对被崇拜者的艺术重复，不仅对自己来说有渎于创造的神圣含义，对文学界来说只会造成艺术创造的萎缩。

三、我创造的黑娃只有一个，以后的作品再不会有这种类型的人物了。在我看来，重复别人是作家的悲哀；重复自己则是缺乏艺术创造勇气的表现，更悲哀。按我以往的创作习惯，完成一部作品之后，便对其中的所有内容和人物搁到一边去了，兴趣和热情随之转移，投向陌生的生活领域和新的陌生的人物。用农民的话说，我对在熟茬子地上反复耕作兴趣索然，对未曾开拓的生茬子荒地充满陌生的惊喜和热情。

四、《白鹿原》去年已在香港和台湾先后出版，据那边过来的文化人说，发行销售不错。台湾另一家出版社随之又出了一本中篇小说集《地窖》，因为读者对《白鹿原》的兴趣而引发起对我其他作品的兴趣，《地窖》据说发行也不错，有一本短篇小说集正在排印中。这是中国的两个地区，同种同文，不算外文翻译，但也确实是两个特殊的地区。

《白鹿原》已有韩国和日本两家出版公司分别于去年和今年春签约，目前正在翻译和排印中，预计今年下半年和明年初在韩国和日本出版发行。美国一家著作权代理公司正在洽谈用英语在美国出版的事宜，有的条例正在洽商。

专此复述，祝您进步、愉快。

握手

陈忠实

1994年8月14日

文学依然神圣

王愚副主席代表省作家协会主席团发布“炎黄文学奖”的新闻消息时说他很激动。我也很激动。本届主席团终于可以向陕西文学界以及殷切关心关注陕西文学事业的各界朋友说，我们为陕西作家群的发展做了一件实事。

我想引用去年六月作协换届会议上我代表新产生的主席团向大会所致的闭幕词中的一段话：“本届主席团受命于五百多名会员代表的委托和信赖，首要的任务就是巩固发展壮大这个群体，我们将把改善作家创作条件和生活条件作为最现实最迫切的一件工作提上议程。做这种努力的初始目的和最终目的只有一个，就是保证现存创作队伍的完整并使其更加雄壮，使这个群体的每一个人都能进入沉静的艺术创作状态。”

我当时所做的这个承诺，或者说吹下的这个牛皮的背景是，陕西以胡采、柳青、王汶石、杜鹏程、李若冰为代表的一代辉煌于新中国文坛的作家已经卸任，有的已经谢世；他们尤其在晚年对包括我在内的中青年作家所倾注的真诚的扶助，有口皆碑；这种以文学事业为己任的优秀传统必须由新的主席团继承下去，贯穿始终。其次就是陕西作家群连失两员主将路遥和邹志安，他们终其一生所从事的艺术创造的个人悲剧是欠下一屁股烂账。前年的陕西文学界被看成是悲怆的黑色的一九九二。请同志们不要轻易淡忘那一段不寻常的日子，才能理解我上述重提的闭幕词的背景和含义，才能理解王君先生为陕西文学界慷慨提供巨大资金设立“炎黄文学奖”的深远意义。

新一届主席团产生了，由我吹的牛皮和由我向文学朋友所做的许诺，既压在主席团头上，也不可避躲地压在我的头上，所谓“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既在其位，就得承担责任。尊敬的朋友们，我终于可以向大家说一句：虽然艰难，这件对陕西文学创作将会产生重大影响的实事终究办成落实了。

我这里首先向提供这项奖的王君先生表示真诚的钦敬之意。他的事业应该说刚刚展开，他要做的事和所需的投资肯定很大，而能毅然拿出一笔数目可观的资金资助陕西文学事业的发展，显然不是出风头，不是为了某种效应，而是一种富于远见卓识的坚定的举措。这就是：一个处于经济腾飞和新的机制形成的充满活力的民族，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或缺了文学。作为一个有理想有道德有操守的医学专家，王君和我一样坚信，一个没有文学艺术的民族无论经济怎样发达，也不会是一个完美的优秀的民族；一个有雄心在经济上独立强大于世界的民族，也应该有最优秀的文学争艳于世界文学的神圣殿堂。他决定出资资助陕西文学事业的举措，在商潮和金钱把科学、教育和文学艺术冲击得不再那么神圣的时候，我感到了一种悲壮。

在商品经济日趋活跃，社会生活也呈多样化发展中，纯文学已经面临挑战。所幸的是陕西省委对陕西文学发展的正确指导和恰当的方针，对陕西当代作家创造劳动的理解和尊重，才造成一种百花齐放的健康的艺术创造氛围。所幸陕西这一茬中青年作家谨于操守，依然不悔自己对文学的崇拜和对事业的虔诚，保持着一个基本整齐而又雄壮的创作群体。我和主席团的同志们完全相信，陕西作家艰苦卓绝的创作精神，绝不是纯文学领域的“最后一个渔佬”，或者说最后的“麦田守望者”。我们的参照系是，经济最发达的欧美国家和地区，并没有因为经济的发达而消灭文学，反而是当代世界文学中最具影响的作品正是

由那里的作家创造出来的。中国的经济刚刚起飞，文学便掉价作家便遭冷落，实际是一种很不健康的社会心理。经济获得更大发展，国民素质获得进一步提高的中华民族，必将要创造一个文学艺术辉煌灿烂的新世界，任何市侩的短视的眼光和浅薄的议论都会过去。陕西作家不悔的操守和不懈的创造性劳动，构成了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倒是应该在较大的创作量的基础上，树立清醒的精品意识，以报偿如王君先生一样热诚关心文学的朋友和读者。

我们满怀自信，真正意义上的文学依然神圣。

1994年9月1日

《梆子老太》后话

最近出版的《梆子老太》这部中篇小说是我十年以前写的，编这本书时又读一遍，颇多了一些感慨。这部小说发表后有些争议，有朋友说好，好在挖掘人的灵魂了，触及民族的某些痼疾了。有朋友说不好，怎么能如此辛辣地讽刺一个“贫下中农老太太”？创作误入歧途了。这样的争论搁到文学已经大进步的今天肯定不会发生，但在八十年代初却是很认真很严肃的争论。这使我想起八十年代初诸如男孩该不该留长发，男女青年该不该穿喇叭裤扭迪斯科的争论。争论的内容相去甚远，而争论的本质却是一样的。现今回想起来，竟有一种恍若隔世的慨叹。

这样的争论依然没有停止断绝，只是形式有所不同而已。这种争论的不断发生，又很清楚地表明生活演进的轨迹，不是简单的生活现象的重复，而是每一次争论的自然消亡和新的争论的产生，都无可置疑地标志着社会的进步和人的心理的更深层的解放。文学的发展亦然。

梆子老太的心理痼疾，作为一个单个的人，不会引起我太多的兴趣。问题恰恰在于，这种不健康的心理，正好造成不正常的政治能够得以疯狂起来的温床，也最容易被不正常的生活所扭曲为一种畸形的灵魂，这种畸形的心灵又会以令人难以理解的恶的方式再去扭曲别的人和整个社会。健全而又健康的政治是属于人民的政治，它的最根本的职能就是培养具有健康健全的国民的素质。而我深感欣慰的是，我们现在正在建设的生活，肯定不会纵容如梆子老太那种心灵膨胀再膨胀了。

生活在今天的年轻人，没有经历过“文革”和“四清”的灾难，恐怕很难理解梆子老太的行为。了解一下这种心灵也不无好处，起码可以看到我们的生活曾经发生过怎样令人哭笑不得的灾难，从而更增加推进新的健康的社会朝前迈进的坚定性。

至于其他各部小说，让读者自己去评判吧，我只是有感于《梆子老太》发表十余年来的一些变化，仅此慨叹而已。

最好的纪念

——陕西名家丛书序

到今年十月，即这一套书面世的时候，陕西省作家协会满四十岁。

按时下的生活新潮，四十周年该当大庆祝。然而我们这里的人，似乎对那种大张旗鼓大吹大响大轰大嗡的庆祝形式缺乏兴趣，便不想随那种厂庆校庆刊庆的热潮而逐流。但确实还是想庆祝一下，毕竟四十年了，很不容易的，于是就策划着用这一套书来作庆祝。

四十不惑，这是说人。然而对于一个作家文人会聚的文学团体来说，何尝又不如是。四十年风雨坎坷，四十年大起大落，无论是对于某个单个作家，还是对于这个由作家文人聚集的社会团体，都会有诸多不惑的警悟。

四十年里，陕西始终作为一个文学大省，两度辉煌，一度黯淡。以柳青、杜鹏程、王汶石、李若冰、魏钢焰为代表的陕西作家群，以其杰出的小说散文创作辉煌于新中国的文坛。新时期以来，陕西成长起来一支更庞大的中青年创作群体，他们的创作成果早已引起文学界的普遍关注和读者的广泛兴趣。最黯淡的日子当属“文革”，从那些享有世界声誉的作家到编辑和工作人员，全给一锨铲起抛到炼狱里去了。当然，这不单是陕西省作协的个别性灾难，所谓“倾巢之下岂有完卵”。然而，在阴霾荡除以后，那些以生命相托于文学的作家又重新集结，那些把生命理想也寄托于文学的青年作者更加踊跃，真可谓十年

悲歌十年生聚，再度辉煌，终于步入这个砸不烂更痴情的文学团体的不惑之年。

尤其令人鼓舞的是，这一代陕西作家在近几年间进入一种艺术创造的大释放状态，把他们的生命体验和艺术体验展示出来，造成了一个省的文学创作的鼎盛期。这种群体创作的大释放状态肯定还会持续下去，可以期待有大作品问世。

无论老一代作家和这一茬中青年作家，他们的全部创造性劳动成果，都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陕西作家的作品带有普遍的地域特色，艺术上也有着迥然不同的个性，成为当代文学百花园里的西部之花。

这三种五本书里选编的中短篇小说和散文作品，是四十年来最具成就也最具影响的作家的代表作，还有一批更年轻也更富于艺术创造活力的青年作家的发轫之作。把这三代作家的代表作汇册出版，无疑是可以看作陕西省作协四十年历程的一次回顾性展览，作为我们献给读者的一份礼物，自觉以为是对四十周年的最富诚意的纪念和庆祝。

1994年9月

不妨极端，自成气候

——我看成章散文

专门参加散文作家的研讨会，我还是第一次。这次研讨会由四家单位联合举办，说明大家很重视成章同志。会议开得很好，人到得很多，气氛很热烈，这本身就证明成章同志成功了，这就够了，我为成章感到骄傲。

成章的散文已经形成气候。他能在散文泱泱大国、大省中挺立起来，很不容易。成章的散文具有独立的体例，叫人一看就知道是他的散文。这种特色之所以能形成，我认为是成章对生活有独特的体验。这种特色概括起来讲是：壮气、大气、内秀。没有哼哼唧唧、矫揉造作之气。文章写得真诚坦率，与他的整个生活体验是一体的。在我看到的一些散文中，人物的对话写得十分精彩，人物的性格、文化、神韵、感情、蕴含都表明了出来，耐人寻味，非常感人。所以读成章的散文往往给人以快感的享受。能收到这样一个效果，没有对生活的真实体验，没有才气是做不到的。因此我说成章的散文有才气，而且有大才气，这是一个鲜明的特点。再是成章的散文风格别具一格。一个作家写文章给千万个读者读，十个百个评论家评，品尝口味不同，不可能满足所有人。川菜好吃不是大家都能接受的，粤菜很好吃也不是所有人都能接受的。艺术也是这样，不可能是一个口味。对成章这样气质的作家，要求他写得精细，写精雕细刻的那样一种文章，显然不属于他个人的气质，也不属于他的艺术。作者对艺术的体验和感觉是各种各样的。他的每一篇文章，哪怕是五百字的短文都有他独特的表现形式。我们不可能要求贾平凹去写像成章那样的散文，也不可能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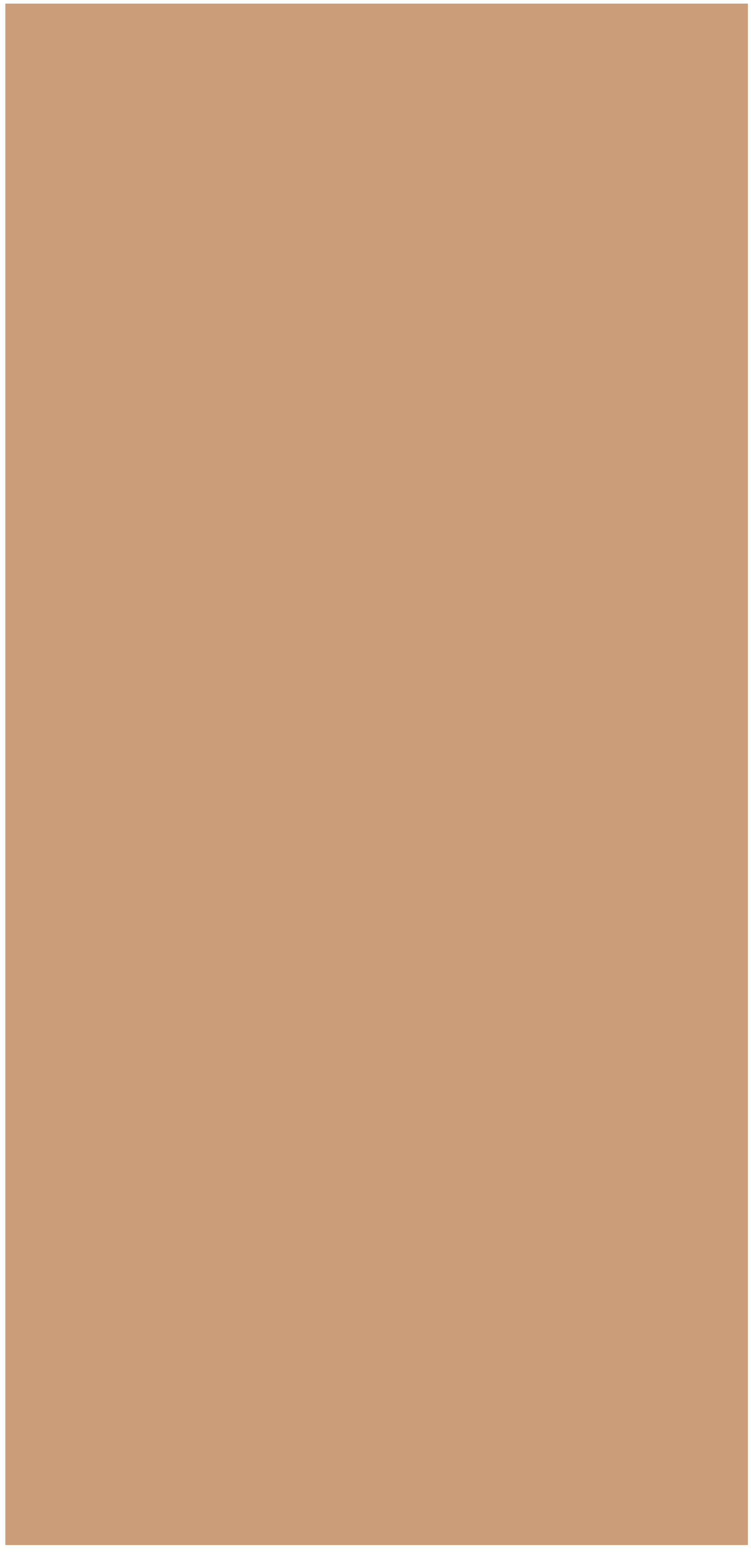
求成章写像平凹那样的散文，就像不能把川粤菜混在一起一样。你让老舍跟柳青怎么去靠近？柳青跟老舍怎么去靠近？这是不可能的。我们不应提倡不同风格的作家靠近，而应鼓励他们远离，拉大距离，让他们那种艺术，艺术追求，一直搞到极端，才能树立起一种有别于所有人的艺术，自成一家。现在，我觉得在散文小说界相似的面目太多，倒是个性明显包括语言个性明显的作家太少。对各种不同风格的艺术体验应该给以鼓励，鼓励他们走到头，往极端走，走向极端才有可能形成一家。这样，艺术个性、艺术色彩才会明朗起来。刘成章能在散文界立起来，很重要一点就是现在散文界矫情娇气的东西太多。他的散文别具一格，个性鲜明，大家读那些东西腻了的时候，感到他的产品很有嚼头。这是第二点。

成章的散文我没有全部看过，看到的一些篇章，有些非常精彩。他的散文侧重表现陕北的人情风貌，他对陕北这块土地的挚情热爱的表现和我的心情是一样的，但他表现这些东西时没有都把握好。如果说创作作为一种生活体验和生命体验这样一个过程，成章的散文属于一种生活体验，但也有一些进入了生命体验。两种体验我觉得差异很大。成章的散文对陕北那块土地在热爱上体现得很突出，但我觉得在爱的同时还应体现一点批判意识。批判意识，借用现代一句话叫"反讽视警"，应该有些反讽意识。因为爱得太深，表现出来的都是美好，但实际上那块土地灾难重重，时至今日，那里的许多山头还是光秃秃的。我们看到的一些报纸上经常报道绿化成果，可是山仍然是光的，看到那里的光山我心里就不舒服。不能说光山你也爱，但总不如有林木的山漂亮。在成章的笔下，把那些山写得美不胜收，如果有点反讽意识的话，就会有另一种体验，爱其所爱，痛其所痛，既要表现欢乐还要表现痛苦。应进入一种思考，一种体验，有一种文化发掘的意

识，在发掘过程中就会感到美好的和叫人痛苦的。成章的散文创作如有了反讽意识，我想会是一个提高。这是我的一个建议。

无论小说散文或者诗歌的创作，都应记着《文心雕龙》里的一句话：“既随物以婉转，亦于心而徘徊。”这一句话把作家的创作状态全部说完了，再没有这么简洁地把创作过程和创作形态揭示得那么深刻。随物婉转就是状物，于心徘徊就是作家抒发感情。希望成章同志继续随物婉转，于心徘徊。肯定有更佳的作品出世。

1994年11月



第 1 卷　1978—1982

第 2 卷　1983—1984

第 3 卷　1985—1986

第 4 卷　白鹿原

第 5 卷　1987—1994

第 6 卷　1995—2000

第 7 卷　2001—2003

第 8 卷　2004—2006

第 9 卷　2007—2009

第 10 卷　2010—20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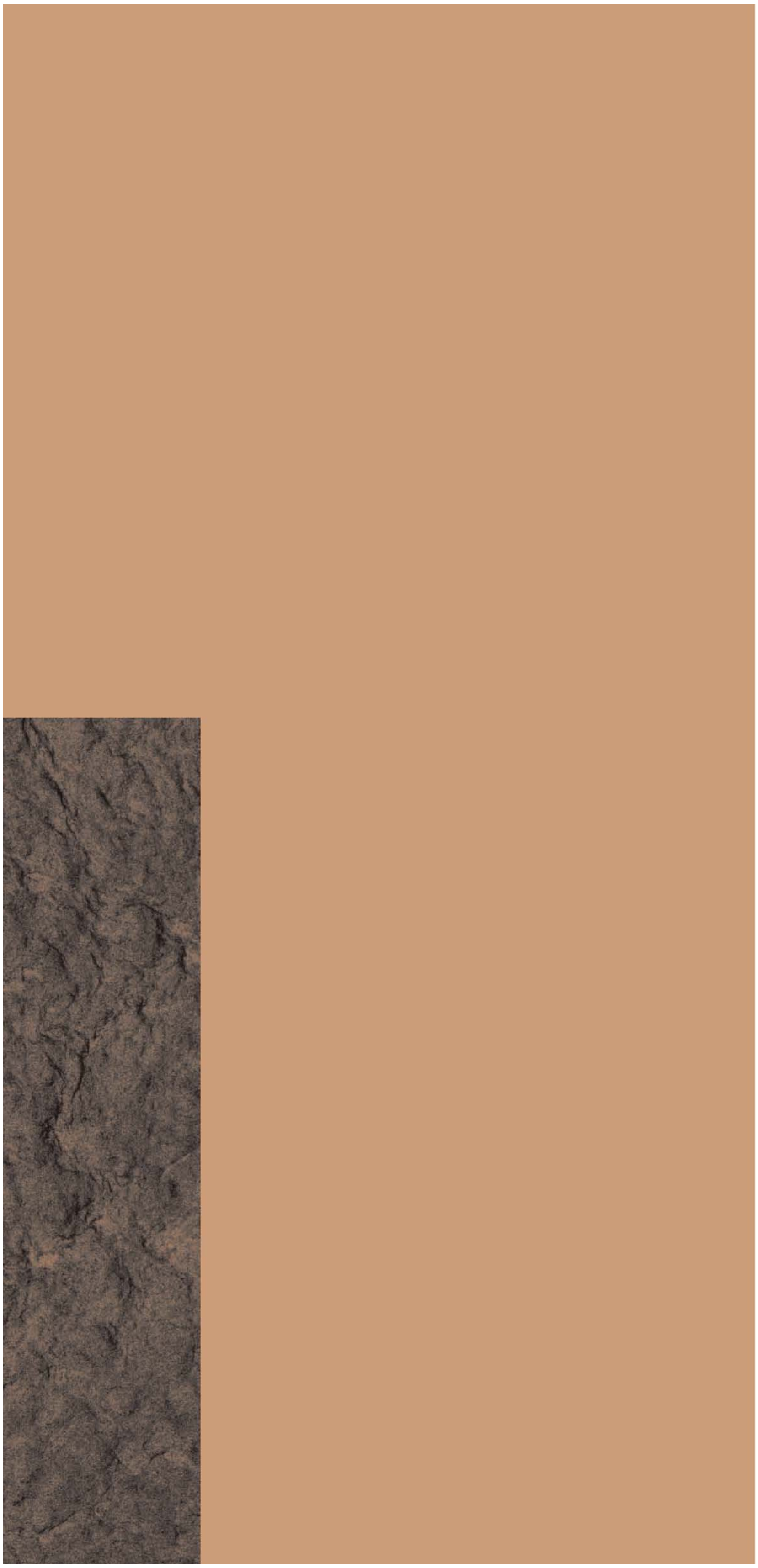
第6卷

1995—2000

陈忠实文集

增订本

人民文学出版社



陈忠实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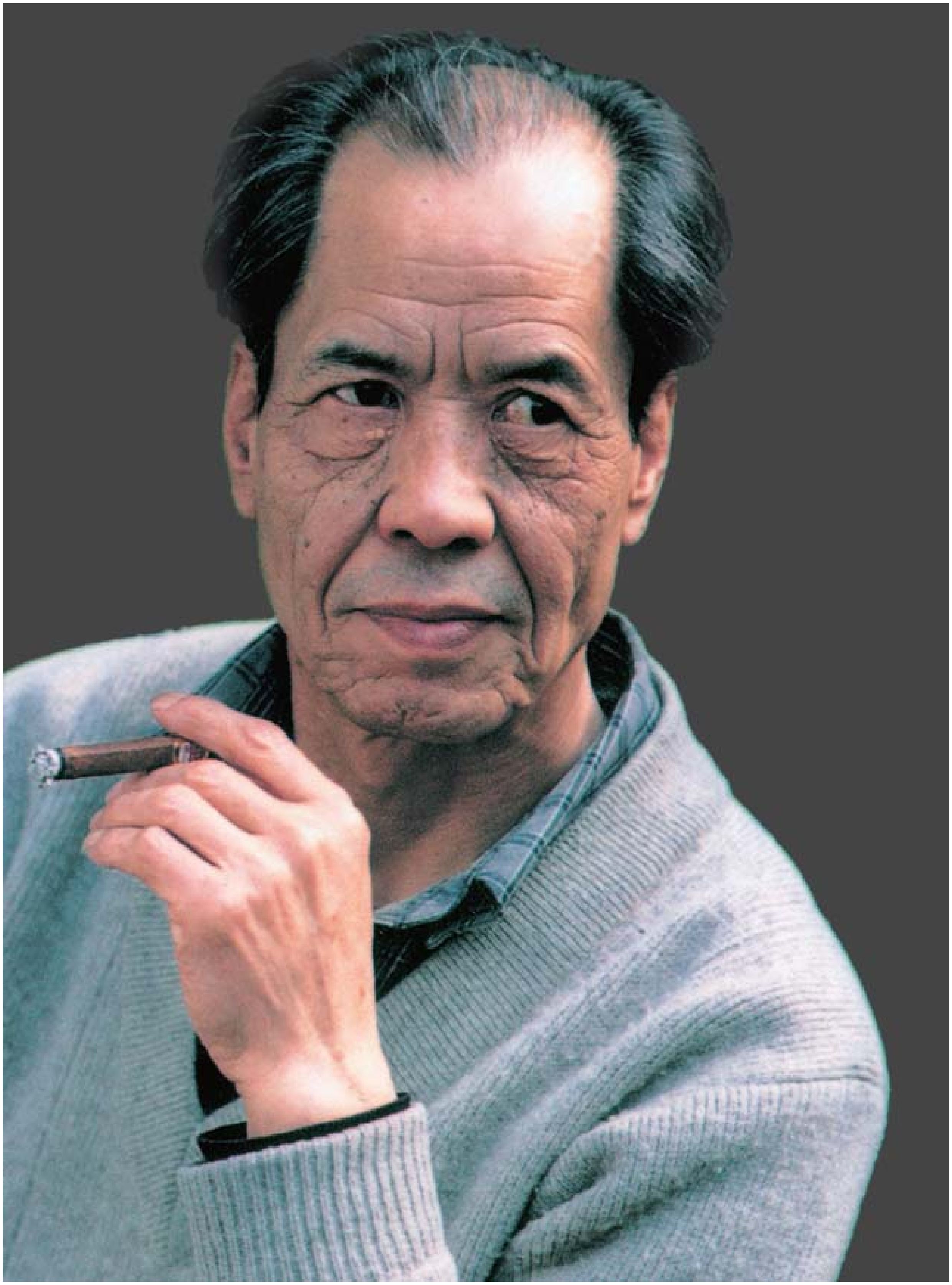
增订本

第 6 卷

1995—2000

人民文学出版社

文前插圖



- 散文·随笔
  - 最初的晚餐
  - 尴尬
  - 沉重之尘
  - 中国餐与地摊族
  - 破禁放足不做囚
  - 创造礼赞
  - 贞节带与斗兽场
  - 那边的世界静悄悄
  - 北桥，北桥
  - 告别白鸽
  - 一株柳
  - 感受文盲
  - 口红与坦克
  - 五十开始
    - 一
    - 二
    - 三
    - 四
  - 朋友的故事
  - 陶冶与锻铸
  - 喝茶记事
  - 追寻貂蝉
  - 自题旧照
  - 无法超脱
    - 一

    - 二
    - 三
    - 四
- 谁打败了斗牛士
- 喇叭裤与“本本”
- 伊犁有条渠
- 灿烂一瞬
- 神秘一幕
- 旦旦记趣
- 自己卖书与自购盗本
    - 一
    - 二
    - 三
- 俏了西安
    - 一
    - 二
    - 三
- 自信是金
- 家之脉
- 拔出话筒
- 骆驼刺
- 盐的湖
- 天之池
- 何谓良师
- 为了十九岁的崇拜
    - 一
    - 二

        - 三
    - 千年的告别
    - 口声
    - 活在西安
    - 动心一刻
    - 取名
    - 自题照片
    - 拜见朱鹮
    - 威海三章
        - “天尽头”的咒符
        - 街心的碑
        - 哦！刘公岛
    - 球迷希尔顿
    - 如炬人生
    - 释疑者
    - 从盗书到盗名
- 言论·对话
    - 文学无封闭
    - 兴趣与体验
        - 一
        - 二
        - 三
    - 生命易老，文学不死
    - 关于陕西长篇小说创作的回顾与展望
        - 一、十年回顾
        - 二、基本估计
        - 三、期待与展望

- 美髯公的画与文
- 送平凹赴华西
- 解读徐岳
  - 一
  - 二
  - 三
  - 四
  - 五
- 致日本读者
- 柳青的警示
- 注钙
- 敞开心灵之窗
- 回声·钟声·双刃剑
- 踏过泥泞
- 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
  - 一
  - 二
  - 三
  - 四
- 关于《白鹿原》获茅盾文学奖答诗人远村问
- 历史和现实的追问
- 跨越障碍
- 业已成荫的大树
  - 一
  - 二
  - 三
  - 四

- 心灵独白
- 生命价值的新启示
- 王国不神秘
- 西安人武元
- 真情无价
- 从生活体验到心灵体验
- 心灵剥离
- 大气·雄风
- 在《当代》，完成了一个过程
- 灵人
- 滔滔汉江水
- 痴情如你
- 人生九问
- 蔚为壮观的诗章
- 人物才是撑起故事框架的柱梁
- 网上夜话
- 我读《山河岁月》
- 你写的书，让我不敢轻率翻揭
  - 一
  - 二
  - 三
  - 四
  - 五
  - 六
- 校验人生
  - 一
  - 二

    - 三
    - 四
- 致冷梦的一封信
- 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 拒绝平庸
- 卓尔不群这一株
- 文学活着
- 说税

散文·随笔

最初的晚餐

——《生命历程中的第一次》之一

想到这件难忘的事，忽然联想到《最后的晚餐》这幅名画的名字，不过对我来说，那一次难忘的晚餐不是最后的，而是最初的一次，这就是我平生第一次陪外国人共进的晚餐。

那时候我三十出头，在公社（即现今的乡政府）学大寨正学得忙活。有一天接到省文艺创作研究室（即省作协）的电话，通知我去参加接待一个日本文化访华团。接到电话的最初一瞬就愣住了，我的第一反应是我穿什么衣服呀？我便毫不犹豫地推辞，说我在乡村学大寨的工作多么多么忙。回答说接待人名单是省革委会定的，这是“政治任务”必须完成。这就意味着不许推辞更不许含糊。

我能进入那个接待作陪的名单，是因为我在《陕西文艺》（即《延河》）上刚刚发表过两个短篇小说，都是注释演绎“阶级斗争”这个“纲”的，而且是被认为演绎注释得不错的。接待作陪的人员组成考虑到方方面面，大学革委会主任、革命演员、革命工程师等，我也算革命的工农兵业余作者。陕西最具影响的几位作家几棵大树都被整垮了，我怎么也清楚我是猴子称王地被列入……

最紧迫的事便是衣服问题。我身上穿的和包袱里包的外衣和衬衣，几乎找不到一件不打补丁的，连袜子也不例外。我那时工资三十

九元，连我在内养活着一个五口之家，添一件新衣服大约两年才能做到。为接待外宾而添一件新衣造成家庭经济的失衡，太划不来了。我很快拿定主意，借。

借衣服的对象第一个便瞄中了李旭升。他和我同龄，个头高低身材粗细也都差不多。他的人样俊气且不论，平时穿戴比较讲究，我几乎没见过他衣帽邋遢的时候。他的衣服质料也总是高一档，应该说他的衣着代表着七十年代中期我们那个公社地区的最高水平。“四清”运动时，工作组对他在经济问题上的怀疑首先是由他的穿着诱发的，不贪污公款怎么能穿这么阔气的衣服？我借了一件半新的上装和裤子，虽然有点褪色却很平整，大约是哔叽料吧，我已记不清了。衬衣没有借，我的衬衣上的补丁是看不见的。

我带着这一套行头回到驻队的村子。我的三个组员（工作组）经过一番认真的审查，还是觉得太旧了点，而且再三点示我这不是个人问题，是一个“政治影响”问题，影响国家声誉的问题……其中一位老大姐第二天从家里带来了她丈夫的一套黄呢军装，硬要我穿上试试。结果连她自己也失望地摇头了，因为那套属于将军或校官的黄呢军装整个把我装饰得面目全非了，或者是我的老百姓的涣散气性把这套军装搞得不伦不类了。我最后只选用了她丈夫的一双皮鞋，稍微小了点但可以凑合。

第二天中午搭郊区公共汽车进西安，先到作家协会等候指令。《陕西文艺》副主编贺抒玉见了，又是从头到脚的一番审视，和我的那三位工作组员英雄所见一致：太旧。我没有好意思说透：就这旧衣服还是借来的。她也点示我不能马虎穿戴，这不是个人问题而是“国家影响政治影响”的大事。我从那时候直到现在都为这一点感动，大家都首先考虑国家面子。老贺随即从家里取来李若冰的蓝呢上衣，我换上

以后倒很合身。老贺说很好，其他几位编辑都说好，说我整个儿都气派了。

接待作陪的事已经淡忘模糊了，外宾是些什么人也早已忘记，只记得有一位女作家，中年人，大约长我十余岁。我第一眼瞧见她首先看见的是那红嘴唇。她挨我坐着，我总是由不得看她的红嘴唇，那么红啊！我竟然暗暗替她操心，如果她单个走在街上，会不会被红卫兵逮住像剪烫发砍高跟鞋一样把她的红嘴唇给割了削了?

那顿晚餐散席之后我累极了，比学大寨拉车挑担还累。

现在，因为工作的关系我常常接待外宾并作陪吃饭，自然不再为一件衣服而惶惶奔走告借了；再说，国家的面子也不需要一个公民靠借来的衣服去撑持了；还有，我也不会为那位日本女作家的红嘴唇被削而操心担忧了，因为中国城市女人的红嘴唇已经灿若云霞红如海洋了。

尴尬

——《生命历程中的第一次》之二

我的宿办合一的住屋的门框上贴着一副白纸对联，内容选用毛泽东的诗章中的摘句：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眉批为：送瘟神。门框右上角吊着一只灯笼，也是白纸糊的。乡间通常是在死了人过白事时才用白纸写对联，那种用白纸糊的灯笼也是专门接灵送鬼的引路灯。自从被大人操纵着的孩子们用这些东西装饰了我的门面儿的那一刻起，我便立即意识到我死了。我已从轰轰烈烈的人世进入阴气逼人的冥冥之域，成为冥国鬼域的一个小鬼了。

那年我二十四岁。

我完了。我已经无数次地重复过这种自我判断。完了自然首先是指政治上完了，那时候的社会准则和生活法尺都是以政治为"纲"的，"纲"完了"目"还能张么？作为"目"的文学理想也完了。那时候我刚刚发表过七八篇散文习作，即使这样短促的夭折也都由痛苦的承受转变为乖顺的接受了。然而这阴纸对联和鬼灯整上我的房门，我发觉我原以为完了死了而沉寂的心确凿地又惶惶起来，每一次进门和出门看见这两样丧气鬼氛的东西心里就发怵，都要经受一次心灵的折磨，都在无时无刻昭示着你是鬼而不是人了。我才明白死了的自己还要一张脸，还会尴尬和难堪。

我到现在也搞不明白，我的那样穷困的家庭环境，怎么会给予我如此根深蒂固的爱面子的心理。我期望那些东西尽快烂掉，然而这房子却是雨淋不着风也吹不到的小套间，那些作为冥国鬼域标志的装饰

物竟然保存了三个月之久。三个月里，我一日不下八次地接受它对我的心灵的警示和对脸皮的磨砺。

我最怕熟人朋友来看我，结果是最令我尴尬的姐姐和表妹先后都来光顾了。姐姐随姐夫五十年代初去青海支援建设，借了“文革”可以不上班的天赐良机第一次省亲。表妹在新疆上大学为节约路费两年都不敢回乡，逮着可以免费乘车免费吃喝的机会如愿以偿回家乡来了，自然是以革命和造反的堂皇名义归来的。姐姐引着我的小外甥进入房子，那个以调皮捣蛋而出名的小家伙一直抱着我姐姐的腰不敢松手，肯定是在进入房门瞧见鬼物而想到这是阎罗统治下的鬼魅世界了。表妹曾经和我在同一个教室里念初中，她的到来更使我自惭形秽而无地自容。她以一个大学生的昂然享受着免费旅游（串连）的革命优惠，我却已走到生命的尽头……在文化水平上姐姐和表妹尽管构成了高低两极，劝慰我的话却是惊人的一致：“想开点儿，你看看刘少奇刘澜涛都给斗了游了，咱们算啥？”

刘少奇作为国家的象征，刘澜涛则是西北地区的领导人，我过去把他们的著作和讲话稿反复学习过，他们现在却成为我落难后应该活下去的一个参照了。然而我依然对自己万分痛心万分悲伤，我不能再写文章更不敢再投稿了，我还活什么呢？

……

我后来才充分意识到这人生第一次的大尴尬对我的决定性好处。不单是脸皮磨厚了，不单是心理承受挫折的能力增强了，恰恰是作为一个企图反映社会的文学理想所不可或缺的生命体验。生命体验显然不应混同于生活体验。这种生命体验是任何哲学或政治教科书所不能给予我的。如果从个人意愿和自觉性上来讲，我肯定不会自愿选择那

种毁灭性的尴尬，然而生活却把我强迫性地踢到那个尴尬的旮旯里，强迫我接受人生的这种炼狱式的洗礼。更值得庆幸的，是在我刚刚步入社会而且比较风顺的二十四岁时。当我后来逃脱尴尬而确信自己并没有完的时候，第一次生命体验便完成了。

后来，用马尔克斯的叙述程式可以说成是多年以后，我又陷入一种人生的大尴尬，我充分而又清醒地能够对自己的过失做出判断，便不像头一次那么慌乱，那么懊悔，那么简单地以为就完了，而能够保持一种沉静的心境，而且能够对自己说，完不完全在自己。尽管是一种清醒的沉静，仍然避免不了在一些特定场合的尴尬，我也清楚这种根深蒂固的爱面皮的痼疾依然附着我。两次大尴尬的经历之后，我完成了这一面和那一面的不同的生命体验，自家的直接体会就是，得按自己的心之所思去说自己的话去做自己的事了。不然——

便不说，更不做。

沉重之尘

——《生命历程中的第一次》之三

八年前的那年春节刚过，浓郁的新年佳节的气氛还弥漫在乡村里，我就迫不及待地赶到蓝田县城去查阅县志。我已经开始了一部长篇小说的孕育和构思。我想较为系统地了解我所生活着的这块土地的昨天或者说历史。县志在我看来就是一个县的历史，又是一个县的百科全书。为了避免一个县可能存在的偏狭性，我决定查阅蓝田、长安、咸宁三县县志；这三个县在地理上连结成片包围着西安，属于号称“自古帝王都”的关中这块古老土地的腹心地带，其用心不言自明。

翻阅线装的残破皱褶的县志时感觉很奇异，像是沿着一条幽深的墓穴走向远古。当我查阅到连续三本的“贞妇烈女”卷时，又感到似乎从那个墓穴进入一个空远无边碑石林立的大坟场。头一本上记载着一大批有名有姓的贞妇烈女们贞节守志的典型事例，内容大同小异事例重复文字也难免重复，然而绝对称得起字斟句酌高度凝练高度概括，列在头一名的贞妇最典型的事例也不过七八行文字，随之从卷首到卷末逐渐递减到一人只给她一行文字。第二本和第三本已经简化到没有一词一句的事迹介绍，只记着张王氏李赵氏陈刘氏的代号了，属于哪个村庄也无从查考，整整两大本就这样实扎扎印下来，没有标点更不分章节。我看这些连真实姓名也没有的代号干什么？

当我毫不犹豫地把这三本县志推开的一瞬，心头似悸颤了一下。我猛然想到，自从这套不断被续修续编的县志编成，任何一位后来如我的查阅者，有的可能注重在“历史沿革”卷，有的可能纯粹为探究“地

理地貌”，有的也许只对“物产经济”卷感兴趣，恐怕没有什么人会对那些只记录着代号的两大本能有耐心阅览。我突然对那些无以数计的代号委屈起来，她们用自己活泼泼的肉体生命〔可以肯定其中有不少身段（曲线）脸蛋肤色都很标致的漂亮的女儿〕，坚守着一个“贞”字，终其一生而在县志上争取到三厘米的位置，却没有什么人有耐心读响她们的名字，这是几重悲哀?

我重新把那三大本揽到眼下翻开，一页一页揭过去，一行接一行一个代号接一个代号读下去，像是排长在点名，而我点着的却是一个个幽灵的名字。那些干枯的代号全都被我点化为一个个活泼泼的生命在我的房间里舞蹈……一个个从如花似玉的花季萎缩成皱褶的抹布一样的女性，对于她们来说，人的只有一次的生命是怎样痛苦煎熬到溘然长逝的……我庄严地念着，企图让她们知道，多少多少年以后，有一个并不著名的作家向她们行了注目礼。

我无言以对。

我喘着粗气，渐次平静；我又合上那三本“贞妇烈女”卷县志，屋子里的幽灵也全部寂然；看着那三本县志，我深切地感受到了什么叫历史的灰尘，又是怎样沉重的一种灰尘啊！我的心里瞬间又泛起一个女人偷情的故事。我在乡村工作的二十年里听到过许多许多偷情的故事，有男人的也有女人的，这种民间文学的脚本通常被称作“酸黄菜”，历久不衰，如果用心编撰可以搞成东方的《十日谈》。

我至今也搞不清楚，是那三大本里的贞妇烈女们把我潜存的那些偷情男女的故事激活了，还是那些“酸黄菜”故事里的偷情男女把这三本“贞妇烈女”卷里的人物激活了？官办的县志不惜工本记载贞妇烈女

的代号和事例，民间历久不衰传播的却是荡妇淫娃的故事……这个民族的面皮和内心的分裂由来已久。

我突然电击火迸一样产生了一种艺术的灵感，眼前就幻化出一个女人来，就是后来写成的长篇小说《白鹿原》里的田小娥。

1995年2月6日夜 西安

中国餐与地摊族

——意大利散记之一

到佛罗伦萨时，这几位中国作家全都再也忍受不了意大利式西餐了，便指使意大利司机开着车满城寻找中国餐馆。

我小有得意。是我对西餐最早最先倒了胃口，大伙起初还拿我逗乐，蒋巍（东北青年作家）说，看见忠实兄每次面对西餐的痛苦表情，我反倒更刺激起吃西餐的胃口。大伙便哈哈笑。我在首站西西里住的四天里，吃西餐很新鲜，离开这个美丽的孤岛之后便开始倒胃，每一顿西餐中唯一觉得可口的只有那种烤得焦黄酥脆的面包，而这种面包是自助早餐花样众多的面包族里最廉价的一种，类似于母亲在乡下的灶锅下用麦秸火烤干的馍馍。后来经过威尼斯、米兰再到佛罗伦萨，代表团的几位作家便一个接一个都控诉西餐的要命了，再也没有谁要笑我们“乡村土胃”了。我的小小得意也不必说出口，其实靠吃中国饭长到这个年纪的中国人，恐怕谁也很难使胃口一下子调整到洋西餐上来，吃稀罕当然可以，赖以为生就受罪了——五十步笑百步。

追寻中国餐馆不仅让受罪的胃得到了满足，意外的收获是让我真切地接触了几家在意大利的中国人。

在一条记不清叫什么名字的街道上找到了一家门面不大的中国餐馆。餐馆的名字也记不起来了。中国餐馆其实很好找，不仅是因为多，而且是汉字招牌之十分突出十分显眼。即使在天黑，即使街巷里灯光依稀昏暗，无论大街无论僻巷，一枚筒状的灯罩上几个蓝色或红

色的汉字所标示的餐馆的名字，在满街满巷的意大利文招牌中，恰如中国城市里走过一个或几个金发碧眼的欧美白种人一样醒目易辨。

这家中国餐馆门面不大，也就是那种窄巴的小两间。老板是位青年男子，见我们进来并不显得十分热情，比招待一般客人热烈的程度有限。招呼我们坐下，一位更年轻的男招待便送来茶水，并问询点菜，随之又回前台给老板报菜去了。我们几位便坐下喝茶。年轻的男招待旋即又来了，瞅着我的脸问，中国作家代表团里有没有一位陈先生。我被人称呼惯了同志和老师（当过小、中学教师），却依然不能习惯先生的称呼。当他得到我就是陈先生的确认后，便喜形于色地到前台向年轻老板回报去了。年轻老板就来到我们的餐桌旁，说他刚刚看过中国侨联发行到海外华人中间的《侨声报》，报纸上有介绍我的文章，还配着我的一幅肖像图画，他是从那图画和我的脸孔对上号的。我也顿生奇异，讨过那张报纸，文章是中国作家协会李炳银朋友写的，那插图却是一幅漫画肖像，对我脸形和脸上的几道皱痕极尽夸张，连我都忍不住笑我的丑陋了。男招待和年轻老板都很得意各自观察顾客的眼底功夫。我也真佩服了漫画艺术的魅力，对我丑陋脸形和丑陋皱痕的极端性夸张，更使读者容易抓住特征，也使我无法躲避。

女老板接着来了。女老板被介绍说是年轻男老板的妻子。女老板不仅年轻也很漂亮，白皙的脸上皮肤，温柔敦厚的神色，没有夸张矫饰的热情，握手介绍认识之后便坐下拉起家常来。我这里之所以选择一个“拉家常”的词汇，确凿是和她交谈时的感觉，经过一年时间的沉淀后回忆那情景依然觉得是一种没有任何矫情娇气的交流。我们几位已经逛过意大利四个城市，全都在经过翻译的语言过滤中和意大利人做“学前班式”的交谈，都希望能直接说话而厌倦了那种过滤式的翻译，大家便争相争宠似的向女老板发问。

女老板姓王，中国温州籍，六八级初中生，丈夫和她同籍同乡同等学力，而且都“上山下乡”接受过锻炼。他们大约八十年代中期闯到意大利，落脚在佛罗伦萨，做餐馆生意，经营运气不错，已经买下这个两间门面的餐馆了。她和他都说经营靠运气，和她同样开餐馆的一位同乡已经破产且负债累累，论起精明和方方面面，似乎并不在他们两口子之下。她和他就特别庆幸自己的运气。她和他已经把属于各自那个系列的亲戚引到意大利三十多个人，大都在佛罗伦萨做事。他们对这些亲友的帮衬办法类似于互济会，大家给某个初来者凑一笔钱，帮他谋划一个挣钱的项目，然后由他去经营，到他赚了钱以后再偿还。这样的互济手段居然十有八九都获得成功，他们夫妇两大干系的亲友三十多人在佛罗伦萨不仅站住了脚跟，而且还都混得可以。

令我惊讶的是，这位女老板八十高龄的母亲早已移居佛罗伦萨，刚刚回温州探亲去了。从北京到意大利三次换乘飞机旅途折腾二十七八个小时，我们几个人来时全都累得难以支撑，而这位年过八旬的温州老太太几乎每年都要做一次佛罗伦萨到温州的往返旅行，真是够精神的了。

她说她挣是挣了一点钱，然而也累得够呛，从早到晚都需要小心谨慎地做好每一件事。到了晚上关门之后，心底的寂寞也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加深加重。“忙活一天晚上打开电视想轻松一下，看不了一会儿突然在心里冒出一句，电视上说的这些事与我有什么关系？马上就觉得虽然身在这个国家，仍然是无法跟这个国家贴近。这样长年累月下去，你说人的心里会是什么感觉？”她很真诚地反诘，显然不是要我和我的朋友回答的，只是需要一种交流和理解。

她说八十年代初刚来佛罗伦萨时，这个城市的华人不过二三百人，中餐馆也只有几家，几年间，通过合法和不合法的移民手段，这

个古老的却够不上大都市的佛罗伦萨城里，根本无法统计有多少中国人，中国餐馆已经接近三位数了。更惊人的是，她说罗马城里已有近三百家中国餐馆，有多少中国人就更难以估计了。急骤增加的华人多数属于非法移民，多数是从德国、法国转道偷渡到这个亚平宁半岛上来的。据说在欧洲，意大利对待非法移民的处治措施是最宽松的，德、法严厉甚至可以说惨无人道，所以那些没有技术专长，文化不高的偷渡者有的是自己跑到意大利，有的是被上述国家驱赶过边境的。其中许多人在罗马等大都市的郊区租赁尽可能便宜的地下室开办皮货作坊，雇工当然也是中国青年，因为无证生产自然属于秘密状态，拿我们的习惯称呼为“地下黑工厂”。这些作坊的产品往往敢于贴上名牌的标签招摇上市。警方的打击也是周期性的一松一紧，类似于我们国内每隔一段时间便搞一次“集中突袭”行动。每当此时，这些作坊主和雇工便闻风而逃，关了作坊门，背上麦包逃遁到郊区的山林里风餐露宿，多则一周，少则三五天风声一过，他们又悄悄返回城里潜入地下继续作业。比起这些地下作坊的人来，他们两口子已算是很值得羡慕的了，生意经营得不错，早已取得合法居住的权利，而且雇用着一个意大利女孩招待。

后来到了罗马，我们有了随意逛街的机会，在商业区，在旅游景点，常常能够看到许多摆地摊的男女青年，地上铺一张约一米见方的塑料单子，有的摆置的是各种式样的打火机，有的摆着儿童玩具，有的就只有单调的雨伞，屁股下坐着一只自我装备和储存货物的大提包。这些摆摊族里的中国青年一眼就可以辨认出来。另外就是黑人，据介绍说多是埃塞俄比亚的偷渡者，以这两种人为地摊族的主体，另有一些棕色的脸色混杂其中。我和蒋巍企图和一位在垃圾箱盖上摆着打火机的中年女同胞拉话，她在问清我俩的身份后反倒说出一些心里不大平衡的话：“你别以为我做这营生丢人，我一月挣一千美金，就卖

这打火机就挣这么多，比国内挣得多。”我和蒋巍便再说不成什么话。转身走去的一瞬，这女人慌慌匆匆用塑料单裹了打火机混入人群溜掉了，我随即看见一个巡警正迎面走过来，我的心里便有一种说不清是什么滋味的难受。

说来每每看见那些地摊族，不用问，除了中国人便是埃塞俄比亚人。我自然知道埃塞俄比亚即使在经济发展滞缓的非洲都是最贫穷落后的国家，我们的年轻的同胞就无可选择地与埃塞俄比亚青年坐地成为一摊之族了。我那时候心里的感觉确实昂扬不起来，倒是切实地感觉到了国家和民族的某种十分强烈的概念，心头涌起一种虔诚的呼唤，哦哦！让我们的国家快快繁荣富强起来，让我们的黑头发黑眼睛的子孙最起码不要到别人脚下去摆地摊，不要做被警察驱逐追赶的兔子，慌忙逃溜的动作失丢的绝不仅仅是他们个人的风度……

在罗马遇到另一种生活形态的中国青年人，她叫卢放，在西南某医学院毕业后到罗马某大学进修意大利语，毕业后被一家意大利人开的中医医院聘任，而且已取得永久居住权。她很有涵养，很高兴给我们充当和两位意大利女孩交谈的翻译，据说她的月收入也是一千美元，然而她的自信和内秀构成一种明显的东方女性的魅力，她的谈吐和气质令那两个意国女郎也由衷钦敬。然而像她这样的同胞又能占那些开地下作坊和摆地摊的几十分之一呢?

在米兰的一家中国餐馆听到一件更令人无言以对的事。这位女老板是荷兰籍的老华侨后裔，几年前到米兰来开办了一家中餐馆，生意不错。她被恐吓威逼，损失了一笔款子。干这种类同绑票勾当的正好又是中国人，似乎还有一个什么“红色旅”的暴力组织。女老板不愿意说出更具体的详情，似乎不单单是被威胁的苦衷。她摇摇头无奈地说，这些中国孩子盲目跑到这里来，没有专长也没有技术，有的就是

连初中也没念完的农村孩子，能干什么呢？摆地摊虽然不大体面，总还算自食其力挣钱吃饭，一些连任何苦也不想吃的人，除了抢劫冒险还能怎么活?

意大利的“黑手党”名噪全球。现在又有了一个“红色旅”，中国偷渡过去的年轻人的暴力组织，施暴的对象几乎都是赚了钱发了财的华人，我又能再发什么慨叹呢？当然，说穿了，所谓什么“红色旅”，不过是一帮一伙纠集起来的小股子偷匪蟊贼罢了，和“黑手党”不能相提并论。然而我又想着我们这个古老而伟大的民族总是向欧洲输送摆地摊的“族员”的现象，何时才能自然中止呢？且不说“红色旅”之流。

我在西安几所大学和大学生对话时，总是忍不住超出文学的话题而引出这一段见闻，对于意大利风光反倒无心描述了。

我发觉我的这些见闻和感慨几乎无一例外地引起大学生们的强烈呼应，既有文科也有理科的同学，正是在那种强烈的呼应里，我从意大利回来潜隐在心灵深处的那种挫伤得到了弥补，感到了一种真切的希望。

破禁放足不做囚

本文的标题是我致答一位朋友赠诗中的一句。理不清是这句诗勾起了我十年前出访泰国时的一件小事，还是那件小事引出来这句诗，这都无关宏旨。有关泰国的许多记忆虽然至今难以泯灭，然而，独有这件小事却常常因为生活的某些感应泛上心头，尤其鲜活。

那是在曼谷，我们中国作家代表团一行七人去逛一家超级商场。一九八五年时中国还没有一家超级商场，我们很想见识一下所谓“超级”的真实面目。完全是“逛”，是看，谁也没打算到超级商场里买什么物品留作纪念的，个中缘由却完全一致，七个中国当代作家的腰包同等羞涩，没有超过一百美元的。在那样的超级市场里，只能逛，逛是不花钱的。

逛到那层专卖皮鞋的大厅时，作家郑万隆对我说，咱俩来做个小调查，数一数从咱们面前走过去的三十或者四十个人，看看能有几个人穿的衣服是一样的？我听了觉得很有趣儿，便瞅着从我们面前的过道上过来过去穿梭着的男女，数过五十多人，竟然没有发现在衣服裤子鞋子的色彩式样上完全一样的两个人。郑万隆调查的结果也是这样。我们俩笑笑，又去继续纯属逛的活动了。

两个中国作家站在曼谷一家超级市场上所做的这个小小动作，在今天的任何一个中国青年都不会感兴趣，甚至会觉得幼稚好笑，因为你现在站在中国的无论南方或北方的任何一家商厦里，也很难找到两个服饰完全一致的人了。然而十年前，我在做着那个小调查的时候却是兴趣十足的，对调查的结果也是大为惊诧的。那时候，我们的改革

正处于启动阶段，新颖的思潮和陈旧的观念在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发生着剧烈的大冲撞。从南方到北方，从繁华的城市到偏远的山寨，从各级党政决策的大小会议到每一个家庭，都在取和舍的选择上，发生着大到国家民族前途命运、小到两代人的生存方式的真实的冲突。大街上依然是蓝、灰、黄色的中山装为主流色彩和坐庄的式样，尽管当时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慷慨激昂地鼓励他的党员和人民穿西装，而且自己带头穿西装打领带做表率，不遗余力进行倡导，甚至不惜借电视当西装模特，然而大街上着西装者毕竟寥寥无几。为打破清一色的中山装和由中山装稍做修改而成的红卫服，党和国家领导人都得做出如此非凡的举动，我和郑万隆对于曼谷人五彩纷呈的服装所感到的新鲜和惊诧，也就不足为奇了，甚至可以说是这十年生活演进过程中的一个必须经历的阶段性心态。

这件在今天看来很可笑的小事，却常常给我以远远超出这件事本身的启示。进入八十年代时，西方青年的喇叭裤开始进入中国的城市，如果我没有记错，应该说这是解放四十多年来中国人的服装样式所遭遇的最严重的一次冲击。记得当时的报纸上曾为此发表过许多讨论文章，交锋的双方各执一端，焦点则是喇叭裤算不算是资产阶级奇装异服、准不准在中国流行……在今天看来，可笑不可笑？不管怎样可笑，这是十年前我们社会生活的真实，由这个可笑的事，完全可以推及更多更大的政治、政策、文艺、教育等方面相类似的事情。不要轻淡地以为只是可笑，它足以引发人思索我们由观念的更新所引起的大到社会争论、深刻到每一个人的心理秩序的重新安排，难道不是这样吗?

由此我又想到更久远的一件事。那是在世界外交史上闻名的毛泽东的“乒乓外交”，即“小球”转动“大球”的事件发生时的一个小小插

曲。周恩来接见第一次访华的美国乒乓球队员时，一位留着披肩长发的美国小伙子用手指着自己的脑袋问周恩来，对他的这头长发有何看法？周恩来说了一句既不表示赞赏也不表示厌恶的外交辞令式的话。这件小插曲是我去听党内政治报告时传达的，我对周恩来的那句机智幽默的回答钦佩极了，因为作传达报告的人在附加的解释中，称那位留长发的美国小伙子为"颓废派青年"，披肩长发正是"颓废派一代"的标志。中国当时的"文革"正进入最残酷的斗争阶段，面对一个美国青年的长发，一个大国总理也不敢表示赞赏，表示了之后就可能成为那些早已对他虎视眈眈者的罪证；然而为了中国与美国的建交，又不能说出让客人扫兴的话，便只好如此。那时我所感到的"机智"后来就看成是一种悲哀，一个大国总理对一个美国毛猴子的头发都不能做最简洁坦率的表态，是周恩来的悲哀还是一个大国的悲哀?

值得欢欣庆幸的是，对人们服饰色彩、服装式样的"阶级分析阶级斗争"式的关注，终于从当代中国的社会生活里剥离出去了。人们——男人女人老人和青年，都可随心所欲按照自己的喜好选择衣物了，再不用担心谁的"穿着打扮也有阶级斗争"的大棒迎头盖脑抽击了。任何一个国家的青年再不会以自己的奇装异服和奇特的发式来炫耀来为难中国本届总理了，他们会发现中国人（尤其是城市）的衣着装扮已经基本赶上了世界潮流。

这件小事给我的感慨绝非偶然，我很自然地想到"辛亥革命"后举国上下的男人剪辫子和女人的放足运动。那时候的问题是全国性的问题，即剪了辫子的男人还算不算男人，不再裹足的女人还是不是女人？问题严重到整个社会、整个城镇和乡村都似乎陷入民族末日的悲凉之中……人们终于发现，丢了辫子和撇开了裹脚布的中国人非但没有完结，反而更健美了。不幸的是，解放以来的人民装中山装红卫装

（大同小异），也已变成一种类似于辫子和裹足那样象征着主义和道德的标志，非此即彼——非此即为大逆，即不忠，即不贞，即为修正主义或资产阶级。从一种封闭又陷入另一种封闭，自我封闭无异于自我毁灭。十余年后，当我们回味这些看来已经十分可笑的事情时，确实感到了一种进步的艰难。

造成艰难的根本缘由在于，陈旧的偏见的甚至畸形的观念对整个民族的心理制约。久而久之的制约所形成的固定的心理结构和思维定式，由此而产生的社会和道德的错误判断。这才是小至一件服饰一种发型的变异都会引发社会广泛舆论的全部因由，更不要说政治、政策、教育、文艺的发展变化了。只要稍微回忆十余年来改革在各个领域各个行业所经历的焦点性争论，真是令人感慨系之。

"让思想冲破牢笼……"

《国际歌》这样召唤我们，破禁放足穿西装打破铁饭碗实行市场经济，其实质就是让思想冲破牢笼，冲破陈旧的偏狭的错误的牢笼，去寻求科学。符合社会的自然的发展规律的科学，才是我们唯一的遵循。

一九九五年初，我在给一位友人的赠诗所作的和诗中有两句，抄摘下来作为本文的结束，也为新的一年开端而明志——

拭目扪心史为鉴，

破禁放足不做囚。

1995年2月15日 西安

创造礼赞

汽车在渭北高原的牛车土路上趔趔趄趄前进，我总是联想到一个洋妞尖锥似的高跟皮鞋在泥泞里的滑稽。窗外是北方冰封地冻万木萧条的隆冬季节，绣织着麦苗油菜的高原像一个沉郁洞达的老人。我终于架不住卫平激扬热烈的情绪的煽动而跃跃赶到铜川，来看一个持续了三年即将告竣的引水工程。清凛的空气如此纯净，我宁可忍受寒冷而摇开窗玻璃，才终于惊悟自己并非完全因为卫平的煽动，也是自己在熙攘的城市里吸进了太多的污尘浊气，企盼田野醇净的清风冲刷我被城市污浊充斥的肺叶。

在桃曲坡有一个依山为堰堵截作坝的水库，属于这个引水工程的配套工程；秃山连绵，沮水在石山之中蜿蜒游龙；山是青石山，不见长树只有酸枣棵子成丛成簇。工程的设计者踏勘辩证，把一个十四公里长的地下引水隧道的道口选定在这里。外行的我简单想来，就是依赖桃曲坡水库积蓄沮水以抬高水位，然后通过这条隧道把这条清流引进铜川市，那个高原城市二十余万男女用水缸水瓮蓄水用水的原始生存方式将宣告到此为止。

跨过一道横越沮河连接两山的索道式桥梁，渠道也就把清流悬空从这边山过渡到那边的原。隧道开口并不雄伟壮观，四方开口，像我这样的个头需猫腰才能进去，十四公里的隧道穿过的地层多为青石，地表上有生长庄稼的田垄和人群聚居的古老村庄，在整整两年地下的爆破和锤钻钢钎的锻击声中，那些在田野里收割的农人、在乡村土道上上学的孩子、在火炕上酣睡的乡民，可曾听到过从地层深处震撼到镰刀上和枕头上的力量和意志的震感？田野绿了又秃了，土路湿了又

干了，火炕热了又凉了，春夏秋冬轮回了多少年，那古原腹心里炸药的爆炸日夜不息，那在地心锤击锻打的叮叮当当的铁锤与钢钎的奏鸣没有间断，十四公里的隧道一尺一尺一米一米从沮水河边跃进了铜川城里。

有几位穿戴破旧的青年和中年农民，还在洞口的水渠上用水泥弥补盖板间的缝隙，有点散涣，并不紧张，叼着烟谝着笑话做着细工活儿。我在想一个无法证实的问题，是谁在这个隧道口挖下第一镢头的？是前来庆祝开工的市上领导还是一位普通工人？无论是书记是市长是工人抑或只是一位民工，他终生肯定都不会忘记这头一镢头的，人一生能遇到一次这样的崇高的机会就很值得庆幸了。

阅读这本记述这项工程的建设者事迹的报告文学书稿是后来的事。在参观过引水工程的几个组成大项目的时候，我心里自然会想到那些英雄的建设者经历了怎样的艰难而征服了困难，尽管已经有了这样的情感准备，仍然被书稿里所描写的建设者们的事迹掀起一阵又一阵情感的波浪。有为民赴命的党政领导干部，有心怀宏图的水利专家，有久经开山战场的施工队伍，还有无以数计的民工，且不说国务院和省委省政府的领导人的关切之情了。

阅读完这部报告文学书稿后我又突发痴想，这个引水工程是一部长篇小说，一部昂扬壮观的史诗，所有为它呕心沥血的建设者著成了这部气贯长虹的史诗，他们和他们的作品铸成铜川古关的一座不朽的丰碑。作家写作文学作品的长篇小说，省、市、地、县的党政领导也在他们管辖的大地上写作长篇小说，一条高速公路或一条新铺就的铁道，一座矿山的开掘和一口油井的喷射，一个大型水利工程的筑建和千古荒漠的绿化，等等等等，就是他为官谋政写在三秦大地上的一部又一部辉煌巨著。

一个二十多万人口的古老的铜川，那里以煤矿工人为主体的老少男女，家家都备有几个大瓮和大缸用来储存生命之水。据说到百日大旱的三伏，一旦发现水龙头里有了龙涎玉液，整个居民楼整条街巷都会男欢女呼起来，储水成为最急迫的事情。尤其是过年过节，首先要准备的年货居然是水……如果这些关于缺水的传说没有太多的夸大，我确是万万料想不到铜川人为水而受苦到如此程度，现代化工业、农业、商业发展所受到的制约就更是可以想象的了。

于是就有为民请命的领导者赴命了。

于是就有了舍家忘身的水利专家亢奋激昂了。

于是就有凿洞大军艰苦卓绝地奋斗了。

于是就有干部、党员、老人、孩子踊跃捐款集资的义举了。

于是就成就了一项大事业。一个截断缺水历史开创新生活的清澈甜润的畅想曲。

生活尽管多样化复杂化，然而生活在前进；前进的生活一年比一年更美好，依靠创造者无私的创造；今天的生活明天就成为历史，历史无情；历史无情地湮灭淘汰平庸者，历史只敬重诚实的创造者，哪怕只是一个平民。

1995年春

贞节带与斗兽场

——意大利散记之二

在关中乡村流传的许多“酸黄菜”式的民间笑话里，有一个放心带的故事，说有位商人四季出远门做生意，那时交通工具不发达，顶好顶快也就是轿子马车或单骑骡子，往返很费时日，多则三月半载，至少也少不了月里四十。他一出门，就把大妻小妾留在家里守活寡，终于听到了大妻状告小妾与用人有不干不净的事情。处置这种辱没门庭的事对于商人来说非常简单，辞退一个休掉另一个就是了。然而麻烦接着发生，小妾随之也向商人打上小报告，说大妻与长工有染。商人在恼火万状中反倒醒悟，把大妻小妾都休了可以再娶，把用人长工全部辞退再雇新的人来也不困难，问题在于自己一出远门就旷日持久，再娶的妻妾与新雇的长工用人再发生偷情的事怎么办？于是商人终于苦思冥想出一条万全之策，在他又要出门进行商务活动之前一夜，把两件铁打的放心链子强迫大妻和小妾套锁到下身，然后便放心地出门上路了。

这个商人与小镇铁匠铺的铁匠共同设计锻造的安全带或者叫放心链的东西是个什么形状，传说笑话里很含糊，任何听取这个笑话的人，在痛快淋漓地笑过之后，并不认真去研究那个铁链钢带的实际可行性，笑过也就完了。然而，万万始料不及的事不期而遇，在意大利国家博物馆里，我看到这样一件中国乡村笑话里的钢铁锁链式的带子，名字叫贞节带。

那是一条类似于健美运动员穿的那种简化到只护苦阴部的带子，不过不是任何纺织布料而是坚硬的钢铁。一块一片真正的钢铁连缀成一条腰带，是用来箍绑女人的腰的；同样的钢铁薄片连结成一条带子，一头与前腰的铁带相连结，通过腹部兜住阴部和屁股，再和后腰里箍缠的铁带相扣接。兜着屁股的铁片中间留着一个空心大孔，肯定是设计和制作者为大便通过的悉心设计；而最富于匠心竭尽智慧显示天才的设计，自然是表现在最核心最要害的部位，即对女人生殖器的防卫措施，那儿的铁片同样留着一个孔，无须阐释便可以想到是给小便的出路；那孔是竖立式扁长形状，宽窄的估计和把握也经过精心的算计，即不容许任何男性生殖器通过；最绝的活儿是在扁孔的边沿上，有一圈倒立起来的约二寸长的三角形尖刺，其锋锐的程度有如锥尖锯牙......想想有哪个情种能够对抗这道监守围墙的钢铁蒺藜？设想某个风流种子看到这钢铁蒺藜时会是怎样的猴急猴急？而被扎上这道钢铁蒺藜式的贞节带的女人又是怎样的心理和生理的屈辱和痛苦?

这件匠心独运的钢铁作品挂在意大利国家博物馆的墙上，外面用一只玻璃罩子罩着；如果不是在一个国家级的博物馆里看到这样一件展品，我也许会怀疑是某个恶作剧者的游戏之作，类似于中国乡村民间笑话里的虚拟之物。我在这一刹那突然明白了什么叫欧洲的中世纪；中世纪的全部黑暗和野蛮浓缩具象为这件贞节带，正是中世纪挥舞的旗帜。

据说这件贞节带主要是为罗马帝国的大将军小士官们铸造的。在他们出征另一个民族的前夜，先用这件万无一失的钢铁制品封锁了自己妻子的阴户，然后才放心地扛着盾牌和利矛去进行征服之战。到他们征服了也践踏了一个民族的尊严和家园而凯旋归来时，在接受国王的嘉奖之后，回到家便掏出钥匙打开妻子腰里贞节带上的锁子。我又

陡生疑问，如果某个将军或团长、旅长、营长战死在异国他乡的沙场上了，那么他妻子的这副贞节带恐怕就要箍勒到死而无法解除了，因为唯一的那把钥匙只能由丈夫装在腰里，他死了钥匙也就和腐烂的肌肉一起埋入泥土。腰际和阴部戴着这种钢铁锁链的女人如何睡觉怎么行走？如何日复一日无时无刻不在承受肉体的折磨和心灵的屈辱？漫长的人生之路对她们来说将意味着什么？

我想用相机拍下这件中世纪挥舞过的旗帜，结果被告知说不许拍照。敢于把这么一件怪物堂而皇之展览在国家博物馆里，主办者的勇气和坦率已经令我钦佩，而不许拍照的禁令却让我留下遗憾。我便久久注视这件怪物，我在想到我家乡那个民间笑话的同时，又想起来我刚刚出版的长篇小说里头的一个女人，这个女人惹得某些脸孔一本正经而臀部还残留着“忠”字的当代中国人老大不顺眼。

我在查阅《蓝田县志》时查到了三大本的“贞妇烈女”卷。第一本上全部记录着某村某妇女夫死守节抚养儿子孝顺公婆的千篇一律的事例，第二第三本里只记载着张王氏李赵氏的代号式的名字，我索然无味便一把推开。推开的一瞬心里突然悸颤了一下，想到多少年来凡是来此查阅县志的人，恐怕没有谁会有耐心读完两大本人物名字，而且不是真实名字仅仅只是两个姓氏合成的代号。我忽然对那些贞妇烈女委屈起来，她们以自己活泼泼的血肉之躯换取了县志上不足三厘米的位置，结果是谁也没有耐心阅读她们。我便一行一行一字一字看下去，如果这些屈死鬼牺牲品们幽灵尚在，当会知道在她们死去多少多少年后，终于有一个从来不敢标榜著名的作家向她们行了注目礼……田小娥的形象就在那一刻里产生了。

我们漫长到可资骄傲于任何民族的文明史中，最不文明最见不得人的创造恐怕当属对女人的灵与性的扼杀，我们有称得经典的伦理纲

常和为推行这经典而俗化了的《女儿经》，然而我们似乎没有设计制造贞节带的记载。我们有贞节牌，我们有县志上的“贞妇烈女”卷，我们以奖励为主导方式弘扬那些嫁鸡随鸡嫁狗随狗、鸡狗早夭了还为鸡狗守节守志的女人们。南欧的罗马人不如我们含蓄也不懂得以褒奖为主的方法，赤裸裸锻打出来这么一种钢铁家伙去强行封堵。历史证明了我们祖宗的高明和罗马人的简单甚至可以说愚蠢，他们那样招人眼目的锁链不久（对历史而言）就被彻底废除了，而我们祖先行之有效的方法却延续到本世纪之初，比他们的寿命悠久了几个世纪。我所查阅的几个县的县志大都是抗战前编修的，依然堂而皇之不惜工本弘扬着代号们为鸡狗殉道的节和志，即使从“五四”算起也有十多二十年了，还在依然故我地立贞节牌进登县志……我便有个恶毒的想法，在我们的博物馆里，起码在妇女解放史的专题性展览馆里，应该展出县志上的“贞妇烈女”卷本，这东西与罗马人的贞节带有异曲同工之妙。

……

此前我曾参观过古罗马斗兽场。这个闻名古今闻名东方西方的斗兽场，在我远远地瞅见它的断垣残壁时竟无任何惊讶与新奇的感觉，对比起来远远不及贞节带对我灵魂的震慑。这原因恐怕在于中学的历史教师。

年轻的历史教员是一位非常优秀的老师，然而他无论如何也无法解决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进程中枯燥无趣的纪年或频繁如麻的王朝更迭的事件。一当讲到中世纪的黑暗和野蛮时，对古罗马斗兽场的情景却讲得有声有色，生动得使我几乎忘记了这是在上历史课。野兽从怎样的地下暗道被放逐出来，奴隶又从怎样的地下囚室爬到场地上与野兽搏斗，我听得毛发倒竖惊心动魄，这主要出自幼年时对野兽的恐惧。我们家乡最凶恶残忍的兽类只有狼，而狮子老虎比起狼来又厉害

多少倍呀！一个奴隶面对一只饿过多日的狮子老虎直到被撕成碎块连骨带肉吞噬下去的情景，即使最缺乏想象力又缺乏同情心的人也要闭上眼睛。

也许是我上了些年岁，对野兽的残暴多了一些承受力，直到我站在古罗马斗兽场的场地上时，竟然是一种冷寂心境。我很自然地企图印证历史老师的描绘，企图印证小说《斯巴达克斯》的描写和同名电影里的印象，而眼下的一切都面目全非了。圈形的高耸的围墙大部分坍塌，残缺不全，如同一只凶兽牙齿七零八落豁豁牙牙的嘴；场内的看台也大都坍塌了，依然可以看出那个时候国王贵妃和普通看客的尊卑台阶；囚禁奴隶关锁野兽的地下洞穴也塌窑了，兽和人放逐出来的通道壕沟也壅塞不畅了……历史把鲜红的血和苦涩的泪已经风干风化，历史演进中人类的耻辱也被风吹日蚀得只余一张空干的破皮了。

我的年轻的历史老师绘声绘色讲述人类历史上最野蛮的这一幕情景时，肯定不会料想到一个背馍上学一日三餐全是开水泡馍的听讲学生，以后会站在真实的斗兽场的废址上印证他生动的讲述。又怎能完全冷寂呢?

当希特勒、墨索里尼和东条英机把整个世界变成一个大斗兽场的时候，当我们在某个时期以“文化大革命”的名义鼓动人与假想的敌人搏斗的时候，人类的如斗兽场的发明者的本性在多次重复演练，才是真正令人触目惊心的。

……

贞节带是一种理论和法律的产物，贞节牌同样是一种观念和道德法绳的产物，同样残忍同等野蛮，然而在它们产生的那个时代却同样

堂皇，同样神圣，同样合理；斗兽场和希特勒和东条英机同样自信他们的理论和这理论掀起的屠杀奴隶屠杀世界的战争；“文革”的阶级斗争已无须批判……各个民族生存发展史中留下来的耻辱都钉到耻辱柱上了，然而那钉住的其实只是一张风干了的再无任何蛊惑力量的破皮。

幽灵呢？破皮风干之前原有的幽灵还有没有呢？会不会在某天早晨以一种更具蛊惑力量的装饰，重新向这个世界挥舞贞节带？

1995年6月28日 西安雍村

那边的世界静悄悄

——美、加散记之一

按照国内某些传媒和传闻给人的先入为主的印象，像美国和加拿大这些属于自由世界的国家，一切都是自由的，自由到想干什么就干什么完全随心所欲的形态，甚至自由到混乱无序的程度。走马观花式地到这两个国家走了一趟，才发现满不是那么一回事，似乎也根本不像国人对自由的想当然式的理解，反而觉得那边的人起码在某些方面还很呆板，某些方面还不如国内自由。

我们说得最多的是言论自由，可以在大街上骂总统而不担心被传讯。我所走过的五六个城市没有看见谁这样骂过，甚至连一起吵架骂仗的场面也没有发现。在纽约的地铁车厢里，无论白人黑人和黄皮肤的亚洲人，大家都静悄悄地坐着或站着，有的看书有的看报纸，什么也不看的人就呆呆地端端地坐着或站着，没有人说话，没有旁若无人声贯车厢的交谈，更没有肆无忌惮的浪谝和浪笑，偶尔有认识的人打招呼或说点什么，也是轻微到只让对方听见就行了。有时很空有时又很挤的车厢里都是静悄悄的，只有火车穿行在地下隧道里的机械运行时单调的回响，就这么二十四小时昼夜不停地运行着。据说美国法律没有关于在地铁里大声喧哗违法的条律，车厢里也没有张贴悬挂不许喧哗、不许吐痰、不许乱扔果皮纸屑的牌子。大家都不说话显然不是美国种系的人生性寡言，也不是法律制约或罚款强迫制裁的结果，那是一种社会生活的无形的公约，自然的习惯，个人的修养。你大声喧哗、浪说、浪谝、浪笑干扰了别人，你也同时会被别人在心里斥为缺乏修养的人而不受尊敬。

有次在地铁里碰到一位演说的黑人，他肯定是从前面的车厢窜到我坐的这节车厢，放下一只黑提包就开始了讲演。我听不懂英语，但从他说话的腔调说话时的表情和打出的颇为有力的手势来判断，对什么事义愤不平因而情绪激昂慷慨。陪我的朋友悄悄告诉我，这个黑人在骂纽约市市长。说那个混蛋市长竞选时曾许诺改善失业者的生活，结果是当上了市长就把许诺忘记了，失业者的救济金没有增加一个钢镚儿……令我惊讶的是，他的长达十余分钟的演讲过程中，车厢里寂然无声，看书读报的人依然津津有味地阅读，闭目养神的人懒得睁开眼睛，无论白人或黑人，几乎没有谁有兴趣看演讲者一眼，更没有凑热闹瞎起哄的现象。那黑人演讲完毕就从皮包里掏出一件什么小物品推销，一件也没有售出，就提着包窜到后边一节车厢去了。他走了，车厢里仍然没有丝毫反应，对黑人演讲者的行为没有任何褒贬和议论。是美国人对这种事见多不怪习以为常，还是生性冷漠?

在人群聚集的所有场合，没有我们的城市里那种嘈杂的市声。无论大饭店或小饭铺，无论白人开的西餐馆或华人开的中餐馆，食客选好食物就坐在餐桌上静静地吃喝，没有猜拳行令，没有喧哗，即使结伴而来的三五朋友在一桌进餐，交谈也是小声地进行，绝不影响邻近餐桌的食客……为了贴近美国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我坐火车也坐公共汽车，所有这些公众场合，男男女女的乘客也都和地铁饭馆里一样安静地旅行或进食，使人感到一种清静、一种轻松、一种和谐。

而居民聚居区更是一种难以理解的静谧。在大波士顿的一个中产偏下阶层聚居的小城里，各式各色的尖顶木板小楼房栉比鳞次，一般都是三层或二层的私有住宅。我住在一位华人家里，首先惊讶的便是这里的安静，从早到晚听不见人的说话的声音，不必说引车卖浆提篮卖蛋的吆喝，连孩子的嬉耍的声音也听不到。早晨起来走出后门，树

上是一片鸟鸣，邻近的一位看去年过七旬的老头往草地上撒着面包渣儿，鸟儿便从树上扑落下来，在老人脚下啄食早餐。松鼠也从树上溜下来，与鸟儿争食。凡有街树的地方，到处都可以看见松鼠在树枝间跳跃，动物和鸟儿对居民的信赖达到了无防无虑的状态。

这个几万人聚居的城镇从早到晚都是悄悄静静的，家家的汽车来也悄然无声，走也悄然无声，没有喇叭鸣笛之声。唯一破坏这宁静的是偶尔传来的狗叫，美国人爱养狗，一般都在屋子的狗居室里，但每天都要遛狗，狗的叫声大都是遛狗时牵出屋子的叫声。在这里住着，我望着稠密的尖顶楼群，对这里的安静总有一种不可思议的感觉，总是无端怀疑那些漂亮的建筑物里是否都有人居住，然而从家家门口停放的汽车判断是不容置疑的。人居住在这样恬静的环境里，即使有什么窝火的情绪也都容易平息舒缓下来，起码有利于心血管脑血管有毛病的人养息。

如果说公众场合的良好秩序凭的是每个公民的自觉来维持，那么对酒的严格限制却带有法律的严肃性制约。美国的大小餐馆都不许售酒，各种饮料应有尽有，可乐咖啡果汁等等，都是不含酒精的，连啤酒也不许在餐馆销售，一边吃饭一边喝酒是不可能的。酒类只许在酒的专卖店和酒吧里销售，那里有世界各国的名牌酒供你选择，然而晚上十二时以后全部停止售酒。

在温哥华的最后一晚，朋友让我看看温哥华的夜景，转转大街小巷，看看夜里的海滨和夜色中的原始森林，反正明天到飞机上可以睡觉，我便兴趣十足地去了。转得夜深了，朋友问我想吃点什么想喝点什么。我说什么也不想吃只想喝一瓶啤酒。转着找了几条大街和小巷，所有尚未关门的饭馆和酒类专卖店都拒绝出售，而且很礼貌地摊开手笑一笑，说这是国家规定的。那一夜尽情感受了一个环绕在海滨

和原始森林之中的现代城市的夜色，唯有缺少了一瓶啤酒的遗憾。其实，这遗憾的另一面，是我对那几位店主的尊敬，他们尊重政府的关于酒的法则，其实是公民对国家的尊重，也是一种职业道德。

和一位律师吃饭，在朋友的家里自然可以喝酒了，然而律师说，他这种职业是不允许喝酒的。这个规定的唯一目的，是怕律师喝得神经兴奋胡说八道。为执行这一规定，律师的管理机关说不定某一天通知某律师到医院去突然抽血化验，一旦发现血液里有酒精，便停止律师一季度的营业，连犯二三次便取消律师资格。这位律师朋友说，自己的职业本身就是以法律为神圣的，自己如果不遵守律师自身的职业规定，连自己心理上都难以自信起来。这显然又是一个职业道德和人本身修养的内质性话题了。

如果从这几方面来对照我们，我们显然比美国和加拿大人自由度大得多。而这究竟是一种光荣的自由，抑或是一种丑陋的习惯？按某些传闻，似乎美国自由到可以为所欲为的说法，显然只是一种猜想。

我不可能在短促的时间里了解这些国家的政治集团和商业集团的内部结构，我对那里发达的交通和城市设施也大开眼界，然而我更注意或者说更感兴趣的是，看看美国的最普通的人是怎样生活着，最底层的美国人以怎样一种形态一种情绪过他们的日子。结果却发觉这个号称自由世界里的人们过着静悄悄的生活。

现代文明显然不单是物质一面，现代人自身的文明修养，高尚的操守，从根本上决定着一个社会的基本形态；而健康健全的心理形态，对于整个民族的复兴复壮来说，是决定性的素质；如此，才能形成一个既有益于生理健康又有益于心理情绪的生存环境。

1995年7月1日 雍村

北桥，北桥

——美、加散记之二

在大波士顿郊区三四十公里的康克尔镇，有一座小木桥，名叫北桥，桥下是一条悠悠静静涌动着黑色水流的泥河。二百二十年前的四月十九日夜，美国“独立战争”的第一声火枪的枪声，就是在这座小木桥头打响的。

北桥从此便成为现代美国历史的启明星。或者说，在北桥的火枪枪声里诞生了一个美国。

北桥从此便成为美国历史和现实中最负声望的桥。康克尔小镇因为拥有北桥而成为闻名于世的一个镇子，波士顿人则因为“独立战争”的策源地而自豪和骄傲。

酿成这个伟大事变的起因却是一件小小的冲突。英国殖民者从东印度公司输入大量茶叶，严重危及当地人的经济利益，当地居民便自发“揭竿”，把刚刚在波士顿海岸卸船的茶叶包扔进大海，用我们的习惯用语来说，矛盾一下子就激化了。这事件在我听来似乎有点耳熟，很容易把它和英国人输入鸦片到中国海岸所引发的冲突联系……英国人首先被激怒了，立即下达戒严令，不许当地居民乱说乱动。而崇尚自由自在的新大陆居民，对古老的英国殖民者以往那种妄自尊大和呆板的清规戒律的做派早已不能承受，也看不顺眼，可以说积怨积火已如欲喷的火山熔岩。这个晚被发现的大陆的居民与英国殖民者的冲突的实质，与世界上所有曾经被殖民过的民族无以数计的各类形式的冲突毫无二致。

康克尔小镇有一个农民自发的民间自卫组织。英国人在下过戒严令之后，决定摧毁这个民间武装的小团体，用意自然是要扑灭任何可能蔓延成灾的火星，时间定在四月十九日夜里。居住在波士顿城里的一位年轻医生在天黑时得到了这个泄露的军事机密，星夜骑马急驰三十多公里赶到康克尔，把英军偷袭的消息报告给处于灭顶之灾的自卫武装。这个自卫武装团体一致决定反抗，虽然仓促，却有准备，最短暂的也最恰当的战术准备迅即做出立即实施。当英军士兵经过三十多公里急行军赶到北桥桥头时，桥的那一头的丛林和草地里已经按各个最有利的位置潜伏着自卫的农民，武器是火枪。

当英军士兵怀着偷袭的窃喜列队跨上北桥，灾难便降临了。从北桥的正面和两侧骤然爆起的枪声，把他们出发时的全部美丽的窃喜葬入桥下的泥河。河是真正的泥河，没有一般河流通常都有的沙滩，密不透风的森林几个世纪以来的落叶沉淀在河床上，河水因此而发黑，人或马都不可能蹚过去。无法料及的强硬的抵抗，首先使偷袭者从心理先输掉了，接续的便是溃不成军的慌乱和全线崩溃。然而英国人的呆板做派还是不变，无论桥上桥下倒下掉进了多少同伙，后边的士兵依然列队整齐，不乱间隔继续拥上北桥。桥那头的民兵几乎不用变换射击位置只需尽快地填充弹药，然后喷射到一堆堆送到枪口上来的目标身上。当地农民嘲笑英国人一切都按固定的程式运动的做派，这回是用火枪完成的。

从北桥之战开始，随后就风起云涌般掀起一场震撼世界的伟大的“独立战争”。北桥随后便日益璀璨起来。那位报信的年轻医生也一代又一代地璀璨在美国人的心里。纪念这位英雄医生的方式不是玉碑，也没有雕像，而是一行马蹄印迹。在波士顿城里的一条街道的人行道

上，水泥地面上镶嵌着一行马蹄铁驰过踩下的间距很大的蹄痕，是黄铜，被无以数计的脚踩得闪闪发亮。

这个北桥现在是美国国家公园，一切都按那场战争发生时的原样保存着。低浅的丘陵被原始森林和野花野草覆盖着，树木不再人工增植也不许砍伐，枯死的树木一任其枯死、倒掉以至腐烂，也不作清理；茅草也是二百二十年前的野草的家族的延续，不许烧荒也不许刈割，更不要人工栽培的新的花草品种；河依旧是那条泥河，野苇茅草丛生的泥岸，没有人工修整的一丝痕迹，至今仍然没有人敢于涉水过河；桥是用粗刨的原木架构的，没有油漆，桥栏被游人的抚摸磨损得哧溜光滑，粗的细的木纹清晰可辨；北桥通往公园各处的几条大路也是用黄褐色的沙砾泥土铺垫的，一切都按一七七五年的原样保存下来，让一切到此观赏的世界各地的游客充分感受当年的自然环境的气氛。成群成帮的鸟儿掠过头顶，从这一片树林喧嚣到那一片树林，多是一种通体墨黑的梭子体形的鸟儿，颇类似于我自幼见惯的知更鸟，然而叫声却相去甚远。不知这鸟儿是二百二十年前的原种，抑或是后来迁居的新族?

桥头有一块纪念碑，大约记述了这儿发生过的事件的简单的经过。更令人注目的是那座雕塑，一个刚刚成年而仍未脱净稚气的乡村小伙儿，右手握着一支火枪，左手按着一副犁杖，猫着腰，前弓后殿着腿，沉静而又机敏地瞅着前方，前方十多米处就是北桥。他的农民服装上扎着一条武装带，再也找不出比民兵更恰当的称谓了。这个雕像我一眼看见就似曾相识，无论抗日战争还是国内革命战争，中国南方北方的战场上到处都是这种武装起来的乡村青年类似的模样。

在桥的那一头，即英国士兵接近桥头的道路旁边，贴着地皮栽着一块小小的石碑，作为偷袭北桥而战死的英国士兵的墓碑，却是战争

的胜利者为失败者立下的。碑文很短也很耐人寻味，没有仇恨没有诅咒，也没有胜利者的骄傲，有的只是一种惋惜。碑文大意说，这些年轻人跑了三千多英里从英国来到北桥，死在这里；此刻，他们的母亲还在梦里想念儿子哩！

用这样动人的惋惜和怜悯的口吻、用这种人性和人道的泛爱的胸襟对死亡的敌手表示哀悼，可能是对那种殖民者又是失败者的最深刻也最深沉的心灵和良知的谴责。在波士顿市区，在华盛顿就任“独立战争”总司令的那棵大柳树旁边，同样为两位战死在这里的英国将军各立着一块小小的碑石。从北桥打响第一枪，到这里时整个战局就发生了一个根本性转折，这里的战斗是一场扭转战局的决定性胜利。在华盛顿的塑像周围，摆着三门缴获的英军的火炮。这里用白色的栅栏围护着一株大柳树，华盛顿在指挥这场决定性的战斗胜利之后，就在这棵柳树下成为三军统帅，也接受了三军战士排山倒海的欢呼和膜拜。北桥的初次交战华盛顿没有参与，稍后便从他的农庄赶来投入了，再后就走到了这棵柳树下，再后就把英国殖民者赶走了。处于绝对的领袖地位的华盛顿，在筹建美利坚合众国和大选的时刻，脱下戎装回到了他的农庄，继续当他的农夫去了。据说华盛顿出于这样的理由，即不以军人的身份参加选举，要以一个农民或者说普通公民的身份进行参选，为此他老老实实当一年农夫。尽管这行为里不无虚伪，即无论他一年后以农夫的身份堂而皇之参选总统，其实选民们投给他的一票主要还是投给“独立战争”的那位无可替代的总司令的；如果不是这样，比他更优秀一百倍的任何一位农民也不可能当选第一任美国总统。即使如此，有一点虚伪也还是可爱的，不属于令人恶心倒胃的伪装；仅此一个农夫的姿态，对于他那样功勋卓著的总司令来说，已经是难能可贵的了。

我还是对那几块为战败战死的敌方的将军和士兵所立的碑石的举动感兴趣。今年九月，我在北京见了翻译过《白鹿原》章节为英文的汉学家苏珊女士，和她聊起四月访美的印象，就谈到了这几块为敌手所立的碑子和碑文。和她一行到北京的一位美国男子却以不屑的口吻说，在越南他们可就没有这份情致了。我不觉一震。十年越战对美国普通公民来说至今还是一块化解不开的积食。许多美国母亲至今仍如那碑文所说，正在梦里思念战死在越南的儿子哩。那块为英国死亡士兵栽下的碑子，现在确实栽到数以万计的战死在越南的美国士兵的母亲的心上；那种出于人性和人道的宽容胸襟的碑文，深刻而又深沉地谴责着当年决定发兵越南的那位总统，他即使卸任多年，依然不能逃避灵魂的谴责。在越战结束近二十年后，约翰逊政府时期的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写了一本书，对越战作了反思和忏悔，感应了一些人。看来，对于被殖民而又争得了胜利的一方来说，对殖民者又是失败者以怎样的方式表示谴责，都是比较轻松比较容易做到的，可以是义正词严的也可以是机智幽默的，可以是这样又可以做到那样一种谴责的方式。然而一旦角色转换，美国人自己自觉不自觉地扮演了当年英国入侵者的角色，到越南，还有朝鲜，他们也就像二百二十年前被驱逐被打败被消灭的英国人一样，先被朝鲜继之又被越南人所仇恨所驱逐所战胜。无论如何都不可能产生给北桥牺牲的英军士兵立碑那种心怀和情致了，倒是朝鲜和越南人把这种碑文的碑石栽到了美国总统和美国母亲的心头，真是得其所哉！罪恶的心理阴影比战争的硝烟要难于消弭得多，甚至要遮蔽折磨几代人。

然而我还是难忘北桥，不单是那里保存完美的原始风景。我是四月初到北桥参观的，与美国友人约定四月十九日再来，据说每年的这一天都要举行别开生面的庆祝活动，人们穿起当年农民的服装，装扮成自己武装的民兵，重新表演当年发生在北桥的故事。今年正好是北

桥打响“独立战争”第一枪的二百二十周年，纪念活动更加隆重更加丰富多彩。然而因为活动安排的冲突终于丢失了良机，留下了遗憾。

1995年12月25日

告别白鸽

老舅到家里来，话题总是离不开退休后的生活内容，谈到他还可以干翻扎麦地这种最重的农活儿，很自豪的神情；养着一只大奶羊，早晨起来挤下羊奶煮熟和孙子喝了，孙子去上学，他则牵着羊到坡地里去放牧，挺诱人的一种惬意的神色；说他还养着一群鸽子，到山坡上放羊时或每月进城领取退休金时，顺路都要放飞自己的鸽子。我禁不住问："有白色的没有？纯白的？"

老舅当即明白了我的话意，不无遗憾地说："有倒是有……只有一对。"随之又转换成愉悦的口吻，"白鸽马上就要下蛋了，到时候我把小白鸽给你捉来，就不怕它飞跑了。"老舅大约看出我的失望，继续解释说，"那一对老白鸽你养不住，咱们两家原上原下几里路，它一放开就飞回老窝里去了。"

我就等待着，并不焦急，从产卵到孵化再到幼鸽独立生存，差不多得两个月，急是没有用的。我那时正在远离城市的乡下故园里住着读书写作，大约七八年了，对那种纯粹的乡村情调和质朴到近乎平庸的生活，早已生出寂寞，尤其是陷入那部长篇小说的写作以来的三年。这三年里我似乎在穿越一条漫长的历史隧道，仍然看不到出口处的亮光，一种劳动过程之中尤其是每一次劳动中止之后的寂寞围裹着我，常常难以诉述难以排解。我想到能有一对白色的鸽子，心里便生出一缕温情一方圣洁。

出乎我意料的是，一周没过，舅舅又来了，而且捉来了一对白鸽。面对我的欣喜和惊讶之情，老舅说："我回去后想了，干脆让白鸽

把蛋下到你这里，在你这里孵出小鸽，它就认你这儿为家咧。再说嘛，你一年到头闷在屋里看书呀写字呀，容易烦。我想到这一层就赶紧给你捉来了。”我看着老舅的那双洞达豁朗的眼睛，心不由怦然颤动起来。

我把那对白鸽接到手里时，发现老舅早已扎住了白鸽的几根羽毛，这样被细线捆扎的鸽子只能在房屋附近飞上飞下，而不会飞高飞远。老舅特别叮嘱说，一旦发现雌鸽产下蛋来，就立即解开它翅膀上被捆扎的羽毛，此时无须担心鸽子飞回老窝去，它离不开它的蛋。至于饲养技术，老舅不屑地说：“只要每天早晨给它撒一把苞谷粒儿……”

我在祖居的已经完全破败的老屋的后墙上的土坯缝隙里，砸进了两根木棍子，架上一只硬质包装纸箱，纸箱的右下角剪开一个四方小洞，就把这对白鸽放进去了。这幢已无人居住的破落的老屋似乎从此获得了生气，我总是抑制不住对后墙上的那一对活泼泼的白鸽的关切之情，没遍没数儿地跑到后院里，轻轻地撒上一把玉米粒儿。起始，两只白鸽大约听到玉米粒落地时特异的声响，挤在纸箱四方洞口探头探脑，像是在辨别我投撒食物的举动是真诚的爱意抑或是诱饵？我于是走开，以便它们可以放心进食。

终于出现奇迹。那天早晨，一个美丽的乡村的早晨，我刚刚走出后门扬起右手的一瞬间，扑啦啦一声响，一只白鸽落在我的手臂上，迫不及待地抢夺手心里的玉米粒儿。接着又是扑啦啦一声响，另一只白鸽飞落到我的肩头，旋即又跳弹到手臂上，挤着抢着啄食我手心里的玉米粒儿。四只爪子掐进我的皮肉，有一种痒痒的刺疼。然而听着玉米粒从鸽子喉咙滚落下去的撞击的声响，竟然不忍心抖掉鸽子，似乎是一种早就期盼着的信赖终于到来。

又是一个堪称美丽的早晨，飞落到我手臂上啄食玉米的鸽子仅有一只，我随之发现，另外一只静静地卧在纸箱里产卵了。新生命即将诞生的欣喜和某种神秘感，立时就在我的心头漫溢开来。遵照老舅的经验之说，我当即剪除了捆扎鸽子羽毛的绳索，白鸽自由了，那只雌鸽继续钻进纸箱去孵蛋，而那只雄鸽，扑啦啦扑向天空去了。

终于听到了破壳出卵的幼鸽的细嫩的叫声。我站在后院里，先是发现了两只破碎的蛋壳，随之就听到从纸箱里传下来的细嫩的新生命的啼叫声。那声音细弱而又嫩气，如同初生婴儿无意识的本能的啼叫，又是那样令人动心动情。我几乎同时发现，两只白鸽轮番飞进飞出，每一只鸽子的每一次归巢，都使纸箱里欢闹起来，可以推想，父亲或母亲为它们捕捉回来了美味佳肴。

我便在写作的间隙里来到后院，写得拗手时到后院抽一支烟，那哺食的温情和欢乐的声浪会使人的心绪归于清澈和平静，然后重新回到摊着书稿的桌前；写得太顺时我也有意强迫自己停下笔来，到后院里抽一支雪茄，瞅着飞来又飞去的两只忙碌的白鸽，聆听那纸箱里日渐一日愈加喧腾的争夺食物的欢闹，于是我的情绪由亢奋渐渐归于冷静和清醒，自觉调整到最佳写作心态。

这一天，我再也按捺不住神秘的纸箱里小生命的诱惑，端来了木梯，自然是趁着两只白鸽外出采食的间隙。哦！那是两只多么丑陋的小鸽，硕大的脑袋光溜溜的，又长又粗的喙尤其难看，眼睛刚刚睁开，两只肉翅同样光秃秃的，它俩紧紧依偎在一起，静静地等待母亲或父亲归来哺食。我第一次看到了初生形态的鸽子，那丑陋的形态反而使我更急切地期盼蜕变和成长。

我便增加了对白鸽喂食的次数，由每天早晨的一次到早、午、晚三次。我想到白鸽每天从早到晚外出捕捉虫子，不仅活动量大大增加，自身的消耗也自然大大增加，而且把采来的最好的吃食都喂给幼鸽了。

说来挺怪的，我按自己每天三餐的时间给鸽子撒上三次玉米粒，然后坐在书桌前与我正在交缠着的作品里的人物对话，心里竟有一种尤为沉静的感觉，白鸽哺育幼鸽的动人的情景，有形无形地渗透到我对作品人物的气性的把握和描述着的文字之中。

又是一个美丽的早晨，我在往地上撒下一把玉米粒的时候，两只白鸽先后飞下来，它们显然都瘦了，毛色也有点灰脏有点邋遢。我无意间往墙上的纸箱一瞅，两只幼鸽挤在四方洞口，以惊异稚气的眼睛瞅着正在地上啄食的父亲和母亲。那是怎样漂亮的两只幼鸽哟，雪白的羽毛，让人联想到刚刚挤出的牛乳。幼鸽终于长成了，所有可能发生的意外或不测的担心顿然化解了。

那是一个下午，我准备到河边上去散步，临走之前给白鸽撒一把玉米粒，算是晚餐。我打开后门，眼前一亮，后院的土围墙的墙头上，落栖着四只白色的鸽子，竟然给我一种白花花一大堆的错觉。两只老白鸽看见我就飞过来了，落在我的肩头，跳到手臂上抢啄玉米。我把玉米撒到地上，抖掉老白鸽，好专注欣赏墙头上那两只幼鸽。

两只幼鸽在墙头上转来转去，瞅瞅我又瞅瞅在地上啄食的老白鸽，胆怯的眼光如此显明，我不禁笑了。从脑袋到尾巴，一色纯白，没有一根杂毛，牛乳似的柔嫩的白色，像是天宫降临的仙女。是的，那种对世界对自然对人类的陌生和新奇而表现出的胆怯和羞涩，使人顿时生出诸多的联想：刚刚绽开的荷花，含珠带露的梨花，养在深山

人未识的俏妹子……最美好最纯净最圣洁的比喻仍然不过是比喻，仍然不及幼鸽自身的本真之美。这种美如此生动，直教我心灵震颤，甚至畏怯。是的，人可以直面威胁，可以蔑视阴谋，可以踩过肮脏的泥泞，可以对叽叽咕咕保持沉默，可以对丑恶闭上眼睛，然而在面对美的精灵时却是一种怯弱。

小白鸽和老白鸽在那幢破烂失修的房脊上亭亭玉立。这幢由家族的创业者修盖的房屋，经历了多少代人的更替而终于墙颓瓦朽了，四只白色的鸽子给这幢风烛残年的老房子平添了生机和灵气，以至幻化出家族兴旺时期的遥远的生气。

夕阳绚烂的光线投射过来，老白鸽和幼白鸽的羽毛红光闪耀。

我扬起双手，拍出很响的掌声，激发它们飞翔。两只老白鸽先后起飞。小白鸽飞起来又落下去，似乎对自己能否翱翔蓝天缺乏自信，也许是第一次飞翔的胆怯。两只老白鸽就绕着房子飞过来旋过去，无疑是在鼓励它们的儿女勇敢地起飞。果然，两只小白鸽起飞了，翅膀扇打出啪啪啪的声响，跟着它们的父母彻底离开了屋脊，转眼就看不见了。

我走出屋院站在街道上，树木笼罩的村巷依然遮挡视线，我就走向村庄背靠的原坡，树木和房舍都在我眼底了。我的白鸽正从东边飞翔过来，沐浴着晚霞的橘红。沿着河水流动的方向，翼下是蜿蜒着的河流，如烟如带的杨柳，正在吐穗扬花的麦田。四只白鸽突然折转方向，向北飞去，那儿是骊山的南麓，那座不算太高的山以风景和温泉名扬历史和当今，烽火戏诸侯和捉蒋兵谏的故事就发生在我的对面。两代白鸽掠过气象万千的那一道道山岭，又折回来了，掠过河川，从我的头顶飞过，直飞上白鹿原顶更为开阔的天空。原坡是绿的，梯田

和荒沟有麦子和青草覆盖，这是我的家园一年四季中最迷人最令我陶醉的季节，而今又有我养的四只白鸽在山原河川上空飞翔，这一刻，世界对我来说就是白鸽。

这一夜我失眠了，脑海里总是有两只白色的精灵在飞翔，早晨也就起来晚了。我猛然发现，屋脊上只有一双幼鸽。老白鸽呢？我不由得瞅瞄天空，不见踪迹，便想到它们大约是捕虫采食去了。直到乡村的早饭已过，仍然不见白鸽回归，我的心里竟然是惶惶不安。这当儿，舅父走进门来了。

“白鸽回老家了，天刚明时。”

我大为惊讶。昨天傍晚，老白鸽领着儿女初试翅膀飞上蓝天，今日一早就飞回舅舅家去了。这就是说，在它们来到我家产卵孵蛋哺育幼鸽的整整两个多月里，始终也没有忘记老家故巢，或者说整个两个多月孵化哺育幼鸽的行为本身就是为了回归。我被这生灵深深地感动了，也放心了。我舒了一口气：“噢哟！回去了好。我还担心被鹰鹞抓去了呢！”

留下来的这两只白鸽的籍贯和出生地与我完全一致，我的家园也是它们的家园；它们更亲昵地甚至是随意地落到我的肩头和手臂，不单是为着抢啄玉米粒儿；我扬手发出手势，它们便心领神会从屋脊上起飞，在村庄、河川和原坡的上空，做出种种酣畅淋漓的飞行姿态，山岭、河川、村舍和古原似乎都舞蹈起来了。然而在我，却一次又一次地抑制不住发出吟诵：这才是属于我的白鸽！而那一对老白鸽嘛……毕竟是属于老舅的。我也因此有了一点点体验，你只能拥有你亲自培育的那一部分……

当我行走在历史烟云之中的一个又一个早晨和黄昏，当我陷入某种无端的无聊无端的孤独的时候，眼前忽然会掠过我的白鸽的倩影，淤积着历史尘埃的胸脯里便透进一股活风。

直到惨烈的那一瞬，至今依然感到手中的这支笔都在颤抖。那是秋天的一个夕阳灿烂的傍晚，河川和原坡被果实累累的玉米棉花谷子和各种豆类覆盖着，人们也被即将到来的丰盈的收获鼓舞着，村巷和田野里泛溢着愉快喜悦的声浪。我的白鸽从河川上空飞过来，在接近西边邻村的村树时，转过一个大弯儿，就贴着古原的北坡绕向东来。两只白鸽先后停止了扇动着的翅膀，做出一种平行滑动的姿态，恰如两张洁白的纸页飘悠在蓝天上。正当我忘情于最轻松最舒悦的欣赏之中，一只黑色的幽灵从原坡的哪个角落里斜冲过来，直扑白鸽。白鸽惊慌失措地启动翅膀重新疾飞，然而晚了，那只飞在头前的白鸽被黑色幽灵俘掠而去。我眼睁睁地瞅着头顶天空所骤然爆发的这一场弱肉强食、侵略者和被屠杀者的搏杀……只觉眼前一片黑暗。当我再次眺望天空，唯见两根白色的羽毛飘然而落，我在坡地草丛中捡起，羽毛的根子上带着血痕，有一缕血腥气味。

侵略者是鹞子，这是家乡人的称谓，一种形体不大却十分凶残暴戾的鸟。

老屋屋脊上现在只有一只形单影孤的白鸽。它有时原地转圈，发出急切的连续不断的咕咕的叫声；有时飞起来又落下去，刚落下去又飞起来，似乎惊恐又似乎是焦躁不安；我无论怎样抛撒玉米粒儿，它都不屑一顾更不像往昔那样落到我肩上来。它是那只雌鸽，被鹞子残杀的那只是雄鸽。它们是兄妹也是夫妻，它的悲伤和孤清就是双重的了。

过了好多日子，白鸽终于跳落到我的肩头，我的心头竟然一热，立即想到它终于接受了那惨烈的一幕，也接受了痛苦的现实而终于平静了。我把它握在手里，光滑洁白的羽毛使人产生一种神圣的崇拜。然而正是这一刻，我决定把它送给邻家一位同样喜欢鸽子的贤，他养着一大群杂色信鸽，却没有白鸽。让我的白鸽和他那一群鸽子合帮结伙，可能更有利生存；再者，我实在不忍心看见它在屋脊上的那种孤单。

它还比较快地与那一群杂色鸽子合群了。

我看见一群灰鸽子在村庄上空飞翔，一眼就能辨出那只雪白的鸽子，欣慰我的举措的成功。

贤有一天告诉我，那只白鸽产卵了。

贤过了好多天又告诉我，孵出了两只白底黑斑的幼鸽。

我出了一趟远门回来，贤告诉我，那只白鸽丢失了。我立即想到它可能又被鹞子抓去了。贤提出来把那对杂交的白底黑斑的鸽子送我。我谢绝了。

又过了一些日子，失掉我的两只白鸽的情感波澜已经平静，老屋也早已复归平静，对我已不再具任何新奇和诱惑。我在写作的间隙里，到前院浇花除草，后院都不再去了。这一天，我在书桌前继续文字的行程，窗外传来了咕咕咕的鸽子的叫声，便摔下笔，直奔后院。在那根久置未用的木头上，卧着一只白鸽。是我的白鸽。

我走过去，它一动不动。我捉起它来，它的一条腿受伤了，是用细绳子勒伤了的。残留的那段细绳深深地陷进肿胀的流着脓血的腿杆

里，我的心里抽搐起来。我找到剪刀剪断了绳子，发觉那条腿实际已经勒断了，只有一缕尚未腐烂的皮连接着。它的羽毛变成灰黄，头上粘着污黑的垢甲，腹部黏结着干涸的鸽粪，翅膀上黑一坨灰一坨，整个儿污脏得难以让人握在手心了。

我自然想到，这只丢失归来的白鸽是被什么人捉去了，不是遭了鹞子？它被人用绳子拴着，给自家的孩子当玩物？或者连他以及什么人都可以摸摸玩玩的？白鸽弄得这样脏兮兮的，不知有多少脏手抚弄过它，却根本不管不顾被细绳勒断了的腿。我在那一刻突然想到，它还不如它的丈夫被鹞子扑杀的结局。

我在太阳下为它洗澡，把由脏手弄到它羽毛上的脏洗濯干净，又给它的腿伤敷了消炎药膏，盼它伤愈，盼它重新发出羽毛的白色。然而它死了，在第二天早晨，在它出生的后墙上的那只纸箱里……

1996年8月16日 西安

一株柳

这是一株柳树，一株在平原在水边极其普遍极其平常的柳树。

这是一株神奇的柳树，神奇到令我望而生畏的柳树，它伫立在青海高原上。

在青海高原，每走一处，面对广袤无垠青草覆盖的原野，寸木不生青石嶙峋的山峰，深邃的蓝天和凝滞的云团，心头便弥漫着古典边塞诗词的悲壮和苍凉。走到李家峡水电站总部的大门口，我一眼就瞅见了这株大柳树，不由得“哦”了一声。

这是我在高原见到的唯一的一株柳树。我站在这里，目力所及，背后是连绵的铁铸一样的青山，近处是呈现着褚红色的起伏的原地，根本看不到任何一种树。没有树族的原野尤其显得简洁而开阔，也显得异常苍茫和苍凉。这株柳树怎么会生长起来壮大起来，怎么就造成高原如此壮观的一方独立的风景?

这株柳树大约有两合抱粗，浓密的枝叶覆盖出大约百十余平方米的树荫；树干和树枝呈现出生铁铁锭的色泽，粗粝而坚硬；叶子如此之绿，绿得苍郁，绿得深沉，自然使人感到高寒和缺水对生命颜色的独特锻铸；它巍巍然撑立在高原之上，给人以生命伟力的强大的感召。

我便抑制不住猜测和想象：风从遥远的河川把一粒柳絮卷上高原，随意抛撒到这里，那一年恰遇好雨水，它有幸萌发了；风把一团团柳絮抛撒到这里，生长出一片幼柳，随之而来的持续的干旱把这一

茬柳树苗子全毁了，只有这一株柳树奇迹般地保存了生命；自古以来，人们也许年复一年看到过一茬一茬的柳树苗子在春天冒出又在夏天旱死，也许熬过了持久的干旱却躲不过更为严酷的寒冷，干旱和寒冷绝不宽容任何一条绿色的生命活到一岁；这株柳树就造成一个不可思议的奇迹，千年奇迹万年奇迹，无法猜度它是否属于一粒超级种子?

我依然沉浸在想象的情感世界：长到这样粗的一株柳树，经历了多少次虐杀生灵的高原风雪，冻死过多少次又复苏过来；经历过多少场铺天盖地的雷殛电轰，被劈断了枝干而又重新抽出了新条；它无疑经受过一次摧毁又一次摧毁，却能够一回又一回起死回生，这是一种顽强一种侥幸还是有神助佛佑?

我的家乡的灞河以柳树名贯古今，历代诗家词人对那里的柳枝柳絮倾洒过多少墨汁和泪水。然而面对青海高原的这一株柳树，我却崇拜到敬畏的情境了。是的，家乡灞河边的柳树确有引我自豪的历史，每每念诵那些折柳送别的诗篇，都会抹浓一层怀恋家园的乡情。然而，家乡水边的柳树却极易生长，随手折一条柳枝插下去，就发芽就生长，三两年便成为一株婀娜多姿风情万种的柳树了；漫天飞扬的柳絮飘落到沙滩上，便急骤冒出一片又一片芦苇一样的柳丛。青海高原上的这一株柳树，为保存生命却要付出怎样难以想象的艰苦卓绝的努力？同是一种柳树，生活的道路和生命的命运相差何远?

这株柳树没有抱怨命运，也没有畏怯生存之危险和艰难，更没有攀比没有忌妒河边同族同类的鸡肠小肚，而是聚合全部身心之力与生存环境抗争，以超乎想象的毅力和韧劲生存下来发展起来壮大起来，终于造成了高原上的一方壮丽的风景。命运给予它的几乎是九十九条死亡之路，它却在一线希望之中成就了一片绿荫。

我崇拜这株高原柳树。

1996年9月

感受文盲

——美、加散记之三

从洛杉矶飞往温哥华的班机起飞以后，我和王教授不约而对视。教授说："好像飞机上没有中国人。"我说："这回麻烦了。"

这是跨越国界的飞行。按照国际航班的公例，在这个国家进入另一个国家的海关之前，须先填写一张入境卡。我和王教授的麻烦就出在这张卡上。卡上的文字是英文，而我们两人谁也读不出一个英语单词更不要谈书写了，这张卡片就成为一道名副其实的关卡了。此次旅行之前，其实就担心着这个麻烦，然而却寄托着一份侥幸，这个航班上说不定会有中国人可以帮帮忙。此前我俩从北京飞往波士顿的途中，就是靠一位赴美留学的青年代替填写那张卡片的。一次侥幸会给人轻易地造成又一次侥幸心理的产生，况且明知在美国和加拿大的中国移民人数逐年骤增。其实在王教授开口之前，我早已把整个座舱都巡视过了，一色的白色人种，点缀着几个黑色和混血的男女，偏不见一个中国人，甚至连一个容易混淆的日本人和韩国人也没有。侥幸毕竟是侥幸，可指望者渺渺。

空姐来了，发给每个乘客一张入境卡。我接过那张卡片就用手势向她申述我没有书写能力。从眼神和手势判断，她明白了我的无能并示意我等一等。

我就等着。教授也等着。我手里捏着那张卡，有点百无聊赖的意味。卡片是淡黄色的，看一眼是无可奈何，再看一眼仍是奈何不得，溜一眼前后左右那些以英文为母语的乘客或随意或斯文或认真地填写

卡片的种种神态，我突然想起母亲。在我们家里，母亲是唯一的文盲，父亲不在家时，她常把远方姐姐的来信递给我说：“给妈再念一遍。”有时候纯粹是一张毫无保存价值的药费单子或什么字条，她不敢轻易扔掉：“你看这里是个啥单子有用没用？”我那时候确曾感到过小小年纪能识文断字的优越，却很少能体味文盲母亲的心情。现在轮到我必须做出把这张鬼卡片送到别人手里去帮助辨识的动作了。我才真切地体味到了作为一个文盲的含义，颇觉用“睁眼瞎子”譬喻文盲真是一个准确而又绝妙的语汇。

那位空姐开始收回入境卡了，她在我俩跟前时笑着点点头就走过去了，两张只字未填的卡片由我俩继续拿着。

教授对我做出无奈的眉眼：“咋办？”我还给教授一个同样无奈的眉眼：“这个麻烦只好交给美国人民了。”教授说：“反正不至于把咱们再运回洛杉矶吧？”我说：“那就要看这航班上的美国人民友好不友好了。”

过了一阵子，那位空姐专程走到我和王教授的座位前，又是做眉眼，又是打手势，眉眼做得很生动，涂红的嘴唇尤其生动，手势也打得十分灵巧，然而表达的意思却无法传递给我们哪怕百分之五十，她也无奈地笑了。教授终于从她指向空中的一个手势领悟出来，她们用广播询问过机舱里的所有乘客，看看谁懂中文，帮助两个不懂英文的中国人填一下入境卡，结果是一个也没有。她对于王教授能理解她的手语眼语很高兴，不断地颔首点头，随后就示意我们继续拿着那个卡片等待。她又忙她的事去了，一会儿推着装满饮料的推车来了，一会儿又推着小推车送便餐来了。每一次来时似乎倒成了熟人，做一个友好坦诚的微笑，把一样一样的饮料拿起来供我选择，因为不识英文，就无法判断里面的内容，想随便拿一样，能喝就喝不能喝扔掉算了。

她依然耐心地继续把各色包装的饮品拿给我看，随之又拉开抽屉，我终于看见了可口可乐的熟悉装饰，便自己挑出来。她也高兴地笑了，有点得意兼调皮的样子。

我和王教授便不再担心被重新拉回洛杉矶了，尽管这卡片依然空白，也不明白最终的结束方式。我反而有点感动，想到前几日从波士顿到洛杉矶的飞行。尽管这是美国国内航班无须填写入境卡，送行的友人还是不放心，把我俩领到登机验票入口处，对一位值班的女孩说，这两个中国人不会英语，希望上下飞机能予以关照。她立即填写了两张通行卡片交给我和王教授。友人解释那卡片的内容，注明了我们需要帮助的问题，只要交给飞机上的空姐或空弟就行了。我和王教授就坐下等待验票登机，却也想在飞机上需要帮助的肯定不只是我们，因为这卡片的设置早就为许多人帮过忙解过麻烦了。验票登机的时间即到，验票人员也提前到来分列入机口两侧，乘客们开始提携行李排队。那位给我们开通行路条的女子突然走过来，示意我们跟她走。她对验票的人说了几句，就领着我俩第一批踏进了通道，直到走进飞机。她从我手里把那张她填写的路条或卡片拿过去，交给一位当班的空姐，又说了几句，就转身走开了。我和王教授坐到自己的座位上，大约五六分钟之后才见乘客们拥进机舱来，真是懊悔没有对那位路条女子说一句感谢的话。我对王教授说：“这位美国女子好像没有使用微笑却把我们感动了。”王教授说：“对于顾客来说其实只要服务质量就够了。”

飞机抵达温哥华。我和教授走到机舱门口，发现那位空姐正在等着我俩。她领着我俩随着人流穿过长长的走廊，走到出口亦即海关验卡处，让别人先走，直到只剩下我俩时，她把那两张依然空白着的入

境卡交给了加拿大国的守关人员，又交代了些什么，转过身来又那么含着调皮意味地笑笑就匆匆走去了。

我现在才直接面对加国的守关大汉了。大汉长得又粗又高，坐在出口的钢铁栅栏上，满不在乎地瞅着我们，随即拨动了电话。一会儿工夫就有一位黑衣黑裙黑头发的中年女人走来了，终于看见了一位熟悉的中国人。加国大汉拿着卡片又掏出钢笔，由那位黑蝴蝶女士用中文发问，又用英语翻译给他，便一项一项填写着，脸上现出多一番劳累的不悦，所以仍然大大咧咧地坐在栅栏上，而宁可让旁边的椅子闲着。当问到我们的职业和在温哥华的接待单位时，王教授报出了我们的作家职业。那大汉倚在墙上的脊背挺直起来，随之从栅栏上跳下，瞬即转换出一脸笑来："作家？噢！作家！欢迎你们到温哥华。"他伸出一只手前倾着身子做出一副友谊而又滑稽的姿态，憨憨地笑着送我和王教授通过他把守的关卡。

1996年10月

口红与坦克

——美、加散记之四

想到这个题目并最终确定下来，仍然觉得有点滑稽，甚至有那么一点荒谬。口红是什么，坦克又是什么？口红派什么用场，坦克又派什么用场？把两件风马牛不相及甚至完全对立的东西焊接成文章标题，首先倒是应该坦白，并非出于哗众取宠出奇制胜的念头，而是一年前在华盛顿街头看到的一尊雕塑的强烈印象。

那是一辆坦克，涂抹着如同实战坦克的铁黑颜色，体积也与实战坦克一般大小，只是没有现实主义的工笔细刻，它是一种粗线条的勾勒和大轮廓的模拟。从艺术上说，可能属于现实主义与现代派的杂交或中性改良。创造者显然并不是要展示这种常规武器的最新产品，甚至无意显示那一代产品属何种型号，只是作为一种常规武器中极具杀伤力的战争的形象，赫赫然摆置在美国首都的一条大街上，准确点说是在大街一旁的比较宽阔的一块草地上。它没有实战坦克最要害的那个部件——炮管，所以它永远也不可能去发射杀人毁物的炮弹。那根炮管被置换为一支口红，长短和粗细的尺码恰好类似炮管。这支口红端直地挺竖在坦克上，戳向天空，偏圆的顶头的红色，像一团火焰，像一瓣玫瑰，或者更像姣美性感的女人的嘴唇？

宽敞的车道，川流不息着各种色彩各种形状的轿车。人道上，匆匆着或悠悠着世界各地各种肤色的男人女人大人和小孩。这辆驮载着一支口红的坦克，就这样与现代都市和谐地统一在一起，构成一道看上去美丽却不只让人仅仅感觉美丽的风景。我在第一眼瞅见它时，不

仅没有丝毫焊接的感觉，而且有一种心灵深处的震撼，这震撼的余波一直储存到现在而不能完全消弭。

这尊雕塑的内蕴其实最明了不过，可说是一个十分陈旧的主题，然而又是迄今为止困惑着人类的一个共同的鲜活的话题，雕塑家用简练到简单的笔法，把一个牵涉所有国家和民族的生存理想的大话题凝铸为一组看来不可思议的“焊接”，如此明了，如此简练，又如此强烈。同类题材同类意旨的美术作品，最负名望的莫过于毕加索的那只和平鸽，还有一尊颇震撼人心的“铸剑为犁”的雕像，早已沉潜在各个民族一代又一代人的心灵深处，然而这尊象征意旨明朗、透彻的雕塑，依然昭示着人类最切近的生存忧患和生存理想。

人们在雕塑前驻足，凝眸，沉思，留影。白毛的欧洲人黄肤的亚洲人和黑脸卷毛的非洲人都在这儿驻足，把自己的情感寄托给雕像，又把雕塑创造者的美好愿望储存心间：企望这个世界能给他们的妻子女儿一支口红，永远不要发生某天早晨或深夜坦克碾过菜园和牛栏的惨景。德国鬼子和日本鬼子同时在欧、亚两个大陆这样干过，美国鬼子在朝鲜和越南这样干过，前苏联同样在捷克和阿富汗如此干过。

用口红取代坦克。

这种强烈的艺术创造让一切平庸的艺术制作感到羞愧和难堪。然而它传达给我的又恰恰不单是艺术创造本身。相信看到这尊雕塑的任何人，都会把他关于战争的全部记忆（直接的或间接的）都激活了。不仅如此，每每通过传媒看到世界某个角落坦克正在发射炮弹的画面或图片，我便联想到华盛顿街头的那尊雕塑。雕塑毕竟是雕塑，艺术也毕竟只是艺术，可以唤醒世界千万计的男女的呼应，可仍然阻止不

住实战坦克的行动，坦克却仍然碾碎着那些地区该当涂口红的漂亮的嘴唇。

那个被国际法庭判处绞刑的东条英机和他的同僚战犯，几乎每年都要受到某个大臣乃至某个首相的参拜和祭奠。尽管此举受到整个亚洲和世界的谴责和侧目，闹剧和丑剧依然年年上演。我感到的不单是闹剧丑剧的可笑，而是惊讶参拜者露骨的虚伪，因为哪怕是一个小孩都会明白，即使烧一万吨香蜡纸表叩一万次响头念一万次佛，都不可能使那些战犯的罪恶魂灵得到安宁，更不可能得到超度了，至于那些在“教科书”和展览图片上屡屡偷偷摸摸搞小动作的人，不仅使世人看到了一个虚伪的灵魂，更看到了他们面对口红和坦克的现实的选择的可能性。

倒是那场世界大战的另一个发动国的现时首脑，在犹太人被害的坟墓前祭献的一束鲜花，尤其是出人意料的那一个长跪动作，不仅告慰的是长眠地下的被蹂躏的灵魂，重要的是使活着的我们看到了一个民族的大气。足以结束一个时代仇恨的一跪，必定成为历史性的一跪——他选择了口红。

那个靖国神社的门前广场，倒是应该有这样一尊坦克驮载口红的雕塑，让那些死去的罪恶的灵魂继续反省，也使那些活着的虚伪的灵魂反省出一个“小”来。

1996年10月

五十开始

一

孙康宜教授到西安来，走出机场见着面时开口就感慨：哦！我去年给你说想到西安来，现在真的就来了！这种感慨随后在从机场开往西安的汽车上又重复说了两次，那神情是连她自己都有点不可置信的惊喜。孙教授是美国耶鲁大学东亚文学系主任，去年四月我在美国东部海岸城市波士顿结识她的。她确凿说过很想到西安来看看，我自然知道她这样的人想到西安来看什么。现在她真的来了，而且驱车行驶在暮色苍茫的咸阳古原上了，我也有某种难以信真的惊讶，甚而至于生出"地球真小"那种中国的地球公民们的伟人意识式的慨叹了。

汽车在气度恢宏地韵沉雄的咸阳原上疾驰，连片的果林和墨绿的禾苗背后，掩映着一个个或大或小或远或近却一律苍老衰败着的皇家墓冢，久远的辉煌和昔日的威仪，终究被历史的风雨剥蚀得精光，只剩下一堆堆荒草盘结的黄土圪墶。孙康宜教授从窗外收回眼光，突然问我：你不再把五十看作是一个危机的年龄了吧？我不觉一愣，想不到她还记着这个话题，随之也就释然：去年基本达成共识了嘛！她依然很直率又很认真地说：不知你回来以后有无反复？

这是一个有趣的话题。

去年四月在美国时，孙教授和北美华人作家协会联手在哈佛大学办了一次文学讲座，包括她和我在内共有四人演讲，每人一小时，我被排在头一个。我讲完规定的一个钟点，从讲台上走下来直接走出讲

演大厅，站在校园的草坪上抽烟。美国的公众场合和绝大多数家庭都不许抽烟，想过过烟瘾就得走出户外。

我刚点烟吸了两口，有一位留学生从讲演厅溜出来走到我跟前，自我介绍之后就提出他想和我单独聊聊。我说我出来仅仅是想抽口烟，很快就要回讲演厅去，还想听听他们三人的讲演内容，想聊得另约时间。他就笑着告诉我：“孙教授正批判你哪。她上台开讲头一句就批。”我以为他开玩笑，并不在意。他更认真地说：“真的批哪！批你刚才讲的五十危机的观点。”这时又有几位男女留学生相继从讲演厅里溜出来，和我在草坪上交谈，也都通报我挨批的消息。抽完一支烟，我便走回讲演大厅，免得更多的人溜出来影响这个讲座。

讲演全部结束，走在绿油油的校园里，孙康宜严肃地对我说：“我刚才批判你一个观点了。”我说我已经知道了。她故作惊讶：“我批你时你不在场呀，怎么会知道？”随之又释然了，“噢噢！有人给你告密了，这么快。”我也开玩笑说：“听说美国人喜欢告密，谁家父母在家里打骂小孩，邻居知道了就要拨电话报警。这些中国留学生受美国人的影响了。”玩笑归玩笑，孙康宜接着认真地问：“你怎么会有五十危机的感觉呢？我简直不可理解。我过五十岁时，整个感觉是我要重新开始了，我觉得过了五十才获得了完全的自由，可以做我想做的事了。”

她告诉我，她从台湾念书念到美国，博士帽戴上了教授也当上了，直到五十岁时，得到了耶鲁大学东亚文学系主任这样一个职位，这个奋斗历程谁都可以想见其中的艰难。正是在五十岁这个重要的年轮上，她有了一种全新的心理感觉，她不仅可以不再为生计忙迫了，而且可以不受别人的支配只按照自己的生存理想来支配自己了；孩子长大了，不再是家庭负累，而是可以获得情感交流和探讨社会的益助

了；更重要的是知识的积累已形成了见解的独立，标志着一种成熟，自信能够发出只属于自己感知的声音了，所以在跨越五十年龄大关时，她说她的整个心理感觉是从未有过之好，整个是一种要有大作为的重新开始的良好心态……所以对我的五十危机论就“无法理解无法容忍不能不批”。

这是完全合理的，因此也完全可以理解的心态，尽管我并未询问她所经历的奋斗的全过程或者最关键的细节，却是以为任何成功者都必然兼备的先天的智慧和后天的艰苦卓绝的努力。谁都可以想到，在美国数一数二的耶鲁大学的东亚文学系的主任一职，不仅不可能靠裙带靠后门靠巴结谋权，稍微一点的平庸都是难以指望的。

然而，我的五十危机的谬论又是怎么一回事呢？我想说，我的那种心理感觉也是真实的。

二

五十危机的心理感受产生于四十五岁即一九八七年，亦即我刚刚完成了长篇小说《白鹿原》的基本构思即将开笔起草的时候。按照当时的总体把握，我觉得大约需要三年时间才能完成它的创作，如果预计的这个规划实施顺利，如果这三年中间不发生写作本身以外的各种意外灾变，那么到完成书稿也就挂上五十的虚龄了，而这两个“如果”的可靠性在我感觉里连百分之五十都勉强。

想到此后将一年一年耗过去直熬到五十，心里便有点恐惧。

在我的习惯性意识里，五十是一个很大的年龄区标，是进入老年的生命区段的标志，面对一个五十多岁的老人，我就想到这是一位做

了爷爷或奶奶的老汉老婆了。这不单是乡下人的习惯性年龄区段的划分标尺，似乎一些国家（中国除外）的共产党领袖公开祝贺生日就是从五十岁开始的，那么也在一定意义上可以看出作为生命的老年区段是有国际公例的。我自然就回顾起迷恋文学的坎坷，少小年纪在作文本上写下头一篇小说似乎只是昨天的故事，然而眨眼就要进入老年行列了；至今尚未写出一部起码让自己满意的作品，怎么就晃过了人生最富于创造活力的青壮年时期，而“一不留神”就会变成老头子了。正是早在此前一年的一九八六年春天，为了进一步了解关中的历史演变，我查阅了《蓝田县志》又赶赴长安县城，住在一家旅馆里继续翻阅厚可盈尺的《长安县志》，朋友李下叔晚上来陪我闲聊，以解除那些糟烂的古本浸淫到我肌骨里的幽微阴腐的气息，记得那晚喝了酒，酒酣言畅之际，他很真诚地说，按你的生活功底，写部长篇还下这么大的功夫，有这个必要吗？我也坦诚相告，下这个笨功夫不是心血来潮，而是已经萌生了的那部长篇小说必须做的功夫，我想了解我生活着感受着的这一块北方平原的昨天，或者说历史，因为我只能依赖着这些古本县志感知这块土地的昨天究竟发生过什么，我辈以前的父辈爷辈老老老爷辈们以怎样的形态生活着，近代以来剧烈的社会革命历程中，他们的心理秩序经历过怎样的被打乱被粉碎和怎样的重新安排的历程……谈到动情时，便有自信和自卑胶着着的悲凉，少小年纪迷恋文学，几十年过去了，发了为数不少的中、短篇小说，奖也获了多次，但从真实的文学意义上来审视便心虚，因为连一部自己满意的作品还没有。我说，兄弟，想想已经晃过四十四了，万一身体发生不可救治的灾变，死时真的连一本给自己做枕头的书都没有。这是很真实的当时的心态，因为迷恋文学而不能移情的悲哀，从这一点上说来，是完全的内向内指的生存兴趣的悲哀，也是完全的个人生命意义的自私的悲哀。正是在这种纯粹的个人兴趣的自我指向的悲哀中，激起了

为自己做一本真的要告别世界也告别生命兴趣时可以做枕头的书的自信。

直到完成《白》书以后，我又有了属于自己的创作之外的人生体验，人不可以完全自卑，亦不可以完全自信；处于无法摆脱的自卑状态，是根本不可能进行任何创造性劳动的，这是极易被接受的普通的道理；而一个人（尤其是进行创造性劳动的人）如果永远处于自信状态而从来不发生自卑的心理，这个人的创造智慧将不仅得不到最好的发挥，反而会受到损害，道理也很简单，没有一定的自卑就不会有自省，更不会有刻骨铭心的自我批判，因而就很难找准自己新的创造目标和新的创造的起点。自卑未必不好，只是不要一味地自卑；自信是所有创造理想的前提性心理准备，然而自信也必须是经由反省之后重新树立的新的蜕变之后的自信。

当我在自卑的深谷进行几乎是残酷的自我反省再到自信的重新铸成，《白》的构思已经完成。更切近地对五十岁的感觉的危机，似乎还不在五十以后算不算老头老汉，而在于能否安全抵达五十。三年是一个不短的时间，春夏秋冬寒来暑往萌芽落叶的自然景象交替三次，所可设想的意外事件都可以不予计较，不予理会，包括生计都可以咬牙承受而不吱不声，唯一畏怯的是万一身体发生某种无计祈祷的灾变怎么办？不单是那时的新闻媒体连续报道了几位中年知识分子英年早逝的消息给我造成的心理阴影。平心想来，人的生命里的神秘莫测的灾变的发生只是个常识性的存在，不单是中年知识分子英年夭亡者众，工人农民职员等各种职业的中年人死亡的数字，只是无人认真统计罢了。而五十岁上下属于危险年龄区段，据说是国际医学界的“最新研究成果”，被各类报刊的生活版反复转抄，无论真假都会造成一种心理影响。

我的固执和我的愚蠢既使我受害匪浅，也使我得益匪浅，受害多了也就没有了一一道来的兴致，得益就得在可以做到不会发生听见风声便是雨的轻信。然而，危机的心理却是确确实实由此时产生了。我毕竟经历过几十年的创作，几十年的中国当代文学的风雨；也经历过几十年的社会风雨，几十年的属于自己的经验和体验，生活的体验和生命的体验，都警示着某种意外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不管对我，对从事任何职业有着任何兴趣和追求的每一个生命都潜存着，仅仅只是有幸与不幸的莫可猜测臆断的事情。每个人都在企盼幸运永驻同时也逃避不幸，然而不幸每日每时都降临到那些熟识的或陌生者的头上。我的危机甚至恐惧心态的产生，便是对那些业已发生的不幸的畏怯，因为我还没有做成不幸突然发生到我身上时能够安慰自己的枕头。

当新的一年的艳丽的太阳把阴坡上的积雪悄悄融化的时候，对生理不幸的畏怯心理完全被汹涌着的创造欲望彻底扫荡了。把那种只属于自己的独特体验倾泻出来展示出来，自信那种生命的和艺术的深沉而又鲜活的体验只属于自己，强烈的创造的欲望既使人心潮澎湃，又使人沉心静气。当我在草拟本上写下第一行字的时候，整个心理感觉已经进入我的父辈爷辈老老老爷辈生活过的这座古原的沉重的历史烟云之中了。这是一九八八年四月一日。

三

北方乡村的冬夜寒冷而又漫长。然而在我即将跨上五十岁的这一年的冬天，最深刻的记忆却是孤清。这是一九九一年的深冬。

我已经在这间小屋里的小圆桌上爬行了四年。冬天里一只火炉夏天里一盆凉水，《白鹿原》上三代人的生的欢乐和死的悲凉都进入最后的归宿。我这四年里穿行过古原半个多世纪的历史的烟云，终于要

回到现实的我了。掀开新的一页稿纸，便有一种“倒计时”的怦然。然而当每天的黑夜降临时，心里的孤清简直不可承受。

我的祖居的家园在一个不足百户人家的村子里。老祖宗选择这块南倚白鹿原北临灞河的风水宝地生息繁衍，在以纺车和石磨为生存的基本手段的农业社会是极富于眼光的选择。有坡地有河川水田，只要灞河不发生断流，河川里就不愁绝收，灞河水是滋润先辈血液的从未枯竭的乳汁。这里虽然距西安城区不足一小时的汽车里程，然而却是天然的偏僻，在兵荒马乱的年月倒是得天独厚少了一些骚扰（绝无桃源之境）。然而先祖们缺乏料知几百年后的子孙的生活前景，却因这个偏僻造成进步的滞缓和生活的诸多障碍。每一家的后院都紧紧贴着白鹿原的北坡，横亘百余华里的高耸而又陡峭的原坡遮挡了电视信号，我兴冲冲买来的电视机无论换上怎样灵敏的接收天线都无济于事，只能当作收音机收听每日的“新闻联播”……

即使在冰封大地万木萧瑟的冬天，只要不是漫天飞雪，农民们便不闲着，他们把鸡窝牛棚猪圈羊栏里的粪便挖出来，捣碎了再用独轮小车推到麦地或棉田里去，或者为小麦冬灌，或者为葡萄园松土翻地，或者挑着菜园里的冬菜去赶集，或者为已经成年的儿女选择配偶。忙是忙着，却是一种冬天里的自然的悠闲缓慢的做派，天黑吃罢夜饭就早早歇下了。整个村庄便沉寂下来，偶尔的几声狗吠之后愈加死寂。我在小桌的稿纸上折腾了一天，写作顺畅的欢悦和思绪不顺的忧烦都无法排解；又读不进去任何书，越是临近这部书稿的结束，越是不想读什么书了，也许是我有生以来阅读兴趣最低落的一个冬天。我似乎无法忍受那种挥斥不开的孤清。

我便在无边的孤清中走出屋院，走出沉寂的村庄走向原坡。清冷的月光把柔媚洒遍沟坡，被风雨剥蚀冲刷形成的奇形怪状的沟壑峁梁

的丑陋被月光抹平了。我漫无目的地走着，走到一条陡坡下，枯死风干的茅草诱发起我的童趣。我点燃了茅草，由起初的两三点火苗哧溜哧溜向周围蔓延，眨眼就卷起半人高的火焰，迅疾地朝坡上席卷过去，同时又朝着东西两边蔓延；火势骤然腾空而起，翻跃着好高的烈焰；时而骤然降跌下来，柔弱的火苗舔着地皮艰难地流窜，我知道，那是坡地上枯草的薄厚制约着火焰的升跌；遇到茅草尤其厚实的地段，火焰竟然呼啸起来，夹杂着噼噼啪啪的爆响……我在这时候便忘记了一切，周身的血液也涌流起来，舞蹈着的火苗像万千猕猴万千精灵，孤清和寂寞顿然被野火驱逐净了，心里洋溢着畅美和恬静。

我坐在坡地上，点燃一支烟。

书稿就要写完了，最初的对于不幸的畏怯早已烟散了。不是最初设想的三年而是整整四年，因为纯粹的客观的因素而停止了两个冬天的写作，而秋天和冬天恰恰是我写作最适宜的习惯性时月，整个写作计划就拖迟了一年，我的耐性经受了锻炼。

这个时候，文坛上正在热烈地讨论文人要不要“下海”的新鲜话题。

我的眼前，可以辨识这儿那儿的一堆堆老墓和新坟。这个小小的村庄里的一代一代的男女死亡以后，他们的子孙邀集族人和乡党在山坡上挖掘墓坑，再把装殓到棺材的尸体抬上山坡埋进黄土，他们生前日夜煎熬着的事，由他们的儿子和孙子继续熬煎；他们平生累断筋骨力争着的生活理想，也只好交由儿子和孙子继续去力争；坡地上无以数计的老墓新坟里的那些到死也没有争取到生活理想的男女无法得知，他们的一代二代乃至八代子孙依然过着和他们一样的光景，甚至

还保不住他们在世时的那两亩田地和两间旧房，时光在这不变的坡上和河川停滞了多久多久……

野火烧到了那面陡坡的坡顶，茅草断绝了，火焰也断断续续熄灭了。我又走下一道坡沟，掏出火柴，这条统直的大沟再次腾起野火的壮观景致。

我在沟底坐下来，重新点燃一支烟。火焰照亮了沟坡上孤零零的一株榆树，夜栖在树杈里的什么鸟儿惊慌失措地拍响着翅膀飞逃了。山风把呛人的烟团卷过来，混合着黄蒿、薄荷和野艾燃烧的气味，苦涩中又透出清香。我又一次沉醉在这北方冬夜的山野里了，纷繁的世界和纷繁的文坛似乎远不可及，得意与失意，激昂与颓废，新旗与旧帜，真知与荒谬，谋算与投机，红脸与白脸，似乎都是另一个世界的属于昨天的故事而沉寂为化石了。

十年以前的这样的冬天，我有幸作为专业作家调入省作家协会搞专业创作。我办完了包括户籍和粮油供应等所有关系，同时也就决定回归老家；我得到了专业创作的机缘，整个心理感觉就是进入生存理想的最佳境地最可心的状态了；这个机缘于我的全部含义只有一点，往后的时间可以由我自由支配了。

我几乎同时决定回归家园，仅仅只是自我判断后的抉择。我的自我判断又基于比较清醒的自省，没有机会接受文学的专业训练，自修所得的文学知识带有很大的实用性和不可避免的残缺性，需要认真读书以弥补先天性不足，需要广泛阅读开阔艺术视野；我在乡村基层工作了整整二十年，我所经历的社会生活和我自己的精神历程，需要冶炼也需要梳理，再也不能容忍自己描摹生活的泡沫而把那些青春和血汗换来的生活积累糟践了。没有拯救作家的上帝，也没有点化灵感的

仙人，作家只能依赖自己对生活对生命对艺术的独特而又独立的体验去创作，吵吵嚷嚷自我标榜结伙哄炒都无济于事，非文学因素不可能给文学帮任何忙，文学的事情只能依靠文学本身去完成。出于对文学的如此理解和对自己的弱项的解剖，便决定回到故园老家去，寻一方耳根清净之地去读书去练笔。

在祖居的老屋老老实实住下来，连自己也觉得不可思议。自小学五年级开始上寄宿学校到后来参加工作再到这次回归，整整三十年里，只有礼拜天和寒暑假在这个村子度过，三十年后窝居老屋，重新呼吸左邻右舍的弥漫到我的屋院的柴烟，出门便是世居的族人和乡邻的熟识的面孔，听他们抱怨天旱了雨涝了太失公道的什么狗屁事啦……又是十年！到这一年的最后一个月份过去即将跨上一九九二年的元旦，我正好在这地理上的白鹿原北坡下的祖屋里生活了十年，小说由短篇写到中篇再写长篇，费时四年的书稿即将完成的怦然又发生了。哦！上帝，我终于把握住了属于自己的十年也拯救了自己的灵魂，迈进五十岁了。

四

孙康宜教授对我说的五十危机的理解显然有点误差。

尽管这样，反倒是这误差给了我一种启迪，关于五十的习惯性认识，老年年轮对人心理的某种威压，毕竟廓清了。我首当想到的是索尔兹伯里这位美国老头，八十岁时走完了中国工农红军长征之路，而且完成了《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一书。这个壮举和这种创造活力，也应该是一个“前所未闻的故事”。八十岁的索氏敏捷的思维，理智而又深刻的论述，捕捉红军壮士个性细节的准确，对复杂的历史事件恰当而入微的剖析，令我感叹不已。应该说，这是我读到的写“长

征”的最优秀的一部书，曾经忍不住发出惊叹，闻名于世的“长征”，怎么让一位美国作家写成了，而且是一位八十高龄的老头。面对索氏，五十算是青年。于是，我对孙教授说：“五十开始好。我来写一篇文章，就用这句话作篇名。”孙教授说：“写出来一定寄我看看。”

在西安的几天时间里，孙康宜走东线看了秦始皇兵马俑、兵谏亭和杨贵妃的浴池，顺路在半坡参观了仰韶文化遗址；去西线参观法门寺、武则天陵和汉武帝陵园，又在杨贵妃的墓冢前久久伫立。抽空又在西安的大街小巷转悠了感受了。我没有作陪，司机给我说，这个孙教授是他所送往参观的客人中最用心最费时的一位，不停地问着记着。在半坡遗址的村落里，在杨贵妃硕大无朋的浴池旁和她被缢死的马嵬坡，在另一个女人——中国唯一一位女皇高耸的陵墓前，孙教授感受到什么，无须揣测，任何人的任何感受都是合理的独自的。我只是觉得她早出晚归不知疲惫的劲头，整个就注释着她的五十开始的宣言。

最后一个参观景点是黄帝陵，我作陪。汽车驰过渭河，在渐次增高的缓坡上前进。从渭河平原到渭北高原过渡的层次一目了然，一方地域独有的气韵总是给人以独特的历史文化和现实格调的强烈感受，平原上的偌大的村落和高原区一排排窑洞，繁衍着延续着一个民族。从那平原上的村庄和高原上的窑洞里，曾经走出过一个又一个杰出的后生，有的甚至走进他们当时的封建政权的中枢，影响过当时的政局和时局。他们的最杰出的贡献和最生动的逸闻，依然在那些树木掩映泥泞遍地的村巷里流传，成为整个村庄整个县域内的子孙的骄傲，他们的精神和气性也就历经千年百年而依然流贯在乡民之中。我给孙康宜教授介绍说，历史上凡是有能力进入当时政权中心的关中人，祸国殃民的奸佞之徒几乎数不出来，一个个都是坚词硬嘴不折不摧的丈

夫，这块土地滋养壮汉。孙教授说，试举一例。我说，太史公。若举二例，便有牛先生，他是《白》书里朱先生的生活原型。

……

直到最近一次打电话来，孙康宜教授说她还想来西安，上次来时太匆促，短短几天的感受，反倒引发起更为强烈更为直接的欲望……末了竟然还追问：“五十开始”的文章写出来了吗?

1997年1月

朋友的故事

小韦是我的朋友，是近年间因为文学这关系才相识相交的，年龄差着整整十岁，所以不像那些同龄的又是经历过十余二十年的朋友在一起时那么随心所欲。因了年龄的关系，他对我总是多了一些尊敬，也就多了一些拘束。我也因此而不能对他畅所欲言，单怕不慎时造成敏感和伤害，不由得也就犯起拘束的毛病。在我的印象里似乎形成一种错觉，无事的时月里，他不见来，他不来时我也没有想念或思念的欲望产生；一见他来找我，肯定有事，有的事大，有些事则很小很小罢了。

去年初夏，关中的气温急剧上升，昨天还穿着毛衣，今天就脱得单衫短裤了。小韦到我家时还穿得很厚重，西装下套着毛衣和扎得很整齐的领带，便不断地擦汗，擦得我身上都感觉汗腻腻的，擦得我心里也热躁躁的。便劝他脱了外衣毛衣再去洗把脸。他却不脱不洗嘴里说着不热不热，却仍然不住手地擦汗。接着就急嘟嘟地告诉我说，他刚刚出版的那本书出了问题。我并不惊讶，因为身在文坛，时不时地有这个作家的这本书或那个作家的哪一篇小说出点问题，早已司空见惯，神经也早已磨炼得说不准是沉静还是麻木，反正是不再大惊小怪更不会惊惊炸炸的了。甚至较长一段时间闻听不到此类消息，反而奇怪怎么会如此风平浪静水波不兴。小韦说他们单位的一位主管领导对他的书“有看法”。

“有看法”这个词组在现代语言里是一个最常用的口头语言，然而确属一个无用无知的废话。任何人对任何一件事都会有自己的看法的，大至美国轰炸伊拉克的战争，小至单位的工作和家庭里买何种品

牌的空调机；任何人读过任何一本书或一篇短文，也都有自己的感受或者说看法，即使判断不定优劣拿不定主意去褒去贬，持一种谨慎的保留，亦是他的看法。所有这些都是人类最基本的也是最正常的行为，所以说“有看法”其实是一句废话。

“有看法”之所以通用之所以流行，并不是我们缺乏语言常识一任废话流行，而是一个包含着特定意味的词组，或者说在当代生活里它已经失丢了原本的正常的含义，而赋予了它一种新的原本不属于它的非正常的内涵，令人心里不安甚至畏怯甚至沮丧甚至大祸临头的一种凶兆。即：“有看法”就是“有问题”。用关中方言说就是有麻达或者说有麻缠或者说惹下是非了捅了娄子了拉屎拉到锅台上了惹下麻达了。方言“麻达”在汉语里更广泛的含义是麻烦。这就是说，小韦的单位的那位主管领导认为小韦的小说有麻达有问题。

我仍然有点麻木，有点无动于衷。这本书是小韦的第二本中短篇小说集，出书之前曾经满心欢喜地约请我给他题写了书名：这本集子收入的几个中短篇小说，都是在刊物上发表过了的。据我所知，所有这些作品发表的时候，没有引起过轰动效应，也没有引发过争议，更没有引起批评，于优于劣于好于坏都没有引起批评界和读者层太大的关注和反应。结集出版以后，小韦便像所有作家一样，把这本书送给自己的朋友和管着自己的领导，既是一种友谊友好的表示，也不乏请示指正的谦逊。万万没有料及的是，主管他的领导在某一篇小说里看出了问题，“有看法”了，真正认真地“指正”起来了。岂止“指正”，而是要当作一个比较严重的问题来“抓一抓”，因为据说“问题”是属于“政治性”的。

我很关心怎么“抓”的问题。小韦说，主管领导已指示专门抓思想问题和政治问题的部门严肃认真地“抓一抓”。小韦把这件事说给我的

目的，是想请我去给他的单位“抓”这本书的领导和部门解释一下。我想到了我的责任，也想到了在一个具体的基本与文学和小说不大相关的单位里，一个作者的前途和生存发展的重大利害。斟酌一番之后，我就有了主意，先缓一缓吧！让主管部门先鉴别先“抓一抓”吧，看看“抓”的情况和“问题”的严重程度，再决定此行有无必要。我尤其强调，现在刚刚开始“抓”，我便去解释，似乎不恰当。小韦同意了。我反倒觉得真成了一档子事了，便问他，你自己觉得有没有“政治性”问题？因为这本小说集我没有来得及读，无法做出我的判断或把握。小韦说，根本不沾边。我就奇怪，那怎么会扯到“政治问题”呢？缘由是什么？他说那篇小说的某个人物的偷情的情节或是细节被一个人敏感了，向主管领导反映了……如此而已。我不由得松了口气，劝他说，那就根本没有必要由我去解释，你准备打官司吧，这是法律范畴的事。

大约一月之后小韦又来了。主管部门的同志“抓”得确实很认真，不仅自己先读了那本书，而且组织了一批人来读，然后由这些读过书的人分组讨论，做出各人自己的阅读判断。我很惊讶也很佩服主管部门“抓”这本书的同志的工作方式，不仅仅是态度从容方式细密而又谨慎，更可珍贵的是用了一种民主的方式。然而我更关注的自然是它的结果。小韦激动地告诉我，没有一个阅读小组甚至没有一个阅读者得出“有政治问题”的结论。我便说，你连官司都不用打了。小韦却依然轻松不起来，说那位主管领导得知这个结果后反而更严厉了，批评主管部门“抓得不力”。问题并没有解决。我便调侃说，那你就仍然做打官司的准备。

小韦为难地讪笑着说，问题反而复杂化了，这位主管领导向来以强硬为个性特点，他所批示的“抓一抓”，就是要抓出问题来，抓出他

已经定性的“政治问题”来，怎么能听任相反的结论呢，那不等于他抓错了吗。小韦又说，怎么能打官司呢，如果不想晋级不想评职称甚至不想在单位工作了，当然可以打。问题是老婆和孩子以及自己还得生活。我也苦笑了，那么又怎样找到既不打官司又不让领导继续“抓”那个“政治问题”的两全其美之计之术之办法呢?

我突然寄希望于主管部门，便问小韦说，弄到如此局面，主管部门打算下一步怎么“抓”？小韦说，主管部门原先打算分两步抓，第一步先让本单位同志阅读讨论，因为本单位本身也是一个知识分子密集的地方，读者是有欣赏水平的。第二步想请一些大专院校的文学评论家讨论判断，现在因为主管领导对他们的这两步做法持否定态度，便不敢再走第二步了。主管领导要他下属的主管部门做出自己的结论，而且要快。主管部门领导已经让小韦写检查了。我已经意识到小韦的紧张心理，便郑重地说，还是准备打官司吧，不要写检讨了，准备写申诉吧。

小韦心事重重地走了。

小韦走了，我反倒又觉得小韦的诸多厉害的考虑是完全有道理的，我既然找不到两全其美之计，也不该纵容他去打官司。即使官司打赢，他以后的晋级评职称分房子以及工作安排中会有多少小鞋等着他。我的处事办法未必会给他解决实际问题，甚至会引发更多更大的灾难。然而面对那位从“抓一抓”上升到抓住不放的主管领导，除了申诉除了打官司又能如何呢?

这件事已经波及我。我的心情压上了负担，我甚至期盼小韦的电话或来访，有点揪心的感觉。

出乎意料的是，刚过一周，小韦来了，我便迫不及待地问：现在情况怎样了?

“没屌事了！”小韦说，“热得很，让我先脱了衣服喝口水。”

我更加急切地想知道怎么会“没屌事了”?

小韦说，主管领导被隔离审查了。

我的天哪！我怎么也意想不到如此急骤的转折和变化。

小韦告诉我，他们单位下属的一个公司的老板被抓了，被抓的老板交出来一份他行过贿的人的名单。“主管我又‘抓’我的那本书的‘政治问题’的领导名列其中，据说一次就受贿十万。”

生活在捉弄谁啊！我真是从内心深处发出惊叹了。如果不是那位主管领导“抓”小韦那本书的“政治问题”，单纯只是受贿十万，我肯定只会当作一个小小的趣闻来听，根本不会惊惊炸炸的，更不会于心灵深处发出浩叹了。因为在中国近年的反贪风暴中，惊人的巨款数额早已使我们闻声不惊了，何况一个“小小的”十万。使我真正惊叹的倒是他在那里一脸肃穆地“抓”着小韦的那本小说集的“政治问题”的劲头是怎么产生的？这个“抓”与那个“贿”有无生存形式的联系？或者说这个“抓”与那个“贿”本身都成了一种人的一种生存模式？这个“抓”于那个“贿”其实只是一种生存的隐蔽色而已。

然而小韦却被“抓”得心神不宁惶惶然如坐热锅，诚恳的毕恭毕敬的解释不起作用，由主管部门煞费苦心组织各阶层读者阅读，然后分组座谈讨论，然后正儿八经汇报讨论结果也不行。受贿案一经揭发，这个“政治问题”便自行销声匿迹灰飞烟灭了。如果写小说用了这样的

情节可能是最蠢的巧合，而实实在在运行着发生着的生活故事，委实让我感受到一次生活辩证法的痛快。

小韦说，这件事让你也操心了。好咧好咧现在没事了，咱还是写咱的小说。

我倒是企盼他能真的写出一部触及当今生活内质的小说来，让那种将“抓”与“贿”玩弄于股掌之上的人真正痛切地感受一下，他们在真正意义的政治的圣坛上属于什么。

1997年2月16日 西安

陶冶与锻铸

我对家乡灞桥区发生的变化和进步尤其敏感，无论报刊、广播电视等传媒上出现的灞桥地区的新鲜事，常常使我怦然心动。每一次因公因私踏入灞桥地域，我的情绪便不自觉地兴奋欢悦起来，似乎那里的地磁磁场与我的心脉有一种神秘的感应。想来不完全是狭隘自私的情怀吧，不过是人类对于故窠的一种深切而又温馨的怀念与眷恋，常情而已。

在那个以英雄的刀剑和人民的苦难绵延过两千年的漫长历史的古原上，灞桥区政府建立了中学生锻炼基地；在风光旖旎尤以柳色迷醉过千古骚人墨客的灞河岸边，又建立起小学生锻炼基地。去年春天我专意看了设在那里的西安市第八十一中学的中学生锻炼基地，看那些十三四岁的少年学习种茶，甚为威严地演练军人的队列步法，英姿勃勃地表演集体武术动作，在风景如画的鲸鱼沟里练习实弹射击。看见他们叠得方方正正四棱不倒的被子和干净整齐的床铺，摆得规矩严整的脸盆和牙具，俨然一座小军营。我聆听了几个男孩和女孩短短一周里的锻炼感受和心灵世界发生的重大变化，真是感动又感佩。是的，他们自觉地摒弃了一些从来也没在意过的成长期里的随意性和任性这些性格缺陷，初初醒悟了作为社会人必须具备的自律和自强的内在品质；他们从不自觉到自觉地开始拒绝家庭和社会给予他们的多余而有害的关怀，初步觉醒做个“小皇帝”“小公主”的畸形生活形态对自身心理健康的危害。所有这些，真是令我深受启示振奋不已。一年后的今年春天，我又赶到位于灞河岸边的西安市第六十三中学，设在那里的小学生锻炼基地也正式开办。这是些年龄更小大约十岁上下的孩子们的小“营地”，又一次使我的内心受到冲击。

这个小学生锻炼基地与原上那处中学生锻炼基地的项目设置和锻炼手段有明显的差别。从这些更小的孩子的生理实际出发，基地让他们饲养小兔、小鸡等小动物，锄草浇水，辨识韭菜、辣椒、茄子等蔬菜的幼株和栽培；更有兴味的是带上他们到乡野去观赏浏览山川原坡和灞河的自然景色，感受大自然，亲近大自然，拥抱大自然，给孩子心灵世界抹一层生动蓬勃的绿色，陶冶孩子的性情。让那些从一生下来就踩着水泥走路的双脚到温厚的黄土里去蹦一蹦，到沙砾堆积成的奇异万状的河滩上去疯一疯，肯定会改变公园里的假山和臭水留给他们关于大自然的虚假概念，让他们的眼光从那个用砖头围垒起来的小公园摆脱出来，投向广阔的天地和壮美的山与河，让他们的心胸也随之而宽阔爽气起来。

我想起前几年发生过的一件事，关于中、日两国中学生联合组织夏令营，在内蒙古草原上中国孩子的表现逊色于日本孩子的事件。那篇通讯曾经引起过不小的社会反应，我当时也是被“震”了一下的。不单是丢面子，重要的是引发了关于一个民族的体魄和心理素质的锻铸的忧虑。随后似乎又有一篇关于这篇通讯的调查报告，逐条予以纠正，有证有据，证明那篇通讯完全是杜撰的哗众取宠的水货。我至今也没弄清楚这两篇文章谁真谁假，然而无论从情感无论从面子无论从深层心理来说，我都希望前者是虚假的后者是真实的。道理很简单，我们的孩子从耐力和自律诸方面至少与日本孩子相当，面子上好看心理上平衡情感上顺畅，自然不会多一层关于未来的忧虑了。

我又退一步想，即使完全没有发生过上述难辨真假是非的事情，平静客观地面对青少年培养问题，应该着手于怎样的现状呢？曾经有一部《中国小皇帝》的长篇报告文学，做过广泛而又严密的社会调查，作者做了精辟的剖解，对民族未来深沉的忧虑和强烈的责任感，

引起社会和家庭广泛的呼应和认同。“小皇帝”成为一个被普遍接受的既带有调侃色彩又隐含着深刻警示意义的通用名词，“小皇帝”们生活的温床，对形成他们健全健康的精神气质和心理结构存在着被公认的不合理成分，即是说重视身体健康而放宽了品德规范的尺码，重视智力培养而忽略了心理素质的锻铸，过分的溺爱以至娇纵，往往把孩子导向自私蛮横而心理承受力却很脆弱的畸形性格。这样的孩子走向社会，承受艰巨创造活动的持久力会是软弱的，承受生活中突发性灾变的能力更差；就智力而言，将会因此而妨碍他们的先天性的智慧的发挥，甚至是一种浪费，许多天才终究落入平庸，这应该是其中一个最致命的因素。

现实的中国人尤其是相对比较富裕的城市人，他们或因自己过去吃过太多的苦，自觉不自觉地把富裕后的享受一股脑倾注到孩子身上，或因计划生育只有一个孩子的客观现实，便自然地把全部肥料和水分都给予这一根独苗，也许明明白白知道这样做反而有害，然而无法不顺应情感驱使。

灞桥区开设的中小学生锻炼基地，无疑是对社会生活中某些难以改变的缺陷的有力纠正。近三年来的试验性实践，逐步完善逐步趋向合理化。接受锻炼的中小学生争相前往，家长也有广泛热烈的呼应，主动配合，“忍痛”送孩子去锻炼，已经在灞桥区的社会生活中形成风气。如此看来，区政府设立中小学生锻炼基地的举措不仅切中实际，更应属一种深远的眼光，一种对国家民族未来的最重要的基础建设工程。

1997年10月

喝茶记事

年轻时收入低微，常常为一家人衣食之大事犯愁，岂敢有品茶之类奢侈事。然而茶水毕竟还是喝过的，大多是别人礼让的，自然谈不上品牌品位和品种，人家泡什么茶就喝什么茶，红茶绿茶花茶，叶儿的末儿的坨儿的以及刀劈斧斫的砖茶，品位等级不仅不能讲究，其实自己根本就不懂，再说也没有品茶的兴趣。

认真地自己买茶叶喝茶，有两回。有一年闹胃病，吃什么东西胃里都冒酸水，大口大口清亮亮的酸水冒将出来，喷到床下和桌下，几乎可以作为洒水息尘之用。发展到胃里开始有隐痛，去看医生。医生轻描淡写地说吃苞谷面高粱面太多了。我心里反倒加重了负担。这些粗粮是按比例配给的，而且看不出有减少的任何可能，不吃苞谷高粱，又到哪里找好果子吃？医生给弄了一大包酵母片，又赠送了一剂良方：回去熬砖茶喝，暖暖胃。我的手在口袋里揣摩了许久，还是花大约三毛票买下二两，先试试。那砖茶名副其实，硬如砖头，用刀劈下碎片，搁火炉上熬煮，倒出来竟是如同中药的颜色。然而喝起来毕竟是茶味，只是后味有些苦涩。这是我第一回花钱买奢侈品，当作医病的药用的。

再就有点雷同，仍然是医用。到新时期之初，生活初得改善，可以不再以杂粮为主，我的身体又引出了截然相反的变化，内火太盛。好东西吃多了热量增加了消耗不完，便聚积而生为火。这是一位中医先生当时剖析病因的诊断词。那火一生成，轻则牙疼，重则小便不畅，且有灼烧似的刺痛。医生给开了一些下火的药丸，又赠我一剂良方：回去常喝点绿茶，绿茶下火。医生是个善解人意的好人，居然指

点说：你就买“陕青”喝，很便宜。我很感谢医生，更欣赏“很便宜”这话，所以说他善解人意。初得温饱的我们家，这回真正让我奢侈了一回。我专程赶到西安最大的一家国营茶叶专卖店，把所有货架上的货柜里的茶叶整个参观了一遍，才知道中国出产这么多品种的茶叶，有的价格高得不可思议。最后在货柜的比较冷僻的位置找到“陕青”，有不同价目的三档，我还是很切温饱“初”得的实际，选了中间一档的，八毛一市两，先买半斤试试，花钱四元。绿茶“陕青”只用开水冲泡，无须费火费劲去熬去煎，而且关键是效果不错，内火得到医治，很少再犯。这回仍是把茶当药用，岂敢说品。

不久，陕南的朋友来西安，便捎给我一包两包茶叶，仅从包装上看，都比我买的“陕青”阔气排场得多。茶叶的形状差异十分明显，一条一条有如羽毛，冲水之后便蓬勃起来，绿油油一朵初芽的茶叶，水色金黄透亮；不说砖茶，先前的“陕青”也相形见绌了。再细一问，曰：秦巴雾毫。友人热情而又自豪地吹捧家乡陕南特产，说这茶叶论质标价已与传统权威茶“龙井”齐价，说陕南是中国茶叶开发最早的地区，唐代陆羽所写的中国第一部茶叶专著《茶经》开篇就说，“茶者，南方之嘉木也，巴山峡川生焉”，“巴山峡川”即指陕南的秦巴山地和汉水流域。然几千年来，这里的茶叶生产仍然处于原始状态，更无名茶。“秦巴雾毫”的研制成功，结束了茶叶诞生母地无名茶的历史。我也较早地品尝了，真是与以往的所有茶味迥然不同。及至一九八九年九月十日在《人民日报》上读到作家王蓬的报告文学《巴山茶痴》，我才得知“秦巴雾毫”的创造者名叫蔡如桂。

他为陕西第一个名茶的诞生，几乎耗尽了整个青春和心血，包括狱牢之苦。读罢使我默然无语，直觉得心闷气憋，这蔡如桂便哽在心头吐也吐不出来了。

六七年后，我在汉中见到了蔡如桂，竟是一条壮汉，年迈六旬，头发依然稠如乌鬃，走路雄壮威武，说话节奏极快，一身西装穿着却显不出挺括，倒像是一位管护茶园的农夫。早已喝过他培育的名茶，又从王蓬文章里了解了他的生命历程，所以一见便如故人。我说，你就那么简单地被弄进监狱去了？他淡淡地笑笑，就那么简单。我就觉得很无奈，把人简单随便地扔进监狱，扔者和被扔者之后都相安无事，除了无奈还能说什么。

现在我可以勉强地说进入品茶档次了，唯“秦巴雾毫”为最。在办公室在家中，在旅途在陌生的新地，捏一撮羽毛样的“秦巴雾毫”丢入茶杯，冲出淡淡的金色茶水，喝着品着，便有蔡如桂先生如影随形似的陪我聊天，由品茶而进入品读蔡如桂其人了。

蔡如桂，安徽人，安徽农业大学茶业系毕业后，分配到陕南秦岭和巴山里最偏僻最贫瘠的镇巴县，从二十几岁的小伙子到年届六旬的老汉，整整一生就在那个地方没有挪过一回窝儿，不是别人不给他挪，他压根就没有想过要挪窝儿。那窝里有茶园，是他安身立命的乐园。他终于把那些像晒晾柴草一样晾晒茶叶的农民教会炮制精品茶叶了，他自己也创造出“秦巴雾毫”这样的名茶了。然而就是这样一个痴情茶叶发展的难得的人才，却被一个副县长执意而又随便地扔进监狱。事因太简单，副县长在干部会上号召乡民毁林开荒，扩大粮食种植面积。作为县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蔡如桂提醒说，国家森林法已法定了，你说的那些地带是不能开荒的。就这么一句话，就这么一句纠正副县长违犯国家森林法的话，他被这位副县长弄进监狱改造了近两年，在社会和民众的舆论压力下，才获释了。我总也不可理解，仅仅因为当众被伤了点面子的副县长，怎么会有如此大的毒劲，把一个为陕南茶叶事业奉献了毕生精力且卓有建树的人扔进监狱？

任何想在这个世界上成就一番事业的人，先天的智慧和后天的持之不懈的探求是必备的条件，吃苦与艰难，也是自不必说的必须经受的，非此就不会有重大发现和发明产生，这种精神准备也十分充足。然而，蔡如桂怎么也不会想到，因为一句维护国家庄严法律的话而坐牢。坐了牢了，在初春时节茶叶冒尖的关键时刻，他要去指导茶农采摘和科学炮制，误了季节就误了一年的茶叶。他三番五次口头申诉又书面报告：我要去指导茶农采茶，可以派两个公安战士押解着我上山！我初读到这里便按捺不住心颤。后来许多年里，一边品着蔡如桂的茶叶，一边品读着他的行为和声音，成为医治我的懒惰和软弱的良方。

今年春天，新茶上市，蔡如桂以自己创办的茶叶公司老板的姿态赶到西安，推销今年的第一茬新茶，也带给我两包，打开即有一股幽幽的香气扑面而来。他又送我一本《茗饮之道》的书稿，是专讲品茶之道的雅著。不读不知自己的浅陋，读罢才知品茶的传统和现代功夫的深奥，鉴定自己其实比早年把茶当药用的水准并无什么长进，充其量只够喝茶的一般概念，离“品”的档次尚远。然而品也罢，喝也罢，只要有蔡如桂这样的好茶和对事业的痴情相伴，我已知足了。

1997年11月22日 雍村

追寻貂蝉

米脂的婆姨绥德的汉。

在陕北，婆姨既指妻子，也泛称女性。这民谣说米脂县出美女，绥德县的男子是最俊俏的。至于米脂的婆姨怎么美，美到如何程度，陕北人一般都缺乏耐心具体地为你描述皮肤如何白嫩细腻，脸腮怎样艳若桃花啦；或是根本不屑于用这些惯常的陈词滥调去涂抹他们心目中的米脂婆姨，干脆随口反诘一句：貂蝉什么样？貂蝉就是米脂婆姨！

貂蝉就成为米脂婆姨的象征，令一切男人崇拜，也成为陕北人可资骄傲的一个无可匹敌的象征。

受这样的广泛流传的民谣的诱惑，踏上北去米脂的人，心里便跃跃着一种追寻貂蝉的企盼，企图阅尝米脂婆姨的风姿。记得是十二年前的一个夏天，黄土高原恰逢十年不遇的好年景，雨水充沛，连绵着的慢坡台田和蜿蜒着的河川里，被各种田禾覆盖得密不透风郁郁葱葱，大豆摇铃，稻子扬花，高粱吐红，谷子抽穗，热风挟裹着醉人的五谷气味灌进车窗，文人们一个个都情不自禁，约好到米脂县城先找一个貂蝉看看。

我和一位朋友在县城转了大街又走了背巷，不仅没有看到貂蝉般美丽的女子，连民谣里传诵的漂亮婆姨也未遇见，便对一位坐在廊阶上摇着扇子乘凉的老汉问话：人说你们这儿婆姨好，怎么一个都不见？老汉摇着扇子直冲冲一句：还问哩！都给你们城里人勾引跑了。我一愣，朋友却调侃说，城市对乡村的野蛮“掠夺”，以至貂蝉。

虽然失望，却仍不怀疑民谣有任何伪诈。米脂水好，虽然粗粮布衣，却有好水滋润，所谓一方好水养一方好婆姨；米脂以北历来为边塞驻军之地，戍边的将军谋士的家属家眷，多是女人中的人尖儿，她们遗散民间，既带着优质良种，又兼着杂交取优的强势，百朝千代下来，米脂的婆姨便独秀于黄土高原了。这是陕北人推论米脂婆姨的自然的和历史的两大原因。同行的陕北作家证实，米脂的好婆姨都留不住，有本事的去上学去革命了，本事不强脸腮儿好的都给有本事的男人引走了；搞活了开放了，好婆姨更是像蜂儿搬家一样飞出去了，近的到延安，远的到西安，再远就是北京、深圳。你去饭店宾馆看看，凡是长得像貂蝉的，不用问，准是米脂的婆姨。

十二年后的又一个夏天，我从榆林返回时夜宿米脂，宾馆里的服务员一个个水灵灵的，操着生硬的夹生的普通话。我便可以想到，可能仅仅在三个月顶多半年以前，她们还在田峁上点瓜种豆，浇水除草，放羊喂鸡，一张招工启事就把她们“掠夺”到县城里来了。我的同行的朋友说，这儿的服务员个个赛貂蝉，比大会堂里的漂亮多了。我似乎难以附和，美则美矣！然而具体为貂蝉，似乎又不甘于此。这就是貂蝉吗?

晚上看歌舞团演出。朋友指点说，那个细高挑儿独唱的女孩，才是名噪陕北的貂蝉。深圳一家演出团开价多少多少月薪要把她“掠夺”南去，整个米脂整个榆林地区整个陕北高原都骚动起来了，自发自觉开始了保卫挽留小貂蝉的捐款捐资行动，资助经济拮据的歌舞团，一定要把这个好婆姨留下来。“这婆姨走了，我们到哪儿还能听到这么好听的信天游？”这个好小婆姨留下来了。

我被这个生活故事深深地感动了，人人都在追寻自己的貂蝉。

貂蝉的诞生源于民间神话故事，一位在天宫主司百花的牡丹仙子私自下凡，与米脂一个勤劳诚实的后生结为夫妻。女儿出生那天，有一只千娇百媚的银貂蝉蹿进屋院，便取名为貂蝉。这个千篇一律到平庸的神话，有两个不同凡响之处，一是牡丹仙子“采撷百花精英孕育胎儿”，二是牡丹仙子被勒令被绑架回天宫之前，在小院里化出一丛牡丹，并嘱丈夫以牡丹花露养育女儿。这样孕育和成长起来的貂蝉会是怎样的仙骨仙姿呢？任你去想象去创造去追寻吧！你是永远也想象不尽的，你是永远也不可能完成那种创造的，你是永远也追寻不到的。

然而，你却无法中止想象，无法停止创造，更无法断绝追寻的欲望。人对貂蝉的追寻，似乎沟通着喻示着关于美的创造和追求的精神?

1997年12月16日 广东河源

自题旧照

前年编选《文集》时搜出了这张照片，当是专为工作证团员证或各种表格使用的标准照，时间确定无疑是一九六三年春天。

《文集》的文字编辑和美术编辑看到这张照片，先后都用一种惊讶或狐疑的眼神瞅着我的脸。这是你吗？怎么会是你呢？你曾经真有过那样光光的一张脸吗？我现在的这张被朋友戏谑被记者们美化为黄土高坡水土严重流失的脸，确凿与那张照片上的脸相去甚远。我便有了阿Q式的自豪与得意，你们该当想到多少万年以前的黄土高原曾经是森林和草地覆盖着的景象！

然而我相信这就是三十五年前那个相对平静的春天的我的脸，从学校走上社会不到一年的我的脸，一个由两人执教七十余名学生的初级小学的民办教师的我的脸。

我的怀疑仅仅在于这张脸上的神情和眼神，似乎不应该如此沉静。我对那个时期的记忆主要是惶惶不定，可以说是百分之七十的自卑和不足百分之三十的自信交织着的心绪。我迷恋文学而且基本确立了自修文学的志向，内心里却无法驱逐自卑，自卑产生的直接诱因便是“天才”这个无法测检也无法判断的神秘莫测的东西。

我的写作发展的历程，老实无伪地标示着我生活体验、生命体验和艺术体验的历程。只是，“天才”再不能折磨我了。所有付出都是合理的，无须对昨天的脸哀婉唏嘘。

1998年1月10日 雍村

无法超脱

一

世界杯足球大赛进入倒计时。面对美丽的法兰西，整个世界都憋足聚饱了一口气。

三十二支参战队伍的临战宣言，没有一家是熊包的。无论整个世界舆论如何只在巴西、阿根廷、德国等几个强国之中猜测和预设，反是那些被看作陪太子念书的足球小国似乎比那些被看好的足球大国更牛气更狂傲。比如第一次获得通行证的牙买加队，比老牌夺冠热门巴西、意大利、德国队信心更足。尤其是南非，敲明喊响要为非洲创造奇迹。我不甚关心最后的结局。我更感佩的倒是牙买加尤其是南非人的这种自信。

这种自信在本质上注定了一个国家和民族的精神，也铸就了足球永久不衰的魅力。

中国足球就缺这点东西、最重要的东西。

二

四年才有这么一回。

一九九八年六月的世界，将是一个癫狂的世界，又是一个空前统一的世界。地球人类思维的兴奋点，高度一致地集中到一只小小的黑白相间的足球上来。

总统和平民，司令和士兵，富商和乞丐，教授和文盲，都会为一个漂亮的进球而狂欢，丢失了差别，达到情感审美的完全平等。只有足球能够沟通处于政治和经济和文化两极中的人们的情感。

三

艳阳高照之下的绿色球场是迷人的。

夕阳涂金之下的绿茵场更使人迷醉。

那样一只黑白相间的球儿在绿草坪上滚动，那样剽悍的年轻人在草地上斗勇斗智斗技斗法，我无法抑制情感。那是人类体能与智能的极端性演示。你会觉得人真是天地间的精灵，人真美；人继承着动物的全部优秀的体能，人又具备了动物永远不可及的体能；人真值得你去爱，每一个生命，值得你去珍惜，值得你去为他在这个世界取得合理的生存形态而付出自己的全部努力。

四

生活中我常常不相信某些关于“超脱”的说教。我更多地看到的现实是，说着超脱很多的人，往往是在关心别人关于集体事情上的超脱，而对牵涉自己的哪怕是一个小指甲盖上已经长长的多余的指甲也不能碰的人，他们所说的超脱就不是超脱一词原本的含义了。

对于足球，我也是从来都做不到超脱。

在世界杯外围赛的时日里，我想要中国队赢每一场球，希望中国队能进入法兰西，面对电视转播，忍不住捶胸顿足，忍不住欢呼更忍不住唉叹。

在国内甲级赛场，我强烈地希望陕西国力赢每一个对手。

朋友说，超脱一点。更进一步说，中国足球嘛你就不要寄任何希望，不必为它伤那一份情感。我不仅做不到，反而陷入愈深。

我又想了，如果人们面对足球而能做到“输了赢了就是那么一回事了”的超脱境地，足球灭亡的时日便到来了。

足球本身就是俱乐部主义、地方主义、国家和民族主义的，它紧紧牵动着的是一个地方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情感，怎么可能超脱呢?

因为那情感的内核里，是一个地方（比如国内某一省）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面子和自尊。

我们在足球世界上已经丢光了面子，已经没有了尊严。我这回或许可以做到较为超脱地面对电视屏幕，去欣赏三十二个国家不同肤色的球员的风采，而割舍自己较为狭隘的民族主义情感了。

多么令人遗憾而近乎残酷的“超脱”！

1998年6月

谁打败了斗牛士

世界杯第一回合战罢，三十二支球队究竟谁是虎是狼是犬是老鼠，已经亮相于数以亿计的众目之下。赢家笑了，输家哭了，平家更憋气了，当属常情。尘埃虽然已经落定，作为一个作壁上观的看客，尽兴欣赏了浏览了当今世界各具风流的球队风貌，自然已经十分满足，唯独对一场赛事耿耿于心而不能释怀，即西班牙与尼日利亚之战。

看家和看客舆论一致，这是第一回合中进球最多也最精彩的一场赛事。我有同感。问题恰恰发生在下半场，确切地说，是西班牙队第二粒入球再度领先之后，场上的战局发生了明显的又是使人莫名其妙的变化。尼日利亚不仅没有因为再遭打击而气急、而气馁、而慌乱这些常见的落后者的反应，反而更加沉稳，进攻更富于节奏感，推进更为简捷明快，进攻线路更加清晰，配合更加默契，一浪接一浪的潮水般的攻势令人眼花缭乱的同时，真正让人体悟到现代足球的难以言叙的魅力。

西班牙队却截然相反，上半时或确切地说二度领先以前的斗牛士式的中场拼抢没有了，疾风似的勇往直前的推进风停浪息了。我们看见的是缓慢的传接，毫无意义的横传，颠来倒去到直令人生厌的后场倒脚，放弃中场退回窝门的防守。当这一局面明显呈现出来，而且在尼队强大的进攻面前仍然不知醒悟的状况发生时，我的心里突然产生了一种不祥的预感，尼日利亚肯定要进球了。非我自吹自卖事后诸葛，确是在那一刻里，我的心里浮出一个曾经痛苦不堪的阴影，就是戚务生式的怪圈的阴影。

最能阐释戚务生足球思想足球理论足球战略和战术的一场赛事，当是上届亚洲杯的中日之战。中国队只要打平即可小组出线，于是从一开场便摆出死守窝口挨打挨炸的架势，中国十一名队员很少有冲过中场的欲望和举动。那时节日本队便肆无忌惮地围住中国队狂轰滥炸，直到最后一刻，中国队球门失守。记忆中那是一场丢尽了中国足球脸面的比赛，也是我所看过的国际国内最不堪入目最丑陋的一场比赛。

戚务生没有汲取这个教训，导致在亚洲十强赛中失败的根本孽障概出于兹：足球本不是守。

欧洲的拉丁派西班牙人，既有传统的斗牛士精神，却陷入了戚务生式的“守”的怪圈，还能招致什么好的结果呢？我的预感不幸而“感”中，尼日利亚接二连三攻陷西班牙人的城池，淋漓尽致地在整个世界面前表演了一回非洲人的足球桑巴。

足球和战争的理论与战略基本相通，不外乎攻与防。无论战争无论足球，最终目的是攻城拔寨夺取胜果，攻防讲究平衡，是不言而喻的足球ABC，然而进攻才是达到胜利目标的别无选择的途径。尤其对足球而言，进攻才是最有效的防守，凌厉而坚决的进攻，才能取得全局上的主动，才能陷对方于奔命式的防守，才能减轻自家后门的压力，把“祸水”一股脑儿地倾泻到对方的窝口。现代足球哪里能找到死守半场以至死守大禁区窝口的战例？只有对抗双方实力过于悬殊，弱方迫于无奈不得不退守才会出现这种被动挨打的局面。亚洲杯的中日之战，世界杯十三日的西尼之战皆为势均力敌旗鼓相当，即便有些许差别，当不能构成悬殊。然而中国队的戚务生的怪圈出现了，西班牙两度领先之后亦陷入这种稀世罕见的怪圈，失败便是在所难逃的了。

这种落后到陈腐发霉的足球战略和战术，怎么会在当今的世界足坛上找到一席生存之地呢?

西班牙人在尼日利亚队的攻击之下终于丢掉第二粒入球，于是如梦初醒，重新投入对攻，然而晚矣！并非完全是为“时”晚矣，关键是此时的进攻已非初战时的进攻，自家心理的自信被摧毁了，完全是慌乱无章的反扑，频频的传球失误，连大牌球星的射门动作也扭曲变形，错失良机频频发生，与上半时有板有眼的西班牙队判若两队。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他们全都不会踢球了，慢说进攻节奏攻防章法之类，队员连最基本的运球动作都做不出来。可见松懈防守会造成怎样不可思议的尴尬结局。综观西班牙人整场表现，所循三大节拍为攻—守—反攻；所得却大相径庭：胜—平—败。真可谓此攻非彼攻，自乱阵脚自我消磨自己打败了自己，自然只能是自食苦果。

古话说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何况在你死我活的足球赛场。这样简单到大白话的道理，除了中国足球队主教练连续演绎过愚蠢的失败先例，像西班牙这样的足球队偶然也会出现这样原始式的错误，给人的启迪就不单是足球了。

人生何尝不如是?

1998年6月

喇叭裤与“本本”

准确无误地记得是一九八○年的春夏之交，我在古长安的东大门——历来为墨客骚人折柳送别的古老名镇——灞桥居住着。某一日，小镇上突然冒出来几个穿一种奇异的裤子的年轻人，引起小镇上各个阶层的人们的惊诧与喧哗。

那是一种谁也没见过的奇形怪状的裤子，膝盖以上的裤管和裤裆以及裤腰都特别窄，紧紧包裹着大腿、屁股蛋儿和小腹，穿着这种裤子的男女青年，或粗浑或纤细的大腿原形毕现，或肥或瘦的两半屁股也如形凸现，或丰或瘪的小腹更有一种风情无限的诱惑。从膝盖往下直到脚面，那裤管逐渐加宽放大，恰如一支杆细口大的喇叭。此裤一上小镇，便不约而同被命名为喇叭裤，形象恰当而又朗朗上口。

最早穿着这种喇叭裤的几个男女青年，走过小镇上果皮、菜叶和马粪拉撒的街道，人们无不驻足凝眸，像欣赏马戏团丑角一样兴味十足。随之就给他们取下一个“业余华侨”的共用绰号，意思是指只有久居海外的华侨才会穿这种花里胡哨奇形怪状的服装，然而他们不过是小镇附近某家工厂的青年工人，所以赐给一个温柔的讥讽，不是正宗华侨而只能算作“业余”。然而那几位青年男女却不管不顾，照直走过小镇被灰黑蓝的中山装一统天下的街道，手里拎一台正在播放着歌曲的录放机，那乐曲的旋律与歌唱者的软柔柔的调儿也令人听来有一种异样的感觉。再稍后，这些穿着喇叭裤拎着录放机招摇过市的年轻人，女的喜欢把一头长发整个披散在肩上和背上，不束不辫；男的头发也蓄留得长长的，掩过脖颈盖过衣领直抵肩膀。不仅这种裤子前所未有，这样长的头发和发式也是几十年所未曾出现过的。小镇上有头

有脸的人物以及推车挑担卖菜卖浆者都用关中最通用最简洁的一句话表示鄙夷与不屑：看看那几个货！

我现在必须坦白我当初面对喇叭裤和长头发的真实感觉。

我第一眼看见被喇叭裤绷得紧紧的大腿和屁股时，惊诧之后也摺出几句调侃的话来，在这种新潮裤式和发式向一统中国人三十年单一的中山装和单一的发式发动挑战的时候，我习惯性地产生了排斥情感。然而在种种如我的排斥情感所形成的讥讽调侃鄙夷的声浪中，我突然在某一瞬间反应出鲁迅先生《风波》小说里剪辫子的历史性细节来，惊讶自己是否陷入了护辫子的遗老遗少的那一类。在习惯性情感和历史性细节的参照物之间我难以摆顺，其实我当时还不足四十岁，从生理上划界亦应属于青年。

这种习惯性的情感排斥与理性的接受所造成的心理秩序的紊乱，从那时开始一直延续到现在都时有发生。尤其是比喇叭裤长头发的争论要严峻得多的诸如“分田到户”“市场经济”等，我的这种矛盾、紊乱以至痛苦的心理历程一直在延续着。

一九八二年春天，我随下乡工作团到渭河岸边的乡村里去落实农业生产责任制的新政策，怀里揣着中共中央一号文件。我们开社员大会宣讲文件，开干部会开党员会开团员会有层次有步骤地发动群众，尽快地做出土地如何合理地分配到农户手中的方案，牲畜和公用水利设施、农业机械的分配和使用方法。我在对乡村基层干部和社员宣讲中央政策精神时全神贯注不打折扣，甚至时时都要正面回答诸如“辛辛苦苦二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这种普遍性的误解。然而就真实的内心而言，我与他们不仅有些相通之处，而且似乎有更深层的忧虑。我在努力地说服他们的同时也在说服我自己。我在区、乡两级政府工作了

整整二十年，其中在当时的公社工作了十年，十年里干的就是“学大寨”，说的就是阶级斗争和走共同富裕的阳光大道，批判和防范的就是“自发的资本主义”。除去极左的政治观念和政策规定，回到五十年代中期合作化的最初的生活理想和思想理论上，我对分田分地和拉牛回家的做法一时难以诠释给自己，我按捺着自己的某些思想的心理的障碍和矛盾，用中央文件的精神去说服那些老党员“老土改”“老合作（化）”，只有自己才知道那个别扭。

某一晚，在一个村子开完社员大会已是深夜子时，我骑着自行车返回驻地。行驶在乡村土路上，稻田莲池里的蛙声浑然似一张铺天盖地的网。我突然想到《创业史》里头某些难忘的情节来，惊诧得几乎从自行车上翻跌到路旁的麦田里。我在干什么？我不是与我几十年崇拜又崇敬着的柳青搞别扭吗？我现在在渭河边所努力做着的一切，不是正好破坏着他当年在长安滴水两岸的蛤蟆滩里呕心沥血的神圣的农业社吗？五十年代中期的县、乡干部，成年累月活动在乡村里，按照中央关于合作化的指示帮助农民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土地入社，牲畜合槽。柳青更是从此入住长安农村，参与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全过程，创造出曾经使我大段大段背诵过的长篇小说《创业史》。柳青为数不少的散文、特写更真实生动地叙述着他在农业社诞生过程中的思索和情感色彩，皇甫村和蛤蟆滩至今流传着柳青帮助农业社解决种种问题，甚至包括总结饲养牲畜的经验这样一类动人心魄催人泪下的故事……我几乎无法回避这样严峻的现实，即柳青当年在长安所要努力建树的理想的生活模式，我现在同样是夜以继日地要把它破坏、摧毁，越快越彻底越好，柳青说服农民把土地和牲畜交给集体去经营去饲养，我现在却要动员农民把土地划归个体经营，把牛马通过抓阄的办法拉回家里去饲养；我现在所做的一切与柳青当年所做的正好互为一个反动，互为一个轮回。由生活发展本身遭遇给我的情感矛盾和复

杂的心理感受，显然不是属于我个人的私人情感，而带有历史性变迁的悲壮与叹惋：我所面对的现实与历史的思索，显然就不能再循着柳青原先的思路了。这是生活赐予我的新的机遇，正好遇上在中国社会的这样一个重大转折性的关口；我比柳青多了一份痛苦和复杂，更多了一份幸运。

在最后确立市场经济的几年大讨论和试验的过程中，我又一次经历如同落实责任制如同看见喇叭裤长头发的心理历程。回想从关于“真理标准”讨论到今天的近二十年的思想历程，我给自己归纳为这样一个公式：扯断—陷入—再扯断—再陷入，及至期待新的扯断的痛快。新的生活命题出现的时候，我总是首先陷入对原来的观念的习惯性依赖，然后就有一个痛苦的剥离过程，然后才有力气把那个习惯性依赖的旧的观念扯断。这每一次的陷入和扯断的过程，实际是由社会观念的变化而引起的心理的旧秩序的紊乱，然后经历了一番剥离，一番弃旧和更新，心理又形成一种新的秩序。《风波》里的辫子问题如是，几十年后的喇叭裤长头发、“责任田”“市场经济”亦如是。如是的不断发生，中国进步了，中国发展步伐大大加快了，中国各民族人民进步了文明了。我也进步了。

又过去了好几年，我终于可以系统地完整地阅读邓小平新时期以来的讲话和文章的文本了。以往，他的许多重要讲话是以内部文件下达到有限定的范围内的，更多的是他的某些最精辟的讲话的关键词以各种渠道流布于民间，甚至带有某些神秘色彩。无论部分的抑或是完整的《邓选》，我其实就只读出了一个精髓思想，那就叫实事求是，它的反义词应该是“本本主义”。

按着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解放以后的几乎所有的“运动”都被否定了，所有被“运动”出来的倒霉蛋儿们重新获得了一个公民的权利。

我往往感慨的是，一旦违反了实事求是，我们还以为陷入的荒唐的灾难是神圣的。一旦恢复了实事求是的精神，我们即使捶胸顿足也无法挽回业已铸成的无法丈量的损失了。邓小平有一段没有任何修饰的又简洁的论述：“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我们改革开放的成功，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靠实事求是。”实事求是是认识世界从而正确地推进生活发展的唯一途径，而造成违反实事求是精神的根源便是本本，因为不是面对社会和生活的实际，而是背对生活实际，唯本本是从。

就我有限的记忆，实事求是是毛泽东在延安提出来的一个著名的口号，而《反对本本主义》则仍然是毛泽东的一部总结极左路线造成红军致命性的损失的历史性教科书。然而不幸的是，提出实事求是口号的毛泽东晚年违反了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陷入了自己曾经深恶痛绝的“本本主义”，直把个“阶级斗争”的“本本”排演出诸如“反右”“反右倾”“文化大革命”的悲剧。反倒是邓小平在遭难的时候清醒地认识了那个“本本”的谬误，并以一个巨人的气魄摒弃了那个造成国家和人民灾难连绵的“本本”，真正地恢复了毛泽东提倡的实事求是的科学内蕴，从而救活了中国。认识真理多艰难啊！

《风波》里关于辫子引起的风波，是那个时代的中国人依照封建的“本本”所形成的心理秩序被打乱而引发的；喇叭裤和长头发在灞桥古镇引起的风波，是如我一样的古镇的人们原有的“灰黑蓝”中山装这样的“本本”所形成的心理审美定势被扰乱了；责任田、市场经济所引发的不同反响同样是原有的“本本”所形成的……剥离腐朽的“本本”，打破旧“本本”所形成的思维定式，冲乱僵化的心理秩序，让新鲜血液涌流，让思维张开最具活力的翅膀……需要学习新的知识，从更新知识结构起首。

1998年9月18日 雍村

伊犁有条渠

到了伊犁，朋友便说林则徐。我的近四十年未见过面的老同学，一见面先说林则徐；新结识的伊犁地区的作家朋友，一松开握着的手便说林则徐；当地的州和县的领导干部给我介绍林则徐；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的朋友同样热烈地对我讲述林则徐。

车子驶过伊犁市郊区漂亮的公路，一条清渠伴着公路在绿杨下流淌，朋友便指给我看，这是林则徐当年流放伊犁时修的，叫湟渠。走进伊犁老街，朋友又指给我看一条小巷，林则徐在伊犁接受朝廷惩罚的两年多时间里，就住在这条小巷里的一院平房内。从乌鲁木齐来伊犁的路上，朋友又说，林则徐一八四二年也是循着这条路走过的。这条路是沿着天山向西伸展的，天山依然是暗褐色的如同生锈的铸铁，山脚下是无边无垠的秀美的草地。在刚刚落成的林则徐纪念馆里，朋友指着一架木头车说，林则徐发配新疆从西安上路时，就坐进了这辆木轮马车，历时四个多月，经过乌鲁木齐再走进伊犁。我便怀着一种崇拜而又好奇的心情绕车观看一圈，只见两个硕大的木制车轮，木板割制的车厢，两根很粗的车辕木。坐着这样的一架木车历经四个多月的行程，尽可以让人随意去想象旅途的种种艰辛了。

在伊犁，林则徐留下了一道永不磨损的光环。把他弄到这里来的道光皇帝原有目的是出于惩罚和羞辱，没想到的是，这却使被惩罚者的精神人格获得了不朽，这常常成为古今中外的一个历史法则，尤其是漫长的封建专制的中国以及相对短暂的人妖颠倒的“文化大革命”时期，往往被惩罚者最后胜利，成为历史不损的光环，而惩罚者自己却最终接受了历史的羞辱。

我在杨树和柳树列岸的湟渠边徘徊。湟渠的水是泛着乳白色的清流。这水的颜色不同于北方的河的水色，也不同于南方的江的水色，更相异于海水的颜色。这水来自天山，是天山积雪融化而成的天上之水，伊犁河便是汇聚这雪山之水而独具色彩的河流。伊犁河从中国的伊犁流到哈萨克斯坦国那边去了。湟渠之水是林则徐率众从伊犁河截流引来的。

这水从一八四四年引流成功到现在，流过一百五十余年，依然充沛而又欢畅地流着，流进号称塞外江南的伊犁的田地和果园，流进农舍的水缸和牧民的饮马槽，一百五十余年以来就这样滋润着这块美丽的土地和多姿多彩的各民族子孙。我企图揣度一个戴罪受罚遭羞辱的人，以怎样的气魄和襟怀在山地和沙滩上亲自踏勘出百余公里水渠的大略走向和具体定位来；一个年过半百的老人，又以怎样的勇气和耐心亲自组织调度汉、维吾尔、哈萨克和锡伯等民族的人民，去开凿修建伊犁地区最宽最长的这条渠。是什么东西铸就林则徐强大的心理力量，踏倒了加给他的惩罚、羞辱，克服了半百之躯的衰老，依然故我地在流放之地实施这项惠佑民众的水利工程？当他在漠风透骨的边陲踏勘和奔走的时候，想没想过那个把他发配到这里来的皇帝在干什么，以及用巧舌和唾液把他喷吐得满脸腥臊的穆彰阿、琦善之流此刻又在干什么呢？

我们绵延两千余年的封建历史，无论正史抑或野史，最生动的篇章，其实就是忠臣的热血和奸党的口水。尘封冷寂的历史摆在书架上，却仍然无情仍然冷峻：造成一个王朝兴与衰、存或亡的决定性因素，不仅是忠臣义士的热血，而更是奸党的口水。口水往往胜过热血，这是漫长的封建历史过程中各家王朝不断重复的悲剧，是不争的史实。但到清家道光帝这一次重演，口水战胜热血就有点不同了。因

为这不只是清家王朝的兴衰与死亡的事了。面对英帝国的蛮横侵略，奸党们的口水不单是吐到林则徐的脸上，而是吐到整个中华民族的脸上；奸党们的口水摧折的不单是林则徐的一顶花翎，而是整个民族的脊梁。我们在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衰败和灭亡过程中，看到了一场也许是最生动最惊心动魄的口水战胜热血的悲剧。它给我们的最不可接受的心理刺激或者说历史教训是，摧毁一个国家和民族的尊严的不仅是侵略者的坚船利炮，居然还是更具内腐蚀力的口水。几个奸党的口水所喷吐出来的条约，使整个民族蒙羞受辱了一个世纪。及至今天我站在林则徐的湟渠沿儿上，似乎还能嗅到那口水的腥臭气味。

我终于来到湟渠的渠首。

湟渠进水的渠首工程修建在东巴扎尔。

东巴扎尔是一个小镇，由三条质地良好的沥青铺设的公路组成一个标准的三岔口，高级轿车、大型货车、长途客车和手扶拖拉机在三股道上穿梭，这样偏远的小镇使人感觉不到荒僻，显现着一种蜕皮图新的气氛。小镇对面是一道沙石堆积的荒坡，有两股道路便绕着那荒坡左右延伸。站在小镇一家小饭店的店门旁朝下望去，便是湟渠渠首的建筑。

那是一条绿色的河川。伊犁河的主要支流之一的喀什河，紧紧贴着东巴扎尔小镇的脚流向远处。河水自然是乳白色的天山雪水，河床不宽，水量充沛，有异于旱季里所有北方河流的干滩景象。河的两岸是丛生的柳树组成的婆娑的林带。湟渠从这里破开喀什河的河岸，把天山之水引进百余公里的人工修凿的大渠，这水便不再自然地流失，而变得无价了。这湟渠紧紧贴着东巴扎尔小镇的崖坡，和喀什河并排比肩流过一段距离便分手了，流向伊犁腹地，就在千村万舍的门楼下

和葡萄园里喧闹。我站在山坡上久久眺望那远去的喀什河和烟柳婆娑的绿波，久久眺望那相伴着的湟渠和同样被烟柳荫护着的渠水在视野消失。

我和朋友在东巴扎尔镇的小饭店就餐，是一大碗用羊肉汤和西红柿烩煮的揪面片，这是我在新疆的首选食品，甚至超过了手抓羊肉。小饭店是一个维吾尔族青年开的，门面不大，小老板的肚子却够大的。他是炉头，主勺，炒菜烩面十分熟练，上唇的一绺黑色胡须浪漫自信。揪面片的是两个更年轻的维吾尔族小伙子，在案板上揉面搓面，往锅里一边揪着面片，一边说着生硬的普通话，神情却透着调皮，透着这个民族素常的幽默。只有唯一的一个女孩是腼腆的，黄色卷曲的头发，眼睛是淡蓝的，尤其是那翘起的鼻尖，秀丽又可爱。

我吃着揪面片，在露天的东巴扎尔小镇上，歪过头就可以瞅见坡坎下的喀什河和湟渠渠首建筑。这个渠首工程是林则徐亲自督建的，据说安排在渠首工程的民工是清一色的锡伯族人。我现在就餐的这个三岔口小镇，当年是否为锡伯族人安营扎寨的场地，无从考证。然而这小镇上肯定叠加着林则徐的脚印，因为这小镇是观察喀什河流向和湟渠走向的最佳方位……许多年以前，自从我在中学历史课本上知道了那一场鸦片战争，也就记住了一个叫作林则徐的中国人。许多年以后，我在西部边陲伊犁的东巴扎尔小镇上，寻觅这个人的足迹，发着英雄的血和奸党的口水的慨叹。

东巴扎尔。三岔口。塞外荒漠上的东巴扎尔，系结在喀什河上的一个小镇，留给我一个鲜活的历史记忆。

1998年11月6日 蒲城

灿烂一瞬

——凉山笔记之一

到神秘的卫星发射地西昌来，原本没有期望能亲眼观看卫星腾空的壮观。这是可遇不可求的事。谁也不会料知什么时间要实施卫星发射。真是令人喜出望外，我们真的就遇合上了，去参观一颗被命名为“鑫诺”的卫星发射。

这是一九九八年七月十八日下午。即使记性很差的我仍然记住了这个日子。这个时月无论在中国的南方北方东西部，都是一年中最炎热的日子。在森林和草地覆盖着的大小凉山，也是热风袭人。汽车出西昌城，沿着安宁河谷走，沿路可以看到低矮的灰色的村舍，吆喝着羊群的山民和背着竹篾背篓的女人，路边上隔一小段距离便有几位站岗值勤的武警士兵，显然是为即将到来的发射临时布岗。然而那些放羊的汉子和背着竹篓的农妇仍然悠悠地走他们的路，即将到来的令人神秘的卫星发射对他们来讲似乎平淡无奇。许是早已看惯了。

汽车驶过安宁河桥，便盘旋而上一座青山。山根有一片高高矮矮的漂亮的建筑群，彩色的旗帜在建筑物的最显眼处飞扬，酝酿着一种节日般期待的浓郁的气氛。朋友指给我看一幢建筑，那是总指挥部。我便不是通过想象而是真实地映现出了那里边的一切，我已经许多回在电视上看到过火箭和卫星发射过程中总指挥部里的程序和紧张的气氛。汽车就从总指挥部的墙角擦身而过，神秘的总指挥部伸手可触，指挥部里的紧张而又神秘的气氛鼻息可感。当这种过去被一概作为军事机密的科学进入和平利用的新的概念以后，便自己动手撕开其不必

要的神秘幕布，给平民和外行人一个感知的机会，于是便有了这个置于半山上的视角尤佳的观望台。然而我仍然继续陷入在神秘之中。

从这里向西望去，安宁河川两岸的连绵着的群山肃穆着。在那个被选定为发射场的河湾里，一边的山绕出一个大圈儿来，形成了一方三面环山的幽幽的天地。银白色的发射架在绿色环绕的山谷里透出一缕娇娜，像万绿丛中的一位飘飘欲仙的靓女。

当中国的第一颗卫星“东方红”号升入太空的时候，那种振奋性的记忆至今犹存。我那时候在家乡灞河岸边的一个公社（乡）工作，在“阶级斗争为纲”的喧嚣里提心吊胆地做事，面对着的却是年复一年的普遍的贫穷和我自己的困窘。我的孩子的被窝是用烧得发烫的河石烘热的。这是我的夫人的最原始也最英明的发明。她在灞河滩里找到一块又薄又扁光滑漂亮的暗绿色河石，在灶锅的柴火里烧得发烫，然后塞进孩子的被窝里。我那时买不起一只暖壶或一只热水袋，依然虔诚地听取“忆苦思甜”，会上因为拥有一只竹皮热水瓶或一双胶质雨鞋的感恩戴德的叙说……当收音机里传出《东方红》乐曲的时候（这乐曲不是素常发自树杈上的大号喇叭而是来自太空），我感到了由衷的自豪，我们国家做成了一件了不起的大事！这样的大事令人扬眉吐气腰杆挺硬，纵然肚腹里装着酸菜和杂粮，纵然给孩子的被窝里塞着烧热的石头取暖。国家在现代科学技术方面的巨大成就，使原始式的贫穷的我们依然欢欣鼓舞腰杆增加了硬度。

轰然一声巨响，我感到了脚下的大地的颤抖。我的眼睛还迷乱在白烟和烈焰翻卷着的火团之中，火箭托着的卫星早已峭立在白云和蓝天里头了。火箭尾巴喷着耀眼的火焰，端直直冲向白云悠悠的天际，洒下一条乳白色的线带。火焰喷发出啪啪啪的连续性爆炸似的响声，

从河谷里一路震响到长空，威风凛凛又卓尔不群。乳白色的线体大弯角转向，朝着东南方延伸，愈来愈纤细以至从肉眼里消弭。

令人陶醉的灿烂一瞬。

晚霞羞羞地洒满青葱的山峰和河谷。人类智慧的轰然一爆，观者的我在那一瞬间感受到了一股壮怀激烈的欢畅。当生活中太多的诸如种种腐败的丑行噎得人忧愤不堪的时候，这样的一声轰鸣陡然使我感到了情感的超越，涨起某种对于腐败丑行的鄙夷。腐败者在灯红酒绿中继续腐败，撑着国家和民族脊梁的人在神秘的山谷默默成就着大事。

安宁河在夕阳里愈加妩媚多姿，拥着两岸婆娑的柳烟向东款款而去。最现代的科学技术隐蔽在最偏僻的丛山之中，隐身在灰蒙蒙的村舍围墙和背着背篓的女人之中，羊群散落在山坡上，耕牛拽着犁具在田地里来去翻耕，路边简陋的烟酒店里聚着赤身的闲人在闲聊。似乎这一切看起来都不可思议地统一在这河谷里。

那样震撼人心的轰然一响，那样灿烂的动人的一瞬，使我长期感到神秘的又是十分遥远的距离全部消失了；眼见的可靠的壮观壮景，使人在那一瞬间突然心地踏实起来，做我们自己应该做的事去。

1998年11月13日 蒲城

神秘一幕

——凉山笔记之二

四川西南部的大凉山和小凉山，在我的感觉里是除了西藏最为神秘的地方。

年轻时读过作家高缨写的小说《达吉和她的父亲》，随后又看了由小说改编的同名电影，那隐蔽在青山和河湾里的一幢幢茅草屋舍，女人俏丽的花裙和胸前挂着的精美的银器饰物，尤其是男人头上装饰着的那一根独角似的帽子，令一个自幼生活在内地关中的人感到新鲜又神秘。后来，我一次又一次地在电影和电视上看到火箭和卫星发射的壮观景象，一次又一次引发的是壮观之后的神秘，是一个无知的外行对于距离自己太远的尖端科学的神秘感觉。这卫星发自西昌，在凉山。然而这些都是后来不断叠加的印象，最初的关于凉山神秘的印象，却是来自红军长征彝海结盟那个历史性的一幕。

记不得是多大年龄时的事了，反正是少年时期，我知道了红军长征的故事。究竟是历史教员先讲的，还是我阅读连环画先知的，记不清了，也无关紧要。长征路上所发生的大大小小的故事，对于少先队员的我都有一种绝对的征服力量。然而仅就神秘感而言，却是刘伯承将军与彝族头领小叶丹歃血结盟的故事。随着年龄的增长和人生阅历的丰富，对于作为世界上“闻所未闻的故事——长征”，当然更多些了解了，然而歃血为盟的神秘依然雾罩在心头。

几十年后，一九九八年七月十九日，我终于有机缘拜谒歃血结盟之地——那隐蔽在青山秀岭之中的彝海，揭开从少年时代潜存到今天

的那个历史性细节的神秘一幕了。

汽车在山上盘旋前进，公路在森林覆盖的山梁和沟壑之中盘旋。森林是人工培植的森林，也是我所见过的人造林中最壮观最具规模的森林。这是飞机撒播的树种，历经数年的精心呵护而培育成功的一片绿色。它是对一九五八年的大毁坏的忏悔，是中国人从愚昧走向觉醒回报给大地的一份真诚的祭礼。汽车每一次转向拐弯，人的眼前便是一方新的姿色。色彩和光线千姿百色，那是天光和地韵和绿叶在山坡在山峁在沟坡沟底自然杂合的色调，每走一步你都能感到那色调在变化在流动。那种美你只能感到目不暇接，你只能感到心旷神怡；你不可能找到任何一个词句或一堆话语把它描绘准确，因为那气韵那色调那景象本身是瞬息万变的，人类创造的色彩（包括最出色的画家的调色板）是单调的，人类创造的语言也就显得更贫困了。那叫自然。西昌人营造和呵护的这一片大自然的景象是西昌人的心灵诗篇。

进入纯自然的原始森林又是别一番天地和景致了。大片的天然草地和望不透的树木，使人惊叹和欢悦的同时亦由不得庆幸，野蛮的大毁坏的一九五八年的斧头尚没有砍到这里。每一座山和每一条沟的每一寸空间，都呈现着一份不同的色彩和韵致。一团一团的白云一次又一次戏弄着太阳，阳光短暂的隐没和再一次复出，这千峰万沟的群山就气象万千了。即使最干枯最寡情的人到了这样的山地也不会无动于衷，即使心灵世界最低迷的那一根神经也会苏醒过来，陷入一种美的陶醉。那叫原始的大自然。

彝海在一座山顶上。这实在称不得海，而只能算是一个大水潭。如果按水潭的概念确实是够大的了。据说在凉山，有许多这样的水潭或者水池，而被称作彝海的水池或水潭其实是较小而又极普通的一个，然而却是知名度最高的一个，也是截至目前为中外游人观瞻最频

繁的一个，歃血结盟的长征中的带有神秘色彩的一幕就发生在这里。这凉山上颇多的水潭或水池的绝妙之处，一是处于海拔两三千米的高山顶上，蔚为壮观，也为带着原始韵味的群山酝酿出一方水的妩媚和水的娇娜；二是这水潭既不是汇聚小溪小泉之水而成，亦不是天雨汇集，而是来自地下，你找不到水的出处，水却在这儿聚潭聚池了不知多少万年。

我站在彝海边上，仅仅只是以一种崇敬的心情来追寻革命历史的一块碑石，一块雾罩着神秘色彩的碑石，却无法沉重。即使我和同来的作家朋友努力追问查询，企图捕捉最生动最鲜为人知也最为准确的历史性细节的一枝一叶，显然再也无法进入沉重。我完全可以想象当年结盟的红军统帅和士兵面临的困境乃至绝境，尽管这感受在事件的发生地比教科书（或连环画）上更贴近更具体也更深刻，然而无法进入当年哪怕是一个红军伙夫彼时彼地的焦虑与危机……我只是已经成为历史的那神秘一幕的参观者和崇拜者，不可能重新进入沉重的体验。

彝海是平静的，水波不兴，如一面蓝色的镜子。绿树密密匝匝环绕着水，鸟儿在啁啾。阳光从枝叶间流泻下来，在水面上撒下一片闪闪烁烁的斑驳色彩。一只小水鸭在水里游过，波纹随兴随隐。当年那一群衣衫褴褛的红军士兵暂聚在这里，期待即将发生的那个历史性细节的彝海也是这样平静吗？一如许多万年以前一直平静过来的平静吗？

紧拥着彝海南沿儿的是一片缓坡，向西铺展而去。泛着淡黄的绿草，随着缓坡起伏着的曲线而起伏着，无名的各色花朵在曲线的任何部位都点缀出迷离和妩媚。野蜂和蝴蝶便成了草和花的君王，随意拈惹，真是蜂乱而蝶忙。缓坡倚靠着山，山上是密不露隙的森林。随着

山势渐次升高，森林的色彩也渐次浑厚而深沉，直到遥远的树梢和白云相接相抚的峰巅处。

刘伯承和彝族首领小叶丹歃血结盟的故事无须再叙写，这是任何中国人都熟知的。我现在才听说，血是一只公鸡的血，印象里似乎一直以为是他们两人割破手指的血呢。后来为此我专门查了字典，在“歃血为盟”词条下注释着：古代举行盟会时，宰杀牲畜，并以牲畜的血涂抹嘴唇，表示精诚团结，结为同盟。我便释然，用公鸡的血和着酒原是合乎古代传统规矩的。不过酒却确凿不是任何酒，是用彝海舀来的水滴进公鸡的鲜血，刘伯承和小叶丹双方都饮下了。据说一时找不到酒，便舀来彝海之水权且做酒。这彝海之水自地下涌出，聚潭许多万年而不散不竭，便如自酿了几万年的一池美酒。彝海之水便促成了一种神圣的事业和一种真诚的精神的结盟，便成就了带着神秘色彩的历史性一幕，便没有重复石达开在大渡河上的天朝悲剧。

在一块稍微平坦的草地上，摆着三块青石，这是当年刘伯承和小叶丹以及翻译站着喝血酒的位置。稍后的草地上，有一方漂亮的雕塑，自然是把那历史性一幕的短暂的细节凝聚定格而成的形象。夏日高原强烈的阳光照在草地上，照着那雕像，照着那三块青石。我坐在刘伯承站过的那块石头上，依然无法感受当年将军的心情，依然无法进入沉重，依然无法挥去那雾罩了几十年的神秘，而愈觉神秘了。

现在人们从中国的南方北方到此游览，观赏凉山大自然的奇异的景致，瞻仰当年在这里发生的神秘的一幕，自然会汲取种种自以为珍贵的东西。历史不能重复体验，而动人的细节却永久存活在后来人心里，历史便不会泯灭。

不会泯灭的历史性细节还发生在这神秘的一幕之后。刘伯承与小叶丹歃血结盟之后，刘伯承将军率领的红军赢得了时间，强渡过了大渡河。晚来迟到的国民党军队便杀害了小叶丹，继续搜捕小叶丹的亲属。小叶丹的夫人和孩子在凉山彝族同胞的保护下，流亡逃躲了整整十四年，直到西昌解放。夫人把当年由毛泽东赠送给小叶丹的一面绣有“中国工农红军”的红旗整整保存了十四年，共和国成立后就交给人民政府了。我的神秘的感觉终于雾散，眼前扬起灿烂的节日的礼花，纷纷的花雨莫如说血雨，有小叶丹的一滴，一个凉山彝人的血。

我的家乡有民谚说：摘不到瓜，拔蔓；逮不住雀儿，砸蛋。活画出那些邪恶的人凶残而又虚弱的无赖嘴脸。中国民间的邪恶的人和封建政权里邪恶的势力莫不如是。

人民终于进入和平发展的理想时代了。在这样荒僻的凉山修筑出漂亮的柏油公路，培育起如此美丽的森林，更不需赘记从奴隶制度下一步跨越到现代生活中的彝族人了。

美丽的彝海是一面天成的镜子。

1998年11月 蒲城

旦旦记趣

外孙取名旦旦，已经长到两岁半，常有“惊人”之语出口。每每听到，先是猝不及防，随之便捧腹，或忍不住而喷饭，且不能忘。

他很贪玩，几乎没有片刻的闲静，即使吃饭，仍然是手不闲脚亦不停。这时候，我便哄他说，你不好好吃饭，屁股上都没肉啦！顺手便捏一捏他的小屁股；再鼓励一番，好好吃肉，屁股上就长肉啦。他便真听了话，张口接住他妈妈递到嘴边的一块肉，刚嚼了两下，估计还未嚼碎，便急忙咽下，跑过来，背过身，撅起小屁股：“爷爷你再摸一下，看看长肉了没有？”在一家人的哄笑声中，我只好将错就错：“长了长了！再吃再长！”我亦忍不住笑，这才叫立竿见影！林彪要中国人学习“语录”要“立竿见影”，肯定没有想到这样的效果和这样幼稚的荒诞和荒谬！

旦旦吃了一块豆腐，蹦过来，转过身，又一次撅起小屁股，认真地说：“爷爷你再摸一下，看看屁股上长豆腐了没？”哇！一家人全部放下碗，停住筷子，笑得前仰后合。

然后就没完没了。一次连一次地重复如前的动作和姿势，一次比一次更加认真地问：

爷爷你再摸一下，屁股上长蘑菇了没？

爷爷你再摸一下，屁股上长木耳了没？

我已经再没劲儿笑了，无可奈何地对他说，旦旦的屁股成了副食超市了。

有一天，我要上班了，照例先和旦旦说再见，然后就走到门口。旦旦却急了，从沙发上跳下来，鞋也顾不得穿，光着脚跑过来，边跑边喊，爷爷别走爷爷别走。我就站住安慰他。他却盯着我喊：爷爷我送你。我也就释然，还以为他缠住我不让出门呢。我拉开门，他先蹦了出去，站在楼梯口，伸出一只小手来。我尚弄不明白他要做什么，就牵住他的手引他进门回屋。小家伙抽回手去，甩了几下，又伸到我面前。我女儿终于明白了，提示我说，他要跟你握手送别呢。我恍然醒悟，随即弯下腰伸出手去，攥住他的小手。他却当即跳着蹦着，另一只手像翅膀一样上下扇着扇着，嘴里连续丢出一串话来：“再见！拜拜！巴尼哈！那就这！”

我对于这突如其来的发挥毫无心理准备。旦旦表演完毕，向我摇摇手，又跑回屋里沙发上去了。我走下楼梯走过楼院走出住宅区的大门，心里还一直在想着。“再见”和再见的英语口语“拜拜”他早都会说了，自然是他爸爸妈妈教的。“巴尼哈”是维吾尔语“再见”的意思，肯定是他奶奶教给他的。我和老伴今年夏天去了一趟新疆，就学会了这么一句维吾尔语的“再见”。这些当然都不足为奇，奇就奇在“那就这”从何而来，谁教给他的？

想想也不难破译。家里来了人，说完了事，送客人出门，握手告别时我常习惯说“那就这”。意思是我们说过的事就这样了。不仅如此，打完电话时，我也习惯说一句：“那就这，再见。”这娃娃不知观察了多少次我的举动和说话，终于和我要来表演一回了。

从这天开始，这样的握手告别仪式就成为必不可缺的铁定的程序，我一天出几次门，就有几次这样的表演仪式，地点也必须是门外的楼梯口。有一次因事急我匆匆开门出去，走到楼下，从窗户里传出旦旦的哭声，哭声不仅大而强烈，且很悲伤。我感到了一种他被轻视了的伤心，我犹豫一下，还是反身回家，补上了那个握手告别的仪式。他的脸蛋上挂着泪珠，仍然把小手递到我手里，蹦着跳着，左胳膊还是小鸟翅膀一样上下扇动着，哽咽着却一字不漏地说完“再见……拜拜……巴尼哈……那就这”。

旦旦学骑小三轮车几乎无师自通，哪怕是车子可以擦轴而过的狭窄过道，他都可以骑过去。旦旦对我说，爷爷我到北京去了，说罢便踩动车轮钻进另一间房子去了。不一会，旦旦又转回来：爷爷我到上海去了。说罢又钻入第三间屋子。我的三室住房加上厨房，不时变换着中国十几个城市的名字，大都是我或家人出差去过的城市。因为去某个城市的时间和回来之后的一段日子，家人总是说那些城市的见闻和观察。旦旦便在谁也不留意他的时候记住了这些城市的名字，而且被他骑车一日几次地往返了。

旦旦睡觉了，家里便恢复了安静。他的一双小鞋却丢在我的房间的床边，我总是在看见那一双小鞋时忍不住怦然心动。我说不清什么原因，似乎也没有什么关于鞋的往事的参照或触发，反正看见那双脱下的小鞋时心里就怦然一动，甚至比看见他穿着鞋跑来跑去更加富于诱惑。

回到家，迎上前来打招呼的总是旦旦。这时候，无论什么顺心的事和烦恼的事甚至令人窝火的事，全都在旦旦的无序的话语里化解了。说宠辱皆忘说心静如水似乎都不大恰切，只是觉得自己就是一个爷爷了。

秋收过后，我带着旦旦回到老家乡村。今年夏天雨水好，秋粮得到了近来少有的好收成，村巷里的椿树槐树皂荚树树杈上，架着一串串剥光了皮壳的玉米棒子，橙黄鲜亮的。这虽然是我自小就看惯了的家乡的最亮丽最惹眼的风景，依然抑制不住对于丰收果实的那种诗意的感受。旦旦也激动起来，扬起两条小胳膊，睁大惊异的眼睛欢呼起来：啊呀！这么多的香蕉呀……

旦旦的惊人之举引来哄然大笑。他奶奶他妈妈和周围的乡亲都笑了。我笑过之后，便由不得感慨。这孩子生在城里，长在城里，两岁半了，第一次看见玉米棒子，把形状类似的香蕉就联想起来混淆一起了。我的三个儿女，包括旦旦的妈妈，都生长在这祖传的乡间老屋里，她们生在“文化大革命”的非常时期，也是我的生活最困窘的时期，香蕉无异于天国的神果，她们正好可能把香蕉当作玉米棒子。香蕉在现时的乡村，已经不是什么稀奇的水果，乡村小镇和马路边的小店散摊，都摆着一堆堆零售的香蕉，肯定不会有农村孩子再把它当作玉米棒子的笑话发生了。无论大人们怎样开心地调笑，旦旦却早跑到树下，仰起脸盯着树杈上的玉米棒子，跳着叫着要摘下“香蕉”来。

两岁半的旦旦，大约正处于人生的混沌状态，什么都要问，却什么也懂不了；什么都感觉新鲜，过眼之后便兴味索然；什么人的什么话都可以不听，一味固执于自己当时的兴趣；什么行动和动作都想去模仿，结果是毫不在意地又丢弃了。我可以看到一个人成长过程中两岁半这个年龄区段里的全部可爱，混沌的可爱。不必做任何意义上的猜想和推测，两岁半的混沌形态容不得意义，因为它本身属于无意义的自然形态。

这个年龄区段的混沌可能很短暂。因为在两岁的时候，旦旦还不是这样的形态。半岁的变化有点急骤，两岁时说不出的浑话和做不出

的行为动作，到两岁半时就都发生了。那么我就猜想，再过半岁呢？到了三岁时，该是从混沌状态走出来而踏入半混沌半清明的状态了吗？他在蜕去一半混沌的同时，还能保持那一份憨态的可爱吗？

猜测那混沌状态的可能消失，依依着那混沌状态的全部可爱，我便打算笔记下来。我的记性已经很差，无疑是老年的生理特征的显现。想到生命的衰落生命的勃兴从来都是这样的首尾接续着，我便泰然而乐。

1998年12月28日 雍村

自己卖书与自购盗本

一

已经是十余年前的事了，唯其刺激强烈印象也就深刻，所以至今不能忘记，这就是我第一次自家销售自己的书籍的事。

那年夏末初秋，关中地区依然暑热难耐。一天午后，一位长得颇为俊气的年轻人走进我在乡下祖居的屋院。他操着河南口音，自我介绍说是中原农民出版社的编辑，叫李明性，是来约稿的。

我很感动。我几乎同时产生了对不起人的内疚。我祖居的西蒋村离西安五十多华里，虽然有一路从市内通到郊区的公交车通达这里，而终点站却是设在一所军事院校的门前，离我家大约还有八华里的路程。我每次回作家协会开会或办私事，先骑自行车走过这八华里的土石公路，到军校门口熟人开设的商店或理发店放下自行车，然后再排队等待定时公交汽车进城。我自然会想到，李编辑在西安城里转车之后又乘上了通往我的家乡的远郊公共汽车，下车之后步行八华里才找到我家，其中的辛苦和真诚，就使我感动而又感佩了。

我在八十年代初调进陕西作家协会，搞专业创作。我当时的唯一感觉是我走到了人生的最佳位置，可以把心思和时间全部支配到我从少年时期就痴迷着的文学和创作上头来。我在欣慰和感到幸运的同时也感到了压力：如果我当了专业作家写不出作品怎么办？写不出像样儿的作品怎么办？因为作协专业创作的几个有限的名额是大家都关注着的。尤其令我不大自信的便是自己的底本，太浅太薄了。我没有机缘接受正规的大学中文训练，喜欢上文学之后所能阅读的大多是受着

极左文艺思想支配的东西，更不必说“文化大革命”中文艺的怪胎了。我现在所庆幸的一点，就是我比较清醒地把握了自己，在取得专业创作资格的同时，决定回归老家，回老家求得一方清静去读书。开放的中国也开放了文学的诸多禁区，外国优秀作家的杰作涌潮一般摆上了中国所有新华书店的书架，我得努力阅读。通过阅读真正的文学作品，排解以往关于文学的种种谬误，尽快地接近真正意义上的文学本身。另外，我想坐下来，静静地像吃饱了草料的牛一样卧在阴凉下，回嚼二十年的乡村生活。是的，从一九六二年走出学校进入社会到一九八二年调入陕西作家协会搞专业创作，其间整整二十年，我都在自己的家乡西安市郊区的基层工作，对中国农村和中国农民的了解和生活演变，与那些挂职体验生活的专职作家艺术家自然就有诸多的不同了。这二十年的工作经历和生活积累，需要回嚼，需要消化，我想只有回到远离城市喧嚣的乡间，才可以做好。住到乡下祖居之地几年之后，清静果然是清静了，不具实际意义纯属应酬的活动也避开了，文坛上不可或缺的是是非非唧唧咕咕也回避了，然而却使那些有重要事情甚至诚恳扶助的朋友为找我而吃了苦费了周折。面对从大老远的河南辗转来到我家的李明性，真是感动而又内疚不已。

李明性供职的中原农民出版社出一套“中国乡土小说”，第一批包括古华等作家的小说集已经面世。我是被选定的一个，或短篇或中篇或中、短篇混编都可以。这真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我的几个中篇（包括即将发表的）正好，可以编一本中篇小说集。我一一介绍了这几个中篇的内容，他均表示感兴趣。在我看来很不容易的出书的事，就这样意想不到地落到实处了。这是我的第三本短篇和中篇小说集，想来真是令人鼓舞。作品写出来能顺利发表又能顺利地结集出版，我觉得左邻右舍从墙头上弥漫到我家院子再灌进我的写作间的柴烟都是

清香的，摆摇着尾巴钻到院子里来觅食的村人的猪和鸡都尤其可爱了。

照例，我只能端给亲爱的慈善如上帝一般的李明性兄弟一碗面条。这是任何陌生的或熟识的朋友到我家来的无可选择的待遇。我那时的两百多块工资和额外的稿费收入，维系着一家六口人的生计，尤其是一个念着中学和大学的孩子，寄宿学校又增加了学杂费开销。每当进入城市，便能听到作家收入低微的颇能激起我共鸣的议论，而且有欧美以及原苏联作家令人咋舌的高收入作参照。然而回到我的依然贫穷着的乡间，我的两百多块的月薪和“外快”式的稿费，却成为农村人羡慕的优厚收入。我清醒地知道我生活在一个临界上，我只是一个中国陕西的尚不走红的作家，用任何国家的作家和左右的农民作参照，都不大现实。一碗调了油炒葱花的手工面条对我是适宜的，对我的新朋老友虽有点委屈，也只能是在心里道一声将就将就了。李明性大概也是真饿了，吃得还很顺畅。似乎他也是农家出身，也是以麦子和玉米习惯了肠胃的，无什么挑剔。

我坚持送他到军校门口的公交车站，用自行车驮着他去。我不忍心让他再走八华里乡村土石路去赶汽车。没有酒肉款待，力气却是足够富裕的，骑车带人的技术也可以自信。这样，我便在自行车后座上载着亲爱的李明性兄弟在我家通往军校车站的乡村土路上愉快地奔驰了。

返回的路上，我才可以舒悦地算计这本书的特殊的经济意义了。我即将动手草拟长篇小说《白鹿原》了，预计三年内完成草稿和正式稿。这就意味着三年时间里要停止中短篇小说的写作，补贴家用的“短平快”式的稿费收入也将断绝，两百多块的工资是很难支付孩子一年涨过一年的学费的。这本中篇小说集的如期（议定一九八八年）出版，

三千余元的稿费基本可以应付孩子的学费了（那时的学费尚没有今天那么高）。这样，我就可以稳稳地坐在小书屋里只操心白鹿原上的白鹿家族里那一群人的生计了。

二

当时怎么也不会想到，这件美事后来每况愈下，直到把我陷入一种尴尬一种羞愧的境地。

明性来信说，书已编好，没有发生任何麻烦，只是提议用其中一部中篇小说的篇名《四妹子》作为集子的名字。我自然表示同意。

明性来信说，已经通过终审，封面和装帧正在制作中。因为是套书，封面有一个规定的体例，每一本只是变换色彩和书名的位置。我也很乐意遵守套书的共同的体例，不成问题。

明性来信说，已经开始征订。由他们向全国的新华书店发征订单，等待各家书店反馈之后汇总，这当然需要较长时间的等待。那时候尽管市场经济的理论刚刚提出，但未进入实施和转换，只是在报章和礼堂的报告中传播和讨论。图书发行还是从省店到县店的传统的计划经济形式，图书出版和发行的第二渠道还没有结胎。从明性兄弟到我家来议定此事到现在，我稍微在意的便是这个征订数字。这个数字对我来说才是关键，不是考虑经济利益（那时尚无版税），而是数字过少则难以付印。

终于等到了明性兄弟报告征订数的信，大约九千五百册。但同时告知，社里以为这个数字太不理想，准备再下功夫做彩色单页征订。我当时以为这个数字大可满足了，因为比我前两本书的征订数都要

大。考虑到中原社的新打算，我表示同意，自然也希望印数能更大一些。于是又开始了关于征订的第二轮等待，期待一个好的消息。

明性兄弟再告知第二次征订数目的信读罢，我的心就收紧了，花了工夫费了钱财的彩色单页征订的结果，不仅没有期待的令人鼓舞的数字的上升，反而跌落到六千余册，真是令人不可思议的事。更被动的事也相继发生，第一次征订的九千余册的征订单合同因为超过了交货时间而作废，原定的一九八八年出版的计划也只好推移到来年。明性兄弟同时也告知了社里的应对措施，仍按第一次征订的九千余册的数字印刷，一九八九年出书。显然，这样的结果是谁也始料不及的。我在受挫的同时，更感动于中原农民出版社和责编明性兄弟的良苦用心。

中篇小说集《四妹子》，我的第三本书出版了。明性兄弟寄来了样书。在八十年代的总体印刷装帧的水平上，这本书的包装还是挺好的，绿色作底，整个封面上潜伏着“中国乡土文学”的若隐若现的字样。拿在手里，翻来覆去地看，有一种无限的欣慰。明性兄弟随之来信告知，由于图书市场的低迷和滞涩，社里面临亏本出书的风险，因之稿酬的付款将以书折价，共同分担风险和困难。我自然不会有意见，出版社赔钱为作者出书，已经是很难能的举措了，共同分担风险自然义不容辞。然而想到自己将要亲自销售自己写的书，一缕隐隐的尴尬就潜伏在心底了。

真正令人难堪的事是在书运来的时候。我和单位的司机从西安市邮电局一包一捆地把千余册书装上汽车拉回住宅楼下，再一包一捆地扛上四楼我的二室住宅房间。送走了司机，我一个人瞅着那一堆我的著作的时候，已经不再是尴尬和难堪，而是切切实实感到了难以启齿的羞愧了。我的出书的欣慰和面对劳动果实的幸福感全都没有了，甚

至不想也不敢多瞅那一堆书，便匆匆地慌乱地逃离作协住宅小院，乘坐远郊公交汽车回到乡下的祖居老屋。

当时的心境有点近乎惨烈的感觉，甚至摧毁了我对自己继续从事写作这样一种职业的最基本的自信。

这本《四妹子》里收集的几部中篇小说，有的获得过刊物年度奖，有的发表出来时引起过几多评论，有的被《中篇小说选刊》选载过，所有这些曾经使我心里舒服过的事，现在都变成飘零的树叶一样毫无生气可言了。你可以得奖，你可以被选载，你可以被评论，甚至可以在文坛闹得沸沸扬扬，然而，一进入图书市场，读者还是不买你的书。出了文学圈儿，陈忠实是何许人也？《四妹子》是什么等级的货色？读者的冷眼便从根本上把什么奖什么好评的话全都扫荡了。想想中国有十二亿人口，接受过中学文化教育的人起码该有三亿或五亿吧？一本《四妹子》仅仅印刷九千余册，还得作者自己去推销，出版社还要积压，这样的作品还得奖，还转载，还得到好评，还有什么意思呢？这样的作品还有什么力量能支撑着你继续炮制出来？

此前一年我刚刚获得了一级文学创作的职称，增加了工资，我也曾经欣慰过，现在都变成一种讽刺了。一级作家写的书没人买没人读，我还怎么津津于作家这个头衔呢？我的老师我的同学我的亲友我的过去一起工作的同事，每当不期而遇或有约相聚，每每都赞许我的毅力我对文学的追求终有所成，尤其是为母校为朋友甚至为祖先争了气争了光云云。我也曾经以谦虚言语作答时确实感受过一种被人尊重的自慰，不无得意。然而在读者面前，我现在才真切地感觉到了羞愧：这样的一级作家，还有什么力量能支撑着你在老师在同学在亲友在同事面前再表现不无得意的谦逊？

这样的尴尬和羞愧终于转入冷静。尴尬也罢，羞愧也罢，都是以前写的《四妹子》造成的我的心理威压，毕竟可以推诿为昨日的羞愧。更揪心的是手头正在写作着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白鹿原》，如果遭遇同样的结局，一面让出版社赔钱出书，一面再让我沿街叫卖，我可能不会再发生羞愧或尴尬，而是目下根本就无法再把这本书写完。道理太简单了，你写书写得劲头兴味十足，写出来没人买没人读，那么写这样的书还有什么意思？对于《白》书的写作便陷入了一种不自信的心态，这是从最初产生构思经过两年准备再到正在写作过程中的第一次灾难性的心理障碍。这样障碍重重的心绪是难以写出理想的文字的，便索性停住。

关于文学和小说创作的原始意义的反省和理解便自然开始了。

促进这种反省的还有一件关于父亲的往事，这时居然也从记忆的脑底浮上面来。那是一九八一年的春天，父亲查出了食道异物，托熟人住进医院而又被推辞出来。七十六岁的老人是经不住那一刀的，于是便接受一位中医治癌名家的救治，每周一次，每次提回七包中草药每天熬煎服用。为了每周一次的这种往返的方便，我把父亲接到我当时供职的灞桥文化馆里，出门不远便是公交汽车站，较之我的老家进城的距离缩短了大半。父亲对这种病似乎不像儿女们那样忧心忡忡，治病也治病，服药也听从医嘱按时按量服药，且表现得平静而坦然，不见慌乱，也不提出任何要求，每天到灞桥古镇上去散步去逛街，在那些刚刚兴起的个体手工业者的小摊儿前闲聊一把锄头一双大门上安装的铁门环的时价，他仍然兴致勃勃。有一天，他对我说，听说你现在写作都有些名气了，我还没看过哩，拿些给我看看。以往，我很少给父亲看我发表的小说特写之类，我就把我发表过的短篇小说，包括得过全国奖和报刊奖的都端给他了。那时候我刚刚编完平生的第一本

书，定名为《乡村》，正在陕西人民出版社邢良俊同志的案头审阅着哩，尚无一本属于我的单集拿给父亲。

两天过后，父亲把那些刊发有我的小说的杂志和报纸交给我，不好意思地说，你还是给我找几本古书吧！我当时心里就凉了半截，父亲并不喜欢我的小说又不好挫伤我写作的兴趣。我从文化馆图书馆给他借了一套《明史》，他就或坐或躺在床上戴着老花镜读起来，除了吃饭上厕所，就那么读着。我当时就回忆起从小见惯的这种姿势，雨天和冬天的不能下地干活儿的日子，父亲躺在祖居的土炕上，头下枕着一块他自己从灞河滩上捡回的方方正正的河卵石，读着书页残断的《说岳全传》《七侠五义》《三国演义》等古董。我当时把这种情况做了一个有利于自己的解释，父亲是一位读过私塾的能写一手毛笔字会打算盘的农民，自然与现代白话文的审美有距离了。我并不太在乎父亲对我小说的冷淡，有奖项和不少的评论支撑着我的自信，继续写着我的小说。现在，我在反省我的写作的时候，父亲的往事也形成一种威压了。

作家为什么要写小说？小说这种文学形式最初产生的诱因和最基本的功能是什么？小说是写给谁的？小说无论在中国在东方在西方国家，为什么历久而不衰，凭什么活着？

这显然是被逼入羞愧境地的我关于小说写作的内反省。从当年文坛上关于各种主义和流派的气氛活跃的争论里退入小说创作的原始意义的反省，就变得单纯明晰起来。作家之所以写作，就是要把自己关于现实和历史的体验用一种自以为美妙的艺术形式表述出来，与读者进行交流。这种体验从生活层面的体验进入到更深一层的生命层面的体验，而表述的形式也是由艺术的表现和艺术的体验显示着差异的。无论生活体验抑或生命体验，致命的是它的独特性，是唯独自己从现

实生活历史生活以及自身经历中所产生的独有的体验。独有的体验注定了体验的独特性和独到之处，从根本上就注定了某部（篇）作品的独立个性，自然不会重复别人也不会重复自己，这是中外古今作家的所有杰出著作的最根本的成因。

读者为什么要读小说？现代娱乐方式的丰富和便捷为什么不能取代小说？通俗的畅销书且不说它，意蕴深刻的雅文学中的小说杰作同样以几十万几百万发行销售，而且以多种文字翻译传播到各个国家和不同习性的民族之中。人们阅读小说，就是要享受电影电视所感受不到的文字的乐趣，通过阅读验证自己的生活体验，领悟自己尚未领悟到的属于作家的独到的体验。如果说作家的体验是肤浅的，甚至低于读者的体验，读者为什么要读这样的小说呢？读者的拒绝阅读，自然是作家的悲哀，因为作家写作的原本意义——与读者的交流无法完成。

作家靠独特的体验（生活的生命的和艺术的）创作小说。读者才是作品存活的土壤。

从这个意义上反省，我终于从《四妹子》自销的羞愧境地重新爬出，重新审视案头正在操作着的《白》稿，审视《白》的全部构思和表述形式，包括读者直观的文字。

我后来总是想到自销《四妹子》的羞愧造成的挫伤对促成我反省的决定性意义，尤其是在第一部长篇《白》书写作的关键时刻发生。我也想到了蒋子龙先生十余年前的一句名言：与其对反映生活的作家发怒，莫如去改造生活（大意）。我把子龙兄的博大的意蕴缩小到我的写作，与其抱怨不欣赏自己作品的读者水平太低，莫如反省自己到底给了读者什么货色。

三

《白》书终于完稿了。那是农历一九九一年腊月末的一天下午，写完以鹿子霖死亡作最后结局的句子，我似乎没有激动，站也没站起来，依然坐在那只小竹凳上，把钢笔顺手放到书桌和茶几兼用的小圆桌上，顿时陷入一种无知觉状态。久久，我从小竹凳上欠起身撅起屁股移坐到挨着后腰的沙发上，似乎有热泪涌出，可能为自己，也兼着为一个被我尽情诅咒嘲弄的生命的悲惨结束。一年后有记者采访问及画上最后一个句号时的感受，我说似乎从一个幽长的隧道摸着爬着走出来，刚走到洞口看见光亮时，竟然有一种忍受不住光明刺激的晕眩。这是真实的，准备了两年，写作了四年，六年里，我与一个世纪前的白鹿原上的男女走过漫长的历史隧道，把他们从母腹中接生出来，再一个个送进坟墓——以他们各自不同的告别世界的方式。白鹿原解放了，编造《白鹿原》故事的我也终于解放了。

白鹿原人四十余年前欢庆解放的方式是集会，放炮放铳子敲锣打鼓扭秧歌；我的庆祝方式便是尽快离开这间囚牢似的小书房，到灞河边上去舒展一下腰腿。我走出屋院下了塄坎到了河滩里。几年来，我无以数计有多少次沿着这条路走向灞河，今日往上游走，明日朝下游转，风雨霜雪，四季转换，都在我眼里一轮又一轮地变幻着，从来也没有这个冬天的傍晚的散步令人轻松舒悦。冬季枯水季节的灞河，沙滩尤为开阔，没有技能的那一类笨拙的农民只好靠下苦力挣钱，撑起一张铁丝编织的罗网，过滤建筑用的沙石出售给那些建筑单位。我从他们旁边走过，打一声招呼，有的许是因为这种单调而费力的劳动太寂寞，故意对我说几句打诨的话。我无法告诉他们，我刚刚干完了一件活儿，那活儿颇类似这种过滤沙石的劳动，一串串从罗网上滚落下来的石子，恰如我写在稿纸上的一行行方块汉字。

我一直沿着河堤走出十华里，那儿是河堤的堤首工程，河水拐了一个大弯，直抵南岸的坡根，路就绝了。冬天依然有小巧的水鸟在沙滩上嬉戏。我转着走着，看夜幕一道一道笼罩下来。一天又尽了，无论如何在我是一个难以忘记的日子。返回的路上，我总觉得无以抒发心中的那种解脱负累的愉快，在点着一支烟的同时也点着了脚下的茅草。河堤上长着绿毡似的茅草，干旱的冬季里见火即燃。河风从西边吹过来，欢跃的火焰就顺着河堤向东窜去，蔚为壮观。我在看着那忽起忽落忽高忽低的自由恣肆的火焰的时候，胸膛里终于鼓动起来了。

回到家中，我打开了屋子里所有的电灯，把一只大灯泡挂到小院的一棵花树枝杈上；打开了那台一直陪伴着我的小录音机，放开了秦腔名家的唱段，我开始为自己煮一碗面条。

总算结束了，无论成功与失败。成功的结束自然是我的期待，值得以这样的方式庆祝；失败的结束，也值得庆祝，因为毕竟是结束了。无论最后的结局如何，完结了就该这么放一把野火听几段秦腔喝几盅西凤酒吃一碗面条了，自己为自己六年的行程的完结庆祝一回。

说不关心《白》的结果是虚伪的，是酸溜溜的清高。前头所说的那种心态是短暂的，是刚刚走出隧道刚刚卸下负累刚刚放下钢笔的感觉，短暂到只有半个下午和一个夜晚。第二天早晨起来就开始担心这部书出版的可能性，以及出版以后的读者反应或根本出版不了当如何过后半生的日子。

其实在接近写完的时候就已经想着这个结局了。妻子曾经问："如果出版不了怎么办？"我毫不含糊地说："我来养鸡。"

如果不是因为非文学因素的制约，而纯粹是出于文学本身的审视而不够资格出版，我就打算中止写作这种职业。我想我能办好一个养鸡场，即使最科学的养鸡技术学起来绝不会比写小说更复杂。我想我出售一筐一筐鸡蛋的感觉，肯定要比自己销售《四妹子》一书更坦然更自信，起码不会陷入尴尬和羞愧。我已经挂上五十岁了，到这个年龄写出的小说还令出版社作难又赔钱，还得自个儿去推销，难道真要如范进一般迂腐到发疯吗？我想把文学只是当作一种爱好，当然也不是说一声丢开就可以丢开的，毕竟追求了大半生了。但得把位置调换一下，把专业写作重新摆到业余的位置上来，把养鸡摆到主业的首要位置。在一片此起彼伏的母鸡下蛋的叫鸣声中，我可以继续欣赏艾特玛托夫、海明威、马尔克斯们的温柔的情怀和优美的文字。况且，也该改变一下家庭的经济状况了，创作那一碗饭因为自身能力不济而吃不饱，该当找到可以吃饱的另一碗饭，这是很简单的道理。鸡族里头偶有一种只会下软蛋的鸡，也许是缺钙，也许是这一只鸡自身的生理缺陷，生下的蛋没有硬壳，只有一层薄薄的软皮包着蛋白蛋黄。这种蛋无法上市，只能自家食用。我销《四妹子》的最道不出口的感受，就把自己归于类似于这种鸡的作家了。

我如约给人民文学出版社何启治兄写了信，报告长篇已经写完，询问书稿是邮寄我送还是他取？回信说将派人来取稿。高贤均和洪清波两位按约定的时间到达西安。我在把那一摞装订整齐的手稿交给他们时，鼻腔有点发酸，涌到口边的一句话还是咽了回去。那句话是：我连生命都交给你们了。想到这话可能有副作用，会使他们感到压力，也想到作品毕竟不是靠吃了多少苦费了多少时辰而判断优劣的。之后我便进入一种闲适的等待的日子。按照惯例，长篇出版需经过三级审稿，这部五十万字的书稿，单是阅读也需两个月。既然我的打算

和主意已经确定，审阅结果只是决定我的两手准备中的一种，所以还可以说处之泰然。

意料不及的是，从交出稿件到收到高贤均先生的第一封表态的信，刚刚二十天。信里说到他和洪清波离开西安赴四川的火车上和在四川开会的闲暇里先后读完了书稿，回到北京的当晚便给我写了这封信。恕我略去高贤均信中关于《白》稿阅读评价的内容，而我的第一反应却是：我可以不去养鸡了，上帝！

《白》文分两期在《当代》连载。一九九二年年末的第六期刊出时，我到邻近的一家邮电局去购买，售书的人说已经售完本期《当代》。这家邮局每期只定售十本，这期是卖得最快的。我赶到市中心的邮电大楼去，那里每期定售四十本的《当代》也已告罄。售书的人说，这期发了一篇《白鹿原》，卖得特快，而且许多人已经预订了下一期刊物。她拿出一页登记着预订者名字的纸条，问我要不要登记预订。我看了那纸条上预订者的名字和单位，没有我认识的文学圈里的熟人，也几乎没有纯文学单位里的人。我大为欣慰，《白》书将从此进入真正的普通读者之中，《四妹子》自销的尴尬和羞愧的阴影现在才开始被扫除被驱散。

此前，《白》文在《当代》面世前，我在《陕西日报》文艺部主任田长山家里共同炮制一篇消息稿，即告诉尚关注我的长篇的朋友一个准确的消息。那篇书讯式的消息稿不足一百字，我们两人抠来敲去弄了一个小时，不要自吹亦不敢溢美，甚至连创作的艰难过程也索性不提，内容简介简单到无法概括的地步。最终就只是一则书讯，平实简约的书讯，目的就是告知《白》文发表和出版的时间。我唯一自己出马为自己张扬的就是这一则书讯，自信不属于过火的炒作和运筹。

《白》书面世后的评论恕我不提。

《白》书于一九九三年七月在西安首次发行销售，十日后盗版书就摆在书摊报亭里。人民文学出版社却是与我一样估计不足，初版征订约一万五千册，已经大为鼓舞，现在才手忙脚乱地加印，从一九九三年六月第一次印刷到十一月连印七次，最终被各种盗本堵住了销售渠道。更具讽刺意味的是，一年后的秋天，我到汉中参加陕西作协举办的“散文笔会”期间，汉中的朋友说市里某几位领导想要我的签名书。我在汉中的大街小巷转了半天，终于在一间私营小书店里找到仅存的两本《白》书，而且是我从来未见过的分作上、下册的盗版本。我买了下来，就在空白处填写上了购买盗版本的自我调侃的话。此前我是坚决拒绝在盗版本上签名的，使许多读者朋友扫兴。随后我就开了此禁，盗版本照签不误。读者是无辜的，我是无能为力的。我倒有了阿Q式的自慰，总比自销《四妹子》心里要好受些。

更具讽刺意味的一件事发生在一九九六年九月。江苏常州市新华书店约我去签名售书，同去的还有张抗抗，她的《爱情画廊》正销得火爆。我九时到书店，门外已排起一列长队。签名过程中，有人把一本《四妹子》递到我的眼前。我拿起一看，封面上有一个古典式的传统美女的头像，版权页上的各条各款均是中原农民出版社的原版。我起初以为是李明性兄弟将此书重版再印了，细细翻阅之后就有了疑问，印刷和装帧十分粗劣，便怀疑为盗版本，我问那位读者从何处购得此书，他说就是我坐着签名的书店。我不再问，心平气和地为他签了名，我向邀我来常州的市新华书店老板老陈问及此事，他大为惊讶，不知此书为盗本。我说我也不知。我向老陈讨了两本作为纪念品带回西安。随之给明性兄弟写信询问，他说未做再版，亦不知《四妹子》有盗版本行世。

我终于从尴尬和羞愧的阴影走了出来。

1999年1月13日 丈八沟

俏了西安

一

西安俏了。俏得让那些老西安人常常发出喟叹：噢、噢、噢，这条大街就是早先那个鸡肠子似的巷子嘛！啥时候修得这么宽敞……人们在新的城市格局的每一个路口或每一座新的建筑物面前，总是忍不住钩沉昨天的记忆，这种喟叹便浸润着生活进步社会变迁的历史性韵味了。

二

急骤的变化仅仅是十余年间的事。

我是八十年代初从灞桥区调入省作家协会的，作协所在的建国路还算得上一条比较宽大的街道，那时候隔五六分钟才过一辆卡车或小车，行人可以悠闲地在街道上晃荡，孩子在马路中间嬉戏，甚至有人在街道中间打羽毛球。而今要横过马路需得左顾右盼以至焦灼等待，几乎首尾相接的机动车从早一直流到深夜。

整条建国路上只有一家食堂，在西南十字路街口，市商业系统下属的一家国营食堂，卖素面和肉面，还卖羊血泡馍，啤酒是散装的，两毛钱一碗，碗是粗瓷黄釉的大号老碗。已是专业作家的我仍住在乡下，每逢奉召回作协开会，中午便在这里花两毛钱买一碗羊血一毛钱买两个烧饼，奢侈时再加一碗啤酒，五毛钱下了一回馆子，心满而意足。那时候的工资是五六十块钱，收入和消费正好合适。几年间，这条街上高档酒店和风味小吃店竞相开张，门面也越换越新，灯光亦越

换越亮，价钱自然也是越换越高，然而食客仍然涌现不断。那家卖羊血泡馍的低矮的食堂作坊早已被高楼所代替，刘家兄弟开了家令人忍不住冒险欲望的蝎子酒宴。民航售票处、证券交易厅门前，如涨潮和退潮的人群标示着股票行情和股民的忧欢……无论如何，在我喝着大碗啤酒嚼着大碗羊血泡馍的那几年里，无法料知蝎子会作为美味佳馔摆上餐桌，更无法料知股票会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牵扯人们的忧欢。

如果再沿着记忆之河溯流而上，我记得七十年代中期以前的西安四条大街上，骡马拉的大车畅行其道，仅仅只要求每匹牲畜的屁股下设置一只接纳粪便的布兜，而尿是可以任意撒的。再追溯到五十年代中期，我在东关读初中的头年冬天，每到傍晚，铺天盖地的乌鸦在天空盘旋，凄丧的叫声令人毛骨悚然，蹲在操场上晚餐的学生们，常常会被从天而降的排泄物所击中，或头上或身上或饭碗菜碟里。这些乌鸦夜栖在东门城楼层叠的木檐下，天明又飞到城外去觅食了。那时候的东门城楼漆彩剥蚀，塌檐断瓦，像一个风烛残年衣履残破的老人。

我现在的住地就在东门内，看着这门楼重新抖出威风重新焕发新姿重新现出昔日（始建时）的雍容和气度，往往忍住感慨，十余年间西安人做了多少大事，五十年本来又应该做成多少大事，而“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又破坏了西安人的多少好事耽搁了多少大事！正在发展的生活和已经逝去的历史才是透视一切的镜子。

三

大约是十余年前，我在西安出的一家报纸上看到过一篇北京一位作家写的西安印象的文章，有一个令我吃惊的观点。看到西安端南正北端东正西以钟楼为中心的四条大街，以及西安“井”字形的街路布局，便大发感慨，说端直的道路客观上造成了西安人的思维的简单，

直戳端出不会拐弯亦不会多向思维，才是西安包括经济、文化等诸方面滞后的原因。

就我有限的阅历，中国的城市凡是建筑在平原上的，无论古都无论新城，大都是井字交叉的大街或小巷，似乎没有哪个城市的创始者为了表示思维的多维性和多向性，故意把大街或巷道多拐几道弯儿。贵阳、重庆那样的山城受地貌的限制自不能作佐证，上海和天津的弯曲街路多是租界地里的洋人们按照自己的势力范围制造的畸形，是中国人的不大愉快的一块旧疤，恐怕也很难牵强到多向思维这个话题上头来。

我便和朋友调侃，以西安端直的街路而判定西安人属端直思维的人，其思维的简单和端直正好应该和西安的街道一样。

西安保存下来全国唯一一圈完整的古城墙不仅对西安，对于这个泱泱大国的古代文明，正好留下一个完整的标志，一道不可复原复制的古代城池的标本，弥足珍贵。开放的西安获得了自己的发展，终于有财力修复残缺破损的城墙，终于完成了城墙的点亮工程。入夜，美丽的古城的轮廓可以使我们笑慰古人，亦可骄傲地指点给海内外的朋友。

又是前几年，我在一家报纸上看到一篇嘲讽西安人的文章，说西安人思想保守观念落后的象征便是这城墙，城墙是一个封闭的思想象征。我在此便先抬杠，秦岭山区和边疆草原，没有任何墙作为封闭的障碍，事实是那里至今仍然是扶贫脱贫的最落后的地区。那里到处都是弯曲的小路，而人们的思维却看不到多维与多向。

在开放的中国和中国的西安，在即将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临界线上，一座明代的古城墙怎么能封闭现代西安人的思维和西安人的观念？现代高科技现代网络信息现代新的知识，难道依靠马车和云梯翻越城墙闯入城门洞么?

作为一个西安市民，我真是感激那些为保存西安城墙的完整和完美而表现出远见卓识的人们，这是一种悠长的历史和深沉的文化意识。我也同时期望着，这座曾经在国家和民族的漫长的历史长河中的独有的辉煌，在现代西安人的手里得以重现。

1999年9月3日 雍村

自信是金

书院门的古文化一条街，是西安古城里一个别样风姿的亮点。书画墨客诗家骚人情钟于此自不必说，那些对中国古文化包括民俗建筑兴趣高高的域外男女，看了兵马俑登了乾陵膜拜了法门寺游转了古城墙，然后告别伟大的神和伟大的死人而遁入民间，到古文化一条街的书院门去逛达。这里的每一条巷道每一扇门窗及至铺路的青石板，都弥漫着很久远年代中国人的民间烟火，无论国人无论洋人，其实大家都是靠民间烟火维系生命启迪智慧滋养创造能力的。

自信是金子的王勇超就在这条街上占有一坨风水宝地。卓尔不群的“洗砚园”又是这条街的一个亮点。

多年以前，我游览这条刚刚复建的古文化一条街时，一幢幢风姿各异的房子令人流连忘返，一副副意蕴千秋笔墨骇俗的对联令人陶醉，尤其是一家一店的名称匾牌更令人不由自主地琢磨主人的情性和意趣。走到三岔巷道时，看见“洗砚园”三个字的匾牌，便不能移步，驻足良久，真是觉得这个名字取得不俗。看看署名，竟是毛锜手笔墨迹。毛锜是陕西当代一位博古通今的大家，如果论起知识装备构成来，他应该是属于学者型的作家，是王蒙多年前倡导的“作家应该学者化”的一个令我钦佩的作家。毛锜的字是文人字，不是那些把汉字写到似龙类蛇的专业书法家的字，这恰恰是我更感兴趣的那些古代和现代文学大家们手稿上的字，即把汉字当字写的那些文人的字。我那时候尚不认识这幢气派的四层建筑物的主人王勇超，只是感佩他找毛锜取名“洗砚园”并题写斋名真是有眼识得金镶玉，找对了门子。

多年以后，我和“洗砚园”的主人王勇超有一次交谈。他是长安郭杜人，五岁时竟然对母亲端给他的一碗面条惊诧地问：这是什么饭?这么好吃！什么时候能天天吃面条呢？这个五岁孩子的问题听来令人心酸，甚至令今天的同龄孩子以为是天方夜谭。其实稍有点年岁的陕西人，尤其是以面食为首选食物的关中人，起码在近一个世纪以来的生存理想就是五岁的王勇超的理想，即：什么时候能盼到天天吃白面面条白面馍馍的天堂般的生活呢？我们曾经在一段很长的时间里嘲笑过赫鲁晓夫对共产主义的注释是“土豆烧牛肉”的名言。其实我们自己的百姓只有死了牛方可以分得一绺干瘦如柴的牛肉，土豆在山区是作为主粮代替麦子和大米来折算供给定量的；我们的百姓根本不敢企望什么牛肉，只是企盼天天能吃白面馍馍或白面面条就完全遂愿了；我们吃着土豆杂粮甚至饿着肚子嘲笑诅咒赫鲁晓夫亵渎了共产主义的崇高和美好，我们的嘲笑也就显出了虚伪的空洞。邓小平以果决和求实结束了虚伪造成的中国人生命和精神世界的那个可怕的空洞，白面馍馍和白面面条早已是关中人的基本食物了。五岁王勇超的生存理想由邓小平一句话就实现了。

然而，争取吃白面面条吃白面馍馍的欲望却更强烈了。他从长安大地的赤兰桥村走进了西安，在古香古色的古文化一条街上撑起来一幢浸洇着墨香的“洗砚园”。这碗“白面面条”可是做得够长的了，这个“白面馍馍”蒸得可是够大的了。无须备述他从一个生产队长到一个三家公司老板的创业过程，相信有传记作家或王勇超自己来完成自传的。我只是对这个从长安大地闯进西安的青年农民表示庆祝。许是我自己也是从古长安大地走进西安的乡村人，也是到城里寻找物质和精神的“白面面条”和“白面馍馍”的一个不想安贫乐道者，因此我对一切从乡村走进城市的人都会生出心理本能的共鸣。

中国的城市本身就是没有得到充分发育的城市，尤其是共和国成立以前的城市，不过是比乡村人口更集中一些的庄或村罢了。然而城市对乡村的居高临下的习惯性意识足以使任何心强气傲的庄稼人变成“庄稼娃”。这种更多地表现为市民乃至市侩意识的东西一直延续下来。随着社会主义低级阶段较长时期的存在形态，随着城市文明较之乡村更快的发展，还会延续下去。一个乡村人要实现他的人生理想和抱负就更为艰辛一层，比如在乡村读书的孩子，比如从乡村创业成功进入城市占有一坨地盘的企业家，通常都只能是更艰辛于城里人。然而令人欣慰的是，许多富于智慧也富于自信的乡村青年，走进了地方和中央的高等院校，随后便进入政府、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和实业界各个领域，成为国家和民族复兴的栋梁之材。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在整个地球上，中国实际也就是一个最大的村庄。进入欧美那些发达国家，一个个中国人的步态和行为其实总使人联想到进入大观园的刘姥姥。然而关起国门来，城里人立即就显出对乡里人的优越来，官更像官，大款更像财主，城里人绝不混同乡里人。人和人的本质性差异，其实并不在他落生在锦帷里或土炕上，而是在于他的智慧和品质。毛泽东的祖宗是乡村人，他的智慧自不必赘述；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原是一位农场主，投犁从戎参加独立战争并成为三军司令，论其祖先还是一个乡村人，仅仅只是两百多年前的事。

乡村青年王勇超以其智慧和诚实干成了一番事业，立即进入大学去自修，先修理工大学，再修中文。他进理工大学的目的是针对自己日渐壮大的建筑实体发展的需要，必须自身提升成为内行；他修中文却是一种兴趣使然。技术和文化含量的提升，人就发生心理和气质的变化了，我们更不可能用一般的城里人或乡村人的陈腐意识去说长论短了，这才是现代中国人更应看重的治本的东西。

毛锜先生取“洗砚园”之名，有历史典故在：民间出身的画家王冕有“我家洗砚池头树”的佳句；《格古要论》中有“凡砚须日涤之”的规矩讲究。可见毛锜先生肚里装了多少老古董新学问，取下这样一个雅而绝俗的斋名。作家徐剑铭感于此名而敏于诗情，推及深层发问：“凡砚须日涤之，那么人呢？人不也应日日洗涤自己的灵魂，以纯洁的灵魂描画自己多彩的人生么？”我再据此反诘，不洗不洁的灵魂又怎能描绘出洁美的人生图景?

王勇超在与我交谈中说过一句话：我相信我是一块金子。这样的话着实令我为之一震。我几十年里自然遇见过不少自信的人，骄傲以至狂妄的人，然而目标为真金的人尚未碰见。我又想了，其实自信和骄傲以至狂妄是有本质区别的，这是人的气质中泾渭分明的形态，无须再论骄傲和狂妄的涵盖和特征。勇超自信是金却显示的是自信。

他向我表白，他靠诚实起家靠诚实创业，主要是靠诚实处人处世，以诚实接活干活，赢得拥挤的建筑市场的一条生路；以诚实既取得主家的信任，也得到了他的帮手乃至工人的信赖。在当今已经复杂化了的社会生活中，许多人类共筑的道德准则和生活准则开始被颠覆，包括诚实做人做事这样的人生信条。勇超自信是金主要指向这一点。

然而单靠诚实也未必能成大气候，得有智慧。有智慧的人，再兼备诚实的品德，智慧便可能超出常规得到极限性发挥。同样有智慧而缺失了诚实修养的人，一个可能是害人，乃至祸国殃民，如古今中外的佞臣奸雄，也都是很有智慧的人；另一个可能就是害己，不诚实的品行导致智慧的浪费，事难成大或一事无成。

自信是金。可贵的是这个自信，可贵的是对“金”的品格的坚守，是对时下某些人类美德颠覆的再颠覆。然而从另一面——人的品质锻铸——自信的素质才是人立身的中柱，是金。

自信才是金。

1999年4月9日 丈八沟

家之脉

女儿和女婿在墙壁上贴着几张识字图画，不满三岁的小外孙按图索文，给我表演：白菜、茄子、汽车、火车、解放军、农民……

一九五〇年春节过后的一天晚上，在那盏祖传的清油灯下，父亲把一支毛笔和一沓黄色仿纸交到我手里：你明日早起去上学。我拔掉竹筒笔帽儿，是一撮黑里透黄的动物毛做成的笔头。父亲又说：你跟你哥合用一只砚台。

我的三个孩子的上学日，是我们家的庆典日。在我看来，孩子走进学校的第一步，认识的第一个字，用铅笔写成的汉字第一画，才是孩子生命中光明的开启。他们从这一刻开始告别黑暗，走向智慧人类的途程。

我们家木楼上有一只破旧的大木箱，乱扔着一堆书。我看着那些发黄的纸页和一行行栗子大的字问父亲，是你读过的书吗？父亲说是他读过的，随之加重语气解释说，那是你爷爷用毛笔抄写的。我大为惊讶，原以为是石印的，毛笔字怎么会写到和我的课本上的字一样规矩呢？父亲说，你爷爷是先生，当先生先得写好字，字是人的门脸。在我之前已谢世的爷爷会写一手好字，我最初的崇拜产生了。

父亲的毛笔字显然比不得爷爷，然而父亲会写字。大年三十的后晌，村人夹着一卷红纸走进院来，父亲磨墨、裁纸，为乡亲写好一副副新春对联，摊在明厅里的地上晾干。我瞅着那些大字不识一个的村人围观父亲舞笔弄墨的情景，隐隐感到了一种难以言说的自豪。

多年以后，我从城市躲回祖居的老屋，在准备和写作《白鹿原》的六年时间里，每到春节的前一天后晌，为村人继续写迎春对联。每当造房上大梁或办婚丧大事，村人就来找我写对联。这当儿我就想起父亲写春联的情景，也想到爷爷手抄给父亲的那一厚册课本。

我的儿女都读过大学，学历比我高了，更比我的父亲和爷爷高了（他们都没有任何文凭，我仅有高中毕业）。然而儿女唯一不及父辈和爷辈的便是写字，他们一律提不起毛笔来。村人们再不会夹着红纸走进我家屋院了。

礼拜五晚上一场大雪，足足下了一尺厚。第二天上课心里都在发慌，怎么回家去背馍呢？五十余里路程，步行，我十三岁。最后一节课上完，我走出教室门时就愣住了，父亲披一身一头的雪迎着我走过来，肩头扛着一口袋馍馍，笑吟吟地说：我给你把干粮送来了，这个星期你不要回家了，你走不动，雪太厚了……

二女儿因为误读俄语，补习只好赶到高陵县一所开设俄语班的中学去。每到周日下午，我用自行车带着女儿走七八里土路赶到汽车站，一同乘公共汽车到西安东郊的纺织城，再换乘通高陵县的公共汽车，看着女儿坐好位子随车而去，我再原路返回蒋村——正在写作《白》书的祖屋。我没有劳累的感觉，反而感觉到了时代的进步和生活的幸福，比我父亲冒雪步行五十里为我送干粮方便得多了。

我不止一次劝告女儿和女婿，别太着急了，孩子三岁还不到，你教他认什么字嘛！他现在就应该吃饭、玩耍甚至捣蛋，才符合天性。女儿和女婿便说现在人对孩子智商如何如何开发，及至胎儿。我便把我赌上去：你爸爸八岁才上学识字，现在不光写小说当作家，写毛笔字偶尔还赚点润笔费哩！

父亲是一位地道的农民，比村子里的农民多了会写字会打算盘的本事，在下雨天不能下地劳作的空闲里，躺在祖屋的炕上读古典小说和秦腔戏本。他注重孩子念书学文化，他卖粮卖树卖柴，供给我和哥哥读中学，至今依然在家乡传为佳话。

我供给三个孩子上学的过程虽然也颇不轻松，然而比父亲当年的艰难却相去甚远。从私塾先生爷爷到我的孙儿这五代人中，父亲是最艰难的。他已经没有了私塾先生爷爷的地位和经济，而且作为一个农民也失去了对土地和牲畜的创造权利，而且心强气盛地要拼死供给两个儿子读书。他的耐劳他的勤俭他的耿直和左邻右舍的村人并无多大差别，他的文化意识才是我们家里最可称道的东西，却绝非书香门第之类。

这才是我们家几代人传承不断的脉。

1999年8月

拔出话筒

日前参加一个纯粹属于民间举办的会议，看见了精彩的一幕，倒是与这个会议本来的宗旨无关。

民间性质的会议也仿效官办会议会场的格局，下设听众席，上设主席台。主席台是由一排铺着白色布单的条桌构成的。简洁庄重，自然是为出席本次会议的各方要人设置的，这是我们耳濡目染司空见惯且已渗透到深层意识中的习惯性格局了。然而今天却没有邀请什么“长”去坐主席台，那一排铺着白色布单的桌子和椅子就空着闲着，倒是体现了民办会议的某些轻松的气氛。是的，主席台上一旦缺失了我们习惯接受的那一排面对着台下的脸孔，顿然觉得心头舒畅了活泛了。于是，每一位被安排好了顺序去讲话的人，便得从台下走到台上，发表完演讲再走下主席台回归到听众席上。我感觉挺好。

主席台的桌子上摆置着一只带支架的话筒，支架的把儿很短，这个高度显然考虑到主席台上坐着讲话的人的身高。坐着做报告也是惯例，坐着作长篇报告腰不疼。

被会议的主持者传唤上台的是一位西装革履的男士。他走到主席台的桌子后边，屁股下边就是空闲着的椅子，却没有坐下去，站着对着那只话筒开始了演讲。于是就发生了小小的矛盾，他站在那里讲话，那个话筒就显得太低了。我看见这位颇有气魄的男士弯下腰来，把嘴巴凑到离话筒尽可能近的尺寸；弯下腰的同时自然免不了要弓起背来，屁股也就撅起来了；那挺括的西装就变得皱褶了，熨帖在胸脯上的领带也就散松开来了。

我坐在台下听他讲话，看他讲话时的这种姿势，就替他委屈，更替他着急，心里甚至三番五次呼吁，坐下来讲嘛，就像所有领导人那样坐着讲嘛！然而他仍然那么弯腰弓背地站着讲着。我简直痛恨起那个话筒来，一个设置过低的话筒，居然把一个仪表堂堂风度不俗的男士扭成了一只腰弯背驼的活虾。

又一位发言者被请上主席台了，她是我所熟识的《劳动早报》副总编秋乡女士。她轻松地走上台，红装黑裙，从主席台的桌子前边走上去，直奔那个话筒。从那个低矮的支架上拔下话筒，转过身来，左手抻了抻那连接着话筒的皮线，右手攥着话筒侃侃而谈起来，自由活泼而不失端庄。

我不由得长舒一口气，替那位男士窝在心里的别扭一瞬间全都散释掉了。我几乎要为秋乡的举动而欢呼起来，因为这举动让我感受到一种小小的解放的痛快。是的，在那位男士把自己扭成一只活虾而屈就于那只话筒的时候，我虽感到了别扭，却仅仅只想呼吁他坐下来。坐下来的姿势依然是习惯性的主席台上的人讲话的姿势，仍然是顺性的定式的习惯性思维。秋乡的举动却是逆性的动势的主动性思维，拔下话筒的那一瞬，就把坐着椅子双臂扶着桌子讲话的习惯性行为颠覆了，更把那位男士屈从于物的姿势彻底纠正过来了。

面对一只话筒，一位男士和一位女士各自做出了截然相反的选择。男士屈就于物，不惜把堂堂七尺之躯扭曲成一只腰弯背弓的活虾；女士却拔出话筒，让物就服于人。这是一个小小的生活哲理。

生活中，人被物所挤、所累、所压，而使人屈就于物的事，何止于这一例小小的话筒！甚或人自己有意设置的那个主席台，以及我们见过的无以数计的种种场合里的主席台，其实未必都是非设不可的。

设了，也是促人屈就的（有坐主席台成癖者例外），其实际效应往往与设置者和就座者的愿望相去甚远。

无论如何，我却因此而深得启迪，在可能发生逼人就服于物的场面时，该当增加一股如秋乡女士的活气与勇气，拔出那个话筒来。

1999年10月19日 礼泉

骆驼刺

——车过柴达木之一

列车是在沉沉夜幕中进入柴达木的。我浑然不察不觉，已经置身于地理课本上用沙点标示着的这片大戈壁了。

早晨起来，睁开眼睛就感受到裹入柴达木巨大的无边无沿的苍茫与苍凉之中了。无论把眼光投向哪里，火车刚刚驶过的来处和正在奔去的前方，车轮下路轨所枕伏的一绺直到目力所及的远处，灰青色的灰白色的沙砾无穷无尽。沙漠的颜色变化着，一会儿是望不透的青灰色，一会儿又转换成灰白色的了，无论怎么变换，依然是构成主旋律的单调。在感受宽阔、浩瀚、博大、雄奇的深层，柴达木投射给人心理的苍茫和苍凉同样是切实的。偌大的火车在柴达木的腹地上奔驰，恰如一只节状的油蜈蚣在缓缓地蠕动，总是让人产生没有指望走出的疑虑……

生命在这里呈现出异常简单的景象。整个世界简单到只剩下一种两种绿色植物，骆驼刺和芨芨草。一株一株的骆驼刺，形似球状，零零散散撒落在沙砾上，没有簇聚，单株单个，据地自生。看不到印象中的森林和草地上那种或互相拥挤互相缠绕的复杂，或勾肩搭背倚杆爬高的姿势，或交头接耳唾沫相溅的喧哗。干旱和寒冷的严酷，使一切绿色生命望而却步，只有骆驼刺以最简单的形式生存下来，形成柴达木的唯一点缀。

骆驼刺，短而又细的枝，针状的叶，无媚无娇，仅仅只是一个绿色的生命体。骆驼刺，开一种细小到几乎看不出的花，和孕育它的沙

地一样的颜色，也应是花中最不起眼的色彩了。然而它的功能却与任何花毫不逊色，授粉，结籽，在沉静的等待中迎接雨水，便发芽了。

远处是昆仑山，寸绿不见，如铁打钢铸似的摆成一道屏障。白如棉絮的云团，在或高耸或低缓的峰巅和峰谷间缠绵。

一条泥浆似的河出现了。名曰饮马河，再恰切不过的好名字，却使人感到徒具虚名。赭红色的水，几乎看不见流动，细小到无法与河的概念联系起来，充其量只算得小河沟罢了。然而毕竟有水，便是理直气壮的河了。有水，不管赭红色也罢，浑如泥浆也罢，就能孕育繁衍出绿色的生命，各色水草，就围绕着水的走向蓬勃起来，蜿蜒出荒漠戈壁上一道惹人眼热的绿色。自然，拥挤和缠绕、簇聚和绣集、勾肩搭背和攀爬倚仗便如任何草地一样发生了，不可避免地形成了。然而，在苍茫而又苍凉的柴达木，饮马河毕竟流出来这一缕生动和一缕活泼，一缕让人遏制不住想要拥抱的俗世绿色。

毕竟使人难忘的还是骆驼刺。在柴达木，在毫不留情地虐杀一切绿色生命的干旱、暴风和严寒里，只有骆驼刺存活下来了。骆驼刺接受了严酷，承受了严酷，适应了严酷，保持而且繁衍着庞大的家庭，便可骄傲于所有的严酷，成为点缀和相伴柴达木的唯一秀色。

1999年10月21日 礼泉

盐的湖

——车过柴达木之二

恰好在我划拉着几笔感触印象的时间里，火车已经进入盐的湖了。

骆驼刺和芨芨草所营造的单调而又令人敬畏的绿色消失了。消失得干干净净，一丝不留，堪称绝杀。一望无际的平坦得令人目眩的沙地，呈炭灰色。湿漉漉的泥沙地表，使人立即想到刚刚落过雨，再远也只能是昨天夜里下了一场透雨。应该是柴达木一年中难得的一个细雨润物的夏夜，还以为天公专意为我们这一帮远客额外的恩赐。错觉！错了！这里是盐湖，盐水千万年来就那么淹渍着泥沙，千万年来就是这种湿漉漉的如同雨淋的景象，让一拨一拨初踏此地的人产生错觉，空喜一场。这是盐湖。我乘坐的列车刚刚驶入盐湖的边沿。这是世界上储藏量最大的一个天然盐场，据说可以供现有的世界人口吃上十多万年。这盐湖在中国青海省的柴达木沙漠里。

白花花的类似浓霜一样的盐出现了，结晶在湿漉漉的沙地的表层，地表的下层蕴含着浓稠的盐的汁液。任何植物，包括英雄的骆驼刺和芨芨草，任谁也招架不住盐汁的浸泡和淹渍，连一丝生存的侥幸都不存在。这里不存在一滴淡水，无由生长一寸绿色，不哺养任何一个或大或小或蹦跳或匍匐的兽类和禽类。这是一个绝生地。

然而这里出产一切生命都不可或缺的盐。国家从五十年代就开始勘探和采掘。我们的血液、肌肤和骨头里，早就注入了这里的盐。血液能够活泼地在身体里涌流，肌肤柔韧而富于弹性，骨头质地坚硬而

具承载力，皆有赖于这盐湖里的盐。我便虔诚地感激那一代又一代工作在这绝生之地的工人和专家，他们的一生都在这里采掘着盐。

列车上骤起的小小的惊呼和骚动，是真正的盐湖的湖水惊炸起来的。一片汪洋！不，其实根本不是任何海和洋的颜色，也不是我所见过的湖的颜色。这里是一片灰白色的浑浊的水。无边无沿无法望尽的灰白色的水的世界，却看不到一根水草，不见一只与水相嬉戏的鸟儿，不见一个搅水翻浪的水中生物，甚至连一只蠓蝇和甲虫都不存在。

上边是蓝天和白云，下边就是这浑浊的灰白色的水，没有遮掩也没有骚扰，没有一缕响声和一丝动静。水便平静到如同死亡了一般，无波无纹，无光无色，使人怀疑这水是不是真正的水，因为作为水的素常的印象和水的相关的表征全部丧失了。

然而，这确凿是水，饱含着浓稠的盐汁的水。随意到湖里用手搅拂一把水，待风干之后，留在手上的盐足够一家人吃一顿午餐。这是什么水哦！是盐，是盐的湖。

盐湖的地名叫察尔汗，蒙语，盐的世界的意思。

1999年10月22日 礼泉

天之池

茫茫灰雾笼罩着。雾就在眼目之下。从高处探望下去，眼下就是一片茫茫的密不透隙的灰色的雾。谁也无法料知这雾什么时候会扯开散去。人愈是疑虑，那雾似乎愈是浓厚，似乎根本没有散去的希望。人就不由得焦虑，甚至抱怨自己选择了一个倒霉的日子：痴心向往的长白山天池，已经站在她的裙边，却看不见她的面目。

这雾确也像一张面纱——世界上那些严守宗教禁忌的妇女遮掩在面庞上的那一张，严密封盖着的是怎样一副含羞带娇的玉容呢?

群峰壁立，结臂连襟，或挺拔或浑实的十六座峰体，气势磅礴，恰似披甲挂胄的武士；火山岩浆铸就的武士，无疑是经受过超高温炼烧的纯洁忠贞之士，守护在这里已经有亿万年了。面对这样忠诚的卫士，我便静下心来，即使花一天时间的等待和守候，又何谈真心痴情！

久久的期待中，那雾终于扯开了。先是一绺，后是一角，稍一显现，随即逝去。刚刚露出的那一绺一角，瞬间又覆盖上雾的面纱了。然而就在那一绺一角露出的瞬间，呈现出湖蓝色的长裙的一幅裙褶，镶嵌着无数宝石或碎金，闪闪眨眨，扑朔迷离……你期待着的人正从楼梯的转角处下来。你屏声静息地等待着一睹芳容，却看见那长裙在楼梯的转角处飘忽一闪，露出炫目的脚腕的雪白，那长裙又消失了，没有下楼，又折回楼上去了……留在心里的是浅尝辄止的更高涨的欲望，期待那面纱彻底抖落，至少至少再撩开一绺一角的机缘，看到半边脸颊一次回眸也可慰藉。

灰色的雾又变化成为白色的了。白色的面纱又转变为灰青色的了。什么时候又在那一边峰峦间挂起连天接地的五彩虹帐。阳光挑逗嬉戏着，然而那雾的面纱却绝不扯散。

纵眼望去，莽莽苍苍的群山浪波一般起伏着，簇拥着，推向烟云浩渺的远处。阳光和云彩给群山投射出变幻不定的色彩，一片深情一片嫩绿转换着交替着，海浪般涌动翻腾起来了，只是听不到呼啸。无声的波浪铺天盖地，从眼目所及的远处一幅一幅推进过来，拍打着赤裸的铁渣似的长白山的主峰，我的胸脯也随着波涌感到脚下的节奏起伏了。放开思维之缰任其飞翔，怎样想象亿万年前这儿曾经是一片汪洋的景象？怎样想象亿万年以来地心之火在那一片汪洋之上雕塑出横亘千里的长白山脉的伟功！哦，真想潜入那依然保持着原始形态的丛林，捡拾一块小小的未经人手和兽爪触碰过的火山岩石。哦，那密林覆盖的千里群山之中，肯定有一只修炼千年终究成仙的狐狸，在山崖侧畔在白桦树后在野花丛中投来羞羞的一笑。哦，在那一笑撞击心灵的一瞬，顿然感悟到俗世的肉身和肉身的世俗。

灰色的雾和白色的雾终于散去了。没有一丝风，不知这雾为什么会自动扯开散去。从火山岩石和岩灰堆积的山峰豁口望下去，那灰白的雾眼看着淡了稀薄了，转眼间就散失净尽了。神秘的面纱徐徐地揭去了，令人灵魂震慑的景象出现了：一片幽深的蓝色，平静地闲适地躺在群山群峰的足下，阳光爱抚着投射下来，那一袭长裙的色彩变幻莫测，胸脯淡了腹上浓了腿脚又浅淡了；愈是颜色浅淡的裙褶里，万千的宝石和碎金的闪光愈是璀璨。山顶上的千年积雪倒映不出影像，被深沉的蓝得发青的水融解了。白云白雪和山峰都无法在其中投下倒影留下印记，她太深了，抑或是太娴静了，不把任何献媚者收入眼

睑？只有太阳是可以骄傲的，可以在那一袭长裙的每一寸裙褶的宝石上撩拨起闪光，她却依然沉静……雾的面纱又徐徐地遮盖过来了。

留在我灵魂深处的，是羞色里的纯净。至纯至洁的天池之水，便自然蓄蕴着羞羞的神色。不洁不净的东西可以以各种华丽和妖艳取悦于世，唯独那羞色难得仿造；纯洁的云和纯净的花和纯洁的心灵，我们都可以发现隐隐的羞羞之色；被把玩过的玉石即使有绝世的雕琢，被汗手油指抚摸过的花朵即使十分美艳，被龌龊充塞着的心灵即使做一万次美容，都不可能再从它们的眼神里泄出一丝一缕的羞色了。

天池的羞色来自她的水，上承天雨，下聚涌泉，皆无任何中间导流环节的污染；她的深厚（三百七十三米）使那些喜欢拈水戏浪者望而畏步，避免了汗渍；她高踞海拔二千多米的长白山巅，绝除了灰土、烟尘和有害气体的浸染，保护着一份至纯至净至洁，那沉静里的羞色正是与天生丽质俱来的一种气韵，而这气韵在一切作为风景胜地的水境中都不可能找见了。

游移不定的眼神是否反射着心灵里的大九九小九九？混浊的眼色是否浮游着心底的脏？无光无亮的眼色是否透射着平庸与无奈？急切而又卑琐的眼神是否袒露着心灵深处那狂狷和卑怯交织着的火与烟的浊流？再到哪里去寻觅如你——天上之池——一样的羞色?

告别天之池，告别长白山，留一份纯净，留一份羞色，陶冶情感滋润心灵。

1999年10月24日 礼泉

何谓良师

——我的责任编辑吕震岳

大概是七十年代末的最后一年的初夏，关中平原正勃发着一年四季里最迷人的景致，复苏的中国文学界亦如这自然界的景致一样撩拨着新老作家们的创造欲望。那时候，我去刚刚恢复不久的陕西作家协会参加一个什么会议，认识了吕震岳先生，直到今年春天我去他的灵堂前点燃一炷紫香，无论如何都抑制不住涌流的泪水了。

那次会议即将结束时，吕震岳来到我住的房子。“你是陈忠实吧？”问过我的名字又自报家门，“我是吕震岳，陕报文艺部的。”我便让座倒水，尤其是对一位年长于我的头发已显得稀疏的老编辑，因为头次见面，愈是礼仪敬重。他坐下后没有寒暄和客套，直接谈明来意，约我给陕报文艺版写篇小说：“你以前的几篇小说我看过，很不错，有柳青味儿。”我便应诺下来。他又叮嘱说：“一版顶多只能装下七千字，你不要超过这个数就行。”说罢就告辞了，干脆利索。

我那时候的心态刚刚调整过来。三年前的一九七六年春天，刚刚恢复的《人民文学》约我到北京参加一个写作笔会，我写了一篇适应当时反“走资派”的小说在该刊物上发表了，引起较大反响。随着“四人帮”的倒台和在一切领域里的拨乱反正，我在社会政治领域里的巨大欢欣与在写作上的失挫，形成剧烈的心理冲突，直到一九七八年的冬天，仍然陷入在真实的又不想被人原谅的羞愧之中。记得我当时正在灞河河堤的会战工程中领工，我和指挥部的同志住在河岸边土崖下的一座孤零零的瓦房里，生着大火炉睡着麦秸铺。正是在被春汛严逼压

迫着的紧张的施工过程中，我先后读到了两篇记忆犹新的短篇小说，先是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陕西青年作家莫伸的《窗口》，后是被后来公论作为新时期文艺复兴潮声的刘心武的《班主任》。莫伸比我年轻许多而刘心武和我同龄，然而都是崭露头角的文学新人，都是从刚刚解冻的文坛土壤里蹿出来的惹人眼目的新苗。我读着这些优美的小说不由得联想到自己的失挫，更深地陷入羞愧之中，便把全部激情都转移到我所指挥着的河堤工程上。

直到这个工程完工的一九七八年秋天，我便调入西安郊区文化馆。我再三地审视自己判断自己，还是决定离开基层行政部门转入文化单位，去读书去反省以便归依文学。郊区文化馆在小寨，有两处办公用房，一处在小寨俱乐部的小楼里，住着大多数文化干部和文化领导，另一处是"文化大革命"前的老文化馆所在地，全部是平房，已破落残损，有三四位干部挑着好点的房子住着，院中荒草尽兴地繁衍着。我便选了东南角一间空房，把一卷铺盖卸下来，掉下来的半张顶棚的苇箔经民工重新搭吊上去，残留在墙上的黑墨标语被我用报纸糊住了……我便坐下来读书。窗外是农民的菜地，生长着日见膨大的白菜，白菜地的畦梁上插长着绿头萝卜，也是日渐粗壮着。我从早读到晚，或借或买，图书馆里获得解禁的小说和刚刚翻译出版的国外的即使获过诺贝尔奖对我们却陌生的大家名作，一概抱来阅读。目的只有一点，用真正的文学来驱逐来荡涤我的艺术感受中的非文学因素。"四人帮"可笑的"三突出"创作原则因为太离谱姑且不论，十七年里极左的文学创作的理论和思想，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属于文学自己的因素，是强加以至强奸文学的非文学因素。对于非文学因素的荡除和真正的纯文学因素的萌生，对写作者来说，用行政命令是不行的，只有用阅读真正的文学作品来荡除，假李逵只能靠真李逵来逼其消遁。

我的自我审视和自我选择在我的感受里是正确的。阅读使我进入了真正的五彩缤纷的小说世界，非文学的因素基本被廓清了，我才觉得我正临门属于真实的文学的殿堂。信心也恢复了，羞愧的心理得到了调整，创作的欲望便冲动起来。直至今天，我依然难忘一九七八年的那个自虐式的阅读和反省的冬天，每每经过翠花路看见历史博物馆的漂亮建筑群，我便想到我曾居住过的那间房子和窗外的菜地，但现在都荡然无影了。一九七九年春节过后，我在那间小房子里重新开始写作小说了。正是在我刚刚涌起新的创作激情里，我遇见了吕震岳，他向我约稿。

我十分珍惜吕震岳的约稿，同样是那个羞愧心理的继续。那篇反“走资派”小说所产生的对我的看法，仍然是我的神经最敏感的因素，因而对那些依然还约我稿的编辑，更多的是一种被信赖被理解的感遇之恩了。由是，便想着应该尽力写好一篇小说送上，不致使这位初次见面的长兄失望。然而正在构思中的一篇小说篇幅较大，原计划给《人民文学》的，不怕长，便想着写完这个短篇之后，接着为陕报老吕再写，七千字是一个不能突破的限制。这时候，接到吕震岳一封信，信皮和信纸上的字，都是用毛笔写的，字很大，虽称不得作为装饰和卖钱的书法，却绝对可以称作功夫老到的文人的毛笔字。内容是问询稿子写得怎样了，一月过去了怎么没有见寄稿给他。我读罢便改变主意，把即将动笔要写的原想给《人民文学》的这个短篇给老吕，关键是怎样把原构思的较大的篇幅压缩到七千字以内。如果就结构而言，这个短篇是我的短篇小说中最费过思量的一篇，及至语言，容不得一句虚词冗言，甚至一边写着一边码着纸页计算着字数。写完时，正好七千字，我松了一口气，且不说内容和表现力，字数首先合乎老吕的要求了。这就是《信任》。

稿子写成心里又有点不踏实，主要是内容。这篇小说写一位挨整受冤的农村基层干部，以博大的胸襟和真诚的态度对待过去整他的“冤家仇人”，矛盾甚至很尖锐。写成后我又有点踌躇，当时正是伤痕文学如苦水怒潮般汹涌，控诉祸国殃民的“四人帮”，社会生活中亦是平反冤假错案刚刚激起社会各阶层强烈反应的普遍性情绪，围绕着“四清”运动的矛盾，农村社会的新的矛盾和社会心理也很尖锐和复杂。这篇小说以这样的人物出现，会不会引起误解？我一时拿不定主意，就带着稿子去找老朋友张月赓，让他给看看，以较为客观的眼光给我把握一下。

张月赓还住在西安晚报社的两层简易居室里，一大间屋子没有隔间，既是卧室也是书房又兼着会客用。部队作家丁树荣已先在座，见面自然都很高兴。我说了事由，便拿出刚刚写完的稿子，二人连续着读了，对我申明的担心以为是多余。丁树荣很热情，说他和老吕很熟悉，正好还要去找老吕，可以替我捎带上稿子。我就把稿子交给丁树荣，夹没夹一纸给老吕的短笺已经忘记了。我第二天就下乡参加夏收劳动去了。

从把稿件交给丁树荣那天起，恰好一周时间，《信任》便在《陕西日报》的文艺版面上刊出了，时间是一九七九年六月三日。这是我自有投稿生涯以来发表得最快的一篇作品。我听到了我周围的熟识的行政干部的议论，尚不敢完全轻信，以为可能有更多的鼓励的因素。又过了大约不足半月，我刚刚从乡下参加夏收劳动归来，又接到吕震岳一封信，意思说作品发表后引起普遍反响，已收到不少读者来信，让我到报社去看看那些读者来信的评说。

我心里便有点按捺不住，骑上自行车绕大雁塔那条路奔东大街的陕报去了。似乎是一种潜意识，我尤其看重读者的反应，想听听文学

圈以外的各个阶层各种职业的读者的评说，直到今天依然是这种心理。这应该是我第二次和吕震岳见面，老吕对我似乎已经是老早的熟人一样随意了。记得我见他第一面留下的最深刻的印象，便是他说话的高嗓子大调门。这回在他的编辑桌旁，不仅依然着这种说话，笑声同样是高腔大声，用畅快用爽朗这些词来形容似乎总不到位。他的情绪很兴奋，完全是一种编发了一篇引起普遍反响的稿子的由衷的快慰。他一边给我述说着丁树荣怎样捎稿给他，他读后的感觉和抓紧处理稿子以促使其尽快见报；一边用右手频频做着手势。我是深深地被感染被感动了的。一个职业编辑，一位长我起码十岁的老兄，毫不掩饰他的兴奋之情，像年轻人一样手舞足蹈着高声叙说着哈哈大笑着，给我一种赤诚热心而不无天真的强烈印象，他随之把一摞读者来信取出来交给我，感慨地说，看看，刚发表十来天，来了多少信说这个作品。

我一封一封读着那些从全省各地发往报社的信，禁不住眼热欲泪。不完全因为他们对我的一篇小说说了怎样的好话，更多的是我太需要他们对我的“信任”了。因为那篇写反“走资派”的小说造成的不良影响，我企图以新的创作来挽回，挽回那些可能弃我而去的读者，重新建立我和读者的真诚的信赖。那一封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向我证明了最基本的这一点，正是我最心虚着企望充实的一点。然而其中有一封信，以不屑的口气评说《信任》，更以不屑的口气讥讽着我，说我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写过适应时风的小说，现在又倒过来写什么《信任》，等等。我以为他说的是基本客观的事实，他肯定读过我过去写的几篇以阶级斗争为主调的短篇小说。不屑的讥讽的口吻不是批评的关键，亦可促使我更进一步作人生和文学的反省。这些信后来由老吕选发了三篇，在《作者·读者·编者》专栏里，我也看到了。有趣的是，十五六年后，我躲在渭南一家招待所里写几篇应急的短文，有天晚上

宾馆（招待所）经理来和我聊天，说那三篇被选发的读者来信中，有一篇是他写的。他写那篇读后感式的信的时候，正在渭南地区所辖属的一个县的水利局工作，接近基层农村，强烈地感觉到，因为几十年阶级斗争扩大化给许多无辜的群众和优秀的基层干部造成的伤害，在实施平反冤假错案的过程中，又出现了新的矛盾和对立，甚至出现简单的个人之间的报复行为。他对这篇小说里的主人公对待同类矛盾的襟怀十分感动，以为是化解阶级斗争造成的人为矛盾的有远见的途径，忍不住便写了那封信。其实，他平素只是喜欢读书看报，并不搞写作，后来几经工作调动，现在已是这家宾馆的经理了……听来真是令人感慨系之。

至今依然记忆犹新的是，由丁树荣把稿子捎给老吕之后，我就到西安北郊的一个生产队参加夏收劳动去了。按当时干部下乡的习惯，自行车后架上捆绑着被褥卷儿，车头上的网袋里装着洗漱用具。大约十天或半月的下乡期满回到郊区文化馆里，《信任》已经发表多日，我在紧如救火的夏收劳动中尚不得知。回到馆里之后才看到发表《信任》的版面，“信任”两字是某个书法家的手书，有两幅描绘小说情节的素描画作为插图，十分简洁又十分气魄，看着看着就觉得眼热。这是我第一次在《陕西日报》文艺副刊上发表作品，但不是处女作，此前已经有为数不少的小说散文在杂志和报纸副刊上发表，按说不应该有太多太强的新鲜感。我不由自主地“眼热”，来自当时的心态和更远时空的习作道路的艰难。当时的心态已如本文开头所叙的反省和调整，这篇小说的发表无疑给我以最真实的也是最迫切需要的自信。更深层的感慨发自此前十八年给《陕西日报》的一次投稿。

一九六一年，正是后来被习惯称作“三年困难时期”最困难的那一年，我正在读高中二年级，无法化解的饥饿折磨着几乎所有人，尤其

是正处于生理生长最活跃的中学生。市教育局为保护处于这个不幸年代的学生，采取了非常措施，取消晚自习自然也就取消一切作业，实行“劳逸结合”来对付饥饿，老师只需完成课堂授课而不再批改作业，学生只需接受老师的讲授而不再去做任何科目的作业题，消耗热量的体育课干脆废除不上了。我突然发现空闲的时候太多了，空闲得令人反而不习惯起来，自然就把课余的时间和精力全都用到阅读和写作这个爱好上头来。我和我的同样爱着文学的朋友常志文，找到了一个既省钱又能读到新书的办法。每天晚饭后，我俩悄悄溜出学校后门，抄田间近路步行到距学校约十余华里的纺织城商场，直奔书店。靠在装满各种书籍的书架立柱上，抽出昨天正在读着的那本书继续读下去，直到大约九点或九点半钟商场统一关门，我再最后看一眼正在阅读着的页码，合上书装进书架然后离开书店。那时候没有“微笑服务”，更没有礼宾小姐站在门口躬身欢语“欢迎光临”的礼仪，却不拒绝如我一类无钱买书的人连续阅读自己感兴趣的书。我和我的朋友便从来时的小路再走回灞河岸边的这所由孙蔚如先生创办的中学，我俩关于阅读心得的交流一直继续到校门口才收住。上床睡觉以前，先喝一大碗盐水哄自己入眠，因为饥饿早已搅得肠胃疯狂起来。在往来二十余华里的疾步运动中，本来就没有吃饱的晚饭早已被消化光光了。这样的课余活动的运动量和对热量的损耗，可能远远超出了做作业和一周只有两节的体育课。

同样在这一段没有功课压力的轻松日子里，我和常志文、陈鑫玉三位文学爱好者组织起来一个文学社。苦于喜欢文学而总是找不到创作的门路，文学社就被命名为“摸门小组”。仅这个名字就可以看出我们当时对于创作的心境和情态，不无猴急和彷徨。成立文学社的同时决定创办文学墙报，名字定为“新芽”，不无才露尖尖一角的小荷的含意。这是一个纯文学的墙报，不是那种为纪念各种重大节日所办的壁

报。“新芽”发表小说、散文和诗歌，必须是文学社成员自己创作的，当然也欢迎同学投稿。

创刊号上，刊登了我的一篇散文《夜归》。陈鑫玉鼓动我把这篇散文投给报刊，我缺乏勇气，终未敢把它投出。我的朋友却把它另写下来，寄给了《陕西日报》文艺部。大约不到一月时间，鑫玉某天从家里来就兴奋地告诉我，说报社来信了，他兴奋激动的表情，自然传递给我某种希望，某种侥幸混合着的急切心理。信的内容是肯定了这篇散文的长处，也指出了缺陷，关键词是让我修改一下，尽快寄去。我到此刻才真正地激动起来，似乎真的就要“摸”到那个神圣而又神秘的“门”了。我很快做了修改，又寄出去了，此后便开始了急切而又痛苦的等待。等待来信通知一个几乎让人不敢奢望的消息。等待中天天到学校的阅报栏去看《陕西日报》，自然是发表文艺作品的第三版。这是我创作生涯中发生的关于投稿的第一次等待，第一次感受那种企望和失望交织着的急切和焦灼的心情。奇迹终于没有出现，我在随之到来的高考的紧张准备中把此种情绪排挤开去。

结束高中学业，高考名落孙山，我在最初的别无选择的痛苦中回到家乡，被公社选拔为民办老师，这才真正开始了我的业余文学创作。次年春天，我重新把《夜归》做了修改，再次投给《陕西日报》，不久又来了信，肯定了长处也提示了不足，仍然让我修改后再寄去。我又一次陷入期待的焦灼之中。久久的等待中，我终于忍耐不住，借着学校到西安举办什么活动的机会，找到了社址设在东大街的《陕西日报》社。我在报社门口踌躇着踅摸着，想不出进入报社文艺部该怎么开口的措辞，自卑和羞怯的浓雾挥斥不开。我终于硬着头皮走了进去，看见文艺部的几张办公桌前坐着几位编辑，我朝门口那一位发出了问询。关于我的这篇散文，均不在在座的编辑手里，便推测

肯定在一位已经下乡锻炼的编辑手中，可他大约需要半年才能结束劳动锻炼。那位好心的编辑很诚恳地暗示我，凡是能发的稿子，肯定会交代给编辑部的。既然没有交代我的那篇散文，肯定是发表不了的了。这次投稿和第二次修改又失败了，我走出《陕西日报》社深长的院庭甬道时，直接的感觉是，那个“门”还遥不知其所在，任何轻易“摸”到的侥幸心理自然云散了，反倒轻松了，当然不可排解自卑。我至今无法判断当时在座的编辑之中有无吕震岳，因为我除了和那位同样不知姓名的编辑说话之外，几乎不敢乱瞅乱看别的人。我站在《陕西日报》社门口，回望一眼那拱形的门楼和匆匆忙忙进进出出大门的人，还是免不了自惭形秽的自卑。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走进一家报社的大门，目的是问询自己投递的一篇习作，留下的记忆难以泯灭。在我被老吕邀请到他的办公室去看读者来信的时候，我心里涌起的便是十几年前头回进入时的复杂心理的记忆。我和老吕聊起这件事，老吕哈哈大笑着说他毫无记忆，那时候出出进进文艺部的各路业余作者太多了。我至今也无法弄清那位两次写信鼓励我修改后再投的编辑是谁，他每次写信都不署姓名，只缀着文艺部的落款。直到一九六五年春天，我把这篇散文打破原先框架，重新构思重新写作，名字改为《夜过流沙沟》，只是没有勇气投给“省报”而改投“市报”，不久就在《西安晚报》文艺副刊上发出了。这是我的变成铅字见诸报刊的第一篇习作，历经四年，两次修改，一次重写，五次投寄，始得发表。我在感激《西安晚报》那位发表它的编辑的同时，也感激《陕西日报》那位两次给我写信鼓励我修改的不知其名的编辑。在这篇散文漫长的修改过程中，我在“摸门”，或者叫作最初的探索；在从事这个容不得任何侥幸的事业的起始阶段，这篇处女作的修改和发表的漫长过程，实际上是我进行文学基本功练习的一个缩影。我和老吕聊起这件事，除了艰苦跋涉的感慨之外，还有一种心理补偿的欲望，我想那位给我两次写信的编辑最好能在此刻在这个办公室出现，我会向他致最真诚的问

候和感谢。他的那两封信，是我写稿投稿生涯中第一次收到的报刊编辑的信。老吕也感慨着。

七月号的《人民文学》转载《信任》。那时候，《小说月报》等一类选刊还没有创办，《人民文学》辟有转载各地刊物优秀作品的专栏，每期大约一两篇。

八十年代的头一个春天到来时，《人民文学》编辑向前给我写来一封信，告知《信任》已获一九七九年度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那时候的评奖采用的是读者投票的方法，计票的结果一出来，前二十名便被确定下来。我当即将此事告知了吕震岳，他和我一样高兴。现在回想起来，无论是我，无论是他，当时似乎没有把这个获奖看成有什么太了不得的。倒是后来愈来愈觉得这种全国性评奖真是了不得的。一是这种奖项被看作一种标志，评职称升工资等等都成为一个硬件；二是这种评奖的竞争愈来愈趋激烈，单就每年一次的短篇小说评奖，已经取缔了读者投票的方法，改由评委投票，非文学因素影响评奖的事时有传闻。我并非超脱文坛，亦非淡泊名利。我从来不说淡泊名利的话。我至今以为，文坛本身就是一个名利场，淡泊不了的，除非你离开。问题的实质在于以什么手段去提高“知名度”和获取“利”，唯一可靠的途径只能是拿出自己独特感受的作品来，即以文学的因素实现文学创造的目的，任何非文学的因素都是无法奏到长久之效的。一个不足七千字的短篇获奖，不可能决定我未来创作的发展，未来的路才刚刚开始。我对自己未来的创作发展不仅没有十分的自信，甚至依然着自卑的惶惑。因为任何一位能被我们记住的作家，都不是凭一个小小的短篇而铸就自己的文学成就，证明自己的文学才能的，这是文学史的ABC。作为职业编辑的吕震岳，更有丰富的经历和经验，早看多了作家创作发展的种种，所以更多地仍然是说着“多读多思索”的鼓励我

的实话。颁奖的通知到来时，我的心里丝毫未动，我的农民夫人突发心脏病月余，我须陪她去医院看病，便请假缺席了。

作为新时期文艺复兴的第一项全国文学奖——短篇小说奖，这是第二届评奖，发奖仪式很隆重，我在报纸上看到了消息。之后某一天，我用自行车带着病情稍轻的夫人从城里看病回来，走到距家尚有七八华里的一个村子，迎面停下一辆小汽车，走出《陕西日报》的文艺评论家肖云儒来。他们开车到了我的村子扑了空，折回来时碰到了。他说报社文艺部领导很重视《信任》获奖，作为报纸副刊的作品能在全国获奖尚不多见，约我写一篇获奖感言的短文，老吕因身体不适而委托他来。我后来写成了一篇《我信服柳青三个学校的主张》的创作谈，这是我从事写作以来第一次写谈创作的文章。

这一年，《陕西日报》文艺部发起了“农村题材小说征文”，老吕给我写来一封信，鼓励我应征。我已经从原郊区文化馆分配到灞桥区文化局，被提拔为文化局副局长，兼文化馆副馆长。为了能避免琐细的事务性干扰，我住在灞桥镇的文化馆里，潜心读书写作。接到老吕的信，我写了短篇小说《第一刀》，不需叮咛便明白七千字的版面极限。这篇小说同样得到老吕的欣赏，以一周的最快速度见报。此后，又收到了一批读者来信，选发了三篇。这是写农村刚刚实行责任制出现的家庭矛盾和父子两代心理冲突的小说，引起读者的普遍关注是可以理解的。尽管在征文结束后被评了最高等级奖，我自己心里亦很清醒，生动活泼有余，深层挖掘不到位。然而关于农村经济改革的思考却由此篇引发，发展到我的第一个中篇小说《初夏》的最后完成。

一九八二年我的第一本小说集子《乡村》出版，在我赠送书籍的名单上自然不可或缺老吕。这本集子里有他鼓励催促下写成的三篇小说，且是在我创作发展的关键时期有着特殊意义的作品。这年冬天，

我调到省作协专业创作组。在取得对时间的完全支配权之后，我的直接感觉是走到了我的人生的理想境界：专业创作。我几乎同时决定，干脆回归老家，彻底清静下来，去读书，去回嚼二十年里在乡村基层工作的生活积蓄，去写属于自己的小说。尤其是读书，需要弥补未能接受大学中文系专修的知识亏空和心理空虚，需要见识中外大家名著所创造的艺术大观，更深一步进入真正的艺术世界，揣摩真正的文学的本来内蕴，以彻底排除非文学因素和出于各种用意强加给文学的额外负载，接近再接近真正的文学的本义。我记得我到陕报去和老吕说了归乡的打算，他仍然高调门感叹着好好好，真诚地说，写作靠热闹是不行的，得拿出好货来。

回到祖居的老屋，反而有一个不长的适应期。偶尔有文学朋友和约稿的编辑找到村子里，都是我十分愉快的事，包括传来许多文坛最新的消息和趣闻。偶尔收到老吕的信，仍然是老文化人的个性明显的毛笔字，或问讯或约稿，读来十分温馨。中篇小说《初夏》在《当代》发表以后，接到老吕一封长信，说他对这篇小说特别喜欢，不完全是因为《第一刀》的缘由。到这篇中篇获《当代》文学奖时，我告诉了他这个消息，老吕像小孩一样拍着简易沙发的扶手大声慨叹起来，似乎验证了他的阅读感觉。他说他在什么报纸上看到《当代》的广告目录，专意到邮局的报刊门市部买来了杂志，读完便给我写了那封长信。乃至一九八六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我的以《初夏》冠名的第一个中篇小说集子，我拿到书后，从乡下赶到西安，找到老吕家里。其时他已退休，住在炭市街的平房住宅里。我送上这本集子，他翻着看着，说那本集子里收编的几个中篇大都读过了。他告诉我，凡是他在什么杂志上发现我的作品就一定要读，凡是他听说我在哪里发了什么小说就自己找来读。他坦率地说着对那些小说的感觉，好的和遗憾的诸多方面，已经远远不是《信任》或《第一刀》经他发表时的

交谈深度了。这一次，是我更深地理解老吕这个人的重要接触。我真切地被这位老兄感动了。他已经退休，已经不再为报纸副刊和我打交道了，他关注我的作品和我写作的发展，至少是出于一种纯粹的关于一个与他打过交道的作者的关注，仅仅只是这个作者的作品他曾经喜欢过付出过心血，仅仅只是这个作者本人他比较喜欢，仅仅只是他希望自己喜欢的这个作者的创作更健康地发展。这就够了，这就足够我这个经他扶助的作者体会人世间那种被赞美着的真诚了；足够我再重新理解作为中国文学各类职业编辑的良苦用心了，任何时候要是还没有忘记这一点，我便相信自己的尾巴会紧紧夹住；足够我理解作为个人劳动标志很明显的创作，其实还有更丰富的社会的催人奋斗的那种力量。告别老吕，重新回到祖居的家园，《初夏》这本书也就划归明日的黄花。我必须以新的艺术形态给老吕这样的职业文学编辑一个见面时可以再聊的话题，包括更多的还喜欢着我的小说的读者。真正的文学意义上的友谊给我的就是这种冲击力。

听说老吕病了时，我很震惊，找到他的新居里，是在一个夏天的晚上。我已得知他得了一种今天的医疗水平很难治愈的病，便约了精于摄影的郑文华去拍一张合影。我们相交整整廿年来，竟然没有拍过一张合照，我不在乎这种照相，他也不在乎这种形式的东西，二十年里我们多次见面却没有谁想到照一张合影。我到邻近的水果店铺里买了水果，也应是第一次。二十年里我多次去过他供职的编辑部和他的家里，从来没带过一件礼物，一盒烟一瓶酒都没有过。那个时期里似乎不兴这一套，我也没有这种意识，似乎拿着这种东西会使他和我都尴尬的。他现在病了，是个病人，按我的心理和习惯，看望病人带上水果是礼仪成俗的。

他坐在一架轮椅上，因为病痛所致的骨头损害，不能坐太软的沙发。他说他出医院好久了，病情稳定。他比以往消瘦了，脸色尚好，仍有既往的红色，表面看不出太多的重病的疲倦和忧郁。他说话依然是朗朗的高调门大嗓子，几乎与我以往的印象没有任何变化和差异，也许是强性子的他自然显现的刚强。我和他聊了他的病情，他却更多地问我现在的工作和写作，不无惋惜之意，甚至启发我赶快离开西安，重新找一个地方去读书去写作。他那么感慨着对我的深层理解，写到这程度太不容易了，再浪费时间就损失太大了云云。我无言以对，也不想对他说出我的苦恼。如他一样的感慨我已从许多朋友口里听到，然而我不想让他再为我担这一份心。我尽量以轻松的话题和他交谈，包括回忆我们以往的趣事，他便大声愉快地笑起来。我给他留下我出版不久的五卷本《文集》，他问《白鹿原》收编在内没有。我说主要的作品全都收入了。他说他早已读过《白鹿原》，不断地感慨着从他编《信任》到《白鹿原》的阅读感觉。临到我出门时，他仍然鼓励我，什么都可以看轻，看淡，再弄出两本书来，弄到这程度太不容易了……

我收到老吕一封信，看小小信封上那很大的行书毛笔字就熟知了。打开信封，夹着他的一页短笺和一块报纸的剪贴文章，是他发表在《陕西日报》的一篇关于《白鹿原》的短论。我的心头一沉，读了短信再读短论，沉默许久都不知道该做什么。他已到骨癌晚期，忍受着怎样的痛苦，仍然还要写这样的短论，仍然还要对《白鹿原》一书获茅盾文学奖的事说他的看法和意见。其时，关于这本书和这个奖的热闹早已过去，我已不再接受关于这个话题的媒体采访。《白鹿原》一书自出版以来的五年时间里，我看到过许多评论家、作家、记者和读者的或长或短的评论文章，说长道短在我已经于心不惊平静听取了，然而老吕的这篇短文一下子把我推入情感的波涛之中，无论如何

我都不能把它看作是一篇“评论”……这是我收到的老吕的最后一封信，那功夫老到笔力遒劲的毛笔字啊！

今年春天，我接到老吕家属的电话，是哽咽着的女声报告的噩耗。当晚我赶到老吕家里，只能面对一幅围裹着黑纱的相片了。我站在灵桌前腿就颤抖起来了，看着照片上那昂昂的朗朗的面容，泪水一下子涌流出来，想叫一声老吕也终于哽塞得叫不出声。他的夫人告诉我，他把我送他的那套《文集》，一直在桌子上用书夹裁着，而没有塞进他的书架，直到他去世。我又一次涌出泪水，却说不出任何话来。

走在夜晚的东大街上，五彩的霓虹灯光是这座古城的新的姿容。天上似乎落着细雨，我木然地走着。我的小说中那个被我赞美也被我批判着的白嘉轩的生命感叹竟从我的心里涌出来了：世上最好的一个文学编辑谢世了！

1999年11月9日 礼泉

为了十九岁的崇拜

——追忆尊师王汶石

一

第一次看见王汶石，大约是七十年代初的事。

记不清是谁家举办的一次业余作者会议，我也参加了。那时候的时代用语为“工农兵业余作者”，会议也称为“学习班”。柳青、杜鹏程、王汶石等小说大家出席了会议，成为业余作者们最大的兴奋点。会后大家在一起聊天，话题仍然围绕着第一次看见自己崇拜仰慕已久的这几棵文学大树，说自己的印象，随后就给他们相起面来。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柳青像一只苍鹰，杜鹏程像一匹马，而王汶石则更像一只狮子。这种比拟不单是初见他们的面孔和体形做出的形象化概括，而且融入了对他们作品的阅读印象，是对人的形象气质和作品的艺术气质综合起来的归结。

第一次见到王汶石之前，我已经读过他发表和出版的全部小说。短篇小说集《风雪之夜》里的十几个短篇，作为范本不知读过多少遍了，一个个活灵活现的乡村人物至今依然储存在记忆里，一幅又一幅关中乡村生活的逼真场景和细节依然记忆犹新。现在回味起来，对我而言，柳青的《创业史》和王汶石的《风雪之夜》的最直接的启示，是把小说的艺术真实和生活真实的距离完全融合了。尤其是我生活着的关中乡村，那种读来几乎鼻息可感的真实，往往使人产生错觉，这是在读小说还是在听自己熟悉的一个人的有趣的传闻故事。我对创作

的迷惘和虚幻的神秘幕纱可以撩开了，小说的故事和人物就在我的左邻右舍里生活着。渭河平原的乡村生活所诞生的《创业史》和《风雪之夜》，丝毫也不逊色于顿河草原上诞生的《静静的顿河》《被开垦的处女地》和《顿河故事》。我读肖洛霍夫我读契诃夫我读莫泊桑，且不说艺术感受，单就那个作品与自己的生活实际的距离感无法消弭，这里的乡村似乎永远看不到那里发生的动人的故事。《创业史》和《风雪之夜》给我的纯粹属于创作上的启示就在于，作为关中边缘地带的灞河川道，白鹿原以及北岭骊山这些我所熟悉的地域里，同样蕴藏着小说故事和小说人物，能不能寻找、捕捉、开掘出来，全得靠自己的努力了。这样，我从最初的迷惘和虚幻之中挣脱出来，眼光落到自己脚下的土地上了。

阅读《沙滩上》的情景，于今想来仍然令人心动。

读高中二年级时，我和另外两位同样喜欢文学的朋友组织起一个文学社。我们三人合资订了一本《人民文学》杂志，新杂志邮寄到来的日子，无异于我们的圣诞节，三人轮流阅读。印象最深的有两篇作品，一是话剧剧本《胆剑篇》，令我们激动了好久谈论了好久；一是王汶石的短篇小说《沙滩上》，三个人几乎是接力式的迫不及待地阅读了，相约着走出学校后门和后门外的操场，翻过灞河长堤和柳树林带，在灞河水边的沙滩上围坐下来，讨论起《沙滩上》来了。这样的讨论连续有三四次，都是在晚饭后的自由活动时间里进行的，每一次都持续到熄灯就寝的钟点。处于艺术创造鼎盛期的王汶石，大约不会料想得到，在星光朦胧的灞河滩上，三个读高中的农家学生正在热烈而动情地谈论着他的名字和他刚刚出台的人物——大军和囤儿的方方面面，正在把他营造的这幢瑰丽的艺术建筑拆卸开来，窥看一柱一梁

以及其中的窍卯……多年以后，当我每见到他的时候，阅读和讨论《沙滩上》的这一幕就首先浮现出来。

二

一九七九年六月，我从西安北郊参加夏收劳动归来，第二天到西安晚报参加一个座谈会，见到杜鹏程。老杜一见面便说他看了《陕西日报》刚刚发表出来的我的短篇小说《信任》，多所赞扬，一派喜形于色的神态，令我感动。老杜又告诉我说，汶石也看了，认为很不错。这是这篇小说见报几天来，我第一次听到的文学圈里人的反应，而且是我崇敬而又崇拜着的陕西文学两棵大树的评说。

当天晚上，我回到西安南郊的郊区文化馆，门上贴着一张纸条，是《人民文学》编辑向前留的。我找到向前的住所时，她说她已经见过王汶石了，老王一见面就谈《信任》，而且建议由《人民文学》转载。随之告诉我，她已经找到《信任》读了，已经向编辑部打了长途电话，转达了老王老杜们的意见；编辑部已经找到《陕西日报》，看过了《信任》，决定七月号转载。当时已是六月中旬，七月号的《人民文学》怎么来得及转载呢？向前说，这很简单，抽掉某一篇已排定的稿子就成了。

骑车重回南郊的路上，我的心里一直不能平静，直到推开我的那间破烂的房子的门。那时候我已三十七岁，此前已经发表过一些小说和散文，对于某篇作品的好话好评虽不敢说超脱，但也不至于得意忘形。我的难以平静的心潮，完全是被老王老杜们的关爱冲击起来的。此前三年，我在刚刚复刊的《人民文学》上发表过一篇迎合当时潮流的反“走资派”的小说，随着“四人帮”的倒台以及一切领域里的拨乱反正，我陷入一种尴尬而又羞愧的境地里。经过大约两年几乎是自虐式

的反思和反省，一九七九年春天我重新铺开稿纸写小说了。在这样的处境和心境里，老王老杜们的一句关爱的话和关爱的行动，必然会铸就我心灵里永久的记忆。我更想到另外一层，他们早已是文学大树，这样关注一个走了弯路的青年作者，在他最需要支持和处于羞愧心境的时候，做出如此热诚的举动，足够我去体味《风雪之夜》创造者的胸怀、修养和人格境界了；具有这样的人格境界的人，才能酿制出《风雪之夜》这样的蜜来。我要接受的显然不单是《风雪之夜》书的艺术，而是创造者本人的人格魅力了。许多年以后，我经历了更多的创作实践，也多多少少经历了新时期以来的文学进程，也许是增长了不少的年岁，愈来愈觉得作家自身精神境界和人格修养对于创作的关键性作用了。制约作家感受生活挖掘素材深层提炼的因素中之最关紧要的一条，便是人格精神；人格精神的错位，往往会把良好的艺术天性矮化了，令人惋惜。

无论过去搞业余创作，无论后来调入作家协会搞专业创作的几十年时间里，我对陕西作家协会的唯一亲近的感情便是文学。我长期住在西安郊区乡村或城镇，或开会或办事得进城去，顺便走一趟作家协会，在《延河》编辑部坐一坐聊聊天，与同代的作家聊聊闲话。往往所能听到的，是编辑热烈议论诸如即将刊发的短篇小说《手杖》，京夫的这篇作品标志着一个阶段性的艺术突破；《人生》刚一面世就引起文学界和读者层的强烈反应，路遥的创作已显示出大家气象；邹志安的《兰鱼儿》正在编辑手中传阅，已经引起广泛兴趣；陕南一位谁也没听说过名字的作者在北京一家大刊上发表了一部中篇小说《沉默的玄武岩》，出手不凡起点很高，还有一股现代派味儿；等等等等。作家协会深深的庭院和几进四合院里，无论走进任何一个房子，都是这样的话题，及至国外一位作家的一部什么重要作品刚刚翻译过来，值得一读。这里的房子是二十年代建筑的中式平房，已不再现当年置

建之初的宏伟和优雅，而日渐败落荒颓，陈腐磨损的桌椅和踩踏上去“吱吱喳喳”响着的木质地板，可感历史的沉压。然而这里弥漫着崇高到几近神圣的文学气氛，终年充溢在各个堆满稿件和墨水的编辑部里，流淌在庭院及至一墙之隔的家属楼院里。这里的人关注着本省青年作家的发展，似乎是一种职业习惯，是一种本能，而又完全是无私的，只有文学这个话题才能达到共同的兴奋点的共鸣。进入这个院庭便进入了文学的圣殿，像佛教或道教信徒进入了寺庙台观，充溢耳孔和鼻孔的全是诵经布道的谐和之音和香表焚烧的幽微之气了。这种气氛是文学发展最相宜的气氛，是任何物质的优劣难以替代的。

王汶石对《信任》的关注，只是这气氛中的一缕，而自五十年代以来所营造而成的这种唯文学是尊的气氛，正是王汶石那一代陕西老作家们力行垂范的结果。想来其实也很简单，如果文学团体里不说文学，那说什么呢？如果作家协会里没有了文学气氛，那么还有什么呢？

中篇小说《初夏》在《当代》发表后，王汶石写了一封长信给我，评说这部篇幅较长艺术上并不圆润的小说。我那时仍住在乡下，以通信的方式回答。我在祖居的老屋写这封回信的时候，总是想到十九岁时在灞河沙滩上与同学讨论《沙滩上》的情景。

我和田长山合作的报告文学《渭北高原，关于一个人的记忆》在《陕西日报》刊出以后，王汶石又以写信的方式予以论述。我读着那热情洋溢的文字，脑海里又浮现出在灞河沙滩上研读《沙滩上》的情景。

十九岁时在灞河滩上在星光下所崇拜的文学之“神”，现在既是文学前辈又是兄长般的真诚，对一个后来者的脚步和舞蹈不厌其烦地评

点着纠正着，影响很自然地便挣开了艺术的层面，让我一步一步感触和体味那艺术创造者的胸襟、内宇宙和人格精神了。

三

近几年来，我有选择地参加了一些有地域特征的笔会，交识了一些作家。许多时候和许多的作家交谈起来，谈到陕西文坛的时候，他们都谈到王汶石，关心他的身体和写作。他们都谈到王汶石的短篇小说，几乎通用的一句话都是“那真是写绝了”！他们动情地回忆着自己当年阅读《风雪之夜》的艺术快感，连一些人物的细节仍然能生动地复述出来，而这些阅读的记忆少说也有三十年了。我在这种交谈中便会滋生出一种自豪感，便会加深和这些作家的交流和理解，毕竟我也在家乡的河滩上热烈讨论过《沙滩上》。他们没有机缘接触王汶石，却虔诚地尊敬着祝福着王汶石；他们没有见过王汶石的面，却记着他创造的艺术形象，及至津津乐道那些生动的细节；尽管九十年代的社会生活和文坛已经与《风雪之夜》创作的年代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们仍一致赞叹王汶石的创造才华，用他们的话说，整个一本《风雪之夜》真是才华横溢。

一次又一次的这种交谈，也给我以最切近的启示，作家凭什么活着？作家这种特殊职业的本质含义是什么？这样简单的事，往往弄出许多复杂的纷繁的文坛现象和怪事来，无一不是非文学因素搅缠的结果。作家凭作品活着，作家活着的全部意义就在于创造艺术；作家创造的艺术比作家自身的生命更恒久，无论做到了或没有做到都应该持续追求；如果游离或转移了艺术创造的兴趣和心劲，那么作家这个职业就没有任何意思了。

这种启示在我每一次见到王汶石的时候都有所验证，无论是在他的家里，抑或是在医院的病床上。退休在家的王汶石，给我的如一的感觉是沉静，沉静里折射出经历过高境界的艺术创造的气象和风范。而这种时候，看着那张慈和而又有力度的方形脸盘，我又想起头一回见面时造成的狮子的印象。即使在病床上，即使到了生命的垂危境地，我看到和感到的仍然是狮子的雄威和狮子的沉静。

面对这位老人，我总是忍不住叹惋，如果他不是那样的年纪而是与我们同龄，能生活在更为开放的当今中国，凭他对文学的专注和痴情，凭他对现实和历史敏锐的感知和深刻的理解，凭他对艺术的敏感的天性和才华横溢的表达能力，当会创造出怎样瑰丽的诗篇，远远不止一部《风雪之夜》。面对极“左”的文艺政策以及发展到摧毁一切的“文化大革命”，天才又能如何？更多地留下的只是令他的崇拜者长久的叹惋了。

面对这位老人，我常常有一种幸运感甚至满足感，发展到今天的中国文坛的气象，可以让百花都有选择生存和发展的土壤和空间，这是在七十年代以前所不敢奢望的事。在我步入中年时赶上了，虽然稍有点晚，毕竟还是赶上了。在这样的催生文学绿色的气象里，如果还不能实现自己的创造理想，只能默认自己的无能了。在这样的文学环境里，我的满足感也促成一种宽容心理，对那些已经发生或继续发生着的非文学性质的事，都可以做到不辩不怨，出于一种最基本的考虑，搁在二十年以前当会如何？！况且，文学也和国家一样，继续着改革，也必须继续去完善尚不完善的诸多体制。处在这个过程之中的我，满以为可以去做自己想做的写作之事了，而不必过多在乎那些作为发展完善过程中的非文学因素。在乎了势必耗费精力浪费生命，这恰恰是我最浪费不起的东西……我比王汶石们幸运多了。

王汶石经历的病痛折磨，是我所经见的最难忍受的。我不想叙述他的令人惨不忍睹的病痛的折磨，也不想宣扬他顽强的生命力以及痛苦折磨下的狮子般的沉雄和幽默，这一切总归是令人心酸的事。而无论作为十九岁时便形成对他崇拜的青年，无论是作为一直受到他关注关爱的一个作者，无论是作为后来在作协管着点事的我，对于他在病卧期间为着医疗费用而受的额外的折磨，业已成为我无法化解的一块良心的死结！

1999年11月25日 礼泉

千年的告别

到成都再到绵阳，记者们都热衷一个话题：当新的世纪到来时感受如何。在这种反复的问询中，我才切实地感觉到了一个新的千年即将起算，一个新的世纪已经跷足可触，我们正处于一个告别和期待的兴奋之中。

正在兴建和刚刚开通的高速公路，对于泥泞和坎坷的小路是一种告别；漂亮的绿树和如茵的草地，对于荒草和垃圾是一种告别；载人的宇宙飞船，对于火铳是告别；把纸屑果皮扔进垃圾箱，对于随意乱扔废物随地吐痰是一种告别；发自灵魂的颤音，对于新老“八股”腔调是一种告别；绷紧的牛仔服显示的优美曲线，对于古典的现代的辫子和裹脚布是一种告别；邓小平倡导的实事求是理论，对于自欺欺人的牛皮作风是一种告别……

告别的仪式发生在当代中国的每日每时，发生在城市和乡村，发生在内地和边疆，发生在古老的成都和新兴的绵阳。

告别的祭礼发生在当代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和心灵世界里，老人和年轻人都在进行着各自的告别。告别痛苦，期待欢乐；告别枷锁，期待舞蹈；告别腐朽，期待新生；告别龌龊和曲屈，期待明朗和舒展；告别虚伪，期待真实；告别愚昧和愚蠢，期待清醒和智慧……

告别是精神和心灵的剥离。

完成一次剥离就完成了一次弃旧图新的过程。剥离是旧的心理秩序被打乱、新的心理秩序重新构建的过程。人的心理秩序决定人的精

神世界，而人的价值观道德观又网织着心理秩序；新的观念首先冲击的是旧的观念，也就冲击扰乱旧的心理秩序，重构新的精神世界。这个过程恰如剥离，完成一次就轻松一次，就新生一回，就跃上一个新的心灵境地。剥离无疑是一个痛苦的过程，经受了这个痛苦完成了这个过程，也就挣脱了心灵的枷锁，获得一次精神的解放和自由；经受不住这个痛苦就可能捂死在旧的秩序的罗网里。剥离不会是一次性完成的，有如蚕之蜕皮，一次又一次的剥离的完成，一个民族的精神体魄也就逐步得以复兴复壮了。

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的最后一秒，我和我的民族将站在一个新的世纪新的千年的临界线上，做一次千年的告别，聆听新的世纪的第一响钟声，迎接第一个黎明，想来真是千载难逢。

1999年12月9日 绵阳

口声

春节将至时，有朋自渭北来，带给我一袋地道的久负盛名的“椽头馍”。这种馍馍形状如同农家房檐下露出的椽子的圆头，故得名，其实更像放大加厚的一枚枚象棋棋子。其味香甜绵长。现在，“椽头馍”已经从农家的锅灶笼屉上获得解放，机械化批量生产，热销于县城和省会城市。有这样一袋本真的“椽头馍”，今年的春节也增添乡村气息了，弥补了乡思。

闲聊间，朋友老梁告诉我，他在市井间听到街谈巷议的一个热门话题，他们那个县的县委书记开会途经秦岭山区，发生车祸，重伤住进医院，昏迷持续三四天之久。当他重新复苏身体逐渐恢复以后，守护他的妻子交给他一张清单，登记着在他昏迷和危险期的时日里，送礼送钱去的单位、姓名和钱款的数字以及礼物的品种。当这位县委书记能够重新站在讲台上讲话的时候，他以一种节制的口吻宣布了一条告示，大意是：在车祸受伤住院期间，感谢大家的关怀。但关怀的形式方法发生了问题，带点食品尚属人之常情常礼，送钱就莫名其妙了。我享受公费医疗，本县财政即使困难，保证我的医疗费还是不成问题的。所以送钱不仅没有理由，也使关怀之情变味了。会后请送钱的同志到××部门去领走自己的钱款，可以不公开你们的姓名……

愕然。哗然。参会的人嗡嗡然议论起来。

这种议论很快流泄到县委和政府的各个职能部门，流泄到县属的企业、学校和商业交易场合，流泄到市井街巷和家居的楼房屋院。我

的朋友老梁给我说这个传闻时，仍然抑制不住情绪的激动，连连感慨，书记的这个举动轰动了县城了，能做到这一点是不错的……

我的朋友老梁年轻时在东海舰队服役，一段很令人羡慕也令他本人自豪的人生篇章，至今偶尔谈到他的水兵生活，甚至驻扎地上海，仍然眉飞色舞高腔欢调儿，因为北方青年能被招为海军水兵的机会太少太少了。他复员回到渭北老家，供职在县供销合作社，工资虽低却是固定的月月照发的，在大家普遍贫穷的那些年月，他很自足自乐。改革开放之后几年，供销社独占乡村商业市场的霸王角色很快被消解，老梁便承包了其中一个部门，自己独立经营起棉布以及与棉毛相关的纺织品来了，生意虽总也做不太大，每年的进账却可以养家，供给孩子上大学，仍然自得其乐。他从未当过官，工作却是尽职尽责的，工作之外喜欢读书，却没有写诗著书当作家的志向，然而确实喜欢文化活动，这便是他和我结交的缘由。他喜欢唱秦腔戏，声色不错，却从来没有当专业演员以此造诣戏坛的雄心，然而确实爱唱，随时随地就可以放开嗓门吼将起来，在我办公室里就吼过一板乱弹，还真是接近专业水平。我写如上这些关于老梁的身世和爱好，仅仅只是想向读者表明，老梁是真实的民间话语，是市井平民芸芸众生之中的一位，他告诉我的关于县委书记的故事来自民间市井的街谈巷议，不是电视、报纸等新闻媒体的宣传。老梁的话是可以信赖的关于一个县的中共领导干部在百姓里的口声。

口声，陕西关中方言，与规范的书面语言里的口碑的意思大致相同。如，那人一辈子落下个好口声。或，王家媳妇这一向遭了口声了，指的是遭遇不好的舆论谴责了。这个县的县委书记因为清退送礼的钱款，市井和乡间正沸沸扬扬着一片好口声。我竟然也被老梁的激情煽动起来了。

老梁说的这位县委书记姓王，名字已经记不起来，我和他共进过一顿午餐，真正的一面一餐之交，且已经过两年，印象很模糊了，大约是一九九七年冬天，我在渭北的蒲城县小住几日，某日午间县委书记派人来约我共进午餐，受宠的同时，也有点惶惶，给本来很忙的领导添麻烦心里总是有所障碍。见面之后才得知书记姓王，很年轻，稍做交谈竟扯到故乡，可以勉强为乡党；也才得知他请来一位牛津大学的博士，也姓王，时任西北大学校长，原籍渭北蒲城，专意请回这位从渭北高原走出去的卓有建树的学子回到故乡，给全县各级领导干部专题讲解现代管理知识，这是王校长的专长。那天的午餐交谈很愉快，结识新任西北大学的留洋博士王校长，我自有钦敬，因为这确实是很不容易的；再则是县委王书记请管理科学的专家给本县各级行政管理干部来上课，也应是一种很富远见的举措。就是赶巧凑到一起的这顿午餐，留下了很难说深刻甚至说不上熟悉的印象，然而毕竟认识了。老梁说到他的传闻时激起我的心理反应却很强烈。

这种较为强烈的感动里，我突然想到县志上记载的一位县令，在任几年之后调离本县时，整个县城都骚动了，沿着县令离去的必经之街道夹道送行，鞭炮连绵，酒香弥漫；沿路所经过的大村小庄，男女老少拦路挽留，跪拜不起的乡民堵塞了道路。这是十余年前我在西安郊县查阅县志时留下的印象，应该说这个县令在任几年的口声好得不能再好了。同样在这摞县志里，记载着民国初年发生在该县的一场前所未闻的突发事件，整个县辖的乡村里的农民于某天早晨从四面八方拥进县城，扛着杈、耙、扫帚、犁杖和镢头木锨，要去交给县长，罢种罢耕，以抗议巧立名目的人头税和田亩税，酿成了关中近代史上影响广泛的“交农运动”。这个民国政府的第一任县长随之被撤职，离走的时间据说选择了夜晚，其口声之坏无须评说。记载在同一个版本的县志里的两位县令和县长，受命于不同的朝代，执政于同一块县辖的

地域，其口声大相径庭，正好演绎注释了“民可以载舟，亦可以覆舟”的古训。

老梁说给我的王书记新近发生的故事，诱发我联想多多的一个重要因素，便是新闻媒体刚刚曝光的江西省副省长因受贿被捉的消息。我曾在听到看到这个新闻时难以理解，已经做了副省长的胡某要那么多钱干什么？钱财聚到那么大堆的数量，对于个人对于家庭还有什么实际意义可言？因为即使以超豪华的消费水平也难以在有生之年把那么多钱花掉，且不说胡某的政治誓言和人生追求这些东西。如果我没有记忆混乱，胡某是媒体公开曝光的官职最高的领导干部，尚属少数中之个别。然而每年年终中央和地方省市反贪部门公布的成绩概括中，那被惩的人数却是令人震惊的。一个个吸附在各级政权里的蛀虫被钳出来，使人感到痛快的同时也不无忧虑。再说到民间和市井，层出不穷的传闻和极具智慧的讥讽腐败的民谣和笑话，消解和淡化着各级政权的神圣和庄严。无论是证据确凿的公开惩治，无论是不敢全信的更多的民间传闻，倾注到人耳朵的这些东西太多了的直接后果，令我忧虑令我烦恼令我开心不起来，真希望能有清风灌进耳来，有清净的绿地映入眼睛，以荡涤污血和浊水。与我仅一面一餐之交的县委王书记的举动传到我这里时，正合了我的这种心理需要。如若在今后可期待的某一个年份，民间和市井里更多流传的不是那些讽喻性的笑话和顺口溜，而是如渭北的王书记的好口声，我敢肯定从地方到中央反贪机关的成绩将会逐年萎缩，当是国家和人民的头等幸事。

朋友老梁讲述的王书记的故事，之所以引起我共鸣的又一个诱因，是我所在的单位正开展“三讲”。“三讲”的内容和目的无须赘述。我在阅读江泽民的著作时，有一句话引起我的震惊，即：堂堂正正做人。

震惊来自对这六个字的直感。在我的记忆里，自稍知人事的童稚时代起，父亲便要求堂堂正正做人。在念书求知的各个学段，不仅父亲尤其是老师，无一不是把“堂堂正正做人”作为最基本的修身准则尺量我们。“三讲”的对象是县处级以上的领导干部，百分之百的共产党员，对他们现在提出“堂堂正正做人”这样的警示，其实只是作为人的道德修养的ABC，是基础；是无论工人、农民、小贩、商人、普通干部等各种职业的人，无论贫富无论智商高低无论性别无论长幼无论宗教信仰的各色之人，立身行事的最基础之准则，是任何一个父亲母亲和哪怕是最平庸的教师，都会对自己的子女和自己教授的学生一以贯之毫不含糊地当作基础品格实施培养的。然而这个话是由总书记说的，有点痛切的味道，对象却是县处级以上的中高级党员领导干部，肯定不是无的放矢。那么我就可以放胆推论，在县处级以上党员领导干部的庞大队伍里，起码有一些人在做人的ABC的基本之点上出了问题，不那么堂堂正正。既然自身都堂堂正正不起来，那么怎样去实施自己的职能所要求的工作，怎样去实施党所赋予他的在他负责的地域或领域的使命和任务？结论是无须点明的。如果连堂堂正正都做不到，那么他的政治信仰、主义、理想全都会飘忽游移，甚至只是一张招牌一块遮羞布而已。

然而总书记不会是随随便便讲这个话的。进而想想，“堂堂正正做人”，对任何人来说，都不会是一次性完成的；在人的生命历程的任何一个阶段，都存在“堂堂正正”能否继续的矛盾和选择。在广泛如“文化大革命”局部如自己所处的具体环境里，邪恶之势逼压以至残害人的时候，能否保持从信仰到灵魂到身躯的堂堂正正？在已经呈现前所未有的进步繁荣也同时出现前所未见的纷繁复杂的社会生活面前，权力的诱惑和物欲的诱惑都在对“堂堂正正做人”这个基础进行无休无止的冲刷，能招架得住吗?

昨天顶住了一万元的诱惑，今天却屈从于十万元的诱惑，昨天堂堂正正是个人，今天就“堂堂”不起来也无法“正正”了；顶住了金钱物质的诱惑，却在传情的眉眼旋飞的彩裙里陶醉了沉迷了，“堂堂正正”了半生的躯体从此怎么也硬撑不直了；昨天做着副手兢兢业业“堂堂正正”，今天提升为第一把交椅，权力和声威突然之间能够作用到所辖领域的一切角落的时候，在真诚与比真诚更富迷惑色彩的巴结逢迎之间发生迷乱，甚而落入鲜花、笑颜、涎水、金币和大腿铺设的陷阱，何论“堂堂正正”；接受卖官的贿赂，必然再去行贿买官，以满足无限膨胀的权欲和如影随形的物欲，官位高升的同时，灵魂却龌龊了人格也矮化萎缩了，自然没有“堂堂正正”这个做人的基础工程了。

朋友老梁讲述的渭北王书记的故事，让我感受到天地正气的痛快，获得阡陌与市井间的好口声，不仅是合理的，也是党心民心所期待的。我愈加自信这样一个人生信条——“苍山无言，江河有声。”

2000年4月13日 汉中

活在西安

又一部历史题材的电视连续剧《大明宫词》轰动了，西安一家发行量居高的报纸在报道这一久违的盛况时用了“风卷荧屏”作为标题词，是没有夸张的。我也是被“风卷”的一个观众。是的，似乎好久好久了，屏幕上甩来晃去的尽是那根令人作呕的猪尾巴式的辫子，恶心到使人吃饭时不敢轻易打开电视。《大明宫词》使我看见了别一种形态的中国人，即距今大约一千五百年前的中国唐朝人的生活形态，尽管这种生活形态基本局限于宫廷深闱之中，尽管这种生活形态只能看作是千余年后的今人对唐人的猜想和模拟，然而仅那服饰、发型、礼仪和宫廷的建构和饰物，似乎都显示着一个年轻王朝的气度和活力，起码少见猪尾巴辫子里的油垢所散发的龌龊和卑琐。且不论宫廷王座上下演绎着怎样惨烈的争夺，也不论大明宫里的争夺和拖着猪尾巴式辫子们在故宫里的争夺有何相似相异之点，我只是有一种最肤浅最外在的感觉，在我们的漫长的封建帝制的历史中，处于鼎盛时期的唐人和处于帝制末日的猪尾巴们的差异，譬如一个青春汉子与一个垂死于棺材边沿的昏朽者的那种既十分截然又难以叙说的差异。

看着屏幕上那些唐人的雍容和威仪，女人们包裹很浅的胸脯，我的思路总是偏离开颇为激烈紧张的剧情，陷入作为一个纯粹的西安人的癖好：这些人和这些人的曲折的故事，就发生在那时称长安的今天的我生活着的西安吗？她们拖地的长裙和高贵的软靴，就拖在踩在西安北郊的那片被荒草掩遮着础石的大明宫遗址里头吗？简直不可想象也不可思议，西安曾经在千余年前那么风光那么神气过？就是被外地人甚至本地人几乎一致看作封闭、顽固、落后、逃之唯恐不及的西安

吗？面对那个只容许想象而不堪对照的辉煌，后来的西安人的我直是觉得羞了唐人这个祖宗先人了。

手边正好有一本刚刚出版的第三期《延河》杂志，刊登着上海女作家潘向黎的散文《东边我的美人西边黄河流》，开篇便直言不讳——

——你愿意生活在哪个时代？有一天，突然有人这么问我。

——唐朝！当然是唐朝。作为中国人，我想象不出比那个时代更让人向往的了。

潘向黎的这篇散文写得见情见性，挥洒自如，字里行间跳荡着她如同咸阳原上游侠少年那样饮酒纵马的豪情和逸致。那个时代的唐都长安的繁荣和文明，我是无法想象的。据说包括日本等周边邻国和以卷发深眼美髯为特征的波斯人，求学经商学佛取经以及朝拜者无以数计，单是取得“绿卡”长年定居长安者不下三万人，不少人已经进入长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有的甚至进入王朝深宫的中枢神经。高度的文明和超级的繁荣产生吸引力，也拥有自信、雍容大度和巨大的包容性，对外可以容纳整个世界的来宾，对内自然不会在乎咸阳原上最早出现的那些类似“嬉皮士”式的游侠少年的飞扬跋扈和放荡不羁了，恐怕只有小气的王朝才计较百姓口里说了什么脚下踩了什么。

千余年来，这个长安一步一步萎缩下来，明洪武年间重新整修的保存至今的这一圈城墙，尽管在全国属于独一无二的规模最大最完整的古城墙，其实仅仅只是唐长安城的七分之一。我曾泛起小孩的童趣加以想象，也终究想象不出七个现今西安城区的规模会是怎样的一种格局和派势！真是无可奈何花落去，废都的萎缩是不可逆转的。

最可怕的萎缩在心理和精神上，自信不起来，雍容大度也流失一空了，落后陈旧所酿制的过时的腐气和霉气挥斥不去。外边的人来这个城市的目的，首先是看地下埋藏的作为往昔文明和繁荣的殉葬品，陶制的秦军兵阵所模拟的阴司其实吓不住一只苍蝇的威严；或是偷窥唐公主墓道里已经脱皮掉渣的壁画上女人们敞开的胸脯，不无淫酸之气地啧啧一声：“我们的祖先早就‘性解放’了嘛！”落后就要挨打，这是就一个国家在世界格局中的情形而言：在一个国家之内，落后的地区和落后的省份就会被轻视被不在乎，甚至连落后地区的本地人也常常自我嘲讽和自轻自贱。有一位来自较发达城市的作家逛了一圈西安，然后把逛感发表在西安一家报纸上，最引人注目的一句结论是，四堵城墙封闭着西安人的思维，西安端端正正的“井”字形街道造成了西安人的思维的简单，因为走路不拐弯也就不动脑筋了。如果这话可靠这个诊断准确，我真想建议省和市的领导拆除城墙，同时把“井”字街道改造成曲里拐弯的形状来，起码让后世子孙从学步就开始走弯路动脑筋形成复杂思维，只怕未来的子孙嘲笑提出这个观点和实施这个药方的人同样犯下简单思维的幼稚病。没有办法，活在西安的我，现在还得忍受诸如这种简单到轻薄的思维的轻视。

近年间，省和市的党政领导不断更替，然而一个决心却一脉延续下来，这就是：重振汉唐雄风。切实地想来，这个距离是比较大比较远的。作为古长安和广而大之的三秦地域的当代领导人，以如此的雄心和使命感去奋斗那个汉唐雄风的目标，确是令人鼓舞的。其实，西安和陕西已经有许多可以骄人骄世的且是无可替代的“拳头”了，一位在国防工业系统的作家告诉我，五十年大庆通过天安门广场的天上和地下的兵器，其中一半均产自陕西，长起的就不只是西安人的自信和豪情了，只是这些家伙不能像粤港京沪的新型消费品摆上超市的柜台，然而一个民族的脊梁却毕竟硬朗起来了。

汉唐雄风，一个遥远的梦。当今中国的发展方略能够产生这样的梦，也能实现这个美梦，肯定不是一代两代人的事，然而开发西部的方略已经启动，行程已经开始，总是会逐步接近以至达到的，到那时我将会是一个幽灵，邀上也许还健在的潘向黎，去观赏咸阳原上超现代的游侠少年的风姿，当是一种慰藉。

2000年4月18日 汉中

动心一刻

下班了就有松懈和慵懒，悠悠地走在回家的小巷里，整个上午对几茬子来人说过什么话大都忘记了，如此而已。

突然听到背后有人连声叫着“爷爷”，想到自己尚不可能有在街巷里跑着玩着的孙子，便放心地继续优哉游哉地移步前行。未几，真有一个孙子抢到我前边挡住去路，喘着小气说：“陈爷爷，听说新办公楼盖好了，要买新乒乓球案子？”

我随口答道：“是的。会买的。”

他竟然发出挑战：“那咱们比赛一场？”

我略有迟疑，随之反问：“你为啥要找我比赛？你的同学伙伴不是很多吗？”

他也略有迟疑，稍现羞涩，还是坦陈原委：“因为我输给你了……”

我心里一动，真是始料不及，正为白捡来的这么一个俊气的孙子得意，不料却是要求“复仇”而且当面送来挑战书的“敌手”。正应了一则民间笑话，一个农夫捡到一封包装整齐的点心喜不自禁，打开来却是一只刺猬……我看看这位挑战者，白净的脸膛，睫毛很长的眼睛，俊气而漂亮，瞅着瞅着竟发觉有点面熟，也想在“决战”前先了解一下“敌手”来自何方姓甚名谁。我刚一发问，他便答道：“我是×××的孙子。”我便明白了，×××是另一家协会的老编辑，已经退休，就住在我

们单位的另一座住宅楼上。其实这个小家伙也不是生人，常在机关下班后，和一伙孩子乘虚而入，爬梨树捉迷藏，把楼梯上宽大的水泥护栏当作溜溜板爬上溜下，我却根本搞不清这一伙孩子是谁家的儿女或孙儿孙女。我说：“好哇，趁着我现在还可以上乒乓球场子，你来试试。”小家伙满脸欢悦地说着“谢谢陈爷爷”，临走还给我鞠了一个九十度的大躬。我竟很感动。多么文明的一位挑战者！×××教养出来这么可爱的一个孙子！

我继续优哉游哉走过小巷，渐渐记起来，前几年机关买了一台乒乓球案子，因为没有房子安置，就支在露天院子里。男女工作人员和编辑们常在工间休息和工余打一阵乒乓球，常常为胜负而耍孩子气，常常打得大汗淋漓红颜浮现，以坐为职业特征的机关院里便有了一股活气和生气。我也是乒乓爱好者，球技平平却有几十年的挥拍史。正经比赛和一般玩耍或打球，自然都要分个胜负，得胜的小小得意和失败的小小不快都发生过，一旦离开乒乓球桌便自动消解。我隐隐记得可能与这个小孩子打过一次或两次，胜负早已不存记录了。然而这孩子却记着。

这将是一个无须判断结局的比赛。可以设想即将到来的这场比赛他又输了，按他的这种优良的不服输的个性，肯定还会向我发出挑战书的……直到他取得胜利。这里存在一个不可逆转更不可论比的条件，便是年龄；他处于少年而我已跨入老年，他训练球技的时日太富裕而我早已不在这方面下功夫了。他肯定是总体上的胜利者，这是无须判断也无须等视的结局。我倒是另有心动的一面，如果这个孩子规规矩矩走到我面前说：爷爷你打得好我打得不好我很服你请你教我打球吧！我肯定赞赏他的谦逊和礼貌，也会在相遇的球场机缘里帮他练

点基本功，然而肯定不会引发心动，不会感到某种挑战的咄咄逼人的少年壮气的冲击。

这个马路上捡来的孙子发出的挑战，使我泛起相仿年纪里我的美妙记忆，背一周的干粮（馍）走五十里路进入西安，一日三餐都是开水泡软的玉米面馍馍，竟然在爱上文学的同时也迷上了乒乓球，常常是一边啃着发硬的馍馍一边抢占乒乓球台子。文学创作后来成为我毕生难舍的职业，乒乓球也断断续续伴着我成为名副其实的业余玩具。

经历过生活的演变也经历过人生的坎坷之后，常常容易感慨，容易以当下发生的事与过去发生过的事互为参照，容易发生由今日之事勾连起往昔里那些尘封沉寂的琐事屐痕，往往令自己心里一动，陷入一种陈年佳酿般的迷醉。人生无论从事什么职业无论崇尚何种理想，可贵在那么一股不服输的气（这气当然不是赌气，此气非彼气）。输是正常的，失败也是正常的，输十次失败十次甚至更多都是正常的，关键在于去争取第十一次的赢或成功时的气还足否？如果输不起也失败不起因而撒了那一股气，便永远消失了赢和成功的机会和可能。

这个捡来的孙子的可爱不单在那一张俊秀的脸膛，而在那一股不服输的气。我便想了，他在赢我之后，应把下一个对手瞅到刘国梁或瓦尔德内尔身上，那是乒乓世界的顶点标志。目标远了高了大了，气会蕴积得更壮，无论对他个人和这个民族的未来，都特别珍贵，乒乓球不过是一个喻体而已。

动心的一瞬之后反躬自省，尽管有了这样的年纪，那个底气还应不断蕴蓄，以备新的行程。这个马路上捡来的孙子肯定只想着赢我这样一个业余水平的老球员，却不会料及他的行为本身给我的人生警示。快哉善哉。

2000年4月29日 西安

取名

给即将要写的或已经写好的文章取名，有时竟是一件颇不容易的事。取不到一个恰切恰当的名字，常常使人心里很别扭。相反，如果能取来一个含蓄而又准确的篇名，是件十分愉快的事。时过多年，偶然翻出某一篇自以为满意的篇名，连自己也会惊奇，当时怎么就想到这样一个别致的名字，真是敝帚自珍。

为自己的作品取名，常见的是以作品的主人公命名，包括绰号，以人物生存或故事发生的地点命名，以故事发生的时间命名，以景物命名，以作家的某种强烈的主观意识命名等。这些都是古今中外的作家通常为作品取名的途径。还有许多使人无法料想的精彩的书名和篇名，读者刚一接触，就会产生某种神秘感，就想穷其内幕知其究竟，产生强烈的阅读兴趣和欲望。如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原苏联作家艾特玛托夫的《一日长于百年》，美国两位诺贝尔奖获得者海明威的《丧钟为谁而鸣》和斯坦贝克的《愤怒的葡萄》等，不胜枚举。

在我的写作经历中，为作品取名有几种情况发生：一种是构思之初，就有一个篇名跳出来，动笔时先在首页写上篇名，直到写完全篇，对这个篇名都未发生动摇和变化，这个篇名就确定下来。至于这个篇名取得好与不好，且不论它。再一种情形是开篇之前确定的篇名，在写作过程中被一个突然冒出的新的篇名所挤对，所动摇，于是就改换一个名字。又一种情形是写作之初怎么也想不出一个恰当的名字，于是就先写文章，把稿纸上本应写篇名的位置暂且空置着，期待

写作过程之中或写完之后会冒出一个自以为可用的名字。如此等等。其中有几个篇名的取得，是很有趣的事。

大约八十年代中期，我正热衷中、短篇小说写作。有一个短篇小说起初取名为《野蔷薇》，草拟到不足一半时就没有耐心再做草稿，从感觉上以为完全有直接写稿的把握了。正式写稿伊始，便更换了篇名，改为《到老白杨树背后去》。这个更换篇名的举动是始料不及的，起初丝毫也没有想到的名字，在起草到不足一半时，作品中“我”的一句对话冒出来，正在写作的我的心悸颤了一下，不仅觉得“我”说出了一句美妙的话，对完成本篇的自信心也突然强大起来，连继续草拟的耐心也没有了，连作品的篇名也在这一瞬间重新确定无疑了。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的陈绪万先生，经营有方，把个出版社搞得红红火火，“日进斗金”，发财而不忘记文学，在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文学书籍出版出现困难的危机里，拟定了“又一村”文学丛书，为陕西一大批作家积压书屉的作品捆束成书。我是“又一村”的第二拨得益的“村民”，编成我的第二本短篇小说集，命名为《到老白杨树背后去》，送交编辑部。丛书出版后，我去拿样书，走进一间办公室，围坐着四五个男女编辑，我报出名字并说明来意，编辑们哄然大笑起来，弄得我有点莫名其妙。随之经一位编辑解释说，在我进门前，他们正在开着一个由我的书名引发的玩笑，某女编辑问一位男编辑另一男编辑干什么去了，答曰：到老白杨树背后去了。由此引起哄然大笑，笑声尚未完全止息，我正巧走进来，真是赶巧了，于是再起笑声。笑声稍息，那位男编辑热情有加，先招呼我坐下，再端来一杯清茶，然后意犹未尽地问：陈老师，你怎么想到这么好一个书名？我一时也说不明白。另一位编辑告诉我，这本书出来，他们就为这个名字所神秘，先读了那篇《到老白杨树背后去》的短篇小说，朋友们之间

开玩笑，顺口一句就说某男与某女“到老白杨树背后去了”。而作品本身的内容，是写几个乡村少年男女在山野里模仿农村婚嫁的游戏，以“老白杨树背后”作为模拟的洞房……

今年初春时节，我为同代作家王宝成一部即将出版的长篇小说《心境》写序，心里竟然是一种诚惶诚恐的感觉。宝成创作刻苦，著述甚丰，既有大卖的小说出版，又有影响面更广泛的影视作品传播民间，我为其作序，难免产生自信心的不足。最后确定下笔，仅仅基于一种理解，即我对王宝成的作品和为人的理解这一基本点上，算作朋友间的交流和置换。然而，思虑再三，却取不到一个恰当的篇名，又不甘心用一个简单的“序”字了结。于是便按既往的惯用办法，篇名先空置着，尽管去写自己要说的话，说不定在写作之中和完成之后会冒出一个意料不到的好名字。

果然，这个期待没有落空，在写到第五节的末尾（共六节）时，谈到对中篇小说《故乡麦月天》的阅读感受时，涌出“依然是诗性的，是一篇深沉得令人不敢轻率翻揭书页的中国乡村的土地诗篇”的句子来。写到这里时，我的心灵深处微微颤动。我终于明白过来，通篇写作过程，都是企图寻找我对王宝成的真实的透彻的准确的某种感知和感觉；我终于抓住了，就是如上引文的那种情形，一旦抓住了，自己首先激动了；我终于期待到了一个可以冠取全篇的名字：《你写的书，让我不敢轻率翻揭》。

这个篇名，道出了我对王宝成作品阅读的最独特的感受。宝成的小说，人们可以以各种审美视觉和审美兴趣说长道短，可以喜欢或不喜欢，然而你不会在阅读之后产生轻率乃至轻视的情绪。他的艺术表述的内涵和形式，不容亦不致使读者产生那样的情绪。作品内容的深沉和艺术形式的严谨，浓厚的自传色彩所渗透的作家自身的人格精

神，都昭示着这种浑然一体的艺术气质和气象，容不得轻率和轻视的。文坛上常有一些堪称重量级的大作家，往往抛出一些扯淡的货色，当我奔着那个响亮的名字去阅读其文之后，却发现这家伙不过打了个喷嚏，或者是在抓脚气引发的痒痒。于是，阅读的失望必然引起轻视，起码可以轻视这篇抓脚气痒痒打喷嚏之类的文章。就我所读过的宝成的大部头和短文，似乎没有这类货色。

找到了独特的准确的感觉，也取得了一个自以为恰当的篇名，真是令人不胜快乐。

2000年5月1日 雍村

自题照片

这张照片寄来时，连我自己都愣住了，我居然还能笑出这番模样！摄影师们总是喜欢拍我忧郁的表情，尤其对我脸上纵横交错的皱纹更感兴趣，于是我就有了许多种以皱纹为表征的大同小异的照片，于是报纸和刊物提供给读者的大都是大致雷同的表情的脸，美其名曰水土流失的黄土高坡式西部男人的脸。这固然是我的丑陋的脸，然而见得多了，连我都怀疑自己是否还会笑。这张照片是在《中国作家》杂志召开的编委会上，由都沛先生随机抓拍的，使我看见了笑着的自己的脸，让我也获得了少许自信：我还保存有笑的这一面。

2000年5月1日

（冯剑华女士为她主编的《朔方》封二《作家自题照片》栏目约稿，遂有此短文。）

拜见朱鹮

中国有熊猫，世界独一无二，国宝。

中国有朱鹮，同样独一无二，同样为国宝。

朱鹮在中国，也只是在陕西洋县一地有。洋县在秦岭南麓，汉江边上，有平坦的坝子，有曲线优美舒展温柔的缓坡，有重叠起伏一袭秀气的丘陵，有挺拔伟岸弥漫着原始森林气息的秦岭群峰，有如画如诗的田畴和稻地，更有性情温和天性怡然的乡民……在世界各地的朱鹮相继灭绝（日本仅余一只失去繁育能力的老鸟）的现今，洋县却存留住了这种鸟儿。

想到今天就可以看到朱鹮，竟有拜谒的激动和忐忑。这种心态源自既久的关于朱鹮的传闻的神秘。九十年代初，第一次从报刊上看到在陕西洋县发现朱鹮的消息，看到了这种前所未闻的稀世珍禽的倩影，尽管报纸上照片的印刷质量极差，然而这鸟儿的仙姿丽影依然飘逸显现，留下来一个梦幻丽人的记忆。那时候，同时就滋生了想一睹其风姿的欲望，整整十年了，曾经有过下汉中途经洋县的行程，却没有机缘去攀见，欲望便滞积在心里，愈久愈强烈。

十年里，有关朱鹮的印象不断地加深着，报刊和电视上不断有关于朱鹮的消息，都是令人兴奋和欣慰的：最初发现的几只朱鹦安全无虞。国家已经在洋县建立朱鹮救护基地，并派出专家精心养护。日本友人捐资救护朱鹮，有社会团体也有个人。更令人振奋的消息说，在洋县某地又发现朱鹮聚生的群体。十年下来，朱鹮的族群从最初的几

只已经繁衍到两百只，成为一个令世界惊羡的华丽家族了，这个濒临灭种的鸟类珍品注定不会从最后一块栖息之地消失了。

朱鹮在南美的丛林里已经消失了，不再重现。朱鹮在日本仅存一只，也到了年迈色衰失掉繁殖本能的奄奄状态，绝灭是注定了的。日本国民为这种鸟儿即将面临的灭绝，几乎举国哀怨，且有自省，他们的许多东西都趋世界前列，而一个小鸟的保护却屡遭失挫，以致眼巴巴看着它绝世而去。朱鹮被日本人视为国鸟，有某种悠长的情结。据说日本人通过几种途径渴求得到中国朱鹮，以弥补国人心里那份永久的遗憾和亏欠，直到天皇访华向国家领导人提出这种愿望，于是就有一对名为“友友”和“洋洋”的朱鹮从洋县起程东渡日本，一路专车监护，经西安，举行隆重的赠送仪式，然后直飞东邻岛国，使人想起那位出塞的汉家女王昭君。我在到达丘陵缓坡下的朱鹮救护基地时，有一位日本人刚刚离开。确凿无误的消息说，一九九八年东渡日本的“友友”和“洋洋”已经成功地哺养了第一只后代，作为日本国鸟的朱鹮有了第一个递增的数字，据说又轰动了日本。

我在电视上看到过有关朱鹮的专题片，一袭嫩白，柔若无骨，在稻田里踯躅是优雅的，起飞的动作是优雅的，掠过一畦畦稻田和一座座小丘飞行在天空是优雅的，重新落在田埂或树枝上的动作也是一份优雅。这个鸟儿生就的仙风神韵，入得人眼就是一股清丽，拂人心肺。头顶一抹丹红，长长的紫黑的喙的尖头竟然是红色，两条细长的腿红色惹眼，白色的翅膀的内里却是红色的，像是白面红里的被子，通体嫩白中点缀着这几点丹朱，凭想象尽可以勾勒它的美妙了。

凭着积久的印象和愿望，在即将见到朱鹮的真身时，就有了某种拜谒至仙的感觉。我在朱鹮救护基地看见的朱鹮是笼养的，未免遗憾，它们无法飞翔起来，只能在人工搭设的木架上栖息，在笼子圈定

的沙地上蹒跚，在人和鸟共同筑成的巢窝产卵孵卵。四月正是朱鹮的繁殖期，不能惊扰。据说受了惊扰的雌鸟激素会受影响，减少产卵数量，我就甘愿远远地站着。

另外的遗憾还是因为时月。处于繁育期的朱鹮，羽毛竟然神奇地变换了，变换出一身的灰色，据专家说这是鸟儿为了保护自己以迷惑天敌的生理性转换。白色的羽毛已经变成灰色，从头到尾，那灰色也有深和浅的不同层次，深灰浅灰和灰白色，像是野战将士的迷彩服。这种羽毛在季节中的变化，最初连专业人员也发生过错觉，以为在山野里又发现了朱鹮的“新新人类”，后来才知闹了笑话，仍然是朱鹮，灰色的朱鹮是白色的朱鹮适应生存发展的一种色变。

灰色的朱鹮头顶上耀眼的丹红暗淡了，长喙尖头的红色也变成铁红了，长腿的红色也收敛了艳丽，只有翅膀内里的红色还依旧鲜亮。为了繁育后代，为了繁育期卧巢和不能远行的安全，这鸟儿一身素装，把天生丽质隐蔽起来，像最爱美的少妇在月子里的不修边幅和甘愿的邋遢。对我来说，遗憾虽然有，毕竟见到了真实的朱鹮，优雅依旧，神韵依然，囚在笼子里的栖卧和蹒跚，依然不失其仙风神韵的优雅。

为了防止最丑恶的蛇和老鼠偷食鸟蛋和幼鸟，偌大的笼子用罕见的细密的钢丝织成围就。我无法想象蛇和鼠对朱鹮生存的威胁和残害的惨景，然而自然界从来就是这样混生着。专家还告诉我，养在笼子里的朱鹮，最初是从野外抢救回来的“老弱病残”，经人工科学养护脱离危险，它们就不习惯笼子里的囚守般的限制往外扑逃，常常撞到丝网上而伤翅破头，感染溃烂致死。于是就在网内再设一层软网，有效地解决了这个棘手的问题。正是这一道软网，使日本人感到自己脑袋

还有不开窍的那一面，能造出世界上最好的汽车和电器，却想不到这一张软网，致使饲养的朱鹮屡屡发生撞伤以至死亡的惨事。

我还是想看到纯如白雪公主的朱鹮，还是渴望观赏朱鹮在稻田和缓坡地带飞翔在蓝天白云下的仙风神韵。需得等到秋天或冬天，朱鹮的幼鸟也能翱翔天空时，哺育和监护后代的使命宣告完成，就逐渐变换出嫩白的羽毛和几点惹眼的丹红，就可以看到掠过水田和绿树的仙姿神韵了。

留下遗憾，也留下依恋和向往，待秋后满山红叶时，再到洋县朱鹮聚居的山野来，再做礼拜。

2000年5月3日 雍村

威海三章

“天尽头”的咒符

朋友说，你到了威海，应该去领略一下“天尽头”的风光。随之又附加一句警告，如果你不怕丢官的话。

这种警告自然纯属调侃和玩笑，谁也不会上心不会在乎的。于是便踊跃着来到天的尽头了。

天尽头，其实应该是陆地的尽头，是陆地伸进黄海最远的那一块巨礁，是中国版图上属于山东省辖的海岸线伸入海域最东端的那个“尖儿”。我现在就站在这个号称“天尽头”的“尖儿”上，真有一种走到尽头的感觉了。满眼都是涌动着的灰黄色的波浪，波涌迭起的浪堆掀起雪白的水花，骤起骤散，骤散又骤起，一刻也不停歇。风是平和的，海浪和波涌便呈现着宽容和优柔。

终生都生活在内陆西安的我，每一次面对大海，襟怀里感知浩渺阔远的无与伦比的气象的同时，总是潜伏着一缕不知所措的茫然。大海对我来说太陌生了。第一次看见大海是陌生的，第十次看见大海仍然是陌生的。二十年前在青岛第一次看见大海，不必说是新鲜而又陌生的；又一次在西西里岛上看见的几乎是黑色的地中海仍然是陌生的；在珠海，在台湾海峡的这边和那边，面对苍茫海天的陌生和新鲜，以及潜伏在深处的那一缕不知所措的茫然……毫无办法，海距离我太远了。

其实，我每一次站在海边的礁石上，都产生过走到天尽头了的感觉。其实，海岸上的任何一块礁石都是陆地的尽头。然而只有这里独占着天尽头的命名，而且起码有两千多年悠久的历史，恰恰却是因为民间俗成的一个恶谥或咒符。

恶谥或咒符来自千古一帝秦始皇。始皇帝一统天下，东巡到此，心情自然是好到不能再好的程度了，已经走到天的尽头了，就在这里筑造大桥以延伸视线，观赏日之出海。在“秦桥遗迹”的碑石上，刻着摘自《三齐略记》的一节文字：始皇造桥观日，海神为之驱石竖柱。始皇感其惠求见。神曰：“我丑，莫图我形当与帝会。”帝始入海四十里，与神见，左右有巧者，潜画其像。神怒曰：“帝负约，可速去。”始皇转马前脚才立，后脚遂崩，仅得登岸。这个神话故事虽然也称得神奇与美妙，却毕竟只是一个传说的神话，类似的神话在中国的所有历史或地理的风景点上都津津乐道着，没有人认真地刨根问底的。因为所有神话和传说都无法推敲其合理性，更谈不上事实的考证了。这个传说里的那个巧者的形象颇耐人回味，自以为偷偷摸摸的行为可以掩人耳目，却忘记了是在无所不察的海神的眼下，搞这样的小动作只是弄巧成拙，坏了始皇帝的好事。

始皇帝从天尽头返回秦都咸阳时，暴病死在路上。这个天尽头从此便蒙上了一层黑色的恶谥，不祥的咒符，已经走到天的尽头了，已再无路了。据说许多历史上的官人多避讳此地，宁可不图一时观海之眼福，也不想让恶谥咒符在心里罩上一道阴影。

真是有点底虚过甚了。

街心的碑

到威海的当天晚上，出去观赏这个海滨城市的夜景。走到一个三股车道交叉的三角地带，有一小块街心草坪，时值五月，青草正绿，茸茸可爱。草坪里散落着一株株枝干苍劲却不高耸的松树，错落有致，枝叶参差出一抹绿色的流云。草地中间竖立着一块玉石三棱碑，看了碑文才知是收回威海卫纪念碑。街道上灯光朦胧，碑文有多处被风雨侵蚀变得模糊的字句，读来十分吃力，便只好放弃阅览。

隔日下午，得了闲空儿，心中仍念念着那块碑上的文字，不堪留下遗憾，就专意奔着这块三棱碑来了。

碑文有如下内容——

“甲午战败，俄租旅大，法租广州湾，英人藉口均势，于民国纪元前十三年七月一日即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十三日租借威海全湾十英里以内之地，及湾内各岛，并规定于必要时可利用威海及后山一千五百平方英里为军事上之设备。民国八年巴黎会议，我国山东问题交涉失败，威海收回几成绝望……

“（民国）十九年四月十八日，经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王正廷与英使兰普森几经周折，正式签订收回威海专约二十条，协定六条。……于同年十月一日正式收回，前后租期共三十二年有二月。”

我从碑文里摘记的这一部分内容所概括的那一段历史中的耻辱，早在中学的历史课本中领受过了；对国家和民族的耻辱的心理承受能力，从识字伊始直到现在，终生都在进行着这种磨炼。然而，我还是在这个碑石下无法不心动，想来大约是这样几处触及我的敏感和易痛之处——

历史教科书毕竟是文字，我站在被租借过的威海卫的街心和收回威海卫的纪念碑下的感觉，是教科书上的文字阅读无法产生的。历史的耻辱就浸润在我脚下的土地里，青草和松树就从耻辱浸润过的泥土里蓬勃起来的。

这篇碑文有几句话尤使人感到刺激，之一便是“英人藉口均势”。这个“均势”的最本质最龌龊的含义便是，从一头被宰割分食的牛身上，英人抢到手的肉还不够多，还不“均”，于是便提出再“补贴”上威海卫这一块。我现在更贴切地理解了中国的一句成语“弱肉强食”，真是语言中的经典。我又想了，进入现代文明国家的英人、俄人和法人，仅仅在百余年前，还是争相宰割中国人的起码不大“文明”的人，为宰割分赃而喊着争着的“均势”，任何文明的遮羞布都是无济于强盗的原形的；今天的文明只说明今天，同样抹不掉遮不住他们祖先的野蛮。这样，羞耻应该是双重的——

我们承受的是被宰割的历史的耻辱。

他们承受的是宰割别人的耻辱的历史。

这个碑石立在这里，昭示的应该是这样的意蕴。

哦！刘公岛

站在威海的海岸上，刘公岛就横在眼前，避绕不过，不是因为岛子太大，恰是因为距离太近。小小的一个岛。

登刘公岛时，有白色的雾笼罩着海。

赴刘公岛的船上，湿溜溜的雾气拂面而过，海面变得迷茫混沌，心里也是难以理清的复杂，既有参观一个陌生岛屿的稀奇与新鲜，又潜伏着挥之不去的悲伤与苍凉，又兼蓄着凭吊千古英魂的虔诚与神圣。这个小小的刘公岛，该当是中国海疆里知名度最高的一个岛了，不是它的风景风光风水的奇巧或神秘，恰恰是它蒙受的耻辱。中日甲午战争就发生在这里。这个小小的刘公岛，替代一个国家和民族首当其冲遭遇了凌辱和羞耻，也替代一个国家和民族记录下中国第一代水兵将士喋血的庄严和凛然。

我登上刘公岛的诸种复杂心理中的最强烈的一点，还是准备接受历史的耻辱的洗礼。那生铁铸成的粗可搂抱的炮筒，曾经发射过抗御倭寇侵略的炮弹，现在供游人抚摸。那座指挥北洋水师的提督衙门，现在成为游客温习耻辱和心祭忠烈的祭坛，提督丁汝昌就自杀在他的这个衙门里。那一枚鱼雷是从德国进口的，应该是当年最顶尖级的武器了，躺在这里让后来的我们叹惋。

我更铭记住了一个历史性的细节。“致远”舰管带邓世昌为掩护旗舰“定远”号开足马力直撞日军旗舰“吉野”号，被敌炮击中要害，锅炉爆炸，顷刻沉没。这个悲壮的过程在电影《甲午风云》里得到充分表现，然而关于邓世昌的一个细节却被舍弃了。邓世昌坠海后，侍从泅水将救生圈送来，邓世昌拒绝救护，自沉自杀。他的爱犬随之凫水来到身边，用嘴叼着邓世昌的发辫，救他浮出水面。邓世昌将爱犬按入水中，一起沉入大海。这是怎样超乎艺术想象的一个生活细节，一个铸成历史悲剧的生活细节！

中国第一支水军在甲午海战中全军覆没，除了历史和军事学家总结的种种败因和教训之外，有两个事实值得后人反复咀嚼：一是当时的北洋水师的总军力排亚洲第一世界第四，舰艇总吨位达四万吨，“二

十五艘舰艇齐泊于刘公岛前，舳舻相接，旌旗蔽空，盛极一时”。然而战争的结局是全军覆没。二是所有舰艇的将士，不仅没有逃跑投降的，且一个个都是战死，或是自杀，直至提督丁汝昌。应该说，从纯粹的军人的素质和牺牲精神来说，也应该是第一流的军人，然而依然挽救不了战争的败局。

丁汝昌、邓世昌们代表一个国家和民族抗击另一个国家的侵略和征服。然而他们撑不起一个腐朽王朝的腐败乃至溃烂的肌体。活着也承受不了失败的耻辱。无论从一个军人，无论从一个民族的精神来看，他们接受后人的崇拜，都是这个民族脊梁里永远不可缺失的钙。

温习耻辱，铭记耻辱，不在复仇。无论战犯认罪也好，不认罪也罢；忏悔也罢，不忏悔也罢；首先是我们自己该当图强。

哦！刘公岛。心中难言的隐痛之岛。

2000年7月

球迷希尔顿

如果除去头部和身上的象征性装饰物，如“肥狼”的狼头头套和“铁哨子”的黄布袍子，在万众涌动的足球看台上，我第一个辨认出来的肯定是希尔顿。

希尔顿有一个超乎常人，也与他身体比例失调的大号脑袋，这是天然标志。那颗大脑袋里储存的全部都是与足球有关的语言。那些语言富于激情富于智慧富于幽默，而且十分敏捷，一旦遇到足球赛事和足球话语的撞击，瞬即便引发反响迅速组合，形成抛撒不尽涌流不竭的快板快书，朗朗上口，易懂易传。往往是希尔顿一口泄出，迅即形成万众一词，形成波涛，卷向绿茵场上正在征战的球员。当然是鼓舞己方球员的同时，压力也倾覆到对方头上。有一出反证正好可以证明希尔顿语言的魅力，一家客队作赛前技战术演练，希尔顿和一帮球迷去观看，他唱起了快板段子，众球迷跟着合诵，客队球员一个个竟然沉迷在那些幽默而动听的快板词中，怎么也打不出教练规定的战术意图，气得教练收兵回营，由此可见希尔顿的语言功夫。我常常遗憾，希尔顿要是有条件接受大学中文系专业培养，九成该是中国当代诗坛的一位青年诗人。

我和希尔顿都爱看足球，在亚洲赛场完全倾注于中国国家队和中国奥林匹克队，尽管他们太不争气；在国内赛场完全倾注陕西国力队，一如既往为国力的保级和今年的升A而鼓劲，所以就有了共同的足球话语和共同的情感倾向。我和希尔顿在公众场合有几次接触，都很短暂，唯一的一次单独接触留下的印象自然更为深刻。夏天的某个晚上，希尔顿给我送来球迷协会的一张球票，让我很不安，因为距离

太远了，他又骑着自行车。他有点拘谨地坐在我的办公室里，说他从球迷协会回家途经这里，顺便把球票捎带过来。我才知道，希尔顿家住东郊，小时候读书有点耽误，也就没有资本去谋一个白领职业，现在自购一辆三轮车，为厂家、店家运送货物，自然都不会是长途，靠自己的苦累和诚实甚得信任，所挣月薪无须询问，吃饱穿暖就不错了。然而，他不仅主场看国力，客场也紧跟国力，花销大却仍然甘心情愿。

这天晚上，我和希尔顿聊了很长时间。他希望由我给球队写一首队歌歌词。我自知不具备歌词创作能力，又怕挫伤他的心情，就答应请既能写诗又能写小说的高建群出马作词，请赵季平谱曲。他高高兴兴离去时已经十一点多了，一辆半旧的自行车上载着一颗硕大的脑袋。那个脑袋在我眼前消失的一瞬，竟有点心动，多大多好的一颗脑袋！完全活在足球情感里的一颗纯净的脑袋。

如希尔顿一类的球迷才是营养足球发展的土壤、空气和水分。无论从运动的角度抑或从足球产业的角度讲，社会和诸方面皆不可轻视球迷这个营养源。试想，如若希尔顿这样的球迷某一天突然从世界所有赛场消失，注定将是足球运动的终结之日。

2000年8月23日 礼泉

如炬人生

和张炬第一次见面，相识，留下了狮子的印象。

是的，张炬脸上的所有器官都是鼓鼓的，雄壮的鼻头和阔大的嘴巴，尤其是眼睛，活脱脱一双狮子的眼睛，硕大的脑袋和浑实的体形，都给我造成一种雄狮的强烈印象。

和这种印象同样鲜明同样生动的是他的笑。笑声的纯真、自然和畅快，都是无与伦比的，不是官笑，不是商笑，更不是礼仪场合那种肉不笑的皮笑，完全是人的生理本能对于情感世界的自然表述，这笑就属于真实真诚率真的笑了。一个年届五十的人的笑颜和笑声，仍然让人能感受到天真，这笑声就留给我一个永久的迷醉。

和张炬的每一次相聚，都能享受他的高谈阔论，涉及绘画、书法、文学等诸多的艺术门类，及至儒家、佛家、道家。他阅读范围的广泛令我吃惊，由杂而汇集为博，由博而融会贯通出独到的艺术和人生的理解，听来十分新异。只有独到的见识和独立的体验，才能形成一家之言，才产生征服力。人云亦云或把人云巧饰为己云，最终都难免学舌之嫌。我因此而折服他的博学和感悟的深刻。是的，纯粹属于张炬的艺术体验和人生体验，自然就绝尘于官腔八股，绝无从洋人古人那里趸来新词旧话的自恃与卖弄。在张炬的高谈阔论里，在那种意味悠长的纯正的关中话所表述的情感里，我亲切地感知到一个艺术圣徒的执着与专注，由此而透出满腔的真实和真诚，才透出视野的开阔和胸襟里的大气。

我们那一次见面和相聚，是张炬富于浪漫诗意的一次策划。

时值清明，桃花初谢，杏花正繁，终南山里的野杏烂漫成一片片粉白的流云，浮沉在山坡上的沟壑里。他约画家崔振宽和我到终南山中的大坝沟去踏青，画家江文湛在那里正在构建他的山居别墅。他说之所以把老崔和我约到一起，仅仅是因为我们两人脸上有着类似沟壑般的皱纹，我和老崔便互相瞅着对方纵横着皱纹的脸哈哈大笑。这种以皱纹邀集类聚的方式，恐怕只能是张炬才会有的别出心裁的方式了。在江文湛即将落成的别墅外边的空地上摆开了野餐，四月的太阳晒得人脸上烫烫的，流水在脚下发出金属撞击般的清脆的响声，各种奇异的鸟的叫声从树林里传过来。人在漫长的冬季里缩紧的筋骨舒展开来了。正是这一次，张炬留给我如上两点强烈的印象。后来的几次重逢和相聚，逐渐深化着这些印象，成为我心目中关于张炬的一种独具个性魅力的形象。

张炬的高谈阔论里，常涉及当代文学和艺术领域里的各种流派，并不避讳具体的人和某件具体的艺术作品。他喜欢的就论说喜欢的道理，不喜欢的就辩证出一条一条的佐证，全部出自他独到的审美价值和审美情趣的判断和取向。他不为尊者饰，也不为名家讳，纯粹的艺术层面上的审视，自然不牵涉人际关系的亲疏和远近，这恰恰是时下艺术界陷入庸俗的难以摆脱的泥淖。我的心里突然一沉，当我们在媒体上说着那些言不由衷的废话的时候，观众和读者中如张炬一样的明眼人，可能正咧着嘴发出嘲笑。

我因此而常有警示。与张炬这样具备真知灼见又襟怀坦荡的人为友，交谈便得启示，较之某些场合里那些虚于应景的言谈要实受得多。有一次我到他的画室里去，一坐下就开始听他说艺论道，似乎又续接上了在大坝沟里尚未煞尾的长谈。我和张炬的相聚相交中，这个人从来不谈商场和商机，不谈市场消费价格的升降，更不说官场秘闻

和人事升迁，甚至连什么职务、职称、工资待遇、特殊津贴等等涉及个人切身利益的事，也从不提及，似乎与己毫无关系。他津津乐道的就是艺术和人生，一个永无休止的话题，一个永不丧失热情的命题，一个几乎带着蛮横式的热情而倾心矢志于艺术的人。

张炬突然离我远去了。

当我上了些年纪，心理变化中很明显的一点，就是愈加珍惜那些可以不必伪饰、不要设防的朋友，这样的朋友有几个已离我而去，每当他们告别这个世界的时候，我都有情感世界天倾一角地陷一方的挫失感、残缺感。张炬的离去，我的情感世界的天和地无疑又亏缺了，永远无法弥补的亏缺。好在张炬留给这个世界一本呕心沥血之著作：《以艺进道——中国艺术道学思想探索》，是他几十年埋头研究的思想结晶。我的阅读当可看作聆听张炬高谈阔论的另一种形式，弥补那个亏缺。

2000年8月24日 礼泉

释疑者

一九九八年四月末尾，茅盾文学奖在京举行颁奖仪式后几日，我托白烨终于打问到了文学理论家陈涌的家居住址，两人便去拜望。

一个在通常的住宅区罕见的阔大的门。门口有军人站岗。白烨正要出示证件时，一个小女孩从里边出来引领我俩走进大门。她是陈涌家的保姆，陕西安康人，我的小乡党，真是巧了。走到内院中间，小女孩说伯伯自己也来了。矮矮胖胖的一位老人，淡淡地笑着，说他不放心进门时盘查的麻烦。一件深色的半旧的夹克服，乍看像一位闲谈的退休老工人。

这是老式结构的单元房，书房兼用会客，也就是一室住铺的小房子。早已过时的格式老旧的沙发，紫红油漆的木制茶几上全堆着书籍、报纸之类。我们三人便坐下聊天。陈涌说话很平和，他祖籍广东，语言中残留一缕乡音。我突然有一错觉，听他说着文学创作，犹如我许多年前在农村基层工作时听一位老农叙说农桑之事。

一九九七年酷暑时节，我在西安听到北京的朋友传话，陈涌认为《白鹿原》不存在“历史倾向问题”，对我无疑是一股最抒怀的清风。直到十月下旬茅盾文学奖正式开评，陈涌把这个至关重要的观点在会上正式坦陈出来。关于《白鹿原》存在“历史倾向性问题”，几年来我自信属于某种误读或误解，然而也没有超脱到不无困扰；我相信这种误读或误解终究会得到匡正释疑的，只是没有料到会在一九九七年内发生，况且是由一位年事已高的老人陈涌完成的。我虽然也久已心仪茅盾文学奖，然而这种误读的被释疑被匡正，才是我首先期待的最根

本的结果。当这两个结果同时形成时，我对陈涌老人已不单是知遇，而是由衷的钦敬了。

陈涌老人告诉我，因为《白》书的阅读印象，随之对我的小说创作产生了兴趣，便自己到新华书店找我的作品集，买了华夏出版社出版的三卷本《陈忠实小说自选集》里的短篇卷和中篇卷两本，约一百万字，而且读完了，写了一篇论述我的小说创作的二万余字的长篇评论，已交《文学评论》杂志。

我当即说，你应该给我打电话，我让华夏出版社陈泽顺给你送一套书来，怎能让你上街买书。陈涌笑着摆摆手，怎能给你们添麻烦！我和白烨相视而默然不语。

我在文学圈内感觉到的印象，陈涌是一位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在各种文艺理论汇聚的当今文坛，人们不一定全都赞同陈涌的某个观点，然而几乎众口一词说陈涌做人很正派。这就够了，足够包括我在内的人的钦敬了。

2000年12月

从盗书到盗名

二〇〇〇年十月，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云南著名作家李霁宇的长篇小说《壁虎村》。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一本内容相同，甚至连目录和内容介绍也相同的《村画》却在一些城市提前上市发行，在该书的右下角有“中国文联出版社”字样，而作者署名为“陈中实”。作为当代知名作家，陈忠实的作品曾多次被盗版，而这一次与往不同，不仅是盗用其名，更使不明真相的读者误认为陈有冒名顶替原作者之嫌。面对如此猖獗的盗版行为，作家发出了强烈的控诉。

二〇〇〇年伊始，心里也跃跃着送旧岁迎新春的欢悦。有朋友自陕西秦岭南边的安康市打长途电话来，开口便有嗔怨之情，说出了新的长篇小说，起码应该给朋友打个招呼。我便问怎么回事。他说他到安康市开会，逛书店时发现了一本名叫《村画》的长篇小说，署着“陈中实”的名字，我便告诉他，你既然看清楚了那个“中”字与我的“忠”字的差别，为什么还要报怨我呢？我随之又给他解释，中国这么多人口，同名同姓的人太多了，即使有一个完全和我的名字相同的人（“中”字有“心”）出版长篇小说，也不奇怪。朋友能否接受我说的话且不论，反正从我处证实了一个事实，《村画》不是我这个陈忠实的作品。

给朋友解释过后，自己心里却泛起了嘀咕，总觉得这事怪怪的。此前我刚刚读完一部长篇小说，这是近两年间在读者中反响最大的几部长篇小说之一，跟着屁股上市的《村画》，是否有秃子借着月亮沾光，有克隆复制之嫌，再加上一个只比我少一个“心”的作者名字，我也隐隐产生了某种欺诈的怀疑，然而却说不出口。在我居住的街巷不远的一家书报摊上，我想随意买一两份报刊，老买主了，摊主告诉

我，你的这本新书卖得很快。我问哪一本。她说《村画》。我问还有吗？她说没有了。我想见识一下或买一本留作纪念，竟不成。

这事也就过去了。直到今年十一月中旬，我到秦岭南边的汉中市开会，随行的同事诗人苑湖告诉我，他逛一家个体书店时，看见了一本署着我名字的《村画》。我顺口告诉他，那个作者与我是两个人，那个人没“心”。苑湖强调说，有“心”哪，和你的名字那三个字一模一样。这家书店就在我们下榻的小宾馆隔壁，我们在街上说着这话时就走到了这家小书店门口，便走进去，便要《村画》。我一看，厚厚的一部长篇，书名果是《村画》，作者的名字为“陈忠实”。终于把“心”安上了。售价高达四十元，而且绝不打折。

这事也就过去了。《村画》署上安上了“心”的“忠”字的陈忠实，终于浮出水面，也就说明了我对那个没安上“心”的“中”字的欺诈的隐忧，也就最终把我说给朋友的那一番同名同姓的话拽出通常的生活经验之轨，我的好意还是被击碎了。尽管这样，我也不当一回事；只有不当一回事，这事自然也就过去了。

我之所以能够把此类事不当一回事，原也不完全是我的宽容和大度，原也不完全是我不负责任到连自己的基本权益也不管不顾，原也不完全是我无知到连中国已出台多年的著作权法或版权法都不晓得。我只能说，我没有办法；没有任何办法了，自然也就不当一回事了，这事也就过去了。且看这几年我经历过的有关盗版的大事记：

一、一九九三年夏天，《白鹿原》在西安举行首发式后十天，发现盗版书开始出现并销售。人民文学出版社负责人带员亲临西安，越查越渺茫，垂头丧气回到北京，了事。由此开端，盗版《白鹿原》便蜂拥般倾泻到市场上，我所见到的各种盗印本不下十种，其中最差的

一种竟然连现代化学符号都挟裹在文字中印出来，令我大跌眼镜的同时也大开眼界。笼统有多少印数，恐怕永远都是一个无法估计更无法统计的谜。八年下来，我到中国的许多地方参加笔会，几乎每到一地都要为闻讯赶来的读者所持的旧存的或新购的《白鹿原》签名，而在拿来签名的书中，几乎有一半都是盗印本。大中城市且不说了，包括边远的山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区，《白鹿原》的正版本和盗印本同时行世，我便也学会了“换一角度看”当今中国的事，不也正说明了《白鹿原》深入读者层面的广度和深度么？于是便对盗印本《白鹿原》照签不误——读者无辜。

二、一九九九年某日，儿子从西安某书摊上购回一本《陈忠实文集》，赫然放到我的眼前，笑着说，你大概还没见过你的这种文集。我一翻阅，内文用小号字印刷，我即使戴上花镜看起来都很费力。一本文集，收编了我的几乎全部的短、中、长篇小说，约一百五十万字，标价我已记不清了，儿子说他只花了十元就买来了。我已习惯于阿Q式的看问题的眼光和角度，花十元钱就可以把陈某的小说一览无余了，于收入不高的读者当为一件善举。之后，我在一条小巷吃早点时，看见一女人拉着三轮车卖书，便走到跟前观看，一眼就瞅见了儿子买回的那种版式的我的文集，和我的文集并列为伍摆放着一长排版式相同的文集，都是中国现时最具影响声誉的男女作家的。我悄悄离去时又有了阿Q式的得意，我能和这么多名家一起被盗版，且能摆列在一架三轮车上，真该荣幸一把。

三、一九九六年夏天，我应邀到常州签名售书，竟然意外地发现了中篇小说集《四妹子》的盗印本，封面上印着一幅像旧时年画上的那种乡间美女，吓我一跳。这部中篇集是一九八九年出版的，一九九六年被人再次挖掘出来盗印赚钱，真是费了心思了。

四、大约九十年代中期，西安和北京等大城市的书摊上出现了一本名为《帝京》的长篇小说，第一页上印着一张三人围坐的照片，附着文字说明，大意为陈忠实、贾平凹和老村在构思本书。朋友从北京打来电话，动员我打官司。我就笑了，人家在书上没有署咱们的名字，照片说明文字只是含含糊糊，算是颇费了一番心计的比较高明的擦边球，可以做多向解释。况且，这类书里所附注的出版社、印刷厂肯定全是假的，即使想打官司，找鬼打去。你想指望“有关部门”追查吗？我早都全部丢失对于“有关部门”的信任了。这是第一次盗用我的名字，藏藏掖掖，尚未达到明目张胆。

还有一些不便提的类似的事，恕我不提。

到了二〇〇〇年最后一月的头上，百花文艺出版社徐丽梅打来电话，询问《村画》一书的事，我便把我所经见的上述情况如实汇报，把署名里的未安上“心”的“中”字演变到安上了“心”的“忠”字的过程也汇报了。徐丽梅随之告诉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了一部长篇小说《壁虎村》，作者是李霁宇。《村画》是《壁虎村》的盗版本，改了书名而已。作者署名先为“陈中实”后再为“陈忠实”。经我与徐丽梅对证，盗版《村画》竟然在正版《壁虎村》之前大约半年出版行销，真带上了某些传奇色彩。

至此，这件事的性质有了大变化。原以为什么人自己写了《村画》，盗用我的名字促销，如此而已；现在很清楚了，什么人盗印了李霁宇先生的作品《壁虎村》，又盗用了我的名字，李霁宇先生既不能得利（版税或稿酬），又不能出名，比之我的作品被盗损失更惨重了；那么我呢？我被结结实实绑在冒名顶替原作者的不大光彩的那根柱子上了。尽管李霁宇和徐丽梅心知肚明，然而《壁虎村》和《村

画》同时行销图书市场，不知底里的读者会怎么看呢？我和李、徐三人到哪儿去解释这一黑幕呢？

事情把人逼到这一步，习惯于吟咏“这事也就过去了”的我，这回看来是难以过去了，不单是徐丽梅代表百花文艺出版社催我说明真相。既然我第一次出面说关于盗版的事，那么不妨昭示或请求“有关方面”，不单是我的书被盗版、盗印，凡有影响的作家和稍微畅销的作品，都有被盗版被盗印的事情发生，各种盗版本几乎覆盖了大小书摊，有的竟堂而皇之摆进国有新华书店的书架，难道没有目睹和耳闻吗？盗版、盗印之猖獗已成泛滥之势，“有关方面”还能安之若素，让其继续闹下去么？

近闻重点开展“打假灭黑”，令人震惊的河南棉花掺假事件和掺有有毒大米的被揭露被追查，给了人震惊的同时也给了人信心。而管理出版的“有关部门”能否借国家“打假灭黑”的行动，在图书出版系统给作者和读者一点信心呢？

无论如何，我终于把这事说了，说了自然也就可以过去了；过不去，又若何！

2000年12月12日礼泉

言论·对话

文学无封闭

自从前年，陕西的长篇小说形成某种影响以来，我不止一次听到这样的疑问，说陕西经济发展步子不大，尤其是比之沿海那些省份就更显得落后，而陕西的文学创作为什么如此繁荣？我在一些座谈会上听到过这样的话题，在接受记者采访和与中文系大学生对话时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成为热门话题，尤其是从南方那些经济发达地区来的报纸、刊物、电台、电视台的编采记者，甚至做出这样的反诘：文学创作是否只有在相对落后贫穷相对闭塞的地方才能获得发展？因为经济发达商业活跃相对富裕的诸如深圳、广州等地的作家已经耐不住写作的清贫而躁动于商事活动了……我几乎无一例外地坚持说这种看法是一种错觉，是对文学创作这种劳动的一种理解上的误区。我说，文学不存在封闭。

文学创作和经济发展不可类比，也不存在一个文学发展与经济发展成正比或成反比的必然性规律。内陆省份经济发展普遍赶不上沿海省份经济发展的速度，这是业已形成的一种经济格局。一个地区的经济发展除了受那里的长官的决策的眼光和魄力重要因素外，还要受地理位置、地理环境的制约，还有气候、交通、文化教育等等因素的影响，这是常识。

上述制约经济发展的因素都不能对文学创作构成危害性或约束。对文学构成危害和制约的最大因素是人为的极左的瞎指挥。比如十年

“文革”期间那种“左”到极端愚蠢极端可笑的瞎指挥。那样的瞎指挥扼杀的不单是陕西或某一个地区的文学创作，而是整个中国的现当代文学都被彻底扫荡到片纸无存。在今天的正常的文学环境和文学气候里，任何地区任何地域的中国作家所获得的发挥自己创作的条件，在根本上或者说在最重要之点上是平等的相同的。经济发达商品活跃地区的作家可能比经济落后地区的作家收入丰厚一些，生活条件优越一些。然而文学创作不是靠物质所能推动的，物质的优裕和钞票的多多益善只是作家进行创作劳动时的生活给养而已；首先得作家“肚子里有蛋”，无蛋空怀的人哪怕住在五星级宾馆里也是难得作为的。作品的高低并不决定你写字的手指上是否戴有金戒指，好像也不决定于写作者吃的是牛奶咖啡还是吃的搅团儿。

作家进行文学创作唯一依赖的是一种双重性的体验，由生活体验进而发展到生命体验，由艺术学习发展到艺术体验，这种双重体验所形成的某个作家的独特体验，决定着作家全部的艺术个性。作家的每一部（篇）重要的认真的而不是应酬之作，都无可掩饰地标志着他在那一段时期的那个独特体验的形态，这种形态的展示也就赤裸裸地标志着作家关于生命和艺术所体验的一切。

这是我关于创作这种劳动截至目前的最简捷的理解。既如此，作家从艺术学习到艺术体验的整个过程所能借助的只有阅读。他想尽可能多地通览古今，也想尽可能多地学贯中西。他一方面要从古人今人国人洋人那里吸收一切有利有益于发展强大自己艺术能力的东西；另一方面就是以广泛的阅读来开阔自己的艺术视野，见识见识那个艺术殿堂里所荟萃着的异彩纷呈的风姿；还有一面就是看看前人和当代人已经跨过了思想和艺术的怎样的标高，从而确定自己探索的方向。作家对于艺术的学习和体验不受任何约束，全靠自己的艺术兴趣和艺术

悟性，并不因作家居住在经济发达的南方或相对落后的北方或西部而构成影响，也不因作家住在京城或住在乡村而影响阅读的效果，住在豪华都市和住在乡间的作家同在阅读《红楼梦》《百年孤独》，各自得到的关于艺术的体味和启示不会因谁在什么地方而决定深浅的。如此说来，相对闭塞的西部作家在艺术的学习上不存在封闭，因为古今的文学名著这里的人都可以见到，即使比沿海比京城晚读半年一年也无关宏旨，艺术的学习和体验不是一朝一夕所能起作用的，不像科学技术军事尖端技术信息急迫到要争夺一天一时一分一秒，而是靠那种多少有点神秘感的心灵的体验和一种艺术修炼的基本功力。

生命体验由生活体验发展而来，生活体验脱不出体验生活的基本内涵。生活体验或体验生活对于任何艺术流派艺术兴趣的作家都是不可或缺的，这是无须做任何辩证的。普遍的通常的情况是，一般的规律作家总是经由生活体验进入到生命体验阶段的；并不是所有作家都能经由生活体验而进入生命体验的，甚至可以说进入生命体验的作家只是一个少数；即使进入了生命体验的作家也不是每一部作品都属于生命体验的作品。譬如写出过属于生命体验之作的《百年孤独》的马尔克斯，随后写出的《霍乱时期的爱情》，我凭阅读感觉以为是属于生活体验的作品。而昆德拉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之前的几部长篇，尽管艺术风姿各异，我觉得仍然属于生活体验之作，只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才是进入一种生命体验的艺术精品。

凭生活体验产生过许多不朽之作，然而生活体验也容易产生许多相似的雷同的作品，诸如批判现实主义的大量的小说，更诸如五六十年代大量的写农业合作化的作品，甚至还有大批的写新时期农村改革的作品。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在于作家顺着一种公用的通行的理论思维去概括生活，尽管南方北方东方西方的中国农村生活差异很大，

在这一批作品中也仅仅使读者感受领略到风俗的差异和方言的差异以及故事情节的大同小异，几乎一律都是农民在合作化集体合作社里生活困苦，娶不下老婆等等，责任田一推行，农民吃饱了穿暖了，敢于和村干部对抗了，也要追寻真正的爱情了。这样如一个模子翻制出来的小说有多少数目啊！包括我的一些作品也不能摆脱这样的窠臼。生命体验首先也是以生活为基础的，生命体验不单是以普通的理性理论去解剖生活，而是以作家个人独立的关于历史关于现实关于人的生存的一种难以用理性言论做表述而只适宜诉诸形象的感受或者说体验。这种体验因作家的包括哲学思维个人气性等等方面的因素而产生，所以永远不会重复也不会雷同。

既然创作活动属于作家的双重体验，那么什么东西能制约呢？不能。什么东西能造成封闭呢？没有。翻转来说，这种双重的体验更不可能靠物质的钞票的东西来促进或推动。不能产生这种双重体验的作家即使坐高级轿车住高级宾馆也无济于事，不能产生这种体验的作家即使关闭在任何闭塞的穷乡僻壤头悬梁锥刺股也同样无济于事；能够产生那种独特体验的作家无论坐轿车或骑自行车都会产生的。产生了，就要展示，就要诉之于文学，就要倾泻，就渴望把自以为是独特的体验尽可能充分尽可能快地与读者进行交流，小说就是实现交流和沟通的媒体。

文学无封闭——也许是我的偏见。

1995年1月22日

兴趣与体验

——《陈忠实小说自选集》序

一

到五十岁才捅破一层纸，文学仅仅只是一种个人兴趣。

为什么读了头一本小说就无法抑制，就产生了一种想把中学图书馆的小说都挨个读一遍的强烈欲望，现在想来就只能归于兴趣。人的兴趣是多种多样的，兴趣在小小的年纪就呈现出来，有的喜欢画画，有的精于算计，有的敏于乐感，有的巧于魔术变幻……文学只是人群中千奇百怪的兴趣中的一种。

首先是阅读直接诱发起我对文学的兴趣。上初中时我阅读的头一本小说是《三里湾》，这也是我平生阅读的第一本小说。赵树理对我来说是陌生的，而三里湾的农民和农村生活对我来说却是熟识不过的。这本书把我有关农村的生活记忆复活了，也使我第一次验证了自己关于乡村关于农民的印象和体验，如同看到自己和熟识的乡邻旧时生活的照片。这种复活和验证在幼稚的心灵引起的惊讶、欣喜和浮动是带有本能性的。我随之便把赵树理已经出版的小说全部借来阅读了，这时候的赵树理在我心中已经是中国最伟大的作家；我人生历程中所发生的第一次崇拜就在这时候，他是赵树理。

也就在阅读赵树理小说的浓厚兴趣里，我写下了平生的第一篇小说《桃园风波》，是在初中二年级的一次自选题作文课上写下的。记

得老师给了我前所未有的大篇幅的评语，得分为5+……我这一生的全部有幸和不幸，就是从阅读《三里湾》和这篇小说的写作开始的。

时光已经流逝了整整四十年。四十年前写作那篇小说时的我，根本不会想到也无法料知今天的我的这一番模样。平静说来，那篇小说本不是当作小说写的，更不是为了出版为了发表为了挣稿费为了什么什么，仅仅只是为了完成一次语文老师布置的自拟选题的作文……当我今天编选这一套三卷本的小说选集的时候，无法湮灭的记忆很自然地又活跃起来，真是感慨系之。

兴趣不衰，热爱之情便不泯。于是就想通了那些被文学这个魔鬼缠住的人之所以被监禁流放被剃阴阳头被踢屁股历经九死而不改不悔的全部缘由。面对在我之先的上两代经历过阴阳两界巨大痛苦的作家，我从来不敢把自己追求文学所招致的小小灾难当作灾难，更不敢把它当作某种资本去争取文学以外的价值。所有对文学情有独钟的人都经历了那个过程，一个不可跨越无计逃遁的火与冰的过程，灾难和痛苦只分深浅或者说轻重，而不是有无。完全得意于那个过程的人是另一种形态或另一种意义上的作家。我在四十年的文学历程中的灾难属于轻的一种，痛苦也属于浅的一类，但毕竟都一一经历了，于是我就有了属于自己的最真切也最牢靠的关于生命和艺术的体验。我常想，那些刚刚走出牢门结束了流放的作家，之所以还能摊开稿纸拧开钢笔，恐怕不是为了出名为了发财抑或为了其他什么什么吧？我想只是兴趣。

兴趣是会转移的，不是所有人都会受一种兴趣的支配而在文学这条路上从天明走到天黑。如果他对文学的兴趣转移了，可能转移到制造导弹保卫疆域，也可能转移到要猴变魔术玩杂技博取观众的喝彩去了。兴趣转移是人类的正常行为，许多人的兴趣从文学转移到其他领

域而且做出了卓越的创造，也有许多人的兴趣从另一样事业转移到文学上来同样写出了辉煌篇章。从这个最简单的本质意义上说，关于文人下海的讨论没有多少实际意义。

文学是个魔鬼。然而能使人历经九死不悔不改初衷而痴情矢志终生，她确实又是一个美丽而又神圣的魔鬼。

二

到五十岁时还捅破了一层纸，创作实际上也不过是一种体验的展示。

体验包括生命体验和艺术体验而形成的一种独特体验。千姿百态的文学作品是由作家那种独特体验的巨大差异决定的。出于对创作这项劳动的如此理解，我觉得作家之间和作品之间只有互相宽容百花齐放，因为谁也改变不了谁的那种独特体验，谁也代替不了谁的那种独特体验。红花没有必要嘲讽白花，黄花也无必要笑傲紫花，家花更代替不了野花，洋花鄙视土花并不能以此显示尊贵。所有红花白花黄花紫花家花野花洋花土花，应该不断完善自身以期更加完美，应该互相鼓励以求更加扩大差异，才会百花齐放争奇斗艳万姿纷呈；要么互相杂交取优汰劣生出一种或几种土洋结合家野合璧的杂种新种，可能不失为一种创造。

总之，不要互相敌视互相撕咬互相消灭，作家毕竟又不是某一种花，他的那个独特体验是消灭不了的；任何一种花的生存，应该靠自身的姿色，也仅仅只能依赖自己的姿色去生存，作家是用作品和这个世界对话的；企望依靠非花（即非文学的因素）去达到花（即文学）

的目的，肯定说是不可能的，文学史上无论在中国和外国在这方面都没有得手的先例；应该消灭的不是任何一种花，而只能是罂粟毒株。

生命体验由生活体验发展过来。生活体验脱不出体验生活的基本内含。生活体验或体验生活对于任何艺术流派艺术兴趣的作家都是不可或缺的。普遍的通常的规律，作家总是由生活体验进入到生命体验的，然而并不是所有作家都能由生活体验进入生命体验，甚至可以进入生命体验的只是一个少数；即使进入了生命体验的作家也不是每一部作品都属于生命体验的作品，这是我通过阅读所看到的中外文坛上的基本的现状。

出于对创作的这样的理解，新时期以来我基本没有参与文坛的种种争论，也不想把自己归结于某一种新潮“主义”的旗帜下。因为在我看来，任何一种流派任何一个“主义”的产生，都是作家的独特体验孕育的结果，不是硬学的，硬学是学不来的，模仿的结果只能是画虎类猫。但艺术毕竟是相通的，可以互相影响，可能用一种流派的长处弥补别一种“主义”的短处，可以加深扩展自己对艺术的体验。

新时期中国当代文学的全面复兴，我是经历了一个全过程，这套选集里的长、中、短篇小说全部选自我一九七八年截至一九九二年初的作品。我在编选时已经惊讶起初几年的一些短篇的单薄和艺术上的拘谨，再显明不过地展示出我艺术探索的笔迹。无须掩丑更不要尴尬，那是一个真实的探索过程，如同不必为自己曾经穿过开裆裤而尴尬一样。《白鹿原》出版后，我基本没有再写小说。我想读书，我想通过广泛的阅读进一步体验艺术。我不追求著作等身，只要在有生之年能多出一本两本聊以自慰死后可以垫棺作枕的书，就算我的兴趣得到了报偿。

生命体验是可以信赖的。它不是听命于旁人的指示也不是按某本教科书去阐释生活，而是以自己的心灵和生命所体验到的人类生命的伟大和生命的龌龊，生命的痛苦和生命的欢乐，生命的顽强和生命的脆弱，生命的崇高和生命的卑鄙等难以用准确的理性语言来概括而只适宜于用小说来表述来展示的那种自以为是独特的感觉。

三

刚刚交上知天命的五十岁时，写完了《白鹿原》。写完这部长篇，关于文学和创作的两层纸才捅透打破了，也发觉自己完全固执于独特体验的己见。

许是因了这部长篇的连锁反应，在此之前的中篇和短篇也不断地被出版社组装出版，印数之大仅仅在此前两年是做梦都不敢想的。很简单，读者恐怕也是出于我当初读《三里湾》之后的那种心理，便想读我的其他小说，这很正常。我当然很高兴，读者多了，作家与读者交流沟通的渠道也就拓宽了，这是任何形态的艺术创造的本意。艺术创造就是为了沟通，小说不过是作家的双重体验和读者沟通的媒体。文学作品沟通古人和当代人，沟通不同肤色不同语系的东方人和西方人，沟通心灵。一部作品能够广泛地完成那个沟通，作家创造的全部目的就算实现，再无须多说一句话，只任人去说。

长篇《白鹿原》从发表到现在接近两年，我收到过数以千计的读者来信，许多信读罢常常使我陷入沉默无言只想喝酒。“我想写出这本书的人不累死也得吐血……不知你是否活着还能看到我的信么？”这是石家庄一位医生或护士写来的信中的一句话。我想借着这套选集出版

作序的机缘，向这位读者和所有关心关注我的朋友致以真诚的谢意，我活得依然沉静如初，也还基本健康。

当然，我更应该告诉读者朋友，这套小说选集包括一九九二年以前的主要作品，小说领域里的长、中、短的形式都算实践过了。明天，我肯定还要展示我的新的体验，绝不会重复自己；重复别人是悲哀，重复自己更为悲哀；重复的直接后果是艺术创造的萎缩。

创造者是心地踏实的。

1995年3月18日

生命易老，文学不死

看到本期专号将要出笼的九位青年作家的小说，我的心里颇不自在了，欣喜中挟裹着某种失落，鼓舞里又隐约着某种沧桑，面对一种蓬勃生机引发的生命意识深层里的酸溜溜的感觉。

翻阅这些墨痕笔迹千姿百态的手稿，我突然想到十四年前一九八一年一月号的《延河》。那一期刊物也是《陕西青年作家小说专号》，集中展示了新时期开始在文坛崭露头角的一拨青年作家的作品，在经过浩劫刚刚复苏的中国文坛第一次亮出陕西青年作家群的基本队列。十余年后，在那一期专号里发表作品的青年作家，现在已是陕西文坛的骁将，贾平凹、京夫、莫伸、李天芳、王晓新、王宝成、李凤杰、王蓬等，以他们各自的艺术风姿活跃于当代文坛；而那个队列中的路遥和邹志安，以他们剧烈的燃烧已经过早地焚毁了；我的失落我的酸溜溜的沧桑感慨出于兹。我虽然还在这个群体队列之中，然而这个队列已不是青年作家的队列了；我再也没有资格入选《延河》任何一期以年龄为标志的青年作家的专号了……岁月逼人。

生命易老，文学不死。

不死的文学自然是指文学原本意义上的文学。假冒伪劣的所谓文学不仅会死，而且比生命死得还早还快，稍稍回顾我们不到半个世纪的新中国的文学史，真是令人感叹不已，假大空的文学浪费了多少纸张且不论，耗费了多少有才华的作家的生命。生活在某个较长的阶段里不仅容忍而且鼓噪那些假冒伪劣的文学，但生活也会在某一个早晨突然做出严峻的面孔，把飘浮在秋阳里自鸣得意的飞蠓极轻易地扫荡

了。文学原本意义上的作品才是顽强的，不死的，几百年前的《三国演义》依然牵动着当代男女的理性思维和情感波澜。

作家这个社会行业之所以不会断绝，根本原因就在这里。文学是个魔鬼，可以使无以数计的钟情者“为伊消得人憔悴”而心甘情愿，且不说那些挨挫受整的越雷池闯禁区者，足见她确实又是一个魅力无穷的美丽而又神圣的魔鬼。陕西作家群的那一拨人大多如我一样已经进入老年年轮，而继来的青年作家又摆出一个更为雄壮的队列，佼佼者如杨争光、李康美、冯积岐、黄建国等等。本期《延河》所展示的这一拨青年作家的作品和这个队列，更使我相信关于文学是个魔鬼的己见；关于商潮冲垮文坛的吵吵不过是小市民式的杞人忧天，他们对于文学的看法和对创作的理解并不比小摊贩对市场小商品的流行趋向的估计高明多少。文学是一种兴趣，人类不灭，人群中总会产生一些对文学感兴趣的人；创作是一种体验，有对人生的独特体验，便有展示那种独特体验的欲望，原本不是待价而沽的那一类那一码子事；商品经济越发达，社会愈进步，提供给作家进行艺术创造的社会环境和物质生活越优越，艺术创造会愈趋繁荣，商潮与真正的作家的创作劳动并不矛盾。

十四年前为我们那一拨青年作家编辑专号的老编辑已经相继离岗，我作为一个继任的编辑为我的年轻的朋友编辑这个小说专号的时候，更加怀念和感佩那些老编辑们，他们是王丕祥、董得理、贺鸿钧、路萌、高彬等。是他们的远见卓识和甘为文学青年铺路搭桥的胸怀，热情而又负责地把陕西一拨青年作家推上文坛。我郑重提出他们的名字，不单是尊敬和怀念，重要的是继续一种精神，这是《延河》精神，为下一拨年轻作家铺路搭桥作人梯的精神。如果把这种精神丢了或中断了，《延河》就把魂丢了。

令我感到欣慰的是，《延河》现今的编辑部，除了正编的徐岳和非正编的我，全是一帮年富力强的年轻人，他们继续着《延河》精神，新的文学环境以及他们的专业修养，都具备了使《延河》汹涌澎湃的基础。去年以来连续推出三期陕西和西北作家作品专号，连续推出陕西和兄弟省市的三十位青年作家的小说专辑，且不必自吹这些作家或作品产生了怎样的影响，这些作品所呈现的异彩斑斓的艺术风姿，已经使《延河》的面貌开始发生变化，“农村题材”和“现实主义”的原有印象开始变化。不必把自己归于某一种新潮旗帜之下，却要的是各种艺术形态的作品都能一展姿容。本期青年作家专号便是一种容纳百川的艺术胸襟的昭示。所以说，《延河》年轻的编辑们编辑了本期的《陕西青年作家小说专号》，两方面的年轻人共同创造着《延河》的辉煌。

生命易老，文学不死。

1995年3月24日夜 西安

关于陕西长篇小说创作的回顾与展望

陕西作家十年以来的长篇小说创作取得了重大成就，已经引起中国文坛的普遍关注和瞩目，一些作家和作品的影响波及海外，在这种情状下，召集陕西小说作家、评论家共同来一次总结，探讨陕西长篇小说取得了怎样的突破性进展，陕西小说作家创作活动的群体性优势和个体性特质；更重要的是分析制约陕西长篇小说创作的普遍性问题，陕西长篇小说创作现状中的倾向性问题和值得研究的个别性的问题，制约陕西作家长篇小说创作质量提高的根本性问题，目的说来十分明确也十分单纯，就是想在现今长篇小说创作活跃的现状下，使作家们能够比较冷静比较客观地估价自己，既充满信心又不盲目自大，既能发挥自己素有的艺术优势又能找到新的艺术创造的突破口，以期陕西长篇小说的创作能出现一个全面突破全面提高的局面，以期对这个群体中的每一个作家的艺术思考有一点启发，使他们在各自的艺术天地里鼓起开辟新的领域的勇气和进入一种沉静的创作心态，以期陕西长篇小说在较大数量的基础上能产生出大作品或者说精品，应该说是十分必要而迫切的。

一、十年回顾

回顾陕西长篇小说创作发展的历程，便不能不从一九八五年八月在陕北延安和榆林两地召开的“陕西长篇小说创作促进会”为发端。

如果说获得一九七八年全国短篇小说奖的莫伸的《窗口》和贾平凹的《满月儿》，为陕西新时期文学复苏的标志的话，到一九八五年的陕西小说创作已经引起当代中国文学的普遍关注。这七年里，陕西

中青年作家创作了大量的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有七篇短篇小说和两部中篇小说获得全国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大奖，尤其是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在中国文坛和普通读者当中引起的强烈冲击和广泛呼应，在当代中国文坛的发展历程中难以泯灭。

然而，到了一九八五年，陕西尚未有一部长篇小说诞生，两次茅盾文学奖评选，陕西作协没有办法推荐一部参评作品。当时的陕西作家协会的负责人对陕西作家的创作态势作了宏观的把握，主要结论有两点。

（一）陕西中青年作家新时期以来在短篇和中篇的创作中取得了显著成就，是新时期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富有地域性特征的群体和较为显明的艺术个性，与全国的短篇中篇小说创作发展保持同步，而长篇小说创作比之全国已经呈现的潮头晚了一步或者说慢了半拍。

（二）已经初具队列的陕西作家群创作了大量的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按最严格最保守的估计，这个群体中的一部分作家已经进行了大量的艺术探索和艺术实践。他们的艺术能力已经成熟或者说趋于成熟；他们多数来自农村、工厂、学校等社会的最基层，经历了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大的历史过程中的全部有幸和不幸，有着既独特又丰富的人生历程和深切的生活体验，他们对于生活的理解和开拓也逐渐深化；基于以上思想和艺术两方面的基本估计和判断，认为这个群体中至少有一部分人已经具备向长篇小说领域突进的条件，应该不失时机地鼓舞他们进入长篇创造的自信和勇气，于是作协党组和主席团做出决定，于当年八月召开“陕西长篇小说创作促进会”。“促进会”这个名称很明确地界定着当时的创作态势和这个会议发起者清晰的思路和用心。

至于这个会议的具体过程已经不须赘述。会后两年，路遥出版了《平凡的世界》（第一部），贾平凹出版了《浮躁》。前者后来获得了第三届茅盾文学奖，后者荣获美孚石油公司所设的“飞马”奖，陕西作家群终于有了新时期以来的第一批长篇小说，而且一开始就达到一个比较高的艺术品位。随后就有了任士增的《不平静的河流》，王晓新的《地火》，李天芳、晓雷的《月亮的环形山》，莫伸的《山路弯弯》，赵熙的《女儿河》，京夫的《文化层》，王宝成的《饥荒与爱情》，王蓬的《水葬》，李康美的《情恨》，沙石的《倾斜的黄土地》，李春光的《黑森林，红森林》，李凤杰的《水祥和他的三只耳朵》，临青的《解放济南》，等等，开始呈现出长篇小说创作的第一个潮头。应该说，这主要是作家创作的必然发展，不能完全归于一次“促进会”的功能，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即当时作家协会负责人对陕西文学创作态势的把握和对这一茬中青年作家创造能力的判断是准确的。“促进会”恰当及时，起到了促进的作用，促进了陕西长篇小说创作局面的打开，从这个意义上讲，当时的作协主要负责人胡采和李若冰同志是富于事业心和富于文学的眼光的。我们不应该忘记任何一位对发展陕西文学做出卓越贡献付出了心力的人，他们是无私的。那次“促进会”的具体执行人路遥已经早逝，我们在此表示对他的真诚的怀念之情。

一九八七年和一九八八年，省作协连着两次召开长篇小说研讨会，对上述先后出现的长篇小说展开讨论，从思想内容到艺术形式，这批作品达到了怎样的深度与高度，存在着什么样的缺憾，对创作者和旁听者都具有深刻的启示。之后的长篇小说创作更趋活跃，每年都有较大数量的作品出版，直到一九九三年，陕西先后有京夫、高建群、鄙人、贾平凹、程海五位作家的五部长篇小说在北京五家出版社出版，形成了这个群体创作大释放状态。这种大释放状态表现在一九

九三年和一九九四年，一直到今年，每年实际都有十部以上的长篇小说出版，这里特别要提及的是，青年作家文兰和李康美也完成了他们的长篇小说，赵熙同志已经完成出版了四部长篇小说，已经逝去的邹志安生前死后完成和出版了九部长篇小说，杨岩出版了《西府游击队》，陕北青年农民严永东和退休纺织女工孙君仙也以坚韧不拔的毅力完成了他们的长篇小说《一个偷儿的命运》和《白雪》，可以毫不夸张地说，陕西作家群的大释放状态将持续发展，长篇小说创作真正开始了一个百花齐放群星璀璨的喜人局面。

二、基本估计

面对以上粗略而不完全的回顾，我们完全有理由为之感到欣慰和骄傲，甚至可以坚持这样一种看法：我们有足够的资本以一种并不急迫的步态在中国长篇小说的文学长廊中漫步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似乎也不会落后。同时，我们也不能忽视与此相对立的另一种心态，即急于在长篇小说创作上跨出更大的步子，创造出更令人瞩目的新的辉煌，甚至在急迫地期待着又一次轰动。这种心态无可指责，我们需要再度辉煌，也必须再现更大的辉煌。我有时候也迫不及待盼望这一天早日驾临。我没有怀疑过，对于一个颇具实力久经鏖战的文学群体来说，实现更宏伟的目标并不是一件十分困难十分渺茫的事。然而，我的心情并不像许多人想象的那么自信那么轻松，我并不是轻视我们这个群体的创造能力，只是基于一些看来十分简单的想法。多年来，在审视和考察了兄弟省份的长篇创作态势之后，特别是在筹备这次具有阶段性意义的创作会议的日子里，一种开始并不十分明晰尔后又久久盘绕心头的思绪提醒和敦促我，面对已经初露端倪的速胜心理、浮躁情绪、盲目奋进心态，我们非常有必要坐下来或坐在一起，心平气和认认真真探幽入微地总结一下在长篇创作中的经验教训以及收获得

失。这里面有着许多值得我们回味和珍视的东西。我们具有这方面的经验。

文学固然是一种个体劳动，但必须承认她也是一种群体智慧的结晶。这里既包括互相竞争，更重要的是蕴含着互相激励互相鞭策互相启迪互相撑持。虽然成功有迟早先后之分，但谁也不可忽视文学创作特别是长篇制作是一个携手并进并肩奋进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讲，这种团结的意义涵盖更为广泛，也更加弥足珍贵。我们的成功靠的是团结，团结曾经是我们获得成功的良好机制，也必将使我们获得更大的成功。这一点我坚信不疑。长篇小说之所以取得了大面积的丰收，我想这是首要的成功因素。这种因素在以后的长篇小说创作中必将产生越来越明显的作用。这是我首先期盼的，也相信这是我们大家所共同期盼的。

另外，还必须认识到在陕西文学创作事业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在近几年的长篇创作活动中，我们遇到了许多“开明婆婆”。这些省委省政府的“开明婆婆”们在宏观上高屋建瓴式的指导，在许多具体问题上不失时机、无微不至的支持和关怀，为我们创造了一个极其宽松极其良好的外部环境。复杂的创作形态有时会使“开明婆婆”面对难度极大的领导态势，他们都以非常杰出而高明的领导艺术予以正确引导，在陕西形成了一个适宜作家进行艺术创造的良好气候，使我们始终充满着信心和希望。这一点使我深受感动，肃然起敬。我进行过广泛的了解，大家和我有着相同的感受和相同的感激之情。良好的创作环境和对这种环境的珍惜，相得益彰，同样是长篇小说创作取得重大收获的重要因素。这种双向的情感交流与理智的交融毫无疑义会在今后的长篇小说创作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对此，我同样深信不疑。

如果说以上两点是我省长篇小说取得丰硕成果的两大外部成因，那么，从这个群体的内部去深掘成功的经验同样显得十分必要。

面对一个文学群体的两度辉煌，面对一个文学大省近半个世纪的连续繁荣，可以找出各种各样的成功因素，但我更倾向于赞同一位蜚声海内外的南方学者型散文家的观点：一条积淀深厚的独有的文化血脉主宰着陕西每一位作家的身心。说到底，文学创作是一种文化的表现，而且是文化最直接最显露的表现方式。在那些要求文化与经济同步进行的观点影响下，我们这个群体面对地域性的经济落后局面，始终没有放弃或嫌弃曾经养育滋润过我们的深厚文化影响。在强劲的审判传统的风潮中，我们知道手中的笔应该如何运行。这种清醒的文化意识最终化作理性化作感情化作一种独特的创作，从而在中国文学史上争得了一席又一席席位。我上面所提到的那位南方学者散文家所持的另一种观点我也十分赞同，他说——“前不久听到有人对那些以黄土文化为背景的艺术品提出批评，认为他们写得过土过野。这些批评家不愿意看到人类行旅上的永久性泥泞，只希望获得一点儿成果性的安慰。”这位学者接着十分尖锐地指出，这些批评家无论在生命意识上还是在审美意识上都是弱者。以上中肯的辩解或者说评价，对我们是一个极大的激励。我们绝不可在迷乱中，在新的起步时刻，轻易地丢弃这可贵的生命意识和审美意识。

始终坚定不渝地在生活源头寻求创造的原动力，也是我省长篇小说创作取得丰硕成果的重要经验。一个简单的事实足以使我们悟出更为深刻的道理，陕西作家群大致是由来自陕南、陕北、关中三个地域的作家组成，新时期以来的中青年作家群在这方面表现得尤为明显。各自丰富多彩的小地域文化和各自的地域性生活积累和体验，在共同的劳动中互衬互补，交相辉映，表现在长篇小说的创作上必然呈现出

比其他一些地方更为异彩纷呈各领风骚的生动局面，面对全国的文学创作也必然独具魅力。外部世界本来就很陌生或狭隘的地域风貌在这个现代庞大而复杂的群体的笔下，反而显现出从未有过的广阔性。这不仅仅是这个群体多才多智，而是文学规律所使然。由此，我们必须拿出比以往任何时候更为明晰的意识，努力去热爱和表现自己所熟悉的文化和生活。这虽然不应成为一成不变的金科玉律式的创作准则，起码不应成为我们可以无端丢弃的东西。找一块熟悉的地方向深层掘进，必然会取得成就，这已被老一辈作家和新时期中青年作家的成功实践所证明。意外的成功也可能出现，但对于一个群体来说，尤其是对长篇创作来说，不可能全部靠意外取得成功。扎扎实实地深入生活，认识生活，应该成为一个永久的话题。我们大可不必为我们所生活的这块地方闭塞落后的经济等观点所束缚，一种反差极大的生活现实有可能成为我们再创辉煌的最有利条件。

在这里，我还要特别提及另一个重要经验，这就是面对近几年各种社会思潮、文学思潮的冲击，我们这个群体有过迷乱有过彷徨，但基本上还是保持着较为清醒的认识和十分坚定的信念，否则，将不会产生多部在全国引起反响的长篇。大家一定注意到了这样一种现象，一些最具影响力的作品正是在商潮冲击最厉害的时期所产生的。这一方面说明，我们这个群体一如既往地让文学面对人生，面对现实，面对未来，同时也使我们看到了一个十分广阔的文化市场。对于今后，长篇小说创作能否被“上帝”欣悦接受，我持乐观态度。关键在于我们是否全身心地投入更为艰苦的创造，赢得更为广泛的支持。由此看来，严肃地面对读者不能不说是我们最为重要的经验之一。我们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面对读者这一悠久的文学创作传统。

三、期待与展望

切实说来，陕西新时期以来所形成的作家群体，是随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所开创的国家和民族全面复兴的大气候而形成的。国家兴旺，文学繁荣，这是一个规律。能遭遇到今天这样的平和、稳定、开明、实事求是的社会大环境大气候，是我们这一代作家的幸运。因此可以说，陕西作家十年以来的长篇小说和新时期以来的全部文学创造活动，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组成部分，一个富有群体地域性特征又艺术个性鲜明的一部分，丰富了中国当代文学的百花园地的花色品种。

对于未来，对于今后这个群体创作发展，我们寄以希望和期待。

（一）希望作家们毫不动摇地继续关注当代生活的发展。党所领导的改革，对于一个饱经忧患和灾难的国家和民族所显示的成就，已经为整个世界所瞩目所震惊，这场改革对于这个国家和民族来说，其历史性意义不亚于一九四九年的解放。改革对于旧秩序旧观念的革除和新观念新秩序的重新建立，不会是一个简单的过程，而是一个剥离脓腐滋生新肌的过程，是一个民族心理结构重新安排的过程。作家不应该回避这个带着阵痛的蜕变过程，应该投身到这个新旧交替的过程中去，感受变革的欢乐也感受改革的痛苦。深入生活是一个永远不会过时的口号，对于任何艺术流派艺术形态的作家都是第一性的，转眼即逝的生活过去以后就成为历史，放过了体验感受的机会就会在心灵的感光板上留下空白，这是永不复返的遗憾。我们仍然倡导作家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去观察体验和感受，而不仅仅把自己拘囚于文化人活动的小圈子里。期待陕西作家能戒除文坛上的某些浮躁萎靡之气，写出深刻反映生活发展的大气之作。

（二）期望作家能广泛读书，开阔艺术视野，更新知识结构，使自己的生活思想和艺术思维永远保持最新最活跃的状态，才会对发展

着的生活和生活中出现的某些复杂现象保持最冷静最灵敏的感受。而这种最新的感受往往是小说创作的最初冲动。这里须得提及一个自信与自满的界限和不同内涵。自信来自于孜孜不倦的学习和吸收新的知识，不断更新观念，不断调整自己的心理结构，使自己永远处于一种清醒而又鲜活的思维形态。这种自信无疑是作家创造劳动的最佳精神状态和心理状态。自满是一种自我封闭，得于一隅而滞留不前，排斥吸收人类的新的精神发现和新的艺术形式，久而久之便形成一种习惯性思维定式，它从根本上排斥艺术的新鲜排斥艺术的更新，因此也排斥艺术创造。思维定式所直接造成的后果是艺术上的陈旧和重复，而陈旧的艺术重复，无论重复别人或重复自己，都只能造成艺术世界的萎缩。

但愿我们这个群体的作家，不要因为年岁的增长和艺术成就的取得而停止吸收，年岁可以老化而艺术思维却依然可以保持活跃，中国和世界上许多优秀的作家都提供了典范。

（三）我们期待这个群体共同创造一种艺术创造的和谐气氛，大家互相尊重别人的艺术探索和艺术个性。因为在任何时代任何民族的艺术世界里，根本不存在如哥德巴赫猜想那样一个陈景润式的唯一正确的答案。作家不同，艺术体验便不同，强求一律早已被文学的发展所摈弃所淘汰，真正实现百花齐放的时代已经到来。现在的问题很大程度上倒是花们要互相尊重互相宽容，红花不要讥笑白花，黄花也无须嘲弄紫花，家花应该容忍野花，洋花也不必吓唬土花；如果能够互相取长补短土洋结合家野合璧而生出一些杂种新种，可能不失为一种创造。

社会已经提供了一个宽松的适宜文学发展的大环境，花们自己也当创造适宜文学发展的小环境小气候。

（四）我们还希望和期待这个群体的朋友，在艺术创造的同时注意自身修养，不断强化自己的人格力量。社会发展的某个时期，在多样化的同时也会呈现某些复杂化现象，甚至某些陈腐的市侩哲学平庸观念也会浮泛喧嚣，作家唯一能够保护心灵洁净的便是人格修养。人格修养不是一个空泛的高调，对于作家的创造活动甚至可以说是致命的。市侩哲学、平庸观念、急功近利，首先伤害的是作家心灵中那个无形的感受生活感受艺术的感光板，这个感光板被金钱虚名被一切世俗的东西腐蚀而生锈，就在根本上窒息了一个作家的艺术生命。

爱护和保护自己的心灵，铸造自己强大的人格力量，才会对生活和历史保持一种灵敏的感受能力，才会永久不悔地保持对这个民族的深沉不渝的责任心。

我真诚地希望会议取得期望的效果。陕西的一批专门和业余文学评论家，始终不渝地追踪关注着陕西作家的创作发展，他们的研究对于今天的创作成果起到过重要的作用，我和这个群体的所有人任何时候都不会忘记，现在唯一期盼的是你们最冷静最科学的评论，捧杀和棒杀曾是老话，今天却并不过时而浮泛于中国文坛。我期待我们从这个会议开始，重新建立真正的文学批评的品格。

同志们，文学把我们扭结在一起，文学依然神圣，这是最重要的，其他一切都不必太重视，我仍然重复一九九三年换届会上的一句口号，一切陕西作家理应对中国当代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做出无愧的贡献。

美髯公的画与文

第一眼看见劳石，首先看见的是一脸漂亮的胡须。

我们这个种族胡须发达者少，所以对那些独具这种天然资源的人就有奇特、出众之感，也是物以稀为贵为尊的吧。出于这个常理，我也特别惊讶劳石的胡须。有人的胡须虽然也是超常出众地发达，但看去并不美，给人一种芜杂粗糙甚或乱七八糟的感觉。须不美反而给脸上添乱，自知者便天天刮脸削腮，弃之唯恐不及；自不知者还敝须自珍自赏，别人就看着那脸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乱着糟杂着；这是个人自由，无干涉之必要。

艺术界留胡须的人比其他行业的人多，所以人说拍电影的演电影演戏的画画的用脚写字的书法家浪漫。有回吃饭看见邻桌一位胡子垂到胸膛的年轻人，俩服务小姐悄声猜测说，这人是个导演。她说在她家乡拍土匪杀人电影的那个导演就留着这样凶的胡子。电影公演时，她跑了二十公里山路赶到镇上电影院专门去看大胡子导演执导的土匪电影，结果却有点遗憾，甚至不无丧气地说，他拍的电影要是和他的胡子一样好看就好了。

胡须好看而拍的电影好看与否，似乎不应该统一要求，也没有必然联系，胡须好看就一定会或一定要拍出好电影，没这个规矩也没有这个标准。然而女孩的心理企望却是善良的，希望艺术家手里出的活儿和他的胡须一样漂亮一样美丽。

欣赏完劳石的画册，我突然想到那位只见过一个留胡子拍土匪电影的导演的山村女孩，陡然想到如有机缘让她看看劳石的画和劳石本

人，她准会弥补那位导演留给她的遗憾，准会说劳石的画和他的胡须一样好看。

劳石的画好看，不单是我的读后感觉，其实早有众议公论，画界行家看好的后起之秀。他的画不仅中国人喜欢，海外华人也同样喜欢。他的画传到南洋一些华裔聚居的国家，随之便有一年几次频频被邀到南亚诸国去的荣幸，去表演画画儿自然也销售画儿，大有“养在深闺人未识，一朝选在君王侧”的宠幸。这君王当然应该是众多的读者。

他刚刚从新加坡归来，给我拿来的不是画儿，竟是一部排定版式只待印刷出版的书稿，我像惊讶他的美髯一样稀罕他的文章。文坛上有些才子型的作家，小说写得好，画儿也画得别开生面，这方面最负盛名者当推当代作家冯骥才。更常见的则是作家们在写作之余涂涂笔墨，意在调节神经兼修身养性，一种业余爱好一种陪衬手段，主要用心还是在作小说而不在画画儿。我孤陋寡闻，似乎画家写小说写纪实文学写散文者不多，而劳石竟然把这些文学体裁的各种形式都试过手了，这一本小说、散文、纪实文学和人物速写的集子，就是他文学创作的结晶。

这本集子以纪实文学为主，长则有几万字的《一个女人的命运》和《一份奇特的报告》，短到千把字的人物速写，总体内容都属于公安范畴的，另一部分则是对陕西画界一些久负盛名各具风骚的画家的扫描之作，这本集子中的这两大板块结构的文章，正是劳石自己生活的两种主要内容。他长期奉职于公安系统，我们每个生活在这个城市的人都受着他和他的战友首长的保护；他又兼作着画儿兼写着文章，给我们的精神生活创造着财富；他的文章主要涉及这两个内容，其实也是创作规律制约的结果，创作逃不脱跳离不了作家的生活轨迹，如同人摆脱不掉自己的影子。

劳石文章写得率直简洁。率直是一种本质的美，也是作家的一种气质的显示；简洁不仅是美的基本要素，而且是作文者的基本修养，或者说基础功夫。时下文坛似乎更珍贵率直，原因是装腔扎势无病呻吟装娇作嗲的文章太多太滥了。没有文字智慧便弄出绕口令来，企望幽默却缺乏灵性便不惜用屎棍子去堵读者的鼻孔。劳石文章没有虚的也没有假嗓子，全是率真率直简洁的叙述。自然就构成了真诚质朴之美，在时下就尤其珍贵。

《一个女人的命运》写得很见功夫，把一个本来很漂亮很坦诚的女人如何堕落到走向深渊走向断头台的历程，写得令人读来毛发倒竖气不敢出汗不敢冒的程度，真是不易做到的事。

我说，劳石的文章也和他的美髯一样好看，耐看。如果那位来自山村只见过一个导演的女孩有缘读一读劳石的这本书，会以我的阅读感觉为然否?

1995年6月26日 雍村

送平凹赴华西

西安市文联苏育生同志并转贾平凹同志:

在中国作协党组精心安排下，平凹同志不日即赴华西村深入生活，西安市委宣传部和市文联组织这个欢送会，这在市文联和本省文学界都将是一件重要的大事。

平凹以自己的智慧和不懈的创造精神，为新时期以来的当代文学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这首先是作为平凹所供职的西安市文学界的骄傲，也是陕西文学界的骄傲。作家进入到较高层次的创造活动时，一方面依赖对艺术的新的独特的个人体验，另一方面依靠对生活的更深层面的开掘，才能使一个杰出的作家在艺术领域保持最新鲜最具个性化的创造活力。平凹此次有机会到当代中国经济最富于活力的南方去体验生活，必将获得丰富的生活资源和达到一种全新的理性认识。我对平凹日后的创作满怀信心和真诚的期待。这道理很简单，创作到了平凹这样的程度，尽管就创作本身来说，仍然是作家个人的劳动，但他这种创造劳动的意义已不完全属于作家自己，而在更大程度上属于一个时代的文学的成就，属于一个国家的艺术创造的成就。

我因今天下午去深圳，不能参加平凹的欢送会，谨此借笔致意，也致以我的祝福。祝平凹同志一路平安。

1996年2月

解读徐岳

一

读着徐岳刚刚编成的散文集《十七岁那年》文稿，颇多感慨与悟叹。不仅是这些文章所营造的浓郁而又纯净的艺术气氛陶醉了我，不仅是丝丝入扣的真实真切的人生体验触动了我的情感之湖，不仅是那些蕴含着机灵、睿智、幽默而又干净简约的文字让我享受到阅读的快感；我总是控制不住心绪，从那些文章的情境中跳开，而且大都是在那些最精彩的一句描写或一句议论上，一次又一次地跳离文本，而联想到作家徐岳本人。

因此而发生了阅读心态的紊乱：我是在欣赏作家徐岳所创造的散文，还是透过这些散文解读人生和人格意义上的作家徐岳?

二

在新时期以来形成的陕西作家群中，徐岳是最早冒出来引起刚刚复兴的文坛瞩目的一位。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初，他创作的别具一格的儿童文学作品，频频发表于上海、北京和本省的大报和文学刊物，而且屡屡得奖，形成一方气候，崭露于新时期的文坛。

徐岳随后做了《延河》编辑，再后来又当了《延河》主编。为了这个年届四十的老字号文学刊物的生存与发展，徐岳全身心地投入了，纯文学刊物所面临的普遍性生存困境和《延河》自身的具体困难，都由这个陕西作协院里个子最低身板最单薄的人扛上背上了。三年过来，刊物的经济拮据的局面缓解了；作品的质量和刊物的总体面

貌，也在悄悄地又是显著地变化着，在如林的文学刊物中展示出独立的姿容。

人们（包括编辑自己）把报纸和刊物的编辑所从事的工作称作“替他人作嫁衣”，包含着特定的职业性自豪和职业性苦涩的多重滋味。徐岳却是既不诉说苦涩也未见张扬奉献，甚至从来不说这个话的一位编辑……我常常有一种说不出口的崇敬和遗憾浮上心头。

崇敬发自于我个人的作品经他之手通过《延河》与读者见面，这是作为作者对编辑工作的基本良心与道德；遗憾呢？我不禁一次又一次地自问，若是徐岳把主要心力放在个人的儿童文学创作上，如今会是怎样一种景观？而我又深知他是具备创作的实力和艺术修养的。

他毕竟有一本散文集要出版了。十七年出一本散文集，我又控制不住要慨叹了。然而从这件事的另一面来看，他抽暇所写的散文，当是体验最深不吐不快的人生片段……少是少了，却是精了。

三

作为书名的《十七岁那年》，无论从哪方面讲，都堪称散文精品。

十七岁那年的徐岳，竟然有如此精彩的故事。

十七岁该当是高中生的年龄，而已经为人师表的徐岳所发生的故事，读来居然使我有一种惊心动魄的感受，我看见了毅然决然甚至可以说押赌人生的青年徐岳的强悍的精神世界，也透见了丑陋和美好交叠着的人心世态。

一篇三千多字的文章，一波三折扑朔迷离而又浪花飞溅，我一次又一次感受到了“怦”然心跳的阅读快感。又反问了，搁那些无病呻吟装腔作势的人手里，这样的故事该会洋洋洒洒到几公里长呢?

《驱车五丈原》是另一种形态的散文，是我们见惯了腻味了的通常称作游记一类的散文。然而在这种体例的散文中，徐岳却同样写出了人生的体验，祖父生命历程中的每一个“九”字，都弥漫着神秘的又是不可逃遁的灾难性故事，透出这块特定历史名原的深沉的内蕴，这是游记散文中很难做到的一种境界。

我尤其感佩徐岳文字的简约。这里没有故作深沉、卖弄新潮句式和时髦名词。所有的文章都是一种徐岳式的简约。简约也不是忍饥挨饿勒紧裤带以求强行减肥式的操作，而是一种艺术修养的天然浑成。我便再一回领悟，真实的独特的体验才是一切艺术的灵魂，不只是文字的问题。海明威誓死以求的那个所谓“属于自己的一个句子”，其实不单指的是文字。

四

作家协会深邃的几进四合院的过道里，常见徐岳匆匆来去的身影，有人调侃说徐老板从早到晚出出进进神秘兮兮的。这尤其形象地道出了初任《延河》主编头二年的徐岳的形象。我却明白未必有什么神秘，确切说是悄悄地忙活着，忙活刊物的亏缺的经费。他不事张扬，悄悄地办自己要办的事；办成了也是悄悄地乐一乐，办不成不愉快时也是悄然默然的样子。

有一件使我永远无法湮灭的小事。为了“双五”文学奖（即五〇五文学奖）评奖工作，徐岳要与设奖的来辉武先生交换意见，有一次，终

于打听到来老板在丈八沟宾馆，便搭乘公共汽车去了。来老板的住室外排着一长串队伍等候见面，徐岳也就遵守秩序排队。他在花坛的水泥围栏上坐等了四个多小时，一口水也没得喝。

我听到这个细节时就哑然了。我首先不是为徐岳的什么伟大精神感动之类，而是感到一种愧疚。我是“双五”文学奖的得奖者之一。获奖的荣耀和获奖的实惠的背后，徐岳做出了怎样的悄悄的“神秘兮兮”的四个小时的排队！

如果说作为《延河》主编，为刊物的生存坐公共汽车骑自行车四处奔波是徐岳的工作责任，那么“双五”文学奖与徐岳个人有什么相干？这个“双五”文学奖是六年前设立的，是由徐岳提议由他与来辉武先生交涉商议妥了之后，由作家协会决议设置的。徐岳当时仅仅只是一位编辑，没有领导责任也没有职责，更没有任何人安排他去做这件事，而完全是徐岳的创意。

自陕西作协成立四十年来，终于有了一项形成规模也形成规则的省级文学大奖，它是在来辉武先生对文学事业的忠诚支持下，由徐岳操办弄成的……弄成的过程和每年评奖的工作备细，徐岳依然按照自己的悄悄默默“神秘兮兮”的习惯，悄悄默默坐公共汽车，“神秘兮兮”地排队等待与来老板交换意见，匆匆忙忙吃一碗凉皮……

五

散文集里有一篇写于右任与陕籍港商胡星元的一段趣闻，且不说对这两位名人惟妙惟肖的老辣独到的文字功夫，倒是于右任论及陕西人的一句话力透纸背：十个老陕九不通，一通便成龙。

我至今也不敢诠释于老先生所论的“不通”是什么不通，“通”又指的通了什么。我只是想着，人类追求文明的漫长进程中，不外乎两大主体，不断丰富的物质和健康健全的心理素养。任何一个优秀民族的精神世界里，总是尊重推崇那些既富于实干而又乐于造福他人的人。于大处说为国家为民族，于小处说为自己的事业为所在的团体，才会得到公众的尊重。这个简单的又是基本的社会法则，不会错也不会变的。徐岳是否属于“通”了的一个老陕？

1996年4月13日 雍村

致日本读者

——《白鹿原》日文版序

从少年时代对文学发生兴趣，到从事写作的四十年时间里，我断断续续先后阅读过大约十余位日本作家的小说作品，自然都是中文译本。这些题材各异风格迥然不同的优秀作品，对我的艺术探索曾经产生过有益的启示。然而，更使我得益匪浅的，是对相邻的日本民族的真实的了解，正是通过这些色彩斑斓的小说的阅读逐步拓宽逐步加深的，远远超出了历史和地理教科书上对日本的条理化介绍。这正是优秀的文学作品最原始最基本的功能，对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社会心灵的透视。

林芳女士将我的长篇小说《白鹿原》翻译成日文，由日本国最具影响的“中央公论社”出版，在我来说是感到十分欣慰的。我首先产生的是一种心理的平衡。作为日本文学作品读者的我，想到自己的作品变成我不认识的日文进入日本社会，似乎于心里完成了一种回报或者说交流。中国传统礼仪云：来而不往非礼也。随着《白鹿原》进入陌生的日本读者手中，原来的单向交流就变成双向性的了。我“往”而还“礼”了。

在我看来，作家创作劳动的全部意义，就是为了实现如上述的交流。作家把自己独特的生命体验和艺术体验凝聚为作品，就是为了和读者实现交流和沟通，达到两颗心灵的验证和呼应。经过林芳女士不懈的卓越的劳动，使我的小说《白鹿原》打破了语言的局限和障碍，

得以与日本读者实现交流和沟通，也使我有机缘与许多日本人握手，成为朋友。我向林芳女士致以深深的敬意和谢意。

1996年5月4日 渭南

柳青的警示

——在柳青墓前的祭词

柳青以他的整个生命所进行的艺术创造的全部历程，在今天，对我们至少有这样的警示——

作家生命的意义在于艺术创造。而创作唯一所可依赖的只有作家自己的生活体验、生命体验和艺术体验。各个作家的那些体验的独特性，在胎衣里就注定了各自作品的基本形态。

既如是，作家只能依赖自己的独特体验达到自己的文学的目的，以实现所憧憬着的艺术世界的崇高理想。企图以非文学的因素达到文学的目的，无论古今无论中外的文坛都没有永久得手的先例。

在这方面柳青堪称典范。他对自己所从事的创作这种劳动有独到的理解，更有精辟的概括："文学是愚人的事业""作家是六十年为一个单元"。在社会生活呈现多样化也呈现复杂化的当今，柳青的"愚人"精神对我们具有最基本的警示的意义。

柳青的一生，不单是作为作家的一生，而且是社会变革的直接参与者。他青年时代义无反顾投身革命，和平时期又毅然参与新生活的建设。柳青始终关注国家的兴旺和民族的命运，宏观如国家的重大决策，细微到生产队的计算工分的方法，他都身体力行参与实践。他的艺术神经对生活保持着一种超人的灵敏功能，因而获得了作品里的那种无与伦比的巨大的生活的真实感。这里构成柳青艺术世界常绿常青的生命之树。

真诚地而不是虚伪地关注国家和民族的命运，热情而不是冷漠地注视当代生活的进程，才能保持心灵世界里那根艺术神经的聪灵和敏锐，才会发出既宏大又婉转的回声。柳青在这一方面仍然对我们具有警示的意义。

作为艺术家的柳青，精神世界里贯注着一股强大的人格力量。他投身革命参与建设的同时也在锻铸着自己的人格，他创造艺术的同时也在陶冶自己的灵魂。他的一生留下的不仅是作品，也留下许多折射着他的人品光彩的生活故事，这些故事佳话和他的作品交相辉映，使我们看到了既作为艺术家又作为一个大写的人的柳青，文品和人品统一的柳青。尤其是在生存环境险恶的“文革”当中，柳青显示出一个民族的艺术家的铮铮铁骨和强悍的人格魅力。

面对物欲膨胀而呈现出的某些生活的混浊，某些文章和人格的扭曲和分裂的现象，柳青无疑给我们以尤为贴近的警示。

柳青以他的生命、智慧和人格所神圣过的文学，我们依然神圣。

1996年6月27日 长安

注钙

未来出版社拟出版中国古典文学四大名著的白话本，听到这个动议时，我当即想起十年前访问泰国观看孔剧的事。戏名叫做《哈努曼》，取材于傣族古典史诗《拉马坚》的一段，那是一个颇似孙悟空的神通广大的白猴子的故事。

由于现代文明的发展，泰国的孔剧作为一种古老的表演形式被现代人冷落了，那情形与近年间我们的传统戏剧所面临的尴尬境遇如出一辙，可见当代人对传统的古老的艺术表演形式的冷落和疏远是一个世界性困惑。然而泰国政府面对西方文化的冲击，坚定不移地采取了对民族文学艺术的保护措施，国家拨专款养活保存一个孔剧剧团，专演传统戏剧《哈努曼》。中小学语文课本上列入史诗《拉马坚》片段作为必修课，中小学生由有关部门统一安排到国家大剧院欣赏孔剧演出的《哈努曼》。我在观看这出戏时，整个剧院座无虚席，全部都是接受民族艺术教育的中小学生。

任何一个民族都尊重自己的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这几乎是一种带有本能的民族心理。这些光辉灿烂的篇章，都是这个民族最杰出的人物创造的，集中体现的是这个民族的意志和生活形态，体现着一个民族发展史中的精神追求和文明建树，体现着一个民族历史演进中的阶段性的巨大痛苦和巨大欢乐。这些文化艺术的瑰宝已经不完全属于创造者，而是属于一个民族的集体智慧的象征。作为这个民族的既有自豪感也有责任感的任何一代传人，都会自觉地继承它传扬它，这不是某个个人的喜好所选择的结果。未来出版社的这个动议在我理解，即是出于一种深远的历史视野和一种责任感。

这四大名著所产生的时代，于今已经既久且远。久远的历史演进的长河中，中国语言和文字的表达形式已经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对于文化知识、历史知识和生活阅历都较为浅短的青少年读者来说，古典文学中的某些语言形态就成为一种阅读障碍。然而青少年时代又是人生求知欲和记忆力最美好的时代，不应因为阅读障碍而使四大名著拒绝一代又一代青少年。况且，中国广大农村尚有数以亿计的文化只限于初中或小学程度的农民，他们的阅读当更困难。经过改编而打通了文字障碍的白话名著版本，它所适应的读者层面，肯定远远超出能够阅读和欣赏原本的人数，这就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创举和善事。

这个白话改编版本的问世，将把四大名著从纯文学的文化人的圈子里彻底解放出来，走向青少年，走向文学圈子以外的广大读者。面对现代文明进程中西方文化的强大影响，给我们的青少年注入民族传统的文学艺术的钙质、汲取本民族文化的精髓，在兼容并蓄各个民族优秀文化的过程中，才能不失自己的立身之本和民族之根。未来出版社的这个举措和我所经见的泰国保护本国文化的坚定措施，是英雄所见略同。

为了促成这个举措的尽快实施，未来出版社做出了严肃认真的部署，选择了陕西作家中的几位成就卓著者从事这一工作，而且由陕西师范大学和西北大学的专家做最后的审定，以便保证原著的全部意蕴能够准确而又通俗地走向读者，相信会受到青少年的欢迎和喜爱。

1996年

敞开心灵之窗

有哲人说过，眼睛是心灵的窗户。

察物观世，我们靠一双眼睛感知世界。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一睁开眼睛，就看见了灿烂的朝霞和渐次沉没的夕阳，看见如铁如铅般厚重的黑云和纤尘不染的雨后的天空，看见气象万千的群山和千姿百态的江河，看见拱破泥土的嫩芽和成熟枯萎的禾秆儿；看见铺天盖地的大字报红海洋以及“黑帮”被游街示众时垂死的脸，看见林彪在天安门上挥舞小红书时八字眉下鬼火一样游移不定的眼神和烧焦在沙漠里的尸体残骸。由眼睛所摄入的自然景观和社会生活的历史性细节的镜头，便成为我们再认识自然再把握生活的一种参照，一种财富。

博览广识，我们凭一双眼睛探索世界。

书是人类进步的阶梯。知识就是力量。读书以获取知识，是通过眼睛来充实心灵的。我们的祖先和别个民族的祖先都留下了璀璨的知识宝藏。我们从一二三天地人识字开始，随之就开始了对自己的祖先和别个民族的祖先所创造的知识的掠夺性继承，随之就开始了自己对生活、社会和人生的探索，随之就开始了自己的艺术风景的创造。这一切都合情合理，因为祖先的创造目的是无私的，我们站在前人的肩膀上进行的接力式的攀登也是属于社会的。

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科学的合理的社会总是努力开辟他的子孙感知世界认识世界的视野，把人类创造的古典文明和现代文明尽快地吸

取过来，开启青年一代的智慧之门，再进行新的创造和发明。然而，不幸的是我们历史上和现实中所发生过的愚蠢透顶的自我封闭，无异于关闭了这个民族的眼睛。

当我们把大字报贴满城乡的所有墙壁，当我们的工人农民拿着竹皮热水瓶和摞满补丁的胶质雨鞋忆苦思甜声泪俱下呼喊万岁的时光，世界又开始了一场科技革命；当我们满怀献身的激情高呼解放全人类的口号的时候，其实最需要解放的正是我们自己；我们的愚蠢和我们的滑稽，正在于我们的眼睛被蒙住了。

邓小平毅然撕去了蒙蔽我们这个民族的眼睛的丑陋的黑布。

我们看到了一个五彩缤纷的世界。我们重新获得阅读人类最新发明最新创造的知识的权利，包括阅览万紫千红的世界艺术风景。

我也和许多当代中国人一样，有幸走出国门，看到了别个民族的生存形态和生活形式，便有了眼界的开阔，便有了防范愚蠢和滑稽再发生的参照系。西方的月亮和中国的月亮一样圆，但要更明亮一些，因为那边的环境保护比我们做得好，空气中的烟灰粉尘更少些。

敞开眼睛面对世界，敞开眼睛阅读世界；更新知识，打破心理桎梏，重构一个活泼而又富于创造活力的心灵。

1997年4月25日 西安

回声·钟声·双刃剑

对于具备中学文化程度的每一个当代中国人，都不会不知道发生在一个半世纪以前这样一场战争，也不会忘记从中学历史课本上得知的这样一场战争，原因是简单的也是基于人皆有之的一种羞耻之情。那场战争留给一代又一代子孙的感受就是耻辱。当时钟一分一秒一日一月年复一年碾过百五十年的历史时空，耻辱也随着这钟声在这个民族的子孙的心上碾压着难以言诉的印痕。电影《鸦片战争》把发生过的那一幕重新展示给我们，让我们再羞耻一回，或者说再咀嚼一回羞耻，我们当会切切感到香港的回归，对于一个民族和国家意味着什么；当会切切地联系到我们正处身的生活现实，我们应该干什么而不应该再干什么，应该怎么干而决不应该再那么干。我们确凿需要聆听《鸦片战争》传递给我们的历史的回声，当为惊世之钟声。

这个电影所重现的历史之声，在我看来是一把双刃之剑：一刃刺剥的是殖民主义者凶残地践踏另一个民族的脸面的本性，起码让生活在今天的我们可以加深理解什么叫殖民主义；另一刃刺剥的则是腐朽到极点的我们的封建帝国，它的妄自尊大里所透现的可笑可憎，它的庞大骨架里透现的不堪一击的脆弱。这样的封建帝国面对新兴的资本主义的殖民帝国，除了失败除了羞耻再不可能有任何稍微体面的结局。纵然有林则徐、关天培这样的民族脊梁，也不可能支撑那个腐朽透顶的封建帝国的架子。

我们便可以更贴近地以此为参照，重新理解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的方针，对于我们国家的现实和未来意味着什么。“弱国无外交”。“落后就要挨打”。整个一个中国近代史给我们最直接的最羞耻的教

训，即如是。我对邓小平与撒切尔夫人关于香港问题谈判时的那句“主权是不容谈判的”话，确实感到了一个当代中国人的尊严。我们终于可以如此理直气壮地对英国首相说话了，凛凛然坦坦然说，不能说的事情是不容许说的。

历史是现实的镜子，每一个对民族和国家怀有责任感的人，都会在这历史的镜子面前，想到什么该做和不该做什么，尤其是那些负有实际责任的人。

1997年6月 西安

踏过泥泞

大约是二十五六年前的七十年代初期，我在西安东郊的一个公社（即乡）里工作，在报纸上读到一篇记叙修建襄渝铁路的长篇通讯文章，集中笔墨突出重点记述的是学生连的优秀代表吴南。也许因为我那时候也是二十来岁的青年人吧，架不住那篇声情并茂激越慷慨的文字的煽情，几次湿润了眼睛，为这个仅仅小我几岁的青年英雄而激动而感佩而折服。吴南牺牲了。至今我依然记着吴南这个名字。

距此十余年后的八十年代末的一个冬天，我到汉中、安康两地去采访。火车在阳平关掉头转弯之后，便在秦巴山地的丛山和大大小小的坝子里蜿蜒穿越。车轮碾过铁轨发出铿锵沉重节奏强烈的声音，我却一次又一次幻觉着吴南——吴南——吴南的呼唤。是的，吴南和他的男女同学或者说战友，用他们尚为稚嫩的肩膀和胸膛，铺就了这一段贯通陕南东部和西部的铁路。我第一次乘坐列车在这条路上旅行，心中总是萦绕着吴南和吴南们。这就是吴南们修的那条铁路！

又过了七八年，即一九九六年末，我在《西安日报》的副刊版上读到了《三线学兵连》的征文文章。第一篇文章尚未读完，我就想起了吴南。随后能读到的每一篇征文，在我的心里就排列起一道吴南的森林。我今日情感和昨日记忆的闸门一齐开启，一次又一次在那些叙说当年的文字上洒下热泪。

“加馍！”这样的呼喊不啻令我心灵震撼，直接引发起我对饥饿恐惧的并不遥远更不陌生的体验，那是一代人的共同的心理恐慌恐惧症。无论干部学生工人农民，无论多么杰出的或平庸的人，面对粮票

油票餐券和米袋面缸的尴尬和忧愁却是共同的。何况这些正长着身体又承担着超常劳动的中学毕业生，然而他们要求“加馍”的呼喊并不是抗议，亦不是示威，而是面对饥饿的一种自然的又是心理的调侃，表现了一种令人心里酸痛的忠勇与赤诚。

张三元死了。然而《巴山汉水且为忠魂舞》里寥寥数笔就把一个欢欢蹦蹦的十八岁青年的形象留在我的心里，怎么也抹不掉。他是西安市第二十六中学的学生，和我所在的作家协会机关同在建国路上，不过百码的距离。往往在经过那所校门看见上学放学的学生时，我就会想起这位牺牲在陕南山野里的孩子。他的患着心脏病的母亲经受不住这样的精神挫伤，死在他的坟堆前，这样的悲剧真令我难以承受。

“在阴暗潮湿的道坑里，脚下的水没过小腿肚，破裂的胶鞋里灌满了泥水和沙子。一步一‘扑哧’，裤脚湿透了大半截，棉衣湿漉漉地贴在身上，在风机震耳欲聋的轰鸣声中……我们完全失去了时间概念，机器人似的只晓得不停地干干干。”

这是《无尘的记忆》里的一段描述劳动场景的文字。作者阎鸿鹏被石头砸破了脑袋，没有经过任何医疗处理，找到一顶安全帽继续干下去。他的战友一脚踩到耙钉上，拔出钉子继续干。这里没有丝毫的英雄主义的自我渲染，而是简洁朴素的铺陈，读来令人心悸。经历过这样殊死搏斗的人，当“青春已逝豪情不再”的今天，竟然如此沉静如山：“无论过去或是现在，我心灵深处始终固守着一方净土，那就是善良和忠诚。这就是那个特殊的年代馈赠给我的终生财富。”善哉斯言！

“三线学兵连”是一个特殊时代里的特定的称谓。那个严格限定的十年，无疑是共和国历史上最黯然失色的十年，通称为十年浩劫。处于十年浩劫当中的年轻人，当是受害最深受苦最深的一代人。在那十

年里活过来的我们，以及比我们年龄大的和稍小一点的同时代人，谁都不会忘记发生过什么经历过什么遭遇过什么得到了什么失掉了什么。当我们今天能够冷静理智地审视昨天（即十年）的时候，既可以是严峻的又能做到一种宽容。严峻自然是面对历史，面对国家，面对民族，再也不能容忍那样持久那样神圣又那样愚蠢的劫难发生了；宽容自然是面对我们的灵魂而言，当整个国家和民族陷入一种持久的灾难，整个国家和民族前进的车轮陷入漫长的泥泞之中，作为我们个人的得失与苦难就是无法摆脱的，是无计逃遁的，是在劫难逃的。如此想来，也就释然了。

在那场以摧毁和破坏为特征的劫难中，三线学兵连的中学生却成就了一桩建设的业绩。襄渝铁路铺摆在秦岭巴山山水之间，二十多年来火车日日夜夜呼啸着穿梭往来，这是写在陕西大地上的长卷诗篇。面对过去面对今天面对将来，那些当年的学兵连的中学生们，都会是一种安慰一种自豪一种自信：在国家和民族处于劫难的年月，他们选择了建设；以自己的青春年华，以自己血肉之躯以至生命，义无反顾地踏过了国家和民族发展历程中的泥泞，也踏过了自己生命历程中的泥泞，心灵永远都是一种最可自信的慰藉；面对儿女以至孙儿都可以心安理得地说，在那个以破坏和摧毁为特征的年代，爸爸、妈妈或爷爷、奶奶选择了建设。

踏过泥泞，人生当是另一番境界。踏过泥泞，人格当会锤锻到更高的层面。踏过泥泞，那个痛苦的过程就升华为人生的一笔财富，这是任何教科书上都不可能捡拾得到的精神财富。

1997年7月16日 西安

（本文为《魂系襄渝线》序。）

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

一

在新时期文艺复兴的潮声中获得新生的《延河》，一亮牌就把它的宗旨放到培养和扶植陕西青年作家的成长上。近二十年来，主编换了四位，唯一不变不动摇的，便是这个宗旨。《延河》曾经筹办过各种名目的作品专号，而坚持下来并且形成较大影响的，当数几期《陕西青年作家专号》。

记得第一次办《陕西青年作家专号》是在一九八一年，同样是一月号，刚刚跃上陕西文坛的路遥、平凹、京夫、志安、莫伸、王蓬、李凤杰等，构成了甚为雄壮的文学青年近卫军队列，他们竞赛似的精心创造的佳作引起了文坛的瞩目，也产生了较为广泛的影响。刚刚走上文学评论舞台年轻的曾镇南先生，读罢那期“专号”写下了万余言的长篇评论。无论对《延河》还是对那些青年作家，都是一种永远值得怀念的珍贵的记忆。因为那是曾先生自动投的稿，而非约请，更非目下某些等而下之的雇佣性评论。

徐岳上任主编不久就筹办过一期青年作家小说专号，恰恰切切当是陕西晚生代色彩的作品专号了。杨争光的《篮鱼儿》手稿送到编辑部，就引起编辑们的欢呼，随之在作协老宅深院里引发喧哗。及至后来作品面世，几乎被现有的几家选刊全部选载，接着又是各种名目的奖励。一篇好的短篇不仅标志着一个作家新的艺术探索的里程碑式的跨越的成功，也动人地流露出刊物编辑和作家同仁共同的爱心。

本期又是专号，是子心走马上任主编之后对那个宗旨的继续不移的举措，即青年才是文学未来的希望，而且恰在新世纪的曙光可眺之时。

二

就题材说，本期专号十分宽泛。作品的描写对象集中于当代城市生活和城市中各个层面的当代人。你可以看到这样一张张新鲜面孔：在处处受制乃至受骗而近乎疯张起来的高校教师；昨日的孤独的城市孩子；努力练着嗓门成不了歌唱家的女人和正练习画画尚未成为画家的男人互相审丑的心理演变；农民妻子和引以为骄傲的吃商品粮工人的畸形爱情，畸形心理，怎一个“商品粮”了得；有敏感入微的城市知识少女的“秘密之香”；有浑身浸润着草原戈壁雄浑诗意顽强如石头的生命意识的灵魂等等。而纯粹的黄土地上的农村生活和乡村人物竟然连一篇都不再见，这对于那些习惯于从《延河》上把握乡村生活变迁和农民世界心理秩序的读者来说，也许是有一点遗憾或者惊讶。然而，我却欣然鼓舞，陕西目下三十岁上下的这一茬青年作家，已经彻底改变了陕西传统的乃至清一色的乡村乡土文学的格局了。少一半遗憾，多一半欢欣与鼓舞。

无论乡村题材，无论城市题材，首先是受作家的生活道路生活环境制约的。本期专号里的青年作家，大多是新时代里成长在城市里的文化人，他们感受城市进而书写城市，这是很自然的事。况且，小说写作的成功与失败，并不在于选择了乡村或者城市作为描写对象，而在于感受到了什么，写出了什么。题材从来都不会成为决定一部或一篇小说优与劣的先决性标志。然而，无论如何值得庆祝，陕西作家清一色的乡村题材创作的局面不再，这种多样化格局的出现，总是标志

着作家视野的扩展，作品人物的多色多彩，才是一个完整的艺术世界。

从艺术手段看，本期专号可谓十八般技艺，各逞其能。荒诞派，感觉派，意识派，后现代，新写实以及现实主义，都应有尽有了，使我眼花缭乱的同时，更觉耳目一新，令人振奋。因为新时期以来的陕西文坛，几乎又是现实主义的一统天下。谁也不怀疑现实主义持久的生命力，更不怀疑其再丰富再发展再创造的余地和空间依然广阔。然而，清一色的乡村题材再加一个清一色的现实主义，也就造成了陕西文坛的单色单调。艺术需要各种主义和流派互相竞争，竞争的过程也就有互相影响互相吸收互相融会互相杂交，更为积极意义的是互相竞技，才刺激互相发展。这种呈现着纷繁的艺术形态的展示，对于清一色现实主义的陕西文坛是一次挑战，更是一个真正的百花齐放的新景观。

就本期专号与一九八一年一月的专号相比较，你就会发出几乎是世纪性的惊叹，陕西文学走过了怎样一个艰难而又令人瞩目的嬗变过程。

三

把黄建国的《两个谎言与一个真实事件》和张虹的《雷瓶儿》做对比阅读，是很耐人寻味的快事。前者是以荒诞的形式叙述的当代生活中的荒诞故事，却正好令我读出了逼近现实的真实；后者是以圆润老到的现实主义手法叙述的一个现实的故事，又恰好令我感到了彻底的荒诞不经。这两篇篇幅都很短的真正的短篇小说，都使我感到了深层的心理悸颤。

张虹以极其隐蔽的叙述文字，通篇布满了阅读的迷雾或者说陷阱。高明之处在于，这种迷雾既感觉不出故弄玄虚，亦感觉不到刻意的小说技巧和文字技巧，而是生活本身的迷雾或者说泥淖，被准确而又敏锐地捕捉到了把握透了。故事发生地——艺术馆的具体生活氛围，是雷瓶儿赖以生存的空气，充满着迷雾和泥淖乃至陷阱。按照作者描述的那种迷雾污浊的生活氛围对雷瓶儿的评价，我也误入其中参与了那种迷雾和泥淖给予雷瓶儿的评价。随着迷雾的转移和泥淖的延伸，自信而清醒的审丑者发现瞅错了对象，作为丑的对象被审的雷瓶儿成为审丑的主体，丑和美，审者和被审者完全逆转，在几乎一切人眼中作为丑的被审对象被斥责被羞辱的雷瓶儿，霍然朗然从迷雾和泥淖中站立起来。

我的深层的悸颤概出于兹，我自己是否在形而上与形而下的审美和审丑中颠倒了别人，亦颠倒了自己？我们有勇气面对雷瓶儿吗?

黄建国一改严格的现实主义手法和乡村故事，给人一种惊奇。《两个谎言与一个真实事件》令人感到了作者对知识分子生活层的更深一层更趋超前的体验，职称与住房的得与失，应得与不应得，该失与不该失，全部复杂的也是司空见惯的过程都被超越了，只集中笔墨写那个得与失的过程之后的直接结果。这个结果留给老讲师吴格远的心理上的不自在，凝结成“不再微笑”，进而发展到最终的恢复微笑或者说微笑的复活。这种纯粹的具象式的细节，直教人也微笑不出来了。黄建国着实“荒诞”了一回，挺够劲儿。

现实主义写到极致时出现了荒诞的效果，以荒诞编造的手段却雕刻出冷峻逼人的真实。两位在陕西一南一北一女一男的青年作家，以各自独到独立的艺术体验，漂亮地完成了一次艺术创造过程，具有异曲同工之妙。

四

我由此而联想到海明威。

海明威在很长的几年里，曾经陷入生命和艺术体验的平庸状态里，写出的几部小说连续遭到评论界的批评乃至讥讽，而海明威自我感觉良好，尚未意识到自己的平庸，为此公开抱怨评论家不理解作品，甚至不惜公开辩论以至“骂仗”。舌战与笔战几番仍然改变不了作品的被冷落被轻视，海明威终于沉静下来，终于意识到了平庸也意识到不应迁怒于评论家。他宣布：我要寻找只属于自己的句子。他终于寻找到了只属于他海明威的新的句子，这就是《老人与海》。整个美国文坛为此而癫颤起来了欢呼起来了。

我曾经因这个轶事而获得了对于创作的更深一层的理解。是的，作家毕其一生都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因为小说创作是以个性为标志的劳动，没有个性就没有文学，这是文学常识。世界上永远再不会出现第二个如“四人帮”一样愚蠢的家伙，硬是要中国所有作家都用“三突出”这一种句子去写作。

本期专号所呈现的生气蓬勃的局面，最直接的印象就是这一茬年轻的陕西作家，个性鲜明，姿态独立，探索独行，完全体现出各自寻找只属于自己的句子的勇气和牛气，我也看到了他们的个性鲜明的“句子”。

祝愿诸位尽快得到自己的独特而如绝唱般的句子。唯一所要互勉的是，寻找自己的句子不是一次性的过程，是一个不断的又是阶段性的突破过程；这个寻找的过程是艰难的也是幸福的过程，唯其在艰难

或痛苦之时，不要重复如海明威迁怒于评论家和读者的蠢事，得面对自己，永远保持寻找的勇气和牛气。

1997年11月19日 雍村

（本文为给《延河·陕西青年作家小说专号》的寄语。）

关于《白鹿原》获茅盾文学奖答诗人远村问

远村：陈老师您好！您的长篇小说《白鹿原》荣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的消息刚刚传来，《延安文学》杂志社的全体同志欣喜若狂，奔走相告。我受《延安文学》主编曹谷溪的委托，首先向您表示祝贺，并就《白鹿原》获奖对您进行采访。

陈忠实：谷溪和《延安文学》都是我的老朋友，好朋友。感谢同志们、朋友们对我的关心与支持！你是《白鹿原》获奖之后我接待的第一位记者，我乐意回答你提出的问题。

问：您的长篇小说《白鹿原》荣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您是否感到意外，或者早已成竹在胸呢?

答：这两种情况都不是。我既不感到意外，也不应该说是成竹在胸。因为，我对历届茅盾文学奖的评奖过程还是了解的。应该说，一个成熟的作家，对自己的作品达到了什么，没有达到什么都是非常清楚的。也就是说，作家创作一部作品之初的总体构想，到他最终创作完成的结果达到了几成，作家自己心里比别人更明白，得失当然也是很清醒的。《白鹿原》是以写家族史来反映中国近现代社会变迁发展的，同类题材的作品也不少，每个作家都将自己的体验和艺术追求融于作品之中，做了各自独特的勇敢的探索，我自然也做了自己的探索，认真的成熟的作家应该能够客观冷静地看待这一切，既不会狂妄，也无须自诩。因为，艺术创作是个实实在在的事情，写书就是为了与读者进行交流，一个人写，千万个读者在看在审，长处和短缺都

逃不脱读者的审视。至于说评奖，据我所知，历届评奖都要考虑各种题材，各种流派，各种艺术手法的作品等，所以，没有评上奖的作品未必就不优秀。因此，《白鹿原》能获奖，并不能说成竹在胸。当然，能获奖我自然很高兴，因为，得奖表明读者和评委们对我创作的《白鹿原》所进行的探索和付出的劳动是一个肯定，也对我未来的创作是一种鼓励。

问：茅盾文学奖已举办了四届，对每届获奖作品您如何看待？对茅盾文学奖本身的价值和意义如何估价？

答：茅盾文学奖已经搞了四届，应该说每届所选作品都是那个年限的优秀长篇。我们大体可以从获奖作品看出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发展的历程，无论反映生活的广度和深度，还是艺术形态，都可以看出近年来获奖作品都有较大的变化，也可以看出我们的长篇创作在不断走向更成熟的目标，尽管它不能囊括各个年限的所有优秀作品，但这并不影响我们通过茅盾文学奖对中国作家在长篇小说创作方面所做的努力的判断。至于茅盾文学奖本身，我以为文学大师茅盾先生用自己的稿费设此奖项，其目的和用意是十分清楚的，它体现了老一代作家对长篇小说创作和后辈作家寄托着厚望。它的权威性和影响力也是肯定的，大家不仅关注评奖的作品，更重要的是通过评奖激发人们对我国长篇创作的关注。作为作家，我也很关注每届的评奖活动。因为作为一个国家级的文学大奖，只有将不同年限出版的长篇中最优秀的作品筛选出来（这是社会各界的共同心愿），才能真实地反映长篇小说创作的真实水准。所以，茅盾文学奖设立的意义，就在于它激励了中国作家不断在长篇小说领域创作出能标志不同阶段长篇水准的优秀作品，也为我们提供了优秀的阅读范本。

问：茅盾文学奖是一项专门奖励长篇小说最具权威性的大奖，那么，您对评奖宗旨“反映时代精神”如何理解？

答：作为我国最具权威的文学大奖，将“反映时代精神”作为评奖宗旨，我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作为文学主体的作家，通过自己的体验和认识，将国家和民族在各个历史时期所经历的痛苦和欢乐真实地再现出来是至关重要的，我曾在评价路遥的作品时，认为路遥就是取得这样成就的重要作家，也因为这一点，我很敬重他。他总是把自己的思想和情绪，最关注的焦点跟民族的命运紧紧结合起来，不是人为的接近，而是自然的关注。作为一个时代的画卷的长篇小说，反映时代精神，揭示时代精神，揭示作品所反映的那个时代人们的精神状态，不光是凯歌，也有人们的奋斗、追求和探索过程中的痛苦、艰难，甚至一些人的悲观情绪。只要将那个时代的本质准确抓住，通过自己不同形式的艺术作品表现出来，它都会从不同侧面反映时代精神。这使我想起了传记文学作家欧文·斯通先生的一句话，他在《马背上的水手》中说杰克·伦敦：“他从来都是将自己滚烫的手按在时代的脉搏上。”我想一个对国家和民族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负责的人，他的手不按在时代的脉搏上，他放在哪儿呢？就我而言，生怕自己的粗糙的手没有按住时代的脉搏。大家知道，我过去的中短篇小说几乎全部都是关注现实生活变迁的作品，只有《白鹿原》是写历史的，但即使就是《白鹿原》，也是反映以往五十年的我们这个民族的发展历程，充分再现那个时期的社会秩序和人的心理秩序变化所造成的人的各种精神历程，或者说是力争表现我们民族在那五十年的历史进程。我是企图追求一种历史的真实。所以，我认为时代精神应该是一个广义的概念，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历史题材的《白鹿原》同样是要达到反映时代精神的目的。我的这种艺术观念得益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和真理复归，使我提高了认识，尤其是参照过去历史发展，更坚定了我对

社会本质的看法。如果说《白鹿原》有值得大家称道之处，我想无非是我做到了历史生活的真实。

问：您的长篇小说《白鹿原》出版之后，被读者和评论界称为史诗性作品，您认为文学作品的史诗性品质主要特征是什么?

答：《白鹿原》出版后，一些读者和评论家有这种说法，但一部作品是不是一部史诗性作品，应该由历史来检验。从史诗性来讲，首先一部作品要真实准确地反映它所反映的那个历史阶段的时代脉搏和精神，历史的价值就是生活的真实。另一方面，就是艺术追求所达到的高度也应该是那个时代的文学水准。所以，史诗性作品不仅是个篇幅问题，更重要的是作品本身所呈现的深度和广度，比如《羊脂球》不过几万字的小说，你可以说是中篇，也可以说是短篇，但它堪称史诗性作品。又比如《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真实生动地再现了卫国战争时期，苏联人民在那场反侵略战争中的心理真实，我认为它就是史诗。一般容易产生的错觉是以为史诗性作品就应该是篇幅很长的大部头作品，实际小篇幅的作品也可以成为史诗性作品，关键是质量和品位。

问：有人说长篇小说是：一、文学中的交响乐；二、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三、一个时代纪念碑式的文章；四、一个民族的秘史。您怎么看？哪一种说法更接近您的文学理想和长篇创作追求?

答：我以为这四种观点都能成立。我们读我们传统的四大名著和欧美苏俄的经典长篇都能找到这四种说法的标本，也就是说长篇小说不是一种规定的范畴。关键在于作家本人要将自己的长篇小说写成交响乐，还是百科全书，或者是秘史，其决定性因素是多方面的，但最根本的因素是作家所关注的那个时代的内在精神，正是这个精神决定

了作品的风格，作家对那个时代的体验和感受规定了作品的形式。我对《白鹿原》的选择，是因为我对我们这个民族在历史进程中的一些别人没有写到的东西有了自己的感受，或者说对民族精神中鲜见的部分我有了新的理解和认识。所以，我规定了《白鹿原》向秘史的方向发展，这自然也说明了我为什么喜欢巴尔扎克对小说的定义。一个民族的发展充满苦难和艰辛，对于它腐朽的东西要不断剥离，而剥离本身是一个剧痛过程。我们这个民族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近五十年的社会革命很能说明这一点，从推翻帝制—军阀混战—国共合离这个过程看，剥离是缓慢而逐渐的，它不像美国的独立战争，只要一次彻底的剥离，就可建立一个新秩序。而我们的每一次剥离都不彻底，对上层来讲是不断的权力更替，而对人民来说则是心理和精神的剥离过程，所以，民族心理所承受的痛苦就更多。在《白鹿原》中，我力图将我们这个民族在五十年间的不断剥离过程中产生的种种矛盾冲突和民族心理历程充分反映出来。我们几千年的封建制度，许多腐朽的东西有很深的根基，有的东西已渗进我们的血液之中，而最优秀的东西和新生的东西要确立它的位置，只能是反复地剥离，所以，我们这个民族就是在这样一种不断饱经剥离之痛的过程中走向新生的。

问：据我所知，您在进行长篇创作之前，对东西方长篇经典进行过大量研读，您认为鉴定一部好的长篇着眼点在什么地方？我们国家新时期以来的长篇写作是否进入一个经典写作水准，它可否与西方当代大家的创作比肩平坐?

答：在《白鹿原》创作准备阶段，除了其他方面的准备，艺术准备也是相当认真的。当时，研究我的作品比较多的一个人是西北大学的蒙万夫，他听说我要写长篇，就告诉我要注意结构，他说像你写跨度那么大的长篇小说，结构非常重要，弄不好就成了“提起来是一串

子，放下来是一摊子”，那就是没有骨头的一堆肉嘛！而我最担心的也就是这个问题，因为，我要写的小说历史跨度大，事件庞杂，人物多，结构不好就会出现这种问题。所以，我压力很大。在这种情况下，我大量研读了一些东西方长篇经典，阅读的结果却使我的压力反倒解除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发现没有一部作品与另一部作品的结构是相同的。即使是同一个作家的作品，也没有相同的结构，这就使我明白，任何一种结构都是作家的创新，没有一个作家能依赖别人的框架来装自己所要表现的生活内容，任何作品都是作家的一次新的创造形式，也就是说自己的结构要靠自己去创立，如果我们仅限于用别人创造的形式来进行自己的写作活动，那就是一次重复。反正别人用过的，尽量不去用，自己用过的，更不能重复使用。只有将一个全新的艺术风貌的作品拿出来，才能争取到它的生存价值。针对当时文学发展出现的一些问题，我又自觉地阅读了一些作品，当时出现的从未有过的现象是，作家出书要自己拿钱，文学跌入低谷。我当时在乡下正在写作这部长篇，无法逃避这样的问题，即文学的萧条肯定跟商潮有关，但并非所有作家都能下得海去，况且作家如何才能将读者从其他的文化娱乐中吸引过来，这才是至关重要的。当时，传媒在炒美国有个作家叫谢尔顿，他几乎每写一部长篇都成为风靡全球的畅销书，我就想，在美国那样一个社会，商业气氛肯定比我们浓，娱乐方法更比我们多了，为什么小说还能这样畅销？我找来谢尔顿的作品看完后，最使我感动的是他的小说的故事和情节都十分生动，而当时我国文坛正在兴起一种新的艺术观点，提出无主题、无故事、无情节等，但谢尔顿与此恰恰相反，他靠生动的故事，深刻的主题占领图书市场，并很快占领中国市场，这就坚定我的长篇写作要有故事的生动性，包括可读性，因为作家不只是为评论家写小说，更重要的是为读者写小说，所以，你不能不考虑读者的阅读情绪。要吸引读者，用高

明的艺术手段去吸引，不是低俗的迎合，小说发展在当代，作家不能不考虑读者在整个文学活动中的参与效果。

长篇小说自新时期以来，生活题材已经非常广泛，几乎每个领域都被作家涉足过了，无论数量还是质量，确实发展了许多，去年正式出版的长篇近七百部，这说明长篇势头很好，但读者和评论界对长篇要求也高了，广泛引起轰动的作品不多，这就提出一个问题，长篇创作质量还亟须提高，为此国家也号召要出精品，至于具体到一个作品是否成为经典，当代恐怕很难判定。当代人能感受作品出来时那种确实令人激动不已的艺术力量，但还不能说它是经典，需要靠时间来检验。任何一个作家都想倾其毕生创造一部不朽之作，但究竟能否不朽，还得留给历史来检验，作家所能做的事情，就是将自己对生活的体验，能充分在作品中体现出来，从而达到一定的艺术高度。

问：作为一个获奖作家，您是否还有一个更大的目标，比如，希望自己今后的作品能在国际上拿大奖？中国作家在文化继承和小说创新方面还应该做哪些有意义的工作？

答：作为一个作家，不管国内奖、国际奖，还是省内奖，只要给一个奖都是件好事，即使是一个杂志的奖，也是高兴的。因为，它都是对作家劳动的肯定，对作家的鼓舞。至于国际奖，和国内奖有很大差异。国际奖很多，但具有真正权威性的奖就是诺贝尔文学奖，最近几年有两三家报纸邀我参加中国作家应该不应该获诺贝尔文学奖的讨论，我都谢绝了。不参加讨论，并非我没有看法。今天，我就首次向你表白我对诺贝尔奖的看法。诺贝尔文学奖历届获奖作品都是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最优秀作家的优秀作品，但我们也应该看到，近十届的获奖作家差异很大，我的印象最深的在国际上产生广泛影响的作家是马尔克斯，而读其他作家的作品深深感到跟《百年孤独》所达到的艺术

高度差异甚大。如果将马尔克斯作为一个标尺，那么，中国作家要获诺贝尔奖是相当困难的，若要跟近几年获奖的那几位小说作家比，我看中国作家获诺贝尔奖的应有人在。大家公认的就是，汉语和英语以及其他语言差异太大，而汉语翻译成英语损失很多，能够翻译成英语的作品太少，我那一年访问意大利，在意大利只翻译有邓友梅的一本书《烟壶》，而中国作家的名字在那里也十分陌生。至于获奖，全都不是谁想获得就获得了，几乎历届获奖作家在接到瑞典皇家学院颁发的获奖通知时，都感到十分惊讶，从他们的惊讶，我们可以看出没有一个作家是事先想到的，或耿耿于怀企盼着的。那么，中国作家也就不要整天想着诺贝尔文学奖，更不要为诺贝尔文学奖而写作，这些都有碍作家的艺术发展。如果有一天，真有某个中国作家获了这个奖，也是值得我们骄傲的。但我们必须保持一个良好的创作心态，将自己的体验充分把握好，形成自己的艺术风格就足够了。因为，获奖本身并不代表什么。在小说创新方面，我们还没有创立一个新流派在国际上产生影响。唯一属于我们的就是章回体小说。这是我们的传家宝，它也产生了伟大的作品，比如四大名著，在题材上也有多样性。但就小说发展看，最自由花样最多的是俄罗斯文学，他对欧美文学、日本文学和世界其他地区的文学都产生广泛影响，而唯独没有一个国家借鉴我们的章回体。相反，新时期文学的花样翻新几乎都可以从西方小说中找到范本。而花样过后，才有可能有真正属于我们的艺术形式被中国作家创造出来。

问：《白鹿原》之后，您处于一个相对冷静时期，有人预言，经过一段休养生息，您将有更臻完美的巨制问世，也有人说《白鹿原》是您一生创作的峰巅，以您的年龄和体力恐怕很难有超过《白鹿原》整体水平的长篇，您自己如何认为呢?

答：首先，我认为持这种看法的人是对我创作的一种关注。我自己也在《白鹿原》出版之后听到过这样的议论，这说明大家都在关心我的创作情况，借此机会，我向广大读者和朋友致谢。我将这段时间的情况介绍一下：《白鹿原》出版发行已经四年了，这四年也是我承担陕西省作协领导责任的四年。《白鹿原》之后我遇上省作协换届，我当选为陕西省作协主席，而我上任时，当时作协的状况不尽如人意，经济拮据，电费欠缺，汽车停顿，办公室墙壁下陷、塌顶等，我既然担任这个职务，就不能眼看着大家在这样的困境中生活。经过抓这些具体工作，作协办公大楼即将盖起，老作家的医疗条件也有改善，作协各部门基本形成有秩序的工作，这自然是这届班子共同努力的结果，但也花去我好多精力。另一方面，在这四年也尽力抓了陕西青年创作队伍的建设，老一代作家曾为我们这一代作家队伍建设耗去不少心血，那么，扶持和建立一支更年轻的陕西作家队伍的责任就落在了我们这一代人的肩上，所以作家协会先后召开过两次长篇创作讨论会和一次青年创作座谈会，并通过协会的两本刊物《延河》和《小说评论》对陕西作家的创作给予支持和鼓励。一九九四年还搞了一次散文专题讨论会，大家反映很好。另一方面，《白鹿原》完成以后，我对小说写作的情绪调整不到最佳状态，也就是说，我好像对小说失去了某种激情，读者对我的期望值很高，我在没有充分的创作激情的状态下，就不能轻易动笔，以免使读者失望。所以，我这几年连短篇都没有写，只是写了些随笔和散文，出了两本散文集。当然，这几年的收获也是有的，通过主持机关工作和改善办公条件，我对城市生活也有一些体验了。尤其是我住进了城市，结识了一些商海弄潮儿和社会各色人等，给了我一些新的感觉，但这种感觉还没有达到形成一部作品的程度，所以我不敢急促下笔。未来的创作是不是鸿篇巨制，是否要超过《白鹿原》，我根本就不思考这个问题。这是个艺术创作的规律，对我来说，《白鹿原》已成为历史，没有必要跟它较劲。记得

《白鹿原》问世后，我跟评论家李星有个对话，李星问过这个问题，我告诉李星我再不会上那个原（白鹿原）了。今天，我依然将这句话给你。我只是尊重我自己的生命体验和艺术感觉。最终能形成什么样的作品，那就写个什么样的作品献给读者。既不重复别人，也不重复自己，只要有独立生存的价值，只要是实实在在达到了我所体验到和追求的目标，我就感到欣慰了，因为，它们都是我的孩子。

1997年冬

历史和现实的追问

雷涛：

你好。

花了一天半时间读完了你的《走近阿尔卑斯山》。作为一本游记，能让人一口气读完，而且读得津津有味妙趣横生，确实是不容易做到的事。可以说，你用朴实无华而又简洁明快的文字，相当娴熟地向读者叙述了几位个性鲜明人格健全且热情友好的瑞士人；尤其是几位嫁给中国男人的瑞士姑娘，她们被你描绘得太逼真太可爱了；当然还有如芦苇、刘金玺这样有棱有角又有血性的杰出的陕西男人，这两位我都认识，但交往不多，现在已经通过你的介绍，烙下深刻难忘的印记了。你描述的阿尔卑斯山，洛迦诺小镇的风情，以及以此为中心辐射到的瑞士城市风貌，乡村风光风土人情，上流社会到地摊货位，历史纠葛以及现实社会风尚，角角落落，上上下下，社会和家庭，男人和女人，欧洲人、日本人、中国人，以及中国人和瑞士人组合的欧亚型家庭形态等等。你的新鲜、强烈的感触而形成的文字，把读者引入一个文明的世界，而且揭示出这个世界与我们自身之间的巨大差异。我尤其看重这一点。

这种巨大的差异，任何一个走出国门的人，尤其是走进欧洲和北美那些发达国家的人，随时随地都会感触得到，说是“触目惊心”也未必言过其实，不说那些国家的富裕和发达，诸如交通设施、收入与消费等等方面的差别，因为我们有这方面的心理准备，往往就是干净的草地、街道和公园，即一切公众场合的环境和设施的保护的完好与干

净，那些地方的人的举止行为的文明优雅与坦诚，使我们感受到一种和谐和舒畅，自然也就不再想去“解放”他们了，倒是觉得我们自己应该更坚定地把小平同志“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理论精神贯彻下去，不仅使我们的经济缩短与发达国家的距离，也使我们的民族素质和社会文明与文明世界的人们能融会起来。你的诸多感慨以及由此引发的历史的和现实的追问，使我感到深沉的同时，又感到一个热血汉子的巨大的责任心。这是引发我钦敬你的最主要之点。

出国一趟，新鲜一回，感慨一番，任何人都如此。不善动笔只善动口的人，总要向亲戚友人道及见闻；喜欢要笔杆子的人写成文章发诸大小报刊，都已司空见惯，亦为人之常情。这其中最叫人读不得也听不得的文字和说话，便是卖弄，这类文章我们在报刊上随处可以见到。你的著述之所以引我钦敬，不单不见卖弄的痕迹，而是透见你的巨大的责任感。面对发达和文明的世界，反思我们的过失和诸多因素，既不自卑也不猥琐，既不妄自尊大也不自我作践，而是实事求是直言以述，显示出一个唯物主义者的严峻的现实精神。是的，我们的历史的尘埃和“文化大革命”的遗物，给这个国家和民族的伤害的程度，只有走出国门才会有痛切的感受。我对你大著中的多处如是的感慨，不仅完全理解，而且感受到了你的精神世界和人格内蕴。

所有状物绘景抒情述志之中，都可以读出你的真诚，这又是很可贵的写作的一种情愫。我为你与芦苇、刘金玺之间的那种动人的真情感动了，我为你对祖国和人民的拳拳之心感动了，也为你写作本身的真诚的态度感动了。恕不一一。

然而，缺陷也是明显的。依着你的真诚，我也不必讳言。首先是文字，明快简洁生动准确已如上述，然而也感到文学化不足，还应争取一种更为内质的美感，给读者阅读中一种除事件本身之外的纯文字

的美。这当然是无止境的，任何作家都是倾其一生做着这个最基本的追求，所谓“死不能休”的追求。再就是选材和叙述中还有不少可舍弃的东西，主要是过程性的交代文字。这些东西如纯属过程式的交代，没有更多的内涵，又不可避免，那就得尽可能地压缩和剪除，不然就芜杂了。以上偏爱和偏见，都供你自由拣取。

祝笔健身健。

1998年3月6日 渭南

跨越障碍

在这两本小说精选集子即将付梓的时候，我很感谢蔡金安先生，经他真诚不懈的努力，使我的这两本小说选集得以在台湾出版发行，与海峡那边的读者实现交流。作为一个作家，平生最愉悦的事莫过于看见自己的作品出版，更何况这一回是在宝岛台湾这样一个特定含义的地方。

一九九六年末，我在北京参加中国作家协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与蔡金安先生以及北京文艺界的两三位朋友相聚于一家饭店，共进晚餐。时值隆冬，中国北方寒风凛冽，冰封大地。初次见面，各自不免都有点拘谨，随着几杯酒饮，便不觉都释怀了。尽管释怀了轻松了，蔡先生依然是低低的缓慢的不急不躁的语调。他说拟定出版我的小说和散文，我自然很高兴也很爽快地应诺了。

回到西安之后，我没有急于编选，是出于一点小小的疑猜，万一要是蔡先生在酒席上随意说的客气话呢？因为就我的生活经验而言，报刊和出版社的编辑与作家见面，约稿常常是作为礼仪性质的事，不可完全当真的。直到去年北方酷夏的八月，蔡先生悄然飞抵西安，电话接通之后，我很惊讶。直到两人再次握手，我便有一种负疚之情于蔡先生了。他说他专程赶到西安来拿书稿。声音依然是低低的缓缓的不急不躁的，唯其更显真诚，以至这诚恳之情使我感到负疚了。

今年四月，我随中国作协组团一行八人走访台湾。蔡先生自然是心仪已久必定要见面的。到台南市是在中午，我对这座陌生的城市却倍感亲切，当然是因为这个美丽的城市有我相识相好的蔡先生工作生

活在这里。我们在台南吃了一顿类似广东人的大排档一类午餐，口味却是绝对陌生绝对新鲜的，随意走在街头观光，心中侥幸着如果能偶然撞到蔡先生，当会是一大快事。（我已电话约定，当晚在高雄见。）

这是第三次握手，在台湾岛南端的高雄。彼此已经无须客套和寒暄，一见面便进入一种融洽和自在的氛围。他说书已基本排版好了，推迟出版的原因是套书需得等齐。我自然不会在意早出晚出这件小事。蔡先生悄悄地告诉我，他的妻子正在临产期，日夜都不敢出门，全方位厮守。说着这些家常话时，有点羞羞的样子。我便大胆设问，新婚妻子是不是在北京和西安紧随着他的那一位。他说是。那是一个很漂亮的年轻女子，几乎不多添一句话，只是静静地看着蔡先生和新朋老友交谈，在北京是这样，到西安时还是这样，很有教养的一个女孩。那时候蔡先生没有介绍他们的关系，到这时候，明朗了已是莲生贵枝（子）了。我很真诚地表述我的祝贺与祝福。

到这两本小说集出版面世时，蔡金安先生的爱子大约该过百日了。对我对蔡先生来说，都是双喜临门的意蕴。

愉快的台湾之行过去近两个月了，美好的记忆依然新鲜。唯有在去台湾到香港转办手续的那种特殊的方式，切切地让我感觉到了一种现实的障碍。这种特殊的又有点滑稽的方式，完全是形式上的障碍了。尽管谁都感觉到了这种形式主义的障碍的滑稽，然而我们还得耐心地等待它的消亡。我在西安接待过近百位台湾文化界来访者，我也终有机缘走访一回可爱的宝岛台湾了，这种双向的文化交流还在扩大着。我的这两本小说集子以及随后出版的散文和长篇小说，无疑也汇入了这种不可阻滞的交流之河中，为最终消除同胞之间的障碍，跨越这种不合时宜的障碍而能起一丝作用，就倍感欣慰了。

蔡金安先生无疑是促进这种跨越的筑桥者。

1998年6月3日 西安

（本文为台湾金安出版社出版的《陈忠实小说精选》序。）

业已成荫的大树

一

《文学报》是我最为关注的一种文学专业报纸，也是我多年来阅读最多阅读最细的一张报纸。记得这张报纸刚刚创刊面世时，我和我的文学朋友们欣喜地传递着观赏她的风姿，企图从字里行间猜测她的倾向。许多年过去了，《文学报》给我留下了一个完整的阅读印象，即是一张真正文学意义上的报纸。

二

如果我的印象可靠，说《文学报》是新时期文学复兴历程中一只扬帆劈浪的大船是恰当的。这船上承载着整个十余个春秋的风风雨雨，包容着诸多的流派和一潮盖过一潮的“主义”，似乎没有瞅红蔑黑的褊狭，而是以一种理性的大度让红也来红一回黑也来黑一回，更兼着五彩缤纷以至杂交派生的变种颜色。《文学报》铺就了新时期文学发展的五彩路，最可宝贵的就是这种理性的大度，显示了对文学创作的逼近本质的理解，而逐渐排除了非文学内涵的某些因素对文学本身的干扰与损害。应该说，这是《文学报》报人关于文学的成熟的体现。

三

《文学报》似乎又像一株郁郁葱葱的绿树。这树上，大鸟小鸟都来栖息一回鸣叫一回，来展示来风光甚至来吹牛，无论南腔无论北

调，这株绿树从不拒绝任何一只鸟的任何声音。我常常从《文学报》上了解那些新老作家的信息，甚至从一篇千字文里能够透见某位作家的最新思考，可能对我成为一个有益的参照。《文学报》从诞生伊始就不是局限上海的一张地方报纸，她在作家的心里，是属于大家共栖的一株业已成荫的大树了。

四

有件难忘的事不能不说。

青年作家邹志安去世后，留下一个破碎而又贫困的家，《文学报》发起募捐活动，报社同仁率先捐助，总编辑携带着八千余元捐款来到西安，亲手交给邹志安的母亲。我在亲历这个过程时，怎么也说不出一句恰切的话。事过几年了，我仍然不必去做什么评价，然而从那时所产生的一种心理感受至今不渝，这就是，文学的最基本的含义是人道的。做文学这个事的人，也须以人道作为最基本的人格修养。从那时候起，我不仅感到了与《文学报》的亲近，也感觉到了信赖，自然也感觉到了对某种崇高人格精神的钦敬。

1998年6月

心灵独白

这应该是我的第四本散文集。

第一本散文集是《生命之雨》，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六年夏天出版。编辑王喆是我的小乡党，正在中学念书时，曾到我所供职的灞桥区文化馆找过我，记得是一帮喜好文学的中学生，叽叽喳喳地问个没完没了。多年以后她以一个出版社编辑的姿态寻访我的时候，我没有想到这就是那一帮喜好文学的中学生中的一位。腼腼腆腆地向我说明来意，希望能经她的手为我出一本书。我不好意思把过去已经出过书的小说再重新组合出版，尤其是面对这个小乡党腼腼腆腆纯洁真诚的眼睛。我便向她提出出散文集的申求。

关于散文，也是我很喜欢的一种文体。我的处女作发表的首先是散文，那是“文化大革命”前一年多时间的事，而第一个短篇小说的写作和发表却是八年以后的事了。新时期文艺复兴以来，我以小说写作为主，其间也抽空写一些散文。八十年代中期以前，我在乡村基层工作岗位上，散文选材多是面对急骤变化的生活而抒发一点感触，或者记取一点人与事的变迁，形式不自觉地就类似特写的形式。八十年代中期以后的散文，且不说它像不像散文，却是脱离了特写的模式。还有几篇篇幅较长的报告文学，尽管有的篇章曾获过国家大奖，但在中国文学关于散文意义限定很窄的大环境下，把这些东西结集出版，我自己首先不大自信，主要是担心书的发行数量。这类书读者会感兴趣吗？让出版社赔钱出书，我就有了诸多的心理障碍。出版社属于企业性质，不仅要上缴利税，而且要给职工发工资奖金，要造住宅楼，要买汽车，等等。尤其是让小王乡党约我出版的第一本书就赔钱，想来

真是既不好说出口更不好拿出手。既然已经说出口了，便把如上的诸多不自信的障碍因素都和盘托出。小王似乎比我自信，说她的出版社老总根本不凭这类书赚钱，赚钱的书有别的渠道，出这类书纯粹是对文学事业尽一点心意，据说他们老总陈绪万本身就是一位文人、作家。

这样，我便编成了第一本散文集《生命之雨》。我最关心的仍然是征订数量，得知有六千余册，我才暂告安慰，这个数字的印行量起码可以不赔钱。不赚不赔，我也就可以不再有亏欠别人的块垒了。

第二本散文集《告别白鸽》，是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的。我在《生命之雨》中严格挑选，把只属于散文规范的篇章挑拣出来，把那些特写和报告文学悉数舍弃，再编入后来未曾入选过的新写的一些散文，虽然字数不多，书本也不够厚，也不能动摇我的入选准则。这本散文设计淡雅精当，拿起来便有点不忍释手，且不顾“敝帚自珍”的客套。每有朋友索要书时，自我推荐的便是这本《告别白鸽》；自己想给新朋老友送点礼物时，仍然想到的还是这一本散文集。

还有一本《走出白鹿原》的散文集，是陕西旅游出版社编辑出版，集中收编了我几次走出国门的见闻和感慨，且不细述。

华夏出版社出的这本散文集，当是第四本。编辑要求八万字，我便在原有的散文文本里面再度挑选，又加入几篇新写的短文。这几本散文集出版的过程，我不自觉地都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挑选和舍弃的过程，便有了一点感受。这感受属于一种自生的反省心理，还是不能写得太多，更不能见什么写什么，尤其是感受平平甚至感受无聊的时候更不能写。

散文是什么？这个话题至今还在探讨着、争论着，虽然仍无一个大家都能信服的条律或定义，然而每个写着散文的人，心里都有自己关于散文的理解，都在创造着自己的散文的形态，都在培育着自鸣得意的散文的百草园，似乎任何人在写任何一篇散文时都很难想起关于散文的定义来。

就我自己而言，散文就是一种心灵的独白，心灵对于现实对于历史的一种感悟，需要抒发，需要强辩，需要呜咽，有时候也需要无言的抽泣。感天感地感时感世感人感物，总而言之在于一个感，有感触有感想有感慨有感悟而需要独白，需要交流，需要……于是就想写散文了。至于散文不应该写什么，或者说读者最讨厌过去的什么样的散文和时下的什么样的散文，且不赘言，让生活和文学那个无形的又是铁硬的法则去作用为好。

我喜欢散文，自然既指阅读，也指写作；我企盼读到别人的精美的散文，也努力地去创造自己的起码不要让读者骂声“扯淡”的货色。

1998年8月17日

（本文为《陈忠实散文精选》序。）

生命价值的新启示

魏军同志:

您好！

大作《虫苑大师周尧》讨论会召开，谨致祝贺。

周尧老先生是蜚声中外的昆虫学家，他毕生的超人的智慧和超人的毅力都倾注在关于昆虫的研究工作上，为我国的昆虫学建立起一个完整的体系，成就了一番重大的事业，令人钦敬。您为周尧教授创作的长篇传记《虫苑大师周尧》，其意义远远不只为一个人树碑立传，而是张扬一种创造精神，而这种创造的目的完全是为着国家的，为着民族的，丝毫也不沾染任何自私的因素。这样，周尧教授才能毕其一生的精力和心血，而穷昆虫世界之大功。这样的精神境界显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自我修养的结果。对于任何有心有志从事任何学科研究的人都是一种激励与参照，自然就成为一种学术之外的精神财富。

您写了如此优秀的一部传记，值得祝贺。我通过您的笔，了解了一个学者，一个真正的中国学者的博大的内心世界和崇高的人格精神。“大虫（日本侵略者）不杀，杀小虫何用？”这是令人灵魂震撼的个性语言，周尧的民族大义和个性如此鲜明地跃然纸上。有这样的精神和血气的人，还有什么艰难困苦能束缚其创造智慧呢！周尧先生的成就的取得是合理的。以自己在某一个学术领域独创的研究成果，在国际上为民族赢得声誉也赢得尊严的人，才是这个民族可以引以为骄傲的脊梁，才是更值得大书专著的人。您写这本书显然不是宣扬周尧的知名度或制造光环，相信这些东西于周尧老先生已经没有任何意

义；您是在周尧的血脉里挖掘一种精神，锻铸一种精神，张扬一种精神，于我们这个国家和民族复兴复壮的途程中最为珍贵的精神，我也因此而受到关于人生关于生命价值的新的启示。

您倾注了大量的精力而掌握了详实的史料和生活素材，这是纪实文学创作的基础；您又避开了专业和科研题材容易形成的枯燥和乏味，把周尧先生写得血肉丰满见情见性，把昆虫世界描绘得生趣万千奇妙无穷，使读者在感受周尧老先生的精神人格的同时，又能了解神秘的昆虫世界；尤其是对青少年读者，更会大获裨益。

祝讨论会圆满成功，祝周尧老先生健康长寿，祝您写出更多的好作品。

1998年10月8日晨

（本文为致魏军的信。）

王国不神秘

雷涛：

你好。

之前读过你的《走近阿尔卑斯山》，至今依然保存着较为清晰的自然是美好的记忆。因了你的《阿》书中的一些人和事触及我也同样易于击发火花的话题，所以曾给你写了一封信，直接地和你托出我的直感，和你交换之后以期交流。似乎写信更为随意，亦可避除朋友间涉及作品时的某些矫饰，所以我仍袭用这种方式来谈谈你的新作《走向王国》的阅读印象。通信虽然方式原始，在我觉得仍不失为一种美好的对话方式。

读完《走向王国》，我的整个阅读印象是（当然是你营造的），这是一个艺术的王国，或者详细注释开来便是，西安电影制片厂是一个艺术的王国。更进一步概括，既是一个神圣的艺术王国，又是一个神秘的艺术王国。

先说神圣。

任何一座圣殿，不是靠它的华美的建筑令人感到神圣的，那只是体现建筑艺术的范畴的话题。圣殿之圣，在于圣徒之圣。在中国古人则说得更透彻，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西安电影制片厂就其原有的影响来说，山算不得高水亦说不上深，殿堂也称不得能“圣”多少分（相对于当时的全国几家大厂）。然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伊始到现在短短的二十年时间里，这里成了几个仙，跃起几条

龙，又活跃着虎豹鸣凤以及自诩为狼的一帮电影艺术的圣徒，“山”也名了，“水”也灵了，艺术殿堂更显得神圣了。

你以多变而又最简约的文字，记述了三十余位圣殿里头的圣徒追求艺术也同时修完人格的生命历程，其于人于世的警示作用远远超出了艺术追求本身。何止艺术上要修成正果非得有一种圣徒精神，人类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以至党政权力的政界，企图在某一领域实现重要的创造发明，企图突破人类迄今为止的认识极限，企图于国于民有大作为者，除了智慧的条件之外，便是对自己所专注着的事业的圣徒精神。这是我从你所刻画的这三十余位艺术家的求索历程中，得到的最强烈也是最合我心意因而最令我动心的东西。

因为你写的这三十余位艺术家的艺术道路和生活道路中，几乎无一例外地涉及成才的因果和青少年时期的苦难，企图阐释某个相关联的内在的规律，且有深度。这个命题无疑是近年来各种媒体对名人成功的探访中的一个热门话题，我也有所感触，不妨与你交换看法，或者说依着你的话题延伸扩展开来。

我长久以来都被“天才”这个鬼魅的东西所困扰。从少年时期喜欢上文学也就结识了这个神秘莫测鬼魅一样的“天才”一词。几十年过去了，我还是不能完全认可天才，但我认同天分。天才是指天生之才，是与生俱来注定要成才的，或者说是上帝给的才智，而我们又如何判断上帝把才智给谁了又不给谁了呢？天分就可靠得多了，是上帝对人的种种兴趣的一种分配或者说划定。譬如说，上帝把摄影和绘画的这个兴趣给了张艺谋和王炎林，譬如说上帝又把对文字的兴趣给了王宝成和莫伸，亦如把对数字和算计的兴趣给了陈景润一样。

兴趣来自于大脑的某一根神经，这一根神经可能只对算计或绘画或文字或音韵特殊敏感，一触即发，即使人产生兴趣的偏向，人与人就有了兴趣和爱好的分野，你看看自己的同学和同事就明白了。由不同神经的敏感所造成的人的兴趣和偏爱，是无法更易的，这才是驱使人对自己偏爱的事业穷追不舍不顾生死以命相托的原始动力。这里再需要进行反证。张子良大器晚成未必是他受到什么难忍的恶言刺激，因为就我所知几乎每一位成功者在初创阶段无一例外地都荣幸过这种类似的讥讽和轻视，也都无一例外地忍受过不被承认（发表和开拍）的较长时间的苦闷和彷徨。受父母分离之苦的孩子在王宝成那一代人中绝非他一个，怎么独独只有王宝成内向了到田野上去与山水抒怀了？和张艺谋一起上山下乡随后又招工招干的知青无以数计，怎么就只有张艺谋操着一架廉价的照相机拍出今天这番风光这番景象？一句话，一根上帝划定的特别敏感的神经。这根神经不死，兴趣便不会转移；这根神经不萎缩，兴趣便顽强地显现为矢志；这根神经愈受刺激，兴趣反而更高涨，甚至是疯狂状态；这根神经经历了必需的锻炼之后，持久的兴趣造成的不断的追求所取得的一阶一阶的进步，最终便把如上述这些人以及你所写的三十多位西影圣徒推向了艺术的高峰。爱你们父亲和母亲吧！作家和艺术家们。父亲和母亲以他们自己也无法认识的神秘的生命精髓中的DNA，结合形成一个具有一根奇异神经的你们，这才是我们可亲可感的上帝。

和天才相关的不可分割的便是勤奋。具体到你所叙述的三十多位艺术家，勤奋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他们经历的苦难之中。苦难中的奋争已经使一般意义上的勤奋失去原本的含义。这些人又几乎无一例外地经历了苦难，年龄长点的孙飞虎、许还山如是。哪个右派会比许还山这个右派轻松一点呢？哪个下乡知青没有经历过如芦苇、张艺谋们所吃过的苦所受过的超负荷劳作呢？哪个农村出身的学生没经历过王宝

成那样的生活艰辛与心理自卑呢？然而恰恰只有他们最终成就了艺术，也拯救了自己的灵魂。他们把苦难作为磨砺自己的砺石，在这个砺石上锻铸自己的技艺也锻铸自己的灵魂，使那根奇异的神经在苦难中不萎缩不死亡而愈加敏锐，泥泞和灾难就成了他们的一笔精神财富。当我们国家和民族整个结束那一场噩梦之后，当艳丽的太阳和和煦的春风重新温暖每一寸冻结的土地和心灵的时候，这些精英们便如龙腾虎啸狮吼狼嗥般跃上复苏的文坛和艺坛了。

我对这一段过去的生活也是感触颇深。我自觉在这一点上与他们是完全可以沟通的。我经历了那一段的直接的人生感受，不单是“该出手时就出手”，更重要的是该聚一口气的时候必须咬紧牙关聚住一口气；聚住一口气可能就成就了一个人，聚不住那一口气自然就滑落了。这气当然不是与任何人赌气，而是跟自己较劲，与自己的意志较劲，在苦难中咬住牙聚一口气踏过泥泞；在创造的阶段性苦闷中，咬住牙聚一口气朝已经意识到了的艺术境界攀登，就可能实现一次新的突破，而创造出一方独立独特的艺术风景。尤其在今天，在各自已经攀登到相当高度的艺术境地的时候，难度不是比以往小了而是更艰难了，有如珠峰的攀登，愈高愈见其艰难，五千米时可能有百余人，七千米时就剩下三十来个人了，最终登临顶峰的可能只有几个人。在今天较为宽松的文艺氛围里，我欣赏那些不抱怨不呻吟也不搞非艺术行为的人，也赞赏那些不随意吐唾沫不轻易释放那一口气的人，因为只有聚住一口深腹大气，才能造就自己的新的艺术境界。

这里我尤其赞同你所写的许还山、张子良等人所谈及的艺术家的人格精神。对于一个事业有成的有声望的作家艺术家来说，人格精神已经不单纯是个人修养的意义了，而是直接制约着他们的思维和创造活动。作家艺术家的眼光投向哪里，人的心灵历程还是人的大便；作

家艺术家如何从生活层面的体验突破进入生命层面的体验，获取自己灵魂战栗的那一种鲜活而又独有的感受；作家艺术家怎样把个人的从生活到生命的体验与整个民族的生存形态的合理性交融合铸，为民族不断完成弃腐朽图新生那个心灵剥离的过程提供一幅幅参照画面；作家艺术家如何跨越艺术上的小花样小变种小动作而能进入艺术体验层面，创造出一种只属于自己的全新的艺术景观，人格精神就突出到最关键最重要的位置上了。人格精神从内在的精神上决定作家艺术家胸怀的包容量，决定作家艺术家眼光投向的兴奋点，决定作家艺术家对民族对人类生存发展的忧患和追求的冷热度，决定作家艺术家对艺术体验和艺术追求的品位。如果说达到了一定高度的作家艺术家之间存在着新的竞争，那首先是人格精神的较量。

再说神秘。

电影电视的创作和制作过程，对一般行外人来说都是神秘的。声名大震的西影自然也神秘，拥有一批名扬国内外的大腕导演、编剧、演员和音乐创作的西影更神秘。我到许多地方去，也常常遇到如你一样的情况，问西影的这个和那个的近况，自然总是一种钦敬和仰慕，作为一个陕西人我也颇感沾光、自豪，这是正常的。现在的各种传媒无一不热衷于炒明星，其中热点和卖点最高的便是名导演名演员名歌星的动向，尤其是隐私和绯闻。这也似乎是正常的，世界上的许多情况都相差不多，热炒者的兴奋点不谋而合。你在自序的《我的初衷》里已经论及，也是你写作此书的目的之一。我就很感佩了。

热衷于明星隐私和绯闻的炒卖可以大行其道，《走向王国》更有必要走向读者。让读者更具体更翔实地了解这些名导演名编剧名演员的艺术道路，他们的执着和他们的艰辛，他们过五关斩六将的八面威风和败走麦城的一面狼狈，他们有长得俊的有长得憨的也有其貌不扬

的，他们的生活形态和内心形态，他们中有绯闻绵绵不断者，更多的却是精神和情感家园的守望者。你把这么一批让读者和观众所关注的名家的真实面目介绍给读者，让大众了解真实的他们，尤其对青少年未来的成长和奋斗具有积极的影响力，同时也揭开了西影神秘的面纱。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本书于被写者和阅读者都是大有裨益的。

记得上次致你的信中说到《走近阿尔卑斯山》的语言时，有文学化不足的意思。《走进王国》则标明你已踏入了文学语言的绿地，无论叙述或白描，无论状物或抒怀，剪裁取舍相当恰切，文字形象生动而又不铺张，有些人的生活场景写得甚至令我忍不住唏嘘捶拳。

这是一本很好的书。

自然，我们仍须努力，说到底这是一个“死不能休”的事业。

祝愉快。

1998年11月2日 蒲城

（本文为又一次致雷涛的信。）

西安人武元

在我生活的圈子里，接触最多交往最多的自然是陕西人，尤其是西安人，这是我的出生地、念书的学校以及工作环境所决定了的，所谓“涝池的鳖——游不远”。而在西安的熟人朋友中，如果抛开权力、财富和个人成就，仅就个人魅力而言，武元是一个最具特点的西安人，或者说，是一个独具魅力的西安男人。

魅力首先来自最直感的说话。

武元说一口纯正而又典雅的西安话，我在西安还没有听到过谁把西安话说得比武元更好。发音准确、口齿清晰、抑扬顿挫、流畅通达、富于节奏感，这是任何人说地方话包括普通话的口语表述的基本要素，也是说西安话的许多人都能说到的，并不为奇。武元的西安话说得饱满、底气十足，使我感到了说这种地方话的人心理自信；武元的西安话字正腔圆韵味无穷，慷慨时如飞瀑倾注，动情时又如行云流水，使我一次又一次感受到母语西安话说起来竟然如此独具韵味，也自信起来了。我常常看到那些以西安话作舞台演出的小品演员时忍不住就想给他们提个建议，可以去找武元学一学西安话，以纠正他们发音中的许多令西安人听来特别不舒服的怪腔怪调，甚至让人感到的只是西安话的丑陋（与剧情中的丑陋无关）。如果只是为了展示西安话丑陋的一面，那么还有什么必要用这种方言去演出呢！

武元的西安话又说得智慧，包括机智，包括调皮，包括幽默，包括调侃。又完全是西安本土韵味的机智调皮幽默调侃，往往是分寸恰当刚到好处而不失于油滑和强装。这是很难学到的。语言智慧是心灵

智慧的直接表述或展示，既有天性因素又有后天的学识视野博闻等因素的综合凝聚。因为文化人现在特别看重幽默，甚至有人断言中国人没有幽默；甚至为了显示自己超出不会幽默的中国人而会幽默，便搜肠刮肚甚至挖出大便来恶心人。幽默不是油滑。幽默也带有地域和民族的特色。幽默是深层智慧的自然流露，唯其自然，才具魅力。武元所说的西安话的魅力全得益于兹。

我和武元是校友。在我进入古镇灞桥柳荫掩映的西安市第三十四中学读高中的前一年，武元因家里的劫难而辍学了。我在进入这所中学之后便感觉到了武元和他的父亲的魅力的影响，武元在初中就发表什么作品了，武元如何如何聪明大有神童之称，云云；武元的父亲武志新讲课如何神采飞扬，而且是三十年代既能演新戏又会编剧本的剧作家，云云。作为文学爱好者的我，武家父子的文学才能对我具有够多神秘的色彩。然而，武先生被划为右派劳动改造去了，武元也因此而辍学了，没有了武家父子的这所母校，如诗如画的烟柳似乎也空洞了。

十余年过去了，在西安兴庆宫公园一隅的一间小平房内，几位西安的业余作者聚会于此，我才第一回见到了武元。其时，他是兴庆宫公园的养鱼工人，和妻儿就住在这间小平房内。我第一次和他握手，听他说话，不单是觉得他把西安话说得如此优美，而且觉得他长得很俊，也应该是我见过的西安文化文学朋友中长得很俊的一位。长得很俊西安话又说得很好，这个武元确实是令人感到一种独特的纯粹是个体生命的魅力。

那天晚上我们几位文友游了兴庆湖。这是我第一次乘坐小木船游这个人工修建的湖，而且是在晚上人散园空的时候，月亮挂在天上，

有跳跃的鱼儿在湖里翻动水声，有两次竟然跃跌到小船里来。这是我们几位文学朋友利用“渔民”武元的特权而得到的一次超级享受。

多年以来，我们都生活在西安完整的老城墙圈子里，彼此接触却为数不多，甚至极少个人相聚，倒是不经意间在某个会议上就碰见了。文人的聚会一般都轻松一点，自然也散漫一点，正襟危坐的情况总是极少的，往往免不了上面发言或报告，而下面我行我素交头接耳沉湎于两人的小交流，大家都习以为常。在这种时候，武元发言了，不过几句话出口，那些窃窃着的小交流的嗡嗡的声音便会渐渐消失。这当然不是行政命令的结果，当是他的独立的见解和敢于直抒见解的勇气，丝毫不管自己的见解冲撞了某个朋友，相悖于某位权威，背驰于某个领导。独立独到的纯艺术见解，加之忠于艺术只看艺术的脸色而绝不顾及非艺术脸色的痴情与勇气，往往便在这种场合形成一个清新纯净卓尔不群的声音。这声音便有了它原本的魅力，况且他的西安话又说得那么纯正那么机智还有那么一点典雅之韵。我常常沉醉在武元的这种声音里，感受西安方言土话的“古调独弹”的魅力。

又匆匆过去了许多年，正儿八经的两人约会才有了第一次。我们在一间借来的小屋子里坐下，我发现他依然很俊，两个小眼角的眼皮虽然有点耷拉，把一双俊气的眼睛变形为准三角，然而准三角的眼睛依然俊气，主要是那眼神依然灼灼透亮。稍有点厚的嘴唇显得有点鼓突，显示着某种傲气和天然的自信。当然，最动人的一瞬还是他开怀时的一笑，准三角的眼睛扯成两条动人的弧线，厚且鼓的嘴唇张开时同样动人，而且那爽朗的笑声使人觉得他胸脯里可能装着一面大铜锣……我们才有了第一次详谈。

武元一九五六年上初三时发表处女作，那是一篇寓言。武元在中学办文学墙报，名曰《柳絮》，显然是取古镇灞桥被千古吟诵的柳色

的意味。武元父亲一九五七年被打成右派，一九五八年春节期间被押去劳动改造。那天武元到文友王韶之家去拜年，传来这个急讯时，他赶回家去，没有见到父亲，随后便和母亲以及弟妹们搬离灞桥。母亲靠糊火柴匣养育子女，武元便开始了打工生活，拉架子车搞运输，为新修的公路砸铺路的石头，自然都是体力活。想想从此愈来愈紧张愈来愈无序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社会生活，作为一个右派儿子的武元会经历什么遭遇什么，谁都会想到的。然而武元就在那样的炼狱里挺过来了，而且在夹缝中对秦腔戏剧的研究功夫深厚，而且保存了那么一口字正腔圆独具韵味的西安话口语能力。

有幸和不幸，从来都是相对的。相对于父亲的遭遇和结局，武元以为自己还是有幸的。毕竟在他中年时期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结束了灾难连绵动乱不已的社会生活，可以从事自己痴迷的戏剧研究工作了。也许正是经历了更多的灾难和艰辛，他珍惜今天；也许是灾难驱使他更多地混杂在各色底层劳动者中间，他汲取了普通人的智慧也吸收了他们的正直善良的美德，至今依旧爽然朗然地行自己的路。据说，武元从他居住的街巷走过去，一街两行开铺面摆地摊的男人女人便会“老武武元武哥”连声吆喝呼叫起来。

武元要出版他的专著了，嘱我作序。

这是年近六十的武元的第一本作品集。一个神童从少年走进花甲，经历了我们国家和人民最迷惘最艰难的全部痛苦，在社会的最底层生活着体验着，坚守着文学，坚守着一个正直的文化人的道德和良心。即使在繁荣的新时期的文坛，武元从来不事张扬，不要鼓吹更不做自吹自炒，这不单是个人修养的事，而是出于他对文学的更本质的理解，任何非文学因素的鼓噪不可能给文学创造活动增添任何实质性

内容。他几十年坚持有话则说，无话闭嘴；有独立见解才说，废话假话绝不敷衍成文。这样一本集子的出版，弥足珍贵。

我便思绪万千。我一下子忆及他与我共同读书的母校，那柳荫如波似烟柳絮如雪的灞河之滨的西安市第三十四中学。他辍学之前的高中阶段主办过文学墙报《柳絮》，我也在往后的高中阶段和文学爱好者组织过文学社，在同一学校的墙壁上张贴《新芽》文学报。我们用同样的形式做过相同年龄里的相同的梦，即在几十年后我突然意识为魔鬼的文学这个梦啊！

人生易老，文学的梦不老不灭，我们便觉得活着很好。

1998年11月7日 蒲城

（本文为武元著《艺文散集》序。）

真情无价

周养俊已经出版过三四本散文集子了。即将付梓的这本散文集《絮语人生》，题材涉及我们生活的各个领域，我惊喜地发现作者的艺术触角是十分敏锐的。之所以令我惊喜，因我深知任何艺术创造的最重要的因素，便是艺术触角的灵敏程度。现在更流行一个词儿叫悟性，我不大喜欢用这个词儿，原因是它罩着某种神秘兮兮的色彩，有意或无意地给艺术创造这项劳动制造神秘甚或神神道道的迷雾，能写出点儿作品便是因为悟了道了的结果，或是通了佛了的因由。我以为首先是作家的艺术触角感受生活的灵敏度，才是引发心灵激情和创造欲望以期形成创造理想的关键。而这个艺术触角的灵敏性程度，既有先天的成分，更依赖后天的磨砺。我更看重后天的磨砺，磨砺艺术触角的途径便是知识的不断丰富和知识结构的不断更新，才能使自己以人类最新的视点去观照现实和历史。通佛悟道往往容易给艺术创造活动弥漫类似神坛鬼庙似的烟雾，可能会给拜佛求道者造成迷离和幻象。我读养俊的散文，首先感觉到的便是他的愈来愈敏锐的艺术触角。

养俊的艺术触角触及他和我们生活的一切领域，他的工作范畴里看似平淡看似机械看似千篇一律，然而他仍能触觉到生活的脉跳。他这样概括归纳一种人的生活形态："参加罢别人的会，又去组织自己的会；听了别人的讲话，又去给人讲话；接受了上级的各种检查，又去检查下级的……"读到这些精彩的文字，我便觉得养俊比我敏锐，因为我过去在基层的二十年和近几年在机关的工作形态，就是这个样子，虽然无奈却也熟视无睹，麻木其中就以为行政工作本身也就是这种形式和形态。养俊简洁而准确的概括便把我们生活中许多行政人的生活

形态给归纳状写了，还有什么比这更稔熟而绝妙的文字呢？我想不出来。

枯燥杂乱的工作中常常更有意外，他在一篇有关错打电话的散文中，捕捉到了原生的生活形态里绝妙的一瞬。一个女人给丈夫打电话错打到“我”的话机上，几句话说罢，那女人对丈夫颐指气使的气性便跃然纸上。短短的一段文字妙趣横生，完全是生活本身的丰富蕴含，让人感到真实的同时又领受了亲切，它撩开了一个最平常人家的窗帘的一角，读者便窥见了发生在家庭里的瞬间的一幕。

这本集子里的散文，除上述一类日常平淡生活的不俗的发现以外，还可以归纳出这样几类：一组写亲情的。一组人物速写，这组人物的构成很丰富，有乡村人，有城市人，还有旅居海外的华人。这些人物的生存环境差异很大，他们的生存理想和生存形态和不公的结局，却是作者最为关注和着力揭示的焦点。还有一组写山水传闻的游记。

这些作品的阅读，给我又一个强烈感觉的是作家周养俊的真实情感，以及由此所折射出来的善良心地。

作品的真实和作家的善良，在那一组写亲情的篇章中尤为浓郁。写一个三口之家里的父子母子和夫妻间的至真至诚的关心，读来令人感动又倍觉温馨。虽然互为至亲，这种无瑕的真情仍然令人心灵悸动，因为这种亲情沟通着每一个家庭。在那些人物素描中，无论乡村人马大、猫女、蛮婆，还是城市里的普通人，抑或是海外华人阿文，纽约的那位中国女孩，作家着重揭示的是他们困窘的生活形态，压抑着委屈着永远得不到张扬的个性。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特的生命个体，一个具体的生命个体的繁荣和衰败的痛苦历程，一个个曾经活泼

泼的生命经历衰败和死亡的无奈和悲凉。透过这一个个独具个性的个体生命，我们可以透见社会形态、生存形态、经济形式和人情世风，有美好更有险恶。作者朴实无华的笔墨文字更增添了真情的气氛，浑然一体透见作者的善良的情怀，这是很值得珍重的情怀。

无论小说，无论散文，能够撩开社会人生的幕帘的一角，让读者感受一份真实，也就成功了。养俊散文给我的就是这样的启示。

1998年11月9日 蒲城

（本文为周养俊著《絮语人生》序。）

从生活体验到心灵体验

——与《人民日报》记者高晓春的对话

高：您自己说，您是在一种十分沉静的心态下写作《白鹿原》的，请问您是如何把握这种心态的？

陈：《白鹿原》一共写了四年。在这四年的时间里，我始终与书上的故事和人物保持着一种距离和一种完全理性的思考，因此进入了这种沉静的写作心态。

这种写作心态产生的原因之一是故事中的那段历史已经过去。比如《白鹿原》描述的那段历史对于当代中国人，包括当代作家，一般来说都能脱离个人的情感因素，都能采用一种冷静的、理性的眼光去审视。原因之二是我完全处于一种艺术创作的心态。在写作开始，我就有了一种非常清醒的认识，那就是要体现恩格斯所讲的现实主义创作原理的精髓——我所编织的故事要完全让人物自己去说话，作家要说的话、要表达的情感，应全部付诸自己所塑造的人物。原因之三是处于一种对自身生命的感受。我写《白鹿原》时四十六岁，完稿时五十岁。在中国人的传统观念中，五十岁是老年人的界线了。在跨入老年这个行列后，我希望能在这本书中体现我的思想情感和艺术追求。

高：文学与现实、历史之间有着怎样的关系？

陈：每位作家都在自己的生活位置上经历、感受生活。以前我们遵从毛主席的教导：作家要深入生活，直接到基层去体验、感受生活。这揭示了文学艺术创作的基本规律，反映了作家创作与生活的关

系。那时候提倡的是作家直接到生活的某一具体场地去深入体验，比如到农村，到大工厂、大工地，现在仍有一部分作家这么做（挂职锻炼）。我以为作家深入生活有两种方式：一种是直接到某一生活场地去深入；另一种则是在自己的生活位置上全身心地感受生活，感受社会，接触各种人物、事件。这两种都是可取的，作家可以选择属于自己的深入生活的方式。

至于历史，我们只能间接地去体验、感受了。把握历史，对于当代作家来说，关键在于要有一定的系统的历史知识，尽可能准确地把握住那个时代特定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心理的真实。鲁迅先生的《风波》是这方面的经典之作。“剪辫子”多少人经历过了，也写过了，但没有产生广泛影响，而《风波》却成功了，是因为鲁迅把握住了剪辫子这一具有历史特征的细节，并写出了人物的心理真实——没辫子还怎么生活？怎么见人？留辫子时代的社会心理秩序被打乱了，剪了辫子，心理上有了恐慌，需要重新建立新的秩序，这就推动了新的社会秩序、道德、审美标准的诞生。

从“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本本主义”到改革开放初期的喇叭裤，再到如今的信息时代，无不是人的心理秩序的打乱、重组、适应、平衡、又打乱的过程，从这个层面讲，所谓历史，就是人的心理秩序不断被打破，又不断寻找到新的平衡的历史。感受历史，就应该是把握住那个时代社会心理的真实。虽然对心理真实的感受因人而异，但从根本上说人性是相通的，因为人性是沟通任何一个时代的人的最基本的支点，也是沟通不同民族、不同国家的人的情感的最基本的支点。我们为什么喜欢外国的那些最优秀的作品（尽管我们不了解他们的生活）？就是因为我们通过读书，能够感受到于连的情感、安娜的情感。所以好的文学作品应该是：它不应该给读者带去阅读上的障碍，

它应该与阅读它的每一位读者沟通。如果达不到这种沟通，只能说是作家的感受层次浅，或者说是艺术的表现能力差。

高：是不是可以这样理解，一部好作品就应该在阅读过程中，完成作家与读者的沟通与交流?

陈：从作家的角度讲，他把对生活的独特体验、对艺术的创作理想诉诸文字之后，最基本的目的就是要与同时代的人，甚至与未来时代的人完成一种沟通与交流。而读者读书的目的——如果他经历了书中所描述的生活，他所经历的生活在很大程度上又通过这部书得到验证，并且在更深层次上给了他启示，他们了解了自己的生活，而且也了解了作品中的历史，那么，他就肯定了作品中的故事，并且在心里肯定作品，欣赏作品，从而完成了作家与读者之间的沟通与交流。从这种意义上来说，作家永远不要抱怨读者，作家只能努力加深对生活的体验，争取从生活体验进入到一种更高层次的心灵体验，争取读者的最终认可和接受。作家其实就是活在读者这片土壤中的，读者不喜欢你的书，你所创造的价值就自然会被否定，尽管这是很残酷的。

1998年冬

心灵剥离

这本书里选入的五部中篇小说，都是《白鹿原》之前的八十年代的作品。这次在编选和校正的过程中，我又一次重新阅读了一篇，竟然有着翻看中青年时期自己的照片的感觉。这就是八十年代的我的小说创作的形态，昨天的我对生活对艺术的体验、感受和表述的形态，自然也最清楚地显示着我的心理形态。

这里所说的昨天，仅指令人感慨万端回味无穷的八十年代。

八十年代中国的政治和经济以及中国的文学，从僵死的教条的禁锢里解放出来，经历过一次又一次痛苦而又雄壮的剥离，除却的是陈腐的“本本”所造成的积久的沉疴，获得的是新鲜的充满活力的血液的涌流。

我五十年代读书，六十年代进入社会，解放以后发生的所有大小“运动”，有的是作为未成年人的观望，有的是作为刚刚步入社会的青年人的亲身经历，尤其是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和结束。及至八十年代起始的一波接着一波的思想解放和一层深过一层的社会经济的改革，中国文学所经历的种种嬗变，依然历历在目。八十年代发生的一切，对于这个国家和民族来说太重要了，太不容易了，太了不起了。对于经历过这一变革全过程的我来说，也是一次又一次从血肉到精神再到心理的剥离过程。这个时期的我的中、短篇小说，大都是我一次又一次完成剥离的体验，今天读来，仍然可以回味当时的剥离过程中的痛苦和欢欣。

经历一次精神到心灵的剥离，似乎对生活（或历史）便有一个新的层面的体验，对于艺术世界的体验也会产生新的创造欲望。我在八十年代的中、短篇写作经历过程，便留下这样的总体印记。因之常常自我警示，自我感觉不能太良好，起码不能使自己较长时间都沉浸在一种良好的自我感觉里，那样就可能造成一种自我封闭，就可能停止精神和心灵的剥离，自己也就很难进入深层的新鲜的生活和艺术的体验了，无可奈何地当会陷入不断地重复自己的困窘状态。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这种状态比任何捧杀和棒杀更具伤害性。

我们已经进入本世纪的最后一个年轮，举步即将跨入一个新的世纪的彼岸。回首昨天，对我来说，感触和体验最深刻的还是八十年代。八十年代的精神和心理的演变，是人生的启示录，是财富，也是警示牌。国家和民族还在继续着剥离，充满生机地进入二十一世纪。中国文学总体也进行着剥离，从非文学进入文学。我也在努力促进自己完成新的剥离，达到新的从未有过的体验。老与不老，不完全在乎年龄，而在于兹。

1999年1月8日 丈八沟

（本文为《康家小院》后记。）

大气·雄风

如同乡村俚语里形象生动的比拟，李若冰属于“满肚子的蝴蝶却飞不出口”的那种人。

这是我见李若冰的第一面留下的印象，自然是很久以前的事了，少说也二十余年了，这第一印象还是没有变。李若冰口语表达能力弱，讲话有点磕巴，总显得不大顺畅，用文雅的话来说，讷于言而敏于行。

从口里飞不出来的蝴蝶，却从笔管里倾泻出来了，灿烂如满天云霞，令人目不暇接；壮美如江河涌流，长泻时转弯时都营造出一方奇异的风景；奇突如千尺飞瀑，顷刻间又归于平静。李若冰毕生用热血和忠诚创造的散文，是生命化作的精灵的舞蹈。

如果把李若冰的散文创作比作化蝶，那么第一只美丽的彩蝶是在一九五三年从心灵里飞出来的；如果比作歌唱，这赞美劳动者的歌是在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头一年出唇的。一九五三年是共和国历史上令人尤为怀恋的年代，战争的硝烟散尽了，包括边疆山寨的残余敌军扫荡了，土改结束了，查田定产了，农民开始了立足和平的耕耘和收获。大规模的又是有计划的工业建设开始了，那是一个开始了希望和自信的年代。是的，那个年代留给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人的心里记忆是生机勃勃，是走路有劲睡觉坦然，是友谊的真诚和心灵的温馨。正是这一年，年轻的李若冰箱藏了军装，踏上了陕北之旅的第一步。陕北曾经发生过的历史性一幕已经落下幕布，弹坑已被谷子糜子和野花所覆

盖，石油建设的号角代替了向胡宗南追杀的号角。李若冰写下了第一篇石油建设的激情满怀的散文。

从踏上去陕北的第一步始，走遍了整个西北，塔里木、玉门、格尔木、塔克拉玛干，这些在中国地图上标示着黄色沙点的板块，令人感到辽阔的同时也感到心生畏怯，那是一块又一块不毛之地，是世界上生命最难存活的地方。青年李若冰一块一块都走过去了，一步一步都踩踏丈量过了，热了冷了都感知于心了，而且发出了连续的浑厚的歌吟。我读《陕北札记》和《山·湖·草原》时发现，几乎是两天一篇三天一篇，便自然想到，这些激情满怀而又优美的文字可能是在膝头上，在行进的汽车上，在帐篷的烛光下写成的。因为从一篇和另一篇只有一天或两天的间隔来推想，他要行路，要进入工地包括临时指挥部的帐篷，要接触各级指挥员以及工人。这种进入生活的热情和写作的激情，一直保持了六十年。顺着《李若冰散文》的顺序读下来，我看到了共和国的发展历史，也看到了李若冰的生命流程。这个人把毕生的热情和智慧都倾注到和平建设——集中专注于石油——上去了，一往情深又痴情不移，从总体上就标明了李若冰是一个和平建设主义者。其中的中断发生在“文化大革命”时期，不仅是李若冰艺术创造的中断，也是共和国和平建设的中断。然而在“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灾难还在延续，李若冰自己稍得逃脱的机遇，便义无反顾地又踏上了陕北旅途，去寻找昨天的陕北和昨天的延安，寻找昨天发生在延安和陕北大地上的神圣，以透视眼下正在发生的亵渎神圣的丑恶。《神泉日出》又接续上了一九五三年的《陕北札记》。一本精选的《李若冰散文》，展示着一位艺术家的生命历程，坦诚壮美的生命形态。

李若冰散文的笔墨投向，几乎全部都是石油战线上的建设者，从刚刚转业的将军到士兵、指挥员和各个岗位的普通工人、工程技术人

员、筑路工、采盐工、测量工、司机等，无不进入他的视野。写他们的生活和工作，情绪和情怀，从他们的行为和言语中发现劳动者的内心世界和心灵的纯美，并且做出毫不掩饰的赞美，这种赞美之真诚几乎到了崇拜的状态。我发现李若冰一旦进入那些建设者的群体之中，情绪活跃了劲头十足了，艺术神经也异常活跃异常敏锐了，接触对象的一句话一个动作一颦一笑都在他的心里引发回响激起波澜，他亦毫不隐伏随感随抒坦荡自如。

这种对着普通劳动者心理世界的敏感，直接决定着李若冰的艺术兴趣和笔墨的投向。这种创作现象给我关于创作这种劳动一个新的启示：作家的笔墨投向是由什么决定的？是作家的艺术兴趣。而作家的艺术兴趣又是由什么决定的？恐怕只能追溯到作家的心理结构或者说心灵世界的巨大差异了。李若冰是少年八路军，是红小鬼，从他还不能做到生活完全自理的年龄里，已经接受一个民族的深重苦难而且负起了解放这个民族的责任；他接受的不是爷爷奶奶父亲母亲的童谣，而是聆听一个阶级对另一个阶级进攻的庄严的誓言；影响他最初的人生道德和信条的不是私塾先生强迫背诵的“子曰”什么，而是把个人融入被压迫者的集体并为这个集体牺牲自己的一切才是至高无上的神圣使命。这样我便能理解李若冰何以对那些在戈壁荒漠上艰苦创业的人一往情深了，便能理解他的艺术兴趣和艺术触觉何以对这些建设者有一种近乎生理性的敏感了。当我们日渐发现太多的闺阁脂粉气味的散文令人腻味的时候，便呼唤有大气的散文出世。然而大气从何而来？只能从作家的心灵涌流，所谓胸中荡大气，笔底有雄风。这是李若冰散文的特质给我的启示，也应是作家艺术个性差异的因由，也应是李若冰六十年艺术生命始终保持一股壮气的本源。

读李若冰的散文，可以逼真地感受一个时代的呼吸，可以触摸一个时代的心率和脉象。他从见惯了的驮着大炮的卡车到看见装载着机器和材料的卡车的景象，引发的强烈的心理反差，正好感受到了历史的昨天到现实的今天的巨大转折，这是一个战士又是一个艺术家的独有的敏感。他们由此而发出的热烈而又动人的慨叹便标志着历史的墨痕了，他捕捉到的瞬间的生活细节便铸成了永恒。

欧文·斯通在对杰克·伦敦的创作个性进行剖解时，有一段十分深刻的概括：他总是把自己的手紧紧地扣在生活运动的主动脉上，这就是杰克·伦敦艺术个性差异于同代其他美国作家的原因之一。李若冰属于这样类型的中国作家，他几乎是用自己的胸脯贴着生活发展的脉搏，感受生活，感受时代，感受他所置身的时代里一个民族的心率和脉象，连续地发出浑厚而又鲜活的诗篇。

这些诗篇是一个民族发展途程中的心灵史式的笔录，却是通过李若冰的心灵感应得到的因而既是一个时代的共同的真实的记录，又是李若冰异常明显的艺术个性的展示，自然十分清晰地透见着李若冰的情怀和人格。一个作家能做到这一点，也就够了。因为他可以坦荡地面对新的生活和年轻的朋友说——

在我的生命历程中，一直和人民在一起。

1999年4月

在《当代》，完成了一个过程

我的第一部中篇小说《初夏》，写于一九八一年一月，发表在一九八四年的某期《当代》杂志上，历经三年多时日。这个过程对我后来的写作是难忘的，也是一个重要的不可或缺的过程。

这部中篇从初稿到定稿，大约写过四次，从最初的六万字写到八万，再到最后发表出来的大约十一万多字。这是我写得最艰难的一部中篇，写作过程中仅仅意识到我对较大篇幅的中篇小说缺乏经验，驾驭能力弱。后来我意识到是对作品人物心理世界把握不透，才是几经修改而仍不尽如人意的关键所在。

八十年代伊始，农村改革的潮声初起。我那时候感觉到了这潮声在各个阶层引起的种种反响，企图写出那种感觉，然而仅仅停留在新潮与死水的认识层面上。我尚未意识到新的生活的潮声冲击的不仅仅是一潭死水，不仅仅是人的旧的观念和僵死的教条，而是人的心理秩序的紊乱。由旧的观念长期统治所形成的心理秩序被冲击了，旧的平衡被颠覆了，开始呈现紊乱和无序。而要达到新的平衡和新的结构秩序，便有一个精神和心灵的痛苦历程。我的投笔的目标，应是作品人物的这个心理历程的解析，那样才能较为准确地揭示那个时期的生活真实，即心理真实。只是我的这个艺术觉醒来得晚了一点，或者说在这三年四稿的反复修改中终于摸索到了这个窍，修改终于跨出了关键性的一步。这一步对于《初夏》来说仅仅只是一部作品的完成，重要的是对我后来的全部写作更具有意义，即进入人物的心理真实。

在这个过程中，令人感佩的是《当代》的编辑，尤其是老朋友何启治，所显示出来的巨大耐心和令人难以叙说的热诚。他和他们的工作的意义不单是为《当代》组织了一部稿子，而是促使一个作者完成了习作过程中的一次跨越，得到了属于自己的一次至为重要的艺术体验，拯救了一个苦苦探索的业余作者的艺术生命。

友谊便由此而加深了，信赖便由此而更加深刻。何启治那时候就相约，写第一部长篇小说给人民文学出版社。我那时候正在中篇小说的浓厚的写作兴趣中，长篇尚未想过。他说什么时候写他不管，一旦写了就要给人民文学出版社。此后的近十年间，每有人民文学出版社或《当代》编辑到陕西出差或组稿，老何都委托他们来看看我。《白鹿原》写成后，自然只能交给老何了。所幸的是，《白鹿原》在《当代》的发表和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出版要顺利多了。

《初夏》的反复修改和《白鹿原》的顺利出版，正好构成一个合理的过程。艺术要经历不断的体验才能找到属于自己的个性，这个过程对作家来说各个不同，然而谁也不可或缺，天才们也无法找到取代的捷径。

我的第一部中篇小说《初夏》发表于《当代》。

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白鹿原》最早通过《当代》和读者见面、交流。

《当代》在我从事写作的阶段性探索中成就了我。再说任何感谢之类的话不仅庸俗，也见外了。

1999年5月7日

灵人

关中民间把那些智慧超常的人称作灵人。灵者，聪明也。灵人，聪明人，或才人才子。

王定成是个灵人。

灵人王定成供职陕西省财政厅，任基建投资处处长，省上的重大基本建设工程的投资款，全都从他的手里码出来，一般都是以百万千万乃至数亿来说话的，这才称得上真正的“大款”。当着这样大的一个家的人，没有一个好用的脑袋肯定是难以胜任的。他的工作无须我评价，早有省长程安东对他处理的批示在：“工作有成绩，还有些改革和创新……”

令人惊奇的是，这个灵人不仅有一个善于理财、精明如运算机器的脑袋，那脑袋里还有一根或两根十分灵敏的艺术神经，这就很不容易了。我们常听说许多艺术家不会算账的笑话，典型的应该是文学大师钱锺书先生，大学考试数学成绩就不好。王定成会写小说、散文、诗歌，年轻时曾迷恋文学，不断有作品发表，一篇名为《当归》的短篇小说在八十年代初的《陕西日报》引起读者热烈反响。如果他从那时候一路写将过来，也许会是陕西作家群的重要一员。

灵人王定成还拉得一把好二胡，不是一般的爱好，而是功夫老到深谙弦韵，颇得丝竹之深层体验，《二泉映月》从他的指下叩出的旋律，如行云如流水如山风更如泣如诉，可与阿炳乱真。这个灵人近年来又“染指”摄影，常有佳作发表出来，对山河对溪水对一支野花野

草，似乎有一种天然的敏感，总是能发现独特的角度，捕捉绝妙的瞬间，传达出精彩的韵味。

然而王定成真正用心的事却是书法。

王定成上学时，我们的学校已经基本废弃了毛笔，入学的孩子先是铅笔后用钢笔，他却正是从启蒙时就拈起了毛笔，摆开了砚台，铺开了仿纸，正规正矩地练起了毛笔字。当然，这种作业可以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家庭作业”，不是老师指派的，而是家父规定的。这个家规说来源远流长，说破了会令人大吃一惊，那可是从书圣王羲之流传下来的，王定成是王羲之的第四十三代孙，嫡系。

王定成从那时起，毛笔、砚台和宣纸就没有离开过。在他广泛的业余爱好中，唯有写字是贯穿始终的，算来少说也有四十多年了。四十余年坚持不辍，磨秃了多少支大号小号毛笔，蘸干了几缸笔汁，这字的功夫能不老到么！据说书法界也多花拳绣腿之作蒙骗行世，没得真功夫便玩奇招儿邪门儿，以至手上不行干脆用脚。定成自然不会在乎这些，而是遵循王氏家训遗风，临帖摹碑，博采众长，尽皆名家大师的传世篇章。起点定调既高，自然不会流俗。直到融会贯通，终于形成自我，独成一家，独秀一枝。我在王定成的书法艺术里，读出雄浑，又读出俊逸；读出苍劲，又读出婉转；感受到凝重和苍凉，也感受了柔情和纯洁；然而更使我感受强烈的是，竟能听到一缕丝竹之声。当我面对一幅幅风姿百态的书法艺术，便有或沉雄或刚劲或如泣如诉的音乐同时萦绕于耳际。这自然得益于他对文学和音乐的素养，更倾注着他深刻而不是浮躁的生命体验。文如其人，字亦如其人。任何艺术形态的创造愈是到高处，就愈显示着艺术家的生命体验和人格精神，这才是决定艺术个性的最要害的东西。

我曾经有一种疑惑，不知那些终身投入到数字运算工作的人会不会乏味枯燥，因为我对数字从未发生兴趣和激情。王定成是一个对数字充满激情的人，终生都在理财，从地方理到省厅，而且理得精当，他兼着文学、音乐、摄影和书法的诸多兴趣，生活该当怎样的丰富多彩，真是令人羡慕，自愧弗如，灵人就是灵人。

1999年6月

（本文为《王定成书法作品选》序。）

滔滔汉江水

汉中市文联要编一套书，总名字叫《汉中五十年文学作品选》，共分小说、剧本、诗歌、散文、报告文学五卷，洋洋百万字。

这实在是一件功德无量的事。王蓬说，喊了八年，至今才弄成！我以为能弄成就很了不起。这既是向共和国成立五十周年大庆的一个献礼，也是汉中市五十年文学历程的一个形象小结和检阅，还可以看成是对后人的一个交代，可以起到弘扬、积淀汉中本土文学精华的作用，对区域间的文学交流也有好处。汉中市的领导机关和领导同志都很支持这件事，我是很感激的，自然是出于文学情结。

我去过几次汉中，对秦岭南边的汉中坝子的风光风土人情尤为敏感，留下了难以淡忘的印象。我喜欢抽的烟是汉中产的城固巴山雪茄；最爱喝的茶是汉中镇巴"巴山茶痴"蔡如桂先生送的"秦巴雾毫"。我第一次翻过秦岭到汉中，几乎可以说是大吃一惊：在西北这片土地上，竟然有如此秀美的地方，青山绿水，空气湿润，稻麦两熟，满目苍翠，一派江南景色。

汉中最令人神往的是这个"汉"字。汉江发源于斯，并贯穿了盆地的中心，孕育了这里的丰饶与文明。西汉王朝的开国君王刘邦就是从汉中起家的。他靠"汉三杰"萧何、张良、韩信的辅佐，打败了项羽，终于在古长安一统天下。汉族、汉字、汉文化中的"汉"字皆缘起于兹，这真是汉中人的骄傲呢！

历史上有两个汉中人令人无比景仰。一个是张骞，开辟了"丝绸之路"，联通了西域，带回来许多中原没有的物种，兼探险家和外交家于

一身。再一个是李固，我知道此公大名，是因为毛泽东主席引用了他的佳句："峣峣者易折，皎皎者易污。阳春之曲，和者必寡；盛名之下，其实难副。"李固是个敢与视社稷如私物的外戚权奸梁冀做斗争的硬汉子，最后被迫害致死。范文澜先生称其为"鲠直派领袖"。看来表面瘦小文弱的汉中人，骨子里却蓄蕴着坚忍和刚烈。张骞、李固就是汉中人的精神内质的典范。

三国时代，诸葛亮是把汉中作为前沿根据地的。半部《三国演义》，几乎都与汉中有关。诸葛亮死后也葬于汉中勉县的定军山下。我窃想，汉中人的聪慧是否受了诸葛遗风的滋润呢?

扯远了，还是言归正传。

据我所知，汉中的文学在新时期以前似乎缺少较大范围影响的作品，只是进入八十年代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经济文化的发展，文学创作才日渐兴旺起来，产生了一批有代表性的作家。王蓬当是跃上新时期中国文坛最早也最具影响的青年作家。他是汉中文学界的代表人物，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电视专题片多种体裁都有收获，出版了十余种专著，尤其令我佩服的是他对栈道文化的专注、执着和稔熟，堪称文学领域的多面手。我想他恐怕既要"感谢"时代的荒谬对他的捉弄，也要感谢鲁迅文学院和北京大学对他的栽培。老作家周竞几十年辛勤耕耘，人虽已经离休，仍然沉浸于关怀下一代的事业中。一个旧社会的童工，只有小学文化程度，出了几十本书，当了研究馆员，成为全国闻名的儿童文学作家和"故事大王"，实属难能可贵，令人钦敬。刁永泉是一位儒雅诗人，他的诗格调清新、余韵悠长、耐得咀嚼；他的散文也是诗，读起来是一种美的享受，从中可以感受到他在传统文化上的深厚修养。我存有他的书法作品，与其诗、散文交相媲美。李汉荣比较年轻，原来是写诗的，脑袋钻进了太空，整天思索一

些看似云飘雾渺的事情，实际皆关乎人类生存这个大命题，所以人们戏称他为“宇宙诗人”。近几年来，他连续发表了一些内涵博深颇有才气的散文，引起了广泛的关注。还有一位后起之秀寇挥，作品类近荒诞派流派，是我省近年间在全国产生广泛影响的几位文学新星之一，被文坛所关注和期望。在我们陕西这么一块以现实主义作家为主体的土地上，出现这样一个现代派作家，是让人高兴的事。还有两位来自汉中的作家：韩起和爱琴海。韩起长期生活在汉中，以一个外来人的敏锐感受着秦巴山地的文化气韵，写了一批佳作。爱琴海这个典型的汉中人，矮小文弱，写出了非常大气而且洋气的长篇《喜马拉雅》，直令人刮目相视。文坛上比较知名的作家蒋金彦、杨志鹏、张虹，还有上海的翻译家、作家、教授王智量先生等也都是汉中人呢！

戏剧上的事情我不大了解。听说老剧作家裴斐先生，本是东北人，随解放大军一起解放了这个古城，扎根汉中五十年，写过不少有影响的戏。郝昭庆原来是搞小说的，多年以前相识，皆因文学为缘。印象中他的发言口若悬河，热烈而坦诚，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曾开玩笑地对他说，你怕是走错了路，应该去当律师，施洋那样的大律师。后来听说他的兴趣转移到戏剧创作上去了，一出手就不同凡响，把两本大戏送到了北京，《清水衙门糊涂官》成为秦腔第一个参加中国艺术节的戏。

除了上述在全省乃至全国有影响的几位，汉中还有一大批文学爱好者，他们紧紧团结在很富于生气的《衮雪》周围，形成了一个群木争荣的蓬勃景观，未来发展潜力是不可估量的。

因为历史和地域的特定因素，汉中自古与楚、蜀、陇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汉中文学必然受到楚蜀陇文化的影响，是秦楚蜀陇

文化交融的产物，兼有从北方到南方过渡地带的刚柔相济的特质，令人惊羡。

谨祝汉中的文学事业如滔滔汉江，后浪赶前浪，代有才人出，重开五十年。

1999年夏

痴情如你

剧作家王军武，小我四岁，算是同代人，祖居长安，又算是乡党（辛亥革命后我的家乡辖属的咸宁县归并长安，直到五十年代中期合作化完成后重划为灞桥区）。相识廿余年来，互有走动，却不频繁，一年半载也未必能见上一面。必要的约见，多是我向他借用秦腔录像带子，前些年我住乡下，电视信号受原坡遮挡，难以享受电视的快乐和烦恼，便用录放机放录像，以便熬过写作之后的寒冷冬夜和溽暑难耐的夏夜，武打片看腻了，便想欣赏秦腔，便想到乡党王军武，借来一厚摞带子，有本戏，亦有折子戏荟萃，更有秦腔新老名角的拿手唱段。在我独居蒋村的十年里，尤其是写作《白鹿原》书的后几年，欣赏秦腔便成为写作之后的最为舒心的艺术享受。唯其因为录像带取之于军武，从那时到现在，我都保持着一段美好的记忆。

初识军武，大约是七十年代的“文化大革命”之中，西安地区的文学爱好者常常聚会，有时是市艺术馆组织的创作辅导活动，更多的是作者们自己的邀约，我确实记不得和军武在什么时间什么场合见的头一面，却确实记得第一次见面之后便被传说的他的一次壮举而感动。一九六八年冬天，二十二岁的乡村青年王军武，筹凑了六十五元人民币，单身一人骑着自行车从长安县出发，到山西省文水县去探访英雄刘胡兰的生平事迹。从那时候到现在我仍然真诚地感动于这个壮举，原因是太不容易了，我首先能切身感到的是，那时候吃饭需要粮票。一月多的行程中，除了筹款，怎么筹借几十斤粮票？抑或是自己背着干粮，像“梁生宝买稻种”那样精打细算，蹭到饭馆去要一碗面汤？那时候从陕西长安到山西文水的交通，远不及今天有高等级公路相通，许多地方连像样的沙石公路都没有，而王军武所能装备的肯定不会有

专为长途跋涉的特殊性能的自行车，充其量只配有农村人在那时代里既能载物亦可驮人的最实用的加重“飞鸽”或“永久”，走到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荒僻山径上，断了链条或撒了气怎么办？况且，一九六八年的中国，从南方到北方，从城市到乡村，武斗的枪声因为夺权斗争而愈趋激烈。一个孤立无助的乡村青年，一个文学爱好者，却踏过了如我一般常人所难以跨越的障碍，到文水县去追寻一个为了理想而牺牲的英雄女儿短暂的人生履痕，为了一个文学的梦。

一年后，王军武的秦腔大戏《刘胡兰》创作完成了，一九七〇年的春节，由长安一个村庄的业余剧团排练演出。这应该是王军武的戏剧创作的第一声，不是小曲小调，而是洪钟大吕，不是小捏搓，而是大披挂。无论这个戏取得了几分成功，真正的意义却在于，王军武第一次验证了自己，奠定了自己，向这个世界发出了第一声吼叫，用的是秦腔秦韵，一个长安乡村农家院落里走出来的子弟的智慧和天赋。

以第一本大戏《刘胡兰》的创作为开端，到现在整整三十年了，他的工作几经变动，可以列出这样一个流程：乡村老师—公社广播员—西大中文系学生—编辑—戏剧创作辅导员—振兴秦腔办公室主任。这是王军武的生命流程，始终围绕着一个轴心——剧本创作而运转。无论他做什么工作，都在正业之余倾注着对戏剧的痴情矢志，绝无动摇，亦未移情，这是那些为着自己喜欢的事业而“消得人憔悴”的中国人的普遍行为。这样，他就有了三十余部大小戏本的结晶，有历史剧，有现代戏，《荆轲刺秦王》《鸿门宴》《雪域忠魂》等，都一一上演，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戏剧比不得小说，尤其在当今，电视的普及把包括京戏这样的国剧都逼压到生存困境之中，地方戏和一切舞台剧就更困难了。然而，正是在这样的逆境之中，王军武依然不改初衷，钟情于秦腔新戏的创作，而且每一部新戏都被剧团和导演看中，

得以演出，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剧本写得好，有戏。剧本无“戏”，似乎令人难以置信，然而却是严酷的又是不争的事实，如同《皇帝的新衣》一样的小说。戏本必须有“戏”，然而又难得有“戏”；真正有了“戏”的戏本才是好戏本，才能首先被搬上舞台，才能拉住观众，才能吸引当代观众和后世的观众，戏本就获得了存活的永久性的生命力。这是包括小说、诗歌和戏本在内的一切艺术形式的作品的概莫能逃脱的铁的法则。

然而在戏本获得真正的“戏”的意义上，自然有多种因素，诸如构思之精巧奇诡，情节之波澜回旋，人物命运的起落跌宕，生动的话语和优美的唱词，都是必备的。更显得重要的是作家感受历史和现实生活的视角，才是一个戏本之“戏”的最关键之处。譬如荆轲刺秦王，譬如鸿门宴，这些几乎妇孺皆知的历史故事，要写出新的有意思的“戏”来，真是太难了，因为这样的历史故事早被普通人把一般意义上的“戏”的趣味在口头上咀嚼得如同蔗渣。王军武以全新的视角透视了这些历史事件，获得了空前的成功，这是军武创作的生命活力的展示。行家论军武的创作有如下的概括：受周秦汉唐雄风影响和黄河文化的哺育，秉承古老的秦腔剧种独具的洪钟大吕，乐府正声的品质，慷慨激昂、悲壮豪放又婉转缠绵的表述风格，纵览其创作的作品浑朴大方，铿锵有力，富有戏剧性和哲理思辨。

军武除了自己的创作，更有一个特殊的社会职务，叫作“振兴秦腔办公室”主任。秦腔需要振兴，这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前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事。秦腔不单独霸西北从省会到县城的几乎全部舞台，而且从乡村的自乐班到村社业余剧团，几乎是西北人最高的精神享受。这种霸气很快便在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消弭。现代娱乐花样及其手段的爆炸，把包括秦腔在内的传统剧种和娱乐形式逼迫到几乎土崩瓦解，生活节奏

和现代青年的欣赏兴趣的变化，都是传统的秦腔所面临的新挑战。如何使这个诞生于秦地且红火了几百年的优秀的民族之花重新焕发活力，正是军武所担负的历史性的重任。我在和军武的接触中可以感受到，他对秦腔一往情深，又满怀信念，显然不是这个职位决定了的（无权无钱的职位），而是对秦腔的那种亲情。这是任何人成就任何事的关键，无论于秦腔的振兴，无论于秦腔剧本的创作——我早在他单骑到山西的壮举中感知到了。

1999年8月6日 雍村

（本文为王军武著《梨园走笔》序。）

人生九问

问：请在一百字以内写出自己的特点、身份和成就。

答：从来似乎都没有总结过我有什么特点，至今仍然说不清楚。

我的社会身份是作家，家庭身份是儿子、丈夫、父亲和爷爷。我出版过二十八种版本的小说、散文书籍，其成色自然不能以获过多少次什么级别的奖项来评说，我更看重读者的阅读印象。我只是做到了截至目前的种种努力，包括社会、人生和文学的思考和探索。

问：你是怎样看待人生机遇的?

答：首先承认人生存在着机遇，且不止一回。

机遇应该是在较宽泛的社会层面上对一茬子人同时存在，才具有意义的。能否抓住机遇，首先是要有敏锐的思维和切实的判断。更重要的是实力，即成就某项事业的实力，才可能在这项事业上有所作为，有所创造，有所成就，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体现自己的生命价值。不具备成就某项事业的实力，即使抓住了机遇，哪怕是天赐良机，机遇仍然会流失。

当然，这个实力自然包括物质的和智力的两个方面，未必都是一次性的具备齐全了的。物质有一个积累扩大的过程，智力也有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尤其是后者，要不断地更新知识结构，要博览博采一切人类优秀的成果，以扩展自己的视野，开启思维疆域，不断地冲破

思维定式，才能实现一次突破又一次突破，才能完成新的创造，取得属于自己的在某项事业上的成就。

问：你认为什么才算成功?

答：一个人对上帝赐予他的或多或少的智慧，通过不懈的努力而发挥到了极限，甚至超极限发挥了，都是成功。一个具备创造原子弹的智慧的人创造了原子弹是成功，如果创造一个普通的常规炮弹，就浪费了智慧也浪费了生命。

在正常的合理的社会环境里，能否走向成功，靠科学的方法，也要有科学的态度。首先是科学的态度，有了科学的态度才能遵循科学的方法。科学的态度在我看来还是一句老生常谈的话，实事求是。任何虚妄的投机的行为不仅于事无补，反而会耽误走向成功的路程，造成智慧的浪费。

问：你是如何处理身边的各种干扰的?

答：我用主动的方式坚决排除了一些干扰，譬如截至目前依然无止无休的各种媒体的采访，先是劝说对方，申明对我的宣传已经够了，没有再宣传的必要了。劝说不下就反诘一句：你总不能宣传到让观众（包括读者）一看见我的脸就想吐唾沫吧？十有十回就把好心的采访者噎住了。

我也选择比较被动的逃躲的办法，排除连续不断的各种挂着文化名义而另有所谋的研讨会、新闻发布会之类，我在这些场合仅仅只是一块招牌，连任何文化的气味也闻不到的，常有一种悲凉的心理感受，便在无奈时逃躲起来。

问：你向往什么样的生活?

答：以至诚和尊重为基调的生存环境，比物质的多寡更重要，比环境的污染更迫切。我无法承受一边工作一边又要提防老鼠偷咬脚后跟的境遇。

问：你喜欢的座右铭是什么?

答：从青年时代起，一直喜欢把“不问收获，但问耕耘”的字牌放在墨水瓶旁边。近十年以来，偏重于这样一种意思，只说自己想说的话，尽量不说自己不想说的话。用一句民间俗语来概括：自己的头由自己摇。对于我这样经历的中国人，能意识到自己的头由自己来摇，既是人生立世的启蒙，也是自己活人成事的基本之点。这句蕴含着哲理也蕴含着民间智慧的谚语，启示我努力地体验社会和人生，然后发出自己的声音，且不管它宏大或微渺，只求是自己的就足以心地踏实了。

问：你尚未实现的人生梦想是什么?

答：我无梦想，我只有文学理想。我的理想从来都是文学创造。我不喜欢“梦想”这个词，因为它太虚幻。我想以自己的新的创作不断展示自己的独立体验，直到拿不起笔的那一天。

问：你的业余爱好是什么?

答：独自坐下来喝茶，哪怕什么也不想，进入一种无思的恬静，是最有益于身心健康的。看体育比赛，我在那种激烈的竞争中感到的是一种无所企及的酣畅淋漓，心理舒展了，精神张扬了，情绪亢奋了，完全是一种享受。当然，在我看来，体育比赛是最公平的，尽管

球场有过黑哨，其他项目也有过黑分，但总体来看，仍是人类所有具有竞争意义的活动中，最具透明度也最公平的一种。我尤其喜欢看高水平的足球比赛，但涉及国家队的重要国际比赛，涉及陕西队的命运的比赛，哪怕水平不高，我仍然喜欢看。在体育竞争中，我是一个民族主义者，甚或是一个地方主义者。当然，工作之余，与孙子逗玩也令人忘乎所以。

问：你是如何看待名利和金钱的?

答：坦率地说，文坛本身就是一个名利场，任何一个身在其中的人，都不可能摆脱名和利的诱惑。这情形有如磁场，除非你脱离文坛，兴趣转移甚至改作他途。

我向来不说淡泊名利的话，我以为这样说法总带有某些勉强或做作，或者如身在磁场内还要摆脱磁场的辐射一样。不断地过分地表白自己的淡泊，反而使人容易产生虚伪的印象。

作家写小说是给读者看的，喜欢读你的小说的读者多了，作家不可避免地就出名了，知名度也就高了。你写的小说读者不喜欢，或者读者很少，知名度自然就小，这是很自然的事，合乎情理的事。这个道理和演员的演出效果是一样的，赵本山和黄宏靠自己超凡脱俗的演技赢得了观众，被观众所喜欢，这是很好的事呀。他还有什么必要再三再四地表白自己淡泊出名这样的蠢话呢？反之，如果不是靠杰出的表演技艺，或者说不具备这样的技能，他们两人即使斥巨资在全国媒体上做一年自我标榜自我吹嘘的广告，也是难以凑到今天这样几乎家喻户晓的知名度的。

作家靠作品赢得读者，也体现自己的创造价值。作家依靠自己的作品造成了在读者中间的知名度，是顺理成章的，不仅无可指责，而且应该得到鼓励。中国早应该多出几位享有盛名的作家，像托尔斯泰之于俄罗斯，歌德之于德意志，马尔克斯之于拉美，鲁迅之于中国，这已经不是个人的名誉的事，而是一个民族的财富和骄傲。

文坛上时不时地流行一些自吹自捧的风事，他吹他捧的风事，更如早就有人讥讽过的哥们姐们互吹互捧的风事，确也能在文坛奏一时之效，然而一到真实的读者层里，就很难奏效了，更不要说严峻的文学史了。

同样，利与名是捆在一起的，作品发行量大，就可以获得优厚的酬金，可以改善生活也改善工作条件，这是合理的。我基本上遵从以自己的劳动（创作）获得生存和生活的物质。至于金钱，如果脱开名利中“利”的含义，而单纯去论述金钱，话题就太大了，超出这篇小文的范围了。

1999年10月18日 礼泉

（本文为答《劳动早报》记者问。）

蔚为壮观的诗章

青年诗人杜爱民主编了一本诗文集，收编了近七十位作者的约一百四十多篇（首）散文、诗歌和小说，所有这些作者都是西北民航系统的业余作者，所有这些作品都是从他们每个人的大量创作中精选出来的。看着这么多陌生的作者名字，读着这些动人的诗文篇章。我在感到蔚为壮观的同时，更感慨着文学发展的令人振奋的景象。商潮浸漫文坛，文学不再神圣，作家掉价等等议论，如不是杞人忧天，便是盲目短视的虚火中烧。西北民航系统居然有这么多的青年男女在诵诗作文，不仅坚持数年不辍，而且还在孜孜不倦地探索着创造着新的诗章，力求实现艺术领域的一次次突破，我真是欢欣击掌了，真是更坚定我说过的“文学依然神圣”的观点了。

这是一部诗情诗意和激情涨溢的书。作者们深情地赞美西北民航人的劳动，赞美新时期以来民航事业迅速发展的新的景象，把个人的情怀完全熔铸到国家复兴民族复壮的撼人心魄的乐章之中。一个大学生选择做空姐的自信，美好的健康的心理肯定能在蓝天白云之中追寻到自己的如梦人生；单飞传达出一种人生的成熟，不仅仅是工作的熟练，更宣示着一代新人的健全的心理素养的形成。几位作者不约而同地写了咸阳和中川，两个机场日新月异的变化，正是共和国改革开放以来急骤变化的一个缩影，身在其中的建设者当然是最为敏感的，最易触动那一根艺术神经的，由衷的吟诵便化作了美文和诗篇。

收入这本书里的散文和诗歌，其题材之广泛同样令人眼界大开，除了上述对自己从事的劳动的真诚的赞美，更多的是几乎涉及文学创作领域的所有社会层面，动人的关爱的自白和追寻，而这爱的含义除

了情侣之外，还有那永恒的母爱父爱兄弟姊妹间的亲情和爱心，都被作者们依自己的独特感受独特视角展示出来，令我感动的同时也分享了那纯真的亲情爱心的温馨。许多诗文的敏感的神经伸展到辽阔的乡村，是那些或出生或下放过乡村，至今依然与原野、村路、火炕、麦田瓜棚有着千丝万缕的牵连的灵魂的颤音，一句秦腔一把红枣都会铸成人的生命交响中的一个撼人心魄的音符。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发过感慨，谁如果经历了中国的乡村，而仅仅只留下愚昧和不讲卫生的痛苦，谁自身的分量也就太轻了。我在这本书里的那些回味乡村生活的短章里，情感得到了交流，接受了从房顶和窑垴的烟囱弥散出来的柴烟的熏染。

作者们的视野很开阔，有对山川大地风花雪月的独特感受，也有对异国异景的精确描绘；有家庭、父子、夫妻间的温情和呢喃，也有关于人生、历史、现实生活的严峻的思考和追问；有别出心裁的关于足球的趣事，也有学者化味道很浓的关于一幅古典名画的评述与论说；有世界各地回传到我心里的感人的友谊和友情，然而那喷射在广岛原子弹爆炸纪念馆里的利齿严词，更令我忍不住击掌……

阅读这部书稿，自然想到这么多的作者的状况，他们大都是年轻人，大都是受过高等教育的新一代民航人，无论他们的人生经历有多大差异，却都有一根对于文学尤其敏感的神经，这就是天分。当他们获得了表述能力，那根艺术神经对于社会对于生活对于历史和现实以至四季转换风花雪月就多了一分敏感，就多了一分思考，就有了把那分敏感和思考的东西倾诉出来的欲望和冲动，于是一篇篇的美文和诗章就产生了，一个个个性显明笔法迥异文采缤纷的青年作家就出世了。

我唯一寄望于他们的是，不要满足于目下的成绩，要争取一切可能去体验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和层面，以打破职业所划定的局限；多多读书，读那些大家名著，体验真正的艺术，开阔我的艺术视野，启迪艺术思维；使自己的那根上帝赐予的艺术神经愈来愈敏锐，对过去的历史和进展着的生活发出独特的回响，也使自己的艺术之躯更为强健壮大起来。

1999年11月12日 礼泉

（本文为杜爱民主编《蓝天抒情》序。）

人物才是撑起故事框架的柱梁

张永昌先生:

你好。你和张翔麟先生合著的长篇小说《草原染绿的爱》，我读了两遍，依然抑制不住新鲜和激动的心情，给你写信交流阅读感受。

读小说是为了寻求动人的故事，这是任何阅读者的最基本的阅读心理渴求。然而故事总是由人物演绎的，人物的情感世界和人物的追求以及命运的最终归宿，才是撑起故事框架的柱梁，才是决定故事的质量的主宰，也是决定读者阅读兴趣的最基本的因素。《草》书的成功就在于此，写出了几个生动鲜活的青春男女，使我过目不忘。娜日萨的自尊和对爱的痴心矢志，令人读来心灵震颤。江卜拉的崇高理想和勇于探索亦勇于实践的个性，让人领略到新一代草原人的魅力。豁达善良的严静桑和诗情洋溢的蒙更花，纯洁恬静的伊琳娜，这些新一代草原男女的心灵世界的崇高追求和现实生活的爱与恨，交织成一曲动人心魄的交响曲，一张张可视可感的青春面孔浮现在如锦的草原绿野之中。

娜日萨的形象尤为丰满。这个女孩来到这个世界时就背着上一代人的痛苦的十字架。构成这"十"字的竖笔是传统的毫无人道人性可言的野蛮的婚配习俗，而"十"字的横笔则正好是现实生活中极左的政治因素投射给这个不幸的生命先天的压迫。令人深思的是，巴德玛额吉既是那个"十"字的切身受害者，甚至可以说在传统和现实构成的不堪重负的十字架下屈辱生存半世，却仍然顽固地要把那个十字架再转移到女儿的心灵里，可见传统的积习所造成的扭曲心理的恢复之难，可

见现实生活中物质生活对人性的新的扭曲的力量。娜日萨面对的不仅是母亲按照习惯思维强加给她的十字架，而且领受着一个披着现代人袈裟的伪善而又陈腐的势力的逼压，她在重重包围中一次又一次突围出来，胜利地完成了对于陈腐和邪恶的精神剥离，一步又一步展示着对于理想对于爱的动人的心灵历程，一个生动鲜活的蒙古女儿的形象塑造出来了。她终于拒绝了那个十字架，拒绝了现实生活中新派生的丑恶，成为新一代草原人的自由女神。

娜日萨生存环境的草原，面对着沙化退化的威胁；娜日萨生存圈里的老一代和同一代人的和谐与不和谐，都深刻地映现出陈腐与新生，美与丑，激进与平庸，纯洁与污浊，鲜红的血与浑浊的水的尖锐冲突。使我在感受草原实现新生的艰苦历程中，草原人也在实现着心灵和精神世界的更新。一个“缚马架”的推广，一部电视机的安装，一辆摩托车的出现，一场迪斯科舞蹈的举办，都会对传统的生活秩序造成冲击，表层的争论可以透见旧的心理秩序的紊乱和重建。娜日萨和江卜拉一伙青春男女正经历着从自然到心灵的双重新生。这个过程不是草原独有的个别的现实，而应该是我们正在经历着的中国社会生活的一个缩影。《草》书的普遍性意义造就了自身的典型性品格。

草原骄子蒙古民族生活风情是《草》书的一大亮点。盛大的浓郁的草原传统庙会的纷繁多彩，剽悍矫健的套马场面，别具民族情趣的婚礼景观，神秘的草原和雄奇的雪山风光的铺陈描绘，读来令人神往。所有这些生动的描写，为娜日萨等两代人的生存环境提供了一个逼真的文化背景和社会生活的土壤。在这样的自然环境里和特殊的传统文化里，正生存着这一群无论在形式上无论在心理灵魂世界里，都在进行着除旧布新的两代人。这样的自然景观和民风民俗的描写就不是可有可无可多可少的装饰，而是与人物的血肉和灵魂息息相关的不

可或缺的统一肌体了。这里既能看出你对草原生活的熟悉，更能看到你对这浸淫着文化色彩的风俗民情的深刻理解，才能把这些东西和你的人物那么浑然地营造为一体。

透过一个个青春男女和一个个老一代草原人的个性各异的生动形象，他们对于草原现存的生存环境的思考和焦虑，对于处于全球一体化的经济发展的新格局下的草原发展的前景，可以透见你的思索和理想，自然包括着你的焦虑和急切，一个当代作家的人文情怀就使我十分感动了。我甚至可以断定，你作为一个在草原生活了许多年的文化人，经历了草原的昨天也感受了昨天的艰难历程，虽然已经离开了草原，而仍然对草原今天的现状和未来的远景情系于心，说梦牵魂绕也不过分，这是我从你的人物的心灵里读出来的作家的心语和血温。这肯定是你写作这部小说的初衷和最终的目的，回报给那个美丽神奇的草原一份厚礼，你的心愿随着你成功创造的小说而回报给草原以至整个社会了。

随兴写下如上一些阅读感受，尚不及作品的全面论述和评说，可供你检验一下自己的创造在一个如我的读者心里引起的艺术效果。祝这本佳作早行于世，亦祝你和张翔麟健康快活。

1999年11月18日 礼泉

（本文为读《草原染绿的爱》致作者的一封信。）

网上夜话

二○○○年三月十八日晚八至十时，著名作家陈忠实在京应鲁迅文学院副院长、诗人雷抒雁邀请，做客网易嘉宾聊天室，接受网上“文学迷”们七嘴八舌的提问——

网友：《白鹿原》是在怎样的条件下写的?

陈忠实：在白鹿原下祖居的小村子里写的。

网友：您最喜欢《白鹿原》里的哪个人物?

陈忠实：我的人物我都喜爱，这个选择性主要还在读者。

网友：我觉得，《白鹿原》里的重点人物是朱先生，您说呢?

陈忠实：这书里有几个人物都应该是重点人物，不应该只是一个。

网友：《白鹿原》及其他短篇小说情节中有无您的亲身经历？！

陈忠实：有的。

网友：那么在《白鹿原》里，哪个角色是您的影子?

陈忠实：与我无关。

网友：《白鹿原》中您对性的描写是你真实的体会吗?

陈忠实：我写抽大烟真还要去抽大烟吗?

网友：为什么您对于性的描写似乎必不可少?

陈忠实：因为性在生活中是必不可少的。

网友：您觉得现实生活中会有小娥这样的女人吗?

陈忠实：我这样写肯定就是觉得她存在，而且是一个概括。

网友：您创造田小娥的动机是什么?

陈忠实：让田小娥以一个女人的本能和本性去争取应该得到的最基本的合理的生存形态。

网友：为什么您会在后来描写小娥的鬼魂附在鹿三的身上?

陈忠实：因为鹿三具备了被鬼魂附体的行为和内心因素。

网友：《白鹿原》的结局是不是太粗了点?

陈忠实：我当时还没有找到比它更好的不留下遗憾的结局。

网友：总觉得结局特遗憾，每每读到这里就不想再读下去了，如果您再出一修订本的话，把结局改改如何?

陈忠实：不会改的，因为现在的结局已经定型了，我改也改不过来了。

网友：有人说您今生再也走不出白鹿原了，您说对吗?

陈忠实：如果走不出白鹿原，就写不出《白鹿原》。

网友：《白鹿原》后您打算写她的姊妹篇吗?

陈忠实：白鹿原是“独生子”。

网友：《白》在文学史上会留下一页吗?

陈忠实：这要看文学史的宽容程度了。

网友：我认为《白鹿原》已经属于您的过去了，不应再吃老本了，您觉得呢?

陈忠实：我比你更痛切地感觉到这一点。

网友：我第五次提问，您的《白鹿原》如果拍成电影，您希望由哪位导演来演绎它?

陈忠实：我首选吴天明。

网友：谈谈您对路遥、贾平凹的作品的看法好吗?

陈忠实：路遥和贾平凹是西北的两座高峰。

网友：请问您对路遥的英年早逝有什么看法?

陈忠实：路遥的英年早逝是一个巨大的损失，不仅对陕西，对整个中国文坛都是一个巨大损失！

网友：对于贾平凹的作品您有何看法?

陈忠实：贾平凹的作品是中国新时期文学的重要收获，真正地表述了他对现实和历史的体验和感悟。我很尊重他的创作活动。

网友：同为西北派，您和老贾的主要区别在哪里呢?

陈忠实：区别全在自己的作品里。

网友：贾平凹能和陈大叔比吗?

陈忠实：我前面已经讲了，我很尊重他，我俩不存在比不比的问题。

网友：陈先生，您好像很不愿意把自己和其他作家比较，这是保存作家个性的一种方式吗?

陈忠实：比较作家从来就是读者的兴趣，我只走我的路，很少想甚至根本没有想到我和另外一个作家有什么差别。

网友：陈老师，难道您不喜欢女作家的作品吗?

陈忠实：我喜欢不少女作家的作品，就不点名了。

网友：您最欣赏的女作家是谁?

陈忠实：李清照。

网友：您对河南的二月河喜欢吗？我喜欢，因为我是河南人。

陈忠实：喜欢。

网友：请问您最喜欢谁的作品?

陈忠实：我喜欢的作家在不断变化，不同时期有不同的欣赏对象。

网友：为什么有不少读者讨厌梁晓声？请您解释一下，最好别绕过去。

陈忠实：这个我没有感觉。

网友：您对现在好多作家写不出书咋看?

陈忠实：有的是正在读书，厚积薄发，等等再写也好。

网友：您认为当今除了您以外，写农村题材比较有特色的是哪位作家?

陈忠实：中国有很多这样的作家。

网友：您的农村题材小说已经达到一定高度，今后是否考虑多写写城市小说?

陈忠实：写什么在我来看并不是想写什么就能写什么，主要决定于作家自己的体验。

网友：有人说陕西作家的作品有一股腐朽的帝王气息，是不是你们那儿埋的皇帝太多了?

陈忠实：我感觉到的恰恰相反，是陕西作家的农民气息。

网友：陈老师，陕西的作家和山东的作家都有很重的“乡土情结”，您认为呢?

陈忠实：这可能与作家自己生存的环境有关系。

网友：陕西的作家有派系之分吗?

陈忠实：陕西作家有一个大派叫作“黄土派”，但大派里面风格各异，都具个性，差异很大。

网友：您能否概括一下陕西的文化特征?

陈忠实：陕西文化的特征应该到司马迁的《史记》那里去找。

网友：陈老师，您出访过美国吗？您最喜欢的外国作家是谁?

陈忠实：出访过，我非常喜欢美国斯坦培克的作品。

网友：当作家是不是很辛苦?

陈忠实：是的。

网友：当作家生活水平如何?

陈忠实：各个作家的生活水平也有很大差别，有富人也有穷人，我属于温饱阶层。

网友：陈老师如果有下辈子的话，您还想当作家吗?

陈忠实：这要看我下一辈子最敏感的那根神经是什么。

网友：陈老师，您的《舔碗》表现的是什么?

陈忠实：让我解释自己的作品往往很尴尬。

网友：您有出自传的打算吗?

陈忠实：我感觉现在还不是写作自传的时候。

网友：写作影响了您的人生观吗?

陈忠实：是人生观影响写作。

网友：那么写作是否使您的人生观发生了改变呢？

陈忠实：起码写作这种劳动对于我发生了重要影响。

网友：您的书我看过几遍，很佩服您写得真实，你有没有想不再现实，像王朔一样？

陈忠实：我可能摆脱不了现实对我的诱惑。

网友：陈先生，您认为是否西部文学也会像现在“西部大开发”一样，不久就会异常繁荣起来呢？

陈忠实：我觉得这两者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

网友：陈老师，您的另一半是如何评价您的作品呢？

陈忠实：我的这一半和那一半是对应的。

网友：您有几个子女，愿意透露吗？

陈忠实：两女一男。

网友：能简单谈一下您的读书生活吗？现在您在读什么书？

陈忠实：读书是我文学生活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我最近还在读拉美几个作家的作品和他们谈写作的文章。

网友：陈大叔，您最近在读拉美的作品，那您认为《百年孤独》怎么样？

陈忠实：这是我读的第一本而且是最好的一本拉美作品。

网友：网上文学是否是个挑战?

陈忠实：因为我不懂网上文学，所以对我没有什么威胁。

网友：您还想养白鸽吗?

陈忠实：现在心境也差了，也没那个条件了。

网友：您在作协是“主席”，影响不影响您写作?

陈忠实：当然影响。

网友：当作协主席累，还是创作累?

陈忠实：前者比后者更累。

网友：去年夏天您说您最难受的事情是在感情方面的失落，快一年了有没改变?

陈忠实：我正在走出感情低谷。

网友：陈先生你想获诺贝尔文学奖吗?

陈忠实：这不是一厢情愿的事情。

网友：您喜欢把自己的作品改编成电视剧吗?

陈忠实：当然喜欢了。

网友：对于您来说，最欣赏的品质是什么?

陈忠实：诚实和刚毅。

网友：您脸上的纹路让我觉得我将是“陈忠实二世”，您允许吗？

陈忠实：你可别学我，呵呵，当然有姑娘喜欢这样的脸除外。

网友：陈老师，您的脸有张艺谋的特征——刀刻的纹路。

陈忠实：张艺谋比我英俊。他的脸是用雕刀刻的，我的脸是粗糙的西北风刻的。

网友：张艺谋说“陕西人一根筋”，是这样吗？

陈忠实：这个问题最好让张艺谋去回答。

网友：陈村先生已经在网上安家了，您有没有这种在网上栖身的打算？

陈忠实：我暂时没有。

网友：陕西的作家是不是要来个集体上网？

陈忠实：我希望有那一天。

网友：您经历过几次爱情？

陈忠实：请尊重我的隐私权。

网友：对您来说，最大的幸福是什么呢？

陈忠实：就是把我对世界的感觉能充分表现出来。

网友：请问陈忠实先生，您到底忠实于什么？灵魂，生活，或者钱？

陈忠实：主要忠实于我的良心。

网友：一本好书的评价标准是不是由读者来定?

陈忠实：当然。

网友：白鹿原那儿的人一定会很有钱吧?

陈忠实：白鹿原人已经获得改革带来的很大好处，但也仅仅是相对而言。

网友：您最近还看足球吗?

陈忠实：经常看。

网友：老陈，能不能谈谈足球？听说您也喜欢足球?

陈忠实：我对足球有一种本能的激情。

网友：您喜欢国外的哪一支足球队?

陈忠实：曼联。

网友：陈老师，您写作时有什么嗜好吗?

陈忠实：喝茶、抽烟、喝酒和听秦腔。现在已经戒酒了。

网友：陈老，您现在抽的是雪茄吗？是国产的吗?

陈忠实：我抽的雪茄是陕西汉中的产品，你现在闻到了吗?

网友：张贤亮下海，您会不会也下海?

陈忠实：我不具备张贤亮经商的智慧。

网友：陈老师，您的样子长得有点酷！！！

陈忠实：我至今把握不住“酷”的含义。

网友：陈老师，您近来身体怎么样?

陈忠实：还好，每顿还能吃一碗羊肉泡馍。

网友：您的人生阅历一定很丰富了?

陈忠实：这个我永远都不会满足。

网友：以您现在的年龄，对生活最大的感悟是什么?

陈忠实：认真面对生活，不断增强对生活中的痛苦的承受力。

网友：陈老师，您是老实人呢，还是情感的骗子?

陈忠实：这只能由你判断。

网友：您写到什么时候封笔?

陈忠实：写到我变成植物人，如果是那样。只要有思维，我还会写。

网友：您最喜欢哪座城市?

陈忠实：西安。

网友：您今晚是赤胆战群雄。

陈忠实：我觉得很愉快，是交流不是舌战。

2000年3月18日

我读《山河岁月》

到汉中参加作家王蓬《山河岁月》研讨会，从一踏上火车直到进入会场，一直萦绕在心的居然是一种感慨。不完全是故地重游的原因。记得上次参加王蓬纪实文学作品研讨会，是在一九九〇年，今年是二〇〇〇年，整整十年了。十年在一个人尤其在一个怀着高远心志的作家的人生历程中，我可以掂到它的分量。这十年，对于年富力强正处于艺术创造旺盛期的王蓬来说，是太重要的一个年龄区段。他的整个创造活动和创造成果表明，在艺术和对生活的感知这两个至关重要的方面，王蓬已经走向成熟。

一九九〇年，王蓬的《巴山茶痴》等五部影响广泛的纪实文学作品结集出版后，召开研讨会，我到汉中时正巧赶上了，不经意间已经过去了十年。十年里，王蓬不仅有《山河岁月》上、下两大部作品出世，此前还有《山祭》《水葬》两部长篇小说出版，单以一个劳动者的角度讲，干了多少活儿呀，取得这样丰厚的收获是令人羡慕也令人钦敬的。这种坚忍专注的倾全部心力进行的创造性劳动过程，不仅对王蓬，对同代作家的我更容易发生感慨，包括《山河岁月》书名中的"山河"和"岁月"这些词，似乎更容易触及追求事业者的那根人生沧桑的神经。"山河"隐蕴着某种历史，"岁月"更包含着某种沧桑，人的追求，人的创造，人的精神和人文情怀，人在现实中的奋斗，瞬即就会成为过去成为历史。

如果再往前追溯十年，即一九八〇年，又是一个难忘的十年，我第一次翻过秦岭到了汉中，是随西安市文联办的一个"文学讲习班"来的，那天下午就赶到王蓬家中。那时候的王蓬还是一个地道的农民，

家住距汉中不远的张寨。到他家时首先看到挂在架子上刚宰杀的猪肉，我惊讶王蓬把那颗硕大的猪头收拾得那么干净，因为猪脸上深深的皱褶里的毛是很难拔除剔净的。我后来想，在陕西文坛活跃着的四十至六十岁这个年龄档的作家中，真真正正从一个农民走进文坛的，王蓬可能是仅有的一个。其他作家仅仅只是工作在农村基层，乡村中、小学教师，县乡政府或文化馆干部，工厂或商业单位职工，注册着城镇户籍领取哪怕是低微的工薪，完全靠种地吃饭穿衣过生活的就是王蓬。这应该是一个人生奇迹。陕西有多少农民，汉中盆地和秦巴山区有多少农民，在改革开放二十年里可能成就了一批大大小小的乡镇企业家，然而真正的作家却只走出来一个王蓬。

王蓬是从农民中走出来的作家，却完全不是“十七年”那时候所定义的那种“农民作家”。王蓬的发轫之作《油菜花开的夜晚》和《银秀嫂》，一出手就标示着新时期文学全新的艺术风貌，一出手就显示出很高的起点也获得很高的声誉。二十年过去，正是王蓬，已经显示出学者型作家的征象和风范。多年以前，王蓬曾提出“作家学者化”的观点，我觉得有很合理的因素。解放后成长起来的作家，历经极左的各式运动，文艺思想“左”得不能再“左”，读书也受到严格的限制，客观上造成了一代作家的知识结构的残缺不全，与二三十年代鲁迅、郭沫若那一代作家的知识积累和文化素养无法相比。知识结构的残缺和知识面的狭隘，对于作家的艺术视野和创造思维的局限是不言而喻的。我在读王蓬的《山河岁月》时，首先品味到一种脱俗的文化品位，颇为惊异，王蓬已经脱胎换骨了。《山河岁月》集中考究的是汉中地域性的历史文化，需得具备以国学坐底的基本的学问和修养，王蓬付出了以健康为代价的扎实的文化和历史知识的自修。对于今天的王蓬来说，二十岁左右做农民的人生体验，成为他成就文学事业的难以替及的础石。

二〇〇〇年又将开始一个新的十年，王蓬刚过五十岁，在未来的岁月里，我祝福王蓬呈现出更新的风貌。那时我们将再聚汉中，再说王蓬。

2000年4月8日 汉中

你写的书，让我不敢轻率翻揭

一

时令正当关中平原的早春时节。细雨把一缕缕让人感到滋润的气息送进窗户，微带寒意。窗外的高架桥上交错着连绵着汽车的灯火。听着作家王宝成随心所欲的说话，悠悠的沉沉的语调，虽是让听者的我摆脱不开一种沉重的心绪。然而在这沉重里，我强烈地感受着一个在苦难人生中跃进着的生命，一个咬破嘴唇吮吞着唇血而又不哭不诉的汉子。

这个汉子和我隔着一个床铺，面对面坐在竹椅上随意聊着，话头儿竟是这样提起的：村子里父辈的人一个接一个死去了。剩下没有几个了。我突然发觉自己有关那些生活的记忆，随着人去而空泛了……这显然是切入生命深层的体验，而非一般的生活咏叹。我的心灵深处微微一颤。

许久许久了，我们生活在这座曾经辉煌于中国历史的古老城堡里，虽然很少串通、走动，下意识里却是一种无须表述的信赖。生活中往往有这样的情形，常常见面常常说话常常吃喝常常勾肩搭背，然而放下酒杯松开握着的手，便什么也没有了；有的人如王宝成这类，一年里见不上三回两回，见了面也未必亲热亲昵甚至有点冷冷的人，我却有一种踏实永远的信赖。生活是万象的，即使活到这个年纪，仍然悟不透这个最普遍的生活世相。

二

王宝成的名字和中篇小说《喜鹊泪》是同时进入我的记忆的。刚刚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陕西文坛和刚刚蓬勃起来的中国文坛一样蓬蓬勃勃，时不时便有一个陌生的名字突然在文学里爆响，你无法料知陕北的黄土高原陕南的秦巴山地汉水流域和渭河平原的古老关中，那里正有一棵文学之树于某个黎明拱破土层摇曳在晨风晨光里。我经历过那个令人惊诧令人振奋的好时月，那是过去的历史和注定的现实都不曾发生也很难重现的一种奇异的文学现象。恰如解冻后的原野上草木的复苏，而文坛的冻结要比自然界严酷而且继续了十余年之久。我记不清在什么场合听到王宝成的名字，说他有一部中篇小说在上海的《收获》发表了。看过的人说写得相当好，作者是省委机关的一位干部。《收获》在“文化大革命”前是唯一的一本大型文学双月刊，在我心中有着一种难以高攀的位置，这个王宝成一出手就跃起到这样一个高度，真令人惊羡。回到我供职的灞桥文化馆，便找来一九八一年五月号的《收获》读《喜鹊泪》，这个小说和作者王宝成便铸入了我的记忆。

现在，我和王宝成隔一个床铺对面坐着聊着。他比我小一两岁，鬓发虽也露白，然而毛发却比我稠密，令我羡慕。他说那个《喜鹊泪》原是听来的故事，是和他在一栋办公楼里工作的省妇联的同志告诉他的陕西周至县的终南山区一个女孩子殉情的惨事。他起初听到时并没有引起创作的欲望，尽管妇联干部很动感情地对他叙说。又过了些日子，妇联主任把那个女孩殉情时留下的遗书给他看了。正是这一封遗书，一下子触及作家的某一根神经，搅起了情感世界里的波澜，他被一个乡村女孩的纯洁而又凄惨的爱的情愫感应得坐卧不宁，当即赶赴终南山下的黑水河边，寻觅遗落在那里的有关一个乡村女孩的情丝爱絮……《喜鹊泪》诞生了。

我听着这个故事，并不太惊奇，每个作家的任何一部成功之作，都有诱发其创作的最初的因素。然而令人感兴趣的，恰好是故事之外的种种奇特的甚至是不可思议的触发作家的创作冲动的诱因，一个为了挣脱包办婚姻为了争取真爱的乡村女孩为情而死的生活事件，虽然动人却终究有点陈旧，毕竟都八十年代了，王宝成产生不了创作冲动是合理的。然而那封遗书中的几句话，仅仅是其中的三两句话，却把一个七尺汉子的心灵和情感之湖颠覆了，一个作品便在这一瞬间如同受孕一样奇异地发生了。作家凭什么感知生活感知世界，或者说生活以什么形式或方式去触发作家心灵从而引起波澜，实在是无法预测无法期待也无法钦定的事。作家自己往往也很难料知很难把握，看似不经意间的一种感应一种触发所产生的受孕的效果，往往正可能是一个独具个性的艺术生命的诞生。

三

我读王宝成的作品，无论是中篇《海中金》《故乡麦月天》《父亲·母亲》等，还是长篇小说《梦幻与现实》三部曲，总会产生一种阅读自己的感觉。我曾经多次在阅读中掩卷思索，这种感觉是怎么产生的?

是我们都生长在渭河平原相同的经济形态和相同的文化氛围中?似乎也不大可靠，因为我们的个人经历中的差异还是很大的，再说在同一块地域上的作家还有许多，为什么在阅读王宝成作品时会产生这种独有的感觉呢？我终于排除了那些客观的容易产生简单化解释的因素，最终归结到王宝成作品本身。

无论中篇或长篇小说，王宝成呈现给我们的文本，首先以其不可置疑的巨大的真实感直接撞击人的阅读神经。作为读者的我便在那种

真实真切的生活图景里完全顺从了，顺从地领受生活的一页斑斓一页泪痕乃至一页污浊；而这一页一页文字所描述的昨天或今天的记忆和景象，恰恰是我经历过承受过也体验过的难以忘却的精神屐痕。阅读这样的文本自然会使沉寂了的记忆重新掀起波涌，且不是简单的重复和重温，而是一种新的咀嚼的快感，是一种回眸来路的感叹和领悟。真正优秀的文学给人的最基本的阅读满足正在于此。

我在阅读《父亲·母亲》时常常忍不住泪眼蒙眬。一个渭北高原最不起眼的土坯屋里流荡着人类最动人的情和爱的大劫，一个关中大汉（父亲）在这种大劫中压抑着灵魂的咆哮承受着走到今天，一个幼稚的生命（儿子）在这种大劫中把哭声转变为沉默、刚毅、正直走出自己的人生，再把这镶嵌在黄土的坡坎下的土屋里美丽的人性的东西双手掬捧给今天的人们：我经历了苦难我经历了成功，我没有被碾压成尘，我终于获得了陈述过去的权利和能力。

王宝成小说的不可置疑的真实感源自他的生活经历和生命体验。我在阅读《父亲·母亲》《故乡麦月天》等中篇小说时，曾经不断发生疑问，这可能甚至肯定就是宝成自己和亲人们真实发生过的生活故事；我在阅读长篇小说《梦幻与现实》三部曲的时候，仍然不断泛起这种联想，企图猜想原有的生活素材和虚构的故事所占的成分，那个经历过极度贫穷经历过亲情割裂又心地纯洁的蒲冬林身上，印染着宣泄着作家王宝成的多少真实的情感份额？我曾经企图把这两者分离出来，探究宝成怎样完成从生活到艺术的奥秘，难得很，终无结果。现在，二〇〇〇年早春的这个夜晚，我们坐在一起聊天的时间，十年前的这种强烈的阅读猜疑得到了验证，宝成坦然地说，所有这些作品，都带有深厚的自传色彩。

文坛常常呈现纷繁的创作现象，作家面对生活进行艺术创造时也是各怀绝技各具套路，本属正常。然而，在真实的树和虚拟的影之间，却有一个难以混同的界线，有的作家面对的是一棵真实的树，有的作家却着意于那树投射到地上的影子。王宝成不仅始终面对着那一棵绿树，甚至那树就扎根在他的心灵和血液里，不可能推开树本身而去追逐那个影子。

真实的艺术效果来自真实的生活体验和升华到理性的生命体验。王宝成不仅有一个巨大的蕴藏，而且具备了开掘和表述这种蕴藏的独具个性的艺术创造能力。我不想在这篇短文里作艺术评价，只是感到遗憾，文学评论界往往也发生追逐影子而忘记了真实的绿树的现象。然而这亦不值得计较，影子的变幻和消失终究是难以改变的，而结结实实的绿树却是愈见其强劲的风姿的。

四

两年前的隆冬季节，我在渭北高原的蒲城县住过一周。朋友带我去参观杨虎城将军的故居，又参观王鼎的故居，我一时感慨万端。在鸦片战争的民族大屈辱里，陕西蒲城人王鼎力荐林则徐，向清帝做出了死谏的举措；在民族生死存亡的严重关头，还是陕西蒲城人杨虎城做出了震惊世界的兵谏的举措，结局亦难免惨死。我在参观他们相距不远的两座故居时，总是不由得慨叹，这块土地出产硬汉，这块土地的土质和水质滋养硬汉，铁的嘴，钢的牙，血的性，热烈而又刚毅，正是关中人的典型代表，正是一个民族的良心和脊梁。

怀着这种强烈的慨叹，走到一条街巷的小学校门口，朋友告诉我，这是王宝成的母校。我的心又一次怦然而动。我竟然产生了幼稚的童趣，企图寻找少年王宝成的足迹和读书写字的课桌，然而这个小

学校已经搬挪一空了。这所小学的前身是清代的一个“考院”，整个渭北的秀才们考取文举人的一个考场，规模庞大气宇不凡，似乎仍然可以感受满室秀才笔试的肃穆和严峻。解放后改为“槐树院小学”的这个浸淫着秀才们墨香和泪斑的屋院，却成就了一位优秀的作家。

我无法想象少年王宝成的举止和情态，眼前清晰地映现着一张黝黑的方脸、浓发浓眉，沉静到使人容易错觉为呆滞的眼睛，悠悠地说话，诚挚到略显羞涩的笑。我甚至瞎想，如若王宝成处在王鼎的那种历史境遇下，同样会把自己的七尺之躯挂上那一条白练的。

大约十年前的一个夏天，正值我的家乡灞河川道白鹿原地区后的夏收时节，我和王宝成坐在灞河岸边的河堤上，看农民在收割麦子，河岸两边的绿树和青草散发的清香和麦田里的香气混合着弥漫在空气中。夕阳灿灿。我们坐在沙堤上，同样是随心所欲地闲聊着。他正在写作一部电视连续剧，躲在距我家不足五里的一个驻军的招待所里，便有了这次相约相聚。

十年后的今夜，我和宝成坐在这家城郊的宾馆里，主要听他说话。这个人曾经把每天定量的馍馍换了一本书，整整两天没有馍吃而饿昏在回家的庄稼地边。不是战争，不是灾害，仅仅只是贫穷。在贫穷和困境里因为渴望知识而能产生这样的承受力的少年，恐怕什么挫折和灾难也难摧折其高远的心态，也难扭曲其刚直的脊骨的。少年时代一旦具备这样的生理到心理的承受苦难的毅力，足以影响一个人的一生。五十五岁的王宝成现在以一个智者的沉稳和透亮的口吻对我慨叹：“骨髓里的东西是难以改变的。”

五

许多年以来，王宝成生活在古城南郊的大雁塔一侧，不声不吭，文人聚会和新闻传媒上很少能见到他的行踪，只有新的作品在杂志或屏幕上出现的时候，他才出现在读者和观众的视野里和言谈中，之外便什么举动都没有了。

这个人从来没有炒作，他炒没有，自炒更没有。他不事张扬，更不会自我膨胀。他面对的始终是书桌，始终恪守着一个作家的真实的为文和为人之道。出于对创作这种劳动的本质性理解，作家是以自己的作品和读者完成交流的，非文学的手段对于作家和作品不可能产生稍为长久的补益。面对屡屡潮起的浮尘式的文坛现象，他至多一句叹惋或轻淡地一笑，该做什么还继续做什么去了。

电视剧《喜鹊泪》不仅使乡村青年男女激起强烈共鸣，同样使城市里更趋现代意识的年轻人感受到心灵和情感深处的某些胎记的东西。《庄稼汉》和《神禾原》的成功，让我更清晰地看到宝成的笔尖所指愈来愈集中愈来愈专注于关中地域性的人的心理结构和文化蕴含，以透视和解析这个民族精神更新的艰难和痛楚。他的小说从中、短篇写到长篇三卷，排列起来是一个令人惊异的雄壮的阵势，当是多年默默的耕耘所得的不倦的收获，这种收获才足以使一个创造者产生充实和自信的良好的心理情绪，也足以面对纷繁的社会和同样纷繁的文坛轻淡一笑。

如果要我进行选拔，这将是十分困难也十分令人为难的事。王宝成的作品几乎没有同类题材和同类意旨的并列性表述文本，每一篇或每一部都是意向迥异的开掘和探求，比较和选择在同一类型间可以进行，而不同类型的选择和比较往往造成选择者的兴趣和所好的暴露。我只能从阅读的直接感受来说这些作品，中篇系列里的《父亲·母亲》当是一颗咀嚼不尽的柠檬，那含混着甘甜酸渍苦涩的汁味，留下的是

人生的复杂而又绵长的记忆。我曾经和朋友们不止一次闲聊过这种阅读感受，多有同感，且以为在八十年代的当代中篇小说里应该是一个重要收获，被评奖机构尤其是被评论界的忽视当是一个遗憾。评论家李星的一句很概括的表述令我欣慰：《父亲·母亲》可与艾特玛托夫的《一日长于百年》比美。可见好酒还是不怨巷子深的。而《故乡麦月天》留给我最初和最终的印象，依然是诗性的，是一篇深沉得令人不敢轻率翻揭书页的中国乡村的土地诗篇。由此我曾联想到连结胎儿和母亲的那根脐带。脐带的绝对温馨的意义和斩断它的毫不含糊同样是绝对的意义，以及因此而引发的必然的痛苦。王宝成不仅是面对，更多的是亲历这根脐带被剪断的痛苦时，发出的声音是那么撼人心灵的真实；美好的传统和不容置疑的剪断所引发的复杂的心理剥离的痛苦，是他独特地从生活体验进入到生命体验的成功展示。当同期同类乡村题材还多停留在农村政策变化的生活浅层故事的编排和演绎上，王宝成却早已透过那个顽固的图解政治注释政策的写作怪圈，进入原本意义上的文学创作的层面了。

六

真正体现王宝成艺术个性和创作才华的还应该是他的长篇小说《梦幻与现实》三部曲。我看第一部《爱情与饥荒》的第一眼时，在振奋的同时也潜伏着某些羡慕甚或妒忌的东西。我那时正在长篇《白鹿原》书的写作中，初试长篇小说的惶恐和对前景的种种担忧，有一种持续数载的无法挥斥的空虚。见到宝成刚出版的长篇，自然期盼自己案头的那一摞墨痕新鲜的稿纸也能变为这么厚厚的一本，该当是怎样令人舒展欢悦的时刻。王宝成不声不响，《爱情与饥荒》写作顺畅出版顺利，真是令人羡慕以至妒意潜生了。

从一九八七年新年伊始动笔，历经整整十二年，宝成完成了百万余言的长篇三部曲，才是真正令人羡慕以至妒忌以至钦敬的事了。

对于同代作家，尤其是面对可以称为朋友的同代作家，对他们杰出的创造成果产生羡慕心理是正常不过的事，产生钦敬的心理应该是高尚情怀了，然而混淆其中的妒忌心理是否正常呢？我以为就我的亲历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记得在八十年代初路遥的《人生》发表时，我的阅读直感就是这样，似乎猛地发现同场长跑的路遥已经超出自己一圈了，由此而产生的羡慕、钦佩之情里，很难排除某些不太光彩的又绝难出口的妒忌。阅读《爱情与饥荒》时，也产生过这种情绪，即妒忌。这个黑黑脸膛又不吭不响的王宝成，这个长篇写得多好哇，深刻的独特的体验和沉稳扎实的叙述功夫，把一个几乎与作家难分难剔的蒲冬林推到我的面前时，我才切实地感觉到《父亲·母亲》的写作仅是艺术锋芒的初露，其璀璨的光芒只有到《爱情与饥荒》这部长篇中才展现出来。羡慕、钦敬以至令人闻之嗤鼻的妒忌就都产生了。

我不敢猜测别人，只是老实承认自己曾经发生过这种情况。然而我却以为这个令人嗤鼻的妒忌还有不可替代的积极效果，那就是重新审视自己，从虚妄和盲目中清醒过来；尽快地把盯着赞美性文字的眼睛移开，把翘起的尾巴收住甚至斫掉；把心理调整到沉静，以冷静到冷酷的心肠强迫自己重新审视以往的一切；调整步履也调整笔锋，在找到新的艺术目标的同时，也对自己的起点有一个科学的准确的定位。这情景同样类似于赛跑，眼见比自己跑得快的同类伸脚使绊子，是妒忌这种作为人类不健康心态最易发生的举动；然而，如果把妒忌转化为内省自审的契机去审视自己的腿和脚，就可能在下一届竞技中重新超出。何况文学创作不完全类同于体育竞技，而更应属于自己体验的展示。

我很难也不可能在这篇散记式的文章里论述百万言的三卷本长篇巨著。我只是要告诉宝成，我的羡慕、钦敬和妒忌又产生了。长跑线上总是对那些比自己跑得快的同类才会产生这种情绪，同代又同地的作家当然是那些优秀于自己的创作才会产生这种复杂心理。历时十二年完成《梦幻与现实》三部曲，在王宝成是一件可慰终生的成功，终于把自己的文学之梦变成一组磅礴的群雕。蒲冬林等人物的生活之路和心灵历程，正可以当作半个世纪一个民族的心灵史来回嚼。

面对我的朋友王宝成和即将出版的《梦幻与现实》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心境》，我在祝福的同时，又一次感到应当重新审视自己的“腿”和“脚”了。

2000年4月11日 汉中

校验人生

一

写下“校验人生”这个题目，自然是为着《中国九九一〇行动》这本书的，然而更偏重更强烈的指向，却是我的内里。

当我被官方媒体揭露的诸多政治和经济丑闻吓得瞠目结舌，当我被市井乡野民间广泛流布的讽时嘲世的歌谣和笑话淤塞了耳朵，当我亲历诸多的欺骗、欺世、吹牛、鼓噪、矫饰的嘴脸而不得不闭上眼睛，常常会由愤怒转换为无奈，为烦厌，为丧气，为无言。世界变得越来越文明越来越富裕，生活也变得越来越混沌越来越无耻，于是难免发生人生价值判断的自嘲式的生存怀疑。

近日阅读《中国九九一〇行动》书稿，几次竟然热泪糊眼，掩卷慨然感叹不已。一次又一次的激情涌动之后，终于从情感归于理性：校验人生。

二

这不仅是一本中国国防工业走向现代化的“创业史”，而是把一群堪称国家和民族脊梁的中国人推到我的面前。面对这一组群雕式的人，就成为人生价值判断严峻而又鲜活的参照，我的指向便落定在自己的内里：校验人生。

九十年代发生的两场由美国人亲自导演的制裁伊拉克和南联盟的战争，让整个世界领略了现代化立体战争的新的形态。无须论述其意

义，也无须再评述，我只是在事后的今天仍然想起当时潜伏在心底的一点隐忧，万一中国面临这样的祸事，我们有与之抗衡的“家伙”没有?

《中国九九一〇行动》阅读的兴奋点正在于此。我终于心里有底了，终于知晓原先想象的那个“家伙”弄到什么程度了，不再糊涂了;我终于了解了那个神秘的“家伙”是怎样被一群优秀的中国人弄出来的，他们的杰出的创造超常的智慧和完美的人格风范，正是铸就一个时代里的国家和民族脊梁的精英。

那个被世界上各种人以各种心理和各种目光关注的“飞豹”和新型地地导弹，被这一群中国人创造制造出来了，而他们又是在被视为落后封闭保守的三秦大地上创造制造出来的，我便有了狭隘的地域性平民的自豪。创造和制造这些在当今世界堪称顶尖级的“家伙”，没有超常的智慧是无法想象的，这是常识常理，书中也有较为充分的叙述和描写。他们果然都是各个学段的高才生，是几十年坚持钻研最新科技发展的尖头。凭他们天赋的智育和智慧，可以想象都会是国际人才市场上炙手可热的抢夺对象，令人眼热的洋房小车和丰厚的洋钞是不言而喻的。然而这些人几十年钻在陕西的山沟里（这些国防厂大多建于人迹罕至的山沟），拿着和各个阶层各种职业相对称的级别工资，铸造着如我一样的中国人心理安全的那一道长城，一笔一笔抹去百余年以来留在我们灵魂深处的屈辱的阴影，重塑着进入新的世纪的中国人的腰杆或者说脊梁。

然而，我更看重也更钦敬的是他们的精神。我怎么也料想不到，令人腰杆挺硬的东风导弹的创造和制造者们具备着同样超人的心理承受能力。他们不仅能承受创造过程的不可避免的失败，同时也有承受生活中突发的灾难的毅力，而普通人可以想象的诸如吃苦、严寒、饥

饿这些生理折磨更不在计较之列。作为新型导弹发动机主任设计师的项建杏，相濡以沫的妻子出差时突然病逝，他在痛苦中默默地调整自己，很快又以冷静的心绪投入工作。在发动机试样的关键时刻，他忍痛割爱放弃了儿子的婚礼，只能留一句祝福。那个一生都在争取干活的机会被人戏谑为“得了爱干活儿的‘病’”的俞清川师傅，在儿子不幸患癌症需做手术的生命关头，他还是为一项紧迫的活儿上班去了。为了试验新型特种装备武器，作为万人大企业的东方厂厂长才长伟和技术人员一样潜伏在蚊虫繁密的野草丛中，既是督战，更需亲历，把一种精神率先垂范到企业之中。《中国九九一〇行动》里多种新式兵器的试验过程，除了艰苦所包含的所有内容之外，还有随时可能发生的意外和难以躲避的不幸和牺牲，在这些预料中的灾难可能发生时，包括总设计师王兴治和“手术医生”王广仁等，在面临生与死的选择中，令人感到义无反顾的悲壮。

三

俗者和庸者和被扭曲者都在随口宣示着一种生活哲学，都什么年头了，你还这样！这种生活哲学的含义有正负两面，正面大约针对那些抱残守缺留恋旧的思维“辫子”的人，负面却是针对那些不肯随波逐流于庸俗乃至畸形生活形态的人。

都什么年头了？

这本书里所写的那些人和事，大约发生在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末，直到今天面对的这个新的世纪。“这个年头”应该是二十世纪里中国发展最快的年头，也是中国人生活和精神上最宽松的“年头”。在这样的自由度空前放大的年头里，各种职业的中国人尤其是年轻一代的自我选择的自由度也是很大了。然而选择什么样的人生途

径，却是一个人生命价值的关键性分野。上述流行的生活哲学的两种含义（抱残守缺与随波逐流）之外，我看到了一大批中国人的人生选择，就是《中国九九一〇行动》里的这些民族精英的人生价值的取向和选择。

生活是万象的。中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起始的新的治国方略，逐步开始了为一切人提供个人发展得越来越自由的社会空间。一茬一茬具备表演和歌唱天资的男女新星演红了唱红了荧屏和舞台，一批一批既具专业知识又具政治意识的年轻人走上各级党政的权力位置，新型的企业家无论国有无论私营已形成一个庞大的阶层，支撑着新的治国方略和新的经济体制的逐步实施和不断完善。然而社会生活在繁荣的同时也伴随着复杂和混沌，经济和政治和政权领域的腐败已经难以分解清楚，极端的自私膨胀起来的对权力和物质的欲望，直把一些高官送上了断头台，庸俗和市侩的生活哲学也在消解着人生价值中的神圣，而且是以轻俏的不屑的得意的口吻。

《中国九九一〇行动》里的精英们当然不是生活在真空式的桃花源里，尽管他们中的许多人大半生都钻在深山大沟里，生活中的明丽和生活的混浊都充分感受到了，然而他们仍然选择了自以为神圣的事业，不仅无怨无悔，而且乐在其中壮在其中，寄灵魂于神圣的民族脊梁之中。有一件小小的却能体现市侩和神圣的尖锐冲突的生活细节：几位在世界上都称得上“杰出英才”的专家，从冰封的荒原完成试验回归西安的途中，正因他们破旧的装束和荒野给予的邋遢频遭冷眼和轻视。在一家火车站的茶座门口，售票小姐断定他们付不起款而拒绝入内。这位小姐肯定不会知道，某个国家的军官代表团正翘首以待在西安一家宾馆里，等待这几位被她不屑的人回去讲授一项新的兵器秘密哩。几位工程师们没有人计较这位茶座小姐，他们肯定改变不了她的

茶座入座“标准”，他们笑笑就够了。心怀海洋、天空和大地的人，怎么会计较一位承继并发扬着势利这种自古传留的市侩眼光呢！

令人腰杆挺硬的新型导弹发动机的总设计师余利风，为这颗“大弹”已经谋算了整整十三年。在这个家伙终于要试射的那一天，作为技术总指挥，他拒绝了隐蔽要求而把自己也摆了出去，就站在距发射现场百米远的地方。他说了一句这样的话：三分钟验证一生。成功了，不负此生；失败了，抱憾终生！

我正是在读到这里时发生情感涌动的，也正是在这种强大的冲击波中，我才意识到重新审视重新校验人生的必要性……

四

这本书的作者，许多是和被写的对象工作在同一个战线上的同志。这里用“战线”这个称呼应该是合宜的，他们研究的带有突破意义的各种新式武器和兵器，本身就是可视可闻爆炸的战斗，他们熟悉他们也理解他们。另有几位是陕西文坛颇具影响的中青年作家，徐剑铭、周矢、和谷、庞一川、阿莹等，他们同样以某种神圣的情感去探索默默地奋斗在这条战线上的人们。所有这些作品都具备一个共同的特质，就是不容置疑的真实和作家自己的真实情感的自然流泻，这两者都是令读者感动的不可或缺的因素。

几位作家都写到了被采写对象拒绝的尴尬。周矢和采访对象——新型重型反坦克导弹武器系统总设计师王兴治，为采访和拒绝采访发生了不愉快的误会。许多作者在接受采访任务去寻找采访对象时，几乎全都遭到婉拒碰上软钉子，于是不得不依赖被采访对象的同事、亲友和上司提供有关素材。他们坚辞和婉拒的理由大致有二：一是集体

创造成功的，不能宣传我个人；二是这是我应该做的本分工作，本来就应该做到做好，跟农民种地清洁工扫街道一样，职责内的事，不必宣传亦不宜张扬。

不完全是个人道德修养范畴的谦虚。

主要是一种以自信作底气的人生境界。

对于这些精英们来说，生命的意义就在于某项科研课题的完全突破，使这个民族和国家在这一领域具备发言权。他们的智慧和生理热能所完成的突破的意义，从心理上就会铸就一种自信，一种大气和一种大境界；而这种成就的科学上的艰辛和严峻性，也排斥那种一般意义上的宣传，更不要说腻人的哄炒了。

他们以为自己在某一项目所实现的突破，正是他们生命意义的实现，生存价值的实现，对于个人的宣传没有什么心理的需要，更不屑于商业操作的“星”们的炒作的需要了。他们明白自己干成了什么，这就够了。

然而对这些精英的宣传，主要是社会的需要，社会生活中需要注入这些人的那种精神和品质的光芒。让社会了解，这个民族还有这样一群精英在默默地完成着最重要的创造，昭示一种可以活血壮骨的民族精神。当然，我们并不指望那些偷窃国库去买官卖官者会因此而缩回手来，也不指望那些自我膨胀自吹牛皮的各类“星”们会因此而脸红。仅仅只是把这些真正的精英们的精神昭示给社会，作为校验人生的一个参照，就足以显示其意义了。

文章的最后，我又想到被世界瞩目的“飞豹”的总设计师陈一坚的一件难忘的往事。一九三七年，日本人轰炸福州，七岁的陈一坚和父

亲逃难到南平县，日本人的“零式”飞机又扫射轰炸到南平。陈一坚和一群人挤进一个防空洞里，被炸的土屑哗哗落下，一个吃奶的孩子吓得哭叫不止，无知的母亲看到众人惊恐的目光，一巴掌捂死了孩子……七岁的陈一坚目睹了这一惨景，同时也发出了中国人为什么不能造出自己的飞机去打日本的“零式”飞机的质问。许多年以后，陈一坚成为中国的“飞豹”之父。

陈一坚可以告慰那位被捂死的孩子和孩子的母亲了。一切创造过程的艰辛是可以不计的，关键在于最初的（七岁）心理动机和最后的结局的完美。

2000年5月7日 东方

致冷梦的一封信

冷梦：

大作《特别谍案》研讨会召开，谨致真诚的祝贺。原先说好了要去参加你的会，不是应酬，而是有感你于九十年代以来的创作实绩和埋头突进的精神。终因一个新近通知的会议，因为在海边，我想去看看大海，所以只能以书信表达我的祝贺和钦敬之意了。

在我的印象里，你是九十年代以后陕西文坛成就最突出的中青年作家之一，你的作品造成的广泛影响，已经超出了文学圈子，许多不搞文学而喜欢读书的人已经留意和关注你了，你开始走进文学存活的真正的土壤，这才是最值得庆贺的事。

我是在读完《百战将星》之后对你开始有点肃然起来。此前未读过你的作品，唯一的又十分之远的印象还是“文化大革命”当中，你我都作为市艺术馆辅导的工农兵业余作者。新时期的文坛没有听到你的声音，到九十年代再见到时，我已认不出你了，也认不出你的大作了。我自然会想到，你出山之前做着怎样的不动声色的磨炼与准备，功夫务到家，出手就不凡，出山来就成为一道独立的风景。我从你身上又一次验证了创作的一条无法更易的本质，作家凭作品和世界对话。造出什么成色的作品，评论家和读者是识得货的。你的《黄河大移民》获鲁迅文学奖，也证明了这一点。另：你近几年的创作以纪实文学为主，而且连续推出几大部，每一部都能保持一个比较高的艺术品位，确实是很不容易的。这方面积累的创作经验值得总结，这种不浮不躁潜心创作的精神才更像一个职业作家的风范。

说到这里，我就惭愧了。在你大放光彩的九十年代，我却进入艺术上的无为期，作家的帽子下，我已经不像个作家了。每每接到你捎来或送来的新的作品，我首先感到的是羡慕和空虚，很长时间不出作品，在我来说是难以言传的空虚，听作家评论家朋友评说自己的作品，无论说什么和怎么评说都是幸福的，基于一点，你的创造成果，使这么多同行朋友有话可说，是创作劳动给作家的最基本的幸福。祝研讨会成功，并问候所有参会的朋友。

2000年5月8日

一个堂堂正正的人

——致徐剑铭

剑铭：

您好，您写的关于陈盈朴创业之路的报告文学读过了。突然想到一句尽人皆知的俗话："说得好不如做得好。"依此推论，您的文章写得好，皆因陈盈朴干得好，事迹生动、质朴感人，使作家写作有了充分的可供开掘的原生素材，写起来得心应手，神思如涛，有如巧妇既有充足的米和花色多样的布，尽可以为炊、尽可以显示其剪裁的巧智。

陈盈朴原是一个基层干部，即公务员，下海不过七八年，已经创造出这样一番景象，真是令人叹为观止。如果用今天流行的关于寻找自我价值，即关于探寻自我发展的人生道路，陈盈朴经过多种职业选择之后，终于找到了最适宜自己生命特质和生命价值的最佳轨迹，不说如鱼之得水吧，也是截至目前的全部实践和一步又一步的成功可以佐证的。人们往往在纷繁复杂的生活面前举足难投，其实更困难的是自我判断中相影随的自我选择的举棋不定。以陈盈朴目下取得的业绩，自然可以看出他在面对生活现实和面对自我这两个世界的判断和选择中，选取了切实的途径，这是很不容易的。

陈盈朴的少年和青年时期苦难连连，这并不能作为成就大事业的根本原因，因为在极左的政策祸害人民的岁月里，因同样的因素而罹难而亡命的家庭和个人当是数以万计。陈盈朴的超人之处在于对苦难的态度，才是一个成就大事业者必不可少的难能可贵的素质。我很感

动于他的极富生活哲理的话："苦难是人生的财富，你要学会积累。有多少苦难积累，就有多少成功的阶梯。"把苦难当作成功的阶梯是一种博大胸怀，一种居高的人生境界。而把苦难变成其他东西，难免就有害于个人的发展了。苦难能够压迫以至摧毁一些人，而又能催生和成就一些人。除去一些客观因素之外，个体品行、个体特质所综合而成的独有的胸怀和素质，就注定了这个人卓尔不群的个性。在看取社会生活中的多种职业行当中的各种现象时，我的习惯更偏重于具体事和具体的人。因为就我的生活经验而言，在相似乃至相同的社会背景和生活现实面前，即使同一职业同一行当的个体差异也太大了。我因此而习惯于面对具体的东西说话，而不能亦不敢笼而统之地对什么新的现象表示南北和高下。无论如何，我对陈盈朴这种对待苦难的理性态度是十分赞赏的。我崇尚这种咬紧牙关踏过泥泞而不诉不哭的强悍角色。

陈盈朴另一个令我钦佩的素质是他的一身堂堂正气。无论他做基层干部，无论他下海经商，直到今天的最时髦的"老板"，他都是一身正气，堂堂正正做人，这是他成就事业的最基本，亦可贵之点。我们的社会生活在繁荣轻松的同时，也出现了纷繁和混沌，尤其是一些无论新老道德标准都不能纳许的欺诈和虚伪，却有行道和市场；官欲和物欲扭曲着灵魂，也颠覆着传统的和现代的做人的道德准则。陈盈朴在当今商海中的步步成功，正是这种道德颠覆的再颠覆，一种道德价值的肯定。堂堂正正做人，切切实实做事，终究向社会证明，成大事业的最根本一条，还在于堂堂正正做人这一点上。我尤其感佩的是，在他的事业已经发展到如此规模，仍然恪守商场道德和做人的道德，该当具备怎样的心理素质！翻过来想，恰恰是这一点，才造就了他的成功和发展。

您的文字，依然保持着鲜活和激情，可见您青春依旧，活力依旧。在你我这样的年岁，您能依旧保持这样的激情，也是令我感动和欣羡的事。因为读得兴起，随手写下最强烈的印象，不知准确否？祝愉快。

陈忠实

2000年6月10日 雍村

拒绝平庸

——答《刘琦之歌》作者的信

俊超、王荣、冠军同志:

你们好！

报告文学《刘琦之歌》读过，十分感动。我和刘琦相识多年，曾经到他创办的白鹿原中学生锻炼基地参观过，也是很受启发很受鼓舞的。但是，读了你们的这篇文章，才对刘琦有了全面的、深入的了解，惊讶刘琦几十年来为教育事业做了这么多的好事和大事。我对刘琦的钦敬之情油然而生，同时也为我的家乡灞桥区有这样一位热心教育事业的父母官而庆幸。

读罢你们生动丰富的叙述文章，我久久陷入一种回味和思索之中，企图捕捉对刘琦最本质的东西，就是他一以贯之永不止息的创造性的工作精神。创造性的工作是一种独立思维的精神、实事求是的精神、生动活泼的精神、拒绝平庸的精神。对于一个领导干部来说，是一种难能可贵的、当然也是应该大力倡扬的精神。

刘琦的创造性工作源自于他的事业心。无论他做中学教师，无论他做市教委教研室的干部，无论他在周至做县长助理，抑或在灞桥做分管教育的副区长，都显示出一种强烈的事业心。正是这种事业心的驱动，使他不甘于一般地完成任务，不甘于按照上级的布置照本下达，而是面对实际，面对自己在实际工作中发现的问题，提出切合实际的解决办法和措施。他在中学德育中选编增编的教材，正是他在调

查研究的切实基础上，富于独创性的举措。这种举措的产生和实施，以及在学生品质和政治思想教育中的良好效果，正是国家和民族教育事业的最需要的众所期待的效果。

强烈的事业心才产生强烈的责任心。那篇《夏令营中的较量》，曾经使多少有识之士产生过震撼和深层忧患，为新的现实中的教育的发展而思索，因为即使普通人也会想到民族的未来。正是在这样严峻的现实面前，刘琦主持创办了中学生锻炼基地。我们真切地感受到他的责任心。这种责任心已经再清楚不过地透视了他对民族和国家未来负责的崇高精神和使命感。

刘琦永不止息的工作激情，又是强烈的对教育事业的责任心自然产生的。他每到一地都要去学校走走，发现问题或困难，当即解决，即使他已离开分管教育的副区长的岗位，仍然保持着这种习惯性的作风与激情。去高家沟小学分校这件小事，尤为感人。这样的工作激情，弥足珍贵。

这样看来，我就可以以如下的公式来索解刘琦了：事业心产生责任心，责任心产生永不疲倦的工作激情，同时也产生生动活泼的举措和方法，于是就形成了一个富于创造精神和创造活力的领导干部全新的精神风貌。

新时期以来，整个民族达成一个共识，振兴教育，唯健全合理、科学化的教育，才是奠定民族未来的希望。我突然想到几年前在哈佛大学看到的一块碑文，那是在哈佛念书的中国留学生共同立下的纪念碑。那碑文里的令我至今不能忘记的宗旨，也是革新教育，是振兴民族和国家的根本性举措。在今天改革带来的长足发展的业绩中，教育的巨大功能已成为整个社会不争的事实。我自然衷心感佩教育战线上

的人们，也更感佩在基层区县做着最切实的教育工作的人们，尤其是刘琦这样富于创造精神的领导干部。我也因此受到关于生命价值的启示：一个人在他的生命历程中，为了自己喜爱的、热衷的事业而认真地工作一生，他的生命就获得了永生的价值，因为他与一个民族和国家复兴的大业紧紧地拥抱在一起。

祝愉快！

陈忠实

2000年7月7日 礼泉

卓尔不群这一株

依着习惯，新书到手先看目录。书省的《仁山智水》书稿捎过来时，单是那一个个别出心裁的篇名，直教人产生一连串的诧异和惊奇，自然就产生一种急切阅读的愿望。

这些篇名，当然不是时下报刊娱乐栏目里那些故弄玄虚热蒸现炒的无聊，而是切中昨天刚刚发生过和今天正在流行着的某些生活现象。面对这些生活现象，我也曾经困惑过，腻歪过，愤愤过，莫可奈何过，过去了的也就如同沙尘暴一样刮一阵就过去了，尚未过去的依然使人困惑、愤愤、腻歪、莫可奈何着。于是便想知晓同样遭遇过这些生活现象的张书省怎么看，怎么说，持何种姿态？阅读欲望自然就产生了，且愈趋强烈和急切。

很少有机会这样集中阅读如此教人痛快淋漓的杂文、随笔了。

《仁山智水》书稿阅读的最直接感受，几乎使我完全改变了对作家张书省的印象。

书省留给我始终如一的印象，面善如佛，慈颜善目，永远的那一缕沉静而又轻柔的微笑。是的，是这样自自然然坦坦诚诚的微笑。在西安这个城市的文化人圈子中，我认识书省大约十余年了，文化人的各种集会见面的机会不少，而真正属于少数朋友的聚餐大概只有一次。应该说，我与书省的这种朋友关系，是我的朋友中最普遍也最散淡的那一种，信赖着也敬重着。平时互不相扰，几乎没有那种频繁聚合杯盏交错的事，好久不见面了，偶然记起，打个电话问一声平安，便觉心和气畅，书省给我的印象就是在这种散淡如水的交情中留下

的。近年间偶尔在报刊上看到书省的短文，曾经为其中所露出的锋芒感到过惊诧，及至这次集中阅读，那曾经感觉到的锋芒完全被证实了。与其说是改变了原先的印象，毋宁说我对书省的了解深入了一层，所谓读文识人，亦理解人。

这本杂文集正着了“杂”的特色，大至国家政治、经济命脉中的腐败现实，更多的则是普遍的生活现象中的浮躁及至丑恶之点，常常是择其症结之所在的痛处痒处，一笔点出，使人读来顿觉痛快淋漓。面对种种丑恶的现实和不健康的社会心理，书省绝无含糊，鞭辟入里，层层剥来，直挤出疮脓，剜净腐肉，毫不留情。尤其是大量的、涉及国民性中不健康不健全的种种世态世相，切入奇妙，笔锋犀利，着笔点准确，读来令人惊叹。我看过的这些篇目，全是作家张书省的评时论世之作，没有一篇属于那种闲适文人的闲适散文。从我个人的爱好和倾向来说，我虽然也偶然欣赏一些闲适散文，然而以为最解馋的还是那些切中时弊，不绕弯不回避的真知灼见的文章。社会需要某些吟风弄月品茗论酒乃至欣赏丰臀肥乳的闲适文章，也更需要驳谬求真批歪取直有益于中国人心理卫生和心理健康的血性文章。作家面对国家复兴、民族复壮的重要历史时期，不可能全都陷入闲适，不可能都投入品茗论酒环肥燕瘦的情趣中，不可能面对生活的某些丑恶而无奈地闭上眼睛。直面现实既是中国传统文人的精神，也是鲁迅等现代作家的风骨，书省的杂文精神与此一脉相承。正是这种阅读感觉，才改变了，或者说纠正了我对书省的表层的印象。慈眉善目之下的张书省，内宇宙里尽是炽烈之焰，一腔堂堂正气，泻于笔底，落纸云烟。恰是这一品格，铸就了书省散文卓尔不群的特质，独立于浩如烟海的散文世界的这一株。

铸成书省散文卓尔不群的特质的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他独自操练的语言功夫。我每读到精彩之处，便掩卷咀嚼，品尝其味。说简洁明快生动幽默等等似乎都不能采到妙处，直觉是端庄不陷入呆板，严厉而不失之凛冽，幽默而不流于油滑。点睛之处或转折之时常有惊人的措辞跳出，使人意料不及，由不得惊叹、钦佩作家思维之敏捷，措辞恰到好处。书省语言的又一特质是简约，几乎挑不出陈词滥句，也绝无矫情娇性故作卖弄的废话，字字着力，句句蕴意，饱含智慧和灵气。书省语言的再一个特质，便是大量的富于表现张力的生活语言的掺入，尤其是那些富于生活气息和生活哲理的民间语汇的开掘和使用的和谐，大大地增加了语言的硬度和韧劲，增强了语言的活力和生动性。在我看来，语言的真正的灵气和优美正在于此，然而要达到这样不留雕琢和有意为之的痕迹，确是不易的。在杂文、随笔和散文中，书省的语言是我很少看到的、最具表现实力的语言。这种语言是属于张书省的，正和他的性情一致，没有云山雾罩花拳绣腿的张扬，只见水落石出月朗风清的简洁。作文达此一境界，正是人格修行境界的透视。

说着孤独的，恰恰是活得最热闹的。表着淡泊名利的，常是争得炒得不择手段的。宣言和招牌恰恰是一种生存方式的隐蔽，文坛上的这些花样和招数，自古有之，洋人那里也有，不足为奇。书省什么招牌和宣言都没有，却恰恰保持了一个作家的道德和良心，真应了一句谚语：真佛只说家常话。

2000年7月17日

文学活着

——答《三秦都市报》记者杜晓英问

记者：请问您对《三秦都市报》关于《青年文学博士“直谏”陕西作家》的系列报道怎么看待?

陈忠实：在贵报这个系列报道的两个多月时段里，我大部分时间不在西安，先是到大连参加笔会，回来后就到本省四个地市参加分片召开的省作协会员座谈会去了。我所看到的有关此次系列报道的文章，是搞资料的同志复印下来的，不太全。我的总体印象和看法也应坦诚相告，这是一场始料不及的，又是近几年来影响最广泛的一次关于陕西文学的讨论。

陕西文学界最具影响力的评论家的大多数和一些作家都说了话，参与了这场讨论，观点鲜明，甚至尖锐对立，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生动活泼的景象，使我感受到了文学批评本来应该具备的最基本的品格。因为在当今文坛（不仅陕西）最缺失的就是这种坦率或者说直言不讳的评论风气。尤其使我感动的是，这场纯粹属于文学话题的讨论，竟然引发了远离文学圈子的那么多读者的热烈反响，并参与了讨论，且不论他们的看法如何，单是他们对陕西文学的至诚的关注之情，就足以使我陡增信心，文学活着。读者才是文学作品存活的土壤。正是基于这样的感动，也同时给我以逼近鼻息的警示：我在对待自己的作品和评说别人的作品时，请想想千万个各种职业的读者正通过各种媒体在审视着我的话语，关键可能不是观点上的不能认同，恰恰在于自吹他吹或吹他所造成的虚假，将从根本上失去读者最起码的信赖和尊

重。在商潮迭浪明星争宠的当今媒体上，陕西有这么多的专家和读者在关注关怀着陕西文学，作为一位身在其中的作家，我又一次确凿地感到了创作这种劳动的意义，更加确信真正的文学依然神圣。

在这场生动活泼的讨论中，无论参与者发表了什么观点，甚至有些相左以至完全对立的看法，但都把握在严肃的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的话题以内，这是很难得的，对于建设一个良好的创作和评论的文坛语境，开了一个好头，恐怕也是引发专家和读者争相参与的关键所在。

记者：对李建军关于《白鹿原》里那个“头发”细节有“狭隘的民族意识”的批评，您怎么看?

陈忠实：初听到这个批评观点的时候，立即想到另一个细节。美国独立战争打响第一枪的地方，在波士顿郊区康克尔小镇旁一条小河的木桥上，那木桥就是闻名美国古今的北桥。桥头的地面上立着一块小小的碑石，是为被打死的英国士兵而立的，碑文内容大约是这样的：躺在这里的这个孩子的母亲正在家里盼望儿子归来。我在这块碑石旁曾有所触动，显然是美国人对被打败打死的英国士兵的人道主义情怀。两年后我在北京与两个年轻的美国男女交谈，谈到了这个令我难忘的生活细节。不料，那位男子却不屑地说，可在越南就做不出这样的事。我的心里受到了撞击。独立战争是美国人反对英国殖民者的战争，美国人又是胜利者，自然是理直而又气壮的，对被打死的入侵者以不无幽默的语调表示一掬人道情怀，既符合美国人的民族天性，也宣示了他们的人道精神，都不难做到的。然而在越南，美国人大致扮演了当年英国人在美国的角色，失败的结局虽然不像英国人当年在美国那么彻底，也成为当今美国千千万万个家庭无法消解的痛，他们的孩子或丈夫注定是无法回归了。美国人在越南就无法再立一块以幽

默语调表述人道主义情怀的碑石了。两百年后的美国人难道丧失了人道情怀又丧失了幽默天性?

朱先生对日本鬼子的那一撮头发表示的恶心，是朱先生心理与情感作用下自然的生理性反应，是作为作者的我对朱先生这个人物的精神气象和心理情绪的把握和判断，是否属于“狭隘的民族主义”，我当时就没有考虑，只求通过包括这个“头发”细节在内的无以数计的朱先生的细节描写，达到真正自然地创造艺术形象的目的。这里所要讨论的问题仅仅只应规范到朱先生这个人物身上，即：在“头发”这个细节上，陈忠实所描写的朱先生的“恶心”反应是否符合这个人物的心理真实？是朱先生这个人物的必然的反应，还是作者强加给他的、本来不属于他的败笔？我至今还在考虑这个细节的合理性。再退一步说，朱先生对“头发”细节的态度不能完全等同于作者本人的态度，比如朱先生在编县志时曾按官方口径把徐海东部称为“共匪”，随后又以笔误的哑谜更改为“共军”，是朱先生的政治判断的发展过程。同样的道理，不能把这个过程看成是陈忠实的政治判断的过程。

关于人道主义情怀这个话题，以及人道主义在中国作家创作中的意义，我以为是没有分歧的。

记者：作为一个作家，您理想的文学批评语境是什么样的?

陈忠实：简而言之，以纯粹的文学立场所建构的文学评论的语境。

纯粹的文学立场，就是面对作品，做出评论家自己的审美判断。评论家自己的艺术趣味的差异，对作品可能做出截然相反的评价，哪怕一个吹到天上，一个砸到地狱，我以为都是正常的。这是一个再普

通不过的常识，任何作品都不可能赢得所有评论家的审美标准和艺术趣味，而我只需听到纯粹出自文学意义上的声音就够了。对于具体到某一部作品的完全相反的评论，如果确实出自文学的立场，不应看成“捧杀”和“棒杀”，作为作家，我只是拣取其中对我未来创作有启迪、有警示意义的东西。

麻烦往往发生在离开了纯粹的文学立场的评论。可以称为非文学因素对于文学立场的骚扰，诸如商业化炒作和人情关系，都可能使评论家的批评立场发生位移，弄出一些脱离作品实际的昏事。此类事已经祸及整个文坛（不单陕西），也祸及读者，已是不争的事实。

坚守纯粹的文学立场的评论，就是坚守实事求是：对作品做出实事求是的评论，对于读者的阅读会发生启示，对作家总结自己创作的得与失也会起到良好的作用。如果是脱离了作品实际的评论，对读者对作者都会陷入一种误导的盲区，尤其是对正在艰苦探索中的青年作家，可能因此而发生对自己创作的错误总结，延缓以至贻误他们艺术突破的进程。对作家尤其是评论家，可能丧失读者最基本的信赖和尊重。

我仍然认为，对作家，尤其是青年作家，最有益的评论是实事求是的评论，但对他们多看长处，说足优势，尤其是处于创作中重要突破关口的青年作家，可以说至关重要。关键的分野在于，长处和优势是作品本身所已具备的，符合作品实际的，本质上是区别于商业目的的炒作的。

作家和评论家一起争取纯洁的文学立场的坚守，媒体也应以此为约律，构建真正的文学评论的语境，是我的期待。

2000年末

说税

问：小说《白鹿原》中有过关于农民抗粮的描写，请谈一下，从历史角度如何认识关于税的问题?

答：习作《白鹿原》里至少有三处写到农民抗税抗粮的斗争，这在小说的总体创作构想中都是作为重大事件设置的。白鹿原是一个农业社会，那里生活着从二十世纪初到二十世纪中叶的一个农民宗族群体，这个以家庭维系的群体的生存形态和社会结构形态里，税和捐成为影响那个社会结构的稳定性和生存形态的一种最重大因素。当然，还有政治因素和自然环境的因素。

中国长期的封建制度的统治，无论王朝如何更迭新老皇帝如何承继，唯一不变的是人治的本质。这种人治的政权性质决定着整个社会结构和社会生活的运转，最大的不稳定性概出于人治这个最大的孽根。税收在根本上就是人治的最重要的体现表征。

从来没有关于税收的铁定的法律，收什么税和如何收税，都是皇帝一句话来定乾坤。皇帝开明了，减轻税赋休养生息，农业就发展，农民的日子相对地就好过了。如果新继位一个混账皇帝，加重税赋和徭役，整个天下的农民就开始倒霉。同样是一句话。这“一句话”就是“猛于虎”的苛政，足以使一个王朝由兴旺繁荣跌入田园荒芜民不聊生，打碎农民饭碗从而引发暴动造反的集体性叛逆行为，引起整个社会生活动荡社会结构混乱无序以至到重建，都是税赋的随意性直接造成的结果。白鹿原是这个大国家里的一个小小的角落，无论怎样小，同样是这种延续了两千余年的封建帝国人治下的一方小小的社会，不

可能独自摆脱人治的大环境而成为“世外桃源”，直接影响这个小小社会的老少男女生存利害的自然是经济。引发原上社会大动荡的几次风潮的直接诱因，均为随意性的税收，导致了原上乡民与当权者的对抗和反叛。作品里的第一个大事件，即是新任县长不择手段搜刮乡民掠夺乡民，以土地重新登记为名而设的“印章税”，很快导致了罢种罢工的“交农事件”。这是农民以传统的“鸡毛传帖”串通联合反抗的形式，当然属于自发的斗争，引起了整个原上社会生活的大动荡。第二个有关税收的事件，是军阀混战直接殃祸原上乡民的生存，也是以随意摊派粮食的行为造成的，农民在强权下不敢不缴纳，结果却把缴纳的心爱的粮食烧掉了。前一种“交农事件”是地方行政长官的恶行造成的。这一次是军阀强权造成的，而到《白》书末尾部分的最重大事件，即拉壮丁和各种名目的税捐，则是国民党统治的国家机器向农民更为随意到疯狂的丧失全部理性的掠夺，从根本上造成了国民党政权与民众的对立，导致了政权的最后灭亡。

从历史角度看，税收的法律和任何其他法律一样，是衡量一个社会进步的重要标志，也是保证社会稳定、进步、发展的重要手段。中国农民对合理的税收从不抗拒，甚至民间长久留传一句民谣：“谁当皇帝都纳粮。”问题就出在没有法律保证而造成的那个随意性上。所以，由人治而进步到法治的社会，税收的法律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组成部分和表现表征。

问：您在美国作过访问，请谈一下有关税收与文明的话题。

答：我在美国访问，是应那里的华人作家协会邀请的，主要活动当然是文学范畴里的交流。对于美国的税收制度根本没有了解和探讨，只是在那里的生活中碰到和听到的点点滴滴有关税收的颇为新鲜的事情。

在美国的超市和专卖店里买东西，不仅经营者要向国家纳税，买东西的消费者也要同步同时纳税，正应了中国人的一句俗话："一个萝卜两头切。"

真真正正两头切，这是美国政府的法律铁定了的两头都要动刀切。我到一家家用电器专卖店买一台收、录、放三功能的录音机，每台大约八十美金，被征税收近十美元。选好物品，到出口处交款的时候，收款员交给我两张票据，一张是买取录音机的发票，一张是收税的单据，我持着这个税单，心里觉得挺新鲜，心里直冒出被切了的萝卜的感觉。后来再去买什么东西，心里就有了被切的准备，问了物品价格，再算一下相应的税款。

陪同我购物的美国朋友解释说，美国很富有，但也有不少贫民，需要社会救助，凡失业或没有工作的人和家庭，即家庭收入达不到某个基准线的，就可以向政府申请救济，一经批准，每人每月可领取三百至五百美金的生活费。这些钱从哪里来？就是税收。包括所有商品的营销者和消费者都要缴纳的税金，小到几美金的小物品都不能免税，商品价格越高，税金越高。这种税收法律的理论根据，据说是作为调节社会贫富的一种手段。

我也想了，如果这个理论确实是税法的立法基础，说是一种调节，当然也是，它有一个最基本的功能，就是保证了失业者或过低家庭收入者有一个温饱的生活。按照固定的救济金收入，安排一家人的吃饭和穿衣，这里头有一点很重要的功能，就是这种救济贫困家庭的行为已经转化为一种社会的功能，而不是个人的施舍行善的行为；领取救济金者面对的是政府，而不是面对某个施舍行善者个人，被救济者就免除了对施舍者个人的感恩戴德的那种卑怯心理，而多了一份对

社会和政府的自信，用这救济金吃起来穿起来都会从容自信一些，对整个社会和民族的自尊会有一种建树。

以上当然只是诸项功能中的一种，更重要的是美国的庞大的税收整个支撑着一个强大的帝国，包括各种健全的社会公益设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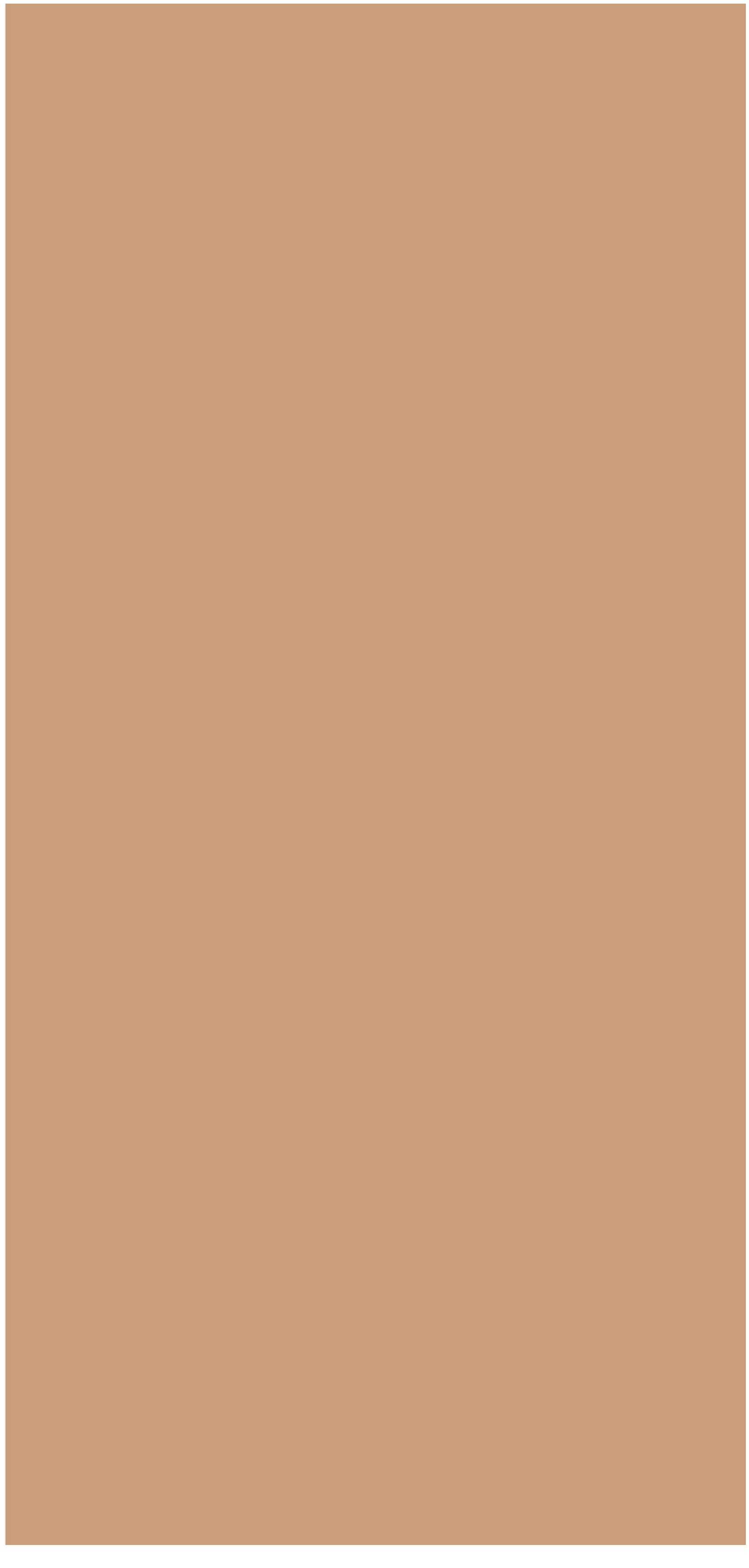
关于个人收入，要缴纳个人所得税，包括工资在内的所有收入。收入低的人，即在一个基准线下的人可以申请免税。获得免税的人不许购买汽车，更不许贷款买房，而且还有一些社会福利方面的诸多限制。作为一个有正当职业收入的人，无车无房是很难长期生活下去的，所以如不是万般无奈，逃税不是明智之举。倒是努力开辟财源，多渠道争取多多收入以争取缴税，然后才能有资格买车购房获得在那种富裕社会里的基本生活条件。

美国的高速公路四通八达，行车畅通无阻。无阻不是说不塞车，而是无交费之阻。据说美国是世界上唯一一个高速公路不收费的国家。后来得知，费还是收的，不过不是在某个管辖路段设卡收缴，而是让加油站代收。什么型号的汽车每公里耗油是有定数的，在加油交款时也就交纳了过路费，政府从加油站按汽油销量提取出来就完了。这样就免去了汽车行驶中受卡交费的麻烦。

当然，这一切都需要有一套严密的监督措施，而且还有人的税法自觉和职业道德作保证。

2000年冬

（本文为答《税务》杂志问。）



第 1 卷　1978—1982

第 2 卷　1983—1984

第 3 卷　1985—1986

第 4 卷　　白鹿原

第 5 卷　1987—1994

第 6 卷　1995—2000

第 7 卷　2001—2003

第 8 卷　2004—2006

第 9 卷　2007—200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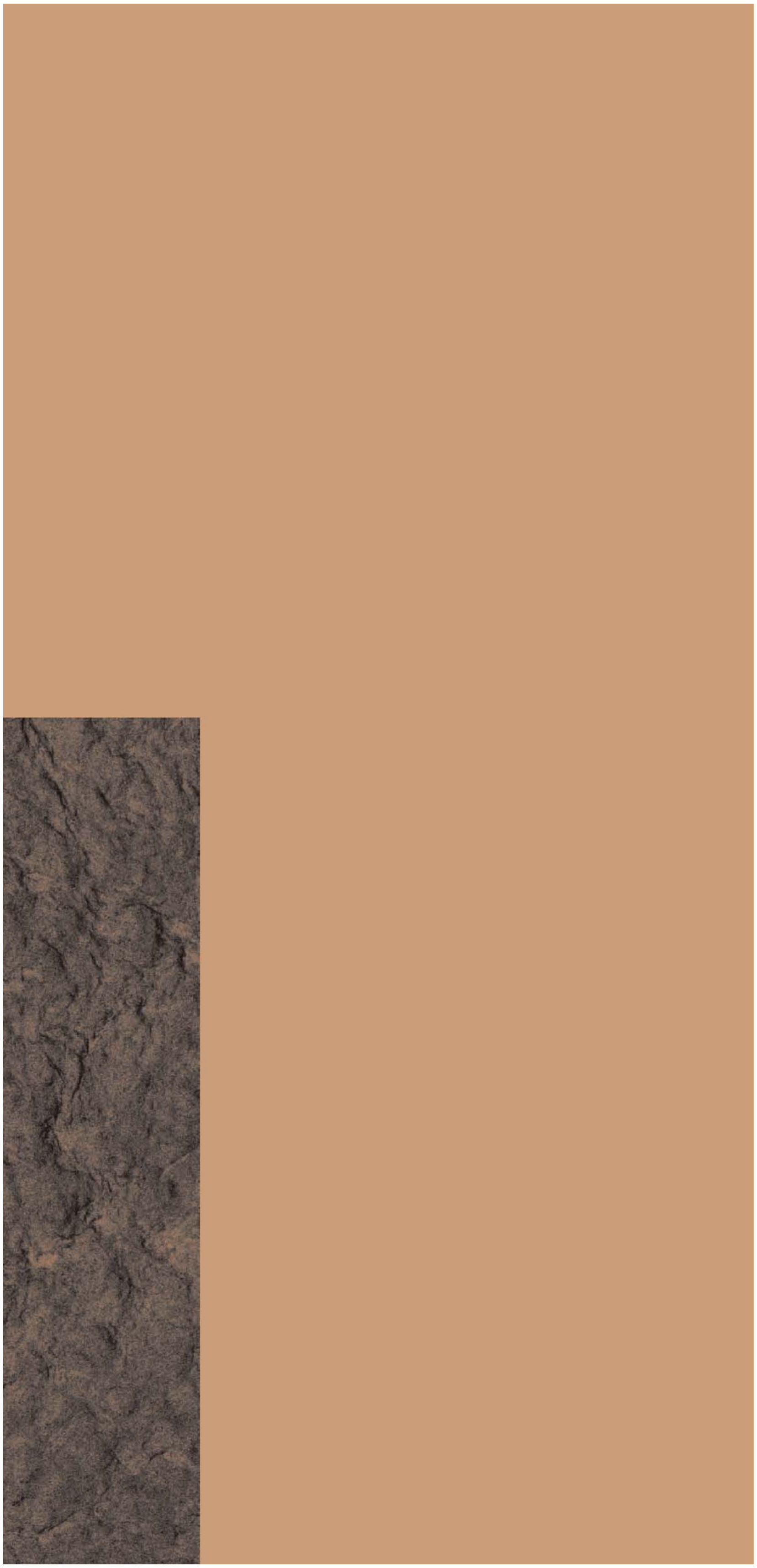
第 10 卷　2010—2015

第7卷
2001—2003

陈忠实文集

增订本

人民文学出版社



陈忠实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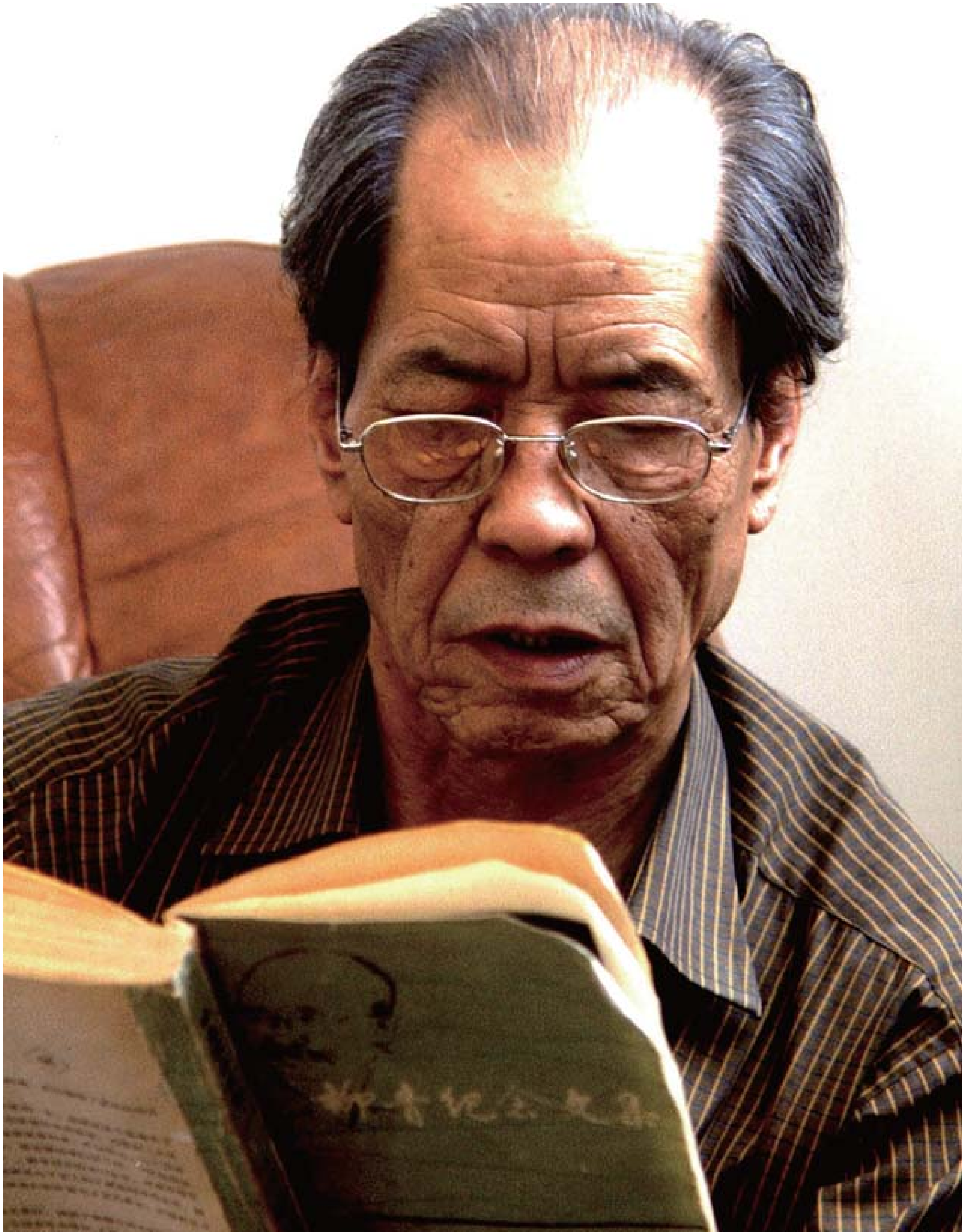
增订本

第 7 卷

2001—2003

人民文学出版社

文前插图



- 小说
  - 日子
    - 一
    - 二
    - 三
    - 四
  - 作家和他的弟弟
  - 一个虚脱症患者的发言片段
  - 腊月的故事
    - 一
    - 二
    - 三
    - 四
  - 猫与鼠，也缠绵
  - 关于沙娜
- 散文·随笔
  - 何谓益友
    - 一
    - 二
    - 三
    - 四
    - 五
  - 足球与城市
  - 家有斑鸠
  - 麦饭
  - 白鸽向我飞来

- 搅团
- 关于皇帝
- 种菊小记
- 成熟的征象
- 再会棕榈
- 再说死亡
- 火晶柿子
- 最初的操练
- 三九的雨
- 称呼柯老
- 与军徽擦肩而过
- 漕渠三月三
    - 一
    - 二
    - 三
    - 四
- 寄语中国队
- 滑铁卢·麦城·蹉尿臊
- 遛了一回之后
- 细腻了的英国人
- 我们那西下子……
- 惨烈的场面与蒸红苕的技巧
- 失败亦可正名
- 桑巴和桑巴之外的魅力
- 遇合燕子，还有麻雀
- 六十岁说
- 在乌镇

- 走进一个美国家庭
- “非典”不是虎烈拉
- 黄帝陵，不可言说
- 回嚼永恒的美好
- 活着，只相信诚实
- 为城墙洗唾
- 重新解读《家》，一个时代的标志
- 黏面的滑稽
- 遥远的猜想
- 孔雀该飞何处
- 原下的日子
  - 一
  - 二
  - 三
  - 四
- 乡谚一例
- 也说乡土情结
- 言论·对话
  - 大地的精灵
  - 《城市尖叫》阅读笔记
    - 一
    - 二
    - 三
    - 四
    - 五
  - 乡村，喧哗与骚动
    - 一

    - 二
    - 三
- 生命的审视和哲思
    - 一
    - 二
    - 三
    - 四
    - 五
- 生命跃进的足音
- 互相拥挤 志在天空
- 诗性的质地
- 把智慧投入到写作中
- 惹眼的《秦之声》
- 文学对科学的解读
- 烛照人类心灵不灭的神光
- 成熟与智慧
- 生命质量的升华
- 第一声鸣叫
- 温馨的记忆与陌生的熟识
- “文学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主题词”
- 激扬的膜拜
    - 一
    - 二
    - 三
    - 四
    - 五
    - 六

- 关于四十五年的答问
- 文学的信念与理想
- 聆听耿翔
  - 一
  - 二
  - 三
  - 四
- 关注人类命运的力作
- 关于《走向混沌》的通信
- 解读一种人生姿态
  - 一
  - 二
  - 三
  - 四
  - 五
- 自在的抒写
- 阳光明媚
- 致西部作家研究中心的信
- 多重交叉的舞蹈
- 功夫还得在诗内
- 在自我反省中寻求艺术突破
- 秦岭南边的世界
  - 关于一座房子的记忆
  - 关于《山祭》《水葬》的解读
  - 关于一个作家的理解
- 位卑位尊都躬行
- 土壕、讲坛和稿纸上的舞蹈

- 民间关中
- 多重视角 独自体验
- 三题《一路走来》
  - 关于阅读的可靠性
  - 关于饥饿
  - 关于对灾难的承受力
- 你的句子已灿灿发亮
- 探索·归结·展示
- 生活的脉象，我的脉象
- 《原下的日子》后记
- 背离共性，自成风景

小说

日子

一

发源地周边的山势和地形，锁定了滋水向西的流向。那些初来乍到的外地人，在这条清秀的倒淌河面前，常常发生方向性迷乱。

在河堤与流水之间的沙滩上，枯干的茅草上积了一层黄土尘灰，好久好久没有降过雨了。北方早春几乎年年都是这种缺雨多尘的景象。

两架罗筛，用木制三脚架撑住，斜立在淘挖出湿漉漉沙石的大坑里。男人一把镢头一把铁锨，女人也使用一把镢头一把铁锨；男人有两只铁丝编织的铁笼和一根水担，女人也配备着两只铁丝编成的铁笼和一根水担。

铁镢用来刨挖沉积的沙石。

铁锨用来铲起刨挖松散的沙石，抛掷到罗网上。石头从罗网的正面“哗啦啦”响着滚落下来，细沙则透过罗网隔离到罗网的背面。

罗网成为男人和女人劳动成果的关键。

铁丝编织的笼筐是用来装石头的。

水担是用来挑担装着石头的铁笼的。

从罗网上筛落下来的石头堆积多了，用铁锨装进铁笼，用水担的铁钩钩住铁笼的木梁，挑在肩上，走出沙坑，倒在十余米外的干沙滩上。

男人重复着这种劳作工序。

女人也重复着这种劳作工序。

他们重复着的劳动已经十六七年了。

他们仍然劲头十足地重复着这种劳动。

从来不说风霜雨雪什么的。

干旱的冬季和早春时节的滋水是水量最稳定的季节，也是水质最清纯的季节，清纯到可以看见水底卵石上悠悠摆动的絮状水草。水流上架着一道歪歪扭扭的木桥。一个青年男子穿着军大衣在收取过桥费，每人每次五毛。

我常常走过小木桥，走到这一对刨挖着沙石的夫妇跟前。我重新回到乡下的第一天，走到我的滋水河边就发现了河对面的这一对夫妇。就我目力所及，上游和下游的沙滩上，支着罗网埋头这种劳作的再没有第三个人了。

在我的这一岸的右边河湾里，有一家机械采石场，悬空的输送带上倾泻着石头，发出震耳挠心的响声。

沙坑里，有一个大号热水瓶，红色塑料皮已经褪色，一只多处脱落了搪瓷的搪瓷缸子。

二

早春中午的太阳已见热力，晒得人脸上烫烫的，却很舒服。

“你该到城里找个营生干，”我说，“你是高中生，该当……”

“找过。也干过。干不成。”男人说。

“一家干不成，再换一家嘛！”我说。

“换过不下五家主儿，还是干不成。”女人说。

“工作不合适？没找到合适的？”我问。

“有的干了不给钱，白干了。有的把人当狗使，呼来喝去没个正性。受不了啊！”他说。

“那是个硬熊。想挣人家钱，还不受人家白眼。”她说。

“不是硬熊软熊的事。出力挣钱又不是吃舍饭。”他说。

“凭这话，老陈就能听出来你是个硬熊。”女人说，“他爷是个硬熊。他爸是个硬熊。他还是个不会拐弯的硬熊——种系的事。”

“中国现时啥都不缺，就缺硬熊。”他说。

“弓硬断弦。人硬了……没好下场。”她说。

“这话倒对。俺爷被土匪绑在明柱上，一刀一刀割，割一刀问一声，直到割死也不说银圆在哪面墙缝里藏着。俺爸被斗了三天两夜，不给吃不给喝不准眨眼睡觉直到昏死，还是不承认‘反党’……我不算硬。”

“你已经硬到只能挖石头咧！你再硬就没活路了。硬熊——”

“唤！好腰——”

我看见男人停住了劳作，一只手叉在腰间，另一只手拄着铁锨木把儿，两眼专注地瞅着河的上方。我转过头，看见木桥上走着一位女子。女子穿一件鲜红的紧身上衣，束腰绷臀，许是恐惧那座窄窄的独板桥，一步一扭，腰扭着，臀也扭着，一个S身段生动地展示在凌水而架的小木桥上。

“腰真好。好腰。”男人欣赏着。

“流氓！”女人骂了一句，又加一句，“流氓！”

那个被男人赞赏着被女人妒忌着的好腰的女子已经走过木桥，坐上男友摩托车的后座，“呜噜噜”响着驰上河堤，眨眼就消失了。

“好腰就是好腰。人家腰好就是腰好。”男人说，“我说人家腰好，咋算流氓？”

“好人就不看女人腰粗腰细腰软腰硬。流氓才贼溜溜眼光看女人腰……”

“哈呀！我当初瞅中你就是你的腰好。”男人嘻嘻哈哈起来，“我当初就是迷上你的好腰才给你写恋爱信的。我先说你是全乡第一腰，后

来又说中国第一腰，你当时听得美死了，这会儿却骂我流氓。”

女人羞羞地笑着。

男人顺着话茬说下去。他首先不是被她的脸蛋儿而是被她的腰迷得无法解脱。他很坦率又步入迷津地悄声对我说，他也搞不清自己为什么偏偏注意女人的腰，一定要娶一个腰好的媳妇，脸蛋嘛，倒在其次，能看过去就行了。

他大声慨叹着，不无讨好女人的意思：“农村太苦太累，再好的腰都给糟践了。”

男人把堆积在罗网下的石子铲进笼里，用水担挑起来，走上沙坑的斜坡，木质水担“吱呀吱呀”响着，把笼里的石头倒在石堆上。折身返回来，再装再挑。

女人对我说：“他见了你话就多了。嘎杂子话儿也出来了。他跟我在这儿，整晌整晌不说一句话。猛不丁撂出一句，‘日他妈的！’我问他你日谁家妈哩。他说，‘谁家妈咱也不敢日，干乏了干烦了撒口气嘛！’”

男人朝我笑笑，不辩白也不搭话。

三

“把县委书记逮了。”

“哪个县的县委书记？”

“我妹子那个县的。”

“你怎么知道？”

“我晌午听广播听见的。”

“犯了啥事？”

“说是卖官得了十万。”

我已不太惊奇，淡淡地问：“就这事？还有其他事没有？”

“广播上只说了卖官得钱的事。”男人说，“过年时我到我妹子家去给外甥送灯笼，听人说这书记被‘双规’了。当时我还没听过‘双规’这名词。我妹家来的亲戚都在说这书记被‘双规’的事，瞎事多多了。广播上只说了受贿卖官一件事。”

“老百姓早都传说他的事了？”

“我给你说一件吧。县里开三级干部会，讨论落实全县五年发展规划。书记做报告。报告完了分组讨论，让村、乡、县各部门头头脑脑落实五年计划。书记做完报告没吃饭就坐汽车走了，说是要谈‘引资’去了。村上的头头脑脑乡上的头头脑脑县上各部局的头头脑脑都在讨论书记五年计划的报告。谁也没料到，书记钻进城里一家三星宾馆，打麻将。打了三天三夜。第三天后晌回到县里三干会上来做总结报告，眼睛都红了肿了，说是跟外商谈‘引资’急得睡不着觉……”

“有这种事呀？”

“我妹子那个县的人都当笑话说哩。你想想，报告念完饭都不吃就去打麻将。住在三星宾馆，打得乏了还有小姐给搓背洗澡按摩。听说‘双规’时，从他的皮包里搜出来的净是安全套儿壮阳药。想指望这号书记搞五年计划，能搞个㞗……”

“你生那个气弄啥？”女人这时开了口。

“我听了生气，说了也生气。我知道生气啥也不顶。”

“那就甭说。”

“广播都说了，我说说怕啥。”

“广播上的人说是挣说的钱哩，你说是白说，没人给你一分钱。”

“你看看这人……”

“书记打麻将，你跟我靠捞石头挣钱；书记不打麻将不搞小姐，咱还是靠淘沙子捞石头过日子。你管人家做啥？”

男人翻翻白眼，一时倒被女人顶得说不上话来。闷了片刻，终于找到一个反驳的话头：“你呀你，我说啥事你都觉得没意思。只有……只有我说哪个女人腰好，你就急了躁了。”

“往后你再说谁的腰好我也不理识你了，”女人说，“我只操心自家的日子。”

“你以为我还指望那号书记领咱奔‘小康’吗？哈！他能把人领到麻将场里去。”男人说，“我从早到黑从年头到年尾都守在这沙滩上淘石头，还不是过日子嘛！我当然知道，那个书记打麻将与咱㞗不相干，

人家就不打麻将还与咱㞎不相干喀！他被逮了与咱㞎不相干，不逮也㞎不相干喀！”

“咱靠淘挖石头过日子哩！”女人说。

“我早都清白，石头才是咱爷。”男人说。

听着两口子无遮无掩的拌嘴，我心里的感觉真是好极了。男人他妹家所在县的那个浪荡书记，不过是中国反腐风暴中荡除的一片败叶，小巫一个。我更感兴趣的，或者说更令我动心的，或者说最容易引发我心灵深层最敏感的那根神经的，其实是这两口子的拌嘴。

他们两口子拌嘴的话所涉及的内容和范围，我都不大在意。我只是想听一听本世纪第一个春天我的家乡的人怎样说话，一个高考落榜的男人和一个曾经有过好腰的女人组成的近二十年的夫妻现在进行时的拌嘴的话。我也只是到现在终于明白，我频频地走到河滩走过小木桥来到这两口子劳动现场的目的，就在于此，仅在于此。我头一次来到他俩的罗网前是盲目的，两回三回也仍然朦胧含糊，现在变得明白而又单纯了：看这一对中年夫妻日常怎样拌嘴。

“呃！这书记而今在劳改窑的日子可怎么过呀！”男人说。

“你看你这人！老陈你看他这人——就是个这！”女人说，“刚才还气呼呼地骂人家哩，这会儿又操心人家在劳改窑里受苦哩！”

“享惯了福的人呀！前呼后拥的，提包跟脚的，送钱送礼的，洗澡搓背的，问寒问暖的，拉马坠镫的，这会儿全跑得不见人影了。而今在号子里两个蒸馍一碗熬白菜，背砖拉车可怎么受得了？”男人说。

“你是闲（咸）吃萝卜淡操心。”女人说。

“他这阵儿连我都不如。我在这河滩想多干就多干想少干就少干不想干了就坐下抽烟喝水，运气好时还能碰见一个腰好的女子过河，还能看上两眼。他这阵儿可惨了，干不动得干不想干也得干，公安警卫拿着电棍在尻子后头伺候着哩！享惯了福的人再去受苦，那可比没享过福只受过苦的人要难熬得多吧？”

没有人回答他的发问。我没有。他的她也没有。他突然自问自答——

“我说嘛人是个贱货！贱——货！”

……

太阳沉到西原头的这一瞬，即将沉落下去的短暂的这一瞬，真是奇妙无比景象绚烂的一瞬。泛着嫩黄的杨柳林带在这一瞬里染成橘红了。河岸边刚刚现出绿色的草坨子也被染成橘黄色了。小木桥上的男人和女人被这瞬间的霞光涂抹得模糊了，男女莫辨了。

四

应办了几件公务，再回到滋水河川的时候，小麦已经吐穗了。

我有点急迫地赶回乡下老家来，就是想感受小麦吐穗扬花这个季节的气象。我前五十年年年都是在乡村度过这个一年中最美好、最动人的季节的。我大约有七八年没有感受小麦吐穗扬花时节滋水河川和白鹿原坡的风姿和韵致了。

太阳又沉下西原的平顶了。河堤和石坝的丁字拐弯的水潭里，有三个半大小子在游泳戏水。我看见对岸的沙滩上支撑着一架罗网。女

人正挥动铁锨朝罗网上抛掷着沙石。石头撞击的“刷啦刷啦”的声音时断时续，缺乏热烈，有点单调。

男人呢?

那个尤其喜欢欣赏女人好腰又被嗔骂为流氓兼硬熊的男人呢?

我脱了鞋袜，涉过浅浅的河水。水还是有点凉，河心的石头滑溜溜的。我走到她的罗网前的沙梁上，点燃一支烟。

“那位硬熊呢？”

“没来。”

我便把通常能想到的诸如病啦、走亲戚啦、出门办事啦这些因由一一询问。她只有一个字回答：没。

我就自觉不再发问了。她的脸色不悦。我随即猜想到通常能想到的诸如吵架啦与邻居村人闹仗啦亲戚家里出事啦等等这些令人烦心丧气的事，然而我不敢再问。

她轻轻叹了一口气。

我还是决定发问：“咋咧？出什么事了？”

她停住手中的铁锨，重重地深深地吁出一口气：“女子考试没考好。”

“就为这事？”我也舒了一口气，“这回没考好，下回再争取考好嘛！”

她苦笑一下：“这回考试不是普通考试。是分班考试。考好可进重点班，考得不好就分到普通班里。分到普通班里就没希望咧。”

这是我万万没有料想到的事。

她这时话多了：“女子自个儿不敢给她爸说。

“他听了就浑身都软了，连镢头铁锨都举不起来了。

“他在炕上躺了三天了，只喝水不吃饭，整夜整夜不眨眼不睡觉，光叹气不说话。我劝了千句万句，他还是一句不吭。”

“女子在哪儿念书？高中还是初中？”

“县中。念高一。这学期分出重点班。”

我也经历过孩子念书的事。我也能掂出重点班的分量。但我还是没有估计到这样严重的心理挫败。

她伤心地说：“这娃娃也是……平时学得挺好的，考试分数也总排前头，偏偏到分班的节骨眼上，一考就考……

“直到昨日晚上他才说了一句话：‘我现在还捞石头做啥！我还捞这石头做啥……’”

“你不是说他是个硬熊吗？这么一点挫折就软塌下来了？”我说。

“他遇见啥事都硬，就是在娃儿们上学念书的事上心太重。他高考考大学差一点分数没上成，指望娃儿们能……

“他常说，只要娃儿们能考大学，他准备把这沙滩翻个个儿……

“他现时说他还捞这石头做啥哩！”

“我去跟他说说话儿能不能行？”我问。

“你甭去，没用。”

我自然知道一个农民家庭一对农民夫妇对儿女的企盼，一个从柴门土炕走进大学门楼的孩子对于父母的意义。我的心里也沉沉的了。

“他来了！天哪！他自个儿来了！”

我听见女人的叫声，也看见她随着颤颤的叫声涌出的眼泪。

我随即看见他正向这边的沙梁走来。

他的肩头背着罗网，扛着镢头铁锨，另一只肩头挑着担子，两只铁丝编织的笼吊在水担的铁钩上。

他对我淡淡地笑笑。

他开始支撑罗网。

“天都快黑咧，你还来做啥！”她说。

“挖一担算一担嘛。”他说。

我想和他说话，尚未张口，被他示意止住。

“不说了。”他对我说。

女人也想对他说什么，同样被他止住了。

“不说了。”他对她说。

“再不说了。”他对所有人也对自己说。

“不说了。”他又说了一遍。

我坐在沙梁上，心里有点酸酸的。

许久，他都不说话。镢头刨挖沙层在石头上撞击出刺耳的噪声，偶尔迸出一粒火星。

许久，他直起腰来，平静地说：

“大不了给女子在这沙滩上再撑一架罗网喀！”

我的心里猛然一颤。

我看见女人缓缓地丢弃了铁锨。我看着她软软地瘫坐在湿漉漉的沙坑里。我看见她双手捂住眼睛垂下头。我听见一声压抑着的抽泣。

我的眼睛模糊了。

2001年5月12日 原下

作家和他的弟弟

我曾在一部小说里说过，昼伏夜出几乎是世界上各路盗贼共有的生活习性。仅就这个习性而言，作家类同于盗贼，只是夜出工作的性质与之相去甚远罢了。这篇小说记述的作家就是一个顽固地遵循着昼伏夜出规律的人。他沉静而又疯狂地写作一夜，天色微曙时伸着懒腰打着呵欠躺到床上，直到午后才醒来。

在作家睡眠的这段时间里，最恐惧的事就是来人。来人太多了，多到一般人不可想象的程度。作家因一部小说以及由小说改编的电影爆炸，就出现了这种寻访如潮的情形。作家自然沉浸在热心者好奇者研究者的不断重复着的问询的愉悦之中，多了久了也就有点烦。烦就烦在心里，外表上不敢马虎也不敢流露出来，怕人说成名了就拿架子摆臭谱儿脱离群众了。然而作家还想写作，还想读书，即使不写不读，仅仅只想一个人坐下来抽支烟品一杯咖啡。于是作家终于下定决心，在白天睡觉的这段时间里，拔掉电话插头，拉下了门铃的闸刀，在门板上贴一张粗笔正楷的告示：如若不是发生地震，请手下留情，下午三时后敲门。作家往往最容易在语言上出错，仅这条告示而言，就存在严重的错误，因为地震如果真的发生时，即使是四五级的中震，作家就会自己冲出门来的，任何人都不必敲门了。无论如何，这条幽默而又严峻的告示确实制止了无数只已经举起或蠢蠢欲举的手，保证了作家的睡眠。

大约十二时许，作家正沉入深睡状态，有人敲门。轻敲时作家没有听见。作家被惊醒时的敲门声，已不是敲而是捶，真如发生了失火

或地震一类灾难似的。任谁都可以感同身受地去想象作家的不快甚至恼恨了：一个通夜写作而刚刚睡了三四个小时的人多么需要休息啊！

作家是聪明人。敢于无视告示而如此用劲儿捶打门板的人，肯定是有重大事由的人，所以也就不敢恼怒，甚至怀着忐忑的心情赶紧拉开门闩。站在门口的，是弟弟。二弟。

作家的第一个心理反应是：这个货又来了。

作家连“你来了”一类客套话都不说，就转身走进客厅。弟弟也不计较哥哥的脸热脸冷，尾随着进入客厅，不用让坐就坐到沙发上了，把肩头挎着的早已过时的那种仿军用黄色帆布挎包放到屁股旁边的沙发上，顺手从茶几上的烟盒里抽出一支烟来点着了。美滋滋地吐出一条喇叭状的烟雾之后，弟弟笑嘻嘻地说：“哥，我想你了。”

作家还没有从睡眠的恍惚里转折过来，木木的脑子里却反应出：你是想我的钱了。其实早在开开门看见弟弟的那一瞬，他首先就想到了自己腰里的钱包。这已经是惯常性的心理反应了。没有办法，他的兄弟姊妹全都生活在尚未脱贫的山区。已经给许多人提供了发展机会的社会环境是前所未有的，然而他的兄弟姊妹没有一个能够应运而出，连一个小暴发主儿都没有，更没有一个能通过读书的渠道进入城市的。他们依然贫穷。他们自觉不自觉地把骄傲的心理和依赖的眼光都倾斜到作家哥哥身上来了。作家是兄弟姊妹中唯一一个走出山沟走进省会城市的出类拔萃者，而且不是一般地进入城市谋得一份普通的社会工作，而是一步步打进文坛，且走出潼关响亮全国文坛的佼佼者。作家自己有时候也纳闷：同是一母一父所生的兄弟姊妹，智商为何有如此悬殊的差别，以至怀疑自己是不是父亲的血缘……现在，作家最揪心的是，兜里没有多少钱，怎么打发这个货出门呢？小说作品

走红了，由小说改编的电影更红火，然而作家的稿酬收入却少得羞于启齿，即使启齿说给兄弟姊妹，兄弟姊妹也不信。

弟弟喝了口水就坦然直言：“哥，你甭怕也甭烦，我不要你的钱。我知道你名声大，钱可不多。你是个名声很大的穷光蛋。你给我钱我也不要。”

作家不由一愣，有点摸不着头脑了。

弟弟更坦率了：“我想搞一个运输公司。先买一辆公共汽车，搞长途客运，发展到三辆以上就可以申报公司了。”

作家吃惊地瞅着眉色飞扬的弟弟，半天才回过神来，我们家里终于要出一个“万元户”了哇。

“你想想你能有多少钱给我？你把我大嫂卖了也买不来一辆‘中巴’……”

作家终于清醒过来，甩了烟头，讥讽道：“凭你这号货能搞长途客运？你是不是昨晚做梦还没醒来？”他太了解这个弟弟了。在他的兄弟姊妹中，这是他唯一可以当面鄙夷地称之为“这个货”的一个。其他几个，本事不大，却还诚实；做不了大事，做小事做普通事也还踏实；挣不来大钱，挣小钱也还扎实巴稳。唯有这个货，什么本事没有还爱吹牛说大话包括谎话，做不来大事还不做小事；挣不来大钱还看不上小钱，总梦想着发一笔飞来的洋财。连父母也瞧不起的一个谎灵儿人物。他唯一的长处是有一副好脾气，无论作家怎么损怎么骂都不恼，而且总保持一张天真的笑嘻嘻的脸。

“我知道你看不起我，不相信我。事没弄成以前谁也不信，大事弄成了人就给你骚情了，挡都挡不住。”弟弟不仅不恼，反而给他讲起生活哲学，“你前几年没成名时，谁把你当一回事？我那时候看你没日没夜地写稿投稿，人家不登给你退回来。甭说旁人把你不当个人看，兄弟我咋看你都不像个作家。可你把事弄成了，真成个人了，而今我咋看你都像个作家……”

作家还真的被弟弟堵住了口。这是生活运动的铁的法则。他当业余作者时，屡写屡投稿屡屡不中且不说，即使后来连连发过不少小说、散文、诗歌时，文坛也没人看好他，只有那部小说和小说改编的电影爆炸之后，原有的、属于他的生活秩序才整个被打乱了。这个过程和过程中的生活法则，被弟弟都识破了。作家突然想到，论脑瓜，这个货还真的不笨；论心计——好的或坏的——他还真的不缺，说不定弄不来小事还能弄成大事哩！而今常常是这类人最早跃出原有的生活轨道和惯性，一夜暴富。作家便松了口，半是无奈地笑笑：“行啊！你想买一列火车搞运输我都没意见。你搞吧！”

弟弟笑了：“现在该求你了。不要你的钱，只要你给刘县长写个字条儿，让他给银行行长说句话，我就能贷出款子来。刘县长是你的哥们儿……办这事不费啥。”

作家故作惊讶：“哦！你还真动脑子了，把我的朋友关系都调动起来了……”

“而今这社会好是好，没有‘关系’活不了。”弟弟说，“你不过写一张二指宽的字条儿。刘县长也不过给行长打个电话说两句话。都不算啥麻烦劳神的事喀！”

作家笑笑，夹着烟在屋子里转了两圈，给刘县长写了一张字条儿。

几天之后，作家越来越感到某种逼近而又逼真的隐忧。这种隐忧之所以无法排遣，在于他意识到某种危险。作家的情绪制约着思路。总是别扭，总是不能通畅，总是无法让想象的翅膀扇动起来，正在写作着的长篇巨著遇到了障碍。他终于拿起电话，拨通了刘县长办公室的号码，很内疚地说明来龙去脉，最后才点破题旨："你不知道我这个弟弟是个什么货！我给他说不清道理才把他推到你手里。你随便找个理由把他打发走算了。"

刘县长笑了："你的电话来晚了。你弟前日后晌就来了。我把他介绍给农行行长了。"

"这怎么办？"作家急了，不是怕弟弟贷不到款，恰恰是怕他贷到了款子，三天两后晌把钱赔光了怎么办？他对刘县长叙说了自己的隐忧。

刘县长不在意地笑了："银行现在不会再做这种挨了疼而说不出口的蠢事了。现在贷款手续严格了。你放心吧。"

作家放下电话时，稍微安稳了。

巧的是，电话铃又响了，是弟弟打来的。

弟弟说："哥呀，贷款是没问题的。刘县长一句话，农行行长照办。我想贷十五万，他连一个子儿不敢少给。"

作家听着弟弟狐假虎威得意忘形的口气，心情又负累了。真要是贷下十五万元，这货把钱给倒腾光了，谁来还贷？他便郑重警告弟

弟："你得考虑还贷能力……"

"害怕火烫还敢学打铁！"弟弟满腔豪气，"现在人家贷款要担保人，或者财产抵押。咱们兄弟姊妹就你日子过得好。你给我来担保。"

作家脱口而出："那就把我押上？"

"谁敢押你这个大作家呀！"弟弟"哈哈"笑起来，"行长倒是给我出主意，把你那本书押上。"

作家现在才放松了，疑虑和隐忧全在这一瞬间化释了。行长给弟弟出的这个主意分明是游戏，不无耍笑戏弄的意味。自以为聪明的弟弟现在还在农行行长的圈套里瞎忙着。作家既不想为贷款而负累，也不想再看弟弟揣着那点鬼心眼在老练的农行行长跟前继续瞎忙出丑。他便一语戳透："我的那本书早都卖给出版社了。版权在人家出版社，不属于我了，押不成了。"

弟弟显然不懂出版法。这个专业法律与弟弟的实际生活太隔膜了。弟弟还不死心："你写的书怎么不由你哩？你的娃娃咋能不跟你姓哩？"

"这是法律。"作家说。

"到底是你哄我哩，还是农行行长哄我哩？"弟弟的声音毛躁起来了，已经意识到那个梦的泡儿可能要碎了。

"你自个儿慢慢辨别吧。"作家说。

"那你得给我想办法。"弟弟说，"哪怕找个有钱的人，哪怕编个谎话，先让我把款贷下。"

作家再也缠不过，便说：“我有一支好钢笔，永生牌的。你作押吧！”说罢挂断了电话。

冬天到来的时候，作家完成了长篇小说的上部。此刻的心境是难以比拟的，像生下了孩子的产妇，解除了十个月的负累之后的轻松和痛苦折腾之后的恬静与踏实；像阴雨连绵云开日出之后的天空一样纯净和明媚。这些比拟似乎又都不够贴切，真正的创造后的幸福感是难以言说的。

作家急迫地想回老家去。温暖的南方海滨，他都毫不犹豫地谢绝了。他迫切地想回到故乡去，那里已经开始上冻的土地，那里冬天火炕上热烘烘的气息，那一家和这一家在院墙上交汇混融的柴烟，那一家的母鸡和这一家的母鸡下蛋后此起彼伏的叫声，甚至这一家和那一家因为牛羊因为孩子因为地畔而引起纠纷的吵架骂仗的声音，对他来说都是一首首经典式的诗，常诵常吟，永远也不乏味，每一次重大的写作完成后，每一次遭遇丑恶和龌龊之后，他都会产生回归故土的欲望和需求。在四季变幻着色彩的任何一个季节的山梁上或河川里，在牛羊鸡犬的鸣叫声中，在柴烟弥漫的村巷里，他的“大出血”式的写作劳动造成的亏空，便会得到天风地气的补偿；他的被龌龊过的胸脯和血脉也会得到迅速的调节，这是任何异地的风景名胜美味佳肴所无法替代的。他的肚脐眼儿只有在故乡的土地上才汲取营养。他回来了。

作家下火车时，朋友刘县长在那儿接站，随后便进入一家新开发出来的民间食物的餐馆。便是豪饮。便是海阔天空的大谝。便是动人的城南旧事式的回忆。作家后来提起了弟弟贷款的事，随意地问：“后来他还缠没缠你？”

刘县长也是多喝了几杯，听罢便大笑起来，笑得前仰后合，说话都不连贯了：“哎呀！我的我的……作家作家……老哥老哥呀……你的你的……这个活宝活宝……弟弟呀！我现在才……才明白了……你为啥为啥把他……叫‘货’……”

作家倒进一大口酒，没法说话，等待下文。

刘县长仍然止不住笑，拍着作家朋友的肩膀：“任何天才天才……作家……也编不出……的……”

刘县长讲给作家一个可以作为小说结尾的故事——

你弟弟从我办公室走时，我借给他一辆自行车，机关给我配发的一辆新型凤凰车子。咱们这个小县长，天天用汽车接送上下班，我嫌扎眼，就让后勤处给每位头儿配发一辆自行车。他把车子骑走了，三天后给我还回来，交给传达室了。传达室老头儿把车子交给我的时候，我都傻眼了。车铃摘掉了。车头把手换了一副生锈的。前轮后轮都被换掉了。后轮外胎上还扎绑着一截皮绳。只剩下三角架还是原装货。真正是“凤凰”落架不如鸡了……

作家“噢”地叫了一声，把攥在手里的酒杯甩了出来，笑得趴在桌子上直不起腰来：“我的多么……富于心计的……伟大的农民弟弟呀！”

刘县长倒是止住了笑：“你不还我车子倒算个屁事！你说你丢了，我还能叫你赔一辆不成？可他……偏偏要这种把戏……”

“这就是我弟弟。常有叫人意料不到的创举，叫你哭笑不得，叫你……”

刘县长说："我看着那辆破自行车，突然就想起你常常挂在嘴上的'这个货'！我忍不住就说了你的'这个货'的称呼……才体会到这个称呼真是恰到好处……"

当日后晌，作家就回到了父母仍然固守着的家园。没有热烈，却是温馨。窑洞整个都收拾得清清爽爽。火炕已经烧热。新添的一对沙发和一张茶几，使古老的穴居式的窑洞平添了现代文明生活的气氛。父母永远都是不需要客套式的问候的，尤其是对着面的时候，看一眼那张镌刻在心头的脸就不需要再说什么了。

他随后转悠到弟弟的窑院来。

弟弟正蹲在窑门口的台阶上抽烟，笑嘻嘻地叫了一声哥就搬出一只马扎来。作家没有坐，站在院子里，看满院作务过庄稼的休眠着的土地。宽敞的院子里有两棵苹果树，统统落叶了，树干刷上了杀灭病菌虫害的白灰浆。一边墙角是羊圈，一边墙角是鸡舍。一只柴狗窜进窜出。是一个井井有条的、令人感到舒服的庄稼院儿。

客运汽车公司显然没有办成。那辆偷梁换柱而焕然一新的自行车撑在储藏棚子门里。所有零部件都是锃亮的，只有三角架锈迹斑驳，露出一缕寒酸一缕滑稽一缕贼头贼脑。

作家用嘴努努自行车，说："兄弟，再去借用一回，把他的三角架也换回来。"

"不用了不用劳神了。"弟弟顺茬儿说，"三角架一般不会出问题，新的旧的照样能用。"

"你也太丢人了！"作家终于爆发了。

“我丢什么人了？”弟弟一脸的诚实之相。

“我给你买不起‘中巴’，买一辆自行车还是可以的嘛！”作家摊开手，说，“你怎么能这样？”

“噢哟哟哟！”弟弟恍然大悟似的倒叹起来，“这算个屁事嘛！也不是刘县长自己掏钱买的，公家给他配发的嘛！公家给他再买一辆就成了嘛！公家干部一年光吃饭不知能吃几百几千辆自行车哩！我掏摸几个自行车零件倒算个屁事！”

作家说：“我现在给你二百元，你去买新车子。你明日就把人家的零件送回去。”

“你这么认真反倒会把事弄糟了。”弟弟世故地说，又嘻嘻哈哈起来，“刘县长根本没把这事当事……权当‘扶贫’哩喀……”

作家瞅着嘻嘻哈哈的弟弟，想说什么也说不出来了，就走出了窑院。晚炊的柴烟在村巷里弥漫起来，散发出一种豆秆儿谷秆儿焚烧之后混合的熟悉的气味。作家还是忍不住在心里呻吟起来，我的亲人们哪……

2000年秋 礼泉

2001年8月20日重写 原下

一个虚脱症患者的发言片段

尊敬的各位首长，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先生女士：

能有机会在各位首长各位领导亲自参加的研讨会上发言，我是深感荣幸的。刚才司仪先生说让我讲演。我怎么敢在尊敬的首长领导面前讲什么演呢！确切地说是发言，更确切地说是汇报。能有机会向尊敬的各位首长及各位领导当面汇报，对我这样一个作家来说是莫大的荣幸和巨大的鼓舞，使我可以当面聆听尊敬的首长和领导的批评和教诲。

我今天汇报的题目是《作家和人民》。在我正式汇报我和人民的血肉感情鱼水关系的切身感受之前，我先讲一个小小的插曲，作为这个汇报题目的序言。这是刚刚发生过的一个真实的小故事。就发生在今天早晨。确切地说就发生在我来开会之前。直到现在我仍然激动不已，我抚着胸脯还能真实地感到心脏在怦怦怦地跳动。我现在站在这里向尊敬的首长和各位领导和各位先生女士还没有说到这个故事的开头已经激动得快要不行了。这是我作为一个人民作家所期待的最幸福的事。

今天早晨起来，我决定自己亲自到市场上去买菜。我的举动把保姆吓了一跳。她尖着嗓子跟我急，你的时间多宝贵呀，怎么能让你做这些粗活杂事呢，浪费你的写作时间就是耗费天才的珍贵生命呀，我会犯罪过的呀。保姆怎么会理解我的行为呢？她不可能理解的。我要亲自去体验一下蔬菜市场的生活了。这个市场是一个大千世界，各种职业各种心态的人都汇聚到这里来了，我要观察他们。我从他们各个

不同的掏钱的动作和讲价还价的口吻就能感受到他们的心理活动。更重要的是，这里是城乡交汇处或者说接合部，许多郊区的农民到这里来卖菜卖肉卖水果卖鸡蛋，我可以感受到农民和城市人的新的人际关系。最最重要的，我要体验人间烟火，菜市场是人间烟火最浓郁最旺盛的场合。感受买者和卖者的心态。我正是要在这里感受生活感受社会，与人民保持一种平等的关系。只有平等才能准确感受。因为进入菜市场，我在他们眼里就是一个消费者，一个普通市民，可以平等交换；在平等的交换中感受到的时代脉搏才是准确的。完全不像在其他场合，被拉去签名、合影，甚至还有崇拜女孩狂热的拥抱。我进入菜市场就还原为一个普通人了。这一点保姆是永远不会理解的。一个作家想要贴近人民的情怀，小保姆总是感到不可理解。这样，我就强行按住保姆的手不许拽我，我就挎上篮子出门了。然后就发生了令我至今仍然激动不已的一幕——

呵呵，对不起尊敬的各位首长领导和各位先生女士。这里我还须汇报一下我家保姆的情况。这个小保姆是从山区雇来的。我之所以专门要从最贫困的山区雇一个保姆，就是为了给国家减少一个贫困人口。我同时清醒地认识到，光帮她经济上脱贫是远远不够的，还必须教给她知识。教育的落后是造成贫困的根本原因，知识扶贫才是打开通向富裕之路的金钥匙。我在给她比较优厚的工资的同时，特别注重帮她学习文化。她只上过小学五年级，文化水平可想而知。我辅导她读我的小说，对她觉得感动的篇章就让她背下来。我觉得背书仍不失为一种可靠的学习方法。我今天之所以能成为作家，与我小时候的背书有直接关系。做语文教师的父亲曾经逼着我背《唐诗三百首》。让小保姆通过阅读和背诵我的小说，对她进行心灵的熏陶，逐渐从愚昧状态脱胎为现代文明的人。为了鼓励她尽快成长，我和她约定，每背诵一千字，奖励一元；能背过一万字，就有十块钱的收入了，我和她

约定的方式是拉钩。她现在已经背过十万多字了，文化提高了，额外又得到了一百多元钱。她又主动提出要把我的这部长篇全部背下来，她太喜欢这部小说了。她同时声明不要我给她的背书奖励金了。她说我帮她学习怎么能让我倒贴呢？我感到了她的内在素质的提升。作为一个人民作家，我时时刻刻都要尽自己的一份责任。现在，我来汇报菜市场上那动人的一幕——

关于我买蘑菇买芹菜买鱼买鸡蛋的过程和买卖过程中达到的交流和收获，就不一一汇报了；关于我为什么买蘑菇买芹菜而不买其他蔬菜，为什么买鲈鱼而不买武昌鱼，为什么买鸡蛋而不买鹌鹑蛋的科学道理，也就不一一汇报了。正是我买完了所需的东西准备撤退的时候，我发现了一个不寻常的人。这是个在肉摊上卖肉的人。一个姑娘。一个漂漂亮亮的小姑娘。卖菜卖肉的姑娘中漂亮的人也不少不足为奇。令我惊奇的是她在看书。在顾客离去和新的顾客到来之前的短暂的空隙里，她便拿起书来看上一眼读上几行。这简直是整个蔬菜副食品市场上一道最亮丽的风景。想想吧，在金钱和物质直接的又是紧张的交换场合里，竟然有一个漂亮的女孩子在叨空儿读书！我的心头一亮，我的心里一热，几乎流下眼泪来。我被这个女孩深深地感动了，甚至可以说是震慑住了。她读书的神态和渴求知识的欲望太令我感动了。我真后悔没有带照相机来。大家想象一下吧！在万头攒动"嗡嗡"的交换的争议声浪里，在一排排猪肉和羊肉排列的肉架肉林之中，有一个卖肉的女孩在读书，这是怎样一幅令人肃然令人感动的浮雕式的画面啊！我当即就产生了《卖肉的小女孩》的小说构思，自我感觉不亚于那个名篇《卖火柴的小女孩》。人民的生活就是这样给我创作的灵感，永不干涸。

我后来才意识到我被她震慑而凝固在原地不动了。我重新获得现实知觉后就朝她的肉摊走去。尽管我不打算买肉。我的胆固醇和血脂都很高，医生再三叮嘱我不能再吃肉了。为了能给人民写出更多更好的作品，我只好忍痛割爱不吃肉了。我走到肉摊跟前，那个女孩还在盯着书看，居然没有发现我的到来。我真不忍心打扰她读书的兴致。然而我太想了解了解这个可爱的小姑娘。我就开口问话了。小姑娘恋恋不舍地放下书，问我要买多少。我便逗她说，这真是羊肉吗？小姑娘说，正宗的内蒙古羊，草原上的羊肉不膻。我上山下乡五年，就在内蒙古草原上放羊，比她内行多了。我故意逗她，挂羊头卖狗肉的事儿还真说不定呢，市场上假货比真货还难辨。她"扑哧"一声笑了，说师傅你太官僚了，而今狗肉比羊肉还贵，该当是挂狗头卖羊肉才合当今行情。我还真不知道狗肉比羊肉贵哪！我还停留在"狗肉不上席"的旧观念状态。这个小姑娘多机智呀！居然把一句古老的成语给颠覆了。我又一次深切地体会到"卑贱者最聪明"的哲理。

我还是对她读书的事最感兴趣。我就问她在读什么书。她回答之后，就让我感到不好意思了。她读的是我的书。是我今年刚刚出版的那部长篇小说。我真不好意思再问她什么了，因为她读的是我写的书呀。小姑娘却由此打开话匣子滔滔不绝起来，从这本书立意的深度到人物刻画，从故事情节说到细节，又从现实意义说到艺术特色，说得头头是道，俨然是一位评论家。我在大家尤其是在尊敬的各位首长和领导面前不好意思重复她的话。我向来不标榜更不自我炒作。这个小姑娘是很普通的读者，她说她读过许多中外名著，也读过中国当代许多作家的作品。她还是有很不俗的欣赏眼光的。她居然敢对我说，这部小说完全有资格获诺贝尔文学奖，起码比那个高什么的法国籍的中国人写得好多了。我怕他看出我的真面目来，因为那本书上有我的照片。那样我就更不好意思了。我和她招呼一声就要走了。她却拉住我

要送我两斤羊肉。我问为什么白送。她说她凭直觉判断我是一个正派正直的人。我只好告诉她，我在内蒙古草原下乡时放过羊，对羊的感情太深了，每看见羊肉，就感觉到人的残忍。我是不吃羊肉的。

尊敬的各位首长尊敬的各位领导，各位先生各位女士，现在我来汇报我的正式内容《作家和人民》——

（一位领导插话：这个故事真是很感动人的。我给你提个建议，你应该把你主要的作品给那位卖羊肉的姑娘送去。）

请领导放心，我一定照您的指示办。我把我全部的作品都送给她，签上名盖上章。这是我最珍贵的一位读者。没有任何功利目的的读者，她的评价才是最可信赖的。我根本不在乎那个总是隐含着政治偏见的什么诺贝尔奖。倒是如卖羊肉的小姑娘那样喜爱我的作品的人民，才是我服务的根本。

……

一家晚报记者闻风而动跟踪追寻。果然在作家所说的那家蔬菜副食品市场找到了那位卖羊肉的姑娘。

被作家称赞为漂亮的小姑娘其实并不漂亮，倒是很普通，很难使人产生漂亮的印象。记者并不研究漂亮与否，作家的夸张和美化无可厚非。关键在于她不仅不是姑娘更不是小姑娘了。确切地说，她是一位青年妇女，少说也有三十四五岁了。记者又一次宽容了作家，把青年妇女回归到小姑娘的队列，也无可厚非，不是原则性的犯规。记者便开始和卖羊肉的青年妇女探询式地对话。

——你喜欢读小说吗?

——喜欢。

——你喜欢读哪些书呢?

——我年轻时特喜欢读琼瑶。读她的书把我的大学都读没了。要是听老师的话不读她的书，我肯定能考上大学，今天绝不会在这儿卖肉了。我后来又迷上了金庸，那书真热闹喂！

——中国当代小说你喜欢读哪些?

——我没读过。

记者便有点踌躇，要不要点出那位作家叙述的亲身经历的他写的那本小说呢？犹豫之间，记者猛然瞅见剁肉的柳木墩子旁边放着厚厚的一本书，正是那位作家提到的长篇小说，便不再作难了。

——剁肉墩子旁边那本小说你读过吗?

——我翻了翻。

——能谈谈你的印象吗?

——我马马虎虎翻了，没有细看。翻完只记得一个好玩的情景儿。

——哪个情节?

——说都不好意思说。

——没关系。说说吧！

——书里写一个作家和小情人正在亲嘴儿，保姆突然回来撞见了。那个作家对保姆撒谎掩饰，说他给她进行脸部按摩……

记者都觉得有点尴尬。

卖羊肉的青年妇女却来劲了，说，这情景倒是个情景儿。问题是书里头被写的作家笨呢，还是写这本书的作家笨呢？怎么连撒谎都不会呢？什么样的谎话不会编，偏要编出“脸部按摩”这种傻话呢！不管是书里头被写的作家还是写这本书的作家，一句谎话都编不好，还怎么当作家呢？你看看琼瑶，你再看看金庸，整本儿整摞儿的假事儿谎话儿，把一拨儿一拨儿的小姑娘老头子一个个哄得云里雾里迷迷瞪瞪的，那才叫本事……

在这位卖羊肉的青年妇女肆无忌惮的嘲笑话语里，记者哑口难辩。她不仅嘲笑了小说里那位作家，也嘲笑了写这部小说的作家。那么写这部小说的作家所做的那篇声情并茂的发言，到底是怎么回事？如果被这位卖羊肉的青年妇女嘲笑的这本书的作者在小说里该编谎话的情节里出不了彩，却怎么会在各位领导面前编出那么生动逼真的纯属谎话的“插曲”，把各位尊敬的首长和领导哄得一愣一愣的？很显然，作为作家的智慧，用错了地方。

记者仍不甘就此罢休，问，那你买这本小说干什么？

——哪儿呀！昨日一个男人在我这儿买羊排把书遗在这里。我叫住他让他带上他的书。他说不要了送我包羊肉用。我闲着没事就翻了翻……

记者原打算探访完“卖肉的漂亮的小姑娘”以后，还要去探访作家家里那位正在背诵长篇小说的小保姆，写一篇关于这位作家的人物通

讯。现在，还敢去找那位贫困山区来的正在通过背诵主人作家小说提升素质的小保姆吗?

记者向卖羊肉的青年妇女告辞的时候，重重地扶了扶眼镜，怕它真的跌了下来。

2001年 原下

腊月的故事

一

这是北方乡村冬天里的一个平淡无奇的早晨。

麻雀在后院的树枝上“叽叽啾啾”吵成一片。这是冬天里唯一能够听到的鸟叫声。天天早晨都是在麻雀这种热烈的吵闹声中睁开眼睛，郭振谋老汉就感到自身这架运转了大半生的机器开始发动，毫不迟疑地从炕上坐起身来穿衣蹬裤。冬天里天寒地冻，田里和果园里没有什么逼紧的活路，放羊也需等得太阳出来霜花化了之后。他随着麻雀的叫声起来是一种习惯。习惯对于一个年过六十的人来说比制度比命令还难以违抗，再那么躺在炕上不仅不是享受而是别扭了。

郭振谋老汉穿着衣服结着裤带的时候，心里渐渐踊跃着一种激情，一种紧张，其实什么急事要事都没有，而那种混杂着紧张情绪的激情却逐渐充溢在整个躯体里。他不奇怪，完全能够把准这种脉象，是年气儿催的。年气儿是看不见说不清的。是期待是期盼，是结束是开始，是抖落是重新披挂？一交上农历腊月，这种年气儿就在乡村潮起了，腊月初五吃“五豆粥”，一种掺杂着五种豆子的稀饭；腊月初八吃“腊八面”，一种在大米稀饭里下进细面条也拌以炒菜的面食。每一家农户的每一口锅里舀出来的，几乎是一律的饭食。年气儿就是这样日渐一日在乡村的村巷屋院里弥漫着，把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血液蒸腾起来。郭振谋老汉准确无误地记着，这个被麻雀吵醒的黎明是腊月十九日，再过四天就是祭祀灶神的日子了。灶神是天帝委派到人间的挂不上“品”位的最小的神，却是最深入基层的神，深入到家家户户。

一张木刻拓印的纸神，坐在两只大红公鸡之间，慈善的脸上最显眼的是一撮捋得顺溜的黑胡须，位置就在锅台正前方的墙壁上。灶神的职责是一年四季三百六十五天一天三顿都要观察记录每一家锅里下进去什么舀出来什么，到每年腊月二十三回到天宫向天帝述职，报告农人锅里的稀稠，天帝据此判断人间生灵的日子过得窝逸不窝逸。配贴在灶神左右两边的红纸对联的内容，是传承了不知多少年代的一成不变的“上天言好事，入地降吉祥”。

郭振谋老汉瞅着已经褪色已经被烟熏得发黑的灶神画像和对联，心里就想着再有三四天时间，这位灶神爷爷就该卸任了，新的一届灶神爷爷也要赴任了。昨日他在集镇的年画地摊上买了一张新的灶神画像，还是木刻拓片古香古色的那种，对联却换了几个字——“上天报实账，入地细观察”。郭振谋老汉问卖画小贩，古人传下来的对联怎么敢胡修乱改？卖画小贩说，镇上那个专门印制灶神画像的老板说，去年全镇人均收入只有九百九十块零几毛几分，镇长给县上报的是两千块零几毛几分。村哄镇，镇哄县，一路哄到国务院。得了奖，提了干，明年年尾儿再冒算……印刷灶神画儿的老板还说，镇长可以胡报冒算，灶神爷回天宫可不敢学镇长的样子，连该下的雨水都误了。卖画小贩说印灶神画儿的老板还说来，这叫对症下药。郭振谋老汉听着，同时就在心里码算自己的年终总收入，其实早都码算过不知多少回了，三代六口之家，统共毛收入也就差不多八千块，人均一千三百多块，在村子里算个中等偏上的家庭。镇长最终报到朱镕基总理那儿的数字却是两千还零几毛几分。他打趣地对卖画儿小贩说，咱们明日搭火车上北京找朱总理，讨要那两千块的缺额去，零头就不说了。俩人哈哈笑着，郭振谋老汉一手交了钱，挑了一张满意的灶神画儿和一幅崭新的对联，分手时又撂出一句，咱也得对症下药……郭振谋拴紧裤带结好纽扣，下一步就是茅房了。

老伴还懒在炕上。老伴向来是比郭振谋早起早离炕头的，无奈小孙子的学前班放寒假，每天早晨都搂着奶奶不许离开被窝，她就依着孙子的性儿多享一会儿福。老伴儿听着老汉开开后门走向后院的脚步声也不在意，早已耳熟能详早已毫不留意，不料，老汉一声惊慌失措的叫声响起：“咱的牛哩？”她一把推开孙子，裹上衣裤，奔向后院。

二

女人奔到后院时，还夹着一泡尿，也不觉得排泄的急迫了。她没有看见老汉。老汉不在后院里，也不在牛圈里。牛圈里已经没有牛了。牛槽里残留着牛舌卷舔未尽的草料。牛圈里有一堆新鲜的牛粪。没有了牛的牛圈显现出一种空前的令人腿软的空寂。女人真的双腿发软要瘫坐到地上了。她叫了一声，我的牛哇！两眼一黑就扶住圈墙的墙壁软瘫到地上。

女人的眼睛重新睁开之后，就急匆匆出了牛圈，后院的围墙已经被破开一个大豁口，足以让硕大的牛通过。我的天哪，要拆开这样大的豁口，得费不少时间哩！这墙的砖头是废砖和碎砖，是儿子从一家拆迁的破产工厂当作垃圾弄回来的。要把这些碎砖扒掉，而且不容弄出声响，得花好久时间哩，一家人却都死睡着，一任毛贼从从容容拆墙搬砖，扭锁开门拉牛，真是睡死了哇！

墙外是麦地。一畛麦地那头是一条田间小道，是农人施肥锄草收割麦子公用的一条窄窄的小路。麦苗上落着一层厚厚的霜花，隐隐显现着老汉郭振谋的两行新踩的脚印，牛的蹄印和偷牛贼的脚印似乎看不出来，被霜花遮掩住了，证明牛最迟是在夜半之前被偷的。女人朝茫茫的麦地望去，看见老汉从小路连接大路的拐弯处走过来，他肯定是跟踪搜寻线索去了。

女人看见，老汉站到当面的时候，额头和脸上满是汗水，蒸腾着一缕缕白色的气体，像是火炉上滚开的水壶的壶盖周边冒出的白气。这么冷的天，这么冷的天的清凛大早时分，还出这么大粒子的汗，还冒这么如壶开锅滚一样的气，可见老汉心里鼓着多大的劲，抑或是心里虚弱到啥程度了。“快把汗擦了。你心里甭吃劲儿——咱人最要紧。”女人毕竟是女人。女人毕竟比男人心软。女人最先掂出来人和牛的分量和轻重。女人也毫不含糊地掂出来自己和老汉的轻重和位置。她把自己刚刚发生的两眼发黑软瘫倒地的惨事已经搁置偏旁了，真诚地关心起亲爱而又可怜的老汉了。

“牛是从这麦地里拉走的。没走小路。斜插过这一畛麦地，走到大路上的。当然，贼当然要抄近路，麦地里走起来也没响动。”郭振谋老汉分析判断，“在二狗家麦地里有一泡牛尿，沥沥拉拉尿了有十步长，牛是边走边尿的。当然，贼当然不会让牛停下尿完才赶路的。在大路上，有一堆牛粪，被踢踏得乱七八糟。牛是在那儿被推上拖拉机的，那儿有拖拉机的辙印。牛尿是贼把牛弄上拖拉机时踩踏稀烂的。当然，贼当然只顾尽快把牛弄上拖拉机逃离现场，哪还顾得脚上踩着牛尿哩！再说，天也太黑了。”

“咋办呢？”女人说，“这该咋办呢？”

尽管把贼和被偷的牛走过的路径勘察得清清楚楚，尽管把牛尿牛屎和运载拖拉机的辙印分析得头头是道，郭振谋看似一个脑袋清醒且不乏主意的人，然而在老伴问到“咋办呢”的时候，却不自觉地呻吟似的反问或自问了同样一句话：咋办呢？其实他在麦地里追踪牛和贼的线索往来的路途中，已经想到过一个又一个应当采取的紧急措施，然而，当女人向他讨要主意的时候，他却没有说出一条来，而是立即想到了儿子。在他的潜意识里，举凡家庭的重大举措，必须和儿子商

量，才能得到肯定或否定以致最后做出决定。他在这个家庭里一言九鼎的时代是从哪年结束的，或者说发生易位的，记不清也说不清，反正早已不可挽救地形成现在这样的家庭格局了。他似乎此刻才想到了儿子。在这样重大的家庭灾难发生时，竟然不见儿子的面，他不可理喻地问老伴：“秤砣呢？”

“还睡着。”女人说。

“这大的事都遇下咧，还睡！”

“兴许娃还不知道。”

郭振谋便从后院走进后屋，走过穿堂，又出了后屋的前门，站在院子里，对着前屋的后窗，忍不住就提升了嗓门吼：“秤砣！”

“哎。”新屋新窗里传出声音。

“牛被贼偷了！”

“我知道。”

“你知道你还睡着不起来？”

“已经偷走了，我起来迟起来早都没用。”

“嗨……”郭振谋老汉右拳捶打到左掌心里，气急败坏地对女人说，“你听听！你听这话说的！就像偷了隔壁的牛——偷了隔壁的牛也该关心问问情况嘛……”

窗户里传出平静而近乎冷峻的声音：“不管咱的牛隔壁的牛，贼偷了就没有了，谁来关心谁怎么关心都不顶啥，牛没有了。”

郭振谋老汉想着，话虽然倒也是这话，事虽然倒也是这事，但似乎一般人都不这样说。然而儿子秤砣就这样说。他平时也就是这样说话说事。这个狗日的什么时候开始这样说话论事，郭振谋记不得了。他的热汗已经晾干，头上的蒸汽也早已偃息，紧张的心和因紧张过度而鼓足着劲的腿脚此刻渐渐松弛，出过汗的皮肤似乎浸了水的冷。他想回到后屋去。儿子一边扣着外套的扣子，一边走过来。

“总得想个办法吧？”老子说，“总不能把牛丢了咱连一句话也不说一步路都不跑吧？”

“我想不出啥办法。”儿子说，“你有啥好办法你说嘛，路由我跑话我也能说。”

“总得去找去寻呀。”

“上哪儿找？”

“牲畜市场。还有……托付亲戚、朋友、熟人，还有你的那么多同学，让他们留心一下，看看谁家槽头新添了牛，咱好暗里去查问。”

“我可以百分之一百告诉你——爸，牛在屠宰场里。在哪一家我估不准，但准在屠宰场里。县上有两家屠宰场，城郊有五家，杀猪杀羊杀牛，还有驴，给西安的大饭店小饭铺送货。凡是送到他们屠宰场的牲畜，一般都是随到随杀，人家连喂牲畜的食槽都不备。屠宰老板根本不问猪呀羊呀牛呀驴呀是从哪条道儿上来的——自养的贩卖的还是偷来的，只是掐一掐肥瘦，以质论价。屠宰场老板更愿意收购那些偷来的牛羊猪驴，贼急于出手贼没摊本钱可以压价收购嘛！送货的人走进屠宰场的大门，老板一搭眼就能看出来人的牲畜是自养的是倒贩的

还是偷来的……现在找到屠宰场，连牛皮也认不出来了，况且人家老板就不准你翻找。”

“狗日的！”老子信下了。

“现在哪里还有偷牛自养的贼呢？”儿子说，“现在的贼也是抓时间抢速度的现代化头脑了。”

郭振谋老汉闷在那儿，打了个冷战。

老伴提议回到屋里去说话。

一家三口回到老两口居住的后屋，毕竟比院子里暖和多了。父子俩在小火炉对面坐下。女人给丈夫和儿子沏茶，弄得玻璃杯叮当响。

“总得给派出所报个案吧？”老子说。

“报也成，不报也没啥。报案和不报案的结果是一样的。”儿子说。

这是郭振谋老汉自己也知晓的事实。村子里时常发生丢羊丢猪丢牛的盗窃事件，邻近的村子也都发生过。被盗的农户主人向派出所报了案，好则来人查看一下，问问情况儿，在本本上记录记录，在被挖开的围墙上照一照相，然后说等着吧，将来破了其他案子也可能把这件案子带出来。结果是本村和邻村被盗窃的案子一件也没有幸运地被带出来。郭振谋老汉还是忍不住说：“报还是报一下吧！兴许还有运气被牵带出来，赔不赔钱也罢了，让人心里明白一回，是个什么贼。”

“牛已经没咧，明不明心都一样。”儿子说，“光脸贼麻子贼本村贼外路贼，都是贼喀，你弄清哪一个没意思——牛是已经没有咧。”

“你不是有个同学在城里干公安吗？”郭振谋老汉突然想起来这个重要关系，直生气自己到这时候才记起这个重要关系，“让他给派出所说一说，让派出所把这事当个事办。”

“没用。”儿子说，“话当然可以说。可你也想想，一头牛顶多值两千块钱，派出所警察为这个小案得花多少钱？开警车一公斤汽油也要两块多。即便把贼逮住了，两千块钱顶多判几天拘留，又放了。派出所花那么多钱劳那么大神受那么多苦，难道就为给你明个心吗？”

“哈呀！世事真是变得没眉眼了。一头牛两千多块哪！两千多块的牛丢了都不值得报案了。那时候谁家丢一只鸡，偷鸡贼都要上会挨批挨斗的。”郭振谋老汉想到“那时候”话就多了，“那时候，猪在街道上跑鸡也在满街巷跑，生产队的牛夏天晚上不往圈里拴，就在树底下过夜，连个牛毛也没人敢偷。而今倒好，挖墙拉牛不光没人追查，还说你丢的牛折价太少不值得查，真是长见识了。”

“你不是常说‘那时候’年年到头不够吃吗？你不是常说你和我妈都被饿下浮肿病了吗？”儿子眼里做出要笑的神气，“你怎么刚丢了一头牛，又想回到生产队里过只挣工分不分钱也吃不饱的日子呢？”

“我没说饿肚子好咯。”郭振谋反驳得意的儿子，“可那时候确实没有这么多贼。”

“这号偷牛偷羊的贼不算啥，小毛贼。”

“哈呀！你的口气倒不小。”

“不是我口气大，是你从年头到年尾只放牛种地啥也不知。我说出那些大贼来把你能吓死——”儿子说，“揣着枪抢银行，票子整捆整捆

整箱整箱地弄走，这贼大不大？一个省长一个市长贪污受贿有几千万上亿的，这号贼大不大？你那一头牛值两千元，你掂掂轻重大小吧！”

“再小也是贼嘛！再小也是我养大的牛嘛！”郭振谋心里还是解不开，“总不能说偷牛的贼不是贼嘛！”

“是贼。偷多偷少都是贼。”儿子说，“一个贼偷了一串麻钱，一个贼偷了皇上的金库，当然得先逮那个偷金库银库的贼——你说还去不去派出所报案？”

郭振谋老汉闷下头，抽着烟袋，仍然耿耿于怀，反问儿子：“这就完了？丢了就白丢了，偷了就白偷了？”

“完了。到这儿就完了。再不提这事了。”儿子说，“你不是还要上集卖胡萝卜吗？不能丢了一头牛连年也过不成了。”

郭振谋老汉又闷住头，再说不出什么话了。

“贼也要过年哩！”儿子秤砣说。

三

不管心里自在不自在受活不受活，郭振谋老汉还是听从了儿子秤砣“该弄啥还照样儿弄啥”的话，骑上自行车上路了，加入明显稠密于往日的人流车流，奔县城去了。

年气儿愈显得浓郁了。冬日里刚刚出山的太阳也泛着温柔的光。郭振谋老汉骑着自行车的速度和姿态，让同时行进的路人感到依旧是个强健的中年人，他自个也感觉和十年前骑车子没有多大差别，上下车子一样轻捷自如，腿脚一如既往那样灵便，车后架上驮载百余斤胡萝卜绝不气喘。他特别自信自己的身体，似乎根本没有年逾花甲老之已至的感觉。他的饭量在那儿明摆着，肉饺子可以吃四十几个，羊肉泡馍能泡足三个烧饼，有时比儿子秤砣还要多吃半碗。狗日的秤砣居然屡屡调侃老子，说，爸的肚子是公社化生产队培养出来的肚子，能饿也能撑，胃的伸缩性很大。狗日的念书念不出名堂，把心眼拐到说俏皮话上了。郭振谋骑着自行车在宽阔的柏油马路上行进着，遭遇盗贼造成的两千多块的重大经济损失，渐渐在减压。“贼也要过年哩！”狗日的秤砣怎么就会说出这种实实在在的俏皮话，让人反倒没话可说了。他的双腿踩踏着自行车，心里就一遍又一遍地发出莫可奈何的自慰，尿咧毛咧就算一回倒霉事儿咧！财去也许人安哩！让贼也好好过个红火年吧！

“杀羊。”

看着父亲推着自行车走出街门，秤砣回过头对媳妇杏花说。杏花正在扫院，仰起头来，平静地说：“你杀。”

“你得帮我压住羊腿。”

“我不敢。我害怕刀子染红。”

“多看几回就不害怕了。”

“我不敢看，也不想看。”

“你倒像是高干家的贵重人儿。”

秤砣说着就走出街门，在街巷里吆喝吼叫来两个帮忙的乡党；又反回身来，从羊栏里牵出一只山羊，走过院子时自言自语着，贼还算是有良心的贼哩！拉了牛还给咱留下羊。秤砣把羊拴到门外土场里的树干上，又反回身来取刀子。秤砣把刀子在掌心掂了两下，就有一种炫耀的快感。这是一把藏刀，真真正正的藏刀；刃不长，把儿也不长，却是浑实实用的一种；把儿上铆嵌着铜钉，闪闪发亮，挂在墙上或佩在腰带上都是很值得观赏的工艺品；然而既能割断羊的脖子，也能割断牛的粗厚的脖颈。这是他的朋友铁蛋送他的。铁蛋在公安局工作，收缴的长刀短刀匕首无数，特意选了这把最实用最精美的刀子送他。

杏花出门倒土的时候，正好遇见最惨烈的那一幕，羊脖子底下射出一道红色的血光，她本能地尖叫一声，扔了盛着垃圾的簸箕，双手捂住了眼睛。那两个帮忙抓着羊腿的小伙子，见状哈哈笑起来。秤砣听见了媳妇的尖叫，瞥一眼立在原地捂着眼睛的杏花，对那两个帮凶说，看看，咱这位真的像是高干院里长大的千金，其实她爸跟我爸一样都是在土里刨食的主儿。

秤砣把扒过皮开过膛的羊剁开拆卸，两条后腿连结的后臀，自然是一只羊身上最好的肉，分装到两个结实的蛇皮塑料袋子里，扎了口，吊捆在自行车后架的两侧，再把剩余的羊肋羊头和下水交给杏花。杏花只是害怕自刀子进去红刀子出来时涌出的血流，等到活羊变成一堆羊肉的时候，她就安之若素波澜不惊了。杏花说，杀了一只羊，后臀送朋友，自家吃杂碎，真是够义气咧。秤砣说，哥们儿就是哥们儿。

秤砣刚跷出街门门槛儿，就跨上了自行车，奔城里去了。这是每年腊月二十前后必有的一次访友活动。他有两个朋友，两个初中念书时交结的朋友。当秤砣在家庭里说话可以算话的时候，就开始了给两个朋友送羊后腿的礼尚往来。每年春节将至，杀了羊，送两位朋友一人一块羊的后臀。今年虽然丢了一头牛，羊还在，这个约定成规的事不能破也不能中断，照送。

一个从未经见过的温暖的冬天，刚刚过去的三九里竟然下了一场细雨。而这种如丝如缕的细雨通常是九尽以后清明时节的景象。大路两边的麦苗似乎压根儿就没有经过冬蛰，绿莹莹的景色也如同开春返青时的征象。秤砣身上已经发热了，想到即将见到久不谋面的好朋友，心里就有点按捺不住的兴奋。朋友真是一种说不大清白的关系，对父母对妻子不便说不想说的话，在朋友那儿就可以毫无忌讳甚至放浪形骸。他不是那种广交的性子，仅有的这两个朋友就愈交愈显出珍贵甚至神圣。然而，与这两个朋友如何形成朋友为什么会结交至今，他没有认真想过也弄不大准确。在中学一个班的五十多名男女同学里，他们三个人是怎么走到一起的，真是说不清，其实论起性格和脾气，三个人正好是三种差异很大几乎是执拗的性情。决定人与人关系远近的是不是有一种看不见嗅不出的气味？这种气味只有身体和心灵能够感知？因此才决定是排斥还是吸附？反正他和他俩在一起就感到舒畅感到亲近，分别了就会思念，思念起来就觉得溢满愉悦。

城市太漂亮了。两三个月不进城再进城就能看到新的更奇特的景观。秤砣每一次进城都会有一种新奇和随之而发的惊叹，然而从来也没有亲近感，如同看见别家门楼里出出进进的年轻媳妇，越是漂亮越有距离感。秤砣想，这市里的市长其实只是城圈里头的人的市长，据说市长安了亲民电话，谁家的狗叫扰乱休息谁家的下水道堵塞哪条巷

道的第几根路灯灯泡被打碎了或无缘无故不发光了，都可以直拨市长的亲民电话，问题和困难一般都会在很短的时间里解决。可是自家所在的村子和周围数不清的村子，别说狗叫扰人，即使狼吃了娃娃，也没谁会想到给市长打亲民电话。一头养了整整一年的肥牛丢了，无论父亲母亲杏花和他自个儿，谁会想到打那个亲民电话呢？最终连给派出所报警也免去了。其实，自己的村子还归属市区管辖，就有点更为分明的市长是城里人的感受了。

秤砣走到一幢住宅楼下。铁蛋在这幢新造的住宅楼上有了一套两居室的房子。同为农村孩子的铁蛋已经在城市里有了安铺支锅的一坨住地，站住脚也就扎下了根，再也不是市长鞭长莫及的乡里人了。他敲了门。他还不习惯按那个门铃的按钮。门开了，铁蛋媳妇开了门，一身松松散散的衣服和松松散散的姿态，突然现出惊喜和热情，把他让进纤尘不染的屋内。

“羊腿。”

秤砣进了门，手里提着羊腿，交给了铁蛋媳妇。铁蛋媳妇客气地笑着接住那个装着羊腿的蛇皮塑料袋子，说：“你年年都忘不了送这。”

秤砣走到不大不小的客厅，问：“铁蛋呢？”

“办案出差了。”媳妇说，“你快坐下。”

“快过年了。”秤砣说，“过年能回来吗？”

“说不准。”

“啥紧火案子过年都不能回来？”

“抢了银行了。”媳妇说，“还有一起爆炸案。都是最急的大案。”

秤砣便告辞。不说今年铁蛋办案出差不在家，即使往年铁蛋在家，他也是放下羊腿便拉上铁蛋一块去给小卫送另一只羊腿。铁蛋这位做护士的媳妇，应该说是绝无一丝可弹嫌的毛病，人的干净整洁和这套住室的干净有序融为一体，你看到她的干净清爽就联想到这屋子里的一器一物的秩序与和谐。也许这屋子和女主人和谐完美到无可弹嫌的同时，也产生一种容留不住客人的效应，起码是秤砣这号客人。真是无法说得清白，秤砣到这个新迁的居室来过不止一次了，过去他们居住的临时性平房，秤砣同样是这种感觉。绝不是护士待人冷淡，反倒是礼仪毕至客气周到面面俱全，然而秤砣还是觉得待不住。秤砣总觉得在这儿放不开，手脚似乎被一根无形的丝络缠裹着，心里也就更觉得被裹束得老大不自在。没有办法改变。铁蛋是好朋友，护士媳妇也是好人好媳妇，可他就是在这两个好人的屋子里待不住。

“我给小卫把羊腿送过去，赶天黑还要回家哩！”

秤砣已经马不停蹄地出城了。小卫所住的房子是靠近工厂围墙的一排瓦顶平房的两间。围墙那边是五六十年代建成的老式住宅楼，与日新月异变着花色的新式公寓住宅比衬着，人就会为这个曾经显赫的庞大的国有工厂生出气数已尽的惋惜。小卫住着的这一排平房，原先是厂里新来的单身青年工人的集体宿舍，秤砣在小卫刚刚进入这家工厂入住这里的集体宿舍时就来过，还住过不止一夜，太熟悉了。这儿曾经是最富生气的一隅，成百号无牵无挂的青年男女集中在这一排平房里，一股壮气和活气就形成一股巨大的气场，反倒比围墙那边的家属院更具活力。他曾经和小卫住在临时调换出来的四人一室的屋子里，喝啤酒，谝闲传，抽烟就是从这儿起步的。他对工人生活的切实感受和仰慕，就是那时候诱发的。现在，他从这家工厂破落残败的大

门骑着自行车长驱直入，看守大门的老头竟然视而不见，或许是连问一声的信心也没有。想想也是，这里既已无任何需要保密的产品，连值得破坏分子破坏的价值也没有了。秤砣骑车通过偌大的厂区时，忍不住咂舌了，曾经令他眼热心也热过的景象，已经无可挽回地败落了，曾经在这儿体验过几个美好夜晚的乡村农民秤砣，现在发觉自己竟然对这儿有某些牵挂，忍不住连连咂着嘴，表示着含蓄的痛心。

“秤砣哥——”

秤砣听见小卫叫他了。他骑车子一直骑到门口跳下来，和小卫就挽着手走进屋子。

“年年送一条羊腿！”小卫说，“我不说谢了。”

“年货办得咋样？”秤砣问。

“嗨！谁现在还办年货！”小卫说，“有亲戚来了，到饭店吃一顿，省事。城里人都这样过年。”

“乡里没有饭店。”秤砣说，“有也舍不得挨宰。自家屋里做着省。”

“麻烦！”小卫说，“人都怕麻烦。”

闲谝着，小卫媳妇端上来茶水，不像以往那么大大咧咧，倒有点往昔印象里少见的拘束和闪烁其词。秤砣首先猜疑小卫大约又欺侮媳妇了，又不好问。小卫则一如既往，一派的昂扬神气和欢畅的说话。从来也不见他忧愁过，从来也不见他皱眉挠头的动作；从来都不向人告艰难哭穷。如果城里人和乡里人都养成小卫这样的爽快，这世界就没有愁苦悲伤的面容了。

“铁蛋出差不在。”秤砣说。

“我在城里也见不上面。”小卫说，“案破不了人可是忙着。”

“厂子看去彻底不行了？”秤砣说。

“不说厂子。咱只说咱的事，咱的话。”小卫说，“谁现在还说厂子的事呢？早就没人说了。”

“那么多工人呢，现在都干啥呢？”

“鸡不尿尿总有出路喀。”小卫说，“各人有各人的活法。”

“你现在弄啥哩？”秤砣问，“收入还可以吧？”

“啥都干哩。啥能挣钱就干啥。”小卫说，“年头上给一家饭店当保安，活儿倒是不重，就跟兵马俑一样在那儿站着。可我看着那些鸟人拿着公家的钱肥吃海喝，还要咱保卫，屁股一拍不干了——眼不见心不烦。”

“那么红火的工厂，才几年时间成了这样！”

“我都不可惜你倒可惜。我的工厂我都不瞅一眼了，你倒总是提说。”

“好好好，不说了。”秤砣说。

“你今年弄得咋样？”小卫问。

“凑合。”秤砣说。他没有说丢牛的事，也许正如小卫不想说工厂的事一样。

“娃呢？”秤砣问。

“到舅奶家去了。”小卫说着，就提高嗓门对厨房里的媳妇说，“甭做饭了。咱和秤砣哥到外边去吃饭。”

秤砣当即表示反对：“在家里吃自在。”

正在为到不到外边下馆子的事稍有争议的时候，门外有人说话，而且脚步声杂乱。小卫坐着不动，却用眼珠斜瞅着门板，似乎不在意，原也无法判断是不是自家的来客，一种沉稳中的不屑，只有眼角的余光显示出留意的神色。

确凿敲的是自家的门，敲门声很有修养。

小卫立马站起，两步跨到门口，拉开了门。秤砣看见四五个人站在门口，有一位中年女人，肯定是做妇女工作的什么干部。倒是这位妇女干部先说了话：“要过春节了，局里领导来看望你们，这是局长。”

局长已经伸出手来，脸上配合着职业性的微笑。小卫却视而不见局长伸出的手，也不管女干部接着介绍的另三位各个方面的主管，却做出急迫的又是莫名其妙的解释：“哎呀！各位领导肯定走错门了。我不是困难户。我从来都没有困难过。各位领导走错门了——肯定。”秤砣瞅着这场景，也有点惊讶，小卫从来也没说过日子难过的话，倒是永远的昂扬；如果真是到了需得救济才能过年的程度，就足以使秤砣吃惊和伤心了。

“没错儿。是你，梁小卫。没错儿。”妇女干部说，随之就职业性或习惯性地赞颂起局长来，“局长十分关心下岗工人，一定要亲自来看

望，把温暖送到每一个困……”

“哈呀！没错儿，各位领导十分关心下岗工人，我绝对相信。”小卫更加快乐地解释，“关键是咱不困难嘛！把温暖应该送给真正需要温暖的主户。”

一个中年男干部说了：“小卫同志觉悟很高，为国家分忧解难，有困难都不说困难。”

“没有没有没有。”小卫更嘎气儿了，“不是觉悟高低的事，关键是我不是困难户。”

几经争议和推让，带来的过年礼物还是留下了。秤砣坐在稍远稍偏的地方，用不着说话，却看完了这一幕送温暖活动的全过程。他发觉随行的几位脸上已现出尴尬或阴影，只有局长温柔的笑还残留在脸上。秤砣看清楚了礼品，一袋标着十公斤的袋装大米，一块缠着显示喜气的红纸条的猪肉，估计有两三斤吧，还有装在信封里抽出来又装进去的两张百元票子。秤砣刚才看见那位女干部把钱从信封抽出来送到局长手里，在局长送给小卫时小卫只顾着分辩自己不属于困难户。局长把钱又交给女干部，女干部又装进信封，放到小圆桌上。在小卫媳妇送客人出门时，小卫只踩着门槛站了一会儿。秤砣在心里早已判断清楚，小卫属于需要救助才能过年的主儿是没什么错的。他太了解小卫了。他对小卫性情和脾气的把握甚至比对自己还清醒还准确。小卫自小就是个佯性子人，上学时与人打架吃了亏，还要说他“把狗日的美美捶了一顿”。他愿意别人说他行而不愿意说他不行，真不行也要说成行；他愿意别人羡慕他有钱而不愿意别人发出哪怕是真诚的怜悯，真没钱也在任何时候任何人面前都做出一副腰粗气爽的神气。今天，当着秤砣的面接受救助，这是让小卫太难堪的事。秤砣唯一所能选择

的就是淡化这件事，便对重新坐在简易沙发上的小卫说：“拾个啥总比掉个啥强嘛！”

“哈哈！把戏儿要得真妙哇！”小卫仍然大大咧咧地笑着说着，“他们把工厂盗光偷垮了，今日个可提着礼品送温暖……”

“嗨，你说你初几到我家？”秤砣岔开话题。

“你知道这是一帮什么货吗？”小卫固执地回到原来的话题。进门时三问都不谈厂子的小卫，现在有点不依不饶地要说话了，“那个刘厂长，还是劳模，当着这个厂子的厂长，在外边给自己还办一个厂，凡是利润大的订单都转到他的小厂去生产。至于把本厂的外购材料弄到他的小厂有多少，谁也说不清。本厂连年亏损，他的小厂却越办越红火。工人告了，上边查了，人家从账面上早都做好了查的准备，结果只查出些鸡毛蒜皮，给了个免职处分。人家早就吃肥了，不指望当厂长挣的那几个工资了，屁股下坐的汽车比省长的汽车还高级。再说今日来的送温暖的局长吧，说是更新产品，进口设备，贷款几千万，结果产品没出厂就捂死了。结论是市场变化神秘莫测，就完了。周游了欧洲，几千万买个‘死洋马’，反而从厂长升成主管局的局长了。下边工人议论说，这个局长是拿票子铺的路砌的台阶。可说归说，局长还风风光光当局长，还笑眯眯地给咱送过年的‘温暖’哩！现任的厂长你猜干什么呢？准备卖地皮。地皮现在可是值钱了。等到这个厂长把地皮卖完，这个工厂就彻底消灭了。国家养了这么一干子货，咱们小工人还能指靠这一袋米一块肉过年吗？哈哈！咱靠咱自个过日子。日子还过得不错。你让你的弟妹说，咱的日子过得咋样？”

“嫽着哩！”媳妇在厨房里快活地应着。

“这一声多脆！”小卫畅快地说，“秤砣哥来了，是哥们儿难得相聚的好日子，硬是让什么‘送温暖’给搅砸了。好了好了，秤砣哥和他送的羊腿，真正才是送来温暖了。”

小卫媳妇已经端出几盘菜来，啤酒也倒上了。小卫对媳妇说：“咱俩先敬送羊腿送来真正温暖的秤砣哥一杯——干了！”

秤砣的心底里沉沉的，有点酸，仍然做出不在意的样子对喝了酒。为了摆脱心里的那一道阴影，秤砣主动挑战喝酒，果然奏效，话多了调儿也高了。小卫一贯好喝酒，酒量却很浅，三下两下就狂声浪语起来了。

四

温馨的记忆现在不可遏制，反复咀嚼的余味却是苦涩的。

秤砣记忆里最深刻的一件事，是和小卫在这家工厂职工食堂吃的那一顿午饭。那年秤砣刚刚进入县城中学，他和小卫和铁蛋开始形成好伙伴的时候，小卫领着他和铁蛋从县城搭乘公共汽车来到城圈外沿儿的这家国有工厂。小卫的爹在这家工厂当工人。正当工厂下班时间，男女工人都是一身深灰色的工作服，许多人手里掂个铝制饭盒朝一个方向走去，欢乐的声浪把秤砣弄得不知所措。

这是秤砣第一次走进工厂，关于工厂和工人的最初的认知就是在这里得到的，跟他自小生活的乡村差异太大了。铁蛋的父母也是农民，同样是头一回进城进工厂，走路的脚步都乱了。只有小卫是三人之中最优越最可资骄傲的，他的家虽然也在农村，他的母亲虽然也是农民，然而他的父亲是工人，是穿工作服吃商品粮月月领工资的工

人。小卫不仅毫无拘束，反而比在学校更显得自在欢乐，就像进入自己的家一样畅快。小卫把他俩引到他爹的宿舍。他爹正在脸盆洗脸，满手满脸的香皂沫子。小卫向他爹介绍了秤砣和铁蛋，撒娇似的宣扬："我们是桃园三结义的兄弟啦！"他爹擦净的脸和眼做出一副惊讶："再添一个女同学可就成'四人帮'啦！"然后"哈哈"大笑。大家都笑。秤砣一下子就觉得轻松自如了。

小卫的爹领着三个孩子到职工大食堂去吃饭。饭是份儿饭。每人一碗混着肉片、丸子、猪皮、豆腐、粉条、白菜的杂烩菜，两个大白馒头，围在一张桌子上，那个香啊！

"大伯，你们天天都吃白馍肉菜？"秤砣问。

"逢到节日大会餐，八菜一汤。"小卫爹说。

"你可是天天过年哩！"秤砣说。

截止到那时候，储存给十二三岁的秤砣的全部生活记忆，就是过年才可以吃几天纯白面的馍馍或包子，荤腥的肉菜或掺着肉末儿的饺子。乡村娃娃需得盼望一年的这些好吃食，在小卫他爹的工厂的职工食堂里，天天顿顿都是。已经了知城乡和工农之间存在差别的初中生秤砣，第一次把这个作为未来政治理想要消灭的巨大差别切切实实体验了一回，留下了至今依然不能泯灭的印象。那么令人向往的工人，现在居然需要用救济的一袋大米一块猪肉和信封里装着的二百元钱欢度春节。佯性情的小卫虽然拒不承认困难户，再三谢绝救济物品，无论如何也不能再现他爹做工人时的优越和自信了。

初中毕业以后，只有铁蛋勉强够上了高中录取分数线，秤砣和小卫都回到各自的村子。已经开始活泛起来的乡村出现了盖房热潮，秤

砣跟一位瓦匠师傅学了几年手艺，最终只达到可以砌墙抹灰的水平，再复杂的工艺就弄不了。乡村建房热潮一过，秤砣彻底扔了瓦刀，买了一辆四轮拖拉机跑运输，挣了一把钱，盖成了他和杏花现在住着的三间新式水泥楼板平房。小卫回乡来大约等了三四年，等到他的爹提前退休让他顶班，一下子就成为天天顿顿都像过年的工人了。铁蛋高中毕业够不上大学录取分数线，却够着了中等专业技术学校，竟然上了省里专门培养警察的学校，三年毕业了，在市里当警察。只有秤砣还在乡村继续着乡里人的日子。工人还需靠救济的一袋米一块肉和二百元钱才能过年？这是乡村人秤砣无法想象也几乎是不敢相信的事；这事发生在好朋友小卫家里，就具有逼近鼻息的酸和痛了……

暖冬的太阳总是让人产生阳春时节的错觉。秤砣和杏花以及父亲母亲，在胡萝卜地里挖掏最后一根可以卖钱的胡萝卜。他一个人在前头抡着双齿镢头，用一层细土覆盖着的胡萝卜被挖出来，在阳光下现出红艳艳水灵灵的嫩色。父亲和母亲在他身后坐着马扎，扒掉胡萝卜上附着的泥土。杏花则蹲着挥动一把刀，嚓嚓嚓切掉胡萝卜顶头上的缨子。

“你前几天给小卫铁蛋把羊腿送去了？”父亲无话找话。

“送去了。”秤砣说。

“那俩娃娃日子混得咋样？”

“差不多。还不错。”

“城里还是好混喀！”

“会混的人混得好，不会混的人难混。”

“咋说也比乡里好混！”

“不见得。真个不见得。”

“即便不会混的人，城里有人管哩！乡里人不管混得好混得不好，没人管喀！”

“管也看怎么管哩！给你送二十斤米一块肉二百元钱让你过个年，可不管过了年又怎么混的事，二十斤米能吃几天？”

“那倒是。人说年好过节好过日子最难过。你说城里还有靠那点点儿东西过年的主户？”

“噢！听说的……”

秤砣便把发生在小卫家的实事说成虚泛的了，免得父亲再问。他不想把小卫的窘境晾到父亲和全家人面前，那是个伴性情的人。

冬天的北方田野里没有农活，也几乎见不到人，静寂容易令人倦怠沉闷，一阵儿摩托车的声响就显得格外震人。秤砣看见那摩托车从村子里驶到田间大路上来，又进入狭窄的小路朝自家的胡萝卜地跑过来，猛乍便扔了镢头叫起来：“铁蛋儿！”

话音刚落铁蛋就到地头了，和秤砣甩着胳膊像是握手又像是击掌，然后就和老人以及杏花一一打招呼，然后就和大伯大妈蹲在一起扒抹胡萝卜的泥土。秤砣爸坚决制止，半是玩笑地说：“这么干净这么细白的手，咋能干这号粗活哩！”说着就对秤砣发出不容分辩的意见：“你把镢头撂下。你跟铁蛋回屋去。这儿连口水都没有喀。”

秤砣跨在铁蛋摩托的后座上。铁蛋告诉他，昨晚从南方回到家，天明时小卫媳妇就找上门来，说小卫昨日晚上被抓了。秤砣大为惊讶，问出了什么事。铁蛋看着已驶到村口便封口不说。待两人进入秤砣的大门，在前屋里坐定，铁蛋才重新开口说："偷盗。"秤砣反而不想再问，诸如偷什么在哪儿偷怎么被抓，似乎都没有什么意思了。无论在什么地方偷无论偷什么东西都没有什么差别了，关键是偷和被抓。铁蛋还是按照思维习惯给他简单介绍了事情的经过：小卫和城郊两个农村青年合伙偷了农民两头肥猪，正好被巡逻的警察撞上了，那两个当地农民跑脱了，不熟悉地形的小卫被抓住了……

秤砣听到这儿，有点按捺不住的急切，忙问："你专门来给我报这个凶信呀？"

"唉！这事……唉！"铁蛋一声三叹，急得脸都红了，"你看看小卫……咋弄下这号事……唉……"

"好了。你甭说了。你不说比说透还好些。"秤砣点燃一支烟，"你只说咋办吧！"

铁蛋还是打破了难以出口的障碍："那天也就巧了，巡警按局里指示春节扩大巡逻区域，正巧撞上咱们的小卫。抓到邻近派出所连着审问，小卫交代他已经偷过四回了，全都是农民的猪咧羊咧牛咧……现在小卫压力最大的是偷你的牛这件事……"

秤砣吁出一口气，没有一丝一缕破案的惊喜，连刚才发生的惊讶都在这一刻散失殆尽了。居然会发生这种事！这仅仅是抽半支烟以前的不可思议的惊讶；当确定这种事居然就发生了的时候，秤砣的苦笑就难以叙说了。他问："现在怎么办？"

“我就是来跟你商量这事的。”铁蛋说。

铁蛋告诉他，派出所让小卫立即交出偷盗的猪呀羊呀牛呀的赃款，不管他实价卖了多少钱，一律按市场收购价赔偿，返还农户。另外还要加罚金……大约近万元。

“我的牛钱不要返还了。”秤砣当即说。

“小卫媳妇让我来找你，就有这意思。”铁蛋说，“小卫媳妇说牛钱将来肯定要还，只是当下太紧张。”

“不要了。”秤砣说，“再不提这件事了。赶紧让小卫快回家——剩下几天就过年了。”

铁蛋说：“我给小卫媳妇先凑一笔钱，赶紧把人赎回来。”

“我手里还有一千，你顺便捎给小卫媳妇。”秤砣说，“我不留你吃饭了。小卫媳妇肯定正等你哩！”

铁蛋骑着警用摩托走了。

秤砣重新返回胡萝卜地里。

“铁蛋走咧？”父亲问。

“走咧。”秤砣答。

“没吃饭就走？”

“警察总是忙。”

“来有啥事？”

“没啥事。”

“没事老远跑来做啥？”

“朋友嘛。”

“我看你说话冷冰冰的？”

“怪你没教会我说热乎话。”

2002年3月8日 原下

猫与鼠，也缠绵

“我要见局长。”小偷说。

“你说啥？我没听清楚你再说一遍。”李警察猛乍从椅子上跳到地上，大声反问。

小偷垂下头，没有再说一遍刚刚说过的话。他相信李警察把他刚才说的话都听清楚了。他和李警察中间的距离大约也就是三米远，他蹲在墙根下，李警察跷着二郎腿坐在椅子上，他的口齿清晰吐字很真声音也大着哩，李警察不会听不清的。恰恰可能是李警察听得太清楚了，而且大大出乎意料了，一个小偷一个小毛贼，怎么敢挑选审讯他的警察呢？而且要局长亲自来，太出格的要求。李警察从椅子上蹦到地上的举动和他佯装没有听清的反问的语气里，有惊诧，有嘲弄，有蔑视。他让他再说一遍的真实语气是，你是个什么货色你以为你是老几你是皇上的外甥吗，居然敢叫我们局长来审讯你？小偷仰起头瞅了一眼李警察，李警察整个脸上的表情证实着他的猜测。其实，小偷在提出这个要求之前，早就预料到了李警察会有这种反应的，他自己也明白局长是不可能去审讯一个小小的小偷的。这样，小偷又垂下头，没有按李警察的命令再重复申述要局长来的要求。小偷以为不再说比说更能表明他要见局长是认真的。

“说！把你刚才说的话再说一遍。”

“你都听清了……”

“听清了也还要你再说一遍。”

“那我就再说一遍——我要见局长。”

“你再说一遍。”

“我要见局长。”

“再说一遍。”

……

小偷不说了。他现在不敢说了，再说脸上可能就要挨耳光或遭唾沫星了。他低垂下脑袋，看看李警察是否还坚持要他再重复那句话。

李警察放弃了。李警察一只手夹着烟卷，另一只手反叉在腰里，在屋子里踱步，竟自乐呵起来：“我办了十来年案，大贼小贼都交过手了，还没见过哪个贼娃子开口先要局长亲自来。嗨呀呀呀……”

李警察“嗨呀呀呀”地笑着，确是把诧异、鄙夷、蔑视以及好笑等丰富的内容，都糅进那听来颇为轻淡的笑声里了。按说，平常发生的这类小摸小偷案子根本就进不了市局的门，属于案件发生地的派出所的正常业务，局里办的都是上了档次的大案要案，李警察也不会上手过问的小毛贼，居然提出要见局长，真是有点滑稽可笑了。

李警察唯一感到新鲜感到惊讶的是，这个小偷偷到了公安局里来了，偷到他的办公室里来了。这是他万万没有想到过的事。这样的案子本身就很滑稽。这样的小偷也就更滑稽。想想明天在局机关传播开以后，会是怎样的惊诧和滑稽。想想这样滑稽的案子在市民中传播开来以后会引发怎样的街谈巷议。这样滑稽的事，偏偏撞到李警察腿上了。完全是撞上了，不经意间撞上了。像他这样肩负本市大案要案侦

破重任的警察，必须审讯这个给本局制造滑稽的小毛贼了。小毛贼居然还要见局长。“嗨呀呀呀呀！”李警察忍不住又笑起来。

这个滑稽的案子，撞得真是太巧了。真得相信世界上确实有这样不迟不早不偏不差恰恰巧巧的事让人撞上。

李警察明日一早要出差，自然还是追查案件线索。这种差事对他这种职业来说是家常便饭，早已习以为常，早已没有了普通人出远门前夜的精细准备和对陌生之地的新奇和激动。他在收拾几件简单的行李时，突然发现把火车票忘记在办公室抽屉里没有带回家，说好局里公车明日一早到家接他送站的。妻子说：“这么晚了，算咧不去取咧。明天一早让司机把车拐进局里去拿。”他沉吟了一阵儿，最后还是决定当即去取回来。许是职业习惯，习惯里充斥着严密，不容许疏忽也不允许拖沓。他说：“别让司机拐来拐去的了。我很快就取回来，不过半个小时。”他就骑上摩托车从城圈外的住宅地进到最繁华的老城区了，在办公室就撞上了这个正在行窃的小毛贼。如果听了妻子的话明早顺路来拿火车票，这场滑稽的捉贼和审讯就会错过了，没有了。

他按局机关军事化的严格管理规定，把摩托车停在东墙下的车棚里，就走过院子，进入办公大楼的大门，轻捷地上着宽敞的水泥踏阶。大楼里空空荡荡，该关的灯都关掉了，楼道里昏昏暗暗，只有厕所的灯照亮着白布门帘。他突然想到，既然楼道里的灯都关了，还开着厕所的灯干什么，给谁开呢，生活里常常就有这些盲区。他上到三楼了，一个人也没有见着，这是正常的不足奇怪的事。他走到自己的办公室门口，摸着黑就把钥匙往那个圆形黄铜暗锁的锁孔里插。准确无误地插进去了，无须解释，再熟悉不过了。他往外扭动钥匙，扭动了，门却推不开。他怀疑是否拿错了钥匙，顺手把门边墙上灯按着了，楼道里一片空前的灿亮。钥匙对着哩嘛！他心里同时想，不可能

错嘛！这门的钥匙几乎跟自己身上的某个器官一样熟悉，怎么可能拿错呢。他又把钥匙捅进去，又往右边扭动一下，仍然是钥匙顺利地扭动了，门却推不开。他怀疑是不是锁子失灵了？滑丝了？可下午开门时还好着哩。他第三次扭动钥匙的时候，右肩顺势就抵到门上，用力一顶，顶不开。尽管顶不开，他却隐隐看到锁子部位的门板和门框有了一点错差的位移。这一刻，他的头发噌的一下竖立起来了。锁子和钥匙都没有问题，正是那两厘米的位移证明了这一点。那就肯定是屋里有人顶着门，这人肯定不是正常的人了，黑着的灯就又证明了在屋子里潜藏的人属于哪样的人了。所有这些判断，都是李警察在用右肩一抵的瞬间完成的。他随之在接着的一瞬间就声色俱厉地叫起来：“谁在里边？开门！”他已经离开门口，贴墙站着，如果有人冲出门来，他只需伸出一只脚就置对方于死地了。他又对着门喊：“狗日的不想活咧！”

门依旧死死地关着。

他用肩膀抵住门板再推，隐隐听到了门里边压抑着的喘气声。他的头发又一次噌地竖了起来。他抓过号称杀人魔王的罪犯，也没紧张到头发竖立的程度，这个隐藏在自己办公室里的歹家伙，却使他两次头发竖立，如同人在野地里看见蛇和在自家床上发现蛇的感觉是有截然差异的。他抵着门板的肩膀和歹家伙顶着门板的肩膀同时都在发着力，肩膀和肩膀之间就隔着一层不过几公分厚的木板，进行着殊死的较量。他又想到，如若对方猛乍抽身，他肯定会闪跌在地，歹家伙一跷就会逃出门去。他又贴着墙壁做好出脚的准备，对着屋子喊：“你狗日再不开门我就挖门了。”他已拨动了值班室的电话，自然说的是悄悄话。

值班的刘警察话毕就到了。两人决定同时用手去推门板。李警察提醒刘警察，小心闪跌！然后再次把钥匙插进锁孔，往右扭动。两人合力一推，那门板就一寸一寸移位。可见里面的人绝不轻易放弃，直到无奈直到大势已去，放弃了抵抗，门开了。李、刘两位警察冲进门时，全都是训练有素的规范化的捕抓凶犯的动作，直到两人看见门后地上蹲着的人，双手抱着头，毋宁说护着头顶，同时就松弛下来。李警察一把揪住那人的头发往后一掀，那人闭着眼睛的脸就呈现出来。李警察几乎失声叫道："怎么是你？你到我办公室来干什么？"刘警察也惊讶地叫起来："怎么是你？"

这是市局机关里烧锅炉的那个小伙子，在水房里干了十多年了，嘴唇和两颊上的茸茸黄毛，业已变成又黑又硬的胡楂子了。

水工从口袋里掏出一沓人民币来，放到就近处那个三角书报架的架板上，这些刚刚偷得的钱可能在兜里尚未暖热。他一步也不敢动。他不做任何分辩也不撒谎，掏出赃款来就表明他已经不做任何徒劳无益却可能招来耳光的对抗。李警察很熟练地把他的双手扭到背后，使其丧失全部反抗和报复的能力。刘警察同样老到地搜查他的每一个衣兜，尚未发现任何凶器。尽管如此，李警察还是把一副手铐扣在水工的右手腕上，同时扣住一只木椅的一条木撑子。然后就和刘警察开始审讯。你在本局院子里偷了多少次？你都偷过哪些人？你偷过多少钱？还有什么物品？你在社会上作过多少回案？就你一个人作案还是有同伙？是谁？诸如此类最基本的疑问都问过了。其中往往夹杂着李警察和刘警察带着情绪性的话语，诸如：你狗日吃了豹子胆居然偷到市公安局里来了！平时看去你老老实实勤勤快快憨憨厚厚的农民小伙子，怎么会是个贼？老鼠居然钻到猫窝里偷食来咧！无论李、刘两位警察怎么追问怎么损刮，水工却只有一句话回答："我要见局长。"拖

得时间稍长逼得也紧了时，水工对于那句话做了修改，意思更明白了点儿：“见了局长我把核桃枣儿全倒出来。”

李警察的手机响起来。是妻子打来的，问他怎么出门这么久还不见回家。他说他跟值班的刘警察说说话儿，没有什么麻缠事。他把意外撞上这个小毛贼的事对妻子保密下来，是职业的严格纪律，已成习惯。而妻子对他这种职业所形成的担心，或者说担惊受怕，却已形成一种心理惯性。她在电话里开始数落：“你这个人出了家门就不知道回家了。你明天要出差要起早你还不知道早点回家，又没有什么正经事。”李警察口里“噢噢噢”应答着马上回家，同时就把刘警察拍了一把，两人走到楼梯口来商量。李警察笑着挖苦：“这狗日的死咬着要见局长，该不是咱局长的外甥吧？”刘警察同样挖苦似的笑笑说：“没听说过局长有这门亲戚。这货在局里烧了十多年的锅炉了，没见过跟局长有啥来往咯！不过也许万一有情况，局长有意避亲躲闲话也说不定。”李警察为难地说：“这号小毛贼的案子挂都挂不上号儿，怎么向局长开口说这话呢？怕是寻着受夯挨头子呀！”刘警察说：“不管局长来不来，得让局长知道这件事。这个案子虽小，跟社会上的偷盗不一样，它发生在市局机关大院里。”李警察连连说着“对对对，有道理”的话，同时也就有了主意：“我给局长报告机关院内发生的偷窃案件，顺便捎带一句小偷要见他才交代问题的话，看局长怎么说就怎么办。”刘警察表示赞同。不过两人都估计到局长是百分之百不会来的。两人就商定，把小偷转移到值班室继续审讯，或者等到明天早晨上班后交给相关部门去。李警察得回家去了，明天出差有更重要的案子。

李、刘两位警察都没有料到，局长居然答应亲自来审讯。李警察愣过神儿一边挂手机一边说：“牛刀真的出面杀鸡来咧。”刘警察也跟着阴了一句：“噢呀！说不定真个把局长的外甥扣住了。或者是局长的

远门亲戚也说不定。”无论如何，有一点可以立即做出决断，李警察不能马上回家了，得陪着局长。

截止到李、刘两位警察抽着烟等待局长到来的时候，他俩同样百分之百地丝毫也不曾意识到，正是他俩的这个电话，把他们的局长送进了地狱。

局长在他的二楼办公室里通知李警察去汇报案情。刘警察看守着铐着一只手的小偷水工。李警察走进局长办公室。局长坐在单人沙发上喝茶，把另一杯沏好的茶水推给李警察，同时指一指并排隔着小茶几的另一把单人沙发，让李警察坐下。李警察有点拘谨地坐下来，礼节性儿地握住了装着茶水的一次性纸杯。他刚才和刘警察在楼梯口商量该不该把小偷的要求报告局长的时候，还轻松地调侃小偷会不会是局长的外甥一类调皮话，现在却无端地拘谨甚至紧张起来了。他就从他来办公室拿明日出差的火车票说起，一直说到给局长打电话为止。他特别解释了要不要把这件事给局长汇报的两难选择。局长真诚地表示，他处理这件事处理得好，说："公安局被偷，当然不是一般的偷盗案子，你说得很对。我也是从这一点考虑，才亲自来审这个小毛贼。他不提出要叫我来我也要来。贼娃子偷到咱们心脏里来了，闹笑话哩嘛！"

局长很平淡地做出安排："你明日要出差你就可以回家了，别影响了正经事。"李警察忙说："我年轻少睡一会儿不碍事，明天坐火车还可以睡觉。我得陪着局长，万一有事你跟前也得有个帮手。"局长淡淡地笑笑，说："这么个小毛贼，我还对付不了哇！万一有事还有小刘在跟前，有一个人就行了。"这样，李警察就不再坚持留下为局长当帮手的想法，看着局长把那只黄绿色的帆布挎包挂上肩头，相随着一起出门，一起上三楼，一起进入自己的办公室，对小偷说："我们局长来

了，你就老老实实交代你的偷盗事实吧。”然后就退出办公室，和伺候在门外的刘警察告别，就回家去了。

李警察下楼，出楼，走过院子，在车棚发动摩托车，直到驱车穿过大街小巷，脑子里就隐隐浮现着局长那只黄绿色的帆布挎包。这种帆布质地黄绿颜色的挎包，曾经在六七十年代风行整个中国，人不分男女长幼和职业，出门一律都是挎着这种包在肩头的。将军挎这种包士兵也挎这种包，教授挎这种包小学生也挎这种包，部长省长和工人农民一样都习惯挎这种包。这种包体现着绝对的平等和绝对的一律。这种包现在在城市里几乎绝迹，连贫穷落后相对不太注意装潢的乡村人也没人用了。随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也结束了一种包的价值，或者说一种包的被废弃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然而，局长还挎着这种包。局长一年四季上班下班开会出差都挎着这种包。局长当警察时挎这种包，调办公室当副主任再升主任挎着这种包，直到跃升为副局长再到局长，几十年所有变化中唯一不变的就数这只包。他曾经亲自批示过给全局干警买一种实用型的手提式皮包的拨款报告，自己却从来也不使用那个质地不错的皮包。这种黄绿色的帆布包挎在局长肩头，早已成为本局一道迥然的风景，这种早已陈旧的过时的包在局长肩头却形成别致的新颖。人们不仅不以为它落伍，反而装满了敬重，也装满了荣誉……至于局长如何审讯小偷水工以及审讯的结果，他已经全然漠不关心了。这个小案子小毛贼，本身不具备让他关心的分量；即使局长这样的牛刀亲自出手，也不会撕下几两肉来；只是因为发生在公安局办公大楼里才不一般，只是体现局长的一种作风一种姿态罢了，案子本身并没有多少意思。

李警察把这个撞到腿上的案子轻描淡写地说给妻子，突然意识到对他的一个重要好处。正是这个贼向妻子证明他私设的小金库里只有

五百元人民币。小偷把他的大小抽屉全部翻了搜了，就是这个数儿。妻子总是不相信他的小金库银子的储量。他解释过多回也无法使妻子的心稳妥下来。现在可好，小偷水工向妻子揭开了谜底儿。妻子舒展地笑了，就把他拢上床去，刚刚获得的踏实的心就蒸腾起更多的温柔，兼蕴含着曾经疑猜小金库打着埋伏的歉意，全部融为一种前所未有的温柔和激情了。李警察自然敏感到熟识的老套里新生的鲜活，作为远行前夜必有的夫妻之事，呈现出新鲜的别开生面的美好……明早轻松上路。

李警察办公室里，局长对小偷的审讯正在进行。

局长走进李警察办公室，第一次和铐在椅子横撑上蹲在地上的小偷水工眼光相撞时，随口轻淡地说出一句："嗬！是你呀！"然后就在椅子上坐下来。刘警察送走李警察，自己在门外侍候着。

小偷水工低下头没有说话。他心里想，从局长到大门口站岗的武警再到扫地务花的勤杂工，任谁知道在水房里干过十多年的他竟是一个贼时，都会发出这样的感叹来。既然贼的面目已经暴露出来，任何人的惊讶对他都不再构成压力。压力只在本真的丑相处于可能被揭开而又可能被继续掩盖的时候才会发生。

"据后勤处同志说，你是用过的民工中最能干最勤快的一个，哪个民工也没干到你这么长时间，十多年呀！从领导到警察对你都很信任嘛！甚至在待遇上把你都当局里职工一样对待呀，结果你却干出这样的事。"局长说，"农民孩子的忠厚老成到哪里去了不说，你连起码的良心都没有。"

小偷无动于衷。这全是废话一堆喀。作为一个贼被铐在椅子下边的横撑上，在你的眼前脚下的地板上蹲着，你却说这一堆属于情感范畴的话，什么作用也不起。小偷心里现在最焦虑的是什么结局。锅炉肯定烧不成了，当水工的工资也挣不成了，都不重要。要紧的是会不会判刑蹲监狱，重判还是轻判，毕竟偷的是公安局这样的谁也不敢碰的单位。其他属于感情世界道德范畴的话语，对他来说任何力量任何意义都没有。他现在低垂着头，等待恰当的时机，按自己蓄谋已久且十分确定的一招进行。这一招是他被李警察铐到椅子横撑上时就冒出来的，相信绝对有效的；如果这一招不能奏效，他就只有蹲监狱一条路一个结果。让局长说吧！局长想说什么，局长无论怎么说怎么问，他都听着。

“我把你狗东西毙了！”

局长“啪”地拍响了桌子，声响震天，同时就直昂昂地突兀在小偷眼前。刘警察当即推门进来，看了一眼局长又看了一眼小偷，弄明白没有意外情况儿，又退出身子拉上门板。

“枪毙你都便宜你了。”局长又补说了一句。

小偷水工低垂着头，心里突然觉得局长不像个局长了。这么大失法律水准的话，居然从他的嘴里说出来，而且鼓着那么大的劲。就他的偷窃行为和偷得的钱数儿，离着挨枪子儿的距离还远得很哩！这种吓唬不仅不起作用，反倒让小偷惊讶局长怎么会说出如此差池的话。小偷倒是有点急，局长一会儿动情的软话一会儿乱抡的吓人的硬话，都不是他等待可以说出那一招儿的时机，就只好再等着。

“明日这事一传开，看看这些干警把你砸死！”局长说，“你们村子的农民知道你竟敢偷公安局，看看谁还会把你当人看。你爸你妈你媳妇，谁在村里还能抬起头来？”

这一下刺中要害穴位了。小偷不自在地扭了扭身子。这是他最敏感也最虚怯的一个穴位。道理很简单，从明日起他就不是公安局的烧锅炉的水工了，可能一辈子再也不会走进从早到晚有武警站岗的这幢高大气派的门楼了，这个院子里的头头脑脑和普通警察会怎么骂他，他都听不见了，也就没有什么压力了。而他生活的村子里的人们的眼色，才是他最不堪忍受的。一旦他的贼皮在村子里亮出来，直到进入棺材也甭想脱掉了。还有他尚健在的父母，也将在别人的那种眼光下度完余生。更有他正上小学的一女一男两个孩子，心里也将罩上父亲一张贼皮的阴影。这个敏感的穴位在他被李警察铐住右手的时候就刺疼了，只是时间和地点都不容他更多地去纠缠，眼下最致命的穴位是他的结局。因为会不会重判或轻判，比他和他的父母他孩子的面子都重要得多。

“说。”局长重新在椅子上坐下来。

“交代你的罪行吧。”局长点燃一支烟。

“你不是说要我亲自听你坦白吗？”局长说。

小偷水工抬起头来。他心里的整个感觉和全部智慧迅捷地完成了一次整合，形成一个判断，现在到了抛出唯一能够拯救自己的那一招的时候了。他抬起头来的时候，没有忘记沉稳，为此而稍作静默，然后才说出来蓄意已久的一句话——

“局长，我偷过你。”

小偷说完这句话，看了局长一眼就低下头去。在他短暂的一瞥里，看见了局长的眼光避闪了一下。那一瞬，他相信他掐中局长最致命的穴位了。这个穴位对局长来说，比局长刺中他的那个虚怯的穴位要致命百倍。局长躲闪了一下的眼光，标志着他和他的关系的根本性易位，老鼠咬住猫的脖颈了；双方在这一瞬间，都清楚谁对谁更致命。他很快低下头去，就是不要再继续去看局长的那种眼光，只要看见躲闪的那一下就行了。让局长掂一掂分量，尽快做出选择。小偷现在是一位超级心理学家，认为像局长这样有身份的大猫，在这样不容久耽的时限里，要与一个他这样的老鼠做出同流合污的妥协达成一种利害同盟，是十分残酷的。他如果一眼不眨地盯着局长，于局长做出他所期待的选择是不利的，他低下头，就是留给局长一个不受逼视的软空间，对这个无法回避的残酷做出自己的整合。

“我不记得我丢过钱。”局长说。

局长说这句话的时候，是一种轻淡的口吻，却也没有否定小偷坦白的事实，只是不记得。他做出这样的回答，是在接到李警察的电话之后，出门上路回到他的办公室时就已整合出来的选择。李警察在电话里向他报告了小偷要对他坦白的要求，他就准确无误地判断出小偷要对他说什么事了。那一刻，他同时感到了地狱的恐惧。这个突然袭来的灾难，比之本市发生的几十年不遇的恶性案件对他更具威压。任何恶性案件的发生，只是增加他的工作压力，对他本人并不构成威胁；这个小毛贼所做的案子虽然不足挂齿，却对他个人的命运直接造成威胁。如此之突然。如此之意料不及。毁灭之网竟然由一个小偷对他撒开。对这样的灾难从来没有心理防范准备，没有先例也就没有参照可循，真是无法找到一个安全可行的办法来处理这个小偷已经抛出

的罗网。他现在说出的听来不大在意的话，是他所能说出的自认为最恰当的话。

小偷仍然低垂着头。他在专心致志地解析着局长的话，尚不敢轻率做出反应。

“说，你还偷过谁？”局长说，“包括你在社会上作的案。”

小偷水工当即意识到，不能让局长就这样轻松地滑开。他甚至在这一刻产生了一种蔑视，你没有做出任何一点儿承诺，怎么可能让我松开咬你的口呢？你怎么可能轻轻松松逃开了呢！他才不想向局长坦白其他偷盗案件。他相信局长其实也无心听他交代其他偷盗案件。他继续低垂着头，而不想和局长对视，就说——

“我偷过别人，钱数都很少。我偷你偷的次数最多，有两次数字很大。”

他说完仍然低着头。他不想看局长眼里的脸上的感情反应，避免对抗，仍然想留给局长一个重新掂量的软环境，以期盼局长朝着有利于自己结局的方向转折。

“你胡说哩嘛！我办公室顶多留一点抽烟和吃饭的零钱，谁拿了也不在乎。我的同事常从我抽屉拿钱让我犒劳他们。”局长说。

这真是稀罕的案情，不管它大小，都是稀罕。小偷坦白招供他偷了局长，局长却拒不接受。局长针对小偷的进攻，做出尽可能轻淡又轻松的反应，让怀着最阴毒的目的的小偷逐渐接受这样的理念，你手里攥着的那个把柄，已经没有证据，可以用如上的话不大费劲就化解了。局长已经意识到现在到了最危险的当口儿，对手已经兜出他攥着

的最后的王牌了，他反而比初听到电话报告初见这个小偷时更具信心了。

小偷听到这里，也已无路可择，更坚定了按最初的一招进行到底，现在还不是这一招完全失败完全捞空的时候。他仍然低着头，说得更具体，把撒手锏抛了出来——

“我有两次偷你都偷得五位数。你都没有报案。”

这个话里的潜台词是明白不过的。小偷明白，被偷的局长更明白。李警察把电话打给他的时候，他的脑子里立即蹦出来的就是这两次被盗的五位数的款子，致命的在于他两次被盗都没有报案，这是他现在最难排除的心惊肉跳的致命的穴位。小偷已经把话说到头了，他只要把小偷最得意的这个把柄化解掉，就会彻底粉碎这个小毛贼的阴招了。他反其道而行，索性把小偷的阴招全部掰开：

“你可以说你偷我的数字是六位七位数。你说得越大，我越无法解说这些钱的来源。你想反咬一口让我解脱你。我明白。你这点小九九很阴毒，可谁会信呢？你想想你诬陷的后果，比你偷盗的行为要严重得多。”

小偷水工现在才感到了软弱。他抛出撒手锏而没有收到杀伤性效果，就感觉手里空空心里也空空的软弱了。他现在才重新感觉到了局长警衣肩头的那个标志性符号，是这个大院里人人敬畏人人仰慕的唯一一个标志符号，是最具分量的。还有那个黄帆布包，就放在旁边的桌子上，这个过时的稀世陈物也对他软弱下来的心构成一个沉重的压力。

局长觉得这个飞来的横祸应该过去了，化险为夷了。他现在才能拿出自己的一招儿。他清楚小偷要什么。他在李警察报给他的案情电话的最初反应，感觉到了横祸的同时，也明白小偷要向他坦白的目的，其实说穿了就是一点小小的勾当。他不能在小偷的胁迫下让小偷的欲望得到满足，留下心灵深处的亏损。他要把小偷这个歹毒阴险的招数粉碎之后，不失局长体面地给予他一点满足。

“你偷了同志们包括我的一些零用钱，算不上什么大事，老老实实交代，争取宽大处理。但——”局长说，“这件事性质恶劣，影响太坏！你居然敢在公安局行窃。我当然得亲自过问了。”

小偷水工听到这里，似乎心里有数了。他的脑袋此刻抵得住一台高速高效运转着的电脑，条分缕析，字斟句酌，刨皮搜核儿，既是一位精确的语言大师，又是一位洞察微明的心理学家。他已经判断出来，关于他偷盗案件的性质和处理结果，都包含其中，而且为他下来要做的口供定准了调子。小偷水工准确无误地抓住了局长这段话里的关键词：零用钱。把局长两次被他盗走的均上了五位数的款子缩小为零用钱的一般范围，于他就“算不上什么大事”了，于局长也就更算不上什么大事了，被盗大额款子而不报案的嫌疑也就化解无虞了。局长后半句话的意思，无论性质多么恶劣，影响坏到怎样的程度，并不依此为据来量刑，真实的用意只是解释局长为这件小案子而出马的因由。这样，小偷要见局长的目的已经达到，蓄谋的一招已经实现了效果，就该及时回报，让被他咬住的大猫也心底坦然。他当即对局长说：“局长，我没偷过你。我连你的‘零用钱’也没偷过。打死我我都说这话。”

局长已经转身拉开了门，对刘警察做出纯粹业务式的安排：“就这样，暂时就这样了。太晚了你先把他关起来。明天我安排人正式审

讯。”

小偷被刘警察带到四楼一间空荡无物的房子，把手铐的另一半扣死在墙上的一个钢环上。他在心里嘲笑刘警察，你不给我戴铐子我都不会逃跑了，你不锁门我都不会逃跑了，我现在还有什么必要逃跑呢！当屋子里剩下他一个人的时候，顿然觉得被抽了骨头也被挑除了筋儿的疲软，高度的精神紧张一旦解除，攥紧的心一旦松开，比射精快感退去之后的疲软还要疲软，欲望完全满足之后的慵懒被瞌睡挟裹着进入温柔之乡。在跨进梦乡之门的最后一缕清醒的意识里，他的脑海里久久闪现着局长最后一瞥的目光。他对局长用压低了的声音说他连局长的“零用钱”也没偷过的时候，局长只瞥了他一眼就迅即避开了。那一瞥忽悠一闪之后就深掩不漏了；初见的那一刻和现在令他仍然挥之不去的这一刻，他在心里一次又一次地发出吟诵，他和我一样其实都是鼠哇！

三天之后，局长被“双规”。

李警察几乎在局长被“双规”的当天，在南方的海滨就知道了这个惊天的消息。电话是刘警察打给他的。他当时正在温厚的海水里游着。他是一个生长在北方旱地却擅长水性的人，难得有大海这样施展生理优势的好水。他回到沙滩上休息的时候，手提电话响了。他听到刘警察报告的消息时如同发生了地震，一打挺就从沙滩上跳了起来，连声问：“你说啥你说啥你说啥？”

极端的震惊之后也是一种疲软。李警察躺在沙滩上，也如同被人抽了筋剔了骨似的疲软。他也开始向温柔之乡移动，在进入梦乡的门槛时尚存的一缕清醒里，眼前像蝴蝶一样飘忽闪动着局长那只黄绿色的帆布挎包。到李警察从沙滩上重新站立起来时，这只黄绿色帆布挎

包还历历飞舞在眼前，不过里边不再装着敬重和风度，而是老鼠和蛤蟆以及浸淫的耻辱和肮脏了。

晚上，李警察躺在宾馆的房间里，妻子又打来电话告诉他局长被“双规”的消息。他说刘警察已经告诉过他了。妻子似乎抑制不住惊奇和新鲜，说事情的起因正是他出差前夜撞上的小偷牵扯出来的。他说他知道，刘警察已经说过了。妻子仍然不甘心扫兴，告诉他局长被宣布“双规”的有惊无险的情景。局长被省上通知去开会。局长还挎着黄绿帆布包坐三菱车去了。局长走进会议室大门，发现会议室内空无一人，还以为自己是第一个到会者。门后闪出两个人同时扭住了他的胳膊，搜了他的衣兜儿，又搜了他的黄帆布包儿——怕他带枪。然后一位领导从套间出来向他宣布组织的决定。她还告诉他一个细节，就在他的局长被宣布“双规”那一天，日报还登着一篇很长的写他勤政廉洁的通讯，作者把那个黄绿色的帆布包单独列了一章，赞美的句子和诗歌一样。他却为那位作者解脱：“我要是那位作者也会这么写的。”使妻子大为扫兴，把局长东窗事发的过程和细节省略不说了。

半个月之后，又是海滨，沿着中国陆地的又一个城市的海滨。李警察和他的一位河南籍的同事，循着这个案子的线索又追踪到这个滨海城市来了。他把他的旱鸭子同事拖到海边来。他在海里劈波斩浪，他的河南籍的旱鸭子朋友在浅水里泡着。他们又先后回到沙滩上抽烟，从报童手里买来一份当地的晚报，翻出来有关他们局长的新闻报道。通栏大标题，醒目，震人。他和他的同事挤蹭着头，几乎同时看完了标题很大而内文不长的文章，过目不忘的是最刺眼的一段文字：小偷交代说，他偷过局长十二次，累计偷得六位数的赃款。他偷第一次时，局长还是办公室副主任。局长升主任时，他偷过。局长升副局

长时，他也偷过。局长升成局长时，他仍然偷。无论偷多偷少，局长都没报过案。局长在“双规”期间交代，这些被偷的钱都是赃款……

李警察的河南籍同事拍了一巴掌报纸：“我操！”

李警察接着用自己的乡土话应和：“我日他妈！”

李警察的同事转过脸模仿李警察的口音：“我日他妈！”

李警察顿然也想滑稽一回，模仿他的河南籍同事的口音：“操！”

2002年7月27日 原下

关于沙娜

这个作家是一位工作和生活都十分正常的作家。天明即起，洒扫清洗，早点自烹牛奶鸡蛋，外加一块馒头，然后坐下来写字或读书；没有废寝忘食，也没有彻夜长熬；不喝酒，更不吸烟；似乎也没有什么抢眼的卓尔不群的风度，读者从报刊上看见的照片，也正常普通，没有目极八荒的伟岸，没有双臂架椅纵论天下的派势，也没有手搓长发眉头紧锁誓与民族共死生的痛苦万状的景象。这个作家很平和，生活和工作平静的时候很平和，被生活和工作中的龌龊事狠狠地龌龊着的时候，依然很平和，把愤怒用平和表达出来的时候，就成为一种个性、一种风度。据说作家出身于一个古典文明很纯正的家庭，培养孩子的诸多戒律中有一条很难做到，不许喜怒无常情绪失控。这样的家庭和受这样律条训诫的孩子也不是绝无仅有，所以并不排除作家性情中的先天性因素。

作家现在骑着一辆自行车正在往回赶路，乳白色的水雾说不清是在消散还是朝峡谷里隐退，笼罩在雾帐下的村庄渐渐裸现出来。灰黑的瓦和粉白的墙，在庞大的树冠下在密如壁垒的竹林中时隐时现，时有一幢幢款式新颖的小洋楼从眼角掠过，有鹤立鸡群的感觉。作家的头发和眉毛上都凝结着细密的水珠儿，面颊也湿润润的。作家每天早晨醒来，不洗不梳，便踏上自行车骑出县城，来到纯粹属于农民生活的某个村庄某个岔口某条山沟的地方，有时候跑出去二三十华里，尚未铺垫柏油或水泥的坑坑洼洼的山野道路，既要求你紧握双把儿，还要你目不斜视心不二用，对轮下的路况做出选择，随机应变调动车头，稍微马虎就可能被石头撞翻，被窝进深坑，或绊倒在拖拉机碾出的七歪八扭的辙道里。作家的大脑和心脏在简单的专注里得到调节和

休息，还有整个身体的锻炼。在这样的山地沟谷间的自然状态的村路上骑自行车，使足部、小腿和大腿的肌肉得到锻炼自不必说，腰部、双肩乃至整个身体每一个部位的肌肉、筋骨和血流，都在频频的小颠大簸中运动不息，心脏、肠胃等内脏都在颠簸里颠簸着。作家有意或无意地自我抚摸时，都明显地感觉到了双腿双臂腹部和臀部的肌肉重新紧凑起来重现弹性。作家骑车到某个择定的地段，扔下车子，在田间小埂上随意走走看看，或者在草地上做一点踢腿舒臂的轻微运动，然后再骑车返回日渐繁华日渐喧嚣的县城。作家两年前开始这套别出心裁的晨练项目的时候，县委书记正儿八经地对此事做出安排，让一位司机送作家到任何感兴趣的地方，晨练完了再送回来。作家不做解释，淡淡一笑说，那我就不去了。书记很诚恳地解释说，你的写作我不懂行也帮不上忙，但我得负责你的安全。山大沟深野兽出没，人也刁悍，万一出个差错谁也受不了。你是名牌作家，是稀有动物，是大熊猫是金丝猴是朱鹮。我的职责是保护，这是上边领导叮咛过了的。作家仍然淡淡地笑着，心里却想，自己在草地在田埂上伸胳膊踢腿，弯腰仰背撅屁股，让一个小伙子站在旁边是不可思议的。况且，骑着自行车所发生的身体各个部位的颠簸的美好感觉和奇妙的健身效果，统统没有了。作家说，忘了给你交底儿，我曾经在省武术队受过专业训练，三五个人近不得身，尽可以放心。

作家骑车驶进文化馆的院子，一眼瞅见自己的门外站着一位年轻女人，墨绿的裙子和粉红的短袖衫，就像在瓦沟和砖缝都透着千年古气的小院里浮现着的一朵清丽的荷花。作家来深入生活时，选择了文化馆作为栖息地，主要是空间里气氛的适宜。文化馆设在孔庙里，平房很多，虽然破旧，却不断修补，漏了修塌了补，画画的跳舞的唱戏的写作的和行政管理的干部们快活地生活在这里，和这些古老的平房

一样古老的合抱粗的柏树下，每天早晨都有一层乌鸦粪，绝无仅有的一方和谐之地。

“秦书记——”

作家骑车到自己门前，刚跳下车，正打算招呼等候自己的女人，对方却先开口了。这个女人很漂亮，脸上和胳膊上裸露的皮肤很细腻白净，眉眼和脸上的气韵都很大气。这样的眉眼和这样的气韵，在纯粹的山民的宅院里是看不到的，也区别于县城街道上那些晃来荡去的天不怕地不怕只怕警察的女人。作家问：“你找我？”

“对。秦书记。”

作家开锁，先让客人进门，自己再进去。作家让客人坐在沙发上，把一只沏上茶的纸杯放到客人面前的茶几上，也给自己那只瓷杯添上水坐下来。作家问：“你找我有事？”

“对。秦书记。”

“你说吧，啥事？”

“我要当乡长。”

作家稍稍愣了一下，确是意料不到的事。作家眨了眨眼，专注地看着这个要当乡长的女人。女人确实很漂亮。在门口初看一眼是漂亮，现在坐在对面再看还是漂亮，粗粗儿扫过一眼很漂亮，专注地细看起来更漂亮。这个漂亮女人坦率而又平静地说她要当乡长，说过之后依然是坦率和平静。这样漂亮的眉眼里蕴藉着坦率和平静，就使漂亮有了气韵和质量，作家发觉自己已经喜欢上这个女人了，这样坦率地“跑官要官”的人，作家竟然喜欢上了。

“你在哪个单位工作？”

“三岔沟乡政府。”

“噢！我唯一没有去过的一个乡。”

“欢迎你去。太远了，路不好走。”

“我已经习惯山路了。”

“你去了，我陪你到下边去看看。”

“你说你要当乡长？”

“是。”

“你现在是副职吗？”

“不是，一般干部。”

“你在乡上分工做什么工作？”

“名义上是搞妇女工作，其实啥都干，啥事紧火了就干啥，哪儿戳下窟窿了就补哪儿。”

“你为什么一定要当乡长呢？”

“我觉得我能当乡长，我要是当上乡长一定是个好乡长，我肯定能当个好乡长。”

“你们乡上给县上推荐过你吗？”

“不推荐我还臭我。”

“为啥？”

“我回答不了，我也弄不明白。”

作家不好再问什么了，这个要当乡长的女人显然是不想直面回答，而不是回答不了，更不是弄不明白。她前面说的“还臭我”的话，实际已经是答案了。这里留下的令作家推测的可能性是多向的，这样短而又浅的交谈无法得出明晰的结论。作家便想松弛一下，绕开话题：“你叫我老秦吧。别叫官名了。那个官衔是为我下乡方便，没有实际意义，作家兼职的官衔跟一般官衔有区别的。”

“你甭推，”女人说，“我知道你是兼职，我也知道你并不管县上的具体事，我只是让你给书记把我提一下。”

“我不推，我可以提建议的。”

“对，这就对，我就是想让你给书记把我推荐一下。我一个普通乡干部，要见县上领导，比见总书记还难。”

“我好坏也是个书记嘛！你连招呼都不打就来了……”

“你是兼职，你也说你是兼职咯！你要是真的当上管事的书记了，肯定也就一㞞样儿的难见了。”

“你的嘴好畅快哇！”

“你是说我说了个㞞字吗？而今㞞字都被人嚼烂了。酒席上一个㞞字从头说到尾，讨论会上一说到㞞就生龙活虎了，男人不说㞞没人

缘，女人不说屌不可爱，领导不说屌脱离群众……哎呀！你们作家不是整本整本写屌的文章吗……”

“你这么漂亮又这么年轻，开口闭口就是屌长屌短地说话，也是为讨个好人缘呀？”

“反正我走到哪儿也躲不过个屌字，我就说，他说我也说，他说我不说他就得意了，我也说了他反而得意不起来了。”

“噢！有这样的效果？”

“难道你没有遇到过？”

“遇到过，城里人比乡里人还喜欢说。”

“你也躲不过吧！躲不过你咋办？”

“跟你一样——也说。不过，没有你那样的效果，我如果掺和说了，他们就更兴奋更肆无忌惮了，恨不得把屌皮子剥开说。”

“我还以为城里人文明不说哩！”

“一屌样儿。”

随之是漂亮的女人爆发的笑声，她先是仰起头笑，笑得浑身颤抖，粉红色的鼓胀的胸脯悠悠地颤着，直到扭过身子趴在沙发一边的扶手上，半天直不起腰来。她已经笑得浑身瘫软，再也发不出笑声，却仍然抑制不住想笑，喉咙里就喷出“嘿……嘿……嘿”的声音，缓缓地抬起头来，断断续续地笑着说着：“秦……秦书记……你也……敢说屌……哩……”

作家自己反而不笑，作家也没有生活在真空中闺阁里，在城市的文化人圈子里，以男女生殖器创作的或隐晦含蓄或直白粗浅的“段子”，层出不穷花样翻新繁茂不衰。餐桌上传统的猜拳行令的娱乐方式早已消亡了，“黄段子”成为美酒佳肴的佐料或者说进行曲，作家的耳朵早被屌的进行曲磨出茧子了，作家说：“你一口一个屌字我都没笑，我说了一回你就笑成这样儿。”

“你是……书记……还是……作家……嘛！”

漂亮的女人喝了口水，拢了拢头发，脸上就恢复平静了，“你看看，咱们也是说起屌来就把正经事儿忘了哩。哦！秦书记，你就在书记面前推荐一下我。”

“我除了听你说了一通屌，啥也不了解呀，你能不能给我说一下你的政绩，只说你。”

女人甩了一下头发，喝了口茶，开口了。

“我只说修水电站的事吧，我们乡最僻远了，电还不通。三任乡长都想修个小发电站，都没有修成，水电局不给钱。我给乡长说你把这事交给我吧。乡长说我们几个头儿齐上阵了都要不来钱，你能成？我说反正你们已经没诀可掐没猴可耍了，我来试试。不出两个月，我把钱要来了。现在，有电了。”

“你怎么要来的，上床？”

“看看看看看！你看看你看看！连你秦书记都这样说，难怪别人臭我哩！”

“我跟你说着玩哪！”

“我把钱要来了，却把我搞臭了。都说我把局长哄到床上才把钱要来了。人家编得有鼻子有眼儿，连细节和对话都活灵活现，比小说写的还曲折比黄片演的还露骨。秦书记你也是个女人，我就给你说一句最难听的……说局长见了我连老命都不要了，一夜弄了八回第九回休克了……你看看他们怎么臭我！”

“你应该让乡长出来说话。”

“现在谁能堵得住谁的嘴！反正又不违反‘四项基本原则’。”

“那你还怎么在那儿工作？”

“我不管，管不了也就干脆不管。局长也惨了，他老婆跟他闹，我倒是替局长难受了，别人乱说是一回事，家里人闹就麻烦了。我就去找局长老婆，那老婆一见我鼻子都歪咧，我一手抓住她打过来的两个手腕儿，她连动都动不了。我真的学过拳道。我听说你也练过。我用另一只手指着她的鼻子：‘论权论钱，数上你的老汉，论起㞗来，你看看我家小伙子。’我把我丈夫的相片支到她眼前让她看，我又说：‘你老汉是个好老汉，少有的好老汉。你把这个好老汉的脸抹得五麻六道，你作孽！’我把她的手撂开，我走了。那老婆居然没动静。”

“嗬！我真刮目相看了。那么你说说，你怎么把钱要到的？”

“其实也是我遇上好机会了。前头三个乡长要不来，也该轮到我们乡了，再不给我们就没有说辞了。当然，我也陪局长和相关干部吃饭喝酒，酒席上，我发现局长也爱说爱听㞗的段子，我也就凑热闹说，局长爱听爱说，人家从来也不动手动脚，这是个好局长，现在可真应了一句俗话：‘好人落下个赖名誉。’”

作家听到这里，很肯定地说："我给一把手推荐，我肯定会推荐。"后半句话她没有说出来，相信聪明的女干部会想到。果然，直言要当乡长的漂亮女人自己说出来了："至于人家提不提我当乡长，你也管不了，我只要你推荐一下。"

作家送女干部出门，突然记起来忘了问名字："你得把你的尊姓大名留下呀！"

她已经用脚拨开了自行车的车撑棍儿，回头笑笑："沙娜。挺洋的吧？"

"你现在回三岔沟？"

"还有拨款的尾数没到位，我去水电局催。"

那女人已经跨上自行车，旋即又跳下来，对作家说："我给你带了一袋蘑菇，新鲜的。"

作家一看，窗台上有一个白色塑料袋，扎着口，拎起来沉沉的。

"喂！书记，我是秦业。"

"噢！秦书记，什么事？你说。"

"这段时间县委不是正在调整中层和乡镇的领导班子吗？"

"是。有什么事你说。"

"我给你推荐一个人——"

"谁？"

“三岔沟乡的女干部沙娜。”

“这人——你甭说。”

“你认识呀？”

“我认识不认识你都甭说。”

“这人挺能干的……”

“这人你甭再提。”

“为什么？”

“甭问为什么。这人你甭说。”

“……”

作家秦业把电话机扣好，没有想到会是这样一个结果。她想到书记即使不满意，也会缓然处理，诸如通常所用的办法，让组织部先了解了解情况吧！唯独这样干脆利落的否定，显然不是她印象中的书记处事的习惯。作家不用回味，那不假任何思索没有丁点犹豫不留丝毫回旋余地断然拒绝的态度，起码证明一点，沙娜在书记的印象里是很糟糕的，连说都不能说连提都不宜提的，根本进入不到“考虑考虑”的层面。书记敢于这样断然表态，还证明了另一点，书记对沙娜很熟悉。在全县几百名干部中，单是各部局各乡镇的党政正副职领导干部，书记也未必能一一叫出名字，一般普通干部办事员就更马马虎虎了，然而却认识而且熟知沙娜，可见沙娜如果不是因为出类拔萃的漂亮而招人注意，肯定就是别的什么原因了。作家唯一能想到的还是沙娜提供给她的陪水电局长喝酒说屌的事，也许……也许是没有底线的，也是没有意义的。

作家陷入一种少有的心绪麻乱的状态。她本来正在赶写一部中篇小说，这是山区风情系列中的一部。前头已经发表的几部反响颇好，已有出版社邀约结集出书，这无疑是令作家最惬意最舒心的事。她没有料到进入山乡以来的感觉如此敏锐，甚至某乡民的一句话都会激起创作冲动，她素来写城市里各色人物的生活纪事和人生沧桑。她生在一座北方古老的城市，长在这座城市也工作在这座城市，而且是这座城市中传统文化甚浓的家庭，除了夏收秋收到郊区农村帮助农业合作社收麦子掐谷穗等短暂的接触之外，最长的一次乡村生活经历是到农村搞“四清”运动，原定半年时间，结果因为“文革”开战而中途撤退了。她没有料到五十岁以后到陌生的山区乡村还会产生这样敏锐的感受和体验，一篇篇大大小小长长短短的小说、散文连续涌泻出来，真的是获得写作上的二度青春了吗……现在，漂亮的沙娜却把她搅乱了。她原打算给书记打个电话推荐一下，甚至不算推荐只是提说一

下，至于适宜不适宜提拔，不仅不是她管的事，说穿了她自己也心里没谱儿，她仅仅只是看见了一张山区少见的漂亮的脸蛋，听了一番为修水电站要钱以及派生出来的风波，她自己也没有力主推荐的意思，只是提说一下。书记反复了三四次“这人你甭提说”的话，反而把自己心里弄得不安宁了，坐不下来也提不起钢笔了。

她喝罢自煮的牛奶，就锁定了分管水电工作的石副县长，拨通了电话。

“喂！我是秦业。”

“哎呀！秦大姐，我都想死你了。”

“甭作秀了——电话可是我打给你的。”

“兄弟不敢骚扰你呀！你给人民制造精神食粮哩！”

“贫！”

“嘿嘿嘿嘿嘿！老姐有何吩咐？”

“我想见一下大驾，有空儿没有？”

“这哪敢马虎，兄弟恭候。”

她之所以锁定石副县长，唯一的原因就是可以断定他了解沙娜。三岔沟乡修建成功小水电站，在县上也算得一个不大不小的基础设施建设工程，主管水电工作的县长不会不认识要回资金的沙娜。再说，石副县长是本地猴儿，从山里走出去念了书又分配回老家山区县工作，从乡里干到县里，又从县里下到乡里，再从乡里调回县里，几十

年来上上下下往返调动，把县机关和下辖乡镇的旮旯犄角都踏踩过了，无异于一部活档案，不会不认识沙娜的。她便骑上自行车，想听听石副县长关于沙娜的印象。

“忙啥哩？”

“没忙啥。”

“看你桌上摊下这阵势。”

“哦！清理清理，及早清理一下。”

作家秦业听出“清理”一词中不寻常的语气，敏感地感到一种“交手”的意味，就开玩笑说：“高升？拍屁股要走？你可怎么撂得下那几个相好呢！”

“再多也不行！再多也不抵老姐一个。”

说罢便“哈哈”大笑，十分畅快的笑。秦业也笑，却是败下阵来的笑，也畅快。在现任的县委和政府的领导班子里，石副县长是她唯一可以肆无忌惮地开玩笑的一位，一是年龄相仿，都过五十了，超越了人生容易引起麻烦的年龄区段，自然还有个性，一个不足二十岁的中专毕业生，在这个县干到五十多岁也干到副县长这个位置上，没有才干没有政绩和没有精明乃至没有一点油滑都是不行的。他的年龄已不允许他继续待在副县长这个位置上，这是毫无疑义的，到哪个位置上去，秦业却不知底儿，现在，看阵势是有眉目了，她就问：“去哪儿？敢告诉老姐吗？”

“对老姐我啥话都敢说，前几天跟我谈了话，到政协去。”

“当主席？”

“噢！”

“如何？”

“好哇，临终混个正县级，再晃荡几年，回家抱孙子，咱这人嘛，尽够了。”

“好，你倒是知足。”

“人得活个明白，人活得明白才活得自在。”

“挺富于生活哲理的。”

“你看看，县长刚挂上四十，书记还不到四十，让人家年轻人指挥咱一个半大老汉，甭说咱心里受活不受活，人家年轻人也别扭。”

“人明白了话就好说事也好办。我想向你打听一个人。”

“谁？”

“三岔沟乡的一个女干部，沙娜。”

“哦！”

“认识吗？”

“你，怎么问这人？”

“我，怎么不能问？”

“一般女人都不问这人。”

“你说什么？”

“女人一般都不问这人。”

“为什么？”

“我没有研究。”

“哎呀！女人一般不问她，那么问她的都是男人了？”

“基本如此。”

“什么原因？”

“我没有研究，只看见现象，现象就是这个样子，为什么是这个样子，我没研究。”

“问她的男人里头有没有你？老滑头！”

“哪轮得上我这老汉呢！”

“这话怎么闻着酸酸的？哈哈！”

“哈哈哈！”

秦业就不再坚持问下去，再问下去，就显得自己不明白了。然而又不甘心这样的结果，她也用石副县长半是正经半不正经的口吻说：“还没卸下县长的乌纱，说话已经像政协主席了。”

“哦？你说什么？”

“说话已经像政协的主席了。”

“县长怎么说话，政协主席又怎么说话？”

“县长就像你昨天那样说话，政协主席就像你今天这样说话。”

“有什么差异？老姐你甭损我！”

“我没研究。我只看到现象，现象就是你这个样子。有没有差异，为什么会有差异，我没有研究。哈哈哈！”

“哈！弄半天你把我装进我的话里了！老姐，你也够滑够损的！哈哈！”

……

秦业骑上自行车往回走，县城的街道真可以用日新月异来形容，上回看见的杂货铺，现在已变成装饰一新的小超市了。洗头洗脚的门面似乎又添了好多家，总是标着温州的牌子，而门口招徕顾客的小姑娘却未退尽当地人的胎音。她又嗅到一缕幽幽的香味，只有烤红薯的香味才能诱发人的食欲，即使你刚刚吃过饭撂下碗筷，仍然会诱发你走到烘烤炉前掏出零钱来。她一眼就扫瞄到了左侧街角那只用大号汽油桶改装的烤红薯的火炉，一个穿戴颇利索的年轻人站在炉前，她便走过去。

她把两个烤红薯放在车前的筐兜里，自然地又想到吃红薯的风波。她刚到这个山区县不久，一位办公室的女干部来找她，传达领导指示，作为县委领导人，不宜在大街上啃烤红薯。秦业没有给女干部解释，她只是传达而已。这位女干部后来又来传达过一次，建议她最好不要穿旗袍上街。无须解释，同样是在群众眼里的党的领导者的形

象问题。秦业后来知道，她的行为已经被编成“段子”，在餐桌茶社流传：县委秦副书记穿着开衩很高的旗袍，坐着当地农民开的“拐的”（三轮篷车），手里攥着烤红薯啃着，引得市民争相观赏，交通为之拥塞。她穿过旗袍上街，她也在街道上边走边啃过烤红薯，她从文化馆到县委开会或办事，乘坐过当地人称为“拐的”的带篷三轮车，车费仅仅一块或两块，图省事，而没有叫县委的轿车。人们把这真实发生过的三件事焊接在一起，就有点滑稽的意味了。她后来买了一辆自行车，她还是穿旗袍，各色裙装里她就喜欢旗袍。她仍然买烤红薯吃，只是忍着馋劲儿，回到屋子里吃。人们可以在餐桌上永不厌烦地说那些以男女生殖器官编出的极富智慧的“段子”，却不能容忍你在街道上啃烤红薯。秦业骑着自行车蹬进文化馆大门的时候，突然把“拐的”、旗袍、烤红薯与沙娜联系到一块。如果她不是个作家而是一个县或乡的干部，如果还有坐着“拐的”穿着旗袍啃着烤红薯的行为，能否提拔为一个乡长呢？这个联想仅仅在一瞬间发生，到她打开自己的门锁坐下来之后，似乎又把这个联想推置一边了。

秦业给自己新沏了一杯茶，秦业坐在沙发上啃着烤红薯，隔年的红薯烤熟后的味道更加绵软香甜。当地农民用什么方法居然能把去年秋天挖下的红薯储存到今年夏天，真是了不起的进步。沙娜肯定提拔不了乡长了，“这人你甭提说”“女人一般都不问这人”这些话里的潜台词可以做多向猜测，而结果却是清楚的分明的。她对沙娜也就刚刚见过一面，只看见一张漂亮的脸蛋和甚为畅快的说话，唯一的政绩就是为三岔沟乡要到了建设小水电站的款子，仅凭这些，她也是无法心地踏实信心十足鼎力推荐沙娜的。

秦业随一个文化代表团出访欧洲，几近一月，再回到县上再推开古柏浓荫遮蔽下的文化馆的房门的时候，似乎从虚幻的世界终于踩踏

到实处。她仍然没有忘记给自己买两块烤红薯，这红薯分明已是今年的新鲜红薯了，红薯远远没有长到它应该长成的个头儿，味道也是一种尚未成熟的浆生味儿。农民急于卖钱，早一天上市就抢一份好价钱。秦业咀嚼着这浆生的嫩红薯的时候，所有西餐无论法式的荷式的都被从胃腔里扫荡净尽了。

有人敲门。

通信员送来厚厚一沓传阅文件。

秦业一手拿着红薯啃着，一手翻检着文件。把那些必须阅读的篇幅又比较长的上至中央下到省市县的文件先浏览一下标题，分拣出来，准备随后再读，她看到一份单页的干部任免的通知，她看到了沙娜的名字。

沙娜被任命为乡长了，沙娜不在三岔沟乡任乡长，而是调派到五里坡乡任乡长。

秦业的眼睛凝固在那页简短的文字上，沙娜两个字在纸页上舞蹈，沙字蹦起来娜字落下去，娜字弹起来沙字落下去，沙字娜字一起弹蹦起来又一起落下去又并头弹蹦起来了，那页白纸像杂技场上的弹床，秦业被那两个弹蹦着的字弄得眼睛都花了，头也有点眩晕，就把眼睛移开，发现拿在左手里的烤红薯已经攥成一把泥，从手指间从后掌下流出来……

2003年2月12日 二府庄

散文·随笔

何谓益友

一

我终于拿定主意要给何启治写信了。

那时的电话没有现在这样便当，通讯的习惯性手段依赖书信。我之所以把给何启治写信的事作为文章的开头，确是因为这封信在我所有的信件往来中太富于记忆的分量了，一封期待了四年而终于可以落笔书写的信，我将第一次正式向他报告长篇小说《白鹿原》写成的消息。

这部书稿是农历一九九一年腊月二十五日写完最后一句话的。我只告诉给我的夫人和孩子，同时嘱咐他们暂且守口，不宜张扬。我不想公开这个消息不是出于神秘感，仅仅只是一时还不能确定该不该把这部书稿拿出来投出去。这部小说的正式稿接近完成的一九九一年的冬天，我对社会关于文学的要求和对文学作品的探索中所触及的某些方面的承受力没有肯定的把握。如果不是作品的艺术缺陷而是触及的某些方面不能承受，我便决定把它封存起来，待社会对文学的承受力增强到可以接受这个作品时，再投出书稿也不迟；我甚至把这个时间设想得较长，在我之后由孩子去做这件事；如果仅仅只是因为艺术能力所造成的缺陷而不能出版，我毫不犹豫地对夫人说，我就去养鸡。道理很简单，都五十岁了，长篇小说写出来还不够出版资格，我宁愿

舍弃专业作家这个名分而只作为一种业余文学爱好。无论会是哪一种结局，都不会影响我继续写完这部作品的情绪和进程，作为一件历时四年写作的长篇，必须画上最后一个标点符号才算了结，心情依旧是沉静如初的。

一九九二年初，我在清晨的广播新闻中听到了邓小平南行的讲话摘录。思想要再解放一点，胆子要再大一点，等等等等。我在怦然心动的同时，就决定这个长篇小说稿子一旦完成，便立即投出去，一天也没有必要延误和搁置。道理太简单了，社会对于具体到一部小说的承受力必然会随着两个“一点”迅速强大起来。关键只是自己这部小说的艺术能力的问题了，这是需要检验的，首先是编辑。我便想到何启治，自然想到他供职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人民文学出版社是文艺类书籍出版系统的高门楼，想着这一层还真有点心怯，“店大欺客”与否且不说，无论如何还是充不起要进大店的雄壮之气来。然而想到一直关注着这部书稿的老朋友何启治，让他先看看，听他的第一印象和意见，那是令人最放心的事。

春节过后，我便坐下来复阅刚刚写完的《白》书书稿，做最后的文字审定，这个过程比写作过程轻松得多了。大约到公历二月末，我决定给何启治写信，报告长篇完成的消息，征求由我送稿或由他派人来取稿的意见。如果能派人来，时间安排到三月下旬。按照我的复阅进度，三月下旬的时限是宽绰富余的。信中唯一可能使老何会感到意外的提示性请求，是希望他能派文学观念比较新的编辑来取稿看稿，这是我对自己在这部小说中的全部投入的一种护佑心理，生怕某个依旧“左”的教条的嘴巴一口给唾死了。

信发走之后，我才确切意识到《白鹿原》这书稿要进人民文学出版社这幢高门楼了。

二

几乎在爱好文学并盲目阅读文学作品的同时，就知道了北京有一家专门出版文艺书籍的出版社叫人民文学出版社，这是从我阅读过的中外文学书籍的书脊上和扉页上反复加深印象的，高门楼的感觉就是从少年时代形成的。随着人生阅历和文学生活的丰富，这种感觉愈来愈深刻，对于一个业余作者来说，这个高门楼无异于文学天宇的圣殿，几乎连在那里出书的梦都不敢做。就在这种没有奢望反而平静切实的心境下，某一日，何启治走到我的面前来了，标着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牌子。

这件事的记忆是深刻的，因为太出乎意料而显得强烈。一九七三年隆冬季节，西安奇冷。我到西安郊区区委去开会，什么内容已经毫无记忆了。会议结束散场时，一位陌生人拦住了我，操着不大标准的普通话（以电台播音员为标准），声音浑厚，在他自我介绍之前，我已知道这是一位外来客了。在我周围工作和相交的上司、同辈和工作对象之中，主要是关中东部口音口语，其次是永远都令人怀疑患了伤风感冒而鼻塞不通说话鼻音很重的陕北人，那些从天南海北到西安来工作的外乡人久而久之也入乡随俗出一种怪腔怪调的关中话来，我已耳熟能详。这个找我的人一开口，我就嗅出了外来人的气味，他说他叫何启治，从北京来，从北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来，找我谈事。我便依我的习惯叫他老何。以后的二十多年里，我一直叫他老何，没有改口。

我和老何的谈话地点，就在郊区区委所在地小寨的街角。他代表刚刚恢复出版工作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来西安组稿，从同样是刚刚恢复工作的陕西作家协会（此时称陕西省文艺创作研究室，以示与旧文艺

体制的区别）创办的《陕西文艺》（即原《延河》）编辑部得到推荐才来找我的。他已读过我在《陕西文艺》发表的一篇短篇小说《接班以后》，认为这个短篇具备了一个长篇小说的架势或者说基础，可以写成一部二十万字左右的长篇小说。我站在小寨的街道旁，完全是一种茫然，且不用吓了一跳这样的夸张性习惯用语。我在刚刚复刊的原《延河》今《陕西文艺》双月刊第三期上发表的两万字的短篇小说《接班以后》，是我平生发表的第一篇小说，也是我自初中二年级起迷恋文学以来的第一次重要跨越（且不在这里反省这篇小说的时代性图解概念），鼓舞着的同时，也惶惶着是否还能写出并发表第二、第三篇，根本没有动过长篇小说写作的念头，这不是伪饰的自谦而是个性的制约。我便给老何解释这几乎是老虎吃天的事。老何却耐心地给我鼓励，说这篇小说已具备扩展为长篇的基础，依我在农村长期工作的生活积累而言完全可以做成。最后不惜抬出他正在辅导的两位在延安插队的知青已写成一部长篇小说的先例给我佐证。我首先很感动，不单是老何说话的内容，还有他的口吻和神色，在我感到真诚的同时也感到了基本的信赖，即使写不成长篇小说，做一个文学朋友也挺好，应该是我文学生涯以来认识的第一个北京人。二十多年过去，我们已经相聚相见过许多回，世界已经翻天覆地，文学也已地覆天翻，每一次见面，或北京或西安或此外的城市，都继续着在小寨街头的那种坦诚和真挚，延续着也加深着那份信赖。

我违心地答应"可以考虑一下"，然后就分手回我工作的西安东郊的乡村去了。老何回到北京不久就来了信，信写得很长，仍然是鼓励长篇小说写作的内容，把在小寨街头的谈话以更富于条理化的文字表述出来，从立意、构架和生活素材等方面对我的思路进行开启。我几乎再也搜寻不出推辞的理由，然而却丝毫也动不了要写长篇小说的心思。我把长篇小说的写作看得太艰难了，肯定是我长期阅读长篇小说

所造成的心理感受。我常常在阅读那些优秀的长篇小说时一回又一回地感叹，这个作家长着一颗怎么样的脑袋，怎么会写出让人意料不到的故事和几乎可以触摸的人物！好在这时候上级突然通知我去南泥湾“五七”干校劳动锻炼改造，我便以此为由而推卸了这个不可胜任的压力。我去陕北的南泥湾干校之后，老何来信说他也被抽调到西藏去工作，时限为三年，然而仍然继续着动员鼓励我写长篇小说的工作。随着他在西藏新的工作的投入，来信中关于西藏的生活和工作占据了主要内容，长篇小说写作的话题也还在说，却仅仅只是提及一下而已。这是一九七四年的春天和夏天，“批林批孔”运动又卷起新的阶级斗争的旋涡……这次长篇小说写作的事就这样化解了。我因此而结识了一位朋友老何。

三

老何再一次到西安来组稿，大约是刚刚交上八十年代的夏天，我从文化馆所在的灞桥古镇赶到西安，在西安饭庄——“双十二事变”中招待过周恩来的百年老店——招待老何吃一顿饭。那时候尚不兴公款请客吃饭。我刚刚开始收入稿费（千字十元），大有陈奂生进城的那份高涨的心情，况且是从小寨街头一别七八年之后的第一次共餐。我要了西安饭庄的看家菜葫芦鸡，老何直说好吃。多年以来的几次相见相聚中，老何总会突然歪过头问我：“那年你在西安请我吃的那个鸡真不错，叫什么鸡？”

他是为创刊不久的《当代》来组稿的。我仍然畏怯这个高门楼里跃出的为文坛瞩目的《当代》，不敢轻易投寄稿件。直到我从短篇小说转入中篇小说的第一部《初夏》写成，才斗胆寄给老何。这个中篇小说是我的写作生涯中最艰难的一部，历经三年多时间，修改重写四

次，才得以在一九八四年的《当代》刊出。我曾在一篇短文中回味过这个至为重要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令人感佩的是《当代》的编辑，尤其是老朋友何启治所显示出来的巨大耐心和令人难以叙说的热诚。他和他们的工作的意义不单是为《当代》组织了一部稿子，而是促使一个作者完成了习作过程中的一次跨越，得到了属于自己的一次至为重要的艺术体验，拯救了一个苦苦探索的业余作者的艺术生命。"我说以上这些话是真诚的，更是真实的。《初夏》历经三年时间的四次修改和重写，始得以发表，不仅是鼓舞，最基本的收益是锻炼了我驾驭较大规模、较多人物和多重线索的能力，完成了从较为单纯的短篇小说的结构到中篇小说结构形式的过渡。此后我连续写作的几部或大或小的中篇小说，不论得失如何，仅就各自结构的驾驭而言，感到自如得多了，写作过程也顺利得多了。正是从自身写作的这个意义上，我是十分钦敬老何这位良师益友的。

《初夏》之后，我正热衷于中篇小说各种结构形式的探索，老何在一次见面中问我，有长篇写作的考虑没有。我很直率地回答，没有。这是实话实说。由他的突然发问，我立即想起十多年前第一次见面在小寨街头的那一幕，心里竟是一种负压感，天哪！他还没有忘记长篇小说的事。他却轻松地说，你什么时候打算写长篇的话，记住给我就是了。

再后来的一次会面，他又问到长篇小说写作的事。我觉得对他若要保密，是一种有违良知的事，尽管按着我的性情是很难为的事情。我便告诉他，有想法，仅仅只是个想法，正在想着准备着，离实际操作尚远。我那时候确实正在做着《白鹿原》的先期准备，查阅县志、党史、文史资料，在西安郊县做社会调查，研读有关关中历史的书籍，同时酝酿构思着《白鹿原》。我随即叮嘱他两点：不要告诉别

人，不要催问。我知道我的这部长篇小说不会在“短促突击”中完成，初步计划实际写作时间为三年。我希望在这三年里沉心静气地做这件大活，而不要在人们的议论，哪怕是好朋友的关心中写作，更不要说编辑的催逼了。过多的谈论过分关心的问询以及进度的催问，都会给我心理造成紊乱造成压力，影响写作的心境。按着我的性情，畏怯张扬，如同农家妇女蒸馍馍，未熟透之前是切忌揭开锅盖的。

然而还是有压力产生。我已经透露给老何了，况且是在构思阶段，便觉得很不踏实，如果最终写不成呢，如果最终下了一个“软蛋”又怎样面对期待已久的老朋友呢！甚至产生过这样的疑问，按照我当时的写作的状况，中短篇小说虽已出版过几本书，然而没有一篇作品产生过轰动性效应，我清醒地知道自己的分量和位置，而老何为什么要盯着我的尚在构思中的长篇小说呢？如他这样资深的职业编辑，难道不知面对名家之外的作者所难以避免的约稿易而退稿尴尬的情景吗？因为我在构思中的《白鹿原》没有向他提及任何一句具体的东西，我自己尚在极大的不自信无把握之中。直到今天，我仍然不得其解，老何约稿的依据是什么？

后来的几年里，证明着老何守约如禁。每有一位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辑到西安组稿，都要带来老何的问候，进门握手时先申明，老何让我来看看你，只是问个好，没有催的意思，老何再三叮嘱我不要催促陈忠实。我常常握着他们的手说不出一句话。直到一九九一年的初春时节，老何领一班人马到西安来，以分片的形式庆祝人民文学出版社建社四十周年，在西安与新老作家朋友聚会。这个时候，《白鹿原》书稿已经完成三分之二，计划年底写完。见面时老何仍然恪守约律，淡淡地说，我没有催的意思，你按你的计划写，写完给我打个招

呼就行了，我让人来取稿。我也仍然紧关口舌，没有道及年底可以完稿的计划，只应诺着写完就报告。

这一年的夏天，先后有两家大出版社向我邀约长篇小说稿，一位是在艰难的情况下给我出过中篇小说集子《初夏》的上海文艺出版社的老张，我忍着心向她坦诚地解释老何有话在先，无论作品成色如何，我得守信。另一位是作家出版社老朱，她到西安来组稿，听人说我正在写一部长篇，我同样以与老何有约在先须守友道为由辞谢了。我坚守着与老何的约定，发端自十七八年前小寨街头的初识，那次使我着实吓住了的长篇小说写作的提议，现在才得以实施，时间虽然长了点，却切合我的实际。

直到一九九一年末写完全部书稿，直到春节过后的一九九二年早春的某天晚上，可以确定《白鹿原》手稿复阅修饰完成的时间以后，我终于决定给老何写信报告《白鹿原》完全脱稿的消息了，忐忑不安地要奔文学书籍出版界的高门楼了。

四

老何很快复过信来，他将安排两位同志于三月二十五日左右到西安。果然，三月二十四日下午，作协机关办公室把电话打到我所在地区的灞陵乡政府，由一位顺道回家的干部传话给我，让我于二十五日早八时许到火车站接北京来客。

给我捎信传话的乡上干部刚出门，村子里的保健医生搀着我母亲走进门来，说我母亲的血压已经高过二百以上，必须躺下。母亲躺下后就站不起来了，半边身子麻木僵硬了，就发生在我注视着的眼皮底下。医生很快为她挂上了用以降血压的输液瓶儿。我的头都木了，北

京来客此时可能刚刚乘着火车开出京城。真是凑巧了，傍晚时分还有夕阳霞光，天黑以后却骤然一场大雪。我几乎一夜未曾合眼，守护着母亲，看着院子里的雪逐渐加厚到足可盈尺。离天明大约还有一个多小时，我请来一位村人照看母亲，就踏着积雪上路了。大雪真好，从我家大门口起始，走过两个村庄和村庄之间的原野，我给处女的雪原和村巷踩出第一溜脚印。我赶上了第一班远郊公共汽车，进入作协大院时尚未到上班的钟点。我要了一辆公车赶到西安火车站，等候许久，高门楼里来的尊贵的高贤均、洪清波终于走出车站来，时间大约八时许。

高贤均和悦随意，一见面就不存在陌生和隔膜，笑起来很迷人的。洪清波更年轻，却戴着一副厚厚的眼镜，不大说话，笑起来有一缕拘谨的羞涩，显得更加迷人。我当时想，从高门楼里出来的人怎么到了地方省份还会有拘谨的羞怯？我把他们安排到招待所，由他们自己去找饭吃找风景玩，就匆匆赶回乡下去了，只说还有两章没有“通”完，没有告诉他们还有突然躺倒吊着药瓶的母亲。我当时家分两地，夫人和孩子住在城里，我住在乡下老屋写我的书稿，母亲是过春节时从城里回到乡下，尚未回城却病倒了。这样，我一边守护着母亲监视着吊在空中的药液的降速，一边在隔壁书房审阅最后两三章手稿的文字，想到高、洪两位朋友正住在西安等着拿稿子，我第一次感到了心理紧促和压迫，这是《白》书从起头到完成四年以来从未有过的催逼感。

过了两天，我一早赶到西安，包里装着这部书稿。在远郊公共汽车上，我一直抱着这摞书稿，一种紧张中的平静和平静里的紧张。我一路上都在斟酌着把这摞书稿交给高、洪时该怎么说话才合适，既希望他们能认真审读，又不想给他们造成压力，所以以不提任何写作的

构想和写作的艰难为好。这样，在作家协会招待所的客房里，我只是把书稿从兜里取出来交给他们，竟然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那时突然涌到嘴边一句话，我连生命都交给你们了，最后关头还是压到喉咙以下而没有说出，却憋得几乎涌出泪来。其实基于一种自己对文学的理解，只需让编辑去看书稿而无须阐释。下午，我又匆匆赶回乡下老家照看母亲，连请高、洪两位新结识的朋友品尝一下葫芦鸡的机缘也没有，至今尚以为憾事。

我由此时开始进入一种完全的闲适状态。我不读任何小说，有了平生里从未发生过的、拒绝以至逆反阅读现代文学书籍的奇怪的心理状态。却突然想读古典诗词，我把塞在书架里多年未动过的《词综》抽出来，品赏那些古色古香的墨痕之中的韵味而惊叹不已。按常规我把《白》书书稿的审阅过程设想得较长，初审、复审和终审，一部近五十万字的书稿走完这个轮番审阅的过程，少说也得两月以上，因为编辑们不可能只看这一部书稿，他们要开会要接待四面八方的来访者还要处理家务事。在他们统一结论之前，估计很难给我一个具体的说法。所以，我就在少有的闲静中等待，品赏一个个诗词大家的妙句。出乎意料的是，在高、洪拿着书稿离开西安之后的第二十天，我接到了高贤均的来信。我匆匆读完信后“嗷嗷”叫了三声就跌倒在沙发上，把在他面前交稿时没有流出的眼泪倾泻出来了。

这是一封足以使我癫狂的信。信中说了他和洪清波从西安到成都再回北京的旅程中相继读完了书稿，回到北京的当天就给我写信。他俩阅读的兴奋使我感到了期待的效果，他俩共同的评价使我颤栗。我由此而又一次检验了自己的个性，很快便沉静下来，进入一种前所未有的舒缓静谧之中。我也才发现此前二十多天的闲适之表象下隐藏着等待判决的紧张和恐惧，只是明知那个结果尚遥远而已。这个超出预

料的判决词式的信件的提前到来，就把深层心理的恐惧和紧张彻底化释了。我的全部用心都被高、洪理解了，六年以来的所有努力都是合理的，还有什么事情能使人感到创作这种劳动之后的幸福呢！随后对唐诗宋词的品赏才真正进入一种轻松自悦的心理状态。

老何随后来信了，可以想象的兴奋和喜悦，为此他等待了几近二十年，从一九七三年冬天小寨街头的鼓励鼓动到一九九二年春天他在北京给我写《白》书的审阅意见，对于他来说是太长了点，对于我来说，起码没有使这位益友失望，我们的友谊便不言而喻。随后便是如何处理书稿的种种琐细的事，我都由他去处理，我完全信赖高门楼里的这一帮编辑了。

五

《白鹿原》先在《当代》分两期连载，之后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书，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西安人民广播电台差不多同时连播，在读者和文学界迅即引起反响，这在我几乎是猝不及防的。书稿写完时，我当然也有一种自我估计，如若能够面世，肯定不会是悄无声息的，会有反应的。然而反应如此之迅速如此之强烈，我是始料不及的；尤其是社会各个阶层，非文学圈子的读者的强烈反响，让我第一次如此深刻地感受到读者才是文学作品存活的土壤。

一九九三年八月，《白》书在京召开的研讨会，也是我平生所经历的最感动的一次会议。会后某天晚上，老何和高贤均找到我住的宾馆，主动与我商议修改原先的出书合同的事。按原先的出书合同，千字三十元，是九十年代初人民文学出版社执行的最高稿酬标准了。按这个标准算下来，近五十万字的书稿可得稿酬约一万五千元，这是从签订合同时便一目了然的计算，我也很兴奋一次可以拿到万元以上的

大宗稿酬而进入万元户的行列了。现在，何与高给我在算另一笔账，如若用版税计酬，我将可以多得三四千元。《白》按计划经济的征订数目近一万五千册，这在一九九三年的新华书店发行征订中已是令人鼓舞的大数了。按百分之十的版税和近十三元的书价算下来，比原合同的稿酬可以多得三千多元吧。他们已经对比核算过了，考虑到我花六年时间写这一本书，能多得就争取多得一点吧。我尚未用版税方式拿过稿酬，问了半天才算明白了其中的好处，自然是乐意的。然而更令我感动的是他们替我所做的谋算，以至于如此细心。作为一本书的作者，面对这样体贴入微的编辑，说什么感谢之类的话都显得多余而俗套。

在《白》行世之后的几年里，有一些认真的或不甚认真的批评文字，无论我无论老何、老高或人文社的其他编辑，尚都能持一种平和的心态，这是文坛上再正常不过的事。然而有一种批评却涉及作品的存活，即“历史倾向性”问题，我从听到时就把这种意见看成是误读。在被误读误解的几年里，涉及《白鹿原》的评论和几种评奖，都发生过一些不大不小的麻烦。在这些过程中，老何、老高们坚守着自己对《白鹿原》的观点，当我事后了解某些情况时，真是感慨而又感佩，甚至因为《白鹿原》给他们添麻烦而负疚，反倒劝慰他们。他们均表示，此种事已经不属和我的友谊或照顾关系的庸俗做法，而是涉及关于文学本身的重大话题。

大约是一九九七年酷暑时月，某天晚上老何打来电话，告诉我一个消息，说陈涌对某位理论家坦言，《白鹿原》不存在“历史倾向”问题，这个看法已经在文学圈子里流传开来。我听了有一种清风透胸的爽适之感，关于“历史倾向性”问题的释疑解误，最终还是有陈涌这样德高望重的文学理论家坦率直言。老何便由此预测，茅盾文学奖的评

奖可能因此而有了希望可寄。约在此前半年，我和他在京见面时，老何还在为我做宽慰性的工作。说茅盾文学奖评奖的可能性不大，对《白鹿原》而言评不评此奖意义不大，有读者和文学界的认可就足够了。我也基本是这样的心态，评奖是一码事，而“历史倾向性”问题是另一码事。我和他在评奖这件事上仍然保持着一种平常心理。现在，陈涌的话对《白鹿原》评茅盾奖可能出现的转机仅只是一种猜估，对我来说解除“历史倾向性”问题的疑虑和误读才是最切实际的。我也忍不住激动起来，评奖与否且不管，有陈涌这句话就行了。有人说过程不必计较，关键是看结果。在《白鹿原》终于评上茅盾文学奖这个结果出来以后，我恰恰感动的是那个过程。尤其在误读持续的几年时间里，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老何老高小洪等一群坚守着文学意义的编辑，才构成了那个使我难以磨灭的动人的过程。至此，这个高门楼在我的感觉里融入了亲切温暖的感觉。

高门楼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凭着一帮如老何老高小洪这样的文学圣徒撑着，才撑起一个国家的文学出版大业的门面，看似对一个如我的作者的一部长篇小说的过程，透见的却是一种文学圣徒的精神。作为一个自以为文学神圣的作者，我结识老何老高小洪们，是自以为荣幸也以为骄傲的。

2001年2月20日 原下

足球与城市

足球是动态的，有了足球的城市便添了动态的美。足球是一种进取精神最富激情的展现，有了足球的城市便呈现出锐意进取的精神。足球展示给世界的是一种生命的活力，有了足球的城市就多了一份生动。足球是属于年轻的生命的，有了足球的城市便不会老化。足球是地球上所有种族、各种肤色的人共同拥有的无须翻译的语言，有了足球的城市便具备了与世界城市对话的一种基本功能。

促使我把足球和城市连接在一起的触发点，是ESPN对二〇〇一年中国足球甲A联赛陕西国力首次主场比赛的转播。见过大世面的ESPN的解说员，竟然连连惊呼陕西球市的火爆场面，用词为“震撼”“振奋”，大为惊讶地处中国西北的西安，在三月份居然能培育出如此“令人非常惊异”的高质量的草坪，连连的惊叹惊异惊呼之词，真是让作为陕西人的我为西安骄傲了一回。

我们陕西和我们西安，引人骄傲的首推先人和先民所创造的历史奇迹，多为墓冢里的藏物。我也殷切地期盼今天的陕西人创造新的奇迹，能让世界产生如对兵马俑、茂陵石雕那种惊喜与浩叹，我们自然可以列举卫星测控和长臂导弹这些令人腰杆挺硬的项目。然而始料不及的是，陕西国力足球队和陕西火爆的球市，风采独具的秦地球迷和一流的球场草地，吸引来了ESPN，直令他们以激情的话语向亚太地区三十多个国家的观众展示当代陕西人的风采，让他们联想和品味秦兵汉将的后人身上所遗存的豪勇和热烈。

近几年来，我走了一些地方，无论繁华的大都市，无论偏远的小县城，以及名不见经传的僻野小镇，随处都可以看到这样同一内容的广告标牌，“让××走向世界，让世界了解××”，这××自然是某个城市某个县城某个小镇，这是可以理解的。开放的中国总的广告词为“让世界了解中国，让中国走向世界”，每个省每个市每个县和每个镇乃至某些发展趋前的村子，也都急于让世界了解他们，更急于走向世界了。为了达到被世界了解、再走向世界这个目的，各种招数各路拳术都被创造出来了，外交的、经济的、旅游的、文化的，甚至带有某些非公开手段，充满了各具特色的、激烈的竞争。然而，就我有限的见闻，把足球当作某个地区达到被世界了解再走向世界的招数的城市，在中国数以百计的大小城市里，大连是唯一的，也确实达到了使用足球广告的目的。我去年十月到大连，在该市的大广场上，有一只堪称中国第一庞然大物的足球雕塑和一组造型逼真的踢球的群雕。大连没有黄帝陵没有兵马俑没有姑婆坟陵，却创造出包括服装节和足球等四大品牌。大连足球在中国足坛是一颗历久不衰的大星体，无形的又是不可估量的效应是提高了大连市的知名度，比之服装节来有着同等的功效。据媒体报道，欧洲几家大牌足球俱乐部都已经在大连开办了足球学校或短训班，他们传播足球技术的同时也在挣钱，大连的孩子在可以得到最先进的培训的同时，大连地方也同样有经济实惠。

陕西或西安球市的火爆是一个奇迹，经济相对滞后于沿海城市，足球环境、足球土壤和足球氛围却类似于欧洲或南美，是文化因素抑或是地域性的群体个性造成这样的氛围，我至今仍说不准确。然而这个谜也不急于求证，而客观的现实是，这个基本属于自发的足球环境、足球氛围真是太可珍贵了，于西安于陕西在中国在世界的知名度的提升只会是有百利而无一弊，是许多城市企盼不及的事。

这样好的足球土壤和足球氛围，是球迷营造的。没有了球迷也就没有了足球。社会各方各界应该关心、关爱球迷，关键在于恰当理解这个世界第一运动和足球本身所难以根除的某些麻烦，诸如偶然发生在世界或中国某地的球场骚乱，最严重的也就是足球流氓的滋扰和闹事，用法律去惩治、用关爱去诱导、用球迷自身的民间组织发挥引导作用，正如泼掉羊水是为了保护孩子是同样简单的道理。

陕西球迷所营造的令ESPN连呼惊奇的氛围，是急于走向世界的陕西和西安的一缕祥风人气，无论作为一个球迷，无论作为一个关注乡土发展的西安人，我幸运能有这样好的足球氛围和越来越好看的球赛。

2001年3月22日

家有斑鸠

住到乡下老屋的第一个早晨，刚睁开眼，便听到“咕咕——咕咕”的鸟叫声。这是斑鸠。虽然久违这种鸟叫声，却不陌生，第一声入耳，我便断定是斑鸠，不由得惊喜。

披上衣服，竟有点迫不及待，悄声静气地靠近窗户，透过玻璃望出去，后屋的前檐上，果然有两只斑鸠。一只站在瓦楞上，另一只围着它转着，一边转着，一边点头，发出“咕咕咕咕”的叫声。显然是雄斑鸠在向雌斑鸠求爱，颇为绅士，像西方男子向所爱的女子鞠躬致礼，“咕咕咕”的叫声类似“我爱你”的表白。

这是我回到乡下老屋的第一个早晨看见的情景。一个始料不及的美妙的早晨。

六年前的大约这个时节，我和文学评论家王仲生教授住在波士顿城郊他的胞弟家里。尽管这座三层小洋楼宽敞舒适，我和王教授还是更喜欢站着或坐在后院里。后院是一片绿茸茸的草坪，有几种疏于管理的花木。这一排房子的后院连着后面一排小楼房的后院，中间有一排粗大高耸的树木分隔。树木的枝杈上，栖息着毋宁说侍立着一群鸟儿。一种通体黑色的梭子形状的鸟，在人刚开开后门走到草坪边的时候，梭子黑鸟便从树枝上飞下来，落在草坪上，期待着人撒出面包屑或什么吃食。你撒了吃剩的面包屑或米粒儿，它们就在你面前的草地上争食，甚至大胆地跳到人的脚前来。偶尔，还会有一只两只松鼠不知从哪棵树上蹿下来，和梭子鸟儿在草地上抢夺食物。

我在那个令人忘情的人与鸟兽共处的草坪上，曾经想过在我家的小院里，如若能有这样一群敢于光顾的鸟儿就好了。我们近年来的经济成就令世人瞩目，然而要赶上人家的年生产总值和人均收入的水平，尚需较多的时日；然而我们的鸟儿和诸如松鼠的小兽敢于到居民的阳台和农民的小院来觅食，却是不需花费财力物力的事，只需给鸟儿和兽儿一点人道和爱心就行了。然而实际想来，实现这样人鸟人兽共存共荣的和谐景象，恐怕也不是短时间的事。

飞翔在我们天空的鸟儿和奔驰在我们山川里的兽儿，对人的恐惧和绝对的不信任是一个基本的事实。我们把爱鸟爱兽作为一个普遍的社会意识来提倡，不过是十来年间的事。我们把鸟儿兽儿作为美食作为美裳作为玩物作为发财的对象而心狠手狠的年月，却无法算计。我能记得和看到的，一是一九五八年对麻雀发动的全民战争，麻雀虽未绝种，倒是把所有飞翔在天空的各色鸟儿吓得肝胆欲裂，它们肯定会把对人的恐惧和防范以生存戒律传递给子子孙孙。再是种种药剂和化肥，杀了害虫长了庄稼，却把许多食虫食草的鸟儿整得种族灭绝。更不要说那些利欲熏心丧尽良知的捕杀濒临灭绝的珍禽异兽者。我曾瞎猜过，能够存活到今天的鸟类、兽类，肯定具备一组特别优秀的专司提防、警惕人类伤害的基因。不然，早该在明枪暗箭以及五花八门的机关和陷阱里灭绝了。

还是说我家的斑鸠。

我有记事能力的时候就认识并记住了斑鸠，像辨识家乡的各种鸟儿一样，不足为奇。斑鸠在我的滋水家乡的鸟类中，是最朴拙最不显眼近乎丑陋的一种鸟。灰褐色的羽毛比不得任何一种鸟儿，连麻雀的羽翅上的暗纹也比不得。没有长喙和高足，比不得啄木鸟和鹭鸶。没有动人的叫声，从早到晚都是粗浑单调的“咕咕咕——咕咕咕”的声

音。它的巢也是我所见过的鸟窝中最简单最不成形的一种，简单到仅有可以数清的几十根柴枝，横竖搭置成一个浅浅的潦草的窝。小时候我站在树下，可以从窝的底部的缝隙透见窝里有几枚蛋。我曾经在六十年代的小学课文上看到过以斑鸠为题编写的课文，说斑鸠是最懒惰的鸟，懒得连窝也不认真搭建，冬天便冻死在这种既不遮风亦不挡雨的窝里。

然而，整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我住在祖居的老屋读书写字，没有看见过一只斑鸠。尽管我搞不清斑鸠消亡的原因，却肯定不会是如童话所阐述的陋窝所致，倒是倾向于某种农药或化肥的种类性绝杀。这种普通的毫不起眼的鸟儿的绝踪，没有引起任何村人的注意。我以为在家院的周围再也看不到斑鸠了。

斑鸠却在我重返家乡的第一个清晨出现了，就在我的房檐上。

我便轻手开门，怕惊吓了它。它还是飞走了。

我朝院中的空地上撒一把小米，或一把玉米糁子，诱使它到小院里来啄食。

初始，无论我怎样轻手蹑足开门走路，它一发现我从屋内走到院中，“扑棱”一声就从屋脊或围墙上起飞了，飞入高高的村树上去了。我仍然往小院里撒抛米谷。直到某一日，我开开门出来，两只斑鸠突然从院中飞起，落到房檐上，还在探头探脑瞅着院中尚未吃完的谷米。我的心里一动，它终于有胆子到院内落脚啄食了，这是一次突破性的进展。

我和斑鸠的关系获得令人振奋的突破之后，随之便是持久的停滞不前。斑鸠在房檐在房脊在院墙上栖息追逐，似乎已经放心无虞。然

而有我在场的时候，它们绝不飞落到院里来啄食，无论我抛撒的米谷多么富于诱惑。有几次我从室内的窗玻璃前窥视到斑鸠在院中啄食米谷的情景，一当我出门，它们便惊慌地飞上房顶。这一刻，我清醒地意识到，它还不完全是我家的斑鸠。

要让斑鸠随心无虞地落到小院里，心里踏实地啄食，在我的眼下，在我的脚前，尚需一些时日。

我将等待。

2001年6月

麦饭

——关中民间食谱之一

按照当今已经注意营养分析的人们的观点，麦饭是属于真正的绿色食物。

我自小就有幸享用这种绿色食物。不过不是具备科学的超前消费的意识，恰恰是贫穷导致的以野菜代粮食的饱腹本能。

早春里，山坡背阴处的积雪尚未退尽消去，向阳坡地上的苜蓿已经从地皮上努出嫩芽来。我掐苜蓿，常和同龄的男女孩子结伙，从山坡上的这一块苜蓿地奔到另一块苜蓿地，这是幼年记忆里最愉快的劳动。

苜蓿芽儿用水淘了，拌上面粉，揉、搅、搓、抖均匀，摊在木屉上，放在锅里蒸熟。出锅后，用熟油拌了，便用碗盛着，整碗整碗地吃，拌着一碗玉米糁子熬煮的稀饭，可以省下一个两个馍来。母亲似乎从我有记忆能力时就擅长麦饭技艺。她做得从容不迫，干、湿、软、硬总是恰到好处。我最关心的是，拌到苜蓿里的面粉是麦子面儿还是玉米面儿。麦子面儿俗称白面儿，拌就的麦饭软绵可口，玉米面拌成的麦饭就相去甚远了。母亲往往会说，白面断顿了，得用玉米面儿拌；你甭不高兴，我会多浇点熟油。我从解知人言便开始习惯粗茶淡饭，从来不敢也不会有奢望寄予；从来不会要吃什么或想吃什么，而是习惯于母亲做什么就吃什么，没有道理也没有解释，贫穷造就的吃食的贫乏和单调是不容选择或挑剔的，也不宽容娇气和任性。

麦子面拌就的头茬苜蓿蒸成的麦饭，再拌进熟油，那种绵长的香味的记忆是无法泯灭的。

按照家乡的风俗禁忌，清明是掐摘苜蓿的终结之日。清明之前，任何人家种植的苜蓿，尽可以由人去掐去摘，主人均是一种宽容和大度。清明一过，便不能再去任何人家的苜蓿地采掐了，苜蓿要作为饲草生长了。

苜蓿之后，我们便盼着槐花。山坡和场边的槐花放白的时候，我便用早已备齐的木钩挑着竹笼去采捋槐花了。

槐花开放的时候，村巷屋院都是香气充溢着。

槐花蒸成的麦饭，另有一番香味，似乎比苜蓿麦饭更可口。这个季节往往很短暂，家家男女端到街巷里来的饭碗里，多是槐花麦饭。

按照今天已经开始青睐绿色食品的先行者们的现代营养意识，我便可以耍一把阿Q式的骄傲，我们祖宗比你阔多了，他们早早都以苜蓿槐花为食了。

到了难忘的六十年代，被史称“三年困难”的六十年代初，家乡的原坡和河川里一切不含毒汁的野菜和野草，包括某些树叶，统统都被大人小孩挖、掐、拔、摘、捋回家去，拌以少许面粉或麸皮，蒸了，食了，已经无油可拌。这样的麦饭已成为主食，成为填充肚腹的坐庄食物。男人女人老人小孩都别无选择，漂亮的脸蛋儿和丑陋的黑脸也无法挑剔，都只能赖此物充饥，延续生命。老人脸黄了肿了，年轻人也黄了肿了，小孩子黄了肿了，漂亮的脸蛋儿黄了肿了时尤为令人叹惋。看来，这种纯粹以绿色野菜野草为食物的实践，却显示出残酷的

结果，提醒今天那些以绿色食物为时尚为时髦的先生太太们切勿矫枉过正，以免损害贵体。

近日和朋友到西安大雁塔下的一家陕北风味饭馆就餐，一道“洋芋叉叉”的菜令人费解。吃了一口便尝出味来，便大胆探问，可是洋芋麦饭？延安籍的女老板笑答，对。关中叫麦饭，陕北叫洋芋叉叉。把洋芋擦成丝，拌以上等白面，蒸熟，拌油，仍然沿袭民间如我母亲一样的农家主妇的操作规程。陕北盛产洋芋，用洋芋做成麦饭，原也是以菜代粮，变换一种花样，和关中的麦饭无本质差别。不过，现在由服务生用瓷盘端到餐桌上来的洋芋叉叉或者说洋芋麦饭，却是一道菜，一种商品，一种卖价不低的绿色食品，城里人乐于掏腰包并赞赏不绝的超前保健食品了。

家乡的原野上，苜蓿种植已经大大减少。已经稀罕的苜蓿地，不容许任何人涉足动手掐采。传统的乡俗已经断止。主人一茬接着一茬掐采下苜蓿芽来，用袋装了，用车载了，送到城里的蔬菜市场，卖一把好钱。乡俗断止了，日子好过了，这是现代生活法则。

母亲的苜蓿麦饭槐花麦饭已经成为遥远而又温馨的记忆。

2001年7月

白鸽向我飞来

为了充分感受七月十三日晚十时左右可能出现的惊喜，我约来了两个年轻的农民乡友到我家。我一个人住在白鹿原北坡下祖居的屋院，平时读点书写点小文章挺自在的，而当七月十三日晚十时这个特殊的时刻渐渐接近的时候，却感到一个人的寂寞了，想到至少应该再多有几个人，一起分享那个真是有点揪心的时刻完全可能带给我的欢乐。陕西电视台新闻部的记者也赶到乡下找我来了，他们要抓拍我在那个谜底揭开之后的第一感受。

有两个和我年龄相差甚远的年轻人，又有新闻记者扛着摄像机堵在脸前，我便提醒自己，那个喜讯真的发生时，应持一种喜而不狂兴而不疯的形态，毕竟这样的岁数了，毕竟有摄像机在眼前支着，免得把一时失控的丑相扩散到电视屏幕上去。然而，当萨马兰奇手中那只魔盒似的信封真的向我抖出一只“白鸽”的时候，我还是从椅子上蹦了起来，扬起了双臂，喊出了“北京”。我把什么都忘记了，忘记了身旁的年轻的农民朋友，也忘记了支在脸前的摄像机，也忘记了仅仅在十几分钟以前自我提示不要喜极失态的话。真可谓本性难移。

萨马兰奇主席手中握着的那只白色的信封，顿时幻化为一只白鸽，向中国飞来，向我飞来，将落脚在北京的长城墙头上。

我便说我的第一感觉是心里头的补偿。

我此刻才如此明晰如此迫切地感受到了一种心里头得到补偿的欣慰和淋漓尽致的痛快。

补偿是因为亏虚。

我有限的近代史知识给我造成的心里头的感受就是亏虚。那段历史留给我的印象就只有男人头上那根猪尾巴似的辫子和女人丑臭不堪的小脚。这个民族在世界上承受的一波叠压一波的屈辱，最后就在我脑子里具象为男人和女人的这两样不堪再睹的东西，心里头的那份亏空便期待着补偿。

当我一次次行驶在不断延伸的高速公路上的时候，当我看到“飞豹”的机体和“长臂”导弹模拟发射的时候，当我一年又一年年终在媒体上看到中国外汇储备迭升的报告时，我的脑际里都有那根猪尾巴和小脚的影子掠过，我的心里头都会感受到一种补偿的欣慰。当萨马兰奇放飞的白鸽向我飞来的时候，我感受到补偿是无法掂量其分量的，是一次大补偿。

积久的亏虚终于得到了大补偿，自然就产生自豪自信乃至骄傲了。正是在这个基本的立足点上，我在不断地理解和探索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不断地理解和思索改革开放的理论和实践。当取得瞩目的成就或发生重大的挫折的时候，脑际掠过那根猪尾巴似的辫子和丑臭不堪的三寸金莲，我便会获得一分清醒，便教我一分理性，从而得出自己的选择。

白鸽已经落脚在长城上。

期待到二〇〇八年的那一天，世界上的白鸽都将飞越重洋群山，到长城上来聚首结群，那将是怎样一派美丽的景象。那时，心里头得到的补偿将是最丰盈的，说是历史性的当不为过。

2001年7月21日 白鹿原蒋村

搅团

——关中民间食谱之二

家乡灞河川道自古盛产苞谷。由苞谷面儿做的搅团便应运而生，历久不衰，绵延至今。

把新磨下的苞谷面儿，在滚开的铁锅里抛撒，一边撒着，一边用木勺搅动。顺时针搅一阵子，再逆时针搅一阵子。苞谷面儿要一把一把均匀地撒下去，不匀则容易结成搅不开的干面疙瘩。灶锅底下的火不能灭断，灶下大火烧着，锅里撒着搅着，紧张而又热烈，一般均需夫妻二人同时搭手默契配合，才能打出一锅好搅团。搅团这种饭食的操作过程，常常可以看到农家夫妻的温情和爱意。夫妻间闹了气儿，男方或女方企图结束冷战状态，便会提议打搅团。在灶下和锅台上近在咫尺的夫妻紧密配合中，搅团打成了，夫妻关系也重修旧好了。

这种搅团，说白了，不过是一锅糨糊。

然而，绝对区别于一般的糨糊。

一锅用苞谷面打成的糨糊。

一般的糨糊，必须用麦子面打成才黏。苞谷面黏力不足，即使农家主妇双手抱着木柄大勺搅动，那搅团只增加筋道却不甚黏糊。所以，地道的搅团必以苞谷面为原料。麦子面打出的反而真成了糨糊。

苞谷面搅团千家万户的锅里打出来的大同小异，区别在于臊子。最简单的是用好醋好酱调汤，伴以葱花蒜泥佐味，有香油滴入自然更

好。复杂一点的是用臊子浇汤。用荠菜做汤浇到搅团碗里，野味鲜味俱佳。最复杂的臊子，在关中东府如同臊子面的臊子做法一样，肉丁红白萝卜丁黄花木耳等烩成臊子，浇到搅团之上，那是超常享受了。以上均为热搅团。

搅团凉吃亦很别致。用勺舀到可以下漏的竹篮里，轻压轻挤，搅团便像一条条小鱼或更像蝌蚪一样漏进盛水的盆里。再捞出来，调进酸辣调味品，口感好极了，怀娃娃的孕妇尤好此食。再把搅团晾在案板上，摊平，冷却后切成小块，调了油盐酱醋，作为喝稀饭的佐菜。一边是热烫的苞谷糁子稀饭，一边是冰凉可口的搅团，男女皆好此一热一冷的刺激。还有烩搅团，不再赘述。

无论热吃凉吃烩了吃，谁都明白，只是把苞谷这种粗粮变一个花样以图好进口罢了。

少年和青年时期，粗粮为主，苞谷坐庄。苞谷稀饭苞谷馍馍，一天三顿均为黄颜色的苞谷做成的饭食，民间戏谑：早上苞谷吃，晌午苞谷喝，晚上苞谷把皮脱。搅团便是把难吃的苞谷面儿变一种饭食花样。农村孩子，没有谁能逃躲苞谷饭食的，自然也逃躲不了搅团。

搅团又被乡人戏称“哄上坡”。说它耐不得饥，易消化。肚子吃得膨胀，干活去走到坡上就又饿了。我曾经发过誓，如果能有福分不吃搅团，我将永远不再想它。

当我和乡民都以白面为主食的日子到来时，过了几年，却想吃搅团了，真是不曾料到。随着年岁递增，对这种曾经厌腻透了的饭食更多一层回味与依恋。

到渭南市，作家李康美约我到他家吃饭，我首选搅团。李夫人买来新磨的苞谷面儿，味道真是好极了。

到咸阳市，作家文兰约我吃饭，我仍然首推搅团。文兰又约来作家叶广芩，说她已早有约求，待有搅团吃时一定相告。叶广芩为清室皇家血统，想品尝关中民间饭食，自然除了新鲜，还有体验民情之美意。不料，我等吃得满头大汗口香腹胀仍不想丢碗筷，叶广芩却一脸茫然，感叹：我就一种感觉——猫吃糨子嘛！

陕西作家协会院内有一家搅团专业户，便是文学评论家李星。平均每周至少打一次搅团，从春吃到夏，吃到秋再吃到冬，全以时令蔬菜做汤伴着。我等想吃搅团，便先告知一声，多撒一把苞谷面儿。或是在楼下闻到搅团锅底烧着了的香味，便直接上楼去讨一碗吃。人说，李星写了大半辈子文学评论，打了半辈子搅团。

搅团而今也被开发被提升到大小饭店的食谱上，卖得一把好价，真是大出我半生之意料，惊疑今天富裕了的人疯了。

2001年8月

关于皇帝

皇帝是什么？就是高居于由人民垒成的金字塔的顶端的那个人。

这个人被神化为上天派往人间来做头儿的，所以称为天子；因为是神的意志的化身，便以人间并不存在的龙作为象征，通常被神圣化为真龙天子。

这个被称作皇帝的人，绝对主宰着他足下的所有人的命运；用俗话说，所有人的碗里的稀稠和身上衣服的厚薄，皆由这个人来决定。

我便突发奇想，如果把从封建帝制的创立者秦始皇到最末一个皇帝溥仪之间的所有皇帝复制出来，排列起来，当是一个颇为壮观的队伍。我们会直观看到，或长或短的王朝无论怎样更迭，皇冠和龙袍的式样如何变化，而皇帝君临一切主宰一切的绝对权力从来没有被质疑过，更没有变化。我们还会发现，在这个长长的皇帝队列中，我们能够认得出来，而且能叫出名号的，其实并没有几个；能被认出被记住的那几个，恰恰是这个队列中处于两个极端的皇帝，最英明的和最混账的那几位；真可谓青史可以使英雄垂名，遗臭同样能够万年。

唯物史观认定历史是人民创造的。这里有两种基本的历史事实，英明的皇帝治下的人民创造历史的辉煌，而混账皇帝治下的人民不仅难得作为，常常闹出颠覆王朝的事。无论盛世或乱世，首先决定于皇帝，是真龙天子，是假龙真虫，抑或是毒蛇猛兽。

有了两千年的时空距离，历史的辉煌和历史的血污都已经沉寂。留给今人心里的只有神秘感。时空愈久远，社会文明愈发展，神秘感

则愈浓。道理再简单不过，皇帝居于塔的顶端，总是孤立一人，任何普通人不仅无法类比，更无法亲身体验，只有想象那高不可及深不可测的皇座的神秘。

于是，有关皇帝的文学艺术作品就畅销于世，正说畅销，戏说也畅销，都具备了满足人们探究神秘的普遍性心理的功能，自然也有汲取历史经验和教训的意义。

2001年8月10日

种菊小记

朋友在一家公园供职，前年送我几盆花色各异的菊花，我大为惊讶，人工竟然能培养出这样争奇斗妍的花色品种来。

花谢之后，我便将盆栽菊花送回乡下老家，移栽到小院里。一来是偷懒，免得时时操心旱涝，也少去了天天或隔天浇水的麻烦，土地里毕竟要比花盆耐得伏旱。二来是出于性情，我更喜欢那些自发自然自由生长的原生形态的草木，向来不大欣赏那种裁剪得太规整的东西，包括盆栽花木，尤其不忍心观赏那些被人为地扭曲到奇形怪状的盆景，总是产生欣赏女人小脚的错觉。这样，这几盆菊花一旦移栽到小院的泥土里，便被迫还原为野生形态，任由其发芽、长茎，任由其倒伏在地上。秋来时花儿开了，白色的更显得白，紫色的更显得紫，抽丝带钩的花瓣更显得生动。只是比原先的花要小许多了。小点就小点吧，少了修饰的痕迹，看起来我倒觉得更顺眼。

今年清明前，妻子去了一回城乡交界处死灰复燃了的古庙会，买了几团菊花的根，同样栽在小院里，一视同仁，一任其自由发展，只是不知道这几种菊花是何品种，开什么形状的花。一团团的花根埋到地下，也就埋下了一团团的花谜，看着蓬勃起来的叶子和茎秆，常常就有揭开谜底的期待。我在这些菊花旱得叶子发蔫时，便用井水浇个透湿浇个痛快，便可耐得多日高温。入秋后一场阴雨，原有的新栽的菊花秆茎全都匍匐到地上，扑倒在院中的路径边沿，我也不想扶起它。有乡友来，建议并出主意，弄几根竹棍或树枝，把菊花枝秆儿绑扶起来。我口头应诺，却仍未实施，心里想着，它自己长得太疯太

软，它自己撑持不住要扑倒在地，何必要我扶绑。再说铺地的菊花开了，当会是另一种风情，也许呢。

前不久有一次时日不长的外出。回到原下的小院时，映入眼帘的却是一片惹人的金黄，黄得那么灿烂，黄得那么鲜嫩，又黄得那么沉静，令我抑制不住心颤。记得离家时，这一丛丛古庙会上买来的菊花已呈现出繁密的骨朵花苞，我以为花期尚早，因为暑气溽热还在，起码也应在野菊花之后，不料，它率先开了，这一丛菊花的谜就这样揭开，金色铺地，花团锦簇，一团一团的金黄的花朵任性开放，直教我左看右看立着看蹲下看不忍离去。

看到这一丛铺地盛开的菊花，金黄金黄的颜色，脑海里便浮出黄巢那首广为流传的《咏菊》的诗来。说真话，我记着这首诗，却不喜欢这首诗。从表征意义上，我不赞同“我花开罢百花杀”的狭隘小气。如果真应了黄巢的心愿，百花杀尽，只存留菊花，这世界就太单调太孤清了。不光在我不能忍受，恐怕任何正常的人都会不堪的。黄巢的咒语自己未能实现，却在千余年后的“文革”中发生了，中国文坛百花杀尽，只准存活八个样板戏。搞到一花独放独尊，肯定会出麻烦，肯定长久不了的。从这首诗的深层说，黄巢不过是以菊花自喻，隐含着称王称霸的政治抱负。联想到刚刚做了皇帝的李自成的胡来，以及尚未完全称帝的洪秀全和他的诸王们的胡整，黄巢即使做了皇帝，肯定也强不到哪儿去。只有菊花是无辜的，向来被有风骨的文人学士暗喻明恋地作为傲霜独立品行的一种花，无端地被称帝当王心切的黄巢拉出来称了一回霸，连柔嫩可人的花瓣也被拟化为黄金盔甲。

昨日傍晚，阴霾初开，夕阳在云缝中乍泄乍收。我走出小院，走上村后的原坡，野花凄迷，蚱蜢起落，树青草也绿着，却已分明是秋的景致了。山沟里，坡坎上，一簇簇一丛丛野菊花已经含苞，有待绽

放。往昔的记忆中，这山野间的菊花一旦开放，漫山遍野都是望不断的金黄，我家小院里的那一丛无法比拟，任何花园里的娇生惯养的公主般的同类也是无法比拟的。那种天风地气所孕育的野菊花，其气象其烂漫其率真，都是人工或小院所难以为之的。

作菊花诗两首，以释怀，以备忘。

其一 家菊

含露凝香铺地开，小院金菊报秋来。

秋风秋雨秋阳好，顿生诗情上高崖。

其二 野菊

何事争春斗妍态，不与桃杏一时开。

伏花凋谢香色去，抖出遍山黄花来。

2001年9月28日 原下

成熟的征象

一个草台班子已经崭露中国足球的国家级豪华舞台。

一支原也不过是聚啸山林的股匪式的莽汉，已经蜕变为训练有素的队伍，驰骋于中国足球的绿茵场上。

这是我对陕西国力足球队的印象。我相信我的印象，是因为我比较完整地看到了这支球队诞生、发展的全过程。国力足球队的诞生，不是天子下凡，没有任何异常的惊天动地的表征出现，而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孩子悄然降生，谁也没有太在乎，更不会产生威胁。国力最像一个普通孩子的成长，更多地经历的是艰难，是挫折，是失败，是让众多的球迷一刻也不能松弛的紧张与揪紧的心和攥出水的拳。几位教练雄心勃勃地来了，不堪评说地走了。几茬球员聚着气攒着劲来了，甩着手跺着脚叹一口气又离去了。从在乙级队的苦熬到甲B的升级、保级，教练、球员和球迷，总有一种刀刃上舞蹈的紧张。然而，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国力队渐渐脱颖而出了，进入中国足球绿茵最豪华的舞台了。国力虽然没有达到一枝独秀独领风骚，却是任何一支劲旅也不敢傲慢和轻视的存在，让中国足坛的王牌劲旅几乎翻船的令人难忘的经典一战，足以显示自己的分量和不容轻视的存在。

国力足球队的发展历程，最具普遍的自然法则，不是骤起骤灿而又骤落，而是该经历的旱灾涝灾的经验和磨砺都经受了，没有旱死也没有淹没，活下来长起来便铸成了骤起骤灿骤落者所欠缺的内质。国力进步着，不是一帆风顺式的，这样的进步便积累了一种较为雄健的

基础。自然万物和人生社会，似乎都大量存在着这种生存发展的普遍性规律。

卡洛斯是一尊真神。

卡洛斯执掌教鞭的国力队是一个分水岭。

这个巴西人不动声色。有点本事的人大都是不事张扬的这种做派。于是我看到了这样的一个基本事实，没有名牌球星，乃至连一个入选国家队的队员也没有的国力足球队，在甲A大半季赛程中成绩不俗；一帮从各个球队替补席上聚集到国力帐下的名不见经传的年轻后生，守可以扼制各队最锋利的尖刀人物，攻可以洞穿名牌球队的大门；任谁都可以看出，这个刚刚晋级甲A诸雄赛场的年轻球队，前后左右和中场已经形成了自己的章法，甚至可以看到一种从容和自信，这才是这支球队成熟的本质性的征象。卡洛斯把这样一支谁也不太在乎的新军调教出这样一番阵势，才是一个真有学问、深谙足球行道的行家里手，算得一尊真神。

我看今日的国力足球队，是一支最富朝气最具发展前景的球队。现有的几个年轻球员已经初见球星的征象，从球技，尤其是从心理素质的训练上需自觉强化，不日将在西北的这支球队里冒出璀璨的球星，时刻准备接替郝海东和杨晨们，到未来的世界足坛上与来年的齐达内、巴乔们再过招儿，再较量。千万不要近视于陕西一隅，千万要记取曾经有过新星征象的年轻球员自我砸锅的教训。这也是从事任何职业、成就大事业者的普遍性生活法则。

我将继续与国力将士同行。

2001年10月26日 原下

再会棕榈

——於梨华印象

到昆明再会於梨华。不料见面第一句便考问我，记着我上次给你说的一句话吗？可以想见我的尴尬，因为我浑然无觉了。於梨华矜持许久才揭出谜底：不要抽烟。难怪我忘了，这种关于烟的劝告我已忘记了许多人的好意。

同是三年前的金秋十月，在福建泉州召开的北美华人作家作品研讨会上，初识仰慕已久的美籍华裔女作家於梨华，如读棕榈，留下了初读《又见棕榈，又见棕榈》一样生动而又难以淡忘的印象，一个纯净如棕榈树的作家。

昆明再见，已是熟人，加之这回笔会人少，出行便或前或后相行，多了交谈的机会，我才得知，於梨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赴美读书，在大学期间就发表文学作品，及至长篇小说《又见棕榈，又见棕榈》发表和出版，骤然卷起留学生文学的风潮，於梨华自然成为留学生华文文学的开山者之一，在美国的文坛上成为独秀一枝的奇葩。七十年代中期，她趁到新加坡访问之机，登上了大陆，可以想见一个怀有正义感的作家的勇气。回到美国后，她写了大陆之行的系列纪实性见闻录，发表于华文报纸，也发表在《人民日报》上或《参考消息》上，在海峡两岸以及美国引起广泛反响。稍微熟悉七十年代中期海峡两岸关系状态和世界冷战状况的人，自然会钦敬於梨华的胆魄和远见卓识。台湾当局立即做出反应，不许於梨华返台。整整有十年之久，

她既不能回台湾探亲，也不能参加任何文学活动，直到八十年代中期才解禁。

於梨华说：“他们太小气了。”

她没有通常人们遭遇此类事件的激愤，也没有任何自我夸耀的言辞和神气。她向我叙述完这个简略到不能再简略的经历之后，只是说：“他们太小气了！”我顿时领悟到这其实是最富于意蕴的一种评判，一种於梨华式的个性语句、修养、人格、胸怀、境界等等。

如果从背影看，於梨华给人不过四五十岁交界处的年龄。然而她确凿已经七十岁了。尤其是轻捷的脚步，几乎与年轻人无异，无论参观的路程多长，她从不落步，更不见疲态。在一处山地踏阶而上时，我中途停歇了两次缓气儿，於梨华早已轻松地登了顶端，对我再次劝示：这回该戒烟了吧?

於梨华二十多年前突破禁区造访大陆以来，多次受到国家领导人的接见和关照。然而她始终清醒地把自己定位为一个作家，一个中国裔的作家，只要有机缘，她便兴致高高地从美国赶过来，踏访探寻，几乎走遍了中国的东西南北，一篇篇一本本的文章或书发表出版，永不衰竭。这回是云南保山市文联相邀，由与她交好的作家方方陪同，所到基层市县，无论条件如何，全不在意，只集中着对山水民俗和历史的兴趣。在傣家村寨，她加入到傣家姑娘的舞蹈队列中，模仿傣族舞蹈的舞步和手姿……只是在一次民族风味占主调的午餐桌上，面对一盘油炸野蜂蛹，无论主人如何热情地介绍此菜的营养价值，她只是摇头摆手不敢认同，天真如一个孩子。

在一座休眠的火山顶上，林间草地上野生着一朵朵蘑菇，於梨华便一个个指认，云南作家汤世杰作义务讲解。於梨华看到一朵艳红的蘑菇，惊呼："好漂亮耶！"汤世杰便严肃警告，这种蘑菇不能吃，越艳丽的蘑菇毒性越大。於梨华瞬即类比，太漂亮的女人不要碰！大伙便哈哈起笑，也不问为什么。於梨华再次申述，真的，越漂亮的女人越不能碰。我便打趣，你的这话可以公开吗？意下隐含你不怕漂亮女人诅咒你吗？她爽快地说，怎么不敢公开？这有什么！

我在七八天的旅行中，只见过她的一次狼狈相。那天中午，车行至山路上停住，下一道很深的坡，去观赏架在怒江上的双虹桥，这是通南洋的古丝绸之路上的一座名桥，建于清初。因为早晨刚下过雨，窄窄的山道上泥泞滑溜，坡度又陡，年轻人走起来也是左摇右晃。於梨华虽然时时惊叹坡陡路滑，却始终没有退缩放弃之意，在大伙的帮扶下，一直走到怒江边上，走在凌空飞架的铁索桥上，孩子一样欢叫起来了……她许久才发现一双白色旅行鞋几乎被黑色泥巴全糊住了，心疼地嚷嚷：我来时专门买的新鞋，八十美金哪！说完又笑了。

翻越高黎贡山到达山顶，停止以观赏高山杜鹃花树。於梨华对着栽在路边的一块广告牌惊疑发问："'淋浴'怎么还要'加水'？"众人顿时爆发出大笑。路边店主立的这块广告牌字大醒目，"淋浴"是指向人的服务项目，"加水"则是指车。因为没有间断，久居旧金山的於梨华同志（戏称）便发生了阅读误差。有人随之打趣道："'修理'之后还要'配套'哩！"这同样是广告牌上下边的四个字，如果与"淋浴"一起联系到人，笑话就闹得更大了。直到此行结束，每有相关的语言误差发生，便有人拉出"淋浴"还需"加水"吗的笑料，消解了旅途的疲累，增添了活泼，包括於梨华同志，时不时地会逗问，还是"淋浴""加水"的问题吗？

依依地分手。方方和於梨华又奔四川九寨沟去了，她毫无倦意。临了仍然不改她的忠告：把烟戒了。

真如一棵常青的棕榈。

2001年10月26日夜 原下

再说死亡

七八年前，伤感于一位正当创作旺期的青年作家的早逝，多年没有写过诗的我写了一首诗：《猜想死亡》。诗里表述了我对死亡的一种猜想，因为人类文明的进步与发展，许多不可知的东西被揭开谜底变为可知，许多不可料知的事也都成为可以预料预防的事了。但迄今为止，人类关于死亡之谜仍然是一个谜，无法阻止无法预测更无法料定，正如民间哲学所归纳的那样，谁再厉害也不知自己该在何时何地以何种方式离开这个世界。所以，对死亡我便做出这样一种猜想：天上可能有一颗专司死亡的星星，它像弹球一样砸向地球，击中了谁谁就倒霉了，而不论这个人是总统是将军或是平民。在那颗灾星击中之前，总统继续施政，将军继续操练士兵，平民继续忙碌自己的柴米油盐，只能如是。因为任何人既不可能长生不老，也无法料知自己被灾星击中的时间、地点和方式。

近日读了青年诗人李汉荣的诗，很富于哲理思索的诗，那些关于生与死，尤其是死的思索，颇得以启迪。李汉荣的观点是：生是欢乐，值得敲锣打鼓鸣炮庆祝；死亦为欢乐，也值得以同样的形式庆祝；欢送一个生命离开世界和欢迎一个生命来到这个世界都应该以欢乐的心理和方式庆祝。我大为惊异。对新生命的诞生的欢迎形式早就以多种风俗习惯持续着，而死亡从来不是庆祝，通常用的是哀悼，是痛失，是噩耗这类凄凄惋惋痛痛切切悲痛欲绝的词语。在生活中，如若谁对谁的死亡说一句“值得庆祝”，准会招骂挨打甚至被看成神经出了问题，因为这话道出了通常习惯和心理。由李汉荣的诗，我又联想到日本大腕导演黑泽明的一组电影短片，其中有约半个小时的《水车村》，这部短片的内容仅仅只是展示了一种丧葬仪式。整个丧葬仪式

集中表达的就是欢乐和庆祝。水车村的男女老少穿着彩色的民族服装，用民族乐器奏着优雅的乐曲，跳着欢乐而又优雅的民族舞蹈，送逝者归入山地。中国诗人李汉荣和日本名导黑泽明关于死亡的哲思是如此的一致，所以我才感到惊异，惊异他们较之我在这个话题上的思索要深了一层。我仅仅只是猜想了死亡的方式，而没有达到值得欢庆这样一种哲学的高度。

关于生的话题且不论。如果没有死亡，今天的世界会是什么样子？孔子如果活到现在会如何？秦始皇和秦二世活到现在怎么办？即使唐太宗李世民活到今天也是不可想象的事。从人类生命诞生一直繁衍到今天会有多少人，这是一个永远也无法统计的未知数，恐怕世界的各个角落都被摩肩接踵挤得水泄不通了，地球早在多少年以前，就变成了绝杀生命的月球。这样想来，死亡真是应该庆祝的事，应该视作欢乐而不应该视作痛失，因为他或她不可能长生不老。人即使活到百余岁终归要谢世，“痛失”这词对年轻人的早夭可以通情理，于已经完全苍老而活着等于受罪的老人，确应视为欢乐和庆祝的事。

生命的意义首当创造。人从事各类行业的工作各个不同，创造物质财富的多少大小也有差异，然而人类生活和生存的所有物质中的任何一种都是不可或缺的，从事各种劳动的所有生命都是平等的，同样都是应该珍惜的。生命存在的不言而喻的意义还有享受。人在来到这个世界的同时首先开始享受母乳，然后才渐渐获得创造物质的能力。人活着就是创造，劳动和享受生活的甘美和快乐，这些都是人尽皆知的生活常识。问题在于，当人的生命在截至目前尚无法逆抗的自然规律的轨道上运行到极限，丧失了劳动和创造的基本能力的同时，甚至连享受生活的甘美欢乐的能力和欲望也都消失的时候，生命的基本价值也就没有了，多活一日与少活一日，多活一年与少活一年，已经没

有任何实际的意义，所以死亡（老死）就应该被视为欢乐和值得庆祝的事。

欢乐和庆祝的意义在于，对其一生的生命价值的最好的赞颂。他种的麦子，他造的住宅和河桥，他的科学发明给社会给他人带来幸福，他对子女的哺养，对亲人的爱抚，对社会的责任已尽到，他的生命价值在社会的繁荣进步和亲友的欢乐中存在着、延伸着，他的生命值得赞颂和铭记。

亲情和友情所引发的伤情伤悲却是千古以来的人之常情，各个种族皆同。因而就会发生于理性上应视为欢乐的死亡，在情感上都表现为伤痛悲哀，属于情感的难以割舍。人于无奈之中，只能寄托于对死去灵魂安息的方式的选择上，尽心尽力做到最好，使活着的亲人也得到情感和心灵的慰藉，把理性的欢乐和情感的悲痛化解为平衡。

孙彦玉女士体察并顺应人类的这一普遍心理需求，与西安市殡仪馆合作，创建西殡安灵苑，为逝者创造一个安息灵魂的幽雅、优美的环境，更为生者创造一个慰藉心灵、寄托亲情的场所。创办几年来，环境愈来愈幽雅，管理愈来愈规范，业已形成浓郁的人文氛围。我钦敬的学界泰斗霍松林先生和书界名家吴三大先生亲自为安灵苑撰写楹联，亲笔书写，概出于对已经谢世的每一个生命的敬重和珍爱，对于逝者的亲人的心理和情感的体察和关爱，显示着中国知识分子的人文情怀。他们的行为本身就是对生命的最好的礼赞。

2001年11月

火晶柿子

我喜欢柿树。柿子好吃，这是最主要的因由。柿树不招虫害，任何害虫病菌都难以近身，大约是柿树特有的那种涩味构成了内在的天然抗拒，于是便省去了防虫治病的麻烦，也不担心农药残留的后患。柿树又很坚韧，几乎与榆槐等柴树无异，既不要求肥力和水分，也不需要任何稍微特殊的呵护。庭院里可以栽植，水肥优良的平川地里可以茁壮，土瘠水缺的干旱的山坡上、塄畔上同样蓬蓬勃勃，甚至一般柴树也畏怯的红石坡梁上，柿树仍可长到合抱粗。按照习惯或者说传统，几乎没有给柿树施肥浇水的说法。然而果实柿子却不失其甘美。

在柿树家族里，种类颇多。最大个儿的叫虎柿，大到可称出半斤。虎柿必须用慢火温火浸泡，拔去涩味儿，才香甜可口。然慢火的火功和温水的温度要随机变换，极难把握，稍有不当就会温出一锅僵涩的死柿子，甭说上市卖钱，白送人也送不出去。再说这种虎柿还有一个致命的弱点，不能存放，温熟之后即卖即食，隔三天两日尚可，再长就坏了，属于典型的时令性水果。还有一种民间称为义生的柿子，个头也比较大，果实变红时摘下，搁置月余即软化熟透，味道十分香甜。麻烦的是软化后便需尽快出手，或卖钱或送亲友或自家享受，稍长时间便皮儿崩裂柿汁流出，不可收拾，长途运送都是比较难以解决的问题。再有一种名曰火罐的柿子，果实较小，一般不超过半两，尽管味道与火晶柿子无甚差异，却多核儿，成为重大的弹嫌之弊，所以不被钟爱，几乎遭到淘汰而绝种，反正我已多年不见此物了。只有火晶柿子，在柿树家族中逐渐显出优长来，已经成为独秀柿族的王牌品种了。

火晶。真是一个热烈而又令人富于想象的名字。火是这种柿子的色彩，单一的红，红的程度真可以用“文革”中用滥了的词儿“红彤彤”来形容来喻示。我在骊山南麓的岭坡上见到过那种堪称红彤彤的景观，一棵一棵大到合抱粗的柿树，叶子已经落光掉净了，枝枝丫丫上挂满繁密的柿子，红溜溜或红彤彤的，蔚为壮观，像一片自燃的火树。火晶的名字中的火字大约由此而自然产生，晶也就无须阐释或猜想了。把火的色彩与晶字联结起来，便成为民间命名的高雅一种，恐怕只有民间的智者才会创造出这样一个雅俗共赏的柿子的名字来。

火晶柿子比虎柿比义生柿子小，比火罐柿子大，个重两余，无核。在树上长到通体变成橙黄时摘下来，存放月余便软化熟透，尤其耐得存放，保管得法的农户甚至可以保存到春节以后，仍不失其新鲜甘美的原味。食时一手捏把儿，一手轻轻掐破薄皮儿，一撕一揭，那薄皮儿便利索地完整地去掉了，现出鲜红鲜红的肉汁，软如蛋黄，却不流，吞到口里，无丝无核儿，有一缕蜂蜜的香味儿。乡间小贩摆卖火晶柿子的摊位上，常见蜜蜂“嗡嗡”盘绕不去，可见诱惑。

关中盛产柿子，尤以骊山为代表的临潼的火晶柿子最负盛名。一种名果的品质决定于水土，这是无法改变的常识。我家居骊山之南，白鹿原原坡之北，中间流着一条倒淌河灞水，形成一条狭窄的川道，俗称灞川，逆水而上经蓝田约五十里进入王维的辋川。由我祖居的老屋涉过灞水走过平川登上骊山南麓的坡道，大约也就半个小时。水土和气候无大差异，火晶柿子的品质也难分上下，然而形成气候形成品牌的仍然是临潼。

大约是“文革”后期，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携妻引子到西安，参观兵马俑往来的路上，王子发现路边有农民摆的火晶柿子小摊，问及此果，陪随人员告之。回到西安下榻处，有心的接待人员已经摆放好一

盘经过精心挑选的火晶柿子，并说明吃法。王子生长在热带，未见过亦未吃过北方柿子并不足怪，恰是这种中国关中的火晶柿子令其赞赏不绝，直到把一盘火晶柿子吃完，仍然还要，不管斯文且不说了，连陪随人员的劝告（食多伤胃）也任性不顾。果然，塞了满肚子火晶柿子的王子到晚上闹起肚子来，引起各方紧张，直接报告北京有关领导，弄出一场虚惊。王子虽然经历了一个难受的夜晚，离开西安时仍不忘要带走一篮火晶柿子。

这个真实的传闻流传颇广。在关中普通到不能再普通的柿子，竟然上了招待外宾的果盘，而且是高贵的王子，确实令当地人始料不及。想来也不足为奇，向来都是物以稀为贵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到与临潼连界的蓝田县查阅县志时发现，清末某年，关中奇冷，柿树竟然死绝了。我得到一个基本常识，柿树原来耐不得严寒的。但那年究竟“奇冷”到怎样的程度，却是无法判断的，那时怕是连一根温度计也没有。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头上，我在原下的祖屋写作《白鹿原》的时候，这年冬天冻死了一批柿树，我至今记得这年冬天的最低温度为摄氏零下十四度，持续了大约半月，这是几十年来西安最冷的一个冬天。村子里许多农户刚刚挂果的葡萄统统冻死了，好多柿树到春末夏初还不发芽，人们才惊呼柿树被冻死了。我也便明白，清末冻死柿树的那年冬天“奇冷”的程度，不过是摄氏零下十几度而已。

编志人在叙述“奇冷”造成的灾害时，加了一句颇带怜悯情调的话，曰：柿可当食。我便推想，平素当作水果的柿子，到了饥馑的年月里，就成为养生活命的吃食了。确凿把柿子顶做粮食的事发生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的“三年困难”时期及十年“文革”之中，临潼山上的山民从生产队分回柿子，五斤顶算一斤粮食。想想吧，作为口舌消遣

的柿子是一种调节和品尝，而作为一日三餐的主食，未免就有点残酷。然而，我又胡乱联想起来，被当地山民作为粮食充饥的柿子，在西哈努克王子那里却成为珍果，可见人的舌头原本是没有什么天生贵贱的。想到近年某些弄得一点名堂的人，硬要做派出贵族状，硬要做派出龙种凤胎的不凡气象，我便担心这其中说不准会潜伏着类似火晶柿子的滑稽。

我在祖居的屋院里盖起了一幢新房，这是八十年代中期的事，当时真有点“李顺大造屋”的感受。又修起了围墙，立了小门楼，街门和新房之间便有了一个小小的庭院。我便想到栽一株柿树，一株可以收获火晶柿子的柿树。

我的左邻右舍及至村子里的家家户户，都有一棵两棵火晶柿树，或院里或院外；每年十月初，由绿色转为橙黄的柿子便从墨绿的树叶中脱颖而出，十分耀眼，不说吃吧，单是在屋院里外撑起的这一方风景就够惹眼了。我找到内侄儿，让他给我移栽一棵火晶柿子树。内侄慷慨应允，他承包着半条沟的柿园。这样，一株棒槌粗的柿树便植栽于小院东边的前墙根下，这是秋末冬初最好的植树时月里做成的事。

这株柿树栽下以后，整个前院便生动起来。走出屋门，一眼便瞅见高出院墙沐着冬日阳光的树干和树枝，我的心里便有了动感。新芽冒出来，树叶日渐长大了，金黄色的柿花开放了，从小草帽一样的花萼里托出一枚枚小青果，直到缀满枝丫的红灯笼一样的火晶柿子在墙头上显耀……期待和祈祷的心境伴我进入漫长的冬天。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我读小学时，后屋和厦房之间窄窄的过道里有一株火晶柿树，若小碗口粗，每年都有一树红亮亮的柿子撑在厦房房瓦上空。我于大人不在家时，便用竹竿偷偷打下两三个来，已经变

成橙黄的柿子仍然涩涩的，涩味里却有不易舍弃的甜香。母亲总是会发现我的行为，总是一次又一次斥责，你就等不到摘下搁软了熟了吗？直到某一年，我放学回家，突然发现院里的光线有点异样，抬头一看，罩在过道上空的柿树的伞盖没有了，院子里一下子豁亮了。柿树被齐根锯断了。断茬上敷着一层细土。从断茬处渗出的树汁浸湿了那一层细土，像树的泪，也似树的血。我气呼呼问母亲。母亲也阴郁着脸，告诉我，是一位神汉告诫的。那几年我家灾祸连连，我的一个小妹夭折了，一个小弟也在长到四五岁时夭亡了，又死了一头牛。父亲便请来一个神汉，从前院到后院观察审视一番，最终瞅住过道里的柿树说：把这树去掉。父亲读过许多演义类小说，于这类事比较敏感，不用神汉阐释，便悟出其中玄机，“柿”即“事”。父亲便以一种泰然的口吻对我说，柿树栽在家院里，容易生“事”惹“事”。去掉柿树，也就不会出“事”了。我的心里便怯怯的了，看那锯断的柿树茬子，竟感到了一股鬼气妖氛的恐惧。

没有什么人现在还相信神汉巫师装神弄鬼的事了，起码在“柿”与“事”的咒符是如此。因为我的村子里几乎家家户户的院里门外都有一株或几株柿树。人在灾变连连打击下便联想到神的惩罚和鬼的作祟，这种心理趋势由来已久，也并非只是科学滞后的中国乡村人独有，许多民族，包括科学已很发达的民族也颇类同，神与鬼是人性软弱的不可避免的存在。我在前院栽下这棵柿树，早已驱除了“柿”与“事”的文字游戏式的咒语，而要欣赏红柿出墙的景致了。漫长的冬天过去了。春风日渐一日温暖起来。我栽的柿树迟迟不肯发芽。

直到春末夏初，枝梢上终于努出绿芽来。我兴奋不已，证明它活着。只要活着就是成功，就有希望。大约两月之后，进入伏天，我终

于发觉不妙，那仅仅长到三四寸长的幼芽开始萎缩。无论我怎样浇水，疏松土壤，还是无可挽回地枯死了。

这是很少有的现象，我喜欢栽树，不敢说百分之百成活，这样的情况确实极少发生。这株火晶柿子树是我尤为用心栽植的一棵树，它却死了。我久久找不出死亡的原因，树根并无大伤害，树的阴阳面也按原来的方向定位，水也及时适度浇过，怎么竟死了呢？问过内侄儿，他淡淡地说，柿树是很难移栽的，成活率极低。我原是知道这个常识的，却自信土命的我会栽活它。我犯了急功近利轻易求取成功的毛病，急于看到一棵成景的柿树。于是便只好回归到最老实之点，先栽软枣苗子，然后嫁接火晶柿子。

一种被当地人称作软枣的苗子，是各种柿树嫁接的唯一的砧木。软枣生长十分泼势，随便甚至可以说马马虎虎栽下就活了。我便在小院的西北角栽下一株软枣，一年便长到齐墙的高度。第二年夏初，请来一位嫁接果树的巧手用俗称热黏皮的芽接法一次成功，当年冒出的正儿八经的火晶柿子的新枝，同样蹿起一人高。叶子大得超过我的巴掌，新出的绿色的干儿竟有食指粗，那蓬勃的劲头真正让我时时感知初生生命的活力。为了防止暴风折断它的尚为绿色的嫩干，我为它立了一根木杆，绑扶在一起，一旦这嫩干变成褐黑色，显示它已完全木质化了，就尽可放心了。我于兴奋鼓舞里独自兴叹，看来栽成树走捷径还是不行的。这个火晶柿子树的起根发苗的全过程完成了，我也就留下了一棵树的生命的完整印象，至今难以忘怀。

这株火晶柿树后来就没有故事了。没有虫害病菌侵害，在院里也避免了牛马猪羊的骚扰，对水呀肥呀也不讲究，呼呼啦啦就长起来了，分枝分叉了，长过墙头了，形成一株青春活力的柿树了。这年冬天到来时，我离开久居的祖屋老院迁进城里去，一年难得回来几次。

有一年回来正遇着它开花，四方卷沿的米黄色小花令人心动，我忍不住摘下两朵在嘴里嚼着咽下，一股带涩的甜味儿，竟然回味起背着父母用竹竿偷打下来的生柿子的感觉。

今年春节一过，我终于下定决心回归老家，争取获得一个安静吃草安静回嚼的环境。我的屋檐上时有一对追逐着求偶的“咕咕咕”叫着的斑鸠。小院里的树枝和花丛中常常栖息着一群或一对色彩各异的鸟儿。隔墙能听到乡友们议论天气和庄稼施肥浇水的农声。也有小牛或羊羔蹿进我忘了关闭的大门。看着一个个忙着农事、忙着赶集售物的男人女人毫不注意修饰的衣着，我常常想起那些高级宾馆车水马龙衣冠楚楚口红眼影的景象。这是乡村。那是城市。大家都忙着。大家都在争取自己的明天。

我的柿树已经碗口粗了。我今年才看到了它出芽、开花、坐果到成熟的完整的生命过程。十月初，柿子日渐一日变得黄亮了，从浓密的柿树叶子里显现出来，在我的墙头上方，造成一幅美丽的风景。我此时去了一趟滇西，回来时，妻子已经让人摘卸了柿子。

装在纸箱里的火晶柿子开始软化。眼见得由橙黄日渐一日转变为红亮。有朋自城里来，我便用竹篮盛上，忍不住说明：这是自家树上的产物。多路客人无论长幼无论男女，无不惊叹这火晶柿子的醇香，更兼着一种自家种植收获的乡韵。看着客人吃得快活，我就想起一件有关火晶柿子的逸趣。某年到一个笔会，与一位作家朋友聊天，他说某年到陕西参观兵马俑的路上品尝了火晶柿子，尤感甘美，临走时又特意买了一小篮，带回去给尚未尝过此物的南方籍的夫人。这种软化熟透的火晶柿子稍碰即破，当地农民用剥去了粗皮的柳条编织的小篮儿装着，一层一层倒是避免了挤压。他一路汽车火车，此物不能装箱，就那么拎着进了家门，便满怀爱心献给了亲爱的夫人。揭开柳条

小篮，取出上边一层红亮亮的柿子，情况顿觉不妙，下边两层却变成了石头。可以想象他的懊丧和生气之状了。事过多年和我相遇聊起此事，仍然大气难抑，末了竟冲我说，人说你们陕西人老实，怎么这样恶劣作假？几个柿子倒不值多少钱，关键是让我几千里路拎着它，却拎回去一篮子石头，你说气人不气人？这在谁也会是懊丧气恼的，然而我却调侃道，假导弹假飞船没准儿都弄出来了，陕西农民给柿篮子里塞几块石头，在中国蓬蓬勃勃的造假行业里，只能算是启蒙生或初级水平，你应该为我的乡党的开化而庆祝。朋友也就笑了。我随之自我调侃，你知道我们陕西人总结经济发展滞后的原因是什么吗？不急不躁，不跑不跳，不吵不闹，不叫不到，不给不要，所谓关中人的“十不”特性。所以说，一个兵马俑式的农民用当地称作料僵石（此石特轻）的石头冒充火晶柿子，把诸如我所钦敬的大城市里的名作家哄了骗了涮了一回，多掏了他几枚铜子，真应该庆祝他们脑瓜里开始安上了一根转轴儿，灵动起来了。

玩笑说过也就风吹雨打散了。我却总想着那些往柳条编的小篮里塞进冒充火晶柿子的石头的农民乡党，会是怎样一种小小的“得意”……

2001年11月20日 原下

最初的操练

在我先是业余后是专业的写作生涯里，后来一直把散文《夜过流沙沟》作为处女作。这篇散文发表在一九六五年初的《西安晚报》文艺副刊上，刊名可能叫《红雨》，取自毛泽东诗句“红雨随心翻作浪”。

我至今也搞不大准确“处女作”的含义，是指平生写下的第一篇作品呢，还是指公开发表的作品？我把《夜过流沙沟》作为处女作，是按后一种含义，即公开发表的第一篇散文。而此前曾经写过不少散文、诗歌、小说，都没有达到发表水平自行销毁了。而按照“处女作”的客观直接的含义，应该是指第一次写下的作品，而不管它发表与否。

其实，在后来被我作为处女作认定的《夜》文发表之前，我还发表过两次作品，而且都是发表在《西安晚报》的文艺副刊上。第一次在一九五八年秋天，我刚刚进入初中三年级，正是“大跃进”势头最猛的时候，学校几乎处于停课或半停课状态。我们一阵儿被安排到东郊的原坡上轰打麻雀，一阵儿端着洗脸盆到灞河里去淘铁沙，一阵儿又到纺织厂周围的马路小巷及垃圾堆上去捡拾废铁。学校的校园里已经垒起了土法炼铁炉子，一伙从各个班级抽调出来的比较能干的学生和几位老师，从早到晚围着那个实在不敢恭维的小泥炉子忙活。学校前门外从生产队借来的一块田地里栽上了一块木牌，写着亩产多少万斤的“卫星”指标，同样有一群学生和几个老师从早到晚在那块神秘的土地上折腾。我对这些轰轰烈烈的运动只感觉到很热闹，却对任何一项也插不上手，倒是对正在掀起的全民写作诗歌运动更感兴趣。我那时

候已经偏爱文学，半停课的松散秩序里正好可以阅读文学作品。每逢周日回家往来的路上，沿途所过的大小村庄，靠着大路或村巷的庄稼院的围墙和房墙上，全都绘上了浪漫主义的图画并配着浪漫主义的诗歌。印象最深的是一幅诗配画，一位头裹羊肚手巾的壮汉双臂推开两座山峰，配着一首响遍全国城乡的诗歌，末尾一句是：喝令三山五岳开道，我来了。看着骤然间魔术般变出诗画满墙的乡村，读着这样昂扬的诗句，我往往涌起亢奋和欢乐。一次作文课上，老师让大家写歌颂大跃进、人民公社、总路线“三面红旗”的诗歌，我一气写下五首，每首四句。作文本发回来时，老师给我写了整整一页评语，全是褒奖的好话。我便斗胆把这五首诗寄到《西安晚报》去。几天后，有同学在阅报栏上发现了我的名字，问是不是我寄过稿。我竟然很激动，激动到不好意思到阅报栏前去。后来被两个同学拽着到了校园前院的阅报栏，我看见了印在我名字下的四句诗。姑且按当年的概念仍然称它为诗吧，尽管它不过是顺口溜，确凿是我第一次见诸报刊的作品。

到了一九六四年，我所在的西安郊区全面开展以阶级教育为纲的“面上社教”运动。冬天里，公社团委安排春节前夕要搞文艺会演，各个村子的团支部都要出节目，我所在的农业中学也接受了任务，却犯起愁来，我根本不会排练文艺节目。情急之下，我把当地一位老贫农的家史编成一首陕西快板，找了一位口才和嗓门比较亮堂的学生，演出后颇多反响。很快，这个快板就在《西安晚报》临时开设的《春节演唱》专栏里全文发表了。

次年，即一九六五年初春，我的散文《夜过流沙沟》在《西安晚报》发表出来。我后来之所以把它作为我的处女作，主要是一种心理因素，即散文才应该是文学作品的正宗。上初三时发表的那四句顺口溜且不说了，篇幅较长的那首陕西快板，从文艺分类上属于曲艺作

品，归不到文学的范畴里来。那是对一次临时任务的响应，我真正痴迷、潜心追求的是文学类里的小说、散文以及新诗歌，曲艺从来不是我写作的兴趣。我在后来许多年里几乎没有提说过那四句顺口溜和那首陕西快板的事。在我的创作心理中，《夜》文的发表才是我真正感到鼓舞感到兴奋感到了入门意义的事情。无论如何，这三次把钢笔写的文字变为公开发表的铅字，都发生在《西安晚报》的副刊上，在我整个创作生涯中是保有永久之鲜活的记忆的。

随后，我在《西安晚报》连续发表过六七篇散文，直到“文革”开始前该报中止文艺副刊，大约有一年稍多点的时日。这是我生命历程中第一次重大的挫伤。刚刚感受到发表作品的鼓舞，刚刚以为摸得文学殿堂的门槛，那门却关上了。尽管有点残酷，美好的记忆依然美好。我记得收到过一位和我同姓的编辑的信。信的原话也大致记着：你的诗歌比起你的散文来稍微逊色。建议你先专注散文，有所突破，然后再触类旁通。这是我接到的第一封指导我的写作的信。我那时候二十岁出头，喜欢写小说、散文和诗歌。这封信恰是在发表了我一首短诗之后写给我的。我立即就掂量出我的诗歌是令编辑勉为其难的水准，相对而言是弱于散文的。我很想当面聆听一个编辑的指导，于是便带着一篇新写的散文，登门求教给我写信的陈编辑去了。真正是诚惶诚恐的，真正是神圣而又庄严的，真正是虔诚敬重地走进西安晚报社大门的。小小的副刊编辑部里，坐着一男一女两位编辑，男的年龄稍长，女的不仅年轻，而且很漂亮，看了一眼说了一句话就不敢再看了。然后我就在陈编辑对面坐下。他话不多，赞扬了我的散文，也坦率地表示不大欣赏我的诗歌，仍然重复着信中的意见。这是“文革”前我唯一一次看见过的文学编辑和编辑室里的情景。人生总是第一次经历的事情印象最为深刻。许多年后，在《西安晚报》的某次座谈会上见到李焱，交谈中才知道，她就是那位漂亮得让我不敢再看第二眼的

年轻女编辑。她已人到中年，精干而又豁朗，成为文艺部主任了，美丽依然美丽，却不怕人看了。在我也有了欣赏美的勇气。关键在于我们的社会生活大踏步地发展前进了。遗憾的是，我曾多次打问，均得不到陈编辑调到什么地方去了。

“文革”中期，大约是一九七一年，我所工作的公社来了《西安晚报》一位记者，采访合作医疗的发展，由我陪同引路。他在知道我的名字之后很惊奇地说，听说他要到西安郊区来采访，一位姓张的编辑让他留心打听一下我。这样，我就和文艺部的张月赓认识了。他说他“文革”前也在《西安晚报》发表散文，见过我发表的几篇小散文。《西安晚报》要恢复文艺副刊了，他已调到文艺部来，便打听我，想约稿。我说我已经六七年不写这类东西了，倒是熟悉了给上边写某项工作的总结材料和公社领导的报告。他坚持不让，说我总是有文学基础的，重新试笔还是可以作为的。我便不好再推辞，却一直难以形成艺术思维并提起笔来。拖了半年，他不断催问、不断鼓励，我终于写成了中断六七年之久的又一个“第一篇”散文《闪亮的红星》。这期间我和公社的赤脚医生到灞水之源的秦岭山中采药，闻听一位军医在山区为群众治病的诸多感人事迹，遂写成这篇散文。交给老张时，依然是诚惶诚恐。我对他说，六七年了，手生了思维也僵了，连一句生动的词儿也蹦不出来。老张却甚为满意，很快在《西安晚报》刚刚恢复的《红雨》副刊上发表，据说引起了一些反响。我明白也清醒，“文革”开始后的六七年里，文学和艺术类杂志全都停刊，报纸文艺副刊也取消了，书店里也是除了浩然的小说再见不到任何文艺书籍了。与文艺几乎绝缘了六七年的民众，在报纸上突然看到一篇散文，肯定首先会有新鲜感，绝不会是我写出了什么佳作。

对我来说，这篇艰难作成的散文的成败并不足论，重要的是把截断了六七年、干涸了六七年的那根文学神经接通了、湿润了，思维以文学的形式重新流动起来了。此后，我便有小散文不断送到老张手里。发表之后，他寄我一张最高价码的一元五角的购书证。我到指定的钟楼新华书店去，根本没有任何可以买的书，便选择了巴掌大的《新华词典》，供孩子念书用；多到自家用不完，便送亲戚朋友的孩子。我以为文学创作仅仅只是发端于人的兴趣，一根对文字尤为敏感的神经，就是由此而想到的。想想那时候不仅没有稿酬，稍有不慎便会惹出文字狱的灾祸来，我当时也搞不清为什么要点灯熬油自赔纸张劳心伤神去写这类散文和小说，后来长了些年岁才悟出是那根神经在作祟。

这种既不能获利也无什么名可言的写作，仍然在业余时间里兴味十足地继续着。我和张月赓的友谊也延续着。老张几年前已经退休，偶尔打个电话过来，不吃大菜和地方风味，却好吃洋餐肯德基。我们俩便走到格局新颖的肯德基店，吃一块鸡腿，啜一盒冰淇淋，看着周围尽是青年男女和小孩子的食客，我们两个头发稀疏灰白的半老汉，却有滋有味忆及当年在《西安晚报》文艺副刊上发稿的事。时代发展了，生活观念更新了，文学也回归到文学的本源上来了。我们尚未完全落伍，尤以这种文学结缘的友谊比什么都更令人熨帖。

报纸的文艺副刊，是专业和业余作家的一块重要园地。新文学发起之初直到解放，鲁迅为代表的作家们的许多著述，都是在报纸副刊上与读者见面的。“文革”前的十七年，陕西两家公开发行的大报——《陕西日报》和《西安晚报》的文艺副刊，成为包括我在内的业余作者操练文字的重要园地。现在刊物多了，报纸也多了，传媒工具更现代化了，然而报纸的文艺副刊仍然独具其风采。我在此向《西安晚

报》的一茬接一茬的新老文艺编辑们致以真诚的祝福，你们是真正无私的幕后人杰。

2001年12月

三九的雨

这是我村与邻村之间一片不大的空旷的台地。只有一畛地宽的平台南头开始起坡，就是白鹿原北坡根的基础了。平台往北下一道浅浅的坡塄，就是灞河河滩了。我脚下踏着的平台上的这条沙石大路，穿过一个个大大小小的村庄，通往西安。

天明时雨止歇了。天阴沉着，云并不浓厚，淡灰的颜色，估计一时半刻挤拧不出雨水来。空气很清新，湿润润的，山坡上的麦子绿莹莹的，河川里的麦子也是莹莹的绿色。原坡上沟坎里枯干的荒草被雨浇成了褐黑色，却有一种湿润的柔软。河川北岸是骊山的南麓，清晰可辨一株树一道坡一条沟，直至山岭重叠的极处。四野宁静到令人耳朵自生出纤细的音响来。

前日落了雨。小雨。通常是开春三月才有的那种"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的春雨。腊月初二（二〇〇二年一月十四日）下起，断断续续稀稀拉拉下到今天天明，让整个村子里的男女惊诧不已，该当滴水成冰冻破砖头的"三九"时月，居然是小雨缠绵。太过反常的天气给农人心里一种不祥的妖孽征候。这是我半生里仅见的一次"三九"的雨，以及不仅不冻反而松软如酥的土地。

我脚下这条颇为宽绰的沙石大路是一九七七年冬天动工拓宽的。与这条大路同时开工的是灞河河堤水利工程，由我任副总指挥具体实施的。那时，我完成这项家乡的水利工程的心态，与我后来写作长篇小说《白鹿原》时的心境基本类同，就是尽力做成一件事。

我第一次背着馍口袋从这条路走出村子走进西安的中学时，这条路大约也就一步宽，架子车是无法通行的。我背着一周的干粮走出村子时的心情是雀跃而又高涨的，然而也是完全模糊的。我只是想念书，想上城里的中学去念书，念书干什么等抱负之类的事，完全没有。我再三追寻记忆，充其量只会有当个工人之类的宏愿，而且这主要是父母供儿女上学的原始动机。在乡村人的眼睛里，挣工资吃商品粮的工人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我在初中二年级却喜欢文学了，这不仅大大出乎父母的意料，连我自己也感到奇怪。通常情况下，爱好文学是被视为浪漫而又富于诗意的事情，怎么会发生在一个穿粗布衣服吃开水泡馍的人身上呢？许多年后我把自己的这种现象归结为一根对文字敏感的神经——文学的兴趣由此而发端。书香门第以及会讲故事会唱歌谣的奶奶们的熏陶，只能对具备文字敏感的神经的儿孙起反应起作用，反之讲了也是白讲唱了也是白唱。

背着馍口袋出村夹着空口袋回村，在这条小路上走了十二年，我完成了高中学业。我记忆中最深的是十六岁那年遇到过狼。天微明时，我已走出村子五华里的一条深沟的顶头，做伴壮胆的父亲突然叫了一声“狼！”就在身旁不过二十步远的齐摆着谷穗的地边上，有一只狼。稍远一点，还有一只。我没有感觉到丝毫的害怕，尽管是我第一次看见这种吓人的动物；不是我胆大，而是身旁跟着父亲。我第一次感受父亲的力量和父亲的含义，就是面对两只成年狼的时候，竟然没有产生恐惧。我成了一个父亲的时候，又在这条几经拓宽的乡村公路上接送我的三个念书的孩子。我比父亲优裕的是有了一辆自行车，孩子后来也有了，比当年父亲步行送我要快捷多了。我和孩子再也没有遭遇狼的惊险故事。狼已经成为大家怀念的珍稀宝贝了。

我的一生其实都粘连在这条已经宽敞起来的沙石路上。我在专业创作之前的二十年基层农村工作里，没有离开这条路；我在取得专业创作条件之后的第一个决断，索性重新回到这条路起头的村子——我的老家。我窝在这里的本能的心理需求，就是想认真实现自己少年时代就发生的作家之梦。从一九八二年冬天得到专业写作的最佳生存状态到一九九三年春天写完《白》书，我在祖居的原下的老屋里写作和读书，整整十年。这应该是我最沉静最自在的十年。

我现在又回到原下祖居的老屋了。老屋是一种心理蕴藏。新房子在老房子原来的基础上盖成的，也是一种心理因素吧。这个祖居的屋院只有我一个人住着。父亲和他的两个堂弟共居一院的时代早已终结了。父亲一辈的男人先后都已离开这个村子，在村庄后面白鹿原北坡的坡地上安息有年了。我住在这个过去三家共有的屋院里，可以想见其宽敞和清爽了。我在读着欧美那些作家的书页里，偶尔竟会显现出爷爷或父亲或叔父的脸孔来，且不止一次。夜深人静我坐在小院里看着月亮从东原移向西原的无边无际的静谧里，耳畔会传来一声两声沉重而又舒坦的呻吟。那是只有像牛马拽犁拉车一样劳作之后歇息下来的人才会发出的生命的呻唤。我在小小年纪的时候就接受着这种生命乐曲的反复熏陶，有父亲的，还有叔父的，有一位是祖父的。他们早已在原坡上化作泥土。他们在深夜熟睡时的呻吟萦绕在这个屋院里，依然在熏陶着我。

这是一个不可思议的冬天。我站在我村和邻村之间的旷野里。

从我第一次走出这个村子到城里念书的时候起，父亲和母亲每每送我出家门时的眼神，都给我一个永远不变的警示：怎么出去还怎么回来，不要把龌龊带回村子带回屋院。在我变换种种社会角色的几十年里，每逢周日回家，父亲迎接我的眼睛里仍然是那种神色，根本不

在乎我干成了什么事干错了什么事，升了或降了，根本不在乎我比他实际上丰富得多的社会阅历和完全超出他的文化水平。那是作为一个父亲的独具禀赋的眼神，这个古老屋院的主宰者的不可侵扰的眼神，依然朝我警示着，别把龌龊带回这个屋院来。

北京丰台。我从大礼堂走出来。《西安晚报》记者王亚田第一个打来电话。选举刚刚结束。他问我当选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后首先想的是什么。我脱口而出：作为一个作家，应该始终把智慧投入写作。

他又问：还有什么呢？

我再答：自然还有责任和义务。

我站在我村与邻村之间空旷的台地上，看“三九”的雨淋湿了的原坡和河川，绿莹莹的麦苗和褐黑色的柔软的荒草，从我身旁匆匆驶过的农用拖拉机和放学回家的娃娃。粘连在这条路上倚靠着原坡的我，获得的是沉静，自然不会在意“三九”的雨有什么祥与不祥的猜疑了。

2002年1月17日 原下

称呼柯老

在“纪念柯仲平一百周年诞辰”这个隆重的会议上，我还是想用柯老这个称呼来称呼这位与世纪同行的狂飙诗人。在他生前和身后，在陕西文学艺术界，各个年龄层次的作家艺术家，对他通用的称呼是柯老。柯老，这个不加任何头衔的纯粹平民化的称呼里，蕴含着陕西新老作家艺术家对他最真实最可靠的崇敬和爱戴之情。生前，他与同代作家艺术家坚持着营造这种平民化情感，谢世后，在后来的作家艺术家的心目里，他依然活在他倡导营造的这种最可靠最真实的平民化情感之中。

我们崇敬柯老追求真理追求革命的精神。这种精神贯穿柯老的整个生命历程，始终一致。他从偏僻的山地家乡出发，从昆明追到北京，追到上海，追到延安，落脚在西安，三次监禁和刑罚没有动摇这种追求，极左给他造成的委屈和伤害也没能动摇这种追求，直到他倒在会议桌下。

柯老终生都在追求真理追求革命，终生都在踏踏实实实践着真理实践着革命，这是柯老最为光彩照人最具启示性意义的精神内质。他用最具体最踏实的实践活动来完成对真理和革命的崇拜。我们从他大量的诗作剧作中，感受到的是狂飙和火焰般的激情，也从他在延安亲手创办的以创作演出陕西地方剧种——秦腔为主的民众剧团，解放后在西安创建并领导西北文联、中国作协西安分会的文学艺术创造活动，看到他既是以火焰般的激情呐喊呼啸着前进的狂飙诗人，又是一位新文学运动的杰出的倡导者和组织者。他对陕西文学艺术事业的发

展，产生了持久的影响，是陕西文学艺术主要的开创者和奠基者，获得同代和后来的作家艺术家的崇敬和爱戴是合理的。

柯老追求真理追求革命的最鲜明的标志，就是他的创作活动。中国新诗发展的历程中，他应该是关于诗歌民族化大众化最早的最富于勇气的探索者之一。他的大量的诗歌创作的实绩，不仅得到革命领袖毛泽东的赞扬和倡导，更是受到普通民众的欢迎。他的诗歌不仅发表在报纸杂志上，自己提着墨桶毛笔书写在延安街头和“七大”礼堂的墙壁上，而且震响在文艺晚会的舞台上和延安街头的人群中，至今墨痕犹存余音萦绕。他和马健翎创办民众剧团，又亲自创作地方戏剧本，有的成为陕西地方戏剧的经典剧目。柯老创作的《无敌民兵》，至今依然是演出和传唱的保留剧目。我很惊讶这样一个事实，一个彩云之南的南国人，一个深受边地山歌音韵滋养的人，居然能如此快地在陕北重新汲取黄土文化的精髓，创作出浓郁的黄土风味的诗歌和剧本，而且是几乎普及到村村寨寨的传唱不衰的经典。我想除了柯老的艺术天赋之外，他的心里怀着真理、革命和群众，当是他艺术创造的出发点，也是归宿点，当是他探索勇气永不衰竭的根源，是他获得永久性的艺术生命的根本所在。这也应该是对我们后来的作家艺术家的一个重要启示。

柯老表现为火焰和狂飙的诗歌艺术形态，显示着强烈的艺术魅力，是迷人的；他的坦荡和诚实，一如既往地显示着的人格魅力和性格魅力，同样是迷人的。

我们称呼柯老，既是一种标志，也是一种鉴定。

2002年1月24日 昆明

附诗一首

百年柯老

彩云之南一少年，一路呼啸到延安。

身卷狂飙唱大风，脚踩火焰铸诗篇。

曾经囚狱终不悔，却蒙委屈一泫然。

诗歌还诵戏还唱，声声柯老祭百年。

2002年1月25日昆明即席

与军徽擦肩而过

进入高中最后一个学期，我的心境心绪便进入一种慌乱，说惶惶不可终日也不为过。去向的把握不定，未来职业的艰难选择，前途的光明与黑暗，像一涡没有流向的混浊的旋流翻腾搅和在心里，根本无法理出一个清晰的流向。我只觉得自己整个被那个旋流冲撞翻搅得变轻了。

把书念到高中即将毕业，十二年的读书生活中经历的无以诉叙的经济艰难，此时都被即将结束这种艰难的兴奋所淡漠。仅仅在春节前的高三第一学期结束时，心境和心绪还是踏实的，还是一种进入最后冲刺的单纯和自信，还没有感觉到这种既无法出手又无法伸脚的惶惶和轻松。仅仅过罢春节，重新坐到自己的桌子前的最后一学期，才发觉一切都乱套了。这是高考前的最后四个月，是万米长跑的最后一百米，容不得任何杂念，只需要单纯，只需要咬紧牙关拼尽最后一丝力气冲过那条终点线闯进大学的校门里去。然而我却乱套了，无法凝神，也难以聚力，陷入一种旋流翻搅的无法判断、无法选择，也无法驾驭自己的艰难之中。造成这种混沌心态的直接因由，竟然全都是与军徽有关的事。

刚刚开学不久，突然传达下来验招飞行员的通知。校长在应届毕业生大会上传达了上级文件，班主任接着就在本班做了动员，然后分小组讨论，均是围绕着国防建设的神圣任务和青年个人的责任为主题的。虽然千篇一律，却是真诚的表白、真实的感动和心甘情愿的迫切。想想吧，神秘的驾驶飞机的飞行员，对于任何一个高中毕业生来说，简直是做梦都不敢想的好事，谁还会迟疑或说不呢？从切实的意

义上说，所有动员和讨论都是多余的，因为这样的好事美差是争都争不来的。学校领导的用意却在于进行一次普遍的爱国主义教育。其实学校各级领导都知道，这几乎是一个只开花而不会结果的事。因为从本校历史上看，每届高中毕业生都要验招飞行员，结果依旧是零的纪录，从来没有从本校走出一个驾驶飞机保卫领空的学生。然而，仍然满怀热情和忠诚地层层动员，仍然满怀精忠报国的赤诚参加讨论和表白。参加验招的人选是由学校团委具体操办的。出身“地、富、反、坏、右”家庭的学生是没有任何希望可寄的，亲友关系中有海外关系的学生也是没有指望的，家庭和直系旁系亲属中有被杀、被关、被管制过的成员的学生同样过不了政治审查这一关。这是那个绷紧着阶级斗争一根弦的年代里，学生们都已习惯接受的条例，况且，驾驶飞机太了不得了。这样审查下来，一个班能参加身体检查的学生也就是十来个人，除去女生。更进一步也更严格的政治审查还在后头，要视身体检查的结果再定。我是这十余个经政审粗筛通过的幸运者之一，又是被大家普遍看好的几个人中的一个。我那时刚好二十岁，一年到头几乎不吃一粒药，打篮球可以连续赛完两场打满八十分钟，一米七六的个头，肥瘦大体均匀，尤其视力仍然保持在一点五，这在高三年级里是很可骄傲的。尽管知道飞行员要求严格几乎是千里挑一，尽管知道本校历史上尚未出现过一个幸运儿的严峻事实，然而仍怀着一份侥幸和期望。也许，因为挑选太过严格，对所有被挑选者都是一个未知数，于是所有有资格进行测检的人反而都可以发生侥幸。我的侥幸大约在第四项检查时就轻易地被粉碎了。

“脱掉衣服。”医生说。

“再脱。”医生坐在椅子上，歪过头瞅我一眼又说。

“脱光。”医生又转过脸再次命令。

我赤条条站在房子中间。尽管医生是位男性，但毕竟是陌生人，也毕竟是紧绷着阶级斗争之弦、也紧绷着道德之弦的六十年代。我浑身的不自在，完全处于无助无倚的状态下，总想弯下腰去，不由自主地并拢紧夹住双腿，真想蹲下去。医生却不紧不慢地命令说：两腿叉开，站直了，双手平举。

我就照命令做出站姿。

医生从椅子上站起来，先走到我的背后，我感觉到那双眼睛在挑剔，在我的左肩胛骨下戳了戳；然后再走到我的前面，不看我的脸，却从脖颈一路看下去。

他仍然不看我又走回桌前，坐下，就在那个体检册上写起来。我慌忙穿好衣服，站到他的面前，等待判词。他不紧不慢地说：“你不用再检查了。”

飞行员与普通兵身体检查的不同之处就在这里，某一项不合格就终止检查。我问哪儿出了问题。他说，小腿上有一块疤。这块疤不过指甲盖大，小时候碰破感染之后留下的，几乎与周边皮肤无异。我的天哪，飞行员的金身原来连这么一小块疤痕都是不能容忍的。我不甘就此终结那个存寄的希望，便解释说，这个小疤没有任何后遗症。医生说，到高空气压压迫时，就可能冒血。我吓了一跳，完全信服了医家之言，再不敢多舌，便赶回学校去，把演算本重新摊开。尽管失败了，许多同学也和我一样破灭了飞行员之梦，然而学校却实现了验招飞行员的零的突破，一个和我同龄的学生走进了人民解放军航空兵飞行员的队列。这个幸运儿就出在我们班里，我和他同窗整整两年半，而且联手进行班际间的乒乓球赛。他顿时成为全校师生最瞩目的人物。班主任按上级指令已经指示他停止复习功课，以保护身体尤其是

眼睛。他的两颗把上唇撑起的虎牙，现在不仅不成为缺憾，倒是平添了亮闪闪的魅力。

我的飞行员之梦破灭了，却无太大挫伤，原本就是碰碰运气的，侥幸心理罢了，而真正心里揣着较大希望的，却是炮兵。按照历届毕业生的惯例，每年都要给军事院校保送一批学生。保送就是免去考试，直奔。政治审查条例虽然和飞行员一样严格，我却并不担心；学习成绩也不是要求拔尖而只需中上水平，我自酌也是不成问题的；身体条件比普通士兵稍微严格，却远远不及飞行员那么挑剔。比我高一级的学生，保送入军事院校的竟有十余名之多，他们大多数我都认识，有几个还是我的同乡，他们在各个方面的状况我是清楚的，我悄悄地把自己与他们比较。我早在验招飞行员之前就做着这个梦了，许多同学也在做着同一个梦了。有人悄悄问过班主任程老师，说还没有开始这项推荐保送军校的工作，但这是迟早的事。做着同一个梦的同学，很自然地就扎到了一堆，私下里悄悄传递着种种有利和不利的消息。而客观的事实是，上一届军校保送学生的工作在去年这个时候早已开始了，今年为什么迟迟不见动静？上一届保送军校的十多名同学，大都去了一所炮兵学院，据说炮院院长还是我们灞桥人。传说今年仍然是对口保送，炮兵便成为一个切实的梦想，令人日夜揪着心。真应了俗谚所说的夜长梦多的话，终于等来了令我彻底丧气的消息。

程老师走进教室，匆匆的样子，神色也不好。他说校长刚传达完上边一个指示，国家正处于经济困难时期，今年高校招生的比例大减。他说到这里时，脸色顿时变青发黑了。他似乎怕同学们不能充分理解“大减”的严峻性，几乎用喊的声调警示我们说，大减就是减少的比例很大！大到……很大很大的程度（上级不许说那个比例）……今年考大学……可能比考举人……还难。整个教室里鸦雀无声。我已经

不敢再看程老师的脸，也不敢看任何同学的脸，微低了头，眼里什么景物人物都没有了，脑子里一片空白。程老师一只手撑着讲桌，最后又像报丧似的说，军校保送生的任务也取消了。不单陕西，整个北方省份的军校保送生都取消了。本来我们班有几位同学是完全够保送军校条件的。现在……你们得加倍用功学习……

我不知道程老师什么时候走出教室的，走出教室的脚步和脸色是什么样子的。他走了以后，教室里许久都没有人动一动，或说一句话。最早做出反应拉开坐凳离开课堂走出教室的，是学习最差的几位同学，他们大约原本就没有考取高校的信心，这下反倒彻底放松了。我没有任何再去和其他同学交流的意图。程老师已经一竿子扎到人心的底层了，还有什么不明白的需要讨论吗？没有了。而停断军校保送生的决定，更是对我蓄谋已久的一个希望的破灭。我从教室走向操场，进入乱争乱抢的篮球场子。我在走出教室时，突然想起初中课本上《最后一课》里的韩默尔先生。程老师向我们宣布招生大减和军校停止保送生的指示的神态，有点类近韩默尔先生。

后来的结果完全注释了程老师所说的招生比例大减的内容，全校四个毕业班只考取了八名大学生，我们班竟然剃了光头。仅仅比我们早一年的毕业生，录取比例是百分之五十，而高两级的那一届毕业生，大学录取比例达到百分之九十以上。这是一九六二年。这是新中国短短的历史中史称“三年困难时期”的一九六二年。这是我对“三年困难时期”最强烈最深刻的记忆，远远超出对于饥饿的印象。许多年后我从捂盖已久而终于公开的资料上看到，因饥饿死亡于“三年困难”的人数之众，完全冲淡了我的那点损失，能活下来已属幸运了。

寄托于飞行员和炮兵的幻想彻底破灭了，所有捷径都被堵死，任何选择的机会都没有了，反而没有了选择的游移不定，反而粉碎了也

廓清了一切侥幸心理，很快就进入一种别无选择的沉静和单纯。明知那个比例减得“很大很大”，反而激起一种反弹，一种不愿就此完结的垂死挣扎。教室里几乎没有杂音，从早到晚都是安静的，晚自习的灯光彻夜不熄。这个时期的学习大约是我漫长的学生时代最认真最下功夫的一段时日。有一天，教导处通知我和班里几位同学去开会，传达上级指示，对取消保送军校的决定补发新的决定，说保送军校的工作还要继续，但只限于“政治保送”，考试照常参加，考生一视同仁。这项被说得颇为神秘的“政治保送”的文件，在我看来，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含义，因为考试分数才是关键。只要考分上线，能上军校最好，分配到地方院校也不赖，所以依旧埋头在课桌上做着最后的拼争。

这种近乎垂死的专一心境很快又被扰乱了。本年破例在高中毕业生中征召现役军人。此前的征兵对象只是初中以下的青年，高中毕业生只作为飞行员和军校的挑选对象。道理无须解释，招生任务既然“大大削减”，正好为部队提供了选拔较高文化兵源的机遇，也为高中毕业生增加了一条新的出路。这是一九六二年“三年困难时期”，做出的任何破例的举措，都是能被接受的。

又是校方传达文件。又是团支部、学生会层层动员。又是各班级里的各个学习小组分组讨论。又是人人表态统一认识。连不在征召范围的女生也一样要接受这一整套的动员过程，应召普通士兵的决定，远不及应召飞行员那么众口一词地踊跃。学生中明显地分成两种倾向，那些对高考根本不抱任何侥幸心理的同学，从一听到这个突然发生的意外消息，就表现出一种惊喜，一种不需任何动员说教的坚定，道理也很简单，这是一条提供了新的发展可能的人生之路。班里那些自恃学业优秀的学生陷入了两难之中，既想考入大学，又怕万一落

榜，反而连这一条出路也丢掉了。小组讨论中虽然一样表示着“守卫边疆”的决心，眼神和语气中却无法掩饰选择中的两难心态。

我也陷入两难中。我的两难选择不是自恃学业优秀，而是纯属个人的没有普遍意义的小算盘。我在专心做着最后拼命的同时，也做好了落榜之后的准备，仿照柳青深入长安农村深入生活的路子，回到农村自修文学，开始创作。已经基本确定的这“两手准备”被打乱了，我既想参加高考一试，又怕落榜而丢失了当兵的机会；在当兵与回农村自修文学的两项对比中，农村生活条件最不占优势，甚至连饭也吃不大饱。那个时候诱惑农村青年当兵的一个最基本的因素，便是部队上那白花花的米饭和白生生的馒头。我在几经权衡几度反复掂量之后，还是倾向于当兵，在美好的高校和艰苦的农村的三项对照中，只有当兵可能是最把稳的，因为对考取高校的畏怯，因为对农村的艰苦和自修文学的不自信，自然就倾向于当兵一条路了。当兵起码可以填饱肚子，出身农村的孩子自然不会在乎吃苦，又可以穿不用钱买的军装，说不定还可以在部队干上个班长排长什么的。唯一让我心存叽咕的事，就是整晌整天整月的立正和稍息的走步。那种机械那种呆板那种整齐划一的没完没了的训练，我不喜欢，却终究是小事。

我很快倒向那些热心当兵的同学一族了，自然就不能专心一致地演算数理化习题了。有人打听到接兵的军官已经到达当地武装部的消息，我们便迫不及待地追到区政府所在地纺织城，十余华里的路不知不觉就到了。那位军官出面接待了这一帮年约二十上下的高中生，很热情，也很客气，又显示着一种胸有成竹的矜持。我是第一次与一位军官如此近距离地对话，他的个头高挑，英武，一种完全不同于地方干部也不同于老师的站姿和风度，令人有一种陌生的敬畏。同学们七嘴八舌询问种种在他看来纯属于ABC的问题，他也不烦不躁地做着解

答，遇到特别幼稚的问题，他顶多淡淡一笑，作为回答。学生们最关心的问题还是有关身体检验，诸如身高、体重、视力、熊掌脚等最表层也最容易被刷下来的项目。有同学突然提到沙眼，说许多人仅就这一项就丧失了保卫祖国的机会，而北方的人十个有九个都有不同程度的沙眼，最后直戳戳地问：究竟怎样的眼睛才算你们满意的眼睛?

军官先做解释，说北方人有沙眼是不奇怪的，关键看严重程度如何，一般有点沙眼并无大碍，到部队治疗一下就好了。究竟什么样的眼睛才是军人满意的眼睛呢？军官把眼光从那位发问的同学脸上移开，在围拢着他的同学之中扫巡，瞅视完前排，又扫巡后排，突然把眼睛盯住我的脸，说：这位同志的眼睛没有问题，有点沙眼也没关系。我在这一瞬脑子里呈现了空白，被军官和几十位同学一齐看着，看着我的眼睛，我不知所措了。大概从来也没有被人如此近距离地注视过，大概从来也没有人称我为“同志”。我至今清楚记得第一次被称为同志，就发生在这一次。在我缓过神来以后，我才有勇气提出了第一个问题，腿上的一块指甲盖大的疤痕能不能过关？军官笑笑说不要紧。

既然眼睛被军官看好，既然那块疤痕也不再成为大碍，我想我就不会再有麻烦了，这个兵就十拿九稳当上了。礼拜六回到家中，我把这个过程全盘告知父亲和母亲。父亲半天不说话，许久之后才说，即使考不上大学，回家来务农嘛！天下农民也是一层人哩！我便开始说服父亲。最基本的一个道理，如果不念高中，回乡当农民心甘情愿，念过高中再回来吆牛犁地就有点心不甘，部队毕竟还有比农村更多的发展机会……这种父子间的对话，与在学校小组讨论会上的表态，是我的人生中发生过的两面派的最初表现形式。公开的表态是守卫边疆的堂皇，而内心真正焦灼的是个人的人生出路。在我的解说下，父亲

稍微松了口，说让他再想想，也和亲戚商量一下。我已经不太重视父亲最后的态度了，因为我已经明确告诉他，已经报过名了。

周日返回学校之后的第三天，上课时候发现了异常，几位和我一起报名验兵的同学的位子全部空着，便心生疑猜。好容易挨到下课，同学才告知今天体检。我直奔班主任办公室，门上挂着锁子。再问，才知班主任领着同学到医院体检去了。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单独扔下我？我便直奔十几里外的纺织城一家大医院，告知说我们班的几位同学已经检验完毕，跟着班主任去逛商场了。我再追到商场，果然找到了班主任，他正借此闲暇，领着爱妻转悠。他对我只说一句话，回到学校再说。对于我急促中的种种发问，他不急不躁，却仍然不说底里，只是重复那一句话。我的热汗变成冷汗，双腿发软，口焦舌燥，迷茫不知所向，无论如何也弄不清突然取消了我体检资格的原因，甚至怀疑是否“政审”出了什么麻烦。我不知怎样走回学校的，躺到宿舍就起不了身了，迫在眉睫的高考前紧张的复习功课，于我都无任何刺激了。

班主任让班长通知我谈话。

班主任很坦率也很平静地告诉我，我的父亲昨天找过他。我自然申述我的志愿，不能单听父亲的。班主任反而更诚恳地说，第一次在高中毕业生中征兵，是试验，也是困难时期的非常举措。征兵名额很少，学校的指导思想是让那些有希望考取大学的同学保证高考，把这条出路留给那些高考基本没有多少希望的同学。班主任对我的权衡是尚有一线希望，所以不要去争有限的当兵的名额。最后，班主任有点不屑地笑笑说，人家都争哩，你爸却挡驾，正好。

我便什么话也说不成了。

我又坐到课桌前，重新摊开课本和练习本的时候，似乎真有一种从战场上撤退回来的感觉。我顺理成章地名落孙山了。没有任何再选择的余地，没有人也不需要谁做任何思想工作，回归我的乡村。

我在大学、兵营和乡村三条人生道路中最不想去的这条乡村之路上落脚了，反而把未来人生的一切侥幸心理排除净尽了；深知自修文学写作之难，却开始了；一种义无反顾的存储心底的人生理想，标志是一只用墨水瓶改装的煤油灯。

2002年2月19日 原下

漕渠三月三

一

从京城来的三位电视记者向我提出，要拍陕西地方戏秦腔演出的盛况，还想拍关中民间农民的文化娱乐方式。我真有点犯难了，据我所知，秦腔作为西北五省尤其是陕西关中地区的名牌大戏种，大约至少有十多年已经退出了西安各家剧院的舞台，包括一些大腕级的名角也都流落到适时而兴的“秦腔茶社”里去被尚有秦腔戏瘾的人点唱，原先几乎每个县都有的秦腔剧团的演员们也都流散了，说来真是令人伤感的。如我一样还喜欢听听秦腔旋律品品秦腔韵味儿的人，要想在西安某家剧院看一场名家大腕的演出，还是很难觅到机会的。至于民间的文化活动，他们三位来得也不是时候，清明都过了，民间文化娱乐集中展示的春节的气氛，早已冷却了，农民们已经从春节的欢乐和慵怡中清醒过来，进入田野进入果园开始新的一年的劳作了。然而三位远道而来的记者仍不死心，让我再想想办法，再三申述作为这个专题片的地方文化氛围和土壤是不可或缺的。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区文化馆一位搞摄影的朋友不经意间告诉我，渭河岸边的漕渠村农历三月三日适逢古庙会，有秦腔剧团的演出，有当地青年男女的秧歌表演，有邻近几个村庄的锣鼓队凑兴。遗憾的是高跷被取消了，据说出于安全的考虑，怕人群过于拥挤而摔伤了表演的人。三位北京来的年轻记者闻讯竟欢呼起来，真是应了“起得早不如赶得巧”的俗话。这样一来，关于秦腔演出和地方文化娱乐特色的东西便全部都可以得手了。

三月三日一早，我便陪三位年轻人上路了。我所存活的白鹿原下的灞河川道，其实只是渭河平原的边缘地带，南岸是古原的北坡，北岸是骊山南麓纵横起伏的丘陵或者说山岭，中间蜿蜒着以柳色愉悦缠绵过古代离人的灞河。车行不过十余公里，便驶出虽然原青岭秀却也显得狭窄的河川，进入坦荡如砥气势恢宏的渭河平原了。那情景如同从一个细杆喇叭里钻出来，进入一个四野再无遮拦的令人舒展也令人惊悸的开阔境地。这是我跟着班主任到灞桥赶考初中第一次走出灞河河川时产生的感受。这种纯粹由地理地形造成的心理感受，一直延续到今天重复到现在，每一次走出家乡灞河川道时都像钻出喇叭细杆儿，每一次回乡也就有从敞开的喇叭口里钻进细杆的感觉。我喜欢走出那个细杆儿似的河川享受无边原野的气度和舒展，也更喜欢重新进入那个狭窄的灞河河川感受南原北岭动态的生动和变幻莫测的气象，甚至包括那一份狭窄造成的拘束。钻进来拘束一段时日，钻出去舒展畅放一回，我的心理秩序和心理感受便处于某种动态的颠簸里，自我感觉真是好极了。

无边无际的麦子刚刚努出穗儿来。满眼都是饱满丰腴的青春的绿色，成熟的含羞带娇的女子就是这种气韵。笼罩着村庄的泡桐织成一片又一片淡紫粉红的花云。天虽然阴沉着，依然罩不住大地青春的气象。

我要到漕渠村去赶三月三日的庙会了。我的心里竟然激动起来了。我已经有许多年没有进入这种关中农民狂欢的庙会场合了。我在少小时候接受过狂欢的场景留下难以磨灭的记忆。现在的乡村庙会与我过去逛过的庙会的气氛会有什么变化吗？淡了还是浓了？三位京城来的年轻的文化人，至少怀着一种猎奇的兴奋，在我则是对一种古老仪式的温习和膜拜。大约还有一公里的路程，我听到了一声火铳的震

响，像是远天云层里奔突的沉闷而又撼人心腑的雷声。火铳是一种最具声威最具张力的爆响器，它蕴聚鞭炮家族炸响时的热烈之外，便是深沉如地出的震撼。这应该是民间庆典或狂欢场合里最具煽动性的响器了。即使极阴郁寡淡的人，也会在火铳的爆响里昂起头来。

二

庙会是漕渠村的庙会。

漕渠村在一道浅坡下。漕渠村是个大村子，自古就是一个大村子。村里有一座古庙，敬奉着佛家的一位神灵，何年建庙何年立神已经无考，所有关于庙堂的文字典籍，以及庙堂内栩栩如生的神像、精美的壁画和梁栋上的彩绘，都被后来屡屡发生的一次火过一次的“革命行动”扫荡净尽了，后来连三月三日的古庙会日也被禁止了。古庙能够存留下来是一个奇迹，说穿了却属无意，仅仅是贫穷的生产队需要用它做库房而没有被摧毁。有形的东西破坏或消灭十分容易，只有无形的传说却能依赖当地人的嘴巴传递下来。可以推断的是，三月三日的庙会是建庙之初就择定了的，庙会的历史也就是古庙的历史，同样是悠久古远得不能再古远悠久了。还可以推断的是，建庙立神的最基本的也是最原始的用意，便是崇拜，或者说是寻求和平安宁所需要的一个祈祷偶像。于是，在渭河南岸广阔的沃野和星罗棋布的大小村庄之中，便形成了以这个古庙为中心的朝拜圣地，三月三日便成为十里八村乡民寄托祈愿和狂欢的盛日。

漕渠村村庄的历史肯定比古庙的历史更为久远，这是常识而毋庸置疑的。一个漕字已注释了这个村子令人敬畏的历史。西汉王朝设都长安，为解决急骤繁荣急骤膨胀的城市吃粮问题，开凿了黄河、灞河、渭河连通长安城的一条可以浮船运粮的运河。关中人却称它为

渠，可见当地人的自大和狂妄了。为了逛好漕渠村的古庙会，我专意儿查阅了《辞海》。漕渠词条下准确无虞地注释着这样的内容——

汉唐时自长安（今西安市）东至黄河的运渠。创始于西汉元光六年（公元前一二九年），在大司农郑当时主持下，发卒数万人，由水工徐伯督率开凿。渠傍南山（秦岭）下，长三百余里，三年而成，漕运大便，渠下民田亦颇得灌溉之利。初以灞水为源，其后凿昆明池，又穿昆明渠使东绝灞水合于漕渠。东汉时尚可通航，北魏时已无水。隋开皇初改自长安西北引渭水为源，浚复旧渠通运，定名广通渠，但习俗仍称漕渠。唐时通时塞。天宝初陕郡太守韦坚、太和初咸阳令韩辽两度修复，壅渭水作兴成堰，傍渭东注至永丰仓（即隋开皇中广通仓，仁寿末改名）下合渭入河，规制略如隋旧。末年迁都洛阳，渠遂堙废。

哦哟！这个漕渠村的历史至少可以前推到公元前一二九年西汉元光年间。甚至可以设想元光年间开凿漕渠之前这个村子就存在不知多少年了。现在仍保存着这个村庄的子孙们用嘴传留下来的当年的盛况，西汉初年漕渠开凿始成，除了为长安城运输粮食，包括渠下村民农田的灌溉，更有各种商船通过漕渠进出长安，漕渠村当时已形成一个中转码头，南北商贾，车船互转，客店饭馆买卖铺店，成一时之盛，漕渠村成为渭河南北广大地区的一大商埠。而古庙肯定在几百年后才形成心灵祈祷的圣地，有佛教进入中国的时间限定出来一个大致的历史轮廓。

我在即将进入漕渠村的时候，感到了这个村庄古远的历史对人的威压。如果不是《辞海》作证和指点迷津，纵然在这个村子的古庙会逛过十回，我也只会以为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庙会而已，关中乡村类似的古庙会多不胜逛。从《辞海》的词条里可以看出，漕渠的开凿

便形成漕渠村水陆码头的繁荣，而败毁于王朝灭亡之后的乱世；漕渠的再度浚通和漕渠村的重新繁华，又是隋和盛唐的时代，堙废的结局正好是大唐王朝没落。这条漕渠的兴衰简史，正好注释了从西汉至唐的中国历史的起落，自然可以想见如漕渠村的乡民的饥饱寒暖了。哦！我的关中，我的渭河平原，单是保存有两千多年的漕渠村这个村名，就够我咀嚼不尽了。我家门前的灞水，曾经是漕渠初开时的水源，我在敬畏的同时，顿然又有了一种沟通历史沟通地域的亲近感。

漕渠村倚靠着的南面的那道浅坡，亦因漕渠而得名为漕渠坡，一道虽然低浅却声名远播的坡。狭义的漕渠村单指这个自然村，而泛义的漕渠村则指漕渠坡下的大围墙村、小围墙村、宋家村、陈家村、王家堡、米家堡、田鲍堡、陶家村、万盛堡、宋家滩等十数个大小村堡，散落在渭河南岸的平原上，绵延十余华里，通称十里漕渠。站在漕渠坡头远眺起来，以稠密的村树和村树的绿叶笼罩下的房脊和屋墙组成的村庄，依次渐远，或大或小，坐落在绿色苍郁的麦田之中。我忽然想起，前年曾在临近入渭的灞河河道里，淘沙取石的农民挖出来一条大船的遗骸，距离漕渠村不过十余华里，又是怎样令人顿生想象的一条谜一样的古船啊！

一位做豆腐买卖的中年农民笑嘻嘻地告诉我："下了漕渠坡，净是豆腐锅。"这儿盛产豆腐。漕渠坡下的豆腐远近闻名。据说这儿做成的豆腐烧了烩了不仅不烂，而且鲜嫩异香，做成臊子，浇到面条里，豆腐漂浮在上而不沉底。更具商家利益的是，同样十公斤黄豆在别处通常只能做出二十公斤豆腐，在漕渠村却能产出三十公斤，甚至三十五公斤。这个额外的利润，对于那些常年经营豆腐生意的豆腐客（主户）来说，是"天赐良水"令其窃自得意的幸事。除去公社化时代的极左政策施虐造成的萧条不计，漕渠坡下无以计数的豆腐作坊自古至今

生意兴隆，现在更是许多农户赖以挣钱过日子的把稳的门路。豆腐客戏言：汉家爷江山败了，唐家爷江山也败了，爷们感念修漕渠占了农人的田地，再没啥可补偿了，就赐给咱漕渠人一井好水，让咱做豆腐过日子……爷们还是有良心的。云云。

我顿然失笑了。顿然从悠远的极富想象的漕渠村的历史烟云里清醒过来。顿然抖落了不无酸渍气味的幽思。顿然轻松地接受了这恩赐给豆腐客们的一眼好井……

三

农历三月三日逢着庙会的漕渠村，展示着一个纯粹属于农民的世界。

漕渠村的正街和各条小巷，现在都拥挤着农民。南北走向的公路与通往漕渠村的大路正好构成一个“丁”字，从公路的南面和北面，骑车的步行的男人女人源源不断拥入漕渠村。绝大多数尤其是中年以上的农民，几乎没有任何修饰，与拥挤着的同类在街巷里拥挤。在这里，没有谁会在乎衣服上的泥巴和皱褶，没有谁会讥笑一个中老年人脸上的皱纹蓬乱的头发和荒芜的胡须。女人们总是要讲究一些的，中老年女人大都换上了一身说不上时髦却干净熨帖的衣裤。偶尔可见描了眉涂了唇甚至在黑发上染出几绺黄发的女孩子，尽管努力模仿城市新潮女孩的妆饰打扮，结果仍然让人觉得还是乡村女孩。无论男人或女人，无论年龄长者或年轻后生，无论修饰打扮过或不修边幅的，他们都很兴奋，又都很从容自信，在属于他们的这个世界里，丝毫也看不到他们进入城市在霓虹灯下在红地毯上在笔挺的西装革履面前的拘束和窘迫。他们如鱼得水。他们坦荡自在。他们构成他们自己的世界。

我在这条长长的街道里和支支岔岔的小巷里随着拥挤的人流漫步。我的整个身心都在感受着这种场合里曾经十分熟悉而毕竟有点陌生了的气氛。这种由纯粹的农民汇聚起来的庞大的人群所产生出来的无形的气氛和气场，我可以联想到波澜不兴却在涌动着的大海。我自然联想到我的父辈和爷辈就是构成这个世界的一员或一族。我向来不羞于我来自这个世界属于这个世界壮大于这个世界，说透了就是吮吸着这个世界的气氛感应着这个世界的气场生长的一族。我现在混杂在他们之中，和他们一起在漕渠村的大街小巷里拥挤，尽管我的穿着比他们中的同龄人稍微齐整一点，这个气场对我的浸淫和我本能似的融入，引发了我心里深深的激动。这一刻，我便不由自主地自我把脉，我其实还是最容易在这个世界的气场里引发心灵悸颤的。

村街两边摆着小饭摊、农具、种子、铁器、服装、搪瓷和塑料厨具餐具，以及不可或缺的老鼠药，举凡农民生产生活所能需用的一切东西，现在都摆置在村街两边供农民选购。最令我动心的是那些传统小吃摊子，仍然保存着在我少不更事时见到过的那种老式饸饹担子，几乎原样未改地摆在这里或那里。摊主抓起一把紫红色的饸饹，在案板上反复弹着，抛进敞口浅底的花边瓷碗里，用小勺挖盐用木勺撩醋用小木板挑辣椒的动作像是一种舞蹈。我小时候跟随大人去庙会的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坐在矮条凳上接过摊主送过来的那一碗饸饹。更奢侈一点儿，还会有临近摊位的油锅上递过来一个油饼或油糕，久久盼望赶庙会的全部目的就在这时实现了。现在，饸饹摊子和油锅前，男人和女人随意地在小条凳上坐下去，包括他们牵引着的男孩和女孩，接过饸饹或油饼油糕，吃罢了抹了嘴就又掺和到人流里去了。我的根深蒂固的关于吃饸饹的记忆就是这种形式。我后来在一些饭店的豪华餐桌上也吃到这种被学者研究出可以防癌可以降血压的所谓绿色食品，却总是尝不出庙会上饸饹摊子主人舞蹈似的动作之后的那种香

味，更不必说那高得吓人的价码了。我敢说，坐在这个饸饹摊子前品尝饸饹的男人或女人，如果他们知道自己掏六七毛钱就可以享到的口福，城里人在大饭店却要花几乎一斗麦子的钱才能吃到一碗饸饹，准会嘲笑发了财的城里人傻得不会花钱了。

秧歌队扭过来了。这是经过费心操练的一支颇为壮观的秧歌队伍。纯一色的农家姑娘农家媳妇，还有一些堪称大娘辈儿的农家女人，一律的红绸衫绿绸裤，一律的粉红色剪花别在右耳上方的黑发里，手里舞着一律的大红绸扇子，一律的弓前殿后左扭右摆的舞步，一律的优雅，从村子中间的大街里自西向东扭过来。她们可能刚刚放下锄头或给猪呀鸡呀添过食料，换上这一身艳丽的服装就结队扭起来了。她们的公婆她们的丈夫（或未婚夫）她们的孩子，此刻就拥挤在街巷两边的人群里看她们舞蹈。她们同样具有强烈地展示自己表现自己的欲望。她们或欢欣或自信或温媚或沉稳或娇羞的眉眼里，都透出这种展示自己风姿的欲望。

秦腔戏的戏台搭在村庄背后的一片空地上。我是循着乐队的响声拐进小巷寻到这里的。一个用木头搭建的戏台，横额上标明长安县剧团。我一眼便看出来，台上正在演唱着的是《铡美案》中的《杀庙》一场。这是这部堪称秦腔经典剧目中最为惊心动魄的一幕。从戏剧艺术上来看也应是最为精彩的一章。一个被主子差遣来杀人的差官韩琦，一个怀着满腹委屈的乡村女人和她的一双儿女，两个人的冲突两个人的命运在一座小小的庙堂里展示得淋漓尽致波澜起伏，堪称戏剧创作上的绝妙一笔。我曾经无数次地看过这部戏剧，尤其喜欢这精彩绝伦的一折。我在小小年纪初看这部戏时，大约也就只看懂了这部戏的这一折，仅就剧情而言。从剧情的发展和剧中多个人物的命运的转

化来看，《杀庙》这一折正好是这部戏的关捩。我早已从这部戏的情感里跳了出来，而进入一种艺术创造和艺术表演的欣赏了。

台下几乎是纯一色的中老年农民。台前的人坐在自带的小凳上，两边和后边的人站立着，几乎全都是上了年岁的人。清脆的梆子声紧密的扁鼓声从响亮的板胡缠绵的二胡声中跳蹦而出，敲击着在台下看戏的农民的耳膜和胸膛。他们自小就接受这种乐曲曲调的敲击。他们乐于接受这种时而强烈时而委婉时而铿锵时而绵软的旋律的抚慰。他们并不太在乎是否完全听明白了那些唱词。我也习惯于接受这种旋律的敲击和抚慰。我也不太在乎是否完全听清楚了那些唱词。主要的是这种旋律的敲击和抚慰。

下雨了。一把一把五颜六色的伞撑开来，在短暂的一阵骚动后，很快又平静下来。我此刻才发现与我同行的三位北京来的记者正跳上戏台的左角，支起录像机的三脚架，随之就把镜头对准了正处在杀人与自杀两难中的韩琦，又把镜头调整过来对着台下的农民观众。

我在来去戏场的路上看到了两顶就地搭起的巨大的帆布帐篷。离地大约一尺透着空当。有小孩子趴在地上往里边窥视。我问一个男孩看见了什么。男孩“嘻嘻”笑着说，光腿。从那个全封闭的神秘的帐篷里传出震人的音乐，偶尔发出一两声女子的尖叫。帐篷开口处坐着一位男青年用电喇叭做着广告，招徕诱惑围观的男女进去观赏，语言像是刀刃上的游鱼。不时有人花一块钱买票入场，几乎是纯一色的男青年。一位站在门外的小伙子和一位刚刚走出帐篷的小伙子搭话：

“里头弄啥哩？”

“跳舞哩。”

“跳啥舞哩？”

“扭尻子舞。”

“穿没穿衣裳？”

“穿着哩。”

“穿的啥衣裳？”

“不好说。”

“这有啥不好说的？”

“你进去看看就知道了。”

“我不知值不值得花一块钱。”

……

搞不清这些就地支帐票价一元的演出团队来自哪里，只是可以肯定绝不是渭河岸边的人。谁家的女子要是在那神秘的帐篷里跳光腿舞，可能不需半天就臭名远扬难寻婆家了，谁家的老少就要被指指戳戳闲言碎语了。这些演出团体游牧一样流动在乡村里的集镇上，逢着某村的庙会更是赚钱的最好时机。他们和古老的秦腔对台。他们在乡村里传播什么冲击什么，他们一般是不会从“意义”上考虑的，只是更多地争取那一元钱的门票所包含的利益。愿意花一元钱进帐篷去的乡村青年，自然是为了看看扭尻子舞蹈以及除他们的媳妇之外的女人的光腿。应该说与城市里富丽堂皇超级豪华的歌舞厅里的看客们的原始目的并无二致，只是演出的水准和票价相差太远了。

四

现在该去听锣鼓了。锣鼓队在村委会门口摆开架势。这是一支远路而来的锣鼓队，按习俗的说法是前来送香火的。送香火的锣鼓队的多少，成为某个庙会盛大景况的重要标志。龙旗前导，锣鼓敲打，响炮放铳，最具声望的老者端着装满紫香黄表的木盘，浩浩荡荡又肃穆端恭地一路走去，把香火送进庙门，跪拜，点蜡，上香，焚烧黄表，再叩头。庙门外的广场上，常常摆开十余家从各个村子赶来送香火的锣鼓队，对着敲，看看谁家能把逛会的人吸引过去的最多，自然是优胜的标志了。这是解放前后的盛景，我留下这样的印记是无法淡漠的。现在的漕渠村庙会上，只有两家锣鼓队。我觉得悦耳好听的这一家占据着村委会门前绝好的地盘。一位两腮凹进牙槽的精瘦老头握着鼓槌儿，眼睛上扣着一副茶色石头镜子，这是我印象中最深刻的那种既富于灵性而又有点倔强执拗的老头形象了。他不看任何人，也用不着看鼓面儿，微微偏着头发稀疏亮着红光的脑袋，两手两把溜光的木质鼓槌儿，在米黄色的牛皮鼓面儿上敲出风摆乱花一样的鼓点儿。鼓是锣鼓队的指挥和灵魂。铜钹和大小铜锣在鼓点儿的指挥下变换着交响着。一个好的鼓手常常成为一方地域里受人钦敬的名人。

这样的锣鼓队现代被命名为“长安锣鼓”。流行在秦岭北边渭河平原的锣鼓曲谱源自唐代，被现在的一些搞民间文化的音乐工作者发掘整理出来，颇多抢救国宝的意味。在我的印象里，整个关中稍微像样的村庄都有一支锣鼓队，诸如我的生地蒋村解放时不过三十余户的小村子，同样有一套锣鼓响器，这是整个村子在合作化以前唯一的公有财产，靠一家一户捐赠的粮食置备起来的。每到逢年过节，村里的锣鼓队就造起声势来，把整个村庄都震动起来颠簸起来，热烈的锣鼓声灌进每一座或堂皇或破旧的屋院，把一年的劳累和忧愁都抖落到气势

磅礴震天撼地热烈欢快的锣鼓声中了。可以肯定的是，乡村锣鼓这种民间音乐，是我平生里接受的第一支旋律。岂止是我，在那个时代生活过的乡村人，出生后焐在火炕被窝里的第一个春节到来时，就被这种强烈震撼的锣鼓声震得在被窝里哭叫起来，锣鼓的敲击声响从此就注入血液。

现在在漕渠村村委会门前演出的这支锣鼓队，是一支真正的民间锣鼓队，除那位显示着执拗自信的鼓手老头儿，还有四五个抓着脸盆一样大小的铜钹（当地俗称家伙），五六个左手手指上挂着碗口大的铜锣右手执着短粗锣槌儿的青壮年农民。令我遗憾的是，这支精当的锣鼓队里缺少至少两三个敲那种比蛋糕稍大一点铜锣的角色。缺少小铜锣而突出了大铜锣，显然是一支以瓷硬为风格的锣鼓队，而那种以大小铜锣为主体的锣鼓队的风格被称为“酥”。酥在演出风格上的突出特点是细腻婉转。然而这个缺少了小铜锣作点缀作调节的锣鼓队，敲出一曲又一曲传统的也许真是自唐代流传下来的锣鼓曲调。这样原始的曲调在我尚在识字之前就听过许多回了，时而如瀑布自天覆倾而下，时而如清溪般流淌；时而如密不透矢的暴风骤雨，时而如疏林秀风；时而如洪流激浪一泻千里，时而如蜻蜓点水微风拂柳。在这样急骤转换的奏鸣里，我的心时而被颠得狂跳，时而又被抚慰，锣鼓的声浪像一只魔女妖精的手，把人撩拨得神魂激荡而又迷离沉醉。我又一次验证了自己关于乡村锣鼓的记忆和感受，依然保持着那份敏感那份融洽而没有隔膜和冷漠。也许应该是我的生命之乐。

我沉浸在锣鼓声中。这一帮由老汉壮年和青年组成的锣鼓队，没有化妆没有统一服饰，也没有由专业乐界行家导演训练出来的统一动作和表情，他们敲到得意时，有的咬牙有的瞪眼有的摇头晃脑，各见性情。常常使我产生错觉，把他们的脸孔和我儿时印象中的我村的某

个人重叠起来混淆起来。我沉浸其中，我已经多年没有接受这种生命之乐的冲撞和震颤了。人的五脏六腑也许需要这种纯属民间的乐器来一番冲撞和洗刷的。无论如何，在民间锣鼓的乐曲里，我心中沉积着的污泥和浊水，顿然扫荡清除了，获得的是清爽和轻松，好继续上路。

我还会再去寻求这种纯粹民间的锣鼓，为生命壮行。

2002年5月16日 原下

寄语中国队

世界杯开战三天来，给人一种乍喜乍悲的感觉。比如说，揭幕战名不见经传的塞内加尔队，就给整个世界一个惊喜。让人感到了新兴非洲足球的崛起，他们扎实的足球基本功和良好的技战术意识，已经开始向传统的足球强国叫板。弱队战胜强旅的可能性确实存在，足球场上也有侥幸，进一步说明足球是圆的，在场上什么事情都可以发生。但不管怎么说，胜利的天平仍然是朝着有实力的球队倾斜，不能只看到塞内加尔队的侥幸，而应该看到他们的实力。

紧接着让人感到遗憾的是，在亚洲还称得上强队的沙特队却让德国队打得满地找牙，输得惨不忍睹。在强大的德国队面前，沙特队就像一座不堪一击的沙堆。〇比八的比分，让亚洲足球蒙羞。

八场比赛过后，给我的第一感觉是，足球世界依然是欧洲和南美人的天下。除了揭幕战法国队惨遭滑铁卢外，已亮相的欧洲和南美几支队伍都呈现了强大的气势，人们已经看不到昔日的斯文足球，也看不到纯粹的力量型足球，或者是单单的技术型足球。各个球队都已经开始把欧洲的力量型足球和南美的技术型足球融合为一体。

看着其他队的比赛，我时时刻刻都想着就要上战场的中国队。中国队虽然没有和塞内加尔队甚至非洲球队交过手，但是，应该树立起像他们那样的不怕强敌，但切切不可把自己等同于塞内加尔队。六月四日，中国队将要首战哥斯达黎加队，应该从塞队的胜利中和沙特队的惨败中，吸取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中国队从塞内加尔队战胜强大的法国队的比赛中，不仅要树立起战胜强敌的自信心，而且更应

该摆正自己的位置，防止出现沙特队的那种情况。中国足球实行职业化以后，取得了可喜的进步，但是，与足球世界强国的差距还是非常巨大的，作为中国球员应该清醒地认识到，自己肩上的任务还非常重。对于首次打进世界杯的中国足球队，不仅缺乏经验，更缺乏足球强国的许多成功的经验。最让我担心的是目前中国队粗糙的脚法和到位率很低的传接球，但愿队员们能够扎紧防守的篱笆，少输球，想办法打开对方的球门，去争取胜利。

良好的心态、扎实的基本功、切实可行的技战术打法缺一不可，俗话说，艺高人胆大，这仍然是足球世界里面的ABC。

2002年5月30日 原下

滑铁卢·麦城·跷尿臊

——法、塞揭幕战观感

在我看过的历届世界杯足球揭幕战中，似乎都没有本届法国和塞内加尔演示的揭幕战令人回味无穷了。

法国人遭遇了滑铁卢。这是我的第一反应。一百八十七年前在比利时南部的滑铁卢一役，彻底结束了拿破仑一世的神话，时间同样是六月。我几乎同时也联想到关羽败走麦城的三国故事，纵然有出五关斩六将的八面威风，还是难免败走麦城的狼狈。所谓常胜将军和无敌的军队都是相对而言的，相对于历史中的此一时段，无法绝对于历史的彼一时段。从此一时段到彼一时段的过渡中，双方乃至多方的力量都在发生着此消彼长的变化，这是常识。法、塞之战的结局之所以令整个世界惊诧，正是整个世界陷入了最易发生的常识性错觉。

整个世界都关注着法国军团。人们对四年前法国军团和齐达内在巴黎决战时的绝佳表演，仍然保持着美好而又鲜活的记忆。塞内加尔不仅是在地图上半天都找不到位置的弹丸小国，在世界足坛上也是从未听见过响声的，整个世界大约和我一样掂量着塞内加尔的分量：能进入世界杯决赛的赛场已经是莫大的荣光了。法、塞不是一个量级的拳击，实力不在一个档次上。令世界大为惊诧令足球行家顿然失措令赌徒美梦破灭的这个意外结局，恰恰是这种常识性的错觉造成的盲区。

我看世界杯这种足球世界的风云际会，历来不在乎谁最后笑了。无论谁笑到最后，都与我没有任何倾向性的情感关联，所以才是纯粹

的对足球艺术的欣赏。我最喜欢观赏的是重量级的势均力敌旗鼓相当的对抗，只有这时才能使那些超级球星发挥出不可思议的精彩绝伦的动作行为。我常常在那一刻感受到人类生命华美绚丽的乐章。我也喜欢不同风格的球队的对抗，粗犷简捷疾风骤雨式的和细腻精巧举重若轻式的风格搅缠在同一粒足球上，常常使人感受到文学世界里豪放派的大江东去和婉约派的浅斟轻吟。然而，我也更喜欢领受如法、塞这种令人惊诧的刺激。

我自然期待齐达内能在本届赛事中再现一代骄子的风采。然而看到法国军团被名不见经传的塞国的黑娃们涮了一回，确也是无法形容的痛快。除了拿破仑的滑铁卢和关羽的败走麦城，还有一个纯属民间的比喻，就是一个既没有地位也没有名气的野小子，把一位声名显赫的庞然大物跷了个尿臊，这种刺激比看一个庞然大物打倒另一个庞然大物更强烈、更新颖、更鲜活。人们事后才去重新掂量这个野小子的分量，发现他关门练功，十年不问寒暑，早已修出一身绝技了。塞内加尔在取得对法国胜利之后，人们才一个个搜寻这帮黑娃的来龙去脉，惊讶他们之中的一大半其实都活跃在法国甲级联赛场上，说来真是属于法国人犯了一个灯下黑的大错。

法、塞之战的结局，为本届世界杯举行了一个非凡的奠基礼。

塞内加尔总统说，我们的目的已经达到，这就够了（大意）。这个话超过了所有各方各界权威人士的评价，然而仅仅只是塞国立场的评价。对于本次赛事，无疑为足球世界那些拿破仑、关羽等庞然大物们敲了一声警钟，免得重蹈滑铁卢或败走麦城的痛苦和狼狈，免遭被野小子再跷尿臊的羞辱。对于那些相对于庞然大物的“弱势群体”，无疑又是一针强心剂。创造奇迹让整个世界大吃一惊的可能性确实存在着。

正是在这一点上，我期待着郝海东、杨晨们走进历史性的二○○二年六月四日。

2002年6月2日 原下

遛了一回之后

——中、哥之战观感

中国队这匹马终于在足球的最高赛场上遛一回。

中国队基本发挥正常，没有令人耳目一新的飞跃，也没有明显的低级的失误，整个比赛表现着真实的水平，〇比二告输的结局合情合理。中国队就是中国队，中国队还是我印象中的中国队，不会给我一类球迷任何侥幸，更不会给我意外的惊喜。

还是在昨天，我写的对中国队的寄语一文中，最担心的就是传球准确性太差这样的基本功问题，在与脚法细腻功夫老到的哥斯达黎加队的斗法中暴露得尤为明显。几乎看不到我们哪位队员有带球连续过人的表现。而哥队恰恰任谁似乎都可以做出这种动作；我们的队员在拼抢中频频失球，脚下笨拙而乱无章法，反观哥队队员，常常在我们二或三人的围堵中仍能轻巧地找到出路，那球如同粘在脚上一样；更要命的是，我们的队员传接球尤其是传球的准确性太差了，常常在没有太紧逼的情况下把球传到于对方有利的位置上，自我瓦解，徒唤奈何！

有趣的是，在整场比赛尤其是前半场的大半时间里，我们队员控球的时间占优，超过了哥队，按常情应是我们控球能力强过对手。然而，这是一个虚假的表象。我们的控球多是在后场倒脚，在后卫和中后卫之间进行，一旦越过甚至接近中线进入兵家必争的中场，我们队员脚下的粗糙和哥队队员脚下的细腻就各见短长劣优了。我们在关键的中场逼抢中失球，甚至自己传丢了，不仅不能给对方形成压力和威

胁，反而给对方造成反击和进攻的机会。纵观整场比赛，我们除了两三次长传冲吊（无奈之举）造成前场的某些机会之外，几乎没有一次默契配合对对方形成真正的威胁。而哥队除了两次进球之外，其实还有多次威胁中国队造成很大进球的机会。

即使如我一样的球迷，都看得清这种不过属于常规性的东西，屡屡发生的不到位的传球，即使有神机妙算的战术，也无法实施无法奏效，自我瓦解再加上对方瓦解，还有什么神机妙算的战术可能救药呢？所谓控球时间，有一个有效控球和无效控球的关键性质量问题，通过中场进入进攻的过渡性控球才是有质量的有效控球，而在后场的控球倒脚是没有重大意义的无效控球。中国队和哥斯达黎加队提供了这个反正两面的范例。

遛了这一回，真实水平已经摆到国人和世界面前。悲愤足球也好，快乐足球也好，欧式的力量型打法也好，南美的桑巴舞也好，都得首先具备基本的控球功夫。如果控制不住脚下的足球，或者如俗话所说的脚下没活儿，怎么悲愤也仍然跳不出新的悲愤，怎么想快乐也无法得到胜利的终极快乐，欧式的力量可能变为瞎冲瞎碰，桑巴舞肯定跳成了趔趔趄趄的四不像。联想到文学创作，如果没有扎实的文学表述的基本功，任何流派，无论怎样新潮，都很难弄出有分量的作品来。

遛了一回的最大收获，就在于此。那些掌握着中国足球发展命脉的人，这回应该摸清中国队的脉象了，总该明白小平同志所说的“足球从娃娃抓起”的意蕴了。从娃娃抓起，有诸多内涵，关键在于脚上的基本功，这功应视为童子功，只有在童子时代才能练成的基本功，到了青年期就练不出来了。这个过程看来又很漫长，也比较遥远，但无捷

径可循。不单是足球，任何事业都是循着这个规律，才可能出现富有创造性的奇迹。

2002年6月4日

细腻了的英国人

英国和阿根廷之战，无疑是第一轮捉对拼杀中最具悬念的一场比赛。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英国和阿根廷为一个小岛的领土权发生过海战。英国人赢了，阿根廷输了。两个国家的积怨乃至仇恨是可以想象的。事有凑巧，此战后的两届世界杯，英国人与阿根廷人相遇，双方队员面对足下的那一粒谁也不曾陌生的足球，都聚足了许多非足球比赛本身的气儿，蕴积着本不属于通常的足球竞技的内涵。结果是阿根廷队一胜再胜，英国队败了一回又败了一回。阿根廷人以足球场上的赢缓解了海战中输的耻辱，而英国人在球场上的连续败绩使整个岛国国民蒙羞。贝克汉姆恶意的犯规被逐出场，无疑是导致第二次失败的关键因素，遭到几乎整个国民的唾骂，一个被器重被宠爱的骄子，顿时成为不堪重托不成器的歪瓜裂枣，久久被嘘声被唾液包围，一个天才的球星同样得不到原谅，这难道仅仅只是一场足球比赛的输赢吗?

真是冤家路窄。英国队这回又鬼使神差地和阿根廷队在同一个小组遭遇了。我倒以为，这种不经意的巧合，可能正合着英队和阿队的心意，前者在于雪耻，而后者则要继续满足于海战失败的心理弥补。看看赛前的两国媒体的言论，就让我感到了这场比赛不属于足球竞技的沉重的意蕴。一家说，输给谁也不能输给他。另一家说，这场比赛的胜输比争夺冠军的决赛还重要。可见憋在双方心里的那一股气，比那粒足球里头所充的气更足。看来谁家都没有从国家和民族的面子（政治的）的狭隘里超脱出来……作为看客，这场比赛的悬念就更富于观赏性了。

英国人终于赢了。

这个结局几乎又出乎世界舆论的预料。人们普遍看好阿队，而小看了英队，连英国人自己在赛前也是把自己摆在这场比赛的弱势地位，再加上英队首战瑞典的一般化表现，阿队的胜数连普通球迷都算定了。然而这一回不是前两回，赛前的估算宣告失灵，英国人硬是赢了。

没有必要再说这场逆转的输赢给两国球迷和球队带来的非足球因素的心理满足和亏空。我倒是对英国人在此战中的令人耳目一新的表演颇多惊讶。仅仅只看了十多分钟，我便发现英国人的战法不像印象中的英国足球了。英国人细腻了。英国人细腻到令人耳目一新的程度了。

英国在世界上是老牌资本帝国，亦是足球的老牌帝国。英式足球是欧洲足球打法的最典型代表。力量、粗犷、长传冲吊尤其是简捷的特点，发挥到了极致，不仅区别于南美的桑巴，也区别同样崇尚力量型打法的欧洲诸国足球列强。在近年间欧洲各国逐渐糅合南美技术型打法的渐变过程中，英国足球依然遵循自己的传统打法，更显出英式足球的别具一格。而此次英阿之战，英国人祭出细腻的技术型打法，这恐怕连对手阿根廷人也不曾料到。令人感佩的事发生了，细腻了一回的英国人把素来以细腻的技术型的阿根廷打败了，可谓以其人之道之技还治其人之身的成功一例。

英国队的突出特点是地面短传，轻巧机智，准确及时，很少有过去的长传冲吊，既表现了巨大的耐心，又显现出娴熟精湛的传切配合功夫，此其一。灵活快速的反击，正得益于绝妙的脚下功夫，似乎个个队员都精通技术型球队的细腻功夫，倒是把阿队搅得无机可乘，此

其二。欧文的细腻精巧的脚功正是这个群体的代表，一次过人又一个穿裆过球过人后的射门，击中门柱，惊得一片慌乱；欧文又一次晃过数人带球疾进，又创造了绝好的杀机；欧文在大禁区前沿巧妙过人直逼球门，迫使对方伸腿钩人犯规，得到了制胜的唯一进球（点球）。英国队最具威胁的几次进攻，都是欧文在禁区前沿以精妙灵巧的技术造成的。此场比赛不把最佳球员评给欧文，应该是一种不公。当然，欧文的这些机会的创造，正是得助于队友中后场的传递功夫，才能使他得到施展的良机。

英国人讲究起技术了，玩起细腻了，在地传球上敢于和阿根廷人过招斗法了，反而显得阿根廷人的技术不那么显眼了。他们可能准备了多套对付英国人粗犷简捷打法的战术，唯独没有考虑英国人会用这一套细腻功夫的后果。世界上的事情往往就是这样。

英国人变得细腻了。变则通。变是顺时适世的发展规律，大到治国治军的方略，小到一粒小小的足球，都得顺应时世的发展，合拍于世界发展的潮流。日本搞了明治维新，清朝皇帝顽固于王朝旧制，两个相邻国家后来的发展至今令人痛惜。即如我们自己，小平一个改革方略，中国濒临绝境的经济一下子活起来了。不变是相对的，变是绝对的。英式足球固有其简捷的长处，也更富于雄性的魅力，然而糅进细腻的技术，又弥补了简捷中难免的简单和粗糙，则更趋完美，更有利于制胜，何必要一成不变抱住一种风格呢！文学艺术中也常见此类情景，一种主义容不得另一种主义，把自己追求的主义视为香包儿，把别人追求的另一类主义视为狗屎，形成门户之见文人相轻，已是文坛艺界的痼疾。只要稍微放纵视野开阔胸襟，各种主义自身其实都在变着、发展着，单是现实主义一类已经变化出多少新种了。各种主义的互相影响和互相渗透，达到了互相丰富互相完美互相发展，这是谁

都看得见的事实。于今还在艺术上念一种经而排斥另一种经，不仅狭隘而且可笑了。

细腻了的英国人完成了一次成功的足球改良。不过，英国队主教练瑞典人颇有绅士风度，也甚为客观，他说英国队踢了七十五分钟好球，我真是为这一句话而深为感动。他没有因为胜利的结局而遮掩后十五分钟英国队的狼狈，这很了不起。后十五分钟的英国队守在窝口，被阿根廷队轮番轰炸，可谓险象环生狼狈不堪。在我看过的英国队乃至英超英甲联赛的赛场上，几乎从来也没见过这样的景象。我倒是想到这是中国队在领先时的惯常做法，尤其是那一场令人至今痛惜的与日本队的较量，就是死守窝口力保平局便可出线的小九九，被日本队一脚不大用心的远射所粉碎的。我此时突然想到，在世界足坛上何时见过英国人如此窝囊的熊样……然而英国人守住了，也赢了。

守住了后十五分钟，英国人皆大欢喜，然而这种窝囊和狼狈的死守，既不是传统的欧洲打法，也不是区别于欧洲的英式打法，更不是拉美的技术型打法，亦于发展到今天的足球潮流毫不沾边。英国人侥幸守住了十五分钟，如若设想再延长一分钟，完全有可能被阿根廷人攻陷城池。

瑞典籍教练只说踢了七十五分钟好球是客观的，对十五分钟的狼狈死守不作评述，言下之意也就不必说白了。仅此一点，就能看出这位教练是个可信赖的教练，也就可以推想这十五分钟的窝口死守的狼狈和窝囊，在英国人绝对不会再重演了。

2002年6月10日

我们那两下子……

十二日夜，《北京青年报》记者打来电话，询问我看世界杯的印象。那时正好是又一个夺标热门阿根廷队落马，我的脑子里就浮现着齐达内和巴蒂斯图塔的凄苦的脸色和伤心的泪水。我为法国队和阿根廷队惋惜，也被这两位超级球星悲戚的神色所感动。记者又着意探询我对次日中土之战的估计，我说赢不了。又问能否打平。我说打平的可能性顶多只有百分之几，微乎其微。又问能否进球，我犹豫一下仍然说说不准。记者似乎有意让我犯难，如果胜了你怎么说。我仍不改口，说除非土耳其人紧张到失常的程度。依我看土耳其前两场比赛的印象，这种可能性并不存在……后来比赛的结局，比我预料的还糟糕，我说不准的能否进球，也按最糟的结果发生了。

这就是中国足球队的真实水平。在这个原以为不属死亡之组那么严峻的小组里，球队曾经订下三阶目标，胜一场平一场进十六强；求其次，胜一场，主要看中的是哥斯达黎加队；再求其次，平一场，仍然瞅中的是哥队，似乎这是一个并不比中国队硬的软柿子。两场比赛下来，三阶目标都不能实现的时候，从球队到球迷到各种媒体的呼声，就降为进一粒球的最低期望了。赛前一天我所看到听到的“进一粒球”的期待，已感到很不是味儿的酸涩了。我们的球队和球迷整个都没有战胜土耳其的信心了，只求能入得一球就可得到安慰了。这样一种未上球场先做好了输球准备的球队，怎么可能指望实现什么呢？正是出于这种感觉，我对《北京青年报》的记者才会坦率地说出我的估计。三场打完，三场皆输，一球未进，净吞九弹。在三十二支参赛队中，恐怕已经没有替我们垫底的球队了。

这就是中国足球。不会给足球专家和痴心球迷任何侥幸，自然不会带来意外惊喜。这是我看罢中哥首场比赛之后写的随笔中的话。当时确实还没有估计到会输得如此彻底，进一两个球总是可能的，三场比赛总不能连一次进球的机会也创造不出来吧？结果比我的估计比球迷的估计比众多媒体的估计输得还要彻底，硬是连作为最低限度安慰球迷心理的一个进球也踢不出来。

一个很难回避却带点残酷意味的问题摆在所有与足球有牵涉的人面前，在群雄逐鹿的世界最高水平的足球赛场上，中国队遛了三回一大圈，收获了什么?

按照我们通常习惯的做法，很顺溜地就会总结出几条几款收获，再归纳出几条上至官方下到每一个球员都可以接受的不关痛痒不失体面的不足，最后又能在一夜之间列出几条改进措施。历届世界杯和奥运会的足球小组出线屡战屡败，总结了多少回，也没有效果。这回在世界大赛上遛完之后，如果还依此类推去做官样文章式的总结，恐怕下一届世界杯连遛一圈的机会都不会有了。我的感觉是，中国队参加本届世界杯的最大收获，就是使球队使球迷尤其是使足球的掌门人，心里有数也有底了，我们脚下那两下子和人家脚下那两下子差了多少斤两；远的不说，从新时期开始也弄了二十多年足球了，我们脚下那两下子究竟长进了多少？不与那些欧洲和南美的老牌足球强国比较，比近邻日本比同样是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塞内加尔总有可比性吧，斤两是越差越多了……应该尽快绕过历来不痛不痒的官样文章式的总结套路，直接进入反省。

把日本队作为我们反省的参照，太具有切近的意义了。从生理和人种上说，欧洲人人高马大，南美和非洲人柔韧灵巧，都比亚洲人占有先天的优势，而日本人与中国人在生理结构身高体能上几乎无差

异，此其一。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日本国家足球队还根本不是当时的中国队的对手，曾几何时，日本国家队和日本奥运队在世界足坛的战绩，已经不只是中国队难以抗衡的亚洲的一枝独秀了，说我们望尘莫及似不为过，此其二。我倒觉得，如要总结，不要总结我们，我们似乎没有什么好经验可总结的，应该去总结日本足球在短短十余年间所发生的长足进步的经验，作为我们反省的参照和参考，当然不是照搬。据说日本有一套十分奏效的培养青少年足球苗子的体制和办法；日本大约与我们紧前接后搞的足球俱乐部赛制，然而他们的甲级乙级赛场上，似乎没有出现我们那么多的黑哨和赃球，这经验更值得参考。

黑哨和假球赃球，损害的远远不止一场比赛结果的公平与否，更深的损害是足球运动员的心理素质、职业道德和人格建设。一个打了假球踢了赃球的人，心理自然就虚空就软弱，很难形成强盛的气魄和强大的人格；球员健康健全的心理素质的锻铸是多方面的，而根除黑哨和赃球，却是最基本最致命之点。

失败到最彻底之时，也有好处，使大家都看清了自家脚底下那两下子功夫太嫩，也没有任何借口和托词可以遮掩方方面面的面子了。真正想为中国足球进步，也想实现自己为中国足球事业的一番抱负的人们，从最痛处反省，才可能找到一条适宜中国足球发展的路径，才有希望可寄。

2002年6月15日 小寨

惨烈的场面与蒸红苕的技巧

韩意之战在即，朋友问我对这两家生死之战倾向性如何。我一时语塞。近几年来看意大利甲级联赛较多，渐渐地不知不觉地喜欢意国足球了，尤其是那位朴实无华而又略显忧郁的巴乔，这人似乎在血液里有一缕高贵。尽管巴乔已不在这届国家队，然而仍觉得这样优秀的一支球队过早出局，肯定会影响后面更为激烈的竞技的精彩程度。韩国呢，前几场确也表现不俗，尤其是拼命三郎的作风，但从足球艺道的全面印象说，似不如日本队那样令人耳目一新地感知现代足球的气象。然而日本已经从八强争夺中淡出。韩国成为唯一一支尚存进入八强希望的亚洲球队。我此刻才发觉，心里隐隐地倾向了韩国队；我便对朋友自嘲着说，我们为自己的国家队操不上心了，却为邻国操心了。为亚洲足球操心了。

韩国队赢了。亚洲足球又一次进入世界杯八强了（第一次还是这个半岛北边的朝鲜人实现的）。我被韩国队员那种拼命精神震惊了。这大约是我自观赏足球兴趣产生以来所看过的最惨烈的一场比赛。是的，比赛到后半段，我的脑海里跳出了“惨烈”一词。我产生了一种幻觉，前边如有一个火坑，跳过火坑便取得胜利，我相信韩国十一名球员会争先恐后鱼贯而入，而意大利人就未必肯舍身了。

长久以来，我已基本形成了一种看法，出于人种和体形的天然局限，包括中国队在内的亚洲球队，无法与人高马大的欧洲队员在体力体能上较劲。韩国队员此役的表现，不说完全纠正我的偏见吧，起码使我大开眼界，需得重新斟酌重新认识亚洲人的能力和体内的巨大能量。相对来说体形单薄身高也不突出的韩国队员（甚至不如中国队员

高大壮实），把南欧的意大利人搅得天昏地暗疲惫不堪直到一败涂地。韩国队员在一百多分钟的比赛中，不是前欢后蔫，而是欢跑到底，甚至越跑越欢，让我真正看到了什么叫跑不死，也让我几乎都不忍心再看下去了，“惨烈”一词就是这样从脑海里蹦出来的。

我反而不相信什么“狗肉汤”之说了，也不大相信兴奋剂之类的猜疑了。什么物质都难以产生这样持久的近乎癫狂状态的力量，只有从这个民族强大的个性和良好的心理素质去寻求解释。我突然想到毛泽东说过的“精神变物质”的话。韩国队员此役的表现，当为毛泽东这个著名的哲学观点的生动一例。

现在不能不说观赏中的遗憾了。

说遗憾似乎还不到位，说厌恶似乎又有点过头，主要是裁判的恶劣表演导致的这种观赏感受，与双方球员无关。

这是自本届世界杯开赛以来，我所看到的最糟糕的一位执法者，说恶劣似乎也不委屈他。我不想一一罗列这个厄瓜多尔籍裁判在整场比赛中的错判误判，以及让人不可容忍的对某些犯规和严重犯规的不判，因为大家都很清楚了。

我只是凭心理感受说，把一场精彩赛事给搅得不那么精彩了，把我倾向着的一方的胜利的欢欣搅得不那么叫人欢欣了。打个比方吧，一碗美食中的一粒鼠屎，美味和恶心就对食客是一种双重的折磨了。

本届大赛之前，国际足联对于拉人抻人的犯规延伸了界定，凡有此类动作者，一律以黄牌惩罚。我很赞成这项专指的规定。足球说到底是一场真正的游戏。游戏必须有规则。规则越严密越完善，比赛就会越精彩越公平，越有利于所有参与游戏的人展示技艺和才能。近年

间，国际足联对于诸如背后铲球等具体动作的具体判罚规定，都是为着上述目的而立的，效果良好。此次对拉人抻人的严格规定，我同样期待会有更精彩的场景出现。道理简单不过，一个最低能最粗暴的拉人抻人的犯规动作，足以把最具天才技艺的球员的创造性发挥全部瓦解，足以把最精湛的整体配合所得到的进攻良机瞬间破坏掉，让某些死缠烂打乃至恶意伤人的行为扼杀真正的强队和天才球员的发挥，如此等等。人类在商业活动工业生产和社会生活各种层面确立的法律，就是在长期的应对各种违规和犯罪斗争中逐渐改进完善起来的。

足球游戏法规的完善，看来并不简单，尽管有了非常严密非常具体的判断尺码，但这些规定是要人去执行的。一条一款规定是死的硬的，而裁判一个个却是各具风姿的大活人。这些来自世界各个角落的黑衣执法者，差别并不在他们的肤色上，也不完全在他们对足球法则领会掌握的水准上，关键在他们的品行上。轻的犯规判重了，严重的犯规判轻了，甚至不作为，犯规而不判，这对任何哪怕是火眼金睛哪怕是铁面无私的裁判都是难免的事。然而，在一场譬如韩意之战的比赛中，连续的轻犯重判对准一方，连续的重犯轻判甚至不判给另一方，受害方球员的委屈就无法申诉了，被恩赐的一方获得的胜利也就减弱其光彩了，作为看客的我也就觉得没多少意思了。

我在那场比赛的后半场，突然想到二十年前报纸上登过的一则通讯，说一位基层的官员有一句体现着陕西地方色彩的名言，“没有蒸不软的红苕”。喻说党、政的有关规定是死的硬的，如同生红苕，但经过一番“蒸”的功夫，生的硬的红苕就变成熟的软的了，自然可以随心所欲地捏扁捏圆抻长掐短了。党和政府的各种严格规定严格纪律，在他们手里被任意揉捏了……在世界最高水平的足球竞赛场上，在全世界数以亿计的球迷包括政要级的球迷睁圆了的眼睛里，这位裁判居然敢

于把足球规则这个生的硬的红苕给蒸熟了蒸软了任意揉捏了一回。看来既具备蒸红苕的胆量又谙熟蒸红苕技巧的人，远不止二十年前报纸上登的那一位陕西某地的基层官员。

至于这位厄瓜多尔籍裁判是有意或无意，是有能不用或无能执裁，现在都随着终场的哨声变得毫无意义了。揭示这个谜底或封死这只黑箱，都没有任何意思了。作为一个球迷，唯一期盼的是国际足联能知人善任，不要再把这种既敢于又善于蒸红苕的裁判派上场去，污脏了神圣的足球精神，一如我们对社会生活中的公正和正义的期待一样。

2002年6月22日 小寨

失败亦可正名

大约多年以来都没有本届世界杯的季军之争更有争头儿，也更有看头了。

所谓争头儿，自然是对垒的土、韩两队。两队均为本届世界杯的黑马，谁比谁更“黑”，谁比谁能跑得更远一步，都具有更新颖的意义。两队都多次参加过世界杯决赛，大都交了学费，充当着各个分组里鱼腩的角色；本次世界杯并不被谁看好，怕是足球世界的整个舆论也没有谁独具慧眼，会把这两个球队猜进半决赛的四强里头去。能打到这种局面，无论韩国，无论土耳其，都是历史性的突破和飞跃，再争取跨上季军的台阶，肯定将载入本国足球的史册。这种心理，不妨颠倒过来透视，如若让巴西和德国，或者欧洲和南美的另外两支强队争夺季军，他们的兴趣和激情肯定难以全面迸发，因为他们自视是夺冠军的料，季军不仅不是荣耀，而是屈才了。土、韩正好相反，在他们两家的心目中，季军之争并不亚于巴德冠军之争的分量。况且，对韩国人来说，还有一个正名的意义，以新的胜利释却裁判偏袒之嫌疑。这样的对峙已经形成，球迷就有看头了。

胜出的是土耳其。土耳其三十分钟的三个进球，尤其是后两个进球，令我经久难忘。如果说开场十一秒的第一个进球带有偶发性的话，后两个进球可以说完美无缺，尽显足球的迷人魅力。看看两个前锋队员在对方三四名后卫的封堵中如何完成了堪称精确无误的传切配合，那份自信那份稳健那份灵巧，对于同样类近欧洲人人高马大的土耳其队员来说，脚法的细腻脚底的灵气尽显风流。在本次世界杯竞技场上，我惊讶以粗犷简捷长传冲吊闻名于世的英国人细腻了，也享受

了葡萄牙、西班牙人类似桑巴的美妙舞步，几乎看不到传统意义上的欧式打法了。整个足球世界在杂交，在融会，在保持自己优长的同时也取别人之长补自己之短缺。真是有趣得很，人高马大体重八十多公斤的欧洲人，把那只小小的足球玩弄在脚尖上的灵巧之气，常常使我惊叹也使我不可思议。土耳其人呈现在我们视野里的，正是一种刚柔相济的成熟的魅力，是玉汝于成的光彩出世，往后当不会再被视为黑马了，甚至摘取大力神杯也不会令人惊诧了。

韩国虽然输了，却也达到正名的目的了。这是我非常感动也很受启示的一点收获。原以为赢了可以证明自己的实力，以正名，以释嫌；却没有想到输了的韩国也达到释嫌和正名的目的了。

这仍是一场比较公正的比赛，即使因一个进球被废为无效进球的韩国队而受冤。人们可以看到韩国队几乎从未出现过的形同漏斗的后防频频出错，导致失败。除此而外，我依然看到韩国队员跑不死的劲头，相当准确尽显功夫的传接球能力，曾经几度对土耳其形成威压乃至围剿，只是刹那间的机会把握不到火候而错失机会。然而其气势其综合战力，都令人有一个基本的判断，尽管此前有裁判偏袒之嫌，其综合能力却是一目了然的，裁判无论如何是无法帮忙的。仅此就完全可以正名了。退一百步说，即使不进入四强，仍然可以作为亚洲足球进步的标志，和日本队一样获得世界足坛的尊重。

落败也达到正名的目的，已经不是虽败犹荣的俗话所能涵盖的了。它给我的启示已经超出了足球，包括做事和做人的某些最基本的东西。

2002年6月30日 小寨

桑巴和桑巴之外的魅力

意大利籍光头裁判终场哨音响过，巴西队员以各个不同的姿态庆祝这场堪称经典之战的胜利之时，一位球迷朋友打电话来，激情和欢愉溢于言辞：这是一个最完美的结局。只要有这个结局，此前的遗憾包括裁判的某些龌龊所造成的烦腻尽可以不在乎它了。

不在乎它。说得多么好。不在乎是一种襟怀，是一种境界，是一种修养，是一种可以不屑于丑恶的人格里凛然的禀赋。足球场从来也不会干净透明到纤尘不染，面对黑哨赃球，争吵以至动粗是一种态度，以法律和法则打官司是一种做法，不在乎它也是一种态度。一般说来，前者是人们惯常的做法，动粗自然不好，而争辩以及用法律法规讨还公道净化足球赛场，是合理合法的规范的通常惯用的手段。唯其不理睬它不屑于它，这种对于丑恶行径的蔑视，才是不易做到的，也是最具心理力量的。只有公正的竞技才是一切竞技比赛的阳光，对竞技者和观赏者都是温柔的，都是美丽的；只有公正竞技中的胜利者才具备征服人心的魅力，欣喜、钦敬以至崇拜就是很自然的天道人心了。

这当然是巴西队和“尔多”们给予我们的。

巴西队一路踢过来，以全胜的赫赫战绩捧起大力神杯，怕是最挑剔的行家和“半迷儿”球迷都难以说三道四了。我却难解这样一个谜底，即在南美争夺参加世界杯的资格赛程中，巴西队历尽风险，败仗连连，险乎遭遇如荷兰队一样被窝死在本大陆之内的厄运。此次决赛前，巴西尽管也被行家和媒体算在有夺标可能的几个热门队之中，呼

声远不如阿根廷、法国、意大利为高为好。主要原因一是他们艰难地出线，二是上届世界杯决赛对法国的糟糕表现，三是对伤愈复出的领军人物罗纳尔多竞技状态的把握不定。看来，这一切都成为错误的估计了。给人的启示是，昨天的印象与今天的新形态没有必然联系。同样错觉也发生在法国队身上，上届夺标的八面威风，此前刚结束的欧洲杯的至高荣耀，眨眼间变得黯然失色溃不成军一塌糊涂。这里倒是应了一句中国古谚，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昨天的老尺子量今天的新事，难免会发生失错的局面。巴西人整个一个优秀。从球艺说，从个人能力说，从整体配合说，从后防的缜密和前锋的锐不可当说，更从球员的良好素质说，都堪称优秀，堪称王者之师的风范。然而最抢眼的还是这个群体中几位优秀代表，即三个名字中都有“尔多”的球员。

里瓦尔多。这个总也看不到舒展眉头的巴西小子，我从在荧屏上认识他直到现在，总觉得这像是一个关中愣娃。他的脸形、眼神和表情，在关中的村寨里在农贸市场上在城市建筑工地做苦力的人堆里，总会发现这样扎实诚朴的硬汉子，靠力气和诚实的劳动而不是靠讨好和机巧讨饭吃的愣娃。他同样有绝活，那一脚在禁区线上的凌空抽射，成为他的才华的灼亮之光。他的迷人之处，就在于他的不事张扬，创造性地进球之后依然是那样憨实和诚朴。

小罗纳尔多，即罗纳尔德尼奥。这回世界杯令人难忘的亮点之一，便是小罗纳尔多的出世。此前他已经有了大声誉，这回却真正以一个超级球星璀璨于世。他仅二十出头。他从少年时代就显现出独到的足球天赋；与他的年龄几乎不相称的那一份从容老练和自信，当是超人的技艺和良好素质的完美展示。我记忆鲜活的是他面对红牌时的一笑。那张红牌是否过分是否恰当是否冤枉，且不论它。面对红牌时小罗纳尔多张开手臂的一笑，有几分天真，有几分不解，却没有愤

怒。也许，这是一种小罗纳尔多式的愤怒表示。这样的笑在同样的情景下几乎是看不到的。通常能看到的是争辩是挥舞的拳头和喷薄而出的唾沫，连许多国际级的明星大腕和国内级的小星小腕都难以掩饰的即兴表现。然而在一个二十出头的小弟弟脸上绽放开来的天真无邪的笑，就潜藏着持久的魅力了，连他那不大雅观的又宽又龇的牙齿也闪出迷人之光了。

罗纳尔多。那位给我打电话的球迷朋友还说，只要看到罗纳尔多最后精美绝伦的表演，这次为期一月的世界杯就足够一个球迷安慰了。话说得有点绝，却有道理。关于罗纳尔多，说什么评价都不过分，在我充分享受了一次足球的完美，构成完美诸多因素中的两点，却是最突显的。

关于快与慢。快马以快著称于足坛是合理的。许多机会都是在快速里赢得的。然而罗纳尔多的快却令人耳目一新。在场上的大多时间里，他并不显得快，整个巴西队都不仅不快，甚至让人感到少有的慢节奏，罗纳尔多往往给人一种散散缓缓的印象。然而一旦瞅准机会，一旦形成可能得手的机缘到来时，尤其在大禁区前沿这个最危险地段，巴西队队员顿时都快起来了，意料不及的默契配合一瞬间就出现了，拉拽也拉拽不住的穿插到位了，整个令人眼花缭乱的桑巴舞起来了。罗纳尔多当是最善于此举的超人。一旦有机可乘，他灵动如脱兔，巧是巧极了，快也快极了，依着巧的绝技和快的速度，穿梭于围堵之中创造杀机，屡屡得手，常常就在于那关键的抢先半步出脚的一刹那间。关于快，给人诸多的纯属足球艺道的启示。

关于重点防范。罗纳尔多这样的超级球星超级杀“脚”，在任何级别的足球赛事中都会成为对方看管的重点对象，这是最愚蠢的教练都会做出的战术安排。各个等级中的大大小小的球星，无一例外都会受

到对手的重点“照顾”，本属常理，球星们自己也有心理准备的。然而，在被重点“照顾”的过程中，对方在企图封死企图冻结的目的完成过程中，种种合理合法的和犯规的行为都是足球场上常见的现象。除了极其个别的足球流氓的穷兵黩武式的有意伤害——所谓杀伤之外，包括某些严重的犯规，都不奇怪。因为你太优秀了，你太难以防守了，你的威胁太大了，所以必须如此防守。罗纳尔多的精彩之处就在于能在屡见不鲜的重点“照顾”之中仍然能绝境逢生，创造出致命的一脚；他的更精彩之处，还在于在种种有意和失当的防守甚至恶意的伤害发生时，那一份痛苦神色中的平静，才是最令我动心的。我看见他倒地时痛苦不堪龇着两颗大门牙的惨相，几乎从来没有看见他对伤害者或怒目或挥拳或报复的举动，不仅本次世界杯、上次世界杯以及美洲杯赛程中，都看不到他的报复行为，即使在他被踢断腿骨几乎断送足球生涯时。

这显然不完全是性格范畴的话题，而应该是一种内在的修养。我们见惯的那些大大小小的球星，包括尚不能在国际上上档次的国产小星，或者脾气和本事一样大，或者本领远远不及脾气大，动辄开口骂，动辄动粗拳脚并用，把内里的小气乃至某些黑皮之相毫不遮掩地展现出来，让看客的我只好闭上眼睛。罗纳尔多的魅力更体现在被伤害的巨大痛苦之时，才更不易，才更令人折服，也才是比技巧更难修炼的东西。

2002年7月5日 原下

遇合燕子，还有麻雀

燕子来了。

刚一打开门，燕子就飞过来，“唧唧唧唧”吵叫着，在过庭的四周旋飞，自然是寻找可以筑巢的地方。有时候多到十余只，在前屋后屋的过庭和屋檐下旋转。整个屋院里，呈现熙熙攘攘热热闹闹的气氛。无论在南方或在北方，燕子都被平民视为吉祥的美和善的形象，也是春天的象征。尽管寒风依旧刺脸，尽管冰雪封冻枯草遍地，心里却已洋溢着春天的气息了。燕子都来了啊！

拒绝燕子，我便闭了前门，也关了后门，不许燕子到屋内筑巢。我十分喜欢这种洋溢着吉祥洋溢着善良的鸟儿，却又不得不硬着心肠拒绝它们进屋，确是无奈的事。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某一年，小燕子在我刚刚建成的前屋里寻觅栖息之地，最后选定了装着电灯开关的那个圆形木盒子，据此便衔泥筑窝。我和妻子和孩子都怀着一份欣喜，在新屋里添一对喜气洋洋的燕子，于心理上似乎平添了一份令人舒悦的吉祥气氛，都十分珍爱十分欢迎这一对客鸟。很短几天，小燕的窝巢极快地长高着，令我惊讶，曾戏谑简直是深圳速度啊！那时候，深圳建筑业挣脱了中国建筑行当习以为常的慢腾腾，以几天建一层楼房的高速度震惊了中国，被誉为深圳速度，也成为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个形象化的代名词。我同时也发现了不妙：燕子用泥筑成大半的窝上，夹杂着一枝枝细长的草枝草叶，悬吊在空中，看上去乱糟糟脏兮兮的。印象中燕子是用纯粹的河泥造窝的，怎么会夹杂这么多草枝？问及村人，老者说，燕子有两

种，一为瑚燕，用纯粹的河泥筑窝；一为草燕，用杂合着草枝草叶的河泥造窝。我才大开眼界，知道燕子中也有精致和粗糙的类别。

在我新屋里筑巢的这一对燕子，无疑是属于粗糙类的草燕一种了。但终归是燕子，粗糙就粗糙一点吧，我自己其实也不属于精致雅细之人，粗糙的人和粗糙的燕子正好合拍，正好可以为邻为伍，谁也不必嫌烦谁。到得这一对燕子夫妇开始轮换卧巢孵卵的时候，我又发现了不妙。墙上开始出现黑一道黄一道的排泄物。留心观察发现，卧巢孵蛋的燕子后急了，便把屁股撅出窝口，完了事又钻进窝去继续孵蛋，墙上就流下来一道儿秽物。我就觉得不能容忍，粗糙也不能粗糙到这种程度嘛！然而还是容忍了，主要是因为那窝里正在孵化的两枚蛋，说不定小燕就要破壳而出了呢。家人已多怨言，说没见过这样又懒又脏的燕子。怨归怨，嫌归嫌，只盼小燕尽早出窝离巢。

及至雏燕出壳，及至嫩雏逐渐长大羽丰，食量与日俱增，排泄量也同步增加，整个那一片墙壁，已经被燕粪涂抹得不堪入目，地上也落着脏物。每有客人来，迎面看见这幅景象，总是说把窝捣了，太不像样子了。我忍耐着那份惨不忍睹，承受着那份脏，直到发现雏燕已经出窝试飞，终于下了逐客令……因为实在无法辨别瑚燕和草燕儿，便闭了门，一律拒绝燕子进屋，有点因噎废食的简单。

拒绝燕子，另有一个更硬的原因。我一个人住在这个祖居老屋里，常有出门的时候，短则一日，长则十天半月，走了就得锁门，燕子苦心巴力筑巢育雏，都会前功尽弃，甚或虐杀幼雏。即使精致的瑚燕，也无法容留。然而心里确实期盼能有一对瑚燕为邻为友，每天“唧唧啾啾”呢喃着，添一分生气和祥和。

真是令人喜出望外的事。早春时节去南方十天，回到原下老家时，我的第一发现，就是有燕子择定了居地。在前屋的后檐下，在那个粗大的挑梁和后墙构成的三角地带，有一个正在建筑着的燕窝。我一眼就看出来，那窝纯粹是用细腻的河泥垒堆的，一根一丝杂草也不见，据此可以断定属于精致的瑚燕了。它选择的地方也太好不过，无论我在家或出外，都不妨碍它筑窝和将来育雏。

又是深圳速度。两只燕子轮番衔着泥回来，把泥团搭在碴口上，歪着小脑袋左按一下，右按一下，然后就飞走了。我很奇怪，一团一团的河泥里掺着细沙，本是很松散的，比普通黄泥的黏合力差得远了，怎么会黏结得牢靠？似乎村人说过，燕子嘴里自含胶。是说燕子的口腔里分泌一种可以使泥团增强黏结力的液体。无法验证，不得而知，反正那窝与日俱增着，速度极快。我在暗自庆幸遇合了这一对精致的瑚燕的愉快心境里，看着专心致志忙忙碌碌筑巢的燕子，常常浮出幼年的一幅难忘的情景来。

大约是我刚刚入学启蒙，还没有认下几个字的时候。某天放早学回家，看见父亲在后屋明间的脚地上锯一块小小的薄板，比我的课本大不出多少。我便问，锯这板干什么。父亲说给燕子架一个垒窝的台板。他说有一双燕子在屋梁上飞来飞去，有两三天了，估计找不到可以落泥垒窝的台板。叔父在一边不经意地说，等你给燕儿把台板架好了，它又不来了。父亲自顾自做着，在刨光的木板的一面，用毛笔写下四个大字，并问我，你都算是学生了，认不认得这几个字。我丝毫也不觉得难堪，因为父亲其实也明白我不可能认识这四个笔画很繁杂的汉字。他有点扬扬得意地念道：喜燕来朝。他继续以扬扬得意的口吻给我讲说，燕子是吉祥鸟，也是喜鸟善鸟，在谁家垒窝是喜事。我便问“朝”是什么意思。父亲嗯了一声，朝嘛也不敢说朝拜，咱是穷家

百姓……叔父已经走开了。他几乎是个文盲，大约不屑看取父亲咬文嚼字的做派。然而父亲随之端来木梯，先在檩木上砸进两枚生铁方钉，再把木板架上去，又用细绳捆扎牢靠。我在梯子旁边瞅着“喜燕来朝”那四个悬在空中的毛笔字，积着灰尘结着隔年蛛网的老房旧梁，似乎顿然有了可期待的灵气了。母亲在催过我和父亲吃饭之后，随口说出几句关于燕子的歌谣：不吃你家米，不脏你家地，只借你家高房垒窝育儿女，也给你家添分喜……

我对燕子最初的认知和记忆，就是这天早晨留下的。父亲精心搭置的木板平台，真的招来了一对燕子。后来怎么垒窝、孵卵、育雏，年代久远，已不甚了了，只是清楚地记得，那对燕子不仅自己不在窝口拉屎，连它们孵出的雏燕的排泄物，也都转移到屋院以外的野地里去了。父亲说，燕子叼着虫回到窝喂小燕，出窝时就把小燕拉的屎叼走了，燕子这鸟比有些人还通灵性儿。这是事实，在写着“喜燕来朝”的木板上筑成的燕窝下面的脚地上，从来也没见过一次秽物，直到雏燕出窝。几十年后我才知晓，燕子中还有既脏地又脏墙令人生厌的草燕一类。据村人说，现在的燕子比过去多多了，村里好多人家都有燕子垒窝，十之八九都是粗糙的草燕，弄得屋里脏兮兮的，又不忍心赶出门去。瑚燕已经少得不成比例，越显得珍贵，也越难遇合了。我多庆幸啊！

看着最后一团湿泥干涸，再不见有新的湿漉漉的河泥垒加，我就明白燕子的这个建筑物大功告成了。这是怎样奇妙的一幢鸟类的伟大建筑啊：贴着墙的一面逐渐悬吊下去，形成一个小小的兜儿，然后又缓缓地朝前往上垒上去，最后收成一个仅仅只容得燕子出入的小口。我便可以推想，那个悬吊在最下部的兜儿，肯定是为产卵设计的，卵不至于乱滚，雏燕藏在这个兜底儿，恰如一个四面设围的摇篮，避免

了瞎滚瞎爬而掉出来摔死的危险。这个燕窝是倚赖挑梁和墙壁平面屋檐的三角地带垒成的，根本没有像我父亲在屋梁上架设的木板作基础，也没有十余年前那对草燕在前屋电灯开关的木盒上垒窝的依托，难度就很大了。这是一个完全悬空的建筑。这是燕群里的一对建筑大师出神入化的杰作，令我叹为观止。可以断定，这是它们的父母无法教给它们的方法和技巧，也是无法从它们的同类那儿模仿的，因为根本不存在完全相同的垒窝筑巢的环境，一切都得依据具体环境提供的可能性，去构思去设计去施工。由此可以推想每一对燕子的每一次筑巢，都是一次重新开始的全新的创造，无法仿效同类，也无法重复自己。

我察觉新垒的燕窝呈现出一种静谧，只有一只燕子在屋院里偶尔掠过，估计这是那只公燕儿，母燕静卧新巢产卵了。我无意间也就放轻了脚步，出入后门走过头顶的那个神秘的燕窝时，自然生出一缕拘谨，生怕惊扰了它。想到再过一些时日，那神秘的窝巢里将会传出雏燕争食的声音，该是多么美妙哦。

外出一周回到原下，打开已经积尘的铁锁，首先想看一看前屋后檐下的燕窝，似乎没有任何动静。我便想到，可能正在产卵或孵卵哩，不到饿极或后急，燕子是不会出窝的。几天过去了，我竟然没有发现燕子一次出入其巢，便有些疑惑，担心也就潜生了。后来就站在较远处的后屋前门口耐心等候，许久仍不见燕子出入的踪迹，倒是有两只甚至多只燕子出入前屋和后屋的大门，或在屋院上空旋飞，却不见进出窝口，这是怎么回事呢？又过了许多天，我终于断定，这个燕窝已是一个空巢，心里竟冷寂起来，猜想这对精心设计苦力构建了窝巢的燕子，不可能另择栖地重筑新巢，也不可能是被孩子虐杀，因为即使最捣蛋的孩子，也不会捉燕子的。我唯一能想到的是农药的绝

杀。然而这个时节的乡村里，麦子已经接近成熟，早熟的水果都是不再施撒农药的。然而也不敢肯定，说不定什么人在菜园里喷了药汁……无论这种猜测的可靠性几何，结果却是不可改变的残酷，燕子确凿没有了，难得遇合的不脏我家地的瑚燕儿。

我的心里渐渐平复，在后屋里继续我写字或看书的事。某日中午，我撂下钢笔点燃一支卷烟，透过窗户玻璃无意朝前看去，看到一只麻雀从前屋后檐下飞出来，心里一惊，用水泥板构建的前屋后檐，没有任何鸟雀可以落脚的东西，这麻雀是不是从燕窝里飞出来的？我便走出后屋前门，站在台阶上想看个究竟。待了许久，再也看不到麻雀进出燕窝的奇迹发生，便想到刚才可能恰恰看见了一只从屋檐下掠过的麻雀，怪我多疑了，便又重新拾起钢笔。

当我再次点烟的时候，无意间又看见了从前屋后檐下飞出一只麻雀。这回我没有走出门去，就隐蔽在原位上隔着窗玻璃偷窥，果然，一只麻雀从屋檐上空折转下来，钻进那个燕窝里去了。我几乎脱口而出，雀占燕巢，千古奇观。随之就放声大笑了，笑得我都岔住气了。我读书读到有趣处时哑然失笑，是常有的事，有时候一个人走路想着某些滑稽可笑的事或人，也会暗自发笑。然而像这样的忍俊不禁的大笑，而且是我一个人独居着的偌大空寂的屋院，却是绝无仅有的事。真是不可思议！好你个麻雀兔崽子！任谁都知道鸠占鹊巢的故事，然而恐怕没有谁如我有幸亲眼目击雀占燕巢的滑稽了。那么精美的燕窝里，现在飞出来又钻进去的，竟然是土头灰脑的麻雀。乡村人惊奇这类不可思议的怪事时常说，奇哉怪哉，楸树上结串蒜薹。现在恰好可以套用乡村人的这个句式，奇哉怪哉，燕窝里飞出麻雀。我突然想到那位诡秘奇思的天才作家蒲松龄，编尽了天下妖魔鬼怪的奇事逸闻，

怕是也想不到麻雀竟会占据燕巢。我听说过蛇和老鼠钻进燕窝偷食燕蛋的事，并不为奇，只觉得残忍。然而麻雀怎么可能欺侮燕子呢?

在鸟儿的王国里，有益鸟和害鸟之分，这是人类按鸟的习性对自身的利害而做出的划界。如果就鸟儿王国本身而言，有食肉类和以草虫为食物的区分。食肉一类的鸟如鹰、鸠、雕、鹞等，以捕杀各种鸟儿和小型动物营养自己，甚至凶残暴戾到敢于攻击人类，它们是鸟类王国里的希特勒和日本鬼子。以各种植物的叶子和果实或小虫为食物的鸟儿，是鸟类王国里的“各民族人民大众”，在广阔的大地上寻觅自己喜好的嫩叶、种子和虫子，互不干扰互不威胁和平共处。鸠占鹊巢就是鸟类王国里恶对善的欺凌。鸠是嗜血成性的凶鸟，而鹊是被人作为报喜禳灾的喜鸟而钟爱的。我却突发奇想，鸠残忍地捕杀喜鹊一类善鸟可能是时时发生的事，而鸠霸占喜鹊窝巢的事恐怕谁也没有目睹过。我见过无数的喜鹊窝巢，是鸟类中最不讲究最潦草的一种，用比较粗硬的树枝杂乱无章地搭压在一起，疏漏如同罗眼。这样的窝，鸠怕是看不到眼里的。鸠占鹊巢无非是喻示恶对善的欺凌，强武对弱势的霸道，没有谁去考察鸠是否真的霸占过鹊的窝巢。

麻雀却霸占了燕子的窝巢，我已先睹为快。

麻雀在鸟类王国里，无疑属于弱势一族中的弱势，那么小的体形，对任何鸟儿都不会构成威胁。在人类的眼里，不该被视为与人争谷的害鸟而曾被动员起来的六亿人民（一九五八年全国人口）围歼，即使为其平反之后，人们也没有太在乎过它，小孩子们的弹弓首先瞄准的还是麻雀。这个被凶鸟欺压也被人类轻贱着的小小麻雀，却可以欺侮燕子。而燕子在人的眼里和心里，自古都是颇为高贵的可以享受“喜燕来朝”架板的贵宾。如果用人类拳击的规则来度量，麻雀和燕子

属于同一个量级，大约都不过零点一公斤的体重吧。然而麻雀却可以以武力霸占燕巢，怕是燕子生性太善也太娇弱了……我这样推测。

我把这个类似“楸树上结了蒜薹”的奇事讲给村里人，听者哈哈一笑便解谜了。村人说，麻雀根本不会和燕子动武。麻雀只要往燕子窝里钻一回，燕子就自动给麻雀把窝腾出来了。为啥？麻雀身上的臊气儿把燕子给熏跑了。燕子太讲究卫生了，闻不得麻雀的臊气。

哦！这又是我料想不到的学问，一个令我惊心的学问。

鸠以武力霸占鹊巢，如同人类历史中大大小小的臭名于世的侵略者，人们恐惧他们的暴力，却不奇怪他们曾经的出现和存在。然而麻雀呢？虽不具备如鸠一样的强力和嗜血成性的残暴，却可以用自身的腥臊气味把太过干净的燕子恶心一番，逼其自动出逃，达到如鸠一样霸占其巢的目的，而且不留鸠的恶。由此类推到自然界，如若蛆虫爬进了蚕箔，蚕肯定会窒息而死，其实蛆对蚕是不具备攻击力的。如若把一株臭蒿子栽到兰花盆里，后果将不言而喻。再推及到人类社会生活中的臭与香、丑与美、恶俗与高雅、鸨婆与林黛玉、泼皮无赖和谦谦君子，其实是不必交手结局就分明了。

这倒成为我开心的一大景观。我站在台阶上抽烟，或坐在庭院里喝茶，抬头就能看见出出进进燕窝的麻雀的得意和滑稽，总忍不住想笑。起初，麻雀发现我站着或坐在院里，还在屋檐上或墙头上窥视，尚不敢放心放胆地进入燕窝，一旦我转身进屋，“刺溜”一声就钻进去了，还有点不好意思的心虚，显现出贼头贼脑的样子。时间一久，大约断定我其实并不介入它占燕巢的劣行，就变得无所顾忌地大胆了，无论我在屋里或檐下，它都自由出入于燕窝。我也就对麻雀吟诵：放心地在燕窝里孵蛋，再哺育小麻雀吧！毕竟也还是一种鸟喀！

2002年7月9日 原下

六十岁说

四十五年前读初中二年级时，我在作文课上写下平生的第一篇短篇小说。这篇大约三千字的小说习作是第一次文学创作，不再属于此前作文的意义。我对文学创作的兴趣由此萌发。这种兴趣持续了四十五年。至今依旧新鲜而恭敬。即使“文革”扫荡一切作品和作家的时候，这种兴趣仍然没有转移或消亡，转变为一种隐蔽性的阅读。我说过我的人生的有幸和不幸，正是从在作文本上写作第一篇小说起始的；正是这一次完全出于兴趣性的写作，奠定了文学在我人生历程中的主题词。

近年来，多种媒体和多路记者几乎无一不问及我的人生感悟和文学创作的感悟。我也几乎无一例外地首先向他们解释，我不大使用感悟、悟道一类词，我喜欢启示。即人生历程中得到的启示，文学创作中思想和艺术的启示。正是这些启示，提升着我对历史和现实的思想穿透能力，也提升着我对文学和艺术本真的体验，完成一次又一次创造理想。在这个漫长的艺术探索过程和人生历程中，有两次自我把握和两次反省成为关键性的选择和转折。

一次是在一九七八年之初，当中国文学复兴的春潮涌动的时候，我正在灞河水利工地任副总指挥。我在完成了家乡的这个工程之后离开了，调入文化馆。我那时候对我的把握是，文学创作可以当作事业来干的时代终于出现了。第二次把握是一九八二年。这一年我从业余写作进入专业写作。我曾在一篇文章中写到过当时的直接的唯一的感觉，即进入我的人生最佳生存状态。我几乎在得到专业创作条件的同时，决定回归老家。一是静下心来回嚼二十年的乡村工作和生活，进

入写作；二是基于对自己知识的残缺性的估计，需要广泛读书需要充实更需要不断更新，这都需要一个可以避免纷扰的安静环境来实现。我选择了老家农村。直到《白鹿原》书完成，正好十年。这两次把握，一次是人生轨道的转换，一次纯粹属于自身生存环境的选择。

两次反省。一次是一九七八年秋天。当新时期文学如雨后春笋般从解冻的文坛发生时，我很鼓舞也很冷静。冷静是出于对自身具体情况的判断。我以为排除“文革”中那些极左思想不难，而要荡涤自有阅读能力以来所接受的极左的非文学的观念不易。我选择了读书，借来了一些世界经典作家的经典作品，以真正的文学来摒弃思维和意识中的非文学观念，目的仅仅只有一点，进入文学的本真。这次反省大约持续了四个月，到一九七九年春天，我获得了文学创作和艺术表现的强烈欲望。我把文学当作事业来干的行程开始了。

第二次反省发生在八十年代中后期，即《白鹿原》写作的准备阶段。我那个时候的思维是最活跃的一段。尤其是文学创作理论中的人物心理结构学说，引发了我对自己以往创作的颠覆。自我的不满意以至自我否定，同时就孕育着膨胀着一种新的艺术创造理想。这种痛苦的反省完全是自发的。发生在《白鹿原》的准备和后来的整个写作过程中，对我来说是一个关键。

多年以后的今天回过头来看，在人生的两个重要阶段上，我把握了自己，主要是以自身的实际做出的选择。在艺术追求的漫长历程中，在两个重要的创作阶段上，进行两次反省，对我不断进入文学本真是关键性的。如果说创作有两次重要突破，首先都是以反省获得的。可以说，我的创作进步的实现，都是从关键阶段的几近残酷的自我否定自我反省中获得了力量。我后来把这个过程称作心灵和艺术体

验剥离。没有秘密，也没有神话，创造的理想和创造的力量，都是经过自我反省获取的、完成的。

仅仅在半月之前的一个上午，我完成一篇五千字的散文，在原下老家一个人兴奋不已。仅仅在十天前一个晚上，读完畅广元教授的一本文化文学批评专著，进入一种最欣慰的愉悦。四天前的那个下午，我写完一篇万余字的短篇小说，竟然兴奋不已。两天前的晚上，在杨凌参加杨凌文联成立的会场里，见到残疾人作家贺绪林，听说他的一部三十万字的长篇即将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我感动而又感奋，同样愉悦。这样，我几十年来不断重复验证自己，文学创作才是我生存的最佳气场。

直到我走进朋友们营造的这个隆重而又温馨的场合，我依然不能切实理解六十这个年龄的特殊含义，然而六十岁毕竟是人生的一个最重要的年龄区段。按照我们传统文化和传统习俗的意思，是耳顺，是感悟，是悟道，是忆旧的年龄。这也许是前人归纳的生命本身的规律性特征。我不可能违抗生命规律。但我现在最明确的一点是，力戒这些传统和习俗中可能导致平庸乃至消极的东西。我比任何年龄区段上更强烈更清醒的意识是，对新的知识的追问，对正在发生着的生活运动的关注。这既是作为一个作家的生命意义所在，也是我这个具体作家最容易触发心灵中的那根敏感神经的颤动的。

我唯一恳求上帝的，是给我一个清醒的大脑。而今天所有前来聚会的朋友和我的亲人，就是怀着上帝的意愿来和我握手的。

2002年7月31日 原下

在乌镇

车溪河紧紧贴着两岸人家的墙根流淌。这一岸的正门，隔河对着那一岸的后门和后窗。河不宽，水量却充沛，人是无法涉水而过的，就有好多座拱起来的桥，把车溪河两岸的人家连接起来。这条河让我联想到人体的主动脉，镶嵌在这个古老镇子的躯体之中，无声无响地涌动着，也滋润着这一方古镇，竟然有一千余年了。

一千余年的古镇或村寨，无论在中国的南方或北方，其实都不会引起太多的惊奇，就我生活的渭河平原，许多村庄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纪年之前，推想南方也是如此，这个民族繁衍生息的历史太悠久了。我从遥远的关中赶到这里来，显然不是纯粹观光一个江南古镇的风情，而是因为中国现代文学的开拓者奠基者之一的茅盾先生，出生并成长在这里。这个镇叫乌镇。乌镇的茅盾和茅盾的乌镇，就一样萦绕于我的情感世界，几十年了。

我和朋友们先乘那种古老的小木船游了一通车溪河。船的尾部设一支既能划水又能导向的木桨。木桨用一颗圆头铜钉固定在后帮上，在摇船人的手中十分灵便自如地翻摆着。正门对着河的那一排人家，大多保持着原有的古色古气的门楼，偶有几幅新式装潢的门面。对岸的那一排房屋，是十分随意因地制宜的后门和后窗，呈现着所有作为后部的凌乱与驳杂。从那些尚未关死的后门和后窗里，可以窥见室内墙壁的饰物，可以瞥见围着桌子把玩麻将的老头儿老太太，平静而又悠闲，似乎古老乌镇的老头老太就应该是这个样子。我无法想象少年茅盾玩戏在这条河边时的景象是什么样子。

游览在车溪河上，我的思绪里便时隐时浮着先生和他的作品。周六下午放学回家的路，我总是选择沿着灞河而上的宽阔的河堤，这儿连骑自行车的人也难碰到，可以放心地边走边读了。我在那一段时日里集中阅读茅盾，《子夜》《蚀》《腐蚀》《多角关系》以及《林家铺子》等中短篇小说。那时候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教育主管部门在中学取消体育课的同时，也取消晚自习和各学科的作业，目的很单纯，保存学生因食物缺乏而有限的热量，说白了就是保命。我因此而获得了阅读小说的最好机遇。我已记不清因由和缘起，竟然在这段时日里把茅盾先生所出版的作品几乎全部通读了。躺在集体宿舍里读，隐蔽在灞河柳荫下读，周六回家沿着河堤一路读过去，作为一个偏爱着文学的中学生，没有任何企图去研究评价，浑然的感觉却是经久不泯的钦敬。四十余年后，我终于走到诞生这位巨匠的南方古镇来了，这镇叫乌镇。未进乌镇主街之前在车溪河的泛舟，恰如无意排定的如水般的思绪的酝酿和沉浮。

从车溪河的一座宽敞的石拱桥上过去，才进入乌镇，头一条东西走向的街巷叫观前街。茅盾故居就在这条街巷里。街巷石条铺地，洁净清爽。两边或高或矮或宽敞或窄狭的门面，挤挤挨挨不留间隙。令我感到奇异的是，所有面向街巷建筑的前檐的墙壁，几乎一律是用松木板镶嵌而成，而且一律不刷油漆，不涂饰料，不作装潢，裸露着松木木板的原本颜色，一圈一圈木纹丝路乃至一个个或大或小的树旋儿都清晰可辨。墙是木板墙，门是木板门，窗是可装可卸的木板窗扇。站在街巷里往前看去，尽是略为陈旧的米黄色木板壁垒，油然而生思古的朴拙。我便惊奇，这样原封不变的整个一个镇子的建筑如何保存得下来，五十多年来频仍的运动的劫难何以逃躲?

茅盾故居坐北朝南，宽大的门面，高耸的屋脊，当是观前街上最气魄的宅院之一。四开间砖木结构的楼房分为东西两院，都有前屋和后楼，中间是庭院。东院购置建造在先，称为老屋，后建的西院顺理成章被称为新屋。东西两院之间有一道隔墙，下有门道，上有楼梯沟通。在窄窄巴巴的小铺店小门面构成的建筑群里，茅盾故居就显示出大家富户的气派，即使今天我站在作为纪念馆的庭院里，依然能感受到当年家业兴旺的气象。

这个宅院的创业者和奠基者是茅盾的曾祖父。原也是乡村小户穷家的农民，却经商有道，在汉口发了财，便嘱茅盾的祖父在乌镇置地造屋，先东院后西院，遂成这幢完整气派的建筑。我在这里看到茅盾落生的那间屋子，倒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天才落生在任何一间屋子都是合宜的，也无关紧要。我更感兴趣的是那间家塾，内有三张至今仍油光锃亮的小方桌。茅盾就是在这间屋子的某一张桌子上铺开纸笔和书本的，一位中国新文学的大师开始了启蒙。他的老师是他的祖父沈砚耕和父亲沈永锡。家业富足以后首先就让子孙读书，是这个民族亘古不变的传统，南方是这样，我生活的关中也是这样。只有揭不开锅交不出学费和买不起笔墨纸砚，才忍心让孩子失学。茅盾的祖父和父亲在教着五岁的茅盾开始念书写字的时候，寄望自然是深厚至殷的。我想他们肯定没有料及这个在他们膝下一句一句背诵一笔一画练习着毛笔字的后人，后来会成为一个写作新小说的作家。

老屋后楼下层的一间作为客厅，茅盾的祖母曾在这间屋子里养蚕。据说少年茅盾曾参与搭手和祖母一起干。由此自然联想到我曾经在中学课本上学过的《春蚕》，文中那个因养蚕而破产的老通宝的痛苦脸色，至今依然存储在心底。我却顿然意识到养蚕专业户老通宝的破灭和绝望，茅盾在自家的深宅大院里是难能体验感受得到的。他少

年时期的生活和读书，得益于这个宅院的创业者；他后来作为一个新文学的作家，眼睛和心灵却又投注到如曾祖父踏上商道之前的无以计数的日趋凋敝的老通宝们的茅屋小院里去了。于今想起在中学课堂上学习《春蚕》时的感觉，竟然没有因为老通宝是一个南方的蚕农而陌生而隔膜，与我生活的关中地区的粮农棉农菜农在那个年代的遭际也没有什么不同。这种感觉对我一直影响到现在，不大关注一方地域的小文化色彩。一个儒家学说，又在同一个历史进程中颠簸着的同一个民族，要寻找心理秩序和心理结构的本质性差异，是难得结果的。

从故居出来，站在观前街上，再回头观瞻这幢宅院，脑海里倏忽跳出了破旧的蛋壳，曾经诞生过一只公鸡的蛋壳。追寻这只蛋壳为什么会生出这样一只伟大的公鸡是没有答案的，其意义也几近于无。于这只公鸡来说，那对于黎明近乎本能的呼唤啼叫，才是中国南方也是北方无以计数的老通宝们的期待……

2002年11月4日 原下

走进一个美国家庭

——丹尼尔与王锦凤

刚刚见面握手大约一刻钟不过，我发觉我已经喜欢上这位西安女婿美国人丹尼尔了。

在最初的这一刻钟里，丹尼尔领着我参观他的这幢尚未完工的住宅，嘴里滔滔不绝，门庭的设计出于怎样的用意，客厅为什么要安排在这个位置上，正在燃烧着柴块儿的壁炉既出于雪天取暖，更多的是一种家庭情调，因为暖气设备本来是完善的。他拉着我看连着客厅的足有五十平方米的活动室，已经铺好了木质地板，已经购置了几件健身器具，然而尚未完全善工。及至卧室、储藏室、洗浴室都介绍参观了，又到后院和前院的草坪上，后院的草坪连接着望不到顶头的农田，收获过大豆正在休眠着的垄沟间残留着薄薄的雪。前院草坪的界畔上是两竖一横排列的郁郁葱葱的松树。最后介绍房屋门前搭建的狗舍里的一只大耳垂颊的黄狗，和一只捡来的肥嘟嘟的曾经无家可归的花猫。我问他，你这宅院占多大面积。他说四千二百平方米。按着积久的农民习性，我折算为中国乡村土地面积单位市亩为六亩还多点。这样的宅基面积，大约相当我的家乡关中地区一个五口之家所能从村委会分配到的全部耕地面积。通用的名称为责任田或承包地，而农民更习惯把它称作口粮田，即这些属于一家一户耕种的土地的本质性意义，是解决农民吃饭问题的，大约也就人均一亩地。同样，顺着积久的农民的习性思维，如若中国人按丹尼尔的宅基建房造屋，不要说一家六亩，一家一亩吧，中国现有的所有耕地就会变成种草栽花的宅

院，不单是农民的口粮，城里人的口粮全都得依赖进口。我当然只有感慨美国人拥有土地的奢侈。

这个丹尼尔在头一刻钟里让我感动的，是他每介绍一处，一方地板一扇门或一扇窗，都要强调一句：这是我干的。其实他只要概括一句，这个宅院里的一草一树一砖一木一椅一桌，全部是他亲手做出来的就行了。然而他仍然不厌其烦地向我强调着“我干的”。在一份自豪一份炫耀的背后，我感到了一种对于劳动创造的本能的乐趣。即使是炫耀吧，更着重于“这是我干的”，我也就十分明显地掂出这份自豪发自于“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的心理。同样是我积久的农民习性，对于这样的表白、这样的炫耀和这样的自豪，便有一种心理上的贴近，一种共鸣，一种感动，自然就喜欢这个美国人。

在客厅坐下喝茶。丹尼尔坐在我对面，作为他的继子的乐乐和他并排坐着担任翻译。几乎全部是丹尼尔说话。丹尼尔很喜欢说话，一说话就显得十分兴奋，修剪得很整齐的上唇上的短髭就跳跃起来，眼里流泻出诚挚、调皮甚至恶作剧的孩子气。他的嘴巴不停地说，一会儿说他的中国妻子多么美多么好，做下的纯粹的西安家庭饭菜多么香，一会儿又说到他的西安和上海之行的新鲜见闻。他的嘴忙着手也忙着，比画着所叙述的事物，说到激动处，还会搂过妻子的肩膀亲吻一口。丹尼尔不时地做出滑稽的表情，嘴里连续发出“这个这个这个”的汉字。他的中国妻子王锦凤在旁边向我解释，因为夫妻语言不通，她也仅仅只会说一点英语的生活用语，常常在不能顺利交流时不由自主地“这个这个”起来。丹尼尔捕捉到了，觉得好玩，常常当作逗笑的话“这个这个这个”起来。他对她接电话时发出的“喂”的口语也觉得好玩，常常用一只手扣在耳朵上做接电话的姿态，连续大声发出“喂喂喂”的声音，和妻子和继子乃至和客人逗趣。丹尼尔也已经学会了几个

汉字发音，夹杂在英语里，而且是西安方言的音调，让我忍不住发笑。

丹尼尔突然抓住乐乐的上臂，瞪着眼睛“咕噜咕噜”说着，十分认真又十分严肃的神气。乐乐便给我翻译，继父说他胖倒是胖，可是胳膊上的肌肉是软绵绵的，没有劲儿，这是不行的。丹尼尔又抬起自己的右臂，握着拳头屈伸一番，不用翻译我也明白，是力量的显示。王锦凤告诉我，他们母子俩刚进入这个美国家庭不久，丹尼尔就坦率地批评乐乐了。乐乐按照自己在西安的生活习惯，放学回来就坐在餐桌上等待饭菜，家庭里外的活路是绝不动手的。丹尼尔很惊讶，一个已经二十岁的小伙子怎么能不帮助父母干活。他就把斧头塞到乐乐手里，让他给壁炉砍劈烧火取暖的木柴，乐乐开始学习劈柴。他教乐乐使用割草机，剪修前院后院大片草坪。他认为二十岁的小伙子坐在餐桌上等待母亲侍候饭菜是不可思议的，看着父母干杂活而不搭手帮忙更是不可思议的，二十岁的小伙子没有一双肌肉强健的胳膊应视为羞事。王锦凤话语不多，却很真诚，说自己本来就是一个并不宽裕的家道，却宠惯孩子。在西安家里，二十岁的乐乐是由奶奶给他洗脚的。现在看成是丑事而不敢向丹尼尔揭露了。我听到这些话时也颇为刺激，什么中西文化差异，扯淡吧！这纯粹是属于怎样培养孩子的最基本的常识性问题。中国古来就有“惯子如杀子”的告诫，与丹尼尔的生活守则本无任何差异的。乐乐告诉我，他已经学会劈柴割草了。一个并不富裕的中国家庭的男孩子，到美国的新家庭里开始接受关于劳动的必要性训练，令我起码感到新鲜，且不作他论。

丹尼尔和王锦凤的爱情和婚姻，听来和说来真有点不可思议。

丹尼尔大约四十五六岁，在密歇根湖畔的一家大型钢铁厂做技术工人，就住在相距不远的这个小镇上。他已经有过两次婚姻，头一次

婚姻不知什么原因破裂，留下的孩子已经独立生活。第二次婚姻相对短暂，据说对方背叛，丹尼尔十分伤情，对美国女性丧失了信心，想找一个东方女性。王锦凤生活在西安，原在一家国有单位工作，丈夫是外省一家大企业的管理者，有一个男孩乐乐。丈夫后来有了一个更年轻的女人，王锦凤便和丈夫分手了。她后来又下了岗，在一家单位临时性就业，生活状况可以想见。她后来也经人介绍谈过对象，没有成功，单身差不多有二十年了，据说对中国男人也部分失掉了信心。她的姐姐王锦儒八十年代头上随丈夫移民美国，也住在这个纯粹白种人居住的小镇上，以针灸行世，渐得声名，也广结病友与乡友，得知了丹尼尔的家庭形态和心理形态，她当即想到了妹妹王锦凤。王锦儒坦率地告诉我，丹尼尔很热心她的联姻，当即约定随她一起到中国来相亲。她却担心妹妹能否被相中。她说这个妹妹是六姊妹中相貌最普通的一个。王锦儒给我说，在上海两人一见面，丹尼尔竟然是一见钟情，“爱得不得了！”丹尼尔不会说一句中文，妹妹锦凤不会说一句英语，两人都难舍难分情意缠绵。两人从上海飞到西安，便在陕西省人民政府大楼里领取了结婚证书，并且在挂着省政府牌子的方柱旁留影。丹尼尔把那张照片翻出来给我看。我在想到“缘分”这个词之外，又多了一份感慨，一个对美国女性失去信心的美国男人，和一个对中国男人失去信心的中国女人的心灵的融合，单是“缘分”这个俗不可耐的词汇是绝难涵盖的。这是两个都经历了情感挫折损害的男女，尽管种族不同语言不通习俗迥异，然而寻找一个可靠稳妥的情感寄托爱意栖息之地的心情却是共同的，一切形而下的障碍都被那一份真诚轻而易举地跨越了，这一个是另一个的情感寄托之大树，另一个是这一个爱意栖息的绿地。

丹尼尔和乐乐坐在我的对面，手舞足蹈着嘴里“咕噜咕噜”着。乐乐不动声色地作同步翻译，反而显得沉稳，一双圆圆的黑眼睛时而透

出纯净的稚气，时而流泻出一股中国式的老练，反而衬托得丹尼尔像个活泼好动的大孩子了。丹尼尔说，按美国家庭不成文的习惯，孩子长到十八岁，就该自谋生路自食其力独立生存剪断连接家庭的脐带了，他充分理解乐乐刚到美国，英语不通，生存困难，先在一家英语补习班学习，现在又要换一家学校强化英语，学费均由继父来负担，希望乐乐能尽快进入大学深造。王锦凤对我插话说，这人心地善良得很。

丹尼尔又转移了话题。他两只手同时按在自己两边嘴角上，往上推，反复几次，那皮肉绷紧的脸颊就造出一些笑意来。我弄不明白他表述的意思，求助乐乐。乐乐羞羞地笑着，未及翻译，王锦凤笑着对我解释，丹尼尔说他训练乐乐要学会微笑。用手把两边的嘴角提高，就造出微笑的表情了。王锦凤说，在这个小镇上，人和人碰面，都会微笑一下，问一声好，她也常常遇见。她说自己在国内，熟人见了面打一声招呼，笑不笑是无所谓的；与不认识的陌生人相遇，如若微笑，人家会认为你有毛病；如若是一个男人对一个不认识的女人微笑，甚至会被看成图谋不轨。她说，丹尼尔很快发现乐乐是个不会微笑的孩子，她是个不会主动发出善意微笑的女人，他要她母子尤其是乐乐一定要学会微笑，遇见任何人都应该用微笑表示友好。乐乐对我说，在中国的家庭里，父母不仅不会要求子女这样做，甚至相反，告诫子女不要随意和不了解的陌生人说话，尤其不要随便与陌生的异性说话。我当然对乐乐说的不感意外，戒备心理是一道传承已久的心理栅栏，与我们封闭的历史和文化，以及勾斗不息的生活造成的不敢轻易信赖相关涉。无论如何，乐乐将开始学习微笑了，先得把嘴角训练到能提起来。

丹尼尔开车，载着他的中国西安的妻子、继子和我去郊游。他的院子里停着五部汽车，轿车、小客货两用、大卡车以及一部可餐可宿可浴的旅行车。周末把旅行车开进森林或湖畔，一家人就可以享受大自然的情趣了。他的大卡车是专门用来挣钱的，周末假日，替人拉载货物，挣一份外快，他体魄强健精力充沛，用自己的方式挣钱。

车窗外是休闲着的大片农田。一层薄雪覆盖着垄沟。田块和田块被大片大片的杂树林子隔断。一幢幢式样各异的小平房或小楼房散落在田野里或丛林中。这些住户有农民也有其他职业的人，唯一区分的标志，就是宅院里有没有农业机械。丹尼尔执意把我拉到他供职的那家大钢铁厂旁边，远远观赏被树木掩遮着的一片片建筑。他告诉我，他已经在这个钢铁厂干了十多年了，工资按小时计，每小时十八美金，每天八小时。因为钢炉不能熄火，直到寿终报废，所以总有加班加点的机会，工资翻一番。作为一个技术工人，丹尼尔的月收入是很满意的。他特别告诉我，“九一一”之后，其实在“九一一”之前，美国的钢铁工业已经萎靡，他供职的这家厂子差点关闭，后来被一个财团兼并了，才不至于熄火闭炉，才不至于失业另谋生路。丹尼尔说，中国钢铁的竞争也是一个因素，此话无法判断其虚实。密歇根湖连接着五大内湖，北边伸入加拿大境内，我们所在的位置，是这湖的最南端的湖岸沙滩。丹尼尔说，图了这一方好水，美国百分之五十的重工业企业都摆置在这五个湖的旁边。丹尼尔自豪地说，这湖水干净到可以掬起来饮用。我想，饮用也许夸大其词，然而干净却是眼见的，不见一件漂浮物，沙滩上也看不见秽物废袋，清澈的湖水如海浪一般卷来退去，泛起层层叠叠的白色浪花。作为一个公民，对保护得如此干净的湖水的自豪，丹尼尔是由衷的。

晚饭是麻食。陕西关中城市和乡村都极其家常的面食。麻食分勤麻食和懒麻食。懒麻食是把擀得比较厚的面页切成指盖大的小块儿，烩入炒菜。勤麻食是把一小块一小块面团用大拇指搓开，成为一个空心小卷儿，煮熟再烩入炒菜。王锦凤做的是勤麻食，煮着的时候，我已经闻到久违了的诱人的香味了。端到餐桌上时，丹尼尔已经喜笑颜开，连连念叨着生硬的汉字：“麻食好吃麻食好吃。”他已经比较自如地使用竹筷，一边把饭菜送进嘴里，一边做着满意的表情。他用筷子夹起一粒黄豆，向我咕噜着，我以为他在显示自己运用竹筷的技巧。王锦凤对我解释，麻食饭里的黄豆是她捡来的。和宅院相连的农田种着黄豆，机械收割过后，路边的杂草中尚有不少遗漏的黄豆棵子，她闲来无事捡拾回来，竟然有一袋子，送亲戚朋友，自家生豆芽，磨豆浆，丹尼尔十分感动。我这时就明白了丹尼尔是在夸赞王锦凤。他放下筷子，又在王锦凤的脸颊上吻了一下。王锦凤矜持地笑笑。乐乐不以为然地吃着，大概对这样的亲昵动作早已习以为常了。

丹尼尔直率地说，他喜欢西安，对上海不以为然。这是不难理解的。上海浦东浦西急骤崛起的高层楼群，对看惯了纽约、芝加哥等地高楼的美国人不会新鲜，更不会惊讶。他放下筷子，又找出一张照片，那是他在上海一个老太太的茶叶蛋小摊前大嚼其蛋的留影，他说他一口气吃了十个。他说他喜欢西安城墙，喜欢逛西安的小铺店小门楼拥塞的巷道，而且过誉骊山是天下最美的风景。我告诉他，骊山只是秦岭延伸到渭河平原上的称不得山的小丘小岭，华山才是最具个性的山，可能更会博得体魄雄壮的丹尼尔攀登的兴趣。其实，走进秦岭的任何一条山沟，都是浑然天成的气象万千的风景。

“是吗？是吗？是吗？”丹尼尔用汉语连连发问，随之又用英语认真地说，他肯定还要去西安，让我领他上华山，进秦岭，登城墙。

我慨然应诺。我会像他骄傲密歇根洁净的湖水一样，自豪于我的秦岭和华山了，还有城墙，还有那些拥挤在支支岔岔小巷道里的如王锦凤一样善良的人。

丹尼尔却抱起脚旁的花猫，说，他的这只习惯于听英语的猫，现在开始会听中国话了。

2002年12月12日 原下

“非典”不是虎烈拉

一场被称作“非典”的瘟疫，把二〇〇三年春天应有的诗意糟践得一塌糊涂。消毒液代替了喷洒花草的兴致。千篇一律的口罩遮住了春天里格外活泼生动的脸孔。卫生部发言人每天通报的确诊和疑似病人数字的跌涨，成为几乎所有人关注的第一要闻。一种被科学家“检举”出来的小动物果子狸，一日之间从美味佳肴变为令人恶心呕吐的妖孽。瘟疫造成的灾难和抗击灾难的斗争，肯定进入各地的史志典籍。

突如其来是这场瘟疫爆发最恰当的词汇。在我的全部心理意识中，对诸如地震、洪水乃至战争都有某种准备，唯独对瘟疫连一丝一毫的戒备都没有。十余年前写作《白鹿原》里的那场蔓延大半个中国的“虎烈拉”瘟疫时，我完全是一种对于不幸者的凭吊和对一种愚昧的告别心境。现在看来，即使在人类可以遨游太空可以置换内脏器官的高科技时代，造成大面积危害人的生命的某种病毒，还是未知数，远远不是马放南山刀枪入库的时候，相应的机制和有效扼制的设施应该尽快完善。

在灾难临头的时候，我看到了敢于负责的政府所显示的力量。“非典”造成的非常时期，各级政府断然采取的措施，畅通无阻，上行下达，一种责任感和一种行政力度，使民众恐惧的心理有所依傍，自信就成为一种强势的社会心理。我已经欣慰地看到这种行政力量所发生的积极效果，全面控制疫情，危害已经在较短的时间跌落到最小。政府的威望是不言而喻的，而威望的核心成分是民众的信赖。

身置“非典”第一线的医务工作者，在他们义无反顾舍生忘死的行为里，彰显出这个民族最可膜拜的精神。我曾经面对电视屏幕上那几位倒下的青春面孔，忍不住泪水潮溢。不仅是崇高的职业道德，不仅是献身精神，更向我们做出了一个时代性的辩证，即：膨胀的物欲和世俗化的世风，并未软化并未摧折这个民族的脊梁。他们被誉为最可爱的人是发自我们心底的。

以钟南山为代表的医学科学家成为震撼人心的形象。我又一次最切近地感受到“知识就是力量”的哲理。知识分子的科学立场、科学态度，以及灾难重压之下的独立人格，成为新的世纪里肩负民族使命的卓然楷模，撑持起民族内在精神大厦的柱梁。那些在商潮里投机腐败的角色应该感到羞愧。

灾难来临，不可避免，各种可以预知和不可预知的灾难，在世界的这一角落或那一角落发生，包括自然的和社会的。因为某种利益所导致的偏见而发生的幸灾乐祸，是一种阴暗龌龊的心理，不会在人类世界引起共鸣，只会自找鄙夷和轻蔑。我们更当从灾难里总结经验，科学的立场科学的态度主旨下的科学举措，才是对付所有灾难的唯一选择，也是使一个民族精神强大的基本起点，勤劳、勇敢、无坚不摧等等，得以发扬光大出新的更富活力的色彩。

2003年5月30日

黄帝陵，不可言说

正在澜沧江边行走。层层叠叠郁郁苍苍的山峰。黏稠的灰云覆盖着尖锐的和平缓的群山。混浊的江水在峡谷里一路冲溅出千姿百态瞬息万变的水花。缓坡上和河谷坝子里，散落着围墙涂成白色的四方形楼房，这是我见过的最为雄壮高大的藏族民居了。房屋周围的田野上，变成黑色的晾晒青稞的木架斜立在刚刚吐穗的青稞地里。耳边活跃着藏族男女无处不在的舞蹈的踢踏声，萦绕着交混着纳西族优雅悠扬的古乐。在这种陌生的大自然里的沉醉是极其自然的，也是无以名状的。沉醉里，突然接到诗人耿翔的电话，约我写一篇关于黄帝的短文。我不由得沉吟一声，那个青砖围垒黄土堆积的陵冢，从青山、峡谷、青稞穗和舞蹈乐曲里浮现出来，哦！老祖宗。

记不清多少回拜谒过黄帝陵了。头一次在我年轻时，默默地围着那个枯草和积雪覆盖着的黄土冢走了一圈，竟然获得了一种绝少能有的平静沉稳的心境。那个时候在我生存的全部空间里，喧嚣着“文革”势到末途的挣扎却也更显疯狂的声音。连厕所和炕头都刷着虚妄标语的生存空间里，只有在整个民族的老祖宗的土冢前，我才获得了作为一个人——活人的正常的心境。

我和家人亲戚拜谒过黄帝陵，烧一炷香，再围着那个已经修葺完整的土冢走过一圈，依然获得的是宁静和沉稳的心境。我陪着外省和海外华裔作家朋友每一次拜谒黄帝陵的时候，都要围着那个已不陌生的黄土冢走过一圈，获得宁静和沉稳。几十年过去，我对老祖宗的拜谒就固定为围绕土冢走过一圈这种形式，至今也没有写过一篇关于黄帝的文字。

在我的全部感觉里，几十年来多次拜谒的过程和拜谒之后，都没有产生企图表述的欲望。我现在才弄明白自己何以会如此，在于这位老祖宗是无法言说的，或者说在我是难以找到表述的语汇的。我观瞻过秦、汉、唐、明、清五大王朝几十位皇帝的陵墓，也是至今没有写过一篇短文。然而，没有写仅仅是我不想再说那些陈年旧事。尽管我确凿在他们或倚山或掘地或打开或依旧死封的巨大建筑面前，想到他们堪称不朽的功业和不可掩抹的巨大罪孽时感慨多多。然而，无论千古第一帝无论汉皇唐王明陵清陵里的帝王，都是可以言说的。没有一个使我产生如在黄帝陵前那种不可言说的感觉，自然也没有任何一个帝王能使我产生那种沉稳和宁静的心境。

我还是想脱开史家的评断而以自家的感受来说这种纯粹属于个人的感觉上的差异，大约就出在同一个读音的皇与黄的本质性的属性上，皇是一种象征，黄却是另一种象征；皇在我的头顶需仰视需顺从需接受“皇叫你死你不得不死”的律令，黄则与我同在黄土地上可以平视可以和他比一比谁的皮肤更接近黄土的色泽……

于是，许多年之后的我，在围着他的小小的黄土冢转过一圈又走过一圈的时候，获得的是宁静和沉稳。

于是，我在一次又一次拜谒这位可以称为老祖宗的陵墓时，总是感到不可言说。

于是，我在注目那个翠柏重荫下的黄土冢时，似乎感知到每一撮黄土每一片草叶浸洇到胸膛里的神圣的灵光，同时也自觉地接受先祖灵光的洗礼，更有透见灵魂的审视和拷问——不肖也否?

2003年7月19日 雍村

回嚼永恒的美好

我第一次听说王毓敏这个名字，距今大约有四十年了。那时我刚刚从学校出来进入饥馑笼罩着的社会，刚刚起始我的文学自修的行程。我在《西安日报》读到一篇小小说，从作品描写的环境气氛上似乎能感觉到极其切近的东西，便猜测这个作者可能距我生活地不远。后来便证实了我的臆猜，作者王毓敏是西安市第六十三中学教师。西安第六十三中学在灞河北岸，我家则在灞河南岸，其间不过七八公里路程。我便永远记住了一个人的名字，因为他有本事在《西安日报》发表作品。我便羡慕，便敬仰，便不能忘记。十年后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当“文革”和贫穷的阴影笼罩着我主要生存的乡村社会的时候，我才有幸见到王毓敏，那是两位业余作者和我一起到灞河北岸去办事，其中一位对我提起，而且肯定他仍在六十三中学。我留下至今不忘的一件事，说他在“文革”里招来横祸，不能忍受折磨而出逃，在深山雪地里昏倒，被山民救出，因冻僵而截去了双足。这样，在我即将跨进王毓敏的门槛时，心里又蒙上一重沉痛的阴影。

我看见的王毓敏，瘦高挑个头，虽正当三十多岁的生命旺盛期，却明显使我看到劫后余生的平和与沉静。他说话平缓，既没有高谈阔论，也没有沉郁沮丧，一种跨越了至痛至悲之后的无奈被平静覆盖着。我大约说到我十年前在报纸上看到他的作品的愉快往事，他没有得意和兴奋，依然是那种平静的淡然的微笑。我们没有问他的灾难，自然是怕引起悲痛。他只说到他的脚，已经安上了两只假足，还算合适，可以走路，还在屋子里走了几步给我们看。他说着走着的时候，仍然是那种舒缓和平静。我那时候就隐隐感觉到，这也许是他唯一所

能呈现出来的生命姿态。傻子也知道，生存的背景是一个不许言说不许倾诉不许对话的时代。

唯一的一次见面距今也有三十年了。王鯍敏已经谢世十多年了。我看到他的几位学生从不同的侧面怀念他的文章，颇有某种关于生命意义的启示。这几位学生中有的是我后来结识的文学朋友，现在仍在自己从事的职业之余不懈地进行着创作。他们大都是灞河岸边骊山南麓的乡村青年，与生俱来一根敏感文字的神经，很自然地聚合在王鯍敏老师的膝下，接受最初的关于文学关于做人关于人生的教诲。他不仅教授给他们文学创作的知识，更身体力行出一个正直正派的知识分子的道德良知，才成为他们至今依然怀念不尽崇拜不泯的楷模。

王鯍敏从秦岭山地洛南村寨能够走进大学课堂，在五六十年代之交的时候，非得有较为超常的智商不可。他的才华给他的学生留下了神秘的印象。他的贫穷也给他的学生留下了不尽的感叹。然而，更重要的是他作为一位教师给予他们的文学智慧的开启，给予他们关于作为一个健全健康人格的人的言传和身教，才是最具影响力和震撼力的东西。这是永恒的东西。这是古往今来各个民族共同推崇的楷模教师所共有所相通的东西。

我和他的崇拜者一样怀念王鯍敏先生的时候，似乎是在心灵深处回嚼人类的那一份美好。

2003年9月9日 二府庄

活着，只相信诚实

——怀念胡采

我是在读了《从生活到艺术》之后，便记住了胡采的名字。

初学写作时，总以为作家创作是有窍门的，很神秘，我在高中念书时和同学共同组织的文学社就叫“文学写作摸门小组”，却总也摸不到那个窍门。读许多成功作家的创作经验之谈，多是教导青年作者说创作无捷径更无窍门，仍然不敢全信，怀疑他们掖着藏着。读了胡采的《从生活到艺术》，才确凿踏实相信创作是无捷径更无窍门的，作家创造活动的神秘过程，就是一个如何完成从生活升华为艺术的过程。反来又顿然醒悟，这不正是“窍门”吗？不过不是巫婆神汉弹玩于指掌间的神丹妙药和含混虚空的咒词，而是对文学创作本质规律的探索和揭示，是科学的理论建树。不仅使我这样刚刚开始习作的人得到启示而且把目光专注于此道，而且使许多颇有声名仍然苦于不能实现更大突破的作家同样得到教益，这是我那时候从这本书出版后发生的强烈反应得到的印象。后来逐渐知晓，在文学研究和评论界，集中探究作家如何完成从生活到艺术这个既富于创造个性更富于神秘色彩领域的理论，胡采是具有开创意义的卓有建树的理论家。在教条主义和极左的文艺政策危害文学创作和文学研究的那些年月，胡采在这一领域探索的勇气，发端于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的科学立场和对文学事业的赤诚。他的探索精神和探索勇气，不仅使那个时代的艺术家受到启示，更受到鼓舞，具有真正的科学品格的深层震撼。

这个名叫胡采的人，以他透彻的理论和不可猜测的形象，铸立于不断写作也不断接受退稿的我的心中。

我终于有机会坐在台下听胡采讲文学创作了。我终于有机会和这个人握手说话了。最清晰的记忆是一九八〇年春天，这个在我心中景仰膜拜的人向我走来了。那个春天对我是最明媚美好的一个春天。我刚刚发表过大约十来篇短篇小说，其中的《信任》获一九七九年全国短篇小说奖。胡采乘车来到我所在的灞桥镇的文化馆，把一篇评论我的小说的文章原稿交给我，说是要当面听听我的意见，并说明是《文艺报》约他对我的小说做一评点。我现在记不清最初阅读的印象，或者根本就集中不起心力阅读那篇文章。我现在最清楚的记忆，是我总在心里反问自己，我的那几篇习作真的进入胡采的理论视野了？我也记得他平静温和地谢绝吃饭。我的又一个总体性的记忆，一座印象里的大山还原为一位睿智温厚的长者，坐在我宿舍办公室合一的屋子里喝那种廉价的茶水。现在，尽管有许多关注我的理论家的专著，有读者的关爱，丝毫也不湮没一九八〇年春天胡采走进文化馆那个破落小院的情景。

两年后我进入胡采等老一代作家工作着的作家协会。我都记不清多少次在大会小会上听他讲创作谈文学了，也记不清多少回迎面碰见时，他总是喜欢问“农村现在怎么样农民生活怎么样”一类问题。许多年过去，又过去了许多年。本月十五日中午当我赶到医院看见躺在病床上处于昏迷状态中的胡采的时候，突然想到同样进入生命即近终结时的父亲的脸。同样的痛苦，同样的痛苦下的平静。诚实劳动者们生命终结时的高贵的平静。一个一生只会作务庄稼的农民，一个堪称卓越堪称杰出的文学理论家，在他们做人的诚实的精神层面上是融通的。

2003年9月25日凌晨 雍村

为城墙洗唾

——关中辩证之一

多年以来，在涉及关中人乃至陕西人现状特质的讨论中，零零散散却不绝于耳的一种说法，是封闭。标志封闭的象征物，不约而同指向了西安保存完好的古城墙。文雅者冠以“城墙思维”“城墙文化”等等，形象思维者更显出想象的丰富，把城墙比喻为“猪圈”，“里边生活着一群猪”。后一种说话尽管有点自我作践自我虐待的残酷，而其意思却与前一种文雅的提法英雄所见略同。后者为前者的注释。

我赞同封闭的说法。我却不敢苟同只有关中人乃至陕西人封闭的观点。大清帝国治下的中国整个是封闭。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也是铁板一块的封闭。大的历史和现实的背景，是一个国家整体的封闭，不独某一方地域。思想解放兴起二十多年来，还把造成关中人陕西人思想封闭的渊源指向一个古物城墙，是否同时也泄漏出当代人思维的浅薄乏力和随意性?

我所知道的史实，重要的有这样几个，西安是响应辛亥革命且完成“反正”最早的几个城市之一。陕西的共产党人在陕西传播共产主义几乎与全国同步。陕西农民运动开展的广泛和深入程度只次于湖南，仅蓝田一个县就有八百多个村庄建立了农民协会，缺憾在于没有人写这场大革命运动的“考察报告”。

“西安事变”怎么看都是扭转中国局势的大手笔。且不说毛泽东和党中央在延安的十三年这样人人皆知的史实了。我便简单设问：在这些标志着中国现代史的重要历史阶段，西安、关中乃至陕西人的举动

都毫无疑义地显示着最新思维最新观念和最果决的行动，城墙把哪一位先驱者封闭捂死了？怎么会把改革开放以来的封闭的渊源，突然瞅中了古城墙?

民间俗谚曰：婆娘不生娃，怪炕栏子太高。陕西经济发展滞后，肯定有至关重要的几条原因，恐怕不单是一个陕西人思想封闭所能了结。而造成思想封闭的因素也可能归结出几条，起码不会在城墙上头。用流行语说来，不是城墙惹的祸。

研究关中和陕西人的地域性特质，在现代化进程中强化其优势，减弱以至排除其劣势，是一个科学而又严肃的课题，对陕西走向繁荣和文明具有切实的意义。而图省力气的简单索象图解式的随意性，可能反而帮了倒忙，更不要说朝城墙上吐唾沫的撒气卖彩式言辞了。

2003年11月18日 二府庄

重新解读《家》，一个时代的标志

——写在巴金百岁华诞

比较清楚地记得是在一九八五年，我在报纸和刊物的阅读中，觅获到一个关于小说创作的新鲜理论，叫作“文化心理结构”。我竟然一下子被这个学说折服了。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当是新时期以来文坛最活跃最富创造活力的一个时段，各种新鲜的新潮理论和种种前所未闻的主义的试验文本一浪迭过一浪，令人目不暇接。我之所以被“文化心理结构”说折服，完全是出于对自己创作状态的把握和反省。我那阵儿正兴趣十足地写作着中篇小说，正在探试着现实主义艺术方法的新的张力的种种可能性，不可避免地苦恼着如何达到现实主义高层境界所规定的两个“典型”，即“典型环境里的典型人物”。“文化心理结构”说正好在我不无苦恼的探求过程里，提供了塑造人物的一条新的途径，即从文化的角度去研究去解析你要创造的人物的心理结构形态，进而准确地把握人物的心理秩序，达到揭示人物心理真实的艺术效果，性格的典型性才会成为可能。

我十分自然地用这个学说解读中国新文学的经典读本。从实际写作的意义上说，阿Q成为一个空前绝后的典型，恰是鲁迅洞穿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而创造成功的一种令人惊骇的典型标本。即如短篇小说《风波》里的七斤，被剪掉辫子后的惶然无着手足无措的行为，正是以辫子为表征的旧的观念和价值取向所形成的超稳定性心理结构形

态被颠覆了。鲁迅敏锐地抓住了一个民族发展史上划开两个时代的那个剪辫子的细节，堪为历史性细节。

我自然又联想到《家》。读这部小说时我刚刚从少年进入青年，尽管距小说出版的时间已经久远，尽管已经是新中国建国超过十年了，尽管高家深宅的生活气氛与我亲历的农家小院的生活相去甚远，我不仅没有感觉到隔膜，反而为高家三兄弟的情感历程折磨得揪心伤痛。《家》里的人物和故事，便成为至今仍然鲜活的记忆。不单是那种年龄里特有的记忆功能，同期阅读过的许多小说早已淡忘了。从已成定论的艺术评价上说，巴金创造出了那个时代中国人的典型环境和典型人物，高家深宅里老少两代主仆之间所经历所遭遇的故事，无疑是活在那个时代的中国人的普遍性精神历程，自然会发生普遍而又深刻的社会呼应，以至几十年后的我在阅读时依然发生心理的直接冲击和完全切近的感受。

几十年后，我突然冒出重新解读《家》的探试性兴趣。书没有再读，记忆里的人物和情节的大致轮廓，正好作为新的透视和解析的疏朗框架。我看出了兄弟三人的性格差异，在于封建文化封建观念所形成的心理结构的差异上，在于各自心理结构的稳定性的差异上，在于接受新的知识新的观念对原有的心理结构的平衡所产生的颠覆性的差异上。以同样的视角和同样的途径，我可以抵达高老爷子的心理结构形态所遭遇到的撞击所发生的颠覆。封建文化所奠定的封建道德观价值观，被五四新文化所倡扬的新道德观价值观革除取代的冲撞发生时，原有的心理结构形态面临着平衡的被打破以至被颠覆。被颠覆过程中的痛苦是必然的，我们可以用解放用革命这些词来概括，也可以用心理结构的除旧布新来形象化表述，实质上都是完成一个心理剥离的过程。这个过程，也就是一个民族完成精神和心理的复兴复壮的过

程。这样，从创作的职业角度上，我感知到巴金把握人物塑造人物的“秘笈”。当年有无“心理结构”说，并不重要，巴金早已用创作实践成功地完成了这个过程。鲁迅亦然。也许这种关于小说创造中的人物“心理结构”说，正是从巴金鲁迅等中外作家的杰出作品里归结出来的创作理论。这样，从文学的社会意义上说，《家》便成为二十世纪初处于新旧两个时代交替过程的一个标志性作品，且不论它对于那个时代的深层震撼，对那个时代的挑战和感召。从文学的视镜透视和研究中国人近百年来的精神心理历程时，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会再次掀开小说《家》来。这就是文学的不朽。

我在重新解读前辈们的这些作品时，还惊讶一个小小的发现，鲁迅先生笔下的七斤剪辫子引发的惶惑无助，和巴老笔下的高家深宅大院父父子子所遭遇的痛苦和惶惑来自同一个渊源，即同一种文化同一种价值观道德观所织成的同一种心理结构形态。文化水准、职业、生存环境的差异是外在的，而心理结构的类同，决定着那个时代所有人进入心理剥离过程时的难以避免的痛苦。至今依然对我的写作具有启示，即不必把主要兴趣完全投入到诸如工人农民或其他什么身份的职业特性上，或不同地域的生活习俗上，而是关注作为人的心理形态，这才是最具沟通各种职业各个阶层乃至各个种族心灵的东西。

巴金已经走过整整一个世纪。《家》等作品早已获得不朽。巴金也同样获得不朽。他把自己的智慧专注地投入艺术创作，以及作为一个艺术家的精神人格，肯定成为同样继续着文学创造活动的我们的楷模和警示碑。

2003年11月19日

黏面的滑稽

——关中辩证之二

一碗黏面，喜气洋洋；没有辣子，嘟嘟囔囔。

这是流传颇广的民间文学里的几句。与诸如陕西“八大怪”一样，以形象生动风趣幽默的韵词儿，描画出陕西（主要指关中）人独特奇异的生活风情，颇见民间智慧。内容基本客观写真，没有夸张失实，也没有褒贬的倾向。说者一乐，听者亦一乐；外省人说着逗乐，陕西人也自娱自乐说着，谁也不在意。

然在一些正经媒体正经场合，被人很正经地用来作为陕西人思想保守不求进取的例证，进而引申到影响经济快速发展的重要原因这样严肃重大的命题上，我不敢完全相信，不禁反问，这样的原因可靠吗?

就我所知，即使比较富庶的关中，人们能喜气洋洋吃到一碗黏面的日子，也只是农村实行责任制以后这二十年的事，之前作为公社社员的农民是把黏面作为待客的豪华饭食的，在“万恶的旧社会”就更不必说了。可见关中人并不具备满足于一碗黏面的先天性惰性。再说，黄河以北的大半个中国，人多以五谷杂粮为生，也都以一碗白面为上好食品，为什么山东人河北人北京人没有因为吃黏面（他们称捞面条或干面条）而保守起来，唯独是关中人抱着一碗面条就变得满足了、不思进取了?

总不会是关中的小麦与山东河北的麦子有质的差别吧！

似乎还隐约着一层言外之意，以面食为生的关中人，不及以大米为主食的南方人脑瓜聪明灵活，自然影响到思维，也影响到经济发展。小麦和大米在所含营养成分上谁优谁劣差异多大，其实在这个话题里失去了对比的意义。稍微具备常识的人都知道，欧洲和北美人多以面包为主食，面包是用小麦为原料而不是以大米为原料的，似乎并没有妨碍他们作为世界经济最发达地区的人的大脑结构和思维方式。影响一个地区人的群体性思维方式和观念新旧的关键性因素，可能有好多条，在我看来至关重要的一条，是眼睛看取了什么脑袋里装进了什么，而不是嘴巴吃进去什么。

既然作为一个地域经济发展这样至关重大的命题，讨论者最根本的立足点是严肃，是言之有据，是对可靠的“据”的科学论证，之后才可能找到制约经济发展的途径。某些浮皮潦草某些华而不实的说辞，不仅挠不着痒处，反而可能造成误导，贻误时机。甚而连关中人选择吃食（比如黏面）的自信心都没有了。

实践的灵魂是探索。“摸着石头过河”就是科学的探索精神。人们能理解能宽容探索过程中必不可缺的失误，却不能接受诸如以一碗黏面给关中人把定脉象的滑稽。

2003年11月24日 汉中

遥远的猜想

——关中辩证之三

在关涉陕西人地域性特质的讨论中，有一种说法叫“中心情结”。即对曾经作为历史上或大或小十三个王朝国都的政治经济中心位置，陕西人尤其是西安人至今怀有挥之不去的深层眷恋，而且形成了某种“情结”，而且因为不能失而复得便走向心理负面，产生了“失落感”。

以史实推理和心理分析来说，颇觉像那么回事。小王国小朝廷的小国都且不说了，单是作为周秦汉唐这四个在中国漫长的文明史中，赫赫然有声有色的王朝的国都的子民，其光荣其自豪乃至自大都是自然的合理的，失去了国之首都也失去了“中心位置”的眷恋和失落感也是常情之必然。然而，拿这个推论来把脉今天的陕西人和西安人，敢信吗?

创造过繁荣和鼎盛的唐王朝，是公元九〇七年瓦解终结的，距今已有一千零九十六年，几乎接近十一个世纪了。十一个世纪里的整个世界发生了怎样翻天覆地的变化，一时难以叙说；十一个世纪时空里的中国变幻了多少王朝的兴衰，也难以述说；一百年来的中国一百年来的陕西和一百年来的西安，发生了怎样惊心动魄的变化，却是清晰可见的。一千余年后的陕西人（尤其是西安人），还被一个皇都的“中心情结”苦苦纠缠，还陷入在酸溜溜的“失落”情绪里，难以了结难以“尘埃落定”，要不是陕西人西安人心理变态，那就是这个“中心情结”的绵绵之力顽固之功胜过毒瘾，以至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一代一代子

孙，都化解不开丢弃不掉戒除不净一个想当中国中心的情结……我是觉得此说未免太玄乎了。

小时候听村里人们把进西安城叫“去大堡子”。西安在乡民的眼里，不过是比他们自己生活的堡子大了一点罢了。虽然有些调侃有点轻蔑也有点自大，却也较为生动地透视出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西安的大概状况。一个凋敝到只配用较大的堡子来称谓的古城的子民，不操心养老扶幼不算计柴米油盐不设防劫匪小偷，亦不关注政权变更不闻不问频频发生的运动不在乎上岗下岗，唯独醉心于那个一千年前“中心”位置的虚幻，如果不是西安人自己活受罪，当是文化人太过遥远的猜想。

文化既可以是深邃的视镜，也是文化人可以自信可以自恃的一杖。眼见的事象，文化已变成了一只时兴的“热狗”，爱吃不爱吃都想品咂一下味道；文化可以成为唬人的巫词咒语，还能变异为包治百病包兴百业的膏药。随便贴一贴作为装潢作为广告哪怕作为幌子，其实也无大碍也无大伤。只是在面对一方地域群体性人群的心理秩序把脉时，切忌不着边际的联想，遥不相及的推理，不仅于心理秩序的实际相去甚远，也会把文化这根颇为神圣的“杖”弄得轻薄了。

2003年12月1日 二府庄

孔雀该飞何处

——关中辩证之四

“刚到西安，我就听说这儿大批人才流到沿海城市，称作‘孔雀东南飞’。请问西安为什么会形成这种现象？”

这是三天前一家南方电视台记者开口就提出的一个问题。我在正面回答之前，先提出另一个例证：“其他领域我不敢断言，贵省的文学界我稍知一二，是一个公认的文学大省，有一批出类拔萃的作家。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以来，最具影响的几位作家，有的移居北美，有的迁居北京，有的转移到广州，更有一批集中飞到海南，几乎把海南作协变成贵省作协的一个分会。这些堪为文坛上的孔雀满世界散飞，能否称为‘贵省现象’？首先要纠正的是，‘孔雀东南飞’的现象，不是西安一家，贵省亦如是。”

小记者被我提供的基本确凿的事实堵住了嘴，有点措手不及。我当即为她解围，这既不是我和她抬杠，也不是为西安护短；西安和贵省发生的“孔雀东南飞”的现象，其实是全国都在发生的普遍现象，甚至可以说是一个世界现象。

在经济发展业已形成巨大差异的东部和西部、沿海与内地，相对滞后的内地和西部的各类身怀一技之长的人，向东部和沿海经济更发达的地区流动，是一个不可逆转的普遍现象；即使在西部或内地发展滞后的一省范围内，也存在中小城市里的人才朝省会城市流动集中的趋势；在世界格局里，落后地区和欠发达国家的人才，朝西欧和北美

这些发达国家流动，已是不争的事实。怎么会是西安独有的现象呢？误传了。

这种现象，常见的解释有二：一是寻求能充分发挥自己智慧和能量的物质条件，比如先进的实验设备和较为充裕的资金。二是和谐和单纯的心理空间，不至于把智慧和创造力消磨在蝇营狗苟的龌龊之中，而能使智慧和心劲专注地投入到发现和创造中去。这当然是有能力也有抱负的人，在省内在国内甚至在世界范围里流动的关键原因。然而，还有一条隐伏的说来不大冠冕堂皇却更趋本能的原因，便是报酬多与少、收益薄与厚的较为悬殊的差别。

还是民间富于生活哲理的谚语来得明快：人总是挑白馍大馍吃。我对小记者说，干同一个项目，在鄙省和贵省只能吃上黑馍和小馍，在深圳在上海却可以吃上白馍大馍，在纽约在温哥华在巴黎更可以吃上面包和牛排，而且项目试验的设备、条件、环境、资金更完备，这种人才流动的地域现象国内现象乃至世界现象，就很难在短期内扭转。君不见，即使在中国经济最发达、个人收入最惹眼的地区，仍然有许多人才流向北美、西欧和东邻日本……

孔雀该飞何处，该栖哪条枝上，这个自主权在孔雀们自己权衡与斟酌。

2003年12月9日 二府庄

原下的日子

一

新世纪到来的第一个农历春节过后，我买了二十多袋无烟煤和吃食，回到乡村祖居的老屋。我站在门口对着送我回来的妻女挥手告别，看着汽车转过沟口那座塌檐倾壁残颓不堪的关帝庙，折回身走进大门进入刚刚清扫过隔年落叶的小院，心里竟然有点酸酸的感觉。已经摸上六十岁的人了，何苦又回到这个空寂了近十年的老窝里来。

从窗框伸出的铁皮烟筒悠悠地冒出一缕缕淡灰的煤烟，火炉正在烘除屋子里整个一个冬天积攒的寒气。我从前院穿过前屋过堂走到小院，南窗前的丁香和东西围墙根下的三株枣树苗子，枝头尚不见任何动静，倒是三五丛月季的枝梢上暴出小小的紫红的芽苞，显然是春天的讯息。然而整个小院里太过沉寂太过阴冷的气氛，还是让我很难转换出回归乡土的欢愉来。

我站在院子里，抽我的雪茄。东邻的屋院差不多成了一个荒园，兄弟两个都选了新宅基建了新房搬出许多年了。西邻曾经是这个村子有名的八家院，拥挤如同鸡笼，先后也都搬迁到村子里新辟的宅基地上安居了。我的这个屋院，曾经是父亲和两位堂弟三分天下的“三国”，最鼎盛的年月，有祖孙三代十五六口人进进出出在七八个或宽或窄的门洞里。在我尚属朦胧混沌的生命区段里，看着村人把装着奶奶和被叫作厦屋爷的黑色棺材，先后抬出这个屋院，再在街门外用粗大的抬杠捆绑起来，在儿孙们此起彼伏的哭号声浪里抬出村子，抬上原坡，沉入刚刚挖好的墓坑。我后来也沿袭这种大致相同的仪程，亲手

操办我的父亲和母亲从屋院到墓地这个最后驿站的归结过程。许多年来，无论有怎样紧要的事项，我都没有缺席由堂弟们操办的两位叔父一位婶娘最终走出屋院走出村子走进原坡某个角落里的墓坑的过程。现在，我的兄弟姊妹和堂弟堂妹及我的儿女，相继走出这个屋院，或在天之一方，或在村子的另一个角落，以各自的方式过着自己的日子。眼下的景象是，这个给我留下拥挤也留下热闹印象的祖居的小院，只有我一个人站在院子里。原坡上漫下来寒冷的风。从未有过的空旷。从未有过的空落。从未有过的空洞。

我的脚下是祖宗们反复踩踏过的土地。我现在又站在这方小小的留着许多代人脚印的小院里。我不会问自己也不会向谁解释为了什么又为了什么重新回来，因为这已经是行为之前的决计了。丰富的汉语言文字里有一个词儿叫龌龊。我在一段时日里充分地体味到这个词儿的不尽的内蕴。

我听见架在火炉上的水壶发出“噗噗噗”的响声。我沏下一杯上好的陕南绿茶。我坐在曾经坐过近二十年的那把藤条已经变灰的藤椅上，抿一口清香的茶水，瞅着火炉炉膛里炽红的炭块，耳际似乎萦绕着见过面乃至根本未见过面的老祖宗们的声音，嗨！你早该回来了。

第二天微明，我搞不清是被鸟叫声惊醒的，还是醒来后听到了一种鸟的叫声。我的第一反应是斑鸠。这肯定是鸟类庞大的族群里最单调最平实的叫声，却也是我生命磁带上最敏感的叫声。我慌忙披衣坐起，隔着窗玻璃望去，后屋屋脊上有两只灰褐色的斑鸠。在清晨凛冽的寒风里，一只斑鸠围着另一只斑鸠团团转悠，一点头，一翘尾，发出连续的“咕咕咕……咕咕咕”的叫声。哦！催发生命运动的春的旋律，在严寒依然裹盖着的斑鸠的躁动中传达出来了。

我竟然泪眼模糊。

二

傍晚时分，我走上灞河长堤。堤上是经过雨雪浸淫沤泡变成黑色的枯蒿枯草。沉落到西原坡顶的蛋黄似的太阳绵软无力。对岸成片的白杨树林，在蒙蒙灰雾里依然不失其肃然和庄重。河水清澈到令人忍不住又不忍心用手撩拨。一只雪白的鹭鸶，从下游悠悠然飘落在我眼前的浅水边。我无意间发现，斜对岸的那片沙地上，有个男子挑着两只装满石头的铁丝笼走出一个偌大的沙坑，把笼里的石头倒在石头垛子上，又挑起空笼走回那个低陷的沙坑。那儿用三角架撑着一张钢丝罗筛。他把刨下的沙石一锨一锨抛向罗筛，发出连续不断千篇一律的声响，石头和沙子就在罗筛两边分流了。

我久久地站在河堤上，看着那个男子走出沙坑又返回沙坑。这儿距离西安不足三十公里。都市里的霓虹此刻该当缤纷，各种休闲娱乐的场所开始进入兴奋期。暮霭渐渐四合的沙滩上，那个男子还在沙坑与石头垛子之间来回往返。这个男子以这样的姿态存在于世界的这个角落。

我突发联想，印成一格一框的稿纸如同那张罗筛。他在他的罗筛上筛出的是一粒一粒石子。我在我的“罗筛”上筛出的是一个一个方块汉字。现行的稿酬标准无论高了低了贵了贱了，肯定是那位农民男子的石子无法比的。我自觉尚未无聊到滥生矫情，不过是较为透彻地意识到构成社会总体坐标的这一极。这一极与另外一极的粗细强弱的差异。

这是新世纪的第一个早春。这是我回到原下祖屋的第二天傍晚。这是我的家乡那条曾为无数诗家墨客提供柳枝，却总也寄托不尽情思离愁的灞河河滩。此刻，三十公里外的西安城里的霓虹灯，与灞河两岸或大或小村庄里隐现的窗户亮光；豪华或普通轿车壅塞的街道，与田间小道上悠悠移动的架子车；出入大饭店小酒吧的俊男倩女打蜡的头发涂红（或紫）的嘴唇，与拽着牛羊缰绳背着柴火的乡村男女；全自动或半自动化的生产流水线，与那个在沙坑在罗筛前挑战贫穷的男子……构成当代社会的大坐标。我知道我不会再回到挖沙筛石这一极中去，却在这个坐标中找到了心理平衡的支点，也无法从这一极上移开眼睛。

三

村庄背靠白鹿原北坡。遍布原坡的大大小小的沟梁奇形怪状。在一条阴沟里该是最后一坨尚未化释的残雪下，有三两株露头的绿色，淡淡的绿，嫩嫩的黄，那是青蒿，长高了就是蒿草，或卑称臭蒿子。嫩黄淡绿的青蒿，不在乎那坨既残又脏经年未化的雪，宣示了春天的气象。

桃花开了，原坡上和河川里，这儿那儿浮起一片一片粉红的似乎流动的云。杏花接着开了，那儿这儿又变幻出似走似驻的粉白的云。泡桐花开了，无论大村小庄都被骤然爆出的紫红的花帐笼罩起来了。洋槐花开的时候，首先闻到的是一种令人总也忍不住深呼吸的香味，然后惊异庄前屋后和坡坎上已经敷了一层白雪似的脂粉。小麦扬花时节，原坡和河川铺天盖地的青葱葱的麦子，把来自土地最诱人的香味，释放到整个乡村的田野和村庄，灌进庄稼院的围墙和窗户。椿树的花儿在庞大的树冠和浓密的枝叶里，只能看到绣成一团一串的粉

黄，毫不起眼，几乎没有任何观赏价值，然而香味却令人久久难以忘怀。中国槐大约是乡村树族中最晚开花的一家，时令已进入伏天，燥热难耐的热浪里，闻一缕中国槐花的香气，顿然会使焦躁的心绪沉静下来。从农历二月二龙抬头迎春花开伊始，直到大雪漫地，村庄、原坡和河川里的花儿便接连开放，各种奇异的香味便一波迭过一波。且不说那些红的黄的白的紫的各色野草和野花，以及秋来整个原坡都覆盖着的金黄灿亮的野菊。

五月是最好的时月，这当然是指景致。整个河川和原坡都被麦子的深绿装扮起来，几乎看不到巴掌大一块裸露的土地。一夜之间，那令人沉迷的绿野变成满眼金黄，如同一只魔掌在翻手之瞬间创造出来神奇。一年里最红火最繁忙的麦收开始了，把从去年秋末以来的缓慢悠闲的乡村节奏骤然改变了。红苕是秋收的最后一料庄稼，通常是待头一场浓霜降至，苕叶变黑之后才开挖。湿漉漉的新鲜泥土的垄畦里，排列着一行行刚刚出土的红艳艳的红苕，常常使我的心发生悸动。被文人们称为弱柳的叶子，居然在这河川里最后卸下盛妆，居然是最耐得霜冷的树。柳叶由绿变青，由青渐变浅黄，直到几番浓霜击打，通身变成灿灿金黄，张扬在河堤上河湾里，或一片或一株，令人钦佩生命的顽强和生命的尊严。小雪从灰蒙蒙的天空飘下来时，我在乡间感觉不到严冬的来临，却体味到一缕圣洁的温柔，本能地仰起脸来，让雪片在脸颊上在鼻梁上在眼窝里飘落、融化，周围是雾霭迷茫的素净的田野。直到某一日大雪降至，原坡和河川都变成一抹银白的时候，我抑制不住某种神秘的诱惑，在黎明的浅淡光色里走出门去，在连一只兽蹄鸟爪的痕迹也难觅踪的雪野里，踏出一行脚印，听脚下的雪发出“铮铮铮”的脆响。

我常常在上述这些情景里，由衷地咏叹，我原下的乡村。

四

漫长的夏天。

夜幕迟迟降下来。我在小院里支开躺椅，一杯茶或一瓶啤酒，自然不可或缺一支烟。夜里依然有不泯的天光，也许是繁密的星星散发的。白鹿原刀裁一样的平顶的轮廓，恰如一张简洁到只有深墨和淡墨的木刻画。我索性关掉屋子里所有的电灯，感受天光和地脉的亲和，偶尔可以看到一缕鬼火飘飘忽忽掠过。

有细月或圆月的夜晚，那景象就迷人了。我坐在躺椅上，看圆圆的月亮浮到东原头上，然后渐渐升高，平静地一步一步向我面前移来，幻如一个轻摇莲步的仙女，再一步一步向原坡的西部挪步，直到消失在西边的屋脊背后。

某个晚上，瞅着月色下迷迷蒙蒙的原坡，我却替两千年前的刘邦操起闲心来。他从鸿门宴上脱身以后，是抄哪条捷径便道逃回我眼前这个原上的营垒的？“沛公军灞上”。灞上即指灞陵原。汉文帝就葬在白鹿原北坡坡畔，距我的村子不过十六七里路。文帝陵史称灞陵，分明是依着灞水而命名。这个地处长安东郊自周代就以白鹿得名的原，渐渐被“灞陵原”“灞陵”“灞上”取代了。刘邦驻军在这个原上，遥遥相对灞水北岸骊山脚下的鸿门，我的祖居的小村庄恰在当间。也许从那个千钧一发命悬一线的宴会逃跑出来，在风高月黑的那个恐怖之夜，刘邦慌不择路翻过骊山涉过灞河，从我的村头某家的猪圈旁爬上原坡直到原顶，才舒出一口气来。无论这逃跑如何狼狈，并不影响他后来打造汉家天下。

大唐诗人王昌龄，原为西安城里人，出道前隐居白鹿原上滋阳村，亦称芷阳村。下原到灞河钓鱼，提镰在菜畦里割韭菜，与来访的文朋诗友饮酒赋诗，多以此原和原下的灞水为叙事抒情的背景。我曾查阅资料企图求证滋阳村村址，毫无踪影。

我在读到一本《历代诗人咏灞桥》的诗集时，大为惊讶，除了人皆共知的“年年柳色，灞陵伤别”所指的灞桥，灞河这条水，白鹿（或灞陵）这道原，竟有数以百计的诗圣诗王诗魁都留了绝唱和独唱。

宠辱忧欢不到情，

任他朝市自营营。

独寻秋景城东去，

白鹿原头信马行。

这是白居易的一首七绝。是诸多以此原和原下的灞水为题的诗作中的一首。是最坦率的一首，也是最通俗易记的一首。一目了然可知白诗人在长安官场被蝇营狗苟的龌龊惹烦了，闹得腻了，倒胃口了，想呕吐了，却终于说不出口呕不出喉，或许是不屑于说或吐，干脆骑马到白鹿原头逛去。

还有什么龌龊能淹没脏污这个以白鹿命名的原呢？断定不会有。

我在这原下的祖屋生活了两年。自己烧水沏茶。把夫人在城里擀好切碎的面条煮熟。夏日一把躺椅冬天一抱火炉。傍晚到灞河沙滩或原坡草地去散步。一觉睡到自来醒。当然，每有一个短篇小说或一篇散文写成，那种愉悦，相信比白居易纵马原上的心境差不了多少。正

是原下这两年的日子，是近八年以来写作字数最多的年份，且不说优劣。

我愈加固执一点，在原下进入写作，便进入我生命运动的最佳气场。

2003年12月11日 二府庄

乡谚一例

——关中辩证之五

关中乡村和中国南方北方的乡村一样，流传着许多谚语俗话民谣。因为历史文化地方风情尤其是方言的差异，这些乡谚也有差异。然而更多的是内蕴上的类同，相同的意思各有各的方言表述形式。关中是一个历史文化沉淀尤为丰厚的地区，即使乡间也是文化和教育相对发达的地区，乡谚等特别丰富。

我生在乡间长在乡间工作在乡间，自打能解知人言，便接受这类民间文学的灌输，只是不太留意，也不太在乎。原因在于“崇洋迷古”，以为中国的外国的书籍上的东西才是知识，民间谚语一类是登不得大雅之堂的。近年间也不知何种因素驱使，竟想到许多谚语是很了不起的大智慧大学问，乃至大哲理。在庞杂的谚语词汇里，有讽时喻世的，有乡风民俗的，有天光地貌气象变幻的、农耕时令和农耕技巧的，几乎无所不包。我更感兴趣的是那些概括生活现象社会现象极富哲理的谚语。因为不是专指一时一事，也就不因时迁事变而销匿；在一定意义上归结出生活的某些规律，因而一代一代传遗，经久不衰。

仅举一例，也是最通俗易明的一例。“狗狂一摊屎，人狂没好事。”乡间的狗是吃屎的，常为得到一堆屎而疯狂。隐喻到人却是反意，疯狂是没有好结果的，乃至死。“屎”与“死”在关中方言里为谐音。小时候玩到癫狂状态，母亲就会掷出这句话警告。话音未落，我已经从楼梯上摔下来了，或者是疯跑到收不住身栽到深沟里去了。然仍不长记性，也不在乎这粗俗的谚语。我后来读到一句流行欧洲的谚

语，“上帝想让谁灭亡，先使其疯狂。”甚为惊喜，欧洲民间和关中民间以谚语方式归结出来的生活哲理社会事象，竟如出一辙。

希特勒为一摊“屎”，何其疯狂乃尔！结局是“畏罪自杀”在地堡里。东条英机何等狂妄何等不可一世，结局是被吊死在国际法庭的绞索上。林彪江青之流横行“文革”，疯狂到无以复加的形态，结局也够惨了。萨达姆被美国士兵从乡村地窖里拖出来时的那副模样，我一眼就看出眼神里丧失了原有的“独气”和“横气”。这两种气色几十年来充盈着萨达姆的眼睛，直到他疯狂地出兵占领科威特，成为一个转折或灭亡前的先兆。

我又怀疑欧洲谚语了。上帝原本是个善的形象，不应也不会故意驱使某个人先疯狂再灭亡的。这条谚语用在上帝头上有失敬意。倒是关中民间的谚语更科学更经得住推敲，它把人群里的疯狂分子比喻为狗，把疯狂分子的反科学反生活规律的行为，比喻为疯狗的行为，似乎更恰切更得当，也更具可视性。

2003年12月16日 二府庄

也说乡土情结

——关中辩证之六

今年夏天，我随中国作家采风团从重庆乘游轮抵达湖北秭归，再转车到武汉，饱览长江两岸雄奇秀美的山光水色，畅美舒悦；沿途全迁或半迁的几座新县城一派新貌，令人叹为观止，流连不想离去。然而，每到一市一县，各家媒体采访的诸多问题里有一个问题却是共同的，即那些移民难以割舍的乡土情结，你如何看待。有的摆出移民男女扶老携幼举家迁移登上船头泪眼回望家园的照片，有的举例说，迁到上海崇明岛已经住上三层小楼的移民，仍然难以化释怀乡之情，甚至说："我住到楼上离土地太远了。"我毫不迟疑地回答，我不敢怀疑这些图片和语言细节的真实性，但却不敢附和这种太过渲染的文人情怀。忍了忍，没有用矫情一词。

我的论据首先是我眼见的事实。沿着长江旅行的四天三夜里，两岸多为雄奇高耸的山峰和起伏无边的丘陵，在七八十度的陡坡上，散落着移民扔下的低矮残破的茅草房，一台一台窄小的如同划痕的梯田。即使毫无农村生活经验的人，恐怕也会想到在这种既破坏植被亦不适宜人类生存的险恶环境里，把这些数以百万计的山民迁移到生产生活条件更好一点的地方去，于长江生态有利，于这些固守大山的山民更是一次历史性的告别，子子孙孙都因此而改变命运了。对于照片上登船离去时回顾茅屋的一双双泪眼，我用另例来打趣，一批一批在中国生活和工作都很不错的人，移居到欧美，临别时在机场与家人分手时也难抑一眶热泪，然而并不能改变他们铁定的去意。至于已经住

上三层楼房还要抱怨“离土地太远”的崇明岛那位移民，渲染这种太过矫情的话，还有什么意思呢！

一百多万祖祖辈辈困顿在长江两岸崇山峻岭里的贫苦农民，做梦也想不到会有机会迁出大山，定居在诸如崇明岛等较为优越的环境里，应该是沾了三峡工程的光。且不说各级政府的经济补助，不看这种改变子孙命运的历史性告别的本意，却以图片、文字渲染故土难离的泪眼，我把其称为“文人情怀”。

从人的本性上来说，总是寻求能有利于自己生存和发展的空间，总是从恶劣的环境趋向相对优越的环境。落后的贫穷的自然和社会环境较差的国家的子民，争相移居发达和文明的国家，是延续许多世纪的一个世界性现象，至今依然，离愁和分手的眼泪从来也没有阻挡这种流向。在中国，常常听别人说关中人抱着一碗干面不离家，乡土情结最重了，因而保守，因而僵化，因而不图创新，甚至因而成为陕西发展滞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我说，在中国范围内，恐怕再没有哪个地域的人比上海人恋乡情结更重了。本质的原因，在近代中国，上海是现代工业文明的首站，工作环境和生活水准高于优于其他各地，上海人离开上海走到中国任何地方，都是与优越的生存环境背向而行，未必纯粹是对故土的一份热恋情结。让我做出这种判断的一个事实是，在近年移民日本和欧美的中国人中，上海人占的比例尤大。为什么上海人移居西北某地和移居日本表现出对故土差别很大的怀恋情结呢。我依此而怀疑文人情怀中渲染的那个情结的可靠性；也怀疑关于人们对故地乡土的那份普遍存在的恋情，真的会成为一个地方经济发展的制约性樊篱。

在关于陕西或西安人的话题的讨论中，常见一些浮于表面缺乏鉴证而又十分具体的结论，甚至裹上了流行的新鲜名词。使我常常感到

某种不敢踏实倚靠的滑溜，以及不关痛痒多属哗众而于事无补的空洞。想来也可释然，这种现象，其实不光发生在关于陕西人或西安人的讨论中，长江沿岸许多县市关于当地人的讨论中也有类似情况，譬如文人情怀驱使下对移民泪眼的热闹渲染，却无心关注移民们开始鼓胀的腰包和明亮的楼房里已经获得的舒悦。

2003年12月30日 雍村

言论·对话

大地的精灵

这是一部赞美生命的优美华章。

读何远波的《人与自然》摄影集，会惊异地发现人自身的美，一种纯粹出自人本身的躯体之美。同时也会发现，属于人的这种真实真切而又无与伦比的美是不可以复制的，任何天才画家的伟大画作，在生动逼真气象万千的真实的人体面前都相形见绌。这些美丽的人体置身于大自然的怀抱之中，自然会使人敏感于一个古老而依旧鲜活的话题，人本是天地共同精心孕育的精灵。

在这些不同肤色的精灵身上，可以读出天光和水色，读出山、湖、草原的韵味。山的傲岸与尊严，湖的恬静和柔情，草原的饱满和妩媚，流水的曲线和韵致，天光的明丽和晦暗，绿树青草鲜花的色彩和芬芳。

除去了妆饰的精灵回归大自然的怀抱，是一种天然的和谐。娇美的肌肤与绿草和红叶是和谐的，与粗粝的树干同样构成天然的和谐；风情万种的人体曲线与起伏的原野和变幻的海岸是和谐的，与耸立的群山错落的树林同样是和谐的；天光在精灵的肌肤上折射的色调不仅是和谐的，似乎更诱发出一种奇异的、潜存着的美。于是可以领悟，精灵本来就是天父地母的精华之笔，无论在什么环境里都会是天然的和谐。

令人赏心悦目地流连的同时，也是一种心灵的净化。在感受精灵们的如诗如乐的韵律之美的时候，似乎陶醉于风和日丽、秀川碧水的风景，得到的是心灵的陶冶，唤起对于生命的崇拜和珍爱。

读这部人体摄影集，我当即回想起八十年代中期美术界发生过的一件影响颇大的事，袁运生为北京机场创作的壁画《泼水节》中有几个裸体女子。正是这几个女子的裸体画像，引发了一场超越美术界的大争论，直到这几个被画家申辩为“干干净净的裸体”的女子被完全覆盖。覆盖就是结论。覆盖也是八十年代思想解放潮流中的一个暂时的休止符。十余年后站在今天的认识高度上，回眸这个小小的争论，我不仅有一种生活发展的慨叹，更多的是一种理性的理解，所有争论和覆盖的结论都是合理的，是八十年代中期中国人必然要发生的合乎国情的事情。在窗户逐渐开启的过程中，在看到外部世界新鲜景物的同时，不仅需要更新知识、更新理念，还有一个心理承受力的存在。

何远波的命名为《人与自然》的人体摄影集的出版，本身就是一种标志，标志着新世纪起始阶段的当代中国人的观念的更新，也标志着当代中国人心理承受力的强化，可以轻松自然地欣赏人体本身的诸种风情万般韵味了。应该看作是一个民族的健康、健全的心理情状的表现，我为此而鼓舞。

2001年3月27日 蒋村

《城市尖叫》阅读笔记

一

这是一本让人越往下读越放不下手的小说。

小说是写给读者看的（宣布写给自己看的且不论）。在通常的意义上，自然是希望人喜欢看，喜欢到放不下手，以至看了头遍还想再看一遍，这应该是小说作者共同的创作心理企盼。解决当代小说的可读性，许多人都在暗暗较着劲儿，做着各自的富于创造性的探索。可读性其实不单是读者层面宽窄的问题，更不应成为某些故意以可读性混淆雅和俗的借口。而我要讨论的话题，从来都是自尊为雅文学的可读性问题，已经无法躲在袈裟下或自诩或不屑面对读者冷漠的危机。同样在通常的意义上，作家靠深刻而又独特的生活体验、生命体验和独到的艺术体验，营造出堪为独俏一枝的艺术品，才可能吸引较为广泛的读者观赏，以至流连忘返。

《城市尖叫》兼备了这些通常意义上的品格。具体想来，作者精心构思所达到的、几乎完美的艺术效果，让我感受到小说结构的魅力。我是主张小说需要认真结构的。所以，尤其看重《城市尖叫》的这一点。

二

这部小说完美的结构，承载起了作者深刻而又独特的关于现实的体验和思考；而那一群充分展示着命运遭际的男女人物，才是支撑这座完美中不无诡秘气氛的艺术大厦的柱梁。

每一个人物，对作为读者的我都是一个谜，这个谜是猜不透的，因为亦夫笔下的这些人物总是离轨，离开通常生活经验判断之轨。

每一个人物，对作品中的另一个人物，即使是至亲至爱的人，也是一个谜。一个人物的生活形态和意志选择，对另一个人物都构成猝不及防的意外和由此产生的生命惊叹，而且是连续性的。一个人物既猜不透另一个人物的过去，也无法料知哪怕刚刚分手片刻之后的惊天异变。

这样，人物与人物之间的生活历史之谜和正在连续发生的难以料知的演变之谜，织成了一张奇幻而又诡秘的网。人物对人物的谜底破译过程，便是心灵与心灵的一次又一次沟通的完成，伴随着各种色彩的眼泪和生命的咏叹。作为读者的我，自然是随着人物之间交织着的痛苦和咏叹的交流，才得以破解一个个生命个体的心灵密码，这部小说就聚足了使我越读越放不下手的吸引力了。

三

这部小说中的几个人物，留给我一个十分显明的共同的概括：病态的正常人。

除了毛文是一个被标明了的生理上的病人，其余所有人物都在生理的意义上属于基本健康且健壮的人，然而他们的心理上，却患有各种疾病。正是在这些心理病态中，投射出运动着的生活里的污泥和浊水，传统的痼疾和新发的病毒，怎样侵袭着年轻生命的心灵，灵魂的挣扎和灵魂的扭曲，生命的抗争和生命的毁灭。我看到了被侵袭的心灵，看到了专事侵袭心灵的丑类，也看到了被侵袭者再去侵袭他人的复杂的生命体。

亦夫的不同凡响之处，在于他把这些病态心理的人，按照生活的逻辑写成正常的人。我从作者的叙述中看到的全是正在运动着的生活。这些生活图景司空见惯，有的如阵风一样一掠而过，有的则早已被视为见惯而不怪，甚至以正常的生活规则被人们所接受。亦夫正是在这里用手术刀一样的笔锋，割开了正常的生活中的病态，勾勒出了生理健康的病态的心灵，才令我的心灵引发震撼。

恕我不再一一做人物剖析。

四

这部小说中弥漫着一缕鬼气妖氛。脸上泛着绿色的开电梯的女人，似乎像站在阳界和阴界的临界线上的似人近鬼的神秘人物。这个人物最终却成仙成佛，炼出了灵气四溢的仙丹。那个给毛文做保姆的老女人，一出现就带着一股令人后脊发冷的气韵。毛燕在日本寄宿的二木的豪华庄园，自始至终都隐伏着一缕神秘恐怖的阴气，及至火灾发生，及至那个孤独的在破屋中的冲浪人葬身大海。包括铁炉庙在内的那些作品人物出入活动的场所，社会与自然界的白斑病和酸雨，都有一缕挥之不去的鬼气妖氛，伴随着人物的痛苦和欢乐。

这种鬼气妖氛，营造着某种荒诞。这种荒诞被作者描绘到逼真无猜的程度，显然不单是文字功力，而且在于亦夫内在的深层体验和把握。

我更看重的是现实的荒诞。戚家兄弟为财产惨烈而又可笑的争夺，戚思泰回乡办公司以及膨胀的企业所呈现的虚妄的繁荣和热闹，一幕幕活生生的滑稽剧，深刻地隐喻着现实生活的荒诞和荒谬。这种荒诞和荒谬的生活不是虚幻，而是仍然继续发生着进行着喧嚣着的现

实；让我感到忧愤以至捶拳的要害在于，人们对这种荒诞和荒谬的生活现实，或因为无能为力或因为司空见惯而见怪不怪直到容忍；而制造诸如此类荒诞荒谬的人却依然主宰着生活的运动，继续制造新的荒诞和荒谬。

于是，《城市尖叫》整体上就营造出来这样两组意象群，鬼气妖氛的荒诞和荒诞的现实。这两组意象变幻着交织成一张网，而人物就无法逃躲地攀爬、挣扎在这张网上。

读罢掩卷，忧愤中不禁自问，制造着荒诞生活的人，患着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疾病？与流行和蔓延的白斑病有何关联？酸雨只是腐蚀器物吗？这部小说便具有了让人可以掩卷而不能断绝忧思的蕴含。

五

亦夫的文字叙述功夫是老到的，由此而使我怀疑作者的年龄。

我在北京和亦夫见过一面，匆匆只有几句话语往来，模糊的印象中是一位颇为文气的年轻人，清晰的记忆是我的关中小乡党。在北京就读某名牌大学后就业于某国家机关。一九九三年陕西作家五本小说产生反响时，同时出版的还有在京的两位陕西旅京作家的发轫之作，即老村的《骚土》和亦夫的《土街》。我是那时候记住了亦夫的名字，没有任何根据却把亦夫错猜成了一个中年以上的人。

到了《城市尖叫》这部小说，已经是亦夫的第四部长篇小说了，也涉足于现代城市生活的揭示和描绘了，文字也老到到令我钦佩的功力了。

2001年4月

乡村，喧哗与骚动

一

《抽搐》是我近年来阅读的唯一一部描写中国乡村现实生活的小说。

整个阅读过程中，我多次不禁惊问，是这样吗？中国乡村的现在时是这样子运行着吗？当然，这是小说，永远无法去印证的事。这种惊异的自问源于两个因素：一是我较长时间离开乡村，早已失去了对乡村生活脉搏的把握，所谓底虚，引发的自然是不自信，被王焕庆所叙述的乡村里正在发生着的故事震惊了。再者，魏家庄的老一代和年轻一代男人女人所演绎的故事，与乡村经济改革之初冯幺爸在乡场上和陈奂生在城里及李顺大造屋过程中所发生的故事，真有隔世的恍惚之感了；更不必说蛤蟆滩上的梁生宝和东山坞的萧长春，与他们相比较，真不知读者会发出怎样的感慨与浩叹了。

魏家庄里的生活秩序和生活氛围，既不是我记忆中的真实的乡村生活气象，也不是我此前阅读过的那些乡村小说所留下的印象，人物更是迥然不同了，惊异以至惊骇就是不可避免的阅读感受了。自以为在乡场上站立起来的冯幺爸、得意于可以住旅馆的陈奂生、因能够造起新房子而欣慰的李顺大以及他们的第二代，在急骤的乡村生活演变的潮流里，经历着怎样的、新的，又是始料不及的难题？《抽搐》里男男女女老老少少正在演绎着的故事，可否看作是冯幺爸、陈奂生、李顺大们后来发生的心理秩序的流变？魏家庄里发生的三个家族两代

人之间近乎惨烈的分化与组合，传导着中国乡村正在发生着的喧哗与骚动。我因此而可以触摸时下乡村生活的脉搏。

二

魏家庄里的喧哗和骚动的最直接表征，是三家两代原有的生活位置的变异和紊乱，在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变化和位移中，一个起着极为突出作用的东西就是金钱。

首先是暴富的李家父子，几乎循着同一条道堕落，父亲李庆堂嫖娼狎妓，气死了老伴；儿子柱子四处拈花惹草，祸及家庭伤害贤妻絮儿，一个曾经温馨的家庭分崩离析，水寡汤淡。金钱使魏家两代、兄弟二人反目成仇，玉财在金钱的驱使下从六亲不认到杀人掠财，着实令人惊骇；倚仗弟弟在官场的特权而轻易发财的黑大杆儿，流氓无赖的本性急骤膨胀，以财掠色达到肆无忌惮、寡廉鲜耻，落得个残酷的报复；当权者魏继明以权易钱、以权掠财，似乎反倒于世不惊，虽小巫一个，却与胡长清之流的性质并无二致。

在金钱的追逐和“叼取一块肥肉”的种种伎俩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个灵魂的异变和扭曲：一时得手的得意，一朝跌翻的痛心，五花八门的心计，花样翻新的寻欢作乐……金钱成了黏合剂，把互相投机者黏合在一起，把各求其需的男女凑合到一张床上；金钱又似分离液，把父子兄弟亲情、夫妻恩爱顿然瓦解；金钱又如一尊铜镜，映照着一张张乍喜即悲的脸孔和舒而又抽、抽而又舒的扭变的心灵。

无须裁判金钱的意义。这是一个仅限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特定环境里，已被中国人热烈讨论过的、至少过时了两百年的常识性问题。读者关注的焦点不在此，作者更不在此着意。在中国农民从二十

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的致富潮流里，作家王焕庆选取这个魏家庄，展示给我们的是一幅无序的骚动与喧哗的图景，透视出进入商品经济的乡村所发生的冲击道德、良知、家族和婚姻等领域的变化，乃至更为深远的历史和文化之脉。《抽搐》里的人们所发生的故事，两代男女在追求生活理想的途程中的悲痛与欢乐，我似乎在城市生活的进程中也感受到了同样的东西。这样，《抽搐》的内蕴就不仅仅局限于乡村了，起码可以说是当代生活进程的一部流变图了。

三

在急迫的致富欲望的驱动下，魏家庄的男人和女人骚动不安，掀起巨大的喧哗声浪，构成了生活发展到二十世纪末的一幅前所未见的社会氛围。在未来的多少多少年之后，人们回望二十世纪末中国社会形态的时候，《抽搐》当是一部生动的参考书。

在实现新的生活理想的机遇到来的时候，魏家庄的男女便各择其径各显其能了。每一个男人和每一个女人的生活轨迹，都呈现着各自的心理秩序的裂变，从平衡到倾斜，从平静到紊乱。骚动就是在这种心理秩序的裂变中产生的，喧哗乃至尖叫也是这种从平衡到倾斜、从平静到紊乱的过程中发出的。人的普遍的心理秩序决定着社会秩序和社会氛围，这是常识。

决定人的心理秩序的诸种因素，诸如知识、观念、法律等，而最终的支点是道德。道德的颠覆是最后一根柱梁的倒塌。（自然，道德有文明与陈腐的不同属性，不在此议。）从《抽搐》里我看到的是观念更新造成的心理失衡，这是魏家庄的男女精神复兴的标志；也看到作为人的基本道德在对金钱的追逐过程中和获得以后的颠覆和丧失。老关的家园守望可以类比为唐·吉诃德；魏玉刚作为一个全新的道德坚

守者，预示着魏家庄的未来和希望；玉财道德梁柱的彻底毁弃，使法律的构架无以依附，达到新的心理平衡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絮儿心理秩序的紊乱是被祸及的，唯其坚守的痛苦和艰难，显示着人性美的光芒；柱子的心理秩序是一个最完整的平衡—紊乱—再平衡的过程，生活造成的紊乱又由生活本身修复到新的平衡。这是人性的更新层面上的升华和进步，更值得我作为一个读者来庆贺。其余人物，各具这种从平衡到紊乱再到新的平衡历程中的欢乐和痛苦，所谓心路历程。可以预设的是，这种心理秩序的颠覆和修复的过程，不会是一次完成的，在新的挑战和新的生活现象发生的时候，魏家庄的男女还会发生新的裂变和新的再建，人就这样更新着前进着，社会就这样组合着推进着。

《抽搐》的生动性和真实性全赖于此，把握住了各色人物的心理秩序的变异过程，就把握住了人物的心理真实，个性自然就跃然纸上了。

2001年4月20日

生命的审视和哲思

一

初知李汉荣，确应了俗话说的未见其人先闻其声，而且是令我惊炸又惊喜的如雷贯耳的宏声。

前年省作协搞诗歌评奖，全省评出十本优秀诗集，应该是陕西五十年来健在着的新老诗人的代表作。评委会又从十本诗集里评出一部最佳作品，是李汉荣的《驶往星空》。评委会把这个评选结果告诉我时，加重语气强调了评出李汉荣的《驶往星空》为本届最佳作品是一致推举。既为一致，就是评委们英雄所见略同，没有异议而一致看好。潜台词自然可以想象为目标显著，出类拔萃。我在惊喜的同时也意识到我的麻木，十本诗集中的九位新老诗人大多数我都很熟悉，个别不大熟悉的年轻诗人，名字却早已知晓。恰恰是这个最佳诗集的诗人李汉荣，既没见过面，也几乎没听到过名字。这回才知道，李汉荣早已是蜚声诗坛的岭南诗人（秦岭南边的汉中）。

我在心里感叹的同时也有所反省，多年来很少读诗，未必是对现代诗歌有什么畏怯，主要是阅读面的狭窄所致。再，李汉荣据说是很重诗道的一个年轻人，很少在文坛上游走，亦不善交际，据于秦岭南边的汉水之滨吟天咏地，大有屈子、太白的遗风。这样，我竟不知晓秦巴山系之间汉中坝子的这位青年诗人。我反而更为心地踏实，还是酒好不怕巷子深，作家靠作品和读者交流，交流的面越宽泛，佐证着作品的魅力，在读者中的影响自然越来越大，还是不愁“养在深山人未

识”的，只要坚信自身是“丽质”，终究会越过崇山峻岭走向广阔的世界。

李汉荣的诗好，散文也好。不断有钟情他的散文的人把他的佳作推荐给《散文选刊》等刊物，连发专辑。而推荐者和刊物的编辑都是陌生人，又应了俗语所说的“张飞卖板栗——人硬货扎实”的话。不靠关系，不走邪门，以自己精彩的华章美文征服读者，打开刊物的大门，是为文学正道，亦为长久计，是作家创造自己的艺术世界，成就文学事业的别无选择的途径。

二

读李汉荣的诗歌和散文，随处都可以感受强烈而饱满的生命意识。我可以想象那肥胀的绿豆羹，跃上墙头的小公鸡的第一声啼鸣。生命的感悟和生命的升华，生命深层体验中的独特的领受，毕竟成为独特而又清新鲜活的吟诵，自成卓尔不群的绝唱。

关于李白，汉荣竟然写成了一本诗集；关于母亲，汉荣也写成了一本诗集；而《与天地精神往来》的散文集，单凭书名就可以猜想作者心灵所感悟到的关于生命体验的质地了。《登高》中有这样的句子：“树木老得令人肃然起敬，想扑上去唤它几声祖父。”大约只有李汉荣才会产生如此令人战栗的生命感知，某些心底猥琐龌龊而又贪婪狂狷之徒，永远也不可能面对山水草木产生这样深沉的亲情。在《草帽》一诗中读到这样的诗句时，我心底的波澜就涌动起来了：“整个原野浓缩成这朴素的一轮／这是母亲昨夜用麦秆编的”“整个原野浓缩成这浑圆的一轮／大自然的语言单纯得/就像这一圈一圈的波纹”“整个原野浓缩成这黄金的一轮／起伏的波浪拍打着我的心胸”。一顶麦秸秆儿

编织的草帽的辫条里，注入了多少大自然和人生亲情的意蕴，大地和母亲融为一顶鲜亮的草帽了。

“唐朝暗了许多／一多半月光被李白/灌进了愁肠”“放开我，我要到山顶上去/敲敲那北斗/看看我前世的酒杯里／盛着多少愁”。读这些绝妙的诗句，不由得击节称绝，直慨叹“怎一个愁字了得”。这个愁是人生的大境界里的一种愁，是生命深层里的寂寞和孤独，只有李白和李汉荣这样的诗家才能触摸得到，绝非仕途受阻、小车档次不高、情人反目等庸常的那个愁。

三

在我有限的阅读印象里，古今中外的大文豪、小文人有多少抒写母亲、歌颂牛的精神的诗文辞章，无以计数。李汉荣作为当代诗人，在这类早被前人写过又为当代人继续写着的同题对象上，依然写出了自己的发现，无论视角，无论切入点皆成独辟且不说，关键在于能开掘出怎样的哲理来，我正是在这一点上发生了钦佩的感觉。在最常见的生活流里，一棵树一座山一条河一方高原一片草地，乃至一爿中药铺店一头牛一根拐杖，作家都追寻到富于哲理的诗魂，渗透着历史关涉着政治蕴藏着文化透视着人生，那样超拔的想象，那样卓越的联想，那样犀利的鞭辟，读来真是令人感到酣畅淋漓，又冷峻通达。文章能写到这种境界，一般故作摇头晃脑无病呻吟矫情娇气的作秀者是难望其项背的。

在《牛的写意》中，由牛的蹄印的大气、深刻和浑厚，突然调侃到帝王印章的小气、炫耀、造作、狂妄和机诈。显然已经不是我们见惯了的那些歌颂牛的精神的平庸诗文。牛在这里成了一种象征，一种关于历史和人的永恒性的假借。“如果圣人的手接近牛粪，圣人的手就

会变得圣洁；如果国王的手捧起牛粪，国王的手会变得干净。”这不是一般的生活哲理，而是圣殿与茅屋这一对历史性对立物的大命题了。被许多人深情吟诵过的、爷爷手中的那根《拐杖》，李汉荣却捣弄出一层人生形态的哲理，启迪人生活在这种形态时不要忘记可能出现的彼时，含蓄而又深远，非同于仅只浮表于爷孙亲情的那根拐杖了。

显然，这里不是通常的联想丰富与否，而是思想。当作家不易，成为有思想的作家更不易。而要达到具备开掘深层生活，造成哲思奇峰能力的作家，不可缺乏思想。

四

读李汉荣的诗和散文，我总也不能宁静，无法达到那种欣赏或者品味的闲适境地，而是被感染，被撞击，被透视，被震撼，常常发生灵魂的战栗。不是一般轻才小慧者的文字游戏，不是看似潇洒随意而其实什么也没有的闲淡寡情，而是一种逼人灵魂的审视。

在散文《手》一文中，李汉荣把对自己的良知和灵魂晾摆到一双手上来诘问、来审视。这双已经“告别了镰刀、锄头，告别了大地上的耕作和收割”而操起了“黑色水笔的手”，在主人连续的反诘之下，发出了令人惊慑的声音：“你握的那支笔写了些什么？真理？真情？真心？真爱？因感动而书写？因忏悔而书写？因发现而书写？……你写的那些文字，无关乎真理，无关乎文学，更无关乎永恒，你写的只是一些被人重复过无数次的废话，你排列的只是一具具语言的尸体。如果还要写，就写‘手的忏悔’吧。”我记不清哪年看过一篇文章，某位成了点浮名的人看着自己的手，那手上的纹路和掌形和指头的长短粗细，都宿命着一只与众不同的天才的手，对着镜子看自己的脸和头发时，惊叹这简直是一副伟人的头颅啊！这种自恋和自吹以至自我造神的荒诞

也不无好处，可以使底虚内空的人增加混世的信心。然而李汉荣在审视自己那双手时，审出了忏悔的警示。作家在认识世界揭示世界解剖世界，以求深刻地反映世界的时候，很需要思想做解剖刀；而这把解剖刀应该是双刃的，一面恰恰应该指向自己的内里；不断地审视、解剖自己的灵魂，才可能获得解剖世界解析历史解剖现实解剖别人的思想和力量，才是可靠的。鲁迅先生早已做出坦诚的表白，他在解剖别人的同时，更严厉地解剖着自己。大约以此法，鲁迅才获得了人生和文字的硬气和力度。

审视的归结无非是两点，舍弃和守护。舍弃肮脏，舍弃平庸，舍弃投机，舍弃虚妄；守护清纯，守护锐进，守护真诚，守护尊严。没有舍弃就难得守护。舍弃和守护的过程是灵魂搏击的过程。在生活出现某些复杂现象的时候，舍弃和守护的灵魂搏击就愈显得严峻，艺术家的良心、道德、人格、尊严存在着或被淤没或更强壮两种可能性。当然，首先是审视意识的苏醒。

五

李汉荣是位诗人，写起散文来也是诗的韵律和诗的情怀。无论诗或散文或随笔，都飞扬着诗人丰富的想象和联通，文字背后透现出诗人鲜活的气质和性情。

爷爷遗落的拐杖，竟然长出了一棵柳树。司空见惯的中药房里，李汉荣却呼吸到“辽阔大地经久不绝的气息，是万水千山亘古弥漫的气息……每一服药都是一片云水襟怀。中药是苦的，这是大地的苦心”。中药是扶正祛邪，进行五脏六腑血脉以至皮毛全面的清理扫除，是为祛邪；带着天地江河雨雪露珠的中药融入人体，可谓天地精华天地正气，是为扶正。作者终于在病除之后庆祝“天地正气重又回到我的身体

和心魂”，而作者隐喻给我们的社会生活何尝不如是！健全的社会乃至健康的心理，也是一个扶正祛邪的反复不断的过程。融入天地江河的精华吧，让我的血脉注入天地正气。

面对星空，作者联想到宇宙、历史和生与死：“生是节日，死也是节日；生，以鲜花欢迎；死，以鼓声相送。”我读至此，当即想到了电影《水车村》。这个大约半个小时的短片演绎的就是李汉荣的这几句诗样的生死体验。那个水车村的人敲锣打鼓奏着祥和的乐曲送逝者入土，没有孝服，没有哭泣，整个水车村的男女都身着民族传统的彩色服装送死者上路。这是黑泽明的关于生命的哲思的表述，与李汉荣竟然如此一致。显然这不是一般常说的超脱，也非那种“活着干死了算”的无所谓的简单化表白，而是关于人的生命的本来意义的哲学思考。

李汉荣用一本诗集吟诵母亲，显然不是单指他的那位可亲可敬的具体的母亲，而是维系诗人生命脐带的大地和人民。“你可以嘲笑补丁，但你不能嘲笑补丁后面那一双眼睛，那一双手。”这种情怀表述着诗人的立足点和人格。有这样的情怀，诗人才飞扬起自由浪漫的翅膀，才产生精绝的哲学思考，才显示着这位岭南汉子的风骨。这一点，在大量的写李白的诗中就更坦诚了：“安能披狼皮入狼窟与狼共舞／安能折腰摧眉侍奉小人／安能学苍蝇狂欢于垃圾堆上”“大唐江山／是我腰间一只酒壶”——作者是在写李白，同时也在写自己。

抒写自己的情怀，浇铸的是自己的人格。

2001年6月

生命跃进的足音

大约是今年四月，为天津一位作家的长篇小说写完序之后，我便硬下心来立誓，今年再不写序。没有什么原因也没有什么道理，就是不想写序了。一定要究出个不写序的因由，说白了，就是因为写得太多了。这个决心一下，半年以来，我已经谢绝了七八位要我写序的人。其中有男有女，有已成名的、有正在跃上文坛的新秀，有素不相识的、也有多年的老朋友。我谢绝或者说乞求宽恕的理由只有一条，序已写得太多了。多了就令读者讨厌了。

当友人把诗文集《你就是春天》的发排校稿送来时，我以同样的理由回答。友人说，你先看看吧，这是一个中学生的诗文集。我便嘴软了，心也软了，“一个中学生”的概念令我惊诧。在我多年以来所作过的近百篇序中，大都是已具相当影响的作家，年龄有比我轻的，多数是我的同代人老文友，我为他们的新作做一些鼓吹，更多的是叙一种友情，把这种友情用墨汁凝固下来印在他的书里，收在我的文集之中，自觉比将来作古写悼念文章要好多了。在我作序的记忆里，似乎还没有一位未成年的作家。再说，中学生，一个中学生的诗文集，一下子就使我不仅惊诧而且振奋了。

近年来，文坛上出现过几位在校大学生作家的冲击波，尤其是上海一位尚未进入大学而弃学的中学生作家。我在惊喜的同时，却没有太多的直接感觉，毕竟离我太远了。当这个西安的中学生的诗文集展现在我眼前的时候，立即产生了阅读的欲望，这是一个陌生的世界，一个未成年人组成的最庞大的世界，一个由这个世界里的小天才所传达出来的心灵的声音。我想倾听来自这个陌生世界的久违了的声音。

这个中学生作家叫孙紫微，今年十七岁。从小学三年级（不超过十岁吧？）就开始有作品发表于报纸和刊物，现在已经在包括《散文》这样名家云集的、有影响的刊物上发表散文了。这本诗文集是作者出版的第一本书，是一个尚未出窝的小鸟向这个世界发出的第一声鸣唱。

作品集从三年级的作品起始，是一个黄口小雏眼睛里所感受到的色彩，这些五彩缤纷的色彩里，有花，有猫，有溪水，有眼泪，有伙伴和伙伴们的梦。这些色彩是一个黄口小儿的眼睛感受到的，这些声音是一双灵聪敏感的耳朵捕捉到的，带着幼童特质的心灵传达给我，我直接的感觉是，这不仅是一个早慧的孩子，而且是一个对语言和文字尤其敏感的孩子，这是作为一个未来作家的独具或者说必具的天资。天才是什么？是一根特别敏感的神经，对音乐、色彩、数字、语言等尤为敏感，必然由此而产生兴趣，再有后天的不懈追求，便造就出音乐家、画家、数学家和作家来。

这本诗文集的最后一篇散文，是作者高中二年级的作品（作者现在还坐在高中三年级的课堂上）。读着读着，我就感受到了一种生命跃进的足音，口角的黄越褪越少，羽毛愈来愈丰满，翅膀也张开来了，眼睛也有透视天籁的力度了，声音响亮了，甚至时不时地有几分老辣的音色冒出来，引起我心灵的震动。是的，作者从三年级写花写水写猫写小伙伴的情态，现在已经把笔锋触及家庭和学校以外的社会生活，触及同龄人甚至成年人的人生课题，触及社会变迁中人的欢乐和痛苦的心灵秩序，对国际国内重大政治事件的观察和审视，对家庭、教育、暴力和堕落等重大社会问题的见解。我能清晰地看到一个矫健起来的脚步，能听到一个绝不愿混淆的独特的声音。意识到这样

的声音是一个仅仅十七岁的女中学生发出的时候，我甚至有点畏怯了，真是不得了哇！

前几日，正当我阅读孙紫微的诗文集《你就是春天》时，有位书商追到我居住的乡下住处，分配给我四篇今年的以“诚信”为题的作文，让我写点评语。我又一次惊讶和感动，现在的高中学生中真是不乏才情并茂者，一个规定的命题作文会写得令我意料不到的好。我甚至想着在那样紧张肃穆的考场里，我是很难写出这样好的文章的。我读孙紫微的诗文集，尤其是高中阶段的诗和散文，有些篇章的独到感受和准确凝练的哲理或语言，在我也是未必能写出来的。于是我就清醒地看到，进入新世纪的中国的中学教育的水平，单就语言能力而言，是令我惊讶的。

我由此而毫不怀疑，未来的中国文学和文坛，必是如孙紫微们的佼佼者的天下。到时候，我再拜读他们的新作。

2001年8月

互相拥挤 志在天空

——有感于叶广芩、红柯荣获鲁迅文学奖

令文学界瞩目的第二届鲁迅文学奖落槌定音，七种文学体裁的三十五部（篇）作品［每种五部（篇）］获得殊荣。消息在媒体上公开，作为文学界中人，我自然关注每种文学体裁里评出了哪位作家的哪部（篇）佳作，尤为关心的是陕西有哪位作家的哪部（篇）作品折桂。令我惊喜的是，叶广芩的中篇小说《梦也何曾到谢桥》名列五部获奖中篇小说的榜首，红柯的短篇小说《吹牛》位列五篇获奖的短篇小说之中，真是令人备感鼓舞。联想到一九九八年春首届鲁迅文学奖陕西获奖的刘成章的散文集《羊想云彩》和冷梦的长篇纪实文学《黄河大移民》，陕西就有一老二中一青的两男两女四位作家在四种文学体裁里荣获此项最高级国家文学奖（另三种文学体裁为诗歌、评论、翻译作品），确实显示了陕西作家的创作实力之一斑。我为他们的创作成就致以钦佩之意。

毋庸讳言，对待多项文学评奖，尤其是国家级的几项文学大奖的态度，有如我对足球的态度相类同。在人类远远尚未实现地球村之前，我是一个国家主义者、民族主义者，甚至是一个地方主义者，我盼望中国足球能进入世界杯决赛，并在某一日（尽管遥遥无期）夺冠，在陕西我则毫不动摇地支持国力队能在全国足球甲级联赛中取得好名次。同样，我以真诚的态度祝贺中国某位作家在未来的某一年摘取诺贝尔文学奖的桂冠，也期望陕西作家，尤其是尚未取得过国家级文学奖的作家能在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的各种奖项中崭露头角。

同样毋庸讳言，我向来不说淡泊名利的话。反之，在一定的场合和相关的文字话题中，我鼓励作家要出名，先出小名，再出大名；先在一个地区出名，再到全省出名，直到全国出名，能在世界出名则更好了；不经过这样的从小到大的过程，能一鸣惊人、誉满天下则再好不过了。一个作家的作品影响到全国，乃至在世界引起反响，我以为这声誉就不仅仅属于作家个人了，而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财富和荣誉了。比如托尔斯泰之于俄罗斯，巴尔扎克之于法国，海明威之于美国，泰戈尔之于印度，鲁迅之于中国。

如果不是妄作姿态而是诚实面对，文坛本身就是一个名利场。道理再简单不过，作家写作这种职业是最孤清、最辛苦的事，而一旦写出好的作品及至作品流行开来，却是最容易出名的事；一本好小说、一本好诗歌、一篇好散文等，可以跨越省界国界和各种民族的人沟通交流，作家自然就出名了，作家不想出名也身不由己了。记得小时候读《最后一课》和《卖火柴的小女孩》，便永远记住了都德和安徒生，也知道了法国和丹麦。都德和安徒生生前即使怎样声明自己淡泊名利，还是被无以计数的如我一样的学童永不泯灭其名字。我之所以敢在一些场合鼓励出名，就是基于这样的理解和认识。我希望有中国作家包括陕西作家能出大名，大到让世界都能闻其名而赞叹，当是我的国家我的民族我的家乡的大幸。我以为，少一分矫饰为好，以蕴积创造的雄心和勇气。

再说利，作家通过自己的创作劳动赢得酬报，改善生活和工作条件，以便更好更多地创作作品，是为正道，有什么可指责，有什么可“淡泊”的呢！前些年里，陕西作家路遥和邹志安英年早逝，整个中国文坛在为他们艰苦卓绝的创造性劳动惊叹的同时，也为他们逝世时的欠债而唏嘘叹惋，以至在《文学报》发起了捐助活动。据我所知，和

他们同代的陕西这一茬作家的经济状况大都如此。陕西作家的贫穷和他们耐得苦战（杜甫诗句："况复秦兵耐苦战"）的精神同时闻名。耐得苦战不仅是文学创作的普遍精神，亦是人类在一切科学领域里凡有大作为者普遍的心理素质和精神形态。然而，"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贫穷也不应该是作家永远的生活状态。邹志安从农村搬家到作协家属楼时，没有忘记搬来酸菜缸。要求喝着玉米糁子就着酸菜的作家"淡泊"名利，缺乏人道。

问题的实质仅仅在于，以什么途径和手段去获取名也获得利。我以为，唯一可靠、唯一能够选择的途径就是写作本身。像路遥和贾平凹那样以作品征服读者，也征服评论界，名自然有了；声望越来越高越来越大，作品一版再版，收入也多了。路遥人虽逝世几近十年，读者群却绵延不绝，一九九八年《文艺报》在首都大专院校做过读者调查，最受大学生喜爱的作品首推《平凡的世界》。路遥的作品选集和文集连续出版，印数颇大，可惜他享受不到一个作家创造劳动的欣慰，也享受不到果实（利）的甘饴了。这里套用鲁迅先生一句话，淡泊名利之说可以缓行。倒是应该警惕那些五花八门的炒作花样，那些遇到评奖便手忙脚乱的隐蔽性动作，应把心劲和智慧用到创作作品、提升作品品位的正道上来。别无选择亦别无遁途或捷径。

据我所知，叶广芩不是一蹴而就一鸣惊人，红柯亦不是一举成名一炮走红。

叶广芩大约八十年代初就发表短篇小说，曾得杜鹏程赏识。记得在八十年代中期《延河》的青年作家专号上，路遥为叶氏的一篇小说写的百余字的点评末尾一句话："这样的好货往后还能拿出多少？"我随后看到的事实是，叶广岑无声无响了，刊物上见不到作品，文学集会也见不到人影了。直到九十年代初，大约是一九九三年吧，《延

河》又做“陕西作家小说专号”，嘱我写导言，读到了叶广芩新创作的短篇小说《本是同根生》。我忍不住惊喜，问过责任编辑，大家阅读感觉一致，叶广芩已经羽化成蝶了。在我看来，从青虫到化蝶是一个量变到质变的关键性升华。《本是同根生》在编辑部成为一个话题一个兴奋点，随之被各家选刊选载，在文学界和读者中也引起广泛的好评，叶广芩开始在中国文坛立足了。最近几年，可以说是佳作迭出，短篇中篇以及由中篇连缀成的别具一格的长篇小说，在文坛形成一种持续而又稳定的影响。我已经强烈地感觉到叶氏的冲击波了，凡我到外省参加文学会议，总有人向我打听叶广芩的行踪，总有刊物和出版社编辑要我帮助他们向叶广芩约稿。在文坛，自然免不了不同的对叶氏作品的评价。然而，叶广芩只忙创作不大走动更没有炒作活动，都是大家公认的基本事实。头一届鲁迅文学奖评奖，叶广芩一部中篇仅少一票而落选，实际上已水到渠成呼之欲出。近几年来，我见到过的几位评委谈到此事，亦为叶广芩遗憾，我也遗憾。这次终于评定了，终于使大家的遗憾得以补偿。我在为《延河》写的那篇导言中说过“还是酒好不怕巷子深”的话，我现在仍然信守此理。同样可以告慰路遥的是，叶广芩的“好货”已经拿出来不少了，还有更好的“货”正在酿制中。

红柯是最具年龄优势的青年作家，不过三十出头，创作历史却不浅短，发作品也较早，只是影响尚未形成。后来出人意料地远走新疆奎屯，感受大漠和草原，一蹲就是十年，潜心艺术领悟。再返陕西宝鸡时，作品已经在当代文坛造成一方奇异的风景。当我晓知红柯时，已经是红柯的中短篇小说开始闹红《人民文学》以及《小说选刊》《小说月报》的时候，其时他已返回宝鸡。我见红柯第一面时颇为惊奇，他的头发是自来卷，眼仁呈黄色，胡楂亦粗硬，调笑说该不会连种系也在新疆被感染了混淆了。冯牧文学奖初设，只评一位青年小说

作家，便选中了红柯。朋友从北京给我打来电话报知此讯，我禁不住从家里到办公室一路上见人便报告喜讯，这确实太不容易了。

今年的鲁迅文学奖的各项奖更不容易。为了不断提升这个国家级大奖的档次和质量，中国作协听取各方意见，将七种文学体裁的奖数压缩到五部（篇），比首届几乎少了一半。单以中短篇小说为例，各省市和各行业作协每种各推荐三部（篇），就有一百七十余部（篇），而且是从近四年以来各报纸刊物上数以千万计的中短篇小说中挑选出来的，想想这五篇获奖的中篇和短篇小说要经过多少道粗筛细筛的筛选，要经过多少口味不同的评家评头论足地说道和挑剔！我因此而为叶广芩和红柯骄傲。因为确实太不容易了。因为我仍不能忘记我在他们这个年龄时的艺术追求和心理冲突的种种。

没有获奖的，未必都是成色差的。就我的记忆，近十年来陕西有几位作家的中篇和短篇曾名噪一时，至今仍被读者所乐道。随便举几篇如高建群的《遥远的白房子》、爱琴海的《神秘的玄武岩》、王观胜的《纵马天山》、冯积岐的《我的农民父亲和母亲》、贾平凹的《黑氏》、张虹的《雷瓶儿》等。这些作品一经见刊，就引起较大反响，被各家选刊选载，被各种刊物评奖评中，或被收入本年度全国最佳小说选本。其中大多数发表于全国中短篇小说评奖停顿的近十年里，可谓生不逢时，错过了完全可能的评奖机运。然而作品的魅力至今仍被读者咀嚼着。

写到这里，我想起新时期开初几年，我在西安郊区文化馆时，归西安市文联领导。市文联为促进西安地区刚刚冒出的十余个青年作者的发展，成立了一个完全是业余、完全是民间的文学社团，叫作“群木”文学社，由贾平凹任社长，我任副社长。记得由贾平凹起草的“社旨”里，有一句话至今犹未忘记：互相拥挤，志在天空。在我体味，互

相拥挤就是互相促进互相竞争，不是互相倾轧互相吐唾沫。道理再明白、再简单不过，任何企望发粗长壮的树木，其出路都在天空。中国当代文学的天空多大呀，陕西和西安当代文学的天空也够广阔的了，能容得下所有有才气、有志向的青年作家，要把眼光放开到天空去。天空是既能容纳杨树柳树吸收阳光造成自己的风景，也能容纳槐树椿树吸收阳光造成另一番完全不同的景致。二十年过去，“群木”文学社早已解体，我却记着这条“社旨”。

我从叶广芩和红柯的获奖和平素的行状里，也感知到了这个道理。

2001年9月15日 原下

诗性的质地

思强出了一本厚厚的诗集，名《彼岸挥手的孩子》。打眼一看，书名是自题的毛笔字，属于旧时以毛笔为书写工具时代的那种实用型的体例，不是当今专门用来展览或卖钱的书法一种，一目了然可见幼学的功底。

思强算得一位颇具实力的民营企业骄子。骄子弄到今日的实力，既不会一蹴而就，也不是一帆风顺，更不是玩空手道玩出来的，确实经历了挫折失败跌倒爬起，风雨兼程而终于赢得了一番天地，粗略算来也有二十年了。二十年里，中国经济改革，经济发展经历了由浅入深的纷繁的变革过程。仅民营企业而言，似乎是忽兴忽衰起落无定的一个过程。一位已把蛋糕做得很大的民营企业家对我说过一件令人震惊的细节，他回县上参加乡镇企业会议时，发现当初和他同时起步的那一批乡镇企业家几乎看不到一个熟悉的面孔了。可见二十年是一个怎样的过程，可见淘汰是一个多么无情、多么残酷的字眼儿。我由此也就联想到李思强，作为一个从乡镇起步的企业家，肯定也发生过如上述“细节”的震惊和对自身存在发展的豪壮和庆幸。淘汰有淘汰者的伤心和教训，成功有成功者的智慧和经验。这些都可能成为人生的财富，值得写书作传，不仅自赏自慰，当可留作二十世纪后二十年中国经济改革的一份资料。

我更感动的是李思强递到我手上的这本诗集。

我不懂商事商道。我却有幸经历了二十余年来改革的全过程。即使以一个旁观者或观潮者的身份。耳闻目染那潮水的起伏和涨退，常

常也是引起心潮起伏的。一个得改革时运、最早脱离习惯性依赖的生活轨道的人，几乎是白手起家，弄到今天这种大报小报专刊记者追逐采访的阵势，尽可以想象其这一面和那一面的辉煌和艰难了。想到尚处于初级阶段的中国社会，再想到几乎处于原始交换形态的市场经济环境，再想到愈来愈令人感慨的俗化温床所滋生的种种龌龊，而终于能站住脚跟成就一番事业，其中的错综复杂艰难打拼的过程，常人如我者尽可以去想象其不易。唯其不解者，在这样的过程中，怎么还会悠然地写诗？诗情和诗性是怎样守护到今天而未泯灭？

我便想到二十余年前。我在灞桥镇上的区文化馆时认识了青年作者李思强。他写诗，也写些生活随感式的散文。我把他的作品推荐到报刊，遗憾的是没有发表，那时候的编辑是不瞅熟人也不照顾面子的。尽管这样，思强还是坚持着写诗、写散文。我在与他的交流中得知，中学时他就开始写诗作文（非课堂作文）了，屡屡得到语文老师的褒奖和器重，文学梦大约就是那时候开始做上了。这是极普通也极普遍的现象，作家无论后来的成就或大或小，而最初的文学梦差不多都是这样发生的。

李思强的文学梦很快就做不成了。“文革”发生了。思强家庭成分属于被打击的对象，不说写诗作文梦想当作家，单是作为一个挣工分的普通社员都成了问题。一个生性不甘屈就的诗人质地的灵魂，便更多了某种心理压抑和痛苦。他选择了写字，在自家窑洞里练习写字。不是为了成为书法家，那时候尚看不到书法可以发财的前景。只是一种安抚骚动的诗性灵魂的唯一可选择的手段。写字的时候就忘记了“黑五类”的屈辱，就可以在窑洞里安静地度过一个又一个漫长的冬夜。现在，人们很惊诧他的毛笔字，一个乡村出身的农民企业家，怎么能写出教授也难以为之的毛笔字。“文革”发展到最激烈的中期阶段，贫穷

的乡村的阶级斗争反而折腾得更厉害，并未因为贫穷以至饥饿而减弱其火候。思强感到生存的危机了，预感到在窑洞里写字可能意味着坐以待毙的危险，便搁置了毛笔，投师练拳去了。白天按时出工劳动，夜晚便偷偷溜出窑洞到远离家屋的拳师那里去练习拳脚。他说他那时候专心痴志练拳，仅仅只是为了保护自己，所以他的功夫和套路属于实用一类。“文革”十年，李思强修炼到“文武双全”了。而多少并无社会压力之虞的青年人却轻易荒废了。生活往往就是这样流过千秋的。

我常想，一个困死在窑洞里自练毛笔字的人，一个为了防身以求得生存而苦练拳脚的人，而今是被各路记者追逐采访报道成绩的人，一个尽可以享受生活的富有和生活的自由的人，留在心里的反差，既是个人的体验，也是社会进步的一份活档案。思强显然没有沉浸在事业有成的得意扬扬之中，没有沉醉在我们惯常所见的那种老板姿态里，而是把个人的体验凝结成一首首诗。他显然已不是二十多年前做文学梦时的心态了，写诗的动机就演变为一种纯粹。纯粹的抒写。关于人生，关于社会，关于理想，关于爱情，关于土地和拽犁的牛，关于儿时爬过而今仍然走着的那道坡。尤其是关于大海，一个在黄土崖下的窑洞里滋生成长的北方人，却写下那么多寄情大海的诗章，可以透见心灵之一缕吧。这种完全摆脱了功利目的纯粹的抒写，可以信赖为心声，没有娇气和矫情，没有虚浮和装腔，是一个人生活的和生命的体验的展示。

也许是诗人质地，也许是抒写过程中对自己和社会和人生的体悟和审视，思强潜存着一种清醒。一种把蛋糕做大了的人很难保持的清醒。这种难得的清醒，常常表现在一种演说、一种玩笑、一种调侃之中，偶尔也露出一种愤世嫉俗的严词厉声。所有这些极具个性化的表现，都透出一种经历过世事、经历过搏击的睿智与清醒。

我依然有点迷惑莫解，当一场复杂的商机谈判完了，当一项重大的工程实施中出现麻烦，当一种计谋造成的迷雾尚未显现前景的时候，思强却能坐下来吟诵韵律推敲诗句，我是确实感动而又钦佩的。

2001年12月9日 原下

把智慧投入到写作中

——与《三秦都市报》记者杜晓英的对话

记者：陈先生，首先向您表示真诚祝贺。您当选为中国作协副主席，这对陕西乃至西部文学来说，都是一种非常盛大的荣耀，请问您如何看待这一事件？

陈忠实：这应当是国家以及中国作协对西部的重视，对西部文学的巨大关怀。这个荣耀落在我的头上，对我也是莫大的鞭策。我由此首次想到的是作家的智慧这个老话题。作家的职业本能是写作，作家的全部智慧都应用于写作，而不是其他。人的智慧的发展是一个不断开发的过程，作家如果对自己负责的话，就应该把自己的文学智慧不断开发到最大的效益——就是力争写出最好的作品来。这是作家生命价值的全部意义所在。至于社会荣誉，这些都是因写作而带来的，写作的目的本不是为了追求这些，而是为了展示作家自己对社会生活的感悟。要写出好的作品，就要把自己的文学智慧充分利用。这里对我警示最大的一点就是，不能把自己的智慧挪作他用，不能浪费。花费在不值得花费的事情上，获得的某些空泛的名誉，对作家来说没有任何实质意义。

记者：西部向来是中国文学的重镇，西部文学在中国文学的大格局中始终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作为中国作协副主席、陕西作协主席，请您就西部文学发展的历程及走向谈谈自己的看法。

陈忠实：解放至今五十年，西部作家的创作在新文学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就西北五省而言，解放以来出现过在全国都非常有影响

的作家，新疆的少数民族作家和可以说领一代风骚的诗人闻捷，陕西的柳青、杜鹏程、王汶石……甘肃也出过非常有实力的作家和剧作家。新时期以来，西部作家的作品也在当代作家中占重要位置，宁夏的张贤亮及陕西的路遥、贾平凹等一大批作家，甘肃和新疆也出现过一大批优秀的作家。尤其在近年间，西北又崛起一批青年作家，这更给人以希望，像宁夏的“三棵树”，刚刚荣获鲁迅文学奖，是继张贤亮之后极具实力的一个小说创作群体。西部是一个宽泛的概念，这些作家各有其艺术特色，不能一概而论，一个人就是一片风景。就陕西而言，路遥和贾平凹都自成一道优美的风景，他们的艺术形态差异又很大。张贤亮是一片宁夏的具有固定影响的瑰丽风景……正是这些不同个性的作家，组成了西部文学这个壮观的森林。这森林里面既有青松，也有白桦。西部文学的构成是一片非常丰茂的、各展风采、多姿多彩的森林。文学发展本来也应该是这个样子，以个性而生存。

现在国家大力开发西部，西部人也劲头十足地开发自己的资源。在这个大背景之下，对西部作家而言，认识西部、理解西部，继而反映西部，这些都会对西部文学起促进作用。尤其令人感奋的是现在有一批三十岁至四十岁的青年作家已崭露头角，陕西、宁夏、青海都出来了一批，他们完全以自己的新的文学形态展示到了中国当代文坛上。

记者：在著名作家和陕西作协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之间，您更喜欢哪个角色？今后，行政性事务是否会分割您大量的时间和空间？

陈忠实：人的生命精力是有限的，这是一个客观存在。作为我，承担了这个角色，就会努力尽到这个角色的责任，就得对陕西文学乃至中国文学的发展，尤其是青年作家的成长负一定的责任。我多年以来做了一些工作，今后还会做这个工作。当下这个体制下的文学事业

需要有人做这样的工作。现在把我推到这个位置上，我就不能推卸这个责任，我会尽我的能力做好，尽量能够建设一个健康、活泼，有利于作家发展，尤其是青年作家成长的比较好的文坛气氛，这也是我工作的意义。

我也得加紧自己的写作，不光是作品的数量，就我对文学的一生追求而言，也不应该浪费时间。因此，我要努力排除一些纯粹的属于社会应酬性的事务，即那种既没有工作意义，也没有写作意义的事务。在这个比较世俗化的社会里，这种事务比较多，这我已经意识到了，我会尽力把这种事务排除掉，多节约一些时间，投入读书写作，让生命更富有意义。

记者：《白鹿原》以其深厚凝重的史诗风格奠定了它在新时期文学领域的巅峰地位，这部作品在读者及文学界中的影响已远远超越了单纯的文学意义。在《白鹿原》创作完成并出版已届八年的今天，请您以切身的回望，给读者谈谈您对这部作品的看法。

陈忠实：我对我作品的看法至今没有改变。我早先曾说过，作家自己最清楚自己写下了一部怎样的书，自己做过什么样的追求，完稿后形成什么样的形态。八年后的今天，我还跟写完这部书的感觉是完全一样的。我在写这部书时，把我对历史生活、对文学的感受等全部体验都努力做了一番表达。但是有一点是我估计不足的，就是这部作品后来产生的影响。八年已过去，关于这部书的议论和在读者中的反响，我走到任何地方都能感受到。我当时确实没想到它能产生这样大的影响，能够如此普及，拥有如此广泛的读者群。迄今为止，《白鹿原》仅正版就发行了逾百万册，现在每年都印几万册，是稳定的长销书。

记者：世纪之交，文学已经在社会、经济等多元力量的浸淫之下发生了一些变化。一些大牌文学期刊《人民文学》《作家》《收获》《当代》也都在文本企划、视觉包装、关注指向等方面进行了调整。作为老牌文学月刊《延河》的主编，您对文学期刊在新文化格局下的种种变革如何看待？《延河》今后会有哪些新的办刊方略？

陈忠实：全国的文学期刊，包括国家级文学刊物和省级文学刊物，都在做着适应市场的调整，最重要的改变就是包装，有的甚至改名。像《天津文学》改名为《青春阅读》，《湖南文学》改名为《母语》。《天津文学》原来发行千把册，改名后增至四千册，《湖南文学》改名的效果却是每况愈下。还有些期刊把原来的版本换为超豪华版本，包装设计、版式设计都更精致、更新颖，这些都是促进刊物发行的措施。但是，尽管这些刊物作了很大的努力，仍然没有明显的订数的上升。读者掏钱买这个刊物，最终目的是要看好作品。精美的版式设计固然很舒服，但它毕竟是从属地位。其要害支点应在于内容。我认为办刊物最重要的在于抓到好作品，这也是我对《延河》的思路。所有的文学刊物都在刊登作家作品，但能被大多数读者一致看好的作品好像不是很多。所以全国文学期刊都处在一种差不多的困境中，没有哪家一枝独秀。要促进刊物走出困境，加大发行发展，出现柳暗花明又一村的转机，文学界还需要努力。这两年《延河》做了很多调整，但总体来讲没有很快地扩大发行量。在这样的情况下，坚守一种文学精神，保存一块文学园地，也是难能可贵的。

记者：不少作家和读者认为，一部经典文学作品就可以成就一个作家一生的生命价值，您是否也这样认为？近年来，您在潜心读书的同时，仍进行着自己的创作，今后，您在创作上有哪些新的设想？

陈忠实：我不敢说《白鹿原》就是经典，它也需要经过历史、生活包括阅读历史的检验。只能说截至现在，读者比较喜欢——这我当然也充分感受到了。我也从来没想过写这一部书就满足了，我还是要尽我的能力去写作品；我也从来不以为我写的这一本书是一个高坎，我自己再也跷不过去。我这两年更多地写了一些散文，也写了一些短篇小说。多与少的问题已不重要，重要的在于形成体验后就把它写好。如果写滥、写没有多少内容的泛泛之作，这也是我所认为的对作家生命的浪费。

2002年1月

惹眼的《秦之声》

我确实喜欢秦腔，却不入迷，自酌远远不到戏迷的程度，更不及对足球的痴迷。然而却真实地喜欢着，且一如既往。如以时间论，秦腔是我平生看过的所有剧种中的第一个剧种；如以选择论，几十年过去，新老剧种或多或少都见识过一些，最后归结性的选择还是秦腔，或者说秦腔在我的关于戏剧欣赏的选择里，是不可动摇的。然而只是喜欢，尚不到入迷的程度。

喜欢着秦腔，也就关注着秦腔；关注着秦腔的最明显的标志，自然属于陕西电视台既誉满三秦亦花香墙外的《秦之声》了。

就我粗疏的印象而言，新时期以来陕西电视台的无以计数的专栏里，《秦之声》是出台最早也最为惹眼的专栏之一，可谓经久不衰，不厌不腻，而且是历久而愈显风光，愈被观众乐道的一个专栏。毫不夸张地说，业已成为许多观众，尤其是乡村观众精神生活里不可或缺的一道风景。同样毫不夸张地说，当是陕西电视台名目繁多的专栏中的一块“名牌”。

十多年来，随着改革的发展和经济的繁荣，文化娱乐的途径和手段日渐丰富，说是令人眼花缭乱也不过分。在诸多的娱乐方式中，对城乡群众起主导作用的是电视的逐年普及。可以说，电视已成为几乎所有家庭最基本的文化设施，对家庭和个人的直接影响是全方位的。它的好处无须赘论，它的威胁大约从它在我们的生活中开始出现就带来了，随着电视机从城市到乡村的逐渐普及，这种威胁日渐强劲，最终把包括国剧在内的所有传统剧种都从舞台上撵跑了，连电影院的电

影放映业也频告生存危机。于是，全国人民都在自发呼吁抢救国剧，各个地域的人民也都不约而同地发出抢救地方剧种的呼声，喜欢秦腔的陕人早就为秦腔的生存和发展大声疾呼了。民间呼声一高，政府也很敏锐，便有“振兴秦腔”的专门政府机构设立，为秦人不可断饮的文化清流献计设策，其精神和干劲都是很令我钦敬的。然时至今日，专演秦腔的数家剧院几乎终年冷清，据说许多享誉三秦、有口皆碑的名角也到秦腔茶社里表演去了（秦腔茶社作为一种新的演出形式，可待观察）。在这样的情势下，《秦之声》现象不仅值得珍贵和珍视，其经验更值得研究探讨。

在我看来，《秦之声》的创意者和实践者的过人之处或超前之处，在于较早地把住了娱乐文化发展的脉搏，就把威胁剧院和影院的电视这个“恶物”自身的巨大优点抓住了。《秦之声》的创立和播出，把跑剧院的秦腔迷和在乡村戏楼下的“社戏”迷们安顿得舒舒服服熨熨帖帖，坐着沙发或火炕，品着香茶嚼着水果抽着烟卷，看那些包括逝去的秦腔老名牌新名牌以及崭露头角的新秀们的风采；更难得的是，那些活跃在机关、课堂、车间、菜园和田畴上的干部、教员、工人、农民以及肩章闪耀的军官，都借“机”走向观众。想想看，即使十家专业演出秦腔的剧场场场爆满，即使逢年过节才演一回的乡村戏楼前人山人海，也无法与《秦之声》播放时的观众数目相比较。于是我便妄自断言——

——《秦之声》以超前的现代眼光抓住了现代文明发展的潮头和走向，不失时机地找到了发展传统文化——秦腔的最好契机和最佳方式。

——《秦之声》多年来的实绩，消除了包括我在内的秦腔爱好者的隐忧，表面上冷落的剧场并不表明秦腔这个剧种的过时或濒临厄

运，而仅仅只是观赏方式的转变。在剧场看戏要跑路、要购票，而且不能抽烟有诸多的不自在，在电视机前坐在家里就优越多了，坐下看躺下看喝着茶看抽着烟看，这种小自由任随性情。因此我就可以断言，《秦之声》对秦腔的普及和传播，可能比任何时候都更深远。换一句话说，秦腔这个独具魅力的、传统的、无可替代的剧种，终于找到了一个发展自己解决生存的最佳渠道。

《秦之声》既誉满三秦又花香墙外就说明了一切。它的主创者的功劳当蕴含在秦腔观众的记忆里，当记在陕西地域文化发展的功臣碑上。

近日看了新版《秦之声》，耳目又是一新。新的栏目令人目不暇接，别开生面，从原来较为一律的以演唱为主的场面，进步为比较活泼多样的特色板块。戏曲小品的切入，融会了传统的正角反演为丑角的“耍戏”类的优点，又是反映现实生活与时俱进的“戏曲小品”，平添了轻松活泼的气氛，也感受到现实生活的新鲜气息。《戏迷说戏》板块颇见创建者的足智多谋和良苦用心。对于一般戏迷来说，大多是关注剧情，品赏唱腔为主，而一些程式化规范化的曲牌名称，有专指意义的表演动作，以及角色名称，乐器名称和用途，对观众，尤其是青年观众起到普及戏曲知识的良好作用，既可提升观众的欣赏品位，也可以培养新戏迷的兴趣，这无疑是为秦腔流传和发展培育土壤。《经典欣赏》当然属重量级板块。说到底，观众守候《秦之声》，还是想听想看一些经典剧目的片段，这是百饮不厌的美酒，是戏迷们过戏瘾的关键一盅。这一栏目的设置，可谓把准了戏迷的戏脉。《戏迷大叫板》的设置，为那些难得登台机缘的业余唱家提供了一个显示的良机，更活泼更有竞争比拼的悬念了。

这是我看到新创版《秦之声》的第一印象，总体上是欣然而又鼓舞的。有些板块中的剧目的选择，当更富品位，宁缺毋滥，万不能迁就。板块之间转换的环节还需更缜密、更细腻，包括主持人的语言衔接、语言智慧的提升。包括我这样的观众，说到底有如食客，总是希望看得眼热耳顺心里滋润，要求也是期盼。

我最为感佩的是，《秦之声》的操作者们没有为声誉和功劳所沉迷，依然清醒地继续着振兴秦腔的事业，用心良苦地重构这块文化名牌，使其更趋向观众的新的审美需求，同时也提升戏迷的欣赏品位。在新的一年到来时，我在对他们富于创造性的工作和献身秦腔艺术的精神表示敬重的同时，也向他们道一声新年的祝福。

2002年1月13日 原下

文学对科学的解读

这套由中国地质学会与沈阳出版社共同策划的《人与地球》丛书，是科学家与作家联手打造的大型科普创作工程，出于一个独特而优美的创意，由科学家提供资料，贡献自己的研究成果，作家来撰写完成。

在我的印象里，很少有谁进行过这样的尝试，即以文学的目光去注视科学，以细腻多情的文学之心去熔炼科学。这无疑是一个大的命题，是异常艰苦、耗费心智的大项目，在面对海洋、森林、山脉、沙漠、河流等雄阔的与人类生存息息相关的自然界，需要作家用笔去解读，用心灵去感悟，并在一系列刻板严肃莫测高深的科学概念和数据中注入飘逸瑰丽的想象。

当我在白鹿原下的祖屋里品读这几部书稿时，意外地获得一种清新爽朗的感觉，情不自禁地沉浸于地球那浩瀚神奇的历史之中，同作家一起如醉如痴地领略那份深远曲折，那份沧桑悲壮……那些专业书中永远属于科学家和学者的“海洋学”“冰川学”“生态学”“地质学”以及“板块构造”“大陆漂移”等，距我们不再陌生遥远，成为一个个令人着迷的神奇故事。

对这颗我们自降生之日起就与之依偎着的星球，我们又了解多少呢？我们知道原始地球上曾经充斥着火山、陨石雨、电辐射，看上去毫无希望吗？大地是怎样经过长达五亿年艰难的自我演化和苦苦等待，最终与第一片雨水相拥？第一个生命分子又是怎样在海水与电光中出世，由此开始构筑漫长的行星生态圈的浩大工程？植物是怎么覆

盖大地，生物是怎么被迫登陆？我们所形容的永恒的大海和不老的山脉有一天竟也会死亡，而喜马拉雅为什么会从古老的洋壳上雄浑地站立起来？我们是否真切地意识到水土和植物构成的森林组成了支撑着地球生物生存的世界？当我们与一株树对峙的时候，是否想到植物也是生命之网的一部分？我们是不是早已忘记流过身旁的河流是冰雪山脉赠予的珍贵礼物？我们是否想到滚滚的沙漠曾是养育生命的最丰沃的水草地?

我们也许忘记了，也许从不知道，也许压根不曾想过。现在，我们跟随几位作家绚丽奇异的笔触，去做穿越时空隧道的旅行，至少是我，被地球恢宏的创世交响和惊心动魄的演化史深深震撼了。相形之下，人类的历史，人类不断制造的战争、掠夺、倾轧、吞并、阴谋和背叛在壮阔的自然面前是多么微不足道。我不禁对这颗生养我们生命的蓝色星球充满深切的敬仰之情。

这套丛书中《凝看海洋》（庞天舒）、《触摸山脉》（庞天舒）、《解读森林》（曹岩）的二位作者均为军中专业女作家。她们远离热闹的传媒，默默构筑自己的文学圣殿，任何浮躁之风都没能扰乱她们宁静平和的创作心态。此次，她们悄然沉入到辽远的地史中。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二人均是少年从军，没有按部就班地接受过正规的数理化教育，但是，她们就敢去触摸深奥的地球科学，并将某些课题解读得如此完美得当，获得众多地球科学家的由衷赞赏，优美的行文绝对是一种阅读享受。这是一个奇迹，奇迹的背后是灵性、才气、大量的阅读求证以及种种我们难以想象的艰苦卓绝的努力，这是只有军人才敢于接受的挑战，才能完成的冲刺。她们是作家和军人，最重要的身份是军人，只有军人才常常在不可能中创造可能。同时，我也为她们开拓了一方创作的新天地而表示由衷的祝贺。中国地质学

会秘书长王弭力教授选择这二位女作家来完成关于海洋、山脉、森林的创作，独具慧眼。王教授作为一名女性，或许她更信任女作家，或许她认为唯有女性才能更细腻更深情地凝看地球的河山，也唯有女性才能以更独特的生命体验去解读这一片片广阔的母性生息地。因为女性生命本身，就与充满创造活力的海洋与升腾的山脉与丰饶的森林与绵长的河流息息相通。

值得一提的是，我们荣幸地请来景爱先生撰写《走进沙漠》。他本是一位考古学家，近年来，又致力于沙漠的研究，已有多部专著问世，成为我国沙漠考古界卓有建树的知名专家。他以学者冷静的头脑、敏锐的思维和生动的文笔，为我们揭开了沙漠的秘密。

我们常常陷入习惯性的误区：文学与科学是彼此毫无关联的两个领域。其实，它们有很多共同点，最主要的一点是从事这两个学科的人，都需具备非凡的想象力，牛顿曾经想象大地深处存在着一种巨大而无形的力，它牵引着扔到半空的苹果落回地面，爱迪生曾经想象把电放入小小的玻璃泡里去照亮黑夜，魏格纳曾经想象我们居住的大陆可以漂移碰撞……于是，生存于这个世界上的我们方才知道了万有引力，享有了电灯，懂得了大陆漂移。想象更是作家进行艺术创造的翅膀，独立的思想和独特的体验正是依赖想象之翅飞翔起来。这套丛书的几位作家，以非凡的想象力征服了这个艰涩枯燥的选题，令人惊讶，乃至禁不住击掌拍案叫绝。

2002年2月

烛照人类心灵不灭的神光

——阅读《落红》致方英文

英文:

您好。

见到刚刚出版的《落红》，竟有一种激动油然而生。我的生活中最舒心的时刻，首先当然是写成一篇作品之后，尤其是自己感到比较恰当地表述出一点独特体验的文章。哪怕仅仅只是三两千字的散文，那种舒心和愉悦是无以言状的，那一刻就觉得比屎还肮脏的龌龊都可以一笑置之了。我屡屡发现，我其实仅仅生活在文字表现的最佳生命气场之中。当然，还有令人愉悦的事，就是读到一本好书或一篇好文章，尤其是较为熟悉的朋友的作品，常常按捺不住，见人就想传递，毫不隐讳。您当记得，一年前我读完《落红》（时定名《冬离骚》）的复印稿时，就呈现出这种抑制不住的兴奋，您我曾有一次忘情的深夜长谈，我把我阅读的全部真实感觉都倾倒出来，传达作为一个读者的读后感觉，自然包括可再斟酌的修改意见。

《落红》终于成书面世，我忍不住又看了一遍，在于重温初读复印稿时的兴奋点，包括奇妙诡谲而又包容了太多的当代人生体验，唐子羽的生存环境生存形态，他对生活和时世的陷入和感知，他进入当代社会生活各种角落时所经历的心灵的颠覆过程，道德的反复自审乃至自虐，对稍微有同样经历和经验的现实读者，都会有一种逼近鼻息、叩击胸脯的真实的冲击。我仅举一例，唐子羽在官场失落时有一次嫖妓行为，这种行为的结局所传达的震击社会震击人心的宏声是难

以轻易淡忘的。唐子羽看似自娱实为自虐自侮的这个行为的结局，却是心灵的自审和自我救赎。我正是在这里看到了一个人的灵魂在呈现着混沌状态的当代生活中的痛苦和跋涉。我所见的此类场景的描写，多属商业目的的诱钓读者胃口的诱饵，多属卖脏，且不论它。您同样让唐子羽经历这种场合，却意在让唐经受一番精神和心灵的洗礼，使人类最基准的那一点道义和良知灼然闪亮，当是人类不死的神光。紧接这个惊心动魄的情节之后，是音乐老师那一袭美丽的红纱巾。我在初读原作至此时而掩卷神伤，我昨日再读时依然发生情感深处的颤动，那是怎样美丽的一条红纱巾！唐子羽少年时代心灵中的这条红纱巾，无论出身城市或乡村的任何一个少年大约都在心灵里藏着一条，进入社会后，谁也不可避免对这条红纱巾的纯洁的守护和渍染的艰难的两难选择。唐子羽的精神世界的几次波澜，工作的官场的生活的家庭的过程，最后推向的彼岸，尽管没有常见的所谓大事，却揪得人的阅读情绪难以罢手。我以为您的了不起之点，就在于通过生活真实的描绘（这是比较容易做到的），把握住了唐子羽心灵和精神流变的真实历程，这是不易做到的不完全属于艺术范畴的话题，而更多地显示着作家关于人生体验的层次，勉强不得，做作不得，非得真的得到了那种人生独立而又独特的体验才能达到，作品品位的高下依此也就分明了。唐子羽作为一个映现着深刻复杂的多棱镜式的人物形象，以其陌生新鲜的面孔立于当代文学画廊人物之列，您是完全应该自信的。

再说一些，关于《落红》的语言。您这部小说的语言，该是读者最为惹眼的也最直观的一点。关于这种语言的特质和功能，我不再做判断，留给评论家挑肥拣瘦更合适。我的直感是，方英文式的别致的语言。这种语言已不陌生，在您的诸多散文随笔的阅读中早见识过了，更多的是听您平时说话的口语表述，内质和方式都是一致的，所以我说是“方英文式的语言”。我的阅读感觉是好的，常能感到“别一种

说法”，正话反说和反话正说，达到的效果都是出奇制胜的。尤其是一些作者感受最深而文字又逢神来之笔的章节，真是令我折服和钦佩。也不讳言，有些时候的语言中所牵涉的事，给我以不大相干而拉扯到一起的勉强，记得读初稿时我当面谈过，现在似乎还存留着某些类似的东西，诸如把一些与此情此境下几乎不相干的政治术语连接在一起，效果反而不怎么好。当然，语言在谁也很难说已经完美，杜甫终生都在追寻惊人的语言效果。相信您也是属于不达此境死不休的角色。

信写至此，已经很长。昨天读书，今天给您写信表白再读的感觉，仅谈了两点，已经深感这个礼拜天过得太愉快了。

祝愉快！

陈忠实

2002年3月10日 原下

成熟与智慧

朱鸿的散文，在我看来，可以说是长驱直入，坚韧不拔，一直追求着一个既定的艺术目标。以《夹缝中的历史》为标志的他的最新的散文创作，达到了一个思想的和艺术的新的高度。

我跟朱鸿认识得很早，但来往并不频繁，见了面有事说事，无事也打个电话问个好，属于很清淡的一种朋友的关系。对朱鸿的散文，还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在作家协会后院晓雷的办公室，听到晓雷和几个朋友议论朱鸿的散文，说朱鸿的散文很不错，很独特。那个时候，我对散文注意得不多，碰上就看，听到了这些对朱鸿散文的评价，引起我的注意，我就找到朱鸿的散文来读，读后是一种非常惊喜的感觉。那个感觉，不说不同凡响，至少是他的散文的表述很有个性，这种个性，在我认为，是一个作家创作开端时最好的艺术形态，好的作家一定要有自己的个性。从那时到今天，十年过去了，朱鸿进入了一个壮年时期，这个壮年，不仅是年龄的，也是创作上的，他的作品的思想和艺术也进入了壮年，而且，这个壮年在我感觉还有一种威武雄壮之势。他的散文的影响，远远超越了陕西，在全国也引起了较大的反响，在全国一些报纸和刊物上，几乎经常可以看到朱鸿的散文，从一些重要的选本也常能见到他的作品。《夹缝中的历史》这本书，与以往的散文集不同，它的题材相对规范，写的是历史。中国几千年漫长的历史，发生的事情很多，朱鸿选取并开掘了那些令人深思的历史题材。他是从新的角度进行开掘，以一个全新的现代人的思维和认识的高度，穿透历史的尘封，阐发出一些给人以启示的见解。历史故事很多，谁都可以去写，谁都可以利用，但真正能够以现代人的思维和眼光穿透它，并能对我们正在进步着的社会和正在进步着的人

的思想以启发，就很不容易了。他的这本书，不仅从思想上翻新着历史故事，而且从艺术的角度看，也展现出一片全新的天地。朱鸿这部散文集，展示了一个作家在思想上和艺术上的勇气，还有他在这部书中表现出的成熟和智慧，一个作家仅有勇气是不够的，要走向成熟，要有智慧。

2002年3月 广州

生命质量的升华

杜晓英总是认真而真诚的。

每一次电话要我做什么事，都很认真地叙说那件事情的重要性，都很真诚地表白由我来做的必要性。有些事我斟酌可以做就爽快地答应下来去做；有些事再三斟酌由我去做未必合适，或者是属于我可能做不好的事，然而再三斟酌之后还是去做了。究其原因，便是杜晓英的认真。她在报社策划的每一件事，都是那么认真地去做，我不仅感动而且钦佩。我敬重那些认真思考也认真做事的人。再就是她的真诚。她要我做什么事从来都是首先让我感到真诚的，那真诚是既包含着她所承办的某项工作的个人责任，更有这项工作所负载的社会意义，而我又是往往在面对真诚的时候，最容易发生主意的改变。

冒着清明时节的纷纷细雨，杜晓英从城里赶到我原下的乡居，背着厚厚的三大本复印件。都是她在《三秦都市报》刚刚终结的《我的自考情结》征文的作品集，要出书了，让我作序。她动情地叙说着那些应征作品感人的故事，我也被感染了。我总是在那些自强不息自我奋斗者踩踏泥泞的脚步声里很快发生情感的融合和陷落。杜晓英直言不讳地说明选我作序的因由仅只一点，即我属于一个自学自修的人，与这个庞大的以自学考试而获取高等教育文凭的族群会有共鸣。我便应承下来，尽管一年前我已内省暂不作序，现在确实觉得有必要将这种共鸣的感受释放出来。

共鸣果然整个地全面地发生了。

这些自述通过自学自修获取文凭也获取专业知识的人的奋斗历程，几乎没有谁是一帆风顺的，普遍性的艰难，普遍性的曲折，又是普遍性的顽强，普遍性的不屈不挠；结果普遍是专业知识的获得，普遍的人生质量的提升和生命境界的升华。这些奋斗者的队列之中，几乎站立着当今社会所有职业的人。他们因为种种不同的遭遇而错过了进入高等学府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那个人人都企望跨过的“独木桥”，容纳不下所有怀着同一目的的人，他们就毅然或几经彷徨之后决然走上自学自考这条更富于包容性也更艰难的求知之路。应当感谢当今中国教育制度和教育方式的逐渐完善，其中重要的一点就是为有志自修自学的人开辟了一条值得赞美的道路，使众多的渴望获取知识的人有一条可靠的途径，这应该是健全的社会的一个重要标志。我于此便忍不住万端感慨。我是一个未能通过那座“独木桥”的失意者。我至今未有一张任何形式的高校文凭。我几十年来直到今天在无以计数的表或证的学历栏目里都签着高中毕业，这是我接受正规教育的客观实际的程度。我后来自修自学的水准无法考量。我的青年时代没有自学考试这一道好菜可食。我在离开学校回到乡村的巨大的人生绝望里，终于点燃了一只用墨水瓶改装的煤油灯，也为自己定下一个考量的标准和目标，自修四年（大学学制），发表作品，第一篇公开发表的文学作品，就是我的大学毕业证。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羡慕今天自学自考获取高等院校文凭的朋友们。

在我迄今为止的所有文字书写和口语表达中，极其有限地涉及处女作发表前后的那一段包括饥饿在内的艰难困苦和茫然无向的探求。这主要在于后来更为艰巨、更为复杂的创作实践的体验，把此前的曲折和艰辛全都淡化了。可以说，你要不甘平庸而有所作为，你要不为目下已取得的成就而自我欣赏，企图更远大的创作目标，就会发觉随之付出的劳动，将是比以往包括饥饿在内的艰难更加富于挑战性，我

的整个自修创作的感受，形成了我对所有富于创造性劳动的最基本的理解，这就是，无论文学艺术，无论自然科学，无论社会科学，任何一个领域里要取得独创性的成果，除了天赋，还要有思想，还得有专注和毅力，吃苦耐劳忍受种种痛苦和牺牲，这是成就事业的最基本的行为而不必太多在意。吃苦耐劳是开启天赋的最可靠的利器。缺失了坚忍的劳动，即使具备天赋之才也会白白流失。即使有幸进入高等学府的人，要成为某项专业人才，要在某一学科有所作为有所突破，同样也得付出艰辛的劳动，忍受常人难以忍受的艰苦，才可能把自己的那一份天赋的智慧开发到极致，才可能攀登到常人难以达到的高度。世界上那些为人类文明做出过重大发明创造的人，无一不具备这种最基本的意志品质。

无论古人，无论今人，人获取知识的途径无非两条，一是正规的学校教育，二是自学自修的自我教育，目的却只有一个，即获得知识。获得知识途径的最大差异，在于前者教育条件的规范完善和优越，后者的简陋残缺和困窘，然而，这也仅仅是形式的差异，并不在本质上决定求知者获得知识的质量。这是无须例证的，古今中外有许多垂范至今的杰出人物都可以参照，社会上只认名牌不究底里斜视自考的偏见，一时难以消除，然而自考者亦不必太在乎，用自己工作的实绩去证明自己，纠正偏见。

云南一位从战地回到家乡做了民办小学教师的朋友，经过自修自考获得本科文凭。现在已经是高级中学的一位教师了。他的实际工作能力正是对那张自考本科文凭知识含量的最好考量。他的一句话说清了最本真的意思，提升人的生命质量。

生命是有质量的。生命本体都是平等的神圣的，然而生命的质量却有巨大差异，这是生活实际，也是生活常识。有理想有抱负的人，

企图把自己有限的生命在这个世界上释放出最大的能量，为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做出有益的贡献，这个生命的质量就得到升华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克服困难承受痛苦不仅是获取知识的过程，也是一个人获得行世的自信获得立于天地的力量的过程，也是人格发展人格完善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自考获得文凭获得专业知识，仅仅只是新的生命的起始，是获取知识之目的实施的开端，将获得的知识释放给社会，创造自个人生最璀璨的景观，生命的质量生命的价值就得到升华了。况且，对新的知识的汲取也才刚刚展开……自考文凭的获得不应视作终结，而是开始。

杜晓英坦诚地告诉我，她的本科文凭也是通过自修获得的。我从来也没在意过她是哪个大学毕业的。我只是感觉到她的认真和真诚，以及出色的工作，正好当是对数以万计的不折不挠奋争的自学自考大课堂里的学子们的一个鉴定和证明，毫无疑问是令人引为骄傲的。

2002年4月7日 原下

第一声鸣叫

在我看来，孩子在纸上写下的第一个字，便预示着智慧之门的开启。这是我在散文《家之脉》里有感而发的话。人识了字，才能掌握接受各类信息、纳入各种知识的手段，才能告别狭隘和愚昧，开阔视野开阔胸怀，逐渐充盈起来，获得对这个世界的生存自信，进而便开始在这个世界的某一领域进行自己的创造性劳动了，进而便有一种对这个世界的独特感受独特体验需要抒发了。

基于这样的理解，孩子在作文本上写成的第一篇把汉字连接成句又连接成文的文章，应该看成是口角尚留黄痕的小鸟的第一声歌唱，是华冠未丰的公鸡的第一次啼鸣，是古人喻为刚露尖角的小荷，是马驹撒欢的第一声嘶吼，是一个新的生命向这个世界发出的第一次挑战和宣言。任何一个心理健康的成年人，都会对其发生惊喜、关爱、宽容、欣慰和期盼，而绝不会在乎幼稚或浅显。

人之所以神圣，在于除生理的基本需求之外，有创造的欲望，有表述的欲望，或者说把自己在这个社会里实施创造过程的种种感受和体验再向社会表白，甚至在他们开始创造性活动之前的求知阶段，在他们获得了文字能力之后，这种表述的欲望就产生了。随着年龄的递增和知识的累积，他们体验社会体验人生的深度也就逐渐掘进，看取生活的视角也会逐渐开阔，表述他们独自体验的文章便会呈现千姿百态百花齐放。毫无疑义，这其中必然会有佼佼者在走向未来的中国文坛，成就一方独立的新颖的风景。过去的和现在的作家、文豪是这样发展起来的，未来的作家、文豪也必定从这个稠密的幼林里脱颖而出，独秀一枝。

这个过程自然漫长，有如小苗到大树，幼芽出土到花团锦簇，然而毕竟开始了。开始就预示着希望，就预示着未来。通往未来的文学之路千条百条，我唯一想要告诉年轻朋友的一点，与其设想一路顺畅，莫如准备崎岖艰辛；与其期盼一鸣惊人，莫如扎实演练逐渐攀升。无论自然科学各个领域的发明创造，还是文学艺术各个门类的杰出成就，从来没有一步登天一镢成井的先例，所有辉煌的高点和深度，都是无以计数的汗水和脚步累积成就的。

我向所有这些刚刚发出第一声鸣叫的朋友表示诚挚的祝贺。

2002年4月8日 原下

温馨的记忆与陌生的熟识

——读李志武《白鹿原》连环画随想

看画家李志武的来信或与他说话，内容大都是关涉他画的《白鹿原》连环画的事。这个话题一提起来，几乎每一次，都勾起我关于连环画的温馨的记忆。

关于连环画的记忆全部是温馨。

我在尚未阅读过一本文学作品之前，却看过不少连环画儿，譬如《铁道游击队》《白毛女》《西游记》等。这些令人着迷的连环画，我自己却从来也没有掏钱买过一本。无须解释，穷得外袋和内袋里根本掏不出一毛钱来。我看的那些连环画或者叫娃娃书、小人书，都是从同学手里借来的。同班和外班同学中，有几个家境富裕可以为大伙提供最新出版的连环画的人。他们在与同学分享一本可读性极强的连环画的快乐的同时，也独自享受着如我一类想看而又根本买不起的同学追逐、讨好和乞求的快感，爽快地给我们排队，谁看完了谁接着看。在轮到我手里的那份兴奋和幸福感，至今想起仍觉得温暖而温馨。想想看，几个同学挤在教室里，或坐在操场一角被踩得瓷光的地面上，或隐藏在学校庭院的小竹坛里，一个个互相搭着胳膊扒着肩膀挤蹭着脑袋，一页一页阅读连环画下注释的文字，一幅一幅品赏画面上多种角色的表情和动作，常常惊作一团笑作一团或骂作一团……现在回忆起来的全部感觉就是温馨。

这种温馨只属于人生的那一个年龄区段。

我后来成年以后仍然喜欢看连环画，尽管没有少年时期那样急切和兴奋，却常常在那些生动优美的画面里沉醉。记得看由法国作家莫泊桑的短篇小说《我的叔叔于勒》改编的连环画时，就有一种沉醉的感觉。此前阅读这个短篇小说所留下的深刻印象，一下子明晰起来运动起来。同样沉醉的感觉还有过一次，就是由柳青的小中篇或大短篇小说《狠透铁》改编的连环画的欣赏感受。这篇小说我读过许多遍，然而阅读连环画的感受依然是全新的。作家用语言文字永远也无法写“透”的东西，优秀的画家妙笔一勾就“透”了，就活了，就形象而生动地呈现于读者的眼前了。这不仅是对作家语言文字的立体化形象化，而且是一种意境的拓宽和意蕴的丰富表述。譬如，《狠透铁》里提供的主人公狠透铁生存环境中的看护庄稼的庵棚，仅一句交代而已，画家却在此发挥了神奇的创造，远处作为屏障的终南山朦胧的轮廓，河川灌渠上随风摆动的一排白杨，突出来一个关中乡村独有的那种临时搭建的庵棚，坐在棚口咂着烟袋锅儿现出忧思而又坚忍神情的狠透铁的造型，以及蜷卧在他脚旁的一只乡村柴狗。那个日夜为公众利益操劳而被阴谋家陷害着的狠透铁的形象与精神内质，使我感受到不摧的群峰不死的野草不折的白杨所蕴含的千古正义。如果仅从艺术欣赏的角度说，画家对作家作品的再次创造，显示出无可企及的连环画本身的艺术魅力。

我的小说被画家改编为连环画，《白鹿原》不是第一次。我的几个短篇和中篇小说都被改编过，而长篇小说《白》书的连环画本，就其规模来说是最大的。

看自己的作品被改编出来的连环画，竟是揭谜一样的新奇心理。新奇首先来自人物。我用文字描写的人物，在画家的笔下会是什么样子？这谜往往在打开连环画本的第一瞬就破解了，噢！这样的。被画

家画成了这样的一个个人物，对我来说往往是陌生而又熟悉的。说陌生，是因为我无数次地思索过的人物，其实从来也没有这样须发清晰地站在我的面前。说熟识，却又确凿是这个人物在复活着我所倾注给他的命运遭际中的痛苦和欢乐。这种时刻，我也就踏实于已经揭开的谜底，噢！我的人物在这个画家的理解中是这个样子。然后我就比较平静地去品评画家创造出来的这个人物在故事情节中的合理性表现，以及某些动作的别扭。

李志武画的《白鹿原》连环画，在我同样经历了这样一个过程。谜是在未刊出时就揭开了。前年我到北京开会，与志武以及《连环画报》杂志的编辑有缘相聚，志武把已定稿的一摞画稿带来，摊开在床铺上。我才第一次看见了白嘉轩、鹿子霖、黑娃、小娥等人物的庐山真面目，又重新感受了一次陌生与熟悉的奇异和新鲜。

志武画的《白》书的连环画，以一种变形的人物形象和变形的场景形态出现。一种古朴，一种原生形态，正吻合着二十世纪前五六十年中国北方乡村农耕社会的气象。人物造型人物的行为和形态，展示着人物的个性人物的内心冲突和情感变换，我以为把握得甚为准确，甚为传神，更有着画家自己着意的夸张和张扬。我几乎没有提出什么异议，而在座的青年评论家李建军也是赞赏有加。

志武在五六年前写信告知我，他想做《白》书连环画这个较大工程。此前，他已经几次深入到地理上的白鹿原，去探访民风民情，去搜寻那里已经过去了一个世纪的遗存在村巷和农家小院的历史残痕。一把废弃不用的农具、一张尚未打碎当作柴烧的方桌或一条缺腿的条凳、一个从极左劫难中侥幸保存下来的镶在农户墙壁上的土地神神龛，都成为他复原白鹿原百余年前的生活原貌的信物。他说他反复读过《白》书，并谈了他对书中人物的理解。我在尚未看见志武是光脸

是麻子的情况下就同意他干了。应该说，他干得不错。他下了功夫，他痴迷于艺术而至于文学。他的画作在《连环画报》二〇〇一年度连载了十二期，据说面世后读者反应不错。现在，这个连环画稿本又将以单行本独立发行面世，又多了一条接近读者的渠道，我为志武庆幸，也为我的《白》书庆幸。

在我的整个创造意识里，写作的最原始也是最本质的目的，就是与读者进行交流。作家所塑造的人物和人物心灵中所蕴藏的情感，当是这些人物所处时代的脉象，自然是作家把自己的体验注入人物血管的。作家创造这些作品并公之于世，自然期待能被更多的读者所接受所共鸣，由此而得到的创造的幸福感是任何名或物的奖赏都不能比拟的。连环画《白鹿原》的面世发行，将以一种富于动态的立体的艺术形式走向读者，自然也展示出画家李志武扩展了的艺术空间和别具一格的绘画风貌。

我和志武一样期待读者的回声。

2002年5月20日 原下

“文学是我人生中最重要的主题词”

——与《西安晚报》记者蔡静、丑盾对话

记者：陈老师，马上就是您六十大寿了，这是您人生中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六十年风风雨雨，您一定有不少人生感悟，能跟我们谈谈吗?

陈忠实：文学是我人生最重要的主题词，但不是全部，我还有许多社会工作。一九六二年到一九八二年整整二十年间我干过六年乡村民办教师、十四年县区基层行政工作。虽然我喜爱文学，但当时的现实迫使我只能将文学作为一种“爱好”，而不能作为“事业”，因为“文革”对文化人正进行着毁灭性的摧残。

一九八二年搞专业创作后，面对文学发展新时期，我才满怀欢喜地把文学当作事业去干。这时已充分意识到二十年农村生活经历对我的文学创作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成为我创作的财富。尤其是在《白鹿原》的创作中，我对农村、农民生存状态的思考与反映，就是长期农村生活自然而然的沉淀。通过和农民，特别是老年农民的接触和交谈，那段历史、那个世界在我脑海里愈来愈清晰起来。

记者：在您四十五年的创作生涯中，有哪些事情是最值得回味的?

陈忠实：我的文学创作中有两次反省对我影响最大，这两次反省都发生在我文学创作最关键的阶段。

第一次是在一九七八年秋冬之交。刚刚粉碎“四人帮”，中国文学出现了后来被称为“中国文艺复兴”的时期，我也刚从行政部门调到文化馆。文学的冻土阶段一旦苏醒，文学青年便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此时，我却陷入一种反省。十七年“左”的文艺思想对我影响太甚，那个时代你如果想在作品中写一个“中间人物”，是完全不可能的，那时的文学作品是完全违反“艺术规则”的。我必须对自己的思想进行一个清扫。如何反省？我那时认为唯一的途径就是静心读书。我阅读了一百多部中短篇小说，以莫泊桑、契诃夫为主。通过阅读，我力图使自己对文学的理解接近文学本身。一九七九年春天，我对文学的理解豁然开朗，情绪特别好，当年创作了十个短篇，《信任》先刊登在《陕西日报》上，随后被《人民文学》等文学刊物转载，获一九七九年“短篇小说奖”。

第二次反省最为关键，是在八十年代中期创作《白鹿原》期间，是一次自觉行动。第一次构思创作长篇，感到压力很大。因为它不仅涉及了对关中历史的认识、地方志的考证，思想内容、作品的结构问题、人物塑造也都想完成一次突破。当时恰逢商潮对文学、作家的冲击，文学贬值、作家地位降低。自费出书现象在那个时候第一次出现了。我也碰到这个问题，平生以来第一次，我的小说集《四妹子》出版后堆积家中，等待自销。这件事对我的刺激很大，我被迫认识到作品的可读性问题，必须把可读性作为文学作品不可忽略的因素。

这两次反省，不管是自觉还是不自觉，对我都有决定性意义，那就是，在艺术追求中不能满足于别人的好话和“自我感觉良好”，否则，就会失去完成突破、创新的动力。

记者：目前是商业社会，很多作家写作的作品被冠以“反腐小说”“国企改革小说”等帽子，我们想知道您今后会不会特意写作这类题

材。另外，读者们也很关心您的第二部长篇小说什么时候出版。

陈忠实：作家应关注自己生活的土地，写自己熟悉的东西。写作是对生活、历史、现实有感受，再深化感受后的有感而作，我不会为写作而写作。我认为，从严格意义上说，“反腐小说”“国企改革小说”有较多非文学本身的东西。

有很多人问我下一部长篇小说的事，读者的心情我可以理解。但也应遵循创作规则，目前的我很坦然平静，主要是在读些东西，写些短篇。

记者：您现在都喜欢看哪些书?

陈忠实：我目前很喜欢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作品，拉美文学的产生说起来很有意思。拉美没有传统小说，只有民间流传的神话和传说。十九世纪末也没有文学。拉美的文学是二十世纪前期诞生和发展的，五十年代至六十年代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在整个世界形成气候。三十年代，拉美的一些作家、文化官员游学欧洲，开始接受并模仿欧洲文学，但几乎无一成功。魔幻现实主义文学鼻祖、古巴作家卡彭铁尔离开欧洲时曾无奈地说：“在法国现实主义的旗帜下容不下我。”回到拉美后，他选择了保持着非洲最原始生活状态和文化形式的海地，深入体验生活，完成了长篇小说《人间王国》，正是这一部作品，在欧洲真正引起了轰动。作品以独一无二的艺术性和神秘感被欧洲人命名为“神奇的现实主义”，对拉美作家也产生了地震般的影响，他们纷纷将眼光转向自己生活的土地，“魔幻现实主义”在世界文学史上第一次形成规模性影响。

记者：研读外国作品对您的创作有什么影响?

陈忠实：外国各种流派作家的作品，以及研究这些作家的传记和关于他们作品的评论，我认为这些对我很有启示，对开阔艺术视野非常有用。在参照阅读中，你能发现差异，也可以发现许多默契的东西和具有文学规律性的东西。当代文坛上风里云里雾里的东西很多，只有做纵向、横向的比较，才能有自信排除文坛上非文学本身的因素，例如“商业性”“炒作”等。

记者：您对“七十年代作家”以及“新新人类作家”有何看法?

陈忠实：曾经在一项全国性调查中，一些“七十年代作家”曲折地表达了一个相同的意思：从来没有任何作家的任何作品对自己有影响。坦率地说，我崇拜的作家很多，我第一个崇拜的是赵树理，因为我看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是他的《三里湾》。到初二暑假借阅了《静静的顿河》，又开始崇拜肖洛霍夫。读完托尔斯泰作品后，又认为他最伟大。

“新新人类作家”受到了西方“后现代主义”的影响，是我国改革开放二十多年后这一特殊时期的产物。“新新人类作家”在作品里所表现的内容、艺术形态和宣扬的文学主张是对中国现存所有文学的一个挑战。他们挑战“心灵写作”“智慧写作”，鼓吹“用身体写作”，其实是“写作身体”。写作对象是自己的身体，写身体在特定环境下的感受，所写当然还是社会生活的一部分，但我们能看出他们究竟钟情的是哪一部分，他们的作品未必能影响别人。

记者：您能谈谈对目前陕西文坛的看法吗?

陈忠实：在文坛我一般不参与辩论，那太浪费时间，而且，文学辩论往往容易导致人身攻讦；文坛有愿意辩论的人，我把机会让给他

们吧。

但是，就陕西文坛而言，现在应该说处在最好的阶段。艺术生存最致命的东西就是没有个性，我们可以欣喜地看到，凡是形成独立风格的陕西作家，艺术差异性都很大。路遥、贾平凹的作品仅从语言上就能体现出这一点；叶广岑、红柯也都有强烈的个性色彩；陕西地域文学共同性东西对代表性作家而言已经消亡了。我们鼓励作家培养独特的艺术风格，为形成独特的个性，不妨走极端。

记者：为什么目前文坛具有震撼力的作品并不多见?

陈忠实：从客观的社会因素来看，商品社会造成人们急功近利，普遍浮躁，使部分作家对文学的理解偏向了娱乐性。从主观因素来看，与作家的意识和能力有关。部分作家还缺乏对历史、社会的穿透力，因此，作品虽然艺术性强了，但社会性弱了。现在，我们普遍感到个人情感文学、游戏文学多，而能引起读者人生思考、心灵震撼的作品少，宣言大于文学本体。所以对作家，尤其是已取得一定成就的作家而言，思想和人格在创作中异常重要。

记者：有媒体以“文坛拒绝一本书作家”为题向您提出非议，对此，您有何看法?

陈忠实：这犯了一个常识性错误。曹雪芹写了半本《红楼梦》，至今几百年了，文学史也不能“拒绝”他，将他开除出文坛；钱钟书一本《围城》，被列入大学生必读经典名著系列丛书，看来他也没有被开除出文坛。就在那家媒体刊登文章的第二天，作者便打来电话向我致歉。我说没关系，我这个年纪对毁誉都已经看得很淡了。

记者：您准备怎样过六十岁生日?

陈忠实：关于这个我已犹豫半年了。六十岁生日可以当它是重要的日子，也可以只当它是普通的一天。但是刚进马年，好多朋友就热心要为我操办生日。朋友的好意我也不能过分拒绝，大家聚一聚也正常。后来经过考虑，我准备把生日当成一个扩大了的纯粹朋友聚会、一个民间性活动。可以邀请媒体中的朋友参加，但不做任何媒体宣传。

记者：您平时还喜欢什么活动？最令您感到愉快的事情是什么？

陈忠实：当然写作、读书是我最爱好的，我还喜欢旅游，在旅游中了解当地人的生活。有一次，我在云南去一个少数民族的寨子，他们生活的窘困令我触目惊心。我回乡下自己家里，很容易就能看到农民普遍的挣钱之难之苦。参照他们的生活，我更容易找到心理稳定之点。

我最愉快的事就是写完一篇文章，哪怕是一篇两千字的散文，画上句号时的喜悦是什么都代替不了的，把自己想说的表达出来以后，我会开心半天或者几天。

记者：您目前的心境如何？能不能介绍一下您现在的家庭情况？

陈忠实：我即将进入“花甲之年”，现在的心境非常平和。我的家庭现在也处在平和的时期。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三个孩子上学，学费飞涨，那是我家经济最紧张的时期。现在，儿女们都工作了，大女儿在律师事务所，二女儿干财会工作，儿子在电视台工作。外孙今年六岁，我希望他健健康康生活，希望孙子好好学习，获取知识，能够适应未来社会。

记者：《白鹿原》改编电影、电视剧的进展如何？您会不会自己参与电视剧剧本的改编？

陈忠实：电影上月已与西影正式签约，办完了版权手续。改编、拍摄电视剧还正在申报之中。我过去改编过《信任》和《四妹子》两部小说，但这次不会参与《白鹿原》电影、电视剧本的改编。

记者：回首六十年风雨岁月，您心里最感宽慰的一件事是什么？对未来有什么打算？

陈忠实：回首往事我唯一值得告慰的就是：在我人生精力最好、思维最敏捷、最活跃的阶段，完成了一部思考我们民族近代以来历史和命运的作品。

至于今后嘛，如果有上帝的话，那么我希望他能让我多清醒两年，让我可以继续写下去；我可以瘫掉一条腿，但不要叫我脑子糊涂。

2002年7月

激扬的膜拜

一

好久没有读到这样激扬如涛的文字了。这是《天路魂》给我最直接最强烈的阅读感受，也是阅读享受。

这是关于青藏高原最壮美的诗。

二

打开《天路魂》书稿，我的耳畔便响起了《青藏高原》的旋律。我在几年前初次听到这首歌时，竟然热泪涌流，陷入一种长久的无言状态。我读《天路魂》的过程中，好几次都抑制不住泪眼模糊，按着书稿，同样陷入一种长久的无言状态。

歌曲《青藏高原》当是纪实文学《天路魂》的主题词。

纪实文学《天路魂》当是歌曲《青藏高原》的诗性阐释。

古往今来的诗家文人，对神秘的青藏高原吟诵了多少诗赋文章，不乏千古绝唱。即使不染文墨的普通旅人，行经这里都会发出由衷的慨叹。面对这样的高原，任何人都不会无动于衷。然而，要在普遍的感慨和千古称颂的绝唱中，书写出不同凡响的独特感受，就非易事了。

雄浑壮美、激情飞扬的《天路魂》，是刘谦感受青藏高原喷薄倾泻的心灵史诗。

三

激越飞扬的文字，发端自作家鲜活纯净因而才保持着的敏锐的心灵。

雪山。高原。峡谷。草原。无边无沿的戈壁。寸草不生、蠓虫不飞的生命禁区。作家笔墨所洇，读来令人荡气回肠、心灵悸颤。

壮美处令人悸颤。

严酷到绝望处令人悸颤。

高原的云彩美丽到令人悸颤。

三棵树的绿色神奇得令人悸颤。

这是最易令我心灵悸颤的生命的颤音。

许是储蓄着丰厚的如苍茫的青藏高原一样苍茫的襟怀，许是装备着青藏高原关涉历史演变关涉经济形态关涉自然地理关涉民族命运关涉今天和未来的诸多思考，许是怀着挣脱浮泛的声色寻求生命的伟力生命的价值生命的真实的躁动不安的灵魂，许是为着寻求诗心所可栖息的圣土……作家走上了高原。走近了灼烫如炙的沙漠。抚摸了从三棵繁衍成林的最初的树。聆听到动人心魄的稀世之鸟鸣。收获了在那里创造着世界奇迹也创造着生命奇迹的男人和女人的心灵史诗。

只有纯净的心灵才能对那一方净土保持敏锐的感受，才能对一群淳朴的建设者发生心灵共鸣，且不说责任感吧。可以肯定的是，某些在龌龊的算计中得意的小心眼儿，是绝难感知那个高原的。

四

激扬的文字发自对劳动的尊重。刘谦对诚实劳动的尊重态度，达到了顶礼膜拜的程度，满怀激情的文字正是面对那些从事各种职业默默奋斗在高原上的劳动者倾之笔端的。

进入《天路魂》的有名有姓的人物，有几十个上百个。有第一批踏破高原戈壁荒寂的人，有为寸草不生的沙漠种活第一株树栽成第一片绿草的人，有打开第一方学校大门播种知识也播种文明的人，有铁路工程技术人员，有普通的修路工人养路工人，有大学生也有以体力劳动为主的工人，有汉族也有蒙古族藏族同胞兄弟。其中许多人终其一生都在这贫瘠地区默默地工作着，还有接替他们的儿女，继续着那条铁路的畅通和雄心勃勃的延伸。这个人人都可以书写英雄自传的群体，只有典型的几个人代表他们走上共和国的英雄讲台。即使几十万字的《天路魂》也还只是勾描了其中一小部分人的最简洁最闪光的一段故事。我总是在读到这些情景时忍不住心颤，总是感到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人，都完全可以写成一本书。

作家对诚实劳动的态度，在很大比重上定位着作家对待社会对待人生的态度；作家对待诚实劳动的态度，反过来又决定于作家对待人生和社会的态度；作家对待诚实劳动的态度，关键在于那份本真的崇敬，这是激情迸发的不可遏止的自然发生的现象：强装的激情总也除不去虚意和矫饰的空洞。我正是在这一点上更深地理解着刘谦这位作家和朋友。

五

激情还来自对神圣的生命的礼赞。

在青藏高原的这条从奠基一直延续了五十年的铁路工程上，许多人不仅毕生付出了最诚实的劳动，而且付出了生命。刘谦的笔端在书写到这些情景时，表现出天才的文采，最准确最具分寸感的词汇流泻出来，描绘出可触可感的场景，传达着最淳朴最真诚的金子般的心灵之声，形成一波又一波冲击我的心潮的力量。

刘谦对这些诚实劳动着的生命的礼赞，渗透在这些无名英雄的生命历程之中。那个牺牲在塌方中的湖南小兵李物旲，兜里揣着一封尚未发出的给母亲的信，仅仅几句话：

妈妈：

我想你，想家。站起来，我是你的希望；倒下去，我是你的太阳。

这是一首真正的生命之歌。这是一个人的生命宣言，伟大而神圣的宣言。有这样的宣言的青年，既获得整个群体的敬重，也有助于刘谦和我这样的作家理解关于生命的价值和神圣，包括作为一个人的尊严。

李物旲的生命宣言，无疑是那些为青藏高原也为民族的未来献出生命和默默奉献着的群体的共同宣言。

六

我认识刘谦少说也有十六七年了。不是过从甚密，倒是一种疏疏淡淡的忘年交。印象中他善于议论，常有与他的年龄不大吻合的独到的敏锐和深刻。他说话极快，快得常常使我的耳朵有承接不暇而溢流

的感受。说话快除了生理特点外，更多地显示着思维的敏锐。刘谦聪慧而敏锐，这不是我一个人的印象。

我读《天路魂》，也读刘谦。读到了刘谦心灵中最可珍贵最令我敬重的东西。

2002年7月7日 原下

关于四十五年的答问

李国平：二〇〇二年，你的文学生涯已走过了四十五年，你是怎样走上文学道路的？你能描述一下最初萌动的情形吗？

陈忠实：追溯起来，我的文学生涯应从我初中二年级时写的一篇小说算起，那是一次作文，我写了一篇小说，题目叫作《桃园风波》。这是我平生写下的第一篇小说。我对文学的兴趣、爱好、追求就起于这个时期。有几个因素决定了我后来的文学道路，一是家脉的影响，父亲的形象。父亲是一位地道的农民，但有些文化，在下雨天不能下地劳作的空闲里，父亲和一般农民的区别就显示了出来，他总是躺在祖屋的炕上读古典小说和秦腔戏本；二是我上初二的时候，那时的语文课本分为汉语和文学两种，我记得厚厚的一本文学课本收录有现当代作家的许多作品，包括赵树理的短篇小说，李凖的刚刚发表的《不能走那条路》。我读他们的东西，似乎直接复活了我少年的乡村生活经验，感到亲切和惊异。也就是从那时起，我第一次产生了借阅文学书籍的欲望。再就是我的初中语文老师，姓车，刚从师范学院毕业，车老师大概是一个标准的文学爱好者文学发烧友，他讲语文课，还给我们讲一些当时文坛的趣闻动态、作家故事。我后来写了一篇作文《堤》，是车老师主动提出为我抄写并向《延河》投稿的。这是我第一次听说《延河》。是车老师拨动了我的文学神经。我后来在一篇文章里说到五十岁才捅破了一层纸，文学仅仅是一种兴趣。那时候的确纯粹是一种兴趣和热爱。

李国平：你觉着你的创作经历了几个阶段？《白鹿原》当然是高峰。有几次高峰？几次转折？

陈忠实：我的文学创作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从创作欲望的发生、萌动开始，在中学办文学社，出墙报，高中毕业后回乡。高考失败后几乎一切人生出路都堵死了，立志搞创作。一九六五年在《西安日报》发表处女作《夜过流沙沟》，直到一九七八年，可以看作我创作的第一阶段。从最初的爱好到能够发表作品，到引起一定的重视和反响，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这个过程包含着基本训练、学习和借鉴，经验和教训，最重要的是解决了创作心理上的自信与自卑和文学的神秘感问题。第二个阶段大约从一九七八到一九八六年。一九七八年，我已强烈地意识到文学的春天到来了，文学可以当个事业干了。我也从基层行政部门调到文化单位，去读书去反省去归依文学，那几乎是一个自虐式的反省，剥离的过程和目的是要用真正的文学来驱逐来荡涤我艺术感受中的非文学因素，重树文学的信心。这一时期是我人生和创作的最重要的转折，解决了反省力和自觉性问题。记得当时《人民文学》的崔道怡先生从北京赶到我下乡的偏僻的山村，要我写一篇小说在《人民文学》亮亮相，哪怕写一篇散文也给《人民文学》先亮一下相，不然有人说陈忠实是否趴下了？我咬牙谢绝了。我说我现在不是亮不亮相的问题，趴不趴下全在我自己。我会以我自己的方式告慰读者。那时候和后来不断深化的精神剥离，使我获得了文学的新生。

第三个时期是《白鹿原》的酝酿、准备、创作时期。这个时期我面临的最大问题是我已意识到了《白鹿原》的内涵和历史内容，和艺术表现上的软弱，拿得下来拿不下来，能否完成自己的创作理想，可《白鹿原》的创作过程和完成使我在更高层次上解决了自信和不自信的问题。

李国平：在你的文学生涯中遇到许多文学前辈、文学编辑、文朋诗友，王汶石、吕震岳、蒙万夫、徐剑铭、张月赓、李下叔、何启治，他们可说是你的良师益友，每每在创作的重要关口给予你很大支持，我注意到你在一些文章里很是感念。

陈忠实：的确是这样，我在文学道路上遇到过许多良师益友。我交往的编辑，原计划写成系列的文章，现在还没有完成。我和这些朋友，都过从不密，纯粹是文学上的交往、交流和爱护。一九七一年，我连续四五年没有写作了。张月赓惦记着我，托人在农村找我，催促我在《西安日报》上发表了散文《闪亮的红星》，可以说是张月赓重新唤起了我的文学梦。就是这样，我们交往三十八年，君子之交。我的第一本小说集《乡村》的责编是邢良骏同志。我的许多文学朋友、编辑朋友，出现在我创作的重要关头，我创作的每步都有他们心血的浇灌，我和他们的友谊是经过了长久的生活考验的，这是我的幸运，我想我回报他们的最好的方式是创作。

李国平：伴随着你的文学生涯，你经历了不同的职业，你创作的原始动机是什么？有没有功利目的？精神层次的东西什么时候占主导地位？它们和职业的改变是平行发展的吗？精神上的东西是和走上专业创作道路一起明晰起来的吗?

陈忠实：我说过，初始阶段，原始冲动，纯粹是一种爱好，高中阶段，有当作家的理想，我最近写过一篇文章《我与军徽擦肩而过》，说的是我高中毕业三年困难时期的情形，从军不成，高考不成，招工不成，几乎人生的每一条道、每一个憧憬都被堵死，而作为一个知识青年，我又不甘于做一个农民，不甘于做只有六七十个学生的民办教师，于是集中心力走文学创作的道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创作冲动几乎是和文学的命运相伴而生。而《白鹿原》的创作，可

以说是我人生价值、生命意义的一次实现，我们这一茬农民出身的作家，投身文学，不能说没有改变生存状态，人生命运的动机，世俗的和精神的剥离过程很难机械地划分，很难说哪一位作家走上专业道路了，他就剥离干净了，我感觉这和作家境界、对文学理解的深度有关系。

李国平：你的生命历程，创作历程，和共和国的风风雨雨构成了同构关系，你的命运你的创作也有过坎坷，现在回想起来一定感慨良多。

陈忠实：我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开始上学，接触生活，六十年代开始，以社会最基层干部的角色，直接参与社会，直接经历感受着国家命运、民族命运的变化，个体命运直接在生活的波浪中颠簸着、感受着，国家的变革和进步的过程，也是我一次又一次心灵剥离、精神提升的过程，可以说不光我陈忠实，新时期文学的任何一项成就，都离不开思想解放、改革开放的大背景，如果说我有什么感言的话，那就是在自己的生命历程中，不断锻铸承受苦难的能力，这是感受社会和人生的支点。如果这样的能力差一点，就会被生活的列车挤下去，就谈不到精神剥离和精神成长。

李国平：你说过，你在四十多岁的时候，有一种恐惧、警觉，五十岁的时候，有许多生命辟悟，现在是什么心境?

陈忠实：我在构思创作《白鹿原》的时候，有一种危机感、恐惧感、紧迫感，感觉五十岁是一个年龄大关，加之那些年不断有罗健夫等知识分子英年早逝的报道，我恐惧的是我的最重要的艺术感受艺术理想能否实现，最重要的创作能否完成。现在我心态很平和，主要是我那时候意识到的创作理想在我最为重要的年龄阶段已经完成。我六

十岁的生命和五十岁的生命是一样的，生活态度，创作态度没有消极。我说的平和不是悟道，不是耳顺，不是超然。对艺术新境界的追求，对生活意义的追寻，都应该渗透到生命里，该顺的顺，不该顺的不顺。

李国平：我记得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观胜的《猎户星座》出来，请民间的一位老者看，这位老者说，观胜，目不倒洋人。这可以说是你们那一批作家，创作志向，雄心的体现，《白鹿原》也可说是这个文学雄心的体现和实践。

陈忠实：是的，《白鹿原》离不开当时陕西文坛氛围的促进。我后来写过一篇文章叫《互相拥挤，志在天空》，说的就是当时的文学氛围。那时候我们那一茬作家，几十个，志趣相投，关系纯洁，互相激励，激发智慧，不甘落后，进行着积极意义上的竞争。可以说每一个人哪怕一步的成功，都离不开互相的激励。路遥、志安，已经离世。现在的文学环境由于社会大环境的影响已经有些病变，比如浮躁比如炒作，我要和年轻作家互相勉励的是：坚守。

李国平：在李星和你的访谈中，你曾谈道，你写出《白鹿原》时有两种估计：一是不能出版；二是一旦出版，肯定会产生反响。《白鹿原》出版后甚至在茅盾文学奖的评奖过程中有过磕绊，似乎读者和文学界的认同好评和某种说法形成了反差，后来的情形是不是说明国家的进步、思想的进步、文学的进步?

陈忠实：关于《白鹿原》可以有各种各样的评价。我们国家的进步从经济到思想都是显著的，《白鹿原》还上升不到这样的高度。如果说关于《白鹿原》有误读的话，那只是文学发展中的一个小插曲、

小波澜。回想起来，新时期以来文学的每一种思潮，都引起过争论。每一次结论都是使文学更接近文学本身。

李国平：一个较重要的时期，陕西的文学创作师承柳青，你是其中的代表，我觉着这种师从先是局部的逼真，后来更多的是创作态度和创作精神上的。在近年来有关你的访谈中，你多谈到外国作家，是不是你的文学资源后期多来自外国作家，尤其是拉美作家?

陈忠实：陕西许多作家的确有过学习、师承柳青的过程。我觉着柳青的遗产我们阅读得还不够。像赵树理、柳青、王汶石，我们今天重读，仍然会获得许多新的东西。后来陕西作家是有一个走出柳青的过程，有一句话叫作“大树底下好乘凉”，还有一句话叫“大树底下不长苗”。这里就有一个自立的问题。我对外国作家的阅读不光是拉美这一块，西欧、俄罗斯文学也是重要的资源，只是近来较多阅读拉美文学罢了。另外，我读外国文学，不光着重于艺术的东西，主要是在那里寻获思想性启迪。说到这里，顺便说一下，我不太重视传统的文学，这也许和我接受的教育有关，古典文化、古典文学是我文学资源里薄弱的一面，现在补课的欲望强，但理解快，记忆力差。

李国平：关于《白鹿原》有一致的评价和定位，这本书写出整整十年了，你是否经常回望关于《白鹿原》的创作？你自己今天如何看待《白鹿原》？

陈忠实：《白鹿原》是在那个历史背景下对特定生活的体验和理解，是我那一时期做出了最大努力的艺术追求，完成的创作理想。它是一个艺术文本的完成，完成后我不多想它了。当然也意识到一些遗憾，比如后几章弱了点，不如前面饱满。后几章写到白鹿原的第二代走出了白鹿原，投入到了更广阔的生活中去，有的还干着地下工作，

过着军旅生活，我对氛围的把握，可能不如农村生活那么丰满和深切了，这说明生活体验的重要。

李国平：读你的有关访谈和文章，发现有几个关键词：体验、神圣、良知，它们在什么层面上表明你的文学认识?

陈忠实：这不是一个范畴的概念。良知是历朝历代的中国传统知识分子的基本品格，历朝历代最优美的散文诗歌里都贯穿着这种品格。良知是心理形态、精神形态，强装不行。具体到创作中，对人类的关心，哪怕是对最卑微的生命的关注，作家的爱、怜悯和忧患都隐含在其中，读者最敏感的是这些东西，它也从根本上决定着作家的艺术气质和作品面貌。

李国平：最近读到你的几个短篇，尤其是《日子》，写出了中国农民的生存状态，写出了他们的无奈和希冀、顽强和坚忍，从中能读出你对现实的关注。也能读出你重回白鹿原后的沉静。好像你正在回归写作《白鹿原》时的状态。四十五年不是一个终结，六十岁不是创作的完成，你是不是正在为大的建构做准备，或者说有系统的创作考虑?

陈忠实：我最近的几个短篇《日子》《作家和他的兄弟》《腊月的故事》说责任感也罢，说忧患也罢，关注的是当代生活过程中的弱势群体，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同情和呼吁，着重写生存状态下的心理状态，透视出一种社会心理信息和意象，为社会前行过程中留下感性印记。关于我的创作我从不做承诺。我的创作忠实于我每一个阶段的体验和感悟。我觉着当代生活最能激发我的心理感受，最能产生创作冲动和表现的欲望。

李国平：有作家说，读者永远比评论家更可靠，这当然脱离不了特殊的语境，但也有恒久的意味，拥有读者的广泛认同，是作家的荣幸，是作家生命力的延续，你可有这样的感触？

陈忠实：自我从事创作以来，也曾有过创作劳动被读者验证、认可的感受。但从未达到过《白鹿原》这样的呼应。我的生命，我的创作报偿全在于此。《白鹿原》出版以来，我亲自盖章签名的书有几万册，一位石家庄的读者来信写道："我想写出这本书的人不累死也得咯血，不知你是否活着，还能看到我的信吗？"而且我惊异的就是在最偏远的地方，读者对《白鹿原》的理解阅读都没有障碍。我曾经说过，读者才是作品存活的土壤。如果我的书对不同的读者哪怕有些微的收益，那是我最大的心理补偿。我也唯有在有限的生命里用我的创作劳动来回报他们。

2002年7月31日 原下

文学的信念与理想

我的文学信念形成的时间很漫长，是从不自觉到自觉的过程，也有去伪存真的问题。最初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单就个人的因素看，写作确实就是一种兴趣和爱好。它的萌发是一种兴趣，包括已经能发表很多作品的时候，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种个人的创作兴趣，一旦沾染上了文学，发表了些作品，同时也就产生了名利之心。再后来，把文学创作当作一种生活目标来追求的时候，毫不讳言，具体到个人出路的非常实际的问题时，我还是从自身考虑得多。尽管在陕西省已成为有影响的一个作家了，社会要求你的写作是要为革命，自然要附着一些当时流行的社会政治口号，把你的创作归列到那上面去。但具体到我写作的真实心理，仍然是兴趣。最初的兴趣是在中学读书时引发起来的，不自觉地连续练习写作。到高中毕业时，处在国家“困难时期”的非常重要的关头，是我人生最重要的转折点，也是我人生最困难的、最苦恼的一段时期。后来我回忆当时，不能进大学学习，对一个青年无论从个人出路、发展，还是从报效祖国、服务人民，即从公与私的角度，所有的路一下子都被堵死了，在一切都不可能的时候，我很自然地把自己的精神集中到文学爱好上来。这也是我当时唯一能选择的道路。这样，反而排除了一些轻易能够进入社会，包括谋一个好的工作这样侥幸的心理，反而归于一种死心塌地的沉静。进入这种自修状态，我的目标很明确，自修四年发表第一篇作品，就是我的大学学历完成的标志。那是我从最基本的文学修养开始练习，摸索写作的道路。在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是文字修炼，虽然也是在任何冠冕堂皇的场合都要讲是为革命写作，其实是以文学创作为寻找自己的人生出路，尽管如此，选择文学的动力还是对文学的兴趣。回忆那一段时

间，我总以为，一种虽然时间不长却极度的恐慌和痛苦过去以后，我才进入学习的最好的沉静状态，开始了文学创作的准备。最初是广泛阅读，包括背诵，记日记，写读书笔记、生活笔记，这些笔记不仅锻炼了文字功力，而且锻炼了我观察生活的敏锐性。我很清醒，如果文字功力不足，想把发生、发展的事情表达出来，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想当作家是不可能的。

到能发表一些作品，并在社会上产生比较多的影响的时候，文学创作仅仅作为个人生存的目的，反而淡化了，退居次位了，不是主要矛盾了。社会承认你是一个作家，你就要对自己创作的进一步发展提出更高的目标。这大约应该是到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清醒地意识到，社会承认你作为一个人的创造价值，但社会同时也强迫你必须认识到它承认的是什么样的作家。换句话说，你要做一个什么样的作家才能与社会的发展趋势相一致，否则，你即使成了作家也难以获得一个作家的安慰和自信。这个意识在写《白鹿原》之前的八十年代中期已经非常强烈了。在这个时期，我的创作已经在社会上有一些影响，短篇小说在全国获过奖，也出了几本中短篇作品集。后来出书的兴奋感渐渐地淡化了，强烈地意识到一种压力，作为一个作家，在陕西和在中国当代文学中，自己给自己打一下分，掂量一下自己的分量，就明白自己达到了什么样程度，包括生命年轮，五十岁都成为我很大的心理压力。这时候，文学信念开始形成，新的创作欲望膨胀起来，想在文学这个事业上形成属于自己的、应该不为人淡忘的东西，也就是努力为自己在文学的领域里占一席之地的想法强烈了。我同时也产生着另一面的心理危机，如果当代读者把我的全部作品淡忘了，这个作家存在的意义恐怕仅仅只剩下“活着”了。

原来我只有一句豪言壮语：应该在中国的图书馆里挤进一本书，哪怕是一篇文章也好。因为图书馆不是任何人、任何书都能挤进去的。一方面，这个时候的创作欲望，不再是在重要刊物上发表作品并获奖，也不是为了获得评论家给予的表扬，这些都很难再激起我的创作；另一方面，与此相辅相成，关于对文学创作的理解也产生新的欲望。创作心态正是在这一时期发生了重大转折。八十年代中期，文学创作和理论都非常活跃，所有新鲜理论不论是中国的还是外国的对我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尤其是关于创作的人物心理结构学说、文化心理结构学说。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到接触这个理论以前，接受并尊崇的是塑造人物典型理论，它一直是我所遵循和实践着的理论，我也很尊重这个理论。你怎么能写活人物、写透人物、塑造出典型来？文化心理结构学说给我一个重要的启示，就是要进入到你要塑造的人物的心理结构并解析，而解析的钥匙是文化。这以后，我比较自觉地思考中国人的文化心理，从几千年的民族历史上对这个民族产生最重要的影响的儒家文化，看当代中国人心理结构的内在形态和外在特征，以某种新奇而又神秘的感觉从这个角度探视我所要塑造和表现的人物。最明确的作品是《四妹子》《蓝袍先生》，这是我的创作实验的两部作品。

特别是《蓝袍先生》发表后的反应，诱发了我强烈的创作欲望，鼓舞我进一步在更大的层面上深层次解析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白鹿原》就是在这样的创作思路下开始构想的。它展现的不仅是两个个别的、具体的、家庭的文化心理结构，而且是整个民族的精神和心理结构。从这一点上看，《白鹿原》里的各类人物，他们彼此间的诸多纠葛和命运的冲撞，其实仅是个载体。抓住对人物文化心理结构的解析，一条新的创作思路便在我的眼前敞开。我曾说过，我当时的思路和精神状态，是最活跃的，充满了新鲜感，好像进入一种新的精神天

地、思想天地、艺术天地，整个形成了对思想和艺术世界极大的兴奋感和探秘感。到了这时，我才有信心完成《白鹿原》这部作品。由于有这些东西的引导让我感觉到了一个全新的境界，创作欲望和思想激情自然就达到了一个我从未有过的高涨状态。由于是个人生命体验性的东西，对人的鼓舞和心理自信的强化，就显得非常内在，不是谁轻易可以摧毁的。

作家探索的勇气和艺术创造的新鲜感所形成的文学信念是无法比拟的，我感觉好像要实现一个重要的创造理想，但是，也有达不到目的的担心存在。一个作家关键的东西是自我把握，自我把脉太重要了，不能简单地不加分析地听任社会上一些人对你的“褒”和“贬”。如果久久得意于自己的一时表扬，目光也会短浅起来，无法把才智发挥到极致。重要的是使自己不断跨越已有的成就，对自己不断提出更高的新目标和新要求。

关于“文学依然神圣”这个话题，主要是有感于现实而发的。九十年代中期，我们的商品经济进入最初的活跃阶段，社会生活形态、人际关系受到猛烈的冲击和颠覆。颠覆未必是坏事，我们原有的观念太陈旧了，这个颠覆的过程把那些陈腐的东西颠覆掉，但也未必产生的都是全新的、正确的、科学的生活观念。颠覆本身具有二重性，尤其是这个过程中对原来比较神圣的一些东西和情感，也都被轻蔑了。所谓“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从事文学事业的作家也像造导弹的专家一样被贬值了，社会真正看重的是卖茶叶蛋的实际收入，而轻视造导弹或搞创作人的创造性的社会价值，人们普遍关注的不是劳动的意义，而是物质性的结果。这个结果甚至简单到单指个人收入。被中国人一贯认为神圣的文学，包括受敬重的作家头衔，在这个时候也不那么神圣了，这种精神劳动在普通人眼里未必能胜过卖茶叶蛋的，这是

那个时段里最为形象的比喻。重要的是我们作家群体里包括文化界，也有一种无奈的自我调侃乃至对市侩观念的认可，对创作的发展造成了影响。“文学依然神圣”的口号是我在炎黄优秀编辑颁奖会上讲的，它虽然被社会传播了，但仍然有人怀疑：难道文学真的依然神圣吗?根据现时代的生活特征，文学果真还能神圣下去吗？作家、科学家都已经被边缘化了，挣钱人神圣了，是否确实把自己变成当代的唐·吉诃德了？生活实际上运转得也很快，我感觉从二〇〇二年的今天回头看五六年以前的生活，这中间的变化不小，应该说人们现在对文学的看法比以前要冷静和正常，这是重新经过选择、思考和鉴别的结果。

让人忧虑的是创作上的浮躁、快速化、平面化和理论上的平庸或者说庸俗化。这不是某一个作家、评论家或某一个地区的现象，而是带有普遍性的，整个文坛都在议论这个话题，各类报刊都在从不同的角度讨论这一问题。创作现在到了最快速化的时代了，一年生产的长篇小说（不说中短篇）近千部，是过去“十七年”的总和的几倍，远远超过“大跃进”时代了。这个快速创作量、出版量固然呈现出了繁荣的局面，但读者对文学界本身的不满足并没有因此而有所缓和。人们依然关注的是提高作品质量的问题，那种一般化地写以及媒体不着边际的“炒作”，严重地倒了广大读者文学阅读的胃口。这样一个局面，当然与浮躁的生活环境所产生的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有关，但从一个作家创作的角度讲，最致命的东西还不是这个，作家的能力、解析当代社会和历史生活的思想穿透力，关键还在这方面。现在大量历史题材的小说、皇帝小说（也没看很多、从电视上看），大多局限在权力的诉说之中，甚至有一种对封建权力的崇拜和阴谋权力的某种兴趣，这种东西展开的故事往往很热闹，斗争很激烈，观众兴趣很大。但是，作为一个作家，我只问他的思想和立场是什么？作家透视历史宫闱的力量有没有？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封建制度确有它辉煌的一面，但

其作为人类历史发展过程的一段，毕竟是一个非常落后的社会制度，回头看看历史，我觉得作家首先要有穿透封建权力的思想和对独裁制度批判的力量，但是现在看不到，全部是把历史当作对有所作为的皇帝的歌颂，甚至在歌颂有所作为的那一面的同时，把其对老百姓非常残忍的一面或隐而不提，或全部抹杀了。作家的思想穿透力远远没有达到五四时代新文化先行者对于历史认识的力度。对现实生活的表现和揭示，也还停留在对当代共产党人的清官与贪官的浅层次辨析上，很难进入一种对人的心灵的关照，难以进入在这个时代中人民心灵的欢畅和痛苦的那种本质上的关照，而这恰恰是文学作品应该全力关注的东西。平面化和浅层化对此既难以发现就只好绕着走，似乎没有高招解决这一问题。但我相信许多作家都在做着各种努力。做努力是一方面，时间又是一方面，因为这是无法回避的。作家创作要提升档次，有文字表现能力包括一些新的表现手法、艺术形式等，对许多作家来说都不成问题，那还剩下什么制约着作家不能登上一个新的创作台阶？就是思想和境界。如果思想无法穿透生活深度，不能超出普通人很多，那么，作品怎会有思想的力度和深度的东西，自然不会引起读者的兴趣了。

作为一个作家的文学理想，当然是要创造出思想内涵包括文学形式上的一种全新的形态，一个作家如果没有属于自己思想和艺术形态上的一种全新的、有异于所有人的作品形态的作品，那么，这个作家是立不住的。各国的文坛都是这样残酷。作家希望创造出属于自己独有的艺术世界、艺术形态，但作品发表出来的结果却是属于人民的、民族的。一个作家的文学理想不能不涉及为民族精神的更新和发展提供点什么。每一个作品对作家来讲都是不一样的，作品的形成过程，体验的方式和结果都不一样，体验决定着作家的精神状态，也制约着艺术形态。体验是独特的、个性化的，表现它的艺术形式也是独特

的、唯一的，这才有可能形成作家独特的创作风格，而最为关键的是作家本身不能削弱也不能淡忘自己对新的艺术形态的探索和追求，不能满足于已经取得的由相当成熟的艺术实践经验支撑的创作成就，这才有可能不重复自己也不重复他人。再就是要不断磨砺自己的思想，面对你所感兴趣的生活，不论是现实的还是历史的，必须有能力穿透到一个新的层面上才会有新的发现。应该说艺术和思想是互为交融的，一个新的艺术形态不会孤立地从天而降，它是与那种新的思想在穿透历史的过程中同步发现、同步酝酿、同步创造而成的。这需要不断更新相关的观念，尤其是像我这个年龄的作家，由于过去接受非文学的东西太多，不排除非文学的意识，就很难接近本真的文学，排除快解禁快，排除得越彻底接近本真文学的意识越纯，才能进行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创作。至于作品，不管其大小，哪怕是一个短篇，只要这些东西具备了，对一个民族建树自己的文化都是有益的。

作家应该留下你所描写的民族精神风貌给后人。不管是历史的还是现实的人生，一经作家用自己的生命所感受的体验后，表现出来的就应是这个民族在特定历史时段整个精神层面的一种比较准确的、具有普遍性的东西。我们从阅读国外作家的优秀作品中，常能对某个国家的某个时段里人的精神状态，包括人的快乐和痛苦，感受到有一种虽异样却颇深刻的体悟。作为一个作家也应该肩负起这样的责任，在这个国家和民族发展的历史上留下你的真实描绘，把这个时代人的精神形态和心理秩序艺术地告诉给后人，让他们从这些已经成为过去的现象里把握那个时代人的精神脉搏，并引发出有益的启示。在西方文化大量涌现的今天，作家们理应提供一个又一个优秀的文学文本，不是消极地保护民族文化，而是以创造优秀作品来丰富、更新、发展民族文化。有了真正优秀的作品，才能长民族文化的自信心，并在国际文化、文学的交流中赢得我们应有的平等地位。目前，并不具备这种

文化平等交流、交换的条件，这不能简单地以经济发展做后盾，也不能用政治上的平等来取代，没有一定数量的优秀作品，交流、交换很自然地就形成了强弱之势，怎么能平等呢！这需要一代一代作家来完成。当然，作为一种社会责任。社会应该尊重和爱护作家，但作家的文学理想却必须把为民族创造优秀作品作为坚定不移的奋斗目标。如果我们没有这样的理想、意志和雄心，必然完成不了文化上平等的交流，甚至连一点回流的力量都没有。想一想看，就我们的出版而言，我们翻译出版了多少欧美国家以及日本、拉美的作品，包括古典的和现代的作家作品，而国外翻译出版中国的作品却是微乎其微，根本构不成一个比例。面对这种情况，说我们不具备与世界文学进行对等交流的条件，显然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文学和电影的状况一样，是西方向中国倾入之势，起码在目前尚无法改变，只能靠一定的政策来制约。把争取在多少年后达到一种平等的交流作为文学理想的一个重要的内容，我看是应该的。

没有优秀的文学文本，要改变外来文化的颠覆是不可能的，这种看法应该让作家普遍地深刻认识到。真意识到这一点了，他就有“天降大任于斯人”之感，他也许就能静下心来，不再浮躁；也就不会满足于一些小小的荣誉，小有成就就欢呼雀跃。说到底还是对文学创作这种劳动的意义的理解。这个问题本来不难解决，你只要往图书馆书架下一站，你只要抽出几本经典的作品来，认真读一下就会明白真正的文学是什么，就会意识到自己取得的某些成绩，虽然对个人而言是值得庆贺的事情，但你马上就会明白不应该耽搁太久，离高峰还很远，只能把这当作攀向另一个高峰的台阶，争取获得实现另一次突破的途径和力量，而不应沉醉太久而耽误了行程。常看到有人在很低的台阶上取得了很小的成绩时，以为就攀上最高峰了，尤其对那些具有潜在能

力的作家来说，因为对文学的理解不足和艺术视野的狭窄，往往把他的天才和智慧浪费了。

我的创作原则没有变，“未有体验不谋篇”。尽管这一个时期没有写小说，但是写了很多的散文，对于文学的思考自觉不自觉地从来没有间断过。创作新欲望的产生，从我感觉上讲，也是对创作过渡到另一种理解的自然过程，我的习作是从短篇开始的，现在重新开始短篇小说写作，仍然很新鲜。就我而言，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中期的写作，我感觉还是不断接近文学本身的过程，直到完成《白鹿原》，这个过程当为一个阶段的完成，也就是说完全接近文学的本身。现在我对短篇写作探索兴趣很大，短篇题材天地非常广阔，作家怎么写都探索不尽，尽管前人（中国人和外国人）创造了无以计数的短篇，仍然留给我们很大的创造余地，谁也不挤（影响）谁。现在才发现，我仍然是对关中现实生活的敏感程度远远超出对历史题材的兴趣和敏感性，《白鹿原》应该说是一个例外。我过去一直关注的都是现实题材，却突然写了一个《白鹿原》这样的历史题材，现在又重新面对我最容易触发心灵和神经敏感的现实生活，包括阅读报纸和感受运动着的生活。最近的五六个短篇都是这种题材的作品。我已经形成了这样的写作习惯，即使写短篇小说，也必须是一个短篇与一个短篇绝不应雷同，不能形成一个似曾相识的稳态模式。在我的创作感觉里，因为每一次体验到的内容不一样，就不可能用一种艺术形态表现它，甚至语言的色彩。每一个短篇都要找到一个新的适宜于表述这体验的艺术形式，它们各有姿态，包括语言姿态。这样的创作发展到以后会是怎么个样子我也不好把握。我的创作是靠感受，感受和体验不是按计划发生的，所以以后的状态真的不知道。

2002年8月12日 原下

聆听耿翔

一

耿翔说，七岁的莫扎特第一次站在管风琴前的时候，“举起的是一双让音乐更神圣的手”，“这双手，把世界弹奏得泪流满面”。

我读到这种诗样的句子便忍不住怦然心动。我的记性已经很差，对这样的好句子却一遍成记，吟诵再三。不说世界是否泪流满面，我相信耿翔肯定泪花涸流，沉醉其中，物我皆忘了。我因此而深为感动。

我为这样的句子感动。我更为写出这样的句子的诗人耿翔感动。暂且搁置文学艺术的话题，单是耿翔在莫扎特的乐曲里的这一份泪流满面的心理感受，首先向读者显露出作者一方纯净而又敏感的心灵绿地。只有这方绿地的纯净，才能保持对社会进程对人的生存对艺术的美的那份敏锐，这是作为诗人作为作家创造生命的关键。这是无须证明的。试想一个玩弄权术咂嚼铜钱而给生活制造龌龊的人，心灵中的绿地早已污脏得根腐叶枯，失却敏感自然难以迎风起舞了，莫扎特的乐曲不仅催不出他的眼泪，怕是连听的兴趣和耐心也没有。

耿翔视觉里的莫扎特和听觉里的莫扎特的乐曲，凝结成的这一组散文，不是一般的音乐爱好者的膜拜和痴迷，更不是一般的欣赏和感慨，而是作为一个中国诗人对一位伟大的音乐天才的情感世界的自然交融和沉浸，是两颗纯净而又极富音乐敏感的心灵的相互映照，是对人类充满博大爱意的灵魂与灵魂的对话。我读这样的文字，领略耿翔笔下的莫扎特和莫扎特的乐曲，也在解读着诗人耿翔。

我第一次晓知耿翔是一位对音乐有特殊敏感的人。耿翔在莫扎特的生命乐章里十分敏感。耿翔沉浸在生命乐章里的时候，感受到的是进入生命体验深层的灵魂的颤音。耿翔展示给我的不是音乐情趣，也不是对乐曲的欣赏或玩味，是坦率而又强烈地倾泻着在生命之乐里的心灵的回响。印象中向来不事张扬的腼腆的耿翔，把灵魂深处与音乐大师的共振和共鸣，如瀑如涓般倾泻出来，我相信是属于耿翔独有的感受和体验了，也相信我更深一步理解这位年轻诗人了。

二

耿翔说，同样在他七岁的时候，“在父亲们的脚心和土地的摩擦中，在母亲们的手心和瓦罐的摩擦中”，感受着音乐。莫扎特的父亲能给七岁的莫扎特提供一架管风琴，而耿翔的父亲给七岁的耿翔提供的是饥饿和一根放羊的鞭子。

耿翔在鞭子的滑响里敏感到了音乐。有一段堪称精彩绝伦的文字——

我坐在被雪埋得很虚的山坡上，除了羊蹄踩雪的声音，万物中更多的声音，几乎都被雪冻僵了。羊有多少寂寞，我就有多少寂寞。我只有倾听，在羊蹄踩雪的声音之外，挣断头发地倾听。就在我鞭子一扬的时候，一种隐秘的声音，通过长长的鞭梢，传至我的耳朵。那是我从未听过的一些声音，它让我坐立不安，它让我血流加快，它让我骨头发热，它让我神不守舍。我不知道，宇宙的深处，也有自己的声音，也有用声音构架生命的信息桥。

被雪覆盖着的中国西北的高原，深沟之间狭窄的皱褶边上，一个可能刚刚识得几个汉字的少年在放羊。这是十分平常的生活场景，几

乎每一个出生在西北乡村的孩子都有类似的生活经历，许多人从这个年纪开始直到老死，才放下手中的那根放羊的鞭子。七岁的少年在雪原上放羊，寒冷是同等的，寂寞是共同的，而耿翔正是在这些共同和同等的感觉之外，多了一分奇异的敏感，鞭梢在冻僵的空气里划过时的那种奇妙的音乐，迥然区别于普通的鞭子的响声。同样的雪原同样的羊群，同样的破棉袄同样的寒冷，同样的孤寂中的同样的一根鞭子，却差别出来一双奇异的耳朵，迥异出这一个。这一个就独秉天赋了。

天赋或者天才是什么？是父母授予的一根神经。这根神经对数字、色彩、机械、文字的选择性敏感，从生理上决定着一个人的兴奋点和后来的兴趣，也就决定着一个人在人类社会各种行业中的职业选择。如果这根神经不萎缩，人的兴趣就很难发生转移，对某项事业的追求就表现出极尽物理万死不辞的感天动地的行状。

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七岁的莫扎特，第一次站在管风琴前举起的手指的奇异现象了。

这样，我们就可以理解初中尚未读完的华罗庚，何以会对数学做出那样卓越的发现了。

这样，我们同样可以理解七岁耿翔在雪原上甩动的那根鞭子，何以会魔幻般地变成一支书写诗文的钢笔。

那根奇妙的神经，一般不受生存环境的制约，金殿与茅屋，披绸挂缎与粗布破衫，山珍海味与粗茶淡饭，高干老子与贱民父亲，满院书画与牛屎猪屎气味，都只会对那根神经后天的发展产生有利或有害的影响，却并不决定那根神经的存在。耿翔独秉一分天赋的才资，并

不因为贫穷而消弭。从中国乡村茅屋破檐下走进中国社会各个领域的杰出人物，一个个在他们的行业里的出类拔萃者，莫不如此。我倒是庆幸，中国少了一个音乐家，却成就了一位卓有建树的诗人——耿翔。

三

耿翔说：“遍地响动的庄稼秆，有一棵，就是我咬牙站着的父亲。抬起头，为你泪流满面。”

这似乎可以看作耿翔写诗的宣言。

耿翔正钟情的乡土诗的宣言。

也可以看作是耿翔从事包括散文在内的其他文学体裁创造的宣言。

我过去读耿翔的诗、散文、随笔，都是零星的，碰到见到时读，很佩服作者不同凡响沉郁而鲜活的言说。这回有了一次集中的阅读，主要是散文。比起诗来，散文使我更近捷地走进这位青年诗人的内心深处，以及内心世界的另一个层面。莫扎特的乐曲和陕北农妇手中铰着窗花的剪子，城市日益缭乱的霓虹灯和黄土高原上的窑洞，虽然雄壮却毕竟僵硬的秦兵马俑和第一次轻叩情感门扉的纤纤手指，正是从心灵的这一层面和那一层面发出回响，雄浑的、缠绵的、朦胧的、锤砸的，正组合成一部又一部生命交响。

耿翔的散文是诗性的。这是我阅读的最强烈的印象。尤其是写莫扎特写陕北和采铜民间几组规模较大的散文，许多篇章，分开排列起来，当是一首首优美的无韵的诗。

耿翔散文的诗性，突出在作者的主观意识十分强烈的感受中。《莫扎特祭》几乎通篇都是丰富的感受性的内心体验，那种体验不属于音乐职业的纯粹的欣赏和审定，而是一曲生命之音对另一个生命激发出来的同样鲜活同样深沉的和声。即便如《陕北笔记》这种通常容易跌入旧巢的纪实性散文，也是凸显着诗人的主体感受，张扬着自己心灵深处的徘徊。二十世纪中期以来，因为毛泽东和他的革命进入陕北，这块被“上帝视为弃地”的高原成为中国最知名的一方地域。半个多世纪以来，多少诗家文人钟情这块黄土地，昂扬者写出了鸿篇巨制的革命史诗，还有婉转悱恻的爱情经典，更多的则是短诗和散文，或者是深情怀念当年饮马延河的恋情，或者是对今日依然贫穷的人民的慨叹，或者是猎奇式的对那洞穴式的土窑和眉眼秀美的婆姨女子的描摹。恐怕再没有哪一方地域会铸成如此浩瀚的文字了。我之所以列述这些现象，只是想例证一点，前边有那么多的作家诗人写下那么多的关于陕北的文字，也给包括耿翔包括我在内的作家堵住了几乎所有的大路和小道，你要再写陕北，你要在别人已经收获过许多次的土地里再搜刨出一块洋芋来，无疑就很难了。

耿翔在陕北被人搜刨翻过无数次的土地里，寻觅到一块硕大的洋芋。

他也写陕北的雪、陕北的窗花、陕北的荞麦，他没有把笔尖停滞在雪原的景象的描写和勾画上，也没有专注一意工笔勾勒窗花的细部，以及漫山遍野的荞麦，而是写诗人自己的感受，面对陕北高原波浪起伏的雪地，面对农妇手中一把剪刀铰出的变形的日月变形的物态变形的牛羊变形的男女，耿翔发出的是一声迭过一声的心灵的喟叹。《文心雕龙》说：“既随物以婉转，亦于心而徘徊。”揭示了包括文学和艺术创造的全部奥秘。在我体会，随物婉转易，无论笔力软硬，都

可以在不同程度上状物，再在不同程度上婉转一番，自然也有高下之分；然而由外入内，由客观描摹到内心之徘徊，由眼观耳闻到引发心灵深处的哲思，就是创作的另一个层面另一番境界了，就不是随性任意发几句豪言壮语或矫饰的呓语所能遮掩肤浅的了。耿翔面对莫扎特的祭词，面对陕北窗花、荞麦，面对陕南的森林和稻田，面对雄壮而僵死的秦兵马俑，发出的正是心灵徘徊的颤音。这样，耿翔就进入艺术创造的更高的境界了，也就区别于所有前人或同代人了，形成自己的艺术个性了。个性化的艺术一旦形成，就不存在被湮没的威胁了。我便庆祝青年诗人耿翔的卓立。

四

耿翔说，要排除“浮躁”，要“澡雪”。

浮躁在今天的社会生活中，已经沦落为一种市井语言，已经普及为所有职业的人的一种感受，任谁都可以随口说出的一个词儿。这个词基本准确地概括了当今的生活气象。人们说着浮躁，似乎多是一种无法抗拒的无奈。耿翔在他的散文和散文诗中也说浮躁，却是认真的拒绝。一个诗人对于世俗气象的清醒和自信，来自精神和心灵家园守护的自觉，为此他多次提出澡雪精神，首先是对自己，自然也是对社会的呼吁。

这种澡雪精神对于诗人对于作家，不仅是一种品德的修养，更重要的是对于心灵中那块绿地的守护，是不断提升人格境界的利器，对于作家感知社会感知人生是至为关键的东西。尤其像耿翔这样已经卓有成就的诗人，创作的进一步突破和发展，更当倚重的是一种博爱的情怀，一种高境界的人格，以及关于人生关于艺术的独立思想。低下的人格境界和平庸乃至龌龊的心怀，是不可能产生自己的思想的，自

然很难发生深刻的独立的生命体验和艺术体验，创作的突破和发展就很难了，天赋的才气就浪费了。

我读到耿翔诗文中的强烈的澡雪意识时，感动而又暗合心拍。我十分鼓舞，正是耿翔澡雪意识的感召。我完全相信，耿翔的人格力量是会壮大起来，感知生命的那根天赋的神经会愈来愈敏锐，好诗和佳作当可期待。

炎炎暑夏，酷热难熬，读耿翔的诗文，如饮清流，得一分艺术享受，得一分心灵的清爽，也得一分沟通和交流的酣畅，确为美事。

2002年8月13日 原下

关注人类命运的力作

读完《情殇可可西里》这部小说书稿，杜光辉又一次给我以惊喜，相信这部书出版后，将会引起文坛的关注和读者的兴趣。

算起来，我与杜光辉交往有二十年了。八十年代初，我和几位作家去陕南重镇安康讲课，那是文学最狂热的年代，竟然有上千名痴迷文学的男女青年听课。讲完课，当我们返回到安康火车站时，一位二十多岁的铁路工人来送行，虔诚地买了兜橘子，让我们在路途上解渴。在站台上等车时，一位同来讲课的作家说，在这一千多名听讲者里面，将来有一个能成为作家就不错了。未及我说，一直站在我们背后的铁路青工搭话了："那个作家就是我！"同行那位作家告诉我："他叫杜光辉！是大巴山里的一个小火车站的工人。"这是迄今为止我和杜光辉唯一的一次见面。平心而论，当时的他并没有引起我特别关注的征象，但这样的自信和勇气却令我振奋。

到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杜光辉的中篇小说《车帮》在陕西文坛引起了较大的反响，看到介绍他的文字，才把这位新星和十年前在安康火车站送行的那位大巴山小火车站的年轻人联系在一起，不禁慨叹，他终于成了那个千分之一。随之，他的一系列中篇小说不断地引起反响。在一九九一年召开的全国青年作家创作会议，杜光辉以其颇为耀眼的创作实绩顺理成章地作为陕西代表参加了这次盛会。在陕西省委宣传部和作协为庆祝建国四十周年选编的《陕西名家中篇小说精选》中，选入了陕西老、中、青三代十九位作家的作品，杜光辉名列其中。我在为这部书写的序言中特别提到此书选编的作品，"是四十

年来最具有成就也最具有影响的作家的代表作，还有一批更年轻也更富于艺术创造活力的青年作家的代表作”。

杜光辉的小说构思奇特绝妙，气势磅礴，文笔冷峻，力求把握时空的高度，给人以心灵的关怀和生命的思索。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他的作品始终关注着人的灵魂的演绎，关注着社会文明的进步。在他艺术探索的历程中，不慕浮华，不被潮流裹挟，终于走出了自己的创作路子，已经凸显出独立的艺术个性。每有阅读之后，便情不自禁地想到安康火车站送别时的那句豪言，一位有才气的作家终于出世。

后来，有人告诉我杜光辉携家带口去了海南。我没有惋惜是出于我对创作的理解，一个年轻而又敏锐的作家进入一个陌生之地，感受会更新鲜更强烈，况且沿海是中国经济最先活跃的地区，当代生活的矛盾和人的心理秩序的变化，更易捕捉。令我颇感意外的是杜光辉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竟然流落在海南街头，陷入弹尽粮绝的地步。就在我甚为忧心之时，他给我来信了，说他找到了在一家杂志社当编辑的工作，结束了窘境。仍然坚定地表白只要有一碗饭吃，他不会放弃文学的。其实，就在他流落街头一天只能吃上一碗面条的时候，也没有放弃文学。我自然可以想到杜光辉对文学执着追求的毅力。不能忘记，那时候，正是文学创作被商潮冲击得有点零落有点贬值的时刻。

杜光辉又进入了创作的一个高峰期，佳作连续面世，《中篇小说选刊》和许多报刊转载他的作品，在读者中产生了普遍的影响。这些作品大多反映海南生活进程，为自己开辟了一个新的创作领域。他的《哦，我的可可西里》获《中篇小说选刊》二〇〇〇年至二〇〇一年“优秀中篇小说奖”，标志着他的创作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我在看完《哦，我的可可西里》后，意识到这部中篇小说触及一个拷问人的灵魂的大问题，一部关涉人类命运的大题材，甚为钦佩。杜光辉曾在电话里告诉我，想把它再创作为一部长篇。现在，这部名为《情殇可可西里》的长篇小说书稿就摆在我的书桌上。

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是人类历史上取得巨大成就的一个世纪，是任何一个世纪都无法比拟的。同时，这又是对人类发生过最严重破坏的一个世纪：规模最大的两次战争，储存着足以毁灭地球的武器；地球资源被无休止地掠夺，野生动物濒临灭绝……《情殇可可西里》这部小说，淋漓尽致地展示了这个关于人类本身合理生存的命题。

杜光辉的这部长篇力作，描写一支解放军的测绘分队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期，进入可可西里无人区执行测绘任务，在那里和野生动物、和大自然、和人性中的善恶发生的悲怆、凄婉、鲜为人知的故事。故事一直延续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好些当年的军人在可可西里又发生着生命和鲜血、友情和利益的剧烈冲突。是一部故事新颖奇特、人物鲜活，具有现实认识意义的精彩小说。

杜光辉当年曾作为这支进入可可西里的解放军部队的一员，亲身经历了可可西里无人区那惊心动魄的一幕，以及他在青藏高原多年的汽车兵生活，为他创作这部小说积累了丰厚的又是独有的生活素材，写出了一个个抒情又扣人心弦的故事。这部小说的文字极富表现张力，勾勒出一幅幅雄浑苍莽的画面，真实地展示出苍凉、美丽却又危机四伏的可可西里。作品犀利地剖析着人的灵魂中的美与恶，人类的真情、友谊、道德，在利益冲突中的背信弃义、杀戮，发出一声声回肠荡气的呼唤，发人深省。

有评家说，杜光辉的《哦，我的可可西里》是新世纪中国文坛出现的精彩小说之一。我也毫不夸张地说，《情殇可可西里》当是近年出现的长篇力作之一。

2002年夏

关于《走向混沌》的通信

维熙兄：您好！

内蒙古之行，我对老兄才有了最切近的感知，真是太难得了。您赠的大作《走向混沌》拜读过了。我要告诉您，这是一次惊心动魄的阅读。这样的阅读许多年都没有发生了，即使世界名著中的小说也没有产生这样令我多次闭上眼睛气不能出的噎死的感觉。残忍、丑恶、伪善这些通常的词汇都在巨大的生活真实里变得没有意味了。同样，在巨大的真实里，许多问题不需言说而明白如镜了。您把这样一部作品推到中国当代图书馆的书架上，其他什么东西都可以不在乎了。这部书的意义，对于当代人是重要的，对未来的国家可能更具有意义。这是任何小说都无法取代的。我向多位朋友推介这部书，直言有存档的价值，对于研究民族的精神历程是最可珍贵的资料。

我们相识已久，了解却从这部书开始，表示诚挚的钦敬之意，请保重，并向夫人问好。愉快安健。

忠实

2002年10月15日

附：从维熙回函陈忠实

忠实老弟：

来信收读。与燕祥和老弟同行北国边陲，是一次北国风光之外的精神享受。多少年了，我的龟型生活态度，让我婉拒了许多邀请，而

龟缩在书斋独善其身，因而我这次与老弟同行，真是一种缘分。说起来也挺可笑，你在精神上首先对我产生刺激的，是在北国的初秋，只穿一件空心单衣。最初，我想是弟妹的失职，后来我才想到这是陕北高原汉子的洒脱与无畏。之所以产生了如此联想，一是听在京的陕西妹子刘茵谈及；二是在几年前阅读过《白鹿原》之后，产生的一种臆断——自古有文如其人之说，一个没有宽阔胸襟的男人，是难以把描述其复杂的历史经纬以及活在那个年代众多人物的笔墨张弛到那种广度和深度的。因而，你给我留下男子汉的印象，是有多重含义的。九九归一，你是文坛的一个自成方圆、有棱有角的汉子。

感谢你对《走向混沌》的真诚赞许。读你的来信时，正是我的酒后，因为酒后放形之故，因为你这封笔飞墨舞的来信，而又多喝了几杯；但酒醒过后，我当真感到了一种莫名的悲凉。面对非正常年代的人文历史，我的笔墨太乏力了，虽然竭尽了全部心神，想给流逝过去的岁月留下一点东西，但远远没有能表达出其斑斑血色之万一。因而，在二十世纪之尾的一九九八年，我重访我流放过的故土时，面对我曾为囚时的大芦花荡，深深地鞠了几个大躬。这是实话。记得几年前，姜文曾为《走向混沌》搬上银幕的问题，来我家家访（当时他只看到了三部曲中的第一部），我也把上述认知告诉了他。这不是谦虚，而是内心的自责。

但是，留下历史的真实形影，总比一片空白要好。不知回头自视民族缺陷的人，正是鲁迅先生笔下所深恶痛绝的。不是吗?

愿你我在这方面做得更好！

别后，十分想念。何日来京一聚，当尽地主之谊矣！

附笔问候弟妹安好！顺祝秋安！

维熙

2002年10月25日北京

解读一种人生姿态

一

在散文《做一个简单的人》中，邢小利说他的朋友给他取了一个绰号，叫“邢直白”。这个绰号主要概括的是他的说话特征。

我和小利在一个单位的院子里和一幢住宅楼上工作生活了近二十年，关系可以说不远不近，疏疏朗朗，为公事打交道自然免不了，为私事打交道也是常有的，却不大留意他的说话方式。听到“邢直白”这个绰号，我想了想，不禁惊讶它的传神。如果就性情而言，“直白”这个绰号还真的是准确而又形象的。邢小利说话，不拐弯抹角，不口是心非，不看脸色也不看顶戴级别，是什么便说什么，直截了当说出来，直到一句几句把事说明白了。这自然是他为人处世说话的方式和特征，几十年如此一贯下来，他的朋友抓住这个特征再奖给这个不错的绰号，他也乐于领受。

我读小利的散文随笔，同时惊异地发现，他的文章的共同特征，竟也可以用“直白”二字概括其风貌。生活现象、人生情态、文学话题、历史旧事和现实热门，在他笔下，没有花里胡哨云遮雾绕终不得要领的虚空，也不见无病呻吟拿腔捏调的矫情和伪饰，全是真有所感真有所得的言说。言说的方式是简洁明快，以至语言都很少有形容词的修饰，凸显出来的印象便是直白。过去零星读到小利的文章，似有这种印象，这回集中读一部散文随笔书稿，更有这种总体风貌和本色质地的明朗感受了。

无论在纷繁的尘世生活中说话，还是在喧嚣的文坛上书写文字，在当今能做到直白，颇为不易。直白，既是一种语言姿态，更是一种人生姿态。我的脑海里现在就浮出来那个戳穿皇帝其实什么衣服也没穿的孩子。这个孩子就是以一种直说的姿态面对皇帝的，直到把话说白了。

二

最能见出小利人生姿态的是散文《做一个简单的人》。“我说的简单的人意思是：为人处世，特别是与人交往，尽量化繁为简，而不要把事情复杂化，更不要耍心眼，与人钩心斗角。”可以看作是他的立身宣言。

文章总是感时应世而出的。时下的社会生活形态，似乎恰恰是复杂化。即把很简单的事和处理这些事的最直接最规范的途径废置，寻求某种曲里拐弯草蛇灰线暗箱操作的幽径，取得一个意料不及面目全非又是出奇制胜的结局，名曰生存智慧。生存智慧酿造生存技巧。官场擢升商场暴利乃至文坛出名，更显灵的就是此道了。敢于挑战这样的生活世相宣言做一个简单的人，必定是见多了也洞透了所谓生活智慧和生存技巧所演示的龌龊，而独守一分清静，继而发出做一个简单的人的宣言，独立成一种人生姿态。

小利引用一个曾经有过显赫声名的红卫兵头目的话：“在政治上只有头脑而没有良心。”小利断定：“简单的人肯定做不到这一点。简单的人是讲良心的。”这里就划开了一个最基本也是最严峻的人生界限，即良心。良心的界限毁弃了，黑可以说成白，丑可以说成美，指鹿为马也不觉得荒谬了。良心毁弃的唯一因素就是某种生存目的的实现。譬如说在某种非正常的环境下，譬如说在自身能力和条件尚不具备的

情势中，而要达到权欲的名利的生存目的，就得玩弄生存智慧生存技巧了，就不能简单地把黑说成黑把白说成白把丑说成丑把美说成美把鹿说成鹿把皇帝说成什么衣服也没穿的光屁股。指鹿为马的中国历史典故，正好为安徒生的童话《皇帝的新衣》提供了生活的依据或注释，前者为生活真实，后者为艺术真实，相得益彰，鉴示中外古今。为什么会把这样简单的事象完全弄到面目全非复杂混账呢？任谁都不会怀疑洋的和土的两帮重臣文化高低造成了失误，都是为了生活得更好的目的而讲究了生存智慧生存技巧的必然结局，良心显然没有了。这样，我就意识到关于简单的人的真实内涵，并不简单；而要做到一个简单的人，更不简单。其中丰厚而又严峻的意蕴是，守护良心，守护心灵家园的纯净，坚守作为一个人的尊严。

在《知识分子：神话与现实》一文中，小利列述了几位古今中外关涉知识分子操守的比较典型的人际关系，论说的是作为知识分子的品格。品格的核心就是良心，或曰良知。“正是有了变节者才显出守节人的可贵。”变节者之所以会变，就得先把良心变了；守节者之所以守住了节，关键是守住了良心。变节者变的过程，就是运用生存智慧生存技巧大显神通的过程；变节者变的结果，起码暂时达到了或擢升或牟利或扬名的生存目的，自然就把事象包括变节者自己都变得复杂化了。守节者坚守的过程，就是守护良心也守护作为一个人的尊严的过程；守节者坚守的结果，却可能被冷落被穿小鞋被戴“帽子”乃至囚禁杀头。

这篇论说知识分子的随笔，可以当作关于“简单的人”这个概念的理性阐释。

在流行生存智慧生存技巧的生活流里，直言不讳标出自己的人生姿态，作为一个当代作家，就标示出清晰而又简明的人生坐标，一种

凛然的清醒和自尊。

三

在散文随笔集《种豆南山》的阅读中，我的欣赏兴趣和既得启示后的兴奋点渐渐集中到一点：索解一种境界、一种情怀、一种人格、一种思想和这种思想发出的一种声音。正是这些形成作家邢小利独秉的人生姿态。

人的一生依着年龄划分出几个大的年轮区段。其中的三十、四十、五十岁当是最重要的三个区段。即使最寻常的男女，也会在这些重要关隘上发生自己的人生体验，敏感的作家就不用说了。小利在《四十感怀》里，整个是一派透亮的境界。这篇文章十分动人。作家奔到四十岁时关于世界关于生活关于事业，尤其是关于自己本身的理解和体验，进入一种哲理的睿智境界。因为真实，因为真诚，因为坦率式的直白，读来令我感动。我也读过一些包括政要在内的许多公众名人的此类述怀文章，参差不齐，无可厚非。但有一个基本的尺码就是真诚。如果一个人到了需要郑重宣示重要年龄区段上的感怀时，还说假话，还矫揉造作，我还能指望他什么时候真诚与人相对呢！小利的《四十感怀》，不单是真诚，难得的是使自己的生命提升到一个新的高度新的境界：

到了四十，只有两个感受：一是思想上顽固了，排斥的东西多了；二是心淡了，很多事也看淡了。当然看淡之后，对有些东西却更看重了。许多过去看轻的今天却觉得无比重要，许多过去看重的今天看来却不值一提。

我读到这里便久久徘徊在这段文字之中。我并不急于探究文字里面“顽固”着什么“看重”着什么“不值一提”的又是什么。我确凿感知到在四十岁这个最重要的年轮到来时，小利完成了一次意义非凡的生命价值的择向，完成了一次从心理到精神的剥离，进入一种全新的人生境界了。进入这个境界的作家，才敢提出做一个简单的人，才敢说良心，才敢审视知识分子的变节和守节，才敢鉴示历史的、现代的和正在运动着的现实生活中的知识分子灵魂操守上的种种。

在这样的人生境界里所展示的人生情怀，既是清丽沉静的，又是美丽动人的。清丽的情怀决定着作家生命的敏感和敏锐，对纷繁的生活事象，对气象万千的大自然，都会发生独有的体验，然后展示给读者一篇美好的文章。我很惊异小利在乡间读书的感觉。“在乡间读古人的著作觉得特别相宜，心能静下去，而读西人的书和今人的书，总觉得与情境更与心境不那么相宜，看不进去。”可以想象，在鸡鸣牛哞声中，在左邻右舍从墙头上弥漫过来的柴烟里，在深夜无边无际的静谧里，一位年富力强的青年作家在阅读中国古典的情景，浮躁和喧哗无染，自然使我想到“拥书自雄”的喻说。

在《乡居致友人》散文中，有一节关于雨的描绘——

夜里听风雨声，那真是很美的。若是柔风细雨，那就像是一个害羞的小女子欲来不来的样子，偷偷地藏在门外，躲躲闪闪的，招招手忽儿来了，迎上去忽儿又走了。若是大风大雨，那就像是旷野里万马奔腾，真有排山倒海之势。此时披衣坐起，静听万马奔腾之声，心中忽地生出一腔豪迈之情，思绪飘得很远……

这是我读过的文学作品中关于夜雨描写的最动人的篇章之一。这样的文字读过是不会轻易忘记的，可堪反复品味的。这样的文字是经

过乡村细雨的滋润和滂沱大雨的拍击之后发出的心灵的颤音，属生命与自然交融的独特体验，只有纯净清丽的情怀才能敏感发生，不是凭想象凭文字功夫所能得到的。

在作家总体的人生姿态里，境界、情怀、人格三者是怎样一种相辅相成又互相制动的关系，是一个很值得研究的话题。是情怀、境界奠基着作家的人格，还是人格决定着情怀和境界，恐怕很难条分缕析纲目排列。我在小利的书稿阅读中，看见了一种境界、一种情怀，更透见一种令人肃然的人格精神。“在强权面前，有人被打折了腰，有人被按着跪倒，有人战抖着趴在地上，却也有这些节操高尚、宁死不屈的文化人，正是他们挺起了知识分子的脊梁，维护了知识分子的信念与价值。”作者所列举的这些形形色色的事象，任何一个知识分子甚至普通人都不会陌生，在诸如封建专制异国侵略以及极“左”政治这些强权面前，知识分子的种种表现，无论怎样五花八门形形色色，核心就是投降与否。而决定投降与坚守的关键便是前文已涉及的良心。

作为人的生理上的音质的软硬，小有差异，而决定知识分子骨质软硬的东西说到底是良心。小利论述这个作为知识分子安身立命的大课题的时候，就凸显出自己的价值取向，一种披阅古今剖皮见核的追问，自我人生选择的坐标就标示出来了。

如果说对已经沉寂的历史人物品格的坚守与投降的辨析，可以看出小利冷峻的犀利，那么，对当代知识分子人格操守的剖析，就复杂得多也费力得多。我读他评论长篇小说《沧浪之水》的长文时，已在此之前强烈地感受到这个问题，即当代知识分子的投降与操守。优秀的小说提供了一个可以让评论家说话的文本，但作为评论家出场的邢小利的理性的透彻，同样显示出自己在当代生活中的人格形态。

人格对于作家是至关重大的。人格限定着境界和情怀。保持着心灵绿地的蓬蓬生机，保持着对纷繁生活世相敏锐的透视和审美，包括对大自然的景象即如乡间的一场雨水都会发出敏感和奇思。设想一个既想写作又要投机权力和物欲的作家，如若一次投机得手，似乎可以窃自得意，然而致命的损失同时也就发生了，必然是良心的毁丧，必然是人格的萎缩和软弱，必然是对历史和现实生活的感受的迟钝和乏力，必然是心灵绿地的污秽而失去敏感。许多天才也只能徒唤奈何。邢小利的随笔中多处涉及知识分子的品格和人格，可能是他鉴于古今的太多的教训，对当代人的一个切中主脉又正在被忽视的提醒。

人格对作家的特殊意义，还在于关涉作家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尽管米兰·昆德拉引用过“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的欧洲民间谚语，然而我理解的昆德拉，正是人类一位深刻超人的思考者。关于人类合理生存的思想，几乎贯穿在他的所有小说创作之中，甚至某些地方露出艺术形式载不动深重的思想的纰漏。作家必是思想家，这是不需辩证的常理。尤其是创作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作家，在实现新的突破完成新的创造时，促成或制约的诸多因素中最重要的一点便是思想的穿透力。这个话题近年间已被文坛重新发现，重新论说。现在我要说的只是思想和人格的关系。

作家穿透生活迷雾和历史烟云的思想力量的形成，有学识有生活体验有资料的掌握，然而还有一个无形的又是首要的因素，就是人格。强大的人格是作家独立思想形成的最具影响力的杠杆。这几乎也是不需辩证的一个常规性的话题。不可能指望一个丧失良心人格卑下投机政治的人，会对生活进行深沉的独立性的思考。自然不可能有独自的发现和独到的生命体验了，学识、素材乃至天赋的聪明都凑不上劲来，浪费了。

小利的文学评论、散文和随笔，除了学识，除了艺术眼光这些大家都可以得到的优长之外，便是思想的力度。上述关于知识分子精神操守的话题，如果从作家创作发展的个人角度说，都是至关重大的关键所在。我正是在这一点上感知到一个外温而内刚的邢小利，一个熟识而又陌生的令人钦佩的年轻作家。

四

小利与说话相似的直白的文字，很耐得咀嚼，很富于魅力。

平静地叙说，尤其是随笔，摆列事实和史实，描人状物，简洁明快，娓娓道来，不冰不火，没有激烈极端的措辞，客观而准确的言说，温厚平实，幽默内蕴，更具思辨的力度。这在表面上看来是文字风格，却更多地见着作家的性格。民间有谚，有理不在声高。是否有理，凭高喉咙大嗓门是无济于事的。由此可以说，这种文字更表现着作家邢小利的自信。即如《“自由职业身”的前提》《我当县令》这样与具体对象辩论或曰商榷的文字，不管对方曾经使用了多么激烈的话语，小利仍然用自己说话（文字）的方式，正题正说，不隐不伏，不搅不缠，不哗不嘘，而是坦坦荡荡，事与理俱存，给人一种透彻、一种清爽、一种阅读的舒服。我这样说，难免会造成缺少思想锋芒的错觉。其实，邢小利在历史和现实的某些话题的辩证中，内质是锋利见骨的，偶尔也会在文字里迸出诸如“下流无耻”“勾当”一类贬斥变节投靠出卖灵魂的行为的词，更见血性。

小利的文字，似乎透见学者的气象。学者当然有各路学者，就文字形态而言，更显现着中国古典文化和语言的质地。我约略感知，小利读过许多古典，尤其是古典杂说一类，他的文字和论说的方式，就

有了现代的白话文的一种颇为独到的语言姿态，又避免了某些食古而不能消化者的半文半白的蹩脚现象。

语言说到底是思想的载体。语言蕴藏着作家的思想，其分量最终定砣在这里。通过语言，感受到作家的体验、作家的情怀、作家的境界、作家的人格。小利的这种可以用直白概括的语言风貌，恰切而鲜明地展示着他的思想、人格、情怀、境界所形成的体验，独立不群的人生姿态。直白不是浅露。我联想到鲁迅“我的后院里有两棵树，一棵是枣树，另一棵也是枣树”的句子，顶直白了，然而内蕴的丰厚和深沉，怎么也咀嚼不尽。我在小利的语言里，隐隐感受的就是这样令人咂品久久的韵味。

五

去年春节刚过，我回到冷落多年的乡村老家，一个人住在白鹿原北坡下的小院里，头一个黎明到来时，我听见了几乎隔世的斑鸠的叫声，从窗玻璃上看到后屋屋脊上两只灰褐色的斑鸠，眼睛瞬间模糊了。之后某日晚上，我坐在火炉前读书，接到小利的电话，与我说一件什么事已经不记得了。他告诉我他住在城南长安乡村的屋子里，我随口便说，君在城之南，我在城之东。说着时颇多一重异样的心理感觉，总之是与居住在城里的人那些通话截然不同了。他与我之间横亘着白鹿和少陵两道原，还有两条小河，似乎有某种地脉的牵连。许多年在一个机关院子里工作，在一幢住宅楼的同一个门洞里憩栖、出入，似乎都没有这个电话给我那种异样的心理感受。我因此而明朗了一点，居地的地理气象会影响人的心理秩序的，进而也影响人与人的感觉的。

在我印象里，小利在生活中是很善于与人相处的，总是一种不急不躁喜眉笑眼的温润的样子，我很钦佩他那样年龄的人能有如此好的修养。也因为年龄距离较大，多年来属于关系疏朗而缺乏亲近的那种。后来外出同行有一次夜谈，他很坦率地对我说，他有时候脾气是很大的，我一时无法相信。他举出例子来，我在领受他内刚的同时，更感动于他的坦诚。然而总体印象依然是涵养和温厚。随笔中写到一位有负于他的朋友躲避与他碰面，偶然撞见时他依旧宽容，读来令我感动，也印证了我的印象。

今年夏天，王旭烽从杭州打电话来说事，提到邢小利为她写序的事，很兴奋也很感动。她说，人民文学出版社要出她的中短篇专集，按套书体例要有序。她的朋友向她推荐邢小利，她没听说过这个名字。一万多字的序寄给她读后，便有了给我打电话时的溢于声音的激动，说这是一篇对她的作品分析得最准确的文章。随之又对我说，这样有学问的评论家为什么她竟不知道呢。我便开玩笑说，他还没学会炒卖自己。

邢小利写中短篇小说，写散文随笔，更见功夫的是文学评论，已出版多部专著。王旭烽的惊讶在我觉得毫不奇怪，正好例证着我上述文字对他做人作文的印象。

我写着有关邢小利的文字的时候，窗外是细雨滴滴，檐水跌落之声温柔而富于诗意。我在解读一部书稿，也在解读一个比我年轻许多的青年作家的心灵秩序，自己竟然很感动。我住在城东的原下依旧。邢小利还在城南长安的乡村和我一同聆听乡村秋雨檐水的跌落之声吗？我便祝福，天行健，君子当自强不息。

2002年10月19日 原下雨中

自在的抒写

读山云的散文，能感觉到作者自在的生活情态和舒朗滋润的心态。散文无论怎样定义，都避不过作者所见所闻所得所感的真实抒怀这一特质。了解一个作家最简捷的途径，便是阅读他的散文和随笔，这是作家关于世界关于历史关于现实的最真实的言说。或者说，作品的形态形成了，作家的心思和情怀也就展示出来了。山云是一位尚未谋面的作家，我没有任何印象，作品也是初次拜读，自然就只有依赖文字窥视透析其内了。

集子里有一组写亲人亲情的散文，写了父亲母亲大姑妻子和儿子等有血缘相连的亲人，读来令人动情。作者从村里走进已趋繁华的都市，生命之脐还联结在乡村的血管上，又能以一个当代文化人的视镜和情怀回嚼已逝的和正在运动的生活。亲情在任何人的情感世界里都是最敏感最黏稠的一块，也因各自的生活形态的差异而有不同的感受和体验。山云和他的亲人们是在灾难重重的乡村生活里体验这种亲情的，便透现出艰难困苦中人的情感人的美德和普通劳动者的人格。许是秦晋地理相近习俗也相近的缘故吧，我读到这些篇章时更感受到一种切近的温馨。

山云的散文视野很散漫，涉猎面十分宽泛。写他的家乡侯马市的文物遗存历史典籍，描绘生动准确，考据凿凿，在大的历史背景里叙说一人一事一物，让人惊讶小小一方地域所经历的历史演进中遗留的鳞爪。这一组散文，把真实的历史事件和民间传说融为一体，写得十分活泼，如数家珍，如说沧桑，如道古经，可见作者知识的丰厚，亦可见对故乡历史人文的关爱之情。写山西传统风味食品的一组散文，

形象逼真，风趣盎然，情态百生，既富于知识性，又可见民风民俗中所隐含的晋地文化演变。有诸多篇章写到读书的种种感受，其妻其子其女以及作者本人，多年来读书选择中的变化，互相推荐互相讨论，其情其态，构成一个令人羡慕的氛围，也让人感动在浮躁的俗世中，居然有这样一块读书自陶的福地。我正是在这些文字的叙说中，首先感受到山云自在的生活情态和舒朗滋润的心态的。这无疑是人生的一种绝佳的生存形态，也是最佳的心理状态。用古人话说，叫拥书自雄。

山云的语言变化灵动，多姿多彩。直抒胸臆，无遮无掩，尽兴写来，时见率真。我看到的语言，大略可以感知作者的性情。明快时短句排出，沉郁时长句缠绵，抒情时柔若水漫，动情时字颤句抖，真性情之人也。

2002年10月27日 原下

阳光明媚

大约是八年前了，鲁曦穿着橄榄绿的公安警服来省作协找我，便知道公安系统有一位青年女作者，却也未必惊诧，各个行业里都有偏爱文学并创作着的青年，已是司空见惯的事。真正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鲁曦很自豪地告诉我，她是全国三八红旗手，刚刚开完颁奖会回来。我便刮目相看，不再当作一般文学爱好者的随意交谈了。也许是我自幼接受的教育以及阅读的长期影响，形成了对英雄以及那些对公众事业做出杰出贡献的模范人物的崇敬心理，即使如鲁曦这样小我许多岁的年轻人，也仍然使我不由肃然起敬。及至鲁曦说她多次抓捕过犯罪分子，我才真正惊讶了。文文静静坐在我面前的鲁曦，我无法想象她扭住罪犯时会是怎样英武的姿态。这样的印象自然是任何行业的作家都不具备的。

后来的七八年间，在咸阳的几次文学聚会上见过，匆匆间不及深谈，却也知道她已调入一家报社做文艺版编辑，和她的兴趣爱好合辙了，我却暗暗遗憾公安队伍缺失了一位巾帼英雄。国庆节放假期间，鲁曦找到我，带来她即将要出版的一部散文集书稿，嘱我作序，我便得知她在文学创作上又逢着大年——丰收的年景了。

鲁曦的散文里，有很鲜明的思辨的色彩，这是这本集子里很富于力度也颇具分量的一部分作品，也是我始料不及却更增阅读兴趣的内容。粗浅的印象里，鲁曦文文静静平平和和，不太爱说话，而散文里却是另一番风姿，由一件小事引发，逐步展开，搜里察外，左右腾挪，纵古贯今，从生活常识提升到哲理高度，思路清晰，语言鲜活，一种生动和生气弥漫在文字之中。《尘埃》中关于人的创造价值和生

存意义的思辨，已经触及既是恒久又是当代生活中的一个重大课题。《与老虎合影所想到的》更是一篇思维敏锐极富力度的随笔，失去了虎性的老虎实则连猫也不如了，给人以启迪和警示，足以显示鲁曦内心里不苟同不平庸不尘俗的独立精神。

散文更直接地标志着作家自己的志趣，展示着作家的人格。在《关于人格的话题》里，我读出了鲁迅《一件小事》的意蕴。鲁曦写到与三轮车夫、理发师等的短暂接触，对他们通过诚实劳动获取报酬的自信与自尊，以及他们的善良和动人的同情心，随手拈来，言简意赅，生动而又真实可信。其中有两点给人启示，他们对贪官的蔑视和不屑，势不大却力沉千钧；再一点就是作者的自省精神，把两位普通不过的职业平民，作为生活的镜子，把自己的内心解剖开来，比照鉴示，反复擦拭，保持灵魂的纯净，提升自己的境界和人格。这样的作品既描绘了生活底层涌动的暖流，也毫不含混地标志出作家追求的人生境界，感人至深。《如莲的心情》当是前文的内心注释。任谁都知莲出淤泥而不染，然而真正在当今的浮尘的俗世中，道以莲的品格就不易了。鲁曦的散文中多处展示着这一清醒的志趣，守护着内心一方洁净，令人感佩。

《感谢上苍》是充分显示鲁曦才华的一篇佳作。作品从不起眼的家中的一盆花一缸鱼起笔，使我误以为又是常见的那些养花喂鱼的闲情逸致之类，不料作者笔锋一转，走出家门，踏进熙熙攘攘的生活流中，峰开路阔，气象万千，春日景色的点缀，扶助小孩过水潭，沉醉夕阳的老人，忙忙碌碌的众生世相。笔锋又一转，及至大江南北，东部西部，纵横捭阖。再一转又回到作者自身，给母亲在母亲节的祝福和接受儿子的祝福。这样大的景象，这样庞杂的世相物象，作者自由纵横，上下翻卷，自如随意，不留硬伤，不见凿痕，令人叹为观止。

及至末尾，笔锋回到自身，人生和事业，耐人咀嚼不尽。通篇洋溢着作者的激情，可以透见心胸里和煦的阳光。

朋友向我介绍说，鲁曦干工作，被誉为老黄牛。我一时竟不解，一位年轻作家，何以会有这种称呼，这种称呼一般都是奖给那些少说实干性情木讷的男人的。然而朋友再三说，鲁曦干工作就是这样，忠于职守，认真扎实。读了鲁曦的散文集，我也就更多地理解这位年轻散文家了，她把对世界对生活对人生对自己的诸多体验诉诸文字，展示给世界，在生活中，她便实践着自己的人生理想，原也不需要表白了。我尤其看重的是，作品通体都弥漫着一种乐观健康的人生态度，便想到她胸中那一缕阳光的温和和明媚。

2002年10月28日 原下

致西部作家研究中心的信

炜评：

您好！

得悉西北大学文学院筹办的西部作家研究中心即将成立，表示最真挚的祝贺。在我看来，这不仅对陕西文学和西部文学，而且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和创作的发展都是一个意义非凡的大事。现当代文学史上，西部有一批作家创造了彪炳新文学史册的不朽之作，研究他们和他们的著作，其意义绝不只局限在西部，而是整个国家文学事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令我更为感奋的是，这个研究中心是在作为百年老校、名校的西北大学诞生。就我粗略的印象，欧美的许多作家尤其是文艺理论家，大都供职在许多名牌大学的文学系里，他们对文学发出的声音往往是举足轻重乃至权威的。对他们国家的作家的创作的评介和传播也是如此。我们国家正处于改革发展之中，政治的、经济的机制不断发生新的适应性变革，逐渐趋向合理和健全。文学的发展也是这样，也在探索和寻求更有利于作品产生、作家成长、作品研究的健全途径，即更能激发作家活力和文学批评活力的机制。西北大学文学院首创西部作家研究中心，当是这种探索的重大举措，把西部作家的创作活动纳入一种学术研究，肯定会使创作和理论更趋向文学本质，逐渐排除非文学因素对创作和批评的干扰。几乎在全国的各类报刊上，都能看到对公正的文学评论的呼吁。从这个意义上说，对当下起码在西部文坛建设健康的批评话语环境是可以期待的。

新时期陕西省冒出颇为瞩目的青年作家群，几乎同时诞生了一个以研究这批中青年创作的业余组织——笔耕评论家小组。现在活跃在陕西文坛的卓有成就的作家，都进入过笔耕评论家的视境，得到过他们“挑肥拣瘦”的品评——自然是热心热诚的朋友式的评价，又是高屋建瓴的直言不讳的指导，对于这一批作家的进步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这作用的关键之处，是他们自信的树立和更高的目标的追求。在我本人，依然怀着一种温馨和感激的情愫，回忆笔耕的老师们。现在，西部作家研究中心的成立，从体制说更趋合理，从阵容看更雄壮，从牌子说更显亮，没有理由不感到鼓舞。

陕西有一批中青年作家已经形成新的阵势，其中一批小说家、散文家和诗人，已经开始在全国文坛造成较大影响。陕西同时也出现了一批更年轻的评论家，顺理成章担负起了新的既面对陕西和西部、也面对当代文坛发言的责任。我唯一寄望您的是，在有计划进行西部作家研究的时候，即对已经取得大的成就的作家重点研究的过程中，亦应关注中青年作家，要对他们创作的探索直接关注，道理很简单：未来陕西乃至全国的文学发展，更看好他们。

我因外出，不能赴会，确实感到遗憾。这个研究中心的建立太重要太适时了。祝您和与会所有朋友愉快。

陈忠实

2002年11月6日

多重交叉的舞蹈

峻里终于要出小说集了。他嘱我作序，我没有推辞。

峻里是灞桥人，我的乡党。我们隔河而居，我在白鹿原北坡下的灞河川道里，他在灞水之北骊山南麓的山岭上。晴明透亮的时日，从我家门前的场塄上隐隐可以眺见被树木笼罩着的山岭上的小村庄。

认识峻里大约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第一个春天。西安郊区重新划为三个小区，我自然选择了我的老家所在地的灞桥区，住在灞桥古镇的文化馆的小院里，分工为文学创作，便有了直接接触乡村和附近厂矿文学创作爱好者的机会，尽管我也还是一位业余作者。峻里在那时候是灞桥地区最年轻的作者，大约刚刚走出校门，很俊气，却不大爱说话。业余作者每有集会，总是争相发言表述己见，场面生动热烈，乃至因观点相逆趣味各异而发生激烈的争论，峻里常常是静悄悄地坐着，很少参与其中，大家能谅解的缘由可能是他的年龄；留下更深印象的是他的作品，我和几位朋友都将他看作是一位很有灵气很有潜质的年轻作者。

二十余年过去了，峻里把这本《在阳光的皱褶中跳舞》的书稿拿给我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是似乎来得太晚了。毕竟二十年了，才有第一本书出版。所以在本文开头用了“终于”这个词儿，以记录我拿到书稿时最初的这种感慨。

及至读完书稿，一个说来非常熟识的峻里，却让我完全陌生了。这是艺术世界的陌生。峻里展示给我一个完全陌生化的艺术世界。我过去读过他的个别中短篇小说，留下的尽管不错却毕竟单一的印象，

完全被陌生的又是崭新的艺术景象覆盖了。峻里默默地进行着小说艺术的探索，已经成为品位高雅独具个性的小说艺术品格的作家。我顿然又生感慨，默默无闻的峻里被忽视了，或者说他的艺术创造的实际成就没有得到应有的与之相称的评价。民谚常常概括出的生活哲理形象而又生动：爱哭的孩子有奶吃。这个更多地体现着生存窍道的现象也引入文坛，尽管谁都明白不会发生普遍的持久的效应，尽管众口一词众刊一声都在鄙弃某些炒作，然而爱哭的孩子还是一味地哭着，哪怕是短暂的效应也是一种满足和诱惑。在这样的时世里，太持重修养太君子风范，就可能造成峻里这样令我感慨的状况。

峻里的小说给我最直接的印象是“城乡交叉地带”的纷繁复杂的画面。我自然想到路遥宣言他切入现实世界的视点是“城乡交叉地带”。峻里究竟有心还是无意，我似乎没有见他宣示过什么主张，然而这部小说集展示给我的生活画面，用“城乡交叉地带”来概括当是最恰切准确的。从乡村土窑院里进入城市的知识分子和干部，从城市的各个角落被排泄出来沦落到乡村山野的被改造被“再教育”的政治异己和“下乡知青”；出身农村却有了城市人特征的乡村教师乡镇干部，新时期从乡村进入城市在商潮中沉沉浮浮的乡村青年；那些职业属性为知识分子而身份仍为农民的民办教师，那些身份属性为“公家人”而心理质地仍为文盲或农民的搬运工、收猪员等等，他们生活在或曾经经历过这种城市和乡村的交叉地带，毋宁说他们的身份和精神正处于代表先进文明的城市和代表落后愚昧的乡村的交叉和冲突之中。种种因为这个“交叉地带”的生活落差所惊现的心灵世界的奇观，让我窥见生活在这个地带的高贵者和卑贱者，得意者和失意者的心理秩序不断发生的颠覆和平衡的过程，正好可以透视和把握生活演变过程的脉象。

一个时代或一段特殊的生活潮流的气象，是由生活在那个时代或那一段生活潮流里的各色男女的心理情绪和心理秩序营造而成的，这是普通常识。作家通过对他笔下人物的心理情绪心理秩序的准确把握微察透视精到描绘，这些人物就成为唯有那个时代或那段生活里才会出现的人物，当代的读者尤其是后世的读者，正是通过这些人物的心理情绪心理秩序的演变曲迹，去了解去洞察那些过去了的生活和时代的社会气息和社会脉象的。我以为这是评判一个时代的优秀作品和平庸之作的根本所在。那些世界名著和我们的古典与现代文学的经典之作，都是首先具备这样的品格。即使如鲁迅的短篇小说《风波》，被剪掉了辫子的七斤所发生的心里慌乱六神无主的种种行为，正是以辫子为标志的价值观念道德观念乃至审美情趣，都被骤然兴起的强迫性的变革颠覆了；以辫子为标志的诸多观念所织成的平衡的心理秩序，在毫无精神准备的情势下亦被打乱被颠覆了；心理秩序的紊乱，才造成了（七斤）行为的惶惑和失措。我们正是透过一个最僻远的乡民七斤的生理行为和心理秩序，透视到二十世纪初发生辛亥革命那个时代的社会气象的。这样一个生活细节的思想和认识的含量，可能超过一部几十万字的热热闹闹的演义类小说。

首先是作家的思想，在这致命严峻的一道坎上经受折磨。人们讨厌乃至调侃故作深沉的某些姿态。深沉是故作不出来的，更不是一种姿态，而是作家穿透历史和现实生活粉尘所达到的深度的思想力量的显示，也是作家思想敏锐程度的显示。这是作家的智慧和才气的关键性检测，也是作品的重与轻、高与下、卓越与平庸的难以混淆的标志。我正是在这一点上看重峻里的作品。

处在“城乡交叉地带”上的一组组人物，透过他们心理秩序的平衡和颠覆的过程，呈现着美与丑、善与恶的互相碰撞、互相映照、互相

交汇，尤其是互相易位互相异变的生动轨迹，便可看到精神和情感坚守的艰难，灵魂被扭曲的惨烈，生命价值生命意义由重到轻的不可承受，令我的阅读常常在不堪忍受中暂且搁置。中篇小说《弟兄们的爱情》始终围绕着爱情故事演绎。在这个爱情故事里，人物与人物的社会属性、社会地位、经济力量和文化程度，在大的社会背景骤变的情势下，由此而导致的个人生活的一波三折难以预料的变迁，全都混乱了颠倒了，高位的优越的可以矜持一番的，掉到低处了处于劣势了，不仅难以矜持而且欲哭无泪了；原先处于政治经济包括文化劣势位置的，一会儿浮出水面一会儿又沉入水底，后来又不可思议地从另一方水域奇迹般地活灵活现了，很难判断是弄潮儿抑或是混世魔鬼。《人之旅》也是一个爱情故事，是一个比《弟兄们的爱情》更为复杂的爱情网络。A与柳依依的美到令人感动的恋情却以不可思议的K的掠夺而破灭，A与后来的妻子背后所隐藏的妻子的那位同学恋人，直到风雨过后泥泞消失整个生活和心灵都是阳光明媚的时候，这个由A为中心的两组爱情网络再一次发生颠覆，发生易位，男女蜘蛛们又一次发生了窜位，哭的笑了又哭了，笑的哭了可能再笑不出来了。短篇小说《错位》《报复》等篇章，都蕴含着令人咀嚼不尽的人生涩味。

“阳光的皱褶”，毋宁看作是心灵的皱褶。解读一个个生灵心灵皱褶里的情感密码，峻里显示出一个成熟作家的思想力度和思想的敏锐性。这些以各种形态进行的爱情故事，都可以在各个人物和人物与人物的关系的平衡与位移过程里，透视他们心理秩序的一次又一次颠覆和平衡的交替过程，人性的扭曲和异变，交织其中的得意与失落、欢乐和痛苦，诸种情感色彩都呈现出来了；心灵皱褶里的光明与黑暗、绿草与污浊、蜜意与龌龊，构成一个个复杂的心灵世界，折射着从六十年代到九十年代生活和时代的斑驳杂烩的色调。峻里在这些篇章里的人物身上所构建的，或者说所揭示的人性的内涵，显示出个性鲜明

的艺术特质。如果仅仅从写作技巧的角度看，把握人物的心理秩序，才是人物形象准确和生动的最基本的“窍门”，然而要做到绝非易事，因为它又不单是一个写作技巧，而是以作家的思想力量和思想敏锐性为先决为基础的。

读峻里的小说，让我看到“农村题材”小说创作探索的途径之一种。

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农村题材小说几乎占据整个文学作品的半壁江山。即使作为题材的所有禁地被打开的今天，以农村为题材的小说仍然占很重的比例。题材本身并不决定作品品位，怎样写或写出了什么成色的作品才是致命的。如果按流行的题材分类的惯例，鲁迅先生也写过许多“农村题材”的小说，然而我们从来也没有把这些作品看作是农村题材。《风波》和《祝福》，不是后来的“农村题材”的概念所能圈住的，而是一个时代中国男人和女人的心灵历程命运遭际生活形态的典型。阿Q按户籍分类也应是属“农”的，谁如果按我们后来的“农村题材”的概念去给《阿Q正传》归类，肯定会闹出笑话。文学史似乎早已定论，阿Q是那个时代中国国民性的象征活物。即如茅盾的《春蚕》、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等，也不会有谁把这些堪称经典的作品划归到我们后来的“农村题材”的类属里去。应该说，现代文学的开拓者们早已为我们劈出一条以农村和农民为写作对象的真正的文学之路，然而后来的“农村题材”的小说创作却陷入千车一辙的窘境。一个坚定地走合作化道路的带头人，绝对是受过种种阶级压迫的贫农，肯定有一个咬牙切齿搞着破坏同时又乱搞男女关系的地主或富农，必不可缺的是动摇的中农和几个落后自私又可以转变的贫农，还有一个往往是活灵活现的也最复杂的介于两大阶级阵线之间的上中农人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的几部最具影响的农村题材的长篇小说

里，无论作品写的南方农村或北方农村，作品里的人物设置皆摆出这样一种阵势。显然不是作家们互相影响更不会是互相商量的结果，而是有关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阶级分析所规定了的。即使如柳青这样的天才作家，尽管他在同类题材的开掘中是最深刻的，然而人物阵势仍然也只能这样摆列。这个时期大约只有孙犁的《铁木前传》是一个例外，是移出这个车辙没有按这个阵势摆列人物的一部“农村题材”小说。这部小说曾经广泛流行也被许多人悄悄地咂味，却很少被评价。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作家们努力挣脱了那个人物阵势，然而一时仍然改变不了摆脱不掉“图解政治”乃至“图解政策”的习惯性思维，出现了一批歌颂“农村责任制”的作品，正好与五六十年代歌颂合作化的作品翻了个个儿，揭露甚至控诉合作化对农民造成的种种灾难。再进一步发展，就演绎出不少吃饱了也穿暖了的农民开始追求精神生活乃至真正符合道德标准的爱情故事，似曾相识的可以归类的人物和情节，大约都源于“物质到精神”这样一个思想认识层面的诱导。时间仅仅只过去了十来年，现在还敢问这样的作品生命力如何？其实无须回答，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之后再也不见此类同样简单图解政策图解某些观念的小说了。严峻的出人意料的生活现实，恰恰没有循着那些作品所设计的思路发展，农村农业农民“三农”问题已成为一个从中央到地方都十分重视的大事。我在回想这个“农村题材”创作的发展过程时，得与失、挣脱与缠绕的麻烦，是包含我自己的创作历程在内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也囿于农业政策的改革给农民生活带来的变化这样简单的思路，写了一些篇章，我并不高明，也不属最快最早挣脱“图解”的习惯性思维的作家，但后来终于挣脱了。这个挣脱的过程颇为不易，记忆也就深刻，今天也还仍然敏感。因为峻里在这个方面有益的甚至可以说是卓有建树的探索，觉得有必要再说这个话题。

峻里这本集子里，有一部分作品是纯粹的以乡村人物为描写对象的。这些人物和他们的生活场景里，几乎不见具体的“农业政策”的痕迹，也不见时下常见的荒僻乡村的怪异和粗鄙的习俗（南方北方的乡村似乎都有这些东西，被揭示被展览出来，据说这些东西蕴含有古老的“文化”）。峻里作品中的男人和女人、老人和年轻人，都是正常的人。这些正常的农民男女的生存形态、心理形态，他们的追求和他们的挫折、他们的欢乐和辛酸，以及比分明的善与恶、美与丑更为复杂乃至混沌的生存形态，让我首先感到的是他们是一个活生生的人，与任何其他行业的人在心灵和人性上没有本质差别的人，其次才注意到他们的社会属性是农村人。《河边的女人》是一个堪称佳作的短篇小说。作品的大背景是极“左”危害中国的时期，没有极“左”政策对一个主人公为“远房姑姑”的具体迫害，也没有贫穷到惨不忍睹的渲染，而是把她置入一个“下放干部”和图谋不轨的乡村干部之间，没有两个男人处心积虑的争夺，只有简约到可以称为精到的一两个情节，便酿造出令人咀嚼不尽缕析不清的复杂情感。这样的情感不是仅仅只属于一个贫穷的乡村女人。《错位》同样是一篇值得称道的短篇，作品里写了一个公社书记和一个颇具姿色的女广播员恋爱或者说偷情的故事。我们司空见惯的那个时代里的公社干部一类人物形象，总是愚蠢透顶可笑透顶洋相出尽，总是做那些令人不可思议的事和说不可思议的弱智的话。峻里写的这位公社书记和广播员的恋情中所展示给我们的，却是复杂得多的最低行政机构里的人际关系，爱情里的某些价值交换，窗户偷窥者眼里的秽气绿光，交织其中的算计和阴谋，告密者的阴暗心理，以及由此而导致的人与人之间戏剧性的浮沉变幻，各个角色心灵皱褶中未被阳光晾晒的阴湿角落里的龌龊都被抖出来了，令人后脊发冷。我的阅读感觉，决然不同于那些只会做令人发笑的蠢事和只能说令人发笑的二话的弱智的乡村干部形象，而是一个个鲜活的人。《报复》写民办教师的生活，同样也是跳出一般此类生活题材的

窠臼，直接进入三个人利益和情感交织着的复杂的内心世界，一层一层剥开心灵皱褶里的光明和龌龊，充分展示各自心灵色彩的异变、善与恶的交锋、人性在权力和利害里的扭曲，令人自然思考生命本身的价值和意义。这个短篇无论就其心灵世界的深层揭示，无论就其艺术章法，都是极见功力的上乘之作，似可当作《错位》的姊妹篇。

无论人们怎样看当今的农村题材小说创作，我的突出感觉是，有成就的作家都在探索自己的艺术路径，远远不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状况了。峻里起步在新时期文学复兴思想解放的潮流中，没有如我一样的作家所接受的极“左”文学观念的沉疴，也没有摆脱“图解政治”“图解政策”以及后来演变的“图解观念”的痛苦过程，起步就在文学原本的意义上进行自己的探索，也不受那些进入不了大地深层却围着一根鸡毛寻找文化基因的时尚的影响，首先把农村人物作为社会的人去探究，当是文学观照社会人生最基本的态度和品格。

峻里小说的叙述方式是十分抢眼的。如果从直接的阅读感觉说，一种新颖和别致、一种酣畅淋漓、一种沉稳里的激情，都使我有一种阅读的快感。

稍大篇幅的中篇小说，峻里善于复式叙述，人物与人物关系纠葛，在时间和空间的网络中交错排列，时空没有顺序，人物的现在时和过去时也没有顺序，人物活动的地理空间翻转挪移，组成一个复杂的又是清晰的人生历程的图景。即使是篇幅较小的短篇，峻里也不用有头有尾娓娓道来的惯常手法。无论人物较多篇幅较大关系错综的中篇小说，无论篇幅短小人物关系单纯生活场景简洁的短篇，都是采取极富动势的立体叙述，使作品始终处于一种难以预料结局的变幻莫测的动态之中。这是很难把握的一种叙述方式。要求作家对他的人物了知透彻自不必说，人物命运遭际和心灵世界展示，要在一种“无序”的

时空里做到合理和自然，更非易事。在《弟兄们的爱情》和《人之旅》这两部中篇小说里，足以显示峻里把握这种复式结构的艺术智慧和颇为老到自如的基本功夫。

《人之旅》是一部尤为值得称道的中篇小说。从人物说，有艺术院校的教授K，有生来就遭遇不幸从农村流入城市贫民阶层的A，有出身教授家庭才貌俱佳的后来的A妻，有生于画家之家与A发生初恋却被K掠夺的柳依依，还有一位纯粹从乡野进入都市也进入A和妻子情感世界的人事处长。从表面形式上看，不仅是乡村和城市的交叉，也是出自乡村和城市底层的弱贱者与上流社会尊贵者的纠葛与交叉；时空的交叉尤其复杂，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直到时下，历经“文革”和改革开放过程，几个主要人物从少年走到中、老年，时间跨度大，人生漫漫，在一种“无序”的时空里，这些人物生命历程互相交织，在社会动荡中各自发生着令人惊骇的灵魂的异变。你可以看到不正常的社会运动对人的扭曲，更可以看到人借助恶风对生活的扭曲，也扭曲自己；弱者和善者被强者伤害，得一时之风势又倒过来实行报复性的伤害他人；人在困境中的坚守，却在得意时轻易地放纵了投降了，如此等等。作品所选取的这一段时空，是中国社会变迁最骤烈的时期，说成翻天覆地也不为过，这些人物的心灵历程在这张立体多重交叉的网络中，展示出令人惊悸骇然的图景。人物心灵的一个又一个侧面、一个又一个皱褶，折射着生活演变时代变迁的种种驳杂的色调。

这种结构的最直接的好处是简洁。我想《人之旅》这样丰厚的内容，包括《弟兄们的爱情》，按素常的叙述方式很容易铺张为长篇小说。峻里总是瞅准人物生命轨迹中最富于转折和裂变意义的那一瞬，在最隐蔽也最浓烈的那个侧面那个皱褶里充分展开，把诸多的平淡的

过程毫不动心地抛弃了，显示出驾驭人物和艺术结构的颇为老到的功力。

峻里叙述的方式，得助于一种叙述语言。峻里不用白描，而是一种基本形象化的叙述。叙述语言本身较之白描语言更为简约，也更富弹性和张力，造成作品厚度的效果。我不想过多论说，因为这是一目了然的事。对任何一个作家而言，语言永远都是懈怠不得的基本功，没有穷尽，是死不能休的终生下力的事。

2002年12月29日 原下

功夫还得在诗内

小说集《蓝衫根》里既有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关中乡村生活，又有当代城市生活，涉猎面有工厂、农村、机关、学校，包括了许多生活领域的人的生存形态。对这些生活的描述和揭示，显示出作者非常强的艺术能力。在表现深度上，是站在现代人认识历史和现实的前沿思维。我能感受到的，是对人的合理生存形态的思考，充分感受到我们最痛苦的精神历程。《一料庄稼》这部中篇，是对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乡村生活的透视。对这段历史的思考和文学表现已经很多了，但作者从新的视点来反思这一段历史所达到的深度，是很令人惊讶的。作家用现代人的思想关照当代生活的篇章，那种思想的力量尤其令人钦佩。

当今的生活世相，许多时候使人迷茫。阎道勇站在生活前沿，不仅不躲避，而且很超前。在作品所揭示的思想的层面上，我能感受到文化意识。这个意识从八十年代中期以来一直说到现在，仍然是文学的热点话题，有时候也显得有些泛、有些滥。在阎道勇的作品里，能够感受到一种真正文化意识的思想是怎样的思想。无论历史和现实，如果把握不到蕴藏在血液里的深层的东西，往往就是在垃圾堆里找鸡毛，然后对着一根鸡毛论文化。八十年代中期兴起寻根文学，为当时的文学辟开一条新路。就是在今天的创作中，那种积极意义的影响还在。但这种寻根后来寻到深山老林里去了，寻到过去和现在都没有人迹的地方，寻不到了。阎道勇在现代都市生活中，寻找文化之根。我以为这个民族的文化更充分更集中地潜储在现代都市之中，应该在现代都市寻找民族文化的根，它们经历过怎样的演变，现在以什么样的

形态存在着。阎道勇的小说提供了种种令人惊心的存在形态，可能正是我和许多读者产生阅读震惊的根本原因。

说到作家的人格精神和作家思想的制约关系。通常的情况是，作家只有具备深刻的思想才能产生对生活的独立判断和独特体验。没有独特体验的作品很难产生个性，很难摆脱平庸，独特的体验才有独特的个性魅力。作家思想深化的过程受诸多因素促进，其中之一是作家的人格精神。缺乏强大的人格精神要形成强大的思想力量是不可能的。作家以独立的人格姿态体验这个社会，才能促进思想不断向纵深发展。关于作家思想形成的人格因素，似乎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被忽视了。在《蓝衫根》集子里处处体现着作家可贵的人格精神。

这本书给我一种强烈的感觉，就是作家对生活的敏锐性。家里的或宿舍里的一张床、一些生活琐事，作家都能捕捉到人生的社会的丰富况味。《偷鸡摸狗的日子》讲一个小房子里两张床该怎么摆，夫妻间的事怎么回避孩子，就这么一张床演绎出多少人内心隐秘的心理、两代人之间冲撞的东西，这种事情许多人都遇到过，司空见惯，阎道勇却能以其思想的敏锐和艺术的敏锐，把人性、心理、生理需求的冲突，表现得淋漓尽致，读来不由得使人击掌赞叹。阎道勇对生活的敏锐性和他思想的深刻性相辅相成，这一点在作品中表现得非常突出。

这部作品集中，几乎每一篇，都是密集的精彩细节和对细节的严格选择，好多细节看似为我们所司空见惯，但经过作家处理后，生动而富于活力，这样的细节俯拾皆是啊！能做到这一点即使对成熟作家来说也极不容易。阅读作品的舒服和别扭也主要体现在这里。细节捕捉准确，描绘精到，就会给人以心灵开启的感觉，细节产生这样奇异的艺术效果。从日常生活里发现再提升到艺术细节的过程，是一个作家艺术能力的标志性体现，也是生活真实进入艺术真实所产生的魅

力。这部作品集中的语言平实而精到，处处显露着作家的生活智慧和艺术智慧。

关于这部作品的语言，我和李星、王仲生老师的感觉不尽相同，就作品所呈现的整体语言风貌，我感觉与作品的内容是恰当的。当然，也能读到个别令人不太舒服的语句。语言的功力是作家的重要追求，作家都在寻找自己独特的语言，“语不惊人死不休”，这是作家一生的追求。但就作品的整体风貌来看，阎道勇现在掌握的语言，是富有魅力的。

《尼姑本善》这篇小说，竟令我感慨颇多。八十年代我到蓝田去，几个文学朋友领我去了水陆庵，那时候水陆庵破败不堪。一个老汉在泥糊的炉子上一边烧水，一边和我聊天。这个老汉原来就是出家人，“文革”时被强迫还俗，还给他找了一个媳妇，生了孩子，八十年代初他从生产队又回到水陆庵。这个人让我产生兴趣，很想多了解一些生活经历，但老汉对他过去的生活讳莫如深，我曾经想写一个短篇或者一个小中篇，今天看来，我没有写是对的，肯定写不到阎道勇这样精彩的程度。

阎道勇的小说艺术处理到位，短篇《纠纠夫驴》中把两个社会背景、人际关系、家庭和经历差异很大的年轻人，放在同一个房间里，对两个人的心理描绘含而不露，艺术处理不留任何痕迹。阎道勇在艺术上这种不露声色的描绘，显示出对艺术的理解和体验的独特领悟。

阎道勇作品给我的阅读启示是：功夫还得在诗内。在文学意义上，这是高品位的创作。这几年炒作行为很多。恶意的炒作和必要的评论和宣传是两码事。不能因为有炒作而减少真正的评论，抵制恶意炒作的办法恰恰是严肃的文学评论。今天的讨论会，评论家和作家给

阎道勇的创作一个科学的评论，体现着文学的力量，也体现文学的道德。希望阎道勇有新的突破，你已经具备了这样的艺术能力和思想能力。

2003年3月13日 西安

在自我反省中寻求艺术突破

——与武汉大学文学博士李遇春的对话

时间：二〇〇三年四月五日晚

地点：陕西省作家协会办公楼

李遇春：陈老师您好！我昨天送您的访谈提纲，您都看了吧?

陈忠实：看了。这些问题都可以谈。

李遇春：那好，谢谢您！我注意到您在创作早期，具体说是八十年代初期喜欢谈“深入生活”，但是从八十年代中期以来，您又热衷于谈“生命体验”，您能解释一下发生这种提法变化的深层原因吗?

陈忠实：深入生活涉及作家与生活的关系，这是一个老话题。这个老话题实际上对任何作家来说又都是一个最简单、最基本的问题，因为没有生活就根本不可能写作。

李遇春：记得当年批胡风的时候曾经批判过他的一个著名观点，叫“到处有生活”。胡风的意思是，生活是一个非常宽泛的范畴，而当时的主流文学规范往往习惯于把生活的概念加以本质化的限定，规定只能写那种反映了主流社会本质的生活。

陈忠实：现在我们谈生活，它应该分为这样的两个部分：一个是作家所看到的社会生活，再一个就是作家所经历的社会生活。作家自

己所经历的社会生活主要包括作家个人的生活经历。这就有两个层面的东西。比如说柳青在长安县搞合作化，他作为一个作家深入生活，他主要看到了当地农业合作化开展时期的农村社会生活，当然他也通过挂职的方式直接参与了农业合作化运动，因此，其中也包括了他个人的一些在合作化中所经历的生活，但不是他个人生活的全部，比如他的家庭生活、情感经历、思想发展经历等。所以我们现在说生活体验或者体验生活，我在这点上泛指两种生活都有，既有客观的社会生活，也有作家个人的生活经历。总而言之，它们都是生活体验的东西，都是从体验生活中得来的。

我后来比较看重生命体验，这是我写作到八十年代后期自己意识到的。无论是社会生活体验，无论是作家个人的生活体验，或者两部分都融合在一块了，同时，既是作家个人的生活体验，又是作家对社会生活的体验，在这个层面上，我觉得应该更深入一步，从生活体验的层面进入到生命体验的层面。进入生命层面的这种体验，在我看来，它就更带有某种深刻性，也可能更富于哲理层面上的一些东西。

李遇春：主张写作进入生命体验的层次，这种观点显然更符合现代人的价值观念，更加契合西方近现代以来的各种生命哲学或文化思潮的核心精神。

陈忠实：我觉得从生活体验进入到生命体验，它好像已经经过了一个对现实生活的升华的过程。这就好比从虫子蜕变到蛾子，或者蜕变成美丽的蝴蝶一样。在幼虫生长阶段、青虫生长阶段，似乎相当于作家的生活体验，虽然它也有很大的生动性，但它一旦化蝶了，它就进入了生命体验的境界，它就在精神上进入了一种自由状态。这个“化”的过程就是从生活体验进入到生命体验的一个质的过程。这里面更多地带有作家的思想和精神的色彩。

我可以举个例子。比如昆德拉，他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我觉得就是进入了生命体验的作品，而他在那之前的《为了告别的聚会》和《玩笑》，我看应该是属于生活体验层面上的作品。对于一个作家来说，他的创作发展也有一个从生活体验到生命体验的过程。有些作家能够完成这个全过程，而有些作家可能从来也没有完成这个过程，这是大量的。就我的感觉，属于生活体验层次的作品是大量的，而进入了生命体验层面的作品是少量的。

李遇春：您能不能举个中国的例子再解释一下?

陈忠实：中国的最好不要说。（笑）那容易犯忌。

李遇春：在我对您的中短篇小说的阅读印象中，我发现专门从标题上就可以看出，您的有些作品是着意在写一个人，比如说《梆子老太》《蓝袍先生》《尤代表轶事》《四妹子》等就是这样的。您当年曾经在创作谈中说《四妹子》是“写人的不自在”的，然而很多人没有从这个角度去理解，甚至把它简单地说成是一篇农村题材的“改革小说”，这显然就忽视了您的新的艺术追求。实际上还包括《鬼秧子乐》《轱辘子客》等作品，我在阅读后对您塑造的人物感觉非常新奇！老实说，在我做学生的时候，我并没有读到您的这些作品，因为我们的许多当代文学史都没有提及您的这些作品。后来经过阅读后我认为，您的这些中短篇小说代表作放在当时的八十年代中前期的文坛，即使是和那些轰动一时的名作相比，也是毫不逊色的。但这里面有一个问题，一个作家的作品能否被文学史所接受，那是需要一个过程的，甚至也是需要一定的机缘的。

陈忠实：（笑）

李遇春：等到《白鹿原》一出，您的书一时洛阳纸贵！这个时候人们再重新研读您以前的许多作品，才发现它们的价值在很大程度上被低估了。我觉得我前面所列的那些作品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就是它们都写出了外在的社会文化规范对内在的人性的某种压抑，以及由此所激发的人性对外在规范的反抗。这实际上体现了您对人物的生命意识的艺术探求。我不知道您是否同意我的这种看法。

陈忠实：是这样的。对我来说，在写作长篇小说之前，从新时期开始，也经历了几个创作阶段。开始主要创作的还是纯粹的符合八十年代初期现实主义文学规范的作品，像一九八四年、一九八五年以前的那些中短篇小说就是如此。这些作品有一个很明显的特点，他们几乎和现实生活同步发展，生活的变化在我思想上所引起的一些波澜，我就把它们凝结成作品了。所以这些作品中直接的生活矛盾冲突比较多，当然这里头也有人物，但大多反映的是当时生活变革的一些现实矛盾。

到了八十年代中期，我自己觉得我已经开始从另一个视角去看生活，虽然看的也是当代生活，但视角已经不是一般的触及现实社会生活矛盾这些东西了。这主要是因为我这时接受了一种文化心理结构学说，并开始用这种视角来解析人物。你刚才提到的那些作品就属于这一类作品。这类作品主要从人物外化的性格进入了人物内在的文化心理结构，这样一个角度，我自己感觉是深了一层。我后来感觉到，你无论写人物的性格怎样生动，生活细节怎样鲜活、栩栩如生，但要写出人物的灵魂世界里的奥秘，写出那些微妙的东西、神秘的东西，你就必须进入人物的心理结构，而这个心理结构本身是由文化来支撑着的。

李遇春：现代文学的经典作品《阿Q正传》就属于这种写出了人物的文化心理结构的作品。

陈忠实：对。在中国文学中写出人物的文化心理结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揭示出传统与现代的那种文化冲突。这种文化冲突造成了人物心理结构的、观念的改变，从而也就造成了原有的心理结构的平衡的被颠覆、被打破。一旦新的观念形成，就随之形成了一种新的心理结构、新的平衡。对于我们这个民族来说，既有传统的道德观、价值观，也包括一些地方地域形成的民间风俗观念，它们跟当代文明、新的观念之间形成的冲突应该是深层的。而实际上我们这个民族从二十世纪初，辛亥革命前后开始，一直到现在都在经历着精神世界的裂变，这个裂变其实就意味着原有的心理结构被颠覆了，不再平衡。我觉得这方面很深刻的一个例子就是鲁迅先生的短篇小说《风波》。

李遇春：哦，就是那个辫子事件吧。

陈忠实：是的。那条辫子是一个外化的东西，它外化了内心心理结构的一个平衡点。所有那个时代的道德观念、价值观念，以及社会风俗观念已经形成的对人评判的全部标准都外化成了这条辫子，从而在这条辫子上形成了一种很稳定的心理平衡。然而辛亥革命把辫子剪掉了。剪辫子其实对人是没有任何伤害的，不伤皮不伤肉，头发要长就要剪嘛。然而，剪辫子实际上剪掉的是凝结在这个辫子上的所有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念，观念被颠覆了，人物的心理结构也就被颠覆了。所以鲁迅先生的这个剪辫子的细节是非常深刻的，它实际上已经进入了人物的心理结构深层。这可以说是一个具有时代意义的最典型的例子。

李遇春：如此看来，鲁迅先生笔下的这条辫子其实凝聚了巨大的文化内涵，因此，这条辫子是一个文化象征。

陈忠实：对，文化象征！它外化出来是辫子，而内在里进入了心理结构的形态。这一切平衡在一条辫子上头，一旦辫子被剪掉了，人的心理平衡也就被打破了，打破了之后人就陷入了心理痛苦，所以七斤说没有辫子怎么活呀，他都没办法过日子啦。这种痛苦是内在的。所以我就想尝试能够从文化心理结构的角度去解析我要了解的人物和生活。作为实践，最典型的、意识很明确的两个作品是《蓝袍先生》和《四妹子》。这两个作品都是从文化心理结构的角度去写人物的。

李遇春：实际上，从文化心理结构去解析人物，去塑造人物，这样产生的人物的灵魂往往在很大程度上也就是一个民族的灵魂。

陈忠实：对。

李遇春：那么，您能解释一下您在早期主张的“性格说”和后期推崇的“心理结构说”之间的关系吗?

陈忠实：这两者之间应该说不矛盾的，因为如果没有写出人物心理结构的微妙性，那么这个人物的性格就缺乏深刻性。在我看来，通过对人物的文化心理结构的解析，可以使人物的性格更鲜明、更生动，更具有内在的生动性而不是外在的生动性。

李遇春：从《白鹿原》来看，里面很多人物的很多细节都写得很鲜活，而且不仅仅是那种表面上的鲜活生动，而是人物内在地具有某种文化意蕴。这也说明了“性格说”和“心理结构说”之间并不冲突，相反，可以说“心理结构说”是对传统的“性格说”的一种深化。

陈忠实：是。

李遇春：接下来想请陈老师谈一谈您的中短篇小说创作对后来的长篇小说创作的影响。

陈忠实：我觉得这没有什么直接的影响，因为那就是我小说创作发展的一个学习、探索的历程。

李遇春：您是说这一切是水到渠成?

陈忠实：对。一个人的写作从初学到一步步地深化，这个历程实际上主要就是完成一次次的突破，包括思想和艺术上的突破。他可能在完成突破后要相对地稳定一段时间，在这个突破的基础上他要有一批作品出来，把他这样的思想观念、艺术兴趣和艺术追求相对地持续一段时间。当他集中写过一批作品后，对这种艺术形式又不会太满意，于是便渴望进行新的突破，进行一个更加重大的突破。当然，一个作家的每一部作品一般不会与另一个作品相同，即使是在同一个突破层次上的作品之间也会有很大的差异。但是，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能不能完成关键性的、里程碑式的突破，或者说达到质的飞跃的突破，这是一个非常致命的东西。譬如说，从生活体验能不能完成到生命体验的突破，既包括对人生的理解、对社会世相的理解，也包括对艺术的理解，这是一个关键。我的整个写作过程可能起码经历过两次突破。

李遇春：能具体解释一下这两次突破吗?

陈忠实：一次是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当时文艺刚刚开始复兴。我此前在“文革”期间曾经发表过几篇小说，到新时期开始，我们要完成对极“左”思想，包括文艺思想的清算和批判。不光是在认识意

义上，而且涉及艺术本身，都要打破极“左”的文艺禁锢，使自己能够尽快地接近真正意义上的艺术和文学。这样一个过程我是通过读书来完成的。这大约是在一九七八年的冬天，我记得很清楚。当时我集中读了一批书。你要去理解真正的文学，你就要阅读真正的文学，通过阅读来开拓你的艺术视野，我当时就是想把我在六十至七十年代所经历和接受的极“左”文艺教条，通过真正的文学的阅读和理解，来把它们冲开，这应该是冲破那些僵化的文艺教条的一个原动力，没有这个你就冲垮不了它们。我记得我集中了三个多月的时间专门读书，一篇文章都不写！因为我那时候刚刚开始重新学习写作，主要目标就是掌握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创作究竟是何物。我首先从短篇小说上面实践，我集中读了一批世界上各种优秀的短篇小说。

李遇春：主要是哪些作家的短篇小说呢？是不是欧美作家的作品要多一些？

陈忠实：有好多作家的作品，但主要是欧美作家的作品。我在这些作家中重点选择了两个作家：一个是契诃夫，一个是莫泊桑。在这两个作家中间我最后又集中在莫泊桑身上，因为我觉得莫泊桑的小说是情节结构的，而契诃夫是以人物来结构小说的，结合我当时创作能力的实际，莫泊桑显得要更容易接近一些。为此我选择了我比较喜欢的大概有一二十篇莫泊桑的小说作品，集中加以精读，主要看他是如何结构小说的，因为我生活不缺，我在农村生活了二十多年，我自己觉得对农村生活应该比较熟悉。问题是怎样打破极“左”的文学套路，进入真正意义上的文学写作。我觉得那个目的是达到了。所以从一九七九年的春天开始，我感觉非常好，就重新开始写作。这样一直写到大约八十年代中期，我已经出过两本书了，而且作品也获过全国奖，尽管影响还不是太广泛，主要是在本地范围，当然在全国也有一些影

响。问题在于我这时候对自己的写作好像进入了不满意的状态。当时我的思维比较活跃，这集中体现在《创作感受谈》那本书中。《创作感受谈》的写作实际上是对我以前创作的一个总结，在此基础上我希望能够再完成一次突破。这时候对我起了决定性影响的就是我前面说过的文化心理结构学说，它对我的写作意义是非常重要的。在八十年代中期的时候，当时的整个文坛最是活跃，各种各样的文学理论介绍了进来，各种“主义”开始纷纷得到实践，文学的发展呈现出一种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

李遇春：那是一个对中国新时期文学影响非常深远的年代。在一九八五年前后，“现代派”文学和寻根文学浪潮的兴起对长期以来在中国文坛独尊的主流现实主义文学产生了极大的冲击。

陈忠实：就在那个时候我广泛阅读和见识了各种新潮的文学理论。当时我觉得对于我最有用的就是文化心理结构学说，我就开始实践这个东西，然后就有了一批中短篇小说，包括短篇小说《轱辘子客》和《两个朋友》，它们都是那之后的作品。当然印象最深刻的除了《轱辘子客》之外，还有两个中篇：《蓝袍先生》和《四妹子》。这是我非常清醒的。无论是《四妹子》写的当代生活，还是《蓝袍先生》中的历史生活背景，我都是从文化心理结构的角度去写人物的。我自己感觉人物的深度和厚度比以前要好一些了。

李遇春：实际上您已经达到了一个更高的艺术境界。

陈忠实：正是通过对人物的命运的观照，我觉得我对生活的思考、对历史的思考，就不再是一般意义上的思考了，而是进入了对人的一种合理的生存形态的思考。

李遇春：就是思考人在历史和现实的社会文化环境中应该怎样生存才是合理的。

陈忠实：对。我当时不好明说这样的话，我就说我是写四妹子的“不自在”的。那为什么不自在呢？就是因为它不是她合理的生存形态，处于一种不合理的生存形态当中才会感觉到不自在！生存形态合理了，美好了，她就自在了。实际上人人都在自觉不自觉地摆脱不自在，要进入自在的境地，我们的生活理想就是争取生活的自在，对不对？所以这就很自然地发展到长篇小说的写作中去了。如果说《四妹子》和《蓝袍先生》是我用文化心理结构学说作为一种写作的新的突破的试验，那么，进入《白鹿原》的写作，我就自己感觉到能够比较自信地运用文化心理结构学说来塑造人物了。所以《白鹿原》的写作是一种自觉的、认真的，比较有把握和自信心的写作。

李遇春：您刚才谈了您文学创作生涯中的两次大的艺术突破，我认为您的这种创作历程对于研究中国当代文学史的变迁很有个案价值。像您是在六七十年代开始文学创作的，然后在七八十年代之交开始第一次创作转换，即从那种“革命现实主义”文学规范向传统意义上的现实主义文学转变，此后又在八九十年代之交完成了第二次创作转型，从传统的现实主义转向了“开放的现实主义”，吸纳了强烈的现代生命意识和诸多现代小说技法。实际上，您的这个创作转换过程与中国当代文学的演进历程是一致的。

陈忠实：对。基本上是一致的。

李遇春：在我的印象中，当代文学史上，像您这样作品越写越好，基本上是一步一个脚印的作家似乎还是很少见的，在五六十年代初登文坛的作家中，许多人虽然在七八十年代之交的“伤痕”“反思”和

“改革”文学潮流中曾经大红大紫，但在八十年代后期至九十年代以来，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就星光暗淡下去了。而您却一步步地走向辉煌，在九十年代终于呈现出大的艺术气象。这其实是很不容易的。

陈忠实：通过我自己的文学写作，后来我感觉到一个作家一个状态，不可类比！文学创作这个东西没有可比性，它跟工匠生产不一样，它不一定就越写越好。有的人的写作也许是这样，可能越写越好，但有的人可能就爆发那么一下，接下来就爆发不出来了。这种现象太多了。有的人的首发之作可能就是他终生的巅峰之作，他后来的所有更大量的写作再也超不过他的首发之作了。当然，文坛上各种作家、各种状态、各种现象都有，所以你很难说哪个是对的，实际上没有什么对与错，也没有什么规律可循！

李遇春：是的，每一个作家都在探索着属于自己的艺术创作道路。

陈忠实：这里面可能有作家自身的因素、社会因素，甚至包括生理因素。读者是很难把握的。

李遇春：我记得您曾经特别谈到过《初夏》这篇小说的创作。您说《初夏》写作得非常苦闷，简直到了写不下去的地步！由于在写作的过程中您一直想控制人物，但最后还是控制不住了，终于发生了人物的叛逃。那么，根据您后来的创作经验，您认为在创作的过程中，作家与人物之间究竟应该保持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和状态才是比较合理的呢?

陈忠实：《初夏》可能是我写作以来写得最困难的一部作品！最初的草样只有四五万字，后来写到八万字，最后又写到接近十一万

字。前后经过几次改写，越写越长。这个作品最初的写作时间是一九八一年，从一九八一年写草稿到一九八四年发表，历经四年，仅仅是一个中篇小说哪。这是我的第一个中篇小说，而实际上大概是第二个还是第三个发表出来的，发表得比较晚，反正中间经历了这么个过程。我之所以迟迟写不出来，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把握不住人物。

李遇春：主要是哪个人物？是冯马驹吗？

陈忠实：对，主要是马驹这个人物把握不住！其实这个人物我倒是受过生活中的一个人物的影响，尽管有一个生活原型的参考，但是我觉得把握不住他的精神世界。怎么写怎么觉得别扭！这个写作过程非常痛苦。第二次写的时候我躲到了太白县，夏天正热的时候，那时没空调，西安根本待不住，我就在那待了十多天。哎呀，那个写不出来呀，怎么写怎么别扭，怎么写怎么不顺，最后一点都没写成，把勉勉强强写成的那一些全部给撕掉，然后又回来了。

李遇春：我个人有一种感觉，不知道准不准确？有人说《初夏》写得像《创业史》，非常接近柳青的创作风格。我觉得您笔下的冯马驹和《创业史》中的梁生宝在许多方面都很相像，梁生宝是当年社会中“大公无私”的一个典型人物，而您笔下的冯马驹本来有更好的就业机会，但他为集体的事业放弃了个人的前途。显然，冯马驹的这种人生价值观念和梁生宝是相通的，但是，与八十年代改革开放初期的主导社会价值观念又是隔膜的。我相信当时的一般人不会选择马驹的这条人生道路。

陈忠实：是，普通的老百姓不会选择这条道路。但我当时思想很明确，就是要把马驹写成一个先进青年形象，因为他直接受到生活中的一个农村先进人物、一个英雄人物的影响。所以，我在创作过程中

脑子里始终有那个先进人物的影子。这说明我当时还没有摆脱掉过去的“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

李遇春：在当年的“革命现实主义”文学规范中，所谓文学典型，就是当时现实社会中先进人物的代表，因为那些先进人物就是当时的“时代精神”的化身，他们体现了“无产阶级”的阶级本质。

陈忠实：是这样的。所以在创作《初夏》的过程中我怎么样也无法从“革命现实主义”的文学窠臼中跳出来。为了迁就一些既定的东西，结果其他的很多内容反而进不去，所以人物就叛逃了。整个写作过程别扭得很！值得一提的是，在第二次写作失败的间隙里，当我觉得在第一稿的基础上无法提高的状况下，我把它放下了。在放下的空当里头，我对写作已经有所思索了。我随之写成了另一个中篇小说《康家小院》，写得非常顺，而且写得非常痛快！实际上在《初夏》写作失败的同时，我已经意识到了写作失败的原因，这就是必须面对生活的直接的感受，而不能依赖于生活中任何既定的人物，让他去限制作家的创作思维。所以我写《康家小院》其实是打开了另一条艺术思路，因此写得非常顺，而且稿子一到编辑部，编辑来信非常热情，对稿子评价甚高！所以《初夏》两次修改失败的反反复复的经历，实际上对于我来说是一件好事，它使我更深一步地从原来的“革命现实主义”文学窠臼里反叛出来，并且逼着我寻找真正的现实主义的本真的东西。

李遇春：现在学界一般认为现实主义最核心的东西还是“写真实”，不光是要忠实于外在的客观生活的真实，而且更重要的是要忠实于创作主体对客观现实生活的主观体验的真实。

陈忠实：对，“写真实”非常重要！当年写作《初夏》失败的教训逼着我重新探索现实主义的时候，我的第一个产品就是《康家小院》。这样就把我的路子“规”过来了，从那条路上“规”到接近真正的文学的道路上来了。

李遇春：看来《康家小院》是您文学创作生涯中的一部非常重要的作品。它实际上是您实现第一次艺术突破的标志性成果。通过《康家小院》的写作，您基本上已经告别了过去的政治化文学，而自觉地走上了真正的文学创作道路。

陈忠实：可以这么说吧。

李遇春：让我们还是走进您的《白鹿原》吧。您刚才说写作《初夏》时最痛苦的就是把握不住马驹这个人物，而我记得您在回答李星老师的一次访问中也坦诚地说过，在写朱先生的出场时好像写得也比较困难。《白鹿原》出版后评论界不少人都说朱先生塑造得有些理想化。我想问的是，您在写朱先生时是不是体会到了和塑造冯马驹这个人物的过程中相类似的困难?

陈忠实：完全不同的两个困难！我在《白鹿原》这部小说里头，从构思这个人物到写作的整个过程中，我可能写得最谨慎的人物、压力最大的人物就是朱先生。为什么呢？在我开始构思那些人物的时候，我就觉得最没有把握的人物还是朱先生，思考得最多的人物也是朱先生。这里面有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如果说这部作品中有一些人物只是借助了生活原型的某一点，那么，唯一一个能够谈得上比较多地借助了生活模特的人物就是朱先生！由于朱先生是一个对生活模特的依赖比较大的人物，这就给我带来了最外在的一个压力，因为朱先生这个人物在关中是老一辈人家喻户晓的，人们都知道这个人物，

而我写这个人物的直接的担心就是，如果我的这部书将来出版了，读者读到了以后，他们说陈忠实写的那个人物就是生活中原来的某一个人，但写得根本就不像，人家那个人不是这样的，这就是压力呀。因为那个人物广泛流传啊，他的儿孙现在还活着，所以这是一个直接的压力。

第二个更重要的压力就是，这是个老知识分子呀，传统的旧学功底非常扎实，可以说是一个学富五车的知识分子。我在蓝田县里查阅县志的时候，那县志的最后一个版本，大概是民国，四十年代初吧，就是由他主编的，他的著作这么厚一摞呀。总之他是一个旧学功底相当扎实的人物，而我恰好就是旧学很薄弱的一个人，因为我是解放以后一九五〇年念的书，没有学过那些“四书”“五经”呀，仅仅就是我们课本上，包括我后来读到的很有限的一些古典文学的东西，至于古典文化的那些最基本的东西，咱们没那个修养呀。你想我们现在这点白话文的基础，你要写好那样一个国学功底非常深厚的人物，总感觉到力不从心！起码你这个文化和他本身的那个文化距离比较远。

李遇春：看来您在塑造这个人物的时候还是有着明显的敬畏之心。

陈忠实：对，还存敬畏之心！所以有一段时间我就想，哎呀，避开这个人物不写算了。但再三思想后，又觉得放弃这个人物太可惜了。而且他作为白鹿原家族社会里精神领袖式的人物，你是不能回避的，因此，最后还是决定去写他。

李遇春：尽管我个人也认为朱先生并不是《白鹿原》中写得最好的人物，但与此同时，我也觉得朱先生是《白鹿原》中不可或缺的一个人物。

陈忠实：（笑）我还是觉得，不管他文化修养多高，我主要是要把握住他精神世界里的东西、心理世界里的东西，只要我把握住了这个人物的这一点，我写这个人物就获得了自由！如果把握不住这一点，那就像画像一样，你就怎么也画不像，或者即使是某一个地方画得像了，但在整体上还是一个躯壳式的人物，因为他没有精神！后来我就想，主要写这个人物由传统文化所支撑的那个精神世界、心灵世界，包括人格世界里头的东西。我抓住这样几点，反复思考得很多，然后就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来写这个人物的。写得确实是小心翼翼呀！（笑）

尤其是一开始写这个人物的时候，我那个小心翼翼呀，至今还记忆犹新。但在他出场之后写过两段后，我感觉我把握住了这个人物的精神了，写得也就比较自如了，直至写到他的死亡。我觉得我写得最好的一笔就是写朱先生死亡的那一笔，就是写他死亡的那个过程，到那时我才觉得我对这个人物已经完全理解，完全把握住了。

李遇春：记得小说中围绕着朱先生之死写了好多意味深长的细节。

陈忠实：尤其是当他预知自己将要谢世了，他还要让夫人看一看他头上是否还有黑头发，夫人于是帮他梳辫，说只剩下三根了，你这下像个白毛鹿了。等夫人正给他剃头的时候，朱先生却突然伏在夫人的膝盖上叫了一声妈。写到这个地方，我当时感觉自己心里都哑了。我觉得这一声妈，其中也包括了我自己的体会，那是从生命深层发出的一声叫喊！

李遇春：记得高中的时候学过太史公的《史记·屈原列传》，我当时喜欢诵读这样的一段话："夫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

人穷则返本，故劳苦倦极，未尝不呼天也；疾痛惨怛，未尝不呼父母也。”像屈原一样，朱先生当年也够“穷”的了，国难当头、无力回天，正是因为走向了穷途末路，他才发出了那声撕心裂肺的呼喊！中国自古就说“男儿有泪不轻弹”，那其实是因为还“未到伤心处”啊。

陈忠实：是。他要把他夫人喊一声妈，那是出自他生命深层的一种感悟，而他夫人也未必理解他为什么要把她叫成妈。

李遇春：我觉得这一声妈其实传达了人向生命的原初地回归的心理倾向。朱先生最后化作白鹿，魂归故土，其实是回到了他的生命的家园——白鹿原。

陈忠实：我后来觉得只有这声妈才能把他送上天去，他告别世界的时候好像只有这一个字啦。

李遇春：实际上朱先生的仁义精神就像厚德载物的大地一样，就像黄土高原一样厚重。我感觉朱先生死亡前喊妈，与这个地理自然环境和文化环境之间是有某种精神关联的。

陈忠实：是。

李遇春：您刚才提到朱先生叫了一声妈，这使我想起了黑娃。黑娃后来浪子回头，做了朱先生的弟子，重新“学为好人”，但他荣归故里的时候，我记得您写他执意要回家睡在死去的母亲的炕上，而不愿意在白家借宿一晚。请问这中间有什么深意吗?

陈忠实：有。黑娃所经历的那个人生波折，那应该比朱先生还要激烈得多、动荡得多！他反反复复、起起落落，最后还是回到了原

上。我写黑娃执意要睡到亡母的炕上，那其实也是黑娃内在的一种生命感悟，他从内心深处感受到了一种强烈的生命冲动和生命激情。

李遇春：那其实是一种回归母腹、回归大地的原始生命冲动。在这方面我觉得《白鹿原》确实具有强烈的现代生命意识，而在不少的评论家看来，他们甚至都没有做详细深入的文本辨析，就直截了当地给《白鹿原》戴了一顶帽子，说什么文化守成呀、保守主义呀，其实这是非常大的误解，因为《白鹿原》中的文化价值立场是非常复杂的。

陈忠实：（笑）

李遇春：我还是想抓住朱先生这个人物再向您请教一个问题。尽管您前面说您后来把握住了这个人物，但我作为一个读者，我觉得朱先生的精神世界仍然还是比较单一的。可以说您后来的一系列的故事情节，如只身退敌呀、为民赈灾呀、投笔从戎呀，这都是为了铺展这个人物的儒家精神和人本情怀。用一句学术一点的话来说就是“人格表演”，“人格表演”是中国古代小说中经常使用的一种人物塑造模式，比如《三国演义》中刘备的“仁”、关羽的“忠”、张飞的“勇”、诸葛亮的“智”，这些人物的单面的人格在小说中通过一系列的故事情节被“表演”了出来。我记得鲁迅先生当年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曾经批评过这种人物塑造模式，他说《三国演义》的作者“显刘备之长厚而似伪，状诸葛之多智而近妖”。而我觉得您笔下的朱先生似乎有“状其多智而近妖”的嫌疑。您把这个人物写得神乎其神，不光是通晓天文地理，而且能预言生前身后事，尽管我在阅读上也产生了阅读快感，但冷静下来，还是觉得有些不满足。

陈忠实：（笑）我来说这个人物！这个观点并不是你提出来的，很多的评论文章也是这么说的。那我来说一下写这个人物的初衷。这个人物是我们传统文化的一个载体，他是白鹿原家族社会里的一个精神领袖。他也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传统文化传承了几千年的最后一个传人，是我们民族历史上最优秀的一个知识分子的代表。在白鹿原的社会结构里面，朱先生承担了一种精神领袖、精神教父的角色。因为在二十世纪初，我们的整个社会结构是家族式的，至于基层的农村村社，那更是典型的家族结构，它没有行政管理，更多地具有宗族色彩，它里边维系社会稳定、人际和谐的价值标准、道德规范，就是那些已经演化成风俗、民俗、乡规、民约之类的东西。这些东西从哪里来？就是从朱先生那里来的，是从当时社会的高级知识分子那里演化来的。

当时的中国社会，普通的老百姓也不分什么工人、农民，统统都叫作“民人”，就是没当官的人、被统治的人，他们之间互相称呼自己为“民人”。这跟我们后来所说的“人民”这个概念恰好翻了个儿。过去叫“民人”，“民人”是对“官人”而言的，因此，“民人”是被“官人”所统治的人，他们处于社会的最底层。不仅如此，“民人”的精神世界里的那些东西都是受“官人”教化的，也就是当时的知识分子所主张并教授的那些东西，其中包括许多统治阶级所要求的东西。而朱先生是在封建社会里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他学富五车，而且考过文举人，在那一方土地上是学得最好的人。但他不是佛，甚至不是道，他就是儒家，所谓“关中大儒”。他甚至不迷信——

李遇春：儒家的传统好像是不主张迷信的，“子不语怪力乱神”嘛。

陈忠实：那为什么朱先生看上去有点儿神神道道的呢？那实际上是没有文化的“民人”不理解他那高深的文化，不理解他对世界的点化，看不透他，由此所造成的一种神秘印象。这就像一个文盲不理解大学生在那里讲天文学一样，一个文盲听天文学家讲天体世界的事象，他很容易把这个人当成一个神，说这个人知道天象啊，这家伙是个神啦。由于是在过去那个愚民时代里，所以我写朱先生出场的时候弥漫着一种神秘的色彩，比如预测种豆会有好收成、足不出户能帮人找牛等。这实际上是当地的“民人”对他的看法。我是根据当时的民间视角来写那一切的。其实朱先生作为一个有知识的人，他根据找牛者的心理，问他的牛是怎么丢的，然后做出一种合理的推测和判断，最后告诉他该往哪个方向去找。因为有知识的人分析和判断事物比文盲要清醒得多，他根据天时地利、地理地貌以及村庄和居民居住情况，合理地判断出这牛可能朝哪儿跑了。而文盲不理解朱先生，而且朱先生也无法向他们解释清楚，所以这一切就带有迷幻色彩。实际上为了扫除前边布下的带有迷幻色彩的迷阵，我特地安排了朱先生在进驻白鹿书院的时候，他自己把四座神像都扳倒了，当地的“民人”反而很迷信，他们说，哎呀，您怎么把几代人敬仰的神像扳倒了，朱先生马上教化他们说，你们不学前人的知识，专门烧香磕头，越磕越浑啦。这说明朱先生并不迷信，是别人看他迷信！这些地方，作为一般读者随便就读过去了，不加分析，而我自己写的是很清醒的，我根本不想把他写成一个神神道道的人，我甚至写他就是一个唯物论者，因为我们也有传统的朴素的唯物哲学观啦。所以朱先生不信神，我也没有把他神化，许多人对他有那么个印象，这其实是一个错觉。（笑）我自己之所以在开始写他那些带有神秘迷幻色彩的东西，那是他在当地“民人”中造成的影响所致。实际上在后来的情节里头，我是剥去那些东西的。

李遇春：后来的朱先生主要就是传统儒家的人格化身了。

陈忠实：我就是想把他写成真正的传统的儒家人格的化身。传统儒家精神中那些优秀的东西在他身上绝对要表现得非常充分。包括写白嘉轩也是这样，白嘉轩是朱先生的精神的实践者，这是他们两个人物之间的关系，我写朱先生和白嘉轩就是要写我们这个民族发展到二十世纪初一直传递下来的，存在于我们民族精神世界里的最优秀的东西，要把它集中体现出来。我有一个看法：尽管我们这个民族在二十世纪初国衰民穷，已经腐败到了不堪一击的程度，但是，存在于我们底层民族精神世界里的东西并没有消亡，它不是一堆豆腐渣，它的精神一直传承了下来。如果我们民族没有这些优秀的东西，它不可能延续几千年，它早就被另一个民族所同化或异化了，甚至亡国亡种了。但是，它在进入封建社会以后，还很完整地把这个民族的生存形态保存并延续了两千年，那说明在我们民族的精神世界里肯定有好的东西、优秀的东西。我要寻找的就是这个东西，就寄托在朱先生和白嘉轩这两个人物身上。

与此同时，在这个最优秀的东西的负面附着的另一面是腐朽的东西、落后的东西，是造成我们民族衰败的很重要的负面因素。我在作品中人物的很多行为上都写出来了。所以在朱先生和白嘉轩这两个人物身上，既有我们民族优秀的东西，同时，也有我们民族最腐朽、最落后的东西，甚至是成为这个民族精神负担的东西。它不是单一的。譬如朱先生的正直人格、道德良心、铁肩道义，这是一面，但另一面是，他所坚持的那个旧学已经不行了，但他仍然坚守，他不学新学，眼看学生一个一个地流失了，到最后自己只好把门关了。他再也没事可干，他又不愿参与政事，他就想教化民众，所以最后自己只能去编县志，他再也做不了什么了。而到了饥荒开始的时候，也只有他这样

一个正直的人才能够拯救民众，而且你给他一个具体的工作去做，他会做得非常好，他身体力行，要知道当时借赈灾之名大发横财的人有的是，但朱先生和饥民吃同样的粮食，与民众共患难，这是儒家真实精神的写照。

李遇春：对，儒家文化精神中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民本思想。

陈忠实：是。朱先生的民本思想是我们民族精神中非常可贵的东西。但是，他精神世界里腐朽的东西也是显而易见的，比如他坚持旧学，但是他阻挡不了，也非常被动地看到自己的学生进了新学堂，他只好把门关了去编县志，这其实是无奈之举呀！再一个就是他对作品中某些具体事件的态度也流露了他的腐朽思想。比如对待黑娃和小娥的爱情，白嘉轩按照儒家的族规不许他们进祠堂，最后弄到小娥被公公鹿三所杀，而且小娥死后闹到了迷信的地步，包括村里发生的瘟疫也被认为是她带来的，那肯定是迷信嘛。那实际上是村里人心理上软弱的表现，他们无法解释瘟疫是怎样造成的，就推到小娥身上去了。

李遇春：小娥其实是一个很无辜的替罪羊。

陈忠实：对。那也可以看作是鹿三杀人后心理上软弱的表现，他外在不表现出来，但内心表现出来了，他心里是无法抵抗的。而在修镇压小娥鬼魂的塔的时候，是朱先生设计的，这说明朱先生也参与了这场镇压行动。这就流露了他精神里面负面的、腐朽的、陈旧的东西。

李遇春：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朱先生作为封建文化卫道士的一面，其实在他的精神世界里面也有一些根深蒂固的专制主义的东西。

陈忠实：我们当然可以给他分析出各种结论来，但他为什么会那样做呢？因为他坚守的是传统的儒家道德规范的价值标准。

李遇春：而中国传统的儒家文化以群体为价值本位，这和西方近现代文化以个体为价值本位是很不一样的。所以在中国历史上我们经常可以见到那些压抑个性解放的例子。

陈忠实：对。我写的小娥始终是反叛的，是反叛旧制的，不管她一开始以合理的形式争取合理的生存形态，寻找合理的爱情和婚姻，那当然是我们应该倡扬的，还是后来她与鹿子霖、与孝文的关系，那实际上是以一种恶的形式表现了她的反叛性。当然，造成她的悲惨命运的既有社会的因素，也有她主观的因素，但导致她最后死亡的不是她自己，而是整个社会的压力！而在朱先生和白嘉轩的眼里，小娥就是一个妖孽。这妖孽，“妖”在什么地方呢？“孽”在什么地方呢？这就是对乡约族规，包括爱情婚姻价值观念的反叛。其实不光是朱先生和白嘉轩不能接受小娥，她的公公鹿三也不能接受她，而且在她与黑娃事发之后，那个郭举人就把她休了，休了后连她的父母也不能接受她，因为那个时代的文化心理平衡被她颠覆了，因为在那些人看来，她的行为是一个忤逆行为，是一个道德沦丧的行为。而不是像我们今天这样，把她的行为看成是寻找婚姻自由和人的合理的生存形态呀。

那当时的社会为什么不这样看呢？这是因为它那个价值判断标准，特别是婚姻道德评判标准与我们今天的价值标准不一样。这样就不可避免地产生了价值冲突，就颠覆了原有的那个文化心理平衡，所以整个社会都不能接受她，而不光是白嘉轩不能接受她、朱先生不能接受她、公公不能接受她、父母不能接受她，那其实是一些表面的现象，问题的实质在于整个社会文化秩序都拒绝她！所以她只能死亡，她已经没有办法在那个社会里活下去了，她已经活不了啦。鹿子霖接

受她其实是乘人之危，是进一步残害她，是促使她堕落，因此，鹿子霖是促使她往恶的方向发展的一个重要的恶的因素。

李遇春：整个书中对她有真情的恐怕还只有黑娃。

陈忠实：但黑娃因社会政治原因遭难了，远离了，留下空白了，所以恶的东西乘虚而入嘛。

李遇春：如此看来，小娥的最终毁灭其实是一种历史的必然，没有任何人能够挽救她！她的悲剧既是社会的悲剧、历史的悲剧，同时，也是文化的悲剧、人性的悲剧。

陈忠实：是。

李遇春：众所周知，您的《白鹿原》主要受了拉美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影响，那么，我想知道的是，您的文学创作除了接受异域文学的影响之外，是否还受到了中国传统的古典小说的影响?

陈忠实：我可以坦率地说，我们传统文化的小说，我很少读！

李遇春：但不管怎么说，中国的四大古典文学名著您总该读了吧?

陈忠实：没读完。我跟你说，四大名著中我最早读的是《西游记》，那是小孩子读的书，我是上初中时读的，觉得很好玩，当时不完全理解，反正很热闹。后来又把《红楼梦》囫囵吞枣地读过一遍，那还是在我初学写作的阶段，大约二十岁的时候。因为那个生活离我的距离太远了，所以首先就没有一种感情上的亲近感，绝对不如我读《创业史》容易产生生活感受上的共鸣！《水浒传》呢，我是没读完，大概读了三分之二吧。

李遇春：当时的那个年代我不太清楚，我不知道包括四大名著在内的许多中国古典文学作品在当时是否广泛流传，它们不会作为“封资修”，或者以“破四旧”的名义给查禁了吧?

陈忠实：那些书在当时全都有，它们在五六十年代都是文学名著嘛！连课本上都收的，当然都是以节选的形式出现的。你说的“破四旧”那是在“文革”中“破”的嘛。而且即使是在“文革”时期，想找到那些书也不是太难。《水浒传》我顶多读了三分之二，我觉得写得最好的就是前边那些人物出场部分，特别是鲁智深、武松、林冲这些人物的出场写得特别棒！一个人物集中写那么几回，这个人物就出来了，接着那个人物出来了又这样写，就是这种结构办法。到后头我就不喜欢了。梁山为了扩大人马，就把有一些地方官，像卢俊义呀，设圈套把人家弄上山来，逼人家走上反朝廷的道路。我就感觉到这与前头那些人物的意义已经大相径庭了。

李遇春：据考证，中国的许多古典长篇小说，包括《西游记》，特别是《水浒传》在内，它们都是作者根据民间流传的许多传奇故事加工整理而成的，这些书的成因都经过了一个滚雪球式的过程。这就造成了它们在结构上相对来说比较松散。

陈忠实：它们可能直接从说书而来，因此不可能像西方近现代以来的长篇小说那样具有统一的结构。比如在西方小说中，一个人物在第一章中出现了以后，他可能要到第三章中才能出现，中间的一章就没有这个人物了。如果像这样说书，那就根本说不成。说书就要集中把这个人物的故事说完，然后才能引到另一个人物。所以，我们的许多古典小说都带有这种痕迹。从情感上讲，我是喜欢现代文学和欧美文学的，我不是太喜欢咱们的传统文学，尤其是那个语言，我们章回小说的语言好像套话太多。

李遇春：我也感觉您的语言，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的语言都离传统文学的语言比较远。

陈忠实：我是不喜欢那些东西的。我上初中二年级暑假第一次读了《静静的顿河》。你看书中那个旧俄统治下的哥萨克的生活，它离我多远呀，我当时还是一个十五六岁的孩子，但我就感觉那些人物的思想情感，包括葛利高里的家庭生活，哥萨克农民和我们这里的农民所共同的东西，我都能感受到，没有隔膜！而且我更喜欢那种语言，当然那是翻译语言，并不是原来的语言，但那种语言的流动性、生动性、活泼性，我是感觉更好一些。所以我后来更多地读欧美文学作品。现在有人说我对传统文学接受比较好，这可能是一个假象！（笑）为什么是假象呢？因为它不是艺术上的，而是因为我在《白鹿原》中重点挖掘了传统民族精神世界里的东西，可能这会使人产生那种印象。

李遇春：那您究竟读了哪些现代文学和欧美文学作品呢？

陈忠实：我在念中学的时候，巴金的“激流三部曲”和“爱情三部曲”，什么《家》《春》《秋》呀，《雾》《雨》《电》呀，我都读了。茅盾的所有作品我都在高中阶段找来读了。还有柔石的作品、蒋光慈的作品、李广田的散文，也就是三十年代那些大家的作品我基本上都读了。后来又读了以高尔基为代表的那些苏联文学作品。到新时期以后主要接受的就是欧美文学和拉美文学。另外，我曾经在八十年代初那一段时间还特别迷恋苏联文学。

李遇春：看来您的文学创作主要接受的是异域文学的影响。实际上中国现代文学自五四以来主要接受的就是异域文学的影响，如果没有现代外国文学的滋养，中国的新文学也就很难生长。

陈忠实：你现在很难看到我们哪个人的作品写得像传统的“四大本”，恐怕很少有人的作品像我们真正意义上的传统文学。因为那种语言是不能学的，它描写风景也就是那几句话，什么“风清月朗”之类，描写女性也是那么几句套话，什么“沉鱼落雁”呀、“闭月羞花”呀，你简直没办法用，一用就显得陈旧！

李遇春：在大多数人心目中，鲁迅是一个彻底的反传统主义者，鲁迅的文学资源和思想资源主要都是来自西方近现代以来的哲学和文学，然而，鲁迅受中国传统的思想和文学的影响也是很大的，记得有人曾经这样评价鲁迅，说是“魏晋风度，托尼文章”。尼采和托尔斯泰对鲁迅的影响就不必说了，魏晋时代的名士风度和文学风骨对鲁迅的影响同样也是显而易见的。这说明，哪怕是像鲁迅那样一位彻底的反传统主义者，要想完全超越自己民族的文化和文学传统也是不可能的。

陈忠实：绝对的超越当然是不可能的。但是我们的新文学作品我看都已经是我们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尽管它们都借鉴了许多异域文学和文化的影响，然而它们毕竟是我们民族的作家创作的作品，都已经成了我们这个民族的东西。比如鲁迅的作品，还有当代许多作家的作品，其他欧美人是写不出来的，而且你翻译过去，人家一看就知道是中国作家的作品，那些欧美作家弄不成这种形态的作品呀。

李遇春：是的，纯粹模仿西方的作品实际上也无法被中国的读者和文坛所接受。刚才您谈了您所接受的文学资源，那您能否进一步谈一谈您所接受的思想资源呢？您前面经常用到“心理结构”这个术语，那您对西方现代心理学著作是否作过深入的探究呢？

陈忠实：我看过一些。

李遇春：记得我原来看过一份资料，一位文艺记者在六十年代访问柳青的时候，他发现柳青的书架上摆了很多心理学的著作。我看到这里感到很惊讶，原来革命年代的作家也读西方的心理学书籍呀。

陈忠实：那个时候是有心理学的书，五六十年代的时候已经翻译过来了。我也看过心理学。我在写作《白鹿原》之前很有意识地阅读过一些历史和理论书籍作为创作准备。为了把《白鹿原》的人物和情节不是仅仅投放在这个原，而是投放到我们民族近现代以来的精神历程上去，我认真地阅读过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我把近代史作为纵的坐标，然后把我作品中要写的人物和情节作为横的坐标，把它定位在中国近代以来我们民族大的历史背景上去。

再一个，我大量查了县志，研究我们一方地域的人的精神历程。因为过去的县志实际上是一个县的百科全书，一个县一千多年的历史演变、人文风俗、文化名人、重要建树、重大灾难，全都记得清清楚楚。哪一年发生过地震，哪一年发生过大旱，哪一年我们那个灞河发过大水，冲毁过多少民屋，死伤过多少人和牲畜，这些东西都记载了。还有，我在蓝田查的县志已经把民国以来的重大事件虽然没有列入正县志，但是作为附录，一年一年地编下来了。所以我把这个地方发生的重大事件，跟我们近代以来整个民族发生的重大事件统一到一块去理解，使我的人物能够活动在那个重大的历史背景上头。

此外，我还读过一个外国人写的《心理学》，作者的名字我记不清了。还有李泽厚的《美的历程》，我对这本书的印象很深。

李遇春：那本书可以说是八十年代“文化热”和“美学热”的一部代表著作。李泽厚提出的“文化心理积淀说”在当时影响很大。

陈忠实：还有弗洛伊德的心理学书，我也读了。我读这些书的目的，就是要借助它们，促使我从思想到艺术，整个地形成我对我构思中的人物和事件的独特的理解和体验。所以，你也很难说哪个人的哪部书对我产生了哪种具体的影响，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它是一种综合的影响。

李遇春：就像您前面所说的，包括历史、方志、美学和心理学等各个方面的思想资源，它们综合起来对您的《白鹿原》的创作产生了影响。

陈忠实：是。它们整个地促进我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审美体验。在创作的过程中，一个作家除了要形成独特的生命体验之外，还要形成独特的艺术体验，因为艺术也是一种体验嘛。

李遇春：按照您前面所说，《白鹿原》中的许多人物之所以性格都很复杂，很重要的一点就是因为您解析了他们的心理结构。我非常同意您的看法。我前段时间在构思评论《白鹿原》的文章时就注意到了这一点。我当时联想到了弗洛伊德晚年提出的三重人格心理结构学说，就是“本我”“自我”和“超我”之间的人格心理冲突，我觉得以此来解读《白鹿原》中许多人物的心理结构还是很有效的。

陈忠实：每一个人的心理结构都是不一样的。为什么不一样呢？因为一个人的道德观、社会价值观和文化观形成了他的人格世界，而人格世界里的那些已经固定了的东西，和尚未固定的东西之间所形成的心理结构是有差异的，人与人之间的根本差异就差在这个上头，而不是差在脸上的形状。而且就是同一个人，随着生活的发展，他在一个时段里头和发展了的生活时段里头，前一个心理平衡点被颠覆了以后会形成新的平衡点，当这个平衡点再被颠覆了的时候，这个颠覆就

不是对前一个颠覆的简单重复，而是在新的平衡点上颠覆了新的道德观和价值观。

李遇春：这么说，人的心理结构常常是一个动态的过程，而不是孤立的静态的东西。

陈忠实：所以生活中每个人表现的痛苦形态都不一样。这样透视出来的人物的性格那就是千人千面，而不是千人一面。你仅仅只是写一个人物的外在行为，而对他的内在的心理结构没有根本的把握，那总像是只触及人物的皮毛的东西。比如鹿子霖这个人物，他心理上的平衡点也是不断地被打破的。其实在他来说，他的两个孩子要比白嘉轩的两个孩子孝文和孝武要好得多。当孝文从族长的位置上被他害得栽下来以后，他就很得意呀。而且他在村里头虽然没有掌族权，但他掌的是更大的政权。他的心理优越就优越在这上头。一旦他的家庭中出了事，比如兆鹏的婚姻让他在村人面前陷入了尴尬，特别是兆鹏革命受挫牵连到了他以后，他的心理优越感就没了，也就是说，他的心理平衡被打破了。但他在第一次受挫之后又去求二儿子兆海，等兆海把他领回县上威风了一番之后，他的心理平衡又恢复了。但后来他的遭际又被颠覆了，他被颠覆的很重要的一点就是他的欲望在暗中作祟。

李遇春：鹿子霖是一个欲壑难填式的人物，他好像始终都不安分，心浮气躁，这和白嘉轩的岿然不动、以不变应万变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陈忠实：他不安分什么呢？他的道德观不一样，他的价值观也不一样。就在这个上头他不断地被颠覆，直到他被送进了监狱，直到他最后被吓疯。鹿子霖和白嘉轩，这两个人物的不同就是，同样面对那

个解放后要杀黑娃的审判台，他们的生理和心理反应大相径庭。当发现镇压黑娃又回到了那个戏楼上的时候，鹿子霖吓得拉屎了，而且从此精神错乱了。他的整个精神心理世界就不再是简单地被颠覆了，而是随着那一声枪响，整个地崩溃了。因为他的道德观、价值观，以及所有的社会生活理想所构成的心理平衡全部垮了，那不是一般的心理失衡，而是整个地坍塌了。所以他就疯癫了，连生理上都引起了症状，他吓得拉稀了。

而同样在现场的白嘉轩，他的反应截然不同，他的精神心理平衡的最后一次被颠覆反映在生理上就是一只眼睛给气瞎了。你看看这个心理平衡点的差别是多么的大！两个人的道德观和价值观所形成的精神世界和人格世界的差异，孰强孰弱，一下子就在生理上不一样地表现出来了。那个是被吓得拉屎，这个是眼气瞎了。一个人的眼能够气瞎了，你看这是多么强烈的精神心理冲撞！而且枪毙黑娃的恰好是白嘉轩的儿子孝文，按说白嘉轩是得势的，因为儿子当了县长了，结果他却气坏了。这是为什么？因为他的道德价值观念，尤其是他精神世界里的那些做人的原则整个地被眼前的一切颠覆了，所以他气瞎了眼。

你看看白嘉轩和鹿子霖，这两个人的性格差异就差在这个上头：从心理上被颠覆、崩溃，到引起生理上的这种反差：一个是吓得拉稀，一个是眼被气瞎。什么叫人格？什么叫性格？不是都出来了吗？对不对？所以，我觉得从心理结构来解析人物、塑造人物就要更准确一些。如果是仅仅写人物的外在的行为，那往往很难写出人物性格上的差异来。

李遇春：实际上您在作品中还是写了人物外在的、表面的细节差异的，不过您并没有停留在这个表象的层次上，而是进一步地写了人

物内在的心理结构的差异。比如白鹿两个不同的家族分支，您在作品中着重写到了他们在相貌上的差异，由于种系的不同、血缘的变异，鹿家族和白家族的人不光在精神和心理上不同，而且他们在生理特征上也有着明显的区别。

陈忠实：我就写了那么一笔，那只是形象上的差异。白家与鹿家的人在面相上的差别在于，一个是鼓出的，一个是凹陷的。一般来说，眼睛比较深，凹陷下去的人更多地富于智慧，你看鹿子霖论心眼儿，那他的鬼点子是太多了。（笑）我就写了这一笔，再没有其他的具体的形象描绘。

李遇春：但是您还写了他那个家族的人都是“勺勺客”的后代，由于他们的祖上曾经有过非人的屈辱经历，所以这个家族的人在人格心理上大都有着致命的弱点，比如喜欢报复、热衷功利、善耍阴谋诡计等等。鹿子霖是这样，鹿兆鹏有时候好像也难免如此，只有鹿兆海仿佛算是一个例外。

陈忠实：我那是写的一种精神继承。

李遇春：对，这种精神继承也可以叫作心理遗传。

陈忠实：是。

李遇春：根据我对您的作品的阅读印象，我觉得您的创作心理有时候是充满矛盾的，特别是在文化价值观念方面这种矛盾性表现得比较明显。

陈忠实：你试举一两例。

李遇春：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当然是《白鹿原》。一方面，您对白嘉轩的道德人格在情感上极为推崇，为这种道德人格的衰败唱了一曲历史的挽歌；另一方面，您对白嘉轩的道德人格所隐含的“非人”因素在理性上又保持着足够的清醒。实际上，这种道德与人性的文化冲突在《白鹿原》之前就已经出现了。比如在《两个朋友》中，对于一桩离婚案件，您在一开始是从大众的视角，或者说按照世俗的道德立场来展开叙述的，但叙述到后来我发现您又站到了人性的立场上。《康家小院》也是这样。一方面，您站在世俗的道义的立场上同情善良本分的康家父子，谴责新媳妇玉贤的失节行为；另一方面，您又从人性解放和现代婚姻观念的角度对女主人公的行为表达了自己的同情和理解。这其实是一个老话题了。早在五四时期，现代启蒙文化精神就已经在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但后来随着中国社会在革命化的轨道上不断推进，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以后，一种革命的道德主义价值观逐步取代了五四时期的现代人道主义价值观，而前者恰恰又在精神上与中国传统的道德文化价值观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而在您的作品中，这两种道德价值观与现代人道主义价值观之间的矛盾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表现。

陈忠实：这种矛盾表现在什么地方呢？我认为有两重。就《康家小院》来说，从传统的道德观念，具体到婚姻观念来看，刚解放的时候，康家父子很勤劳、很忠诚、很老实、很善良，这些优秀品质在他们的身上都存在，而且他们对玉贤也很好。但玉贤与勤娃的婚姻不是她自主选择的结果，而是他们父子诚实为人的品质感动了她的父亲，她父亲于是就把她许给这个人家了。在一开始，她对父亲的选择也并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好，因为那父子俩在思想上、品质上并没有明显的缺陷，因此，她要说出什么不满意来还很难，觉得这样生活下去也还是可以的。一旦那个小学教师进入了她的生活，并且展现出另外一种

新的生活形态的时候，玉贤的心理平衡马上就被打破了。她原有的道德观念、价值观念、婚姻观念、家庭观念一下子就被那个陌生的闯入者给冲破了。造成她的心理平衡被颠覆的因素就是一种新的文明的闯入，于是矛盾就产生了，精神不平衡出现了，所以后来发生的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事情。这是一重复杂。

另一重的复杂在于，当她按照老师给她宣扬的婚姻自由、新的生活观念去追求的时候，最后退缩的是新的文明的倡导者、宣传者本人，这个问题又复杂了一层。倡导现代婚姻自由的文明精神的人……

李遇春：我们通常把这种人叫作启蒙者。

陈忠实：对，启蒙者。那个启蒙者所宣扬的启蒙精神并没有错，但他个人的人格是有缺陷的。

李遇春：也就是说，他所宣扬的那种启蒙思想并没有化为他内在的人格精神。借用一句佛教的话来说，就是他还没有达到“道成肉身”的精神境界。

陈忠实：由于他个人品质上的缺陷，所以他没有面对现实的精神勇气。他最后用一句话刺伤了玉贤，使她又回到老路上去了。他对玉贤说：“我跟你不过是玩玩罢了，你怎么能够当真啦？”这就是说，当她按照启蒙者的教诲去追求合理的生存形态，却发现了这个人品质上的毛病以后，她也就怀疑起了启蒙者的宣言的正确性，然后又回到勤娃的身边去了。她就这样退缩了。这也就反映了现代文明进程的复杂性。在现实生活中，往往宣传的文明本身并没有错，但由于宣传者本人的某些缺陷，也会造成文明的曲折的历程。

李遇春：实际上在勤娃的身上也存在着心理失衡的现象。

陈忠实：勤娃在新的观念的冲击下，他的心理平衡也被打破了。但他不是朝着文明的方向发展，而是朝着恶的方面、堕落的方面发展下去了。所以现代文明进程确实是很复杂的。

李遇春：从这个角度来看，《康家小院》才是您真正的第一部中篇小说。尽管这部作品是您在写作《初夏》的过程中创作受挫的产物，但这两部中篇小说在思想内涵和艺术取向上简直是大相径庭。

陈忠实：是。本来《康家小院》就是我发表的第一部中篇小说嘛。

李遇春：那么，请问您对中国现代启蒙文化传统和文学传统怎么看呢？一般来说，人们现在提到的以鲁迅为代表的启蒙文学传统是以“人性论”为核心价值观念的，而后来的革命文学传统则是以“阶级论”为核心价值观念的，比如柳青笔下的梁生宝就是依据“阶级论”而塑造的革命英雄人物典型。在革命年代里，我们习惯于把“人性论”直接抛给资产阶级，仿佛“人性论”姓“资”不姓“社”似的，而实际上，“人性论”这个东西有点像我们现在搞的市场经济，以前我们也是认为市场经济姓“资”不姓“社”，后来我们才意识到市场经济并不是资本主义的专利，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同样的道理，我们也是在“文革”结束以后才意识到“人性论”也并不是资产阶级的专利，“人性论”同样适用于无产阶级，甚至可以说，“人性论”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超阶级的范畴，“阶级论”不过是“人性论”中的一个文化因子而已。所以，我们实在是没有必要一定要在“人性论”的前面加上一个意识形态的修饰语。

陈忠实：人性和人道是一切人类文明的基础。没有人性和人道也就很难说到人类文明。我觉得五四时代的新文化运动很重要的一点就

是文学的胜利。它比论文、学术的东西更容易普及，更容易激发民众的觉悟，真正是适得其时啊！因为我们当时就纠缠在那一根辫子上头，（笑）我们整个民族的文化心理形态就可以简化为一根辫子，那根辫子实际上是我们民族的一个集体意识呀。中国新文学的启蒙呐喊，实际上就是要在中国人的心理上剪掉那根辫子，《呐喊》的意义就在这里。

李遇春：就是要把中国传统封建礼教的那根心理脐带给剪掉！

陈忠实：是啊。当时所有道德的、社会的、价值的、文化的观念全都可以概括成一根辫子。所以中国新文学的启蒙的历史功绩对于民族精神的复兴和革新，可谓功不可没，因此，我有时候确实感到我们有些人对鲁迅那一代作家的那种浅薄的非议，实在是一种亵渎，他们真是不理解或者说忘记了鲁迅那一代人的历史功绩，对一个民族的意义。在鲁迅的《呐喊》中，以《狂人日记》和《阿Q正传》为代表的那些短篇小说震撼的不是一个人，它震撼的是一个民族，它把整个民族的旧的精神心理结构给颠覆了，《呐喊》的意义就在这里。我们今天似乎不存在这个东西了，已经没有那种直接的心理感受了，我们反倒说什么鲁迅没有写长篇呀，只是写了一些短篇，因此不够大师呀，甚至使用一些调侃的语言，我觉得作为一个民族精神的承继者，起码这个态度不应该太轻佻了。

李遇春：记得郁达夫当年曾经写过一篇《怀鲁迅》的短文，他说："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

陈忠实：是。一个民族没有出现伟大的人物，是悲哀的，但出现了伟大的人物又不去爱护，那是更大的悲哀！

李遇春：实际上，如果没有接受五四启蒙文学传统的影响，那您就不可能在《白鹿原》中写出小娥这个人物来。小娥这个人物的出现，集中表明了您对五四精神的一种承继。

陈忠实：是。《白鹿原》中有两个比较重要的女性人物：一个是小娥，再一个是白灵。这两个人物都是那个时代里头对旧的体制、精神、心理等所有观念的背叛者。但白灵的背叛是自觉的，因为她接受了共产主义的新的理论，因此，她的背叛在态度上很坚决，在行动上也敢于公开地与父亲对抗。她反抗父亲的包办婚姻，为了争取一种合理的自由的婚姻，她绝不妥协，她始终捍卫着自己的个体意识和个性尊严。包括她对兆海和兆鹏的再选择，也表现了她的自觉精神。她在婚姻选择上头两次都不是被动的，而是主动的。她是一个全新的具有反叛精神的现代女性。

而小娥是忠于人的本能的一种反抗。因为她的生活太苦了，她连将就也将就不下去呀。比如《康家小院》中的玉贤，如果不是因为遇上了那位启蒙教师的话，她很可能就和勤娃比较和美地生活下去了，不会产生本能的反抗。而小娥就连凑合下去过这种日子都没办法，因为她嫁给了那么一个老先生、老举人，而且老举人跟她连合理的基本的性生活都不能过，小娥既是他的一个发泄的工具，也是一个养生的工具，她存在的意义就是全部为了那个老举人，所以她没有任何个人的生命价值可言。因此，在黑娃出现后，她的反抗是本能的，也是自然的，因为她太屈辱了。以后发生的一切都是很自然的事情。但是，小娥的反叛是本能性的，而不是自觉的、出于一种精神提升的反抗，所以小娥的行为带有很大的盲目性。连她自己也不知道她已经冲撞了

跟她相关的整个社会结构，后者被她的行为打乱了。而她的反抗是无法对抗当时整个的社会秩序的，她既不能对抗老举人，也不能对抗她的父母，更不能对抗白嘉轩的宗族祠堂，因此，她最后只能悲惨地死在她公公的刀下。作为一种本能反抗，等待小娥的必然是悲剧性的结局。

李遇春：但是，白灵的那种自觉的反叛，或者叫选择，最终也还是被历史所无情吞没了。

陈忠实：白灵反叛的最后的悲剧结果并不是她婚姻价值上的悲剧，因为她最后选择和兆鹏相结合，那是很完美的一段婚姻生活，虽然没有举行公开的、正式的婚姻仪式，但在性的结合上是很完美的，非常完美的。我为什么要在那一段集中写她的那种性感受，就是为了写一种完美的合理的婚姻性形态。

李遇春：您始终觉得他们的结合是完美的，但我不知道该不该说我自己的阅读印象。我在阅读的过程中始终感受到白灵在内心深处还是在挂念着兆海、深爱着兆海，这就像《青春之歌》中的林道静，虽然她最后也是嫁给了一个无产阶级革命者江华，但在她的内心深处却始终无法忘怀另一个带有小资情调的革命知识分子卢嘉川一样。

陈忠实：（略作思忖）我们从今天的观点来看，也许是这样，可能会产生这种感觉。但如果放在那个时代来看，作为一个追求革命、追求新生的革命自觉分子来讲，她的精神追求、理想追求应该是第一位的、最崇高的，这在她心里不是被动的，不是强迫性的，而是自觉的。因此，白灵与兆海在“主义”上的背离必然会影响到他们的情感。他们各自忠于自己的“主义”，于是发生了思想背离，这种思想冲突必然会引起情感上的冲突。譬如说在原上发生的农民运动，兆海就看作

是“痞子运动”，白灵与他的第一次冲突就是在这里发生的。然后两个人在情感上就发生很大的背离了。

李遇春：这很容易让人联想起当年的红色经典《青春之歌》，女主人公林道静对余永泽、卢嘉川、江华三个男性的爱情选择在本质上其实是一种政治选择。对于林道静来说，革命应该是第一要素，爱情必须服从革命的要求。

陈忠实：是。这东西我们今天的人已经不大理解了。你想想看，为了革命，为了心目中的“主义”，他们当年连生命都可以不要，“主义”就是他们的第一生命选择，那婚姻当然就是从属性的了。而且他们由志同而道合，情感必然就会融洽。

李遇春：这是当年最理想的男女婚姻模式——“革命伴侣”。

陈忠实：就是从我们今天来看，不在革命的意义上讲，譬如说，如果你找个爱人，她跟你的志趣完全相反，你能和她在一起生活吗？你喜欢追求高尚一点的东西，美好一点的东西，可那个女人老是跟你闹世俗的东西，你跟她久而久之能生活吗？你肯定会发生情感上的背离，因为情趣、追求上的差异必然会引起情感上的差异。再譬如说妓女，妓女长得都是很漂亮的，但你不可能因为她漂亮或者说生理上的美感就跟她结合呀，那是不行的，对不对？这都是一个道理。我们今天所认为美好的东西跟那个时代的人所认为美好的东西并没有什么本质上的不同。那个时代的青年认为美好的东西就是“主义”。我们今天的青年不在当时的那个情境之下，不在这个和那个“主义”的争斗之中，我们就很难理解革命在他们心中的那种神圣性。这个东西怎么可能不影响情感呢？不可能不影响嘛。在精神和情感之间并没有什么万里长城，它们不可能截然分开呀。就像刚才打的那个比方所说的，你

还想追求精神上完美的东西，虽然那个女人形象上头很好，可是她老是追求世俗的东西，这肯定要影响你对她的情感，你马上就会对她有看法，会觉得两个人不合调、合不来嘛。

李遇春：白灵和小娥，这两个您重点塑造的女性人物，虽然她们最后都有着一个悲剧性的结局，但悲剧的内涵和性质看来并不一样。

陈忠实：白灵的悲剧是极左的政治路线所造成的，在她和兆鹏两个人的情感世界里并没有出现任何问题。

李遇春：所以说，白灵的悲剧是政治悲剧、历史悲剧，她是被历史的“反动”政治势力所吞没的。而小娥的悲剧更多的是文化的悲剧、人性的悲剧。这是她们不一样的地方。

陈忠实：小娥完全是一个反叛的失败者，她是一个十足的悲剧人物。光靠她那种本能性的反抗是无法战胜强大的封建道德文化势力的。其实不光是她，在历朝历代，在那个严酷的道德规范下，又出现了多少反叛的女性啊，可最后她们全都死了，没有一个有好下场的！古代的戏剧很多都反映了这个东西。

李遇春：如此看来，有一个问题似乎就不解自破了。记得在《白鹿原》发表之后，有人说您是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

陈忠实：那是没有的事！无论是写白灵还是小娥，以及其他的一些人物，我都是要写人的复杂性！

李遇春：但在阅读《白鹿原》的过程中，甚至包括阅读您早期的《信任》等作品在内，我感觉您对中国传统的文化道德价值观念还是有所留恋。特别是在白嘉轩这个人物的身上，尽管您也写出了他性格

中的专制主义因素，如镇压小娥的一系列行为，这说明您也在努力地用启蒙的眼光批判性地审视他，但白嘉轩最后留给人们的是一个苍老悲凉的背影，读者从中很容易感受到您的一种挽歌心态，或者说怀古心态，您为主人公及其所代表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念的消亡深感惋惜和痛心。

陈忠实：不！前边实际上已经谈到过这个问题了。我确实写了白嘉轩精神世界里的美好品质，我是着力去这样写这个人物的，这不是我留恋什么的问题，而是我着力去写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人格力量！这个东西是不应该非议的。我们这个民族如果没有那些优秀的精神世界里的东西，那就不可能存在五千年，这是一个基本事实。而且历朝历代，哪怕是到了清朝末年，朝廷割地赔款、丧权辱国，腐朽腐败到了那个程度，我们仍然有民族精神支柱性的人物存在呀！你可以说这些人物观念上是落后的，但他们在精神品质上是没有任何毛病的。

我就是要写我们最底层的一个“民人”——白嘉轩，他作为一个最底层的农民是如何继承着我们这个民族的优秀品质，并呈现出一种怎样的生存形态的。所以说，不是我留恋这个东西，而是我着力去写我们民族精神的光辉的一面的。白嘉轩的正直、勤劳、富于同情心、以德报怨……这都是他精神世界里非常光彩的。难道我们今天要把他们全部都丢掉吗？！实际上任何民族都是具有这些优秀的品质的。这不应该作为批判的东西，你只能批判他精神世界里落后的、腐朽的东西。比如他固守在土地上头，不思进取，不学习新的知识，不发展新的眼光，像他主张耕读传家，读了书还不让孩子出外干事，就在那继承家产，继续耕读，这种狭隘保守的做法是我坚决批判的，我把白嘉轩的那种生存形态写出来就是为了作为一种批判形态。还有，他对小娥前前后后的整个做法，那都体现了他精神世界里腐朽残忍的一面。

包括他对白灵态度的变化，他对白灵小时候的爱甚至超过了他对三个男孩子的爱，但一旦白灵背离了他的精神的时候，他只是很冷酷地说了一句话：“就当她死了。”白嘉轩冷酷的一面、理性的一面只有当白灵违反了他的道德价值观念的时候才会体现出来，然而，当这个孩子真的死了以后，他就伤心得不行了。他总是一个人嘛。

所以，我们不能把集中在白嘉轩身上优秀的东西全部都看成旧的观念。不是我留恋那些旧的东西，而是我从我们民族精神世界里陶冶出我们这个民族之所以能够长期存在的美好的东西。这个东西并不是我们这个民族所特有的，英格兰民族、德意志民族甚至犹太人都有的，正直、勇敢、勤劳、富于同情心、以德报怨、坚忍不拔……哪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这些东西它就不可能生存，早就被其他的民族改造了。白嘉轩作为一个文学人物之所以能够站住，就因为他是一个完整的人物，而不是仅供批判的一个腐朽的地主，一个周扒皮，也不是一个南霸天，一口就想把穷人的血喝光。其实白嘉轩对鹿三的剥削本质并没有改变，他们之间的阶级关系并没有改变，因为在中国封建社会结构中，地主与雇农之间的关系是长期自然形成的。问题是，白嘉轩应该给予鹿三的那一部分他都给予了，他不像那些恶霸地主，该给予被剥削者的那一部分都不给予，而且还要剥夺他们的生存权。

李遇春：像这样的反动地主形象在中国二十世纪文学史上简直是太多了。

陈忠实：但应该说在白嘉轩的身上才能看到我们民族的非常优秀的东西。

李遇春：自五四以来，我们的新文学只要涉及封建家长，几乎都是作为批判对象来塑造的。

陈忠实：那个时代写成批判对象是合理的。像《家》里的高老太爷，《阿Q正传》中的赵老太爷，他们作为一种旧世界的符号，在当时的历史情境中，要革新中国人的精神世界，就要把他们化为腐朽的形象，作为反封建的批判对象是合理的。到了今天，时代过去近乎一个世纪之后，我再来写，我就希望写出一个完整的形象来，既批判他落后的东西，又写出他精神世界里为我们这民族应该继承的东西。这应该是对我们文学世界画廊的一个补充吧。

李遇春：应该是一个补充，因为您给我们的文学人物画廊增添了一个崭新的形象，一个不同于以往革命文学中的地主形象。

陈忠实：过去的革命文学为了唤醒民众起来从事阶级斗争，把地主写成那样一种形象也是合理的。像《半夜鸡叫》中的周扒皮，那完全是一个漫画式的人物。（笑）

李遇春：在启蒙文学语境中，地主都被塑造成了高老太爷式的人物，而在革命文学语境中，地主都被塑造成了周扒皮式的人物。其实无论是启蒙文学还是革命文学，那些作家都具有强烈的功利性的写作目的。众所周知，革命文学带有强烈的政治功利性，而启蒙文学也具有明显的社会文化功利目的，五四时期最大的文学社团——文学研究会标榜“为人生的文学”就是如此。应该说，二十世纪以来的中国新文学在总体上具有强烈的功利性，其中，如果说谁要是主张超功利的文学观，那他很有可能就会被戴上诸如“帮闲文人”“第三种人”“自由人”“落后文人”“反动文人”之类的帽子。

陈忠实：五四文学产生的历史情境，就是为了把我们民族从封建社会的整个框架中解放出来。而当我们现在再理性地看待那一段历史

的时候，我就写出了《白鹿原》。经过历史的长期的沉淀以后，我们需要冷静地、理性地去写那一段历史。

李遇春：也就是说，您试图用一种超越的眼光去全面地还原那一段历史的真实。

陈忠实：不敢说超越，算是一种补充吧。（笑）

李遇春：九十年代以来，在中国内地的思想文化界和文学界中出现过两种不同的声音：一种声音是“保卫五四”，另一种声音是“超越五四”。您不是理论家，但我认为，您通过具体的文学创作实践其实达到了“超越五四”的目的。

陈忠实：我还是不敢妄谈超越。（笑）

李遇春：应该说，《白鹿原》是一部现代性和民族性相结合的典范作品。自八十年代以来，许多中国作家都在现代化与民族化之间从事着辛勤的艺术探索，但他们大多陷入了进退失据、顾此失彼的尴尬。

陈忠实：我明白你的意思。现代性与民族性或者传统性相结合，我当时确实没有这方面的明确的意识，我那时候根本就没有想过这个结合的问题。当时我只是以我在八十年代末所能接受和达到的现代理念，去透视已经构成了我们民族历史传统的那些东西，然后形成我自己的独特的体验，包括生命体验和艺术体验，再把它表达出来，这就是《白鹿原》。至于是否完成了你说的那种结合，我自己都不敢判断。实际上，今天你要用我们纯粹的民族传统的东西去写那一段历史又怎么可能呢？况且你很难分清什么叫作传统，孔子的东西是一种传统，五四是一种传统，后来的阶级斗争观念又是一种传统。

李遇春：实际上我们今天的人面临着三种不同的传统：古典传统、启蒙传统和革命传统。

陈忠实：那么，你究竟定点在哪一个传统上头？我觉得哪一个都是不可靠的。对于当时的我来说，我就是用八十年代末自己所能接受的现代意识（我不是全面的接受，因为八十年代中期到后期的思想界非常活跃，包括思想上和艺术上的各种“主义”层出不穷，我选择了我自己能接受的东西），然后用我已经形成的理性思维来透视我们的那一段历史，从而形成了我的体验，再把这种体验表示出来就是这本小说。至于自己是否实现了什么结合，我基本没有考虑。

李遇春：尽管您没有考虑现代性与民族性相结合的问题，但您在《白鹿原》中塑造了那么多闪耀着中华民族精神的人物，并用现代的眼光揭示出了他们文化心理结构的复杂性。

陈忠实：决定性的就是八十年代末我已经形成的属于自己的那种全新的思维。八十年代初我不可能形成那种思维，因此也不可能去透视那一段历史，如果一定要透视，那也只能是另外一种形态。截止到八十年代末，我已经逐步形成了自己透视那一段历史的思维、感悟和体验。所以，如果要说是进步的话，那也是时代在推动着我进步吧。

李遇春：《白鹿原》不光是一部现代性与民族性相结合的典范作品，而且它还是一部雅俗共赏的文学佳作。那么，我想问的是，您如何看待在当代消费社会中通俗文学对严肃文学或者雅文学的挑战？

陈忠实：真正的现在的俗文学的标本我都不知道有哪一些。我们现在都习惯于说这个话，但是没有人能够告诉我雅文学和俗文学的区

分界限在哪里。近些年来，我们不是就雅和俗争论得很多吗？但是究竟哪一些是属于俗文学呢？

李遇春：比如琼瑶的言情小说、金庸的武侠小说就是公认的通俗文学作品。

陈忠实：言情小说我觉得是文学的一种。它的那种情调和文字的表述形式可能更容易被普通读者所接受。但是，我们雅文学经常说的人物的典型性、时代性，人物的精神负载、文化负载之类，你也不能说人家言情小说就没有！琼瑶的书我曾经看过一两本，我觉得那里面还很讲究这个东西，但她能深入到怎样的层面，那是一个深浅的问题，不能说其中完全没有严肃的精神内涵。我曾经看过一部根据琼瑶的小说改编的电影，那里面就讲了对传统的落后的道德观念的反叛。而且写得很生动，读者爱看。当然，你要是把她提到昆德拉的那个高度，那肯定没有哇。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里头也写了情爱，但那个情爱里面所负载的精神内涵太深沉了。这应该是雅文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吧。但《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部小说也很好读呀，文字也很美。

我觉得现在倒是我们的雅文学应该好好地反省了。一些自视为雅文学的标本，无论是在文字上头、结构上头、表述形式上头，实际上都是自己在拒绝读者，因为他们把文学弄成了那个样子，其实是在拒绝读者阅读。你如果能在不损害人物和思想的前提下，换一种更形象、更生动的语言去表现，那结果可能就是另外一种情形了。实际上很多优秀之作都是很好读的。除非像卡夫卡的那些小说，确实比较难读，我也读不懂。（笑）

李遇春：有些现代主义的文学作品是写得很晦涩难懂，像卡夫卡的表现主义小说、乔伊斯的意识流小说就是这样。其实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虽然很好读，但是又有多少读者真正读懂了呢？昆德拉的小说大都有很吸引人的艺术外观，但它们那种强烈的思辨性和哲理性也并不是一般的读者所能领悟的。唯其如此，昆德拉的小说才能够做到雅俗共赏。我赞成您的观点，我们的雅文学应该放下自己的架子，以俗文学为镜子，好好地反思一下自身的尴尬处境，否则，我们还会失去更多的读者。实际上我觉得我们的严肃文学作家也不应该太“自私”了，太“自我中心主义”了，还是要主动考虑一下读者的不同层次的精神和心理需求。就像您在《白鹿原》中所做的那样，让不同层次的读者在阅读中享受到不同层次的精神满足，同时，也让同一层次的读者在阅读中享受到不同层次的精神愉悦。

陈忠实：我想这应该是我们努力的方向。

李遇春：我从您的一部分散文和随笔中隐约地了解到，您在“文革”期间曾经写过有关阶级斗争方面的政治小说，这给您后来带来过严重的生存尴尬和心理挫折。我想知道，您在新时期之初是如何从那种心理阴影中走出来的？

陈忠实：我在新时期之前，也就是“文革”中间曾经发表过四个短篇小说，它们都带有当时政治斗争的烙痕，主题都属于演绎阶级斗争的。但是，我那些作品在当时都产生了广泛的社会影响。这在当时那个艺术沙漠的状况下，我的那些作品之所以能产生广泛影响，主要是因为我对现实生活的艺术描绘可能在生动性上做得更好一点。但在骨子里这些作品所要演绎的还是阶级斗争，所以到了新时期以后，当阶级斗争已经被视为一个很糟糕的概念时，我就陷入了尴尬之中。这是很自然的事情。并在这种情况下，由于我的那几个短篇小说产生过广

泛影响，在刚刚粉碎“四人帮”以后甚至引起了行政上、政治上对我的不同看法，所以我就更尴尬。

李遇春：这就像当年的汪曾祺一样，由于他曾经在“文革”期间参与过创作革命现代京剧《沙家浜》，所以“四人帮”垮台以后，他也陷入了很尴尬的状态，而且也伴随着政治上的困窘。

陈忠实：当年我曾经在《人民文学》上发表过一篇题名《无畏》的小说，就是这篇小说给我带来了很大的麻烦。《人民文学》当时很关心我，因为我作为一个工农兵业余作者是被他们约去写了这么一个小说，所以他们为了解脱我，就特地派了一个编辑——崔道怡到陕西来替我解释这个问题。当时老崔跟我讲，说你尽快写一篇小说，按现在的认识观点写，那正是新时期刚刚开始的时候，一九七七年吧，写完后就在《人民文学》上发表，这样就把任何问题都解释清楚了。可我却跟他说，在这种心态下我写不了任何小说。他说那你就写一篇散文吧，我争取在某一家大报上发出来，先把你的牌子给亮出来。把牌子亮出来在当时很重要，因为过去的有些读者还在关心我，看我是否垮掉了。老崔说要让读者感觉到陈忠实还没有趴下，我就跟他说了一句话，我说我趴不趴下全在我，我现在不需要去证明，我要用以后的写作实践去证明！

我这个人得益于我的好处就是自己拥有自我反省的能力。我不要轻易地去表态，因为以我当时的理解，新的文艺复兴已经开始，我要以一个新的姿态出现在文坛上。这个新的姿态就包括我自己对我此前应该否定的东西要彻底否定，当然是就我当时所能达到的彻底程度，是我自己能理解到的程度。我不要轻易地去做，我要认真地去做！所以从一九七七年老崔来找我以后开始，一直到一九七八年的冬天，有一年多的时间我一直坐下来读书，就是我刚才跟你说过的，读了那一

批短篇小说。我想通过阅读来自我清理那些极左的东西，不光是阶级斗争的观念，这个比较容易清除，难的是艺术上的极左教条，那是很难清理的。所以你必须大量地阅读，接触真正的文学作品、经典的文学作品，这样才能够摒弃那些非文学的教条。

李遇春：那些外在的教条好排弃，难的是排弃已经长期内化的教条。

陈忠实：是啊。尤其是文学意义上的，艺术上的条条框框很难排弃。至于思想上的阶级斗争观念，其实我们当时也是很反感那些东西的。所以一直到一九七八年的冬天我都在读书，当一九七九年的春天到来以后，我觉得我的反省已经完成了，我的心里整个感觉都非常好，所以一九七九年春天我就开始写作。那一年里我发表了几个短篇，其中一个短篇《信任》还获得了当年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我觉得我这个牌子就真正亮出来了，我的新的文学姿态也就出来了。而且经过认真的自我反省，也完成了新的艺术突破。我们前面谈的艺术突破实际上是在我自我反省以后所完成的突破。所以，我在艺术上、写作上的某些进步，可能就是我自主的自我反省的结果。

李遇春：看来您是一个不断地通过自我反省来寻求艺术突破的作家。在几十年的文学创作的道路上，您是一个不倦于自我探索的人。

陈忠实：大体上可以这么说吧。

李遇春：您的早期创作深受陕西老一代作家柳青和王汶石的影响，您能谈一谈您对他们那一代革命作家的评价吗？包括历史的评价和审美的评价。因为我作为一个教当代文学史的青年教师，每当讲到以柳青为代表的“十七年文学”时，总是感到很棘手，老实说，大部分

学生对那个时代的革命文学是排斥的、漠视的，但我觉得我们的当代文学史课又有义务去引导学生了解那一个特殊时代的文学状况以及社会状况，这不光是因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之文学”，当年的革命现实主义文学形态确实有它独特的历史和艺术价值，而且即使是我们今天抱着一种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态度，也应该去接近和触摸那一段文学史。

陈忠实：对。这里头实际上涉及一个作家的学习、影响和发展自己的问题。我不敢妄谈别人，就我而言，影响过我创作的外国作家就不说了，我们就说中国作家，也有很多人。鲁迅也不用说了。最初影响我的是赵树理，赵树理是我崇拜的第一个中国作家。

李遇春：这里我想插问一句：我记得您在《兴趣与体验》一文中说您最早读到的赵树理的作品是《三里湾》，后来我又在您的一篇文章《忠诚的朋友》中看到，您说您最早接触的赵树理的作品是《李有才板话》。我想求证一下，您最早读到的赵树理的作品究竟是哪一部呢？

陈忠实：《三里湾》是我读到的中国作家的第一个长篇小说。我最初接触赵树理的是他的一个短篇小说，那是在中学课本上读到的，什么名字我记不起来了，好像不是《李有才板话》，《李有才板话》是一个中篇。受了这个短篇小说的影响，我才去图书馆找赵树理的书来读。后来陕西作家柳青和王汶石对我影响很大。我在中学时有一段时间非常喜欢茅盾的作品，我把茅盾的作品都借来读了，我也很崇拜。柳青和王汶石两个人对我的影响更直接的原因是生活地理上的接近，他们描绘的生活都是关中生活。柳青在西安的南边，我在西安的东边，中间很近的，没有几十里路，因此他描绘的生活形态，包括文

学语言和方言，对于我都有一种直接的亲近感。当然整个作品的思想深度和艺术魅力那都不在话下。所以这方面的影响肯定是存在的。

影响过我的外国作家那也可以列出一长串来。我有一个观点：一个作家喜欢的作品肯定会对他发生艺术上的影响，但他不可能只接受一个作家的影响。起码我不是这样。我接受过很多作家的影响，刚才我们还说到了莫泊桑和契诃夫，实际上在八十年代初期的时候，我特别喜欢苏联时期的作家舒克申的短篇小说。

李遇春：（笑）这个作家的名字我连听都没听说过。

陈忠实：我来帮你写。他的短篇小说我特别喜欢。所以，某一个作家的某一些作品对我总是有一些启示。我从初中二年级爱好文学、接受赵树理的影响和启示开始，一直到四十多岁还在阅读着不同作家的作品，并接受着他们的不同的影响，在综合了这么多作家和作品的基础上，到最后就很难说清到底哪些作家作品对我产生了哪些具体的影响。这些人都启示着我对艺术做一种更深入的理解与体验，都启示着我对文学、对创造这种劳动的理解与体验，包括思想上对人性和人道的启示和体验，这一切都在开阔着我的艺术视野，都起到了它们应该起的作用，然后才有可能在一个不断的艺术探索过程中间形成我自己。也许在某一段时间我达到了某种艺术体验的程度，那我就形成了那样形态的作品，但过上几年后我自己也许又有了新的艺术体验，于是就形成了新的艺术形态的作品。我不敢说别人，反正我自己就是这么样走过来的。

但在众多的作家里头，柳青对我的影响应该说是最重要的。这有种种因素，包括我对他作品的喜欢、我对他本人的喜欢等等。所以我最初在“文革”中间写了四个小短篇之后，人们为什么喊我为“小柳

青”，主要就是我那些小说的味道像柳青，包括文字的味道像柳青，柳青对当时我的文字的影响、句式的影响都是存在的。我后来比较清醒地决心对影响我的作家进行反叛是在八十年代中期，那是我思维最活跃的时候。我已经清醒地意识到我要在文学创作上形成我自己，那么我就必须既要吸纳所有人的优长，以此增进我对文学的理解，同时我又必须摆脱某一个人对我的单独影响。如果你不摆脱这个影响，你就永远也走不出别人的阴影，包括思想的阴影和艺术的阴影；你就不能够形成你自己，就发不出自己独特的声音来。

发不出自己的声音的原因在哪？就是因为你没有形成自己独特的体验。作家是靠个性存在的，没有个性就没有作家。而个性表现在什么地方呢？不单纯是语言，不单纯是某一个结构，而是整个的文学气象。只有你自己营造的那个文学气象才是你最具有个性光彩的东西。而怎样才能形成自己独有的文学气象呢？那就必须形成你独特的、只属于你自己的艺术体验和生命体验。这种体验必须是独特的，别人没有的。由于它是你个人独自体验到的东西，所以表现出来绝对就是独具个性的东西。一个作家如果不能够形成自己独特的体验，包括生活体验、生命体验和艺术体验，那他就不可能形成自己的创作个性；那么谁都可以模糊你！谁都可以湮没你！

李遇春：那您觉得当年的那一代革命作家中柳青和王汶石是否形成了自己的独特体验？

陈忠实：我觉得起码柳青形成了自己独特的体验。王汶石应该说也形成了独特的体验。他们的艺术个性是很明显的。王汶石的作品，你读他描写的生活气象，包括语言，我们不需要公布他的名字，你就能够感觉到那是王汶石的东西。这是一个有个性的作家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标志。文学上所谓个性的胜利就是这样发生的。

李遇春：这么说，对于柳青和王汶石，您更看重的是他们如何形成自己独特的创作风格的?

陈忠实：是。他们那一代作家所做的艺术探索里面优秀的东西影响过你，但影响你不是叫你停留在简单的模仿的层次上，而是影响你去进一步理解艺术本身的含义，去进一步理解真正的文学是什么。包括他们个人的人格都会对你产生影响，而不是简单地去学他们的写作技法。当然，在最初你还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个性体验的时候，你是无法摆脱模仿的，而且模仿也不是任何时候都是羞耻的事情，最初的模仿是很自然的事情。这就跟小孩不会走路时一样，必然要别人给牵着，但一旦你会走路了，你都十多岁了，还要大人牵着走，这不是很别扭吗？所以你必然要甩开大人的手，去走自己的路。我不敢说别人，起码我个人是这样的。（笑）

李遇春：现在当代文学研究界对柳青为代表的"十七年文学"普遍存在着两种观点：一种是站在启蒙主义的立场上否定"十七年文学"，认为那一代革命作家的文学创作只有历史认识价值，而艺术价值不大。再一种就是站在历史主义的立场上，认为应该本着尊重客观历史的精神和原则，严格保持学术的"价值中立"立场，理性地研究那一段文学历史的外部环境和内在成因。

陈忠实：在这两种观点中我可能比较尊重后一种意见。因为那个时代的中国文学的发展已经是一个客观事实，你要它与不要它都没有办法，反正它已经形成了这个过程了，作为一种历史已经摆在那儿了。柳青这一代作家在那个时代里头，在我们当时的文艺思想的指导下，他应该是那一代作家中做得最好的人之一。当然，他瞧不出当时那个时代的局限，不管他自觉不自觉，他都瞧不出，这不是他一个人瞧不出，而是所有的那一茬人都瞧不出！但在当时狭窄苛刻的艺术禁

律下，柳青做出了最大的努力，应该说他是那个时代最优秀的艺术家之一。我们从他的作品中充分地看到了他天才的智慧。你现在要去指责他，那是很容易的事情，那些局限是谁都能看出来的，这并不能说明我们比他高明。我们如果没有后来的思想解放运动，不要说“文革”，就是五六十年代那种思想体系如果一直贯穿到现在，我们可能还做不到柳青那个程度！这是很有可能的事情。

李遇春：我想也会是这样的。想当年，那一代革命作家“戴着镣铐跳舞”，那该是多么的艰难！除了一些纯粹的政治投机型的作家以外，像柳青那样的严肃作家取得了那样高的艺术成就，其中必然付出了大量的、也许还不为人所知的艺术心血。

陈忠实：是啊。当时有那么多的文学禁区，连“中间人物”都不能写。我倒是觉得思想界、艺术界、学术界怎么看是一码事，我作为一个作家，我是能够理解那一代作家的，因为我也是“半个过来人”。我只能说我们站在今天已经发展的基点上，我们应该把重点放在我们仍需努力去做的事情上，而不要去责怪前人，因为他们已经做了很大的牺牲和创造。

李遇春：您用了“牺牲”这个词来评说那一代作家，让我很感动，也让我对那个年代的严肃作家油然生出一种崇高的神圣的敬意。这些年来，我们听惯了学术界对那一代作家的口诛笔伐，今天从您这儿我懂得了那些随意苛责前人的做法是浅薄的。

陈忠实：是啊。

李遇春：您经常在随笔中说您是一个既自信又自卑的作家。《白鹿原》发表已经满十年了，记得当时您曾说以后将以长篇小说创作为

主，但您的新长篇至今未能面世，我想您是不是又陷入了艺术上的自卑心理的陷阱呢?

陈忠实：写完《白鹿原》以后，我当时想，如果要继续写的话，肯定还会写长篇小说，因为那是我的第一部长篇，而且我还有写作的兴趣。但实际上，后来我发觉，这个长篇小说写完以后我对小说这种形式，不管是长篇还是短篇，总之是对小说写作本身的兴趣一下子跌到低谷了，原来的写作欲望突然变得不是很强烈了。我自己都讲不清楚我为什么会陷入这种状态。倒是对散文写作的兴趣大增，这几年写了几本散文。一直到前年开始，我好像对短篇小说这种形式又重新发生兴趣了，写了包括《日子》在内的几个短篇，我觉得短篇这种艺术形式还是有很多值得重新探索的地方的。

李遇春：很多作家都谈到了童年生活对他们的文学创作的影响。我在您的一篇小说《到老白杨树背后去》中也看到了您的童年趣事在艺术中的折光。您能谈谈童年生活对您的文学创作的影响吗?

陈忠实：你说的《到老白杨树背后去》，那是我从现实生活的复杂性反观少年生活的一部作品。人生有不同的阶段，人生到中年以后，那些世俗的东西在我们各自不同的人生角落里对生活发生着方方面面的影响，尤其是对人的本性产生着深刻的影响。所以到了这个年龄相聚以后，我已经感叹到现在人的精神的易变，因此很自然地想到了童年时代那一面镜子一样的生活状态。所以那实际上算是一种生活咏叹式的作品。

李遇春：在《白鹿原》中有很多人物您都写了他们的少年成长历程，像白家兄弟、鹿家兄弟，还有黑娃、白灵等人的少年生活都被您写得情趣盎然，一种向往之情油然而生。

陈忠实：少年时代应该是一片空白嘛。随着年龄的增长，它接受着各种色彩的浸染，最后那块白布究竟被画成了什么样子，那是很复杂也很无奈的事情。人生个个不同啊。其实人生也不都是这样过来的吗？包括我们自己。（笑）各种各样的色彩都放进来涂抹啊。

李遇春：自五四以来，在中国现代文学传统中，父亲的形象一直是负面性的占绝大多数，现代中国作家习惯于从启蒙主义出发，对笔下的父亲形象进行批判性的审视，因此那些专制的父亲们很少能够赢得读者的尊重，相反总是能激起读者反封建的叛逆行动。而您笔下的白嘉轩却是一位能够赢得读者的尊敬和仰慕的父亲形象。请问在白嘉轩的身上有您父亲的影子吗?

陈忠实：我对我的父亲很虔诚，而且还有一种负疚感。他为了我实在付出得太多了。

李遇春：所以，他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您在创作中对父亲形象的塑造?

陈忠实：是。那个直接影响就来自我父亲。我父亲给我更多的影响是精神上的和人格上的。不管他文化上的高低，财富上的多寡或生活的贫富，这都不可能成为影响我对我父亲情感的主要因素。从小一直到他去世，我都能感受到他精神世界、心理世界里头的那个影响。我从来都是很感动、很虔诚的。

李遇春：您经常抱怨“文学这个魔鬼”，但您也曾说过“小说最是有情物”，您能解释一下这种看似矛盾的文学体验吗?

陈忠实：它并不矛盾呀。之所以说它是魔鬼，还是它有情的原因呀。没有情就不会有魔鬼，魔鬼常常也是很有魅力的呀。你看妖女，

她不是比普通女性更有魅力吗？你看传说中的白蛇，那不就是妖女，不是很有魅力吗？还有《聊斋志异》里的狐狸精，不是也都很有魅力吗？（笑）

李遇春：古人说“为伊消得人憔悴”，原来“伊人”其实就是“魔鬼”呀。

陈忠实：从我初中二年级迷恋文学以来，在我的身边有多少人做过文学梦，多少人走在这条路上最后甚至连起码的生活也过不下去了。这我经历得太多了。

李遇春：您有个中篇小说《夭折》好像就是讲的这样一个文学爱好者的故事。

陈忠实：是。但那仅仅是一例，实际的人数就太多了。而我所经历的同时代的作家作者后来很多人都回到原路上头了。真正最后能够做成一点事情，有一点创作成绩的其实是那众多人数里头的塔尖呀，那个底座简直是太大了。他们不是都被文学这个魔鬼给缠上了吗？如果这个魔鬼不重情的话，那他们能被缠得住吗?

李遇春：看来文学既是无情的魔鬼，又是有情的女神啊。

陈忠实：对。既有情又无情，既是天使又是魔鬼，这就是文学。

李遇春：昨天见面的时候您提到，您打算把这多年来的创作经验大篇幅地揭示出来，为未来的文学青年提供一种艺术参照，这是真的吗?

陈忠实：我现在还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必要。你觉得有这个必要吗?

李遇春：我觉得还是有必要的。因为自八十年代以来，文艺界在创作理念方面，应该说天才论还是占有主导地位，很多人都愿意把文学艺术创作归入到一种神秘的迷狂状态，仿佛它真的是一种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东西。

陈忠实：天才肯定是有的，但能够使天才成才，中间还有很多因素。一个因素就是天才还必须有我们习惯上说的勤奋，光有天才不勤奋，那天才就浪费了，也就成不了才。但光有勤奋也不行，还要他能够在探索他所从事的事业上的方法对头。因为文学创作的路跟科学研究的路还不一样，科学这条路比较规范一些，大家都必须沿着从基础科学到尖端科学的路往上走，至于谁能最终完成到尖端的突破，那当然有智慧上的问题，也有一个方法上的问题。但文学道路的选择，也就是文学方法的选择不像科学那么规范，它的可能性和灵活性更大一些，如果选择偏了，走上了一条岔道，那天才也就浪费了，这是第二个因素。第三个因素是思想。天才是一种天生的东西，而思想的形成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是决定性的，特别是创作到了一定的高度的时候，思想就愈加显得重要，甚至是关键性的东西。

李遇春：对。鲁迅之所以伟大，就因为他不光是一个伟大的文学家，而且还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

陈忠实：世界上伟大的作家都是思想家。因此，如果没有形成独立的思想，不具备那种能够穿透历史和现实的独立精神力量的话，那天才也就起不了作用。第四个因素是人格。比如说一个人智慧很高，天分很高，但人格非常卑下，修养很差，他就不能够把自己的精神上升到一个应有的高度。我认为卑下的人格不可能形成强大的思想世界和精神境界，因此那天才也就浪费了。我想，在这四个因素中，可能综合者能够把他的天才发挥到极致，那天才就起大作用了。如果在这

四个因素里头缺乏一些重要因素的话，那这个天才可能就浪费了，或者说“大材小用”了。大的天分形成了小的材料，那就是浪费了天才！

李遇春：陈老师，非常感谢您！天都这么晚了，快十二点了，真是不好意思。本来说分开谈两个晚上的，没想到一次谈完了，真是打搅您了。

2003年4月5日 雍村

秦岭南边的世界

关于一座房子的记忆

每过秦岭，自然首先想到岭南的王蓬。

文学的王蓬。

认识王蓬的二十余年里，去过几次秦岭南边的汉中，每次都见王蓬，印象最深的还是第一次。大约是二十世纪的八十年代冬天，西安市文联约了几位新时期刚刚露头显脸儿的青年作家，到汉中去做文学创作交流。记得刚到汉中的当天下午，大家便相约着去看王蓬。王蓬对我来说早已不陌生，省作协此前几年里组织文学活动，我们早已相识多次相聚，他是秦岭南边陕西辖地内冒出的最惹眼的一位文学新秀，其发轫之作《油菜花开的夜晚》《银秀嫂》刚刚俏出文苑。然而，在刚刚形成的陕西青年作家群这个颇具影响的群体里，社会属性纯粹属于农民的只有王蓬一个，还是靠着在生产队挣工分也从打谷场上分得稻谷过日子的。其他人无论家境怎样窘迫经济如何拮据不堪，却总有一个可以领月薪又可以吃商品粮的公家人身份，大多散居在各地县的文化馆里搞半专业文学创作。我想大家之所以马不停蹄急于要看王蓬，有这样一个共同的心理因素，谁都明白中国农村意味着什么，谁都不同程度地明白一个写着小说的农民意味着什么，谁也许一时都不甚明白，一个社会属性纯粹是农民的王蓬，其作品的整体风貌却丝毫不沾我们习惯印象里“农民作家”作品特定的那种东西，关于生活思考关于人生体验关于艺术形态，都呈现出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到

八十年代初，中国作家在这些领域里所能达到的最前沿的探索，这又意味着什么?

在一个号称汉中第一大村的张寨，我们走到王蓬的门前，稻草苫顶土打屋墙的两三间茅庵，一目了然。王蓬的父母热情谦和，独不见一般农民在这种场景里的紧张乃至自卑，我当时以为是争气的儿子使他们获得自信，多年以后才知道他们原本不是靠扒拉粪土柴火过日子的农民，而是一对落难改造的知识分子。王蓬的外形反而比他们更像农民，壮实而干练，刚刚杀完一头肥猪，两扇诱人的皮白瓤红的猪肉还挂在横架上，一颗刮剔得干干净净的猪头搁在一边。王蓬就在屠宰架下和大家握手，仍然依赖肉票购肉的这几位西安来的作家，围着吊在架上的两扇猪肉艳羡不已，竟然操心这么多肉吃不完变坏了的事。我更感兴趣的是那一颗亮晶晶的猪头，问王蓬怎么会把布满沟槽凹坑的猪脸拾掇得如此干净。我虽干部身份，可家人也都是靠工分吃饭的农民，不足四十元的月薪比纯粹的农民家庭也强不了多少，每年过年都买一颗既便宜又实惠的猪头，脖子口残留的带膘的肥肉剔下来炒菜包包子，其余皆一锅煮熬凉成肉冻，下酒再好不过。只是每回洗涮处理猪头太费劲了，藏在猪脸那些沟凹缝隙里的猪毛，常常整得我用镊子拔，用火棍烫，烦不胜烦。王蓬便告诉我一个诀窍，用松香熬水一泼，冷却后敲打掉松香，猪毛就拔掉了，柏油也可以代替松香。那时已临近春节，我获得这个窍道就付诸实践，果然。那时候，我和他站在他家场院的屠宰现场，集中交流的是关于如何弄干净猪头的民生问题。

我又特意留心这幢屋子的墙。墙是土打的，用木板或椽子夹绑起来，中间填土，用碗口大的铁夯夯实，一层一层叠加上去，便是一堵屋墙。关中农民用土坯垒墙，也用这种夯打的墙盖房造屋，并不奇

怪。令我奇异的是那土墙的厚度，底部足有一米厚，真是我见所未见的厚墙，除了结实之外，便是隔热，比砖头水泥墙实用多了。也是多年之后我才知道，这是王蓬跟随被视为政治异己的父母从城市里被剔除出来，流落陕南农村十年之后才搭建起来的属于自己的房子。此前十年由生产队安排，曾五次搬家，最后四年是在远离村庄的一座古庙里搭铺盘灶谋生的。这些超厚的土打屋墙是尚未脱尽少年黄喙的王蓬和善良的乡民们一夯一夯捶打起来的。王蓬说，他那时候早已熟练陕南农村所有粗杂活路的技能，体魄颇强健，甚至比少小读书后来做邮政公务的父亲更具适应性。

以房屋为主体的这个小院，有猪栏，有鸡舍，有柴火垛子，还有一块用三合土搪制的小平场，晾晒谷物。这纯粹是一个陕南农村的家院，与左邻右舍的农家小院大同小异，唯一的也许是惊世骇俗的差异，是这幢新搭建的稻草苫顶泥土筑墙的茅舍里，辟出来了一方小小的书房。至今我依然记忆犹新，一张床，一个书桌，四面墙壁用报纸糊蒙着，整个书屋就浮漫着纸墨的气息。（我当时曾经很羡慕这个书房，因为直到此后六年我才给自己造成一个书房。）这个书房外边是一家连一家的农户的围墙和高低错落的屋脊。小院里刚刚宰杀过一头自养的准备过年的肥猪，是王蓬操刀还是请屠夫操刀我已无记。书房里摆着世界名著和中国名著。托尔斯泰和鲁迅以巨大的兴趣和不无惊诧的眼神，看着这个崇拜他们、屡屡在他们博大的爱心里战抖流泪的中国张寨村的青年，瞬间竟会身手矫健地把一头大猪压倒在屠宰台上。

我走出王蓬的屋院再走出张寨村子，走进汉中坝子冬眠着的稻地和油菜田畦。秦岭南边越冬的油菜竟然是一派蓬蓬勃勃的嫩绿，看不到我的家乡渭河平原这个时节冬日肃杀的萧瑟。我沿着绣满杂草的田

埂往前走着，对着我脸的是暮霭迷蒙的秦岭群峰，隐隐现出汉水流域植被的绿色。晚炊的柴烟从村子里弥漫到田野上。我回过身眺望烟树笼罩下的张寨村，竟然很感动，就在这个村子的一个农家屋院里，一个青年作家已俏出文坛。二十二年后的二〇〇二年初秋，我又一次来到汉中，进入这个小院，作为农家生存的猪栏鸡舍柴垛已荡然无痕，小院里蓬勃着几株名贵的花树和草花。屋顶的稻草已换成机瓦。屋内也经过了一番改造，清爽而舒适。那近乎一米厚的土墙仍然保存着，粉刷光洁自然无须用报纸遮掩丑陋了。那个小小的书房还在，已经装备了书架、书案、台灯和软椅，更像一个书房了。我坐在小院里喝茶，又生一份感动，一位重要的当代作家王蓬，就是从这个依然很不起眼的乡村小院走上中国文坛的。关于作家创作这道颇为神秘的帷帐从心头扯开，顿然醒悟，天才诞生在任何角落都是合理的。

关于《山祭》《水葬》的解读

从二十年前读《银秀嫂》到最近系统阅读长篇小说《山祭》《水葬》以及大量的纪实文学和散文随笔，我才意识到对王蓬达到一种较为透彻的理解。我曾经在面对自己崇拜的柳青时说过，真正崇拜和理解一个作家，最好的途径是阅读他的作品。

王蓬大量的小说创作，无论短篇中篇，尤其是珠联璧合成姊妹篇形态的长篇小说《山祭》和《水葬》，给我强烈的又是贯穿如一的感受，是作为一个现实主义作家面对生活的严峻的审视目光和深刻的穿透纷杂现实的思想力量。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文坛背景里，鲜活的思想、活跃的思维、层出不穷的艺术形式，令人难忘。给人很大启示的寻根文学的思路很快由雄壮到细微，最后追寻到深山老林破庙古刹或原生态蛮荒人群那里便迷失了消弭了；还有远离政治躲避现实的

理论阐释，显然是对昨天政治谎言的拒绝，颇具影响力。我在王蓬的阅读中发现，王蓬二十年里以小说和报告文学为主体的创作，一刻也没有从现实生活层面上游移，没有从他熟悉的人群的生命历程和心灵历程中游移，甚至连丝毫的犹豫也没有。从解放到改革开放的秦巴山地的生活演进和历史演变，呈现一种全景式的展示，对山地社会结构人际关系和人的心理层面的解析，显示出现实主义作家王蓬的勇气和尤为令人钦佩的思想穿透力。我想，某些回避生活现实回避政治的现象，除了创作探索中的不自觉因素，除开因为谎言政治产生的逆反心理，恐怕更重要的一点在于作家思想的肤浅，肤浅思想所带来的心理软弱和苍白，透视不到生活深层的奥秘，便只好围着一根陈旧的鸡毛臆猜文化。在王蓬笔下，解放前和解放后，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公社化，“镇反”和“反右”，农村“四清运动”和十年浩劫的“文革”，直到改革开放的时下，这些在中国乡村和城市发生过的影响到所有人生活的重大事件，无一遗漏地进入王蓬严峻的视镜，纳入秦岭或巴山某个村寨，淋漓尽致地演绎出来，正可当作生活的教科书和历史备忘录，留给这个民族的子孙，以为鉴戒和警示。《山祭》《水葬》等小说的认识价值和不朽的意义，就在于此。王蓬恰是在这里显示出独禀的气性、思想者的勇气和思想的力量，以及由此而蕴蓄在作品里的凛然之气。

审视和展示这些生活，对作家是一个严峻的挑战。直接亲历过这些生活历程的作家或间接了知这些生活过程的作家，任谁讲述几段生动而又荒诞的故事都不算难事，然而要避免简单化的图解和演绎，要避免浮泛的苦难展览而进入深部，却不是随意能够做到的。王蓬以《山祭》《水葬》为代表的大量的小说创作，有一个无处不在的幽灵徘徊在大小篇幅的文字之中，就是人道和人性。我在意识到这一点时有一种破解后的欣然之情。我从八十年代初读王蓬作品就有某种一时

说不大准的特异气象，一种区别于同期同类题材小说的独禀的气质。显然不是来自作家对秦巴山地独特的生活习俗的生动描绘，不是对一方地域生活语言的成功改造和书写，甚至不完全是对生活的直接体验，因为这些东西许多作家都拥有着。我在这次通读王蓬作品的过程中豁然明朗，王蓬有一个人道人性的思想视镜，有一个博大深沉而又温柔敏感的人道人性的情怀。回溯新时期当代文学复兴的历程，王蓬当为具备这种思想视镜和精神情怀的最趋前的作家之一。

这样就不难理解，同样直面揭示那些已经过去了的“运动”给乡村和城市所造成的普遍性灾难时，王蓬何以会跳脱同期同类题材常常陷入的对某些口号或政策的谬误的简单鉴证的局限；在人道人性视镜下的思考，穿过极左运动造成的荒诞生活现象的表层，进入关于人的合理生存的深部层面。合理生存是人类追求奋斗的共同目标，也是各个民族堪为经典之作的文学作品一个永恒的常写常新的主题，自然包括政治的、自然的、宗教的、经济的诸多方面，不同制度下的各个种族，唯其在此一点上是共通的。这样，王蓬笔下人物的心理轨迹就烙印着沟通各个民族的普遍性意义。《山祭》里“我”的灵魂扭曲和异化的过程，由浅入深，从被动到主动，从一个心理层面解剖到另一个层面，丝丝入扣，合情合理。“我”的灵魂堕落过程中的痛苦，恰恰来自堕落中的清醒。清醒的堕落便揭示出人性里的复杂性。清醒的堕落，让我看到极左的东西不单是造成普遍性的贫穷或人身伤害，关键是对一个民族精神自信的摧毁。清醒的堕落之后，又是清醒的忏悔；清醒的忏悔之后，又一次发生清醒的更深的堕落，痛苦就成为愈陷愈深的深渊，无论如何也树立不起作为一个人的自信来。我在同类题材中见到过不少堕落者形象，通常都是以堕落换取某种境遇下的快乐的，或者说为了改变生存境况实现快意生存的目的而向邪恶投怀送抱甘愿堕落，这是人性里一种极其普遍的弱点，也是古今中外许多真实发生的

和艺术家塑造的堕落者形象共有的心理依据。王蓬创造的“我”这个堕落者形象，恰恰没有享受多少以良知为代价换取的快乐，却是丧失良知陷入的黑雾似的痛苦，把一个人性渐次泯灭渐次沉沦的人刻画得动人心魄，成为堕落者人物序列里一个颇具现代中国特色的典型面孔。“我”不仅揭示了我们民族精神历程中那个丑陋的扭曲形态，重要的是作为一个生动的警示，让现在和未来的人们在面对可能发生堕落的境遇时，把人性和人道既作为生存的旗帜也作为生存底线坚守，似乎比任何道德的规范更为可靠。

拯救“我”（宋老师）灵魂堕落的恰恰是人道和人性。从肌肤到心灵都美到令人悸颤的冬花，与外形丑陋不堪的庞聋得入住的茅草洞房，其实是作家王蓬构建的一座人性的真善美的祭坛。庞聋得总使我联想到《巴黎圣母院》里的卡西莫多，然而他不是敲钟人而是秦巴山地里一个种田狩猎的山民；冬花也使我联想到那个吉卜赛女郎，然而冬花仍然是冬花自己。这对对时空距离太过遥远的不同种族的人物形象，只在人性的意蕴上完全融通。何妨把冬花和庞聋得的茅草洞房当作巴黎圣母院来读。“我”的灵魂的救赎，自然可以列出几重因素，而主导性力量正是发自茅草洞房这座人性的祭坛。王蓬在这里蓄意浓墨泼洒，又兼以细部工笔精雕，把一个堕落者在人性祭坛前的复杂心序揭示得淋漓尽致，读来令人惊心动魄。在谎言制造的荒诞现实胁迫人们倒向邪恶之途的时候，真理被混淆了，道德被颠覆了，唯有人性成为一个民族不死的精神之光，恰恰存储在山民冬花和庞聋得的茅草屋子里。

以同样的角度解读长篇小说《水葬》，或者说在阅读《水葬》时，我愈加清晰地体味到王蓬关于人道和人性更为深沉的思考。

《山祭》以“我”这个进入一个闭塞山地的小知识分子的视角，比较集中也比较透彻地完成了一次艺术展示。《水葬》在艺术上选取的是开放的多重视角，展开的是一幅全景式的社会图像：从时间跨度上看，着笔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实际延伸和展开到三十年代更为纵深的历史；从将军驿这个小社会里的人物构成上看，有李宗仁秘书和社会最底层的屠夫、商界小老板政界芝麻官军界游走于两大壕垒的士兵、富户深宅大院的主人和仆佣、革命者和革命的追随者，组成一幅由各种社会角色交织的完整的社会图景。这些人物从三十年代走到八十年代初的半个多世纪的生命历程中，人物与人物之间的组合与反叛、上升与跌落、畅泳与溺水、跃上前台与消隐幕后，小小社会里各种角色令人眼花缭乱的分化与重组，使人常常发出一种历史的慨叹。我发觉，面对一件具体的历史事件或一个人物的一次生活遭遇时，是一种感受，而面对一群人物五十年的生活经历和他们构成的这一段较长的历史流程时，又会是截然不同的另一种感觉。这种感觉很自然地会使人发出关于人的合理生存的思考。各个民族和国家在争取人的合理生存这个基本的又是永恒的理想的历程中，经历过各种形式的斗争，自然的科学的哲学的人文的个人的集团的，包括极端的手段革命和战争。而人合理生存的最基本的东西，就是人道和人性。《水葬》里最虔诚的革命者陈放、最美的精灵似的翠翠，以及不断变幻脸谱色彩的麻二、任义成、蓝明堂、何一鸣等人物，他们的追求、挣扎、坚守、投机、挫折、伤害，扭曲别人也扭曲自己的异变，使我很容易排开纷繁的社会时象，进入人道和人性这个底线上，发出沉吟。

《山祭》里的“我”以男性的视角审视和感知世界，隐喻山的意象；《水葬》以全开放的视角，却聚焦在翠翠这位女性身上，隐喻着水的意象。翠翠无疑是天地山水间孕育的一位女神，属于底层民间。她的美她的善她的真诚，辐射到富家公子何一鸣、流浪汉任义成、不

称心的丈夫麻二，以及心怀叵测的蓝明堂。翠翠实际上已经成为将军驿这个小社会里人际关系网中的关键。翠翠也是一座人道和人性的祭坛。在这座祭坛前忏悔的不是一个男人，而是将军驿这个小社会舞台上的几乎所有重要角色。任义成在通常情况下对义的坚守和在关键的利害掂量中的人性沉沦，何一鸣和翠翠情窦初开时的纯美直到彻底落魄时得到的金子般的爱的抚慰，翠翠在麻二身上发生的由淡到浓的情感渐变，蓝明堂作为一个终生都在算计财产算计政治风向也算计婚姻性爱的阴谋家，在翠翠祭坛前的失算才是最具摧毁意义的。在翠翠的祭坛前，展示着一幕又一幕扭曲人性的几近惨烈的荒诞戏剧，这些在极左政令下一阵儿发起高烧一阵儿跌入冰窖魔鬼般舞蹈的男人们，为争相攀爬便互相践踏，结果却一个个落得伤痕累累，为丑化别人却丑化了自己，为把别人描绘成魔鬼结果自己却成了魔鬼，为揭掉别人的画皮却把画皮包裹在自己脸上。在陈放背叛李宗仁秘书的父亲走向革命迎接解放主笔报纸的辉煌生命中，却有一个右派帽子在等待着他，成为革命的异己被流放偏僻一隅，陷入远远超过轰轰烈烈时段的漫长的受虐期，给他致命一击的恰是由他领入革命队列的何一鸣，其精神心理的伤害就如伤口上的那把盐。何一鸣追随陈放追随革命也完成了一个令人感动的背叛富户家庭的人生壮举，伤害陈放并没有得到挽救自己的效果，由领导秘书到林业局干事到伙食管理员再到被剔除出干部队伍成为一个农民，最后连将军驿这个农民世界也不能容忍，撵出村庄住进山野的孤庙。任义成的人生轨迹带有很大的传奇性，甚至有义士之风，在翠翠真挚的情爱之中坚守着义，最后的也是唯一的一次交融让人感到真实的爱的真正的完美，然而对麻二的揭发一下子使人看到极左怎样把人性里最邪恶的东西发酵膨胀，道德和情感的操守脆弱到空无。麻二和蓝明堂从个性上是呈两极状态，麻二走过了一条向善的更多带有自然色彩的人生之路，蓝明堂却靠着奸诈和投机心理，在极左掀起的邪火中一次又一次偷出栗来。在这些男人们各个不同的

人生轨迹中，我很轻易地除去种种社会的政治的经济的家庭的浮尘，看到他们在翠翠这座祭坛前的精神裸体。

我不想做各个人物形象的具体解密，韩梅村教授在《王蓬的艺术世界》专著中有十分精到的论述。我尤其在这两部长篇中看到王蓬关于人道和人性的精神，由此而涉及关于人的合理生存形态的思考。《山祭》和《水葬》所指涉的时代和生活，好多作品也都写过，甚至现在还有人在写着。作家自由选取自己感兴趣的某一时段的时代生活，包括上自黄帝历代王朝及至当下，关键在于谁写出了独自的独特的又是深部的体验。从这个意义上说，《山祭》和《水葬》是写那个时代生活最杰出的长篇小说之一。作品所指涉的时代生活已经成为历史，作品本身也面世十余年了（前者一九八七年，后者一九九一年出版）。我在二〇〇三年春节前后连续阅读时，单就艺术风貌而言，仍然是一种全新的鲜活的感觉，尤其是在扑朔迷离变幻无定的世态时风中捕捉到人道和人性的幽灵时，我竟然有一种深深的感动和伴之俱来的钦佩。我确知这两部小说写作时段里文学领域思想解放艺术探索的进程和情状，王蓬当是最前驱的思想者和最具勇气的探索者之一，由感动而引发钦佩，属于自然发生。《山祭》和《水葬》之所以在十余年后的今天读来仍然令我震撼，也使我领会到人性和人道在作家的思维和作家的情怀里的关键性意义，作品的生命力或者说恒久性才成为可能。我也几乎同时意识到，关于《山祭》和《水葬》以及王蓬整个艺术创造的评价，似乎不大相称。文化市场往往存在这样一种盲区，时尚时风刮得许多人都疯跑猛追某道光圈而终于扑空时，却发现脚下有一块被忽略了的金子。我又一次感动之后发生感慨，在风行炒作的时下文坛，太持重修养太君子风范，就形成这种状况。显然不是作家的悲哀。

关于一个作家的理解

尽管年龄有几岁差异，因为生活进程的决定性因素，我和王蓬在新时期文艺复兴的陕西文坛相遇相识，似乎至今也没有明显的年龄障碍。当我为写这篇文章较为系统阅读其作品时，却分明感觉到某种熟识里的陌生，即王蓬艺术创造所达到的深部探索的陌生和作家精神人格世界的陌生。

我现在才意识到王蓬是一个对灾难和痛苦承受力极强的人。相识的二十余年里，我约略知道他在幼年就随着有“历史问题”的父亲从西安落难到陕南农村，具体因由和遭遇的灾难全然不晓。王蓬确也没有稍微细致地提说这方面的事，偶尔牵扯到这个话题时，三句两句言简意赅掠了过去，甚至哈哈一笑再无下文。多年来我未深问是出于我的性情，别人不愿意说的事我绝不追问。直到我读了王蓬一年前发表在《延河》上的《祭父》文章，陷入难以抑制的苦涩却又无言的状态。王蓬从一个较为优裕的城市知识分子家庭落难到陕南农村，即使在最贫穷落后的农民世界里，也是被打入另册排除在外的“黑斑头”，经受了频频发生的所有极左运动带来的全部灾难。我首先悟觉的是，经历过如此巨大如此持久的灾难的人，到了他可以说话也有能力说话的时候而不说，不是暂时不说而是二十余年都不予诉说，不是一般回避而是哈哈一笑简言掠过，这个王蓬对于痛苦的承受能力就是非凡的强大而又深刻的了。对于王蓬而言，其影响已经远远超出了作为一个人的品质层面的意义，重要的是作为一个作家关于社会关于人生的思考和体验的厚度，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正是从这一点上，我得以解读王蓬小说以及纪实作品里弥漫的人道和人性情怀。

人在沉重的灾难——社会的或自然的——连续折磨之下，大致有三种结局，不堪忍受时的屈从与沉沦，承受持久折磨之后的破碎和麻木，炼狱折磨过程中逐渐强大的心理承受力量和精神升华的清醒。王蓬无疑属于后者。一个在颇为优裕的城市知识分子家庭生活的少年，一夜之间跌落到连气候也差异很大的陕南农村，学割草学砍柴学推磨，学习所有作为一个农民生存的一切技能，而且要承受作为一个“异己分子”的子女在心理上的无边无际的压迫，时间长达二十余年，正当王蓬从少年到青年的人生关键时段。在连续的巨大的人祸和天灾的灾难中，在善与恶、美与丑、真与假的轮番演练过程里，王蓬被指定的特殊的社会角色和所处的特殊的社会位置，反而促成他保持一种观察和辨识过程中的清醒，从情感上也更自然地朝善的一方倾倒。蒙难中的父亲似乎更具人生导师的影响力量，他的知识、他的人格修养和他的人生阅历所形成的灾难中的独特禀赋，正是王蓬辨识生活荒诞的一个参照和坐标。第三个因素当是王蓬的阅读，当“大跃进”跌入“三年困难”的深渊，当“四清”“文革”闹到神鬼不宁的崩溃境地，饥饿的王蓬躺在秦岭脚下的草丛中阅读《六十年的变迁》《到格鲁曼去的道路》，直到完整地阅读一个堪称伟大的中国现代作家的全部著作《巴金文集》。这里暂且不论这种阅读对王蓬在艺术上的熏陶，更重要的是对于正处在从少年到青年成长期里的王蓬的思想视镜的开阔，对他辨识正在疯狂运动着的荒诞现实，对于他作为一个人存在于世的基础性的心理建设，无疑更具有意义。因为王蓬所阅读的上述这些优秀作品，无论其思想倾向或艺术流派有多大差异，而关于人道和人性的底蕴却是共有的。这种人道和人性的精神，在一个丧失了真理丧失了道德丧失了作为人的基本规范的荒谬生活现实里，就成为自我救赎的最可靠的心理依傍。这样，我似乎才可能揣测探寻何以在封闭而落后的陕南农村的孤庙里，会有一位充满人道和人性情怀的作家走进中国当代文坛。很长时间里，人们却随意赠给他一顶农民作家的“桂冠”，错了。

这样我就能较为切实地理解王蓬小说作品中对于人性善和美的张扬，对于人性里的恶和丑的淋漓尽致的剥皮式的解剖。即使在他的纪实文学作品里，仍然可以感受到这种精神，那位曾经血战台儿庄的敢死队队长，在陕南某县文化馆任职的副馆长，仍然能精心辅导一位业余作者编写剧本；那位从农学院毕业便扎进秦巴深山，为陕西培育出一个名牌茶叶的老专家，即使在八十年代排除了极左的生活中，却因为反对毁林开荒的一次会议发言而被某副县长投入监狱；一个回族作家富于传奇也富于个性的艺术创作历程；一个尼姑和她的信徒；等等。王蓬对于这些在事业上卓有建树的真正的民族脊梁的赞美是由衷的，对于社会正义的伸张是凛然的。这些真实人物的真实故事里，同样可以感知作家王蓬对于这些承受着民族灾难创造着民族辉煌的人的虔诚的崇拜，作家的人格和精神也交融在墨痕之中了。去年夏天，陕南突发洪水，佛坪一位乡党委书记牺牲在救助群众的山洪之中，王蓬随即追踪采访，写成万余字的报告文学，我在《陕西日报》读到这篇作品时，曾几次忍不住泪水涌流。王蓬对于生活里的善和美似乎有一种本能的敏感、一触即发的激情、一种虔诚的崇拜，这是作为一个人民作家最为可贵的基础，也是一个艺术家永不枯竭的智慧之源。

王蓬笔下的陕南，秦岭、巴山、汉江、盆地、坝子，以及连绵的浅山丘陵，变幻无穷气象万千的四时景致，相传既久的为适应生存而形成的奇特生产和生活方式，弥漫着神秘神奇色彩的一方世界，微弱的现代文明带来的缓慢进步和猛烈粗暴的极左政策所造成的摧毁性破坏，古老的农业文明所遭遇的惩罚或灾难，其逼真的过程令我心悸。然而，即使书写这样近乎惨烈的生活，我发现王蓬的笔触一涉及自然，一触摸家养的或野生的牲畜，便灵动有如神助，山民围猎时惊心动魄的场景令我气不敢出；写到劳动和生活习俗的场景，也是逼近眼前的生动和诗性的赞美。我既感动王蓬对各个生活领域的熟悉，更感

动作家对人类基本劳动的膜拜和敬重。一个被动接受纯粹出于惩罚目的的苦役式劳动而入乡村的城市少年，当他成为一个能熟练操持乡村种种农活儿的农民，同时又成为一个可以向世界展示这一方地域人们的精神历程的作家的时候，我看到的不是对折磨式的劳动的诅咒、鄙薄或嘲弄，而是圣徒般由衷的虔诚和赞美。由是想到研究一个作家艺术道路的时候，更应看重这种似乎反常的心理和精神历程的探究，王蓬成为类似族群里迥然独立的一个。作家思想的深度和厚度，与作家的精神人格和情怀是怎样一种关系，这些因素在作家的艺术探索艺术创造里又发生着怎样的作用，王蓬无疑是一个值得研究的个例。

王蓬近十年间又潜心于汉中历史文化的研究，硕果累累，不下百万字的作品，奠定了作为学者化作家的基础，完成了一次升华式的蜕变。我去年秋天应邀赴汉中参加一次群众文化活动，得着机会在汉水边上踏访古迹，在汉王刘邦拜收韩信的拜将坛，在存留了两千余年的绝壁上的栈道遗迹上，在萧何追韩信的那条小溪边，在曹操千古绝笔的“衮雪”题字前，王蓬如数家珍，却不是解说员那样的用语，而是典籍中的确凿的记述文字，我便可以猜测王蓬翻检了多少史书资料，而且背熟成诵了，言语中流露着对汉中为代表的汉水文化的热衷和自豪。这也许是他至今坚守在汉中而且其乐无穷的原因吧，尽管他有多次机会重新返回他的故乡西安，却一次次地放弃了，连同他的父母，依然生活在那幢曾是稻草苫顶而今改换为瓦顶的土打墙壁的房子里。王蓬又是一位热心公众文化尤其是群众文学事业的作家，他的一半是自己的写作，另一半是属于纯粹为这个事业发展所做的建设性的又是具体到一座办公楼一张办公桌一张报销发票的琐屑事。经过不断的努力工作，他和汉中文艺界的朋友们获得了可告慰藉的工作环境，也创造出一方甚为和谐的艺术氛围。一位青年作家说，王蓬二十年不懈工作的成绩，就是把这一帮人弄到一块快乐做事。对于一个文化团体来

说，大家能快乐地作文、画画、写字（书法），又是多么可值得珍重而不易的事啊。

王蓬每有重要文章成竹于胸，便从汉中市区奔到乡下这幢由他在最困苦的日子里建造的屋子，显然不单是图一方清静，更有一种心理的依偎。王蓬的父亲谢世后，他把父亲埋葬在巍峨绵延的秦岭脚下。“考虑到父亲在秦岭脚下这片土地整整度过了四十个春秋，已与这片土地融成一片，应该让他安睡在这里。”我知道其中的二十多个春秋，是承载着莫须有罪名接受精神和生理的惩罚“融成一片”的，这需要怎样的豁达境界和精神的厚度？包括使用这个词的王蓬。在为父亲选址筑陵制碑的同时，王蓬也为自己“日后亦当归此”并预立碑石碑文：

他因在这片土地上生活而写作，

他的代表作是父母亲的墓志铭。

写到这里，我忽然意识到，这篇已经偏长的序文，似乎仍然触摸不到王蓬“冰山”的主脉，所可慰藉的是重新吟诵这两句心灵之诗。

2003年5月4日二府庄

附：关于《王蓬文集》的通信

王蓬：

您好！

这篇序拖得太久了，种种因素之外，主要是关于这篇文章怎么写和写什么的问题，好久定不下来。按一般序文，总是要面面俱到，全面评说，而您所给予我的作品和做人的东西很多，那样写来有诸多好

处，却也易于陷入一种习惯的窠臼。想抓住您作品的精气神之关键一点争取说透，又怕遗漏诸多确也值得说的东西，就形成很难确定的自我别扭。最后还是下决心以后者为主，评作品既不面面俱到，说做人也不优点缺点做操行评定，集中在人道和人性的这个关键词上。您的小说给我提供了这个关键词，追寻到作品的制造者，我也醒悟出一个没有加入中共的人忘我为公众事业工作，也在几乎所有样式的文学作品里伸张正义和人性人道的心理蕴藏了。我也是通过这篇文章才弄明白一个问题，人道和人性是人类自我救赎的最为可靠的底线，较之某些口号某些道德规范，都要可靠。于是我便从作品到作家，用这个话题统领下来，其余方面，在不枝不蔓的前提下顺笔涉及。

近年写序较多，既要全面论说，又要避免流行的溢美；既要理论阐释，又要避免枯燥；既要生动，又要避免浮泛油滑，真是不易。然给几十年老朋友作序，心里踊跃，却也不无惶恐。最后还是冒险，企图抓住文与人的精神内核。且自以为不仅在灾难年月，即使在今天较为宽松的生活里，这一点仍然是最可珍贵的，既是一个社会的人的精神底线，也应是高扬的精神旗帜。

这是我迄今写过几十篇序里最长的一篇了，我不断地谢绝着序，然而给同步过来的朋友作序，倒是一种心理慰藉，那就是不可抑制的过来岁月里的跋涉，尤其是友谊，回顾中的思索和情感里的温馨。

有某些观点或措辞上的不准确之处，有某些时间地点或其他不恰切之字词，请告知纠正。“非典”施害，请谨慎，勿马虎，并祝家人安康快乐。

忠实

2003年5月6日 西安

位卑位尊都躬行

我知道立章喜欢书法，先是行书草书，后来兴趣转移到大篆，潜心默练多年，功夫老到。然而我丝毫不知立章还钟情着古体诗词，写下这么多精美篇章。以写作时间看，从七十年代直到新世纪之初，诗作不断。三十余年里，竟然对我只字不露，在我拿到这一摞诗稿时既感慨又惊讶。

我和立章七十年代初结识，友谊延续大半生，整个感觉是一位可以踏实信赖的朋友，不仅没有因各自所从事的职业的差异而隔膜，而且给我一种完全可靠的“为镜”的参照。我们可以坦率地谈天说地，议论时世时风和人生，既涉及他身在其中的政界，也涉及我所在的文坛。我尤其注重他对一个时期文艺现象的评点，包括对我某些作品直言不讳的意见，在我起码可以对自己保持一种清醒。这个比我尚年轻几岁的朋友给我留下的最明晰的印象，恰恰是平和的沉静。平和不是平庸，不是随波逐流不是趁热起哄。立章对生活演进和由此而发生的生活世相，都有自己独立的见解，常常令我叹服。我知道他拥有较为丰厚的历史知识，也钻研政治经济理论和新说，兼以颇为宽泛的文化视野，自然就有独立见解，人无论从事何种职业，一旦有自己的独立见解，其精神形态和心理世界就会显现为沉静。表述自己的独立见解，无论用书面语言无论用口头语言，立章都是一种平和和沉静的姿态，显示出一种精神和心理的自信，也弥漫着性格修养里的个人魅力。即使是某个时期的社会热点话题，在立章的言谈里，不见声言于色的慷慨激昂，却也绝非消极冷漠平庸无主抑或暧昧模棱，总是以平和沉静的姿态陈述自己的见解和观点，让我感到一个清醒者的睿智，也感到一种个性的魅力。然而几十年来虽然信赖着却是散淡着的交往

过程中，他竟然只字都不提及他的诗词写作，我未看到他少量公开发表的诗篇，亦未见过他反复吟诵推敲字词深藏于书柜中的稿笺。他谢世后，夫人陈瑞玲把手稿收集整理出来，我在拿到这一摞诗稿时，真是感慨万端又无言以对。最直接的一点无疑是铁定的可靠，即：立章写诗词不是为了发表，不是为了当诗人，更不是附庸风雅，纯粹是感时感世感悟生命意义的直抒胸臆之作，一种心灵的独白，恰恰是诗词写作的原始意义，抒情、言志。

立章诗词给我冲击最强烈的一点，是一个有思想有抱负想作为的共产党人发自肺腑的声音。立章在西安市水利局局长任上，用五年时间，解决了西安周边山地和原坡地区七十余万人世世代代“吃水比油难”的生存困境，所有精心的策划实施的艰辛和具体工作中的事无巨细，都被夙愿的实现和民众的实惠而转化为幸福感。为人民做实事，领导者自己获得的是生命价值实现的幸福感，只有真正的公仆才能感受得到。同时，立章在完成这个工程的实践过程中，也完成了一次重大的精神升华。在《世纪承诺》短文中，立章写道：“一个人一生中，可能有许多如意，随之又有如意中的尴尬；有许多成功，又有许多遗憾；有许多成就，但伴之有说不清的惶惑。而唯有这一件工程，使自己有了一种感觉，仿佛自己是一个农民的儿子，为父老乡亲做了一件顺心悦意的事。”没有喧哗，没有庆祝锣鼓，更没有居功的炫耀，依然是平和的语言姿态，依然是沉静的心理形态，依然是朴素到不着任何修饰的言辞。这里有一个关键用词“农民的儿子”，可以透视身为水利局局长的立章把自己摆在一个什么位置上。既然是“儿子”，为父老服务为父老做事惠及一方百姓，就会看成是自己应做的事应效之劳，而绝不会炫耀，更不会当作“形象工程”铺设晋升之阶。写到这里，我想到小平感人至深的表白，“我是中国人民的儿子”。国家前途民族命运人民福祉，都依赖各级政权的行政管理，上至国家高层下到乡镇村

寨，执政者把自己摆在什么位置，决定着那一块那一方荣与衰的根本。我很感动我的朋友延立章把自己摆在儿子的位置上，在为父老做成一件可以称作历史性的告别的大事时开怀赋诗的动人情景：

世纪承诺重如山，坡原父老望欲穿。

汗水伴随塔林起，心血绕峰引清泉。

五载艰辛绘新图，八百工程布山原。

七十一万民乐日，举觞自慰心亦甜。

作者并未沉浸在“自慰心甜”的情绪里，反而进入更深沉的思考：“在实现这一世纪承诺的时候，我又常常想到，解放半个世纪了，父老乡亲才改善了一个生存的基本条件，使人总是有一种沉重的感觉。”（着重号为我所加。）一个“才”字，一个“沉重”，便透出一个公仆一个“农民儿子”的忧患意识和赤诚之心。

立章诗词中还有一点撞我心灵的强大的精神，就是作为一个领导干部的自省。这种自省可以使人在纷繁的生活里保持一种清醒。生活发展到今天，腐败已经成为一个执政党面临的重大课题。身居重要位置的立章，在复杂化乃至某些浑浊的生活环境里，始终保持着共产党人的凛然正气。这种表述所感所思乃至痛切的心声，占了他诗词的最多篇章。首先是严于律己，以自省保持清醒：“立身但凭直而正，处世更须谦且诚。”（《静夜思》，一九八六年）“热肠冷面勉国事，直心爽语慎己行。”（《偶题》，一九八六年）这种直白的自省诗句从八十年代延续到他的生命终结，贯穿始终。在自省的同时，立章也表示出对于官场诸种腐败现象的批判和拒绝：“不屑躬身趋势炎，怎奈宵小趋风云。”“不羡势炎奢乐重，更厌世俗媚附来。”贪财享乐，攀爬依附，

这些腐朽的封建官场的陈疾老病，腐蚀着党和国家政权的机制运转功能，一个坚守着共产党员的道德良心和精神品质，尤为感人。立章甚至借用“打油”类的“戏作”，彰显着对于不正之风的讽刺和鄙视：“无情抛却成贫汉，有意谋取反成殃。此物只宜直中取，切忌奸诈曲内藏。”（《钱》，一九九六年戏作）对于一时成风的浮夸风，讽喻颇形象颇尖刻：“脸定平兮气鼓全，声调高亢腔放圆。‘大解放促大发展’，数字膨胀无风险……昏天黑地会上吼，火了上年又下年。”然而，立章对于那些真正的共产党人，却尊为楷模，视为榜样，对孔繁森的精神，竟然打破格律的束缚，用自由诗展开抒写自己的崇敬，成为本诗集里篇幅最长的一篇。

诗言志。立章的诗词和为数不多的随笔散文，向我展示出一个新时期的领导干部全新的精神风貌，展示出一个“儿子”的拳拳之心，一个大写的人的风骨。面对他的事业和他为之鞠躬尽瘁的父老，可以获得无悔的自信，这就够了。我以两句诗应和：

修身砺志开视镜

位卑位尊都躬行

2003年7月30日 雍村

土壕、讲坛和稿纸上的舞蹈

见到刘路之前，早已听说并记住了这个名字。那是一九七九年在《延河》编辑部听老董说的。老董整个就是一个职业文学编辑。任何时候见到他都是说文学作品，慢条斯理又津津有味，尤其是说到本省某位作者写了一篇富于突破性的作品，那种兴奋那个喜形于色乃至某种神秘感，令人恨不得立即把那篇作品找来捧读。他的神经系统的敏感区兴奋点就在发现新作者和新作品上头。他自己似乎并不意识，旁观者看来却已成习惯。我常常是从他那里获取新时期刚呈复兴之势的陕西文坛的最新动态和信息的。好多新冒出来的作者和他们不同凡响的出手之作，都是首先从老董那里得知的，刘路就是这样未见其人先闻其声的。

刘路当时还是陕西师范大学的一位在校就读的学生。第一篇小说《心是肉长的》送到《延河》杂志社，就在编辑部引起欢呼，就得到了时为副主编的董得理的文学神经敏感区的高度兴奋，而老董通常是被看成颇为老到颇多识见也颇为挑剔的老编辑，极少发生鱼目混珠的意外的。被老董推崇的稿子肯定会获得读者的阅读呼应的。于是我便记住了又一个新作者的名字：刘路；于是我便期待着刊载《心是肉长的》那一期《延河》的面世。后来这篇小说引起的广泛而又热烈的社会反响，就成为预料中事。王蒙曾说这篇小说是一九七九年短篇小说创作的重要收获，可见是入得高人眼的。

后来就和刘路认识了。在什么时间和具体地点已经不记得了，大致可以肯定的是陕西文学界的某次聚会。我至今留下的最精彩最深刻记忆的一句话，是“我在农村打过胡基”。胡基是关中土话，即土坯，

盖房砌墙盘火炕垒猪圈、茅厕都离不得此物。通常是用一个三十余公斤的青石夯捶打装在木模里的黄土而成，一般定量是每个工日捶打五百块。这在以手工和体力劳动为主的关中乡村算是最重的活路了。解放前和解放初，操此业者大都是失掉土地又无其他生路可寻的穷人和笨拙的人，靠这种出卖力气和简单技能求得生存。到“三年困难”再到“文革”十年，普遍贫穷的乡村已经分不出穷人和富人了，仅仅是穷的程度的些微差异，打胡基（土坯）这种最费劲最笨拙的劳动倒是全面普及开来了。我那时虽已是乡镇干部，为省一两块钱，也是自己动手为换火炕为垒猪圈打过几回胡基。这样，我就获得了与刘路最切近的交流，一种共同从事过的劳动形式上的沟通，打胡基标志着一种生存形态。一当得知彼此都在打胡基这种生存形态上活着，似乎就不需要任何多余的话了。

《心是肉长的》一鸣惊人，中短篇小说随之喷涌而出，结集为一本书出版，刘路已成为新时期刚刚形成的陕西青年作家群一位被看好的青年作家，既有厚实而又直接的关中乡村生活体验，又接受了高等院校文学专业的修养，自身又潜存着敏感文字也敏感生活的艺术性天资，具备着文学创作的最完备的基础。而且出手不凡，起点很高，连续的创作也都保持在相当稳定的艺术水准之上。然而时过几年，却很少见到刘路的小说了，几乎是戛然而止，令我不得其解，多所遗憾，渐渐得知，刘路转到做学问的另一条路上去了。现在，他的又一本学术专著书稿放在我的案头，阅读中，我原先颇为遗憾的心理渐得平释，陕西作家群少了一位作家，却成就了一位卓有建树的学者，同样是令我鼓舞且钦敬的。

刘路是一位颇受学生拥戴的教师，后来又成为陕西师范大学新闻传播学院院长，自然可以猜想工作的繁杂和担子的负荷，面对这样一

摞书稿我就忍不住感慨。不单是数量之大，不单是涉猎面之广，更重要的是品格质地，不仅令我感慨，令我惊讶，更令我长了见识，顿生钦佩敬重。

刘路的艺术眼光，一刻也没有离开不断嬗变的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坛。一个时期几部代表性的作品，都在他的艺术视镜里得到品评，无论艺术上标示着什么主义的作品出现，都可以看到刘路解析的文字。他的独到见解，出自纯文学的审视，首先令我感到一种纯粹的文学立场上说话的可靠性。在当代文坛说话，可靠性已经成为第一要素（本来不应发生的事），要排除人情之网，要排除商事诱惑，要排除花样翻新名目迭出的炒作，甚至要冒得罪人招惹气恨的风险。刘路清醒如镜，仍然坚持着一个纯粹的文学立场，实为不易，突显出一种文学精神一种学者风骨，弥足珍贵。

刘路的纯粹文学立场上的说话，来自真知灼见。浅见薄识自然难免人云亦云，朝“令”夕改，随风扬尘。刘路对现实主义作家的客观冷静的评说，出自扎实而又开阔的理论功底，把陕西赵熙和畅销不衰的作家池莉等人的作品，都放在开阔的艺术视野里评析，令人信服。绝处充分说其绝，好处充分说其好，不是处冷静说其不美，只据文本说话，不看市场行情不看旁人脸色。除了纯粹的文学立场，除了作为一个学者的道德良心，关键还在于真有所知独有所得的独立的艺术见解，才能发出独到而又新鲜的一家之言。在《小说可能性的新探索》里，刘路对行者小说的评论，标志着他的思维跟踪着当代文学创作最前沿的小说文本，透现出当代文学理论研究最新鲜的声音。对行者小说的总体把握和细部解析，显示出刘路艺术视野的宏阔、思维的敏锐、阐释的精微，以及宽厚的包容。对于深居学院而且也已过了五十岁的人来说，真是令我深为感动颇得启迪的事。在我看来，对一种新

的文章的敏锐性，应该是艺术家生命里最可珍贵的东西，来自于新的知识构建所产生的新的观念，无论对于文学评论家，无论对于继续创作着的作家，都是致命的东西。敏锐性的缺失，难免陷入思维的麻木和停滞，陷入陈词滥调的絮絮叨叨。正是在这一点上，我感奋于刘路敏锐的思维所弥漫的活力，正呈现着一个思想者的生命形态。这种趋前的思维活力，同样显示在对卡尔维诺小说的理论阐释之中。卡尔维诺是二十世纪里被称为头脑里充满传奇的一个异类作家，其作品亦被称为“小说中的小说”，充满着离奇、童话、荒诞的色彩。刘路以其非凡的透视力，剖析出来隐蔽在荒诞离奇迷彩之中的哲理，深刻到令人惊悚的思想内涵，其阐释的明快和精到，比那些云里雾里翻弄新词儿的饶舌的文章就显出了思想的功力和艺术的眼力。

面对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创作，尤其是面对创作的文学批评，刘路持一种冷峻的犀利，这面孔这姿态这笔锋，使我感知到一种思想的力度的同时，更感到一种思想的勇气。思想的力度是一回事，充分展示这种思想力度却需要勇气，这既决定于一个学人的道德和良心，也决定于对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这个事业的忠诚程度。《新时期以来文学批评的反思与重建》一文，涉及新时期以来几乎所有形成影响的小说文章，尤其涉及面对这些小说的文学批评的文章，我才充分感受到刘路的冷峻、犀利。这篇文章的观点恕我不再重复。我以为可以当作新时期以来短短二十余年小说创作和文学批评的简史来谈。刘路既面对不断嬗变的小说创作文章直言不讳，即使是很叫响的作品，仍然发出自己的见解，尤其面对同时期的文学批评，更显出理论的深厚和纯文学立场的姿态。刘路都在为完成一个神圣的使命而顽强地坚守着，即：让小说创作尽快回归文学本身的规律上来，不断排除种种非文学的因素对于小说创作的影响和误导。在这里，我看到刘路毫不迁就毫不附随的锋芒。

生活中的刘路却是善与人处和与人为善的老师、朋友，既不咄咄逼人，却也不随俗纵恶。生活场合里一种谦恭的低调儿，正是思想者的自信。这本以理论为主的集子，收录了为数不多的几篇散文纪事，读来让我心动，也可以映照出刘路心灵世界动人的一个侧面。他对柳青为文为人的崇敬，对他在文学创作道路上的良师董得理的诚挚的感念，尤其是对一位同事韩爱敏的崇高品格的感怀，可以感知刘路在生活里崇尚追求着内在人格的完善，自然也能感到他排斥拒绝着什么。我便确信，正是在这样雄厚强大的心理和人格的基础上，成就着他的文学批评思维的独立性，成就着他在当代文坛作为文学批评家的卓尔不群的姿态。

一个被非正常的生活逼到土壕里打胡基谋生的农村青年，在生活刚刚恢复正常的运行轨道的时候，便一步从土壕跷进高等学府，丢下了石夯而握住了钢笔，在大学的讲台、在稿纸上，赢得了新的生命价值。我在感动刘路的智慧和品格的同时，也感动一个人和客观环境的决定性关系，健康健全的社会生活，才是一切天之骄子展现才华服务社会完成自己创造活动的基本条件。刘路是有幸的。刘路展示生命价值追求生命意义的诸多动力中，土壕里的体验当为不可或缺的一种。这一种非彼一种，可能更具某种心理力度。我便为刘路庆幸和骄傲，长安乡村土壕走失了一位打土坯的农人，却在当代文坛站立起一位卓有建树的作家和文学批评家。

2003年8月8日 雍村

民间关中

打开中国历史教科书，便打开了关中。便走进关中。便陷入关中。在历史的烟云里走了几千年，仍然走不出关中。

我从蓝田猿人快活过的公王岭顺灞河而下不过五十余公里，便踏入姊妹河浐水边上半坡母系氏族聚居的村落，大约一个小时就走过了人类进化几十万年漫长的历程。我以素心净怀跪拜在人文始祖黄帝陵前的时候，顿然发现开启一个民族智慧灵光的祖先仅仅拥有如此少的一掬黄土。面对周人精美绝伦的青铜制品，无法想象一个火炉如何冶炼得出如此复杂深奥的化学命题。作为周、秦、汉、唐等十三个王朝首都的长安不说也罢，单是东府一个小小的骊山，便可当作一部鲜活的历史来反复咀嚼。

火山骊山窒息死灭之后在山脚留下一汪上好的温泉。这股温泉不经意间浸洇了一个民族的历史教科书。戏弄了诸侯也戏弄了周王朝的骊山上的烽火台尚未火熄烟散，始皇帝就在山脚下修筑地下宫殿以及陶制的禁卫军方阵。短命的秦王朝的惨痛教训，丝毫也不妨碍近在咫尺的温泉里君王和贵妃的人生快活，压根不知百余里外的马嵬坡等待他们演出生死别离的一幕。恰是在这个烽火台下秦皇陵侧与残留着贵妃凝脂的汤池窗户斜对的五间厅里，蒋介石带着温泉的余热慌不择路逃到山坡上，隐伏在北方寒夜的冰冷如铁的一个凹坑里。这一夜的这一声枪响便注定了他十三年后逃亡海上的结局。那个隐藏过他的骊山上石隙里的凹坑，却成为中国现代历史完成转折的一个关键性符号。毛泽东曾经说过：“历史的经验值得注意。”以上几位在骊山下在温泉里演绎过兴亡故事的角色，似乎谁也没有在得意的时候“注意”到前者

在同一地点发生过的“历史经验”。今天，当世界各地的男女拥到骊山下来游逛的时候，未必一定要去“注意”“历史的经验”，却也不至于发出“都是温泉惹的祸”的戏言吧！

一个古老民族的大半部文明史是在关中这块土地上完成的。历史教科书提供的资料，无以数计地遍布地表和地下的历史遗存，无论怎样翔实怎样铁定的确凿，却都不可避免时空的隔膜和岁月的阴冷。即如唐墓壁画的女人如何生动艳丽，即如兵马俑的雕像如何栩栩如生，你总也感受不到一缕鲜活。当这些主宰着历史的统治者贪婪一池温泉醉生梦死的时候，关中民间的生活秩序和生活形态是怎样一幅图景？教科书和遗存中几乎无存，我只能看到生活演进到二十世纪几十年来关中农村和农民的生活形态。在最近十余年来中国的城市和乡村以前所未有的真实的高速度发展的时候，更多地保存着体现着原有的生活图景生活习俗生产方式，或正在加速消亡，更多地浸淫着思想文化以及由此透见的关中人心理形态的戏曲、演唱、歌谣、婚丧礼仪等等，都在加剧着变化，加剧着消亡。我在儿时甚至延续到青年时代的许多，如牛拉的石磨石碾一类东西早已停转了，即使今天乡村的孩子也不可理解麦子怎样经过石磨变成了面粉。

摄影家胡武功先生无疑是最早敏感到生活的这种变化的先觉者。几十年来追踪生活骤烈的和细微的种种变化，把新与旧的交替留在了自己的心灵底片上。在基本普及了机械收割和脱粒的关中乡村，《光场》的场面已经稀少难见，而这仅仅在十余年前小麦收割上场之前还是遍布关中乡村的生产图像。《麦客》里的麦客也正在消失，这个汉子挥舞镰刀的姿态定格为一个历史的雕像。我可以听见钐断麦秆的脆响，可以感觉到镰刀下卷起的风和微笑，犍牛一样韧劲的脖颈和刀刻一般的口鼻，比任何舞蹈家苦练的舞姿都优美百倍，比任何雕塑大师

的金牌雕像都要震撼我心，一种生活原型的自然美是无法取代难以复制的。即将出场的《社火》，梳妆完整只待出门的《新娘》，我在看到一缕羞涩掩饰不住的欣喜的同时，似乎能感知到心跳。《皮影》的幕后操作的架势，《哭坟》里儿女的痛心裂肺的表征，都使我直接感知到生活真实的运行形态，也一次又一次感到真实生动的艺术力量的撞击。

沉重的体力劳动为主的关中乡村生产生活方式正在加剧变化，带有浓厚的地域特质和周秦汉唐文化色彩的民间文化也在悄悄发生变化。从秦代一路犁过来的铁犁终止在小型拖拉机前。被农民挥舞了几千年的长柄镰刀被收割机械代替了。大襟宽裆的衣裤已经被各色流行服装替换。电视把乡村传统的社火、戏曲、木偶、皮影毫不留情地排挤到冷寂的角落，甚至改变着年轻一代的语言习惯。这是一种进步，一种胜利，一种新的文明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然而，我还是动情于那种替代过程中的差异，一种习惯了的又必须舍弃的依恋，一种交织着痛苦也浸润着温馨的情愫。

敏感而先觉的胡武功朋友，许多年来专心致志于关中乡村的这种生活演变，捕捉到了堪称历史性的告别的生活画面，使我真切地感受到今天民间关中的生产形态和生活形态，感受到在周秦汉唐的古老土地上生活着的关中人的心理形态；肯定为未来的史学家民俗学家包括作家艺术家了解两个世纪交接时代的民间关中，提供了一幅幅最可依赖的原生资料。

我便说，胡武功不仅是敏锐而先觉的摄影家，更是一位富于历史眼光和人文意识的思想者。

2003年8月27日 二府庄

多重视角 独自体验

这是一本颇为奇特的书。

书里的三位作者不是合作者合著者，这是一家两代三位女性各自创作的散文作品的合集。其中王芳闻和潇洒是亲姊妹，子叶是她俩的亲侄女。我过去曾经零星阅读过她们的散文篇章，留下过美好的印象。这回较为系统较为完整地阅读三人精选出来的散文合编书稿，便感到一个强烈而又明晰的差异，一家两代三位女性，同时以各自的审美视觉观察社会，观察自然，以各自在社会中不同的位置体验生活看取人生，以各自的艺术兴趣创作出个性鲜明绝难类同的散文作品。恰是在这些作品的个性差异里，给我关于个体与社会、个体与自然、个体与艺术的诸多启示的机缘。

三位同一血统的作者中，我与芳闻较为熟悉，结识多年，虽然缺乏深入的交流，印象里她是一位事业型的又很有品行修养的女干部，长期在党政部门工作，业余进行着不懈的文学创作，已经出版过散文和报告文学集，可惜我读得不多，倒是她的功夫老到的钢笔字一见便令人刮目。这次集中阅读她散文作品，对她整个作品的风貌得以观瞻，同时，也了解了她成长成才的社会和家庭环境。一个极其普通同样贫穷到连买一支铅笔都作难的山区农家，一个读书欲望十分强烈也很聪慧的农村女孩，一个默默地承受着生活艰辛也自觉锤炼着自信自尊的年轻人。我对芳闻几篇回忆求学和如饥似渴读书的散文感触甚深，以至情不自禁地为之动情，说透了是联系到我少年时期求学的艰难往事。芳闻在被糟践成文化沙漠的“文革”时期，通过许多途径搜集到那么多书，对于一个乡村女孩来说是令人感动的。当她广泛阅读获

得的丰富而又复杂的知识，逐渐扩展了了解世界的视镜，这对于一个生活在大山里的女青年是具有脱胎换骨完成蜕变意义的事。她的目光已经从农家小院猪圈鸡舍里摆脱出来。她的思维也冲破了当时极左思想的愚弄和封闭落后的愚昧，与文明先进的文化进行对接。关于人生价值关于生命意义的人生坐标开始确立，逐渐完成了从一个山村女孩到一个初具人生理想追求的知识型女性的蜕变和升华。广泛的阅读奠定了她健康健全的心理形态，人类崇高的品格影响着陶冶着她的个性气质和品德修养。无疑，这种以文学书籍为主的博览，激活了磨砺了她先天对文字敏感的那根神经，对生活对人生的感受和体验也就愈来愈灵敏，展示这种体验和感受的文学创作就成为自然的泉涌了。这样，永寿山区缺失了一个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荷锄种禾抱柴做饭的农妇，却脱颖而出一位干练忠诚的党政干部，兼着灼灼才华的青年作家。

阅读芳闻的散文，便感到一种诗意。这种诗性的气韵弥漫在几乎各类题材的篇章里。写亲情的心灵感应是温馨而又纯净的诗。即使艰难贫穷的屋院里，弥漫的依然是父爱母爱如诗般的温情，滋润着幼小的心灵，抵抗着也化解着极度穷困的生活对孩子的伤害。《阁楼》里父亲逝后才发现的那一箱书籍，是以使人体味甚为伟大的父爱，当是高耸如山深沉如湖。芳闻青少年时期经历的是中国乡村天灾人祸加害施虐的危难时期，她却总是能在艰难困苦的体验里透出一缕内蕴的人性人情的诗性的美，既体现在她读书生活里，也体现在筑泥为案的民办教师的工作中。《夏收时节》对关中大地小麦成熟收获季节气象的描绘，洋溢着关中大地古远的农耕文明的情致意蕴，给我以经久的回味与品赏。

芳闻的散文细腻明快而不黏滞。细腻与明快很难协调，细腻往往容易陷入黏滞。芳闻的细腻能够呈现出明快，既得之于文字功力，得之于审美情趣，更赖于个性气质的独特禀赋，所谓心性使然。较之其他文学形式，散文更直接地展示作家的思想倾向、审美倾向和完全个性化的心理形态，真正是心灵的独白。只有明快明媚的心灵世界，才可能在即使艰难的时世里捕捉到生活底层那一缕温馨，才可能感受到别一个心灵里动人的人性人道的脉搏，才可能对一镜明月一株青柳一树梨花一朵红梅发出如此富于质感富于灵性的吟诵。自然，一个心底幽暗龌龊的灵魂，是很难作假作秀出明快和明媚的文字来。无须解析，这样的心理既无法感受亦无法喷涌这样的文字。这样，我可以以对芳闻的印象来理解她的散文，反过来又可以以她的散文来加深了解芳闻本人，结论是互为可赖可靠。

潇洒的散文从总体上看，再与芳闻的对比里鉴赏，更为突出的是率性，也不乏细腻；更见出恣意洒脱，舒畅淋漓。《手之种种》从人的手这样简单的事象起笔，纵论历史，横向时下世相，涉及词家舞场麻将桌和集市上遮掩在草帽下摆码子讲价钱的种种姿态的手。作者大开大合，甩得开又收得住，视野开阔而又精妙至微，犀利而不粗俗，真是一篇直抒胸臆更见性情的佳作。《电话的自白》以一个独特的视角看取世相，针砭俗丑，颇见入木刻骨功夫。较之其姊芳闻散文，相异出自己的棱角，更见坦直和率性。

潇洒还有一些纯粹抒情的散文，亦见细腻，亦见敏感。然潇洒的细腻与芳闻的细腻又呈现着不同的质感，表面看是文字上的，其实在于个性气质上的根本性差异。这是无法做出高下结论的事。同胞姊妹展示出来个性鲜明的散文作品，却是一个有趣的现象，也是文学创作本质规律的生动体现。

姊妹二人在不同的篇章里都写到家庭环境、生存形态，都写到她们的父亲和母亲，甚至父亲那一根旱烟袋都给她们以永久的记忆，然而同样显示出两人艺术再现时的差异来。无论姊妹二人以怎样差异的心性感知父亲，又以怎样差异的文笔描述父亲，已不重要，倒是一个堪称真正的关中汉子的形象，雕像般兀立于我的眼前。我从他的职业（公社干部）行为里很自然地融通了情感，不仅仅是我在关中东府和他做着同样的工作。这个父亲的坚毅、诚朴，尤其是对苦难的强悍的内在承受力，使我感动而又钦敬。这些品质无疑已经潜移默化到儿女的血液里。

小小子叶尚在初中，已经写作散文了。一个孩子眼里的世界，鸡、狗、猫，无尽的情趣里所呈现的童心童趣。进而到用一双纯净灵聪的眼光看取大人的世界，感受母爱，接触同学和朋友，包括一位不幸早夭的伙伴，可以看到一颗天真澄明的幼小心灵，动人的爱怜和同情心，都彰显着人类最可珍贵的敬重生命的崇高情感。

我发现，侄女子叶眼里笔下呈现的客观世界和心理世界，与其两位姑姑笔下所描绘的她们在相同年龄区段时的世界，似乎已经恍若隔世了。生活和人在近二十年的中国变化之快，常常使人就发出这样的慨叹。但愿中国乡村的孩子再也不要重复芳闻和潇洒童年的生活。但愿中国的孩子都能开始子叶眼里和心灵中美好的记忆。

2003年9月12日 二府庄

三题《一路走来》

关于阅读的可靠性

阅读任世德的传记《一路走来》，突然意识到阅读的可靠性这个话题。

读这部书稿，我很快便投入其中直到陷入其中。这是一种情感的陷入，一种由情感引发的整个心理感受的深深的陷入。不是通常所说的感动了，我的心悸颤了。我与写这本书的作者和被书写的传主发生共鸣了。稍稍平静下来，我首先想到的是一部作品给读者阅读的可靠性这个话题。

我常常招架不住写家、评论家、导家在作品面世前的阐释的诱惑，去看一部小说、一部电影或一部电视连续剧，结果往往不大美妙，在多数的阅读和观赏的真实感受里，基本找不到阐释词中所标榜的主义和意义。屡屡的受挫，就有了关于阅读的可靠性的质疑。尽管知道这是艺术进入商品时代的初级伎俩，譬如好酒和假酒都不能悄悄默默固守在深巷里，都要走出深巷、走上大街、走上报纸、走上电视、走进广播等媒体兜售，劣酒和好酒较劲的功夫都写在广告词的制作上了。多年前有一种以中国文化先师命名的酒，畅销全国，广告覆盖了从中央到地方各级传媒的荧屏和版面，赚了一大把钱，我曾对本省一家很有名气的老字号酒厂的老板说，你们是否舍不得广告费？他说，那家酒厂其实连作坊都没有，只有一个勾兑车间，从包括本厂和全国好几家酒厂购进原浆酒，勾兑后就装瓶出售了……现在，这家只做勾兑没有作坊的酒家是否还存在，搞不清楚，这种以文化先师命名

为品牌的名酒，似乎已从大小酒店、酒铺和超市骤然消失了。我想，曾经喝过此酒的人，于今回想起来的那份心理感受，大约与我上述的阅读作品观赏影视之后的感觉相类似。然而我也能自我宽心，初级阶段的中国市场经济就是这样，假酒更需要铺张造势的广告；小说和电影也是商品，同样需要铺张造势，好走出深巷播扬于闹市，好赚钱过好日子。于是，我在阅读某些小说包括翻译过来的作品，观赏某些电影电视之前，就有了如同酒席上选择那种酒的类似情形，这个酒到底咋样？尽管如此，还是免不了受挫的感觉，还是要阅读作品观赏影视，如同喝酒的人不会因为喝了几回假酒而戒酒一样。

《一路走来》之所以引我发生情感和心理的陷入，首先是作品的可靠性。可靠性的最基本品格之一是真实。这部书的传主任世德就是一个普通人。一个当过农民做过工人穿过军装坐过机关扛过相机当过记者又经营着文化企业的阅历十分丰富的人。然而，确确实实是一位普通人，当兵虽有惊人的英雄事迹却未被宣传，当干部也没有显赫的级别，却是一个让我能够可靠地感受真实的生活进程，且引发心理共鸣情感陷入进而思考社会的人。

《一路走来》提供给我的，是一个人六十年的真实的履痕和真实的心路历程，从农村到工厂到军营到机关到商海，任世德经历了苦难也得到过温馨，遭遇过死神的光顾也经历过爱的抚慰，遭受过包括牢狱的冤枉也得到过正直和良心的仗义。一个人的生命经历，透视着六十年社会生活的阴晴雨雾，涌动着生活底层的清流和浊水；一个人追求什么经历了什么得到过什么，心灵怎样被生活现实锤打着颠覆着也锻铸着；一个人面对阳光的欢欣和面对泥泞以至陷阱的无奈，怎样坚守作为人的正义、正直、善良这些最基础的品质，从而能够在他六十岁到来时说一声，我终于没有堕落！

我曾经读过中国和世界的一些在政治、军事、科技和文学艺术上有过大作为的人物的传记，有些属于名家的名著，有些是专业的传记作家的作品，有的是身边人包括秘书、子女的写作，都给我以不同方面的启示。《一路走来》写的是普通人任世德。任世德与我同龄，属相为马。他阅历中的职业色彩比我多样多变也更多丰富，然而我们生活历程中大的社会背景却是一样的，书中叙述的他的生活感受，与我不仅毫无陌生感，而且身同心同，以致激发起我对过去生活的重新回嚼。即使是我没有经历过的工厂和军营，也仍然感受到亲切，丝毫不隔膜。一个普通人的生活历程，更多地给我的是亲近，这得助于作者李沙铃和秋乡的笔墨。在这部传记里，欣赏到的不仅是作家遒劲的笔力，更强烈的是作家思想的敏锐和深邃，把一个普通人的人生经历，开掘得有声有色，颇多警示，颇见警世骇俗的力度。

关于饥饿

任世德生长在号称米粮川的关中平原的兴平县。这块属于俗称白菜心的富庶之地，大约在史称“三年困难时期”之前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贫穷尽管贫穷，一般农家粗茶淡饭还是可以吃饱肚子的，然而白面和肉食却是稀罕物。作品写到尚未完全成年的任世德被招进一家国营大厂，第一顿午餐看见白生生的大米饭和管饱吃的肉菜，那个惊讶，那个贪馋，读来令人动情伤感。这何止是任世德一个人的特殊感觉，而是包括我在内的一个时代的农村孩子的共同经历。还有一处细节，写进入“三年困难时期”又回到乡村当了农民的任世德，不仅再不能享受工厂食堂的白米细面和肉菜，在农村里真正体验了饥饿，连少年时代的粗粮也吃不饱了。他去参军，临走时母亲瞒着弟弟塞给他一块油渣。油渣是关中农村用棉籽榨过油后的渣子，通常是用来给瓜果和棉花作为肥料用的。现在，油渣成了上等食品，不是随便可以享受

得到的吃食了，因为他要参军上路远行边关，母亲才把藏匿许久的这一块油渣塞给他，作为干粮，而又是瞒过弟弟偷偷塞给他的。到部队集合地点报到时，领到了一个大白馒头和一碗有肉块的菜，来送行的弟弟和他一样傻眼了。任世德此时才掏出那块油渣，和弟弟一块就着肉菜享用了，把那个半斤重的白面馒头，让弟弟拿回家去给母亲。我读至此，便泪眼模糊，读不下去了。

贫穷和饥饿，曾经是我们生存的土壤，很长一段时间煎熬着我们的身体和心灵，留给任世德和我这一代人至死也无法忘记的记忆。每有触及，便在眼前浮荡起来，便在心里引起回响，便牵动人情感世界里最脆弱的那一根神经的战栗。

令我感动钦佩的是，在贫穷和饥饿的煎熬中，任世德默默地承受着，显示着巨大的承受力。尤其是在后来的农场里，他忍受着饥饿，却顽强地创造着解除或减轻饥饿的果实，真可以说是惊天地泣鬼神的。他没有逃避，也没有放松自己做人的尺码，保持了一个汉子的道德和操守。而我们常见的现象是，在这样的困境的压迫下，有人放纵自己以至堕落。困难和饥饿煎熬的过程，恰恰是任世德成长的过程。他踏过了泥泞，也学习了文化，反而在精神上比任何时候都富有都强大了。人的价值的升华或贬损，往往就在那个很难熬的过程中自然区分开来。

再令我感动钦佩的是，现在已经不再贫穷的任世德，对待金钱的态度。他在经营一家广告公司的过程中，突显出思维的超前性和经营的才能，加之他的诚实和信用，广告公司的经济效益颇丰厚。然而在他的生活中，仍然动情于一碗蒜水蘸面片，简单而又可口，没有时下某些大款挥霍摆阔的做派。可任世德又绝不吝啬，仍然保持着一个善良人真诚的同情心，每每遇到或听到自己过去的同事（有下级也有上

级）遭遇不幸和困难，不管这些人与自己的关系远近亲疏，都会送去一份心意，几百成千元不等。不单是现在他的广告公司获利时，即使原先做普通干部拿固定工资时也是如此。人的品质中的正直和善良是孪生的，没有正直就没有善良，正直本身隐含着真正的而不是虚伪的善良。正直和善良是一个人品质和精神的基石，不受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的左右，若受到这些因素左右了，正直和善良的色泽就会消失。当人们普遍叹惋商品利益冲淡了人际间的同情心的时候，作为普通人的任世德，依然守护着自己心灵世界的道德家园，体现出作为一个人的健全健康的人格。

关于对灾难的承受力

在这本传记里，我看到了作为一个人的任世德对灾难的巨大的承受力。这应该是这位普通人精神世界里最强大的支柱性质的东西。

他承受过贫穷和饥饿。他承受过战场的艰苦和随时可能遭遇的死神。他承受了非常时期里在非常环境下，种植庄稼的比农人还要艰辛的超负荷劳动。他都挺过来了，他不是悲悲凄凄、怨怨艾艾地被动地承受，而是脚踏实地不遗余力主动地承受。这是他总是能走出困境、走出灾难的精神因素，自然也包括他的豁达的性格因素。在人生漫长的承受灾难历练中，任世德成为普通人中的强者，这主要指他的精神。

在如上述这些自然的生活的社会的普遍性灾难中，如任世德一样磨砺过承受力的，同时代有一批人。而经受不白之冤，蒙受监牢之苦、之委屈、之屈辱的人，就成为极个别人的灾难了。任世德就遭逢了一回。对于这种灾难的承受力，远非上述那些灾难的意义可比。正

是在这一偶然的冤案的过程中，作为普通人的任世德的心理承受力，令我感动，令我钦佩。

一九八〇年的中国城市人，在充分感受安定祥和的社会生活气氛的同时，工资见涨奖金也见涨了，作为国营军工大企业的职工，自然是首先体会到春江水暖的鸭子。有了吃饭穿衣之外的富余钱的职工们，普遍渴望家里能添置一台电视机。那时候的电视机主要依赖进口，一般家庭能购得起的是十二英寸和十四英寸的黑白电视机，在日渐迫切的需求的呼声中，任世德和他的同事受众人之托、也受领导委派，到广东去购买回来几百台十四英寸黑白电视机。满足了许多家庭的心愿，赢得了职工的欢心爱戴，也显露出任世德会办事的能力。几年后，任世德被无端怀疑在购买电视机的过程中有问题，首先是作为经济犯罪大案提出来，之后又收容审查，进了号子，时间几近一年之久。

这个案情不只是十几年后的今天，让人感到荒唐，即使当时法制尚不健全的情况下，许多人也感到莫名其妙。这件荒唐的冤案在这本传记中是最沉重的一笔，也是传主任世德人生历程中最沉重的一笔。他经历中的贫穷和饥饿，是那个时代绝大多数人的经历；他经历的战争死亡的磨砺，有一块爱国的英雄主义的磨石沉在心底；唯独蒙受屈辱的冤案，于心理上是一个无以诉述也无法自释的沉重。在这个过程中和过程之后，我才看出了作为普通人的任世德的不平凡之处。

面对这个人为的灾难，他的态度比我想象的要简单得多。他只抱住一条老主意，我没有做睡不着觉的事，在号子里仍然踏实入睡。这种做人的修养和心态，恐怕用处变不惊这个词也难以概括。一个老实人的老主意，才是对待灾难的强大的承受力的基础。一个对社会对世

界玩着两面派手段的人，内心永远都是虚弱慌乱的，即使没有灾难降临，时时处处都摆脱不掉虚假带来的内虚的幽灵。

更让我感动钦佩的是任世德事后的态度。他从冤案和冤狱中走出来，不仅不闹，连那些给他制造冤案的人他也原谅了。他说他们还陷在“整人”的习惯性思维和心态中，恨他们闹他们已经没有多大实际意义，他要抓紧时间去干他想干的事业了。他被委任去创办《军工报》，几乎是白手起家，短短时间内就把一张专业报纸办得红红火火，创造出令人眼热的雄厚的家底。而与他一起因购买电视机而蒙受同样冤屈的同事，为讨一个公道、讨一个正名的平反通知，愤懑和忧虑得难以解脱。任世德接受了事实上的平反，并不看重那一张平反通知。这是同样合理的两种态度。

我曾经说过，我的整个人生体验可以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不断增强承受痛苦的能力。这样才能踏过种种灾难的泥泞，走出自己的天地。我正是在任世德这位同龄人身上，感受到了这点相通的东西。

2003年6月19日 小寨

你的句子已灿灿发亮

和王宜振结识的时候，我们还都是小伙子，都爱着文学，别无选择地都把习作稿投给《西安晚报》文艺副刊，和副刊编辑张月赓都成了朋友。我约略记得，和他第二次见面，就是在老张仅有一间屋子的家里。笑眯眯的，说话声音很绵软，这是第一次见面的印象。三十余年过去，我谢了顶，他的头顶上也空白闪亮，然而依旧是眯眯笑着，说话的声音依旧绵软。三十多年前我在报纸上看他写作的儿童作品，三十多年后他依然写着儿童题材的诗歌。诗集出过八本，国家级大奖获过六次，完全是一位影响深远的儿童文学大家了。我真是感慨而又感动。

我的感慨和感动在于一个人一生都在与孩子对话，都在感受着儿童心灵的妙音，都在专注地与那一双双天真烂漫纯洁无瑕的童稚的眼睛对视和交流，聆听如竹笋拔节般活泼泼的生命旋律，这样的作家活到百岁，心灵也是一片童稚的纯净和鲜嫩。

只有具备一颗纯美圣洁的心地，才能和纯洁无瑕的童心发生共鸣；只有如圣母般的善意和爱心，才会得到灵敏的童心的呼应；只有满怀巨大的至诚的对生命的敬畏，才会张开想象的翅膀。小说创作需要想象，诗歌亦然，儿童诗歌更不可或缺想象。没有丰富的想象力，就没有创作。宜振对于童稚心灵世界的敏感，得助于自身心灵的纯洁，想象的翅膀呈现出非凡的活力和恒久性。我在吟诵他的诗篇时，常常被那些绝妙的喻体——想象的结晶——所惊讶，所陶醉。我很怀疑这样年龄的人依然会保持如此丰富的想象的活力，便断定宜振的心是年轻的诗性的心。

即使在感怀乡土感怀亲情的诗篇里，宜振仍透出一缕少年的纯美。这本诗集里几乎有一半都是写土地和乡村以及生活在这古老土地上的广义的父老乡亲。土地、乡村和黄土高原，是从这块沃土走出来的一代一代诗人吟诵不竭的圣地。宜振生长在陕北农村，诗性最敏感的部位也在于此。这些诗篇里洋溢着宜振独特的声音、独特的旋律、独特的韵味。我揣测来自他纯粹个性化的独特体验以及难以企及的赤诚。这些诗篇常常使我吟哦不止，心灵颤颤。有些堪称不可多得的精品佳作，仅示较短一首《父亲从乡下来》：

父亲从乡下来

乡下的父亲

伸开粗粝的手

手心里握着四个季节

父亲从乡下来

乡下的父亲

用草帽扇风

扇出一串串鸟鸣

乡下的父亲

跟我睡在一起

夜深人静，父亲的骨节在舒展

从骨节里蹦出一片蛙声

乡下的父亲

用旱烟袋抽烟

把烟袋锅磕一磕

竟磕出一地的乡情

乡下的父亲

头颅是一颗太阳

无论头顶是黑是白

都能把一个个日子照亮

这样的诗是不需要解释的，也不适宜解释，任何高明的解释都很难达到精微的语言之外的韵味和意蕴。世界上有许多诗是需要讲解的，也可能有多重意释的；有些诗不适宜解释而适宜吟诵，只有在吟诵时才能充分感受它的美，才能陶醉在无尽的难以言说的情感里。宜振的这首诗对我就产生了这样的认知。无论诗歌，无论小说、散文，

写父亲的篇章太多太多了，精品也不少，宜振的这一首且不判断算不算精品，却可以说出类拔萃。

在宜振的诗集里，通本都布满着这样的词：绿草、花瓣、蝴蝶、小鸟、麦子、幼芽、萤火、灯笼、青蛙、池塘、火苗、月亮、星星、羽毛、苍鹰、鸿雁、鸟巢、鸟蛋、蟋蟀、蝈蝈、油菜花、稻田、纺车、炊烟、烟袋等等。宜振自己不知是否留意，在阅读者我的感觉里，却是如此强烈。这些语汇漫散在整本诗篇诗句中，阅读者的心境和情怀不觉中泛潮起诗意了。这些语汇原本都是最富于生命活力的，它们从诗人宜振的胸膛倾泻出来，进入我的视野，触动我的神经，满心都潮起生命的活力了。我现在大致可以冒昧猜测宜振永远眯眯的笑脸和绵软的声音了，一个眼里和心中装满绿草花瓣鸟鸣虫叫蝶舞的人，大约不会在乎生活里的龌龊的。一生都能保持如此美好的笑容和声音的宜振，令我在感动之同时又分外钦敬。

宜振一生都沉浸在儿童的心灵世界，一生都在为着儿童工作（编辑《少年月刊》）。他吟诵不止，孜孜不倦，永不满足，追求着心灵的完美和诗的境界的完美。有一首《摸亮》的诗当是他这种追求的写照：我摸一个词语/从嫩摸到老 / 我想把它摸亮。我摸一个句子/从青摸到黄 / 我想把它摸亮……我读这样的诗，同样以为只可意会而不必言说。我惊讶“从嫩摸到老”“从青摸到黄”这样漂亮的句子。我几乎感同身受般可以感知到艺术探索的兴致和艰难。我想到了古人的“推敲”。我也想到了海明威以无比的毅力追求自己创造境界的感人故事，他有一句名言概括得十分生动，叫作“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海明威“寻找”的“句子”和宜振“摸”索“词语”和“句子”的精神是一样的，都是要得到只能是属于“自己的句子”。只有“自己的句子”才是具有艺术个性的“句子”，才是不会被淹没的“句子”。

我想以宜振《母亲的嘱咐》来互勉：临走的时候 / 把母亲水灵灵的嘱咐 / 掐一段 放在阳光下 / 晒干 装进小小的/旅行袋/饥时 嚼一点 / 渴时 嚼一点 / 一小段晒干的/话儿 嚼它 / 需要我一生的 / 时间。这样的诗，我一触摸，便有一种质感，这是一个艺术家用事业的大锤，溅着满心的生命之火，锻铸出来的一个凛凛然的大写的关于人的诗句。这种被称作诗的句子，莫说轻才小慧者难以获得，肤浅浮躁着难以寻找，只有宜振这样把智慧和用心完全投入创造的人，才可能在几十年不改不移的追寻和摸索中获取，这是生命体验的真谛。诵读这样的句子，也就诵读着生命和创造的韵味，一种踏实，一种尊严，一种执着，一种执火前行而不惜焚毁的神圣。

我想和着宜振吟诵的旋律，咀嚼那一段被“晒干的话儿”，为生命壮行。

2003年11月21日 二府庄

探索·归结·展示

——在《王蓬文集》首发式上的讲话

我到汉中来专门参加《王蓬文集》的出版发行仪式，首先非常感动的一点就是，汉中市的党政各界领导，都来出席这样一个作家的文集发行仪式，这样高规格的礼仪，我在陕西没有经历过，第一次；包括我的文集的出版，都没有这样高的规格，所以我很感动。这就给我一个启示，就是汉中包括以王蓬为代表的这样一批作家、中青年作家的成长，它历来受到汉中市市委、市政府，包括相关的各个部门，真诚的关怀、爱护和扶助，才有这样一批作家成长起来、发展壮大起来。因为汉中自新时期以来，尤其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以后，几任书记、市长，我大体都打过交道，都认识。在八十年代像王蓬还都是青年作家的时候，这些领导都很关注他们，帮助解决很多实际生活和工作的问题。从创作这个意义上讲，作家的具体写作是作家的事，人物咋样刻画，主题咋样开掘，田杰（书记）管不了，那是王蓬的本事、王蓬的努力，但给他们一定的、必备的一些工作条件，包括他们个人生活上的困难的解决，各级领导的关注对这些作家的成长，具有很重要的意义。倒不是他们的享受如何，而是能够使作家把他的智慧和精力，投入到艺术探索中间去。这样就在汉中这块地域上，就使在文学创作这个领域里有兴趣有智慧的人，能够把他们的智慧发挥得最好，也就能够给我们陕西、大到给我们国家培养在文学领域的一批人才。我看到了汉中市市委、市政府，包括相关各部门，这种支持的连续性。这个我是断断续续亲身经历的，有些事我都直接参与过。所以我很感动。包括去年九月，我到汉中来，前任书记胡悦到现任书记田杰，去年九月我都见过。他们对文学的热心不是一般的兴趣，不是说

哪个书记哪个市长，喜欢文艺或不喜欢文艺，来参加一下某个作家或者艺术家的一些活动，而真正是出于他对汉中这块土地上的一种事业的责任心。我在这个领域常讲，有人把文学说得太过重要的时候，我反倒把这个调子往低降一下，我说一个地方，一个省一个市，老百姓过日子，主要靠经济发展，靠这个决定碗里的稀稠呢。文学包括其他艺术这都是边缘的，或者就是摇旗呐喊的，它有个主次。但是我在汉中这里能感到的，就是领导们在艺术这个领域里，他没有把这个当作一个边缘，而当作一个非常重要的党的事业来抓，我看到了这个事业的继承性。尤其今天这个会议，市委、市政府、人大、政协，包括军分区，各个方面的领导来参加一个作家文集的发行仪式，我是非常感动的，所以我想说这个意思：表达对市委、市政府、人大、政协各界领导，包括真正的关注过汉中文化事业、作家艺术家的各级领导的真诚的感谢之意。

下面讲《王蓬文集》的发行。大概是去年九月，我到汉中来，王蓬才第一次说，他原来一直不敢出文集，现在受凤杰的影响想出文集。王蓬跟我说到这个话，我说你确实应该出文集。这样王蓬就决定出文集，让我来写序。我很荣幸地接受了写序这样一个承诺。我跟王蓬认识多年，甚至在“文革”尚未结束之前，我们作为陕西的业余作者认识以后，一直到去年他说这个话之前，我没认真写过王蓬一篇文章。这是很遗憾的事情。在我的印象里，关系走得比较近、接触比较多的朋友，反倒容易忽视这个东西。到王蓬要出版文集，我就觉得是一个很庄严的事，因为对一个作家来讲，探索大半生，这个文集的出版，实际上是对于他整个生命意义、创造意义的一次归结、一次展示。我是比较认真地、系统地阅读了王蓬的主要著作，思考了一点问题，包括对王蓬。对王蓬和他的作品理解起来就比较容易，因为与他接触毕竟多。我就写了一个序文。王蓬的整个创作的意义和他取得的

成就，里边所涉及的作家与生活、作家与人民、作家与地域、作家与个人经历，以及作家跟社会……这种种关系，通过我和他的接触，更多的是依赖他的文本，思考了几个包括我自己对创作的理解和看法，我在这里就不再赘述，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看序就了解了。总而言之，王蓬作为陕西省会城市西安的一个城市人，因为不幸而随着父亲流落陕南，反而因祸得福，在这片沃土上经历了灾难，却成就了事业。这个现象本身就给人生做了多种可能性的注释。它给人的人生启示是多重的。今天，当王蓬成长为一个具有全国性影响的大作家的时候，我们回味或者探索王蓬的成长历程，显然就具有了更广泛的意义。这个问题我文章里已多所涉及，就不再多说。总之就王蓬的文集的出版，表示最真诚的祝贺——无论作为朋友，无论作为一个同道者，都是一种非常真诚的祝贺。

近年，我又看王蓬写汉中——现在好像已经走出汉中涉及关中，以及陕西整个历史文化的一些随笔，最近我在某个杂志上还看到他写了两篇探索陕西历史文化的很有学术价值的文章。王蓬已经从小说创作进入学者化作家的层次，带有更多的文化品位。这个连我都做不到。对于汉中地域性的历史文化、自然风光、风土人情，包括现在的经济政治状况，王蓬写过一些电视专题片、写过很多文章向外界介绍。这对地区知名度的提高，对汉中的开发，都有积极的意义，对地方经济、地方人文的发展，起到了最基本的功能。这里，我也对《王蓬文集》的编辑李金玉——远方的客人，也是我的老朋友——表示真诚的感谢。她应该是功勋编辑。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是具有很大影响的一部长篇，是她编辑出版的，咱们陕西还有很多作家，都受过李金玉编辑的扶助，包括王蓬的很多作品。我想汉中人民是会欢迎你的，会拿汉中米皮来欢迎（你），这是我最喜欢吃的东西。在汉中文学界除王蓬之外，各个年龄层次已经出现了一批很优秀的作家，有的

还坚守秦岭南边，有的流落到或者说打进西安去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陕西现在很具影响的两个现代派作家——青年作家——都出在汉中，一个寇挥，一个爱琴海，现在这两个都在西安，在小说这个领域是具有全国性影响的，是现代派意识的两个作家。看来汉中并不封闭，秦岭把什么都挡不住。现代传媒——我不会上网，但我知道网很厉害——把整个世界都沟通为一体呀。所以我们不要以为汉中就封闭，汉中不封闭。在这块土地上，现在还有很多年轻的诗人、小说作家、散文作家，像李汉荣，还有一个丁小村。汉中已经成为我们省一个文学重镇。新时期以前，汉中以戏剧和诗歌创作影响大，好像没有小说创作的重要作家，现在已经打破了这个格局。而且汉中有戏剧大家，白头发那个、跟我年龄差不多的老郝，都是很具有影响的。我把这个简略讲一下，因为我知道今日在座的，是汉中市的各级领导，你知道一个轮廓，你以后能在各个方面关注一下王蓬之后的更年轻的作家。谢谢大家！

2003年11月22日 汉中

生活的脉象，我的脉象

——小说自选集新版序

重新编选这三本小说自选集时，抽掉了五六篇旧作，添进去新世纪这两三年来新写的六篇小说。最早的短篇小说写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尾，最晚的一篇写于今年年初。我之所以强调写作时间，是新时期文艺复兴以来，亦即是标志为改革开放时代以来的二十五年间，单是从内容上看，我自己似乎也才猛然发现，这些小说几乎是亦步亦趋留下了生活演变的屐痕，大致可以揣摩二十余年来在冲决一层一层精神和心理樊篱的历程中，中国人尤其是农民，心理秩序发生过怎样的变化。

我对自己的写作也更清楚地确信一点，二十余年来我一直正面面对现实，面对乡村里发生的剧烈的或微妙的人心悸颤。我说不清是为了什么或因为什么，也滤析不准是出于个人气性或思维方式，而作品摆列下来的既成事实，显示着二十余年来我始终没有从现实生活的层面移开眼睛。我的中、短篇小说几乎全部是生活演进过程的即时即兴之作，只有长篇小说《白鹿原》是一个例外，是以一九四九年以前远逝了的那半个多世纪的历史生活为背景的作品。即使在《白》书创作的准备和实际写作的六年时间里，我仍然抑制不住生活急骤变化的冲撞，抽空寻隙写下了几个短篇小说，没有使这一段时月留下空缺，甚以为幸，也甚以为欣慰。新世纪伊始，我重新开始短篇小说的写作操练，像以往一样，且不论在艺术上做过何样儿谋算，而内容依然是把着现实生活运动的脉搏。这样，这些中、短篇小说就大致勾勒或者说

记录着新时期二十余年来，我从中国乡村一隅所把握到的社会生活变幻起伏的脉象。

我也因此而有了一个重新把握自己的契机，运动着的现实生活对我最具诱惑力和冲击力。换一个角度说，我对现实生活的波动最容易发生呼应，最为敏感，无法移开眼睛，也无法改易。

这三本小说自选集，差不多收入了新时期以来我的绝大部分小说作品，同样也摆列出我在小说创作一路上的印迹。关注和喜欢我的小说创作的朋友，也会清楚地看出一个作家二十余年艺术探索的大略脉象，捡取一点一滴有用的东西，即使是借鉴式的教训，都足以让我感到安慰。

长江文艺出版社重新出版这套小说自选集，使其重新进入图书市场，走向更多的读者。作为作者，当是最为鼓舞的事。谨向周百义和他的长江文艺出版社致以谢意，正是他们提供了作家、作品和读者完成交流的桥。

2003年12月4日 二府庄

《原下的日子》后记

要写这篇后记的时候，突然意识到，在已经出过的大约三十种书籍中，我只给自己的一本书写过千把字的后记，就是我平生出版的第一本书，短篇小说集《乡村》。第一本书的出版在我创作历程中的感动，都留在那千把字的文字之中了。我不大喜欢作自序，只在出版社编辑申明不可违拗的理由时，我才顺应去写，这样就有五六种散文或小说集子留下了序。在我的整个意识里，作者关于社会关于生命关于艺术的全部体验和用心，其实都蕴含在大大小小的作品里，读者读了就了然于胸，无须作家再表白什么或阐释什么。只有在作品里读不到而又必须向读者交代与内文有关的事时，才有必要写序或跋。

这本书既写了序，又写了后记，当是我的所有集子里最完善的一本了。这固然与责任编辑说明此套书统一体例有关，而写序却是我原有的欲望，可谓不谋而合。原因只有一点，新世纪伊始的头两年，我又回到白鹿原祖居的小院。我又闻见了邻家从墙头弥漫过来的柴烟，虽然有呛味，却是城市废气无法对比的。我第一声听到的是斑鸠的叫声，随之就听到了乡村里所有常住鸟和季候鸟的叫声。这些叫声从幼年起就刻印在我心灵的磁带上。我把种种感受写成短篇小说或散文，自觉已经不是十年前在这个屋院写作中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的感觉了。我自己以为有诸多差异，说来肯定话长。其实，如若读者对十年前我的作品还有一缕印象，就很容易在这本集子的阅读中鉴别出某些差异来。

这本书原来只想编二〇〇一年至二〇〇二年在原下写的各类体裁的作品，只想把这两年的作品拢集起来，也单列出来。这想法不单是

为标志这两年在生活和艺术上的追寻，还有一点也许对我更富有意义，这是我的生命历程中颇有单列意味的两年。这两点都值得作为存照。责任编辑看过二〇〇三年的一些作品，不愿舍弃，我也就同意编入了。我在今年春节后离开原下的小院，住到城南和乡村的杂混地带，窗外还留一大片被各种建筑物包围的农田，有四季变幻的庄稼和各种蔬菜。原下一切都更适宜我生存，致命的是一日三餐烧锅燎灶太麻烦了。在这里比较清静，也有一份省得自己动手的饭吃。

于是离开原下，再择地而居。

原以为有二十余万字，编一本书正好。不料排版排出近四十万字，有些偏厚了，造价也会偏贵，于读者就会斟酌开支了。

遵责任编辑韩霁虹嘱写下这篇后记。

2003年12月14日 二府庄

背离共性，自成风景

——《陕西名家作品选》序

许久许久以来，我都陷入在关涉陕西作家和作品的话题之中。

最初是一种情感陷入。那是青少年时代阅读柳青《创业史》和王汶石的《风雪之夜》所发生的情感活动。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我能写一些小说并参与一些文学活动的时候，关于陕西作家和作品的议论，就成为几乎所有关涉创作的各种形式的活动里最重要的话题，一直延续几十年。直到现在，在专题集会里，在报纸刊物电视等大众媒体上，乃至作家朋友之间的茶棚饭桌的闲谈之中，依然以丝毫不减的热切浓厚的兴趣讨论着。话题的核心常常集中到一点：陕西作家的作品，在中国当代文学总体格局中的位置，与别的地域最具代表性的作家和他们的作品比照，优长何在，弱点在哪儿？这个最被关注的话题的种种观点和看法中，常常牵涉到解放以来陕西两代最具代表性的作家和他们的作品。前者是写乡村题材的柳青和王汶石，写战争和工业题材的杜鹏程，写诗歌和散文的胡征、魏钢焰和李若冰等作家；后者自然是新时期崛起当代文坛以路遥、贾平凹为代表的一个人数颇为整齐雄壮的作家群。尤其是新时期形成的这个群体的许多作家和他们的作品，近三十年来一直在陕西文学圈子内和广大读者群里探讨着议论着（且不说除陕西地域之外的当代文坛的作家、评论家和读者的评价和议论），甚至从他们的处女作和发轫之作开始，一直被关注被讨论到现在。除开某个较为极端的一竿子扫光的观点且不论，总体来看，正是这种讨论和议论所酿造的颇为神圣的文学气场和文学氛围，把这个群体中的一批作家提升、推进到中国当代文学的大格局当

中，甚为耀眼。应该说，十七年里的柳青、杜鹏程、王汶石、魏钢焰、李若冰和新时期以来的路遥、贾平凹等为代表的一批作家的创作，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成为不同时期不同的读者群里被广泛传诵的作家和作品，当是陕西文学颇可自信的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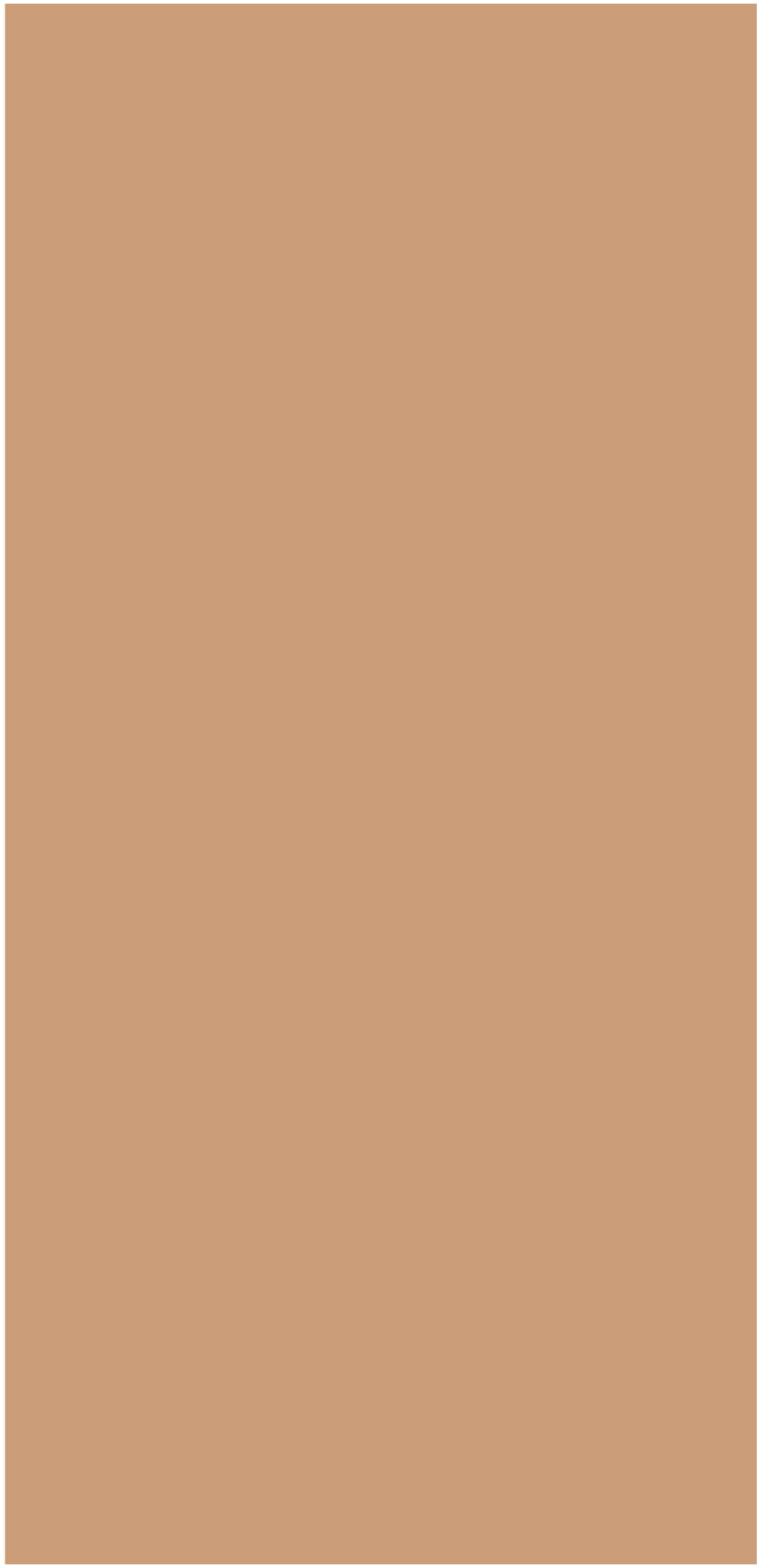
关于新时期以来陕西作家群的小说作品的总体印象，似乎都在说着一个共性太多的问题。从表面看来似乎不无道理，诸如多以农村生活为写作选材，都在关注当代生活进程中的农民命运，大多都在追求一种生活演变中作品思想的深刻性，艺术上绝大多数也都遵循着现实主义，语言上都弥漫着秦地方言的浓厚色彩。说到这个共性的负面，视野狭窄，手法陈旧，等等。

如果说这些看法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还比较切合当时刚刚形成的这些青年作家作品的实际，那么，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这个群体作家的作品风貌就很难用上述的共性来概括了，无论从哪一个角度哪一个视角去看，都很难把任何两个作家（更不要说一群）拢在一起论说共性了。就是说，他们各自已经完成或者说基本奠定了艺术的个性化特质。我目睹也切身经历了那个自觉而又迫切地逃离共性的过程。路遥的《平凡的世界》和贾平凹几乎同期创作的《浮躁》，其艺术气象、艺术风貌各成一景，更不用说后来的《废都》《高老庄》了。我是清楚地看见这个群体的一批作家不断地实现各自的艺术探索和艺术突破，以鲜明的艺术个性闪耀在当代文坛上。稍后的年龄更轻的几位作家，一经出现在文坛上，就以其别具一格的艺术个性令人刮目相看，杨争光、叶广芩、红柯、冯积岐、爱琴海等，很难在他们那里归结出共性来。中外古今的文学史有一点十分严峻也极富启示性，即个性化的艺术形态，既是作家成熟的重要标志之一，也是作品存活于世的关键之一。从这个说来，其实也属通常的法

则的意义上说，我向前辈陕西作家和当代正活跃着创造着的作家表示钦敬。

《陕西作家五十年——优秀小说选》和《陕西作家五十年——优秀散文选》，收编了陕西五十年来两代作家的代表作，读者既可以一窥一比同代作家的鲜明的艺术特质，也可以看出差异更大的两代作家各自难以归纳共性更难以混同的独立风景，起码不会轻率地统而论其共性了。

2003年12月23日 海口



第 1 卷　1978—1982

第 2 卷　1983—1984

第 3 卷　1985—1986

第 4 卷　白鹿原

第 5 卷　1987—1994

第 6 卷　1995—2000

第 7 卷　2001—2003

第 8 卷　2004—2006

第 9 卷　2007—2009

第 10 卷　2010—20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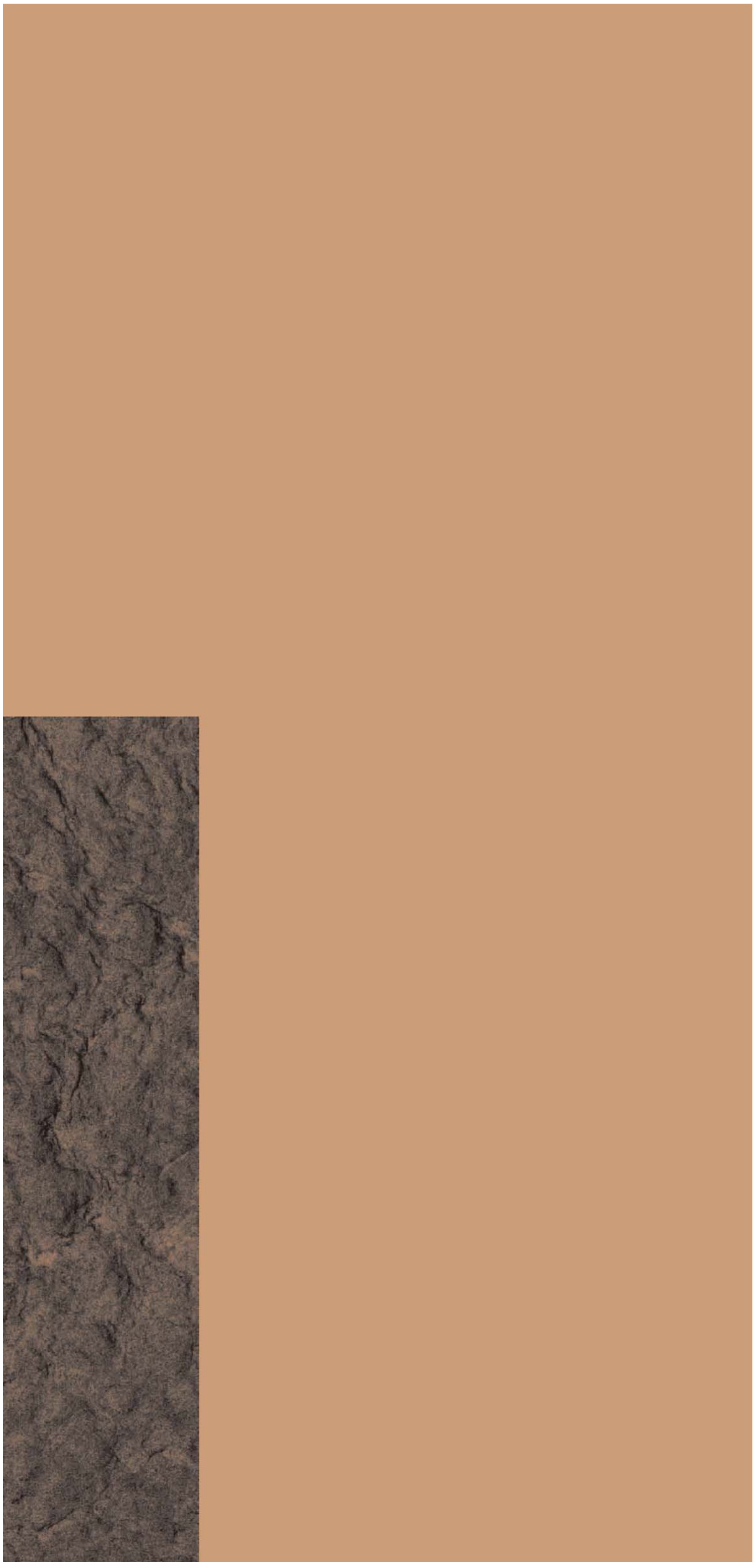
第8卷

2004—2006

陈忠实文集

增订本

人民文学出版社



陈忠实文集

增订本

第

8

卷



2004—2006

人民文学出版社

文前插图



- 小说
  - 娃的心 娃的胆
  - 一个人的生命体验
- 散文·随笔
  - 两个蒲城人
  - 舒悦里的亲情和友谊
  - 永远的骡马市
  - 皮鞋·鳝丝·花点衬衫
  - 从大理到泸沽湖
    - 头上的风花雪月
    - 蝴蝶泉
    - 凤凰山·鹤翼村
    - 泸沽湖畔
    - 火塘·花楼
  - 在好山好水里领受沉重
  - 第三粒失球致使的摧毁
  - 妩媚的回眸
  - 一把铁勺走天下
  - 失败 仍令我敬重
  - 为女曲喝彩
  - 话说梦游
  - 胜者的平静与败者的微笑
  - 在河之洲
  - 柴达木掠影
  - 借助巨人的肩膀
  - 完成一次心灵洗礼

- 白鹿回到白鹿原
- 太白山记
- 关山小记
- 也说中国人的情感
  - 一
  - 二
  - 三
- 黄洋界一炮
- 再到凤凰山
- 魅力亨利
- 陷入与沉浸
- 关于一条河的记忆和想象
- 也说“抬杠”
- 陪一个人上原
- 走过武汉，匆草一笔
- 半坡猜想
- 五月，临近盛事的期待
- 正确的坚定和无知的固执
- 最后才学会射门及其他
- 黑马尚未出现
- 帅气和率性的转移之谜
- 绅士风度和心理赘肉
- 尽享盛宴
- 老陈与陈老
- 又一次高潮式的盛宴
- 娲氏庄杏黄
- 太过的残酷和太过的轻松

    - 经典的防守也精彩
    - 谁都强，谁都强不起来
    - 再看亨利的魅力
    - 绝妙的与吓人的
    - 父亲的树
    - 地铁口脚步爆响的声浪
    - 林中那块阳光明媚的草地
    - 回家折枣
    - 关中有螃蟹
    - 一九八〇年夏天的一顿午餐
        - 一
        - 二
        - 三
        - 四
- 言论·对话
    - 什么使我钦敬
    - 有剑铭为友
    - 你的发现，令我敬重
    - 我的关中
    - 关于《开坛》
    - 天性与灵性
    - 心灵的狂欢和舞蹈
    - 关中娃，岂止一个冷字
    - 令人惊喜的阅读
    - 灿烂在创造里
    - 红烛泪 杜鹃血
    - 难以化解的灼痛

- 一种气质，鲜嫩和灿烂
- 思辨决定形式
- 思辨的这一声
- 敬重宝成
- 天使或是蜻蜓，翅翼沉重
- 吟诵关中
- 唏嘘暗泣里的情感之潮
- 仰天俯地 无愧生者与亡灵
- 诗性的婉转与徘徊
- 业已铸就无限
- 陈孝英，让我感到灿烂
- 气象万千的艺术峡谷
- 真实又真诚的叙写
- 别一种情怀
- 心斋，一个海阔的文学空间
- 中国乡村形态的智慧表达
- 筛选自己
- 少年已知情滋味
- 我看话剧《白鹿原》
- 在现实的尘埃中思索与漫游
- 再读《活动变人形》
- 长庆，鲜活的记忆与激情的书写
- 印在生命脚印里的诗
- 人生笔记的笔记
- 难得一种真实
- 文学的力量
- 关于《白鹿原》及其他

    - 电影不必忠实
    - 放在棺材里做枕头的书
    - 社会的而非个人的
  - 公安文化及其他
  - 答《解放日报》记者姜小玲问
    - 得到的远超出期待
    - 离开土地最是痛处
    - 要把短篇写到非读不可
  - 答《南方周末》记者张英问
    - 电视剧《白鹿原》还没拿到许可证
    - 为了茅盾文学奖，修订《白鹿原》？
    - 《白鹿原》之后的门槛
  - 和《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的对话
    - 唯一觉得踏实的是整个过程没有炒作
    - 文学始终在边缘
    - 小说家实际上是从心理层面来写历史
    - 作家不是培养出来的
    - 新农村不能离开现实而空想
    - 交朋友，不交铁哥
  - 我相信文学依然神圣

小说

娃的心 娃的胆

——三秦人物摹写之一

司令跪下去了。

司令跪倒在黄河滩上。司令跪倒在黄河水和沙滩相接的水边。悠悠波涌的浑浊如泥汤似的黄河水，在司令跪着的膝头前扑闪着。眼前是翻卷着泥浪的铺天盖地的雾幔似的黄河河面，右首是陡峭冷峻的悬崖石壁。

司令跪下去之前，在水边的沙滩上伫立了一瞬，用左手系好粗壮脖颈上的风纪扣，双手轻轻地弹捋好戎装的前襟和后摆，几近一米九的雄壮巍峨的身躯就折腰屈膝跪倒了。他的身后，十余位师长团长营长和随员也都相继跪倒了。稍远处，十余匹棕色青色红色白色的战马石雕一般撑蹄昂首。马倌就跪倒在马前腿旁边。司令双手撑住湿溜溜的泥沙，深深地叩下头去；昂起头来，再叩下去；第三次叩下去的时候，他的硕大的前额抵着泥沙，许久许久都没有昂起来。司令蜷跪的身躯微微颤抖着，三叩之后昂起头来的时候，涕泪交流。

这样的跪拜仪式并不少见，每年除夕后晌，在占满整个一面墙壁的记载着列祖列宗的族谱下，在点亮漆蜡点燃紫香焚烧黄表的祭桌前，他和同族同辈兄弟排在上辈人的身后，打躬作揖叩拜者三，差别只是穿着袍子和棉褂。在柏树成荫的祖坟前，每到清明每到传说的农

历十月一日的鬼节，他都不忘给逝去的先祖烧一炷香，焚一堆纸，叩拜三匝。从他投笔从戎直到成为三军司令，几十年来戎马倥偬移师南北，这样的祭奠仪式一年也难得实施一回。现在，他以从未有过的庄严从未有过的肃穆从未有过的痛彻心脾的悲怆，跪倒在黄河滩上，为着八百个尚未完全成年的关中子弟的英灵。

这儿刚刚发生过惊天地泣鬼神的一幕。

司令的八百个士兵，就从右前方的悬崖峭壁顶上跳进了黄河。他们的手榴弹扔完了，子弹打光了，肉搏之后刺刀拼弯乃至断折了，有的连枪也拼丢了。他们被两倍于自己的鬼子逼到这悬崖上，悬崖三面都是绝壁，逼近的鬼子一边射击一边哇哇叫着，这八百个中国士兵从崖顶上跳进了黄河。这八百个士兵是商议好了才决定集体投河，或是有人先跳了下去，其余人随后也跳了下去，现在都说不清楚。他们全都跳下去了，没有一个人被俘虏，也没有一个能逃出来报告实情。在司令的整个意识里，也许是尚来不及细问究竟，也许是不想探问这件意料不及的事件发生的具体情景。他的感觉里就只有八百个士兵从悬崖上跳下黄河的不堪一睹的画面，而这个画面确是让人不忍过细想象的，因为，这足以使司令窒息。

司令在他的指挥部里听到这个噩耗时，确实窒息了许久，才回过神来。他的极富力度的嘴唇紧闭着，脑子里却连天轰响着一个声音，八百个娃娃八百个娃娃……八百个娃娃呀！这确实是一群娃娃，全在十六岁至十八岁这个成人与未成人的年龄段上。他们是三个月前从关中乡村征召到烽火连天的中条山抗日前线来的农家子弟，有的就是司令老家邻村的乡党，他们的爷爷和父亲或是司令的同乡长辈，有的竟然是同一个私塾里的同窗学友。他们把自己的孙子和儿子送到他的军营里来了……他们现在一猛子都跳到黄河里去了。

就在他精心策划的这场战役打响之前，也是这个刚刚组建的新兵团结束军事训练即将参加会战的时刻，他亲自去看望了这些他习惯称为小乡党的士兵：一张张鲜活的脸孔上的神色，尚未完成农家子弟到军人的蜕变；新发的军服穿在身上，似乎还不大协调不大熨帖；他们挎在肩头的步枪，总让司令看出扛着犁杖的架势；他们跑步的姿势，明显存留着在雪地里莽原上追撵觅食野兔的野性……面对着那一张张或胖或瘦或方或圆的脸孔，耳畔滚过被他的讲话激发起来的阵阵呼吼的声浪。司令曾经动情地想到，站在这个队列里的娃娃，肯定将成为日本鬼子难以招架的对手；他们之中肯定会有出类拔萃的人物显露出来，进入军队各级指挥岗位，乃至成为统率全军的将军。当然，他们也免不了死亡和伤残……这是打仗。

他唯独没有料到这八百个娃娃最后选择了跳入黄河这种结局，这种死亡方式。他在司令部里最初听到这个事件所发生的几乎窒息的时间里，无法判断这八百个娃娃的死亡方式是增添了他打击敌人的意志，还是把组织和实施摧毁日寇的会战的意志摧毁了！许久许久的沉默之后，他从墙上摘下马鞭，听也不听身边将领和随员的劝告，跨马疾驰到这黄河滩上。

司令从沙滩上站起身来，膝盖和裤脚被扑淹上来的河水浸湿了。他沿着沙滩朝右前方的悬崖走去。他站在紧贴着河水的崖根下，仰头朝崖头山顶上望去，浓厚的暮色里一片模糊，一片沉寂，只有山峰和山崖的轮廓在微弱的星光里呈现出较为清晰的线条和走势。他久久地昂首注目，他突然听到他的随员在身后惊讶的声音：“河里那是什么？”有人接着以更惊讶的声音说：“像是一杆旗？”司令猛乍转过头来，顺着随员手指的方位看过去，苍茫模糊的河面上，隐隐可以看到有布质的东西在摆动。司令也首先想到是一面旗子，而且是一杆军

旗，而且肯定是这个新兵团的军旗，这是八百个娃娃留给他的唯一的也是最后的遗物了。司令看看他的左右，问：“谁会凫水？”

“我会。”一个随员说着就解扣子。

“你真会凫水？”司令问。

“我家在渭河滩里，咋能不会凫水！”

“我也会。”一位马夫站出来说。

“你家也在渭水边上吗？”司令问。

“在灞河边上。离你家的村子不过五里。”马夫说，“我自小在灞河里耍水。”

又有一个卫兵站出来。

司令不再问了。

三个人脱光衣裤，走进水里，当河水没过臀部以后，先后扑趴下去，伸胳膊蹬腿向前游去。三个人几乎是一种姿势，狗刨，这是河边上的乡村孩子无师自通的泳姿。司令看着三个人渐渐隐没了，手臂和腿脚击打水波的声音也渐渐消失了。他和他的随员屏声静气地等待着这面有幸保存下来的军旗。

河滩上似乎时有微风掠过，那风不是天生而是涌流的河水掀动起来的。缓缓涌动的黄河在这儿没有涛声，偶尔才有一声水波相击的微弱的闷响，却使人感受到了一种潜伏着的深厚雄浑的力量。

猛乍听到三个人接连发出的惊叫声，啊呀！妈呀！天爷爷呀！司令身旁的随员们几乎是本能地同时发出尖声问询，咋回事？出什么事了？千万小心千万……司令紧紧地盯着河面，什么也看不到，随之什么都听不到了。

就在司令和随员们揪着心等待的漫长的时间里，终于听到水波被人击打的声音，越来越响。随员们有人高声呼叫问话，那三个人都不回应，许是击打水浪的声音遮掩了一切。终于可以看到渐渐靠近的若隐若现的人影，终于能清晰地看到三个人前拽后推着两具尸体靠近岸边。随员们一拥而上，把三个人推到岸边的尸体拽到沙滩上来，全都惊呼起来。

司令自己也惊呆了——

军旗旗杆的钢质尖头，从一个日本鬼子的胸膛刺进去，从背脊处穿出；那个日本鬼子紧紧抱住中国旗手的后腰。中国旗手的双手死扣着日本鬼子的脖子：两个国籍的士兵面对着面，中国旗手把一个日本鬼子用旗杆的尖头捅穿胸膛，直压到黄河水底；旗杆上的中国西北军的军旗已经撕裂，暮色里看不出颜色。

随员们纷纷发出啊……啊……啊的惊叹，谁都说不出一句完整的话来。司令自己也在那一瞬发出一声“啊”的惊叫声，当即又陷入噤声默语。司令发觉自己的心里顿然变化了，就在他发出惊叫的那一瞬，听到八百个娃娃投河噩耗时弥漫笼罩在心头的黑雾扯开了，他从愤怒、悲怆还有自愧的混乱心境里重新挺立起来。

他默默地解开腰里扎着的皮带，再一个一个解开纽扣，脱下军装上衣，蹲下身去，捏着衣襟擦拭旗手的脸膛。一个随员刺啦一声撕破

衣服，点燃一绺布条，给司令照亮。旗手的脸膛上漫浸着水痕，眼洼和鼻孔里积存着黄河的泥沙，圆睁着的眼睛和鼓出的眼球，显示着他用旗杆钢尖捅穿鬼子胸膛时，憋着多深的一股仇气鼓着多大的劲儿啊！

有位随员想替代司令给旗手擦脸，伸手抓住了司令手里的军衣。司令没有说话，用一个轻微却又坚定的动作掀开那位随员的胳膊。司令小心翼翼地捏着衣襟，轻盈地擦拭着，从前额擦过去，饱满圆润的额头在布条燃烧的闪亮里重现生机；司令擦过眼洼里的泥痕和眼睫毛里的泥沙，再三捋揉眼皮，那圆睁的眼睛终不肯闭合；司令擦拭那个尚未完全发育尚未完全挺直的鼻梁，透出一缕羞涩的秀气；两个脸颊在净化之后显出来圆润，司令用左手掌轻轻地抚摸了一下左脸，又抚摸了右边的脸；上唇有黄色的茸毛，尚算不得胡须；咧开的嘴角和咬紧的牙关，肯定是直到把这个被刺穿胸脯的鬼子推下崖去压到黄河水底也没有松口……司令从腮帮擦到下巴的交界处时，突然停下手发出一声惊叫："三娃！是你呀！"随员们也都惊诧地嘘叹起来。司令紧紧盯着旗手左腮和下巴楞儿交会处优柔的轮廓，那儿有大拇指盖大的一块暗红色的痣斑。又一次呼叫，声音却骤然降低到颤抖的低唤了："是你啊！我的三娃……"

给新兵团做完讲演之后，司令走下讲台，绕过讲桌，直接朝列队的士兵走过去。按原定的仪式安排，讲完之后由副团长带领新兵喊呼应式的口号，表示新兵团抗日杀敌的决心，然后再由团长陪同他离开现场回到团部。司令突然走向新兵团的兵阵队列，确是一时冲动的举动，这是那些尚未完全褪尽乡村孩子神色的一张张脸膛让他情不自禁。他想面对面和他们说话，甚至想用拇指和食指捏一捏那些或胖或瘦或方或圆的脸蛋儿。从讲台到新兵站立的队列也就几步远，他一跷

腿就站在他们面前了。他随意对着一个脸孔瘦削而眼睛却机灵的小孩，问:“哪个县的？”

“岐山。”

“在家里干什么？”

“跟我爸种庄稼。”

“应该说务庄稼。”司令纠正了一字。

“噢——是务庄稼。”士兵随口改正。

“你会犁地不会？”

“刚学会，犁沟还犁不端。”

“还会做啥农活儿？”

“溜种、锄地、割麦、打掐棉花、扬场、喂牛啥都会弄，啥都不精。”

“除了务庄稼还干什么？”

“耍哩！”

“耍啥哩？”

“逮蚂蚱撵野兔……我猛乍（偶尔）还胡日鬼哩！”

队列里有人忍不住失声偷偷笑了。

“都‘胡日鬼’些啥事？”司令像煞有介事地问，又故作调侃地答，“要水上树逮老鼠吗？”

突然爆起一片哄笑，那个士兵不好意思地歪了歪头，斜睨司令一眼，低下头去了。司令用关中西府岐山扶风一带的口音说“傻（耍）深（水）上世（树）逮老失（鼠）”，自己也在众口哄笑声中悠悠地笑了，拍了拍士兵的肩膀，表示友好。

司令又盯住一个浓眉大眼方脸的士兵，尚未开口，那士兵抖抖身子挺挺肩膀，举手行一个军礼，铿锵有劲地开口自报家门：

“报告孙司令，我是蒲城人。”

司令稍一愣怔，眨了眨眼：“你是杨军长的老乡。”随之扬起头，面对士兵，提高嗓门说：“蒲城出忠臣哪！咱们西北军的杨军长，我不用介绍大家都知道了，现在不光咱陕西人，全中国都知道杨虎城将军的忠肝义胆。蒲城还出过一个忠臣叫王鼎，在清廷大堂上扯住皇帝的龙袍，不许退堂不准离朝，非要皇上答应不签割地赔银的卖国条约……悬梁自尽了。王鼎尸谏皇上，死忠；杨将军兵谏，大忠。”

会场顿时一片肃然。

“你们知道不知道蒲城为啥出忠臣？”司令问，顿了顿，便自解奥秘，“人说蒲城包括整个渭北水硬土硬，长出来的麦子，秆儿硬麦芒也硬，麦子磨出来的面粉也是性硬，这样的麦子养起来的男人女人能不硬气吗？”

一片惊乍神秘的嘘叹。

司令转过头，再把眼睛盯住了蒲城籍士兵，诚恳地问："你是自愿来的，还是他们硬拉来的？"

"自愿来的。"士兵答，回落成软软的口气。

"老实说，甭害怕。"

"自愿真是自愿。"士兵说，眼色就露出羞怯来，"俺爸收了招兵人给的三块银圆。俺爸不要，招兵的人硬塞……拿了银圆还算不算自愿？"

"算！"司令说，"那是我定的招兵规矩，你爸收下了就对了。你爸要是不收那三个银圆，你还当不上我的兵哩！"

会上响起动情的啊啊啊的声音，继之爆起一片掌声。司令更踏实自信自己的招兵规定。负责征召这个新兵团的堂兄告诉司令，因为军费不足，他把自家三十亩好地卖掉了，用卖地款送给应征兵员的家庭。

司令仍然对着蒲城籍士兵问："你刚才一开口称孙司令，你怎么知道我姓孙？"

士兵不在意地笑着说："大家都知道你姓孙。我在村里就知道你姓孙。满蒲城人都知道俺杨军长把兵交给你带了……"

"你知道我的名字吗？"

"知道。"

"叫啥？"

士兵低下头，不吭声，一脸难色。

“说，我的名字叫个啥？”

士兵仍然低着头，脸憋红了。

“叫！大声叫！让全团都能听见。”

士兵突然直起脖子，牛一样大吼：“孙——蔚——如——”

司令拍了拍蒲城士兵的肩膀：“你知道我为啥要叫你叫响我名字？记住，叫响我的名字你在心里也就立誓，将来准备接手我这个军长我这个司令。敢不敢？”

“不敢。”

“要敢。”司令转过脸，对着新兵团，“你们都要敢立此誓，都要记住。”

司令又瞅住了一位红扑扑脸膛的士兵。这个士兵效仿蒲城籍士兵行礼之后自报家门：“长安人。”

“长安哪一方？”

“灞桥。”

“灞桥？”司令一瞬惊喜，“哪个村？”

“图书村。”

“你知道孔从洲吗？”

“孔从洲是桥梓口村的，现在是你的独立旅旅长，西安逮……时——”士兵不敢说出“蒋”字，迟疑一下就跳过去了，“孔从洲是西安城防司令。你是豁口村人，离俺图书村不过十里。灞桥人都知道你和孔旅长……”

司令笑笑：“你还真知道不少事。家里都有啥人？”

“俺妈俺爸，俺婆俺爷，俩哥一个妹子。”

“你妈能舍得你当兵？”

“俺妈哭哩！俺爸把俺妈训（斥）住了。”

“你爷呢？”

“俺爷听俺爸的主意。”

“这不是颠倒了礼教吗？”

“俺爷说俺爸主意正。”

“你婆呢？婆跟孙子比儿子还亲嘛！”

“俺婆心宽，走时还叫我念她教的口曲儿呢！”

“啥口曲？念一念，让我和大伙听听。”

士兵清清嗓子，大声诵念起来：

啥高？

山高，

没有娃的心高。

啥远？

海远，

没有娃的脚远。

啥宽？

地宽，

没有娃的眼宽。

啥大？

天大，

没有娃的胆大。

司令听得情绪激昂，高扬手臂拍起手来，士兵们更热烈地鼓掌。司令说：“咱们关中及至整个陕西人，自己都说自己是‘冷娃’，什么‘关中冷娃’‘陕西冷娃’。关中娃陕西娃，何止一个‘冷’字哇！听见这个灞桥小老乡唱的他婆教给他的口曲了吗？心——高，脚——远，眼——宽，胆——大。这才是关中娃陕西娃的本色。”司令亲昵地抚着小乡党的后脖颈，“你婆会编这么好听的口曲儿，不简单！”

“俺爷还会唱戏哩，整本整本地唱，逢年过节搭台子唱。”士兵更得意了。

“你爸会唱吗？”

“会。跟我爷同台唱。”

“教给你了没？”

“我能唱几段，没有我爷唱得好。”

“那你就唱几句。”

士兵也不忸怩，肯定跟爷和爸上台凑过场子，清清嗓子就拉开了架势，吼唱起来——

两狼山哎——战胡儿啊——天摇地动——好男儿哎——为国家啊——何惧吔——死啊——生……

司令已经热泪盈眶。士兵望见就惊吓得哑了口。司令颤着声问：“你叫啥名字？”

“三娃。”

“哪个三字？”

“一二三的三。”

“改成‘山’吧。”

“好。”

“像山。就像咱们长安的秦岭山一样，压到小倭寇小鬼子的头上。”

“山娃记下了。”

司令抚摸了这个小乡党下巴楞上的那块暗红色的痣斑："我把你也记住了。你爷教你的戏词你婆教你的口曲儿，我听一遍就都记下了……"

六年之后，一九四五年九月十八日。湖北省武汉市中山公园。日本投降仪式在此举行。

陆军上将、第六战区司令孙蔚如一身戎装，高大威武地坐在受降主官的位置上，他的两侧和身后，端坐着包括中共代表董必武等三人在内的八十八人组成的受降团。一片肃穆和肃静。正义对邪恶人道对兽道天道对鬼道的终结性审判，将在这里完成。

日本第六方面军司令官冈部直三郎大将和他的高级军官，举着白旗走过来，两边是监押的全副武装的中国士兵。这个挥舞着战刀给中国人造成长达十四年国难的刽子手的双手，现在举着标志投降也标志耻辱的白旗。他们终于走进也许是作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军队最不堪的被审判的这个地方来了。

孙蔚如司令坐在受降官席位上，一派凛然，显然不单是因为他近一米九的魁梧的身躯，更是因为他对曾经不可一世的疯狂野兽沉重一击的一身正气。在立马中条山的三年时间里，这个以杂牌军为主的第六战区，死守着陕西和西北的东大门潼关，使日军不仅过不了这个关口，而且死伤惨重，成为中国各大战区里日军死亡数字超过中国军队死亡数字的唯一战区。也许有整个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背景，也许有美国扔到广岛和长崎的两颗原子弹的威力，然而，孙蔚如巍峨生威的躯体里所展现的是自信和自尊：在中条山在我军队的面前，你早已是死伤惨重的败将。

冈部直三郎跪倒在受降官孙蔚如的面前了。他双膝跪地，双手举过低垂的脑袋，托着那把制造杀戮制造罪恶的指挥刀。孙蔚如走过去，从匍匐在脚下的冈部直三郎的手里收取了这把战刀。那一刻，他的眼前浮现出三娃或被他改为山娃的那一杆捅穿日军士兵胸膛的军旗的尖矛，耳边响起三娃他婆教给三娃唱的口曲儿。他想对跪倒着的战败之将说，你知道我带的兵娃们的心有多高胆有多大吗？挨挫了你都不知道。

孙蔚如向他们宣布了第一号命令。冈部直三郎签了字，那握笔签字的手在抖。他此前一直握着战刀的手大约都没有抖过。耻辱对于野兽似的罪恶制造者来说，也难以承受。

孙蔚如想到了母亲。大约一个月前，当日本天皇宣布投降后，消息传到西安城东豁口村孙家祖居的屋院时，母亲闻讯喜极而泣而终了。孙将军悲喜交加，决定立即回灞桥老家奔丧，要看母亲遗容一面……

六年前，在即将东出潼关进军中条山之前两日，他驰马回家向母亲和妻儿告别，仍然在距离豁口村前一里路的地方下马，步行回家。这是母亲的叮嘱，无论官做到多高事干到多大，无论坐车或者骑马回家，务必在村外下车下马步行进村。他跪倒在母亲膝下，说他不能尽孝了。母亲似乎早知道了儿子出征的事，只说了一句："当兵就要打仗。国家遭人欺侮哩。这是尽大孝哩，你要打赢回来。"

现在他赢了，母亲却在闻得胜利的兴奋里辞世了。他向蒋委员长呈上回乡奔丧的请示报告，却收到蒋委员长任命他为第六战区主受降官的委任状。他接受了，按照母亲的道德规范，为国为民是尽大孝……

孙蔚如瞅着那双在投降书上签字时颤抖着的手，骄傲地自吟，这样伟大的母亲训导成长起来的儿子，你无法构成等量的对手，尽管你手里拥有更残暴的武器。

那张投降书上，印着一九四五年九月十八日。这个时间是孙蔚如选定的。在他接受中国第六战区主受降官的委任令后，部属征询他关于受降仪式时日的意见，他几乎不假思索地指令：九一八。这是不需要思索的。十四年前的九月十八日响起的罪恶的枪声，十四年来日夜都刺痛着作为军人的孙蔚如的心。孙蔚如对请示他的部属斩钉截铁地说："就放在九月十八日。"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一九四五年九月十八日，日本侵略军第六方面军司令冈部直三郎在投降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既是天道，亦是人道，最终把惩罚和耻辱，定格在他们伸出罪恶之手的那一天。

2005年3月9日 二府庄

一个人的生命体验

——三秦人物摹写之二

柳青终于决定：自己消灭自己。

他已经确定了周密的消灭自己的计划和具体的实施方案。最关键的一点是消灭自己的方式——他决定采取电击。这也许是他唯一能够找到的办法，唯一能够做出的选择。

他尚未被最终判决，却已经生活在和囚犯无异的环境里。这是一排只有顶棚和墙壁的平房，很长很长的一排，没有隔墙。据说这是文化行政管理机关停放自行车的车棚，原先只有三面墙壁，空着的那一面自然十分宽敞，是为着庞大机关里的干部上班来存放车子下班回家时取走车子避免拥挤磕碰的精心设计。现在把敞着的那一面垒起墙来了，安上了一扇门，自行车棚就变成一幢完整的平房了。柳青就被囚禁在这幢屋子里，还有许多他认识或不认识的文艺界被揪出来通称为“牛鬼蛇神”的人。这个被堵上第四面墙壁的房子，不再叫作车棚，很快就有了一个“牛棚”的名字。选择这个房子是经过反复比较和论证才确定下来的。至关重要的一点，就好在没有隔墙，把一群戴着“牛鬼蛇神”帽子的人装进去，通铺大床，一人占一块床板，谁躺下谁坐起谁翻身谁皱眉谁傻笑谁和谁互使眼色都在众目睽睽的监督之中，也减少了看管人员的人数和劳累强度。上厕所有人跟着，被单独叫去训话更有监视者。弄一撮毒性剧烈的老鼠药或杀灭害虫的农药是不可能的，亲属都被隔离接触了，无法获得；上吊也是无法实施的，既没有绳子，也没有拴绳上吊的悬梁或可以承载一个人体重的壁钩；刎颈或割断手

腕或腿上的主动脉，没有刀子，再说万一一刀割不死再被抢救过来，会有“自绝于人民”的又一桩被认为叛变行为的罪名；唯一能够消灭自己的手段，便是电击——房子里有电，这是必备的也不引人注意的照明设备，更关键的是，一触即宣告生命结束，短暂的一瞬就把较长时间酝酿确定的消灭自己的方案实施完成了。

在决定这个晚上就付诸实施的时候，他甚至庆幸自己掌握有最基本的用电常识。这是他久居乡村的意外收获。乡村滞后于城市的生活条件迫使他学会的用电知识。他住在被他用诗一样的语言描写过的终南山下的蛤蟆滩的南沿，那是不太高也不甚陡的一道原坡。那儿有一幢在解放后破除迷信运动中搬掉了泥胎神像的庙院，一番整修以后，他就携妻引子住了进去。站在门口可以远眺终南山壁立突起的群峰，或高或低的峰峦之间绝无雷同的过渡性谷地。终南山几乎终年都被薄雾和烟岚缭绕着笼罩着，只有雨后或强劲的西风扫荡之后，才可以看到清晰的山峰和山谷的面目。眼皮下的蛤蟆滩，不是四季都在变换色彩，而是每天都在神奇地呈现着浓淡深浅的诱人的色彩。乃至清晨午间傍晚都显示着变化。他踏遍了河川的大路小径，麦子扬花和稻子扬花的香味各具魅力，刚刚犁翻的新鲜泥土的清新气味是难以恰当描述的……他在庙院里常常发生的困难却是断电。停电是不可抗拒的，也是心安理得的，他知道国家对农村定时供电是电力尚不充足，他备有蜡烛。有电而因为家里线路故障再停电就让他很不甘心，就难以忍受淌着油的蜡烛的昏暗光亮，就想找电工来检修。电工热情而又耐心，多出于对兼着县委副书记的作家的尊重，毫无弹嫌指责之处。问题是他得亲自去找，或让妻子马葳去找。有一段不近的路程且不论，往往找不见人，电工是大忙人也是大活物，不会待在家里等候用户去找；还有下雨下雪不便出门的时候，还有黑天半夜的不便……随后他学会了接电，知道了开闸关闸，也懂得了火线和地线，尤其明确火线和地

线一旦交叉接通，就会发出光明，也会击打死最强壮的生命。现在，乡村生活迫使他学会的最简单的电路技能，可以用来实施消灭自己的目的了。

电灯在这幢被床铺占满的房子里亮着。这些床铺的住户或坐在床沿上阅读毛泽东著作，或坐在小马扎上以床为依托写着读书笔记或交代罪恶的材料，从早晨到下午再到晚上。这是最基本的内容，斗争会揭发会单个训诫，毕竟不是每天每晌都会发生的事。柳青坐在床沿，那双十万个人里也难得挑出的明亮犀利的眼睛，平静地注视着眼前的读本：这样透亮饱满的光泽却看不见一个汉字，这些汉字已经与即将消灭的自己没有任何关系了。他已经把遗嘱写好。他把死亡的姿势和摆放遗嘱的身体位置都想好了。他把电击的方式也论证确定，用他所具备的最简单的也是最初级的电工技能，一只手攥住火线，把一只脚伸到床下踩住地线，他的身体就在那一瞬间宣告生命的毁灭。这间房子里的电线的线路就裸露在砖墙上，仍然是此前作为自行车棚的原有电线设备，许是来不及装修得稍微隐蔽一点，许是这幢“牛棚”的主宰者疏忽了，结果给企图消灭自己的柳青提供了条件。

他已经躺到床上了。所有人都躺到床上的被窝里了。不管能否预知明天，不管能否进入睡眠，大家都按时钻进被筒里，电灯也按主宰者规定的时间熄灭了。柳青睁着眼睛躺着，左手把那份遗书按在胸脯上。遗书有三句话：

我不反党不反人民不反社会主义

我的历史是清白的

这是我反抗迫害的最后手段

他静静地躺着等待着。等待这屋子里的痛苦着的灵魂暂且忘却痛苦响起鼾声，他就可以伸出右手抓那根早已看好的电线，再伸出左脚踩踏另一根被农村电工称作地线的电线了。他的聚着整个生命活力的眼睛瞅着顶棚，顶棚穿透了，抑或是揭掉了，湛蓝的天幕明晰地波动着银河……

轮到柳青上批斗台了。

他倾情歌颂抒写的终南山下的蛤蟆滩和这村那寨的男女已经陌生了，以庙院安置的家院和书桌也陌生了，最熟悉的场合倒是各种批判斗争的台子，或固有的或临时搭建的，或人多的或人少的，走上台再弯下腰接受各种语言的谩骂和栽赃和丑化和打倒踩翻等等，都给耳朵刺出血滴磨出茧子麻木不辨了。无论斗争场面的大小，无论批斗台的高低，柳青唯一不变的是他走上批斗台时的脚步和姿势，他穿着蛤蟆滩中老年男人穿的对门襟布纽扣黑颜色的棉袄，差别在于布的质料——农民多是自家织布机生产的土布，柳青是用国家配给的布票买来的机器纺织的洋布；头戴一顶被乡村人俗称为瓜皮的无檐帽，执行斗争他的造反派主持人勒令他摘下帽子时，他就从头上一把抓下来塞到棉袄的明口袋里，圆溜溜的光头和阔大的前额就呈现给参加斗争会的所有人。圆脸通鼻，鼻头下的上唇有一排黑森森的短胡须，成为他显著的风景和奇特的标志。那个时代的中国人一般都不蓄胡须，但最具风景异质的是那一双眼睛，走向批斗台的时候，从拥挤着人群的呐喊声的通道走过去，柳青只瞅着脚前的路，两边的人都能在瞬息里敏感那双眼睛泻出的纯净犀利透彻的光亮，混浊的铺天盖地的口号声是无法奈何那一束光亮的。他很单薄，身高不过一米六，体重大约只有七十斤，这样的穿戴这样的体型和体重，很难有雄壮和威武，然而柳青缓慢的步履能产生一种威势……走在他前边的“牛们”已经走上台了。

柳青唯一感到不同的是变换了花样的侮辱方式。是的，每次批斗会上，都有新的侮辱被斗对象的花样创造出来。今天，不再是主持斗争会的造反派向参加批斗会的革命群众一一介绍被斗争者的姓名，姓名前肯定要加上诸如“三反分子”“黑帮”等定语。主宰他们命运的人，给每一个被斗争者确定了一个定性的用语，让他们挨个向造反派和革命群众自报家门自我辱践，给柳青规定了“我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黑作家柳青”的定论，不许少说一字说错一字。

排在柳青前头走上批斗台的被斗争的对象，一个一个都按规定给他们的定性自报姓名了。每个人报完，就会有领呼口号的人在台前挥拳领头呼口号，诸如“打倒××××分子×××”，台下举拳呼应，绝不厚此薄彼。小小的差别也不是没有，某人自我介绍时或有结巴或声音太小，就会被严厉斥责再来一遍。柳青走上批斗台了，被主持者搡戳着呵斥着走到台前指定给他的地点，站定，服从的肢体行为里隐隐透出绝非顺从的意味，也透出无奈里的沉静，倒显示出呵斥着搡戳着他的主持者的狂乱和虚妄。柳青开口了，口齿清晰一字一板嗓门腔调颇为洪亮：正在接受审查的共产党员柳青，向革命群众报到……

斗争会的主持者顿时愣住了。策划和组织这场斗争会的大小头目们，也都在主次分明的斗争台上的各个位置上愣怔住了。台下拥挤的黑压压的人群也在柳青的话音尚未落定时愣怔住了，台上和台下同时呈现出冷寂这是完全出乎所有人意料所造成的心理反应不及时的情状。所有人尤其是台上的那些主宰者，愣怔的同时明白无误地意识到挑战和反抗。出于各种心理需要和生活目的的需要狂欢着“文化革命”的得意者，早已形成接受被批被斗者顺从和讨好的心理状态。完全出乎意料之外的挑战和反抗，把他们惯于接受顺从乞求的心理状态打乱

了颠覆了，也把与会者普遍形成的社会性心理扰乱了，于是便出现了潜伏着巨大危险的冷场。

潜伏的危险以铺天盖地的愤怒爆发出来。一记耳光扇到挑战的反抗的作家柳青脸上。扇打这第一巴掌的人，无疑是第一个从愣怔状态里清醒过来的人，肯定是具有敏锐反应的神经功能的人。随之就有人伸出腿脚踢到柳青身上了。同时就有几乎挣破嗓门的口号呼喊出来。在台下呼应的口号声浪里，柳青重新站端立定了，依然平视着的眼睛愈加清澈透亮，有一股逼人的冷光，嘴角有血流下来。

开始了一段对话:

“重报——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三反’分子柳青。”主持者命令。

“正在接受审查的共产党员柳青。”柳青说。

又一番拳头和脚踢。

“重报——”

“正在接受审查的……”

柳青被打倒了。

这是力量严重失衡的对抗。一个年过五十岁体重仅有七十斤的作家柳青，面对一帮身强体壮的中年和青年汉子，况且是在狂飙正猛的“文革”风暴之中。然而，无论这些挟裹着“文革”风暴的身强体壮的汉子们如何吼叫，乃至轮番拳脚相向，那个身矮瘦弱的作家柳青说出的

话语，他以洪亮的嗓音一字一板口齿清晰地说话时的沉静和自信，也形成悬殊的无法构成抗衡的对比。

又一番语言较量展开，“文革”通用的名词叫作“拼刺刀”：

“你是对抗‘文化大革命’，反对伟大领袖……”

“我是实事求是。”

“你必须交代你的罪行。”

“从入党那天起到现在，我不敢保证不做错事不说错话不无缺点，但我敢保证做到实事求是不说假话。”

“你刚才一直在说假话！”

“我一生都没说过假话。”

“你还在狡辩！重报——‘三反’分子柳青！”

“实事求是不是狡辩。我要是说假话，就是自己打断自己的脊梁。”

再一番拳脚，柳青就不说话了。

……

柳青听到第一声打鼾，是从这屋子最东头的墙根下响起来的。从不时响起的出气声的轻重，柳青能判断出来哪种呼吸声是进入睡梦者发出的，哪种呼吸声是正在痛苦不堪的清醒者佯装睡着了的声息。他还得等待。等待里的心境是死样的平静，却浮出马葳的眼睛——这双

熟悉的眼睛，瞅着他陪着他从京华首都回到西安，再相跟到蛤蟆滩南沿的庙院里，那是世界上最可依赖的美丽的眼睛，虽然也有不高兴的神光流泻的时候，却不影响依赖和美丽。就在他在台上为“自报”自己是什么的对抗中，在他第一次挨打之后重新站定的时候，看见站在台下的马葳的眼睛，那种惊愕那种痛切的神光，像是一种凝固的冰雕，这是相伴相依几十年来从未见过的眼神。柳青第二次第三次挨打之后再去搜寻那冰雕似的眼神，却只看见亲爱的马葳低垂着的黑发，她没有力量看他了。那一刻，他心里泛起一缕庆幸的欣慰，低头不看是最好的选择，可以减轻折磨。现在，柳青眼前就浮出那双惊愕不堪痛切不堪而凝固为冰雕似的眼睛。

他在心里沉吟，亲爱的马葳啊！你肯定不知道你惊愕恐惧和恨起来的眼睛是怎样感动老夫的心啊！

“我放不了‘卫星’。别人用水笔写字写得快，能放；我写字跟刻字工一样慢，放不了。我给你实事求是汇报，刻字比不得写字快嘛。”

柳青对找他说话的领导说。

柳青坐在领导对面。这是西安南郊的一个别墅式的高级宾馆。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由驻扎西安的国军军长胡宗南修建，接待党政要员的场合，解放后变为开会和休养的招待所了。这里刚刚召开过一个前所未有的热气腾腾的大会，是文艺界知名的写家演家唱家弹奏家耍（魔术）家放“卫星”的大会。中国在一九五八年掀起的“大跃进”高潮里又兴起放“卫星”，最大的“卫星”是亩产小麦五十万斤，报纸上还配发着一个站立在麦穗上的男孩的照片，随之便潮涌着各行各业争相放出的吓死人的大“卫星”。文艺界不甘落后，各路名家名手聚着气铆着劲到这个招待所放“卫星”来了。柳青不仅不放“卫星”，甚至一言不发。在

这样热烈的气氛里，坐着这样一位冰冷着脸色的人，弱智的人都会产生对于“大跃进”的态度问题的敏感，更不要说这些文学艺术界的人精了。会后，领导就找柳青来谈话。柳青坐下后就解释自己放不了“卫星”的原因。

“可是……你想没想到你不发言的负面影响？”

“实事求是。我只能实事求是。我放不了重量大的‘卫星’。我不能对党说假话说我能放。”

谈话停止了。气氛虽有点滞闷，却不紧张。这位领导和柳青既是同志战友，也是朋友，早在延安革命战争年代就熟悉了，他们当时都是年轻人。他现在是省上的重要领导，柳青是中国当代重要作家，友谊却不因年岁递增工作性质的差别而改变。或者说，领导叫他来坐坐来谈话，本质用意是替他担着一份心，须知对于刚刚兴起的“大跃进”运动的态度，往往决定一切职业者的命运，越知名越能干的人越是这样。这几乎已成为稍有政治意识的人的生存常识。柳青能感知领导和朋友的好心用意，又重复一遍：“我是作家，又是党员，我必须对党实事求是地发言。”

“你按你的实际情况，能放多大个‘卫星’就放多大个。你总得表示一下态度嘛！”

柳青浅浅地笑笑。那笑首先给人感到真诚，也掩饰不住（或不作掩饰）内蕴的讥讽：“我到这种场合里整个被吓瓜了，脑子停止转动了。热火朝天……雄心壮志……一个比一个重一个比一个大的……‘卫星’，把我……吓得快要透不过气来。我正写的那个东西……相比之下……显得小得拿……拿不出手。我表个啥态嘛……没法子表……”

柳青所说的“显得小得拿不出手”的“那个东西”，就是长篇小说《创业史》，正在做最后一遍的修改和润色。

谈话始终断断续续。这会儿又断了。领导的心里是有点复杂，也有点难言之隐。他不仅情感上喜欢柳青，更敬重柳青，敬重他已有的创作成就，更敬重他的人品人格。隐而难言正在这里，在铺天盖地的“大跃进”的响锣密鼓声中，瞪着两只黑亮透壁的眼睛死盯着别人高声大调表决心放“卫星”，紧闭着有一绺黑胡须的嘴唇一言不发的柳青，他首先担心“政治态度”的负面影响和伤害。他和柳青交谈，就是出于战友和朋友的关爱，身居政坛要职的他，习惯性敏感“表态”的特殊意味。他希望柳青避免不必要的负面损害，明天还要继续放“卫星”，还来得及弥补。他已经把话说到这样清楚无误的程度，柳青却仍然在解释他的主意。领导吸起烟来，瞅了柳青一眼，又避开了，漫无目的地眯着眼，沉浸在飘绕的烟雾中。

领导再瞅着柳青的时候，突然睁大眼睛，紧紧盯着柳青的手，提高了声调，惊讶里蕴含着兄长般的关爱：“你的手指头咋成这样子？”

“破了。”柳青轻淡地回答。

“破了？削铅笔割了？”领导很急切。

“都不是……”

“皮肤病吗？”

“也不是。”

领导已经抓住柳青的左手，拉到自己的眼前，左手食指和中指的指甲盖周围，全是一片红肉，没有皮儿了，渗血仍然没有完全凝结，

看来令人心头发瘆。领导逼住柳青的眼睛问：“那到底是咋弄的？”

“抠的。”柳青抽回手，平淡地说。

“你自己抠的？”

“别人谁能抠我的手嘛！”

“什么时候抠的？”

“今日个。”

“为什么抠？”

“……”

抠指甲是柳青一种习惯性的下意识动作。在听大报告或参加小讨论会的时候，听到那些令他感动和启迪的话语，抠指头的动作不会发生，因为他的手指捏着钢笔忙于记笔记；只有在听着套话废话狂话假话尤其是胡说的昏话时，他就瞪着黑眼珠抿嘴不语，搭在膝头或夹在两膝之间的手就抠起来了。别人很难发现，膝盖总是在桌子底下，他自己也是不知不觉地习惯性地抠着。不过，抠着也就抠着，并无多大肢体损伤，从来没有发生过把两个指头的皮儿抠光剥掉了这种惨相，他竟然浑然无觉。

这是今天下午发生的事。上午是领导们一个一个报告或讲话，或代表单位表红心。他那时已经开始抠了，不过没有抠破皮。下午是各位诗人作家唱家演家弹奏家耍（魔术）家竞放“卫星”，有诗人说他在多短时间里要写出多少万行诗，有演家说观众喜欢他在舞台上翻跟头，他要把现在的十个跟头翻到八十个跟头……热烈地放“卫星”的大

会暂告结束，柳青绷紧到麻木的神经一时还松弛不下来，站起身，离开座位时，才发现右手把左手的食指和中指抠得不见皮了，竟然没感觉到疼，竟然没有感觉到渗出的血滴把膝盖内侧的黑裤子浸湿了……

领导俯下身轻轻地问："你是下午开会时抠的？"

柳青平静地说："这是我的坏习惯，不知不觉就抠成这样子了。老也改不了。"

"噢……噢……噢……"领导转过身，独自微微点着晃着脑袋，走到窗前背对着柳青站住，只见冒烟，不闻话语，再不启发柳青表态了……

一年之后，饥饿便笼罩了蛤蟆滩。在忆苦思甜活动中被作为象征旧中国贫穷的稀糁子野菜树皮等食物，现在摆上了蛤蟆滩家家户户的饭桌。有人嚼着野菜树皮仍不改活泼的天性，哎呀！甭说亩产五十万斤粮，就按一亩地打一万斤，咱们该当干面锅盔操心吃得撑死呀！那么多的麦子跑到哪儿去咧？没有人敢在公开的或正经的场合追问高产的粮食到哪儿去了，更没有人敢追问亩产五十万斤的"卫星"放到天宇里去了，还是把家家户户的粮缸砸粉碎了！那些放过高产"卫星"的农民和决心把跟头从十个翻到八十个的名演家，现在全都不管他们放出的"卫星"跌到什么地方去了，早把心思集中到挖野菜和计算购粮票证上去了，然后依然热情不减地对新兴的口号表态去了。柳青却把心思集中到牛马身上了。无论碗里糁子多么稀，野菜树皮如何难以下咽，蛤蟆滩尚未发现完全属于饥饿而致死亡的人。牛马却大面积死亡，一个村子都难以幸免。在蛤蟆滩只有水车改成电动机械解放了牛马，成为机械化电气化的唯一标志，其余耕地拉车拉磨等重量级的农活儿仍依赖畜力。牛马死完了怎么办？道理不言自明，人都没有正经吃食

了，牲畜早在人之前就省去了精料只有麦草了。柳青现在没有抠指头的下意识动作了，整天走村串寨，踏访那些有饲养抚弄牛马经验和绝招的老农民，开始推敲字句编写饲养牲畜的“三字经”，既要通俗——饲养员文化普遍偏低，又要朗朗上口易读易记——有些饲养员缺乏对文字的耐心。柳青把正在写作的《创业史》第二部放下来，牛马占据了他的思维中心……现在来不及追问谁怎么把粮缸砸破了，拯救人和牲畜的性命不能有一丝一毫的迟疑。

通铺长屋里已经此起彼伏着男人们的鼾声，连续的间断的和偶尔骤暴骤落的，深厚的清亮的和黏糊滞稠的，都交混在一起，给最清醒的柳青听着。这些和他一样被呵斥被推搡被栽赃被谩骂被凌辱的大家人精们，现在进入一天二十四小时里最幸福的时段，痛苦和焦灼都解脱了。柳青确定最后的时刻已经来到，竟然自嘲地想着，现在早已用不着抠指头了。“文革”初期他还抠着，后来就被口头的炮轰和拳脚代替了。相对于年轻壮汉的拳脚，抠指甲这种小动作已经中止了，因为整个七十斤重的躯体都要消灭了。他的眼前浮出的是那双惊愕不堪痛苦不堪的美丽的冰雕似的眼睛，就要结束自家的折磨和终生依偎他的人儿的折磨了。柳青伸出右手，抓住了一根电线，几乎同时把右腿伸出被窝，一脚就准确无误地踏住接电板的另一根电线……

写到这里，长篇小说《创业史》里的一段话浮现出来：人生的道路虽然漫长，紧要处往往只有几步或者一步……我在初中毕业那年春天，每月按时到邮局去购买一本连载着原名《稻地风波》小说的《延河》杂志，两毛钱是从父亲给我买杂拌咸菜就馍吃的副食费里俭省下来的。梁生宝在饭馆里花两分钱买一碗面汤泡着自家带的风干馍大吃大嚼的时候，我想到父亲每逢赶集进城也是这个消费水平这等消费做派；梁三老汉的好恶和审美的言语和行为，活脱就是我家门族里的八

爷；梁生宝母亲在稻棚屋里顺意开心和愁肠百结时的神情，常常与我的母亲重叠……还有前引的这句话，我在那时就一遍成记，至今依然能浮现出来。我后来结识过南方北方的同代作家，每谈都会说到柳青和他的《创业史》，一般都是朋友先提起，而且常说到这句话，有的说曾经当作座右铭置于案头，或抄录在日记本首页上。我现在想到，以一句人生哲理式的警句影响过不知多少读者的柳青，在他把一根电线攥在右手，又决绝地用右脚踩踏另一根电线的时候，怎样阐释这“紧要处的几步或一步”……

大约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林彪事件”之后一年多，“文革”的气候似乎暂时缓和了一阵儿，出版界在西安召开第一次集会，我有幸作为业余作者参加了。得知这天下午柳青要来做报告，竟然兴奋得等不到开会。需要交代一句，柳青没有把自己消灭得成，活下来了。不知是接线板有什么问题，还是他从蛤蟆滩电工那里学到的用电技术不完备，抑或是上天怜惜天才和正派人，他把右脚踏到地线时，“嘭”的一声把他的脚打得缩了回去，直到三次踩踏三次都被打得退回，柳青作罢了。竟然没有一个人发现他自杀的蛛丝马迹，直到一周后，一个同在“牛棚”的编过他《创业史》的编辑，一把抓住他从早到晚都紧攥着的右手，当即掰开，手掌心是一片焦煳的疮疤。他向这位暗中操心着他的编辑说了原委，那人顿时把眼睛睁翻到眼眶上去了，又苦不堪言地闭上了……柳青活下来了，他的那位留给他冰雕般神光的亲爱的妻子马葳，从城里逃回蛤蟆滩，却在一口深井里终结了自己……柳青终于被“解放”了，回到韦曲县城，由长大的女儿用自行车驮着到卫生院看病和注射，他慢性病缠身。

柳青从会场的通道走向讲台，步履悠缓，端直走着，不歪向左边也不偏向右边，走上讲台时，我和与会者才正面看清一张青色的圆

脸，最令人惊讶的是那双圆圆的黑白分明力可穿壁的眼睛的神光。开头所写的十万人里也未必能找到这样犀利的一双眼睛的印象，就是我第一眼看见柳青时有感而出的。柳青还留着黑色整齐的短髭，和善而又严谨……他在不过一个小时的讲话过程中，有三次从黑色对襟棉袄里掏出一个带着尖头的圆形橡皮喷雾器，张大嘴巴，把尖头伸进嘴里对准喉眼，用手一捏一放那个橡皮圆球，发出刺啦刺啦的响声。整个会场里鸦雀无声，一声咳嗽都没有，空寂的会场里就响着刺啦刺啦的喷气声。百余双眼睛，紧紧盯着这个心中偶像的右手一捏一放的动作。他大约已经不足七十斤体重了。我记得我只看了他第一次往喉咙喷喷雾剂，到第二次第三次，他从口袋里掏出那个圆形尖头的器具时，我就低下头去了……那刺啦刺啦的声音无法躲避，一直到现在还清晰在耳。

再见到柳青是两三年后，还是文艺界的一次会议，那时候不称会议称“学习班”。又有新的政治口号指示下来，“文革”又掀起一个新的浪潮，叫作“反潮流”，反“复旧复辟”的潮流，据猜测是针对复出不久的邓小平的。柳青被请到场讲话，还是青布褂子，对门襟，不过是单衣，还是整齐的短髭，还是锐可透壁的眼光。借着时兴的“反潮流”的话题，柳青有几句话震响：在我看来，“反潮流”有两层意义，首先要有辨认正确潮流和错误潮流的能力，其次是反与不反的问题。认识不到错误潮流不反，是认识水平的问题；认识到错误潮流不反或不敢反，是一个人的品质问题……

语惊四座。会场里又是鸦雀无息的静寂。所有眼睛都紧紧盯着更频繁地从口袋里掏取喷雾剂的那只手，所有耳朵都接受着那刺啦刺啦的响声的折磨……

直到现在我才肯定，这惊人的论述绝对不会来自中外古今的哲学经典，也不会来自古代人和现代人的修身修养的规范，当是从抠指头和上批斗台的纯个性体验中获得，跨越过生活体验，进入更深一层的生命体验。

2005年5月21日 二府庄雍村

散文·随笔

两个蒲城人

——关中辩证之七

许多年以来，我都被两个蒲城人感动着。一个是晚清军机大臣王鼎，一个是西北军首领杨虎城。鸦片战争时，王鼎对道光帝以死相谏；抗日战争时，杨虎城对蒋介石发动兵谏。在近百年里两次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两个关中蒲城县人分别以死谏和兵谏的方式力挽狂澜，对于今天纷纷扬扬讨论着的关于关中人的话题，我来提供一个参照。

嘉庆帝时，王鼎历任工、吏、户、礼、刑各部侍郎，所谓“迭居五部”的重臣。到道光帝时，担任军机大臣整整十七年，直到自杀。他的政绩他的方略他的品格，短文不足叙，仅举他生前一二年内的几件大事和细节。王鼎力荐林则徐赴广东禁烟。林则徐被革职流放新疆，王鼎也被道光帝支使到开封封堵决口的黄河，他提出林则徐为治水助手，企图使林躲避流放苦役。年过古稀的王鼎拒绝豪华“宾馆”，把指挥大帐扎在施工现场，直到完工，裤裆里早已溃烂化脓。道光圣旨下来，林则徐继续发配伊犁。王鼎跺脚捶拳，仰天长叹，挥泪为林送别。

王鼎知道鬼捣在哪里。回到朝廷，与琦善、穆彰阿之流就形成白热化交锋。“每相见，辄厉声诟骂”，“斥为秦桧、严嵩”。诟骂大约类

近臭骂。王鼎是否用了关中最普遍最解恨的那句“陕骂”，不得而知。无论这个老蒲城怎样斥责怎样羞辱怎样臭骂，穆彰阿却“笑而避之”。道光帝以“卿醉矣”来和一摊超级稀泥。王鼎之所以失控之所以猴急之所以开口动粗，在于道光帝早已视他为妥协政策的障碍和赘物了。王鼎几乎气疯了，当朝大叫“皇上不杀琦善无以对天下。老臣知而不言，无以对先皇帝”，竟而扯住道光龙袍不表态不许退朝……随之便以一条白练把自己吊到屋梁上，留下三条谏言：“林不可废。琦、穆不可用。条约不可签。”

当着一群得宠的蛇鼠弄臣围着昏聩的皇帝出卖国家和民族的丑剧演到热闹处，一个把整个国家存亡和民族荣辱扛在肩上的关中蒲城人，我们怎么好意思叨叨喋喋他“生冷蹭倔”也否？是吃黏面还是吃大米更先进也否?

杨虎城离我们时空较近，较之王鼎，“知名度”更高得多。正是这个蒲城人和东北军首领张学良联手，捶拳一呼，“把天戳个大窟窿”，捉了蒋介石，一举扭转了中国的格局。应该说，中国后来的历史进程和结局，就是从那一刻发生转机的。杨虎城兵谏比王鼎的死谏要有力得多，结局和效果也相差甚大，然而杨虎城的个人结局却更为惨，是他杀，而且同时被杀的还有妻和子，没有示弱没有变节。

王、杨二人是蒲城人，在其思想、精神、抱负和人格上有诸多共通的东西，无疑也和我们这个民族垂之青史的志士仁人共通着。我可以骄傲并引以为做人楷模的当是他们。这样说，并非蒲城并非关中就没有巧舌如簧骨软缺钙专事龌龊的卑琐之徒，这是任何一个地域的人群里都不可或缺的人渣，也如同任何一个地域都会有担负民族和国家兴亡荣辱的铁肩一样挺立于世。我只想说，我们在讨论一个地域性群

体的共性时，无论这个共性中的优点或缺点，不要忘记不要绕开这个地域最杰出的人物，应该作为讨论的参照之一。

我再想说，我们讨论陕西关中人的视野应该更宽泛一点，视角应该更具穿透力，不要只局限在民间市井浮泛调侃的层面上，那样会弄得陕西人笑也不自在哭也不自在，吃面不自信吃米也不自信地无所适从了。

我以为，决定一方地域人的素质高下的关键是受教育的程度和知识结构。对于文盲而言，喝米汤和喝咖啡都产生不了新思维，无论他是关中人或是广州人，或是欧美人。

2004年1月6日 二府庄

舒悦里的亲情和友谊

过年在我的整个意识里，就是亲情和友谊。不寻常之处，是在一种特有的欢乐祥和的气氛里，享受亲人和朋友之间的情谊。

匆匆忙忙从年头奔到年尾，最想做的事最想观的景以及不可或缺的应酬，紧紧张张着，做成一件事高兴了，未做好的事遗憾了。乃至被生活里的垃圾事龌龊着心了，到年尾就意味着一概过去了。过去了就抖搂掉了，都成为“过去”而不含任何意义了，自然是身心俱为轻松舒缓的状态。此时，一种幽幽的情绪浮上心头，便是亲情和友谊的亏缺。

虽然生活在同一座古城里，交通也应快捷，然而常常是一月两月见不了儿子一面。他扛摄像机赶着追着社会镜头，偶尔回家来，我却出门了。如此等等。乡下的亲戚也都为耕庄稼和挣钱的生计各忙各的，无事就舍不得时间进城，进城来家或打电话来，肯定有事需要帮办，或孩子上学就业，乃至生病住院受到冷遇，也不管我能办不能办，反正就指望你这个“名声很大”的亲戚来了。而真正能在没有压力没有闲事的纯粹亲情和友谊的心境对面促膝，说说家道，谈谈儿女和孙辈，聊聊熟人，喝一杯酒，笑三五声，便觉得与过去的生活和曾经交过手的亲戚朋友又浑然一体了。至于儿女，那反而倒简单了，看一眼胖了瘦了黑了白了，接受一声最真实的问候，就看着他们在屋子里走来走去，姊弟间互相说话逗趣，孙子出出进进瞎忙着玩，就足以让心境涨满温馨。这时候吸一支烟，喝一口茶，甚至不说什么话，都是最踏实最平静最美好的心情。

尽管从理智上不想进入回忆，然而情绪总是无法闸断。逝去的父亲和母亲总是在心头徘徊，更多地带着那个时月的艰难，动我心怀的却是慈祥与温情。那种在今天想来不堪承受的艰难里的慈爱与温情，常常在烟雾缭绕和举杯咂饮之间令我心颤。父亲刚刚贴在街门上墨汁未干的对联，门外刚刚点燃的迎接列祖列宗神灵的纸火，扔到半空爆炸的雷子炮，母亲刚刚揭开锅盖的白面包子……尽管距今天的生活已经遥远，那气氛那欢乐那祥和那些难以言说的美好，却一脉相传到现在，以新的方式弥漫在我的这套城市里的小居室里。

难得一年之终结一年之复始之间的这几天轻松和舒缓。生命里不能缺失的温暖的亲情和友谊，滋养我有一个健康健全的心理，继续自己想做的事，面对人生，也面对良知。

2004年1月15日 二府庄

永远的骡马市

头一回听到骡马市，竟然很惊讶。原因很直白，城里怎么会有以骡马命名的地方呢？问父亲，父亲说不清，只说人家就都那么叫着。问村里大人，进过骡马市或没去过骡马市的人也都说不清渊源，更说不明白，也如父亲一样回答，自古就这么叫着，甚至责怪我多问了不该问的事。

我便记住了骡马市。这肯定是我在尚未进入西安之前，记住了的第一条街道的名字。作为古城西安的象征性标志性建筑钟楼和鼓楼，我听大人们神秘地描述过多少次，依然是无法实现具体想象的事，还有许多街巷的名字，听过多遍也不见记住，唯独这个骡马市，听一回就记住了。如果谁要考问我幼年关于西安的知识，除了钟鼓楼，就是骡马市了。这个道理很简单，生在西安郊区的我，只看见各种树木和野草，各种庄稼的禾苗也辨认无误，还有一座挨着一座的破旧厦屋一院连一院的土打围墙，怎么想象钟楼和鼓楼的雄伟奇观呢？晴天铺满黄土，雨天满路泥泞，如何想象西安大街小巷的繁华以及那些稀奇古怪乃至拗口聱牙的名字呢？只有骡子和马，让我不需费力不需想象就能有一个十分具体的活物。我在惊讶城市怎么会有以骡马命名的街区的同时，首先感到的是这座神秘城市与我的生存形态的亲近感，骡子和马，便一遍成记。我第一次走进西安也走进了骡马市，那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我进城念初中的事。骡马市离钟楼不远，父亲领我观看了令人目眩的钟楼之后就走进了骡马市。一街两边都是小铺小店小饭馆，卖什么杂货都已无记忆，也不大在意。只记得在乡下人口边说得最多的戏园子“三意社”那个门楼。父亲是个戏迷，在那儿徘徊良久，还看了看午场演出的戏牌，终于舍不得掏二毛钱的站票钱，引我

坐在旁边一家卖大碗茶的地摊前，花四分钱买了两大碗沙果叶茶水，吃了自家带的馍，走时还继续给我兴致勃勃地说着大名角苏育民，怎样脱光上衣在倒钉着钉子的木板上翻身打滚，吓得我毛骨悚然。

还有关于骡马市的一次记忆，说来有点惊心动魄。史称“三年困难时期”之后的一九六三年冬天，我已是乡村小学教师，期末考完毕，工会犒赏教师，到西安做一天一夜旅行。头天后晌坐公交车进城，在骡马市“三意社”看一场秦腔，仍然是最便宜的站票。夜住骡马市口西安最豪华的民用西北旅社，洗一次澡。第二天参观两个景点，吃一碗羊肉泡馍，大家就充分感受了作为人民教师的光荣和享受了。唯一令我不愉快乃至惊心动魄的记忆发生在次日早晨。走出西北旅社走到骡马市口，有一个人推着人力车载着用棉布包裹保温的大号铁锅，叫卖甑糕。数九天的清早，街上只有零星来往的人走动。我已经闻到那铁锅弥漫到空气里的甑糕的香气儿，那是被激活了的久违的极其美好的味觉记忆。我的腿就停住了，几乎同时就下定决心，吃甑糕，哪怕日后挨一顿饿也在所不惜。我交了钱也交了粮票。主人用一个精巧灿亮的小切刀——切甑糕的专用刀——很熟练地动作起来，小切刀在他手里像是舞蹈动作，一刀从锅边切下一片，一刀从锅心削下一片，一刀切下来糯米，又一刀刮来紫色的枣泥，全都叠加堆积在一张花斑的苇叶上。一手交给我的同时，另一只手送上来筷子。我刚刚把包着甑糕的苇叶接到手中，尚未动筷子，满嘴里都渗出口水来。正当此时，啪的一声，我尚弄不清发生了什么，苇叶上的甑糕一扫而光，眼见一个半大孩子双手掬着甑糕窜逃而去。我吓得腿都软了，才想到刚才那一瞬间所发生的迅捷动作，一只手从苇叶刮过去，另一只手就接住了刮下来的甑糕。动作之熟练之准确之干净利索，非久练不能做到。我把刚接到手的筷子还给主人，把那张苇叶也交给他回收，谢拒了卖主要我再买一份的好意，离开了。卖主毫不惊奇，大约早已司空见惯。关于

“三年困难时期”的诸多至今依然不泯的生活记忆事项里，吃甑糕的这一幕尤为鲜活。在骡马市街口。

朋友李建宁把一册装潢精美的《骡马市商业步行街图像》给我打开，看着主街次街内街外街回廊街漂亮的景观，一座座具有中国传统建筑风韵的现代商业建筑，我耳目一新，心旷神怡，心向往之。勾起对骡马市的点滴记忆属人之常情，也自然免不了世事变迁生活演进文明进步等阅历性的感动和感慨了。

西安在变。其速度和规模虽然比不得沿海经济大市，然而西安确实在变化，愈变愈美。一条大街一街小巷，老城区与新开发区，老建筑物的修复和新建筑群的崛起，一行花树一块草皮一种新颖的街灯，都使这座和这个民族古老文明血脉相承的城市逐渐呈现出独有的风姿。作为这个城市终生的市民，我难得排除地域性的亲近感和对它变化的欣然。骡马市几乎是脱胎换骨的变化，是古老西安从汉唐承继下来的无数街区坊巷变化的一个缩影，自然无须赘述。我最感动的是这个名字，从明朝形成延续到清代，都在红火繁荣着以骡马交易的特殊街坊，把农业文明时代的城市和乡村的脐带式关系，以一个骡马市融会贯通了。什么叫封建文明封建经济形态？古长安城有个骡马市。

无论西安日后会亮丽到何种状态，无论这个骡马市亮丽到何种形态，只要保存这个名字，就保存了一种历史的意蕴，一种历史演进过程中独有的风情和韵味，而没有谁会较真，真要牵出一头骡子或一匹马来。

哦！骡马市。永远的骡马市。

2004年5月30日 雍村

皮鞋·鳝丝·花点衬衫

第一次到上海，是一九八四年，大概是五月。上海文艺出版社举办“《小说界》第一届文学奖”颁奖活动，我的第一部中篇小说《康家小院》荣幸获奖，便得到走进这座大都市的机缘，心里踊跃着兴奋着。整整二十年过去，尽管后来又几次到上海，想来竟然还是第一次留下的琐细的记忆最为经久，最耐咀嚼，面对后来上海魔术般的变化，常常有一种感动，更多一缕感慨。

第一次到上海，在我有两件人生的第一次生活命题被突破。

我买的第一双皮鞋就是那次在上海的城隍庙购买的。说到皮鞋，我有过两次经历，都不大美好，曾经暗生过今生再不穿皮鞋的想法。大约是西安解放前夕，城里纷传解放军要攻城，自然免不了有关战争的恐慌。我的一位表姐领着两个孩子躲到乡下我家，姐夫安排好他们母子就匆匆赶回城里去了。据说姐夫有一个皮货铺子，自然放心不下。表姐给我们兄姊三人各带来一双皮鞋。父亲和母亲让我试穿一下。我在屋子里走了几步就脱下来，夹脚夹得生疼，皮子又很硬，磨蹭脚后跟，走路都跷不开脚了。大约就试穿了这一次，便永远收藏在母亲那个装衣服的大板柜的底层。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已经在家乡的公社（乡）里工作，仍然穿着农民夫人手工做的布鞋。

我家乡的这个公社（乡）辖区，一半是灞河南岸的川道，另一半即是地理上的白鹿原的北坡。干部下乡或责任分管，年龄大的干部多被分到川道里的村子，我当时属年轻干部，十有八九都奔跑在原坡上某个坪某个沟某个湾的村子里，费劲吃苦倒不在乎，关键是骑不成自

行车，全凭腿脚功夫，自然就费脚上的布鞋了。一双扎得密密实实的布鞋底子，不过一月就磨透了，后来就咬牙花四毛钱钉一页用废弃轮胎做的后掌，鞋面破了妻子可以再补。在这种穿鞋比穿衣还麻烦的情境下，妻弟把工厂发的一双劳保皮鞋送给我了。那是一双翻毛皮鞋。我冬夏春秋四季都穿在脚上，上坡下川，翻沟蹚滩，都穿着它。既不用擦油，也不必打光，乡村人那时候完全顾不得对别人的衣饰审美，男女老少的最大兴奋点都敏感在粮食上，尤其是春天的救济粮发放份额的多少。这双翻毛皮鞋穿了好几年，鞋后掌换过一回或两回，鞋面开裂修补过不知多少回，仍舍不得丢掉，几年里不知省下多少做布鞋的鞋面布和锥鞋底的麻绳儿和鞋底布，做鞋花费的工夫且不论了。到我和家庭经济可以不再斤斤计较一双布鞋的原料价值的时候，我却下决心再不穿皮鞋尤其是翻毛皮鞋了。体验刻骨铭心，双脚的脚掌和十个脚趾，多次被磨出血泡，血泡干了变成厚茧，最糟糕的还有鸡眼。

这回到上海买皮鞋，原是动身之前就与妻子议定了的重大家事。首先当然是家庭经济改善了，有了额外的稿酬收入，也有额内工资的提升；再是亲戚朋友的善言好心，说我总算熬出来，成为有点名气的作家了，走南闯北去开会，再穿着家做的灯芯绒布鞋就有失面子了。我因为对两次穿皮鞋的切肤记忆体会深切，倒想着面子确实也得顾及，不过还是不用皮鞋而选择其他式样的鞋，穿着舒服，不能光彩了面子而让双脚暗里受折磨。这样，我就多年也未动过买皮鞋的念头。“买双皮鞋。”临行前妻子说，“好皮鞋不磨脚。上海货好。”于是就决定买皮鞋了。“上海货好。”上海什么货都好，包括皮鞋。这是北方人的总体印象，连我的农民妻子都形成并且固定着这个印象。那天是一位青年作家领我逛城隍庙的。在他的热情而又内行的指导下，我买了一双当时比较价高的皮鞋，宽大而显得气派，圆形的鞋头，明光锃亮的皮子细腻柔软，断定不会让脚趾受罪，就买下来了。买下这双皮鞋

的那一刻，心里就有一种感觉，我进入穿皮鞋的阶层了，类似进了城的陈奂生的感受。

回到西安东郊的乡村，妻子也很满意，感叹着以后出门再不会为穿什么鞋子发愁犯难了。这双皮鞋，只有我到西安或别的城市开会办事才穿，回到乡下就换上平时习惯穿的布鞋。这样，这双皮鞋似乎是为了给城里的体面人看而穿的，自然也为了我的面子。另外，乡村里黄土飞扬，穿这皮鞋需得天天擦油打磨，太费事了；在整个乡村还都顾不上讲究穿戴的农民中间，穿一双油光闪亮的皮鞋东走西逛，未免太扎眼……这双皮鞋就穿得很省，有七八年寿命，直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才换了一双新式样。此时，我居住的乡村的男女青年的脚上，各色皮鞋开始普及。

我第一次吃鳝鱼，也是那次上海之行时突破的。关中人尤其是乡下人，基本不吃鱼，成为外省人尤其是南方人惊诧乃至讥笑的蠢事。这是事实。这样的事实居然传到胡耀邦耳朵里，他到陕西视察时在一次会议上讲过："听说陕西人不吃鱼？"其实秦岭南边的陕南人是有吃鱼传统的，确凿不吃鱼的只是关中人和陕北人。我家门前的灞河里有几种野生鱼，有两条长须不长鳞甲的鲇鱼，还有鲫鱼，稻田里的黄鳝不被当地人看作鱼类，而视为蛇的变种。灞河发洪水的时候，我看到过成堆成堆的鱼被冲上河岸，晒死在苞谷地里，发臭变腐，没有谁捡拾回去尝鲜。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国家第一个五年计划实施时，西安拥来了许多东北和上海老工业区的技术人员和熟练工人，这些人因为买不到鱼而生怨气，就自制钓竿到西安周围的河里去钓鱼。我和伙伴们常常围着那些操着陌生口音的钓鱼者看稀罕。当地乡民却讥讽这些吃鱼的外省人：南蛮子是脏熊，连腥气烘烘的鱼都吃！我后来尽管也吃鱼了，却几乎没有想过要吃黄鳝。在稻田里我曾像躲避毒

蛇一样躲避黄鳝，那黑黢黢的皮色，不敢想象入口会是一种什么感觉。

那天在上海郊区参观之后，晚饭就在当地一家餐馆吃。点菜时，《小说界》编辑、现任副主编的魏心宏突然兴奋地叫起来：“啊呀，这儿有红烧鳝丝！来一盘，来一盘鳝丝。”还歪过头问我，你吃不吃鳝丝，就是鳝鱼丝。我只说我没吃过。当一盘红烧鳝丝端上餐桌时，我看见一堆紫黑色的肉丝，就浮出在稻田里踩着滑溜的黄鳝时的那种恐惧。魏心宏动了筷子，连连赞叹味道真好做得真好。随之就煽动我，忠实你尝一下嘛，可好吃啦，在上海市内也很少能吃到这么好的鳝丝。我就用筷子夹了一撮鳝丝，放入口里，倒也没有多少冒险的惊恐，无非是耿耿于黄鳝丑陋形态的印象罢了。吃了一口，味道挺好，接着又吃了，都在加深着从未品尝过的截然不同于猪、牛、羊、鸡肉的新鲜感觉。盛着鳝丝的盘子几乎是一扫而光，是餐桌上第一盘被吃光掠净的菜。似乎魏心宏的筷子出手最频繁。多年以后，西安稍有规格的餐馆也都有鳝丝、鳝段供食客选择了，我常常偏重点一盘鳝丝。每当此时，朋友往往会侧头看我一眼，那眼神里的诧异和好奇是不言而喻的。

还有两把小勺子，也是此行在上海城隍庙买的，不锈钢做的，把儿是扁的。从造型到拿在手里的感觉，都特别之好，不知在什么时候弄丢了一把，现在仅剩一把，依然光亮如初，更不要说锈痕了。有时出远门图得自便，我就带着这把勺子，至今竟然整整二十年了。

还有一个细节，颇有点刻铭的意味。

还是那位年轻作家陪我逛街。我们随意走着，我已记不得那是条什么街什么弄了，只记得街道两边多是小店铺。陪我的青年作家随意

介绍着传统风情和市井传闻，我也很难一遍成记，尽管听得颇有趣味。突然看见一个十分拥挤的场面，便停住脚步。一家小店仅一间窄小的门面，塞满了顾客，往里硬挤的人在门外拥聚成偌大的一堆；从里头往外挤的人，几乎是从对着脸拥挤的人的肩膀上爬出来；绝大多数为男性青年，亦有少数女性夹在其中，肌肤之紧密接触也不忌讳了；往外挤着的人，手里高扬着一种白底碎花的衬衫。不用解释，正是抢购这种白底上点缀着蓝的红的黄的橙的小花点的衬衫。

一九八四年春末夏初，上海青年男女最时髦、最新潮的审美兴奋点，是白底花点的衬衫。

十余年后，我接连两三次到上海。朋友们领我先登东方明珠电视塔，再逛浦东新区，令我眼花缭乱，目不暇接，新的景观和创造新景观的奇迹般的故事，从眼睛和耳朵里都溢出来了。我在宝钢的轧钢车间走了一个全过程，入口处看见的橙红色的钢板大约有两块砖头那么厚，到出口处的钢材已经自动卷成等量的整捆，厚薄类近厚一点的白纸，最常见的用途是做易拉罐。车间里几乎看不见一个工人，我也初识了什么叫全自动化操作。技术性的术语我都忘记了，只记住了讲解员所讲的一个事实：这个钢厂结束了中国钢铁业不能生产精钢的历史，改变了精钢完全依赖进口的局面。尽管是外行，这样的事实我不仅能听懂，而且很敏感，似乎属于本能性地特别留意，在于百年以来留下的心理亏虚太多了。

从小学生时代直到进入老龄的现在，我都在完成着这种从祖先遗传下来的先天性心理亏空的填垫和补偿过程。我们的第一台名为“解放牌”的汽车出厂了；我们有了自己生产的“红旗牌”轿车；我们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我们的卫星上天了飞船也进入太空了；我们有了国产的彩色电视和国产空调和国产电脑和国产什么什么产品。这样的消

息，每有一次都是对那个心理亏虚的填垫和补偿，增加一份骄傲和自信，包括制造易拉罐的这种钢材对进口依赖的打破，也属同感。我便想到，什么时候让欧美人发出一条他们也能“国产”中国的某种独门技术的产品的消息的时候，我的不断完成着填垫补偿心理亏空的过程，才能得到一个根本性的转折。

告别布鞋换皮鞋的过程发生在上海。吃第一口黄鳝的食品革命也始发于上海。这些让我的孩子听来可笑到怀疑虚实的小事，却是我这一代人体验“换了人间”这个词儿的难以轻易抹去的记忆。还有历历在目的上海青年抢购白底花点衬衫的场景，与我上述的皮鞋和黄鳝的故事差不了多少。在南方和北方、东部和西部都被灰色黑色和蓝色的中山服红卫兵服覆盖着的国家里，一双皮鞋一餐鳝鱼丝和一件白底花点衬衫，留给人的镂刻般的记忆，记忆里的可笑和庆幸，肯定不止属于我一个人。

2004年7月5日 二府庄

从大理到泸沽湖

头上的风花雪月

不足一小时，飞机从昆明飞到大理，降落在一座被削平的山头机场上。视野开阔，无遮无碍，远处的山和眼皮下的大理城尽收眼底。一个风格独具的高山小型机场，小到只有刚刚落地的这一架飞机，没有拥挤，更不会熙攘，颇有凛冽寒气的风，把旅客刚刚出口的话儿和热气一律扫荡，抛撒。

沿着苍山绵延起伏的山系，远远望去，可以辨别新城和老城截然不同的风貌。从苍山到平川坝子漫缓下来的坡地上，房屋呈现出自然错落高低的壮观景象。即使是大片大片的平房或低层楼房，前边的建筑绝不遮挡后边的房屋，从平川一直立体展现到半山上。无论姿势别致的新建筑物或传统的老式房子，几乎一律把外墙都涂成白色，或者纯白的瓷片。苍山是深灰到黑青的颜色，一眼望不到边际的宽幅襟怀里，是大片白亮亮的建筑群，如此强烈的反衬，又如此和谐，从视觉到心理都感觉轻俏和透亮。与苍山并列的是黄色的秃山，断崖裸露无遗，沟壑也赤裸无遗，颇类西北黄土高原地区的地貌。两条平行并列的山系之间，是一片灰蓝色的水，高原人习惯把这种高原湖泊称作海，这个海的形状活像人的耳朵，便有洱海之称。洱海平静清丽，把两列风貌和气象截然迥异的山系襟连衔接，一种天然和谐的过渡。

满城都飘动着白衣白裤。白族喜欢白色。白色的选择和白族的族史一样悠久。令人眼花缭乱的新潮时装，起码现在还无法动摇白族少女对白衣白裤坚定到崇拜的审美选择。一年四季无论季节如何变换，

少女的一袭白色服饰却始终不变。最神秘也最招惹人的是少女的包头，用漂亮精湛这些词汇似乎都不及意。包头有四种颜色，分别代表风花雪月。大理在两条山系夹峙之间，形成一条风道，常年有风，不同的时节刮不同的风；大理气候温润，四季有花，山野的花从年头开到年终；苍山顶上却是终年冰雪封盖，融雪的好水注入洱海，滋润着高原；没有烟气污染也不见尘埃迷漫的天空，月亮就愈显得清净和柔媚。风花雪月都是大理特定地理环境下大自然的恩赐。白族少女将其具象为符号戴到头顶，一种对大自然虔诚的膜拜。我很感动，一个自古以来就把风花雪月顶在头上的民族，当会是怎样一种胸怀和心地?

最神秘的是包头的左耳侧那一绺白色线穗，垂过肩膀，暗示为未婚的女子，剪短到耳际的，标示为已婚。无论这白色线穗或长或短，是不允许任何人触摸的，尤其男性。如若谁敢违禁犯忌冒险动手，便要遭到惩罚，打是最轻的了。唯有求爱的小伙子可触摸少女过肩的长线穗。触摸表示求爱。小伙子必须有十分被接受的把握才敢伸出手去，姑娘接受了这种求爱皆大欢喜皆大完美；如若遭到拒绝，小伙子就得到女子家里义务做工，时限为三年，以观其行状，由姑娘最后表态做出抉择，留下来或走人。

蝴蝶泉

汽车在苍山宽幅襟怀里弯来绕去。下车前行，寻觅到杂树密林遮掩下的一个水池边。水是地下涌泉，真是太清了，清到纤尘不染，至清至净，透彻如无，可以逼真地透见水底一丝一缕的水草。这是声名远扬的蝴蝶泉。

原以为只有浪漫派诗人才会给此泉以蝴蝶命名。了知原委后，方才明白这样动人的泉名纯系写实主义的杰作。泉边有合欢树，蝴蝶在

枝条上停落，一只扒着一只，垂吊下来，五颜六色的彩蝶，一串一串从树枝上倒挂垂吊在泉水上空，蔚为壮观，亦堪称奇到不可思议的奇景。据说是合欢树分泌散发着某种气味，蝴蝶难以抗拒这种气味的诱惑，遂成此景。我不敢全信，合欢树并非仅此一棵，而蝴蝶独恋此树却是绝无仅有，那么只有一种解释，只有这儿的合欢树才有分泌出蝴蝶喜欢的那种气味的特异功能。

苍山怀抱里的这一汪好水，涌流了不知多少年，彩蝶垂吊合欢枝条的奇景也不知延续了多少年，可谓“吊在深山人未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才被电影《五朵金花》剧组选外景时发现，这泉和这泉水上的蝴蝶串儿，就和《五朵金花》里美丽的“金花”一起出名了，蝴蝶泉成为天下名泉。我猜想这个美丽的泉名应该是剧组人员的集体创作。这个蝴蝶泉的浪漫奇观，连郭沫若老先生都难以拒绝诱惑，不远千里攀上山来，到此一游，不仅乘兴挥毫，为此泉题写了“蝴蝶泉”三字，而且赋得七律一首。郭老题名的蝴蝶泉镌刻在泉水涌流的出口处，论书法是精湛称绝的。那首七律已制碑，按郭老的亲笔书法刻制，亦为大家气象，弥足珍贵；只是那七律的遣词采句，在印象里的大师的诗词著作中，仅算得一般，不属上乘。

蝴蝶泉下不远处还有一条清泉，水量更大，泻出时在小小的跌差处形成碎银般明亮的小瀑布。此泉没有命名，却有传说惹人，撩一把水，升官；撩两把，发财；撩三把，得艳遇。游人和陪客便嘻嘻哈哈争抢撩拨水花，谁也未必当真，图得快活有趣。我便调侃，撩过四把五把，官财色如果俱得，内乱外患也就交至。

凤凰山·鹤翼村

一大早乘车出大理城，沿着两条山系之间平坦宽阔的坝子西行，黄突突的秃山在右，苍劲挺拔戴着银白雪帽的苍山在左。清凉的晨风让人忍不住敞开车窗。窗外田野里一抹翠绿。一色的蚕豆秧，如绿波涌过来，闪过去，一眼望不到边际，看多了就觉得缺少色彩的变化和调节。据说蚕豆近年间销路通畅，既可以做小食品，更可以做饲料，用途不衰，销路便红火。农民以此作为作物种植的选择，是本能的，田野就成为蚕豆的一统江山了。

翻过苍山，进入另一条川道，面前横着又一条山系。这是凤凰山。我一时根本无法把突兀横戳进眼里来的这个山与凤凰发生丝毫联系。任你如何多情如何富于想象，如何理想主义的浪漫，都不可能用凤凰给这样的山命名。这是怎样的一座山哦！黑森森的一座座高高低低的山头，黑森森的歪歪斜斜的山梁，山头和山梁赤裸着横的竖的粗硬的条纹。我在睃视的过程中，脑子里不仅飞不出凤凰，倒是堆满了铁渣。这是一座铁渣堆积的山。这样的铁渣已经堆积了亿万年，愈加冷寂了。这山戳进人的眼里，满是蹭硬和干涩，根本不想触摸也不敢触碰。只在一处山头和山梁交叉的低洼处，有几株不知名的树的绿色，弥足珍贵。这个凤凰的名字因何缘起？不外乎神话传说。神话传说往往都传递着先古生民的期待和向往，愈是残酷愈是不堪的生存环境，愈是容易飞扬激越热烈的关于美的期待。

同样不可想象的是，这个干涩到几乎见不到一撮泥土的铁渣山山根，到处都涌流着泉水，在山下的川道里聚成望不到边际的湿地。丛生的隔年的芦苇已经干枯，在早春的风中摇曳，新生的芦苇大约刚刚拱破地皮。一群群野鸭在芦苇丛中悠然浮游，时隐时现。另有多种辨不出种类的水鸟，在水面上忽起忽落，毫不戒备。据说这儿的村民即使穷极，也不会猎杀水鸟。野鸭和水鸟自由无忌。

凤凰山根下，散落着几个自然村，归属行政上的新华村辖制。我们走进的这个自然村是最大的一个村寨，叫鹤翼村，也叫石寨。前者属浪漫主义，后者是现实主义。白鹤的翅膀。凤凰山下，白鹤一翼，浪漫和吉祥都汇聚到这个古老的白族聚居的石寨了。街道上走过来一帮步履匆急的中年女人，有的人背着竹篾背篓，一色的黑底蓝边布衣，头上的包头也是青布做的。包头的颜色，成为区别白族支系的标志。颇有异趣的是，中年女人包头上还复加着一顶仿制的黄色军帽。石寨的白族男子喜欢戴这种仿制的陆军士兵帽，缘自“文革”时期“全国人民学习解放军”的“最高指示”的巨大而又深入的影响，形成习俗，至今不衰。这种仿军帽就成为男子汉的象征。妇女能顶半边天和男女平等，同样是“最高指示”的思想和倡导，于是白族妇女在传统的象征着女性的包头上垒加一顶仿军用品的黄色帽子，以标志在社会在家庭在人格在地位上与男人平等了。

鹤翼村的历史已经湮灭，尽管没有羊皮书一类神秘典籍存留下来以证明其古远，而聚居在这个寨子的白族人制作银器银饰的手艺，却已相传千年了，足够悠远古老了。村里的绝大多数人家世代从事各种银器铜器生活用品和首饰的制作和镂刻，千余年来盛名不衰美誉远播。孩子学会用手抓摸东西就抓摸到了银器铜器银饰铜饰，以及凿刻钻镂那些精美饰物的器具。几乎家家都有作坊。几乎家家都出过一位或几位天才的巧手名匠，单是能被现在的人记住名字的就可以顺口摆出一长串。从鹤翼村走出去的银匠兼铜匠，遍及整个西南各省的大城市小街镇，尤其是西藏、广西、四川、贵州、内蒙古等少数民族聚集的地区，云南各州自不必说了。不管哪个民族戴着什么样的银货首饰，十有八九都是鹤翼村的能人巧手做的活儿。我不敢全信也不敢不信。确凿的事实是，鹤翼村现有四位佼佼者，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授给“中国民间艺术大师”的称号。这四位大师在村里享有盛望，几无异

议亦无窃语，不似文坛常常发生关于大师的脸红脖子粗的争议。他们早已在鹤翼村乃至同行业里独具威望，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授名只是锦上添花。

我走进其中一位大师老寸的家院。

寸大师不在。寸大师的夫人热情地领着一行人参观家庭银器作坊。一个名副其实的家庭作坊，不仅在家里的廊檐下做工，匠工全部是寸家的儿女和亲属。大女婿正在镂刻一把白银酒壶。这把酒壶专配八只白银酒盅。这把酒壶里所装的白酒正好斟满八只酒盅，不多一滴也不亏一滴。据说这酒壶酒盅容量的数学公式运算十分复杂。寸大师如何完成这项发明创造的秘诀至今秘而不漏，没有拜请数学家的公式运算却是确凿的。这项绝门技艺早已获得创造发明专利，至今尚未被谁破解。这把纯银酒壶的外观造型和浮雕式的镂刻的精美，令人叹为观止，直觉得更适宜作为新居摆设或收藏供人欣赏，用它装酒倒酒似乎把某种美的感觉俗化了低贬了，也使饮酒者平添一分珍惜的沉重。这种神秘的银质酒壶的生产过程却是公开的，起码在镂刻浮雕这一环节上任人观摩。大女婿在廊檐下坐一把小凳，十分专注，目不斜视，手里的小角刀一划一削，一拉一挑，一种熟练的自信和自如溢于眉眼和神色里。尚未婚娶的二女婿也坐在廊檐下的高台阶上，刻着一种银器，丈母娘向客人介绍到他的时候，抬起头腼腆一笑，羞涩浮在清秀的脸庞上，又低头做活儿了。大女儿跑前颠后，动作行为和语言质地都显示出当家或主持的角色。二女儿一副轻松姿态，颇多天真，她说她在大理城里开着一家银器店，经营着自家作坊的产品。我稍微留意一下，寸夫人和她的两个女儿都没有戴白族的包头，更没有再垒加一顶仿军品黄帽。男女平等在这个家庭里，肯定不必用一顶男人喜欢的帽子来暗示了。

寸大师家的房子我也不忍忽略。

一个典型的白族院落。两层楼房，一色的木头，木柱木梁自不必说，外墙和内墙全用木板，每一扇门板和窗扇，都是花鸟异兽的雕刻。高耸轻俏的挑檐，一眼望去就使人感到某种舒畅，避去了寻常建筑物的闭塞和郁闷。这幢建筑耗资八十万元。请不要忽略这是在僻远的鹤翼村。在鹤翼村的街道上行走，两边大多是两层木楼，从成色上判断，都应属于近年间的新建筑。有几处又低又矮破旧不堪的老房子，可以见证以往村庄的概貌。还有两家正在兴建的楼房，施工的工匠和辅助的工人忙碌在屋架上和院子里……制作银器铜器和首饰，已经使鹤翼村的白族人过上了好日子，甚至使我都不想再听关于过去如何怀着绝技讨饭吃的往事了，这种令人痛心的教训岂止一个鹤翼村或者石寨，整个中国南方北方的每一个村寨，都在演示和见证着同一个教训。我更愿意观赏寸大师寸夫人和他们的儿女，以及鹤翼村老的少的银匠们今日的生活状态，对我关于过去乡村的记忆和体验，当是一种抚慰。

泸沽湖畔

差不多有六个小时的行程，几乎都在大凉山里盘旋。上一架山下一座山。再上一座山再下这座山。就这样上上下下在大凉山的山丛中整整盘旋六个小时，人得有巨大的耐心，因为沿途的奇峰和美景早已看得眼满神疲了。只有一架山留下了至今想起依然心悸的记忆。那是一座最陡的又无法绕过去的山。从山顶斜瞭一眼，窄窄的公路在这架山的同一壁面上，绕过七八道弯才到山顶，像天女舞罢随意丢弃在山壁上的一条黑绸。这是我后来想到的比喻。当时被汽车载着盘旋其间的时候难得想象，一满是目眩和心悸。

就为着看一眼神秘的泸沽湖，就为着亲眼看看比湖泊更神秘的摩梭人。

傍晚时分，汽车翻上又一座山头，突然瞥见远处一片灰蓝色的水雾，凭感觉就知道是泸沽湖了。视线又被眼前的山峰遮住了。只一瞥，精神顿然亢奋起来了。那一片蒙蒙的水雾又在两座山头之间出现了，稍为宽限的时间，可以看到灰色水雾下蓝色的湖水。第一眼和第二眼的最新鲜的直感，就是沉静，一种悠远的沉静。

站到泸沽湖边上，我的心也顿然沉静了。不想欢呼，连赞叹的词汇也不想出口，只有哦哦哟哟的呻吟。似乎眼前的湖面是熟悉的，可能就在昨天或去年的某个梦境里，似乎又确凿是陌生的，因为即使梦里也根本不会浮出这样好的水和仙境般的湖。近前已经是澄明清澈的湖面，幽深的蓝变成青色。水雾在远处浮漫着，愈远愈浓，隐隐能看出水气在湖面上丝丝缕缕时现时隐。远处的水雾蒙蒙成帐，遮住湖边的山的根部，山就浮在湖上了。人说对面的山形恰如卧佛，佛就在这四季弥漫的水雾里滋润着修养着。近处的湖面上浮着一种通体黑色的水鸟，悠悠然漂浮。金黄色的野鸭集成堆，成片。白色的鸥鸟是显眼的，也是最活跃的，时而在水上浮游，随即就飘飞起来，在空中恣意了两圈儿，又落到水面上来了。无论好静无论喜动的各色鸟儿，在这儿都能随心所欲，绝无偶然突然发生的伤害，一种原始的安全。岸边停靠着许多猪槽船，可以乘坐十人。这是作为商业经营的仿造品。我在图片上见到过类近最原始的猪槽船，是把一根粗壮的木头凿空了的恰似给猪喂食的食槽的船，坐两个人是合理的负载。这种猪槽船源自摩梭人源头形成时的神话故事，又吻合着教科书上人类进化到母系氏族社会时的特征，就给今天的现代人一种悠远想象的符号，倒是不必细究传说的可靠性了。湖面上频频往返着一条条这种十人乘坐的猪槽

船，到湖心的小岛上观光。一个黝黑的小伙子在船头划桨，船尾是一个同样年轻的摩梭女性也在摆着木桨，经问得知，是一对走婚的摩梭人夫妻，他们已不忌讳。

泸沽湖四面被山围定。落水村依傍在湖的南岸。远远望去，湖的北岸西岸和东岸的山脚下，都有散落的房屋的屋脊隐现。汽车从山里盘旋过来的唯一出口，就是落水村。这是山根到湖边难得的一块颇为开阔的平地，成为落水村摩梭人千古繁衍生息的福地。崇山峻岭层层叠叠形成的严密不泄的封闭，为今天的人们无意保存下来人类进化过程中的一块活化石，母系时段的家庭形态。落水村被外部世界撩开神秘面纱，在人类学家民俗学家和普通人的惊喜惊诧和好奇的熙熙攘攘声浪里，大小商贾的心思和行为却最单纯最简捷最务实，不过十来年时间，把落水村装扮成一个具有现阶段发展水平和流行特色的消费娱乐商城了。

沿着湖边业已形成的一公里长的商品走廊，一家紧挨一家的大铺店小门面，各逞风姿的装饰扮相，基本与当地古朴的建筑风貌毫无牵涉，都是用二十一世纪初中国都市里流行的审美情趣构建的图像。店铺里的商品多是内地输入的吃、喝、穿、戴、用、玩的东西，偶有少量仿造摩梭人原始生活用品纯粹作为象征的物什。开店坐店的大小老板和雇员，十有八九都是从外部进来淘金的青年男女，据说有远自广州的女商家。和这排甚为讲究的建筑物一路之隔的对面，紧靠着泸沽湖岸的沙滩，是用各色彩条塑料篷布搭建的小吃店，在泥土地上支着一个个炸锅烤箱或蒸笼，小女子小男孩尚未脱尽稚气也未脱尽原有职业的举止特征，只顾一个不漏地招徕走过面前的每一个行人。这种临时设置和摊主普遍不甚踏实的神色，让人想到顾客一串烤肉尚未嚼咽完成，摊主就会拔篷挟锅逃走。沿着山根的公路，有规模壮观的大酒

店、饭店和过夜生活的唱歌洗浴按摩等级参差不齐的场合。所有这些骤然冒出的建筑和设施，都是为进入神秘的泸沽湖的游客准备的。

落水村已经是一片式样大致相同的楼房。大多为两层，用水泥也用木头。院落很宽敞。主人食宿住卧只占少量房间，更多的房间是作为家庭旅社接待游客的，而且有宽敞明亮的餐厅，销售各类风味的饭菜，晚上的篝火晚会在一座宽大的院庭里举行，已经不是传统那种随意自如的自娱自乐的方式，而是经过艺术家指导、编排的规范化表演了，为赚取游人钞票的纯商业化演出，男女村民演员的服装也很精美而讲究。据说，当晚演出结束，游人带着异样风情的回味离去，所有参与演出的人员现场分酬，绝不过夜也不拖欠，完全公开化，也就避免了矛盾和意见。据我乘坐的那条猪槽船的女船主介绍，村民分为A、B两组，划船和演出隔一周轮换一次，游人的多少决定着收入的丰薄，天气和季节是最主要的制约因素，全凭运气了。为来自世界各地和国内游客服务的旅游商业，成为落水村人致富的始料不及的机遇。作为怀着猎奇探访心理的我，看到群山环抱的湛蓝湛蓝的高原之湖，看到黝黑强健的摩梭男女，自然是一种预期的心理满足。然而也不无欠缺和隐忧。山脚下和湖岸边的商业区和娱乐区，包围着落水村，豪华酒店简陋歌厅里的流行歌曲和陪女的嬉笑声连同洗脚水倾泻出来，原始的纯粹的母系家庭能否坚守久远。我又矛盾得很，落水村的摩梭人有无必要坚守那种古有的习俗。摩梭人独有的歌舞成为纯商品化的致富途径，我也在赞赏与遗憾的矛盾中难以抉择。唯一可以做出判断的一件事，湖边已形成很宽的浑浊的污染带，再不能往湖心地带扩展了；把一个纯洁不染纤尘的高原湖泊弄成一湖脏水，那是无须点示后果的最愚蠢的作孽。

火塘·花楼

终于走进一间摩梭人日常起居的屋子。这是我昨夜歇住的家庭旅社的主人家的住屋。房主人叫达巴，丰满的身材，很镇静，镇静到与她后来自报的还属于年轻人范畴的年龄不太相称。果然，她已经在深圳这样中国最现代的城市里生活工作过两年了，见过大世面也见过比较洋的世面了。她上身穿着有花纹图案的毛衣，坐在火塘边向我和同行的作家朋友介绍摩梭人的风俗和家庭结构，很镇静。

火塘是房子的核心。家庭成员商协家政家务的活动就在火塘周围。家庭成员依长幼辈分在火塘边有一个相对固定的位置。火塘靠近木质背墙。背墙根下火塘两边，摆置着有软垫的木板，从火塘最近到最远端的位置次序，是舅舅们按年龄长幼依次排定的。火塘旁边还散摆着不少圆形墩子，是家庭其余成员随意坐的。包括孩子的父亲，他到这里来表达对孩子的关爱之情，可以坐在火塘边，却不能坐到舅舅坐的上首木板上。火塘左边的圆木叠垒起来的木头墙上，嵌着一张床，那是这个家庭主持家政的家长的卧铺，神秘而又神圣，偌大的屋子里，只有这一铺住处。家长通常是这个家庭里年龄最长的女性，在火塘边主持一年之初的计划预算和年终总结，家庭随时要安排处理的一切内政和外交，由舅舅们和女儿各抒意见，最后由家长做出决断，走婚的父亲是不能参与的，也就没有说长论短的资格。

有资格坐在火塘左右两边属于上首位置的木板上的成年男性，承担田地里的主要劳作，无私地供养着姊妹们生育的孩子，作为舅舅的身份，承担着父亲的责任。孩子的亲生父亲，在他们的家庭里同样抚养他们的姊妹生育的孩子。人们习惯说这是单亲家庭，兄弟姊妹终身生活在同一个火塘周围。姊妹们到成年后，每人有一间花楼，夜里等待亲爱的夫君来走婚；成年男子在这个家庭里只有坐火塘的尊贵位置，而没有资格安铺下榻，晚上必须走出屋院到相亲相爱的女子的花

楼里共度良宵。女性的花楼是除了走婚的男子之外的任何人不得涉足的。我们之中有人向达巴打问她的花楼，笑而不语。达巴转移话题说，她曾到深圳的民族村做过摩梭人的歌舞表演，有两年多时间，还是觉得泸沽湖边的家乡更适宜自己，况且落水村因为近年间的旅游热而增添了收益的渠道，决意回来了。达巴坦率地告诉我们，她已完成走婚，有一个正在哺乳的女儿，“孩子的爸爸很帅，他二十五岁”。达巴特意注重地解释，外面的人传说摩梭人走婚很随便，误传了。青年男女经过暗恋到热恋，一旦确定走婚关系，就会固定下来；一旦有孩子出生，虽不能尽父亲抚养孩子的责任，却可以随时走到女方的火塘边，表达对孩子的爱怜和关心，也可以和家人聊天和交流。这种关系也是村人几乎共知的，一旦发生变异，会受到众人的不齿和轻视，很难再去找到新的走婚对象。我就很清醒地感觉到，这是一种依凛然的道德维系的婚姻纽带。

我也不难想象，从泸沽湖从田地里从山野里摆渡耕作放牧归来的男人和女人，漱洗完毕吃罢夜饭，女子进入花楼等待夫君时该是怎样一种甜蜜的急切；那些匆匆走过幽暗的村巷进入花楼偏门的男子该是怎样一种坦然的幸福。那些甚至需要骑马或摩托赶到另一个村寨的小伙子们，以怎样动人的痴情在两个村寨之间的山路上的每一个夜晚走向自己心中的花楼……这是怎样充溢着激情的生动的泸沽湖。

2004年7月18日 雍村

在好山好水里领受沉重

到云南，就为着看那里的好山好水。

对于一直生活在中国北方又偏于西部的我，看彩云之南的好山好水，几乎是为求得某种心理补偿。近年间，竟有机缘先后四次去了云南，确实可以说是饱尝了好山好水，也得到好山好水对人心理的滋润。然而，那好山好水的色彩终久架不住时间的消磨，渐渐远逝而淡隐，却是腾冲县里倚山而建的“国殇墓园”，久久撑立在心头，愈久愈清晰，不仅难以淡忘，反而必须以我的文字来致一个深躬礼了。

这是四年前我第一次去云南，一到腾冲，就踏进了“国殇墓园”的大门，就感受到一种凛凛然森森然的沉重和威压。这是滇西一座草木葱茏四季常绿的山。在这座山的山坡的襟怀里，长眠着八九千名中国士兵的魂灵。从山根到山顶，从右坡到左坡，按照原来的军事编制，一个班一个排一个连直到师一级，阵亡了的士兵和阵亡了的军官依序排列。每块小小的石碑下都埋葬着一个士兵或军官的尸体，石碑上刻着他们的名字和生前的军职。整个这座青山，就是一个用尸体铸建的军阵。他们战死了，依然保持着原有的完整和威势。

这场战事发生在一九四四年。为了收复被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两年的腾冲，中国士兵战死了八九千人。中国士兵是这场战争的胜利者。他们不是赶走而是全歼了日本占领军。所谓全歼，就是一个不剩，干净彻底予以消灭；就是除了少数日寇士兵被活捉当俘虏，其余所有践踏过滇西这块美丽山城的鬼子，一个也没能活着逃出去。人数为六千，包括侵略和占领腾冲的日军最高司令长官藏重康美大佐。这应该

是占领大半个中国八年之久的日寇最彻底的一场败仗，彻底到一败涂地一个不剩。

我踏着石阶从山脚往山顶走，两边是望不透的土冢和墓碑。我辨认着那些被风雨侵蚀过几十年的一块块碑石上的士兵或军官的名字，抚一抚墓堆上枯了又生的野草，最切近地感受到一个人的尊严和一个民族的尊严，最切近地感受到为着自己也为着民族的尊严而捐躯的这一片中国士兵的呼吸。我在小学课本上就知道了平型关大捷。平型关从此成为我永远都感到扬眉吐气的一个关。我后来读过几本抗日题材的小说，看过更多同类题材的电影，地道战地雷战游击队长李向阳小兵张嘎，让我反复享受民族英雄杀灭野兽的痛快淋漓。还有令我久久难以释怀的惨烈悲壮的台儿庄。我的案头现在正摊开着一部《立马中条》的长篇纪实书稿。这是由杨虎城将军创建的17路军改编的31军团，由杨的爱将孙蔚如将军率领，走出潼关浴血山西中条山抗击日寇的英雄诗章。这是一支由号称“冷娃”的关中青年为主组成的军团，我深深地陷入浓厚的乡土情结缠绕着的民族大义之中，每一座山头的争夺令我揪心，每一个关中子弟的阵亡令我闭气……我走在倚山为墓青山作碑的墓园中间的山道上，许久都不想说话，也不去想象那场战争的过程，心头只响亮着歼灭这个汉语词汇。这肯定是八年抗战无以数计的大小战役里，唯一可以使用歼灭这个词汇来概括结果的一场大战。我当然也感受到这个词汇对于侵略者和被侵略的人民永远都无法含糊的情感记忆。

墓园门口的右墙根下，有一个石块垒成的圆筒状的冢堆，下边埋葬着三个日本兵的死尸，其中一个是侵占腾冲的日军最高司令长官藏重康美大佐。石块上标刻着两个字：倭冢。在我们被外强侵略欺凌的史记上，日本侵略军先是被卑称为倭寇，即个子矮小的匪贼；抗日战

争改称为鬼子，比倭寇更为鄙视更为不屑也更通俗化。倭冢沿用了古典称谓的习惯，如若按抗日战争的通常称谓，应该是鬼子冢或鬼子坟鬼子墓了。这个冢堆里的大鬼子藏重康美大佐和两个不知名姓的小鬼子，作为践踏蹂躏腾冲的六千个被消灭的大小鬼子的代表，是向青山上长眠的中国将士跪伏认罪的一个象征。我很自然联想到岳飞墓前跪地的秦桧，千百年来不知承接了几百吨游人的唾沫儿。然而，我和同来拜谒的十余位作家朋友，谁也没有兴趣向倭冢吐出口水。整个人类正义的“唾沫儿”，早在“二战”结束时铺天盖地地倾覆到所有鬼子的脸上了。

我也记住了一位名叫张问德的老人。日寇从缅甸一路打过来占领了腾冲，当任的一位钟姓县长携着家眷逃之夭夭，不知踪影。张问德老人是卸任赋闲的前任县长，时年六十二岁，于危难之中拍案而起，重新披挂上任，被百姓称呼为名副其实的抗战县长，领导腾冲民众，周旋在群山之中，游击办公兼游击指挥，整整两年，直到全歼日寇收复腾冲。张问德可谓文武全才，曾经是朱德和叶剑英两位大元帅青年时代的老师，亦可谓名师出高徒。面对日寇占领军的劝降，张问德有一纸《致岛田书》传世，展示在墓园陈列馆的台阶上。且不说文采，单是那义正辞严的凛然与决绝，如山岳巍峨，似江河咆哮，竖起处于危难之中一个不屈民族不可摧折的脊梁。我在诵读这篇写于五十九年前的文采激越的文字时，依然发生血液涌流的加速和心脏的猛跳。在滇西一隅的腾冲县正任和卸任的两个县长身上，截然分明着什么叫软骨头什么是硬骨头。

我对同行的朋友说，人的骨头的软硬，看来不是以年龄所能论定的。

2004年8月5 雍村

第三粒失球致使的摧毁

——老陈看奥运之一

下半场德国队攻进的第三粒入球，才是对中国女足的摧毁性的一击。

下半场开场到第三粒失球前的一段时间，中国队打得有板有眼，传接球到位，成功率高，进攻节奏加快，造成一种令我颇为振奋的也是期待的那种气势。赢球往往决定于这种气势。强者的自信才可能创造出这种气势，当然不可或缺的是较为扎实的基本功和训练有素的技战术套路。正是在这一时段里，我看到了被中国队的气势和连续几次极具威胁的进攻抑制住了的德国队，即使人高马大也颇见狼狈。我产生了起码打平的希望。然而，德国队一次成功的反击和准确的远射，攻进第三个球之后，局面顿然改变，中国队传接球失误频频，几乎没有与对方争抢和身体对抗的任何能力，场上连续出现失误，守门员几乎被打晕头了。即使到现在，我也觉得8:0的比分并不符合双方的实际水平。

这里便可看出最为致命的心理素养。对于一个球队来说，即使失掉三球，应该如何面对？还能不能保持乃至激发扳平的强烈欲望和自信，这是一种心理素养，不是一个人而是整个球队共同的心理质地。事实上，世界足坛各种赛场发生过许多次类似的战例。我清楚地看到了心理自信挫失后的不堪续看的场面。不服输是足球的基本精神。输到任何程度都应该保持不虚不软的心理气势。再退一步说，即使败局难以挽回，那么少输一球挽回一点面子和尊严的自信心决不能丧失。

看来，现在的中国女足不单是锋线上缺乏孙雯那样攻城拔寨的杀手，更缺失群体性以自强自信为心理质地的不服输精神。

这种精神，又岂止于女足，又岂止于体育竞赛种种项目？对从事任何职业的人，都是至关重要的。

2004年8月12日 西安

妩媚的回眸

——老陈看奥运之二

直到最后一粒子弹在靶心落定，女子10米气步枪冠军产生了，这是中国山东的一位小姑娘，名字叫杜丽。

那一刻杜丽回过头来，我看见一张尚未完全松弛下来的笑脸。笑得自然，笑得含蓄。那是高度集中的神经刚刚松绽时的本能的笑，一种生命真实的笑。那回眸一笑里，弥漫着动人的妩媚。

这是本届奥运会的第一块金牌。中国人历来讲究“开门红”，中国运动员如愿以偿实现了夺取第一块金牌的开战大吉。其实何止中国人，参赛的各国团队也都盯着这个“开门红”会“红”到哪一家门楣上。从开第一枪，我的心就攥紧了。每一枪击完，心也如螺丝拧紧一圈，电视直播的解说员张珊说她已经承受不了了。我很佩服小姑娘杜丽，越打越沉静，发挥自然愈出色，直到最后一枪创造出她年轻生命的辉煌。

等到开打第一枪，我的思路还完全集中在赵颖慧的手指上，既往优异的成绩使更多的观众注目于她。今天的某张报纸上有一位记者断言百分之八十的可靠性在赵颖慧的手指上。杜丽却脱“颖”而出了。我想到了杜丽发挥出色的非技术因素，即较少社会关注，较少领导寄望，反而少去了压力和包袱，反而甩开了，反而把最被舆论看好的强手打败了。这可能作为一条非专业技术性的经验，值得借鉴。

几年前，我跟朋友到陕西射击队参观，见到曾取得亚洲和全国3×20米步枪冠军芮青，她已经作为教练默默地培养着新手。她让我题词，我写下“凝眸”两字。意思再清楚不过，射击最能体现凝结一切智慧、技术和精神于一双明眸。芮青带着她的得意女弟子武柳溪到雅典去了，我企盼着她和武柳溪呈现给我如杜丽一样妩媚的回眸。久久的凝眸到回眸一笑的妩媚，正是所有实现创造理想的英雄们的共性。

2004年8月14日 雍村

一把铁勺走天下

蓝田县张彦文副县长告诉我一件喜事，蓝田被中国烹饪协会命名为“中国厨师之乡”了，不久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授牌仪式。

许是年龄日渐趋高引发的心理异变，我对家乡近年间发生的一动一静尤为敏感。我和朋友玩笑说我算半个蓝田人，原也不无因由。我的出生地蒋村，北边东边东南边都与蓝田县辖的大小村庄为邻，我的小学高年级就是在灞河北岸蓝田县油坊镇的小学就读的，路程也就二三里地。那个油坊镇是一个古老小镇，农历每到单日逢集，总是人山人海，包揽了南原（白鹿原）北岭（骊山南麓）和灞河川道的庄稼人，到这里来完成农林牧副产品的交易。这是我十二岁以前所能看见的最繁华的景象。在那个年龄区段属为深刻的记忆，是油坊镇的几样好吃食，至今想来仍禁不住口水渗溢。

首当麻罗油糕。瘦瘦的一位中年汉子，眼睛很灵活，手指摆弄着烫面团的灵动如同魔术，脸上有几颗淡淡的麻子，麻罗就得名了。那个油糕紫红油亮，鼓而不扁，竟然可以咬出酥脆的响声来，黑糖白糖和青红丝的内馅，清香可口。还有荞面饸饹，也是紫红的诱人的色泽，卖主按照你出手的钱数，一把就准确地抓起一团来，在抹过清油的枣木案板上反复弹拉，竟然一条不断，筋柔适度，然后调入细盐白醋蒜泥红辣椒，送到买客手里。我总是在饸饹客（卖主）做着一连串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动作时，早已咽着口水了。我后来进入社会，虽然到处都能吃到油糕和饸饹，然而总是找不到最美好也最原始的味觉感受和记忆。我后来在乡居的几年里，曾经多次去油坊镇，有油糕炸锅却没有麻罗的油糕，看来是失传了。饸饹还保存着，在蓝田县城的大

饭店和小摊担上，隐隐可以重新享受那种独特的美味。我常常在公差和私行路经蓝田县城时，得着机会就坐在饸饹摊子前，重新享受一次儿时美好的味觉记忆。

同样是在少不更事时，就听到过蓝田做厨师的人很多，通称勺勺客。关中人对那些从事某种特殊职业的人，常在职业名称之后缀一个客字，意即做这种活儿的人。比如卖蒸馍的叫馍客，杀牛卖肉的叫牛客，把卖豆腐的叫豆腐客，把抢劫杀人的土匪叫刀客。如依此惯例，导弹专家就是弹客，作家该是写客或者墨客了。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蓝田猿人发现之前，蓝田勺勺客早已闻名于世。我读过书的小学和中学的教工灶和学生大食堂里，我后来几经变更的工作单位的灶房里，至少都会有一位蓝田籍的厨师。就我的印象，蓝田厨师工作勤谨，做事踏实认真而脾气少，待人谦和，不强装笑脸也绝不倚一勺之权横眉食客，这恰是这个行当里的师傅最常见的职业病灶。单位喜欢用蓝田厨师，除专能技术外，善与人处更显出蓝田厨师的优长。

蓝田属于人类进化发源地之一，也是中华民族农业文明开发最早的地区之一，人口自然密集，越往后就越显出生存的拥挤和环境的局促。土地均配到人的比例越来越少，气候变化造成的干旱的肆虐，生存困境必然驱使人们寻求新的生存之路和谋生之道，这大约是蓝田多出厨师的最基本的因由。

成功者示范性的巨大影响力，鼓舞着也诱惑着更多的后生踏上此途，更坚定了这条谋生之路的可行性和可靠性。明末崇祯皇帝的御厨就是蓝田人，名叫王承恩，烹饪技艺超绝，又难得沉稳忠信的品行，被崇祯帝破格提拔为司礼监秉笔太监，名倾一时。可以想象其人在蓝田地域乡民之中的影响之深之广了。慈禧太后在八国联军攻陷北京仓皇西逃到西安，一路颠沛流离，难免饥不择食，昔日对食物千般挑剔

的矫情劣性自然省略了。慈禧落脚西安惊魂初定，自然急需补偿身体，地方臣僚就推上名厨，蓝田人李芹溪是也。以“金边白菜”领头的十余道菜肴，味道之鲜美，深得慈禧赏识，不仅在陕只吃李芹溪的菜，还要把“绸子李”带进行宫，三顿侍候。因李芹溪晋见时着一身绸衣，慈禧灵感一来就赐名为“绸子李”，并亲书“富贵平安”中堂赐赠。慈禧在为自己祝寿时，又是另一位蓝田厨师侯治荣的超绝手艺，使慈禧在百官面前骄傲了一回。“五月捧寿”“八仙过海”“八仙庆寿”“孔雀开屏”“嫦娥奔月”“八宝稀饭”这些吉祥美好的菜名和奇异的香味，都深得慈禧赞赏。尤其是拿手绝活“泡油糕”，权倾中国的慈禧居然眼未见过口未尝过，一下子就赞美有加了。我便有小小得意，虽然穷到积攒许久才可以买两个油糕的幼年的我，早在麻罗的油锅前享受其甘美了，而拥有国库的慈禧到垂暮之年才得一尝（一笑）。侯治荣也得到慈禧一串朝珠一件马褂的赐赏。王承恩、李芹溪和侯治荣的高超厨艺所获得的成功，影响到各级府衙争相聘用蓝田厨师，年轻人便竞相学厨。到清末民初，蓝田厨师已形成职业规模，在西北在全国各种大小厨房操铲执勺的厨师已过万人。乡谚曰：凡是冒烟（厨房）地方，都有蓝田乡党。

现在，人口为六十三万的蓝田县，厨师厨工已有三万余人，这确实是一个令人惊讶也令人振奋的数字。在“三农”问题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大事的今天，蓝田人找到了一条生存和致富的途径，自然，蓝田的领导人发展思路有关键作用，促进蓝田传统厨业上的独特优越之势，在竞争激烈的当代社会里得以扩展和壮大。实实在在为民造福，令我钦敬。

蓝田厨师正步入辉煌期。中国驻美国、俄罗斯、印尼、日本和欧洲诸国等几十个国家的大使馆里，都有蓝田厨师为那些经年不得归乡

的负有重大使命的外交官做着可口的中国饭菜；朝鲜已逝首相金日成，法国卸任总统密特朗，西班牙首相冈萨雷斯等多国首脑和无计其数的政要都品尝过蓝田厨师研究开创的“仿唐菜”；一批又一批蓝田厨师到巴黎、莫斯科、纽约、伦敦、东京这些世界性大都会，传授中国菜的烹饪技艺，不亚于中国功夫的传播；还有一些厨师已经升华羽化，进入理论研究和著书立说的境界，也有一批智者成为星级宾馆的管理人才。我可以重复一句古谚也是古训：“行行出状元。”蓝田在厨师职业行当里的状元，可谓人才辈出，鼎盛一时，声名远播。

我更感佩这样一个最基础层面上的意义，在一个拥有三万之众的厨师大军的蓝田县，三万余人从事着铲勺技艺的最切实的劳动，且不论服务于社会的意义，且不说对中国传统餐饮文化继承发展的作用，单是这三万余人和他们的家人所获得的诚实劳动者的自尊和自信，就具有精神和心理上深层的意蕴了。这也许是最可珍贵珍重珍视的东西。

2004年8月17日 雍村

失败 仍令我敬重

——老陈看奥运之三

中国女篮输给了西班牙女篮。我自然期盼胜利。当败局已定，我发觉没有接受失败的痛苦，甚至连遗憾都没有，倒是涨起一种敬重之情，一种令人敬重的失败。

上半场结束，中国女篮落后二十几分。到哨响战罢，中国女篮以八分落败，就意味着中国姑娘在下半场赢回来近二十分。上半场比分曾拉大到二十八分的时候，我对挽回败局已失去信心，甚至担心身体和体能都不及欧洲人的中国姑娘还会拉大比分差。然而战局正好朝着我习惯性思维的逆向发展，下半场开局后，场面开始悄悄地却也明显地发生变化，比分不再拉大而是缩小。直到第四节开始，中国姑娘有如神助，竟然威风八面，巧传和神投的灵光，不断闪现，把人高马大的西班牙姑娘搅得眼花缭乱，失误频频，虽不好说威风扫地狼狈不堪，至少可以用当下流行话说，找不见北寻不着感觉了。第四节伊始，中国姑娘竟打了对手一个8:0。真使人有转败为胜的兴奋期待。如果再有三五分钟延长期，或者这种扭转战局的神力早来三五分钟，胜败还真是说不定属于谁家。

我很自然想到了中德女足那场糟糕的比赛。我曾在观战短文里说到一个非技战术性的问题，即如何面对较大比分的落后局面。我看到了对这个问题最精彩也最具鉴示意义的阐释，这就是中西女篮之战。

我看到中国女足在三球落后时的心理自信的溃崩，由此带来蒙羞意味的0:8的结局。我又看到中国女篮以二十八分的大比分落后局面下

的另一种表现，不急不躁，尤其是不气馁不服输，而是通过半场较量，摸清对方套路，找到掐死对方战术套路的穴位，自己的优越就凸显了；抑制了对方的威风，自己就威风抖擞了；自己的灵光闪烁了，对方的灵光就大失颜色了。这叫此消彼长。长自己的威风灭对方的锐气，兵家和球场的通理。

失败是正常的。和胜利一样正常。在体育种类繁多的竞赛项目里，冠军只有一个，失败者总是大多数。有一种大家都敬奉的精神，叫作重在参与。就是参与一种人类进取的精神。技有优劣长短，气却不可轻易撒泄。这种精神实际上是人类进步、人类文明长途上共有的精神。正义对邪恶，光明对黑暗，或如一切发明创造技术革新，都是这种精神不断探求奋斗的结果。

我因此而敬重中国女篮姑娘。失败了，仍然令我敬重，或者说令我敬重的失败。

2004年8月17日 雍村

为女曲喝彩

——老陈看奥运之四

中国男篮以大比分败给西班牙男篮，一塌糊涂的输局惹得大将军姚明大发脾气。中国女篮接着又输给西班牙女篮，尽管我曾为中国姑娘的顽强拼劲所感动所敬重，毕竟还是败局。紧接着中国女子曲棍球队又遭遇西班牙，这回以3:0的结局赢了。单纯从中、西两个国家荣誉的视角，不说女曲队员为我们挽回面子之类的俗话，起码让我感到某种心理平衡。

分组赛迷雾散尽尘埃落定，中国女曲三战三胜，以打入三家对手球门八个进球不失一球的骄人战绩，可以称得上完胜，可以称得上干净利落，毫无拖泥带水之嫌。这样令人痛快淋漓的胜利，却听不到掌声和喝彩声；报纸只在一角旮旯里，发给赢得胜利的姑娘们小孩巴掌大一则消息，更吝啬版面难见她们飒爽英姿的画面了；记者和评家只忙着朝女足吐唾沫，忙着为被人看好也寄予厚望的女排惋惜（输于古巴），却把中国女曲姑娘这样漂亮的战绩冷漠了，轻淡了。我来为她们喝一声彩。

古诗词有"红了樱桃，绿了芭蕉"的绝妙佳句，描写两道各呈风姿的自然景观，原意并无高下轻重之别，不幸却被后人引申到喻示不平等待遇的歧义里。我以为对女子曲棍球的冷漠与此歧义不相干，尽管冷漠的现象已经发生了，却不是主观故意。曲棍球这个竞赛项目，即使在世界体坛，也只是在巴基斯坦几个少数国家被奉为第一运动，中国开展此项运动则更晚，不为人所关注也是客观的。其实，曲棍球虽

小到可以归入乒乓羽毛球一类小球，而比赛的场面却类似足球，参赛人数也与足球同为十一人，比赛的激烈几乎不亚于篮、排、足球。对相对来说刚刚开展不长时间的中国女曲，近两年取得不俗战绩，进入世界女曲强队的显眼位置，在举世瞩目的奥运会上，以一球不失的全胜战绩打进半决赛，真是值得大声喝彩。

中国女曲请来一位难得的好教练，韩国人金昶伯。我在电视画面上所见到的那张瘦长条脸和两只与中国人无异的黑眼睛，给我一个固定的印象，只专注场上风云而再没有任何东西，没有进球的狂喜，也不见逆境时的怒形于色，从头至尾都是略呈焦急揪心的紧张和专注，几乎看不到我们在这种场合里见惯了的各种所谓风度。然而这个人成功了。他把中国女曲调教成一支世界强队，早已成功；现在又进入奥运女曲四强，又是成功；能在下来的比赛里夺得冠军或亚军，更是了不起的成功；即使拿个三名或四名，还是成功。

一个真有两下子而又不摆花架子的教练，决定着女曲的技术和作风风貌。我为韩国金昶伯先生鼓掌，尽管你永远都是低调。

一个训练有素迅速崛起的女曲球队，为中国人在希腊已经争得不俗的成绩，我为女曲姑娘喝彩，再喝彩。

2004年8月19日 雍村

话说梦游

——老陈看奥运之五

美国男子篮球队被波多黎各队打败，不管美国人怎样难以接受这个始料不及的痛苦，媒体舆论却多是幸灾乐祸。尽管体育竞赛最能显示国家和民族的荣誉，基本与国家之间的政治和外交关系无涉。美国与波多黎各既无世仇，亦无近恶，即使布什打伊拉克各国政府有不同态度，但与这场球赛毫不沾边。那么幸灾乐祸因何而来？我唯一能想到的一点，美国篮球太强大了，美国国内的NBA联赛的影响自不必说，国家男篮许多年来几乎谁也难以撼动霸主地位。你太强大了。你赢得太多也风光得太多了。美国以外的观众就想看一回你的失败，满足某种并无恶意的看常胜将军败走麦城的狼狈样子的心理需要。人往往有这种说来颇觉不可思议却普遍发生的心理情绪。

在所有调侃撇腔的风凉话里，把美国男篮“梦之队”戏谑为“梦游队”最富于想象也最调皮。梦原本是一种理想，梦游却是一种病魇。我看过那场比赛，美国那些篮坛超级明星在场上的表现，真有点梦游症患者的征象。不过我以为他们可能是小瞧了对手波多黎各而铸成的大错。直到昨晚看他们和澳大利亚男篮的比赛，才发觉我的判断只在皮毛表象，根本不是轻敌，更不是技战术出了偏差，确凿是美国队员患上了类似梦游症病人的病灶。无须复述他们在场上种种表现的别扭，仅一个细节就足以看出他们怎么梦游了，这些在篮坛声名赫赫的老将和新秀，连续四次都把球投不进篮筐，而且全都在罚球圈周围，而且是属于同一次进攻的四次连续不中。我便信了澳大利亚队员赛前的调

皮话："让美国人再继续一次全场梦游。"比分曾经拉大到十三分，澳大利亚一路领先，气势不减。

美国队队员从第三节渐渐从梦游症里走出来。到第四节就打疯了，或者说疯打起来了。在守方和攻方队员拥挤的人堆中，居然能连续带球连续过人上篮把球投中；仅仅两人一次传接，就准确完成了空中接力，扣篮的动作优雅如同杂技；沿着底线歪七趔八绕过两名防守到篮下勾手一扣命中，绝对不可能是教练导师传授的技艺，而是只有打疯了的状态下才能发生的超常现象。美国人赢了。澳大利亚队赛前的预言落空，美国队员顶多梦游了不足三十分钟，醒来后只需十分钟就赢了整场比赛。

我已经不关心孰胜孰败。我对赛场上常说的"不在状态"倒是突生兴趣。梦游就是"不在状态"的形象化描述。看来造成不在状态的通常所说的原因，诸如轻敌、过度疲劳等原是不大准确的诊断。我想可能出于生命本身某种神秘的东西，只是尚未揭示而已。乡谚早已有传：人一日有三昏六迷七十二糊涂。就是归结的这种至今说不清摸不准治不好的梦游征象。其实在社会的很多领域，也发生此类现象：你怎么弄都弄不好你想弄的事，你越想弄好越弄不好。这状况甚至延续三年五年，也是常有的事。

如何找到自己调节状态摆脱梦游的办法，达到生机勃勃的运动状态，对于从事任何具有创造意义的事业的人来说，都不可忽视和盲目，更不要信鬼。

2004年8月20日 雍村

胜者的平静与败者的微笑

——老陈看奥运之六

我喜欢观赏体育竞技比赛，似乎没有受什么人的影响和诱导，而是从年轻时候就发生的兴趣偏向。谁都知道人的兴趣各异，跟性格难以逆转一样。麻将响遍中国城乡多年，我至今认不得那精致的方块上的圈圈点点等符号，但我尊重有麻将瘾的人，跟别人尊重我的足球兴趣一样。

在体育竞技项目中，尽管我首选足球，却不局限此球，篮球排球乒乓球再加曲棍球，还有跳水游泳和体操等，我都喜欢观看。也有不喜欢的体育项目，比如柔道，横看竖看都看不出兴趣来，连那专业服装也觉得别扭；拳击也不喜欢，感觉太野蛮太残忍；还有举重，看去太单调，缺乏变化，尤其是大重量级的项目，人都肥得失了形，很难感受人体运动时的那种美的旋律和韵致。

昨天晚上看唐功红举重，我的兴趣大大被激发起来，而且感动得难以自已。

这是本届奥运会中国夺得的第十八枚金牌，为国争光完成预计任务之类的光荣和骄傲自不必说，我感动的是人在某种特定的竞争环境和氛围里，所爆发的超乎想象的奇异到不可理解的功能。唐功红之前的韩国选手张美兰最后一举的成功，从她极度兴奋所爆发的吼叫挥拳的举动可以看出，冠军已经攥到手心了。我也觉得非她莫属了。唐功红要想夺冠，必须举起182.5公斤，比前一把整整增加十公斤。在所有同台竞争者已经偃旗息鼓只剩两人对抗的最后关头，一次加码十公斤

的重量，在举坛历史上如果不是绝无仅有，肯定也是难得一见的事。然而唐功红成功了。无论怎样惊诧不可思议，奇迹在那一瞬成为事实。

我很难信服常说的为了什么又为了什么而获得力量的话；也难以信服什么优势加什么优势完成此举；甚至把唐功红和她的父母至今还睡乡村土炕的事都搜罗出来，作为一个由头。睡土炕或睡席梦思都与昨夜非凡的一举无关。我倒注意起唐功红四年前在悉尼落败给张美兰后回去说的一句话：“我不服气。”输是输了，却不服气。不服气，就理智地总结失败原因，寻找新的突破的出路，自然不可或缺苦练，果然就把四年前胜过她的同台竞争者战胜了。这是体育竞赛的基本精神和长盛不衰的永久性魅力。如果唐功红服气了甘拜下风了，就没有今晚惊天撼地魅力四射的一挺一举，也没有举重新纪录的产生。看来，体育竞争比其他行业的竞争要规矩得多干净得多，官场商场和其他种种场上的竞争，充斥着阴谋谎言欺诈贿赂收买和陷害，还有鸡肠小肚的猜疑言不由衷的奉承迷离晦暗的诋毁，其实都是缺乏如唐功红再度实现突破的自信的并发症状。真正确信自己具备完成新目标的突破的信心和实力的人，反而很平静，她明白该从何处着手何方着眼何地着力。达到了这个新目标的唐功红依旧很平静。

我恰恰从韩国姑娘张美兰在颁奖台上迷人的笑容里，充分感受到上述这种最可珍贵的自信。张美兰站在亚军的领奖台阶上，从头至尾，即从跨上台阶到走下那个台阶，一直保持着轻松自然的微笑，甚至在走下颁奖台让记者拍照时，对唐功红还有一个亲昵的倾身的动作。我被那微笑和倾身的动作深深地感染了触动了。那是怎样美好的一个微笑！既体现着一种高尚的修养，也展示出一种高贵的风采；既是对同台竞争对手所创造的成就的尊重，也是对钟爱着同一事业的自

己的尊重。当然，这微笑里也许蕴藉着更强烈的“不服气”。把“不服气”用平静而高贵的微笑表现出来，就预示着实现新的目标完成更大突破的自信。我期待张美兰在未来的某个世界性举重赛事中，传来好消息。

2004年8月22日 雍村

在河之洲

汽车驶出古城西安东门，不久就进入麦深似海的关中平原的腹地。时令刚交上五月，吐穗扬花的小麦一望无际，眼前是嫩滴滴的密密匝匝的麦叶麦穗，稍远就呈现为青色了。放开眼远眺，就是令人心灵震颤的恢宏深沉的气象了。东过渭河，田堰层叠的渭北高原，在灰云和浓雾里隐隐呈现出独特的风貌，无论立陡的险坳，无论舒缓的慢坡，都被青葱葱的麦子覆盖着，如此博大深沉，又如此舒展柔曼，无法想象仅仅在两个月之前的残破与苍凉，顿然发生对黄土高原深蕴不露的神奇伟力的感动。

我的心绪早已舒展欢愉起来，却不完全因为满川满原的绿色的浸染和撩拨，更有潜藏心底的一个极富诱惑的企盼，即将踏访两千多年前那位“窈窕淑女”曾经生活和恋爱的“在河之洲”了。确切地说，早在几天之前朋友相约的时候，我的心里就踊跃着期待着，去看那块神秘莫测的“在河之洲”。

我是少年时期在初中语文课本上，初读那首被称作中国第一首爱情诗歌的。无须语文老师督促，一诵我便成记了，也就终生难忘了。“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许是少年时期特有的敏感，对那位好逑的君子不大感兴趣，甚至有莫名的逆反式的嫉妒，一个什么样儿的君子，竟然能够赢得那位窈窕淑女的爱？在河之洲，在哪条河边的哪一块芳草地上，曾经出现过一位窈窕淑女，而且演绎出千古诵唱不衰的美丽的爱情诗篇？神秘而又圣洁的“在河之洲”，就在我的心底潜存下来。后来听说这首爱情绝唱就产生在渭北高原，却不敢全信，以为不过是传说罢了，而渭河平原的历史传说太多太多

了。直到朋友约我的时候，确凿而又具体地告诉我，在河之洲，就是渭北高原合阳县的洽川，这是大学问家朱熹老先生论证勘定的。朱熹著《诗集传》里的《关雎》篇，以及《大雅·大明》的注释，有“在洽之阳，在渭之涘”可佐证，更有“洽，水名，本在今同州合阳夏阳县”，指示出不容置疑的具体方位。合阳即今日的合阳县，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还沿用古体郃字作为县名，后来为图得简便，把右边的耳朵削减省略了，合阳县就成今天通用的合阳县了。洽水在合阳县投入黄河，这一片黄河道里的滩地古称洽川，就是千百年来让初恋男女梦幻情迷的“在河之洲”。我现在就奔着那方神秘而又圣洁的芳草地来了。

远远便瞅见了黄河。黄河紧紧贴着绵延起伏的群山似的断崖的崖根，静静地悄无声息地涌流着。黄河冲出禹门，又冲出晋陕大峡谷，到这里才放松了，温柔了，也需要抒情低吟了，抖落下沉重的泥沙，孕育出渭北高原这方丰饶秀美的河洲。这是令人一瞅就感到心灵震颤的一方绿洲，顿然便自惭想象的狭窄和局限。这里坦坦荡荡铺展开的绿莹莹的芦苇，左望不见边际，右眺也不见边际，沿着黄河也装饰着黄河，竟有三万多亩，那一派芦苇的青葱的绿色所蕴聚的气象，在人初见的一瞬便感到巨大的摇撼和震颤。我站在坡坎上，久久说不出一句话来，那方自少年时代就潜存心底的“在河之洲”，完全不及现实的洽川之壮美。

芦苇正长到和我一般高，齐刷刷，绿莹莹，宽宽的叶子上锈积着一层茸茸白毛，纯净到纤尘不染。我漫步在芦苇荡里青草铺垫的小道上，似可感到正值青春期的芦苇的呼吸。我自然想到那位身姿窈窕的淑女，也许在麦田里锄草，在桑树上采摘桑叶，在芦苇丛里聆听鸟鸣，高原的地脉和洽川芦荡的气韵，孕育出窈窕壮健的身姿和洒脱清爽的质地，才会让那个万众景仰的周文王一见钟情，倾心求爱。我便

暗自好笑少年时期自己的无知与轻狂，好逑的君子可是西周的周文王啊，哪里还有比他更能称得起君子的君子呢！一个君王向一个锄地割麦采桑养蚕的民间女子求爱，就在这莽莽苍苍郁郁葱葱的芦苇荡里，留下《诗经》开篇的爱情诗篇，萦绕在这个民族每一个子孙的情感之湖里，滋润了两千余年，依然在诵着吟着品着咂着，成了一种永恒。

雨下起来了。芦苇荡里白茫茫一片铺天盖地的雨雾，腾起排山倒海般雨打苇叶的啸声，一波一波撞击人的胸膛。走到芦苇荡里一处开阔地时，看到一幅奇景，好大的一个水塘里，竟然有几十个人在戏水，男人女人，年轻人居多，也有头发稀落皮肉松弛的上了年岁的人。这个时月里的渭北高原，又下着大雨，气温不过十度，那些人只穿泳衣在水塘里戏闹着，似乎不可思议。这是一个温泉，名处女泉，大约从文王向民间淑女求爱之前就涌流到今天了。温泉蒸腾着白色的水汽，像一只沸滚的大锅，一团一团温热湿润的水汽向四周的芦苇丛里弥漫，幻如仙境。洽川人得了这一塘好水，冬夏都可以尽情洗浴了，自古形成一个风俗，女子出嫁前夜，必定到处女泉净身，真是如诗如画。洽川这种温泉在古籍上有一个怪异的专用汉字——瀵。自地下冒涌出来，冲起沙粒，对浴者的皮肤冲击搓磨，比现代浴室超豪华设施美妙得远了。在洽川，这样的瀵泉有多处，细如蚁穴，大如车轮。《水经注》等多种典籍都有生动具体的描绘。现在成了各地旅客观赏或享受沙浪浴的好去处了。

这肯定是我见过的最绝妙的温泉了，也肯定是我观赏到的最壮观最气魄的芦苇荡了，造化给缺雨干旱的渭北高原赐予这样迷人的一方绿地一塘好水，弥足珍贵。我在孙犁的小说散文里领略过荷花淀和芦苇荡的诗意美，前不久从媒体上看到有干涸的危机，不免扼腕；从京剧《沙家浜》里知道江南有一处可藏匿新四军的芦苇荡，不知还有芦

苇否？芦苇丛生的湿地沙滩，被誉为地球的肺。无须特意强调，谁都知道其对于人类生存不可或缺的功能。

我便庆幸，在黄河滩的洽川，芦苇在蓬勃着，温泉在涌着冒着，现代淑女和现代君子，在这一方芳草地上，演绎着风流。

2004年9月21日 雍村

柴达木掠影

出敦煌城，满眼都是变幻着色彩的沙子。无边无际的沙丘沙梁和沙地，金黄金黄的，灰白灰白的，淡青淡青的，铺天盖地的沙漠没有期望里的变化，仅仅是沙子的颜色淡了浓了在变幻着。进入祁连山，沟底和山坡上有绿草生长，尽管可以看出干旱施虐下存活的艰难，毕竟是绿色生命，毕竟带给人一种鲜活。远处的祁连山是凛凛的赤裸的峰峦和沟壑，有几处可以看到峰顶上闪闪发亮的积雪。翻过祁连山，又是砾石堆积的戈壁，零星的骆驼草顽强地在这里宣示着生命。偶尔可以发现一只小小的蓝底白翅的小鸟，从这蓬骆驼草飞到另一丛，使这无边沉寂的漠地有了一点灵动。

进入柴达木腹地，便进入生命的绝地。一株草一只蠓虫都绝迹了。地表是如同刚刚得到细雨润湿的黑油油的土壤，踏上去竟然坚硬如铁，这是经过盐渍造成的奇异景象。薄薄的土层下，是青石一般坚硬的盐层，深不知底。柴达木意译是盐渍。性能精良的越野车，在沙漠戈壁行进了整整九个小时，陪伴左右的祁连山隐去了，阿尔金山扑入眼来了，白雪皑皑的昆仑让人生出走到天尽头的错觉。我已经知晓，一九五四年早春，在西安组建的第一支石油勘探队从敦煌开始行程，用脚步并借助骆驼横穿过沙漠和戈壁，历时半月，到达我们即将抵达的尕斯库勒湖畔。他们吃自己背着的干粮。他们走到哪儿就在哪儿的沙地上挖坑（地窝子）夜宿。在关中已经是柳絮榆荚飘飞的春景，柴达木依然是严寒的冬天，夜晚沙坑里彻骨的冰冷是可以想见的。最严酷的是根本找不到淡水。我从当年那些首闯绝地的勘探者所写的回忆短文里，首先感动的是朴实无华坦诚平静的叙述，对于任谁

都可以想象的绝地里的困难，绝无渲染辞藻。这样的叙述反倒令人感受到创业者的豪迈和威势，读来令人产生对某种远逝的纯情的怀念。

我已经看多了造型各异令人眼花缭乱的高楼大厦，看多了越来越精致的城市绿地和花卉，越变越华丽越雅致的地毯和壁饰。我现在置身于寸草不生蠓虫不飞严酷到连一口淡水也找不到的柴达木。把赤裸的祁连山赤裸的阿尔金山冰雪闪亮的昆仑山揽入视野纳入心胸，对我的心境和心态是一种无可替代的良好的调节，起码不至于仅仅把眼光流连在人工制造的草地花丛地毯壁饰的色彩和图案上，人的情趣需要带着严酷意味的荒漠群山的调节。

远远便瞅见昆仑山脚下尕斯库勒湖蓝莹莹的好水。人在干枯单调的荒漠里整整走过九个小时，对眼前突然出现的这一湖好水的亲近是强烈的，况且是融雪汇聚成湖的纯净的水，绿色就环绕着湖水而蓬勃着生气了。我们来到一座高耸的碑塔前，这是柴达木打出第一口油井的井址，站在这个碑塔下，感知那种令人肃然起敬的创业者的神圣和尊严。

花土沟是发现油砂石的地方，在连绵不断的如同被大火燎烧过的群峰之中。汽车在山间盘旋而上，残破的山梁残破的沟坡残破的山峰，在见惯了黄土高坡的我的感觉里，仍然是不堪。就在这样的沟壑间山梁上，这里那里都竖立着正在掘进的井架，悠悠然有节奏运转着的抽油机，黑色的输油管或凌空飞架或顺地铺设，我可以想象技术人员和工人完成每一道工序的艰难，更感佩把石油采出的意志力。

花土沟山顶上立着一块石碑，铭记着这里是首先发现油砂石的地方。一九四七年，一支仅剩下三人的石油勘探队，几乎是在绝望中听到一个什么人说这儿有一种可以点燃起火的石头，欣喜若狂，立马赶

到这里，发现了山峰和山沟里裸露着的油砂石，这是潜藏石油最可靠的资料了。石碑上镌刻着那三个发现者的名字。这块石碑，完整记录了柴达木石油勘探开采的历史，一种令人感佩的科学态度。我接受了油田一位朋友随手捡拾的一块油砂石，尽管早已干涸，仍然可以闻到一股油腥气味，颜色是被石油浸渍过的紫黑色。我在看着摸着嗅着这块来自地心的不寻常的石头时是平静的，不过有一点好奇，却可以理解那三位勘探者抓到它时的狂欢，那对他们来说是发现，是求证的证据，是理想的实现。也可以理解一九五四年的勘探队在此打出第一口油井的狂欢，应该是献给刚刚建立不久的新中国的一份厚礼。从那时开始，到我以参观者的身份到这里来的时候，整整经过了五十年，新的井架还在搭建，油井还在出油，新的年生产指标还在提升。一茬接一茬的石油人在这里付出了汗水心血和青春，又一茬年轻人继续活跃在平川里和沟壑间，依然是一丝不苟的全身心投入，依然是面对戈壁所有艰辛的顽强和乐观。

还有开创者的诗性情怀。他们为柴达木取下一批极富诗意的地名，这是这些处女地自形成以来的第一次命名。花土沟是依山峰和沟坡的颜色命名的。冷湖这个名字取得多么别致，怕是大学问家也未必能推敲得到。还有一个南八仙，就不仅仅是文字上的光彩了，而是一种虔诚的缅怀。一个由八位女子组成的勘探队，走出营地后消失了，无影无踪地消失在柴达木荒漠上，一缕布条一页纸片都没有残留。战友们在搜寻绝望之时给她们失踪的地方命名为南八仙。愿这些报效国家的巾帼英雄，化为天仙。

在柴达木一路走来，超出想象的大自然的严酷，对我发生着连续的冲撞；传说的和墨写的开发柴达木的英雄业绩，对我也发生着令人由衷感动感叹的冲撞：眼见的正在掘进的钻机和悠然运动的抽油机，

穿着溅有油痕制服的技术人员和工人，一张张自信而又鲜活的脸孔，有一种更富活力的冲撞。尽管我不可能加入这种环境下的这一群劳动者的行列，却乐意接受这种冲撞，增强精神和心理的钙质，更踏实更从容地面对生活。

2004年9月30日雨晨 雍村

借助巨人的肩膀

——翻译小说阅读记忆

平生阅读的第一部翻译长篇小说，是《静静的顿河》。尽管时过四十多年，我仍然确信这个记忆不会有差错，人对自己生命历程中那些第一次的经历，记忆总是深刻。

从学校图书馆借这部小说时，我还不知道它是一部名著，更不了解它在苏联和世界文坛的巨大影响。那是我对文学刚刚发生兴趣的初中二年级，“反右”正在进行。我的语文老师是一位初出茅庐的中文系大学生，常常在语文课堂上逸出课本内容，讲某位作家某位诗人被打成“右派”的事，尤其是被称为“神童”的刘绍棠被定为“右派”，印象最深刻了。好奇心也在同时发生，天才、神童，远远比那个我尚不能完全理解其政治内涵的“右派”帽子更多了神秘色彩，十分迫急地想看看这个“神童”在与我差不多接近的年龄所写的小说。课后我就到学校图书馆查阅图书目录，居然借到了《山楂村的歌声》短篇小说集，大约是学校图书馆尚未来得及清查禁绝“右派”作家的作品。大约是在这部小说集的“后记”里，刘绍棠说到他对肖洛霍夫的崇拜和对《静静的顿河》的喜欢。“神童”既然如此崇拜如此喜欢，我也就想见识这部长篇小说了。看到在图书馆书架上摆成雄壮一排的四大本《静静的顿河》，我还是抑制了自己的欲望，直等到暑假放学，我便把这四部大著背回乡村的家中。

我知道了地球上有一条虽然不大却很美丽的河流叫顿河。这个顿河总是具象为我家门前那条冬日清冽夏日暴涨的灞河。辽阔的顿河草

原上的山冈，舒缓柔曼的起伏转承的线条，也与我面对着的骊山南麓的坡岭和白鹿原北坡的气韵发生叠印和重合。还有生动的哥萨克小伙子葛利高里，风情万种的阿克西尼亚。我那时候忙于自己的生计，每逢白鹿原上集镇的集日，先一天下午从生产队的菜园里趸取西红柿、黄瓜、大葱、茄子、韭菜等，大约五十斤，天微明时挑到距家约十华里的原上去，一趟买卖可赚一二元钱，整个暑假坚持不懈，开学时就可以揣着自己赚来的学费报到了。集日的间隔期里，我每天早晨和后晌背着竹条大笼提着草镰去割草，或下灞河河滩，或者爬上村庄背后白鹿原北坡的一条沟道，都会找到鲜嫩的青草。虽然因为年幼尚无为农业合作社出工的资格，而割草获得的工分比出工还要多。我在割草和卖菜的间歇里，阅读顿河哥萨克的故事，似乎浪漫到不可思议。我难以理解故事里的人物和内蕴，本属正常。所有这些也许并不重要，有幸的是感受到我的生活范围以外的另一个民族的生活形态，视野抵达一个几乎找不到准确方位的遥远的顿河草原，生活在那里的人们的快乐和悲伤竟然牵动着我的情感，而我不过是卖菜割草的一个尚未成年的乡村孩子。我后来才意识到，我喜欢阅读欧美小说的偏向，就是从这一次发生逆转的，从“说时迟，那时快”的语言模式里跳了出来。

另一次难忘的阅读记忆发生在“文革”期间。我已经几年都不读小说了。“文革”一开始，以“三家村”为标志的作家们的灾难，使我这个刚刚在地方报纸副刊上发过几篇散文的业余作者，终于得出一个最现实的结论，写作是绝对不能再做的事了。我把多年来积累的日记和生活纪事，悄悄从学校背回乡下家中，在后院的茅房里烧毁了，也就把因为一句不恰当的话而招致灾难的担心解除了。我后来被借调到公社（乡）帮忙，遇见了初中的地理科任老师。他已经升为我们公社地区唯一一所中学的校长，“文革”中惨遭批斗，新成立的“革委会”拒不“结合”他。公社要恢复“文革”中瘫痪多年的基层党支部，他也被借调来公

社帮助工作，我和他就重新相聚了。我听他说来此之前在学校闲着，分配他为图书管理员。这一瞬我竟然心里一动，久违了的好陌生的图书馆呀。他说学校的图书早已被学生拿光了，意在他这个管理员是有名无实。我却不甘心，总还有一些书吧？他不屑地说，偷过剩下的书在墙角堆着。我终于说服了他，晚上偷偷潜入校园，打开图书馆的铁锁，不敢拉亮电灯，用事先备好的手电筒照亮，在那一堆大多被撕去了书皮的书堆里翻拣。真是令人喜出望外，我竟然获得了《悲惨世界》《血与沙》《无名的裘德》等世界名著。我把这些书装入装过尿素的塑料袋，绑捆到自行车后架上，骑车出了学校大门，路边是农民的菜地，如做贼得手似的畅快。我的老师再三叮嘱我，绝对不能让任何人看见这些书，我便发誓，即使不慎被谁发现再被揭露，绝不会暴露书的真实来处，打死我都不会给老师惹麻烦。

于是就开始了富于冒险意味的阅读。这大约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事。处于“文革”中期的整个社会氛围是难以确切描述的，我只确信一点，未曾亲自经历过的人是不可能有那种亲历者的直接感受的。大约也就在这个时候，八个样板戏里的头几个样板被推出来。整个社会都挥舞着一把革命的铁帚，扫荡“封资修”——那些古今中外的优秀文化和文学遗产。我在一天工作之后洗了脚，插死门扣，才敢从锁着的抽屉里拿出那本被套上“毛选”外皮的翻译小说来，进入一种最怡静也最冒险的阅读，院子里传进来干部们玩扑克为一张犯规的出牌而引发的争吵。最佳的阅读气氛是在下乡住到农民家里的时候。那时候没有电视，房东一家吃罢晚饭就上炕睡觉了，在前屋后窗此起彼伏的鼾声里，我与百余年前法国的一位市长冉阿让相识相交，竟然被他的传奇故事牵肠揪心难以成眠；抑或是陌生到无法想象的西班牙斗士，在斗牛沙场和社会沙场上演绎的悲剧人生；还有那个“多余人”裘德，倒是更能切近我的生活，尽管有种族习俗和社会形态的巨大差异，然而作

为社会底层的被社会遗忘的“多余人”的挣扎和痛苦，却是穿透任何差异的共通的心灵情感，甚至可以作为我理解自己身边那些乡村农民的一个参照。许多年以后，我才从开禁的有关资料中得知，《无名的裘德》是欧洲文坛曾经颇有影响的写社会底层“多余人”文学潮流的代表作之一，包括高尔基也写过这类人物和很具影响的一部长篇小说，名字记不得了。

这应该是我文学生涯里真正可以称作纯粹欣赏意义上的阅读。此前和后来的阅读，至少有“借鉴”的职业性目的。此时此境下的阅读纯粹是欣赏，甚至是消遣，一种长期形成的读书习惯所导致的心理欲望和渴求。因为“文革”开始我就不再做作家梦了，四五年过来，确凿不再写过任何属于文学色彩的文章。读着这些世界名著的时候，也没有诱发写作欲望或重新再做作家的梦想，然而我依然喜欢阅读。阅读这些一概被斥为“封资修黑货”的小说，耳朵里灌进的是以毛主席语录谱写的歌曲，还有样板戏的唱段，乡村树杈上的高音喇叭从早到晚都在向田野和村庄倾泻着，在我的心里，正好是无产阶级文艺和资产阶级文艺全面对抗尖锐冲突“你死我活”的双方交战的场面。我那时尚不能做出判断，以“样板戏”为代表的中国无产阶级文艺如何发展前景怎样，然而却确实发生最基本的属于常识层面上的怀疑，欧洲的无产阶级和穷人喜欢如《悲惨世界》《血与沙》《无名的裘德》等这一类作品，我不可能有任何片纸只言的资料，所在只能依常情常理来推测。依据仍然是这些文本，它们都是为劳动者呐喊的呀。我至今也无法估量发生在“文革”中间的这种最纯粹的阅读，对我后来创作的发展有何启示或意义，但有一点却是不可置疑的，欧洲作家创造的这些不朽作品，和我的情感发生过完全的融汇，也清楚了一点，除过八个样板戏，还有如上述的世界名作在中国以外的世界上传诵不衰。

还有一次发生在“文革”后期的阅读是难忘的。大约是一九七五年春天，我到西安电影制片厂去改编电影剧本，意料不到地读到了苏联作家柯切托夫的几部长篇小说。需稍作交代，此前两年，被砸烂了的省作家协会按照上级指示开始恢复，在农村或农场经过劳动改造且被审定没有“敌我矛盾”的编辑和作家，重新回到西安，着手编辑文学刊物。为了与原先的“文艺黑线”划清界限，作家协会更名为创作研究室，《延河》杂志也改为《陕西文艺》。老作家们虽被“解放”，仍然不被信任，仍然心有余悸，“工农兵”业余作者一下子吃香了。我也正是在这时候写下了平生的第一个短篇小说，且被刚刚恢复业务的西影厂看中，拟改为电影。我到西影厂以后，结识了几位和我一样热心创作的业余作者。记不清谁给我透露，西影厂图书资料室有几本“内部参考”小说，是供较高级领导干部阅读参考的，据说这几本小说揭露了“苏联修正本义”的内幕。我经过申请，得到有关领导批准，作为写剧本的业务参考，破例破格阅读“高干”的参考书。

第一本是《州委书记》。作者是柯切托夫。这部小说写了两个苏共的州委书记，拿我们的习惯用语说，一个实事求是做着一个州的发展和建设工作，另一个则是欺上瞒下虚夸成绩搞浮夸风。前者不断受挫，后者屡屡得手于表彰升迁等。结局是水落石出，后者受到惩治，前者得到伸张。依着今天我们的眼界来说，这部小说的主旨和人物几乎没有什么新颖之处。然而在一九七五年的时空下，我的震撼和兴奋几乎是难以抑止的。一九七五年再度加压的政治气氛，却无法堵住中国人私下的议论，包括直白的诅咒和谩骂，这应该是施虐近十年的极左路线穷途末路的一个先兆。我可以和几位朋友在私下里谈《州委书记》。我甚至以为把作品人物名字换成中国人的名字，把集体农庄换成公社或生产队，读者的感觉就会毫无差异。就当时而言，柯切托夫揭示的苏联社会问题，在中国的实际生活里更普遍也更尖锐，然而中

国却集中到几乎是莫须有的“路线斗争”。更令我惊讶的是，我们作为揭露苏共修正主义的标本，在苏联却照常销售普遍阅读，如若中国有一位写出类似作品的作家，且不说能否出版，肯定性命都难保全。

兴趣随之由作品转移到作家本身，柯切托夫创作历程中的几次转折似乎更富于参照意义。我连续在西影图书馆借到了柯切托夫的两本长篇小说，都是“文革”前已经翻译出版的《茹尔宾一家》和《叶尔绍夫兄弟》，以城市家族的角度，写产业工人在社会主义劳动中的英雄主义精神，都公开出版发行的。这个以写和平建设时期的英雄而在苏联和中国都很有名气的作家，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把笔锋调转到另一个透视的角度，揭示苏共政权机关里的投机者，以至他的《州委书记》等长篇成为中国“高干”了解“苏修”社会黑幕政权质变的参照标本。柯切托夫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转折？显然不是艺术形式追求变化层面上的事，而是作家的思想。作家思想发生了怎样的变化？是什么东西促成了柯切托夫的这种变化和视点的转移，当时找不到任何可资参考的资料。我唯一能做出判断的是，这既需要强大的思想穿透力，也需要具备思考者的勇气。

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柯切托夫的作品重新出现在新华书店的售书架上，包括曾经作“高干”内参的《州委书记》。我在从书架上抽出这本小说交款购买的简短过程里，竟然有一种无名的感叹，不过六七年时间，似乎有隔世的陌生而又亲切的矛盾心理。不久又见到《你到底要什么》，柯切托夫直面现实的思考和发问，尖锐而又严峻，令人震撼。这个书名很快在中国普及，且被广泛使用。随后又购买到了《落角》，柯切托夫的变化再一次令我惊讶，无论从思想到艺术形式，几乎让我感觉不到柯切托夫的风格了，有点隐晦，有点象征，更多着迷雾，几乎与之前的作品割断了传承和联系。转折如此之大，同

样引起我的兴趣，柯切托夫自己“到底要什么”？尽管我难以作出判断，却清楚地看到一个作家思想、情感以及艺术形态的发展轨迹，早期歌颂英雄的鲜明立场和饱满的情感，转折到对生活里虚伪和丑恶的严厉批判揭露，再到对整个社会和人群发出严峻的质问，“你到底要什么”，一时成为整个社会都无法回避的问题，最后发展到晦涩的《落角》，我都不大读得懂了。自然是作家主体的思想和情感发生了变化，然而是什么东西促成了这种变化，我却无法判断。隐蔽在晦涩文字下的情绪，直接感到那个曾经洋溢着热情闪烁着敏锐思想光芒的柯切托夫可能太累了，且不断定其失望与否。这样一个曾经给我们提供过“参考”样本的作家，死亡时，苏共党魁勃列日涅夫亲自参加了他的追悼会，似乎并不计较他对苏联社会的揭露、批判、诘问和某种晦涩的失望。

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在省作协院子里，出现过一阵苏联文学热。中苏关系解冻，苏联文学作品有如开闸之水，倾泻过来，北京两所外语高校编辑出版了两本专门翻译介绍苏联作家和作品的杂志《苏联文学》和《俄苏文学》，这是空前绝后的事，可见对苏联文学之热不单在我的周围发生，而是一个范围更大的普遍现象。我把这两本杂志连续订阅多年，直到苏联解体杂志停刊，可见对苏联文学的关爱之情。我通过这两本杂志和购买书籍，结识了许多苏联作家。我那时候住在乡下老家，到作家协会开会或办事，常常在《延河》编辑兼作家王观胜的宿办合一的屋子里歇脚，路遥也是这个单身住宅里的常客，话题总是集中到苏联作家和作品的阅读感受上。艾特玛托夫、舒克申、瓦西里耶夫，还有颇为神秘的索尔仁尼琴，等等，各自阅读体验的交流，完成了互补和互相启示，没有做作，不见客套，其本质的获益肯定比正经八百的研讨会要实在得多。在大家谈到兴奋时，观胜会打开带木扇的立柜，取出珍藏的雀巢咖啡，这在当时称得最稀罕最昂

贵也最时髦的饮料，犒赏每人一杯，小屋子里弥漫着烟气，咖啡浓郁的香气也浮泛开来。

我感到了面对苏联的历史和现实，不同的作家以不同的思想视角和艺术形态，展示出独立的思维和独立的体验，呈现出独有的艺术风景，柯切托夫属于其中的一景。我开始意识到要尽快逃离同一地域同代作家可能出现的某些共性，要寻求自己独自的生活体验和艺术体验，才可能发出富于艺术个性的独自的声音。真正蓄意明确的一种阅读，发生在此前几年。一九七八年春天，作为家乡灞河河堤水利会战工程的主管副总指挥，我住在距水不过五十米的河岸边的工房里，在麦秸作垫的集体床铺上，我读到了《人民文学》发表的刘心武的《班主任》。我的最直接的心理反应，用一句话来概括，创作可以当作一项事业来干的时代到来了！我在六月基本搞完这个八华里河堤工程之后，留给家乡一份纪念物，就调动到文化馆去了。我到文化馆上班实际已拖到十月，在一个无人居住的残破的屋子里安顿下来，顶棚塌下来，墙上还留着墨汁写的“文革”口号，“打倒”“砸烂”之类。我用废报纸把整个四面墙壁糊贴了起来，满屋子都是油墨气味，真是书香四溢了。我到文化馆图书馆借书，查封了十余年的图书馆刚刚开禁。我不自觉地抽取出来一本本“文革”前翻译出版的小说。我在泛读的过程中，很自然地把兴趣集中到莫泊桑和契诃夫身上。想来也很自然，我正在练习写作短篇小说，不说长篇，连中篇写作的欲望都尚未萌生。在读过所能借到的这两位短篇大师的书籍之后，我又集中到莫泊桑身上。依我的阅读感觉来看，契诃夫以人物结构小说，莫泊桑以故事结构小说塑造人物：前者难度较大，后者可能更适宜我的写作实际。这样，我就在莫泊桑浩瀚的短篇小说里，选出十余篇不同结构形式的小说，反复琢磨，拆卸组装，探求其中结构的奥秘。我这次阅读历时三个月，大约是我一生中最专注最集中的一次阅读。这次阅读早在我尚

未离开水利工地时就确定下来，是我所能寻找到的自我把握的切合实际的举措。我从《班主任》的潮声里，清楚地感知到文学创作复归艺术自身规律的趋势。我以为“文革”期间极左政治和极左的文艺政策，因为太离谱，早已天怒人怨，连普通读者和观众都背弃不信；倒是“文革”前十七年里越来越趋“左”的指导创作的教条，需得一番认真的清理。我那时比较冷静地确认这样一个事实，自从喜欢文学的少年时期到能发表习作的文学青年，整个都浸泡在这十七年的影响之中，关于文学关于创作的理解，也应该完成一个如政治思想界“拨乱反正”的过程。我能想到的措施就是阅读，明确地偏向翻译文本，与大师和名著直接见面，感受真正的艺术，才可能排解剔除意识里潜存的非文学因素。我曾经在十年前的一篇短文里简约叙述过这个过程，应该是我回归创作规律至关重要的一步，应该感谢契诃夫，还有莫泊桑，在他们天赋的智慧创造的佳作里，我才能较快地完成对极左的创作理论清理剔除的过程。到一九七九年春节过后，我的心理情绪和精神世界充实丰沛，洋溢着强烈的创作欲望，连续写下十个短篇小说，成为我业余创作历程中难以忘却的一年。

阅读《百年孤独》也是读书记忆里的一次重要经历。我应该是较早接触这部大著的读者之一。在书籍正式出版之前，朋友郑万隆把刊载着《百年孤独》的《十月·长篇专刊》赐寄给我。我在一九八三年早春参加中国作协在河北涿州召开的“农村题材创作研讨会”期间，看到万隆正在校对《百年孤独》的文稿，就期盼着先睹这部刚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新世界文学名著。一当目触奥雷连诺那块神秘的“冰块”，我就在全新的惊奇里吟诵起来。我在尚不完全适应的叙述形式叙述节奏里，却十分专注地沉入一个陌生而神秘的生活世界和陌生而又迷人的语言世界。恕我不述这部在中国早已普及的名著初读后的诸多感受，这里只用一个情节来概括。一九八五年夏天，省作协在延安和榆

林两地连续召开“长篇小说创作促进会”，我有几分钟的最简短的发言，直言阅读《百》著的感受，大意是，如果把《百》比作一幅意蕴深厚的油画，我截止到目前的所有作品顶多只算是不大高明的连环画。我的话没有形成话题，甚至没有任何反应，甚至产生错觉，以为我有矫情式的过分自贬。我也不再继续阐释，却相信这种纯粹属于自我感觉所得出的自我把握。这次阅读还有一个不期而至的效果，就是使我把眼睛和兴趣从苏联文学上转移了。

我关注有关拉美魔幻现实主义的作家和作品，尤其是介绍或阐释魔幻现实主义的资料。我随后在《世界文学》上，看到魔幻现实主义的开山大师卡彭铁尔篇幅不大的长篇小说《人间王国》，据介绍说这是魔幻现实主义的首创之作。同期配发了介绍卡彭铁尔创作道路的文章，我才对魔幻现实主义的创立和发展有了一个较为清晰的脉络。据说《人间王国》之前拉丁美洲尚无真正创造意义的文学，没有在世界上引起关注的作品和作家。《人间王国》第一次影响到欧洲文学界，是以其陌生的内容更以其陌生的形式引起惊呼，无法用以往的所有流派和定义来归纳《人间王国》，有人首创出“神奇现实主义”一词概括，且被广泛接受。《人间王国》引发了拉丁美洲文学新潮，面对一批又一批新作品新作家的潮涌，欧美评论界经过几年的推敲，弄出一个“魔幻现实主义”的词汇，似乎比“神奇”更能准确把脉这一地域独具禀赋的作品特质。

对我更富启示意义的是卡彭铁尔艺术探索的传奇性历程。他喜欢创作之初，就把目光紧盯着欧洲文坛，尤其是现代派。他为此专程到法国，学习领受现代派文学并开始自己的写作，几年之后，虽然创作了一些现代派作品，却几乎无声无响，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他在失望至极时决定回国，离去时有一句名言：在现代派的旗帜下容不得

我。他回到古巴不久，就专程到海地“体验生活”去了。据说他选择海地的根本理由，这是拉丁美洲唯一一个保持着纯粹黑人移民的国家。他在那里调查研究黑人移民的历史，当然还有现实生存形态。他在海地待了几年时间我已无记，随后他就写出了拉丁美洲第一本令欧美文坛惊讶的小说《人间王国》。我只说这个人对我启示最深的一点，是关于我对乡村生活的自信被击碎了。我的生活史和工作历程都在乡村，直到读卡彭铁尔的作品，还是在祖居的老屋里忍受着断电点着蜡烛完成的。我突然意识到，我连未见过面的爷爷以及爷爷的兄弟们的名字都搞不准确，更不要说再往上推这个家庭的历史了，更不要说爷爷们曾经在我现在居住的这个屋院里的生活秩序了，我在家乡农村教书和在公社（乡）工作整整二十年，恰好在改革开放之前和之后，我一直自信对解放以后乡村经历的欢乐和灾难的全过程的了解和感受，包括我的父亲从自家槽头解下缰绳，把黄牛牵到初级农业合作社里用一孔废弃的窑洞改装成的饲养大槽上。这时，才意识到对于企图从农村角度述写中国人生活历程的我来说，对这块土地的了解太浮泛了。也是在这一刻，我突然很懊悔，在“文革”之初破“四旧”烧毁族谱时，至少应该将一代又一代祖宗的名记抄写下来，至少应该在父亲谢世之前，把他记忆里的祖辈们的生活故事（哪怕传闻）掏挖出来。我随之寻找村子里几位年龄最高的老者，都说不清来龙去脉，只有本门族里一位一字不识的老者，还记得他儿时看见过的我的爷爷的印象，高个子，后脑上留着刷刷（从板刷得到的比喻，剪辫子的残余）头发，谁跟外村人犯了纠葛，都请他出面说事；走路腰挺得很硬，从街道上走过去，在门口敞怀给娃喂奶的女人，都吓得转身回屋去了。这是他关于我爷爷的全部记忆里的印象，也是我至今所能得到的唯一一个细节。这个细节从听到的那一刻，就异常活跃地冲撞我的情感和思维，后来就成为我的长篇小说《白鹿原》主要人物白嘉轩的一个体形表征，尽管那时候还没有这部小说的构想。

几乎与此同时，中国文坛呈现出“寻根文学”的鲜活生机。我不敢判断这股文学新潮是否受到拉美文学爆炸的启示或影响，我却很有兴趣地阅读“寻根文学”作品，尽管我没有写过一篇这个新流派的小说。我后来很快发现，“寻根文学”的走向是越“寻”越远，“寻”到深山老林荒蛮野人那里去了，民族文化之根肯定不在那里。我曾在相关的座谈会上表述过我的遗憾，应该到钟楼下人群最稠密的地方去“寻”民族的根。我很兴奋地处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文坛里，多种流派交相辉映，有“各领风骚一半年”的妙语概括其态势。其中有一种“文化心理结构”的创作理论，使我茅塞顿开。人是有心理结构的巨大差异的。文化决定着人的心理结构的形态。不同种族的生理体形的差异是外在的，本质的差异在不同文化影响之中形成的心理结构的差别上：同种同族同样存在着心理结构的截然差异，也是文化因素的制约。这样，我较为自然地从性格解析转入人物心理结构的探寻，对象就是我生活的渭河流域，这块农业文明最早呈现的土地上人的心理结构，有什么文化奥秘隐藏其中，我的兴趣和兴奋有如探幽。卡彭铁尔进入海地，“寻根文学”和“文化心理结构”创作理论，这三条因素差不多同时影响到我，我把这三个东西综合到一起，发现有共通的东西，促成我的一个决然行动，去西安周边的三个县查阅县志和地方党史文史资料，还有不经意间获得的大量的民间逸事和传闻。那个长篇小说的胚胎渐渐生成，渐渐发育丰满起来，我感到真正寻找到“属于自己的句子”了。

我并不以卡彭铁尔从欧洲现代派旗帜下撤退的行动，作为拒绝了解现代派艺术的证据。现代派艺术肯定不适宜所有作家。适宜某种艺术流派的作家，会在那个流派里发挥创造智慧；不适宜某种艺术流派的作家，就会在他清醒地意识到不适宜时逃离出去，重新寻找更适宜自己性气的艺术途径。这是作家创作发展较为普遍的现象。海明威把他的艺术追求归纳为一句话，说他一生都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

这个“句子”自然不能等同于叙述文字里的句子。既然是“一生”，就会有许多次，我们习惯用一次新的成功的探索或突破来表述这个过程和结果。卡彭铁尔到海地“寻找”到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句子”，开创了拉美文学新的天地，以至发生爆炸，以至影响到世界文坛。今天坦白说来，《人间王国》我读得朦朦胧胧，未能解得全部深奥，也许是生活距离太大，也许“神奇”的意象颇难解读，也许翻译的文字比较晦涩。我的最重要的启示在于卡彭铁尔扎到海地去的行动，即他“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时富于开创意义的勇气，才是我的最有教益的收获。未必也弄出“人变甲虫”的蠢事来。

在昆德拉热遍中国文坛的时候，我也读了昆德拉被翻成中文的全部作品。我钦佩昆德拉结构小说举重若轻的智慧。我喜欢他的简洁明快里的深刻。这是“寻找到属于自己的句子”的又一位成功作家。我不自觉地把《玩笑》和《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对照起来。这两部杰作在题旨和意向所指上有类近的质地，然而作为小说写作却呈现出决然不同的艺术气象，我习惯从写作的角度去理解其中的奥秘，以为前者属于生活体验，后者已经进入生命体验的层面了。我在这两本小说的阅读对照中，感知到从生活体验进入到生命体验，对作家来说，有如由蚕到蛾羽化后的心灵和思想的自由。

2004年11月24日 二府庄

完成一次心灵洗礼

——感动长征之一

大约是在小学或初中读书时，听老师讲过朱毛井冈山会师和长征的故事。随着年岁增长和阅读面的拓宽，包括两位美国作家斯诺和索尔兹伯里影响深远的《西行漫记》《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两部著作的阅读，井冈山早已成为我心里最高的山，最神圣的山。几十年过去，适逢长征胜利七十周年之际，终得观瞻井冈山的机缘，兴奋和踊跃之情就是很自然的了。再，延安是长征胜利的终结地，我和作家朋友以及家人，已经多次参观过，总想着到长征的起始点去感受一番，这个震惊世界的二万五千里长征，才会在我的心里有一个完整的感受。作为一个自我感觉关注着国家和民族现实发展和未来命运的当代作家，仅从书本和资料上获取发生在井冈山的历史事件是不够的，必须领受最直接的心理冲击和体验，才能使在井冈山发生的血与铁的历史铸入情感也铸入理性。

我在南昌走进了那幢打响起义第一枪的楼房。我在井冈山下坐在朱德和毛泽东第一次会面的龙江书院的方桌旁的长凳上。我抚摸了一炮轰得“敌军宵遁”的黄洋界上那门迫击炮的炮筒。我在瑞金观瞻了中华苏维埃召开第一次和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祠堂和会场。我在云石山看到毛泽东被排斥出中央决策领导层时所住过的孤寺。我在于都河边八个长征渡口走了四个。我在遵义会议召开的木楼上看着依照原样摆置的桌椅，几乎无意识地屏声静息，却忍不住心跳加剧……

从八一南昌起义和秋收起义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建立，再到瑞金中华苏维埃政权的诞生，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劳苦大众，寻找探索到符合中国实际的一条革命道路，刚刚跨出了第一步，毛泽东用生动鲜活的理论阐明并概括为可以燎原的“星星之火”。这是从四一二政变的惨痛教训里获得的富于开创意义的理论，开始了红色革命割据和农村包围城市的伟大实践。我兴奋的是，我们这个民族在二十世纪初，涌现出一批以改变国家和民族命运为己任的先驱，从中国的南方和北方会聚到井冈山，他们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怀着共产主义的革命理想，成为自觉承担国家和民族命运的青年革命家。对于已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任何一个年龄阶段的人，在思考自己的生命意义、人生目的和人生定位，个人事业的追求和国家民族未来的责任时，当是一种最富教益、最具鉴示意义的垂范。我们今天真正解决如何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的重大命题，就更具有现实的最贴切的意义了。任何一个共产党员，站在那些曾经发生激战流血的山沟的土地上，面对那些青年革命家住过的简陋的房屋，粗糙的桌凳和油渍积垢的菜油灯盏，都不会无动于衷，当会反省立身立志和生命意义这个人生的重大命题的。

我站在于都河边，因为暴雨造成的浑浊的河水涌动着漩涡。红军从八个渡口渡河的那几天，应该是最危急的时刻，说是面临毁灭也不为夸张。危机来自两个主要方面，蒋介石一次又一次成倍增加的“围剿”的兵力，必置之死地不可，两方军力的悬殊；更关键的是红军高层领导的指导思想和军事方略的错误，可谓内外交困，导致惨重失败也导致毁灭的绝境。当我踏进遵义会议的木楼时，真切地体味到红军完成了置之死地而后生的至关重要的转折过程。从于都河开始长征到遵义会议，我才理解了指导思想最鲜活最生动最具说服力的含义，才感受到指导思想的质感的力量，才能使崇高理想和伟大抱负落到踏实可行的途径的过程。

在这个置于死地而后生的过程中，红军在巨大的牺牲和曲折艰难的历程中，验证着指导思想，也在寻找统领革命的领袖。指导思想对于那场革命才是最具决定意义的。红军的发展实践验证了毛泽东的指导思想的正确，历史无可辩争地选择了毛泽东。几十年后，当中国陷入“文革”的灾难，国家和民族又一次面临未来出路的迷茫，历史在关键时期选择了邓小平，拯救了中国革命，也拯救了国家和民族，二十多年来中国令世界震惊的快速发展，已经证明了邓小平理论的科学性。对于想在这个世界上成就一番事业的人，尤其是以揭示社会生活运动为目标的作家，思想同样具有非同寻常的意义，思想的科学性和深刻性，既决定着观察社会生活的敏锐性，也决定着理解生活反映生活的深度和典型性，更决定着对生活纷繁迷乱事项的取舍倾向。这里丝毫没有轻淡艺术的意思，那是另一个议题。

在瑞金革命纪念馆，一条革命标语、一把长矛、一册变黄的书都令我感动，有一组数字都令我不敢轻易议论：在于都河长征出发时有八万多名红军战士，到达陕北时只有一万多人；仅兴国县牺牲在长征路上的红军士兵，大约一里路就有一个，而能在后来修建的纪念碑上刻上名字的人数，不过十之一二，绝大多数烈士至今连个姓名也没留下。

在旷世未闻的艰苦卓绝的长征过程中，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共产主义革命的先驱和红军战士，坚守信仰绝不动摇退避的钢铁意志，义无反顾的牺牲精神，当是我们面对现实生活发展和生活矛盾的教科书，审视自己的意志和品质的参照，检测自身对于困难乃至灾难的承受力的标志，我们当以此完成一次精神境地和心理世界的历练和洗礼。即使从单纯的个人立身的角度上说，都会蓄积起不屑于种种腐败事象的正气和傲骨。

长征的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在那个时代展示给整个世界的一种非凡的精神，也是我们民族立于世界的精神，不可淡化不可忘记；我自信也不会忘记或淡化，这是这个民族的历史业已证明了的事实和继续证明着的现实。

2005年6月27日夜 雍村

白鹿回到白鹿原

经过两年多时间的筹备，我们终于迎来了今天这个喜庆的日子，坐落于白鹿原上的白鹿书院成立了。今天有这么多的作家、艺术家、专家、学者和朋友，以及关心热爱文化发展的各级领导来参加我们白鹿书院的成立庆典，特别是从维熙、张贤亮、熊召政、张日凯等几位远道而来的朋友来参加这个庆典仪式，我感到非常高兴，我在这里向各位表示诚挚的谢意！

我在长篇小说《白鹿原》里曾写到一个书院，这个书院就叫白鹿书院。小说是虚构的艺术。《白鹿原》中的人物大都是虚构的，唯有白鹿书院的山长朱先生是有生活原型的，就是清末举人、著述甚丰的学人、影响很大的蓝田人牛兆濂。白鹿书院也有真实生活依托，就是牛兆濂先生当时主持的蓝田县的芸阁学舍。如果要追溯芸阁学舍的文化脉络，渊源可以追溯到宋代，芸阁学舍是在为宋代“关学”代表人物吕大忠、吕大防、吕大均、吕大临所修“四献祠”的基础上，拓修为传道授业解惑的书院，鼎盛一时，曾有韩国留学生在此学习。二〇〇二年，我和几位学者讨论一些问题时，有学者建议，可以在白鹿原上创建一个白鹿书院，承继中华文化的脉络，弘扬其优秀品格。创建白鹿书院的构想得到了社会各方人士的热心赞赏，西安思源学院周延波院长更是大力赞同积极支持，白鹿书院从而由构想变成了现实，白鹿终于回到了白鹿原上。

在我们传统文化乃至民族心理意识里，白鹿是吉祥、和谐、纯洁、美好和超凡的一种象征性图腾，上至王宫下至庙堂乃至民居宅院都有鹿的各种生动壁画和雕刻。以白鹿来命名书院，就是想创造一种

和谐纯净的学术探讨和文化研究氛围，这种和谐与探究的精神与我们所要创造和谐社会的精神是一致的。

书院是教育和学术研究机构，同时它又是一种文化和精神的象征。我们办白鹿书院，第一，承继中国传统文化精华和风神秀骨，以白鹿书院为平台，广泛团结、联系国内外的学者、评论家和作家开展游学、讲学、讨论等交流活动，让传统文化在现代化进程中焕发生机。白鹿书院诞生在古长安这块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土地上，我们将会开掘源远流长的关中文脉、关学精神，探索促进传统文化向现代转型的新途径。第二，我们现有的这些人差不多都是从事文学和艺术创作和研究的人，文学和艺术只是大文化范畴里的一系，文学、艺术与社会、历史和人的生存形态，有非常紧密的关联，但只是一条途径，因此，书院的研究课题将对现实问题和人类普遍面临的问题，既从文学和艺术的角度，也从思想理论的角度，以及学术的角度进行研究和探讨，争取对我们的生活发展做出富于建设性的建树。第三，白鹿书院还会以文学和艺术为其特色，藏书、编书、教书，研讨、交流，从而对陕西、对西部乃至全国的文学事业发生影响，为促进和繁荣文学事业起到促进作用。

我们逐步开办白鹿书院网站，与陕西以及西北的文科大学联手，整合研究资源，确定研究议题，共同进行学术研究，争取与国内外文学界、学术界进行高层对话，让白鹿书院办成思想、文化交流的一条途径。

西安思源学院是中国十大万人著名民办高校，很有影响。白鹿书院依托思源而建，对双方都很有利。湖南有个岳麓书院，宋代理学家朱熹曾在那里讲过学，目前这所书院已是湖南大学的一部分，因而使

湖南大学成了千年学府，提高了知名度。同样，办好了白鹿书院，将与思源学院互相促进，相得益彰。

我希望，白鹿书院能办成一个萃集各界贤达优秀思想的地方，一个能传承优秀的中国文化和传播时代新声的地方。

2005年6月28日 曲江

太白山记

刚到太白山下，先听到雷鸣似的吼声连续轰响，宏大而又沉闷。昨晚下了大半夜雨。汤峪河涨水了。第一眼看见夹在群山峡谷中的这条溪流，是在乱石上疾流飞溅起来又骤落下去的明里透黄的水柱和水花，紧接着那如雷的轰鸣声就铺天盖地倾灌进人的耳孔，心胸里顿时就波涌浪翻了。这是太白山，秦岭的最高峰，高三千六七百米，山顶终年积雪，而汤峪里却有天赐的地热温水，三伏溽暑登山踏雪赏景，归来泡一回地壳里涌出的热汤，真是神仙过的日子了，古往今来人们都乐游不疲，都憧憬着至少有一回太白山的悦目赏心。

杂树恣意，野花凄迷。峡谷窄处仅容得脚旁湍急的流水和这一条贴着悬崖的车路。绕过横堵在眼前的直立的山峰，又豁然一片蓬勃着绿草野树的谷地，千姿百态，气象各异，人便为城市里精心打造的花卉园林惋惜其雕琢的小气和别扭了。在我多次穿越秦岭的印象里，其实你随便走进任何一道峪或一条沟，都是浏览不尽美不胜收的天然景致。

说话间进入四面堵实了的一方峡谷之中，迎面是座坡势稍缓却很宽幅的山林，一直往后倾过去也升高起来，直抵视力迷茫的灰云笼罩之中。右边是两座携手并立的山峰，几乎是直起直立，陡峭如墙，峰体的石头多有裸露，怪异在于北边那山的石头一条一条竖向摆列，南边一座的石条卧倒排比，真无法想象造化如何把如此亲近的两座山峰弄出截然不同的结构来。转过身看北边的那座山，才显得最为奇绝，整个一架山就是一块石头，几乎看不到断裂的缝隙，除了山顶和山脚

被矮树杂草戴帽穿靴，其余的山体光滑无遮，灰白色和灰黑色相叠印，突兀横摆在人的眼前，真乃铜墙铁壁堵死将军的绝地了。

又一处景观却以李白演绎出传说来。这山体也差不多是偌大一块完整的石头，无裂缝无以存垢土，草木便无法寄生，树种草籽也难以藏匿，太光滑太陡峭了。几乎通体裸露的石头呈黑色，似有墨汁泼洒下来，一片片像是直泼的墨汁，一条条一绺绺像是墨汁流淌的痕迹。便有了神话般的传说，李白被大自然神刀鬼斧的创造陶醉了，也被美酒饮得真醉了，张狂起来时，扬手把墨汁泼洒出去，仍不能抑兴止狂，又把酒具抛掷出去，泼墨山的对面就有酷似酒壶酒盅的两座山。更绝在溪流里，有一块百余平方米的石头，灰白色里缀着暗红的石粒，恰如一张卧床。又是天赐给这位天才诗人的醉卧之榻了。这样宽大的一张石床，四面山风，白云高悬，清水拂过肢体，可以想见有怎样的舒畅，这是民间人士奖赏给李白的享受了。我到这儿才知晓，秦岭的这个最高峰取名太白山，却与大诗仙李白无关，早在唐以前就得名了。我却也生发一点欣慰。后人在太白山里为李白编织出这么浪漫的传说，让舞文弄墨的文人们可以找到一份自信；却也难得骄纵，毕竟诗没有写到李白那样的境地，也缺了这位诗仙独具的性情。

愈往峪沟里头走，凉风竟然变为刺激肌肤的寒气了，雨也星星点点落下来，山外正是热得人恨不得扒一层皮的溽伏，这儿却让人冻得时不时抖颤。经不住奇峰妙谷的诱惑，继续沿着汤峪河谷走着，山脚下飞出一道单檐角亭来，背倚青石崖壁，两根立柱，撑起单面瓦顶。三面无墙。下有一尊丈余的卧佛，浑身饰过金粉，黄灿灿的十分耀眼。卧佛造型优美，怡然神情，据说清代雕成，是一块完整的石头，近年间才被涂饰了金粉。一九三三年暑月，于右任进山散心赏景，驻足观瞻大佛，当即赋诗，现在依照于体笔迹镂刻在睡佛侧卧背后的崖

壁上，诗曰：“睡佛好，睡佛好，一睡百事了。我也想来睡，谁来把国保。”于右任国学渊深，写得一手好字，也写下诸多堪为绝妙的古体诗章，而如上述既类“打油”又像民谣的诗，当是稀罕一例。此时已是九一八事变之后二年。先生上太白山避暑消夏，心里还沉悬着被倭寇掠占的东北山河，无论如何是难以如佛般安卧青山碧溪的。这首“打油”韵味的短诗，亮示给我一种情怀，既是军人的，亦是诗家词人的，我愈加不敢轻泛称佛说道了。

2005年7月23日 雍村

关山小记

汽车刚钻进山，车里的朋友就兴奋起来，争相发出连续不断的赞美的话，夹裹着由衷的惊诧的叫声。近似鼓噪，不过从口吻声调判断，还属真实。想想这些常年出入高楼游走在水泥沥青马路上的人，眼里看的是瓷片玻璃鼻孔吸入的是种种废气，时下又正当溽热难耐的三伏，突然钻进这不见人烟的群山之中，仅生理心理的本能性舒悦就足以开怀了，况且全都是挟有绝技绝招的文墨人，更敏感也更习惯表述。

这山也真是美。在仅容得汽车穿过的窄道里，两边或陡直挺立或悬空扑突的青色岩石，轻易就可以把钢铁制品挤弯压扁。溪水就在车轮下飞迸着水花，喧闹出弥天铺地的浪声。车在群山里盘绕，一会上了一会下了，眼前的空间一会宽了一会窄了，瞬息变换着的景致，却再也激发不起朋友们的大呼小叹了。也许是目不暇接了，也许是喊得累了。车子再翻过一道缓坡横梁，眼前展开一片宽阔漫长的谷地，峭壁陡峰早已不见了踪影，溪水隐没到草丛里去了，满眼都是阅览不尽的绿草，在西斜的阳光下迭变着色彩，人被狭谷窄道挤压过的心胸顿然舒展开来。又是一片惊诧的咏叹。

这是关山。我这回是专意瞅着关山来的。

我对关山的向往，是两年前电视播放的一则风光片诱发的。记得是在一场顶级足球比赛的场间休息时随意转换频道，不经意间看到一片奇异的高山草地，一下子就被吸引被诱惑住了。起初竟然以为是异国风光，而且与在图片和荧屏上见过的阿尔卑斯山的风景叠印在一

起；后来听着优美抒情的播音员的解说词儿，才知道这是中国的关山草原，更令我意料不及的，这关山就隐藏在秦岭山地里边，属于陕西陇县辖地，离西安不过三个多小时的车程。我在那一刻就有了“养在深闺人未识”的惊喜，向往也在那一刻注定了。终于逮着机会，直奔关山来了。

一眼望不透的高矮起伏着的群山。这里的山已经不见秦岭的陡峭挺拔威严凛峻，却是一派舒缓柔曼的气象，从山根到山顶，坡势拉得悠长，一种自在自如的娴静和浅淡。由近处望到远处，山头都被绿树笼罩着，近在眼前的是一派惹眼的葱绿，越往远处颜色渐渐加深到墨绿，再到目力所及处和雾气灰云混融了，完全看不出绿色了。这里的树林颇为怪异：从每一座山头覆盖下来，到半山腰便齐崭崭收住，形成一道密不透风的绿色壁垒。看上去颇为壮观，往往使初见者误猜为人工有意所为，其实是自自然然形成的地理地貌性奇观。山腰往下直到河谷，漫坡漫川都是绿毡铺着一样的野草，草里点缀着黄的红的紫的白的小花。这山里的世界就显得十分简洁。绿的树和绿的草，树占山腰以上，草铺山腰以下。这种简洁的美是一种大气象的美。是舍弃了繁复舍弃了芜杂也舍弃了匠心的美，非阅览过千番景致，也见惯了各种色彩的大手笔不可造得。这当然是大自然的神笔造出的神韵，却也启示舞笔弄墨泼彩的文人画家，不可把一种自营的色彩色调说绝了。

从河谷里随意走过去，走过一个山间谷地再到一个山间谷地，每一道沟每一面坡都各有风姿，绝不重复类近。然而稍微留心，或浅短或长远，或伸直或斜延，那一面面坡一道道梁，其走势其形态都显示舒缓优雅自在自如气韵酣畅神闲气静，一弯一转一扭一回旋，都丝毫不显急促，更不见猥琐，如一张张锦帛一条条绿绸随着轻微的山风随

意飘落。我不止一回提问自己，这是秦岭吗？以陡险雄峻闻名的秦岭，到这里却呈现出一派舒缓柔曼的姿态和情调，当可看作伟岸凛峻的大丈夫的躯体里，原本怀有诗意绵绵也情意绵绵的软心柔肠。

关山和秦岭一样悠久，却是山系里的壮年汉子，多少万年以来，这天赐的美景只是默默地自我欣赏。从二十世纪后半段的几十年里，这里是繁殖培育骑兵所用战马的军事禁地，旁人不得进入。再说那时候的中国人，无论城乡，都是数着粮票掐斤扣两过着日子，不仅没有游山逛景的资本，作为一种意识都不为当时极左的时风所容忍。现在时风开化了，一部分人可以在衣暖饭饱之后派生游逛的“余事”了。骑兵已经从中国军队的兵种里悄然消退了，关山军马场相继歇业关闭了，然军马却在山沟野洼乡民的屋院里繁衍。现在，这里最能引发游人新奇的项目是骑马，近处和远处的男女山民牵着自养的良种军马，争先恐后地把马鞭往来此散心的城里人的手里塞，甚至拽着游客的胳膊往马背上掀，竞争到了空前激烈的状态。马们是无所谓的，驮着这些城市来的先生女士老汉老太小伙姑娘，听着他们在自己耳后发出的惊惊吓吓嘻嘻哈哈的声音，祖传的血液里的冲锋陷阵蹄踏敌阵的血性和激情荡然无存，只是懒洋洋地溜达。我的朋友们都上了马。我无端地谢绝真诚的乃至不可理喻的邀约，只有一个托词，我属马，自己不好压迫自己。

我便独自一人在夕阳即逝的草地上随意走着。我迎面碰到草地小路上一位骑自行车的小伙。小伙眉眼很俊，黑眼睛灵活而聪慧。我和他有一段短捷的交谈，得知散落在一道一道沟谷里的山里人家，除了种苞谷土豆自供吃食，主要是饲养放牧羊和马，羊供游人们烧烤，现场宰杀，架火烤全羊或羊肉串儿，从维吾尔族蒙古族那里学来的烧烤技术。马除了供游人骑玩，更多的是卖给客户，听来有点残酷。小伙

告诉我，上海年年来人收购，有多少要多少。听说买回去抽血直到抽干。抽马血做啥用咱就不知道了……听得我毛骨悚然，身上起鸡皮疙瘩，顿然意识到属马不骑马的自我约律没有一丝意思了。

小伙子跨上自行车远去了。暮色里可以看见前边山口有一堆瓦顶房子。不过五六户人家。我往驻地走过去。绵软的草地已经有湿气潮起来。包括我在内的城里人到这里来散心，来赏景，来换一口清新干净的空气，体验一回骑马的新奇感觉。明日回去又陷入城市的文明和喧嚣之中。山民们大约对这里的树这里的草这里的空气，早已习以为常，只有尽快把长成的羊和马卖出去，欢悦和窃喜才会产生。美丽得类近阿尔卑斯山风貌的关山的景致，对他们只有谋得生存的真实含义。

夜色完全落幕。阴沉的天空尽管没有星月，还是能够看到天和地的分界，那是群山顶上的树梢，在天空划出的起伏着的优美曲线，凝然不动。我回到驻地场院。听到聚在灯光下的一堆游客在议论，咱们有这样好的山地和草原，外地人却把陕西一概印象为风沙弥漫的黄土高坡，全是那首破歌惹的祸……“大风”把陕西全刮光了。

我想这肯定是个乡土自尊比我还强的陕西人。

2005年8月7日 雍村

也说中国人的情感

一

近日看到一位在中国作品翻译很多知名度也很高的日本作家写的一篇短文，评说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对当年日军侵略罪行暧昧而又顽劣的态度，说小泉不能从受害国人民的情感上考虑，于是就把日韩、日中、日朝等关系弄糟糕了。

我想还有更深层也更致命的一点，在于小泉纯一郎对六十年前日本在亚洲诸国所犯的侵略罪孽的认识。认识决定情感。没有对侵华侵朝等罪恶的深刻认识，就不会有对罪恶历史的自觉反省，又如何能体察受害国人民的情感？于是才会把给亚洲诸受害国造成灾难的东条英机等十恶不赦的厉鬼，作为神而年年祭拜。我在电视上看到过德国总理到被纳粹屠杀的犹太人墓前下跪的画面。那个庄重虔诚地跪祭的举动，谁都能看出是强烈的情感支配，却又不仅是对被无辜屠杀的受害者的情感体察和理解，而是对希特勒法西斯这个狞厉的魔鬼在欧洲所犯罪孽的深刻反省和坦诚的忏悔。我在看到这个电视画面时曾经揣测，欧洲诸受害国和犹太人看到这个画面时，对德国总理应该产生基本的信赖。我又反过来揣测，如若德国总理如小泉拜祭靖国神社一样去跪拜希特勒，或者羞羞答答偷偷摸摸地“修改历史教科书”，我真不敢猜断欧洲各受害国和犹太人会闹出什么事来。

很显然，小泉对亚洲各受害国人民的情感，只有在割断对靖国神社里一伙战争厉鬼的情感纠缠之后，才可能发生转移。我近日在电视上还看到一组严酷的画面，东条英机等六名被国际法庭审判为死刑的

战争罪犯，一个一个被押上绞架，套上绞绳，“咚”的一声抽掉脚下的踏板，悬空吊死。这是整个世界的正义力量对邪恶的审判和惩罚。几乎同一时期，在南京制造过三十万人大屠杀的谷寿夫等七名日本战犯，被中国军事法庭审判为死刑。这七人之中有两个叫作向井敏明和野田毅的鬼子，在南京城做过一场杀人比赛，看谁先杀死一百人谁就为赢家。单是这两个狰狞的厉鬼，就以杀人比赛的娱乐方式，杀死了三百余名手无寸铁的南京市民。这些被中国法庭和国际法庭推上断头台的罪大恶极的厉鬼，六十年后还被小泉首相当作神去参拜，作为受害国中国公民的我，会是一种什么情感？坦率地说，我不以为这种以鬼为神而参拜的举动滑稽可笑，因为作为一个经济大国的首相不可能在这种铁定的历史事实面前表演滑稽。我的情感里就只有鄙夷，除了鄙夷还是鄙夷。

二

在我的整个心理情感世界里，充溢着对我们民族和国家的尊严的敬重。正是六十年前的抗日战争，让我真切地理解了什么叫民族尊严和民族脊梁。

六十年前取得的抗日战争的胜利，是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人民反抗各种列强侵略战争的第一场完全彻底的胜利。在我粗浅的历史常识的印象里，总是凸显着各种名目的割地赔银的条约，百年近代史教本几乎都可以用屈辱来概括，我曾在中学学习这段史实时产生过逆反情感。八年抗日战争的胜利，确如国歌所唱的，是用整个民族的血肉筑成的新的长城。这是在血与火中铸造的民族和国家的脊梁。

我在少年时期就记住了赵一曼，刻骨铭心地记着杨靖宇牺牲后从肚子里刨出来的草根树叶，还有令幼年的我感到解气的平型关大捷和

百团大战。后来历史知识渐多，尤其是遇逢抗日战争胜利六十周年的今天，陕西和各省的各种媒体，都向我提供了前所未闻的抗战英雄和战例史实。毛泽东和朱德领导指挥的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根据地的游击队，给予日寇沉重的打击早已彪炳史册。蒋介石统领的国民党军队里，有一批殊死抗击侵略的将军和士兵，至今读来听来仍然令我心潮波涌热泪难抑。去年年初，我读到徐剑铭等作家所写的纪实文学《立马中条》书稿，得知曾经为我的灞桥籍前辈乡党孙蔚如所统领的包括赵寿山、李兴中、孔从洲等陕西籍将士，当年硬是堵在潼关外的中条山，使不可一世的日本鬼子难以前进一步，而且损失惨重。我在阅读时，几次被英雄的壮举和拼死的精神感动得掀不开下一页。前不久应陕西民革的邀请，参加纪念抗战胜利的座谈会，我听到张居礼讲述他的父亲张灵甫将军的抗战事迹，真是气壮山河、撼天动地、泣鬼神般的壮勇豪烈。我不敢想象作为团长的张灵甫组织并带领敢死队和鬼子拼刺刀时的那一股豪勇；他曾经十一处负伤直到被打断腿骨还不离开战场；武汉会战中，张灵甫在德安万家山取得大捷，被叶挺将军称为“与台儿庄、平型关鼎足而三，盛名永垂不朽”的重大胜利；国歌词作者、戏剧家田汉，亲临战地采访张灵甫，创作并演出了话剧《德安大捷》。在开赴缅甸的十万远征军里，有一万多名踊跃参战的陕西热血青年，总指挥是陕西籍将军杜聿明。在正面战场使日军第一次遭遇重创的台儿庄战役，那位挥舞大刀的敢死队队长仵德厚是陕西泾阳人，正是他的大刀杀得鬼子难以前进，为中国援兵赢得了制胜的时间。我无法把那场长达八年的抗战中的英雄一一罗列出来，只是随手择出几位陕西籍的抗战英雄，他们每人都可以写成一部半拃厚的英雄纪实文本。他们是在战场上战死和在家门口被杀害的三千多万同胞的杰出人物。

中国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是在抗日战争中诞生的。

中国人的脊梁，正是在持续八年的抗击日寇侵略的血与火的战争中挺立起来的。这是制造罪恶的“加害者”始料不及的。

三

我们不播种仇恨。

不种植仇恨，却应该记取和吸取历史教训。让今天过着和平安宁日子同时享受着国家尊严的每个公民，了解曾经发生过的积弱挨打的屈辱历史，感知并铭记那些于危难中构筑和撑挺起民族脊梁的先辈，明白自己对国家肩承的道义和责任，进而设计并实践一条健全健康的人生道路。我甚至妄断猜想，那些落马的贪污腐败官员，如若能在伸出贪婪掠取的巴掌之前，读一读这些抗日英雄的事迹，也许会把伸出的手收回来，不致成为国家和人民的罪人，也许还能悟到手中的权力真正神圣的使命。

我又有感于一些西方右翼势力的言论了。

大约是今年以来，不断看到美国有人提出并奢谈“中国威胁”的言论观点，日本也有起哄式的响应言论。我开始读到时有点纳闷，像我这样年纪的人都清晰地记得，在“左”的政策造成的普遍贫穷乃至三年大饥荒的时期，西方有一拨政客的幸灾乐祸式的鼓噪集中到一点，共产党政权把中国弄糟了。改革开放纠正了“左”的路线和政策，探索出一条适合中国发展的新途径，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然而与世界上最强大最富裕的国家比起来，中国还排在贫穷国家之列。我纳闷不解的问题是，中国穷时他说你不行，中国刚刚发展起来又说你“威胁”，那么，中国如何是好？如何才能使现在这一拨右翼政客闭上鸟嘴？譬如在我这辈人心中尚有印象的一个日本人中曾根康弘，走出首相府多

年了仍然闲不下心来，由他负责的一个日本智囊机构近日发表一份警告报告，说“中国的民族主义意在主宰全世界”，“由中国来充当霸主的世界秩序”，如此等等。我又联想到日本那位作家批评小泉首相不能体察理解受害国人民情感的话，前首相中曾根康弘所体察理解的受害国之一的中国人的情感，却是说中国要充当“主宰全世界”的“霸主”。这种耸人听闻的鼓噪，被西方那些正直客观的政治评论家概括为“妖魔化中国”。这就够了，世界上有制造谎言鬼话的人，也不会缺失揭穿鬼话谎言的人。在某个意义上，还真应了中国民间一句俗话，以老鬼子的小人之心，猜度刚刚繁荣起来的受害国中国之怀。

暂且搁置历史的和现实的因素，也剥离开政治和经济的利益因素，我想到人类丰富而又复杂的情感里，普遍存在的一种最坏的东西——妒忌。一个国家或者一个人，贫穷积弱时被瞧不起被欺侮乃至被侵略被蹂躏，翻过身来挺起脊梁强盛起来，又被诽谤以至被“妖魔化”，这恐怕与一些人最坏的那个妒忌心理不无关系。

退一步想，被妒忌与受屈辱不可同日而语。

记住惨痛的历史，自立自强，走自己的路，让喜欢瞎说的政客去说吧。

2005年8月14日 雍村

黄洋界一炮

——感动长征之二

到黄洋界时，雨住了。云也薄了淡了，天空和地上便有了亮光。刚刚从井冈山主峰下来，心存一缕遗憾，一大早乘车攀上井冈山最高处，想观瞻类似握紧拳头的五指峰，不料刚走出东门，便是倾泻狂泼的大雨，黑云压在头顶，浓雾把远近的山峰沟谷全都遮蔽起来。我站在被朱德称为“天下第一山”的井冈山上，对着雨雾里的拳头主峰，听群山翻卷着的如排山倒海般的雨的啸声。

站在黄洋界上，我已经排解了那一缕遗憾而兴奋起来了。“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

几十年前记住的毛泽东的《西江月·井冈山》词，那隆隆作响的炮声，就一直神秘地潜存在记忆深处。我现在就看见这门迫击炮了，静静地支在黄洋界窄窄巴巴的坪头上。尽管被告知说这已经不是原来的那门迫击炮，是代用品，游人仍然兴致不减，倚在炮身或炮筒前留影拍照。我也瞅着空隙，抚摸迫击炮冰凉的炮管，留一张存念照。那一瞬，即在我的手抚摸着炮管的时候，心头掠过一阵悸颤，当年操纵这门迫击炮发出致命制胜一炮的红军战士，他们是谁？有谁还活着？

那场战事发生在一九二八年八月三十日。毛泽东和朱德在这一年的五月举行了会师后的誓师仪式。红军在井冈山刚刚扎住脚，跟踪而至的“会剿”就连续发生。八月中旬，毛泽东率31团3营去湘南迎接红军大队，只留下第1营守卫井冈山。湘赣敌军调集七个团的兵力乘虚而来。七个团对一个营有怎样悬殊的差距，且不说武器装备的优劣，而

黄洋界成为井冈山五个哨口中敌军“会剿”的重点突破的哨口。红军1营战士守卫的措施有五道，竹钉、篱笆、滚木礌石、壕沟，最后一道是有真枪实弹的射击掩体。这是红军当年所能采取的防御手段，用埋在草丛里的竹钉和树林间的篱笆和险隘口的壕沟，制造障碍；夹道两边的滚木礌石，是可以砸死敌手的攻击型武器；只在最后关口，备有射击的杀伤武器。凭着这些最原始的防卫措施，居然在八月三十日上午阻击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今天想来真有点不可思议。

更富于戏剧性的一幕发生在下午。在敌军发动新的一轮进攻之先，红军战士把一门在茨坪刚刚修理好的迫击炮搬上黄洋界瞭望哨来了，有了一种更具威力的重武器，可惜只有三发炮弹。把握着敌人进攻的最紧要关头，才把炮弹发射出去。谁也料想不到，炮弹因为受潮而没有打响，第二发还是一颗因受潮而未响的臭弹，令人焦急乃至丧气。最后一颗终于打响了，不偏不倚打到敌指挥部里，炸得那些指挥官人仰马翻。借着这颗炮弹爆炸的威风威势，两边山崖上埋伏的赤卫队员暴动队员一起开了火，呐喊声震荡山谷；更有在煤油桶里燃放的鞭炮，制造出机枪连发的音响效果，攻山的敌军以为红军主力回归，连夜收兵撤离了。

这真是神奇的一炮。只有一炮。在红军发展壮大到人民解放军的战史上，由一门迫击炮发展到大炮列阵，炮弹排山倒海轰响，应该说只有黄洋界的这一炮最负盛名了。这一炮发生的神威，毛泽东是第二天从湘南回归井冈山的半途中听到的，抑制不住胜利的喜悦，便“哼”出这首词来。我原先初读这首词时，以为有许多门大炮，不然怎么会有隆隆轰响的效果，直到站在这门迫击炮跟前，才把几十年的错觉纠正过来，不仅是一门炮而且只打响了一发炮弹。毛泽东把这一发炮弹填进了诗词。

更让我意料不到的是，黄洋界守卫战的两位最高指挥员之一的何挺颖，是我的陕西乡党。他是31团党代表，团长叫朱云卿，他们两人负责指挥这个团第1营的红军战士，守住了黄洋界，也守住了井冈山根据地。我查找有关何挺颖的资料，想了解这位红军早期领导人的情况，所得十分简单，却也有了一个大致清楚的轮廓。何挺颖是汉中地区南郑县人，那是一块富庶的盆地，二十岁时考入上海大学数学系，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参加北伐战争，随后参加毛泽东发起的秋收起义，以及三湾改编。直到一九二八年春天，党的前委改编为师的编制，毛泽东任师长，何挺颖任师委书记。在黄洋界保卫战之后不到半年，何挺颖在进军赣南闽西的大余战斗中牺牲，年仅二十四岁。

我早都熟知在陕西关中和陕北闹红的刘志丹、魏野畴、李子洲等先烈的名字，却几乎没有听说过何挺颖。在从秋收起义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初创时期，何挺颖竟然在唯一的一个红军师里，和毛泽东结成搭档成为最高首长，如若活到共和国成立，该是怎样举足轻重的一位领导人物。我又从另一个角度设想，何挺颖能从闭塞的南郑县考入上海大学，非得具备两个基本条件，既要有一颗天资聪慧的脑袋，还要有一个能供给得起学费的较为富足的家庭。何挺颖在贫穷和文盲一统二十世纪初的中国，能进入大学学习，无论如何是不愁找不到一份可心如意的工作的。这个人却选择了革命，投身革命，从秋收起义到初创井冈山根据地，其艰苦卓绝危机四伏之险恶，与一个堂堂的上海大学学生的生活形态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我便相信基本的一点，信仰的神圣和志士的抱负。他信仰了共产主义，就神圣在整个人生价值取向上，就自觉承担起改变中国命运的责任，不惜以二十四岁的年轻生命作为新中国的祭礼。

当人们轻淡随意地嘲笑信仰和精神的时候，显示了什么呢？比何挺颖们聪明了还是混球了？重了还是轻了……

我有一点小小的狭隘的地域性私念，就是想让更多的人知道，黄洋界保卫战里那神奇的一炮，是一位年仅二十三岁的陕西南郑籍的红军指挥员何挺颖和朱云卿（省籍不详）的杰作。这仅仅是我附着在敬仰钦佩情感里的一缕私念，与何挺颖包括牺牲在内的整个生命意义无涉。

2005年11月22日 二府庄

再到凤凰山

小小的凤凰城远近闻名，着意在山水韵味。凤凰城山水名扬天下，得益于作家沈从文。凡读过沈从文作品的人，不仅难以忘记湘西的山水韵味和民俗风情，而且同时种下有朝一日走一回湘西的欲念。凤凰城是湘西风景风情的代表性杰作，自然为首选之地。

大约十年前到凤凰城。看了山，看了水，看了沈从文先生的书屋和墓地，感触多多，却不著一字，说来很简单，沈先生早在几十年前把湘西的山光水色和民生的风情灵气展示得淋漓尽致，至今都很难再读到那样耐得咀嚼的文字，我便不敢贸然动笔了。这回又去湘西，再上凤凰山，不仅有沈先生文章里的景致为参照，而且还有第一次来凤凰城的印象做对比，我发觉变化真是太快了，也太大了。我记得十年前进凤凰城时，要过一座桥，从桥上看下去，河水里浮游着几头水牛。水牛在河里懒洋洋地游着，露出硕大的头和头上的弯角，还有浅灰色的脊背。水色不清，浑而近浊，漂浮着有藤蔓的野草，据说是刚刚下过雨涨了水的缘故。这幕水牛戏水的景象就留在我这个北方人的记忆里。这回一看见凤凰城，一看见那条河，自然不再陌生，却看不见水牛的姿容了。水变清了，大约没有落雨也就没有涨水，更看不见浮草；原先沙子泥土铺就的河岸，用水泥砌得整整齐齐，类似城市公园人工湖的堤岸了。我似乎隐隐生出某种缺失的惆怅。我又不敢说这种整修有什么不合适，却想着那泛着青草的泥岸伸展着的自然状态的曲线。再也不复重现了。

其实，更想看的是沈从文先生的旧居，十年前看了一回，这次来仍然想再看一回。我从东正街拐进中营巷。就感到拥挤和熙攘，拥挤

着的男男女女，都是因观瞻一位作家的宅第的好奇心所驱使。而这位作家生前却是落寞的，尽管住在繁华的北京，活着时几乎是蛰伏隐居，即使在胡同里迎面撞怀，乃至不经意间头与头碰撞得起了疙瘩，却谁也认不出个沈从文来。现在，先生早已弃居的老宅旧屋，却“下自成蹊”。据说一年四季都是络绎不绝的参观者，旅游旺季就这么拥挤着。

大门口是进出的交汇之地，我得侧了身才能挤进去，院子里和前屋后厅都挤满了人，观看的照相的购书的琢磨着风水八卦的人，似乎都津津有味自得其趣。我也在拥挤的缝隙里看沈家的这座四合院，进得门来算门房，正在经营着沈先生作品的各种版本，需排队才能交上钱拿到书。中间是左右对称的厢房，显得低矮而又窄小，我是以北方四合院的厢房作参照的。最重要的建筑是厅房。以石条起垒。是一种淡淡的橙红色石条，平生一缕暖色。石条上砌砖。青色的砖只垒到窗下，不过半人高，之上就全部是木格大窗子，再不见一块砖石墙壁。木窗和木门之间以木板嵌镶作墙，古香古色，自成一种优雅。我在北方乡村和城镇，几乎没有看到过窗台以上不用砖或土坯砌墙的房子，甚为稀罕新奇。

厅房内一明两暗，明间当为长者议事、说话、训子的比较庄严的场合，也是接待客人的会客厅。左卧室背后，有一方小小的火塘，上边吊着一只水壶，四周摆着几只小板凳。使我自然地发生最生动的联想，无论家人或朋友，围坐在火塘边，听燃烧的劈柴噼啪响着，看火苗呼啦啦往上蹿起，水壶里的水咝咝咝响着，沏一碗热茶，或叙友情，或议家事，或逗笑取乐，该是怎样一番惬意和快活。

沈先生的墓地在半山上，山不高，却很幽静，曲径盘绕，杂树蔽阴。突兀看到一块碑石，刻着神采飞扬的手书字体：“一个士兵要不战

死沙场，便是回到故乡。”初看吓了一跳，碑题内容似乎太硬，一下子竟反应不及。细看副题为“悼念从文表叔”。立碑题字者为大名鼎鼎的黄永玉。便把太硬和突兀的感觉隐压下来，慢慢嚼磨，反复体味个中内涵。

沈先生的墓，是以一块巨大的石头为标志，据说重达五吨。上边刻着沈先生自己的话：“照我思索，能理解人；照我思索，可认识人。”这应该是先生一生的哲思概括，也是一种复杂曲折的人生历程之后的生命体验，只可领悟，不敢评说。我很赞赏这块石头，不是名山采来的名贵石料，而是当地山上到处可见的一种沉积岩石块，大大小小的各色砾石，和沙粒堆积凝结在一起，呈现出一种自自然然的原本的颜色，亦未做任何雕琢，似乎这石头一直就蹲踞在这里，与山与树融为一体。据说这石头是黄永玉先生亲自为其表叔选择采掘来的。我便钦佩这位画坛大师超凡脱俗的审美取向，真是一块再恰切不过的石头。有清泉自石缝涌出。贴着山根的石凹流下去。一年四季日日夜夜，在沈先生耳边流过，不时泛出叮叮的响声。想先生平生不声不响，似乎也不爱热闹，悄悄走出凤凰，死后又悄然归于凤凰，不料热闹发生在死后，拥挤了旧宅老屋，又川流不息吵吵嚷嚷在坟头墓前，如果真有先生不死的幽灵，怎么承受得住……

我依着同行的朋友去河上乘一种专供游乐的小艇，河水清洌，暑气闷热暂得缓解。看河边的小幢民居建筑，真是稀罕奇观，倚山而造，栉比鳞次，一幢幢小屋小楼借着山势和立足的地坨大小，结构着种种样式。最下边的一排，居然是凌空立柱铺出一方地基，搭建成别致的房子，河水便在床铺下日夜流淌，有水声催眠入梦，当是怎样一种如仙的境界。河边有人在洗衣淘米。女人洗着淘着。淘着洗着的还有男人。洗菜的男女似乎平平常常，洗衣的男女居然还用着棒槌。棒

槌在石头上捶击衣服的响声听来悦耳，那是我自小在家门口的涝池边和灞河里听惯了的脆响乐声，但家乡的乐声早已在多年前消失了。

上岸后沿河边的小路走，不时有人拉着小车擦身而过。车上绷一顶遮阳的花布，车内置一张躺椅。花了几块钱的人坐在躺椅上。挣了几块钱的人拉着车子在小巷和河边跑着，供花了几块钱的人观光赏景。这是最简单最直白的一种关系，容不得多愁善感者说三道四。我看着觉得有点扎眼的，是一位坐在躺椅上的人的姿势，手里夹一支正燃着的纸烟，两条腿以“八”字形撇开，搭在车子的两边，旁观者入目颇觉不雅。

沈先生如果活着，今日的凤凰和湘西在他的笔下，会是怎样一番景致。

2005年11月29日 二府庄

魅力亨利

记不清哪年哪月在电视绿茵场上发现了亨利。而第一眼看见那张英俊清秀的脸便不能忘记，却是确凿无疑的事。完全出于一个偶然的非足球因素，亨利的模样让我想起四十年前教过的一个乡村中学生，五官和脸型如同一个模子里铸出来的，差异仅仅是亨利皮肤的颜色稍重了点，脑袋的后把子长了点儿，确实像极了。

亨利一入得人眼，便感到耳目一新。亨利跑起来真可谓疾步如飞，总能在与一个或几个人相持的竞跑时抢先一步，让对手眼睁睁看着他把球抢去带走，完成最要命的一击。更富魅力的是，他在轻捷如鹿的跑动过程中，连续完成传球接球控球直到射门，如行云流水般轻盈顺溜。足球在亨利脚下，展示的是另一种概念，更轻松也更富观赏魅力的艺术。我由此而纠正了自己积久的一个偏见，足球更依赖体格和力量，中国球员处于人种的先天性弱势，亨利当是亚洲尤其是中国球员提高自信心的一个范例，把心劲鼓到脚下基本功夫的练习和瞬间判断的眼力上，完全可以避开人高马大却也笨拙的力量型人种球员。

亨利的魅力还在他的性情。这个小伙儿永远都是不卑不亢。不事张扬，球队赢了他也高兴，却是一种自然的含蓄的快乐。他进球了，尤其是定胜败的某个进球，抑或是不可思议有如神助的一脚绝杀，他也会张开双臂跑跳起来庆祝一番，却绝少有狂喜失态失形的行为。多数进球之后都是以舒心的微笑接受队友的拥抱。我很自然想到一个人底蕴的自信，不是装得出来的。

我也记不清看过亨利多少场比赛了，由亨利而喜欢上阿森纳球队了。凡有阿森纳的比赛，我想方设法争取观看的机会，主要是想看亨利会有怎样的表演。回想几年来看过亨利的比赛，享受过无数次赏心悦目的盘带、疾进的姿势，一脚瞬间发生的十分隐蔽的致命的妙传，一脚看似绝无可能的远射造成的绝杀，真是享足了足球的快乐。然而，我几乎一次也没有看过亨利恶意的犯规。他似乎从未与对手争吵过、脸红过，更不必说踢脚挥拳吐口水等报复性失态失礼的行为了。足球毕竟是体育竞技。不是战争。亨利更深地理解足球，充分展示的是足球的才华和技艺，而不是非足球因素，当是最令人敬重的一种自信。

即如最新看过的二月四日晚和伯明翰队的比赛，阿森纳2:0完胜。两个进球都是亨利的杰作。第一个进球发生在上半时，亨利已跑到禁区线上，左路队友恰当其时，一脚准确的妙传把球送到亨利脚前，亨利轻轻一脚拨传，球到了右侧队友脚下，带过两步一脚劲射，致命的一击顷刻间发生了。关键的瞬间发生在亨利的分球动作上，是凌空颠拨传球还是落地连拨传球，快到令人眼花缭乱，却又干净利落，而且准确无误传到刚刚赶到的队友脚前，这恰是一个致命空当，仅面对守门员一人，而守门员此前已做出防范亨利居中射门的动作。亨利在那一瞬，已看到右路扑上来的战友，同时判断出那是一个比自己更有利射门的位置，于是那快捷到一瞬间的传球就完成了。如若看不到或判断不出右边拍马赶到的队友，如若脚下稍有黏滞，致命的机会就稍纵即逝，而被两三名对手围堵着的亨利，射门的难度和进球的可能都很难把握，神来之一脚不仅表现在亨利自己射门的一瞬，还体现在为队友创造出绝杀的机会这一点上。

第二粒进球是亨利本人完成的。亨利在前场得到队友的一个绝好的传球，其时对方的防守重心在中场，但亨利身边仍有两个防守队员，而己方的进攻队员也远在中场附近，亨利只有独自带球单刀赴会了。那一瞬的亨利，疾如脱兔，三闪两拐就把两个防守队员甩开，面对着守门员一人了。亨利在守门员扑倒的同时起脚射门，皮球从守门员的指梢前划过，从远角打入网内，让守门员鞭长莫及，用关中民间话说，干瞪眼没办法。

这是亨利经常表演的绝技，也是亨利最有把握进球的路线和角度，自然也是我近年间看到最多的亨利的绝招，可谓痛快淋漓，美不胜收，回味无穷。美到几乎令我都不大关心阿森纳输了还是赢了。

2006年2月8日 二府庄

陷入与沉浸

——《延河》创刊五十年感怀

我至今依旧清楚无误地记着，《延河》是我平生最早闻名的第一种文学杂志。这是五十年前的事了。五十年前的一个大雪初霁的早晨，我和同学正在操场上扫雪，语文老师站在身后叫我，让我到语文教研室去。我开始有点忐忑，此前曾因为他对我的一篇作文的评语闹过别扭，所以心存戒备。走出扫雪的人窝，老师把一只胳膊搭到我的肩膀上，这个超常超级亲昵的动作，顿然化释了我的小心眼里的芥蒂，却也被骤然潮起的受宠惊慌得不知所措。

到了一楼的语文教研室。刚进门，我的语文老师车老师以玩笑的口吻宣布："二两壶来了"。教研室里五六位男女教师哄笑起来。我有点手足无措。"二两壶"是我在作文本上写的一篇小说里的一个人物的绰号。我的语文老师车老师把我领到他的办公桌前，颇动情地告诉我，西安市教育系统搞中学生作文比赛，每个学校推荐两篇作文，我的这篇小说被选中了。末了，他很诚恳地说，除了参评，他还要把这篇小说投稿给《延河》。他告诉我两点，如果能发表，会有稿费的，他显然知道我因家庭经济不支而休学的事。他说投稿由他来抄写，"你的字写得不行"。我由此知道了《延河》。这是初中二年级第一学期的一个大雪的早晨。

《延河》又是我掏钱购买的第一种文学杂志。这也是近五十年前的事了。一九五九年春天，我得知柳青的《创业史》将在《延河》连载，竟然有一种按捺不住的兴奋和期待，自然属于对一位著名作家的

膜拜，更多的因素是出于某种揭秘式的好奇心理。我已经听说柳青在终南山下的长安农村深入生活的事。我常常站在学校大门外刚刚返青的麦地边上，眺望白云凝然的终南山峰，柳青无疑是世界上离我最近的一位作家，不过几十华里的距离吧。他的笔下将会使关中乡村呈现怎样一种风貌？这无疑是我所能读到的第一部描写我脚下这块土地的小说，新鲜新奇的神秘感几乎是无法抑制的。

我读书到初中三年级，转学到了离家较近的西安东郊刚刚兴起的纺织工业基地，通称纺织城，学校设在大片住宅楼东边一片开阔的高地上，校门口便是庄稼地。我仍然继续着背馍上学的生活，硬是把家里给的买咸菜的零钱省下来攒起来，到纺织城邮局去买一本当月出版的《延河》。记得《创业史》在《延河》连载的第一期，书名为《稻地风波》，有通栏长幅插图作为衬底，是诗情画意的稻田畦埂和灌渠上一排排迎风摆动的白杨树，远处的背景是淡墨涂描的终南群峰。看到这幅题头画儿，我印证的却是我家门前灞河川道的自然景致，从未见过有什么画儿让我感到如此逼近的真实和亲切。同样，我读着作为《稻地风波》（即《创业史》）引子的《题记》时的完全沉迷，也是此前读任何小说都未曾发生过的逼近的真实和真切，且不说艺术成就的评价，我一个初三学生也难得估价这部作品的分量，而真实和真切的阅读感受却是比任何世界名著都强烈。

这样，我每月头上最操心也最兴奋的事，就是捏着积攒下来的两毛钱走进邮局，买一本新出的《延河》，无异一个最开心的节日。我在《延河》上认识了诸多当时中国最活跃的作家和诗人，直到许多年后，才在一些文学集会上得以和他们握手言欢，其实早已心仪着崇敬着乃至羡慕着了。

像茹志鹃的《百合花》，吴强的《红日》选章，王汶石的许多短篇，不仅在文学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更在普通读者中享有盛誉。尤其是茹志鹃和吴强的两篇（部）佳作，据说辗转过好几家编辑部都被退稿，均不是作品的水平问题，而是作品情调或写法有什么问题。《延河》敢于拍板发表，不单是胆子大小的事，恰是对文学创作艺术本体的尊重和坚守，以及由此而拥有的自信和神圣。

《延河》已成为大家名作云集的一方艺术天地。我在喜欢它的同时，也产生了畏怯心理，可望而不可即的文学高地。此后十余年的业余创作时日里，我一次也没有往《延河》编辑部里投过稿。我的自我把握是尚不够格，《延河》在我心里业已形成的那个高格。尽管我已经在西安的报纸上发表了七八篇散文。直到一九七二年的冬天，徐剑铭把我的一篇散文推荐给编辑路萌、董得理，我才走进了《延河》的门槛。

这年接到徐剑铭一封信，告诉我一个重要消息，“文革”中被砸烂的陕西作家协会（当时称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恢复工作，为避“四旧复辟”之嫌，改为陕西省文艺创作研究室。出于同样的顾虑，即将复刊的《延河》也改名为《陕西文艺》。徐剑铭还告诉我，他刚刚参加过由《陕西文艺》召集的一次西安地区业余作者座谈会，希望大家给刊物写稿，并推荐工人农民解放军（工农兵）新作者。那时候，许多著名作家被打倒，有的未被“解放”，有的虽被“解放”了，仍心存余悸，无法进入创作，刊物主要靠业余的工农兵作者写稿。徐剑铭在“文革”前已是西安地区卓有影响的工人身份的诗人。他说他向董得理、路萌等编辑推荐了我，两人均表示毫不知晓。他说他同时推荐了我刊登在《郊区文艺》上的一篇散文《水库情深》，而且由他剪贴下来送到编辑部。我很感动。这种热心和无私给我以永远动人的记忆。

大约是一九七一年“林彪叛逃事件”之后，极左到无以复加的“文革”有所收敛，政策也有所调整，体现在文艺界，开始恢复文艺机构和文艺创作。我所在的西安郊区，由文化馆召集本区内的业余文学作者开会，创办了《郊区文艺》自编自印的文学刊物。我和郊区一帮喜欢创作的朋友兴奋不已，写作热情不必说了，而且到印刷厂里亲自做校对。我的散文《水库情深》就刊登在《郊区文艺》创刊号上。我尚不知身居城区的剑铭竟然看到了这本内部交流刊物，而且力荐给即将创刊的《陕西文艺》（即《延河》）。

时隔不久，接到《陕西文艺》编辑部的一封信，内装我的散文《水库情深》，是发在《郊区文艺》上的剪贴样稿，在边角上用红笔修改勾画得一片红色。我当时刚刚从村子里下乡回到公社机关，看了附信，得知此稿将在《陕西文艺》创刊号发表，下乡一天的劳累烟飞云散了，饥肠辘辘的感觉也消失了，兴奋得令人慌乱的情绪，竟使我无法坐下来阅读修改的文字。直到晚饭后，我才能静下心来把这篇习作再读一遍，尤其是那些用红笔修改的字句，细细嚼磨，反复推敲，求得启示。

之后两三天，我借着到郊区开会进城之机，顺便送去了修改稿。陕西省文艺创作研究室和《陕西文艺》编辑部，在东木头市那条巷子里。怀着诚惶诚恐却也兴奋的心情走进院子，问到一间屋子，便看见了董得理和路萌，说过几句很诚恳的见面话之后，董得理离开了，由路萌和我谈稿子。我这时才得知，用红笔勾画修改过习作的人，就是和我当面坐着的这个名叫路萌的编辑。他很客气。他很和悦。他很谦逊。他长得细皮嫩脸，文质彬彬又热情洋溢。他最像个文人……我进了早就仰慕着的《延河》的大门了。

一九七三年春天，我到位于纺织城的西安郊区党校参加为期一月的“学习班”。我在公社机关工作已经五年，对关中乡村生活和农民世界开始有初步了解。我的工作，除了参加会议，多是跑在或住在生产队里，很少有相对安定和清闲的日子，这次长达一个月的有规律的作息时间的日子，对我来说简直称得上享受了。就是在这期间，我利用早起的时间，或是晚上看电影的机会，躲开大厅通铺的人，写成了我平生的第一个短篇小说《接班以后》，中学作文本上的小说除外。这篇小说从字数上来说具有突破的意义，接近两万字，是我结构故事完成人物的一次自我突破。我记不清是用信寄到《陕西文艺》编辑部，抑或是亲自送去的，只记得时隔不久，便收到董得理用很富功力的毛笔字写下的长信，对这篇小说完全肯定，多有赞美的评语，而且似乎说到编辑们传阅过程中的热烈反应，信末约我到编辑部交换一些细节处理的意见。我同样利用到城里开会的机会，第二次走进东木头市《陕西文艺》编辑部的大门。这回是董得理和我谈稿，我似乎能觉察到他在刊物编辑部负有重要责任。他很兴奋，完全是对他喜欢的一篇小说由衷的兴致。他也很严谨，对小说的细部包括不恰当的字词都谈到了。他又很坦率，谈到真正的文学和当时流行的“假大空”文艺的区别，我更感动他的胆识和真诚，第一次谈话就敢说对“假大空”类文艺的不恭之词。

这篇小说在《陕西文艺》第三期上发出来了。我看到题头上配着一幅神采飞扬的人物肖像画儿，是现在的西安国画院院长王西京的作品。王西京当年供职《西安日报》美术编辑，已经崭露出画画儿的头角。小说发表后产生了广泛影响。编辑部把这期杂志送给柳青。关于柳青对《接》的反应，我却是从《西安日报》文艺编辑张月赓那里得到的。老张告诉我，和他同在一个部门的编辑张长仓，是柳青的追慕者，也是很得柳青信赖的年轻人。张长仓看到了柳青对《接》修改的

手迹，并拿回家让张月赓看。我在张月赓家看到了柳青对《接》文第一节的修改本，多是对不大准确的字词的修改，也划掉删去了一些多余的赘词废话，差不多每一行文字里都有修改圈画的笔迹墨痕。我和老张逐个斟酌掂量那些被修改的字句，接受和感悟到的是一位卓越作家的精神气象，还有他的独有的文字表述的气韵，追求生动、准确、形象的文字的“死不休”的精神令我震惊。这应该是老师对学生的一次作文辅导，铸成我永久的记忆。今天想来颇感遗憾的事，那时候没有复印设备，这本经柳青修改的刊物，在我看过之后就被张长仓收回了，据为珍藏。

新创刊的《陕西文艺》，很快聚拢起一批青年作家。不过，那时候没有谁敢自称作家，也没有他称作家，他称和自称都是作者，常常还要在作者名字之前标明社会身份，如工人作者农民作者解放军作者等，自然是为区别于“文艺黑线”，表明“工农兵”占据了文艺阵地。邹志安、京夫、路遥、贾平凹、李凤杰、韩起、徐岳、王晓新、王蓬、谷溪、李天芳、晓雷、闻频、申晓等，先后都在《陕西文艺》上初露头角，进行了最初的文学操练，到“四人帮”垮台，这些人呼啸着呐喊着跃出，一个个都成为荒寂十年后的文坛上耀眼的新星，形成中国文坛令人瞩目的陕西青年作家群。一九八一年，中国作协选定湖南和陕西，作为新时期中国南北两个形成作家群体的省份交流经验，陕西乡党阎纲受《文艺报》委托回陕调研，我参加了座谈会。湖南青年作家到陕访问，陕西青年作家却未能按时回访，原因是我等家住农村，夏收需回家割麦碾场。我仍然觉得，改为《陕西文艺》的《延河》不过三四年，上有极左的政治和文艺政策铺天盖地，包括我等业余青年作者受到束缚局限的同时，也受到“三突出”的不同程度的影响，然而有一批深谙艺术规律的编辑，如董得理、王丕祥、路萌、贺抒玉本身又是作家，他们实践着教导着也暗示给这些作者的是文学创作的本真。

在《陕西文艺》存在的三四年里，我写作发表过三篇短篇小说，也是我写作生涯里的前三篇小说，一九七三年发《接班以后》，一九七四年发《高家兄弟》，一九七五年发《公社书记》，一年一篇。这些作品的主题和思想，都在阐释阶级斗争这个当时社会的“纲”，我在新时期之初就开始反省，不仅在认识和理解社会发展的思想理论上进行反思，也对文学写作本身不断加深理解和反思。然而，最初的写作实践让我锻炼了语言文字，锻炼了直接从生活掘取素材的能力，也演练了结构和驾驭较大篇幅小说的基本功，这三篇小说都在两万字上下，单是结构对我来说都是一种突破。

还有一点至今值得总结，就是我对作家这种劳动的理解。我后来把我对文学的偏爱和对创作的坚持，归结为一根对文字敏感的神经，以此作为对神秘的天分说的物质化解释。是这根与生俱来的对文字敏感的神经，决定着一个人从少小年纪就对文字发生偏爱，发生兴奋性的敏感，与书香门第以及奶奶的动人的歌谣无关，或者说这些书香家庭或会唱歌谣的奶奶，只对具备那根神经的人才发生影响，才起促进促成的作用。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我写作上述那几篇作品的时候，实际是我对文学创作最失望的时候，自然是“文革”对前辈作家的残害造成的。我当时已谋得最基层的一个干部岗位，几乎不再想以写作为生的事，更不再做作家梦了。写作当不了饭吃，尽管发了几篇颇有反响的小说，董得理奖励给我的是一摞又一摞稿纸。我回到公社几乎只字不提写作的事，发了我小说的刊物压在桌斗里，从来不让公社机关任何人看见，怕给领导和同志造成不务正业不操心“学大寨”本职工作的恶劣印象。事实上，这三篇小说都不是在公社大院里写成的。《接》在党校学习期间抽空写成。《高》又是在南泥湾五七干校劳动锻炼的半年时间里写成，为此我自己买了一盏玻璃罩煤油灯，待同一窑洞的另三位干部躺下睡着，干校统一关灯之后，我才点燃自备的油灯读书

和写作。读的是《创业史》，翻来覆去读；写成了《高》文。《公》则是被文化馆抽调出去工作时间的副产品。那个时候不仅没有稿酬，还有一根极左的棒子悬在天灵盖上，朋友、家人问我我也自问，为啥还要写作？我就自身的心理感觉回答：过瘾。这个“过瘾论”是我的最真实感受，也是最直白的表述。有如烟瘾，一年写一篇小说，有幸发表了，再得到编辑几句夸奖和读者的呼应，那个“瘾”就过得很舒适。许多年后，创作有了发展，对创作这种劳动的理解也有了新的层面的体验，也才明白那个“瘾”原是敏感文字的那根神经致成的。当年把写作当作“过瘾”的时候，只是体验和享受一种生命能量释放过程里的快乐和自信，后来发生的名和利的薄了厚了多了寡了是根本料想不到的。

新时期伊始，《延河》又恢复了。这自然不单是一个名字的改写，而是中国社会发展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历史性转折，包括文学艺术，属于文学自身的精神和规律，重新得以接续、传承和发展。新时期恢复的《延河》，我发表的第一篇小说是短篇《南北寨》，此后每年都要发表一篇或两篇小说，统共发过多少篇已经记不清了，是我发表小说最多的一种文学杂志，却是确定无疑的。

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我调进陕西作协专业创作组，以我自己的审视和把握，索性回到祖居的老家，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集中思想的注意力，充分利用中年后的后半生读书和写作。每隔十天半月，我就会来作协，开会或买煤买粮，只安着一张桌子一张床的两室的房子，我往往懒得开锁进门。开会办事的间隙，我都滞留转悠在编辑部的小院里，和老编辑聊天，更和年轻的或同龄的朋友天上地下乱扯胡谝，往往获得一些新鲜的信息和文坛动态，得到启迪。印象最深的是王观胜的兼着卧床的办公室，常是畅所欲言十分放纵的场所，路遥似

乎是常客。聊到开心时，王观胜会打开立柜的木扇，取出某位作者进贡的高级咖啡，赐赏每人一杯，满屋子飘荡着令人陶醉的香气儿，路遥们的谈锋就会更幽默睿智。直到我告辞出门准备回乡下时，观胜送出门时才撂出一句："给咱得空再弄一篇（小说）。"文学的氛围，朋友的坦诚无忌，和咖啡清茶的香味弥漫在记忆里。还有李星那半间凌乱不整的办公室，常是我聆听文学新潮的气象站。

人生苦短，生命有限。创办《延河》的陕西第一代作家和编辑，有的年事已高，有的已经谢世。接替的一茬一茬主编和编辑，也一茬接一茬卸任。无论开创《延河》的先辈，无论接任又卸任的同辈，他们崇高的文学理想实践在《延河》里，他们各自独立的创造精神体现在《延河》上，他们为一代一代作家的成长和发展默默地躬耕在《延河》这块土地里。我以自己一个作家的真诚，向胡采们董得理们致敬。我向卸任的白描们、徐岳们和徐子心们致以真诚的问候，你们为《延河》的发展付出的智慧和心血，作为一个受益的同代作家的我，也铭记着。我更满怀信心寄望于新任主编常智奇们，《延河》将成为陕西新一代作家发展壮大的沃土和福地。

2006年3月7日 二府庄

关于一条河的记忆和想象

在我写过的或长或短的小说、散文中，记不清有多少回写到过这条河，就是从我家门前自东向西倒流着的灞河。或着意重笔描绘，或者不经意间随笔捎带提及，虽然不无我的情感渗透，着力点还是把握在作品人物彼时彼境的心理情绪状态之中，尤其是小说。散文里提到这条河，自然就是个人情感的直接投注和舒展了，多是河川里四时景致的转换和变化，还有系结在沙滩上杨柳下的记忆，无疑都是最易于触发颤动的最敏感的神经。然而，直到今年三月一日，即农历二月二的“龙抬头”日，我站在几万乡民祭祀华胥氏始祖的祭坛上的那一刻，心里瞬间凸显出灞河这条河来，也从我已往的关于这条河的点滴描述的文字里摆脱出来；我才发现这条河远远不止我的浮光掠影的文字景象，更不止我短暂生命里的沙金碎花类的记忆。是的，我站在孟家崖村的华胥氏始祖的祭台上，心里浮出来的却是距此不过三里路的灞河。

锣鼓喧天。几家锣鼓班子是周边几个规模较大的村子摆下的阵势，这是秦地关中传统的表示重大庆祝活动的标志性声响，也鼓着呈现高低的锣鼓擂台的暗劲儿。岭上和河川的乡民，大约四万余众，会集到华胥镇上来了。西安城里的人也闻讯赶来凑热闹了，他们比较讲究的乃至时髦的服饰和耀眼的口红，在普遍尚顾不得装潢自己的乡村民众的旋涡里浮沉。前日刚刚下过一场大雪。北边的岭和南边的原坡，都覆盖着白茫茫的雪，河川果园和麦田里的雪已经消融得坨坨斑斑。乡村土路整个都是泥泞。祭坛前的麦田被踩踏得翻了浆。巨大的不可抑制的兴奋感洋溢在男男女女老老少少的脸上，昨天以前的生活里的艰难和忧愁和烦恼全部都抛开了，把兴奋稀奇和欢悦呈现给擦肩

挤胯而过的陌生的同类。他们肯定搞不清史学家们从浩瀚的故纸堆里翻检出来的这位华夏始祖老奶奶的身世，却怀着坚定不移的兴致来到这个祭坛下的土壕前投注一回虔诚的注目礼。

华胥镇。以华胥氏命名的镇。距现存的华胥壕遗址所在地孟家崖村不过一华里，这个古老的小镇自然最有资格以华胥氏命名了。这个镇原名油坊镇，亦称油坊街，推想当是因为一家颇具规模的榨油作坊而得名。然而，在我的印象里，连那家榨油作坊的遗迹都未见过。这个镇紧挨着灞河北岸，我祖居的村子也紧系在灞河南岸，隔河可以听见鸡鸣狗叫打架骂仗的高腔锐响。我上学以前就跟着父亲到镇上去逛集，那应是我记忆里最初的关于繁华的印象。短短一条街道，固定的商店有杂货铺、文具店、铁匠铺、理发店，多是两三个人的规模，逢到集日，川原岭坡的乡民挑着推着粮食、木柴和时令水果，牵着拉着牛羊猪鸡来交易，市声嗡响，生动而热闹。我是一九五三年到一九五五年在这个镇的高级小学里完成了小学高年级教育，至今依然保存着最鲜活的记忆。我在这里第一次摸了也打了篮球。我曾经因耍小性子伤了非常喜欢我的一位算术老师的心。因为灞河一年三季常常涨水，虽然离校不过二里地，我只好搭灶住宿，睡在教室里的木楼上，夜半尿憋醒来跑下木楼楼梯，在教室房檐下流过的小水渠尿尿，早晨起来又蹲在小水渠边撩水洗脸，住宿的同学撩着水也嘻嘻哈哈着。这条水渠从后围墙下引进来，绕流过半边校园，从大门底下石砌的暗道流到街道里去了。我们班上有孟家崖村子的同学，似乎没有说过华胥氏祖奶奶的传说，却说过不远处的小小的娲氏庄，就是女娲“抟土造人”的神话发生的地方。我和同学在晚饭后跑到娲氏庄，寻找女娲抟泥和炼石的遗痕，颇觉失望，不过是别无差异的一道道土崖和一堆堆黄土而已。五十多年后的二〇〇六年的农历二月二，我站在少年时期曾经追寻过的女娲神话发生的地方，与几万乡民一起祭奠女娲的母亲华胥

氏，真实地感知到一个民族悠远、神秘而又浪漫的神话和我如此贴近。我自小生活在诞生这个神话的灞河岸边，却从来没有在意过，更没有当过真。年过六旬的我面对祭坛插上一炷紫香弯腰三鞠躬的这一瞬，我当真了，当真信下这个神话了，也认下八千年前的这位民族始祖华胥氏老奶奶了。

在蓄久成潮的文化寻根热里，几位学者不辞辛苦劳顿溯源寻根，寻到我的家乡灞河岸边的孟家崖和娲氏庄，找到了民族始祖奶奶华胥氏陵。

历史是以文字和口头传说保存其记忆的。相对而言，后人总是以文字确定记忆里的史实，而不在乎民间口头的传闻；民间传说似乎向来也不在意史家完全蔑视的口吻和眼神，依然故我津津有味地延续着自己的传说。这里发生了一件有趣的事，史家的文字记载和民间的口头记忆达成默契，互相认可也互相尊重，就是发生在灞河岸边创立过华胥国的华胥氏的神话。

这点小小的却令我颇为兴奋的发现，得之于学者们从文史典籍里钩沉出来的文字资料鉴证的事实。华胥氏生活的时代称为史前文化。有文化却没有文字。没有文字，反而给神话传说的创造提供了空前绝后的繁荣空间。等到这个民族创造出方块汉字来，距华胥氏已经过去了大约五千年，大大小小的史圣司马迁们，只能把传说当作史实写进他们的著作。面对学者们从浩瀚的史料典籍里翻检钩沉的史料，我无意也无能力考证结论，只想梳理出一个粗略的脉系轮廓，搞明白我的灞河川道八千年前曾经是怎样一个让号称作家的我羞死的想象里的神话世界。

据《山海经·海内东经》说：“华胥履大人迹，于雷泽而生伏羲。”据《春秋世谱》说：“华胥氏生男名伏羲，生女为女娲。”在《竹书纪年·前篇》里的记载不仅详细，而且有魔幻小说类的情节，“太昊之母，居于华胥之渚，履巨人之迹，意有所动，虹且绕之，因而始娠”。华胥氏在灞河边上，无意间踩踏了一位巨人留下的脚印，似乎生命和意识里感受到某种撞击，那一美妙时刻，天空有彩虹缭绕，便受孕了，便生出伏羲和女娲两兄妹来。

据史圣司马迁《史记·五帝本纪》说，华胥氏生伏羲女娲，伏羲女娲生少典，少典生炎帝和黄帝。这样，司马迁就把这个民族最早的家庭谱系摆列得清晰而又确切。按照这个族系家谱，炎帝和黄帝当属华胥氏的嫡传曾孙，该叫华胥氏为曾祖奶奶了。被尊为“人文初祖”的轩辕黄帝，埋葬于渭北高原的桥山，望不尽的森森柏树迷弥着悠远和庄严，历朝历代的官家和民间年年都在祭拜，近年间祭祀的规模更趋隆重更趋热烈，洋溢着盛世祥和的气象。炎帝在湖南和陕西宝鸡两地均有祭奠活动，虽是近年间的事，比不得黄帝祭祀的悠久和规模，却也一年盖过一年地隆重而庄严。作为黄帝炎帝的曾祖母的华胥氏，直到今年才有了当地政府（蓝田县）和民间文化团体联手举办的祭祀活动，首先让我这个生长在华胥古国的后人感到安慰和自豪了，认下这位始祖奶奶了。

我很自然追问，华胥氏无意间踩踏巨人的脚印而受孕，才有伏羲女娲以至炎黄二帝。那么华胥氏从何而来？古人显然不会把这种简单的漏洞留给后人。《拾遗记》里说得很确凿，华胥是“九河神女”。而且列出了九条河流的名称。这九条河流的名称已无现实对应，具体方位更无从考据和确定。既是“九河神女”，自然就属于不必认真也无须考究的神话而已。然而，《列子·黄帝》篇里记述了黄帝梦游华胥国的

生动图景："其国无帅长，自然而已，其民无嗜欲，自然而已。不知乐生，不知恶死，故无夭殇。不知亲己，不知疏物，故无所爱憎。不知背逆，不知向顺，故无利害。都无所爱惜，都无所畏忌。入水不溺，入火不热，斫挞无伤痛，指擿无痛痒。乘空如履实，寝虚若处林。云雾不碍其视，雷霆不乱其听，美恶不滑其心，山谷不踬其前，神行而已。"这是一种怎样美好的社会形态啊！其美好的程度远远超出了几千年后的现代人的想象。黄帝梦游过的华胥国的美好形态，甚至超过了世界上的穷人想象里的共产主义的美妙图景。华胥氏创造的华胥国里的生活景象和生活形态，不是人间仙境，而是仙境里的人间。这样的人间，截止到现在，在世界的或大或小的一方，哪怕一个小小的角落，都还没有出现过。黄帝的这个梦，无疑是他理想中要构建的社会图像。然而要认真考究这个梦的真实性，就茫然了。我想没有谁会与几千年前的一个传说里的神话较真，自然都会以一种轻松的欣赏心情看取这个梦里的仙境人间。我却无端地联想到半坡遗址。

黄帝梦游过的华胥氏创建的令人神往的华胥国，即今日举行华胥氏祭祀盛会的灞河岸边的华胥镇这一带地域。由此沿灞河顺流而下往西不过十公里，就是中国第一座史前遗址博物馆——西安半坡遗址。这是黄河流域一个典型而又完整的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的生活图景。有聚居的村落。有用泥块和木椽搭建的房子。房子里有火道和火炕。这种火炕至今还在我的家乡的乡民的屋子里继续使用着。我落生到这个世界的头一个冬天就享受着火炕的温热，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用电热褥取代了火炕。半坡人制作的鱼钩和鱼叉，相当精细，竟然有防止上钩和被叉住的鱼逃脱的倒钩。他们已经会编席，也会织布，这应该是中国最早的编织品，编和织的技术是他们最先创造发明出来的。他们毫无疑义又是中国制陶业的开山鼻祖，那些红色、灰色和黑色的钵、盆、碗、壶、瓮、罐和瓶的内里和陶盖上单色或彩绘着的张着大

嘴的鱼，跳跃着的鹿，令我叹为观止。任你撒开想象的缰绳张开想象的翅膀，想象六千多年前聚集在白鹿原西坡根下浐河岸边的这一群男女劳动生产和艺术创造的生活图景。他们肯定有一位睿智而又无私的伟大的女性作为首领，在这方水草丛林茂盛、飞禽走兽鱼蚌稠密的丰腴之地，进行着人类最初的文明创造。这位伟大的女性可是华胥氏？半坡村可是华胥国？或者说华胥氏是许多个华胥国半坡村里无以数计的女性首领之中最杰出的一位？或者说是在这个那个诸多的半坡村伟大女性首领基础上神话创造的一个典型？

这是一个充满迷幻魔幻和神话的时期。半坡遗址发掘出土的一只红色陶盆内侧，彩绘着一幅人面鱼纹图案，大约是魔幻现实主义的创始之作，把人脸和鱼纹组合在一幅图画上，比拉美魔幻小说里人和甲虫互变的想象早过六千多年，现在还有谁再把人变成狗的细节写出来或画出来，就只能令当代读者和看客徒叹现代人的艺术想象力萎缩枯竭得不成样子了。我倒是从那幅人面鱼纹彩绘图画里，联想到伏羲和女娲。华胥氏无意踩踏巨人脚印受孕所生的这一子一女，史书典籍上用“蛇身人首”来描述。“蛇身人首”和“人面鱼纹”有无联系？前者是神话创造，后者却是半坡人的艺术创作。我在赞叹具备“人面鱼纹”这样非凡想象活力的半坡人的同时，类推到距半坡不过十公里的华胥国的伏羲女娲的“蛇身人首”的神话，就觉得十分自然也十分合情理了。浐河是灞河的一条较大的支流，灞河从秦岭山里涌出，自东向西沿着北岭和南原（白鹿原）之间的川道进入关中投入渭河，不过百余公里，浐河自秦岭发源由南向北，在古人折柳送别的灞桥西边投入灞河。我便大胆设想，在灞河和浐河流经的这一方地域，有多少个先民聚集着的半坡村，无非是没有完整保存下来或未被发现而已，半坡遗址也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兴建纺织厂挖掘地基时偶然发现的。华胥国其实就是又一个半坡村，就在我家门前灞河对岸二里远的地盘上，也许

这华胥国把我的祖宗生活的白鹿原北坡下的这方宝地也包括在内。据史家推算，华胥氏的华胥国距今八千多年，半坡村遗址距今六千多年，均属人类发展漫长历程中的同一时期。神话和魔幻弥漫着整个这个漫长的时期，以至五千年前的我们的始祖轩辕黄帝，也梦牵魂绕出那样一方仙境里的人间——曾祖母华胥氏创造的华胥国。

告别华胥氏陵祭坛，在依然热烈依然震天撼地的锣鼓声响里，我陡增起对祭坛前这条河的依恋，便沿着灞河北岸平整的国道溯流而上。大雪昨日骤降骤晴。灿烂的丙戌年二月二龙抬头日的阳光如此鼓荡人的情怀。天空一碧如洗。河南岸横列着的白鹿原的北坡上的大大小小的沟壑，蒙着一层厚厚的柔情的雪。坡上的洼地和平台上，隐现着新修房屋的白色或棕色的瓷片，还有老式建筑灰色瓦片的房脊。公路两边的果园和麦地，积雪已融化出残破的景象，麦苗从融雪的地坨里露出令人心颤的嫩绿。柳树最敏感春的气息，垂吊的丝条已经绣结着米黄的叶芽了。我竟然追到蓝田猿人的发现地——公王岭——来了。

这是一阶既不雄阔也不高迈的岭地，紧依着挺拔雄浑的秦岭脚下，一个一个岭包曲线柔缓。灞河从公王岭的坡根下流过，河面很窄，冬季里水量很小，看上去不过像条小溪。就是这个依贴着秦岭绕流着灞水的名不见经传的公王岭，一日之间，叫响了整个中国，乃至世界，进入中学历史课本，把公王岭发现的蓝田猿人铸入一代又一代人的常识性记忆。这是在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人类化石遗存，刚刚从猿蜕变进化到可以称作人的蓝田猿人，距今大约一百一十五万年。

这个蓝田猿人化石的发现，带有很大的偶然性，或者正应了“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的老话。一九六三年春天，中科院古脊椎动物与人类研究所的一行专家，到蓝田县辖的灞河流域作考古普

查。这是一个冷门学科里最冷的一门，别说普通乡民摇头茫然，即使有一定文化知识的当地教师干部，也是浑然不知茫然摇头。他们用当地人熟知的龙骨取代了化石，一下子就揭去了这个高深冷僻的冷门里神秘的面纱，不仅大小中药铺的药匣子里都有储备，掌柜的都精通作为药物的龙骨出自何地，蓝田北岭和原坡地带随处都有；被他们问到的当地识字或不识字的农民，胳膊一抡一指，烂龙骨嘛，满岭满坡踢一脚就踢出一堆。话说得兴许有点夸张。然而灞河北岸的岭地和南岸的白鹿原的北坡，农民挖地破山碰见龙骨屡见不鲜，积攒得多了就送到中药铺换几个零钱，虽说有益肾补钙功效，却算不得珍贵药材，很便宜的。农家几乎家家都有储备，有止血奇效。我小时割草弄破手指，大人割麦砍伤脚腕，取出龙骨来刮下白色粉末敷到伤口上，血立马止住不流，似乎还息痛。我便忍不住惋惜，说不定把多少让考古科学家觅寻不得的有价值的化石，在中药锅里熬成渣了，刮成粉末止了血了。

这一行考古专家在灞河北边的山岭上踏访寻觅，终于在一个名叫陈家窝的村子的岭坡上，发现了一颗猿人的牙齿化石，还有同期的古生物化石，可以想象他们的兴奋和得意，太不容易又太意外地容易了。由此也可以想到这里蕴积的丰厚，真如农民说的一脚能踢出一堆来。这一行专家又打听到灞河上游的古老镇子厚镇周围的岭地上龙骨更多，便奔来了。走过蓝田县城再往东北走到三十多里处，骤然而降的暴雨，把这一行衣履不整灰尘满身的北京人淋得避进了路边的农舍，震惊考古史界的事就要发生了。

他们避雨躲进农舍，还不忘打听关于龙骨的事。农民指着灞河对岸的岭坡说，那上头多得很。他们也饿了，这里既没有小饭馆就餐，连买饼干小吃食的小商店也没有，史称“三年困难”的恶威尚未过去。

他们按“组织纪律”到农民家吃派饭，就选择到对面岭上的农家。吃饭有了劲儿，就在村外的山坡上刨挖起来，果然挖出了一堆堆古生物化石，又挖出一颗猿人牙齿。他们把挖出的大量沉积物打包运回北京，一丝一缕进行剥离，终于剥离出一块完整的猿人头盖骨化石，震惊考古学界的发现发生了。这个小岭包叫公王岭。我站在公王岭的坡头上，看岭下公路上川流着的各种型号的汽车，看背后蒙着积雪的一级一级台田。想着那场逼使考古专家改变行程的暴雨。如果他们按既定目标奔厚镇去了，所得在难以估计之中，这个沉积在公王岭砾石里的猿人头盖骨化石，可能在随后的移山造田的“学大寨”运动中被填到更深的沟壑里，或者被农民捡拾，进了药铺下了药锅熬成药渣，或者如我一样刮成粉末撒到伤口永远消失。这场鬼使神差的暴雨，多么好的雨。

我在公王岭陈列室里，看到蓝田猿人头盖骨复原仿制品，外行看不出什么绝妙，倒是对那些同期的古生物化石惊讶不已。原始野生的牛角竟有七十多厘米长，人是无论如何招不住那犄角一触的。作为更新世动物代表的猛犸象，一颗獠牙长到二十多厘米，直径粗到十余厘米，真是巨齿了，看一眼都令人毛骨悚然。还有剑齿虎，披毛犀，单是牙齿和犄角，就可以猜想其庞然大物的凶猛了。我便联想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我下乡驻队在白鹿原北坡一个叫龙湾的村子里。那是一个寒冷异常的冬天，在北方习惯称作冬闲季节，此时倒比往常更忙了，以平整土地为主项的“学大寨”运动正在热潮中。忽一日有人向我通报，说挖高垫低平整土地的社员挖出比碾杠还粗的龙骨。随之，打电话报告了西安有关考古的单位，当即派专家来，指导农民挖掘，竟然挖出一头完整的犀牛的化石，弥足珍贵。龙湾村距公王岭不过四十公里，当属灞河的中偏下游了。可以想见，一百万年前的灞河川道，是怎样一番生机盎然生动蓬勃的景象。这儿无疑属于热带的水乡泽

国，雨量充沛，热带的林木草类覆盖着山岭原坡和河川。灞河肯定不止现在旱季里那一绺细流，也不会那么浑，在南原和北岭之间的川道里随心所欲地南弯北绕涌流下去。诸如剑齿虎、猛犸象、原始野牛和披毛犀牛等兽类里的庞然大物，傲然游荡在南原北岭和河川里。已经进化为人的猿人的族群，想来当属这些巨兽横行地域里的弱势群体，然而他们的智慧和灵巧，成为生存的无可比拟的优势。他们继续着进化的漫漫行程。

从公王岭顺灞河而下到五十公里处，即是灞河的较大支流浐河边上的半坡氏族村落遗址。从公王岭的蓝田猿人进化到半坡人，整整走过了一百多万年。用一百多万年的时间，才去掉了那个“猿”字，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真是太漫长太艰难了。我更为感慨乃至惊诧的是，不过百余公里的灞河川道，竟然给现代人提供了一个完整的从猿进化到人的实证；一百多万年的进化史，在地图上无法标识的一条小河上完成了。还有华胥氏和她的儿女伏羲女娲的美妙浪漫的神话，在这条小河边创造出来，传播开去，写进史书典籍，传播在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民族的口头上。这是怎样的一条河啊！

这是我家门前流过的一条小河。

小河名字叫灞河。

2006年4月12日 二府庄

也说“抬杠”

前不久在《夜光杯》版面上读到说“抬杠”的一篇短文，颇为兴奋。一在“抬杠”这词汇，我以为只是陕西的方言，从字面上很难揣摩其本意所指，所以在已往的写作中很少采用，艰涩的方言不仅于文字叙述难增色彩，反倒会给读者造成阅读障碍，如同吃饭碰到硌牙的沙粒，这是我选择方言的标准。读到这篇说“抬杠”的有趣文章，起码让我知道陕西之外的某个地域的人，也说“抬杠”这个话。再，由这篇文章的阅读，引发起我的有关“抬杠”的趣事趣人的记忆，也想说一说凑点趣谈。

在我生活的关中乡村，在我工作过的机关，几乎每个村子每个单位都会遇到一个爱跟人“抬杠”的角色。所谓“抬杠”，主要指说话，你说东好，他偏会抬出西好的例证，似乎总与人作对，闹别扭。乡间把这种人称为“杠头”。

民间流传着不少关于“抬杠”的经典话语。孙子问爷爷：“树上的柿子咋那么红呀？”爷爷说：“日头晒的。桃呀杏呀沙果呀都是日头晒红的。”孙子反诘：“红萝卜长在土里，压根儿没见过日头，为啥也是红的？”爷爷被问得哑口无言。孙子又问：“爷爷你脸上咋有那么多渠渠儿（皱纹）？”爷爷说：“爷爷老了。老了的人都是这个样子。你长到爷爷这把年纪，也是满脸的深渠儿浅渠儿。”孙子又反诘道：“咱家的猪娃刚生下来，为啥也是一脸渠渠儿？比你脸上的渠渠儿还多还深？”……

类似这种“抬杠”的民间笑话，常常把取笑的对象对着私塾先生，让他们在学生的“抬杠”话语的反诘中出丑。我粗略想来，“抬杠”的人多出自天性，性格使然。他们好像从小小年纪就显示出不归行列而旁逸斜出的个性，用今天的话说属于“另类”。他们的思维往往是反向的，而且很敏捷，随时随地都会对大路的主流思维做出反向的辩驳。就我接触和见识过的“杠头”人物，有的性格倔拗，行为举止和脸色眼神，都让人一看就是个不入辙的家伙，出口就会顶得你跌个跟头，反不上话来；有的性情却十分随和，蔫不拉唧不动声色，脸孔和眼角总浮泛着捉弄人的神气，轻声慢语里亮出来的却是意料不及的“杠话”。他们看似处处与人作对，却获得周围人的喜欢，在于他们的“杠话”给人们带来意外的惊喜，得一时之开心，并不计较那“杠话”违背了普遍的生活哲理。有时候，他们的“杠话”却被生活实践所证明，因为生活运动里往往有“少数人掌握真理”的事象存在。他们的“杠”就“抬”对了，“抬”出水平了。

如果剔除开“抬杠”中那些片面的故意偏执的意趣，“杠头”们的某些不随大流的独立精神倒是于人有益的。尤其是当一种“流行”覆盖了整个社会、你不“流行”便难以存活的世相发生的时候，有一点“杠头”们反叛的“杠劲儿”，可能会找到更适宜自己生存和创造的道路和途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先锋派文学在中国文坛潮起的时候，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几乎被视为过时的中山装，谁不说先锋创作和先锋理论谁就难得有一口饭吃。记得路遥在这样的“流行”时风里说过一句话：“我不信全世界都成了‘澳大利亚羊’。”这是一个颇富个性的比喻式“抬杠”。当时，陕西引进了优质优种的澳大利亚细毛羊，在省内尤其在有养羊传统的陕北，向牧民和农民推广。为了农牧民致富，应当是好心好意；为了排除农牧民习惯意识里对本地羊的依恋，免不了把澳大利亚羊说得天花乱坠一好百好，同样免不了把当地羊种说得一钱不值一

无是处。路遥是陕北人，对羊尤其熟悉也尤其敏感，于是就有了类比先锋文学潮起时那种现象的妙语。他便以“杠劲儿”挑战，不是语言辩论，而是闷住头在现实主义的道路上探索实践，默默六年过去，完成现实主义的百万字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赢得了读者的广泛呼应。十余年后，我在《文艺报》所做的一次读者调查报告中看到，《平凡的世界》在被调查的大学生读者中，阅读量排列首位。近年又从杂志上看到，当年许多先锋派作家纷纷回归到现实主义创作，颇富启示。

我倒以为，现实主义是一条创作方法，先锋派也是一种艺术流派，况且还有诸如魔幻现实主义、荒诞派、象征派等种种创作方法，都出现过经典的或杰出的文本，也成就过大家大师。问题仅仅在于，既不要把文坛弄成现实主义独尊的一统天下，也不要时兴什么流派就全搞成什么流派的一色样式，不要搞成“全世界都只能养澳大利亚羊”。艺术创造尤其重要的是个性化的创造活动。作家个人的气质和个性，作家独有的生活体验和生命体验，需要找到一种最适宜最恰当的表述形式，才能得到最完美的表述。一种创作方法或流派，既不可能适宜个性迥然的所有作家，甚至同一作家也不可能用一种写作方法去表现各种体验，这是常识。

“抬杠”者往往执一端而蔑视普遍，只当趣事罢了。“抬杠”者说不定执的那一端，却是被普遍现象掩饰住的真谛，倒令人钦佩。尤其在当今一潮卷过一潮一风掀起一风的迷彩世相里，有一点清醒的辨识和选择，再加上“杠头”们的某些“杠劲儿”，对于想在这个世界上成一点事的人来说，可能还是有益有用的。

2006年4月17日 二府庄

陪一个人上原

电话里响着一个陌生的声音，开门见山：“我是北京人艺林兆华。”我在意料不及的瞬间本能地噢了一声，随口回应：“你是大导演呀，我知道。”接着再没有寒暄和客套，他就说起要把《白鹿原》改编成话剧的设想。我只是确定了小说《白鹿原》被大导演林兆华相中改为话剧的事，自然是一种新鲜而又欣然的愉悦，都不太用心听他说有关改编的纯粹的具体事务了；倒是欣赏起他说话的声音，温厚绵软而又简洁，没有盛气，更没有夸夸，自始至终没有一句新名词。我之所以敏感他的说话方式，似乎是某种先入为主的印象，我虽然是几年也难得看到一场话剧演出的与戏剧隔得老远的门外汉，却早已闻知林兆华的大名，尤其知晓他是一位艺术观念颇为新潮的导演。我依积久的经验自然地作为参照和推想，不料却令我诧异，竟不见一句新潮词汇，而且声音如此温厚如此平实，可以信赖的踏实感就在短短的第一次通话里形成了。

随后就有了第一次见面。那是几年前的早春时节，我把几件事挪攒到一起赶到北京。西安已经是柳絮绽黄迎春花开的气象，北京还裹在丝毫不见松懈的寒冷里。我找到北京人艺门口，看见一个小小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牌子，注目许久，顿生慨叹，真正的名牌依然保持着原有的标徽，当是一种自信。我第一眼瞅见林兆华导演同时握住手的时候，电话里的印象迅即延伸为一个更令人意料不及的具象，一个号称“中国话剧第一导”的又以现代派闻名的人，不见披肩长发，没有垂胸的胡须或别致的短髭，却是灰塌塌的不经任何修饰的本色寸发，还有不显线条也不见棱角的对襟纽扣的布褂。我在那一刻暗自发笑，文艺界的朋友调侃我的脸是关中老汉的典型代表，我也在记者关于电

影《白鹿原》采访的提问里自我调侃，我最适宜演老年的长工鹿三。我突然发现握着手的林兆华，如果走进关中乡村的任何一个村子，那里的农民会以为是一位老亲友来了。他的对襟布褂和看不见裤缝的裤子，更触发得我一时眼热，我自小一直穿这种家母织布、家母染色、家母缝制的褂子和裤子，穿到高中毕业都换不出一件新式样，照毕业相片时借同学的一件制服上装改换了一回装束。我虽向来不打领带极少着西装，却也再没有穿这种老式对襟衫褂的兴趣，包括花样翻新的“唐装”。我在握着这位新结识的大导演的手时，又生出一层慨叹，一个以探索现代新潮话剧导演风格闻名的人，却用过时的中国乡村最传统的民间服饰打扮包装自己，割裂了矛盾了，还是某种天然的融汇和统一？抑或纯粹属于生活习性？然而确凿无疑的一点，以服装的式样和须发的长短来判断一个艺术家精神气象的明暗，看来难免会出意外的。

我已经记不清他来过西安几趟了。印象深的有两次。他要上白鹿原上去观察感受那里的天象地脉气韵，我完全能理解。我做向导，从灞桥区辖的原的西坡上去，直到蓝田县辖的原的东头下了北坡，沿着灞河川道途经我的隔河相望的家门再回到西安城里。我按他的意趣指向，进一个村子又找到另一个村子，寻找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前的民居住宅，还有家族的祠堂，还有接近类似小说主人公白嘉轩经济实力的宅基房屋的规模和样式。令他也令我遗憾的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六十年代成片成堆的土坯墙小灰瓦的大房和厦屋已经很少了，几乎是一色的装饰着瓷片的水泥平房或二层小楼房。祠堂连一座也没有找到，所答几乎众口一词，早都拆了。林兆华仍不死心，我更是觉得过意不去。无论如何，我还是为这个原上的乡亲庆幸，他们终于有了一砖到顶机瓦或楼板覆盖的结实而又美观的新房子，基本实现了独门独户，几乎见不到三家五家乃至八家拥挤一院的穷酸相了，无论种田植

果树抑或出苦力打工，尽管比不上城里人生活水平提升幅度大，总是比改革开放前几十年好得远了。至于旧房老屋之无存，让林导难以感受贫穷乡村的氛围，自是不成遗憾的遗憾。我们终于找到一家古旧的房屋，可以看出曾经是颇有点经济实力也就比较讲究的建筑，迎面的门板是宽幅的木扇，门板上有简单的格子雕刻。经打问得知，建造这房子的业主，是一位手艺超群的刻字匠，曾给民国时代的几多要员刻过墓碑铭记，收入自然优于乡民，房子就讲究了。林兆华当即就拍板：“这个门和窗子我要了。”房主人说了这个旧房马上就要拆掉，林导嘱咐把门窗妥为保管。进得屋里，有木板镶成的木楼，早已被烟熏成黑色。一架宽板木梯搭在后墙边，两根梯柱原为一根粗大的木头，用锯居中锯为两半，镶着一块一块宽约尺余的踏板，比那些木条梯子豪华气派多了。我家曾经有一架木板梯子，与这架梯子几乎出于同一个木匠之手。林兆华又是一句：“这梯子我也要了，给我保护好。”出门到了乡村街道里，他便告诉我这些东西将做何用场，在于展示旧时乡村的一种逼真的景象。我却想到，这个人现在脑子里整个转着一部戏，随即都有最敏锐的招儿在触景中冒出来。不能忘记的是下到原上的一条沟底的兴奋场景。这个沟里原有的民居几乎都是窑洞，整个村庄搬迁到原上的平地里去了，无法搬动的土窑洞留下一片败落和荒凄，倒塌的窑院围墙，杂草野树丛生的院落，一孔孔或大或小的被烟熏黑的窑洞。林兆华一看见就惊叫起来：“这就是小娥和黑娃住的窑洞呀！”他一个接一个察看卸掉门窗的空洞的窑，始终兴奋不已。我便提示他，这就是关中一些坡崖沟坎地区的窑洞，比较高，比较宽大，更显得深。我作为比较的对象是陕北的窑洞，一般比较低矮比较窄小也比较浅，却比较精致。我开玩笑说，千万不要把小娥和黑娃的窑洞，在布景上搞成毛泽东在陕北住过的那种窑洞的样式。

去年夏天，正是西安酷热难熬的伏季，林兆华领着剧组二十多号男女演员来到西安。我把他们安排在原坡下浐河边的半坡饭店，图得演员上原到乡村体验生活方便。灞桥区文化局给予精细周到安排。观众喜爱的濮存昕等演员上到原上，几乎每个人在到达原上时都发出同一声感叹，噢！这就是原。原是西北特有的一种地理地貌，不过就是一个小平原而已。阅读小说所发生的对“原”的神秘和不可理喻，瞬间就成为一种真实的感觉和体验，如同我初见南方的小桥流水和水上人家的感觉。这些北京来的演员大多在电视电影里出现过，被偏远的原上的乡民指点出来，受到最诚朴的欢迎。他们走村串户，看当地的男人走路的姿势，说话的口吻和身体动作语言，看女人如何烧火做饭，管教儿女，看得津津有味。我陪他们看了两家颇气魄的老宅旧院，一家仍有人住，一家已荒废，都是青砖包墙方砖铺地的四合大院，尽管陈旧破败，依然可见当年的品格。这两家的主人都是乡村中医，我自小就听说过他们的名字，川原上下不幸生病的人都上门求救。他们的子孙大多已在西安或外省安家立业，留在乡村的人也已另择新居地。林兆华在这两个院子里踏勘。我猜想，他大约在琢磨让白嘉轩还是鹿子霖主掌这样的庭院？濮存昕也始终笑眯眯地，看那过道里生动的砖雕，是否还是他——白嘉轩当年刻意的镶嵌？他将如何进入这个庭院并演绎他的人生？

相聚过来的男女乡民，在街道上或立或蹲。濮存昕也学着村民站一会儿又蹲一会儿，东拉西扯着闲话。我陪着林导和濮存昕，在树荫下在房檐下和南枝村的老少闲聊。这个村分白姓和魏姓两大宗族，有人悄悄向我探问，你书里写的白家是不是俺村的白姓，鹿家是不是俺村的魏姓。我说不是。他反而不信，又问，为啥你写的白家和鹿家的事跟俺村××和××的事情那么相像？我说我是瞎编的，偶合了。我随后和林导、濮存昕到一户农家吃午饭，煎饼卷黄瓜丝和洋芋丝，是地道

的农家灶锅烹饪的食品，林、濮都吃得很新鲜，似乎还说这样可口的饭菜拿到北京去卖，生意会很火。

林导提出要看纯粹的民间演出的秦腔。不费多少力气就召唤来一批男女唱家。这些人农忙时务庄稼，农闲时组合在一起，到乡间的庙会集市去演唱，也为新婚庆典和丧事葬礼演唱，有报酬，却不高。其中一些男女唱家已唱出影响，在方圆几十里乡村甚为闻名。我担心这些业余唱家达不到林导要求，还联系来西安几位年轻的专业演员。演唱一毕，林导就拍板了，就是这个就是那个还有某某……全是业余唱家。我大略领会他的意图，在话剧几个主要情节转折处，插唱一段或三五句秦腔唱段，要乡野里这种原生形态的唱法和腔调，太完美的专业演员的唱腔不适宜话剧的乡土气氛。同时请来了华阴县的"老腔"演唱班子，也是纯一色的农民，他们保存着流传在华山脚下一种几乎失传的古老唱腔，乐器也区别于秦腔，更为苍凉悲壮。我看着林导目不转睛的神情，想到他已经入迷了。果然他兴奋地拍了板。这个老腔早已在张艺谋的电影里作为衬底的旋律，正恰切不过地流动着关中这块土地沉重苍凉浑厚的底蕴。林兆华敏锐地感知到了，这从他的专注沉迷的神色里显示出来。

我后来到北京人艺，参加了《白》剧的新闻发布会。我看到了林兆华的自信。他的自信溢于言语和神色。这应该是我参加这次活动的最富实际意义的收获。还有宋丹丹的发言，她说林导告知她出演田小娥一角的第二天，就去健身房减肥健身了。她婉谢了电视剧邀约。我也深受感动，艺术创造的意义和价值，不是经济实惠所可完全改变一切艺术家的。

我在把话剧改编应诺给林兆华导演的时候，基于纯粹的我对写作的一种理解，我写小说的一个基本目的，就是要争取与最广泛的读者

完成交流和呼应。我从短篇写到中篇再写到长篇，这个交流和呼应的层面逐渐扩大，尤其到《白》书的出版和发表，读者的热情和热烈的呼应，远远超出了我写作完成之时的期待。我以为这是对我的最好回报，最高奖励。即：在于作家通过作品所表述的关于历史或现实的体验和思索，得到读者的认可，才可能引发那种呼应，这就奠定了一部作品存活的价值，也就肯定了作家的思考和劳动的意义。话剧将是完成《白》书与观众交流的另一种形式。小说阅读是一种交流形式，话剧舞台的立体式的活生生的表演是迥然不同的交流形式，有文字阅读无法替代的鲜活性，以及直接的情感冲击。这与我创作的初衷完全一致，我自己甚至也觉得新奇而又新鲜：看到活跃于舞台上的白嘉轩们当是怎样一种感觉？濮存昕创造的白嘉轩和宋丹丹创造的田小娥当会和观众完成怎样的交流和呼应?

我几乎没有提出任何条件性的要求。我唯一关注的是能体现我创作小说的基本精神就行了。我知道话剧很难在有限的时间里演绎所有情节，取舍是很难的事。我相信林导和编剧，让他们作艺术处理吧。我在初见林兆华的交谈里，领受到他对《白》书的深层理解，已经产生最踏实的信赖，连“体现原作精神”的话都省略不说了。

我记下与林兆华导演几次接触中的印象，在于体察和理解一位艺术大家，如何完成他艺术世界里的一次新的创造理想。我在写完《白》书最后一行句子就宣布过，我已经下了那个原了。林兆华导演却上了原。我期待看到他创造的白鹿原上的新景观。

2006年5月14日 雍村

走过武汉，匆草一笔

从秦岭北边飞过来，正遇上江汉平原景致最好看气候最舒适的季节。我却陷入一种南方和北方截然鲜明的差异性感受。仅仅在两个小时之前，我乘车疾驰在渭河到咸阳的关中腹地里，满眼涌进来正在拔节抽穗的麦子。那刚刚抽出来的麦穗和麦芒，是一种嫩白和嫩黄，覆盖了原野，直到一眼望不尽的地天相接的远处，我领受着关中大地恢宏的丰盈和沉雄里的生机。现在，我的眼前铺展开江汉平原纷繁复杂的色彩，大片大片业已变成青色的麦田，那是籽实穗熟前的颜色；一绺一绺金黄色的大麦间插在麦田或油菜之中，等待开镰；大片的油菜田里，看不到叶子，灰白色的荚角密密匝匝绣满了枝丫；还有不时闪过的水塘和河汊，清水映着天光。同样雄浑同样丰盛的江汉平原，得了纵横的河汊和星罗棋布的水塘的浸润，清秀灵气浮现在人眼所到的每一条垄亩之上。我为我的北方的关中遗憾着这一汪一汉里的水了。

我又一次走进武汉。

我漫步在长江边上。脚下踩着一方一方别出心裁的图案铺就的地砖，瞅着悠然翻涌着波浪的江水，在不仅雄伟且呈现着精美的堤坎下涌流，我还是感觉到了“人定胜天”的科学性。鉴于“大跃进”的盲目冒进所造成的破坏，“人定胜天”这个词汇遂成为一个特定含义的嘲讽。其实人类自智人时期始，就进行着与自然灾害这个“天”的抗争，从我的家乡的半坡先民对火的发现到今天人类登上月球，历史浓墨重彩记载着各个民族在各个领域的发现和创造。每一项或大或小的发现和创造，都是“人定胜天”的成功实践。泛滥成灾的长江在堪称雄伟而又精美的堤岸下驯顺地流走，当是为江边有记载以来的灾难画上句号，再

不复现军民背扛沙包堵塞决口的吓人场景了。人胜了天了。现在，一群一伙男人女人在江边漫步，在各种健身设施上用功，我脑海里竟浮出几年前电视上那些抢险堵漏的军人和民众的身影。

我走进一家现代化企业，自动化流水作业，产品如同流水一样涌流出来。工人只是监控，轻松到让我这个旁观者都感到单调了。这并不特别令我惊奇，这样高产出而又文明的工厂我见过不少了，倒是每一次都不由得慨叹和庆幸，那些穿戴整洁一丝不苟地操控着仪器的工人，进入一种文明的生产，也进入文明的生活形态了。我的记忆里装着太多的昨天的陈年旧事，小镇铁匠铺里一手拉着风箱一手攥着煤铲往火炉里添炭的老叔，光膀子上的汗水把尘灰冲出一道道污黑的印痕；已烧红的铁锭从火炉里夹到铁砧上，同样光膀赤臂的壮汉抡锤砸敲出壮怀激烈的叮当，一支镢头一把斧头一把锄头在汗水溅着的烟火里诞生了。这种作坊里的景象，从我记事一直延续到我所工作过的公社的农具厂，其实早在我的记忆之前已经存在了不下两千年。现在，我走过几乎纤尘不染的机械流水线和花园一样静谧的厂区，感知着社会进步带给人的劳动的自信。

近年来，每走进南方北方任何一个城市，无须介绍无须解释，搭眼就能看到已经发生的变化和正在完成着的改造，最直观地呈展着从昨天到今天的脱胎和剥离，让人直接感知到生活极具活力的运动着的脉象。我在武汉又一次接受着这种活力的冲击。在汉江汇入长江的三角地带，观赏千古以来就呈现着的江河汇聚处独有的气魄，却再也看不到历史沧浪里残存的荒凉和残缺，坚固的堤防和凌空跨江的桥梁，一派崭新的装饰大江大河的景致，令人浩叹。我在汉口的大街小巷穿行，新铺的地砖新植的花木和新置的栏杆，把旧时的陋巷改扮得清爽亮丽。我又一次登上黄鹤楼，眼下是横摆着的长江和投奔过来的汉

江。长江汉江的这岸和那岸，是丛林一样耸立的楼群，龟山和蛇山愈见低矮了。被两江隔开的武汉三镇，又被雄伟的大桥沟通连接为一体，这样壮观的阵势无与伦比，也是武汉自形成城市以来前所未有的。我自然又浮出崔颢李白和诸家各路诗人的名句，无论怎样浩荡雄壮，无论怎样神奇的神风仙姿，更不必说悠伤哀怨不尽离愁的，似乎都无法与眼下的景观相吻合，都避免不了苍白和陈旧。我也亲历了晴川阁，吟诵了“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然而无论如何都找不到“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的感觉了。这样千古传诵的好诗怕是再也难以出现了，倒不是绝了如崔颢一般的才子，黄鹤楼下的景致变了，才子们的心境和意趣也变得远了。

我在武汉走过两天，走马观花而已，却也直接感知到这个城市进入到二十一世纪初的风貌，感知到一种急骤的蜕变，自然是直观的表层的，也足以令人感奋了。昔日的武汉正从旧壳里剥离蜕变出来，呈现给世界一个现代化都市的新武汉。这是武汉人促进和完成这个蜕变过程的，或者说武汉人在不断完成自己心理和精神的剥离和蜕变的过程中，实现了一个全新的武汉的创造。写到这里，我便想到张之洞。

我很早就知道“汉阳造”，却不知道张之洞。像我这样年龄的中国人，恐怕没有不知道“汉阳造”的。即使如我这样一生只摸过一两回枪的人，也早都知道“汉阳造”。“汉阳造”是中国人制造出来的第一种现代枪械，而且持续使用了半个多世纪。民族复兴史多少委屈了促成这第一支枪诞生的张之洞，毛泽东却还记着他提起他的名字。我来到“汉阳造”的发生地汉阳，在高低错落的楼群里，在纵横交错的路道上，在绿树和花草铺成的缤纷的图案里，找不到任何当年“亚洲第一世界第二”的汉阳铁厂的遗痕了。我能看到的只是图片。令人依然抑制不住心

潮的壮观的照片。张之洞便以其凛然的气性活生生地站立在我的眼前。

张之洞是在一八八四年抗法战争取得大捷的战役之后萌生了开办铁厂的创意。他最痛切地领受到法兰西第二帝国派来殖民中国的士兵手里操持的枪炮的杀伤力。他在给清廷呈送申请报告的同时，就向德国英国订购冶铁炼钢制造枪炮的设备。直到十年后的1893年，其规模居亚洲第一世界第二的汉阳铁厂建成并点火开炉，告别作坊式的炼铁铺里的小炉灶，以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技术和最大的规模炼出了中国的第一炉钢，随之又用自己冶炼的钢铁制造出中国的第一批铁轨、中国的第一管快枪。都被民间命名为“汉阳造”。

这里有一则小小的逸事很令我咂摸。时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把铁厂的厂址选在广州，部分购置的设备已运抵羊城，光绪皇帝又调张之洞到湖北主持修建芦汉铁路。继任两广总督的李翰章“懒事张扬”，托词广州无铁矿亦无煤矿，不宜设铁厂，迫使雄心勃勃的张之洞又启运他已购得的炼钢设备，挪移到湖北，新选汉阳作为厂址。我尤其欣赏“懒事张扬”这个词。如此准确如此妙俏地刻画出一个“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只领饷银而不放骆驼的平庸官僚。“对比”写人的手法看来不是作家艺术家首创的，生活里到处都呈现着这种参照对比，站在张之洞身旁的这个同级别同饷银的主儿，丝毫也不掩饰他的平庸和不作为，更不害羞。我很自然地崇敬这个炼出中国第一炉钢铁的张之洞。法军从越南方向侵入中国边境时，时任山西巡抚的张之洞居然一日三奏朝廷要“速下迎敌之决心”。山西离云、桂、粤诸省够远了，他却比领兵的人还火烧火燎坐卧不宁，一个铁血气性的张之洞就跃然于我的眼前了。他的钢铁企业从创立到分崩离析，真是令人徒叹奈何。那些在封建帝制末期最早觉醒的中国人，几乎无一不留下悲怆的痛苦。无论如

何，在这个民族从封建桎梏下剥离蜕变的极其漫长也极其复杂痛苦的历程中，张之洞既经历着个人思想和心灵的蜕变过程，也促进了这个民族和国家的蜕变。在汉阳已经消失的第一座钢铁企业和已经弃置不用的“汉阳造”枪炮，不应该也不会从这个民族的子孙的记忆里消失。我便建议，把这个简要的过程镌刻出来，竖立在汉阳曾经炼出中国第一炉钢铁的旧址上，让如我一类游览武汉的人，在欣赏今日三镇的壮观景象的同时，凝眸这一块方碑，最直接感受这个民族近代的觉醒和复兴的历史过程。应该把张之洞的名字重刀刻记。

2006年5月25日 二府庄

半坡猜想

在陕西远至黄帝陵，近到最后一家乡试考场的无以数计的历史遗存景观中，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的一个完整的村落——半坡遗址，有意与无意间却是我观赏留恋最多的一处。这纯粹出于一种故乡情结。我的生生之地在白鹿原北坡下的灞河岸边。半坡村落遗址在白鹿原西坡下浐河岸边的二级台地上。两个村庄之间的距离不过十公里。绕着白鹿原北坡和西坡的灞河和浐河，在古人迎客的欢声笑语和折柳送别的情殇层层叠叠发生的灞河桥下汇合，投入广阔深沉的渭水。任何时候路过半坡，瞥见那个圆顶无柱的标志性建筑，眼前就浮现出六千年前那个村落里的清晰的格局，圆形或方形的泥墙草顶房屋，屋里的火塘和土炕，那造型精美的陶罐、陶瓶、陶盆、陶壶和陶钵等，还有那野生务育而成的粟，那开创人类乐声的埙，那至今令人百思不得其确切意指的人面鱼纹图画……几十年来，半坡遗址在我心中都是一种梦幻般的景象。

我第一次踏进半坡先民生活过的遗址，是一九五五年秋天。我刚刚十三岁，到西安上中学，周六回家背馍路过半坡，我和同学到正在发掘的遗址，年老的和年轻的考古工作者蹲在大土坑里，用小铲和小毛刷在小心翼翼地剔除土屑。我连粗通的历史知识都没有，只有新鲜和稀奇，几乎再没有什么价值意义的理解，以及遥远到不可思议的梦幻般的迷茫。

这种梦幻般的迷茫一直延续到现在。尽管我对人类进化的历史普及到一些常识，尽管我记不清多少次听专家讲述半坡人的生存形态和创造性劳动，这种梦幻般的迷茫不仅没有透彻清晰出来，反倒陷入愈

来愈富于想象空间的梦幻般的迷茫和诗性的迷离了。水流清澈而丰沛的浐河两岸，丛林修竹野草茂盛，虎、狼、豹子、山猪、狐狸、獐子、野兔和鹿自由其间，天空是各类鸟的领空，河里是鱼蟹的领地，半坡先民生活在这样的自由王国里，那位统领着他们的伟大女性当是怎样的姿容。下河捕鱼上原狩猎，每有重要捕获，该是怎样一种狂欢和喜悦。他们围着火塘烧烤新鲜兽肉的香气儿肯定弥漫到整个村庄，男女老少会是怎样一种欢乐融融。

我总是想着永远也不得谜解的谜，是哪个男性或女性在野草丛中发现了可以作为吃食的野生谷物，又如何把它引种成功，又是如何发现了将粟煮为熟食的秘窍？神农氏就诞生在这样的村落里，这个氏族的子孙至今依然顶礼膜拜。是哪一位伟大的天才创造出第一件陶器，使人类的生存状态进入一个空前文明的阶段。那个不知名的绘出“人面鱼纹”图画的人，当是人类最早涌现的天才美术大师，其构图里展示的丰富的想象，令今天的现代派艺术家们也叹为观止，亦令今天的现代人仅仅只能做出猜想式的种种判断，诸如氏族图腾生殖崇拜等，比哥德巴赫猜想还要费解。那只埙或曰陶哨，无疑是人类创造的第一件乐器，捏成这乐器的那位先民，当是人类第一位音乐天才演奏大师，人类从此有了愉悦自己的音乐和乐器。六千年后的当今，中国演奏家用这种陶哨吹出的曲子，不仅令中国人倾倒，连听惯了洋乐洋曲乃至疯狂摇滚的美国人也发出了欢呼。可以想到，从半坡人手里创造的陶哨和由半坡人心灵世界流淌出的音符和六千年后的中国人和美国人完成了交融和沟通，几乎没有时空的阻隔和民族习性的障碍，我更感动音乐的无形的伟力，更感佩制造陶哨和吹出第一声乐器的半坡村诞生的那位音乐天才。他肯定不会想到捏成的陶哨会产生如今人评说的价值和意义。他大概只是对音响尤为敏感的一个普通村民和大酋，照样打猎、照样种谷或者制陶，他独有的一根敏感音符的神经促使他创作陶

哨。在他原有的意识里，也许只是一种兴趣，一种试验，一种新奇促使着的好玩的行为。然而，却成就了人类第一件乐器的诞生。

面对那个装殓幼童的瓮棺盖上的圆孔，每一次我都抑制不住心的悸颤。这个装着幼童的瓮棺没有进入成年人的墓葬区，而是埋在住宅区的房屋旁边。据考证说是幼童需要得到母亲的继续守护，或者说纯粹是母亲割舍不开对幼童小生命的骨肉情感，显然是现代人依着常情常理的一种推想。唯有那棺盖上专意留下的小圆孔，令人更多了推测和猜想，据说是给幼童的灵魂留下的出入的途径。我愿意相信这种判断，这个圆孔打开了阳世与阴界的隔障，给一个幼稚的灵魂自由出入自由飞翔的途径，可见半坡人的温情。人类后来文明愈发展，反倒是对人鬼两界禁锢愈厉害，无论皇帝的豪华墓冢里的石棺，抑或平民的木板棺材，都是唯恐禁闭不严而通风透气的。

浐河边上的半坡人，距离灞河边上的蓝田猿人不过五十多公里的路程，却走了整整一百一十五万年，我简直不敢想象人类进化史这个漫长的时间概念。在半坡遗址的村落上漫步，我就感觉到很近很近了。在我的家屋不到二里远的华胥镇上，今年农历二月二日举行过华胥氏的祭祀仪式。华胥氏踩踏巨人足印而受孕，生伏羲和女娲。女娲抟土造人，炼石补天。华胥氏和她的女儿女娲，是我们的始祖。这在史籍记载里，也仍然是神话传说。华胥氏冢所在的华胥镇，距半坡遗址不过十公里。华胥氏和她的女儿女娲，当是在无以数计的类似半坡村落里的女性首领的基础上，后人创造的神话。

那是一个最适宜用神话表述的时期。我的家乡有活生生的半坡人遗存，又张扬着一个民族诞生的神话，这是浐河、灞河。

2006年5月31日 北京

五月，临近盛事的期待

——二〇〇六足球世界杯观感之一

进入五月以来，我发觉我的生活氛围悄悄发生着明显的变化，文学和文化圈里的熟人朋友，见面说写作谈文化的话少了，说足球的话多了。而且一说到即将开赛的足球世界杯，腔儿亮了爽了，调儿高了响了，兴奋和欢悦溢满眉眼。我在西安每遇如此，到青岛参加小说学会颁奖盛会，也是如此。与会的全国各地的作家评论家中有一批球迷，比我迷得更深更痴，握手间先问足球怎么看，先估计鲁尼能否出场，骨伤愈合恢复的最新消息。获得此届重奖的湖北作家刘醒龙不说获奖的欣慰和风光，先问我看后半夜的比赛能否坚持，竟关心到如此细致入微的程度。腼腆少言的黑龙江迟子建，谈到世界杯，其专业水平不亚于足球赛事的现场解说。

这氛围这情景，让我很自然联想到每年岁尾进入农历腊月的感觉。传统的新年佳节在中国人心理情感上的分量，任何节日都难以替代。腊月伊始，熟人朋友以及亲戚，见面或打电话，先问年怎样过，在家团聚出外旅游抑或回归故乡，年货办得如何；孩子和亲戚能否团聚，等等。年的气氛日渐浓厚，人的脚步也日渐匆急，气色更日见欢悦。世界杯开赛前的五月，类似农历腊月，也类似西方人圣诞节前的气氛。可以借用一句歪改了的毛泽东的话概括，环球同此心热。

然而，又不完全与过年相同，或者说相同点仅仅只限定在盛大的节日到来之前一月的殷殷期待。一旦辞旧迎新的爆竹烟花碎屑落定，春节就以无虞的祥和天伦的欣悦悠然缓行，作揖握手间话说年成，儿

孙绕膝泛出的一满是慈颜悦色。然而，世界杯开幕式的礼炮一旦响起，霎时间便是绿茵场上你死我活的较劲，万千球迷震天撼地地呐喊呼号，狂欢的声浪席卷德国；电视信号把现场的战况传递到世界的各个角落，狂欢也传递到世界各地的不眠之夜；整个世界都在为着一只彩色的足球所凝眸，各种肤色的人操着乱七八糟的语言说着足球这一个词汇。这种令世界失去秩序的狂欢，要持续整整一个多月，而且愈到后来愈加升温，没有厌倦没有疲惫，反而更加揪心更加来劲，更加疯狂，世界上有什么好事或坏事能让这么多人保持一个月的兴趣和劲头？没有的。

可以设想那些参赛国的国民，将陷入一种期待胜利和担心失败的揪心的焦灼，明明白白知道王冠最后只能戴到一个人的头上，却仍然坚信那个人肯定只属于自己的国家。于是，悲伤的泪水将浇湿三十一个国家的国土，只有一个国家的笑脸会被激情狂喜的热泪浇洒得灿烂。明知足球不过是玩玩而已，却那么认真，那么痴心地与一个国家的荣誉紧紧连在一起。大国强国需要这荣誉，似乎与其国家才相称；小国穷国也需要它来增强一个民族的自信和豪气。平民和总统，穷人和富豪，在面对一次绝妙的进球的刹那，情感世界上达到一种共同的平等的享受。

我是被排除在揪心关涉自己国家输赢情绪之外的纯粹欣赏者。我想看那些驰骋球场的超级明星的演出，也更期待一脚震荡国际绿茵场的天才小子。借助整个世界都注目凝神的世界杯盛事的赛场，正是那些新星展示他们天赋的足球才华的绝好机缘，绝艺绝技和他们的身姿，将嵌进亿万球迷的眼睛。有他们跃出，就有足球更精彩的明天和后天，也就有如我一类球迷不尽的欢乐和畅快。

2006年6月3日 北京

正确的坚定和无知的固执

——二〇〇六足球世界杯观感之二

昨夜德国与哥斯达黎加的揭幕之战，是我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看足球世界杯赛以来，最精彩最好看的一个揭幕亮相。出于运动员普遍的紧张心理造成的压力，出于教练员普遍的谨慎而选择的试探姿态，我看过的历届世界杯揭幕战多是观众热火朝天，而场上比赛却精彩不足，乃至黏滞沉闷，进球少，平局多，远不及后来渐趋白热化的比赛好看。昨夜哨声一响，德国人就摆出一副势在必得大举进攻的架势，创造了世界杯近几十年来进球最多也进球很快的精彩场面，一扫历来的紧张和谨慎心理造成的沉闷和乏味，重新张扬起足球以攻城拔寨为主旨的进攻精神。德国主帅克林斯曼看上去是位斯斯文文颇有点博导风度的先生，从一开场直到终场哨响，都在场边大声呼喊他的球员，向前！向前！拉姆在开赛五分钟进球后，克林斯曼仍然大呼向前；德国队丢失第一个球，克林斯曼更起劲地喊叫向前。向前是克林斯曼的足球意识和精神，也是人类从事各种事业的普遍精神，即进取的精神。

这是一场强弱分明的比赛。本来就是强势的德国队，又张扬着“向前”的主导意识，创造了四个进球纪录，其中三个却都是下底传中完成最后有效的一击。拉姆的第一个进球堪称技艺超群。他接队友传球后轻松回撤几步，把防他下底的哥方队员闪在身后，抬头瞅了守门员一眼，就确定了射门的角度；眼到脚到，皮球躲过守门员指掌，直挂远处死角，撞门柱内侧弹入网内。第二第三个进球，都是下底传中恰到空当好处，由克洛泽门前挡射头槌完成致命一击。差别仅仅是一次从

右路下底，一次在左路。我似乎十分眼熟这种战法，历来是中国队惯常使用的，多是出于脚底功夫粗糙传接球和控球技术弱，很难实现中路正面突破，而选择的所谓两翼齐飞下底传中的套路。想不到德国队也用这种老套式，竟然如此实用而奏效，当是给中国队的一次示范。弗林斯在终场前的一脚远射，可以说成是撼天动地精彩绝伦。这是前场任意球，只经一次传递就完成了射门进球，展示出德国队绝非只会下底传中这一招。

哥斯达黎加不可小瞧，他们在上届世界杯曾打入第二阶段的淘汰赛，在最后的座次排在第十三位。然而在与主导“向前”的强大的“德国战车”的拼搏中，却是明显的弱势和劣势，九十分钟的赛场里，哥队控球时间大约三分之一，三分之二的时间里，皮球都在德国队队员脚下传接掌控。我特别感兴趣的是哥队的战法，他们是弱势却不选择下底传中，中路进攻屡屡失败，多次的进攻回合里，未传接到大禁区外就被对手抢截夺走，却仍然不走边路下底更不传中，依然坚持中路正面突破，似乎不可理喻。

后来我就看明白了，这是教练坚定不移的聪明选择。在德国队强势进攻面前，哥队没有能力打对攻，无法达到压过对方进攻的进攻，只有选择出其不意的偷袭和奇袭策略。我所看到的球场的实际格局是，哥队大多数队员和大部分时间，都在对方半场防堵，只把身高接近六尺的大汉万乔普隐蔽在前场捕捉机会，坚决打反越位战术。加之德国队一味“向前”而后门不紧，恰好给哥队实现自己的方略留下了可乘空隙。上半场十一分钟，万乔普得到一个出其不意的禁区边沿传球，反越位成功，单刀面对守门员，一脚并不着大力的捅射，球从德国队守门员右腋下穿过，从空无一人的门前进入网窝。哥队下半场的第二粒入球如法炮制，又是在禁区沿传给万乔普，又是反越位成功，

又是单刀赴会，在守门员做出扑救动作之前一秒，又从他的左肩上挑过去入网。这一幕发生的时候，电视镜头转向看台上的德国第一门将卡恩，他这回做了替补，多是年龄因素。镜头明白显示一句潜台词，如果是卡恩把门，将不至于失球。我以为这是习惯思维的典型事例，世界万事万象容不得“如果”，球场更不容这种思路。

检验教练员战略战术的标准是比赛胜输这个铁样的结果，却未必是唯一。克林斯曼大获全胜，验证了其方略正确自不必说。哥斯达黎加虽然落败，其教练的战略战术的坚定选择更显出高人品相。他的战法有点游击战的味道，取得了虽败犹荣的赛场效果和心理效应。在控球时间、射门次数、角球和任意球的各个关键指标中，德国队都占绝对优势，甚至是成倍的比例，唯有一项指标哥队居优，即射门次数和进球的比例：射门三次，斩获两粒入球。其高效比率不仅远远超过德国队，在世界杯足球赛史上，也是一大奇迹。于此才可能区分教练员的天才和平庸，也才可能分辨正确的坚定和无知的固执。德国队和哥队教练无疑都显示出前者的风采和风度。

2006年6月10日 雍村

最后才学会射门及其他

——二〇〇六足球世界杯观感之三

澳大利亚队和日本队昨夜的比赛，是我看过的本届足球世界杯开赛以来的几场赛事里，最好看也最难看的一场。

澳大利亚除守门员之外的十名队员，身着黄衫。有人类比为澳洲袋鼠，我却感觉更像十辆轻型和重型混合组成的坦克阵，一开场便是大刀阔斧，横冲直撞，前追后堵，斜里劈刺，威风凛凛，所向披靡，绿茵场上卷过来转过去的尽是黄色旋风。抢能抢得下，堵能堵得住，过（人）能过得去，正面远射，斜传冲吊，下底传中，三面都是攻击途径，如入无人之境。可怜东邻日本国队员，向来作风硬朗兼脚法细腻娴巧，有“东方巴西”足球风格。然而面对人高马壮的澳大利亚坦克，不过是自行车，充其量算得摩托车，任你技术玩得怎样调皮，却无法构成对抗。我看到的简直是令人惨不忍睹的场面，澳队黄马甲所到之处，尽是日本队员人仰马翻。一碰一撞等足球法则允许的合理冲撞，被又粗又壮的澳大利亚人充分占得了便宜。日本队在人仰马翻的阵势里，几乎溃不成军，难以发挥技术优势，细腻的脚法盘带的技巧和传接的套路，都被蛮横无忌的坦克冲击得七零八落。这情景又使我联想到葫芦蜂（人头蜂）对小蜜蜂的肆无忌惮和蛮横无理。

澳大利亚人把足球的激情体现到极致。这种猛打猛冲长传冲吊的战法，其核心是简捷，一脚能过去的球路，绝不多费事再倒一次脚；不要小脚传递更不讲究细腻盘带。这是英国人在足坛上呈现的一种典型风格，被世界称为英式足球，和巴西的技术配合型足球构成两大流

派。近年间英国人注重细部细活儿，鲁尼等几位球星的细腻灵巧的脚法不亚于巴西人。上届世界杯时，我惊讶地发现他们的变化，曾写过《细腻了的英国人》的短评。英国人已经摒弃了至少是改变了的战法，澳大利亚人却保存着。事实上，在整个欧洲和南美洲足球强国里，基本看不到这种别名力量型的粗硬打法了。澳大利亚人不愧是英裔移民，得了澳洲地大物博和好山好水好气候，似乎比英国本土子民发育生长得更雄壮更孔武，更适宜力量展示，也更富于激情展示，真让我观赏和感受到人的一种野性的近乎疯狂的激情。

让我产生难看的感觉，也正出在这有点滥施的激情上。上半场伊始，澳大利亚人就照着球门狂轰滥炸，能射不能射宜射不宜射，抬脚铆劲儿就射。尤其是在日本队得了一个“便宜”进球之后，澳大利亚人射得更凶更欢了，虽有少数几次射到门框以内的球，唯其太正，均被神奇的日本门将川口能活没收。其余的绝大多数射门，不是偏左偏右偏得离谱，就是放了高射炮。这样的激情没有效果，就变成事物的另一面，单调、粗糙而少了欣赏的情趣。我那时就忍不住遗憾，澳大利亚人捡拾了英国足球的简捷和勇猛，却丢失了或者至少没学到人家精准的射门功夫，所谓皮像而神不像。又毕竟是军备里淘汰了的老式坦克。尤其到下半场的中前半场，也许是累过头了，也许是久攻不下情绪烦乱了心理失衡了，控球和射门更离谱了，反倒让日本人的技术逞一时的优势，几次反击打得坦克兵团竟现出顾不住后门的狼狈，只可惜日本人也发挥欠佳，错失几次进球良机。

直到终场前六分钟，澳大利亚人才攻进了第一粒入球，连带补时在内的不足十分钟时间里，竟然连进三球，我便忍不住向左右的球迷朋友喊出我的发现：到最后六分钟，澳大利亚人才学会了射门。

关键在第一粒入球。关键的一半在川口能活的出击扑救太远，不能及时返回门前，给混战中的卡希尔留下了一个无遮挡的空门，得逞了。这一刻，双方的心理瞬间发生了变化，轮到日本人失衡了。澳大利亚人又张狂起来了，信心倍涨了。卡希尔真正显示出一个射手功夫的第二粒进球，把日本人彻底击垮了。心态和技术发挥的关系，如同咒语和魔杖，咒词乱了，魔杖就失效了。

关键还在教练。澳队教练希丁克竟然换上三个前锋，几乎不要后场了，孤注一掷了，一掷成功，功德完满，神奇教练愈加神奇了。日本队教练济科也是足坛名宿，在终场前十分钟换下一个前锋，增加了一个中场队员，用心很明显，加强中场堵截的强势防守，把一球优势拖到终场。这是常见的思路，这回就显得判断失措了。

尽管有几次颇具威胁的反击，日本队昨晚的比赛，是我看过的日本队踢得最差的一场，乏善可陈。几位在欧洲足坛闯荡且表现不俗的亚洲明星，看不见锐性和灵性的锋芒，且屡失良机。我曾经以日本足球的长足进步而鉴照中国队的徘徊不前，更把亚洲足球的希望寄在日本、韩国和伊朗人身上。在前一日伊朗打了半场好球后，我虽是难以排解深深的惋惜，反倒以空前的兴趣等待日本人的佳音，结果却比伊朗人失败得更惨，踢得更难看。看来学巴西人的技艺还远不到家，只是在亚洲的筷子里稍长了一截。我宁愿把这一场无光的比赛看成是日本队的反常失态的偶然，寄一缕希望到下一场。

看完球赛回家的路上，李国平打电话，情绪颇忧伤，说他为亚洲足球忧虑。我顿然想到，在亚洲我们为中国足球曾伤情锥心多少回；在足球世界杯盛会上，又为亚洲足球伤感。真是咸吃萝卜淡操心，费的哪门子心伤的哪门子感嘛！

2006年6月13日 二府庄

黑马尚未出现

——二〇〇六足球世界杯观感之四

沙特和突尼斯作为小组第一轮比赛的收尾一仗，出人意料的精彩，煞是好看，当是第一轮赛程中最富足球魅力也最具观赏性的少数几场赛事之一。

在昨天的三场赛事中，我的兴趣集中在西班牙和乌克兰的对决。西班牙不仅斗牛出名，足球也是世界上几个热点之一，近两年把贝克汉姆、齐达内和大小罗纳尔多这些超一流明星重金收揽，使皇家马德里和巴塞罗那俱乐部成为世界超豪华阵容，西甲联赛的水平和热火劲儿，似乎盖过英超德甲和意甲，我自然想看西班牙本国球员的实力。乌克兰是新崛起的一支球队，预赛中第一个以小组第一名出线，使俄罗斯队黯然失色，被看作黑马。这两家相遇，我断定必有好戏。然而一开场，乌队就现出技术粗糙和配合的生硬，更显得西班牙人刚柔相济的弹性功夫，踢得有板有眼不急不躁游刃有余，让我欣赏到最精准的传接配合的足球艺术。尤其是第四粒入球，经过令人不可思议眼花缭乱的四次传切，且都是蜻蜓点水般轻巧的一脚传递，第五脚就把球送进球门了，堪为经典。即使常看欧洲各大俱乐部赛事的我，也难得一遇这样精彩的配合。令我丧气的是，下半场伊始，乌克兰被直接红牌罚下一人，本来就显弱势的一方就基本失去了威胁力，本来在上半场后半程已显出默契迹象并对西班牙构成对抗的势头，一下子就釜底抽薪般瓦解了。乌克兰疲于奔命。西班牙放心放胆一家独舞，虽尽显脚功技法，却毕竟让人感到不平等（少1人）的对垒里的乏味。我最讨

厌红牌。少了一个人的比赛就不是真实力量的较量，看起来就减了兴致。

倒是不大操心的沙—突之战，精彩纷呈。突尼斯打得中规中矩套路清晰，队员功力不俗不虚简练实用，一度占得些微优势。沙特队更显技术娴熟脚法柔韧，快速灵活如黄鼠出没，搅得突尼斯难以完成有效进攻，正弥补了个矮身轻的短处；第一个进球是在大约三秒内完成的，传到恰好门前位置，不过一米六个头的前锋虽然腿短，速度却不慢，仅超两个守将半步把球推进网窝，真如脱兔般轻捷。这场比赛打得一波三折波澜起伏峰回路转，又扑朔迷离胜负难料，突尼斯人刚笑完就轮到沙特人笑了，而且比突尼斯人笑得更持久，然而却还是没笑到最后，突尼斯人又释怀了。这两家亚非兄弟之旅，旗鼓相当，谁比谁高不了一筹，谁比谁差不过半指头，可谓势均力敌，终于难以分清雌雄或伯仲，倒是成为并列的好汉。正是在这一点上，足球的观赏性愉悦，超过了西—乌那种悬殊对抗的乏味。

第一轮小组赛过后，三十二队精英尽皆亮相，捉对厮杀，有的笑了，有的哭了，笑的自然要争取笑到最后，哭的正运气蓄力铆劲以求重笑，绝不会有一家甘愿停留在赢了一回或输得一蹶不振的情绪里。倒是可以设想第二轮的交手将更加激烈也更加好看。我在如同赶集撵场子的兴致里，把各路诸侯观览过一番，只顾兴味十足地看足球滚来滚去，好看的和难看的都如云烟散去。昨夜突然醒悟，不禁反问，至今怎么仍未看见黑马跃出?

已经烟消尘绝的第一轮比赛，该赢的都赢了；预料中该赢而未赢的，却不是黑马造成的意外结局；该输的都没赢，所以亮不出一张黑马的脸相来。这是就一个队整体而言。如果再聚焦到个人，有大牌明星依然灼亮闪光，也有业已在俱乐部崭露头角的新星表现突出，却不

见一个名不见经传的黑驹让世界为之一震。黑马国队和黑驹队员，在历届世界杯都是亮点，这届至今尚未惊现，令我感到某些缺失。我喜欢看那些业已成为明星或曰大腕的宿将有超常的表演，更期待黑马黑驹跃出，既给人一种惊喜，也会使日后的足坛赛事更趋热闹。如果上届这届和下届赛场都是我已看惯的那几张胡须越来越黑的脸蹦来蹦去，独缺了更光亮更青春的娃娃脸，难免会使人兴味索然，且不从事业的高度去评说。这道理既是足坛的，也是世间万事各坛共通的，有后继的天才才有新的兴旺和新的发展。

其实不过才战罢一轮。黑马黑驹可能还被某些障眼的烟云笼罩着而没露出脸来。我期望并相信，会有黑马和黑驹惊世跃出；即使无团队黑马，黑驹是断然不会缺席的。

2006年6月15日 二府庄

帅气和率性的转移之谜

——二〇〇六足球世界杯观感之五

加纳赢了捷克。赢得不黏不滞也不算野，倒是干净利落痛快淋漓。

昨晚的三场比赛，我偏重这一场，原因完全是小小的一点自身的因素。捷克首战痛宰美国队，三个进球一个比一个精彩，令足坛后起的新秀美国队几无还手之力。这场竞技中，捷克整体状态绝佳，甚至给人以走到最后雌雄一决者的可能性印象；再则捷克人在场上的运动姿态，给我留下轻捷骁勇干散利气的帅气率性的印象。可惜那晚因琐事干扰不能专心用意看球，留下些许遗憾，便想着一定要看捷克小伙第二轮的表演。足球场上不稀罕威猛的身影，也常见那些轻捷如攀援的猿猴的身姿，都有着令人着迷的生命旋律。然如捷克人整体都显出那种帅气和率性者实不多见，用关中民间语言即是干散利气，煞是好看。昨晚在支应一天十分疲累的状态里，我还是兴味不减地要看捷克小伙表演。

怎么也料想不到，捷克人遭遇了滑铁卢，直到终场哨响，我才不得不相信这个大出意料的结局。从一开场，我就陷入一种既成的心理偏见，只期待捷克人更加帅气率性的令人赏心悦目的足球技艺。赢加纳是不足虑的事，只是入球多少和进球漂亮与否。加纳人打进第一个球，哨响不过一分钟略过几秒，我并不为捷克队担心，看成是借开场立足未稳搞了一次成功偷袭，凭捷克的实力，当不会成为致命的一球，况且时间是绝对的充裕。即使捷克队连连错失打门良机，即使捷

克小伙在加纳小伙的冲击下难得再现帅气和率性，我依然怀着一缕重图江山力挽危情的希冀。直到最后半场加纳队获得点球，我那时似乎才意识到捷克人败走麦城的尴尬难以避免了；万幸点球击中门柱的一瞬，我为捷克人破灭的那一缕希望之火瞬间又复亮了。结果大出意料自不必说，更遗憾的是不仅没有得到期待里的欣赏的享受，倒是看到捷克人的某些气急败坏，某些狼狈相。气急败坏和狼狈相里的捷克人，不可能复现帅气和率性的。

我在本文开头把本来描绘捷克人的词儿“干散利气”给了加纳人。加纳队是第一次闯进世界杯盛事圣坛，在非洲足球普遍崛起的潮流里，算不得出头鸟，也没有多大响动，我记得的是南非和尼日利亚等国家的不俗战绩。加纳人整场打得令人刮目相看，配合的娴熟和进攻套路之舒畅，令捷克人顿然缺光失色；其自由自如穿过捷克人的层层障碍，起码比捷克人通过加纳人的防区要轻松顺畅得多。再说个人，一个个黑脸上如涂油彩而熠熠闪亮的小伙儿，身手不凡，脚功灵巧细腻而又刚劲简洁，毫不拖泥带水，既不见疲软，也基本不见粗野。他们的速度他们的敏捷他们的灵动，都比对得捷克人相形见粗见绌了。他们在捷克队门口制造的几乎致命的危情，远远超过捷克人给他们的。捷克得了一个救危扑火的功勋守门员，加纳人失之临门一脚角度的算计和把握，才不至于落得比2:0更大的悬殊比分的难堪，而就加纳队创造的多次势在必得的进门良机而言，这完全是可能的。

想在捷克人身上看到的干散利气的帅气率性，却在加纳人身上看到了。我倒是再一次重复体验一种生活常理，人和事都在变化，尤其是这种每一次出脚都在对抗的竞争，成败既决定于自己一方，也决定于对手一方。你强了，你就自由自如了，也就把帅气和率性展示出来了；你遇到技艺和心态都强过你的对手，就是另外一番模样另外一种

结局了。捷克人证明了这一点，加纳人也验证着这一点。无论如何，都不能跟人胡急要赖，更不能把心眼用到非足球竞技因素之外的歪门上。唯一的途径，再行休整，再加操练，以达旗鼓重整之状态，再帅气起来率性起来，用关中话说，再干散利气起来。是为常道。

2006年6月18日 雍村

绅士风度和心理赘肉

——二〇〇六足球世界杯观感之六

巴西和澳大利亚之战，有两点颇令人耳目一新。

鉴于澳大利亚和日本首战的深刻印象，多日来脑际里总轰轰隆隆着“黄衫坦克”，以及日本轻量级苗条身材被撞击得人仰马翻的场面。澳大利亚这种典型的力量型打法，在技术型巴西人身上还能奏效吗?力量和技术的较量，会给我怎样一种观赏乐趣，以及关于足球运动新的理解呢?

巴西毕竟不是日本。日本人被誉为亚洲的巴西风格。现在拿巴西人在场上一招一式作参照看来，日本队确凿是“小巫见大巫”了。巴西人的身体部件的结构形式，肌肉筋骨的刚健和柔韧，不仅好过日本等东亚足球队员，似乎比身高体壮的欧洲人更胜一筹，属人种的先天性优势。澳大利亚坦克面对巴西，冲击效果不再有刺眼的显著，或许是柔韧并刚健的巴西人经得住其冲撞，或许是巴西人个个都精通的运球功力化解了强大的力量冲击，或许是你冲你的我玩我的，关键在于你影响不了我控制和传递足球本身。于是我看到场上基本是一种平衡，各自拥有的力量和技术达到的一种精彩异常的攻防平衡。这似乎也是富于生活哲理启示意义的。

澳大利亚更使我感兴趣，在于他们与首次亮相判若两家那种痴狂的野性的横冲直撞不见了，倒是更显出传接配合的令人眼亮的精准和灵动，让我看到许多脚下闪光的细腻的好活儿。那个屡屡以个人速度和技艺创造门前机会的维杜卡，把他司职的左路变成巴西人最受威胁

的一条茶马通道。不仅是我器重这个英俊大气的小伙子，电视特写也多次对准了他的每一次精彩表演，无疑是那场比赛里享受电视镜头最多的运动员之一。我一时竟忍不住调侃，怎么把黄马甲换成蓝布衫，顿然就由清道夫变成英裔绅士了！他们创造的进球机会并不比巴西人少，却终究没有破门，似乎没有对日本那场的运气好。上回进球集中在最后几分钟，我讪笑他们最后才学会射门；昨天面对巴西人，把刚学会的射门技术又丢了。我对澳大利亚这两场球赛所呈现的迥然不同的风貌，看到一个球队的不同侧面，似乎颇多启迪，不可用一次印象断定之后的所有事。

再一点是罗纳尔多。不仅在我，整个世界的球迷都在关心着这位巨星："廉颇老矣，尚能饭否？"

罗纳尔多最显老道的一脚，是在禁区沿上接到罗纳尔迪尼奥神奇的直传球，左右倒了两下，晃不开对方近在眼前的两名防守队员，却一眼瞥见右沿的阿德里亚诺，精准的一脚就传到其脚下，阿德里亚诺一停一转身就把皮球射进去了。与这一脚精妙传球相映成趣的是，在禁区里，罗纳尔多在守防不紧的难得一遇的机会里，跷起腿来却居然没有踢上脚边的皮球。还有他明显笨拙了的动作，过人过不去的无奈表情，毕竟老了。电视解说员说如果罗纳尔多减掉三公斤赘肉，情况就会好得多。我却不敢完全苟同，身上的赘肉可以减少，肌肉筋骨和脉络的硬化却难以改变。况且，一个早已达到顶峰且风光了许多时候的大罗，和刚登上山头的小罗，以及正欲达到顶峰的被看作贝利接替者的罗比尼奥比起来，不仅是年龄差别，创造欲望和心理激情差别更大了，他比他俩不仅身上赘肉多，心理的"赘肉"更多；这种心理赘肉，也更难以除肥。谓予不信，大罗下场，罗比尼奥甫一登场，巴西前场顿时活跃起来，节奏更富于变化，一会儿快了一会儿慢了，打得

变幻莫测。整场虽未进球却仍不失澳洲虎兼英裔绅士风度的澳大利亚队，此时发生风声鹤唳顾此失彼的慌乱。我便坦然面对，与其让大罗心有余而力不支地强撑硬受，何如让小罗和小小罗（小贝利）担纲主打。足坛如此，江山如此，社稷如此，家庭家族亦如此。

2006年6月19日 二府庄

尽享盛宴

——二〇〇六足球世界杯观感之七

昨晚真可谓球迷的盛宴。球迷天天晚上熬到深更半夜不惜把生物钟弄得紊乱，在诸多看点中最想看到的，还是如何把皮球顶进或踢进门框的瞬间一幕。昨晚四场比赛，每场都有进球，不留一家空白，统共打进十二个，平均每场三个。真是让球迷从眼里到心里都饱享愉快。

德国对厄瓜多尔的三个进球，可以说个个都很精彩，没有一个黏糊球，令人感到痛快尽兴。克洛泽的远射，如冷箭又如重型炮弹，直挂远处死角，足见脚下功力非凡，亦可感胸腹间的豪壮大气。克洛泽不负众望梅开二度，又一次做二过一巧妙默契，急中用大腿把球挡过守门员扑来的指掌，轻松送进空门；最后一个进球是干净爽朗的三段传接，波多尔斯基抢到门前空当一脚捅进网窝。许是德国女总理坐在台上，个个队员都涨起表现的欲望，异常兴奋，发挥自然出色超常。厄瓜多尔以替补队员出阵，显然是教练从长计议。然而这些替补却获得难得的表演机会，并不见丝毫松懈，打得更卖劲，虽然未进球，却没有偷懒省力，正好给德国人一次演练的机会。

哥斯达黎加与波兰虽然都已出局，却打得难分难解，真正是为荣誉而战。荣誉尽管只在一只皮球上，却是世界上所有体育竞技项目中最被关注最被看重的一项赛事，历届和本届都有一些国家的元首和王侯临赛场观战，和普通球迷一样为自己国家的进球而振臂而狂呼，也为自己的失球而绷脸而攥出掌心的水来。可见这小小皮球确凿不单是

球员和球队的荣誉，而是让一个国家添光增彩的事。连被“核试问题”搞得颇烦的伊朗总统，赛前也张罗着要去看球，似乎没能如愿，也不知谁在后面使拐，或是哪个环节不畅。不过他未去成也好，伊朗输得太令人丧气了。

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队又顶进一个乌龙球，令我这个远方的看客都替他们遗憾了。那个吊到门前的皮球，不在巴拉圭队员头上。正好在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两名队员头顶，俩人同时跃起争顶，竟然顶进自家大门，俩人顿时愣住。记得他们首战英格兰时，贝克汉姆发任意球至门前，就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一个队员顶进自家球门的，英国队凭着这粒对手的赠品全取三分。特立尼达和多巴哥队在三场比赛中送给对手两粒乌龙球，独独打不进对手的球门，却得到了一个特殊的“送球”纪录，该当怎样愧悔莫及抱憾长久。看来，教练员得加练一门功夫，如何才能防止把球踢进自家大门。

最值当说的是英国和瑞典之战。一个巨大的得天时地利的“德国战车”横在眼前，一个巨大的阴影投在双方的心里，为了避开这个谁都看得见的障碍，便是打败对手，把对手以小组第二的排序推到“德国战车”轮前。结果却是又一场平局，英国遇瑞典只平不胜的纪录创了世界之最，却仍然如愿以偿找到自以为软柿子的厄瓜多尔，把瑞典人逼到德国人对面。我听到厄瓜多尔教练的豪言壮语，说他们什么对手都不惧不怕，要抵达的目标是最后一场的问鼎之战。这从他对德国的布阵可以看出，让五位主力养精蓄锐，都是为着下一场的淘汰赛，无论是对英国或瑞典，早已蓄谋加重兵以待了。这样看来，厄瓜多尔究竟是软柿子，还是又硬又涩的青色柿子，就看英国人的本领了。球迷有好球看了。

有一个花絮值得一记。鲁尼被换下场时，脸色不悦，还没坐到椅子上，就把一只鞋扒下来，重重地摔到地上；坐下之后又把另一只鞋扒下来，再摔了一次。猜测他抱怨换他太早下场，或者就不想被换；猜测教练是考虑他的脚伤，属于好心爱意。鲁尼显然没有尽兴表演，把不高兴摆在脸上又摔到地上。真是一个孩子。

2006年6月21日 二府庄

老陈与陈老

爬山或上楼梯时，会有好心的年轻朋友搀扶我的胳膊。那手上的温暖和力量同时传导过来一种意思，你老了。我一般不太乐意接受这种好心美意的扶助，便婉言谢绝，尽管知道自己已跨入老年划界，心里却在拒绝。

老朋友或新结识的年轻朋友，见面时偶尔会冒出一句“陈老”的称呼，口吻和态度更见真诚。然而这美好的称谓传导给我的意蕴却也是，你老了。我第一次和第十次听到这个称呼，每一次都有某种惶惶然的惊悚。已经到了可以被称呼“某老”的那种状态了吗？在我的习惯性意识里，一般在姓氏后面加一个“老”字的人，往往都是功德卓著或学富八斗的老者，我自觉底虚内空，惶惶然不敢冒充也不敢领受；二般就纯粹指年龄和生理状况了，多是晚辈对那些老得颤颤抖抖的长者的尊称，而不计较文化水准的高低乃至有无的，乡村人也习惯把年迈的人称您老的。我的惊悚的感觉就发端于这一层，还是一种对老的拒绝。

我习惯于被称作老陈。我从三十几岁就被人称呼老陈，其实根本谈不上老，实际还是小伙子。我那时候被调到公社（乡政府）工作，乡村民间把政府机关的男女干部，不管年长年轻通称“老某”。机关院内也有称官衔的，却不普遍，多数人和多数时候互相称“老某”。我在区和乡工作二十年，乡村农民和机关干部差不多都习惯称我老陈。后来调到作家协会，和我年龄相仿的作家朋友都称呼名字，我也直呼他们的名字，连姓氏都省略了，感到自然和亲切。比我年轻一大截的小伙子称我老陈，倒也自然无奇，有趣的是，一些年龄大过我一轮两轮

的老同志，也称呼我老陈，让我就觉得有点心理负荷了。但时日稍长，也就不在意了，在于我渐渐明白，这个作家协会的人际关系，单是称呼一项，就充分体现着群众团体的别致风俗，“老某”成为一种互相之间的代称。参加过“延安文艺座谈会”的文学评论大家胡风，年龄和革命资历以及行政级别都是这个院里的老夫，会议上和私下里都被人称作老胡。最早写出人民解放战争史诗《保卫延安》的杜鹏程和短篇小说神手的王汶石，也都是延安老区过来的离休干部，都是以老杜老王为通用称谓。长时间任作协党政领导的李若冰，年龄虽轻过上述几位几岁，在延安是红小鬼，进城后却是老革命了，又是影响广泛的散文大家，也是称为老李，因为人太随和太少架子，有时候还被年轻人直呼其名。在这样的环境气氛里，我被称老陈，比在基层行政机关叫着的老陈还更习惯。我几十年里早已习惯这个称呼了，自己往往也以“老陈”自报家门。

不经意间，老陈变成陈老，两个完全相同的作为我的称呼的汉字调换了排列位置，被谁一旦叫出声来，心里竟有惶惶然的惊悚，甚至如同发生一次内里的小震。

其实，我又何至固执到愚蠢得不承认衰老呢。我在即将六十岁的时候，曾看到朋友推荐的黑泽明的一组据说是经典的短片，名字已忘记了。其中之一演绎的是日本一个山村的老人过世了，村子里的男女盛装打扮，敲锣打鼓弹奏丝竹，唱着悠扬的歌曲跳着舒缓的舞步，从村庄进入田野，送其入土为安。我看到那场景颇为惊异，因为与我所经历过的丧葬的印象截然相反，无论乡村无论城市，都是白色孝衣孝布和白花，还有号啕的哭声和沉痛的悼词。我不知道黑泽明从哪个年代的日本的哪个小山村挖出这个题材，似乎在日本也没有多少普遍性。然而，我在黑泽明的短片里还是得到了关于生命的新的理解，尽

管亲属和朋友难以割舍情感，难以摆脱永远的告别所意味着的感情黑洞的悲哀，而终老到死还是应该庆祝的。人不可能永远活在世界上，长生不老的药不仅秦始皇寻找不到，现代科学也研发不出来；如若真找到了或研发出来了，无法想象地球会是怎样一番热闹而又拥挤的情状了。这样从理性常识来说，以鲜艳的盛装让至爱的逝者告别这个世界时有一片热烈的色调，以鼓乐丝竹奏出一路祥和温馨的送别曲，以悠扬的轻歌曼舞颂扬其在世时的建树和美德，给逝者本已悲凉的灵魂添上欢乐的温暖……这个不知朝代的日本小山村的乡民，对待死亡的仪式，不仅更富于理性，也更富于人性的情感。我在那年看过黑泽明的那个短片，对于我以坦然的心态进入六十岁这个老年划界，确是一个理性的铺垫，而且有了颇为自然的接受心理。然而遇到好心的搀扶之手和美意的“陈老”的称呼，心理上却又在拒绝，看来我也是在理性和情感之间不断发生混淆的昏俗之人，四年前的六十岁生日感言里，我唯一的心愿，是希望上帝能给老年的我一个思维清晰的大脑。

其实上帝就是自己。要保持一个清醒的大脑，就需接触新的知识新的理念。我清楚老年人的固执，除了生理因素之外，多是在于对一生经验的依赖，以及对新的观念的排斥，容易形成心理和精神的死水，或曰赘肉。我是在看到罗纳尔多被一身赘肉累得施展不开素有的超凡球艺球技时，联想到人的心理赘肉的。人们以空前的热情关注着身体增肥的赘肉如何削减，也应该以同样的意识重视心理赘肉的形成和消解，尤其是如我一样跨入老年的人。

心理无赘肉，思维当会活跃，心里也会清爽，中国古人推崇的“淡泊”“明朗”等境界，不仅会抵达，而且会超越。我不太把自己困禁在老年圈内，争取多参加青年人的集会，也是想接受一种新思维的活力、

一种新鲜气象、一种强烈的创造欲望，借以冲刷荡涤自己心里可能形成的死水和赘肉。

2006年6月22日 二府庄

又一次高潮式的盛宴

——二〇〇六足球世界杯观感之八

昨晚又是球迷的一场盛宴。在我感觉里，当是世界杯开赛以来的一个高潮。四场比赛打进十四粒入球，其精彩壮美暂且按下不说，单是这四场对垒的八支队伍，均属晋级或打道回府的生死大战。从三十二支参差不齐的参赛队中脱颖而入十六强，对于满口放出大话誓夺大力神杯的几家列强，是"万里长征走完第一步"；对于众多的中不溜球队来说，打入十六强就标志着从芸芸众生中攀上一个档次，在世界足坛上亮出一张脸来。这情形可类比为技术职称从中级跃进次高级，即副高，八强和四强可看成正高，冠军当是毫无争议的"天下第一碗"。在这四场关涉晋级的八支球队里，除日本与他的师傅巴西队似无悬念外，其余六支队伍中的列阵对手，全是半斤八两难以判断彼此，赌球和猜奖者恐怕要多费一些算计了。

我首先把兴趣毫不迟疑地对住捷克和意大利之役。对意大利怀着一种久远的温情，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我看意大利甲级联赛，罗西和巴乔的矫健身姿至今仍存记忆，尽管现在似乎缺失了这样的世界级球星，还是寄着一缕爱意。捷克人第一战中的骁勇洒脱，真可以用毛泽东为女民兵题照诗中的"飒爽英姿"来描绘。然而二战全成了另一番不堪的局面，我仍然寄望于最后一战，在于把它看成一次偶然失常，最后的生死战理应恢复到最佳状态。捷克人开场摆出的架势让我看到有好戏可看。致命不完全在意大利第一个进球，而是被一张红牌彻底崩溃了。又是我们忌讳的红牌，把一场对等的较量搅黄了。我从此时就把电视调到加纳和美国之战的屏幕上，直到电视解说

员报告意大利又进球了，我才调回来看那个进球的慢镜头，竟看到一点凄凉。因扎吉反越位成功，和另一位前锋双锋直逼大门，且不说那个前锋处在打门更有利的位置，因扎吉仍不传球给他，而是绕过守门员轻推入网。因扎吉上届世界杯打入两球都被哨子吹黄了，这回终于打进一球，情可理解情有可原，凄凉在于因扎吉背后竟无一名捷克队员追赶，整个小半个球场上空空荡荡，两把尖刀正对着一个守门员和他背后的空门。这景象在这样盛大而又高格的赛场上实属少见。捷克输得令我不仅惋惜，以至凄凉了。据说他们实在跑不动了。

日本输给巴西是意料中事，唯输得和中国队一样难堪有点意外。上届巴西打进中国队四球，本届同样又灌进日本队四球。看来面对巴西这个足球标杆，中国和日本不过如乡间话说的席篾之差，稍强在日本打进巴西一球。克罗地亚和澳大利亚之战堪称恶战，体型体力和技术类型差别不大，又都是逼到悬崖边的背水一战，打得气粗眼红，搅起腥风血雨。以致粗话恶骂泼到裁判脸上，似乎是开赛以来少有的恶战，却令看客压抑憋闷，少了欣赏的愉悦。

无论从足球的竞争意识、战术意识和观赏性来看，加纳和美国之战更好看。美国队上届曾打进八强，当了一次黑马，这回却让第一次闯进世界杯的加纳人送回家去。加纳队终于露出黑马的迹象来。整场比赛中，我看到这些肤色黑到不能再黑的非洲兄弟，对足球的感觉似乎是一种天性的默契，充沛的精力和柔韧的肢体对足球的控制，有一种舞蹈的优美和和谐，令我叹为观止又意犹未尽。加纳队第一个进球源自一次禁区外巧妙的抢球，直逼禁区后优雅准确的推射，颇见大将风度。那个点球似可存疑。加纳人也不乏狡猾，假摔赢得点球得了便宜，却带来下半场的债务。裁判大约得知这个存疑的判罚，下半场明显地偏向美国人，而且一偏再偏，偏得不顾几万现场球迷锥子一样的

眼睛。连我们的电视解说员都急了，撂出一句“裁判非要给美国进球呀”的话。我猜想裁判是一种还债心理，送给加纳一个便宜球，再送美国人一球，就把自己解脱了。可以证明这一点的是下半场加纳队员在禁区确实被绊倒，裁判却闭眼不盯不吹哨子，放过美国队一次点球惩罚。不该判的点球判了，该判的点球却不判。正是因为不该判的判了，所以该判的点球就不判了。加纳队没有损失，美国队也未吃亏蚀本，裁判也终于解脱心中负疚，三全其美，三角平衡，无矛亦无盾了。这是生活运动不成文的法则。

美国人回家，我看本也不亏，比之同组三家对手，确是技乏一筹，尤其对垒加纳，就更显得脚下粗疏了。让优美舞蹈的加纳队继续寻找新的更强的对手再来展示风采，似乎比美国人更有戏也更有看头。加纳这匹初显黑马相的新军，还能“黑”到哪一档，我的兴致大增。

2006年6月23日 二府庄

娲氏庄杏黄

蓝田朋友老曾打电话来，说岭上杏黄了，约我去摘杏吃杏。听这话时，心里已沁出酸水来，因为手头事情太稠，一时难以确定成行与否，只好把话说到活处。隔几日，老曾又打电话来，杏熟正到洪期，过三几日该清园了。我终于经不住记忆里的大银杏的诱惑，决定上岭去，又有酸水沁出来，完全是生理反应。

村子后背的崖坡上，东头有一株粗大的银杏树，西头也有一株。从杏儿在刚刚萎干的杏花里形成如小拇指大小，锈着一层茸茸细毛，我和伙伴就开始偷摘了，咬一口就酸得龇牙咧嘴睁不开眼睛，仍然还是要偷摘；在树的女主人尖锐的叫骂声中，迅即逃遁到坡沟里隐蔽起来，嘻嘻哈哈品尝那酸过醋精的小杏儿。到我成年后成为基层干部，有年夏天到盛产杏子的一个村子去帮助收麦子，生产队长曾领我到一棵最好的杏树下，几乎吃饱了肚子，实在忍不住这大银杏清香绵甜味道的引诱，中午饭都免吃了。三十多年过去，留在味觉记忆里的香味，再也没有重得享用的机会。

大清早起来，空气都是燥热的。城里燥热，家乡的田野里也燥热，毕竟是夏天的征候了。汽车在我最熟悉不过也亲近不过的灞河川道里疾驰，满眼扑来绿树和绿草，以及刚刚割过麦子在阳光下闪闪泛着亮光的麦茬地，怎么看都觉得舒服。这种舒悦是潜存在生命深层的每一根神经里。除了父母和屋院，我睁开眼睛看到世间的第一道风景，就是割过麦子后留在土地上的麦茬子，被夏天的太阳晒得闪闪发亮，还有河川灌渠上一排排优雅傲然的白杨树。几十年里年年都重新温习反复观赏这河川和岭坡上的景致，铸成一种永久的油画在心灵深

处，只是近年间隔断了。今日又触及了，搞不清是眼前的景致融汇到心底，还是心底的那幅油画铺展到眼前的天和地之间，我却是陶醉了。发亮的无边际的麦茬和碧绿的白杨树，引发的是久违的生命本能的舒悦。乡情何止一杯酒所能比拟。

车子拐上岭坡通直的乡间公路。在遇到第一个村子时又拐向西。村子里一幢幢红砖红瓦的新房子，还有两层小楼，迎面的墙壁多用白色和橘红色瓷片装饰，在庄前屋后的椿树槐树桐树和杏树的绿荫里，看去煞是鲜艳煞是清爽。新房和小楼背后的黄土崖下，还遗存着一孔孔窑洞，那是不知多少辈人出出进进过的落生和终老的穴居式住宅。他们搬出窑洞住进新房小楼了，从昏暗的穴居迁入阳光敞亮的新居了。不过十多年的时间，河川和岭坡上的农民，完成了一次历史性的告别。

车子向西走到一个阔大的河谷的东岸，在沿山路往北，满眼都是绿树，可以闻到杏子成熟时散发的香味了。我觉得有点眼熟，这应该是红河谷，二十多年前我曾来过这里，就在车子向北折拐的坡嘴上。那是杏花三月，我从自家门前的场塄上看到对面岭坡上一片白色的花云，回家收拾了书桌，戴上草帽，蹚过灞河，在小镇上买了两瓶啤酒，找到一条上岭的小路走上去，已见热力的太阳正对着后背，浑身有热燥燥的感觉，走到这个坡嘴上，我被眼前阔大的沟壑迷住了。红河谷入口处不过是一条小小的窄巴巴的山沟，上游却豁然展开一片偌大的谷地，被四周的山岭环抱着，岭坡上到处都是粉白的杏花，如同云彩，隐隐可以看到隐藏在花云之中的村庄里的黑色屋瓦。我便坐在红色黏土地上，面对那层层叠叠的岭坡环抱的谷地，吸着弥漫在温热的空气里的杏花的清香，席地而坐，打开了啤酒瓶。那是我最温馨的一次春游。我那时就想到这漫坡满岭杏黄的时节，再来尝一回刚刚摘

下的杏子，不料几十年过去，到今天才成行了。我走进了盛产大银杏的娲氏庄。

娲氏庄在红河谷延伸过来的谷地的南岸。娲氏庄以女娲名字得名的，现在无人能说得清是从哪朝哪代开始启用这个村名的。村子的西北是开阔的谷地，四面再大的暴风刮到这谷地时，都会减弱其暴力而温柔起来，确属一块天成的风水宝地，七八千年前的女娲选择这块地盘，哺养她繁衍的和用泥土抟造的儿女是有道理的。这方岭坡地带整个都弥漫着人类始祖的美丽神话。下了谷底，上了对岸的岭坡，一直向北走，不过三十里地就是闻名天下的骊山下的秦始皇陵墓了，我现在摘杏的娲氏庄，是骊山南麓的边缘，整个骊山浑然一体无所间断。北边的山顶上有“人祖庙”，是秦汉以前始建的女娲祠，每年农历七月十五，四面八方的乡民都来朝拜，多为成年女性，依然向这位抟土繁衍了华夏民族的女神乞求一个大胖大壮的儿子。人们广泛知晓骊山下杨贵妃沐浴的香池，也知道周幽王烽火戏诸侯丢失江山的典故，更知晓杨虎城和张学良在这儿扣蒋发动西安事变的故事，却忽略了女娲氏在这方山地岭坡上抟土造人和炼石补天的神话。我到女娲的村庄里摘杏来了，我踩踏的村巷和坡地上的黄土小路，我走进的杏园里的松软的土地，肯定是这位老奶奶无数次奔走踩踏过了的。还有比这更幽远更神秘的岭坡吗?

得了山水地脉独有的优势，娲氏庄的大银杏是口味最好的杏子，左右的或对面岭上坡下的村庄，不过三五里或几十里，都是铺天盖地的杏林，为何娲氏庄的银杏远近传出了名声？据说还是土地和地下水的差异，还有光照的差别，再就是沾着女娲氏的神韵仙气了。娲氏庄银杏出名，不是商业宣传的效应，而是早已名声远播，起码在我小小年纪就听说了，早已有口皆碑了。眼目所到之处，尽是大大小小的杏

树，岭坡被层层叠叠的杏树覆盖着；屋院内外都是杏树，金黄的杏子在绿叶里显露出来；墙外的杏树把枝条伸进院子，院里的杏树的枝条又逸出墙头来，枝条上都串结着半黄的和金黄了的杏子。

走出村子，下一道坡坎，沿一条铺满青草的小径走过，草木的清香和杏子的香味在微风里送过。小路上有男人和女人推着用大竹笼装满银杏的独轮车走过，汗涔涔的脸上堆满真诚的笑，大声爽气地礼让我和朋友吃杏。几经转弯，走到一棵大杏树下，树冠遮盖了至少一分多地的山坡，树干已有空洞，枝叶却依旧茂盛，壮气而又精神，不显一丝衰老气象。老人说这棵杏树已超过百年，记不清是哪代先人栽植的了。我相信他的话，两人合抱的树干就摆在这里。我惊讶的是这株杏树依然着的活力。杏子已经黄了，熟了。主人颇为遗憾地说，他刚刚摘掉树顶上的杏子，只剩下中下部树股树枝上尚未熟透的杏子。杏子是从树梢往下逐渐成熟的。我坐在杏树下，浓密的树叶遮挡着六月的阳光，一片让人可以享受树荫的凉爽。你可以在这个世界上接受诸多的现代享受，也可以获得前人想象不出的快意乐趣，却难得这种原始的树叶遮盖下的一方阴凉儿的享受。远处是不尽的群山岭坡，眼前是随着地势起伏着的杏园里的绿叶，坡坎上正竞相开放着的野萝卜野豆荚的白色和紫色的花，我坐在一棵百年大银杏树荫下，享受山野里大太阳下的一种清凉，似乎回到我青壮年以前的天地里的生活方式和歇息方式。我没有拒绝现代文明生活的矫情，却在重温以往的那种生活形态里除了苦涩，只留下简单的温馨和单纯。我已经很久没有在山野里的树荫下独坐和吸烟的那一份纯净到简单的心境了。

主人攀上一架梯子，从树上摘下几个杏子来。我接在手里，凭感觉就知道它熟透了，通体金黄，轻轻掰开，就是鲜黄近红的杏肉，略停片刻，凹心里便沁出一汪杏汁来，用舌尖舔一点，那种清香的甜味

真是无可形容，无可比拟，因为它是独有的唯一的银杏的香味，何况又是久负盛名的娲氏庄大银杏。只觉得清凌凌的蜜一样的水汁，和着杏肉，入到口里，已渗入到心肝脾脏里去了。主人在骄傲地宣扬他的杏，干净无染，尽可以放心吃。我完全相信，杏树无病虫害，四季不洒任何化学成分的药物。况且这岭坡山洼，没有一家工厂，不见任何有害气体和煤烟，甚至连尘土也很难飞扬。我贪婪地连续吃着，大约把多年以来的亏欠一次性补偿了。

这位拥有百年大树的主人是一位智者，又是一位热心公众利益的富于威望的老者，他把村子里的农民联合起来，组织了一个果农协会，扩大宣传，统一包装，吸引来不少客商，不用推车挑担到城里沿街串巷去叫卖，城里的果品商人开着汽车到村里来收购。还有大批的城里人结伴来摘杏买杏，既体验了自摘鲜杏的情趣，也到山野里怡悦性情。一位年轻干部悄悄告诉我，经过挑选分类，再经过印刷精美的盒子包装，银杏的价值成倍提升，村民自然高兴了。华胥镇政府几年来在岭坡地带搞银杏基地建设，娲氏庄银杏已打出名声，农民见着实惠，仅留一点土地种植粮食作物作为自食，绝大多数土地都栽植大银杏树了。据说他们近年来一亩地杏树的收入，抵得上十亩麦子的价值。真应了乡村自古就流传着的谚语：一亩园，十亩田。娲氏庄和岭上的乡民，真没料想到指靠杏子可以过上舒坦的日子了。

朋友老曾约我明年再来。

我便玩笑说，我明年到岭上来种植杏园，你帮我物色一块好地。把写作重置于业余。

2006年6月30日 二府庄

太过的残酷和太过的轻松

——二〇〇六足球世界杯观感之九

真是不愿看到德国和阿根廷在八进四这一轮相遇。这是自世界杯开打以来竞技状态最好的三五支球队中的两家。在专家和球迷投票推举的最具冠军相的四支球队中，甚至跃居最显眼的头两位。让两支业已呈现王者灵光气象的球队硬碰死磕，真有点于心不忍，这种残酷的对决发生在下一轮四进二的时候，似乎还可以接受。这种过早的死磕，无异把一位具备登上皇位资质的王子早早废了。

真没有料到会踢得如此难看。德国难看得不像德国队，阿根廷也难看得不像阿根廷队。这两个队风格尽管有差异，却都是大打进攻足球的，且都打出了好战绩，也打出了威风。两队都不见凌厉的进攻势头，沉闷而又黏滞。人说是双方教练的谨慎方略，我不敢全信，倒觉得是强强对决中的互相消磨和抵消，还有互相畏怯的心理对脚下功夫发挥的制约。双方能力的悬殊，才可能造成一方的肆无忌惮和尽兴尽情的发挥；势均力敌，必是互相制约下的残酷的消耗消磨。点球不过是一种最愚蠢也无奈的决胜方式。

相对而言，意大利和乌克兰的比赛就显得太过轻松，轻松到不像是八进四的含义里所应有的艰辛。竟然出现3:0的悬殊比分。乌克兰是走得最远的一支新军，第一次参加世界杯就踏上八强的台阶，该当是黑马了。据人说是因为头次参赛缺乏经验，还有说运气欠佳导致失败，似有道理，却不敢全信。两三次击中门楣和门柱，毕竟还是脚腿和头上的功夫和把握差了一点点，所谓差之毫厘，谬以千里，门柱内

和门柱外的结果就大相径庭了。也许我的生活实践所决定，不大相信命运的毛鬼神秘，而更注重自我实践中的欠缺和弱项的弥补。命好命不好的说词，往往会给一时一事的受挫者一个逃避尴尬的巢穴，进而丧失修励图举的勇气。记得乌克兰有一次门前头球，顶得有力而又刁钻，意队守门员在猝不及防里已无能为力，那势在必进的皮球，却被站在球门线上的意队后卫挡出。这只能说意队不仅攻击力强，守域也有方略，单是抱怨命运不济是软弱的逃遁。

最可感人的是卡恩的脸和左手。卡恩在场间休息时，左手搂着年轻莱曼的肩膀，又一次一次用那只手抚摸莱曼的脑袋，那张粗糙的脸上尽是真诚的鼓励，蹲在莱曼身旁许久许久。卡恩是德国队多年来的首选钢铁门神，那张誓与球门共存亡的脸上的神态，不仅刻在德国人的记忆里，也为我这样的准球迷所熟识。这回世界杯上他坐了凉板凳，我曾为之神伤。他对接替德国队球门的莱曼，却是这样一副动人的热脸，贴上这位年轻的尚留稚气的莱曼的脸。鸡肠小肚与宽阔胸怀，个人得失与国家荣誉，岗位替换与精神传承，如此等等潜词默意，都在卡恩那只左手和前所少见的脸相里蕴含不尽。莱曼扑救两个点球的壮举，补偿了德国，也补偿了卡恩。卡恩尽可以放心地领儿子逛山游水了。

2006年7月1日 雍村

经典的防守也精彩

——二○○六足球世界杯观感之十

看着八进四最后一场法国—巴西的对决，我终于明白过来，八进四这四场生死磕碰看什么？看精彩的防守。

法国对巴西之战赢在强大的防守机制上，也让我看到了当今足坛超一流强队是如何完成城门的确保不失，堪称防守的经典之役。从排阵上看，只把亨利一个人摆在前锋线上晃荡，伺机绝杀，且果然奏效。强悍如将军的齐达内统领他的中场和后卫，几乎是浑然一体地盘踞在巴西的门前和中线，不给任何巴西队员从容拿球传球的机会；对大小罗纳尔多锋线杀手，几乎连一次从容起脚的机会都没有，不给一丁点空当。已经身肥脚慢的大罗且不说了，把足球当作踢毽子一样轻巧自如的小罗，在封堵夹击的重围里，也只能徒叹奈何；几乎很难再现一次他擅长的有威胁的传送，更看不到他在巴塞罗那攻城拔寨时的潇洒风流。罗比尼奥的天才苗头也被扼杀了。法兰西人强悍而又严密到一丝不漏的防守功能，把最具攻击力的前锋骁将的进攻悉数瓦解，向当今足坛展示出精彩的防守。

我也才明白，德国和阿根廷为什么打得那么难看。高吼着“向前”的克林斯曼曾让我兴奋不已，面对阿根廷却摆出死守的架势。看来喊不喊“向前”，却是视对手的软硬而定，如俗话说的“看客下面”。他把强于自己的阿根廷扼制住了，笑到了最后，尽管有点球的侥幸因素，能拖到点球就成功了大半。意大利也得益在铁箍般的防守体系上，这是他们家传的老本领了。乌克兰恰恰忽略在这一点上，自食苦果。英

格兰的防守尽管有点被动，却是无奈里的坚决到死心塌地的唯一选择；在少一人的七十分钟里，硬是把葡萄牙人治得射不出一个好球。以多一人和七十分钟的充裕时间葡萄牙队却打不进一粒入球，让这样没出息的球队进入四强，真不如让英格兰人或阿根廷人留到下一轮。

除了意大利轻松过关且攻入三球，另三场比赛仅有三球进网，当是最低的进球比率了。我便确信我昨日的观察，强强对垒里的互相消磨和消耗，似乎谁也显不出超级来；也只有在这种高位高水平的较量里，才会发生此消彼长和彼消此长的难分难解的局面。于此我才明白，为什么八支球队的至少七个教练，不约而同采用了防守策略这个谜底。于球迷看起来难看，却对具体战例实用。

昨晚两场比赛的结局，颇使我感伤，这明摆着是无法逃脱的：我既想看大小罗们继续演出，亦不想让齐达内和亨利从视野消失，当然还有贝克汉姆和鲁尼。在这种最难割舍的情结里，最惋惜的是小罗和鲁尼。大罗早已挥洒欧洲足坛多年，风头出尽，谅也难再超越；贝克汉姆早享足了世界女球迷的青睐，再来不了也罢了。令人期待已久的鲁尼和罗纳尔迪尼奥这两颗新星，本应异彩纷呈，灵光神现，却都在昨晚铩羽落魄。这两个被世界注目的新秀，不过开过几朵小花（有几次漂亮传球），却竟然未结一果，简直令人不敢想象，在各自俱乐部的威风灵气，为什么直到昨晚都不复现？尽管有对方的重点防守和死缠烂搅，可巨星正是在这种藩篱中脱颖而出独秀一枝的嘛……我还愿意等待。

2006年7月2日 雍村

谁都强，谁都强不起来

——二〇〇六足球世界杯观感之十一

一路八面威风地走来，业已显现出龙种光环的年轻的德国队，跌倒在最后角逐皇冠资格的台阶之下，让我一阵儿恓惶。草皮上躺倒着仰天掩面的球员，六万多观众的看台上是令人畏怯的静默，电视镜头定格住美丽少女凄楚动人的泪眼。我却想看看德国女总理默克尔，这位铁娘子在接受这个不堪的结局时，会是怎样的脸色和眼神。她已经几次出现在有德国队比赛的现场，此战开赛前的序幕里，她站在看台上和球员和观众一起唱着德国国歌，一派庄严里的激情，尽管她已年岁不轻。我在那一瞬曾为之感动，竟惦记起这位女总理了，可惜电视镜头不给我这个机会。

电视播音员对这场比赛有一句概括，说是一场只有守门员而没有前锋的比赛。这是一句显示着智慧的调侃。无论德国无论意大利，此前一系列征战里那些力拔山兮气盖世的远射，那些机敏灵巧的单刀捅射，那些令对方猝不及防的头槌，统统都没有了。尽管双方都有几次机会难得也功夫不俗的射门，却都一溃在毫厘之间，倒使两家的守门员出足了风头。克洛泽、拉姆和波多尔斯基，这些崭露头角的锋线杀手，都不会射门了。意大利的皮耶罗和托尼也一样，只是到最后四分钟，才没有浪费几乎是唯一的机会。什么样的解释都难以令人信服，为什么同一个球队上一场是那样，这一场却变成这样；同样一个球员前一场或几场为什么如有神助，这一场却偏偏怎么踢怎么别扭，连罗纳尔多这样的名牌在告别赛时也是如此。让两家教练和队员在咀嚼落败的苦楚中慢慢总结去吧。我却看到足球的神秘的魅力。

说白了，克林斯曼和里皮各自所订的策略，无非都为着一个目的，如何抑制对方不让其射进皮球，如何能发挥自己的优长多进一球，把对方绝对置于死地。我们看到的比赛过程，在一百一十六分钟里，他们的第一层意图都实现了，都整得对方无计可施，所以谁也实现不了第二层目的，用民间话说，干瞪眼没办法。从这个意义上说，两家教练都无可指责，两家队员也无可指责。他们都是强中之强，结果却是谁都强谁也强不过对手。试想他们任何一家如果面对中国队，个个都会如狼似虎都是天才射手了。日本队已有先例在。

德国队在最后四分钟出现了一次悔恨莫及的疏漏，竟然让突入禁区的格罗索周围形成一个太过豪华的空当，无人看守无人抢夺无人使拐，格罗索在右门柱侧从容起脚打入远角，脚上功夫和良好的心理铸就了最致命也最耀眼的一击。德国人在这一瞬间被打晕了，几乎没有挽回的时间了。意队在终场哨响前的第二个进球，是德国队慌乱的直接恶果，皮耶罗没有多少可骄傲的资本。

有点侥幸的意大利足球，在这一瞬间——高水平较量的一个刹那间，倒是真的闪现出伟大的光芒来。

2006年7月5日 雍村

再看亨利的魅力

——二〇〇六足球世界杯观感之十二

今年春节假期刚满，便接到《光明日报》一位尚未打过交道的编辑的电话，为今年的世界杯造势，他约请一些作家球迷，写自己喜欢的一位足球运动员。我没有推辞，却暗自惊讶，我的足球爱好和我黑脸上的深沟浅纹一样小有名气了。随后又意识到，这是今年接到的第一个约稿电话，竟然是写足球：关于世界杯的期待，就是从写作《魅力亨利》一文启动的。

我喜欢亨利，自然就关注他在本届世界杯上的一举一动，满心期盼他能有出色的表现，倒是与法国队没有什么倾向性的情感联系，纯粹是欣赏他超群的球技，他的朴实无华到简单自然的性情，他的从来不见粗野出脚更不招惹黄牌的君子风范，在当今整个世界足坛独亮一帜，我就无法拒绝这个说黑不黑说白不白也不属黄肤色的小伙子的魅力。单是最近两场八进四和四进二的关键性比赛，都是亨利一脚奠定法国队命运的。

在上一场对巴西队的对决中，全场唯一的进球是亨利创造的。这里用创造这个词儿，是我看见亨利击球入网的动作时就溢出脑子的。亨利当时抢到右门柱前侧旁，斜背球门，正对队友传给他的足球，来不及或者是无须转身，凌空用脚内侧似垫似射，待守门员跃起时，足球已越过他迟到的手掌跌入身后的网窝。守门员大约想着亨利的站位就不是射门的位置，或者说这样的位置不可能对球门构成威胁。我眼看着这一幕发生的全过程，便赋予亨利这一脚为富于创造性的射门。

球迷朋友李国平有哲理式的阐述，什么是足球明星？就是在别人不可能射进的时间和空间里，他射球进门了，他就成明星大腕了。妥哉斯言。这一脚拯救了法国队，传言里说什么齐亨龃龉的话，在齐达内畅快的笑声里瓦解了。这一脚创造性的不可思议的进球，把大小罗等超级明星送回巴西了。然而在亨利自己，依然如在英超赛场进球后一样，没有太过张扬的庆祝举动。

昨晚对葡萄牙的比赛，表象上似乎法国队占一点优势，而更具要害的进攻却是葡萄牙人制造的。我也许太喜欢亨利，便在不觉中倾向到法国队一边，实质是想看最后决赛里的亨利。在法国队的射门数字中，最具威胁的射门大约有四次（不精确记忆），其中三次都是亨利完成的。上半场三十分钟刚过，亨利欲左故右，欲前故退，闪开对方缠身的队员，突入禁区，形成近距离的空当，守方队员在亨利虚实莫测的晃动下自己跌倒，无奈勾了亨利一脚，致成点球。齐达内射进了。法国队仅凭这个点球进入最高决斗的台面。此前不过几分钟，在同一位置，亨利已有过一次更灵巧的过人，在几乎和守门员伸手可触的地方挑射，已被封死了角度。下半场开始不久，亨利在禁区左侧得球，闪过三名防守队员，沉到禁区射门，球在穿过守门员扑倒的右臂时，被轻触一下，没有入网。亨利这三次攻击，都在他最得心应手的左路。

足球明星亨利，用他创造性的一个进球和他制造的一个点球，使法国队连闯两关，登上最高的决胜台，把一个球队的团队精神和共同愿望体现出来，受到敬重和爱戴就是自然的了。

2006年7月6日 二府庄

绝妙的与吓人的

——二〇〇六足球世界杯观感之十三

尽管齐达内有一个把头当作铜锤锤击对方胸脯的非足球动作，昨晚的最后一道盛宴还是令人赏心悦目的。

这是一场不负世界杯决赛应有的高水平的较量。从任何一个角度看，法国和意大利球员的技战术水平和脚底功夫，都属上乘；比赛之激烈，转换之快捷，似乎不分伯仲，令人充分感受最后的也是最高水平角逐的魅力。我便抑制不住兴奋，大力神杯最后较量的场面就应该如此。我曾因阿根廷和巴西的出局而深深遗憾，单怕最后的盛宴缺光失色，法意开战不过一刻钟，我便完全沉入了。无须全面评说这场比赛，有几个镜头堪称经典，当会成为足球世界杯“史记”上不可淡忘的记忆，我也想把它留在自己的文本中。

齐达内在开场七分钟射入点球的脚法和动作，电视解说员称为“勺子脚法”，真可谓最敏锐反应下最准确生动的命名。齐达内用右脚踢那只停在罚球点上的皮球时的动作，确如一个家庭主妇或高级厨师用勺子轻轻铲起刚刚煎熟的鸡蛋，准确无误地抛到食客伸手端着的碟子里，没有浪费体力的必要，只为显示那道弧线的脚头绝技。这样的点球，这样的脚法，为世界足坛无以数计的赛场所罕见，齐达内的这一脚“勺子”技法将永铸魅力。

还有我特别欣赏的亨利的一次带球过人，让我又一次体味足球的天赋灵性。那是下半时在禁区右首发生的一幕，亨利携球脚下，有三个意队队员堵在当面，亨利从其中一个人缝之间过去了，被绊了一个

趔趄，皮球竟然还在双脚控制之下；调整失衡的身体时有一个转身，那皮球又跟他转过去了，而且绕过了第三个防守队员。那动作的轻巧和肢体的柔韧，那种心理自信，不是说说而已，更非白脸失道的吹牛所可奏效。尽管这个球没有打进球门，却让我欣赏了一种天赋的足球灵性。这样的绝技也不是想看就能随时看到的。

和齐达内的“勺子点球”一样不会轻易淡忘的一个动作，是他用铜锤一样的脑袋，锤击了意队一个队员的胸膛，被红牌罚下场去。他以这个令整个世界球迷都难以忘记的非常犯规动作，终结了自己的足球生涯，也断送了法国触手可摘的果实——大力神杯。加时赛的这一时段，正是法国队占着上风的可能进球的良机，一头撞得乾坤颠倒了。谁都记着齐达内作为统率打到最后的功勋，却在这一瞬间变成了“罪人”。我都愣住了，无法解释，从任何角度考虑，齐帅都不应发生这低级的乃至愚蠢透顶的一撞。

失控，我只能从人的心理和性格上去解读。人在某个瞬间，会爆发本能的劣性色彩，即使最理性的人，也有这神秘的失控的一瞬。问题的轻重在于爆发在什么场合，如果在对小组赛的一支弱旅时发生，无大障碍，唯其发生在昨晚，把整个法兰西人民的心伤透了，也把喜欢他的我吓住了。

2006年7月10日 二府庄

父亲的树

又有两个多月没有回原下的老家了。离城不过五十华里的路程，不足一小时的行车时间，想回一趟家，往往要超过月里四十的时日，想来也为自己都记不清的烦乱事而丧气。终于有了回家的机会，也有了回家的轻松，更兼着昨夜一阵小雨，把燥热浮尘洗净，也把心头的腻洗去。

进门放下挎包，先蹲到院子拔草。这是我近年间每次回到原下老家必修的功课。或者说，每次回家事由里不可或缺的一条。春天夏天拔除院子里的杂草，给自栽的枣树柿树和花草浇水；秋末扫落叶，冬天铲除积雪，每一回都弄得满身汗水灰尘，手染满草的绿汁。温习少年时期割草以及后来从事农活儿的感受，常常获得一种单纯和坦然，甚至连肢体的困倦都是另一番滋味的舒悦。

前院的草已铺盖了砖地，无疑都是从砖缝里冒出来的。两月前回家已拔得干干净净。现在又罩满了，有叶子宽大的草，有秆子颇高的草，有顺地扯蔓的草，吓得孙子旦旦不敢下脚，只怕有蛇。他生在城里，至今尚未见过在乡村土地上爬行的蛇，只是在电视上看过。他已经吓得这个样子，却不断问我打过蛇没有，被蛇咬过没有。乡村里比他小的孩子，恐怕没有谁没见过蛇的，更不会有这样可笑的问题。我的哥哥进门来，也顺势蹲下拔草，和我间间断断说着家里无关紧要的话。我们兄弟向来就是这样，见面没有夸张的语言行为，也没有亲热的动作，平平淡淡里甚至会让生人产生其他猜想，其实大半生里连一句伤害的话都从来没有说过，更谈不到脸红脖子粗的事了。世间兄弟姊妹有种种相处的方式，我们却是于不自觉里形成这种习惯性的状

态。说话间不觉拔完了草，堆起偌大一堆，我用竹笼纳了五笼，倒在门前的场塄下，之后便坐在雨篷下说闲话，懒得烧水，幸好还有几瓶啤酒，当着茶饮，想到什么人什么事，有一搭没一搭地聊着。还有一位村子里的兄弟，也在一起喝着扯着闲话。从雨篷下透过围墙上方往外望去，大门外场塄上的椿树直撑到天空。记不清谁先说到这棵树，是说这椿树当属村子里现存的少数几棵最大的树，却引发了我的记忆，当即脱口而出，这是咱伯栽的树。这话既是对哥说的，也是对那位弟说的。按当地习俗，兄弟多的家族，同一辈分的老大，被下辈的儿女称伯，老二被称爸，老三老四等被称大。有的同一门族的人丁超常兴旺，竟有大伯二伯三伯大爸二爸三爸和大二大三大到八大的排列。这里的乡俗很不一般，对长辈的称呼只有一个字，伯、爸、大、叔、妈、娘、姨、舅、爷等，绝对没有伯伯、爸爸、大大、妈妈、娘娘、姨姨、爷爷、舅舅等的重复啰唆……我至今也仍然按家乡习惯称父亲为伯。父亲在他那一辈本门三兄弟里为老大，我和同辈兄弟姐妹都叫一个字：伯。如此说来，这文章的标题该当是：伯的树。

我便说起这棵椿树的由来。大约是“三年困难”最困难的一九六〇年或是一九六一年，我正上高中，周日回到家，父亲在生产队出早工回来，肩上扛着镢头，手里攥着一株小树苗。我在门口看见，搭眼就认出是一株椿树苗子。坡地里这种野生的椿树苗子到处都有，那是椿树结的荚角随风飘落，在有水分的土壤里萌芽生根，一年就可以长到半人高的树秧子。这种树秧如长在梯田塄坎的草丛中，又有幸不被砍去当柴烧，就可能长成一棵大椿树；如若生长在坡地梯田里，肯定会被连根挖除晒干当作好柴火，怕其占地影响麦子生长。父亲手里攥着的这根椿树苗子是一个幸运者，它遇到父亲，不是被扔在门前的场地上晒干了当柴烧，而是要郑重地栽植，正经当作一棵望其成材的树了，进入郑重的保护禁区了：也自这一刻起，它虽是普通不过平凡不

过的一种树，却已经有主儿了，就是父亲。父亲给我吩咐，你去担水。他说着就在我家门前的场塄边上挖坑。树只是个秧儿，无须大坑，三镢头两铁锨就已告成，我也就没有要替父亲动手，而是按他的指令去担水。那时候我们村里吃的是泉水，从村子背后的白鹿原北坡的东沟流下来，清凌凌的，干净无染。泉水在村子最东头，我家在村子顶西边，我挑一回水，最快也需半小时。待我挑水回来，父亲早已挖好坑儿，坐在场塄边儿上抽旱烟。他把树苗置入一个在我看来过大的土坑里。我用铁锨铲土填进坑里，他把虚土踩踏一遍，让我再填，他再踩踏。他教我在土坑外沿围一圈高出地面的土梁，再倒进水去。我遵嘱一一做好，看着土坑里的水一层一层低下去，渗入新填的新鲜土坑里，成活肯定是毫无一丝疑义。父亲又指示我，用酸枣刺棵子顺着那个小坑围成一圈栽起来，再用铁丝围拢固定，恰如篱笆，保护小椿树秧子，防止猪拱牛抵羊啃娃娃掐折。我从场边的柴堆上挑选出一根一根较高的业已晒干的酸枣棵子（这是父亲平时挖坡顺手捡回来的），做着这项防护措施。父亲坐在地上抽烟，看着我做。我却想到，现在属于父亲领地的，除了住房的庄基，就是这块附属于庄基地门前的这一小片场地了，充其量有二厘地。下了这个场塄，就是统归集体的土地了。父亲要在他可以自主掌控的二厘场地上，栽种一棵椿树。

我对父亲的一个尤为突出的记忆，就是他一生爱栽树。他是个农民，种玉米种麦子务弄棉花是他的本职主业，自不必说，而业余爱好就是栽树。我家在河川的几块水地，地头的水渠沿上都长着一排小叶杨树。水渠里大半年都流淌着从灞河里引来的自流水，杨树柳树得了沃土好水的滋养，迎着风如手提般长粗长高。随意从杨树或柳树上折一根枝条，插到渠沿的湿泥里，当年就长得冒过人头了，正如民间说的“三年一根椽，五年长成檩”的速度。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以前，

我的父亲就指靠着他在地头渠沿培植的这些杨树，供给先后考上高小和初中的哥和我的学杂费用。那时的小学高年级，我都是住宿搭灶的学生。父亲把杨树齐根斫下来。卖了椽子，七八毛钱一根，再把树根刨出来，剁成小块。晒干，用两只大老笼装了，挑过灞河，到对岸的油坊镇上去卖，每百斤可卖一块至一块两毛钱。我至死都不会忘记五十年代中期的这两项货物——椽子和木柴的市场价格。无须解释原因，它关涉我能否在高小和初中的课堂上继续坐下去。父亲在斫了树干刨了树根的渠沿上，当即就会移栽或插下新的杨树秧或树枝，期待三年后斫下一根椽子卖钱。父亲卖椽卖柴供两个儿子念书的举动无意间传开，竟成为影响范围很宽的事。直到现在，我偶尔遇到一些同里乡党，见面还要感叹几句我父亲当年的这种劳动，甚至说“你伯总算没有白卖树卖柴”的话。不久，农村实行合作化以后，土地归集体，父亲也无树根可刨了。我就是在那一年休了学，初中刚念了一个学期。不过，我那时并不以为休学有多么严重，不过晚一年毕业而已，比起班上有些结婚和得了儿女的同学，我是年龄最小的一个。这是解放后才获得念书机会的乡村学生的真实情况，结婚和生孩子做父母的初一学生每个班都有几个，不足为奇。

我在每个夏天的周日从学校回到家中，便要给父亲的那棵椿树秧子浇一桶水。这树秧长得很好，新发出的嫩枝竟然比原来的杆子还粗，肯定是水肥充足的缘由。某一个周六下午我回家走到门口，一眼望见椿树苗新冒出的嫩枝折断了头，不禁一惊，有一种心疼的惋惜，猜想是被谁撞折了，或被哪个孩子掐折了。晚上父亲收工回来吃晚饭时，说是一个七八岁的骚娃（调皮捣蛋的娃）用弹弓打断的。父亲说，娃嘛！就是个骚娃喀，用弹弓要哩瞄准哩，也不好说他啥。后来就在断折处，从东西两边发出两枝新芽来，渐渐长起来。我曾建议父亲，小树不该过早分杈，应该去掉一枝，留下一枝才能长高长直。父

亲说，先不急，都让长着，万一哪个骚娃再折掉一枝，还有一枝。父亲给骚娃们留下了再破坏的余地，我就不仅仅是听从了，还有某点感动。再说这椿树秧子刚冒出来便遭拦头折断的打击，似乎憋了气，硬是非要长出一番模样来，从侧旁发出的两根新芽更见茁壮，眼见着拔高，竞相比赛一般生机勃勃。父亲怕那细杆负载不起茂盛的叶子，一旦刮风就可能折断，便给树干捆绑一根立杆，帮扶着它撑立不倒不折。这椿树便站立住了。无意间几年过去，我高考名落孙山回乡当了民办教师，为生活为前程多所波折，似乎也不太在意它了，这椿树已长得小碗粗了。小碗粗的椿树已经在天空展开枝杈和伞状的树冠，却仍然是两根分枝，父亲竟没有除掉任何一根，他说越长越不忍心砍那多余的一根分枝了，就任其自由生长。这椿树得了父亲的宽容和心软，双枝分杈的形态就保持下来，直到现在都合抱不拢的大树，依然是对称平衡的双枝撑立在天空，成为一道风景，甚至成为一种标志。有找我的人向村人问路，最明了的回答就是：门口场塄有一棵双杈椿树。

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始，生活已发生巨大转机，吃饱穿暖已不再成为一个问题的好光景到来时，我已筹备拆掉老朽不堪的旧房换盖新房了，不料父亲发生了绝症。他似乎在交代后事，对我说，场塄上那棵椿树，可以伐倒做门窗料。我知道椿树性硬却也质脆，不宜做檩当梁，做门窗或桌椅却是上好木材。父亲感慨说，我栽了一辈子树，一根椽子都没给自家房子用过，都卖给旁人盖房子了，把这椿树伐下来，给咱的新房用上一回。我听了竟说不出话，喉头发哽。缓解一阵后，我对父亲说，门窗料我会想办法购买（那时木材属统购物资），让椿树长着。我说不出口的一句话是，父亲留给我的活物，就只剩下这一棵椿树了。不久，父亲去世了，椿树依然蓬勃在门外的场塄上。八十年代初，我随之获得专业写作的机会，索性回到原下老家图得清

净，读书写作，还住在遇到阴雨便摆满盆盆罐罐接漏的老屋里，还继续筹备盖房。某一天，有两三个生人到村子里来寻买合适的树，一眼便瞅中了我父亲的这棵椿树，向村人打听树的主人。村人告诉说，那主家自己准备盖房都舍不得伐它，你恐怕也难买到手。买家说可以多掏一些钱，随之找到我，说椿树做家具是好材料，盖房未必好，可以多给一些钱，让我去选购松木这些上好的盖房材料，并说明他们是做家具卖的生意人。我自然谢绝了。这是绝无商议余地的事。我即使再不济，也不能把父亲留给我的最后一棵树砍了。这椿树就一直长着，直到现在。每隔一段时日抽空回到老家，到门口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这棵椿树，父亲就站在我的眼前，树下或门口；我便没有任何孤独空虚，没有任何烦恼，没有任何腌臜的事能够把人腻死……

我和我哥坐在雨篷下聊着这棵椿树的由来。他那时候在青海工作，尚不清楚我帮父亲栽树的过程。他在"大跃进"的头一年应招到青海去了，高中只学了一年就等不得毕业了，想参加工作挣钱了。其实，还是父亲在这时候供给着两个中学生，可以想见其艰难。我是依靠着每月八元的助学金在读书，成为我一生铭记国家恩情的事。"大跃进"很快转变为灾难，青海兴建的厂矿和学校纷纷下马关门，哥和许多陕西青年一样无可选择又回到老家来，生产队新添一个社员。哥听了我的介绍，却纠正我说，这椿树还不是最老的树，父亲栽的最老的树要算上场里地角边的皂荚树。那是刚刚解放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我们家诸事不顺，我身后的两三个弟妹早夭，有一个刚生下六天得一种"四六风症"死去，有一个妹妹和一个弟弟都长到三四岁了，先后都夭亡了。家养一头黄牛，也在一场畜类流行瘟疫里死了。父亲惶恐里请来一位阴阳先生，看看哪儿出了毛病。那阴阳先生果然神奇，说你家上场祖坟那块地的西北角太空了，空了就聚不住"气"，邪气就乘虚而入了。父亲吓得不知如何是好，急问如何应对如何弥补。阴阳先生

说，栽一棵皂荚树。并且解释，皂荚树的皂荚可以除污去垢，而且树身上长满一串串又粗又硬的尖刺，更可以当守护坟园的卫士。父亲满心诚服，到半坡的亲戚家挖来一株皂荚树秧子，栽到上场祖坟那块地的西北角上，成活了也长大了，每年都结着迎风撞响的皂角儿。这皂荚树其实弥补得了多少空缺是很难说的，因为后来家里也还出过几次病灾，任谁都不会再和阴阳先生去验证较真了。这儿却留下一棵皂荚树，父亲的树，至今还长着，仍然是一年一树繁密的皂角，却无人摘折了，农民已经不用皂角洗涤衣服，早已用上肥皂洗衣粉之类。哥说了父亲的这棵皂荚树，我隐约有印象，不如他清楚，我那时不太在心，也太小。现在，在祖居的宅院里，两个年过花甲的兄弟，坐在雨篷下，不说官场商场，不议谁肥谁瘦，也不涉水涨潮落，却于无意中很自然地说起父亲的两棵树。父亲去世已经整整二十五年，他经手盖的厦屋和他承继的祖宗的老房都因朽木蚀瓦而难以为继，被我拆掉换盖成水泥楼板结构的新房了，只留下他亲手栽的两棵树还生机勃勃，一棵满枝尖锐硬刺儿的皂荚树，守护着祖宗的坟墓陵园；一棵期望成材做门窗的椿树，成为一种心灵感应的象征，撑立在家院门口，也撑立在儿子们心里。

每到农历六月，麦收之后的暑天酷热，这椿树便放出一种令人停留贪吸的清香花味，满枝上都锈集着一团团比米粒稍大的白花儿，招得半天蜜蜂，从清早直到天黑都嗡嗡嘤嘤的一片蜂鸣，把一片祥和轻柔的吟唱撒向村庄，也把清香的花味弥漫到整个村庄的街道和屋院。每年都在有机缘回老家时闻到椿树花开的清香，陶醉一番，回味一回，温习一回父亲。今年却因这事那事把花期错过了，便想，明年一定要赶在椿树花开的时日回到原下，弥补今年的亏空和缺欠。那是父亲留给这个世界也留给我的椿树，以及花的清香。

2006年8月31日 二府庄

地铁口脚步爆响的声浪

——俄罗斯散记之一

我们下榻的宇宙宾馆，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苏联为举办夏季奥运会专门修建的一座高层建筑。二十多年的时间虽然称不得古也说不上老，却仍然让我有一缕世事兴亡历史沧桑的思绪，苏联已经没有了。记得当年要在莫斯科举办这届奥运会，牵头世界一极的美国带头抵制，欧美不少国家跟着起哄，搞得那届奥运会有点索然。中国不是响应美国，而是累积五十年代末以来的意识形态分歧，也不参加“苏修”举办的奥运会。奥运会历史上，恐怕就数这一届闹得最别扭了。时光仅仅过去二十多年，作为当时世界另一极的苏联，早在十多年前解体了，只剩下美国一极横在当今世界上。这座有着特殊历史意味的建筑物依旧竖立在这里，每天都进进出出来了去了世界各国的游客，傍晚竟将宾馆的大厅拥塞得水泄不通，多样肤色的男女老少，到今天的俄罗斯观光旅游，人窝里夹杂着一眼就可以辨识出来的不少中国人，当年的敌意和分歧似乎连一缕游丝的痕迹也看不到了。

宇宙宾馆在莫斯科老城的外围，距离市中心的红场还有一段不近的路程。我们今天的行程是去红场，大家乐意乘坐地铁，也是想见识一下这个号称世界最深的地铁的规模。莫斯科的地铁启动于斯大林时代的一九三五年，大约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开始运行，由时任莫斯科市委书记的赫鲁晓夫主持实施。据说当时有两个建设方案，其一是由一位铁路专家并兼着权威意义的人设计的，明开直挖，比较浅，自然省钱也便于施工；另一个是由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设计的方案，深达八十米，施工难度工程进度和花钱都非同一般了，其理论基础是

万一发生战事，可当作防空洞供市民避难。两个方案难以选定，最后直送到斯大林手上，当即拍定了年轻人的方案，世界上随后就有了一条深入地下八十米的铁路。不幸而被那位年轻人言中的事发生了，地铁刚运行不久，德国法西斯便攻打莫斯科，斯大林的指挥部就潜藏在深入地下八十米的地铁里。这是迄今为止世界上最深的一条地铁，建成近七十年了，一直运行到现在，还是属于莫斯科载客量最大也最便捷的公共交通设施。

我和朋友步行往地铁站走去。街道上川流不息着汽车，没有自行车，行人也不多。清晨碧透的天空，洒下明丽的阳光，城市显得明媚清爽。待转过一个街角，人骤然密集了，气氛也显得异样地紧张了。对面急匆匆走过来一眼望不尽的男人和女人，我的左侧和右首不断冲向前去一拨又一拨男人和女人，高跟鞋敲击地砖的脆响不绝于耳。愈往前走愈接近地铁站口，人愈密集，如同过江之鲫，鱼贯而过却不远去，从三面往地铁站正聚。或素雅或艳丽的夏日女装稍纵即逝，或周整的西装或随意的便服与女性的色彩互相折叠互相掩盖。无论男人女人老人少年，无论高个长腿无论矮子肥腰，几乎百分之百一致向前，快脚阔步，摆甩手臂，一往无前的快节奏；几乎百分之百的人都挺直着身子，目不斜视，端直平眺，看不到一个东张西望左顾右盼的眼睛，只有专注于目标的单纯和执着。娇俏如五月芦苇的女孩，跨步轻盈如同芭蕾点地，粗壮到两人合抱也难得围拢其肥腰的妇女，富于快节奏的步履更显示着一种自信。地铁站门口，已经是一片人流，人与人的空间很小很小，却没有拥挤和混乱，更没有碰撞或搅缠。令人惊异的是，这样密集的人流往前涌动，而所有人的脚步并未放慢，人流往前流动的节奏也不见趋缓；整个进站口里外是一片高跟鞋钉敲击地板的震耳的声响，唯独听不到一句说话的声音，更不要说吵闹、呼喊或喧哗了。我被眼前的景象和耳际的响声震惊了。我相信这是我所见

过的最密集的人群所达到的最有秩序的运动行为。我多少也走过几个国家，这是我见过的节奏最快的人群的脚步。及至到地铁自动扶梯入口，踏上台板，便看到站得满满当当的乘客向深不见底的地下运动，依然是安静无声。令我尤为感动的是，本来并不宽畅的电动扶梯，川流不息着如此稠密又如此急迫的人群，却在下行的这一通道的右边，自觉留出一条空道，乘客全都靠着左边站着。那些事情急迫或心情也急的人，不满足于电梯运行的速度，从上往下如山羊蹦崖一样跨越着往下去了，有女孩也有胖妇，有脚步轻捷的小伙，也有脱光头发肢体已显着老态的老汉，不时从电梯台阶上往下蹿。据说因为这地铁太深，电梯运行的速度也是同类中最快的，单程不过两分多钟。那些踏级而下的急性子，兼着自动运行和自身运动的双重速度，估计一分钟就抵达洞底了，就可能提早赶上一列火车。这儿有这么多人在争分夺秒，赶着自己人生的行程。

我踏上一列到站的地铁，在不算十分拥挤的车厢里扶栏站定的时候，静悄悄的车厢里让人感觉到加剧了的心跳。我和同行的朋友没有急迫的事，也就没有必要用莫斯科人的脚步节奏赶路，更没有从电动扶梯小跑下去的举动，这心跳何以如此加骤？我才意识到地铁入口里外震天响着的鞋跟撞地的声浪。是这声浪拍打人的耳膜拍打人的神经，被触发被感染而于不觉间变得激越了。我站在车厢里，隆隆响着的车轮的回声灌进耳朵，却不紊乱，这是机械的律动。在这一时刻，我把一些有关俄罗斯人的传闻推翻了。人说俄罗斯人很懒。懒人怎么会有这样迫不及待的行进节奏和如同征程上的脚底的脆响！这是八月下旬最平常的一天的早晨，数以千万计的莫斯科男女以王军霞竞走的姿态和专一的神情赶赴地铁入口，可以推想莫斯科每一个地铁入口处，每天早晨都踏响起这样令人心跳加剧的声浪，世界上哪有这样的懒汉？我也听说莫斯科到处都是喝得醉醺醺的酒鬼，喝伏特加已成为

一种灾难性的普遍习性。到俄罗斯一周，我确凿于一瞥间看到过一个在路边长椅上躺着扭着的胖男人，猜想大约是一个醉汉。我没有机会到大街小巷酒馆公园去踏访醉鬼的行径，不敢贸然否定这个传闻。然而看到地铁站前令人惊心动魄的景象，我想还操有多少醉鬼这份闲心又有什么意思。我们从莫斯科到彼得堡再回到莫斯科，共同惊讶这两个城市年轻女性的低胸开领和低腰乃至无腰裤的着装。尤其是在彼得堡，几乎看不见能掩住肚脐的年轻女性，这儿年轻女性的低腰已经不再成为时髦，而是普及到一律化了。我一瞬间想到鲁迅先生几十年前挖苦中国人论人说事要"离开脐下三寸"的话，然而在彼得堡你是离不开也躲不及那大面积裸露的小腹的。人家有勇气展示腹脐之美，我们倒无胆量去欣赏了。莫斯科的年轻女性露脐之风虽不如彼得堡普及到一律化，却也比比皆是，躲犹不及。我倒是想，那些胸领开得很低裤腰也落得很低的女性，清晨的阳光里奔向地铁的脚步一样冲冲而又匆匆，挺挑的身材一样端直而不失婀娜，高跟鞋踩出的叮叮咣咣的声响，洋溢着青春旋律和生命活力，还有一种奔赴明天的自信。我在地铁自动扶梯上，同时看到这样最时髦装束的女孩不能等待电梯运转的速度，颠着蹦着从台阶上加速度奔下去。无须猜测，她们是赶到自己的工作岗位上去，自然可以想到是莫斯科各个位置各个角落的某个工作位置。她们进入自己的位置，整个莫斯科就活起来了，就继续着生活继续着生产继续着创造，这个城市就充满了活力。

我们到站之后，再乘上行的电动扶梯，依然是几乎乘无虚阶的满负荷运转，又在电梯的右侧，自觉留下一条专供事由更紧迫性子也急的人往上跑的通道。往上跑比往下蹦要费劲吃力多了。然而，仍有人不安于电梯运行的速度，往上踏级急走，在争分夺秒。以这样的节奏以这样专注的神情进入生活岗位的人，可以猜想他们工作起来的姿

态。我便感到这个民族内在的劳动激情和内在的创造力了，可以推想他们的明天和未来了。

2006年9月9日 雍村

林中那块阳光明媚的草地

——俄罗斯散记之二

早晨醒来便听见哗哗哗的雨声。拉开窗帘就看到满天低沉的黑云，从黑云里倾泻而下的雨条闪着些微的亮光。到俄罗斯整整一周了，走到哪里都是蓝天白云下碧透的天空和鲜亮的阳光，今天遇到下雨了。有阳光又有雨，当是感受俄罗斯大地自然天象变幻的一个小小的又是难得的完满。

冒雨去图拉，拜谒托尔斯泰。车行四小时，大雨一路都在不歇气地下着。我总是忍不住拉开车窗，开阔的原野覆盖着望不透的森林，无边无沿的草场，都笼罩在迷迷蒙蒙的雨雾里。飞进车窗的雨滴打湿了我的头脸，这是托翁故乡的雨。临近图拉城的标志，是路边终于出现了人。一顶顶简便装置的帆布或塑料帐篷，零散地撑持在公路边上，摆列着一排货架，守候着一个一个女人，都在卖着以图拉命名的饼子。据说这种饼是闻名俄罗斯的土特产品，以黑麦制成，别有一番独特绵长的香味且不论，绝不加任何防腐剂却可以存贮半年以上，久享盛名。看着在雨篷下守候过路客捎带图拉饼的女人，我顿然联想到家乡关中类同的情景，每到五月初，通往我的白鹿原的原上和原下的两条公路边，便摆满一筐筐一笼笼刚刚摘下来的樱桃；通往临潼秦兵马俑的路旁，九月的石榴和九月末的火晶柿子招惹着世界各方的男女；还有去女皇武则天陵墓的路边，垒堆如小塔的锅盔，既可以整摞整个售购，也可以切成西瓜牙儿一般大小零卖，还有人索性就把大铁锅支在路边现烙现卖。乾县的锅盔虽不及图拉饼的盛名，却在遍地锅盔的关中独俏一枝，皮脆里绵，满口麦子纯正的香味，武则天在锅盔

的香味里滋润了一千多年，该当改为女皇牌锅盔了。看着那些伫立在路边的图拉女人，我想大约和关中路边守候的农夫农妇一样，卖下钱不外乎盖新房，供孩子读书，以及为儿女娶媳妇办嫁妆。托翁故乡的农民和关中乡民谋求生活的方式和思路如出一辙。

车过图拉城时，雨缓解松懈下来。汽车穿过图拉城，从街面建筑和街道的景致看，都显示着一种久远的陈旧，与中国任何一个中小城市一夜之间的全新面目都显示着距离性差别。雨时下时停，出图拉城就看到远方天际一抹蓝天和阳光。拐过两个交叉弯道，就看到一排很长的林木遮蔽下的围墙和一个阔大的门，这就是托翁自己命名的“林中那块阳光明媚的草地”——庄园故居了。

站在宽大的门口，一眼看见两排整齐高大的白桦树的甬道，通向林木笼罩的深处。我跨进大门并走上白桦树下的甬道，踏着用三合土铺垫的大平小不平的路面，庆幸自己终于有缘走在遍布着托翁脚印的土地上了。托翁一生都走在这庄园里的大路小径、果园耕地和林荫草地上，我踏在已经消失沉寂了托翁脚步响声的印痕里，依然感知着一个伟大灵魂神圣的灵性。白桦树依然枝叶茂盛，白色鲜亮的树皮浮泛着诗意。头顶的枝叶不断洒下水滴。甬道土路的小坑浅洼里积着雨水。左边有一排涂成灰蓝色的木板房，是马厩，庄园里曾经耕田拉车以及溜达的好多匹马，就养在这里，现在依着原样原封不变地保存着，自然都已经圈干槽净了，我似乎还可以闻到马粪马尿和畜生混合的气味。甬道右边还有一排蓝灰色的木板房，是贮藏草料和马具的库房，可以看到门里散落的干草，还有犁具、围脖和套绳，似乎刚刚罢耕归来卸下，散发着马脖子的臊味儿。还保存着农耕生活记忆的我，顿然浮现出这里添草拌料和骡马踢踏喷鼻的生机勃勃的图景。现在是一片人畜不在的冷寂。

甬道尽头往右拐进去，是一座涂成黄色的两层小楼，这是托尔斯泰的居室和写作间。下层一个大约不超过十平方米的小屋子里，托翁写成了《战争与和平》。我站在这间屋子的一瞬间，弥漫在心头的神秘顿然散失净尽了。一张不大的木板桌子，不仅谈不到精致或讲究，大约当初只刷过一层清漆，可以清楚地看到被磨损的或粗或细或直或歪的木纹；可以猜想长胳膊长腿的托翁伏案写作时，肯定会摊占大半个桌面。房间里还有一只小茶几和一张单人床，这床也应是我见过的最窄的一张床了，当是写得腰酸臂困时伸懒腰的设施。房间不仅没有装饰装潢，更没有如中国文人惯常装备的字画铭题之类，连一个像样的书架都不置备。到二楼的一间几乎同样小的房间里，也是漆成淡黄色的一张木桌，椅子的四条腿截断了一节，低到如同我家里的马扎。据说是托翁视力不好，椅子低点就可以缩短眼睛和稿纸的距离，避免了低头躬腰。在这间小小的简便到简陋的书房里，托尔斯泰写成了《安娜·卡列尼娜》。我还想看看写作《复活》的房间，讲解员说这部写作长达十年的小说，托尔斯泰先后换过三个写作间，没有解释换房的原因。我走出这座二层小楼时，脑子里就凸显着两张淡黄色的木桌。我更加确信作家从事的写作这种劳动，最基本的条件不过就是一张桌子和一把椅子，可以铺开稿纸可以坐下写字，把澎湃在胸膛的激情和缠绕在脑际的体验倾泻到稿纸上就足够了，与房子的大小、屋内的装备和墙面上贴挂的饰物毫无关系。说句不算抬杠的话，如果脑子里是空乏的，胸腔里是稀薄的，即使有镶着宝石的黄金或白银的桌椅也无济于事。无论如何，我至今还想着那把太低太矮的椅子，坐上去就得把腿伸到很远，坐久了会很不自在的，何不加高桌子的四条腿，同样可以达到既不弯腰低头而缩短眼睛和稿纸的间距的目的，况且能够让双腿自由自如地屈伸……

在这座托尔斯泰写作和生活的黄色小楼前，有一块不大的空地，该当算作院子吧。在这方小院的三面，都是稠密到几乎不透阳光的树林，林间长满杂草，俨然一种森林的气息。楼前的这方小院，除了供人走的台阶下的土路，也都栽种着花草，却不是精细琢磨的管理，完全是自由生长的泼势。花草园子里有一棵合抱粗的树，不见一片绿叶，粗壮的枝股和细细的枝条，赤裸在空中，在四周一片浓密的绿叶的背景下，这棵树就令人感到一种死亡的凄凉。我初看到这棵枯死的树时，就贸然想到保存它与周围的景致太不协调，随之了解到这棵树非凡的存在，竟然有一种内心深处的震撼。枯枝上挂着一颗金黄色的铜钟，我初看时就想到小学校里上课下课敲出指令的铜钟。托尔斯泰属于贵族，却操心着贫苦农民的疾苦和委屈，以真诚之心帮助那些寻找救助的人，久而久之，那些四野八乡遭遇困境的乡民便寻到这个庄园来。托尔斯泰在楼前院子的这棵树上挂了这只铜钟，供寻访的穷人拉响，托尔斯泰就会放下钢笔推开稿纸，把敲钟的穷人请进楼里，听其诉叙困难和冤屈，然后给予帮扶救助。据说有时竟会在这棵树下发生排队，等候敲钟。然而没有哪怕是粗略的统计，曾经有多少穷人贫民踏进这座庄园走到这棵树下，憋着一肚子酸楚和一缕温暖的希望攥住那根绳子，敲响了这只铜钟，然后走进了小楼会客厅，然后对着胡须垂到胸膛的这位作家倾诉，然后得到托尔斯泰的救助脱离困境。

这棵曾经给穷人和贫民以生存希望的树已经死了，干枯的枝条呈着黑色，枝干上的树皮有一二处剥落，那只金黄色的铜钟静静地悬空吊着，虽依原样系着一条皮绳，却再也不会有谁扯拉了。救助穷人的托尔斯泰去世已近百年，这棵树大约也徒感寂寞，已经失去了承载穷人希望的自信和骄傲，随托翁去了。

托翁晚年竟然执意要亲手打造一双皮靴，而且果真打造出来了，而且很精美很结实也很实用。我自然惊讶这位伟大作家除了把钢笔的效能发挥到无可替及的天分之外，还有无师自通操作刀剪锥针制作皮靴的一双巧手；我自然也会想到这位既是贵族庄园主又是赫赫盛名的作家，绝不会吝啬一双靴子的小钱而停下笔来拎起牛皮；恰恰是他几乎彻底腻歪了已往的贵族生活，以亲自操刀捏锥表示向平民阶层的转向和倾斜。一种行动，一种决绝，一种背离。我在听着那位端庄的俄罗斯姑娘说这个逸事时，瞬间想到曾经在什么传媒上看到谁说谁已有了贵族的气象和派势，显然是一种时尚推崇。我似乎感到某些滑稽，昨天还用旧报纸（城里人）和土坷垯（乡下人）擦屁股，一夜睡醒来睁开眼睛宣布成了贵族了……托尔斯泰把他精心制作的这双皮靴送给一位评论家朋友。这位评论家惊讶不已，反复欣赏之后，郑重地把这双皮靴摆到书架上，紧挨着托尔斯泰之前送给他的十二卷文集排列着，然后说：这是你的第十三卷作品。这话显然不单是幽默，是以俄罗斯人素有的幽默语言方式，表述出对一位伟大作家最到位最深刻的理解。

我真感觉到幸运，在林中的这块草地上领受到了明媚的阳光。雨在我专注于黄色小楼里的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张照片一页手稿的时候，完全结束了。头顶是一片蓝色的天空和自在悬浮着的又白又亮的云。林子顶梢墨绿的叶子也清亮柔媚起来。阳光从枝叶的空隙投到林子里的硬质土路上，洒在小小的聚蓄着雨水的坑洼里，更显一种明媚。走到一大片苹果园边，天空开阔了，阳光倾泻到苹果树上，给已经现出颓势老色的叶子也平添了柔和和明媚。树枝上挂着苹果，有的树结得繁，有的树稀稀拉拉挂着果子。苹果长足了时月停止再长，正在朝成熟过渡，青色里已淡化出一抹白色。从果树的姿势看，似乎疏于管理；从果型判断，当是百余年前的老品种了，在中国西北最偏远

的苹果种植区，早在十几二十年前都淘汰了。这些苹果树和大面积的园子，自然完全不存在商业生产的意义，而是作为托翁的遗存保留给现在的人，现在依然崇拜和敬仰这位伟大灵魂的五洲四海的人。我看不到托翁了，却可以抚摸托翁栽植的苹果树，在他除草剪枝施肥和攀枝折果的果林间走一走，获得某种感应和感受，不仅是慰藉，而且是一种心理的强力支撑。

沿着一条横向的硬质土路走过去。湿漉漉的路面上有星星点点的阳光。路两边是高耸的树，从浓密的树叶的空隙可以看到碎布块似的蓝天和白云，平视过去则尽是层层叠叠的湿溜溜的树干。我尽可以想象雨后初霁的傍晚，阳光乍泄的林间树丛中，托翁拨开草叶采摘蘑菇的清爽。树林间有倒地的枯木，杆皮上生出绿苔和白茸茸的苔衣，都依其自由倒地的姿态保存着，更添了一种原始和原生形态的气息。这里已没有了剪枝疏果吆马耕田采蘑制靴的托尔斯泰的身影，没有了闻铃迎接穷人听其诉苦的托尔斯泰，也没有了在木纹桌前摊开稿纸把独自的体验展示给世界的托尔斯泰了。然而，一个伟大的灵魂却无所不在。恰在我到这儿来之前几天，《参考消息》转载一篇文章，说欧美一些作家又重新阅读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了。我便想，小说的形式和流派如狗追兔子般没命地朝前抢着，跑到“后后后”的地段上，终于有人歇下来缓口气，又往来路上回眺了。看来似乎没有完全过时的形式，只有空虚肤浅的内容最容易被淡忘被淹没。

横着的路出现了三岔口，标示左边通托翁的墓地。路上的光线似乎暗下来，许是树木更密了，也许是太阳光照角度的差异，路面和小水坑里已经看不到亮闪闪的光斑了。在树林的深处，看到了托翁的墓地，完全是意料不及想象不出的一块墓地。在一块临近浅沟的边沿，有一片顶大不过十平方米人工培植的草坪，中间堆着一道土梁，长不

过一米，高不过半米，是一种黑褐色的泥土堆培而成。上面没有遮掩，四周没有栅栏防护，小土梁就那样无遮无掩地堆立在小小的草坪上。我站在草坪前，竟有点不知所措。这样简单的墓地，这样低矮的土梁标志，比我家乡任何一个农民的墓堆都要小得多。没有任何碑石雕像，就是一坨草坪一撮褐黑的泥土，标志着一个伟大灵魂的安息之地。那个小土梁上，有一束鲜花。我在转身离去的一瞬，似乎意识到，托尔斯泰是无须庞大的墓地建筑来彰显自己的，也无须勒石刻字谋求不朽的，那小小的草坪和那一道低矮的土梁，仅仅只标示着一个业已不朽的灵魂安息在这里。

离开墓地和通往墓地的林间幽径，有一片开阔的草地，灿烂着红的白的紫的金黄色的野花。季节还算是夏天，雨后的太阳热烈灿烂，仍不失某种羞羞的明媚。我沉浸在野草野花和阳光里，心头萦绕着托翁为自己的庄园所作的命名，“林中那块阳光明媚的草地”，真是恰切不过的诗意之地，又确凿是现实主义的具象。

2006年10月4日 雍村

回家折枣

在巷子的水果摊上看到红枣摆上来。自然想到又到枣月了，也自然想到该回家折枣了。妻子肯定也知道了枣子开始上市，催促我说，抽空回家折枣。在关中乡村，一般不说摘字，凡用摘字的地方，大多数时候用折，譬如折豆夹、折桑叶、折棉花等，摘一切水果都说折。

“在我的后园，可以看见墙外有两株树，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这是鲁迅《秋夜》开篇的绝句。我已记不得什么年纪读的，却记得是一遍成诵，自此便把一缕无尽的意味绵延到现在，也把一种文字的魅力绵延到现在。在我的前院中院和后院，栽了七八种树，有南方和北方的两种白玉兰，粉红色的紫薇，黄色的蜡梅，紫荆花树有红白两株，石榴树，火晶柿子树，还有三株枣树，都是我十余年间先后栽植的。几种花树依着各自的习性在不同季节开花，柿树和枣树也都挂果。每当花开或果熟时月，得空回到原下老屋小院，或尝花闻香，或攀枝折果，都是一种难以表达的清爽和愉悦。今天又要回家折枣了。虽然都是面对自家院子里的枣树，我已很难体验先生在“风雨如磐”的“秋夜”里的那种忧思的情境了。

正是秋高气爽的好季节。树依旧很绿。天空是少见的澄澈和透碧。可以看到远方影影绰绰起伏着的秦岭的轮廓。左首的北岭和右首的南原沉静地摆列在两边，清晰透彻，不时现出掩蔽在村树里的一角红瓦屋脊或一方净白的檐墙。路两边的樱桃园里显示着收获过的败落和冷寂。这条在我生活历程中走得最多也最熟悉的回家的土路，却从来都不曾发生熟悉里的厌倦，视力触摸到任何一个角落，都会在昨天的记忆里泛出新鲜的差异性意味来，夏收后泛着白光的麦茬地，采摘

樱桃时不慎攀折断了的枝条，从路边野草丛中突然蹿飞的野鸡，都会把我在城市楼房里的所有思绪排解到一丝不剩，还有乡野的风对城市的污染空气的排除与置换。

进得我原下的村子，再踏进村子里我祖居的院子，先来到柿树下，缀满枝头的柿子，深绿渐变为浅绿，尚不到成熟的时月，似乎比往年结得稀。穿过前屋到了中院，扑面而来就是满树的枣子了。今年的枣子结得顶繁了，细软的枝条不堪重负，一条一条垂吊下来，像母亲过去挂在明柱上的蒜辫儿。且不说品尝吧，单是看见这缀满枝条的枣子，就令当初栽树的我有一种实现期待收获果实的无以名状的舒悦和幸福了。枣子已从绿色蜕变出鲜亮的乳白，果皮上有一坨一丝紫红色，尚未熟透到通体变成红色，完全可以折来品尝了。这种枣子比红透的枣子更脆更甜更有水津味儿。东墙根下一株，西墙根下两株，都把蒜瓣似的枣子展现在我的眼前，一派来自土地结晶而成的鲜活，一派无遮无喧亦无言的丰盛，真是让种植它的我感受体验到无与伦比的欢欣了。亲友已搬来梯子。我听到一声吃枣子的咔嚓的脆响，还有对枣子美味的欢叫声。

七八年前，我在早春的时候回家，路过一个业已城市化了的乡村，正逢着传统的庙会，顺便到会场去溜达，到处都摆着乡村人生产和生活的用品，庙会已无庙无神可敬，纯粹变成商品交易市场了。到处都摆着树苗，北方乡村适宜种植的柴树果树和花树秧子，成捆成捆堆放在路边，我总是忍不住在那些有树秧的摊儿前驻足停步：总是在抚摸那些树秧嫩秆的时候忍不住心动，绝不弱于面对稿纸拔开笔帽时的冲动和激情。也许是自小跟着喜欢栽树的父亲受到的影响，也许是应了一个乡村“半迷儿”卦人给我算就的木命，我确凿爱栽树。和我一起溜达的妻子更喜欢那些民间编织的生活用品，装馍用的竹篮和装筷

子的箸笼儿，还有装提水果的竹编长条笼。她不时拽我并提醒我，不要再买任何树苗了，屋前院内再找不到栽树的空地了。其实我心里也明白，能容得我栽树的地皮，只有老家庄前屋后和小院里那几分庄基地了，早被我栽得满满当当的了。不经意间，碰见一位老相识，他也曾弄过文学，却仍然在乡间种地，还在业余写着剧本。我看见他就有说不出口的话，城里有十余家专业剧团，或排场或别致的舞台整年都凉着，一年也敲响不了几回梆子锣钹，他把剧本写给鬼演呀！他的架子车厢里放着一捆打开的枣树秧子，是他培育的一种新品种，比普通枣子个儿大，味更脆更甜，名曰梨枣，却与梨不相干。他卖得很好，满满一车只剩下半捆了。他一边给我说他正在写作的剧本，一边往我手里塞枣树秧子。他知道我乡下有屋院。再三谢辞不掉，我便拿了三株梨枣回家，下决心把中院一株老品种的樱桃和一株太泼也太占地盘的花树挖掉，给这三株枣树腾出空位。令人惊诧的是，这枣树一年就长到齐墙头高了。直到这枣树秧委实出脱成茁壮的枣树，而且挂了果，赠我枣树的朋友打电话说，他的剧本早已写完，请几位高手名家看过，都在说写得不错的同时，也都说着遗憾。不是剧本能不能排，而是专业剧团根本就不排戏演戏。他问我能不能帮忙想点办法。我不仅没有办法可支，连安慰他的话都说不出口。

在新世纪到来时，我终于下决心回到乡下久别的老宅新屋住下了。枣树是我的院子里最晚发芽的树。当那嫩芽在日出日落的日子里蓬勃出鲜绿的叶子，我发现了短短的叶柄根下的花蕾，不过小米粒大小，锈成一堆。我在那个早晨的心情顿然变得出奇的好。每天早晨起来，我都忍不住到枣树下站一会儿，看那小米粒似的花蕾的动静。直到有一天早晨，我刚走到屋檐下，便闻到一缕奇异的香气儿，凭直觉就判断出枣花开了。小米粒似的花苞绽放开来的花儿自然不起眼，比小米的黄色浅些，接近于白色，香味却很浓郁，枝条上稀稀拉拉的枣

花，却使整个小院都弥漫着清香。蜜蜂先我绕着枣树飞舞了。枣花蜜是蜂蜜中的上品。

眼看着那枯萎的枣花里挣出一只枣子来，恰如刚落生的婴儿，似乎可以听到那进入天地之间的啼哭。小米粒大的枣子，似乎一夜或两夜之间就长到扁豆粒大了，豌豆粒大了，花生粒大了，最后就定格在乒乓球那般大小了，个别枣子竟然有柴鸡蛋的个头。在桌子前在椅子上坐得久了，无论读着什么或写着什么，走出屋子走到枣树下，看着隐蔽在枝杈叶丛里的青枣，那正在你眼皮下丰满和长大的果实，一种蓬勃的生命的活力便向人洋溢着。枣子青绿的颜色，在我日复一日的注视下，渐渐淡了，泛出乳白色了，又浮出一丝一坨的紫红，它成熟了。我折下最先显出红色的一颗，咬了一口，便确信是我有生以来吃到的最好一颗枣子了。这枣子皮薄肉细，又脆，满口竟有一股蜂蜜味儿。我便不忍心再吃第二颗，给家人品尝，也给那些从城里跑到乡下来找我的朋友享一回口福，让他们知道还有这样好吃的枣子。我给他们宣布政策，每人只能品尝一颗。无论年轻朋友，无论德高望重的老教授，都是咬下一口便禁不住声地赞叹起来。我便相信我的口感不沾连栽种者的偏爱因素，也毫不动摇地拒绝要吃第二颗的申求——总共只结了六七十颗，该当让更多的远道来客添一份情趣……后来几年的枣子，结得多了繁了，味道却大不如头一年。今年是前所未有的丰年，味道更差了，有点干巴。我心知肚明，肯定是干旱造成的。没有办法，我住了两年又离开原下的院子，一年回不来几回，枣子在每年伏天的旱季能保存不落，已属幸事了。

我已经不太在意枣子的多少和品味的差别了。我只寻找折枣的过程。常常庆幸得意我尚有一坨可以栽植枣树的院子，以及折枣折柿子的机会。这心理往往是瞅见城里人悬在空中阳台上盆栽的花草而生发

的。他们已无可以栽一株树或一窝花的土地，只能栽在盆里悬在楼房的阳台上。我在被晒得烫烧脚心的水泥路和被油气污染的空气里憋得透不过气时，得空逃回乡下的屋院，拔除院子疯长的草，为柴树花树和果树浇一桶水，在树荫里在屋檐下喝一瓶啤酒，与乡党说几句家长里短的话，尤其是回来折一回枣儿，心里顿然就净泊下来了。

今年回了家，折了一回枣。

明年还回家折枣。

2006年9月23日夜 雍村

关中有螃蟹

读本月十六日《今晚报》雷抒雁《口味》一文，妙趣横生，颇多兴致。抒雁是陕西关中泾阳县人，和我算是乡党，文中涉及关中乡俗风情，让我回味品咂不尽，尤其是对饮食习惯的普遍性口味的描写，既可看到这位乡党离乡大半生乡思萦怀的依依之情，更可感知他人生沧桑之后的睿智和达观，一种清朗的生命境界。

《口味》也勾起我诸多的生活记忆。得从文中引用的宋人沈括《梦溪笔谈》里开关中人玩笑的一则笑话说起。沈括说他在陕西做官时，听到秦州人收到一只干死的螃蟹，对其形状很恐惧，以为是怪物，便把它挂在门首，作为驱鬼避邪降灾之物。之所以会闹出这等笑话，让沈括做随笔记入名作《梦溪笔谈》，在于起首一句的“关中无螃蟹”的概论。这是这则笑话得以传播的基础。然而这个基础在我的经验里却是值得辨正的。

我生在灞河边上，村庄离河岸不过二里地，未进学堂先在河滩学会割草拾柴，也在河水里耍水，逮鱼捉鳖是小孩子无师自通的耍活儿，未识字前就认识螃蟹黄鳝蚂蟥等水生物了。那时候灞河的常年水量比现在大，河边杨柳列岸，野草野花里藏匿着兔子野鸡，大片大片的芦苇地里，从早到晚都响着一种土灰色的鸟儿咕咕咕的鸣叫。沿着河岸，有大片的稻田，每到溽热三伏，男人女人挽着裤管在稻田里拔草，常常会在踩住一条黄鳝或被蚂蟥叮咬时发出一声尖叫，随之顺手从脚下抽出黄鳝甩到干滩上来，有时候就甩过来一只硬壳子螃蟹，小孩子们就用树棍儿挑着玩儿。灞河出山直到汇入渭河的百十余里流程中，两岸的湿地水田里滋养着的水生物不仅有螃蟹，无鳞的大嘴鲇鱼

和长着两根硬如钢针的牙齿的刺鱼，还有鲫鱼鲤鱼，诸多叫不上名字的水生物，不知繁衍了多少万年，从未绝种，螃蟹算什么稀罕。

有一个生活印记在我心中至今不泯。那是我读高中时，正遇着“三年困难”物质极度贫乏时期，学生吃不饱，老师也毫不例外地忍饥挨饿。学生饿得受不住时，还可以相互之间悄悄说几句俏皮话；老师为人师表，饿着肚子就硬扛着，还要给学生做思想政治工作。我看到的第一个因饥饿而患上浮肿病的人，是我的班主任兼数学老师程老师。他刚刚从陕西师范大学毕业，一米八以上的大个头儿，家在关中西府的一个山区县，把粮票省下接济更艰难的家室儿女，自己便先浮肿了。我看见第二个浮肿起来的老师已忘记了姓名，那浮肿的脸上的灰黄色至今仍历历在目。他没有给我带课，他的办公兼宿舍的一间屋子和我教室的门斜对着，下课出门就能看见他和妻子孩子。那男孩子六七岁，常常蹲在窗台下的小火炉边，专心致志地焙烤着一只只小螃蟹。我就读的中学就在古人折柳送别的古灞桥桥头的河堤下，学校一面临着灞河，三面都是稻田和茭白地，自流水渠在宿舍后窗下和操场之间日夜流淌。这男孩的父母都是南方人，自小就承袭着南方人喜食水鲜的习性，自个到学校周围的稻田水渠里捉鱼抓蟹，自己洗涮开膛，在父母做饭的小火炉上烘烤焙熟，坐在小凳上吃那些变得黄灿灿的小鱼小蟹。我曾好奇地走到小男孩跟前，看他神情专注地剥着蟹壳蟹爪，津津有味地嚼着，颇为惊讶和好奇。这是我平生里见到的第一个吃螃蟹的人，一个在全民大饥饿年月里自我救助的南方男孩。他的父亲我的老师浮肿了，他却未见浮肿征象，许是得了小鱼小螃蟹的营养滋润。

其实，何止灞河流域有鱼蟹。自古有八水绕长安的美妙景致，灞河只是绕着长安的八条河流之一支，其余七条河流流经的关中平原，

两岸的景致大同小异，笔直的白杨和婆娑的柳林，夏天的小麦和秋日的苞谷，更兼着沿河两岸的水稻，是延续了三千多年的丰美的农耕图画。紧临长安的户县曾经长期生产一种进贡朝廷的上好大米，无尽的荷塘莲藕也是名传四方，鱼类螃蟹自在其中。柳青在《创业史》里描写的如诗一般的终南山下的水乡画面，可惜忘记了给螃蟹一笔文字。渭河自甘肃天水过来进入陕西宝鸡，一路浩荡横穿关中，出潼关汇入黄河进入山西，这关中平原也别称渭河平原，又称八百里秦川，有大小十三个封建王朝在这儿立都，姑且不说。渭河自西向东贯通关中，沿河两岸多种稻米莲藕，杂鱼草虾黄鳝和鳖，还有螃蟹，都得水而生生不息。再推到五六千年前的仰韶文化时期的半坡遗址，也是在绕着长安的浐河的东岸，那儿出土的早期先民绘制的人面鱼纹陶画，成为人类始祖最早的艺术品的标志性杰作，浐河岸边断然也缺失不了螃蟹。

沈括的这则随笔所记述的笑话，是“闻秦州人家收一干蟹”而演绎出来的。是“闻”而不是沈括亲眼所看到。“闻”是听到，是听到的传说笑话。既是传闻传说的笑话，姑且甚至完全不必当真，只当它是笑话罢了。我又想起我生活的河边人给缺水的旱原上人编的笑话，说原上人为节省用水，每天早晨起来，夫妻面对面吐唾沫洗脸，晚辈的兄弟和姊妹皆仿效之。谁会相信它？如若沈括“闻”得，《梦溪笔谈》又多一则随笔了。然而，不能当作笑话则不究其真的是，沈括起首一句便断定“关中无螃蟹”。他还说“元丰中，予在陕西”。可见他在陕西做官时，大约很少下乡视察和访贫问苦，犯了点“官僚主义”，竟闹出“关中无螃蟹”这样的笑话。想说关中人笑话的大学问家沈括，自己倒闹出孤陋寡闻的笑话，倒是颇有教益的一则笔谈。

2006年11月23日 二府庄

一九八〇年夏天的一顿午餐

一

一顿午餐，留下两个人半生的记忆。

这两个人，一个是作家刘恒，一个是我。

十一月中旬在北京召开的中国作家协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在堪称豪华的北京饭店的过厅里，我和刘恒碰见了相遇了，几年不见，他胖了，头发却稀疏了。心想着按他的年纪，头发不该这么稀，眼见的却稀了。对视的一瞬，都伸出手来握到一起。没有热烈的问候，也没有搂肩捶胸的亲昵举动，他似乎和我一样不善此举。刚握住手，他便说起那顿午餐，在我家乡的灞桥古镇上吃的那一碗羊肉泡馍。正说间，围过来几位作家朋友，刘恒着意强调是站在街道边上吃的。我说是的，一间门面的小饭馆容纳不下汹涌而来的食客，就站在饭馆门外的街道上吃饭，站着还是蹲着我记不清了……

这是一九八〇年夏天的事。

这年的春节刚刚过罢，我所供职的西安郊区随区划变更为雁塔、未央和灞桥三个区。我的具体单位郊区文化馆也分为三个。我选择了离家较近的灞桥区文化馆，为着关照依赖生产队生活的老婆孩子比较方便，还有自留地须得我播种和收割。刚刚设立的灞桥区缺少办公房舍，把文化馆暂且安排到距离区政府机关近十里远的灞桥古镇上。这儿有一家电影院，用木材和红瓦建构的放映大棚，据说是一九五八年“大跃进”年代兴建的文化娱乐设施，地上铺的青砖已经被川流不息的

脚步踩得坑坑洼洼了，既可见久远的历程，更可见当地乡民观赏电影的盛况。放映棚后边，有一排又低又矮的土坯垒墙的平房，是电影放映人员工作和住宿兼用的房子，现在腾出一半来，给我等文化馆干部入住，同时也就挂出一块灞桥区文化馆的白底黑字的招牌。我得到一间小屋，一张办公桌、两把椅子和一块床板，都是公家配备的公物，一只做饭烧水的小火炉是自购的私家财物，烧煤是按统购物资每月的定量，到三里外的柳巷煤店去购买。我那时已官晋一级，兼着区文化局副局长，舍弃了区政府给文化局分配的稍好的办公室，选择了和文化馆干部搅和在一起。我喜欢古人折柳送别的这个千年老镇。一缕温情来自桥南头的高中母校，三年读书留下的美好记忆全都浮泛出来了；另一缕情思或者说情调，来自职业爱好，多年来舞文弄墨尽管还没弄出多大的响声，尽管生活习性生活方式和当地农民差不了多少。而文人的那些酸不酸甜不甜的情调却顽固地潜在着，诸如早春到刚刚解冻的灞河长堤上漫步，看杨柳枝条上日渐萌生的黄色嫩芽，夏日傍晚把脚伸进水里看长河落日的灿烂归于模糊，深秋时节灞河滩里眼看着变得枯黄的杂草野花，每逢集日拥挤着推车挑担拉牛牵羊的男女乡民，大自然在这个古镇千百年来周而复始地演绎着绿了枯了暖了又冷了的景致。刚跨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古镇周边的乡民在这里聚集，呈现出从极左律令下刚刚获得喘息的农民脸上的轻松和脚下的急迫，我常常在牛马市场木材市场和小吃摊前沉迷……我觉得傍着灞河依着一堤柳绿的古镇灞桥，更切合我的生活习性和生存心理。

刘恒突然来了。是我在这个古镇落脚扎铺大约半年。一九八〇年正值酷暑三伏最难熬的季节，一个高过我半头的小伙子走进电影院后院的平房，找我，自我介绍是《北京文学》的编辑。我在让座和递茶的时候，心里已不单是感动，更有沉沉的负疚了。古镇灞桥通西安的13路公交汽车，那时候是一小时一趟，我每逢到西安赶会或办事，在

车上前胸后背都被挤拥得长吸粗吁；汽车在坑坑洼洼的沙石路上左避右躲，常常抵不上小伙子骑自行车的速度。这是唯一的公共交通设施，别无选择，出租车的名称还没有进入中国人的生活。刘恒肯定是冒着燥热乘坐西安到城郊的这班公共汽车来的，而且是从北京来的。我的那间宿办合用的屋子，配备两把椅子，超过两个来客我便坐在床沿上，把椅子让给客人，沙发在那时也是一个奢侈的名词。刘恒便坐在另一把椅子上，喝我递给他的粗茶。他说他来约稿。他似乎说他刚进《北京文学》做编辑不久。他说是老傅让他来找我的。说到老傅，我顿然觉得和近在咫尺的这位小伙子拉得更近了，距离和陌生顿然大部分化释了。

二

老傅是傅用霖，年龄和我不相上下，还不上四十，大家都习惯称老傅而很少直呼其名，多是一种敬重和信赖，他的谦和诚恳对熟人和生人都发生着这样潜在的心理影响。我和他相识在一九七六年那个在中国历史不会淡漠的春天。已经复刊出版的《人民文学》杂志约了八名业余作者给刊物写稿，我和老傅就有缘相识了。他不住编辑部安排的旅馆，我和他也就只见过两回面，分手后也没有书信来往。一九七八年秋天我从公社（乡镇）调到西安郊区文化馆，专注于阅读，既在提升扩展艺术视野，更在反省和涮涤极左的思想和极左的艺术概念，有整整三个月的时间，完全是自我把握的行为。到一九七九年春天，我感到一种表述的欲望强烈起来，便开始写小说，自然是短篇。正在这时候，我收到老傅的约稿信。这是一封在我的创作历程中不会泯灭的约稿信，在于它是第一封。

此前在西安的一次文学聚会上，《陕西日报》长我一辈的老编辑吕震岳当面约稿，我给了他一篇《信任》。这篇六千字的小说随之被《人民文学》转载（那时没有选刊，该杂志辟有转载专栏），到一九八〇年年初被评上第二届全国短篇小说奖。老吕是口头约稿。我正儿八经接到本省和外埠的第一封约稿信件，是老傅写给我的，是在中国文学刚刚复兴的新时期的背景下，也是在我刚刚拧开钢笔铺开稿纸的时候。我得到鼓舞，也获得自信，不是我投稿待审，而是有人向我约稿了，而且是《北京文学》杂志的编辑。对于从中学就喜欢写作喜欢投稿的我来说，这封约稿信是一个标志性的转折。我便给老傅寄去了短篇小说《徐家园三老汉》，很快便刊登了。这是新时期开始我写作并发表的第三个短篇小说。直到刘恒受他之嘱到灞桥来的时候，我和他再没见过面，却是一种老朋友的感觉了，通信甚至深过交手。

三

我和刘恒说了什么话，刘恒对我说了什么话，确已无从记忆。印象里是他话不多，也不似我后来接触过的北京人的口才天性。到中午饭时，我就领他去吃牛羊肉泡馍。这肯定是作为主人的我提议并得到他响应的。在电影院我的住所的马路对面，有镇上的供销社开办的一家国营食堂，有几样炒菜，我尝过，委实不敢恭维。再就是八分钱的素面条和一毛五的肉面条。我想有特点的地方风味饭食，在西安当数羊肉泡馍了。经济政策刚刚松动，我在镇上发现了头一副卖豆腐脑的挑担，也过了久违的豆腐脑口瘾；紧跟着就是这家牛羊肉泡馍馆开张，弥补或者说填充了古镇饮食许久许久的空缺。这家仅只一间门面的泡馍馆开张的炮声刚落，在古镇以及周围乡村引起的议论旷日持久，波及一切阶层所有职业的男女，肯定与疑惑的争论互不妥协。这是一九八〇年特有的社会性话题，牵涉到两种制度和两条道路的议

争。无论这种议争怎样持续，牛羊肉泡馍馆的生意却火爆异常，从早晨开门并拨旺昨夜封闭的火炉，直到天黑良久，食客不仅盈门，而且是排队编号。呼喊着号码让客人领饭的粗音大响，从早到晚响个不停。尤其是午饭时间，一间门面四五张桌子根本无法容纳涌涌而来的食客，门外的人行道和上一阶土台的马路边上，站着或蹲着的人，都抱着一只大号粗瓷白碗，吃着同一个师傅从同一只铁瓢里用羊肉汤烩煮出来的掰碎了的馍块。

我领着刘恒走出文化馆所在的电影院的敞门，向西一拐就走到熙熙攘攘吃着喊着的一堆人跟前。我早已看惯也习惯了这壮观的又是奇特的聚吃景象，刘恒肯定是头一回驾临并亲自目睹，似不可想象也无所适从吧。我早已多回在这里站着吃或蹲着吃过，便按着看似杂乱无序里的程序做起，先交钱，再拿七成熟的烧饼，并领取一个标明顺序数码的牌号，自然要申明“普通”或“优质”，有几毛钱的差价，有两块肉的质量差别。我招待远道而来的贵宾刘恒，自然是肉多汤肥的“优质”。那时候中国人还没有肥胖的恐惧，还没有开始减肥抽脂刮油等，还过着拿着肉票想挑肥膘肉还得托熟人走后门的光景。我便和刘恒蹲在街道边的人行道上，开始掰馍，我告诉他操作要领，馍块尽量小点，汤汁才能浸得透，味道才好。对于外来的朋友，我都会告知这些基本的掰馍要领，然而这需得耐心，尤其是初操此法者，手指别扭，掐也罢掰也罢往往很不熟练。刘恒大约耐着性子掰完了馍，由我交给掌勺的师傅。

我和刘恒就站在街道边上等待。我估计他此前没经过这种吃饭的阵势，此后大概也难得再温习一回，因为这景象后来在古镇灞桥也很快消失了，不是吃午餐的人减少了，而是如雨后春笋般接连开张的私营饭馆分解了食客，单是泡馍馆就有四五家可供食客比对和选择；反

倒是那些刚刚扔下镰刀戴上小白帽的乡村少男少女，站在饭馆门口用七成秦腔三成京腔招徕笼络过往的食客。

四

几年之后，我有幸得到专业作家的资格，可以自主支配时间，也可以不再坐班上班，自我把握和斟酌一番，便决定撤出古镇灞桥，回归到灞河上游白鹿原下祖居的老屋，吃老婆擀的面条喝她熬烧的苞谷糁子，想吃一碗羊肉泡馍需得等到进城开会办事的机会。

住在乡下，应酬事少了，阅读的时间自然多了，在赠寄的一本杂志上，我发现了刘恒，有一种特别兴奋的感觉。随之又读到了《狗日的粮食》，我有一种抑压不住的心理冲动，一个成熟的禀赋独立的作家跃到中国文坛前沿了。每与本地文学朋友聊起文学动态，便说到《狗日的粮食》，也怀一份庆幸和得意，说到在灞桥街头站着或蹲着招待刘恒的那一碗泡馍，朋友听了不无惊诧和朗笑，玩笑说，你把一个大作家委屈了。我也隐隐感到，便盼着有一天能在西安最知名的百年名店"老孙家泡馍馆"招待一回，挽回小镇站吃的遗憾。这时候不仅公家有了列项的招待款，我个人的稿酬收入也水涨船高了，况且"老孙家"也得了刘华清题写的"天下第一碗"的真笔墨宝，店堂已是冬暖夏凉和细瓷雕花碗的现代化装备了，我在这儿招待过组团的兄弟省作家和单个来陕的作家朋友，却遗憾着刘恒。刘恒似乎不大走动，似乎除了一部一部引起不同凡响的作品之外，再没有其他逸事或作品之外的响动。我能获得的信息，都是他的作品所引发的话题。这样，刘恒在中国文坛的姿态，便在我心里形成了，让我无形中形成了敬重，不受年龄的限制。敬重不在年龄。

从一九八〇年夏天初识于我的灞桥，街道边的一顿午餐，成为我们二十多年深刻的记忆。这期间，我和刘恒大约有两三次相遇，每当见面握手，便说到街头的那顿午餐，一碗牛肉或羊肉泡馍。以我推想，随着经济快速发展，也随着作家腰包的不断填充，大餐小餐中餐西餐乃至豪华宴会，他和我都经历过了。在他，起码我没听见对某一顿大餐的感受；在我，即使吃过什么稀罕饭菜，稀罕过后也就不稀罕了。灞桥街头的这一顿牛羊肉泡馍，之所以让两个人经久不忘，我想在于这情景发生的年代——一九八〇年夏天，中国新的发展契机初露端倪时的一个标志性的年份，第一家私营饭馆在古镇灞桥张扬出来时的特有景观；另一因由在于这碗牛羊肉泡馍，标记着那个年月的我的消费水平，自参加工作十八年第一次涨薪，拿到四十五元月薪了，大约发表了十多篇小说，累计有一千多元的外快稿酬了，可以请本地和外埠的朋友吃一餐泡馍了；还有一点在于，蹲或站在街道上吃泡馍的这两个人，后来都成了有点名气的作家，一个在北京，一个还在关中。这似乎才是造成记忆不泯的关键，作家微妙的生活感受；此前此后我陪过老朋友新相识包括乡村亲邻等都吃过，过后统忘记了。唯有作家不会忘记，我记着，刘恒也记着。

这回在北京饭店和刘恒握手，他开口便说起这顿牛羊肉泡馍午餐。笑罢，我突然想到，这顿街边的午餐已成为一种情结，也成为一种警示，在我千万别弄出摆显“贵族”的嗲来，当下这种发“贵族”的嗲气小成气候。那样一来，刘恒可能再不说一九八〇年夏天古镇灞桥的午餐，也不屑于和我握手了。

2006年11月29日二府庄

言论·对话

什么使我钦敬

——读《走近李焕政》

认识李焕政是在一九八七年秋天。他和我作为中共十三大代表赴京开会，前后大约有十天相聚相随的时间。那时他是榆林地区专员，第二年就调进西安做中共陕西省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直到在这个岗位上退休。在这十四五年不短的时段里，我作为省委候补委员，参加省委各种主题的许多会议，都会看到他，或是在大厅里看着他坐在庄严的主席台上，或是听他做报告或发表讲话，或是在会场走道餐厅饭桌碰面，应该说是很熟悉了。然而，我和他的接触却也只停留在“面熟”这个层面上。我没有和他单独接触过一回，无论公事或私事，连一次个人交谈或聚餐的过程都没有，十几年竟然已经过去了。

从见第一面直到看到刘凤梅写的《走近李焕政》书稿之前，他留给我的印象就是那张类近关中农民的脸和一双笑起来眯成一道缝的眼睛。这样的脸和这样的眼睛，你在关中的乡村里或人头攒动的集市上都会碰到，无论他穿着中山装或者西装，都不能影响这种脸色和眼光里给人的善良诚实以及由此产生的踏实信赖的感觉。感觉也仅仅限定在这样的层面上。当我读完《走近李焕政》书稿，一个有棱有角的活生生的李焕政站在我的面前。确切地说，在我读到接近一半页码的时候，原有的浅层面的印象就打破了。恰如这本书的书名，我在走近李焕政。走近了，感受一个人的呼吸，感受一个人的内心世界的脉搏，

感受一种饱满的情感的波动，感受一种思想的力度和厚度，感受一种性格的魅力，也感受一种令人钦敬的灵魂世界的纯粹和洁净。我甚至有点懊悔，这样优秀的一个人，认识十四五年了，却根本不了解。我清醒地知道这主要出于我性情里的弱点，把自己的事尽可能做好，不要干扰这些身负重任的“高官”的工作，也免得造成攀爬的负面影响。现在看来，起码错失了了解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的机会，好在《走近李焕政》弥补了这种缺憾。

我在阅读一个人的心灵史。这个人堪称一个真正的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人。

读着这个人童年的生活环境，父亲在麦田和牛圈里的劳作，母亲在纺车和织布机上的身影，农家铁锅里舀出的饭食，简陋的私塾学堂里的格局，乃至在乡村集市上难得得到的一块糖，都令我眼热耳熟，甚至迷乱，以为在温习自己的童年生活。想来也不奇怪，我的故乡原也属长安县管辖，生产程序生活习俗尤其是生产发展水平，基本一致。李焕政最初受到父亲和母亲关于做人的基本规范的教育和影响，对于他后来形成诚朴无华忠诚正直乃至刚烈不屈的个性，当为基石。他少年时代的这种生活环境和影响，对于刚刚诞生的新中国的呼应几乎是自然的本能的事。十六岁，一个在今天看来属于撒娇任性阶段的少年，在李焕政却已经接受了革命的基本理论和训练，怀着改造世界的大志和热情，远离长安家乡，踏上北去榆林的征途。他的抱负他的襟怀和他在危难时期所显示的凛然正气，虽然远远不是他的父辈所可比照，然而依然可以感到那个最初形成的做人的基石的最结实的力量。

在普通民众和庞大的干部队列里，李焕政已经是职位很高的领导干部了；在李焕政这样很高职位上的干部，自解放以来到现在，统计

起来也应该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在这个数字里，他又是普通的默默无闻的一位。我的感动正发生在这里。一个从最基层成长起来走到很高职位的领导干部，没有过关于个人突出的或一般的宣传（公务活动除外），似乎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似乎默默无闻。然而打开了《走近李焕政》，就打开了一个人堪为惊心动魄的生命史。在这个人的生命页码上，记录的不是个人盈了亏了胖了瘦了哭了笑了，而是强烈地直接地映现着一个地区乃至整个国家的发展和挫折的大命运，展示出共产党在五十年以来执政历程中成功的辉煌，令人扼腕的错失，以及在新的形势下所潜存的障碍。如此具体，如此生动，如此感人。正是如李焕政这样一批既富于政治自觉又富于革命道德的干部，推进着党的事业，创造着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我没有必要复述李焕政人生历程中那些感动人也启示人的太多的事，任谁打开这本书就很难放下停止阅读。我只能说最让我钦佩的两点。其一，就是这个人开创建设事业的魄力和决断力。在榆林发现令世界震惊的优质大煤田的时候，在资金困扰勘探和开发的关键时刻，李焕政断然拍板，那个缺口资金“我拿”。这个钱似乎不属于一个地方的投资范围。更令人惊诧的是，榆林有史以来的第一条铁路，竟然是按李焕政设计的走向定案直到修成，他说服了铁路专家和领导，把原有的方案放弃了，不单是出于榆林的地方利益，而是更科学更符合大局的利益。还有在水库指挥部蹲守的三天三夜，就为着保一库在榆林沙漠里珍贵的水，他甘愿冒着风险，经过准确判断而不是盲目蛮干……如此等等。我读到这些令人震撼甚至令人揪心的情节时，往往忍不住一次又一次慨叹，这个人竟然潜藏着如此巨大的创造活力，如此强烈的创造欲望和创造智慧。具有创造能力和创造智慧的人并不少见，关键是把这种宝贵的能力和智慧投向何处，才是人的生命价值生命意义的高与下、重与轻的鉴别。李焕政令人钦佩和获得当地民众热

爱的最重要之点，他把包含着能力和智慧的能量，释放在边城榆林的土地和沙漠上，应该说是带有改变历史命运的一笔。

其二便是李焕政的人格品质。对于李焕政这样的政坛高位的人说人格品质，其核心在于政治品质。十年浩劫的“文革”，对于走上革命路途开始进入地方政权核心的李焕政，是一场生与死血与火的锻铸和考验。那时候他刚刚三十岁出头，在那场错综复杂变幻莫测又裹着堂皇理论的运动中，进行理论的判断是十分困难的，决定一个人行为走向的关键性因素里就凸显出个人品质，包括政治品质和道德范畴的品质。我以为，正是这个品质决定着李焕政在长达十年的劫难里，保持着一个共产党人的规范，灾难自然是不可躲避得了。他两次长达一年多时间的逃亡，不仅是躲避个人灾难和迫害，而且是以这种行动表示了对某种错误路线的拒绝，既然扭转不了乾坤，却也决不助纣为虐决不同流合污。有一个细节使我心颤，他在逃回长安农村半年之后，闻听革委会成立而以为秩序恢复，便返回榆林，妻子告诉他榆林武斗和对革命干部的迫害更残酷了，推他赶紧逃走。到家没坐十分钟又逃出门来，大雪地里辗转多日又躲回长安农村。还有一个细节耐得咀嚼，造反派以某种许诺诱他入伙时，他清醒而又坚决地拒绝了。虽然这种拒绝招来更深的报复性的灾难，却也拒绝了变节投降，拒绝了投机钻营，拒绝了龌龊和肮脏，保持了作为一个党的地方领导干部的政治品质，也保持了作为一个人的纯粹道德层面上的纯洁。恐怕再没有比“文革”这面更能检测人的精神、思想和品质的大镜更为严峻的镜子了，李焕政可以永远自信于那个全过程。

如果说“文革”是一种很难复发的畸形事件，那么，和平发展环境下的改革开放时期，作为执政党生死存亡的最重大命题，即反腐败，也是全党全社会最关注的命题，李焕政又恰恰置身于这样的岗位上。

李焕政坚持党的纪律，毫不手软地惩治了一批贪官污吏。我更钦佩的是他为预防和堵塞经济犯罪所采取的富于创造思维的措施，健全了管理程序，显示出律治的科学性。这样防止干部堕落以至犯罪的指导思想，比之单纯的惩治要主动得多。这些也都属于他的神圣职责，不说也罢，我感动的是当有人公开阻碍甚至无视党所赋予他的这种神圣职责的时候，不是一般人的干扰与破坏，而是我们习惯上所说的潜藏着不尽意蕴的所谓“有来头”的人企图背离那个神圣意义的事情发生时，也就清楚地看见了了不起的李焕政。我在浩繁的可以赞誉溢美一个人的词汇中，选取了“了不起”这个词。我很自然地选用了这个词。我觉得李焕政确凿了不起。这样的来自“有来头”的压力的事件书里写到过两次。我能充分想象李焕政的艰难，因而更敬重他的以党纪国法为生命的那种崇高感和神圣感，也充分感受到了正义对于邪恶的一种凛然，甚至在一瞬间浮出“拗相公”的名字来。归结一句，李焕政以自己的行为彰示出一个共产党人的品质规范。

李焕政对人民群众的那份自始至终的诚爱，贯穿着他全部从政生涯，也贯穿在这本传记作品里。他在理发铺理发时，对那位生活困难的理发师的举动，令我眼热泪涌，又恰好对比着他对儿女和亲属的严厉，使我联想到毛泽东处理亲属的诸多感人事迹。人的心灵世界有许多层面，掀开李焕政的每一个层面，我看到的都是洁净与坦然，这是很难很难的事。

刘凤梅的这部著作，占有大量的生动鲜活的资料，下了功夫；她选择了不加修饰的最平实的文字风格，更贴近传主本人的气质特征，这应该是艺术创作的大境界，非深厚的功力而难为；对传主思想和精神世界的理解，包括对传主大批资料的选择，显示着作者的价值取向

和审美取向，我依此而看到了刘凤梅同样令我敬重的精神品质，不单是写作才能。

2004年1月19日 雍村

有剑铭为友

我无论如何都想不起来，是哪一年在什么场合和剑铭见第一面的。我想打电话问问剑铭，拿起话筒却又放下了，既不具备井冈山会师那样决定中国革命历史命运的意义，弄不弄清这个时间和地点也就无所谓了。倒是年轻时的几次接触，随着岁月的河流越流越远，反而愈加清晰，愈觉珍贵，也倍觉幸运，即：淡淡的漫长的两个人的生命历程中，能留下至今让我偶尔忆及依然动情的事，真是人生幸运。

大约是一九七二年秋天或冬天，我收到剑铭一封信，告诉我他刚刚参加过一个重要会议，陕西作家协会被下放到农村的作家和编辑又回来了，被砸烂的陕西作家协会要恢复工作了，只是不准再用“文革”前的旧称，改为“陕西省文艺创作研究室”。无论这个新的名字听来怎样别扭说来怎样拗口想来怎样不伦不类词不达意，已经无关紧要，起码标志着文学创作又被捡起来了。剑铭还告诉我，陕西的文学刊物《延河》也即将复刊，同样出于与旧的“文艺黑线”决断的思路，改名为《陕西文艺》。这个会议就是“省文艺创作研究室”和《陕西文艺》共同召开的，与会者是西安地区的一些工农兵业余作者。会议的主题之外，还有一个更具体的事，让与会者向新的编辑部推荐各自认识的业余作者，目的很明了，新的刊物需要作品，作品必得作者创作，声名赫赫的老作家有的虽然从流放地回来，改造思想的距离仍然遥远，能否重新发表作品似乎还难说。工农兵业余作者，一下子成了香饽饽受到器重了。剑铭在信中告诉我，他推荐了我，而且推荐了我刊登在西安郊区文化馆创办的内部刊物《郊区文艺》上的散文《水库情深》。

我首先感动的是剑铭这封信里的真挚。我也很为我心中崇尚着的一个文学刊物《延河》的复刊而鼓舞，尽管更替了一个新的刊名。我在“文革”前一年的一九六五年年初发表散文处女作，到“文革”开火时的一九六六年夏天，发表了六七篇散文特写，全部刊登在《西安晚报》文艺副刊上。除了初中二年级时语文老师把我的一篇作文亲自抄写投寄给《延河》之外，此后许多年的业余操练和投稿过程中，从来也没有敢给《延河》投寄一稿。在我的感觉里，说文雅点，《延河》是全国大作家们展示风采的舞台；说粗俗点，那门槛太高了。怀着这种敬畏的心理，我把习作的散文都送到报纸副刊了。尽管西安地区的业余作者朋友略知我一二，而《延河》和作家协会的全然陌生是合情合理的。正是剑铭这一次推荐，荐人和荐稿，使我跨进了作家协会和《延河》的高门槛。接到剑铭信后没过几天，就接到《陕西文艺》编辑部路萌的电话，谈了他对剑铭送给他的《水库情深》的意见。随后又收到路萌经过红笔修改的稿子。这篇经剑铭推荐的散文《水库情深》，发表在《陕西文艺》创刊号上。今天想来，感慨之际，真应了某点宿命。许多年前一位游迹村野的算卦先生硬揪住我相面，说了许多恭维之词，也免不了提醒的话，统忘记了，原因在于我向来不信这些神神道道虚虚幻幻装神弄鬼混馍吃的做派。倒是记得他有一句“紧当处有贵人相助”的话。单是在创作生涯里，再缩小到《延河》这条道上，相助的贵人有两个，一个是我刚刚对文学发生兴趣并在作文本上写小说的时候，语文老师车占鳌把我写的第二篇小说自己亲手抄写到稿纸上，投寄给《延河》。整整过了十五年，剑铭把《水库情深》又推荐给《陕西文艺》，而且发表了。我的车老师和我的文学兄弟剑铭，就是在创作道路上相助的贵人，恰如其分。

那时候，在西安，工人业余作者徐剑铭的名字是响亮的（那时候没人敢自称或他称作家这个大号），知名度是最高的。西安仅有的三

四家省市两级报纸和文学刊物，上稿见报最频繁的莫过于他了。首先是他的诗歌，再就是当年十分流行的一种演出和阅读皆宜的称作“对口词”的韵体文学样式，还有散文和小说。打开报纸和刊物，就会看到徐剑铭的名字和他的新作。我至今依然记得在报纸上阅读散文诗《莲湖路》时酣畅淋漓的美感，激情澎湃，诗意泉涌，才华横着竖着漫溢。我所熟悉的业余作者朋友都觉得诧异，这样的诗和这样的文字，怎么会由一个缩脑耸肩貌似绺匠（小偷）的人倾泻出来？也难怪，剑铭行为举动涣散，在任何庄严的场合，都是习惯性缩着脑袋耸着肩膀不急不慌懒懒洋洋的样子；说话不急不躁，一口地道的西安市民的家常话，极少乃至不见一句文学修辞：在任何正经或闲谈的场合，都是一种低调姿态。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人，那诗那散文里掀起的气象万千排山倒海似的涌潮，让我在阅读时心怀激荡不已。我串用一句古话，是真才子自风流，显然不指外装潢，而在内宇宙。

剑铭在西安一家名牌工厂当工人，我在西安东郊一个公社当干部（乡政府），距离不过三十余华里，然而常常难得一见。上班各自忙事且不说了，那时电话很不发达，经济更捉襟见肘，所以很难有一聚吃顿饭喝回茶的机会，倒是一年里遇着哪个文艺管理部门召集业余作者开会或辅导，便是文朋诗友的盛会。大约是一九七七年，剑铭骑着自行车到我供职的公社来了。我开开门，吓了一跳，仍然是那种不动声色更不张扬的样子，身后站着李佩芝。李佩芝也算熟人，也是业余作者，开会时见过，几乎很少说话，更谈不上交往。我把他和她迎进宿办合一的房子，坐下聊天。我那一年正陷入某种难言的尴尬状态。我在前一年为刚刚复刊的《人民文学》写过一篇小说，题旨迎合着当时的极左政治，到粉碎“四人帮”后就跌入尴尬的泥淖了。社会上传说纷纭，甚至把这篇小说的写作和“四人帮”的某个人联系在一起。尴尬虽然一时难以摆脱，我的心里倒也整端不乱，相信因一篇小说一句话

治罪的荒诞时代肯定应该结束了，中国的大局大势是令人鼓舞的，小小的个人的尴尬终究会过去的。

我按我的职责抓着蔬菜生产和养猪，以及正在施工的一条灌渠工程。剑铭说他听到某些闲话，显然是传言，说他很不放心，又不摸虚实，便叫上李佩芝来看望我。我此时此刻的感动，远不是他给《陕西文艺》推荐稿子那种层面上的意蕴了。我感到了一种温暖。我充分感受到陷入尴尬之境时得到的温暖是何等珍贵的温暖。其实任何安慰或开脱的话都不必说，单是此时此地的这个行为就足以使我感到温暖了。我那一刻的感觉只有一点，在这个纷纷攘攘的世界上，有徐、李两位文学朋友还关心着我的兴亡，在感到温暖的同时，心里也涨起力量了。已经错过了机关吃饭时间，公社（乡）所在地连一家食堂也没有，只有一家供销合作社，我执意买下两斤点心，那一刻竟是打烂账的豪勇，决不能让两位送温暖的贵人饿肚子踩自行车运动几十里回城。今天的人也许以为矫情，需知那时候我月薪三十九元养着一家五口，平日里是捏着钢镚儿过日子的，身上不名一文是正常状态。大约是这年冬天或次年（一九七八）早春，剑铭又约了西安几位文学朋友到我原下的家里。我当时刚刚接手家乡灞河河堤工程的副总指挥，难得有一个休假的礼拜，家庭经济也仍然维持在三十九元月薪的水平，一下子来了这么多城里贵宾，就紧张就发窘了。倾其所有贮备，只能是一碟生萝卜丝做凉菜，一盘萝卜条和白菜烩熬的热菜，主食则是干面。朋友们都知道我的家境，来时就带着白酒，喝着谝着，倒也尽情尽性。那时候的社会主题和民间话语，都是笑骂“四人帮”，很自然地以各自的观察和猜测设想未来中国的可能性变化，时有争议。这些朋友在西安城里的某个角落，都有一个社会角色，工人、公园杂工、街道办干部等，许多年来因为一个文学的共同兴趣联结在一起，此时最关注的当然是文艺政策放宽放松的尺码。放松放宽是共同的肯定的看

法，而在尺码上却很难把握。这次聚会发生过一个细节，剑铭把一张稿酬汇款单据给我的农民夫人验示了，依此证明稿费要恢复了。无须解释的言下之意，稿酬一旦恢复，你的日子就会好过了，这个家庭的困窘和拮据就会改善了。我隐约记得那张稿酬单上的汇款额不过十几块钱，那时却是一个令人目眩到不敢相信的数字。我也在心里盘算着，相当于当时增加三级工资的这笔“外快”，一旦注入家庭经济，我起码可以不让来访的朋友自带白酒了。

大约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中国当代文学以摧枯拉朽之势冲决极左的文艺桎梏，真是让新老作家经历了一场历史性的大释放和大畅美！想到仅仅三四年前在原下老家聚会的时代，似乎跨越了从猿到人的漫长历程。我那时住在灞桥古镇上，反倒没有了吟哦灞桥如雪柳絮的怡情，更无法体验验证古人折柳相送的悲凄，我被扑面而来的大解放的生活潮流掀动着，把我的生活感受诉诸文字。我已经有一篇短篇小说获取全国奖。我的第一本小说集刚刚印刷出来。我感觉自己已经进入生命的最佳轨道，即自幼倾情文学虽经受种种挫折而仍不能改移的这个兴趣。忽一日，剑铭来到我的住所，自然相见甚欢。闲聊中，剑铭说，咱们那一帮文学哥们中，你老哥这几年成绩最显著了。借着这个话头儿，我也说出我对他的一点建议来，减少或者不参与某些厂矿的文化活动和属于好人好事的报告文学写作，以便集中精力去写属于文学意义上的作品。我的这个意见其实不是我一个人的看法，和原来那些如他称为哥们的文学朋友遇到一起时，哥们似乎都有点惋惜，按剑铭的才气和智慧，对于文学的敏锐和不俗的文学功底，对城市深刻的体验和个人经历的丰富，早就应该出大的创作成果了，早就应该是文学复兴最先跃上文坛的新星了。哥们常常带着遗憾议论，所能找到的原因便是我上述的那点事。出于对文学创作的理解，我渐渐形成一种个人戒律，不给别人开药方，不对无论生人或熟人的写作说“你应

该怎样又不应该怎样”的话。我此前也与剑铭多次相遇，都不敢说，今天终于说出来，最基本的一点，也是想到按他的天分和现有的文学装备，理应出大成果，便有遗憾和损失的心理。剑铭笑笑说，这一点自己早意识到了，只是心肠太软，架不住朋友的热情邀请，也不忍心让那些过去的工人朋友失望。

后来听一位年轻的业余作者说：“如果不是为扶持我们，徐老师的名气肯定比现在大多了！”我这才忽然明白：从文学解冻之初，剑铭就开始主持一个工人文学刊物，后来又到《西安晚报》当副刊编辑。依他的热诚与执着，这种“为人做嫁衣”的事业肯定耽误了他许多耕作“自留地”的时间和精力。我在为他惋惜的同时也就多了一份肃然。

前年某日，接到剑铭电话，说报社给他在沪河边上购得一套住宅，想约几位老朋友在新居一聚，庆祝乔迁之喜。我竟然很感动，最直接的感动就是我们在地理上的距离变得如此之近。我那时重新回到原下祖居的村子，不过是为了逃离太过逼近的生活的龌龊。这个年龄了，经历了冷暖冰火几十年的生活了，唯一不可含糊的生活信条，人给社会建树美好的能力总是相对的，而不能制造龌龊却是绝对的。我便在原下的灞河边上重新阅读和写作。剑铭住到原西的沪河边上安居乐业了，应该是距我最近的一位作家了。

猴年伊始，我到原上去给老舅拜年，回来路经剑铭沪河边上的住宅，喝一杯清茶，仍是一种素有的平淡、素有的踏实。剑铭的住房还宽敞，修饰得也不错，书房里挂着几年前由我写的“无梦书屋”的毛笔字，我看了颇觉别扭，吹牛说毛笔字已有进步，我要重写一幅，心里却潮起“历尽劫波兄弟在”的诗句来。剑铭告诉我，他已经写过一千万字的作品了。我并不惊诧，他的敏锐的才思勤奋的习惯呈现为快手，我是早就知晓的。他说他要出三本选集，诗歌、小说、散文各出一

本，应是较大规模的一次专著出版，我也不惊讶，甚至以为早应该有这样规模的出版了。他拿出来一本《黄罗斌传》的长篇人物传记，才是令我震惊不已的事。黄罗斌为陕西蒲城县人，陕甘红色政权的创造者之一，二十世纪六十年代遭遇冤案，一生充满传奇性的超平常人想象的纷繁事件。无论解放前和解放后黄罗斌的全部生活历程，都与剑铭的生活经验相去甚远，然而剑铭写成了，并付诸出版了，包括传主眷属在内的各方都评价甚高。更令我惊奇到不可思议的事实，这部三十余万字的作品，写作时间仅仅只有一个月。剑铭不动声色轻声慢语给我说："我一天写一万字。"我听说过用电脑一天可以码出万字的事，年轻时的我也曾经有过在兴头上一天用钢笔写出万把字的事。然而剑铭在整整一个月的时间里，每天用钢笔以一万字的速度写完一部三十余万字的长篇人物传记，而且一遍成稿，而且得到出版社编辑和传主眷属的高度评价，且不说我如何惊讶、感动和钦佩，起码日后不会因为谁的出手之快吃惊了。

我约略知道，多年以来，剑铭写了大量的各行各业杰出人物的短篇纪实文学，主编了某些系统优秀人物的报告文学集子，既亲自出马采访写作，又兼以帮助修改整本书的稿件，不厌其烦，不拿架势，深得各家主管领导和作者的尊敬与爱戴。我较为确凿地知道一件事，是他主编陕西国防工业系统的一部报告文学集。我曾为这本书作序。在国防工业系统有那么多鲜为人知的无名英雄，我在阅读中不止一次热泪难抑，那本书里就有剑铭写作的九篇激情洋溢的文章。我之所以特别提到这部英雄碑史式的报告文学集，只有一点想加以强调，即在剑铭以诗人的激情倾注那一个个无名英雄献身事业的文字时，他还被一桩冤案囚锁着。一个被冤案侮辱侵扰的作家，依然故我地对国防事业的英雄倾心纵情，展示的就不仅是一个人民作家的情怀，也应是对冤案制造者的一种凛然表白，一种无意的嘲讽。

剑铭告诉我，他手头还在写作一部长篇纪实文学，是三秦子弟立马中条（山）抗击日寇的气壮山河的群雕式作品。这样，在已经到来的猴年，剑铭将有两部长篇纪实作品和三部选集文本出版，当为盛事。一个作家，一年里有着如此丰硕的耕耘果实得以收获，还有什么事能比其更令人感到心灵与精神的慰藉和自信呢！剑铭属相为猴，今年满六十岁了，这是怎样令自己也令朋友欢欣鼓舞的一个年轮哦！

我前年曾在一篇致剑铭的短信里写过这样一点感慨，相识相交几十年了，他在城里，我在城郊，多则一年里有几次碰面聚首的机缘，少则一年也许难得相遇，既不是热爱到扎堆结伙，也不是互相提携你捧我吹。几十年过来，剑铭大约有两篇写到我的逸事的千字短文；我也只有前述的那封对他的一篇纪实作品读后感式点评的书信。然而我心里有个剑铭，或者说剑铭实实在在存储在心里，遇着机会见面，握一把手就觉得很坦然了。剑铭小我两岁，今年也年过花甲。我写这篇文章的时候，心里始终萦绕着一个小小的核儿，就是温情，就是友谊。热闹的人生与社会交会的场面，过去了就如烟散了；生活演变中的浮沉起落，也终究要归于灰冷。作为朋友，能留下来永远在内心闪烁着温暖光焰的，除了真诚，什么都难以为继。

我便倍觉荣幸，有剑铭为友。

2004年2月4日 长安

你的发现，令我敬重

每见到凤杰，便获得快乐。甚至在与朋友的闲聊中提及凤杰，顿然都会在心里潮起愉悦。未必完全是结识的久远或友情的深浅，尽管有三十多年交往的时间了；未必完全是因为记忆里几乎搜寻不出稍微别扭的一件事，因为这种淡如清茶的友情也不止凤杰一人；我便归结为凤杰的性格，一个快乐的人，他带给我的是快乐，他留给我的全部记忆都泛着愉悦。

凤杰约我为谭旭东写他的儿童文学研究专著作序。我在阅读《当代儿童文学的重镇——李凤杰创作论》书稿的过程中，在那些令人眼睛发亮心里也随之波动的字行里，时不时浮出凤杰睿智清明的眼睛和快乐的脸色，泛起三十余年来没有剪辑梳理的原生形态的生活片段：在太白县城郊田坎上的漫天闲谈，记不清多少回听他讲述民间笑话笑倒一片的场面，宝鸡街头小餐馆享受羊肉泡馍的纯香，以浓重的西岐口语在各种主题的集会上做坦白率真的讲演，等等。然而，记忆里最深刻最清晰的还是第一次，在他的故乡岐山县文化馆我对他的夜访。

大约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我随西安郊区卫生局组织的一个参观团体，到岐山县参观学习“改灶洁水”工作的先进经验，住在县政府招待所里。岐山是历史名地。周人入主关中前，在这里完成了重要过渡。诸葛亮在这里演绎了半个三国。凤鸣岐山让一代一代的子孙享受着诗性神话的美好向往。然而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不说乡村如何凋敝农民如何贫穷，单是吃水也是靠天。乡民在自家庭院里挖出一个极像漏斗的地窖，把天上降到地下的雨水收集到窖中，再吊上来食用。我第一次在这里看到传说中的水窖时，才感觉到生在灞河边上的

我的幸运。那天晚上，回到招待所，停着电，百无聊赖，我便贸然找到文化馆里去，拜访已经有点名气的李凤杰。因为天太黑，看不出文化馆的格局，却较为顺利地找到凤杰的房子。进门旁的窗户下安一张带抽屉的办公桌，另一边靠墙有一个简易脸盆架子，后墙下安一张木板床，床上铺着的床单是农家织布机织出来的产品，隐隐可以看见细密的花格儿。这种摆设毫无新奇或陌生，我在公社的办公室也是这种格局，北方地区的县和公社（乡镇）干部的房子，大都如此。那时候的干部，只有周六下午才放假回家，周日晚上必须回到机关，宿舍和办公室就兼容并蓄了。房子里点着灯，同样是电力严重不足，吊着灯泡却总是派不上用场，他点的是蜡烛还是煤油灯已经不记得，尽管昏暗却不妨碍两位做着文学梦的青年奢谈文学，也不妨碍我如此近距离地欣赏那张英俊的脸。

这确实是一张可以用英俊来概括的未来作家的脸。浓重的眉毛，恰到好处的双眼皮，大而发亮的眼睛，充溢着聪慧敏锐的光波；鼻子直而不钩，也是恰到好处配置和谐；整个脸形和器官组合，几乎看不到任何缺点，有棱有角，疏朗协调，凸显出英气却不见粗俗，洋溢着秀气却绝非生活或舞台小生的奶油味儿。我很难想象，一个既无泉水也打不出井水只能窖藏雨水的旱原乡村里，竟有如此英俊的青年从农家土炕柴门里走出来，而且正在敲击文学圣殿的大门。他那时候调到文化馆不久，那是因为他在“文革”前就已经发表作品，在一个县造成空前的影响的结果，与人情后门无任何干系。那个时候能在省级报刊发几篇文学作品的人，在一个县是了不得的惊动四方的荣耀事。我们谈着文学创作，他又介绍了另一位作者徐岳。徐岳后来成为《延河》主编和省作协专业作家。凤杰矢口不提他曾经经历的政治造成的灾难。我在多年以后才知道，因为发表过几篇习作，“文革”一开始就被打成“右派”。他到文化馆来是平反以后的事。在后来断断续续的交谈

中，我才了解到他苦难的童年和政治运动中的几经挫折，更多的却是从他的作品里感知。一个能够连续承受生活灾难，尤其是能承受极左的政治灾难而站立不倒的人，精神是强大的，既不会轻易改换自己的事业追求，也很难在变换着色彩的生活流里随波逐流，更难改易自己的精神旗帜和道德旗帜。凤杰向我如镜般鉴示着这个人生坐标。现在，偶尔小聚，望着那张英俊的脸依然不失棱角，也依然透着俊气，然而，业已花白的头发毕竟显示着岁月的无情。从发轫之作《铁道小卫士》到《针眼里逃出的生命》，再到《还你一片蓝天》，这些标志着凤杰艺术探索历程中具有阶段性重大突破意义的作品，不仅刚一问世便在文学界产生广泛热烈的反响，而且在无以数计的少年乃至成人读者群里引发真诚的呼应和共鸣。客观的事实是，这些作品以独特的体验所展示的生命内涵和艺术风貌，卓尔不群地独立于儿童文学领域，作家李凤杰也成为儿童文学创作的大家。作为一个从古老周原干旱贫瘠的乡村走出来的作家，起码可以告慰在文化馆夜访时那颗高涨着创造欲望的心灵了。我曾经在感动王蓬的创作环境时说过，天才诞生在任何地方都是合理的，凤杰同样让我发生这样的感慨和认知，喝着蜂蜜水嚼着面包可能成就天才，喝着窖水熬煮着玉米糁子稀饭的乡村孩子李凤杰，同样可以进行天才的创造性劳动，而且十分出色十分卓越。

我很感动谭旭东在《李凤杰创作论》这部专著的《后记》里所述说的写作缘由，在于他泛读中对于李凤杰的发现，不是一般的发现，而是“惊奇地发现”：

他（李凤杰）的儿童小说看似传统，其实充满着苦难意识、忧患意识、人文主义情怀和人道主义精神，不但是西北小说的佳作，而且是当代儿童小说中难得的好作品。

这段话里有三层意蕴十分明了，论家与写家非亲非故，本不相识，由阅读中的惊奇发现到产生要做专题研究，再到专论出版，是一种纯粹的关于创作和评论的文学活动，与人情评论乃至金钱交易式评论的非文学活动毫不相干，我就完全可以放心地来阅读这部专著。另一层意思使我更加确信，好的作品还是不会被冷漠被埋没的，尽管非文学式的评论把泡沫乱抛乱撒，而富于生命的“难得的好作品”，还是会被如谭旭东这样神圣着文学的学者“惊奇地发现”。我因此而为凤杰感到骄傲和自信。他在《后记》里直言不讳地点击了儿童文学创作和评论现状的病相，用“文化泡沫”一言蔽之。这种病相不单发生在儿童文学创作和评论领域，整个文坛都呈现着这种“泡沫”式的非文学因素。谭旭东在广泛的阅读中对李凤杰儿童文学作品的“惊奇”发现，直观地向我彰显着对于非文学因素的凛然姿态，应该是时下难得的文学的道德和良知，是促进当代文学发展最可信赖的声音。他看到了被“文化泡沫”“遮蔽”着的李凤杰和他的儿童文学作品，专心致志写出关于李凤杰儿童文学创作的研究专论，我首先对这种文学圣徒的纯洁和坚定由衷地钦敬。道理很简单，以作品“进入”评论家的“视野”的这个最基本最正常最健康的文学运行规律，之所以令人珍视和感动，恰恰就在于非文学因素的“泡沫”造成了整个文学活动的病相。

谭旭东把李凤杰的儿童文学创作，纳入中国新文学史的大背景上来比照，来滤析，来定位，其中许多作品是儿童文学的经典，几位作家也是已有定论的儿童文学创作的大师，有的堪称新文学史上儿童文学的开创者奠基者。这样我就理解了谭旭东“惊奇地发现”李凤杰的深层意义。一个对儿童文学进行了独特的卓尔不群的创造劳动的作家李凤杰，终于被一位深刻地理解自己也深情地神圣着文学精神的评论家“惊奇地发现”，并被定位于新文学史中儿童文学的大家行列，应该看成是真正的文学精神的坚实存在。

谭旭东对李凤杰作品里的苦难意识和忧患意识的解析和论述，是准确而又深刻的。由于历史的和现实的、社会的和自然（地理和气象）的原因，善意的失误和故意的作孽，造成了中国乡村持久的贫穷和接连不断的灾难，较之城市更甚更烈。苦难不是局部的，因而注定了经受苦难的人带有普遍性，也注定李凤杰是无法逃躲的。李凤杰一来到这个世界便经受苦难，同时也看到整个乡村社会如同他的父兄一样遭遇苦难的人群。可以说，苦难像础石一样奠基在他的灵魂世界和心理感受之中。然而这毕竟不是李凤杰独有的东西，任何一个乡村人都背负着这种苦难的沉重阴影。李凤杰的杰出之处在于不仅把这种苦难感受升华为一种意识，自然就不会沉浸其中仅仅展示苦难，而是再升华为忧患意识，进入人道和人性这种精神和心理情怀的高品位的境界了。李凤杰的创作谈里袒露过这些，作品里的底蕴和精神指向也体现着这种人道和人性情怀。谭旭东的论述给我的启示，在于一个经历着苦难的作家要跳出苦难，要完成精神和心理的升华和羽化，其创作就不会局限在狭窄的个人苦难的层面上，而是以人性和人道的光亮温暖更广泛的社会层面上的心灵。

这种包含着人道人性底蕴的忧患意识，不单体现在凤杰对于过去生活苦难的写作的作品里，也体现在对当下现实生活热切关注的作品之中。谭旭东对《还你一片蓝天》和《魔鬼的诱惑》的高度评价，显示着论者敏锐的思想和独具的文学眼光。我们通常把这叫作作家的“责任心”，也无可非议。那么李凤杰的这种责任心发自何端？显然不是受谁指派受谁偶尔启发，更不是要找一个别人不大关注的冷门而爆彩，而是源自那个忧患意识。谭旭东充分肯定高度评价这两部书的创作成就，也在评价着作家李凤杰发端于忧患意识的那个责任心。在我理解，此责任心有别于通常所说的责任心一词。这个责任心更见着凤杰

的自觉。几乎是一种心理和精神驱使下的本能的写作行为，作家对社会的道义和良知，成为驱使写作行为的最重要的选择指向。

忧患意识也在深层上影响作家内在诗意的表达方式。诗意从来不会在空壳一类文字上闪光。诗意来自文字出处的精神底蕴。谭旭东在李凤杰朴实、准确且流荡着关中方言韵味的文字里发现了诗意，又可以见出他审美眼光的老到。

写到这里，我突然想，关于谭旭东先生研究李凤杰儿童文学创作的专著，其实只要看重这个行为本身，就足以令我也有“发现的惊奇”了，无论从儿童文学在当代文学被关注的状况说，无论从儿童文学本身流行和发展的现状看，谭旭东潜心研究一位被他称为“被遮蔽”的作家的作品，应该是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复归文学精神的垂范。

2004年2月21日 二府庄

我的关中

青年朋友天宝要我编一本《关中故事》的短篇小说集，并嘱要作自序。这自然不难，因为我大半生所写的长、中、短篇小说以及散文，几乎全部取材于我的家乡关中大地，而编这本以关中命名的短篇小说集，竟令我心中一动，我终于有机会把我的家园关中打在我的书的封面上了。

我最早的短篇小说写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最新的一篇写于今年年初。我之所以强调写作时间，是新时期文艺复兴以来，亦即是标识为改革开放时代以来的二十五年间，单是从内容上看，我自己似乎也才猛然发现，这些短篇小说几乎是亦步亦趋留下了生活演变的履痕，大致可以揣摩二十余年来在冲破一层一层精神和心理樊篱的历程中，中国人尤其是农民心理秩序发生过怎样的变化。

我对自己的写作也更清楚地确信一点，二十余年来我一直正面面对现实，面对乡村里发生的剧烈的或微妙的人心悸颤。我说不清是为了什么或因为什么，也滤析不清是出于个人气性或思维方式，而作品摆列下来的既成事实，显示着二十余年来我始终没有从现实生活的层面移开眼睛。

即使在《白鹿原》创作的准备和实际写作的六年时间里，我仍然抑制不住生活急骤变化的冲撞，抽空寻隙写下了几个短篇小说，没有使这一段时间留下空缺，甚以为幸，也甚以为欣慰。新世纪伊始，我重新开始短篇小说的写作操练，像以往一样，且不论在艺术上做过何样谋算，而内容依然是把着现实生活运动的脉搏。这样，这些短篇小

说就大致勾勒或者说记录着新时期二十余年来，我从中国乡村一隅（关中）所把握到的社会生活变幻起伏的脉象。

我也因此有了一个重新把握自己的契机，运动着的现实生活对我最具诱惑力和冲击力。换一个角度说，我对现实生活的波动最容易发生呼应，最为敏感，无法移开眼睛，也无法改易。

我曾经在不少的话题里言说过对关中这块土地的热爱和理解，用一句话或者一个词概括我的直接感受，这就是：沉重。既是背负的沉重，更是心灵的沉重。

2004年3月13日 雍村

关于《开坛》

参加这个会我本来就犹豫不决，主要原因是对这件事确实连个合格的观众都不够格。我多年以来就把握一点，我能说的话，还稍微懂点的话题我说，基本上不懂的事我就不说。包括中央电视台、几家省市台都约过我做一些节目，我都谢绝了。他们说我架子大不来，其实不是，因为讨论的话题我不懂。今天电视台领导在这儿，我把这个话说透，不是架子大，是不懂的就不能说，这是实事求是。我常看到电视上有些不大懂的人在那儿说些外行话，我就提醒我，不要做这种尴尬的事。这是一个最基本的常识。电视我确实不懂，但因为是《开坛》做的节目，我跟《开坛》又发生过一些关系，先后做过两次还是三次节目，谈过一些话题，因为那些话题我还可以谈，所以我不能不来。更重要的一个心愿是想听听这些专家学者们关于电视的意见。我感觉今天下午起码达到这个目的了。听了前面四位专家学者谈的意见，我才深层地理解到做电视是多么难，尤其是专栏的节目，包括主持人的选择、修养等，越发加重了我不敢在这儿说话的心理负担。为啥？因为电视确是一门大学问，外行真是不能随便胡说。但有一点，我跟陕西电视台的领导，包括《开坛》具体工作人员传达一个信息，是我的义务。

近几年来，我到全国各地应邀参加一些文学活动比较多，东西南北都走了，所到之处人们见我的第一句话就是羊肉泡馍如何，这是开玩笑的，还有兵马俑如何，下来再谈得近一点就是路遥如何，平凹如何，赵季平如何，吴天明如何，最近两年人们在这些被读者和观众关注的名牌之后，又加上一个《开坛》如何。可见《开坛》已经和羊肉泡馍，和兵马俑，和赵季平、吴天明这些名牌一样，被全国人——不

敢说全部中国人，起码在文化层面上的人所关注。据说《开坛》是叫好不叫座，就是收视少一点。收视少这个要看怎么看，因为你不可能做到一个专栏拥有全部观众，就是收视面再宽也不可能占有全部，电视台设的各个专栏就是为了适应不同层面的人，这个道理也很简单。比如我那个小孙子，他闹的时候，突然电视上出现一个“燕子”，我说你看“燕子”出来了，赵薇，小孙子马上不闹了，看“燕子”去了。我们不能把《开坛》弄到这种地步，不同专栏各有各的意旨意趣，各有各的取向。十三亿人组成太复杂，各种各样的人，单是文化人这个层面，按城市的白领阶层来算，为数已经相当不少，相当于欧洲中等国家一个国家的人数，能适应这些人的层面，如果搁到欧洲某一个国家就是全面覆盖了，多伟大呀。

再一个好像说经济效益，拉广告困难一点，我对这事也是外行，跟王渭林台长乱建议，如果广告差一点，他们再做努力，《华山论剑》我估计广告效益会好一点，不可能都做成《华山论剑》，如果在广告收益差一点的时候，把效益好的挪一点过来，把这个专栏支援一下，不要叫《开坛》这么高品位的节目，让他们奖金最少，这个不行，于心不忍。

另一点，对这个栏目的发展，看远一点，视野放宽一点，现在有的观众需要投其所好，比如有的爱热闹，爱看那些带有娱乐性质的东西。但电视台以及报纸等媒体，也应该引导，逐渐提升观众的欣赏品位，应该引向于文化，引向一些包括地理、天文、军事、文学、艺术的常识性东西，逐渐提升观众的素质。不然，咱们孩子现在说话都说的港腔。说话是那种腔，这个好像无伤大雅，港腔也是中国一方地域的方言腔调。但是心灵里和精神里，是否把兴趣弄得比较窄，也不说低级吧，起码把这个民族的兴奋点弄低了，兴奋点太低，欣赏的水平

就不可能提高。这个趋势如果时间长了，多少年之后，就可能形成包括心理结构和精神结构上的挫伤。我觉得在这样的状况下，保持一些人文品位比较高的栏目，对我们的未来，对我们一些年轻人的成长可能更见功利，当然这个一下子很难看出来。

总之我很鼓舞，很骄傲，就是我们陕西终于有了一个除羊肉泡馍和兵马俑之外，能被当代人认可，有一个现代传媒的电视专栏叫《开坛》，谢谢大家。

2004年4月13日

天性与灵性

结识李成海是近年间的事。他的字写得好，影响颇大，声名远扬，不光书法界已成公论，连我这种与书坛稍远的人都闻知在心了。及至有幸相遇相识，才知成海不仅字写得好，人也好，率性而坦诚，不像人们想象的某些古典书家或文质彬彬目不斜视，或据一技之长桀骜不驯视其余如粪土。他的衣着与常人亦无奇异，很难从头饰衣着上看出书法家的风度来；他的行为举止尽管有他的习性区别于旁人，却仍然归属普通人的大路行为，无特别讲究无特殊动作更无怪僻举止；他甚至更像一个社会公众型职业的普通人。这是我初见时的印象，再见和三见以及多回聚首之后，不仅没有改变初见的印象，而是加深着这种印象。我为什么要反复说这个印象？因为我和普通人一样心存一种经验，画画的写字的作文章的名声弄大了的和正在弄大的人，都有不同凡人的风度，很富于个性，让人一眼就可以抢到而且过目不忘。依这种经验看李成海，颇觉失望，竟是一个外表举止上毫无抢眼特点的人。我却又反过来想了，外表举止看去没有特殊抢眼之处的书法家，恰好就是书法家李成海的特点，这叫作难得普通。一个在汉字书法达到很高境界取得令人钦佩成就的人，在生活中完全是一种平民的普通姿态，在今天这个美好又显着某些杂碎的世相里，确属难得。

李成海是一位来自平民阶层的书法家。门第里没有书香，没有祖业，甚至在这个宽大无边的社会阶层里，李成海也是更为不幸的一个。他七岁丧父，人在这个年龄区段里理应享有的天真烂漫无忧无虑的倚赖之柱倾塌了。面对生活，他无可选择，只有承受和承担。过早承受生活的艰难过早承担生活重担，很容易在终年三百六十五天的柴米油盐的局促里消磨了进取的锐气和恒心，况且谁都知道他所处的“阶

级斗争”年代的非常时月里的人为灾难。我惊讶和钦佩的一点就在于此，生活不仅没有把他压垮，没有把他消磨到平庸，反而是让他出脱为一个精神和心理都很健康的书法家，真是一个奇迹。

我感兴趣的是，既没有书香熏染引诱，又遭逢到柱倾屋塌般的家庭灾难，李成海怎么对用毛笔写字发生兴趣，以至到痴迷不改的程度呢？他的少年和青年时期，中国的小学和中学里基本废弃了传统的毛笔和砚台，而是使用方便耐用也更实用的铅笔和钢笔了。况且，那时候的社会生活里，单靠写毛笔字是既找不到工作也讨不到生活的，写字挣钱即今日所美言的润笔费，如同上古神话。那么李成海为什么拿起毛笔就歇不下来呢？我就只有一个解释，兴趣驱使。

人后来所从事的社会职业，除了无可奈何或鬼使神差的种种因素外，主要是兴趣决定着对万千种事项的选择。画家画画作家著作建筑学家设计建筑收藏家搜寻古董，以及斗蛐蛐放鸽子，都是天性使然，难得改易。所谓天性，就是与生俱来的潜存于生理生命机体里的某种兴趣倾向。再进一步从物质层面上说，就是各人都有一根对某种事项尤为敏感的神经，这根先天生成的神经，决定着一个人后天兴趣选择的倾向；这根神经不萎缩不枯死，它就对某种事项永远敏感，就驱使这个人对某个事项的兴趣不衰不烦。这样我就可以解释前述设置的种种现象，这样也就可以解释李成海在没有任何家庭的和社会的诱导因素的环境里，为什么从少小年纪选择了毛笔和砚台，而且终生都乐在其中，而且把毛笔字写到可以独立于书法之林的不凡气象了。应该感谢父母（即天）给予他对砚台和毛笔构成的墨香尤为敏感的天性。

他在社会底层做着沉重的体力劳动，挣取他和家人生存必需的物质；他承受着骤晴骤阴难估难卜的多事之秋年月里的社会压力，却能把自己的眼睛和神经专注于一块块碑石、一页页古帖、沉寂幽冷的大

家先贤的汉字，把全部用心倾注到手里的毛笔和一张张仿纸上，日复一日夜复一夜年复一年，练着指掌间的基本功夫，体悟着历代诸家的玄妙和内韵，终于出脱为书界一家了，修行成“佛”了。须知他把一切工余时间痴迷在笔墨纸砚之中的颇为漫长的生命历程时段，正是中国书法最为暗淡无光的时期，不仅无名无利可言，而且随时都有可能以种种借口横遭批判的灾祸发生。李成海依然坚持不辍，可见醉心于书法的兴致，具有某种凛然的藐视的力量。我在这里得到的又一个启示，即作为艺术创造的书法，基本功的不可超越，不可轻易绕开跳过，不可能有轻松的捷径通向独立创造的境地。成海在基本功夫上的扎实程度，是有口皆碑的，也是他终成大家的成功秘诀。后天的诚实到痴迷的基本功的修炼，才使先天的那根神经那份天性得到健康的发展，得到充分的发挥，得到最大乃至超常的创造能量的释放，创造出令人惊奇的艺术风景。在这一点上常常能见到相反的现象，耐不得寂寞下不了功夫急于出名图利，终究也成不了气候，反倒把先天的那份天性浪费了。这与文学以及其他艺术创造相同，都循着一个基本的规律。

成海最重要的一点，没有停留在临摹效仿前人的笔画结构之中，而是从扎实的基础上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突破，终于形成属于自己的书法。我以为这才是最重要最关键也是最致命之点。说最致命，在于有如蚕的羽化，有如水到汽的飞升。吃着桑叶的蚕和涌动的水，还是在常态下运动，只有羽化成蛾蒸腾为汽，才会进入创造的自由状态，才能随心所欲地进行艺术创造，才能创造出既不同于先贤大家也不类似同辈人的独立风姿的艺术景观。李成海已经达到这种自由创造的境界。

抵达自由创造境界，至为关键的一点在灵性。人们常说悟性。如果再进一步追问，靠什么完成悟的过程？或者说凭什么才能有所悟？靠灵性。灵性可以有两方面的内涵，一是本文前述的那种天性，即对墨汁笔砚敏感的神经，长期演练、揣摩、吸纳，不断强化不断得到壮大，愈来愈敏锐。再就是后天积累的学养，不单是书法知识，政治的、哲学的、历史的诸多人文知识的装备；还有个人的生活经历和生活体验，形成对社会对人生对历史对现实的基本态度和姿态；以及个性气质，综合为一个人的气质和素质，都决定着那个灵性的大与小轻与重的质量，也决定着所谓悟性的质量和结果，自然就决定着艺术创造的境界了。李成海无疑完成了对先天性智慧的珍惜，也完成了后天诸项学养和修养的充分装备，才使他的灵性得到充分的超常的发挥，才造就了他在书法艺术上的羽化和飞升，才创造出令人欣羡的书法作品。

正炉火纯青。正自由自如。可待有惊世之笔墨飞扬。

2004年4月22日 雍村

心灵的狂欢和舞蹈

初次见到李珖，即生诧异，言谈举止间，颇有某些中国传统礼仪的气韵。我稍作留意观察，李珖穿着当代人的服装，不见流行的硬领对襟布纽扣的伪唐装，也不见蓄留长发美髯，这些画家书家导家时兴的头上装备，倒是令人看到神清气爽的寸头，从上到下一袭青色衣裤，干练简捷而又彬彬有礼的古典风范。后来几经往来，包括到他的案头观摩，这种初得的印象愈加浓厚，让我体味到久远却也久违了的熟识而陌生的古典韵致。

李珖以草书著称。我在他一幅美幻无穷的大草面前，直觉得一种飞瀑倾覆或锣鼓声乐远荡的酣畅淋漓之感。无须赘问，这样的功夫非三年五载所能练得。也无须赘论，书法以及绘画乃至文艺创作，基本功夫是必不可缺的，却不是唯一的通向成功的通道，还得有一点天性，有大一点的与生俱来的天性，再有锲而不舍唯以此道为尊的久练的功夫，才可能形成自己的气象，成就自己的创造。

天性从幼童孩提时代就显现出一个人的兴趣倾向。或者说一个人最初对音乐、色彩、文字、数字以及小机械等的偏好兴趣，源自与生俱来的一根对人类生活某种事物敏感的神经。面对李珖自幼就偏爱书写而终于成为书法家的个例，我为又一次验证着我的观点而感到得意。李珖似乎没有受谁驱使，也没有或近或远的书香祖宗的熏染，况且在他入学念书的时候，毛笔已经从社会也从学校的书写工具里早都废弃了，小学生写平生的第一个汉字统统用铅笔、油笔或钢笔。李珖何以会对用毛笔写字发生兴趣？而且不是一般的兴趣是痴迷，就是那根对墨汁的香气尤为敏感的先天性神经驱使的必然，不可逆改。

痴迷不仅不畏困难和艰辛，而是乐在其中，陶醉其中，尤其在战胜困难抵御艰辛过程中得到进展和些许的成就，那种快乐就是生命意义里最大的欢庆了。李珖从西郊的电工城步行到城里，为的是省下三两毛钱的车费，积攒下来买毛笔、纸张和墨汁；初学时没有高手指导，对着一本书帖反复临摹，既练习指掌间的基本功力，也揣摩方块字笔画里无穷的韵味。几年过去了，也敢于把字拿出来让人看让人指点了，也顿然发出寻找名家大师指点的强烈欲念。他毫无委顿一门心思便从西安一步跷到上海，要做心仪已久的一位书坛名师的跪拜弟子。可以想象在上海大街和里弄里奔走探问的繁复，可以想象无名小卒跨进名师门槛之前的虔诚和惴惴。李珖终于站到名师的面前，鼓着勇气做一番自我介绍和心愿的表述，也拿出自己最好的作品让名师审阅。名师拄着拐杖逐张看过李珖的字，投以赞赏的目光，却以婉转的口吻拒绝了拜师的请求：“我从来不收弟子，也不会破例。你的字写得不错，很有天分，好好努力写吧。”情急之下李珖双膝跪倒在老人面前，表白自己的虔诚和求学的强烈愿望。名师虽不为所动，却指点他要不懈地读帖临帖，师法古人名帖，定能写出自己的字来。

坚持不懈地读帖，体会领悟书坛诸家笔下汉字的万千气象和独有的气韵；坚持不懈地临帖，腕上指间的功夫逐渐进入可以随心所欲表述自己心灵情感，兴趣和天性便开始升华，便开始脱颖而出，便进入书法艺术的既是必由之道，也带有独立体悟的新鲜途径。这其中的痴迷也已形成一种习惯性的自然状态，按时到工厂上班，业余保证每天有几个小时的临池挥毫，春夏秋冬季节转换而不止歇，终于有了崭露头角的一天，获得了全国书法大奖赛二等奖，时年二十四岁，一个小伙子的标志性年龄。

汉字书法作为一种艺术，历久而不衰，在世界各个民族创造的文字中是独有的。今天仍有中国少年业余练习毛笔字，首要的功能已不是交流和表述，而是纯粹作为书法艺术摊着时间苦练，且乐此不疲。李珖在临过读过百家名帖的过程中，功夫老到了，视野开阔了，重要的是心理结构也在诸家墨涸中形成健全自信的质地了。书法作为一门艺术，也和其他艺术循着基本相同的规律，即创造性。创造的核心是独自的富于开创意义的发现和新的境界的实现，心理质地决定着达到这一创造境地的关键。尤其是草书，是人的心理和精神世界的狂欢和舞蹈，墨汁的重轻急缓笔痕的显隐提落，更多的显示着心的律动和情怀的直抒，精神的飞扬尽在其中了，一般的技巧和功夫已不是进入这种境界的关键了。说得直白一点，一个龌龊心胸无论基本功如何扎实技巧如何娴熟，要进入这种创造性的境界是困难的，只会在匠气的包围里重复。我看李珖的狂草作品，首先敏感的是笔痕笔画间那种灵魂恣意张扬的气象，便可以感到一种心理质地的品格。他给我的启示就在这里，心理素质人格建构应该和临帖练笔同步发展。

我会写毛笔字，即用毛笔写出来的汉字，向来不敢称书法。在书法艺术界，我完全是门外汉。我之所以敢对草书大家李珖说三道四，其情形类近于看戏和演戏。我不会唱秦腔，却爱看爱听秦腔，看多了听多了也就能感知品尝各路流派名家独有的绝妙的韵味，而自己仍然是一句也唱不出来的。

相信李珖在业已进入的境界里恣意汪洋，还会创造新的境界。

2004年7月28日 二府庄

关中娃，岂止一个冷字

——读《立马中条》

近在我身边东侧的黄河三门峡，有两则远古神话流传下来。一是说三门峡的形成：水神在与火神打斗到崤山时陷入颓败之势，情急时便不择手段，调动天下之水将崤山方圆千里倾入汪洋，人真的“或为鱼鳖”或攀树求生。灭顶之灾中出来一位英雄，三板斧劈开三道豁口让洪水泄流，这就是人门、神门、鬼门的三门峡。这位英雄据说是共工，曾经头触不周山，又斧劈三门峡。那座至今依然挺立于急流中的被称为中流砥柱的石峰，作为神话英雄也作为现实英雄的象征，既令人遐思绵绵，也令人肃然起敬。另一则是英雄降伏妖孽的神话故事：齐景公行车到此，一匹拉偏套的马被黄河里突然跃出的一只巨鼋拖入水中，随行保镖古冶子当即跳下河去，斜行五里逆行三里追杀巨鼋，血染黄河。古冶子被尊称为古王，留下古王渡口和古王村传承至今。

我在尽可能简约地复述这两则很适宜给小学生讲述的神话故事时，是再三斟酌过必要性才不厌其烦地依此开篇。就在英雄与邪恶、英雄与妖孽进行过殊死搏斗的这个地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中国军人与日本侵略军也进行过一场长达两年多的战争。他们把不可一世妄言“三个月占领中国”的日本鬼子拒阻于潼关以外，使其进入关中掠占西北的梦想死于胎中。日本鬼子不仅未能踏进潼关一步，而且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仅“六·六”会战一役，日军排长以上军官的尸骨层层叠叠堆了一千七百多具。这是八年抗战中取得重大战果的战区之一。

这个战区在山西境内的中条山。

横刀立马中条山的中国军队的军团长，是杨虎城的爱将孙蔚如将军，西安东郊灞河北岸豁口村人；是让我引以为骄傲、敬重和亲近的前辈乡党。

孙蔚如将军麾下官兵，几乎是清一色的号称“冷娃”的关中子弟。

由徐剑铭等三位陕西本土作家创作的长篇纪实文学《立马中条》，叙写的就是六十多年前，孙蔚如将军率领关中子弟与日本侵略军血战中条山的一部英雄史诗。

我很早就阅读过几部抗日题材的小说，也看过不少同类题材的电影，地道战、地雷战、野火春风斗古城、小兵张嘎、游击队员李向阳、挥舞铡刀片子的史更新。这些在民族危亡时带有传奇色彩的英雄，一直储存在我的情感记忆里毫不减色，毫不受时世异变审美异变对这些作品评价的变化的影响。尽管如此，我还是坦率地说出我的阅读感受：在有关抗日战争题材的艺术品的阅览历程中，《立马中条》给我的冲击是最强烈的。我至今仍然无法找到几个准确的词汇来概括那种感受。我不排除与上至将军下到士兵近距离的乡谊乡情因素，战死了的和仍然健在的英雄，就在我曾去过多回或耳熟能详的大村小寨里。然而，我更确信一种千古不灭、人神共敬的精神——民族大义。这些关中将士无论性格性情具备什么样儿的地域性特质，在民族存亡的血战中，体现出来的凛然不可侵侮的大义，正是中华民族辉煌千古存立不灭的主体精神。

一条山沟一个村庄一个小镇反复争夺的殊死拼杀，使我的神经绷紧到几乎闭气；一位军官一位士兵的死亡，常使我闭上眼睛心情起伏

不忍续读下去；一场大捷一场小胜和一次挫折，使我的情绪骤然飙升起来，又跌入扼腕痛惜的深渊；每一个创造战场奇迹的英雄和每个壮烈倒下的英雄掠过眼前，我总是忍不住猜想这是哪个县哪个村子的孩子？当我清晰地意识到民族危亡里的大义，正是承担在我的周边乡党的肩头的时候，我的地域性的亲情和崇敬就是最敏感最自然的了。

就是在这种情感里，我阅读着《立马中条》，完全沉浸在一种悲壮的情怀里难以自拔。我自始至终都在心底里沉吟着两个字：英雄。每一个士兵都可以用英雄来称谓，几万士兵又铸成一个英雄群雕，使日本鬼子难越潼关一步。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士兵，昨天还在拉牛耕地或挥镰割麦，拴上牛绳放下镰刀走出柴门，走进军营换上军装开出潼关，就成为日本鬼子绝难前进一步的壁垒。他们之中的大多数可能只上过一两年私塾初识文字，有的可能是连自己的名字也不会认写的文盲，然而他们有一个关中的地域性禀赋：民族大义。这是农业文明开发最早的这块浸淫着儒家思想的土地，给他们精神和心理的赠予；纯粹文盲的父亲和母亲，在教给他们各种农活技能的同时，绝不忽视对国家和民族的忠诚和信义；在火炕上的粗布棉被里牙牙学语的时候，墙头和窗子飞进来的秦腔，就用大忠大奸大善大恶的强烈感情，对那小小的嫩嫩的心灵反复熏陶。一个“冷”字，怎能完全概括这块神奇的土地上一茬接一茬的“娃”的丰饶而深厚的内心世界和情感之湖哩！

只复述《立马中条》里的一个细节。

这是前文提到的“六·六”会战里的一个细节。177师有一千多名士兵被两倍于己的鬼子包围，经过拼杀后死亡二百人，余下的八百人被逼到黄河岸边的悬崖上，三面都是绝壁。这八百士兵在短暂的一瞬里从悬崖上跳了下去。下面是被称作母亲的黄河。黄河以母亲的慈爱襟

怀包裹了这八百个殊死搏斗后不齿投降的关中“冷娃”。他们都是十六岁至十八岁的孩子。他们从关中（也有少数山西河南）乡村投到孙蔚如麾下来，不是为了吃粮饱肚，而是为着打日本鬼子走进中条山的。他们没有一个人活下来。他们八百人集体投河的那一幕，被山里的村民看见了。活着的这个村民尤其清晰地记得最后一名士兵跳河的情景：悬崖上只剩下最后一个关中籍中国士兵，这是一位旗手。他的双手紧紧攥着他的部队的军旗。那是他和他的父亲和村民们崇拜着的杨虎城创建孙蔚如统率着的西北军的军旗。军旗已经被枪弹撕裂被硝烟熏染，他仍然双手高擎着。他在跳河前吼唱了几句秦腔。那位活着的当地村民还记得其中两句戏词，是《金沙滩》杨继业的两句——

两狼山——战胡儿啊……天摇地动——

好男儿——为国家——何惧——死——生啊……

孙蔚如将军率官兵在八百壮士跳河的河滩上举行公祭。黑纱缠臂。纸钱飘飘。香蜡被河风吹得明明灭灭。有人突然发现黄河水浪里有一杆军旗，诧异其为何不被河水冲走。士兵下河打捞这杆军旗时，拖出两具尸首来。旗杆从一个人的后背戳进去，穿透前胸，这是被称作鬼子的日本士兵的尸体；压在鬼子尸体上边还紧紧攥着旗杆的人，是中国士兵，就是那个吼着秦腔最后跳入黄河的旗手。

我在阅读《立马中条》书稿前，曾经听到过本书作者之一的张君祥先生讲述的这个细节。我久久无法化释那两具叠加在一起跃入黄河的中国士兵和被旗杆刺穿背胸的鬼子的具象。我在阅读《立马中条》重温这个过程时，突然联想到西汉大将军霍去病墓前“马踏匈奴”的石雕。后世的人们多是以艺术的眼光和角度，以惊叹的口吻欣赏两千年前的艺术家完成了精美绝伦的构图与雕刻，包括刀法的简洁都呈现着

一个时代一个民族的大气和壮气。两千年后一个中国关中籍的士兵，吼着秦腔，用手中仅有的一把旗杆刺穿日本侵略军一个士兵的胸膛，再把他压到黄河水底，作为祭旗的一个基座，让代表一个民族尊严的旗帜飘扬在黄河母亲的浪涛之中，其内涵和外延的最简单的意蕴，昭示着天地日月河岳之正气，正合着那座“马踏匈奴”石雕的现代版注释。

我十分自然地归结到关于英雄的命题上来。我在文章开头复述两则有关三门峡的神话故事，都是英雄主义的质地；我再复述八百壮士跳投黄河的一幕，却更像是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主义的神话故事。从三门峡开天辟地的神话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真实的神话，崇拜英雄，贯穿着整个民族心理的精神历程。我也自然想到，世界上几乎所有民族，都以最虔诚的感情，世世代代传递着、吟诵着他们的英雄。英雄总是在危难发生时挺身而出，直面不外乎自然的变异和邪恶势力制造的种种灾难。英雄是正义和善良的化身，驱除邪恶挽救生灵重开新境，使人类得以存在得以延续得以发展。这是一种永恒的精神，也是各个能够延续发展的民族共通共敬的精神。我可以以爷爷的姿态给已经上学的孙子讲三门峡的神话传说，也可以以“马踏匈奴”的雕像向朋友炫耀汉家气象，却绝难以相同的心绪和口吻去讲述那八百个跳入黄河的中国士兵的史实，还有那位旗手。他们都是从三秦大地这家那户的柴门或窑洞走出去进入抗日战场的娃，单是一个“冷”字，岂能概括得了！

我也只有在这本书稿的阅读中，鼻息可感地感知了孙蔚如将军。这位在我刚刚能解知人话的幼年时期就记住了的将军。我就读的西安市三十四中学，就是孙蔚如将军于一九三五年倡议并捐资兴建的，是西安东郊第一座中学。我的父亲和村子里的村民，我后来的中学同学

以及再后来的不少同事，都在传说着孙蔚如将军的故事。他们有的以见过孙蔚如为骄傲，有的以见过孙蔚如的嫡亲乃至旁亲都自豪得很，还有更权威的是孙蔚如将军的同村或同族或近门的人，就荣耀得令我羡慕了。我无缘一睹将军风采，却确确实实感受到一种纯粹民间的敬重和崇拜。这才是最真诚最原本的也是最可靠的社会心理情绪。没有任何功利目的，因而不会因为某些卑污的企图用心而改变，或动摇。一个为民族和国家于危亡时候横刀立马的将军，获得如此敬重和崇拜，不仅是合理的，更是这个民族——具体到关中这方地域的后世子孙的天地良心，不会改变。有这一点，孙蔚如将军就足以告慰九泉了。

我很感动三位作者以如此激扬的文字，书写了这一段史实；我很感动他们背着行李，自费进入中条山，踏访那场战事的知情者时所付出的艰难和忠诚。他们终于把这一场几乎被淡忘被淹没的史实钩沉出来，注入这个民族的血液，也注入这个民族的现实的记忆；作为杨虎城将军、孙蔚如将军和西北军将士的后人，也是一次精神的洗礼和灵魂的慰藉。

2004年9月4日 雍村

令人惊喜的阅读

无论在业余文学创作阶段，抑或后来以创作为专业，甚至可以肯定从喜欢上文学的少年时期开始，直到现在的大半生时间里，阅读成为几十年生命历程中永远都未发生厌倦情绪的生活内容。不说认识价值吧，不说对自己艺术视野的扩展和艺术手段的启示作用吧，还有一种最基本的业已形成习惯性的心理需要，任何一天如果没有阅读，似乎就有心理亏空，并由此而发生心虚乃至焦虑的生理反应。反过来说，期盼中的又是意料不到的令人惊喜的阅读，说感动震撼说启迪教诲说获益匪浅似乎都不完全到位，还有一种最基本的最普遍的功能，就是对人的心理调节和心境的扩展，对社会的某些丑恶对个人生活遭遇的龌龊，在那种美好的阅读感受里获得了不屑的自信。这大约才是阅读超越专业局限的最关键性功能，才是各个种族自古不衰的一种共同的生活内容。

二○○四年的国庆长假里，我有一次值得记忆也值得抒写的阅读，就是陕西省残疾人联合会和省作家协会联合举办的残疾人散文诗歌大赛获奖作品。这些作品远远超出了我的阅读期待，让我不仅惊喜而且惊诧，在残疾人这个特殊的群体里，有这样天性和资质优秀的诗人作家，创作出这样出色的诗歌和散文，令我欣喜令我深为感动的同时，也产生某种负疚，对残疾人这个特殊群体里的文学创作的关注，几乎是一种无意识的忽略。

我先是被“我能走路了”的一声呼喊感动得闭上眼睛。这是散文《行走的树》开篇写到的一个细节。一个腿脚有疾的孩子，直到五岁时才可以架着拐杖练习走步，她的母亲用一条红纱巾揽着她的腰予以

帮扶。当她在楼道上走过较长一段路程而止步时，才发现母亲早已悄悄抽去红纱巾在楼道的那一头对她笑着，她在感到恐惧的同时也爆发出狂欢："我能走路了！"我被这个五岁孩子的狂欢深深地震撼了。我有儿女也有孙子，我牵着他们的手学会走路。他们在甩开我的手独立行走的时候，我的愉悦是自然的，然而从未感受到这个五岁孩子第一次独立行走时发出的狂欢对我心灵的震撼。我的儿女和孙子与别的孩子一样，一岁左右学会走路是生理肌体发育的规律。而这个患有脚腿疾病的五岁孩子，第一次独立行走就有了战胜灾难人志胜天傲步天下的非同寻常的意义。而这种威震人心的鲜活的生命体验，也许只有这位生而不幸的五岁孩子才能感受得到，才能以恐惧伴着狂欢向这个世界呼喊出来。我便寄以最虔诚的祝福，这是一个有血性的孩子，五岁就显示出不甘匍匐在地的志气和血性，现在该当以更骄傲的自信向妈妈汇报："我是一个用文字向社会发言的作家了！"

赵林祥的《亮亮·木车·小鸟》，更像一篇精彩的小说。这篇作品在开篇叙述中的一个"晃荡"的词汇就把我的心揪住了。亮亮是一个因为延误医治而落下双下肢残疾的不幸的孩子，从此便以一根布带绑在父亲或母亲的脊背上，开始了漫长而不堪期待的人生之路："亮亮整天俯在爹精瘦的脊背上……看晃荡的天、晃荡的云彩、晃荡的日头，在风吹日晒的颠颠簸簸中睡睡醒醒。"一个绑背在大人脊背上的孩子，连独立行走拔草栽花和泥捏马跳绳弹球儿的自由也没有，而是随着大人脚步的快疾缓慢被动地活动着颠簸着，他看到的日头、云彩、土地、山原、河流、树木和大人小孩，都是晃荡的。好生动的一个"晃荡"！我在忍不住赞赏这个绝妙的词汇的同时，心里隐隐波动着对这个在晃荡里看世界的不幸孩子的凄婉之情。

这篇散文或者说短篇小说，最震撼我灵魂的一笔在小说的末尾。这个孩子后来渐大，在父母出山劳作的一天又一天一月又一月时日里，被搁置于一辆小木车车厢里，寂寞无奈里开始与头顶大树上的鸟儿对话，学会了各种山鸟美妙的叫声。鸟儿也与他为友，在他的小车上乃至他的头上肩上手上毫无顾忌地落脚。孩子和鸟儿一齐鸣唱，一幅人与自然超乎想象的和谐天趣。商人来了，与父亲交易成功，由这个孩子凭借绝技捉鸟卖钱……最后导致一个令人惊心动魄的场面，鸟儿在树枝间疯狂冲撞，撞死跌落在孩子的小木车上和周边的土地上，被孩子刚刚诱捕入竹笼的鸟儿同样疯狂冲撞，企图出笼，也企图撞死笼中……我读到此，几乎闭气。这样惨烈的情景对我的震撼不亚于地崩天裂洪水猛兽。

这篇作品提供给我们思量的内蕴丰富宏大而又十分单纯，人类关于良知的坚守和背叛。且不论父亲和儿子在这场惨烈的悲剧中各自角色的演变，单是这个逼近灵魂的命题就足以让人扪心自问了：在官场商场名利场上，是否曾经乃至依旧诱捕过诚信和良知之鸟儿？这篇作品写得含蓄、自然，故事类近寓言，却使人领受到真实，语言的简洁干净尤值得称许。

获奖的散文和诗歌，涉及社会生活诸多领域，面对土地，面对树木和绿叶，面对过去和现时，面对自己和社会，面对城市和乡村，面对红日和黑夜，作者们都以各自独特的视角和独有的感受，发出吟诵和抒写。让我确切感知到这些或因先天或因后祸致成残疾的弱势人群，在视野上是开阔的，在精神上是强大的，在情感上是敏锐细腻的，在关于生活的思考上是严肃的，有的已达到哲理的境界。他们与我们一样进行着思考进行着建设进行着创造，然而他们比我们要克服

更多的障碍，要付出更多的汗水，要具备更大的毅力。我向他们致礼。

这些作品里有一大部分都写到亲情，父母的爱，兄嫂的爱，同学亲友的关爱等。由于生理上的病残，需得方方面面的关照和扶助，比一般人感受亲情和关爱自然要切贴得多深刻得多，抒写这种感受已经成为一种情感和心理的需要。作家贺绪林得助于一位嫂嫂的几十年如一日的护理，早在乡里和文坛传为佳话。嫂嫂去世，那份心痛和情殇是不可不诉的。《遥寄天国的家书》，如泣如诉，感人至深，使人不仅看到一位贤惠的嫂嫂，更感到一位伟大女性博大深厚仁慈的襟怀。《岁月深处的孤灯》写一个残疾孩子对母亲的动人记忆。这篇作品没有局限在母爱和母子情感关系上，而是展开了更广阔的社会背景和幽深的历史文化背景，生动而深刻地解剖开一个封建宗法迷弥着的关中农村家庭关系的血肉脉络，显见其复杂和陈腐，行动的封锁和心灵的封闭。物质的匮乏和心理的压抑，后者比前者更不可忍受，这位母亲反抗了，宁可舍弃物质而要寻求心灵的自由，从残余宗法意识浓厚的父亲统治下的大瓦房反叛出来，甘愿进入一孔残破不堪的窑洞。大量的生活细节堪称精妙，让我相信作者杨晖敏感而又富于力度的观察生活的眼力。正是这些由作者直接观察直接掘获的生活细节，把一个浓厚宗法色彩的家庭里的君君臣臣父子婆媳间复杂关系，揭示得鲜活淋漓，一读便知这是从生活深层获得的真货，而不混同常见的那些伪造的生活细节或民风民俗之类。这位母亲读书的爱好和读书的情景包括读书时翻揭书页的动作，让我看到一个不甘平庸不甘无为而强烈追求精神自由的新乡村女性。中国女性追求自由争取平等的历程至少已有百年，这位母亲仍然在关中乡村的破窑里苦斗着。这样，我从这位母亲身上所感受到的，已不局限于她对残疾儿子的关爱和亲情，而是颇为丰富颇为厚重颇为深刻的社会生活内容。这当然是作者从一个残疾

孩子的视角提供给读者的，把一个极富个性的关中女人的鲜活形象树立起来，显示出作者敏锐的眼力，强有力的筛选本领和描写叙述的扎实功力。

真是一次令我惊喜而又振奋的阅读，在残疾人这个弱势群体里，有一批已经显示出极富天赋才华的作者。愿他们持之以恒，不断完成艺术探索之路上的突破，多出佳作，走进当代文学的队列，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

2004年10月7日 雍村

灿烂在创造里

——感动葛玮

爱看爱听秦腔，几乎是无可选择的事。肯定在尚不解知人事的混沌年纪，秦腔的音乐旋律和慷慨激越的吼唱，就成为心理接受的第一支乐曲，可能是村里某家过红事或白事请来的戏班子，也可能是扛犁牵牛走出村口的某个农民随口吼唱出来的。后来就跟着父亲到那些有实力也有人才能排得起戏的大村里去看戏。上中学时因为偏爱贪看任哲中的《周仁回府》被老师罚站在校门口示众。后来曾经有过来回步行一百华里从东郊到西安城看秦腔的壮举。然而，真正让我过足了秦腔戏瘾的一次，是二〇〇二年的春节期间。

正月初九晚上，陕西电视台最受观众欢迎的栏目之一《秦之声》，搞了整整一年的《戏迷大叫板》开始决赛，我被邀请为评委。此前接受这个头衔时颇多忐忑，虽然爱听爱看秦腔，却终究还是外行，没有专业知识就让我缺乏自信，害怕打分不准而亏了乃至坑了真正的优秀选手。而我又明知这十二位月冠军选手是从每月的四个周冠军中脱颖而出的，均是怀有绝技绝唱的佼佼者，仅选出一位有高额奖金的年度冠军，就有某种压力，因为还有无以数计的与评委同步观赏品评的秦腔迷们。葛玮给我鼓励，葛玮为我壮胆。我终于决定下来去担当这个评委的角色。当然，还有隐藏的一缕私心，就是想借此机会享受秦腔的韵味。十二位决赛者，有东路腔也有西路腔，有男有女，还有一位唱了一辈子戏而依旧保持着铁嗓子的七十余岁的业余老唱家。他们肯定都会拿出最得意最绝门的唱段一展风采，这样集中地欣赏多路流派唱腔的机会是不多的。这样，从正月初九到正月十五，每

天晚上我都沉浸在秦腔的旋律和唱腔之中，真正进入不知福祸不觉宠辱不管得失的忘情境地了。

就是这一回，我记住了葛玮，感动于葛玮，也钦佩这个小我许多岁的年轻人葛玮。

《秦之声》栏目创办多年，以各种灵活新鲜的形式呈现在观众面前，早已形成一个拥有相对稳定却也相当庞大的收视人群，影响早已扩展到西北五省，成为一个名牌栏目。葛玮到这个业已声名赫赫的栏目来，就更多地承受名牌的压力。他以热情和专注面对，搞出一个《戏迷大叫板》的赛事。叫板，在秦腔专业用语里，是演员起唱前叫响给乐队自己唱段的板路，在民间，叫板被衍生出带有挑战意味的流行语。每周有几位戏迷，实则属业余秦腔演员，同台竞争，评选出一位冠军；四位周冠军在月末再同台竞争演唱，评出月冠军；说定年末年初由十二位月冠军再同台决赛出一个年度冠军来。每一周每一月的竞争演唱，不仅把竞争者搞得心里早聚着一股劲，而且把观众从年头到年末都激发得热火朝天。在正月浓厚的春节气氛里，城市和乡村竟然形成了议论关心《戏迷大叫板》的热门话题，几乎不亚于球迷对中国足球队世界杯出线的关注。直到正月十五过小年的晚上，达到高潮，成为西安城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我因为当了评委，所到之处都被问及，深感秦腔仍然是西安人陕西人心里浓厚得无法淡化的情结，远远超出了对一部电影、一部小说的普遍性兴趣。应该说，这是《秦之声》名牌栏目的又一个高潮。这是葛玮和同人策划运作的成功实践。

大约从一九九四年起始直到这次《戏迷大叫板》，葛玮已经成功地策划导演过许多场大型文艺晚会的电视节目了。一九九四年，他给宝鸡电视台策划制作的春节晚会节目，被好几家省级电视台转播，出

手便崭露头角，那时他还是个小伙子。随后他给省台搞过几年的国庆文艺晚会和春节文艺晚会，以独特的思路和新颖的文化视觉，以及精粹的节目，赢得了普遍的赞誉，也为陕西电视台赢得声誉。我们在祥和的春节里期待着春节电视大餐，享受着别具一格的晚会节目带给我们和家人的快乐的时候，葛玮就是为城乡千家万户制造快乐的人。

这个为我们的生活制造快乐的葛玮，在拍摄一九九八年春节晚会节目的时候，母亲患癌症住院治疗，他难以在病榻前服侍尽孝，只能由家人代替了，直到病危的最后时限，他才挤出半天时间陪同母亲走过人生的最后驿站。我了知这件事时是十分感动的。我前述说到对葛玮的钦佩和敬重也是由此而生的。他以超人的意志抑制着母亲离去时寸断肝肠的痛苦，却全身心投入到为观众酝酿新春快乐的劳动中。我的敬重之情是对一种崇高精神的心理折服。

葛玮对电视艺术的痴迷是圈内人所共知的。葛玮在任何艰苦环境下，为完成拍摄任务所体现的拼命三郎的劲头，以及一丝不苟的精神，感动过许多与他联手合作的人。我觉得之所以如此，说到底还是关涉生命意义和人生价值的理解和取向来决定的。葛玮无疑属于创造型的价值取向，把自己的智慧和能量发挥到极尽处，努力争得对社会有所建树，有所创造，个人生命的价值就灿烂其中了。在这样强烈的精神心理支配下的生命形态，就体现为孜孜不倦地吸收接纳新的知识，凡承诺的事项绝不凑合，而是深谋远虑，如琢如磨，找到自己独到的绝招，就有了独立创造的另一番景观了。这是我所理解的葛玮。在今天，时世呈现着急功近利乃至投机获利的喧嚣声浪，我看到如葛玮这样踏实创造着建树着的青年，是颇以为鼓舞颇以为自豪的。社会的进步和文明的提升，正是依赖着这些以建设为生命意义的中坚力量

而获得实现的。葛玮赢得人们普遍的尊重是合乎情理的，这是古往今来任何一个时段里的社会正义。

这本可看作葛玮热情洋溢又披肝沥胆般的工作手记的书，当属今日以前的鉴证。相信葛玮追求的艺术事业会不断扩展新的天地，抵达新的艺术境界。这是不必置疑的，我满怀信心地期待着。

2004年10月21日 雍村

红烛泪 杜鹃血

为一位素昧平生只在照片上领略其风采的女作家作文说话的时候，我的心情颇不平静。昨天下午，我和她年过八旬的丈夫、剧作家王烈先生晤面，就在她和王烈曾经度过晚年时光的文艺家大厦的住宅里。我听着尽管有点耳背精神却依然健旺的王烈先生说她的往事，心情就波动起来了；尽管王烈叙说的口吻很平和，即使说到某些令人痛心令人发瘆的事情时，也基本保持着一种善良诚朴的平静，我反而在这种平静的叙述里感受到一种冲击。我就有点遗憾，有点懊悔，竟然没有机会和她结识：我和她都生活在西安，几十年了，却未能见上一面，以至在她谢世五年后，才得以从王烈的叙说里认识她了解她，才来写这篇追念她的文字。

她叫王纾。

王纾是一位作家，却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名字，我在陕西文学界大约有近三十年，一直都未听到过这个名字；然而，她的知名度却远非小小文坛几个名家所可比照。稍有点年岁的当代人大约都看过由巴金的短篇小说《团圆》改编的电影《英雄儿女》。这部电影在中国的城市和乡村播放过几十年，可以说家喻户晓人人都耳熟能详。凡看过这部电影的人，也肯定不会忘记那个在硝烟弥漫血肉飞迸的抗美援朝战场唱着京韵大鼓的漂亮的女文工团员王芳。这个飒爽英姿的女战士的原生活模特就是女文工团员王纾：尽管我不可能从巴金老先生那里取得考证，却也绝非臆测。巴金到朝鲜慰问和深入战地生活的大部分时间里，就和文工团员们吃住在一起。文工团中的团员各怀演艺绝技，能唱京韵大鼓的却只有王纾一个。王纾不单擅长演唱技艺，而且会编

创唱词唱段，她把朝鲜战场上我军战士的英雄事迹随时编写成京韵大鼓唱词，到连队、到病房、到弹雨炮火纷飞的战壕里去演唱，直接鼓舞着那些志愿军战士。王纾原籍北京，一口纯正的京腔，十足传神的京韵鼓调，成为志愿军指战员心中一只美丽的百灵鸟。想想看，有哪位名家能拥有《英雄儿女》电影里那位叫作王芳的女志愿军战士数以亿计的观众呢。作为艺术形象的王芳存储在起码两三代人的记忆里，而生活原型的王纾却在天才乍现之后被打成“右派”，跌入灾难的深渊。

王纾从朝鲜光荣归来，进入西安建国路作家协会的大院，即我现在生活和工作的这个院子。这是建成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的一个深宅大院，连续四进或五进砖木结构的四合院，青砖从前门一直铺到后门，院里有蜡梅白玉兰紫槿等当时颇为稀罕的名贵花木，主人是国军高级将领高桂滋，人称高公馆，南隔一条金家巷与规模更宏大建筑更讲究的张学良公馆相毗邻。一九三六年西安事变发生时，蒋介石曾在前院议事厅的东耳房套间里，度过了也许是他人生最难熬的三个夜晚，签订了“双十二协定”。解放后，起义有功的高桂滋将军成为新生的人民政府的领导干部，毫不犹豫地将自家的公馆捐献给人民政府了。刚刚成立的西北文联和稍后成立的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机关，被安排到这个舒适幽雅的大院，正应和着作家艺术家的性气和情调。这个院子一下子拥进来一批由延安和各解放区汇聚而来的大作家大诗人，开口闭口都是“主题、结构、人物”，少不了“革命现实主义革命浪漫主义”的争论，把昔日卫兵把门、警卫森严的军政要员出入的神秘大院，酝酿出一派神圣而又呈另一种神秘的气氛：由延安到西安的早已蜚声国内文坛的诗人柯仲平，跟着刘伯承、邓小平二野转战的诗人胡征，刚刚以《保卫延安》震撼新中国文坛的青年作家杜鹏程，已经出版两部长篇小说《种谷记》《铜墙铁壁》的同样声名赫赫的作家柳

青，诗人魏钢焰，文艺理论家胡采，以及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王汶石、余念、李若冰，理论家王愚，等等。王纾在朝鲜停战后回到她的十九军驻地西安，一九五五年退役后安排到刚刚成立一年的中国作协西安分会工作，进入了大家云集的这个大院。我猜想，曾经先后两次获得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务委员会授予的军功章，在朝鲜战地和在国内慰问演出中多次获奖的王纾，之所以高兴到这个只适宜作家生存、创造、发展的大院来，恐怕也是那根对文字尤为敏感尤为钟情的神经。她到来时，这个以大行政区——西北局设立的作家协会，刚刚成立一年，凭她在朝鲜战场编创的尽管数量很大尽管深受欢迎尽管获奖立功的各种演唱曲艺作品，还是不能成为专业作家的资本，她是作为为作家服务的行政工作人员，以她勤勤恳恳认认真真却也雷厉风行的军人作风做着事无巨细的工作。

她却一刻也没有忘记创作。她把业余时间投入到读书和写作里。她知道她写过的那些演唱作品类属于曲艺，不属纯粹的文学；纯粹的文学作品单指诗歌小说和散文。她已经开始写小说。她的小说习作在西安仅有的两家大报——省报和市报的文艺副刊版上发表，然而在这个大院里几乎没有任何反应。这个大院里人们欣赏的兴奋点聚焦在《保卫延安》、《铜墙铁壁》、《大进军》（胡征）、《草鞋进行曲》（魏钢焰）等作品的高水准上，报纸副刊上几千字的短篇小说很难满足这个大院里的品尝胃口的，甚至进入不了他们的眼角。然而，这些最初创作的作品对王纾却是重要的，标志着她已经从曲艺创作思维转换到小说的艺术方式上来了，紧接着便以短篇小说《大尉》在这个大院里引发了响动。作品刚刚在《延河》杂志发表，首先使热情洋溢激情豪壮的杜鹏程欢呼起来。曾经在《延河》当编辑的词论家王愚，四十多年后依然记得那动人的一幕，他写道：“已经名闻遐迩的著名作家杜鹏程同志，到《延河》编辑部来说，刊物发了一篇好小说

《大尉》，可见作协大院人才济济。他当时连用‘难得难得’加以赞赏。”实际上，《大尉》在编辑部审阅过程中早已引起普遍兴奋，赞赏有加。王纾自然被大家刮目相看，这是一九五七年夏天的事。这篇令大作家杜鹏程等大加赞赏的作品，稍后就被骤然掀起的“反右”的震天声浪淹没了。王纾被打成“右派”，不在一九五七年之列，而是在“反右”运动业已结束一年转入“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补划的，据说是以牺牲她补足划定“右派”的比例。王纾为什么会被打成“右派”，乃至整个“反右”运动，人们现在已经懒得再说什么，这是人们对荒谬的一种最蔑视的不屑。

我是最近才读到《大尉》这篇小说的，距其问世的一九五七年差不多半个世纪了。小说涉及战争与人，即人的命运，爱和人性的命题。我惊讶的是在烽火连天的战壕里，自编自演着英雄主义唱段的王纾，坐在高公馆的大院里已经进入战争与人的命题的思考，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文坛，应该是一颗独到思维的脑袋。我便自然设想，如果没有“反右”而致使这颗智慧的脑袋中止思考，王纾会有怎样振奋人心的创造都是可以期待的。然而，似春光乍泄，似昙花一现，便就地封喉。

这一年王纾二十七岁。她经历了整个朝鲜战争。她以自己天赋的智慧和歌喉唱遍了整个西线战区。她以独到的视角和独立的思维刚刚发表了第一篇小说。她戴着一顶“右派”的帽子走向监狱。她已经爬上火车。青年剧作家王烈抱着刚满一岁的儿子在站台上送行。夫妻母子泪眼对着泪眼告别。年过八旬的王烈给我说到这个生离死别的情景时，一瞬间，失掉了平静，声音颤抖。王纾到秦岭深入一个偏僻的山村接受改造。这方山区以麻风病流行而闻名，人们把不幸染病的人撵出村子逐入山野，让其自生自灭，避免传染。王纾发觉晾晒的衣服被

人偷走了，就跟踪追去。且不说能否再购买得起新衣，布票在当时是最大的限制。她穷追不舍一直追到杳无人迹的深山，偷衣人钻进一个浅陋的崖洞，她才发现这是个麻风病人，几乎赤裸如野人。她声明不要衣服了，还把身上几个口袋全部翻开，把所有钱币送给那位偷衣服的山民……王纾经历了怎样的肉体和心灵的磨炼，我已不想赘述，因为“反右”和“文革”遭遇灾难的人所倾诉的让人不堪听读的事实，早已“屡见不鲜”了。我的这种心理感受，是前年阅读从维熙老兄《走向混沌》之后发生的生理反应。我在乡下祖居的老屋读这部书的时候，正值关中热死狗的夏天。我读着读着却总是下意识地倒抽冷气，不时闭上眼睛，喉咙噎得咽不下唾液。我本能地钦佩从兄忍受折磨的生理机能，其次才想到关于活下去的精神支撑力的强弱因素。我之后就决定再不看这类书了。我相信自己不会软弱到不敢面对昨天，实在是对心灵刺激太过残忍，单是生理性的心理感觉也承受不住。我在面对与从维熙同样遭遇的同代人王纾的灾难历程时，两年前阅读《走向混沌》的感觉又如黑雾一样弥漫于心。

比起从维熙长达二十年的囚狱折磨，王纾还算是幸运的一个。三年之后的一九六一年，她被摘去了“右派”帽子，从秦巴山地回到西安。她没有再进那个高公馆大院，那是伤心之地；她到西安市曲艺剧团去了。这不仅是工作单位的变化，而是她重新完成了一次艺术道路的选择。她不再写小说了，《大尉》留给自己也留给文坛一个绝唱。她重新回到曲艺创作的轨道上去了。我作为一个喜欢小说创作的作家，本能地发生深深的遗憾和惋惜，一个已经呈现出天才征象的小说家逃离了。她重新操起京韵大鼓，又是自己创作自己登台演出；她已不单擅长那一只鼓，很快操练熟悉了山东快书、山东琴书、梅花大鼓、河南坠子、陕西快板、陕西快书，如此等等。她一个人创作完成了配合宣传中心的几个专场的多种曲艺节目，诸如《焦裕禄》《欧阳

海》《雷锋》《刑场上的婚礼》等。她在这一时期的曲艺创作呈巅峰状态。我看到她的创作天赋、演出天赋的同时，自然想到她的创作和演出的激情。且不说单篇零星创作，即如这四个专场的人物，都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全国人民学习的榜样，王纾在很短的时间里配合党的宣传中心及时拿出一个又一个专场，我便想到她对英雄她对革命的激情来自精神和心灵深处，绝不会是在闭塞的山村的惩罚性劳动改造所能发生的，我便想到戴在她曾经戴过军帽的头上的“右派”帽子，当为一种讽刺。

我与王纾的丈夫王烈是二十多年前认识的。我们应邀结伴到甘肃庆阳地区的长庆油田驻地去。我早已知道他在戏剧创作上的实力，其话剧和秦腔剧本的魅力，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现在依然不衰。我在与他相处的一周时间里，看见的总是不慌不急的脚步，永不消失的笑眯眯的眼睛，曾经暗自猜想，这是一个少年得志卓有成就生活也就优裕的城市人，无论如何也没有想到他有这样的家庭灾难。直到二十多年后的昨天，他说在王纾被劳改的三年时间里，他是“又当爹又当娘”抚养一岁的儿子，我突然想到，他的沉稳和笑脸，如果除去先天因素，当是经过太多折磨之后的平静和不惊。

我没有太多问及他们夫妻间的生活过程。我已经感知到这是一对堪称模范的夫妻，是由王纾诗文集里领略的：一对夫妻，两个作家，联手创作剧本，互相赠诗酬答，真可谓珠联璧合。尤其是在王纾身拘山地不得自由的年月，他们通信中以诗词相敬赠，鼓舞激励，传达着爱心与温暖，成为渡过劫难的精神支柱。我看到王纾的诗词里习惯性地称王烈为“烈兄”，可见情感里的一般和非同一般。

王烈已到八旬高龄。在王纾谢世后，已经编辑整理出版了《王烈王纾剧作选》《腊月桃——王纾诗文集》，现在即将出版《王纾小说

选》，约我为王纾的小说创作说话。我在听他介绍了王纾之后就坦言，我想更多地说说王纾这个作家本人。我在那一瞬，突然记起王蒙一句话，他说每一个中国人的经历就是一部当代史（大意）。我很折服这句话。王纾的人生经历，光荣和侮辱，天才和无为，幸福和痛苦，有幸和不幸，阳光和冰窟，等等，正是一部生活发展的真实历史。我把她的生命历程简单记叙下来，不单是对她的祭奠，也不单是对王烈老先生的敬重，更是为自己竖起一块警示牌，不可荒废了当下的光阴。

（注：文题来自王纾七绝。）

2004年11月5日 雍村

难以化解的灼痛

——读陈行之新作《危险的移动》

习惯上被称作“中国的文艺复兴”的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陕西涌现出一批颇引人注目的青年作家。那时候属于中国社会（也包括文学在内）的破禁解冻时期，文坛和整个社会一样呈现着新思维的巨大活力，这些高涨着诗性激情的青年作家初出茅庐，创造欲望表现欲望求索欲望都十分强烈。每有集会，这些来自黄土高原、关中平原、秦岭山区和汉中盆地的作家聚到一起，用陕西三大地理板块差异很大的语气和发音，竞相对刚刚出现的新文学流派坦率发言，或者向大家介绍自己刚刚读过的某部翻译小说的新鲜感觉。无论那些地域方言的发音如何大相径庭，有一个字的发音却是一致的，就是把“我”字发出类似“俄”的声音。北至长城毛乌素大沙漠，南到秦岭巴山的汉水坝子，以及被称作帝王之都的渭河平原，竟然以“我”字完全相同的发音标志出一条共有的基本特征。

在这一群用“俄——俄——”的发音慷慨激昂或沉稳睿智或俏皮尖刻地表述各自见解的青年作家中间，出现一个操最标准京腔的人，反而让众人感到陌生，感到有点儿不大协调。这个用京腔说话的人就是陈行之。

尽管陕西籍青年作家走出潼关，走到南方北方东部西部，常常会因“俄——俄”的奇怪发音引起好奇者的模仿和善意的嘲弄，然而，在陕西境内的聚会里，陈行之纯熟顺溜的京腔却成为不合时宜不合地宜的弱势音响。有玩笑说，一窝土蚂蚱把一只洋蚂蚱箍住了。

其实，这只洋蚂蚱和这窝土蚂蚱早已融会贯通为一体，他甚至已经与其中的一些人成为莫逆之交。

陈行之在这一茬刚刚冒出的青年作家群里，属于更年轻的一位。他获得大家的尊重，首先是因为他的创作实力，确切点儿说，是出手不凡的创作实力。他的中篇小说处女作《小路》在颇有文学资历的《延河》发表，曾经引起这个青年作家群体的热烈反响，后来，《小说选刊》又隆重推荐给了全国的读者。素来只发表短篇小说的《延河》破例分两期发表《小路》，也获得了作家们的敬重，被赞誉为既有文学眼光识得好货又有博大胸襟不惜破格推出新人佳作的伯乐。

陈行之这一时期的创作属于青春激情诗性的喷发期，单是中篇小说就接连发表了十一部，还发表了不少短篇小说，他是那种才思敏捷并且高产的青年作家。这批作品从题材上大体可以划分为三类：

前两类为知青题材和陕北题材，这两类题材有明显的差异，也有无法剥别的筋脉拉连。陈行之从北京到陕北插队时，尚属从少年到青年过渡的那个稚嫩而微妙的生命区段，突然从首都北京踏进荒原秃山连绵不尽的黄土高原，从窗明几净的北京学堂进入用麻纸糊着窗格的昏暗的土窑，嚼咽土豆和苞谷小米，从事砍柴放羊抡镢挥锨的纯体力劳动，生活带给他的那种复杂感受，肯定要比落生在土窑火炕上的当地作家更强烈更敏锐，会获得更独到的生活视角。他写与他一同走进陕北的洋蚂蚱们在艰难困苦的生活环境里心灵和精神所经受的炼狱般的洗礼，也写他们看到感受到的男女土蚂蚱们的生存形态，写他们对明天的期待，对理想的追求，对爱的渴望……陈行之是外来人，是洋蚂蚱，他虽不及当地作家对生活习俗的熟悉，却也避免了因为司空见惯而导致的麻木和不敏感，以及囿于一隅的视野狭窄和思维局限，多了一种新鲜和敏锐，多了一种较为开阔的眼光和更富活力的思维，这

就使得他的作品呈现出明显区别于同样以黄土地为题材的当地作家作品的气象，别具一格，独成一景，令人耳目一新。

陈行之的眼光和思维没有完全专注于黄土高原，他同时还投注于急遽变化的社会生活，这就有了他写作的第三类：关注社会与人生题材的作品。中篇小说《生者与死者》在《当代》一经发表，就引发了较大反响，我也受到了震撼与启迪。就这部写作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作品而言，应该说，他是较早提出不正常的社会生活对人产生异化这个尖锐命题的作家。

上述三类题材的作品尽管生活层面上的距离较远差异很大，然而有一个共同的灵魂徘徊其中，这就是：陈行之对社会和人如何求得健全发展的生存形态的思考。这既显现着作家的襟怀，也蕴含着作家超前的思想。这是一个作家艺术个性的最重要最具价值的标志——独立体验所获得的独特发现。陈行之在喷涌般写作的同时，还在陕西人民出版社编辑大型文学双月刊《文学家》。《文学家》是至今仍令我这一茬年龄的陕西作家以温情兼着遗憾缅怀着的杂志。陈行之在《文学家》主事的时候，有一件事影响颇大：给陕西作家开辟专辑，有作品，有言论，有评价，有作家写真，一位作家一个专辑，占去一期刊物四十万字的大部分版面，让读者全面了解一位作家的作品和他的成长道路。此举对刚刚形成影响的陕西青年作家群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贾平凹、路遥等都上过这个专辑，我也是幸运者之一。

土蚂蚱们敬重亲近这只洋蚂蚱，在于这只洋蚂蚱的文学之心文学之情是博大的也是纯真的，他自己在努力写作着，同时也在努力把他的同代朋友推荐出去，扩大他们的影响和知名度。这是一个人的人品、修养和精神境界的表现。

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陈行之工作调动到北京，我和朋友们以一种颇为矛盾的心情为他送行，既乐见于他到更广阔的世界去发展作为——北京毕竟天高地阔，并且是他的故土——也怀有走失一位好编辑好作家兼好朋友的缺憾。

十年以后，陈行之把这部名为《危险的移动》的长篇小说书稿寄我，读罢有诸多的感动和慨叹，最强烈的竟然是一种难以抑止的灼痛。其实，在整个阅读过程中，通过书中几个主要人物生活轨迹所呈现的波动起伏的心理脉象，就已经常常使作为读者的我忍不住吁出一口气来，惊叹这脉象正暗合着生活深层无形无序却得意地运行着的潜流的征候，触目惊心却无法捕捉，感知到灼痛却只能哑口。我很钦佩陈行之的这一双眼睛，这是一双既敏感又富于穿透力的眼睛。

关注生活的发展变异，把握生活运动的脉象，是现实主义作家的天然属性和自然要求。陈行之面对纷繁的生活世相，显示出独特敏锐的眼光，又聚焦于一个独特的视角，营造出了一个接近于生活原生态的世界。《危险的移动》避开时下依然持续热着的“官场小说”的写法，选取处于纯官场边缘的一个“单位”下笔，深入到人物的心灵深处，从“脚趾”上把握和触摸到了心脏搏动的脉象。

作家切入生活的视角，决定于作家感知生活的社会位置和角度以及艺术表现的种种需要与斟酌。陈行之在《危险的移动》里几乎没有涉及赤裸裸的权钱交易，也没有肮脏的权色交易，他描述和展现的只是权力网里人与人极其微妙的所谓“关系”，处在这张网各个位置上的角色，在承上在启下在平行的关系里纵横捭阖的技巧，或者说一种别具特色的生存智慧。

在这张关系网里，有人把生存智慧和生存技巧演练到超绝如魔术戏法般天衣无缝，而表演过程也如魔术大师一样从容不迫矜持自如，然而却与魔术师仅仅只是取悦观众的小小目的大相径庭——发展自己扭曲对方，笑眯眯地置对方于死地而绝不心跳。被扭曲被置于死地者眼瞪得老大却找不到看不出哪儿出了毛病，接受扭曲接受龌龊的结局却说不出话来。

作为读者的我跳出被扭曲被龌龊者的具体局限，从最浅显一层说，人把天赋的智慧用到事业上的比例极小，而把智慧里最精彩的部分发挥到扭曲别人的功能上去了，这是一种浪费；稍微往深里想，这类富于生存技巧的人，已经形成生活深层里的一股潜流，得意地舞蹈于神圣的法典庄严的党纪政纪之下，而又不露声色，构成亵渎和蔑视社会公正和社会道德的极其危险的破坏力，即所谓潜规则。《危险的移动》演绎着解析着的正是这种潜规则运动的全过程。

陈行之以敏锐的眼力，把隐蔽在这一过程里的曲里拐弯的运行轨迹展示得惟妙惟肖；他以非凡的思想穿透力，把隐藏在其中的心灵污秽人格龌龊，解析得如丝如缕。我真切地感知到这种东西在当代现实生活里无声无响的渗透力，真切地感知到它对民族心理结构必然导致的异变和溃散。只是在这时，我才领悟到那个“移动”的“危险”的意蕴。这种危险较之于百万千万的权力金钱交易的危险，可能更具破坏力，它游走在各种法典条律和公共道德评价之外，以至于使整个社会健康健全的运行机制空转。尽管本书没有大起大落的大事件大情节，却使我心灵深处感受到惊心动魄，后脊发凉，含混着难以化解的灼痛。

《危险的移动》无疑是把握住了生活发展到今天的脉象的作品。陈行之呈现给我们的令人灼痛的“危险”，自然在于引起社会的审视；

处在这种“危险”中而不自觉或者麻木，又是更深一层的“危险”。这里，我又感知到作家陈行之面对生活面对民族未来的强烈的责任心，由此而理解作家保持思维的敏锐性和思想穿透力的原动力。这是作家应当获得社会和读者尊重的根本原因之一。

《危险的移动》的骨架是现实主义的，有一个大致依时序发展的故事，其中几个主要人物性格的刻画，有一种鞭辟入里的透彻和鲜明，成为诱惑和引发我阅读兴趣的关键。我在翻译作品和本土作品的阅读选择中，最易引发兴趣的是对过去或正在进行的生活发出透辟有力的独自声音，人物形象心灵历程让我发出呼应以至称绝的作品。那一刻，我会感到自己被点亮了，从混沌里一下子走了出来，被提升到一个新的境界，我会充分感受到小说阅读的意义和美的享受。《危险的移动》的阅读即如此。

时下的有些小说似乎陷入了某种误区，成堆成垛地堆积铺排某些陈腐的生活习俗，某些怪异的甚至不堪的细节，还要罩上一缕魔幻的时髦色彩，以为这就是文化。我感觉到了这类作品里思想力量的软弱，自然很难唤起阅读的兴趣。《危险的移动》卓尔不群，就在于作者所揭示的人物心灵各个层面的逼真和鲜活，这是陈行之的独自发现，也是我对现实主义创作获得自信的一个文本。

《危险的移动》的语言魅力，是不断激发我阅读的重要诱因。通畅准确的叙述语言，富于弹性和质感，通体呈现着睿智与沉静的叙述姿态，可以看到隐藏在文字背后的作者的情怀。人物对话的精彩，取决于对各个角色心理脉象的准确把握。准确才有生动，才有个性的突显，才有艺术的质感，才会对读者产生可信和阅读兴趣的诱发。我在感知陈行之透视人物心灵隐秘的敏锐的同时，也很钦佩其语言表述的老到自如。它绝不是那种时下常见的为显示语言风格而故意强做出来

的矫情语态。语言是小说的载体也是作家手中的工具，是作家完成创造的最直观最外化的形态。作家在酝酿某种新的创作时的诸多图谋和设想中，大到鸿篇巨制，小到千字短章，都有一个语言选择的过程，即要选择寻找到最适宜表述新的人物新的体验新的情绪的语言结构和语言姿态。这是写作者的常识，也是写作者的基本功夫。鲁迅不可能用写阿Q的文字去写祥林嫂，也难以用《秋夜》的语言去写《社戏》。陈行之在《危险的移动》中选择了负载半官半文知识分子生活形态心理情绪的最恰当的小说语言，透见出作者对他们的态度和情绪，如同我们从鲁迅截然不同的文字形态里感知他对阿Q和祥林嫂决然不同的情绪一样。从过去读陈行之的中短篇小说得到的印象，到这次再读《危险的移动》，单就语言而言，他的确完成了一次成功的飞跃。语言风格的选择或者形成，从纯粹写作的角度来说，当是作家走向成熟并彰显成熟个性魅力的重要标志。

在我的印象里，陈行之从小说创作发轫之初，就是一位呈现着直面社会直面人生姿态的作家。《危险的移动》最终证明他的眼睛一直关注着社会现实。他的笔触一直没有离开当代社会的潮涌和病相。

我想到杰克·伦敦。人们评价他是一位“终生都把手指紧紧按住生活脉搏”的伟大作家。我喜欢这样的作家和他们对生活有独到开掘的作品，自然与我写作的兴奋点趋同有关，绝无排斥和轻视那类虫鸟花草趣味的作品的意思，读者欣赏趣味的需要是多向的，触发作家创作的兴奋点也是大相径庭的。然而，读者群中确有较大一个群体喜欢阅读离自己生活的时代较近的作品，尤其是对既富于前进活力又呈现着某些纷繁浑浊的时下生活发出深刻的独自声音的作品。

《危险的移动》当属这类杰作，相信它会引起读者的共鸣。

2004年12月9日 二府庄

一种气质，鲜嫩和灿烂

——罗贯生山水画印象

早晨正要出门，作家徐岳电话约我到他家小停。我住二楼，他在同一门洞的一楼，扣下电话说到就到了。敲开门就看见徐岳那张让我看了三十年的谦和诚厚的笑脸，身旁稍后站着一位壮实的中年人，浓眉乌发，鼻挺唇厚，尽管诚恳地笑着，依然可以看出眼里专注沉稳的底色。徐岳介绍说，这是他的故乡岐山的乡党，在蔡家坡文化馆任馆长，是一位画家，让我欣赏他的画作，末了才说他叫罗贯生。

画儿便打开，铺展在徐岳的床上。徐岳的屋子里没有可以铺开一张画作的稍大的书案，为了看得更好，取得一个对面平视的较佳欣赏效果，徐与罗就把画儿从两边拎起来，在墙壁前展开，一张一张五彩斑斓的山水画面，在我眼前迭出渭北高原热烈壮美的景观。我在最初触及这些色彩的直接感受是震惊，随之便沉醉在渭北山水美的韵致和惹眼动心的色彩之中了。

我说最初看见罗贯生的画面时有震惊的感觉，丝毫也不是夸饰，而是真实的心理感受。人在始料未及的超出习惯性欣赏期待的艺术景观出现的时候，尤其是一种大美突兀展示在眼前的时候，由惊诧而引发的震惊就是一种很自然的情绪波动了。我不会画画儿，完全是外行，多年来有意无意间还是看过不少国画，包括古典和当代名家的名画。国画里的山水画，在我多年无意形成的印象里，或险峰奇树，或小桥流水，或一角古刹翘檐半壁角亭，或老僧侧影丽妇远像牧童牛背横笛，笔墨有重有轻有显有淡，更有密不透风把墨汁泼洒得黑天昏

地，各有各的绝妙笔法，各有各的意趣。然而像罗贯生这样鲜红嫩绿天蓝橙黄雪白的色彩交融，在我确属罕见；尤其是画面多取之于我情感记忆里极易触动极其敏感的渭北山水，惊诧到震撼就很自然地发生了，而且勾起诗意绵绵的记忆。舒缓漫远地起伏着的原坡的线条，冬天满眼的银装素裹，清明时节染遍平川和原坡的葱绿，一夜之间突暴出来，耀眼的无边无际的金色麦浪，沟坡土崖上从春到秋不断变幻色彩的野花，黄的红的紫的粉的白的花儿此谢彼绽，热烈地宣示着生命的灿烂和美丽。我似乎见过关涉渭北生活的山水画儿，多是强调着残破和凄悲，自然无可厚非。我在罗贯生的画作里，却感受到渭北高原来自黄土深层的生命的律动，生命的色彩，生命的大壮和大美。大自然赐予渭北高原独具的雄浑和优雅，舒展的襟怀，庄重而不失灵动丰富的气韵，准确地把脉到笔头，生动地勾勒渲染得淋漓尽致。让我如饮美酒，如听秦腔，在交融里沉吟沉醉。

《渭北春早》里坡地上看似随意描抹的一片片一绺绺嫩黄，《春》里从地表到树梢涂染的嫩黄和嫩绿的水乳交融，到《春谷天籁》已过渡到晚春的葱绿，无意间完成了渭北大地从苏醒到生机勃发的春天的旋律，可以感知画家罗贯生关于绿色生命的激情和诗性。再看《秋韵》和《一夜西风染霜林》，一丛丛一道道红透的丛林，尽情渲染着大地孕育的生命成熟季节的华美，丰盛饱满的襟怀，正可以当作画家罗贯生的生命追求生命哲学来解读。前人和今人画过多少名山的红叶，却很难产生渭北大地如此炽烈如此诚挚的火焰般的生命激情。且不说西风凋零枯树寒鸦断崖残豁的凄楚和恓惶。

欣赏罗贯生的渭北山水画，我很自然联想到作家的创作。经历着基本相同的时代背景，甚至同时段同地域的乡村或城市生活，不同的作家创作出来的作品却截然差异着题旨和意趣，人们可以对比出造成

这种差异的种种因素，诸如艺术流派生活角度文字风格等等。我觉得还有尤为重要的一条，即作家独禀的气质，决定着作品从题旨到文字的基本风貌和总体成色品相。画家作画似乎类同作家写作，气质是决定色彩的浓淡和线条转折的关键，决定着画面的构图和气氛的冷与暖。技巧可以传继和借鉴，师承可以不断变换，而作家和画家的气质禀赋，却是无法借鉴承传，更难以改易的，它只属于这一个画家或作家个人，自然也有逐步发展逐渐成熟成型的过程。画家独禀的气质，决定着他眼睛观察事物的敏锐性和兴奋点，决定着他取此舍彼的选择标志，决定着他用画笔和色彩张扬什么彰显什么突现什么，兴趣和倾向都构成气质的重要内涵。这样，我就破译出隐蔽在罗贯生渭北山水画中春也生机盎然秋也生机勃勃的密码，即几近本能地热爱生命敬重生命，必然发生抒写生命张扬生命的不可抑止和改易的创作欲望。这不单是情感因素。同样热爱着渭北大地的人，却完全可能以残沟衰草的画面发出悲凄的咏叹，这同样发自于情感。决定情感倾向更深层的更内在的东西，是画家（抑或作家）的气质。

许多知名画家和鉴赏家对罗贯生山水画的评点，颇为集中的一点，是对山水画艺术的创新。我便庆幸我这个外行和名家们的欣赏感受“所见略同”了，开头所述的包括震惊的感觉，就发自那一派全新的艺术景观。创新被看作各种艺术创造活动的生命，罗贯生完全跳出因袭传统的窠臼，既获得了创造的活力，也获得了山水画创作的生命力，新的境界的开拓是艺术存活的关键。我对罗贯生的艺术独创精神深为钦敬。

从个人习性上说，我更喜欢在住宅里挂一张如罗贯生渭北大地生机勃勃的图画，任何时候瞥上一眼，就会有鲜活的嫩绿浸润心灵，就会有灿烂的红叶为人注入一股壮气，就会时时感受大地的气脉，当是

一种心理和精神的滋养。于是我便忍不住破了戒，向罗贯生讨要一幅画。我深知画家的画比不得书刊可以随意印刷，原作仅就一张，尤其是得意之作，怎么能随意讨要呢，且不说市场价值。这样，我至今只向一位画家开了一次口，确是忍不住喜爱之情。罗贯生慨然赐予。这幅浸漫着盎然生机的绿色画儿，便给新居室里终年渲染着春天渭北大地的气韵。

2005年4月10日 雍村

思辨决定形式

——从一部小说说起

读《容颜在昨夜老去》这个作品，我还真的引了震动，这不是虚假的话。作品读到一半，越往后，人物命运的发展趋向和归宿过程中，当看到那些心灵越来越扭曲的时候，就让我很揪心了。开始读这部小说时，能感觉到一个个都很纯洁可爱的灵魂，在四年大学即将结束的时候，都扭曲得不像个人样子了，每一人物都有令人惊讶的扭曲轨迹。他们企图扭曲别人，最后也扭曲了自己，各种形态，读来令人揪心令人痛苦。应该说在去年以来的有限阅读中，有两部作品对我产生过这样强烈的心理冲击，其中一部就是雷电的这个《容颜在昨夜老去》。阅读期待各人都不一样，有个性、兴趣、审美的差异。我的阅读期待，起码在《容颜在昨夜老去》这一部小说里得到了很大满足。你对生活和社会有同样的感觉而欲说不能或者说不大清的时候，有一种理论或一部文学作品，它给你提供了认识这一段生活的点示或生动的参照，在心里真实地感受到了，自然就会发生这种心灵共鸣，这种期待在雷电这部小说的阅读中是完成了。

这个作品尽管说晚发表了近二十年，或者说跟我们今天的生活有二十年的距离了，但它揭示出的新的生活矛盾，对人的心灵的扭曲，到今天并没有消除，而是演变为更复杂更隐蔽的方式了。今天生活运动里潜伏的丑恶，远远超出了八十年代，这些丑恶的东西在生活的各个层面上扭曲着人。八十年代王守信贪污三十多万元就枪毙了，《人妖之间》震撼了整个中国，现在非法贪占三十多万元恐怕很难引起谁的关注了。对腐败现象的见怪不惊，是我们的心理承受力增加了，还

是我们麻木了冷漠了，抑或也被扭曲了！我觉得这个作品提出的生活问题是严峻的，用文学作品对生活发问，引起社会的警示，也是文学的一种力量。《容颜在昨夜老去》就显示着这种力量，如我这样的读者才感受到心灵的巨大冲击，表明作家是严肃的。不管文字形式如何，属于非常严肃的一部作品。

我没上过大学，对大学的感觉至今都是很神秘、神圣的，某种心理遗憾一直到现在都存在着。有些大学请我去讲创作，上人家讲台总有些不自信，既充满神圣感，也夹裹着慌恐。我想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发展，应该说更多地依赖于大学为社会培养各方面的精英人才。谁再骄傲自大，恐怕都不敢藐视大学教育。所以这部小说对上世纪八十年代大学教育状态的揭示，在一定程度上使我对大学那种神秘感受到了冲击，几个人物的心灵异变和扭曲尤其令我关注，原因正基于此。或者说是解构但不是完全的解构。不管东门还是西门这两个很生动的人物，在我感觉也只是两个艺术形象。作为艺术形象去分析的时候，雷电就为我们创造了“这一个”，一个富于八十年代时代特质的心理层面的人物形象。学校本来是培养最纯洁的人，最有知识的人，有理想的人，有人格尊严的人。学生肯定在知识层面都获得了各自的满足吧，而面临毕业分配，却发生着对人的自尊的污渎，对心灵的扭曲，不仅是局限在对那两个教授个人的品性上，它敏锐地反映了生活发展到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我们的体制改革转变，或者说更新蜕变时期所发生的复杂问题。我不单把它看作是校园里孤单发生的异事奇闻，而是整个社会生活的缩影。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觉得这个作品内在的精神蕴含是沉重的。所以我说这是严肃文学，作者对生活有认真的思考和独到的见解，而且有富于艺术个性的表述。

首先我感到很新鲜的是一种叙述方式，不光在陕西文学圈里这种叙述方式很新鲜，就在我有限见识的更大范围的文本里头也是别具一格的。我有幸接触不少的文学杂志，可以见识各种风姿的叙述文本。在我理解，叙述形式不完全是个语言形态问题，更多地显示着作家的思维方式和精神状态，甚至包含着作家的个性气质。作家独禀的个性气质，才是作家叙述形式、语言形态的一个决定性因素。作家的个性气质决定着他不断变化的新的语言形态的追求，自然包括作家的叙述形式和语言审美。看看鲁迅和沈从文即可得到最好的印证和启示。

对雷电的语言形态和叙述方式，我不感觉奇怪，也不陌生。我跟雷电的接触中，他跟人说话，就是这一种语言特点，充满了辩证的激情，往往是正手一耳光，接着是更精彩的反手那一耳光。这种语言形式显示着他的思维特征，也显示出一个作家的鲜明个性气质。这么一种语言形式作为一本书的叙述形态显示出来，应该是一种独立的个性化的风格吧。作家在语言形态上，充分体现着自己的气质个性，得到读者的承认和欣赏，最重要地是能把他的思想负载起来，这个语言就成功了。

如果说感觉到还有什么不足的话，还是在语言形态上，当然这也可能涉及到作家的判断。亵渎往昔生活里的神圣，包括上帝，恰当与否，这取决于判断。判断准确，抓住了虚伪的神圣，会达到反讽的艺术效果和思想效果；如果不当，就会变成闹剧。比如作品中那个辅导员和他的女朋友亲热完了后想起来一件不能原谅的事在呵斥女朋友“滚蛋”时，作者写了这样一笔，她转身出门时的姿势让他想起了江姐赴刑场那个姿势。这是人物自然发生的心理和行为细节呢，还是作者给人物强加的叙述呢？这也涉及到创作最基本的问题。再，反讽，或者说调侃的尺度是什么？反讽是一种批判方式，准确是关键，准确才有力

量，否则就造成没有是非标志的“没正经”。当然，这是一个细节，尽管不影响对整部书的总体感觉，但让人读来别扭，所以说出来，供雷电参考。

这部小说写了这么多人物，非常复杂的情节，用传统现实主义方法，估计得写四五十万字。这部小说的语言，是一种叙述而不是描写，是俯瞰式叙述，没有描写语言那种铺排，这种叙述简捷而概括，读来更贴近现代人的心理节奏和生活节奏。我不仅可以接受，倒是偏爱叙述体语言。精湛而生动的叙述体语言，尤其富于魅力，既要智慧也需功力，相信雷电会更趋精湛和精美。

2005年4月

思辨的这一声

——读朱鸿散文之感受

阅读朱鸿的散文作品，时时都有盯瞅着活泼泼的作家朱鸿本人的生动感受。

生活形态里的朱鸿，彬彬有礼、喜眉善眼，见人说事先笑后开口，中规中矩，起坐谦谦，既显传统礼仪又呈现代文明的行为举止，无论生人陌客，都会感觉一种礼敬的亲和。我不记得和他相识相交多少年了，从未见过他矜持作态拿腔捏调的姿态，更没有纵横张扬故显不羁的浪漫行为。如果以此而判断他是循规蹈矩顺和顺溜的人，就大错特错了，而我在最初结识他的几年里，就停留在这种表象的印象中。后来听到朱鸿的一则逸闻，说他在北京出差时邂逅一位吉林姑娘，单凭一面之交就陷入神不守舍万念俱不成念的痴迷状态，乘火车搭汽车兼着步行，一路风餐露宿打问到长白山里的一个散落的村寨，终于再会了一面再看了几眼。我向他证实这件传闻，他坦然备细地叙述了一路的艰辛和一路的坚定：“我就想再看那娃一眼。太美了。过去从未见过这么美的女娃，后来也再没碰到过。”

长白山里的那个女娃，无疑是朱鸿审美视角里的女神。他不顾囊中羞涩，不管行政机关管理的条律，更不在乎道德规范市井议论种种，径直追寻理想中的女神去了。那种勇气和坚定，后来就使我不仅更深地理解了他内在的个性气质，也使我联想到他的创作姿态，以及独禀的文字气象，如同追寻长白山女娃一样，以特立独行不管不顾的专注和自信，追寻精神和心灵世界的文学之神。我的最强烈最突出的

阅读感受，是朱鸿的思辨，确凿感受到思考和思辨的力量，常常受到撞击，乃至震撼。在朱鸿的缜密而又尖锐的思辨文字里，我的直观感受总是受到一种理性激情的催发；催发人走向陌生而又新鲜的认识境地，扩展精神视野，又达到一种前所未有的心理沉静。《司马迁之残与苏格拉底之死》和《在马嵬透视玄宗贵妃之关系》，以及他诸多论说历史人物历史事件的篇章，显示着他不同凡响的思辨的这一声。在前人和当代作家反复写过的这些历史事件和人物身上，写作者无可回避的难事，必须翻出哪怕一点一滴属于自己的独特的发现，不然就很难避免被湮没进成堆成捆的同类题材的字纸里。想想杨贵妃，我曾在马嵬坡的土冢前徘徊；想想司马迁，我也攀爬过陡如天梯的石阶叩拜过。但终于没有写出一个字来，就在于翻不出浩如烟海的既有文字的包围。我对朱鸿思辨力度的钦佩，即由此而发生。他没有在既成的观念上停留，没有重复别人的吟诵；他的思维不是顺着通常的流向流下来，而是呈现着逆向和侧偏的反诘；他把同时代的东方的封建中国和西方的希腊横向陈列，又把两千多年前的社会法则与当代生活纵向竖剖，纵横捭阖，参照解析，直抵各个位置上的人物内心世界的脉象和律动，显示出思考的新鲜和思辨的力度，震撼和撞击读者心灵的效果就自然地发生了。朱鸿思辨的声音，跳出了通常所见的几乎千篇一律的思古之呻吟，那种甚为得意的平庸，自恋自赏乃至自吹里的苍白和肤浅，无一不是在自我欣赏的幻光里瞬即枯萎。朱鸿引发读者广泛的心理呼应，当是对他思考思辨的最美好最合理的回报，也是对思想者朱鸿继续思考思辨历史和现实的激励。我因此而获得自信，不要以为现时的生活只时兴热销软绵绵肉嘟嘟的东西，有硬质有力度的思想肯定引发生活深层的强大呼应。

即使写个人生活体验的散文，依然可以感到思辨的色彩。朱鸿出生并生活在农村，他没有沉溺于苦难的诉叙，而依然是对现实的考问

和思辨。即如《一臂之力》这篇颇类似鲁迅先生《一件小事》的生活小事，稍微粗疏就成过眼烟云了。鲁迅从车夫身上发现了伟大，也照出来自己的“小”。朱鸿在人生至关紧要的几步的困境里，却清楚不过地洞察出一个人狭促阴暗的心理世界。他的不凡之处在于，不仅没有仇恨，不计旧怨，反而把他作为自己人生的一面带有警示意义的镜子，把心灵向世界敞开，把热心和温情送给需要一臂之力扶助的人。这种富于人生哲理的辩证，显示着作家本人的个性气质和襟怀，令人过目难忘。

朱鸿也有偏重抒情的散文，也是独自体验的别一种情绪和情调。《白原》即是具有个性色调的代表作。就我的印象，讴歌黄土地、回忆黄土地、批判黄土地的各类散文，几乎把黄土地翻掘得兜底朝天了。朱鸿笔下的黄土地具象为一个特殊的景观——白色的原野。这个白色，不是冬天的雪白，却是麦子收割之后残留在原野里的麦茬子的颜色。这种精细的观察，敏锐的色彩感觉，所引发的心灵感受，是朱鸿独有的，几近深化到生命层面的体验，却不是谁都能轻易获得的。我由此而看到了差异，尽管任谁都可以面对熟悉或略知的黄土地抒发一番文字，成色却大显区别。再如《辋川尚静》其情景之交融，真可谓独具慧眼，进入朱鸿笔下的景致，是一种独具审美兴趣的选择和取舍。我便想到前人关于散文写作的经典性论述：“既随物以婉转，亦于心而徘徊。”描景状物，一在文字功力，二在描什么景不描什么景，状何样物舍何样物，就显示出作家的审美兴趣和情感倾向了，作家的个性就跃然于物而婉转成绝唱了。于心徘徊更是作家胸怀、精神、灵魂的展示，“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是一种心的徘徊。朱鸿在各种特定景物里的婉转和心的徘徊，更兼着思辨的理性色彩，在家乡的白原上如此，在大诗人王维的辋川也如此，其独立的徘徊的心韵，只有在阅读里充分感知。

思辨着的朱鸿，似乎也有偏执的时候。《关于女人》一文对于“男女平等”的异议性辩证，我一时尚接受不了。男女平等是针对封建礼教下的男尊女卑而言的，从人权和人性的意义上说，男人和女人理应是平等的。限于各自的生理特点，选择社会职业应充分照顾到女性是健全社会务必应尽的责任。但绝不可一概而论，如是，则会扼杀天才的居里夫人和许多富于创造智慧的女性的头脑……限于篇幅，我会把不同的看法和朱鸿在闲聊时对话，我也要向他学一点思辨的能力和勇气。

2005年5月6日夜 雍村

敬重宝成

令我们十分敬重的作家王宝成谢世了。

王宝成在少年时期就显示出写作的灵光天赋，青年时代就把文学创作基本确立为自己的人生追求。在这个时期，他广泛阅读古今中外文学名著，默默钻研丰厚的中国古典诗词赋章，为后来的创作打下坚实的基础，达到令人羡慕的传统文学的功底和修养，这就使他的文学创作一起步就站在一个较高的基点上，就有一个高远开阔的艺术视野，就初步体现出高雅纯美的基调和品相，就呈现出独自不俗的艺术个性。经过从少年到青年的扎实的练笔，一部《喜鹊泪》的发表，得到无以数计的南方北方读者的强烈呼应，也使他踏进已经复兴的新时期文学的殿堂，成为刚刚形成的陕西青年作家群里的一位引人注目的作家。直到他年届花甲，创作出了大量的短篇小说、中篇小说、散文、古体诗词，尤其是三卷本百万字的长篇巨著《梦幻与现实》的创作出版，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的重要成就。宝成同时涉猎电影、电视剧创作，《喜鹊泪》《庄稼汉》《神禾原》，拥有数以亿计的观众，成为陕西作家群里为数不多的拥有双栖型艺术才华的作家。

宝成的小说、电影、电视剧乃至散文的创作，首先都给读者一种深沉深厚的掘自生活深层的大美，其撼动读者心灵的最主要的力量是生活的真实，这是艺术典型化的唯一不可缺失的基础，只有这种从生活升华到艺术的真实，才能走进读者的视野，才能达到作品人物和读者情感的交流和心灵的交融。宝成无论短篇、中篇、长篇，或电影、电视剧，无论城市乡村里的男人、女人、老年、青年等各种人物角色，都是以其真实的情感世界走进读者和观众的心里的。让我们看到

了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新的世纪中国社会尤其是乡村的变迁史，是半个世纪中国乡村的真实记录，是鲜活生动的带有生活变迁特质的心理蜕变的史诗。他把成年以来的全部热情，都倾注给渭北故乡的土地和父老乡亲，他把精神和心里的全部思维，都集中在他热爱着的乡村生活的变化之焦点上。这样，他对生活发生的或大或小的变异，对人的心理情感的体验和感应，始终都保持着难得的敏锐敏感状态，这是他获得创作灵感创作激情，把握生活深层主流脉象的关键之所在，也就获得了生活的真实。

我们从宝成作品的阅读和观赏里，感受到的各个时代人的心灵情感是可靠的。正是在这个基本点上，我们敬重作家王宝成。

宝成生活在城市，终生却系结在黄土地上，他关注农民世界农民命运的情感，几乎是天然的本能的，也是无法改变的；他不是把乡村和农民仅仅作为采集生活素材的对象，而是关注着他们的欢乐和痛苦，有幸和不幸，乃至锅里的稀稠和身上衣服的薄厚。这与他出生并成长在乡村有关，更重要的是由作为一个作家的人生定位思想境界情感倾向所决定的。这样，他获得读者和观众的喜爱和敬重就很自然了，也获得了我们的敬重。宝成高尚的人格修养，质朴无华的品性，纯净无染的心灵，独具一格的个性，几十年来以难得的道德操守，独立在既呈繁荣活跃又现驳杂纷乱的文坛上，坚守着一个作家对国家民族永志不渝的责任，保持着对生养他的土地和人民的热情和真爱，恪守着作为灵魂工程师的作家的道德良心和品行，这才是他获得我们敬重的更难得的因由。

宝成一生真实真诚地面对生活和人民，真诚真实地面对文学，是以强大的精神和心理自信为支点的，他获得生活和文学回报给他的尊

重是必然的、合理的；自然也得到文学界朋友普遍的敬重，所谓天道人心。

这样，您的卓越的文学创作和您的风范，将成为永生。

安息吧！我们永远怀念您，宝成。

2005年6月29日晨 雍村

天使或是蜻蜓，翅翼沉重

——读《午夜天使》及其来由

去年十二月中旬，西安已进入滴水成冰哈气凝雾的严冬季节。我冒着清晨凛冽的寒风出门，赶赴汉中参加一个文学聚会，钻进冰冷的车厢，缩肩袖手，却仍然忍不住打开刚刚拿到的当日报纸，看到一位名叫珍真的女孩子在市中心钟楼广场叫卖小说书稿的新闻，颇觉新鲜。大半生从事写作，身在文坛，不仅自己经历过发表和出版作品的曲折艰难，更多地看到未成名者乃至颇具声名的作家出版作品之难处，包括贴本儿赔钱自费出版其含辛茹苦之创作，早已多见不鲜。然而敢于在闹市广场公开叫卖自己小说书稿的举动，外省有没有发生过我不知晓，在陕西省肯定是首例，自然引发媒体关注，西安几家报纸在同一天都以大字标题大幅照片做了报道，我也甚为惊诧，竟有以这样的方式和途径谋求小说出版的人。

依我的直接感受看来，作者太年轻，大约尚未接触文坛，还不了解图书出版发行的渠道和规则；我又猜断，作者可能与出版社接触过，或因不具名气不被重视，或因书稿尚不成熟不被欣赏而遭遇困境，才出此令人惊诧的举措；再而，免不了自我炒作的嫌疑。我以自己的常识理解判断，小说稿比不得其他商品，购买者可以一目了然，可以看可以摸可以试穿试调乃至品尝，而厚厚的一部长篇小说稿很难当场读完，匆匆翻看几页或几章是难以对整体做出肯定性评价的，谁会在尚不知底的情况下就贸然出资二十万元买下书稿？傻瓜才会。我对这个叫卖的结局几乎不寄什么希望，转眼也就不当一回事了，只是

隐隐希冀能有人提示作者，把书稿抱进出版社寻找编辑阅审，这是大家至今一直都循蹈着的出书的途径。

从汉中回到西安，某日清晨又在报纸上看到关于在钟楼广场叫卖书稿的珍真的连续报道，令我深为惊讶，不仅在我，任谁也难以料知这位叫卖书稿的女作者珍真，竟然在十一岁时被查出系统性红斑狼疮。且不说这个令人一听便毛骨悚然的疾病的名字，更令人寒心伤悲的是这个病属于世界医学尚未攻克的难题。我在这一瞬间的感觉是触目惊心。我首先感到一个年轻生命的悲剧和不幸。我在这一瞬里就把最初看到此事的报道时的几点看法全部掀开抖落了，原来如此！原来有如此令人伤惨的隐情！原来引发叫卖书稿的非常规举动，出于生命危机引起的紧迫感，是在受病痛折磨、抗争命运的非常境况下完成的生命之歌！

因为自然的或环境的不可抗拒，因为政策的某些不完备或执行政策者的掉以轻心或不作为，因为人群里的邪恶分子的作恶作孽，因为纯粹的个人生理疾病和不幸发生，作为一个公民，我只能以自己有限的能力予以关照，尽管在多数属于怜悯的祝愿里感到苍白无助，却还不失真诚。当得知年仅十九岁的作者珍真已经与命运抗争了八年的事实时，我竟坐不下来读书或写字了。十一岁，应该是读小学五六年级的年龄，珍真因患红斑狼疮，勉强上到初中毕业，通过自学和阅读，写了大量的短诗和长诗，已在十六岁时自费出版过一本书，现在又完成了一部新长篇小说《午夜天使》。我自然会想到人的文学天赋，古今中外少年成器的天才不少，不足惊奇，关键在于这个女孩承受着重症的有如塌天的压力，进行着文学创作最基本功能的学习和操练，这需要怎样坚强的勇气，怎样强大的心理承受和精神支撑的力量?

我们的生活近年间发生着令世界瞩目的变化，最贫穷的乡村也早已解决了温饱这个生存底线问题，城市里形成一个数目可观的中产阶层，且不说大款和巨富。人们开始懂得爱惜自己，人们开始讲究形体美，报纸电视上猴急似的居然动用了“抽脂”这样残酷拙劣的词汇来做减肥广告。肥了瘦了蚊子叮了蛇蚤咬了都成为重大话题交响在握手问候之间。十一岁就承受着生命绝望的珍真，是怎样走到十九岁的？在她在钟楼广场叫卖自己创作的书稿的举动里，我现在才感受到一个惊世骇俗的高昂的生命乐章，令多少也沾染了点矫情娇气的我意识到惭愧。

在这样的情绪里，恰好《三秦都市报》社记者打来电话，问我看到有关珍真事件的连续报道没有。我说看到了。他告诉我，珍真曾向记者说到她喜欢读我的作品，并有想见面的意愿。我说我也想当面了解她的处境。随即便约定了见面的时间。其时我正参加省文联换届会议，第二天我们便在丈八沟宾馆我住的会议楼的会客厅里相聚了。和珍真一起来的有她的母亲和亲友、《三秦都市报》社记者等十多个人。经介绍之后，珍真在我坐的长沙发椅上坐下来，我看见一张有点苍白的脸，握手时我竟然说不出话来，喉头如有石头一般哽噎，就是这个看上去相当柔弱的女孩，以非凡的意志力和强大的心理承受力挑战命运，倾情专注着文学创作。人的真正强大，不只表现在彪悍的外形和肢体动作语言，而在于内在的精神。这种精神才是真正令人感动和钦佩的，折服的，尤其是呈现在一个女孩身上。我现在不得不借助《三秦都市报》社记者李永利杜晓瑛的纪实报道，我对珍真和她的亲友说了一些话，有这样几句：“这是一个生命的悲剧。我们要立足于对生命的珍爱，而不完全把她当作一个作者……我被你的勇气感动。”

我是真实被感动了。我在报纸上看到那个令人恐惧病症字眼时很感动，在珍真坐到我旁边时就发生抑制不住的泪眼模糊。这种情况近年间不止一次发生，几位我尊重的前辈和同代作家去世，面对他们垂死的眼神和随后的哀乐，我都哽咽难语。我怀疑自己进入了一个脆弱的年龄心理生理区段。我刚刚读过季振帮先生的一篇散文，专意谈他近年间出现的这种脆弱情感，举例皆是生活细节里的真爱和大关，看来这是人类共同的一种普遍性心理情感。似可当作自我心灵情感敏锐或麻木的检测。随后在《三秦都市报》社召开的座谈会上，社会各界那么多人拥来了，为着一个身染重病的青年作者珍真。其中有一位犯过法的年轻人，流着泪说他愿为珍真捐赠器官。我又一次受到震撼和感动，相信在繁荣也发生着迷乱的世界里，生活深层涌动的依然是真诚和善良，是对美的敬重和呼应，是对一种人类永恒精神的膜拜。人们完全有理由也有自信，蔑视浮泛在生活表层的虚假和喧嚣，生活深层的脉动是雄壮的健康的，足以让人感到踏实和可靠。

珍真的《午夜天使》即将出版，由太白文艺出版社推出。总编陈华昌先生也是被珍真的精神所感动的一位学者，也在得悉这部不同寻常的书稿和作者珍真的经历之后，毫无犹疑地接受了，当即安排阅稿审稿。周瑄璞是颇具影响的青年女作家，承担起一个编辑的责任和爱心，和珍真对话交流，提出修改意见。她和记者小杜几次电话向我通报书的修改和审稿进程。在多方切实真诚的关注里，《午夜天使》即将面世，既是珍真生命理想的成功，也当是社会各界关爱生命关爱文学的一种精神的彰显和张扬。

我昨天刚刚读完《午夜天使》的校对稿。

《午夜天使》是年轻珍真眼里的世界。这只是广义世界里的一个角落，既不是广阔的乡村，也不是活跃着政治色彩权力竞争商场银号

大企业小作坊的最富活力和竞争计谋的城市层面，而是谁也不大在意的潜伏在城市夜色里的歌厅舞场。这种场合不被人关注是合理的，它不涉及人类生存的重大命题，也不是当代生活发展的主流动向和焦点，社会发展的进程和脉象，都不标示在这个场所和角落。这是有财力的人群休闲娱乐的地方，谈情说爱交友结谊的秘密角落，抖落负载放纵情感图得轻松惬适的领地。《午夜天使》展示的就是发生在这个小角落大场合里的一帮青春男女的生存形态。

开篇阅读时，对刚刚出场的几个青春男女的那种令人陌生的职业和生活方式，我曾产生过一个印象性比喻，犹如傍晚斜阳里飘掠在城市低空里的蜻蜓，或夜幕初罩下闪亮的流萤。随着作品的推进和展开，这几个青年男女情感纠葛的异变，太令人难以把握难以推想了，疾骤逆转的行为演示着这个小圈子里人与人之间远近亲疏的裂变和组合，展示出复杂的情感和鲜明的个性。我在一次又一次的惊叹里，感受着这些陌生面孔的颇为多变也颇为沉重的情感历程，用通常所说的酸甜苦辣一词来概括，就显得很不到位也很浮泛了。

具有音乐天赋弹得一手好琴的雅风，被伤害致残了手指，单是一本《圣经》，如何拯救得了未来漫长的生命行程里的心灵苦涩；身怀钢管独舞绝技的忧子，也属天才型的人才，一场又一场堪为精美绝伦的表演，给各色看客带来的是欢乐快活和愉悦，而自己内心却经受着连续的挫伤和折磨，几度都在阴阳交界线上反复裂变，令人扼腕；在杯盏交碰的酒液和烟的浊雾里谋生的赛林，想要保持一份真诚和善良，却遭遇到一次又一次的精神摧残，以至被毁容。美和丑，善与邪的争斗不容许任何浪漫，不相信好心和眼泪……我起码了解了这样一个常识，这些快乐地舞蹈着倾情地弹奏着狂热地歌唱着的青春男女，卸了舞妆扣下琴盖关了话筒之后，谁都面临着生活里的清与浊的冲

击，谁都难以回避人生道路上千古以来永恒着的选择的严峻，无论天使或蜻蜓，翅翼却沉重。

这是一个自生自灭的群体。社会各级团体的影响和关爱似乎抵达不到这个角落，家庭和亲友的温情和点拨似乎也很难产生影响；他们是一个没有约律的松散组合，他们任凭自己尚未定型的个性自由生长自由发展；他们的艺术表演所能获得的，仅仅是那些在昏暗的灯光里心不在焉的消闲男女的掌声和呼哨，没有嘉奖没有职称更不会奢望社会评价；他们的路子走直了走歪了乃至栽跌了，都是自己一瞬间的判断和选择；他们总是以欢乐为表征的职业里，同样隐含着人生的痛苦包括凶险，这样的痛苦已经不是无食无衣的饥饿寒冷，也不是极左政策的歧视和陷害，而是心灵和精神层面上的新的困惑和欲望促使下的正与斜的人生途径的选择。我由此而想到，社会各级团体对活跃在城市夜幕下的这方角落里的这帮青春男女，可能疏忽了缺失了关注和疼爱。

能把这个不被人在意的小角落里的几个人物，写到令我可以感受到生活底层运动的脉动，也感知到人生重大命题的颇为深刻的内容，真是出我意料的艺术效果。更难得的是，作品的背景是歌舞厅这种场合，却写得干净、清爽，没有污脏龌龊，更没有一笔一墨的色情和性描写，这是最能显示作者文学功力也显示作者思想和艺术意趣的见证。谁都知道，歌厅舞厅在普通人心里的普遍性印象。谁也都知道，近年间文坛有“上半身”和“下半身”写作。在这样的社会背景和文学创作背景里，年轻的珍真在《午夜天使》里呈示的题旨所指和艺术气象，都是难得的可贵的。

祝贺《午夜天使》面世。珍真无疑已经跨进她神圣着的文学殿堂。

2005年7月12日 二府庄

吟诵关中

刚一接触强文祥写乡情的文字，我便嗅出一个地地道道的关中人的气息。

其实，早在多年前结识他的时候，我就知道他是关中腹地乾县人。这本不足为奇，在我的新朋老友中，从事多种职业的关中人不在少数。我所敏感的首先是他的文字，文字里弥漫着的本色而又醇厚的关中乡村的气息和气象，就令我发生阅读欣赏的兴致和欣喜，以至惊诧，文祥不仅是一个用关中话说话的人，而且是一位会用关中话作文字表述的作家，这是很难得的，也是极其不易的事。

演艺界常有用各地方言演出的剧目和歌曲，包括陕西关中的方言。在我的有限观赏印象里，有深厚造诣者表演出来的是地域性语言独具的魅力，蹩脚的角色却只是一味地强调夸张方言里最浮泛最浅陋也最乏味的某些话语和腔调，想招人笑声却惹得人生厌。类似现象也多见于喜欢用地域性方言写作的小说和散文中，流于不得要领觅不到真谛的种种病相，在文字里专挑那些生涩怪僻的让关中人自己都莫辨难解的字眼儿，以为是地方语言特色；在生活细节的选择上，也是对某些怪异的丑陋的乃至肮脏不堪的行为表示出特别的欣赏兴趣，甚至杜撰瞎编一些怪诞的行为动作加到关中人头上，以为能够突显一方地域的生活特色，结果连被描写的那方地域的读者都感到莫名其妙，诧异其何曾如此何至于如此。被称作伪民俗写作现象。正是较多地见识过这样的文学文字现象，我才敏感强文祥作品里对生活的描写和描写的文字，能让我真切真实地感受到关中这块古老土地独特的令人迷醉的气象和气息，而且勾引诱发出我的生活记忆和生活体验。依我的阅

读直感和经验真正写出生活本相和内在律动的作品，无论小说或散文，都会给读者这样的欣赏享受，也是引发读者阅读兴趣的最基本的东西；读者对作家作品的靠近和排斥，多以此为分野，难能勉强。我便是在这样的阅读兴致里，对强文祥的散文发生惊诧的欣赏和喜悦之情的，甚至陡生感叹，这人要是不从政，从年轻时就专注于文学创作的探索，很难估计他会有怎样惊世骇俗的著作早已创造出来。

无论作家有怎样的创作主张和艺术表现的形式，包括语言形态的选择，都难以从根本上掩饰或改变对生活的体验和理解的深与浅的层次。我在强文祥关中乡情散文阅读时发生的惊诧，出于对不是专业作家而纯属业余兴趣创作的他，对生活的体验和理解所达到的深刻性。文祥笔下的关中生活事相、生活秩序和生活情趣，往往触及一种悠远历史的传承和延续，让我生发出对这块最早呈现农业文明的古老土地的思古幽情，又能感知在今天依然沉稳而又沉重地跳动着的脉搏。他写了许多人的人生片段或人生经历，有他的生身父母，他的近亲远邻至交好友，还有与他不大相干却令他动心伤情的男人女人，不是搜索他们怪异的生活习性或猎奇式地出他们的洋相，而是从直接或间接的体验里，直面他们的生命历程，有大起大落里的欢欣和挫伤，也有平静乃至平庸里的卑微的追求，专注于他们的生活形态个性气质和心理秩序的变化，尤其是艰难困苦之中顽强的道德坚守，还有无奈的妥协，让我看到人性的光亮也看到人性里的软弱，我从强文祥散文里获得的感动和启示，首先具备着真实和真诚的品质，自然就有踏实可靠的信赖，这是最可珍贵的。

在《父亲如山》里，开篇写到父亲死亡前夜的那种超然的又是朴实无华的平静，令我悸颤。这位父亲竟然平静地对儿女安排起自己的丧事来，“他一个一个计算他死后有多少人为他送葬，要招待多少来

客。这些客人谁和谁应该坐在一席。他按照这些客人计算应该买多少肉、多少斤豆腐，买多少木耳、粉条和花菜”。“他突然感觉不好，看着身边的家人大声说‘我走呀！’就再没有言语，永远地静静地去了。”一个已经跨上阴阳两界的人，没有叙述平生的成就和挫败，没有对生的留恋和对死的丝毫畏怯，也没有遗训遗嘱训诫后人，却平静而又周密地按照关中乡村的习俗给自己的丧事做着安排，精细到座席的次序排位。直到生命的最后一瞬，大声对家人说了一句“我走呀”，便戛然而终止住了他的人生行程。我读到这里时被震慑得闭上眼睛。这是一种超越了人鬼两界的坦然心态，一种对生命和生存价值达到哲理式感悟的超凡境界。这种心态和境界，不是财产的多寡权力地位的高低乃至知识水平的深浅所能达到的，核心的决定因素在于生存信仰和道德修养。这个大半生都在冷与暖、饥与饱的困境里挣扎的农民，以最本真的生活信仰和最纯朴的做人规范，面对一次又一次生存困境里的善与恶、正与邪的选择，而坚守着作为一个人的尊严，正直和刚强就成为肉体脊梁和精神支柱里的主宰。一个既阅尽人间春色也历尽风霜雨雪的人，一个踏过泥泞和坎坷的人，就达到游遍千山自成仙的理性而又达观的境界。想想那些被权欲财欲名欲物欲纠缠到死也不能轻松下来的各路角色，哪个能如这位农民父亲如此爽快地喊出“我走呀”的告别词。我在这声音里，最直接地感受到无愧的意义。是的，只有在道德层面终生都无愧于世界无愧于生命无愧于近亲远邻的人，才可能在他生命终结的一瞬，有如此轻松如此豪壮如此坦然的这一声告别世界的话。

文祥以人为叙述主体的几篇散文，把复杂的人生经历写得简约而生动，读来十分抓人感人。他深得叙述文体的写作奥妙，又极具表述的基本功夫，力避铺张繁冗，总是能筛选出十分鲜活而又极富个性的细节，包括渗透着人物心理特性和个性气质的行为细节和语言细节，

让我看到一个个陌生而又真实的人物。他写到父亲、母亲、大舅和祖父这些亲人是如此，写到他的老师和朋友也是这样的艺术效果。他和这些人的相处相交里，崇尚着他们精神层面最珍贵也最具个性魅力的品格，常常达到对生活的某种哲理的审视。我在阅读时不止一次感叹，这些纪实性散文对生活的审视深度，人物个性气质的独立性和鲜活性，语言的准确和生动，远远强过那些忸怩、做作、矫情如空壳的小说。

文祥有不少写自己生活情态情趣的散文和随笔，同样写得不同凡响。这主要不指文字色调，而是作者的思维、观念、理想、追求以及兴趣。有这些充沛的东西张扬在文字篇幅里，每一篇都可以感知到丰富充实而又是独立思想的内涵，才有不同凡响。《和平是福》写到作者目睹美军轰炸伊拉克的画面，爆炸的火光和烟雾里，是被毁的残骸和尸体，惊恐的眼神和无助的哭泣。作者问道："中国人讲做人的尊严，西方人讲做人的权利，你真的能用飞机和导弹炸出欢迎你的笑脸和掌声吗？"这是美国发动伊战第十三天写下的文字，事过两年半的现在，几乎每天都在发生着袭击和自杀式爆炸所造成的伊人和美军的死亡。面对伊拉克的这种形势和局面，我就钦佩文祥当初这种判断，伊战两年多以来的演变，验证着这个判断，不仅是情感的，排除了种种利害关系的哲理性判断，才是深刻的。

再如纯粹抒发个人情怀情趣的《筑屋于野》，在故乡"盖几间瓦房，圈一座小院……屋后一道岭，属渭北梁山一脉……左邻右舍，周围是望不到头的果树和庄稼。每到周末节假……偕妻领孙，回到乡间小屋。坐在院子里树荫下的石凳上，脱去那一身'周正'，袒胸露背，挽裤赤脚，端一碗妻擀的浆水细面条，那感觉简直是神仙了……"这是一种情怀，一种人生境界所决定的情怀，不可单纯看成故乡情结或乡

村生活习性。君不见多少昔日受冻饿肚的乡村穷娃，熬得升官了或财大气粗了，什么衣料贵就穿什么，什么饭最奢华就品尝什么，笙歌燕舞，卡拉OK，也算是一种兴趣和情怀。我在读到这些篇章时有一种沉醉，文祥在乡居时不无自得自乐的感觉，清澈如星月的心境，完全和我一辙。我进入他文字里那个乡间小院，感觉和意识完全融入我在原下新盖了房子的老宅了，我在小院抽烟、喝茶或饮酒，夜风从原坡上吹下来，挟裹着蚂蚱的歌唱。就在这一刻里，我理解了文祥，在物欲膨胀和时尚流行的迷乱里，保持着也陶醉着一种纯净高洁的襟怀。

文祥又是一个兴趣广泛的人，涉猎地方剧种如秦腔、老腔、弦板腔等古老文化遗产，也考究关中民风民俗以及四时八节的乡情礼尚，还有对关中地域风貌特质的探察，等等。他的整体观点是准确客观的描述，情趣横生，渊源和现状脉络清晰，不似有些同类散文，故意夸张乃至制造某些丑陋的枝节。作为一个关中人，我在阅读文祥的这类散文时，总有扩展眼界弥补缺欠的欣喜，也不断加深对关中乡民心理气性的感知和理解，对文祥敬重乡土文化的虔诚态度油然而生敬重。

文祥的文字是别具一格的。本文开头即由文字阅读的感受说起，就在于他把关中话作为文字表述时的那种自然，不留别扭的硬痕，这是很不容易达到的一种语言境界，非语言操练和追求的功夫不可。把关中话不仅作为对话语言而是作为叙述语言，不是小说情节的叙述而是散文式叙述，就更见难度，作为作家，我是深有体会的。比如这样的叙述：“北方缺水，关中的灾便是旱。旱也不过百日，旱死玉米谷子，旱不死火里生的小麦。”且不说这句子的凝练简约，单是把民谚“旱不死火里生的小麦”用得如此熨帖如此自然，成为难得的令人眼睛发亮的妙句。写到多年一遇的雨灾，“下雨最多的是秋季，阴阴纤纤，下下停停，所谓‘秋淋’，只是并无大灾害。日子好一点的人家啥也不

折损，只是男人睡够了觉，女人忙完了针线活。穷家也不过屋漏墙斜。关中人不着急，用根木头支在倾斜的墙上，屋里接上盆盆罐罐，等待天晴”。这样的叙述里，几乎很难挑拣出一个多余的字来，用民间语言达到的不留痕迹的句式，如同水泥里掺和的沙子和石头。不仅生动形象，更有硬度和弹性的文字效果。这种叙述的文字口吻，一读便知是关中人的直接表述，而且是深领关中语言关中民风神韵的人才能做到。

在我粗浅的印象里，文祥和我大约有相同的生活经历，出自关中乡村，家境都不富裕，相对而言，我似乎比他还稍强一点，起码可以温饱，尽管多为粗布杂粮。他似乎连这些也无保障。然而他比我念书念得好，智商高得一筹，我落榜他却完成了高等教育。后来进入社会，他长期在乡镇和县里工作，我也如此同途，差异又在于他比我的工作也干得好，官阶比我高出不止一阶了。他从乡镇一直干到省上，从基层到高层，主要精力和智慧都投入到谋利一方造福百姓的事业中去了，却仍然在几十年的历程中，于胸怀里保存着一块文学的绿地，创造出如此丰盈的美文。我在文学欣赏的愉悦之外，更多地感动着这位同代人的精神、品格和情怀，一种充实一种高尚和一种纯净。艰难困苦近乎绝境里，对想有作为心怀抱负的人的意志品质是严峻的考验和磨砺，而面对繁华世界里弥漫着的种种欲望膨胀的陷阱，人生课题的严峻性似乎更不轻松，一念之差一不留神而跌入陷阱愧悔终生者已屡见不鲜。我在文祥散文随笔里感受到的如上述的内涵，既具社会意义，亦富于人生价值的哲理或启示。我对同代人文祥的钦敬就是由衷而自然的了。

2005年9月8日 二府庄

唏嘘暗泣里的情感之潮

我确实喜欢关中地方戏曲，秦腔不用说了，也喜欢眉户，还有民间艺人演出的合阳线胡儿和华阴老腔等。能够诱发我再三再四观赏的，则多是那些历久不衰堪称经典的传统古装戏。而以当代现实生活为题材创作的眉户剧《迟开的玫瑰》，却让我看过三回后还不满足，又找来剧本从从容容品读一番，可见其独具超凡的魅力。

我至今依然记得《迟》剧演出时剧场里那种感人的氛围，不时爆响的掌声且不说了，而潜伏在每一次掌声落下之后的屏息静气里的唏嘘暗泣的声音，形成一波又一波涌动着的情感之潮，与舞台上的人物交融呼应。尽管我看了三回，然而每一次都能很自然地沉浸其中，而且每一次都抑制不住热泪涌流，根本无法保持观赏者的理性状态。在我看来，《迟开的玫瑰》完全不属于戏剧分类概念里的悲剧。没有奸邪势力制造的冤狱命案，也没有妻离子散这些作为悲剧的惯常内容，却如何酿造出这样令观众泪飞如雨的感情场面？是一种崇高的人格，一种以善良为内核的道义。这种崇高的人格是真实的，善良是朴实无华的。从生活升华的艺术真实，就有了浸润以至震撼观众心灵里最富于共性的那根弦儿的力量。在乔雪梅这个大善至美的灵魂面前，我和同场数以千计的从事社会各类职业的观众，都在不知不觉中完成了一次灵魂的自我检测。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尚能保持那根道德神经的敏感和软弱，尚未被某些时髦话语鼓噪耸动而膨胀起来的极端欲望所麻木或硬化。

这个闪耀着崇高和纯美的道德之光的乔雪梅，她的生活环境和生存形态，和当下乡村或城市的无以数计的普通中国人毫无二致，她的

理想追求、人生愿望和同时代的这一茬青年男女也完全相通；她的家庭遭遇的车祸和病灾，也称不上任何离奇，任何一个家庭都可能发生这种类似的灾难，或者因为自然环境以及非本人因素导致的家庭困境。正是在这种具有普遍性意义的人生路途上，乔雪梅面对困境时逐渐显示出来的人性之大美，所显示的广泛的感召力就很自然地发生了，观众抑制不住的暗泣和唏嘘，是感同身受般的情感交流和心灵的呼应。她在家庭困境里的人生选择，是放弃已经铺展到脚下的红地毯，承担起照顾瘫痪父亲和幼年弟妹的生活重担，支撑起一个面临破碎的家庭，真让我联想到甘愿自己下地狱，而放兄弟姊妹到灿烂光明世界去的那个有着壮美襟怀的英雄。然而，乔雪梅面对的不是重大历史事变里的义无反顾的人格和道义的坚守，也不是官场、商场里的正义和投机的较量，她面对的是父亲的轮椅，是需要扶携的弟妹们的温饱和求知渴望，是每天米面油盐青菜的掐算，和同代人诱人的光圈和庸俗不堪的时髦时尚的刺激灼伤。就在这样的境况下，她不仅让绝望的父亲享受到生的温馨和欢乐，更重要的是引导弟妹们一个个走出困境，抵达各自人生成功的第一个驿站，为社会奉献自己的聪明才智。这样看来，她与那些肩扛灾难之门成就众生的英雄，在精神人格上是相通的。而正因为她是一个不起眼的普通市民，除了获得人们像对英雄的那种尊敬之外，更多了无隔的亲近和亲和。

《迟开的玫瑰》里的乔雪梅之所以引发剧场里那种罕见的效果，大约与目下的时风不无关系。思想开放和经济繁荣的现实生活里，“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腐朽观念，以各种迷人的色彩或新潮的话语重新包装后，被堂而皇之地津津乐道，不择手段的丑事丑闻常常令人惊骇不迭。乔雪梅在这样的时风里走向我们，对人们普遍的关于正直、善良、崇高的渴求欲望，是一种心理填补和满足，是一种健全健康的人格示范，是关于人生价值估量过程的鉴示。

乔雪梅的精神取向和道德内涵，是我们民族传统的美德，自有文字以来就推崇着这种美德，然而，它又不局限于传统，更不仅仅局限于我们这个民族。就从有限的阅读感受来看，乔雪梅的精神人格和道德规范，是所有民族都推崇着神圣着的，差异仅仅在于教育方式和生活习俗的不同，任谁恐怕都难列举出一个崇尚邪恶的民族来。乔雪梅的人格和品德，是许多民族共通的一种不需语言沟通的东西。人类各个种族正是在这一共同遵奉共同神圣的一点上找到契合之处的，它超越宗教超越社会制度也超越人种差异习俗差异。如果总是局限在中国的传统和现代的习惯上讨论乔雪梅，无可避免会陷入落后和趋时的浅白。

我看过陈彦创作的三部戏，有眉户，也有秦腔，都是以当代生活为题材，多以城市里的普通人为解剖对象，却都有直抵观众灵魂的冲击力量。他不回避生活中的矛盾，反而在司空见惯的市井生活里，常常有惊人的发现和深刻的开掘，既显示出一个剧作家思想的勇气和力度，又显现出其在舞台艺术方面的个性鲜明的才华。无论剧坛或者文坛，不少见某些标新立异乃至荒诞的形式，作为新的探索，这不仅无可厚非，还应鼓励，问题在于除了带有模仿痕迹的形式之外，恰恰缺失了对生活的独立发现，甚至不惜瞎编臆造怪诞丑陋的情节细节，以掩饰思想的浅陋和苍白。陈彦的创作指向和追求，令我钦敬，尤其是这样年轻的一位艺术家。

2005年9月20日 二府庄

仰天俯地 无愧生者与亡灵

——感动孔从洲将军

至今依旧清晰地记着，头一回听到孔从洲将军的名字，而且还是我的灞桥乡党时的那种惊讶和神秘的情状。

那是我刚刚进入高中学习，从结识不久尚未完全消除生疏的同班同学那里得知的。“孔从洲是我村人。我村出了一位将军。炮兵司令。”等等。他说话的表情和声调是骄傲，亦不无炫耀。然而，他只是再三强调孔从洲将军是他们上桥梓口村人，他父亲曾经和将军在同一所私塾念过书一块在村巷田野疯玩，却再也提供不出化释我的神秘感的内容，诸如将军如何踏上革命道路，经历过怎样艰难曲折的过程，有哪些超凡事迹或英雄壮举，这都是我乍听之后特别感兴趣的话题，他却不甚了了，只顾沉浸在本村出了将军的荣耀和骄傲的情绪里。我的高中母校就在古人折柳送别的灞桥桥南，学校的围墙就扎在灞河河堤根下，过桥朝西北方向走不过几华里，就是孔从洲将军的老家上桥梓口村。我和同学帮助农民秋收时，往返于上桥梓口村开阔的田野，眺望沿着灞河长堤伸向渭河平原深处的柳树林带，走在上桥梓口村雨后深陷的马车辙痕的土路上，看不出这个上桥梓口村和邻近村庄有什么不同的气场脉象，然而一位共和国的将军就出在这里。我的崇拜和敬重是很自然地发生的，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是一个崇拜英雄的时代，为共和国的建立流血牺牲的烈士和功勋卓著的英雄，获得整个社会的尊敬和爱戴是由衷的真诚的；从少年时代到步入青年，我充分感受浸润着这种崇拜英雄的社会气氛，也因为我的个性和刚刚萌生的想有作为的心理，对前辈英雄不仅崇拜，而且形成一种心理情结；孔从洲将

军是离我最近的一位前辈乡党，我的崇敬我的骄傲和我的神秘感，由那时贮入心底，竟然有四十多年了。

直到去年年初，我读到作家徐剑铭等人写作的长篇纪实《立马中条》书稿，看到孙蔚如司令麾下战将孔从洲浴血打击日本侵略者撼天动地泣鬼神的战绩，我几次被感动得心潮难抑，对将军第一次感知到最切实的了解。再到今年读到孔从洲将军的外孙张焱写作的《也无风雨也无晴》书稿，我对从家乡灞桥走出去的孔从洲将军，才有了较为完整的了解，一位从未见过面的将军生动地浮现在我的眼前。我读这部书稿，不是通常意义的文学作品欣赏，尽管年轻的张焱思想深刻笔锋犀利。我的整个阅读感觉是走进一座大山，伟岸凛峻，却也高襟柔肠，那是对自己追求的事业的忠诚，对国家和人民承载的责任的义无反顾，对一个高尚的人的精神情操的历练，对一个纯粹的人的人格品质的坚守和修养，使我感到一个人用整个生命历程铸成的巍峨大山的形象。这座大山，不仅经得住同代人的审视，更经得起后人的阅读和叩问。这座山的独有的品格，独具的魅力，立于群山之中，不摧不老。

有一个至关重要的细节，我一遍成记。孔从洲在刚刚兴起的新式学校读了两年初中，因家里一场土地官司打得倾家荡产而辍学，回到村子别无选择地学做农活儿，而且很快成为赶马车的把式。依我乡村生活的印象，马车把式在关中农村是受人敬重更令人羡慕的“高职”人才。无论给自家驾车吆马或受雇于旁人执鞭，都是“高人一等”的技术性人才。然而孔从洲既无心纠缠于家庭土地纠纷的恩怨（乡村里无论贫富无论长幼都易陷入的仇恨情结）之中，亦不留恋沉迷小康之家和车把式的优越，扔下马鞭走出虽也凋敝却仍可以养人的天府关中，投奔远在陕北之北的杨虎城去了，行程几近一千公里，“经过数月奔走，

衣衫褴褛满身疥疮，沿路乞讨”抵达目的地安边，走进一个显示着强烈反叛旧制度的杨虎城部队的军营，开始了他戎马倥偬的人生征程。这一年孔从洲年仅十六七岁。关中乡村走失了一个驾马抡鞭的车把式，成就了一位肩负国家民族命运的将军。依我所能得到的文字资料，说孔从洲在西安读书时听到过杨虎城和他的部队的侠义精神，是促使他投“鞭”从戎的唯一导向。我相信这种导向对青年孔从洲的影响力，但得注意孔从洲个人的接受基础。即孔从洲刚刚萌芽的人生抱负，不甘于普遍的乡村生活的平静和平庸，肯定是与生俱来的个性气质里的叛逆因子起着关键作用，使他自觉脱离开无以数计的关中乡村青年习惯接受的生活模式和生命运行轨道，他的生命没有消磨在麦垄马厩，而是张扬在民族救亡国家解放的烽火之中。我便确信，一茬一茬的茫茫人群里，少年时期就显出鸿鹄之志的杰出人物，是自古以来就屡见不鲜的事实。

孔从洲参加了消灭军阀的北伐战争。尤其在西安城被军阀刘镇华围困的八个月时间里，孔从洲和守城的军民成功坚守到胜利，他已经初显军事指挥才智，荣任炮兵排长，时年二十岁，被杨虎城爱称为“娃娃排长”。也就是从这时起，孔从洲与炮结下了不解之缘，直到他创建中国人民解放军南京炮兵学院并荣任院长，再到中央军委炮兵副司令员。

在标志中国革命形势重大转折的西安事变发生时，孔从洲已经成为这场震惊世界的事变成败的举足轻重的人物之一。他任杨虎城17路军警备二旅少将旅长兼西安城防司令。按照张学良杨虎城的部署，两三个小时内，城防司令孔从洲指挥部属一举解除蒋介石布置在西安的军、警、宪兵和特务组织，一个不漏地抓捕了包括陈诚、卫立煌、蒋鼎文等军政要员。作为东北军和西北军联手起事捉蒋的一九三六年十

二月十二日凌晨那两颗信号弹，是孔从洲指令士兵发射的。这两颗信号弹射向夜幕沉沉的古城西安的高空，扭转的却是整个中国的时局，是中国从黑暗走向光明的一个历史性转折。孔从洲在他后来的民族战争和革命战争历程中，不知发射过多少颗进攻的信号弹，都比不得上述这两颗。作为一个军人，一生中能有这样重大的历史性机遇，是骄傲自豪，也是幸运，足可以告慰平生。

在随后的中条山抗日前线，在战区司令孙蔚如麾下，孔从洲率独立46旅，先后参加过十余次大的战斗，血战永济成为重创日军鼓舞士气的重大胜利。他的民族血性在打击日本侵略者的战争中，成为这个民族后代子孙永远珍重和膜拜的精神楷模。

抗日战争胜利，孔从洲即率部起义。正式回到人民解放军的队列，从华北一直打到西南，成为共和国的开国将军。

我从《也无风雨也无晴》书里，简要列举出孔从洲革命历程中这几件史实，在于勾出一个清晰简明的线条，可以看出一个完全可能成为庄稼能手马车把式的关中乡村青年，怎样走过堪称光辉的人生历程，留给后人多少精神启示和激励；这些重要史实的意义，绝不仅仅属于孔从洲个人，而是让我看到自辛亥革命以来，这个民族和国家在寻求生路、出路和解放的艰难曲折复杂漫长的历程的一个缩影，孔从洲是一个坚定的实践者，一个在革命烽火里舞蹈的凤凰。我列举孔从洲生命历程的重大事件，也在我的心里铸刻下革命历史的几根该当铭记的线条。

毛泽东曾经连声称赞孔从洲“是个老实人”。毛泽东这个评价的依据和注解是“别人都相信你”。这不仅是毛泽东的赞语，而是几十年的风雨历程里，他的上级他的左右臂膀和他的部属对他的共同印象和评

价。在我理解，这个“老实人”的所指，当有更为丰富更为深厚更为高尚的内涵：对认定的主义追求的坚定不移，在艰苦卓绝乃至生命绝境里的殊死坚守，对肩负的每一个使命的忠诚，对同志同道的赤诚和坦然，业已形成独禀的个性气质和性格魅力，远远不是人们习惯上所说的“老实人”概念所能包容得了的。有一件事令我感动，当张学良和杨虎城两人做出“捉蒋”决定，并且拟定了这场惊世事变中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分工部署，杨虎城把这个决定说给的第一个人，就是孔从洲，就是被他昵称为“娃娃排长”而今西安城防司令的孔从洲。可靠和信赖不需说了，成就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壮举是他们共同的抱负，才会产生彼此间不言而喻的生死与共。

关于孔从洲的党龄，也是令我十分感动的一个细节。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蒋介石在各个部队剿杀共产党人，杨虎城拒不“清党”，把西北军里的共产党人或送走或隐蔽，就在这种白色恐怖乌云笼罩之局势里，孔从洲向共产党在陕西的创始人魏野畴提出入党要求。魏野畴觉得他暂时不要加入共产党，以他在西北军里的中级军官身份，更有利于为党工作。孔从洲听从了党的安排。一九三〇年孔从洲向南汉宸再次提出了入党要求，南以同样的考虑让他暂时不要入党。在中条山抗日战场上，孔从洲任旅长的独立旅，几乎是共产党人领导的一支部队，从旅部到士兵，谁都搞不清有多少共产党员，然而谁都明白这是一支皮白瓤红的战旅，连蒋介石都清楚，三番五次指令38军军长孙蔚如“清党”，孙蔚如和杨虎城一样保护了共产党人，孔从洲实际上是按党的指示在执行。直到抗日战争结束，孔从洲按中央指示率部起义回到延安，经由毛泽东做介绍人加入中共。他的党龄就只能从一九四六年起算。从一九二七年到一九四六年，几近二十年的党龄，对于一位高级将领，不仅仅是荣誉和待遇层面的含义，更重要的是心理层面的感受。他不应是“党外的布尔什维克”，而是从魏野畴

那里开始，就自觉按照共产党的方略和思想规范着自己行动的老党员了。可贵的令人钦佩的在于他的态度，他提说过此事，因为种种原因没有解决，也就坦然接受了既成的事实，毫不动摇甚至毫不在意地专注于他的炮校和炮院培养炮兵骨干的工作，这也是“老实人”处理个人事情的一个范例，一种襟怀，一种境界。

这位“老实人”将军，可以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却绝不含糊重要的历史真实。他为杨虎城的继任者孙蔚如，以及孙蔚如统领的38军浴血抗战的史实，因为极左思想影响而受到的不公正待遇，甚至许多烈士和活着的官兵蒙受不白之冤和委屈，表现出某些“拗相公”的铁面和执着。他联合当年的知情者和亲历者申述真实事相，发表文章，为他们一个个平反或正名为烈士。他为自己统领的陆军整编35师抗日阵亡将士，自掏腰包修建陵墓。直到他疾病缠身行动不便的暮年，仍然为一座烈士纪念碑坚持不懈地努力，直到这纪念碑竖立在黄河岸边。“在我有生之年见到这座纪念碑修复，了却了我的最大心愿，作为这个师的师长，我可以告慰长眠在九泉之下的烈士了。”我被这样的话深深地震撼着。我便想到，一个人让共事的同志感到信赖，让死亡的战友的灵魂得到安慰。真是实践了中国古代先贤所说的仰无愧于天、俯无愧于地的博大胸怀了，在孔从洲这个“老实人”将军身上，还有既无愧于生者，又无愧于死者的道义和道德。

孔从洲将军的功勋，令我一直崇敬；孔从洲将军的品德，令我永远敬仰为做人楷模。我为我们灞河岸边走出的这位杰出的将军由衷地自豪。

2005年9月29日 二府庄

诗性的婉转与徘徊

和谷要出版文集，嘱我作序，虽心里惴惴却不敢推辞。

在我的意识里，深知文集这种出书规模对于一个作家非同寻常的意义，既是艺术创造的里程碑式的检阅和归结，更展示着一个作家创造生命的绚烂和庄严。和谷几十年痴心文学创作，大半生的心力和智慧都倾注在稿纸上，竟有五百多万字的散文、小说、诗歌、报告文学、随笔、文论和剧本，年过五十得以拢集梳理，编成六大卷，是挑选而不是全部。作为同操文笔的我，首先感觉的是对和谷创造成就和创造精神的敬重，自然不敢推辞，把能否读懂能否作好这篇序文的惴惴就隐压到心底。

乡情是一杯酒。一杯潜存在情感之湖深层里浓郁馨香到化释不开的陈年老窖。

我看到也感知到，被乡情的酒液浸润着的作家和谷，那根情感世界的主神经十分敏感，十分脆弱，又十分鲜活。一丛萱草，一撮茵陈，一根皂角，一棵老树，一种鲜花，一圈窑院，一架纺车，一页氏族谱纸，一位老人和一个同辈，等等，一入得眼一谋得面一握上手一开了口，那根情感的主神经便发出颤音，记忆里的爷爷奶奶父亲母亲的亲情和村巷里父老同辈的友情，弥漫在野花野草窑院火炕里的苦难和温馨，这些纯粹农业文明时代里的生活形态的记忆，苦涩也温暖，朴拙却纯净，简单更有真诚，因为在小小年纪无染的心灵镌刻下记忆，不仅难以风化，反是隔离愈久，或年事愈长，愈加鲜明，每有触

及，便潮涌般泛滥起来，便是这一篇篇弥漫着浓浓思恋深沉忧伤的文字。

我猜测和谷写着这些文字的笔在颤抖，因为作为读者的我，在掀动着这些冲荡着情感文字的书页时，手指都发颤了；我也猜想和谷的稿纸上滴溅着泪痕，证据也是我自己触及这些文字时，泪湿老眼。

幼年的和谷是不曾穿过一件洋布衣服的，“总穿着一身母亲织的土布”。我长过和谷几岁，解放前不必说了，直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读书到中学，也依旧是母亲手织的土布。和谷笔下母亲的那架纺车和织布机，母亲右手摇着转把左手扯着棉线的姿态和眼神，双脚轮换踩踏底板的呱哒声响，那自然地左右扭动着的臂膀和腰肢儿，是叩击心灵的永恒的生命交响和舞蹈。我在阅读的绵绵不尽的情思的咀嚼里，那纺车和布机上和谷的母亲，不知不觉中已经幻化出我的恩德如海的母亲了。我掀动书页的手指颤抖起来，泪水模糊了眼睛。

那纺车和织布机上的母亲，不是和谷一人的母亲，是乡土中国人的母亲，每个从乡村长大的一茬又一茬中国人，都是在嗡嗡的纺车和呱哒的织布机的乐曲声中，睁开眼睛学步走路进入各自的人生旅程的。无论这个人后来有怎样的造化，有多大的出息和成就，官居几品财富几斗（金），抑或是掐数着硬币过日子的平民，有这样的生命之乐贮藏心底，当是对人的精神和心灵的永久性滋养。和谷催我垂泪的一页页乡情诗篇，让我看到被这生命之乐滋养着的人性和人道的底色的鲜活和纯净。这无疑是透视作家心灵世界的窗户，也是萦绕在爱心柔肠间的音符的直抒。反过来看，如若这生命之乐被抹掉了，人性和人道的那根神经也就麻木了僵硬了，即使硬要发出回瞻的声音，难免弄出矫情的虚空的腔调，这类东西早已屡见不鲜了，令人生腻了。

我为和谷所感动，更愿这哺育灵魂的生命交响，鸣奏在往后的每一个黎明。

和谷不是单纯地忆旧，也没有沉浸在少年苦涩和温馨的记忆之中，记忆里的昨天的印痕，与现时正在踏着的村路田野相叠相衬，落在心头的巨大而又强烈的反差，体验到的是焦灼和无奈，容不得童年的诗性记忆泛浮。作家和谷面对的是被无序的市场折腾着的果园和菜圃，鲜美的苹果不仅激发不出诗人惯常的赞美，反而是愤怒，愤怒的果园农夫用机械来铲除来颠覆。小叔父的牛也缺失了风光，早已不是少年和谷山坡草地上摇甩尾巴的黄牛了。“它哞地叫了一声，没有同类的回应。明年收麦子的时候，还会听到牛的叫声吗？”牛与农民的关系，由过去的几近至亲的相依为生，正在变成养而为肉的纯商品关系，农民在这个冷酷的转换过程里的不可承受之痛。和谷为着明年能否再听到烙在心底里的黄牛悠长的“哞”叫声，也只能徒叹“孤独和无援”。

有几篇写人的散文，读来令人忧伤百结。那位尚未成年的堂妹，在绝望无助里的平静，读来让我惊心动魄，让我如此逼真地看到一个冰清玉洁般的精灵，却透着凄美，萦绕在心间。《风中的小辫》里的“小辫”，是作家自己在乡村订婚六年的未婚妻，那种浓郁的乡风习俗笼罩下的少男少女的神秘，闭塞心态里的娇羞，初萌的爱情里的纯净，把刚刚过去的那个时代里最神秘的初恋形态逼真地展示出来，由此可以领略一个时代文明的征象，解读一个时代的人的心理结构的标志性密码，感知那个时代社会生活的基本形态和脉象。我顿生感慨，这样写人的散文，就体验到的深刻和真切，就艺术的生动和逼真，给我阅读的可靠和可信的踏实，以及由此产生的强烈的冲击，远远超出了以各色艺术标志掩饰着空泛体验的小说。

这效果得益于作家的思想。我由衷感觉到和谷思想的力度和深沉。他对生活体验的质量，对生活景象穿透达到的层面，绝然峭拔于常见的某些衣锦还乡者矫情娇气的吟诵，更迥然区别于那些猎奇者故作惊讶的妄议。思想还决定着作家感受生活体验生活的敏锐性，昔日窑院的落寞，得不到回应着的哞叫着的牛的孤情，被颠覆的果园主人无言的愤怒，风中那根小辫在黄尘里的无助……和谷神经的敏锐敏感和体验体察入微之准确，令我感动又钦佩。思想也影响作家的情感倾向和投向，和谷尤为明显，他对接触的父老乡亲和同辈男女，已经不是表层的同情，而是一种感同身受的交融，而且自然到几乎不见一丝隔膜。我看到一个思想家的和谷。

更见出和谷独特的体验里思想力度的作品，当数他写现代都市生活的一批散文和随笔。《远行人独语》是一颗咀嚼不尽的橄榄。很少能读到如此深刻而又真实的内心冲突的文章。这是由生活体验进入生命体验的精神剖白。整篇文章都激荡着一种复杂情感，一种独有的感受和独自的体验。这情感之波气象万千，左冲右突，我却很难体会酣畅淋漓，在于那一波一波翻涌的笔浪里，挟裹着“悲烈和壮观”以及“艰窘苍凉”。这是很难产生很难自我把握更难得脱俗的叙述。多少人闯荡南方乃至欧美的现代都市，有成功者也不乏落魄者，其中不少人写下了各自的感受和体验，形形色色，或长篇巨制或点滴笔记，而和谷的这篇三两千字的短文，却是无可企及无可掩遮的上乘佳作。我想到杜甫的一首诗。安禄山制造的长安之乱，诗家文人写下多少感时伤世的诗文，只有杜甫的“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写到至深至痛处。显然不单是艺术形式写作方法乃至采词遣字的因素，更关键更致命的是思想影响下的独到而深刻的体验。

这里就显示出差别来。一种深刻深厚的思想，决定着和谷由表象的生活体验，进入更为自由的生命体验的写作状态，与那些要着尿泥而且自鸣得意的小调皮小情调小把戏类的东西，就划开截然不同的品相了，就显出某种大家气象来。我以为不单纯依赖天才，而是思想力量把天赋之才张扬到令我惊羡的艺术创造。

我同时感受到诗性的和谷。

好的散文本身就无异于诗。在和谷的还乡见闻散文里，在他抒写急骤蜕变着的当代都市生活的随笔杂感里，我都感受到一种诗性，诗的情怀，诗的情思，诗的张扬和诗的含蓄，差异仅仅在文字叙写的色调里。表述对当代城市复杂感受的诗性，呈现为激烈喷吐的情状；面对昔日记忆的乡村，却是忧惋不尽的拙朴无饰，然而其内核里弥漫着的还是诗性。一种区别于任何诗人作家的和谷的诗性，即独禀的诗性气质和诗家道德。仅以其记游类散文看，这种诗的襟怀似乎更为率性。无论是写惊涛骇浪里的黄河的木船，无论是明媚清丽的长安秋色，抑或是在历史上落下一个大大的惊叹号的鸿门，其精彩的描述，逼真的映景，精确的点染，还有随心着意的情绪性渲染，就自自然然形成独有的诗性了。常见的此类散文，最难脱俗的是笔墨缠绕于来去的过程，或是黏滞于过程中的小零碎。和谷的每一篇开笔都是一种气象，直接入景，一笔一景，气象万千。《黄河古渡》起手便是“莽原上艳阳朗照，幽谷里秋风萧瑟。山壑沟峁之势，渐渐趋于叶脉的形状。临近叶柄处，显得峻峭起来，有一种古铜的色调……”这种文字里蕴含的气势和气象，真有“抚四海于一瞬”的博大豁朗，又有细微生动为叶脉的精妙。未见黄河古渡里的木船，读者的我已经沉浸到群山拥挤的壮观气韵中了。

诗性大约不是学而得之的，不然为何在某些诗歌里竟然感觉不到诗人的诗性，更何况散文等类。诗性应该是一种气质一种境界一种追求所熏陶出来的心理气象，看去无形无状不可捉摸，却于一词一句间无处不见。

和谷散文阅读里的语言感觉是巨大而又截然的差异。这种语言色彩语言质感和语言结构形态的差异之大，甚至使我不敢相信是同一只手握着的钢笔所书写。譬如："你已开始投入类似吃蛇般的崭新的生命体验。""你在拯救自己心灵的行动中咬响夏日生鲜的麦粒。""你感到正午炽热的阳光如同老家人说的白雨倾泻在尖顶帽与花伞上，大雷雨则把天空变成海洋一样酣畅淋漓而回肠荡气以至磅礴浩然。""你得经历失落惶惑和被疏远的时节……然后再换一种压力和快活的方式采撷果实。"这是作为远行人和谷在繁华而又喧嚣的都市里的叙述方式，且不说我对其内蕴的复杂感受。再譬如："它易燃，又耐火，洁净顺溜不扎手。""谁知大雨滂沱，一连下了三天，泥土下不了铧。""她望着我，我不认识她，我端直走过去。不对！我的心怦然碎了！她不就是我曾经的小辫吗？"这是作为老大还乡的作家和谷触景生情时的叙述方式，同样且不论其中一种复杂苦涩的感受。我之所以摘抄这些句子，就是想探讨一个纯属写作的问题，即制约或决定作家语言形态的关键是什么东西？

刘勰在《文心雕龙》里有一句精辟精到的论述："既随物以婉转，亦于心而徘徊。"这两句话十二个字，把用一切文体写作的作家的创作本相都说清道白了。暂且避开这句概论的主旨，仅就语言而言，也是精微难违的。作家的语言以怎样的形态"婉转"起来，得"随物"而选择到最恰当最贴切最应手的表述方式；还有"心之徘徊"，可否理解为作家的思想、精神、气质对"物"所产生的体验和感受，决定一种特殊到

别无替代的最适宜展示“徘徊”内质的语言方式？这样看来，不管面对什么样的“物”，只用一种语言形态语言结构来写作，而且自鸣扬扬为语言“风格”，是不可思议的。即如鲁迅，“既随”祥林嫂和阿Q和孔乙己等不同对象的“物”，“婉转”和“徘徊”出来多大反差的语言形态，已属阅读常识，且不说面对不同对象所使用的两极式冷暖语言的杂文。

这样，我就看到和谷语言炉火纯青般的成熟季节，既有汪洋一样恣肆林涛一样呼啸长河一样奔涌的抒发，又有简朴纯净到几乎不见长句几乎不用一个修饰形容词汇的素描。让我看到“随物”的对象差异所“婉转”出来的语言姿态和色彩，更看到这一颗独有的“心”所“徘徊”出来的灵魂世界的这一面和那一面的颤音。语言当是一个作家最显明最具标志性的个性表征。

我限于精力，更拘于能力，仅只说到和谷的散文阅读感受。和谷是一位多种体裁写作的作家，而且都有不俗的建树。他写诗歌写小说写影视剧本，也写过曾获全国大奖的长篇报告文学及电视连续剧《铁市长》，曾经产生过广泛的轰动性影响，远远超出了文学圈子，也超出了纯粹的文学鉴赏和评价的范围，在普通读者心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提到这篇报告文学和以此改编的电视剧，在陕西虽不敢说是无人不晓，拥有广泛的读者和观众却是客观的事实。然而作者和编剧和谷，却在文学圈外少有人知。这里就应了一句俗话，爱哭的娃多吃奶。当今文坛，谁都看见会炒作的人易出名，他炒自炒伙炒用钱买炒，都在一时一地炒出热名来，已经屡见不鲜。和谷依然故我，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写作到今天，从西安写到海南再回归西安，除了做必做的公务和家务，就是写作，悄悄默默地写作着，几乎不见张扬和张罗，与任何形式的炒作不沾。我在西安这地方几十年，虽然与和谷过

从不密，甚至可以称作稀少往来，然而关于他在文坛的姿态，还是清楚的，自信如上的“悄悄默默”的用语，基本准确。

这首先是一种修养、品行和道德的自我恪守；这又是对自己所钟爱的文学创作的理解，相信作家以作品存活这样古今中外难改的法则，因而对自己从事的创造性劳动的神圣和尊重；这更是一种自信，对世界万象通达理解下的自信，对自我创造活力的自信，才能几十年保持这种沉静的姿态。

2005年10月5日 雍村

业已铸就无限

——悼念巴金

巴金谢世了。即如巴老这样罕见的长寿百岁的作家谢世，我还是惋叹生命之短促。

巴金是中国新文学的开山者和奠基人之一。巴金天赋的文学智慧峭拔于整个新文学潮流之中。巴金的作品业已成为中国新文学库存的压山经典，是我们民族可资骄傲的精神财富。以《家》为代表的长篇小说，敏锐、准确而又深刻地揭示出从封建桎梏下走向新生的中国人的心理历程，封建政治封建思想封建道德网织下的中国人的心理结构和心理形态之种种，觉醒者冲破这桎梏这网织之痛苦之勇毅，尽管只是一个家族一个家庭，却铸就了一个时代中国人的典型。大的社会变革有历史教科书可循，而人的精神和心理更新复壮的历史性过程，我在巴金的小说里如亲历般地领略感受到了，那座封建老厦倾塌过程里中国男人和女人、老人和青年的呼吸和脉象。在我理解，这就是时代精神，一个特定的至关重要的中国历史大转折时代的精神。参与过这个时代历史性变革的人数以千万计，经历过这个历史性过程的作家也不少，而真正能以小说记录下这个不会重复的历史性变迁的作家巴金，便铸就了不朽。他的作品已经成为这个民族精神复兴复壮的历史过程的最准确最生动也最宏大的声响和映象，无可取代。

阅读巴金的小说，远远超越了纯粹的文学欣赏的意义，更不是那个时代有闲阶级把酒品茶所可赏心悦目的兴趣性阅读，而是对封建专制封建道德的挑战和呐喊，挟裹着新生世界强大的冲激荡涤的力量，

震撼警醒着“铁屋”里一个个麻木的灵魂。我的印象里，那个时代无以数计的青年，就是在读过《家》等小说后，断然与旧世界旧秩序宣告决裂和背叛，寻找新的生活道路，追求人生的新的理想，走上革命道路的。巴金的作品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中国青年，就是从思想和精神启蒙的意义上达到其不朽的意义的。即使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我读《家》《春》《秋》《雾》《雨》《电》等小说时，依然感受到深刻的启示。

巴金的道德、良知和人格，堪为楷模，高山仰止。他在经历过十年“文革”灾难之后的反省精神，不仅是一个作家自我道德和人格的完善，更是为着一个民族和国家未来发展的刻不容缓的责任心。他的《真话集》《随想录》，又一次使谎言鬼话肆虐许久的中国人受到警示。巴老直言不讳地阐明文学创作的意义，“是为着扫除人们心灵里的垃圾”。这对目下的我们所置身的文坛，更具切实的意义，作家不仅不能给生活制造垃圾，而是要荡涤人们心灵里的污秽；作家要扫除别人心灵里的垃圾，首先得涤除自己灵魂世界里的不干净的东西。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作家巴金生命的意义，依他不朽的著作，业已铸就了无限的活力。

2005年10月21日 二府庄

陈孝英，让我感到灿烂

是在我的创作和陕西文学界开始发生关系时，就认识了陈孝英，还有“笔耕组”的一茬评论家。在他们极大的关注和关爱下，我的创作得以发展。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一直到现在，陈孝英一直关心着陕西文学，多年来陕西一些重要作品、重要作家的研讨会，陈孝英都参加过，他很关注陕西文学创作。

大概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下半期，陈孝英开始把主要精力转移到喜剧美学研究上来。据我所知，陕西评论家中，涉及喜剧美学研究的不仅陈孝英一人，但他是专注于这方面研究而且很有建树的一位。在文艺评论这个大的领域里，喜剧美学是一个分支。陈孝英在这个领域里闯出一番自己的天地，卓有建树。他研究的主要对象是中国最富于创造活力的一位作家——王蒙。我看过孝英的很多评论文章，十分佩服。一个人一生能在一个领域内做成一件具有开创意义的大事，我觉得生命的价值就可以完全体现了。我希望他有更大的建树，取得更大的成就。他在喜剧美学这个领域中的建树，应该说至少在陕西是独树一帜，这就很了不起。到了我们现在这个年龄，常常容易对生活触发一些感慨，每个人由年龄的变化引起的生理、心理上的变化多有不同。陈孝英和我属于同龄人，对我们这茬人来说，过去的生活经历中都有灾难，更多的是极左的政治造成的灾难。我曾经当过农村基层干部、农村中小学教师，灾难也依然难以躲避。在那个时代背景下，在那种极左的政治气氛里，很难从灾难里头逃脱出来，要么装个庸人，啥都不说，或者要他怎么做就怎么做，一切顺从；要么就跟着极左的势力去制造灾难。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之下，不要说保持一个知识分子的独立人格，就是保持一个正常人的良心，你都会很难生存，所以造

成大量知识分子的灾难，比如老舍的自杀，柳青也自杀过，只是“未遂”而已。这个灾难不是一个人的，而是一个民族的灾难。连农民也受祸害，吃不饱、逃荒、饿死人。令我十分欣慰和庆幸的是，在这个极左造成的政治黑洞里，我们终于完成了一次社会变革。包括能召开今天这样的讨论会，大家能这样说话，陈孝英能出自传，这样的事只有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才可能发生。过去谁敢写自传哪？只有个别伟人才有这种权力，普通人怎么能写自传？那是不可思议的事。

我以为，陈孝英自传出版的意义就在于，他以个人的生活体验、生命历程、事业追求、人生追求，比较深刻地展示了这段中国社会的大变革，展示了一个人在这个社会中所占据的位置、生存形态、感受、经历等等，很有教育意义。不仅他本人可以拿这个来做自己的人生总结，他的儿女可以拿这个来感受父辈经历了什么，社会上很多人看过一个知识分子陈孝英的人生经历，他们也会对社会、人生产生心理上的影响和启发。这部自传出版的重要意义就在于此。孝英刚才发言讲到有些东西不能写，对此我也有同感。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到现在，有多家出版社安排人给我写传记，还有一些出版社要我自己写自传，或让我选择某个作家或记者来给我写，我都谢绝了。原因就是刚才孝英说的：“很难完全写出生活的真实来。”且不说今天的理论审视对你的那个“真实”能容忍到什么程度，仅仅是孝英刚才所讲的，和你同代活着的人跟你有很多纠葛就不好处理。包括青年时代经历的这事那事，发生过纠葛的人现在还活着，不要说你讲那个人有多么不好，不要说谁长了谁短了。就是一个词儿分寸不恰当，都会引发一场官司。所以我从来都不想写自传或者让别人来写陈忠实传记。与其不能真实地、全面地写出生存状态、精神经历、生活经历，那我就把它封存着，我本人抱的是这样一个态度。

而陈孝英能够把社会和生活容忍的那一部分东西表述出来，是了不起的一种途径的选择。这里还有一个民族心理习惯在起作用。从艺术真实的层面上讲，本来没有一个绝对标准，把细节生动地描写出来是真实，点到为止也是一定程度的真实。现在的舆论标准能容忍你到什么程度？心里没数就不敢写。比如，你写了几个隐而不宣的事，哪天他哥们儿来揍你一顿，问你："咱俩的事你怎么给全社会宣传？"所以这里还有一个民族心理承受习惯的问题。正因为如此，我觉得，关于真实，陈孝英能写到这个程度就很好了，真实是没有绝对标准的，这也是一种真实。社会在发展，民族心理在健康的意义上再向前发展一点，孝英还可以继续把真实向深处延伸。

关于陈孝英这个人，多年接触下来，我感到他是一个很好的人，很平和地研究喜剧美学。在我接触的评论家和作家中，孝英是一个让人感到灿烂的评论家、作家，思维活跃、知识面广，对于文化活动、文化策划点子很多，而且获得了很多成功。那一年我到北京去，孝英告诉我一个关于"幽默城"的文化活动，带我去北戴河转悠了一番，给人家做了一回广告。孝英和朋友相处很平和、很善良，生活接触面很宽，使用面很广，创作空间也很大，别人想学也学不来。寄望孝英把这个优长充分发挥，多创造一些美好的东西。

2005年4月2日写

11月13日改

气象万千的艺术峡谷

——高峡印象

多年前结识高峡，颇多惊异，竟有这样面相英俊穿戴周正利落的书画家。在我的印象里，书法、画画、摄影、导演等艺术家，都在努力追求着创造着极富个性的艺术境界，慢慢地自觉不自觉地也使自己的个人形象个性化了，或卷发披肩或长须垂胸，一摆一甩里都展示着独行不群的浪漫风度；服装也是千姿百态，该窄的地方宽到可装半石小麦，该宽的地方却绷紧到能显示最细微的肌肤线条。以这样的印象看高峡，笔挺的西服，无褶的衬衣，严谨的领带，其色彩的搭配恰到好处，横看竖看正视侧视都让我觉得得体而舒服。尽管我从来不着西装，却不反感西装，而高峡确凿是我见到的最能体现西装之美的魅力的中国人之一。还有高峡的头发，由额前往后拢梳，整整齐齐，一丝不乱，多年前如此英俊，如此清爽，多年后看去依然英俊，依然清爽。几十年下来，高峡英俊清爽的形象，在书苑画坛反倒独成一景了。我从高峡多年来留给我的这种印象里，感知到某种独禀的气性里的自信，一个艺术家对自己坚守的人生信条的自信，对自己不断探索的艺术境界和艺术创造理想的自信。

高峡的书法和绘画艺术，也造就出独立一景，独具艺术个性的一景。

与高峡整齐规范的衣着装束恰恰相反，他的书法艺术却是不拘一格千姿百态气象万千令我眼花缭乱应接不暇惊讶不已，看去变化无穷，赏来意趣无穷。我真不敢相信，这些仪态万方的汉字会是这个让

人看去十分周正的高峡所作，也不敢相信，那些规整到一笔不苟的楷书，和自修一体的行草，和独辟蹊径拙朴而又俏丽的草隶，更有独成一家如诗如画意蕴无穷的意象书法，会出自这周正规范的人的同一根毛笔。很自然引发我的猜想，这个外表看去中规中矩的人，蕴藏着一个无限丰盈的内心世界，一个自由活泼的灵魂，一双凌空飞舞的羽翅，一种迷幻想象的艺术创造活力。看来，真应了古人说的“是真才子自风流”这句话，真正的风流着意于艺术家自己创造的艺术景象和艺术世界，与头发胡须的卷直长短和服饰色彩基本无关。

我便想到变化。变有变的道理，也有变的理论。不变也有不变的道理和理论。似乎没有错与对的划界，仅仅在于不变的固守里达到怎样的艺术造诣和境界，或在不断变化的追求过程中创造出怎样的艺苑奇观。我见过几位大书法家的作品，无论发表报刊无论街头题匾，晾一眼便知为某老的作品，他们一生就只用一种字体写字，成为某体，赢得观赏也赢得书法界的敬重。再有更多的人是在不断变化里追求新的书法之美，高峡即属于最不安分最活跃最富于变化的一位书法家。他的草书，尤其是草隶，更有不可思议的意象书法，让我看到对中国古老书法艺术新境界的开拓，一种创造欲望的张扬和实现，一种探索和创造的勇气，这种永无止境的追求所呈现的变化，实乃珍贵，其精神启示何止于书法，文学创作亦然。

高峡的国画多为山水和花卉两类。山水画里的山，尽管是不同视觉里的极具个性的造型，却总能看到山的伟岸、山的雄浑和山的挺拔，让人强烈地感受到一种刚毅肃穆的精神气质。几乎所有以山为主题的构图，绝少繁复，更不见凌乱，多为疏朗明快的气象，间以白云薄雾，观之顿觉心胸舒展开阔。在以青黑为主调的山的这一皱褶或那

一方断崖上，总有红的黄的或绿的花草点染，峻峭冷峻里泛出一抹活泼和柔媚。我便可以透视画家高峡内心里的那一份刚劲和柔肠。

高峡的花卉多取材于梅、荷、菊、竹、兰、玉兰和水仙等，这些花草在我们民族自古传承的内涵，是傲霜是骨气是纯净是清爽是纯洁。高峡以独立的体验和独特的领悟，把这些花草所象征所寄托的中国人最崇尚的品德和气质，展示得充分而又生动，说淋漓尽致也不为过誉，扑面而来就让人感到一种高尚纯洁的气韵。我同样可以自然地感知高峡的心灵趣味和审美倾向了。中国的国画，从来都是传达画家的心声的。后人从那浓淡粗密的墨痕里，读到的是画家的内心世界对客观世界的宣言。

行话叫写意。国画里的山水花卉，我之所以更偏爱写意一类，就在于那一峰一壑一枝一朵里意蕴无穷。写意自然也有高境界和低俗层次的差异，不单在笔墨功力，更在于体验层次的深浅，也在于画家个性修养品格内涵的关键性因素。这也类同相通于文学创作。高峡给我展示的山水里的抒怀寄情，花卉里的风骨和清爽，都是其胸襟里的气象所展示的卓尔不群的“意”。

高峡自幼迷恋书法绘画，天性驱使，难得改辙。他孜孜不倦，沉迷其中，苦修其中，也得趣享乐其中，匮乏的物质生活丝毫不能动摇他的追求，即如十年“文革”扼杀一切文化艺术的险恶环境，他也没有中止学习和探索。高峡师承的书法绘画的大家大师人数之众，令我甚为惊诧，曾被石鲁赞为“最好的学生”。我从高峡师承和自立的求索历程中，颇得启示和教益，即吸收继承与独立创造的关系，这也与作家的阅读借鉴到独立创作完全类同。高峡可以说是博取百家之长的一位具有惊人的吸收借鉴能力的人。他在较为漫长的基本功力的操练过程里，将各路各派艺术大师的优长和“绝招”融注到自己的墨痕里，使自

己的功夫日渐扎实，这是其一。更重要的是诸多大家大师的艺术思路艺术见解和艺术家的襟怀，给予青年高峡潜移默化的影响、启示和陶冶，对于书法绘画艺术的理解和领悟，对于艺术创造思维和视野的扩展，乃至对自身精神情操的滋补和修养，已经远远超越了笔法用墨等技艺层面的仿效。这样，高峡便避免了蜗居遮蔽于大师阴影之下的不幸。和文学创作某些不幸现象极类似，有人亦步亦趋模仿某种文学流派，甚至模仿自己喜欢的某位作家的语言，结果只是形似而神不见。书法绘画也有只是临摹某大家的笔法技巧墨色浓淡，而不得大家的思维和精神，终究走不出大家大师的阴影，无法形成独立艺术个性的自己这一家。高峡既得益于前辈大师众多的技艺技法，更领略其内在精髓，便把自己充实起来，进入自由的创造境界，达到随心所欲海阔天空浪漫风流的艺术创作的最佳状态，于是便呈现出如前述的那些令人惊诧令人迷醉令人击掌的书法绘画的佳作。

高峡沉潜在一座举世闻名的碑石宝藏之地西安碑林。那里保存着这个民族自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以来的诸多碑刻的稀世珍宝，是海内外书法家无不仰慕膜拜的至尊之地。高峡多年沉潜其中，真可谓得天独厚，灵气神韵任其反复揣摩反复浸淫反复感受，注入灵魂，成为照耀艺术创造世界里的灵光神火。高峡又不局限于个人学养的得益，更倾心竭力于这些瑰宝的保护和研究，不仅是对民族独有的艺术光辉的弘扬，更是对当代书法艺术发展的促进。据我这个行外人所知，书坛业界无不对高峡的这些作为赞誉有加。

高峡是一位学养丰厚的学者型书画家，古典的传统文化知识可谓渊博，却又不沾拈须晃脑的老古董的迂腐；他又兼有当代世界最新知识的最新思维，显示着一种论说见解的新鲜活力。这应该是艺术创造的原动力，我据此而期待他新的创造。

2005年11月16日 二府庄

真实又真诚的叙写

——毛安秦散文读记

在陕西文化艺术界这个不小的人群圈子里，毛安秦称得上是一位颇有人缘也颇有名气的人物。她的职业是电视记者，既做新闻采访，也做人物专题，尤其是后者，向观众介绍和宣传的对象，多是在学术研究、文学创作各类艺术创造领域，卓有建树的学者、作家、画家、雕塑家、书法家、舞蹈家、作曲家和歌唱家，还有少为人知的某些冷门如秸秆研究的专家、探索人脑奥秘的人。她的人物专题做得热情洋溢，又严谨自然，不见某些华而不实的吹嘘卖弄等时下常有的通病，而是在一个个特定的人物对象那里，挖掘出独禀的精神气质，给人以启示。观众看时也就自然产生一种基本的信赖，对被介绍的人物留下踏实可靠的感觉。

作家路遥，是她从事电视职业不久做的一个很有品位也很有影响的人物专题，是较早向读者揭开陕西这位杰出作家神秘面纱的一部好片子。我之所以赞赏，是这部专题片播放之后，吹到我耳朵里的良好反响所形成的印象。大约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电视传播的技术尚不发达，我所居住的东郊原下的村庄，收不到电视讯号，无法看到这部专题片，颇多遗憾。文学界的作家朋友以及文化界熟识的艺术家，好多人都向我说到这部专题片的观感，赞赏有加。路遥生前对这部解读他的创作追求和生活历程的片子，也是颇为称道颇为珍重的。直到许多年后的今天，我才看到毛安秦写的这部专题片《路遥，一个普通劳动者》的解说词。这是一篇精到的文章，对路遥这位艺术个性独特的作家的理解是相当深刻的，对路遥艺术创造的生活历程和时代氛围

的剖析是准确的，对路遥深刻的思想和宏大的艺术追求的探索是到位的。于是，毛安秦的这部初出茅庐的电视专题片，不仅向观众介绍了一位具独立个性的作家路遥，也显露出采访者毛安秦脱俗的眼光和艺术才华。依稀记得毛安秦这个名字，还是路遥对我的说话里提到的。不过路遥称她小毛，那时她很年轻。

我和毛安秦的接触却是十多年后的事了。二十世纪最后一年的冬天，借助一位热心朋友的安排，我躲在礼泉县读书。毛安秦电话相约采访。我那时处于一种渴望清冷乃至寡淡生活的心态，此前业已谢绝了几家媒体的好心邀约，理由是关于写作似乎没有新鲜的话题。我仍然是推辞。突然想起刚刚得悉青年雕塑家李小超完成了《白鹿原》群雕的事，约定我去观赏，于是就把这个消息告诉毛安秦，可以以此为话题，着重介绍李小超的雕塑创作。这样，毛安秦如约前往礼泉，于寒冷的清晨赶往李小超乡村老家的宅院。我也同时看到简陋环境里艰苦而又富于创造性的一组组群塑，令人惊讶不已。这个在西安美院学过雕塑的年轻人，蜗居礼泉乡村老家，埋头苦干了两年，把小说《白鹿原》里的一些情节和人物，用泥捏出三十多组群雕，展现出故事发生的氛围和人物个性，说惟妙惟肖也不为过誉。我发现毛安秦被现场展示的景观感染了激发了，完全投入到让人始料不及的艺术景观里去了。恰是在礼泉乡村农家小院观瞻李小超雕塑创作的现场，毛安秦完成了和我的对话和采访。对我来说也是一次难忘的经见，脑子里至今都刻记着小院里那三间简陋的厦屋，厦屋里堆放着三四千个陶制的雕塑像，还有后院里自建的烘烧陶品的小窑，颇有点诸葛出山之前茅庐的味道。得助于握有先进传媒手段的毛安秦的相顾，把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李小超和他的雕塑艺术推到广大观众视觉里，也推到陕西艺术界，现在李小超已成为很有名气也很富于创作活力的青年雕塑家。许

多默默地进行着专题研究和创作的学者和艺术家，得助于毛安秦热诚而理性的推介走向广泛的人群，被社会关注和关爱。

匆匆五年过去，又到一年的冬天，毛安秦把一摞厚厚的书稿摆到我的面前，是她多年来创作发表的散文、随笔和采访笔记，我读后真有一种始料不及的惊讶，更多刮目相看的惊喜。平时偶尔在报纸上也看到过她的短文，没有太留意，现在却确信这是一位独具慧心颇富才气的作家了。她把热情倾注给各路名家宣传对象，却把自己的创作隐蔽起来，也把自己的作家面目深藏不露。

我读毛安秦的散文，最强烈的感觉是真实，既是描述的生活事象的真实，更是处于事象演变过程里"我"和相关角色心理的真实。这种阅读感受，主要得之于她写自己和自家亲属的一组散文。我也借助这次阅读，大略了解到毛安秦成长的社会背景和家庭环境。在改革开放前普遍贫穷的乡村生活背景，毛安秦又在一个支离破碎的情感环境里生长，犹如雪上加霜，至痛处令人扼腕。毛安秦叙述里呈现的经济困境和情感绝望的母亲形象，我在阅读过程里，竟然不止一次有揪心的紧张。这是不少小说的阅读里都难以获得的情绪性感染。《追忆父亲》是一篇难得的散文佳作。父亲在文章里也在作者的成长史中的几次出现，标志着这个人几个阶段的生存形态和精神形态，其生动典型的举止行为和语言细节，活脱刻画出一个悲剧人物痛苦、辛酸、慰藉等丰富的情感内蕴。我由此而能透视到当时社会和家庭双重的挤压，如何摧折着一个父亲的心灵和脊梁。这篇散文深刻的社会内容和"这一个"的典型性，正是许多同类题材的小说所企望获得而未能达到的艺术效果。

这种感人以至逼人的真实感，渗透在作者一系列叙述个人生活片段的篇章里，崩析的家庭里的阴影，对少年时代心灵世界的遮蔽，艰

难的求学历程中所经受的磨砺，真诚的友谊和善意的救助，不仅让我看到一个顽强地追求着生命理想的心灵的灵光，更感知到默默地潜存在人群里惜才的老师至诚的士兵等洋溢着爱心灵光的人。这种坚实质朴的真实，是毛安秦散文的灵魂。不争的事实是，矫情娇气或游戏卖弄的文字，在当今散文创作里随处可见。既看不到真实的生活感受，更无思考思想的一丝敏锐的火花，落叶似的语言里没有生命活力。这样，我就尤其珍重毛安秦散文里那种真实的生活体验，以及她对那种刻骨的鲜活的体验的准确描述。这样的散文，就获得了存活于世的基本资质，不会被时间改易，也不会因时世的演变而褪色。

毛安秦散文的语言，质地淳厚，颇富力度，形象和准确自不必说了。这种语言更让我联想到优秀小说的语言。我在阅读中往往设想，毛安秦从散文写作很容易也很自然地能过渡到小说创作，还在于她对散文布局架构的把握十分得体，繁简得当，起伏迭出，把生活里真实发生过的极富戏剧性的情节叙述得恰到好处，给读者以一波强似一波的情感冲击。这也是小说作家不断追求的艺术效果，毛安秦的叙事性散文却达到了。这就显示出作者驾驭题材的本领，和艺术表现的智慧。

阅读了毛安秦的散文，我才意识到以往对她的了解太浮泛了。这是一个极富个性的人。这种个性不是怪僻类的，而是不甘平庸不甘屈服的自强不息的内驱力，小小年纪就显示出来。正是这种内驱的力量，才跨越过不单是穷困的障碍，完成了艰难的求学之路，获取了强大自己的知识，从终南山下的乡村走向自己热衷的专业。毛安秦也是一个极富道德良知的人。她对真诚地帮助过自己的老师念念不忘，《师恩重如山》一文读来令人击节扼腕，既感动一位良师，也感动作者对于知遇恩情的敬重和珍惜。这应该是作为一个人的基本的操守，

是人与人之间既可说崇高也可说是底线的东西。我在阅读里不仅了知毛安秦的身世和成就之路，更重要的是看到一个有志气有追求有道德的人。散文是作家最直白最坦诚的表述。了解作家最直截的途径是阅读其散文，作家关于世界的理解，作家关于生活事变的态度，作家关于生活的独特体验，作家面对世界的信仰，都通过散文毫无遮掩地袒露出来。毛安秦深得散文立足之命脉，让我达到一种理解。

我把作家这种从业者的因由，从生理上解释为一根对文字敏感的神经。这根神经决定着这个人从少小年纪就会对文字尤其是诗样的文学语言发生敏感，再到喜欢以至不倦地追求，往往是与物质的优裕或匮乏无关。我从毛安秦身上也验证了我的观点，她也是小小年纪就热衷文学作品的阅读，尽管那时候受束缚于“文革”极左的环境，依然阻挡不住那根敏感文字的神经，终于在进大学时就发表诗歌了。那是一首很耐得吟诵的诗。毛安秦已成为一个优秀的散文作家，营造出独立的散文风格和艺术景致。

这个多年热衷于宣传各色专家的人，对自己的创作一直低调处理，不事张扬，更不沾文坛上某些自我标榜自我吹嘘的时风。她专注于自己的电视职业，把对生活和工作里的感受和体验诉诸文字，造就一篇篇颇有独立见解的文章。这种踏实的心地里所蕴含的自重和自信，尤为难能。

2005年12月20日 二府庄

别一种情怀

我诚惶诚恐，说老实话，快十年了，写了不超过二十首诗和词。我到现在把平仄都搞不清，也没有时间硬记，仅仅只是能把握住对仗。开始学写古体诗的时候，还敢标上七律七绝，后来就一律去掉了，仅作为诗，这样就可以逃脱古典诗词审判者严厉的标尺。但我确实喜爱古典诗词，得空常读一些篇章，也看到现代人写古典诗词的非常多，报纸、刊物，以及中国作家协会办的《诗刊》上也能看到一些。最近，看了我们的老领导张勃兴同志出的两厚本诗词集，有诸多感慨，我只谈一点，从《荏苒录》中，可以充分感受到一个新生活建设者的情怀，这点非常突出。

我们常说“文如其人，诗如其人”，这是一个难得悖反的规律。张勃兴同志长期担任陕西省的主要领导，就我和他有限接触的印象来看，他应该是陕西新时期改革开放的奠基者。他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开始担任省政府和省委的主要领导。我们陕西跨开较大较快的改革开放的脚步，正是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的，那时有很多理论问题在辩论，思想解放的阻力很大，新的思想理论体系还没有建立起来。陕西大的改革开放步伐大约在八十年代中期到后期终于启动了。这个时期勃兴同志担任陕西省的主要领导。记得，我连续多年参加省委会议，令人振奋的“米”字形高速公路建设规划就是那时提出来的，到九十年代“米”字形高速公路已成为现实。去年，我看到新的发展思路，已经把“米”字形高速公路建设提升到一个新的阶段，叫作“三纵四横”，从“米”字形已发展到一种网状交通。从报纸公布的交通示意图上看，未来高速公路基本上把陕西网起来了。仅公路交通而言，这二十年期间陕西发展很快，而且越来越快，因为现在的物质基础和财力要

比八十年代中期强大得多。我们显然能感知到勃兴同志是陕西发展新图景的奠基者、开创者。

这样一个人，在担负着繁重的社会责任和千头万绪工作的同时，还写了这么多诗。承担着这样重大的社会发展使命的人写起诗来，心境肯定不会像陶渊明那样“悠然见南山”了。张勃兴同志作为新生活的建设者，即使见到“南山”，情怀也不会是“悠然”的。所以我们研究诗、品诗，要与作者、诗人的情怀联系起来，这是解读诗歌最致命、最直接的密码。陶渊明在退居到南山之时和中举之前的心情显然不一样。人的心理变化和情绪的变化决定着诗词的变化。我在这两本诗集里充分感受到一个新生活、新社会的建设者的一种情怀。这种情怀我们不能代替，只有张勃兴同志才有，他对社会发展过程中的变化，不仅看得最准确，关键在于他是直接促进发展、进步、变化的领导者、组织者，这样他就有了对三秦大地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最直接的生活体验，旁观者就很难感受到这种生活体验；他所在的位置与其他参与者的体验是截然不同的。我们看到的既是一个建设者，更是一个负有更大使命的领导者直接体验的情怀。在我们中国古典诗词里，就充分体现着那些有道德、有良知和社会责任感的伟大诗人传统的品质。在古代，专职的诗人很少，很多大诗人、大文豪都担任着或高或低的职务，有的在朝廷中央，有的在地方，包括苏轼都是这样的。他们在领导一方地域的时候，由民情、国情和政治抱负引发的情怀，都是以他们直接的生活体验抒发出来的。“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文字里涌动的不仅是长江的大浪，更是苏轼自己豪情万丈的精神情怀、内心波浪，旁观者不进入、不参与当时朝廷忠与奸、政见与分歧的矛盾中，没有直接体验，是很难产生这样博大的气魄的。所以，我看到勃兴同志的诗词，联想到传统的诗家词人，他们不是单纯的忧国忧民，而是直接解决国之忧、民之忧的人。杜甫没有做成官，他的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只能徒叹奈何，给后世留下那个腐败王朝下的百姓生活的凄惨景象。有一些诗家如王安石，他直接参与政治改革、经济改革，有失败者，有成功者，他们的诗词所表现的直接体验，与旁观者感受到的体验差别很大。从这个角度来看，勃兴同志几十年来是我们陕西改革开放的领导者、组织者、发动者。他把这种情怀注入诗词之中，我作为读者在书中到处都可以感受到。

勃兴同志从领导岗位上退下来以后，这种心情仍难以完全改变。尽管不在主要领导岗位上，但他长期修炼成的这种心理和责任感，这种对人民、对事业的情怀，是很难改变的。在他的诗篇中，即使吟诵山水风物，也能感受到这种情怀。

这样，我们就能以非常崇敬的心情来理解过去的书记、现在的诗人，感受他作为诗人的一种大爱者的情怀。至于诗词的采词造句、意境风采，我就不一一说了，让专家学者来品评。

祝贺张勃兴同志两部诗词著作出版，祝愿他在身体健康的同时，诗词创作更上一层楼。

2006年3月25日草

4月13日修订 二府庄

心斋，一个海阔的文学空间

王愚同志从事文学评论活动很早，而且那时他还很年轻，他在文学评论上的主要成就，却是在新时期取得的。王愚是一位富于才华、富于智慧、富于正义感，尤其是富于独立思考、独立见解的艺术家。可想而知这样的一个艺术家在我们过去不正常的社会生活和文学生活当中，首当其冲地遭到了打击，就是必然的事了，从“右派”升级为“反革命”，从“劳教”到“监狱”，惩罚也在“升级”。几十年后的今天，我们再回过头来反思这一段历史的时候，我觉得年轻的王愚当“右派”是合理的，今天看来几乎是难能可贵的伟大。王愚青年时期走上文坛，他的文学理想和艺术的思维一经付诸报端，就以强烈的锐气和独立的见解引人注目。而我们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一直到“文革”，越来越不能容忍任何艺术个性和艺术见解，这早已成为不争的事实。王愚刚刚发出自己的声音，就被封喉，一个天才、一个富于独立艺术个性的天才，就只能放下纸笔去“背砖”。这当然不是一个人的悲剧，而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悲剧。我之所以说王愚的主要文学活动是从新时期开始的，因为只有挨到生活“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新时期，他的创造智慧和创造活力才获得释放的历史性契机，以喷涌之势壮观于文坛。我十分惊讶一个被封喉了二十余年的人，不仅未被摧折未沉没麻木，反而依然保持着敏锐和热情。王愚的主要著作都是新时期以后所创作的。新时期以来的陕西文学、中国当代文学记载着一个不能泯灭的名字——王愚。

新时期文艺复兴一开始，王愚重新说起了现实主义神话的话题。这是他几十年前刚刚跃上文坛时说的一个话题，并由此而遭难的一个话题。几十年后又说这个话题就显得意味深长，也是一种历史性的讽

刺。一个背了几十年的砖、受了几十年的劳改，一出监狱，一走进文坛，仍然说几十年前因为说了现实主义话题而落难的话的这样一个人，重新能说这个话题本身就给人一个非常大的启示，我们现在选择的政治路线所打开的新局面，由此而出现的前所未有的文学繁荣，是关于社会主义的认识达到一个新的深度和高度，自然是从正反两面的经验和挫折里完成这个理论的升华过程的。在这个艰难的过程中，我看到了一个人的精神，就是王愚这种“还得说”的精神。王愚对新时期文学评论，表现出了巨大的热情，发出了独到的见解，也表现了一个艺术家的良心。他跟新时期的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是同步的，尤其在我们陕西文学的发展过程中是一个很重要的声音。

新时期以来，王愚对我们国家出现的一些重要作家的代表性作品几乎都有所论及。从一九七八年到一九九八年的二十年，即改革开放后的二十年中，王愚对这二十年间我国文学发展中几个潮流所形成的阶段，都在他的论文里有所涉及，表现了对中国当代文学发展的一种巨大的热情。我们不能忘记，王愚对于陕西新时期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新时期伊始，王愚、畅广元、刘建军、蒙万夫、李星、肖云儒等陕西一批重要的评论家，以民间的形式组成“笔耕文学评论组”，一直关注全国的文学发展态势，尤其是对陕西新时期以来出现的这个作家群的关注和研究。陕西新时期涌现的主要作家，都在王愚和笔耕组的评论视野之内，尤其是那些发生过重要影响的作品：像路遥的《人生》、贾平凹的《腊月·正月》等这些作品都受到过巨大的关注，有过深入的研究讨论，产生了一批评论文章，对作家创作的进一步发展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对作家群体也发生了重要启示。每当他们感觉到有必要对陕西文学创作的发展状态做一次阶段性分析时，笔耕文学评论组就开会。这一段过程我是经历过的，因为我也是被他们关

注和评说的对象，我是记忆犹新难以忘怀的。应该说他们的评说是无私的，也应该说是“无情”的。

当然这个“无情”不是指情感，而是说没有个人私情的情。他们面对的就是文学，除了对一些重要作品的研究，更关注一个又一个作家创作发展的状态，达到了什么高度得了什么艺术成果，更偏重分析制约某个作家大步提升的关键性因素，促进其尽快提升作品的品相。这是无私的爱，是大爱。对陕西新时期以来的这个中青年作家群体创作的发展，王愚和他的笔耕组确实起到了一种不可替代的作用，也体现了一种兄长和朋友的真诚。王愚和这一批评论家的年龄要比这一批作家年龄稍微长一点，哪怕批评都叫我感觉到是一种真诚的批评，希望你尽快跃上一个台阶的那一种真诚。我想跟我年龄差不多的这一茬作家都有这样的感觉。王愚不仅关注著名的作家，还以最大的热情和真诚关注陕西一大批青年作家的成长和发展。王愚对于新时期以来的中国文学和陕西文学巨大的热情和重要建树，体现了一个真正的文学评论家的一种生命形态、心理形态和生命价值。

王愚年龄还不大，不幸连着两次发生中风，身体和情绪都受到一定的影响。而当病情一旦有所缓解，王愚就又开始了他的“心斋”里头的叙谈活动，令我尤其感慨，一个人的生命追求，一个人的终生用心，一个人对文学创造的迷恋和永不衰退的创造活力。柳青说作家的创作六十年为一个单元。王愚按年龄说现在过了六十年了，但文学活动还不够六十年，活到八十七岁这个六十年的一个单元就完成了。

祝愿王老身体和心理保持年轻，雄雄壮壮地活到八十七岁，完成他文学的六十年这个单元。

2006年4月18日

中国乡村形态的智慧表达

——我读《山匪》

《山匪》是我阅读过的同类题材小说中非常优秀的一部，写出了真实而深刻的生活形态，达到了一定的深度和高度！《山匪》具备了沟通更大空间读者的品格，是一部显示着耀眼的语言魅力的小说，也是那个历史过程中乡村生活的百科全书。

我昨天晚上一点钟才读完这部小说。不读作品我是说不了话的。直到现在还陷在《山匪》阅读的兴奋和愉悦之中。这部小说在媒体连载时我看了几个章节，首先感到非常漂亮的叙述语言，是难得的让人一旦触及便感到兴奋的一种文学语言。直到今天看完了，仍觉得这部作品可以让人言说的话题很多，从任何一个角度上去看这部作品，都能引发人论说的兴奋点。

关于《山匪》这部小说的内容，如果要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一个历史过程中的中国乡村形态。作为一个读者阅读任何作品业已形成的习惯，我是通过阅读作品来看取作家的创作意图的，而不是根据作家的创作意图来看作品。我之所以说《山匪》展现了一个历史过程中的中国乡村的社会生活形态，在于这部作品所取的那个历史时段，是封建社会解体、新的社会架构没有建立起来之前，确切说就是二十世纪前半期这一段中国乡村的社会生活形态。我不认为这仅仅只是商洛一个村一个镇的生活形态，而是中国乡村社会生活形态的一幅浓缩了的影像。无非是作家孙见喜把他的描写对象搁在他最熟悉也最敏感情愫的家乡商洛罢了。就跟斯坦贝克把他作品描绘的对象，一生都放在

他的家乡那个地球上像邮票大的一块地方，而它辐射出来的社会意义和人生形态却是人类共通的东西。我读《山匪》的感觉也是这样的。在《山匪》里，孙见喜展示出来中国乡村在那个大动荡大混乱大裂变的社会背景里的政治形态、经济形态、文化形态、教育形态、生产形态、道德形态、民俗形态、社会结构和生活运动的形态，我如同领略业已湮灭的那个时代、那个历史过程中乡村生活的百科全书，阅读时可以充分感受和体味到上一代人昨天的心理秩序的脉象。清朝灭亡以后，有军阀混战王旗迭变的时段，军阀刘镇华围困西安城就是这种政局在陕西的一个典型事件，它不仅影响了关中，也影响了商洛和周边地区。这是一个大的政治历史事件，不仅是经济损失，不仅是生灵涂炭，而是更深层地影响到社会结构和民众的心理秩序。《山匪》以几个家庭和各个社会位置上的人物的大起大落为脉象，生动地展现出那些不容置疑的生活景象。我很感兴趣的是，传奇、神话、诡异的传说等，这些在作品里都做了详尽的描写。有一个情节写到孙家老大承礼，一出门就被割掉了头，最后他的头在她媳妇尿尿的那个地方的裤裆里发现了。类似这种神奇、离奇的情节很多，整个作品弥漫着一种浓厚的诡异气氛，展示了社会发展到那个程度时人的思维方式、人的精神形态和心理形态，而不仅仅是展示某些缺失内涵的怪异事情。这些我们从拉美魔幻现实主义作品中常能领略得到，但《山匪》不是拉美的魔幻现实主义，跟那截然不同，因为拉美魔幻现实主义可以把人突然变成甲虫。《山匪》里写那个人物的头不见了，是因为他媳妇在太岁神头上尿了一泡，这完全是中国民间神秘的思维方式。作品最后揭示出来的不是尿错了地方，而是有人为的因素，作者的思想是用诡异的形式来展示的。我们知道，缺乏科学的愚昧和落后的社会，是神鬼怪异滋生的土壤，人们以鬼怪来解释许多无法理解的自然现象和复杂的社会现象，这往往给各种图谋散布下迷彩。见喜就真实地揭示了这个本相，而不是我们见惯了的、某些作品故意宣示的那种怪异。还

有生产形态，那个时代的农民怎么种地，写得太逼真了。譬如书中对种植罂粟的精细描写，对罂粟熬制大烟再到销售渠道的准确叙述，真是令我大开眼界，我惊讶作家对生活了解的深度。读到这儿我都有自愧弗如的感觉。作为一个作家，阅读别人的作品，受感动的地方，总能联系到自己的写作。我写作《白鹿原》的时候，也涉及种植大烟、熬制大烟，我仅仅只能写到那么粗略的程度，因为我在乡村找到八十岁的老人，他们只能说到这种程度。孙见喜比我的了解深刻得多、精细得多。作品提供的那个时代人与人之间的生活形态，包括礼尚往来、婚丧娶嫁、人际交往、喝酒饮茶吃饭等民风民俗，这些东西描写得非常精到，展示了中国封建制度解体以后到新的政权建立的这几十年间，中国乡村的社会结构形态和生活运动的形态，是怎么运动过来的；我们的上两代人经历了怎样的生活，经历了怎样的精神剥离和心理结构的重建，才到了一九四九年共和国成立。阅读并感受这个过程，应该说这部小说是我读过的同类题材的小说中，非常优秀的一部。我不想用史诗这种话来说，但它确实是非常优秀的。涉及上述这些社会形态，感受过去了的那个历史时段，《山匪》让人能体味到丰富而不尽的内涵，达到了一定的深度和高度。

有几点我特别感受深刻：从封建帝制到新的社会诞生过程中的痛苦，不是商洛人独有的，而是我们整个民族共同的；这个历史过程中的时代风貌，我在阅读中既能感觉到一种原生态的陌生，又能感觉到一种原生态的熟悉，既有一种艺术形态的陌生，又有一种艺术形态的熟悉。这种感受好像很矛盾，原生形态的历史的这种陌生，主要是它和我们今天的生活距离拉得太久远。之所以让我又感受到一种原生形态的熟悉，是因为作家所描绘的生活事项和社会状况，是建立在生活真实的基础之上，这就最容易触发读者记忆里最敏感最软弱的那根神经。要让读者对一种陌生的、原生形态的生活发生这种熟悉的似曾经

见的阅读效应，最基本的一个条件是真实。我敢肯定孙见喜为获取那种久远而陌生的生活形态下了很多功夫，完成了深入生活调查研究的过程，没有这个过程绝对不可能展示出如此真切如此生动的生活图像，我强烈的阅读感受，完全出自自身写作的切实体验，生活的真实和编造的虚假是难得混同的。我也常在某些作品中能看到作家在生活描写上的捉襟见肘，硬是把那一点点自以为有趣的细节无节制地显夸，这恰恰显露出作者生活体验的肤浅乃至生活的匮乏。孙见喜对这些生活形态拥有的丰富、内蕴体味的稔熟，令我确实感到惊讶。关于艺术形态的陌生，这一时段的生活形态，不少作品已经涉猎过，但触及这样深的程度、真实的程度，呈现出一派陌生的艺术景致，艺术对生活提升的巨大效果，是别开洞天令人惊讶的新奇，前所未见的陌生，是艺术新景观的前提。可以肯定孙见喜在这一点上有重大突破！之所以说又是一种艺术形态的熟悉，这种艺术熟悉感，具备了优秀长篇小说的基本规范。我们读世界名著，它靠什么跟中国读者沟通？美国人的生活形态跟我们差异太大了，拉美的人差异更大，我们阅读那些作品为什么没有隔阂？在于他们对那些生活形态的描写，沟通的是人类心灵里共同的情感。见喜笔下艺术形态的这种熟悉感，使《山匪》这部小说远远地挣脱了一些表现地域性生活形态的作品常常令人遗憾的局限，具备了沟通更大空间读者的品格。我对《山匪》里的人物，像十八娃、孙老者、陈八卦，这些人物自身性格的发展，是从他们的命运机遇里的情感变化过程中完成沟通的。我感觉不到“隔”，反过来说，如果让一个中国作家感到“隔”，异族外国的读者就很难读了。小说达到艺术熟悉的境界，是难得的大突破。

我特别喜欢《山匪》的语言，一接触文本我便产生了耳目一新的真实感觉，用一句话概括：这是一部显示着耀眼的语言魅力的小说。孙见喜把生活语言变成作家主体的叙述语言，我作为一个作家，从写

作实践来体会，是很见语言功力的，是很难掌握的一种叙述方式和叙事本领。小说的语言有描写语言和叙述语言。叙述语言也有各种叙述形态，单从叙述形态就能明显感觉到一个作家成熟的成色。孙见喜在这部小说写作中，不是我们常见的某些作品如生硬地塞进一些生僻少见的土语方言，这不仅产生不了美感，反而觉得别扭，而孙见喜对大量的生动鲜活的民间生活语言不仅完成了提炼，更难得的是他驾轻就熟地进入直接的叙事，这种语言是形象化的叙述，这当是语言的至高境界。打一个比方，既有钢的硬度又有麻绳的韧性的一种极富弹性的语言。我从写作中感受到，这是作家孙见喜完成了语言上质的飞跃，而且对话语言达到令人叫绝的准确、生动和个性化，其精彩纷呈，常常叫人忍俊不禁而拍案击掌，读者感受的是一种纯粹的语言的魅力。我是从写作的角度去理解，不是从评论家的角度上理解的。在这种形象化叙述的文本里，我处处感知一种语言智慧，他不猎奇性地挑拣那些比较古怪的民间生活语言，更不是完全地照搬。他把民间创造的富于智慧的语言淘采出来，也显示出作家自己的语言智慧，这是不类同于任何文本的鲜活一支。再是见喜这种叙述语言的密度相当大。阅读中间能感觉到他在浓缩，然而又不仅是浓缩，是严格把握着每一个句子的内涵和质量，既是形象的，又是鲜活的，更含蕴着丰富的意指，几乎感觉不到任何语言的虚意卖弄，对人物和具体场景的描述恰到好处。能把这样密度的语言保持始终，几十万字不泄气不松动地持续到最后一行，真是不易。

作家在生活的拥有量上非常丰富，我在阅读时感觉有些东西还可以再展开，就内容来说，恐怕远远不是现在这个字数的小说，弄到五十万字，仍然不会感觉到累赘，可见作家在斟词酌句上确实下了很多功夫。

作为一个同代作家，读完《山匪》颇有一种感慨和感动，已经成为历史的二十世纪前半叶的生活，已经冷寂到令后半叶出生的人如闻神话，然而却是这个民族艰难踯躅的真实过程。《山匪》不仅把那一过程重现给今天和未来的读者，而且达到一个生活和艺术的真实，这是一个作家的成功，也是一个作家的责任和道义，让他同代的和后代的读者，可以信赖无虞地去品咂自己先祖的生活形态和心灵历程。

2006年3月23日草

5月6日修订 雍村

筛选自己

我向来不热心给自己要出版的书作序。出头一本书《乡村》，收揽了新时期文艺复兴头三年创作的短篇小说，那种不可抑制的兴奋是不可名状的。责编再三鼓励我作一个序，也是出于一本书对一个习作者的庄严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文学创作和青年作家这些名词不仅笼罩着五彩光环，还有一种庄严和神圣的气象。我理解责编的文学之心，然而还是没有自序，只写了千把字的后记，留下对平生出版的第一本著作的感动之情。后来这二十余年里，我出版过三十余种选本，写过几次序文，都是专题系列书籍规定的统一条例，我不敢破例，免得造成别扭执拗不合套的坏印象，于是就写了。我是出于这样一个基本理念：作家把自己的作品拢集出版，其生活体验、生命体验和艺术用心，都展示在一页一页一行一行的文字里，读者会一目了然的，作者就无须再啰嗦什么了。自序在我看来就是多余的啰嗦，包括后记之类。退一步说，如果作品文字里呈现不出作者原本的创意，企图以自序和后记来弥补，恐怕是于事无补的。当然，那些纯属介绍该书创作和出版机关事项的自序和后记，有利于读者了解相关背景，意不在阐释乃至自我标榜，另当别论，是为有用。

这回编选这本《自选集》，要求编入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选章，还要编散文、随笔和对话，几乎把我试验过的文体都包容进去了，而且规模很大，容纳七十余万字，是至今我出版过的集子中最厚的一本了。这样，我就重新把今年以前的几乎所有作品筛选了一遍，倒有了一些纯属自家的启示。

散文和短篇小说，是我不自觉地坚持始终写作的两种文体。我发表的处女作是散文《夜过流沙沟》，这是四十多年前的事了；四十多年来一直没有中断过散文写作，差别不过是某几年写得少些某几年又多写了几篇，最近几年竟以散文随笔写作为主了。我大约在发表过十数篇散文之后，才有了第一个短篇小说的写作和发表，算来也有三十余年了。我早期的散文多是乡村记事，有些就是生活特写，意料不到的好处，不仅练习文字基本功，也在不断锤炼观察生活捕捉生活的眼力，歪打正着倒是成为进入小说创作最实用的途径。从后往前看过去，长篇小说只写了一部《白鹿原》，中篇小说写过九部，都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作品，只有短篇小说的写作断断续续延伸到现在还在写着。尽管是六十多岁的老作者了，每有一个短篇小说出手，不管评论家如何看怎么品评，自己往往颇为得意，愉悦之情丝毫不弱于当年处女作发表的情景。由此，我便明白，散文和短篇小说，有意无意间已成为我最喜欢也得心应手的写作样式；我同时也明白，我的神经系统最敏感的兴奋点，还是写作，即使一个短篇小说或一篇散文完成，都兴奋得不亦乐乎。无论大小长短，都是对社会、人生的感受和理解，所谓一得，又一鸣也。有得能鸣，才得我的人生至乐。

这次筛选过程，使我清楚而又清醒地看到当初的幼稚和肤浅，自然也能看出循序渐进的提升，从最初出手时的紧张和局促，到逐渐演变的舒展和自如，还有看取人生和世事的视觉和转换。我便能够清醒地面对自己，属于学而知之演练而进的一类，绝非天才。以此来把握自己，更确信适宜本身继续探索前行的途径。

这本《自选集》，在编选时偏重中后期的作品，也挑选了新时期文学复兴初期少量篇章，在于让人看到社会生活近三十年来演变的声响，除长篇《白鹿原》之外的几乎各类体裁的作品，我都是感应着生

活脚步写作的，多少可以看见生活经历者的心理流程；也可以让读者审视我写作探索和逐渐演进的笔痕，求得批评和指向；更在于使自己保持一种基本的清醒。

2006年8月10日 二府庄

少年已知情滋味

——禹治夏诗文印象

近几年来，有意无意中接触过一些中学生写作者的作品，有的是报纸和刊物举办的写作征文征选的佳作，有的则是熟人朋友的已经迷恋文学写作的孩子的诗文。前者是要我做阅读后的评判意见，后者则是要我给予指点，看看孩子的创作如何发展。然而，我每一次阅读，都有不同程度的惊讶和抑制不住的欣喜，今天的中学生里偏爱文学的学生的文字表述，看取社会人生的独特感受，由此自然联想到新的一代人的新鲜视觉和独特个性，便强烈地对照着生活演变社会进步在不同年代人的心里和眼里的巨大差异。我读禹治夏的诗歌和散文，还有小说，同样敏感到这种冲击。

禹治夏的散文和小说，多取之于他正在进行着也体验着的学校生活，又不局限在校园和课桌之间，已经旁及家庭，尤其是社会生活。在这个少年眼里触及的社会生活，某些现象和不可或缺的矛盾，心里的感受和理想，生动而逼真，显然区别于成年人的视角和感受，让我看到未成年人开始进入社会和尚未进入社会这个时空里的心灵世界，已经呈现出个人独特的体验和理解，已经向社会和生活发出自己的鸣叫。如同小鸟的第一声歌唱或公鸡第一声啼鸣的叫声，小鸟类和人类都会以欣然惊喜做出欢呼，而且坚信不疑会嘹亮起来婉转起来昂扬起来。

我在禹治夏的文字里意料不及地感到某些惊讶，他在少小年纪开始理解人与社会和人与人相处过程中的基本关系，这是许多成年人半

生乃至到老都意识不到更做不到的境界。作者写道:“我会试着体谅他人，因为我也需要他人的体谅。我们相互体谅对方，再大的误解也会解开。”“我想，能多为人着想，自己也会受益无穷吧！”这是一个十多岁的中学生对人对世界的基本姿态。话语看似平常，没有华丽的辞藻，却说出了人性里至美的一个内涵，可以看出一个少年健康健全的心理建构和个性里的品相。尤其在当今纷繁的生活世相里，种种利己害人危及生活的赤裸裸的言论和丑行，应该在这个少年的语言里感到害羞，以至矫正。我们的社会生活能有这样众多的健康健全的心灵作为基本构成，当会和谐发展，于一个民族的未来希望，也是最基本的构成和营造。

人生历程中初踏上路的人共同具有的现象，就是情感世界的敏感和萌动。禹治夏许是因受了文学阅读的熏陶，似乎尤为敏感。我自然不会缺乏常识地去猜测，这些散文小说里的人和事和作者的真实关系。即使从纯粹的文学创作虚构的本意上来看，禹治夏写少男少女朦朦胧胧的情感流动的作品的数量，也就可以看出人生这个年龄区段萌动爱情是人类共性。《当海风吹来时》里的贝儿和虾儿，两个家庭社会地位物质财富的巨大差别，尚不能影响两个少男少女纯如水晶洁如花苞的友情，论不上物质价值的贝类赠品，亦是对成人世界使爱情扭曲的权力和物质的蔑视。就作品而言，禹治夏的这篇小说，只是写了贝儿和虾儿的友谊，尚不属爱情，至多是由友谊友情刚刚超出的依恋性情愫，在两个少男少女的心里只感觉着依恋的美好和分离的浅痛，尚不自觉爱的萌动。这一份朦朦胧胧的清纯，真是令人心颤的美好。它只能发生在这个年龄区段。谁在这个年龄区段发生了这种萌芽情愫，无论时月或长或短，无论后来能否再聚首握手，都会是情感世界里最值得珍藏也难以抹去的财富。《那年冬天，我们擦肩而过》，一种罩着较为强烈和明显的情爱色彩的友谊，来得自然，去得也倏忽，

少年初尝到的忧伤、焦躁和恨意，也是这个年龄区段特有的心路历程和独特感受。作者写得很准确，也就很真实，心理感受和外在情绪的真实。到《秋天的事》，类似的初萌的情感更明朗了。不经意间得到的同桌位置，投合了一种爱恋的心理期盼；同样不经意间发生的位置调换，所引发的失落和无以表述的忌妒，应该说写得恰到好处。作者着墨如惜金所刻画的郁，如埋伏一样最后才亮出剔透如玉的美好心灵来。这篇小说已经有了一定错综的人物关系，以及三个少年之间也颇为复杂的情感交错，而且可以说跨入爱情的绿地了，由朦胧的萌动而爆出鲜活的花朵了。秋的坦率和奔放，性格化的人物呈现了。郁的含蓄和真诚，也呈现出别有一番动人感人的质地。能把并行的两个女孩写出不同形象和各异的内里气性，可以看出作者的功力也在大步长进。

然而，这毕竟是少年作家的作品，几篇写自己成长时期心理情绪的散文，也是活灵活现地写出了少年时段人的某些说不清的瞬间情绪。在母亲早晨敲门叫醒上学的时候，心理却是逆反的情绪，是“永远都是老调子”，是“唠叨”，是“烦得要死”。上学时间是铁定的不能耽误的，不仅母亲明白这一点，被叫醒的“我”更是清楚不过了，然而还是“烦得要死”，还要逆反为“唠叨”和“永远的老调子”。这就是少年的特有情绪，任性和理性此起彼伏的心理特征，从家走到校门口的短暂时间转换里，心绪也很快就转换了。所以大人们千万不能在孩子赖睡的时候发火。

禹治夏在生活地叙说着少年心理的同时，也表述着他对生活和人生前路的探索，他已经发现了世界上的生活形态，一种像粘在蜘蛛网上的蝴蝶，失去了美丽翅膀的功能。另一种是网死了蝴蝶的蜘蛛，其

实终生也只能是在那张小小的网上，离开了也就做不成事了。这应该是富于生活哲理意味的发现。

小禹同志还写了不少的古体诗词，意境和情感都让人能咂出古人的韵味来，颇为不俗。尤其是采字遣词，很可以看出古典文学的功底，我想他肯定读过传统文学里的诸多篇章，有一定的中国古典文学的储备和修养了，这很难得，也无疑终身受益无穷。

禹治夏正处于学习阶段，吸取人类知识以强大自己底蕴的美好时期，相信会有属于他实现艺术创造的人生光辉期的到来。

2006年8月12日 雍村

我看话剧《白鹿原》

二〇〇六年五月最后一天的傍晚，夕阳里的北京竟然还是燥热难耐。我从西安来到北京时，正是西安今年的第一波热浪，创出全国的最高气温。印象里的北京似乎比西安节令稍晚，不料如同伏天的高温，让我诧异季节可能紊乱了。我走进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大门，竟然难以抑止明显加骤的心跳，嚷嚷了三年的话剧《白鹿原》今晚首演，就在我刚刚踏进的这个院子里的“首都剧场”公演。剧场大门口已经开始检票，穿着各式各色夏装的男女走进剧场去，院子里围着一堆堆的人在交流着议论着。我此刻竟然感到某种紧张，某些压迫，还有某些胆怯。

这是我走进北京人艺大院里的真实心态。我相信走进剧场和站在院子里的所有观众，都不会和我此刻的心情雷同。我是小说《白鹿原》的原作者。尽管小说出版发行十余年来获得普遍认可，但毕竟是小说，是以文字叙述和文字阅读作为交流的形式，读者可以通过文字阅读欣赏作家文字描写和叙述里的精彩之笔，也能够以自己的生活经验个性情感和独特的艺术想象力，继续丰富和拓宽作家文字局限的空间，甚至弥补其不足或缺失；读者在接受作家创造的人物形象的同时，还在以自己的思想解析批判着人物，甚至继续创造着作品里一个个人物，这是我尊重读者的基本因由。现在，那些仅供阅读的文字就要以活人的口说响在舞台上，要灌进不同年龄不同兴趣不同专业的男女观众的耳朵，而且是用古道关中的方言。人物对话里的地域性较强的生活语言，阅读时从字面上可以从容地揣摩其意蕴，也许还有语言的某些地域性情趣和韵味，而让大活人的演员一句接一句说出来，观众能在不容思索的连续不断的过程中接受吗?

在我的肤浅印象里，话剧是最无遮蔽也最显艺术硬功的一种表演形式。不必说影视可以借助生动的造景和切换手段，即使传统的以唱腔为主的各路戏曲，即使剧情欠佳人物失真，而演员有一副过硬的嗓子和一二段精彩唱腔，也可以满足观众纯粹听戏的部分兴致。譬如我听秦腔，自然最想看到剧情、思想和表演俱佳的剧目，如果达不到全面满足，只要能听到自己喜欢的名角几段唱腔也就过瘾了。话剧就依赖演员一张嘴从台前说到台后，从拉开大幕说到拉上大幕，内容、思想、个性全都靠一张嘴说出来。纯粹靠说的话的内容把观众固定在座椅上两个半小时，这"话"得有多大的引力和魅力！而这些"话"的始作俑者是我，现在就要把那些"话"说响在众目炯炯的舞台上，能"响"在观众的情感里吗？导演林兆华是当代最受敬重最被注目的人，孟冰是写过多部获得好评剧本的青年编剧，濮存昕、宋丹丹和郭达，不仅在我，而是在全国拥有数以亿计观众拥戴的演员，他们的艺术思维创造能力和个人魅力是毋庸置疑的。这样，我便胆怯我的小说本身了。不是他们能否把小说表现出来，而是他们以话剧表现出来的小说能不能活起来，或者说立起来。常识我尚知道，小说不等于戏剧。况且，这是在成就过许多大导演和大剧作家以及名演员的首都剧场，能容得《白》成活吗？

我在大幕拉开的那一瞬，即被震撼了，也自然进入其中了。一片黄土原上的慢坡和土坎，残断的木轮车轱辘和远处的一棵孤零零的树，尤其是舞台右角那道断裂的黄土崖壁，以及崖壁上那孔残缺的窑洞，顿然让我进入我的地理上的白鹿原了。尽管明知是舞台艺术家的设计和造型，其不容原生民的我置疑的真实和典型，传递出黄土高原独有的风貌，弥漫着这块土地独特的浑厚和苍凉的气象。白嘉轩在他的宗族领地里出现了；鹿子霖在他不断滋生膨胀着欲望的原上走来了；着意从心理和精神上改造原上生民的儒学教父朱先生也稳居原

上；黑娃牵着小娥走进已不能容忍他们的这道古原……一个时代里的两个家族的两代人的人生戏剧展开了。除了某些可以预想的形式上的小小陌生，我很快便进入了心中的那个原，十分自然十分熟识，几乎没有任何隔膜的感觉。

当田小娥回答族长白嘉轩的盘问并纠正说她是“嫦娥的娥”那一刻，我还能认出和听出是饰演者宋丹丹；到被阿公鹿三用削标利刃从背后捅倒的时候，那个痛楚万状趔趔趄趄倒下去的女人，纯粹就是田小娥了，早已没有宋丹丹了。我在那一刻泪眼模糊。我在《白鹿原》小说写到这里时就是泪眼模糊手笔发抖而停下来抽烟，随之用钢笔在一张硬纸上写下“生的痛苦活的痛苦死的痛苦”摆在桌前，才继续把小说写下去。舞台上呈现的是一个以生命本能反抗封建政治和封建道德的乡村女性田小娥，只能以悲剧结局的伟大女性田小娥。中国的民主革命妇女解放的呐喊，就是从她们的伤口上呼吁出来的。的确如此——我被舞台上的田小娥打动了，独独忘记了宋丹丹。表演艺术家的天才就在于此，把性格各异的一个个人物的灵魂活生生展示给观众。让原本的自己消失得越彻底越干净越好。她不再是她，而是一个艺术形象了。

我自然更关注濮存昕饰演的白嘉轩。无论小说无论话剧，他都是主角。从林兆华确定要改编这台话剧之初，就首先确立了白嘉轩的扮演者是濮存昕。据传是濮存昕自告奋勇要塑造这个角色。我第一次到北京人艺见到濮存昕，他谦和地笑着说，我演白嘉轩。我说，好，你能演好。

我不是贸然恭维，而是出于我对表演艺术的常识性理解，即形似与神似的关系。形神兼得自然更好不过，关键在神似。白嘉轩是小说人物，不是真实的历史或现实生活的人物，所以甚至不存在似与不似

的障碍，而是由濮存昕自己依托小说内容任由驰骋去创造的一个艺术形象。也基于我对濮存昕很有艺术修养和道德修养的印象，便确信他具备创造各种个性人物的艺术空间，是常说戏路子宽的一类。尤其是我印象里他的含蓄和内敛，他的正直和善良，他的内在气质和外在气象，当是创造好白嘉轩这个具体人物的基础。我以自己的理解给不少关心该剧的朋友坦率表白过。现在，濮存昕饰演的白嘉轩向我走来。开场不久，我还关注他的关中话哪儿轻了重了尚不到位，及至到换地的小计谋得以实施，我便面对白嘉轩而忘记了濮存昕了。当那根鞭子——封建乡约织成的法绳——从一个乡民传给另一个乡民的手中，抽得违规越轨的儿子孝文从台中滚向台左的当儿，一个心头能插得住刀子的白嘉轩却佝偻着腰不动声色，震撼我的不单是那根噼啪甩响的皮鞭，更是发出指令的岿然不动的族长。他举酒坛向杀倭寇的鹿兆海祭灵的庄严凛然，他与附着鹿三躯体的小娥不屈的鬼魂的坚硬不折的顽固，他为被冤的黑娃求情而跪倒在儿子孝文足前的真诚，直到他向钩斗了大半生的对手鹿子霖的忏悔（换地）……白嘉轩塑造成功了。这个人物性格里的坚强和冷酷、凛峻和诚恳等侧面，可以说展示得恰到好处，感觉不到过于的夸张或不及。我便印证了我最初的判断，甚至超过了那个判断里的期待，濮存昕确是一位善于理解也善于创造的表演艺术家。

我的乡党郭达饰演鹿子霖，当是一种得心应手之作。他本色的关中方言有一种表述的自由，长期的小品演出的灵性更适宜鹿子霖的气性。这个人物生活历程中的大起大跌，得意时的肆无忌讳和张狂，跌落时乃至绝望时的独特心理变化，郭达也把握得十分准确。我也很快从小品里的郭达进入到鹿子霖了。郭达完全可以自信地向人宣示，我不只演小品，更擅长演大型话剧，更善于创造富于个性性格的话剧人物。我也真诚地祝愿，乡党郭达能再进入某剧的人物创造。

我在看完首演的第二天，先后回答过不下十家媒体的采访。大家的兴趣有一个共同点，你作为原著作者感觉如何？我便坦言，甚好。超出我期待之好。因由如下，首先是把一部五十万字的小说在两个半小时的舞台上表演出来，即如我这样的戏剧门外汉也能感到其难，况且熟知拙作里有诸多并不连贯的事件，以及众多的人物。我惊讶编剧和导演竟然连原作中的次要人物都推到舞台上来了，如镇嵩军士兵和赖子狗蛋都得着上台的机会了。没有删除人物，也没有截掉任何一个大的情节，把整个原上发生的事变完整地保存并演绎下来，仅仅只是把一些事件作背景幕后处理。我到走出剧场时才感到孟冰编剧和林兆华导演的大手笔。这是最难的也是最佳的选择途径。

所有主要角色和次要人物所酿制的气象和氛围，是二十世纪前半叶白鹿原上特有的时代标志，这归功于所有演出者。我切实感到，不似某些穿着特定时代服装却演着当代市井情绪的剧目，而是创造出一个时代真实的社会气氛和脉象；是严肃认真的艺术追求和创造，而且实现了目的达到了效果。我自己也受到触类旁通的启示，即，林兆华用最前卫的导演艺术，演绎了已经成为历史的原始封闭形态下的白鹿原上的乡村生活，而且能被最具现代意识的首都北京观众所接受所理解，这对我的小说写作也是富于启迪意义的。我后来才听说，林兆华始终要求演员——贯满全场的主角和出场一二次的配角——按生活行为去表演，力戒戏剧动作和戏剧腔调。我进一步理解了濮、郭、宋们的演出。最前卫的表演思想和最原始的生活形态，这两种看似无法调和的东西，竟然完美地统一在一幅布景下的舞台上，严丝合缝，不留痕迹，自然渠成，恰如林兆华导演个人的风格风度。

这台话剧还有几处细节上看去扎眼夯口的地方。鹿子霖乘人之危达到窃色的意图，与田小娥在舞台右角的性动作，看起来我觉得扎

眼；狗蛋也是抓住田小娥与鹿子霖偷情的把柄，要挟并达到占有的邪念，直白赤裸说出“日一回”的话，也颇夯口锥耳。其实这些行为和语言都是原作中我写下的，那是供不出声的阅读，而不宜响出声来；即使生活实地中有这种行为发生，也是当事人互相之间的语言行为，容不得旁观者看和听的。我曾向林导建议修改，已经有改变。其实不难，让狗蛋换一句“让我睡一回”听来就稍觉顺耳了，让鹿子霖和田小娥滚倒在土坎下也就可以意传其内容了。还有一些枝梢细节，再经过斟酌加工，修饰打磨，我想会不断完善，以臻完美。

我看到小说《白鹿原》以话剧的形式出现在首都剧场的舞台上。用一种鲜活的直接的形式与观众完成了交流，我感到欣慰，并有一种创作者的幸福感。无论如何，这部话剧能在见多识广的北京连续演出三十场，首先让我这个偏于西北一隅的作者感到踏实了。我由衷感动，感谢林兆华导演和编剧孟冰，濮、郭、宋等演员以及美工们，他们共同合力成功地完成了一次艺术创造工程，让我跟上沾光了。

2006年9月6日 二府庄

在现实的尘埃中思索与漫游

——序远村诗集《浮土与苍生》

远村又有新结集的诗歌出版，这是诗人远村的第四部诗集，名为《浮土与苍生》。远村约我作序，不仅不敢推辞，倒有某种评诗论文之外的因素，即一缕明晰却又朦胧的印象、一种无意间形成的颇令我敬重的情感。认识远村时，我还住在乡下老屋写作，每次回到作家协会，在古朴却也残败的四合院里，往往就能撞见一个年轻编辑，名叫远村，是来自陕北黄土高原的青年诗人。我心里很自然地泛出一句“陕北真是一方哺育诗人的沃土”。陕北出了两位举世闻名的小说家柳青和路遥，也出了一批诗人，活跃在当今陕西和全国诗歌界，远村是令诗界关注的一个。然而我回城办事总是来去匆匆，未得与远村有一次深谈的机会。我记得最初印象，是他上唇有一溜整齐的短髭，站在小小的编辑室门外的院子里抽烟，静静地站着。我撞见时，笑着打一声招呼，就没有话了。似乎没见过他到人多聚谈的屋子里闲聊，也几乎看不见他走门串户。几年之后他离开《延河》编辑部到另一个单位，我和他见面的机会就更少了。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的陕西文坛，各种文学活动频繁，作家、诗人、评论家聚首的机会很多，我却发现很少能撞见远村。谁都看见现在的文坛正应着古人说的“功夫在诗外”的话，却不是这千古名言的本意，“诗外”已不属诗，而是“关系网”，靠各种关系张扬诗和小说本身并不存在的意义和价值。远村是远离并冷眼相对着这种状态的。他在做自己承担的工作，也在写着他的诗。这样，反倒留给我一个令人敬重的印象。我想把这印象留在我的文本里，不仅是对远村诗性神圣的敬重，也是对自己尚以为神圣的文学的敬重。自然，还有那一溜整齐的短髭。

大概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在《延河》做诗歌编辑的远村一年内出版了三本诗集，赠送给我这个不会写诗的人了。不会写诗，却还喜欢读诗，尤其是那些能触及情感的诗。远村的诗就是这种一经阅读便撩拨起无尽思绪波涌的诗，带给我的归属感，远胜于欧美诗歌中一些篇章。他的第一本诗集《独守边地》，诗象自然而语速轻慢，泥土的芬芳与草根的清香弥漫在一页一页一行一行诗句里，激起我对家园和大地难以化解的记忆。比如"春天，面对一堆黄土 / 父亲感恩的双肩挂满鸟鸣 / 背靠太阳，让种子在一条河边 / 长出撩人的民歌"（《春天》），再如"父亲是跟庄稼一样古老 / 一样穿越四季 / 成为永恒的天空 / 他忠实的爱人我的母亲 / 像一根谷子，在高高的山坡上 / 站成一派秋收的景象"（《父亲》）。可以看出从小在陕北农村长大的远村，对生活在黄土高原的亲人以及赖以生存的庄稼，所深埋于心底的那种感恩情怀。这个父亲已经不单是远村的父亲，而是我们共同的父辈影像。在他的诗中，很难看到常见的那种对中国乡村贫穷、愚昧、悲凉及至鄙弃的恣意渲染，反倒是句里行间洋溢着一派温情、祥和、浑厚的气象。他曾说物质的匮乏并非一味的苦难，农业社会里虽然存在饥饿，但人类拥有大地的激情，内心是敞亮的、幸福的。这是现代都市人很难想象得出体味得到的，更是那些钢筋水泥地板上长大的新新人类无法领受的精神高地。我在远村"独守"的"边地"里发生了本能的共鸣，跟我记忆里乡村的阳光、风雨、墒情和行走在土路上的乡亲，交融在一起。远村在黄土地上经历了贫穷和封闭，感受并吟诵出来的却是潜蕴在物质匮乏之下生活的伟力、生命的光华和生命的诗性品质。谁如果只在黄土地上收获贫穷和落后，并发出轻率的鄙夷，结果往往轻贱了自己。我曾在一部关于西部的专题片里领略过一句著名的解释词：啊！这真是一片上帝的弃地。这句诗性的感叹是编者在直升机上俯视黄土高原时发出的。我读到这样的感叹句子时，顿即生出本能的反应，谁有牛皮代表上帝来宣布这是一块无可救药只能放弃的土地！

即使上帝真的放弃这块土地了，不再拯救这块土地上的生灵了，生活在坡坡堖堖沟沟旮旯里的男人和女人，依然以自己的激情和希望，面对黄土挥舞着镢头和镰刀，压根也许想不到在他们头顶上代替上帝发出抛弃话语的那个声音。正是在这块黄土地上，开创并延续着这个民族历史的灿烂和辉煌，恕我不必一一列举赘论。我还是那句话，谁轻贱这块土地，结果肯定是把自己轻贱了。我在这里与远村发生了共鸣和交融，并不因年龄和生活时代的距离而隔膜。我在阅读里领会到的远村对那块土地的体验和感知、独特的视角和独立的思考，以及几乎完美的语言表述，不仅共鸣与交融，而且受到启迪，以至更加自信了。

在远村的第二本诗集《回望之鸟》里，我看到诗人对乡村往事和古都陈迹的反窥之态，如此痴迷地讴歌农业文明而又在历史的废墟中轻松漫游，远村便以独立独特的姿态和气质在诗坛独成一景了。远村告别乡村以后，进入已开始躁动着现代化的古都西安。一个敏感的诗人，对十三朝古都透射出的厚重与漫长不会无动于衷，他被某种来自时间的力量拉动，诗思穿过尘封已久的时光隧道，触碰秦砖汉瓦的气息和精魂，便有了《回望之鸟》中“让泥土在智慧之芒上高起／或者河游在掌中自动改向／一个完整的房子，被无数柔肠／虚无为一滴泪／几许槐香”（《阿房宫》）。这样的诗句，只有远村才写得出来。诗人没有在大量的人文遗存前滞留，而是一路走去，以其敏锐的触角找到人类文明在时间的长河中坚硬发亮的部分，并期望以自己的坚定和执着使其精神复活。

远村的第三部诗集《方位》是一本心灵史的诗歌集子，不再看得到诗人在乡村泥泞的小路和古都的窄巷里行走的影子，而是向内心诗意的世界掘进，并展现出更为自由自在的歌唱方式，直达自己精神的

乌托邦。这些诗作中呈现出另一种别开生面的精彩的句子，例如：“我看见森林之妖在谁的指尖上舞蹈／看见一匹鹿在雾气中显露音乐之灵／看见一滴水最后回到树的内心”（《静树》）；“雨中的八月，手中的忧伤放在门后／我们走在积水之上／谁将一句话掉在地上，一句还在嘴里”（《八月》）。这些精美的诗句营构的意境颇为虚幻，却又真切感人。至此，我可以发现远村的诗歌写作几乎就是诗人的精神史和生存史的真实写照。每一部诗集，集中体现了诗人某个阶段的现实体验和美学追求，使我在诗歌的阅读和欣赏过程中，完成了与诗人心灵世界的交流和感知。

我之所以要说对远村的前三部诗集的阅读印象，是参照即将出版的第四部诗集《浮土与苍生》，令人振奋地看到一种跨越式的诗意的提炼和意境的升华。在这些诗作中，我几乎再看不到诗人原先的身影。呈现在现在时的远村，其诗作中理性把握和对语言的驾驭十分老到，无论是词的运用句的锤炼，还是诗的结构、色彩、节奏和意蕴，都耐得反复品尝咀嚼，不忍罢手。“什么声音将我们与尘世隔开／我看见谣曲之王，他轻微地呼吸／惊动昼夜之间的距离”（《民歌》），又如“十年前的意外投奔，使我认清了路的面目／不在大师的书中，也不在琴者的火焰中／而是藏匿在时间腋下的杂草中”（《我一直以为自己在路上》）。读这样的诗句，诗人的美学追求已趋于哲学、建筑、雕刻，甚至可以达到大音大象之境。较之先前，这些诗的速度慢了，阅读的韵味却更为强烈，从诗所表达的主题看，诗人更关注生命的意义和生存的价值，一个冷静的思考者开始了对人类命运的关怀和现实真相的批判。读完远村的诗歌作品，我可以明晰地看到一个诗人不倦的追求之路，远村的创作经历了三个阶段，诗人的角色也发生了三个根本性转换，即家园的守望者——城市的旁观者——现实的思考者。

远村是一个内敛和自省的人，专注于艺术的探索，坚持不断追寻新的意境，不断超越自我。这是作为一个痴心于艺术创造的人最为珍贵的精神，愿现实的思考者，还不是诗人最后的状态，期待远村能抵御浮世各种诱惑，坚守自己心灵世界的一方绿地，创造完美的诗的诗境。

2006年9月12日 二府庄

再读《活动变人形》

“中国当代作家王蒙的《活动变人形》、张炜的《古船》，哥伦比亚的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和《霍乱时期的爱情》，意大利的莫拉维亚的《罗马女人》以及美国的谢尔顿的几部长篇……比如说上述两位中国当代作家的两部作品，一本写旧北京，一本写农村，都对我当时正在思考着的关于这个民族的昨天有过启迪。”

这段文字是我一九九五年早春和《小说评论》主编李星对话时写的。时间过去十年多了，《南方文坛》主编张燕玲竟然还记着，约我为她新辟的《重读经典》专栏《活动变人形》专集写篇短文，正为我回味一次难忘的阅读提供了机缘。想来整整二十年过去了。我在筹谋《白鹿原》写作伊始，一直关注我写作的西北大学教授蒙万夫老师不止一次提醒我：长篇小说是一个结构的艺术。他把结构得不好的小说类比为剔除了骨头的肉，提起来是一串子放下去是一摊子——撑立不起来。这使头一回写作长篇的我对于结构产生了慌恐，于是就选择了上述一批经典和名著来阅读。且不赘述这次阅读对我关于长篇小说结构的启示，只说我对两位中国作家作品阅读前后的变化。《活动变人形》和《古船》，既是朋友推荐给我读的，也是我意识里拟定的目标。这两部小说发表伊始，就引起巨大反响，成为文学朋友聚会或见面议论的一个兴奋点，普遍认为是截止到当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最具标志性的两部长篇。我开始也是把它们当作当代中国文学的名著去读的，结果读完之后我产生了另一种想法：它们同时也应该是世界名著。这种意识产生的原因，在于我把它们和那几部在中国享有盛名和高评的世界名著集中在一起阅读，很自然地就有了参照和对比。不比

不知道一比吓一跳——让我对中国当代作家的创作成就引发起甚为踏实的自豪感。

单说《活动变人形》。我是侧重于从“结构”方面来阅读的。这是一部结构得最随意最自如的长篇小说。它的叙事流程呈开放型，既有现在时倪藻的欧洲足迹，又有倪吾诚等半个多世纪的生命折腾。我几乎看不出作家刻意结构的痕迹。这种随意自如的叙事，说它驾轻就熟、挥洒自如，似乎还不得写作操作意义上的要领。细细体察，主要在于作家把他笔下的人物以及人物生存的生活背景已嚼烂如泥烂熟于心，从生活体验进入一种生命体验的层面；已经不是通常写作的“随物婉转”，而是达到“于心徘徊”的自由状态了。常识告诉我，任何一种写作流派写作方法包括长篇小说的结构方式，都可以由作家的艺术兴趣做出选择，进而借鉴，进而创新，然而，最致命的“于心徘徊”的生命体验的层面和状态，上帝也帮不上忙，非得自己完成和抵达。有了这样的体会，我踏实下来，专注于自己已经酝酿着的白嘉轩们的心理结构。只有把这些人物的心理世界体验深入一层，才可能找到负载他们生命历程的一个合理结构。

王蒙笔下的倪吾诚，变幻着各种脸谱。用我们惯常的性格说解读不透。我看到一种心理结构被颠覆心理秩序被打乱的典型人物形态。这个人接受新的政治理念以及洋的生活理念，把原有的旧的理念所结构的平衡和稳定颠覆了，却无法实现和达到新的结构的平衡和稳定。这既有自身因素，也有家庭和社会的封堵和抵抗。他相对平衡和稳定的心理秩序都是短暂的，而失衡和紊乱乃至七零八落的结构却是绝对的伴其终生的。王蒙把握着这个人物和他周围有关系的人的心理脉象，而且总是切中短暂的平衡和遭遇颠覆时的脉象迭变，呈给读者的就是一个反复经历着心理折腾的痛苦的灵魂。这个倪吾诚和他身边的

人物生活的大背景，和我正在酝酿的那一群原上的人物经历的生活时空和背景是同一历史时段的。一个是旧北京，一个是偏于一隅的关中乡村，在剪掉了脑袋后边那根猪尾巴之后所伤及的心理秩序的紊乱，都类同于鲁迅先生《风波》里被剪了辫子的那个惶惶不可终日的七斤的症状。

为了张燕玲女士的邀约，我又读了一遍《活动变人形》。我读得津津有味。我发觉这是一本可以随意打开阅读的小说。随便翻开到任何一页，就可以读下去，随之就可以进入人物，就可以感知到人物逼近眼前的生动和真切。前后情节的连贯不成为阅读障碍。在我的阅读经验里，这是很少有的作品所能达到的阅读效果。我觉得倒不在于作家不倚重故事和情节，而是在于小说紧切着人物心理脉象所发生的独特的细节的新鲜和真实，一种无可置疑的真实。倪吾诚和他身边的几个人物连续不断地冲突时，每个人物截然不同的反应，一个动作一种语气一片脸色一句对白，不看人物名字就能辨出这是谁来，个性化也典型化了。阅读中丝毫感觉不到某个细节的游离或多余，这是我在现在的阅读中常常遇见的事。我觉得根本区别在于，作家是在写他的人物，还是在写他自己。

再一次阅读《活动变人形》，那本在中国一版再版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不觉间浮出。倪吾诚们生命中承受的，无论从重的或轻的意义而言，在我的感受里，远远超出也超越了那个捷克人。

2006年9月29日 二府庄

长庆，鲜活的记忆与激情的书写

国庆和中秋双重喜庆祥和的假日期间，在迎客送友叙旧说今的间隙里，断断续续读完了由陕西一批知名作家和油田作家赴长庆油田采风所写的报告文学作品，着实令我激动不已，甚至冲击着、改变着节假日里常有的轻松慵懒的情绪，不断陷入油田建设者那种发自地球深处的伟力和激情之中，涨潮般掀起一波又一波的亢奋与感动。有关石油的有限却也珍贵的记忆又鲜活地呈现出来。

刚刚交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我还在古人折柳送别的灞河桥头的文化馆时，有幸受邀到长庆油田去，从西安到庆阳整整走了一天，小面包车在坑坑洼洼的路上颠簸到上灯时分才到达油田总部。我第一次看见了在玉米丛中，在原坡半崖上，如磕头虫般机械运动着的采油机。我至今依然清晰地记得一组石雕般的画面，在一条河川左首陡直的原坡上，劈出一方平台，一架掘井机械竖立到高空，马达发出震天撼地的轰鸣，两个小伙子手握钢钳，专心致志地操纵控制着哗哗哗转动的钻杆，飞溅的黄泥浆把他们的工作服涂成泥糊服了。几步远的电机旁，一个戴着安全帽穿着粗糙质地工装的年轻姑娘，满身都沾着黑色的机油油污，俊俏的脸蛋上也抹着黑色的油彩，和我说话时，有一份腼腆的羞涩，更透着一种劳动的自信。一位青年女工正挑着两只竹笼从原坡下走上来，把午饭给他们送上钻井台。没有清水洗手洗脸。他们快活香甜地吃起来。这个荒野原坡上的图景长久地留在我的记忆里，甚至影响到我对后来叠影般变化着的生活世相的判断和趋避的选择。到九十年代中期，我又一次应邀赶赴甘肃庆阳的长庆油田，想再一次吸纳活跃在荒原野川里的石油人的豪壮之气，以充实自己的底气；我想再看看长庆油田新的发展规模和新的气象，感受生活激流的

流向和潮涌的力度，以荡涤积郁于脑际胸间的麻木和废气，保持对生活现象感应的敏锐和辨识的眼力；我也想重登那方半坡上的钻井平台，再访那两个溅满黄泥的小伙子和那位满身油污的姑娘，却因不知姓名无从查找，不知转移到哪一方钻井平台上去了。这回去庆阳油田的作家都是在文坛耀眼的人物。评论家雷达，作家张贤亮，诗人雷抒雁，等等。他们在油田的几天里，一个个都显得亢奋异常。我便验证了我的感动是正常人的感动，由此推想到任何从事尊严劳动的人，在这样的环境和这样无私奉献的石油工人之中，都会发生心灵感应和精神交流的。

到二十一世纪初，我仍然抵不住石油的诱惑，又随中国作家采风团到柴达木油田去了。比之陇东的荒原野川，柴达木属一块生命绝地。去柴达木的路上，我看到连一只蠓虫蚊蝇都难以生存的千里赤裸的绝杀的荒凉，辨认着新中国第一支石油勘探队曾经挖坑过夜的沙漠，自然早被风沙掩埋得不见一丝痕迹。他们徒步踩过的沙丘，现在铺展着一条通向天际的高等级公路。我在柴达木第一口新中国打出的油井纪念碑前，和正在施工着的年轻的继任者留一张影，任着想象展开当年打成这口具有奠基意义的第一口油井时工人们狂欢的景象，他们确凿是一群尚来不及换下军装的解放军战士。五十多年过去了，这里的石油不仅没有采干掘尽，反而提升着年开采量；几乎寸草不生的赤褐色的山峁沟梁里，一架架抽油机昼夜不停地默默地运转着。就在这块纪念碑前，一个年轻的油田工人拿来一张白纸，让我为他们自办的一份文学刊物题写刊名。文学的激情和梦幻与石油创业者的激情和理想，在荒无人烟的生命绝地一样澎湃着蓬勃着。

我在阅读《共和国的脊梁》这部大型报告文学集的过程中，不仅勾起对油田的粗略却又鲜活的记忆，竟然还有一种始料不及甚至令人

惊诧的发现，作家中那些我自以为熟识的年长或年轻的朋友，全都变出一副陌生的面孔，陌生的声音，陌生的色调了。自然，这是指他们的文字，他们留给我阅读印记里作为风格标志的文字，其色彩其声调其面孔，全都呈现出新鲜的陌生。

王观胜虽是关中腹地人，却有一种刻骨铭心的天山、草原、戈壁滩的生活体验。我作为他近在咫尺的读者，他的影响颇大的小说集《放马天山》，以及由此发轫后的一系列小说创作，早已给我一种相对稳定也相当突显的叙述风格，简约，凝练。曾经活跃在天山、戈壁和草原的西部硬汉，其小说的人物对话，是那种能蹭破耳膜的个性化语言，作家主体叙述也是掺和着钢筋碎石富于弹性和硬度的混凝式语言，给人一种刀削斧砍般冷凛的语言线条。然而，在本次叙写石油人刘仲敕的人生轨迹时，却是纵情的畅朗，几乎可以感觉到被激情催发而喷涌出来的文字，似乎还冒着被书写者专注的眼神和热汗的气息，在稿纸上闪亮，跳弹。于是我看到了宁夏最贫困地区的一位乡村少年，刻苦学习掌握技术，广泛阅读开阔眼界，确立起自己的人生坐标，进入油田便开始了富于创造精神的劳动，勤奋敬业是基础性规则，连续不断的开拓性建树，把一个人的能量发挥到超常出色的层面，成为石油战线成长起来的新一代的中坚和脊梁。鹤坪是以《大窑门》跃上文坛的。这部长篇小说和他后来写老西安的中短篇小说，把古城西安大街小巷阔宅贫窑里沉积的陈年旧事，逸事趣闻，兴衰迭变，写得淋漓尽致，我曾留下深刻印象，姑且不论。单是语言，写足写尽了古城方言深蕴的韵味，而且不露做作和卖弄痕迹，既卓立于偏重方言写作的诸多文本之上，也使他写古长安生活的小说独呈一色，独秀一枝。这个极尽老长安古调独弹的鹤坪，在沙漠的油田里奔走的时候，也变出一腔热情洋溢的文字来，老辣而又自由的坊间小说语言的色调已了无痕迹。“我的眼前立即出现了一个新嫁娘站在高高井架下

的情景。这是人类最为壮美的一幅画，这幅画的名字应该叫《崇高》。”如果不看文章署名，我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这是鹤坪的文字。鹤坪以这种饱满的诗性语言，写了一组五个油田人物速写，把这些最可敬重的人的闪光精神揭示出来，令人感动。刘谦本来就是一位思维敏捷文字也畅达的作家，在接触到油田人的时候，那素有的激情就更趋高涨了。我曾经在他写青藏铁路的长篇报告文学里，领略过他激昂的情怀，这回在他的《为祖国找石油的年轻人》里，更充分感受到一个向来敢于面对生活关注现实发展的作家，一个严峻而又敏锐的思想者，对生活的建设者那种出自内心的由衷的钦敬和倾慕，这也许是一个年轻作家最可珍贵的情怀。还有以写报告文学成名的女作家、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冷梦，还有谦于言而热于心、卓有建树的小说家京夫，女作家刘风梅、张艳茜，报告文学高手钟平、冯天海、霍竹山，知名记者方越、马师雄等，他们在踏进沙漠荒野，在面对一个个活生生的油田人的时候，都不约而同地以最鲜活最富诗性的语言，抒发他们的理性认知和感性激情。

我便想到，作家的语言方式和叙述形态，不单是单纯的个性执意的追求；即使执意于某种方式的追求，如果不顾及时空环境，不考虑书写对象的气质和心性，就会形成那种不可思议的乖戾文字。我从这些早已以个性化文字突显文坛的作家写石油人的文章里，确切感知到作家描写或叙述文字的色调，首先当以描写对象和时空环境为基准，做出最适宜的变化和最恰当的选择，寻找到一种最贴切的叙述方式，不仅适宜表述对象，也适宜把自己一腔感动性体验倾泻出来，就完成一次新的语言探索和创新了。这样，我便看到，这些早已个性化语言的作家，在面对那些石油人的时候，即使都呈现出来共同的激情，诗性的语言，却依然显示着各自的独立性差异。

在这里，我还要提到《共和国的脊梁》中“来自长庆油田作家的报告”一卷里的文章。这一卷大约有二十多位作家的作品。

以第广龙为首的这些油田青年作家，个个生龙活虎，热情饱满。他们不仅活跃于长庆油田公司，无疑也是整个石油文学战线不可忽视的生力军和轻骑兵。他们中的一些作者，如第广龙同志，早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已经是活跃于全国诗坛的青年诗人了。他有多部诗集出版，并多次获得石油文学大奖，产生了广泛影响。他同时还是多面手，写诗、写散文、写纪实性作品和短平快的通讯报道，在紧张的本职工作之余，多年坚持勤奋写作，笔耕不辍。

还有一些更年轻的名字：彭旭峰、李伟、胡玉珍、刘宁、李亚玲、郝朋朋等，恕我不能一一列举。他们在长庆油田公司的工作、岗位、角色，各自不同，但相同的是，他们的命运都与“长庆油田”的发展壮大息息相关，“油田”的昨天和今天，是他们生命和生活中的主要内容。所以写“油田”他们最有资格，最有发言权，不需要像专业作家那样去“深入”生活，他们就置身于火热的油田生活之中。你读他们的作品，或长或短，或深重或灵动，但篇篇都充满石油人的真诚和豪情。

听说，长庆油田公司王道富总经理非常看重他们的作家，非常重视公司的企业文化。在这本文集中，收入长庆油田作家的作品，还是他亲自建议的。与被采访单位作者的合作，这对我们也是第一次，具有创新意义。希望以后专业与业余、文学与企业有更多的合作与交流。

我至今记得一个历史性的细节。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我刚刚在一个两人执教的乡村小学当教师，还处于“三年经济困难”的阴影之

中。有一天，被通知到区上听大报告，半公开地宣布了一个振奋人心的消息，大庆油田成功了。“打破了‘帝修反’的封锁。”“把贫油国的帽子扔到大西洋里了。”这是我至今都记得的当年的报告语言。我那时就记住了一个英雄的名字“王铁人”。我对石油的理解就是从那时和国家及民族的自尊连到一起的。我那时还无法把石油和个人生活牵扯起来。现在，做饭和取暖都依赖这些作家朋友倾情歌颂的长庆油田无名英雄的劳动成果了。

这是一部述写生活建设者和财富创造者的书。书中的人物或许名不见经传，却默默地劳动着创造着，以他们的智慧和他们的赤诚，当之无愧地成为当代中国的脊梁。

2006年10月15日 雍村

印在生命脚印里的诗

——冯在才诗集《曲江吟》阅读印象

大约二十年前认识冯在才的时候，就有一种敬重之情；二十年后的今天，他把自己创作的厚厚一摞诗稿送给我看的当儿，我是敬重之中又添意外的惊讶了。认识冯在才的同时，就知道他在省委核心机关工作，是笔杆子，我的敬重之情就油然而生了。在我看来，他手里攥着的那杆子钢笔的分量，非我等写诗作文的这支笔所可相比。他那杆子钢笔写就的文字，习惯上不叫文章而称为文件，以党政领导机关的权威文件下达各级学习领会贯彻执行落到实处。毫不夸张地说，三秦大地改革开放以来日新月异天翻地覆的变化，就是他和一帮笔杆子的墨汁铺展造就的。换一种通俗说法，他手里的那支笔，决定着一个省的发展方略，也决定着城乡百姓兜里的肥缺和碗里的稀稠，远远非我等一篇文艺作品得了失了好了差了所可类比。我说的敬重之情，概出于此。

这位写了大半辈子政治经济等发展方略重要文件的人，突然把一厚摞诗稿交到我的手里，真是出乎意料，由不得瞪起眼睛十分惊讶了。此前，我从未听说过他喜欢写诗，想来无非是接触太少所知也浅；还有他自身的个性因素，喜欢写就不停地写着，只是默默地遣词调韵自我陶醉，绝无张扬。我从这部诗集里每首诗作标明的写作时间掐算，最早的一首七绝已是三十多年前的事了，那时他还不满三十岁，正当诗兴诗情激扬的青春年华。我以切身体验来理解冯在才的诗歌创作追求，深知其不易深解其痴迷的同时，自然颇多感动和感慨，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写诗一直写到现在，三十多年没有间断更没有

中止，这需得怎样的意志和痴情。再，三十多年里，他在一页一页一行一行一句一字斟酌着那些不容丝毫含糊的思想指向、政策划界的律令性文件的漫长岁月里，仍然始终保持着一种诗性的襟怀诗性的激情，对这个民族的历史和现实不断发出吟哦诵唱。我便看到一个有趣的画面，体现在文件的文字上是一张思逐风云不无凛峻的脸色眼神，与一行行诗句里洋溢着壮怀激情的鲜活生动的另一幅脸色眼神，正好映像着一个人精神和灵魂的两根支柱，实在是一种难能的踏实而又丰富的生命姿态。

我读这部诗集，切实感觉到是循着一个人的足迹和墨痕，探寻着这个可以算作我的同代人的冯在才的人生轨迹和心路历程。他笔下的名山大川古墓老碑，由衷地倾泻着对脚下这块土地的深情，也发出抚古鉴今的历史性兴叹。他写春韵冬雪农时季节春播秋收，我便感到他对季节变化里的乡村农桑事项的敏感和兴味。他看春雨的视角，首先想到的是麦子返青，“好雨知时乃发生，飘飘洒洒绿田荣。云迟雾懒轻轻下，雨缓苗肥嘀嘀声”。不似玉楼香车里的人赞赏春雨“这下呼吸湿润了”的感受，而是直接发出和亿万农民同一腔调的欢呼，麦子可望有好收成了。他写春雨冬雪夏果秋实的诗句，自然流露出一个根在乡村、至今仍然心系乡民的人本能的思维倾向和情感投向，颇令人感动。作为一个诗人，冯在才在面对大自然界美好的和极其普通常见的事物时，那根敏感于文辞的神经，都会触碰出诗的华章，都会发出轻吟朗诵来。夏荷秋菊红梅青竹，富丽的牡丹热烈的月季和高贵典雅的兰花，这些被古今诗家千万回吟诵赞颂过的美好物体，冯在才依然发出自己独特的感悟，寄托着自身的性情崇尚和审美标志，一种高洁纯粹的心灵趣味。在他眼里和意识里的竹和梅，“枝坚叶绿溢清芳”，“生来就是钢脾气，不畏风霜雪雨摧”。诗在写竹和梅，着意在一种精神，即做人的最可珍贵的精神品质，诗人做人的志趣修养就托喻清楚了。

还有名闻天下的黄山松和名不见经传的家乡村头那棵相思柳，还有传说中系着北半个中国人祖魂的山西大槐树，如泛溢而出的诗章里，鸣响着一个子孙的情思和自觉承系的责任。

尤其值得称道的是，冯在才写了大量政治抒情的诗篇。其实，即使在如前述的名山大川古墓老碑风花雪月的诗章里，也潜隐着喻示着社会和人生的哲理，对美和崇高的礼赞和对奸佞腐丑的贬斥，小处说是道德操守的指向，实质也是人生的大课题大政治。这里要特别评说的，是作者三十年来所亲历的我们国家的重大事变，诸如粉碎"四人帮"这样带有重大历史意义的事件，还有开创中国新长征的华章彩页的改革进程，党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十一届三中全会。他的诗篇不仅载负着历史重要关头的内涵和征象，也表述着冯在才自己在生活发生重大转折时的心理情感。几十年后，当这些重大事件已成为历史，冯在才于花甲之年自赏这些及时即兴所作的诗篇的时候，不仅是一种浩叹，更应是一种骄傲与自信，即在自己最富生命活力的年龄区段上，直接参与了我们民族和国家复兴复壮的伟大到无与伦比的工程——改革开放，而且以诗的方式留下了记录。他对遵义和延安这样作为中国革命标志的城市，歌颂是真诚的热烈的，也是一种信仰的自觉。在这种崇高而又神圣的人生信仰的驱使下，他对足下的土地发生的巨大变化取得的重要成就，乃至一条路一片果园，都发出由衷的吟唱。我无须再赘摘其中的佳句。随处都可以感受到诗人投身变革参与变革以及变革实践过程中所凝结的诗句里的心跳和音符。我突然想到，年过花甲的冯在才现在拢集这本诗稿时，肯定有一种回眸自己生命历程人生脚印的感觉，这诗句脚印里注满他人生一步一步的情感，既是一种豪壮和自信，也是一种欣慰。

我至今自知国学浅薄。对我们丰厚如宝山的古典文学缺失研习，不敢轻妄论说，难以推辞在才的虽简约却真诚的邀约，就冒胆说一点阅读和欣赏的感受。最后要说的是冯在才古体诗的艺术质地，坦诚自如，简洁明朗如晴空云朵；真情实感，时而倾泻如疾雨狂雪，时而亦如细雨薄雪，皆自然畅达，不见当代人写古体诗普遍发生韵凑字捆句的别扭。我很感慨在才的古体诗的畅朗通达，这是极不易的境界。我自然寄望他的诗作开创新的艺境和意境。

2006年11月5日 雍村

人生笔记的笔记

天卿电话约我编一本“人生笔记”的集子，乍一听到，心里竟然不轻不重地有一点响动。按说已经出版过三十余种书了，二十多年前头一次出版作品集时的新鲜感兴奋劲儿以及某些难以隐蔽的得意，早都不再潮起了。那么，这回在我心里引发的这种响动，无疑是这本书的题旨“人生”撞击出来的。

人生，在我的意识里是一个太大的话题，更是一个令我敏感到几近恐惧的话题。

我至今没有以文字来系统地面对自己的人生，截至目前也没有写作自传之类的打算。我谢辞过好多家出版社朋友至诚的邀约，我都没有应承，心里隐隐着对于这种自传写作的实际意义的怀疑。我近年间多以散文写作为兴趣，有意无意间涉及人生历程中的点点滴滴的往事，也仅仅是点点滴滴而已。我的散文写作和我的小说写作一样没有预设性规划，都是随感而出，即在生活世相里耳濡目染，触发到心灵里的某一根神经，或兴奋或灼痛到释之不去，便会把那一点感受和体验诉诸文字，便有了一篇篇或长或短的小说和散文。过去以小说创作为主是依着兴趣，近十年来以散文写作为主也还是依着兴趣。除了少数命题作文的篇章，绝大多数都是由兴趣激发的感受和体验，随有随写。原始森林如海涛涌动的绿浪令我的心潮也跟着起伏，荒凉高原上孤立的一株柳树更令我感到了自己的软弱和轻。家乡灞河重新归来的鹭鸶让我久久不忍离去，和我的白鸽告别却留下永久的伤情。我和父亲一样喜欢栽树，却不再是为了卖钱添补家需，纯粹是一种心理习性。我在意大利国家博物馆看到用钢铁打制的禁缚女人性事的贞节带

时，当即联想到中国女人的小脚和“守志”法则，人类从野蛮走向文明的过程大同小异，无非是一方地域觉醒得快完成得早，某一方地域完成得慢些迟些。我在美国街头看到坦克驮载着口红的雕塑时，顿然涨起对任何杀人武器的蔑视，包括挥舞它的总统。我在茶几下发现了三岁的孙子遗丢的小鞋，竟然抑止不住心跳；我在祖居老屋一人独处时，半夜里似乎听到沉重而又舒缓的呻吟，只是无法辨别是从哪一代祖宗的深喉里泄出的声音。我对那些为我的稿件一字一句阅审、连一个错误的标点符号也不放过的编辑，以文字雕刻下他们的形象，存储到我的作品集里，也雕记在我的记忆深处。还有那些为民族和国家复兴复壮而义无反顾地走出顶天立地魄势的人，我虽无缘一面却要表述一缕崇敬之情……我在遵照天卿“人生笔记”的题旨挑选以往的散文随笔的时候，既重新阅览了这些人生体验的篇章，更在完成一次自我的人生检验和人生阅审。

这次编选中的温习式阅读，我发现有好几处写到动情落泪的文字。过去零零散散写下这些涉及个人情感的文字时，只是随着性情即兴写来，只想记下真实的感受；今天笼统一览下来，落泪和暗伤的细节似乎太多了，倒使我顿然惊觉自己是不是太脆弱了。有一个细节清晰地呈现在眼前，我在离开祖居老屋八年后重新回归的第一夜，天微明中被鸟叫声惊醒，睁开眼睛透过窗玻璃看到后屋房脊上一对咕咕咕叫着的斑鸠，竟然忍不住动心落泪。这样的情感能被读者理解和接受吗？然而我却真实地发生了。我的散文写作的基本守则，首当真实，既不容许妄说，更不添附虚伪之词。时过几年的今天，我对自己也有了一层认识，可能在遭遇丑恶和虚伪时扭转头去，却承受不住一丝一缕美和善的浸润，我的粗糙且已老化的躯壳里，还存活着对大美至善尤为敏感尤为脆弱的一根神经。

这是我赖以活得踏实自信的一根神经。

我依赖这根神经发出自己的声音，是无声的文字的声音。

这些无声的文字里记述的人生感受生命体验的点点滴滴，构成这本“人生笔记”，期待我的读者的交流和批评。这肯定有益于验证和校正我日后的生活观察和情感体验，为着这种“人生笔记”继续下去，且能获得更高境界的进步。

2006年12月9日 雍村

难得一种真实

在我尚属青年业余作者走进陕西作协深宅大院的时候，韦昕已经是这个院里资深的工作人员了，做着行政管理工作，也做过杂志的文字编辑，后来又做党政领导。我调来作协的二十多年里，和韦昕进进出出同一个大门居同一幢住宅楼，抬头见脸低头见脚，当属熟悉不过的人了。无论他做行政做编辑及至做领导，几十年里都在工作之余勤奋地写着小说和散文，说他是作家协会这样的专业文学团体里的业余作家，不是幽默而是恰切。直到他工作到年龄额限从领导岗位退到二线，创作很自然地调换到主业位置，一篇篇小说连续不断创作、发表、出版，尤以唐代历史题材的小说引起了广泛好评，其老到的艺术功力赢得作家和评论家的钦佩和敬重。有朋友甚至和我表示惋惜，如果韦昕从早年间就有以创作作为主业的条件，真不可估量现在会有怎样卓越的文学建树。尽管人的生活历程生命轨迹容不得“如果”，然而韦昕仍然能保持今天甚为旺盛的创作状态，足以告慰神圣着的文学情怀了。

我读《绳套难解也得解》，首先感到一种毫不置疑的真实。既是艺术的真实，更是生活的真实。我之所以强调后者珍视后者，是有感于某些作品在艺术的名义下对生活所采取的随心所欲的姿态，把对生活的虚拟和虚假，振振有词地湮没或张扬在所谓艺术的天花乱坠里。我对《绳》的真实性的敏感，完全是文本阅读过程中不断引发的感动和感慨，这样兼备着艺术真实和生活真实的朴实文字，似乎好久都寻觅不到了。

《绳》写的是韦昕"文革"中下放陕南山区农村的生活体验。这部作品的生活背景，直面的是"文革"过程里最惨烈的"清理阶级队伍"和"一打三反"运动进行的时候。除了最后一章没有具体情节故事算作尾声，前四章写了发生在风雪公社何家梁大队的四个案件，赵臭臭辱骂领袖案件，柱子偷公粮案件，顺顺子的偷情杀人案，贾进洲政治诬陷案。韦昕写了这四个案件发生和破案的复杂而又曲折的过程，准确地再现了处于"文革"非常时期的乡村社会的特殊氛围特殊秩序，无序的社会结构里的秩序。赵臭臭被人揭发辱骂过一句领袖画像，被当作最严重的反革命事件；贾进洲为泄私仇，潜入会计家里用针刺扎领袖画像的眼睛后再去报案，企图以当时最严厉惩治打击的反革命罪置会计于死地。这两桩案件，只会发生在"文革"时期。或者反过来说，这两桩令今天的人们觉得荒唐、滑稽到不可思议的事件的发生，正是非正常的"文革"时期特殊的社会现象。这两桩被看作最严重的政治事件，在政权机关的判断自不必说，在更广泛的群众思想意识里的普遍性判断，恰切地透视出整个社会的生活氛围，即使在穷乡僻壤的农民，心理结构心理秩序也错乱了，正是无序的社会秩序的典型体现。即使柱子偷公粮和顺顺子偷情杀人，这些本属于刑事性质的案件，在发生和处理的过程中，也弥漫着"文革"时期特有的社会气氛。韦昕选择的这四个故事，展示出最偏僻最贫穷的山区乡村"文革"时期的生活图景，给我以不容置疑的真实。

这四个案件的破案过程，没有公检法参与，全部是公社（即现在的乡镇）和大队（即现今的村委会）的干部完成的，嘲笑那时的法制的合理性已无实际意义，我们当时的社会现象就是那样，况且业已揭过这一页了。我甚为感佩的是，韦昕既是典型地又是生活化地写出了那种社会形态下基层干部处事的方式，生动里的真实，真实里的生动。生活细节的真实，有各个人物举止行为的个性特点，也有语言行

为的独特性，这里往往可以鉴别从生活体验而得，还是随心所欲以概念和印象编出种种莫名其妙的举止行为和话语，一部作品的基础和底蕴也就截然分明了。然而，还有更紧要的一点，即不同时代的人的思维方式思维特点，更是从内质里决定着一个特定时代的人物的真实性。尤其在我们改革开放前和之后截然不同的思维理念所形成的社会生活景象，仅仅不足三十年，却让人有恍若隔世之感。石主任、雷社长和“我”，他们都呈现着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初的思维理念，遵循当时的政治思想和判断是非的标准。他们没有一个能跳出荒谬而独逞高明，而是遵循时代共有的理念进行着自己的思维和判断，真实准确地展示着那个时代的生活运动的形态。

尤其令我感动的是，在这几位基层干部身上，都隐隐体现着一种人性的温情。无论主事的石主任，无论旁落的雷社长，还有改造锻炼的下乡干部“我”，在调查这几宗案件时，没有动辄棍棒相加，而是想方设法破开谜团，及至处理犯案人时，显示出在那个非正常年代的一种人性之善和美。对偷了一袋苞谷的二队队长柱子，石、雷决定不向上级报案，是被柱子偷盗的因由所感动，为了讨媳妇。这两个公社负责干部尚未在极左路线极左政策里一味迎合而泯灭良知，作品表述得恰到好处。如果说一袋苞谷只算刑事案件，不予声张地化解了，保护了一个贫穷到娶不起媳妇的乡民，还好办些；而对于一个以污蔑栽赃企图置人于死地的人，这个人既狠毒也很愚蠢，他用针刺扎了有私怨者家中的领袖像的眼睛。这在“文革”时代是十恶不赦的头等重罪。这种利令智昏的行为，终究真相大白，落得性命难保。即使在这种严峻的情况下，“石主任和雷社长鉴于贾进洲终归是个农民，很想宽大处理……”我是经历过这段难忘的生活过程的人，“文革”大运动中不断掀起严厉打击某个社会目标的“专题”运动，诸如“清理阶级队伍”“一打三反”等，无论城市或乡村，都被愈绷愈紧的所谓“阶级斗争这根弦”陷入

持久的灾难，即使一个大字不识的农夫农妇，也都知道什么话不敢说，说了就有掉脑袋的危险。而包庇这类重点打击的头等要犯的人也脱不得身，何况作为一个公社的领导者石主任、雷社长这些干部。他们在这种莫须有的“阶级斗争论”酿成的恐怖气氛里，能为被害者减一分刑责，哪怕有一句同情的话，都是要冒政治风险的，也更是弥足珍贵的，也显示着在人为的恐怖下的人性还存活着。韦昕创造的这两位基层干部形象的不同凡响的意义，在于一种特定历史过程——“文革”中乡村的真实形态。

这种真实还体现在乡村生活场景的写作中，公社和大队干部的办公设施和摆设，各种乡民家庭的农家气象，都有独到的却也准确的观察和文字描绘，不着意夸大更不渲染，平实里逼真的艺术效果就出来了。各种性格的乡村男女，也不故意夸张其行为举止上怪僻的习性，而是颇为敏锐地抓住其某时某地对某件事的微妙表现，一个眼神一种脸色，一句直截的表述或含糊其词或环顾左右而言他，都呈现着各种位置各种利害里的角色的分寸和色彩，你可以看到那些虽然贫穷的乡民的语言智慧和极富心计的思维，较之那些随意把农民写得如自己一样傻的作品可靠可信得远了。

无论写人无论状物无论做事，韦昕都用一种平实的语言。说平实容易产生缺乏色彩的误解。恰恰相反，韦昕语言里的睿智和透亮随处可见，都是在平静的叙述和描写中蕴含着，不做故意强调，有大智若愚和大象无形的气象。我所特别欣赏的作品的真实感，除了前述的因素外，也得益于他的语言。一种纯净平实的语言，决定着作品整体叙述风格的完美，也是造成作品艺术真实的至关重要的策略。

韦昕已年过七十，虽然有点耳背，交谈需得提高嗓门，却依然健朗，尤其是艺术思维，似乎更趋活跃和敏锐，充满如此令人惊羡的创

作活力，真是活到一种纯作家的人生境界了。

2006年12月13日 二府庄

文学的力量

——与《陕西日报》记者张立的对话

记者：陈主席，关于这篇访谈，咱们去年冬天就碰头酝酿过，就是关于陕西省作协成立五十周年的内容。可是您一直很忙。今天总算能坐一起来畅谈陕西省作协走过的风风雨雨的五十年。我想，这也是我们《陕西日报》的一个责任。经过讨论和思考，我们确定这次访谈的主题是"文学还有多大的力量"。您觉得合适吗?

陈忠实：提出"文学还有多大的力量"这个话题以及反诘的语气，本身就是预先设定的怀疑意味。我不完全把它看成是设问者的挑战，更愿意理解为设问者对当代文学在社会生活里的尴尬扮相的不安和忧虑。既如此，就不是这个话题"合适"与否的事情，倒是很有讨论的必要。

说到文学的力量，我至今保持着最动心动情的记忆。奥斯特洛夫斯基（保尔·柯察金）是深受《牛虻》的影响，成为一个自觉的钢铁意志的共产主义战士的。他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又影响了不止一代的苏联青年和中国青年，义无反顾地走向争取解放的道路。鲁迅的《狂人日记》，应该是腐朽的封建制度封建文化封建礼教的终结性的判词。还有巴金的《家》，影响和感召着无以数计的青年知识分子冲破封建笼子，走向新生。我自己也在年轻时被牛虻和保尔激发得热血难抑，稍微涉猎文学作品阅读的人都有这种难忘的记忆。即如二十多年前的一个短篇小说《班主任》，在整个社会生活里发生的冲击和震荡，当是对极左思想路线的第一声棒喝，正呼应着二十世纪七十

年代末中国人压抑已久承受不住的心灵呐喊。毛泽东曾经说过，革命文艺是打击敌人教育人民的武器，是符合当时的社会形势和情态的。

我们现在的文学很难发生如上述的影响力度了。现在还要求文学发挥如上述的影响力是否可能？是否符合新的社会生活的科学性？都值得探讨和研究。而眼下不争的事实是，即使是一些被评论家叫好的作品，也仅仅只是在文学圈子里反响一阵儿，很难走向普通的非文学职业的读者群里。这样，这些被好评的作品的影响力，也只是局限在文学圈子里被评说的阁档上，对社会生活各个阶层的读者完全陌生，更谈不上影响力量的大小和有无了。你提出来的无疑是一个大的命题，不是一般艺术流派写作方法的议争，而是触及文学创作最重要的东西，躲绕不过回避不得。

记者：在一切商品化的今天，许多艺术家沉湎在个人的小天地里，专事制作抽象的、低级的形式主义的玩意儿。一面是骗人的奢侈品，供小圈子内少数几个人玩赏；另一面，则以粗制滥造的东西迎合市场的低级趣味。而真正的大众关心关注的问题，却在文学中得不到表现。几乎到处都堆放着这些垃圾，到处飞舞着五光十色的纸屑，装模作样、沾沾自喜、趾高气扬、酷相十足。最终文学切断了同现实生活的联系。文学没有血脉的涌动、没有挣扎搏击的激情，没有疼痛和悲悯，没有爱，甚至没有讽刺。文学精神应该永远处于领先的主导地位。当下的文坛，有以腐朽为美，有以残酷为美，有以淫秽为美；有所谓的“身体写作”“行走写作”“零度写作”“纯客观”“冷叙述”，这类的例子很多，您认为这是“百花齐放”，还是亵渎文学？这是不是有一个文学倾向性的问题?

陈忠实：如你列举的这些创作现象，确实在近年的文坛浮泛过或长或短的一阵时日，有的热炒热闹一阵儿，迅速冰锅冷灶难以为炊；

有的还强自浮泛，却也日渐稀少了炒者的兴趣。我要辨正的一点是，这不是文坛的全部，在这些浮泛于文坛表层的热闹现象的另一岸，依然沉静着追求崇高的文学理想和生命精神的作家，他们不是一个两个，也不在少数，而是一个数目庞大的作家群，远远超过了如上述现象的人数，这是我所了解的一个估计。三两个主张以暴露隐私而满足窥阴癖的作品，一夜之间造成的惊呼的声浪，似乎把整个文坛都要笼罩了，却也销匿得比预计的时间还要快。

这些一波偃息一波又起的写作现象的发生，甚至还能形成或短或长的浮泛，在我看来，还是出于写作者对创作的理解，理解上的巨大差异，就会形成艺术兴趣的巨大差异，作品的品相也就由此定形定格了。“性”和“爱”无疑是诸多浮泛现象里最热门的一种。中外当代的许多杰出作家，在这个精神和心理领域，做出了震撼读者心灵的探索，无须一一列举那些堪为经典的作品。现在浮泛在中国文坛的所谓“身体写作”乃至“下半身写作”的颇为畅销的小说，其兴趣集中在性的种种形态种种过程和种种感受的展示上。稍有教养稍有欣赏雅趣的人，就会有自己阅读的判断和选择。然而，也不能无视人的某种窥阴癖的潜意识习性。

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是一个商业利益的驱使，出版方想以此谋利，写作者也以此获得厚酬。还有“名”的诱惑，不能正道出名就想绝招歪招。在钟鼓楼广场脱光衣服蹦跶，吸引的好奇者肯定比任何穿戴整齐的人要多得多。他们联手获得丰厚的利润和酬金，去买房去买东西去喝咖啡到欧洲美洲游逛去了，丢给文坛一个颇多争议的话题，让那些尊重着文学精神的老者和青壮年去讨论，包括你和我。这些现象很难构成主体倾向。我所熟知的许多作家都不在意这种东西，更不动摇自己的行程和方向，自然也是出于他们对文学创作的理解和

兴趣。譬如陕西文坛，至今也不见一部号称“身体写作”的作品，许多省也类似陕西。认真掐着指头算起来，标榜“身体写作”的作家和他们的作品，也就那几个、那几本。很难形成倾向。

记者：伟大的时代呼唤伟大的文学家和文学作品。在历史上，社会危机尖锐的时代、断裂的时代，在强大的社会潮流影响下面临变革的时代，都有伟大的作品产生。我们一再赞颂我们这个时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可是为何没有出现相应的伟大作品？

陈忠实：你的这个问题是就世界文坛的大格局而言的。如果具体到某个国家或一个民族，情况就很难以这个普遍现象而论定了。比如泰戈尔之后，印度很少有世界性影响的作品产生，印度人也会提出如上述的诘问。类似的文学现象，就我大概的印象，颇为普遍。

就我对文学创作的感知和理解，伟大作家的出现和伟大作品的产生，确凿没有任何可行性的规律去蹈循。一个时代的伟大作家和伟大作品的出现，都只能看作是一个个例，几乎找不到相类似的第二个。这就是说，在相同的“伟大时代”的氛围里，或在“危机尖锐”和“断裂”的时代风浪冲击下，为什么出现A这个伟大作家，而不能再出现又一个伟大的B作家，永远都无法阐释清楚，永远也难以寻找到令人信服的依据。如果能阐释清楚也有依据可寻，那就有了培养伟大作家产生伟大作品的规律性途径，就可以如商品一样批量生产了，伟大作家和伟大作品就不再惹眼了不再珍贵了。研究者永远回答不了这样一个问题，在打破封建帝制冲破腐朽的社会氛围的大时代背景里，为什么既能出现呐喊呼号的鲁迅，同时也能出现鸳鸯蝴蝶派，可见作家的个性差异和感受冲击的内在气质有多大距离。依此类推的方法在作家出现和作品诞生这种事上，是无效而失灵的。我的态度是等待，是期盼，

而且急不得。肯定在未来的某个早晨，影响世界文坛的一个伟大的中国籍作家和他的作品将辉耀于世。

记者：联想我们陕西出现的王汶石、柳青、杜鹏程、路遥，包括您以及贾平凹等这一批作家，请您谈谈文学作品与所处时代的关系。

陈忠实：上述提到的两代四位陕西作家，都是与时代几乎同步发展同步创作的最具影响力的作家。柳青一边兼职长安县县委书记搞农业合作化运动，同时就酝酿创作长篇小说《创业史》，被公认为十七年的文学代表性成就之一。杜鹏程随西北野战军一路前进直到解放新疆，放下行军包就开始了《保卫延安》的创作，属于最早反映人民解放战争的长篇小说，亦被誉为战争史诗。路遥的中、长篇小说，几乎全部都是写新时期陕北社会生活的变迁，尤其是青年男女情感和精神世界的复杂的历程的。《人生》和随后的《平凡的世界》里的人物，曾经得到无论北方无论南方无论城市无论乡村读者的共鸣和呼应，这是一个作家最值得自信的奖赏和回报。就我有限的阅读，贾平凹的小说创作，占绝大多数是写当代生活的，包括他的成名作获奖作以及有争议的长篇《废都》。他的笔触从农村延伸到城市，却仍然是当代城市各个阶层人物的心理躁动和向往。这四位作家均为最拥有读者群也富于声誉的作家。起码可以辨正一点，作家选择与时代发展同步的路子，没有如某些言论裁定的所谓误区，起码是诸种创作途径中的一种，同样可以获得优秀作品的一条途径。

在我理解，作家在他生活的时代，每日每时都在接受生活运动的冲击，大的社会浪潮的直接冲撞，细微的生活异变的无声感应，各种人物在生活变迁里发生的得意、欢乐、挫伤、跌落、笑声和叹息等等，都会引发作家最敏感的神经，产生表现的欲望，进入思考和文字诉述。这是包括我自己在内的创作某篇某部或大或小的作品的过程。

即使是写过去生活题材的作品，也是所处时代某种因素的启示所产生的诱惑，新的思维对过去了的生活内容达到了新的理解，如同照亮到前所未及的深的层面。这样，我就依然相信，作家应该进入生活，参与生活的变革，感受生活运动的形态，研究生活变化里的各种心态和情绪，把握较为新鲜而又准确的各种情感的流向，就可能把握住时代生活的准确的脉象。当然，这仅仅是进行创作的一个重要因素，而不是全部，还有作家对生活的理解的深浅，以及艺术表述功夫的强弱。

记者：一百多年前有人问雨果，说我们的文学、戏剧和诗很快就要死亡了——当年也有很多新东西构成了极大的吸引力，比如更通俗更便当的那些读物，一如我们现在从报纸上、电视上看到的那些东西——雨果说你不要担心这个，如果连文学都要死亡，那就等于说情人之间不再相爱，比利牛斯山就要倒塌，母亲不要她的孩子，也没有阳光了。一百多年过去了，我们的文学时而高潮时而低谷，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文学它没有死亡。非但没有死亡，而且单从印刷量上，已经比雨果时代增加了百倍，借您常说的一句话“文学依然神圣”，您对当今的文学走势是如何看待的?

陈忠实：从你提问里所引证的雨果的掷地有声的话可以判断，你也神圣着文学。人们对当代文学之所以有诸如“死亡”诸如“不再神圣”的议论，大约是对如前述的某些浮泛文坛的玩文学的现象产生失望。我到美国坐地铁坐汽车，站前的书摊上卖着各种流行杂志和流行小说，专供长途旅行的人消遣时光的读物。旅客花小钱买一本，看看热闹和离奇，乃至荒诞不经，下车时就扔到废物筒里了。据说有一批专门写作这种读物的作家，写得快出得快，收益颇丰，却也不计较在文坛的排名。然而这并不妨碍一个又一个堪称伟大的作家在美国出生。

用一句话概括，不以文学为神圣而乐在玩中的作家尽可以继续玩下去，还以文学为神圣的作家仍然在探索着艺术的新的途径。

我对文学未来的发展走势持乐观态度。我们的社会实行开放政策不过才二十几年，禁锢打开之后出现的纷繁和杂沓现象，之所以还会兴一时热议，更多的是出于稀奇。当这些尚能引起新奇诧异的花样过眼之后，读者就见怪不怪了。我之所以确信未来文学前景的乐观，首先是时代的进步，思想的开放，信息的流通，作家可以获得诸多的思想启示和艺术形式的参照借鉴。再，教育的普及和作家文化素养的奠基，都比我这一代作家雄厚得多了，艺术视野更开阔，起步会更高，思想力度会更具穿透的深度，优秀的作家和如你前称的伟大作品，肯定会出现，只是一个时日长短的事。

记者：“人一思考，上帝就发笑；而人不思考，上帝就会发疯。”您经常讲的文学家应是个大的思想家，也就是说一个伟大的作家必然是一个伟大的思想家，他的作品也应该灵魂裸露、个性逼人，从语言到思想，不同凡响。您对文学和文学性、思想和思想性是如何理解的？

陈忠实：关于作家的思想，是我近年间愈来愈感到清晰明朗的一个创作命题。这是经过优秀作品和平庸小说的阅读参照过程中得到的启示。

作家创作发展历程中要完成多次突破，其情景类似蚕儿一次又一次的眠蜕。每一次突破，都使作家进入一个新鲜的开阔的艺术境域。作家完成一次突破或在突破的坚壁之前被捂死，通常所说的诸如生活积累生活体验，艺术表述能力，想象力，包括文字功夫等等，都是重要的因素，欠缺哪一方面的能力或是火候不足，都会成为实现新的突

破的制约性障碍。然而，近年间对各类作品的阅读参照里，我意识到思想对创作的至关性的作用。尤其是那些已有颇多建树的作家，或者说创作已经达到较高层次的作家，如何避免类似性的自我重复，如何缩短原地踟蹰的时间，实现更新更高艺术境界的突破，思想力度就成为诸多因素里尤为突显，乃至致命的一个因素。

作家拥有各自的生活积累和生活体验，进入创作就进入对生活素材的取与舍或者说提炼的艰巨过程，这是常识。甚至在一个或大或小的作品刚刚产生灵感之时，直到酝酿和构思基本完成，这个过程里就进行着素材的选择和提炼。对生活素材的选择和提炼的决定性因素，首当思想力度。这情形类似于炼钢，冶炼手段的强弱，决定着钢的精度，粗钢和精钢都来自同一块矿石，而钢的品位却相差甚远。作家的思想力度可以类比为炼钢能力。作家的思想决定着穿透生活的深度。匍匐着的平庸的思想，穿透生活和提炼生活的力度太浅太弱，作品的平庸不是最后而是最初就注定了的。思想铸就作品的脊骨，是渗透游荡在字里行间最具攫获力的幽灵，是精神张力和人物心灵世界最具冲击力的灵魂。我在阅读那些经典——老经典和新经典——作品时，都会有类似的感受，而绝不因这些经典作品题材的差别和生活远近而发生影响。我也看到许多缺乏思想力度可资借鉴的作品，素材的随意选择，生活细节的大量堆砌（且不说胡编乱造）不可避免一堆铺摊着的无骨无灵性的肉的直观效果。企图凭借某些小趣味小噱头或吓人的想象的情节细节来制造艺术效果，都是很难奏效的。

思想的深度和力度，影响乃至决定着作家生活体验的质量和层次。尤其是从生活体验进入生命体验，非超常独到的思想而绝无可能。人们很随意地说着生命体验这个颇为时尚的词汇。就我的感觉，能进入生命体验的作品，也只是许多堪称名家名作中一个小小的部

分。我差不多读过昆德拉的全部小说，在我的阅读判断里，只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是进入生命体验的一部小说。有趣的是，此前昆德拉还有一部成名作《玩笑》，题材和立意与《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颇为类近。《玩笑》也是超出捷克国界产生广泛影响的一部小说，结构、人物和作品开掘的深度，都可以说完美。然而对照《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我发现《玩笑》还是属于生活体验的作品。只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部小说进入生命体验的层面，这是一个作家创作生涯里梦寐难求的一次升华性质的艺术突破。我曾经认真思索昆德拉从《玩笑》到《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两部小说的创作现象，唯一能得到的较为合理的理解，是昆德拉的思想提升了发展了，穿透生活烟云的强度和力度更强大了，而且在这种独到的思想的辐射下，对社会和人生获得独自独特的发现，而且潜移默化为生命深层的体验了，创作就进入自由自如如同蚕到蛾的羽化状态。

说到作家的思想，有人便联想或等同于政治，甚至敏感到极左的政治。这显然不是无知就是无趣。极左政治只是政治这个概念里不大光彩的歧义性的一支。尽管无论生活在什么制度下的国度里的作家，都无法避脸蒙眼不问政治，因为政治充盈着所有国家的社会空间，政治影响着社会发展和人的生存状态，必然引起作家的关注。然而作家的思想绝无可能等同于政治，这也是常识。作家关于世界关于生活关于人生，应该而且肯定有自己的见解，这见解就是思想，这思想的锋芒、深度和力度，决定着作家全部创作的成色，即便是一篇千字文，也显示着思想左右下的审美趣味。还有一种更简单化的理解，说到思想，便以为让作家用文字去图解政治乃至政策，已经没有辨正的必要了。

记者：这几年陕西这块厚土似乎让文学有所板结，甚至有断代说。有人说是你们几个重量级作家“震慑”住了，您觉得你们几位名气很大的作家对陕西作家队伍的形成、茁壮、繁茂是有益还是有阻力?

陈忠实：进入新世纪以来，关于陕西作家“断代”的议论时有耳闻。我不大赞成也从未使用过“断代”一词。我认为，陕西作家和陕西文学没有“断代”。就我所知，陕西青年作家的人数和出版发表的多类体裁的文学作品的数量，都是前所未有的。我省有一批四十岁以下的青年作家，起步高，出手不凡，思维活跃，艺术灵感敏锐，一些人已经出版了几部长篇小说，有的作品得到省内资深评论家的好评。这个年龄区段的这一批青年作家的作品，改变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形成的包括我在内的青年作家群体几乎清一色农村题材作品的单一结构，更多地把笔触伸向变革前沿的城市，城市里多个层面上从事各种职业的人，尤其是青春男女，官场商场校园以及文化体育等等，在他们的作品里都可以感知到生活最新跳动的脉象。就我有限的阅读印象，最强烈的一点，他们笔下的城市男女形象，确实属于当代城市人的真实真切的气息，起码不似我偶尔写到的城市题材的作品，总让人感到是穿着城市人服装的乡下人。他们的写作手法包括语言都更趋多样化，作品面貌不沾陈迹旧痕。因为几乎所有作品都与当代城市生活同步发展，作品人物的生存形态、追求里的得失所引发的情感世界的流程，弥漫着当代城市生活蜕变的最新心理信息，更容易与现时的读者发生情感交流和心灵呼应，作品出版发行甚为可观的数量，就是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

我能感到的问题仅仅只集中到一点，如何使这个甚为壮观又极富艺术创造活力的创作群体里的青年作家，实现思想探索和艺术追求的新突破，哪怕先有一两个或三四个，率先完成一次重大突破，不仅使

自己的作品跃上一个更新更开阔的艺术境界，也能跃出陕西，在当代中国文坛打开局面，崭露头角，横空出世，引得普遍关注和好评，在整个国家现时的文学平台上突显出陕西青年作家的名字，其作品成为年度和阶段性的创作述评里不可遗漏的被论说的佳作。

以我对文学创作的理解，尚不能急，更不可泼冷水，需要等待，因为一个作家的成长和一部好作品的出现，几乎没有可以依赖的规律去循蹈。至于几位所谓重量级是否有“震慑”的遗患，我以为不过是调皮话而已。

记者：有人说，当年的那个陈忠实如果不走进陕西作家协会，很可能就不会有后来的辉煌和成就。请您谈谈个人理解。

陈忠实：这个纯粹涉及我个人创作的问题，又是从这个角度提出来，不仅始料未及，此前似乎没有从这个角度想过。

“当年”这个时间概念，在我判断应该在进入陕西作家协会之前。我是一九八二年冬天调进来的。“当年”即应是此前一段。在我看来进入作协的最重要的意义，就在于时间完全可以由自己支配安排了，即所谓专业创作的实质。此前我在西安市灞桥区文化局和文化馆都挂着行政职务。那时区委的张书记是很关护我的创作的，他亲自当众宣布，让我只参与文化局大事的决策和研究，把更多的时间用在创作上。我从那时到现在都一直感动着。进入省作协之前的“当年”，我实际上已处于半专业的创作，读书和写作的时间还是充裕的。但我仍然参与区里的中心工作。西安郊区农村推行“责任制”的一九八二年春天，我到渭河边的一个乡里住了两个多月，骑自行车奔跑在渭河滩大大小小的村庄里，有时深夜才回到下乡“知青”返城后遗下的屋里。一九八二年所写的一组反映农村生活变革的短篇小说，即是这次下乡参

与生活变革的收获。那时我对我的生活和创作状态颇为满足，对进入省作协不是太急切。因为此前的一九八一年，省作协党组已决定调我到专业创作组，只是因为行政辖属的绊磕没有调成，我也基本泰然地顺其自然。

一年多后调入省作协，几乎同时我就做出决定，回归老家。自从一九六四年离开老家村子，我变换过几种单位和职业，按那个时候的规矩，只有星期六下午放假回家，周日晚必须回到供职单位，直到在文化局文化馆工作都如此一贯制下来。我做出回归老家的理由有这样几点，珍惜难得的时间支配的自主权，可以避免没有实际意义的应酬；我在新时期形成的青年作家群里年龄偏大，又遇到前所未有的文艺复兴时期，自然就有紧迫感；我在乡村工作整整二十年，很想安静地坐下来，回嚼我的乡村生活体验和积累的素材，争取多出作品；也很想认真读书，一些过去被禁的名家名著，需要领略，以开阔自己的艺术视野，进一步清除极左文艺政策所造成的视野的狭窄和偏见；躲开热闹，也躲开文坛不可或缺的叽叽咕咕是是非非，保持思考所必具的沉静的心境，把精力和用心专注到思维和探索上，不至于空耗了。这样，我在乡下居住的老屋生活了十年，从短篇、中篇写作到《白鹿原》长篇的完成。

如果继续在文化馆待着而不进省作协，我不知道会循怎样的创作道路发展过来。因为人生只能就已有的过程论说得失，任何“如果”的假设既不可靠，也无依据。

我感慨自己在“当年”做出了一个起码切合我实际的回家的决定。我依然怀恋那十年在乡村捅着火炉吃着烤馍和农民乡党下棋的日子……没有上帝，自己拯救自己。

2005年3月26日 二府庄

关于《白鹿原》及其他

——与《时代人物周报》记者徐海屏的谈话

电影不必忠实

时代人物周报：吴天明很早就说希望《白鹿原》为自己的导演生涯画个句号，你也一直在推荐他，为什么最终选择了王全安?

陈忠实：我可以提供一点参考意见，但我决定不了，那是制片厂的事情。据我所知，现在的导演王全安是编剧芦苇推荐的。芦苇比较认可这个年轻导演的风格和拍摄手法。

时代人物周报：白嘉轩的扮演者一直确定不了，当时你写书的时候，心中有过具体的形象吗?现在有觉得贴切的男演员吗?

陈忠实：我对影视圈不熟悉。“白嘉轩”是一个关中地区典型的男人形象，很综合，没有对照什么人来写。

时代人物周报：小说改编电影，有时会将小说改编得面目全非，比如《周渔的喊叫》改编为《周渔的火车》，当时电影恶评如潮。

陈忠实：我觉得电影是另外一种表述形式，你要按照作家的方法那可弄不成电影。电影编剧和导演自有他们对小说中感兴趣的东西，他们有他们的方法。

时代人物周报：但是无论改编成什么样，电影出来以后都会写着“陈忠实”的名字。

陈忠实：原著是“陈忠实”，但是电影不是。他们编的剧嘛！

时代人物周报：以前听说你对无论是秦腔还是话剧的改编都很放心，现在看起来你对电影的改编也很宽容?

陈忠实：只能如此。我也听说过一些小说的作者和导演编剧之间关于作品的争执。哪儿多了，哪儿少了，一旦争起这个来，结果都是很不愉快的，而且作家还很难改变编剧和导演的意见，那我也就顺其自然了，这是一。第二，主要是我这个小说改编电影的难度比较大。有些小说人物和故事集中，改编成电影好弄。这个小说我自己知道，时间跨度长、人物多、情节比较复杂，没有一个中心事件。就我一般的印象，电影都应该有一个中心事件，一个线索，一个发展的过程，曲折，迂回，还要有悬念。而我这个小说没有统一的故事和统一的时间，从小说写作上来说，是以人物为结构的，这样电影改编起来就有很大难度。而且电影用不了小说的全部，在取舍问题上，包括我自己都不好把握。

放在棺材里做枕头的书

一九九八年获得茅盾文学奖之后，陈忠实的行政职务步步高升，从陕西作协主席到全国作协副主席。《白鹿原》无疑是陈忠实的巅峰之作，仅人民文学出版社发行量就累计一百二十万册，此外还有港台、海外其他版本，以及销数不可估计的盗版。《白鹿原》也不时地以连环画、陶塑、秦腔等形式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陈忠实的人生在外人看来也因为这部小说而被分割成了两个部分——《白鹿原》之前与《白鹿原》之后。

时代人物周报：每过一年，是不是有时候会感到自己离《白鹿原》又远去了一年？

陈忠实：当然越来越远。写完它以后，我对小说的兴趣就恢复不到最好状态了。所以这几年我主要写散文，对散文特别感兴趣，可以直接抒发情感。

时代人物周报：我注意到，不少茅盾文学奖获奖作者都在获奖或者说完成获奖作品之后，没有再出过长篇，这一点在你身上最明显。这是因为在创作第一部长篇后功力耗尽？

陈忠实：不可能耗尽的，这都是外行看的。作家某一部作品的产生，不可能还用上一次的办法去写，那是最笨的办法，新的小说也不可能获得成功。那样实际上等于自己重复自己。一部小说的产生，创作欲望是最重要的。《白鹿原》之后，我对小说失去了兴趣，这个状态持续了好长时间。近几年才又开始写小说，不过都是短篇的。

时代人物周报：按照随笔、短篇、中篇、报告文学和长篇的顺序，你最终创作出了一部获得最高荣誉的长篇作品，是不是觉得此生足矣？

陈忠实：没有，没有这个感觉。因为我很小的时候对文学就挚爱，从来不会有这个感觉。这部小说能够获得读者普遍的接受和喜爱，我非常欣慰。作为一个作家，能受到读者如此的热爱，我说过一句——“我过去所有的付出都是合理的”，这足以表述我的心理。现在表面看起来大家感兴趣的就是改编话剧、电影、电视。实际上前一段时间，有一位青年学者把二〇〇四年的有关资料整理出来，仅仅去年一年发表在全国高校学报上的关于《白鹿原》的评论文章就有四十多

篇。他把这个拿给我的时候，我自己都吃惊，我这里很难接触到学报，只有陕西几家高校的学报给我寄，外省的都不寄，所以我接触不上。我根本没有想到，到现在每年还能有四十多篇评论文章发表在大学学报上，我确实很感动。

时代人物周报：所以你觉得“过去所有的努力都是合理的”。假设《白鹿原》没有获得那么大的成功，是否所有的努力都不合理？

陈忠实：那我就养鸡去了。这部小说再写失败，我都五十岁了，我就把我的生活再颠倒过来。因为过去我有正经工作，创作是业余的，后来搞了专业，创作是职业，其他事儿那就是副业了。小说写完以后老婆说，如果这个书出不了怎么办？我说出不了咱们就去养鸡吧。以养鸡为业，创作我也不会放弃，只是创作我就摆到了业余的位置上。那样的话我心里可能会调节得更好一些。

时代人物周报：你还说过《白鹿原》在创作之前就是你发誓要写成将来放在棺材里做枕头的书。

陈忠实：死人进棺材都要有枕头的，就是垫头的。我意思是说能让我死后有一个让我安宁地闭眼，能托住我脑袋的一本书，能让我踏实地死去，就算是对我一生爱文学的安慰吧。我起草这部书的时候已经四十六岁了，在陕西当时那一拨青年作家中，我年龄偏大一些。我一想，按照写作计划，写完都五十岁了。五十岁的人按照过去的观念看就已经算是“老汉”了。爱了一辈子文学，弄到现在还没有写出一本得到读者普遍认可的作品，如果这个作品写不好，“老汉”了以后，还有多大能量，自己都觉得有点不安。

时代人物周报：获得茅盾文学奖之后，是否觉得自己再写也超不过《白鹿原》的水平了?

陈忠实：我没有这个感觉，我想着如果有新的生活启发，可能还会写。写出来，也没有必要再和《白鹿原》较劲儿。作家创作一部新的作品，是根据新的体验，要表述的东西，你能把它表述完美，就你所体验到的表述出来，你感觉没有遗憾，这就行啦。你要较劲儿，那世界上优秀作品太多了，你跟哪一个较劲儿呢？要超过哪个呢？而且作品没有可比性的，是要看你体验的东西有多少价值。你总是跟什么在较劲儿，那是作家创作的一种误区。

时代人物周报：如果发表在今天的文学市场上，《白鹿原》是否还能有这样的结果?

陈忠实：我相信会有。一九九三年出版以后，这都出版十二年了，读者和评论界依然对它热情洋溢，并不因为美女作家、“下半身写作”而冷落《白鹿原》。所以我对文学，真实的文学仍然有信心。

时代人物周报：你喜欢发表《白鹿原》的那个文学年代，还是现在？为什么?

陈忠实：那个年代也不好。进入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后，一九九一年和一九九二年是文学的最低潮时期，“作家出书难”的呼声就是从九十年代初喊起来的。当时出版界改革，从原来的计划经济、政府管理转变为企业化经营的时候，有名作家的作品去征订就是几百册，这是常有的。当时《白鹿原》第一版全国征订，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征订数字是一万四千八百五十册。他们写信告诉我，我非常振奋，当时都高兴死了。一万册以上意味着出版社不赔钱，这样我心里就安宁了。

不要说稿费多少，你让出版社赔钱给你出书，自己心里都不安啊。那时出版环境相当艰难，所以征订一万四千八百五十册，出版社就是按照这个数字印的，再多印一百五十册凑够一万五千册，出版社都不敢多印。不过出来很快就开始了第二次印刷，五万册、十万册……而且是连着印。这种盛况现在可能不太见得到了。

社会的而非个人的

陈忠实对自己的创作反思过，他自问为什么总是写这么“土”的东西，为什么不能写出今天的生活。然而功成名就的陈忠实至今仍然喜欢守着西安东郊灞桥西蒋村的老屋，抽着两块五一包的巴山雪茄，喝着烧酒，咂摸着乡里的秦腔。或许就是这种遥远于互联网时代的生活方式注定了陈忠实小说的“土气”，然而谁也无法否认，正是这种土得掉渣的生活经历帮助陈忠实孕育出了《白鹿原》。

时代人物周报：你曾说到白嘉轩，“我理解他是这种精神剥离过程中最痛苦的人，因为他最顽固最深切地与他的时代相融”。你是一个与自己的时代顽固深切相融的人吗?

陈忠实：我也在不断地进行着那种剥离过程。

时代人物周报：像你的“蓝袍先生”（一九八五年具有突破性的一部短篇小说《蓝袍先生》的主人公）一样的剥离过程吗?

陈忠实：有点类似。因为我们接受的都是过去的社会和道德观念。随着社会新命题、新标尺的出现，我们肯定就要与原来恪守的东西发生冲突。我倒是觉得很随意地能够完成这个过程，一步从封建社会跳到社会主义的人，可能就没有任何精神信仰和道德恪守。太轻易

的人可信度就比较低，他对什么都能适应，最后他自己什么都没有了。

时代人物周报：现在会不会写书的名人都在忙着出自传，你有写自传的计划吗?

陈忠实：有好几家出版社从七八年前开始，一直到现在都在约我写这个东西，我不想写。

时代人物周报：是因为你的经历和你的感受都在你的作品中写彻底了?

陈忠实：我觉得自传不能做完全的表述。尽管有一些东西是真实的，但是既然不能做完全的表述，那它就不是你完全的真实历程。

时代人物周报：是哪一方面不能做完全的表述呢?

陈忠实：这个我就不解释了。

时代人物周报：作家通常总会将自己写进作品中，如果在《白鹿原》中找出一个角色，你觉得哪个角色最能代表自己?

陈忠实：有一些小说更多带有作家自传性质，个人色彩特别明显；有一些小说是作家对社会和人生的体验形成的。我的作品就不属于前者，我到现在也没有过多揭示我个人世界的作品。

时代人物周报：不希望别人在小说中读到你本人？现在很多作家都喜欢以自己的生活为原型来写作啊。

陈忠实：那是对社会理解太少，生活面太窄，他们只感受着自己，对社会的了解还有待于进一步打开，有待于进一步完成对社会的体验。我对社会的变革和人的精神历程的变异比较敏感，也感兴趣，所以我的作品大部分都是这种题材。

时代人物周报：《白鹿原》曾被著名学者范曾誉为“一代奇书”，有人评论说它是完成了“一部民族的秘史”。现在回想，当时一个做了十几年农村基层干部的，如何能有“探索民族文化发展隐秘与描述和批判的能力”呢?

陈忠实：这也可能就是我认识发展变化的结果吧。谁都拥有生活素材，但如何能把这些素材提炼出来？这就跟炼钢差不多，大家都拥有矿石，有人炼出来的是粗钢，有的人是合金钢。差别在哪呢？除了艺术表现形式以外，更重要的是思想。作家对生活的提炼和发现，就有如炼钢的冶炼能力。思想平庸、软弱，就跟炼钢的落后设备，冶炼能力差，只能炼粗钢一样。所以思想的提升对于发展到一定程度的作家是至关重要的，是致命的。

时代人物周报：这更多的是来源于技巧的培养还是天赋?

陈忠实：学习，不断接收新的理念。当然更多的是对生活的思考。有些作品写得也很生动，但是你感觉就是生动的素材和生动的故事，你得不到什么感受，很难完成一种精神和心灵的震荡。如果你研究生活，研究新的关于生活的观念，接受你觉得合理的成分，来提升思想，强化自己的思想，然后把这种思想化为无形的关于生活的一种体验，用这样一种思想照亮你拥有的生活素材的时候就大不一样了。

时代人物周报：“蓝袍先生”经过了省城生活之后回到乡村家中的时候发出了“归来已觉不是家”的感慨。一九九八年你从人民大会堂领奖获得至高荣誉，回到家有没有这样的感慨？

陈忠实：我的感觉是，家更亲切了。因为我生于斯，长于斯，得于斯，这部小说就是在我老房子里头完成的。我现在把那个老房子改造成新房子了。直到现在，一旦回到老家那个院里头，我的情绪就总是最好的，最敏感的。这个没有办法改变。

2005年4月4日

公安文化及其他

记者：您认为公安文化是什么样的文化?

陈：我认为公安文化和社会的文化没有区别，文化不应该条条格格细到行业中去，这是行业特点不是文化特点。文化形态延伸到社会各个方面，各个领域。当然，也覆盖到任何行业。在我的意识中，不太主张把行业划分得太具体，太细，包括对一个地域、一个地区的文化。我都不太欣赏强调一个地区、一个地域自己的文化特点。包括中国人，我们常说中国的东部人、西部人、南方人、北方人，好像特点分明，其实也无多大差别。总之，走出国门，在外国人眼里都是中国人，根本不能区分。所以，把这种东西分得越细，反而把最重要的东西失掉了。在我理解，中国人在传统的文化中，都受孔子的影响，在历代文化，南方、北方都受这个影响。“五四”以来，我们同样都接受新文化的影响，革命的影响。“文革”期间，北京的红卫兵穿的是解放军退下来的旧军装。上海、广东、广西、陕西都是这样的打扮。还有多大差别？人生所受的精神和心理的影响主要来自社会观念和文化的影响。外在形象上包括个性习惯上的影响，那个就差别很多了，东一个村子和西一个村子都是有差别的，总不能把文化分得这么细吧！这没有多少实际意义，反而分得越细越让人找不到北，失掉了文化的核心和精华部分。公安的文化是行业的差别，公安接受的也是共产党的领导。我们现在学的是最新的科学知识，包括文化的科学知识，仅仅是个职业的差别。流行歌曲——社会上的年轻人都喜欢唱，我们警察同样也喜欢。所以没有太大的差别。我以为，公安上搞文化的，不管是传播文化的或者接受文化的，不要老在公安文化上定格，而应该接受民族泛文化的东西，才不至于圈在很狭小的职业范围里面，变得狭

隘。倒是应该倡导民族最优秀、最传统的东西，也应该融入现代文明的东西。应该接受这些东西，来提高自身的素养，启迪自己的思维，更新自己的心理结构和思维结构，这样能使自己的眼界开阔。

记者：公安题材的影视作品，群众喜闻乐见，受众面很广，怎样才能更深地挖掘公安题材?

陈：我也很喜欢公安题材的影视作品，因为它涉及惩治犯罪这样的社会问题，本身就带有惊险性。作为普通观众，就我所知，大家都喜欢看些现实生活的惊险情节题材的影视作品。不仅是要拍得好，也要有一些纪实的东西，这样才能给人一种生活的真实感。现在的一些公安影视作品远离生活，为什么造成这种后果？我后来想了想：这些作品要么剧情不是太高明，要么凭空想象，当然也包括演员造作的演技。如何提高这些东西？这和其他的影视，包括文学都有类似的问题。就我有限的看过的公安影视片而言，看到坏人得以惩治，道义得以捍卫，总有一种痛快感。我们现在社会犯罪率比较高，且不说职业犯罪，抢劫等暴力行为几乎每天的电视上都有报道，有些很残忍，所以从整个社会来说，呼唤惩治邪恶的强大力量，作为社会分工，就要体现在公安上。这样一种力量，公安题材的影视作品多加以表现，它对社会受众的心理也是一种呼应。这既是社会的一种正义力量的显示，也能加重以正压邪的社会气氛。这种艺术造成的气氛会给人们造成一种很好的影响，实际上我们社会在很大程度上减少犯罪，最直接的功能就是公安（它不是全部），还有道德和良知。当然教育是另外的一个层面的。影片水准的提高有各个方面的途径。编剧应该更精彩，更趋于一种艺术的真实；另一点，演员的演技有待于提高，有的造作，故意做出公安人员特有的那种行为。叫人看了很不舒服，应该演得更自然些，更贴近生活一些，应变成艺术的真实。从生活的真实

到艺术的真实，不是从生活提升出来变成一种虚假，那种装腔作势，好像和生活中的公安人员不相匹配，让人看了很别扭，这当然有个提高的过程了。不光是公安题材，很多影视作品都存在这个问题。还要讲究自然的真实，作品中的正面英雄人物也有家庭、有普通人的生活。他在社会交往中，也面对社会的方方面面，要体现公安人员情感生活多面性。不光是爱情，也包括亲情、友情，真正的公安实际上集成着一种大善和大美，这样才能惩治社会的大恶和大丑的东西，没有大善和大美就没有那种惩治邪恶的道义和良知，所以充分展示惩治邪恶的正义这一面同时，也要展示大善、大美，能让人看到他们比较丰富的内心世界和情感世界。我们现在常谈人性，那么人性中就有善和恶，公安人员就是以大善惩治罪恶的英雄。作品要把生活领域各个方面表述得更清，把平常人的那部分表现出来。英雄就是英雄，问题是这个英雄是虚假英雄还是真实英雄？真实的英雄，人们是会崇敬的。欧美影视也努力塑造英雄的一面。他们的一些作品让人看到英雄更丰富的东西。但并不是把英雄拉入庸常之辈，英雄就是英雄，他们身上的一些东西是常人所不具备的。我们从英雄身上看到更多的东西，你要承认生活中需要英雄，艺术表述要表述英雄，这是艺术的责任。我们现在不满足对英雄世界的狭窄，情感世界的狭窄，精神、性格等方面的单调。而不是说要否定英雄，尤其是公安题材，没有英雄就不行，破一起案件就会有英雄出现。基于这一点我觉得我们应该塑造出一个或者几个让观众难以忘怀的英雄来，惩治邪恶的英雄来，因为我看过一些美国类似破案的题材，那些人个性鲜明，机智勇敢，塑造出他们自己的英雄，惩治社会丑恶的英雄。但发脾气摆架子的不是我们所要塑造的英雄，不能简单化理解。创作者自己探索理解，当然也要学习、借鉴一些东西，把英雄塑造得更丰满、更人性化、更让人难忘。

记者：公安系统在书法、绘画、文学等各个领域人才辈出，是否应该走专业化的道路?

陈：关于专业和业余不只是公安系统，实际上是各行各业的里面都有。文学的业余作者、书法作者都很多（包括很多领导干部工作之余也都在练习书法，练画画），就文学领域来说，从全国的范围来看，大都对原有的专业作家形态持否定态度。要提高业余水平，提高写作能力。能想到好多办法，好多创作苗子，我现在认为，他在工作之余，搞自己喜欢艺术的门类：书法、音乐、美术和文学包括各种活动，大家都有这种爱好而愿意作为调节生活陶冶性情的方式，人家感到很愉悦，这是很好的。有人愿意不断提高、不断钻研，走到专业的作家或者画家书法家的队伍中，这个也无可厚非。现在有很重要的一点，比如说“画画和写字”，靠公家养的道路行不通了，现在都在改革，咱们国家延续下来的专业作家、专业画家等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西方的国家整个没有这种体制，如果你的专业养活了你，你在社会上谋求一种生活，是很自然的事情。其实我认为在业余和专业之间没有明确的界限。你觉得你在这个行业里有建树了，你可以发挥才能，你就是专业的。要多看、多写，提高自己的修养、提高自己的境界。不管是钻研哪方面的，都有提高的过程。品位提高到一定的高度，得到受众欢迎和认可，专业和业余也就没有什么界限了。得到欢迎都可以很自信地称自己是个“家”，读者和观者不是因为你是专业人士就喜欢你的作品。他不是依人来判断，主要是依作品来判断。现在一周有两天的礼拜，一年有三分之一休息日，有自己正当职业、有自己爱好的人，就应该充分利用这些时间，晚上用两个小时做业余的钻研，你可利用这些时间学习某个艺术种类就相当有优势了。所以不应该争取专业时间，利用这些业余时间不断提高，达到一种新的境界，社会就会非常需要你了，社会就会为你创造专业的时间。但大多数人

将艺术作为生活爱好，生活调节，下班后闲余时间画画、读书、弹琴……这种自娱感觉会很好。当然你们在提高艺术修养的同时，更要做好本职工作，因为你承担维护社会安宁的重大责任。

2006年3月24日

答《解放日报》记者姜小玲问

得到的远超出期待

问：说到您，总是绕不开《白鹿原》，《白鹿原》是您的代表作，又是一个已经树在那儿的标杆，这对您以后的创作是利还是弊?

陈：这个问题此前已经几次被问及，我几乎没有想过对我这会是一个问题。现在看来，这的确已成为一个问题，但仍然不属于我，而是记者、研究者和关注我的创作的读者，猜测我的写作状态想到的一个疑问。我的理解是，无论我日后的写作朝哪里走，会产生什么样的作品，都与《白鹿原》没有关系了。《白鹿原》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到九十年代初的一次写作，是那时候对历史和现实的体验所选择的一种表达方式。我后来寻找新的体验，同时也寻找新的表述形式，哪怕一个短篇小说或一篇散文。在写这些东西的时候，几乎想不到昨天以前我曾经写过什么，包括《白鹿原》。

问：您说，要写一部可以"放进棺材里当枕头"的作品，《白鹿原》有没有实现您的这个想法?

陈：我确实说过这个话。这个话是我当时的创作心态的表述形式，所指完全是内向的，让我从小就迷恋创作的心，别弄到离开这个世界时留下空落和遗憾。我从这本书出版到现在所领受到的文学界的评价和读者的热情，已经远远超出原来的期待了。

问：《白鹿原》为您带来了很多，包括名、利，您觉得这些东西有没有干扰您的写作?

陈：我在写完这部小说时，最基本的估计是，如果能够出版，肯定会有反响，不会不被理睬的。但刚一发表迅即引起的强烈反应，尤其是读者收听广播或文本阅读后的热烈反响，让我始料不及。再说利，当小说被确定先在《当代》发表然后出版单行本，我和夫人暗自庆幸，按当时稿酬标准，各得一万元，我们家将成万元户。后来一版再版连续印刷，版权费也就超出最初的预计。

我随之承担了作家协会的一些工作责任。我想对陕西文学发展尤其是更年轻一代作家的发展尽一份义务。我是自觉自愿地做，从来没有把做这些事看成对我写作的“干扰”。干扰确实存在，有许多打着文化招牌却与文化基本无关的活动，有的常常策动我的领导、朋友乃至远亲近邻来扯拽。时间就被分割得很零碎。

问：有人说，您以前的写作是丘陵，而《白鹿原》是高山，“高山仰止”，您有没有想过要继续写出超过《白鹿原》的作品？

陈：无论是所谓以前的“丘陵”，还是后来所谓的“高山”，都已是跋涉过的熟路旧途了，我不会再流连。写作对我永远都是一种新鲜的陌生和陌生的新鲜。只有对陌生境界的探看才有新鲜感，才激发创造的欲望和热情。当要把一种体验和感受诉诸文字，铺开稿纸的时候，哪怕是一个短篇小说，甚或一篇两三千字的散文，依然是一种唯恐写不到位的诚惶诚恐。我只按我的写作习惯写作，写自己真实的体验，既不跟别人较劲，也不与自己较劲。

问：您好像说，《白鹿原》是“独子”，不会有续集，您是基于什么样的考虑？

陈：《白鹿原》作为一部单行本独立的长篇小说已经完成，无事可续。这是在给《白鹿原》画上最后一个句号时就确定无疑的事。哦！应该是在起草第一章第一行时就确定下来的事。

离开土地最是痛处

问：土地和农村是您小说创作丰厚的资源，您现在长期生活在城市，离开了土地写当下的生活，您认为自己有优势吗?

陈：你的这个话题点到了我的痛处。用关中民间话说，“戳到了疤疤子上”。我与乡村失去直接联系已有十余年时间。我抬头所见的左邻右舍，已经不是不做任何修饰的乡村男女，而是满口新潮文化名词的城市人；出门看到的不是树木和田野色彩的淡浓变幻，而是从地皮直砌到天空的各色瓷片。乡村对我来说不仅是创作资源的累加，还有一个情感纽带。这些都在近十年间基本隔断了。已经不是优势存在与否，而是断止了直接的生活体验。我基本上是依赖直接的生活体验写作。我现在偶尔回到乡下老家，和碰见的熟人匆匆聊几句家常。我在城市最令人伤痛的位置上看见的几乎全是农民，常常说不出话来。我现在很难回到如过去一样的生活氛围里去，人们不在意我。我却在意他们的行为和说话方式。

问：感觉上，擅长写农村题材小说的都是年纪比较大的，有较长农村生活经历的作家，您怎么认识生活和创作之间的关系?

陈：擅长农村题材写作的人，有一批卓有建树的年纪较大的作家，也涌现出一茬接一茬的年轻作家。就我有限的经验，在农村题材创作上有显著成就的作家，几乎都有直接的乡村生活经历。生活与创作的关系是一个大话题，也是一个老话题，自我学习写作的少年时期

就知道了作家要体验生活，要写自己最熟悉的生活。尽管近年间有不同意见，然而在我看来，似乎尚不足以推翻这个被古今中外的大作家普遍验证着的规律。差异或歧义仅仅在于，相对于社会各个大的生活层面，有作家坚持写个人生活圈子的体验。在我看来，只是生活圈子大小的事，关键在于，作家体验到了什么质量的东西，还有表述的成色究竟如何。

问：写作对您意味着什么？是倾诉的需要？是生活的一部分？

陈：创作对我来说，最基本的无法改变的一点，完全是兴趣。这发端于一根对文字敏感的神经，兴趣由此而生。最大的陶醉，往往就是获得了自己得意的文字叙述，任何财富任何荣誉都无法比拟，更无法替代。这根对文字敏感的神经如不萎缩干枯，对文字表述的兴趣就不会衰竭，也就难以搁笔。

要把短篇写到非读不可

问：当您为《白鹿原》打上最后一个句号时，忍不住热泪盈眶，六年辛苦，作家所花的精力和代价，读者不难从字里行间感觉到。而现在一些作家四十三天可以完成一部长篇小说，您怎么看这个现象？

陈：每个作家的写作习惯差别迥然。单以写作时间长短或写作速度的快慢难以判断作品的成色。“慢工出细活”，多指技艺性劳动。创作活动中，慢工能出好活儿，也会出平庸活儿；快工出粗活儿，也出过不少绝活儿，这在中外文学史上不乏先例。关键在于，作家体验到了什么，或者说体验的深浅和独到性如何，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表述形式的完美程度。我只是特别关注一点，如果作家获得了深层的又是

独立独到的体验，弥足珍贵的又是难得的体验，当耐心细致打磨，不要因仓促而留下遗憾。

问：您写作是“精雕细刻”型的，还是“高产快手”型的？

陈：我可以找到更符合我也更恰当的比喻，我如果获得良种，就要寻找最适宜其生长的土地，尽我的务作能力，耙磨播种，除草施肥浇水，期待收获。我有慢的时候，像关中农民过去普遍使用现在还未绝迹的手推车，一步一哼地前行。也有快的时候，如同骑自行车，相对手推车就快得远了。然而没有飞行器速度，连汽车速度都达不到。

问：很长时间没再读到您新的小说了，为什么不写了？

陈：自二〇〇一年以来，写过大约十个短篇小说，可能没有进入你的阅读视野。我争取要把短篇小说写到让你感兴趣非读不可的水准。

问：如果要您给自己作个评语，您会怎么写？

陈：早已对自己有一个基本评判，只是不可告诉你。存在自己心里，踏实自信。洒出去就等于放了气了。

2006年4月30日 二府庄

答《南方周末》记者张英问

十三年前，《白鹿原》刚一发表就红极一时。获得茅盾文学奖以后，《白鹿原》累计销售超过一百三十万册。还成为教育部“高等学校中文系本科专业阅读书”当代文学唯一入选长篇小说。

今年，《白鹿原》突然又成了一个文化热点，各种形式的《白鹿原》纷纷面世：北京人艺的话剧；西安电影制片厂的电影；首都师大的音乐交响舞剧；北京一家公司与央视正在运作的电视剧。

话剧《白鹿原》首演次日，在人艺附近的一家酒店里，记者对看过话剧《白鹿原》的陈忠实进行了独家专访。

电视剧《白鹿原》还没拿到许可证

记者：《白鹿原》刚出版，就有影视公司要买改编权，但后来又传出《白鹿原》不能被改编的消息。时隔多年，《白鹿原》怎么就突然可以被改编成话剧、电影、电视剧了呢?

陈忠实：《白鹿原》刚出来的时候，有几位大导演都有把它改编成电影、电视剧的想法，后来我也是从媒体上看到不准改编《白鹿原》的消息。一九九八年《白鹿原》获茅盾文学奖之后，改编就不成问题了。我想，大概是一个作品从出来到大家接受，要有一个过程吧。

记者：将一部长篇小说改编成两小时的话剧，你有什么期待?

陈忠实：我把《白鹿原》话剧改编权给林兆华导演时，唯一关注的是话剧如何体现小说的基本精神。我相信林兆华导演，与他初次交流时，我已经感受到他对小说《白鹿原》的理解，产生了最踏实的信赖，所以连“体现原作精神”的话都省略不说了。

话剧有文字阅读无法代替的直接的情感冲击，然而这种“直接的情感冲击”，又与我写《白鹿原》小说的初衷完全一致，连我自己也觉得新奇又新鲜。

记者：新鲜在哪?

陈忠实：林兆华将《白鹿原》改成了独幕话剧，大幕拉开，一个背景，一群演员从头演到尾，让我感觉很新鲜，因为我以前看过的话剧都是多幕剧。

《白鹿原》这部小说人物众多，情节复杂，时间跨度也很长。两个半小时的话剧，把小说中的重要人物、重要事件都包容进去了，对敏感事件也没回避，在这点上，话剧《白鹿原》大大超出了我原来的估计。再者，话剧《白鹿原》能够以舞台艺术形式，把二十世纪前五十年中国乡村封闭的原生态表现得淋漓尽致，与原著的精神气质一脉相承；演员的表演也很生活化，对人物的心灵世界也有很好的揭示，做到了艺术与生活的和谐统一。

记者：你自己为什么不做编剧?

陈忠实：小说和电视剧、电影、话剧完全是不同的表达方式。《白鹿原》改编难度的确很大，首先是人物众多，一部电影至多两个多小时，但是小说要涉及上百个人物，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完全展现，是不可能的；其次，小说并没有一个连续的完整的故事，而电影

要求故事性强，这两方面都是改编最难的地方。改编成话剧、舞剧有同样的困难，我从未试探过话剧创作，舞剧更隔膜，现在学习也来不及了。我最想看到的是电视剧，只有电视剧能够不受时间限制，充分展开，拍他个四十集。北广集团很早就跟我表明了改编的意向，也一直在做这方面的工作，但不知什么原因一直到现在没拿到拍摄许可证。

为了茅盾文学奖，修订《白鹿原》?

记者：我十一年前采访你，你对自己的作品很自信，但对于社会是否接受心里没底。你怎么看待这部作品被接受的过程?

陈忠实：我写小说的基本目的，就是要争取与最广泛的读者交流和呼应。一个作家，具体到我本人，从写短篇小说、中篇小说到写长篇小说，与读者的交流和呼应的层面就会逐渐扩大。《白鹿原》发表后，读者的热情和呼应，远远超出我写作完成之时的期待。

十三年来，这部作品也带来了不少荣誉，获了几次文学奖。但真正能给作者长久安慰的还是书的畅销和常销。从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到现在，每年加印几万或十几万册，持续这么多年。算起来，《白鹿原》总共发行了一百三十多万册。暂且可以说，这部小说不是一个“过眼云烟”。我以为这是对我最好的回报和最高奖励，一个作家通过作品表达对历史或现实的体验和思考，得到读者的广泛认可，才可能引发那种呼应。

记者：为什么当时的茅盾文学奖是奖给《白鹿原》（修订本）的?后来你修改了哪些地方?

陈忠实：这些指责存在误传和误解。第四届茅盾文学奖评到最后，已经确定《白鹿原》获奖了。当时评委会负责人电话通知我的时候，随之问我："忠实，你愿不愿意对小说中的两个细节做修改？"这两个细节很具体，就是书里朱先生的两句话。一句是白鹿原上农民运动失败以后，国民党"还乡团"回来报复，惩罚农民运动的组织者和参与者，包括黑娃、小娥这些人，手段极其残酷。朱先生说了一句话："白鹿原这下成了鏊子了。"

另外一句话是朱先生在白鹿书院里说的。鹿兆鹏在他老师朱先生的书院里养伤，伤养好了，要走的时候，他有点调侃和试探他老师，因为当时的政局很复杂，他老师能把他保护下来养伤也是要冒风险的。鹿兆鹏在和朱先生闲聊时，问朱先生对国民党革命和共产党革命怎么看，朱先生就说了一句话："我看国民党革命是'天下为公'，共产党革命是'天下为共'，这个公和共没有本质区别啊，合起来就是天下为公共嘛。（'天下为公'是孙中山的话，是国民革命的宗旨和核心。）为什么国民党和共产党打得不可开交？"朱先生是一个儒家思想的人，他不介入党派斗争，也未必了解孙中山之后的国民党，他是站在旁观者的角度看的，说这样的话是切合他的性格的。那个细节我记得很清楚，就是朱先生说完之后，兆鹏没有说话，这个没有说话的潜台词就是不同意他老师的观点，但也不便于反驳，因为毕竟是他很尊敬的老师，但是也不是默许和认同的意思。后来我就接受意见修改这两个细节。

记者：修订本还没有出版就拿了奖，当时媒介对此有很多指责，说这是文学腐败，还说你为拿奖而妥协。

陈忠实：当时已经确定了获奖，投票已经结束了，当时这个负责人是商量的口吻，说你愿意修改就修改，我给你传达一下评委的意

见，如果你不同意修改也就过去了。我当时就表示，我可以修改这两个小细节，只要不是大的修改，这两个细节我可以调整一下。后来调整的结果是这两句话都仍然保存，在朱先生关于国共的议论之后，原来的细节是兆鹏没有说话，后来我让兆鹏说了几句话，表明了自己的观点，也不是很激烈的话。

我之所以愿意修改，是因为我能够理解评委会的担心。哪怕我只改了一句话，他们对上面也好交代，其实上面最后也未必看了这个所谓的修订本。

记者：十一年前，你对我说《白鹿原》是一部可以“垫在脑袋底下进棺材”的书。现在你还这样认为吗?

陈忠实：大概是一九八八年，我到长安县查县志和文史资料时，遇到一个搞文学的朋友，晚上和他一起喝酒。他问我：“以你在农村的生活经历，写一部长篇小说还不够吗？怎么还要下这么大功夫来收集材料，你究竟想干什么？”我当时喝了酒，性情有点控制不住。就对他说了一句：“我现在已经四十六岁了，我要写一本在我死的时候可以做枕头的小说。我写了一辈子小说，如果到死的时候才发现，自己没有一部能够陪葬的小说，那我在棺材里都躺不稳。”

这句话是我当时的创作心态的表述，所指完全是内向的，我不想在离开这个世界时留下空落和遗憾。可以说，这个期望应该实现了。

《白鹿原》之后的门槛

记者：十一年前，我采访你的时候，你当时说正在准备下一部长篇小说，已经准备了两年时间。为什么到现在这部长篇小说还没有出

版?

陈忠实：唉，这对我是个老问题了，这些年我走到哪里都有人问我，你不写是不是因为害怕超不过《白鹿原》，让读者失望？我一般都打个哈哈混过去。既然是你问我，我就告诉你，确实，《白鹿原》写完后，我一直想写长篇，但这个小说和《白鹿原》没有直接的联系。

《白鹿原》写的是二十世纪前五十年的事。《白鹿原》完成时，我心里很自然地有一种欲望，想把二十世纪后五十年的乡村生活也写一部长篇小说。但我这个人写长篇小说，必须有一种对生活的独立理解和体验，一种能让自己灵魂激荡不安的那种体验，才会有强烈的表达欲望。可惜，我至今未能获得那种感觉。因为缺失这种独特体验，我发现自己没有写长篇小说的激情和冲动。如果凭着浮光掠影或人云亦云的理解去硬写，肯定会使读者失望，也更挫伤自己。

于是我开始写散文和随笔，没想到竟陷进去了。这些年我一直都在写散文，而且一连出了几本散文集。二〇〇一年我恢复写小说，对写短篇小说兴趣陡增，这几年我已经写了十个短篇小说了。

对这个现象，我不知道评论家如何从理论上、心理上进行阐述。《白鹿原》获得了那么大的荣誉，按说我应该进入创作的兴奋期，结果却相反，我对小说的兴趣跌入了最冷淡的心理谷底，很长一段时间都回升不起来。

记者：具体来说，你的困难在哪里？

陈忠实：我面对的一个重要困难是，二十世纪的后五十年历史离我的生活非常近，非常熟悉，写来本应该更得心应手；但也正因为后

五十年我是亲身经历和参与的，所以很多政治、社会问题，我很难用理性思维来把握。

我在一九八〇年代中期准备写《白鹿原》时，对二十世纪前五十年的理解和把握，是非常自信的，所以写起来就很从容。现在我对二十世纪后五十年的理解，还达不到当年的那种自信。一直到现在，我对二十世纪后五十年历史的理解还在持续之中。

记者：你的压力是来自于自己，还是外界？比如发表之后可能有争议，或者不能被出版？

陈忠实：这个我没有考虑过，我想写就会写，即使不能出版也没有关系。

问题的关键在于，我要求自己理解历史，如果我想做出对整个历史的判断，我就要负责任。在这一点上，以前的教训太多了。

从实际操作上来讲，我不能让我对历史的理解直接进入作品中，我必须将其转化成一种体验。我写作的时候，特别注重自己的体验和感受。这些年里，一想到《白鹿原》，我就不由自主地陷入了对后五十年这段历史的“回嚼”。

记者：也就是说，写下一部长篇小说，还有些“关口”要过？

陈忠实：对后五十年的历史，我还没有能够形成独到见解，并把这种见解转化为个体体验。

打个比方，矿石大家都有，谁都能把它冶炼成钢。但你炼的是粗钢还是精钢，这要看谁的思想深刻，谁的能力强，谁的冶炼容器大。小冶炼炉只能炼出粗钢，大的、现代化的冶炼炉就能够炼出精钢。

我现在需要做的，就是找到大的容器。一个作家对创作形成有自信的理解，要花很长时间，这个过程我现在还没有完成。这些年里，我的压力和痛苦不是来自于外界，而是来自于自己。

记者：说到痛苦，你痛苦在哪里呢?

陈忠实：陕西这个地方的文化氛围比一些商业城市要浓厚一些，但它现在也附着了商业社会的因素，贴着文化标签的商业行为的干扰也很厉害。身为作协主席，我现在受这方面的影响很大，各种复杂的人际关系浪费了我很多精力。

记者：你现在也开始卖字（书法）了?

陈忠实：写字完全是好玩，到各种场合参加社会活动，有时候人家就要我写字，没办法。

记者：你的下一部长篇小说迟迟难以动手，如何对自己交代?

陈忠实：我有时候就对自己说，中国现在不缺长篇啊，现在一年有一千部长篇小说出版，我会写的，我现在还处在准备过程中……我就这样宽慰自己。

2006年7月13日 二府庄

和《瞭望东方周刊》记者的对话

听陈忠实说话，就知道他是西北汉子。他不会客套，几乎不用形容词，说话简单直白。偶然一两句的玩笑话，也会逗乐在座的所有人。

在说到一些地方官商勾结掠夺式开发资源时，他冒出一句：钱都让能人拿走了，把烂摊子留给放羊的。

他过去喜欢抽巴山雪茄，现在这种雪茄停产了，他就改抽安徽产的另外一个牌子。别人送他一盒古巴雪茄，他点了一支，抱怨说：这个“抽不动”。

他似乎是个能够享受沉默的人。一起吃饭的时候，他很少主动挑起话题。别人高谈阔论的时候，他就用手在桌布上画字。

西安美院旁边一个叫作荞麦园的风味餐馆是陈忠实时常坐坐的地方。那里的陕北琴师把陈忠实编进了说唱大鼓里：写书的吃了烩麻什，将来赛过陈忠实，画画的吃了香酥鸡，以后就超过刘文西……陈忠实听了，刀削斧刻般棱角分明的脸上闪过憨厚的一笑。

五月三十一日，人艺版的话剧《白鹿原》终于在北京拉开大幕。演出持续到七月初，但这一名著的电影和电视剧还迟迟不见动静。

在上海华山路《瞭望东方周刊》编辑部里，抽空来做客的陈忠实提起了当天碰到谢晋的情景。谢晋对他说：老陈，当初要是你把《白

鹿原》给我，电影早都出来了，可你非要给吴天明。说这话的时候，陈忠实一脸平静。

临别的时候，我们希望他说一句体现生活感悟的留言。陈忠实一边走一边说：馍蒸到一半最害怕啥？最害怕揭锅盖。锅盖一揭，气就放了，馍就夹生了。

唯一觉得踏实的是整个过程没有炒作

据记载，白鹿原在周代时就有了。小说《白鹿原》给真实的白鹿原带来的好处，是让一个古老的、在人家记忆中消亡了很多年的名字复活了。现在到白鹿原旅游的人也多了，还有人抢注白鹿原商标。南方有个省注册了一个野菜，也叫白鹿原。

这本书，我唯一自信的、心里觉得踏实的，是整个过程没有炒作。我记得一个细节，当时我们灞桥区只有一个复印机。我小说写出来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叫一个朋友假公济私，帮忙给我复印。他复印了半部分，后半部分是雁塔区政府一个朋友帮忙的。为什么要复印，因为过几天编辑要把书稿拿走，万一弄丢了，我就不得活了。

当时陕西几个评论家知道我写完了，都很关注，把书稿传得一两个月还传不回来。最后我找到刘建军家里，很奇怪，床头摆了一部分，卫生间也摆了一部分。刘教授很过意不去，说不怕难为情，连上卫生间都要看。

《白鹿原》后，我对写长篇小说的欲望和兴趣一下子降下来了，再提升不起来了。这个现象我都没办法解释。现在就是写点有兴趣的文章，写序成了一个很大的压力。

作家把握的是一个时代人的精神心理，普遍的一种社会精神心理。我有一个观点，作家不应该淡泊名利，而应该创造更大的利润和影响。但这有一个前提，是以正常的创作途径，而不应该用一些非文学手段来获得文学的名利。

人们现在厌恶的是，文学力量不足而自我炒作有余，用非文学的手段去制造名气。任何非文学的手段，达到的名和利的收益永远不能获得文学真正的成就。包括有些自露隐私的极端的方式炒作，刚兴起的时候，的确达到了一定的目的，但现在留给大家的，显然负面的比正面的要多得多。

文学始终在边缘

文学本身不存在边缘与不边缘的问题。任何一个时代，任何一个国家，文学都不可能成为整个社会的中心话题。实际上，文学始终都应当在边缘上。一个合理的社会结构，首先是政治，其次是工商业的发展。这些始终是一个国家最主要的东西，是一个国家占统治地位的、永远都不会转变的话题。文学欣赏都是附属于这个而存在的，是皮和毛。

我不能忘记，三年困难时期，人连饭都吃不上，谁还有心思读小说呀。所以文学，你就不要想占据国家的中心位置。作为作家，也应该关注国家经济的发展。当官的可以不喜欢文学，但他应该了解文学。比如咱们不搞科研，但咱们对“神六”上天还要了解一下基本常识。

商业化写作也不是中国独有。美国虽然没有多少历史传统文化，但出了一批有世界影响的大作家，也有一批纯粹是商业利益的写作通

俗作品的作家，是给社会上爱看热闹的人写的，纯粹是情趣性的猎奇性的。你上火车时，火车站口搁一堆书，两三美元一本，上火车后就可以消磨时间，看完就扔到垃圾桶里了。有些人对文学虽然没有啥兴趣，上火车时没事干，是纯粹的阅读消遣。

这样的作品，生产很快，包装很简单，产品对社会也没有啥伤害。不是所有人都想当作家，不是所有人都想进行高雅文学欣赏。金庸的小说为什么有那么多的读者，我是很钦佩的。

现在各个行业都有大批的文学爱好者，政界、商界、农民，这也是个正常现象，是一个社会的文化精神。也不是所有出格的事情都可以单纯地归结为炒作。有一天我去机场，在报纸上看到有个女孩二十万元叫卖书稿，当时觉得是炒作没在意。出差回来后，我从媒体进一步的报道看这个娃的情况，她得了绝症。后来记者和我联系，说作者想和我见一下，我说可以，如果书写得基本还好，就是稍微差一些，咱也尽量帮忙。见面后我就给太白文艺出版社说明情况。后来作品就出版了，叫《午夜天使》。

小说家实际上是从心理层面来写历史

历史常常是突变演进的。它有一段是处于一种平稳发展的时期，有时就是处于突变的关键时刻。譬如说中国历史中帝制的被打碎，共和兴起，这种突变我们把它叫作“历史性”的变化。

辛亥革命带来了很多变化，比如从表层的象征性意义上把代表封建帝制的辫子剪掉，女人缠了千年的小脚要解放，不准裹脚了，婚姻不能包办了。那么作家要研究的是，这个辫子被剪掉对中国人意味着什么？对一个人意味着什么？女人的脚放开以后，对女人意味着什

么？一般来说那是一个大政治观念的更新。作家要研究的关注的是，留辫子的观念和剪辫子的观念，这个变化对人的心理会发生怎样的秩序颠覆？

鲁迅先生在他的短篇小说《风波》中，就把这个深刻的见解留下了历史的一笔：一个人跑到城里被人把辫子剪掉了，回到家就惶惶不可终日。老婆说：你看你没辫子还像个人不？明天怎么出门呢？那个辫子，在我们今天看来无法理解——没有辫子就不是一个人了？这就是历史裂变在人心理层面的投影，是作家应该关注的东西。

辫子有没有都危及不了生命，辫子是旧的观念所影响下的长期稳定的心理结构的象征。人的心理是以他的精神道德的那些准则织成的一个稳定的结构，这个心理结构就平衡在那个辫子上头。有辫子是人，没有辫子是鬼。有这个辫子心理就平衡着，剪掉这个辫子就把心理秩序打乱了。心理结构打乱了颠覆了，就出现惶恐不安甚至自杀，所以更深层的东西是心理秩序。接受了新的观念，就会形成一种新的心理秩序的平衡。比如女人这个脚，以前女人都要缠脚，大脚就是最丑的女人，嫁不出去。现在小脚是被整个世界嘲笑的丑陋东西。中国人的心理早已经都平衡在"大脚是美"这个观念上了。

小说家实际上是从心理层面来写历史和现实生活。作家要把握的是一个时代人的精神心理，普遍的一种社会心理。我觉得巴金的《家》伟大之处也在这里。人们经常形容一部作品像史诗。史诗不单是写了重要的历史事件，更重要的是反映了重要的社会心理变化。

作家不是培养出来的

我们设想和创办的白鹿书院，借用了小说《白鹿原》里虚拟的那个书院的名字。书院主要搞文化交流和学术讨论。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有很多优秀的东西。我觉得，我们今天已经到了可以冷静地、客观地对待这个民族一脉传承下来的东西的时候。开掘民族文化中优秀的东西，重新回首来看传统文化，关于人道人文人性，包括做人的一些精神品质方面，这些东西当然应该继承。

我们国家引进和建立现代教育之前，传统教育最高的形式就是书院。书院培养出了好多思想家、政治家，也出了一批人文专家。成立这个书院，一个是寻找中国传统文化和现代文化的契合点；另一个就是，搞一些文学交流活动，搞文学创作和研究，包括对一个具体作家和一种文学现象的研究，尤其是促进青年作家创作的发展，甚至包括图书出版。

白鹿书院对正常的教学来说是一个补充。我当了十几年作协主席，从来不用也不敢用一个词：培养。作家不是培养出来的，白鹿书院只是提供一种服务和环境，促进他们创作发展。如果能培养作家，我为啥不把我儿子培养成一个作家。我三个娃没有一个搞创作的。谁都不具备把一个人培养成一个作家的能力。

陕西青年作家的发展，是我多年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现在陕西四十岁以下的作家，连续出版几部长篇小说的，有几十个人，但几乎没有一部小说在全国打响的。应该说这不是文化素养的问题。现在的年轻作家普遍都接受过大学教育。我们这一代人，学历最高的是贾平凹和路遥，我和京夫、邹志安都是高中毕业。创作发展一时上不去，不能怨天尤人。文学创作的神秘性可能就在这里。

文学创作是个体劳动，有影响力，但又几乎没有直接的传承性。作家的成长和作品的诞生是个自然的过程。你既难揠苗助长，也不能靠炒作去催发。我们能做的是，按文学规律来促进青年作家的发展，促进优秀的文学作品的产生，做一些有益的事情。

新农村不能离开现实而空想

我当过官，当过最低层一级政府的小官，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称作公社（现在的乡镇）的副主任、副书记，前后干了有十年。后来有三四年在区上的文化局当过副局长，这都是实际工作。我对中国农村的了解和体验，对那个时代农民生存形态的了解，就是这二十年印象最深刻（此前在乡村中小学六年），那不同于作家兼职体验生活。

很实际地说，解放前的农村我不太了解，但现在的农村起码是解放后最好的发展状态。农民能够吃饱穿暖，普遍盖起了新房子。远的不说，自解放以来，一直没能完全解决农民吃饭穿衣的问题，饥饿这个阴影始终没有从中国农民心里解除过。土地下户以后，一年就把吃饭问题解决了。这个事情说来是很神奇了。

我们现在说农村的差距是相对城市而言，我们的农业人口基数和少得可怜的土地决定了这种现实。我现在想，任何国家都很难有什么好办法能很快解决这个差距，这不是哪个领导人的能力，而是我们的现实，需要一个较为漫长的过程和持续的努力才能改变的。

农村的发展前景我不敢说，我也没法想象。离开农业人口多和土地越来越少这个现实，光凭想象有什么意思？现实就在那里，怎么能假如它不存在呢？空想是没有任何实用意义的。我充分意识到，城市

化过程中乡村人口削减，城市人口增加，还有商业快速发展给农村人口提供就业机会，当是希望所在。这不会是简单的过程，不可能快。

我唯一能够期待的就是，把进城打工的农民纳入行政的法制化管理。已经打了工的工钱，一定要保证给到农民手里头。现在不给农民工工钱的黑心老板连周扒皮都不如。这一点政府应该做到，把它纳入法制化、规范化的管理。如果政府连这一点都做不到，那么就是对农民最基本的权利的不负责任。

交朋友，不交铁哥

我多年来过年基本不出门。节假期间看哪天家里没人来，就到原上看老舅，只走这一门亲戚。大年三十下午，肯定要回一趟老家。我哥还在老家住。我的一院房常年锁着门。大年三十下午回去把院子清扫一下，按我们的传统风俗，放一长串炮，用炮声把在这个房子生活过的列祖列宗的灵魂招回来，昭示他们过年了，你们回家吧。

过年最愉快的是三十晚上，在西安的家里，全家人都聚到一块，说说话。孙子放炮我也跟着，很愉快的感觉。前几年还自己写写对联，给农村老家的大门上贴，后来有一年三十下午贴好，大年初一早上就给人揭跑了。揭得还很完整。邻居说可能三十下午贴的糨糊还没干，就被谁给揭了。后来这几年都是我哥给我写，没人揭了。

我不会上网。手机会用来收短信，但自己不会发。

我有好多朋友，却没有铁哥，也不要铁哥。我的理解里，铁哥往往都带有某些狭隘利益搅和在一块。大家都是朋友，接触多点或少点

没有关系。朋友怎么亲近都可以，但亲近不是铁哥。“铁哥”在我的印象里，是不管坏事好事都兜上揽上，这个有损于朋友的含义。

我的朋友其实很少有我这种性格，我交了各种性格的人。我交友不选择性格。爱说还是不爱说，严谨或者开朗，我不选择这些。一个最基本的契合点是诚实。不管思想观点艺术见解差异多大，都可以交流。接受不了不要紧，这个东西不可能一致的，但可以互相倾听，互相了解。作为朋友，一个最基本的东西是信赖，是真诚。

譬如说已经去世的西北大学老师蒙万夫，就是我非常敬重的一个朋友。在我的创作发展历程中，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他就比较关注，常给我一些理解文学和创作的有益的启示。我们从没有在一块为了某种利益，要去设计一个什么，达到一个什么，我们的友谊完全限定在对于创作的理解上。

2006年7月16日 雍村

我相信文学依然神圣

——答《延安文学》特约编辑周瑄璞问

在我看来，陕西男性作家——尤其是优秀的几位——假如要从他们身上找一个共同点的话，他们的形象、气质总体可概括为介于欧洲绅士与关中农民之间。陈忠实是个最典型的代表。

《白鹿原》问世十多年来，保持着持续不断的销售和话题，印数累计一百三十多万册，各种评论文章已无法统计。话剧《白鹿原》的上演，更是掀起一个新的《白鹿原》热。而这十多年来，作家陈忠实不断地出现在人们期待的目光里。他对于大众，对于文学爱好者、研究者，是熟悉的还是陌生的？他是被人们神化了的偶像，还是一个平凡的人？在重重光环的映照下，在文学的身份变得边缘、模糊的当今，他在思索着什么？他的欣慰和烦恼是什么？他的内心世界是怎样的斑斓姿彩？让我们一起和他对话吧。

周瑄璞（以下简称周）：《白鹿原》相对于您此前的作品，在文学观念上，思想深度上，代表了哪一个层面？是否认为《白鹿原》达到了臻美的境界？

陈忠实（以下简称陈）：《白鹿原》是我小说创作又一次突破的作品。每个作家的创作历程，都在寻求突破和实现突破。每一次突破，既意味着一种新的艺术表述形式的呈现，也意味着对生活体验的深化和独立发现。我自发表小说直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的较长时段里，小说创作可以说是与生活发展同步，都是对眼下发生着的生活现象做出回响式的反应，现在我可以在那些小说的阅读里，回忆新时期

以来疾骤变化的重要的社会事件。到一九八二年秋天，我写出中篇小说《康家小院》，应该是对之前的那种同步感应式写作的一次突破。从这个中篇起始，我探索人的情感世界的复杂性，探索我所熟悉的地域原生形态的生活意蕴，包括贫穷和落后里潜存的诗意和人性美，争取展现生活的厚度和深度，把此前作品里较为直白显露的意指化为一种情感体验。这种探索持续了五六年，直到《白》的创作意图的萌发，应该是我对生活的理解和体验又进入一个新的层面，有了自以为颇为新鲜甚至惊讶的发现，实现新的表现欲望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强烈。当然有艺术形式的探索，也不再满足此前中短篇小说的表述形式，包括语言，都必须寻找到能够负载已经意识到的生活内容的新的艺术形式。应该说，《白》是我小说创作截至九十年代初的探索结果，是从七十年代不断学习不断探索不断突破所实现的一次长篇创作。

我无论如何也还不至于愚蠢到或利令智昏到会以为它“臻美”。尽管读者和评论界给予了巨大的关爱和评价，我仍然清醒地思考那些批评性的文字。

周：目前，中国当代文学面临的整体性问题是什么？外界对陕西文学界有一些相当尖锐的批评，比如说他们对当今时代的审美、观念上的落伍。总体来说还是在写农村。您对此怎么认为?

陈：中国当代文学呈现着前无古人的繁荣景象，年均出版八百到一千部长篇小说的数量，已持续多年，应该是世所罕见的繁荣局面。对于小说创作尤其是长篇创作的神秘感，是一个彻底的颠覆。我说不准“面临的整体性问题”，这是一个太大的问题。我向你和大家推荐《光明日报》7月5日头版头条发表的雷达的文章《当前文学创作症候分析》。这篇论文对当代文学创作尤其是长篇小说创作的见解，在我

感觉是切中症候的，是高屋建瓴的灼见，甚至有振聋发聩的力度。我自觉没有这样深刻透彻的见解，所以建议你读雷达文章以作参考。

你说到“外界对陕西文学界有相当尖锐的批评”，我把握不准批评“尖锐”到怎样的火色，也不知道“尖锐批评”的内容指向，仅依你列举的“时代审美、观念上的落伍”，我也很难判断。就我阅读本省一些颇具代表性作家作品的印象，他们一个和另一个的审美倾向、对生活审视和体验里所呈现的观念和意识，差别很大，谁也不类同于谁。他们本身就不存在一个共同的“审美”和“观念”，更无从谈论其前沿或滞后了。你归结到“总体来说还是在写农村”，问题所指就比较具体也比较明晰了，我可以说话了。

我以为一部优秀的作品，既在于他写了什么题材，更在于他对这类题材写出了什么新的前所未见的内涵。谁恐怕也不会简单到认为“还在写农村”就“落伍”，写城市生活就一定前卫。二战过去六十年了，世界上创作出版了多少反映二战的小说，拍摄了多少电影，现在仍然有新的长篇中篇小说在出版。已经成为了过去的旧题材，却在新的思想视点透视里折射出令人震惊的力量，让人类重新理解更深刻反思曾经发生过的重大历史事件，依然被那些对生活自觉承担着责任的作家艺术家开创着。中国一直是一个乡村社会。历经大小十三个王朝国都的西安，到解放前夕不过是一个集中着较多人口稍大点的村镇。尚不足三十年之前，我工作的西安东郊的生产队的马车长驱扬鞭，骄傲地碾过坑坑洼洼的东西大街的街道，响鞭在残破剥落的钟楼金顶上回响。五十年前我在西安东关读初中，学校后院居然有狼出现，吓得同学晚上不敢上厕所。西安的现代化外景，不过是最近二十年才形成的这般壮丽模样，对这个已进入现代文明节奏和新潮情感的城市，作家们当会有强烈而又新鲜的体验，形成自己的小说。但不要排斥写乡村题

材。中国乡村一直负载着这个民族精神和心理上最辉煌和最痛苦的记忆，直到今天，仍是生活发展中引发疼痛的敏感点之一。我只是期待有独到体验的作品，也相信那种负载着民族精神和心路历程的作品，肯定会被当代或后来的作家创造出来。

周：请说一下陕西文学在全国文坛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在西部处于什么样的位置？和全国其他省比较怎样？它还是中国的文学重镇吗？

陈：陕西是一个文学重镇，主要指当代文学。新文学和现代文学的开创者奠基者和卓有建树者，多为南方人，我们常说的最具代表性的“鲁、郭、茅、巴、老、曹”，其中仅老舍一位是北方人。陕西在现代文学史上最具影响的一位作家是郑伯奇先生，长安区人。当代文学我说陕西是一个重镇，有两条因素，首先，有一个对当代文学做出重要著述的作家群。“文革”前的十七年和“文革”后的新时期，陕西都形成了在全国有广泛影响的作家群体，恕我不一一列举，那将是很长的一串名字。再者，这些作家现在仍然被读者和评论家频频论说，稍微了解陕西文学的人都很清楚。他们作品的影响，不仅跨越省界，有的被译介到国外。另一条因素，是产生过一个时期最具思想深度和艺术魅力的作品。这样的作品可以当作一个时期当代文学的标志性成就，譬如《创业史》在十七年农村题材的诸多小说里，应该是至今依然被公认的一部。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在许多写解放战争题材的小说中，也是这样品格的作品之一。路遥的《人生》和《平凡的世界》，贾平凹的《浮躁》和获得南北评论界广泛好评的《秦腔》，都是新时期文学最重要的作品。作为一个省的文学，能拥有这样令人注目的作家群体和广泛获得好评的作品，就应该构成一个文学重镇。现在的状况，似乎没有太大的变化，新时期跃出的这个作家群体，还活跃在文

坛上，尽管路遥、邹志安等几员大将早逝，但五十岁左右的一拨作家的势头依旧强劲。我近年比较关切的是四十岁这个年龄档上的青年作家，人数很多作品也很多，在省内文坛形成了影响，在全国文坛声音微弱。期待他们的声响早一年影响到中国文坛去，以自己独特的声音。

我向来不与其他省市做比较，更不做排列名次的愚蠢事。一个省的GDP是可以排列的，文学是难以如此排位的，至今尚未见到任何一位高人对中国当代文学排出各地域的名次来。我倒是想强调一点，可以称得文学重镇的省有许多，绝不止陕西一家。我们不能把自己囚在潼关以内自吹自擂自我欣赏，更不可自己给自己排座次，文坛毕竟不是水泊梁山。自信是进行艺术创造最可靠的精神品格和心理素质，而自吹"自排"却滑到不健全的心理形态去了。

周：很多人对您文学的师承很感兴趣，拉美文学、俄罗斯文学、欧洲文学中，您受哪一块文学的影响更深呢？有没有具体到哪一位或哪几位作家？

陈：我崇拜的第一位中国作家是赵树理。我在初中二年级的语文课上知道了赵树理，并到学校图书馆借阅了已出版的赵树理的几本书，这是我有生之年第一次借阅文学书籍。两年后《创业史》在《延河》连载发表的时候，我崇拜的第二位中国作家柳青，一直延续到今天，仍是崇拜和敬重。崇拜一个作家，主要是接受其作品的熏染和影响，还有对他的精神人格的仰慕和尊敬。我接受翻译文本的影响也比较早，在爱上文学的同时（即初中二年级），借着暑假阅读了《静静的顿河》，这是我读的第一本外国小说。当时给农业合作社的牲畜割草挣工分，坐在村子背后的山坡上，常常把脚下的灞河川道想象成顿河草原。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到八十年代中期，我持续阅读苏联作家

的作品，高尔基不用说了，肖洛霍夫的长篇和短篇我几乎全部读了，还有柯切托夫写苏联五十年代以后的七八部长篇。再如瓦西里耶夫、艾特玛托夫、拉斯普京、沃罗宁等名家的作品，凡翻译过来的都读了。也读过包括海明威、杰克·伦敦等美国作家的作品。还有捷克作家昆德拉的全部翻译小说。到八十年代中期，读过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之后，我又读了拉美几个国家几位代表性作家的代表作，我还是以为《百》是最耐得阅读的史诗。所有这些我曾经喜欢的作品，都对我的写作产生过影响，很难分清谁更深谁次深或谁重谁轻了。这些作品不仅提升我的写作能力，更重要的是扩展我的艺术视野，也扩展我看取生活和社会的视角。我曾在前年末写过一篇较长的这方面内容的文章，《借助巨人的肩膀——翻译小说阅读记忆》，获得《长江文艺》年度奖。

周：您爱不爱诗歌？您和诗歌的关系怎样？对当代中国诗歌有了解吗？

陈：我在爱上文学的初中二年级就开始写诗。我一直写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不断向报纸副刊投稿诗歌和散文。《西安晚报》一位副刊编辑对我谈话，让我往后以散文写作为主，先行突破，再触类旁通。他直言不讳地告诉我，诗歌写得不如散文。我后来就侧重写散文和小说了，仍然忍不住时常会写点诗歌，却不敢投稿。当我的短篇小说引起关注（七十年代中期）以后，基本不再写诗歌了。直到九十年代以后，偶尔写点古体诗或词，却因平仄的难以把握而受制。

我对新诗比较隔膜，很少读，对诗歌的现状和态势一片茫然。

周：我们发现，在陕西男性作家中，作家本人和男主人公的身上，儒家文化的痕迹非常多，表现为牺牲、退让、顾全大局，甚至他

们处处在维护这种观念。您是不是这样的呢？用现代眼光来看，他们的软弱和胆怯将会何去何从？

陈：我还真没有注意更没有研究陕西作家儒家文化痕迹多了还是少了的事。如果你的这个“发现”能够成立，那么如你列举的“牺牲、退让、顾全大局”这些观念，有什么可指责的呢？一个人（包括作品中的人物）对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命运负载使命和责任，乃至牺牲自己的生命，顾全大局而不计较个人得失，在个人利益上退让，这是儒家精神，既是这个民族千古以来推崇的高尚人格，也是世界上几乎所有民族都崇敬且延续着的精神和美德。各个民族都出现过这种精神品质的不朽典型。我崇敬这样的精神，但我仅仅是一个普通人。一个普通人也不应丧失这种人类共同的道德操守。

你用“现代眼光”一看，怎么把儒家文化一下子就归入“软弱和胆怯”的范畴了。“软弱”和“胆怯”不是儒家文化，而是儒家文化所摒弃的不齿的秕谷。无须动用现代眼光，这个民族从来也没有推崇过“软弱胆怯”作为子孙的心理建构，也没有听说世界上哪个民族和国家把“软弱胆怯”作为民族精神去推广。

周：有研究者发现，陕西主要的男性作家作品中被肯定的女性形象多为勤俭克己、泥土式的人物，这是不是中国农耕文明对你们造成了这种根深蒂固的影响，你们对女性的价值取向不自觉地形成了，女人是男人的泥土。如您的《白鹿原》中着墨不多的白嘉轩的姐姐、朱先生的妻子，但您对她进行了完全的肯定与礼赞。请您说一下在您心目中她与小娥的区别，她们代表着你们男性作家心目中怎样的女性评价？

陈：我同样没有注意研究陕西男性作家笔下的女性形象的共性，更不敢妄论是否“多为勤俭克己、泥土式的人物”，亦不知“女人是男人的泥土”这样“价值取向”是从哪儿归结得来的。你既然以《白鹿原》里朱先生的妻子朱白氏为例，那么我就只能作自我阐释，不敢妄论别的作家和作品，是否如你所说的那种印象。

首先得把我和朱白氏暂且分开说。我写的朱白氏是一位贤妻良母，是我塑造的那个时代中国人道德规范里理想的一位女性。还用我啰唆她与小娥在我心目中的区别吗？我只想告诉你写作这两个人物时的不同感受，写到朱白氏时几乎是水到渠成十分自然，几乎不太费多少思索就把握住这个人的心理气象和言语举止，因为太熟悉了。而投入到小娥身上的思索，不仅在这本书的女性中最多，也不少于笔墨更多的另几位男性人物。我写到小娥被公公鹿三捅死，回过头来叫出一声“大呀”的时候，我自己手抖眼黑难以继续，便坐下来抽烟许久，随手在一张白纸上写下“生的痛苦活的痛苦死的痛苦”，然后才继续写下去。我在朱白氏和小娥身上投注的笔墨有何“区别”，还用得着我说出ABC等条文吗？不仅这两个人物，还有白灵，还有被封建道德封建婚姻长期残害致为“淫疯”的冷先生女儿。我写了那个时代乡村社会不同家庭不同境遇下的几种女性形象，我自觉作者投入情感最重的两个女性是田小娥和白灵。前者是以最基本的人性或者说人的本能去实现反叛，注定了她的悲剧结局的必然性，想想近两千年的封建道德之桎梏下，有多少本能的反叛者，却不见一个成功者。活着的小娥反叛失败，死了的小娥以鬼魂附体再行倾诉和反抗，直到被象征封建道德的六棱塔镇压到地下，我仍然让她在冰封的冬天化蛾化蝶，向白鹿原上的宗法道德示威……你竟然不体察我的良苦用心。白灵是以一个觉醒了的新女性反抗白鹿原沉重的封建意识的人物，她不仅决然弃除包办婚姻，实行自身的婚姻解放，更着意在她对白鹿原和整个中国旧制度

的反叛，争取国家和民族的解放。我对这位女性投注的笔墨里的情感是最热烈的，区别于对所有人物的文字色彩。这除了纯粹的作品人物个性气质对作家文字的制约之外，难道没有作家的感情倾向吗?

然而，你偏偏看重的是我对朱白氏的笔墨，而且由此结论出我和“陕西男性作家作品中被肯定的女性形象多为勤俭克己、泥土式的人物”。看来你的敏感点，只局限在你比较热心关注的既定成见上。

周：我一直在关注一个问题，当代文坛，一说女性写作，写情感，写个人——当然，我这里说的是优秀的作品，不代表泛滥成灾的速成之作——那必然是轻的，是浅的，是不厚重的，是轻飘的，是不可以堂而皇之地拿奖的。还有人将她们归为女性写作。为什么没有相对的男性写作呢？这个局面的造成我认为有两个：一是长期男权社会形成的观念，女性是附庸是陪衬，即使她们写的是人类共有的、需要男女双方来完成的情爱、结合、人类的繁衍，它还是轻的。二是我们国家长期贫穷落后，我们的人民、每个个人的奋斗目标是解决温饱，是出人头地和光宗耀祖，是致富奔小康，总之我们的情感是公共的，大众的，我们的文学也理所应当地担起这样的责任。在这样两个原因形成的大环境下，女性写作似乎有饱暖思淫欲之嫌。您对这个问题怎样看待呢？请您评价一下陕西文坛女作家。

陈：我首先坦白，在我此前的文章或集会发言中，几乎从来不使用“女性写作”这个词汇。在我的意识里，向来是以作品的阅读感受说话的，不是太在意作者的性别。作为一个读者，我阅读的基本目的是欣赏作品，期待获得新的超出我的理念的关于社会人生的体验，以及独到的新颖而又智慧的叙述艺术，以开阔自己的视野，启迪自己对生活更深一层的理解，扩展艺术表现的境界。这种阅读目的不会因为男作家或女作家而发生区别。

我感到当代文坛没有性别歧视。中国当代文坛活跃着一批女作家，她们的精彩之作时时在文坛引发波澜，对新时期文学做出了谁也不敢轻视的贡献，每一届茅盾文学奖和鲁迅文学奖，都有数量可观的女作家的作品获奖。张洁两次获得茅盾文学奖，不仅在女作家，而是在当代所有作家中绝无仅有。如你所说的写情感写个人“那必然是轻的，是浅的，是不厚重的，是轻飘的，是不可以堂而皇之地拿奖的”现象，我不敢断定绝对不存在，但确实没有太深的印象。应该说，作品都是写人的情感的，不写情感的人物，能算小说吗？我想你说的侧重点，可能主要指人物的男女恋情。这不仅女作家写，男作家也多有人写，都在探索人的情感世界的复杂性和丰富性；国内作家无论男女都有成功之作，翻译作品也不乏产生巨大影响的作品。二〇〇四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是奥地利女作家耶利内克，她的小说《钢琴教师》被认为“以一种非凡的语言炽热，揭露了社会成规的荒谬及其使人就范的力量”。我读这部小说时很久难以理解，直到三分之二后才感到一种深度的震惊，也才惊讶耶利内克的敏感和透视人的情感的锋利，以及她所抵达的层面，也就感到了自己的浮泛。由此可以说，无论写社会结构中哪个位置上的男人或女人，负有重大使命的以革命为职业的大官或村官，囚于四堵墙里的大专院校中小学各类知识分子，演艺界的明星或要地摊卖唱的艺人，都要集中于他们的情感世界，这是任何一个男性作家和女性作家都不会含糊的，问题的致命之点在于，某部作品对人的情感写出了什么，这才是决定作品分量和品相的关键。这里根本不存在因为写感情就“必然是轻的浅的”的偏见，这种常识性的低级偏见存在的可能性很少很小。

你由此而归结的两个原因我也难以苟同。男权社会这个话题太大也太老，我在这里很难说得充分。我只想提醒你，别的国家我不敢贸说，中国无论南北或东西，倒是弥漫着“妻管严”的社会习性，且已有

年。从中央到乡镇的各级领导班子，都配备一名女性，但仍然是男性占绝对多数。世界各国的政要，也是男性居绝对多数，尽管近年间有几位女性跃上几个国家的最高权力位置，还是改变不了男性的绝对多数。我觉得这主要是男人和女人生理差异形成的局面。再说是否定性为男权社会，既要看男人统领国家还是女人当总统，更要看这些领导者对待男人和女人的态度是否平等，这才是实质。我以为共和国成立以来，政治路线上出现过极左，经济方针上发生过重大失误，知识分子政策上也出过问题，只有男女平等的国策和人权一直稳定而没有反复，甚至有人咏叹“妻管严”了（玩笑）。怎么会由此而引申到对女性作家是“附庸和陪衬”呢！

你说的第二个原因，我以为更离谱了。我的理解是，作家经历着社会生活的演变，体验着各种人在这种演变过程中的精神蜕变。作家自己在经历社会裂变的过程中，也经受自身理论和情感变化中的欢乐和痛苦，才会产生以创作来表述这些体验的欲望。中国人的奋斗目标是“解决温饱”，“是出人头地光宗耀祖，是致富奔小康”，那么世界上哪个民族不是如此呢？无非是一些发达国家早过中国人百十年，度过了温饱小康阶段而进入富裕社会罢了。耶利内克为什么不在意享受富裕的生活，而要把巨大痛苦的精神黑洞揭示给当代人呢？中国人刚得温饱刚见富裕（一部分人），怎么会以为女性写作是“饱暖思淫欲”呢？我的理解是，如上所述，作家创作的欲望产生自对社会的体验和个人经历的体验，基本与个人物质的多寡关系不大。

陕西女作家的创作成就是显著而耀眼的。

“文革”前十七年，贺抒玉的小说和散文在全国有很好的影响。新时期以来的女作家人数成十倍扩大了，李天芳的小说创作和散文创作很有成就，产生过广泛的影响。早逝的李佩芝的散文不同凡响，在全

国赫然有名。叶广芩和冷梦都获得了鲁迅文学奖。这个奖项设立以来的几届评奖，陕西有四位作家荣列其中，男女作家各占半壁。更年轻的女性作家，远比十七年和新时期之初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队列壮观得多了，刘亚丽的诗歌，张虹的小说和散文，惠慧的几部长篇小说，都在全国产生了重要影响。还有如夏坚德、毛安秦等人的散文，数量虽不太大，都很富个性。近年来，又涌现出几位不上四十岁的青年女作家，王晓云、唐卡、辛娟，还有你周瑄璞，等等。我关注这一茬女作家，不是性别的劣势或优势，而是从四十岁以下陕西青年作家群体的发展和建树来考虑的。我期待在三十岁左右的年轻作家里，跃出如路遥、贾平凹、杨争光、叶广芩等震响当代文坛的新人来。路遥的《人生》发表时不过三十三岁，平凹叫响文坛比路遥还年轻。现在这一茬三十多岁的女性作家，比新时期我这一茬更具优势，不单是社会环境物质生活都好得远了，更在于知识装备更雄厚，读书面很宽，信息量大而又敏锐。你们已经有相当数量的作品出版，业已形成令人鼓舞的文学创作成绩。但不要满足，要有新的探索的锐气和雄心，以新的独到的深层体验的作品，推到中国文学的前沿，也推到读者阅读惊喜的声浪里去，创造陕西文学的又一个繁荣和高峰，也为当代中国文学留驻一部或几部不被言说家忽略的作品。尽管我也理解作家的创作是一种体验所催逼的文字诉叙，许多人也直言不讳地表示只要诉叙得自己痛快淋漓就再不顾什么了。我仍然期待能有作品让更广泛层面上的读者，对这个诉叙发生共鸣，引起一个又一个心灵的惊悚，甚至形成一种普遍的呼应，一部无须炒作的优秀作品就诞生了。我印象最深的《人生》就是这样。

周：有人说，您也就一部《白鹿原》了，并且有着先天的、后天的一些缺陷，您怎样看待这些说法呢？您同意李博士对您“狭隘的民族

主义”的批评吗？我们看到，话剧《白鹿原》中也出现了“日本人的头发”这一情节。您怎么看这个问题？

陈：感谢你给我传达了“有人说”的这些议论的话。其实，我比任何人都明白这一点。“先天性和后天性的缺陷”，具体所指我尽管不清楚，相信不会超过十余年来一些批评文章的内容。这本小说发表十三年来，已出版六七本研究专著，其中有冷静的缺点分析且不说，大量的单篇评论已收集出版三部合著，每一集的编辑者征求我的意见时，我都首先要保证把虽居于少量批评包括否定的文章编入合集。有的意见和分析很富于启示，即使对于已出版的小说无法补助，对我进一步理解创作很有教益。有些看法未必与作者我的实际相吻合，也未必切到人物的真实脉象上，然对我仍是一种提醒，让我清醒地看到别人会从这样使人意料不到的视角看你的人物和细节。也发生过这样一种批评，对《白》做出彻底的全盘的批评否定，甚至推断出“陈忠实的创作才能等于零”。我没有看到那本书，是从两三篇对这种观点辩论的文章里知道的。这位评论家我没有谋过面，肯定没有人际关系和人为因素，我也将其尊重为一种看法。所谓一人掌勺百人品味，任何作品都不可能获得百分之百的赞成。我当然也不会矫情地接受这种判断，那样也就虚伪了。按照“零才能”的判决，不是现在而是早就应该洗手封笔去养鸡了。

关于李博士因“倭寇毛发”而涉及“狭隘民族主义”的批评，到多年后你还记着，且来问我，真是很有心的人。首先要从创作的技术性说，要鹿兆海带回他亲自杀死的倭寇的毛发，且确实捎带回来四十三撮。这是朱先生这个人物当时的强烈的国仇家恨的表现。是作者我对朱先生这个人的心理气象和个性气质之一个侧面的揭示，包括他发表抗日宣言且不惜老身要渡过渭河亲赴前线。作者对人物各种行为的塑

造，必然蕴含着自己的情感倾向，这也是写作常识，所以坦率地说，我对朱先生在国难当头时的义举是崇敬的张扬的。这样就涉及朱先生这个人物和作者在这个细节上，是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我知道这样一个数字，抗日战争八年时间里，中国军人战死和被日本鬼子屠杀的无辜平民达三千五百多万，这数字相当欧洲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从东条英机到进入中国的士兵，整个都变成了野兽，蹂躏科技和经济尚不发达的中国。中国人除了杀死野兽驱逐倭寇出中国，不然就会亡国亡种，连任何做人的尊严和基本权利都丧失了，如何发生宽容仁慈之情愫？只有在把野兽驱逐出家园，野兽反省之后复苏了人性，被害者才可能原谅和宽容。实际上中国人已经做到了，譬如战争赔款，毛泽东一句话就把那一笔罪恶债务划掉了。德国连续两任总理在被杀害的犹太人墓前跪倒忏悔，整个世界被纳粹伤害的人都感动了。日本现任首相小泉至今还坚持拜谒包括东条英机在内的二战厉鬼……我想我不需再解释了。

周：在陕西文坛，您是一棵大树，大家都知道您乐于扶持新人，帮助弱小，热心地奔走一些事情。这非常符合一个作协主席的身份。您在一名作家和一个主席之间如何把握？您还有时间写作吗？您是否怀念当年独居白鹿原下潜心写作的五年时光？您现在还能否走得开？您是否曾为此苦恼？

陈：我做过一些在我看来于文学发展需要做的事，既与我承担的主席这个身份有关，更在于一种责任。我基本不欣赏这个官衔意味着一个作家之外的什么荣耀待遇之类，我坚持领作家职称工资，而舍弃了级别工资。在不可推辞的环境里，我才遵从在某些主席台上的位置安排，一般较为自由灵活的集会里，我更喜欢坐在随意一个位置上，这不是矫情，而是从年轻时就形成的一种心理。我坐在太庄严的主席

台上往往很不自在，想抽烟想咳嗽想挠脖子想打个盹儿，总觉得被许多人盯着而极不舒展，很受罪，从来没有坐主席台坐出风光的感觉。我有许多毛病，只信一个优点，从来没有因为在什么场合给我的排位不显眼不醒目而闹意见。我不是靠当“主席”这份荣耀获得自信，而是以一个作家活着。

我毕竟又兼着这个名号，其意义仅在于对本省文学的发展做有益的事，还有帮一些作家尤其是年轻作家做一些需要帮助的事。我做得很不够，既有能力不济的因素，也有我个性里的弱点，这不是客气。

我确实怀念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在白鹿原下祖居老屋写作的环境气氛。乡村人知道我是作家，却按习惯把我当作乡党对待，红白喜事必不可少邀我去管“账房”当先生，盖房上梁要我去轰热火的场面。我家里偶有活儿需得帮干，都热心来帮忙。我每天写作完毕，晚上就找他们去下象棋，饿了就在他家吊在房梁上的馍笼子里摸馍吃。我的生活稍优越于他们，大约十天可以吃一次肉，他们达不到这个水平。我只有进入小房间扭开钢笔与稿纸上的人物对话时，我才是一个作家。你想想，我现在怎么能回归到那种心理状态中去。我常年回不了几次老屋，回去就是急急忙忙清除院子里长到房檐高的野草。我锁着大门，仍然有人扛着相机到那里去拍摄，难得一方安静之地了。

我没有再写长篇，主要不是工作和活动的原因。尽管这些活动不少，把时间分割得很零碎，也难集中思维，但仍不是这原因。主要是我没有产生自以为独特的体验，没有达到令人兴奋难捺非写不可的状态。那么还有写作的必要和劲头吗？我注重那种体验的质量，这是我的习惯。

周：话剧《白鹿原》终于问世了，也回到了陕西演出，请您评价一下这部话剧。

陈：林兆华以他全新的话剧理念，导演了关中乡村半个世纪的生活演变，让今天的观众没有陌生感和距离感，这是他的成功。把那么多的人物和那么多的情节和那样长的时段，在一张布景之中在两个半小时里得以完整地表现，这已是非富于创造性的构思而难以达到。作品中的几个主要人物的命运转折和起伏突显出来了，他们经历的心理剥离和精神蜕变也就完成了，人物的个性气质也塑造成功了。我作为原作者，可能最清楚小说写了多大一堆庞杂的事件，也就最知舞台时空限制下演绎的难处。应该说，我已经感到一种超出期待的欣慰。

导演林兆华和编剧孟冰，创造性地展示了他们理解的《白鹿原》。我陪他俩上原。

周：您曾有一句名言：文学依然神圣。结合目前文坛种种现象和一些无奈的现实，您现在和不论多远的将来，还这样认为吗?

陈：文学依然神圣的话，是我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说的。那时候满社会都在吵吵文学已经失去光环了，谁都可以不在乎了，吃文学这碗饭已经没有什么味道了。十余年过去，现在又有一个“文学边缘化”的说法，与九十年代初的说法差不多，或者是一言以蔽之的归结。当今文坛，是有许多让人无奈的现象，我把它看成一种过程。即社会发展到今天，今天中国社会特有的文学现象就发生了出现了，似乎持续多久也难以判断。这现象只能看成是我们这个特色的社会里的文学特色，能否在世界上找到先例以便参照，再做出日后会如何演变的预料，似乎不易。我觉得，这些现象既然已经发生和出现，可能会自觉不自觉地挟裹进去不少声音，就同样需要一定的时间完成那个过程。

我可以参照的倒是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媒体上最热闹的一个讨论话题是“文人要不要下海”，而主张下海的观点显然更充分更得到欢呼，确也有一批作家下海了搞经营去了。不过十年，下海的人先后又回到文坛，比当时不主张下海的人的理由更新鲜更有说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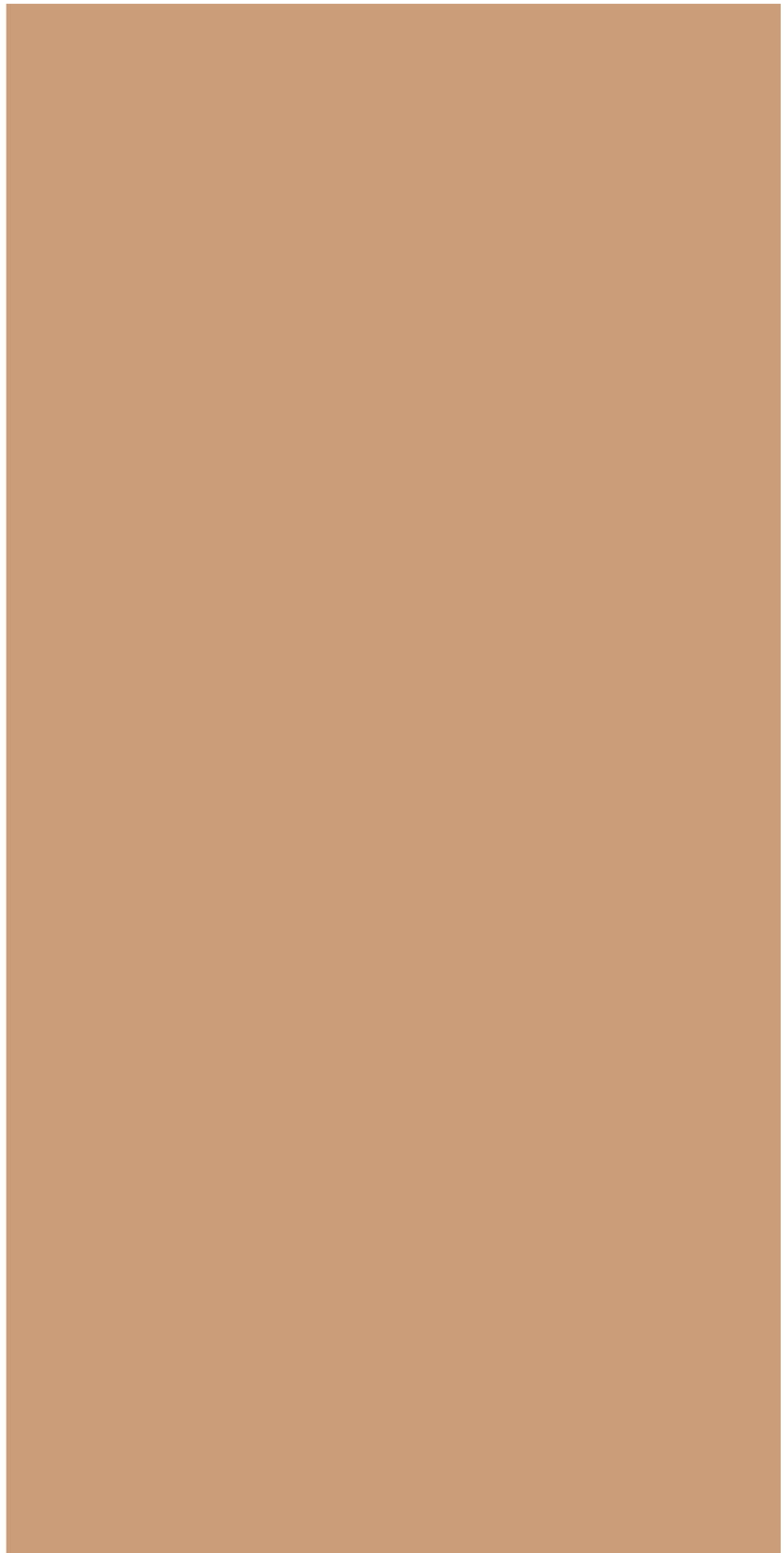
我还是相信，文学本身是神圣的，不会因为出现了这样那样的现象就改变文学本身的神圣质地。谁以为文学不神圣是他个人的选择，以为文学神圣也是另一种人的选择。

周：请说说您对延安的印象和对《延安文学》的评价。

陈：延安我记不清去过多少次了。我第一次去延安是一九七三年冬天。我怀着虔诚和敬仰的心情参观了毛泽东和老一代革命家住过的窑洞和发表讲演的讲台，那是另一种精神的神圣。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小饭馆里要饭的孩子比食客多得多，一个人刚坐下吃饭，就有一伙孩子围住他伸出手去。我后来每去一次延安，最敏感这个革命圣地的每一条街巷的变化，男人女人服饰和脸色的变化。应该说，现在的延安，才实践了五十多年前那一代老革命对延安人和中国人的革命远景的承诺。

《延安文学》是我省唯一一本大型文学双月刊。一个地区市成功地创办一本大型文学刊物，弥补了我省的空缺，给作家们提供一个宽阔的园地，很了不起。我记得这是诗人谷溪兄当年创办的，他的气魄和胆识，还有痴迷文学事业的精神，令我敬重和感动。现在继任的同人们把这本刊物办得更具声威了。谁都会想到它对作家的意义，我也借此机会向他们表示敬意，他们的富于创造性的办刊思路，对于陕西和当代文学的繁荣和发展，对于青年作家的成长，都是最可敬重的默默的无名良师和益友。

2006年7月29日 二府庄



第 1 卷　1978—1982

第 2 卷　1983—1984

第 3 卷　1985—1986

第 4 卷　白鹿原

第 5 卷　1987—1994

第 6 卷　1995—2000

第 7 卷　2001—2003

第 8 卷　2004—2006

第 9 卷　2007—2009

第 10 卷　2010—20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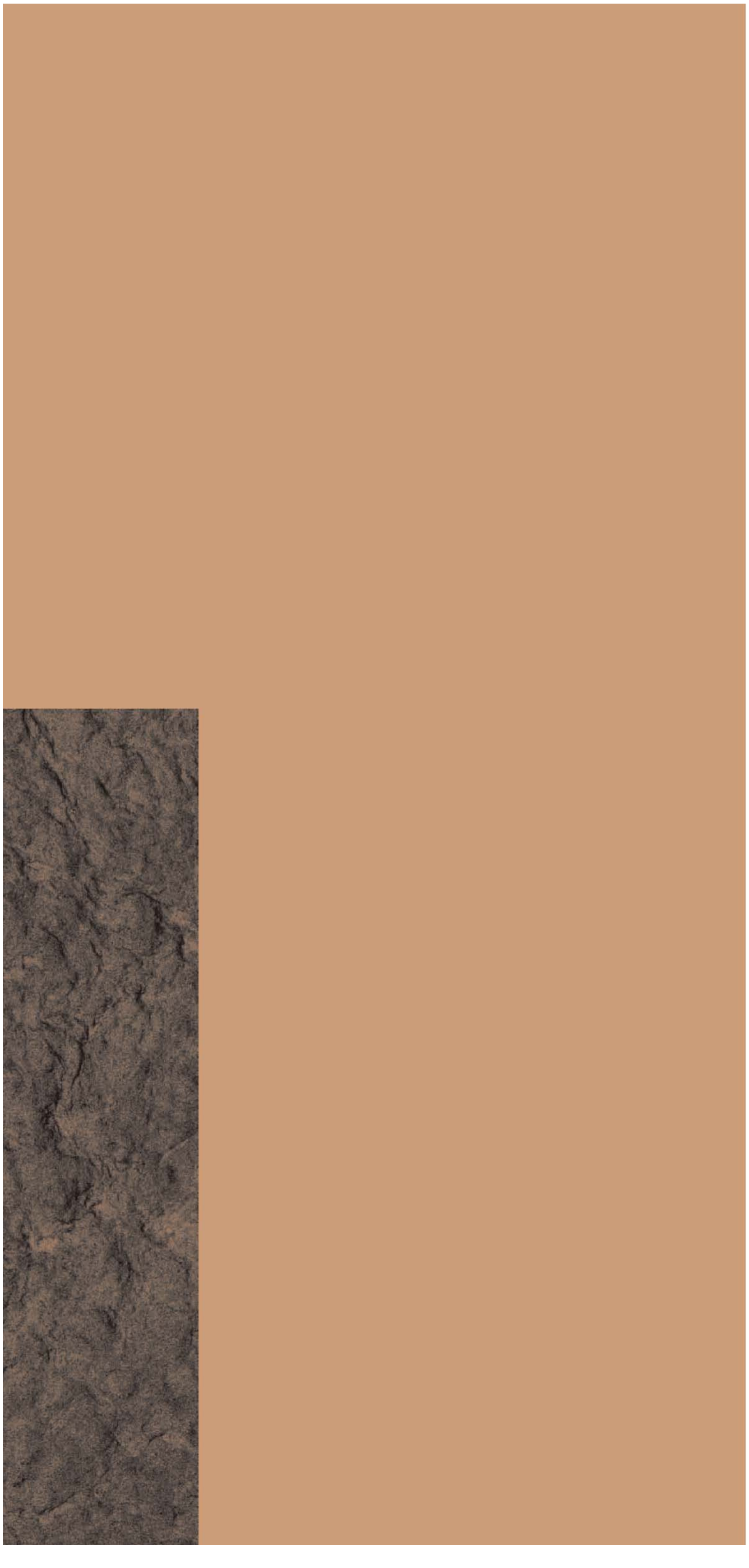
第9卷

2007—2009

陈忠实文集

增订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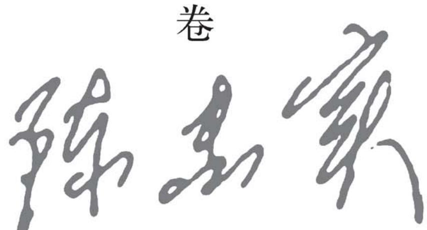
人民文学出版社



陈忠实文集

增订本

第 9 卷



2007—2009

人民文学出版社

文前插图



- 小说·散文·随笔
  - 接通地脉
  - 从黄岛到济南
  - 多姿多彩的绽放
  - 玩自己的足球
  - 李十三推磨
    - 附记
  - 追述一首词的成因
  - 沉默的山
  - 在原下感受关中
  - 走进铁军
  - 你让我荡气回肠
  - 第一次借书和第一次创作
  - 一个人的声音
  - 在灞河眺望顿河
  - 一个空前绝后的数字
  - 办公室的故事
  - 排山倒海的炮声
  - 关键一步的转折
  - 摧毁与新生
  - 一次功利目的明确的阅读
  - 米兰·昆德拉的启发
  - 汶川，给我更深刻的记忆，不单是伤痛
  - 心中的圣火
  - 阅读自己
  - 我的秦腔记忆

    - 龙湖游记
    - 老君台记
    - 铁岭掠影
    - 一双灵光纯净的眼睛
    - 难忘一渠清流
    - 说“我”
    - 再说盗版和盗名
    - 原或塬，是耶非耶
- 言论
    - 面对城墙的吟诵
    - 寄望灿烂
    - 行走间的匆草一笔
    - 真实自信的叙述
    - 敬重修军
    - 出神入化的意境
    - 《白鹿原》创作散谈
        - 一
        - 二
        - 三
        - 四
    - 别一种感动
    - 村子，乡村的浓缩与解构
    - 感受西安行进的气象和脉搏
    - 无弦的诗性歌吟
    - 钢枪马蹄溅落的诗句
    - 望外的欣慰和感动
    - 柳青创造了一个高峰

- 阅读柏杨
- 再读阿莹
- 语言里的生命质感
- 蓄久的诗性释放，在备忘
- 无法归类的文化寓言
- 添了一份踏实
- 乡党曾宏根和他的华胥国
- 展示秦腔的新图景
  - 关于青春版《杨门女将》
  - 关于秦腔的趣事
  - 关于秦腔的发展
- 陷入的阅读及其他
- 难得一种纯洁与鲜活
- 敏锐的思考与诗性的激情
- 青山碧水复原历史悲剧
- 我看碎戏
- 你的体验，令我耳目一新
- 呼应与鼓舞
- 激情赋华章
- 遥远的文君和现实的女性世界
- 关注人类命运的力作
- 再说李十三
- 热风扑面
- 感知一双敏锐的眼睛
- 感知并领受，一种鲜活的生命气象
- 难得尽在传神处
- 方言散谈

    - 感知一种真实的精神高尚和情感丰满
    - 少年笔下有雅韵
    - 用生命的体验思考生命的价值
    - 精神高蹈之履痕，坚实行走的伴唱
    - 难得豪情又柔肠
- 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创作手记
    - 一 意料不及的写作欲念
    - 二 卡彭铁尔的到来，和田小娥的跃现
    - 三 枕头，垫棺作枕
    - 四 沉静与松弛
    - 五 难忘一九八五，打开自己
    - 六 朱先生和他的“鏊子说”
    - 七 寻找一种叙述
    - 八 复活了的呻唤声
    - 九 关于性，庄严与挑战
    - 十 从追寻到转折，再到删简
    - 十一 我的剥离
    - 十二 原的剥离
    - 十三 原上的革命
    - 十四 原下，自在的去处
    - 十五 生命历程里的一个下午
    - 十六 读诗诵词，前所未有的闲情逸兴
    - 说一回多余的话
- 对话
    - 关于真实及其他
        - 关于艺术追求
        - 关于创作力

        - 关于自传或传记
        - 关于《白鹿原》的改编
        - 关于陈忠实文学馆
    - 《白鹿原》之外
        - 《白鹿原》几乎就不算个什么
        - 文学的那根神经好像特别敏锐
        - 靠色情是写作者的悲哀
        - 我所追求的语境
        - 阅读的记忆
        - 选择了莫泊桑
        - 寻找自己的创作方法
        - 《白鹿原》怎么可能把我挖空
        - 忍受苦难已经成了习惯
    - 我与《白鹿原》
        - 《白鹿原》的创作过程
        - 《白鹿原》的出版
    - 三十年，感知与体验
    - 让生活升华为艺术
    - 再说那道原
    - 关于读书
        - 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构建
        - 读书月不应局限于一个月
        - 《白鹿原》创作手记即将出版
        - 《静静的顿河》是阅读起点
    - 创作成就取决于作家的敏感、深刻和独特
        - 一、影响与借鉴
        - 二、构思与人物文化心理结构

    - 三、创作与探索
- 也说思想

小说·散文·随笔

接通地脉

约略记得那是麦收后抢时播种玉米的最紧火的时节，年轻的村长掮着铁锨走进我的院子，高挽到膝盖的裤管下是沾着泥水的赤脚。我让座。他不坐，连肩头的铁锨也不放下来，一副急不可待的架势，倒是不拒绝我递给他的一支烟。他说，你去把场塄下那二分地种上苞谷，到时候娃们也有嫩苞谷穗儿吃嘛！

我一时竟然很感动，却有点犹豫。我在两年前调入省作协当上专业作家，妻子和孩子的户籍也随之从乡村转入城市，刚刚分到手且收获过一料麦子的责任田，又统统交回村委会重新分配给其他村民了。专业作家对我至关重要的含义，就是可以由我支配自己的时间和生命行程了。几乎就在那一年，我索性决定从城镇回归乡村老家。我在祖居的屋院里读中国新时期文学一浪高过一浪的小说，读着刚刚翻译过来的陌生的世界名著，也写着我的小说，是一个不再依赖土地丰歉生存着的乡村人了。村里的乡亲有人送来一把春天的头一茬韭菜、几个刚刚孕肥的嫩苞谷穗子、一篮沾着湿土的红苕，常常引发我内心的微妙感慨，过去我曾拿着这些东西送给西安城里的朋友，现在我自己反倒成为接受者了。我在接过一把韭菜一篮红苕几个嫩苞谷穗子的时候，分明意识到我和这块土地依存的关系割断了，尽管还住在祖居的老屋里，尽管出出进进还踩踏着这方土地，却无法改变心底那一缕隐隐的空虚的发生。我对村长好心好意的提议之所以犹疑不定，是因为我已无资格耕种哪怕巴掌大一块土地了。

村长显然早已揣透了我的顾虑，解释说，村口场塄下这一畛子地，猪拱鸡刨，你交回的那二分地分给谁谁都不要，这几年都荒着，你种点苞谷谁也没意见……说罢转身出门去了。

我便种上了苞谷。这二分地在村子东头的场塄下。当年的新一茬的蒿草正长到旺盛时，比我还高出半头。我丢剥了长袖衣和长裤，握一把磨得锋利的草镰，把蒿草齐摆摆砍掉割尽，再用镢头把庞大的根系一一刨挖出来。因为天旱土壤干硬，也因为几年荒芜土质板结，牛拽的犁铧开掘不动，只能用双刺镢头开挖，再把大块硬土敲碎，点种下苞谷种子。大约整整干了三天，案头正在写作的小说或散文全部撇下，连钢笔也没有扭开，手掌上的血泡儿用纱布缠了几层，仍有血丝渗出来。又过了几天，于夕阳沉落西原的傍晚，我在湿漉漉的地皮上看见一根根刚冒出来的嫩黄的旋管状的苞谷苗子时，心底发生了好一阵响动。我坐在被太阳晒得温热的土塄上，感觉到与脚下这块被许多祖宗耕种过的土地的地脉接通了，我周身的血脉似乎顿然间都畅流起来了。

我在这二分地里间苗定苗，锄草施肥。三伏的大旱时节，村长便安排村民开动抽水机灌溉，轮到我的地头的时候，我便脱了鞋子，用铁锨挖开灌渠的口子把水放进地里，双脚踩着沁人肌肤的井水，让每一株苞谷都浇灌得足饱。眼瞅着苞谷拔节了，冒出天花和红缨来，绿色的苞谷穗子日渐肥大起来，剥开一条缝儿，已经孕出白色的一排排颗粒，用指甲轻轻掐一下，牛奶似的稠汁迸溅到我脸上。我掰下一篮，剥去绿色的皮壳，等待周末从寄宿中学回家的女儿，那是作为一个父亲最温馨的等待时刻。

我后来在这二分地里种过洋芋（土豆），收获的果实堆在屋角，有亲友来家，便作为礼物相送。也种过白菜和萝卜，不知是技术不得

要领，还是种子不好，那白菜只长菜叶不包心，只能窝泡酸菜；萝卜又瓷又硬，熬煮勉强可食，生吃很不是滋味。只有栽种大葱大获成功，许是我勤于松土，那葱长得又粗又高，葱白尤其多，做料子菜自不必说，剥了皮生吃也很香甜，我常常是一口馍一口生葱吃得酣畅淋漓。我在务这二分地里的庄稼和蔬菜的劳动中，渐渐稀少了到河堤散步的习惯，或者说替代了。我在一天的阅读或写作之后，傍晚时分习惯到灞河边上散步，活动一下在桌椅间窝蜷了一天的腰和腿。河堤内侧的滩地里是汗流浃背忙于做事的男人和女人，河堤外侧的沙滩上是割草放羊的孩子，我往往在那种环境里感到不自在，很难生出古典和现代才子们赏山阅水的情致来。现在，当我在那二分地里为苞谷除草或为大葱培壅黄土的时候，满脸汗水满手土屑，猛不防会有一个我能闻声辨人的人发出的声音："还是把式喀！"然后就在地头坐下来，或者他抽我递给他的雪茄，或者我抽他的旱烟，然后说他儿子或女儿遇着什么难事了，需得我去帮忙交涉，我比他的"面子"大哇……我往往在那种时刻，比之在河堤上散步时的感觉稍好。

这几年间，大概是我写作生涯中最出活的一段时光，无论是中篇《蓝袍先生》《四妹子》《地窖》等，以及许多短篇小说，还有费时四年的长篇《白鹿原》，我在书案上追逐着一个个男女的心灵，屏气凝神专注无杂，然后于傍晚到二分地里来挥镢把锄，再把那些缠绕在我心中的蓝袍先生、四妹子、白嘉轩、田小娥、鹿子霖、黑娃们彻底排除出去，赢得心底和脑际的清爽。只有专注的体力劳作，成为我排解那些正在刻意描写的人物的有效举措之一，才能保证晚上平静入眠，也就保证了第二天清晨能进入有效的写作。这真是一种无意间找到的调节方式，对我却完全实用。无论在书桌的稿纸上涂抹，无论在二分地里务弄苞谷蔬菜，这种调节方式的科学性能有几何？对我却是实用而又实惠的方式。我尽管朝夕都生活在南原（白鹿原）的北坡根

下，却从来没有陶渊明采菊时的悠然，白嘉轩们的欢乐和痛苦同样折腾得我彻夜失眠，小娥被阿公鹿三从背后捅进削标利刃时回头的一声惨叫，令我眼前一黑钢笔颤抖……我在二分地的苞谷苗间大葱行间重归沉静。

记不清是哪一年了，陕北榆林一位青年诗人送我一小袋扁豆，这是夏天喝稀饭的好作料。因为产量太低，扁豆在关中地区早都绝种了。我倍加珍惜的一个缘由，是我生在三伏，又缺奶，母亲用白面熬煮的扁豆喂活了我。直到我的孩子已经念大学的时候，母亲往往面对牛奶面包而引发出扁豆救命的老话。我在重新品尝救命的扁豆稀饭之后，留下一部分种子，当年秋天种到我的二分地里，长出苗儿来，年龄在中年以下的农民竟不认识是何物。扁豆长得很好，绿油油罩满地皮，常常引来许多村民围观。扁豆比麦子早熟，在大麦成熟小麦硬粒的时候成熟了。我准备近日收割，自然跃跃，慷慨地答应过几个村民讨要种子的事。不料，当我提着镰刀走到二分地头，扁豆秧子竟然一株都不见了。我愣在那里，半天回不过神来。肯定是昨晚被谁偷割了。我其实也没有生多大的气，只是有点怨气，怨这人做得太过，该当给我留下一小块，我好留得种子。

那是至今依旧令我向往而无法回归的年月和光景。

2007年1月4日 二府庄

从黄岛到济南

我第一次出远门参加文学写作笔会，在一九八一年溽热的三伏，是由时任《北京文学》小说组组长的傅用霖组织的，地点在与青岛隔海相望的黄岛上。人对于第一次经见的事物总是新鲜而难免惊奇的。囚于黄土高原和秦岭之间的夹道——关中——半生的我，第一次看到大海时竟有些眩晕，而第一次乘坐驶往黄岛的轮船却不仅没有发生呕吐，连眩晕也解除了。我想象里的大海总是波浪排空，倒是为第一次看见的大海的平静而长舒了一口气。

黄岛是一个小岛，站在稍高一点的坡岗上，便可以看到四面无边无际的灰蒙蒙的海天。据说这岛上只有一个居住着十来户渔民的生产队（公社建制），岛中心刚刚建成一个体育宾馆。我在宾馆的大餐厅里吃到了各种海产的鱼，据说都是本岛渔民从海里捕捞得来后直接送过来，再新鲜不过了。印象最深的是每张餐桌都配有一满盆铜钱大的小蚌，我也是第一次品尝，竟吃得很贪婪，同行的作家朋友常常瞪起眼睛问我，难道比西安的肉夹馍还好吃吗？我们常是把本桌那一大搪瓷盆小蚌吃完，再搜来邻桌上盆里吃剩的小蚌，蚌壳把餐桌铺满堆高，引来那些服务小伙儿小姐友善的笑。

这次笔会邀集了几位刚跃上新时期文坛的青年作家，锦云以《笨人王老大》横空出世，更有不同凡响的汪曾祺。此前我已在《北京文学》读过《受戒》，对汪曾祺这个名字就蒙上一层神秘莫测乃至莫解的感觉，尽管在火车上听他谈天说地纵古论今，尽管他机智幽默举止自如，不仅不摆谱儿，似乎随意自如到不拘小节，然而，我仍然排弃不掉那一缕神秘莫解的感觉。傅用霖把这些作家囚在黄岛一周，闭门

写作，唯一可选择的消遣是晚饭后在夕阳里泡海水澡，沙滩上只有水鸟的爪痕而绝无人的足迹，即使脱光下海也不担心有碍观瞻。这自然也是我第一次触摸海水，尝到了海水咸腥的味道。直到每位受邀作家都如母鸡努出一个蛋来，交给傅用霖一篇短篇小说，才撤离了这个日夜都弥漫着海腥味的小岛。我后来在《北京文学》上看到了汪曾祺的《大淖记事》，就是他在黄岛上下的一个堪称精品的蛋。

从青岛再转到济南，我找到了一种类似西安的似曾相识的感觉。我们一伙人溜达在济南的大街小巷，自行车和架子车占据着或宽或窄的道路，仍然是中山装的统一服饰，唯一让我有异地感觉的是市井嘈杂里的口音，告知我在孔子的鲁地而不是在秦。那时候的济南，还看不到一幢高层建筑。

傅用霖领着这一帮背兜携袋的作家，在街巷里懒懒散散地转悠着，寻找一家可以进餐的饭馆。一九八一年的夏天，私营的小饭铺刚刚冒出，似乎还有点贼头贼脑。国营和集体属性的饭馆一律称作食堂，不仅门面小，而且少得很难寻觅。终于在一个记不清什么街巷的丁字口，迎面看见挂着食堂招牌的小饭铺，一帮人不由分说也别无选择地拥了进去。

我落在最后。不是我不饿，却是被无意的一瞥停步在食堂门口。这家食堂一间门面里的摆设一目了然，一排条桌，呈现着古久的油腻，桌上摆一只装满筷子的粗瓷箸筒，旁边摆着盐碟、醋瓶和酱油瓶，和西安食堂里的装备摆设一模一样，我没有任何异地的陌生。我在跨进食堂门口时看见了一个食客，是一位中年妇女，坐在门口的那张桌子边正在吃饭，左手端着一只白色的粗釉瓷碗，碗里盛着大半碗米饭，右手捏着筷子，往嘴里拨拉着米粒。那纯粹的大米呈酱紫色，我断定那是用酱油调味变色的。她的桌子上没有一碟下饭菜，也没有

任何最廉价的汤。我就是在瞥见她大口大口吞嚼用酱油调拌的米饭时，心里猛然遭遇了撞击而停住脚步的。她的腿脚边，放着两只藤条笼，从笼里剩存的碎麦草判断，她是到济南来卖鸡蛋的农妇。鸡蛋卖完了，她也饿急了，花一毛钱买四两米饭，调上不花钱的酱油，就算下了一回馆子。在我驻足愣神的时候，她又往米饭里倒了一次酱油，大约还嫌味轻，我的眼睛已经模糊了。

这个卖鸡蛋的山东大嫂吃米饭的情景，我在此前二十五年的一九五六年就试验过了。我那时刚刚中止休学恢复初中学业，依旧是背着一周的玉米面馍到三十里远的城郊中学去念书，有时突破了用粮计划而吃不到周六，有时因为短命的玉米面馍霉坏变成黑色无法下咽，父亲每周给我两毛钱以备急用。记得我是和一个同样断顿儿的同学相约走进了一家食堂。我俩各掏各的腰包花一毛钱买下四两米饭，我趴在桌子上就大吞大嚼起来，白生生的大米是喷香的，比又冷又硬的玉米面馍好吃得多了。这个同学拿起酱油瓶子给自己碗里倒下酱油，又给我碗里倒下了，不无得意地说，酱油不要钱，放心调，调酱油香得很。我把碗里的米饭使劲搅拌，变成了紫黑色，尝了一口，尽是酱油的香味，一种陌生的香甜的味道。我的家里，一年四季不缺醋，全是母亲用谷糠酿制的，但从来没有买过酱油，酱油味对我是陌生又新鲜的味道。我俩抹着嘴走出食堂回学校的时候，都洋溢着一种开了一回洋荤的幸福感，也洋溢着白吃酱油的得意……

我和这位山东大嫂，都是经历过把白米饭调酱油当作超常大餐超级享受的人。

又二十五六年过去了。我自己也搞不清因为什么由头，竟触发出一桩久远的生活记忆，且挥之不去，顺手为记。

2007年2月28日 二府庄

多姿多彩的绽放

第一次看任小蕾的戏，不是在她供职的陕西戏曲研究院的剧场，却是在中央电视台的荧屏上。她演的是碗碗腔折子戏《桃园借水》，通常更含蓄的说法是《借水》。这折戏演绎的是崔护那四句千古绝唱的情诗：“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后两句是诗人再访时的失落和惆怅，而可供剧作家展开想象翅膀的创作依据，仅仅只是回忆情境里的桃花掩映着的柴门，以及和桃花一样美丽俊俏的人面。剧作家以非凡的想象力，演绎出一折生动活泼缠绵不尽的爱情剧。任小蕾以她俊俏的扮相，精确细腻的一颦一笑、一招一式的表演，把一个率真清纯、情窦初开的村姑塑造得淋漓尽致、惟妙惟肖，令人不仅欣悦，而且启迪思路拓宽眼界。我在老剧新戏里，看过皇家女子官家闺秀且不论，单是乡村女孩，多是傻头愣语简单无趣，像任小蕾扮演的桃小春这样美好的乡村女孩，可以说是一个别开生面的艺术形象，意义更在纠正某些对乡村的浅薄和偏见。桃小春无疑成为戏剧舞台无以数计的女性形象中的“这一个”，不仅不会被湮没，也不会被覆盖。崔护如若有灵，当感知他在桃园难求再会的“人面”，正“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在一千多年后的舞台上，出类拔萃，赢得广泛喝彩。“这一个”独立的村姑桃小春的形象，是任小蕾树立到舞台上的，自然成为一个艺术形象的标杆和高度。

作为一个陕西地方戏曲演员，任小蕾获得成功的最根本途径，是精心打造、刻画角色，创造出只属于自己的“这一个”舞台形象来，桃小春无疑是一个。其实，那些在观众中享有盛名的陕西戏曲演员，莫不如此，任哲中在《周仁回府》里塑造的周仁，达到一种臻于完美的境界，被戏迷和行家称为活周仁，也给再演这部戏的演员堆起一堵

墙，观众戏迷总是拿他们心目中既有的任氏周仁，去评判别一个周仁演出者的得失或说长道短。任小蕾能打造出一个烙印着小任标志的桃小春，在三秦这块地方戏人才济济的、自然也颇挑剔的大地上，实非易事；同样不言而喻，一个深蕴表演艺术潜质和才华的地方戏演员任小蕾，脱颖而出了。

更让我这个老秦腔戏迷钦佩的是，任小蕾在舞台上创造出年龄和个性差异迥然的多样性人物。一般来说，女演员有小旦、花旦、正旦、青衣、武旦、媒旦等之分，包括许多卓有成就的女演员，也只是工其一种或接近的两种旦角。然而任小蕾除了老旦和媒婆（旦），其他各种差别很大的旦角都扮演过，且演出了各种主要角色的特定个性。从人物类型上说，真是令人有点不可思议，《借水》里那个清纯、率性、人见人爱的桃小春自不必说，到获得国家精品工程奖的现代戏《迟开的玫瑰》里，却摇身一变成为一个养尊处优、贪图享受、趋追时髦令人讨厌的女孩宫小花，几乎无法让人联想到她是桃小春的扮演者任小蕾。

如果说桃小春是折子戏的角色，宫小花还不是《迟开的玫瑰》剧的主角，而真正让我看到任小蕾表演艺术巨大潜质的，是在近十部地方戏曲里塑造出一个个个性和命运迥然不同的女性形象。中国传统戏剧的经典悲剧《窦娥冤》，几乎被中国所有地方戏曲改编演出。豪壮激昂为底色的秦腔，不知被多少女演员创造出各自的窦娥。任小蕾在众多窦娥的影壁前知难而进，展示给观众一个新的窦娥形象，悲愤刚烈、忠贞不贰，获得新老秦腔迷的认可，亦获得剧界专家里手的赞赏。作为一个优秀的秦腔演员，生动逼真的扮相、一招一式的举手投足，还有优美的唱腔，都是丝毫不可或缺的基本本领，然而绝不是为技巧而技巧为绝招而绝招，更不是单纯的夸嗓子。任小蕾的不凡之处

在于努力理解剧作家用文字创造的人物，把握人物的个性、气质、思想和操守，以及这个人物在情节变化和事件推进的重要过程中所发生的命运挫折，由此而导致的灾难或得意、欢乐或痛苦，据此琢磨出能准确传达和充分展示人物内心世界心脉气氛的招式和腔调。在窦娥赴刑场时，用小步、蹉步、云步等细腻的肢体动作，体现窦娥满腔冤情无以表述的痛楚，直到震天撼地的“地哪”呼啸而出的时候，连同观众心头积聚的对黑暗邪恶势力的愤怒都呼喊出来了。此刻展现在舞台上的窦娥，确是观众心目中的窦娥而不是任小蕾了。这里的窦娥已经完成了一种质的升华，看似强大的得逞的邪恶，顿时变得虚弱如灰了；而看似弱小的被害无助的窦娥，正义正道的强劲的翅膀顷刻间飞扬起来。一个鲜活的立体的窦娥站立在舞台上，也融入观众的情感和心理世界。出演《西湖遗恨》里的李慧娘，任小蕾面临的难题与《窦娥冤》类似，这是一部比《窦》剧还要普及得多的传统经典秦腔剧目，从名角云集的西安到关中多个县的专业剧团，乃至无以数计的乡村业余剧团，都在演出《西湖遗恨》，说不清有多少个或高或矮或胖或瘦的专业和业余女演员，展示出各自心理上所理解的李慧娘。一个不争的事实，是这部名著里的李慧娘，成就了不止一个两个观众经久不忘的著名演员。任小蕾以她对李慧娘的精到剖析和深层理解，把自身投入并融化到李慧娘的生活遭际和命运起落之中，调动优美的唱腔和独到的表演功夫，在眼前的无数个李慧娘面前，继而托出一个小任风采的李慧娘来。李慧娘塑造成功了，演员任小蕾也脱颖而出了。

李慧娘在《西湖遗恨》里是以一个美丽的鬼来完成倾诉和复仇的，其实在观众的眼里和心里是一尊正义化作的女神。刚刚卸下这个女神一身白衣白裙素妆的任小蕾，摇身一变就成为一个为偷情而死依然要续旧情的面目颇为复杂的鬼了，这是《水浒》里被宋江杀死的那个作为荡妇淫娃的阎婆惜的后续演绎。小说写到阎婆惜被宋江怒杀即

告结束，剧作家却把死了的阎婆惜的故事以鬼的化身延续下来，她想着她痴情并为之丧命的情夫，却发现情夫想另寻新欢，既辨不出她呼叫他的声音，更在招蜂引蝶的欲望里早把她忘记得一干二净，她活捉了情夫。这里的阎婆惜已不是《水浒》里那个只呈现单色调的人物了，已演变发展为一个更复杂的新的女性形象了，在宋江的爱情天平上，她是颠覆者背叛者，是被作者施耐庵鞭挞被宋江血刃的淫邪形象。到《活捉三郎》戏剧里，剧作家把谴责和讨伐的鞭子交到阎婆惜手中，惩罚的鞭梢落到一个更无廉耻亦无情义的男人身上。这个呈现出多面色调的复杂的阎婆惜，把握其心理演变的分寸和合理性，就给任小蕾的表演提出更高的要求，还有非演技方面的一道障碍，即《水浒》小说和电视剧在读者和观众心里已形成的阎婆惜的固定印象，都需要任小蕾把复杂多面的阎婆惜既生动鲜活地树立起来，更要合情入理，才能被观众接纳。接纳了《活捉三郎》的阎婆惜，也就打破了读者心里原有的那个阎婆惜，把读者和观众的思维也拓宽了。我已无须再赞许任小蕾完成这个复杂角色、刻画塑造的过程，仅就连演不衰的热烈反响，以及由此而获得的多项大奖，就可以看到任小蕾表演艺术的潜质和可塑性之大了。

《雀台歌女》是今人新编的秦腔历史剧，任小蕾受命完成主角来莺儿的塑造。这个来莺儿的形象，不似窦娥、李慧娘、阎婆惜等角儿，既没有前人演出的高度性障碍，也没有任何可资参考和继承的东西，一个对自己对观众来说都是完全陌生的艺术形象，需得全凭自己来理解来刻画。成功了，将为秦腔舞台新添一个新的艺术形象；失败了，也就意味着来莺儿的夭折。

这是一次别开生面的创造，也是独立自主的创造，是一种创造意义上的挑战。创造的意义上的诱惑，激发着任小蕾创造的热情，这应

该是所有不甘平庸的艺术家共通的心理。《雀台歌女》是一部坚守与背叛的人格化戏剧。历史背景很宏阔，社会环境很复杂，复杂里的选择，就把操守者来莺儿置于一种凛峻的境地，尤其是面对敏感而不乏奸险的曹操，更有负情又负义的偷生者王图——与来莺儿有爱情誓盟的人。王图不类同于传统戏里的任何一个负心汉，来莺儿更不似任何痴情殉情的女子。来莺儿重在对情的忠贞和坚守、对背叛者的轻蔑、对利益的不屑，更独特的是，来莺儿的个性背离抛却了常见的那种在遭遇背叛时的大悲大恸，一种深蕴的坚守不渝所显示的力量成为来莺儿区别于一切悲剧女性的一个新鲜而又陌生的特质。任小蕾创造来莺儿的成功，其意义既在她把一个新的人物形象推到秦腔舞台上，推到观众戏迷的欣赏视角里，也在她的艺术道路上完成了一次完全独立的个性化创造，这应该属于一个演员艺术成熟的标志。

任小蕾演出过许多个性差异很大，乃至品相相悖的人物，甚至还演出过貂蝉。貂蝉和窦娥的距离当是南北两极，却由同一个人塑造出来，我自然想到任小蕾的艺术创造能力，用戏迷的话说，这人戏路子太宽了。任小蕾在对地方戏曲的领悟和阐发方面，也是具有令人惊羡的天性，秦腔自不必说，还有被称作北方黄梅戏的小剧种碗碗腔、眉户等，不是一般爱好唱唱而已，而是整本戏或折子戏的正经演出，且唱出独有的韵味，《借水》如此，眉户剧《梁秋燕》亦如此，呈现出多姿多彩的绽放。

作为一个陕西地方戏曲的老戏迷，眼见着现代流行娱乐形式挤压传统的地方戏曲，眼见着那些地方戏曲的令人神魂迷醉的功勋演员一个个谢世，真诚期待有新的演员出世，在继承的基础上展示新的创造，这是地方传统戏曲发展的关键之一。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为任小蕾的现在和未来，重重地持久地鼓掌。

2007年3月20日 二府庄

玩自己的足球

——西安民间足球联赛印象

在中国足球折腾到让人实在不堪说啥的光景下，西安的民间足球联赛却成了气候，令人耳目一新。说来还是架不住足球原本魅力的诱惑，我很自然地把兴趣和视点转向西安足球的民间赛场。

足球和绝大多数体育项目一样起源于民间。尽管当今的世界足球已形成令任何其他体育赛事无可相比的热闹境地，仍然没有改变民间基础这层关系。球迷耳熟能详那些欧洲和南美的名牌俱乐部，却未必关注数量几倍几十倍于名牌球队的乙级队丙级队丁级队，还有挂不上名号的纯粹民间自组的业余球队，正是从这个庞大雄厚的基础足球人才堆里不断冒出足带绝技的新星，再去撑持那些名牌俱乐部球队的门面，闯他们的足坛天地。即如罗纳尔多和小罗，干脆就是从既脏又乱的街巷里练就足下的基本功夫，相继在欧洲这家那家大牌俱乐部闪光亮彩，更无须列举非洲许多打到欧洲赛场的球星——曾经的穷娃——都是在民间先露出足球天赋的。中国足球难得出现世界级的明星，球员来源的民间基础太小太窄，肯定把许多具有足球天赋的娃娃耽搁了。

我为西安民间足球赛事的热烈景象感动而又振奋。从二〇〇三年创立民间足球赛事，四年间已发展到超乎想象的规模，组队参赛的球队超过八十支，参与这项活动的热心者形成一个三十余万的庞大群体。令我有点眼花缭乱的是参赛队伍的组成，有职业警察球队，有能言善辩的律师球队，各种专业工人和专业商贸人员也有球队，电视报

刊的采编人员放下笔杆或电脑键盘，到绿茵场显示一回足下功夫，还有郊区的农村青年，几乎包括了社会结构里的所有职业的年轻人，更有一位缺失一只胳膊的小伙子，足下功夫令四座惊异。这种民间足球赛事已从西安辐射到周边城市和区、县，延安、户县、高陵都组队参赛，不仅让人感到足球在中国在陕西的巨大潜力，也感到足球民间的这个基础开始扩展起来雄厚起来。

对中国足球的难再复加的伤心，在西安民间足球的赛场可以得到缓解，得到补偿，更在于一种心理的转换和调节，即足球原本属性里的娱乐和开心。

《三秦都市报》开创这个西安民间足球联赛，把蕴积在庞大的足球群体里的激情释放出来了，给那些足球青年一块展示激情和个性的场合，也给如我一类老球迷提供了一个可以只享受欢乐，而不至于再添伤心的健康的足球。我想，这应该是民间足球比赛能够迅猛发展形成气候的根本所在。

祝愿新一年的民间足球赛更出新风采。自己玩得开心快乐也很好。

2007年3月25日 二府庄

李十三推磨

“娘——的——儿——”

一句戏词儿写到特别顺畅也特别得意处，李十三就唱出声来。实际上，每一句戏词乃至每一句白口，都是自己在心里敲着鼓点和着弦索默唱着吟诵着，几经反复敲打斟酌，最终再经过手中那支换了又半秃了的毛笔落到麻纸上的。他已经买不起稍好的宣纸，改用便宜得多的麻纸了。虽说麻纸粗而且硬，却韧得类似牛皮，倒是耐得十遍百遍的揉搓啊翻揭啊。一本大戏写成，交给皮影班社那伙人手里，要反复背唱词对白口，不知要翻过来揭过去几十几百遍，麻纸比又软又薄的宣纸耐得揉搓。

“儿——的——娘——”

李十三唱着写着，心里的那个舒悦那份受活是无与伦比的，却听见院里一声呵斥：

“你听那个老疯子唱啥哩？把墙上的瓦都蹭掉了……”

这是夫人在院子里吆喝的声音，且不止一回两回了。他忘情唱戏的嗓音，从屋门和窗子传播到邻家也传播到街巷里，人们怕打扰他不便走进他的屋院，却又抑制不住那勾人的唱腔，便从邻家的院子悄悄爬上他家的墙头，有老汉小子有婆娘女子，把墙头上掺接的灰瓦都扒蹭掉了。他的夫人一吆喝，那些脑袋就消失了，他的夫人回到屋里去纺线织布，那些脑袋又从墙头上冒出来。夫人不知多少回劝他，你爱编爱写就编去写去，你甭唱唱喝喝总该能成嘛！他每一次都保证说记

住了再不会唱出口了，却在写到得意受活时仍然唱得畅快淋漓，甭说蹭掉墙头几片瓦，把围墙拥推倒了也忍不住口。

“儿——啊——”

“娘——啊——”

李十三先扮一声妇人的细声，接着又扮男儿的粗声，正唱到母子俩生死攸关处，夫人推门进来，他丝毫没有察觉，突然听到夫人不无厌烦倒也半隐着的气话：

“唱你妈的脚哩！”

李十三从椅子上转过身，就看见夫人不愠不怒也不高兴的脸色，半天才从戏剧世界转折过来，愣愣地问：“咋咧吗？出啥事咧？”

“晌午饭还吃不吃？”

“这还用问，当然吃嘛！”

“吃啥哩？”

这是个贤惠的妻子。自踏进李家门楼，一天三顿饭，做之前先请示婆婆，婆婆和公公去世后，自然轮到请示李十三了。李十三还依着多年的习惯，随口说：“黏（干）面一碗。”

“吃不成黏（干）面。”

“吃不成黏（干）的吃汤的。”

“汤面也吃不成。”

“咋吃不成？”

“没面咧。”

“噢……那就熬一碗小米米汤。”

“小米也没有了。”

李十三这才感觉到困境的严重性，也才完全清醒过来，从正在编写的那本戏里的生死离别的母子的屋院跌落到自家的锅碗灶膛之间。正为难处，夫人又说了：“只剩下一盆苞谷糁子，你又喝不得。”

他确凿喝不得苞谷糁子稀饭，喝了一辈子，胃撑不住了，喝下去不到半个时辰就吐酸水，清淋淋的酸水不断线地涌到口腔里，胃已经隐隐作痛几年了。想到苞谷糁子的折磨，他不由得火了：“没面了你咋不早说？”

“我大前日格前日格昨日格都给你说了，叫你去借麦子磨面……你忘了，倒还怪我。”

李十三顿时就软了，说：“你先去隔壁借一碗面。”

“我都借过三家三碗咧……”

“再借一回……再把脸抹一回。”

夫人脸上掠过一缕不悦，却没有顶撞，刚转过身要出门，院里突响起一声嘎嘣脆亮的呼叫：“十三哥！”

再没有这样熟悉这样悦耳这样听来让人从头到脚从里到外都感觉到快乐的声音了，这是田舍娃嘛！又是在这样令人困窘得干摆手空跺

脚的时候，听一听田舍娃的声音不仅心头缓过愉悦来，似乎连晌午饭都可以省去。田舍娃是渭北几家皮影班社里最具名望的一家班主，号称“两硬”班子，即嘴硬——唱得好，手硬——耍皮影的技巧好。李十三的一本新戏编写成功，都是先交给田舍娃的戏班排练演出。他和田舍娃那七八个兄弟从合排开始，夜夜在一起，帮助他们掌握人物性情和剧情演变里的种种复杂关系，还有锣鼓铙钹的轻重……直到他看得满意了，才放手让他们去演出。这个把他秃笔塑造的男女活脱到观众眼前的田舍娃，怎么掂他在自己心里的分量都不过分。

“舍娃子，快来快来！”

李十三从椅子上喊起来站起来的同时，田舍娃已走进门来，差点儿和走到门口的夫人撞到一起，只听“咚”的一声响，夫人闪了个趔趄，倒是未摔倒，田舍娃自己折不住腰，重重地摔倒在木门槛上。李十三抢上两步扶田舍娃的时候，同时看见摔撂在门槛上的布口袋，“咚”的沉闷的响声是装着粮食的口袋落地时发出的。他扶田舍娃起来的同时就发出诘问：“你背口袋做啥？”

“我给你背了二斗麦。”田舍娃拍打着衣襟上和裤腿上的土末儿。

“你人来了就好——我也想你了，可你背这粮食弄啥嘛！”李十三说。

“给你吃嘛！”

“我有吃的哩！麦子豌豆谷子苞谷都不缺喀！”

田舍娃不想再说粮食的事，脸上急骤转换出一副看似责备实则亲畅的神气：“哎呀我的老哥呀！兄弟进门先跌个跟斗，你不拉不扶倒罢

了，连个板凳也不让坐吗？”

李十三赶紧搬过一只独凳。田舍娃坐下的同时，李夫人把一碗凉开水递到手上了。田舍娃故作虚叹地说：“啊呀呀！还是嫂子对兄弟好——知道我一路跑渴了。”

李十三却以不容置疑的口气对妻子说：“快，快去擀面，舍娃跑了几十里肯定饿了。今晌午吃黏（干）面。”

夫人转身出了书房，肯定是借面去了。她心里此刻倒是踏实，田舍娃背来了二斗麦子，明天磨成面，此前借下的几碗麦子面都可以还清了。

田舍娃问：“哥吔，正谋算啥新戏本哩？”

李十三说：“闲是闲不下的，正谋算哩，还没谋算成哩。”

田舍娃说：“说一段儿唱几句，让兄弟先享个耳福。”

“说不成。没弄完的戏不能唱给旁人。”李十三说，“咋哩？馍没蒸熟揭了锅盖跑了气，馍就蒸成死疙瘩了。”

田舍娃其实早都知道李十三写戏的这条规矩，之所以明知故问，不过是无话找话，改变一下话题，担心李十三再纠缠他送麦子的事。他随之悄声悦气地开了另一个话头：“哥呀，这一向的场子欢得很，我的嗓子都有些招不住了，招不住还歇不成凉不下。几年都不遇今年这么欢的场子，差不多天天晚上有戏演。你知道喀——有戏唱就有麦子往回背，弟兄们碗里就有黏（干）面吃！”

李十三在田舍娃得意的欢声浪语里也陶醉了一阵子。他知道麦子收罢秋苗锄草施肥结束的这个相对松泛的时节，渭河流域的关中地区每个大小村庄都有“忙罢会”，约定一天，亲朋好友都来聚会，多有话丰收的诗蕴，也有夏收大忙之后歇息娱乐的放松。许多村子在“忙罢会”到来的前一晚，约请皮影班社到村里来演戏，每家不过均摊半升一升麦子而已。这是皮影班社一年里演出场子最欢的季节，甚至超过过年。待田舍娃刚一打住兴奋得意的话茬儿，李十三却眉头一皱眼仁一聚，问：“今年渭北久旱不雨，小麦歉收，你的场子咋还倒欢了红火咧？”

“戏好嘛！咱的戏演得好嘛！你的戏编得好嘛！”田舍娃不假思索张口就是爽快的回答，“《春秋配》《火焰驹》一个村接着一个村演，那些婆娘那些老汉看十遍八遍都看不够，在自家村看了，又赶到邻村去看，演到哪里赶到哪里……”

“噢……”李十三眉头解开，有一种欣慰。

“我的十三哥呀，你的那个黄桂英，把乡下人不管穷的富的老的少的男的女的都看得迷格瞪瞪的。”田舍娃说，“有人编下口歌，‘权当少收麦一升，也要看一回黄桂英’。人都不管丰年歉年的光景咧！”

说的正说到得意处，听的也不无得意，夫人走到当面请示：“话说完了没？我把面擀好了，切不切下不下？”

“下。”李十三说。

“只给俺哥下一个人吃的面。我来时吃过了。”田舍娃说着已站立起来，把他扛来的装着麦子的口袋提起来，问，“粮缸在哪儿，快让我把粮食倒下。”

李十三拽着田舍娃的胳膊，不依不饶非要他吃完饭再走，夫人也是不停嘴地挽留。田舍娃正当英年，体壮气粗，李十三拉扯了几下，已经气喘不迭，厉声咳嗽起来，长期胃病，又添了气短气喘的毛病。田舍娃提着口袋绕进另一间屋子，揭开一只齐胸高的瓷瓮的木盖儿吓了一跳，里边竟是空的。他把口袋扛在肩上，松开扎口，哗啦一声，二斗小麦倒得一粒不剩。田舍娃随之把跟脚过来的李十三夫妇按住，扑通跪到地上："哥呀！我来迟了。我万万没想到你把光景过到盆干瓮净的地步……我昨日格听到你的村子一个看戏的人说了你的光景不好，今日格赶紧先送二斗麦过来……"说着已泪流不止。

李十三拉起田舍娃，一脸感动之色里不无羞愧："怪我不会务庄稼，今年又缺雨，麦子长成猴毛，碌碡停了，麦也吃完了……哈哈哈。"他自嘲地撑硬着仰头大笑。夫人在一旁替他开脱："舍娃你哭啥嘿？你哥从早到晚唱唱呵呵都不愁……"

田舍娃抹一把泪脸，瞪着眼说："只要我这个唱戏的有得吃，咋也不能把编戏的哥饿下！我吃黏（干）面决不让你吃稀汤面。"随之又转过脸，对夫人说："嫂子，俺哥爱吃黏（干）的汤的尽由他挑。过几天我再把麦背来。"

田舍娃抱拳鞠躬者三，又绽出笑脸："今黑还要赶场子，兄弟得走了。"刚走出门到院子里，又折回身，"哥呀！我知道你手里正谋算一本新戏哩！我等着。"

"好！你等着。"李十三嗓门亮起来，说到戏，他把啥不愉快的事都掀开了，"有得麦吃，哥就再没啥扰心的事了。"

李十三和他的夫人运动在磨道上。两块足有一尺多厚的圆形石质磨盘，合丝卡缝地叠摞在一起，上扇有一个小孩拳头大小的孔眼，倒在上扇的麦粒，通过这只孔眼溜下去，在转动着的上扇和固定着的下扇之间反复压磨，再从磨口里流出来。上扇磨石半腰上捆绑一根结实的粗木杠子，通常是用牲口套绳和它连接起来，有骡马的富户套骡马拽磨，速度是最快的了；一般农户就用自养的犍牛或母牛拽磨，也很悠闲；穷到连一条狗都养不起的人家，就只好发动全家大小上套，不是拽而是推着磨盘转动了。人说“拽犁推磨打土坯”是乡村农活里头三道最硬茬的活儿，通常都是那些膀宽腰圆的汉子才敢下手的，再就是那些穷得养不起牲口也请不起帮手的人，才自己出手硬撑死扛。年届六十二岁的李十三，现在把木杠抱在怀里，双臂从木杠下边倒钩上来反抓住木杠，那木杠就横在他的胸腹交界的地方，身体自然前倾，双腿自然后蹬，这样才能使上力鼓上劲，把几百斤重的磨盘推动起来旋转起来。他的位置在磨杠的梢头一端，俗称外套，是最鼓得上力的位置，如果用双套牲口拽磨，这位置通常是套犍牛或儿马子的。他的夫人贴着磨道的内套位置，把磨杠也是横夯在胸腹交界处，只是推磨的胳膊使力的架势略有差异，她的右手从磨杠上边弯过去，把木杠搂到怀里，左手时不时拨拉一下磨扇顶上的麦子，等得磨缝里研磨溜出的细碎的麦子在磨盘上成堆的时候，她就用小木簸箕揽了。离开磨道，走到罗柜跟前，揭开木盖，把磨碎的麦子倒入罗柜里的金丝罗子，再盖上木盖，然后扳动摇把儿，罗子就在罗柜里咣当咣当响起来，这是磨面这种农活的象征性声响。

“你也歇一下下儿。”

李十三听见夫人关爱的声音，瞅一眼摇着拐把的夫人的脸，那瘦削的肩膀摆动着。他抬起一只胳膊用袖头抹一抹额上脸上的汗水，不

仅没有停歇下来，反倒哼唱起来了：“娘——的——儿——”一句戏词没唱完，似乎气都堵得拔不出来，便哑了声，喘着气，一个人推着磨扇缓缓地转动，又禁不住自嘲起来：“老婆子哎！你说我本该是当县官的材料，咋的就落脚到磨道里当牛做马使唤？还算不上个快马，连个蔫牛也不抵……唉！怕是祖上先人把香插错了香炉……”

“命——”夫人停住摇把，从罗柜里取出罗子，把罗过的碎麦皮倒进斗里，几步走过来，又回到磨道里她的套路上，习惯性地抱住磨杠推起来，又重复一遍，“命。”

李十三似接似拒的口吻，沉吟一声：“命……”

李十三推着石磨。要把一斗麦子的面粉磨光罗尽，不知要转几百上千个圈圈，称得“路漫漫其修远兮”了。他的求官之路，类如这磨道。他十九岁考中秀才，令家人喜不自禁，也令乡邻羡慕；二十年后的三十九岁省试里考中举人，虽说费时长了点儿，却在陕西全省排在前二十名，离北京的距离却近了；再苦读十三年后到五十二岁上，他拉着骡子驮着干粮满腹经纶进北京会试去了。此时嘉庆刚主政四年，由纪昀任主考官，录取完规定的正编名额后，又拟录了六十四名作为候补备用的人。李十三的名字在这个候补名单里。按嘉庆的考制，拟录的人按县级官制待遇，却不发饷银，只是虚名罢了。等得牛年马月有了县官空缺，点到你的名字上，就可以走马上任做实质性的县官领取县级官饷了。李十三深知这其中的空间很大很深，猫腻狗骚都使得上却看不见。恰是在对这个“拟录”等待的深度畏惧发生的时候，失望同时并生了，做官的欲望就在那一刻断灭。是他的性情使他发生了这个人生的重大转折，凭学识凭本事争不到手的光宗耀祖的官衔，拿银子换来就等于给祖坟上泼了狗尿。

他依着渭河北部高原民间流行的小戏碗碗腔的种种板路曲谱，写起戏本来了。第一本名叫《春秋配》，交给田舍娃的皮影班社，得了田舍娃的好嗓子，也得了他双手绝巧的“耍杆子”的技艺，这个戏一炮打响，演遍了渭北的大村小庄……他现在迷在写戏的巨大兴趣之中，已有八本大戏两本小戏供那些皮影班社轮番演出……现在，他和夫人合抱一根木杠，在磨道里转圈圈，把田舍娃昨日晌午送来的麦子磨成白面，就不再操心锅里没面煮的事了……

“十三哥十三哥十三哥——”

田舍娃的叫声。昨日刚来过怎么又来了？田舍娃压抑着嗓门的连声呼叫还没落定，人已蹿进磨房喘着粗气。收住脚，与从磨道里转过来的李十三面对面站着，整个一副惶恐失措的神色。未等李十三开口，田舍娃仍压低嗓门说：“哥呀不得了咧……”

李十三喘着气，却不问，他和夫人在自家磨道推磨子，闭着眼也推不到岔道上去，能有什么了不得的祸事呢！那一瞬，他甚至料定田舍娃是虚张声势。虚张声势夸大事态往往是这些皮影艺人的职业习性。

“哥呀！皇上派人抓你来咧……”

李十三“嘿”的一声不着意的轻淡的笑：“你也算是当了爸的人了，咋还说这些没根没影的话……”

田舍娃见李十三不信，当下急得失了色变了脸，双手击捶出很响的声音，像道戏曲白口一般疾骤地叙说起来：“嘉庆爷派的差官已经到县上咧。我奶妈的三娃在县衙当伙夫，听到这事赶紧叫人把信儿传给我。我撂下饭碗赶紧跑过来给你透风报信。你还大咧咧地信不下……”

李十三打断田舍娃的话问：“说没说我犯了哪条王法？”

“‘淫词秽调’——”田舍娃说，“皇上爷亲口说你编的戏是‘淫词秽调’，如野草般疯长，已经传流到好多省去了。皇上爷很恼火，派专使到渭南，指名要‘提李十三进京’，还说连我这一帮演过你的戏的皮影客也不放手……”

田舍娃说着说着就自动打住口，哑了声。他叙述这个因由的过程，突出的眉棱下的两只燕尾形的眼睛一直紧盯着他亲爱的李十三哥，连扶着磨杠的嫂夫人一眼也顾不及看。他看着李十三由不信不屑不嗤的眼神脸色逐渐转换出现在这副吓人的神色，两眼瞪得一动不动一眨不眨，脸色由灰黄变成灰白，辨不清是气恨还是惧怕，倒吓得田舍娃不敢再往下说了。

李十三突然猛挺起身子，头往后一仰，又往前一倾，“噢”的叫了一声，从嘴里喷出一股血来。田舍娃眼见一道鲜亮如同朝阳的红光闪耀了一下，整个磨房弥漫起红色的光焰，又如同一条血的飞瀑，呼啸着爆响着飞溅出去，落在磨扇顶端已经磨碎的麦粒上，也泼洒在凿刻着石棱的磨扇上。磨盘上堆积着的尚未收揽的碎麦麸顷刻间也染红了，田舍娃“噢呀”惊叫一声，吓愣了。

李十三又挺起胸来，头先往后一仰，即刻再往前用力一倾，又一道血的光焰血的飞瀑喷洒出去，随之横跌在磨盘上，一只手垂下来。

田舍娃手足无措地站在一边，突然灵动过来，一把抱起李十三，轻轻地摆平仰躺在地上。夫人也早吓蒙了，忙蹲下身为李十三抚胸搓背，连声呼叫：“你不能走呀你甭走呀……”随之掐住了丈夫的鼻根。

许久，李十三终于睁开眼睛了，顺手拨开了夫人掐着他鼻根的手。稍停半刻，他两手撑地要坐起来。夫人和田舍娃急忙从两边帮扶着。李十三坐起来。田舍娃这时才哭出声来。夫人也哭了。

李十三舒了口气，看着田舍娃说："你咋不跑还在这儿？"

"你是这样子，我咋跑呀！"田舍娃说，"让人家把咱俩一块提走，我好招呼着你。"

李十三摇摇头："咱俩得跑。"

田舍娃忙接上说："就等你这句话哩，快走。"

李十三站起来，走了两步试了试腿脚，还可以走动，便对夫人说："你也甭操心了。你操心也是白操——皇上要我的命，你还能挡住？挡不住喀。我要是命大能跑脱，会捎话给你，会来取戏本的——这本戏刚写到热闹的当当儿，你给我藏好。"

两人装出无什么要紧事的做派，走出门，走过村巷，还和村人打着礼仪性的招呼。村人乡党打问今晚在哪个村子摆场子，舍娃说在北原上很远很远的一个寨子。乡党直惋叹太远太远了。两人出了村子，两人又从出村的这条宽敞的土路拐上一条一步多宽的岔路，两边是高过人头的苞谷苗子。隐入无边无际的苞谷绿秆之中，似乎有一种被遮蔽的安全感。两人不约而同又拐上一条岔道。岔道上铺满青草，泛着一缕缕薄荷的清香。两人又绕过水渠，清凌凌的水已经没有诗意了，渠沿上的白杨也没有诗意了。这渠水和这白杨是最容易诱发诗意的景致，他每一次踏过渠上的木桥或直接绕过这水渠的时候，都忍不住驻足品味，都忍不住撩起水来洗一把脸。现在只有奔逃的恓惶和恐惧了。李十三在用力跳过渠的时候，有一阵眩晕，眼睛黑了一瞬，驻足

的同时，又吐出一口血来。稍作缓息，田舍娃搀扶着他继续走着。两边依旧是密不透风的苞谷秆子，青幽幽闷腾腾的田野。走到这条小路的尽头，遇到一道土塄，分成又一个岔口。李十三站住脚：“咱俩该分手了。”

田舍娃愣了一下，头连着摇：“分手？谁跟谁分手？我跟你分手——我死都跟你不分手。”

李十三说：“咱俩总不能傻到让人家一搭儿抓了，再一窝端了一锅蒸了嘛！留下一个会唱会耍竿竿儿的（支撑皮影的竹竿）人嘛！”

“不成不成不成！”田舍娃的头摇得更欢了，“耍竿竿儿的人多，死了我还有那一大帮伙计，会编戏的只是你十三哥——死谁都不能死你。”

“是这样嘛——”李十三说，“咱俩谁都不该死。咱俩谁都不死当然顶好咧！现时死临头了，咱俩分开跑，逃过一个算一个，逃过两个更好。千万不能一锅给人家煮了蒸了。”

田舍娃还是听不进去：“你这么个病身子，我把你撂下撇下，我就是你戏里头写的那号负义的贼了。”

李十三说：“我的戏本都压在你的箱子里，旁人传抄的不全，有的乱删乱添，只有你拿的本子是我的原装本子。想想，把我杀了不当紧，我把戏写成了。要是把你杀了又抄了家，连戏本子都会给人家烧成灰了……你而今活着比我活着还当紧。”

田舍娃这下子不说话了。

李十三又说：“你活着就是顶替我活着。”

田舍娃出着粗气，眼泪涌出了。

“你的命现在比我的命贵重。”李十三再加重说，“快走赶快跑，哥的戏本就指望你了。”

李十三转过身走了。

田舍娃急抢两步，堵在李十三面前，扑通跪在路上，连磕三个响头，站起来又抱拳作揖者三，瞪着眼睛说：“我的哥呀！你放心走，只要有我舍娃子一条命，你的戏本一个字都丢不了！”

“你的命丢了，本子也甭丢。”李十三也狠起来，“你先把戏本藏好再逃命。”

“记下了。”田舍娃跑走了，跑到一畛谷子地里，对着坡塄骂了一句，“嘉庆呀嘉庆，我没有你这个爷了。”

田野静寂无声。

李十三顺着这条慢坡路走着。他想到应该斜插到另一个方向的梯田里去，谁会傻到顺着一条上渭北高原的官路逃亡呢？他不想逃跑，又不想被抓住。他确凿断定自己活不了几个时辰了。他只不过不想死到北京，也不想活着看见那个受嘉庆爷之命前来抓他的差官的脸。他也不想死在磨道里或死在炕上，那样会让他的夫人更恓惶，活着没能让她享福，死时却可以不让她受急迫。他也不想死在田舍娃当面，越是相好的人越想死得离他远点。

莽莽苍苍的渭北高原是最好的死地。

李十三面朝着渭北高原背对着渭河平原，往前一步一步挪脚移步，他又吐出一口血。血把脚下被人踩踏成细粉一般的黄土打湿了，瞬间就辨不出是血是水了。

再挣扎到一个塄坎上的时候，他又吐血了。

当他又预感到要吐血的时候，似乎清晰地意识到这是最后一口所能喷吐出来的血了。他已经走出村子二十里路了，在这一瞬转过身来，眺望一眼被绿色覆盖的关中和流过关中的渭河。他吐出最后一口血，仰跌在土路上，再也看不见渭北高原上空的太阳和云彩了。

附记

约略记得是上世纪五十年代末，我在周六从学校回家去背下一周的干粮，路上的男男女女老人小孩纷纷涌动，有的手里提着一只小木凳，有的用手帕包着馒头，说是要到马家村去看电影。这部电影是把秦腔第一次搬上银幕的《火焰驹》，十村八寨都兴奋起来。太阳尚未落山，临近村庄的人已按捺不住，挎着凳子提着干粮去抢占前排位置了。我回到家匆匆吃了饭，便和同村伙伴结伙赶去看电影了。“日行千里夜行八百”的火焰驹固然神奇，而那个不嫌贫爱富因而也不背信弃义更死心不改与落难公子婚约的黄桂英，记忆深处至今还留着舞台上那副顾盼动人的模样。这个黄桂英不单给乡村那些穷娃昼思夜梦的美好期盼，城市里的年轻人何尝不是同一心理向往。直到五十年后的今天我才弄清楚，《火焰驹》的原始作者名叫李十三。

李十三，本名李芳桂，渭南县蔺店乡人。他出生的那个村子叫李十三村。据说唐代把渭北地区凡李姓氏族聚居的村子，以数字编序排列命名，类似北京的××八条、××十条或十二条。李芳桂念书苦读一门

心思为着科举高中，一路苦苦赶考直到五十二岁，才弄到个没有实质内容的“候补”空额，突然于失望之后反倒灵醒了，便不想再跑那条路了。这当儿皮影戏在渭北兴起正演得红火，却苦于找不到好戏本，皮影班社的头儿便把眼睛瞅住这个文墨深不知底的人。架不住几个皮影班头的怂恿哄抬，李十三答应“试火一下”。即文人们常说的试笔。这样，李十三的戏剧处女作《春秋配》就“试火”出来了。且不说这本戏当年如何以皮影演出走红渭北，近二百年来已被改编为秦腔、京剧、川剧、豫剧、晋剧、汉剧、湘剧、滇剧和河北梆子等。这一笔“试火”得真是了得！大约自此时起，李十三这个他出生并生活的村子名称成了他的名字。李芳桂的名字以往只出现或者只应用在各级科举的考卷和公布榜上，民间却以李十三取而代之。民间对“李芳桂”的废弃，正应和着他人生另一条道路的开始——编戏。

李十三生于一七四八年，距今二百六十年了。我专意打问了剧作家陈彦，证实李十三确凿是陕西地方戏剧碗碗腔秦腔剧本的第一位剧作家，而且是批量生产。自五十二岁摈弃仕途试笔写戏，到六十二岁被嘉庆爷通缉吓死或气死（民间一说吓死一说气死，还有说气吓致死）的十年间，写出了八部本戏和两部小折子戏，通称十大本：《春秋配》《白玉钿》《火焰驹》《万福莲》《如意簪》《香莲口》《紫霞宫》《玉燕钗》，《四岔》和《锄谷》是折子戏。这些戏本中的许多剧目，随后几乎被中国各大地方剧种都改编演出过，经近二百年而不衰。我很自然地发生猜想，中国南北各地差异很大的方言，唱着说着这位老陕的剧词会是怎样一番妙趣。不会说普通话更没听过南方各路口音的李十三，如若坐在湘剧京剧剧场里观赏他的某一本戏的演出，当会增聚起抵御嘉庆爷捉拿的几分胆量和气度吧，起码会对他点灯熬油和推磨之辛劳，添一分欣慰吧！

然而，李十三肯定不会料到，在他被嘉庆爷气吓得磨道喷吐鲜血，直到把血吐尽在渭北高原的黄土路上气绝而亡之后的大约一百五十年，一位秦腔剧作家把他的《万福莲》改编为《女巡按》，大获好评更热演不衰。北京有一位赫赫盛名的剧作家田汉，接着把《女巡按》改编为京剧《谢瑶环》，也引起不小轰动。刚轰动了一下还没轰得太热，《谢瑶环》被批判，批判文章几成铺天盖地之势。看来田汉胆子大点儿气度也宽，没有吐血。

一切都已成为过去。过去了的事就成历史了。

我从剧作家陈彦的文章中，获得李十三推磨这个细节时，竟毛躁得难以成眠。在几种思绪里只有一点纯属自我的得意，即我曾经说过写作这活儿，不在乎写作者吃的是馍还是面包，睡的是席梦思还是土炕，屋墙上挂的是字画还是锄头，关键在于那根神经对文字敏感的程度。我从李十三这位乡党在磨道里推磨的细节上又一次获得确信，是那根对文字尤为敏感的神经，驱使着李十三点灯熬油自我陶醉在戏剧创作的无与伦比的巨大快活之中，喝一碗米粥吃一碗黏（干）面或汤面就知足了。即使落魄到为吃一碗面需得启动六十二岁的老胳膊硬腿去推石磨的地步，仍然是得意忘情地陶醉在磨道里，全是那根虽然年事已高依然保持着对文字敏感的神经，闹得他手里那支毛笔无论如何也停歇不下来。磨完麦子撂下推磨的木杠，又钻进那间摆置着一张方桌一把椅子一条板凳的屋子，掂起笔杆揭开砚台蘸墨吟诵戏词了……唯一的实惠是田舍娃捐赠的二斗小麦。

同样是这根对文字太过敏感的神经，却招架不住嘉庆爷的黑煞脸，竟然一吓一气就绷断了，那支毛笔才彻底地闲置下来。我就想把他写进我的文字里。

2007年5月9日 二府庄

追述一首词的成因

小刘自广州打电话来约稿，为庆祝香港回归十周年，且指定要写一首诗。我顿然一愣，这是出乎意料的本能性反应，约我作文写稿的编辑不少，而约我写诗者多年也难得一遇。我随之告诉她，我在香港回归前夕曾填过一首词，自我感觉颇好，请她翻检出来看看如何。过了两天，她打电话过来，说她找我的文集，也找到那首标着“酹江月——香港回归感赋”的词，说她很喜欢，顺口便给我说出其中几句来。我感到了鼓舞，也顿然兴奋起来，一首诗或词，能被人过目之后记下几句，这是对作者最高的奖彰了。

这首词作于十年前的六月，正是香港回归倒计时的钟声敲到最后几槌的时候，也是中国人被这槌击的钟声撩拨得几乎不可按捺的时候，我也是每晚在中央台被那钟声撞击得怦然心动的一个中国人。这时候接到《光明日报》一位编辑朋友电话，约我写这个题材的短文，我有了表述自己独特感受的出口和渠道，便满口应承下来。在我写这篇短文时，却觉得不知从何说起，转念之间竟涌出一首词来。尽管我素来深深畏怯名目繁多的古体词牌严密的平仄格律，却也顿生勇气不管不顾了，只求得词意顺畅，节奏明朗，可以尽兴倾泻那份情感就行了。这是我为数不多的诗词里，填写得最痛快也最顺手的一首。

那真是一个激荡情感的日子。我的心里敲响着倒计时的钟声。我无法阻止这样的联想，“丧钟为谁而鸣？”在我们听来是欢欣鼓舞雪一百年之耻的钟声，响在殖民者心头的回声无疑是丧钟。这是无法替改无法逆转也无法掩耳回避的钟声。

伴着这倒计时的钟声，我的心里就只轰响着一句四川口音的声音：“主权是不能谈判的。”任谁都知道这是邓小平的语言。这句话没有加一个字的修饰，也不见任何带锋芒的字词，却是一种最准确最坚定的表述，没有任何含糊，容不得对手任何回旋的余地，连试探和商议的可能都不留一丝空间，甚至容不得你把思谋已久的话说出口来。这是最典型的邓小平语言。这是关于香港回归这个历史性盛事的最核心的语言表述，最恰当最简约的邓公语言风范，一个个人魅力鲜明的大国领袖的精神气质胸怀气象便弥漫开来。

我再一次回嚼着邓公这句经典话语的时候，又想起了我的陕西乡党蒲城人王鼎。他是道光帝的宰相兼军机大臣，又是道光帝幼学的老师。道光向他征询派谁去广东禁烟时，他极力推荐了林则徐。道光帝后来惩罚林则徐，把他贬斥到新疆的同时，也把王鼎支使到河南去防洪治水，不想再听他与皇帝相逆的絮絮叨叨。王鼎治水完工回到朝廷，道光帝已经完全被穆彰阿等投降派掌控，他孤立无援却不改易主张，与穆彰阿、琦善碰面时已经不再辩理，而是动粗破口大骂，直到扯住道光帝的龙袍，不抗敌不禁烟便不得退堂下朝……最后绝望的是我的乡党王鼎，他跑到圆明园，用一丈白绫把自己悬到梁上，企望以死谏影响道光皇帝。他把一绺写着谏言的字条揣在怀里，后人把其内容概括为“四不可”：“条约不可轻许。恶例不可先开。穆不可用。林不可弃。”……王鼎的谏言和他的性命，挡不住英国的坚船利炮，也挡不住投降派的唾沫儿，更谏不醒道光帝软弱里苟且偷生的梦。

香港回归后次年的冬天，我到蒲城县寻访王鼎的足迹，在一个土打围墙的院子里，有几样王鼎的遗物和照片。我面对这个血性汉子，吟诵了邓公“主权是不能谈判的”的话。从他舍命都不能改变一个国家

和民族的耻辱，到邓公沉毅地把这句话说给撒切尔夫人的时候，我更切实地体验到什么叫尊严。

2007年6月13日 二府庄

附：

酹江月

——香港回归感赋

云开飞虹，神州望，钟声撩拨心声。分分秒秒，重如槌，教我泪纷血涌。北国南海，演歌练舞，期盼七月同庆。铁栅断处，血脉一日接通。 难诉百五十年，屈辱一页，兽行到寿终。“一国两制”大思维，主权不可议争。壮哉斯言！纵有铁腕，难续旧梦。何须再问，“丧钟为谁而鸣”！

1997年6月20日

沉默的山

——军营笔记之一

从已经呈现着繁华的城市一进入山区，眼里便纯粹了，只有深浅不同的绿色和裸露的岩石。一座座山头多呈圆顶，可以看到土黄色的沙石底构，草长得不密更不高。零星有几株树，大约得了石头缝沟的难得机遇，才得以扎下根去撑起一方风景。愈往山的深处走，山坡和沟壑的绿色渐次加深，树木已结成密不透风的丛林，一派葱茏的绿。

这是大山腹地的一个兵营。一个令外部世界异常神秘更尤为敏感的所在，这里是一个导弹发射场。这里驻扎着一个营的士兵。夹在几座连接着山之间一绺稍为宽绰的沟道里，有一块缓坡地，被几代官兵许多年连续开发修整，建成一方清爽悦目的居住地。几排说不上阔绰却很实用的平房，红砖红瓦、木窗木门，在清水绿山间构成一道爽亮畅朗的景致。借着地势，修成一方连一方的平场，上下之间用水泥台阶连通，平台上栽植着花草。一脉山泉流经营区，已用水泥砌成整齐的水渠，渠边不足两脚宽的平台，栽植着葡萄，可见设计者和修建者一腔的诗情画意。葡萄管理得一丝不苟，在水渠上蓬勃出一道风景，一串串尚未成熟的绿色葡萄串令我心动。

这个营地是一九六一年开辟建立的。起因是毛泽东在此前说了一句话，“原子弹这个东西，别人有，我们也得有，要不，说话就不算数，我们也要搞一点原子弹”。我先看到随之又听到这句“语录”时，颇有点惊诧，毛泽东是一个诗性和激情洋溢的人，他的著作和大量的批文，都洋溢着诗性质地；关于原子弹要不要搞的批示，不加一字一句

的修饰词，直白简略，却把如此重大的决策说得透彻无遗；其口吻不像是行笔下的文字，更像是与人说一件轻淡之事的轻松语气，胸怀和气度尽在那平直的文字和平淡的语气之中了。此话一出，很快便有了这支进驻大山的部队，拉开了中国导弹部队建设的序曲。道路是披荆斩棘开辟出来的，平场是镢头铁锨改造出来的，流血流汗是任谁都可以想象得到的常有的必然的付出。我尤其敏感的是时间，正发生在中国普遍发生的记忆深刻的年代，那一批进入深山老林创建中国第二炮兵的官兵，就更有着非凡的贡献和牺牲精神的意义。四十六年过去了，这个隐蔽在大山深谷密林中的营地，来了又走了多少茬新兵和老兵，洒下他们的汗水、刻下他们的忠诚、献出他们的智慧，把中国的导弹营地建造成功了，有的佼佼者已成为将军了。现在，一拨又一拨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人才，相续着走进这座军营，默默奋斗在这深山老林之中，铸造着共和国的利剑，也铸造着共和国的隐形长城。为着我们可以在世界上平等说话。

有一位叫张环节的老班长，三十一岁时不幸患绝症去世。在他的班里当过兵的人，至今回忆叙说起来仍忍不住热泪涌流，领导过他的军官更是赞不绝口，那是一个类似雷锋也区别于雷锋的模范士兵。有一个调皮的城市籍的新兵，情绪易变，在他真诚的影响下发生了人生的重大转折，现在已是一位军官了。他向我们叙说张环节的时候，仍然止不住热泪。

午饭是在军营食堂吃的。之后有半个多小时的休息时间，我被安排到营长的卧室，同行的作家朋友说我有不足一小时的营长当当。我便走进营长宿办合一的房间，左首靠墙是一排书架，最简易的一种，摆列着各种书籍，有人文历史和政治军事等专著，有不少翻译出版物，多为世界名著。从读书可以知人的襟怀和性情，这个营长显然已

不再是八路军的营长了。小小的屋子里，摆两张书桌，靠南窗的书桌供写字读书，窗外是伸手可触的山坡上的枝叶；另一张书桌在右首，放着一台电脑，当是现代军人的标志；北窗下是脸盆架和水桶，用水需自己去打。再就是一张洁净清爽的硬板床。我躺在这张床上，竟然眯了一刻钟，不仅圆了我年轻时错失的军旅梦，而且当了一回短暂的营长。

导弹部队的兵和官都说他们是沉默的兵。是的，如山一样的沉默。但愿他们永远沉默。如果这世界上某一天有一个疯子逼得他们无法保持沉默，将是怎样一种积久沉默的喧哗。无疑，受挑衅和伤害的祖国和人民，都会把期待的眼睛遥望到这大山里来。那时候的远方山地，将是雄狮猛虎腾跃呼啸的山了。但愿永远沉默不语。

2007年7月18日 二府庄

在原下感受关中

我后来才意识到，看取社会的角度和看取生活的对象都是乡村，尤其是我生活和工作过大半生的灞河区域，完全是一种无意识亦无任何自觉的事，也是在一种无可选择的单纯里自自然然发生且持续做着的事。

且不说毛泽东一九四二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里论证的创作与生活的关系，并号召作家到工农兵火热的生活中去，后来甚至闹到要对那些留恋城市的作家“押解下乡”的严重程度。我对深入生活向来就不认为是个问题，我生活在农村，父母妻儿都是指靠生产队的磅秤分配的麦子苞谷的多少，决定碗里的稀或稠的。我从学校毕业后，走进只有一座教室和一个单间独庙改做的办公室的乡村初级小学，后来又走进最低一级行政建制的公社，现在已改称乡镇了，整整二十年。我获得专业创作的优越条件后，没有从西安城郊搬进市区，反倒彻底回归老祖宗遗传下来的屋院，尽管椽朽瓦破透光漏雨，我在这屋院里又住了十年。到走进西安住到作协家属院的小楼时我已跨过五十岁。我的前五十年都是在乡村过的，差别仅仅只是身份：乡村孩子兼乡村学生，乡村教师身份是民办性质，当公社干部，一年有三季都住在村子里的农民家中；当专业作家，又生活在只有六十余户人家的以陈姓为主的村子里。我曾经调侃说，柳青在长安县从头到尾工作和生活十四年，成为文坛传诵至今的佳话，我在农村五十年倒没有谁在乎。

我五十年里所看到的世界，是乡村；我五十年里所感知的人生，是乡村各色男女的人生；我五十年里感受生活的变迁——巨大的或细

微的、欢乐的或痛苦的，都是在乡村的道路乡村的炊烟乡村男女的脸色和语言里体验的。我对离我不过五十里的西安，进去出来不知几百成千回了，却形成一种感觉里的陌生和隔膜。当我可以拿钢笔在稿纸上书写我对生活的理解和体验的时候，乡村就成为无可选择的唯一，是顺理成章的事。我在初中二年级的作文课上写下平生的第一篇小说《桃园风波》，不仅是农村题材，而且就是我的村子里私有果园归入农业合作社时发生的矛盾所引发的。我在公社（乡镇）工作的十年里，正值“文革”，文学创作先被禁绝和后来稍作放松，我早已确定想吃文学创作这碗饭是靠不住的，偶尔的一点写作，只是过一过文学写作的“瘾”，专心致志于基层乡村的工作了。这样就很明确也很单纯，我在乡村是做工作的，不是为体验生活积累素材的目的，倒让我避免了睁着艺术家的眼睛支着艺术家的耳朵去看去听乡村，而是在各种工作的过程和各色乡村人共事处事，吻合的愉快和不合的争执，在快乐和焦虑里感知各种生活经历和个性特征的男女。到后来世事发生重大的转折，文学创作和各项事业一样重现生机，我感到创作这碗饭可以争取的时候，顿然意识到曾经的乡村生活全都派上了用场。

我的乡村生活是无意识里形成的一方狭窄的天地。在西安市郊的东南角落，属于渭河平原的关中的东南一隅。灞河从我家门前流过，古人在灞河桥头折柳送别泪溅柳叶，我后来领工为灞河修筑了八里防洪河堤，至今依然发挥着防洪的作用。稍西边有浐河从秦岭流出，河边曾是六千多年前新石器时期的“半坡人”群居的村落。我家的后院就是白鹿原的北坡坡根，我从小就厌烦这道坡，跟着父亲上坡去劳动特别费劲；只有在不依赖这坡地吃饭穿衣的时候，我才有文人的雅兴生出来，欣赏原坡上的四时景致，也才发生了探问这个原的生活演进的隐秘。夹在灞河和浐河之间的这一方土地，我在其间奔走了整整五十年，咀嚼了五十年，写下了一篇篇或长或短的小说和散文。

应该说，我生活的地方地域，属于关中的边沿。西安古城也不在关中的中部，而在东部偏南的位置。近年间起于各种因由，我在关中多走了一些地方，见多了听多了反倒愈加不敢开口说话了。只有我的感觉是这种障碍的不可逆改或硬撑的成因，面对这块土地上或地表下残存的历朝各代的遗物，我发现我的口再难随意张开了。我在西安西南一隅的沣水东岸，看到周人存留的车马坑里，木制轿车的轮子和拽车骡马的白骨，镶嵌在略显深褐色的黄土里，这是现今能看到的两千多年前曾经富于生命活力的冰凉的骨骼。我在渭北高原看过几座唐朝皇帝规模巨大的墓冢，墓前排列着的石兽和百官雕塑，突然觉得这些权力如天的帝王太过愚蠢，花那么大的财力物力修筑这种豪华场景，自己不仅欣赏不了享受不了，倒招引盗宝贼挖一道通风漏气的洞，甚至连尸体也被扔得七零八落。这是我现在能看到的历史实物，而王朝里的种种秘闻，只有文字。不同版本里的文字常常相违，我真是没有耐心去辩证，就不敢轻易说话了。更重要的制约，我开始怀疑自己的感知究竟有多少用处，如果没有用，说了等于白说或没说。

近年间我的兴趣常发生在一些人物身上，即生活在关中的一些令我肃然敬仰的人。譬如柳青，创造过十七年小说艺术高峰的作家；譬如灞河边上的老乡孙蔚如，直接参与“西安事变”，又在中条山打得日本鬼子过不了潼关，保护古都西安不受鬼子蹂躏的民族英雄；譬如堪称伟大的剧作家李十三，能编成十大本至今还在演着的戏剧，却招架不住嘉庆皇帝一声“捉拿”的断喝，在磨道里推着石磨时吓得吐血……我无力为他们立传，却又淡漠不了他们辐射到我心里的精神之光，便想到一个捷径，抓取他们人生里最富个性的一两个细节，写出他们灵魂不朽精神高蹈的一抹气象来，算作我的祭奠之词，以及我的崇拜之意。如果有幸，留给关中，也留给关中以外的世界，作为我对故乡关中的回报。

2007年7月21日 二府庄

走进铁军

——军营笔记之二

在即将踏进一二七师营地时，我的心里已潮起肃然。

这是铁军。即使如我这样几乎完全隔绝军事的人，仅凭一点革命历史常识，也深知铁军的威风和威名。这是由中国共产党创建并领导的第一支正规武装力量，诞生于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时期，命名为独立团，叶挺为第一任团长。这个主要由共产党员组成的独立团，北伐时一出手就显示出不凡的品相，打进武汉就赢得了市民的铁军的赠誉。铁军参加了南昌起义。铁军参加了毛泽东的三湾改编，是毛泽东提出把支部建在连队的第一批实践者。铁军是长征的先行队，几场至关重要的生死之仗都打胜了，四渡赤水、抢渡乌江、飞夺泸定桥等，这些在中外战史上堪称神话般神奇的赢仗，都是铁军参与创造出来的。这支铁军直到解放全中国再到现在，当是从起头到今天最完整地走过人民解放军发展壮大全过程的一支部队。我在中学课堂上就知道了铁军，五十年后终于有机缘走进铁军军营来了，肃然是很自然发生的情感。

我看到一辆又一辆不同功能的坦克和装甲车。我被允许爬上一辆坦克，驾驶舱盖打开着，第一次看见真实坐在狭窄的驾驶舱里的一个士兵，便和他交谈起来。这是一个四川籍的士兵，刚满二十岁，入伍两年，已是车长了。我端详着这个车长，瘦瘦的黑黑的结结实实的。我问一句他答一句，可以看出腼腆，却不是畏怯，眉眼里一满都是诚朴和单纯。我问到暑天和数九天车里的冷暖，他说热时达到四十多

度，冷时也就可想而知了。无论暑天太阳强照或三九天寒风呼啸，这个铁疙瘩无疑都具备最敏感的传导性能。他说到冷热时不动声色更不动情感，肯定是久经历练习以为常不在话下了。然而他仅仅只有二十岁，还是个大孩子。我已经喜欢上这个淳朴的车长，便向身边一位军官请示，想和他照张相，得到许可。这位车长从驾驶舱出来，和我照相，几位作家都爬上坦克和他照相。那一刻，我是他的崇拜者。

我还是第一次观看士兵的军事技能训练和火炮打靶。一只像跷跷板一样支着的长方形铁皮箱里，钻进去几个士兵，一头被拽下，另一头便翘到空中，反复起落便反复颠簸，受训的士兵在箱中该是怎样一种滋味？这是为着生理和心理的适应性而特设的训练项目。还有一项钻火圈，连续摆列的钢圈上泼洒着汽油，点燃起烈焰，一个一个士兵跃起钻过，如鱼儿般轻捷自如。早晨还下着大雨，地上是水潭和稀泥。士兵从火圈鱼贯而过扑跌到泥水里，随即爬起又冲向另一个火圈。同样是心理训练，为锻铸一种冲锋的勇气，杀向刀山火海的勇敢精神和强势心理。更令我感到惊心动魄的一幕是，士兵从正在行进着的坦克底下爬过去了，泥水已不足在乎。我看着在泥水里燃烧的火圈中和滚动的履带间跃动着的士兵的身影，不觉之中泪水模糊了眼睛。我刚刚从城市走进旷野里的训练场，一下子还无法把这里发生的事和城市里的影像连接起来。愈来愈美丽的城市，街心花园的一棵花树和一株草，都接受着可以说无微不至的呵护和保养，更不要说这个盛夏季节里闪过街头的俊男靓女万紫千红的时装了；稍为褪色的口红文眉等不及坐下来修整，在大街上一边行走一边对着镜子描画……而在这远离城市的山野泥水里的士兵，壮健的身躯跃进跳腾的身姿，却展示着生命无与伦比的活力。

前天在另一个兵营，我听到一支士兵创作士兵演唱的歌曲。我一遍听下来便记住了其中最为撞击我心灵的两句：“兵的守候，兵的支撑”。这是从士兵胸怀里流淌出来的誓词，含蓄却又饱满，无疑是新世纪士兵情感和壮怀的表述形式，不再是“我是一个兵，来自老百姓”那样的语言方式了，然而核心的质地是一样的崇高。现在，在铁军士兵的训练场上，我不仅看到他们“守候”和“支撑”的内涵，而且看到他们为完成“守候”和“支撑”义无反顾的行为。我也很自然地浮起一幕陈旧的历史图景，地图上不足小拇指盖大的国家，都曾经长驱直入到中国来划界圈地。那个时候的中国，缺失了“守候”的意志，也没有“支撑”的力量。现在有了，铁军在。

火炮实弹打靶，于我真是惊心动魄。这是中国制造的几种性能最先进的常规炮，轰天撼地的响声尚未落下，裹着火焰的炮弹曳过空中，划出一道壮丽的弧线，击中对面山坡上的目标，腾起一团白色的烟雾。几枚火炮合打一个目标时尤为壮观，从不同方位同时发射的炮弹，织成一方火的湍流，击中同一靶心。此刻，连最含蓄的人都跃起欢呼了，我老汉自不例外。

这是今天的铁军。应该是秉承着自创立以来的意志和作风的铁军，又是比任何时候装备更精良、心理更强悍的铁军。人的脊梁隐藏在体内，支撑着直挺的身躯；铁军和人民解放军的各个兵种形成的合力，是我们国家和民族的脊梁，支撑着民族和国家的尊严。这样，每一个公民才能坦然愉快地做自己想做的事，自然包括我和同行等怀着各种艺术趣味的作家，自然也包括一边走路一边抹着口红的女孩……

2007年7月25日 二府庄

你让我荡气回肠

——《华夏龙脉》群雕·碑文

这是一组令我荡气回肠的石雕雕塑群。在我阅览的过程中，无意识间涨起关于一个民族的豪壮之气和骄傲的情怀，脊梁顿然挺直起来。

我们的历史太过沉重。大小王朝的兴起和颠覆都演绎着杀戮，是以无数的生灵涂炭为代价的。以理性和情感的双重视角审视五千年的文明史，都是对国家和民族未来不容苟且的严峻。然而，我不想沉湎在明杀和暗陷的痛切之中，尤为珍惜更加敬仰历史进程中的阳光。世间一切有生命的物种都仰赖太阳，一个民族和国家文明的开创和推进，是由那些出类拔萃卓有建树的人实现的完成的。我看他们就是我们漫长的历史进程中撒播阳光的人。这组群雕所选取的历史人物和历史故事，包括神话传说开天辟地的盘古，以及开凿架铺栈道的工匠，都是富于建设和创造意义的阳光英雄。我便心领神会，这组石雕的创作人与我看取历史的心情相吻合。

这组名为《华夏龙脉》的雕塑镶嵌在秦岭腹地，恰切而又传神。龙是中华民族的象征和图腾。横亘在华夏大地中腰巍峨雄浑的秦岭，是相伴母亲河——黄河的父亲山，正恰如既威严持重又摇曳多姿的龙。秦岭把中华大地分隔为南北，形成北国岭南无限风物风情的万千气象，更哺育和影响着华夏悠久的可资骄傲于世界的文明的进程，造就了中华文明独立独秀于世界的个性与风采。一百一十五万年前的蓝田猿人、六千年前仰韶文化的半坡人、始祖炎帝和黄帝族居之地以及

陵寝，都紧依着父亲山——秦岭的北坡。盘古当是后人创作的概括了他们精髓的神化了的英雄。石雕群中遴选的人物，都是对华夏文明具有开创意义和对中国历史进程具有决定性影响的英雄，既是龙的传人龙的子孙，也是龙的精神的彰显和象征。他们组合在一起，镶嵌在秦岭，正构成一部简约的华夏文明史，也张扬体现着秦岭内在脉象——龙脉。

巍峨雄浑的秦岭，史圣司马迁冷峻地视为“天下之大阻”，在中国第一浪漫派诗人李白眼里，竟然是一唱三叹为“难于上青天”。今有四万筑路专家和工人，以富于创造性的智慧和无坚不摧的成就事业的雄心和毅力，把一条最直接便捷的高速公路铺展在秦岭之间，成为岭南岭北人民的阳光坦途，也为秦岭这条华夏龙注入了新的血液，让这龙脉更富于活力和灵气。雕塑家无疑是深得古今神韵的大手笔，着力铆劲处可见刀锋利刃粗犷的刻痕，精雕细刻处显现着绣花裁纸的丝丝入扣的纹路，可以猜想艺术大家对民族精英的敬仰之情，也可感知洋溢着的才华。这样，就有了一组震撼人心的《华夏龙脉》的雕塑，与作为龙的象征的秦岭融为一体，铸成永久。

2007年8月14日 二府庄

第一次借书和第一次创作

——我的读书故事之一

上到初中二年级，中学语文老师搞了一次改革，把语文分为文学和汉语两种课本。汉语只讲干巴巴的语法，是我最厌烦的一门功课，文学课本收录的尽是古今中外的诗词散文小说名篇，我最喜欢了。

印象最深的一篇课文是《田寡妇看瓜》，一篇篇幅很短的小说，作者是赵树理。我学了这篇课文，有一种奇异的惊讶，这些农村里日常见惯的人和事，尤其是乡村人的语言，居然还能写文章，还能进入中学课本，那这些人和事还有这些人说的这些话，我知道的也不少，我也能编这样的故事，写这种小说。

这种念头在心里悄悄萌生，却不敢说出口。穿着一身由母亲纺纱织布再缝制的对襟衣衫和大裆裤，在城市学生中间无处不感觉卑怯的我，如果说出要写小说的话，除了嘲笑再不会有任何结果。我到学校图书馆去了，这是我平生第一次踏进图书馆的门，冲着赵树理去的。我很兴奋，真的借到了赵树理的中篇小说单行本《李有才板话》，还有一本短篇小说集，名字记不得了。我读得津津有味，兴趣十足，更加深了读《田寡妇看瓜》时的那种感觉，这些有趣的乡村人和乡村事，几乎在我生活的村子都能找到相应的人。这里应该毫不含糊地说，这是我平生读的第一和第二本小说。

我真的开始写小说了。事也凑巧，这一学期换了一位语文老师，是师范大学中文系刚刚毕业的车老师，不仅热情高，而且有自己一套教学方法。尤其是作文课，他不规定题目，全由学生自己选题作文，

想写什么就写什么。这真是令我鼓舞，便在作文本上写下了短篇小说《桃园风波》，大约三四千字或四五千字。我也给我写的几个重要的人物都起了绰号，自然是从赵树理那儿学来的。赵树理的小说里，每个人物都有绰号。故事都是我们村子发生的真实故事，农业生产合作社由初级转入高级，把留给农民的最后一块私有田产——果园也归集体，包括我们家的果园也不例外。在归公的过程中，发生了许多冲突事件，我依一个老太太的事儿写了小说。同样不能忘记的是，这是我写作的第一篇小说，已不同于以往的作文。这年我十五岁。

车老师给我的这篇小说写了近两页评语，自然是令人心跳的好话。那时候仿效苏联的教育体制，计分是五分制，三分算及格，五分算满分，车老师给我打了五分，在五字的右上角还附添着一个加号，可想而知其意蕴了。我的鼓舞和兴奋是可想而知的，同桌把我的作文本抢过去看了老师用红色墨水写的耀眼的评语，一个个传开看，惊讶我竟然会编小说，还能得到老师的好评。我在那一刻里，在城市学生中的自卑和畏怯得到缓解，涨起某种自信来。

我随之又在作文本上写下第二篇小说《堤》，也是村子里刚成立的农业社封沟修小水库的事。车老师把此文推荐到语文教研组，被学校推荐参加西安市中学生作文比赛评奖。车老师又亲自用稿纸抄写了《堤》，寄给陕西作家协会的文学刊物《延河》。评奖没有结果，投稿也没有结果。我却第一次知道了《延河》，也第一次知道发表作品可以获取稿酬。许多年后，当我走进《延河》编辑部，并领到发表我的作品的刊物时，总是想到车老师，还有赵树理的田寡妇和李有才。

2007年12月10日 二府庄

一个人的声音

似乎真的难以抗拒进入这个年龄区段，便容易对生活世相发生感慨的特点，即使我对这种生理现象时有提防，避免发生常见的那种不由自控的唠叨惹人生厌，仍然还有提防不住的时候。前几日，李星打电话告知他要出文集，当即表示祝贺，完全是出于一种本能的心理反应，又忍不住发生感慨。发自本能的祝贺，是我深知文集这种文体对一个作家和评论家多么重要，可以说是一生追求的归结；然而，这种文体的文本很难畅销，出版社一般都会亏本赔钱的，向来出书难，出一本纯粹文学评论的文集就更难了，才说我的兴奋之情是出于本能。感慨则纯粹发自李星这个和我差不过两岁的同代评论家。

结识李星，完全是文学的缘分；和李星低头不见抬头见，算来竟有三十四五年了，也是文学的纽带牵携着。大约是在“文革”后期的一九七三年，被砸烂的作家协会和被驱散的作家编辑，得了上级新的政策，重新聚拢，挂起了陕西文艺创作研究室的新牌子，把原先在中国文坛颇具声望的文学刊物《延河》，改为《陕西文艺》重新出版，老作家大多数心存余悸一时进入不了创作，刊物便倚重“工农兵”业余创作爱好者。新时期一拥而上中国文坛的那一批陕西青年作家，绝大多数都是先在《陕西文艺》杂志上练习写作基本功的，我是其中之一。我在《陕西文艺》发表了平生的第一个短篇小说，才有机缘走进位于东木头市的陕西文艺创作研究室的院子，也才有机缘认识李星。李星从中国人民大学毕业刚刚分配到文艺创作研究室，是最年轻的编辑，我却仍然有点心怯。这是毫不夸张的真实心态，因了我没有实现的接受高等教育的梦想，对李星这位从名牌大学毕业的同代人，岂止艳羡，早已隐隐着一种怯的心态了。那时候我还在西安东郊一个公社

（乡）工作，《陕西文艺》编辑部常召集业余作者开会，便有了和李星接触的机会，感觉他很随和，不是姿态性的随和，而是出自个性里的天然，我的那种怯着的心态渐渐淡释。尤其是得知他来自兴平农村，闲聊中说到乡情和家境，和我多有相似的经历和共同的感受，很自然地涨起亲近感，“名牌大学”的副作用也消失了。几十年过去，几乎是谁都不曾在意更无心留神的匆匆一瞬，他和我相继都“退了”。我至今记得两年前相见的一个细节，他到我的办公室，开口便说刚刚办完退休手续，给我打声招呼。我安慰了他几句，不做惊讶状。然而，送他出门以后，我望着他的背影消失在他即将告别的办公室门里，再回转身坐下去的时候，腿有了软的感觉。我什么文章也看不进去，什么事也不想做，脑子里就连续鸣响着一个声音，李星退了，李星退了，李星……我自然想到我的年龄，也该退了，却又不完全是退，真切地感受到某种伤痛的不堪，岁月竟是如此的急迫和短促。我想起在东木头市陕西文艺创作研究室院子里初识李星时，那一张虽然偏黑却泛着红光的青春脸膛，又浓又密的自生卷发，眼里总是显出一缕与年龄似乎不相称的天真。我后来调到作家协会，和他在一个院子办公，在同一幢楼上起居，真是抬头见低头也见，一天不见似乎就少了点什么。眼见着这人的胡须一年比一年浓密，脸孔从青春洋溢到中年明朗再到花甲的平和，头发由黑变灰再变白，似乎觉得自自然然原本也就该这样，没有惊讶没有感慨，甚至连多一分在意也没有。突然就在完全无备的那个上午，他走进我的房子说他办完退休手续了……我才在如同被猛然当胸一击里不知所措，才意识到属于供职年限的最后一个年头走到头了。以往多年，他也是这样随意走进我的办公室，开口便是某某杂志发表了某某某一篇小说，写得不错，你抽空看看；或者是某某评论家在某报上发表了一个新颖观点，并直率无忌表白他赞赏或不敢苟同。他说着文学的时候，是那样的坦诚，说了几十年，都是坦诚不改，我听着也觉得坦诚。今天他却说他办完退休手续了。我独自

坐着半天说不出话来。我根本梳理不清几十年来和他说过多少话题的话，文学的和社会世相的，纯粹互相取笑调侃逗乐的或正经认真的不同看法的争辩，过后不记也就统统湮没了，唯有那些事关我视为生命的写作的细节，如刻刀般铸刻在记忆深处，时月愈久愈加显亮。

那是一九九一年春节过后的早春三月，我第一次出门参加太白文艺出版社的一个有关出版计划的座谈会。我天不亮起来骑自行车赶到远郊的一路公交站，搭乘汽车到东城墙外的终点站，再换乘市内公交车赶到出版社的时候，会议已经进行到讨论的议程了。路遥正在发言。路遥的旁边有个空椅子，我便慌不择位赶紧坐下来，爬楼梯和赶路弄得我压抑着喘气。坐在路遥另一边的李星，从路遥背后侧过身来。我明白他要跟我说话，仍然喘着气侧过身子把右耳倾向他的脸。他说，你大概还不知道，路遥获茅盾文学奖了。我说我真的不知道。他说今天早上广播的新闻。未及我做出反应，他辞我而去坐直了身子。我也坐直了身子，等待路遥发言完毕即表示祝贺。我早上起来忙着赶路，没有打开半导体收听新闻，漏了这样重要的喜讯。我刚觉得喘息平定，李星又从路遥背后侧过身来，我再次把右耳凑给他。李星说："你今年再把长篇小说写不完，就从这楼上跳下去……"

按农历说这年（一九九一年）的腊月二十五下午，我写完了《白鹿原》的正式稿，却没有告诉逼我跳楼的李星。春节过后用一个多月的时间，我把《白》书正式稿又顺了一遍。待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高贤均和洪清波拿走手稿之后，我把一份复印稿送给李星，请他替我把握一下作品的成色。他和高、洪是这部小说最早的三位审阅者。我回到乡下，预想高和洪的审阅意见至少得两个月以上，尽管判活判死令人揪心，却是急不得的事。但李星的个人阅读的意见却要简单得多也快捷得多。截止到这个时候，李星对一部或一篇小说的判断，在我的意

识里已经形成一种举足轻重的信赖。我在乡下过着一种看似闲适的轻松日子，心却悬在李星身上。李星会怎么看？能过得李星的法眼吗？且不说李星全盘否定，即使不疼不痒说上几条好处再附加两点不足，我都不敢想象接下来的日子该怎么过。捺着性子等了大约七八天，我从乡下回到作协家属院，恰好在住宅楼下看到提着一袋菜的李星的背影，便叫住他。我走到他跟前尚未开口，李星倒先说了："到我屋里说。"我看见他说这句话时不仅没有平时的热乎笑脸，反倒黑煞着本来就黑的脸，说罢转身便走。我当即就感到心往下坠，头皮发紧，跟着他从一楼上到五楼。他一言不发，依然黑煞着脸。我的心不再下坠而是慌惶难控了，只有失望透顶到不好言说的阅读，才会摆出这张冷脸来。我跟他上到五楼走进他的家门，已经有了接受批评的几分准备。他把装菜的袋儿放到厨房，领我走进他的书房兼卧室，猛然转过身来，几乎和我撞到一起，依然黑煞着脸，睁圆两只眼睛紧盯着我，声音几乎是失控了："哎呀！咋叫咱把事弄成了！"我一下愣住了，从他转身开口之前的那种紧张到惶恐的情绪里一时转换不过来，发愣又发蒙地站在原地，听着他又重复了那句话，同时击了一下掌。我很快就感到心头发热到浑身发热，却仍然说不出话，也不想说话，只顾听他慷慨激昂随心所欲畅快淋漓地说话。他在小屋子床和墙壁之间的窄道上不停地走动，激动时还跺着脚，说他对《白》手稿阅读的印象。我也站着，听他尽兴地讲着。

这是我听到的关于《白鹿原》的看法和评价的第一声，是颇具影响的中年评论家李星的声音。他当时踱着步跺着脚说了那么多好话，我现在连一句都想不起来了，只记着他说的"咋叫咱把事弄成了"这句话。我后来曾调侃作为评论家的李星，对《白》书发出的第一声评论，使用的竟然是非评论乃至非文学的语言。正是这句关中民间最常用的口头话语，给我铸成永久的记忆。越到后来，我越是体味到不尽

的丰富内韵，他对《白》的肯定是毫无疑义的，而且超出了他原先的期待里的估计，才有黑煞着脸突然爆发的捶拳跺脚的行为，才有非评论语汇的表述方式；我体味到一种同代人之间弥足珍贵的友谊，他从阅读《白》感觉到我的创作的进步和突破，不是通常的那种欣喜欣慰，而是一种本能的激情式爆发，那一种真诚和纯情使我终生回嚼；我体味到作为一个评论家对文学的钟情和神圣，显然又不完全是和我的个人友情所包含得了的，在小处说，他期盼陕西新时期起步的这一茬作家能完成新的突破，弄出好作品来。他对路遥获得茅盾文学奖真诚地祝贺，侧过身在路遥背后逼我跳楼，因了我的不进步而发急。他对路遥、贾平凹、邹志安、天芳、晓雷、京夫、王蓬、李凤杰等作家的创作一直关注，写过不少评论文章。他为每一部独出心裁的新作坦诚评点，已经成为这一茬作家共同信赖的朋友。他首先面对的是文学、是作品，为某个作家有突破性的新作品而激情慷慨，却不是因为朋友而胡吹冒评，既可见他对陕西乃至当代中国文学的殷殷之情，也可见他的坦诚与率真，只面对作品说话。

我还是珍惜情感。这个同代人李星和我在一个协会相处几十年，对我的包括《白》书在内的小说写过不少评论文章，恕我年龄进入忘事阶段，竟然记不住一个完整的句子，倒是“你今年要是再把长篇写不完就从这楼上跳下去”和“咋叫咱把事弄成了”这两句——非评论语言的话，几乎一字不差地铸刻在心。事过多年，我现在平心静气想来，我这大半生和李星说过多少话，都忘记了，有这两句就足以在我心头树立一个永不褪色的朋友——李星。再说一句多余的调侃的话，李星哪怕现在骂我什么话，我都不在乎了——在我创作和生命的最重要时段，李星率真诚挚到忘记使用评论语言的这两句话，终生都受用不尽回嚼不尽了。

自从李星电话告知要出文集并约我写文章那一刻起，短暂的兴奋之后便陷入犹豫不定的矛盾心理，是侧重于李星文学评论的贡献和估价，还是偏重于几十年来我所看见的评论家李星，包括个人的友谊和情感，竟一时难以决断难以下笔。后来促使我做出倾向性偏转，既有理性的判断，也受情感的驱使，理性地估价和评说李星对新时期文学尤其是对陕西作家创作发展的强力促进，早已形成超出文学圈的普遍性社会影响，早有公论；李星对我创作的真诚关注和以文学为纽带的友谊，却只有我有直接的感知，我不逮住这个机会表述出来，就可能留下遗憾，于是便发生了这篇文章的倾向性偏转。我回想从认识到相处三十多年的人生历程，共同经历过多少事说过多少话，写一本不薄的书也足够了，于是便筛选，似乎没费多少工夫，李星对我说下的那两句非评论非文学语汇就浮现出来。我便毫不犹豫地做出判断，对新时期以来当代文学和陕西文学说话的人太多了，而对我说出这样精确精彩回嚼不尽的个性语言的，是李星。我把这两句话公之于众，文学圈内和圈外的人，就会看到一个真实生动的李星独秉的胸怀，他的可敬和可爱已不完全局限我一个人了。

前面已牵涉到李星的文学评论在新时期当代文学尤其是对陕西作家创作的重要影响，很难做出一个量化的估价，但有一个基本的事实早已形成，这就是，无论是某位卓有建树业已成名的作家推出新作，无论是某位初出茅庐的青年作家出手令人耳目一新的作品，作者本人特别关心李星的评价自不必说，整个文学界——作家和评论家，都特别关注李星的评价。换一句生活化的说法，李星对这个作品咋看咋说。尤其是对某一部作品的评价发生较大争议的时候，大家更重视李星的看法和说法，由此可见李星的声音具有怎样的分量；尤其是在非正式场合的民间，形成这种习惯性对李星声音的关注，更可以检测其真实性与可靠性。我很自然地想到，自新时期文艺复兴我开始较频繁

地走进陕西作家协会的院子，常会听到朋友包括李星颇带神秘口吻给我传递信息，胡采对某个作家的某篇（部）小说说了什么话……胡采应是陕西文学自解放以来的泰斗，其文学评论的影响远不止陕西。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开始听到文学界朋友之间传递李星对某部作品的说法了，时过近二十年，李星的声音愈来愈被关注，足可见其成色和分量。我倒用李星说给我的那句话，李星也把事弄成了。

我现在说李星这句话时，只有感慨独没有惊讶。我发表第一篇小说时，李星也是刚刚走进陕西文学界，他是以评论的姿态走来的，不过在那时候的陕西评论界，还容不得他这样的“毛娃娃”插嘴多言。新时期文艺复兴伊始，李星的声音和刚刚冒头的一茬青年作家的创作发生共鸣。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李星作为“笔耕”文学评论组的最年轻的评论家，对一些重要作品的评论和看法，已经产生重要影响。就我耳闻，作协院内的几位专业作家，每有自己看重的某个作品出手，先在私下里要听听李星的评说；谁在艺术上探索一种新的尝试，也要听听李星的看法。印象深的是邹志安写作“爱情系列”中篇小说的时候，每发表一篇都送李星，看李星怎么说，然后以其得失调整后来的作品的写作。还有我，《白》书写成，第一个反应，就是想听李星的声音。新时期开始形成的陕西青年作家群的几乎所有作家，都受到李星的关注和关爱，对每一个人的作品都发出过坦率真诚地评说的声音，及至新世纪跃上文坛的更年轻的作家，李星都发出自己的声音，予以评点，业已成为老少作家都不可缺少的一种声音。

李星之所以能发出老少作家都深感魅力的声音，首先在于对一部作品的判断，长处和短处都看得准确，不光在旁观者感觉如此，即使在作者本人也多为折服。只有准确的评说才能服人，也才能建立评论者的威信，久而久之，十年二十年过来，就成为独具魅力的非同凡响

的一声了。他的智慧和学养，对各种流派作品的敏锐感受，注定着他独到的审美视角；他以文学为神圣的纯粹性，排除了种种非文学因素的干扰，使他那种独特的审美视角能得到充分展示，这是过去不难当今颇难做好的事。李星声音的威信和魅力，依此而生。

我在本文中记述了李星说给我的两句话，我也记着我说给李星的一句话。那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读了他写的一篇较为全面的研究王安忆小说创作的文章，竟然很感动，对他说，你该当对中国当代最具影响的作家的创作说话。我是从他评王安忆作品的文章里看到一种力度，才忍不住说出我的感想。我想，具有这样的思想力度和独特艺术视角的人，应该对当代最具影响的作家的作品发出声音，无论对作家本人乃至对当代文学的发展，都会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自然也有施展李星才华和影响的意思。大约过了一些时日，我对这种想法稍做修正，颇为正经地对李星说，你应该对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趋势和现状，发表自己的看法和意见。我能感到雷达等评论家，就是面对一个时期的创作现象发表看法的。我完全相信李星具备这样的能力——综合的能力和解析的能力，敏锐的感知和独特的视角，具备这样能力的人，局限在地方一隅太可惜了，应当把他的影响力发挥到整个中国文学。李星很赞同我的意见，连续写过几位名家的创作评论，影响日渐扩大，及至进入茅盾文学奖评委，当是一种标志。直到今年夏天，雷达在《光明日报》发表了一篇严肃剖析当今文学创作的文章，我读后深为震撼，私下里却想着，李星也该有这样振聋发聩的文章打出去，深知他有这个实力。

一个兴平乡村的农家子弟，走到陕西和中国文学的前沿，发出任谁都很关注的声音，恕我用他说给我的那句话来归结——

李星把事弄成了。

2008年1月14日 二府庄

在灞河眺望顿河

——我的读书故事之二

我准确无误地记得，平生阅读的第一部外国文学作品，是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

我读初中二年级时，换来一位刚从大学中文系毕业的语文老师，姓车。他不仅让学生自选作文题，想写什么写什么，而且常常逸出课本，讲些当代文坛的趣事。那时正当“反右”，他讲了少年天才作家刘绍棠当了“右派”的事。我很惊讶，便到学校图书馆借来刘绍棠的短篇小说集《山楂村的歌声》，读得很入迷且不论，在这本书的“后记”里，刘绍棠说他最崇拜的作家是肖洛霍夫，我就从这儿知道了《静静的顿河》。捺着性子等到放暑假，我把四大本《静》借来，背回乡村家里。

我的年龄不够农业合作社出工的资格，便和伙伴们早晚两晌割草，倒不少挣工分。逢着白鹿原上两个集镇的集日，先一天后晌在农业社菜园趸了黄瓜、茄子、西红柿、大葱等蔬菜，天不明挑着菜担去赶集，一次能挣块儿八毛的，到开学就挣够学费了。割草卖菜的间隙和阴雨天，我在老屋后窗的亮光下，领略顿河草原的美丽风光，骁勇剽悍的格里高利和风情万种的阿克西妮娅。

小说里的顿河总是和我家门口的灞河混淆，顿河草原上的山冈，也总是和眼前的骊山南麓的岭坡交替叠映。我和伙伴坐在坡沟的树荫下，说着村子里的这事那事，或者是谁吃了什么好饭等等，却不会有谁猜到我心里有一条顿河，还有哥萨克小伙子格里高利和阿克西妮

娅。我后来才意识到，在那样的年龄区段里感知顿河草原哥萨克的风情人情，对我的思维有着非教科书的影响，尽管我那时对这部书的历史背景模糊不清。我后来喜欢译文本，应该是从这次《静》的阅读引发的。此后便基本不读“说时迟那时快”和“且听下回分解”的句式了。

书念到高中阶段，我在学校图书馆发现了肖洛霍夫的一本短篇小说集《顿河故事》，便借来读。平时功课紧张不敢分心，往往是周六回家时，沿着灞河河堤一路读过去，除了偶尔有自行车或架子车，不担心任何机动车辆撞碰。这部集子收录了大约二十个短篇小说，一篇一个故事，集中写一个或两个人物，几乎都是顿河早期革命的故事，篇篇都写得惊心动魄。这是肖洛霍夫写作《静》之前的作品，可以看作练笔练功夫的基础性写作，却堪为短篇小说典范。

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我高考名落孙山，回到老家做乡村教师，确定把文学创作正经作为理想追求时，从灞桥区文化馆图书室借到肖氏的另一部长篇小说《被开垦的处女地》。小说写的是苏联搞集体农庄的故事，使我感到可触摸可感知的亲切，总是和我身在的农业合作社的人和事联系起来，设想把作品中的人物名字换成中国人的名字，可以当作写中国农业合作化的小说。

直到前几年，我才读了他的那篇超长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这是他最后一部影响深远的作品，算是把他的主要著作都拜读了。写作这个短篇小说时的肖洛霍夫，从精神和心理气象上看，完全蝉蜕为一个冷峻的哲思者了。他完成了生命的升华。

2008年1月17日 二府庄

一个空前绝后的数字

——我的读书故事之三

柳青长篇小说《创业史》的阅读，在我几乎是大半生的沉迷。

那是一九五九年的春天，我从报纸上看到，柳青新著长篇小说《创业史》，即将在《延河》杂志连载的消息，早早俭省下两毛钱等待着。我上到初三时，转学到离家较近的西安市十八中学，在纺织城东边，背馍上学少跑十多里路。当我从纺织城邮局买到泛着油墨气味的《延河》时，正文第一页的通栏标题是手书体的《稻地风波》（初定名），背景是素描的风景画儿，隐没在雾霭里的终南山，一畦畦井字形的稻田，水渠岸边一排排迎风摇动的白杨树，是我自小看惯了的灞河风景，现在看去别有一番盎然诗意。当我急匆匆返回学校，读完作为开篇的《题叙》，便有一种从未发生过的特殊的阅读感受洋溢在心中。

这个小说巨大的真实感和真切感，还有语言的深沉的诗性魅力，尤其是对关中人情的细腻而透彻的描写，不仅让我欣赏作品，更让我惊讶自己生活的这块土地，竟然蕴藏着可资作家进行创作的丰富素材。或者说白了，我所熟视无睹的乡村的这些人和事，在柳青笔下竟然如此生动而诱人。我第一次开始关注自己生活的这块土地。我几次忍不住走出学校大门，门外便是枣园梁上正待抽穗的无边的麦田，远处便是隐隐约约可见山峰沟岩的终南山，在离我不过四五十里地的神禾原下，住着柳青。我的发自心底的真诚的崇拜发生了。十二三年后，“文革”中备受折磨的柳青获得“解放”，我在大厅里听柳青讲创作

时，第一眼看见不足一米六个头、留着黑色短发的柳青，顿然想到我在枣园梁校门口眺望终南山的情景。三十四五年后的初夏时节，我和长安县的同志在柳青坟头商议陵园修建工程，眼见着柳青坟墓被农民的圈粪堆盖着，我又想到十七岁时在枣园梁上的眺望。

后来我到位于灞桥镇的西安三十四中学读高中。镇上的邮局不售《延河》，阅读中断了。随之得知巴金主编的《收获》一次刊发《创业史》，我托在西安当工人的舅舅买到了这期《收获》，给我送到学校，我几乎是置功课于不顾而读完了《创业史》（第一部）。我在该书发行单行本的时候，又托舅舅买了首版《创业史》。我对文学的兴趣已经几乎入迷，对这部小说的反复阅读当是一个主要诱因。高中二年级时，我和班里几个喜欢文学的同学组织起学校的第一个文学社，办了一份不定期的文学墙报，自己发表自己的作品。

我后来进入社会，确定下来文学创作的人生命题，《创业史》便成为枕边的必备读物。一九七三年发表第一个短篇小说时，许多人说我的语言像柳青。编辑把这篇小说送给柳青看，他把第一章修改得很多，我一句一字琢磨，顿然明白我的文字功力还欠许多火候。我后来到南泥湾劳动锻炼，除了规定必带的《毛选》，还私藏着《创业史》，在南泥湾的窑洞里阅读，后来不知谁不打招呼拿去了，也不还。我大约买了丢、丢了又买了九本《创业史》，这是空前的也肯定是绝后的一个数字。

2008年1月18日 二府庄

办公室的故事

多年前曾看过一部苏联电影《办公室的故事》，至今尚能记得其中一些精彩的情节。我之所以斗胆给这篇短文也取这个名字，是我用过的一间办公室里曾经发生过的故事，真可谓晴天霹雳惊天动地，扭转了中国当年的去向，远非苏联那位女部长的办公室里的故事所可量比。这就是“西安事变”故事的发生地之一。

一九九五年初夏，西安阴雨连绵。我早晨上班走到那间顶多十平方米的平房前，围着几个后勤办公室的干部，说我的这幢房子下沉了。我顺着他们手指的墙壁一看，砖墙齐崭崭断裂开一道口子，可以塞进指头。他们告诉我绝不能再住了，却没有别的房子调换，让我等待，说是前院一间房子正在翻修，需十天左右弄好。我便趁此无处立足之际，住进医院，去做医生早就催着要割除的一个粉瘤。待我康复回归，后勤办的干部领我走到前院一座独楼前，指着东边的耳房，说这就是我的新办公室，我一时竟有点犹疑不定，还有点怯。这是任谁都知道关押过蒋介石的屋子，给我做办公室，心里难免忐忑，尽管我向来不在意风水吉凶，仍然有说不清的某种心理障碍。

我所供职的作家协会这个院子，建于一九三三年，是陕北籍的国民党八十四师师长高桂滋的公馆，和张学良将军的公馆是两隔壁，中间夹着一道称作金家巷的丁字小巷。高桂滋将军后来叛蒋起义，解放后把这座颇为阔绰的公馆交给人民政府，省政府把成立不久的陕西作家协会安排于此。这个院子当年曾经是别具一格的个性化建筑，进大门是一个颇具规模的喷泉，养着金鱼；左首是一幢中西合璧以西为主的两层小楼，下边一层为半地下建筑，据说是用于隐藏警卫兵力，上

边一层中间三间是镶着花纹瓷砖的议事大厅，东西两边是颇为宽绰的附属耳房，当是办公室或主任或秘书的用房。后院是连续三进四合院，有高氏一家的生活用房，也免不了办公和警卫兵力的用房。通前到后栽植着玉兰、紫薇、石榴、月季、玫瑰等名贵花木，且不赘述。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十二日凌晨，驻扎西安的东北军张学良将军与西北军杨虎城将军联手发动的“西安事变”获得成功，在西安东北约五十华里的骊山抓捕蒋介石。蒋氏闻变只身跳后窗逃出，摸黑在骊山荆棘中爬行了不短一段山路，隐身藏匿在悬空的一道石缝里。还是被士兵搜捕揪出来押回西安，住在现在的陕西省政府大院内一座三十年代的旧建筑名曰黄楼的楼房内，十二月十四日转移到高桂滋公馆这幢二层议事厅的东耳房里，即后勤干部给我安排的这个办公室。

我粗略查证了一下，蒋氏在省政府那座小黄楼只住了一天半，因为十二日凌晨跳窗逃跑被起事的士兵从石缝中拖出，再下山，再送到五十多里外的西安，那时候没有正经公路，车速缓慢，到得小黄楼离天明也不远了。十四日转移到高氏议事厅的东耳房，隔着金家巷的那边是张学良公馆，见面、说话、议事包括送饭都方便多了，也更安全。在我现在要做办公室的这个东耳房里，蒋氏介石被软禁达十天十夜，曾经发生过许多历史性的情节和细节。

蒋介石刚被转移到这个东耳房，张学良便从他的公馆赶过来看望，一副毕恭毕敬的军人礼仪。张学良连叫几声“委员长”，蒋介石不仅不搭话茬儿，裹着被子蒙着脑袋连脸也不露给他看。此前，送过来的饭食也不进口，一副绝食的抗议。我似乎看到过有文字说老蒋给张学良使性子，还有难听点的说成耍无赖，也有做心理分析的文字说蒋氏怕处死他……我想也许都是，是否还应有一种气死气活的懊恼?

十二月二十二日，宋子文宋美龄来到这个高氏议事厅的东耳房，向蒋介石汇报了南京政府自“西安事变”以来的复杂情况，也透露了他们兄妹二人到西安后与张、杨会谈的意见，这是至关重要的一步。

隔过一天到十二月二十四日晚上，早几天从陕北下来到西安参与调节此事的中共代表周恩来，和宋氏兄妹一起走进了蒋介石下榻的东耳房，举行正式会晤，达成了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六项协议，为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奠定了基础……

我无可选择地搬进东耳房这间办公室。好在这是一个南北隔开的套间，我在北边隔间办公，蒋介石被关押过十个日夜的南边隔间，现在布置成一个小型会议室，中间有一道小门相通。我在北边隔间接待各路来客，包括热心读者，得空写点短文章，倒也罢了。偶尔得着一个人闲静，尤其是晚上独饮两杯的时候，往往会想到套间那边曾经住过的蒋介石，张学良和杨虎城走进过这东耳房的套间，宋子文和蒋夫人宋美龄从南京飞过来走进过这套间房。周恩来、叶剑英也成竹在胸地来过了。七十年前的这个东耳房套间，无疑是决定中国何去何从的生死命运的一个集结点，决定中国命运的各方势力的最敏感的神经，都纠结在这东耳房的南套房里。至今想象当年那种外表热闹内里紧绷的气氛，我都有点透不过气的感觉，甚至不敢相信那样重大到决定中国命运的事件，真的就发生在这间房子里。我有时抬脚三五步走过套间小门，看着东窗下曾经给蒋介石支床铺的那块地方，仍然是恍若幻境，信不下曾经发生过的事。记不清是哪一天或哪一晚，我突然意识到，蒋介石十三年后落荒而逃到台湾，其实就是在高桂滋公馆议事厅东耳房南隔间住着的时候注定了的结局。

事实摆得很明显，道理也就很简单。蒋介石在江西五次“围剿”共产党领导的苏区和红军，近十万红军被迫战略大转移开始长征，历经

一年到达陕北时，主力一方面军仅剩下八千多人，到“西安事变”发生时，各路红军会聚到陕北也不足两万人。蒋介石已经几次亲临西安，继续布置剿灭红军的军事行动，企图把红军全部消灭。然而，令蒋介石意料不及的事发生了，自己反倒被软禁在这东耳房的南隔间里，签署了不得再剿灭共产党和红军的协议。我在几十年后瞅着蒋介石下榻的东窗下那块地方，无法猜想他当年怎样度过了那十个日夜，在“六项协议”签字的那一刻，他是否意识到十三年后落荒而逃的结局？东耳房发生这样重大的历史一幕时，我尚未来到这世界，现在看得再简单不过，这儿发生的历史一幕的核心，一是共同抗击日本侵略，一是不许剿灭红军。共产党领导的红军获得了在中国合法生存和发展的机会和空间，也就注定了蒋氏十三年后的结局。

一九九八年春夏之交，我随作家代表团去了台湾，最后一站走到台湾最南头的海滩上，看到一尊蒋介石的雕塑，面朝大陆，微倾向前，脸上是少见的一副复杂的表情，与我所见过的他的塑像和照片都不一样。我在那一刻想到我还在用着的办公室，原高桂滋公馆议事厅小楼的东耳房，即他曾经被迫住过十个日夜的房子，便断定他后来乃至终生都不会了结在这里被关押的记忆。

2008年1月22日 二府庄

排山倒海的炮声

交上农历腊月，在冰雪和凛冽的西风中紧缩了一个冬天的心，就开始不安生地蹦跳了。腊月初五吃“五豆”，整个村子家家户户都吃用红豆绿豆黄豆赤豆黑豆和苞谷或小米熬烧的稀饭。腊月初八吃“腊八”，在用大米熬烧的稀饭里煮上手擀的一指宽的面条，名曰“腊八面”，不仅一家大小吃得热气腾腾，而且要给果树吃。我便端着半碗腊八面，先给屋院过道里的柿子树吃，即用筷子把面条挑起来挂到树干上，口里诵唱着“柿树柿树吃腊八，明年结得疙瘩瘩”。随之下了门前的塄坎到果园里，给每一棵沙果树、桃树和木瓜树的树干或树枝上都挂上面条，反复诵唱那两句歌谣。到腊月二十三晚上，是祭灶神爷的日子，民间传说这天晚上灶神爷要回天上汇报人间温饱，家家都烙制一种五香味的小圆饼子，给灶神爷带上走漫漫的上天之路做干粮，巴结他“上天言好事，入地降吉祥”。当晚，第一锅烙出的五香圆饼先献到灶神爷的挂像前，我早已馋得控制不住了，便抓起剩下的圆饼咬起来，整个一个冬天都吃着苞谷面馍，这种纯白面烙的五香圆饼甭提有多香了。

乡村里真正为过年忙活是从腊月二十开始的，淘麦子，磨白面，村子里两户人家置备的石磨，便一天一天都被预订下来，从早到晚都响着有节奏的却也欢快的摇摆罗柜的咣当声。轮到我家磨面的时候，父亲扛着装麦子的口袋，母亲拿着自家的木斗和分装白面和下茬面的布袋，我牵着自家槽头的黄牛，一起走进石磨主人家，从心里到脸上都抑止不住那一份欢悦。父亲在石磨上把黄牛套好，往石磨上倒下麦子，看着黄牛转过三五圈，就走出磨坊忙他的事去了。我帮母亲摇摆

罗柜，或者吆喝驱赶偷懒的黄牛，不知不觉间，母亲头顶的帕子上已落下一层细白的粉尘，我的帽子上也是一层。

到春节前的三两天，家家开始蒸包子和馍，按当地风俗，正月十五之前是不能再蒸馍的，年前这几天要蒸够一家人半个多月所吃的馍和包子，还有走亲戚要送出去的礼包。包子一般分三种，有肉做馅的肉包和用剁碎的蔬菜做馅的菜包，还有用红小豆做馅的豆包。新年临近的三两天里，村子从早到晚都弥漫着一种诱人的馍的香味儿，自然是从这家那家刚刚揭开锅盖的蒸熟的包子和馍上散发出来的。小孩子把白生生的包子拿到村巷里来吃，往往还要比一比谁家的包子白谁家的包子黑，无论包子黑一成或白一成，都是欢乐的。我在母亲揭开锅盖端出第一箅热气蒸腾的包子时，根本顾不上品评包子成色的黑白，抢了一个，烫得两手倒换着跑出灶房，站到院子就狼吞虎咽起来，过年真好！天天过年最好。

大年三十的后晌是最令人激情欢快的日子，一帮会敲锣鼓家伙的男人，把陈姓为主的村子公有的乐器从楼上搬下来，在村子中间的广场上摆开阵势，敲得整个村庄都震颤起来。女人说话的腔调提高到一种亮堂的程度，男人也高声朗气起来，一年里的忧愁和烦恼都在震天撼地的锣鼓声中抖落了。女人们继续在锅灶案板间忙着洗菜剁肉。男人们先用小笤帚扫了屋院，再捞起长把长梢的扫帚打扫街门外面的道路，然后自写或请人写对联贴到大门两边的门框上。最后一项最为庄严的仪程，是迎接列祖列宗回家。我父亲和两位叔父带着各家的男孩站在上房祭桌前，把卷着的本族本门的族谱打开舒展，在祭桌前挂起来，然后点着红色蜡烛，按照辈分，由我父亲先上香磕头跪拜三匝，两位叔父跪拜完毕，就轮到我这一辈了。我在点燃三支泛着香味儿的紫香之后插进香炉，再跪下去磕头，隐隐已感觉到虔诚和庄严。最后

是在大门口放雷子炮或鞭炮，迎接从这个或那个坟墓里归来的先祖的魂灵。整个陈姓氏族的大族谱在一户房屋最宽敞的人家供奉，在锣鼓和鞭炮的热烈声浪里，由几位在村子里有代表性的人把族谱挂在祭桌前的墙上，密密麻麻按辈分排列的族谱整整占满一面后墙内壁。到第二天大年初一吃罢饺子，男性家长领着男性子孙到这儿来祭拜，我是跟着父亲的脚后跟走近祭桌的，父亲烧了香，我跟他一起跪下去磕头，却有不同于自家屋里祭桌前的感觉，多了一缕紧张。

对于幼年的我来说，最期盼的是尽饱吃纯麦子面的馍和包子和用豆腐黄花韭菜和肉丁做臊子的臊子面，吃是第一位的。再一个兴奋的高潮是放炮，天上满是星斗，离太阳出来还早得很，那些心性要强的人就争着放响新年第一声炮了。那时候整个村子也没有一只钟表，争放新年第一炮的人坐在热炕头，不时下炕走到院子里观看星斗在天的位置，据此判断，旧年和新年交接的那一刻。我的父亲尽管手头紧巴，炮买得不多，却是个争放新年早炮的人。我便坐在热炕上等着，竟没了瞌睡，在父亲到院子里观测过三四次天象以后，终于说该放炮了，我便跳下炕来，和他走到冷气沁骨的大门外，看父亲用火纸点燃雷子炮，一抡胳膊把冒着火星的炮甩到空中，发出一声爆响，接连着这种动作和大同小异的响声，我有一种陶醉的欢乐。

真正令我感到陶醉的炮声，是上世纪刚刚交上八十年代的头一两年。一九八一年或一九八二年，大年三十的后晌，村子里就时断时续着炮声，一会儿是震人的雷子炮，一会儿是激烈的鞭炮的连续性响声。这个时候已经早都不再祭拜陈氏族谱了，本门也不祭拜血统最直接的祖先了，“文革”的火把那些族谱当作“四旧”统统烧掉了，我连三代以上的祖先的名字都搞不清了。家家户户依然淘麦子磨白面蒸馍和包子，香味依然弥漫在村巷里，男性主人也依然继续着打扫屋院和大

门外的道路，贴对联似乎更普遍了。父亲已经谢世，我有了一只座钟，不需像父亲那样三番五次到院子里去观测星斗转移，时钟即将指向十二，我和孩子早已拎着鞭炮和雷子炮站在大门外了。我不知出于何种意向，纯粹是一种感觉，先放鞭炮，连续热烈的爆炸，完全融合在整个村庄的鞭炮的此起彼伏的声浪中，我的女儿和儿子捂着耳朵在大门口蹦着跳着，比当年我在父亲放炮的时候欢实多了。我在自家门口放着炮的时候，却感知到一种排山倒海的爆炸的声浪由灞河对岸传过来，隐隐可以看到空中时现时隐的爆炸的火光。我把孩子送回屋里，便走到场塄边上欣赏远处的炮声，依旧连续着排山倒海的威势，时而奇峰突起，时而群峰挤拥。我的面前是夜幕下的灞河，河那边是属于蓝田县辖的一个挨一个或大或小的村庄，在开阔的天地间，那起伏着的炮声洋溢着浓厚深沉的诗意。这是我平生所听到的家乡的最热烈的新年炮声，确实是前所未有。我突然明白过来，农民吃饱了！就是在这一年里，土地下户给农民自己作务，一年便获得缸溢囤满的丰收，从年头到年尾只吃纯粹的麦子面馍了，农民说是天天都在过年。这炮声在中国灞河两岸此起彼伏经久不息地爆响着，是不再为吃饭发愁的农民发自心底的欢呼。我在那一刻竟然发生心颤，这是家乡农民集体自发的一种表达方式，是最可靠的，也是“中国特色”的民意表述，世界上再也找不到可以类比的如同排山倒海的心声表述了。

还有一个纯属个人情感的难忘的春节，那是农历一九九一年的大年三十。腊月二十五下午写完《白鹿原》的最后一句，离春节只剩下四五天了，两三个月前一家人都搬进西安，只留我还坚守在这祖传的屋院里。大年三十后晌，我依着乡俗，打扫了屋院和门前的道路，我给自家大门拟了一副隐约着白鹿的对联，又给热心的乡亲写了许多副对联。入夜以后，我把屋子里的所有电灯都拉亮，一个人坐在火炉前抽烟品酒，听着村子里时起时断的鞭炮声。到旧年的最后的两分钟，

我在大门口放响了鞭炮，再把一个一个点燃的雷子炮抛向天空。河对岸的排山倒海的炮声已经响起，我又一次站在寒风凛冽的场塄上，听对岸的炮声涌进我的耳膜，激荡我的胸腔。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形成的这种热烈的炮声，一直延续到现在，年年农历三十夜半时分都是排山倒海的炮声，年年的这个时刻，我都要在自家门前放过鞭炮和雷子炮之后，站在门前的场塄上，接受灞河对岸传来的排山倒海的炮声的洗礼，接纳一种激扬的心声合奏，以强壮自己。一九九一年的大年三十，我在同样接纳的时刻不由得转过身来，面对星光下白鹿原北坡粗浑的轮廓，又一次心颤，你能接纳我的体验的表述吗？这是我最后一次聆听和接纳家乡年夜排山倒海的炮声。

2008年1月31日 二府庄

关键一步的转折

——我的读书故事之四

我的人生道路的关键一步转折，发生在一九七八年的夏天，从工作了十年的人民公社（乡镇）调动到当时的西安郊区文化馆。

我当时正负责为家乡的灞河修建八华里的防洪河堤。在我们那个很穷的公社，难得向上级申请到一笔专项治理灞河的资金，要修筑一道堤面上可以对开汽车的河堤，在那个小地方，称得上是一项令人鼓舞的宏伟工程了。工程实际上是从一九七七年冬季开始的，我作为工程负责人，和七八个施工员住在一道红土崖下灞河岸边的一幢房子里，没有床也没有炕。从邻近的村子里拉来麦草铺在地上，各人摊开自己带来的被褥，并排睡地铺了。我那时候心劲很足，想一次解决灞河涨水毁田的灾害，尤其是给包括我的父母妻儿生活的村子在内大半个公社修建这样一个工程。为此，从早到晚都奔跑在各个施工点上。一个严峻的节令横在心头，必须在初夏灞河涨水之前，不仅要把河堤主体堆成，而且必须给临水的一面砌上水泥制板，不然，一场大水就可能把沙堤冲成河滩。工程按计划紧张地进行，四月发了一场大水，只是局部损伤，我的信心没有动摇。

到初夏时节，我在麦草地铺上打开一本新寄来的《人民文学》杂志。夜晚安排完明天的事儿，施工员们便下棋，或者玩当地人都喜欢玩的“纠方”游戏，我也是参与者。这一晚我谢辞了下棋和“纠方”，躺在地铺上看一篇小说，名曰《班主任》，作者是我从未听说过的刘心武。我在这篇万把字的小说的阅读中，竟然产生心惊肉跳的感觉：每

一次心惊肉跳发生的时候，心里都涌出一句话，小说敢这样写了！请注意这个“敢”字。我作为一个业余写作者，尽管远离文学圈，却早已深切地感知到其中的巨大风险了，极左的政治思想影响下的文艺政策更“左”得离谱，多少作家都栽倒了，乃至搭上了性命。《班主任》竟然敢这样写，真是令我心惊肉跳。

我在麦草地铺上躺不住了。我走出门，不过五十米就到了哗哗响着的灞河水边，撩水洗了把热烫的脸，坐在河石上抽烟，心里又涌出一句纯属我的感受来：文学创作可以当作事业来干的时候终于到来了。这是我从《人民文学》发表《班主任》这样的小说的举动上所获得的最敏感的信号。我几乎就在涌出这句话的一刻，决定调离公社，目标是郊区文化馆。那儿的活儿比公社轻松得多，也有文学创作辅导干部的职位，写作时间很宽裕，正适宜我。即将完成河堤工程的六月，我如愿以偿到郊区文化馆去了。我的仍然属业余文学创作的人生之路开始了。

《班主任》在文学界的影响可谓深远。文学界先把其称为中国的“解冻文学”的先声，这是借用苏联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一个文学现象的名词，随后又称其为新时期文艺复兴的发轫之作。其实，两种称谓的意思相近，即从极左文艺政策下解放出来的第一声鸣叫，一个时代开始了。我的人生之路也发生了关键一步的转折。

2008年2月3日 二府庄

摧毁与新生

——我的读书故事之五

一九八二年五月，陕西作家协会在延安举行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四十周年纪念活动，胡采主席亲自率领七八个刚刚跃上新时期文坛的陕西青年作家到延安去，我是其中之一。有一个细节至今难忘，胡采在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外的场地上，给我们回忆当年他聆听毛泽东讲话的情景。我和几位朋友在一张大照片上寻找当年的胡采，竟然辨认不出来。最后还是由胡采指出那个坐在地上的年轻人，说是当年的他。相去甚远了。四十年的时光，把一个朝气蓬勃的小伙子变成了睿智慈祥的老头，我的心里便落下一个生命的惊叹号。

参加这次纪念活动的几个青年作家，各自都据守在或关中平原或秦岭山中或汉中盆地的一隅。平时难得相聚，参观的路上、吃饭的桌上就成为交流信息的最好平台。尤其是晚上，聚在某个人的房间，多是说谁写了一篇什么小说，多好多好值得一读。被说得多的是路遥，他的一个中篇小说即将在《收获》发表，篇名《人生》。这天晚上，大家不约而同聚到路遥房间，路遥向大家介绍了这部小说的梗概，尤其是说到《收获》责任编辑对作品的高度评价，大伙都有点按捺不住的兴奋，便问到《收获》出版的确切时间，路遥说已经出刊了。记不清谁提议应该马上到邮局去购买。路遥显然也兴奋到恨不得立即看到自己钢笔写下的文字变成铅字的《收获》，还说他和邮局有关系，可以叫开门，便领着大家出了宾馆，拐了几道弯，走到延安邮局门口。敲门敲得很响，也敲得执拗。终于有一位很漂亮的值班女子开了门，

却说不清《收获》杂志是否到货，便领着我们到业已关灯的玻璃柜前，拉亮电灯。我们把那个陈列着报纸杂志的玻璃柜翻来覆去地看，失望而归。

我已经为路遥简略讲述的《人生》故事着迷，尤其是像《收获》这样久负盛名的刊物的高调评价，又是头条发表，真有迫不及待的阅读期盼。我从延安回到文化馆所在地灞桥镇，当天就拿到馆里订阅的《收获》，几乎是一口气读完了这部十多万字的中篇小说《人生》。读完时坐在椅子上是一种瘫软的感觉，显然不是高加林波折起伏的人生命运对我的影响，而是小说《人生》所创造的完美的艺术境界，对我正高涨的创作激情是一种几乎彻底的摧毁。

连续几天，我得着空闲便走到灞河边上，或漫步在柳条如烟的河堤上，或坐在临水的石坝头，却没有一丝欣赏古桥柳色的兴致，而是反思着我的创作。《人生》里的高加林，在我所阅读过的写中国农村题材的小说里，是一个全新的面孔，绝不同于此前文学作品里的任何一个乡村青年的形象。高加林的生命历程里的心理情感，是包括我在内的乡村青年最容易引发呼应的心理情感。路遥写出了《人生》，一个不争的事实便摆列出来，他已经拉开了包括我在内的这一茬跃上新时期文坛的作者一个很大的距离。我的被摧毁的感觉源自这种感觉，却不是嫉妒。

我在灞河沙滩长堤上的反思是冷峻的。我重新理解关于写人的创作宗旨。人的生存理想，人的生活欲望，人的种种情感情态，准确了才真实。一个首先是真实的人的形象，是不受生活地域文化背景以及职业的局限，而与世界上的一切种族的人都可以完成交流的。到这年的冬天，我在反思中所完成的新的创作理念，写成了我的第一个篇幅不大的中篇小说《康家小院》，后来获得了《小说界》的首届评奖。

许多年后，我对采访的记者谈到农村题材的创作感受时说出一种观点，你写的乡村人物让读者感觉不到乡村人物的隔膜就好了。这种观点的发生，源自在灞河滩上的反思，是由《人生》引发的。

2008年2月11日（正月初五）夜 雍村

一次功利目的明确的阅读

——我的读书故事之六

在我的文学生涯中，阅读不仅占有一个很大的时间比例，而且是伴随终生的一种难能改易的习惯意识。即使在把一切出版物都列为“黑书”禁封的“文革”年代，我的“地下式”的秘密阅读也仍然继续着。然而，几乎所有阅读都不过是兴趣性的阅读而已，增添知识，开阔视野，见识多种艺术风格的作品。只有一次阅读是怀有很实际具体甚至很功利的目的，这就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一次阅读。

那时候我正在酝酿构思第一部也是唯一的长篇小说《白鹿原》，大约用了两年左右的时间。随着几个主要人物的成型和具象，自我感觉已趋生动和丰满，小说的结构便很自然地突显出来，且形成一种甚为严峻的压力。这种压力的形成有主客两方面的因由，在我是第一次写长篇，没有经验自不必说，况且历史跨度大，人物比较多，事件也比较密集，必须寻找到一种恰当的结构形式，使得业已意识和体验到的人物能得到充分的展示；另外，在这部小说刚刚萌生创作念头的时候，西北大学当代文学评论家蒙万夫老师很郑重地告诫我说，长篇小说是一个结构的艺术。他似乎担心我轻视结构问题，还做了一个形象化的比喻，长篇小说如果没有一种好的结构，就像剔除了骨头的肉，提起来是一串子，放下去是一摊子。我至今几乎一字不差地记着蒙老师的话，以及他说这些话时平静而又郑重的神情。当这部小说构思逐渐接近完成的时候，结构便自然形成最迫切也是最严峻的一大命题。

我唯一能做出的选择就是读书。我选择了一批中外长篇小说阅读。我的最迫切的目的是看各个作家是怎样结构自己的长篇，企望能获得一种启发，更企望能获得一种借鉴。我记得有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最具影响的两部长篇，一是王蒙的《活动变人形》，一是张炜的《古船》。我尤其注意这两部作品的结构方式，如何使多个人物的命运逐次展开。这次最用心的阅读，与最初的阅读目的不大吻合，却获得了一种意料不及的启发。这就是，每一部成功的长篇小说，都有自己风格独特的结构方式，而平庸的小说才有着结构形式上相似的平庸。我顿然省悟。从来不存在一个适宜所有作品的人物和故事展示的现成的结构框架，必须寻找到适宜自己独自体验的内容和人物展示的一个结构形式，这应该是所谓创作的最真实含义之一；我几乎同时也理顺了结构和内容的关系，是内容——即已经体验到的人物和故事决定结构方式，而不是别的。这样，我便确定无疑，《白》必须有自己的结构形式，不是为了出奇一招，也不是要追某种流派，而是想建一个让白嘉轩、鹿子霖、朱先生们能充分展示各自个性和命运的比较自然而顺畅的时空平台。

小说出版许多年了，单就结构而言，也有不少评说，有的称为网状结构，有的称为复式结构，等等。多为褒奖的好话，尚未见批评。我一直悬在心里的担心，即蒙老师告诫的那种“一串子一摊子”的后果避免了。我衷心感激已告别人世的蒙老师。

我也感慨那次较大规模又目的明确的阅读，使我获得了关于结构的最直接最透彻的启发。其实不限于长篇小说，其他艺术样式的创作亦是同理，实际已触摸到关于创作的最本质的意义。

2008年5月3日 雍村

米兰·昆德拉的启发

——我的读书故事之七

米兰·昆德拉热遍中国文坛的时候，大约稍晚加西亚·马尔克斯几年。从省内到省外，每有文学活动作家聚会，无论原有的老朋友或刚刚结识的新朋友，无论正经的会议讨论或是三两个人的闲聊，都会说到这两位作家的名字和他们的作品，基本都是从不同欣赏角度所获得的阅读感受，而态度却是一样的钦佩和崇拜。谁要是没接触这两位作家的作品，就会有一种落伍的尴尬，甚至被人轻视。

我大约是在昆德拉的作品刚刚进入中国图书市场的时候，就读了《玩笑》和《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生活在别处》等。先读的哪一本后读的哪一本已经忘记，却确凿记得陆续出版的几本小说都读了。每进新华书店，先寻找昆德拉的新译本，甚至托人代购。我之所以对昆德拉的小说尤为感兴趣，首先在于其简洁明快里的深刻，篇幅大多不超过十万字，在中国约定俗成的习惯里只能算中篇。情节不太复杂却跌宕起伏，人物命运的不可捉摸的过程中，是令人感到灼痛的荒唐里的深刻，且不赘述。更让我喜欢昆德拉作品的一个因由，是与马尔克斯《百年孤独》决然不同的艺术气象。我正在领略欣赏魔幻现实主义的兴致里，昆德拉却在我眼前展示出另一番景致。我便由这两位大家决然各异的艺术景观里，感知到不同历史和文化背景里的作家对各自民族生活的独特体验，以及各自独特的表述形式，让我对小说这种艺术形式发生了新的理解。用海明威的话说，就是要“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这个“句子”不是指通常意义上的文字，而是作家对生活——历史和现实——独特的发现和体验，而且要有独立个性的艺术表述形

式。仅就马尔克斯、昆德拉和海明威而言，每一个人显现给读者的作品景观都迥然各异，连他们在读者我的心中的印象也都个性分明。但是，无论他们的作品还是他们个人的分量，却很难掂出轻重的差别。在马尔克斯和昆德拉的艺术景观里，我的关于小说的某些既有的意念所形成的戒律，顿然打破了；一种新的意识几乎同时发生，用海明威概括他写作的话说就是，“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只有寻找到不类似任何人而只属于自己独有的“句子”，才能称得上真实意义上的创作，才可能在拥挤的文坛上有一块立足之地。

在昆德拉小说的阅读过程中，还有一个在我来说甚为重大的启发，这就是关于生活体验与生命体验的切实理解。似乎是无意也似乎是有意，《玩笑》和《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这两部小说一直萦绕于心中。这两部小说的题旨有类似之处，都指向某些近乎荒唐的专制事项给人造成的心灵伤害。然而《玩笑》是生活体验层面上的作品，尽管写得生动耐读，也颇为深刻，却不像《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那样让人读来有某种不堪承受的心灵之痛，或者如作者所说的“轻”。我切实地感知到昆德拉在《生》里进入了生命体验的层面，而与《玩笑》就拉开了新的距离，造成一种一般作家很难抵达的体验层次。这种阅读启发，远非文学理论所能代替。我后来在多种作品的阅读中，往往很自然地能感知到所读作品属于生活体验或是生命体验，发现前者是大量的，而能进入生命体验层面的作品是一个不成比例的少数。我为这种差别找到一种喻体，生活体验如同蚕，而生命体验是破茧而出的蛾。蛾已经羽化，获得了飞翔的自由。然而这喻体也容易发生错觉，蚕一般都会结茧成蛹再破茧而出成蛾，而由生活体验能进入生命体验的作品却少之又少。即使写出过生命体验作品的作家，也未必能保证此后的每一部小说，都能再进入生命体验的层次。

2008年5月6日 二府庄

汶川，给我更深刻的记忆，不单是伤痛

五月十二日午后，我像往常一样准备摊开稿纸工作的时候，突然发生的天摇地动使我顿时陷入慌乱和恐惧。当我很快确知这不过是地震余波的虚惊时，汶川——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四川山区小县，霎时间震撼了整个中国，一场特大地震的毁灭性灾难发生在汶川及其周边地区，无以名状的沉痛和悲伤紧紧压着每一个中国人的心，我的心。

使我很快从这种不堪压迫的心境里转换过来的一件事，是我看到了代表党和国家走向灾难发生地的温家宝总理的身影。那一瞬间，希望顿时高涨起来，强大的力量高涨起来，深深的感动和钦敬高涨起来。几乎出于本能，我把一个时间铸成永久的记忆和永远的感动，这就是在汶川地震灾难发生刚刚一个小时，一位代表党和国家责任的年近七十岁的老人，登上赶赴灾难发生地的飞机。这是我的记忆里最具感动和钦佩情感的一个时间概念，在世界的灾难史上前所未闻。

几天来我一直通过电视关注着抗震救灾的每一步进展。我被这位老人感动着。他蹲在倒塌的废墟上和一个被困的孩子的对话，更像一个慈爱的爷爷；他手握话筒对灾民再三申明，救人是第一紧迫的大事，再三申明拯救每一个生命绝不放弃的时候，体现的是新一代党和国家领导者的全新理念全新思维；他对参与救援的解放军、公安、武警部队、医护人员等的讲话，凝聚着整个中国人的心愿和情感，显示着一个国家的权威性意志和力量，让我感到信赖和可靠，更胆壮。

我在灾难发生的令人揪心的几天时间里，强烈地感知到人民和国家这个大的命题。我们刚刚经历过奥运圣火在国外传递过程中“藏独”

分子破坏捣乱的事件。我感受到整个中国人民和世界华人骤然掀起的维护国家统一和国家尊严的庄严意志，充分意识到人民对国家的爱心，人民的意志和力量擎立着的国家，是最具活力和尊严的国家。而当毁灭性的灾难发生的时候，受灾的人民群众所可依赖的就是国家。党和国家领导人是国家意志和力量的体现。我看到的是灾难发生时最迅敏的决策、最务实的行动，把人民的生命看得神圣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由他们领导的国家获得人民的爱，是自然的，是真实的，是不可摧毁的。我以为我们的人民和国家，已经进入一种水乳交融的和谐。

二〇〇八年五月十二日十四时二十八分，地震灾难留给每一个中国人最沉痛的阴暗记忆。

二〇〇八年五月十二日十四时二十八分之后的几天，也铸成国家和人民完全一致的历史性记忆，更具力量，也更深刻。

2008年5月17日 二府庄

心中的圣火

我举着奥运火炬在西安跑过四十米。

这是从佛家的小雁塔通往佛家圣地大雁塔途中的四十米。

这是从希腊奥林匹亚山通往北京——传过六大洲——之间的四十米。

几个月前，当我被通知推举为奥运火炬手的那一刻，神圣的感觉便产生了。在我的意识里，这火是在希腊的奥林匹亚山上点燃的，采自太阳，即为天火。天火是圣火。我感觉到这火的神圣。

太阳普照大地，驱逐黑暗和阴霾，滋养万物，无论国界、无论种族、无论肤色、无论语言、无论信仰，把光明和温暖洒到地球的各个角落，才有这五彩缤纷万紫千红的世界。来自太阳的天火，是神圣的。这种神圣的感觉，几个月来一直蕴积于胸萦绕于心。今天，我举着这采自太阳圣火的火炬，在我的家乡长安大地上跑过四十米的时候，每一步都释放着纯粹的神圣。

前几天有位记者别出心裁对我提问，你演练跑步姿势了吗？你最想以什么姿势跑步？我几乎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我就想以我最习惯的跑步姿势，自在自如自由地跑过那一段路程。道理很简单，如果用一种演练出来的姿势去跑，肯定影响心中那种蕴积已久的神圣的释放，演练的姿势不属于我的肢体本能，也不属于我心趋向。

这个有趣的问话，倒勾起我积久的记忆。我刚学走路便学在坑洼不平的黄土路上移步，也学会在乡村泥泞的道路上走路。我的大半生都是在乡村晴天的土路和阴雨天的泥泞里走过的。这很可以类比我的人生，泥泞里摔倒过，干燥的平路上也摔倒过；决定人生某一段取向的岔路口的犹疑，择错后的懊悔和重新选择之后的酣畅淋漓。我在乡村的黄土路或泥泞里体验乡村，感受和体验我们国家曾经的泥泞和挫折，终于赢得能够承办举世瞩目的奥运会这样的盛事了。我也在自身的人生历程中体验人生，不断丰富着也深化着生活体验和人生体验，形成自己。用一句话概括，我在自己的人生行程中，承受追求的艰难和痛苦，也享受追求的欢乐和欣慰，这种反复发生的过程，建构成承受痛苦继续追求的心理承受能力。我在跨过五十岁时写过一首拙诗，其中有两句颇能见得这种感受：踏过泥泞五十秋，何论春暖与春寒。

今天，我举着从奥林匹亚山上采来的圣火火炬，在从小雁塔通往大雁塔的道路上跑过，无论距离长短，都会铸成永久的最神圣的记忆。

这圣火已经荡涤记忆里的泥泞。

这圣火必然温暖我踏过还可能遭遇的泥泞。

圣火留在心中，就是在心中留驻着太阳。

2008年7月4日 二府庄

阅读自己

——我的读书故事之八

一部或长或短的小说写成，那种释放完成之后的愉悦，是无以名状的。即使一篇千字散文随笔，倾述了自以为独有的那一点感受和体验，也会兴奋大半天。之后便归于素常的平静，进入另一部小说或另一篇短文的构思和谋划。到得某一天收到一份专寄的刊登着我的小说或散文的杂志或报纸，打开，第一眼瞅见手写在稿纸上的文字变成规范的印刷体文字，便潮起一种区别于初写成时的兴奋和愉悦的踏实，还掺和着某种成就感。如果没有特别紧要的事相逼，我会排开诸事，坐下来把这部小说或短文认真阅读一遍，常常会被自己写下的一个细节或一个词汇弄得颇不平静，陷入自我欣赏的得意。自然，也会发现某一处不足或败笔，留下遗憾。我在阅读自己。这种习惯自发表第一篇散文处女作开始，不觉间已延续了四十多年，直到今天，仍然如此。

阅读自己的另一个诱因，往往是外界引发的。一般说来，对自己的作品，如上述那样，在刚发表时阅读一过，我就不再翻动它了，也成了一种难改的积习。有时看到某位评论家涉及我的某篇作品的文章，尤其是他欣赏的某个细节，我便忍不住翻开原文，把其中已淡忘的那一段温习一回，往往发生小小的惊讶，当初怎么会想出这样生动的描写，再自我欣赏一回。同样，遇到某些批评我的评论中所涉及的情节或细节，我也会翻出旧作再读一下，再三斟酌批评所指症结，获得启示也获得教益，这时的阅读自己就多是自我审视的意味了。我的切身体会颇为难忘，在肯定和夸奖里验证自己原来的创作意图，获得

自信；在批评乃至指责里实现自我否定，打破因太久的自信所不可避免的自我封闭，进而探求新的突破。几十年的创作历程，回头一看，竟然就是这样不断发生着从不自信到自信，再到不自信，及至新的自信的确立的过程，使创作完成了一次又一次的新探寻。

有一件事记忆犹新。一九七八年是改革开放的标志性年份，也是被称作中国新时期文艺复兴的一个标志性年号。正是在这一年，我预感到把文学创作可以当作事业追求的时代终于到来了。一九七九年春夏之交，我写成后来获得全国第二届短篇小说奖的《信任》。小说先在《陕西日报》文艺副刊发表，随之被《人民文学》转载（当时尚无一家选刊杂志），后来又被多家杂志转载。赞扬这篇小说的评论时见于报刊，我的某些自鸣得意也难以避免。恰在这时候，当初把《信任》推荐《人民文学》转载的编辑向前女士，应又一家杂志之约，对该杂志转载的《信任》写下一篇短评。好话连一句都记不得了，只记得短评末尾一句：陈忠实的小说有说破主题的毛病（大意）。我初读这句话时竟有点脸烧，含蓄是小说创作的基本规范，我犯了大忌了。我从最初的犯忌的慌惶里稍得平静，不仅重读《信任》，而且把此前发表的十余篇小说重读一遍，看看这毛病究竟出在哪儿。再往后的创作探寻中，我渐渐意识到，这个点破主题的毛病不单是违背了小说要含蓄的规矩，而是既涉及对作品人物的理解，也涉及对小说这种艺术形式的理解，影响着作品的深层开掘。应该说，这是最难忘也最富反省意义的一次阅读自己。

这种点拨式的批评，可以说影响到我的整个创作，直到《白鹿原》的写作，应该是对“说破主题”那个“毛病”较为成功的纠正。我把对那一段历史生活的感受和体验，都寄托在白嘉轩等人物的身上，把

个人完全隐蔽起来。《白》出版十余年来有不少评论包括批评，倒是没有关于那个“毛病”的批评。

我又有启示，作为作家的我，在阅读自己的时候，不宜在自我欣赏里驻留太久，那样会耽误新的行程。

2008年7月10日 二府庄

我的秦腔记忆

在我最久远的童年记忆里顶快活的事，当数跟着父亲到原上原下的村庄去看戏。

父亲是个戏迷，自年轻时就和村子里几个戏迷搭帮结伙去看戏，直到年过七旬仍然乐此不疲。我童年跟着父亲所看的戏，都是乡村那些具有演唱天赋的农民演出的戏。开阔平坦的白鹿原上和原下的灞河川道里，只有那些物力雄厚而且人才济济的大村庄，不仅能凑足演戏的不小开销，还能凑齐生、旦、净、末、丑的各种角色。我们这个不足四十户人家的村子，演戏是连想也不敢想的事，我和父亲就只有到原上和原下的那些大村庄去看戏了。

不单在白鹿原，整个关中和渭北高原，乡村演戏集中在一年里的两个时段，是农历的正月二月和伏天的六月七月。正月初五过后直到清明，庆祝新年佳节和筹备农事为主题的各种庙会，隔三岔五都有演出，二月二是传统习惯里的龙抬头日，形成演出高潮，原上某个村子演戏的乐声刚刚偃息，原下灞河边一个村子演戏的锣鼓梆子又敲响了，常常发生这个村和那个村同时演出的对台戏。再就是每年夏收夏播结束之后相对空闲的一个多月里，原上原下的大村小寨都要过一个各自约定的“忙罢会”。顾名思义，就是累得人脱皮掉肉的收麦种秋的活儿忙完了，该当歇息松弛一下，约定一个吉祥日子，亲朋好友聚会一番，庆祝一年的好收成。这个时节演戏的热闹，甚至比新年正月还红火，尤其是风调雨顺小麦丰收家家仓满囤溢的年份。

我已记不得从几岁开始跟父亲去看戏，却可以断定是上学以前的事。我记着一个细节，在人头攒动的戏台下，父亲把我架在他的肩上，还从这个肩头换到那个肩头，让我看那些我弄不清人物关系也听不懂唱词的古装戏。可以断定不过五六岁或六七岁，再大他就扛架不起了。我坐在父亲的肩头，在自己都感觉腰腿很不自在的时候，就溜下来，到场外去逛一圈。及至上学念书的寒暑假里，我仍然跟着父亲去看戏，不过不好意思坐父亲的肩膀了。

同样记不得跟父亲在原上原下看过多少场戏了，却可以断定我那时候还不知道自己看的戏种叫秦腔。知道秦腔这个剧种称谓，应在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离开家乡进西安城念中学以后，我十三岁。看了那么多戏，却不知道自己所看的戏是秦腔，似乎于情于理说不通。其实很正常，包括父亲在内的家乡人只说看戏，没有谁会标出剧种秦腔。原上原下固定建筑的戏楼和临时搭建的戏台，只演秦腔，没有秦腔之外的任何一个剧种能登台亮彩，看戏就是看秦腔，戏只有一种秦腔，自然也就不需要累赘地标明剧种了。这种地域性的集体无意识就留给我一个空白，在不知晓秦腔剧种的时候，已经接受秦腔独有的旋律的熏陶了，而且注定终生都难能取代的顽固心理。

在瓦沟里的残雪尚未融尽的古戏楼前，拥集着几乎一律黑色棉袄棉裤的老年壮年和青年男人，还有如我一样不知子丑寅卯的男孩，也是穿过一个冬天开缝露絮的黑色棉袄棉裤，旱烟的气味弥漫不散；伏天的“忙罢会”的戏台前，一片或新或旧的草帽遮挡着灼人的阳光，却遮不住一幢幢淌着汗的紫黑色裸膀，汗腥味儿和旱烟味儿弥漫到村巷里。我在这里接受音乐的熏陶，是震天轰响的大铜锣和酥脆的小铜锣截然迥异的响声，是间隔许久才响一声的沉闷的鼓声，更有作为乐团指挥角色的扁鼓密不透风干散利爽的敲击声，板胡是秦腔音乐独有的

个性化乐器，二胡永远都是作为板胡的柔软性配乐，恰如夫妻。我起初似乎对这些敲击类和弦索类的乐器的音响没有感觉，跟着父亲看戏不过是逛热闹。记不得是哪一年哪一岁，我跟父亲走到白鹿原顶，听到远处树丛笼罩着的那个村子传来大铜锣和小铜锣的声音，还有板胡和梆子以及扁鼓相间相错的声响，竟然一阵心跳，脚步不自觉地加快了，一种渴盼锣鼓梆子扁鼓板胡二胡交织的旋律冲击的欲望潮起了。自然还有唱腔，花脸和黑脸那种能传到二里外的吼唱（无麦克风设备），曾经震得我捂住耳朵，这时也有接受的颇为急切的需要了；白须老生的苍凉和黑须须生的激昂悲壮，在我太浅的阅世情感上铭刻下音符；小生和花旦的洋溢着阳光和花香的唱腔，是我最容易发生共鸣的妙音；还有丑角里的丑汉和丑婆婆，把关中话里最逗人的语言做最恰当的表述，从出台到退场都被满场子的哄笑迎来送走……我后来才意识到，大约就从那一回的那一刻起，秦腔旋律在我并不特殊敏感的乐感神经里，铸成终生难以改易更难替代的戏曲欣赏倾向。

我记不得看过多少回秦腔戏了。有几次看戏的经历竟终生难忘。上学到初中三年级，学校在西安东郊的纺织工业重镇边上，住宿的宿舍在工人住宅区内。晚自习上完，我和同伴回宿舍的路上，听到锣鼓梆子响，隐隐传来男女对唱，循声找到一个露天剧场，是西安一家专业剧团为工人演出，而且有一位在关中几乎家喻户晓的须生名角。戏已演过大半，门卫已经不查票了，我和同学三四个人就走进去，直到曲终人散。无论从哪方面说，都比乡村戏台上那些农民的演出好得远了，我竟兴奋得好久睡不着觉。第二天早上走进学校大门，教导主任和值勤教师站在当面，把我叫住，指令站在旁边。那儿已经站着两个人，我一看就明白了，都是昨晚和我看戏的同伴——有人给学校打小报告了。教导主任是以严厉而著名的。他黑煞着脸，狠声冷气地训斥我和看戏的同伙。这是我学生生活中唯一的一次处罚……

二十多年后的一九八〇年，我被任命为区文化局副局长的同时，新任局长就是训斥并罚我站的教导主任。我和他握手的那一刻，真是感慨“人生何处不相逢”灵验了。从和他握手直到我离开这个单位，始终都不曾提及此事。他肯定不记得这件事了，他训斥过可能就置诸脑后了，又忙着训导另一位违纪的学生去了。不过，这个时候的他，已经半老，依然严厉的脸上总是洋溢着微笑，大笑的时候很爽朗。一张棱角严厉的脸无论畅怀大笑还是微笑，尤其生动感人，甚为可爱。

还有一次难泯的记忆。这是“四人帮”倒台不久的事。西安城里那些专业秦腔剧团大约还在观望揣摩文艺政策能放宽到何种程度的时候，关中那些县管的也属专业的秦腔剧团破门一拥而出了，几乎是一种潮涌之势。他们先在本县演出，又到西安城里城外的工厂演出，几乎全是被禁演多年的古装戏。西安郊区的农民赶到周边县城或工厂去看戏，骑自行车看戏的人到傍晚时拥满了道路。我陪着妻子赶过二十里外的戏场子。我的父亲和村里那几个老戏友又搭帮结伙去看戏了。到处都能听到这样一句痛快的观感：“这才是戏！”更有幽默表述的感慨：“秦腔到底又姓秦了！”这种痛快的感慨发自一个地域性群体的心怀。“文革”禁绝所有传统剧目的同时，推广八个京剧“样板戏”，关中的专业剧团和乡村的业余演出班子，把京剧“样板戏”改编移植成秦腔演出，我看过，却总觉得不过瘾，多了点什么又缺失了点什么。民间语言表达总是比我生动比我准确：“这是拿关中话唱京剧哩嘛！”还有“秦腔不姓秦了”的调侃。

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的经济状况初得改善，便买了电视机，不料竟收不到任何节目，行家说我居住的原坡根下的位置，正好是电视信号传递的阴影区域。我不甘心把电视机当收音机用，又破费买了放像机，买回来一厚摞秦腔名家演出的录像带，不仅我把包括已

经谢世的老艺术家的拿手好戏看了个够，我的村子里的老少乡党也都过足了戏瘾，常常要把电视机搬到院子里，才能满足越拥越多的乡党。我后来又买了录音机和秦腔名角经典唱段的磁带，这不仅更方便，重要的是那些经典唱段百听不厌。大约在我写作《白鹿原》的四年间，写得累了需要歇缓一会儿，我便端着茶杯坐到小院里，打开录音机听一段两段，从头到脚、从外到内都有一种无以言说的舒悦。久而久之，连我家东隔壁小卖部的掌柜老太婆都听上了戏瘾，某一天该当放录音机的时候，也许我一时写得兴起忘了时间，老太太隔墙大呼小叫我的名字，问我，“今日咋还不放戏？”我便收住笔，赶紧打开录音机。老太太哈哈笑着说她的耳朵每天到这个时候就痒痒了，非听戏不行了……在诸多评说包括批评《白鹿原》的文章里，不止一位评家说到《白鹿原》的语言，似可感受到一缕秦腔弦音。如果这话不是调侃，是真实感受，却是我听秦腔之时完全没有预料得到的潜效能。

我看过、听过不少秦腔名家的演出剧目和唱段，却算不得铁杆戏迷。不说那些追着秦腔名角倾心倾情胜过待爹娘老子的戏迷，即使像父亲入迷的那样程度，我也自觉不及。我比父亲活得好多了，有机会看那些名家的演出，那些蜚声省内外的老名家和跃上秦腔舞台的耀眼新星，我都有机缘欣赏过他们的独禀的风采。然而，在我久居的日渐繁荣的城市里，有时在梦境，有时在一个人独处的时候，眼前会幻化出旧时储存的一幅幅图景，在刚刚割罢麦子的麦茬地里，一个光着膀子握着鞭子扶着犁把儿吆牛翻耕土地的关中汉子，尽着嗓门吼着秦腔，那声响融进刚刚翻耕过的湿土，也融进正待翻耕的被太阳晒得亮闪闪的麦茬子，融进田边沿坡坎上荆棘杂草丛中，也融进已搭着圆顶的太阳的霞光里。还有一幅幻象，一个坐在车辕上赶着骡马往城里送菜的车把式，旁若无人地唱着戏，嗓门一会儿高了，一会儿低了，甚至拉起很难掌握的“彩腔”，在乡村大道上朝城市一路唱过去……

秦人创造了自己的腔儿。

这腔儿无疑最适合秦人的襟怀展示。

黄土在，秦人在，这腔儿便不会息声。

2008年8月7日 二府庄

龙湖游记

踏上游艇，在清湛湛的湖面上划行，一缕缕清凉湿润的风迎面拂过，把满身三伏酷暑的溽热顿时荡涤光净，从头到脚从外到里都是一种期待里的舒服。我似乎还不尽兴，忍不住撩起水来，搓了胳膊又搓洗了脸，便融入这水天一色的湖了。

水是湛蓝湛蓝的水。天是湛蓝湛蓝的天。眼前的水看不到边际，远处的水被灰白的水汽遮住了蓝色，与目力所能及至的同样呈现着灰雾的蓝天相接相融。一叶小艇泛在这水天相接的水面上，很容易让人产生海的迷幻，尤其是对我这样意识和习惯里储存着黄土原和杂生着荆棘野草榆树枸树的坡岭的人，漂浮在这样无边无际的水面上，往往会产生风平浪静的海的错觉。然而，这确凿是湖。

真正让我不再发生湖与海的混淆性错觉，是进入这湖独有的生动到超出想象的景物。湖里生长着大片大片的蒲草，小艇在蒲苇丛中的狭窄水道上缓缓划行，不时有鸟儿从蒲苇丛中飞出，又有鸟儿沉落其中，偶尔能听到幼雏混乱一团的叫声，可以猜想是争夺食物的颇为激烈的本能的叫声。无法想象，这密不透风的蒲苇丛林里，有多少双鸟儿在自由地繁衍后代。这种鸟在我并不陌生，我的家乡灞河边的苇子林丛是它们的福地，叫声不大优美，是比较单调的“呱呱呱”的粗声，当地人就因其叫声称作“苇呱呱鸟”。一个苇字，标明了它生存繁衍的独特领地——苇丛。这湖里的苇丛更是难得的一方自由领地了，首先不担心安全，没有如曾经的我一样捣乱的孩童掏取鸟蛋。

在蒲苇丛里相间着的大块水面上，有通体白亮的鹭鸶悠然浮游，它们总是成双成对，一会儿游远了，一会儿又聚拢并行了。我无意间捕捉到一个瞬间即逝的画面，一只鹭鸶张开翅膀从水面跃起，不偏不倚落在另一只鹭鸶的背上，又滑落到水里去了，被踏了一下的鹭鸶抖一抖身子，似乎没有在意，又并头游动着。还有几只野鸭，显然缺乏鹭鸶的优雅风度，却洋溢着活泼的天性，不时把头伸入水中又冒出来，争前恐后，左右穿梭，自然都是在水里捕捉小鱼小虾等食物。几种叫不上名字的小鸟，从空中掠过，有一种背上是一抹鲜艳的红色，瞬间就消失了。

小艇从苇丛中出来，又进入野生的荷花丛中。许是得了这好水和好水下的好泥的滋养，硕大的荷叶遮罩着水面，红色白色粉红粉白的荷花竞相开放，开放的荷花和含苞待放的花蕾都是出奇的硕大。浓郁的香气弥漫在水面上，真有仙境里的沉醉了。我便想到，无论密不透风的苇丛，无论花香扑鼻的荷花，当是适宜所有职业所有年龄的男女驾舟散漫的好去处。进入苇丛和荷花丛中，得意的事和烦恼的事都会被荡涤出心胸，获得一分娴静和爽快。我便想着约一二好友，在这苇丛和荷丛中自在游荡，既不说马尔克斯也不说网络文字，只看蓝天白云，只听“苇呱呱鸟”哺食引发的幼雏的叫声，把记忆里的往事和昨天刚发生的事统统扫除，装进鸟叫声和撩拨清水的声音，储入白云和苇丛荷花，还有鹭鸶和野鸭……

直到我如此沉迷的时候，仍然不敢相信这一方好水是在河南淮阳大地上。不单是我孤陋寡闻，更在我多年来偏颇的心性，以为和我住得相邻的省份大同小异，就把兴趣偏向于那些自然景观奇特的边远地域、大漠荒原、海洋冰山、少数民族聚居的山寨、野狼游走的草原、

寸草不生蠓虫难觅的生命禁区的盐湖……此刻，我甚至有某种懊悔，竟不知和我相邻的中原河南淮阳，有这样一方好水——龙湖。

湖以龙命名，也是这一方好水所系的悠远到神话时代的神秘历史。传说伏羲氏从我的家乡渭河边来到这里寻求更广阔的发展天地，神农氏也在这里教民稼穑，陈胜在这儿建立第一个农民政权，更有诸多文人墨客如李白、苏轼等都留下不朽诗篇。在我尤为惊喜的收获，陈姓氏族的源头就在这里。这龙湖在夏代称为陈，到商汤时把舜帝的后裔分封到陈地，到西周时周武王把女儿嫁给舜的后世嫡孙妫满，就在这龙湖上建城立国为陈国。随之以国名为姓氏，便有了陈姓。妫满传二十世，历六百四十三年，陈姓便繁衍了不知多少万子孙，到现在大约七千万人，遍布中国南北和海外华侨之中。十多年前我在广州的陈氏家谱园里获悉，陈姓源自舜的后裔所在的陈国，却不知具体方位，今天竟然一脚踏进陈姓始祖所在的陈国的门槛了，无意间完成了一次最久远的寻根，顿然觉得和淮阳亲近到有亲情相系了。

龙湖有好水。《诗经·陈风》有赞美龙湖的诗章："彼泽之陂，有蒲与荷……彼泽之陂，有蒲与蕳……彼泽之陂，有蒲菡萏。"把龙湖上这些水生花草融铸进《诗经》，可以猜断肯定是这龙湖的风景激发了作者的诗兴，留下这生动的诗章。我在龙湖蒲苇丛荷花丛中的忘情和沉醉，和几千年前《诗经·陈风》的作者相通，只是我笔拙，吟诵不出一首诗来，仅留笔记一篇，聊以尽兴。

2008年9月29日夜 雍村

老君台记

到鹿邑城东北不远处去看老君台，传说是老子升天的地方。尽管我基本不信神更不信鬼，却仍然兴致高涨，纯粹在于神话传说超乎常人想象的那种神秘而又神奇的魅力，已不介意有或没有，也就不存在信或不信的心理障碍。老子有创立并铸就中国道教教义的经典著作《道德经》，是伟大的思想家哲学家；老子就出生在今属河南的鹿邑东太清集，姓李名耳，字伯阳，号老聃。我列举这两件确凿无疑却也几乎人人皆知的事实，仅仅只是要证明老子曾经是一个大活人，不属我们远古洪荒时期那些神话传说里的人物。一个真实的老子被神化了，演绎出一个升天的神话，尽管我信不下，反而更来兴致，想看看老子的崇拜者给他创造出怎样一个神秘莫测到可以沟通天上人间的老君台。

在如注的大雨里走到老君台前，我稍觉失望，一个让老子成神升天的地方规模很小，似乎甚为简陋，几乎感觉不到仙气神韵。细看了，是一个圆柱形高台，比我想象中的高度差得远了，不过十多米，仅有三十二三级砖铺台阶。构筑这个圆柱形高台的砖头显得陈旧，倒是泛着某种历史的沧桑，却还是让我不能发生仙风神韵的神秘感。踏着被踩踏得溜光的青砖台阶拾级而上，台顶有几间庙宇式的房屋，也比我想象里的建筑规模相差甚远，甚至觉得粗糙，太不精细，太不讲究，这是老子升天的地方啊！老子的塑像端坐房中，无法判断像与不像，却泛不起任何神秘的气氛，须知老子本身早已笼罩着半人半神的神秘色彩了。企望领受神话神秘的心理似乎没有满足，便平静地走下高台来，一个意料不及的神秘到令人震惊的事件摆到眼前——

一位朋友把我引到圆柱形高台的西侧，那儿载着一个注释盘，盘里有一排业已生锈的炮弹。听了这些炮弹的来龙去脉，岂止神秘，已经使我发生头发竖立头皮发紧的生理反应了。

抗日战争时期，这里已经沦陷。日本侵略者一个榴弹炮班组，对着这个传说中老子升天的圆柱形高台发炮轰击，尽管这高台里不仅没有抵抗力量，而且空无一人，只有一尊老子的色彩脱落的泥塑彩绘塑像端坐其中。几个操着榴弹炮的日本鬼子，要把它轰击垮塌，夷为平地，其得意和狂妄的姿态可以想象。然而，谁也始料不及的奇迹发生了。一发榴弹炮炮弹发射过去，击中本已有些老朽的砖墙，而且穿进墙内，却未发生爆炸。鬼子炮手以为是哑弹，接连发射，仍然是炮弹钻进砖墙，没有墙倒屋塌的效果，也没有爆炸声响。鬼子炮手再发炮弹，都是如同陷入沙堆不见响声，倒是发炮的鬼子惊诧莫名了。惊诧的鬼子炮手在气急败坏的失控状态里，连续发射了十多发炮弹，竟然一颗都未发生爆炸，全部钻进砖墙成了哑弹死弹。几个鬼子莫名其妙，随之得知这是老子升天的老君台，吓得扛起榴弹炮炮筒和炮弹溜走了。没人能猜准他们当时的心态，是恐惧，抑或是触犯人道也触犯天道的罪孽感?

半个多世纪过去，这个老君台天天迎来又送走如我一样的观光者，也少不了海外洋人，除了对老子的崇拜以及对神化老子的好奇心，还多了一种对日本鬼子十余发榴弹炮炮弹不响不炸的真实故事的迷惑莫解，然而谁也不会永久放到心上。某一日，一个年过七旬的日本老者专程找到老君台，在圆柱形的砖砌台墙下跪倒了，连连忏悔，连连谢罪。他公开自己的身份，就是当年用榴弹炮轰击老君台的炮手。那场罪恶的侵略战争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游人和观光客把榴弹炮炮弹不炸不响的故事也只当作奇闻逸事传说，倒是这个当年发射

炮弹的士兵背上了解不开放不下的心灵负担。他作为榴弹炮炮手，在中国的土地上不知发射了多少枚炮弹，炸死了多少生灵炸毁了多少房屋，他已经完全无记，而只有发射到老子升天的老君台上一颗都未炸未响的榴弹炮炮弹，压在他的心上，不仅不能忘记，而且年龄愈老愈清晰，负罪感愈深重。他向有关人员毫不含糊地说，一共发射了十三颗榴弹炮炮弹，一颗都未响未炸。他说这话之前，在老君台发现并找到十一颗未炸响的炮弹，后来果然又找到两颗，可见当年这个日本炮手的记性。现在，这十三颗未炸响的榴弹炮炮弹，就展示在老君台，供国内国外的游人观赏，再由各人自己去解这个神秘神奇的真实的神话。

我至今解不开。

初看时本不觉得神秘的老君台，在我一下子神秘起来，直到现在依旧神秘莫解。

我猜断那个当年发射榴弹炮的炮手，即后来跪倒忏悔的那个日本老人，已经解开了这个真实的神话。

2008年10月1日 雍村

铁岭掠影

电话上听到邀我赴会的城市是铁岭，当即反应出赵本山的名字来。我已记不准是哪一年得知赵本山是从铁岭走出来的，却一遍成记。这位在我的印象里堪与卓别林比肩的中国小品演员，早已独成一方个性化魅力的艺术风景。几位朋友在与我的通话中得知我要去铁岭，无一例外地便随口说出那是赵本山老家老窝儿的话，可见并非我的记性好，确凿是赵本山太招他的观众喜爱了，不仅记着他的名字，还都记住了他的出处铁岭。我到铁岭赴会，隐隐看看赵本山曾经生活的老窝的风景，还有某种神秘的崇拜心理。

我到铁岭是深夜三点，在大街小巷穿引的过程里，充分感受着处于沉睡里的城市的静谧和安详。然除了街灯下的景致，既看不到行人，更看不到稍远的铁岭独有的景观。为不留下遗憾，我放弃了早睡，在满窗灿烂的阳光里走出门去，走进铁岭的大街小巷。

这是铁岭老城，大街两边是大的商店和小的店铺，小巷里则是一家挤着一家的窄门面专卖店。无论大街或小巷，多是低层住宅楼，尽管做了各种色彩的装饰，仍然可以看出是老式建筑，让我想到上世纪八十年代西安老城区的情景。街道也是一眼可以看出旧有的格局，尽管增补了花木草皮，原有的格局依然，名副其实的走车观景，铁岭留给我的总体印象，和我见过的许多北方城市无大差异。然而，我却不敢马虎，心中响着独特的二人转欢乐明快的唱曲，脑子里浮现着穿着各色大襟花袄舞着彩色手帕的男女轻盈的舞步。诞生在这块黑土地上的唱腔和舞步，是这一方地域的人最具个性的艺术展示。看似平常的

这座北方城市里，蕴积着独特个性的文化，显示着乐观、欢快、简洁、活跃的群体生命活力。

出铁岭老城，我的眼前是一望无际的开阔到令人震撼的平原，收获过的畦垄如棋盘的田野里，隐约可见满地的稻茬子；脱过粒后的稻草捆子堆积在稻田里，密密麻麻望不到边沿；裸露的稻田呈黑色，让我这个见惯了黄土地的人大开眼界，自然想到它肥沃的质地，心中滋漫起一缕欣羡之情了。我生活的关中的黄土地孕育了慷慨激越的地方戏秦腔，生存环境更为艰难的陕北的黄土地，却孕育了个性张扬的民歌信天游，更有比迪斯科还癫狂的腰鼓舞。在这方肥得流油的广袤的黑土地上，孕育了让人赏心悦目的二人转。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一方水土更孕育一方人个性化的艺术。

车子在黑土地上疾驰，眼前突然出现一座新城，我被告知这是正在建设中的铁岭新城。接近新城边沿，我看到的是左右都看不到头的脚手架。有钢铁撞击的响声。卷扬机的钢铁长臂在高空运转。掘土机在一片阔地上推着黑色的泥土缓缓行进。道路两边是刚刚栽植成活的花草和树木，还有尚未整修成形的凌乱的土堆。一个新的铁岭城正在这方黑土地上呈现出雏形，其规模其景观其风姿，都与老城是别一番崭新的景象了。新城的街道宽阔规整，更有别出心裁富于诗意的街名，南北走向的通道以中国的名山命名，如泰山路、华山路等；东西走向的路以中国的江河命名，如长江路、珠江路、澜沧江路等。我很真切地感知到一种命名的创意和诗性，命名者的创造性思维，既是开阔的，也饱含着诗意的浪漫。

远远看到一片蓝的水面，在中午的阳光下闪烁着幻影似的光环，那是凡江。在我的意识里，对那些有江河流过的城市留下更为生动鲜活的记忆，南方自不必说，几乎有城就有水，珍贵自然是北方的城

市，难得有流水依傍或河流穿城而过。这种心理缺憾与我生活的古城西安缺水有关，尽管古有“八水绕长安”的迷人景象，然而都与城区有较远的距离，近年间水量锐减，以至干涸。看到铁岭新城流过的凡河，便有一种滋润的感觉。待车转到一方高台上的时候，我有身临仙境的错觉，奇花异草，诸多叫不出名字的花树，修葺规整的小径，细工雕琢的玉石围栏，真如同诱人的公园。上到高台的平顶，眼前是一泓蓝莹莹的湖水，岸边绿树掩映，平添出生动的诗意。这是一方人工湖，引凡河河水进来，成为令人舒悦的风景。人工湖那边，是一排业已完成的新式建筑，造型各异，高矮错落有致，到这儿就可以领略未来铁岭新城的全新风貌了。我有点不可思议，一座新的城市就这样说建就建成了，堪为奇迹。

匆匆走过铁岭老城和新城的每一步，我都感受着生活运动令人振奋令人鼓舞的步伐。这种步伐在我走过的中国南方和北方的城市都能感受得到，而在黑土地上的铁岭却尤为强烈。我不仅期待而且相信，崭新的铁岭在创造新的经济奇迹的同时，也将创造新的文化景观，别一种风格的赵本山将走进中国观众的视线。

2008年11月12日 二府庄

一双灵光纯净的眼睛

大年初二下午，难得的清闲里，突然涨起涂鸦兴致。手机又响了，以为还是老朋或新友祝贺新年的事。不料，竟听到一种沉痛的声音，是王德芳的儿子给我报丧，他父亲王德芳去世了。我的脑子里顿时出现空白，不由得悲哀地慨叹，这难以逃避的悲剧还是发生了。

大约一月前的元旦前夕，我到长安郭杜镇参加柳青文学研究会年会，见到诗人徐剑铭，悄悄地也是伤心地告诉我，王德芳查出肺癌，住在西安东郊的军大医院里。我听罢心里一沉，一道阴影便罩上心头。当天下午，我便赶往医院。第一眼看到躺在病床上鼻孔里插着输氧管的那张眉骨清爽棱角分明的脸，我又不由得在心中涌起悲叹，一个铮铮汉子被撂倒了。我叫了一声“德芳……”便说不出话，喉头堵塞了。我和他几乎同时伸手相握，竟然能感到他的手还很有力。倒是他先开口说话，而且容不得我插嘴。他还说文学创作，却几乎不提自己的要命的病。他的口齿发音时而清晰，时而含混，我已不在乎他说的内容，倒是更想知道病情和恢复的可能性。他的儿子已经习惯他的语言，不断地给我“翻译”那些我听不懂的话，仍然是文学创作、小说和诗……我姑且听着，用心观察他的外在变化，本来就偏瘦的人更瘦了，本来就棱骨分明英气铮铮的脸，更突显出分明的棱角；鼻子更显得通直了，雄踞脸盘中央，我顿然想到直立蓝天白云间的峭壁；那双黑黑透亮堪称灵气和纯净之气同时泛溢的眼睛，依然泛溢着纯净之气和灵气，我便想到那些大气磅礴和那些情感纤细的诗句，都是这双眼睛的泄光。我劝他暂且不说也别再想文学创作的事，无论小说无论诗歌都不想不说，只需静静地养病……

临走时，德芳的儿子告诉我，病发现得太晚了，医生已无技可施。大约一月前，儿子和夫人发现德芳不断消瘦，要他去医院检查，他却一拖再拖，推说忙完这事再忙完那事后去医院。就在他躺到医院之前不久，还陪着全国一批新老诗人登华山，激情满怀地吟诵华山的诗歌。

我知道并记住王德芳这个名字，是四十多年前的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的事了。《延河》和陕西的两家省报和市报的文艺副刊上，频频出现署名王德芳的诗歌，格外令我这个喜欢写作又发表不了作品的文学爱好者羡慕。陕西那几位卓立文坛的习惯上称老作家而其实不过四十出头的大作家，许是与自己距离太远，心里存着的是仰视，不具备可比性，倒是那几位频频出现在《延河》和报纸副刊上的业余作者的名字，对我更具神秘的诱惑性魅力。他们通常被称为“工农兵业余作者”，其中写诗的王德芳算是人数有限的几位中的一员。一九六五年，他已经参加过“全国青年业余创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足见他诗歌创作的影响，时年不过二十四岁。

见到王德芳，大约是接近二十年后才有的机缘。确凿记得的过程，是尚未谋面，却听到他在“文革”中的惨痛遭遇，在新时期刚刚恢复的文学圈子里广为流传，义愤阵阵。在“文革”刚刚发生时，他就被揪出来批判斗争，罪名是他用诗歌反党。他满腔激情创作的歌颂共产党歌颂毛主席的诗歌，被倒反过去挑刺，变成诅咒的恶意了。吊挂在他胸前的牌子上的罪名不断升级，先是“小三家村头目”，再是“三反分子”，直到最吓人的“现行反革命”。他被逮捕入狱，判刑十五年，可以想象又令人不敢想象狱中的折磨。他在狱中整整被折磨了七年零七个月，直到一九七八年元月获得平反释放。他的坚强自信所产生的强大心理支撑力量，让他承受了不堪忍受的折磨而保存了性命，终于盼来

了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垮台的一天。他的更为感人的举动发生在出狱之后。在他被囚禁牢狱的时候，拖着一男一女两个小小孩的妻子无法维持生活而改嫁了，丈夫是个很善良的人。他出狱后就到车间上班，晚上下班住在招待所，仍抑制不住洋溢的激情倾泻诗歌；他确定不再找已经改嫁的妻子，只怕给那个业已组成几年的家庭造成伤害，自己已经被伤害过了，就由自己一个人承受。他不仅没有抱怨妻子，倒是把初入狱时妻子从窗户塞给他的一袋水果的情义永记不忘……我在听到王德芳的这些传闻时，完全改变了“文革”前在报刊上看到他的诗歌时的印象，羡慕升华为钦敬。呈现在我意识里的不单是一个才华横溢的工人业余诗人，而是一个顶天立地的堪称大境界大胸怀的大写的人了……直到我来阎良为他送行，一位和他共事的同志忆及一个细节，在逮捕他的万人大会上，他昂头不低，被压下去，又仰起来，又印证了我的印象。

我已记不准是在什么环境里和他第一次握手了，我却记着第一次见面留给我的印象，就是那一双泛溢着灵光也泛溢着纯净之气的又黑又大的眼睛；他的身体大约还未从七年之久的牢狱折磨里恢复过来，偏黑的脸上，泛着灰黄色；他的精神和心理，大约也尚未从积久的挫伤里完全恢复。然而，那双眼睛却让我感知到这一个诗人独禀的壮气和灵气。包括我在内的同一茬作者都在关切地安慰鼓励他，也忍不住问他的生活情状。他不再抱怨什么，也不哀叹，甚至不愿意再提曾经冤枉无告的灾难，一种理性的大度和谦和，让我更具体地产生敬重。

及至后来不断读到他的诗歌，震惊全国的张志新烈士的惨案公开以后，王德芳写下《真理的回答》。记得我在《延河》上读到这首诗时，反倒庆幸他是不幸中的万幸，还能为张志新烈士献诗。我随后又读到《啊！永远明亮的心》这首较长的诗，更为惊讶。四川成都一个

青年盲女苦学苦练，成为一位医术出众的按摩医师，治愈了全国各地许多病人。他从报纸上读到这位女按摩师的感人事迹后，一发不可抑止，写下一百多行诗歌倾情歌颂。我在读着那些真情倾泻的诗句时，突然想到，这个自身受过七年多牢狱之难的王德芳，刚刚走出牢狱不久，便忘情地歌颂一位平凡而伟大的普通劳动者，足以见证一个中国诗人的赤子情怀了。

许多年里，他在阎良，我在西安，离得很近，却很少谋面，甚至一年半载也见不上一回。我知道他很忙，身为一个超大型军工企业杂志的主编，又为企业的宣传工作尽心倾力地忙碌着，还不断写着他的诗。人说诗是年轻人干的事，年龄偏大时，诗性激情便会转化为相对的理性叙述了，不少诗人后来改写小说、散文或戏剧了。王德芳的诗性激情却不受年龄的制约，一路吟诵过来，激情不减，写下七百余首诗歌，直到躺倒前，还登上华山纵情赋诗。我便想到这是一个天生的诗人，一个灵气和壮气始终旺盛的诗人。

2009年1月31日 雍村

难忘一渠清流

在村子里的初级小学校念书到四年级期满，算是毕业了。要继续深造，需要通过升学考试，到所辖学区的高级完全小学接着读五、六年级。严峻的前提是，必须通过考试得以录取。初级小学是复式教学，一个教室里四个年级的三四十个男女学生，由一位既是教师也兼校长的青年老师独统这一方乡村教育领地。他很负责任，在我们毕业前夕已经打听到准确的招生消息，属于西安市辖区离我家最近的两所高级小学都不招生，却有蓝田县辖的一所高级小学招生。我家所在的地域属西安市辖的最东头一个村子，再往东就属蓝田县辖的地域了；往北是灞河，河北边也是蓝田县辖地，正对着我们村子的灞河北边的油坊镇上有一所高级小学，距家不过三里地。我和同村的两个同班同学搭伙儿涉过灞河，抱着碰运气的心理找到那所小学，再找到管招生的老师说明来意，竟破例允许不属蓝田县辖的我们报名应考……考试的结果，我们三人有一个落榜，我竟有幸得中。这是一九五三年的事，我十一岁。

即将开学的时候，天降暴雨，灞河涨起洪水，多日不退，我几乎天天乃至一天三次跑到河边，看河水落下去的情状。直到水落到我可以蹚过的时候，开学已过一周了。父亲送我上学，他肩头扛着一袋面粉，我背着一捆被卷，走进学校大门时竟然忍不住心跳。学校给北边岭上和南边白鹿原上的远路学生安排住宿，并设有学生灶，把自家磨好的面粉交来，再交大约一元人民币的副食费，只有盐和醋两种调味品，酱油属于奢侈品，不供，更谈不到蔬菜或肉了。

父亲回家之后，我进入教室上课，陌生是不消说的，麻烦发生在晚上。作为我们五年级新班的教室是新建的一幢房子，房内用木板铺楼，作为睡觉的宿舍，尚未完全做好，工匠正在赶做尾巴活儿，把我们班临时安排在一个既老又低矮的教室里，晚上就睡在桌子上过夜。我初来乍到，不知底里，天尚未黑，课桌被人并拢占定了，连长条坐凳都被合并各有其主。我把剩下的三条木腿活络的板凳并拢起来，铺开被子，自然是一半做褥一半做被，又找来一块旧砖做枕头，睡下了。睡到不知什么时候，我有从悬崖跌下的恐惧，惊醒后半天反应不过来，迷迷蒙蒙还以为在自家炕上，摸到左右的木板凳，才顿时醒悟，我是从以凳做床的板凳上掉到地上了。我爬起来，眼前黑咕隆咚，那时候尚未通电，照明需学生自备油灯。我刚来一天，还未来得及买油置灯。摸着黑把掉在地上的被子拎起来，才发现三条并拢做床的长条凳分开了，我掉到地上时夹在木凳之间，也就明白是木凳的腿子太活络而难以固定，才造成这场虚惊。这是我第一次离家出门在外过夜的经历，竟铸成永久记忆。

到第二或第三四天，我的紧张心情才逐渐缓解，也才敢把这个学校的前院后院走了一遍看了个明白。大门朝南临街，将一排作为教室的房子中间留一间作为通道。进入校内，西边一排低矮的房子，是老师的餐厅和学生灶，还有储藏杂物用房；北边是一排教室，中间夹着校长和几位教师宿办兼用的单间房；东边就是新建成的即将启用的我们班的教室了。四面被连排房子连结，中间是一方甚为宽敞的空地，下课后便被拥出教室的学生渲染得生动活泼。最令人难忘的一景，是从围墙外引进一渠清流，从北边那一排教室前折拐到我们的教室门外，再向西折拐到大门通道，从石板铺盖的地下流出学校，穿过街道流进对面的村子。这条水渠的水一年四季都清澈无浑，是地下渗出的一股颇为丰盛的清泉，大约流过许多许多年了，渠边上粗大的小叶杨

树即可见证。北排教室外的水渠边，有小块竹林，是冬天里校园内的一抹绿色。竹林边，还有一大丛玫瑰花。北排房子中间也有一条通道，出去后便是偌大的操场，只有一副木制篮球架，再无任何体育设施。操场东北角还有两座教室，供低年级学生学习。操场西边是土打围墙的厕所。北围墙紧靠着一条沙石出路。我出围墙门站在公路边上，平生第一次看到大卡车。那些从北岭和南原上来的同班同学，晚饭后常不约而同走出北围墙后门，站在公路边等待过往的汽车看风景。那时候汽车很少，往往等半个多小时，未必能看到一辆汽车，小车几乎没见过。后来我才知道，这是关中通中国南方的唯一一条公路。

我很快便和同学混熟悉了。大约是年龄造成的不同兴趣，我和那些年龄接近个头也相差不多的小同学很自然地聚拢为友。我的学习不是太用功，把老师讲的课本内容听懂了，很顺利地做完作业，就不再翻揭书本了，课余便尽着性情玩。那时候尚未使用钢笔，必备一支大字毛笔和一支小楷毛笔，一个砚台或墨盒，每天写一张大字，两天写一页小楷字，连算术作业的洋码字也是用小楷毛笔书写。我现在还后悔那时候把大仿字和小楷字只当成作业去完成，没有认真用心地练习书法基本功。我们班有一位个头不高却很老气的同学，毛笔字写得好到被老师划归为柳体，即大书法家柳公权的笔体风格。我常见他在课余独自写毛笔字，用粗糙的黑麻纸订成一个大厚本子，一张一张地写，左手边就放着一本柳公权的字帖，作临摹。我第一次听说大书法家柳公权的名字，第一次见到字帖，皆源于此。我和不少同学写毛笔字还处于描“影格”的初始阶段，“影格”是班主任杜老师写的，放在纸下，再在上面白纸上照着描摹。杜老师后来把给学生写“影格”的事转嫁到那位同学身上，他在全班同学面前说，谁要用“影格”，别找我，让×××同学写，他比我写得好。可惜，我忘记了这位同学的名字。

学校最火的体育运动是篮球比赛。班级之间搞得热火朝天，却是那些年龄大个头也高的学生。如我一样年龄小个头又矮的同学，流行玩一种小皮球，比赛人数和规则与篮球完全一致。我曾经热衷到入迷的程度，一个篮球场，很难有给玩小皮球的学生尽兴的机会。我在闲余时就踢毽子，仅仅一条灞河之隔，我们河南边的村子里的小孩，几乎人人会踢用鸡毛扎的毽子，女孩也踢，而河北岸的同学却把我的毽子当作稀罕物，无人会踢，许多同学竟然没见过。不过，他们好奇地试踢几回之后就索然了，我一个人玩不出兴趣，就又找机会和他们一起打小皮球了。

我是顶着“毛盖”发型走进这所高级小学的。还有北岭南原偏僻乡村的同学也蓄着这种乡村未成年男孩传统的发型，即前脑上蓄留一绺长发，苫住了前额。在已经普及了所谓“一边倒”和“平头”等文明发型的学校里，常常遭到讥笑。班主任杜老师倡议男同学每人交一毛钱，买回推子、剪刀和梳子，亲自动手，把我和其他所有蓄着“毛盖”发型的同学的头发剪掉了，一律变革为新式文明发型。他随之培养了两个心灵手巧而又热心服务的男同学做理发师，给全班男生义务理发。我后来由此番发型革命约略可以感知当年辛亥革命男人剪辫子的心理。

从教室门口流过的清湛湛的水，是我们寄宿学生洗脸的再好不过的水了。因为是地下涌泉，夏天清凉，冬天又显得温热，洗手洗脸是一种享受。半夜从楼上宿舍下来小解，出门便对着水渠撒个痛快，尿被水流冲走，不留任何遗味。记得某年初夏，我似乎睡醒后还有点迷糊，下楼后刚站到水渠边，看到前方站着一个没有脑袋的人，吓得折身跑上楼去，躺进被窝再无法入睡。第二天早晨起来在水渠边洗脸时，才看出那个无头的“鬼”是那丛含苞待放的玫瑰。我把这场虚惊写成作文，受到杜老师的表扬，不仅在全班通篇读完，而且对几处生动

描写做了点评。这是我的作文获得的第一次评论，而且以阅读的形式公开“发表”在全班同学面前，难以忘记。

在油坊街高级小学的两年寄宿生活，几乎记不起任何不愉快的事。唯一的缺憾，春末初夏时节遇到暴雨，灞河涨起洪水，周六回不了家。寄宿的同学和学校老师都回家了，只留下我和灞河南岸三五个同学，好生恓惶。我常站在河边，看着南岸走动的大人和小孩，清晰到可以辨认出张三李四来，却总无法回到母亲身边，忍不住滴泪。尤其是升中学考试的关键时候，遭遇洪水，不能回家，不仅口袋无钱，关键是我穿着一双鞋底快要磨透的布鞋，踏上行程三十华里的沙石公路，很快就把脚后跟磨破流血了……

2009年3月2日 二府庄

说“我”

说“我”，不是说我本人，是想说“我”这个字的读音。更确切地说，是陕西人对“我”字的读音，自然也是我对“我”字的读音。

先从我自己的遭遇说起。记得年轻时第一次出潼关也出陕西界，就发现不妙，和人初识开口说话，发现对方眉头一愣，眼神里掠过一缕惊诧，初以为自己行为举止有不得体之处，却一次几次反省竟查纠不出，后来才发现概出于对“我”字的发音。及至生人初交之后变成熟人，乃至成为可以坦然直言的朋友，他或她在听到我说“我”时不仅不愣神不惊诧，反倒跟着我模仿起“我”的发音来。初学自然都不顺口，也不像，发出既不像普通话里“我”的读音，也不像陕西话里“我”的读音，他或她的怪怪的读音，惹得自己笑，也惹得我笑。

他或她笑一回乐一回也就过去了，分手之后便忘记了。在我却很难忘记，似乎有一种说不大清楚也说不准确的东西潜存在心头。这种事情多有发生之后，我意识到以“我”字的奇特发音为典型特征的关中话，在别人——他或她听来可能是新鲜的稀罕的独特的，也有一分可笑或滑稽的意味。由此我试图说普通话，避免给人留下口语的滑稽和可笑。且不说我的普通话说得靠谱不靠谱，麻烦在于说不到三句五句，无意识间又返回到陕西关中东府的发音了，再要纠正回到普通话，连自己都觉得别扭了。有几回强迫自己坚持说普通话，相信说多了也许就顺溜了，却发生一种致命的障碍，说着普通话的时候，严重影响表述；许是总想把普通话说得像普通话而分散了注意力，往往影响表述，不单形成结结巴巴话不连贯，而且把准确的意见表述得含含糊糊；搞得自己出汗倒在其次，而不能说出想说的意见，是令人很丧

气的事，尤其是那些诸如会议或电视台颇为庄重的场合……我后来便决定还是说关中东府话，何必活受洋罪。我也警惕一点，把关中地方话中那些太生僻的词汇和太怪异的发音尽量避免，譬如“水”字，我的家乡口音说成土匪的匪音，改为普通话里的水的发音却不难。我并非抱残守缺，说话总以让人听懂完成交流为目的。然而，这个“我”的发音却始终难改，在于别人能听明白所指，只是觉得读音有点好笑罢了。

我就依着跟父母学会的“我”的发音或读音，一路说下来说了几十年，到后来经见的他或她的惊诧以及学舌的事太多了，反倒不在乎了。记不清是近十年前的哪一天，又遇到一位跟我学舌“我”的读音的朋友，记不清是他或她，却肯定不是陕西人。他或她在挺认真地学我说“我”的时候，却不无逗趣的轻松，想让他或她发出稍微像样的“我”字的陕西读音，比学外语还难。着急处，我的脑际突然冒出以我字为偏旁的几个汉字来，诸如饥饿的饿、鸡鸭鹅或天鹅的鹅、小飞蛾的蛾、嫦娥的娥、吟哦的哦、巍峨的峨、莪蒿的莪，还有俄罗斯的俄，这些任谁都不陌生的以我字为偏旁组成的汉字，都读作我所发的“我”的读音。我便自然推想到一个简单的事理，发明并最后确定下来的如上这些以我字为偏旁的汉字，最初是以陕西人对“我”的读音确立“俄、饿、娥、峨……”等字的读音的。我便玩笑说，创造这些以我字为偏旁的汉字的人，肯定是陕西人的一位老祖宗。于是，我对那些跟我学舌说“我”读音的他或她说，别学舌了，其实你早就会跟我一样发“我”字的读音了，你会说俄罗斯会喊肚子饿会形容山势巍峨更感动过嫦娥奔月，你就会发出和我这个老陕一样标准的“我”的读音了……他或她当即停止嘻嘻着的学舌，发现自己真会说出陕西人的“我”的读音，甚至不无感慨，老祖宗当年造汉字的时候，敢情真是以你们陕西人的“我”的发音为准的？我便骄傲一回。

我还是无意识中发现，构成陕西三大板块的陕北高原关中平原和秦岭南边的汉中盆地，不仅地貌、气候、风俗差异很大，说话的口语也截然不同，陕北有几个县的纯地方话，在我能听懂六成就不错了，而陕南汉中盆地的语言已经九分类似四川口音。然而，对于“我”的读音，这三大板块的人却是十分一致。我曾玩笑说，许多许多年前划定陕西省辖地图的人，大约把对“我”的读音也作为一个不大不小的因素吧。不管以放牧为生存依托的毛乌素沙漠，不管以周秦汉唐等十余个大大小小王朝立都的关中，还是一派江南风韵的汉水流域的安康和汉中。对“我”的一致读音，便打上了老陕的标志性印记。

我也有意无意地发现，我的儿女在家里和我用家乡话闲聊的时候，突然接到手机电话，立刻便调换成普通话的频道了。到我的孙子，无论大的或刚刚学说话的小家伙，都是一口普通话，这是从上幼儿园再到上学练成的语言，陕西人对“我”的读音，已经从他们的口头完全消失了。我便生发出一缕无可如何的心结，老陕对“我”的读音，在我们家即将终结，我无疑成了还不改口的老陕说“我”的“最后一个渔佬”。

2009年9月10日 二府庄

再说盗版和盗名

前不久接到官员兼作家刘凤梅先生打来的电话，说她在一家书摊上发现署着我的名字的长篇小说，不是一本，而是赫然醒目地并排摆着一套三本。她说她未曾听说我有长篇小说出版，怎么突然一下子冒出三部来，心生怀疑，便给我打电话问个究竟。我当即回话，肯定地告诉她，那是冒名的假书，并感谢她告知这个情况。

刘先生顺手买下这套长篇小说，并托人转交给我，我才一睹这套署着我名字的三大本长篇小说的芳容。三部长篇小说的书名分别为《艳荒》《艳村》《艳妹》，当称三艳。书的封面上用红色字体标明“茅盾文学奖获奖书系”，顶头是茅盾先生的侧面头像，即“茅盾文学奖”的那幅标志性徽章的照片。三部以艳字打头的书名的黑色字体，大到几乎占去封面三分之一的版面，站到七八米外瞥一眼都会看到。书名下方印着“陈忠实著”。再下方用指盖大的黑字标明“西部艳情当代红楼梦”。封面最下方印着“作家出版社”。封面的底色是淡黄色，有大大小小的五角星散布着。这是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到新世纪之初人民文学出版社所出版的“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系列”的统一封面，早几年已经不再采用了，而是重新设计了一种封面。

看到这样装潢的三部书，我的第一感觉是贼头贼脑的贼气。再看，愈发觉得是贼气弥漫着的贼眉鼠眼了。我心里很清醒，这种感觉纯粹属于我先入为主的意识幻象，因为在我未见到样书之前就断定它是盗名本了。盗者，偷盗的贼。尽管不是盗窃国库或偷盗私家财物，而是盗用别人名字，却也改变不了盗字的原本字义。这样，我所发生的贼头贼脑贼眉鼠眼的意识幻象，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

瞅着这三本堆成厚厚一摞颇为壮观的盗名书，虽不敢说一丁点气也不生，确凿已经生不出稍微大一点的气来，莫可奈何倒是基本符合当时的真实心态。如实说来，不是我修德养性宽容大度到可以遇盗不惊不气，而是十余年来屡遭盗版又遭盗名，想惊也惊不了，想气也生不出气了，甚至有点麻木到只会本能地反应出，噢，又盗了……正所谓常言所说见多不奇，或如乡间俗话“虱多不痒账多不愁”了。

准确记得是一九九三年八月《白鹿原》首先在西安上市不过半月，《白》的盗版书也跟着面世了。我当时不在西安，是从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位编辑的电话里得知的，不仅惊讶，也更生气。其实比我更生气以至愤怒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老总，道理不言自明，盗版书充斥市场，直接伤害正版书的发行和销售，他们抓到一本畅销的书，市场却让盗版书占领了，作为经济效益的钱，自不必说让盗版者挣去了。况且，盗版书既不给国家纳税，也不给作者付酬，纸张粗劣，印刷马虎，成本低廉，真乃一本万利。在我得知此消息的时候，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位老总早已飞到西安追查此事。大约一周后，我得到的消息是老总已返回北京，只有一声接一声的难言的叹气，自然是毫无结果地无功而返了。

之后不久，盗版《白》书蜂拥而出，持续数年，绵延不绝。我是在朋友和读者提着一包或拿着单本的《白》书要求签名时，见识到各种各样的盗版本。我无法估计盗版本的总量，仅以那几年目睹的签名本，十本里有七本都是盗版本。在西安是这种情况，到外省参加笔会免不了也要签名，盗版《白》也在七成，只多不少。我起初拒绝给盗版本《白》书签名，不仅是心理上逆反，更以为是签名就意味着承认盗版的合法性。后来时日久了，自己似乎渐渐意识到，无论你签名与不签名，盗版本依然畅销市场，不签名无非是阿Q的那个精神胜利法

的无聊了。尤其是在外省，那些拿着盗版《白》的老少读者说，我也不知道这书是盗版书，何况你难得再来，即使日后买到正版《白》也签不上名了。我在这一刻突然明白，读者是无辜的。我便给他们签了名。由此开始，无论是哪种盗版本《白》，包括后来出现的中短篇小说的盗版本，我一概签名不误。直至见到一本厚厚的《陈忠实文集》，字体小到我需要用放大镜阅读，竟然把我的长、中、短篇小说一网揽尽，我看着那本书竟连一丁点气也生不出来了。起初几年我还收集遇到的各种盗版本，此时竟然完全失去了兴趣，见到就扔到废纸篓里。

盗名书大约是十年前开始出现，第一本盗名书是哪一本已经无记。热心的朋友发现时顺手买下赠我，累计已不下二十余种了，因为谁也没有费工夫搜集，可以肯定不是全部。这个过程中有几件尤为难忘的事，大约新世纪之初，两位和我可以算作同代（“40后”）且在文坛卓有建树的作家朋友的书被署上我的名字上市了，其中一位的刚刚面世的长篇力作，被改换了一个书名，署着我的名字盗版应市了。这位朋友打电话问我。我得知此事，慌乱中竟替盗版盗名的人向作者道歉起来。道完歉发觉不对，我道的哪门子歉呀！便和这位作家朋友说明，在他被盗版是首次发生，在我被盗名已多有发生，只是没有这回拙劣罢了，两人便一笑了之。几乎在这件事刚刚过去不久，百花文艺出版社一位女编辑打来电话，说她责编的一部长篇小说即将出书而还未出，这部小说却署着我的名字已经招摇书市。她的口气有点硬，更令我别扭的是该书的作者，也是我熟识的同代作家，且是该省作协的领导人之一。这回我不慌乱也不随便道歉了，反问她，小说原稿只有你和作者占有，如何被人盗版又盗名先出？不言自明责任在谁了，且不说我被盗名的冤枉。待她换过一种商量的语气后，我答应写一纸关

于此书被盗版又盗名的声明性短文，后来发在《中华读书报》上，收效难以估计。

我后来对不断出现的盗名书也不惊不气了。直到两年前，朋友赵润民打电话过来，说他在一家小书摊上发现三本署着我名字的小说，问我知道不知道。我一年也逛不了一回小书摊，自然不知道。这回我突然生气了，最直接的反应是，盗名一本也就罢了，再一本一本盗名也都罢了，现在竟然批量盗名出书了，真有点欺人过甚了吧！我曾寻找有关管理部门，结果据说只是把那家小书摊的盗名书没收了。后来零星出现的盗名书，我已完全不在乎。太在乎的结局和不在乎是一样的。直到这回又是三本成套的批量生产的盗名书再出现于书市，我着实生不出稍大一点气来。

事过月余，心理上似乎隐约着一点亏欠的感觉，我可以在无可奈何的心态里随其自然，想到那些离文学圈子较远的读者（文学圈里的人是蒙骗不过的），可能买下署着我名字的那些诸如以艳字打头命名的三本书，如若读得无聊，骂陈某人我两句倒也罢了，反正我也听不到；如若读得有趣，或者竟是盗得哪位名家的力作，说一声好，我反而落下不该获得的褒扬了，把真实的原作者的荣誉掠取了。

谨此敬告。

2009年11月7日 二府庄

原或塬，是耶非耶

前不久西安在一周内先后两次下雪，尤其是头一场雪，下得早又下得厚。雪兆丰年。我仍然习惯依乡村人的眼光判断自然现象的利或弊，对麦子再好不过了。大雪初晴那天，接到一位陌生人打来的电话，先是盛赞一番这场难得的好雪，接着便说他想到白鹿原上去赏雪景。我也不觉间被激发起来，随口附和，原上的雪景确实值得一览。不料他接着问我有几个白鹿原。我说就我所知，西安东郊有一道原叫白鹿原，也叫狄寨原，还叫灞陵原，是同一道原。再远一道白鹿原，在三原县城北边。他说他问的是西安东郊的白鹿原。他随之解释给我打电话的原因，是在一些报刊上见到有附加着土字偏旁的白鹿塬，以为是另一道也以白鹿命名的塬。我便玩笑说，在西安东郊，只有不加土字偏旁的白鹿原。

这样的问询电话已不止一次。近年间，白鹿原上的万亩樱桃已成盛大的景观，每到五月初，白鹿原上和原坡以及北坡下的灞河川道，一眼望不透的樱桃红了，西安城里蛰伏了一个冬天的男女老少，或呼朋唤友，或伴妻携子，更缺失不了热恋的情侣，纷纷赶到原上或原下的樱桃园来，自己攀树采摘一年里最早成熟的鲜果，品尝美味，也兼着游春踏青的独得乐趣，常常是公路为之堵塞，盛况一年更盛过一年。这期间，我常常接到一些陌生电话，如同前述的那位想上原观赏雪景的陌生朋友同样的问询，附加土字偏旁的塬和不附加土字偏旁的原，是不是同一道白鹿原。我便逐个解答，不是我耐心有余，确也是怕错失了问询者的游兴，也怕耽搁了原下原上果农乡党的收益。

白鹿原和白鹿塬，这个原耶？那个塬耶？

不单是陌生的想上原踏青摘樱桃和观赏雪景的朋友发生疑问，近年间我也在报纸和刊物上多次见到附加着土字偏旁的白鹿塬的字样，不太在意，以为不过是多此一举罢了。既然引发如摘樱桃如赏雪的朋友的疑问，我想做一个小小的辨释，免得我再无休止地解释下去。

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查阅《蓝田县志》在《历史沿革》卷首即有记载：《竹书纪年》中“有白鹿游于西原”。这无疑是位于蓝田县城西边的这道原获得白鹿原名称的原始因由，这个“西原”未附加土字偏旁。又如《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里所引《后汉书郡国志注》：“新丰县西有白鹿原。”再如《续修蓝田县志》记：“白鹿原位于灞浐二川间。”我所能见到的古典文献资料上所记的白鹿原的原，没有一处附加土字偏旁。唐朝诗人白居易有一首脍炙人口的以白鹿原为题的七绝，不妨借此共赏：“宠辱忧欢不到情，任他朝市自营营。独寻秋景城东去，白鹿原头信马行。”且不说白居易到原上纵马赏秋景的畅快豪壮，只说白居易诗里的白鹿原的名字不附加土字偏旁。还有唐朝一位皇帝遗留的两句诗：“白鹿原头回猎骑，紫云楼下醉江花。”这位皇帝也喜欢到白鹿原上纵马放情，亦不论他，只见证这个皇帝笔下的白鹿原的原字不附加偏旁的土字。很显然不是白居易和这位皇帝不喜欢以土字为偏旁的塬字，更不会是他们都忘记了给原字附加偏旁的土字，而是以白鹿命名的这道原的原字，原本就不附带那个偏旁的土字。从《竹书纪年》到白居易和皇帝的诗歌里，白鹿原的原字都不附加土字偏旁。

前不久，我在一种报纸上看到一则新闻，是说谁家在白鹿原上搞了一项什么开发项目，文中竟然把不附带土字的原和附带着土字偏旁的塬都用上了，白鹿原和白鹿塬交替出现在同一篇通讯文章中，真让人徒叹奈何，便动了写这篇小文的念头。

白鹿原是地名，和什么村什么寨或什么街什么巷一样，要改名要换字，似乎需要经过甚为严密的申办手续，获得批准后才能改换，不是任谁的好恶说改就能改说换就能换得了的兴之所至的事。同样的道理，白鹿原的原字，也应当不是随心所欲就可以给它附加一个土字为偏旁。

但愿在正经的公众报刊上再不出现白鹿塬。不消说，会造成白鹿原之外的又一个白鹿塬的错觉，且不说附加着土字偏旁的多此一举。但愿不再发生上原赏雪、踏青、逛景以及摘樱桃的人，又打电话给我问询这个塬和那个原是不是同一道原的疑惑，不是我缺乏耐心，而是人为制造这个谜团，真想不出其多此一举的因由。

2009年11月30日 二府庄

言论

面对城墙的吟诵

——《南城墙》序

连续几个夜晚，我躲在办公室里读《南城墙》。走出明亮温暖的房间，院子里是深夜的阴冷。尽管是西安多年不遇的暖冬，虽不见往年“三九四九”这个时月里冻破砖头的严寒，却毕竟还是冬天。在裹衣缩脖的瞬间，我从书稿的纷繁意象里跳脱出来，面对着一个素未谋面却颇感熟识的人。这人不隶属任何文艺团体，也未著一项作家头衔，却写出一部让我难以掩卷更难以释怀的散文集，令我顿生诸多无言的慨叹。

这人叫鲁振田。看名字，容易让人猜想到他是来自乡村仰赖土地生存的农民子弟，然而确凿是一个地地道道的老西安城里人，生在并长在西安的南城墙根下；从小学念到中学再念到大学毕业，也是从这道巷子的学校出来，再进入另一条街巷门楼更高校园更阔大的一所新校园；走出校门进入社会，也还是转悠在这座历史悠久的古城里，不过是从这家工厂调到另一家企业，或从这个机关又派往挂着另一个牌徽的机关，直到从区长的领导位置上退休；退休下来的这个人，于朝曦初露或夕阳渐隐的美妙时分，散步在城墙根下护城河边。我便自然想到，这真是一个完完全全的老西安人了，他的独有的心理感受，是包括我这种后来进入者无法类比的；这个人经历了这座古城近代以来的风霜雨雪新旧更迭和水涨潮落，并亲自投身到这座历经沧桑的古城

复兴更新的开创性建设之中，眼看着崭新的令人眼花缭乱的景致从残檐断墙里脱颖而出，当是怎样一种骄傲和舒悦。我也很自然地确信不疑，这个人笔下吟诵的以南城墙为表征的西安的情感，是真实的、真切的、可靠的，因此才有了令我陶醉的韵味。

鲁振田写下许多儿时老西安生活印记的篇章，都是他的幼年时期所见所遇所亲身体验而历几十年之后不能泯灭淡忘的鲜活记忆。这些生活影像记录下上世纪四十年代古城西安南城墙里的生活秩序生活形态，让今天的读者感知一种并不悠远却很古老的生活氛围。城墙里的孩子玩耍的花样，是跳房子，是老鹰抓小鸡，是跳绳，是捉蛐蛐。我读到这些生动的情趣十足的生活细节，把我的童年记忆激活了，我在西安东郊灞河岸边一个偏僻的小村庄里，玩的也是这些把戏。甚至弥补了我心里的一点虚空，以为城里娃根本瞧不起乡里娃没啥好玩才玩的这些耍活套路，看来在落后封闭的四十年代的中国，西安城里和城外乡村的孩子所能选择的娱乐的花样基本一样。甚至还不如乡下的我玩耍的途径更多，比如我可以在秋天上原坡摘酸枣，冬天烧野火，夏天偷杏偷桃偷豆荚，割草拾柴，脱光衣服在灞河里捉鱼，只是碗里的白米细面和肉块要比鲁振田稀罕得远了。

让我感到最不堪承受的一笔，是他被父母拖着背着躲避日本飞机轰炸的情景。八年抗日战争的民族灾难里，陕西是日本鬼子没有能够践踏的一个省，西安却照样被日本鬼子的飞机轮番轰炸，手无寸铁的古城里的男女老少，在密集的炸弹轰炸里毫无遮掩，在明朝的长安人为阻止刀矛骑步侵袭的城墙里，掏洞以藏身，任谁都可以想象一堵夯土包砖的土墙对于现代战争炸弹轰击的苍白和无奈。鲁振田记下了自己儿时钻在城墙土洞里的情景。这不是老鹰捉小鸡的耍活儿，而是一个贫弱落后国家子民的惨烈屈辱的精神灼伤，让今天的古城市民温习

一回，起码在我更不屑于那个拜鬼的业已下台的所谓首相的自欺欺人的鬼话了。

鲁振田喜欢绿色，几篇写自己年轻时栽花种草植树的文字也引发我的共鸣。我喜欢植树，大约是从父亲那里承袭的习性，乡下小院门前屋后栽着十余种材树、花树和果树。城里人的鲁振田，显然没有我培植绿色的空间大，然而他在拥挤的城市小院里热衷着绿草和花木的育养，不仅在自家小院，连亲戚家荒裸的庭院，也由他自告奋勇亲自动手铺就绿色。那个时期的中国人的意识里，只提倡植树，绿化荒山秃岭，尚不见说草地花苑，可见鲁振田对绿地花木的亲近，不是听从号召的结果，而是自身生命底色染就的绿，是对绿色本能的敏感所发生的自发的行为和举动。到他对古城西安的现实和未来发展具备影响力度的时候，一眼便瞅中了历经风雨颇遭冷落的那些古槐，施肥浇水修枝杀虫自不必说，且不惜破费为每棵老槐树建起钢筋围栏，备受呵护宠爱有加。我读到此，不单感知到一个城区领导人的眼光，而是体味到一个喜欢绿色且亲手培植绿色的人，足以透见其性情里的活力。绿色原本是生命活力的象征，是清纯洁雅的意旨。人的心灵世界有一方蓬勃的绿色，这个人的精神和意趣便有一种天然的质地和纯粹的禀赋，也就有一种不竭的创造的诗意的激情，就会拒绝庸俗和脏污。但愿这绿色继续蔓生在鲁振田的锄铲之下，也继续蓬勃在他的心灵世界。

从生平简历得知，鲁振田长我一岁，生活的光明和生活里的荒诞，自然成为共同的经历。我在读到他写的上世纪五十年代到八十年代初的往事记忆文字的时候，引发的感受是全面的吻合，引发的共鸣绝无二致，似乎已经消隐了城乡的差别。有一段记事尤令我难忘，那是“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他和同学停课了，建炉垒墙要炼钢铁了。

我那时正在西安东郊一所中学读初中三年级，也停课炼铁铸钢了，操场一角垒砌成一座土炉子，全校同学端着脸盆分批到灞河里淘取砂铁，或到附近工厂捡拾废铁锈钉。这种荒诞的愚蠢是在整个中国全面发生的行为，我们这代人便有了一段不单可资谈笑的记忆。他写到他拿着一张刊登小麦亩产过万斤的报纸回家讨教父亲，父亲以一种素有的平静指出常情常理，还提醒他凡事要动脑筋想想，以辨真伪。我很感慨这位父亲，作为不种庄稼的城里人，却确知农业生产的常识，尤其是实事求是不跟风不附时不说假话的品行，尤为难得。我在中学的政治课上，在老师展示给我们的报纸上，看到站立在麦穗上的一个穿花裹肚男孩的照片，我那一刻就迷瞪了，那肯定是比得木头一般硬的麦秆儿。自小就在麦田里耍大的我，尽管怀疑那照片是如何照出来的，却不敢当面质疑或揭穿。振田这个城里人记住了一个荒诞的数字，我这个乡里人至今不能泯灭一幅荒诞的照片。这数字和这照片，恰是因其荒诞而成为我们难忘的记忆，倒是作为一种人生的鉴示，对后来生活发展里的更为复杂的事项的辨识和选择，当是有益的财富了。

新时期文艺复兴伊始，首先冲破文学创作中爱情题材禁区的，是张洁的短篇小说《爱，是不能忘记的》。这篇小说记入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史典，当之无愧，至今依然被评论界论及。我读到鲁振田《没有握过的手》时，便引起上述这个短篇小说的阅读印象。这是鲁振田生命历程里不能忘记的爱。这种爱的美好，因其真诚和真实，因其纯粹和纯净，因其初始的朦胧和后来的亮示，因其跨越了时空的久远和生活的巨变而不减色，令人感动感慨；又因其阴差阳错，以及自身的含蓄和外在的纷扰，而终久留下让当事人也让读者的我吁不出的一腔闷气。前述的小说毕竟带有艺术虚构的色调，而鲁振田却叙述着自己情

感世界一件真实的经历，真可谓爱到极处也痛到极处，真实的记述就显示出任何艺术作品所不可取代的独有的撼人心魄的力度。

我读这篇文稿，首先感动的是巨大的真实的力量。许是同代人的因由，发生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重提阶级斗争为纲”大背景下的爱情的方式，男女交往和接触的行为举止，传达爱意的语言行为，鲁振田的文字达到了一种重现生活原本形态的真实。也许今天的青春男女不可相信不可理喻，然而我们那一代人就是这样经历过的，我由此而对照某些影视作品和小说，涉及那个生活时段的表现形式，恰恰缺失了鲁振田的真实体验和真实表述。再就是那位女主角，鲁振田简约的叙述文字里，活脱出一位纤尘不染透明若仙又含蓄自珍的女性，把一个爱的信物藏在心底，不显不露，也不改易，直到生命终结之时才伸出手来。我读到此已感到不堪承受，自然会想到这女人以怎样的毅力承受到生命终结，鲁振田又怎样承受这个爱着他又即将终结生命的太过沉重的生命之约。我在号称暖冬的深夜里感到透骨之冷，不无这文稿阅读的效应。再三，我感动鲁振田的勇气和勇敢，把这一段不能忘记的纯洁的恋情展示出来。以他的社会职务以及种种世俗的羁绊，能够撇开而诉诸文字，确是难能可贵的，显示了鲁振田的坦诚，也显示着一种珍惜，把那个美丽高尚的女性展示出来，既是对自己的一种情感释放，也是对那位只限在情感层面上的生命之约的人的一种报偿，别无选择的又是铸成永久的报偿方式。

鲁振田有一笔好文字，质朴干净，生动准确。我只尤为欣赏这种质地的文字，往往是那些矫情的文字把人读腻了。我向来不以为文字仅仅只是一种语言趣味的选择，而是受着作者内在气质、心理质地和思想意识的制约，所谓“文如其人”即指这点。《南城墙》里的文字，无论状景，无论叙事，无论抒情，都呈现出真实准确而又不拖泥带水

的简约，对于一个不想当作家的人来说，真是难能可贵了，也让我见识到一个人的文字功底。

从文稿里得知，鲁振田已经卸下西安发展建设的重担，从繁忙的办公室离开了，有闲暇到城墙根下护城河边散步了；在修整一新的环城公园里，听自乐班演唱秦腔和豫剧，当是一种为古城复兴动脑出力者的欣慰；尤其是那些受到过他帮助而生活得幸福的人，相遇时的一声问候一次握手一句谢词，足可以告慰平生了。人的有限的生命，面对他的人民和面对自己的良知，能达到这样境地的时候，是一种自信，是一种充实，才可以面对这千年的古城南墙发出如诗如歌的吟诵。

2007年1月27日 二府庄

寄望灿烂

——笔记高璨

二〇〇七年伊始，省作协做一年一度的新会员审批。和往年一样，平静而又平和，然而其认真乃至严肃的气氛，却总是令我有一缕隐隐的感动，两位年过七旬的副主席王愚和韦昕，对近二百名申请者的资料表格一一翻检阅览，还不时做着笔记，还要查看申请者提供的发表或出版的作品文本，这个工作量不可谓不大。我比他俩小过近十岁，常看得眼睛发黏发花，看见他俩一丝不苟如同审视经国大业的专注和认真，感动之情里又隐含着敬重。

一个令人惊喜又诧异的话题在圆桌会议上爆开，在今年近二百名申请入会的人当中，有一个年仅十一岁的小学生，好奇和惊诧就是很自然的事了。包括我在内的一帮年过六七十岁的审批者，面对一个尚未成年的小孩子充满稚气乃至调皮的笑脸（照片），面对一本本印刷精美的诗歌、散文、童话文本，没有谁不发出惊诧的赞叹，然而却无异议，一致同意接收这位少年成为陕西作家协会会员。她叫高璨。

这是陕西作家协会破天荒的事。大约九年以来，每年都接收发展新会员一百余人，尚未有一个未成年人会员；在二千一百二十六名陕西作协会员的长长的名单里，如今有了一位年仅十一岁的会员；她排在这个庞大的作家队列里，对于那些高过九旬以及各个年龄段上的男女作家来说，当会是怎样无声无形的欣悦和激励，还有对奋进的催发。

就是这次在前不久召开的审批新会员的主席团会上，我第一次听到高璨的名字，第一次翻阅她已经出版的四部诗歌、童话、散文集文本，第一次看到印在文本首页上那张洋溢着孩子气的笑脸，我顿然想到了曹植，传说他大约也是在这个年龄段上，写出了千古传诵的“煮豆燃豆萁”的绝唱；中国当代作家刘绍棠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誉满文坛的神童，他的小说被选入中学语文课本做教材，其时他自己也还坐在中学课堂上当学生。国外也不乏这样的神童。无论国内国外，无论古代当代，人们习惯称这种人为天才，且为早熟早成的天才。世界上被称作天才的作家为数不少，大多是在青年或中年显露出天才独具的风采，有的乃至跨入老年才露出峥嵘，习惯上称作大器晚成。人们对少年时代就成器成才的天才表现的本能的惊诧和欣喜，多是在于他或她在这样小的年龄档上所显露的才情和诗性，在同龄一辈中几乎是绝无可能的事。我在随后阅读高璨的作品时，最突出最直接的感觉就是这样。这些作品是她八到十一岁时写的。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当是背记词汇运用词汇辨识名词动词形容词写通写顺句子的基本训练，她却已经开始进行创造意义上的写作，已不属通常的作文课上的作文。单就语言文字而言，我真的很难用通常的普遍的事理去解释，这个孩子如何完成了从作文语言到文学创作语言的升华？文学创作区别于作文训练的重要标志，是想象，是丰富的绝妙的独自生发的想象能力，高璨正是在这一点上显示出超常的智慧，无论童话，无论诗歌，都张扬着诗意的想象的翅膀，常常令我有一种顿然豁朗的惊喜。那些童话，无不闪烁着诗意的想象，可以看作是诗；而那些诗里展示的意境，却也可以看作是想象的翅膀飞翔时画出的童话。随意选出一首“棉花云”——

棉田里／一片云掉下来／像一朵朵棉花／成熟最早的棉花／男孩来了／穿一身补丁衣服／摘下云／要织成布送辛劳的父母／云不想回

天了 / 真的变成了一朵朵棉花

这首诗里美丽纯净的意象自不待言，更在于意象里的意韵，那个穿着补丁衣服的男孩摘下云朵，再织成布要送给父母，读来令人心颤。高璨在这个自己创造的童话幻境里，思维是反向的，衣服通常是父母种棉织布送给儿女的，也是儿女终生不泯的恩情所系；那个穿补丁衣服的男孩自然是穷困的，不仅没有要求父母给他置换一身新衣，倒是把期盼里的幸福和温暖首先奉送父母，这个意象里的内韵真是让天下的父母读来心颤了。这样看似童趣依依的文字里，有如此雅致高尚的韵味，就决定了小小高璨的出色。

我看到评论家谢冕，儿童文学大家金波、王宜振，诗人沈奇和作家梁小斌，对高璨作品的评说，很是感动。他们从不同的视角对高璨的创作和高璨现象，做出了客观新颖的评论，很富于教益。尤其是对这位少年作家的出现所表示的由衷的欣悦和关爱之情，是出于一种共有的博大而真诚的爱，显然是为着自己终生所从事也神圣着的文学，有一个可期待发展为茁壮的参天大树的苗子了。

这个高璨，确是一个让人满可期待的壮苗。我在多年对文学天才的探究中，归为一根对文字敏感的神经。这根对文字尤为敏感的神经是先天生就的，跟人群中那些生来就对数字、机械、乐律、色彩等敏感的人一样，很可能在后天的发展中成为数学家、工程师、音乐家、画家，对文字敏感的人很自然地表现出写作的兴趣性倾向，社会就给其冠上某某天才。具有对文字敏感的少年高璨，已经做出令人惊诧的创作，然而毕竟才刚刚开始，毕竟还是个孩子，要把天赋之才——上帝（父母）给予的这根敏感文字的神经发挥到最好，成就一番文学事业，还需得做种种装备，除了知识结构，还有心理素质的构建，更有

待成年后进入社会的从生活到生命逐渐深化的体验。这是优秀作家无可或缺的过程。也许这话我说得早了点儿。

我满怀信心地期待着，高璨的未来，走向中国当代文学的前沿。文头所述王愚老韦昕老的兴奋和欣然之情，亦出于此。

2007年2月14日 二府庄

行走间的匆草一笔

这是我为天卿编的第二本散文集。第一本是《凭什么活着》，属于他所供职的时代文艺出版社首创的作家的“我的人生笔记”系列图书中的一本。记得这本集子刚刚印刷包装完备，正好赶上在北京开幕的图书订货会。他从会上给我打来电话，说这本书的订数和销量挺好，话音语调里是毫不掩饰的兴奋。我听着当然更兴奋，读者愿意买我的书，既是我写作的初始目的，也是从事文学生涯几十年来不曾改变的目的，更是往后余生写作的终极目的。在我对文学创作意义的种种演进着的理解中，只有目的这一点不曾动摇和变化，即：写作是一种交流方式，是作家把自己对历史对现实人生的种种体验诉诸文字，然后进入读者的视野，达到和完成一种交流。书销得多，交流的社会层面就大，这是一个作家创作生命的意义所在和作家存活的自信的原本土壤。我基本信不下“我的书是写给我看的”这种话。如果真是这样，书就没有出版的必要了，自我欣赏原稿就更亲切了，何况现在有电脑可以永久储存。

我从天卿的话语里更感动他对编辑工作的敬业精神。他辛辛苦苦事无巨细操作一本书，从一个标题的设定到目录的编排，从一字一句一个标点的审校到一幅图片的挑选，这个工作量的大而烦琐且不论，更提心吊胆着这本书进入市场的销路。出版社靠图书发行赚取利润，销量太少就会亏本，不说扩大再生产，编辑的饭碗里也会由稠变稀，这是谁也难以抗拒的商业正道。支持某些有社会价值的冷门书籍，也只能在赢利较为雄厚的基础上体现这种善行义举，否则任何高调利词都是空话。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稍感安慰，不致使天卿的一番美意一腔热情万般辛劳落得赔钱伤心。

这本散文集是天卿提议让我选编的，据他传达说是他的主管领导的意旨，在看了我的散文随笔稿后，想到把我写行走各地的观感单另编辑一本，我顺意接受了。十余年来，我受邀到许多只在地图册上见过的地方走过，也有几次走出国门到别个民族生活的国家观瞻，随感而发写下一篇篇游记随笔。这回编选的时候，让我有了一次系统回看这类游记散文的契机，我便对自己的这类文章有一个基本判断。写作这些短文的诱因，总是发自一种感动，或因一个在政治在社会在文学在艺术领域卓有建树的人，我在看他曾经吃过饭的碗、写过字的毛笔、睡过觉的木板床的时候，往往会触发出想张扬这个人某一点令我钦敬也得到启迪的精神；还有会令人陌生而新鲜的风景，长白山如波涛涌动着的森林的绿浪，寸草不生蠓蝇绝杀的柴达木，我在身临其中时的难以抑止的感受，都倾泻到纸上来。

我也发现了二十年来写这类文章前后的差别。初前几次出门远行，看什么都新鲜，笔记很细微，恐怕把哪一幕遗漏了，而今看来就有点琐细了，尤其是第一次走出国门，进入泰国这个人种形态差异不大而生活形态却令人瞠目的国家，我竟然以一天不漏的日记记下四万余字的见闻。七八年后我随作家代表团抵达意大利的时候，不仅没有以日记记载行程见闻的耐心，甚至在一幢幢堪称绝品的教堂前感叹连连，却不想用文字再写点什么，倒是在意大利国家博物馆展厅的墙上，发现了一枚不起眼的钢制器具，引发我深深的震撼。那是一种用钢铁打制的制止女性性交的贞节带，通常由远征的士兵出门分手前锁到妻子的阴部。我在看见那具精心设计着倒刺的器物时，倒吸一口冷气，却无端地联想到中国城乡给那些守志守寡的女人高悬在门楼上的贞节匾，真是异物同工。中国人以教化为主，而意大利人许是出于个性的率直，不用多费唇舌不花教化工夫，用一具钢铁器物一锁了事，可以彻底放心地去征服另一个国家的民族而不担心后院生事了。中国

和欧洲都经历过封建时代的黑暗，仅就对女性的残害而言，没有性质的差别，只是对付女人的手段显示着差异。我后来还去过三个国家，也是循着这种方式产生写作的兴奋点。我上过美国那幢被恐怖分子炸毁的高层建筑，却没有留下一字，倒是在街头的一幅雕塑前久久驻足，那是一辆坦克驮着的巨型口红。我在儿时就记住的红场和彼得大帝，到进入老境才得以身临其境时，却不想写什么，倒是被莫斯科地铁口汹涌如海涛一样的脚步声所震慑住了，那脚步声传达给我的是这个民族复兴的力量和自信心。

我把这些随记随感式的散文分为两集，一集是国内，一集是国外，为给这两部分文章概括一个标题却费了心思，随后还是想到最贴切的用语，分为“自家的山水”和“别人的风景”。是的，无论我走到内蒙古大草原的深处，抑或是海南岛天涯海角的崖壁前，云南山寨里唱着各种山歌的苗族、佤族不无怪异的习俗，我都有一种陌生里的熟知和亲近，说白了就是“自家的山水”。反之，在南亚在欧美，无论看到的是闻所未闻的事象或奇观，还是从传媒或图片上早已见识过的人文或地理的景致，终究都改变不了“别人的风景”这个划界：我在观览别人的景观。看别人的风景，无论自然的人文的，无论历史的现实的，在最深处的感知和最直接的视角里，确实和游览自家的山水是不一样的。同样的山水同样的景观，不同的人看了有不同的感受和各种文字色彩的表述，那都是受着各个意趣和审美主体的差别注定的，我把我的感知和体验比较集中地拢集在这本书里展现给读者的时候，尽管不无诚惶诚恐，却相信是真实的，即真实的情感和真实的体验，少有矫情或虚妄，这一点让我踏实和自信。

天卿已经给我编辑第二本书了，至今只通过话而尚未谋面，话音已熟悉到掂起话筒只听一声，便知道是来自遥远的东北的那位尽职尽

责的年轻编辑李天卿了。陕北民歌有一段广为人爱的情歌，唱的是在相邻的两个山头的青年男女，“咱们见个面面容易，哎呀拉话话儿难”。我和天卿得益于先进的通信设备，正好倒是“拉个话话儿容易，哎呀见个面面难”了。

2007年3月24日 二府庄

真实自信的叙述

——《浅浅的雪》序

一个被老师和同学普遍认定会考取名牌大学的天资超常的少年，不幸诊断出晚期血癌，正走到太过短暂的生命尽头，无望地挣扎在医院的病床上，被作者的“我”看到了。“我”大约和他年纪相仿，利用学校假期到医院搞社会实践活动，不经意间看到了“眼眶深深地陷了下去”的一双很大的眼睛，“冲我们极微弱极艰难地笑了一下”。就在这天晚上，“我”又一次走进这间病房时，白色的床单上人去床空，那个上午还艰难地微笑了一下的天才少年，此刻已进入黑暗的另一个世界。这个艰难的微笑，大约是这个少年留给光明世界最后的一缕微笑，却是面对一个向往生活的同龄少女发出的。这个少女就是这篇散文的作者刘万铭。多年以后，刘万铭把那个天才少年的微笑用文字表述出来，呈现给他已经告别的这个世界的读者，让我在阅读时发生了心颤，留住了令人不禁惋叹的一缕清澈美丽的神光。我也很自然地推及刘万铭，不经意的相遇，不经意收获的那一缕微笑，竟是一个人生命最后的阳光，她能在多年后表述为文字，证明那一缕最后的生命阳光镌刻在她的心里。一个本能地珍惜着别一个陌生生命的人，也向我一般的读者袒露了自己心灵的善和美。

刘万铭写读书生活里的人生成长的体验，处处显示着这段人生敏感期的种种生动鲜活的感受，我读到一种真实和真诚的生活态度，这在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大学校园里，显示出一种难能可贵的独立思考的精神。尤为令我感到富于启示的是，多篇散文写到昔日的同窗学友，走向社会的各种位置之后的人生轨迹，人在生活里的追求和搏击，生

活对人的锻炼，也免不了扭曲下的异变，及至把校园里留下这种印象的好友，扭曲为截然不同的另一番模样。作者持一种客观的叙述，令读者我感到生活对人重铸的力量，也看到扭曲的无奈。校园里那份纯净到令人羡慕的爱，竟然在现实利益冲击之下显得如此脆弱，留给当事者的只有回忆里的珍惜。然而，显示给读者的，却不无人生鉴示的意义。

《忧伤雪梨》给读者的不仅是忧伤，还有一种不经意间的微妙。这种微妙心理有一种说不清道不白的迷乱，有一种连自己也把握不住的小小的任性，一种人性里被爱驱使着的盲目的无意，却铸成情感世界终生的错失，留下永远无法补救的缺憾。致成这种朦胧的爱意错失的因由，不在外在因素，更不在通常所见的权力、地位和物质的诱使，纯粹在于爱的初萌期某种心理的微妙，读来就使人不由得发出惋惜的吁叹了。

刘万铭这本散文集里的绝大多数篇章，都是写她人生历程中的感受和体验。从少年写到青春年华，从小学中学大学写到进入现代化大都市，从家庭父母亲友写到老师同学再写到社会各色人等多种世相，正可以当作一个生命从幼稚到丰厚的鲜活生动的履历来读。一种成功的得意，一种错失的伤情，一种恣意的任性，一种莫名的孤独，一种对美的感动以及对庸俗的厌腻，等等。这些在人从少年到青年时期带有普遍性的颠荡色彩的情性情绪里，仍然显示着个性。刘万铭个性的不可混淆，正是在如上述的种种情绪情性的颠荡过程和新的平衡形成的飞升中显示出来的，颇为倔强却不偏执，洁身自重却宽容世俗，追求完美却也把不住任性。一篇篇生活记事和一首首抒怀的诗样的散文，在描写着世事世相的同时，更多地展示出的却是自我，自我的感知感受和自我的心理情感，率真率直，不作伪饰，尤其不见虚妄的议

说，更没有矫情娇气的吁叹。我在一路读下来的时候，眼前便自然形成一个独立于当代纷繁生活潮流之中的清醒的女性。清醒于今不易。

显示一个独立清醒的女性情怀，还可以从一篇追述往昔英雄刘起龙的纪实文章里突显出来，刘起龙的胆略，对国家的忠诚，对乡民的敬重，对外侮的蔑视，对横行霸道官员的不屑，不仅有鉴示今天的切近意义，更可以从文字里感知到作者的精神崇尚的情感倾向。当物质利益和物质欲望把人类普遍的崇高和神圣的精神情操淡化，以至庸俗的世相不再引发惊觉的时候，刘万铭显示着清醒的操守。我说的不易和难得概出于此，也令我敬重。

有一篇极短的童年记事，竟令我过目不忘。上世纪经济萎缩物质极度贫乏的年代，给孩子发放的防疫药片因为有诱人的果汁香味，竟成为一种稀罕的让孩子期盼的口福。有一次街道的阿姨多发给“我”一片，父亲却把它交还回去了，并说，“你本来就应该只有一片”。她记住了父亲在那一瞬间看着她的眼神。父亲的话和眼神，就是教给孩子面对生活和世界的基本态度，诚实和坦然。有诚实才有坦然。他把诚实和坦然铸入女儿的心底，绝不把虚假和投机示范给一个尚不明白世事的懵懂幼稚的心灵。这个孩子就在这样的家庭环境里长大起来，强壮起来，而且日渐完成了一种健康的心理架构，去阅审自己遭遇的类似果味药丸的诸多世相了。

刘万铭的散文，无论叙事，无论抒情，都以自己亲历的人和事为发端，从一个个侧面或视角，写种种人在生活里的步履，直的顺的歪的乱的乃至颠的，让我看到人面对生活时的各个不同的形态，从而也看到当下生活运动的颇有深度颇富启示的种种世相；自然可以看到作者本人的心境和眼光，敏锐的眼光和清醒的思维。刘万铭的文字简朴而率真，不见任何矫饰之情，更不见故弄玄虚的墨痕，以真实生动和

尤其准确的叙述，和读者建立起基本的信任，这是说来容易做来却难能的功夫。由此样文字的表述形态，更可见出作家刘万铭的性格。在我看来，能够不加矫饰地进行质朴的文字叙述，也是对自己所感知的生活和情感的一种自信。

我接到刘万铭的书稿和附信时，回忆起我和她见面的情景。那是十一年前，西北政法大学约我去给学生讲创作，接待我的几位学生中就有她。她和我和几位同学合影，之后给报纸写了一篇通讯。她怕我忘记，把当年的通讯文章和合影附带寄来了。我记得这件事，却一时辨不出合影上的哪位女生是当年的小刘同学。毕竟是十多年前的一见，况且我的记性确已差池。相信小刘不会计较，她能把散文书稿寄给我欣赏，就是一种信赖，足以让我感动了。况且，可以推想今日的刘万铭，已经是一位监检战线的干部，又是一个敏锐的作家，真是令我欣慰而又鼓舞。

2007年4月27日 二府庄

敬重修军

我试用一句话来概括这个研讨会，所有画家、作家的发言，其实是继续和忽培元共同塑造着一个具备伟大人格和伟大艺术成就的画家——修军。生前站立很直的艺术家修军，谢世后这么多的人在评说他时多是一种感动、感佩和敬重之情，我觉得修老可以很欣慰地长眠在另一个世界里，而不留遗憾。

修军这个名字，我在初中念书时就知道，那时尽管穷得只吃开水泡馍，但还是把父亲给我买咸菜的两毛钱去买《延河》。《延河》上就发表过修老的《枣园之春》等木刻作品，留下了至今不能磨灭的印象。

我成为专业作家关系转到作家协会时，修军就住在协会院子里。到作协开会，往往能在院子里碰到修老，打个招呼，问声好，握个手。记得有一次走进他那间令我很仰慕也颇觉神秘的画室，里边的景象，就是他儿子为他创作的那幅木刻肖像里的景象。

我们没有深交，真正了解修老是读了培元写的这本书之后。

这部作品完整而鲜活地展示出具有高尚的艺术追求和丰富的内心世界的艺术圣徒修军。他终生不渝地进行着艺术探索和追求。尽管有“文革”“下放”等灾难，有一些摆脱不掉的人际纠葛，但始终占据他心灵世界的是艺术，什么都不能干扰不能动摇这个人生主旨。从他留给我们的木刻画里，就能读出这艺术家的精神和心灵世界。他给受磨难的彭德怀及柳青、石鲁、柯仲平所做的木刻肖像，把他们的精神风骨展示得淋漓尽致。他还创作出大量歌颂生活和人民群众的木刻，题材

多为乡村生活司空见惯的场景和细节，比如打麦场、割麦子、收高粱，还有农户院里的玉米柱子。

我是个农村出身的人，一看这些画面就感到亲切，也充分感受到画家满腔的诗意和激情。由此就能透视修军内心与生活的那种天然的联系，饱满而优美。培元在这部书里用大量生动的细节，充分描写了修军的精神境界，读来令人感动。培元政务繁忙，还坚持创作，至于为啥要选择修军呢？我猜想他可能就是要张扬一种警示的意义。

修军的淳朴和高尚人格，他如何待人接物、怎样处理行政性事务，生活中跟艺术家怎么相处、跟晚辈怎么相处、跟农民怎么相处，细节中表露出几近完美的人格。

认识培元已有多年，最先读到他的一本散文集，后来又看到他的长篇传记《群山》。培元曾经是延安市市委副书记和政协主席，官已经不小了，年龄还不大，应该说仕途还很有发展。读了《群山》，我却觉得他完全可以不当官，当个作家可能更符合他天性里的优势。他是很富有艺术创造的形象思维，艺术感觉相当敏锐的一个人。昨天读了这部新作品，我又产生了这种感觉。《修军评传》从结构和叙述形式，以及语言色调，都与《群山》迥然不同，全然是一种新的艺术景观，看得出他还在进行着新的艺术探索。

尽管都是传记文学，但他没有重复《群山》那种表述形式，最直接让人感到差异的是语言。不同的写作对象，注定着作家必须探索到一种恰切的表述形式，这是创造的重要意义之一。

应该说培元的这部作品获得了一次新的成功的开拓。我确信他具备一根发达的艺术神经，是位对文字非常敏感的作家。应该说从《群

山》到《修军评传》完全是艺术家的思维、作家的思维，忽培元怎么把政务和创作统筹兼顾，是一个值得研究的课题。

2007年5月4日 西安

出神入化的意境

——《罗国士国画》序

对某一门类的艺术，没有实际操作，没有深入研究，也没有专业知识，很难形成审美的独立思路，说话就难免心虚，气更壮不起来，老害怕说外行话，让内行人笑话就十分尴尬了。基于此，近几年来有书法家还有一些画家朋友约我写序，就有点惶惶不可终日的压迫，这不是夸张而是实情，既怕说外行话出洋相，又怕谢绝影响朋友交情，甚至产生误解说你拿架子。最后还是实事求是，不懂就是不懂，解释以诚。最近我想了个类比的办法，让我给画家书法家写序，就好像让刘文西给陈忠实的小说写序。刘文西的绘画成就很大造诣很深，名气也够大了，但他对文学创作就隔一道墙了。尽管艺术在精神内质是相通的，而精通各种艺术门类的天才毕竟太过稀少。这样一说，我就不失礼貌地把一些朋友说服了，老罗是我敬重的一位艺术家，我今天来参加这个会，仍然有那种思想负担。刚才听过几位同志的发言，已经得到点拨，敬寅是位专业里手，长期写字画画，有专门研究，有专著，对老罗的艺术创作有深入的研究，有独到的见解，评价很到位。我也看了几位评论家的文字，从不同视角做了探讨和研究，也很富于启示性。我获得勇气，感性理解。

老罗的画，已臻形神兼备，及至出神入化。这是我观赏他画作的直接感觉。他的作品显得灵气激扬，给人直接的心灵撞击，譬如“灞柳风雪”。我看他的月季，一眼看上去，水灵灵的富于生命活力生命质感的那种鲜活的气象扑面而来，让我久久沉迷，以为在月季园中，似乎隐隐闻到花的香气。一丛花，一个花瓣，给人心灵产生这种美好的滋

补，已超出平常意义的美术欣赏。我觉得这不单是一般的画法、技法上的技巧，当然技法技巧是基本功力，这里头肯定融注了更重要的东西，我推想可能与作家创作也有相似之处，就是这个画家进入了一种心灵体验，他已经完成了从一般技巧技法等基本功的束缚中超越出来，进入一种感受性的意象的展现，我从那些花朵花瓣花蕊簇拥的画面里，感受的是一种气韵，一种气象。这恰如古人对写作两个阶段的归结，先是“随物婉转”后是“于心徘徊”，随手婉转者众，能跨越到“于心徘徊”创造境界者就少而又稀了。能有幸进入此境的佼佼者，其创造就能产生这种“出神入化”的艺术效应。换一种说辞是进入了心灵体验。

作为一个画家，我觉得老罗有几点对我富有启示，老罗传统文化的根基深厚，尤其对古典文学、古典诗词很有学识修养，而且自己能完成很多创作，许多诗词写得相当漂亮。这个传统文化，尤其中国传统画，包括文学创作，拥有古典文学对人发生的影响不单在技艺上，更重要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神，对艺术家心灵的长期陶冶。这是作为一个作家、画家、书法家不可或缺的精神大餐，是一种心灵素质的构建，是一种陶冶，是一种锻造，这是艺术家创作境界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东西。它实质上关涉到艺术家的精神人格。我听改民、敬寅两位的发言，他们跟老罗交往的时间很长，了解更深，既谈到老罗的艺术造诣，也感动老罗的人品，都说老罗人好，不仅他俩说老罗人好，我能听到对老罗印象的话都是这两个字：人好。人们说老罗人好不是一般意义上说的“好好先生”之类，却是指涉一种精神人格。是老罗在纷繁的社会生活中，有自己崇高的人生坐标的选择，不是以利和害作为选择的标志，而是以善和恶、美与丑作为人生价值的取向，这个取向对艺术家甚至可以说是致命的。在我的理解，艺术家创作的发展越到后来，越想进入大的创作，在完成这个艺术突破过程中，这个精神人

格越成为一个关键乃至致命的东西。精神人格在你的整个创作当中，影响的不在技术技巧层面，而是对艺术家感受社会、理解社会、感受人生、理解人生的独特性发挥关键性影响，艺术品内质里的卓尔不群就因此而产生。说老罗人好还指心灵的纯美和纯净。一个搞艺术创造的人，不干净的齷龊的东西裹在心中，你的文字恐怕也很难鲜活起来，你的花瓣恐怕很难鲜活起来。在我看来，正是老罗个人精神人格境界的提升，促成了创作进入一种新的境界。打一个比方，比如蚕从出壳成了虫，要经过五次蜕变，在这个过程中，吃桑叶、运动、脱壳，完成一次蜕皮，但这是在常态下完成，一旦吐了丝，结了茧再破茧而出，就羽化成蛾了，就不是爬行的蚕，而是自由飞翔的蛾了，就进入自由状态，从常规的爬行运动到自由飞翔。艺术家的关键性突破是类似由蚕到蛾的这个过程的，孜孜不倦的演练和追求，像蚕食桑叶，艺技的提高类似蚕一次又一次的蜕皮，重大的突破恰如由蚕到蛾的飞跃。完成了这个过程，创作就进入自由状态，就是前述的老罗这种出神入化的境界。在实现这个至关重要的突破过程中，在诸多促成这种突破的因素中，艺术家的精神人格境界是一个分量最重的因素。我们谁都见惯不惊的事实是，许多人没有实现如蚕一样捂死在吐丝之前，或是破不了茧。当然，从生物角度来看，蚕都会完成这个过程，然而艺术家因于一般层面的很多，进入不了自由创作状态。我感觉到老罗早已实现了羽化，完成了这个最致命的突破，进入一种自由创作状态，我们从山水到月季，一个花瓣都能感觉到一种自由创作状态。

我祝贺老罗的艺术达到炉火纯青、出神入化的境界；盼能保重身体，多多贡献美。在我来说，家里大厅能挂老罗的一幅月季，任何时候看到，心里都会注入一种清爽和生机。

2004年4月草

2007年5月13日修正 雍村

《白鹿原》创作散谈

一

一九八二年陕西省作家协会决定把我吸收为专业作家，从那以后我的创作历程发生了重要的转折，这个转折带来的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这个专业作家怎么当？之前做业余作者的时候一年能写多少写多少，写得好写得差，评价高评价低，虽然自己也很关注，但总有一个"我是业余作者"的借口可以作为逃遁之路。做了专业作家之后，浮现在我眼前的，国内国外以前的经典作家不要说，近处就有柳青、王汶石、杜鹏程、魏钢焰等小说家、诗人，无论长篇、短篇、诗歌，在当时都是让我仰头相看的。跟他们站在一块儿，我的自信心无疑将面临巨大的威胁。那我应该怎么做呢？也就在那前后，陕西省作协先后调进几个专业作家，他们先后都搬进了作协刚建好的一幢小住宅楼，我在这个时候的选择却是回到乡下，回到我的老家。当时我在区文化馆工作，是周六回去，周日晚上返回机关单位，做所谓"一头沉"干部——最沉的那一头在农村。做这样选择的主要原因有两点。我离开学校进入乡村社会，先当小学教师再到公社和区上的区县机关，整整二十年，有了很多生活积累。成为专业作家对我的意义，就是时间可以完全由自己来支配了，可以全身心投入到创作和学习上来了，回嚼我的生活。我希望找一个更安静、更少干扰的地方，因此就决定回到乡下。第二个回归老家的原因是我对自身的判断。四十岁的我和当时陕西起来的那一茬很有影响的青年作家们相比，年龄属于中等偏上，比我更年轻的像路遥、贾平凹等。尽管也有几位比我年龄大的，但更多的感觉还是年龄的压力和紧迫感，我已经四十岁，再也耽搁不起。我

想充分利用这个时间把之前的农村生活积累提炼出来，形成一些作品。回到乡下去，离城市远一点，和文坛保持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既可保持文坛信息的畅通，又可避免某些文坛上的是是非非，省得被一些闲话搞得心情不愉快，影响到作品构思和对生活的思考。当时想，一生的专业作家生活就在乡下度过了，没有做过进城的打算，心态很坦荡。作协分给我的四十平方米房子，我只支了一张床，连个桌子都没放。回到乡下除了正常的工资外还有稿费收入，虽然很低，但对我来说也够了，于是就把三十、五十的稿费积攒下来盖房。就像高晓声的《李顺大造屋》，这个我是深有体会，李顺大怎么造屋我就怎么造，一根椽子、一块水泥板都要去讲价。我是我们村里较早几个盖新房子的户主，农民都说我的房子盖得阔气。其实不过就是砖头搭的水泥板。当时花了七千块钱，欠了三千块钱的债。家里面夫人和孩子的户口都迁到西安了，我建这个房就是打算永远在祖居宅院里生存下去。从筹备到盖起这个房的过程也是我创作最活跃的时期。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中期，我的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写得兴趣很足、劲头很大。写作短篇小说的意识还不太明确，就是有什么感觉、有什么体验赶紧把它写成一个短篇。到后来以中篇小说写作为主的时候，就略作调整，不是盲目随意去写，每一部的结构都不能重复前一部。我记得当时引发我的创作发生重大变化的是《蓝袍先生》。这个中篇小说开始时涉及一九四九年解放以前的乡村生活，好像突然打开我的生活记忆中从来没有触及过的一块。蓝袍先生的父亲从小施加给他的乡村传统文化的规范和教育，对他的个性产生了重要影响。一下子触发了我的很多生活记忆，由此而波及乡村社会里很多人和事给我留下的最初印象。但这些印象性的生活包容不进我要写的那个中篇小说《蓝袍先生》里去，因为这部小说在艺术结构上没有大的情节，是以人的心理和精神经历来建构的，和由此激发起的生活记忆、

生活积累完全是两码事。长篇小说写作的欲念发生了。这个中篇小说发表后也引起过一些反响，然后就开始长篇小说创作的准备，记得那是一九八五年年末的事。一九八五年春夏之交，陕西省作协的老领导为了促进陕西省中青年作家长篇小说的创作，专题在延安召开了“陕西长篇小说创作促进会”。此前连续两届“茅盾文学奖”评奖，让各省的作协推荐作品时陕西都拿不出来，因为没有出版一部长篇小说，全部陷在中短篇写作的热潮之中。省作协领导经过认真分析论证，认为一部分青年作家已经进入了艺术的成熟期，可以开始长篇小说的创作了，所以就开了这个“促进会”。这个会我也参加了，开会时让大家谈写作长篇小说的计划。我记得我发言没超过两分钟，很坦率也很真诚，说我现在还没有写作长篇小说的考虑，因为我还需要以短、中篇小说的写作继续对文字功力、叙事能力做基本的训练。我当时的心态和意识里，长篇写作是一个很庄严的，甚至令人敬畏的事情，不是随意轻举妄动的事。始料不及的是，那年十一月左右写完《蓝袍先生》，写作长篇小说的欲念突然被激发出来了。

二

创作长篇的想法激发了我想了解自己生存的这块土地的欲望，顿然觉得之前一些生活经历太肤浅了。一九八六年春天，春节一过，我就离家去蓝田县查阅县志，当时计划查阅包围着西安这个古老城市的三个县的县志：蓝田、长安和咸宁（辛亥革命后撤销归并给长安县，但县志还在）。这些县志和后来各级党委以及人大、政协编的那些地方党史、回忆录等，让我对我生活的那块土地有了意想不到的更真实更贴切的了解。由于关中很大，我常说我是关中人，实际上是关中地区边沿的白鹿原下的一个小山村中的人。西安城在关中平原的东南角，整个平原部分是朝西朝北铺展开来的。我选择这三个县有一个基

本考虑，就是它们紧紧包围着西安。应该说城市从古以来无论任何一个历史时期都是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首先辐射到距离它最近的土地上。通过查阅县志了解这片土地近代以来受到的辐射和影响，让我有种震撼的感觉。我举个例子，一九二七年农民运动席卷中国一些省份的时候，我们都知道湖南农民运动闹得很凶，因为有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恐怕很少有人知道陕西关中的农民运动普及到什么地步：仅蓝田一个县就有八百多个村子建立了农会组织。我当时看到这个历史资料后就感慨了一句："陕西要是有个毛泽东写个《陕西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那么造成整个农民运动影响的可能就不是湖南而是关中了。"这里就有个很尖锐很直接的问题让人深思，关中是我们这个民族和国家封建文明发展最早的地区，也是经济形态落后、心理背负的历史沉积最沉重的地方，人很守旧，新思想很难传播，那它如何爆发出如此普遍的现代农民运动呢？在县志和相关资料的搜集过程中，有一些记忆是很令人震撼的。我在蓝田查阅县志时有个意料不到的收获，就是一九四九年解放前蓝田县志的最后一个版本，这个版本是蓝田县的一位举人牛兆濂编的。这二十多卷县志中，有四五卷全部是用来记载蓝田县有文字记载以来的贞妇烈女的事迹和名字的，我记得大概内容就是某某乡、某某村、某某氏，没有这个女人的真实名字，前面是她夫家的姓，后面是娘家的姓。比如一个女人姓王嫁给一个姓刘的，那就是刘王氏，这就是她的姓名。这个刘王氏十五岁出嫁、十六岁生孩子、十七岁丧夫，然后抚养孩子、伺候公婆，终老都没有改嫁，死时乡人给挂了个贞节牌匾。我记得大约就是这些内容，她成了"贞妇烈女"卷第一页的一个典型，第二第三个人大体与此类似。后面几卷没有记载任何事迹，把贞妇烈女们的名字一个个编进去，我没耐心再看下去，在要推开的一瞬，突然心里产生了一种感觉：这些女人用她们整个一生的生命就只挣得了县志上几厘米长的一块位置。悲哀的是牛先生把这些人载入县志，像我这样专程来查

阅县志还想来寻找点什么的后代作家都没有耐心去翻阅它，那么还有谁去翻阅呢？这时有一种说不清什么样的感觉促使我拿着它一页页地翻、一页页地看，把它整个翻了一遍，我想由我来向这些在封建道德、封建婚姻之下的屈死鬼们行一个注目礼吧。也就在这一刻，我萌生了要写田小娥这么一个人物，一个不是受了现代思潮的影响，也不是受任何主义的启迪，只是作为一个人，尤其是一个女人，按人的生存、生命的本质去追求她所应该获得的。这是给我印象很深的一件事。第二件事就是通过翻阅资料，我心里最早冒出来的一个人物，就是后来小说中的朱先生，获得了活力。朱先生的原型就是县志的主编牛兆濂，清末的最后一茬举人。他的家离我家大概只有八华里远，隔着条灞河，他在灞河北岸我在灞河南岸。我还没有上学时，晚上父亲叫我继续剥玉米的时候，就会讲牛先生的种种传闻故事。当地人都叫他牛才子，因为这个人从小就很聪明，考了秀才又考了举人，传说很多。在一个文盲充斥的乡村社会，对一个富有文化知识的人的理解，最后全部演绎为神秘的卜筮问卦的传说。我听我父亲讲，谁家丢了牛，找他一问，说牛在什么地方，然后去一找，牛就找着了。这样的传说很多，我也很想把他写到作品中去，但最没有把握，或者说压力最大的也是这个人，因为这个人在整个关中地区的影响很大。他在蓝田开设的芸阁学舍相当于现在的书院，关中很多学子都投到他的门下，在上世纪初还有韩国留学生。关于他的民间传说很多，反倒形成了创作这个人物的巨大压力。你要稍微写得不恰当，知情的读者就会说：“陈忠实写的这个人不像牛才子。”他在编县志时严格恪守史家笔法，尤其对近代以来蓝田县发生的重大事变，不加任何个人观点，精确客观地叙述，都用很简练的文字一一记载下来。他写了一些类似于今天编者按的批注，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正是从那七八块编者按中，我感觉我把握到了这个老先生的心脉和气质，感觉到有把握写这个老先生了。这是查阅县志的一大收获，却是始料不及的。

在酝酿这部小说时，受到一个很重要的影响，一位作家写的理论文章，大致叫作“文化心理结构说”。估计也是从国外解读过来的，但这个给我很大启发，对于我正在构思的这部长篇小说具有很重要的启示意义。之前我一直遵循现实主义创作的基本手段，刻画人物，尤其注意肖像描写、行为描写、语言个性化等等。这个“文化心理结构说”给我揭开了另一条塑造、刻画人物的途径，就是探究你所要写的人物内心的心理形态。不同的人的心理各有不同的结构形态，这个心理结构形态有多种结构与支撑点，是他的价值观、道德观、文化观等等。接受这个理念以后，我在构思人物的时候，尤其是对从清末民初一直到一九四九年以前这段时间的乡村社会的人物的把握上，受到了很大的启示。特别是对几个作为我们传统文化的人物的心理形态的解析，为了准确把握他们的心理结构，我决定对人物不做肖像描写，这和我以前的中短篇写作截然不同。除了对白家、鹿家两个家族象征性的特点做了一个相应的点示以外，其他人物都没有个人肖像描写。由牛先生演绎过来的朱先生，也没有肖像描写。我想试试看能否不经过肖像描写，通过把握心理结构及其裂变过程写活一个人物。另外我要说的是关于小说的语言。最初构思的时候想到这么多的人物类型、这么多的内容、那样长的时间跨度，估计得写两三部书才可能充分展示。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偏后那两年，即我要动笔之前，文坛上开始出现一种危机感。新时期文学一路繁荣昌盛，第一次危机感就是文学书籍出现滞销，连名家大家的集子也没有订数，由此引发“文人要不要下海”的争论。我对这个话题有个简单化理解，想下的就下，不想下的就继续写。除文人下海话题之外，一种不容简单化理解的危机感，就是一九八七至一九八八年甚至最严重的一九八九至一九九〇年这段时间，新时期以来长篇小说出版第一次遭遇市场的冷遇，这是我记忆很深刻的一件事。报纸上登过某某大作家新作仅征订八百册，一部长篇小说或一部中短篇小说集印数一两千册是普遍的，对于任何一个正在

写作的作家都是一种巨大的威胁，起码对我是一种巨大的威胁。这个威胁直接影响到我正在构思的这部小说的篇幅问题。我原想写两三部，面对这样的图书市场环境，我决定压缩，一部完成，哪怕这部多写点字，也不要弄成两部三部。这个篇幅规模的大小直接影响到我的文字叙述。如果用以往白描的写法篇幅肯定拉得很长，我唯一能想到的就是以叙述语言统贯全篇，把繁杂的描写凝结到形象化的叙述里面去。这个叙述难就难在必须是形象化的叙述，就是人物叙述的形象化。作为写作者，我知道难度很大，当时自己心里没有底。在开始长篇写作之前，我先写了两三个短篇试验一下，我记得最清楚的是《轱辘子客》。这个短篇写了农村的一个赌徒，带有政治赌博的一个赌徒，写这个短篇就是要试验一种叙述语言。这篇一万字的小说从开篇到结束不用一句对话，把对话压到叙述语言里头去完成，以形象化叙述完成肖像描写和人的行为细节。作为试验的几个短篇，我感觉还可以，发表以后给周围的评论家看，他们都说与我以前的写作风格很不相同，最直接的感觉就是语言叙述上的变化。我感觉这种形象化叙述是缩短篇幅、减少字数、达到语言凝练效果的途径。还有一点我觉得印象深的就是关于这部作品的结构。这部作品时间跨度比较长，事件比较多，人物也比较多，结构就成为一个很棘手也很重要的问题。当时，西北大学有一个比较关注我写作的老师蒙万夫教授，我把长篇小说的构思第一个透露给他，他用一句话很真诚地指导我说：“长篇的艺术就是一个结构的艺术。”我当时正担心结构问题，老教授就直接点到要害上了。这个结构该怎么结构呢？我静下心来读了大约十来部国外、国内比较有名的长篇，发现没有一部跟另一部结构是类似的。倒给我以最切实的启示，优秀的长篇、好的长篇都是根据题材和作家体验下的人物、事件来决定结构的，最恰当的结构就只有自己来创造。作家创造的意义这可能是重要的一点。

三

原来计划用三年完成的小说，实际上仅草稿就写了四十多万字，写作草稿的用意主要是把人物、事件和框架搭起来，把结构初步确定下来。草稿只写了八个月，接下来打算用两年时间写完正式稿。草稿我是用大笔记本子写的，写得很从容，不坐桌子，坐在沙发上把笔记本放在膝盖上，写得很舒服，一点也不急。正式稿打算两年完成，很认真，因为几十万字，那时又没有复印机，不可能写了再抄一遍，所以我争取一遍作数，不要再修改、再抄第二遍了。写正式稿的时候心里很踏实，因为草稿在那儿放着，写得还比较顺利，本来应该两年写完，不料此间发生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事，影响了我，不得不停写了两个半年。一九八九年四月到八月正式稿就写了十二章，这书一共才三十四章。但到了一九八九年下半年整个半年就拿不起笔来了，因为发生了“风波”，几乎天天开会，我记得到离过年剩下一月多的时间这场“风波”才结束。而这时我基本把前面写的都忘了，还得再看一遍，重新熟悉，让白嘉轩们再回来，我就把之前写成的十二章又温习了一遍。春节前后写了几章，刚到夏天的时候，“整党”开始了，后半年写作又中断了，到春节前结束，又重新温习重新接上写。一九九一年从年头到年尾除了高考期间为孩子上学耽误了一两个月，这一年干了一年实活，到春节前四五天画上最后一个标点符号。如果没有那两个耽误掉的半年，应该在一九九〇年末就完成了。写作的大体经过就是这样的。

后来我接受采访时常说“三句话”，一句话是说写这部小说的时候我基本处于一种“蒸锅”的状态。那几年中篇基本不写了，写长篇的空当插空写个短篇。大家都能猜到陈忠实可能在写长篇，不是我玩什么高深，完全出于我个人的写作习惯。作家的写作习惯都不一样，各人

有各人的特点。我在西安的一些作家朋友，有人心里刚有个构思就要找人交流，希望得到一点补充的东西，思路也会受到启发。我恰恰相反，我想到什么就不断地去想，一般不敢给人说。不敢给人说不是害怕别人把这个东西抢先写了，而是我对正在兴趣盎然地酝酿着的构思，如果给谁一说，就如同把气撒掉了，兴趣减弱到甚至都不想写了。《白鹿原》完成的过程也是这种状态，别人问我，我说这个写作过程就跟蒸馍一样，不能撒气。我不知道南方人、江苏人蒸不蒸馍，不蒸馍就蒸米饭啊，不管蒸馍还是蒸米饭都必须把气聚足，不能跑气，跑了气馍蒸不熟，米饭也蒸不熟，夹生。我的创作习惯，包括长篇和前面的中短篇都是这样的，从开始写作到完成要把这口气聚住。这是一种写作习惯，无论好坏，反正对我适用。

另一句就是“给自己死的时候做枕头”的这句话。这是我在长安县查县志的时候，和一个比我年轻的作家朋友说的。那些县志都是很珍贵的版本，无论是县图书馆还是文史馆借给你的时候，只肯借一到两本，看完两本还回去再给你换两本来，一套县志往往是几十本啊。我住在八块钱一晚的旅馆里，拿着本子把县志里重要的东西一条条抄下来，抄完了再去换。抄一天这种东西比写作要累，写作有激情，干起来没有抄写这么累。到晚上那个长安县的作家朋友赶来和我喝酒。酒喝多了人就有点张狂，我也是。他问：“你在农村几十年的生活体验和积累还不够吗？到底要写个什么东西，还把你难到跑上好几个县查阅资料。你到底想干什么？”我在农村工作了二十年，还不包括幼年青年上学时期，在农村生活积累上我比柳青深入得更多。柳青在长安县兼职副书记，兼了两年就不兼了，我在公社乡镇里头整整干了十年，搞工程，学大寨，执行极左政策，收农民的猪和鸡，那个期间那个积累是最实在的。尽管当时没有创作的打算了，“文革”中间已经没有任何文学创作希望了，只把工作当工作干，然而生活积累和体验却存储

着。想到这些，我随口说了一句："老弟，我想弄一个死了可以放在棺材里垫头的书。"当时喝得有点高，却没醉，说过以后就忘了。事隔两三年，我有幸参加中共十三大，需要在《陕西日报》上发一篇宣传基层党代表的文章，由长安那位朋友写了一篇，标题大致就是我酒后说的那句垫棺做枕的话。文章发了以后，影响不大，很快就过去了，并没有引起人在意。到《白鹿原》小说出版了以后，这句话才开始流行起来，到处都在说。后来我反省这句话似乎有点狂，但不是乱说狂话，完全是指向自己，我要为自己死的时候做一个枕头，与别人没有关系，完全是出于我对文学创作的热爱，以至我个人的生命意义和心理满足。从初中二年级在作文本上开始写小说，经历了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极左政治的风风雨雨，我仍然不能舍弃创作。按当年的写作计划，完成这部小说我就四十九或者五十岁，在我习惯性的意识里，即村子里农民的习惯意识里，过了五十岁就是老汉了，人的生命中最具活力的时期就过去了。那么，我到五十岁的时候写的这个长篇小说，如果仍然不能完成一种自我心理满足，肯定很失落、很空虚，到死都要留下遗憾。出于这种心理，我说弄一本死的时候可以放在棺材里做枕头、让我安安心心离开这个世界的书。这是第二句话。

我再说第三句话。这部小说从萌生到写成历时六年，从草稿到正式稿两稿，大概一百万字。写完的那一天下午，往事历历在目，想起来都有点后怕的感觉。历时六年，孩子从中学念到大学，我的夫人跟我在乡下坚守，给我做饭。年近八十的母亲陪着大孩子到西安去念书，直到一九九一年的最后几个月，母亲腿不行了，孩子和她都需要人照顾，于是夫人也进城去照顾她们了。祖居的空院子就剩下我一个人坚守写作，夫人在城里把馍蒸好送回乡下，最后一次离过年不到一个月了，我说这些馍吃完进城过年的时候，书肯定就写完了。腊月二十五的下午写完，我在沙发上呆坐半天，自己都不敢确信真的写完

了，有一种眩晕的感觉。这四年时间，从早上开始写作到下午停止写作，按我们正常工作就应该休息下来了，但我的脑子根本休息不下来，手不写了，那些人物依旧在我脑子里头活跃着，过去写作从没有如此强烈的真实体验。我便想，必须把白嘉轩、田小娥等从我的脑子里驱赶出去，晚上才能睡好。作品中的主要人物结局都是悲剧性的，对我自己的情感来说，纠结得很厉害。要把这些人物情节排除和忘记，开始采取的方法是散步，时间稍长就不灵了，这个时候学会了喝酒。喝酒以后，我脑子好像就能放松，那些人物才能驱赶出去，然后好好睡一夜觉，第二天才能继续写。到腊月二十五写完以后，情绪好像一下子缓不过劲来，我在沙发上坐了好长时间，抽着烟，情感总是控制不住。傍晚的时候，我就到河滩上散步去了，一直走到河堤尽头。冬天的西北风很冷，我坐在那儿抽烟，直到腿脚冻得麻木、我也有了一点恐惧感才往回走。在家的小屋子里写了整整四年，突然对家产生了恐惧感，不想回去，好像意犹未尽。我又坐在河堤的堤头上抽烟，突然产生了一个荒唐的举动，用火柴把河堤内侧的干草点着了。风顺着河堤从西往东吹过去，整个河堤内侧的干草哗啦啦烧过去，在这一刻我似乎感觉到了一种释放。然后走下了河堤回家。回家以后，我把包括厕所灯在内的屋里所有灯都打开，整个院子都是亮的。村子里的乡亲以为家里出了什么事呢，连着跑来几个人问。我说没什么事，就是晚上图个亮，实际是为了心里那种释放感。第二天一早我就进城了，夫人说你来了我就知道你写完了。到吃饭的时候她问:“你这个写完了要是发表不了、出版不了咋办? ”我说如果发表不了、出版不了，我就回来养鸡。这是真话，我当时真是有这种打算。为什么呢?你投入了这么多的精力和心思的作品不要说出版不了，就是反应平平，都接受不了，我就决定不再当这个专业作家，重新把写作倒成业余，专业应该是养鸡。因为四年期间没有稿费收入，生活很艰难，有一年，三个孩子相继上高中、上大学，暑假我拿不出三个孩子的学费

钱，曾经跟我在乡下一块搞过文学的人闻讯送来了两千块钱，他搞了一家乡办企业赚了钱。我当时真是感觉到，农民企业家很厉害，两千块钱就给你摔在桌子上，多豪壮啊。后来我很踏实地对夫人说：“这个小说要是能出版，肯定会有点反响。”因为我清楚作品里写的是什么。但是我在这里很坦率地跟大家讲，这本书出版后引起那么强烈的反响我从来就没有设想到，再给我十个雄心壮志我都料想不到。

四

这个书的出版过程也有点意思。书稿为什么给人民文学出版社，这完全是一种朋友间的友情和信赖。我在“文革”期间发表了第一个短篇小说，尽管国家还处在动荡之中，但已经开始恢复刊物，逐步恢复文艺创作、培养文学新人，人民文学出版社也开始恢复出版。该社的一个编辑何启治到陕西来，找了几位老作家，有人就说陈忠实写了一个短篇小说，大家都反映不错。我当时正在郊区区委开什么生产会，这个编辑就到区上来找到我，他对我说：“你这个短篇我已经看了，再一扩展就是二十万字的长篇。”我当时给他吓得几乎不敢说什么了，能发表一个短篇我当时就很欣慰了。但这个何启治的动人之处就是由此坚持不懈。回到北京以后，不断给我写信，鼓励我写长篇。半年之后，我被派到南泥湾五七干校接受劳动锻炼半年，几乎同时他也被派到西藏去做援藏干部，还保持着书信联系，他虽然已经不在岗位上，但还鼓励我写长篇。新时期以后，何启治跟我有一次相遇时说：“我现在再不逼你写长篇了，但咱们约定一点，你的第一个长篇，你任何时候写成，你给我。”我就答应了。所以《白鹿原》写完之前，几家出版社闻讯我有长篇，先后来找我，我都说已经答应给别人了。写完以后一个月我就给何启治写了信，按我说的时间来了两个编辑。这两个人来西安以后还等了两天，我把最后两章梳理完，把改好的长篇稿交给

他们以后，他们下午就离开了，到四川开个什么会，然后再回北京。因为当时出版程序不像今天，一个礼拜就可以印刷出一部长篇小说来，我预计最少得两个月以后才会有消息，心里倒很坦然。出乎预料的是，大概不到二十天，我从乡下再回到城里就见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回信。我当时以为肯定不会有什么结论，打开一看，我几乎都不敢相信，大叫一声就跌坐在沙发上了。我夫人从灶房里跑过来，吓得脸都青了，我躺在那儿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这两个人从西安把稿子拿上以后，在去四川的火车上就看完了。他们回到北京就给我写了这封信，评价之好之高，大出我的意料，心里一下子就踏实下来，出版肯定没有问题。对一部五十万字的长篇小说表态如此之快，在我看来是非常少有的。在此之前也有一件让我感觉欣喜的事。我曾把《白鹿原》的复印稿给作家协会的一位年轻评论家李星看过，让他给我把握一下。他跟我是同代人，是朋友。我从乡下回到作家协会，在院子里撞见李星，问他看过了没有，他说看完了。我说我都不敢问你感觉如何。李星拽着我的手说："到我家里去说。"刚一进他家的门，李星转过身就跳起来说："这么大的事，咋叫咱们给弄成了！"我听完了以后也愣在那儿。后来我调侃李星，我说："李星第一次用非文学语言评价文学作品。"

2007年4月13日 南京

2007年6月6日修订 二府庄

别一种感动

——王红武楷书《白鹿原》序

大约两年前，我认识王红武时，他正在用小楷抄写《白鹿原》。他说他自幼喜爱书法，潜心埋头，修炼不辍，又偏爱《白鹿原》，读过几遍，遂生出抄写的念头。既为加深阅读感受，又是对自己书法功夫的一次阶段性检阅和归结。我看他说话凝重，不是随兴起意，况且业已在抄写工程的行程途中。我初闻时确实吓了一跳，半天竟不知该说什么，却确凿很感动。我以自身最直接的切实体验做类比参照，很自然想到我用钢笔这种极灵便的书写工具，草稿和正式书稿恰恰写了四年，尽管时时注意字迹工整清晰，然写到兴起激动时，仍免不了笔下潦草走形。想到红武用一支毛笔，一点一横一竖一撇一捺都要一丝不苟，力求笔力精到，不仅容不得潦草轻率，连墨汁的饱满也要求通体匀称，不许有肥脖瘦腿。那支小楷毛笔写不了三五个字，就得蘸一回墨汁，搞顺笔尖，如我这样的书法外行，也能推算到需得花多大工夫，耗费多少时日，储备多大的毅力和耐心，倾注怎样的痴情和专注，且不论书法艺术造诣的深浅。

到今年入夏，这个不可谓不浩大的工程终于完成，红武把已经装裱了的部分抱给我看。我打开一册册装裱精致的书法集子，真有望而眩晕的感觉。五十万字的《白鹿原》，他以小楷抄写下来，没有一笔一画修改的痕迹，也不见补添遗漏的一字半句。我纳闷，不得其解，人怎么会精密到滴水不漏的程度，最虔诚的和尚也难免诵经时打盹儿。他解释说，写错字和遗漏字词是难以避免之事，一旦笔下发生又及时发现，便把整张毁弃，重写，即使一张接近写满，也不犹豫，绝

不将就。这样推算下来，他实际上抄写的字数，远不止这部书的字数了。我更为这个年轻人的敬业和专注艺术的精神深深感动，钦佩之情也就自然产生了。我一页一页翻开那些我曾用钢笔写过他又用毛笔抄写的汉字，曾经是我再熟悉不过的文字，顿然变得陌生了，也新鲜了，更有一种庄重的气象，我细细嚼磨那些堪称书法艺术上品的小楷字，笔画里的一拐一折一弯都着力精到，不见一丝松懈或马虎，着笔和收笔交代清楚，气韵通畅，整篇气象匀致而又浑然，我自知是书法外行拙手，仅大略辨几分成色掂几成轻重。看得出红武小楷书法清秀里见得凝重，端庄里又透出灵气，确也耐得品赏。

如何出脱成这番艺术气质，达到这样高度的艺术境界，皆出于天性和苦练。红武自少年就练童子功，二十余年不舍不断，楷书、隶书、小楷师从王羲之《黄庭经》等名帖，逐渐有了自家对书法艺术的独特感受和领悟，自然得益于天性里的敏锐，这种自成一体的书法艺术必然创造出来，不仅没有描摹大家的死笔死字，而是取众家之长形成自己的创作，也就是王红武书法个性了。任何艺术都是以独特独立的个性存活的，王红武无疑已获得了存活的可资骄傲的艺术个性。

我的长篇小说《白鹿原》，得王红武一支灵秀之笔的非凡功力，以小楷书法的罕见形式得到亮现，真是令我不仅感动，而且倍觉荣幸之至。

2007年7月1日 雍村

村子，乡村的浓缩与解构

我是以一种平静的心态开始阅读《村子》的。这是我无意识间形成的阅读比较熟悉的作家的新作时的常有心态，兴趣不由自主地集中到一点，看他在这部新作里有什么新探索，玩了什么新的艺术招数。《村子》的作者冯积岐，和我在一座楼房的同一层办公，真是抬头见了低头也能见，他的中短篇代表作和长篇小说代表作我都读过。正处于创作旺季的冯积岐，我近年间有一种切实的感觉，他在闷着头却又是义无反顾地进行着自己独特的艺术体验和实践，既不轻易吹牛式的表态，更不向任何时兴的流派靠拢，而是执意要创造出自己艺术理想里的长篇小说景观。我拿到《村子》并打开书页的时候，很自然地就着意在他的新探索上，以为以一种平静的心态才能保持较为专注而敏感的阅读。记得是读到一百页的时候，我忍不住兴奋和激动，给冯积岐打了一个电话，我说《村子》写得好，真好。这种电话我是极少打的，即使真好的作品，我也是在读完全篇打给作者的。这回竟抑制、按捺不住了。

这是一部确实令我感受到心理震撼的长篇小说。震撼来自于作品丝毫不见矫饰的巨大的真实感。我被这种既呈现着乡村生活的真实和艺术描绘的精确和典型深为感动。这部小说最直接的阅读感觉是不能读得太快，对我这个老读者来说，产生这种阅读直感也不是很多。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阅读感受，《村子》展示给我的是，自公社体制解体到农民个体经营二十多年来，中国乡村社会生活演变的一部深刻而又真实的小说读本，可以透见生活深层运动过程里令人心颤的复杂和艰难的形态。我有过较长的乡村生活和工作的经历，作为一个纯粹的读者，对农村题材的小说的真实性尤为敏感，往往成为我继续阅读或

无奈舍弃的首要标志。真实才能获得读者的信赖，也是揭示生活深层运动形态的基础。《村子》首先以其巨大的真实感触发我的心理震撼。

即使没有乡村生活经验的人也约略知道，生活发展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公社化体制终于撑持不住而解体，其势如土崩瓦解，比合作化和公社化建立的速度更迅猛。土崩瓦解声中是数以亿计的农民的欢呼。最初反映这场变革的是何士光的短篇小说《乡场上》，成为名篇，随之潮起并持续多年的同类题材的小说，我也不甘寂寞写过不少中短篇小说。二十多年后回过头来看，农民获得土地的欢乐，很快被新的生活矛盾引发的困惑所淹没，成了太过短暂的欢乐。《村子》把那场短暂的欢乐之后二十多年的乡村生活的裂变，浓缩为一个颇具典型意义的读本。我看到这已不算太短的时光里，中国乡村的政治形态、经济形态、文化形态、家庭形态和道德形态，从旧的经济体制蜕变转换过程中，处在乡村各个生活位置上的人所经历的适应性变化，心灵世界的有适和不适，道德规范里的坚守和溃堤，由此而发生的得到的窃喜和失却的痛苦。冯积岐着重刻画的田广荣、祝永达、马子凯、马秀萍等人物，都呈现着从旧体制解体前业已形成的心理结构形态，在新的体制和新的生活秩序转换过程中所发生的异变；在原有的心理结构逐渐崩塌、新的心理结构尚未立架的这个相对混乱的心灵历程中，利益和道德的判断发生的冲突所引发的撞击，在一幢幢或宽敞或曲窄的厦屋里的困惑和痛苦，似乎与现代城市或高或低的楼房里所发生的判断性选择，并无质的区别。这些人物以各自的人生经历和在村子里的不同位置，呈现着各个个性的新的色彩，却是只有在这段生活进程中，才会发生的丰富而又驳杂乃至畸形的心理映象。我从这些人物身上，感受到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以来乡村生活发展和运行的

脉动和脉象，包括病象。这几个人物已呈现出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段的典型性。

我尤其欣赏田广荣这个人物。在公社化时代，这是一个年岁不是太老却资深的村子的主事人，在乡村体制发生重大改变的颠覆性过程中，以及之后乡村社会以一种相对宽松散漫的秩序运行的较为漫长的过程中，这个人都能轻而易举地做出适应性变化，一如既往地处于村子权力的核心。冯积岐从外形到心理都把准了这个人物的脉搏，也刻画成功一个少见的人物典型，具有广泛的覆盖面，且不局限于农民身份和乡村地域。我不需赘举情节和细节，作者笔下的田广荣的大事小事和一举手一言语，都是一种特定的心理形态所制约着的突出的个性行为。我的阅读印象是，田广荣是乡村社会人群里的高智商，他的智慧主要用来巩固和加强他在村子里的权力地位，只用指梢撩拨着公众的事，撩拨的目的也仍是个人的权力的再巩固。他在村子里几十年来形成一种积久难改的意识，也是一种心理结构形态，这是由权力所附带的经济利益个人荣誉以及声威所架构的一种特殊的心理结构，任何削弱和断裂，影响他的已不单是或大或小的经济利益，而是一种难以改易的生存理想的溃毁。失却了权力核心和声威的田广荣，肯定比村子里最不起眼的闲汉还难以生存下去。他很敏感地盯住了祝永达。这是个颇有书生意气和质地的理想主义者。他的理想越宏大性情越纯真，对田广荣构成的威胁就越严峻，而田广荣正是从他的纯真穴上把他击败。田广荣不乱方寸更不动声色，最致命的出手可以做到不留声响。按乡村人的俗话说，这是一个摸准了共产党政策脾气的人，对乡村社会包括家族利益以及各色人物心知肚明的人，他按自己的手段和办法轻而易举地处置矛盾，不变的目的就是巩固自己。我很感佩冯积岐创造了这个典型性人物，深知这是不易做到的，没有对乡村社会的深层了知，没有穿透表层事象的眼光，没有强大的穿透心灵的思想，

以及由此发生的敏感而又敏锐的体验，那是很难弄出田广荣这种人物个性的。

《村子》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百十户人家的村子，而是浓缩了一个特定历史过程乡村社会的变迁史裂变录。不凡之处在于作者直面这种裂变和变迁的深层脉动，确凿把握住了令我惊悚令我捶掌的不曾见识过的熟识里的陌生，才令我震撼。我尤其看重冯积岐在这部作品里面对生活和社会的姿态：直面。近年间就我有限的阅读和视屏观赏，不少写乡村生活的文艺作品，似乎无意识里偏重于怪癖性猎奇，兴趣偏移到农民的种种愚鲁可笑的行为，甚至明显是作者生编的怪癖细节，企图以此见到深刻效应，也果真使远离乡村的读者和观众惊诧一回。我常想，这些经济贫穷文化偏低的乡村人，总还是人呀，多少总会有家庭传统教育和现代文化的一些影响吧，如何一个个都呈现着和野人无异的行为，供城里人一乐！我因此而钦佩冯积岐，他以执拗的个性和已具备的强大的思想，勇敢地直面乡村社会，以几近完美的艺术表述，把自己独特的乡村社会的体验呈现给我们，让我不仅感知到中国乡村社会的深层裂变，也为整个社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可资信赖的参照。

就冯积岐的几部长篇小说而言，最具代表性的是《沉默的季节》和《村子》。前者是第一部长篇小说，起手便落在一种高品相上，这部小说是一个和几个人的心灵倾诉，尽管也以乡村为生活背景，着重在个人与社会环境下的心灵体验。《村子》则面对社会，浓缩了一个村子，解构了一个村子，也就浓缩和解构了乡村社会，视野开阔，生活容量也沉重得多了。不仅让我看到作者视觉的转移，也看到思想发展的力度。基于对《村子》的感知，我对冯积岐再后的创作更有期待的信心。

2007年7月15日 雍村

感受西安行进的气象和脉搏

集中阅读“外乡人在西安”征文的文章，在我确有意料不及的兴奋和感动，甚至可以说是惊讶连连发生，颇有震动。几十篇严格限定在一千五百字以内的纪实性文章，尽管文字叙述的韵调和色彩各呈其姿，而纪事内容可以说篇篇充实饱满，没有虚词废话，也不见矫情粉饰，全是扎扎实实写人叙事的干货。不仅返璞归真于言之有物的务文之道，更为我打开了现在进行时的西安的一条条街巷、一幢幢高耸的楼房或低矮的陋屋的窗户，让我看到一个个从外乡进入西安的男人和女人的生活图景，令人感动，也令人感奋。

我看到沉潜在西安城区各个角落和社会架构各个层面上的外乡人，以坚忍的意志乃至艰苦卓绝的精神，以诚实的劳动和富于开创意义的智慧，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创造着社会财富，丰富着生活各个层面的物质需求。这几十篇短文所介绍的几十个进入西安的外乡人，几乎包揽了社会生活所有角色：为中国画画家和书法家装裱字画的艺人，为中外旅客服务的导游，巷道小门面里摊出诱人香味煎饼的青年，为城市白领和上班族解除家务之累的钟点工，踩着三轮短途转运货物的车夫，为那些爱美爱俏的男女美化容颜也美化发型的美容师美发师，承传着民间工艺绝活的巧手艺人，还有新兴起的网站工作者，来自近邻缅甸、唱歌跳舞的小兄妹，更有任谁也不可或缺的隐于小巷一隅的修鞋匠等等。生活世相里的各个行业，都被这些来自东西南北的外乡人操持着。他们是生活运行、社会进步的最基本的推动力量。不敢设想，如果他们从现在的位置上集体撤离，西安城行进的脚步肯定失去正常的节奏，乃至慌乱。

他们没有惊天动地的壮举，却是默默无闻的诚实劳动者，我们常常不太在意他们。当我们从媒体上不断看到腐败官员和奸商大亨的丑闻丑行，看到诈骗、偷盗以及抢劫杀人的种种凶事，对世事和世风往往发生担忧或抱怨的情绪。读了这些颇有代表性却普通不过的诚实劳动着的外乡人的事迹，不仅感动，而且更会使人确信，生活主流的创造者和推动者是沉静的雄健的，足以让人对那些腐败的官员腐烂的商人和丧失人性的罪犯涨起不屑和蔑视的自信。我相信从这些最基本的劳动者身上所感受到的气象和脉搏，才是西安这座发展着经济也发展着文明的古城的真实的脉搏和气象。

这些征文文章读过多日了，许多感人的行为细节依然记忆如新。从关中西府到西安来的两个喜欢美术的年轻人，很务实。先在书院门装裱字画，赢得了作家兼书法家李廷华的信赖，唯一的纽带就是可信和可靠。他们创业初获成功，爱情也开花结果，而且铺开宣纸掂起画笔开始国画艺术探索了。我感动于那个把石磨从乡村运到西安，为爱吃辣椒的城里人现场研磨辣椒面的自诩为“二百五”的乡下人，以决绝的行为对抗假冒伪劣的商品，令人肃然。我不难想象一台石磨在西安城一角转动起来的风景，却是生活前进的中坚力量的铿锵之音。我也感动那个组合了自己家族和亲属的浙江籍的乡村人，在城中村租住的房子里加工制作服装，不过三米高的卧室里竟是上中下三层的床铺，凌空吊床，地上地铺，中间仅一米高的床，三层住着二三十人，每人的空间不足一平方米。这个浙江人和他的亲友不是制造奇观，而是白手起家创业时的艰难。他很快发展起来，成为一个颇具实力的老板了。他说他现在最渴望的是完成高等教育。我随意举出这三个令人难忘的人，他们来自不同地域的乡村，文化程度年龄长幼和性格差异很大，而诚实做事和艰苦创业的精神却是共同相通的。我便归结到一个似乎不大时兴的生活哲理，做人做事还是得依靠诚实，成事既靠智

慧，更靠承受生活艰辛的心理撑力，才能建立成就事业的自信。那些刚刚跨步做事就叫唤艰苦就期待照顾的人，大半很难在这世界上成事，且不论智商高低和本事的大小。我还有纯文学的一种感动，卖辣椒的“二百五”的石磨和浙江老板的三层床铺，读着的时候惊诧不已，读过多日依然新鲜不忘，倒想起曾经读过某些长长短短的小说，读过后竟连一个情节或细节也记不住，颇为感慨。我想，这两个人的创业史，肯定能写成更丰富感人的较大篇幅的纪实文学，也值得写。

《西安晚报》搞了一次视角独具的征文，为读者的我打开了西安的各个角落的视镜，让我看到西安真实的生活景象，听到生活运行的可靠的节奏，很受教益。

2007年7月24日 二府庄

无弦的诗性歌吟

——《谁识无弦琴》序

认识高亚平多年了，除了写作的关系之外，还有一层间接的人际关系。他是文学教授王仲生的学生，很敬重老师的才学，也挚爱老师的为师为人的品格；王仲生教授也和别的老师一样，有他尤其喜欢并寄着厚望的一伙得意门生，高亚平是其中一个，多年来相敬相携，信赖无隙，令我颇为羡慕。我与王仲生教授相识相交已近三十年，也是文学之缘的投合之外，还有一点地缘亲情。江南籍的王仲生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西安，在我家乡灞桥区一所中学任教，长达二十余年，后来我便有相遇恨晚的遗憾。这样，王仲生就成为我和高亚平共同的老师，尽管我和高亚平差着一代人的年岁，却都是王仲生教鞭下的聆听者，也就接触多了，算忘年交情的同窗。

印象里高亚平一直写着散文，在报纸和文学刊物上时有新作，我得空读过一些，只是一篇一篇的零碎感受，这回得着他的散文集《谁识无弦琴》，集中阅读，不禁兴致越读越高，而且连我对高亚平个人的印象都彻底改变了，或者说更进一步理解到他的内里了，也可以说刮目相看，得庐山之真面目了。虽是忘年同窗，见面聚会却委实不密，多年下来的印象，高亚平似乎是个急性子，说话比常人快半个节奏，成为生理习性，即使快到常让听者听不准记不住，他得再一再二重说再述，却仍然是节奏很快，快到不可避免地出现磕绊，足可见心直口快不拐弯的真性情。然而，读了《谁识无弦琴》里几十篇散文，都是他的生活感受和体验，一个诗性的高亚平的坦率、纯厚以及对乡情乡土不尽缠绵的内里情怀，展示在我的眼前。

这部散文集里有不少篇章写作者的生活见闻，行走在城市大街小巷，耳闻目睹，各色人脸，诸种行状，假声假眉假呻吟的市声世相，都入得眼耳，再诉诸文字，生动逼真，留下生活发展的足迹和印痕。这足迹印痕，可以读出繁荣和文明的潮涨之音，也可以看到蝉蜕过程中的污秽和糟粕，一个从落后封闭朝着繁荣和现代文明蜕变脱胎的城市，便留下了这个特有的且不会再重复的时代的细节。我因此而发现亚平有一双敏锐的眼睛。

敏锐的眼睛是受敏锐的神经支配的。我不禁惊讶他的神经的敏锐，更感动这敏锐神经对生活世相和人的行为的审视的砝码，是坚守一种高尚和真实，还有纯净。对生活里这些美的东西，他毫不掩饰自己的倾慕和敬重，与之相反的矫情娇气以及种种伪饰，毫不苟且，即使无力遏止，却可以冷睥。在当下这样繁华挟裹着种种虚妄的生活潮流里，能有如此的清醒和坚守，令我感动且敬佩。

这一组或这一类的文章文字，别具一格，是我看到的不类同任何人的叙述风格。短句，准确精到，少见虚词空话，更无不见幽默的贫嘴，这是目下常见的文字。这些散文随笔里，多有古典文言和现代白话词语的搭配参接，周密而且自然，协调而又畅达，不仅增强了语言的厚实感，也强化了文字的韧性。我约略见过有人也做过这方面的语言探求，效果倒多是负面，甚至给人咬文嚼字没有消化融通的别扭。亚平语言的如此呈现，让人眼前一亮，把我们古典文学里优美的富于张力的语汇重新注入了活力，且不留硬痕，这是很不容易的文字功夫，也可见得古文修养的扎实。这样，高亚平别具一格的语言个性就凸显出来。

如果还从语言角度看，高亚平写乡村生活的散文又呈现出另一番鲜明的景致，那就是诗性。这一组散文，多是作者生身并成长其间的

终南山下的长安乡村，且多是作者少年时期玩耍其中所留下的记忆。高如屏障的终南山下的一条又一条小河，被小河环抱着的或大或小的村庄，连接村庄的马车土路和通往田地的小径，夏日碧绿的秧苗和秋后收割过的稻茬，悠然飞翔空中或踯躅在稻地里的鸬鹚，和生活在这些村庄里的父老兄弟和亲戚朋友。无论《躲在季节里的村庄》《忙月闲天》和《村庄及其周围》里一束一束泛着泥土乡情诗意的短文，无论《姨婆》《根田》和《乡间人物》等这些可视作人物速写的篇章，我阅读里最强烈的感受就是诗意洋溢着的诗性质地。

我能想到，首先在于这些乡村题材的真实，因为是作者曾经刻骨铭心的记忆，今天抒写出来，是依着心意和情感的自然流淌，无须矫饰，更不必掩饰，那是会亵渎幼年乡村留给心灵垫底的最神圣的情感。我看到这些凝结着情感的最普通的乡村世相，用的是几乎不加修饰和形容强化的文字，展示的却是浓郁的诗性。这里给我一个启示，生活的诗性，可能恰恰不是我们见惯了的某些诗的语言所能体现出来，反倒是如亚平这种几乎写实的文字，把生活内蕴的诗性体现出来了。我有与亚平类似的乡村生活经历，又与他笔下所写的长安相距不远，阅读里的亲切感是不言而喻的，甚至为他对乡村生活鲜活记忆和生动状景而感慨连连。他笔下的马蹄牛蹄羊蹄的轻重节奏，我有相同的感知。他写到的柿树上的鸟儿，我记不清见过多少回，我家大门外有一株一搂抱粗的柿子树，院子过道还有碗口粗的一株。尽管如此熟悉，我却为他写的一个细节所感动，年年都来叼吃柿子的鸟儿，这一年不知因为什么缘故，没有在柿子成熟的时节来叼吃柿子，乡人不仅不庆幸少了为害，反倒在柿树上为鸟儿留下一些柿子，等待鸟儿来叼来吃。乡民的话是出于一种生存信仰：天地万物，有人一口，就有鸟儿一口。这样简约直白的乡村俚语，道出来的却是人与自然的生存哲理，天和地和人以及万物共生共荣的普遍性真理。这三句最质朴的乡

民语言所阐明的道理，在理论家笔下往往要弄出叠摞的文字来论证。我被亚平诗性的语言里描绘的乡村图景都迷醉了。他让我重新进入一种纯生活的诗性记忆的回嚼。他让我从另一种文字叙述重温柳青《创业史》里的诗性画面。我一遍就记住了他这样颇富哲理的句子：有牲口出没的村庄才叫村庄。读到这句时，我心里泛起的是一阵惊悚，我曾经生活的村庄已经没有牲口了，自然也没有蹄印了。某个村子的某个养殖专业户，批量圈养的牛，不会拽犁套耙，正长到可与农人为友进入垄亩时，却被用汽车送进屠宰场了。乡村的诗意正在消失，我和亚平留在记忆里的蹄印也在消失，就愈显得珍贵。

高亚平写了一组乡村人物，无疑都是他幼年时朝夕相处的乡下人，姨婆、根田、王福厚、民民等，尽管在同一种极左的政策框架下生活，却仍然有自己的个人兴趣和性情。姨婆无可解释的婚姻形态，大约是她专注于烧香拜佛的支撑性情感寄托。沉湎于二胡音韵的根田，悲剧性的人生过程和归宿，终究也无法解释一次致命的偷盗女孩衣服的行为。如此等等。这些人物不是小说家塑造的艺术形象，也不是纪实文学所集中刻画的特殊人物（尽管是真人真事），甚至与柳青在那块土地上刻雕的典型人物也不同，而是原生形态的乡村人物，是普通人，更是平凡人，普通平凡到任谁都不会在意的生存状态。然而正是这普通和平凡，却勾引起他们的一个后辈子弟高亚平的情感一缕，替他们发出生活最深处的一声呻吟，并雕铸为文字，成为一种生活原生态的真实。

长安历来为京畿之地。在昌盛的王朝里，是官家的宅地，也是纵马狩猎的去处，更是游春景赏秋天红叶的赏心悦目之地，出了许多传留至今的故事，“人面桃花”的好诗就写在离高亚平家不远的村子的门板上。更具备让今人研究这方地域的独特底蕴，大小王朝宫殿里泼溅

出来的法令政令和道德规范，长安是最近的也是最直接的接受的土地，遗落在今天长安的土壤里，给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一代一代子民的心里沉潜着什么？我从亚平的文章里，约略感受到一种沉重。

高亚平有自己极易触发灵感的生活对象，也有一根极敏感的文学思维的神经，业已形成独立不群的文字风格，我完全相信这支笔会展开新的艺术景观。

2007年7月30日 二府庄

钢枪马蹄溅落的诗句

——《心语》序

上个月的这个时候，我正行走在军营之中，陷入在一波又一波的新奇而又感动的情绪里。对军营的完全陌生和对多种新式武器的精到表演，不单新奇甚至可以说大开眼界惊讶连连；已经实现了知识化武装的现代军官和士兵，依然传承着对国家的神圣职责的忠诚，那种泥水里的演练让我感知到义无反顾的坚定和纯粹，由感动而进入崇敬和钦佩了，这是国家和民族可资信赖的脊梁。

这是一次非同寻常的笔会，名曰作家走军营，由中国作家协会组织，我便有了一次弥补平生缺空军营生活遗憾的机会。从军营回到西安，我赶写着军营笔记，所见所闻和所引发的感动，依旧沉浸在迷彩服所营造的氛围里。这时候，我接到陈时宝将军的指令，他是陕西军区司令员。我真有点诧异，人民解放军建军八十周年前的这一月，与军人的接近，成为我生活的最主要内容。

见到陈时宝将军，握手的一瞬间就化释了此前所有关于将军和司令的神秘想象，也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这也是我在走军营的过程中屡屡发生的感受，一位从资料或介绍中得知的功勋卓著的校官或将军，到见面时却看不出超凡出众的迹象，一满是和气和坦诚，陈时宝将军也是这样。可见我们的这个定性为人民的军队，确实保持着人民的子弟兵的本色，以及由此而传承着的独有的作风。让我始料不及的是，作为一个省的军区司令员，竟是一位诗人，近四十年的军旅生涯

中，从来没有停止那支写诗作词的笔。他把一厚摞打印整齐编辑完备的诗稿送给我看的时候，我竟半天说不出话来。

我通读这部近二百首诗歌的《心语》，直感的第一印象，这不是一个想当诗人的人写下的诗。或者说，陈时宝写诗的目的不是想要做一名诗人。他现在是军区司令，是一位将军，不断地写着各类生活题材的诗，诗兴不因职高位显和年近六旬而减弱，倒是愈发高涨起来；然而仍然是一种兴趣和爱好，是对生活事象的感动而触发的一种情怀的表述和言说，他的首要的毋庸置疑的生命位置的取向，是做好一个军区司令承载的重大责任。即使在他当团长连长排长以及士兵时，就不间断地写着诗，却不是为了当一名诗人，首先是做一个优秀的士兵，以及一级一级提升起来的各种领导岗位上的工作和职责。我面对陈时宝的人生履迹颇为感动，一个从十八岁走进军营的湖南青年，从士兵直到陕西军区司令，整整四十二年的军旅生活，当会是怎样一部人生大书，自不必说；让我这个以写作为业的人尤为惊讶的是，在他从一个士兵晋升到将军的四十二年戎马生涯中，几乎一直没有中断写诗，便忍不住感叹这个人的豪情和雅兴了，一个人内里心灵之纯粹和精神世界之丰富，尽在马蹄和钢枪的声浪里溅落的诗行中标显出来。

我正是从陈时宝将军的诗行里认识他的。我和他短暂的交流，不可能感知一个士兵到将军的艰苦卓绝和丰富饱满的人生体验，他的诗歌却把这些坦陈在我的眼前。他在得到入伍批准后，便以诗歌表述了抑止不住的喜悦和当好一个兵的强烈心愿。他进入军营的每一种训练，每一种新鲜的事物，都以诗歌记载下来。他的诗记述着他的军旅行程，依着他的诗，可以清晰地看到他军旅生涯里的足迹。他从南方走到北方。他驰骋在大西北最适宜练兵的各个地方，而练兵的地方无疑都是最艰难艰苦的地形和气候，荒漠戈壁、缺氧的高原、奇险的华

山、蚊虫逞凶的草地、荒无人烟的边防哨所……无论是兵或是指挥员，他都在自己的位置上认真负责尽职尽责，把当时的感受和体验化作诗行。他的工作内容和生活内容远不止军事和军营，他参与地方政府发展的许多事项。他走进驻地农民和牧民家庭访贫问苦解决困难。他关心老区的新发展，也关切乡村教育，包括对地方乡村卓有贡献的杰出人物由衷的礼赞。由他的诗行里可以感知一种巨大的责任心，一种真挚和真诚的情感，一种昂扬的精神，还有赤诚的宽厚的襟怀。我便用一句话概括，陈时宝把他的美好青春年华和毕生的智慧投注给人民军队的建设，他的诗歌把他的精神、心灵、情操和情趣展示给我和读者。一部心理世界的话语，也是无愧人生的壮歌。一个不以当诗人为目的的人，却成就为一个别具一格的诗人。

陈时宝将军的诗给我再一个强烈的阅读感受，是真实和真诚，这也许与他意不在当诗人有直接关系，都是一种生活行程中的真实感受的直接涌流。随意举出几行，“借来走石砺筋骨，喜得紫光练精神。”这是他率部到昆仑山实验时面临的艰苦环境，对人伤害的紫外线，也是锤炼精神的另外一种心理境界了，溢满豪迈之气概。“蚊虫王国一身血，雪海孤岛两鬓霜。”可见难以想象的生存环境，都被一种崇高的目标和忠诚的爱国之心所征服。既不为当诗人而写诗，就排除了功利目的，也就保持了对生活体验的那一份鲜活和真实，恰是诗歌存活的基础性质地，也是感染感动读者的基本灵光。

陈时宝多年来走遍大江南北，在政务军务之外，看到各方地域新呈现的景观，发出情不自禁的赞美歌颂，让我看到他情系国计民生的情怀，对国家繁荣的景象和人民逐渐富裕的欣然之情，溢于诗行。尤其令我感佩的是，将军有不少诗篇写到家庭亲情，有悼念父亲的绝句，也有依依不舍为娘送行的感人诗作。“晴空万里飘祥云，喜鹊一叫

喜临门。”这是营造的双喜临门的气氛，女婿赴京去读博士，爱女即将为他生育孙儿，将军欣悦的心情跃然纸上，这种人之常情尤为感人。在他的上辈下辈和左右亲属的家庭氛围里，也是一种蕴含着高尚人生的儿女情长：“但愿更有英才出，建设祖国做栋梁。”正所谓志高者情亦殷，却独不见私情里的平庸和物欲，恰是“诗言志”的体现。

我便猜想，将军任何时候回顾自己人生追求和人生历程的时候，吟诵这一厚卷从心灵里涌流出来的诗句，那一份自信和欣慰，当是无可替代的独特的生命活力。

2007年8月5日 二府庄

望外的欣慰和感动

——《日子》获奖感言

真是一种喜出望外的感觉。《文艺报》一位尚未谋面的编辑明江发来一则手机短信，告知我的《日子》获得首届“蒲松龄短篇小说奖”。其时我正在集中阅读柏杨先生即将出版的短篇小说集，沉浸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底层社会各种职业劳动者痛苦不堪的挣扎吁叹的氛围里，获得这个喜讯，竟然好一阵儿转换不过情绪来。许久，不由得“噢呀”一声自吟。

我确实很感动。最直接的第一心理反应是，这个短篇小说写作和发表至今整整七年了，在当今潮水般一波迭过一波的文学节奏里，不足七千字的《日子》，能够不被淹没沉底，还能被推举到首届“蒲松龄短篇小说奖”评委们的案头（我至今尚不知推荐者是哪家团体或某个个人），还能入得各个评委的法眼（同样至今不知一位评委的名字），作为作者真是意料不及的欣悦和颇深的感动了。这来自我对创作的自始至终不渝的理解，无论篇幅或大或小的小说，抑或散文随笔，写作完成后的唯一心理企盼，能得到读者的认可和呼应，认可的范围越大呼应的声音越响，我的生命的意义就获得最踏实的自信了，完全不在乎吃什么好穿什么不好血脂高了低了或肥了瘦了的事项了。我很尊重“我的作品是写给自己看的”的话，包括记不得谁说过的“我的小说是写给几十年一百年后的读者看的”。作家的写作心态和对创作的理解，各个不同，也不可能相同，这是常识。我却是写给读者看的（自我欣赏那是无须再说的事），而且是首先写给同时代的读者看。

这种写作心态，还是出于我对创作的理解，我对过去的生活不断回嚼，也对正在行进着的生活不断发生的新感受，达到某种自以为是独自独有的体验的时候，就生发出一种创作和表述的欲望。而当一个或大或小的新作完成，我总是改变不了那种忐忑不定的心情，担心我的这种体验和对体验的表述形式，能否得到读者的呼应和认同？在我看来，读者对某个作品的冷漠，无非是这作品对生活开掘的深度尚不及读者的眼里功夫，或者是流于褊狭，等等，自然还有艺术表述的新鲜和干净。当下乡村生活题材的各种艺术品不计其数，一个短篇小说《日子》能否引发读者的阅读兴趣，确凿是我刚刚写成时的心理疑虑。我在《日子》里所表述的那一点对乡村生活的感受和体验，在《人民文学》和《陕西日报》先后发表后，得到了颇为热烈的反响，尤其是《陕西日报》这种更易于接触多个社会层面读者的媒体。我看了《陕西日报》关涉这篇小说的读者来信，回到原下的屋院，对着月亮痛快淋漓地喝了一通啤酒。

七年后的今天，在我的短篇小说里算是少数几篇篇幅最小的《日子》，能被首届“蒲奖”相中，又是另一番心理感动和鼓舞了，也潮起我尤为喜欢的短篇小说的写作兴致和信心。

2007年8月30日 雍村

柳青创造了一个高峰

我今天参加柳青文学研究会成立大会，非常高兴。同时还有一点遗憾，遗憾的是这个研究会成立得太晚了。我觉得早在十年前就应该做这种事。这是一种心理，是我个人对柳青由仰慕到崇拜这种一直延续到今天的情感驱使着的一种心理。今天这件事终于做成了，我如愿以偿地欣慰。

我国当代文学自然形成的格局，一般分为两个大板块，一个是军事题材，一个是农村题材。这种文学格局一直延续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才有了较大的改变。柳青在农村题材这个领域里创造了一个高峰，艺术的高峰，思想的高峰，至今依然为文坛所敬重。这不仅是我个人的感受，也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史家共同的一种看法。大家习惯用一种最简单的话来概括十七年的文学，说“三红一创”是十七年文学的代表作。《红岩》是写国民党监狱中革命烈士斗争的故事，《红旗谱》是写现代革命历史题材的，还有一个《红日》是写战争题材的，唯一一部能进入这个民间和专家形成共识所概括的“三红一创”的乡村题材的长篇小说，就是柳青的《创业史》。《创业史》是陕西作家柳青在长安的秦岭山下完成的，它的艺术成就远远超出了个人的意义，而是属于中国当代文学的一个高度的标志。所以，研究这个作家，不仅仅是对柳青研究有意义，也不仅仅是对陕西今天和未来的文学发展有意义，而且对中国当代文学发展有很重大的意义。我们起码可以看到，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文艺思想和文艺政策受极左思潮影响那种艰难的环境里，柳青如何以超凡出众之思想深度和艺术功力，完成了一次艺术高峰的创造。这是同代人努力在做而没有做到的，柳青做到了。我们研究他，就是研究十七年文学中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伟大的作

家，处在不像今天改革开放时期的文艺政策和创作环境下，进行了怎样艰难而勇敢的艺术突围，完成一个文学高峰的创造，我们从中学习和汲取对今天和未来有益的东西。

许久以来，我就非常期望有这样一个研究机构的出现。我完全信赖我们陕西的文学理论家和批评家，还有作家和各界人士，能对柳青创造的意义、艺术的意义和思想的意义，包括人格的意义，进行充分的研究，全面揭示柳青及其文学创作的意义价值。我祝贺柳青文学研究会的成立，我满怀信心期待这个研究会不断推出新的研究成果。

我对热心策划并促成“柳青研究会”的董颖夫等长安区的朋友，致以真诚的谢意。你们对长期生活在长安的柳青的情感，令我感动。

2007年9月8日 长安

阅读柏杨

——《柏杨短篇小说选》序

闻知并记住柏杨，不觉间已有二十多个年头了。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文学朋友碰面聚首时，传递着台湾作家柏杨的名字，新奇到颇带某些神秘的色彩，原因是他的一本名曰《丑陋的中国人》的书在西安传播，首先在敏感的文学界乃至范围更大的文化界引发议论，似乎媒体上还有不同意见和看法的争论。我闻知这个信息时，当即到街头最近的一家书摊上买到这本书。那时候我住在原下的乡村老屋，夜静时读《丑陋的中国人》，竟读得坐卧不宁击掌捶拳，常常在读到那些精妙的毫不留情的议论时走出屋子，点燃一支烟，站在我的寂无声息偶闻狗吠的乡村小院里，面对着星光下白鹿原北坡粗疏的轮廓，咀嚼品咂那种独到的尖锐和深刻，更感到一种说透和揭穿的勇气，令人折服，更令人敬佩。就我的心性而言，这是很自然发生的情感和情绪。我可以不在意某些自我感觉良好到自我膨胀再到大言不惭胡吹冒撂的人和事，而当读到那些在自己尚未意识尚未发现的独到见解时，一种新鲜的富于启示的深刻，便自然地折服并出示敬重的情感了。一个令我折服并敬重的名字，是不会忘记的，这是柏杨。

二十多年后的今年夏天，我有机缘阅读柏杨的小说，如同初读《丑陋的中国人》时一样发生深层的心理震撼，却也有明显的差别，《丑陋的中国人》里的柏杨，是一个犀利到尖锐的思想家，而敢于直面直言说出自己的独自发现，让我看到一个独立思考者的风骨，甚至很自然地联想到鲁迅；隐藏在一篇篇小说背后的柏杨，却是一个饱满

丰富的情感世界里的柏杨，透过多是挟裹着血泪人生的情感潮汐，依然显现着柏杨专注的眼光和坚定的思想。

柏杨的眼光专注于台湾社会的底层生活，这是我阅读的直观感知。在他以各种艺术方式结构的短篇小说里，几乎全部都是挣扎在底层社会生活里多种职业的普通人——业务员、公司职员、雇员、教授或教师、娼妓等。每个人几乎都有痛苦到不堪存活的生存难关，都是令人心头发紧发颤的悲剧性人生。几十篇短篇小说里的百余个各色人物的生活悲剧，勾勒成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台湾社会生动、逼真的情状，万象世态里的社会不公，虚伪奸诈，金钱和物质对人的形形色色的扭曲，读来真有屏息憋气汗不敢出的阴冷和惨烈。

《相思树》里写了一个曾经负过伤的抗日连长，失业落魄，到处寻找打工而打不上工，连坐公交车的五元钱也凑不齐，到一个曾经在大陆时有交情的朋友开的饭馆蹭饭吃，不料这饭馆主人因入不敷出而破产，竟吊死在窗外的相思树上。这位流浪街头的抗日连长，面对吊死的朋友，思念起他的为他从骨缝里掏出子弹的女儿。更令人惨不忍睹的是《路碑》，也是一位参加过抗日战争的士兵，曾经在肉搏战中用枪托打得日本鬼子脑浆迸溅的英雄，在妻子生小孩时需要一支三十八元的止血剂，而手中只有五元钱，到几位熟人处借钱分文未获，尤其是那个被他从日军俘虏营里救出的人，到台湾后发了财，却把他巧妙地支开了。他忍痛把孩子身上的毛衣脱下来送进当铺仍凑不够钱数，妻子因抢救不及死在产床上，他于悲痛到绝望时冒着大雨跑到抗日纪念碑前，把被日本鬼子刺伤的疤痕敞亮给天空和雷声，撞碑而死。我读至此，已听到隆隆爆响的雷声，已看到这位英雄撞到石碑上迸溅的鲜血，也分明看到石碑后柏杨愤怒的眼睛。他的呐喊，在那位抗日英雄脑袋撞碑的血花里，如雷一样轰响。

柏杨说，社会悲剧是时代造成的。上述这两位抗日老兵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台湾的人生悲剧，读来令我触目惊心，甚至有不忍不敢再往下读的恐惧感。这样的阅读心理的发生，许多年已经没有出现过了，类似年轻时读维克多·雨果的《悲惨世界》和《巴黎圣母院》的情景。不单是我对这两位在民族危亡时刻，以鲜血维护我们尊严的英雄的非人生活难以承受，更多的篇幅里所描写的普通人艰难挣扎的生活状态，同样使我透不过气来。《进酒》里写了一位失业的大学教授，在完全的绝望里发出无奈的天问，人生下来的目的是什么？他自己的回答是，人与猪是一样不可选择的。《窄路》里写了三个少年时代的好伙伴后来的人生历程，一个为求职做小学教员四处求情而不得；另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高才生，恪守道德和人的尊严而不甘低眉，落得窘迫而死，女儿于困窘无奈的境况下私开娼馆，出卖自己；从马来西亚回来的韦召去看他的朋友时，瞅见了沦为娼妓的朋友的女儿，已经没有了羞耻感，其母（朋友妻）不仅和女儿一样面对昔日的朋友毫无惭色，反倒咒怨丈夫生前给她什么也没留下……这种咒怨和控诉，与其说是对着死去的丈夫，毋宁说是对着那个时代里的台湾社会。《客人》里同样写到一位受过高等教育的失业者惨不忍睹的生活情景。他于中国人传统的端午节时买了三个粽子，那么一小点花费惹得夫人生气发火。夫妇二人却诚恳地招待了处于饥饿摧残中的一对父子。父亲无疑也是一位有知识的失业者，竟然一连吃下六碗米饭，而不好意思夹菜。这些挣扎在饥饿乃至死亡线界上的业务员、教授等人的情状，最自然最直接地揭示着社会对人的摧残。而在一篇篇不事任何夸张和矫饰的沉稳的文字叙述里，我感知到柏杨关注社会民生的强大思想，这种思想决定着他全部情感的倾向，就是不合理的社会里无以数计的不幸男女，他的眼睛不仅关注这层人群，而且十分敏锐和敏感。在我理解，正是这一点，决定着一个作家的基本质地，决定着他独立存在的永久性，也决定着他的创造意义和生命价值的无可企及。

柏杨还说，个人悲剧是个性造成的。这句话是前一句话的另一面，构成柏杨审视社会和人生的双重视角。《凶手》写了一个嫉妒到极端的人的畸形心理。这种嫉妒不断产生无法缓解更无法消除的仇恨，残忍到连自己也承认为禽兽不如。柏杨在这里展示出一种恶的人性，一种把卑鄙演示到极端的人性。《陷阱》更是人性恶的更深刻的展示，一个名叫钱国林的年轻人，在北洋政府上海特务机构供职，先设奸计诬陷他瞅中的婉华为革命党，再把这个诬陷的罪名栽到婉华的恋人家康头上，先致婉华入狱，再致家康被酷刑施暴致残，蹲三十五年牢狱一直到死。心里的冤屈无法辩白，更无法向婉华表白。钱国林以这件罕见的阴谋获得了婚姻的目的，娶了婉华。婉华和一个杀人不眨眼的魔鬼生活在一起。这种恶的人性酿造的惨剧，读来令我后脊发冷，却也超出了一般个性的理解，主宰个性的是品德，以及能任这种披着人皮的魔鬼恣意的那个社会。作家柏杨鞭挞的既是人性之恶，更鞭挞社会之恶。在那样的社会生活里，这种人性之恶既得助于权力而膨胀，也依赖财富肆无忌惮地横行。《一叶》里的老板和秘书偷情被老婆察觉，却怀疑魏雇员偷窥泄露，不仅解雇使其失业，而且陷入更惨的绝境。偷情的女秘书此刻被老板送到美国留学。这里的个性也让人更深地看到社会，穷人和富人，道德和法律，对人性善的扭曲以至摧残，对人性恶的张扬和横行。但柏杨对个性造成的个人悲剧的一篇篇小说里，其实都不局限在单纯的个性层面，让我感到更广阔也更深层的社会背景里的丑恶，才是这种人性恶得以肆无忌惮地给善良的人群造成伤害的根源。

柏杨的这种坚定而深刻的思想，显然体现在他的一组爱情题材的作品里。柏杨冷峻的眼光所透视出来的爱情形式，大多数不仅缺失浪漫和诗意，而且有一种痛切的强烈感受。《秘密》写了设计致死哥哥又逼得父亲自杀的逃犯徐光军，在一个月夜把叶静诱到豪华公馆，说

他已继承了千余万美元的家产。这个本来不大乐意和他游园赏月的叶静，一下子就叫起哥哥了，就接吻并把身体献上了，山盟海誓永远陪伴徐光军。这些行为一般看作肤浅，似乎无大非议，令我触目惊心的是，徐光军完成野合之后，便一幕一幕揭开秘密，父亲信赖哥哥而把继承权决不传给他这种不成器的儿子，他便设计害死哥哥，活活逼得父亲自杀，警方把全部家产没收，他背着债务一无所有从马来西亚逃回中国。这个叶静在听到他杀兄夺财的恶行时，不仅丝毫不以为残忍和丑恶，反而继续表白着爱的誓言，赤裸裸地说："即令你是凶手，不要说你仅仅是弑兄凶手，甚至你竟是弑父凶手，都不影响我对你的爱。爱情如果连凶手都不能包涵，那还叫什么爱情呢……"读到这里，我的心头不由得发生战栗，同时依着这句惊心动魄的话，相应对出一句话来，爱情如果连杀人凶手都能包涵，那算是一种什么爱情呢！一个陷害谋杀了哥哥又气得父亲自杀的在逃犯，仍然受到叶静的毫不动摇的爱的表白；而当他说明负债逃亡身无分文的真相时，她不仅断然告辞，连亲昵的称呼也不准他叫，甚至几乎甩出耳光。变脸鸡也比不得，一个绝妙的讽刺。我似乎尚未读过这样令人惊心动魄的爱情故事，一个狼一样的男人和一个狼一样的女人，金钱让狼一样的男人杀兄逼父，狼一样的女人爱的是男人抢夺的美元。爱是什么？这样赤裸裸的爱的表达，连狼和凶残的雪豹也不及了。《窗前》类似于上述的故事，却挖掘出"爱情"这个迷人的词汇里另一番滋味，一个女人对男人的态度的转变，在于男人在美国获得了一笔数目可观的奖金，由原先动辄打骂男人，变为被男人抽打。这里我也不无吁叹着发问，爱是什么情是什么？美元左右着一对夫妻的情感和行为。如此残酷阴冷的爱情，想来令人毛骨悚然。《沉船》倒是令我感到一种慰藉，一个痴心鼓励帮助妻子出名谋利的男人，在妻子实现了目标后，却被遗弃了。许多年后接到妻子病危时的来信，对他追悔致歉。终于让我难以承受的神经松弛下来，作为人的良知终于苏醒回归。仅举这三篇小

说，由此可以看到“爱情”这个在所有种族的人心里都泛着幸福浪漫波浪的词汇，在名利尤其是物质这个更实惠的东西面前，不仅一文不值，而且丑恶到不眨眼不脸红的残忍，即人们常说的灵魂的扭曲。我读到这些篇章的时候，倒产生一点疑问，是经不得架不住物质的诱惑，使某桩原本纯净的爱情变得污浊不堪，使某个原本真爱着也善良的灵魂变得丑恶到残忍？还是那灵魂那人性本来就是一种污浊和残忍？这是柏杨观察体验到的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爱情种种，半个世纪后的今天，海峡那边的台湾我不敢妄议，海峡这边的爱情范畴里的五光十色，且不依作家笔下虚构的故事为据，也不依民间传闻为据，单是各种媒体依实报道的南方北方的丑闻，足以让人对爱情的浪漫和真实性做出再理解，也让我信觉柏杨先生半世纪前那个独具的犀利而冷峻的眼光。

难得在这一辑爱情题材的小说中，有少数几篇写到人人心里所期待的真正的爱，让我感到阴冷不堪的心享受到一缕温情。《拱桥》写了一个类似《五典坡》戏剧里的三姑娘的现代女子，爱上了给她做家教的老师，而这个老师却是考上大学却上不起大学休学打工养家的乡村穷人。她爱他爱得纯洁无瑕，爱得深沉，深沉到蔑视一切社会名利和物质利益，敢于表白“不要把我当作总经理的女儿”，也敢于当面对抗父亲。我读到这些令人感动的情节时，便想到那个苦守寒窑十八年的宰相的女儿王宝钏。结局却不是王宝钏式的大团圆，这个痴情纯美的女子被父亲几乎是捆绑押送美国留学，十年后以名牌大学教授归国任教，教室里坐着得以复学的超大年龄的昔日家教老师。这个悲剧性的结局尽管令人徒生慨叹，却毕竟让人领受到纯美的爱情的温馨。我也因此联想到三姑娘的古典戏剧人物而颇有领悟，从唐代到当今，人类追求理想爱情的愿望和实践，由此发生的对权势和物质的蔑视行

为，从来也没有绝迹，让爱的真实含义一如既往地激励着也温暖着一个又一个年轻的追求者。

爱情是一个永恒的主题，不同的种族尽管有不同的习俗，而对爱的真实性和纯洁性完全一致；爱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不同的社会制度下有不同的形态，而人追求理想爱情的愿望总是一样执着和痴迷。从另一个角度说，社会地位和物质财富，却是任何社会形态里必须面对的一块爱的路障，种种爱情人生由此发生各个不同的故事，如同柏杨先生所演绎的种种，令人不单触目惊心，自然更会进入关于社会和人性的思考。这个永恒的话题，在物质生活远远超越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今天，诸多爱的悲剧和丑剧，似乎更突显着物质这个路障的普遍性因素的功能，尤其在先富起来的人群里多所演绎，对照柏杨小说里多因物质窘迫生活陷入绝境而发生的爱情悲剧，今天的现实生活似乎却因膨大的物质，而把浪漫纯净的爱弄得扭曲而又浑浊了。不过，仍是物质这东西的寡与多的功能性呈现。

柏杨的短篇小说大都有一个紧紧抓住读者的故事。这些故事不是随由想象为猎奇而编织的传奇，而是真正意义上的从生活到艺术的甚为完美的创造。这些故事与社会传奇性质的故事的本质性区别，在于后者是娱乐，而柏杨着意在对人的灵魂的叩问，对人性的各个层面的揭示，既是曲折抓人的情节，更是令人意料不及倍感震撼的人生悲剧。这些故事首先以不容置疑的真实感抓住我，甚至常常让我猜想到生活里真实发生的事件，柏杨把它创造为更富社会意义的小说。这是柏杨的创造理想和艺术追求，也是柏杨独有的艺术功底。尽管作家们关于小说要不要故事情节各执一端，还有主张无故事无情节甚至无人物的小说，都是不同作家对于小说写作的不同理解和不同追求，无可

厚非。柏杨显然是注重情节和故事性的追求和探索的。在我的阅读兴趣里，偏好情节曲折故事扣人的小说，阅读柏杨小说就充满快意。

柏杨十分讲究短篇小说结构。往往先以悬念横在读者眼前，诱发读者继续阅读的好奇和兴趣，然后逐步一扇一扇打开所写人物生活历程中愈陷愈深的灾难之门。几经转折，就把人物心灵世界的各个侧面和社会背景里的险恶都展示出来了，活生生的各个生活位置上的人就呈现在我的面前。柏杨短篇小说结构呈现着灵活多样千姿百态的技巧和灵性。尽管都有一个紧紧抓住读者阅读兴头的故事，尽管屡设悬念，然而却几乎不见一篇是从头到尾循序铺展娓娓道来的故事，多是依不同人物的不同人生境遇，恰到好处地结构着人物心灵中的情感波动和转折。《重逢》写一位因孩子重病无钱救命偷盗公司黄金而入狱的男子，从他走出监狱铁门写起，着重不在当年犯罪，而在出狱第一天的更残酷的遭遇。他在回台北的火车上，情急中误登头等车厢，在往自己的三等车厢走去时，撞上了他十年未见的妻子。在头等车厢里，妻子正倚在一个男子的肩头，“那男人怜惜地握着她那涂着鲜红蔻丹，而又柔顺地放到他掌中的纤纤手指”。他为她和他们的孩子偷盗，在狱中苦熬十年而终于要见到妻子和孩子，却是在头等车厢看到倚在别一个男人肩头的妻子的现实。然而并未就此止步，这个妻子又与警方暗中联手，把他再次诱入陷阱。这是一篇让我受到强烈震撼的短篇小说。稍微平静下来，我便重新自头至尾翻阅，意在这篇小说的堪称精妙绝伦的叙事结构。这样一个令人震撼的人生悲剧，这样两个曾经是夫妻的男女的灵魂，作家柏杨用了不足八千字就揭示得如此淋漓尽致。作为作家的我，颇受启发，一篇小说一般都有几种叙述方式，作家得认真寻找到一种最好的结构，不可随意为之，柏杨有示范的意义。

柏杨总是能找到适合某个特定人物展示灵魂的小说结构。翻一面说，他的结构方式不是单纯的出奇制胜，而是以特定的人物为对象，寻找最恰当的结构和叙述方式。这样，因为表现对象——人物的本质差异，结构形式和叙述方式就呈现着各自的架构和形态，不拘一格，也难见熟路。《约会》是这部小说集里篇幅较长的少数几个短篇之一，写一位侨居国外大半生的六十七岁男子回到曾经发生初恋的小城，置重病在身而不顾，夜里重新踏踩曾经与恋人走过的一个又一个角落，回嚼如酒如诗的初恋的美好，在一个越过半个世纪的老人心里引发的复杂感受。整篇作品就只有这个老人，没有矛盾没有伏笔，这是很难写的一种结构。我却看到在这样单调的时空里，柏杨把一个人的情感体验写得动人心弦，而叙述方式也让我联想到意识流文体，却又不是。一个短篇小说，一个单调的时空背景下的老人，写得如此自如又如此令人感伤，真可见柏杨笔下功夫，也是我前述的以描写对象选择结构和叙述方式的别具一格的文本。

我甚为敏感柏杨小说的语言，简洁干净，紧紧把握着人物的心理走势和情绪脉络，达到一种准确到位而又丝毫不过不及的叙述，也达到揭示人物心灵隐秘刻画个性的艺术效果。没有一句废话，也不见游离人物心理动向之外的一句闲话。我之所以对此尤为敏感，是常见某些小说里不着人物裙边发梢的废话闲话多余的话，作者不管笔下人物此刻心理的冷暖，只顾自己随着兴趣和性情离题三尺地卖弄，把叙述的大忌变为得意。柏杨的叙述语言和描写语言，都把握着一个艺术的度，这个度决定于笔下的人物，这也应是如何把短篇小说写得短的一条途径。另，语言的简约和含蓄，应给读者丰富的想象余地和再创造的开阔空间，确也是作为作家基本功力不可轻易大意的事。《重逢》里我已列举过的那个出狱的男子，在火车上意外撞见妻子，柏杨只写了“头等车厢”的环境，再写了妻子“涂了鲜红蔻丹的手指”，这样的细

节，再不做多余的介绍，就让读者理解到妻子为什么会倚到那个男人的肩头了，把复杂的过程全部省去了，留给读者关于情感的分量和价值再审视的一个含蓄而又严峻的空间。读到此处，我确切领悟出，含蓄既是一种语言功夫，更是柏杨独禀的语言智慧，一种天赋的自然呈现。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柏杨回到西安，走后我才知道，陕西作家协会搞联络接待的同事说，无法与我联系得上。我那时住在西安城东郊一个偏僻村庄，不通电话，我便错失了拜见柏杨先生的机会，甚以为憾。许多年后，我系统阅读柏杨的小说，这种积久的遗憾得到很大的补偿，不敢说全面，我已经在精神内质和心理气脉上，感知到了柏杨。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写到过我的体验，想要了解和学习一个作家，最好的途径是阅读他的作品。道理很简单，作家可能在社会生活中因种种因由隐蔽某些观点，甚至坚不吐口；而在稿纸上，作家总是煞费苦心倾其所有能耐，把自己关于社会关于人生的理解和体验展示出来，那一行行文字中就呈现着作家的思想和人格。我阅读柏杨的作品，也在阅读柏杨；我被一篇篇小说的多是悲剧人生的人物感动着震撼着，也被关注着并把社会生活的不公和人性里的恶展示出来的柏杨先生的人格和思想震撼着感动着，一个令人敬重也钦佩的柏杨的风骨铸入我心里。

柏杨的短篇小说，全部面对社会底层的各种生活位置上的男女，又都是不合理社会结构里人的无法逃脱的悲惨人生，还有人本身的丑和恶给他人制造的灾难；即使如爱情范畴的小说，也是更多地透析着上述两方面的决定性背景和因素。我便看到柏杨面对这些悲惨人群的凛然姿态，把这些人的命运遭际诉诸文字，向社会抗争和呐喊，柏杨

的思想，柏杨整个的情感倾向，柏杨一双冷峻的眼光的关注点，都在社会大众人群里。这样的作家，我是引以为敬重和钦佩的。

2007年9月11日 二府庄

再读阿莹

和作家朋友谋面聚首，常会说到各自读的很有兴趣的新书，这是自然到几乎无意识的事，既在释放阅读获得的新鲜启示和快感，也在有意无意地向对方推介。我由此获益匪浅，得知刚刚出版了一部哪位大家的翻译作品，或是国内文坛冒出来某位新星的超凡脱俗的新作，便成为我阅读的选择。今年遇到这种场合，有朋友问我，你看过《俄罗斯日记》吗？不等我回答，对方便说出他的感动，阿莹部长真是个作家。还是等不得我做出反应，他紧接着辩证关于阿莹是个真作家的理由，这本《俄罗斯日记》写得很不一般。他列举了几本作为“一般”出访异国的游记，不过是些浮面的见闻录记，缺乏稍微一点历史人文的独立感受，文字也缺失了优美和情趣。阿莹恰是在这些文本参照之下，见出“很不一般”的独俏的风姿来。到这时他才问我读没读过这本书，感觉如何？显然是要印证他的阅读感受。我说我读过了。确实“很不一般”。这部《俄罗斯日记》甚至令我颇为不解，短短的半月左右时间，阿莹竟然把眼看着的和感触着的俄罗斯写成一本近十万字的书，可以看出历史上的俄罗斯和现实里的俄罗斯，还有中间夹着一段的苏联，作者目光所触笔下所系，尽是一个中国作家特殊的也是独有的历史性感受，一条河一幢建筑一个展馆，让我感受到从沙皇时代到列宁和赫鲁晓夫时代，再到普京时代所遗存和所呈现的历史印痕，透见一个民族从精神到心理的颠覆和重构的运动过程，真是非一般的游山玩水赏景观奇之作。朋友见他的观点得到呼应，我俩便都有“英雄所见略同”的快慰。这本书已出版两三年了，之所以到今年才引发如此不同凡响的阅读反应，我想在于《文化艺术报》的连载，扩大了与读者的接触面。这种纯粹个人间阅读感受的交流，不是某种场合上的捧场，更

不属于看人的眉高眼低的评论，故而应当是真实的可靠的，借此机会传达给作者阿莹，添一分自信。

让我更惊讶的是读了陕北歌舞剧剧本《米脂婆姨绥德汉》。

陕北是一块盛产又盛行民歌的天地，看是愤世的和咏叹生活的民歌，生动准确到令人一遍成记；尤其是表白男女情爱的民歌，不仅一遍成记，而且经久不忘。陕北民歌走出陕北走出陕西走向全国，本来属于交流障碍的方言却不构成局限，并为中国南北审美情趣差异很大的各方人群都乐于欣赏，确凿是一个奇迹，足以见出陕北民歌独禀的气质。随着陕北民歌的广泛传播，米脂出美女绥德出俊汉的佳话也流传到各地。榆林地区要搞一部民歌歌舞剧，把遍地流传的几成经典的爱情故事升华为一部代表性作品，无疑是适时而又适宜的富于创造性的思路。去年弄出来一部剧本，邀集西安多位评论家讨论，我也参加了，意见纷纭却都中肯，涉及剧本的基础性意见，要修改提高，几乎是脱胎换骨的难题。提罢意见和看法后各人回各家了，不知剧作者该费多大劲才能整出新的剧本来。确实意料不及的是，今年夏天遇见阿莹，说他写成了《米脂婆姨绥德汉》歌舞剧剧本，让我看看。原来，那次讨论会后，他竟动了写这个剧本的念头，而且一挥而成了。

舞剧塑造了一个米脂的貂蝉青青，长得漂亮自不必说，却不是弄得吕布昏头晕脑的那个貂蝉，而是爽快泼辣透亮开朗的乡间民女。在她周围，紧盯着三个性格各异却独有一架俊骨的年轻汉子，展开了痴情的追逐，戏剧冲突和冲突中的情趣十分抓人。同样在这冲突中，把三个迥然不同的青年的个性演绎得十分生动鲜明。当这场爱的追求激烈到不可开交时，我真不知如何归属，如何收场，达不到爱的追求目的的虎子会发生什么暴烈行为，因为按他的性情和当时的生活位置，很容易让人做出这种猜断。我的这种猜断无疑是最愚笨的庸常的思

路，剧作家总是以超凡脱俗的构想出奇制胜，制造惊心动魄的戏剧效果，给观众以始料不及的心灵冲击。阿莹在这里完成了堪称绝妙的一笔，虎子把青青和石娃送进了拜婚结亲的福地，不仅观者的我料想不到，乡间参与婚礼的乡亲也惊诧不已，尤其是拜婚双方也如同梦里相逢。我读到这里，不由得“噢呀”一声慨叹，一个顶天立地仗义不蛊的虎子的形象挺拔起来，透出熠熠的心灵之光。没有说教也没有表白，惊心动魄的一幕就发生在人物最合理的性格行为之必然，让读者的我在这一刻充分回嚼人物的魅力。阿莹完成了一种美的心灵的揭示，也完成了一个陕北汉子的形象塑造。

这部歌舞剧的唱词也是几近完美的。阿莹穿插了大量的陕北民歌歌词，这些歌词是经历了不知多少年的传唱和不断的锤炼而完成了经典化过程；这些歌词又经过了不知多少年和多少人的传唱，又完成了一个扬弃和筛选的过程；留下来被当代人有滋有味歌唱着的，无疑都是最具生命活力和艺术魅力的唱段。这些经典歌词被剧作家穿插在唱段里，不仅具备原生态的魅力，而且进入了具体的人物对象的心里，也进入具体的情节推进过程中人物的情感波浪之中，把一种泛化的情感变成活生生和单指的人物情感，不仅如鲜活的血液注入人物，而且因人物的具体化而使这些歌词顿添活力，这也是我始料不及的艺术效果。阿莹自己创作的唱词，紧紧把握着人物的个性，紧紧切脉着人物在不同情景下的心灵情感，准确而又鲜活；依着陕北民歌的格律和语言习惯，多是生活化的民间表述方式，几乎让我分辨不出自创和借用，浑然天成，功夫匪浅。我印象里的阿莹的创作，以小说散文为主，这部歌舞剧的成功创作，真是让我刮目相看，也切实体会到阿莹创作的多样性活力。

认识阿莹有许多年头了。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初识阿莹时，他是一家国防工业大厂的领导，指挥着军工生产，业余时间却写着抒情散文，我那时就颇费解，那种冷冰冰的钢铁家伙充塞着脑子，如何转换出诗样的优柔情怀来。我为他的散文集《绿地》作序时，就在心头悬着这个问号。几年后，阿莹调到省委宣传部做领导，分管文艺，应该说与他的特长和爱好接上弦了，确凿也显示出内行的效应，陕西文学创作和艺术创作呈现勃勃生机。到今年年头上，阿莹又调到陕西国资委当领导去了，作为外行我都可以想象事务的繁杂和压力之沉重。这人的出众之处在于，不仅把担子挑得悠然，事项有条不紊，创造性思路显示着活力，业余时间仍能进入形象思维，弄出一部陕北特色的歌舞剧来，在我就不仅是刮目相看了。

愿阿莹的事业兴旺发达，也愿他的创作活力持久鲜活，无疑是最充实的人生。

2007年9月27日 二府庄

语言里的生命质感

杜爱民是一个诗人，我和杜爱民认识十几年了，尽管平时见面不多，有事时才见一面。读了他的散文随笔，让我对他的创作有了更深的理解。

了解一个作家最好的途径也是最可靠的途径就是阅读他的作品。

由于对杜爱民散文随笔的阅读，对他又有了新的认识。他的诗歌给我的印象是：激情洋溢，诗情浪漫。但读他的散文随笔后，我看到一个截然不同的杜爱民。我发现他这个人很冷静、很沉静，跟诗人的杜爱民是表现在两个精神层面上的两个人。通过阅读杜爱民的散文，这种了解更深了。我发现杜爱民的文学神经非常敏感，无论是对当下生活世相的直接感受，或是回忆童年的旧事，都能感知到他的敏感。这对一个作家来说难能可贵。这一点体现在他写童年的这些篇幅里，他对童年生活的敏感记忆一直保存到现在。对生活的种种陈述，弥漫着诗意，还有点忧伤的东西，表现得很准确。感受生活敏感，这是达到对生活准确描绘的前提和基础。杜爱民不仅对生活细节、生活世相的感受准确，对生活节奏、生活气象的感受也是很准确的。这一点在《仁义村》里表现得很充沛。我当公社干部时，检查过这个生产队。这个村子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的演变过程，杜爱民把它描绘得冷静而准确。作为一个读者阅读时，任何质疑都没有。我全部读了，我完全信赖作者对仁义村几十年生活演变的这种描绘。我读完后就想：杜爱民是个城里人，仅仅是小时候翻越过城墙，泅过城河，在仁义村偷瓜偷枣，可能比我这个长期生活在乡村的人感受更敏感，描绘更到位。我甚至想，杜爱民完全可能把它写成一个小长篇，就仁义村的生

活演变和他所能感受到的东西，完全可以做到，而且还能写得很有自己独到的理解和感受。

他对生活的描绘的细腻准确，是散文包括随笔给我很深印象。像《肉眼看民工》。我们常常说到民工，但要准确地描绘民工的生存形态，也许很难做到。他用文字把感受描述出来，一千来字。我看到他写民工生存的细节及生存的形态，尤其是开头写道：高楼一盖起来，民工连回头看一眼都不看，很可能就又到另一个工地去了。他们走了，这个楼上发生什么，歌舞升平与他们无关了。这种感受，包括我自己在内，作为大楼住户之一，我可能很难有这种情感。而杜爱民是完全从一个民工的心理感受出发，写出这样凝练的文字。还有他对童年生活细节的描述，尤其《菜四种》写“荠菜”一文。我也挖过荠菜，我也有感受，但他能描绘得这么细致入微，令我惊讶，自愧弗如。写他母亲如何洗菜、拌面蒸麦饭。我母亲也这么做。我想我们乡下这么做，城里人怎么也这么做。他描绘得这么准确，叫人有一种艰难生存中的温馨，传达的这种感受没有任何矫饰，很难得。

我感受到杜爱民的思想和对生活的观照，有一种独到的穿透力，这种独到的思想力量也应该是作家作品存活的生命力，是最基本的东西。如果大家感受都一样，写出来的肯定是千篇一律。他感受生活世相，有独到的思想，有对生活不同视角的选择。还有更可贵的一点，他的作品很坦诚，袒露着直白不误的杜爱民思想，甚至让人震撼。杜爱民坦率地表达个人独立的、不雷同的思想，是个人对生活的独特感受。我所读过杜爱民的文章，可以说篇篇精彩。人的情感是思想的，人看取生活的视角和力度，总要靠思想来穿透。一个平庸的思想者，很难穿透生活的深度，那么，作品肯定就平庸了。我以为杜爱民实际上就遵循的这个原则。

2007年9月28日 西安

蓄久的诗性释放，在备忘

——《青春的备忘》序

读长诗《青春的备忘》时猛然发现，我也是很健忘的，顿然领略到诗人薛保勤“备忘”的庄重含意。

和公仆相遇，兴致颇高地说到正在推行的某项事业的新进展，也少不了晋升的得意或失落；和商界人士一拉起话来，也多是生意场上赚了赔了以及由此引发的昂扬或丧气；和艺术界的朋友闲聊，常涉及某唱家演家吓人的出场费，某画家书家涨价到多少万一尺的画和字；还有各界人都热衷的家常话题，某处房价翻了一番而另一处还比较合算，某家饭店有新开发的独特风味的菜系值得试一回筷子，某个名牌轿车又降价了，对尿糖有奇效的新药上市了，如此等等。几乎每天都耳濡目染在这样的生活氛围里，有谁还惦念“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那档子事儿，即使偶尔牵扯出一句半句，也多是一种“历尽坎坷”之后平静的咏叹。当生活把那一段最不堪的记忆自然而然淡化并抹去的时候，诗人薛保勤却以令人震撼的激情和拷问，铸成铿锵的诗句，给我和我们“备忘”。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确是令人不堪回首却持续了近十年的旧事，不堪到残酷和荒唐。无以数计的城市高中、初中毕业生，在一个不容置疑的口号和严密的政策条令下奔赴农村，开始经受“炼狱”般的洗礼和锤炼，薛保勤是他们中的一个。我推算，他们之中的头一二批该当年过花甲退出原来的生活位置，或散步于城墙根下草地树荫之中，或抿茶抚须抱孙儿于膝头，庆幸有一个温馨的晚年。他们之中最

末两茬也该五十出头了，还在各自的生活位置上坚守着创造着。我推算薛保勤大约是最末一茬，也是最年轻的经历过这场上山下乡洗礼的一个，更是一个至今不能释怀且提示社会“备忘”的思想者。“知青”是一段特殊的历史过程里的特指名词，不单是那一段城市知识青年的简称，而是标示着一段灾难性的社会大背景里的“文革”，或者说是作为“文革”灾难的重要社会标志之一。诗人薛保勤在几十年后对那段经历的回嚼，提供给当代人以“备忘”，既显示着一种思想的力度，也昭示着一种耿耿于怀的责任，对自己，对事业，也对国家和民族的未来。

《青春的备忘》展示的是一个曾经“上山下乡”的“知青”的精神历程。诗一开篇便直言不讳当今世相里对当年那场“上山下乡”运动的种种心态，有忘记说，有不再提及说，有控诉说，有反思说，还有诅咒说，诗人薛保勤当属“备忘”说。诗中的我是一个典型的“知青”形象，他既有广大“知青”的普遍性心理历程，又具有许多人不具备的深刻反省和思考的个性，应该是那一代“知青”的典型。

诗中的我，起初也是和广大“知青”一样，完全信仰“大有作为”的话，以青春的全部热情到庄重神圣的实际行动，义无反顾地奔赴农村那个“广阔的天地”去了。诗中有一个生动真实而又传神的细节，送别时，母亲不无担忧地唏嘘流泪，被激情燃烧着的我却“假装视而不见”，毫不在乎地“高昂着骄傲的头”。信仰产生的激情是无所畏惧的，母亲的亲情不仅不会引发心理感动，反而可能被视作短视或多余。那个时代整个社会的每一个角落，都弥漫着纯粹而又浓烈的“忠于”领袖的气氛，凡领袖的任何一句指示下来，都会激发红旗招展锣鼓喧天万众一呼拥护执行的效应，处于人生血气方刚年龄区段的年轻人，更是时时事事都站立在潮头的先锋。我是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完全相信诗人的描述，并为那个传神的细节而产生真实的信赖。

怀着“大有作为”的理想进入农村“广阔天地”之初，一切都是新鲜的，扶犁吆牛和挥锨扬场，都是和着汗水的诗意；批判指定的敌人和斗掉自己的私心杂念，也是一样勇敢一样虔诚的激情；物质的贫困和精神的贫瘠，尚不能动摇坚守的信念。时月稍长，当一时的热烈和血涌被庸常化释为平淡，且有“压抑”和“慨叹”从年轻憧憬的胸膛不由自主发生的时候，“破旧的口琴”和二胡哀怨的丝弦是无法化解的了，应当是心理和精神裂变的前奏，诗人写得如此细腻而真实。

严酷冷淡的现实容不得稍微持久的浪漫，更容不得任何伪造虚假的美丽。乡村真实生活的某些严峻及至冷酷，迫使一切浪漫情怀和美丽图景化作冷寂和飞灰。诗人以简洁的叙事诗句，列举了促进“我”心理转折的三桩事件，一个正处花季的女“知青”被骡子撞下山沟跌成终生瘫痪，一个对“明天、明年、未来”怀有“色彩斑斓”梦想的小伙儿被坍塌的窑洞砸死在睡梦中，这两起多少带有意外的偶发事件，却无法减轻任何一个同类巨大的心理悲痛，以及由此引申的从情感到精神的严重挫伤。而一对发生了恋情也发展到同居的“知青”的悲惨结局，却完全是人为制造的。“文革”把极左政治搞到极端，由此而派生的极左政策是骇人听闻的冷酷，又是五花八门的普遍性泛滥，由“无产阶级专政”派生出来一种“群众专政”的手段，把一切揪斗对象不经任何事实核对，更谈不到法律程序了，先实行一番既在惩罚又在羞辱的“游街示众”，那个同居过的女“知青”禁不住这场游街示众的羞辱而自杀。实行专政的群众可能还陷入在维护革命也维护道德的庄严感之中，却丝毫不觉得自己维护的革命是极左理论导引下的歧路和绝境，更不觉察自己维护的道德是自五四开始声讨和推翻的封建道德。那些目睹同类惨死的“知青”们，任谁恐怕也再难继续保持诗性的浪漫和愚昧的盲从了。诗里仅仅列举了这三个惨痛事件，自然是出于艺术创造的考虑，而实际生活中所发生的类似的和多种惨痛悲剧，几乎不胜枚举。更有

无法遮掩的广大乡村普遍贫穷到饥饿和无衣的现状，使一切极左的理论都难以达到其切实的效力，也使一切因此理论而张扬起来的激情和诗性难以持久。道理很简单，真实的生活和社会的真实图像，是一切空想和极左理论无法改变的。

于是，怀疑和反叛就成为必然。诗性的浪漫和信仰的激情被眼见的生活现实粉碎了，一时又找不到新的理论作填补和支撑，便会发生空虚和沮丧。从人的普遍性心理来把握，这时候是最痛苦最无助的一种心理状态，也是最容易发生毫无目的的极端的破坏行为的。《青春的备忘》敏锐地写到这个必然的心理过程，“偷鸡摸狗”“打架斗殴玩世不恭”“偷懒装病”，以至“损坏即将成熟的农田”。我可以见证诗人所写的这种真实，那时候我在西安郊区一个公社（乡）工作，所有以粮食和棉花生产为专业的生产队（村子里的公社化组织称谓），按土地面积分派着从西安城里下来的“知青”，如诗中所写的这些无政府行为，几乎到处都在发生，从行政管理部门到普通村民已经形成一种概念，似乎哪个村子的“知青”较长一段时日不发生此类事件，倒成新鲜事了。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摆在所有人面前，以“大有作为”为理论指导的“上山下乡”运动，结果却不仅不是在“广阔天地”里的建树，而是某种带有普遍性的破坏。然而，谁都没有胆量戳破这个谎谜，倒是用某个先进的“知青”典型人物，注释着张扬着这场运动，不惜掩盖普遍的如诗中所述如我所例证的实际发生着的真实。

这个庞大的“知青”群体，在普遍的挫伤和失望发生的时候，如上所述的带有破坏性质的行为，也必然是普遍的一种社会现象。然而，这个庞大的群体里，不乏有心人和思想者，他们不甘沉沦，更不甘把美好的生命里最鲜活的青春空耗了，于是就进入思考。他们把曾经信仰不渝的极左理论摆到生活现实的层面上来拷问，来鉴证，以求证它

的科学性和可行性。他们不仅以自己“上山下乡”的遭遇为例证，而且跳出了个人命运的圈子，观照到自己所感知体验到的乡村里的男人和女人的生存形态，视野开阔了，心理厚度也强化了，对谎言的判断就更为自信了。“为什么 / 昔日老师的镜片 / 总是折射着惊恐与不安 / 读书还得偷偷摸摸 / 知识变得如此下贱。”这又是极为传神的一笔，传授知识的教师在例行他的职责的时候，已不再是神圣和自信，而在眼镜片里折射出的是“惊恐不安”的神色，这种神色在任何民族的发展史上都不会有记载。而更荒唐的是，中国此时曾出现过一位震惊世界的“白卷英雄”。诗人写“知青”我的疑问和反思。由教育引申到农民命运，“为什么 / 乡亲们一天劳作 / 工分仅值几分钱 / 面朝黄土背朝天 / 终年辛劳仍要受饥寒”。这里已经不单是“知青”这个特殊群体的命运了，而是近十亿农民的命运，直到对整个社会发出诘问，“为什么……指鹿为马的耻辱 / 为何屡见不鲜”。应该说，这是反思后的觉醒，终于戳破谎言的发现，一种面对现实的勇气，一种精神的升华。这是倒行逆施的极左政治导致的必然结果，恰恰与推行者的愿望相背相反。这是推行者的悲剧，却是人民和国家的希望所在，就是越来越明显的濒于崩溃的经济，以“形势大好”的虚伪之词再也蒙骗不了人了，尤其是那些有思想力量的人，预示着新的变革必将发生。

这首长诗写成于二〇〇五年，是诗人薛保勤既站在今天的认识高度来回看那一场持续十余年的“上山下乡”运动的，而且有了改革开放近三十年的实践，就能够深刻地反省作为“文革”特殊产物的“上山下乡”运动的荒谬，给那个时代的年轻人造成的青春荒废和人生挫失，由此引发到对“文革”的再反思。如本文开头我发的感慨，终止“文革”错误思想路线之后三十多年的当今中国，绝大多数人群获得了做梦也不曾想到的温馨生活状态，中国令世界惊羡的经济成就持续保持好而又快的发展，社会呈现着前所未有的富足和平景象，当今社会的年轻

人，多数未经见过“文革”的灾难和“上山下乡”的事，听老人说到那些事压根儿都不敢相信，我们的昨天曾经如此荒唐和荒谬吗？我在读此诗时，首先感到的便是诗人薛保勤的责任心，一个不能轻易忘掉昨日灾难的人，既要把曾经的荒谬雕琢为诗句，存档于一个民族的精神历程，也在于给当代人以“备忘”，如果在社会发展的某个时候又有极左出现，这诗便成为一种警示。我便对诗人自然产生一种深沉的敬重之意。

从艺术欣赏的感受说，我感到一种大气磅礴的气魄，有长江奔涌的气势。平缓处悠悠涌流，气象肃穆，这是大河深流独禀的气质，非涓涓小溪所可比拟，譬如开头的首节，平静下蕴积着汹涌，预示着倾泻；急流处的跌宕，卷起情感世界之堆雪，迷雾腾天，声响震野，我读到诗人连续发出的“为什么”的诘问，便联想到壶口黄河瀑布的景象。大河在落差处发生的冲击力和吼声，类似“知青”在生活发生挫失时的精神冲撞，不解的疑团如急流的反冲。一部长诗能造成这样的阅读冲击力，自然在于诗人久蓄于胸的独特体验，一旦释放，就有倾覆的激情和真情，对读者的冲击力感染力就很强烈。

我以前只知道薛保勤是一位思想理论工作者，又兼着省上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的领导，后又成为宣传部的一位负责人，无论从自然的专业或承担的工作责任，在我推想中是严密而又严谨的人，确实料想不到他还是一位激情澎湃的诗人，一出手竟有这样大气磅礴内蕴深沉的诗歌，可见人的创造力，不可凭一般现象去判断。我倒真诚希望，薛保勤无论社会工作如何转换，能保持这份天性里的诗心和激情，也就焕发着一种永久的青春。

2007年11月19日 二府庄

无法归类的文化寓言

在马玉琛长篇小说《金石记》的研讨会上，几位评论家把《金石记》定位为文化寓言小说，这一点与我不谋而合。我也认为这是一部现代文化寓言小说。小说刻意而着力表现的是长安城的文化精神。我们知道，中华民族文明史前半部在长安完成。对这座城市，对这座城市的文化，我想写却不敢写。可喜的是，马玉琛弥补了这个缺陷。马玉琛找到了透视长安文化的渠道，可以说独辟蹊径。

马玉琛把文物作为说话的载体，以昭陵六骏、小克鼎来透视都市人，透视都市生活，透视当代人的精神。

当代人把道德蔑视到脚下时，作者要说话，作者一说话就把杜大爷、唐二爷、金三爷、郑四爷、楚灵璧树立在这儿。人们阅读他们的行为，阅读他们的精神品质，自然会联想到现代的生活形态。马玉琛在这一点上显示了他的高智商、高智慧和概括能力。我们能从冰冷残缺的古玩里感受到当代人的精神痛苦，这是作品最成功的一点。这一点超出我们这一代人。

一般而言，作家写作有两个层面：一是生活体验；二是生命体验。即使是同一个作家，其作品也不是全部都进入生命体验的层面。米兰·昆德拉的《玩笑》属于前者，而《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则属于后者。《金石记》里有几个人物也已进入生命体验这一层面。比如杜大爷、唐二爷、董五娘、楚灵璧、齐明刀等人。

《金石记》是寓言式小说，却又运用的是现实主义手法，不用叙述语言，而用白描语言，这样写难度很大，要把虚幻性、精神性小说

用现实主义手法写出来很难，但马玉琛解决了这个矛盾。

小说骨子里散发的是精神虚幻的寓言，阅读的感觉却是现实主义的。马玉琛解决这个矛盾，有两点值得称道：一是细节的精确性，小说里的细节可信到了无可置疑的地步，即使现实主义作品里的细节描写都很难达到这种精确性，实在令人惊讶！二是关中方言的运用，阅读时在情感上有最舒服、最顺畅、最亲切的感受。尤其是在人物对话里，关中方言运用得自然顺畅。可见马玉琛在对关中方言如何进入文学语言而进行锤炼升华方面，功夫匪浅。马玉琛小说语言成熟了。

《金石记》的整体品相、风格不同于任何一个人，形成了自己的风格，又为大家所接受，是一个为大家所接受的自己。评论家说《金石记》无法归类，无法归类就是独树一帜，在陕西乃至全国小说创作中独树一帜。

2007年12月25日

添了一份踏实

二〇〇七年岁末，按时令西安已经进入冬天。记忆中有好多个年份在这时月里降过大雪，把尚未落叶的树枝都压断了，融雪在房檐瓦沿上结成两三尺长的冰凌。而二〇〇七年的岁末却找不到冬天的感觉，温腾腾的气象，即使深夜和清早，最敏感清冷的头皮和耳梢也丝毫感觉不到冷的刺激。冬至过了就数九了，难得有了一次久违的降水，气象预报为雨夹雪，却是只见雨滴不见雪花，给人一种春雨润地的错觉。我既庆幸这种温润不冷的冬天，却又在心底期待漫天大雪遍地铺白的壮观景象，颇为矛盾。不料，中央台资深编辑叶咏梅自北京发来信息，为庆祝“中国小说连播”六十周年，近期搞了一次最具影响力的节目排行榜的评奖活动，我的《白鹿原》入选，且排名居前，一时颇为兴奋，为这个本来不冷的岁末又添了一份温暖。

我看重长篇小说连播，出于我对小说创作的理解，我希望我写的小说读者越多越好，为此我不断试验多种表现形式，包括语言。一说到取悦于读者，就容易引发一个敏感话题，似乎只有低俗乃至色情，才能赢得广泛传播的市场效果，其实是一种误解。我接触过一些中外很具影响力的作品，拥有广泛的读者群，而且传播到许多国家，可见有品位的纯文学素来都为读者所期待。我不想陷入低俗还要赢得读者，便以我读过的名作的成功之路为佐证，坚信不疑进行着探索，“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海明威）；我希望我的小说能打破文学圈子进入各个行业的读者之中，能引发他们的阅读兴致当是最高的嘉奖。广播电台连播长篇小说，恰是进入社会各个角落读者心中的最便捷的途径，比文本阅读还要方便。譬如乡村农民，一边在地里干活，地头放一个半导体收音机，收听他喜欢的小说，不仅不耽误手中活计，而且

化解了劳动的沉闷。譬如休闲时倚在沙发或炕上，品着茶听着广播员绘声绘色的说道，比阅读更添了生动形象的情趣，这是一种滋润的心理享受。当然了，前提需得是他喜欢连播小说里的人物和内容。我也有过这样的经历，也享受过这种滋润。我也见过乡村人和城里人听小说连播的情景，乡村人多在炕头或地头上听，城里人在城墙根下散步时，手里端着收音机听得有滋有味。

有一件事至今难忘，《白鹿原》在中央台小说连播节目首播时，我回乡下老家去，半道上遇见一位熟识的乡民，拉住手便说他正听《白鹿原》的连播，用我熟悉的乡村语言大声感叹着他的收听兴趣。我听着他的话，不亚于大评论家雷达对《白鹿原》的有深度的评论。我把乡民的这种评说，看作是非文学评说，是小说受众的最基本的反应，是作为作者的我最感踏实的一种心理报偿。中央台的播出，无疑是对刚刚出版的《白鹿原》最具力度的传播措施，两月内连续几次印刷，市场仍供不应求。

这本书不觉间已出版近十五年了，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先后三次连播，收听的读者无以数计。近十五年来，这部书每年都在印刷，多则五六万册，少则两三万册，累计已超过一百三十余万册，这些都与小说连播的广泛传播有直接关系，想到这，我真诚地表示感谢，也感谢播音艺术家李野默。

我从叶咏梅的介绍中得知，“中国小说连播”已有六十年的历史，和人民广播电台是同时诞生的一个节目。六十年的历程，不辩自明着一个事实，听众喜欢这个节目，过去没有电视和网络的时月里喜欢，今天仍然是电视和网络无法取代的一种受欢迎的艺术形式。再，六十年来，播出过多少长篇小说呀，古今中外的名著播了，国内新出的适宜长篇连播这种艺术形式的小说也播了不少部，今年做一次奖评，

《白鹿原》能被听众和评委认可，光荣入选，我是真感到欣慰乃至骄傲了。

我的欣慰和骄傲，发自我对小说创作原本的目的和愿望。三次连播和此次获奖，让我又添了一份踏实，读者喜欢读听众也喜欢听，《白鹿原》把我创作的原本目的和愿望实现了。

前不久得知，陕西人民广播电台刚刚录制完成《白鹿原》的关中方言小说连播节目，二〇〇八新年伊始即将播出。我出于如上所述的同样心理，自然愉快，又多了一种新的传播方式。小说出版近十五年来，不断听到本地读者给我说，这小说用陕西关中话朗读更有味。我自然明白底里，写作时心底涌动的原本就是关中话的节奏。现在，陕西人民广播电台一位资深且有造诣的播音艺术家，用地道的西安本地方言播出，自然会别有一番韵味，我都想听了。

2007年12月31日 二府庄

乡党曾宏根和他的华胥国

我素来把曾宏根视为乡党。宏根是蓝田县人，我自号半个蓝田人，我生活的村子背依白鹿原北坡，面临灞河，是西安市管辖的最东头的一个小村子，北边和东边是蓝田县辖的或大或小的村子，南边上到白鹿原顶，还是蓝田县辖的村子。我在小学高年级的两年求学生活，就是在灞河北岸蓝田县辖的华胥镇一所小学度过的。我为长篇小说《白鹿原》做准备工作时，第一站就走进蓝田县城，住下来翻阅县志和党史文史资料，收益太大了。基于此，我说我是半个蓝田人，自然视宏根为同饮灞河水的乡党了。

去年农历二月二的龙抬头日，蓝田县政府在华胥镇祭奠华夏民族的始祖华胥氏，邀我为公祭人，我不仅受命赴祭，而且感慨连连。华胥镇距我家不过二三里路，又是我自小读书再熟悉不过的一个小镇，却是产生华夏民族起源神话里的始祖华胥氏的故土。记得那天雪后初晴，满山、满原、满川都是白皑皑的雪，公祭活动在融化着的雪地上举行。祭祀完毕，我竟然浮想联翩，不能自已，邀约宏根带我到公王岭，去看了蓝田猿人遗址，回来后认真翻阅了有限的资料，很快写成一篇较长的散文《关于一条河的记忆与想象》，把灞河上游公王岭的蓝田猿人和灞河中下游南岸六千年前仰韶文化的半坡母系氏族村的女性首领，与华胥氏联接起来，完成了我的一次自我感觉甚为新鲜的想象。我由此对自小游泳耍水的灞河，敞开了长久以来溢满胸膛的诗性浪漫，进入这个民族起源的悠远而又博大的神话世界。

曾宏根曾在蓝田县档案局身负要职，尽职尽责地做着要求十分严谨的档案管理工作。他很喜欢写作且功力不俗，得了历史人文档案资

料的方便，还有对家乡蓝田这块土地的殷殷情感，多年来矢志不移研究、挖掘蓝田悠久丰厚的历史人文遗迹。尽管华胥国是神话传说，但宏根搜集了大量历史文献资料，又对应着蓝田县境内的实物古迹，逐个考证，写成了或许是有关华胥氏这位民族始祖最完整的文字资料。他从《史记》《列子》等著作中，考证出今天华胥镇的神秘历史，不仅是华胥氏的故国，女娲、伏羲、炎帝、黄帝都曾留下足迹；他考证出华胥国的图腾和崇拜，华胥国的文化及音乐。连接着蓝田和临潼两区县的骊山，有人宗庙、三皇庙和羲母庙，还有女娲抟土造人、炼石补天的遗址。他钟情于这块土地的神秘历史、神秘文化，坚持数年又乐在其中，每有发现、每有所得便兴奋不已，用生动的文字记述下来，为考究这块神秘土地的丰富遗存，可以说功莫大焉。他的这些文章，不仅让我们了解到蓝田县的悠久历史和人文传统，也让我们了解了民族起源的历史和人文。灞河流域和骊山发生的神话和史实，在我看来已经不局限于蓝田一隅，而应属于华夏民族。这个民族的起源，尽管带着浓厚的、神秘的神话色彩，但是发生在蓝田县，也是足以让今天的蓝田人骄傲和自豪的了，包括自封为半个蓝田人的我。

宏根几乎考证并书写了蓝田境内所有的文物古迹，还有几位颇具影响力的历史人物，翔实而又生动。譬如程朱理学关中学派的最后一个传人牛兆濂先生，这位有学问、有思想的牛先生，不仅对关中学派卓有建树，而且个性鲜明到被老百姓视为神话人物，他的影响远及日本、韩国。我在《白鹿原》一书中所写的朱先生，就是以他为原型创造的。我当年也曾搜集牛先生的资料，包括民间传说的逸事趣闻。读了宏根所写的《华胥名流——关中大儒牛才子》一文，我便忍不住惋惜，他比我拥有着更丰富的有关牛先生的资料，当初要是认识宏根，该有多好，竟有一种相见恨晚的遗憾。不过，于读者来说却是只有益

处，可以知晓清末民初灞河北岸曾经出现的这位大学问家，他的学识、他的人格和他的大义凛然，可以说是今天学人的楷模。

宏根文笔流畅、生动，又很朴实，少见闲词和多余的话。既有考据的严密，又不失叙述的生动，把这种兼有考据色彩的文体容易发生的板结气儿都化解不见了。这些神话色彩甚浓的传说，经了宏根的准确描绘逼真生动，可读性很强。想来颇为不易，既要拥有渊博的历史知识，又要广闻多见，还得到现场实际勘察，有一个辩证的思维，才能淘出真知灼见来。最后，得靠手中那支笔，形成饱满而又活泼的文字。宏根的这些文章，系统读来，就令我颇为感动了。

2008年1月2日 二府庄

展示秦腔的新图景

关于青春版《杨门女将》

关于“杨家”的戏，以前看过好几个版本，但这次看青春版《杨门女将》，却有一种耳目一新的感觉，其突出点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体现了一种精神。这个戏集中体现了中华民族为了国家统一、民族团结而不断抗争、永不屈服的英雄主义精神。杨家将忠心报国，这是“杨家戏”的一个中心主题，青春版《杨门女将》以杨家女将为主要人物，集中表现了她们对国家的忠诚、对民族的热爱。这种精神应该说是一切英雄人物都具备的，但是为什么在这个戏中能震撼人心呢？因为人物的反差：百岁佘太君挂帅，显然与二三十岁的年轻将领挂帅不一样，更何况此时正值杨家遭遇家庭灾难（杨宗保殉国），这本身就体现了一种悲壮苍凉而又非悲伤的英雄主义气概；而且由佘太君统领，把整个杨门的女将都激发起来，统一到爱国主义精神之中，七场戏之间这种精神意识极为集中，慷慨悲壮，波澜壮阔，从而形成了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

现在我们处于和平岁月，物质丰富、生活优裕，社会普遍追求的是享受，在这样的生活氛围中，传播、凸显英雄主义、爱国主义的传统精神，是有其重要作用的，可以说它是国民精神一种最基础的建设。

第二，展示了一种形态。表现英雄主义、爱国主义类题材的作品很多，很容易给受众造成说教、趣味性不足这样一些弊病，陈彦改编的《杨门女将》这个新版本，以一种活的人物形象推进故事、展示精

神，集中、凝练、淋漓尽致地凸显了一个百岁老人——佘太君的胸怀、情感和谋略，不仅避免了说教的负面效果，而且有几处相当感人。一部戏能达到这样的艺术效果和剧场效果，我觉得是很不容易的，这应该是改编成功的一个最重要的标志。现在很多影视剧都走改编的路子，但好像都很难达到预期目的，于是就采取怪诞离奇甚至色情的东西来吸引观众的眼球和注意力。这个戏以刻画人物的真实情感和精神世界来取胜，这才是艺术的本真，改编者很成功的一点就在这里。另外，舞台美术设计也是完美、简约、大气、激荡。可以说，这部戏是几近完美的舞台艺术，它展现了秦腔剧种的新风貌、新形态。

第三，倡导了一种举措。这样一台大戏全部由二十岁以下的年轻孩子们演出，很了不起，让我感觉很兴奋。演佘太君的主角魏艳妮，其唱腔、表演、对人物的理解及情感表述，给人一种成熟老到、几近完美的感觉；几位主要演员的整体素质也已经显现出进入陕西秦腔剧坛明星行列的潜质和形态；其他演员的表演也都激情饱满，激荡人心，非常精彩。这些不禁让人鼓舞：秦腔后继有人了。演员们都是研究院训练班的学员，虽年轻，却能出色地完成这么一台大戏，体现出了相当过硬的基本功，可见研究院在培养秦腔演员方面做出的重要成绩。不是说要振兴秦腔嘛，这就是振兴秦腔的最扎实的举措。

关于秦腔的趣事

最早的音乐熏陶　我出生在西安东郊离城五十华里的乡下，小时候，那里逢年过节农民们会自发组织演戏。特别是夏收之后，关中道几乎每个村子都有个庆祝丰收的聚会日叫“忙罢会”，大村子搭台子唱戏，农民自己业余演出，亲戚朋友及邻村的人都赶过去看。我最早看戏，就是晚上跟着大人们去看“忙罢会”的戏。那时候年龄小还没有上

学，什么也看不懂，就是逛热闹哩。尽管如此，那秦腔的锣鼓敲击、花脸的“吼”、旦角咿咿呀呀的唱，对我进行了最早的音乐熏陶。在一种几乎无知的状态下，在乡村的秦腔舞台下接受的这种独特的旋律的熏陶，那是一生都很难忘记和改变的。

看戏被批评罚站　上初中时，我们学校在工厂区，西安一家剧团有一回到厂区演出。晚上下自习后，我们几个同学就偷偷跑去看戏，那是专业演员，演得很好，只看了后半场就结束了，十一二点回到宿舍睡觉。第二天上学时，我们一进校门，教导主任就在门里等着我们几个偷着去看戏的学生，不知谁打了小报告，让我们罚站了半天，批评教训了一顿，早操都没上成。这次我记忆犹新，这是第一次为看秦腔受了批评处分呢。

最痛快的看戏经历　“文革”结束后，艺术上恢复最快的就是秦腔演出。记得很清楚，一九七七年三伏天，我在公社的一个平整土地的会战工地当副总指挥，当时，省戏曲研究院在西大街的实验剧场由任哲中演出《血泪仇》。我与工地的几个施工人员晚上骑自行车，从白鹿原的北坡出发骑至少三十多公里，到西大街实验剧场买票看戏，看完后又骑车返回会战工地指挥部，当时精神特别大。由于“文革”中许多剧目禁演，多少年都没有看过这些戏了，这次听到了原汁原味的秦腔，那痛快淋漓的感觉一直持续到晚上一两点，我们在院子里喝着水，吃着馍，谈论着任哲中，兴奋不已。

秦腔伴随在《白鹿原》的孕育中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回到白鹿原下的老家创作《白鹿原》。那时电视传播信号不好，收不到电视节目。于是我托人找了好多秦腔录像带用电视机来放，这成了我在乡下的娱乐享受。每到晚上，半个村子的人就来我家看电视放秦腔，我跟村民一起看；更方便的是，一些秦腔的经典唱段有磁带可以用录音机

放，吃饭的时候，《辕门斩子》《周仁回府》就在一边唱开了，几个名家的唱段真是百听不厌。可以说，在创作《白鹿原》的过程中，秦腔是我主要的精神享受。后来有人评说：《白鹿原》的语言节奏就是秦腔的节奏，大概与之有关吧。

关于秦腔的发展

秦腔比起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已经丰富和发展得很多了，那时候尤其是乡村演出的秦腔，音响设备就是梆子、边鼓、板胡、二胡、大小锣、喇叭，而现在用交响乐，多丰富，秦腔音乐配器的丰富，对人物唱腔和情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烘托作用；舞台美术设计也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越来越豪华和生动化，这些都是很好的。

谈到改革，我主张秦腔在其音腔设计中不要丧失秦腔最基本的东西。秦腔之所以经历几百年一直存在到今天，而且被西北地区的人喜爱，就是因为它本身的特点，主要是秦腔独具特色的旋律和唱腔。如果把秦腔改成接近京剧或者歌剧的唱腔，那就没有秦腔了。人们说秦腔是“吼”的，我以为它主要是指秦腔演员是用真嗓子唱戏，不像其他剧种如京剧是用假嗓子唱，用真嗓子唱，更易于走近观众，更能直接体现各种年龄层次、职业背景、社会地位的人物的个性、心理和真实情感，这一点非常难得，是一种很好的倾向；但现在很多人说秦腔“吼”，是带有某些贬斥的意思，“吼”无非是花脸这个行当的唱法，除了黑头、花脸，秦腔中还有老旦、花旦、青衣、老生、小生等很丰富的人物群体，这些角色唱腔优美，各有特点，而“吼”就涵盖不了这些主要角色，“吼”是不能代表秦腔的。所以，秦腔改革，应该强化自身最优美的东西，坚定不移地体现自己的特点，不要被一些不懂秦腔、不理解秦腔而又老批评秦腔的人弄得丧失主意、丧失秦腔。

现在城市人看秦腔不如过去踊跃了，这是客观现实。过去人们除了看戏没有别的娱乐了，一个城市有几家舞台在演秦腔，城市人晚上下班没事，一月能看一两回戏，那就是非常好的娱乐享受了。现在，电视及多种娱乐形式的普及，把人们到剧场看戏的娱乐形式分流甚至取代了，这个问题也是所有传统戏曲艺术共同面临的问题。面对这个基本事实，在这个基础上发展秦腔就要心安理得，设想秦腔被观众拥戴的程度再回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那样，那是不可能的了。但是要看到毕竟还有很多喜欢秦腔的人，他们不满足于面对着电视，还希望去现场感受戏曲舞台表演的魅力。我相信，在各种新兴艺术、娱乐形式兴盛的时代，我们的秦腔不会丧失所有观众的，因为它太符合我们这个地域的人的心理气质和艺术的兴趣了，这是无法扭转的，所以秦腔艺术圈子里的人应坚定信心，努力创造秦腔艺术的新图景。

2008年2月20日 雍村

陷入的阅读及其他

——《骞国政文集》序

我一直习惯称呼骞国政为老骞，偶尔在和人说到他时也提到过骞国政的名字，却确凿记得从来没叫过他的官号，无论他当省报社长兼总编的时候，无论他当陕西广播电视厅厅长的时候，见面握手时一声“老骞”就呼出口了。其实，我结识老骞大约有三十年了，是作为改革开放也作为新时期文艺复兴的标志的一九七八年，作为业余作者参加文学集会认识的，那时候的他和我不过三十五六岁，属于小伙子的青春年华。我和同时跃上陕西新时期文坛的青年作家朋友，几乎都是互相直呼名字，多数时候连姓都不用，包括为数很少的女作家，都是省略了姓而直呼其名，自然随意里蕴含着真诚无间。我至今搞不明白，为什么独独把几乎同龄的骞国政称呼老骞，而且老骞老骞地叫了三十年，叫官衔叫不出口，连名字也叫不出口了。在我的印象里，他似乎也不像对同代作家直呼其名那样呼我名字，多是称我老陈。当我们现在进入老年年龄区段，这种相互间的称呼，在我猛然意识到一种不单是相敬相重相信赖的回嚼不尽的意味了。

比起与陕西新时期跃上文坛的同代作家的来来往往，老骞在我是接触得较少的一位，原因很简单，他的主业不在创作，而是身担名副其实的重任，先是记者，一年四季在全省城乡奔着新闻，随后是《陕西日报》和省广电厅的首席负责人，可以想见有多忙多累了，写作文学作品便排在业余位置，许多纯粹的文学活动，他难得分身参加。有一件事却让我和他结下难忘的友谊。一九九〇年伏末，《陕西日报》田长山等三人找到我，说省委决定要宣传农业科技干部李立科的先进

事迹，由《陕西日报》承担此事，总编老骞点名让我去写一篇报告文学。我感动于老骞对我的赏识，却不敢也不想应命。原因也很简单，我当时住在原下老家，《白鹿原》正写到纠结处，腾不出手也分不出心来写别的东西。田长山们便再三强调骞总编点名要我写的话。我应承下来，确是一种被感动的力量，把《白》的写作暂且放下。我和报社五六位各司其职的记者到合阳农村去，采访了大约一周，回来后与田长山合作写成《渭北高原，关于一个人的记忆》的报告文学，《陕西日报》头版发表，省委省政府随即发出向李立科学习的决定。年末李立科荣登陕西十大杰出人物榜首。隔年，这篇文章被评为全国报告文学奖，真是一个意料不及的荣誉。我当即让田长山将此喜讯转告老骞，心里已洋溢着感激了，他敦促我尝试了一次报告文学写作的实践，也获得了一次原本不曾期待的荣誉，建立在这种基础上的友谊的可靠性，非社会流行的“来来往往”的关系所可类比，且不说珍贵和意义之类。

许多年过去，截止到今天，老骞依旧是我在文学圈里接触较少的同代作家朋友。然而，平时在报纸或刊物上见到他的文章，总要读，阅读心理上似乎有一点小小的差异，不大在意欣赏艺术，却着意于老骞在说什么，企图了知他的动向意向和对生活事象的倾向。依着这种小有差异的阅读心理，我才知道自己多年来一直关注着这个老朋友。近日，当我拿到他即将出版的文集的稿样，系统读完他的包括散文、随笔等多种文体的作品，却在一种久久的默然无语之后，发生了懊恼性的自责，之前读他的作品太少了。这次阅读，不仅让我看到他在各种文体创作上的才华，更让我对他这个人有了一个立体的又是透彻的了解。我曾经说过也写过我的个人经验，即，想要了解一个作家，最直接最可靠的途径，就是阅读他的作品。这经验其实是很直白的话，身边的或远处却认识的作家可以通过直接交往达到了解，对古典作品

的作家和外国的作家，就只能依赖阅读其作品来了解他的思想和他的人格性情，自然还有艺术风格。我说这经验的时候，偏重于写小说的作家，现在读老骞的作品，多为散文随笔，于是又有新的领悟，散文和随笔是了解一个作家更直接更可靠的途径。道理也很简单，小说里体现的作家，是躲在作品人物背后的隐形人，即使以第一人称“我”也是作品人物，我们是从作家注入作品人物身上的文字，来了解和判断作家的思想和情趣的；而散文和随笔，是作家对生活事象的直接观察和体验，直抒胸臆的表述，赞颂的感慨的或贬斥的鞭挞的，都是作家和读者面对面的叙述；尤其是作家写个人生活的篇章，过去的生活记忆和现在的生活遭遇，儿女夫妻温情里的感动和朋友交际中的动心一刻，还有纯属个人情趣喜好的心灵一隅的诉述，等等。这些都是作家直接的表述，首先是作家被感动了非诉诸文字不可，读者阅读时所受到的感染和感动，就是作家从心底直接辐射给读者的力和热了。我在老骞的散文、随笔等作品的阅读中，充分感受到了这种深沉的又是真挚的心灵的冲击，才发生那种久久的默然无语的情绪。

我在老骞的散文阅读中，有一种完全的陷入，这是很少发生的阅读现象。读着老骞叙述他的生活记忆的情景，我竟然忘记了作品的叙述者老骞，而几乎是在回忆自己的生活经历。我起初以为这是一种比较自然的心灵呼应，越读越觉得是一种完全无意识更不自觉的陷入，直至深陷到以为是自己昨天的生活故事。我想到我和老骞乡村生活经历和感受的相似，更感知到他今天描述出来的巨大强烈不容任何置疑的真实的情景，让我发生阅读里的陷入。这种少有的阅读感受，多发生在他写乡村生活记忆的那些篇章里。《家乡戏》里叙述的关中乡村演出秦腔的情景，十里二十里赶往演戏村庄的乡村土路上的盛况，戏台下的拥挤、鼓噪、叫好和起哄的氛围，维护秩序的人挥舞的竹竿，少小年纪的老骞所身临其中的感受，也是我在同样年纪记不清经见过

多少回了。我便想到，他和我接受的最初的音律熏陶，是秦腔的旋律，而且都是在乡村露天野场子里的民间演奏家的合奏。这种旋律对心灵审美的影响，可以说是刻骨铭心的，虽然后来还可能欣赏包括西洋乐在内的别的旋律，却排除不掉也代替不了秦腔的旋律根深蒂固的影响。我至今仍然喜欢接受乡村挂在树枝上的喇叭纵横四野的秦腔播唱，老骞直到现在对秦腔的沉迷远远超出我的程度。有趣的是，他在中学念书时因为偷着看戏被老师训斥，我也在中学时因偷看秦腔被教导主任罚站；他在城里剧院看戏买的是最便宜的站票，我第一次在西安专业剧院看秦腔买的也是站票。如此等等。我读到这些情节时，已经忘记了老骞，完全陷入我的生活记忆和情感历程之中。还有《难忘父亲》，有几次使我不得不中止阅读，闭目无言，乃至心酸眼湿，喉头发哽。老骞的父亲从少年起进山砍柴，到集镇上卖柴以养家，我的父亲直到解放头几年也是卖树又挖树根卖柴，供我和哥哥念书；老骞的父亲在解放前被苛捐杂税压得喘不过气，又被保丁押到联保所拳打脚踢受尽凌辱，我的父亲被捆绑到联保所抵壮丁，家里倾其所有贱卖交钱赎回人身；他们终生勤劳终生节俭，自不用说，连教育儿女的言语都如出一人之口："公家的事你要好好干，不敢胡来。也不要操心我和你妈。"这样的语言，老骞的父亲不止一次对老骞说了，我的父亲也记不清给我说过多少回。这应该是无以数计的乡村父老发自心底也发自土地深处的声音，他们首先要保证自己的儿女行为端正，对得住天地良心，也是对所有干公家事的父母官的基本期待，不要胡来。读着老骞笔下的父亲，呈现在我眼前的却是我的父亲。我第一次发生这种阅读陷入，即使在阅读世界名著时也不曾发生过。

《前面就是芳草地》这篇散文，是最可见到老骞这个人心理气性的一篇杰作。正当他青春末尾进入中年之际，公事私事以及灾难都凑到一起压过来。他被安排到最远的榆林记者站，那时候交通不畅，家

里有两个不上十岁的孩子，夫人恰恰争取到一个久盼的进修的名额，整个家庭谁也帮不上谁，乱套了，更始料不到的是夫人得了一种严重的心肌炎，时时昏厥处于生命边沿，女儿也发生骨折，而且有极左的“文革”政治的压迫。我读到那些逼人几乎到死路的情节时，真有喘不过气不忍续读的痛楚。这不是小说，是老骞的真实人生阅历中最逼仄的一道横沟。当我读到中秋之夜一节时，我的心再也抑制不住颤抖了，老骞把病情稍有好转的妻子从医院接出来，和孩子到医院门口的商店买了水果，一家人坐在小商店旁边僻静的角落，团圆欢聚，共赏头顶的圆月。这个夜晚的城市和乡村，城里和乡下的家家户户都依着各自的情趣度过中秋之夜，任谁也不会留意更不会想到，在西安古城的一个小商店旁的角落里，相拥相携着一家四口，以刚刚松弛的心情在赏月，度过他们的中秋之夜。这是当时作为驻榆林记者后来当报社社长兼总编的老骞的一幅独特的人生风景。我理解了这篇名为《前面就是芳草地》的人生内蕴，不单是人生步履的诗性印痕，更强烈地感知到一种生命和理想的雄壮，构成了个性，也构筑了人格。我更感沛老骞这个人内在的承受力，如此沉重的打击和压迫，竟然不诉求不叫唤更不丧气，默默承受里是一种男子汉支撑生命（自己的和亲人的）的坚定和韧性。他的心里展示的是，泥泞前面的芳草地。我读到这里顿然领悟，一个人成就事业的大小，诸种因素中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便是承受灾难的能力，它影响到人面对世界面对生活的态度和姿态，影响到人对世界和生活理解的深度，也影响着人对善与恶事象的取向。我在这里读懂了老骞，并深感钦佩和敬重。

结识老骞的许多年里，他留给我一个基本确定的印象，平实更务实，谦和又自信，在一切我所遇见过他的场合里，无论庄严隆重的大型聚会场面，无论三五好友轻松自在的散谈闲聊，从来也未见过他张扬的动作和张扬的话语，更不要说骄性矫情交际打点以及出风头一类

虚事了。加上我零散读过的他的文章里那种纯粹写实的文字，再加上他越来越显赫的工作位置，在这所有最直观的正面形象之后，给我同样一个基本确定的负面印象，老骞庄重有余，活泼欠缺，甚或有点刻板。这个负面印象和正面印象几乎同时发生，留给我许多年难以改变，甚至在心里调侃说，我自己已经太死板了，老骞比我好像还刻板一成。

这种印象直到新世纪到来的时候开始改变。那年我重新回到原下祖居的老屋，也是即将九尽的正月末尾，夜里守着火炉喝茶，突然接到老骞电话，颇为惊讶，许久未谋面也没通过话了。他说正筹备出版一部奇石画册，把他收集的奇石用画册公示于世，约请国内许多诗人和作家为每一块奇石各题一首诗，给我也摊派了一首。我听着他说，忍不住接连发问。这实在是我意料不到的事，许多年来一直身负重任的老骞，竟有收藏奇石的闲情雅趣，印象里作为负面的刻板的色调开始瓦解，也顿然意识到和老骞交流得太少。及至拿到他寄给我的那块奇石的照片，命名为“白灵璧”的石头上，竟是如画般绽放的一枝灿烂的红梅，顿时激起我的诗兴，写下一首十二句的五言诗。及至我看到这部诗配画的奇石集，真是惊讶不已又大开眼界，天地灵气孕育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种奇石，让我几乎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应该说，这是孤陋寡闻的我第一次大长见识，更是我第一次感知到老骞心灵世界丰富多彩的另一面。我便据此发生想象，从千头万绪的厅长办公室回到家中，端一杯热茶，徜徉在花团锦簇般的奇石之间，绷紧了一天的神经当即就会松弛下来，任何烦人恼人的事都会被排解开了，诗情和画意就会漫溢胸怀。这样的老骞，怎么会如我一般刻板呢……及至读完老骞的文集稿样，我又一次惊讶，何止奇石收藏的雅兴，那不过是心灵世界的一角，更丰富的细腻的畅朗的乃至多愁善感的内心世界全展示出来，真是要刮目相看自以为熟悉的老骞了。

老骞还喜欢养花，而且不惜摊着工夫钻研养花知识，常常痴迷到在紧迫的时间里随意扒拉一碗饭，省下十分二十分钟时间培养花苗。他能养育较为珍贵的绣球花，尤为珍爱，冬天里每天搬出去晒太阳，晚上搬回家中。我有点不可思议，一个庞大的省级广播电视体系，有多少紧迫的事难缠的事需要决断和处理，有多少人的事找到办公室又找到家里，他却在一一应对之后，仍然早晚搬出搬进他心爱的绣球花花盆。终于发生了一次遗忘，绣球花被冬天夜晚的大雪冻死了。这个在我的印象里有点刻板的大厅长，居然面对冻死的绣球花连连自责，挖出一个小坑，把冻死的枝叶埋了进去，重演了“黛玉葬花”的一幕（《花絮》）。我读到此，似乎感知到这个人唏嘘叹惋声里的心颤，泛起鲁迅先生“无情未必真豪杰”的诗句来。这才是老骞，务实的坚硬的另一极，是柔软和细腻；成摞的工作计划项目方案紧急指示等等事项逐渐落实绝不马虎，之后却是奇石观赏名花栽培书法演练，还有更痴迷的文学创作。这个人精力之充沛，内心之充实和丰富，可以想见（《我的第二世界》）。

然而，老骞和你我一样生活在同一生活氛围之中，同样面对着纷繁的尤其是恼人的事象的搅扰。在《“静心斋”释义》随笔里，他发出了疑问：“为什么眼看着该办的事办不成，不该办的却一件件都办成了；你本来不生气，却偏偏有人要叫你生气……”还有“那个‘行业不正之风’‘腐败现象’，为什么谁都反对，却总是屡禁不止……”面对谁都看到也遇到的这些社会现象，老骞首先想到的是自律，并把自己刚刚得到的一间书房命名为“静心斋”，要静心，也含有冷心冷眼看那些歪风邪气的意味，才使自己的精力投入到承担的社会责任上，才保证自己的心灵世界和情感世界的丰富多彩又纯洁清爽。在《花甲感怀》一文里，老骞把自己的生活历程和心境归结为一副对联：“不容易，也还顺利，得到的超乎所想，所以我很满足；受过苦，亦享过福，到老来福

气更大，因而我更欣慰。”这是人生最重要的一个年轮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驿站到来时，老骞的心态和心境，没有常见的那种官场谢幕的失落和慌乱，更没有欲望未满足的懊恼。恰恰相反，是一种泰然坦然的平静和微笑，基础在于“得到的超乎想象”这种心态。一句不说自己对社会的贡献，只说社会给予自己的——无论地位和物质生活——都超出了自己原有的欲望性想象，于是常见的那些不平衡心理所派生的怪事就在他身上不见发生。这种心态不是强装出来的，而是一种修养包括生命价值取向所决定了的；还不是平庸者的自我满足，而是早已确立的重在事业作为不计个人所得的生存目的所垫的老底，当属创造者的无私所产生的快乐。

前不久，我连续接到两三家媒体同一话题的电话采访，即官员搞文学创作的事。我读到老骞《我为什么要写》，便对我已经回答的看法更加踏实，就是这些官位颇高的官员，长着一根对文字敏感的神经，只要这根神经不萎缩不干枯，时时就会对文字发生敏感性反应，就会产生创作灵感，就有不吐不快不写难活的急迫心情。我在老骞这里得到充分的验证。他已经当了厅长，而且是难得一日清闲的广播电视厅，干一天已经够累了，家人不忍心看他于深夜还爬格子写文章，好朋友也爱护他，甚至说他没有必要写稿子了，不言而喻，作为厅长，名也不小了，收入也不少；甚至老骞自己也问自己，不为出名也不为赚稿酬，为什么止不住写作的欲望？“只要一坐到写字台前铺开稿纸，我马上就来了精神，一坐就是几个小时……思维在这种情况下也奇妙地空前活跃起来……”这就是那根与生俱来的对文字敏感的神经的奇妙魅力。在老骞这里可以排除对名和利的诱惑，却不能阻止这根神经对文字敏感的发作。再者，老骞是个对社会具有责任心的人，而且对社会事象有自己独立思考能力的人，自然就发生独立独有的体验和感受，表述就不仅是那根神经的生理需求，而且是一个思想者的精神

和心理的释放性需求了。于是就有了几百万字的著作。于是就成就了一位卓有建树的作家。

2008年3月9日 二府庄

难得一种纯洁与鲜活

希学是位作家，我结识他很久了，平时见面却不多。他沉浸在孩子的世界里，在文学的圈子里几乎不大走动。我后来才知道，他在孩子世界里全身心投入，不是通常多见的儿童文学作家深入孩子群体体验生活的那种形态，而是倾注着情感，将儿童的健康成长全面发展作为自己毕生的事业，把自己的精力和智慧也倾注到了这项堪称伟大的育人工程之中。

他对少年儿童世界的特殊情感，是从他进入社会之后便开始了的。他人生的第一项工作是中小学教师，连续十年，都和小点或大点的孩子朝夕相处，做着“传道授业解惑”的基础性建设工作。十年里，他还兼着做少先队和共青团的工作，而且做得尽职尽责，“优秀辅导员”“优秀共产党员”“先进工作者”“全国儿童少年先进工作者”，从县到市到省到国务院的奖励称号都获得了。且不说他对这项育人大业的忠诚和敬业，且不说他的人生志向的专注和投入，我却想到他个性里的天性，大约有一种乐在童趣的氛围基因。民间有两句传播久远的谚语，“家有隔夜粮，不当孩子王”。在希学这里，他不仅当了“孩子王”，不仅当了一个受到地方和中央都表彰奖掖的优秀的“孩子王”，而且自己也享受到了儿童世界的巨大快乐和幸福，至今年过五十，仍然乐在其中，不烦不疲，兴致更专注，情感投入更热烈，这是我从他的岗位改换之后令人震惊的创作成就中所领略到的。

希学主编《少年月刊》，做记者当编辑又做领导工作，已有十五六年了，把这个刊物办成少年儿童喜爱的一本综合性读物，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也显示了智慧。也是在这本刊物上，凸显出希学写作的才

气，创作出近二百万字的儿童文学作品。我一眼就看出他的儿童题材创作的偏向，集中在报告文学。他数年坚持不懈，倾心倾情于那些少年典型人物的写作，仅编入这本纪实文学集子里的就有近八十篇。这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数字，把这八十位优秀少年排列起来，是一个蔚为壮观的队列；发现并决心把他们推到全国少年读者面前，也推到无以数计的家长面前，成为一种生动的示范，会发生怎样潜移默化的影响，真是无法做量化的考量；要亲自采访和较深挖掘这些优秀少年的典型事迹，在省内省外要跑多少路，要和多少人谈话，要到多少不可预料的艰难环境里实地观察、亲身感受和体验，要有怎样的耐心和毅力，克服和解决诸种障碍和困难。自然，形成一篇具有感人力量的报告文学，不仅要有适宜儿童阅读的文字，还要具有开掘素材的思想力度，希学都做成了。

我读了他写的本省和外省的这些优秀少年的典型事迹，有协助政府做环境保护的王鹏，到延安市一家一户去检查禁止烧煤的落实工作，颇多感想，这样小小的年纪，不仅促进了环境保护，更重要的是培养了一种对社会的责任心，对于孩子未来的社会志向是一种基础性的心理建设。《深情的眷恋》里的卿远香的成人事迹令人感动。她在少年时遭遇不幸，人亡家破，十一岁的小姑娘和小弟弟相依为命，得到了“希望工程”的救助。她恢复了学业，而且成为一名人民教师。令我感动不已的是，她记着社会救助的恩情，更记着和她一样生活在艰难环境下的山里孩子，拒绝了在城市就业的殷切邀请，怀着一份诚意回到山区的家乡做小学教师，为山里孩子服务。这个卿远香的人生步履，正是社会和个人关系的一曲完美和谐的诗，社会有责任有义务帮助弱者和不幸的群体，获得救助摆脱困境走向成功的人，自觉回报社会，这是健全的社会和有道德感人生的基础性和谐。

我不必赘述这部集子里所写的近八十个少年的典型事迹，他们几乎代表了社会各个层面各种家庭结构形态里的男女少年，有幸的和不幸的、各种爱好和特长、各种个性和奇才等等。把这些模范少年推广开来，把他们的富于个性气质的行为铺展到同龄少年眼前，给那些数以万计的少年提供一种人生最初的行为选择的示范，关于正义和邪恶、关于美与丑、关于崇高和卑下等等，这些人生初始阶段的基础性心理建设，恰恰给这些处于朦胧甚或混沌的年龄阶段的孩子做出了示范，可能影响到他们后来的整个人生道路。我想希学持久的热情和全心倾情的专注，源于此结。

希学的用心着意，也得到了令人羡慕的回报。这些先进少年事迹的写作和传播，得到了广泛热烈的反响和回应，《少年月刊》再把那些动人的反响和回应的事迹推广开来，形成一波又一波的良性社会效果，真是感人至深。单就希学个人而言，精神和心理的收获是丰盈的。他写的那些先进少年的事迹，在整个社会引起反响，有几个被评为市级、省级和全国的先进模范人物，受到省市领导和党中央江泽民、胡锦涛总书记的接见，作为发现者和书写者的陈希学，当有一种幸福和自豪。还有无以数计的小读者的反响，或书信或电话反馈到希学眼里耳里的时候，无论作为一个儿童刊物的编辑，无论作为一个儿童文学作家，那种人生的幸福感和踏实感，是无法用金钱所估量的。

我已体会到，把心灵和情感投入给纯洁无瑕的儿童世界的人，自己的心灵也会获得少年鲜活气氛的滋养，保持一种纯洁和鲜活，这是人生最难得的幸福，唯希学有。

2008年3月13日 二府庄

敏锐的思考与诗性的激情

——《行云走笔》序

这本《行云走笔》散文集，是没有戴作家头衔的作家张水平的著作。我之所以开口先强调戴未戴作家头衔这个话，是一种甚为强烈的阅读冲动引发的感慨。倒过一个角度想，张水平写这些散文的时候，就我的阅读直感，他不是为了当作家才写，纯粹是要把对世界万象的观感向人诉叙，便形成这本大著。在我的阅读经验里，为了当作家而写作的某些文字和纯粹出于不吐不快直抒胸臆的文字是截然不同的。前者缺失独特感受，便多忸怩、装腔和做作，给人如看塑料花的感觉；后者如张水平者，走到世界的各个角落，又有一根极其敏锐的神经，触景不仅生情，而且敏于思考，便有了一篇篇让我能触摸到脉搏跳动独具个性的文字。由此我顿时想到有没有作家头衔不过是个形式，能写出这样独立体验独立思考不同凡响的一篇篇文字，就足以欣慰了。这里涉及的不是清高的话题，恰恰是人写文章的原始动因和目的，面对历史和现实有感而发，不吐不快，经典大家的传世史诗便是这样写成的，名不见经传的写作者的一篇篇短文也是这样出手的，谁也不在乎作家这个头衔，致命在于是无香无臭的塑料花，还是独特感受独抒己见的真货。阅读和文坛有隔山之遥的张水平的游记散文，给我一种超出阅读期待的感动，还有甚为强烈的冲动。由此才感慨出有没有作家头衔的话。

说张水平和文坛有隔山之遥不是夸张。他身兼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陕西分会和中国国际商会陕西商会的负责人，即使同样有隔山之陌生的我也能想到，在中国的市场经济正在融入世界的大背景里，

他肩负的责任对于一个省的商贸发展和商务拓展具有怎样的分量，姑且不论。正因为他的工作对象和工作范畴是整个世界，就有机会走遍世界，欧美那些高度发达的国家自不必说都走遍了，非洲一些自然环境恶劣也很贫穷的地域也走到了，自然是为着一个省的贸易和商务的发展和拓宽，《行云走笔》是他走遍世界留下来的额外收获。他不是作为旅行家的专题考察，更不是刚刚富裕起来的那一部分中国人观光逛景的闲情逸致，是他在商务活动的间隙里的一瞥，世界万象引发的敏锐的回响，便酿制成《行云走笔》不同凡响的气韵，也是张水平极富个性气质的这一声。

文章无论长短，弥漫在字里行间的气韵，是作家独特个性气质的展示，可以透见作家的精神和灵魂，也在根本上显示着一个作家和别一个作家迥然差异的质地。我在《行云走笔》里所感知到的张水平，首先是他面对世界万象时迸溅出来的思想火花，让我看到一个敏于思考且颇具思想力度的人。他的善于思考的个性，影响甚至决定着他行走目标的兴趣性选择，多是那些影响过一个国家和地区乃至世界历史进程的人。这些人多数业已谢世，他怀着虔诚和激情拜访他们留给后人的墓地，或者是他们生活和工作过的故居，像马克思、列宁、斯大林、赫鲁晓夫、胡志明、圣雄甘地，还有托尔斯泰、安徒生等。他去过三次伦敦，两次拜谒马克思墓。面对一方方造型各异的墓碑，墓碑下静默的青草，张水平对伟人顶礼膜拜的虔诚，抑制不住对发展到今天的世界格局和世界潮流追寻和辩证的浓烈激情。他在马克思墓前献上鲜花再深鞠三躬的时候，汹涌而出的是对马克思主义真理坚信不疑的诗一样的坦诚话语；在高尔克村的列宁故居，对环境里的一草一木和室内的大小器物的精细准确的描绘，可以感受到一种敬仰的真实心态，而聚焦却在“列宁遗嘱”产生的历史瞬间，这是关系苏联历史也关系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历史的一个瞬间，我被张水平富于力度的辩证震

撼了，一时不能平静；对斯大林和赫鲁晓夫这两位在世界范围内都有争议的人物，尤其可以见出作者张水平独立辩证的思想个性，不见偏颇，却是一种客观的历史眼光，令我信服；他用极节俭的一篇短文，竟然生动具象地描写出被泰戈尔尊称为“圣雄”——印度“伟大的灵魂”的甘地的生动形象，他以他独创的道路，实现了他的“主义”，揭开了印度民族独立和国家解放的新的一页，他的坚定的行为和苦行僧般的个人风格，令人感动，一遍成记，张水平所做的“静悄悄地搞政治，也静悄悄地搞经济”的形象化概括，既是印度的国风，也是甘地的个性化风度，或者说是甘地开创并影响形成的一个民族和国家独具个性的形象；作者访问过依然坚挺在美国眼皮底下的古巴，卡斯特罗是尚健在的第一代领袖人物，却也是依然未减神秘色彩的一个老人，通过对他的爱情婚姻以及生活习惯的生动描写，这位在我印象里神秘了几十年的卡斯特罗，顿时呈现出鲜明的生动的形象……我跟着张水平的脚步，倾听着他在这些影响过一个国家乃至世界历史进程的人的墓碑前的声音（卡斯特罗例外），使我大开眼界增长见识，和这些曾经铭刻于心的人拉近了生活的距离，更重要的是作者张水平的富于思想力度的辩证的声音，不仅给我以启示，更让我相信我们的生活并不是完全世俗化，乃至只求实惠的庸俗化，有如张水平这样时时处处几乎出于一种习惯的善于思考的人。

一个敏于思考也善于思考到成为个人生活习惯的人，是无法抑止的，也是难能改变的，而且不仅不觉其累，反而在思有所得的那一刻，会享受无可企及的精神跨越的快活。张水平就是这种人，这是我阅读《行云走笔》所认识的张水平。他的敏锐的思维神经，不拘于上述的伟大人物的墓地，面对足迹所到的正在行进着的世界各个角落的生活世相，同样触发鲜活生动的又是独特的反应，既保持着一贯的思考深度和力度，又是一种诗性语言的激情抒发，无论是影响过世界历

史进程和世界格局的滑铁卢和倒塌的柏林墙，抑或是在世界名牌哈佛大学找不见排场门楼，以及外国人把香蕉皮如何处理，等等。他的独特感受和诗性语言浑然一体，让我在阅读中领受种种启示又享受艺术表述之美。我随着张水平的笔墨，走进拿破仑结束其军事生涯和政治生涯的滑铁卢古战场。我很惊讶作者丰富的知识，尤其是包括雨果等各界人士对拿破仑的评价，把十九世纪初的法国和欧洲的总体趋向表述得十分清楚，就不是平常所说的一般概念上的文字功夫了，信息量之丰富和叙述之简明生动，令我钦佩。在拿破仑兵败的滑铁卢战场遗址，张水平居然吟诵起关汉卿杂剧《单刀会》里关羽的唱词："水涌山叠，年少周郎何处也……好教我情惨切！这也不是江水，二十年流不尽的英雄血。"且不说作者思想和情感驰骋的疆域既跨越了历史，又跨越了东方和西方，单是这一缕纯粹诗人的气质，就使我产生甚为强烈的感染，几乎忘记了他作为一个省的国际商会负责人的社会身份，仿佛面对着一个专业的诗人了。这位诗人的联想，又从关羽和拿破仑身上扩展到古希腊神话里的两位英雄："安泰是英雄，赫克里斯也是英雄，而且赫克里斯是杀死安泰的英雄。但人们记住的是安泰而不是赫克里斯。这是因为，安泰和大地之间的关系给人的印象太深。站在大地上的安泰力大无穷，一旦离开大地他就变得软弱无力。"他又郑重阐释："大地，就是人民。"我读到这里颇不平静，作为一个省的商会领导——老大不小的官职——的张水平，在拿破仑兵败的滑铁卢遗址，感知并思考的是作为英雄赖以生存的大地，即人民这个最基本的命题，无论作为诗人，无论作为会长，都是独成一景的质地了。

我很敏感张水平散文的语言，简明、生动、准确，又时时迸溅着诗的激情。许是在文学圈子里圈得太久，常能看到某些装腔作势或忸怩作态或无病呻吟或故弄玄虚而实无所得的文字，读得人颇烦。初读《行云走笔》便觉耳目一新酣畅淋漓，再读便有忍俊不禁的慨叹自然

流露。他对许多庞大复杂的历史人物和影响深远的历史事件，叙述得脉络清晰疏朗分明，多数不过三两千字，却又是形象化的具象式的文字，让我读得兴趣盎然，填补了许多知识性的空缺。且不说他知识的渊博，单是这样的文字功夫，也令我慨叹“了得”！对照文明国家里人的文明举止和行为，包括自觉遵守公共秩序，包括不乱扔香蕉皮、塑料袋，包括见面时一个自然的微笑，包括异国异族的风土乡俗人情，都写得生动逼真使人如临其境，往往对我们的许多不文明陋习点击批评，成为一种参照和鉴示。他眼里和笔下的号称经济王国“国王”的美国商会主席、安利公司董事会主席史提夫·温安格，一出场就给我一个生动逼真的立体具象：“随眼望去，在一行人中为首走来一位风度翩翩瘦高个的先生，哇！至少两米以上，真有‘鹤立鸡群’之态。当与我握手时，这位美国经济王国的‘国王’，丝毫没有显现出人生凯旋之后的得意和高傲，从那张清癯的脸和那双深陷的灰色眼睛里，我看到的只是热情、谦逊和沉静。”我真不敢相信，这是陕西商会会长笔下的文字；更让我惊诧的是，这个做商务工作的张水平，看人时完全是一种艺术感受的眼光。简短几笔文字，就把美国经济王国的“国王”的形象刻画出来，颇有层次讲究，先是作者“我”第一眼看到的形象，再到从“灰色的眼睛里”感受到的以“沉静”为基调的气质，这个“国王”便生动地站立到读者我的面前了。作者进一步写了温安格的一个细节，面对一位因销售安利公司产品而脱贫的贫民窟里的墨西哥女人感恩的眼泪，“国王”温安格有一段关于政治和经济的新鲜理论：“我理解的故事不是政治的，而是经济的、市场经济的。我看问题总是从山脚下，而不是站在山顶。”“市场经济的机遇可以带给每个人跨越政治的影响，它可以成为稳定社会的一种力量，可以改变我们的生活。我们的目标就是改变人类的生活。”作者选择的这个细节堪为典型，它诱发出来“国王”温安格精神内里的气象，这个外表生动的肖像便有了质感，便

有了重量，便是一个立体的人了。我尚清醒这是写实散文，或者算人物速写，不是报告文学，更不是小说，能有如此的艺术效应，难得。

我便期望，作为商会领导的张水平，在他做好陕西商务的余暇，多写一些这样的散文随笔，不致把上帝赐给他的这根敏感文字的神经浪费了。

2008年6月5日 二府庄

青山碧水复原历史悲剧

向大家问好，我是个舞盲，对于舞蹈基本常识都不大懂，说舞盲一点不夸张。昨天晚上看《长恨歌》，不是以专家的眼光去审视，而纯粹只是用一个观众的眼光去欣赏的。

《长恨歌》是一首叙事长诗，在我们国家是普及率最高的一首古典长诗，有中学文化的人都不陌生，也应该是最感动人、最震撼人心的一部长诗。这是打破了阶级界限的一首爱情长诗。内容是中国封建统治者皇帝和他的妃子的爱情故事，可是被感动的却是哪怕只有初中文化的农民和工人乃至文盲。这种爱情的力量跨越了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界限，流传一千多年，永久不衰，一直到我们华清池今天又把它演绎成舞剧，而且是富于独创精神的实景剧，被南方北方各种年龄和知识结构的人乐于欣赏，可见一部长诗的生命力。

昨天晚上我看的时候，尽管这种实景剧让人看不清演员的面部表情，却似乎完全可以不在乎，作为一个观众的真实感觉，竟然被距离我太远的皇帝的爱情悲剧，直到一千多年后的今天，仍然冲击着我的心灵。对于一个作家来讲，关于创作的内蕴，赋予了极大的启示。

李隆基和他的夫人，这段爱情悲剧实景舞剧的创作，在我昨晚观赏时的总体感觉就是情景交融、荡气回肠。尤其是情景交融。因为荡气回肠的感觉，过去读唐诗的时候就发生过，纯粹是这个被白居易无与伦比的诗句所渲染的真实的爱情悲剧的魅力。而在这里发生的情景交融的感觉是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找不到的，但是昨天晚上找到了。我只说一个细节，在东边那个大山和西边那个小山的山谷，舞剧开始时

是一个半圆的月亮，最后是一个满圆的月亮，这个真山真谷的场景给人无限的心灵冲击。在无论怎样逼真的现代化舞台上是找不到也产生不了这种感觉的。我对策划者张小可先生说，有利就有弊，你要营造这种真实的自然气象的魅力，必然拉开距离让人看不到演员的脸上表情，所以说有利有弊。但是在这儿，作为我这个观众，更关注的是在真实的自然气象里，爱情悲剧发生地的这种真实感觉，就不计较看不清演员脸上的表情了。这种情景交融的感觉是室外真实环境演出中的一种独特艺术享受，是富于创造性的舞剧，一个富于开创性的先例。

再，我看了这个依《长恨歌》叙事诗改成的实景舞剧，还有一个强烈的感觉，就是如诗如画，犹如仙境，沉醉其中。这里是这个发生在一千多年前的真实故事的具体地点，一千多年前的这种历史悲剧到一千多年后的实景舞剧，本身就弥漫着太过久远的历史时空的一种神秘感。这种神秘感使人产生种种想象，当年的唐明皇和杨贵妃在这骊山涌出的温汤里，怎样极尽他们最美好的爱情表述；一直到马嵬坡要杀死杨贵妃……我仍然充满神奇的想象，包括神秘感。

这个实景舞剧创造的艺术氛围，以及舞剧的编舞，满足了作为一个观众观赏这部舞剧的心理期待，就是某种神秘感的心理期待大获满足。除了别出心裁的编剧和精彩的演出之外，现代化的技术手段也达到很好的效果，声、光、电，包括水下的很多设施，都促成了这个舞剧如诗如画的氛围的营造。结尾的神话用的技术手段，我作为一个外行，感觉到效果很美、很新颖，使叙事诗最后的寄托成为生动的具象，有很好的艺术效应。

昨天我去看了唐太宗、李隆基洗浴过的池子，一千多年前的遗迹，是历史的一种复原。想到一千多年前皇帝和他的妃子曾经在这儿

多么开心多么忘情，留给今天任何一个观众的，却是历史的冷寂，实景舞剧《长恨歌》把曾经的骊山激活了。

祝这个实景舞剧成功。

2008年6月29日 华清池

我看碎戏

“碎戏”展示了生活原生形态的真实性，这是很难得的，我尤其看重这一点。现在常见的电视剧，缺失的恰恰是这一点。不管是演城市还是乡村当代生活的电视剧，叫我这个当代人都感觉不到当代生活的真实脉动，既缺乏艺术真实，更缺失生活真实，太虚假。我看重咱们这个《都市碎戏》，就在它生活的真实性上，既体现在剧情故事的可信性上，也体现在那些业余演员的生活化表演动作上。比之某些专业的虚假剧情和做作的表演，让人感觉到生活的真实气氛。

咱们这个方言小剧，在生活的真实性上，赢得了观众，取得了一定的优势。在我的意识里，生活和艺术的真实是统一的，缺失了真实性，就很难立足。就我看过的一些《都市碎戏》，内容涉及面很广泛，可以说触及当前生活的各个角落，包括一些甚为尖锐的生活矛盾和生活世相，或彰显或讽刺，都显示着一种切实的逼近的力度，我以为这是赢得观众的关键。我这个老观众喜欢碎戏，就在于这一点。这是就内容而言。

就语言而言，它采取的是陕西关中方言的表述方式，不光面对陕西观众。以西安为代表的陕西这种语言形式，应该说是能够被陕西以外的人所接受，听懂了就接受，除非一些个别的比较怪僻的发音和说词。绝大部分语言（西安话）外地人是可以听懂的。关中很多方言我在《红楼梦》中都屡见不鲜，它不是只属于关中的方言，很多词语是整个北方语系都用的，无非是关中人发音跟其他省的人有差异。“碎戏”用方言自有方言的魅力，有普通话达不到的魅力，当然也有不及普

通话的局限，任何事物都有强和弱的两面。起码在陕西人看起来听起来很富有真切感。

就我看过的有数的那些“都市碎戏”，咱们有的演员对地方语言把握得不到位，明显能看到他为了强调方言的那个味道，以至把它强调到不适当的程度。语气太重，故意把某个字语气强调得太重，那就有点过了，因为与剧情和人物情感不吻合。单是为了强调地方语言的那个特点而不顾及人物此时此景下的准确心态，它就跟戏剧人物的情感脱离了。在这点上要把握好，首先得把握好剧中人物情感不断变化着的那个成色，才能把握语言的色调。在这个语言里一些太生僻的字词和太少有的奇怪发音，我以为不用为好。太生僻或者太粗俗的字，比如我在某一集上听到了那个“sónɡ”字，而且字幕都打出来了。这个字在我的《白鹿原》里用过，小说用是供阅读的，不出声的阅读是一码事，戏剧表演说出口来是另一码事。演员说出口就有点口羞，观众听起来也有点塞耳。类似这个字的一些太粗劣的地方话，不用最好。太粗的太烂的太脏的那些话尽量回避，把关中方言独具的那种韵味能够展现出来，让本地和外省人都能品尝关中方言不可言传的味道，这是方言的魅力。任何语言都是交流的工具，都是为着表现剧中人物的情感，喜怒哀乐的情感，用陕西语言怎样表述得准确，我觉得这个分寸要不断地揣摩。总而言之，我觉得这是展示咱们地方语言魅力的一种新途径，不断总结经验，精益求精，不断提高，把这个很有特色的地方小剧做得更好。

相信你们能把这个陕西方言剧做得更好，拿全国大奖，让全国人民享受陕西方言的魅力。

2008年7月 雍村

你的体验，令我耳目一新

非常感谢杨凌的老领导和新领导出席一个诗人的作品研讨会，这很令人感动。就我的整体感觉，现在对于一个地区而言，最重要的是经济指标和招商引资，这我能理解，也很赞成。借此我说几句题外话，前不久，一熟人和我见面就大发感慨，说把文学边缘化了，我就冷冷地给他泼点凉水，撂了一句："文学本身就不应该处在中心位置。"把文学搁在社会中心位置，你吃啥？你穿啥？"三年困难"我亲身经历过，对饥饿的那种不堪忍受的感受终生难忘，饿死人陕西可能还不多，河南、安徽饿死的人据说是一个令人后脊发冷的数字。我说文学老争社会的中心位置干什么？你就在边缘上好好写你的小说写你的诗歌就行了，你为什么老争社会的中心位置？社会的发展从来就是靠开明的政治和经济的繁荣，不是靠文学，李白和杜甫再伟大，也挽救不了唐朝，也推翻不了唐朝，给老百姓碗里添不了一粒米，身上添不了一件衣，只是有知识的人闲时的欣赏品而已。况且还需社会稳定物质丰富，才有此闲情逸致的高雅兴致，如果战乱加上饥饿，生死难保，还有心思读小说吟诗词吗？作家得活个明白，把自己放到恰当的社会位置，好好写作品。

对于胡照普的诗，刚才老教授新诗人都做了评价。作为照普的朋友，希望他拣拾其中最有教益的东西，哪些对未来创作有益，你就把它分拣出来。至于评价的高与低，这个在我看来并不太重要，重要的是分拣出对未来创作有启示的见解，拣取那些切中要害的，对未来创作最有教益的东西。作品研讨会既在肯定已有创作的成就，更在寻求未来创作的新途径和新境界。这是大家以往对我作品评论的我的基本态度，愿与你共勉。一本诗集，一个人写，许多人看，每个人都有不

同的阅读感受，有不同的看法，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对大家的意见，我不再做总结，这是我对作品研讨会一贯的态度，道理很简单，同一部作品，不同的读者有不同的甚至差异很大的欣赏角度和感受，很难归结，都是该作品产生的不同阅读效应，和作者当面完成交流就是够完美了，让作者再慢慢回嚼，拣取其富于启迪性的见解。

作为一个读者，一个参会者，我也谈一下对照普诗的阅读感受。照普的古体诗，像雷会长所说的，古体诗、旧体诗、传统诗几种叫法规范为传统诗。从这个概念上说，我对照普的诗有个最基本的估计和看法，这是真正的中国传统诗。以我有限的古典文学积累，我感觉照普这本诗集中的诗，属于我们传统诗中规范的诗。为什么这么说呢?刚才几位同志说到，现在写传统诗的人很多，远远超过写小说的人。这其中高下差别很大，确实有写古典诗词写得好的，品位很高，内涵很丰富。但常见的大量的是连古体诗基本格律都不能遵从，凑字拼句，层次参差不齐，差别太大，内蕴索然无味。照普的诗是真正的传统的古体诗。在今天这么多写古体诗的人中达到比较高的审美层面，这是我阅读照普诗的一个基本感受。他的格律平仄对仗等基本功夫早已不成问题，而更重要的是形象化的语言别出心裁，传达的体验也是独有的令人耳目一新的，这是一首诗存活的根本所在。这本诗集所涉及的内容非常广泛，可以看出他是行吟诗人，经历很广。照普的这本诗集笔触涉及古人今人城市乡村亲情友好的各种人和事，所有这些诗的内容的价值取向和道德取向，是符合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传统的道德和现实的道德、传统的价值观和现实的价值观共同取向，是对正气、正义的张扬和雅的志趣，是对社会健康有益的一种审美。这也映射出了诗人的审美心理和生存形态，是富于建设性的一种创造。值得再探讨和再审视的一点，是认识价值与思想价值似乎还存在一些差异，认识价值还有待进一步提高，在我的意识里，这往往决定着体验

的层次或者说深度。情感的融入，诗的气象就会大不一样。形象愈生动，诗的境界就愈高。照普坚持多年追求传统诗创作，很不容易，达到今天的颇高的水平值得赞赏；听取大家提出的不足，再作新的探索，相信会抵达新的境界，会有更好的诗词作品创造出来。我期待着看照普第二本诗集。

2007年4月28日 杨凌

2008年9月5日 二府庄

呼应与鼓舞

《小说选刊》和铁岭市促成这样一个文学大奖的创意是令人钦敬的，我向你们敬礼了！我的敬意和敬礼，是出于这样一种心理，人都是需要鼓励的，年轻人尤其需要鼓励，老头儿也不可或缺。比如我，突然听到《小说选刊》的编辑电话通知我获奖，我忙问你们搞了个什么奖，说是“中国小说双年奖”第一届。我很惊讶。惊讶的主要内容是高兴。也是在这一刻，我才发现我人老而心未老，还希望得到褒奖。这种心理也验证着我还有创造的欲望和活力。

《小说选刊》自新时期文学创作潮起以来，对于中国小说创作的发展起到了无可估量的作用。这不是我夸张，纯粹出于我对写作的理解。文学作品是作家把对历史和现实生活的体验付诸文字，然后就发生跟读者交流的过程。交流的过程，实际上是期待在读者那里获得验证，能得到读者普遍而且强烈的呼应，包括得到评论家的呼应，作家就验证了自己对历史或者现实生活体验的独到性，还有艺术表达的独到性，无疑是最好的劳动报偿了。现实的问题在于，文学刊物很多，作家在任何一个杂志发表作品接触读者都有限，经过《小说选刊》的遴选，把优秀作品推举到范围更大的读者面前，扩大了作品和评论家以及读者完成交流的空间，也激励作家不断探索体验的独特性的兴致和勇气。基于此，我说《小说选刊》对新时期文学创作的发展功不可没。

作为我这个作家，一个中篇或短篇小说在某家杂志上发表了，如果能获得《小说选刊》的选登，在我来说就是一种鼓舞，因为文学界公认，《小说选刊》选稿有独特的眼光。由此也验证了一点，我没有

脱俗；从另一个角度想，我对生活体验的表述，得到了《小说选刊》编辑的呼应，而且通过他们的刊物推向更多的读者，继续完成沟通和交流，这起码是我写作的基本目的，又说不到俗处去。这回的“中国小说双年奖”，在广泛遴选的基础上，又进行严格的筛选，评出第一届获奖小说，对我来说，是一种巨大的鼓舞。向设置这个奖的铁岭市和《小说选刊》表示最真诚的感谢！尤其像铁岭这样一个中等城市，在没有任何商业利益驱动的背景下，能关注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我表示真诚的敬重！

2008年10月29日 铁岭

激情赋华章

——《秦·赋》序

赋是我国所特有的一种文体，是地道的国粹。赋发轫于先秦，西汉盛世迅速蓬勃起来，成为我国灿烂的古代文化中独具魅力的一种文体。时至今天，仍有许多人沉迷于写赋。赋体文学适于歌颂，故太平盛世多有佳作；今日中国展现改革开放的大繁荣新姿，创建和谐社会，赋这种文体的创作恰逢其时。

骆浩著《秦·赋》，辑录了六十余篇描写三秦大地的文赋及古体游记，从远古到周秦汉唐，新颖大气、慎思严谨、文采斐然。作者骆浩是一个英俊少年，地地道道的长安娃。也许是感应了终南山的灵秀，赋在他的笔下得心应手华章迭出。他撰写的《2008年戊子清明公祭轩辕黄帝祭文》，在陕西省政府二〇〇八年戊子清明公祭轩辕黄帝祭文全球征稿中获得二等奖。在高手云集的竞赛中能脱颖而出，可见这少年不光模样英俊，更有内才，获奖当是对他文赋创作的一次肯定。

陕西是中华文明的根，文化厚重。骆浩对三秦非物质文化遗产、人文景观、自然风光、民俗文化情有独钟，挤出业余时间，走遍三秦大地，实地考察了诸多的祠庙陵墓，名山大川，不仅做了大量考据工作，重要的是激荡出一篇篇诗赋华章。他的赋或磅礴，或秀美，语言爽落流畅，艺术想象丰富，对描写对象的倾爱如瀑喷涌。骆浩的知识面颇广泛，涉及天文、地理、自然、宗教、历史、园林、书法、绘画、建筑、生物等各个领域，读者在欣赏赋文的同时，开阔文化视野。

《周易·系辞》说“仁者见之为仁，智者见之为智”。我和骆浩一样期待和读者完成交流。

2008年12月19日 二府庄

遥远的文君和现实的女性世界

——《文君赋》序

进入新世纪近十年来，一批独具禀赋的年轻女作家跃上陕西文坛，形成令人鼓舞的格局，也引起社会各界的关注。这些女作家在感受生活方面，敏感、细腻、独到，她们既能敏感到生活的疼痛，也敏感于心灵之美，更善于在细微处发现生活的奥秘，其作品展示出情感生活一幅幅千姿百态的图景。

汉中青年女作家侯莉的中短篇小说集《文君赋》，就是我省女性文学的最新收获。

一方水土养一方作家。汉中是一个美丽的地方，山美水美，文气盛。早几年，我几乎每年都有机会到那里去走走看看，领略秦岭南边的山川地貌、风土人情，对我这个关中人是一种心理补偿。侯莉自小生长在汉中，汉中独特的地理人文环境的长期熏染，赋予她的作品以清秀柔媚的气质。

《文君赋》是侯莉的处女作，也是发轫之作，是她痴迷着的文学创作的可喜尝试，是她长久眺望文学的致敬之作。阅读着这本集子里的小说，很明显地可以看到属于侯莉这位青年女作家个性化的独特禀赋，这尤为难得，也尤其值得看重。

《文君赋》收集了十三部（篇）小说，短篇小说多是叙写都市日常生活，特别是女性情感生活，揭示都市女性在以金钱为中心的现代社会中的茫然无措、随波逐流和人性的扭曲，展现她们在金钱和权力

的社会罗网里的冲撞和自我拯救，以及围绕着这些女性的男性在生活中的挣扎和沉沦。这些作品现实感很强，也很时尚。也许是作者一直在网络上活动，无论取材还是行文，深受网络文学的影响，有的篇章则直接取材于网事，可能更合青年读者的胃口。中篇小说只有一部即《文君赋》，却是作者匠心独运、别具一格的一部压轴之作。

相对短篇小说的时尚和前卫，中篇小说《文君赋》显得比较传统，呈现出几分高贵和典雅。这部中篇小说取材于汉代司马相如和卓文君的爱情传奇，本来是一段千古流传的爱情佳话，历来为文人士大夫所津津乐道，有多种不同的版本，且毁誉不一、各执一端，至今争论不休。作者选取这个题材，显然不只是要还原一段爱情故事，而是要努力开掘出新意，写出她对历史人物的不同凡俗的最新解读。中国历史浩如烟海，可写的人物多不胜数，作者之所以偏偏对这一段爱情传奇发生浓厚兴趣，许是有感于真诚的爱情在今天尤为珍贵了。这位理想主义的作家之所以把眼光投向历史，开掘这桩被深深掩埋于历史云烟中的爱情标本，意在彰显纯美的爱情。在作者的笔下，不光作为古代杰出女性的卓文君光华四射，一向被误解甚深的司马相如，也不再是男权社会中轻佻放荡、骗财骗色的面目了，而是既有才，又有德、又忠于爱情的堪为典范的一个全新形象了。

这是一部关于爱情的致敬之作，体现着作者的爱情理想。作者以小说的形式拨去浮尘，为历史人物“平反”，将一个原本的司马相如还归今天的读者。这个司马相如不单是杰出的汉代文豪，他对女性的平等态度，对于爱情的忠诚和坚守，足以令今天视爱情如玩物的男性汗颜。

侯莉把一个太过久远的爱情故事写得充满生活气息，得助于观察生活的敏锐和洞察力，显现出了良好的禀赋。作者着笔多为生活世相

细事，几乎没有涉及波澜壮阔的社会历史事件，却丝毫没有小女人文学的媚态，而是将笔锋指向平凡生活事件的深处，着力于挖掘那些普遍性的事物，通过女性角度，揭开那个特定年代生活大幕的斑斓一角。语言简洁而又富张力，叙述进退自如、游刃有余，这在一个青年作家已属可贵。

侯莉是一个勤奋的女子，自幼钟情于文学，要求自己很苛刻。单是《文君赋》这部小说，就曾尝试过两种写法，第一次是以全知的视角来写，第二次调换为卓文君的视角，以第一人称来叙述。为了找到准确地把握人物的感觉，不惜推倒重来。而在重写这部中篇小说的时候，汉中正在闹地震，在临街搭建的简易帐篷里，冒着酷暑和余震，侯莉在一个笔记本电脑上敲打着这部中篇小说的一字一句，进入忘他也忘我的境地，足见艺术创造理想之单纯，以及创造欲望之强烈。

我期待并相信，侯莉将不断拓展自己文学创作的天地。

2008年12月23日

关注人类命运的力作

读完《可可西里狼》这部小说书稿，杜光辉又一次给我以惊喜，相信这部书出版后，将会引起文坛的关注和读者的兴趣。

算起来，我与杜光辉相交竟有二十多年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和几位作家去陕南重镇安康讲课。那是文学最狂热的年代，竟然有上千名痴迷文学的男女青年听课。讲完课，当我们返回到安康火车站时，一位二十多岁的铁路工人来送行，他虔诚地买了一兜橘子，让我们在路途上解渴。在站台等车时，一位同来讲课的作家说，在这一千多名听课者里面，将来有一个能成为作家就不错啦。未及我说话，一直站在我们背后的那位铁路工人搭话了："那个作家就是我！""那位作家"告诉我，他叫杜光辉，是大巴山里的一个小火车站的工人。这是迄今为止我和杜光辉唯一的一次见面。平心而论，当时的他并没有引起我的特别关注，但这样的自信和勇气，却令我振奋。

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杜光辉的中篇小说《车帮》在陕西文坛引起了较大的反响。看到介绍他的文字，才把这位新星和十年前在安康火车站送行的那位大巴山小火车站的年轻人联系在一起，便不禁慨叹，他终于成了那个千分之一。随之，他的一系列中篇小说不断地引起反响。在陕西省委宣传部和省作协为庆祝新中国成立四十周年选编的《陕西名家中篇小说精选》中，选入了陕西老、中、青三代共十九位作家的作品，杜光辉名列其中。我在为这部书写的序言中特别提到此书选编的作品"是四十年来最具有成就也最具有影响的作家的代表作，还有一批更年轻也更富于艺术创造活力的青年作家的代表作"。

杜光辉的小说构思奇特绝妙，气势磅礴，文笔冷峻，力求把握时空的高度，给人以心灵的关怀和生命的思索。尤其值得称道的是，他的作品始终关注着人的灵魂的演绎，关注着社会文明的进步。在他艺术探索的历程中，不慕浮华，不被潮流挟裹，始终走着自己的创作路子，已经突显出独立的艺术个性。每次阅读他的作品，便情不自禁地想到安康火车站送别时他的那句豪言，一位有才气的作家终于出现了。

后来，有人告诉我杜光辉携家带口去了海南。我没有惋惜是出于我对创作的理解。一个年轻而又敏锐的作家进入一方陌生之地，感受会更新鲜更强烈，况且沿海是中国经济最先活跃的地区，当代生活的矛盾和人的心理秩序的变化，更易捕捉。杜光辉令我颇感意外的是，他没有找到合适的工作，竟然流落在海南街头，陷入弹尽粮绝的地步。就在我甚为忧心之时，他给我来信了，说他找到了在一家杂志社当编辑的工作，结束了窘境。他仍然坚定地表示，只要有一碗饭吃，他不会放弃文学的。其实，就在他流落街头一天只能吃上一碗面条的时候，也没有放弃文学。我自然可以想到杜光辉对文学执着追求的毅力。同时不能忘记的是，那时候，正是文学创作被商潮冲击得有点零落有点贬值的时期。

杜光辉又进入了创作的一个高峰期，佳作连续面世，《中篇小说选刊》《小说月报》和许多报刊转载了他的作品，在读者中产生了普遍的影响。这些作品大多反映海南生活进程，为自己开辟了一个新的创作领域。

我在看完《哦，我的可可西里》后，意识到这部中篇小说触及一个拷问人的灵魂的大问题，一部关涉人类命运的大题材，甚为钦佩。

杜光辉曾在电话里告诉我，想把它再创作为一部长篇。现在，名为《可可西里狼》的长篇小说书稿就摆在我的书桌上。

刚刚过去的二十世纪是人类历史上取得巨大成就的一个世纪，是以往任何一个世纪都无法比拟的。同时，这又是对人类造成最严重破坏的一个世纪：规模最大的两次战争，储存着足以毁灭地球的武器；地球资源被无休止地掠夺，野生动物濒临灭绝……《可可西里狼》这部小说，淋漓尽致地展示了这个关于人类本身合理生存的命题。

杜光辉的这部长篇力作，描写一支解放军的测绘分队在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期，进入可可西里无人区执行测绘任务，在那里和野生动物、大自然发生的悲怆、凄婉、鲜为人知的故事。故事一直延续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那些当年的军人在可可西里又发生着生命和鲜血、友情和利益的剧烈冲突。这是一部故事新颖奇特、人物鲜活，具有现实认知意义的精彩小说。

杜光辉当年曾作为解放军部队的一员，亲身经历了可可西里无人区那惊心动魄的一幕。同时，他在青藏高原多年的汽车兵生活，为他积累了丰厚而独特的生活素材。这部小说的文字极富表现张力，勾勒出一幅幅雄浑苍莽的画面，真实地展示出苍凉、美丽却又危机四伏的可可西里。作品犀利地剖析着人灵魂中的善与恶，人类的真情、友谊、道德，利益冲突中的背信弃义、残酷杀戮，发出一声声荡气回肠的呼唤，发人深省。

有评论家说，杜光辉的《哦，我的可可西里》是新世纪中国文坛出现的精彩小说之一。我也毫不夸张地说，《可可西里狼》当是近年出现的长篇力作之一。

2009年1月 二府庄

再说李十三

刚刚参加过一个有关开发三秦文化产业主题的座谈会，回家路上接到《小说月报》刘书棋先生电话，告知我获奖了，是短篇小说《李十三推磨》获得《小说月报》第十三届百花奖，在我自然又是一番惊喜。他又告知获奖作品汇编出书，每个获奖作者都要写或长或短的一篇获奖感言，我便把已到口边的想推辞不写的话压下去。道理很简单，既然是每个获奖作者都要写，我不能违反已定的体例。

我之所以产生推辞不写获奖感言的念头，在于我已经写过一回了，也是为《李十三推磨》写的。那是去年初秋时节，《小说选刊》编辑电话告知，他们刊物设立的“中国小说双年奖”首届评奖结果刚刚揭晓，《李十三推磨》被评为短篇小说奖，并邀我参加颁奖仪式并发表获奖感言。我是即兴说话，却是坦白了刚刚获悉得奖消息时的真实心情，就是高兴；由此意识到像我这样年龄的人，也是需要褒奖的，褒奖的最直接效应是鼓励；期望褒奖的鼓励，也就意味着继续创造的欲望和活力。这个即兴发言被录了音，我后来看到的是整理出来的不足千字的文字稿，《小说选刊》的朋友表扬我的发言有幽默感，要发表。我做了修饰，后来发表了。

《小说月报》两年一度的百花奖，已经坚持评到第十三届，业已形成广泛影响，也形成颇纯正的文学品格。《李十三推磨》能获得这项奖，让我再一次感受到褒奖直接发生的鼓励的效应，且注入一种心理上期待的踏实。这已经是让我感受到的第三回鼓励了，去年初，作为发表《李十三推磨》的《人民文学》杂志，搞二〇〇七年作品评

奖，《李十三推磨》是获得短篇小说奖的两篇作品之一，我已初尝褒奖的鼓励了。

引发这个短篇小说写作的诱因，倒是值得我体味。我在《美文》读到剧作家陈彦写的一篇纪实散文，是写秦腔剧作家李十三的事迹的，兴趣顿增。李十三这位秦腔剧创作的开创者的名字，似乎早先隐隐听说过，却不甚了了，这回阅读中得知他写过八部大剧两部小戏，号称十大本，几乎被中国南方北方各种剧种都移植演出了。其中有一部剧作被田汉改编为京剧《谢瑶环》，于上世纪六十年代遭批判。这位天才的剧作家，却被嘉庆皇帝派到陕西来捉拿他的兵丁吓死了（有人说气死了）。罪名是“伤风败俗”。我在陈彦的文章里读到两个真实的生活细节，一个是他和老婆推磨，令我心悸，一个中过举人又写着在中国南北热演不衰的剧本的堪称伟大的剧作家，却要推着石磨才能吃到面粉。我便判定他连我这个贫农的家境都不如，我家还养得起一头黄牛，磨麦子用牛拉磨而无须人推，用人代替牛推磨，在乡村里是穷困到最不堪的家庭。再一个细节，是他听到将要被抓捕的消息时，恰好正在推磨，吓得（或气得）吐血……这两个细节竟然折腾得我坐不住，在工作室里来回踱步，情急中给陈彦打了一个电话，想借用他的这两个细节，为李十三写一个短篇小说。陈彦爽快答应了。这是我写得最顺手的短篇小说之一。

到这个时候，我业已形成一种新的写作感觉，尤其是短篇小说，想写一个什么人物，要有至少两个独特的生活细节，即只有这个人物才会发生的生活细节，才能下手，也才有写作的较为强烈的欲望，也才会有写作的信心。此前的作为《关中人物摹写》系列的短篇小说，都是这样发生写作欲望，再形成构思和叙述的。

我在《李十三推磨》的“写作附记”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就想把他写进我的文字”。我把李十三这位名副其实的堪称伟大的剧作家，用了不足一万字写成小说，连续三次得到褒奖，足以告慰我对李十三的敬仰之情了。

2009年3月19日 二府庄

热风扑面

——《山溪》序

电话里得知是董发亮的那一瞬，确实发生过一点小小的惊诧。惊诧纯粹发自始料不及或者说意外，在于董发亮虽然属于老熟人，却是一年半载也未必能通一次话或谋一回面，确凿属于熟人里的稀客。稀客更不敢怠慢，便应约。待见面，握手，坐下，容不得嘘寒问暖的寒暄，他便从提兜里掏东西，看来真是个急性子的人。我以为他会掏出一袋久负盛名的商洛山地特产薄皮核桃，却把厚厚的一本标着《山溪》的文稿递到我手里。我以为是即将出版的散文集，先表示祝贺，却也不惊讶，现在出版一本两本书已属寻常事了。然而，不寻常的事恰在此刻发生，他说这部书稿既不是散文集，也不是小说集，而是一部序文的结集，是他多年来为百余位作家艺术家的著作所写的序文，结集梳理成这样厚厚的一部书稿，即将付梓，邀我作序……我顿时发生的惊讶颇多震惊的意味。

这种惊讶之所以来得强烈，同样因为始料未及。在我积久却也粗疏的印象里，董发亮是商洛市文联主席，又是中共商洛市委宣传部副部长，可谓身负要职，且有多年，按习惯思维推想，给人留下文化官员的印象。在我有限的信息里，似乎一满都是对这个文化官员的董发亮的赞誉，而且多是民间话语，闲聊中偶尔发生的不经意的涉及，本来说张某王某或李某的什么事而牵扯到董某，所能得到的都是说他的好话；往往是顺口撂出的一件两件生动感人的个性化生活细节或话语，都是由衷地赞赏董发亮，为了商洛市的文学艺术事业怎样倾心尽力，怎样在许多年里热情不减，尤其是为着成就一项大事，乃至帮扶

一位有困难的作者，他往往在不惜全身心投入的过程中还要忍受难言的委屈；然而却依旧不抱怨更不动摇，依旧热情不减地做事，直到做成。他落下了好名声。他是一方地域里文化艺术界男女老少都信赖着的一位文化官员。这些纯粹来自民间的尤其是不经意间流传出来的评说，当是真实的，也是可靠的，董发亮当会获得真情付出之后的心理报偿。

同样在我粗疏的印象里，董发亮是一位摄影爱好者，有许多独具个性也独具魅力的摄影作品，多次获得国家级和专题摄影的大奖，已经是摄影艺术卓有建树也颇具影响的摄影家了。我不懂摄影艺术，从一些文艺报刊上零散获得有关董发亮摄影的造诣和成就的信息，已经形成这样的印象。他拍摄过胡耀邦、江泽民、温家宝等国家领导人的照片，留下了弥足珍贵的资料。他尤其擅长山地风光和山里人生活情态的瞬间凝眸，铸成一幅幅生动撼人的画面。尽管我不懂摄影艺术，以艺术的共性推想，瞬间凝眸的前提是发现；而要有所发现，就不单是摄影技巧的高下了，而更在于眼光敏锐；影响乃至决定眼光是否敏锐的关键，在思想智慧。董发亮许多年来把眼睛也把镜头对准商洛山地的各个角落，对准他的父老乡亲，那些神奇的山光水色和各色人物情态，既可感知他的思想的敏锐，更可感知一个艺术家对家乡独有的情感。这些作为成就一个摄影家的独特的质地尽管难能可贵，想来却也自然，并不觉得意外和惊讶，倒是这部厚厚的序文集，着实令我惊讶不已。

读着《山溪》这部序文集书稿，我最直接的感觉是作序的董发亮的饱满的热情。这种热情可以说扑面而来，在打开书稿的第一篇写给诗人张书生的诗集《清明雨》的文字里就充分感受到了。他读完《清明雨》，竟然兴致高涨到难以抑制，不顾“七月火辣辣的日头”，快步

走到东龙山下去找诗人倾诉去了，一个热情激情的性情中人跃然纸上。这样的事并非一次。他每读到一本商洛作家的好书，乃至一篇好文章，一幅好画或漂亮的书法作品，便找作家画家书法家去了，完全忘记了主席和部长的官爵级别，而实实在在是商洛地区各路艺术家推心置腹的朋友。他听说有一位在西安艺术圈里很有作为的商洛裔年轻人，便想结识，却一时搞不准联络途径，终不得谋面。忽一日，这位年轻人被另一位文化人引领着找上门来，他大喜过望，“对我这个爱客并特别爱文客、淡茶一杯酒一瓶的丹凤人来说，不到一刻钟，已‘酒逢知己千杯少’了”。我读到他的这些文字时，可以想见他满脸洋溢的春风，和一个不过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在“一刻钟”里便成“知己”，足见董发亮坦诚热情的个性魅力了。我便暗自发笑，这回他不仅忘记了自己颇显赫的行政级别，连颇大的年龄上的差距都消弭了。他的热情底色是真挚和坦诚，这是他和各种年龄各种脾气各种艺术兴趣的各路艺术家都能交结朋友的根本所在。

董发亮为一百多位艺术家的作品集作序，这个事实本身就不言而喻着作家艺术家对他的信赖和敬重。如前所述，我在阅读这些序文时最直接的感受，就是热情洋溢。不唯我，任谁阅读这些序文的文字时，都会感受到扑面而来的热风。依我的感受而言，热情控制不好或出于某种偏爱到偏执，容易发生言过其实溢美过度，甚至发生瞎吹的弊病，平素已经不鲜见。董发亮的热情洋溢的文字底气，集中显示着准确的分寸。无论说诗，无论说文章，无论说书法或绘画，他都是面对某个人的具体作品，努力探寻其独有的已经实现的艺术创造的境界或高度，给予真诚的评说，也不隐蔽其不足，然而着重点在发现其独创性并给予肯定。这一基本思路，在我不仅赞赏，而且相通。我也为一些作家朋友的作品集写过序，我的主导意识在于尽可能地发掘其作品所做的探索，尤其是他对生活的独自发现，独具个性的艺术表述，

充分予以彰显的唯一目的，促进他实现新的艺术探索的自信和勇气。然而，我的忌讳就是不做不切作品实际的吹捧。这样做不仅对作者无益，反倒可能造成误导。我在读董发亮所作的序文的时候，颇多感慨，热情的激励和真挚的肯定的同时，完全不见庸俗的乱捧，又更令我感到难能可贵。我便推想，各路艺术门类的朋友乐于找他作序，信赖和可靠性才是基本的诱因。

我读这些序文的时候，对董发亮不断发生着刮目相看的惊喜，这是一个知识面很宽的人物，虽不敢说“全才”，却可以肯定他对各种艺术门类不仅不陌生，而且有独到的鉴赏视觉。他可以评说新诗，也可以品赏古体诗词，对散文、小说的品赏不仅到位，颇见老到。相比之下的书法和绘画，和文学范畴的小说散文诗歌就显现另外的专业特质了，然而董发亮品评起绘画和书法来，头头是道，可见其对绘画和书法的研究功夫，非一般水准和泛泛而论。仅举一例，他对魏振中先生的书法作品的品评，从笔墨中间能感知到“气息”“章法”“功力”的一段论述，显现着他对中国书法艺术独特的欣赏视角，甚至超脱了单纯的书法，而进入一种高端诗意的境界了……写到这里，我才切实地意识到今日之前的粗疏印象里，只是董发亮的一点皮毛而已，这也是我不断发生惊讶的因由；所以说刮目相看，在于看到了一个不仅热情真挚热爱文学艺术事业的文化官员，也切实看到了一个艺术建构十分丰厚的诗性的董发亮。这种诗性充分展示在他的序文的文字里。几乎每一篇序文里都是跳跃着的文字。不见一般序文中常常难免的评说的干涩枯燥，更不见扭捏作态装腔作势。他的序文是感性的激情和理性的阐释，尤其是理性阐释的文字，也是生动到可以触摸的动态的语言，作为序文这种特定的文体，确实不易。我便想到，他的诗性语言，是内里热情的外化形态。

我抚着翻阅着《山溪》书稿，不止一次感慨，要为百余位作家艺术家的著作写序，就得把百余部作品认真阅读，才有真知灼见表述出来，需得摊下多少阅读的时间。单此一点，我对董发亮先生便油然而生敬意。

2009年4月5日 二府庄

感知一双敏锐的眼睛

——《别样的非洲》序

和徐君峰初识见面，也是至今唯一一次谋面时，他送我一部厚厚的图文并茂的书稿，并嘱我作序。许是记性越来越差，也许是时日拖得太久了，徐君峰先生的高矮胖瘦已经无记，相貌也完全模糊，再见面时不经介绍或自我介绍，我肯定认不出来。然而，我的脑海里却浮现着徐君峰的眼睛，一双敏锐的眼睛。敏锐的眼睛通常都是灼灼灿亮的。这双灼灼灿亮的敏锐的眼睛，不是初识徐君峰时留下的印象，如上所述他的形象他的面目已经模糊无记了，这是在我阅读《别样的非洲》这部书稿时发现的一双眼睛。更确切地说，是从书稿的字里行间浮现出来的一双眼睛。这双眼睛浮游在非洲那方神秘大陆的沙漠、丛林、草原和海湾的上空，眼色和眼神不时变换着生动的色调儿，一会儿灿亮一会儿忧郁一会儿凝思一会儿又豁然纵情了。我被这双眼睛的神采所陶醉，更为浮现着这双眼睛的文字所沉迷，时不时地发生撞击发生呼应也发生惊叹。

打开《别样的非洲》书稿，刚刚接触到开篇的文字，我便感知到一双尤为敏锐的眼睛。徐君峰经历长途飞行而不见通常难以避免的困倦和疲劳，走出飞机舱门踏上异国他乡的第一步，就扫描到开罗机场“周遭环境脏、乱、差”了。伴随着徐君峰的脚步，诸多不顺眼更不顺情的世相，全都逃不过这双愤世嫉俗的眼睛。作者走到开罗城的制高点穆盖塔木山旁的“死人城”时，看到富人为死者建造的一家阔过一家的墓上建筑，竟然为那些寄居在死人墓地的一无所有的逃难者流浪者鸣不平了。“坑坑洼洼的街道”里，“污水横流，苍蝇乱飞”。在那些“数

不清的棚屋”和“残垣断壁的房子里”，苟活着以“捡垃圾为生的社会边缘人”。作者断定“这是社会两极分化的结果”。作者再走到肯尼亚的首都内罗毕的时候，从富人阔绰的住宅区一眼掠过，又定格在“垃圾乱堆，随地都有废弃的车辆和轮胎，街道污水横流，沤馊的气味充溢在空气中，无事可做的年轻人三五成群闲荡着”的贫民窟。如此等等。

在《别样的非洲》的书稿中，多次读到如上列举的这些贫民窟穷人生存的不堪的情景，我并不太惊讶，在诸如美国那样超级大国富国的黑人聚居区，我也看到过“脏、乱、差”的景象，美国靠救济金过穷日子的人也还占有一定的人口比例。像埃及、肯尼亚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现在还解决不了贫穷人口的生存困境，想来似乎也不足为奇。让我引发心里撞击的事，恰好也正在这里，徐君峰怎么总是揪住不放这些穷人不堪的生活景象？当整个社会都在把不无羡慕的眼色盯住富人的别墅式住宅和肥不胜肥的钱袋的时风里，这双总是盯着贫民聚居区不堪的生活景象的眼睛，就有了独立个性，就显示出别一番心理和精神的大气象。换一个角度说，具备了大的心理和精神气象的独立个性的人，才可能有一双敏锐的眼睛。这无疑是令我敬重的一双独立个性的眼睛。

这双眼睛还呈现出某种幽深的历史感。作者每到一地，触现实之景观，总是引发遥远到几百年乃至千余年前的另一番景象。作者一踏进开罗，便点出这座闻名于世的古城的由来，阿拉伯人征服埃及后，舍弃了作为基督教城堡的亚历山大，重建新都开罗，而且成为伊斯兰教的象征性名城。“穆斯林每天有五次祷告，在我还没有走下城堡时，从各个宣礼塔中传来了雄浑有力拖着尾音的诵经声，虔诚的穆斯林放下各种工作，面朝圣地，跪地礼拜……”一个被异族征服的国家，不仅废弃了原有的首都改建新都，而且改换了宗教信仰，成为被全民精诚

信仰的国教，真是让人引发感慨。作者精细地描述着今日开罗的景象，把历史和现实的逼真情景以及动感的音响融为一体，不仅鲜活了，而且有了纵深感。作者漫步在所有空间都弥漫着宗教的神圣气氛的城市里，超越了素常所见的游客多会发生的新奇和惊诧，很自然地进入某种关于宗教和法律对国民精神心理以至生活习俗的影响的思考，颇具哲思的韵味。“宗教规范着人们的心灵与习俗，从某种意义上讲，比法律更有力量……所谓异国风情，就是对已渗入到社会生活多个方面浓郁宗教情结的体验，在这个城市，宗教主宰着社会。”每当读到这些精彩的文字，我的眼前便浮出一双敏锐的眼睛，区别于那些观光逛景后稀罕图热闹的游客的眼睛；这双眼睛不单敏锐，而且完成着一次又一次的颇为精到的哲思。

我便想到，这双敏锐而又独立思考的眼睛，得之于知识的渊博。无论在开罗，无论在亚历山大，无论在西奈半岛，以及苏伊士运河或东非大裂谷，等等。徐君峰足迹所至，目光所触，便铺陈出这一方又一方地域的历史演变，重大的或细微的，史载的和民间传闻的，让我这种对世界历史和地理知识先天不足的读者，不单得到了弥补和普及，而且是生动的富于哲思的。我便得到一种切近而可靠的启示，这双眼睛之所以敏锐，之所以呈现着哲思的不同凡响，在于作者拥有的知识的丰富性，世界的和中国的，历史的和现实的，人文的和地理的，史籍传承的和民间散布的……这是《别样的非洲》展示给我的一个人的知识储存。知识才是使一个人眼睛敏锐的魔器。徐君峰无疑拥有最丰富也最富质量的魔器，才拥有一双敏锐的眼睛。

我同时感受到这双眼睛里的诗性质地。作者身临西奈半岛的荒漠时，“我的思绪突然放飞，觉得数千年前留有英名的大人物，和我距离如此之贴近，好像所有故事都发生在刚才，在我注目礼下，历史人物

在历史舞台上正谢幕而去……沙丘相连，人烟罕见，犹如登陆在月球表面，当年先知摩西率犹太子民所走的‘西奈旷野’，其秃岭沙原的景观亘古未变”。这就叫发思古之幽情吧。在我简单想来，思古的幽情不是谁想发都能发得出来的，关键得知古，即需得知道很久很久以前这儿曾经发生过什么重要人物导致的重大事件，才可能在足迹所至目光所触的一瞬，涌出历史和现实撞击的别一番情感来。再，这番情感表述的方式，也界别着纯属个体的独有个性，只有如徐君峰这种自然天性的诗性禀赋的感知者，发出的“幽情”就是诗性意韵的文字了。我便想到，那些触景而生的不可压抑的激情所铸成的“口占一绝”或“一律”，就是这样创作出来，且成为千古传诵的诗词绝唱。作为当代人的徐君峰，以激情和诗性的文字发出自己的“幽情”，对读者的我的撞击，不仅有新鲜的启示，而且有诗意欣赏的享受了。

当作者的脚步踏进一方又一方非洲独有的纯自然的地域时，那种天然的诗情更率性了，溢于笔端，倾泻于文字，读来的感觉是扑面而来的鲜活。“当脚步落在大裂谷边缘悬壁远眺时，展现眼前的景象完全颠覆了以前的凭空猜测。谷底广阔，湖泊众多，植被繁密，田畴连陌，红、白、蓝三种颜色的农舍，错落有致地点缀在郁郁葱葱之中，蔚蓝天空下一片生机盎然。”读着这样的诗性文字，我的眼前便展现出一幅逼真的图像，如同身临其境，仿佛自己也站在东非大裂谷的悬壁上了。这儿不单是一幅天成的自然风景油画，更有作家最易触发欣羡的一座山，即海明威的名著《乞力马扎罗的雪》里的乞力马扎罗山，是非洲的最高峰。作为一般游客尽可以欣赏这座山的独特魅力，而作为这篇闻名于世的以此山命名的小说的读者，心中早已悬着这座山了，徐君峰心里悬着，我也悬着。徐君峰比我幸运，心中悬着的乞力马扎罗和真实的乞力马扎罗互相叠印互相参照的那一刻到来时，本来就属诗性质地的他，可以想象其激情喷涌之情状了。

我读完《别样的非洲》，还感知到一个派生的话题，诗性的激情对于专业艺术创作的人是至关致命的，诗性的激情一旦衰枯，创作的生命也就基本终结了。而作为从事社会实际职业的人，能潜存一种诗性的激情，尤为可贵到令人欣羡，不仅可以保持一种丰富多彩的精神世界，而且可以激励所承担的社会角色的责任感使命感，焕发创造的活力。这是我由徐君峰的眼睛里感知到的启示。愿君峰的诗性激情永驻不懈。

2009年6月20日 二府庄

感知并领受，一种鲜活的生命气象

结识画家赵振川很久了，不仅不属过从甚密，倒可以说过从甚疏。我的印象里是一张永远都笑着的脸，还有一头过早花白的头发。十多年前，振川送我一幅国画，名为《白鹿原》。我久久品赏，感到一派不凡的气韵。他说他专程到白鹿原上感受这道古原的气象，作成此画。我玩笑说，你该叫我为你领路当向导……

赵振川出生在一个艺术氛围浓厚的家庭，父亲赵望云是“长安画派”的创始人。赵振川自幼眼里便储入浓浓的色彩和墨痕，还有变幻神奇的线条，受到极好的艺术熏陶。受“长安画派”尊重传统、注重生活的艺术主张影响，四十多年来赵振川一直在国画创作领域默默奋斗，认真吸纳传统与前辈在创作实践中的所长，又不断在生活之中寻找新的国画创新的元素和活力，不断积累、不断丰富和提高自己，终于成为“长安画派”第二代的代表人物和当代山水画的大手笔。

与陕西其他艺术门类的艺术家类同，赵振川的山水画分量感足，厚重、扎实、大气。他的绘画有着牢固的生活根基，不是从书本到书本的产物，也不是只坐在画室里就可随便完成的东西。他的画里似可嗅出民间生活烟火气味，感知世道与人心。这一点不仅超凡脱俗，而且注定了画作的生命活力，也呈现出独禀的个性气质。

赵振川的人生经历和生活曾遭遇了太多的苦难，在他的生命里铸就了坚忍和坚定，生命体验和艺术感悟就形成了。让人通过他的绘画，感到了他对自然与生命本身的敬畏。

在赵振川的童年时期，父母被国民党特务逮捕入狱，这是一种堪称残酷的记忆。一九五九年，他的父亲又被打成“右派”，赵振川也被下放到了陇县山区长达八年。“文革”中，他的父亲遭受迫害致死，赵振川身体和心理上所承受的灾难是难以言传的。他伴随着苦难开始了自己的国画创作之路，却不忘记父亲的叮嘱，到民间、到生活、到自然和劳动的人群中汲取绘画的养分，也就获得艺术创作的灵感，将自己的情愫，倾情地寄托其中，靠一支画笔将升华了的生活展示为艺术。

赵振川的山水画令我感到震撼的是其背后呈现的生命格局。不论是画的陕南，还是陕北，都有一种向死而生的精神旨归，都饱含着充沛的生活气韵和活力。赵振川不大着意亭台楼阁、小桥流水和名山大川，即使画陕南，也不是田园牧歌，而是聚集陕南最具生活与生命活力的情境，展示自己心中超迈的人生；他笔下的陕北更是气象苍茫，荡气回肠。作为画家，他已走出了历史与个人的局限，使自己的绘画进入超时空的精神指向，呈现出生命昂扬的一种过程和气象。艺术作品最终要靠它所承载的生命格局来支撑。作品的气格，不是空穴来风，它是能够穿透世态表象，直逼人心的力量感，不矫饰，袒露而直率。赵振川的绘画正是在这一点上有着十足的分量和体量。他的绘画已经成为一种强大的精神存在，不仅有悲悯的情怀，而且有超凡脱俗的大爱。

绘画是一门空间的艺术。中国画是靠笔墨对空间进行营造而完成表达的目的。画家的修养情怀，艺术的动力，思想的力度，决定着体验的层次和个性化的独立品格，通过笔墨在空间的展示，和受众完成交流。赵振川的绘画正是在这一至关致命的关口实现了升华，抵达新的境地，独辟一方个性化的艺术天地。他依然非常讲究笔墨，但已经

很难分辨出属于哪一家哪一派的路数，而是融入了自己的理解，自己的情感元素，达到了对于自身笔墨随心所欲挥洒的自由状态。赵振川的绘画洋溢着鲜活的生活信息，他的构图、布局和点景，别具一格，不与别人雷同，深山野洼中的乡居小屋、田垄树石，见出一种艰难生存中的温馨。更难能可贵的是，读赵振川的绘画，总会给人带来启悟性的思考，自然来自画面里隐约着的生存的追问，让人感受到不是过程的结束，而是一个个新的开端和起始。

我比较喜欢具有穿透时空，也穿透表象，充满生命张力的艺术品。艺术在这个意义上与生命的气象直接相连，并且表现生命的大美与大气。中国画讲究气韵生动。我想这其中更多是指向绘画所表达的天地万物生命的气象、气格和气量。赵振川正是在这个层面进行绘画创作的，他的绘画是对生命气象的充沛表达。

愿振川在他已抵达的艺术的自由王国里，尽情尽兴挥洒。

2009年7月21日 二府庄

难得尽在传神处

多年前认识杨稳新并欣赏了他的国画作品，竟然经久不忘，每当再次碰面，脑际便泛出他的画儿来；甚至和人闲聊时偶尔提到他的名字，首先在脑际泛出的不是他被人多所赞美的颇为英俊的脸膛，倒是一看便烙下印记，多年也难以忘记的几幅画儿，自然也多有模样和画儿相叠印着浮在眼前的情景。

今天想到这种生活细节，似乎才意识到难得也更不易，一个画家，无论专业或业余，倾其毕生智慧不断探索，取得各自独到的艺术成就，也获得在画坛专业圈内不俗的评价且不论，能给如我一类画坛圈外的普通人留下一幅或几幅经久不忘的画儿，这位画家的代表作品大约就有了普及的意义，也就该当横空出世独俏一枝修成正果了。譬如一提到凡·高的名字，我的眼前便映现出向日葵的画面，多少人包括我在中学美术课上都画过这种美好的植物，却只有凡·高的向日葵储入我的记忆。画马的国画油画素描画更是无以数计，自然各具独自的魅力，然而常常面对姿态和色彩各异的马，下意识里不由自主便浮出徐悲鸿的那匹马来，甚至在草原上看到奔驰撒欢的马群，徐悲鸿的那匹和那几匹马顿时从我的脑海跃出，加入到草原上的马群中去了。还有石鲁那幅《转战陕北》，初见这幅画儿，算来四十多年了，听人说到或在文字中看到石鲁的名字，便泛出这幅画的颇为震撼的气势来。站立在汹涌的黄河岸边悬崖峭壁顶头的毛泽东，其实只是一个侧背形象，传达给读者的却是顶天立地力“主沉浮”的神韵。我充分地感知到所谓艺术的传神。徐悲鸿的那匹马，传神；凡·高的向日葵，传神。这三位大画家的笔下，侧背的革命领袖、动物世界的马和植物王国里的向日葵，都是以传神而横空出世，也给读者储成永久的记忆。

恰是在杨稳新的画儿里，我也感知到作为艺术创作难得的传神的韵味。我不厌其烦地也是随意地列举三位大艺术家的三幅画儿，无非是想说传神给读者的非同寻常的艺术感受，当不会发生我要把杨稳新的画儿推到不恰当的高度的错觉。是的，杨稳新的画儿，有传神的意韵，这才是我经久不忘的因由。

一幅《偶钓美人鱼》，让我久久流连，竟然一时难尽意趣。画面上只有一条鲤鱼和一根飘飘忽忽的钓绳儿，还有一个显然夸大了的鱼钩儿。那条头朝上身朝下弯曲着尾巴的鲤鱼，不过就是一条看不出任何特色的鲤鱼而已。让我意料不及到有点惊诧的一笔，就在那个被夸大了的钩儿上，它不是通常所见的钩住了鲤鱼的嘴，恰恰是钩住了鲤鱼弯曲上去的尾巴梢儿。这个完全违反生活常规的画面，初看似乎不无滑稽，再看便觉颇含某些生活哲理，一万和万一，必然和偶然，众里寻他千百度和得来全不费工夫，如此等等。这个鱼钩儿堪称神奇的一笔，将会钩起观赏者任谁都有的生活记忆里的偶然现象，那一瞬间，便和画家沟通了心领神会了。我在看见那个钩着鲤鱼尾巴梢儿的鱼钩儿时，竟然把五十年前在中学看过的一幅漫画钩出来了，那是一个记不得名字的外国漫画家的作品，也是取材于钓鱼，一个站立在河边的高个子男钓客，在猛然拉起钓绳的一瞬间，钓钩上没有钓住鱼，却钩住了钓客的屁股。我记得当时看到这幅漫画时忍不住大笑，周边的同学传看时惹起一片笑声。这两幅画儿画的都是出其不意的偶然，相比较而言，后者漫画更多的是惹人一笑的滑稽，而稳新钓住鲤鱼尾巴梢儿的那个钩儿，内蕴则丰富得多。这幅画儿的缺憾不在画本身，却在画家的题词，似乎多余，把令人浮想丰富的画面说白了，甚至说没了。不题那么多话更好，如出于画面需要，文字当更含蓄，才会与画面相映成趣，也给观赏者以联想的更大空间。

《梦中情人》又是一幅堪称绝妙的画作。这是一幅人物画儿，绝在不过三四线条，便勾画出一个青春女性的背影，尽得风韵。有多少人画过女人，从蒙娜丽莎到乡村妇姑，国画油画木刻素描，自然各有妙处，然而简约到不过三四线条便勾勒出一个女性不尽韵致的画儿，似不多见，不敢说唯一，在我确是第一次开了眼界。妙在这样简约的几根线条，却不容我轻易一瞥而放过，再三品读，又似乎难以做出精确的语言表达，大有只可意会而不可言传的神韵，我又一次感知到艺术创作里的传神。我也想到，艺术创造里往往有这种现象，最简约的却造成丰富的内蕴，成为艺术画廊里独特一景。

简约构成稳新国画创作的主调。几乎在我能见到的已不算少的画作里，都留着大面积的空白，不作任何陪衬的背景，总是在最恰当的位置上突出着所要表述的主体，对观赏的我发生直接的感性冲击，很难让我随便轻易放过。《高瞻》的画面下部，随意涂抹着横五竖三的意象形栅架，居中高竖一根独木，顶端俏立一只叫不出名字的鸟儿，传神尽在那回首远眺的神态，那只并未精细刻画的眼睛和超长的尖嘴，似可读出沉静的无畏，也可想象它已有过可资骄傲的飞行，却已抖落不记，只集中在即将开始的新的行程的凝眸与专注。《中秋明月夜》的画面也不过三五笔墨，底部两抹墨痕的地上，点抹着一个人的影像，顶端一笔勾成一轮满月，中间的大面积空白，恰是天上人间的空旷和阔远，然而却蕴聚着不尽的情思。这应该是一首难以用文字表述的，却是在一代一代中国人心灵和情感世界里传承最久远的情愫。草叶上的一只老蝉，细枝上张嘴鸣唱的小鸟，荷叶上的蜻蜓以及对着荷花飞舞的蜻蜓，黄芽柳枝下相倚而歇的鸟儿伴侣，自在嬉戏着的两条鱼伴儿，简约的画面都有让我再三品读的不尽意味。前述所说稳新画里的传神，便是我再三品赏中的领悟和感知。

传神不易。相对说来，状物较易。想要在画面需得点睛之处传出独特的神采来，不完全在技术层面的基本功力，而更依赖画家的独特体验。画家对生活事象以及山水花鸟，获得了独自独有的独特体验，以别具一格的笔墨表述出来，让如我一样的观赏者有触目惊心的感受，这画儿便获得了独有的品相，也获得了生命的活力。所谓的别出心裁，在我理解，就是独特体验。如果再有扎实老到的画画儿功夫，把那种独特体验展现得恰如其分，这幅画儿就脱俗了，成为独具个性的艺术品了。上述随意列举的稳新的几幅画儿，即如是。要想不断地获得富于生命活力又蕴含生活哲理的独特体验，更不易。在我理解，颇多依赖画家的思想。思想的敏锐和思想的深度，影响乃至决定画家对生活事象的理解，然后才可能发生独到的不落俗套的体验，才能勾出令人惊诧的传神一笔。正是在这一点上，我对稳新刮目相看。

稳新和我是乡党。我在灞河中游，南有白鹿原，北属骊山南麓，中间是灞河流经的狭长的小川道，已经处于渭河平原的边沿地区了，难免贫瘠和视野的局限。稳新家在灞河投入渭河的地段，当属开阔的渭河平原的腹地，天高地阔，沃野阡陌。在灞河渭河交汇处生长，真是得天独厚，不单麦谷保收，瓮里不缺白面细谷，而且视野开阔，一望无极，乡下人说眼宽心也宽。我后来才得知他曾经写过数量不少的诗歌，有长诗也多短章，却不仅不拿给我看，竟连一句也不提及。他说后来兴趣发生转移，痴迷丹青水墨了。他练书法，已有个性化的不俗书写，只是还不及钟明善那样的影响广泛的程度。他起初画月季，师从罗国士，我已经完全分辨不出那月季出自罗先生还是他的手笔了。虽然得了罗先生的神韵，却不能形成自己，画得越好越只能乱罗先生之真，不看署名，人不相信是他的作品。他另辟蹊径，开始独创意义的国画探索，把自己的独特体验用自己的审美笔墨涂抹出来，经几年持续探索，开始形成自己，也形成个性化的杨稳新的国画了。我

却说不清遗憾还是庆幸，少了一位诗人，却长成一位画家。不过也不必计较，他的那些画儿里还隐蕴着一缕淡淡的诗意，当是他的诗性的另一种艺术形式的表述吧。

2009年9月25日 二府庄

方言散谈

——《都市方言辞典·陕西卷》序

方言，顾名思义，乃一方地域的人使用的独有而又独特的语言。

中国国土阔大，历史悠久。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当即采取的几项重大举措之一，便是统一文字，遗憾的是没有统一汉字的规范读音，致使同一个汉字，南方和北方、东部和西部的人，发出截然不同的读音，造成直接交流的障碍。我听上海人和广东人说当地方言，几乎一句也听不懂，跟听外国人说英语或法语差不多。十多年前我到江苏一个中等城市去参加笔会，接触当地基层那些没有普及普通话的读者，说话要有翻译，不然连一句也听不懂。当地的朋友告诉我一个事实，说那里的方言划界很窄，甚至这个乡镇的人说话，相邻的另一个乡镇的人都听不懂，何况我这个关中人。正是在那一刻，我确凿感知到国家推广普通话的决策太英明了。

其实，就近而言，单是我所在的陕西，陕北、关中和陕南三大板块地域上的语言也截然不同，汉中地区人的口语已接近四川话，而陕北有些县区的作者和我说话，顶多只能听懂六成，另四成全凭推理了。即如关中，东府和西府的语言差别也不小，我听到过东府人调笑西府人说话的一个典型个例，把“要水上树逮老鼠”，说成“傻（要）谁（水）上世（树）逮老失（鼠）”。再往近处说，即如我的老家白鹿原北坡下的灞河川道，和我们村子仅一河相隔距离不过二三里路的对岸村子里的人说话，也有不少字词发音的差异，把“水”说成“邃”音，把“三”和“桑”读成一个音，如此等等。几百乃至几千年过来，各自一如

既往地说着各自的话，谁也不学对方的话而改口，甚至觉得对方的发音很滑稽。近到不过二三里距离的双方都不因对方说话而改口，这里应该潜存着方言传承的隐秘，值得细细考究。

对不同事物和世相的不同称谓和决然不同的说辞，是各路各地方言的又一实质性特色，也是方言最具魅力又具学术性价值之所在，当为汉语言博大丰富挖掘不尽的语言宝库。外地各种方言我不敢妄说，单是关中方言，就有无可替代的独有意蕴独有魅力。随意举例，关中人把父亲的弟弟称大，如果父亲有三五个弟弟便依次称为二大三大四大五大。这种称谓在外省外地似乎没有发现。然而令我惊诧的是，《金瓶梅》里的潘金莲给西门庆骚情时竟然把西门庆叫“大大”，西门庆在兴不可抑时也是自称大大。我在那一瞬间突发奇想，这两个活宝会不会是关中人，或者至少是跟关中人有某种亲缘关系（一笑）。再如表现人行为动作的吃，关中人除了也说吃外，还普遍说“咥”，似乎很土，土到出了潼关再没人能听得懂，不料却在古典文学《中山狼传》里早被人用过了，倒入得大雅之门了。这个“咥”字在关中人口里，早已从吃的意思扩展到许多的行为动作里，把某人打了或者说揍了一顿，关中人说咥了一顿，绝不会混淆为吃了一顿。把干成了一件大事，往往说成咥了个大活儿。这个咥字所表述的几种生动的情状，远非吃和打和干这些通常所用的词儿所可比拟。我便推想，方言之所以经久到百年千年传承不衰，它的不可替代的表述魅力，当为一个重要因由。

在我来说，生长在渭河平原东南部的边沿地带，学会说话便注定了满口基本标准的关中东府口音，直到青年时期第一次走出潼关，和外路人一搭话，才发觉自家所操口音的局限和拘束，别人听不懂自己的某些话。然而，让我真正关注关中方言，却在此前的少年时期就开

始了，那是我在中学作文本上写下第一篇小说的时候，就开始寻找方言中那些形象而又生动的词汇。算下来有五十年了，我一直在寻找我的母语方言里的精粹，其乐无穷，却也几经波折。起初，误以为越土乃至越怪僻的方言才愈生动新鲜，结果却造成读者阅读的障碍；有许多方言，一时找不到准确的汉字，只能依着发音用相应的汉字代替，结果造成完全相反的负面效应，那些代替的相应的汉字，根本不能传达那个方言语汇的原来意思。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即《白鹿原》开始写作时，关于方言土语的运用，才基本确定下来一个规矩，即，凡是从字面上可以表述词汇百分之九十以上含义的方言，便用，起码能让外路读者从字面上理解到六成意思，才能体现方言的独有韵味，方言才有阅读的意义和活力。反之，方言对于叙述或描写以及对话的语言，效果当适得其反。从我写《白》以及后来读者阅读的效应看，恰当的方言土语运用到叙述语言中，可以强化其语感的硬度和韧性。

话说到此，我便要说到前不久发生的一种深以为憾的情绪。这是我看到《都市方言辞典·陕西卷》后发生的。我刚刚翻阅了一些内容，这种遗憾的情绪便发生了，很自然的又是甚为强烈的反应。原因再直接不过，我曾经苦苦寻找的许多方言的原生汉字，因为寻找不到，便忍痛舍弃，把许多独有意蕴独有魅力的方言词汇丢弃了。这些在我无奈舍弃的准确而又传神的方言的真身，在这部《陕西卷》里都列入了，不仅标出原生态读音，而且阐明出处，注释有据，还有简要的演变过程。我便很直接也很自然地想到，如果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能拥有这样一部堪称陕西方言大全的辞典，不仅会让我节省许多寻找的工夫，更会使我选择方言的空间扩大很多，也会避免丢弃许多传神而又富魅力的方言词汇的损失……这不过是仅我而言。

待我细细翻阅这部《都市方言辞典·陕西卷》的时候，才感知到这是一部难得的力作。这部陕西方言辞典收录常用的方言词汇一万余条，说是陕西方言大全当为恰切。我觉得编撰者最富价值意义的功劳，是把那些陕西人口头说了不知几百或几千年的方言土语，一一做了严密的考证，一条一条列出这些看似土得掉渣的方言土语的典籍出处，顿然平添一缕优雅气象；又搜集到一些以此方言演绎的歇后语和笑话等，不仅让我领受到方言特有的韵味，更感受到阅读的纯粹的文字本身的乐趣。我便想到，陕西方言土语对于人的表述——文字或口头——的丰富和生动，是不可缺失的；对于交流过程中的普通话的普及和标准词汇的普及，难以避免语言的平淡乃至萎缩，方言当会注入一种别具魅力的语言的活力。我便建议，在公众场合或与外路人对话时，尽可能用普通话和标准词汇，而与本乡人和家人说事拉话，不妨换成自己家乡的方言口语，既亲切，又自如，而且保护又延续了一方地域独有的方言的生命力。谁如果觉得说陕西话太土气，不妨读一读《都市方言辞典·陕西卷》，当会树立起说陕西话的兴趣，更有自信和骄傲。

我向这部辞典的编著者胡劲涛、孙立新、史鹏飞，诚表敬意，对于悠久而又优美的陕西方言的系统化规范化开掘，你们功莫大焉；同样，对于生动鲜活而又独具魅力的陕西方言的流传，以及对祖国汉语语言的丰富，你们干了一件功德无量的大事。面对这部辞典，用卷帙浩繁当不为过，每一个词条的考证，我想到你们花费的无法量化的工夫，非有一番成就事业的专注而难以成事。基于此，我向诸位表示诚挚的敬意。你们富于创造性的工作精神，当会在这部辞典的读者阅读时的会心微笑里得到报答，这应是最珍贵的奖赏。

2009年10月15日 二府庄

感知一种真实的精神高尚和情感丰满

我是第二次观看《大树西迁》了。几年前《西部风景》完成创作，初演时我就看过。这部戏经过作者的不断修改、提升，今天再观看《大树西迁》，我确实被它所感动、所感染，甚至震撼了。

《大树西迁》所选题材的生活原型是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交通大学从上海西迁西安的历史事件。交大西迁，这个事件蕴含着一个大的社会时代背景：五十年代中期，刚刚成立不久的共和国雄心勃勃地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一个重要思路是全面发展、开发西部，提升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实力。而发展西部最重要的一个契机就是科学文化知识的提升，科学文化知识向来是解决贫穷愚昧落后最基本的也可以说是唯一的途径，不仅中国如此，世界上很多先进文明国家都是通过这一途径获得发展的。交大从上海西迁西安，就是在共和国刚刚成立，振兴国家、振兴民族成为整个社会最迫切的要求时，国家做出的一个重大而又英明的决策。通过这个事件，可以看到共和国刚刚成立的那个时期，社会和人心的倾向，所以“大树西迁”这个剧名也就具有一个时代的独有的气象表征。

依托这个典型的时代生活背景，剧作家陈彦以苏毅和孟冰茜组成的知识分子家庭为主线，展示了这个家庭在社会的进程中，为国家的复兴复壮而不息奉献的精神追求和生存理念。苏毅对于国家民族复兴大业的那种自觉承担精神是真实的，是令人感奋的。我是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过来的人（尽管是少年时代），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无论长幼，无论男女，无论个人性格，对国家和民族的精神牵连和心理承担，已经成为他们生命意义和个人品质最主流的东西，苏毅身上有一

种坚定的，甚至是急不可待的奉献精神，完全可以说，他是五十年代知识分子的典型代表，他的身上凝聚着那个时代知识分子共有的，弥散着那个时代特有的社会气氛。可以说，要感受上世纪五十年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心理情怀，请看苏毅一家！

孟冰茜是剧中另一个知识分子典范，是贯穿全剧的一个主要人物。孟冰茜在对民族和国家大业的精神承担上与苏毅是共同的，作为知识分子的她，在传播知识、承担责任、科学探索、无私奉献这些方面，与苏毅相比都毫不逊色，从这一点讲，这是一对完美的夫妻。只是因为孟冰茜对于上海当时中国最发达城市的生活的留恋，也包含乡土情结，形成了后来贯穿剧中的矛盾冲突和情感波动。而这也使得孟冰茜的个性特征和心理情感更为多面，更为丰富。最令人感动的是，在“文革”中面临几乎是毁灭性打击，甚至有生命危险的时候，孟冰茜那种对苏毅爱情的坚贞、对社会邪恶势力的坚定而义无反顾的对抗，不仅展示出一个知识分子的妻子对丈夫的美好情感，更显示出一个知识分子女性自身的精神闪光点，“打倒了你是我的百宝店，踏碎了你是我的珍珠衫。批斗会我搀你人前站，再跪下妻陪你把膝弯。危难中夫妻不分散，我是你永远的行星生命的港湾”，我听到这个地方时，不由得心里打战，这是剧作震撼人心的一笔。孟冰茜是一个非常丰满的女性知识分子的舞台形象，她不仅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知识分子的一个典型形象，也是贯穿并延伸到新时期的一个典型形象。

在与儿女的情感上，又体现出孟冰茜这个女性非常美好而动人的一面。矛盾发生在儿女的前途、工作和家庭的选择上：儿子要继承祖父的遗愿到更远的新疆去（祖父是解放前献身新疆的科技工作者），女儿要选择陕西娃做丈夫。儿子对个人前途的选择，无疑是既继承了苏毅又继承了未能见面的祖父那种对国家民族自觉承担的精神理想。

而她恰恰希望两个孩子回到故乡上海，正是在对儿女的亲情、爱情的指向上发生冲突，突显出孟冰茜心理和情感真实丰富而又动人的一面。

剧作中不乏让人发生哲理式思维的闪光点，即如孟冰茜后来回到上海时出现的某些不适。当初从上海迁来西安，情感上本有一种对上海故土难舍的依恋；在西北奉献了大半生，实际上在不知不觉中她的情感已经和西北黄土地完全融汇到一起了；当她老年时重新回到上海后，她精神和心理上所产生的某些感受，却和她潜藏在心底几十年的心理依托发生了矛盾，这是探索人的精神和心理历程很微妙的一笔。由此我觉得陈彦这个戏，写人的精神心理是很精辟很独到的。

陈彦在塑造孟冰茜这个人物上，我觉得很了不起的，甚至是我很钦佩的一点。他不是出奇招、怪招制胜，不是像我们现在看过的一些电影、电视甚至一些小说凭猎奇乃至瞎编某些怪异来引发读者的兴趣；他是把我们生活世相中最具普遍意义的人的一些心理历程凝结成故事情节，在人物关系中展示人物丰富的内心世界。陈彦努力寻求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知识分子精神历程中最富典型意义的事件，然后以普遍大众都能亲自感知和感受到的一些世相作为表述形式。比如，你想把儿女留在大城市，儿女却志在边疆；你想让儿女找一个现代一点、新潮一点的对象，儿女却愿意选择一个从表象上看比较落后地域的人组织家庭。这些世相是任何一个家庭都可能面临的，所以孟冰茜的情感能引起大多数普通观众的心理呼应。不仅《大树西迁》如此，《迟开的玫瑰》中也体现了这一点。《迟开的玫瑰》中有什么大得惊人的事件吗？没有。它选取的都是我们社会生活中每个家庭、每个个人都可能遇到的生活矛盾，然后把它典型化，通过人物关系、人物命运、人物的生活态度来塑造人物。这不仅体现了一个作家感受生活的敏锐

程度，更难得的是他将普通生活典型提升的深厚功力，往往见出作家思想的深刻性，这是作家最致命的、也是最令人钦敬的一点。

再说李梅的演出。我看过李梅主演的《迟开的玫瑰》《大树西迁》两部大戏，《大树西迁》中李梅的表演，从个人形象、精神气象方面已完全不同于《迟开的玫瑰》中的大姐乔雪梅。乔雪梅是一个社会普通家庭中的一员，而孟冰茜完全是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形象。高级知识分子女性形象是很不容易塑造的，尤其是要塑造得让人感觉真实、可信、可亲。《大树西迁》演到中后半部分时，我们已经看不见李梅的影子，只看见一个典型的富有个性的知识分子孟冰茜的形象呈现在舞台上。李梅能完成这一艺术角色的塑造，应该说她的艺术表演得到了一次升华；同时也展现出她开阔的舞台艺术创作空间，既能演好普通市民，也能演好高级知识分子。可以说，这是李梅表演艺术的又一次大跨越。

2009年10月31日 二府庄

少年笔下有雅韵

——《胡雪诗集》序

胡雪的这本诗集，收入五十余首诗歌。在我有限的阅读印象里，这是篇幅最少的一本诗集了。然而恰是这本篇幅最小书稿最薄的诗集，却给我欣赏性阅读以厚重的感觉。这种厚重的感觉，是一本篇幅最小书稿顶薄的诗集影响给我的阅读效应，我便顿然明白了一个带有哲理性的生活常识，无论是诗歌或其他形式的艺术品，分量不全在文字的数量和纸张的薄厚，而在文字的内蕴的多或寡，深或浅，丰或歉。胡雪的这本最薄的诗集，却给我造成深沉丰厚的阅读感受，正是上述这种生活哲理的一个可靠的例证。

这种阅读感觉，说来真有点始料不及。始料不及便很自然发生惊讶，包括震惊。始料不及的因由之一在于这本诗集的构成，绝大部分诗歌是中国传统的各类古体诗，另有几首自由体现代诗，绝妙的是还有几首用英文写的诗。在我的印象里，新时期文艺复兴以来的三十余年间，被冷漠乃至冰封了的中国传统古体诗歌，日渐复兴日渐繁荣起来，报纸杂志随处可见，单是陕西就有三四种专发古体诗词的刊物，似乎和现代新诗有平分天下的壮观景象。就我的印象说，热衷这种古体诗词创作的诗人，多是古典文学学识渊博的老学者；再有相当一大批喜欢传统文学的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卸去重负获得支配时间的自由之后，沉浸在古体诗词的遣词造句的乐趣之中；而年轻人专注于古体诗词写作的就很少了。胡雪按流行的提法当属“80后”，不仅能写古体诗词，而且能用英文写现代诗，真可谓集传统与现代为一身，或者用通俗的民间话语说，是“中西并举”或“土洋结合”

了。一本集中国古体诗和英文自由诗的个人诗集，在我确凿是第一次看到，开了眼界。

始料不及的因由之二，在于作者的年龄。诗集没有作者胡雪的简介，笼统只知是“80后”，我从几首诗后所署的写作时间推算，胡雪古体诗的写作是从少年时期就开始了。这本诗集中所显示的最早一首古体诗写于一九九八年二月，当为少年时代。当今本省外省常有少年诗人少年作家频频跃上文坛，本不足奇。胡雪这位少年小诗人之所以引发我始料不及的惊奇，概出于她的古体诗本身的不凡意韵，包括颇为深奥的词汇，似乎和她这样年龄档的孩子很不相称。换一个更直白的说法，一个尚属少年年龄区段的女孩，竟然能写出一篇篇让人感到深奥不俗的诗词，且不说天才之类已被用滥了的称谓，却真的是我颇觉惊诧的不同凡响的稀有之声。就我的感知而言，中国古典诗词的创作是容不得半点马虎的，姑且不论诗或词境界的高下，也不究其对仗以及合辙与否，单是最直观的语汇表述，即可一目了然作者古典文学储备的虚或实了，或者如俗话所说肚子里有几滴墨水了。我随意录出这本诗集中写得最早也写得较多的一九九八年的一首《无题》，是有感于一首英文老歌《花落何处》吟诵而成的：“别鹤辗转凄长空，齐眉举案意难平。兰言尽释浩劫苦，风花雪月寄苍生。可怜硝烟葬落英，独绕香冢泣残红。朝歌夜啼天尽头，超尘漂泊觅风流。”单是文字词汇，很难让我想到这是出自一个小学生或中学生的笔下。因由不言自明，仅凭现行的中小学语文课本收录的有限的古典文学课文，断不可能造就成这样的古典诗词的文字修养来。小小年纪的胡雪，如何获得这样令人惊诧的古典文学修养，尚未得知，且不猜测，总归有其途径，难得在于这个事实本身。

无论古今诗人，无论古体诗或新诗，都为抒情言志。正是在抒发了什么样的情又直言了什么样的志，才铸成一个个独成风景的伟大诗人。胡雪的诗歌创作，也是触景生情，情里见出不同凡响之志，尤其是在少年时代所抒之情所言之志。一九九八年，是这本诗集中收录的诗歌最多的一年，当为小诗人诗兴迸发的一年，随意选读这一年所写的诗篇，都可以感知到这个少年对美的崇尚，对善的真诚，对高雅的精神境界的憧憬。小诗人看过《罗马假日》，把童话世界里的天使具象为影片里的奥黛丽·赫本，吟成一首七绝："清漫幽谷质如兰，优游竹馨逸翩涵。概本济世一天仙，凡间不改莞尔颜。"且缓品读这首诗的内蕴，单是第一句"清漫幽谷质如兰"，就见出这位少年的心灵追求了，如幽谷兰花一样清纯的质地。在尚未成年的年龄区段，有对自己人生境界这样纯洁而又这样明晰的追求，令我感佩。这种对人生清纯高雅质地追求的情绪，多所袒露，《贻韩昌黎》七绝里有"高洁犹似出水莲……骨格清奇非俗流"的佳句；在《贻贤弟》里有"羡君风采超凡尘"句，等等。无论是兰或莲，都是一种纯洁的象征物，拒绝的对应物是"凡尘"。一个在少年时代便把兰和莲植入心灵的女孩，便有了拒绝不断翻新着的流行的庸俗的自觉和自信。

这样高雅纯粹的心灵质地的构建和精神世界的追求，贯穿着胡雪从少年到青年的整个生命历程，有诗为证。在《神女吟》一诗中，胡雪赞美历史小说《康熙大帝》里一个"身为奴才"的女子苏麻喇姑，称"她是我心中最圣洁的'神女'"，不惜篇幅以二十行的五言诗，"表达对这位'神女'的敬意"。之所以将一个身份为奴才的女性视为"神女"，在于"她有无比高贵的铮铮傲骨"。人的心灵和精神品相的高雅或低劣，不是爵位决定的，胡雪心中敬仰的"神女"，恰是一个奴才身份。这里我注意到小诗人用了"傲骨"这个词，标示着少年诗人到青年诗人胡雪的独立风姿了。从兰和莲的清纯高洁质地的憧憬到对"神女""铮铮傲

骨”的敬慕，胡雪的心理和精神境界已经形成自己一方独立亦独有的气象了。这个人格的构建过程，呈现在她的诗作里，从一九九八年到二〇〇九年的诗篇里，我能感知这种精神追求和人格升华的履痕。随意举一九九九年作的《广寒行》，小诗人表白：“曲高和寡本无妨，吾自风流自慨慷。此等圣贤虽寂寞，恒飘万世一缕香。”在社会愈来愈风行实用乃至迷俗的氛围里，这个处于少年到青年的人生交界处的胡雪，能有“曲高和寡本无妨”的心理自信，再有十年多的对“一缕香”的坚守，才铸成纷繁世相芸芸众生里一个独立个性的人。依着我的理解，无论就其年龄区段而言，无论就其成长的生活背景而言，能以如此清醒的自信完成心理和精神的铸建，令我感动并钦佩。胡雪这本诗集收入的诗篇不多，却都保持着甚为高雅的品相，无论状物写景，无论抒发情感，都有堪称绝妙意蕴的文字，可以耐得再二再三品味。古往今来，多少人被林黛玉感动过，留下的文字无以数计，胡雪仍然有自己新鲜的体验，“倦柳残荷惜瘦影，泣血穷年化诗魂”。显然已见作者的情怀了，其中状物对柳用“倦”，对荷用“残”，对人用“瘦”，再着一个朦胧的“影”，营造出任谁读来都会发生“惜”的情怀。到“泣血”句，便是作者的情感抒发和情感寄托了。再如《七步诗》这个几乎家喻户晓的历史故事，我已记不得多少年前初读那首五言绝句时发生的心灵冲击，却终究没有留下一个字的笔墨，少年胡雪却吟成一首七律，对于亲情相煎的人间悲剧发出了讨伐的声音，“天理难寻愤难平，哪管凄凄与清清”。当为可见作者情状的佳句。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七言叙事诗《广寒行》。这首长达近六十行的较大篇幅的诗，是作者的一个梦的叙述。从作者注里得知，年仅十七岁时做了这样一个奇妙的梦，并写成此诗。我不必全面评说这首诗的意境，单说一点，可以看出作者丰富的想象力；或者说，是小诗人超人的想象力的充分展示。常识在于想象力是一切艺术创造的关键之

一，可以说没有丰富的想象力，是绝难进行艺术创造的。十七岁的胡雪在《广寒行》里所展现的想象天赋，令我惊诧到惊叹了，且不说天才之类。另外，这首长达五十多句的七言诗，文字意蕴生动，工整，更在典雅，尤为难得达到的一种艺术境界，却是一个十七岁的小诗人创造出来的。

这篇短文只涉及这本诗集里的古体诗，谈了我的一两点欣赏感受，其中的几首新诗尚未涉及，发觉短文已经不短了，当即刹住，对于同样有话可说的新诗，留下余地，待后再品读。至于胡雪用英文写的诗，对于我这个至今连“OK”都不会说的人来说，只能是“望洋兴叹”了。

2009年11月24日 二府庄

用生命的体验思考生命的价值

——《死囚牢里的陪号》序

我和剑铭相识相交几十年了，我俩既不是热爱到扎堆结伙，也不是互相提携你捧我吹。几十年过来，剑铭大约有两篇写到我们逸事的千字短文；我也只有一封对他作品点评的书信。然而我心里有个剑铭，或者说剑铭实实在在存储在我心里，遇着机会见面，握一把手就觉得很坦然了。剑铭小我两岁，如今也早已过了花甲之年。可我心里却始终萦绕着一个小小的核儿，就是温情，就是友谊。

《死囚牢里的陪号》这部书，剑铭给我，起初我不想看。原因是几年前我曾读过老作家从维熙的一本书《走进混沌》，是写作者被打成右派，在劳改场接受改造期间的生活，阅读起来很痛苦，那种生活简直是惨不忍睹……从那以后我就下定决心，今后凡是写监狱劳改生活的作品，就不看了！为啥？痛苦不堪，不忍卒读！我知道剑铭这部书写的是啥，所以我也不准备读这书。和剑铭相交大半辈子，对他的遭遇我也知道，他那个案子我也比较清楚。很荒唐，荒唐到了让人无言，无话可说。剑铭出狱后我们无数次见面，我在他面前基本不提这件事……剑铭中途曾给我打过电话，问我看了没。我还是不想看。直到最近我才开始读，而且读得很认真，当然也很痛苦。

作品主要写的是他蒙冤入狱，又被派到死囚牢当“陪号”的经历。在那个社会最不堪的环境里，面对形形色色的案件，与那些最不堪的人日夜厮守，剑铭面对的这一切真令人惨不忍睹！剑铭这么一位作家、一位名记者，被抛入这样一种最不堪的环境里却能坦然处之，我

对剑铭适应生存环境的能力深感敬佩！我觉得最重要的是剑铭的冷静与清醒，他既把这些人当作死囚犯人，又把他们看作生命走向最不堪的境地的人来对待，以作家的良知来理解或者叫剖析他们走向不堪的心灵轨迹。书中有一个细节，看到那时我的心都在打战——几个十八九岁的孩子，明知道自己明天就要被拉出去枪毙，晚上，他们还在打扑克，而且打得很认真，谁出错了牌还要遭到“对家”的指责……哎呀！这究竟是怎样一种心态啊?

这时我才忽然认识到我过去不大注意的，一个对我们的社会、对人的命运有着重大思考的徐剑铭。他在那种最不堪的环境中，自己又身负奇冤，却在对生命、对社会进行着深度的思考；而正是因为这种思考源自作者血泪交织的生命体验，有着令人震撼的真实，才使这部书有了更深的更重要的价值。而这部书的出版，不仅要对它的文学艺术价值做出评价，更重要的是，它为社会提供了一个样本。通过这个样本，我们需要思考的不仅是法律的健全，而且还要思考如何认识我们这个正在发展中艰难前行的社会……我觉得我们的舆论应当有勇气把这本书推出去，让它进入更广泛的社会领域，让那些权力者们看到并引发他们的反思，尤其是让那些对我们的社会发展起到关键作用的人看到这部书。这比我们这些文人在这里空谈要强得多！

这两年，剑铭写的作品很多，读都读不过来。听人说，《死囚牢里的陪号》是剑铭作品的顶峰，我要说，且慢！徐剑铭还有《血沃高原》，还有《立马中条》。《立马中条》写得气壮山河……所以我说，剑铭的作品是群峰林立，各有建树！

2009年11月28日 西安

精神高蹈之履痕，坚实行走的伴唱

——《黄楼吟》序

电话里得知他又要出版诗集了，我的直觉反应是，他还在写诗。这种反应不算很强烈，却有着个例的非常感受。这本即将出版的诗集应该是他的第三本诗集了，可见他以古体诗为主的创作一直伴随着他的人生步履，并没有因为生活角色的变化社会职位的升迁和肩头承载的加重而泯灭了他的诗兴和诗情。或者用我独自的理解来说，无论他承担的社会职务的责任怎样不断加负，那一根对文学敏感的神经不仅没有疲惫，诗兴诗情依然汹涌，在我的感知里就觉得难得而又可贵了。我同时也意识到一个基本的事实，这个诗兴诗情不断迸发有如潮涌的诗人，却在任何报刊上几乎看不到他的诗歌发表。以我粗略的印象，单是本省就有至少三种专门刊发古体诗词的杂志，其他综合类杂志和报纸也时常可见古体诗词作品，却难得一见孟建国的名字。我便自然地想到，这是一个低调处事不事张扬的人；也印证了他关于诗歌创作的一贯不渝的初衷，即随时把生活的触发和感动凝结成诗诉诸文字留存下来。几乎类近日记，留下人生情感和心理以及精神世界的浪花点滴；倒不在乎发表，自然也无意于要奔某种诗歌创作的艺术境界，确凿是一种情感和精神的抒发和表述，这大约应该是诗歌这种艺术最原始也最本真的创作因由了。依着这种完全排除了功利目的的诗歌创作，其情感的真实和精神境界的表述，当是可靠的，可资信赖的，也足以洞察一个人真实、丰富而又鲜活的内心世界，一个独立秉性的这一个人便跃然纸上。

这个独立品相的孟建国，我在六七年前就领略到了，是在赏读他的第二部诗集《风雨尘声》时形成的。这是确凿的事，在此之前我和他几乎没有私交，只是在公务活动中认识又有几次碰面，匆匆间只留着浮表的印象。及至读过《风雨尘声》，一个独立禀赋独立个性的人便呈现在我的眼前。他的生活角色是关中一个县的主要负责人，一个县的经济发展的快或慢，完全在于他的思路他的决策和实干的举措，所谓执政能力。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便是亲民的情感，往往影响着决策的质量和举措的实效。且不论他在市县执政时的政绩，单是他直言不讳表述的那种对乡民的情感，就深深地打动了我，甚至不无震撼。我且举这样几句诗："农人稍温饱，摊派接踵来……花样何其多，手段何其歪！譬若唐僧肉，争食亦哀哉！"作为一个县的掌事人，孟建国不仅强烈地意识到自己肩负的责任，更难能可贵在他毫不掩饰地发出自律自省的心声："愧我执县事，止遏力未逮。兹事枉食禄，殷忧常萦怀。"无须细究或赘述他如何尽职尽责又倾心倾力地为乡民减负的举措和政绩了，单是这种伤乡民之所伤痛乡民之所痛的真情柔肠，尤其是未能阻止未能尽快解除乡民负担的自我反省自我责问的精神，已经展示出作为一个县的掌事人所独具个性的精神品格了。我读到这些发自心底溢泛着真实情感的诗句，不仅感知到孟建国的内里，同时也肃然起敬了。

六七年后，我面对孟建国即将付梓的新作诗稿《黄楼吟》的时候，很自然地想到，几经变换工作岗位，及至进入省政府核心部门的孟建国，视野无疑更加开阔了，工作无疑更是千头万绪般的繁杂，能够依旧持续着那种诗性的纯情和激情，我竟生发一种看似无端却也有缘的欣慰，洋溢着诗性情怀的孟建国，才是完整而又丰富的孟建国，也就是我阅读《风雨尘声》印象里一路走来一路吟诵着的孟建国。

触景生情是人类所有不同种族的人共同的感受，多情善感的诗人尤其如此。景自然多指气象万千的自然风物山水奇观，也包括人生情状生活际遇社会万象。单就自然景观而言，面对同一时令里的同一物象（景物），不同的人所发出的情怀情感却差异迥然，甚至相去甚远，显示出的不仅是喜好和兴趣的个性差异，更在襟怀、理想和人生志向的差别，诗人的个性化特征就跃然纸上。即如同一位诗人，不同时段观览同一景物，却生发出不同的感受和体验，可见其此时此地与彼时彼地的不同心境，更可看出其深化了的思想和跃升起来的精神境界。这是我从《黄楼吟》的长诗《华山秋》里感知得到的。古往今来，有多少诗人登临华山，留下各具风采的不朽诗篇，而孟建国在一个秋日登临华山之后，竟然一气呵成近百句五言诗，可谓倾情畅怀，可谓放胆言志，自然见性见情。仅举其中尤见性情的诗句共赏："岁月催人老，虚名误人深。"无论官场，无论文坛，抑或社会各个场合，都难以躲避名和利的诱惑，实至名归和应获之利自不必说，麻烦恰在一个"虚"字上，不仅误人太深，也造成层出不穷花样翻新的丑事。身处官场的孟建国，能有如此清醒的理性，就令我这个长过他许多岁的人又一次肃然而生敬意了。

"尘海苍茫茫，何处辨浊清？正气未充盈，清流怎洁身？尘嚣滚滚来，江湖水难清。"这些发问的诗句，显然是直指生活世相里的丑恶所造成的混浊，不仅可以看到诗人面对甚嚣尘上的浊流的清醒，更可感知到严词诘问里的正义之声，确凿传达出一种凛然正气。面对这种纷繁且多有混浊的生活世相，诗人不单诘问，而且袒胸亮怀："胸中存静气，怀抱有清风。谈笑看山水，净心出围城。"这无疑是简洁直白毫不含糊的人生取向。在此，我想强调一点，孟建国胸怀里的"静气"和"清风"，不是通常意义上业已多见的"淡泊"或"无争"，这些词既含有洁身自好却也有淡出生活无所作为的某些消极情绪；面对生活世相里的纷

繁和混浊，孟建国不是淡泊以至淡出，而是卓立其中的凛然和决绝，标示着一个真正共产党人——官员兼诗人——的精神境界和品格操守。《尚书·尧典》有言："诗言志"。这篇因登临华山而触景生情喷涌而出的激情诗章里，托情而言的人生志向人生追求人格坚守，坦荡而又自如，大约只有在峻峭挺拔的华山上获得寄托才是合情又合理的。

孟建国的这种人生志向、情怀和道德，在许多诗篇里都有抒写，佳句迭出。借托一只掠过天空的无名小鸟，顿生出"虽然没有痕迹，飞翔就是充实"。看似平实无奇的诗句，却蕴藏着一种人生可资信赖的生活哲理，"飞翔就是充实"。鸟儿的飞翔可以类比为人类的劳动，富于开创意义的探索性劳动，可以获得人生的充实感，最普通的劳动同样能够获得人生的充实感，恰如哲人所说的"劳动着是幸福的"。幸福的基础首先是充实。这里对充实感的突出性强调和歌颂，正对应着诗人对虚名的鄙视（前文已涉及），一脉相承着作者努力做事不图虚名的人生姿态。还有一首不能不提及的七律《黄楼吟》，是孟建国进入省政府这个令人瞩目的大院之后，审视并确立的做人做事的务实姿态。这个大院里的一座富于历史意蕴的建筑——黄楼，是杨虎城张学良当年策动"西安事变"的遗址，自然有着非同寻常的意义。这首七律《黄楼吟》里有这样两句直抒胸臆的难得的佳句："任事唯恐辱使命，竭诚总耻问前程。"我读到此诗，明白之所以产生难得的佳句，就在"总耻"这两个字上。一个但凡接手大小事项都要认真做好"唯恐辱使命"的人，对于自身的发展前程，或者直白了说升迁挪移，却是"总耻问"及。谁都大略知道许久以来跑官要官已成为一种社会公害，贿赂买官的丑闻时有暴露，某些人为着升官晋级闹得脸厚心黑。身在黄楼院里的孟建国，却怀着一颗羞怯之心，向来不问自己的"前程"。我便想到二十多年前写过的短篇小说《害羞》，大致也是缘此而发生创作冲动。商品经济运动过程中的趋利追逐，把道德恪守的堤坝冲决摧毁，

连其底线的羞耻之心也荡涤了。难得害羞。如果羞耻之心未泯，坚守住做官做人的基本道德操守，也完善着行走在大千世界里的自尊和自信。孟建国的一贯的“总耻”，恰是颇可珍贵的又是健康健全的一种心理质地，那些在华山激情吟诵正气凛然的诗章，从这样质地的心怀发出是合理的，也是自然的。

上述较多的文字说到孟建国诗中所坦诚直抒的人生真谛，无疑是读者的我最为动心并生发敬重的情感。其实，这部《黄楼吟》诗集里，展示着孟建国多姿多彩的生活，丰富的情感，多重的情趣，甚至不乏令我哑然生笑的诙谐幽默。许是工作的机遇，孟建国走遍中国，也走过不少国家，中国的和异域的文物古迹和名山大川，都能在一瞥间吟诵出或长或短的诗词来，其文学神经之敏感可见一斑。尤其令我感兴趣的是，对行车途中匆匆一览的景致，或是走过异国街头的市井见闻，都能描绘出生动的别一番风景和风情。随意举一首《印度见闻》：“都市繁华牛横行，信步大街若闲庭……妻子负重纱丽卷，丈夫沽酒绅士风……”牛可以在繁华闹市信步游走，当为世界奇闻异景，且不说妻子负重丈夫自在饮酒的风情。孟诗人描绘得栩栩如生，读者我也顿生情趣。再如诗人至埃及的卢索克帝王谷时，这个埋葬着古埃及六十二位帝王的谷地里的景象，大笔略过，最末两句竟勾出一幅现实生活图景：“游客如鲫接踵来，土人顽石也卖钱。”神圣的帝王陵墓区里，对当今的埃及老百姓而言，不过是一个难得赚钱过日子的好地方，以至“土人顽石也卖钱”。这些生动的异国生活情趣的勾画，有如速写，信笔拈来，可见诗人的性情。还有《登里约耶稣山》，看到万众朝拜的巴西里约热内卢北侧的耶稣山上的巨大的耶稣雕像，诗的末尾发出道破真谛的诤诤实话：“倘使不存良善愿，信耶信佛皆枉然。”我读到这末尾一句，竟忍俊不禁击掌称妙叫绝。关中民间有谚语：“嘴里念佛哩，心里啰活哩。”“啰活”这个乡村方言，多指谋划或下手干坏

事。这是嘲讽那些把佛挂在嘴上当作招摇幌子，心里却想着干坏事的人；也泛指那些唱着高调说着漂亮话却常干丑事的言行不一的两面人。几大宗教的共通一点，就是教人向善。孟建国的诗句和民间广泛流传的谚语互为印证，可见民声和孟声审美判断之一致。我之所以忍不住击掌叫绝，自然也是一种心理应和。

《黄楼吟》诗集里收入不少写给具体人的诗篇，有的标明对象人名，有的用英文字母标示某君。从诗的字里词间，约略可以猜测是同学、同事、朋友等等。这些写给他们的诗，有对友情的珍视，有对写作对象品格的赞美，更有对其纯情的寄语。如果要找共同点，我能感到的是孟建国的真诚和真情，没有夸张之词，更无矫情虚意，对所有有名姓的和所有“某君”，都是推心置腹的纯情凝结的诗句，尤可见他处世待人的本真质地。二〇〇四年春节写的《致J君》七绝：“借得春风几缕情，送与先生入年珍。诸事参透天地大，岁岁除夕听炮声。”友人友情的感动和感悟，细密柔情里的旷达和率性，跃然字里行间。这些写给友人的诗篇，往往是几笔便勾勒出对方的典型特征，足见诗人笔底之功力不凡。

说到笔底功夫，孟建国的《黄楼吟》确凿令我惊叹。且以《华山秋》这篇篇幅很长的五言诗来说，尤可见出非同寻常。诗人秋日登上华山，且不论借景畅怀的豪壮与浪漫，单是以“秋”字为句首的排比诗句，竟然多达三十四句，真可谓写尽了华山秋日的万千景象，读来令人目不暇接又美不胜收。秋阳秋声秋水秋风秋云秋空秋雨秋树等等，却不是单纯地写景状物，而是每一幅秋景都直接对应着诗人的情感：“秋阳迎我笑，秋声为我鸣。秋水涤我眼，秋风吹我胸。秋云绕我起，秋空明我心。秋石沥我胆，秋雨洗我尘……”及至“秋歌我吟诵，秋诗我赠朋”。华山秋景里的诗人孟建国，一路走来，敞开胸襟，又放纵情

思，恣意汪洋，把自己的肉身和情感都托寄于华山山水，而且和金秋里的华山的一峰一石一片阳光一缕清风一掬秋水一树秋叶融为一体，物我互衬互托互寄了。这里不仅让我见到孟诗人浪漫畅达的心灵，也看到诗歌创造的绝佳意境，已不单是笔底功力的深或浅了，而是一个高蹈的精神情怀与泛溢而出的诗性魂魄的完美结晶。

一个从少年时期便立志报效祖国和人民的乡村少年，一路走来，坚守着自己的人生价值和人生抱负以及道德；同时又是洋溢着诗性激情的诗人，从少年至当下，一路吟诵。我便猜想，诗歌既是他人生脚步的履痕，又是激发他新的步调的昂扬进行曲，也是他不断完成精神剥离的催化剂，还应是陶冶性情完善道德的一渠清流。

但愿……更完全相信，诗性激情一如既往在你心中洋溢，成为坚实行走的脚步的伴唱。

2009年12月10日 二府庄

难得豪情又柔肠

——《贺兰踏阙》序

初识申宝峰，他自报家门是临潼人，距离和陌生感顿时便消弭了大半，在于同属西安东路的乡党。尽管不属同一区或县的辖地，却是地理位置上抬头可见的邻区邻居。我家是在灞桥区东头的一个小村庄，门前横着自东向西倒流着的灞河，河的北岸便是骊山的南麓，我们村子的人便通称其为北岭。每天清晨拉开街门，第一眼瞅见的便是北岭——骊山。北岭顶上往北便属临潼。北岭顶上仍保存着周幽王戏诸侯失丢江山的烽火台，岭下温泉有闻名古今的杨贵妃洗浴的贵妃池，还有“西安事变”发生时蒋介石跳窗出逃的房子，以及隐蔽的山洞，更有被誉为世界八大奇迹的秦兵马俑坑。申宝峰和我算得乡党。尽管古人说“秦人不党”，乡党不是结党，便不会私营，而是同乡的关中说法，乡党就是同乡。同乡便有了心理上的亲近和温热。

这是一位令我感到自豪和骄傲的乡党。

他生来就是难得的聪明天资，记忆力惊人，小小年纪就通篇背诵了当时流行的《毛主席语录》，读小学和中学成绩优异，颇为挑梢出众，甚得乡里赞誉。不幸在于他成人亦成才的年代，是一个普遍贫穷又多动乱的社会大背景，尤其是“文革”，把多少富于天资的城市和乡村的青少年耽误了；有幸在于他的顽强个性，于贫穷和灾难中顽强奋斗，争取到接受中等专业学校教育的良好机会，尽管不及高等院校，却毕竟比无以数计的城乡失学青年幸运多了。

我之所以感到为他骄傲和自豪，更在他后天的奋斗精神。一个只接受过中等专业技术教育的乡村青年，进入工厂也进入社会，从一个普通的技术员做起，直到被推上一个国家电力大厂的厂长，这中间经历了十四年，自然可以想象十四年里的多少个难眠也难忘的日日夜夜。尤其是起初的动因，当他听到位于毛乌素大沙漠边缘的贺兰山山口的新建电厂需要技术人才的时候，毅然举家从西安来到不毛之地的荒漠，奉献智慧也奉献青春。在他当厂长的时候，这个电厂荣获西北地区首家"一流火力发电厂"的称号。他随后奉调回陕西一家电厂。短短几年，不仅使这个电厂扭转亏损，而且走上发达的繁荣之路。两个电厂的实践，见证着一个人的能力、魄力，还有事业心，自然不可缺失道德，这是凝聚人心、焕发超常智慧的基本因素。

申宝峰既是一位实干家，同时也是一位富于诗性的感情丰富的人。他在倾力实干成就电力生产的同时，时时涨溢着诗潮，信手写来，可见胸怀，也可见性情。诗词产生于他干成某件重大工程之后的壮怀激情，又不局限于眼前的厂房围墙，中国举办奥运盛事，还有汶川地震，都引发他的诗兴，倾情里可感知豪情和伤情，更有儿孙兄弟之间的一缕柔情，都入得诗词韵里，让我看到也感到豪情和柔情的丰富和鲜活。仅示《金缕曲·祭兄长》里情真意切的词句：

仰首望，问天庭，几时哥还乡？

清角吹寒南行雁，菩萨难了心愿？

这位干着实业的申宝峰，不仅有一副诗性质地的襟怀，还有不俗的古体诗词的修养。他写了一组散文，更为率性，文字修辞也见功夫。我便不由得做另一番猜想，此人如果不干实业，而是有缘搭上文学创作的顺车，成为一个卓有建树的作家或诗人，也完全可能。

借申宝峰文集《贺兰踏阙》出版，赘言如上，以示祝贺，但愿人长久，文心诗心亦长久。

2009年12月15日 二府庄

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创作手记

一 意料不及的写作欲念

至今确凿无疑地记得，是中篇小说《蓝袍先生》的写作，引发出长篇小说《白鹿原》的创作欲念的。

这部后来写到八万字的小说是我用心着意颇为得意的一次探索。是写一个人的悲喜命运的。这个人脱下象征着封建桎梏的蓝袍，换上象征着获得精神解放和新生的列宁装，再到被囚禁在极左的心理牢笼之中，他的心理结构形态的几次颠覆和平衡过程中的欢乐和痛苦，以此来探寻这一代人的人生追求生存向往和实际所经历的艰难历程。在作为小说主要人物蓝袍先生出台亮相的千把字序幕之后，我的笔刚刚触及他生存的古老的南原，尤其是当笔尖撞开徐家镂刻着“读耕传家”的青砖门楼下的两扇黑漆木门的时候，我的心里瞬间发生了一阵惊悚的战栗，那是一方幽深难透的宅第。也就在这一瞬，我的生活记忆的门板也同时打开，连自己都惊讶有这样丰厚的尚未触摸过的库存。徐家砖门楼里的宅院，和我陈旧而又生动的记忆若叠若离。我那时就顿生遗憾，构思里已成雏形的蓝袍先生，基本用不上这个宅第和我记忆仓库里的大多数存货，需得一部较大规模的小说充分展示这个青砖门楼里几代人的生活故事……长篇小说创作的欲念，竟然是在这种不经意的状态下发生了。

这确实是一次毫无准备甚至可以说是不经意间发生的写作欲望。

这是一九八五年的秋天。按我当时的写作状态，正对中篇小说的多种结构形式兴趣正浓，短篇小说也还在写，只是舍不得丢弃适宜写作短篇的题材，而更重的用心已经无可逆转地偏向于中篇小说的谋划。我写中篇小说较之短篇写作只明确了一点，即每一部中篇小说都必须找到一个各个不同——起码区别于自己此前各篇的结构形式，而短篇写作几乎是随心所欲。这一次的《蓝袍先生》，不着重故事情节，以人物生命轨迹中的生活琐事来展示人物，当然不是那些无足轻重的扯淡事儿，而努力寻找有心理冲击力的细梢末节。我当时想通过各种不同的中篇小说结构，来练习写作的基本功力，似乎还不是很明确地为未来的长篇写作做准备。可以确定地说，我在一九八五年夏天以前，把长篇写作尚作为较为遥远的事。主要的一点，在我对写作的意识里，长篇小说是一种令人畏怯的太大的事，几乎是可望而不敢想的事。我想唯一能使我形成这种敬畏心理的因由，是过去对诸多优秀长篇包括世界名著阅读造成的畏怯心理。我此时写中篇小说正写到热处，也正写到顺手时，我想到至少应该写过十个中篇小说，写作的基本功才可能练得有点眉目。

仅仅在此之前的一个月，我和陕西刚刚跃上文坛的一批青年作家参加过一次别出心裁的笔会，名曰“陕西长篇小说创作促进会”。连续两届“茅盾文学奖”评奖组织部门要求各省推荐参评作品，陕西省都推荐不出一部长篇小说，不是挑选过于严厉，而是截止到一九八五年夏天，陕西新老作家尚无一部长篇小说创作出版（一九七八年文艺复兴以来）。当时以胡采为首的作协领导核心引发重视，开会研究讨论，对陕西新冒出的青年作家的创作状况认真分析，结论是：起码有一部分人的艺术修养和思想能力已达到长篇写作的火候，可以考虑进入长

篇小说创作，需要“促进”一下。于是便很认真地策划和筹备了这次会议，在延安和榆林两地连续举办。我参加了这次会议，有几位朋友当场就表态要写长篇小说了。确定无疑的是，路遥在这次会议结束之后没有回西安，留在延安坐下来起草《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实际上路遥早在此前一年就默默地做着这部长篇小说写作的准备了。我在会议上有一个很短却很明确的表态发言，尚无长篇小说写作的丝毫准备，什么时候发生长篇写作的欲望，没有任何考虑。我这次到陕北，除了想聆听各位朋友的意见，还偏重于想看陕北榆林的毛乌素沙漠。我还没见过真正的沙漠。当我和同辈作家朋友在大沙漠上打滚，才发现那里的沙子不仅不给人沾尘土，还把我布鞋上从黄土路上带来的黄土吸附得一丝不剩了。我登上残存的古长城“镇北台”的殿楼，一望无际的草原，匈奴和蒙古人的铁蹄在眼前如骤风般卷来……无论如何料想不到，当关中的酷热稍有转机，秋天的凉意在清晨和夜晚发生了，我坐下来写《蓝袍先生》这部蓄意已久的中篇小说时，却撞击出长篇小说的欲念，几乎把自己都吓了一跳。

尤其是写到第三章“萌动的邪念”时，蓝袍先生与杨龟年家寡居的年轻儿媳在学堂和村巷有三次邂逅，为这个女人的美貌所惊扰，邪念刚萌而未生，就被父亲察觉了，遭遇到严厉的绝不留情面的训示。我意识到这个门楼里的故事不会因一场训示而了结，还会更热闹更富戏剧性地演绎下去。然而这些故事已不属于蓝袍先生。《蓝袍先生》仍按原先的构想耐心地写下去，长篇创作的契机就在此时确定下来。蓝袍先生刚刚萌动的邪念被父亲掐灭杜绝了，我的长篇小说创作的欲念却在此时确立。

我自然最清楚不过，这个长篇小说尚无任何一个具体的影像。如果要找最初的影像，就是原上一幢镂嵌着“读耕传家”的四合院的门

楼，我想探知这门楼里神秘的故事。我也清楚不过，这个长篇小说不仅不是中篇小说的写作，更不是一般线条较单的长篇的写作，况且如前述的我对长篇小说写作的那种畏怯，都使我以一种“急不得”的心态来处理这个欲念。事实上，我在写完《蓝袍先生》之后做短暂休整时，从一家报纸上看到一个乡村女人创办养鸡场的事迹报道，竟十分激动，冒着关中数九后的严寒，搭乘汽车几经打问找到户县一个苹果园里，见到了这位女性。令我感兴趣的是她的不甘囚禁屋院的开创型性格，更令我震惊的是红火的养鸡场破产的过程，不是经营的失措，也不是市场动荡导致的经营的亏损，而是家族利益致成的无可挽救的破败。我那时候正关注着乡村世界的变化。我写了约五千字的报告文学，随之又写了八万字的中篇小说《四妹子》。我已从生活原型的正宗关中腹地女人身上跳脱出来，写了一个陕北女子。我想探究不同地域人的文化心理结构，相处时引发的关于生活和亲情的冲突。

《四妹子》是一九八六年的八月写成的。这一年的春节过后，我苦心筹备了三年的新房动工开挖地基。我在近一个月的盖新房的劳动中，常常想到高晓声的小说人物李顺大，他造起新屋的艰难和欢乐，与我的感受几乎一致。我在把工匠送出门的第二天，便迫不及待地背起挎包，蹚过家门前的灞河，四月的春水还有点刺骨的感觉，再穿过对岸的村庄，到公路上搭乘通蓝田县城的班车。左边是骊山的南坡，右边是白鹿原的北坡，中间是一道狭窄的川道。灞河从东往西流过去，一个个或大或小的村庄坐落在灞河两岸。我乘坐的公共汽车还是那种最简易设备的老公交车，所幸有一个右首靠窗的空位。我临窗而坐，第一次以一种连自己也说不准要干什么的眼光瞅住了白鹿原的北坡。坡地上的杂树已披上绿叶。麦苗正呈现出抽穗前的旺势。间杂着一坨一坨一溜一溜金黄的油菜花。荒坡上的野草正从陈年的枯干灰黑的蒙盖里呈现出勃勃的绿色。历经风雨剥蚀，这座古原的北坡被冲刷

成大沟小沟。大沟和大沟之间的台地和沟梁，毫无遮蔽地展示在我的眼前，任我观瞻任我阅览。我在沉迷里竟看出天然雕像，有的像奔突的雄狮，有的像平滑的鸽子，有的像凶残暴戾的鳄鱼，有的像醉卧的老牛……我此前不知多少回看见过这些景象，而且行走其中，推车挑担或骑自行车不知有几十几回了，春草夏风秋雨冬雪里的原坡和河川，在我早已司空见惯到毫不在意，现在在我眼里顿然鲜活起来生动起来，乃至陌生起来神秘起来。一个最直截的问题旋在我的心里，且不说太远，在我之前的两代或三代人，在这个原上以怎样的社会秩序生活着？他们和他们的子孙经历过怎样的生活变化中的喜悦和灾难……以这样的心理和眼光重新阅读这座古原的时候，我发现这沉寂的原坡不单在我心里发生响动，而且弥漫着神秘的诗意。

我住进供销社办的一家旅馆，八元一晚的住宿费是全县的最高标准，也是全县最豪华的旅馆，至今我都不忘当时的作家协会领导为我提供的资金支持。我立即询问有关蓝田县历史资料保存在什么部门，以及借阅需得经过什么手续……

二 卡彭铁尔的到来，和田小娥的跃现

促使我这回到蓝田查阅资料的举动，大约有两个因素，一是如前所述，因为无意间瞅见蓝袍先生家那幢门楼里幽深的气氛，所引发的长篇小说写作的欲念，并因此而直接意识到我对生活了知的浮泛。长久以来，我很清醒，因为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文科教育，所得的文学知识均是自学的，也就难以避免零碎和残缺，再加之改革开放前十七年的极左文艺政策所造成的封闭和局限，我既缺乏系统坚实的文学理论基础，也受限制而未能见识阅览更广泛的文学作品。新时期以来，偏重于这方面的阅读和补缺就是很自觉也很自然的事了。至于对生活的了解和体验，我向来是比较自信的。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我在解放后的一九五〇年入学识字。我看见过邻近的东西两个村子斗地主分田产的场面，我们村里没有一户够划地主成分的人家。我亲眼看着父亲把自家养的一头刚生过牛犊的黄牛，拉到刚刚成立的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大槽上。到合作社变公社吃大锅饭的时候，我亲身经历过从公社食堂打回的饭由稠变稀由多变少直到饿肚子的全过程。我由学校高考名落孙山回到村子，进入一个由三个小村合办的初级小学做民办教师，另一位是年近六旬的老教师。学校设在两个村子之间的平台上，两个人合用的办公室，是一幢拆除了不知哪路神灵泥像的小庙。教室旁边是生产队的打麦场。社员出工上地下工回家经过教室门口，嬉笑声议论声和骂架声常常传进教室。后来我调入公社办的农业中学，校址也在一个村庄的前头，四周是生产队的耕地，我看着男女社员秋天播种麦子夏天收割麦子、播种苞谷再到掰（折）苞谷棒子的整个劳动过程。再后来我被借用到公社帮助工作，又调动到公社当干部，整整十年。十年里，我把公社大小三十多个村庄不知走过多少回，其中在几

个村庄下乡驻队多至半年，男女老少都叫得出名字，谁家的公婆关系和睦与否都知晓。直到我最后驻到渭河边一个公社，看着农民把集体畜栏槽头的牛骡拉回家去饲养，把生产队大块耕地分割成一条一块，再插上写着男人或女人名字的木牌，便意识到我在公社十年努力巩固发展的人民公社制度彻底瓦解了。

我对乡村生活的自信，不仅在于生长于兹，不仅是看着我的父亲怎样把黄牛归集体，而且我是作为最基层的一级行政管理干部，整整在其中干了十年，又把土地和牲畜分到一家一户。我不是旁观者的观察体验，而是实际参与者亲历的体验。我崇拜且敬重的前辈作家柳青，他在离我不过几十华里远的终南山下体验生活，连同写作《创业史》历时十四年，成为至今依然着的一种榜样。我相信我对乡村生活的熟悉和储存的故事，起码不差柳青多少。我以为差别是在对乡村社会生活的理解和开掘的深度上，还有艺术表述的能力。恰是在蓝袍先生家门楼下的一瞅一瞥，让我顿然意识到对乡村社会的浮泛和肤浅，尤其是作为标志的一九四九年以前的乡村，我得进入一九四九年以前已经作为历史的家乡，我要了解那个时代乡村生活的形态和秩序。我对拥有生活的自信被打破了。

大约在这一时段，我在《世界文学》上读到魔幻现实主义的开山之作《人间王国》，这部不太长的长篇小说我读得迷迷糊糊，却对介绍作者卡彭铁尔创作道路的文章如获至宝。《百年孤独》和马尔克斯正风行中国文坛。我在此前已读过《百年孤独》，却不大清楚魔幻现实主义兴起和形成影响的渊源来路。卡彭铁尔艺术探索和追求的传奇性经历，使我震惊更使我得到启示和教益。拉美地区当时尚无真正意义上的文学，许多年轻作家所能学习和仿效的也是欧洲文学，尤其是刚刚兴起的现代派文艺，卡彭铁尔专程到法国定居下来，学习现代派

文学开始自己的创作，几年之后，虽然创作了一些现代派小说，却几乎无声无响，引不起任何人的注意。他失望至极时决定回国，离开法国时留下一句失望而又决绝的话：在现代派的旗帜下容不得我。我读到这里时忍不住“噢哟”了一声。我当时还在认真阅读多种流派的作品。我尽管不想成为完全的现代派，却总想着可以借鉴某些乃至一两点艺术手法。卡彭铁尔的宣言让我明白一点，现代派文学不可能适合所有作家。更富于启示意义的是卡彭铁尔之后的非凡举动，他回到故国古巴之后，当即去了海地。选择海地的唯一理由，那是在拉美地区唯一保存着纯粹黑人移民的国家。他要“寻根”，寻拉美移民历史的根。这个仍然保持着纯粹非洲移民子孙的海地，他一蹲一深入就是几年，随之写出了一部《人间王国》。这是第一部令欧美文坛惊讶的拉丁美洲的长篇小说，惊讶到瞠目结舌，竟然找不到一个合适的词汇来给这种小说命名，即欧美现有的文学流派的称谓都把《人间王国》框不进去，后来终于有理论家给它想出“神奇现实主义”的称谓。《人间王国》在拉美地区文坛引发的震撼自不待言，被公认为是该地区现代文学的开山之作奠基之作，一批和卡彭铁尔一样徜徉在欧洲现代派光环下的拉美作家，纷纷把眼睛转向自己生存的土地。许多年后，拉美成长起一批影响欧美也波及世界的作家群体，世界文坛也找到一个更恰当的概括他们艺术共性的名词——魔幻现实主义，取代了神奇现实主义……我在卡彭铁尔富于开创意义的行程面前震惊了，首先是对拥有生活的那种自信的局限被彻底打碎，我必须立即了解我生活着的土地的昨天。

我顿然意识到连自己生活的村庄近百年演变的历史都搞不清脉络，这个纯陈姓聚居只有两户郑姓却没有一户蒋姓的村庄为什么叫作蒋村。我的村子紧紧依偎着的白鹿原，至少在近代以来发生过怎样的演变，且不管两千多年前的刘邦屯兵灞上（即白鹿原）和唐代诸多诗

人或行吟或隐居的太过久远的逸事。我生活的渭河流域的关中，经过周秦汉唐这些大的王朝统治中心的古长安，到封建制度崩溃民主革命兴起的上个世纪之初，他们遗落在这块土地上的，难道只有鉴古价值的那些陶人陶马陶瓶陶罐，而传承给这儿男人女人精神和心理上的是什么……我不仅打破了盲目的自信，甚至当即产生了认知太晚的懊悔心情，这个村庄比较有议事能力的几位老者都去世了，尤其是我的父亲，他能阅读古典小说也写得一手不错的毛笔字，对陈姓村庄的渊源是了解得最多的人之一；至于我们家族这一门更是如数家珍，我年轻时常不在意他说那些陈年旧事和老祖宗的七长八短的人生故事。父亲已谢世了。我既想了解自己的村子，也想了解原上那些稠如爪蔓叶子的村庄，更想了解关中。经过一番认真的考虑，我选择了蓝田、长安和咸宁三个县作为了解对象，因由只出于一点，这三个县包围着西安。咸宁县号称陕西第一邑，曾是我的家乡隶属的县，辛亥革命完成后撤销又合并到长安县了。正是西安四周的这三个县，当是古长安作为政治经济中心辐射和影响最直接的地区，自然也应该是关中最具代表性的地区了。我首先走进蓝田，当我打开蓝田县志第一卷的目录时，我的第一感觉是打开了一个县的《史记》，又是一方县域的百科全书。县志上分类着历史沿革，县域划界的伸缩变化（咸宁和长安多所变更名称，唯独蓝田自秦设县以后一直沿用到现在）；山川河流平原坡岭沟峪谷地，不仅有文字叙述，而且有图示；历代的县官名称简历和重要政绩，典型的三两位在调任离开时，沿路百姓蜂拥送行，跪拜拦轿者呼声震野；记载着蓝田地域自古以来的名人，最响亮的是宋朝的吕氏四兄弟，先后都考中状元，都有文集著作，其中吕大临创造的哲学“合二而一”论，被杨献珍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发掘出来，遭到毛泽东点名批评，形成一次关于“合二而一”与“一分为二”的哲学大辩论大批判运动。其时我刚刚从学校进入社会，在一所两人为教的初级小学任教，按上级指示，全乡（公社）的中小学教师开过专题批判

会。我久久地注视着绵薄发黄到几乎经不起翻揭的纸页，一种愧疚使我无言，我在对“合二而一”和“一分为二”几乎无知的情况下也做过“表态”发言，现在近距离面对这位尊贵的哲学家乡党的时候，领受到真正的学问家对浅薄的讽刺，也领会到人类从哲学角度认识世界的漫长和艰难。这些县志还记载着本地曾经发生过的种种灾难，战乱地震瘟疫大旱奇寒洪水冰雹黑霜蝗虫等等，造成的灾难和死亡的人数，那些数以百万计的受害受难者的幽灵浮泛在纸页字行之间，尤其是看到几本“贞妇烈女”卷时，我意料不到的事发生了。

一部二十多卷的县志，竟然有四五个卷本，用来记录本县有文字记载以来的贞妇烈女的事迹或名字，不仅令我惊讶，更意识到贞节的崇高和沉重。我打开该卷第一页，看到记述着××村××氏，十五六岁出嫁到×家，隔一两年生子，不幸丧夫，抚养孩子成人，侍奉公婆，守节守志，直到终了，族人亲友感念其高风亮节，送烫金大匾牌一幅悬挂于门首。整本记载着的不同村庄不同姓氏的榜样妇女，事迹大同小异，宗旨都是坚定不移地守寡，我看过几例之后就了无兴味了。及至后几本，只记着××村××氏，连一句守节守志的事迹也没有，甚至连这位苦守一生活寡的女人的真实名字也没有，我很自然地合上志本推开不看了。就在挪开它的一阵儿，我的心里似乎颤抖了一下，这些女人用她们活泼的生命，坚守着道德规章里专门给她们设置的“志”和“节”的条律，曾经经历过怎样漫长的残酷的煎熬，才换取了在县志上几厘米长的位置，可悲的是任谁恐怕都难得有读完那几本枯燥姓氏的耐心。我在那一瞬有了一种逆反的心理举动，重新把“贞妇烈女”卷搬到面前，一页一页翻开，读响每一个守贞节女人的复姓姓氏——丈夫姓前本人姓后排成××氏，为她们行一个注目礼，或者说挽歌，如果她们灵息尚存，当会感知一位作家在许多许多年后替她们叹惋。我在密密麻麻的姓氏的阅览过程里头晕眼花，竟然产生了一种完全相背乃至恶

毒的意念，田小娥的形象就是在这时候浮上我的心里。在彰显封建道德的无以数计的女性榜样的名册里，我首先感到的是最基本的作为女人本性所受到的摧残，便产生了一个纯粹出于人性本能的抗争者叛逆者的人物。这个人物的故事尚无影踪，田小娥的名字也没有设定，但她就在这一瞬跃现在我的心里。我随之想到我在民间听到的不少荡妇淫娃的故事和笑话，虽然上不了县志，却以民间传播的形式跟县志上列排的榜样对抗着……这个后来被我取名田小娥的人物，竟然是这样完全始料不及地萌生了。

我住在蓝田县城里，平心静气地抄录着一切感兴趣的资料，绝大多数东西都没有直接的用处，我仍然兴趣十足地抄写着，竟然有厚厚的一大本，即一个硬皮活页笔记本的每一页纸抄了正面又抄背面，字迹比稿纸上的小说写得还工整。我说不清为什么要摊着工夫抄写这些明知无用的资料，而且显示出少见的耐心和静气，后来似乎意识到心理上的一种需要，需要某种沉浸，某种陈纸旧墨里的咀嚼和领悟，才能进入一种业已成为过去的乡村的氛围，才能感应到一种真实真切的社会秩序的质地。在我幼年亲历过的乡村生活的肤浅印象不仅复活了，而且丰富了。

我在这一年还写着中篇和短篇小说。在查阅县志和写作的间隙里，穿插着对我生活的这个村庄历史的了解。我找了村子里几位是我的爷辈的老汉，向他们递上一支雪茄烟。或在他的家里，或在我的刚刚启用的写作间里，我让他们讲自己所记得的村子里的事，记得什么便讲什么。许是年岁太大记忆丧失，许是耽于种种顾虑，谈得很浅，可以想到不是害怕已经逝去的歪人劣事，而是怕得罪他们活在村子里的后人。然而也不是没有收获，我和近门的一位爷爷交谈时，把范围缩小到他和我的这个陈姓的门族里。他约略记得也是从老人嘴里传下

来的家族简史，这个门族的最早一位祖先，是一个很能干的人，在他手上，先盖起了这个陈姓聚居的村庄里的第一个四合院，积累囤攒了几年，又紧贴在西边建起了第二个四合院，他的两个儿子各据一个，后来就成为东门和西门。我是东门子孙无疑。到我略知火烫冰寒的年纪，我的东门里居住着两位叔父和我的父亲。西门人丁更为兴旺，那个四合院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八家院，这位说话的爷就是西门的。东门西门后来再未出现过太会经营治家的人，因为后人都聚居在这两个四合院里，没有再添一间新房，也就无人迁出老宅，直到一九四九年解放。我在弄清家族的粗略脉络之后，这位爷爷随意说出的又一个人令我心头一颤。他说他见过我的曾祖父，个子很高，腰杆儿总是挺得又端又直，从村子里走过去，那些在街巷里在门楼下袒胸露怀给孩子喂奶的女人，全都吓得跑回自家或就近躲进村人的院门里头去了。我听到这个他描述的形象和细节，是一种无以名状的激动和难以抑制的兴奋。此前我已经开始酝酿构想着的一位族长的尚属模糊平面的影像，顿时就注入了活力也呈现出质感，一下子就在我构想的白鹿村的村巷、祠堂和自家门楼里踏出声响来；这个人的禀赋、气性，几乎在这一刻达到鼻息可感的生动和具体了。也就在这一刻，我从县志上抄录的《乡约》，很自然地就融进这个人的血液，不再是干死的条文，而呈现出生动与鲜活。这部由吕氏兄弟创作的《乡约》，是中国第一部用来教化和规范民众做人修养的系统完整的著作，曾推广到中国南北的乡村。我对族长这个人物写作的信心就在这一刻确立了，至于他的人生际遇和故事，由此开始孕育。骑自行车或散步，吃饭或喝茶，在村长赐给我的二分地上锄草、培土和浇水，或在小院里栽树植花，只要是一个人独处而又不着纸笔的环境里，白嘉轩这个族长的形象就浮现出来，连同他周围的那些他喜欢的敬重的或讨厌的不屑的人，逐渐清晰起来丰满起来，故事也由单线条到网络似的复杂起来，竟有两年多时间，一个怀得过久的胎儿。

我在断断续续的两年时间里，进入近百年前的我的村子，我的白鹿原和我的关中；我不是研究村庄史和地域史，我很清醒而且关注，要尽可能准确地把握那个时代的人的脉象，以及他们的心理结构形态；在不同的心理结构形态中，透视政治的经济的道德的多重架构；更具妙趣的是，原有的结构遭遇新的理念新的价值观冲击的时候，不同心理结构的人会发生怎样的裂变，当是这个或欢乐或痛苦的一次又一次过程，铸成不同人物不同的心灵轨迹，自然就会呈现出各个人物的个性来……我对以西安为中枢神经的关中这块土地的理解初步形成，不是史学家的考证，也不是民俗学家的演绎和阐释，而是纯粹作为我这个生于斯长于斯的一个子民作家的理解和体验。我把这种理解全部融注到各色人物中，几乎在此前（小说写成前）没有做过任何阐述和表白。到一九九〇年初，在中断了半年写作，而重新进入写作氛围之时，我为我的家乡一本《民间文学集成》作的序文中，第一次比较透彻或直率地袒露了我对关中这块土地的理解和体验——“作为京畿之地的咸宁，随着一个个封建王朝的兴盛走向自己的历史峰巅，自然也不可避免随着一个个王朝的垮台而跌进衰败的谷底；一次又一次王朝更迭，一次又一次老帝驾崩新帝登基，这块京畿之地有幸反复沐浴真龙天子们的徽光，也难免承受王朝末日的悲凉。难以成记的封建王朝的封建帝君们无论谁个贤明谁个残暴，却无一不是企图江山永铸万寿无疆，无一不是首当在他们宫墙周围造就一代又一代忠勇礼仪之民，所谓京门脸面。封建文化封建文明与皇族贵妃们的胭脂水洗脸水一起排泄到宫墙外的土地上，这块土地既接受文明也容纳污浊。缓慢的历史演进中，封建思想封建文化封建道德衍化成为乡约族规家法民俗，渗透到每一个乡社每一个村庄每一个家族，渗透进一代又一代平民的血液，形成一方地域上的人的特有文化心理结构。在严过刑法繁似鬃毛的乡约族规家法的桎梏之下，岂容那个敢于肆无忌惮地呼哥唤妹倾吐爱死爱活的情爱呢？即使有某个情种冒天下之大不韪而唱出一

首赤裸裸的恋歌，不得流传便会被掐死；何况禁锢了的心灵，怕是极难产生那种如远山僻壤的赤裸裸的情歌的。”

这应该是我正在写作《白鹿原》时的最真实的思绪的袒露。我的白嘉轩、朱先生、鹿子霖、田小娥、黑娃以及白孝文等人物，就生活在这样一块土地上，得意着或又失意了，欢笑了旋即又痛不欲生了，刚站起来快活地走过几步又闪跌下去了……

三 枕头，垫棺作枕

我到长安县查阅县志和党史文史资料的时候，正是暑热的八月。同在蓝田县一样，只有供销社开办的唯一一家旅馆，而且客住已满，只有一个套间空着，日租金十二元。我尚未反应过来，协助我来住店的当地一位作家朋友扭过头就朝门外走去。我以为发生了什么事，急忙走出门赶上他，尚不及我问，他就气嘟嘟地说，啥房子吗就要十二块，杀人哩！我放心了，原猜疑他是不是遇见什么不友好的人哩，却是嫌房价太高。其实，我也觉得房价高，还想再交涉一下，能否调出一间普通单间来，不料他比我还倔。他便领我到紧贴着县城的乡村，说那里有农民开办的家庭旅社，很便宜。走过大街进入一个村子，再走进挂着写有旅舍二字的一个农家院子，在主人引领下上了一幢简易单面二层楼，楼梯是用粗钢棍焊接而成的，房间有木板床和一张桌子，还有脸盆和热水瓶，倒也可以，我在自家屋里也就是这几样必备的东西，价位每天只收两元钱。就在我要放下背包准备下榻于此的时刻，突然想到夜晚如厕的问题。主人指着楼下院子拐角的一个小厕所。我顿时就打了退堂鼓，我喜欢喝水，晚上往往要起来排泄两次，担心那个钢棍楼梯很可能在睡意蒙眬时踩空，再说从楼上到楼下再到院角那个厕所来回跑一趟，肯定会弄得睡意全消无法再度入眠，且不说安全之类。我便说服我的朋友，重新回到旅馆，住了下来。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住宿消费水准。十年不过，且不说大城市，即使在长安县城，一日收费几百乃至千元的宾馆已经习以为常，我经过的日租金十二元的价位不单成为历史，而且成为令今人惊诧的笑话。我每当到长安开会住宿在某个宾馆，总是想到当年在长安旅馆住宿的

事，说给朋友，年轻人当作不可思议的笑话，同龄朋友便有恍若隔世之叹，其实不过是几年十年的事。

这应该是我平生第一次入住的套间房，倒有些不适的慌惶，每有熟人朋友来，也都无一例外地惊讶一番其豪华享受，我也随意解释几句。我到县资料馆去借阅县志，因为有了在蓝田的经历，对于“一次只能借阅一本看完再换”的政策，不仅再无异议，而且很为这种负责的精神感动了。我便小心地翻揭那些太薄太软的纸页，摘抄其中有用的资料，然后小心翼翼地用报纸包裹起来，送回县资料馆，再换一本来，每天在县城里往返跑路，腿上的劲儿一直很足。

有天晚上，一位不速之客到来，令我受宠若惊，竟是长安县委书记程群力。一位浓眉大眼十分俊气的年轻人，不过三十出头，据说是陕西省当时最年轻的一位县委书记。他说他听某人说我住在他的辖地长安，也说到他读过我的某些小说，便来看望我，看看有什么问题和困难需要帮助解决。我记不得当时说没说一次只能借一本县志的困难，第二天再去换借的时候，资料馆的同志把一摞县志都交给我了，我倒真有点为其安全而操心而感到负担了。程群力书记和我谈到文学，也问及是不是有新的大部头的创作计划，我隐瞒了查阅县志和资料的真实意图，只是轻描淡写地说道想了解自己脚下本土的历史渊源。我没有说明想写长篇小说的意图，是不想张扬，也是不敢张扬尚无完全把握的事，更是属于长期养成的一种写作的心理习惯。一篇或长或短的小说，在画上最后一个标点符号之前，我是不习惯说给人听的。我经历过这样的场景，有作家朋友有了重要的创作意图，约一位或几位朋友交谈，听取意见，开拓自己的思维，完善小说构思，避免写成之后的缺陷和遗憾。我不是固执到盲目自信不愿听取好的思路，也不是怕被“调包”（曾经风闻过此类丑闻），而是纯粹属于个人的习

惯使然。我在多年前也曾怀着虔诚的愿望，把正在谋划着的小说说给同代作家朋友，虽然听到确可采纳的建设性意见，却发生了始料不及的心理反应，即在我道出了小说构思之后，到开笔写作时，那种写作的强烈欲望变得不太强烈了，对这篇小说的新鲜感减弱了，甚至弄得兴趣消退以至索然无味，竟放弃了这篇小说的写作。这样的现象出现过三两次以后，我才面对自己反省出一个道儿来，未动笔之前的“说”，实际上是撒了气儿，撒了气儿也就绽了劲儿，创作的欲望创作的新鲜感都减弱了。如同蒸馍馍，成熟之前是不能揭开锅盖的，只有添柴烧火，达到上足气，才能蒸出好吃的馍来。后来我就把想写的小说憋着，反复酝酿，直到觉得可以动手时才铺开稿纸，直到写完，竟成了一种难以改易的写作习惯。

这习惯也有被打破的时候。就在长安县旅馆刚住下时，有一位年轻作家来访，公开身份是《长安报》编辑记者。这个小过我十多岁的人留给我的第一印象是坦诚不雕，也有点肆无忌惮，近二十年后还继续着这印象，自然由不太适应到基本适应了。我珍重交往里的真诚，就容忍人个性里的某些偏颇，更在于对虚伪和谎话的恐惧。对这个自取“下叔”笔名的年轻作家，很快就发展到可以既说文学也说生活世相了。他几乎每晚都来旅馆和我聊天。关中人把聊天叫作谝闲传，把聊一聊说成谝一谝。他这天晚上来，我们又谝上了，还喝着啤酒。我已经意识到他在用语言技巧套引我尚不成熟的小说构思。许是酒力促使，许是对这个年轻朋友的信赖，我说到一些想法，却难深入。许多话因年深事远而模糊，唯有一句话后来留给我们两人。

啤酒喝到令人有点张扬时，他似有不解地问，而且鼻梁上皱着结儿颇为认真，话的大意是，按说你在农村生活工作二十多年，生活积累该是雄厚的了，写个什么样的长篇都用不完。只有他反问的话我至

今记着原话：“你用得着到长安摊时间下功夫查资料？你到底想弄啥（干什么）？”我在他有点咄咄逼人的问询里也没有回避，便坦诚相告：“我想给我死的时候有一本垫棺作枕的书。”他大概有点意外，随之无言。我也不再啰嗦。两人相对一阵沉寂。

这是我当时最真实的心态。这心态发生在基本确定要写这部长篇并着手做准备事项的时候。这部尚未成形的小说，让我开始感觉到不同于以往中篇小说的意义，是已经意识到的历史内涵和现实内涵，尽管还在深化着这种意识和体验。另外便是我几乎同时就划算着的粗略的写作计划，写成正式稿时可能就接近或超过五十岁了，记不清那一天算计到这个令人顿生畏惧的生命数字时，我平生第一次意识到生命短促的心理危机，几乎一生缠绕于心的文学写作，还没写出真正让自己满意的作品，眼看着就要进入乡村习惯上的老汉的标志性年龄了。由此而引发出我对以前创作的自我反省，不是因为社会等外部世界的刺激而迫使发生的，更非文学界评价高了低了诱导发生的，纯粹是由生命年轮即将碾过五十大关时几近悲壮的轮声催发出来的。我把自己关在小屋子里，抽烟喝茶，回顾了自初中二年级在作文本上写下第一篇小说以来的人生历程和写作经历。我发觉，我第一次摆脱掉或近或远的文坛，而使自己面对文学；第一次发生了不再关注我的那部（篇）小说评价高了或低了，包括曾经获得各种奖项也得意过好一阵子的小说；我处的文坛上的冷暖亲疏以及不可或缺的是是非非，也在那个反省过程中散淡了，于我没有切实的价值和意思了；我的刚刚形成的致命的一个心结，竟然是如果突然身体发生绝望性异变，单凭已出版的那几本中、短篇小说集用做垫棺的枕头，我会留下巨大的遗憾和愧疚；我现在的心结聚集到一点，凝重却也单纯，就是为自己造一本死时可以垫棺作枕的书，才可能让这双从十四五岁就凝眸着文学的眼睛闭得踏实。

这完全是指向自己的一次反省，使我对创作这种劳动有了更进一步的理解，它只能倚重作家自己，对社会历史和现实理解的深刻程度，生活体验到生命的独自发现的独特性和普遍性，自然还有艺术体验包括语言叙述的选择。这些决定作品成色也决定作品成败的因素，除了自己之外，谁能充当拯救者的角色？只要稍微留意一下那些名著巨作的作家的写作历程，就会把那些与创作没有关系的非文学因素看轻了淡远了，只指向自己。这样的反省，既完成了对文学创作的新的层面的理解，也完成了一次心理奠基，进入一种前所未有的沉静状态的心境。

一年后，下叔为《陕西日报》写的一篇千字文的人物通讯里，提到我和他在长安旅馆夜谈时说的“枕头”的话，没有多少反应。时过五年之后，《白鹿原》发表于《当代》，接着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发行之后，青年作家雷电对我做了一次采访，写了一篇六七千字的文章，其中说到“枕头”之作，这句话才传播开来。我至今倒颇为安慰，这个垫棺的枕头的创作心理，不是狂妄的高端指向，而是为着自少年时代就迷恋着的文学的本心的。

我和下叔每有机缘相聚时，偶尔还会提到长安旅馆那一夜的闲谝，竟有恍如隔世之感，又如同发生在昨夜，连自己都捋不清记忆了。

四 沉静与松弛

到一九八八年的清明节前后，我开笔写《白鹿原》的草稿。

从一九八五年秋天因中篇小说《蓝袍先生》的写作所诱发的长篇创作的欲望，经过大约两年半的准备、酝酿和构思，终于形成了，依着以往中篇短篇写作的某种感觉和把握，可以操笔动手进行文字叙述了。二十多年过去了，我已无法回忆是怎样完成这部小说的构思和结构的。有一点可以确信，即使在二十年前开笔写第一行字的时候，即刚刚确立这部小说构思的时候，也很难说清那些情节那些场景是在什么时间构思出来的。我曾经要给几个主要人物列一个提纲，结果是只给白嘉轩写了一页半的文字就感到了属于多此一举，就没有耐心再写下去，甚至担心因为提纲的写作而冲淡减弱了正式写稿时的新鲜性兴致，便决然停下不做了。我随之只列了一个人物名单，人物的谱系，人物的社会关系和族亲关系。尔后实际写作的过程，一次也没有翻阅过，证明也纯属多此一举，人物的这些关系网络和他们之间的恩怨纠葛，乃至生死遭际，早在两年半的反反复复的酝酿和判断过程中烂熟于心了。

我确定先写草稿。这也是经过几次反复斟酌之后确定的。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写作第一部中篇小说时写过草稿，因为是第一次，又是我写过的中篇里篇幅最长的一部，主要是出于结构上的合理性把握，先以草稿试笔。之后，我的几部或长或短的中篇小说都是一次成稿，渐成一种写作习惯，不再有写草稿的耐心。我不习惯在稿纸上做稍微量大的修改，在于见不得涂抹添加成乱七八糟的稿样儿，宁可把不大满意的章节撕毁重写。在动手写《白鹿原》之前，约略估计到需得四

十万字，如若写草、正两稿，单是书写量就很可观，且不说写作中间肯定会发生的不顺或磕绊。然而，几乎没有任何犹豫，就决定先写草稿，再写正式稿，花多长时间费多大工夫似乎已不是问题。这是第一次长篇小说的写作，强烈的创造欲望表述欲望和初试的畏怯并存，作为试笔的草稿就成为解决畏怯的最好途径。再者，我自己最清楚这部小说的构思，时间跨度较长，人物比较多，人物与人物之间的关系和纠葛比较密集也比较复杂，结构就成为突出的问题。当《白鹿原》中那些人物在两年多的孕育过程中已经成形，已经丰满，已经呼之欲出，已经按捺不住要从脑底蹦跌到稿纸上的时候，人物间横向和纵向以及斜插歪穿的关系，如何清晰而又合理地展示出来，不仅让未来的读者阅读畅达，更重要的是影响和致命着每一个人物的展现，把我业已意识到的他们心灵世界最隐蔽的角落里的东西也能得以显示出来，又不想在情节发展和人物随着裂变的过程中留下人为的别扭的败笔，关键就在于一个合理的结构框架了。我也清醒地意识到，这个结构不是我有意安排给人物的，而是人物的生命轨迹决定着这个结构的框架，我的着力着重点，在于找到他或她以及他们互相影响互相制约互相牵扯的关系，在亦步亦趋过程中的一个合理的轨迹。这个结构形式，在动笔之前就成为第一凸显的大事，我在基本确定之后，不无担心，能否如预想的思路和架构得以实现呢？更深一层的担心，预想的思路和架构能否达到让那些人物充分展示出来？我想先做一次试笔，打草稿。

我甚至做了退一步考虑，不致使自己在开笔时有畏怯的压力，便把草稿的定义再下降一档，叫作“草拟”，以便为自己松绑，让思维和想象自由起来。这个草拟稿的用意，就是把各个人物的生命际遇能摆列出来，把那些已经构思的自以为得意的情节和细节展示出来，那个结构的框架基本合理就行了，到写正式稿时再进一步推敲判断，做出

更自然顺情的调整。这样，我就在很松弛也很兴奋的情绪里，打开一个大十六开的硬皮笔记本，写下开篇第一句话：“锅锅儿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这是一个全知的叙述视角，人物的人生之谜一开始就撒给读者了。“锅锅儿”是白嘉轩的绰号，是他被已沦为土匪的黑娃的弟兄拦腰一击打断腰杆之后的体形，挺得很直很硬的腰佝偻下去，俗称罗锅儿背锅儿或锅锅儿。大约写过几章之后又觉得不妥，这个绰号未交代形成的特殊因由，会造成阅读的烦恼，于是便决定以白嘉轩的本色姓名亮相，把这个绰号涂掉了。

至今依然记得那个清明节前后的早晨，我的小院里去年栽活的月季花已经绽开新的叶片。冬天已经彻底结束。乡村人已经开始更换上春天的衣服。麦苗在我眼前的河川蓬勃着动人的绿色。从村巷传来的狗在这个春天的叫声，似乎都格外响亮。我依旧习惯着当地乡村的生活秩序，早晨起来洗把脸，左邻右舍的乡党扛着农具上坡或者下滩干活了，我则比他们奢侈，洗脸刷牙之后要先喝两三杯清茶，然后摊开稿纸。今天与以往的感觉很不一样，没有摊开稿纸，而是揭开了一个大号笔记本；我没有上平时写作的桌子和木椅，而是坐在沙发上，把笔记本在膝盖和大腿面上揭开。我自己也不大弄得清为什么要选择这种写作姿势，过去总是在听领导报告只有坐凳没有桌子的环境，才依助膝头做记录，凡写稿子总是要依托一张桌子的，即使如早年间用过的用麻绳捆着四条腿的祖传的方桌，毕竟也是桌子，并不影响写字，更不决定写下的字的分量。我坐在长沙发左首，一只胳膊托在扶手上，左手控制着笔记本，就顺着纸页上印制的暗格写下去，心里竟是前所未有的一种沉静。

我想促成这种写作情绪和心境的一个外在因素，就是我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写作专用房，颇多感动与感慨。这是一九八八年春天，是我

名正言顺成为陕西作家协会专业作家后的第七个年头，我为自己建起了一座新房，辟出大约十多平方米的一间书房，或者说写作间。一九八二年以前，我在乡村中小学、乡镇和文化馆工作，都是宿舍兼办公的一间屋子，多是两人合住合办的环境。一九八二年调陕西作协成为专业作家之后，分给我一套两居室的楼房，我没有入住，而是索性从原供职的灞桥区文化馆搬回老家去住了。在我家的街门外，父亲借厦屋北墙盖了一间又低又窄的简易房，门在原厦屋的北墙上凿开，串连在一起，形成一个套间，这是父亲上世纪七十年代最艰难的时月为已经长大成人的妹妹搭的房子。父亲已经谢世，妹妹早几年前也已出嫁，这间简易房就成为归来后的我的写作间。里面摆着一张单人床，一张祖传的方桌占据了几乎一半空间，还有一把椅子和一张同样搞不清在哪位祖宗手里置办的条凳。那张方桌的桌面已变成黑色，似乎不是漆染的颜色，四条桌腿没有一条是稳固的，父亲生前用麻绳把四条腿互相捆着，用两根交叉的木棍把桌腿固定不倒。我把已经松弛的麻绳解下，重新捆扎结实，就在那张方桌上开始写我的短篇和中篇小说。我有捆绑桌子的经验。我从学校回到乡村时，用着一张带抽屉的条桌，也是四条腿松动，我用草绳捆扎过。直到一九八六年春天我在屋前空院里盖起三间新房，这间简易房被拆掉了。在新房尚未启用的一年多时间里，我在叔父和我对换的同院西厦屋里摆下吃饭用的小餐桌，坐一只小方凳就可以写作。因为年久失修又兼着空无人住，墙皮大都脱落，弃置不用的火炕早已坍塌，地砖下已被老鼠掏空，不小心就会踩到凹坑里，我在这间破败到破烂不堪的厦屋里，眼前展现的是想象世界里各色人物运动着的场景。我后来和一位记者谈到写作环境对作家的影响的话题时，有感于我的亲身经历，不敢一揽旁人，仅我而言，环境和写作条件不是毫无关系毫无影响，但作用力度有限，至关致命的是构思的发生、完成和写作，不大受书房简陋或阔绰的影响。我向来不注重也不讲究（生存环境里的无力无能无法讲究）写作

的条件和环境，只要一张可以铺开稿纸的桌子就行了；唯其挑剔到苛刻的一个条件，就是在我进入写作时，我所在的那个空间不能再有一个别人。我以玩笑解释说，在我写作着的屋子里，要是坐着或站着一个熟悉或陌生的人，正在写作的小说里的人物就会吓得逃离而去，不敢走近前来，我的笔头就抡空了。我还以玩笑的方式打过一个比方，如同母鸡下蛋，关键不在鸡窝造得好或造得次，在于鸡肚子里有没有蛋，一只空怀无蛋的母鸡，即使用软绸锦缎铺垫成窝，卧多久也生不出一颗蛋来……

这不是抬杠。然而，对于一个清静而又较为舒适的写作间，我不仅不拒绝，而且是期待着拥有，前述的那些简陋的写作环境，是无奈条件下的举措罢了，好在我并不抱怨，也未向谁诉苦，倒是为那些偶然看到此景而惊讶的朋友做轻松的解释。现在，我在祖居的宅基上盖起了三间新房，我和夫人和孩子，将永久性告别阴雨天便觉得盆盆罐罐太少（接屋漏雨水）的手足无所措的日子了。我那时候是专业作家，兼着作家协会副主席的职务，论行政级别已属副厅级，我把提升到一百五十元的工资和每一笔稿酬都积攒下来，自然要减掉日常吃穿和三个孩子读书的费用，以及总闹病及至住院治疗的母亲的开销。然而，还是攒下钱来，令人鼓舞，终于把新房建成了。我在任何场合都不说生活的困窘和拮据，大约应该是生性决定的，我在无钱交学费的少年时期休止学业，也不诉苦，而是等待家境缓解再去复读；我在已经是最基层的公社（乡镇）一位副职领导的青年时期，冬天给孩子烘热被褥的制暖器具，是夫人从灞河滩里挑选的一块河石，在灶锅下烧得滚烫，当作暖壶使用，我大加赞赏夫人的创造性思路，却在年终拒绝申请困难补助金。我在进入初中时写过助学金申请书而未获批准，尽管我知道那些获得助学金的同学确凿比我更为困难，理智上能理解，情感上却受到挫伤，直接的感受是丢脸，十三岁发生的这次挫

伤，不仅致使我后来对一切困难补助申请一概排斥，而且形成不诉不说的习性。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住在乡村祖居的院子里，周围都是聚居一村许多代的乡邻，我在他们眼里，不仅不是一个穷作家，而是颇多不可理喻的“特权阶层”的人，拿着公家的工资还不上班，写文章还能挣钱，几乎是不可思议的好事美差。我在这种环境里的最直接的参照，就是那些挑着蔬菜和土产水果到城市边沿出售的农民，还有时时议论着市场上猪肉鸡蛋价格涨了跌了的声音。我已经切实感觉到拿着工资又得了稿费的优越。我的新建的房子，亦属村子里较早出现的纯粹用砖头构建的新房中的一座，尽管有省吃俭用的积攒过程。

我现在有了一间正经的写作专用房。这个房子是我亲自建造的。我请乡村木匠割制了一张带抽屉和柜子的桌子，一把有靠背的椅子，把祖传的方桌和条凳废置不用了，还做了两个书架，把我一直堆积着的有用的书摆列上架了，这屋子顿然就生出文人的气氛了。到得要动手起草这部长篇小说的时候，村子里一位刚学会制作沙发的农村青年找上门来，要为我做一套沙发。几经合计，我和夫人决定破费定做，一长两单的沙发也摆置起来了，我选择了绿色的罩布，这书房就显出某些豪华的气象来。我坐在新沙发上，把硬皮笔记本在腿面上打开的时候，是一种前所未有的似乎是矛盾的激情里的沉静。我的笔尖一触及白嘉轩的四合院，置身的这个颇为得意的书房已不存在，眼前呈现着近百年前的原上白鹿村一位族长的深宅大院。与其说是我必须以沉静的心态去探究白嘉轩们屋院和祠堂里的气脉，不如说是那些气脉迫使我的心境必须沉静下来。

这是连我自己几乎都不敢相信的一次顺畅的写作。从一九八八年清明前后动手，到次年的元月就完成了草拟稿，两个厚厚的大十六开的笔记本写满一本和半本，大约四十多万字，这是我写作量最大的一

年。记得这一年的七八两月，是关中地区素有的酷暑溽热的时月，又添了孩子考试选择学校的周折，我索性停止下来，到九月立秋早晚有了凉意，孩子也各得其所上学念书了，我又开始“上原”的行程了，重新进入已经骚动也骚乱了乡约族规的白鹿村。我仍然坐在业已习惯的绿布沙发的左首，把硬皮笔记本摊在膝盖和大腿面上，追逐着已经烂熟的一个个男人女人的脚步。我对首次采用的这个写作姿势，最直接的体验是放松，坐在沙发上又是在笔记本上写字，有一种写日记和早年间作为练笔写生活记事的感觉，这就是纯粹写给自己看的或用的，不是给编辑给评论家给读者看的，心理上是松弛的自如的，没有了在稿纸上写作时的紧促和拘谨。这样，动手前业已构思的人物形象和各自的命运遭际，各自的大的情节和颇为得意的细节，大多都已通过文字固定到硬皮本上，更令人兴奋不已的是，一个个首先令自己兴奋莫名的细节，是在草拟过程中源源不断地纷至涌来，让我常常处于忘我的兴奋之中，又不禁对自我发生惊讶的反问，这些近百年前的人们的生活方式交往方式和语言方式，是什么时候存储到我的记忆深处而又毫不察觉，现在却一桩桩一件件被激活了。我的感觉是如同一个连自己都遗忘了的仓库，突然被打开被照亮，才惊讶地发现自己竟有如此丰厚的库存。随意举一个例子，田小娥被鹿三从背后捅进削标利刃的情节，是动笔起草之前就构思成形的一个重要细节，写来很顺且不论；而鹿三之死在起初尚无具体的细节，直到写到这里时才骤然开朗，几乎是一个事先无从料及的死亡方式；更有发现鹿三死后白嘉轩随口而出一句慨叹，“白鹿原上最好的一个长工去世了！”这话似乎不是出于我心我口，分明是我看见听见白嘉轩仰天慨叹时发出的声音，我瞬即记到我的硬皮本上。那一刻，我的新置的书房已不是书房，而是鹿三的马厩牛槽和他僵死的土炕……

原先计划用一年时间完成草稿，而实际的写作时间只有八个月。原先最担心吃紧的是结构，实际写作过程却是始料不及的顺畅。我没有欢呼，甚至连任何欢呼的意向和小小的举动都没有，仅仅只是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一个最大的担心解除了，算是踏实了，曾经也有生活素材是否够用的担心也已解除了。春节已经临近，我合上第二个只用了半本的笔记本，开始和村子里的农民搭帮结伴去逛集镇，备办过年的年货，猪肉和蔬菜、鞭炮和雷子炮、写对联的红纸……我已从原上虚拟的白鹿村回到原下河川里我的蒋村。除了我的妻子，我再没有告诉谁草拟完成的事。这是一个轻松欢畅的春节。我帮夫人洗肉淘菜。我和孩子守在案边，等待不及抓到新年蒸熟的第一锅大肉葱花包子。我和孩子一起在新修的门楼两边贴上对联。对联由我拟成并用毛笔写了，隐约有白鹿的意蕴，却没有具体的写作方面的指向，只有我心里清楚其韵味。天上的星星尚未完全隐去，一九八九年的春节的第一缕晨光还未撒出，我的孩子却先我醒来，催我和他一同去放炮。

从我家院里响到门外的鞭炮声，融进村庄的此起彼伏的爆竹的声浪里，我在那一刻才感到了释怀的陶醉。

五 难忘一九八五，打开自己

一九八五年，在我以写作为兴趣以文学为神圣的生命历程中，是一个难以忘记的标志性年份。我的写作的重要转折，自然也是我人生的重要转折，在我今天回望的感受里，是在这年发生的。

这年的十一月，我写成了八万字的中篇小说《蓝袍先生》。这部中篇小说与此前的中、短篇小说的区别，我一直紧紧盯着乡村现实生活变化的眼睛转移到一九四九年以前的原上乡村，神经也由紧绷绷的状态松弛下来；由对新的农业政策和乡村体制在农民世界引发的变化，开始转移到人的心理和人的命运的思考，自以为是一次思想的突破和创作的进步。还有一点始料不及的事，由《蓝袍先生》的写作勾引出长篇小说《白鹿原》的创作欲望。

这年的最后一个月的最后十天，我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泰国。这是我第一次走出国门，为此置备了一套质地不错的西装。当我第一次穿上西装打上领带站在穿衣镜前自我端详也自我欣赏的时候，我的脑海里浮出蓝袍先生来。这是我在一月前刚刚写成的中篇小说《蓝袍先生》里的主要人物，其中有一个我自己很欣赏的细节，他穿了许多年的蓝色长袍，从解放前的教书先生一直穿到走进人民共和国的一所新式教师进修学校，在同学的讥笑声中脱下了作为封建残余标志的蓝袍，换上了象征着获得精神解放的“列宁装”。我脱下穿了几十年的四个兜中山装再换上西装的那一刻，切实意识到我就是刚刚塑造完成的蓝袍先生。我在解析蓝袍先生的精神历程揭示心理历程的人生轨迹时，也在解析自己；我以蓝袍先生为参照，透视自己的精神禁锢和心灵感受的盲点和误区，目的很单纯也很专注，打开自己。

人生的每一个年轮都会发生大大小小许多事，过去了也就过去了，无论好事或者挫折的事，对人尔后的经验积累和人生体验，都有益处。而几件难忘的事完全是毫无意识地凑到一起，事后回嚼起来发现如此的奇妙。正当我以一种强烈的自觉意识希求打开自己的时候，中国作家协会通知我随团访问泰国。到泰国首都曼谷机场时已是傍晚，在机场完成礼仪性会见仪式再乘车驶上高速公路，我被河流一样的汽车车灯吓得不知所措。不仅我这个乡下人第一次看到这奇观异景，随团的北京几位作家也连连发出惊叹。还有一个细节至今记忆犹新，参观曼谷一家超市时，郑万隆让我和他合作做一项社会调查，他数往这边过来的顾客四十人，让我数往那边走去的顾客也数四十人，有男也包括女，看看能有几个人穿着相同式样和颜色的衣服。结果是他没有看到我也没有看到服装完全一样的两个人。这个细节之所以比泰国那些保存完美的古典宫殿还要深刻地保持记忆，在于太赋予一个时代的讽刺性标征了。大约就在一九八五年前一年，胡耀邦在某次重要的中央会议上，把他穿戴整齐的西装领带示范给与会的各位党政领导人，身体力行倡导穿西装。西装和中山装已经成为思想解放和思想保守的时代性标志。我的《蓝袍先生》，就是在这种处处都可以感受到生活正在发生的激烈而又广泛的深层冲突过程中，引发思考触动灵魂也产生创作欲望的。我那时候把这种过程称作“精神剥离”。

我生活周围的乡村人有一句自我嘲弄的卑称，相对见多识广也富裕文明的城市人，把自己称作“乡棒”，由此演绎出许多“乡棒”进城的笑话。我在曼谷超市大楼上被五颜六色的各种式样的服装搞得眼花缭乱的那一刻，确凿意识到，不仅我是“乡棒”，教我观察服装的北京作家郑万隆也是“乡棒”。面对世界，一九八五年的中国人大都是“乡棒”。胡耀邦倡导各级党政领导脱下中山装换上西装领带，应该是换一种思想也换一种思维方式的符号，强烈地要改变中国“乡棒”的形象，

进入世界充当角色。作为作家，我在泰国看到的生活世相，恰好吻合着我当时的心态，这儿的人是以这样的形态生活着，这就足以让我开了眼界了——打开自己。

我更迫切也更注重从思想上打开自己，当然还有思路和眼界。这肯定与我业已发生的新的创作内容有关系，即在此前两三个月产生的长篇小说的内容。一九八六年的清明过后，我去蓝田县查阅县志和党史文史资料，开始把眼光关注于我脚下这块土地的昨天。我同时也开始读一些非文学书籍，这种阅读持续了两年，直到我开笔起草《白鹿原》初稿，才暂且告一段落。我印象深的有两本书，一本是号称日本通的一个美国人赖肖尔写的《日本人》的书，让我颇为惊悚。我曾在十四年前与评论家李星的对话中较为充分地阐述了惊悚引发的思考，不再重述，倒是这种惊悚之后关于历史和现实的态度，进入一种较为理性的沉静，对于我所正在面对的白鹿原百年变迁的生活史料的理解，大有益处，甚至可以说至关重要。我在惊悚之后进入这样一种状态，“所有发生过的重大事件都是这个民族不可逃避的必须要经历的一个历史过程，所以我便从已往的那种为着某个灾难而惋惜的心境或企图不再发生的侥幸心理中跳了出来。”这部书让我了解了明治维新前后的日本，正好作为我理解中国近代史一个绝好的参照；意料不及的意外收获，让我看取历史理解生活的姿态进入理性境界。另一部书名为《兴起与衰落》。这是青年评论家李国平推荐给我读的，他大约风闻我在查阅西安周围几个县历史资料的举动，让我读一读他已读过且以为很有见解深度的这本书。这是研究以古长安为中心的关中历史的书，尽管历史教科书向每一个读过中学的人普及了长安曾经的几度辉煌，然而作者对这块土地上的兴盛和衰落的透彻理论，也给我认识近代关中的演变注入了活力和心理上的自信。同样在与李星的对话里也谈到这一点，“当我第一次系统审视近一个世纪以来这块土地上发生的

一系列重大事件时，又促进了起初的那种思索进一步深化而且渐入理性境界，甚至连‘反右’‘文革’都不觉得是某一个人偶然判断的失误或是失误的举措了。所有悲剧的发生都不是偶然的，都是这个民族从衰败走向复兴复壮过程中的必然。这是一个生活演变的过程，也是历史演进的过程。”这是我那时候的真实感受，是给我以可靠感觉的阅读文本，帮我打开了禁封的自己。

我集中阅读了一批文学书籍，主要是长篇小说，意图也很明确，需要更进一步在艺术上打开自己。实际上我的艺术视野在新时期以来是不断扩展的，每一本有独到性的小说乃至某一个优秀的短篇小说，都在起着打开艺术眼界的效果。我向来是以阅读实现创作的试验和突破的。印象最深的是作为新时期文艺复兴的标志性的一九七八年的夏天，我确信文学创作可以当作一项事业来干的时代到来的时候，要求从行政部门调到西安郊区文化馆。这年秋天，我在文化馆一间废弃的房子支了一张床，把墙上用粗笔写的“打倒”“砸烂”之类的黑墨字用报纸糊起来，把吊在空中的顶棚重新搭好，我就开始坐下读书。一九七八年冬天还找不见新翻译小说，我在文化馆图书馆把所有的契诃夫和莫泊桑的短篇小说搜出来，坐在那间只有一张旧桌子一把旧椅子和一张床的房子里阅读。这大约是我一生读书经历中心境最好的一次。最重要的一点，我在此时确定下来一个尚不敢张扬的人生志愿，要当一个作家。我在“文革”前一年刚刚发表散文处女作，到“文革”摧毁一切的时候，仅仅发表过六七篇散文，还有诗歌、快板。那时候能在报刊上发表作品的业余作者远远比不得现在这样多，尽管我自己很鼓舞，却也能掂出自己那些小散文的分量，确凿还不敢确信自己能成为一个作家。作家柳青和王汶石就在离我不远的西安，是我顶礼膜拜的人，他们才是作家，等不得我有创作的新发展，也等不得我有当作家的雄心壮志产生，“文革”把我最切实也最平庸的能发点文章就不错的好梦

也打碎了。到“文革”后几年，被赶出作家协会院子的作家和编辑得到指令，从陕南陕北关中几处劳动改造的乡村回到西安，组建陕西省文艺创作研究室（不许复旧作协名称），创办一本文学杂志《陕西文艺》（不许复旧《延河》），老作家惊魂未定，大多数没有动手写作，用心偏重于培养“工农兵”业余作者。我从一九七三年到一九七六年中国发生第二次“解放”的四年里，写了四篇小说，还有一些散文。第一个短篇小说处女作被改编为电影，后来留下笑柄。这几篇小说都演绎阶级斗争，却也有较为浓厚生动的乡村生活气氛，当时颇得好评。尽管如此，我也没有产生当作家的梦，依旧认真地在当时的西安郊区一个公社里“学大寨”。我把这几年的写作自嘲为“过瘾”，大约只有我深知自己的这种写作感受。我真喜欢写作，如同酒鬼的酒瘾和烟民的烟瘾，我一年写一个短篇外加几篇生活速写或散文，就是要过一过文字表述的“瘾”，最大的安慰就是在杂志和报纸发表出来的时候，看着被铅印的自己的名字，有某种自我欣赏的愉悦。那时候取消了稿酬，没有一分钱的实际利益，写作又是最冒风险的事，一句话写不好就会有“帽子”扣过来，就形成只想“过瘾”不做作家梦的清醒而又矛盾的状态。

现在想当作家了，我当时能想到的切实举措就是读书。我那时想从短篇起步，就读契诃夫和莫泊桑。我一边关注着新的文学观点，重心却在这两位大家的作品的阅读感受，是驱逐排解以往接受的极左到可笑的非文学因素的最有效的办法。我在契诃夫与莫泊桑之间又选定莫泊桑，把他小说集里我最喜欢的十数篇作为精读的范本。房子里生着火炉，我熬着最廉价的砖茶，从秋天读到冬天直读到春节，整个沉浸在阅读的愉悦之中，没有物质要求，也不看左凉右热的脸，是一种最好的读书心境。到一九七九年的春节过后，我在依然凛冽的寒风里敏感到春的骚动，开始涌动起写作的欲望。这一年，我写了近十篇小

说，《信任》获得全国短篇小说奖。此前一年冬天围着火炉的阅读，不仅从极左的文艺禁锢下得到拯救和重生，而且开始形成自己，也成为我创作道路上的一次深刻的记忆。现在看，当是第一次打开自己。

我在七八年后又发生了这种迫切的阅读欲望。我在《白鹿原》创作苗头发生以后，突然意识到以往阅读长篇小说太粗心了，竟然没有留心解读它们的结构。《白》的主要人物重大情节和一些自以为得意的重要细节基本确定以后，如何把已经意识到的内容充分合理地表述出来，结构就成为横在眼前的首要难题。我尊敬的西北大学教授蒙万夫老师，得知我想写长篇小说之后，十分关切，不止一次郑重告诫我，长篇小说是一个结构艺术。其实在我不单是一个结构问题，我既想见识各种长篇小说的结构方式，也想看看各路作家的语言选择，甚至如何开头和结尾才恰到好处。我已十分切近地感到某种畏怯，第一次写长篇，人物和内容又那么多，时间跨度也那么长，写砸了就远不是某个中篇或短篇不尽如人意所可类比。阅读以开阔眼界，同时也在完成心理调整，排除畏怯心理，树起自信来。

我先后选择了十多部长篇作为范本阅读。我记得有《百年孤独》，是郑万隆寄给我的《十月》杂志上刊发的文本，读得我一头雾水，反复琢磨那个结构，仍是理不清头绪，倒是忍不住不断赞叹伟大的马尔克斯，把一个网状的迷幻小说送给读者，让人多费一番脑子。我便告诫自己，我的人物多情节也颇复杂，必须条分缕析，让读者阅读起来不黏不混，清清白白。我读了王蒙的《活动变人形》和张炜的《古船》，这是那两年先后出版的两部深得好评的长篇小说。在我的印象里是新时期文艺复兴刚刚开端的长篇小说创作，一出手就把长篇小说创作推到一个标志性的高度。我读这两部长篇小说时，完全不同《百年孤独》的感受，不是雾水满头而是清朗爽利。《活动变人形》

呈现一种自然随意的叙述方式，结构上看去不做太讲究的痕迹，细看就感到一种大手笔的自由自在的驾驭功夫，把人物的现在时和过去时穿插得如此自然自如。我在《古船》的阅读中却看到完全不同的结构方式，直接感知到一种精心设计的刻意。我又一次加深体验了我说过的话，想了解一个作家的最可靠最直接的途径，就是阅读他的作品。《古船》和《活动变人形》对近代和当代生活的叙述，就显示着张炜和王蒙的不同质地和个性，这且不多论。我在这两部小说阅读中得到的关于结构的启示，不单是一个方式方法问题，而是如何找到合理结构的途径；不是先有结构，或者说不是作家别出心裁弄出一个新颖骇俗的结构来，而是首先要有对人物的深刻体验，寻找到能够充分表述人物独特的生活和生命体验的恰当途径，结构方式就出现了。这里完成了一个关系的调整，以人物和内容创造结构，而不是以先有的结构框定人物和情节。我必须再次审阅我的人物。

这时候刚刚兴起的一种研究创作的理论给我以决定性的影响，就是“人物文化心理结构”学说。人的心理结构主要由接受并信奉不疑且坚持遵行的理念为柱梁，达到一种相对稳定乃至超稳定的平衡状态，决定着一个人的思想质地道德判断和行为选择，这是性格的内核。当他的心理结构受到社会多种事象的冲击，坚守或被颠覆，能否达到新的平衡，人就遭遇深层的痛苦，乃至毁灭。我在接受了这个理论的同时，感到从以往信奉多年的“典型性格”说突破了一层，有一种悟得天机茅塞顿开的窃喜。我自喜欢上文学创作，就知道现实主义的至为神圣的创作目标，是塑造典型性格的人物；我从写第一篇小说就实践着典型性格人物的创作，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都在做着这种努力；我已经写过几十个短篇小说和七八部中篇小说，却没有一个人物能被读者记住，自然说不上典型了。我曾经想过，中国古典几部经典小说塑造的张飞、诸葛亮、曹操、贾宝玉、王熙凤、林黛玉、孙悟空、猪八戒

等典型性格，把中国人的性格类型概括完了，很难再弄出新的典型性格来；我也想到新文学，仅就性格的典型性而言，大约只有阿Q和孔乙己。我自然想到我的这部长篇小说，几十万字写出来，如果给读者不能留下一两个性格显明的人物，读者读完便什么都忘了，我写它的必要性还有多大？且不敢妄想“典型性”。我在以偷得天机的接受“人物文化心理结构”说之后，以为获得了塑造《白》的人物的新的途径，重新把正在酝酿着的几个重要人物从文化心理结构上再解析过滤一回，达到一种心理内质的准确把握，尤其是白嘉轩和朱先生，还有孝文和黑娃，他们坚守的生活理念和道德操守，面对社会种种冲击和家庭意料不及的变异，坚守或被颠覆，颠覆后的平衡和平衡后的再颠覆，其中的痛苦和欢乐，就是我要准确把脉的心灵流程的轨迹。我已树立起一个信念，把自以为对这些人物的心灵轨迹心理脉象把准了，还能有恰切恰当的叙述文字，这些人物的内在气质和个性应当是立体的。为了实现从这条途径刻画人物的目的，我给自己规定了一条限制，不写人物的外貌肖像，看看能否达到写活人物的目的。这样，我的思路明晰了，也单纯，就是从人物各个不同的心理结构下笔，《白》书的结构框架也脉络清晰水到渠成了。我在和李星的对话里说过：“最恰当的结构便是能负载全部思考和所有人物的那个形式，需得自己去设计，这便是创造。”

我至今记着一九八五年的一个细节。这年早春三月，中国作协在河北涿县召开“农村题材创作”研讨会。我在赴京的火车上和由北京赴涿县的汽车上，看到河北平原寒凝大地的凋残景象，一望无际的越冬小麦的垄畦里，看不到一缕绿色，贴在冻结的地皮上的麦苗的叶子，一抹被冻死风干的黄色，我顿然意识到不同于我的家乡关中冬天的严酷了。在关中，在我的祖居和现居的白鹿原下的灞河川道，即使数九天里，小麦的叶子只不过稍微变成深灰，却仍然是绿的底色。三月的

河川和原坡，已经是一派葱茏的返青的麦苗了，柳树已蓬勃着一派嫩绿浅黄的柔和诗意。我第一次领略到河北平原的三月，是这样一番不堪的景致，虽然颇多惊诧，却毫不影响我参加这次会议的兴致。我感动中国作协对以农村题材写作为主的作家的关心，召开这样一个专题研讨会，起码给我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可以听取那些在农村题材创作上成就卓著的老作家的经验，也可以了解新时期在农村题材创作上出手不凡的年轻作家的创作思路，还有涉及农村题材创作诸多话题的种种见解，我可以开阔眼界扩展思路和视角，对往后的创作肯定只有益处。我只是一个聆听者，一个虔诚的聆听者，这是我起程赴会时就自我确定的姿态和心态。我一次不缺参加分组讨论和大会发言，都是倾心真诚地聆听各路新老作家的见解，即使完全相对相悖的看法，我都认真听取，在我的思想里过滤、判断和选择。我至今留下的印象，这是难得的一次有质量的会议，讨论的话题已不局限在农村题材，很自然地涉及整个文学创作，即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文学创作的现状和走向。其中现代派和先锋派的新颖创作理论，有如白鹭掠空，成为会上和会下热议的一个话题。记得是在大会安排的发言中，我听到路遥以沉稳的声调阐述他的现实主义创作主张，结束语是以一个形象比喻表述的："我不相信全世界都成了澳大利亚羊。"

那个时候刚刚引进来澳大利亚优良羊种，正在中国牧区和广大乡村推广，路遥的家乡陕北地区素来习惯养羊，是陕西推广澳大利亚羊的重点地区。他借此事隐喻开始兴起的现代派和先锋派创作，却没有挑明直说；他只说自己崇尚并实践着的现实主义写作方法，自然归类于陕北农民一贯养育着的山羊了。我坐在听众席上看他说话，沉稳的语调里显示着自信不疑的坚定，甚至可以感到有几分固执。我更钦佩他的勇气，敢于在现代派先锋派的热门话语氛围里亮出自己的旗帜，不信全世界只适宜养一种羊。我对他的发言中的这句比喻记忆不忘，

更在于暗合着我的写作实际，我也是现实主义写作方法坚定的遵循者，确信现实主义还有新的发展天地，本地羊也应该获得生存发展的一方草地。然而，就现实主义写作本身，尽管我没有任何改易他投的想法，却已开始现实主义写作各种途径的试探，这从近两年的中短篇小说尤其是中篇小说的写作上可以看出变数。一九八五年早春的涿县会议使我更明确了此前尚不完全透彻的试探，我仍然喜欢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但现实主义写作方法必须丰富和更新，寻找到包容量更大也更鲜活的现实主义。

我随后便以自觉的意识回看自己的现实主义写作历程。这是一九八五年最活跃的文学创作氛围冲击下获得的自觉。我自然会想到柳青和王汶石，他们对渭河平原乡村生活的描写，不仅在创作上，甚至在纯粹欣赏阅读的诗意享受上，许多年来使我陷入沉醉。“文革”中的一九七四年我到南泥湾“五七干校”锻炼，规定要带《毛泽东选集》，我悄悄私带了一本《创业史》，在窑洞里度过了半年，那是一种纯粹的欣赏性阅读。这两位作家对我整个创作的影响，几乎是潜意识的。我的早期小说，有人说过像柳青的风格，也有人说沾着王汶石的些许韵味。我想这是自然的，也是合理的，当年听到时还颇为欣慰，能让评论家和读者产生这种阅读感觉，起码标志着不低不俗的起步的基点。到了一九八五年，当我比较自觉地回顾包括检讨以往写作的时候，首先想到必须摆脱柳青和王汶石。我曾在一篇文章里写到过这段经历，概括为一句话说：一个业已长大的孩子，还抓着大人的手走路是不可思议的。还有一句决绝的话：大树底下好乘凉，大树底下不长苗。这是我那段时间反省的结论。在之后酝酿构思《白》书的两年时间里，想要形成独立的自己的欲念已经稳固确立，以自己的理解和体验审视那一段历史。但有一点我还舍弃不了，这就是柳青以“人物角度”去写作人物的方法。

不同的作家有不同的写作人物的方法，有的是全知的叙述或描写，有的则是作家自己的视角和口吻，等等。柳青的“人物角度”写作方法，是作家隐在人物背后，以自己对人物此一境况或彼一境遇下的心理脉象的准确把握，通过人物自己的感知做出自己的反应。我曾经一直实验着这种方法。我在一九八五年获得并决定接纳“人物文化心理结构”说的跃跃欲试的兴奋情境里，似乎很自然地把柳青的“人物角度”写作方法联想起来。我较长时月里虽然都在使用这种方法，总是苦于把握不准“人物角度”，或者留下生硬的痕迹，难得如柳青那样自然熨帖。我这时才意识到，“人物角度”只是现实主义写作的一种方法，这个方法谁都可以用，用得好用得不好，或者说能否显示这种写作方法独具的艺术效力，关键还在作家对自己要写的人物深度理解上，一个本身没有多少思想负载的人物，单凭某种写作方法是无法为其增加分量和深度的。我也就豁然开朗，我可以使用“人物角度”的写作方法，而关于历史和现实生活的理解和体验，只能由自己发生，这是无法借助或教授所能获得。关于二十世纪前五十年的生活体验生命体验，自以为是新鲜的独自的；对那些已经酝酿着的人物的“文化心理结构”的把握，顿然确信获得了“人物角度”写法的自由。在后来的写作中，自我感觉果然比较自如，在人物直接出场的行为中，我以“人物角度”描写他们；在人物不直接出场纯由作者叙述的篇章，我也能比较自如地以“人物角度”进行叙述；描写和叙述都从“人物角度”得以实现，我以为真正的要领在于“人物文化心理”的把握，才获得了描写和叙述的自由。“人物文化心理结构”说，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令人难忘的思想和学术的活跃氛围里，似乎还没有形成轰动效应，大约是学术味太偏浓的缘故，我却有幸领教了也接纳了，而且直接进入创作试验了。我便想到，谁接受什么拒绝什么，也是因谁的具体个案而决定取舍的。我说不清我为什么接纳“人物文化心理结构”说，要说还是一句大实话大白话，觉得它有道理，有道理就可以信赖，就对自己认识世界认识

生活以及正在努力着的写作具有启示意义，自然就信服了。而我确切地感知到这是一次重要的非同一般的启示。

我想到阅读《百年孤独》的情景。我是在《十月》上读到这部名著的。这部小说和作家马尔克斯风靡中国，一直持续到今天，新时期以来任何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和作品，都无法与其相比在中国文坛的影响。我随后看到中国个别照猫画虎式的某些模仿，庆幸我在当初阅读时的感受和判断，尚未发昏到从表面上去模仿，我感受到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是一部从生活体验进入生命体验之作，这是任谁都无法模仿的，模仿的结果只会是表层的形式的东西，比如人和动物的互变。就我的理解，人变甲虫人变什么东西是拉美民间土壤里诞生的魔幻传说，中国民间似乎倒不常见。马尔克斯对拉美百年命运的生命体验，只有在拉丁美洲的历史和现实中才可能发生并获得，把他的某些体验移到中国无疑是牛头不对马嘴的，也是愚蠢的。我由此受到的启发，是更专注我生活的这块土地，这块比拉美文明史要久远得多的土地的昨天和今天，企望能发生自己独自的生活体验，尚无把握能否进入生命体验的自由境地。在形式上，我也清醒地谢辞了“魔幻”，仍然定位自己为不加“魔幻”的现实主义。这道理很简单，我所感知到这块土地的昨天和今天，似乎没有人变甲虫的传闻却盛传鬼神。我如果再在中国仿制出人变狗或变虾鱼的细节来，即使硬撑着顶住别人的讥讽，独处时也会为这种低能而羞愧的。我确信中国民间的鬼神传闻在本质上不同于魔幻，不单是一句批判意义上的迷信，尽管其发生和传播的一条原因在于科学的缺失，然而仍蕴含着不尽的文化，也应是中国某些人“文化心理结构”的一根构件，即使是小小的不起眼的一件。我自幼接受的第一件恐惧事象不是狼而是鬼。天黑之后我不敢去茅房，四周似乎都有鬼的影子。即使在我已经做了乡村教师，还是在路过有孤坟的一段村路时不由得起鸡皮疙瘩。我在未识字前的最丰

富生动的想象力，就集中体现在对鬼的千姿百态的描绘上。我对神却是一片迷糊，从来没有想象出一幅神的图像来。在《白》书的构思里，有几处写到闹鬼情节，却不是为了制造神秘魔幻，而是出于人物自身的特殊境遇下的心理异常。鹿三杀死小娥后就发生了行为举止失措的变化，这是仅仅出于鹿三这个人独具的文化心理结构，按他的道德信奉和善恶观，无法容忍小娥的存在；然而出于同样的文化心理结构，杀人毕竟不是拔除一根和庄稼争水肥的野草，在一时义举之后就陷入矛盾和压迫，顺理成章就演绎出小娥鬼魂附体的鬼事来……我少年和青年时期，不下十回亲自看见乡人用桃条抽打附着鬼魂的人身上的簸箕，连围观的我都一阵阵头皮发紧发凉。有论家说我在《白》书中的这些情节是“魔幻”，我清楚是写实，白鹿原上关于鬼的传说，早在“魔幻”这种现实主义文学传入之前几千年就有了，以写鬼成为经典的蒲松龄，没有人给他“魔幻”称谓；鲁迅的《祝福》里的祥林嫂最后也被鬼缠住了，似乎没有人把它当作“魔幻”，更不必列举传统戏剧里不少的鬼事了；我写的几个涉及鬼事的情节，也应不属“魔幻”，是中国传统的鬼事而已……

真是难忘的一九八五。我在文学艺术的各种流派新潮的涌动里，接纳并试验了我以为可以信赖的学说，打开了自己；我在见识各种新论的时候，吸收了不少自以为有用的东西，丰富了自己；我也在纷繁的见识中进行了选择，开始重新确立自己，争取实现对生活的独自发现和独立表述，即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

六 朱先生和他的“鏊子说”

朱先生是这部长篇小说构思之初最早产生的一个人物。或者说，《白鹿原》的创作欲念刚刚萌生，第一个浮到我眼前的人物，便是朱先生。原因很简单也很自然，这是这部长篇小说比较多的男女人物中，唯一一个有比较完整的生活原型（即生活模特）的人物。

朱先生的生活原型姓牛，名兆濂，是科举制度废除前的清朝最末一茬中举的举人。我在尚未上学识字以前就听到这个人的诸多传闻。传闻里的牛先生是人更是神，他的真实名字民间知之甚少，牛才子的称谓遍及乡间。我父亲是牛才子的崇拜者。解放前后我刚刚能够解知人事的年龄，每年秋收时会收获很多苞谷棒子，堆在大房的明间里，高过人头的一大堆，晚上点着昏昏暗暗的煤油灯，一家人围着苞谷堆子剥苞谷穗子上的黄皮，干不了多大一会儿我就打盹了。父亲便讲《三侠五义》，讲《薛仁贵征东》，讲包文正刀铡陈世美，似乎都止不住我的瞌睡。父亲又讲牛才子的神话，说他站在院子里观测满天星斗，便能断定明年种何种作物，就会获得丰收；一个丢了牛的乡民求到他的门下，牛才子掐指一算，便指出牛走失后的方位，循此途径果然找到了牛。如此等等。我听得津津有味兴趣陡涨，忍不住连连发问。父亲也回答不了，只说牛才子眼力通天。这个带着神秘色彩的牛才子，从童年起便成为我一个永久性的生活记忆。

我后来上了学，从小学念到高中毕业，接受的是新中国教育体制规定的内容，其中包括常识性的辩证唯物主义哲学，也包括无神论。从我粗浅的理论认识到心理感受的真实性上说，在高中时期就接受并信服了这些哲学观点，不仅不信神不信鬼，连掐八字算卦也觉得是毛

鬼神的无聊瞎说了。这样，对于被父亲神话了的牛才子的那些传闻里的神秘色彩，很自然地就淡释了。我相信牛才子是一个学问家，因为文举人不是轻而易举可以获得的。在我的简单推理中，一个学问太高太深的牛才子，他的言论和行为，他对社会事象的看法和对日常俗事的判断，在文盲占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乡村人群的眼里，是很难被理解的。理解不了便生出神秘感，以至演变到神话，还有一个心理崇拜为基础。我在此前几十年里，没有搜集过牛才子的资料，更说不到研究，印象仍然停留在父亲所讲述的那个浅层面上。想来也很正常，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论，一波叠过一波的阶级斗争主导的各种运动，冲击撞荡得城市和乡村已无一寸安生之地的时候，牛才子不仅作为传闻已不合时宜，能不被拽出来再批判已属万幸了。“文革”初起大破“四旧”时，我听到一则传闻，牛才子的墓被红卫兵掘开，却发现墓道暗室用未经烧制的泥砖箍砌，使贫穷的生产队指望用挖出的墓砖砌井的打算落空。传闻又一次把牛才子神化了，说他死前就料定会被人掘墓，故意不用成砖而用未烧制的砖坯箍了墓室。我听到这个被传得神乎其神的事，信与不信已不是判断要点，倒是觉得颇富讽刺意味，掘墓鞭尸批判“四旧”的疯狂行动不仅没有达到批臭的目的，反而给沉寂多年的牛才子又添了一则神话。

这是截止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白》书创作欲念萌发时，有关朱先生的生活原型牛才子的全部资料记忆。当这个人物成为《白》书构思里第一个浮出的形象时，我的畏怯心理同时就发生了，这个牛才子的影响太广泛了，我把他写得让人感到不像或歪曲怎么办？没有生活原型的人物尽由我去刻画塑造，读者尽可以指点写得好与不好，却不存在像与不像的事，而朱先生所依赖的牛才子的原型，就构成一个像与不像的很具体的压力，乃至威胁。揣着这样的畏怯心理，我走进蓝田县档案馆，怎么也料想不到的意外惊喜发生了，我借到手的《蓝

田县志》，是牛才子牛兆濂先生作为总撰编写完成的，是蓝田县解放前最后一个版本的县志，也是牛兆濂谢世前的最后一部著作，由他挂帅和八个编者共同完成的一部完整的蓝田县志。

且不赘述查阅这部县志的诸种收获，只说和牛才子相关的一件事，也是意料不及的重大惊喜。牛总撰编撰家乡《蓝田县志》的总体指导思想，是严格而又严密的史家笔法，一种纯客观的文字叙述，稍一触及便能感觉得到。我发现写到近代蓝田的史实时，尤其作为县志附录的“民国纪事”篇时，对县域境内发生的重大事件，在用客观的史家笔法记述之后，牛总撰加了几则类似于“编者按”的小段文字，表述的是牛总撰自己对这些社会或生活事件的看法。读到牛总撰的这几则“编者按”式的附言，我兴奋得忍不住心颤，一个被神化了的牛才子剥除了神秘的虚幻的光环，一个活生生的可触可感的牛才子站在我的眼前。我可以感知到他眼里的神光，也能感知到他出气吸气的轻重缓急，以及沉静里的巨大愤怒。我感到我已切住了牛才子的脉象。我对以他为生活原型的朱先生写作的畏怯心理，就在这一刻被排除，涨起自信和强烈的欲望来。

我后来还搜集到牛才子一些真实事件，其中对我震撼最大的一件事，是他联合了南方北方几位旧知识分子，在上海一家发行量最大的报纸上发表抗日宣言（他称日寇为倭寇），响应者众，可见他的影响绝不局限于关中。他不仅发言立誓抗击倭寇侵略，而且身体力行，要到山西中条山抗战前线去，走到潼关正待过黄河时，被部队派人力劝强拉回来。在民族和国家的危亡时刻，牛才子疾恶如仇的骨气品格，真可谓惊天地泣鬼神。民间传闻里的神秘神话的色彩，已是荡然无存，一个铮铮铁骨的老知识分子，巍然如山立在我的眼前。我常常于傍晚时分站在家门前的灞河堤岸上，眺望河北边七八华里远的一道黄

土高崖，高崖下有一个小小的名曰新街的村子，是牛先生的生身和归葬之地。我和他的地理距离不过七八华里，一种天然的亲近把历史时序的距离缩小到几近于无，自然还在于崇敬仰慕基础上的心理贯通。

牛才子是程朱理学关中学派的最后一位传人，对关中学派的继承和发展有重要建树的一位学人。关中学派的创始者张载，有四句宣言式的语录流传古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无论做学问，无论当官从政，这样的抱负和这样的胸襟，至今读来仍令我禁不住心跳血涌。从这四句语录就可以感知关中学派的精髓，也就可以更深刻地理解我的灞河北岸的老乡党牛才子的精神内质了。我也就可以更切近地理解他冒着生命危险劝说企图反扑已经“反正”（辛亥革命）了的西安的清兵总督，也就理解了他以耄耋之躯亲赴抗日前线驱逐倭寇的举动。然而，到上世纪之初及至三十年代，辛亥革命和共产党革命兴起的时候，关中学派的某些具体理念的局限难以适应新的社会潮流，在牛才子身上也很难回避。他坐馆的曾经影响甚远的书院很快冷落，弟子走失，红火时曾有韩国留学生。先后有西安和蓝田两家新兴学校聘他为师，他都不能适应而告辞，回到书院编起了县志。我努力理解他在这个急骤的社会革命浪潮里的心态，他的超稳定的心理结构面临种种冲击时的痛苦，等等。

我依牛先生为生活原型，创作了朱先生。朱先生已不再等同于牛先生。道理属于创作常识，前者是生活真人，后者是一个艺术形象；艺术形象从精神心理上已摆脱了生活原型的局限和束缚，给作者以再创造的绝对而海阔的自由空间，把作者的理解和体验浇铸进去，成为我的“这一个”。

对于朱先生这个人物，我的态度是不做任何注释，由读者和评论家去审判。这也不光是我对朱先生这个人物的态度，而是我对《白鹿

原》小说里所有人物的态度，事实是，《白》书发表出版十五年来，我基本不做作品人物的解释，只在对某一些访谈提问时偶有涉及。令我感佩的是，大量的评论文章对包括朱先生在内的几乎所有人物，都有甚为精到的解析和评说，有些甚至超出了我的期待。自然，也免不了一些令我意料不到的评论视角，包括个别误读，我基本能保持平静的心态，当作一种观点来看取，也有鉴示的意义。我在这里想说一下朱先生的“鏊子说”，算是坚守十五年不做人物阐释的一次破例。

我在蓝田查阅县志和许多史料时，看到一些老革命回忆当年“农民运动”的文章，大为震惊。渭南地区的华县和华阴县，是陕西农民运动的中心，运动开展的广泛程度和卷入的农户人数，当是北半个中国闹得最红火的地区，与毛泽东在湖南发动的“农民运动”遥相呼应。尚不属于渭南中心地区的蓝田县，绝大部分村子都成立了“农民协会”，建立了农民武装，包括地理上的白鹿原地区。我在中学语文课上学习毛泽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更多地领受毛泽东看取这场运动的独立观点，以及他生动而雄辩的文字，至于那场农民运动本身，已经是遥远的过去，又是发生在遥远的南方。几十年后我突然感到一种切近的冲击，竟然忍不住心跳，就在我的生身之地白鹿原上，曾经发生过如此红火的乡村农民革命运动。

我家住在白鹿原北坡根下，出门便上坡上原，我到原上蓝田辖区的集镇赶过集，到几个大村看过壮观的社火和秦腔戏剧演出，却从来没有听说过六十年前那些大村小寨曾经发生过的轰轰烈烈的“农民运动”。我在手抚那些资料时感慨连连，自言自语着一句调侃的话，渭南地区的农民运动就规模和人数而言，不比湖南差多少，只可惜没有人写出一篇类似毛泽东的“报告”，竟然无声无息被历史淡忘了。这场运动骤起骤灭，国共合作破裂之后，“农民运动”遭到残酷的镇压，习惯

上称为“还乡团”。报复性镇压的残酷性是不难想象的。《白》书写了这个过程。朱先生在他的白鹿书院里，也听到杀伐的声音，嗅到了血腥气儿，说了一句话，白鹿原成了一个鏊子啦。正是朱先生的这句“鏊子说”，发生了一些误解和误读。恕我不再重复赘述那些误读误解的话。

“鏊子”，是朱先生面对白鹿原上“农民运动”被残酷镇压时的一个比喻。鏊子是北方乡村烙锅盔烙煎饼的铁制炊具。我在写到朱先生面对原上正在发生的“还乡团”的报复事件时，很自然地让他说出这个比喻来。或者说，是我意识里的朱先生自己说出的这个颇为形象的喻体。我在上一章里谈到，我以人物的文化心理结构把握我正在写作的各个男女人物，朱先生是我体验较深也自以为把握较准的一个重要角色。以他的文化所架构的心理形态，面对白鹿原上“农民运动”骤起骤灭的现实，说出“鏊子”的比喻，表示着他的看法和判断，这是作者我所严格把握的朱先生这个人物角度所决定着的，更是他独独禀有的心理结构所主导着的性格化语言表述方式，形象也含蓄。

这里有一个常识性的界线，作品人物对某个事件的看法和表态，是这个人物以他的是非标准和价值判断做出的表述，不是作者我的是非标准和意义判断的表述。作为作者我的写作用心，说明了只有一点，努力把握各个人物不同的文化心理结构形态，才能把握住他们不同的角度，才可能写出真实的性格差异来。这些人物对同一事件大相径庭的判断和看法，只属于他们自己，而不属于作者。读者可以审视、评点作者对各个人物把握得准确与否。只有准确了才能谈到合理，才能谈到真实，也才可能进一步谈到人物的深度和典型性。如果连最基本的准确都做不到，就无合理和真实，更遑论人物的深度和典型了。读者和评论家可以严格挑剔朱先生等人物的刻画过程里的准确

性和合理性，包括他的“鏊子说”，是否于他是准确的和合理的，而不应该把他的“鏊子说”误认为是作者我的观点。再者，朱先生的“鏊子说”，错了对了或偏了，更具体点说，是对“农民运动”和“还乡团”报复行为的大是大非的判断是否正确，即使如此，也是属于朱先生的判断，不是作者我的判断。单就“农民运动”这个事件，《白鹿原》里不同的人物都有截然不同的态度和判断，革命者鹿兆鹏自不必说，田福贤等从根本上就说成是“共匪”煽动的作乱。如果把朱先生的“鏊子说”可以看成是作者观点的糊涂，同样可以类及田福贤的反动观点给作者，鹿兆鹏的革命观点也应该是作者的。这种常识性的笑话，我在写作过程中是丝毫也不曾预料得到的。

某些不了解创作的人对朱先生的“鏊子说”发生误读以至指责，我都以平静的心态表示理解。我还听到行家指点说作者缺乏智慧，为什么要让朱先生说出“鏊子”这样的比喻来，让朱先生换一种说法不是不惹事吗，等等。我有限的智慧只把握到朱先生的“鏊子说”才合他的文化心理结构形态，只有他才能说出“鏊子”的比喻体。如果会料到惹事的后果，进而让朱先生说出别一种不惹事的话来，那么朱先生的面目就会是另一番景象了。这样一来，作者有限的智慧不仅专注不到人物的准确把握上，反倒耗费到如何逃躲误读的机巧上去了。把智慧耗费到机巧上，且不说合算不合算，恐怕创作都难以继续了，如果还有作家的道德和良知的话。

七 寻找一种叙述

在一九八六年到一九八七年《白》书构思的这两年里，新时期文艺复兴发展到真可谓百花齐放的红火时段，欧美以及拉美几乎所有流行过和正在流行的文学流派，都被引进中国文坛来了。无论学得像或不像，似乎没有谁太在意，或者尚来不及细究，全都陶醉在新鲜乃至稀罕的感觉里。我也是陶醉者之一，眼花缭乱应接不暇，尽管未必都能读得懂，未必都能进入欣赏的愉悦，却仍然兴趣十足地阅读，基本的收获是大开眼界甚为鼓舞。即使有人调侃这样的文坛景观说“各领风骚十来天”，也遏制不住我想长见识的兴致，依旧兴味十足地阅览文学杂志上新发表的标新立异之作。我当然不可能看到某个新流派就学写某个流派的小说，但我起码想知道世界上和中国有这种和那种文学流派。这如同牛仔裤引进中国，我不想穿它却想欣赏这种服装样式，看到别人穿起来还挺风光。

和这种五彩缤纷的文学景观不大匹配，或者说不大协调的事，已经悄然出现，就是出书有点难了。作家们正忙着追求新的文学流派和别致的写作方式，不太留意出版业已经完成了一次体制改革，由政府支配的计划经济性质，改为纯商品运作的市场经济体制了。一本书能否出版，商品利润的判断已成为一条硬杠子，具体到征订数目，如同一道判决书。出版社最基本的一条原则是要出能赚钱的书，赔本的买卖再不做了。道理很简单也很冷酷，政府不再给出版社拨款，过渡性的补贴也取消了，编辑的工资得靠编书出书赢得利润赚到钱才能获得，想靠人情和长官意志出书，在这个冷冰冰的硬杠子面前都开不了口了。一些意料不及的现象随即出现了，按习惯性思维和习惯性心理一时很难适应，纯粹的雅文学遭到市场的冷脸，出书难了；一些在文

坛上颇得风光的作品，在非文学读者的更广大的读者群里不买账，出书也难了。在作家和出版社编辑之间传递着令人丧气心凉的逸闻，某名牌大家的集子的征订数居然不到一千册，令约稿的编辑骑虎难下。我自己出书的经历才是最可靠的体验，一本颇得好评的中篇小说集征订不足三千册，迟迟不得开印，据说此订数在不赔也不赚的及格线上，后来还是侥幸面世了。另一部中篇小说集收集的作品，被转载或得过发表刊物优秀作品奖，征订数仍然不景气。至于短篇小说，全部堆在书柜里，没有哪家出版社问津，据说短篇小说和散文随笔最难赢得市场效益了。自以为还算是中国实施改革的拥护者，不料市场经济的观念和意识，竟是以这种切身压迫的方式让我领受的，而且别无选择，而且正值这头一回试笔的长篇小说快要定型的时候。

你写的小说得有人读，你出的书得有人买。出版社刚刚实行的市场经济理论和运作方式，无论多么深奥多么陌生多么冷硬，具体化对象化到我头上的时候，就变得如此简单。唯一的出路，必须赢得文学圈子以外广阔无计的读者的阅读兴趣，是这个庞大的读者群决定着一本书的印数和发行量。此前也不是没有想到这个层面的读者群体，却确凿没有形成至关致命的心理压迫和负担。

这种心理压迫的直接效应，使我很快确定这部小说的规模。构思的近两年的时间里，就其规模而言，虽然尚未完全确定，却一直偏重于写成上下两部。我是就已经酝酿着的较多的人物和他们较为复杂的人生故事，需得上下两部才能完成，每部大约三十万至四十万字。唯一犹豫未决的因素，是我的阅读习惯不喜欢多部规模的小说，这是长期形成的不大说得清道理的阅读习性，包括某些声誉颇高的翻译小说。我既然有这样的阅读习性，自然也不想弄出上下部或多部这样规模的小说，却想到这部小说的内容和人物，一部很难装得下。当市场

经济运作的无情而冷硬的杠子横到眼前的时候，我很快就做出决断，只写一部，不超过四十万字。之所以能发生这种断然逆转，主要是对这本书未来市场的考虑，如果有幸顺利出版，读者买一本比买两本会省一半钞票，销量当会好些。

我便重新审视一个个业已酝酿着的人物，重新审视每个重要人物的每一个重大情节和细节，合理性和必要性为审视的尺码，舍弃某些可以舍弃的情节和细节。即使如此，我仍然觉得四十万的字数很难装得下已经难以再做舍弃的内容。这样，我便把自己逼到语言方式这条途径上来。采用叙述语言，也几乎就在此时做出决断。在我的语言感受和意识里，仅就篇幅而言，叙述语言比之描写语言，是可以成倍节省字数和篇幅的。同样出于以往写作的语言感觉，叙述语言较之白描语言，难度也要大很多，尤其是一部几十万字的长篇小说，要做到通体不松懈更不露馅儿的形象化叙述，就我已不算少的文字实践的感受和理解，完全能估计到这是非同一般的难事。然而，我已经确定要用叙述语言来表述已经意识和体验到的那一段历史生活内容，或者说必须寻找到和那一段乡村历史生活内容最相称的语言方式，即叙述，而且必须是形象化的叙述。从我的写作实践看，尽管能充分感知这种叙述语言的难度，心头涨起的却是一种寻找新的语言形态的新感觉，甚至贴切地预感到这种叙述语言的成色，将直接影响乃至决定着内容呈现的成色。这次由小说规模引发的语言选择，很快就摆脱了最初为缩短小说篇幅的诱因，导致成对这部小说语言形态的严峻课题。

我很自然地发生对已往写作中语言演变的检索。我是由描写语言开始小说写作的，生动和准确的描写成为那个时期的语言追求，这大约在我热衷短篇小说写作的时段。这个时候对语言似乎没有太明显的刻意，完全凭着对要写人物的某种感觉去写作，是一种含糊盲目的尽

兴式写作，我对小说语言的自觉，发生在随后的中篇小说写作的时候，说来不单纯是语言自觉，而是由对小说创作新的理解引发的。我在中篇小说写作开始，意识到以人物结构小说，从此前的故事结构里摆脱出来。我发现一个很简单也很直白的问题，面对不同的写作对象，性格和心理形态差异很大的人物，很难用同一种色调的语言去写他们，包括他们各自不同的生活氛围和社会氛围，必须找到一种适宜表述不同人物的相应的语言形态。尤其是在写乡村知识分子的《蓝袍先生》和乡村农家院里两代人生活的《四妹子》，仅语言而言，差异是很大的。我自己回看这几部中篇小说，每一部都有相应的语言选择，各不相同。那个时候对语言的这种探索，也依赖着我的阅读感受，我发现，有的作家的主要作品，基本保持着一种语言结构形态和语言色调，形成一种固定的语言风格，让读者不看署名就能感知到这是谁的文字。另有一类作家的小说作品，语言差异很大，譬如鲁迅，《阿Q正传》和《祝福》的语言形态是太截然了，还有《狂人日记》《药》《在酒楼上》等，可以说无论篇幅大的或小的，每一部和每一篇都呈现着独有的语言形态。从纯粹的写作实践上来理解，我便推想到鲁迅肯定也面临过语言选择的事，用写阿Q的语言无法写祥林嫂，用写祥林嫂的语言也写不成酒楼上的男女。很显然，作家面临不同质地的写作对象选择最恰当的语言形式，才可能把自己体验到的生活内容，完成一次最充分也最富有个性化的独特表述。我几乎是很自然地倾向于这种语言选择的实践的，中篇小说的写作，还处于自觉和不大自觉的过程。

我这次对语言检索的更侧重的一个课题，就是由描写语言到叙述语言的过渡。对叙述语言的喜爱和倾倒，也是由阅读中充分感受其魅力而发生的。最直观的一点，一句凝练的形象准确的叙述，如果换成白描语言把它展开描写，可能要用五到十倍乃至更多的篇幅才能完

成，而其内在的纯粹的文字魅力却不存在了。再一点是叙述语言的内在张力和弹性，又不仅是一个外在的语言形态，而是作家对他的人物的透彻理解和掌握，获得了一种言说和表达的自由，才可能有叙述的准确和形象，才能恣意纵横而不游离各个人物的气脉，也才能使作者的语言智慧得以展示，充分饱满而又不过不及，废话就不可能落到某个人物身上。我对叙述语言的理解，是一个渐次加深的过程，在此之前的一些中篇小说写作中，自觉不自觉地试用过，用一句话说，火候不够也达不到完美。我已深切体会感知到叙述语言的难度，尤其难以掩饰的是，很难用叙述语言从头至尾把一部几万字的小说写下来，总有几处露出描写的馅儿来。这既是一种语言功力的欠缺，也是对作品人物心理演变准确合理把握的不到位，表象的标征却是语言。

为了一种新的语言形态——形象化叙述——的追求，我唯一能想到的办法就是试验。我在长篇《白》书开笔起草之前，写了短篇小说《窝囊》和《轱辘子客》，用意十分明确，就是要试验一种纯粹的叙述，选择这两个题材的人物和故事，自然也是适宜使用叙述的语言的。我确定尽量不写人物之间直接的对话，把人物间必不可少的对话，纳入情节发展过程中的行为叙述；情节和细节自不必说了，把直接的描写调换一个角度，成为以作者为主体的叙述。印象最深的是《轱辘子客》，近万字的一篇小说，通篇都是以形象化的叙述语言完成的，只在结尾处有几句对话。我切实地体验了叙述语言的致命之处，不能留下任何干巴巴的交代性文字的痕迹，每一句都要实现具体生动的形象化，把纯属语言的趣味渗透其中，才能展示叙述语言独有的内在张力，也才可能不断触发读者对文字的敏感性，引发他读下去直至读完的诱惑力。记得《轱辘子客》在《延河》杂志发表不久，我从乡下赶到城里去买粮和买煤球，在作协院子里碰到几位同事，都说到这个短篇的语言，对熟悉我以往语言的他们来说，感到新鲜，也感

觉到了明显的变化，似乎都以为这种语言形态不错。我大受鼓舞，却不便说出这种变化的深层因由。在《白》书已经草拟过半的一九八八年夏天，关中的三伏天热到近四十摄氏度，空调还只是传说中的高档器物，屋里屋外都热得汗流不止，再加上孩子高考升学的麻烦事，迫使我的草拟停止下来。偶遇下雨得着短暂的凉爽，我又写了两个短篇小说《害羞》和《两个朋友》，继续着叙述语言的演练。我又为纯粹的叙述里加入人物对话，意在把握对话的必要性，自然是对对话的内容再三斟酌和锤炼，以个性化的有内涵的对话语言，给大段连接大段的叙述里增添一些变化，避免大段叙述语言阅读过程中可能产生的累。因为《白》的人物和主要情节已经基本确定，草拟过半程的感觉挺不错，叙述语言就成为承载和展示作品内容的一个关键。其实，正在草拟着的《白》的语言，也是以叙述的形态展示着，主要把握着作者叙事主体的角度，形成叙述语言的架构和形态，尚不能顾及语言的细部，也顾不及字词的推敲。道理在我很清醒，草拟的主要用意在于把这部跨越半个世纪的小说的框架搭起来，把白鹿原上那些人物命运遭际的粗线条勾勒出来，叙述语言的精确斟酌，那是写正式稿时要做到的事，我计划的草拟时间为一年，正式稿预计两年，多一倍的时间预算，其中一条因素就是花给叙述语言的……我得着机会就想写个短篇，既在增添收入补贴已现窘迫的家庭经济，更在叙述语言文字的练习，意图很实际，到半年后摊开稿纸下笔正式稿时，便能进入完全自如的文字叙述。

草拟稿进行得超出预料的顺畅。到一九八九年元月，超过四十万字的草拟稿完成了。一九八八年四月动笔，到次年元月完成，刨除暑期近两个月的停笔，实际写作时间只有八个月，这大约是我自专业创作以来写作量最大的一年，也是日出活量最高的一年。这年过了一个好春节，心头的鼓舞和踏实是前所未有的。春节临近的时候，我已经

从《白鹿原》的历史烟云中彻底摆脱出来，和村里的乡党搭帮结伙去赶集，挑选猪肉和蔬菜，进城买面粉、大米、清油和煤球，这些东西都是凭票定点供应给我这个住在乡下的城市居民的，今年办起这些啰唆事来的心情都是前所未有的舒悦。动笔草拟之前的种种担心，都在画上最后一个标点时彻底化解了，既比我起初预想的顺利，也比我草拟之前的感觉更好，起草之前某些思路，竟在写作过程中得到扩展和深化；更有许多自以为得意的细节，竟是在写作过程中不断蹦出来的。我在进城或赶集办年货往来的路上，常常面对白鹿原北坡的沟壑台梁久久注目，这原坡已不是我小时候割草砍柴捉蚂蚱的那个原了。我已经把家乡的这个古原写成小说了，尽管是草拟，亦然抑制不住心头的兴奋。

一个无比快乐的新年过完了，待把三个孩子一个一个送进学校，再把家庭这样那样的杂事处理过手，又到清明了。我摊开稿纸，竟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沉静和舒展，这也是以往写作短篇中篇小说时几乎没有过的一种心境，当是因为草拟稿摊开在桌子左首，白嘉轩们的人生际遇里的大事小事已失去了草拟时的情感冲动，多了重新审视和斟酌的冷静；更深层的原因，我想还是已经草拟出来的那些内容，容不得激情，也更容不得随意，沉静几乎是在摊开稿纸时必然形成的写作心境。当我在稿纸上写下"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的开篇话句时，我的心境更沉静了，一种进入近一个世纪前的原上社会特有的沉静。我开篇叙述的感觉是空前的自在，对于叙述语言的把握也是空前的自信。我后来才意识到，此前用几个短篇小说练习叙述的功夫没有白做，更重要的甚至是决定性的因素，在于对那个历史时段原上人物的理解和体验的程度。

八 复活了的呻唤声

记不准确是在构思基本成型，或是在已经开始动笔草拟《白》稿的某一天深夜，我确凿无疑听到从上房西屋传出的沉重却也舒缓的呻唤声，且不止一声。这是我的厦屋爷的呻唤声。我不由得战栗。家人早已进入梦乡。我在前院的书房里磨蹭着我的事，也许只是抽烟喝茶，无意中就听到不止一声的沉重却也舒缓的呻唤。上房的东屋和西屋至少有两年不住人了，西屋放着柴火。我透过窗户看了看上房模糊的檐墙和瓦檐，静谧无声。我走出屋子站到院子里，瞅着即使在朦胧的夜幕里也掩饰不住的上房老屋残破颓败的景象，顿然意识到，这沉重却也舒缓的呻唤声，是从我记忆的心底发出的。

我的祖父辈有兄弟三人，属于两股的堂兄弟。我的祖父为一股，单传一个，到我父亲仍是一个单传，我的这个嫡系爷爷在我出生前已经谢世。另一股的两个爷爷是亲兄弟，老大也去世早，我未见过面未听过声，老二这个爷爷在分家时住着上房和门房之间西边的厦屋，后辈的我们这一茬孙子便叫他厦屋爷了，叫顺了也不觉得拗口。厦屋爷有两个儿子，据说都属于不安分守己种庄稼过日子的人，跟着外边来的一个人走了，先后各回来过一次又走了，此后再无声息踪影。老大也有两个儿子，都是我的叔父，便把小叔父过继给厦屋爷了。小叔父是个孝子，当即把厦屋爷从厦屋搬挪到上房西屋。在我稍有辨识本领的时候，看到的是出出进进于上房西屋的告别了厦屋的厦屋爷了。我爷爷和我父亲都是同辈兄弟中的老大，分家的格局至晚在曾祖父那一代就形成事实，我父亲便继承着上房东屋和中院东边的厦屋。东为上，分家归属长子是族规里天经地义的规矩。上房东屋和西屋之间隔着一间明室，作为共有的通道，东屋和西屋是窗户对着窗户门对着

门，中间的距离不过三大步四小步。我家的两间厦屋用土坯隔开，南边做厨房北边养牛做牛圈，一家人住在上房东屋。我沉在心底几十年的厦屋爷的呻唤声，就是从他住着的上房西屋的门窗传进我住的东屋的门窗的。

厦屋爷的呻唤，似乎不能等同于呻吟，更不是打鼾声。我的父亲睡熟时鼾声跌宕起伏，我常常被突然暴出的一声如炸雷般的鼾声惊醒，半天难得重新入睡。恰是在这种夜半惊醒或是被尿憋醒爬下炕在瓦盆里尿尿的时候，往往会听到从对面窗户传来厦屋爷深沉而又舒缓的呻唤声。那种呻唤声一般只有一声，偶尔还有连接着的较短也更轻的一声，好像第一声的余韵或回声。厦屋爷在解放后的第二或是第三年就去世了。我顶大不过十岁。我连他说过的一句话也没有记下，更不要说他曾经有过什么英雄壮举或遭遇过怎样窝囊的事了。他很少搭理我那样年龄的孙子，从来也没有像村子里那些爷爷和孙子的亲昵举动。我也记不得有过什么亲近他的行为。他的面貌早已模糊，唯一的印象是他手里总捏着一根超长的旱烟杆儿，抽烟时需得伸直一只胳膊，才能把燃烧的火纸够到装满烟末儿的旱烟锅上。我唯一见过的祖父辈里的一个爷爷，就是这样粗浅到有点陌生的印象。大半生跌跌撞撞走过来，仅仅只记得作为厦屋爷象征的那根超长的烟袋杆儿，无论如何也料想不到，在我心底最深的一隅，还储存着厦屋爷呻唤的声音，竟然在这一夜的更深人静的时刻响了起来。

我从院子回到小书房坐下来，也就准确无误地解开了这个始料不及的现象，这是我业已构思成型即将动笔或刚刚开笔草拟的《白》书里的人物，白嘉轩朱先生鹿三甚至包括鹿子霖这一茬白鹿原上的男人，把我的厦屋爷在夜深时的呻唤声，从我的心底记忆里感应而出了。我坐在沙发上推想，我的厦屋爷的年龄，大约和原上白鹿两家的

当事人属于一茬儿。原上原下属于这个年龄茬儿的人，不知有多少万，然而距离我最近——近到夜半可以听见他呻唤的人，却只有厦屋爷一个，我的亲爷和门族里的二爷（厦屋爷的哥哥）都在我出生之前去世了。我用两年时间营造或者说编排的白鹿原上那一茬男人和女人的故事，让白鹿原北坡坡根下的我的厦屋爷留在我心底的呻唤，感应而出了。依我当时有限的关于人的神秘的生理和心理现象来理解，在我尚不解人世人事的幼年时期，厦屋爷夜半的呻唤，是我直接感受直接纳入的白嘉轩鹿三们富于生命质感的声音。

我在小书房里骤然间兴奋起来，甚至有点按捺不住的心颤。我在这一瞬，清晰地感知到我和白嘉轩鹿三鹿子霖们之间一直朦胧着的纱幕扯去了，他们清楚生动如活人一样走动在我的小书房里，脚步声说话声咳嗽声都可闻可辨。这是厦屋爷的呻唤声，扯开了那道朦胧的纱幕，打通了我和白嘉轩那一茬人直接对视的障碍。我的创作一直依赖对生活的直接感受和直接体验，这在此前的中短篇写作中不存在障碍，我的作品几乎都是与生活同步发生发展的。我在《白》书里构思的人物和生活背景，是我的厦屋爷这一茬人的生活历程，离我有些远了。我无法获得直接的感受和体验。无论我做了自以为多么认真和切实的准备工作，却总也不像我写解放后亲历过的时段里的小说那样心底踏实。厦屋爷的呻唤声，让我获得了弥足珍贵的踏实感。在我学习创作的已不算短的历程中，越来越相信创作需要想象，想象力愈丰富作品就出奇制胜，甚至可以说想象力贫乏的作家，是很难实现思想和艺术的突破的，我不仅相信这个理论，也有自己创作实践的切实感知。但在我个人的创作实践里，还有一个不可或缺的东西，就是对生活的直接感受和直接体验。如果既保持活跃丰富的想象，又对具体一部小说所描写的生活背景和人物生存环境有直接的体验和感受，我就会进入最踏实最自信也最激情的写作状态。缺失几十年前白鹿原上或

原下乡村生活氛围的直接感受和体验，在我构思《白》书的两年里，一直是无法实现填补的一个亏空。愈是接近构思完成即将草拟，这个亏空造成的不踏实乃至不自信的阴影，一直徘徊于心。我曾经努力搜寻儿时的记忆，我曾经跟着父亲，大年初一早晨到敬奉着陈姓族谱的人家（小村子建不起祠堂），由父亲上完点燃的香支，毕恭毕敬地抱拳作揖，再跪拜三磕头；我记得父亲在厦屋北间养的一头黄牛，他每天几次添草拌料还要垫黄土，用铡刀铡断苜蓿或青草时的“嚓嚓嚓”的声响，重新在我耳朵里响起。这些在幼年看到的乡村生活太细碎，不能形成一种总体的直接的心理印象，为此我曾经几次走上白鹿原，在那些规模较大的村子里转悠，尤其是那些老房子和老街巷，企图感受到遗存在这里的旧时的气氛，虽不无收益，却是难以形成良好的感受。无论如何也料想不到，厦屋爷的呻唤声，把我欠缺的那种直接感受和直接体验填充起来了。

连着几个夜晚，我都在回嚼厦屋爷的呻唤声。这是厦屋爷睡到最沉最熟乃至睡死的状态下发出的呻唤，他自己肯定是无意识无知觉的，然而却是生理身体和心理身体的深处倾泻而出的，没有忧愁没有怨愤没有悲伤没有凄楚更没有痛苦，我所能找到的基本恰当的形容词汇，就是深沉而舒缓。我幼年被父亲的鼾声惊醒而一时难以入眠的时候，听到厦屋爷的这声呻唤，反而让我很快进入睡眠。当我即将动手写作《白》的时候，才反复咀嚼这呻唤声的内涵，这是我们家族中即将走到生命尽头的最后一个爷爷辈老人的呻唤声。我很自然地展开想象，无论人生信条人生理想的坚守和追求，无论财产的聚集或丧失，无论婚姻家庭的可心或别扭，无论行为里的端正或龌龊，无论亲族乡友相处中的亲了疏了乃至仇恨，等等。其中伴随一生的成功和得手时的巨大欢乐和得意，还有挫折和丧失时的难以承受的煎熬和悔恨，现

在都淡释了烟散了，只剩下衰老躯体睡熟时发出的深沉而又舒缓的呻唤。

我的不大丰富的想象力竟然活跃起来，把厦屋爷的呻唤想象成白鹿原发出的呻唤的声音。我坐不住了，便走出小书房再走出大门，站在场边上面对村庄依靠着的白鹿原的北坡。突出的峁梁和凹进去的大小沟壑，在早春的星光下都呈现着模糊却也柔和的轮廓，稀疏的杂树撑立在坡坎上，静无声息。坡根下自东至西排列着一幢幢或排场或寒酸的房屋，以陈姓为绝对多数的这个只有五六十户人家的小村庄，因为“文革”焚烧了族谱，我问过许多老人都说不清有多少年的历史了。一茬一茬的娃娃在这家那家的土坑上落生，能逃过种种疾病存活长大，女娃嫁到外村，男娃在村前的灞河河滩地和村后的坡地上春种秋收，死了再由儿子埋到原坡上属于自家的某一块土地里。我自小在这原坡上割草挖柴逮蚂蚱，总是躲避那些长着荒草和荆棘的坟堆，有一种本能的阴森。我现在站在门外的平场上。看着星光下静谧的原坡，不仅不再有任何阴森冷气，倒是耳畔不断萦绕着一种深沉舒缓的呻唤。我感觉已经开始融入这个原了。

由厦屋爷引发到白鹿原的这种呻唤，不仅扯开了我与白嘉轩们之间的朦胧纱幕，也使我获得一种前所未有的沉静的写作状态，这也是不曾预料得到的。在草拟和正式稿写作的四年时间里，常常有这样的情况发生，写得太顺利也太得意的章节，往往不自觉地进入一种太过兴奋状态，句子往往粗疏，把可能找到的更准确更形象也更耐得咀嚼的词汇和句式丢失了，甚至连稿纸上的钢笔字也潦草了。尤其是在写得不顺，甚至遇到怎么也跨不过的沟坎的时候，烦躁以至气馁。我往往是在夜静时分挪一小凳，坐在中院的破烂不堪的两幢厦屋之间，寻觅捕逮厦屋爷的呻唤，不仅使我过分兴奋的情绪归于沉静，更使我烦

躁丧气的心境渐次恢复起来，明天早晨可以以一种沉静的心态打开稿纸。还有社会生活不断潮起的热闹，杂以文坛开始兴起的炒作的热闹，能使我看见权当没看见听见权当没听见而依旧坐在原下祖屋的屋院里，也是厦屋爷那深沉舒缓的呻唤给我的调节和镇静。我如果也学着自炒他炒赢得文坛的某些虚名，到厦屋爷那种年龄的时候，还能发出纯粹到无意识的深沉而舒缓的呻唤吗?

我从小小年纪喜欢文学并开始在作文本上涂鸦，尤其到新时期的文艺复兴，不断见识着也接受着种种关于写作的新鲜观点，还有不少成就卓著的中外作家的写作经验，作品如何既达到深刻性又有独自的发现，如何实现艺术的独创风格又能被普遍接受，种种观点和种种经验，有的给我以启发有的给我以借鉴，至少也给我开阔艺术视野的好处。然而，在我三十多年的习作历程中，第一次感知到幼年无意听到的一种声音——厦屋爷睡熟时同样无意发出的呻唤，却影响着我的生活思考，也影响着我的写作情绪。我至今难以判断，这是一种什么体验。

九 关于性，庄严与挑战

在《卡彭铁尔的到来，和田小娥的跃现》一章里，我写到查阅《蓝田县志》时，面对卷帙浩繁的“贞妇烈女”卷所发生的始料不及的深度震撼，最直接的冲面而来的声浪，这陈年老本里封盖着多少痛苦折磨着的女性的灵魂。在《白鹿原》尚无任何人物和情节构想的情境下，田小娥（当时尚未命名）这个人物便冒出来了。一个没有任何机遇和可能接受新的思想启迪，纯粹出于人的生理本能和人性的合理性要求，盲目地也是自发地反叛旧礼制的女人。尽管当时还不可能有任何情节和故事，这个女人却出现了。我几乎不怀疑这种女人的生活真实，这是我耳闻的大量民间故事和我亲历的真人真事给予我的自信。

我从二十岁离开学校进入社会，到四十岁调进作家协会搞专业创作，整整二十年都工作在县以下的公社（乡镇）里，接触的多是乡村的干部和农民，和许多人成为熟识不过也互相信赖的朋友。我听到过许多荡妇淫娃的传奇性故事。这些故事不知在乡间传播了几百年，依然在乡村的那些偏僻的角落里传播不衰。即使在上世纪七十年代以阶级斗争理论为纲的严峻时月里，我常常和农村干部一起参加各种名目的“学习班”，在庄严的报告厅里，他们严肃地听报告；小组讨论时，也很认真地说学习体会；一旦到饭后的自由活动时间，他们便三五一伙聚到某个角落里，说着各自拥趸的那些被称作酸黄菜的民间故事。二十年间我不知听过多少回多少种，从来也没有在意过，听了哈哈一笑就过去了，更没有和写作联系起来，这些酸黄菜故事，压根儿登不得文学的大雅之堂的。在我翻阅了那几本“贞妇烈女”卷的文本之后，那些尚未忘记的民间口头本的酸黄菜故事从心底浮出。我顿然意识到，民间流传着的无以数计的酸黄菜故事，毫不留情地亵渎着嘲弄着

也颠覆着一县之志的庄严；在偏僻角落里说着听着那些酸黄菜故事的肆无忌惮到放浪的嬉笑声中，“贞妇烈女”卷里那些女人以神圣的生命所换得的荣誉，不仅一钱不值，而且是片甲不留体无完肤。

更有我幼年时亲眼所见的两件事也突兀地钩沉出来。我由那些“贞妇烈女”卷里密密麻麻排列着的作为楷模的女人的名字，想起悬在我家西隔壁门楼上方的那块贞节牌匾，大小仿若中学教室里的黑板，黑色发亮的油漆板面上的漆皮已出现小点脱落，自右至左排列着四个金色楷书大字：“贞节可风”。落款署名的人，是陕西完成辛亥革命后的第一任总督张凤翙。我自小就在这门楼前的空场地上和伙伴玩耍，到得能认识“贞节可风”那四个大字的时候，却没有任何兴趣打问这匾牌是奖赏给我们宗族里哪一位守寡守成贞妇的人，而且是陕西总督题写的匾牌，倒是把好奇心放在那个少见也难认的题匾人名字里的“翙”字上。直到一九五八年我上学到初中三年级，周六回到家门口，突然发现西隔壁门楼上方呈现着一方陌生的空缺，那块匾牌不见了。这是“大跃进”的强势“东风”卷起的“破除封建迷信”的运动，横扫打掉的。打掉了也就打掉了，在我几乎没有任何感觉，无非也仅仅只是觉得那门楼上方的空白有点陌生，过后很快也就不觉得陌生了。还有一件比这块匾牌更富刺激也更深印记的事，是对一个违抗婚姻法则的女人的集体惩罚事件。这是解放前夕的事，我还没有上学，却有了记事能力，一个结婚不久的新媳妇，不满意包办的丈夫和丈夫家穷困的家境，偷跑了。这种行为激起的众怒难以轻易化解，在一位领头人的带领下，整个村子的成年男人追赶到新媳妇的娘家，从木楼上的柴火堆里扯出来藏匿的新媳妇，把她抓回村子，容不得进门，就捆绑在门前的一棵树干上，找来一把长满尖刺的酸枣棵子，由村子里的男人轮番抽打。全村的男人女人把那个捆在树干上的新媳妇围观着，却不许未成年的孩子靠近，我和小伙伴被驱赶到远离惩罚现场的空巷里，看不到那长满

尖刺的酸枣棵子抽击新媳妇脸皮时会是怎样一副血流满面的惨象，只听见男人们粗壮的呐喊和女人们压抑着的惊叫声中，一声连着一声的撕心裂肺的惨叫，肯定是刺刷抽打时不堪忍受的新媳妇本能的叫声。这叫声尽管惨烈，在我毕竟是少不更事的时候，渐渐也就沉寂了。

四十多年后的这个春天，我在蓝田一家小旅舍的房子里，一页一页翻着“贞妇烈女”卷里那些不知封盖了多少年的女人名字时，我家隔壁门楼上的贞节匾牌和被刺刷抽击新媳妇的惨烈的哭叫声，从沉寂的心底复活了。竟然是历历在目，声声在耳。无须太多的回嚼，我为这一正一反的两个具象颇为惊讶。那副由总督题名的匾牌昭示着什么，而被捆绑在树干上用刺刷抽打的女人惨不忍睹的情景又炫耀着什么，这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是一个不难回答甚或太过简单的话题。然而，那与我时空距离太过久远的“贞妇烈女”卷，那些在我当作笑话听的流传民间的酸黄菜故事，尤其是在我幼年亲眼所见的本家宗室门楼上高悬的贞节匾牌，和那个因逃婚而被刺刷抽打的新媳妇的尖叫声，全都搅和在一起，抹掉了时间和空间的隔膜，也拂去了陈旧的烟尘，以一种令我心颤的新鲜和生动，横陈在我的眼前，盘绕不散，更无法淡忘。我一时尚意识不到，这部小说最初的酝酿实际已经自此开始了。同样让我可以说意料不到的是，随着一个个人物的出现，关于性的命题突显出来了。尽管这些刚刚出现的人物面目还比较模糊，却涉及性描写，在那时候我的文学创作观念里，无疑是一个严峻的命题，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十分严峻的命题。且不说新时期文学发展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在性禁区做了多少探索，仅我自身而言，这个性描写的命题更有特殊的严峻性。

在我小说写作的初始几年，似乎不由自主地以男性为主要写作对象，尤其是那些乡村各色老汉的生活故事和他们的个性，曾经颇得各

家报刊编辑的赏识。我曾经不无得意。为了练习刻画人物的写作基本功，我写过一篇《徐家园三老汉》的短篇小说，在不足一万字的篇幅里，我想写出三个个性不同的老汉形象，甚得好评。在我生活的这个不大也不小的文学圈子里，甚至形成某种普遍印象，说我这个业余作者写乡村老汉比较拿手。当我后来由小小的得意进入反省，意识到这种写作状态的另一面，恰恰是自我局限。这种写作状态形成的原因并不奇怪，在我刚刚进入社会并确定把文学创作当作人生追求的时候，是重提阶级斗争并确立为纲的时候，一个接一个的运动发展到“文革”且不论，文艺界的阶级斗争也是一日紧过一日一年紧过一年，直到“文革”把几乎所有作家关进“牛棚”。我读过的解放以后创作出版的文学作品，英雄人物和所有正面人物，有恋爱情节，却无一个字的性描写。我准确记得只有在长篇小说《创业史》里，写到破坏农业合作社的富农分子姚士杰强奸落后妇女素芳的场景。尽管篇幅很小，却独成稀有的一景，而且是为了揭示富农分子丑恶的灵魂而设的笔墨。在写到主人公梁生宝和改霞的初恋情节时，两个人连手指头也没有碰过，我尽管曾为梁生宝的理性深感遗憾，却仍然相信这是我读过的那个时期的小说里写得最动人也最可信的恋爱故事。我那个时候也读过一些翻译作品，倒是不乏爱情乃至性场景的描写，但在阅读的同时绝不发生迷糊，这是外国小说，外国小说是允许这样写爱情包括具体的性描写的，我们的小说不仅不能这样写，写了会吃不完让你兜着走的。直到“文革”中提出创作的“三突出”原则，几个样板戏里的英雄人物都是光身汉和寡妇，肯定是剧作家谁都不敢碰爱情这一页难念的经了，更不要说性描写了。在这种背景下学习小说写作的我，不说有意识或无意识，把学习创作的基本功力的练习对着男性，尤其是乡村老汉的生活故事，想来是无可选择也是很自然的途径。我在一种粗浅的反省之后，写了几篇以女性为主要描写对象的短篇小说，写到恋爱的美好，也写到挫伤留下的终生痛苦。发表倒发表了，却几乎没有引起任何反

应，于好于坏都不见评说，倒使我丧气，甚至怀疑我对女性世界的了解和体验可能隔膜太远。直到一九八二年冬天，我写出第一个中篇小说《康家小院》，得到编辑颇热烈的反应，我才第一次获得了探索男女情感世界的自信。不过，仍是以写爱情为主线，涉及感情的复杂性，却基本没有性情景的描写，把握着一个“点到为止”的不成文的原则。这个不成文的写作原则，直到我已开始构思《白》，穿插写作中篇小说《四妹子》和《地窖》的时候，尽管已经意识到关于性的严峻性在《白》的写作中将难以回避，却仍然在这两部中篇小说中把握着“点到为止”。这两部中篇小说的男女角色和情感纠葛，提供了可能稍微放纵一笔，写他们和谐或不和谐的性心理感受里的性行为，我却依旧没有放开手笔。原因很简单，性在《白》的构思中刚刚有所意识，同时就显示给我的是这个甚为敏感的话题的严峻性，岂敢轻易放手；还有一点不好出口的心理障碍，读者对我的一般印象是比较严肃的作家，弄不好在将来某一日读到《白》时可能发出诘问，陈某怎么也写这种东西。

在《白鹿原》两年的构思过程中，爱和性是我一直反复嚼磨着的几个自以为重要的大命题之一。我曾搜寻过涉及这个命题的专论，关于爱尤其是性在文学作品中的必要性得到一种理论的确认，无疑给予我以启迪也给我信心。然而却很难与我正在构思的《白》里的人物发生切实的参照。理论阐述的是普遍的道理，而在我所要写的多个人物身上，很难发生具体的分寸把握的功能了。这是仰赖理论所不可能解决的事，不然就无所谓创作了，属于常识。让我确信必要而又恰当的性描写不应该继续成为禁区，是我对文学创作理解的一次突破。然而，哪个人物必须涉及性描写，分寸如何把握，却一直是我纠缠着的问题，又无法请教任何人。

随着《白》的构思的深入，关于性描写这个命题似乎又是很自然地得到解决，起初发生的那种严峻性，已经化释了其中的某些威压的成分，而更多地突显出某种庄严感，甚至连最初从理论上确认的关于性描写的必要性，进而增添了某种挑战的意味。这是我对那道“原”的不断深入的理解和体验，我对原上那几位逐渐生动也丰满起来的人物的自以为独自发现的感受，自然发生的某种未曾体验过的颇富挑战性的庄严感。我很清楚，这是我接受了关于人的文化心理结构的新鲜学说，并试探着对《白》里的人物完成透视和解析，看到蒙裹在爱和性这个敏感词汇上的封建文化封建道德，在那个时段的原上各色人物的心理结构形态中，都是一根不可忽视的或梁或柱的支撑性物件，断折甚至松动，都会引发整个心理平衡的倾斜或颠覆，注定人生故事跌宕起伏里无可避免的悲剧。获得了这个自以为得意的透视人物的视角，我很自然地把这个视角扩大到整个意象里的白鹿原，和这个民族历史一样久远的地理上的白鹿原和正在构思的小说意象里的白鹿原，被封建文化封建道德严密缠裹了不知多少层的爱和性，同样是支撑这道原的最重要的柱或梁式构件。岂止是我家后门外的这道原，辛亥革命的一个最切实的革命行动，是剪掉男人脑后的那根猪尾巴扯断缠裹女人小脚的发臭的布条；五四运动则提出婚姻自由，可见裹缠在爱和性这个敏感词汇上的臭布条，中国南方北方一样久远。这个时候，我才大致梳理出较为分明的头绪，对于在查阅《蓝田县志》的“贞妇烈女”卷时颇为激烈的心理反应，以及田小娥这个人物的跃现，现在都可以纳入到这个视角，进入理性的探视了。

我后来归纳的“写作三原则”，大约就是在这个过程中完成的：“不回避，撕开写，不做诱饵”。既然我想揭示这道原的“秘史”，既然我已经意识到支撑这道原和原上人的心理结构中性这根重要构件的分量，如果回避，将会留下“秘史”里的大空缺。不仅不能回避，而且要撕开

写，把我已经意识和体验到的缠裹着性构件的长布条彻底撕开，该当是“贞妇烈女”卷里无以数计的女人不敢出口的心声，也该当是民间盛传不衰的那些酸黄菜故事传播者未必自觉的叛逆心理，还有留在我幼年记忆里的那位逃婚者被刺刷抽击时的尖叫。我的庄严感就由此而产生。

这种庄严感在我此前的写作中没有发生过，而且伴随着挑战性。这在我是很切实的矛盾，既要撕开写性，又担心给读者留下色情的阅读印象，确实感觉到甚为严峻的挑战。我为自己的定位比较清醒，不把性描写作为吊某些读者胃口的诱饵。尽管确信不疑，尽管不想如此下作，而要不造成色情或贩黄的阅读效果，关键就在性描写的必要性的再三审视和描写分寸的恰当把握。揭示这道原的“秘史”里缠裹得最神秘的性形态，封建文化封建道德里最腐朽也最无法面对现代文明的一页，就是“贞妇烈女”卷。在这部小说写作的四年时间里，我给自己写过两张提示性的小纸条，一张是关于性描写的三句话十个字：“不回避，撕开写，不做诱饵”。贴在小日历板上，时时警惕走神。另一张是田小娥被公公鹿三用梭镖钢刃从后心捅杀的一瞬，我突然眼前一黑搁下钢笔。待我再睁开眼睛，顺手在一绺纸条上写下“生的痛苦，活的痛苦，死的痛苦”十二个字，再贴到小日历板上。其实这张纸条的内容已不属于提示性质，纯粹是我抑制写作冲动的即兴行为。后来我也意识到，仅写过的两张小纸条，都是与性描写有关。

十 从追寻到转折，再到删简

白鹿原和原上的白嘉轩。

抑或是，白嘉轩和他的白鹿原。

这是二十一年前的一九八八年的清明前几天或后几天，或许就在清明这个好日子的早晨，我坐在乡村木匠割制的沙发上，把一个大十六开的硬皮本在膝头上打开，写下《白鹿原》草拟稿第一行钢笔字的时候，整个世界已经删简到只剩下一个白鹿原，横在我的眼前，也横在我的心中；这个地理概念上的古老的原，又具象为一个名叫白嘉轩的人。这个人就是这个原，这个原就是这个人。

自一九八五年秋天写作中篇小说《蓝袍先生》引发长篇小说创作欲念，到最后完成删简和具象，足足用了两年半时间。我把最后完成基本构思说成删简和具象，似乎更切合《白鹿原》构思过程中的特殊体验。两年多的时间里，除了读书除了不去不行的会议除了非做不可的家务以及不吐不快的少量写作，我的主要用心和精力都投入到我家屋后的白鹿原上，还有和白鹿原隔浐河可望的神禾原、少陵原、凤栖原和隔灞河可望的铜人原。白鹿原的西北端埋葬着汉文帝和他的母亲还有他的夫人。凤栖原上埋葬着汉宣帝。神禾原是柳青住过十四年完成史诗《创业史》最后自选安葬自己骨灰的地方。秦始皇在铜人原上焚书坑儒，到汉朝又把他收缴天下兵器铸成的铜人搬来摆置在这道原上。从白鹿原东北端下原，沿灞河往东走不过二十多华里，就是挖出距今一百一十万年的蓝田猿人头盖骨化石的公王岭。在白鹿原西端坡根下的浐河岸边，有一个新石器时期（约七千年前）半坡人聚居的完

整的村庄。白鹿原至今仍流传着这个皇帝那个皇帝在原上或纵马或郊游或打猎的逸事趣闻；大诗人王昌龄在原上隐居时，种植蔬菜，下原到灞河逮鱼，也少不了吟诗；王维走得更远，从长安城东的灞桥乘一叶小舟，沿着白鹿原下的灞河逆水而上直到秦岭山中的辋川，留下千古绝唱；刘邦从鸿门宴的刀光剑影下侥幸逃生回到白鹿原上，也许是从我家的猪圈旁边的小路爬坡上到原上的驻地。我不搞考古，对中国悠远的历史也马马虎虎，说以上这些遗存的史迹景观，仅仅是想让喜欢小说《白鹿原》的读者，大致了解一下地理上的白鹿原的方位，以及文明进程中虽然早已冷寂的几点遗痕，多少可以感知这道横在西安城东不过二十华里的古原，和我们悠远的历史基本同步，没有隔绝更不是世外桃源。我那时对白鹿原太过悠远的历史不仅感到沉重，更有一头雾水的茫然，没有丝毫细究的兴趣。我在撞开绰号蓝袍先生徐慎行家雕刻着“耕读传家”的门楼下那两扇黑漆木门的时候，有一种奇异的惊悚的感觉。这种感觉不属于刚刚开始写作的中篇小说《蓝袍先生》的人物和情景，甚至使我在那一刻偏离了笔下的人物，把眼光盯住了白鹿原。此前我从来没有认真关注过我生活了大半生的这道原，仅仅只在一些小说或散文的风景描写里顺带过几笔，即如正在写作的《蓝袍先生》，我把这道原仍然依往常风景描写里的习惯称作南原，根本没有触碰业已被淡忘却也颇富形象的白鹿原，可以见证我当时对白鹿原并无特殊的意识。

在那种奇异的心里惊悚发生的时候，我第一次把眼光投向白鹿原，预感到这原上有不尽的蕴藏值得去追寻。我在这个原上追寻了两年多，在那些糟得经不住翻揭的县志上，看到《竹书纪年》里的白鹿原人的生活形态，风调雨顺的丰年里的锣鼓，以旱灾为主的多种灾害里饿殍遗野的惨景；某朝某年发生的乡民驱赶贪官的壮举令人读来惊心动魄，万民自觉跪伏官道为一位清官送行的呼喊和眼泪感天动地。

我踏访过创造中国第一部教化民众的《乡约》的吕大临的归终之地，也是牛兆濂（朱先生生活原型）建馆兴学的书院。我也寻找过在白鹿原上建立第一个共产党支部的那家粮店的遗址。还有我从老人口中掏出的包括我的祖宗的故事，不乏令我窃喜不尽的生活细节。自信这样的生活细节不仅在我读过的中国小说里没有见过，也不逊色顿河草原（我读的第一本翻译小说《静静的顿河》）和马孔多镇上（我刚读过不久的《百年孤独》）那些令我新鲜而又惊诧的异域异族底层社会的生活细节（仅就生活细节而言）。更有一些意料不及撞面而来的人生喜剧和悲剧，让我一次又一次产生情感冲撞和心灵震撼，对生活本身的丰富性愈加信赖也愈觉神秘，单凭想象力无论如何是难以取代真实生活的底色的……两年多的时间里，追寻到的白鹿原上的种种人和种种事，以及因这些人和事而诱发出来的虚构的人物和情节，使我一次又一次反复感知到起码适宜我的创作的某种规律，即真实生活里的某个情节乃至一个细节，当即会诱发想象力，并有一种抑止不住的兴奋和窃喜，又把记忆里的某些生活细节激活了。由生活诱发的想象里的虚构，在我揭开《蓝田县志》里的“贞妇烈女”卷时就开始了，之后的两年里就没有断止过。我在原上原下追寻着的每一步，想象力催发的构思同步发生，完全不是待生活素材搜集齐备才坐下来构思。在构思形成基本框架的过程中，很自然地发生过左右为难犹疑难断的烦恼和焦灼，这样构想觉得不尽我意，换一种构想似乎又很难判断比前一种构想强出多少，甚至包括某个人物的某些情节的必要性，常常也会发生难以抉择的困惑。

我曾经深切地感知到穿透这道太过沉重的原的软弱和平庸，深知这会直接制约体验的深浅，更会制约至关重要的独特体验的发生。我在反复回嚼这道原的过程中，尤其着意只属于我的独自体验的产生，得益于甚为认真的几本非文学书籍的阅读（此前已谈及，不赘述），

终于获得可以抵达这部小说人物能够安身立命的境地的途径，我也同时获得进行这次安身立命意义的长篇小说写作的自信，探究这道古原秘史的激情潮涌起来。这个过程自然是多重因素促成的。自我感觉是完成了至关重要的一次突破，也是一种转折。此前是追寻和聚拢的过程，由真实的生活情节和细节诱发的想象产生的虚构，聚拢充塞在我的心中，取舍的犹疑难决和分寸的把握不定形成的焦灼，到这种突破和转折发生时也发生了转折，开始进入删简过程。删简的过程完成得比较顺利，整个白鹿原很快删简到只具象为一个白嘉轩。实现这个突破和转折再到删简的过程，自然是由多重因素促成的，其中接受并初试“文化心理结构”这个新颖理论，对我看取白鹿原的世相和正在酝酿着的小说《白鹿原》里的人物，确凿有某种点化的神奇效应。

如实说来，实现这个关键性的突破和获得点化效应，也不是凭空而来或是突生奇想，更不是神灵点拨，确凿有一个蓄久的追寻和反复回嚼的基础。在我翻开县志里的白鹿原和漫步在白鹿原这村那庄的时候，心里一直悬挂着一个最直接最简单却也难回答的大问号，在最后一个封建帝国解体的时候，历经两千多年封建制度的这道原上大村小寨里的乡民，怎样活着？换一个角度说，两千年里轮番转换着的大帝国和小王朝的无数个或精明或昏庸的皇帝，给白鹿原数以万计的臣民留下了什么？稍微延伸一下，没有了皇帝的白鹿原上的村民，怎样走到一九四九年共和国成立？我说这个问题最直接最简单，这是任谁包括白鹿原上的乡民都看得见也回答得出的：和封建帝制一样久远的铁铧木犁继续耕地，自种自弹自纺自织自缝的单衣棉袄轮换着冬天和夏天，且不说频频发生的灾年的普遍饥荒和瘟疫流行时掩埋尸体的潦草……两千多年前的秦始皇在离这道原不过六七十华里的咸阳原上建立第一个封建帝国的时候，这道原上的人这样活着，到两千多年后最后一个皇帝被赶下台的时候，这道原上的人仍然这样活着。那具决定

碗里稀稠的木犁犁过两千多年的白鹿原的土地和时空，让我这个曾经也用它耕过地的作家，直到把眼光盯住这道原的时候，才发生了一点小小的感叹。这种感叹之所以不大更谈不上惊叹，在于司空见惯到麻木无觉的状态了。我又说这个问号很难回答，隐隐约约已经意识到，仅仅依靠着木犁和自织的棉布这样简单的生存方式，这道原上的人何以能延续两千多年？两千多年里，这道原上的人遭遇过多少回战乱、灾荒和瘟疫，到上世纪初最后一个皇帝被废掉的时候，依然按继往的秩序用木犁耕地用织布机织布，男人吆喝耕牛的声音和女人搬动织布机的响声背后，还潜存着什么？我的这个问号，开始就挂在发生辛亥革命的一九一一年这个年轮上。这是一个历史性的划界。

在我刚开始面对这个问号的时候，曾经浮现出鲁迅先生短篇小说《风波》里的一幕，被强迫剪掉辫子的七斤，在张勋复辟的背景里惶惶不可终日的情景。几十年前在中学课堂上听老师绘声绘色讲解的时候，似乎只觉得滑稽好笑；几十年后到我面对白鹿原的时候，顿然意识到那是先生留给历史的碑刻式的一笔，一场打碎封建帝制的轰轰烈烈的革命，影响到中国南方一个靠摇船为生的乡民七斤家庭的时候，仅仅只是一根辫子该不该剪掉的事。然而在我却有顿开茅塞的惊喜，白鹿原的男人们是怎样剪掉脑袋后边的猪尾巴辫子的？我在原上原下的村庄里曾经看见过不少剪掉辫子却仍在后半个脑袋上保留长发的遗老，据说我的祖父也残留着这种发型。男人们平衡在一根辫子上的心理，剪掉时会经历怎样一个心理过程？具体到已经酝酿着的白嘉轩和鹿子霖，剪掉辫子时会有怎样不同的心理过程？在诸如这种追寻不尽反嚼不尽的思绪里，接受“文化心理结构”理论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了。还有两本书的阅读受益匪浅，一本是号称日本通的美国人赖肖尔写的《日本人》，另一本是陕西一位学者研究以西安为中心的关中历史文化的专著《兴起与衰落》。前者的阅读，对我几乎有一种逼近的震

撼，西方资本主义的新式武器——炮舰，几乎是一前一后对准并轰开了东方一小一大这两个封建帝国的大门，结果却大相径庭，一千多年前就拜中国为师的日本人，发现了西方国家更富活力的社会机制，断然弃师而把眼光投向西方，很快完成了“明治维新”，开始了脱胎换骨式的和平革新，直至把刚组建的第一批炮舰对准中国。中国也搞了“戊戌变法”，其结局不堪述说，之后的军阀混战，等等等等。除开以往接受过的常识性的解释，我切实感知到一种太过腐朽太过厚积的封建尘埃淤塞了中国人的心理，这对我解构白鹿原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形态提供了一个大的背景。后一本《兴起与衰落》，专题研究的就是包括白鹿原在内的关中历史和文化，对我解构白鹿原人的文化心理结构更有切近的意义。我以文化心理结构来解读上世纪之初的白鹿原上的种种生活形态的男人和女人，穷人和富人，尤其用心地解析业已酝酿着的《白鹿原》里的人物。

我首先面对的是白嘉轩。我的意识已经明确而又集中，解析不透把握不准这个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形态，不仅影响其余所有人物的心理形态的把握，而且直接影响到业已意识到的这部长篇小说内容的进一步开掘（在此我不想做白嘉轩等人物文化心理结构的具体阐释。作者自己解释作品人物，在我是有难以跨越的心理障碍，作品人物摆在读者面前，相信他们会理解作者哪怕最含蓄最隐蔽的意图，没有必要再做小说文本之外的解释）。我在企图解析白嘉轩的文化心理结构的颇为困扰的时候，记不得哪一天早晨，眼前浮出了我从蓝田抄来的《乡约》。就在那一刻，竟然发生一种兴奋里的悸颤，这个《乡约》里的条文，不仅编织成白嘉轩的心理结构形态，也是截止到上世纪初，活在白鹿原这块土地上的人心理支撑的框架。小说《白鹿原》里的白嘉轩和地理概念上的白鹿原，大约就是在这时候融合一体了。当初抄这份《乡约》条文的时候，多是一种新奇的感觉，很自然地联想到上世

纪五十年代中期我读中学时，上级要求家家户户在门楼柱墙上刷写内容完全一样的《爱国公约》。初看到《乡约》文本，我惊诧封建时代也是以这种方式教化民众的，内容却比我看到的村子里家家户户门口的《爱国公约》的内容周密得多具体得多。仅此而已。大约两年后，这个《乡约》已经成为构想里的白嘉轩心理结构的鲜活的构件了。

这个《乡约》文本，是中过宋朝进士的蓝田人吕大临的作品。吕大临是个名副其实的大学问家，著述颇丰，尤值得提到的是他创立的“合二而一”哲学观，在近千年之后的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被杨献珍发掘出来，遭到毛泽东的批评，随即在全国掀起不小的批判“合二而一”哲学观的运动。吕大临不做官只专注研究学问，属于高层高端的事，竟然不忘对最底层民众的教化，为提高并培养整个民众的素质，编写了供乡村氏族祠堂教化子弟的教材，却比教材更硬一手属于“约”的性质，即必须照此做人行事。《乡约》内容具体而又直接，毫不含糊，该怎样做人做事和不该做什么样的人和什么样的事，规范性划界清楚，操作性很强。文字通俗易懂，简练顺口就很易记，显然考虑到受众绝大多数都是文盲这种实情。再究其源，吕大临曾在陕西关中眉县的“横渠书院”，拜理学——新儒学的关中学派创始人张载为师，也当属关学的中坚之一。张载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语录的精神，在今天读来仍可感到神圣与豪壮。吕大临把这种精神具体化对象化到操作性很强的《乡约》，教化一千年前的南方北方的民众，而作为关中学派最后一位传人的朱先生，在白鹿原依然坚持着《乡约》的普及性实施，白嘉轩是坚信坚守不疑的一位族长。我在这时候才对自己一直悬挂着的问号有了感觉，在木犁、棉布、饥饿、灾荒和瘟疫世相弥漫了两千年的白鹿原，还有一部《乡约》。这《乡约》应该是倚赖木犁和棉布延续生命的一个支撑性质的因素，也是抵御饥饿、灾荒和瘟疫之后继续繁衍的力量，却也是

固封在木犁和棉布这种生活形态的枷锁。这《乡约》决定着中国人和世界各种肤色和体型的人的区别。肤色的深浅、个头的高矮、鼻子的长短、眼珠的蓝色或黑色，仅为其肢体表征的区别，而本质的区别在文化心理结构，以《乡约》构建心理框架结构的白鹿原人，才从内在里显示着独有的共性和各自的个性。

解构透视出白嘉轩的文化心理结构形态，有一种豁然开朗的兴奋和痛快。白嘉轩和《白鹿原》里各个人物的种种冲突，顿然梳理明朗了；某些情节着墨的轻重，也很自然地显示出来了；不少此前酝酿过程中甚为得意的生动情节，此时发现游离在白嘉轩心理冲突之外，只好忍痛放弃了。我的意识很集中也就单纯到近乎简单，我要表述的《白鹿原》里的最后一位族长，依他坚守着的《乡约》所构建的心理结构和性格，面临着来自多种势力的挑战，经济实力相当却违背《乡约》精神的鹿子霖，是潜在的对手；依着叛逆天性的黑娃和依着生理本能基本要求的小娥，是白嘉轩的心理判断绝对不能容忍的；以新的思想自觉反叛的兆鹏和他的女儿白灵，他却徒叹奈何，这是他那种心理结构所决定的强势，唯一难以呈现自信的对手；他倚重的白孝文的彻底堕落彻底逸出，对他伤害最重，却撞不乱他的心理秩序……这样，我才获得了本文开头的那种删简结果——

白嘉轩就是白鹿原。一个人撑着一道原。

白鹿原就是白嘉轩。一道原具象为一个人。

我才踏实地打开笔记本，草拟这个人和这道原上的故事。

十一 我的剥离

我后来才找到一个基本恰当的词儿——剥离，用以表述进入上世纪八十年代我所发生的精神和心灵体验。

先从一件铸成我人生刻骨铭心记忆的事说起。准确无误记得是刚刚过罢一九八二年春节，我所供职的灞桥区抽调一批干部分派到各个公社（即乡或镇），协助并督促落实中共中央一九八二年一号文件。用一句话概括文件精神，就是分田到户。区上限定大约三个月的时间，必须实现把土地分配到农户手中，自然还有农具、耕牛等。我和一位年龄相仿的水利干部被划为一个工作组，派驻渭河边一个既种小麦棉花又栽水稻和莲藕的公社。我俩骑着自行车载着铺盖卷赶到公社时，被告知公社机关办公房偏紧，就把我俩安排到距离不远的一个业已人去房空的下乡知青住过的院子里。我把铺盖卷摊开在知青睡过的床铺上，接着生着了火炉。返回西安的男女知青们留下的这个阔大空旷更显冷清的大院，现在又有淡淡的灰色烟气从屋顶上冒出来，我俩反倒庆幸难得占有这样宽敞的一方空间。

我和同来的水利干部跟着公社干部，从早到晚骑着自行车奔跑在公社所辖的三十多个大小村子里，或是开社员大会宣讲中共中央一号文件，或是召开有社员代表参加的干部会，研究土地、耕畜和农具的分配方案和办法，再召开社员大会征求意见，补充完善之后再实施。这个过程里牵涉每一家每个人的直接利益，七嘴八舌乃至面红耳赤甚至破口动粗，几乎每个村子都难以避免。我倒也不烦，十年的农村基层工作对于这种现象早已司空见惯，不说经验，起码不会惊诧也不会慌乱失措了，颇能耐心地调解矛盾，把分田到户的工作逐步推开并落

到实处。几乎每天都是一大早出门，深夜才回到那个悄无声息的原知青大院，还盘算着工作进度，能不能在棉花播种水稻插秧之前把土地分到农户手中，农时不待人，不能耽搁一料庄稼收成。

有一天深夜，我一个人骑着自行车从一个村子往驻地赶（水利干部请假），早春夜晚的乡野寒气冷飕飕的，莲池里铺天盖地的蛙鸣却宣示着春天。我突然想到了我崇拜的柳青，还有记不清读过多少遍的《创业史》，惊诧得差点从自行车上翻跌下来，索性推着自行车在田间土路上行走。一个太大的惊叹号横在我的心里，我现在在渭河边的乡村里早出晚归所做的事，正好和三十年前柳青在终南山下的长安乡村所做的事构成一个“反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柳青举家从北京迁回陕西，把家安到长安农村，他以县委副书记的身份，直接参与刚刚兴起的农业合作化运动，走村串户，宣传实行农业集体化是共同富裕的道路，教育农民放弃单家独户的生产方式，把一家一户的土地挖掉界石和隔梁归拢合并，把独槽单养的耕畜牛、骡牵到集体的大槽上去饲养。近三十年后的一九八二年春天，我在距他当年所在的长安不过五十公里的渭河边上，把生产队集体的大片耕地，按照地质的优劣划分等级，再按人头分给一家一户。我看着那些刚刚分得或宽或窄或大或小一绺一块土地的农民，当即动手在地头栽下界石，再用铁耙刨成隔梁，大片待耕待播的棉田里，不出一晌工夫，便堆满了令人眼花缭乱的湿土埂梁。我在看见第一个村子分地栽界石刨隔梁的那一刻，心头有一句未涌出口的话，建立并巩固了近三十年的农村集体所有制，彻底瓦解。我刚才走出的村子，是把生产队集体饲养的以牛为主的耕畜分配给农民个人去饲养的第一家，因为农户多耕畜少，无法公平分配，便采用抓阄碰运气的办法倒消解了意见。看着那些抓阄得手的农民一个跟一个走进饲养室，从大槽的横梁上解下母牛或犍牛的缰绳牵出饲养场大门，走进东头或西头的村巷，我的心头又涌出一句未出口

的慨叹，无论最初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无论后来的人民公社集体所有制彻底解体，又恢复到一九五三年之前单家独户种庄稼过生活的乡村秩序……我在这个清冷的春天的乡村深夜里，想到了柳青和《创业史》，不是偶然兴之所至，而是必然要面对的生活课题。

我从对《创业史》的喜欢到对柳青的真诚崇拜，除了《创业史》的无与伦比的艺术魅力，还有柳青独具个性的人格魅力之外，我后来意识到这本书和这个作家对我的生活判断都发生过最生动的影响，甚至毫不夸张地说是至关重要的影响。我生活在农村。我们那个小村子建立农业合作社的时候，我刚刚上中学。我看着父亲满脸不悦地拉着我家的黄牛送到临时作为饲养室的一孔大窑里，甚至对父亲有一种不以为然的情绪。我对刚刚成立的农业社洋溢着满心的新鲜感，常常跑到地头看聚拢在一块地里干活的男人和女人。我在中学二年级的语文课本上学到了第一篇反映农业合作化的文学作品，就是李准的短篇小说《不能走那条路》。这篇小说的思想倾向既坚定又形象化，单家独户的小农生产方式的路再不能往下走了，那是一条苦难之路；应该走的是合作化的道路，这是使农民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康庄大道。语文老师这样讲解这篇小说的主题意旨，我都接受了，充满了美好的向往。然而，真正对农业合作化的更切近个人情感的理解，却是一年后我读初中三年级和高中一年级的时候。《创业史》在《延河》连载，我每月用家里给的买咸菜的钱到邮局买一本《延河》杂志，后来又买了全文刊载的《收获》。姑且不说这部小说对我这个文学爱好者在包括语言等艺术上的完全倾倒，单是对中国农村和农民的认识，《创业史》给我的既是启蒙也是深刻的影响。柳青揭示的几种极富代表性的农民家庭形态，和几个堪称典型的农民形象，不仅让我感受着不尽的阅读惊喜，重要的是在潜意识里铸成一种生活理念，农业集体化是农民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唯一选择。今天回想起来颇为有趣，我对农民

走集体化道路的确立和坚信不疑，不是从理论开导发生，而是由李准的短篇小说尤其是柳青的长篇小说《创业史》的学习和阅读而形成的。我后来走出学校进入社会才读到毛泽东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大量批示和按语，更从理论上坚信不疑了，这是我对乡村和农民问题的看法形成的基本过程。

尤其是我在公社（即乡或镇）工作的十年时间里，不仅对集体化道路信奉不疑，而且不遗余力地做着最具体最切实的事。我在公社分管过卫生工作，每一个村子都建立起医疗站；我抓过养猪，落实毛泽东“关于养猪的一封信”的精神，实现了每户一头猪的要求；我同时还兼管蔬菜种植，保证上级分配给我们公社的城市区段的蔬菜供应；我常常被派驻到某个派性严重对立或干部撂挑子不干的村子，少则半月长则半年，化解矛盾恢复生产。我在公社工作的后两三年，干了三件较大的工程：一是贯通大半个公社的一条引灞水灌溉大渠，把旱地变成水浇地；再一个是利用夏收完秋播前的两个月时间，平整了八百亩坡地，修建成保水保肥的台阶式平地；最后为我家乡的灞河修造了一条八华里长的河堤，一劳永逸地解决了洪水泛滥淹田冲地的灾害，至今依然发挥着作用。我把三十年前干过的一些事摆列出来，不会是为着自我显摆企图奖赏，即使有这想法也太晚了。我只是想用这些做过的实际工作，证明我在认真地实践着“集体富裕”的理论信仰。这个时候的社会大背景是“文革”中后期，“四人帮”的极左路线推行的农业政策，已经“左”到了不能再“左”的极端，生产发展受到致命性的制约和限制，即如我工作的公社里的条件甚好的一些村子，也发生农民口粮欠缺吃不到新麦上场的穷困地步。在这种生活环境里，不仅我，周围的不少干部都在窃窃私议，对农民的限制太死了，最典型也最可笑的一件事，农妇养鸡下蛋卖给公家供销社还是卖给个人，也属路线斗争。无论我无论周围的干部，议论只局限在某项具体政策的恰当与

否，谁也不会发生对农业集体所有制的丝毫怀疑，甚至可以说，对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完成的农业集体化体制的理性信奉，已经形成意识里的自然性习惯。我在中国行政建制最下边的一级政府机关人民公社（即乡或镇）里，工作的对象是集体所有制下的农民，他们碗里的稀稠乃至有无，是我无法逃躲的永久性命题；我在他们眼里，是公家干部，他们村子里发生的问题和矛盾，找我是很顺当也很自然的事，包括把我堵在办公室要救济粮，分配数字不满足时，真的动火吵闹，根本不在乎甚至完全不知道我还喜欢写什么小说；我自己从来都是以公社干部姿态和心态和农民说话办事打交道，似乎没有发生过以作家的心态和姿态去体验和观察他们的生活。几十年后回看乃至审视在公社十年的生活，基本上还是专心致志尽心尽力为着集体化的乡村做着一个又一个具体的事。尽管有“文革”动乱，有极左路线和极左政策导致的集体经济发展的困境以及破坏，然而对农村集体所有制和集体化道路，无论作为一个公社干部，无论作为一个业余文学写作者，从来也不曾发生过怀疑，分田到户的事不是不敢想，确凿是不可能也不会去想的事。

一九八二年春天的这个深夜，在渭河边的麦田棉田稻田和莲藕地交错着的乡村土路上，我刚刚看过农民从集体大槽上把耕畜牵回家去的全过程，昨天或前天，我看到集体的棉田被分割成一绺一块，栽上了个体农民的界石。这是两个带有示范性的化整为零的公平分配的举动，公社所辖的三十多个生产大队所属的近百个生产队，将依此效法全面铺开分田分牛的工作。不出半月，一望无际的渭河平原上正在返青的麦田，等待翻耕的棉田和稻田，还有地方特产莲藕生长该当放水的池塘，都将被分割成一绺一块，栽上永久性界石或临时插一根标杆；同样不出半月，作为每个村子人气最旺的饲养场，将是牛去槽空门可罗雀。我想到柳青的同时就想到一个问题，柳青如果还健在，如

果看到眼下分田地分耕畜的场景，将会做何感想？我甚至产生过也许是庸人自扰的担心，当年身体力行推动农业合作化，又倾尽智慧和情感创造出被公认为史诗的长篇小说《创业史》，柳青会不会在此情此景里伤心？尽管柳青逝世还不足四年，急骤变化着的生活现实不允许“如果”这种假想成立，无疑是永远也不可能获得答案的。我几乎同时意识到，其实这是自己正遭遇到的必须回答却回答不了的一个重大现实生活命题，无非是借助几十年一直崇拜着的柳青，使这个横在心头的问题暂得回避或转移。我心里很清楚这个问题的核心，作为一个农村题材写作的作者，你将怎样面对三十年前“合作”三十年后又分开的中国乡村的历史和现实？这个问题一时回答不出，事实是随后许久都在寻求起码使自己信服的答案，颇为不易。反倒是涌出这个问题的这一夜的这一刻，我的身份和思路，由一个行政干部转换为作家（尽管属业余创作）。在作为一个基层干部的时候，我毫不含糊地执行中共中央一号文件精神，切实按照区委区政府的具体实施方案办事，保证按照限定的时间，把集体所有的土地、耕畜和较大型的农具分配到一家一户；在我转换出写作者的另一重身份的时候，感到了沉重，也感到了自我的软弱和轻，这是面对这个正在发生着的生活的大命题时的真实感受。这种感受发生在一九八二年的早春的渭河边的乡野里，成为我人生历程中难以淡漠的新鲜记忆。

我后来梳理自己那一段至关致命的精神历程的时候，才发觉此事并非出自偶然。在截止到一九八二年早春下乡到渭河边之前的三年时间里，我发表的三十多篇短篇小说和特写：一类是不涉及农村政策的秦地风情和人物；一类是对极左政策和不正之风伤害农民的揭露；还有一类写摆脱极左政策实行责任制管理的农村新人。尤其是三四个月前，我刚刚写成一篇报告文学《崛起》，是写一个年轻的党支部书记带领社员打翻身仗，把一个劳动日价值不过一毛的“烂杆儿”村，变成

家家存款过万户户住上二层楼房的超级富裕村（就一九八一年的水准），而且依他的某些极富个性化的生活细节，写了一组短篇小说。这就清楚不过地表明，不仅理念，包括情感，我都还倾注在集体经济上。我赞成开始实行的包括开放农村市场的新政策，也赞成体现按劳分配的包工包产管理办法，而且写了几个短篇小说。但是，我没有想到分田到户的无异于单干的大动作；尽管近一年来私下里有传闻说，安徽某地试行分田到户了，却不敢相信。仅仅在写过颂扬集体富裕带头人的报告文学之后三四个月，我却在渭河边的乡村里，督促着一个又一个集体所有制的生产大队把土地、耕畜和农具分配到一家一户去经营，农民都明白这个所谓“责任制”的名称的实质，就是单家独户的“单干”。我着实感到措手不及。我不仅感受到理解这个突然出现的生活大命题的思想的软弱和轻，也切实感受到情感投向陷入漩流似的紊乱。我依多年干部的习惯，完成了在渭河边一个公社分田分耕畜分农具的任务，回到文化馆不久，写了短篇小说《霞光灿烂的早晨》。这是我唯一一篇直接切入这场重大生活变革的小说，尽管用了一个很阳光的篇名，评家和读者却感知到“一缕隐隐的留恋”。我写一个为生产队抚育了多年牲畜的老饲养员，在分掉牲畜牛去槽空的第一个黎明到来时的心理情感。在当时几乎一哇声的既揭露集体化弊端又赞颂“责任制”的作品中，我写的这个老饲养员恒老八，却流露出一缕留恋的情绪，就引发出不太被在意的侧目。我心里倒也踏实，在实行了近三十年的农业集体化的中国乡村，仅我工作过十年的那个灞河边上的公社的大村小寨里，确凿有不少为社员尽心尽力的乡村干部，以及默默无闻的饲养员，他们把自己的心智和精力倾注到集体事业上，十几年甚至几十年费心竭力，到一九八二年春天必须按限定时间散伙，心理上远远不止一缕留恋。我在渭河边的村子里，接触那些自合作化伊始就当干部而依旧是挣工分的农民身份的男人和女人，不由得想到柳青笔下的梁生宝的生活原型王家斌，他们无非是没有遇合到某个作家才默

默无闻，他们和我熟悉后，总是随口发出慨叹，三十年前咱动员人家把牛合槽饲养，三十年后咱又把牛分给人家拉回家去，你说咱三十年倒是干了一场啥事嘛！我对他们并非一定要我回答的慨叹，感到的不纯粹属于写作者才有的软弱和轻。作为一个写作者，我很难把握他们的人生慨叹，仅仅只是把一丝一缕留恋的情绪体现在恒老八这个老饲养员身上，在我的文字里留下一笔印痕。他们的这种人生慨叹，不属于个人的私有情绪，而是生活发生重大转折时，无以数计曾为集体所有制下的农村费心用力的一茬人的普遍心情，我也有。

我回到被调侃为“闲人店”的文化馆，却闲不下心来，在渭河边那些或大或小的村子里所经历的人和事，长久地横在我的心里，作为派出干部我完成了工作任务就行了，作为写作者面对农村的时候，我更深切地感到了思想的软弱和轻。

到这一年的秋收之后，我自家也分到了几亩土地，我请假回家给自家种麦子，我的角色就是一个地道的农民了。我的妻子和孩子属于农村户籍，分到了土地。我和几个热心的农民搭帮结伙为临时互助组，扶犁的扶犁，溜种子的溜种子，身强力壮却又欠着技术火候的我，便自告奋勇把皮绳搭到肩头去拽犁。因为耕牛太少，坡地里和河川里到处都是人在拽犁播种麦子，谁也不笑话谁。大约有七八天时间，我都是肩头挂着粗硬的皮绳，在坡地里和滩地上拽犁，直到把我家和搭伙互助几家的麦子种完，得到了从未有过的当牛的体验。我拽着犁流着汗在田地里来回劳作的时候，偶尔会想到，中国还有没有哪位作家也有拽犁的经历和体验，一个和牛一样拽犁种麦子的人，竟然还操心着农民命运这样的事，我不完全觉得滑稽，却切实感到可笑里的自卑。之后每到礼拜天回家，放下自行车喝一口水，我便上坡下滩，把已经出苗显行的麦子看一看，这些大小不等的田块，属于我

家。直到第二年春天麦苗返青，再到吐穗扬花，直到黄熟，田埂上被我踩成一条小径。指望着多收三五斗的我，还在继续着有关农民命运的难解的课题，还继续做着作家的梦，无论滑稽无论自卑都不能改变。我确凿记得，横在心头的那个生活大命题获得的转机，发生在夏收我家打完麦子的那个夜晚。无须赘述收割和脱粒的脱皮掉肉的辛苦，就在用土造的脱粒机打完麦子之后，我的新麦装了满满二十袋，每袋按一百斤算，竟有整数两千斤，妻子和孩子人均五百斤，全年尽吃白面可以吃两年。这样令我几乎不敢相信的一大堆麦子，其实在村子里只算得中等水平的收成，那些精于作务而又勤劳的老庄稼把式，收成比我家好得多了。打麦场成为男女老少活动的中心，从早到晚洋溢着喜悦的气氛。即使不识字的人也会算这笔很简单的大账，今年一料麦子的收成，抵得上生产队三年或四年分配的夏季口粮。这一夜我睡在打麦场上，装在袋子里的新麦明天要晾晒，看着身旁堆积的装满麦子的袋子，尽管很疲劳，我却睡不着。打麦场上堆着好多人家的粮袋，也是等待明天晾晒，我能听到熟悉的同样是守护自家麦子的乡党的说笑声。我已经忘记或者说不再纠缠自己是干部，是作家，还是一个农民的角色了，心头突然冒出一句再通俗不过的话，何必要在一棵树上吊死?

一九八二年末尾，我被调进陕西作家协会创作组，成为一个专业作家。一九八三年春夏之交，我受益于陕西省新出台的一部关爱知识分子文件的优惠政策，把妻子儿女的农村户籍转入西安。仅仅在半年时间内，我由一个行政干部转换为专事文学创作的作家，我的妻子儿女一夜之间由农民转换为城市居民，靠粮票到粮店买米面过日月，再不用操心天旱雨涝制约着的收成的丰歉了，真可谓好事叠着摞儿来了。

我后来才意识到这些好事发生时的某些生活玄机，在我从乡村基层干部转换为专业作家之前仅仅三两个月，生活驱使我在刚刚分给妻子儿女的田地里当了一回牛，把皮绳套在肩膀拽着犁播种麦子，满脸的汗水不断滴到脚下的土地上，获得了一次真实的体验，可以当作告别这块世代祖宗赖以生存的土地的虔诚的礼仪；尤其是在转换为专业作家这种社会角色的这年年头，给我到渭河边乡村工作的机会，这不是以往我已习惯的下乡，而是由我直接参与把集体所有的田地耕畜和农具分配到一家一户，把包括我在内的无以数计的干部苦心巴力巩固了近三十年的农村集体所有制完全解体，让我有了这种千载难逢的体制改革的感受和体验，把一个生活演变的大命题横在我的心头，迫使我理解，迫使我回答，没有任何回避的余地。这意味着一个残酷的现实，如果对这个大命题不能获得自己的独立理解，就不可能发生创作所至关重要的独特体验，我的乡村题材的创作就不可能获得进展。我和打麦场上的农民乡党一样守着自家麦袋子的那个晚上，和他们一样享受好收成的喜悦之外，对压迫着我一年多的那个生活大命题发生了转机，倒使我自己都很惊讶，在这样繁重的纯体力劳动的场合里，我依然继续着一个写作者的思考，而且在完全意料不及的打麦场的这个夜晚，获得了转机，毋宁说是我未来乡村题材创作的生机。我在慨叹不必在一棵树上吊死的时候，几乎同时想到“不论白猫黑猫，能逮住老鼠就是好猫”这句话。

仅仅只自种自收了一料麦子，因为妻子儿女的户籍转入城市，便把那几亩土地交回村委会，我不仅没有把家搬进城市，反倒从原来供职的区文化馆所在的灞桥镇搬回甚为偏僻的老家。不单是专业作家不用坐班，时间由自己安排支配，更重要的是出于我的也许特别的心理，想找一个清静甚至冷僻的环境，读我想读的书和非读不行的书，尤其是需要冷下心来，回嚼我亲身经历的生活，我刚刚跨过四十岁，

前二十年作为学生所看见的乡村生活，以及后二十年直接参与其中的乡村生活。我在亲身参与其中的二十年里，有许多直接的感受和体验，现在跳出具体的生活位置，不再是以干部而是以作家的身份看取昨天的生活，更有可以说是天翻地覆的正在发生着的改革，需要坐下来回嚼。回嚼自己经历的生活，每有所得，且涨起某种新鲜到自鸣得意的心境，便形成一部小说，多是中篇，有新中国的阳光刚刚温暖乡村农舍的时候，一个极普通的人家发生的爱情悲剧的《康家小院》，有极左政策扭曲人性使人变形的《梆子老太》，还有直接面对“文革”的《地窖》等。直到回嚼出《蓝袍先生》并引发《白鹿原》的创作欲望，再经过两年构思四年写成，我最直接的自我感动，是对白鹿原北坡根下祖居老屋这个写作环境的选择，无疑最适宜我的回嚼。这十年的回嚼和写作，得益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新思维新流派的启发和丰富，也得助于许多非文艺书籍的启迪和开通，前面几个话题已有涉及，不再细说。

后来总是回忆到原下老屋十年的写作生活，生出一个“剥离”的词，取代“回嚼”，似乎更切合我那十年的精神和心理过程。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采访过一位搞农业试验的科技工作者，获得一个技术性词汇“分离”，是说种子提纯复壮过程中，淘汰劣种，选择优种，坚持数年，不断分化，直到取得一种优良而又稳定的植株的种子，才推广开去。我对生活的回嚼类似“分离”，却又不尽然，在于精神和思维的“分离”，不像植物种子劣汰优存那样一目了然，反复回嚼反复判断也未必都能获得一个明朗的选择；尤其是在这个回嚼过程中，对于昨日既有且稳定了不知多少年的理论、观念，且不说审视、判断和选择的艰难，即使做出了劣和优的判断和选择，而要把那个“劣”从心理和精神的习惯上荡涤出去，无异于在心理上进行一种剥刮腐肉的手术。我选用“剥离”这个词儿，更切合我的那一段写作生活。

这种精神和心理的剥离几乎没有间歇过。当胡耀邦总书记在中央会议上号召党的各级领导带头脱下中山装换上西装领带的时候，我看着电视荧屏上西装领带装备一新的胡耀邦的形象，脑海里自然浮出毛泽东等第一代领导人一律中山装的画面，似乎意识到这不仅仅只是换一身装束；古时折柳送别的灞河桥头古镇上，逢着集日拥挤着的牵牛拉羊挑担推车卖货买货的男女农民之中，突然有三四个穿喇叭裤披长发的男孩女孩旁若无人地晃悠，竟然引发整条街道上的行人驻足观赏，惊呼怪物；无主题无人物无标点小说和朦胧诗在文坛引发的激烈争议，使我无端地和灞桥镇上第一次出现喇叭裤时的惊诧联系起来；我被朋友引去看扭摆舞，是在一个很小范围的隐蔽环境里，第一次看着绷紧屁股更绷紧胸部的妙龄女子疯狂扭摆肢体的时候，我的发涨的脑子里浮出“忠字舞”的场面；我看到县长给全县第一个“万元户”披红戴花的电视画面时，又一次想到吃着自带干粮为农业社换稻种的梁生宝和真人王家斌，还有柳青；当城市和乡村刚刚冒出一批富裕户，立即引发“造导弹的（收入）不如卖茶叶蛋的”惊呼，并波及文坛“文人要不要下海”的争论……这些接踵而来撞人耳眼的事，在我都发生着“剥离”的过程，首先冲击的是我意念里原有的那些“本本”，审视，判断，肯定与否定，淘汰与选择，剥离就不是轻易一句话了，常常牵动感情。以上不过是随意列举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发生的生活事象，我既不能看了听了权作不见不闻，甚至没有一件会轻易放过，曾经怀疑自己心胸是否太窄，有些毫不关涉自己的事又何必较真；又怀疑自己是不是因为既有的“本本”影响太深，剥离就显得太艰难，甚至痛苦。然而，无法改变。还有比这些生活事象更复杂也更严峻的课题，譬如怎样理解集体化三十年的中国乡村，譬如如何理解一九四九年新中国之前的中国乡村，涉及思想、文化、革命、传统与现代，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等等。剥离这些大的命题上我原有的“本本”，注入新的更富活力的新理念，在我更艰难更痛苦。剥离的实质性意义，在于更新思

想，思想决定着对生活的独特理解，思想力度制约着开掘生活素材的深度，也决定着感受生活的敏感度和体验的层次。我之所以注重思想，是中外优秀作品阅读的影响。

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不断发生的精神和心理的剥离，使我的创作发展到《白鹿原》的萌发和完成。这个时期的整个生活背景是“思想解放”，在我是精神和心理剥离。

我记着，这种剥离初始发生于一九八二年的早春，在渭河边一个深夜的乡村土路上。

十二 原的剥离

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发生的精神和心理剥离，延伸并贯穿着整个八十年代，既涉及现实和历史，也涉及政治和道德，更涉及文学和艺术。这种连续不断的剥离的每一次引发，几乎都是被动的，一种新的政治理念和新潮口诀，一种新的文学流派或一种文学主张，一种大胆的生活理念和道德判断，都会无一例外地与我原有的那些“本本”发生冲撞，然后便开始审视和辨识，做出自以为可信赖的选择。这种剥离一次接一次发生时尽管多属被动，而一旦我面对其颇为艰难甚至痛苦的过程时，却是一种类近决绝的挑战心态。之所以有这种心态，在于我此时甚至稍前对自己做过切实的也是基本的审视和定位，像我这样年龄档的人，精神和意识里业已形成了原有的“本本”的影响，面对八十年代初生活发生的裂变，与原有的“本本”发生冲撞就无法逃避。我有甚为充分的心理准备，还有一种更为严峻的心理预感，这是决定我后半生生命质量的一个关键过程。我已经确定把文学创作当作事业来干，我的生命质量在于文学创作；如果不能完成对原有的“本本”的剥离，我的文学创作肯定找不到出路。我以积极的挑战自我的心态，实现一次又一次精神和心理的剥离，这是纯粹指向自己的一种选择，说来也是很自然的一个过程。

确凿在我意料不及的是，这种自我选择的纯粹指向自我的精神和心理剥离，竟然指向了地理上的白鹿原和正在酝酿着的小说《白鹿原》，自然是指向这原上的人，在我已确定的上世纪之初，无论男人和女人，也遭遇到一种精神和心理的剥离。这个绵延了两千多年有文字记载的白鹿原，遭遇或者说开始发生了划时代的剥离。相对于渺小的我的剥离，这是一座原的剥离。

横在我眼前的这座古原，据《竹书纪年》的文字记载，“有白鹿游于西原”。这座位于蓝田县城西南方位的原，便有了新的名称白鹿原。白色的鹿被先民看成神鹿，将给这座古原带来吉祥。民间传说里的神鹿所带来的吉祥已经具体化形象化，风调雨顺，五谷连年丰收，毒虫自毙，瘼疬廓清，尊老爱幼，邻居以及村舍人群之间都是彬彬礼仪，夜不闭户，更无仇杀……读到原上先民寄托在一只被神化了的白鹿身上的向往里的生活景象，当即联想到早已储存于心底的共产主义的美好图景，这是在中学课堂上政治老师绘声绘色灌述给我的生活画面。我颇为惊奇，几千年前白鹿原上的先民理想中的美好生活构图，与几千年后包括我在内的信仰不渝共产主义的人们所憧憬的天堂般的生活图景基本相同，差别仅仅在于，先民把这种美好的生活理想寄托在一只被神化了的白鹿身上，而我所信奉的共产主义，却一直坚信依靠全民的艰苦奋斗努力创造来实现。我不在意民间神话传说和作为科学理论的共产主义的不可类比的差别，但有一点却使我顿然豁朗，人对于富裕和和平生活的向往和期待，从先民时期就开始构思了，其实这不过是作为人生存的最基本的要求。然而，原上的先民把这种向往和期待只能寄托在一只被神化了的白鹿身上，供一代一代的人继续向往继续期盼继续咀嚼，从来也没有实现过。重要的历史典籍有提及白鹿原的几笔，《史记》“鸿门宴”写的“沛公军灞上”，据今人考证就是白鹿原的西北角，可以俯瞰西安，晴朗无雾时能远眺咸阳。汉文帝看中这块风水宝地，钦定白鹿原北坡为自己的墓葬地。因为灞河从北坡下流过，文帝陵便被命名为灞陵，白鹿原随之又称灞陵原，也称灞上。到宋仁宗天启年间，大将军狄青在白鹿原西头屯兵操练，准备征剿西夏，这座原又改称为狄寨原，一直沿用到现在。地方县志上关于白鹿原的记载颇为精细，却多为兵荒马乱和自然灾害造成的生灵涂炭，几乎是不断重复着的这样那样的无计逃躲的灾难，包括几次大毁灭的人祸和天灾。这座原沉重悲怆到令人不敢翻揭的历史，在我面对它的时

候，却基本保持着几乎不动声色的平静心态。不是我冷漠，更不是孤傲，在于我粗识中国漫长的封建历史过程里，白鹿原不过是小到不起眼的又一个演绎之地罢了，开明皇帝治下的短暂的太平安宁，更多的却是荒淫帝王执政和改朝换代过程里漫长的难得聊生的灾难。白鹿原不仅不是世外桃源，而是兵家必争的掠夺长安的军事重地。我有这样的意识，不会发生惊诧；更关键的一点，我几乎从一开始就把心思确定在二十世纪到来的时段上，原本没有想去细究这座原悠远漫长且沉重的封建历史。

一九一一年在中国发生的辛亥革命，当是二十世纪最重大的事件之一，一个绵延了两千余年的封建大帝国到此终结。这场革命在白鹿原上最具影响的事件，不过是限令男人一律剪掉脑袋后面那根猪尾巴式的长辫子，这是中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最具标志性的一种男性发式。尽管这场革命在这座古原上显得太过浮皮潦草，原上人根本弄不清没有了皇帝的日月究竟是祸是福，更搞不清把陕西巡抚换成总督会有什么不同。然而，他们面对的心理剥离却无法逃避，不过是一种集体无意识状态。我由自己一九八二年早春在渭河边开始的精神和心理剥离，类推到二十世纪初辛亥革命之后的白鹿原上的人，以我的体验来理解他们的精神和心灵历程，似乎也是很自然的事。

这里还得提及那个《乡约》文本。

我不惜工时颇为耐心地翻阅西安周围三个县的一摞摞县志，一次又一次爬上白鹿原，在那些大村小寨的村巷里踏访，记不得哪一天顿然意识到这样一个说来简单的基本事实，这座古原的历史和中国历史一样久远，这个原上的先民经历过中国各个王朝的或长寿或短命或开明或昏庸的皇帝治下的有幸或不幸的日月，这几乎纯粹是一个大白话。然而，无论王朝怎样更迭，无论王朝更迭过程中的战乱和灾难怎

样残酷，还有频频发生的自然灾害，有的完全是毁灭性的灾难和灾害，这座原上依然延续繁衍着生命。灾难和灾害过去之后，重新繁衍起来聚而成群的生命，又聚集在氏族的祠堂里背诵《乡约》。这部把儒家文化儒家精神条理化且通俗化了的《乡约》，是为着教化以文盲为主体的乡村人群的，途径是各个村寨以姓氏为体系的宗族，宗族祠堂通常是完成教化的颇为神圣的场所。这部《乡约》是宋代进士吕大临创造的，他是儒家文化关中学派卓有建树的一位思想家，在朝廷忙着处理国家大事，还不忘教化民众。这部《乡约》普及到中国南北各地的乡村，在吕氏的生身故地白鹿原上更被尊奉为金科玉律，成为各个村寨各个宗族教化一代又一代子孙的人生教材。不必追溯太远，即使从吕氏创作《乡约》的宋代算起，到辛亥革命发生的二十世纪之初，这《乡约》已经被原上一代一代的子孙诵读了八九百年了。作为原上人文化心理结构柱梁框架的这部《乡约》，当属二十世纪初的原上人精神和心理上尊奉着的“本本”。尽管辛亥革命的影响波及这座原上不过是浮皮潦草，而作为《乡约》存活的封建帝制却毕竟是寿终正寝了；也许因为无论“旧三民主义”或“新三民主义”在原上几乎没有任何响动，才给《乡约》留下继续传承的空间；封建帝制在辛亥革命的枪炮声中土崩瓦解，而作为原上人文化心理支架的《乡约》却难能这样快捷地解体。尽管如此，原上人对精神心理上的这个“本本”的剥离，必将发生，不过是暂时处于集体无意识状态。

原上人的心理剥离确实很缓慢。对《乡约》的精神理念构成颠覆性影响的，无疑只有新的教育内容。就我所能获得的资料，这个分属蓝田、长安、咸宁三县辖管的几十万人的古原，直到辛亥革命发生十几年后的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后期，才先后办起两三所新式小学，只有那些家境宽裕的孩子才能走进校门，接受新式教育，因为路远必须在校食宿，不菲的开销对于普通农家的孩子无疑是可望而不可即的

事。原上原下几百个大小村寨里的旧制私塾学堂，依然是那些老学究继续吟诵着不知从哪个朝代延用下来的识字课本，其内容所蕴含的理念，与《乡约》一脉相承。尽管如此，新的理念通过新式小学开始传播了，对近千年来一统原上的《乡约》开始发生冲击。尽管接受新式教育的学生与原上的总体人口是一个太小的比例，但毕竟发生了。就在这两三所新式小学里，都有中共党员隐蔽其中，甚至建立支部，秘密发展党员，每有祸国殃民的事件发生，新式学校的老师便领着学生到集镇和村子里去游行，挥舞旗帜，呼喊口号。我看到这些资料时，竟然激动不已，脑子里当即浮现出那几个我很熟悉的集镇和村庄里学生游行的画面，对那些以《乡约》为心理架构的乡民，虽然不可能完成剥离，却总会发生冲击，这个古原终于响起一种新的声音，不再是《乡约》一统原上的格局了。

还有一件令我震惊的事，大约是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中期，白鹿原有一位在北京某大学念书的学生回到原上，发展了两个中共党员，在白鹿原腹地小镇的一家粮店里建立了一个中共支部。当时处于国共合作时期，初建时以国民党的名称命名支部，不足一年后去掉国民党的伪饰，公开了中共支部的旗帜。这个资料很简短，关于这个支部后来的发展和活动，几乎未提，那个发展党员并建立支部的年轻人，后来离开了白鹿原。我读到这则资料时真是震惊不已。这个古老封闭的古原，在中国共产党刚刚成立四五年后，便有了三个党员的支部，他们在小镇粮店里举手誓言的时候，无疑是向这个古老的原发出了挑战。我那时候很直接地发生猜想，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比六十多年后的我肯定更了解原上人的生活形态，绝大多数人挣扎在温饱临界线上，百分之八十以上的人是大字不识一个的文盲，却都虔诚地信守着那个《乡约》文本，以及本氏族的规矩。他们三人敢于发出这样的挑战宣言，需要怎样的理想火花和奋斗的勇气……这三个人的声音，无疑是

那个时代最激进也最科学的声音，标志着这个古老的原和中国革命基本同步，没有推迟更没有留下空白。

共和国成立以前的近半个世纪里，白鹿原上影响最广泛声浪最响亮的一个革命事件，是地下党策动的农民运动，尤其是在蓝田县辖区内的绝大多数村子，都建立起“农民协会”，批斗恶行劣迹的地主。这场农民运动的中心在渭南、华县等县，无论范围和参与的人数，在中国北方是最广泛的一个地区。我跟朋友调侃说，可惜这里没有人像毛泽东写《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这样声势浩大的农民运动，后来几乎无人知晓，起码在我查阅历史资料之前，确凿闻所未闻，一无所知。这场农民运动兴起得快也塌火得快，因为国共分裂很快被镇压下去。这是原上发生的一场阶级斗争运动，是穷人斗争富人又被富人镇压了的骤起骤落的运动，尽管斗争的对象不全是族长，也不直接针对《乡约》，然而，在“一切权力归农会”的一年左右时间里，作为族长即使不被斗争，也是大权旁落，失去了往昔在族人群体中的威势，无疑会给以《乡约》为心理构架的乡民留下不同程度的印痕。

我以自己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在渭河边发生的剥离的颇深切的体验，进而推及上世纪初封建帝制终结之后的白鹿原人的心理历程的时候，有一个基本清醒的判断，我和我这一代人在“解放思想”时代背景里所发生的精神和心理剥离，不过是此前二十多年里被生活证明属于非科学的理论和政策，包括极左的东西，能够较快地完成剥离过程；这座沉积了两千多年封建文化封建理念的白鹿原，还有普及儒家思想的《乡约》也有近千年根深蒂固的影响，况且多是难得以文化开启的文盲，要完成《乡约》文本架构的心理剥离，确实不会是一朝一夕的事。浮皮潦草的辛亥革命和随后持续的军阀混战，给原上人带来的是变本加厉的苛捐杂税和王旗变换的混乱等生存危机；在粮店里由三个

中共党员建立的白鹿原第一个共产党支部，虽然发出了改造白鹿原旧秩序的宣言，随之转入地下秘密活动，很难对原上普通人的生活和心理发生影响；规模和声势广泛而巨大的农民运动，当属上世纪前五十年里最激烈也最具影响的革命事件，然而终因太过短促的骤起骤落，对原上人的生活秩序和心理秩序很难发生深层的影响；随后的共产党的革命活动，在原上完全处于秘密的地下状态，不断遭到国民党的追搜破坏，不断地恢复发展，却因为极其隐秘，也很难对原上普通人的生活发生直接影响。这样，白鹿原上以《乡约》构架的文化心理的乡民，虽经历过几次冲击，却很难发生实质性的剥离。

我同时意识到另外几种生活现象。

原上的新式小学尽管发展缓慢，几十年间不过只有三四所高级小学，却应该是对传承了近千年的《乡约》最具颠覆性的因素。这个看法的形成，在我是基于这样的一个基本事实，凡在新式小学接受过教育的学生，几乎无一例外地都走出白鹿原，进入社会的各个领域，没有谁再留恋原上的生活。尤其令我受到启发的是，许多人在新式高级小学接受新的理念的同时，接受了隐蔽着中共党员身份的教师的影响，走出白鹿原就开始了革命活动，应该是心理剥离完成得最彻底的一批人。他们是接受了科学的共产主义理论，剥离了原本尚未形成稳定的《乡约》理念的心理结构。他们无疑是以科学理论主动完成这个心理剥离的一批人。

还有盲目的包括被动的实现了心理剥离的男人和女人。这类男人和女人形形色色的故事存储在民间，久传不衰，有男盗也有女娼，有败家子，也有顽劣到六亲不认的坏典型，等等。我在乡村工作的二十余年里，听到不少这类人的故事，只是听听热闹而已。面对那个《乡约》，我便想到，即使再坚守不移的族长，也难得把所有的族人都训

导到对《乡约》忠诚不贰的程度。对《乡约》和族规的信守，多种性情和多种利害制约下的族人差别很大，有的出于经济利害和人际关系，不自觉陷入对《乡约》的背叛；有的男人和女人，纯粹出于不可心的婚姻状态里的情感压抑，做出生理本能驱使下的离经叛道。在《乡约》一统天下的原上，这些纯属个人的叛逆行为，从来都没有中止过，大大小小的村子都不乏其人。他们几乎谁也摆脱不了悲剧的最终结局，这是很简单的必然的结局，因为谁作为个人都无力对抗以《乡约》为道德审判的铁律。

我在前文中说到白鹿原人的文化心理结构，而关于心理剥离的个人体验，成为我把握未来小说《白鹿原》里各个人物心理形态和心灵历程的一个途径，不是唯一。各个人物的经济状态、家庭状态，以及文化心理结构，还有个性，自然都受制于他的阶级地位，这是一个基本常识，我没有任何异议，因为这是中国那个时代的真实存在。我无非是透视那个时代的地理上的白鹿原和小说《白鹿原》里的各色人物时，从多重角度探索他们丰富的真实的心灵历程。避免重蹈单一的“剥削压迫，反抗斗争”的老路，而能进入文化心理结构的探寻，剥离无疑是其中一个重要途径。

我后来有一个小小得意的句子，白嘉轩在先后接待了重新回到原上祠堂的长子白孝文和鹿黑娃之后，备受冲击的心理结构完全稳定，获得更坚实的自信，慨然说，凡是生在白鹿村炕脚地上的任何人，只要是人，迟早都要跪倒到祠堂里头的。他的悲剧在于，恰恰是他叛逆的儿子白孝文重新跪倒在祠堂之后，也发出自己的慨叹，谁走不出这原谁一辈子都没出息。

我在此为自己的这两句人物对话得意一回，意在本文的意旨“原的剥离”，冒昧了。

十三 原上的革命

在追寻搜索白鹿原及其周边三县上世纪前半期生活演变和历史演进的业已沉寂的脚步声、同时也在构思小说《白鹿原》的两年时间里，我常常发生惊讶、惊愕、惊奇、惊诧、惊喜等意料不及的心理撞击，还有更强烈的震撼，也有忍不住捶拳吁叹的失控状态。在这种心理遭遇过程中，我几乎不知不觉进入了男人刚剪掉辫子女人还继续缠裹小脚的白鹿原，感受着也体验着这道原上生活的脉动，平缓到死气沉沉的和激烈到你死我活的那五十多年的生活演变的声响。那些引发我心理撞击的人和事，促使我从不自觉到自觉地以多重视角去透视这道沉积太过深厚的原。那些人和事前文已多所涉及，这里只想谈谈原上曾经发生的革命对我的撞击，以及如何实现艺术化表述的思考。在《原的剥离》一章里，已经涉及共产党人在原上的一些革命活动，那是从原上人发生心理剥离的角度，透视革命活动对这种精神和心理历程所可能产生的影响。这里调换一个角度，在我正面面对原上曾经发生的一系列革命的人和事的时候，竟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新鲜切近的独特感受。是切近。

且不说从小学到中学的政治课和历史课的教师讲述过多少回革命的艰难而又辉煌的历史，在我有阅读能力且有阅读兴趣的几十年里，记不清看过多少有关共产党在中国诞生之后进行革命的文字资料，包括许多先驱和先烈感天撼地的英雄壮举，更不要说小说、电影等多种艺术形式刻画的各个历史阶段的革命者的感人形象了。然而，在我获得白鹿原上和原下曾经发生过的一件又一件革命活动事迹和一个又一个革命者的时候，无一例外地都会引发惊讶和冲动，一次又一次感慨着革命原来离我这么近，就发生在我生活了大半生的这个白鹿原上和

原下。在这种心理反应发生的同时，我才意识到此前记忆里的真实的革命和艺术刻画的革命者形象，在我心里有一种遥远的差别。这个遥远的差别，除了业已成为文字和图片展现的历史的时空概念之外，更在心理概念显示着的遥远，无论建立中共的上海，无论国共合作又分裂的黄埔军校以及八一起义的南昌，无论毛泽东发动声势浩大的农民运动的湖南乡村，无论建立第一个中华苏维埃政权的瑞金，无论气壮山河的长征，以及离我比较近的党中央所在十三年的陕西北部的延安，都在我获知白鹿原上和原下曾经发生过的革命事件的一刻，显示出遥远的差别；同时也意识到，革命离我近到几乎没有地理概念上的任何间隔，就发生在我生活的白鹿原上和原下。

这是一种非常奇妙的感觉。我至今仍然清楚地记着二十二年前初夏的一天上午，我在白鹿原的腹地孟村镇寻找一家粮店的情景。上世纪二十年代中期，一个在北京某大学念书的青年接受了马列主义，而且加入了中共，回到白鹿原上便发展了两个党员，在这个小镇的一家粮店里成立了一个中共支部。这是中共在白鹿原上建立的第一个支部，他们三人无疑是这阔大的古原上最早出现的中共党员，而那位在北京念书的年轻人，无疑是在这古原上第一个传播共产主义的人。这是我在蓝田县查阅资料时获得的确凿无疑的史实。我在获得这个史实的那一刻，惊讶得不由“噢哟”起来。那一刻便发生一个强烈的欲念，一定要到原上去寻找那个神秘的粮店，心里是一种真诚的崇敬和钦佩。我在孟村镇的街道上寻找，一家一家或大或小的门面店铺都不放过，一边辨识一边猜测，哪家店铺有可能是六十年前的粮店，竟然无法确定，问过几位看去有一大把年纪的老者，也都摇头。我不仅没有失望的情绪，反倒更来兴致了，那些显得陈旧的店铺，都有可能是当年建立中共支部的粮店。我为自己开脱，中共在白鹿原上的第一个支部，就是在这个孟村小镇上诞生的，时在一九二一年中共于上海成立

仅仅四五年之后。我的惊讶里的震撼就发生在这个时间概念上，已往的记忆里，一九二一年在上海召开的第一次中共代表大会，十二个参会者代表着全国五十多名中共党员宣布了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仅仅不过四五年，我家后院背靠着的白鹿原上，已经建立起来一个中共支部。就在这一刻，革命和我生活的白鹿原的时间和空间距离顿时消失了。我对这个古老的原，不单是探秘，又滋生起一种庄严的敬畏。

我对那位在孟村小镇粮店里建立中共支部的青年充满着神秘的敬佩。可惜资料提供的信息太少了，这位青年后来再无音讯，连他是哪个村子谁家的子弟都无记载。我无法进一步调查了解，却有一种基本的判断，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的白鹿原上，能进入北京念大学的青年，不单要有很高的智商，关键要有一个起码是殷实的家庭做经济开销的坚实后盾。原上能上得起私塾学堂的孩子都是少数，这个供给孩子到北京念书的家庭，按解放后划成分的条例，肯定属地主家庭无疑。这个富有人家把孩子送到北京求学，可能推想的目的是学习知识增强本领，再进入社会干一番荣耀先祖的大事，做梦也不会想到，这个孩子在北京的大学里接受了刚刚开始在中国传播的马克思学说，要在中国搞共产党的革命了。他不单接受了马克思的理论，回到白鹿原上就付诸最切实的行动，发展党员，建立支部。我便自然想到，他在宣布中共支部成立的那一刻，肯定会想到在原上的革命对象，就包括他父亲那样的财主。

他更要面对的是上世纪二十年代贫穷落后以及文盲充斥着的白鹿原。从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下解脱出来的原上乡村，经历了你上我下的军阀混战，到二十年代中期，国民政府才开始实施从县到乡镇一级政府的建制，而各个大村小寨仍然是传承着宗族族长的权威；各个姓氏宗族都有自家的法规，原上社会最底层的基础部分，还是按照封建

宗法的机制在按部就班地运行。这个在白鹿原上建立第一个中共支部的年轻书记，肯定比我更直接地了解原上的社会形态，敢于在孟村小镇粮店里发出挑战——既是向国民党政权挑战，也是向宗族祠堂挑战，更是向整个白鹿原社会挑战，这需要怎样坚定的信仰，需要怎样强大的气魄，需要怎样无畏的牺牲精神……我的钦佩以至敬畏，概出于此。

还有一位至今难以淡忘的革命者，名叫张景文，是白鹿原上较早投身革命的一位杰出的知识女性。我在获得这个人有限的事迹资料时，几乎是一种捶拳吁叹的失控状态。

我在原上原下追寻往昔业已冷寂的生活演变的足迹时，收获颇丰，常常有意料不及的令人兴奋不已的发现，常常处于一种亢奋和敏感的最佳心态之中。某一天突然意识到，还缺少一个在这道古原上闹革命的真实的女性的事迹，在我查阅的资料中没有发现，在民间传闻中也没有听到一句半句，我感觉到某种巨大的缺失和缺憾。这种心理是我构思这部长篇小说时越来越直接的一种感受，一个正在构思中的类型人物，要有一个真实的生活里的人物为依托，哪怕这个生活人物的事迹基本不用，或无用，但需要他或她的一句话，一句凝结着精神和心理气氛的话，或独禀的一种行为动作，我写这个人物就有把握了，可以由此生发开去，依我的意图编织他的人生的有幸和不幸的故事了。这也许是我的一种写作感受，即生活人物的凝结着心理气象的话和独禀个性的一种行为动作，总是可以调动我的生活储存，然后就获得刻画小说人物的自信和自由。在我已经开始构思着的小说《白鹿原》里，有多种形态的女性，自然不可或缺至少一个觉醒了的新女性的形象。我还没有获得白鹿原上真实出现过的一位新女性，便感到缺失里的不自信。

正在此时，我这个基本不信运气的人碰到好事了。我收到作家张敏寄来的他主编的刊物《革命英烈》。在这本包装简单的小开本刊物上，我读到了张景文烈士的事迹。她是白鹿原上人，在西安读书加入了中共，因为身份暴露被国民党特务追捕，地下党把她送到刘志丹在南梁开辟的革命根据地，大约一年左右时间，在极左路线执行者发起的清党运动中被怀疑为“特务”活埋了，我的捶拳吁叹的失控心态，就在这一刻发生。文章不足一千字，作者是一位同样被怀疑为“潜伏特务”的女战士，她和张景文被关押在一孔窑洞里，此前并不熟悉，关押的三两天时间里，才得知张景文是白鹿原上某村子的人。她眼看着张景文被拉出去活埋了。她在等待同样下场的时间里，等到了长征到达陕北的周恩来代表毛泽东发出的“刀下留人”的指令，有幸逃过一命。这位老革命在文中说明，她和张景文是在关押的同一孔窑洞里相识的，所知不多，我曾几次想前去拜访而终于放弃，主要是担心她重提那恐怖的等待活埋的窑洞一幕而不堪承受，毕竟是七老八十的人了，再则是我竟然也有点畏怯那样残酷的事件的冲击。她的回忆文章太简单，连张景文是原上的哪个村子都说不准，我想踏访的欲念也难以实施。我转而一想，留下这些悬念，也给我留下自由想象的开阔空间……我终于找到白鹿原上女性革命者的这一个了。

从最初阅读这份简单的回忆文章的震惊里平静下来，一个鲜活的女革命者就横在我的心里了。我对她的敬畏和钦佩，甚至超过了那个在孟村小镇粮店建立原上第一个中共支部的青年，唯一的因由在于这是一个女性。一个能从白鹿原走进刘志丹革命根据地的女青年，我能充分感知需要怎样的思想和勇气。尤其是那种消弭了距离空间的切近感，乃至亲近感，这个张景文就区别于我记忆里的真实的和艺术创作中的女革命者了，类似于我得知那个在原上建立第一个中共支部的革命者的独特的感觉。这种感觉确实很奇妙，不断地在我的感受里发

生。比如刘志丹，这位在陕西人心目中敬仰着也骄傲着的革命先驱“人民英雄”（毛泽东语），当我获知他曾经在上世纪二十年代国共分裂时发动并领导“渭华起义”的重大事件时，我和刘志丹的地理概念上的距离一下子缩短了，原有的印象里，他是在陕北闹革命并建立根据地的先驱，与我生活的关中有某种地理上的距离。尤其是刘志丹被叛徒诱骗，把队伍从根据地照金拉出来陷入早已布置的埋伏圈，造成全军覆没，覆没的地点在离白鹿原东端不远的进入秦岭山区的第一个驿站张家坪。那是一个下着大雨的深夜，当敌军合围的枪声爆响的时候，刘志丹和几个红军士兵趁黑冲出埋伏圈逃走了。他只身逃到灞河源头的灞源小镇，不知怎样打听到这个小镇镇公所的治安员，竟然是他在黄埔军校的同学，这个南方籍的同学如何流落到秦岭山中的小镇混一碗饭吃已不重要，重要的是他还秉持着昔日同窗的友情和义气，把乔装一番的刘志丹送出秦岭，纵虎归回陕北。刘志丹由此重新开辟革命根据地。张家坪和灞源镇，我曾经在十五六年前去过，那是我领着赤脚医生到秦岭山中采挖中草药的经历。我记得在路过张家坪时吃过一顿午饭，四周的山势地形还记着一个大致轮廓；我也记着灞源镇在七十年代初的风貌，我曾在采药的间隙里逛过集日。刘志丹在这两个地方的惨败遭遇，让我顿时化释了陕北刘志丹的地理距离，那种期待里的切近感和亲近感发生了。

我后来才意识到，这种切近感和亲近感对我写白鹿原发生的革命，可以说是具有决定性的意义。我在未来的小说《白鹿原》里要写的革命，必定是只有在白鹿原上才可能发生的革命，既不同于南方那些红色根据地的革命，也不同于陕北的“闹红”；从沉积着两千多年封建文化封建道德的白鹿原上走出的一个又一个男性女性革命者，怎样荡涤威严的氏族祠堂网织的心灵藩篱，反手向这道沉积厚重的原发起挑战，他们除开坚定的信仰这个革命者的共性，属于这道原的个性化

禀赋，成为我小说写作的最直接命题。让我获得创作这些革命者形象的自信和激情，却是和那些从我生活着的原上走出的革命者的切近感和亲近感，确凿是始料不及的事，也是我已往小说创作中起码不甚明朗的一种创作感受。

有了这种特殊的创作感受，把我一直潜存着的写作革命者形象的不自信到惶惶然的心态基本排除了。我的整个小说创作，主导性的因素是直感体验和直接感受，此前的中短篇小说，都是我在生活里直接体验和直接感受的表述，至于体验的深浅和表述的优劣是另外的话题，致命在于体验和感受都是经由直接而发生。白鹿原上普通人的生存形态和心理形态，尽管有一九四九年的时代划界，却不是一声“解放”就会改换一新的，我从少年再到青年的生活印象和感受，都奠基着我面对这道原在封建帝制瓦解再到共和国成立的生活演变的直接感受和直接体验。唯有白鹿原上曾经发生的革命，因为我的年龄注定了我的陌生；革命到一九四九年彻底完成，晚来一步的我无法进入直接体验；包括对中国革命的理解，也只能从书籍和影视画面去获得，缺失的又是无法补救的直接体验和直接感受，成为我创作《白鹿原》里革命者形象时的底虚和隔膜。当我对原上的革命者发生的切近感和亲近感越来越浓的时候，隔膜首先消失了，自信心涨溢起来了。

这种切近感和亲近感，直接决定着我要写的未来小说里的革命者的底色，即白鹿原的底色。或者说，只有从这道古老的原上走出的革命者的独有的气质，尽管他们信奉的主义和对信仰的坚贞，与中国南方北方的革命者没有区别，未来小说《白鹿原》里的革命者的这一个和那一个，起码要让读者能较为明显地感觉到，这是从白鹿原这道古原上走出来的这一个和那一个革命者，起码不致混同或相似湖南、江西那些革命老区的革命者。在构思基本完成再到写作的整个过程中，

不断丰富着的小说《白鹿原》里的几个革命者形象，盘旋在脑海里，活跃在心中，过去记忆里的革命英雄——真实的英雄和艺术创造里的英雄——全都隐没了。我有一种骄傲，更有一种激情，我将要把我生活着的白鹿原上的革命者推到读者面前。他们是先驱。他们对信仰的坚贞不渝。他们义无反顾的牺牲精神，是这道古原的骄傲。还有，他们几乎无人知晓，被遗忘得太快，也太久了。

还有一点纯粹写作的特殊感受，也是后来才意识到的，就是我所写的几位革命者，竟然没有一丁点缺点，除开我对他们的钦敬之外，主导因素还是那种切近感和亲近感的支配。不写他们的缺点，不仅不意味着要塑造“高大全”式的英雄形象，反倒是清醒而且严格地把握着一点，我要塑造生活化的革命者形象。我的革命者的生活化意念，就是要把我从白鹿原上真实的革命者所感知到的那种切近感和亲切感，再通过小说《白鹿原》里的革命者形象，传递到读者阅读的直接感觉里……话说到此必须打住，再说就有阐释人物之嫌了，这是我的忌讳。

这里我想说一下小说《白鹿原》里的革命者白灵，却基本与人物塑造不相干。这个被极左路线执行者当作潜伏特务活埋的情节，在作品面世后，似乎被人特别诟病过。白灵的这个悲剧情节，取自本文前述的张景文烈士的真实事件。自然，生活真实未必一定会造成艺术真实的效果，艺术真实的感染力，也不一定非得生活真实发生为依托，这是常识。这里涉及的显然不是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的关系，而是如白灵被极左路线执行者活埋错杀的情节，能不能写的非写作技巧范围的事。这是不得不涉及革命烈士张景文和小说人物白灵的关系。那篇简约到不足千字的回忆张景文烈士的文章，确凿使我获得了塑造一个女革命者的激情和自信，尤其是文中的两个细节：一是张景文在西安

民乐园扒地砖抛向训导学生“用心读书勿问抗日”的国民党要员，这个抛砖头的细节让我把握住了一位白鹿原女性的独禀气质和个性；二是她被关押窑洞等待活埋的情节，令我心寒又心颤，我从未如此真切地感知到一个激情如火又纯洁如玉的女革命者此刻的激情，她是白鹿原上的女儿。此前许多年我也知晓，开辟陕北革命根据地的领袖刘志丹，曾经被极左路线执行者关押起来，是长征到达陕北的毛泽东闻讯及时喊出“刀下留人”，救了刘志丹等革命者一命，也终结了极左路线的蔓延。这样严重的从内部扼杀革命的极左路线，不容许文艺创作涉及吗？我的小说没有正面涉及极左路线的破坏，也就不涉及如刘志丹这样的革命领袖人物，仅仅只涉及一个小战士白灵，竟然不能容忍，显然不是人物塑造的艺术范围的事了，而是如何面对革命历史上的极左路线。我一时无解。

此后不过三四年，我看到身为延安市领导人又兼着作家的忽培元的长篇纪实文学《群山》，其中正面写到极左路线把持陕北革命根据地的残酷性破坏，其中有一个情节，已经是根据地中坚力量的马文瑞等九位中层骨干，被关押在窑洞里，眼盯着窑窗外不远处正在挖着九个土坑……我读到这里时闭上了眼睛，我无法猜想马文瑞等九人看着正在挖掘的活埋他们的土坑时，将是怎样一种心情？随之又想到现在身为国家领导人的马文瑞，看到《群山》文本里的情景，又会是怎样的心情？我接着想到小说《白鹿原》里的白灵和地理的白鹿原上的张景文，无论前者或后者，都会感到欣慰的，不单是她和她得以平反，重要的是这样的文本警示后人，再不可重复这样内部自残的蠢事。至于写了白灵的我，便有一种不必说话的基本心理。

又过了十余年，二〇〇五年纪念红军长征七十周年，我随中国作协“重走长征路”的一批作家来到江西，先上井冈山，再到瑞金第一个

成立中华苏维埃的会场旧址，感动和感慨且不赘述。我于一日下午到了瑞金城外的一座小山上，仍然保存着七十年前一座房子，是一个和尚住持的僧房。毛泽东曾被隔离软禁在这座孤零零的和尚庙里。创立中华苏维埃并任主席的毛泽东，已经被极左路线的执行者架空且隔离了。据说毛泽东每天在房里读书，也在屋后的一棵大树下闲坐。我在这个如今作为展览场所的和尚庙里转悠的时候，又想到陕北革命根据地里被关押的刘志丹，等待活埋的马文瑞们，已经被活埋的原上女革命者张景文，还有小说里被活埋的白灵。

第二天，我和作家们走到于都河边，这是红军被迫长征的出发地。稍有革命历史常识的人都了解，是什么原因破坏了革命根据地，迫使红军不得不放弃瑞金而逃离，涉过于都河的红军后来遭遇了怎样的损失……我在于都河边看着涨起的浑浊的河水，想到毛泽东们，也想到正遭遇灾难的刘志丹、马文瑞们，还有张景文和白灵。我忽然想到，且不评论小说里白灵这个形象的东长西短，持异议和责难的人该当到瑞金来走一趟，面对山上隔离毛泽东的和尚庙和平静流淌的于都河，大约就不会计较白灵被活埋的情节了。

还有一个情节后来引发的议论，是我当初构思和写作时完全没有意料得到的，这就是白灵爱情选择过程中先兆海后兆鹏的情节，似乎有议论指斥鹿兆鹏夺走了弟弟鹿兆海的恋人白灵，有不大光明的品德污斑。在我的关于这三个年轻人的理解把握里，他们先后走出白鹿原进入西安读书的同时，都接受了新的革命思想的影响，开始投身革命。那时候的中国的社会大背景是“国共合作”，初涉革命的兆海和白灵尚无稍深一些理解，才能做出抛铜钱选择加入国民党或共产党的轻松举动。而当“国共分裂”成为敌对势力的时候，这一对恋人就面对着无可逃避的再选择；这次选择应该是他和她独立的选择了，远非抛铜

钱那次游戏式的轻松了。小说写到两人重新选择时有一场激烈的辩争，是各自对“国”和“共”的截然对立的观点，这就从根本上形成了不可调和的隔障，可以说是敌对。那个时代里的这样两个政治意识很强的恋人，个人情感很难淡漠政治歧见，必然导致决裂。如果他们对“国共分裂”的看法一致，甚至有一方不问政治只读书，那就是另外的结局了。鹿兆鹏是坚定的共产党人，和白灵志同道合，又有假扮夫妻开展地下斗争的特殊空间，结合就是很自然的事了。让兆鹏和白灵以假夫妻相处的决定，是地下党做出的，不是兆鹏假公济私的小小阴谋。白灵之所以扮假成真和兆鹏结合，既是她的选择，也是作者我以为合理而又完美的结合。在他们结合的第一夜，我没有写他们的情，也没有写性，而是到新的一天的太阳升起之后，让白灵回味新婚之夜的幸福感受。我以朦胧的和象征的文字，写了白灵的诗样的美的感受，无疑也是我对新的最理想的婚姻的抒写。这种描写和叙述，是否切合人物的真实情感，尽可以严厉审视乃至挑剔，我都会认真听取，再审视自己。而关于鹿兆鹏以小阴谋夺弟妻的议论，我颇为兆鹏抱屈，今天借此替他申辩表白，也是作为作者的我的责任，更是我那种切近感和亲近感催生的举措。

十四 原下，自在的去处

在破旧的厦屋和后来建成的新房的写作间里，无论是写中短篇小说和随后写作长篇小说《白鹿原》，无论是再三掂量昆德拉《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到底是轻还是重，抑或是反复审视中国民间是否存在人和甲虫互变的魔幻现实主义的生活基础，自然不可或缺如雨后春笋又只能“各领风骚一半年”的中国文坛的迭出新潮，突然会有一位乡党走进来，眉眼里洋溢着不加掩饰的喜悦，以不容置疑的和不许推辞的口气说，明日给咱那个大货（大儿子）办事哩，今黑（晚）请执事（帮忙的乡党），你今黑（晚）就得去。我不仅不会说半个不字，而且表示踊跃，他又补充一句，你还干你那一摊子事。说完又忙着邀请别的执事去了。我的正在写作中的人物，或者是正在阅读的昆德拉的人物，以及更遥远的马孔多镇上的男女老少，顷刻间统统消失了。我当即要做的最切实的事，给一家为儿子娶媳妇的乡党去做帮忙的执事，承担账房里“那一摊子事”的账房先生。

我这个账房先生的主要业务，先一天下午就是写好对联，并贴好，一般需给大门，正屋和新房贴上三副对联，内容有区别，大门对联是向全村的人宣示这家的某个小子（大货、二货或三货）结婚的喜事，正屋的对联应是农家院主人胸怀和姿态的表白，新房对联纯粹就是指向两个新人未来美满婚姻的祝福了。再是协助总管（一般是书记和村长）安排好执事分工，挑水的、洗菜的、端饭的、烧酒的、洗碗的等活路，都要落实到人，再由我写到红纸上贴到院子最显眼的墙壁上，哪一个环节出现漏洞，就可以找到具体的人。账房先生真正进入角色，实际上是从先一天晚上就显示出来，接二连三会有乡党好友送礼祝贺，或一段布料或一床被面或不等数量的现金，我要一一登记，

再用红纸书写了张贴到主屋正面墙上，这事要持续到深夜再无送礼者上门。最忙活的时段是结婚日的上午，东西南北各路亲戚来参加婚礼，既有传统的各色花馍，又有绸缎被面和布料，偶尔还有西安城里时髦新潮起来的亲朋好友送来的花篮，等等。我同样一件一件登记，再用红纸写了贴在墙上，不敢马虎。最复杂的事，是烟酒糖果的支配，尽管烟算不得高档，却是可以尽情随意抽的供给制，不抽白不抽，平素不抽烟的那些人，也在嘴角叼上一支，更有某些调皮的小伙子，随意虚设一个借口向我讨要几盒烟，转过身便装进自家腰包据为己有。如不恰当控制，主人交给我的这些消费品就可能支应不到终场，尤其是那些家境不太宽裕的人家，交给我的消费品本来就有点紧紧巴巴，稍微计划不周或手松一点就会断档，我在计划性和灵活性的掌握上颇费思量，即使明知某个小伙在撒谎讨烟讨糖果，也不忍心看着笑嘻嘻的眉眼在谎话落空时转换为尴尬，得想法应对。

相对结婚的红事而言，埋葬老人的白事更为复杂。从逝者咽气倒头直到下葬完毕，最短需要三天，更为隆重一些的丧事要持续五天或七天。我同样是干"那一摊子事"的账房先生，写对联颇需动一番心思，把这个老人一生的功绩和性情概括归纳到一副对联里，用白纸写了，张贴到大门门楼两边的门柱上，往往能赢得乡村那些识字的人的赞赏，甚至说逝者能得到我的对联的彰显，死了也能合上眼了。我在获悉这种反应的时候，跟某一篇小说受到好评的感觉是无甚差异的。甚至不止一回发生这样的事，一位老头走进我的账房，接过我递给他的一支烟，便说这副对联写得如何好，随之半认真半玩笑地说，到爷（或叔）闭眼的时候，你给爷（或叔）也写上一副，爷（或叔）一辈子受的苦就算没白受。我在那种情景下往往被感动，即使一个最普通的农民老人，也需要在告别这个世界时获得一种客观的评价，他终生的努力终生的奋斗，以及恪守的道德人格，也需要以对联这种最简约

的形式做集中概括，用白纸黑字展示给这个村庄的男女，似乎就可以安寝地下了……相对红事而言，白事往往容易发生纠葛，多是在老人丧失劳动能力需要赡养的年月里，因为付出的不均，兄弟姊妹间隐藏着的积怨，往往就在老人去世时爆发出来，甚至发生打骂冲突。我这个账房先生还得参与调解矛盾，以便逝者能如期入土为安。

我这个账房先生的角色，还延伸到乡党建房的喜事中。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到九十年代初，是我们那个六七十户人家的小村子建新房最红火的年份，一幢幢红砖红瓦的传统的砖木结构的三间宽房大屋，或是刚兴起的红砖立墙水泥板盖顶的新式平房，在拆掉老房厦屋的宅基上或新辟的庄基地上格外惹人眼目。谁先富起来谁一时尚未富起来，从村子西头走到东头瞭一瞭作为家庭招牌的房子，便一目了然了。在破土动工和上大梁（或吊装水泥楼板）的两个重要日子，对于主家来说更具有盛大庆祝的意义。他们同样以不容推辞的口吻邀我，仍是那句老话，你给咱把“那一摊子事”管着。每逢这种作为农民家庭的大事喜事来到时，常常无须他们邀请，我自告奋勇就参与其中了；我建房的时候，满村的乡党几乎全部都来帮忙了；我不仅做着“管那一摊子事”的账房先生，活路紧张人手短缺的当儿还会抬木头搬砖瓦。

我追述账房先生这个角色的生活细节时，颇多犹豫，为乡民的红事白事和建房的喜事做账房先生，似乎与写作本身并不相干，我却抑止不了对那段生活的情感牵连，甚至有一种不可复还的遗憾。最后确定留一点这个特殊角色的生活细节，不仅供自己烦闷时做诗性回嚼，也留下十年乡村写作时的原本生活形态之一斑。

我回到祖居老屋三年的一九八五年春天，陕西作协老领导为主席团增补了几个年轻作家为副主席，我有幸算一个，行政级别属甚为惹眼的副厅级，工资差不多翻了一番达到一百五十多元。这一年夏天，

陕西作协发扬作家挂职深入生活的优良传统，一批新时期出现的青年作家到农村和工厂去了，我被任命为中共灞桥区委副书记。我又回到老家的辖区挂职，原想多参加一些区上的工作，感受正处于农村变革最活跃时期的生活脉动，不料到这年秋末冬初发生了《白》的创作意向，我便调整自己的安排，着重《白》的先期准备，也不想完全放弃对现时生活变化的关注，我向区委书记坦然说明，每周一参加区委常委会，了解区委的工作计划和大事；每逢三级干部大会，无疑是了解农村发展动态和问题的最好机会，我可以到各个小组直接听取种种发言；区上的重大活动，我也争取参加；日常事务我不参与，腾出时间做我写作的事。然而，在我的乡党眼里，你当什么副主席副书记似乎和他关系不大，只要能在他家遇到红事白事和建新房的喜事时，给他当好管“那一摊子事”的账房先生就很满意了。他们也不关心作家是干啥事的，约略知道那是耍笔杆子就能挣钱的省力的好事。偶尔也有应急的事找我，酒酿好了猪养肥了要给儿子结婚，不料领不来结婚证，要我去给乡政府领导说情；或是女方家里又提出不能接受的物质要求而陷入僵局，要我去给女方家长做调节工作……我似乎比较自然地适应生活赋予我的几种反差颇大的角色，回到作家协会参加作品研讨会，和作家朋友交流创作体会，尤其是刚刚潮起的某个新的艺术流派，更有新鲜感；参加甚为庄严的区委常委会，常常被急于要改变本区落后现状的领导们的发言所感动；在祖居的破旧的老屋里与刚刚装备一新的书房里，或者读中国的新潮小说和从欧美刚刚引进的新的小说流派，或者写我的中短篇小说和后来的长篇小说《白》；在某个乡党需要我当账房先生的时候，我尽职尽责地管好“那一摊子事”。以上这些社会角色所花费的时间，除了每周一次的区委常委会之外，一年也不过十来二十回，并不构成某种负担。到一九八八年我要草拟长篇小说《白》的时候，便终止了在灞桥区委的挂职。其他的文学活动和账房先生的角色，依然继续。我的心境踏实而且单一，只集中在写作

上，几乎再没什么欲望，尤其是在《白》的构思完成开始草拟以后，我对这个世界几乎再无任何个人欲望了。

这是我写作生涯中最好的十年。

一夜大雪，漫天皆白。我起床后顾不得洗脸，先掂起长柄竹条扫帚扫雪，先扫院子，再扫大门外的道路，听到的第一句话是邻居扫雪的人不由自主地赞赏好雪，于麦子的生长太好了。然后回到小书房，捅开火炉烧开水，洗罢脸再喝一口新沏的热茶，面对窗外白鹿原北坡上覆盖的耀眼的白雪，激情便潮溢起来，铺开稿纸。春天的某个早晨打开窗户，院里那株梨树的花儿开了，我便跑到树下，点一支烟，久久不忍离去，这是我栽的梨树苗儿第一次开花，不过十来串，粉白娇丽，点缀在枝杈绿叶之间，无疑是世界上最让我动心的花朵了。之后，眼看着一个个弹球大的小梨一天天长大，直到拳头大的青梨变成黄色，成为每天必赏的风景。三伏酷暑是一年里最难熬的季节，趁着前半天凉快抓紧写作，午后便无法捉笔了，我给桌下放一盆凉水泡脚降温，无奈手心手背手腕上渗出的汗水弄湿稿纸，无法写字，便只好等待明天早晨，能保证半天的写作时间尚可告慰。这种酷暑季节也有好处去，每当傍晚日落时分，我到门前的灞河里洗个痛快，再走上村庄背后的白鹿原北坡，择一处迎风地坎坐下，点一支烟，不时有下坡的微风拂过，整个坡地里此起彼伏着蚂蚱的歌唱，偶尔会有狐狸一两声不大好听的叫声，偶尔还会看到一团鬼火忽起忽落飘移不定，沉浸在野风和天籁之中。

有一件事至今难忘，一九八九年清明前后开始写《白》的正式稿，竟是超乎预料的顺手，交上八月的不过四个月时间，已经写成前十一章十五六万字。如不遇意外照此速度写下去，原先预计的两年时间肯定提前完成正式稿写作，八月头上，同乡青年作家峻里到我家

来，邀我到他家避暑写作，他家有冬暖夏凉的窑洞。我感觉暑热的程度尚可忍受，起码前半天可以摊开稿纸，尤其担心换一个陌生环境，如果一时难以适应，进入不了写作状态反而不好，便谢绝了。不料几天之后，持续的干旱造成的酷热已不分早晚，屋子里像个大烤炉，晚上睡在大门外的露天场地上仍然汗流不止难以入睡。我陷入在《白》的写作激情里难以断止，又恰恰遇到结构安排的第一道障碍，便发生烦躁不安坐卧不宁的糟到不能再糟的情绪里。我想到峻里家的窑洞，当即夹着提包渡过灞河，乘远郊公共汽车到一个路口下来开始爬坡，一路询问找到峻里位于骊山南麓通常称作北岭上的村子，浑身衣服早已被汗水湿透。因为没有电话设置，无法事先打招呼，我推开那扇土打围墙上的木门喊了一声峻里，他从窑里出来看见了我，便大呼大叫着把我领进一孔窑洞，清凉之气让我有一种天堂般的享受。

这座农家小院位于一道高高的黄土崖下，依崖凿成两孔大窑洞，不知住过多少代人了，峻里一家三口住在西边窑里，东边那孔窑洞长期空着闲着，便是我的住处。许多天以来，我睡了一个最舒服的午觉，又是一种天堂享受的感觉。不料这天晚上却发生了意外，肆无忌惮地奔跑撕咬的老鼠，仍然干扰不了我积攒太多的瞌睡，直至疯狂到从我的脸上跑过的时候才被惊醒，之后便睡意全消了。我自幼年不仅厌恶而且恐惧老鼠，几乎每回看到老鼠便会作呕反胃，是一种生理性弱项。峻里第二天从友人家借来不过巴掌长的一只小猫，我担心它会被癫狂的老鼠咬死，不料它当晚就咬死了两只老鼠，从此这孔窑洞就再也看不到老鼠的动静了……得了这孔土窑洞里天堂般的凉爽和清静，我很快便进入了《白》的情境之中，大约不过一周，写成了第十二章。这一章是我写正式稿开始以后遇到的第一道障碍，是对草拟稿在此处的结构感觉不顺，曾一筹莫展多日情绪烦躁，竟然在这窑洞里甚为轻松地化解了跨越了。事有凑巧，在我完成这一章的写作快意

里，收到当地公社（乡）通信员送来的一纸电话记录，作家协会通知我回去开会，特别强调不许请假。我当晚回到原下溽热难熬的家中，第二天起大早赶远郊公共汽车回到作协开会，是这年六月发生的“政治风波”的内容。从这天起，这个内容的会一周至少有四次，持续到年终，我竟没有时间再上北岭从那孔窑洞拿回我的手稿，由峻里给我送回来。从八月下旬到十二月底，我几乎天天骑自行车赶到远郊公交车站，乘车进城开会，晚上又原路返回原下老屋，四个月里再没有揭开《白》的草拟稿的大开本笔记本。从酷暑三伏直到数九寒冬，白嘉轩鹿子霖朱先生田小娥不知逃遁到哪里去了。掐指一算，离过年还有一个多月，我点燃了小书房里的火炉，也打开了草拟本《白》，把已写成的前十二章正式稿重新温习一遍，唤回逃遁的白嘉轩田小娥们，重新进入我营造着的《白》的村巷，又铺开稿纸了。从新年佳节的气氛里摆脱出来，继续写作很顺利。原上原下的美丽无比的春天似乎太短暂，眼见着麦苗绿了高了拔节了吐穗扬花了，我一章一章写着，“小麦覆垄黄”了。又是酷暑将至，容不得我考虑要不要再上北岭再进那孔天堂般的窑洞，历时四五个月的“整党”工作又开始了。我完全重复着前一年下半年的生活，早上赶车进城开会，晚上回到原下家中，《白》的写作又中断了，直到年终。我同样重复前一年这个时节的程序，重新打开《白》的草拟本，把逃遁许久的白嘉轩再次邀集回来，和他们对话……中断了两个半年的写作，不仅不可能比原计划提前完成，倒是推后了整整一年。我后来才意识到这件事的另一面好处，我反而不着急了，以死心塌地不用着急的心态，进入后少半部的写作。我想，早半年晚半年甚或早一年晚一年写完都不标示什么实质性的意义，倒是有利于把业已体验和意识到的东西充分展现出来，不留遗憾，还有了可能再审视的更从容的时空和心态。

除了诸如账房先生这种临时角色，平常写作之后的业余生活，也是丰富而且完全适宜我的习性。三伏天躺在清澈见底的灞河里，看满天星斗和浮上原顶的一弯新月，我不会向往任何极尽豪华的浴池了；坐在月光下迎风处的一方坡坎上，此起彼伏的蚂蚱叫声，是天籁的交响；眼看着河岸上柳树枝头的芽苞绽出嫩黄，再到嫩绿再到随风飘散的柳絮，原坡和河川日渐蓬勃的麦苗，从枯枝败叶里冒出的各色杂草的嫩绿，我每天都感受着大自然生命运动的活力；大雪覆盖河川和原坡的早晨，一夜间把寒冬季节里这方北方原野的枯燥和丑陋装饰出素洁里的柔媚。我曾劝走送我回家的司机，踏着灞河长堤的净雪走过三四公里回家，这样的好雪不是每年都能踏上一脚的；野草萎枯树叶飘落的秋末冬初，心头刚刚泛出几分冷寂，很快又被出土现行的麦苗的嫩绿激活了。每天写作之余的傍晚，我把自己融入四时变幻着色彩也变换着情调的原坡和河川，已经成为心理乃至生理的不可或缺的需要了。

我的娱乐也很丰富。破费买了一台电视机，看了不足一月，设在原顶上的一家转播台撤掉了，我家的位置正好在电视信号被白鹿原遮蔽的阴影处，只能收听声音不出图像，电视机只能当作收音机用。我便再破费买录放机，再买或借一些秦腔录像带，过去没机缘看到的经典剧目和著名演员的演出，可以尽情尽兴地欣赏和享受了。每当这种时候，村子里的男女乡党便拥满屋子，有时需得把电视机搬到院子里，才能容纳得下蜂拥的乡党观众。我对秦腔音乐的着迷已难以中断，往往等不得晚上放录像带，又购买了更为简便的收录机，写作中途需要歇息时，我便端一杯茶点一支烟坐到前院，听一段两段那些百听不厌的堪称经典的名角演唱的唱段。久而久之，一墙之隔的小卖部里的那位近门婆婆也听得上了瘾，若是某一天我写得兴起推迟或忘记打开收录机，她便隔墙叫我的名字，说她听戏的瘾犯了……有一位评

论家在谈及《白》的语言时，说他在文字里能读出秦腔的旋律和节奏。我不知此话是否当真，如果真有这样的效果，却是我当年听秦腔时完全没有料想得到的意外补益。我的另一个娱乐项目是看足球比赛，尤其是亚洲杯赛和世界杯预选赛亚洲区涉及中国足球队的比赛，我是一场也不能放过的。因为电视信号受阻，我得赶到七八里外的亲戚或熟人朋友家去看转播，有的比赛场次安排得很晚，到夜里一两点钟看完，又骑着自行车赶回家去，在所过的村子惹起一片狗叫声。如若中国队获得胜利，回到家依然抑止不住兴奋；如若中国队又输了，那种忧愤更难以平息。无论赢了输了，都影响到睡眠，赢了兴奋得睡不着，输了又憋气得睡不着，自然会影响第二天的写作。相对而言，赢球毕竟是快活事，第二天迟起半天也就恢复过来，遇到输球尤其是决定出线的生死之战的输球，给我的心理挫伤往往造成两天三天都无法进入写作。好在这种赛事不是年年都有，隔一年两年经历一番小喜大悲的心理折磨，倒不至于影响整体写作。在我更通常也更实用的娱乐是下棋。这种娱乐方式到后来就不单是娱乐了，而是成为自觉地寻求解脱的最实用最有效的途径了。事出有因，大约从田小娥被公公鹿三用梭镖从背后捅死开始，我的写作发生了前所未有的现象，每天停止写作之后，白嘉轩鹿子霖或其他人物，仍然盘踞在意识里继续做他们的事说他们的话。往常到河边或山坡上散步，他们也就淡出了隐去了；现在却不灵了，不仅不肯淡出隐去，反而影响我散步观景的情绪；他们盘踞在我的意识之中挥之不去打发不走，脑子清爽不下来也就难得休整，直接影响到第二天的写作。我无意间发现下棋是驱赶他们最有效的手段，车马炮一旦进入交战厮杀，《白鹿原》上的男人或女人的这事那事全部都摆脱了。我有几位棋友，本村和邻村都有，常常下棋到深夜，回家便进入梦乡，待睡过一个好觉醒来，心清目爽，重新摊开稿纸，把白嘉轩们再召唤回来。还找到一种摆脱作品人物的途径，便是喝酒，喝得飘飘忽忽，便解脱了。很快就形成一种生活规

律，傍晚停止写作后，以下棋等手段把盘踞意识里的作品人物挥斥驱赶出去，第二天早晨起来喝茶铺纸，满心真诚地再把他们聚拢到我的小书屋里……遗憾的是，我的棋艺没有多大进步，从不沾酒的我却落下了酒瘾。

这种沉静专注的写作情态基本稳定地持续着。直到《白》的写作的最后一年也是关键性的一九九一年，却连续发生两件意料不及的事，或短或较长时间打破了这种沉静的写作状态。一九九一年春节过完，我应邀参加的第一场文学活动，是陕西人民出版社有关文艺书籍出版计划的座谈会。我从乡下赶到出版社会场的时候，已经进入自由表述意见的议程。我一眼看到路遥的旁边有一把空着的椅子，便坐下了。路遥正在发言，我和他不约而同都点一下头，算是互打招呼，以免中断他的发言。待我点燃一支烟听路遥说话，不料坐在路遥另一边的李星歪侧过身子，从路遥背后拽我的胳膊。我当即同样歪侧过身子，在路遥背后把右脸右耳递上前去。李星说，路遥获得茅盾文学奖了，你知道不知道？我说不知道，待路遥发言完毕我要表示祝贺。李星又说，是今天早晨新闻广播公布的消息。说罢他又端正坐好了。我平时也有早晨听中央新闻广播的习惯，今天因为要进城开会，起床后匆忙洗把脸就推上自行车出门了，来不及打开收音机，竟然漏掉了这样重要的喜讯。我刚刚抽了几口烟，李星又把身子歪侧到路遥背后，我意识到他还要告诉我什么消息，也歪侧身体把右脸右耳递给他。我无论如何也料想不到，李星压低嗓音却一字一板甚至发着狠说，你今年要是还把长篇（小说）写不完，就从这楼上跳下去。说罢，他坐直了身子。

我后来如何向路遥表示祝贺，以及我在出版计划会上说了什么意见，统统忘记了，唯有李星逼我跳楼的话一字不差地铸成永久的记

忆，包括他说话的姿势说话的神色说话的语气，都是一遍成记。这句话出他的口入我的耳，便响在我的耳畔也敲响在心里，许多天都不能消隐。我首先感到一种同代人的至诚的关注和关心，诚挚到恨铁不成钢的急切心态。我回到原下小院，耳际依然回响着逼我跳楼的话，自然联系到我正在写作的《白》，尤其是我持续了几年的写作状态，是不是太过沉稳了，要不要或者说能不能加快写作速度。朋友李星的着急情绪，有一定的普遍性基础，尽管我的长篇小说写作处于不张扬的隐蔽状态，但文学圈里的朋友或迟或早也都知道了。几年里只有几个短篇小说发表，猜也猜得到我在写长篇小说，而持续几年不见作品出手，李星的话当是典型的个性化语言了。我停止了两天或三天写作，再三斟酌再三审视我的写作情状，终于平静下来，继续按已经形成的习惯和节奏写《白》，早起喝茶，把白嘉轩和他宗族里的人呼唤回来，晚上还是利用喝酒或下棋的途径，把他们从意识里挥斥赶走——何必跳楼。

李星这句震人的话造成的冲击为时很短。不久，到春天时又发生一件打破写作心态更厉害的事。在一次范围很小的作家朋友聚餐的场合里，我听到一则涉及我的小道消息，上级领导要把我调动到省文联去做党组书记。我根本不相信，也就不在意。我清楚这种传闻产生的背景，是上级领导已着手省文联和省作协的换届工作，新一届的人事安排自然成为热点话题，多种猜测多种传闻，可信度很难判断。传闻要调我到文联当党组书记的事，在我看来连百分之一的可信度都不存在，聚餐完毕回到原下继续写作我的《白》稿，不久就忘记这小道消息了。大约一月之后，我从正式渠道获得让我去省文联做党组书记的真实信息，当即毫不含糊地表明态度，我不适宜去文联做党组书记。我不是形式上的谦虚，也姑且不论我是否具备做好这个角色的能力，而是早已确定后半生以写作为主业了。我当即陷入焦虑甚至可以说是

慌惶状态，却没有任何改易的游移不定。我从作协回到原下小院的路上，采取的措施已经确定，给省委宣传部部长王巨才写信申述我不愿调离作家协会去文联任职的理由。我骑自行车跑了八华里路到邮局把信发走，却发现此事不仅不能了结，反倒是把心悬吊起来了，王部长会不会认可我的理由，万一不认可，下一纸任命调令怎么办……我的心很难集中到《白鹿原》上。我几乎天天都在等待宣传部的回应，回信表明态度或者找我面谈，却一直未有任何反应。眼看又过一月，我的预感越来越紧张，便决定第二次写信申述，除了前信申述的理由再做概括性重复，这回着重申明两点，我不愿意调离作协，组织部门如果下任命书调我，我不遵从，不仅我被动，于领导也不大好。我已把话说透，如果不开除党籍，我是不会调离作家协会的。再一点还是表明我的态度，我猜想作协和文联换届的焦点是人事安排，需要安排的人多而职位有限，恰如所谓僧多粥少的矛盾，早已是明摆着的多所议论的话题。我便直言不讳地表白，如果作家协会人事不好安排，我心甘情愿放弃现任的副主席职位，只要能保留专业创作这个职业就心满意足了。这封信我还是写给王巨才部长，又添了分管文艺的一位副部长部尚贤，署了两位领导的名字。信发出后近两个月，已经从春天进入伏天，仍然没有任何反应，但也没有调我去文联的任命书下达，我仍然惴惴不安。事情的最终了结，是伏天在丈八沟宾馆，我参加省委会散会后走出门来，听见有人叫我，回头一看是我两次写信的王巨才部长。我们在一株大松树的阴凉下驻足。他说我写给他的两封信都收到了。他告诉我，收到第一封信后，他以为我怕耽误写作，便决定派一个能力很强的副书记主持日常工作，让我只参与大事的决策就行了，可以不坐班。他说接到我写的第二封信看过，也让另一位分管文艺的副手看了，他们都很感动，有些人托门子找关系想挂一官半职，给你个正厅级你却不要……他很真诚地说，那你就原样不动，倒是觉得亏了你。我不单悬空的心落到实处，更为这位领导的实心体贴感动

了，便握着他的手表示无以言表的感激。在他就任宣传部部长后，这是第二或第三次单独接触，并无私交。

从丈八沟回到原下小院，我不仅感觉到前所未有的踏实，而且分明意识到另一种前所未有的感觉，我是自己把自己逼到再无选择余地的一棵树上摘桃子的猴子了。踏实里的某种压迫，具体到摊开稿纸直面白嘉轩们的时候，我感觉更沉静也更专注了。我依旧到灞河里洗浴，依旧到山坡上欣赏此起彼伏的蚂蚱的合唱，自然免不了和东村或西村的棋友纵车跃马，还有颇可以胜任而自信的账房先生的差使。至于三个正在上大学和中学的孩子的这事那事、家务杂事等，我都视为不可推卸的事认真去做，做完再回到小书屋摊开稿纸。

临近《白》书完成时，又出了点意外干扰，一位喜欢写作的本区乡党，为一家发行很大的本地晚报写了一篇文章，内容是说我写完了《白》书。我看到报纸上的这篇文章时，几乎噎得喘不过气来，且不说那些道听途说的关于《白》的内容，关键是当胸击中我的忌讳，作品在完成之前是一直捂着不说的。我把这种心态比拟为蒸馍，馍未蒸熟之前是不能揭锅盖漏气的，否则就会弄成一锅半生不熟的死面圪垯了。这位熟人不打任何招呼的举动，如同揭去了我即将蒸熟的馍锅的锅盖，那种措手不及的感觉有如噎死，然而又无可奈何。经过几天调整，自己安慰自己，好在《白》已接近完稿，漏一点气已无碍大局，待噎住的气平喘之后，重新坐下来面对稿纸。

进入一九九一年的深冬，陪大女儿在西安城里读书的老母亲双腿出现问题，属老年性病变，无法支应买菜做饭的家务。我的妻子当即进城代替母亲，另两个孩子都在中学寄宿读书，原下小院便只剩下我一个人了。我的写作没有受到什么影响，自己打火做饭，还有洗锅刷碗，虽然不大熟练，很快也就适应了。其实倒也简单，妻子走时给我

擀下并切好一大堆面条，我只需把它煮熟就可以止饥了；还留下不少的馍，我在火炉上把馍烤得焦黄，竟是无与伦比的美味享受。得着空闲，她回家来给我送馍，少不了擀面条。她忙时，我便赶到城里家中，再背馍回原下，似乎也没觉得艰难或者说艰苦，也许少年时背馍进城念书已是轻车熟路，差别仅仅在于，少年时为读书从乡下把馍往城里背，现在为写作把馍由城里往乡下背，看来我这大半辈子都离不开背馍的生活情趣了。

准确无误地记得一件事，一九九一年农历腊月，妻子最后一次送补给品——擀好的面条和蒸熟的馍回来，临走送她出小院时，我说，你不用再送了，这些面条和馍吃完，就写完了。妻子突然停住脚问，要是发表不了咋办？我几乎没有任何迟疑地说，我就去养鸡。妻子转身出门进城去了。

我说养鸡不全是调侃。《白》写到最后接近完成的这个冬天，我自然不会不考虑出版的可能性。从最坏处着想，往往是我考虑问题的习惯，如若不能出版，无论是什么原因（作品本身不够出版水准，或是业已出现的出版政策回缩的制约），我都不会继续以写作为专业的生活了。道理是无须别人点明说透的，当专业作家已经整整十年，且已挂上在习惯里被看作老年年龄区段的五十岁，写出的长篇小说出版不了，我就考虑实行自我调整，以养鸡为专业或者说主业，把写作的爱好重新摆置到业余的位置。这种考虑不仅是因为经济拮据生活困窘，更不堪的是专业作家这块牌子造成的精神压力难以继续承受。我想做一个养鸡专业户，不仅可以较快地改善甚为困窘的家庭经济状态，养鸡劳作之余，写点小说或散文，才可能享受写作的快感和愉悦。

这是临近一九九二年农历春节前的真实心态，此时大约只剩下最后两章了。已经有了当养鸡专业户的打算做退路，完成《白》的最后两章的写作心态就更为沉静了。

十五 生命历程里的一个下午

至今依旧准确无误地记着，写完《白鹿原》书稿的最后一行文字并画上最后一个标点符号的时间，是农历一九九一年腊月二十五日的下午。在原下祖居的屋院专业写作生活过了接近十年，不知不觉间我已经习惯了和乡村人一样用农历计数时日，倒不记得公历的这一天是几月几日了。

那是一个难忘到有点刻骨铭心意味的冬天的下午。在我画完最后一个标点符号——省略号的六个圆点的时候，两只眼睛突然发生一片黑暗，脑子里一片空白，陷入一种无知觉状态。我坐在小竹凳上一动也不能动，是挺着脖颈木然呆坐，或是爬在摊开着稿纸的小圆桌上，已经无记。待到眼睛恢复光明也恢复知觉，我站起身跨过两步挪移到沙发上的时候，才发觉两条腿像抽掉了筋骨一样软而且轻。

我背靠沙发闭着眼睛，似乎有泪水沁出。在我刚刚感到力量恢复的时候，首先产生的是抽烟的本能性欲望。我点燃了雪茄，当是我抽得最香也最过瘾的一口烟。眼前的小圆桌上还摊开着刚刚写成的最后一页手稿纸，似乎还不敢完全相信，这个长篇小说真的就这么写完了！我在这一刻的感觉，不仅没有狂欢，甚至连往昔里写完一部中短篇小说的兴奋和愉悦都没有。我的真实的直接的感觉，是从一个太过深远的地道走到洞口，骤然扑来的亮光刺激得我承受不住而发生眩晕；又如同背负着一件重物埋头远行，走到尽头卸下负载的重物时，业已习惯的负重远行的生理和心理的平衡被打破了，反而不能承受卸载后的轻松了。直到现在回想并书写这种意料不及的失重情景时，我还是有点怀疑单纯是因为拖得太久的写作造成失明、晕眩和失重的生

理现象，似乎与《白》书最后写到的人物结局不无关系。当时的情景是，在我点着雪茄的时候，眼前分明横摆着鹿子霖冻死在柴火房里的僵硬的尸体。这是我刚刚写下的最后一行文字：“天明时，他的女人鹿贺氏才发现他已经僵硬，刚穿上身的棉裤里屎尿结成黄蜡蜡的冰块……”这个被我不遗余力刻画其坏的《白鹿原》里的坏男人，以这样的死亡方式了结其一生。写到这一行文字时，我隐隐感觉到心在颤抖，随之就两眼发黑脑子里一片空白了。在我喷吐着的烟雾里，浮现着“棉裤里屎尿结成黄蜡蜡的冰块”的鹿子霖的僵硬的尸体，久久不散。这个浮现在烟雾里的坏男人的尸体，竟然影响到我写完《白》的应有的兴奋情绪，也是始料不及的事。

南窗的光亮已经昏暗。透过南窗玻璃，我看到白鹿原北坡的柏树已被暮色笼罩。尚不到下午五时，正是一年里白天最短的时月。我收拾了摊在小圆桌上的稿纸，便走出屋子，再走出小院。村巷里已不见人影，数九寒天傍晚的冷气，把大人小孩都逼回屋里的火炕上去了，游走在村巷里的鸡也都归窝上架了。这是冬天里日落之后天天都重复着的景象。我已经难以像往常一样在这个时候守着火炉喝茶。我走下门前的塄坡，走在两排落光了叶子的白杨甬道上，感觉到灞河川道里如针扎一样的冷气，却不是风。我走上灞河的河堤，感觉到顺河而下的细风，颇有点刀刺的味道了。不过，很快就没有知觉了。

我顺着河堤逆水而上。这是一条自东向西的倒流河。河的南边是狭窄的川地，紧贴着白鹿原北坡的坡根。暮色愈来愈重，原坡上零散的树木已经模糊，坡塄间的田地也已经模糊，只呈现出山坡和塄坎的粗线条的走势，把这个时月里干枯粗糙的丑陋全部模糊起来了，倒呈现出一种模糊里的柔和。我曾经挑着从生产队菜园里趸来的黄瓜、西红柿、大葱、韭菜等蔬菜，沿着上原的斜坡小路走上去，到原上的集

市或村庄里叫卖，每次大约可以赚来一块钱，到开学时就装着攒够的学费到城里中学报名了。我曾经跟着父亲到原上的村庄看社火，或秦腔。我曾经和社员一起在原坡上翻地，割麦子。我曾经走过的熟悉的小路和田块都模糊了。我刚刚写完以这道原为载体的长篇小说。这道真实的熟悉到司空见惯的原，以及我给这原上虚构的一群男女人物，盘踞在脑子里也盘踞在心上整整六年时间，现在都倾注在一页一页稿纸上，身和心完全掏空的轻松竟然让我一时难以适应。我在河堤上快步走着。天色完全黑下来了。黑夜的微弱光色里，我走到河堤的尽头了。我不知累也不觉冷，坐在临水的一条石坝上，点燃一支烟，脚下传来河水冲击石坝的婉转的响声；哗哗的响声里，间隔着会有铃铛似的脆响。鹿子霖僵硬的尸体隐去了。我的耳朵里和脑海里，不间断地流淌着河水撞击石坝的脆响。腊月数九的白鹿原下的灞河川道里，大约只剩下我在欣赏这种水流的妙音。

我不记得坐了多久，再站起来转身走向来路的时候，两条腿已经僵硬到挪不动步子，不知是坐得太久或是太冷造成这种麻木。待到可以移步的时候，想到又要回到那个祖居的屋院，尤其是那间摆着写作趴过四年的小圆桌和已经破损的小竹凳，竟然有点逆反以至恐惧。然而，我在河堤上还是快步往回走，某种压抑和憋闷在心头潮起，真想对着南边的原坡疯吼几声，却终于没有跳起来吼出来。已经走到该下河堤的岔口时，我的胸间憋闷压抑得难以承受，想着这样回到小院会更加不堪，索性又在堤头上坐下来抽烟。打火机的火光里，我看见脚下河堤内侧枯干的荒草，当即走下河堤，点燃了一丛菅草。火苗由小到大由细到粗，哗哗哗蔓延开去，在细风的推助下，火苗顺着河堤内侧往东漫卷过去，发出哗哗啪啪的响声。我早已重新走上河堤，被烟熏呛得大咳不止泪流不止。弥漫着的烟气里，我能嗅出一阵是蒿草的臭味，一阵又是薄荷的香味，自然还有菅草马鞭草等杂草的纯粹的熏

呛味儿。火焰沿着河堤内侧往东烧过去，一会高了一会低了……我的压抑和憋闷散失净尽了，鼻腔里还残留着蒿草的臭味儿和薄荷的香气儿，平心静气地走下河堤，再回到小院。

我打开每一间屋门，拉亮电灯，还有屋前凉台下的照明灯，整个屋院一片亮光，心头也顿觉畅朗光明了。我打开录放机，特意选择了秦腔名角脍炙人口也普及到城乡的《花亭相会》，欢快婉转的旋律和生动形象的唱词，把一对青春男女的倾爱演绎得淋漓尽致，妙趣迭出。这是我平时放得最多的磁带之一，往往会改变人的情绪。我的满屋满院的灯光和秦腔的声响全都泄出小院围墙，竟然招来两三位热心的乡党，以为我家有什么不寻常的事要办，问我要不要帮忙。我竟忽略了这一点，乡村人为省电费开支，总是选择瓦数很小的电灯泡，临街的窗户只有昏黄的灯光，这种屋院通亮的景象，只有在办红事白事或建造新房的时候才会出现。我当即向他们解释什么事都没有，只是想畅亮豁朗一下。为避免招惹更多的热心乡党过来询问，我把院子里的电灯熄灭了，房间里的灯依旧亮着，《花亭相会》的旋律和动人的唱腔也继续着。我开始动手点火烧水，为我煮一碗面条。

这是我几年来吃得最晚的一顿晚饭，也应该是几年来吃得最从容的一碗面条，且不论香或不香。尽管从草拟到正式稿写作的四年里基本把握着以沉静的心态面对稿纸，然而那道原却时时横在或者说楦在心里，虽不至于食不甘味，心理上很难感到一种从容。现在，横着或者更确切地说楦在心里的那道颇为沉重的古原，完全腾空了，经过短暂的不适和诸如烧野火的释放之后，挑着面条的时候已经是一种从容了。我只能找到从容这个词表述吃着面条时的心态。我做完了一件事情。这是我在写作上做的前所未有的耗时费劲和用心的一件大事，尚不敢预测它的最后结局，或者说还不到操那份心的时候，仅仅只是做

完了这件事。做完以后的轻松和从容，我在火炉旁吃着面条的这个寒冬的深夜，充分地享受到了。

我睡了一个自来醒的好觉。我骑自行车赶到远郊公共汽车站始发站，乘车进城，这是许多年来别无选择的一条轻到不能再轻熟到不能再熟的轻车熟路了。敲开屋门。开门的是妻子。我说：“完了。”连“写”字都省略了。她也平淡地回了一句：“完了就好。”她不惊奇是心中有数，大约十天前她回乡下给我送给养的时候，临走时我告诉她，等这些馍和面条吃完，我就可以写完了，年内不用再送吃食了。

她是第一个知道我写完《白》的人。此后很久，我没有告知任何人。不单是我不想张扬，也不光是我习惯于“馍未蒸熟不能揭锅跑气”，刚刚写完的稿子还得再过一遍手，尚需一些时日，更关键的一个因素，是我感觉到当时的文艺政策收得比较紧，《白》里所写的我对那段乡村历史生活的体验和感受，能否被理解被接受，这是很自然会发生的疑虑。我在当时反复审时度势，要不要拿出来，或者说这时候拿出来合适不合适，我基本确定在否定的隔档内；待到什么时候文艺政策再放宽了，拿出来也不迟。这是我的生活经验所形成的处事习惯，自改革开放伊始，包括文艺政策在内的多项政策，一阵儿松了一阵儿紧了一阵儿又放宽了的情况多有发生，这种收紧的文艺政策肯定还会做出调整，只是难以把握持续时日的长或短。无论如何，当下拿出去是不合时宜的。出于这样的考虑，我便不想把写完长篇小说的事告诉别人。我的从容的心态，也与这个因素不无关系。

从容而又轻松地过罢春节初五，我在原下的小书屋打开《白》的手稿，开始修改，我把这项工作习惯叫作再过一遍手。我充分感受或者说享受着这种再轻松不过的工作。我的工作主要是文字审阅，把写作过程中的疏漏弥补起来，错字别字和掉字自不必说，尤其是通篇试

用的叙述语言，比较长的句子容易发生毛病，需得用心阅审。然而，毕竟已有既成的文字，比不得写作时的专注和倾力，相对而言轻松多了。我记得有一两个情节被重复交代过，倒是始料未及，自然都做了处理。我在这种轻松的工作里，感觉到我在开笔写正式稿时的想法是正确的，考虑到这部小说文字比较多，再写第二遍稿将是不堪设想的事，必须一遍成稿，就得充分酝酿，尤其是叙述文字的把握，必须一步到位。另外一个纯属个人创作的“忌讳”性感受，第一次陷入在那些既陌生又熟识的人物的情感世界和其身临的生活环境的时候，迸发出来的文字往往是最恰当最准确的，甚至常常有始料不及的出奇的细节涌现出来，让我享受到任何奖励都无可替代的陶醉。当某部（篇）作品写完，人物和人物生活的环境都成为熟人旧地了，新鲜感也随之淡化甚至消失了。如果写得不尽如人意，要想重新写作，或者做重大修改，最大的障碍不是费时费劲的劳作，恰恰在于对人物和环境的新鲜感的淡化和消失，很难再恢复重现，以致文字叙述常常都发生迟钝和艰涩。这是我多年写作的个人感受，显然有违“文不厌改”“千锤百炼”的古训，权且只作为个人的“忌讳”，然而又不易改变。基于这种个人创作的“忌讳”，我把《白》的第一遍稿当作正式稿去写，现在修改起来就很轻松了。

这种再过一遍手式的轻松的修改，除了上述再阅审再把握的用意之外，还有某种自我温习乃至自我欣赏的感受。这部书稿的正式稿写了四年，到我这时打开第一页再读的时候，已经有了不算太久却也不近的时空距离，尤其是前边的大部分篇章，我早已从白嘉轩们的情感世界走出来，进入一种冷静的心态，有如看自己幼年用刀子刻在裸露的房柱和木梯上的字和画。我常常会发生小小的得意，当时竟然写出这么一句颇为传神的对话，抑或某一个令人哑然失笑的细节，确信如果现在重写肯定写不出来了。然而，更多的时候却是犹疑不定的心

态，眼下正在重新阅读的这些描写白嘉轩等人物的人生故事，如果某一天真的有幸公之于世，读者会有兴趣吗？近百年前的白鹿原上的一伙乡村男女的生活故事，会招惹正倾慕现代化生活方式的当代人的眼球吗？在我的感觉里，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的社会氛围，常常是西方吹进的一股又一股风酿制成社会热点。造成这种犹疑不定心态的另一个因素还在自身，从构思到草拟再到正式稿完成的六年时间里，白嘉轩、鹿子霖、朱先生、田小娥、鹿兆鹏、白灵们的生命历程，在我心里不知审度再审度体察再体察了多少回，他们横在或者说楦在我心里六年了，可以说真正属于烂熟于心。熟悉到烂熟的状态，不可避免地发生的负面效应不仅是不新鲜，甚至形成某种无感觉状态，很难把握读者阅读时可能发生的真实反应了。即如一些构思和写作时曾经让我手抖心颤的情节，也因为烂熟而缺失了新鲜，也就难以推测读者阅读时会不会感兴趣了。这种疑虑的心态无法排除，却也无法改变业已完稿木已成舟的现实，仍然继续着修改。

修改是轻松的，因为确定尚不急于拿出手，修改更没有急迫的因由。乡村正月是一年里最轻松自在的日子，许多在“文革”中禁绝的庙会已经恢复，而且越来越热闹，耍社火，唱秦腔，农村能工巧匠制作的小农具，各种植物种子和树苗，都赶到庙会上来出售，更缺少不了多种民间小吃。我常常经不住幼年记忆里庙会场景的诱惑，骑着自行车和村子里的乡党搭帮结伙去逛庙会，《白》的修改迟一天早一天完成没有什么实际意义。这种轻松自在的日子大约过到正月下旬，也是公历二月下旬的一天，早晨起来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突然听到邓小平南行的消息。电台播出了小平南巡到一些地方即兴说的话，我至今还记得其中的两句：思想要再解放一点，胆子要再大一点。我的心有一种被撞击的感觉，竟然有按捺不住想要欢呼的欲望。我对这两句语录的敏感以及它的不可估量的伟大意义，几乎是切身的直接的

感应，中国改革开放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必然要破除某些思维定式的禁锢；而要打破制约改革开放的某些不无复旧色彩的条律，需要创造性思维的胆量，邓小平号召并鼓励解放思想，中国的改革大局必将发生大的转机。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作为更为敏感的文学艺术事业，必然会率先破禁而出，“收得太紧”的文艺政策肯定将要放宽。几乎就在这一刻，我便断然决定，把《白》稿拿出手，甚至有点懊悔，此前的修改进行得太轻松太自在了。

我当即决定给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兼任《当代》杂志副主编）何启治写信，报告长篇小说《白》已完稿，正在做最后的修改，并确切地告知他，三月下旬将完工。这个时限经过认真算计，并留有余地，我的家事颇多，把可能耽搁的时间做了充分预算。这里要简略说一下我和何启治的交情。在一九七三年冬季，我便认识了何启治，刚刚恢复出版工作的人民文学出版社派他到陕西组稿，那时候的老作家一般都在被批判之列，约稿对象自然就是“工农兵”业余作者了。他到同样是刚刚恢复工作的陕西作家协会（当时叫陕西文艺创作研究室，以示和旧作协的区别）了解情况，在刚刚恢复出刊的《延河》杂志（改称《陕西文艺》，昭示与旧《延河》的区别）看到了我写的短篇小说《接班以后》，便找我约稿。我那时在人民公社（乡或镇）工作，上级恰好确定我到南泥湾“五七干校”接受劳动锻炼，并到上级机关西安郊区开会听取具体安排。老何赶到西安南郊的小寨，待我开完会后见面，并站在小寨十字街头说事。他说他看了我的短篇小说《接班以后》，以为这是一个长篇小说的框架，充分展开来写，便会是一部不错的长篇小说。我几乎被他的热情吓住了。《接》是我写成并发表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长篇小说在我完全是不可想象的遥远莫测的事，便不敢应诺。他耐心地说服我，并举出两位在陕北插队的女知识青年正在合写一部长篇小说的事，为我壮胆。我仍不敢应诺。然而，

我和他从此却成为朋友，常有书信互动。到改革开放文艺复兴的好时代，他编《当代》，我把第一部中篇小说《初夏》送他，几经修改，终于发表，并获《当代》奖。在后来的交往中，他仍不忘长篇小说的约稿。我便承诺，如果今生会发生长篇小说的写作，第一个肯定给他。从一九七三年年末和他初识并约稿，到一九九二年年初写完《白》，并决定写信告知他的时候，整整二十个年头了。

我在信里说明了几件事，到三月下旬就完全可以脱稿，由他派人来取稿，或由我送稿，请他决定。需要说明，此前他曾在见面时告知我，如果长篇小说写成，会派人来取稿。我在信中还申述一点，希望他能安排一位文学理念比较新的编辑做责编。很快收到他的回信，到三月下旬派人来取稿。到了这个时候，人民文学出版社这块牌子突然对我形成压迫，这是国家级出版社的大牌子，要通过其出版水准，谈何容易。我在珍重并信守和老何的约稿承诺的意识里，似乎把这块大牌子的压迫淡化了，当真有两位编辑要来拿书稿的时候，我才敏感到某种压迫。

前来拿稿的编辑是高贤均和洪清波。那时候我还没有电话设备，老何把火车车次告知陕西作协，作协把电话打到我所在的乡镇，由通信员把一绺电话记录送到我手里，高、洪两位所乘火车到西安的时间是西安天明的时候。事有凑巧，在我刚刚看完电话留言的时候，村子里的赤脚医生扶着我的母亲走进院门，说母亲血压升高到危险的度数。随即扶母亲躺到床上，挂上了输液瓶，同时也就瘫痪了，我坐在床边侍候。更让人意料不及的是天公也凑热闹，这天夜里下了足有一尺厚的雪。天不明我便起身，请来一位乡党照看母亲，因为积雪封路，我便步行七八华里赶到远郊汽车站，搭乘头班车进城。在高、洪两位贵客走出车站时，我和他们握手了。我的《白》的修改还剩下三

四章，至少还需一天时间做完。安排完高、洪的食宿，我又赶回原下老屋，一边做最后几章的修饰，一边管护输液的母亲。我记得很清楚，一九九二年公历三月二十五日早晨，我提着《白》书的手稿赶往城里，在陕西作协招待所的房间里，把近五十万字的厚厚一摞手稿交给高贤均和洪清波的那一刻，突然涌到口边一句话：我连生命都交给你俩了。我把这句话还是咽下去了。我没有因情绪失控而任性。那一刻几乎同时意识到，这种情绪性的语言会给高、洪造成压力，甚至不无胁迫的气味，我便打住。我从事创作多年了，常识或者说不争的无数事实是，出版社出书是以作品的质量为准绳的，不是以作者投入的程度和付出的劳动的多少说话的。

这天中午，我约高贤均和洪清波在家里吃午饭，是我妻子用心做的饺子。两位编辑很随和，连口说饺子好吃。我相信不完全是客套话，因为饺子的内馅有新春的头茬韭菜，我吃着也觉得新鲜。说真话，我那时候没有请他们进餐馆的经济实力。

下午，我送他们去火车站。他们要赶到成都去参加一个文学笔会。

天黑时赶回乡下老屋院，先看卧床的母亲。母亲说，他的腿可以动了。我的心里真可谓一块石头落了地，不由慨叹，在我完成最后一笔文字并交稿的这一天，天灾人祸竟然都来凑热闹了。好了，《白》的手稿由高、洪带走了，母亲的病也大有转机，我在点着一支烟的时候，竟然是一种前所未有的松弛到轻和软的感觉。

我捅开火炉，早春乡村的深夜寒气仍然很重。电灯光泄出到小院里，月季的枝头影影绰绰可以看到新冒出的叶芽，再远处就是白鹿原北坡在星光下的粗略的轮廓了。我喝茶，抽烟。隔壁屋里偶尔传出母

亲轻声的呻吟。我不想看书，什么书都不想看，就那么坐着喝着抽着。多年来形成一种潜意识习惯，只要一个人独处，如果不动笔，总要捞上什么书或报刊翻看，这时候却什么也不想看，连我自己一时都想不到这种心理变化，竟然厌倦阅读。

这个世界距离我很远。亲朋好友都远如缥缈，只剩下我一个人面对着星光下白鹿原的北坡。我心上悬着两个刚刚认识的人，就是拿走《白》书手稿的高贤均和洪清波，高贤均爽朗的蜀地口音和洪清波总显得羞涩的眼神。他们拿着我的手稿，正乘坐在由关中进入蜀地的火车上。我自然会想到他们读后的看法的致命性，却还不至于担惊受怕，不是我自信自己的货色——前述已涉及烂熟到无感觉状态，而是按照当时处理稿件的一般成律，需得较长的时日才会有结果，当下是犯不着太过惦记的。

这样坐着喝着抽着，看是平静里的轻松，内里却开始积聚准备承受那最不堪的关于《白》的结局的心力。

十六 读诗诵词，前所未有的闲情逸兴

高贤均和洪清波拿走《白鹿原》手稿之后，我随即把一份《白》的复印稿送给李星，请他看看成色究竟如何。我瞅中李星完全是别无选择的事，他的文学评论在那个时候开始形成影响，在陕西“笔耕”文学评论组里是最年轻的评家，呈现出全新的锐气，审视和评判是可靠的；还有一个情感因素，他和我属于同代人，认识近二十年了，在一个单位工作又住同一栋楼房，见面既说文学创作，也说到某些新呈现的生活世相，虽不可能完全吻合，却能够坦诚坦白地直抒己见，毫无忌讳，这在有较大年龄差别的人中是难得发生的，起码在我是多所顾及的；更重要的一个决定性因素，是他一年前逼我跳楼的那句话，即路遥的《平凡的世界》获茅盾文学奖的消息公布的那天早晨，他带着狠劲儿对我说，你今年要是还把长篇（小说）写不完，就从这楼上跳下去（说这句话的环境前文已述，不赘）。可见这个同代人的评论家李星关注我的写作，殷切到了完全可以说是恨铁不成钢的状态，我便毫不犹疑地瞅中他来为《白》把握一下成色。

我确实很想听到别人读《白》的真实感觉，如实说来，几乎是迫不及待的一种焦灼心理，更多的是担心乃至害怕。担心和害怕的唯一一点，就是对《白》的阅读反应，且不说完全否定，单是对《白》里所表述的我对那段历史生活的体验和对体验的表述形态如果反应平平，无疑标示着我的失败。我能沉住气在原下的屋院写作四年，现在却按捺不住期待审判的焦灼。读者也许会产生陈某在此故作矫情，反问一句，你自己对你写下的作品难道没有一个最基本的把握吗？我的问题恰恰就出在这里，而且几乎是自喜欢写作几十年形成的一种习惯性心理，这就是，以一种不可抑制的惊喜发生创作冲动，兴味十足地

完成构思，满心自信乃至不无得意地进行创作。然而，一当写完最后一个句子，心理便开始发生逆转，这篇（部）写的这种体验，以及试图出新的叙述方式，编辑会有兴趣吗？而且多是否定性的阴影罩上心来。最典型的也是记忆犹新的一次，是一九七九年初夏写成短篇小说《信任》，就发生了很严重的自我怀疑和否定性心理挫折。这个短篇小说本来是应《陕西日报》老编辑吕震岳的约稿，写完后却不敢送给他，我和他初识一面，既怕他失望，也怕我出丑。我便乘车跑到《西安晚报》编辑张月赓家，想请他先给看看，把握一下成色，再决定要不要拿出手，老张是许多年的老朋友，不怕出丑。在老张家遇到部队作家丁树荣，快人快语又快手，把《信任》稿接到手先看。他很快读完这篇六千余字的小说，大加赞赏。看他说话的表情和口吻，不像是应酬之词，我才获得一点自信。他自告奋勇把此稿送给《陕西日报》老吕，并说明他正好要去老吕那里说事。大约不过一周时间，《信任》在《陕西日报》以整版发出，引起不小的社会反响。随后，《人民文学》转载了《信任》。再随后，竟然获得一九七九年全国短篇小说奖。这一年的评奖，是以读者投票选择的方式定夺的。另有短篇小说《霞光灿烂的早晨》写成时，这种自我否定的心理又一次严重发生。这是一九八二年春天的事，写成后锁到桌斗里不敢投寄，直到去延安参加纪念《讲话》发表四十周年活动，想到可以见到作家朋友邹志安，便带着手稿去了。志安读罢连连说好，似乎也不是虚于应酬的表示，我才壮着胆投寄到杂志，发表后被选刊转载，还有评家评说。这种往往在写成作品后发生的心理逆转，几乎成为一种难以改易的恶性循环，尽管有上述两个短篇小说的切身感受，仍然不能改变这种可能纯属个人的奇怪心态。基于这种心态，我从来不会发生作品刚刚写成便吹牛的事，不是谦虚，而是难能。现在，这部连构思在内耗时六年的长篇小说《白》送出去了，无可避免地又陷入那种自我否定的恶性循环，不仅难以自拔，而且比以往任何一次都来得更严重。因由很

简单，这是我第一次试写长篇小说，而且耗时六年，做了怎样的准备以及投入了怎样的努力，都是以前写中短篇小说难以比对的事。在作品即将完稿的时候，妻子问到“如果发表不了怎么办”的时候，我毫不迟疑地回答说“我就去养鸡”，这是真实的心态。尽管已经有这样的心理准备，到了交出稿子面临命运抉择的这个时段到来时，这种恶性循环的自我否定已经发展到自己轻贱的严重程度，想着新潮话语和新潮艺术正热，不仅各种媒体上热播，人们口头相传更热，谁还会对一个偏僻而又无人知晓的白鹿原近百年前的陈年旧事感兴趣？那些老掉牙的乡村男女的故事，怎能吸引正兴趣十足地瞄着新潮生活和新潮艺术的读者的眼睛！我一个人住在空荡荡的原下的屋院，读不进去任何书籍，便找到一本古典诗词集子，强迫自己阅读，企图改善心态，收效甚微，我便大声朗诵，焦灼的情绪略得缓解。

过了十来天，估计李星应该读完《白》稿了，我从乡下赶往城里，专意聆听他的意见，不无忐忑。除高、洪两位拿稿的编辑之外，李星无疑是第一个阅读《白》稿的人，也是我能听到意见的第一个人。我进入家属院，拐过弯便看见住宅楼下甬道上走着李星，手里提着一个装着大葱等蔬菜的塑料袋。我叫了一声李星。他转过身看见我，却没有说话。我走到他跟前尚未开口。他说：“到屋里说。”我便明白他要说的话自然是关于《白》的看法。我几乎敏感到他说话的表情，原来就不显白的脸居然黑煞煞着，完全没有了印象里见面时不笑不说话的好模样，我便感觉到大事不妙。我跟着他从一楼上到五楼，这个人竟然不说一句话，我的心也沉到底了。进了他家门，他把装菜的袋子放到厨房，依旧硬着脖子连头也不回一下，径直走到他的卧室兼书房的房间。我也跟进了门。李星猛然回过身来，瞪着一双眼睛，用劲儿地捶打着掌心，几乎是喊着说：“咋叫咱把事弄成了！”我站在原地一动不动，就那么僵硬地站着，一种巨大的惊喜，倒把我在这一

瞬间冲击得僵硬了。他不管我的反应，自己不坐也不让我坐，在那间小屋子里转过去又倒过来地走着说着，不容我插一句话，全部都是他的阅读感觉，随口随意说来，情绪激动。我站在那儿听着，一种被呼应被理解的幸福感从心底里泛溢起来。那种自我否定的焦灼感被驱散了。许多年过去了，他那天激动激情地说出的好话，我一句都不记得了，只记着他那句“咋叫咱把事弄成了”的话。我后来调侃说，我读过李星不少精辟的小说评论，却记不住一个完整的句子，倒是这句非文学评论语言的话，铸成了永久性记忆。我后来和他开玩笑，有了你这句非评论语言的评价，我不用跳楼了。

我回到原下的屋院，心情大为改观，被李星提及的人物和情节，竟然不断地浮现出来，这些被我反复斟酌再诉诸文字叙述以后的情节和细节，早已失去了新鲜感，更不会惊奇了，甚至麻木了，现在，以一种生动鲜活的景象重新演绎出来，让我享受着一种被人赞赏之后的自我欣赏的愉悦。我的自信开始恢复。尽管尚不知晓高、洪的阅审意见，尽管明白他们两人的意见才是决定《白》的命运的关键，却毕竟从那种最不堪的心态里转换过来。再说，按我既有的常识性估计，高、洪的阅审意见不仅不会轻易表示，而且需得一段较长的时间；决定出不出某一本书，要经过三审通过，才会有一个确定性的意见告诉作者。我便等待。有了李星的那句非文学评论语言的话垫底，等待的心境改善得很好。

完全出乎我预料的事发生了。见过李星之后在乡下待了不过十天，我再次返城去背馍的时候，竟然收到了高贤均的信。那天进门后依着往常的习惯随意问妻子，外边寄来的信你在哪儿放着。妻子也随意地说在沙发上。我翻检了一下，有一个下署“人民文学出版社”的信封，不禁一愣，仍不敢相信是高或洪的来信，从他们到西安拿走

《白》的书稿到这天不过二十天，在我想来看稿也未必看得完。我拆开信先看最后的署名，是高贤均，这一瞬间感到头皮都绷紧了。待我匆匆读完信，早已按捺不住，从沙发上跃起来，“噢哟”大叫一声，又跌趴在沙发上。妻子从厨房跑过来急问出了什么事，我缓了半晌才告知这件喜讯。待我稍得平静，又忍不住细读这封信。高贤均在信里说，他和洪清波从西安坐上火车便开始读《白》稿，一开读便放不下手，两人轮流着读；到成都，利用会议的间隙时间接着读，待成都会议开完，两人都读完了；回到北京，由他综合两人的共同意见给我写信告知。自然，让我震惊到跃起又吼喊的关键，是他对《白》的概括性评价。他的评价之好之高是我连想也不敢想的事。我说这句话不是做谦逊姿态更不是矫情，确凿是当时的真实心态。且不说自交稿之后发生的那种习惯性自我否定的反常情绪，即使在为着给自己死时能有一本垫棺作枕的书潜心静气写作的四年时间里，也不曾想到这本书会获得编辑如此高的评价。为着“枕头”的写作是完全指向自己的，是自初中二年级喜欢文学创作而终生都不能舍弃的一种人生兴趣；喜欢了大半生文学创作，如果到死时没有一本可以垫棺作枕的书，我不敢想象离开这个世界时会是几重悲哀；自然，如果自己可以垫着枕着平心静气地告别人世，那么这本书理应不会太差，会有一定的个性化特质的内容和叙述方式。然而，我没有想到会有高贤均如此又高又好的评价，不单是受宠若惊，而且切近地感知到独处原下祖居屋院近十年的选择是适宜于我的。由李星颇为激烈的反应和高、洪甚高的评价，让我直接感知到被理解也被认可的踏实和欣慰，自然想到所有的用心和努力都是合理的。我在平静下来之后对妻子说，可以不去养鸡了。

我还是背着妻子为我准备的馍和面条等吃食回到乡下。不久就收到何启治的信，他也读过《白》稿了，自是让我欣慰的评说，却不再有看高贤均来信时的紧张和失态般的癫狂了。我能想到他读《白》稿

的特殊心理，二十年前他到西安组稿找到我，在西安南郊的小寨街头，鼓励我把平生发表的第一个短篇小说扩写为长篇小说，把我吓住了。此后许多年里，他仍不断提醒我给他写长篇小说，我和他达成君子协议，如果我今生能写成长篇小说，肯定先送他过目。现在，他看过《白》稿了，不仅说了很多好话，而且给我说了处理稿子的程序和进度。我在原下的院子里散步，或在小书屋里喝茶，以及到春草勃发的原坡上和灞河长堤上游走，往往忍不住感慨我和何启治的交情，二十年了，这个职业编辑一直等待我的长篇小说。人生的有效年龄里，能数得几个二十年啊。我终于把《白》交给他手上，他做这部小说的责任编辑，每想至此，我便感动着一种人格一种真挚的友情是无法斗量的，且不说作为编辑的事业心等话。此后每隔一段时间，他便有信来，告知我《白》稿的处理情况。我完全依托于他，由他根据实际情况处理。我相信他和我一样珍惜这部小说，有损人物不能删节的文字和细节，他比我更坚持。

这无疑是我五十年生命历程中最好的一个春天。我是说我的心情。灞河边上被古人的送别诗吟诵得很美的柳色，原坡上返青的麦苗和田坎塄坡上的荆棘野草，每年也都如此而少有令人惊异的差别。即使天象变化，无非是雨多了雨少了寒流频繁或少来了，我已司空见惯。然而，今年的春天在我是前所未有过的美好，也是前所未见的敏感。我于天色透亮时起床，匆匆喝一杯水，便走到原坡的一处高塄上，看太阳从秦岭山峰上冒出来，把鲜嫩的光泽撒满河川和原坡，刚刚成形的野草的绿叶上的露珠闪闪发光。傍晚又下到灞河川道，看落日之前和之后久久不散的霞光；我常常蹲在村民栽着红苕秧苗的沙地里，为那一株株刚刚冒出的嫩叶而心颤，便想到秋后地下会有一嘟噜紫红的红苕被刨出来。

我依旧应邀为办红事白事和建造新房的村民乡党当账房先生，这些差事在这小村子里未必每月都能遇上一回；依旧在不能下地的雨天和夜晚，和那几位相对稳定的棋友下象棋；这种调节和休息毕竟费时不多，更多的时间是在自己小书屋里阅读。这是我预料不到的一次阅读，竟然对几十年不断阅读着的小说（包括名著），在写完《白》稿之后顿然失去了兴趣，竟然想读中国古典诗词了。尽管未能接受高等文科教育，深知国学基础浅而又薄，然几十年来仍然兴趣专注于现当代文学和翻译文学作品的阅读，从来也舍不得把业余有限的时间花费到国产古典辞章的阅读中去。这回突然发生的阅读中国古典诗词的兴趣，也并非要弥补国学基础的先天性不足，再说年届五十记性很差为时已晚了，可以说是没有任何功利目的纯粹欣赏的兴趣。我后来想过，这种欣赏兴趣的发生，在于古典诗词的万千气象里的诗性意境，大约是我刚刚完成小说写作的长途跋涉之后所最渴望沉湎其中的。然而，在《白》的阅审尚未确定的悬心状态里，又很难潜心静气地进入其中，以至用高声朗诵的措施来排解对《白》可能发生的不堪的结局的焦虑。现在，有了高贤均和何启治的肯定，也有李星的别具个性的语言的肯定，我便完全松弛下来了，进入一种最欣慰也最踏实的美好状态，欣赏古典诗家词人创造的绝佳意境就成为绝好的精神享受了。

这是五十年生命历程中空前亦绝后的一段美好时月。往昔里写着中短篇小说的时候，且不说那些在编辑读后反馈的平平的意见，即使甚好的评说，过不久也就淡化了，被新的写作兴趣和追求替代了。这回关于《白》的阅读意见所带给我的这种踏实和欣慰的心理感觉，是前所未有的，也是出版以后再也没能恢复的一种绝好的心境。我这时候才确信为自己死时垫棺作枕的一本书写成了。我向来不表白清高，也基本没有宣示过轻名淡利，在我理解，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写作这种特殊的社会职业，本身就不可避免地附着名和利，几乎是如影随

形。问题在于以什么途径获取名也获得利，那些世界名著的作者早已谢世，书却流传着，不同民族不同语言的读者被其作品吸引，自然也记住了作者的名字；书籍发行量大，获得的稿酬版费自然不少，可谓名利双收是拒绝也抵挡不了的事。问题恰恰在于，作品不能赢得读者，名难得扬起来，利也得不到，说轻淡名利的话原来没有用处和必要。这个时期的文坛重提这个话题，其语境大约因为商品经济刚刚在中国潮起，波及并影响到文坛，开始出现某些为数不大却较为刺眼的炒作现象，文学圈里多所议论，便有强调轻淡名利的正面言说。我在和文坛相对间距的乡下，也约略听到看到一些炒作现象，却没有愤世嫉俗，而是相信靠炒作红起来的作品是难以持久的，依据是古今中外的优秀作品，无一不是依赖自己独有的魅力获得长久的生命力的。我甚至觉得，炒作的结果反倒可能造成炒作者的自我损害，因为炒作行为本身就标示着缺失了探索的勇气和自信，企图以轻松简单的途径获得荣誉，而炒作恰恰耽误了探索的时间，浪费了年华。基于这样的对文学写作的理解，我在原下小院津津有味地读着古典诗词，不觉进入夏季，炎热到我在平房小书屋里难以忍耐，便把一张竹椅挪到舍弃已久的祖传上房里。这幢不知住过多少代祖宗的木头房子，隔着一层木制楼板，有了隔断，尽管破烂不堪，却仍有隔热作用，比较凉快，我便能够继续吟诵李白、杜甫、苏东坡和陆游等的诗词，兴致不减。读着读着，竟然也想试一试了，虽然粗浅幼稚，多少可以感知到当年的心态情绪。不妨抄录一九九二年夏天填的一首词《小重山·创作感怀》，这是我平生填写的第一首词——

春来寒去复重重。掼下秃笔时，桃正红。独自掩卷默无声。却想哭，鼻涩泪不涌。 单是图利名？怎堪这四载，煎熬情。注目南原觅白鹿。绿无涯，似闻呦呦鸣。

还有这年夏天写的一首《青玉案·滋水》——

涌出石门归无路，反向西，倒着流。杨柳列岸风香透。鹿原峙左，骊山踞右，夹得一线瘦。 倒着走便倒着走，独开水道也风流。自古青山遮不住。过了灞桥，昂然掉头，东去一拂袖。

这两首词都是一九九二年夏天填写的，具体时间已经无记。前一首很直白，无须注释。后一首的滋水，是河流原来的名字，秦孝公为宣示霸气，将其改为霸河，后人给添加了三点水偏旁，成为灞河。这滋水这灞河涌出秦岭山中，受山地制约，朝西流出山来，南边有白鹿原，北边是骊山南麓，这条河便夹在其中的小川道里往西流去，一条很标准的倒流河。一直流过千古离别送行的灞桥，水里溅落着依依不舍的泪珠，也翻卷着无以数计的诗词吟诵，在摆脱了山和原的挤夹进入开阔的渭河平原，便有一个大转弯，投入渭河。我截止到写成《白》的五十岁，生活的范围都在这条倒流河的水边，我调离公社时刚刚完成了这条河的防洪大堤。我已记不得这首词写作的具体情景，不外乎这样几种可能，许是傍晚落日的晚霞里在河堤上散心，或在水中洗涮黏汗，一时兴起，有了写作的冲动；也许是朝霞初露时在原坡上欣赏日出的壮景，看到自东向西一路蜿蜒过来的披着霞光的河水，便有了某种想要抒发的欲望，然后回到小院的小书屋或老木房里，歌颂这条世界上离我最近的河流。我以往的小说包括尚未面世的《白》，其中的风景描写多有涉及这条河的文字，却几乎全是这篇或那篇小说人物在这条河边发生的人生故事。现在，我直接面对这条河了，这条我平生触摸的第一条河，也是平生都不曾离开的一条河，似乎此时突然意识到这条河从我心里淌过，我的血液时时都受到河水波浪的拍击，与河水融合了。我填写成了这首《青玉案·滋水》，已经是物我相融相寄了。虽自知文字直白，却也直抒胸臆；不为示人，只是

一时兴起；也未必太多自尝，倒是留下刚刚写完《白》稿且得到难得的肯定和评说之后的真实情状。平生不敢吹牛，更不习惯炒作，填一首拙词，泄一下窝聚胸间多年的创造欲望之气，于心理乃至生理都是一种释放的需要，词的韵律和平仄都顾不及了。

我后来意识到这一年——一九九二年，是我人生历程中最自在的一年。前文已涉及过我曾两次舍弃工作调动和行政晋级的机遇，而且坚决到毫不犹豫，无非是受着一根对文字敏感的神经的生理制约，也是专注到文学创作的兴趣已经无法改易的心理制约，直到发展为一个具象的“枕头”。这个“枕头”说来单纯到再不能单纯了，在我却时时感受到它的沉重的分量，从幼年的文学兴趣到中年的创作理想，已经凝聚为唯一的生命追求的实现了；这个“枕头”，能够让我以欣慰的心情枕着离开这个世界，不应是一个随意打制的东西。现在，有了高、洪、李的已经超过我期待的评说，我很快便从惊喜里沉静下来，以前所未有的轻松里的恬静心态，再看这道原和这条河的时候，完全是一种融入的感觉，原上的一撮土一把草，河里的一掬水，此外似乎再没有什么更大的欲望了。我一个人住在原下祖居的屋院，早晨在小书屋里读苏轼读陆游也读李白杜甫；到午时热得受不住时便转移到上房旧屋，房顶掉瓦的小洞射进蓝莹莹的阳光，还在咀嚼那些诗词里绝妙到令我不可思议的用词；晚上似乎更适宜我的心情，把竹椅挪到院子里，喝着茶，回味那些白天尚未记牢的诗句，月亮正悬浮在眼前的原顶上。我向来不说佛，也不问道，我的此刻的宁静自然不是从佛家道家修行达到的，而是做成了最想做的事之后获得的。

就在我游走在原坡和河川吟诵古典诗词的这段时月里，市内文学圈里纷纷议论着《白》，那时候没有电话等传话工具，我是丝毫也不得而知。直到有一天返城取干粮，一位我敬重的评论家托人捎话给

我，急于要看《白》稿。《白》的那份复印稿我是交李星手的，他读过之后又交给一位朋友读，然后就传读下去。到我这时再问李星，他也弄不清《白》稿在谁手里。几经追问，在西北大学中文系主任刘建军家里。刘建军是我很敬重的评论家，出版过柳青的《创业史》的研究专著，也写过我的短篇小说《信任》的评论，能听到他对《白》的评说无疑是难得的。我找到刘老师家的时候，他让我看到生动的一幕，他的书房里摊开着《白》的书稿，卫生间里摊开着一部分书稿，卧室里也散放着几章。他说看似很乱的摆放着书稿，其实是家庭各位成员各读各的书稿部分。一家人都喜欢读，我的心里很受鼓舞，且不说刘老师的评说。我向他说了把书稿交给捎话要书稿的人，又回乡下来了。还有一件记忆不忘的事，后来我收到陕西师范大学当代文学评论家畅广元教授的一封信，谈了他读《白》的复印稿的印象。这位教授畅老师也是熟人，往时接触却不密切，他是"笔耕"文学评论组里的主笔之一，出语不俗而有分量，人刚到中年已经脱光了头发，颇给我某种威严的印象。"笔耕"文学评论组的几位主笔，对陕西新时期冒出的几位青年作家一直关注其创作发展动向，却不知是有意分工或是各有偏爱，又都有各自研究的作家对象，关注并指点我的创作的是西北大学中文系的蒙万夫教授，写有专论。蒙老师不幸中年早逝，西安文理学院的王仲生教授又偏向于对我写作的关注。以往和畅老师接触不多，他的信里对《白》的概括性评说给我鼓舞，能入得他的法眼，给我再添一份踏实。我记着他在信的末尾谈到一条很具体的意见，即红卫兵挖开朱先生的墓时发现的那块砖头，他说写到辨出一面刻着"天作孽犹可违"，另一面刻着"人作孽不可活"的细节就恰到好处，含蓄不露，符合朱先生的个性。我在后边还写了一个细节，红卫兵生气地把这块砖摔到地上，裂开，里面还发现一行字："折腾到何日为止。"畅老师说这个细节是多余一笔，不仅不合朱先生的个性，太过直白，也太过神奇了。我接受这个看法，却没有及时删节，隐隐着别一种用

心，即让神秘而睿智的朱先生对身后几十年的民族灾难“文革”，痛斥一声，一时竟顾不及人物个性和直白弊病了。直到五年后的一九九七年冬天，茅盾文学奖评奖负责人传达两条修改意见，都是朱先生的两句话，却没有这一句。我同意做可能的修改时，经认真斟酌，把这句狗尾续貂的话删去了，这是我的选择，源自畅老师五年前那封信的意见。后来又有朋友说这句话不当删，对“文革”这样的灾难，让朱先生痛斥一句是很解馋的……我却还是偏重于人物性格的合理和完整。好在修改和未修改的版本都在出版发行，读者按自己的兴趣选择，不碍。

这一年的八月，好久不写散文了，又触景生情写下《又见鹭鸶》。自小在灞河水边见多不奇的鹭鸶鸟儿消失多年，这一年的春天在河边有草丛的浅水里，又发现了这白色精灵优雅的姿容，我从春天一直看到夏天，唯恐它另择他乡离开灞河。也许是“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吟诵得沉醉，便把“在水一方”的“所谓伊人”铺陈于文字。这应是我前所未有的颇多闲情逸兴味儿的散文，由此也引发了后来散文写作的持续不减的兴趣。这样恬静的情绪一直持续着。大约到了秋天，收到何启治有确切安排意见的一封信，已确定《白》在《当代》年末最后一期和一九九三年第一期各发表一半，单行本出书要等到来年了。从三月交稿到年末在《当代》发表，再到第二年出书，在今天看来似乎拖得太久了，然而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还在原来的计划经济运作习惯里，算是正常的出书速度，我也没有早点出书的要求，单是有了这个很确定的发表和出书的安排意见，已经很有盼头了。我在原坡和河川散步，看草木的叶子的颜色日见加深，再变黄，直到树叶纷纷飘落，冬天在一场西北风的侵袭过程里，来到了。

算计着《当代》杂志出版的时间，我找到《陕西日报》既当编辑又兼创作的朋友田长山，请他在报纸写一则书讯，把《白》在《当代》即将发表的讯息，告知那些关注这部小说的朋友和读者。在长山的卧室兼书房里，我简单地说明了来意和关于这部小说在《当代》即将发表的情况。长山很快拟出一篇草样。我看了后很坦率地说了意见，不要一句溢美之词，因为这些好话在未被读者的阅读印证之前，应该说是强加；索性不提内容介绍，因为很难概括，只说这部小说写的是一九四九年以前的乡村故事就行了；不必太强调作者耗时六年的事，也是取决于读者对小说的兴趣，如果读者读不出兴趣，耗时十年也无用，创作时间的短长不是作品的决定因素。田长山是我的老朋友，曾经合作写过一篇报告文学，且获得了全国奖，没有任何可计较的心理障碍。他半笑半梗地盯住我说，这不准说那不能写，倒叫我写啥呀……最后形成百字左右的一则书讯，竟然让两个作家兄弟耗去一个多小时的斟酌。这是《白》书发表和出版前唯一一篇宣传文字。在我来说，这不单是个人处事的性格因素，更多的是对写作的理解。对一部小说的评判，既要文学评论家的审判，更有文学圈外无以数计的读者的阅读判断，这两个方面常常脱节，也有完全一致的先例，印象深的是新时期的《人生》。尽管已有高、洪、李以及后来几位传阅复印稿的刘、畅等评论家的评说，我仍不敢确定发表和出版之后，文学圈外的社会层面的读者会有怎样的阅读反映。如果读者反映冷淡，且不说反感，那些宣传里的溢美之词，无疑就成为对我的反讽。我怕这种结果。

刊有《白》书前半部的《当代》出版发行了，我从乡下赶到城里，找到离我最近的一家邮局购买，已经售完。我又赶到西安市最大的钟楼邮局大楼的时候，也已告罄，售货女孩随意地对我说，这期《当代》发表了咱陕西一个叫陈什么的作家的长篇《白鹿原》，我这

儿五十本《当代》两天就卖完了，还不断有人来问，你来得太迟了。她还告诉我，更保险的办法是预购登记，可以保证买到明年第一期，并拿出那个登记本，我看到一串陌生的名字，没有一个我认识的人。我没有登记，主要是想到会露出她刚才说的“陈什么的作家”的那个“什么”的答案。尽管没有买到刊物，心里踊跃着的鼓舞，足以安慰遗憾，那么多我不认识的文学圈外的读者争购《当代》，我感受到一种鼓舞，便回到乡下，读古诗词更有情趣了。我对普通读者的关注，几乎是一种深层心理的敏感。致成这种敏感的因由有两件事，一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头上，我发表了一批短篇小说，也获过全国奖和地方刊物奖，父亲要看我的小说，看过却不冷不热地说，还是《三国》《水浒》好看。我有一种无以出口的挫败感。再一次是《人生》发表后，我骑自行车回家的路上碰见一位初中同学，他挡住我直言坦诚地说，他听广播听到《人生》，太好了，你怎么弄不出《人生》这样的作品？他也曾经是一位文学写作爱好者。我的挫伤可想而知。许是这两件不经意发生的小事，便铸成了我尤其看重普通读者反映的心理刻记，如我的父亲和我的同学如果有一天会说一声好，也许不亚于评论家的好评。

《白》的出版是一九九三年六月，真正上市已到七八月份了。我应邀到书店为读者签名售书。早晨八时，我赶到书店门口的时候，看到了排着看不到尾的长队，竟然有点不知所措，便坐下开始签名，几乎不容抬头，签到十二时许，简单吃了午饭，继续签名，直到太阳西沉。形成这种热销的场面，得助于两家广播电台的小说连播。《白》在《当代》发表后，西安广播电台便选中连播，于一九九三年四月中旬开播。稍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也开始连播《白》，在一天的不同时段，两家电台都在播出。有这么多人排队购买《白》，无疑是两家广播电台播出的直接效果。我很清楚，除了《陕西日报》刊登的百字

左右的书讯，此间再没有任何对《白》的宣传文字。《当代》杂志的订购和零售册数毕竟有限，能招惹这么多普通读者来争购，我能想到的唯一原因，便是两家广播电台长篇小说连播的效应。此刻，我有自信面对那位恨铁不成钢的初中同学了。只是无法判断，如若父亲还活着，看到《白》会怎么说，他的参照样本太令我畏怯了。

说一回多余的话

——我写《白鹿原》创作手记

在我业已出版的六十余种小说、散文选本和文集中，只有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出版第一本书——短篇小说集《乡村》时，我写过一篇不足千字的后记，留下我当时欣喜而又鼓舞却还属按捺得住的情状。后来还给少量几种小说和散文集子写过后记或自序，却不是我的自愿，是责任编辑带有强迫性的要求，在于这几种书属于出版社各种选题的丛书，规定凡入选这套丛书的作者都必须写自序或后记，我不能搞特殊化的例外，便写，以维护丛书体例的统一性。后来找到一种省事的途径，把某一篇短文做自序，后面附加一个“代”字，虽然有点勉强，得了该书责任编辑的宽容，也就了事。

不是我偷懒，也不是我摆什么架子，而是出于我对写作的可能属于偏颇的理解，作家是用作品和读者实现交流的，作家把自己对现实或历史生活的体验诉诸文字，形成独立体验的小说或散文，发表出来，在各种职业各种兴趣的读者那里发生交流，如能获得较大层面读者的呼应，无疑验证了作者那种体验和表述那种体验的艺术形式的可靠性和可行性，作家的写作用心和探索也就实现了。如果自信作品基本展示了自己的体验，就没有必要作那种多为解释作品的后记，这不仅是相信不相信读者审美能力的事，也是作家自己面对读者自信不自信的事，相信读者会理解作家的体验，也会接受确实较为完美的表述艺术；反过一个角度，如若作品表述的体验得不到读者的呼应，表述的形式又难以为读者所欣赏，那么，后记做怎样的解释都是难以弥补的。我的这种理解可能属于一种偏见，却几十年难以改变，甚至形成

一种意识深处的障碍，一当某种丛书统一要求写自序或后记，便有多此一举的逆反。

《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写作手记》编成，我却自己反了自己的常态，想要写一篇后记，着意不全在解释这本小册子，倒是想说明这本小册子的成因。

二〇〇四年冬天，上海文艺出版社和陕西作协联合在西安召开文兰的长篇小说《命运峡谷》研讨会，责任编辑修晓林和出版社副总编魏心宏都赶到西安来了。两位都是老朋友，相见自然高兴。尤其是魏心宏，已有二十多年的交情，我的第一部中篇小说《康家小院》，甚得他的赏识，在他编辑的《小说界》推出，并获该刊奖，给我刚刚开始的中篇小说创作探索以莫大的鼓舞。这回在西安刚一见面握罢手，魏心宏直言不讳地对我说，他来西安首先是参加《命运峡谷》研讨会，第二件事就是要约我写自传。他的热情和真诚让我一时哑口。稍做缓解后，我也真诚地告诉他，我还没有写作自传的打算。我又给他解释，自《白鹿原》出版十余年来，先后有五六家出版社约我写自传，我都谢绝了，现在还没有改变。这样给他解释的同时，心理却隐隐着一缕亏欠。我随后便有了弥补这种亏欠的一个动议，试写《白鹿原》的写作手记，着重点在写作生活本身，而不在作者的自传。他欣然应允，说好。

待魏心宏回沪，我也很快冷静下来，便又有点后悔，陷入一种游移不定的矛盾心态。其实，关于《白》的写作手记这个选题，也不是我突然想到的，是不止一家杂志的编辑给我出的题目，我都谢辞未写。我之所以不写这种创作手记，因由类似于不写自序或后记，作家某一时段发生的某种自以为新鲜而又独特的体验，形成作品并公之于世，这就应该完成了一次创作过程，相信读者会理解作家的体验，也

会感知隐藏在文字里的内韵和隐秘，就没有多少必要再说文本或文本之外的话了。基于这种理解，十余年来，除了与记者和编辑的采访对话，我没有写过关于《白》的文字。和魏心宏约定之后，很快陷入写好还是不写好的矛盾心态，竟然一拖就过了两年。魏心宏没有催稿，我也基本偏向且确定还是不写为好，只是心里还隐隐着食言失约的亏欠。不料到二〇〇七年春天，《江南》杂志张晓红电话约稿，让我写一些有关《白》书写作前后的有趣的事儿。我稍做斟酌之后便答应试一试。我基本爽快答应试写，主要的因由还不完全是她说的“读者对此话题很感兴趣”，而是把隐存在心里的对魏心宏的亏欠又搅起来了。我瞬即反应出纯属个人的小打算，试写一篇有关《白》书写作的有趣的事儿，通过《江南》杂志公之于世，看看读者有何反应，然后再确定要不要接着写下去。如若读者不感兴趣，甚至有负面反应，那自然就该到此为止，亏欠魏心宏的食言失约，也无法弥补了。我很快拟定了四个话题：《意料不及的写作欲念》《卡彭铁尔的到来，和田小娥的跃现》《枕头，垫棺作枕》《沉静与松弛》。写下近两万字，送给张晓红阅审，不久，便在《江南》刊发出来。

我甚为关注读者对这组文章的反映意见，这决定着《白》的创作手记还有没有必要继续写下去。张晓红那边收集读者反应需得一个过程，倒是和我隔墙办公的《小说评论》年轻主编李国平有反应了，他说的好话不必说了，他决定在《小说评论》分两期连载，并要我继续写下去，继续连载。之后得到张晓红反馈的读者反映，还算鼓舞人，我这时才铁下心来，把这种《创作手记》写下去，写成一本小册子，以十万字为限。

这样，从二〇〇七年五月写成第一篇，到今年六月初写完最后一个话题，历时整整两年。因为《小说评论》连载，只要赶得上刊物发

稿时限，两月写一篇就不会误事（双月刊），写起来就比较松散，几乎没有压迫感。整个写作过程是愉快的，因为所写话题，不仅是自己的亲身经历，写起来竟有一种重新温故的新鲜；再则经过十余年的沉淀和淘汰，芜杂的东西消逝了，能够留下而不能遗忘的事，无疑是当年思考最激烈包括刺激最强烈的人和事；时间在无意识里助我完成了一次梳理，我选择了十余个话题，如实说来。直到今年春天写成第十五个话题：《生命历程里的一个下午》。我便作罢，这一篇写到完成写作《白》的情景。在我想来，《白》的写作完成了，《创作手记》无疑也就应该结束了。字数尚不足十万字，和我预计的小册子的字数相当。我把此事说给李国平。他甚为热情地鼓励我再写，应该还有可以言说的话题。我当面不敢应诺，过后斟酌，似乎应该把交出《白》的书稿到公开面世这一年多的感受再写一篇，因为这个过程里，作为作者我的心理起伏变化太富刺激了。再说，书未正式面世之前，还勉强可以归入《创作手记》。于是写成第十六个话题：《读诗诵词，前所未有的闲情逸兴》。一直做这个连载文本的责编的《小说评论》副主编邢小利建议我，应该把小说《白》出版后的反应再写一写，尤其是“茅盾文学奖”评奖过程中的波折，很值得写一下，因为我是当事人，说明曾经发生的事实真相，给读者一个确凿可靠的真实事相，也可以澄清一些流言。我斟酌之后，还是决定到此为止，唯一的因由，是这本小册子的体例的制约，既是《白》的创作手记，写作完成了，写作手记也就应该结束了。《白》出版后的诸多反应，以及“茅盾文学奖”评选过程中的波折，已经不属于写作本身的事了。

关于这本小册子所写的内容，我不做任何阐释，任由读者去阅览，去理解。唯其一点需要说明，从开始写第一篇直到写完最后一篇，我都在意识里亮着一盏红灯，既不能阐释创作理念，更不能解释人物。然而常常发生某些话题写作中难以避免的牵扯，我便努力回

避，尽可能不越雷池。只有一次是有意的触犯，便是写《朱先生和他的“鳌子说”》的时候，我写了从生活原型牛兆濂到《白鹿原》里朱先生的异同，很难避免作者解释人物之嫌，便在文中索性说明了这一点。尽管如此，我仍把握一点，只解释朱先生这个人物曾惹起的一些不同意见，包括被误读的几句话，尤其是牵涉政治色彩的话，我不得不做解释。除此之外，关于朱先生这个人物的整体形象和个性，我仍然不做解释。

这本小册子的内容在《小说评论》连载的两年时间里，我也听到不少好话，无疑给我增添了继续写下去的兴致和劲头，恕不列举，以免自吹之嫌。倒是一位年轻批评家的话值得记取，他给我的手机发来短信，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立即停止《白》创作手记的写作，作家说了评论家就没法儿说了。这个简短的短信，直捣我最软弱的神经，证实了我的担心和忌讳，就是作家不必解释自己的作品，前述我曾在和魏心宏约定之后矛盾迟疑了整整两年不能动笔。我的忌讳，现在被这位“忍无可忍”的年轻评论家的直言证实了。我自然相信他无恶意，因为我和他原本完全一致，只是我后来在“亏欠”心理的不自在情况下，改变主意写起这组写作手记来。现在，事已至此，小册子预定要写的内容也只剩下最后一少部分，只能继续写下去，算是了结一件小小的工程。这位年轻评论家曾写过《白》书的评论文章，电话里通过话，却未能遇得谋面机缘，他的坦率令我敬重，当即回话给他，表示完全赞同他的意见，却难得把剩下的小小尾巴舍弃不写。

这本小册子取名《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是决定要写这种创作手记之初便确定下来的。“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这句话，是海明威说的。此前几年，在读一篇论说海明威创作的文章里，我看到评论家（记不得姓名）引用的海明威谈自己创作的这句话，不觉眼前一亮心

里一震，如同淘得一粒金子，竟然一遍成记。我读到过许多作家谈创作的文章，也有不少警句类的语录，启示和受益匪浅。然而读到海明威的这句话时，我的第一反应是，把作家创作这种颇多神秘色彩的劳动，让海明威一句话说透了。这句话很准确，要准确就不容许夸张；这句话又很形象，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如同勘探者寻矿源；这句话尤其着重在“属于自己”这个划界，可以说把作家的个性化追求一语道破了。任谁都一目了然，海明威所说的“句子”，不是通常意义上的白描或叙述的语言句子，“句子”在此不过是一个形象比拟。海明威说的“句子”，是作家对历史和现实事象的独特体验，既是独自发现的体验，又是可以沟通普遍心灵的共性体验，然而只有作家独自体验到了；他说的“句子”，自然也包括艺术体验，以一种独特的最适宜表述那种生命体验的语言完成叙述。作家倾其一生的创作探索，其实说白了，就是海明威这句话所做的准确而又形象化的概括——“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那个“句子”只能“属于自己”，寻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句子”，作家的独立的个性就彰显出来了，作品的独立风景就呈现在艺术殿堂里。

我也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我从初中二年级的作文课上写下第一篇小说，实际上就开始了寻找，只是无意识里的盲目，却是从模仿赵树理的语言开始的。许多年后，当我在经过短篇小说中篇小说的探索，进入到长篇《白》的创作时，企图要“寻找”到真正“属于自己的句子”的欲望是前所未有的。然而，欲望不决定结果。我在这本小册子里只是写到寻找过程里的一些零碎的事，却不标明我真正寻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最好的句子。

我还将继续“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

2009年7月10日 二府庄

对话

关于真实及其他

——和《文汇报》缪克构对话

关于艺术追求

——“至关重要的一项就是真实”

《文汇报》：我最近重读了你的《白鹿原》，同时也比照读了一些当代作家史诗性、家族史写作的长篇小说。我有一个强烈的感觉，同样是描述自己没有亲历的时代，你的小说却一点也没有给人“隔”的感觉，很真实、很细腻，仿佛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讲述自己过去的故事。你是如何做到不“隔”的?

陈忠实：真实是我自写作以来从未偏离更未动摇过的艺术追求。在我的意识里愈来愈明晰的一点是，无论崇尚何种“主义”采取何种写作方法，艺术效果至关重要的一项就是真实。道理无须阐释，只有真实的效果才能建立读者的基本信任。我作为一个读者的阅读经验是，能够吸引我读下去的首要一条就是真实；读来产生不了真实感觉的文字，我只好推开读本。

我在追求真实的艺术效果的途径上几经坎坷，由表及里、由浅入深，是一个较为漫长的探求过程。及至《白鹿原》创作，我领悟到对人物的刻画应由性格进入心理脉象的把握，即人物的文化心理结构。

人物的思想崇拜、价值取向和道德观念等因素，架构成一个人独有的心理结构形态，决定着这个人在他生活的环境里的行为取向，是这个人物性格的内核，是这个人物区别于另一种人物的最本质的东西。这种独有的心理结构被冲击、被威胁乃至被颠覆时，巨大的痛苦就不可避免；及至达到新的平衡，这个人的性格就呈现出独特而新鲜的一面。我把它称为把握人物的“心理脉象”，关键是要把脉准确。我在《白》书中探试了一回，几乎没有做人物的肖像描写。

《文汇报》：“创作来源于生活”，这是一个老话题。也有作家表示，“生活无处不在”，因此，生活不应该成为创作的一个问题。你怎样看待生活和创作的关系?

陈忠实：“创作来源于生活”这话是对的，“生活无处不在”这话也对。前一句是一句老话，是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来自我喜欢上文学就知道的宗旨性的写作命题，出处大约是上世纪四十年代初毛泽东在《讲话》里提出的。一般理解，这里所强调的生活是指“工农兵”的生活。放到今天来讲，应是整个社会生活，包括已经逝去的历史和正在行进着的现实生活，重点在于要作家走出自己的家庭和书斋，到社会的各个层面去体验去感受。这是无可置疑的事，不仅中国作家，世界上诸多名著的创作者也都得益于他们亲身经历的生活的丰富性。后一句大约是针对过去单指“深入工农兵”生活而言的。从字面到内涵，这话也无可指责，凡有人群的地方就构成了人类生活的各种场景和各个不同的角落，大到一个城市，小到一个二人组成的家庭。

在我理解，作家进入社会不同的场合和角落，体验和感受是截然相异的。肖洛霍夫年轻时在顿河亲身参与了战争，写出史诗《静静的顿河》，后来参与了苏联乡村集体农庄化的过程，又写出了《被开垦的处女地》，老年又写出了深刻的生命体验的《一个人的遭遇》。我

是属于那种关注社会生活进程、也敏感其进程中异变的作家，并赖以进行写作。我不轻看、更不排斥那些在较小的生活范围里体验着的作家，相信会有独到体验的作品产生。

无论面对历史或现实生活，无论进入纷繁的社会生活或游走于小小的家园世界，至关重要的是作家体验到了什么，深与浅的质量，才是影响与读者交流的关键。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

《文汇报》：你说过，还有一个不可忽视的是表述形式的完美程度。你认为的“表述形式的完美”是怎样的一个标准?

陈忠实：关于“表述形式”，主要是指呈现在读者面前的文字。我力求把人物亦步亦趋的心理脉象，首先能准确地展示出来。第一是准确，第二还是准确。先有把握的准确很重要，而后来文字表述的准确才算实现。文字色彩的选择和夸张尺码的分寸，都以准确来推敲、来确定。

还有文字的叙述或描写的选择。我的小说写作过程，是由白描语言过渡到叙述语言的。《白》是一种自觉追求的叙述。尽管是我在叙述，却是我进入每一个人物的叙述。作家自己的叙述和进入人物的叙述，艺术效果是大相径庭的。我写作的直接体会是，真正进入了人物的叙述，是容不得作家任何一句随意性的废话的，人物拒绝和排斥作家文字的任性，包括啰唆。

另外，形象化的叙述语言不仅有味儿，且节俭篇幅。

关于创作力

——“千万不要因为急于出手仓促成篇”

《文汇报》：你说过，在创作活动中，慢工能出好活儿，也会出平庸活儿；快工出粗活儿，也出过不少绝活儿。这在中外文学史上不乏先例。

《白鹿原》这部长篇从一九八六年起开始构思和准备史料，自一九八八年四月动笔，到一九九二年三月定稿，历经四年写作修改才告完成，可谓慢工出绝活儿。我同时注意到，在完成《白鹿原》之后的十余年时间里，你主要进行的是短篇小说和散文的写作，你觉得是在出慢工，还是在出快工？你会给期待的读者怎样的好活儿、绝活儿？毕竟，在出了《白鹿原》这样的皇皇大作品之后，短篇小说和散文很容易被湮没和遗忘。

陈忠实：写作速度的快或慢，不是一部作品成功与否的关键。关键是作家在这部作品里所要展示的体验的成色和质量。打个不大恰切的比方，一只怀着软蛋乃至空怀的母鸡，在窝里卧多久都没有意义。我只是认定一点，如果确凿预感到自己怀着一颗有质量有成色的大蛋好蛋，千万不要因为急于出手仓促成篇，使已经体验到的独有的成色得不到充分而完美的表述，这种遗憾甚至带有悲剧色彩。因为某些独立独特的生命体验，往往对一个作家是不会重复发生的。

我后来陷入散文写作的浓厚兴趣之中，间以短篇小说。我以兴致和感受写作，甚至不去想能否留下来和被湮没的事。我在二○○一年写的五六千字的短篇小说《日子》，前不久还有读者写信给我，说他读到最后忍不住流泪。作为作者，我不仅欣慰，而且感动。

《文汇报》：在创作《白鹿原》之前，你发誓要写成一部将来可以放在棺材里做枕头的书。《白鹿原》取得了极大的成功，不算译文版和无数的盗版书，正规发行的就有一百余万册，除了获得茅盾文学

奖外，还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唯一的长篇小说，被教育部列入大学生必读文学书目。你现在如何看待自己的这部作品?

陈忠实：我说要为自己写一本垫棺作枕的书，完全是指向自己的。即为着自少年时期就倾向写作且一生都难以合弃的那种神圣的文学梦，为自己写一本在告别这个世界时可以告慰的书。我在即将写完这部小说时，很自然地发生一种自我估计：如能面世，肯定会有一定反响。然而后来在文学界和读者中骤然引起的强烈反响，却是做梦也不曾料想到的。我借此机会向评论界的朋友致意。更多的年轻的评论家关注着这部小说，近年间对这部小说的评论散发在我难以看到的诸多的大学学报上，一位热心的朋友搜集来二〇〇五年和二〇〇六年的评论文章，竟有一百五十篇。人文社近十年来每年都以三万到五万册持续印刷，可以想到读者的兴趣，这是最令我踏实的安慰。

我曾在该书面世后说过，我把对这个民族发展到上世纪前五十年的感知和体验以小说展示出来，能得到文学界和读者的认可，那是我作为一个把文学视为神圣的作家最好的劳动回报。我拯救了自己的灵魂。

《文汇报》：《白鹿原》是否有续集或者姊妹篇？你觉得还会写出超越《白鹿原》的作品吗?

陈忠实：《白鹿原》没有续集，这是在写作之初就确定了的，即按一部独立完整的小说构思的。

我到现在还没有成熟的长篇小说写作计划。我的写作习惯往往是受一种感动而被催发，无论中篇、短篇、长篇小说，抑或一篇散文，

把自己的感动和体验，找到一种恰当的形式表述出来，就有一种很难代替的快乐。

我不会跟自己较劲。这也是出于我对创作这种劳动的个人化理解。譬如爬山，每一座山都有各自的奇景和妙境，都值得探寻。我爬过华山，丝毫不影响我去黄山观光的兴致，甚至在一望无际的科尔沁草原，别有陶醉。我的写作大致可以做此类比。

关于自传或传记

——“我第一辞谢而未做”

《文汇报》：都说生活中你有三个“情人”：足球、雪茄、酒。现在，“她们”是多了还是少了？

陈忠实：我还在看足球。主要看周末中央五套和陕西七套的欧洲几个国家的赛事，尤其喜欢英超。二十多年来，我看着一茬一茬世界足球明星退出绿茵场，又接续着新一茬的足球奇才，颇多人生感慨。我现在基本不看国内俱乐部联赛，不全是水平高低的因由，而是让我有一种说不清的排斥感。我和陕西球迷诚心拥戴的球队，最后却在一种令人隐约感到肮脏的灰雾里消解了，我就不想再进那个曾经挥舞过手臂也狂叫过的球场。我依旧关注中国男女三个级别的国家队的发展，尽管几十年长进不大，仍然寄望奇迹发生。

雪茄照抽依故。最早抽四川生产的“工字牌”，后改抽陕西汉中生产的“巴山雪茄”，有十余年，直到前年这家烟厂转产，又选择了黄山生产的“王冠牌”，较合口味。人们有种种传说，其实在我更清楚不过。在公社（即乡镇）工作的十余年里，接触的人主要是乡村干部和

农民，他们都抽用烟袋锅装的旱烟，多为自己种植，即使在集市上买来也很便宜。我因工资不足四十元，难以抽即使最廉价的烟卷，便自备一把旱烟锅儿和烟包，和农民一样抽起旱烟了。旱烟不仅比烟卷劲儿大，甚至比古巴雪茄更猛烈，我的烟瘾就可想而知了。进城以后，烟锅有诸多不便之处，尤其是无处磕烟灰，我便改抽雪茄了，绝非"风度"之类。

原先喝白酒，且只喝陕西生产的"西凤"。喝到上世纪末，胃有些不适，就改喝啤酒了。每天一瓶，自斟自饮，感觉绝佳。

《文汇报》：你是否会为自己出一部自传或者传记?

陈忠实：《白鹿原》出版十余年来，有多家出版社约我写自传，或让我口述，由人代笔写成纪实传记，我都辞谢而未做。这类自传写作的基本一条是真实，然而要达到真实有诸多障碍。既然如此，不如不说不写。我对某些自我评功摆好以至自吹的自传，阅读的感觉是无言，警示我别做这类蠢活儿。

《文汇报》：回眸过去的创作，你觉得自己最成功的是什么？有什么遗憾?

陈忠实：令我回头想来比较欣慰的事，是在人生的几个重要关头，依据自己的实际做出了相应的选择。一是新时期伊始，我看到了文艺复兴的希望，要求从公社（乡镇）调到时间较为宽裕的文化馆。我那时的感觉是，文学创作可以当作事业来干的时代终于到来了。之后曾有行政上提拔的机遇，我坚决地回避掉了，整个心思和兴趣都投向写作的探索。另一次重要选择，发生在成为专业作家的同时，我决定回归老家，读我想读的书，回嚼我二十年乡村工作的生活积累，写

我探索的中短篇小说，避免了因文坛是是非非而可能浪费时间和心力。我在祖居的乡村住了十年。

如果要说遗憾，我应该一直坚守在原下已修葺得齐整的屋院里，尽管生活有诸多不便，毕竟那里要清纯得多，易于进入创作气场。

关于《白鹿原》的改编

——“惊喜和担心同时发生了”

《文汇报》：北京人艺推出的话剧《白鹿原》在北京演出时，据说几乎场场爆满。濮存昕、郭达、宋丹丹等演员用陕西方言进行对白，依据原生态的地方戏曲、窑洞、黄土高坡营造出来的一幅极为生动的陕西农村风俗画卷，强烈地吸引着观众。《白鹿原》到西安演出，也出现了一票难求的情况。据说你对这部话剧也是情有独钟，你是如何评价话剧《白鹿原》的?

陈忠实：从林兆华导演给我打第一个电话、告知我他要把《白》搬上北京人艺舞台的那一刻起，惊喜和担心就同时发生了。惊喜是不言而喻的，作为一部小说的作者，总是乐意看到作品以别一种艺术形式和读者进行更广泛的交流。况且是在北京人艺这样的舞台上，还有久慕其大名的林兆华导演。担心的是：这部作品时间跨度长，似乎还不是主要麻烦，最难处理的是人物太多，事件太多，话剧受时间和空间限制很严格，舞台将如何处理或者说取舍？此前几年西安一位剧作家改编秦腔剧时，我当面直言不讳地替他操过这份心，他却一副成竹在胸的态度。这回尽管已有了前次的经验，我还是忍不住流露过。林导更是早有这方面的考虑，邀约很有话剧创作成就的编剧孟冰改编剧

本。我便以一种期待心理等待舞台上的白嘉轩们以怎样的姿态向我走来。

这场话剧的首演我看了，最令我欣慰而又感动的是把小说的全貌演绎展现出来了，既没有舍弃任何一个稍微重要的人物，也没有删除任何一个重大的情节，这是高度浓缩了的一场话剧。濮存昕的表演可以用神似来概括，尽管他的陕西关中方言说得还不大准确，尽管他的鼻子比我笔下的白嘉轩的鼻子略低了一点，然而他的气质气性和气韵，托出来一个具体的活的白嘉轩。恕我不一一对人物做出观感，我此前在一篇专文里已经说过了。总体来说，这部话剧把那个时代北方乡村的历史脉动准确地展现出来，自然是以不同精神和心理裂变的人物来体现的。

《文汇报》：每一次改编，都使《白鹿原》这部一九九三年出版、一九九八年获得茅盾文学奖的小说成为一次“热门话题”。《白鹿原》改编为秦腔、话剧获得欢迎后，大家对电影《白鹿原》又充满了期待，也期待了很久。屡屡有报道说即将开机，又屡屡不见动静。此前又有报道说，随着上影集团的加盟，电影《白鹿原》的投资高达五千万元，属于艺术片中的大投资，预计今年四五月份开机，二〇〇八年正式上映，不知消息是否属实?

陈忠实：我所能知道的，往往是从报纸上记者的报道中获得的，无非如你上述这些纷纷纭纭的消息。厂方有自己的安排和处理方案，我不便多问。我把改编权交给电影制作方，自然是相信他们会尽力做好。再说，电影是另外一种艺术形式，于我已是外行，不便过多问询乃至叨扰。

《文汇报》：因为著名编剧芦苇的鼎力推荐，王全安一度成了电影《白鹿原》的筹拍导演，他还用了近两年的时间进行前期筹备。王全安的《图雅的婚事》获得柏林电影节金熊奖，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他明确表示和电影《白鹿原》没太大关系了。他表示《白鹿原》的搁浅，最大的问题是想法上出现了争议，他不能忍受的是《白鹿原》会被毁坏，而不是巧妙地推广。

他认为这是一部伟大的小说，但电影《白鹿原》凝聚了太多人的诉求点，也寄托了太多人的希望，做起来很难。你是原著作者，你有怎样的期待?

陈忠实：我对影视艺术是个门外汉，略知一点常识，对于任何一部引起普遍关爱的小说的改编，不同的编剧和不同的导演，会有不同的甚至差异很大的理解，自然也就会偏重各自以为需要强化、需要突出表现的那个要害之处，同时就会找到各自以为最恰当的切入角度。然而，最终呈现出来的却只能是一种形态，我和观众只能就这个得以实现的创作意图去谈观感。另一个或几个不能实现的意图和构想，是无以参照的。这其实也跟文学创作相类似，面对同一个题材，不同的作家会写出完全不同的小说，报告文学尤其具有可比性。

王全安的见解我也在报纸上看到了。他对电影《白》的设想和关爱令我感动。《白》的导演由厂方和投资公司选定，我和你一样期待着。

我作为《白》书作者，期望编导和演员既体现原作人物的思想和精神特质，又不囚于文字的桎梏，以电影无可替代的艺术优势，创造出几个独具思想内涵又有鲜活个性魅力的人物形象来，让观众喜欢观赏，且不在看后失望。我同样替编剧和导演犯难，电影和话剧一样受

制于时间和空间的压迫，突出哪个舍弃哪个，连我自己都把握不住了。祝愿他们成功。

《文汇报》：《白鹿原》改编的秦腔、话剧，甚至陶塑、连环画都出来了，电影也将要出来。你说过其实最适宜改编的还是电视剧，与北广集团签了改编意向后，现在有什么进展?

陈忠实：就我的感觉而言，电视连续剧可能是最适宜《白》的改编的。主要优越之处在于不受时空限制，可以充分地完整地展现每一个人物的心理裂变和生命轨迹。然而，至今仍然不能启动。十余年来，不下十家制作公司和我说过电视改编的事，终无结果，包括北广集团，现在仍无进展。

倒是有一个确凿的消息，舞剧《白》已定于六月在北京首演。首都师范大学筹划了三年，编剧和导演几经修改打磨，主要演员选了两三个获过金奖的舞坛新秀，已到白鹿原体验过生活。我在去年冬天看过排练中的几个片段，颇令我意料不及，顿然意识到舞剧倒是挣脱小说文字囚禁的一种堪称自由的艺术表现形式。

我常常接到许多熟悉朋友和陌生读者的电话，询问电影、电视剧的进程，甚至热心地推荐某个人物扮演者的最佳人选……借贵报一角，表示真诚的感谢了。

关于陈忠实文学馆

——“在我有点勉为其难”

《文汇报》：陈忠实文学馆最近在西安东郊白鹿原开门迎客，这是继白鹿书院之后，又一个与你有关的文化项目，主题依然是白鹿

原。这是六届茅盾文学奖二十七位获奖者中的第一家个人文学馆。有人质疑——二十七位获奖者中资历老作品多的大有人在，为什么偏偏是陈忠实占了“第一”？也有专家认为，“作品的多少与作家的成功度没有关系，有的人以一部长篇、一首诗就可以在文学史上留下一笔，有的人写了几十部作品，却依然会被人忘记，而陈忠实无疑属于前者”。你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陈忠实：就我自身写作历程中所得到的对创作的理解，基本都是在生活中受到感动或刺激，才有了表现的欲望，努力把那些从未有过的感受充分展示出来。自然期望能赢得读者的呼应，那便是创作初始目的完成和满足。我似乎没有想到过某一部作品能否在“文学史上留下一笔”这样太严峻的问题。我近年间注意到诺贝尔文学奖的多位获奖者，在得到自己获奖的通知后，第一反应几乎如出一辙，均是自己感到意外，或者说出乎意料地荣幸。由此可以看出，他们也未必坚信会在“文学史上留下一笔”，如果姑且把获诺奖看作是能留在文学史上的一个标志。

每一个作家都有自己的创作形态，一个人一个样儿，谁都比不得谁，谁也照搬不了谁。不仅是写作习惯和方式各有所从，更在于不同思想、不同气质、不同阅历、不同个性的作家，对相同的生活时段历史事件看取的角度不同，感受的炙灼点不同，体验的结果也就各呈其色彩。至于哪一个人的哪一部作品能留给文学史一笔，我想都是创作者搭笔之初就注定的，未必是作家当初的既定目标和写作目的。

文学史上各种现象都有，有你说的两种情况，还有一种现象我做个补充，托翁的每一部长篇几乎都成为经典，嵌定在世界文学史上。

我的《白鹿原》，至今尚不敢奢望如你说的那样的后果，还需继续经受读者的审视，更有生活发展作为严峻的检测。

《文汇报》：白鹿书院以及陈忠实文学馆，主要进行哪些文学活动?

陈忠实：白鹿书院成立已有三个年头。最初是几位作家和文化人的动议，我的响应是畅快的。《白》书中写到朱先生的白鹿书院，其生活原型是牛兆濂老先生，在白鹿原北坡下的蓝田县地段开设的是芸阁书院，清末时为鼎盛期，曾有韩国留学生在膝下求学。在地理上的白鹿原西坡的二道原上，有一道狭窄的平台，近年间有几所民办大学选址于此，一下子使这座古原呈现出生机。其中办得最早也最具规模的一所是思源学院，特别看重文化氛围的营造，热情支持这个新的白鹿书院的创办，且在白鹿原二道原畔。成立那天，西安各界学人都来凑兴，可以看出对传统国学的一种普遍高涨的兴致。头年搞了一次学术讨论会，题旨是“影响中国人思维的传统观念”，应邀的全国各路学者各有见解，之后编辑出版了一本论文集。去年举办了“中国文人书法论坛”，并展览了全国各地的文人书法作品，论文亦拟出专著。今年拟定举办一次“新时期文学三十年”的研讨会，正在筹备中。书院不是古代的教学场所，而是作为文学和文化交流的一个民间团体。

文学馆在我有点勉为其难。初有这个动议时我是拒绝过的，因为我自觉太肤浅，受不住这种文学馆的压力。同样，是这所大学文化建设的一项措施，在热情的说服下我应允了，至今仍然诚惶诚恐。

2007年4月

《白鹿原》之外

——与《关注》记者白小龙、逸青的对话

《白鹿原》几乎就不算个什么

《关注》：有文章称，陕西人有两种骄傲，一个是老腔、秦腔，另一个就是秦人陈忠实。您是否认同这种说法，如果认同的话，您认为您让陕西人骄傲的地方是什么，是《白鹿原》吗?

陈忠实：这显然是一种夸张的说法，我不可能认同这个说法。秦腔和老腔是我们三秦大地上人们所创造的传统的、独具魅力的一种戏剧形式，尤其是后来发掘的老腔，它是保存原生形态的一种民间娱乐方式，是最典型、最具秦人个性的一种表演，所以它一旦被发掘出来，就受到不光是陕西人的欢迎，我甚至感到外省的人比我们陕西人自己反应更强烈。我粗略想，他们有一种陌生感，老腔的音乐旋律靠近秦腔，在陕西人听来差别不大，但秦腔是业已规范化了的艺术，而老腔这种赋予了原始的带有原生形态的表演形式和演唱旋律，对于外省人来说，从来没有接触过这样豪壮而又质朴的民间戏曲，那种震撼和冲击力我们本省人是无法理解的。我在现场聆听过北京的专场演唱会，整个会场气氛的热烈程度并不亚于《白鹿原》（话剧）本身，可见我们的这种民间传统的演唱形式与当代人，甚至与当代流行的很趋前的娱乐形式并不矛盾，它有它的受众。这是我们这块土地上产生的一种极具个性魅力的表演形式，它经过不知多少年演变到现在，依然受人欢迎。而我仅仅是写了一部小说，和这种艺术形式是无法比拟

的，陕西可资骄傲的东西还很多，比起我们先人创造的历史文明，《白鹿原》几乎就不算个什么！这不是谦虚。

文学的那根神经好像特别敏锐

《关注》：一九八二年您调入省作协后正式成为一名专业作家，而那个时候您做了一个决定，就是返回老家，用您自己的话说，就是“我想找一个地方能安静下来，和文坛保持一个若即若离的关系，但是还需要文坛，不能离得太近，唯恐牵扯到某些是非里去，就是要保持这样一种关系”。现在您还有没有这种心境和愿望，再回到老家去呢?

陈忠实：我不仅有这个愿望，而且都已经实践了两年。《白鹿原》出版后我就进城了，后来又当了作协主席。那个时候作协的条件太差，房子墙体下陷，有的房顶漏雨，一见下雨编辑就没办法工作，房顶糊了一层又一层还漏，房子太老，大家呼声很强烈。社会上调侃说，在作协院子拍《聊斋》鬼狐故事不用做任何修饰。我和那届党组下决心要把新的办公楼盖起来，而当时正好是咱们省上经济最拮据的时候，公开说“吃饭财政”，还是给作协批下五百万元。但这笔钱不是一次到位，一年给一百万元，所以大楼整整盖了五年。这五年我配合党组集中干了这件事，当然还要做其他的很多事情。

二〇〇一年至二〇〇二年，我感觉工作压力小了，就再次回到乡下老宅，一待就是两年。这两年是我长篇完成以后写作量最大的两年，写的主要是散文、短篇小说、随笔，包括给作家朋友、青年作家写序等。我感觉进入写作状态最好的环境就是在老家祖传的小院里，一走进那个环境就能产生一种隐性的心理习性，心里整个沉静下来了，很自然进入一种纯文学思维，文字的那根神经好像特别敏锐，达到一种最好的写作状态。很奇怪！

我一个人在老家坚守了两年，是五十九岁和六十岁的时候，家里人都回不去，我自己做饭、洗碗，尤其到了冬天还要生火炉，实在太麻烦，一方面是年龄大了，再说我本身就不喜欢做那些事，后来坚持不下来了，就回到城里来了。

现在情况好多了，我之所以能回来，是石油大学聘用我做兼职，给我一个头衔，提供了一个工作用房，我可以躲在那里排除一些杂事和社会干扰，静下心来写些东西，相对来说比较安静，也有口省手的饭吃，不再为生活琐事劳神了。但是在创作方面还是达不到在老家的那种状态。

靠色情是写作者的悲哀

《关注》：现在二十多岁的年轻人看的网络文学、玄幻小说比较多，传统文学主要看武侠小说，比如说金庸和古龙的小说，传统文学慢慢淡出青少年的生活，文学界是不是应该反思一下，作家到底给年轻人提供了什么，需要给提供什么？中间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空当，为什么没有写出让他们感兴趣的作品来？

陈忠实：这是个比较尖锐的问题，而且是社会普遍的问题。网络上的东西良莠不齐，涉及性方面的东西也比较多。这个现象任何一个人对此都不难有一个正常的看法。至于对文学本身的反问，我们的文学作品给读者提供了多少？为什么吸引不了这些青少年？除了性的因素之外文学本身的魅力还能不能吸引人？这已经成为一个大的问题了。我个人的意见，即使抛开网络，单就文学本身来说也存在这个问题，因为现在有一些文学作品，包括国家禁止的一些带色太重的作品，如果靠色情去俘获读者、去提高发行量的话，这是写作者的悲哀。

读者的阅读欲望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想感知作家无论对历史、对现实生活的透视、理解和体验的独到之处，独到深刻的某一点。只有具备了独到深刻的这一点，又有一个比较完美饱满的艺术形式来表述出来，读者在阅读中能受到启示，自然就产生吸引阅读的魅力了，尤其是对现实生活。如果作家自己对生活的理解深度限于普通市民的水准上，那么读者为什么要读你的作品呢？只有你对现实生活或历史的某一点有独到的体验和理解，那个深刻之处普通人尚未达到，他读了以后心灵受到冲击，才有启示有启发，才有收获。所以在这一点上也对作家提出一个基本的要求，不光罗列社会事项，具备罗列社会事项的人很多，老太太拉家常对社会现象发出自己的批评或者赞扬，那也是一种表述形式。人们之所以尊重作家，那就是在于他的深刻穿透历史和现实生活的能力，并以一种完美的形式形成的艺术品，让读者的阅读既是享受也是一种启示，这个作品就会有它的读者市场和读者群。不具备这点，靠猎奇，靠一些色情，靠一些小噱头甚至靠炒作获得一些欢呼，都是暂时的，都很难持久，这是被无数的事实证实了的。

《关注》：有些作家就抱怨现在的读者已经不具备读者的这种素质了，他们不需要启示或其他的东西，只需要一种阅读的快感，认为严肃的文学作品曲高和寡。

陈忠实：那是一种偏见，这个社会层面的人太多了，就二十岁上下年轻人的这个层面的读者也不是全都沉浸在网络里头，只图娱乐和快感，有生活追求的人多的是，关键就在于要有好的东西，他就会去看。

我所追求的语境

《关注》：肖邦说过，音乐的最高境界就是朴实，从您的形象到语言，非常彻底地贯彻了朴实、本真，您是否比较认同肖邦的这种观点？文学作品的最高境界也是朴实吗？

陈忠实：这是肖邦对艺术的体验，不同的艺术家各有各人的境界。我的追求就是把事说清，如果绕着弯把事终究说不清的话，那我就不说。一切语言形式和语言能力就是要把我所体验的那一点自以为新颖的东西，含蓄而又真实地表现出来传达给读者，完成一种交流，所以这种语言形式就是我追求的语言境界。《白鹿原》的表现形式不是我一开始就能达到的，是经过了几十年的漫长的文字功夫修炼，不断地改善，不断地追求，最后才有了《白鹿原》这样一种包括语言在内的艺术表现形式。

作家的语言形式，还受他所写的题材、内容和人物的制约。要选择到一种与他的人物和题材相适应的语言形式，不是一种语言形式都能表达所有的题材和人物。举个例子，沈从文的小说、散文基本上是一个调，因为他都写的是湘西，湘西那个地域情调和人情大概就适宜用这种语言。比较一下同时代的鲁迅，一部小说用一种语言形态，《阿Q正传》是一种语言形态，《祥林嫂》是截然不同的一种语言形态，《在酒楼上》写知识分子的语言又不一样了，你很难设想用写阿Q那种语言去写祥林嫂。所以，我说是作家所描写的不同对象和他所体验到的内容，决定着作家的语言选择。我基本就属于这一类作家，选定一个生活题材后，把其中的人物基本上确定下来，是这些东西决定我在这部作品中的语言选择，要选择一种最能恰当表现这个人物的语言形式，然后再开始写，我看到大多数作家属于这一种。

阅读的记忆

《关注》：您属于自学成才的那一类作家，因为家庭、社会环境等多种原因没有上成大学，您读过很多中外的名著，您最喜欢的是谁的作品或是哪一类的作品？您看过以后对您影响比较大的是哪些作品或者是作者？尤其是国外文学作品。

陈忠实：我记忆最深刻的阅读是在“文革”期间。“文革”中我的文学梦整个都破灭了，我已经放弃文学。公社把我调去临时帮忙，总共抽了七八个教师，其中有我中学时的一位地理老师，他当时已经是一所中学的校长了，“文革”中间没有被“结合”，在学校被安排为图书管理员。因为我喜欢看书，问他那个学校还有没有图书。我老师告诉我说书几乎让学生抢完了，剩下的都是学生不爱看的书，连书架都没有了，堆在墙的拐角处，我提出让我挑上几本书。我老师起初不敢去，在我的再三劝说下他同意了，于是我们俩在一个晚上骑自行车悄悄去到那所中学，打开图书室门，不敢开电灯，做贼似的，拿出事先准备好的手电翻那一堆书，竟然找到了《悲惨世界》《无名的裘德》《血与沙》等世界名著。我就拿回家读，反复读。

“文革”一开始就把作家梦粉碎了。因为早都不想当作家了，这回阅读完全不是为了创作，纯粹是一种欣赏，白天把书锁到桌柜里头，到了晚上睡觉前关了门拿出来读，这都是禁书。后来才意识到，对我来说这是最真实的文学影响，没有任何急功近利的目的，是一种沉浸其中的艺术欣赏和感受。这种欣赏和感受，我觉得对于一个作家的熏陶和影响可能是最好的。

选择了莫泊桑

《关注》：您早期的创作受哪位作家的影响比较大？

陈忠实：我读苏联作家的著作比较多，对我的影响很大，尤其是写苏联五六十年代社会生活的一些作品。譬如柯切托夫的作品几乎全部都读了，《茹尔宾一家》《叶尔绍夫兄弟》《州委书记》《落角》等，这都是他最具影响的几部长篇，可以看到他们的社会问题跟我们的社会问题很相似，尤其是《州委书记》，因为那个社会制度和我们基本一样，官员的名称和中国有些差别，他写的那些社会生活病象和中国大同小异。欧洲的文学我比较喜欢写现实的作品，直面现实而且有他独到深刻见解的一些作品。

一九七八年秋，我从公社调到郊区文化馆，首先坐下来读了两到三个月的书，先读的是契诃夫和莫泊桑，把这两个人出版的书从图书馆借出来通读了一遍，在这两个人中间我又选择了莫泊桑，为什么呢？莫泊桑是以故事和人物来结构小说的，而契诃夫是以人物来结构小说的，写作难度更大一些。根据我的实际情况，便选择了莫泊桑那种小说结构的形式用心钻研。我读了莫泊桑的《温泉》，是一部写得很好的长篇小说，但他最具影响的是短篇小说。我把他当时出版的几本短篇小说集读完以后，又在里边挑选了我最喜欢的十几个短篇小说反复阅读，揣摩短篇小说不同形式的结构。我当时已经意识到自己结构小说的形式比较单一。读了两三个月书以后，到一九七九年春节一过就开始写作了，这一年我大概发表了十来个短篇，对我来说是很受鼓舞的事情，其中一个短篇小说《信任》获得全国短篇小说奖。

寻找自己的创作方法

《关注》：《白鹿原》是您文学创作生涯的一个高峰，并获得第四届茅盾文学奖，介绍一下您写这部长篇小说的启发来源于何处？也是一些优秀的作品吗?

陈忠实：对我影响比较深的是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作品。我最早读的是《百年孤独》，觉得形式很新颖，甚至急忙还读不懂，特别是那种叙述形式。

我随后在《世界文学》上读到魔幻现实主义的创始人卡彭铁尔的《人间王国》，那是一部大约十万字的小长篇。我从介绍卡彭铁尔的文章中，了解到魔幻现实主义这种文学形式的起因和发展。拉丁美洲原来没有自己的文学，只有一些民间传说，一些文人（所谓的作家）把民间传说改写成作品。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拉美开始觉醒，很多有条件的文学爱好者到欧洲去留学，寻求新的思维。魔幻现实主义创始者卡彭铁尔是其中之一，在法国留学两年，他学习欧洲现代派作品的写法发表了一些作品，却没有任何反应，最后他反省自己的路子，决定离开欧洲。在他离开欧洲的时候留下一句话："在欧洲现代派的旗帜下容不得我。"这个反省是多么深刻！卡彭铁尔回到拉美后选择了海地那个弹丸之地去深入生活。选择海地的唯一理由，它是保存着纯黑人移民的一个拉美国家。卡彭铁尔去了解黑人的移民史、社会形态和各种人的生活状态，各个社会层面上人的生活形态，后来他写了一部长篇小说《人间王国》。

《人间王国》一经发表，当即引起欧洲文坛的强烈反响，他写的海地人的生活形态、情感世界，很独特的带有魔幻色彩的生活方式，譬如人变成甲虫等。尤其是别开生面到陌生的叙述形式，引起欧洲文坛的惊讶，已有的所有文学流派都归类不了卡彭铁尔的作品，欧洲评论家就给《人间王国》起了个"神奇的现实主义"的称呼。

《人间王国》在欧洲产生重大影响，也为拉美那些正在追求着的作家们找到了一条发展的道路，就是面向自己的民族和国家的现实和历史，寻找自己的创作方法。之后每个国家很快脱颖出来两三个很有

成就的作家，竟然形成了一股拉美文学浪潮。欧洲评论家为这些风格比较相近的作品找到了一个更为恰当的名字“魔幻现实主义”。后来的《百年孤独》，震惊世界文坛，把魔幻现实主义这种艺术形式推到了一个高峰。

“魔幻现实主义”对我的启示很大，主要倒不在说这些作品如何，包括《百年孤独》，而是魔幻现实主义创始者卡彭铁尔寻求创作出路的精神和行为，给了我以振聋发聩的启示。我突然意识到我也应该对此前的创作做一次深刻的反省。面对我生长和生活的这块土地，我一直很自信，我了解乡村生活，因为我出生在农村，工作在农村，在农村做基层工作二十年，搞了专业创作我还住在农村。我既是农村生活直接体验者，又是农村社会工作直接参与者，在公社工作的时候直接面对的就是农民，一年有四分之三的时间都住在这个或那个村子里，所以我一直很自信我了解农村生活，也拥有生活。我搞专业创作以后从机关搬回老家住，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把我拥有的生活逐渐形成作品。

我既需要用阅读扩大艺术视野，同时需要对生活理解的穿透力，然后才能实现创作的突破。受魔幻现实主义创始人卡彭铁尔创作道路的启发，我马上意识到我了解的仅仅是六十年代后的乡村，尤其是一九四九年以前的乡村我根本就不了解，包括我生活着的那块土地的历史渊源都搞不清，灞桥区在清朝的时候叫啥县名？那个时候是个什么状况？我想了解这块土地的昨天，恰好那时候写中篇小说《蓝袍先生》，由于《蓝袍先生》的写作牵涉到解放前的一些生活形态，我仅有的一些解放前的生活记忆被激活了，就动了写长篇小说的念头，随后就下决心要到蓝田去查询资料、了解这块土地的昨天。于是，就有了作品《白鹿原》。

魔幻现实主义作品中把人变成甲虫，如果我们仅仅是再模仿把人变成狗，这不是艺术学习和艺术借鉴，照猫画虎的创作不可能有任何出路。关键是人家的创作道路对你的启发，来寻找适宜自己的一条创作路子，才能获得进步和突破。

《白鹿原》怎么可能把我挖空

《关注》：过去有人说过，路遥继《人生》之后再也不会有什么惊世之作了，而后来路遥又写了《平凡的世界》，同样是一部非常好的作品。有人说一部《白鹿原》将陈忠实挖空了。继《白鹿原》之后您还会有类似于《白鹿原》这样好的作品吗?

陈忠实：《白鹿原》怎么可能把我挖空呢？这样说显然是不了解我。全国解放的时候，我才七岁，我的生活阅历、直接的生活体验应该是在六十年代以后，这是我进入成年直接体验和感受到的中国乡村生活。而这部分生活我除了写中短篇小说之外，还没有用长篇小说去写它的构思。

《白鹿原》写的是一九四九年解放前的关中，是我间接体验的生活，而我直接体验的东西都写的是中短篇小说，还没有写过长篇小说，就是说没有写解放以后我直接经历和体验的乡村生活的长篇小说。没有写是别有原因，却不是缺乏生活。

《关注》：那是什么原因呢?

陈忠实：事情说起来比较复杂，我一般不说这个话题，但起码不是那个所谓“挖空”的原因，你想想，我不可能被挖空。

《关注》：可否说您正在积累、准备?

陈忠实：没有，这么多年来，尤其是一九九九年办公大楼盖起来以后，我们党组和主席团要改善作家协会的工作和生活条件的承诺兑现了，整个人就轻松了，以后我就以写作为主，主要写作散文、随笔和短篇小说，出了几本散文集，读者对我期待的可能是长篇小说。

忍受苦难已经成了习惯

《关注》：艺术源于现实生活，一个作家要有好的作品必须要有丰富的人生经历和对现实社会的深刻透视。自《白鹿原》获茅盾文学奖后，您经常参加各种各样的社会活动，后来任省作协主席，用您自己的话说："成名无非是换用一根结实的绳子来捆桌子的腿"。这根绳子到底有多结实？就是说过去的那根绳子是您过去的那种积累，那么现在用"更结实的绳子"是不是说您的积累更加厚实了？

陈忠实：这是我当时接受媒体采访时调侃的一句话，说到我当初刚刚进入社会，把文学创作当作一个生命追求的时候，用的桌子比较破旧，四条腿都是活动的，我就用一根稻草绳捆绑固定。到我当了专业作家回到老家后，那个桌子彻底破散了，当柴火烧了。我家还有一张祖传的大方桌，这张方桌的四条腿也撑不起来，还是用绳子捆着。我当时调侃说，唯一的改善是把草绳换成了麻绳，生活改善的程度只是把草绳换成麻绳。

我上小学高年级是住宿生，一礼拜回一次家。我的家在灞河南边，学校在灞河北边，那年在中学升学考试的时候刚好灞河涨了水，连家都回不了，脚上穿的布鞋底子磨得已经很薄了，本来打算去考试的时候换一双新鞋穿，结果却回不了家，就跟着老师上路，走了大概十里还不到一半的路程的时候鞋底磨透了，脚后跟磨得血淋淋的，硬忍着磨到灞桥。那时候我十三岁。我二十岁的时候当民办教师，后来

调到公社工作，整整工作了十七年，工资从三十元涨到三十九元，幸好我的三个孩子都很好，没有出过什么大毛病，家庭经济一直很窘迫，没有宽松过。

我正在写长篇小说的四年里，连着两年在春节前到汉中、安康去给那些刚刚兴起的民营企业家和一些国营企业写报告文学，他们给的稿费比国家的能高一点。因为自从开始长篇小说写作以后没有时间写中短篇小说，没有了稿费收入，只凭那百十块钱工资顾家就比较紧张了，我的三个孩子相继上初中和高中，学费年年也在增加，所以就连着两年在春节前的一个月，我就把长篇写作停下来到汉中、安康去写报告文学。所得稿费是万字五百块钱，比国家当时的标准能多二百块钱，过完春节孩子上学的学费就不用愁了。

我不善于诉说自己的困难，既不给公家诉说，也不给别人诉说，遇到事情就自己解决。忍受苦难已经成了习惯，因为在我上初中上了一学期，就是因为交不起学费休学了，从那个时候开始一直到当了专业作家，经济窘迫一直没有缓解，这就是生活。

现在不用捆桌子的那个绳子了，这个矛盾已经解决了，无非就是努力去写作。我现在的写作状态是不勉强自己，某一件事情有了感触，适合写散文就写散文，适宜写随笔就写随笔，适宜写短篇小说就写短篇小说，就是随心所欲地去创作。

2008年1月11日

我与《白鹿原》

——在中国现代文学馆讲演稿

首先我要道歉，不会说普通话，只会说西安话，我尽量不说西安那些生僻的词，说陕西的普通话，请大家谅解。

跟北京的读者交流，对我来说是一种荣幸。作家关注评论家对他的作品的评价，对我来说，更关注与读者交流。与非文学圈内的读者交流，对我来说更为珍贵。

首先我来介绍一下《白鹿原》这部小说的缘起和创作过程，以便读者理解作品，实现作家与读者的交流。

我先来提供一下作品创作的情况。我是新时期开始走上文学创作的一个作家。一九七八年，是对我国具有重大意义的一年，大家习惯地把一九七八年叫作“文艺复兴”开始的一年。这个复兴直接面对的是十年“文革”的文学荒漠。我就是在这个时候开始文学创作的。之前虽然也有一些创作，但真正把文学当作事业就是在一九七八年。

一九七八年春天，我当时在家乡的公社，现在叫乡镇，正领着搞一个八华里长的水利工程，给我的任务是修河堤。在指挥部的房子里，我收到了杂志社给我寄来的《人民文学》，看到了刘心武的短篇小说《班主任》。那天晚上看了后，心里头产生了很大的冲击，直接的感觉就是可以把文学当作事业来干的时候到来了！当这个河堤快修完的时候，我就从公社调到区文化馆去了。从一九七八年的春天开始，文学对人们的影响可以说是前所未有的。尽管我青年时期喜欢文

学，但把文学当作主要的职业，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一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一直在写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也出了几本集子，并获了全国短篇小说奖。

对于长篇小说的写作，心里一直有种畏惧感。我记得，在陕西新时期成长起来的一批作家，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在全国有比较大的影响。《文艺报》还专门到陕西去报道了这批青年作家的情况，刊发了一整版的文章。但是，这批作家写的都是短篇和中篇，头两届茅盾文学奖，我们陕西连一部作品都推荐不出来，且不说质量，而是连一部长篇小说都没有。后来，陕西作家协会的领导对这种情况做了认真的分析、研究，认为这批青年作家中的一部分人思想艺术开始趋向成熟，应该促进他们进入长篇小说的创作。一九八五年夏天，陕西作协召开了贯彻这个精神的会议，促进陕西青年作家从事长篇小说创作，这个会从延安一直开到榆林，开了很长时间。会后，一部分青年作家立即进入到长篇小说的创作之中。路遥，大家都知道，长篇小说促进会一完，他就在延安坐下来，开始《平凡的世界》的创作。他在会上就表态要开始长篇的创作。我在当时还没有考虑长篇，正热衷于中篇小说的写作。当时我的一个基本想法是，至少写过十个中篇小说之后，再看看能否进行长篇小说的写作。在我的意识里，长篇小说太严峻，不敢轻易动手。因此，从写短篇、中篇入手，先练习文学基本功，进行各种艺术形式的探索、练习，为将来的长篇小说打好基础。

这个会是夏天开的，我还是这样很平静的心理，结果到秋天、冬天的交界时，我写了一个中篇《蓝袍先生》。写了不到一万字的时候，突然发生了意料不到的情况。《蓝袍先生》开头这一万多字写的是一九四九年前一个关中乡村的小知识分子的家庭。这块生活的幕布

一打开，咿呀！我的心里就受到了很大的冲击，这个乡村私塾教师家庭的背景，把我幼年乡村生活的记忆一下子就打开了！这一打开，对于我来说是个惊喜，一种惊讶，完全陌生而又新鲜的感受性记忆直接冲击着我。我也同时惊异地发现，一九四九年前或者稍后关中乡村生活的记忆，我有一个库存，从来没有触动过，现在突然感到很珍贵。在乡村私塾先生的四合院里，我就朦胧地意识到，这里头有着挖掘不尽的故事。于是萌生了长篇小说创作的想法，至于故事的情节、人物都还没有任何想法。这就是《白鹿原》最早创作欲望的产生，由这个中篇小说而突然引发的。

我从新时期创作以来，一直面对的是现实生活的发展。我的短篇、中篇，包括纪实文学都是对当下生活的变迁做出的反应，是跟现实生活同步的创作。尤其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乡村的改革非常热烈，乡村世界的变化非常之大，我有点应接不暇。所以，我的短篇、中篇、纪实文学都是写乡村改革变化和人的心理精神变化。写《蓝袍先生》发生的转折，第一次把眼睛朝背后看过去，我生活的关中的昨天，这里的人是如何生活的。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发生的事情。

这个中篇写完后，写长篇小说的准备就开始了。当时还无头绪，是一次不寻常的阅读启发了我。我在《世界文学》上读到古巴一个作家卡彭铁尔的《人间王国》，尤其是他的创作历程的故事对我启发很大。这个时候拉美魔幻现实主义进入中国，对我国文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多家媒体都笔谈魔幻现实主义如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可以说我是在中国读者中比较早阅读的，这是郑万隆在《十月》杂志上翻译发表的。初读《百年孤独》，似懂非懂，但确实对魔幻现实主义刮目相看。

读了卡彭铁尔的创作历程故事后才搞明白，拉美在上世纪初并没有文学，虽然各个国家都有一些写手，但都是写一些进入不了真正艺术殿堂的民间故事。到拉美资本主义开始兴起以后，一些最早觉悟的学者，纷纷到了欧洲，尤其是到法国留学，接受法国文学的影响。其中就有卡彭铁尔，他在法国待了四五年，写了一批小说，学习欧洲现代派的笔法，但发表后都如石沉大海，没有引起任何反应。他很失望，经过反思和自我调整，决定离开法国。有一句话我至今还记得：他坐上轮船离开法国回古巴的时候，面对法国海岸说了一句话："在法国现代派的旗帜下，容不得我！"

卡彭铁尔这句令人触目惊心的话，确实对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我，起到了一种震撼性作用。他回到古巴以后，去了拉美一个纯粹黑人移民的国家——海地，在那里待了好几年。他主要研究海地的移民史和黑人在海地的生存状态。我当时很感动，我想毛泽东号召作家深入生活，还常常引起一些争议，这个卡彭铁尔并没有人教导他去深入生活啊，却一个人深入到海地，一待就是两三年，最后写出近十万字的小长篇《人间王国》。我在《世界文学》看到的就是这部翻译小说。

《人间王国》发表以后，不仅在拉美地区引起很大影响，而且是拉美文学第一次震撼了欧洲文坛。法国、德国等一些艺术评论家，拿欧洲种种艺术流派试着把《人间王国》框进去，都不怎么合适，无法给这个长篇命名，最后给它创造了一个新的文学艺术流派叫"神奇现实主义"。

卡彭铁尔在拉美国家影响更大，受他影响的作家很多。作家们纷纷把眼睛面对着自己的国家和土地，研究自己民族生存的现实和历史，在欧洲文坛引起更大的反响，直到《百年孤独》出现，欧洲那些

评论家把原来命名的“神奇现实主义”修正为“魔幻现实主义”。从此，魔幻现实主义成为一种文学流派，至今仍有着巨大的影响。

“魔幻现实主义”使我受到很大的启迪。卡彭铁尔从法国跑到海地，去研究拉美的移民史，这使我突然意识到，我对自己脚下的这片土地的昨天还不甚了解。因为，我在解放后才上学，直接面对的都是解放后的生活，写作也是面对解放后的生活，对它的昨天没有了解。只有在写《蓝袍先生》时，才突然意识到应该了解昨天我脚下的这片土地是怎么一回事。

《白鹿原》的创作过程

写长篇小说的想法一产生，我就想，不用跑远，就把西安周边的三个县区的昨天了解一下。因为，西安在陕西的关中地带，是历史古城，包围着西安的有三个县：蓝田县、长安县，还有我家乡的咸宁县。咸宁县在辛亥革命后撤销了，合并到长安县，但县志都还在。解放前蓝田县最完整的、也是最后一部《县志》的主编，就是《白鹿原》中的朱先生。这个朱先生的原型姓牛，是清末最后一茬举人，他家离我家隔着灞河，大概有八华里远。

我查《县志》，其中有一件事对我影响很大。《县志》一摞几十卷，其中有五六卷是“贞妇烈女”卷，第一卷，某某村、某某氏，都没有妇女的名字，前头是她丈夫的姓，接着是她的姓，没有名字，两个姓合在一起就是一个女人的称谓：某某氏，十六岁结婚，十七岁生子，十八岁丧夫，然后就是抚养孩子，伺候公婆，完成一生。这是我记忆里的妇女生命史，这大概是第一页上介绍的第一个人；往后一个比一个文字更少，一页上只是记两三个。到第二本的时候，没有任何事实记载，仅列一个人名字，某某村、某某氏，就排着人名。翻了几

页我就挪开，没有什么内容。哎呀！就在我推开的一瞬间，我的心里咯噔一下，突然意识到，这些女性，用她们的整个生命换取了在《县志》上仅四五厘米长的位置。可悲的是，后来的人，包括我在内，没有谁愿意翻开它，没有人耐心地读一遍。这是几重悲哀！你想想，十六岁结婚、十七岁生子、十八九岁丈夫就死掉，然后在屋子里头伺候公婆、抚养孩子，作为女人的一生就是这样的过程！这种悲哀谁能感受得到？也许我多了一点敏感，随后又把这个《县志》拿过来，一页一页地翻过去。我想，多少多少年之后，一个还没有名气的作家，向这些屈死鬼们行一个注目礼吧！一页一页地翻过去，就在这种心理感受中，我产生了要写田小娥这个女人的想法。我想，无以数计的贞妇烈女传中，应该有这种声音，反叛那个腐朽不堪的婚姻制度。但是，具体的人物名字当时都不可能产生，我就是想应该有这样一个女人，为了合理的生存自我反抗。我跑了蓝田、长安和咸宁，把他们的县志都看了。田小娥这个人物是我意外的收获。

还有，小说中有生活原型的人物是朱先生，真人叫牛兆濂。我父亲给我讲过他的许多故事，他是关中地区被神化了的一个举人，他可以观天象、去凶避灾，包括哪个农民丢了牛也来问他，他说朝东找，就找到了。我在构思小说时，很想写这个人物，一个传统的知识分子。但是，我心理压力最大的，恰恰就是这个有生活原型的人。为什么？因为如果没有生活原型，是虚构的，读者无非判断这个人物有分量或者没分量、深刻或者浅薄、有意思或者没意思。而这个牛先生，直到现在在关中都是影响很大的一个人，一旦这个人物写得站立不起来，读者拿真实人物做参照，就会说：哎呀，老陈写的朱先生这个人物不是人家那个牛兆濂先生，不像！这一句话就把你打倒了，把你的作品否定了。所以，对我反而压力更大。

正式查牛先生编的《县志》，我始料不及的是，他在编到《民国纪事》卷的时候，关中发生过的很多大事，包括李先念的红军到过蓝田县都有记载。这个老先生编《民国纪事》时，严格恪守史家笔法，即纯粹的客观笔述，我猜测其中当然也压抑了不少个人情感，在客观纪事之后又加了一些相当于我们现在“编者按”的文字。面对蓝田发生的重大事件，作为老先生的个人观点，作为附记表述出来。正是他加的这些东西，让我把握住了这个老先生的心理结构和心理状态，使我把牛老先生在那个裂变的时代中，面对世事变化的感受，基本上把握住了，一下子有了写这个人的信心。

还有就是对这块土地的了解。我的老家位于西安城东大概五十华里的地方，就在地理上的白鹿原的北坡根下。我们那个小小的村子，在我的记忆中是很贫穷的。我家在原的北坡下，还好一点儿，离灞河很近，到改革开放之前，尽管粗粮多，基本还不饿肚子。通过查《县志》《民国纪事》，当时的史料、老革命写的回忆录之后，我才对这个原产生了很大的感动。这个原上的老革命应该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早期就开始了革命活动。这个原几乎在湖南、江西、上海闹革命的同时，就成立了共产党的一个支部。从资料上看，当时陕西的农民运动，规模和参与的人数很大很多，刘志丹是领导人之一。农民运动打土豪分田地，轰轰烈烈，蓝田县就有一二百个农民协会组织。我当时看了这些有关资料后，调侃了一句：“陕西的农民运动深入程度可能与湖南差不了多少，但是陕西没有人写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所以陕西的农民运动没有人知道。”由此，也更正了我的一个观念：我们陕西经济发展不上去，改革开放这么多年了，经济总量老是在全国后十名排着，陕西人到处议论、调侃，说陕西人太保守，有一个肉夹馍就不愿意走出潼关，自己作践自己。我把近代史上关中土地上发生的一些大事看了以后说，陕西人可不保守啊！抗日战争最危难的时候，是一个

陕西人和一个东北人联手把蒋介石抓了起来，强迫他签了一个抗日的协议，谁有这个陕西人思想解放？杨虎城思想不保守；农民运动打土豪分田地那个时代，陕西也搞得很厉害，可见也不保守。我写过一篇随笔，说我们改革发展上不去，步子走得慢，应该另找原因，不应该自己作践自己，这样可能永远找不到出路。所以，通过查阅资料，对于我理解这里的人和这块土地，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再一个是阅读。经过大概两年的筹备，中间也牵扯着一些阅读。我记得，对我印象深刻的书有这些：范文澜先生写的《中国近代史》，我重新把它读了一遍。为什么读这本书呢？我想把关中近代以来，尤其是辛亥革命以后发生的各种事变，跟我们国家近代以来的那个大的背景联系起来，避免孤立地看待在白鹿原发生的事情。

在阅读中我又惊奇地发现，关中这块土地上发生的历史演变过程，跟我国近代史发生的过程完全是同步的，也就是说，关中这块土地上的人物命运跟我们近代以来整个民族的命运是一致的。

还有两本书对我的启发很大，一本是一位陕西学者写的《兴起与衰落》，他从西安为代表的关中这块土地历史上几次大的辉煌到几次衰落，直到清末以后的大衰落中，研究这块土地的历史，并从理论高度分析解构，使我更切近地理解了关中。

在两年的准备期间，我也读了一些长篇小说。我记得在构思小说之初，西北大学文学系一位关注我创作的蒙老师，对我说过这样一句话：“长篇小说是一个结构的艺术，结构好了小说就立起来了，有骨有肉就立起来了；结构不好，你的小说就像剔了骨头的肉，提起来是一串子，放下去是一摊子。”这话把我吓住了。因为，我第一次写长篇小说，本来就有畏惧感。没有办法，只能去阅读，看别人是怎样结构长

篇的。这时候，我突然意识到以前阅读长篇怎么光看热闹，光看人物情节，没有认真去研究结构呢，真是太粗心了！于是，我读了一些长篇，首选的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影响最大的两部长篇：王蒙的《活动变人形》和张炜的《古船》。后来，又读了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霍乱时期的爱情》等。

读了这些书之后，我的最大感觉是，根本没有一种现成的结构形式让作家把他思考的内容装进去，结构形式只能由作家自己去创造。这就是创作。创作成功了，你就成功了；创作不成功，你就失败了，就这么简单。

当时还有一个严峻的问题是，当我快写完《白鹿原》时，新时期的文学第一次面临低谷状态。像我们陕西的文学杂志《延河》，改革开放初期文学热的时候，发行量是八十万，此时掉到只有几千册。此时，已经出现出书难、作家写的书没人出的情况。那时，计划经济刚刚转入市场经济，不仅作家有压力，出版社的压力也很大，找不到赚钱的书，赢不了利，没有办法运作。不光是文学界，我还记得当时的报纸登过这样醒目的消息，造导弹的不如卖茶叶蛋的收入。那个矛盾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很尖锐，反映在文学界也是这个矛盾。面对这种情况，我首先想到的是，必须得有人来买你的小说，出版社有了起印数，小说才能出版。

在这个过程中，我反复思考了可读性的事，觉得需从两个方面解决，一个是人物的命运描写，要准确，作家自己不能在那里任意地去表述什么，而是必须把作品的各色人物把握准确，争取写出那个时代的共性和典型性。再一点是文字叙述。开始我曾想写上下两部，《白鹿原》的内容比较多，时间的跨度也比较长，但最后决定还是写一部，而且不超过四十万字。所以，从情节、人物、构思上重新考虑，

尤其是文字，解决篇幅太长的一条有效途径，就是把描写、白描式的语言变成文学叙述语言。我那个时候已经意识到，三十个字的叙述语言，可以把二三百字的白描语言所表述的内容涵盖了。这个转变过程需要语言功力和语言感觉。在正式写长篇之前，我连着写了两三个万把字的短篇小说，练习叙述语言，我给自己规定从开篇到结尾，不用人物对话，把人物对话的心理活动，以人物的角度叙述来完成，要达到形象化的不是概念化的叙述，这样不仅节约了篇幅，也使语言发生了质变。

还有一点，就是对非文学书籍的阅读。这时候有一种新的研究观点，叫文化心理结构学说。我对这个观点很感兴趣。我们中国人和外国人，包括黑人，谁黑、谁白，谁个子高、谁个子低，谁鼻子高、谁鼻子低，一目了然，种族间的这种差别都挂在脸上，不用谁教你就能看得出来，而真正的差别是在文化心理结构上。中国人和美国人、法国人巨大的差别就在文化心理结构上。

我意识到，中国人的心理结构就是我们的传统文化的心理结构——儒家，具体到我们西安这个地方，把儒家文化发展成一个关中学派，并衍生出诸如《乡约》条文教化民众，对人的行为，长辈、晚辈、夫妻的行为规范非常具体。正是这些东西，结构着人的心理和心态。

具体到我生存的这块土地——白鹿原，像我写的上世纪的前五十年，原上原下能够接受教育的人可能只有百分之一，大部分都是文盲。文盲的文化心理结构跟乡村的中等知识分子是一致的，他们虽然没有接受正规教育的机会，但却接受一代一代传下来的那些约定俗成的礼仪和审美标准，支撑起一个人的心理结构。简单地举个例子，“男女授受不亲”，家长对孩子都有过这样的教育，男孩就跟男孩玩，女孩

就跟女孩玩，从小就给你灌输这样的观念，尤其是女孩的家长更严格。这些禁锢从小就有。所以，改革开放之初国门打开，在西安看到外国的一个男人挽着一个女人的腰，在街上走路，满街都是围着看稀罕的人群。现在我们中国男人在大庭广众中挽着女人的腰，比外国人还开通。为啥呢？就是原有的那个中国人的心理结构被打破了。当然，我们传统的文化心理结构比这个要复杂得多。一旦心理结构的某一个支架或支柱发生倾斜，这个人就发生心理上的紊乱，发生紊乱就痛苦，到他重新建立新的心理结构的时候，就达成了稳定和快乐。

过去，我接受的创作观念是写小说就要写典型人物，到我要写长篇时突然意识到，几种类型的典型人物早就让四大名著写完了，现在再要塑造一个能称得上典型的人物形象，还真不容易。

我懂得了文化心理结构学说，就给我塑造人物打开了一条路子，从肖像、外形描写到对话语言都进入一个新的路径。正是依着这个新的角度，我来探索我的长篇小说中的几个主要人物。

为了写好这些人物，我默默给自己定下一条禁忌：不搞形象描写，这个人模样长得咋样、身材如何，基本不做描写，就从心理出发，从心理结构出发，让他或她依自己独有的文化心理结构决定自己的行为。为了把握人物心理结构和心理活动，我还读了《心理学》《犯罪心理学》《梦的解析》《艺术创造工程》。大约经过两年，我完成了从准备、到调查、到构思，一九八八年清明一过，我就开始写草稿。

再谈一个关于性描写的话题。这是我在构思长篇小说时认真思考过的几个问题之一。这对我来说也非同小可。我从一开始写小说，在我们西安、陕西青年作者群中，包括有限的读者都认为，陈忠实写老

汉写得好，写农村的各种老头形象写得好。我也不知道怎么形成这个看法的。在我开始写的几个小说里，没有女性，全是男的，有年轻的、中年人和老头，在这些人物里头，大家觉得我写老汉写得最生动。其实，我当时才三十岁，为什么会形成这种印象？我一九七九年在《北京文学》上发表了《徐家园三老汉》短篇小说，我试着同时写三个老头，能不能把他们的性格特征、心理差异写出来，而且还都不是坏老头，三个人都在生产队的菜园里工作，写他们的个性差异，练习写作基本功。

到后来创作发展以后，意识到不能光写男性，也探索写女性，结果写了几个短篇，发表出来以后没有什么反应，没什么人觉得好。第一个有反响的是中篇小说《康家小院》，在上海还获得一个奖，使我感到鼓舞。到《白鹿原》面临一个从基本的生存、合理生存的本能上来反抗封建婚姻制度、封建文化的大命题。最初的小娥形象，涉及的不是孤立的一个女人的命运。关于性描写问题，在我自己心里也有障碍，怕那些熟悉我作品的读者会说：陈忠实怎么也弄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

我小时候目睹过一件事，有一个年轻的女性，不满意婚姻而逃婚，被抓回来后捆在一棵树上，全村的男人用刺刷抽打她。我写小娥被刺刷抽打，就是从这里来的。这是我亲眼看见的惩罚女人的一种残酷行为。为了这个逃婚的女人，村子里的所有矛盾暂时都化解了，凝聚起来惩罚这个女人，这意味着什么？在封建婚姻的是非认定里，是空前一致的，这是我们民族文化心理结构中的一根很重要的梁或柱。

辛亥革命倡导女人放脚，五四运动提倡妇女解放，经历的过程却是十分艰难的。于是，我对写性有了一个基本的把握：如果包含着文化心理的东西，那就写；如果不含这个东西，读者为什么要看你写这

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判断是否属于乱七八糟的东西，或者是人物心理结构中不可或缺的那根梁或柱，关键就在这里。

我以这个来判断，并给自己定了三句话、十个字：“不回避，撕开写，不做诱饵。”以前我都是回避的，这部作品不能回避，而且要撕开写。把握的分寸在于，不能把性描写作为吊读者胃口的诱饵，这是写性的必要性和非必要性的标准。我把这十个字写在我的日历板上，时刻提醒。

第一次写长篇小说，我的心里真的很有压力，为了放松这个压力，我分两步，第一步写草稿，第二步写正式稿。因为人物和情节比较多，穿插结构复杂，合理结构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加上我的老师那句压迫性的话：“提起来一串子，放下去一摊子。”所以我都不敢叫草稿，叫草拟，能把这些人物互相交错的架构摆出来就行了。为了减缓心理压力，保持写作的放松状态，我不在桌子上写，而是在沙发上写。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那时的经济还不宽裕，农村的木匠给我做了沙发。坐在沙发上用一个大日记本放在膝盖上写，写了四十万字，没有上桌子。这种写作方式以前没有过，就是为了减轻心理压力。在日记本上写草拟稿的感觉就是很放松，心里放松就能够展开。初稿实际上只写了八个月，正式稿写了三年，终于完成了这部长篇小说。

在整个写作过程中，我基本过着和当地农民一样的生活。稍微优越一点的是，我十天半月吃一次肉，改善一下生活，而农民大约是逢到红白喜事才能吃到肉。上世纪八十年代，农民就是这个状况。搞专业创作以后，就彻底回到家乡农村，生活形态跟农民差不多。我是一九八二年搞专业创作回到村子的，到一九九三年离开村子。在村子里所有人家的红白喜事，都是聘我当账房先生（哈哈）。包括农民盖房上大梁的时候，要举行庆祝活动，也把我拉去，管烟管酒，还不准我

参加劳动。整整十年我在村里就这么过着。到我筹备写长篇的时候，我家才盖了三间平房，我才第一次有了自己的大约不到十平方米的书房，之前都是在家里搁柴火的房子里，支了一张桌子。我写作只要一张桌子就可以了。我跟人抬杠："母鸡下蛋不下蛋不在那个窝好不好，一只空怀的母鸡，你给它弄到金銮殿上还是下不了蛋。真正怀了蛋的母鸡，即使没有窝，一边走着路它就下蛋了。"（笑声）作家体验生活、感受生活，然后形成作品的成色如何，不在你住得好、穿得好、吃得好，不在这个，关键在你的感受能力和理解能力。所以，我一向不太计较这些东西，在生活形态上没有任何要求，能保持一种纯净的写作心态，最好。

《白鹿原》的出版

小说写完，人民文学出版社拿走稿子之后，还留下一份复印稿，我第一个请人看的，就是评论家、朋友李星。我说："你看一下，谈一下你的感觉。"交给他十天后，我从乡下回到陕西作协，在院子里碰见了他，我问："你看了没有？"他黑煞着脸："到我家说！"我就陪他上到五楼他家。他提着刚从菜市场上买的蒜苗什么的，往厨房里一甩，便进到他的卧室。他突然转过身来，捶了一下拳说："咋叫咱把事弄成了！"我听见这个话，那吊在半空的心，才沉下来。然后，他在房子里根本不坐，也不让我坐，就转来转去，不停地跟我说，小说里的人物、情节怎么好怎么好。全是他在说，激动得不得了。这是这部小说写完后，我听到的第一个读者的声音，是评论家的声音，我很感动。

紧接着，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高贤均看完书稿后的一封来信，让我激动得跳了起来，趴在沙发上，喊了一声，几乎窒息（哈哈）。为什么？这个小说快写完的时候，我家发生了点变化，在西安陪着我孩

子念书的老母亲，身体突然不行了，跟我一直住在乡下的老婆赶紧赶到城里去，这样乡下就留下我一个人，自己写小说，饿了自己煮面条吃，情绪还蛮高的。老婆走的时候，我说："我再进城时小说就写完了。"老婆顺口问了一句："如果你这个小说出版不了咋办？"我说："我就去养鸡。"为什么？我这个专业作家当了十几年，写一个长篇小说出版不了，专业作家还有什么脸再当下去？况且，我的家庭经济状况也不允许我再当下去，我过五十岁了，给孩子还交不起学费，这个专业作家还当到什么时候去啊？所以，看了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高贤均的信，他的评价非常令人激动。我跌倒在沙发上，大叫一声，我老婆从另外一间房子奔过来问："怎么了？"以为我出事了。我的最直接的反应是：可以不办养鸡场了。

好的，今天就讲这些。

2008年4月27日 中国现代文学馆

三十年，感知与体验

——中国著名作家访谈录

邢小利：新中国成立到明年就六十年了，前三十年政治运动不断，以阶级斗争为纲，后三十年改革开放，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奔小康、建设和谐社会。你的人生经历了这个全过程，你是一位亲历者，是一个过来人，我想请你从你的切身体会或者从一些生活细节，谈谈你的生活感受，说说这“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的沧桑巨变。

陈忠实：我只说一件乡村住房的生活事象。

依我生活了大半辈子（我直到五十岁出头才搬进西安）的那个村子为例，解放时三十七户人家，到“文革”发生时的十七年间，已扩大到有近五十户人家的村子，只有三户盖起了宽大的两边流水的大瓦房。平常人家省吃俭用积攒多年，能盖起一边流水比较窄小的厦屋，都是全村人羡慕的大事，可以想见那三户盖起大瓦房的主人在村民中间的影响了。然而，就我亲历的感觉，村里人的反应比较冷淡。原因很简单，那三户人家建造大瓦房的举动，是绝大多数人家可望而不可即的太遥远的事，或者用他们的话说是连想也不敢想的事。我很清楚那三户人家，他们中一户人家有一个在地质勘探队的儿子，另一户人家有一个在煤矿下井挖煤的儿子，都是工人这个阶层收入较高的工种，挣下钱都寄回老家了。上个世纪五十年代建筑材料很便宜，他们很轻易地盖起了让大部分公社社员可望而不可即的大瓦房。只有第三个盖起大瓦房的主户是地道的农民。他在“三年困难”来临的时候，把另一个村子扔掉不种的一小块土地悄悄地栽上了红苕，获得全村人眼

馑的收成，又恰好遇到普遍饥饿的非常时期，红苕的市价超过正常年景里麦子的价格。他仅仅凭着这一年捞得的外快，就盖起三间大瓦房。其余所有村民，都依赖着在生产队挣工分过日子，能吃饱且不欠生产队透支款就不错了，盖房谈何容易。即以我家来说，我哥在乡镇企业工作多年，才盖起两间土坯砌墙的厦屋。我和父母还住在祖传的老屋里，每逢下雨就用盆盆罐罐接漏水。别说盖新房，连修补旧房的资金也没有。一个基本事实摆在这个小村子的编年史上，十七年里，完全依靠公社体制生活的农民，没有一户能盖起三间瓦房，已经不是谁有本领谁无本领的事了，而是在这种生产经营方式之中，任谁都不能盖起三间大瓦房来，且不做深论。

这个村子实行生产责任制是一九八二年秋天，到八十年代中期，不过四五年时间，形成了一个盖新房的高潮，本村和邻村的匠人供不应求。谁家和谁家不做商量，一律都是砖木结构的大瓦房，或是水泥预制板的平顶大房子，并且开始出现两层小楼房，传统了不知多少年的厦屋没有谁再建造了。也是在已经潮起建造新房的颇为热闹的一九八六年春天，我也盖起了三间平顶新房。曾经很得意，尽管是用积攒的稿酬盖房，心理颇类近高晓声笔下造屋的李顺大。二十多年过去，我祖居的这个小村子，家家户户都盖起了新房，二层小楼比比皆是。我想着重说明的一点，这个小村子处于地理交通环境中的一个死角，且不说商品经济的大话，农民进行小宗农产品交换都很不方便，比起那些环境更方便的村子的农民，还显得后进一截。尽管如此，较之公社化体制下的生活状态，也可以说是超出想象的好了。

我的直接经历的生活演变引发的感慨，不是通常的理论阐释所可代替。我上初中的一九五五年冬天，我的村子完成了农业合作化建制。我记着把黄牛交给农业合作社集体饲养以后的父亲坐卧不宁的样

子，给黄牛添草拌料饮水垫圈已成生活习惯的父亲突然闲下来，手足无措百无聊赖。我不仅不以为然，甚至觉得他思想落后。我刚刚在中学课堂上接受了老师宣讲的“集体化是共同富裕的道路”的新鲜理论，不仅完全接受完全相信，而且充满了对明天的美好想象。今天想来，我自小所看见所经历的农家生活的艰难，是渴望改善的基础性心理，很自然地相信老师宣讲的理论了。从初中念书到高中毕业进入社会参加工作，尤其是我在基层乡村人民公社工作的十年，尽管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包括饥饿，我都没有从理论上怀疑过“集体化道路”。对于自六十年代初重提“阶级斗争”再发展到十年“文革”灾难，造成生产队这个最基础的生产单位陷入混乱和无序，架着革命名义的种种矛盾和斗争，使生产遭到数年的破坏。我尽管能看到这些问题，却仍然对“集体化道路”未曾产生怀疑。当八十年代初实行责任制之初，我曾不无担心，单家小户如何实现机械化和水利化，等等。就在我自己躺在堆满小麦口袋上的那个夜晚，才对自少年时代就信奉不渝的理论怀疑了。

时间过去近三十年了，我的经历所引发的生活直感归于沉静。毛泽东在五十年代农业合作化初期所写的大量“按语”，既坚信不疑又热情洋溢，几乎全是诗性的语言，这是我信奉“集体化共同富裕道路”的理论基础。且不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句俗话，一种美好的愿望和坚定的理论支持的信念，经过十亿农民近三十年的实践，结果却是仍然由农民个体经营土地效果最好。我的心理感受很难归入“河东河西”那种感慨，又一时说不确切。还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话可靠，只是这个检验过程未免太长了。就我个人而言，从少年时期的信仰到整个青年时期投入的实践，却仅仅证明了这条道路的不可行。好在进入中年之后，我的专业转移到文学创作，那种体验和感受就具有了另外的意义和价值。

邢小利：中国的社会改革最初是从农村开始的，从你上个月才去参观考察的安徽省凤阳县小岗村起根发苗，你也长期生活和工作在农村，你对中国农村社会和农民生活是相当熟悉的，而且至今非常关注农村，研究农民。请你谈谈农村这三十年来的变化，包括农业生产经营上的、农村生活方式上的、农民文化心理上的变化。还有，你是如何认识农村城市化的。

陈忠实：中国的改革首先是由农村发起的。这是事实，也可以说业已成为历史。如果要问为什么改革会在相对落后的农村首先发生，我能想到的诸种因素中最突出的一点，便是饥饿。在此之前的中国，城市人凭粮票吃饭，有的家庭尽管也存在口粮不足的现象，但毕竟有一个虽不宽裕却可以保证基本生活的粮食，做点稀稠搭配就可以从月头过到月末不致断顿儿。农村没有这个基本保证的粮票，全靠生产队土地上的丰歉，决定家家户户碗里的稀稠以及有无。决定土地每年丰歉的直接因素，除了自然灾害之外，便是生产队的管理和经营。仅以我生活和工作的号称八百里秦川的边沿灞河岸边的农村来说，最大的一种自然灾害是干旱，却不是年年发生，一般都是隔几年才有稍微严重的一次。在这方史称粮仓的渭河平原，口粮不足始终是一个困扰家家户户的最突出的问题。记得我在公社（乡镇）工作的十余年里，每到春二三月，近一半生产队的队长紧紧盯着公社，几乎天天跑公社找领导要救济粮。谁都明白，在这样好的条件下仍然吃不饱肚子，是生产队管理和经营不好造成的。不是个别而是普遍发生管理和经营不好的现象，且是一个持续始终的问题，就没有谁再敢深究了，只是用当时流行的政治口号去解释，诸如未“突出政治”，没有抓“阶级斗争”这个“纲”，等等。就我个人而言，我相信“集体化”是中国农民共同富裕的道路，即使饥饿始终是一个难以改变的普遍现象存在着，也没有怀疑过“集体化道路”。不是胆量大小的事，确凿是一种理论的信仰。安

徽小岗村的十八个农民不仅怀疑了，而且做好了以生命为代价的挑战，私自实行土地分户经营。

在这十八户农民秘密分田到户三十年之后的今年春天，我终于有机缘走进了小岗村。三十年前他们冒着坐牢杀头的风险所干的事，早已通行全国所有乡村，今天听来看来颇觉一种不可思议。然而，在亲身经历过那个年月的我来说，却几乎有一种感同身受的心情。我握着当年策划这场分田到户事件的生产队队长的手时，是真诚的崇拜和钦佩。我想到我在分田到户第一年的情景，我的妻子和孩子也分得了土地，第一个夏收的某个夜晚，我躺在堆积着装满麦子的口袋摞子上的时候，首先是一个农民的共同感觉，身下的这一堆麦子，足够畅畅快快食用两年，夏季一料收成就解决了困扰多年的吃饭问题，而且全是被称作细粮的麦子，那种喜悦和舒坦是无与伦比的；我比农民可能还多了一种感受，是自少年时期就接受并信奉不疑的"集体化道路"，就在我躺在那一堆属于自己的装满麦子的口袋摞子上的夜晚产生了深深的怀疑，隐隐感到一个苍白的心理空洞，那是我为这个真诚的信奉做的许多工作说的许多话写的许多文字一旦消解，必不可少会发生的心理感觉，与彻底解除吃饭问题的舒坦心情形成一种矛盾，或者说不协调。

三十年过去，吃饱穿暖早已不再成为农民的一个问题，很快凸显出来的问题是获得富裕的新途径，几乎无可选择地走向城市，尤其是青年男女。就我眼见的乡村，走进村子几乎看不到年轻人，只有老汉老婆和被儿子留下的小孩。我解开这个谜是在九十年代出访美国的时候。我乘火车从美国东部往西部旅行，正当小麦泛黄时节，田野上是一眼看不尽的麦田，却看不到一个农民聚居的印象里的村庄，只有几乎淹没在麦田里的一户农庄主的建筑物。无须介绍，我能想到这堆建

筑物四周的不知几千公顷的麦田，就属于这个农场主。我也大体会算一笔大账，这么多的麦田收获的总产量，在我这个出身农家的人来说，当是一个天文数字且不论，即使一公斤麦子赚一毛钱，纯收入也是一个天文数字。我的家乡农民人均一亩地，即使亩产四百公斤，即使一公斤小麦赚五毛钱，也很难致富。道理很明白，除了一家人食用，所剩余的粮食有限。我也同时明白，中国无论山区无论平原的农民，都清楚那一亩地是难得致富的，谁和谁不用商量，都奔城市挣钱去了，形成一个新的群体——农民工。这个庞大的群体承载着现代化城市建设和发展的基础性工程，铁路公路建筑以及国营私营厂家商家的用工，多为民工，他们做着最粗笨的劳动，收入的报酬大多是最低的档次，且不说干了活不给钱的事。在这个庞大的群体里，有一部分优秀分子，已经提升起来，成为某项专业的骨干，个人素质也陶冶质变，成为现代社会健全健康的新人。这是令人感奋的一个现象，在于富有中国特色的城市和乡村的融化过程，也在于乡村向城市的蜕变过程，可以想见其漫长，但毕竟发生了，也开始了。

邢小利：你从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就开始创作，“文革”搁笔，到了上个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又开始了文学创作，但你创作的旺盛期和成熟期则在改革开放时期。无疑，改革开放给你的文学创作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也提供了一个比较好的文化环境和创作环境。这其中，是哪些人和事以及社会思潮对你的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促使你的创作发生根本性的转变？你自觉地反思自己的文学事业，都是在什么情况下进行的？这种反思对后来的创作最有影响的有几次？

陈忠实：我是一九六五年发表散文处女作，截止到“文革”发生的大约一年半时间里，发表过六七篇散文和诗歌。中止写作五六年后的“文革”后几年，作家协会又恢复工作，停刊的《延河》改为《陕西文

艺》重新出版，老作家还无法进入创作，刊物以业余作者为主体，我每年写一篇短篇小说在《陕西文艺》发表。我把这几年的写作称作"过写作的瘾"。每年写作和发表一个短篇小说，过一过文字写作的瘾，这是我的特殊感受。我的主要工作职责是"学大寨"，常常是把被卷从这个村子背到另一个村子，或是从一个刚刚结束的农田基本建设指挥部，再搬到另一个刚刚开始的新指挥部里。一九七八年初夏，我在治理灞河的指挥部里，看到了《人民文学》杂志上发表的刘心武的小说《班主任》，且不说对这篇小说的读后感，心中潮起的却是一种改变我人生道路的强烈意念，这就是，文学创作可以当作一个事业来干的时代终于到来了。这是《班主任》给我艺术欣赏之外的一种前所未有的强大信息。我把八华里的灞河河堤工程按期完成，便调动到当时的西安郊区文化馆工作，唯一的目的，文化馆比之公社（乡镇）要宽松得多，有充裕的时间读书和写作。从这个时候起，写作不再是一年一篇的"过瘾"，而是全身心地投入和追求，是一种永久到终生的沉迷。

我第一次清醒而认真的自我创作反省，就发生在调入文化馆的一九七八年秋天和冬天。既然要把文学创作当作事业来干，深知自己的基本装备太差，我没有机会接受高等文科院校的教育，自学造成的文学知识的零碎和褊狭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我自初中喜欢文学以来，是中国文坛一年紧过一年的阶级斗争理论和极左的文艺理论一统的天下，我必须排除这些非文学因素对自身创作的限制，获得文学创作的本真意义，才可能开始真正的文学创作。我那时能想到的最切实的途径是读书，以真正的文学作品剔除极左的非文学因素对我的影响。我那时以短篇小说写作为主，就选择了契诃夫和莫泊桑。我把"文革"中查封的这两位短篇小说大家的小说集从图书馆借来，系统阅读。后来又偏重于莫泊桑的作品，唯一的因由是他以故事结构小说，比较切近我的写作实际，而契诃夫以人物结构小说的手法很难把握。我通读了

莫泊桑的几本短篇小说集，又从中挑选出十来篇我最欣赏的不同风格不同结构的小说，反复阅读，解析精妙的结构形式，增长艺术见识，也扩大艺术视野。极左的非文学因素在真正的艺术品的参照性阅读中，比较自然地排除了。这种阅读持续到整个冬天，春节过后，我便有一种甚为强烈的创作欲望涌动起来，心力和气力空前充实，便开始短篇小说创作。这一年大约写作发表了十余篇短篇小说和小特写，其中《信任》获一九七九年全国短篇小说奖。

再一次认真的反省是由同代作家路遥的《人生》引发的。中篇小说《人生》和据此改编的同名电影，在读者中引发的广泛而强烈的反应是空前的。我在为这部小说从生活到艺术的巨大真实所倾倒的同时，意识到《人生》既完成了路遥个人的艺术突破，也完成了一个时期文学创作的突破。首先是高加林这个人物所引发的心灵呼应和共鸣，远远不止乡村青年，而是包括城市各个生活层面的青年，心灵的呼应和共鸣同样广泛同样强烈，高加林是一个此前乡村题材小说中完全陌生的形象，堪为典型。再者，《人生》突破了乡村题材小说创作的另一个普遍性局限，即迫不及待地编造和演绎政策变化带来的乡村故事，把农民丰富的内心世界囚拘于褊狭的一隅，等等。我对这两点感受尤深，在于我的创作一直和生活保持着同步运行的状态，敏感着生活发展中的每一声异响，尤其是乡村生活的演变，我也避免不掉图解政策的创作倾向。由《人生》引发的反省，使我看取乡村生活的视角由单一转化为多重，且获得创作的拓宽，不再赘述。

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的一次反省，是由一种新颖的写作理论引发的，即“人物的文化心理结构”说。我一直信奉现实主义创作最高理想，创作出典型人物来。然而，严酷无情的现实却是，除了阿Q和孔乙己，真正能成为典型人物的艺术形象，几乎再挑不出来。我甚至怀

疑，中国四大名著把几种性格类型的典型人物普及到固定化了，后人很难再弄出一个不同于他们的典型人物来。我在八十年代中期最活跃的百家学说争鸣过程里获益匪浅，尤其“人物文化心理结构”学说使我茅塞顿开，寻找到探究现实或历史人物的一条途径，也寻找到写作自己人物的一条途径，就是人物的本质性差异，在于文化心理结构的差别，决定着一个人的信仰、操守、追求、境界和道德，这是决定表象性格的深层基础。我把这种新鲜学说付诸创作实践，完成了《白鹿原》人物的写作。为了把脉人物文化心理结构变化的准确性，我甚至舍弃了人物肖像描写的惯常手法。

我得益得助于新时期文艺复兴的创作浪潮的冲击，不断摒弃陈旧的创作理念，从优秀的作品和理论中获得启示，使我的创作获得一次又一次突破。我个人的心态也决定着创作的发展，我一直在自卑和自信的交替过程中运动，每一次成功的反省使我获得寻找的勇气和激情，也获得自信；而太过持久的自信，反而跌入自卑的阴影之中；要解脱自卑，唯一的出路就是酝酿新的反省，寻求艺术突破的新途径。

邢小利：你的长篇小说《白鹿原》大约从一九八六年开始构思和进行艺术准备，一九八八年动笔，一九九二年完成。这一段时间正是中国社会由风云激荡的八十年代向冷静现实的九十年代转变之时，市场经济逐渐取代计划经济，社会心理包括一些作家的创作心态都比较浮躁，你当时的心理状态是什么样的？你怎么能、怎么敢沉下心来，居于乡间，写你的《白鹿原》？《白鹿原》之所以顺利问世并获得强大的社会反响，与当时的社会情势比如邓小平南方讲话有无关系，有多大关系？

陈忠实：我的心态用两个字可以概括，就是沉静。

我之所以能保持一种沉静的写作心态，与我对文学创作的理解有关。

一九八二年年末，我获得了专业创作的条件。我当时最直接的心理反应只有一点，我已经走到自己人生的最理想境地，可以把创作当作自己的主业来做了，而且名正言顺。这件具有人生重大转折意义的好事的另一面，便是压力，甚至可以说成是压迫，必须写出好作品来，不然就戴不起“专业作家”这顶被广泛注目的帽子。我几乎同时就做出了符合我个人实际的选择，不仅不搬进作协大院，反而从城镇回归乡下老家，可以平心静气地读书，可以回嚼我在区和乡镇二十年工作积累的生活，也可以避开文坛不可或缺的是是非非，免得扰乱心境空耗生命。我家当时的条件很差，住房逢雨必漏，我的经济收入还无法盖一幢新房子，更不奢望有一间写作的书房。我在一间临时搭建的小屋里，倚着用麻绳捆绑固定四条腿的祖传的方桌，写我的小说，而且自鸣得意，有蛋要下的母鸡是不会择窝的，空怀的母鸡即使卧到皇帝的金銮殿上，还是生不出蛋来。

我住在乡下却不封闭自己，尤其是文学界一浪叠过一浪的新鲜理论和新鲜流派我都关注。八十年代的中国文学是最活跃的时期，有人调侃说那些新的流派是“各领风骚一半年”。我虽然不可能今天跟这个流派明天又跟那个流派，但各种流派的最具影响的代表作我都要读，一在增长见识，扩大艺术视野，二在取其优长，丰富我的艺术表现手段。譬如“寻根文学”，我曾经兴趣十足地关注其思路和发展，最后颇觉遗憾，它没有继续专注于民族文化这个大根去寻找，却跑到深山老林孤寺野洼里寻找那些传奇荒诞遗事去了。我反倒觉得应该到人口最密集的乡村乃至城市，去寻找民族文化之根，寻找这个民族的精神和心灵演变的秘史，《白鹿原》的创作思考，这是一个诱因。

在《白鹿原》构思和写作的六年时间里，是我写作生涯最为专注也最为沉静的六年。这种沉静的心态不是有意的，而是自然形成的，决定于两个因素，首先是这部作品的内容，正面对我们民族最痛苦也最伟大的一次更新，即从业已腐朽不堪的封建帝制到人民共和国的彻底蜕变，我感受感知到一种自以为独自的体验和理性的理解，也产生了以往写作中从未有过的庄严感，很自然地转化为沉静的写作心态。再者，纯粹出于自己追求文学创作的心理感受，我计划这部长篇小说需三年写完，那时我就跨进被习惯上称作老汉的年龄区段了，第一次感觉到生命的短促和紧迫，似乎在平生追求的文学创作上还没写出自己满意的小说，忽然就老了。我的切痛之感也发生了，如果死时没有自己满意的一部小说垫棺作枕，我一生的文学梦就做空了。我是为着死时有一本可以垫棺作枕的书进入这部小说创作的，社会上潮起的诸如“文人要不要下海”的讨论，基本涉及不到我的心态。我只是注重一点，把已经意识到的内容充分表达出来，不要留下遗憾，这是形成沉静的写作状态的又一个纯属个人的因素。

在写完这部小说时曾有一点担心，怕出版社发生误读不能出版，一九九一年被普遍看作是文艺政策有“收”的倾向。在我对小说做最后的润色和校正的一九九二年初，一个早春的早晨，我用半导体收听每天必不可缺的《新闻联播》时，听到了邓小平南行讲话，竟然从屋子里走到院子，仰脸看刚刚呈现到屋檐上的霞光，心里涌出的一句话是：这部小说可以投稿给出版社了。

邢小利：《白鹿原》发表和被移植到不同的艺术形态后，你的文学心路历程是怎样的。一、你的文学观念有无变化或深化（包括从各种改编中意识到的）？二、你的文学事业的设计有无更新？三、你对自己所取得的文化影响力（包括获茅盾文学奖）是如何认识、评价和

使用的？四、你是怎样和新生代作家在文学活动中相互对话、交往的？五、面对大众文化的冲击和商业文化的侵蚀，加之一些文化机构的官僚化，你有无一种“文化无聊”的感觉？这些和你既有的艺术人格有无冲突？你是如何应对的？六、文学依然神圣的信仰有无变化？

陈忠实：这部小说接近完成时我曾奢望过，如果能顺利出版，有可能被改编为电视连续剧，其他艺术形式的改编几乎没有设想过。果然，《白鹿原》刚刚面世，南方北方和陕西当地有四五家电视制作人找我谈电视连续剧改编。出乎我的意料，最早看好的电视连续剧改编至今未有着落，倒是不曾预料甚至完全料想不到的几种艺术形式都改编完成了。最早改编并演出的是秦腔《白鹿原》，接着是连环画，稍后是话剧和舞剧，还有完全意料不到的三十多组《白鹿原》雕塑，电影《白鹿原》已经搞了七八年，现在还未进入拍摄阶段。在两家广播电台几次连播之后，今年初西安广播电台又以关中地方语播出。作为作者，这是远远超出期待的劳动回报。我不止一次很自然地发生心里感动，也反省作为平生不能舍弃的文学创作的原本目的，在我只有一点，就是把自己对现实和历史的独有感知和独自理解表述出来，和读者实现交流，交流的范围越广泛，读者阅读的兴趣越大并引发呼应，这是全部也是唯一的创作目的的实现，是无形的却也是最令作者我心底踏实的奖赏，创作过程的所有艰难以至挫折，都是合理的。我收到很多读者来信和电话，往往会为他们对某个人物某个情节的理解而深为心动，丝毫也不逊色各种奖励。决定一部小说生命力长久短暂的唯一因素，是读者，这是任谁都无可奈何的冷峻的事实。

下面依次回答你的几个问题：

一、关于文学理念。

这个题目太大，我只说感知最深的一点。

作家要体验生活，这是常挂在嘴上的话。我至今仍然信服这个话，但应承认体验生活的各种不同的方式。我在八十年代末到九十年代初，意识到了作家的生活体验和生命体验的巨大差异。这是我从阅读中领悟出来的。我觉得实现生活体验的作品很多，而能完成生命体验的作品是一个不成比例的少数；对一个作家来说，有一部作品进入生命体验的层面，却无法保证所有创作都能保持在生命体验的层面。让我感到最富启发的是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的几部小说，从《玩笑》到《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昆德拉实现了从生活体验到生命体验的升华，或者如同从蚕到蛾的破茧而出的飞翔的自由。《生命》之后的小说，似乎又落在生活体验的层面上。

我对颇有点神秘的生命体验难以做出具体的阐释，却相信从生活体验进入生命体验的诸多因素中，作家的思想是至关重要的一个。思想决定着作家感受生活的敏锐性，也决定作家理解生活的深度，更决定着对生活理解的独特性，也可以看作是作家对生活的独自发现。那些在我感知到生命体验的作品，无不是深刻的思想令人震撼，倒不在通常所见的曲折情节或生活习俗的怪异所能奏效。即使生活体验的小说，也因作家思想的因素决定着作品的深刻程度，这在同一时期的同类题材的作品中，分明可见。譬如《创业史》在十七年的农村题材的一批小说中，柳青是开掘深刻体验深刻的佼佼者，在于他的思想的深刻性和独到性，且不说艺术。

二、关于文学事业的设计。

《白鹿原》书刚面世时，记得我和李星的一次对话中谈到，往后将以长篇小说创作为主。这是当时的真实打算。我在新时期文艺复兴

的头几年，集中探索短篇小说的各种表述形式；在第一个中篇小说《康家小院》于一九八二年末顺利写成之后，便涨起中篇小说写作的浓厚兴趣，偶尔穿插写些适宜短篇素材的小说；在《白鹿原》顺利出版并获得较热烈的评说时，很自然地发生对长篇小说创作的兴趣，曾想试验长篇小说的不同艺术表述形式。

连我自己也始料不及，这种兴趣很快消解，甚至连中短篇小说写作的兴趣也张扬不起来，倒是对散文写作颇多迷恋，写了不少感时忆旧的散文。我没有强迫自己硬写，倒有一种自我解脱的托词，中国现在不缺长篇小说。

三、关于文化影响力。

这是一个在你之前没有谁向我提出过的问题。我没有稍微认真地想过这件事。我只有一些直感的事象，诸如读者对这部小说的阅读兴趣，从出版时的畅销到持续至今十五年的长销，我走到东部西部南方北方所感受到文学圈外的社会各层面的读者的热情，切实感觉到作为一个仅写出一部长篇小说的作家的荣幸。

这些事象给我的最直接的影响，就是要写被读者普遍感兴趣的作品，即使一个短篇或一篇散文，也得有真实感受，不可忽悠读者。我也钦佩茅盾文学奖评委，在《白鹿原》一度发生某些误读的情势下，坚持使其评奖，显示的是一种文学精神。

我没有使用这种影响力做个人的事，倒是应邀参与过一些社会文化活动。

四、关于和新生代作家的对话和交往。

我尊重各个年龄层面的作家的创作，这不是个人修养或处世姿态，而是因为我的整个学习创作历程决定的。我从写作小散文到写短篇再到长篇小说，从业余作者到专业作家，从没什么影响到有一定影响，其中免不了大大小小的挫折。依着这个过程的人生体验和对文学创作不断加深的理解，我敬重各个年龄层面上正在探索自己艺术道路的作家。

我和新生代作家的交流方式是阅读他们的作品。我对他们作品的基本态度，是多看他们的用心所在，发现他们独有的艺术特质，并予以彰显。但我把握一个基本准则，绝不乱吹，以至像某些抛出的彩球高帽把作者自己都吓住了。我面对作品，基本不考虑与作者的远近或亲疏。

五、关于大众文化和商业文化。

你提出的这个问题，我已和不少人讨论过。我先讲一个对我颇多启发的经历。我十多年前到美国，有一次从东部到西部的火车旅行。火车站台上有一个自动售书台，乘客上车时花小钱拿一本书到车上读，到目的地下车时，我看到不少人把书扔到门口的一只箱子里。据说，有一些专门写作这类供旅客在旅途解闷打发时间的读物的作家，经济收益颇丰。可以想见这类包括小说在内的读物会是什么内容，海明威的作品肯定不会摆在那里。

商业社会产生商业文化是必然的。纯文学作家不要太在意商业文化对自己的威胁，倒是应该涨起自信，以自己的艺术魅力拥有读者。要相信人群中有大量不甘局限于消遣阅读的读者。

六、关于“文学依然神圣”的信仰。

“文学依然神圣”这个话是我在一九九四年说的。那时候之所以说这种话，就是文学已经面临着商品经济的冲击，也面对着商业文化的冲击，文学似乎不仅不神圣，甚至被轻淡了。我缺乏对正在发生着的社会气象的理论判断，往往会找参照物来做参考。我那时所能选择的参照对象便是欧美那些老牌商品经济的国家，他们的纯粹作为商品赚钱的文化和艺术品制作，太久也太发达了，枪战片色情片和荒诞片，卖到世界的各个角落。然而并不妨碍产生一个又一个伟大作家和伟大作品。可以看出一个基本事实，商品文化和有思想深度的纯文学各行其道，各自赢得各自的读者；谁都取代不了谁，证明着社会人群的多重需要。我想我们也会是这样的。“文学依然神圣”这话说过十四五年后的今天，我们的快餐性的消费文化已经获得大面积的多样化的繁荣，而依然追求纯文学理想的作家创作的作品，更是一个空前繁荣的态势，单是长篇小说，每年据说有两千部出版。我很感动，有多少有名的和暂且无名却待时破土而出的年轻作家，全心专注于神圣的文学追求啊。我被他们感动着，怕是很难变了。

2008年5月22日 二府庄

让生活升华为艺术

——答《文化艺术报》贾英问

记者：《白鹿原》已经出版了十五年，可是直到今天依然魅力不减，这次又作为唯一一部当代小说入选了“三十年三十本书”文史类优秀读物，您觉得原因何在?

陈忠实：我写的是前五十年的事情，之所以能够为当时和今天的读者所理解，实际上还是缘于一个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的问题，这是作家创作所面对的最基本问题。

从生活真实升华到艺术真实，这是我这一生追求的创作境界，也是我作为一个读者在阅读中所体会到的。在我的阅读过程中，我发现能否由生活真实过渡到艺术真实，对于一个作家来说，至关重要。只有不断地完成一次又一次突破，让读者在感受到一种艺术真实美的同时，还感受到生活真实的美，这样的作品才会受到读者喜爱。

面对同一段历史、同一段生活，不论是历史的还是现实的真实，不同作家所感受到的生活内涵差异很大。比如，同样写农业合作化，柳青那个时代出了七八部关于这一题材的长篇小说，而唯独《创业史》成为其中的代表作。为什么柳青的作品能够独具魅力呢？这是我长期以来所思考的问题。我想，除了柳青创作作品的语言美以外，更具影响力的应该是作家的思想。作家思想的深浅，直接决定了他感受、理解生活的深浅。柳青写农业合作化，并没简单地只写合作化这条路子有多么好，而是写出了我们能感受到的农村生活的发展变化和中国农民的真实生存形态，以及农民的命运转变过程。从这部作品

中，你能感受到一种深重的历史，一种中国农民从几千年前发展到上世纪五十年代时，他们所具有的独特的心理形态和精神形态。这就显示出，柳青这个作家具有比较深刻的思想，正是这思想使他所感受到的现实或者历史是深刻的，耐人咀嚼的。当我面对自己的作品，我也努力用自己的思想去感受、感知我所要描写的那个年代的生活进程，在此基础上，能够比较深刻地感受生活，从而完成由生活到艺术的升华，这是我写作的最高命题。

记者：听说您前年出访俄罗斯时，由于时间关系没去顿河平原，只去了托尔斯泰故居、陀思妥耶夫斯基故居和普希金墓。这些俄罗斯作家中，您最喜欢哪位？他们对您产生了什么影响？

陈忠实：有好多作家的作品影响过我对文学、对创作的理解。比如，苏联作家柯切托夫，他的七八部长篇小说我都读过，尤其他那部《州委书记》，如果把其中的苏联人名字换成中国人名字，就像在中国发生的，非常真切。普希金、莱蒙托夫、屠格涅夫笔下的许多人物形象都令我印象深刻。雨果的《悲惨世界》我也很喜欢。不过最早产生影响的当然是俄国作家肖洛霍夫，我读他的《静静的顿河》时，还是在上初二的时候。《静静的顿河》是我接触的第一部文学作品，这部作品一下子为我打开了另外一番天地。我当时还没有出过西安城，却通过这部作品感受到了哥萨克的民族风情。虽然那个年龄段的孩子还不能完全理解这部小说，但它最起码的功能是将一个农村少年的眼界扩展开了。后来我又接触了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这是写苏联集体农庄生活的，也写得相当好。

记者：您是否也受到了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

陈忠实：我算是最早读《百年孤独》的中国读者之一。当年《十月》杂志首次在国内发表《百年孤独》。一次，我和《十月》杂志的一位编辑一起开会，他正拿着《百年孤独》的校对稿，交谈以后，他答应刊物一出来就寄给我。于是，我就这样成了中国首批接触《百年孤独》的读者。这部作品对我最大的启发在于，我开始思考作家应该如何面对自己民族的生活和历史。

马尔克斯的魔幻现实主义在作品中的具体体现是人畜互变，马尔克斯用自己民族的民间传说隐喻民族历史的种种变数，非常恰当。但这很显然不能直接拿来用在表现我们中国人生活的作品里。因为人畜互变是拉美民间传说中的东西，而不是我们的，我们对这并不熟悉。于是，我开始试着用自己的眼睛和思维去面对我们民族的历史。虽然我们不怎么讲人变狗、人变猪的传说，但是我们有关于鬼神的传说。“鬼”在我们的乡村，尤其是解放前的乡村生活里非常盛行。在《白鹿原》之前，我从未将鬼神的东西引进作品，但是受到《百年孤独》的启发，在构思《白鹿原》这部小说时，第一次认真地来面对鬼。我从小害怕两样东西——鬼和狼，鬼比狼还要可怕。我还不识字的时候，就听乡里人说谁碰见鬼了，听着就打冷战。不过，如果仅仅从封建迷信的角度将鬼神传说引进小说中，这就失去了运用这些传说的意义，应是在对刻画人物或推动情节发展有利的情况下，才能适当地将传说引进去。后来，我就选定将《白鹿原》中的人物命运和“鬼”联系起来，运用“鬼”来烘托人物的性格。有个情节是，小娥死了后鬼魂附体。这是我从小就在农村看到的表演鬼魂附体的情节，不知看了多少回！书中，鹿三杀死了小娥，小娥变成鬼后首先就要报复他，小娥的魂就附着在了鹿三的身体上，通过他来说明事情的真相。从鹿三的心理上来看，他本是多么善良的一个人啊，杀人以后，背上了很大的负

担，心理压力过重必然导致了鬼幻的情景出现，这实际上从心理学角度解释了鬼的传说。

记者：改革开放三十年中国经历了巨大的变革，您认为这为文学提供了怎样的机遇和空间?

陈忠实：改革开放以后，尤其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我们的文学极大地繁荣。新世纪以来，每年都要出版一千多部长篇小说，这是一个惊人的数字。要知道，新中国成立至一九六六年的十七年中，我国出版的长篇小说才六七百部。长篇小说反映了各个领域的社会变迁，从历史到现实，从农村到城市，乃至军事题材、青少年题材，作家都做出了自己的充分表述，这很不容易。这种繁荣的景象是前所未有的。而剧烈变革的时代，往往含有某种相似之处。我们改革开放是解放思想的过程，把人们从极左的心理、禁锢的思想中解放出来，形成一种新的思维，这也导致人的心理结构被颠覆。一九七八年以来的解放思想历程，如果文学能够恰如其分地表现，就会让读者感受到一种精神心理上的强烈共鸣。

2008年12月 二府庄

再说那道原

——答《陕西日报》杨小玲问

记者：陈老师，您的小说《白鹿原》让广大的中外读者知道了您的家乡白鹿原，他们中间的许多人甚至专程前来陕西实地寻找，我们想知道您记忆里的白鹿原是个什么样子？

陈忠实：最早的记忆，自然是幼年时留下的。上原去，到原上去。这是村子里包括我父母常说的口头话。到原上去干什么，不外乎走亲戚、办事。我的那个小村子紧贴着白鹿原的北坡坡根，家家在北坡上都有土地和祖坟；村子前头有灞河，也就有自流灌溉的旱涝保收田，包括水稻。人们通常不说这道原的名字，省略了，不会和别的原混淆。我很长时间只知道这道原的名字叫狄寨原，到成年后才知道叫白鹿原，再后来又知道了这道原还有一个名字叫灞陵原。如果要排顺序，白鹿原是最早的名称，得之于"有白鹿游于西原"的神话，蓝田县志的《竹书纪年》有记载。汉文帝逝后葬于这道原的北坡，当地人称凤凰嘴，两边的原坡的地形像凤凰伸展的翅膀，中间突出的三角形墓地像凤凰的头。《史记》里《鸿门宴》中"沛公军灞上"，就是这块地方，即白鹿原西头。自汉文帝埋葬于此后，这道原又称灞陵原，傍白鹿原而依灞水。灞陵原多见于典籍文字和古诗词，民间口头称呼不多。大将狄青后来又在白鹿原西头屯兵扎寨，随后又称狄寨原，一直通称到现在，以致当地人把白鹿原的名字都失传了。解放时有狄寨乡，后来有狄寨人民公社，现在有狄寨街道办事处。

至于我对白鹿原的记忆，小时候在原坡上割草逮蚂蚱，成年后在原坡上翻地、种麦、割麦，春节等农闲时节到原上那些大村庄看秦腔戏和规模壮观的社火。更难以忘记的是，尚未成年的我，挑着从河川菜园里趸来的大葱、茄子、西红柿等时令蔬菜，到原上的集镇卖掉，有时到村庄里叫卖，每次能赚一元钱就知足了，到开学时就攒够学费了。那时候原上缺水，吃菜靠原下人供应。

当我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面对这道原时，竟然感知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鲜活和沉重。

记者：稍稍留意就不难发现，现在的白鹿原上兴起了一股文化教育热，掐着指头算算有西安思源学院、西安海棠学院等七所大学，令人惊奇；同时，有模有样的白鹿原风景旅游区也正在筹建中。那么，我们想请陈老师谈谈一部成功的文学作品对文化、旅游、教育的影响何在?

陈忠实：这七所大学已经在这道古原上形成了一种甚为强大而又新鲜的气魄。西安思源学院是这道古原上的第一所高等学府。记得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周延波先生约我参加一个座谈会，即他想到原上创办大学的意图。我是热烈而真诚地表示赞成的。不单是结束本来没有高等学府的历史，不单是将会在中国人口结构中增加多少接受高等教育人群的比例，我同时意识到某种无形的影响，即一所高等学府对一个相对闭塞地区的文明进步的影响力，几乎是看不见的，却又是不可估量的。现在，大学办成了七所，那种无形的对于古原文明进程的影响，无疑更不可估量了。

关于小说《白鹿原》对地理上的白鹿原的文化、旅游、教育的影响，我不敢居功，更不敢吹牛，也很难做量化考量。在我看来，几所

大学的兴办，其选址必然要经过多种有利因素的科学考证，绝对不会因为一部小说《白鹿原》的成功与否成为主要依据。在我看来，这儿的地理环境是第一要素，高于平川，视野开阔，却比山区交通便达；和西安城区的繁华热闹拉开间距，去除了城市喧嚣，成一方做学问的清静之地，又和城市相距不远，有利于交流，等等。

一部小说对一方地域的影响，也有。譬如《白鹿原》，我直观且唯一敢肯定的效应，是把这道原的极富诗意的名字——白鹿原，重新打响了。喜欢《白鹿原》的读者，得知真有一个白鹿原，且离西安不远，总会有不同程度的神秘感。正是这种神秘感，给我招惹来诸多意料不到的热闹，不仅陪国内的一些友人到原上逛景，还陪一些外国友人到原上村庄考察风土民情，记得有韩国、日本、越南、英国等国家的留学生和文学研究工作者。其实，在我作为一个读者读那些自己喜欢的小说时，也产生对小说所写的地理背景的神秘感，只是去不了。有幸的是后来去了托尔斯泰的故居——被托尔斯泰称作“林中那块阳光明媚的草地”的时候，反倒愈觉得神秘了。我到美国南方时，距离福克纳故居不远，很想去看看被他称作“地球上邮票大的地方”，那是他的故乡，也是他一生不曾远离的“生活根据地”，却因故未能成行，留下遗憾。再如近在身旁的柳青长期生活和创作的终南山下的蛤蟆滩，我已不记得去过多少回了，印象最深的一次，是我约了二三文友，到柳青住过的业已垮塌的崖畔的房前，寻找柳青的遗韵，也到蛤蟆滩的小路上漫步，感受梁生宝和合作社社员栽水稻的劳动气氛。

我的家乡白鹿原，不仅发展起来七所高等院校，不仅开发历史景观——汉文帝和他的母亲和夫人墓冢，不仅开发鲸鱼（荆峪）沟和北坡，而且原上原下的樱桃种植已成规模，已名噪省内外。五一节假开始，西安市民结伴上原摘樱桃，成为意趣无穷调节生活的好去处，原

上原下种植樱桃的乡党也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这已与《白鹿原》没多大关系了，是家乡灞桥区因地制宜又得心应手的乡村致富的杰作。

记者：我们知道，与您相关的“白鹿书院”和“陈忠实文学馆”皆设在西安思源学院内，您如何评价这之间的关系？又对“白鹿书院”和“陈忠实文学馆”有着怎样的设想和期待？

陈忠实：“白鹿书院”最初的动议是两三位中年学者提出的，并广泛征求了一些资深学者的意见，后来才说给我。我初听时颇多心理障碍，在于自知国学本来就是一块缺失之地，很不自信；书院在我意识里又是传统国学的神圣所在，绝不敢冒昧。后经他们耐心说服，说明了现代书院的新的议题，也确凿架不住创意者的热心，“白鹿书院”便成立了。“陈忠实文学馆”是书院成立并活动了一年后，由书院常务副院长邢小利提出的。他感觉到我的相关资料的散乱无序，需要整合和保存，也给有兴趣的研究者和读者提供较翔实的资料，才有此动议。

无论“白鹿书院”或“陈忠实文学馆”，都是得到思源学院院长周延波的支持，甚为顺利地办成。我充分感知到这位周院长的事业心和文化意识，才不惜投入财力、物力兴办这些没有直接经济效益的文化和文学事项。得力于他的支持，“白鹿书院”成立以来每年都有一两次较大的学术活动，邀集全国专家学者聚首发表独立见解，活跃了学校的学术气氛，当属难以量化的效益。再者，书院和文学馆开展的小型的也更方便的交流活动，常有一些学术界和文学界难得请到的学者、作家，在专项活动的间隙，给思源学院的师生做学术报告，可以说得天独厚独得偏食，活跃了艺术气氛，见识了各路名家的独特思维，无疑可以启迪思路，开阔眼界。

无论书院或文学馆，都是初创，尚无既成经验可效仿。如何选择有益于社会也有益于教学运行的话题，都是正在探索的事。总体而言，能为文化和文学的发展有促进，也能为白鹿原上第一所大学的良性健全的发展产生效益，无疑是努力的着重点。

2009年6月14日 二府庄

关于读书

——答《深圳商报》记者问

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构建

《文化广场》：二〇〇八年深圳读书月，您的小说《白鹿原》入选“三十年三十本书”，您代表为三十年阅读做出巨大贡献的作家来领这个奖。还记得台前幕后的感受吗?

陈忠实：那是一个很隆重的颁奖仪式。任何一位作家，当他写完一本书、一部小说，都不希望今天发表，明天就被大家忘记，这是作家最基本的心态。《白鹿原》出版十五年了，还能被评论家和读者记着，而且还给它一个奖，作为这本书的作者，我感到莫大欣慰。我不敢说这本书可以传世，能传到今天我已经很欣慰了。现在据说国内一年出版一千多部长篇小说，竞争这么激烈，《白鹿原》到现在还能每年发行十多万册，出版至今总印数也有一百五十多万册了，我确实感觉非常高兴。

《文化广场》：您对深圳熟悉吗？深圳读书月让您印象最深刻的地方是什么?

陈忠实：我到深圳来过两三次。第一次去深圳是受中国作协所邀，那是一九九四年，待了大约十天。第二次就是去年的“三十年三十本书”颁奖仪式了。隔了多年重回深圳，感觉变化特别大。尽管每次都匆匆而过，没有深入生活，但就是从深圳读书月这件事上，已经能够感觉到深圳人的现代意识很强。

深圳在全国首先策划读书月，这令我很感动。深圳是中国第一个经济特区，是改革开放三十年最富象征意义的城市。人们说到改革开放，首先会想到深圳，它不光是发展了一个深圳，而且打开了中国面对世界交流的一扇窗口和一个渠道，意义非凡。而恰好是在这样一个标志着现代经济和科学发展的新兴都市，首倡读书月活动，这令人深思也令人感动。在深圳，不光是经济发展独占鳌头，而且也倡导市民、公民读书，完成一种心理的、精神的构建。这是一种物质和精神的双重构建，那么这样的深圳人无疑是最健全的人。

读书月不应局限于一个月

《文化广场》：深圳读书月不仅在推动全民阅读上设置了许多环节，也举行了一些比较高端的读书活动，比如“三十年三十本书”评选、读书论坛等。在您看来，这种高端的评选和讲堂对推动全民阅读的作用在哪里?

陈忠实：深圳读书月已经产生广泛影响。我所在的西安也有读书月活动；西安的两家报纸也开辟了读书专栏，向读者不断介绍一些优秀读物；前两年，我还受邀在西安读书月中讲过读书，大概都是受到深圳的启发。深圳读书月的广泛影响，应该是对整个民族的精神、心理建设，造就新的现代人的一个最有力的措施。一种健全的心理，一种现代人的思维，都要通过阅读来完成。

《文化广场》：读书月即将迎来下一个十年，今后如何办得更扎实，您能否提供一些比较细化的建议?

陈忠实：我想读书月不应局限在一个月里。每年的十一月可以集中举办一些读书活动，对于广大市民是一种启发和促进；平时也应该

有一些促进读书的措施。

《白鹿原》创作手记即将出版

《文化广场》：您平时的阅读状态是怎样的？最近还有新的创作吗？

陈忠实：我会读一些当代文坛上反响比较大的作品，更多的是我给很多作者写序，把大量时间都花费在读他们的作品上。这种状态已经持续了好多年。

我刚刚完成了一本《白鹿原》的创作手记，大约十一万字，上海文艺出版社即将推出。书的名字叫《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这是海明威的话。我以为，这一句话，就把作家的所有创作追求全部概括了。这本书是《白鹿原》创作完成后，第一次出版的关于创作手记的书。这么多年我一直迟疑着没写，直到去年才下定决心写《白鹿原》的创作手记。二〇〇七年，《江南》杂志约我写《白鹿原》的创作感想，我写了两万字，试着写了一下，反应还挺好。后来《小说评论》看到这篇文章，就鼓励我继续写下去。写创作手记这类东西很难避免谈作品，后来我写作时努力把这一点排解开，只写创作中的感受。

《文化广场》：现在阅读的状况大家比较忧虑，国民阅读率在下降。在信息泛滥的时代，读者该如何挑选？

陈忠实：我听说网上阅读好像把很多读者分流了。我看到媒体批评说长篇小说写得太肤浅，读者不愿意读。其实如今每年出版长篇小说一千多部，平均每天供应三部长篇，读者确实没法读。大家越来越忙，不可能把全部时间用在阅读上。我对这种现象比较宽容。如果作

家把作品能够写得独树一帜，引人入胜，读者就会重新回到阅读。这种分流也是对作家的一种督促。就我自己选书而言，多数还是看评论界、媒体的推荐。因此，有价值的荐书，包括好的书评，都是非常重要的。

《静静的顿河》是阅读起点

《文化广场》：在您的阅读生涯中，受哪些文学作品的影响比较多?

陈忠实：除了通读中国四大古典名著之外，我年轻时，受翻译文学影响比较多。我准确无误地记得，平生阅读的第一部外国文学作品，是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那是初中二年级，我和我的伙伴坐在坡沟的树荫下，说着村子里的这事那事，或者是谁吃了什么好饭等，却不会有谁会猜到我心里有一条顿河，还有哥萨克小伙子格里高利和漂亮的阿克西妮娅。我后来才意识到，在那样的年龄区段里感知顿河草原哥萨克的风土人情，对我的思维有着非教科书的影响。我后来喜欢翻译文本，应该是从《静静的顿河》的阅读引发的。

在昆德拉热遍中国文坛的时候，我也读了昆德拉被翻译成中文的全部作品。我钦佩昆德拉结构小说举重若轻的智慧，我喜欢他的简洁明快里的深刻。这是“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的又一位成功作家。我不自觉地把《玩笑》和《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对照起来。这两部杰作在题旨和意向所指上有类近的质地，我在这两本小说的阅读对照中，感知到从生活体验进入到生命体验，对作家来说，有如由蚕到蛾羽化后的心灵和思想的自由。

2009年7月 二府庄

创作成就取决于作家的敏感、深刻和独特

——与西安工业大学人文学院郜科祥教授对话

郜科祥：陈老师，采访您的愿望早在半年前就和您沟通过，但直到现在才开始进行，这一方面与您的事务繁忙有关，另一方面我自己也需要进行较为充分的准备，正如您所提醒的，关于您的采访已经很多了，不少问题早有涉及，反复谈意义不大。因此，我必须尽可能避开这些话题，这就费了时日，希望您能谅解。本来《文艺研究》杂志主要请我就您与老一代作家、批评家的交往情况以及创作经验进行采访，我又在您以前回答别人提问的应答基础上发现和深化了一些问题，希望能再次聆听您的高见。

陈忠实：实在不好意思，让你等了这么长的时间。我很乐意回答你提的所有问题。

一、影响与借鉴

郜科祥：您在陕西作协正式工作的时间接近三十年，您和陕西的上一代作家柳青、杜鹏程、王汶石等都有过从，与路遥、京夫、邹志安等同代已经过世作家的关系也很密切，能否谈谈他们分别给您的印象？你们之间的关系是一种什么状态？

陈忠实：我和陕西上一代作家的接触说来很有意思。陕西上一代作家各自取得了在中国当代十七年文学中不可取代的地位，令我敬仰！就我喜欢小说写作的艺术形式而言，从情感和兴趣上说很自然就贴近于柳青和王汶石。这两人都是写农村题材的，都是写解放后中国

农村变化的，都把重点放在写合作化以后的农村生活，这种生活正是我所经历的、熟悉的。虽然我年纪比他们小一大截，但对农村的感受有很多相似之处，所以阅读他们的作品就有一种被“击中”的感觉，不由得为他们的精彩描写叫好。我在农村那些诗意的生活体会，在他们的作品中都能得到呼应，所以不禁击掌。阅读《创业史》是这样，后来读其他农村题材的作品都有这样的感觉。第一次读《创业史》是在我上初三的时候，那是一九五八年，到一九五九年上高一时全部读完。《创业史》先是在《延河》杂志连载，后来《收获》发了全文。我当时每周有家里给的两角咸菜钱，为了读《创业史》就把这些钱省下来，攒起来买了一本《延河》，现在还能记得那期《延河》的题头，背景是蜿蜒的终南山脉，山前一条小河，河边一排迎风飘舞的杨柳。当时还不叫《创业史》，而叫《稻地风波》。只读了开头的“题叙”即关于梁三老汉在民国十八年年馑时收留梁生宝母子的情景，我就为作品传神的描写，尤其是那样平实、具体的文字所震撼。尽管我没有经历过那个饥饿的年代，但听我的祖辈、父辈经常说起；尽管当时我对苦难的感受还不是很深，但我能理解。上高中后，我托在西安工作的舅舅给我买了一本载有《创业史》第一卷全文的《收获》。在我的阅读生涯中，我大概读了“九本”这样的《创业史》。后来，描写农村合作化题材的作品不少，如秦兆阳的《在田野上前进》、赵树理的《三里湾》、周立波的《山乡巨变》以及浩然的《艳阳天》等，虽然这些作品在风格上有南北地域的差异，但我更钟情于《创业史》，始终摆脱不了这部小说的影响。

“文革”后期即一九七四年，我被派到南泥湾“五七”干校锻炼半年，临行前我带了两本书，一本是组织规定的《毛泽东选集》，另一本就是《创业史》——这是我偷偷带的。当时三个人住一个窑洞，九点半以后电灯就熄了，我为了读《创业史》专门买了一盏煤油灯，在

别人都睡下后，悄悄拿出来读。虽然，这件事我做得很保密，但不久这本书就被同宿舍的不知哪位同事拿走了，他不还，我也不好问。那时可读的书太少，这也不难理解。可以这样说，我走到哪里，就把《创业史》带到哪里，未必每次都能读完，但只要开卷，随便一章，我都能马上进入书中描写的情境。因此，一九七三年，我发表第一篇小说《接班以后》，读者、评论界最普遍的反映是：这是学习柳青学得最像的一篇小说。当时，“作协”刚刚恢复，还不叫“作协”，叫创作研究室，《延河》也刚复刊，名字改为《陕西文艺》，像柳青、王汶石、杜鹏程等老一代作家还没完全恢复写作状态，能写作的大部分是工农兵中的文学爱好者，我就是这时开始写作生涯的。尤其是我这篇处女作小说的语言特像柳青，所以有人就怀疑这是柳青换了一个“陈忠实”的名字来发表作品。

我总共见过柳青三次面。一九六六年，我在社办农中当教师，那时学校自己还养猪，有一次学校派我和另一名老师去西安的郊县给猪拉麸皮当饲料，路经西安时正赶上文艺界的人被游街，柳青就在其中，那是我第一次见他，远远的、隐隐约约的。后来听过他两次报告。一次是一九七一年（或一九七二年）出版社开始恢复，柳青也被允许可以重新写作。我正好被出版社抽调去写一篇纪实文学的稿子，他们在此期间组织了一次业余作者培训会，会上邀请柳青做报告，我就参加了。这是我第一次近距离地见到他，一个上唇留着浓密胡须的矮个子，讲的内容现在记不清了，但有一个最深的印象是柳青每讲一会儿就要停下来用一个小喷雾器向嗓子喷一阵药，他有严重的气管炎。每当这时，会场上鸦雀无声，只听到喷雾器嗤嗤的声响。第二次听报告是一九七五年左右，还是“作协”组织的业余作者培训会请他做报告，报告中有两句话至今记忆犹新。当说到对当时“反潮流”政治运动的看法时，他很机智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其实也是对青年作者的

谆谆教诲：“能不能识别错误的潮流是觉悟的问题，识别了不反对那就是品质问题。”这句话可以说影响了我的后半生。

一九九三年我刚担任陕西省作协主席，偶然在《陕西日报》上看到一位读者写了一篇拜祭柳青墓的文章，其中写道柳青墓破败不堪、令人惨不忍睹。第二天我就要了辆车去柳青墓。看到农民家的粪土就和他的坟头连在一起，心中很悲哀。回来后马上与有关单位商量先圈一个围墙把墓保护起来，我亲自与当地农村的干部谈判，并在一位当地很崇拜柳青的农民企业家和长安县政府的帮助下，征下了柳青墓所在的那块地，并很快砌上了围墙。当然在这过程中也遇到一些麻烦，包括柳青家属的一些纠缠，这就不说了。不管怎样，我算是借职务之便对自己一生崇敬的作家做了一件让灵魂得到安慰的事。

《创业史》在主题上是赞美农民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但不是简单的图解。这部小说真实地描写了中国农民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生活状态，塑造了各种类型的农民形象，创造出了几个典型，这使之有别于其他同类型题材的小说。一个作品能达到这个水准已经够了，我们不要希望过多，这不可能，也没必要。

王汶石的短篇小说对我的影响也很大，他同样是写关中农民的，很亲切，语言生动而且与柳青有明显的不同。他塑造和表现了具有自己风格的人物形象，他的《风雪之夜》，我曾当作范本不知读过多少遍。其中有一篇《买菜中》，描写了一个叫王云和的老汉。王汶石把农民特有的心计写得那样生动传神，语言相当美，所以我现在还能记住。一九七五年左右，他也给我们辅导过创作，一般是柳青先讲，接着他讲。

在新时期，王汶石很关注我的写作。我的小说《信任》在《陕西日报》发表后，正赶上《人民文学》来陕组稿，他们向王汶石要，他当时手头可能没有成品，就推荐了我的《信任》。当时全国的文学杂志特别少，像《小说月报》等还没有创刊，一个年轻作家的作品能上《人民文学》是非常不易的。有意思的是，正是那一期，我清楚地记得是一九七八年的第七期，与《信任》同期发表的前三篇小说在第二年都获得了第二届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陕西省委宣传部为了宣传一位农民科学家李立科，安排我写一篇报告文学，我有点不愿意，因为《白鹿原》的草稿正在进行。可是《陕西日报》的文艺部主任田长山非要我写，他说这是政治任务。没办法，我就向他提出一个条件，写可以，但要两人合写。这就是后来的《渭北高原——关于一个人的记忆》。王汶石曾就这篇报告文学专门写过一篇评论。后来，小说《四妹子》发表后他又以书信的方式对我的小说给予了好评与鼓励，我真要感谢老先生！

对杜鹏程，我也很钦佩！只不过他重点是写军事题材，所以从写作倾向来说，与他就稍远一点。其实，我最喜欢的是他的《在和平的日子里》，有亲近感。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杜先生去世的时候，我住在灞桥的乡下，那时不通电话，下雨天车也过不去，作协想通知我根本没有办法。等我知道他去世的消息时，已是他的追悼会开过以后很久，我赶忙去他家里慰问，可是他的夫人显得很不高兴，但我没有办法。

至于路遥、京夫、邹志安这几位同代已经过世的作家，我们的关系与上一代作家当然不同，不存在下对上的敬畏，主要是同代人的平等和随意。 我们认识时都在一九七三年左右，“作协”恢复，《陕西文

艺》创刊，常办业余作家培训班，大家就在此相遇。那时我们的起步水平都比较低，发表的小说也很幼稚，阶级斗争时代的印痕明显。这些人真正大展艺术智慧已到了新时期。尽管大家在个性上差异较大，但当时的关系非常友好，坦诚无忌。李凤杰的段子特别多，说起来没完没了，而京夫很少说话。那时很少有后来出现的复杂情况，因为大家的心思全部集中在创作上面，这之外的事很少去想、去争。再一个，也由于大家一般都分散在各地县，所以隔较长时间见一次面都很亲热。

这些人在八十年代后各自呈现出自己的面貌，他们的过早去世真是生命的悲哀，无可奈何！

二、构思与人物文化心理结构

郜科祥：最近看到您在《寻找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写作手记》中有一段描写，正好涉及柳青的《创业史》以及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政策的改变对您的巨大冲击，您好像有一种被历史嘲弄的意味，这种思想上的大困惑以及由此所催生的思考和最后的彻悟是不是您决定写《白鹿原》的主要动因？或者说，您对新中国成立后农村的两次巨大变化的思考并不想用现实的题材加以表达而有意选择了历史的（近现代史）视角，也因此在《白鹿原》之后，您反复说“再不想上这个原了”，也就是说无须写所谓的续篇，因为这个“原”既是历史也是现实甚至还是未来。不知我的感觉和理解对否？

陈忠实：我对农村政策的变化感受的确很深。这也是促使我思想发生转折的重要一步。不只是因为受了《创业史》的影响，我亲自经历了解放后农业合作化的过程，我所在的村子在一九五五年完成合作化，在此之前对农村的艰难困苦、贫穷落后感受深切，而且当时在学

校整天宣传这种制度的优越性，所以从内心里很喜欢合作化，能接受集体化的理论。后来，我一直泡在农村，背着铺盖卷从这个村到那个村抓阶级斗争，带领农民学大寨，与集体化的情感联系始终未断。尽管也看到数次政治运动对农村的冲击，也发现了集体劳动方式的不少弊端，但在情感上一直没有动摇集体化的信念。所以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再次经历拉牛散社的情景，的确在思想上一下子转不过弯来。当时，我的妻子、孩子的户口都在农村，包产到户后，我家分了五亩地。生产队的时候，牲口本来不多，承包的时候都是把牲口估成价，用抓阄的方式重新分配，我家因为没有养牲口的地方，也就没有参与抓阄。但这样一来，种地的时候就得人曳犁，把人当牲口用，我就是这样黑水汗流地拉着犁进行艰难的耕作，那时孩子小，也帮不上忙，连溜种也不会。虽然是这样不大情愿地进行着个体化的劳动，但来年庄稼的丰收却一下改变了我的“唯集体主义”的思想。麦场上堆了那么多粮食，这是此前合作化时期从未实现过的现实。所以，我就想，中国农民为什么要在一棵树上吊死？但这种困惑与《白鹿原》的写作动因无关，有一篇小说《最后一次收获》对此做了描写。至于我说“再不上这个原了”的意思，是我的那段体验全部完成了，不会再去纠缠那个话题。

邰科祥：《白鹿原》一定有提纲，对吗？这个提纲能否让我翻阅或拍几张照片？它是否与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的提纲形式很相似，基本上把每一章节的主要情节或事件都标示了出来？换句话说，《白鹿原》的构思在您动笔之前，其轮廓已基本分明？能说说您的提纲以及在创作过程中的随机改动情况吗?

陈忠实：不是我故意这样说，还真的是没有提纲。倒是想给作品中的主要人物每个人写一段传记性的文字，不要太长，主要是把他们

是什么角色，与其他人物的关系摆置清楚，包括从其他人物的角度如何看这个人等信息，但就是这也只写了一两个就写不下去，不想写了。一是觉得没必要，二是没有那份耐心。因为经过两年多的构思，这些人物不知在头脑中过了多少遍，早已烂熟于心。当然也担心过没有提纲会使复杂的人物关系前后混乱，但最终还是没有写。

也许这样做是为了给自己减压，毕竟是第一次写长篇。为此，我甚至有意不用稿纸，不趴在桌子上写，不把所写的叫草稿而叫草拟稿。主要是把人物和事件的框架基本合理地摆置出来，完成每个人的生命史，特别是每个人的重大痛苦情节，记下他们个性化的语言。

第一次写长篇小说，人物多、事件杂，但这都不是问题，对我压力最大的是结构。西北大学已故教授蒙万夫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最早研究我的人。《白鹿原》的草拟稿很不成熟，当时只有他和另外极少的几个人看过。蒙万夫看完后说了一句话："长篇小说是结构的艺术。"他还做了一个形象化的比喻："如果结构不好，提起来一串子，放下去一摊子，是一堆没骨头的肉。"这个话给我的印象太深了。长篇最重要的是结构合理，每个人生命的历程合理，交织在一起不要有隔的感觉。

出乎意料，《白鹿原》的草拟稿写得很顺畅。我当时用的是十六开的日记本，坐在让农村的木匠刚打好的沙发上，把笔记本摊开在膝盖上写，总共用了八个月时间，写了一个半日记本，大概有四十万字。后来的正式稿基本上保持了草拟稿的原貌，只是在文字上进行了全面的润色。

郃科祥：我在西安思源学院为您开辟的展室中看到《白鹿原》定稿的复印件，开头一个字包括后文凡是涉及白嘉轩姓的地方，您都用

笔做了涂抹，我曾经猜测“白”姓是您后来改就的，但在其他文章中注意到您的解释，那其实不是姓，而是白嘉轩的外号“锅锅”两字。这就是说，您在动笔前，白嘉轩挺直的身板、刚正的人格形象就早已形成，用“锅锅”的外号是为了形成反衬的效果，同时给读者留下悬念。

陈忠实：是这样，后来之所以要改，主要是考虑到一起笔就给主人公，而且是一个严肃、正派的主人公带上一个外号，太不庄重，容易给读者留下“小丑”的第一印象，与整体行文的基调也不协调，所以直接恢复了他的本姓。

郃科祥：我一直很关心的几个问题是，在《白鹿原》动笔之前，您从理性上是否已经很清楚您要描写的白嘉轩这个“好地主”或“新地主”（传统术语）形象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从未有过的，或者说您要自觉地反叛以往对这类形象的描写？您要大胆地对中国现代革命的真实历史（或中国现代史）进行反思或还原？特别是关于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您已经完全理清？这几个问题恰恰是您的《白鹿原》能够备受推崇的主要因素。

陈忠实：你这个问题提得好。很多评论者都提到白嘉轩是一个好地主、新地主形象。如果放在文学史上地主类人物的画廊中去看，的确与以往的形象大为不同。但是，实际上一开始我根本就没有这个意识，我没有想着去塑造一个新地主的形象，更没有想着把白嘉轩等与南霸天、黄世仁等有意区别开来。我所想最多的是，处于封建制度解体、民国建立这种改朝换代的特殊区间的中国人到底做了什么，我们传统人格中一个完整的人是什么样的？

我有一个很清醒的理念：那就是如果传统人格、文化全是腐烂的、糟朽的，在乡村具有重大影响的人都是黄世仁、刘文彩，那封建

社会还能延续两千年吗？虽然有些朝代的皇帝昏庸无能，但总体的传统文化精神未变，绝不能简单地用“腐朽”一词来概括。王朝更替，人的文化心理结构不变。准确地说，支撑我们民族延续几千年的文化因素是最优良的基因与最腐朽的基因的结合物。

我没想着写一个地主，而是要写一个族长。中国古代封建的官僚体制没有细化到乡村这个层面，在乡村最有权威的人是宗族势力，他的代表人物就是族长。至于保甲长也与现在乡长、村长不一样，而且保甲的目的是为了防御共产党，他们其实没有行政权。尽管这样，也不是谁都可以做族长。一般来说族长不会是穷人，当然也不一定是大地主，常常是我们称作财东的人为多。他们没有国家赋予的行政权，他们主要依靠一个宗族自己制定延续的《乡约》来规范约束族中人的行为。这个《乡约》其实是儒家思想的通俗化。我在《白鹿原》中抄录的那篇《乡约》还是咱们陕西人第一次创造的，他叫吕大临，是关学的传人。这个《乡约》后来普及到大江南北。就此而论，我没有自觉地反叛以往地主类形象的写作意识，而且在我的观念里，我并不否认现实中真有黄世仁之类的地主。我只是不想用以往的阶级斗争观念去描写人物，如果非要说有反叛的话，这一点可能是明确的，即在我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接受了一个文艺理论家的文化心理结构学说，我是用这个理论来塑造人物的。

文化心理结构在我看来是一个深层的人性特征。中国人和西方人在外形上好辨别，差异不大，无非一个是黑眼睛、黑头发；一个是蓝眼睛、黄头发。这些很表面，真正的差别在心理结构，尤其是做人，《白鹿原》中提到的《乡约》实际上就是普及到中国乡村的心理结构，它能判断人和事的好坏、高下、是非。我思考的是面临新世纪的到来，白鹿原上的人的心理结构会受到怎样的冲击？鹿兆鹏很快会接

受刚刚兴起的新思想——共产主义；白孝文不是接受新的理念而是被作为族长的接班人设计的，但通过更常见的社会现象、个人命运的不断冲击，他最后变得没有任何信仰，完全成为以个人利害取舍自己行为的流氓；田小娥因为没受过教育，她的文化心理结构是个人心理本能的冲突，人性与命运的错位，一个女人正常的人生乐趣都得不到还要受老秀才的作践，她当然要寻找机会反叛，但这种反叛是本能的；白灵则受过新文化的教育，她之逃离家庭完全是自觉地追求新生活理想的结果。

诸如以上这些关于人的文化心理结构的思考的确是很清晰的、很自觉的，在动笔前都有了较为详尽的设计。

郜科祥：在《白鹿原》动笔之前，您和李下叔的交谈中曾经发生了一幕严重走神的情景，就是您突然的不说话而且目光飘忽，精神完全沉浸在“黑娃被枪毙的场面中”，当您被李下叔打断时，您问他听到一声枪响了吗。类似这样精彩或经典的构思场面在后来的创作中发生的次数多吗？由此也可看出，当时《白鹿原》的构思已经基本完成，是这样吗？

陈忠实：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你知道尽管那些重大转折的情节包括一些关键的细节在构思时反复斟酌过，但写作和构思还是有差别。比如田小娥被杀的场景就有写不下去的感觉，当我把这段终于写完后，眼前是一片模糊，好长时间缓不过劲来，我试图借抽烟让自己平静，但似乎意犹未了就顺手拉过一张纸写下：生的痛苦、活的痛苦、死的痛苦。其实包括写到所有死亡的情节时都很沉重，每到这个时候，我就会失神，跳不出故事。鹿三的死让我感到其莫大的孤独，但对他我不能用这个词。所以，我通过白嘉轩的嘴发出了感叹：白鹿

原上最后也是最好的一个长工走了。总而言之，每写一个生命的死亡，精神上都要受一次折磨。

在这个时候，小说中的重要人物的生命转折、细节包括一些极富个性化的语言都在构思中完成了，至于日常的事件通过实际写作就可以补缀。

三、创作与探索

邰科祥：很多人都问过您《白鹿原》之后还写不写长篇小说这个问题，您许多次的回答都是还没有进入状态，特别是没有那种进入新的生命体验并冲动不已的状态。但是唯有一次，您对一个记者说："这两年有一些想法和念头，打算封闭起来，写一个长篇，构思时间比较长。"由此可见，您所期待的那个状态已经到来，那么能不能透露一下这个长篇的某些信息？以您目前的生活习惯，您还能像《白鹿原》写作的时代一样再次封闭起来吗?

陈忠实：这是很早以前的事了，李星在《白鹿原》之后不久问的，不是最近。但在二〇〇一年至二〇〇二年，我还真的又回到我的老屋，封闭了一次。还是由老婆烙一篮子馍，擀很多面，我背回去。吃完了，她再送或者我回去取。那个感觉真好！我一回到那个小院就完全沉静下来，城市的嘈杂、纷扰全会散去。《日子》等小说就是那时写出的。

邰科祥：您的创作进程恰好与我国改革开放的历史同步，当代文学上的许多重大事件您也不同程度地经历、参与甚至处于中心的位置，那么对一九七八至二〇〇八年间中国文学的巨大变化，您有哪些

最深刻的感受？换句话说，您觉得三十年中国新时期文学取得了哪些明显的变化，有哪些事件或现象可以做标志？

陈忠实：从我喜欢文学到“文革”前这段时间，我只想能成为一个业余作者就满足了。偶尔能发表几篇散文，心里感觉特别好。但是这种感觉没持续多久，“文革”就开始了。再一次提笔，已到了一九七三年。在一九七三至一九七六年这四年间，我主要是参加一些文学爱好者创作辅导班，再就是每年写一篇小说和几篇散文，我这时的愿望很简单，就是想过一把文学瘾。文学的兴趣压抑太久就像抽烟的人被断了烟的感觉一样，发表一篇作品所获得的心理满足、愉悦与过烟瘾很相似。这样每年一篇小说的慢速度即与这种放松或兴趣的心理状态有关，也与我当时的主业有关，那时我担任着公社的副主任，行政事务比较烦琐，整段的时间很少，每年只有一个机会，就是集中给各村干部和积极分子办政治学习班的日子，往往是白天学习，晚上没事干。我就把平时思考、感受的内容整理成小说。说真的，那时根本没有把写作当作事业来干，反过来那时写作很危险，文章发表后，说不定哪天会被人抓住辫子就会遭到批判。

一九七八年，我在一个水利工地领工，无意中看到《人民文学》杂志上刊载的刘心武的《班主任》。那时在工地上大家都睡的是草铺，我就是躺在草铺上一口气看完了这篇小说。读完后按捺不住心中的激动就来到附近的河堤上，对着月光，我自言自语，小说还可以这么写！我有一种直感，把小说当作事业的时代就要来了。因此，这个工程一结束，我马上向组织打报告要求调到一个比较清闲的单位，就为了使我有充足的时间开始写作。事实也果如所愿，我被调到了区文化馆，那是一九七八年的夏天，算是我人生的第一次重大转折。

在文化馆比较务实，那个时代“左”的文学观念对作家的影响不可能摆脱，我又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完全是凭兴趣写作。所以在我这个“文学自觉”的时期，我首先想做的是把自己对文学的理解回归到真正的文学，也就是要摆脱“左”的观念。为此，我专门选择了两个我最喜欢的西方作家，一个是契诃夫，另一个是莫泊桑。我把文化馆里收藏的这两个人的全部作品借过来，整整读了一个秋天。在这两人中，我相对而言更倾向于莫泊桑，因为他的作品好理解。契诃夫的小说重视人物和结构，莫泊桑的小说注意故事和情节。契诃夫难度大，莫泊桑容易学。在读过我能找到的他们的所有作品后，我又从中精选了十几篇反复阅读，体味不同的结构和人物塑造。大概到了这年的冬天，经过这一番阅读之后，我对文学的理解有了新的感受。一九七九年春，我产生了写小说的欲望。我后来的创作过程也一直是这样，往往是其他人写得红火时，我一点都不焦急，我需要做必要的准备，急是没有用的。正是这样，在这一年，我连续发表了十部小说，在我迄今为止的创作生涯中，这是我一生中少有的高产期。其中《徐家园三老汉》，我印象最深，我在这篇小说中有意锻炼人物塑造的基本功，我想看看自己能不能写出同类人物的差异来。这篇小说在《北京文学》发表后，评论家阎纲正在住院，他看到这篇小说后很高兴，意识到我明显的变化。

一九八二年《人生》发表了，作者是近在咫尺，每天抬头不见低头见的路遥，虽然在此之前，他已经由于《惊心动魄的一刻》获得全国小说奖，但当时他在陕西的影响并不大。可是《人生》发表后对全国的同行，特别是对我带来了巨大的冲击。一方面，小说开辟了农村题材的新视角；另一方面，我当时也正在寻找描写农村生活的突破口，正好两者撞在一起。正是在这一年，我出版了自己的第一个短篇小说集，收了十九个短篇。在这个时候我自己就有寻找突破的念头，

正在此时看到了《人生》，首先看到了新的视角。当时描写农村题材的作品很多，但都局限在极左路线的模式下，包括高晓声的“陈奂生系列”也摆脱不了从政策角度写农民，这个很自然，我也写了不少这样的作品。但《人生》一出来就不一样，从个人人生追求的角度写，太真实了。其实在生活中有不少人比高加林有过之而无不及。由此觉悟到小说更应该写人的心理、精神追求，即使写政策的伤害也要落脚到情感的伤害。我这时正写自己的第一个中篇《初夏》，涉及体制改革的内容，写得很不顺，索性就放下。转写《康家小院》对农村重新思考，是探索的视角。后来，《康家小院》倒先发表，并获得上海第一届小说奖，而《初夏》则成了第二。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各种文学思潮综合影响，这一时期文坛最活跃，各种文艺理论、流派都被介绍，作家们也在进行各种试验，且不管其成功与否，但见识了文学的各种形态。对这一切，我都不拒绝，至于是否要那么做，不一定，主要是开阔眼界，我就想他们各派中总有一些对我有用，所以认真地读，选择于己有用的。

其中文化心理结构学说对我写人物有重大的启发。恰好这时在构思《白鹿原》，它就派上用场了。以前苦恼的是不知怎样塑造传统理论中的典型人物，这多难啊！中国现代有几个作家创造出典型？没有。柳青的梁三老汉算一个，鲁迅也不过创造了一个阿Q。而且总觉得中国人的典型让古典的四大名著弄完了。像莽撞的李逵、智慧的诸葛亮等。我们还能写出什么呢？好长时间为典型困扰，写不出。可文化心理结构救了我，使我找到了写人物的途径。心理结构成了我解析白嘉轩、鹿子霖、田小娥等人生密码的钥匙。我甚至给自己立下一个规矩，在这个长篇小说中不写人物的肖像，要通过对人物心理的描写让读者分辨出相互的不同。事实上后来的作品中也的确是除了对两大

家族外形的一个生理特点有一种预设之外，其他都没有描写，这个特点就是白家的鼻子突出，鹿家的眼睛深陷。

对我写作产生了重大影响的两部作品，一个是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另一个就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昆德拉的作品截至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出版的我都读过，从他的作品中，我理解了什么叫生活体验、生命体验。《玩笑》写捷克的极左路线，属于现实主义的风格，也是生活层面的作品，故事完整、人物生动。《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虽然与《玩笑》主题相似，但已深化到生命体验的层次。当然要完全从理论上区别这两个概念，我可能说不太清，但我能感受到。

第一次读《百年孤独》汉译本的时候读不大懂。当时我还未开始写长篇。他对拉美地区历史文化、人生形态的概括、叙述太了不起了。后来有不少作家模仿他，但都表面化。他让我思考，作家如何完成对本民族生存真实形态的概括。人变甲虫、人长尾巴的形象拉美有，可中国没有魔幻，中国有的是鬼神，是它统治着乡村甚至城市。但鬼神不是魔幻，也就是这部小说让我再次审视中华民族的语境。鹿三在杀田小娥之后的灵魂附体就是中国的民间文化，当然我对此进行了科学的阐释，鹿三的疯癫表面上是田小娥的鬼魂报复，其实从心理的愧疚和恐惧上完全能够理解。

邰科祥：说到这里，诸如灵魂附体的事件您亲自遇到过吗？怎么解释？

陈忠实：遇到过，至今弄不清。对这些文化现象，我当时也给自己定了一个原则，可解释的就写，不可解释的一概不写。

郜科祥：您是怕被指斥“宣扬迷信”吗?

陈忠实：要有这个防备。我在写《白鹿原》的时候，为什么要去查县志，就是受了寻根文学和魔幻现实主义的影响。一个作家连自己生存的县区历史都不了解，还怎么谈得上写中国。县志上记载的很多事件让人惊心动魄，特别是涉及民国时期的很多事件让人惊心动魄，特别是涉及民国时期的一些重大事件，包括一些回忆录。

郜科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在全国几所高校相继办起了作家班，陕西的西北大学也曾经招了几届学生，这些人中有不少后来在当代文坛成为响当当的人物，但是也有很多人并无什么作为。请问，就您了解的情况，当时开办作家班的初衷是什么？为什么后来又迅速叫停，作家能不能专门培养?

陈忠实：西北大学几届作家班的开学典礼我都参加了。西大当时的中文系主任刘建军以及蒙万夫先生，在他们第一届作家班招生时，还请我去参加作家班的学习，但是我当时因为家里的事情太多，孩子、老人一大堆，负担很重，实在离不开，就是上了，也坐不住，所以没有去。

郜科祥：这就是说您从内心也希望系统地学习一些创作的理论，补补课?

陈忠实：是的。我们的新文学发展到一个爆发期，很多作家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有的连中学都没有完成。但都喜欢写作，也有些人需要知识的填补，从这个意义上说，办作家班是一个有创意的举动。现在大部分作家都受到良好的教育，作家班是特殊历史时期弥补性的措施，很多作家踊跃接受教育值得肯定。至于你说到上过作家班的人

有的功成名就，有的销声匿迹，这其实很正常。这与读作家班没关系。作家很难齐步发展，必然要分流。进入社会后他们会如何发展，这有很多综合因素在起作用。如果一个人要继续在文学上发展，对生活的理解感悟能力和表达能力至关重要。

说到作家能不能培养，一般说不可能，但我觉得丰富作家的知识，上作家班也是一种培养。自然，创作的成就更多地取决于作家对生活的敏感程度、深刻理解程度和表现形式的独特程度，这些东西是任何高明的老师也解决不了的。

郜科祥：谢谢您接受我的采访！

2009年3月7日

2009年8月23日

也说思想

——答《南方周末》张英问

我是从报刊的统计数字里知道长篇小说创作出版的巨大数字的，也从我周边的生活环境能亲自感觉到。这种繁荣景象起码证明了一点，那些敏感于文字进而喜欢创作的人获得了表述的空间，把文学创作的神秘化自然而然淡化了。

我想谁也不会对文学创作的繁荣持异议，而在于对高水准长篇小说的比例太小不大满意。专家和普通读者都期待令人耳目一新的大作品出现。

从题材来说，上个世纪中国的一百年历史，其剧烈演变的复杂过程，在世界上是没有哪个国家所能比拟的。亲身经历并参与其中任何一个段落的有思想的人，抑或从资料获得具体而又鲜活的生活史实的作家，很难摆脱对这个民族近代以来命运的思考，也很难舍弃在独立思考里形成的生活体验或生命体验，会潮起一种强烈的表述欲望，自然就会有小说创作。这一百年应该反复写，应该有许多作家去写，各自以其独立的思维和独特的体验，对这个民族百余年来反复的心理剥离的痛苦和欢乐，就会有各自不同的异彩呈现的艺术景观展示，留给这个民族的子孙，也展示给世界各个民族。

作家们现在获得了独立思考和独立体验的社会氛围，不再受制于某些极左思想限定的狭窄小径，有勇气也有责任面对自己先辈所打开的百年变迁的历史了。

我想不明白中国为什么没有像《静静的顿河》《约翰·克利斯朵夫》《复活》《铁皮鼓》《百年孤独》这样有史诗品格的长篇小说。

这似乎与经济的发达程度和物质的文明高低没有直接关系，这些史诗作品，都是在旧的农业时代完成的，《静静的顿河》产生时，苏联正处于物质最贫乏的战争恢复期。《百年孤独》的作者马尔克斯生活的哥伦比亚，用我们的话说也是一个属于发展中的国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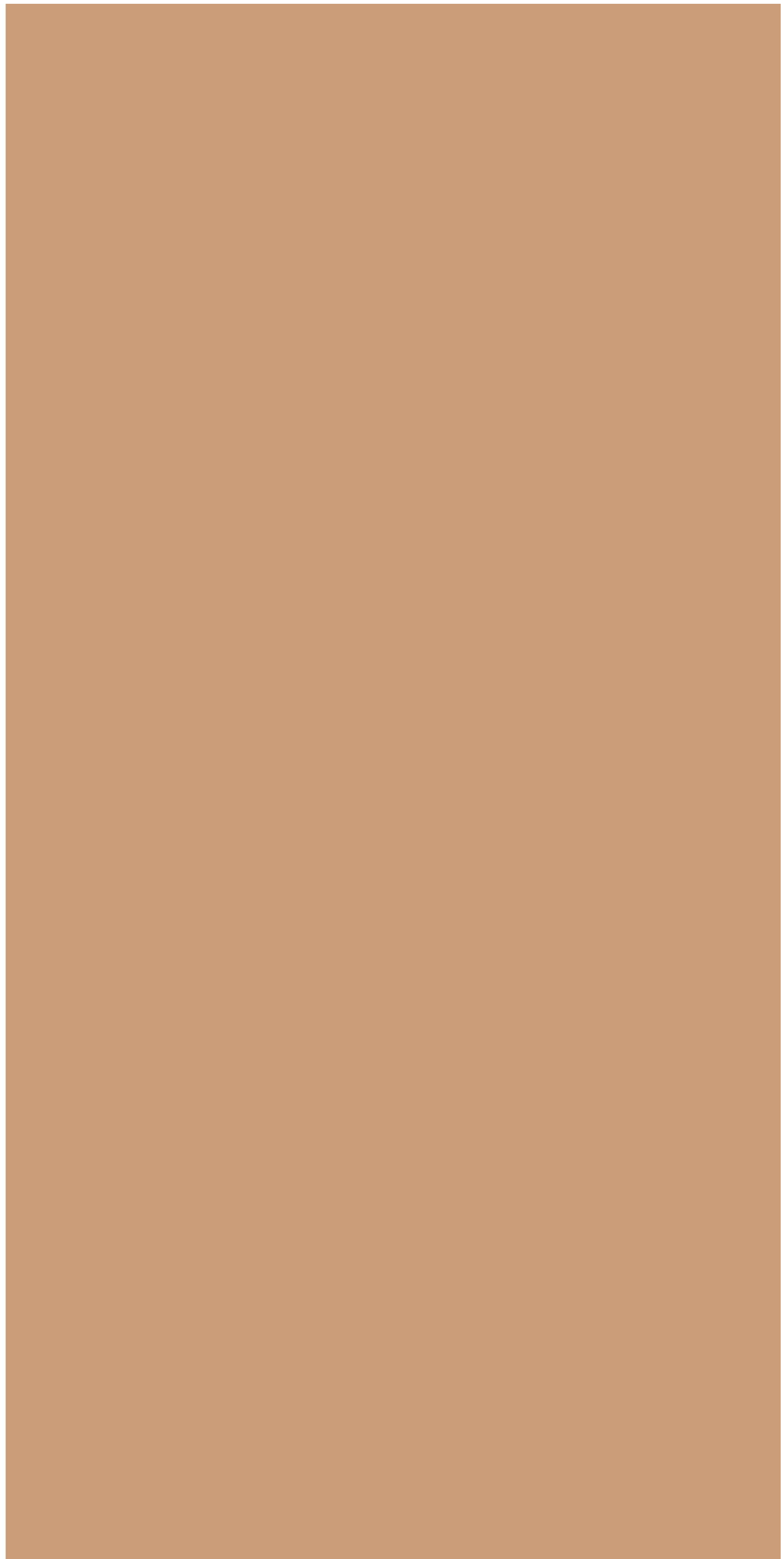
对于当代长篇小说的研究和讨论，一直都在持续着，多家评论杂志和文学专业报纸，有许多认真的研究文章阐发着种种见解，我从中曾获得很富于启示的收益。在诸多观点和诸多因素里，有一个主和次的判断，在我看来，主要在于思想的软弱，缺乏穿透历史和现实纷繁烟云的力度。

说到思想，似乎是一个容易敏感的词汇。思想似乎沾惹到政治，说到政治，似乎又很容易招惹令人厌恶的极左或平庸的教条。我想应该早就排除极左政治的阴影了，尤其不能把极左政治等同于政治，不能因噎废食。富于理论高度和深度的政治，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光明之灯。应该从对极左政治的厌恶情绪里摆脱出来，恢复对建设性的政治的热情。既然作家都关注民族命运，就不可能脱离系着民族命运的政治。

作家的思想还不完全等同于政治，这是常识。作家独立独自的思想，对生活——历史的或现实的——就会发生独特的体验，这种体验决定着作品的品相。思想的深刻性准确性和独特性，注定着作家从生活体验到生命体验的独到的深刻性。这也应该是文学创作的常识。

我以为急不得，首先是繁荣提供了一个雄厚的阵势，那么多作家都持续在进行探索和创造，大作和精品肯定会出现，我想这个过程应该宽容。

2009年9月 二府庄



第 1 卷　1978—1982

第 2 卷　1983—1984

第 3 卷　1985—1986

第 4 卷　白鹿原

第 5 卷　1987—1994

第 6 卷　1995—2000

第 7 卷　2001—2003

第 8 卷　2004—2006

第 9 卷　2007—2009

第 10 卷　2010—201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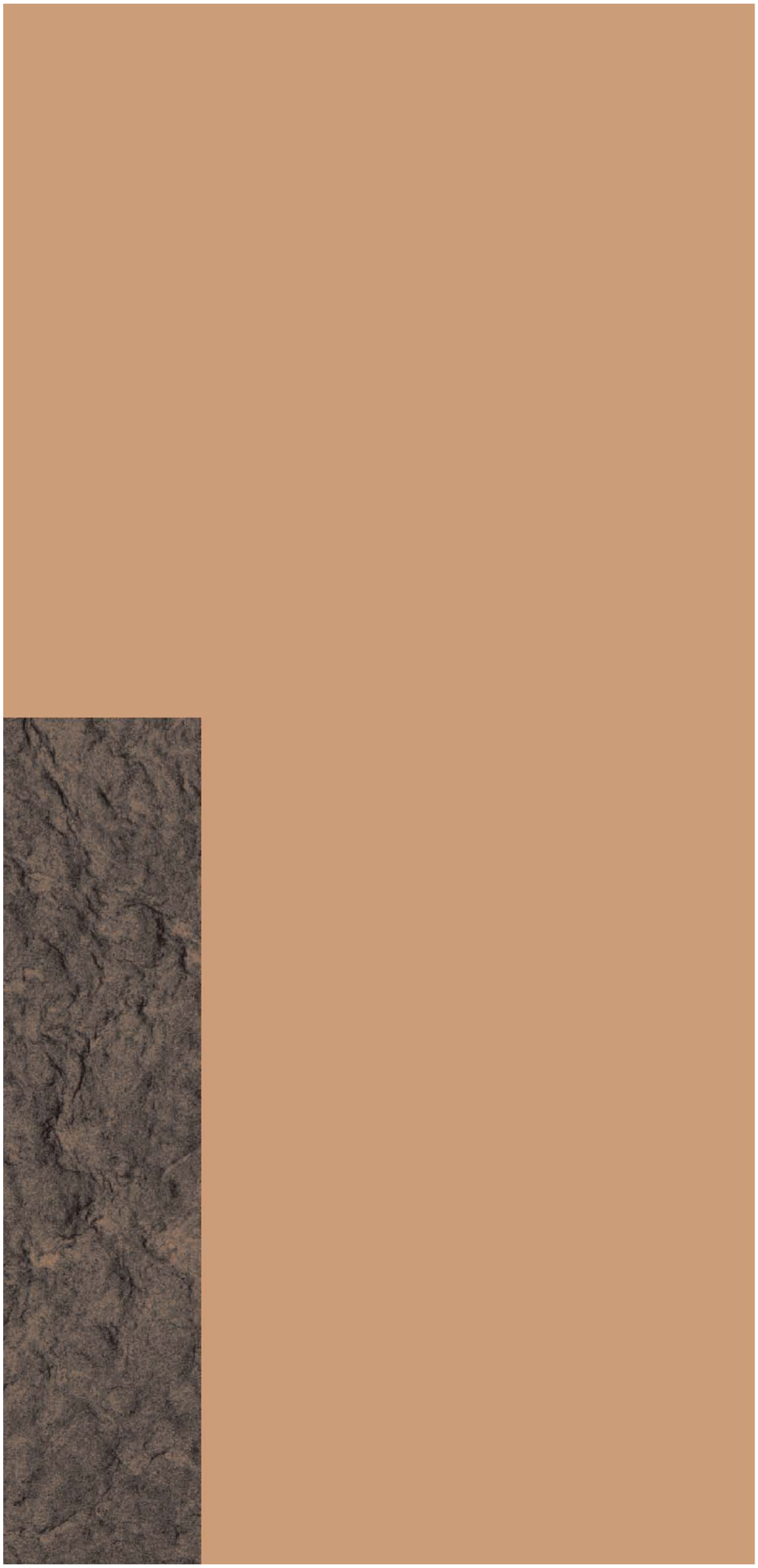
陈忠实文集

增订本

第10卷

2010—2015

人民文学出版社



陈忠实
文集

增订本

第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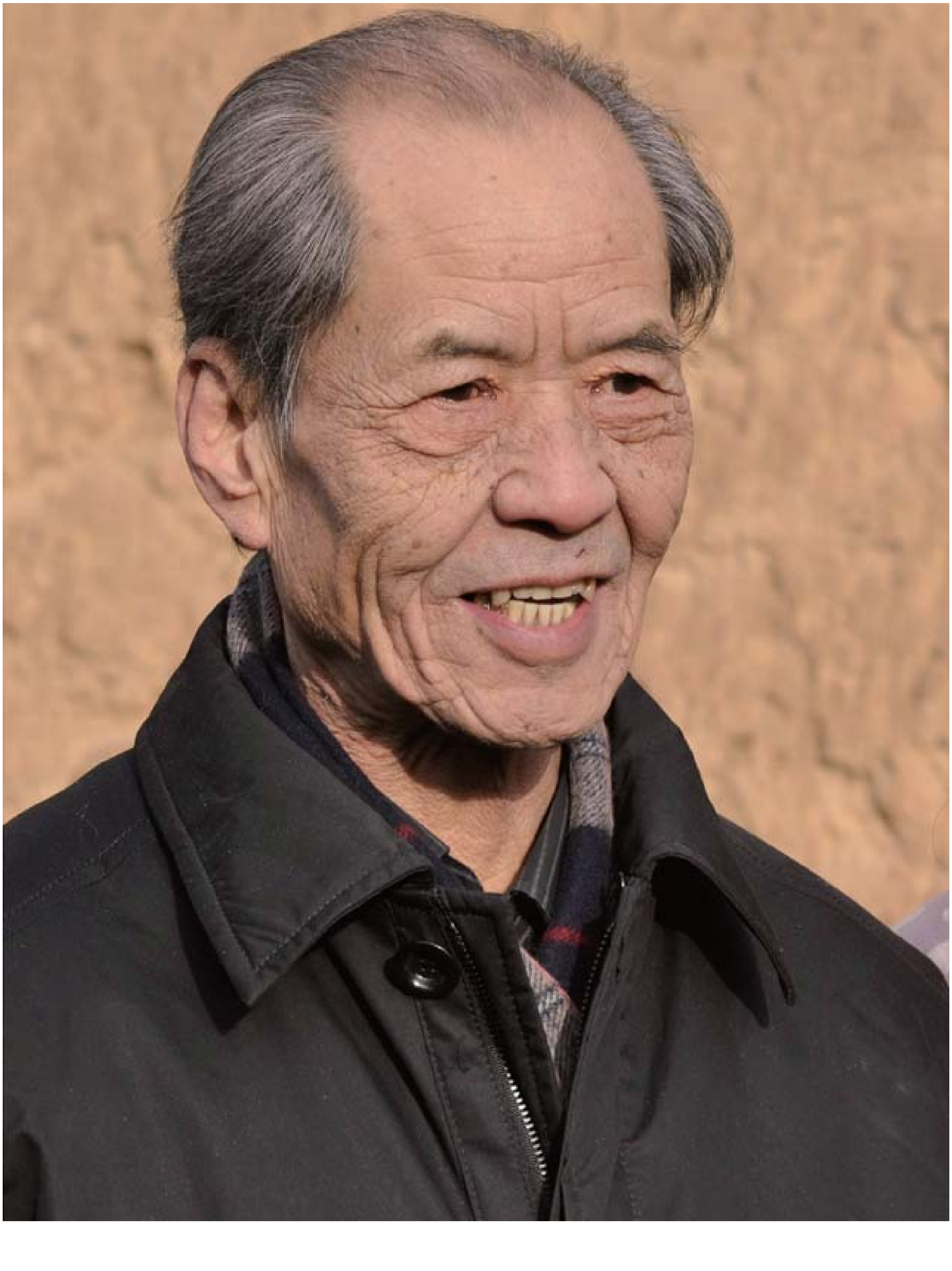
10

卷

2010—2015

人民文学出版社

文前插图



- 散文·随笔
  - 我读《创业史》
  - 仅说一种本能的情感驱使
  - 热情率性与悄没声息
  - 我经历的狼
  - 大智慧者的人生选择
  - 十九届世界杯足球赛点评
    - 未闻哨响已踊跃
    - 劣境也有出奇处
    - 两种功夫，脚下和心理
    - 期待一次痛快淋漓的发生
    - 初尝酣畅淋漓的忘情
    - 两个半想不到
    - 足球赛场不理会眼泪
    - 话说一个球的错判
    - 巴西队也猴急了
    - 神来之笔及其他
    - 悬念的诱惑
    - 侥幸也否
  - 毛乌素沙漠的月亮
  - 我经历的鬼
  - 感动一种决绝
  - 两株玉兰树
  - 原上原下樱桃红
  - 敲响城门的远方乡党
  - 猜想一根神经

- 饭事记趣
- 我们村的关老爷
- 一个人的邮政代办点
- 依然品尝你的咖啡
- 缺失斋号
- 白墙无字
- 难忘的一声喝彩
- 有关《白鹿原》手稿的话
  - 一
  - 二
  - 三
  - 四
- 年年柳色
- 删繁就简……
- 我看老腔
- 沉默的翻译家孔保尔
- 难忘一种鸟叫声
- 接通地脉，只因乡村情感
- 原白鹿长驻此原
- 感受历史的生动和鲜活
- 儿时的原
  - 这道原·那道原
  - 割草·搂麦
  - 祭祖
  - 卖菜
  - 木板·秧歌
- 回家 回家

    - 闲心一例
    - 文盲体验
    - 神秘神圣的文学圣地
    - 不能忘却的追忆
        - 走进小岗村
        - 我们村的安徽菜贩
        - 惊天动地“万言书”
        - 绝望终未绝
- 言论
    - 我们没有史诗，是思想缺乏力度
    - 珠联璧合说吴、罗
    - 难得一种渴望性阅读
    - 感知躬行者的履迹声响
        - 一
        - 二
        - 三
        - 四
        - 五
        - 六
    - 话说陕西人
    - 简说柏峰散文
    - 想起了杰克·伦敦
    - 说给云儒三句话
    - 老到少年陈奕博
    - 独得一笔活字
    - 探索与创造者的礼赞
        - 视角·视野

    - [倾情·倾向]
    - [激情·婉约]
- [回首山路，槲叶依然灿烂]
    - [精彩到堪为经典的细节]
    - [宽容，坦诚阔大的襟怀]
    - [灾难体验的反向升华及其他]
- [思考和思想，是精神活力与精神脊梁]
- [一方独特的艺术风景]
- [说者与被说者，相通着的境界和操守]
- [一次探秘性阅读]
- [难得敏捷与坦诚]
- [马蹄溅落的诗行]
- [期待交流]
- [略说党宪宗]
- [四位才子，共舞心灵绿地]
- [慢说解读 且释摹写]
- [不敢妄言经典]
- [横空出世 非同凡响]
- [独立个性的声音]
- [借助一双敏锐的眼睛]
- [记忆抒雁]
- [因为感动作后记]
- [难得热诚，更难得慧眼]
- [新时期最具影响力的文学评论家——雷达]
- [超越文学的史料品格]
- [感佩一双眼睛]
- [燃烧的生命]

    - 欣慰与感动
    - 父子冲突的社会内涵与文化意蕴
        - 一
        - 二
        - 三
        - 四
    - 难忘一个人的响动
    - 生命禁区里的生命壮歌
    - 哲思的诗性抒怀
    - 我去你来无尽意……
    - 路遥和他的《平凡的世界》
- 对话
    - 作家要有使命感
    - 作家都在思考这个时代
        - 一、《白鹿原》每年都在印刷
        - 二、为自己造一部死时可以垫棺作枕的书
        - 三、行政级别的升迁对我诱惑甚微
        - 四、每个作家都在思考这个时代
    - 作家生命的意义在写作
    - 自我定位，无异自作自受
        - 《白鹿原》之前的写作都是练笔
        - 定义自己：自作自受
        - 不同的人离开这个世界的方式和途径都不一样
        - 白鹿原上最难写的朱先生
        - 让作者落泪的田小娥
        - 土茅房里头把日记一页一页撕下来烧成灰
        - 爱好和生存，生存总应该是第一

        - 谁也不可能跨越当时那个时代
        - 知青题材背后的城乡差别
        - 问我能不能跨越《白鹿原》，我不敢保证
        - 我想去看一下杜甫 给他送一斗小麦
        - 始终把握性描写的准则
        - 我喜欢赵本山的小品
    - 有关我的创作
    - 没上大学是人生的遗憾
    - 有关体验及其他
    - 关于电影《白鹿原》
    - 和作家秦岭说水
    - 文学的心脏，不可或缺
        - 对电影《白鹿原》，总体上是满意的，却也不无遗憾
        - 我写的人物我都喜欢，没有主次之分
        - 农村里日常见惯的人和事居然都可以写成小说？我想那我也能写
        - 我把我的创作转到接受真正的文学，第一次完成了“剥离”
        - 大树底下好乘凉，但另一面就很残酷——大树底下不长苗
        - 从文学爱好者到职业作家，我这个转变经历了二十五年
        - 我把作家的思想喻为炼钢，磨砺思想锋芒是很费工夫的
        - 我当了十几年作协主席，从来不用“培养”这个词
        - 生活和文学的自然法则，容不得任何人投机
        - 不可能大家都去写《百年孤独》，如果这样文学就太孤独了
        - 文学的本质，是作家对社会对人生的独特体验

        - 缺少高水准长篇小说，主要在于思想软弱，缺乏穿透历史和现实烟云的力度
        - 对于诺贝尔文学奖，我想都不想
    - 白鹿原上的文化守望
    - 从话剧《白鹿原》再演说起
        - 二十年魅力不减，多形式表现各有千秋
        - 《白鹿原》与华阴老腔的不解情缘
        - 大家的认可、甚高的评说，是作者最大的幸福
        - 写自己所想，实现自己的文学梦
    - 再说《白鹿原》
    - 附：诗词23首
        - 小重山·创作感怀
        - 青玉案·滋水
        - 踏莎行·人民大厦四十年
        - 阳关引·梨花
        - 七律·和宁夏张其玮先生
        - 七律·和路友为先生诗
        - 七律二首·故乡
        - 酹江月·香港回归感赋
        - 贤亮印象
        - 菊花诗二首
        - 七律·百年柯老
        - 红梅傲雪
        - 墨洇点点润屐痕
        - 致柴达木油田工人
        - 白鹿书院成立感赋
        - 致能召政

- 凤栖原
- 渭滨夜聚
- 幸会陈忠实
- 少陵原
- 王锋印象
- 致魏明伦

散文·随笔

我读《创业史》

《创业史》是一九五九年四月在《延河》首发。当时我正在读初中三年级，离毕业大概还剩下两个月。那个时候的乡村学生上中学，绝大多数都是背馍，就是家里把馒头蒸好，我们当地人都叫馍，背一礼拜的馍，礼拜六吃完再回家去背。家长一个礼拜给我两毛钱，买咸菜或者辣子酱、副食。一周六天吃的都是从家里背的干馍，大部分都是杂粮，就着咸菜或者辣子酱，喝开水。从报纸等媒体上知道《创业史》要在《延河》连载的时候，我就把那两毛钱的咸菜钱省下来，只吃干馍喝开水，赶到纺织城邮局买了一本《延河》。我直到现在都很清楚地记得，首发的《创业史》是那个《题叙》。那个题头插图到现在仍然历历在目，尽管刚才展示的刊物有点远，我老花眼也看不见，但到现在这个印象仍然在我脑海里。首发时不叫《创业史》，叫《稻地风波》，题头画的是稻田和稻田水渠上的一排白杨，白杨迎风舞摆。我一看到这幅图画就想到我家门前就是这景象。我家门前是灞河，一道一道的灌渠，灌渠上就是一排一排的白杨，少有柳树，也有稻田。读完《题叙》之后，我心里最欣慰的，或者说当时觉得最可安慰的，是把这两毛钱的咸菜钱省下来，买这本杂志是大赚了，而没有任何受苦的感觉。然后一直到念完初中毕业回家，后来断断续续地就买不全这本杂志了。后来我上了高中，听说《创业史》要在《收获》全文载出，当时托了在西安当工人的老舅给我买了一本《收获》，送到灞桥的三十四中学去，我才完整地读完了《创业史》。初读《创业

史》还不能完全理解，因为当时只是一个初中转入高中的学生，但几个人物仍留在了我的记忆中，至今不能忘记，梁三老汉、梁生宝、郭世富、富农姚士杰、改霞。这一茬人物，我在我们那个村子一个一个都能找到相对应的形象。我的这个村子和柳青的那个村子相隔大概也就是六七十里路。越到后来我越相信，《创业史》的人物在任何一个村子都能找到相应的生活人物。到后来对文学有了不断加深的理解的时候，才明白了柳青从生活真实到艺术真实的这个过程，应该说达到了一个完美的过程，至今令我望尘莫及。

《创业史》这部小说我前后大概读过九本。《创业史》单行本出版时，我首先买，仍然是托我舅买的，因为我舅有工资收入，我没有钱。我记得，“文革”时，气势之猛，令人很恐惧，我把我存的书（当时宣布是黑书），全部都当废纸卖掉了，唯一保存的一本就是《创业史》，尽管当时《创业史》也被批判，但我偷偷把它保留下来了，后来也不知叫谁拿走了。另一次记忆犹新的是一九七三年末至一九七四年初，我上南泥湾五七干校去锻炼，规定必须要带“毛选”，另外我偷偷带了一部《创业史》，外面套了一个“毛选”的塑料封皮。在南泥湾的窑洞里，晚上十时统一断电熄灯，我自制了一个油灯，同窑里的人睡了，我在油灯下读《创业史》。好在我们那个窑里的人没有谁说陈忠实读黑书。后来不知道谁把我这本书发现了，悄悄拿走了，再没还我。我记得十余年间先后读丢过九本《创业史》。这本书读到后来，就是我有一点时间随便打开这本书，打开到任何一页或者任何一章，我就能读进去，而且就能把一切烦恼排除开，进入蛤蟆滩那个熟悉的天地，这种感觉是我这一生的阅读史绝无仅有的现象。

生活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也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最早对这种变化的感受，我在一篇文章里写过，对我印象最深的一个晚

上，是一九八二年的春天，我被我们西安市灞桥区派到渭河边上去给农民分地，实行责任制。区上派的工作组到各个乡镇（当时叫公社），开始给农民分地。我在我驻的那个公社先做了一个村子分牛分马分地的试验，总结经验然后再推广。我记得在渭河边上第一个分牲畜的那个村子，晚上分完牲畜以后大约快到凌晨一点了，我骑着自行车回驻地的时候，路过一个大池塘——莲花池，刚从分牲畜的纠纷里冷静下来，突然意识到，一九八二年春天我在渭河边倾心尽力所做的工作，正好和柳青五十年代初在终南山下滈河边上所做的工作构成了一个反动。完全是个反动。三十年前，柳青不遗余力，走村串巷，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宣传实行农业合作化的好处；三十年后，我又在渭河边上一个村子一个村子说服农民，说服干部，宣传分牛分地单家独户种地最好，正好构成一个完全的反动。那个晚上从村子走回到我驻地的时候，这个反动对我心理的撞击至今难忘。生活发生这种戏剧性的变化，在我们文学界，多年以来涉及对《创业史》的评价，也是最致命的一个话题，就是农业合作社不存在了，那么《创业史》（包括柳青的写法）存在的意义如何？我以为很有探究的必要。作为柳青一个忠实的读者，截止到今天，《创业史》里头的那个梁三老汉、郭世富、姚士杰、梁生宝、徐改霞，依然在我脑子里栩栩如生，作为中国乡村的典型人物，似乎还没有哪部作品能把这些人物掩盖了，更别说抵消了。柳青和他创造的生命的意义，我想就在此。这就是我的理解。

2010年1月23日 长安

仅说一种本能的情感驱使

至今依然清晰地记得，三十一年前的一九七九年的二月下旬，因“文革”而瘫痪了十余年的陕西作家协会（当时为中国作家协会西安分会）召开会员代表大会，我有幸作为代表参加。会议结束的那天下午，一位陌生人敲门并走进我的房子，开口便自报家门：我是《陕西日报》文艺部的编辑吕震岳。我自然虔诚恭敬迎接。老吕头发脱得稀疏，脸上突兀着一副高而又直的鼻梁，说话嗓门很响亮。他没有一句客套和寒暄的话，开口便约稿，并再三强调副刊版面最大的容载量是七千字。说完急匆匆走掉了。

我在这年春天刚刚开始新时期的文学创作，兴致正盛，接连写了三四个短篇，都送给几家文学杂志了。尽管记着老吕的约稿，却无奈这几篇小说都在万字上下，报纸版面难以容纳。到五月初，收到老吕一封短信，催问约稿事。我顿然觉得有负老吕了，当即决定把正在构思的一个短篇小说确定给他写出来，关键还是七千字的极限。我便从两条途径探路，一是结构，要集中要紧凑；二是语言，必须简洁凝练，才可能缩短篇幅，经两三构思，较为顺利写成《信任》。尚不足七千字，甚为庆幸。这篇小说托一位正好要去陕报的作家朋友丁树荣捎给老吕，我便带着被褥骑着自行车到西安北郊农村参加夏收劳动去了。

大约半月后，我从下乡的农村回到西安郊区文化馆，才知道《信任》已发表多日，从送走稿件到见诸报纸刚好一周时间，这是我的习作发表得最快的一次。又过了几天收到老吕来信，说《信任》见报后反响很大，不断有读者打电话和写信说看法，约我到报社去看读者来

信。第二天我赶到陕报，老吕很兴奋，嗓门更响亮，把一摞读者来信交给我。我读着那些多为赞赏《信任》的或长或短的信，感受到一种前所未有的欣慰。那些写信的人，是全省各地从事各种职业的男人和女人，我更感觉到心理上的踏实。

此时《人民文学》一位编辑到陕西组稿，我很敬重又很崇拜的王汶石向她推荐了《信任》，当即在七月号《人民文学》转载（各种文学选刊尚未创刊）。这事我随后才得知，更敬重王汶石老师了。

一九八〇年春节刚过，接到北京一位编辑来信，告知《信任》获得第二届全国短篇小说奖，这又是太过重大的喜讯。这届评奖是由读者投票推选，可以判断不单陕西读者喜欢《信任》。这一年《陕西日报·秦岭副刊》搞农村题材征文评奖，老吕写信约我应征。我很用心写了《第一刀》，发表后不久，老吕又电话告我去编辑部看读者来信。我看着那些评说习作的热情洋溢的信，鼓舞和欣慰是最好的享受了。老吕摘编发表了三位读者来信。这是我最早写农村体制改革的一个短篇小说，由此发端，三年后写成十二万字的中篇小说《初夏》。

十年后的一九九〇年初秋某日，我从乡下回到省作家协会开会，《陕西日报》副刊部年轻编辑田长山和另外三位先生赶来，说陕报要宣传一位长期深入渭北的农业科技工作者李立科，要我采访写作报告文学，且郑重说明，是陕报总编辑骞国政点名钦定的。我当时正融入《白鹿原》的写作过程，孤守原下一隅，目无暇顾，当即推辞。然架不住几位编辑词恳意切的煽呼，尤其说到是省委决定要宣传这位默默地为农民干实事的科学家，我不敢执意推辞了，只得把手头正写的《白》暂且放下，便接受下来，仅提出一个要求，让田长山和我联手完成这一写作使命。

一个由农业科技记者、摄影记者和文字记者共七八人组成的采访组来到合阳县。我平生唯一一次被授名为特约记者。我们见到了李立科。我们和李立科坐下长谈。主要是倾听李立科说他在合阳十几年的科技普及和推广，自然免不了发问。我们到几个乡镇和几个村庄，访问那些接受新技术并且获得显著效益的干部和农民，更多地感知到干部和农民对李立科的赞颂乃至感恩的真挚情感。我们跟着李立科来到田间地头，亲眼看到实施他的新技术和未用新技术的麦田里差异明显的麦苗，起码对我也是一次科技知识的普及。记得我们采访到号称合阳的西伯利亚的一个乡镇，那位朴实而又务实的乡党委书记说到李立科，似乎有讲不完的故事，言语里深沉的情感味儿是那样自然的、由衷的。这个号称西伯利亚的乡镇，年降雨量很少，李立科的新技术正好解决了缺水保墒使麦子增产的矛盾，他说他这个书记也好当了。我至今依旧不能忘怀的是，接受我们采访的李立科不久前刚刚做过面部颌骨癌症手术，说话困难；许多接受采访的男女乡民，说着说着便泣不成声……我在那一刻，真实地理解了作为一个人的生命的意义和价值；那些男女乡民的眼泪，无疑是对一个堪称伟大生命的礼赞。

回到西安不久，我和田长山写成了报告文学《渭北高原，关于一个人的记忆》。全篇约一万五千字，《陕西日报》全文刊发。

隔日，陕西省委和陕西省政府联合做出向李立科学习的决定，在《陕西日报》头版刊登。一个长期扎根渭北高原为民兴利造福却默默无闻的农业科学家李立科，突显在人们眼前，影响着也提升着人们的审美和价值判断。我也完成了一次心灵洗礼。

一九九二年春天，在写完《白鹿原》等待编辑审稿意见的颇为忐忑的情境里，我一个人仍住在原下祖居的屋院，陡增吟诵古典诗词的兴致。初夏时节，一个始料不及的好事发生了，《渭北高原，关于一

个人的记忆》被评为一九九〇至一九九一年度全国报告文学奖。这是中国作协的奖项，《渭》文是由谁家推荐参评，我竟然不知，所以说是意料不及的好事。

三十多年过去，我颇多感慨，在我文学写作的生涯中，有幸获得三项国家文学奖，而其中两项（短篇小说奖和报告文学奖）的作品，都是在《陕西日报》发表的，而且是编辑热诚邀约促成的创作。且不论理性的意义，也不说道德的操守，单就纯粹本能的情感驱使，恰是《陕西日报》这方平台，让我获得了文学创作探索过程中的重要突破……许多年来，凡有《陕西日报》召唤，需我配合，我都不敢马虎，多是那种本能的情感驱使。

2010年3月13日 二府庄

热情率性与悄没声息

——王愚印象

王愚以悄没声息的方式告别这个世界，在我的直接感觉里颇为意外。他谢世前两三个月时，便留下“不设灵堂不搞遗体告别仪式不保留骨灰不接受花圈……”的手书遗嘱。他不要惊动任何人。他要安静地告别这个世界。我之所以产生甚为意外的直接反应，除了不合时下通行的丧葬习俗因素，除了这位在文学理论、文学批评界有建树且有广泛影响的人应有的社会反响，姑且不论，单就王愚个人性情而言，似乎难能采取这样决绝的悄没声息地告别这个世界的方式。

在我的印象里，王愚是位热情洋溢的人，尤其于他钟情的文学事业，永远是一种热情洋溢的姿态；涉及文学创作和文学评论两翼的人，无论性别和年龄，无论省内或外省的生人或熟人，他总是一种不分彼此的热情洋溢的姿态；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初涉文坛时的热情洋溢，历经二十年“右派”冤案及至牢狱之灾后重返新时期的文坛，不仅热情不减一丝一缕，而且焕发出一种更为持久的热情洋溢的姿态，倒像是要把“右派”帽子和牢狱之灾重压之下积久的热情加倍释放出来。

我认识王愚的时候，是新时期文艺复兴的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尾，他刚刚获得平反走出冤狱重新坐到《延河》编辑部的办公桌前。我见到他的突出印象，是上唇和鼻头下一绺修剪得整整齐齐的极其浓密的胡须，当即联想到鲁迅先生标志性的那道胡须，颇为相像。其实远不止一抹胡须与鲁迅相像，王愚的又瘦削又低矮的个头，浓密而又硬挣的剪短直立的头发，尤其是窄窄的脸型，还有高眉骨下略显深陷的单

皮眼睛，活脱一个北方的鲁迅。这张脸看一眼便储成记忆，不会发生张冠李戴的混乱。就是这位刚刚走出牢狱不久的王愚，于一九八〇年春天发出一篇影响广泛的文学评论文章，题目为《二十五篇之外》。文章的背景是这年春节刚过，中国作协公布了一九七九年全国短篇小说评奖的获奖篇目，共二十五篇。王愚当即做出反应，品评了几篇未获奖的优秀的短篇小说。尽管他没有对获奖的二十五篇小说提出歧义或批评，然力举另外几篇小说的评论本身，就显示着不言而喻的辩争意味。我读过这篇评论文章，一个历经二十年冤情刚刚走出劳改砖场不久的王愚，对文学作品依然保持着敏锐的审视眼光，还有不看别个眼色直抒己见的纯文学精神，在我就自然发生了敬重和钦佩。

人们似乎有一个基本的看法，上世纪八十年代是新时期文艺复兴的黄金岁月。在这个黄金岁月里的王愚，展示出他人生里程中的黄金时段。他关注着一波迭过一波的中国文学的潮流，许多新跃出的作家的重要作品，都进入他的视镜，而且发出他独特的评说的声音，说他是新时期文学的推波助澜者当为恰切。尤其是对刚刚跃上陕西新时期文坛的几位青年作家，都有他关注的目光，这几位作家的每一篇或每一部中、短篇小说所展示的新的艺术追求上的变化，都被他扫描到了。我在八十年代中期写过一篇短篇小说《轱辘子客》，在《延河》发表。我那时住在乡下老屋，有一日回作协办事或开会，在作协院子里碰见王愚，匆匆地擦肩而过时，他停住脚："刚看了你发在《延河》上的短篇小说，不像原来的陈忠实了，变得好。"这是这篇短篇小说面世后我听到的第一声评说。仅仅一句话的好评之所以经久不忘，在于我对这篇小说写作的用心非比寻常。我已在构思着《白鹿原》，需要用一种叙述语言完成，《轱辘子客》这篇小说的写作，纯粹是为着叙述语言的试验而作的，通篇故事和情节都以叙述实现，只在结尾处有几句人物对话。这种叙述语言的艺术效果如何，在我已不仅是这篇短

篇小说的成败，而是牵涉到未来长篇小说的写作，能否有自信实现叙述语言的新探索。王愚给了我鼓励。也可见王愚对一篇短篇小说都不放过。其实何止于我的写作，新时期初始涌现的十余位陕西青年作家的作品，都被王愚关注着，写了大量的评论文章，对这些青年作家创作的探索和发展，起到了难以量化却确实积极的促进作用。王愚促成了“笔耕”评论组的成立，被推为组长。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由他和陕西高校的几位当代文学评论家谋划，成立了一个纯民间性质的文学评论团体，取了一个极富诗意的名字——笔耕。这个“笔耕”评论组，既关注新时期中国文学创作的发展动向，更关注陕西刚刚涌现的一批青年作家的创作，不仅写了许多评论文章，而且对每一位青年作家创作的优长和缺失都进行讨论，力促他们的创作不断跃升新的艺术境界，我是受益者之一。难得在于这个“笔耕”评论组没有公费，那时尚未发生社会赞助的事，他们专注地讨论完某一个文学专题，散伙后各自回家吃饭，顶奢侈的时候，是由一位慷慨之士掏腰包请大伙吃一碗羊肉泡馍。

在全国十余家文学理论与批评杂志里，有一种单纯对中国小说进行评说的杂志《小说评论》，王愚是促成这本杂志创刊的主力之一，先任副主编，接任主编。这本个性独具的评论杂志，对新时期当代文学的重要小说作品都发出了评说的声音，视野之开阔，已不局限陕西文学创作，而是对当代中国文学的发展起到了无可估量的作用。自然，对陕西新时期以来涌现的一茬又一茬以小说创作为主的作家的作品的研究，对他们创作的提升和发展，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优势，恕不一一赘述。

送别王愚那天，看到躺在花丛中的这位体形瘦削脸孔酷似鲁迅的人，我突然意识到这样一个事实，在认识他并和他在一个院内生活和

工作的三十余年的时间里，无法数计听过他多少回作品研讨会的发言，更记不得闲适环境里听过他多少回即兴的随意而出的闲话，却几乎没有听到过他在二十年的冤狱里遭遇的灾难生活的只言片语。他向来不说，我也一直不敢问。我约略知道一点，就是他在监狱的砖场劳动改造。任谁都知道，上世纪七十年代以前的砖场生产属于手工劳动，尤其是把烧成的砖从砖窑里弄出来，通常说出窑，主要靠人往出背，后来稍微先进的轮窑，用架子车往外拉。我不敢想象，体重不足五十公斤、身高顶多不过一米六的王愚，怎样完成规定的背砖出窑的定额！即使用架子车往外拉砖，也得把刚刚烧成的砖块搬到架子车上，从高温和灰尘弥漫的砖窑里拉出来，再把砖块一摞一摞搬下来垒堆到砖场上，那些尚等不得冷却的砖头，搬上搬下，烫人手掌。王愚竟然挺过来了，挺了许多年而没有倒下，对于这个矮小瘦削到不足五十公斤的生命个体，算是一个奇迹，也属万幸。然而，他却不说，也没有看到他对这些不堪的往事的文字记述。

我之所以对他不说不写那些灾难性经历多所感慨，是有一个诱因，七八年前我读过从维熙先生的一部写他“右派”劳动改造生活的书《走向混沌》。如果用一句话概括我的阅读直感，应是惨不忍睹。从维熙写得很平静，通篇文字里都是一种平静，平静的文字愈让我感受着惨不忍睹。我那时就想到王愚，背砖拉砖的劳动改造的日子怎么熬过来的，他却不说，也不写。我自然会发生庸常的猜测，王愚襟怀宽阔，过去的事就过去了，不说也罢，说了也白说，往前看也往前走，珍惜重新获得的生命创造的机会，着重于钟爱的文学评论的新探索；再，能做到不提也罢的基础心理，大约是不想再触及那些业已过去了的不堪，痛苦到难以言说的状态，有人索性就不说了，这是性格的一种，这是王愚。

在人多的场合，王愚是健谈的一个人，尤其是在朋友聚餐喝过几盅酒之后，妙语连珠；再贪杯多喝几盅之后，便呈现出一种忘我忘他又忘乎所以的自由状态，常常做出一些类似童稚少年的表情和举动，转瞬又说出几句狂放的豪言大话。同座熟悉的或初识的朋友便看到一个鲜活而又个性化的王愚。我在那种场合里，往往会突然想到，这样富于性格张力的一个人，如何走过了背砖出窑还不许“乱说乱动”的二十年岁月；同时想到，被封口二十年的王愚，一旦出了劳改的砖窑，依然保持着既能说又喜动的活泼天性，真应验了民间俗语说的禀性难移的话。还有，他手舞足蹈，妙语迭出，尽是国事省事文学写作事，却绝不提及自己二十年冤狱里的任何事，即使喝到八九成醉态，仍不会提及，我便感佩这个瘦削矮小的人的巨大的承载能力，也隐约感知到这个人非同一般的精神品相。

王愚喝酒在文学圈里已有名气。他每天必喝，多是在自家屋里自斟自饮，喝到兴奋处，便推开稿纸，把激扬的文字倾泻出来。他喝酒似乎不大讲究品牌，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从乡下回到城里，在住宅楼道上遇见王愚，他手里提着一瓶酒，是从巷道里的小卖部买来的，我想看看这位大评论家喝什么好酒，一看却是汉中生产的“城固特曲”，当时售价不过三元。未及我问，他笑着自我解释，这酒好着哩。王愚喝酒也留下不少笑话，多是喝醉时的失控行为惹出的。典型的一次是某晚聚餐后回到作协大院，东倒西歪地走步，竟然不辨眼前的水泥围栏的水池，一头栽了进去，爬不出来。一个路过的人听到水池里有拨拉池水的声音，初以为是鱼儿戏水，又想到金鱼弄不出这样大的水声，跑到池边一看，晦暗的水池里蠕动着一个人，当即拖出水来，一看，竟是大评论家王愚。任谁都会想到，如若没有路过的这个人的奇遇，后果不堪设想。然而睡过一夜的王愚，又正襟危坐在《小

说评论》主编的书稿堆垒如山的办公桌前，或是对一位来访的作家纵横捭阖起他的阅读意见来。

这样一个热情洋溢又颇见自由率性的王愚，却决然地选择了悄没声息告别这个世界的方式。我在最初感到诧异之后，随之也就释然，这是王愚性情里相辅相成的另一面，犹如鲜亮的阳光之后，浮上天际的柔媚的月亮的谧静。

2010年4月15日 二府庄

我经历的狼

几个根系都扎在乡村的朋友遇到一起，很随意也更自然地慨叹着生活发生的急促到不敢想象的变化，由此而不由自主地感慨童年时期乡村生活的艰难，有人说到一块糖疙瘩留下的难忘的记忆；有人说到他直到进县城寄宿读中学时，晚上睡觉脱裤子时才发现别人穿着贴身衬裤，回家哭闹着要母亲赶制一条；有的人说他和一位女同学同坐一条长凳同趴一张课桌整一个学年，竟然发现没有说过一句话，甚至不敢正眼看对方一眼，往往是伪装看书用眼角的余光偷瞄一眼，如此等等。这些旧时生活经历的细节，几乎是一人道来人人呼应，都有过同样的或类似的经历。其实不难理解，那时候关中乡村乡民的生活情况大同小异，如上三种在今天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事，在我都经历过也发生过，那时候寻常存在的生活世象，今天竟有恍若隔世之感，却又如此鲜活，如在昨天发生。

这种老朋友老同学老乡党的聚合，没有任何主题话语，纯粹闲聊，想到哪儿就说到哪儿，一种再轻松不过的气氛，再加上几杯酒下肚，情绪愈加亢奋，往往发生几个人同时说话各说各的人生际遇以及感慨。我往往在这种境况里省下口舌，享受听的乐趣，却也有控制不住的时候，便是有人说到了狼。几个人都争抢着说到自己幼年遭遇狼的险事和趣事，我也加入了说狼的旧话之中。朋友中竟有人插话说，你能写文章，把你这些狼的故事写出来，挺有意思。我曾动过此念，之后又觉得意思不大，便拖下来。前几日在电视上看到一个说狼的短片，业已沉寂的写狼的兴趣又发生了。

自有生活能力的幼稚时期，我对自己生活的世界最早产生的恐惧来自两种东西，一是狼，另一个是鬼。印象里对狼的恐惧肯定早于鬼，先说狼，暂且搁置鬼的故事。

小时候闹性子要脾气，父母顺口一句恐吓的话，狼来了。尤其是晚上，玩得兴奋不安生睡觉，或是因什么不高兴的事使性子，父母没招了就请出狼来吓唬我。狼是什么样子无法想象，恐惧的效应却在心里形成了。我对狼的近距离感知，发生在十三四岁的时候。

那年实行了农业合作化，劳动分红需得等到年底，父母平时只顾在农业社出工干活，属于自己的土地和土地上的物产都归集体了，自然没有任何经济收入了。家里总不能缺盐，醋可以由母亲酿造，也难免头疼脑热去看病买药，还有我和家兄的学费，都得花钱。父亲想到了养猪，猪养肥杀了卖肉，或是把肥猪卖给屠户，都会赚一点利钱。父亲在后院垒了猪圈，春天买回一只小猪，放进猪圈。那个猪圈的上方，横着搭了几根木棍，上边又架着一束一束从坡坎上砍下来的满身长刺儿的野酸枣棵子，是为防狼跳进猪圈咬小猪的。在猪圈的外墙上，用当地出产的一种白土化成浆水画了几个圆圈，据说狼怕钻圈。其实，村子里凡养猪的人家，猪圈四周和上边都是这种防狼的措施。然而，不妙的是，把小猪放进猪圈仅仅半天一夜的第二天早晨，父亲便在猪圈外边的地面上发现了狼的蹄印。尽管小猪安然幸免，父亲仍断然采取措施，白天把小猪关进猪圈，晚上把小猪放出来安置到屋子里，在后门左侧的木梯下的墙拐角，铺了一层黄土，又撒了一撮稻草，小猪便卧在那里过夜。

我那时在城里读初中，寄宿学校，周六晚上才回家一次。有天晚上睡到半夜，我被敲击后门的响声惊醒。父亲却依旧打着鼾声。我摇醒父亲说谁在敲门。父亲随口不在意地说：“是狼。”我不由得“啊”的

一声，睡意全吓跑了。父亲便告诉我，自打把小猪安置到后门门内的墙角，夜里时不时就有狼来守在后门口，初发生门被撞响的头两次，他手抓一根木棍，拉开后门门闩时，狼便蹿上后门外的白鹿原坡上了。他曾在月光下看见慌急逃窜的狼的身影，佯装追赶几步，吓一下狼，多少能安生几晚。过不了十天半月，狼又来了，又把后门板弄得咣咣当当响，他不仅懒得招理，而且照睡不醒。父亲告诉我，狼能够在很远的原坡上闻到猪的气味，总想吃猪。父亲还告诉我，狼是用屁股碰撞后门板，狼是铜头铁尻子（屁股）豆腐腰，打狼要打腰。说罢，又睡着了。

我却睡意全无，似乎心还在慌跳着。后门板停住了响声，大约是狼听见了父亲说话的声音。当父亲睡着不久，后门板又响起来，我更加害怕了，从我睡觉的后屋的炕，到后门不过几步，狼就在后门外用尻子碰撞后门，门板响几声，卧在后门内的猪就发出却也不甚惊慌的一两声哼哼。我怎么也睡不着，想象着狼的发着绿光的眼睛，龇着长牙的大嘴，越想越怕越睡不着。我又摇醒父亲。他披衣下炕，懒得开后门，只听他用脚把后门板蹬得山响，就回屋睡下了。后门再未发出响声，狼吓跑了。我缓了好久才睡着。

到这年冬天放寒假时，这头猪已长成一头大肥猪了，正在加精料追肥，不久就该卖掉或宰杀了。我几乎每天晚上半夜时分都能听到狼用尻子碰撞后门板的响声，竟然也不再发生惊吓睡不着的事了。有一晚，又被狼碰撞后门板的声响惊醒，我竟然想和狼有一个短距离接触的冒险举动，捞起父亲常备的那根木棍，走到后门口，本想拉开后门敲那只恶作剧的狼一棍子，但到后门前却胆怯了，万一我在拉开后门板的一瞬间，那馋急了的狼朝我扑来怎么办？我便学着父亲的做法，用脚猛蹬后门板，狼逃走了。这是我与狼的最短距离的接触，之间仅

隔两扇门板。过了几天，杀了肥猪，再也听不到夜半狼用尻子撞碰后门板的响声了，我竟觉得有点寂寞，似乎缺失了什么。

早在一年前的冬天，还经历过一回狼的故事，不是发生在通常的乡野，却是发生在省会城市西安。我刚刚考上初中，新建的校舍尚未完工，便把新招的四个班级的学生临时安排在一所停歇的教堂里。教堂在西安城东门外的东关北边一条狭窄的小巷里，倒也清静，是一方听讲写字的好地方。教堂的后门外，是一块很大的平场，有一孔早已废弃的砖窑，可以判断这儿曾经是一个制砖烧砖的场地。有人在这里养了一群羊，用很简陋的围栏围住羊群，养羊人自己食宿在废弃的也很破旧的砖窑里。教堂的后门外设置男女厕所，我和同学一天几次走出后门去方便，不久也就看出过去的砖场，现在的“牧场”上的生活景象，大约在太阳出来许久，养羊人才赶羊出场（据说羊吃不得有露水的草）到野外去放牧。太阳落山时，他又把吃饱了牧草的羊拦回“牧场”，圈进围栏里。入学时看见的小半大羊，眼看着到冬天就长成大羊了。

临近寒假，正是关中地区最寒冷的数九季节。我在某日早晨进入教室开始早读，听班里同学说，昨晚“牧场”上的羊被狼咬死了两只。我架不住好奇，和一个同学跑出教堂后门，头一眼就看见，放羊汉子正在持刀剥着羊皮，那羊是倒挂在一根凌空架起的横杆上，并排挂着两只，一只已经剥光了皮，鲜红的肉体，且已开膛，内脏就堆在脚旁边的一只木盆里，正在剥离这一只羊的羊皮。我闻到一股血腥味，却也没问羊的主人，想来昨天夜里发生狼咬死羊的惨事是无疑的了。

这是一九五五年的冬天，西安城东门外的东关北边一条小巷里发生的狼咬死羊的事。顺便简介一下那时的西安古城的格局。西安古城有一圈虽则破旧却基本完整的明代修筑的城墙，墙顶上可以对开汽

车，足见其雄厚。西安城中心有钟楼鼓楼作为标志，以此展开东西南北四条大街，也就有了东门西门南门北门四道大城门。四道城门外仍然延续着城市的格局，分别为东关西关南关北关，比之四道城门内的四条大街的规模自然小而短得多了。我在一九五五年看到的东关的东面南面和北面都是庄稼地，这里那里散落着村庄，却不与东关里的城市人混居。就在东关的北面的小巷里，庄严肃静的教堂后门外，竟然有狼光顾，且咬死了两只即将出栏的肥羊，约略可以想到五十多年前古城西安的一斑。我曾猜想，说不准那野狼完全可以蹿进东门，在东大街乃至钟楼鼓楼下转悠觅食……在我却是看到了弱肉强食的直观现场，竟然是在城市范围内的教堂后院。

我第一次看见狼，是在两年后的一天早晨。我上初中三年级时，转学到离家较近的一所中学，约二十华里，依旧继续着背馍寄宿的生活。已成规律的生活秩序，是周六下午放学回家，周日下午背着母亲蒸好的馍上学，绝大部分的农村学生都是这样求学读书的，不仅不以为只啃干馍喝白开水的生活艰苦，而且对新中国给予的上中学的机会心怀感恩。记不得那个周日下午因何故未能返校，周一天不明便起身背馍赶路，那时没有公交车，更不敢奢望自行车，只有步行，却也习以为常。因为天尚未明，父亲便陪我赶路，主要担心是怕遇见狼，那时候拦路打劫的凶事几乎闻所未闻。

暑末秋初的灞河川道的黎明时分，弥漫着一层白色的水雾。路上不见行人。过了一个马家村，也未遇见一个早起的村人。出马家村要翻一道流沙沟，很深，仅有一步宽的小道，这是传说中多有野狼出没的地方，往往使人有阴森的心理压迫。有父亲相陪，我只顾走路，没有任何恐惧，下沟再上沟丝毫也不觉得累，只怕迟到，尤其是陌生的新学校的开学第一天。不觉间翻上流沙沟对面的平地，天色有亮光

了。父亲突然惊叫一声，狼！我吓得当即收住脚步，便看见离我们不过十来步远的谷子地头，有两只狼，灰黄色。两只狼在谷子地头的流沙沟边上嬉戏，这只跳起来扑向那只，那只歪头躲过，纵身跃起又扑向这只。狼肯定看见了父亲和我，却不逃走，依然戏耍着。人说虎不失威，我直接看到了的狼也不失威。父亲似乎不甘于就此走掉，顺手在地上捡起两块石头，接连朝狼扔去。那两只玩得正开心的狼并不惊慌，却也终止了戏闹，缓缓慢跑着朝北边去了，给人以悻悻的感觉。这是我平生唯一一次在乡野间和狼的遭遇，距离很近。有父亲在身边，短暂的惊怕很快过去，我又真实体验了父亲存在的意义。再说，那两只戏耍着的狼，没有任何凶猛残忍的外相，和我见惯了的戏耍的狗几乎没有差别。这是一九五八年九月初“大跃进”正热火的年月的一次奇遇，这年我十六岁。

这时候，我尚无在生产队参加劳动挣工分的资格，每逢学校放假，寒假时到坡上拾柴火，暑假也是到坡上割草，可以挣工分。这里所说的坡，就是地理上白鹿原的北坡，起伏有急有缓，形成一条连着一条的大沟浅峪；舒缓的坡地上被先人们开垦为田地，种植小麦；陡峭的坡坎和沟峪里只能生长荆棘和野草，间有杂树。我和伙伴拾柴割草的时候，常常能发现狼拉下的新鲜粪便。狼的粪便很容易辨认，常常挟裹着白色的羊毛和黑色的猪毛，任何其他动物不会拉出这种粪便来。可以想到，就在昨夜，狼从这里走过，不由得心里发紧，偶尔还会看到被狼撕扯破烂的小孩的衣裤，那是不幸早夭的孩子因为埋得浅，被狼刨出来了，却不见残骨，我常被吓得不敢多看一眼。后来的许多年间，时不时会听到村人中间的传闻，邻近哪个村子什么人家的猪或羊被狼咬死了，或叼走了，甚至偶尔传闻吓人的惨事，什么村什么人家的小孩被狼伤害了。这样积久的传闻，即使无意，也在加深着对狼的印象，凶残。

大约到了“文革”发生的第二年，我所工作和生活的西安东郊地区，也和西安其他地区一样激烈着造反夺权的风潮，几乎是村村社社无宁日。与这里那里不断发生的武斗相映成趣的是，有两只狼似乎也被疯狂的社会气氛感染了，到处为非作歹，前日咬死了坡上某人家的猪，昨天夜里又叼走了河川一户人家的羊，还有威胁行人的危险事相继发生，已经闹得人心惶惶。我那时候正在一所民办中学任教，造反伊始便停课闹革命了，学生时来时不来，教师也获得了来去自由。我因被划到“保皇”系列，受到小小的批判，虽然成了什么组织也不参加的逍遥派，却不敢任性，坚守在学校养那只正待产的老母猪（农业中学自力更生办校）。这时几乎心如死灰，却也没有了任何欲望的烦恼，业余爱好文学创作的兴趣早都消亡了，能否继续做一名教师都不敢太乐观。尽管如此，却仍然不敢马虎对老母猪的保护，到坡地上挖来酸枣刺棵子，几乎把猪圈上边纵横交错架满了，料定那两只癫狂的狼也只能徒叹奈何。我真的在猪圈外边的土地上不仅发现了狼的蹄印，还发现了狼拉的粪便，完全可以想见在猪圈外踅摸着又不能得逞施暴的狼猴急的样子，可惜这里没有我家的后门板供它用尻子碰撞撒野，我自安然睡觉。

这年春节过后不久的一天，早晨起来便看到地上落了一层不薄亦不太厚的雪，原也不足为奇。我正洗脸的当儿，突然听到学校背后传来几声响亮的枪声，扔下毛巾便跑到院子里，心里想着武斗虽不新鲜，却还没有动用过枪炮，是不是今日破禁了？跑到院子里往后看去，白鹿原北坡上茫茫一层白雪，蓝天下的白雪地上，有三四个人在缓慢行走，可以辨认出是穿着绿色服装的军人，手里提着枪。起初以为驻军借着难得的雪地演练，随之遇到一位路过学校的熟人说，解放军为民除害，打死了那两只呈疯狂状态作恶多端的狼。我当下便有欢呼的欲望，表现出来却是脱口而出的一句“这下好嘞”的话。

我的家乡有一所军事性质的高校，就在白鹿原北坡一个很大的深洼里。据说是经过反复论证，这是一方最可隐蔽的好地方，便把军校设置在这里。军校有警卫连，常常做许多爱民的善事，在当地群众中口碑甚好。他们肯定听到乡民被那两只癫狂的狼危害的议论，便决定为民除害。难得这一场雪，再狡猾的狼也无法消除行走留下的蹄印。战士便循着狼的蹄印，在白鹿原北坡的沟梁坡坎之间追踪发现了两只狼，先打死一只，再追着逃脱的另一只，又打死了。我听到的那几声枪响，就是射击逃到学校背后坡沟里的那只狼时发生的。

眼看着战士们从坡坎上走下来，从学校门前的公路上经过。我站在路边等着，看见两个战士用步枪抬着一只狼，另两个战士跟在左右，侍候着换肩。那只狼的皮毛上染着血，刚刚结束它癫狂的生命。狼头耷拉着蹭着地皮，舌头伸到长嘴外边。我不自觉地留心看了看狼的皮毛的颜色，灰黄色，只是比我十年前上学路上碰到的那两只狼的灰色偏重一点，感觉却相去甚远，那两只狼在熹微的晨光里嬉闹，尽情撒着欢，眼下看到的却是被枪击致死的一具狼尸。

这是我的家乡灞河川道白鹿原坡地最后的两只狼，死在解放军战士的枪口下。四十多年过去，这方有原有坡有河有川的颇为适宜野生兽类生存的地方，却再也没有发现过狼的行踪。

在濒临灭绝的动物名单中，似乎还没有列入狼，可见狼的生命力之强。然而，就我眼见的关中平原地区，自不必说，单是渭北高原乃至毛乌素沙漠，十余年间已经变得铁路、公路和高速公路纵横交错形成网状体系，火车奔驰汽车穿梭，狼们便失去了任性撒野随性作恶的自由空间，迁徙到更僻远也更阔大的荒野地带去了。可以想见狼的数量在减少，比不得上世纪五十年代随处都有狼的蹄印的现象了，却远远不到濒临灭绝的危机状态。我又想到，有些濒临灭绝的动物，除了

生存环境恶化等因素外，很重要一条是这些动物自身所具备的商品价值，被那些生财无道挣钱无门的人盯住，或捕捉或猎杀，偷换几张钞票。譬如老虎，虎皮虎骨乃至虎血，都是任人随意张口要价的昂贵之物。狼的皮毛不值几个钱，狼的骨头亦无保健的药用功能，内脏无疑属于废物。即使作为动物的一个品种，狼在动物园里，其形象也缺失观赏趣味，甚至连狐狸的毛色也不及。狼是以凶残而造成深远影响的。如果不是它对人类和家畜为害太过太烈，一般情况下，人是不会和狼计较的，也懒得费劲劳神去捕杀它。同样可以对比的是狐狸，不在乎它天性就喜欢偷鸡，可见人的宽容；人之所以捕杀狐狸，诱因全在它那一身珍贵的皮毛，狐皮做褥不仅色彩漂亮，而且特别暖和，尤其是它的尾毛，是中国传统的书写工具毛笔的绝佳用料。狼与狐狸是连一点优势都比不出的，且不说虎。

时不时地从媒体上得知老虎生存的危机，便引发担心；获知仅剩几只的朱鹮，经持续多年的精心救助和保护，已经繁衍到一千余只的颇为壮观的族群，完全脱离灭绝的危情，我甚为欣慰，那鸟儿实在太漂亮了；无论狼是否会灭绝，我却怎么也操不上心来。平心而论，我和狼没有构成成见的因由，尽管它曾经用尻子撞碰过我家的后门门板，却不过是猴急的无奈的举动罢了，没有对家养的猪造成伤害；尽管上学的路上遇见过两只狼，因为身边站着如山的父亲，我也没有受到威胁，倒是看到戏闹着的狼的可爱的一面。在我生存的白鹿原下灞河川道，四十年不见狼的声息和踪迹，似乎也没有听到过一声惋惜或遗憾。

我相信狼不会绝种，少几只就少几只吧；也希望狼不要灭绝，它毕竟是野生动物之一种，是造化赋予世界的一种生命形态，无论其可恶或可爱与否。

2010年4月30日 二府庄

大智慧者的人生选择

——忽培元印象

结识忽培元先生有许多年了。许多年来，这个人总是给我带来意料不及的惊诧和欣喜。我最初读过他的散文，最直接的感觉是作家的散文。我之所以产生这种感觉，在于我知道他的社会身份是一位职位颇高的“官员”，我先入为主的偏颇印象是，“官员”的文学创作难免有附庸风雅的印记。然而，我最初读忽培元的散文，却完全是作家的纯粹的生活体验的表述，文字也是颇有个性化的韵味。及至读到他的长篇人物传记《群山》，我的意料不及的惊诧和欣喜就同时发生了。《群山》对我产生的已经不是一般作品的欣赏层面的意味了，而是一种真实而强烈的震撼。忽培元以崇敬的心态和冷峻的眼光，叙写了陕北红色革命根据地创建和发展的艰难历程，让我看到业已成为历史的真实而又撼人心魄的、沉重到不敢掀动的一页。我那时有一种很直接的反应，就是忽培元应该把创作当主业，把行政任职辞掉，或者挂一个虚衔，不然，把这样好的文学天赋和创作实力耽搁了，就太可惜了。

随后多年，忽培元隔不长时间送我一本散文集，或是人物传记，或是中短篇小说集，都引发我的慨叹。这个人的创作量之大，真难以思议。而且他兼任着实际的行政工作，真不敢想他有多少睡眠时间。及至看到他的长篇小说《雪祭》、长诗《共和国不会忘记》，我简直就是惊诧连连了。属于文学的几乎所有样式，散文，特写，传记，中、短、长篇小说，诗歌以及评论，忽培元都多有著述，成就卓著。可见忽培元不仅有文学创作的鲜活而敏锐的灵感，而且有理论审视的

严密，更难得有一腔澎湃着的诗性激情。我司空见惯着天才之说，忽培元当属天生文学创作之大才。这位可谓著作等身的天才作家，兼任着行政要职，又恪守着作为一个既传统又当代的作家的道德，把自己对历史和现实的体验作尽可能完美的艺术表述，却不见一丝张扬性宣传，更不屑做任何炒作，尤为难能可贵，令我钦佩和敬重。

写到这里，我突然意识到，我最初读《群山》之后产生的所谓弃官作文的意念确实褊狭了，甚至谬误了。忽培元担任行政官职，不是虚职而是实职，便可令他直接进入当代日新月异的生活主潮之中，包括漩涡里焦灼的社会矛盾，已不是通常意义上的体验或感受生活，而是生活迫使他必须作深刻思考；这种痛切乃至焦灼里的思考所获得的体验，就不是作为局外人的体验者的感受了。忽培元的体验是独有的发现，而且泛溢着生活主潮的脉动。这样想来，我才理解了忽培元多年来把主业放在行政职场，始终把文学创作置于业余的因由。他这样做，无疑是一位有大智慧的人。

2010年5月18日 二府庄

十九届世界杯足球赛点评

未闻哨响已踊跃

世界杯又来了，我的心也开始踊跃起来。作为一个标准的球迷，这是我盼望已久的时刻。

世界杯是独一无二的，别的项目也有世界杯，但只有加上体操、摔跤等定语，它们的身份才能得到确认。但足球的世界杯没有这样的障碍和烦恼，只要没有特别注明的世界杯，就肯定是足球的，仅就这一点，就表明了足球的普遍性和影响力。这是一种殊荣，只有足球才能专美。

据我了解，北京奥运会有二十八个大项，三百零二个小项。但那么多的项目，却没有任何一个能和世界杯足球相比。论参与国家和地区的广阔程度、论参与球迷的数量、论社会影响的大小，足球都堪称第一，而世界杯则是足球的最高舞台，更是具有至高无上的影响力。

世界杯既是竞技场，也是人类的狂欢节。世界杯最令我感动的是，在这三十天里，在绿茵场内外，无论肤色白、黑、黄，性别男或女，年龄大或小，地球上所有人种所有民族，都能投入全部的热情，都能够忘乎所以。

用现在时髦的话说，我算是一个"骨灰级"球迷。我看了三十多年球，不光看世界杯，还看各国联赛，看中国足球，原本以为随着年龄的增长，体能的减弱，我对世界杯会慢慢冷漠起来。但当世界杯真的来了，我却发现自己对足球的情绪依然没有冷却，最近几天，看着央

视世界杯的赛前报道，我也莫名激动起来，心也一直向南，到了那个美丽的彩虹国度。

就我以往看球的经历来说，我觉得看球实在是莫大的享受。在这九十分钟里，足球可以让人全身心投入，让人忘记年龄，忘记生活中发生的那些不堪之事。在飞来飞去的足球中，我常常忘乎一切。在我看来，看球时的这种状态才是最美妙的，才是最适宜人生存的心理形态。毫无疑问，世界杯的到来又可以使我的心进入到那种欢畅欣赏的状态里。那些妙到不可思议的传球、过人、射门，总能够让我惊奇，让我迷醉。

世界杯揭幕战的开场哨今晚就要响起了，我的心已踊跃起来。我和全世界的球迷一样，期待着一台精彩大戏的开场。

2010年6月11日 二府庄

劣境也有出奇处

揭幕战无疑是最受人关注的。而墨西哥队和南非队恰好是两支风格截然不同的球队，他们碰出的火花也因此格外绚烂迷人。因为以前没有机会看墨西哥队的比赛，所以我对他们比较陌生，但比赛刚踢了三分钟，我就有眼前一亮的感觉。墨西哥队是典型的技术型球队，他们有精到的短传配合，通过层层传递通过中场，前几分钟就制造出了几次有威胁的进攻，这种风格的球队我非常喜欢。而南非队则主要采取长传冲吊的打法，他们总在伺机用长传打对方身后，企图用最简单也最有效的办法给对手致命一击。

两支球队风格各异，各有所长，这样的比赛踢起来自然好看。以我一个老球迷的看法，南非队所用的防守反击打法一般是弱队打强队时采取的路数。毫无疑问，这是一种理性务实的选择。技术不如人，比赛的控制权就不在你手里，因此只能打防守反击，这是一种无奈之下的选择。但世间的事往往就是这样，那表面上弱势的一方反倒可能是一场角力的胜利者，而表面强势的一方却有可能吞下失败的苦果。

整个上半场，无论控球时间还是射门次数，墨西哥队都远胜于南非队。我就觉得东道主这次麻烦大了，而且随着比赛的进程，我的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但最终的结果我们都知道了，场面上必胜无疑的墨西哥队最终只得到了一个难以令他们满意的平局，而在很长时间里都被动挨打的南非队却得到了已经可算是万幸的平局。强弱分明的过程和绝对平等的结果，这两者放到一起，也给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启示。就像打仗一样，两军对垒，有精兵强将和坚船利炮的一方却往往被四处迂回的散兵游勇所打败。这就是现象和本质，主观愿望和客观结果的悖论，这也是人生和世事的常态。

幸好，拥有美妙技术的墨西哥队扳回了比分，平局是他们至少应该得到的一个结果。如果输了，我会替他们遗憾。在墨西哥队扳平的那一刻，我这个原本中立的球迷突然有了倾向性。站在一个欣赏者的立场上，平局的结果不完美，但也可以接受。毕竟，墨西哥队踢出了那么美妙的足球，一支富于美感又如此努力拼搏的球队，上帝不应该以失败让他们难堪。

2010年6月13日 二府庄

两种功夫，脚下和心理

看到韩国队完胜希腊队的那一刻，听到解说员倾情韩国队为亚洲足球争气争光的语言，我颇有同感的同时，甚至改变了我某些积久的偏见。几十年看足球比赛，几乎形成一个基本的印象，足球这项运动，是上帝安排给人高马大的欧洲人玩的；亚洲人尤其是东亚地区黄色肌肤的几个国家的人，玩玩足球是无可无不可，要在世界足坛玩出大名堂，却几乎是不可能的。我向来不怀疑东亚球队投入的真诚，主要因素归之于先天性的人种劣势，论身高、论力量，无法与欧美白种人抗衡，论韧劲、论灵巧又比不得黑种人，而兼具力量与灵活双重生理优势的南美混血人种，就更难比肩了。事实也无可争议，亚洲球队在世界杯上不仅没有摘冠的事，仅有韩国入四强的一次突破性纪录，我却仍不踏实，是否因当年作为东道主而受到某些运气的光顾。

韩国队那晚的胜利堪称完胜，面对身高马大的希腊队，却基本看不到人矮体轻者的被动和难堪，倒是尽得主动，尽显风采，甚至不无足球的风流，倒让我看到了身高马大者的笨拙和尴尬。韩国球员如何把先天的人种劣势实现了突破，很值得仍然对足球尚未丧气死心的中国队研究研究，借鉴其妙招儿。作为球迷的我能想到的通常公开的奥秘，不外乎精湛的脚下功夫，还有不服输更不服软的心理功夫等等。所有这样那样的制胜招数要显示效应，都必须把踢假球捞外快的坏事清除。不然，纵有上帝亲派教练来，也救不了球场失败的命运。

韩国队开了个好头，但愿一路浩荡。

此前曾闻朝鲜队要夺冠的豪言壮语，初听时我竟有哑然失笑的感觉，随之又觉得自己又犯了某种偏颇的毛病，即使不能夺冠，即使进入不了复赛，单是有这种藐视群雄的心态，就为未来的朝鲜足球奠基了一个宏大而又坚实的起点。

2010年6月13日 二府庄

期待一次痛快淋漓的发生

昨晚看完世界杯的几场比赛，竟是少有的一种平淡到可看可不看的心态，且不说失望。尽管导播员不厌其烦地强调日本队是亚洲的巴西足球，同样不厌其烦地强调加纳队的非洲雄狮威名，然而我看到的两队的表现，却都不尽然。日本有比加纳多几脚的门框内射门，却不具威胁性，唯一一次进球，也说不上精彩惊人，有点逮着运气的便宜球。加纳队倒像是狮子，不过不像威风凛凛的雄狮，倒像是一群莽撞的缺失训练的野狮子，个人控球以及拼抢确有点狮子的野性的本能，却缺失了整体配合的耐心和功夫，拿球便长传到禁区，多有从后场的盲目远传，十有八九都被日本队员反踢反顶出去，不仅不能构成对日本球门的威胁，倒让旁观者的我都感到了乱无章法。

再说荷兰和丹麦，也让我感到乏善可陈。相对而言，我对这场比赛的兴趣更是在于对荷兰队的独具个性化的印象，想看到他们既有整体配合更显个人风采的出奇制胜的表演。再说丹麦也属可以抗衡荷兰的欧洲强队之一，相撞必有亮丽的惊人的火花迸出。结果仍让我兴奋不起来，荷兰队只有在临结束前逮住了一次对方失防的机会，把近在咫尺的碰柱球打入门内，和日本那个进球一样，不过是个进球而已。这场比赛令我心头唯一发生一震的事，是那个踢了乌龙球的丹麦队员的表情，不仅不懊悔丧气，更不见通常所见的顿足捶胸乃至痛苦流泪的表情，反而自自然然地笑着。这是我看足球比赛几十年来唯一一次看到踢乌龙球者的笑脸，肯定将会记忆不忘许久许久。

到昨晚我才发现，自己看世界杯的诸种兴趣之中，有一种是期盼那种意料不及也想象不来的惊喜的发生，诸如马拉多纳当年连过三四

道围堵的绝境，而仍然能把球打进对方球门，我在那一刻便失声惊叹乃至噢呀大叫起来，那是看足球赛的精神享受。还有不可思议的几十米外的远射中的，密不透风却又精准灵巧的短传配合获得的进球，等等，都会激发出我的惊叫来……然而，我已看了四天的比赛，竟然难得发生一次痛快淋漓的惊叫，多少有点不能释怀的遗憾。

继续期待一次令人痛快忘情的时刻的发生。

2010年6月15日 二府庄

初尝酣畅淋漓的忘情

前日刚说罢本届世界杯缺失令人痛快淋漓的忘情享受的话，不料昨晚就发生了。弗兰三十多米外的一脚远射，确凿惊出我压抑多日的一声惊叹来。堪称开赛五天来独具风采的一脚。再从大场面上说，三场比赛，都异常精彩。精彩在于激烈的拼争，令人有目不暇接的甚至喘不过气来的紧张。三场比赛的场面，竟是难得一遇的惊人的相似，几乎都是一家压着另一家打，智利死死压着洪都拉斯，西班牙更把瑞士压得更死，乌拉圭也基本上是占据优势的压迫型打斗。这种场面的发生，几乎无可选择的战术套路也就相似了，强者一味强攻，弱者一心死守。三家强队的教练不谋而合采取攻势策略，三家弱队的教练都取死守之对应措施，肯定是无可选择的选择。然而，令人悬念迭生的兴致，恰恰在于大相径庭的结局。

论好看当数智利对洪都拉斯一战。在世界足坛上，这两国足球队的名字肯定没有响亮过。在我的盲目印象里，半斤对八两（老秤），谁也强不了谁一分二分。然而，一开场来回几脚，便突显出智利队强势的架势，而且把这种强势的猛攻保持到最后。整场比赛，智利攻势

一浪高过一浪，洪都拉斯却死守不漏，把几次失城的危机化解。我为智利的绝对强势而仅得一球颇为遗憾，却也为洪都拉斯的成功防守而赞叹。我不意间想到此前阿根廷的首场比赛，尤其在下半场，阿队进攻不仅不见起色，甚至不起性了，过来过去的后场倒脚，看得我既烦又腻。我看着半刻也不安生的主教练马拉多纳，猜不透这个激情而又好动的人押的何种绝招，仅有一球入账的阿队难道不存在万一的错失……智利和洪都拉斯的比赛，是作为球迷的我最能感受足球魅力的比赛。

西班牙和瑞士的比赛结局，造成了开赛以来的最大最冷的冷门。从始至终占据绝对优势和攻势的西班牙队，却败倒在欧洲一般化球队的瑞士人脚下。无论从控球时间无论从射门次数看，西班牙都成两倍三倍优于对手，然而却只见频频射门，不见一粒入球，真应了只开花不结果的中国民谚。瑞士队的死守是铁了心的，封堵围堵，不惜粗脚犯规，却不忘死守总策略里得着机会的反击，竟然奏效，难得发生的第二连着的第三脚射门，把欧洲冠军又兼夺冠热门的西班牙球门射穿了。那是一次出其不意的巧妙传递造成的杀机，于人仰马翻的乱局中得逞，令人感觉着惊心动魄的一幕。

本来只顾看球赏球不带偏向的我，到后半场却为西班牙人着急了，有倾向性了，占尽绝大优势的西班牙队踢不进一球，似乎有亏公平，直到终场而不能替西班牙队舒一口气。顿然间我意识到又犯了球迷大忌，足球是圆的，意料不及和逆反结局，不仅是足球的无限魅力，也合着某些生活世相，且不论纯技术战术的因素。

2010年6月17日 二府庄

两个半想不到

看了昨晚三场球赛，我的直观感觉是两个半想不到。

想不到德国队竟然输给塞尔维亚队，而且输得如此窝囊。即使被红牌罚下一人，我想依着德国队的实力，和塞队起码可以持平。从场面上看，少了一人的德国队仍然略占上风，却总是打不进一粒入球，甚至连点球都射飞了。抱怨裁判出牌太频太多，不着边际，黄牌是亮给双方球队的。在世界足坛久享威名的德国队遭遇如此不堪，我真的没有料想得到。再想不到的是英国这支同样在世界足坛公认为老牌劲旅的球队，竟然拿不下名不见经传的阿尔及利亚队。倒让我想到英国队被美国队逼平的首场赛事，媒体普遍怪罪守门员在比赛的最后时刻扑球失措，导致了美国队的侥幸进球。阿队大约在实力上强不过美国队，英国队照样赢不了，该怪罪谁?

美国队和斯洛文尼亚两队的比赛，在我的感觉里是半个想不到。论其在世界足坛的影响，两队都不具备德、英的盛名；论其实力，两队大约旗鼓相当，也不像德、英和各自对手的较大差距。两个堪称球（棋）逢对手的球队相遇，往往难以预料结果，更富悬念，也更好看。然上下半场的比赛场面的跌宕起伏，出我意料——算半个。

我约略知道美国人最喜欢篮球棒球等球类运动，足球大概排到其后了。然而近年间足球在美国开始发热，尽管仍比不得橄榄球篮球运动，而足球运动的水平提高之势，却令人刮目相看。我看过美国队几场国际比赛，是一种大开大合删繁就简激情澎湃的风格，颇为喜欢。然而上半场连丢两球，旗鼓不仅不相当了，而且已成积重难返之势。美国队在下半场刚开始的惊人一举，堪称石破天惊。一脚身后长传，造成巨大空当里的疾风奔突，直冲到守门员当面，射门的角度和空间几乎没有了，教练儿子布拉德利却是朝高处踢去，球应声入网。我在那一刻便想到绝了。绝在球迷的我没有想到会如此出脚，更绝在斯队

的守门员也没有料到会有如此脚法。我不是低估斯队守门员和我一样平庸的判断，在足球飞过他头顶的时候，他不仅没有做出任何扑球动作，竟然把脑袋往一旁闪躲过去，这完全是一种下意识的自防动作，足以证明他的无备。

我又一次印证了对美国足球的原有印象，而且有新的发现，不仅是激情式的简捷，而且有了聪明的细活儿，上述那个往高处踢的选择，堪称灵机一动的绝妙一脚；第二粒进球也属此类，面对即将冲到身边的斯队队员，美国队队员用脚往高一搓，球从守方队员头顶越过，入网，搓球的时机和力量都恰到好处，可见脑袋之机灵，又兼不俗的脚尖功夫。

跌宕起伏，峰回路转，柳暗花明，绝处逢生，是美国队的精彩表演，让我看了一场好球。转败为平（且不说那个被废的进球是否冤枉）确非易事，美国队却实现了。这不仅需要足球技战术，更需要强大而良好的心理素质，美国队证明了自己。

2010年6月19日 二府庄

足球赛场不理会眼泪

朝鲜队昨晚以三个失球的完全失利告别本届世界杯。终场哨响的那一刻，我的眼前浮现出郑大世在首场比赛开赛仪式上那热泪涌流的感人一幕。我当时确凿被打动了，随之从媒体上看到岂止是我，世界上各个角落的许多人都被感动了，真可谓珍贵无价的一掬热泪。

朝鲜队首战巴西，尽管以1:2告负，我想到郑大世热泪涌流的面孔，反倒觉得这帮小伙子输得不失体面，尤其是能打进巴西队球门一

粒进球，颇令人敬重。到再战葡萄牙队时，我的预感是一场尤为好看的球赛，因由有二，一是能与巴西这样的头号强队打成1:2的比分，和葡萄牙队当为旗鼓相当的对手，又有满脸热泪和满腔热血的激情，当会有神奇的发挥。更看重的一点，是一九六六年那届世界杯上，朝鲜队和葡萄牙队相遇，在3:0领先的绝对优势下，竟然被葡萄牙队连进五球而告负。输虽输了，能率先打进葡萄牙队三球，说明朝鲜队不差葡萄牙队多少，属于等量级，况且已有前车之鉴的难忘教训，这回会发挥得更好。这样推想，我很自然地更看好朝鲜队。万万没有料到朝鲜队竟然以0:7的创纪录（本届世界杯）的大比分，输得一塌糊涂。直到昨晚再以三球输给科特迪瓦，又出乎我的预料，原本推想这应是挽回尊严的一战，况且科队的水平也不过尔尔……那个热泪涌流的郑大世，怎样接受这种惨不忍睹的再二再三的失败?

如实说来，在葡萄牙队打进朝鲜队第一粒入球时，郑大世的泪流满面的面孔，几乎同时浮现到我的面前；之后葡萄牙队每进一球，球应声入网那一瞬，我的眼前就出现那张动人的泪脸；及至连续不断的失球发生时，郑大世的泪脸就挥之不去了；我在电视画面上着意寻找郑大世，想看他此刻会是怎样一番表情，甚至替他操心，如何接受这种不堪忍受的尴尬。及至昨晚与科特迪瓦队的比赛，又一次不堪忍受的尴尬如何忍受得下？须知那是感动过包括我在内的世界上无以数计的人的一掬热泪的人呀！

谢幕的哨声吹响的那一瞬，我从替郑大世操心的情绪里折转过来，耳畔响起一句老掉了牙的进口箴言，莫斯科不相信眼泪。由此推演，足球赛场更不理会眼泪了。足球赛场上，无论万众瞩目的世界杯，无论欧洲的各大赛事，以及各国的俱乐部联赛，都是各个球队实力的较量。这种实力不过两种因素，有一位好教练的操持，再就是队

员的脚下功夫，后者比前者更重要，因为教练的技战术策略的实现，需得依靠队员的超强的脚下功夫，非此都是纸上谈兵而已。这样，我便想到还是那个基本的事实，脚下功夫不如人，纵有满眼满脸热泪，也只能徒叹奈何。

我为朝鲜队送行，回朝鲜好好练习基本的脚下功夫，不惜卧薪尝胆之狠劲。脚下功夫超强了，再有一掬报国的至诚的热泪，当会有惊世骇俗的竞技风景。

2010年6月26日 咸宁

话说一个球的错判

英格兰队和德国队谁淘汰谁而能进入八强的这一仗，早几天就被各路媒体所关注，热心球迷也期待着这场两强对决的好戏了，我自不例外。然而对决的结果，媒体和球迷对于德国队以4:1的悬殊比分取胜的兴趣，似乎远远不及对英格兰队那个被裁判错判的进球更大。我甚至遗憾到有点耿耿于怀。平心而论，看这两队的比赛，我完全是等距离地纯粹地观赏，尚不存在为韩国队出局而惋惜的东亚情结，确是那个误判破坏了我坐山观虎斗的情绪和兴趣。

且不赘论公平，这是明摆着的天大的冤枉。然而在足球这方特殊的语境里，裁判的哨音和手势是绝对权威，判对了要执行，判错了也要按判对了执行。仅从这一点来说，足球裁判比独裁的皇帝还要牛皮，稍微开明的皇帝如果事后发现某道圣旨下错了，还能够收回成命，历史上不乏此例；足球场上裁判的错判误判，却是一错到底，冤死你也不改判。然而这不是裁判自己要独裁到如此不讲理的程度，而是足球规则规定了的，裁判想改判反倒不能了。大家共同议定的足球

规则，大家都得循规照办，万一轮到谁蒙受冤枉，你就只能受着。这里再说足球是圆的那个套话，就显得太过轻飘，无法使蒙冤者化释半分冤气。

我之所以遗憾到有点耿耿于怀，完全是这个错判破坏了一场好看的足球比赛。在德国队两球领先的优势里，英格兰队有如神助，竟然连进两球，且已接近上半场结束，可以想见下半场的好看了。关键就在英格兰队第二粒进球被裁判废掉了，这在英格兰队球员的心里会造成怎样的挫伤，情绪会发生怎样的波动，真是难以估量，势必影响到战术配合，及至足下头上功夫的正常发挥。任谁都明白这第二粒进球对英格兰队的意义，甚至比第一粒进球更大更重要，扳平比分对英格兰队员来说，无疑能使自信心达到最佳状态；对德国队却会造成一定的心理压力，起码要比两球或一球领先时的压力要重得多了。这个不算数的第二粒进球，对英格兰队无疑就有几重伤害了，不单是一个错判的进球。

我还在想，如若没有发生对英格兰队第二粒进球的错判，英、德两队上半场打成平分秋色的2:2比分，下半场该会是激烈到怎样不可猜测的精彩场面，只能是遗憾再遗憾了。

2010年6月28日 二府庄

巴西队也猴急了

巴西队输给荷兰队多少有点出乎我预先的猜想，倒也不甚惊讶；而巴西队赢得起输不起猴急的样子，确令我大跌眼镜了。

巴西队和荷兰队属强强对决，又是欧式足球和典型的南美风格的对抗，任谁都会以极大的兴趣关注这场好看的比赛。就我积久的印象而言，稍微看好巴西队，胜数可能大些。开赛刚刚十分钟，巴西队一次简捷到令荷兰队员发愣的传接配合，创造出一粒漂亮到令人赞叹的进球，我看好巴西队的比重又添了一分。

不单是这粒进球，开赛后巴西队员娴熟自如而又准确的传接配合，令我眼花缭乱目不暇接，直感叹这帮小子把足球玩到如此轻松的程度，简直不可思议，不觉间便沉浸到艺术足球的享受之中了。完全料想不及的是，下半场开赛不久，巴西队一记乌龙球之后，似乎乱了阵脚，尤其在荷兰队趁势又攻入一球之后，巴西队完全变成了个令人陌生的球队，传接球频频失误，精妙的短传配合不见了，优势一下子倒向荷兰队。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五号梅洛情急中恶意踩踏倒地的罗本，一脚还不解恨，呜里哇啦口水乱溅，肯定没什么好话，招致红牌被逐出场。我竟忍不住自言自语，巴西队员咋成了这模样了。

这里能想到的原因，便是心理失衡。然而令我颇为不解的是，丢球后的慌乱乃至失衡，多见于那些弱队，或中不溜儿球队，像巴西这样既拥有盛名又不乏球星的老牌强队，居然也会脆弱到架不住一球落后的失控到失衡的境况。其实，在我这个球迷看来，依着巴西队的实力，完全有可能扳平甚至胜出。这样失衡导致的失控以至失态，就把脚下练就的令人羡慕的功夫全窝死了，发挥不出来了，可见心理素质和脚下功夫都不可或缺。

最值得一说的是巴西人五号梅洛。巴西队的进球，起码一半功劳该归功于他精确且神奇的直传；巴西队的乌龙球也是这个梅洛造成的；恶意踩踏对方队员而被罚下的也是梅洛。梅洛是巴西队失衡到崩溃的典型代表，真可谓成事是他，坏事也是他。在旁观者的我看来，

梅洛失衡失控失态到有点气急败坏，有点丧失理智，用中国民间话来说，猴急了。马拉多纳情急之下用手打进一球而逃过裁判法眼，不无幽默地自诩为上帝之手；梅洛踩踏罗本的一脚，却不仅缺乏幽默，确实当属魔鬼的黑脚，猴急到有失体面了。应该说，巴西队不是输在技不如人（荷兰），也不可完全归罪于教练（据说邓加治军以严厉著称），肯定不会唆使梅洛情急时使出魔鬼一脚。

我颇为感慨，印象里的巴西队，向来以良好的心理素质和精湛的球技享誉国际足坛，罗纳尔多和小罗纳尔多都堪称典范，尤其那个有点龇牙的小罗，赢球时兴高采烈，输球时也不见怒气丧脸，常见着的是一副可爱的纯真的笑脸，包括龇牙都笑得别具风情。这天晚上的巴西队不仅输了球也丢了人。但愿大罗小罗的笑，重新回到巴西队队员的脸上。

2010年7月3日 二府庄

神来之笔及其他

在两场诱人的半决赛即将打响之前，凭着说不清道理的直观印象，我预想荷兰队可能胜过乌拉圭，德国队更强于西班牙。两场比赛哨终人散，我的猜断半对半错，却不仅不留遗憾，反倒大开眼界，获得了预想不到的两三点强烈的足球奇观和无可企及的一种愉悦。

且不说荷兰队战胜乌拉圭队应验了我的预测，我经久不忘的兴致，完全集中在范布隆克霍斯特的那一脚劲射入网的风采上了。那是一脚堪称神来之笔的射门。距离有三十五六米远，范氏面前有乌拉圭队两个防守队员。范氏脚步不急，铆足了浑身力气一脚踢出去，皮球如离膛炮弹，击中门柱上端内侧，应声入网。守门员尽管跃起扑救，

那皮球正好高过他的指尖，有如神算。守门员显然预料不及这个球的来路和击中点，从他站在球门正中的位置可以证明，也是造成进球的致命之误。设想守门员如能料定此球的来路和击中点，他肯定会移位到他的左侧门柱旁，那样扑救就很保险了。

我之盛赞此球为神来之笔，在于通常情况下是万难实现的。我看过不知多少场球赛，如此远距离的如此精妙的射门，屈指数不出几个。我甚至想，且不说别的足球明星，即使范氏本人，让他再来如此一脚，十有九点九成也做不到；即使不设防，让他在同样距离射中同样位置，也难。我便想到，神来之笔是不可能重复的，也难以仿效，可能连踢出这一脚好球的范氏本人也理论不清，神就神在那瞬间不可重复的一脚。人们常说某个画家的某一个线条或某个作家的某个细节为神来之笔，也是不可重复不可仿效的。范氏这神来之笔，似乎称为神来一脚更恰切。有了这神来一脚的美的享受，对于我这个球迷来说，谁输谁赢都不重要了。

德国队和西班牙队的比赛结果出乎我的预料，不仅不尴尬，反倒增添了观赏的兴趣。我为西班牙队队员灵活自如游刃有余的短传配合而入迷，起码不逊色于精通此道的巴西队。欧洲人能把脚下的活儿演练到如此精绝的状态，真让人大开眼界。我便看到在西班牙队员的细活儿面前，德国队员处处不适到有点狼狈不堪的局面，真有点不敢相信眼前的赛场景象，一路雄风一路凯歌直打到半决赛的这一帮德国小伙子，被西班牙人压在半场围打，昨日和前日的威风全然不见了。西班牙队有两三次势在必得的进球，仅仅错失在毫厘之间而不得，按照比赛的场面，应当不是1:0的结果。

德国队教练赛后不仅服输，而且很感佩西班牙的球技。我在看着这位教练说话的时候，竟然心软到感动了。赛场上常见的多是脚软嘴

硬的人，难得认可对手的优长。德国队未来的希望大约也在此时奠定了，如若能让这位教练继续留任的话。

2010年7月8日 二府庄

悬念的诱惑

看着德国开场不到二十分钟便打进一球，我便发出由衷的慨叹，这才像是德国队踢的足球。同时也就意识到，对两天前与西班牙队的半决赛中败下阵来的德国队的表现，仍然存在着遗憾。其实，德国队和西班牙队谁胜谁负，在我并无倾向性，谁赢我都会为他们球队和他们国家庆幸。遗憾恰恰在于德国队在关键一仗中的表现出乎我的预料，用观球者纯粹的直接感觉说来，德国队那场比赛踢得不像德国队的足球了，且不究是教练布局的失误，或是球员心理压力导致的足下的失措。昨晨与乌拉圭队的比赛，其实在首粒入球之前我已经感知到印象里的德国队重新披挂登场了，又会有一场精彩的比赛可以欣赏了。

德国队踢得像德国队的样子了。乌拉圭队也几乎是超常发挥了。一家是典型的欧式足球，一家是比南美足球更见力量型的新风貌，一开场便不客气，你攻我也攻的对攻战，看起来尤为痛快，也委实让人过瘾。从场面上看，似乎势均力敌，看不出谁强过谁一分二分，尽管球场统计各种技术数字德国队略多一分比例，现场却让我看到谁胜过谁都有可能。相对而言，一方死守一方强攻的比赛不大好看，两方如果都守字当头就更难看了；还有双方实力相差过大，造成一方死压着一方的一边倒的比赛，也不大好看，就在于缺失了竞赛的悬念。在我多年看足球比赛的印象里，高水平的对攻，势均力敌的较量，看起来是最忘情的享受，关键就在难判输赢的悬念的无可言表的魅力。

德国队和乌拉圭队的季军争夺战，就是这样一场峰回路转高潮迭起悬念悬到终场哨响的那一瞬，诱惑得人几乎不能移开电视画面半分钟。因为每一个半分钟里都发生着精妙叫绝的传切配合，都可能发生射门入网的精彩瞬间。德国人先入一球，似乎略胜一筹，容不得德国队得意太久，上半场结束前乌拉圭队也打入一球，上半场平分秋色，悬念就留到下半场。不料下半场乌拉圭又进一球，倒该德国队着急了，高潮又一次迭起，悬念便更悬了。德国队打入第二粒入球，悬念不仅没有减弱，坐同一条板凳的较量更趋白热化。到德国队再次领先一球的时候，我却希望乌拉圭队能二度扳平，重新坐到一条板凳的两头，却也隐隐替德国队操心，能保住一球的优势吗？悬念悬到我竟然顾此（乌队）又怕失彼（德队）了。我的预感略差一分，就在终场哨音吹响之前半分钟，乌拉圭队一记漂亮的任意球射门击中横梁，揭开了谜底，结束了悬念，留下了遗憾。

难得这样一场峰回路转到扑朔迷离，高潮迭起到悬念重重的精彩比赛。我倒担心最后的大力神杯的争夺战会如何表演，通常的现象是，最致命最关键的比赛，球员往往会发生心理上的异变，还有教练决策上的取向，都是为着那个杯的如何得手的最保险的套路去干的，丝毫不顾及足球场面好看不好看的闲事了，更不会顾及如我一类纯粹欣赏足球的球迷的兴趣了。且拭目以待。

2010年7月11日 二府庄

侥幸也否

世界杯决赛打响之前一天，接到上海一家报纸体育记者打来的电话，说他们筹备一期各界人士猜球的活动，问我大力神杯将杯落谁家。我不好生硬谢绝，顺口答道，你问得晚了一步，那只神奇的章鱼

已经做出判断了，满世界都知道了，我不宜再多嘴多舌了。对方竟愣怔不语。

玩笑归玩笑。决赛双方的西班牙队和荷兰队，盘旋在我的脑子里，几天来一直是此起彼伏又此伏彼起，难得形成一个哪怕纯属个人偏颇的猜测意向。西班牙队和荷兰队的最后对决，都是一路打杀过来，力克群雄，也技高一筹，才得以脱颖而出。这里没有投机倒把，没有银子贿赂（假球赌球传闻不足信），完全靠实力才争得亿众瞩目的最后决战。两家此前的几场比赛我都看过，各有优长，又有差异，西班牙队员娴熟的传接配合，把南美尤其是巴西人的脚下细活玩到家了，给传统的欧式足球别树一帜；荷兰队依旧是欧式打法，简捷明快，脚下更见准确的功夫，这两家对垒，的确难做出预测，却可以肯定有好球看了。尤其是有西班牙队的参与，弥补了南美风格足球的缺失，成为了一个看点。

无须赘述比赛过程。西班牙还是西班牙人的打法，荷兰队也依旧还是荷兰队的风格，似乎看不出任何一家的缺陷，却总是打不进球去，直到加时赛的最后，西班牙队才侥幸打入制胜一球。我之所以用侥幸这个词儿，是荷兰队的防守出现了空白，射门的那个西班牙队员面前无碍，只对着守门员一人打了远角入网。须知造成这种难得的又是优越的射门空当，是在荷兰队被罚下场一人之后发生的，不无侥幸的成分，也很难让事不关己的我欣赏到进球的快愉。整场一百一十多分钟的你来我往，竟然谁也打不进一球，难免让观赏者感到沉闷，尚不至于乏味，就在双方都有两或三次单刀或近在咫尺的射门机会，却都浪费了。尤其是作为荷兰队功臣射手的罗本，两次单刀面对球门的时候，却都被守门员化解了，给观赏者的我留下一次又一次有惊无险的遗憾，其实也是欣赏心态的别一番滋味。

有评球家说西班牙队夺冠是顺理成章的结果，依据是该队控球时间占较大优势。我不能信服，因为控球时间的谁多谁少，可以看出球场上的上风和下风，然而更重要的是控球的有效和无效，设想罗本独对守门员时踢出更冷静也更刁的一脚，那么起码场面上就更好看了。常识和常遇的赛场现实，过于繁琐的控球，往往招架不住简捷实用的精准到致命的一脚直传造成的威胁。

西班牙队赢了，好。尤其是第一次捧得大力神杯，国王都喜得蹦起来给球队打祝贺电话了。

荷兰队输了，尽管是完全可能赢的结局，却输了，倒显出世界冠军的征象，也潜伏着希望。

2010年7月12日 二府庄

毛乌素沙漠的月亮

朋友电话约写一点有关月亮的记忆。话尚未落音，我的心底便有一轮又圆又大的满月缓缓浮现出来。这是我平生见过的最大的月亮，在毛乌素大沙漠的天空悬浮着，也沉浮在我的心底，整整二十五年了。

那是一九八五年的酷暑时月，由路遥挑头在陕北召开“长篇小说创作促进会”。“促进”二字彰显着这次会议的主旨，却也明白不过地提醒与会作家，应该考虑长篇小说创作的探索了。客观的情况是，新时期出现的一茬陕西青年作家，正热衷于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的创作，尚无一部长篇小说出版，作协领导有点着急，需要促进一下。会议的第二阶段由延安转移到毛乌素大沙漠中的塞北重镇——榆林，作家们的兴致更高涨了，纷纷表态要把长篇小说的创作列入最近的写作计划，“促进”促得会上会下的气氛十分热烈。挑头的路遥无疑也很鼓舞，顿时突发奇想又别出心裁，要搞一场篝火晚会，就在荒无人迹的毛乌素沙漠里，这在当时无疑是一场浪漫而又颇为新潮的晚会。

柴火是向当地乡民购买的，一捆一捆干绷绷的沙柳棒子，见到引火便蹿起火苗，得着沙漠夜风的鼓吹，火势顿时便起一丈多高，把刚刚降下的夜幕现出一片光亮的空间。与会的这一茬作家正值青年壮年，又得着思想解放的时风的鼓舞，全都围着噼啪爆响的火堆几近疯狂地蹦跳起来，很难看到谁有规范的舞步，都是随心所欲地胡蹦乱跳，夹杂着平素很难发生的野性的狂呼吼叫，把静谧无息的毛乌素沙漠吵翻天了。我也夹杂其中，蹦着跳着，便有了难得的一次尽情放纵

的生命狂欢。不料有人从背后抓住了我的胳膊，不容分说把我拉出狂欢的人窝儿，说，咱俩散散步去。依声音辨识，这是诗人子页。

我便随着子页走，几乎是漫无目的地无意识行走，却恰恰走在往北的沙地上。往北无疑是更为荒凉的沙漠腹地的方向。估摸不准走出多远了，篝火晚会的嘈杂的人声消失了，腾跃的火焰也看不见了，只有一片小小的略显红色的亮光标示着篝火晚会会场的方位。天上繁星点点，沙漠夜幕里仅有一丝微弱的亮色，我只能看见并排走着的子页的人形，完全看不清他的眉眼。凭着感觉判断，已经走得很远了，恰好脚下踩到了一道沙梁，两人不约而同停住脚步。他坐下来。我也坐下来。白天被晒得烫脚的沙子似乎还有余温。他说了些什么话，社会热点话题或文学写作什么的，认真的和不认真的，正经的或不正经的，现在竟通通忘记了，一句也没留下来。同样，我对他说了些什么话，也通通忘记了，一句都回忆不起来。我俩在沙梁上对面坐着，此起彼落地聊着（用西安当地话说叫“谝着”），仍然是谁也看不清谁的眉眼，依着说话的语调和口吻的缓急，感知对方的思想和情感。

无意间，我突然看见他脸上的轮廓了，不由一惊，瞬间就意识到月亮出来了。他几乎同时轻轻地惊呼：啊！多大的月亮！我转过身，就看见沙漠尽头地天相接的地方，浮现着一轮小碾盘那般大的月亮，惊得我一跃身站立起来。子页也站起来了。

多大的月亮。我忍不住赞叹。

没见过这么大的月亮。他也随口赞叹。

多大多圆哇。我忍不住再说一句，便想到当属农历的六月十五或十六。

难得看见毛乌素沙漠的满月。子页庆幸地说。

子页是一位颇具广泛影响的诗人。我也算得一个作家。诗人的他和作家的我站在毛乌素沙漠里，面对初升起来的一轮满月，反复赞叹的词汇里，只有一个“大”字和一个“圆”字，竟然再反应不出一个更生动更美妙的文字来。我俩站在沙地上，看那又圆又大的月亮缓缓浮升起来。沙漠里偶尔传来一声单调的野兽的叫声，我可以辨出是狐狸，城市长大的子页却以为是狼。月亮浮上天际大约有一竿子高了，似乎渐渐缩小了一轮，却更明亮更清湛了。子页突然对我说：“我有一个提议——”却不说提议的内容。我也没有急于追问。只见他俯下身去，在月亮照亮的沙地上摸索，终于找到几根沙蒿秆儿，捋去枝叶，盯着我说：“面对毛乌素的满月，咱俩发誓——”说着便跪倒在沙地上，把三根蒿草秆儿双手举起，反复三匝，插在沙地上，颇为郑重地发出誓言：“我对毛乌素沙漠的月亮起誓，和忠实老哥肝胆相照，永不背叛……”我看着他突如其来的甚为庄重的举动，虽然始料不及，却没有任何犹疑，瞬即便和他并排跪下了，捡起三根替代香火的蒿草秆儿，照他的动作做起：双手握住蒿草秆儿，从胸前举起到眉心，反复者三，同样插在他插着的蒿草秆儿的一边，也信誓旦旦地对着毛乌素沙漠上空的月亮起誓，誓词自然和他的誓词保持一致。待我说完，两人相应地转过脸来面对面瞅着对方，两双手便紧紧地握在一起，然后便四仰八叉倒躺在沙地上，纵声大笑起来……

有人吼叫我和子页的名字，我俩当即应了声，料想篝火晚会要收场了，我俩似乎还留恋这一方静谧神奇的夏夜的沙漠，更有沙漠上空越升越高也愈加明亮的月亮。奔到我俩面前的两位作家虚张声势：还以为你俩被狼吃了呢！我俩都不在意地笑笑。有位作家颇认真地渲染说，沙漠里的狼可厉害了，常叼牧民的羊。子页随机应变，从沙地上

捞起他和我插下的蒿草秆儿，说：“我俩有金箍棒，什么样的恶狼都不怕……”

算不得结义，也算不得结拜，不过是面对沙漠上空一轮又圆又大的月亮，诗人子页诗性激情的瞬间生发的举动。我之所以毫无犹疑地响应，有一个基本的感知，就是子页弃政从文的人生选择。他在新时期文艺复兴的热烈而又神圣的文学氛围里，辞去了给一位重要领导当秘书的工作，自愿调动到文艺圈子里来，在作家圈里曾发生了好久的一阵议论。任谁都能预料，为一位重要的一把手当秘书多年，仕途上绝不会亏他的；他却舍弃了，毅然投身到文学圈子里来了，可见他对文学的痴迷和神圣。平心而论，我和他认识也有四五年了，来往屈指可数，他热衷诗的创作，我学习写作的兴趣却在小说，文学大圈子里还有不同文学样式的几个小圈子。再说他住在西安城里，我住在白鹿原下的乡村，平素难得相遇。我对他最直接的印象，便是他舍弃官场投身文坛的举动，一个如此痴迷文学也神圣文学的同龄人，大致该当是可以信赖的……我便和他并排跪倒在毛乌素沙漠上，面对那一轮又圆又大的月亮。

之后二十五年，淡淡如水，一年半载遇合到一起，我看着他虽依旧浓密却大半花白的头发，他瞅着我光亮的谢顶，互相先自笑了，竟然谁对谁都说不出一句客套的话，开口总是调侃。待喝过两盅之后，或他或我就会说起毛乌素沙漠里用蒿草秆儿作香火对月起誓的事来，仿佛就在昨夜。可见毛乌素沙漠上空的那一轮又圆又大的月亮，沉浮在我的心底，也在他的心底沉浮着。我便自然想到，如果谁有了无论大或小的苟且之事，沉浮在心底的那一轮又圆又大的毛乌素沙漠天空的月亮，就再也浮现不出来了。原本仅属于诗人子页兴之所至的一项

提议，其实不无玩笑作趣的成分，现在倒感觉到一种人生的颇可珍重的情趣了。

2010年7月28日 二府庄

我经历的鬼

知道世界上有鬼，和知道有狼一样，都是在少不更事的愚顽时期。晚上玩得癫狂不能安生睡觉，母亲为了节省灯油，好话规劝无奈，往往就用绿眼长牙凶相毕露的狼来吓唬我，却从来不说鬼，这已成铁定的忌讳。然而，她不说鬼却有人说鬼，谁家屋里昨晚闹鬼了，一个看不清面目的黑衣女人从院中飘到房脊上；隔不了三五天又有鬼事发生，某人在村人回家歇工的正午时到坡地上寻找丢遗的烟袋，看到乱葬坟堆里有二三人影，均无头，他咳嗽一声便消失了；某妇人走娘家回来，看到不远处的柿树下有一位老妇人在哭着诉着，便加快脚步想劝慰其节哀，不料竟眼睁睁看着那人隐去了……我的这个不过三十多户人家的小村庄，隔不过几天就有鬼事发生，当天便传得家喻户晓，两人一堆，五人一伙，说得如同亲见一般生动翔实。夹在她们胯旁的我听得头发倒立毛骨悚然，却仍忍不住想听。相对于狼而言，鬼更可怕，狼一般在夜深人静时才到村子里偷叼猪羊，鬼却不管白天黑夜都在游荡；狼活动在山野荒坡，鬼却天上地下荒野宅院任由出入，防不胜防，想躲更难。年少时我不仅不敢独睡一屋，甚至不敢走进空无一人的自家院子，心里总怯着房顶上、过道里或屋梁上会隐藏着一个鬼。

我只说我经历过的几次鬼事。

有月亮的夜晚，往往是村里孩子聚合玩耍的天赐良机。我平生仅有一次碰见过的鬼，就发生在一个冬天的月色朦胧的村巷里。我跟着比我稍高一点的哥哥到村子东头去玩耍，刚走到离家门不过百十步的一户人家的围墙口时，他却突然改变主意不许我跟他走了。眼睁睁看

着他和几个伙伴往前走去，我很失落地转身回家。就在刚转过身的一瞬，看见不过五步远的一个茅厕里有一个怪物，体形像一头半大的牛，又像一只超大的猪。出奇更在不是我每天都能看见的活牛生猪，而是如同过年时乡村集市上叫卖的纸扎的动物造型的灯笼，从头到脚涂饰着红的黄的绿的色彩鲜艳的圆形和方块形的图案，似乎还有一缕亮光透出。好奇心驱使我停住脚步，那纸扎的“四不像”的怪物竟然走动起来。那时候的乡间茅厕，多是三堵半的土墙围成的一方避身遮丑的小小空间，那怪物笨拙地移动着纸扎的躯体，竟然还扭过头来看着我。恰是在这一瞬间，我的毛发倒竖，后脊发冷，恐惧顿时攫住了我的心，腿都软了。我已经记不得是怎么回到家的，也不记得母亲后来施用了民间的哪种措施为我驱鬼除邪，随后似乎也未遭遇什么灾祸或病痛。然而，那个纸扎的却会移动的“四不像”的怪物的身影，却铸成永久的记忆，及至六十年后的今天，我仍然能够描绘出曾经眼见的形态和色彩。

我更多经见过的鬼事，都是发生在村子里这家或那家、这个人或那个人身上。

村子里以及周边最爱闹鬼的地方，是距村子不过一里路的一座孤坟。这座孤坟在很窄的一畛地的南头，倚着矮矮的一道地坎。这畛地的北边有一条两步宽的土路，是我们村子通向外部世界的主干道，离那座孤坟不过十来步远。这里埋着一个不幸死去的年轻男子。我很小的时候就听到村里某个女人或某个男人在这里撞见了鬼，有的人在夜里撞见，有的人竟然在大白天撞见，还有早起赶路的人在微明的晨光里，也撞见过鬼。有人撞见的是有身躯却无脑袋的鬼，有人撞见的竟然是有头有脸四肢齐全的走动着的鬼，还有人竟然看到坐在孤坟不远

的路边发出呜呜哭声的鬼。谁都会想到，这是孤坟里那个年轻男人的鬼魂再现。

我记不清从这座孤坟旁走过几千上万次了，却一次也没有撞见那个被许多人都看见过的鬼。然而，每一次走过这座孤坟旁的进村路时，我都不敢扭头去看土坎下的那个小小的长着荒草的坟堆，而且头发便倒立起来，头皮感觉到一缕凉意。小时候不敢单人走过这里，即使和家人或伙伴大白天走到这座孤坟旁，仍然抑制不住头发倒立头皮生凉的反应。及至成年，我自信已经成为不信神更不信鬼的唯物论者，每当单人路过这里，头发照旧倒竖头皮仍然会生出一缕凉气，甚至连自己都忍不住暗暗自嘲。有一回我和自己较起劲来，当头发倒竖头皮生凉的反应发生时，我索性停住脚步，点燃一支烟，直对着孤坟抽起烟来；似乎这样还不足以把劲较足，干脆走到土坎下的孤坟堆前，转过去又转过来，抽着烟转了三圈，又伫立在坟堆前，直到倒竖的头发不再倒竖，头皮上的凉气消散，我才离去。我以为经过这次最近距离的心理抗争之后，当会终止往常生理反应的惯性，结果却依然故我。说来更不可思议的是，在我住在原下老屋写作《白鹿原》的最后一年，难耐每天停笔歇工之后的无聊，迷上了下象棋，本村的棋友如若凑不到一起，我便到东边或西边的邻村去找棋友，常常玩到半夜方可尽兴。关键是去西边邻村下完棋回家时，满天星光，走到土坎下的孤坟旁，仍然头发倒竖头皮生出凉气，须知我已经是年近五十岁的准老汉了。幼年时因为这座孤坟野鬼的传闻而发生的恐惧，由恐惧而引发的头发倒竖头皮生凉气的生理反应，竟然成为一种惯性，直到准老汉的年岁都难以消除，也就只好任其发生罢了。

真正致成我心理创伤的鬼事，却是发生在一九六二年。

这一年，我高中毕业，高考的作文题有两个，一为“雨中”，一为“说鬼”，前者无疑是记叙文，后者亦无疑为论文体。依我自己而言，选择叙述文体的“雨中”为宜，因为我在初中的作文本上早就写过几篇小说了，颇得语文老师好评，记事的叙述文体当胜过论文一筹。然而，我却鬼使神差地选择了“说鬼”。我已不记得我是如何说鬼的，也不必说我把鬼论说得如何，致命在于我没有写完。考场的铃声响起的时候，我的紧张在残酷的铃声里完全失控了，脑子里一片空白，完了！我完了。看着监考老师从我桌上收走考卷，我连站起来的力气都没有。我走出考场和设置考场的中学的大门，看到街道上熙熙攘攘的人群，这时才意识到已经尿湿裤裆了。

后来自我检讨，之所以选择我并不擅长的论文体去写“说鬼”，原是出于一种错误的判断；之所以发生判断的失误，说穿了是自作的小聪明所致成；再扎实说来，是不无投机心理的。我读高中的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有一本名为《不怕鬼的故事》的书，不仅风靡全国，而且成为高中生的必读物，是政治课的补充教材。后来才知道出版并要求党政干部和高中以上学校师生阅读这本书的社会背景，既有国际因素，又有国内因素。国际关系中，兄弟般的苏联和中国，矛盾已发展到不可调和的面临翻脸成仇的地步，视苏联为修正主义，简称“苏修”。修正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的代表人物赫鲁晓夫，被喻为鬼。国内的背景是庐山会议关于“大跃进”大炼钢铁和人民公社造成灾难的事，持这种观点的彭德怀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者。右倾机会主义者也是鬼。无论赫鲁晓夫，无论彭德怀，两大事件尚没有向国民公开，先以打鬼运动造成舆论。我那时候似乎在私下里隐隐听到一点风声，便自作聪明地选择了论文“说鬼”的题目，以为正合拍于社会的大命题，肯定要比“雨中”这类抒情的叙述文更切社会热点……不料却栽

倒在“说鬼”上。那个年代的高考语文试卷，问答题占六十分，一篇作文占四十分。我的作文无疑为零分，我便觉得完了。

我回到那个三四十户人家的小村庄，才切实感到曾经热烈到热切的人生梦想彻底破灭了。上初级中学时，关于人生前途还黏黏糊糊，而一当坐进高级中学的教室，便想着某所大学，几乎再无第二种意向。我是我们那个小村庄的第一个高中毕业生。我回乡务农的事实开了一个念书白念也白花钱的糟糕先例。当然，关键还是对我自身的挫伤，“说鬼”没有说完，更遑论完美，这个意象里的鬼便刺刻在我的心灵深处。

单举填表一例。从我走出学校走进社会，几十年来不知填过几百成千次表，无论什么用途的表，不可或缺“文化程度”专栏，我都填写“高中”。每一次写着“高中”这两个字时，心底便泛出“说鬼”这道作文题目来，几乎没有一次幸免。尽管随着岁月的流逝和年龄的递增，“说鬼”泛出的心理滋味渐渐淡化；尤其是得幸成为一个作家写出了一些作品，“说鬼”没有说完全的那种无以言状的挫伤感基本平复，然而仍缺失不了填表每遇“文化程度”栏目写着“高中”俩字时，便泛出“说鬼”的事。那情形极其类似每过村子西边土坎下孤坟时头发倒竖头皮生凉的生理反应。孤坟野鬼致成的是纯粹的恐惧，由恐惧致成的头发倒竖头皮生凉的纯粹生理反应竟然成为根深蒂固的生理惯性，即使成为无神无鬼的唯物论的信徒，仍抑制不住生理惯性的发生。相对而言，“说鬼”写作的失败造成的心理伤害，是我人生历程中可以用致命来划档的三两次最厉害的伤害之一，且是第一次。

高考落榜的那年暑假，我不止一次于半夜里惊叫着翻跌到床下。父亲大约担心我会弄成“神经客”，却也只有一句平常的话来劝慰：天底下农民一层人哩。正是这句平常到平庸的话，遏止了我的慌乱无着

的情绪的恶性发展，我的人生参照是中国最庞大的人群——农民，我的悬空的心便落到了鸡鸣狗叫猪哼哼的村巷里了。然而，“说鬼”里的那个纯属意象的鬼，尽管没有村子西边土坎下孤坟里的野鬼可怕，却远远超出其伤害的重和深。有一年我被邀出国访问，办公室王主任让我填写出国申报表时，笑着为我建议，在“文化程度”栏目里填上高等学历，至少应该填成大专学历。他替我操心，怕我以往所填的中等学历会被洋人轻视；他又为我释疑，反正也没人查验毕业证书。我拿着表格回到自己办公室，犹豫之后，还是填写上“高中”二字。这一回，“说鬼”里的鬼所引发的心理反应较大，办公室王主任好心替我出谋划策的时候，这个意象里的鬼就在心里泛浮出来，一直盘旋在心头，直到我回到自己的办公室，直到我犹豫不决的一段时间，直到我终于拿定主意写上“高中”二字，那鬼才隐去……村子西头孤坟里的野鬼和高考作文“说鬼”里的鬼，竟然几乎伴我一生，我至今辨不清有幸或不幸。

还遭遇过更严峻的鬼事。

上世纪八十年代后半段写作《白鹿原》时，涉及田小娥被杀后变鬼的情节，有二，一是田小娥的鬼魂附着在杀死她的公公鹿三身上。关于这个情节的合理性和我写作的原意，且不自白，以免自我阐释之忌讳，单说出处。

乡村中的层出不穷的鬼事，有一种便是鬼魂附体，即刚刚死去不久乃至死去多年的某个男人或女人，其鬼魂附在活着的女人或男人身上（女性居多），说出他或她生前未能实现的心愿，甚或冤情。被鬼魂附体的人往往处于失去自我的半癫狂状态，说出的事乃至说话的口吻，都很像死鬼生前的神态。

我小时候看见过被鬼魂附体的人，成年及至中年也都见过和听过。印象深的是一个接近成年尚未成年的女孩，昏倒在灞河岸边的浅水里，被午后出工的人发现救回家中，恢复知觉后便自说自话，竟然说什么他被淹死灞河的事，亏了什么他的妻子养大了孩子……云云。那口吻显然不是一个尚未成年的女孩说话的习性。她说着说着又昏厥过去，围着的女人们便往她身上扣一张簸箕，用桃树枝条抽打簸箕（桃树枝条驱邪），她竟又苏醒过来，又自说那些鬼话。我看得身上直起鸡皮疙瘩。我写田小娥鬼魂附着鹿三的情节，得益于许多年前亲自目睹的鬼事。

然而，让我敢把这种可能被认为是“宣扬迷信”的情节写进小说，却是得了马尔克斯的启示，他敢让他的人物长出尾巴，我何必要忌讳写鬼。再说，他让人物长出尾巴等情节属拉美魔幻。我面对至今也不能消除的乡村鬼事，自审依旧属于生活真实的现实主义范畴。好在基本没有人批评我“宣传迷信”。

二是田小娥的鬼魂不散制造瘟疫，朱先生和白嘉轩修塔镇压的情节，却出了一点麻烦。关于这个情节的合理性，同样不做阐释，我已因评论家和读者的评说深感欣慰了。麻烦恰恰出在关于这个情节的写作上，有一位批评《白》的评论家说，这是模仿鲁迅《论雷峰塔的倒掉》里那座镇压白蛇的塔而写作的。如实说来，我从构思到实施写作这个情节时，确实想到过镇压白娘子的雷峰塔，我最终没有回避，是以为此塔与彼塔还是有区别的。再者，储存在我记忆里的塔，有记不清的许多座，而镇压白娘子的雷峰塔是在中学语文课本上才知道的。单说我们那个三四十户人家的小村庄，不仅有四座敬神的庙，敬着关公敬着佛爷（不知谁），还有一座仅为一间房的马王爷庙，那是为保

家畜安全而修建的最小的庙。此外，还有四座镇邪驱鬼的高低和粗细不同的塔，分别建在村子的东头和西头。

我能在村子里玩耍的年纪，常和伙伴在其中的三座塔周围游戏，至于这三座塔因何故而修建，不甚了了，而第四座塔却是我眼见着修建起来的。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我们村子发生过牛的瘟疫，作为农户半个家当的犍牛和母牛一头接着一头死掉了，我父亲养的一头黄色皮毛的牛也未躲过。第二年又有一种儿童传染病流行，村子里夭折了六七个娃娃。接连发生的灾难，搞得村子里一片悲伤的气氛，便有人出招，应该找一位能禳灾驱祸的阴阳先生来，看看哪儿出了毛病。被请来的阴阳先生很认真，把我们村子东部和西部的坡地踏察了一遍，最后把脚步停驻在村子西头稍微偏后的小台地上，说，给这儿修一座塔。据说他给村里干部说明修塔的原因，是村子东头有一道深沟，村口已有一座塔，避了邪气妖孽，邪气妖孽却从村子西边的沟里钻进村子来施虐了。村里干部召集全体村民议事，得到一哇声的拥护，家家户户都交去了该分摊的粮和款，这座青石垫底料礓石砌身青砖镶顶的塔很快垒成了，塔的高度和塔身的直径，都是严格遵照阴阳先生设定的尺码修筑的。这是我眼看着平地而起的一座塔。

我家在村子西头的倒数第二家，距这座新修的也是村子里最高最粗的塔，不过百十步距离，尽管当时我只是一个小学高年级学生，似乎隐隐也感觉到了驱邪避灾的安全感。其实，何止我们那个小村子，在我走到过的大大小小的原上原下的村子，都有敬神的庙，更有驱邪避祸的塔，有的且不止一座。

乡村里后来经历了一场连一场的运动，传承了许多代人的敬祭神灵的庙会废止了，香火也断了，庙里神像的色彩也渐渐褪色，以至褪皮，再也没有谁敢张罗重塑，却也没有人搬掉神像，而是一任其垮

塌。塔更无人问津，风吹雨淋，村东村西的四座高低不同的镇压不同来路鬼魅邪恶的塔，先后倒塌，了无痕迹。这些敬神驱鬼的庙和塔的消亡，主要是多种运动扫荡的结果，也包含着乡民对神和鬼之事看法的变化，通常说觉悟提高了，起码对神鬼这类被指斥为封建迷信的事是如此。我在高中政治课上学习《辩证唯物主义常识》时，又有附加教材《不怕鬼的故事》，自信已基本确定为既不信神又不信鬼的唯物论者，回到村子听到鬼事时，我便向乡民宣讲纯属迷信的道理，年轻气盛到不能容忍鬼事继续迷蒙乡人。尽管如此，直到我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回看白鹿原前半世纪的生活演变时，那些沉潜在记忆深处的庙和塔里的神和鬼，以及我亲历的听说的鬼事，竟然也都浮泛上来了，而且不仅只是封建迷信的概念，而是和原上原下的男女人物的心理结构中的文化色彩大有关系……无法排除神，更无法回避鬼，尽管知道法海用雷峰塔镇压过白娘子，仍然让白嘉轩把田小娥的尸骨压埋到塔下，不惜犯模仿这种写作之大忌。唯一让我可以强词夺理的因素，便是原上原下那个时代里的真实生活的难以回避的世象，白嘉轩面对田小娥的鬼魂，除却修塔这种惯用的也是极端的手段，似乎都不足以达到彻底解决的目的。

生活发展到改革开放的年代，科学思维以迅猛之势连续冲决政治概念上的个人迷信，无疑给人鼓舞，而传统习惯里的封建迷信却在刚现宽松的社会氛围里死灰复燃。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的家乡的一座业已拆除多年的古庙又得以重建，引发了不大不小的社会舆论。这座古庙位于白鹿原北坡西段，曾经是西安城东规模最大的一个庙会，每年农历二月二俗称的龙抬头的吉祥日子为会日，人山人海。大约在“文革”前两三年已被拆毁，倚坡而挖的敬着多路神仙的窑洞也被挖掘机械毁掉了，那儿刚刚建立了一家机械生产砖瓦的国营工厂。二十多年后，当地乡民串通联手，捐资捐粮，在原坡上很快挖出新窑洞，窑洞

里又塑成了神像，二月二烧香拜神包括乞子的庙会又红火起来。当地政府曾经力阻而不能止，随后就任其自然了，直到现在红火依旧。我曾在事发之初，理智和情感上都不能接受这种封建迷信活动，曾写过一篇随笔类短文发在当地报纸上，不惜惹恼乡党。然而谁也不在乎我那篇小文章，庙会每年依旧红火，我也只能随其自然了。

说了这些鬼事，似乎想图得一缕抛却的轻松；回头一想，其实无论镇鬼的塔或记忆里的鬼事，早已失去分量，仅留下习惯性的生理反应；写罢这篇谈鬼事的文章，不知能否除去头发倒竖头皮发凉的生理反应，还有“说鬼”没有说好更没有说完全的心理亏损，也只能随其自然了。

2010年8月8日 二府庄

感动一种决绝

一个刚刚进入中学尚未读完一年书的十三四岁的少年，突然决绝弃学，回到家中窝居一室，铺纸磨墨练习书法，间以执刀勒石摸索篆刻手艺，一干便是二十年。这人名叫钟镝。钟镝坐在我对面叙说着自己这种非常举动，我似乎惊诧到不敢相信的程度。在我的习惯性印象里，十三四岁的刚刚进入初级中学的少年，多是把学习作业当作任务来完成的，兴趣也多在各种时兴的耍活儿，大约只有极少的也是个别的孩子发生兴趣性偏爱和追求，譬如少年写作爱好者和天文爱好者等等。然而，没有听说过哪个孩子舍弃学业而去追求某种爱好的事。即如我，尽管也是在相同年龄发生了对文学的兴趣，却从来没有过放弃学业的念头，倒是愈来愈看重接受高等教育的迫切性；后来的自修，那是名落孙山之后别无选择的选择。我便对坐在对面侃侃而谈的钟镝刮目相看了。

十三四岁便敢于做出弃学的决绝举动，足以证明他对书法和篆刻艺术的爱好不仅痴迷，而且已经确立了钻研这两项中国传统的也是中国独有的艺术的宏大志向，而且已经专注到刻不容缓时不我待的迫切状态，这种心理和行为，在同龄人中大约是绝无仅有的。这个少年便在自己的小居室里开始了基本功的练习，从正书下手，唐楷、魏碑、隶书和篆书，一笔一画正正规规临摹，反复多回，不仅不曾厌烦，反倒意趣无穷，体味横生，直到把颜真卿的《勤礼碑》写得惟妙惟肖到以假乱真的形态。他又迷恋魏碑，临摹过二百通北魏墓志，深得多家妙笔奇韵。不仅正楷，对隶书亦下足功夫；还有篆书，因为喜好篆刻，更为着力用心。他把一本秦汉印谱《十钟山房印举》敬奉为楷

模，每天临摹刻印三方，持之以恒，即使大年初一也不间断，持续三年通临一遍……写到这里，我便感慨连连了……

我自然想到基本功这个话题。就文学创作而言，我是深知文字基本功的重要的，曾在年轻时以遣词造句和写生活记事练习文字表述能力，大约类似于钟镝的临摹。钟镝深得几位书法大家的指点，从临摹起步，打下扎实的基础功夫，进入个人的创造便是水到渠成的事了。他的天性爱好在书法篆刻，扎实的基本功会使那种天生的灵性获得张扬和发挥的最大可能，便会进入独立个性的艺术创造的境界了。我依文学创作类比，常有灵性和智商不俗的作者，也有甚好的构思，往往因文字功力不逮而留下表述的遗憾。钟镝下足了底功，而且是地道的童子功，又兼着天生的书法灵性，获得篆刻和书法的个性化创造，当属顺理成章，他在十九岁能入选全国优秀篆刻作品，我倒不甚惊讶了。

我同时也想到苦守寒窗的话题。无论从事哪一门艺术追求，都有一个较长时月的包括基本功练习的初创初探的艰难过程，古有苦守寒窗十年的佳话，今有耐得寂寞冷眼喧嚣的倡导。然而切实想来，在诸种艺术门类的追求中，最枯燥也最难耐的寂寞，大概莫过于书法临摹，尤其是篆刻了。我习文学创作，写到得意而又尽兴处，常常忘情到忘我，不仅不觉寂寞，反倒能享受一种痛快淋漓的体验；即如不可或缺的读书，读到那些精彩的章节或妙句时，常常会有击掌称绝的阅读享受。在我推想，面对古碑文，一笔一画临摹，而且日以继日、年以继年；还有篆刻，一把刻刀，一块石头，从早刻到晚，经年不断；该会是几重的寂寞和枯燥，而且是正当一个人好奇好玩的少年时代。我再推想，单是毅力，即使是出名图利诱惑下的用意和用心，都是难以为继的。只有天性里的爱好所促成的兴趣，才是承受寂寞耐得枯燥

的无可量化的心理基础；天性不枯兴趣便不会改易，追求的兴致和劲头不仅不减，反倒愈久愈强烈；天性驱使着的兴趣，不仅不会发生枯燥寂寞的感觉，反倒在一笔一画的无穷韵味里获得陶醉。这样，我便看见从少年到青年一直陶醉在笔墨和刀石兴趣里的钟镝，已经成就了自己的事业，成为一个独立创造且卓有建树的书法家兼篆刻家了。

我很惊讶钟镝的阅读。作为书法和篆刻这种纯粹中国的艺术，和中国传统文化是浑然一体的，从事书法和篆刻的人，接受传统文化的熏陶是必不可缺的，也是顺理成章的事，有建树的书法名家，无一不是国学修养深厚的人。钟镝钻研儒释道，我觉得是必修的功课，他说他读《报任安书》感动得热泪涌流，我也能理解，所以并不惊讶。惊讶发生在他所列举的一长串翻译书籍以及作者的名字，诸如他读过巴尔扎克、雨果、莎士比亚的全集，而且对康德、黑格尔的哲学著作也有涉猎，我便刮目相看这个年轻人了。我无法判断孔子、孟子、老子和康德、黑格尔同聚一庐会是什么情景，却可以肯定既接受中国传统哲学又接受西方哲学的这个人的思维，当会脱俗，必然直接影响到他看待生活世相的眼光，必然影响到他直面自己从事的艺术的姿态，必然影响到手中的毛笔和刻刀在宣纸和石头上的成色和韵致了。我相信这种成色和韵致，只属于既读中国国学又读西方哲学的钟镝所独有；或者说，只有经过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交替熏陶的钟镝才会展示出这种独特品格的成色和韵致。在我理解，个性化的艺术景观便由此发生而形成了。

钟镝的书法和篆刻便形成独有的气质和气象，行家里手识得真谛和妙处，多所赞赏，古拙奇诡，自标一格；书法更是苍奇古厚，笔法浑拙；刀石刻工，浑然如上古图腾，显示丈夫之气……如此高的评价，用一句话归纳，便是艺术个性已经形成，且突出。对于三十来岁

的钟镝来说，既是一种心理报偿，也是一种自信，对于未来的艺术追求，都是最可珍贵的无可量化的精神动力。

2010年9月8日 二府庄

两株玉兰树

清明前一日后晌回到老家，到村子背靠的白鹿原北坡上，在父母的坟头烧了一堆被视为阴币的黄纸。尽管明知这是于逝者没有任何补益的事，然而每年此日不仅不能缺少，甚至早早就泛溢着一种甚为急切的情绪。自己心里明白，上坟烧纸和跪拜的行为，无非是为消解对父母恩德亏欠太多的负疚心理，获得一种安慰。

天气很好。温润的风似有若无。西斜的依然明媚的阳光下，原坡和河川满眼都是蓬勃的绿色和黄色，绿的是返青的麦苗，黄的是盛开的油菜花，间有零星散落在坡梁上杏花的粉白。

回到老屋小院，便坐在前院闲聊。许是那种负疚心绪得到消解，许是得了这明媚春色的滋润，竟是一种难得的轻松和平静。记不得是谁颇为惊诧地叫了一声，玉兰树开花了。我便朝大门右侧的玉兰树看去，在树梢稍下边的一根分枝上，有两朵白花。我的心微微一颤，惊喜得轻叫一声，从坐着的小凳上站起来，几步走到玉兰树下，久久观赏那两朵玉兰花。那是两朵刚刚绽放的玉兰花，雪白，鲜嫩，纤尘不染，自在而又尽情地展示在细细的一根枝条上，洁白如玉，便想到玉兰花的名字确属恰切。玉兰树尚不见一片叶子，叶芽刚刚在枝条上突出一个个小豆般的苞，花儿却绽放了。我久久地看那两朵花儿，竟然不忍离去。玉兰花在我其实也算不得稀罕，见得也早也多了，之所以发生一缕不寻常的惊喜，这是开在自家屋院里的玉兰花，而且是我栽植的玉兰树苗，便有了一种情结；还有一种非常因素，就是这株玉兰树苗成长过程的障碍性经历，曾经让我颇费过一番心思。

几年前我重回原下小院读书写字，一位在灞河滩苗圃打工的乡党，闲聊中听说我喜欢玉兰花，便给我送来一株不过食指粗的幼苗，我便在大门右侧的围墙根下挖坑栽下了。为了便于浇水和保护，我在玉兰幼苗四周用砖箍了一圈护栏。得到我的用心守护和浇灌，玉兰树苗日见蹿高，分枝，加粗，蓬蓬勃勃，生机盎然，我便期待花苞的出现。恰好盼到玉兰树应该发苞开花的规定期树龄，不仅没有开花，失望且不论，等到叶子成形，我发现了非常的征象，本应是深绿色的叶子，却呈现着浅黄；即使到盛夏烈日暴晒的时月，各种树叶都变得深绿近青的颜色，我的玉兰树叶反而由浅黄变得几乎透亮了。任谁都会看出这是一种病态的表征。村里乡党见了，有说是蛴螬咬了树根，有说是缺肥，有说是化肥施多烧了根，等等。后两种说法不能成立，我栽植时填的是农家粪土，不缺肥更不会发生烧根的事，倒是蛴螬啃食树根有可能发生，却也无可奈何。我曾扒土寻找蛴螬，一只也未见到。我就怀疑大约是玉兰根自身发生了什么病患。

等到第二年，玉兰树仍然是满树病态的黄叶，自然不会开花了。我便有所动摇，这株病态的树会不会自愈？需得几年才能缓解过来？如果等过几年不仅缓解不了反而病情加重以致枯死了，那我就会白等了。我便想挖掉它，重植一株。拿着镢头刨挖的一瞬，却似乎听到一种凄婉的求生的哀音，那一片片透亮的黄叶似乎也幻化成哭相，我便举不起镢头来。突然想到，任它继续存在着，如果真的挨过了病患，当一树健康墨绿的叶子呈现在小院里的时候，我会获得一种别样的欣慰和鼓舞；如果万一病患发展到发生枯死，再换植一株也无妨，这株玉兰树便保存下来。约略记得去年夏天回家，玉兰树的叶子变绿了，尽管仍不像正常的叶子那么深色近青的绿，却不是往年那种透亮的黄色了，我不由得庆幸，它的病情缓解了，更庆幸我握在手里的镢头没有举起来……今年，这株玉兰树开花了。尽管只有两朵，却是一种美

的生命的胜利。遭遇过生存劫难之后开放的这两朵洁白如玉的玉兰花，就不单是通常对所见的玉兰花的欣赏的愉悦了，多了一缕人生况味的感受。

栽在中院里的一株广玉兰，相对而言似乎简单得多了。这是我离开老屋小院之后一年春天栽下的。大约是我栽植上述这株玉兰幼苗的时候，问过送来玉兰树苗的乡党，苗圃里有没有广玉兰？问过也就不在心了，尤其是返城之后就淡忘了。这年清明回家祭祖时，那位乡党又送来一株广玉兰幼苗。他竟然对我的那句问话经年而不忘，知道我每年清明肯定回老家，便预备下这株我问过的广玉兰树苗，让我颇感动。我就把它栽到中院左侧的北边，避免后屋对阳光的遮蔽。

我之所以喜欢广玉兰，不全在它的各种颜色的花朵，更偏爱它的四季常青的绿叶。多年前到广东见识这种完全迥异于玉兰树的广玉兰，尽管很喜欢它四季不落的深沉的绿色，却不曾发生拥有的奢望，常识让我难以动心，这种在南方温暖湿润气候环境里生长欢实的好树，难得抵御北方凛冽的寒风和大雪。及至近年间，我在西安看到作为街心路边风景的广玉兰树，才意识到我犯了一个想当然的错误。这种广玉兰树在干燥缺雨的西安依然蓬蓬勃勃，有紫红的花，也有雪白的花；尤其是那浓密的深绿色叶子，在最难熬的冷风刺骨的三九寒冬里，依然蓬勃着一道绿色，为天灰地枯的冬天的西安增添了一种生命的活力。我就在第一眼看见这道风景时，便想给我家屋院栽植一株广玉兰，冬日回到老家，开门进院能看到一株绿树，当会是别一番生动情怀……这株广玉兰的幼苗终于栽到中院了。

我对这株广玉兰的管护，远不及前院那株玉兰树。这是难能补救的事。我居住在城里，偶尔回到乡下老屋，才可能为它浇一桶水，拔除杂草，每到夏天常有的久旱不雨的时月，它就只好忍受干渴了。然

而，这株广玉兰生长的欢实简直令我不可思议，每隔二三月回家看到它时，又冒高了一大截，树干也变粗了许多，且又伸出二三条横枝来。不过二三年，树梢已经高过房檐了，树干也有我的胳膊粗了，我便想到它该开花了。

这株连管护粗疏都说不上的广玉兰，就这样茁壮起来蓬勃起来。春天夏天和秋天且不论，每到山枯水瘦的冬天回到老家时，看到的是白鹿原北坡灰黄的枯草，灞河川道里落光了叶子的果树和杂树，路边上烧荒留下的黑色灰渣。而一当走进屋院，看到绿色依旧的广玉兰，这古老的祖居的屋院洋溢着生命的活力，心理上便泛起一种鲜活。就在我盼着它开花的期待心绪里，灾难却不期而至。那是三年前的隆冬季节，一场多年少见的大雪降至。雪后多日我回到乡下老屋，便看到一幅惨不忍睹的场景，广玉兰的主干从高处折断了，颇为庞大的枝叶躺在尚未融尽的残雪上。我看着主干折断处白色的断茬，再看看脚旁的断枝，一种隐痛久久难以化释。这是太浓密的树叶上积压的雪所导致的惨相。无论怎样惨不忍睹怎样心疼，却无可如何，我只能弥补，便用水在地上和了一团泥巴，涂抹到白色的断茬上，这是乡村里抚慰断枝的传统技法。当我涂抹着泥巴的时候，心情渐渐缓解了，相信到来年春天，断茬处肯定会发出新芽来，这是我种树的生活经验。

去年夏天回家时，从断茬处长出的主枝，已经和主干浑然一体了，初看竟看不出曾经让我心疼的断折的痕迹，凑近了才能看到重新弥合后的新枝与老干树皮颜色的差异。我便有了灾难之后的完全的欣慰。尤其让我格外惊喜的是，广玉兰开花了。枝叶太过繁密，几朵紫红色的花朵夹在树叶之间，不拨开枝叶竟难以发现。我似乎不大在意这花的色彩，也不甚在意这花朵夹在枝叶之间难得赏心悦目，我栽广玉兰的着意处，原本是为着冬日的小院有一派绿色。

山枯水瘦万木萧条的隆冬季节，回到祖屋小院，我能看到蓬勃的绿树绿叶。

初春的刚刚明媚的阳光里，回到祖屋小院，我可以尽情观赏洁白如玉的玉兰花。

这方久蓄着许多代先人命运的沉重气氛的小院里，平添了绿叶的鲜活和玉兰花的柔媚。我回归的向往便铸成永久。

2011年5月4日 二府庄

原上原下樱桃红

白鹿原的樱桃红了。

时令刚过立夏，向阳面的原坡上的樱桃率先红了；晚不过两天，原下灞河川道里的樱桃接着也红了；再过两三天，受地理高度温差制约的原上的樱桃，最后红了。

这个时候的白鹿原，便进入一年里最红火的时月。原上原下和原坡，新修的水泥大道和田间小径，便呈现着车水马龙熙熙攘攘的车流和人群，这是西安城里的男人女人或搭伙结伴或扶老携幼摘樱桃来了。他们散漫在樱桃园里，伸手攀下缀满或紫红或金黄的樱桃的树枝，摘下一串一串熟透的樱桃，填到嘴里，便发出舒心的赞叹，好鲜好甜耶。更有男孩或女孩，攀爬到树上，从树梢上摘下最大也熟透的樱桃极品，下树来送到情侣手里，会心的微笑里荡漾着别具一格的浪漫。喧哗声嬉笑声和呼朋唤友的声浪，此起彼伏在樱桃园里。原上原下通往樱桃园的大道和小路两边，摆满了盛着樱桃的筐篮和纸箱，叫卖声议价声嘈嘈一片，交易活跃。我看着那些抱着一箱箱樱桃乘车离去的男人和女人欣慰的脸色，无疑是北方这种第一料鲜果独有的滋味带来的。我更感兴趣的是那些出售樱桃的卖方收款装钱的动作，无论农夫农妇抑或小伙姑娘，从买方手里接过钱来数一数，尽管数钱的手指的动作有灵巧和笨拙的差别，而脸上的表情却无多大差异，不见惊喜，更不见得意，多是数过之后塞入挂在胸前的布兜，无论三十五十乃至三百五百，都是以习惯性的动作塞入布兜了事，又忙着招呼围过来的新的顾客了。他们一把一把往布兜里塞着钱时所显示的平静而又平常的表情，可以透见原上原下乡民的心理气象了。

这里的樱桃，在我已形成难以化释的情结。

我至今依旧清楚地记得，四十六年前的一九六五年，我在《西安晚报》发表过散文《樱桃红了》，是歌颂一位立志建设新农村带领青年团员栽植樱桃树的模范青年。这是我初学写作发表的第二篇散文，无论怎样幼稚，却铸成永久的记忆，樱桃也就情结于心了。樱桃在我生活的白鹿原地区，是当地乡民种植的诸如桃、杏、沙果等果类中的一种，多在原坡不能种植庄稼的坡地上生长，没有资料显示何朝何代开始栽植这种水果；村子里年龄最大的长者也说不清，只记得自己穿开裆裤的幼稚年纪，就吃樱桃，吃着自家园里的樱桃还嫌不够味儿，常常结伙偷摘品尝别家的樱桃。当地人自古以来不称樱桃，称作玛瑙。如果依这种水果的果形和色彩而论，玛瑙远比樱桃更为恰切也更富诗意，那缀满树枝的一嘟噜一嘟噜或鲜红或金黄的小颗粒，活脱就是一串串珍珠玛瑙。

加深且加重这种樱桃情结的另一种因素，说来就缺失浪漫诗性了。我在白鹿原地区生活和工作大半生，沉积在心底的记忆便是穷困的种种世相。不单是我和我的家庭，整个白鹿原的乡民，从年头到年尾都纠结在碗里吃食的稀了稠了有了空了。尤其是我在公社（现称乡或镇）工作的十年时间里，体味尤深。每年交上五月，即民间俗话说的青黄不接的时月，一些生产队（即今村民小组）的干部便三天两头赶到公社来，堵住分管粮食的干部，百般申述缺粮的困境，要求多给他们分配救济粮食。这些求助的生产队干部，多是来自白鹿原北坡上或大或小的村庄。坡上沟道里有小股泉水，仅供人畜饮用，“学大寨”大潮中修建过一些蓄水池，效益甚微；北坡上的田地，多为跑水跑肥不蓄墒的薄田，仅种一料庄稼的小麦产量，顶好的年份不过二百斤，遇到干旱缺雨的灾年，稀疏矮小的麦秆儿搭不住镰刀，只好用手撅

拔，俗称猴拔毛，产量就可想而知了。上级调拨下来的救济粮可以说是杯水车薪，分管粮食的专干即使慈心软肠也只能撒胡椒面儿。那时候的樱桃虽然依旧开花结果，却当不得饭吃。随着“文革”愈来愈“左”到极端的农村政策，一只鸡蛋卖给国家还是卖给城里个人，都被提高到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两条道路斗争的严重性看待，又有“以粮为纲”的纲纪，樱桃树虽然没有被铲除，却也不提倡，处于自生自灭状态。尤其在“学大寨”学得几乎发疯的“文革”后几年，许多生长在坡地上的樱桃树，因为修造梯田而砍掉了。有幸存留的樱桃树，在青黄不接的五月初成熟的樱桃，由社员摘下再送到指定的国营商店，换回的有限的钱款，成为生产队空乏已久的钱柜里的库存，首先作为头等合理开销的项目，便是给发生疫情的牲畜作疗治费用，弥足珍贵。

在西安郊区辖属的二十六个公社里，地处坡、原和山岭地区的公社不过两三家，与那些占据渭河平原腹地的公社相比，难以望其项背。这两三家自然环境较差的公社干部遇合到一起，便自我调侃定位为“第三世界”；在“第三世界”里，我工作的原坡地区当属垫底的一家，走到处似乎都有矮人半截的感觉，所谓人穷气短不单说个人，工作单位似乎也应此话，我有双重体验。

彻底扭转以至完全改换那种不良感觉的卓绝一笔，便是樱桃。我约略知道，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起始，灞桥区的领头人，既得改革开放之“天时”，更度白鹿原地理特质之“地利”，确定该地区以樱桃种植为主业，为乡民开创一条脱贫致富的途径。且不赘述领头人和技术人员如何四处奔走，引进西洋大樱桃品种；如何向乡民推广普及樱桃种植的技术要领；还有为樱桃的销售不遗余力……我尤为赞赏尤为敬重的一点，二十余年来，灞桥区的领头人调换过一茬又一茬，而一茬又一茬的新继任的领头人，都一如既往地瞅住樱桃园的建设和发展，

终于形成气候，形成产业化的规模。单是白鹿原原上原下和原坡，现已种植樱桃二点四万亩，结果的樱桃树有一点五万亩。三千余户乡民现在年均收入超过四万元，人均超过万元，竟然比本区那些过去的盛产粮食的平川地区的人均收入超出近两成。尽管我知道读者腻烦文章里引用数字，仍然忍不住要把这些数字摆列出来；这些数字牵涉我的情感，甚至颠覆了情感记忆里最软最短的那一脉。我确凿相信这些数字，尽管没有必要挨家逐户去询问谁个收入了多少，因为你随便走进原上原下和原坡的或大或小的村庄，一街两行全部都是新建的房子，有平房也有二层小楼，三合院司空见惯，迎着大门的正面几乎全部都用白色瓷片包装，一派崭新气象。这里的乡民积习已久善于门楼的建筑，却几乎很少见到老祖宗们用青砖刻着神鹿白鹤的图案，而是用现代建筑材料或白色或紫红颜色的瓷砖，给人直观的感觉是清爽和温暖。每每看到这些宽敞漂亮的农家小院，我便想起高晓声的小说《李顺大造屋》来，如果说李顺大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以前的中国农民生活形态和心理形态的一个典型，那么白鹿原上下一幢幢新房小楼的主人，便是对李顺大的终结。我在原坡的樱桃园里散漫时，看到龙湾村几幢破旧的厦屋，墙皮多半脱落，房檐多处垮塌，垒墙的土坯暴露无遗。这些尚未拆除的旧房破屋，却勾起我的似曾相识的记忆，在这些屋子里，我当年下乡时吃过派饭，约略还记得房子的主人。他们不是作家创造且难免夸张的李顺大，却是我亲历且认识的真实的村民。

有朋自远方来，恰逢樱桃成熟的五月，我便领他们上原摘樱桃。站在白鹿原头，原上平地里是蓬勃着的樱桃树，一眼难尽；原坡上随着坡势和浅沟起伏错落着一派绿色，自然都是樱桃树了，几乎看不到裸露的地皮；原下的川道，灞河自东而西蜿蜒过来，几乎被满川的樱桃树遮掩住了。朋友无论男女，也不论长幼，站在原头观赏这一方自然景致的时候，无不发出由衷的慨叹，你老兄（或老弟）竟独得这一

方活水绿山！我便凑兴纠正，这不是山，是原和原下的坡。另有一点需要纠正的，活水绿坡绿原只是当今的景象，为不致扫兴，我不想提过去。远方的朋友多见过中国和世界多处的好风景，能对白鹿原的樱桃园流连忘返感慨连连，储存在我心底的那种“第三世界”的块垒，便悄然化释了。

进入五月，便进入这座古原最红火的季节。果农们选择了早熟和晚熟的多种樱桃品种，采摘的时间可以延续月余。这座雄踞于西安东南方位的开阔的古原，距离西安不过十来公里，工余假日，人们呼朋唤友引妻携子，驾车不过半个多小时便进入樱桃园了，或上原或上坡或到原下的河川，尽都是缀满红色金黄色珍珠玛瑙的樱桃树，诸种烦恼和疲倦顿然消解了。当各种媒体大呼急叫着西安城区应该形成“低碳”的健康空间的时候，这里的樱桃园无疑是一方天然氧吧，从城里赶来的男女老幼，从树枝上摘下一颗颗樱桃填到嘴里嚼咂品尝的时候，或在樱桃园里逸情漫步的时候，把在城市里吸入的污浊废气全都排出了，获得一种神清气爽的生命活力。即使在樱桃清园以后的夏天和秋天，原上原下和原坡的果园和小路上，仍有不少城里人观光散心，迷恋这个天然氧吧的洁净的空气。

每到清明，樱桃花开，原上原下和原坡，尽皆是粉白的樱桃花，香气弥漫。树叶刚刚吐芽，花儿却灿烂了，这原这川这原坡，望去是纯一色的樱桃花的世界。果农们忙着种种技术性管护，只企盼樱桃开花时不要下雨，雨水灌花就结不出樱桃。城里人搭帮结伙来赏花了，散漫在樱桃花的海洋里，留几张以樱桃花为陪景的照片，在农民开办的“农家乐”饭馆吃一顿地道的农家饭菜，不仅释放了胸中积存的废气，缓解了办公室或工作台上的紧张的神经，把粉白的樱桃花储入胸间，当属滋养精神心理的氧。

有朋友要约见，我便顺口说，如果事由不急，最好五月来，或清明前后来，或摘樱桃或赏花，坐在农家屋院或果园里说话，我会有最佳的情绪；相信南方北方来的朋友，也会感应而生诗性的灵气。

2011年5月30日 二府庄

敲响城门的远方乡党

和这个人握住手的一瞬，我的胸膛里发生了非同寻常的响动，同时就有终于有此机缘的默然慨叹。

这个人叫安胡塞，哈萨克斯坦陕西村的村长，一个远方归来的乡党。他原本姓安，取了个异族色彩很明显的名字胡塞，想来是入异乡而随其俗的一个标志。他一开口说话，却是满口最地道的关中东府腔调，地道得比当今西安及其周边人的口语腔还要纯正与古朴。也许是受普通话的持久性影响，许多太过费解的方言土语和太过艰涩的发音，西安城里乃至郊区的本地人都不说不用了，但安胡塞一如既往满口满腔地说着。在我的听觉感受里，却不单是品咂家乡原生态口语的韵味，更在他这原生态口语里所隐伏着的悲惨不堪的历史。那是一八七七年的清朝同治年间，左宗棠镇压为生存抗争的陕西和甘肃的回民，从陕西关中一直把他们打杀驱赶到天山脚下时，仅剩下一万多人；翻越天山时又遇到暴风雪，有幸翻过天山逃脱劫难者只有三千多人……这不堪的一页已经翻过去一百三十多年了。

现在和我挨肩坐着的安胡塞，就是那侥幸逃过劫难的三千人中的一位安姓回族人的第四代传人。他的祖宗和那些逃亡者进入中亚地区，在楚河岸边停下了长途跋涉的脚步，落脚定居。楚河的那边属今天的哈萨克斯坦辖治，楚河的这一岸是吉尔吉斯斯坦的领土，那时候都统属于沙俄，他们却浑然不知。他们看到的是一眼望不到边的水草茂密的草原，当地人竟然不种庄稼只放牧牛羊，真可惜了这一方好水沃土。他们停下脚便开荒种地，把从渭河平原上带过去的粮食和蔬菜种子，撒播到中亚楚河两岸向来没有垦植过的土地里……直到有一

天，一位或者几位沙俄官员来到他们的驻地，瞅了又瞅这一伙穿着长袍、拖着长辫子的“怪人”，便开口盘问，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们是从哪里来的？他们谁也不敢说明真实的来路，只含糊地说出一个大的方位，是从东岸子来的。这样，在沙俄帝国的众多民族里，又添加了一个东干族。这个“东干”族名，显然是“东岸”的音译。关中人说到四个方位时很少说东边西边南边北边，多是说东岸西岸南岸北岸，而且习惯在末尾顺带一个子字。我从小听惯了也说惯了这样的方位指向词，现在和乡党说起来也还会顺口说东岸子西岸子这样的话。本属中国回族的一伙移民，却成了沙俄和后来的苏联以及今天的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东干族。

我第一眼看到东干族乡党似曾相识的面孔时，竟然下意识地从坐着的沙发上站了起来。那是一九九三年陕西电视台播放的春节晚会，一位来自中亚的东干族演员出现在荧屏上。这位被称也自称黑老五的人，头戴一顶草原牧民习惯戴的高顶皮帽，开口便叫了一声：“乡党！黑老五回来咧！”我就是在那一声地道而动情的乡音里站起身来的。这是太过久远却又令我闻之耳热心跳的一声乡音，是逃亡到中亚的三千多乡党在近一百三十年后第一个返回故乡的后人发自肺腑的声音。黑老五的脸色不仅不黑，而且泛着俊气和喜色，他演唱着一首古老的民歌，歌曲的音调只有关中平原才会产生，我听来再贴切不过。而那首民歌的歌词在我却颇为陌生，也就甚感新鲜，如果不完全是我孤陋寡闻，在我生活的这个时段和空间大约已经失传了。却在中亚地区的东干族乡党中完整地传承下来。接着在一九九四年的陕西电视台的春节晚会上，一位名为侯赛因的乡党跃上荧屏，比之英俊的中年汉子黑老五，他的如雪一般银白闪亮的头发，成为舞台上的一个亮点。他同样表演的是关中民谣《一对牛》，内容是说一个已经贫困至极的农民，却连续遭遇一个又一个倒霉事，诸如借牛耕地打破犁铧，收获的麦子

不及种子多，天上下冰雹穿过房顶的窟窿打破了孩子的头，等等。他的绘声绘色又极尽诙谐幽默的表演，惹起一阵又一阵笑声，谁都很难看出这是一位七十二岁高龄的老人。这首民谣我似曾相识，大约是少不更事的幼童时期听婆说给我的，自然比不得曾荣获苏联人民演员称号（苏联七十年命名人民演员不足十人）的侯赛因声情并茂且惟妙惟肖的表演了。这“一黑一白”——黑老五和银白头发的侯赛因——两位远方归来的乡党美好而亲切的形象，至今依旧清晰地呈现在我的眼前。尽管侯赛因现已谢世，但他当时模仿的那个乡村倒霉蛋逼真而又滑稽的动作和生动诙谐的音调仍留在我的记忆之中。

无论是“一黑一白”舞台表演的语言声调，抑或是坐在我右首的安胡塞，都是百余年前的原生形态的关中语言。这倒不难理解，他们生活在楚河两岸，无论是那边的哈萨克人，还是这边的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各族人，没有能听懂或会说汉语的人，更谈不上关中话了。这样，他们便形成一个完全封闭的语言环境，任何影响他们关中语言和语音发生变化的因素都不存在。他们学会了俄语和所在地的民族语言，那是走出家门作为社会交流的工具，一旦走进家门或面对同族乡党，便是更为顺口也更为自如的关中话了。因着环境的封闭，对许多社会事象以及生活世相的称谓，竟然原封不动地保留着清朝的词汇，至今把政府机构称“衙门”，把警察称“衙役”，把政府官员笼统称作“大人”，把总统或首相仍然称为“皇上”或“皇帝”，把无论小学或大学一律称为“学堂”。有意思的是，他们把从事写作的作家称为“写家”，我斟酌起来，似乎“写家”比“作家”更切合从事写作这种职业的特点。最具直观的服装，依旧保持着清代关中民间的样式，男人的礼帽和长袍，女人的偏襟上衣、裤子和裙子都有绣花彩饰。出门上班，尤其是到各级衙门（政府）或学堂（学校），都是西装革履或校服；回到自己村子里，却更习惯自家的裤褂和手纳的布鞋；尤其是结婚喜

事，绝对要穿长袍马褂和彩裙……二〇〇九年，时任陕西省省长的袁纯清到中亚几国访问时走进了陕西村，听着那些久远而纯正的原生态关中话的热烈问候，又看了东干族孩子用关中话表演的文艺节目，竟然激情难抑，跟着孩子们唱起来。孩子们表演的是民间儿童歌谣：娃娃勤，爱死人；娃娃懒，拿个棍棍儿往出撵……尤其是这些孩子唱起至今不仅在关中而且在全国也唱红了的秦腔歌谣：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高桌子低板凳都是木头，走一步退一步全当没走，哭了笑笑了哭糊里糊涂……在陕西工作多年的袁纯清省长，向来是满口湘音普通话而不说一句陕西话的，此时竟忍不住和这些东干族人用关中话对话了——这次破例被传为佳话。

听到这些传闻，我便自然想到，我如若有幸在那种场合里，不仅关中话会派上用场，可能忍不住会和孩子们唱起来。前一曲教孩子学勤勿学懒的歌谣，婆和母亲不知给我念过多少回。多是在她们让我干活而我贪玩不做的时候；后一曲歌谣全是逗人一乐的大实话，话剧《白鹿原》的编剧孟冰要编主题歌曲，让我为他提供关中地域色彩浓厚的民间歌谣，我不假思索便说出了这一首，他当即选中。这首主题歌曲由华阴老腔艺人演出，成为话剧《白鹿原》的一个热点，由此被邀请到许多地方去演唱。设想我若有机缘到哈萨克斯坦或吉尔吉斯斯坦的陕西村，能看到听到这些东干族孩子唱我唱过的童谣和民歌，当会是一种无可比拟的享受。把隔绝一百三十年的关中与中亚的时空，在这幼童演唱的歌谣里消弭了。

还有一种太过沉重的声音。

每有从中亚楚河两岸陕西村回来的东干人，都要到西安城的西门前，用拳拍击那古老而宽大的明代修建的城门，然后高呼三遍：“我回来了！”安胡塞告诉我，多年前他第一次回到西安，出火车站便直奔西

门，拍打着西门门板的时候，热泪涌流，含泪高呼着“我回来了”。三声呼喊过程中，曾祖父、祖父和父亲都映现在眼前，他们的夙愿由他实现。

这是一个太过久远的东干人的共同夙愿。被左宗棠驱赶打杀的关中回民，是从西安城的西门逃亡而去的，西门便成为他们背离家园的一个情结。逃亡的回民领袖叫白彦虎，一个既有较高文化修养又兼过人武功的青年汉子。率领着回族父老兄妹翻过天山到达楚河两岸定居之后，他仍然成为异国他乡里乡党的核心。他为这一伙逃过劫难的幸存者的生存费尽心力，不幸染病不起，正当中年而早逝。在他告别人世的一刻，他对他的乡亲说了一句话：回到陕西，要拍打西安的西门，要连说三遍“我回来了”。白彦虎的遗愿在东干人里一辈一辈传递着，这一令人震撼的敲门的声音，却是一百多年后才敲响的。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前述的“一黑一白”两位东干族表演艺术家，当属第一拨实现白彦虎遗愿的东干人；安胡塞多次回到西安，每一次回来都要去拍敲西门门板，为着白彦虎，为着自己，也为着现在生活在中亚的十余万东干人。

东干人保存着原生态的关中语言和生活习惯，却丢失了汉语文字。逃亡到中亚的三千多回族男女，多为不识字的文盲，迫于新的生存环境的适应和必需，他们和他们的孩子，都接受了俄语和所在地的民族语言，几乎没有人会读会写汉字了。作为十余万人的陕西村的大村长，安胡塞向哈萨克斯坦有关部门打了报告，申请在东干族人聚居区的学校开设汉语课程，却因为师资和经费等多重困难而一时难以实施。安胡塞又多方奔走另辟途径，于十年前把五名东干族孩子送到西安上学。由陕西方面予以资助，他们已经在西北大学读到三年级了，汉语水平得以提升。现在，经安胡塞多年持续不懈的努力运作，已有

十六名东干族学生在西安和兰州学习过，汉语语言的空白被填上了开创意义的一笔。

作为村长的安胡塞，为陕西村十余万村民的公益事业热心奔走于陕西和中亚之间，也有自己一个沉积太久的心事，便是想找到祖宗曾经生活过的村子，用中国流行的话说是寻根。从他逃亡到哈萨克斯坦的曾祖父传留下来的甚为模糊的关于村庄的方位是四句话：出门是稻田，抬头见南山，门前有条河，河上有座桥。当他回到西安向人打听这种地理特征的地方时，谁都难以说出具体答案。因为秦岭在陕西段的被称作终南山的北麓，多有从山谷里流出的小河盘绕，河两岸都是稻麦两熟的肥沃良田，小河上多有木桥。这种景象自东而西铺开好几百里，安胡塞却搞不清祖居村庄的名字，说大地寻针也不为过。他便先到离西安最近的长安县走访打问，竟然在一个小铺店和一位女性的闲聊中发现了线索。无须赘述那个太过曲折的问祖寻根过程，他终于找到了本族且为本家的同辈弟弟安和平，其中一个至为关键的因素，是安姓同族每一辈人姓名之中相同的那个字。安和平保存的族谱上，最近的四辈是兴——长——吉——庆。安和平即属庆字辈，遗憾的是他没有遵庆字取名，按祖制规矩应为安庆平；安胡塞尽管没有族谱，却记着祖传的上几辈人的名字，正合着安和平族谱上的辈分，逃亡到哈萨克斯坦的曾祖父就是兴字辈人，叫安兴皇，曾祖父的弟弟叫安兴虎。口头惯称太爷和二太爷。

我这回能和安胡塞握手，就是安和平牵线搭桥。现在，安胡塞坐在我右首的贵宾位上，安和平坐在我左首位上。圆桌上还坐着几位西安的回族朋友，说当年的往事，叙今天的生活，在我是一种少有的别一番感受。安胡塞送我一顶哈萨克人习惯戴的高而且尖的皮帽（就是

黑老五戴的那种）。我戴上和他合影留念，似乎我就此成为了他这个村长领导的陕西村的村民。

2011年6月20日 二府庄

猜想一根神经

我对文学发生倾向性兴趣的同时，便知道了“天才”这个词汇。我至今依旧记得，是在读书到初中二年级时，我对文学发生了深厚的兴趣，而且在作文本上写起小说来。读书到初中三年级，我转学到离家更近的一所中学，在学校不算太大的图书馆里，发现了刘绍棠的短篇小说集《山楂村的歌声》和长篇小说《运河的桨声》，便喜不自胜地借了来读。在原校读初二时，正是“反右”运动搞得最激烈的时候，我的文学课老师在课上讲到了刘绍棠被划为“右派”的事。我记住了刘绍棠的名字，更神秘着他被冠名的“神童”。我在课后到图书馆去借他的书，却没有。在我新转入的这所中学的图书馆里，竟然借到两本他的著作，真是大喜过望，“神童”的神秘面纱在我第一行文字的阅读时便渐次揭开。

且不赘述我对这两部著作阅读中的喜爱之情状，更富刺激和压迫的是在《运河的桨声》的《后记》里，他写到肖洛霍夫在很年轻的时候便写了《静静的顿河》这部史诗，称肖为天才作家。我知道了文学创作是需要天才的。我几乎没有任何间隔便反躬自问，那么我是天才吗？如果我不具备文学创作的天才，那么把兴趣和精力投入到写作上，不仅出不了成果，肯定把其他可能做成的事也耽误了。然而，生性中天才成分的有无乃至多寡，却是无法检测更难得到判断的事，天才这个令我感到刺激的字眼儿，很快也很自然地转化为一种压迫一道阴影，沉在心底罩在心头。读着中学时写的小说上了中学语文课本，这样令人不可思议的神童刘绍棠，三十岁出头便完成了百余万字的史诗《静静的顿河》的天才作家肖洛霍夫……少年时期便出类拔萃着天

才的光环，真是令人有望而却步的畏怯。尽管如此，一个矛盾到令我不无痛苦的事实是，无法中止阅读，也无法停止想写的欲望。

让我减轻心理压迫拨开心头阴影的契机，记不得是哪一天突然想到“大器晚成”这句古训。中国和世界出了许多少年天才作家，而大器晚成的文学巨擘也为数不少，我不敢想自己是晚成的大器，是个很小的“小器”也很荣幸，说到底只要是能写点变成铅字的“器”，也知足了。尤其是后来读到契诃夫的一句语录：大狗小狗都要叫，就按上帝给它的嗓子叫好了。我肯定不会是大狗，能成为叫出几声的小狗就足以欣慰了，而能不能叫出声音，无法验证，只能靠埋头苦修。直到我能在地方报纸上发表小散文的那一天，终于可以相信自己是能叫出声的狗了，自然是小狗。不料，刚叫了几声，便哑了嗓子，“文革”把许多令我敬仰的“大狗”全整得趴下了，乃至把命都赔上了，我这个小到不能再小的小狗，不足挂齿。

当文艺复兴在中国风起云涌的时候，我又张嘴叫起来。尽管仍然是小狗，却比“文革”十年前叫得欢了。我发现，天才的阴影依然罩在心头，许多年来都在企图破解天才这个太过虚幻色彩的字眼儿，期望获得一种可以捉摸的物质化的物象。记不准确是哪一年，我突然意识到，天才当属一根对文字尤为敏感的神经，自然是指作家而言。如果有一根对数字敏感的神经，很可能出脱为一个数学家；如果有一根对色彩和线条特别敏感的神经，这个人就会喜欢画画，成为一位画家；如果生来具备一根对音响十分敏感的神经的男人或女人，很可能成为作曲家或演奏家……余不一一。这是我积多年的观察，形成的一种猜想。

准确记得是在上世纪的六十年代初，高考名落孙山回到祖居的白鹿原下的小村子，当了初级小学的民办教师，在煤油灯下读过一部苏

联小说《盲音乐家》。一个颇为富裕的知识分子家庭，不幸生下一个盲童。这个盲童长到读书入学的年龄，却只能坐在家里。某一天，他的父亲看见盲童不断地转动脑袋，一会儿转到左边，一会儿又转到右边，看不见东西的眼睛轱辘轱辘转动着，脸上是专注而又兴奋的表情。这位父亲起初以为儿子发生了什么异变，很快又醒悟过来，儿子的脑袋是随着一种美妙的鸟叫声的方向转动着。这位父亲顿然想到，儿子对鸟鸣的天然敏感，很可能敏感乐声，随之便让儿子接触乐器，并接受音乐的辅导和训练。这个孩子后来成为国家有名的钢琴演奏家，而且创作了不少钢琴曲，一位颇有建树的作曲家。我后来才意识到，这个孩子有一根对音响尤为敏感的神经，尽管天生不幸为盲人，却仍然阻碍不了那根神经的神奇发挥；自然也亏得那位聪明的父亲的发现，才不致使他那根上帝施予的乐感神经萎缩。

已经不幸英年早逝的速算专家史丰收，在他未成就大名之前就以神奇到不可思议的速算神话不胫而走。大约是“文革”后期，我所在工作的公社（即今时乡或镇）的一家小学邀请史丰收作速算表演，面对随意写出的三十或五十为一组的数字的加法（每一个加数都在千位和万位），史丰收对着小学黑板上的密密麻麻的数字看过一遍，随口便报出结果来。同时有两位手执算盘的老师，费了小半天工夫才得出结果，和史丰收口算的总数完全吻合。史丰收是陕西大荔县一个农家子弟，“文革”中读初级中学可以想见所获的稀寡，作为农民的家庭环境几乎没有任何数学的氛围，他怎么就练就了如此神奇的速算能力？我便想到上帝赐给他一根对数字尤为敏感的神经。这根神经对数字的敏感反应，基本不受身上穿着西装革履或粗衣布鞋的影响，也不会因为嘴里填的是面包或咖啡或苞谷糁子酸菜而呈现差别。说到此，忽然联想到钱锺书先生，在考取清华大学时数学大约只得了不上二十分，上

帝给了他一根对文字尤为敏感的神经，而关于数字和计算的神经几乎是一个盲区。

我记不清读谁的一篇谈创作经历的文章，其中说到他自幼受家庭书香氛围的熏陶，喜欢阅读文学书籍，进而学习写作，后来便成为一个作家。我读着便生疑，同样的书香家庭，为什么仅仅只把他一个人熏陶成为作家，而兄弟姊妹却各有另外的从业选择，有的干技术事项，有的从商，有的就是一个普通工人。我想其实很简单，上帝（父与母）给了他一根对文字敏感的神经，书香便很自然地熏陶上他了；他的兄弟姊妹可能具备一根对其他事项敏感的神经，便有了不同的兴趣和人生追求的选择；“四书”“五经”以及中外文学名著还有舞文弄墨的父母所酿造的家庭书香氛围，却难得把他或她熏陶成一个文学爱好者。由此联想到一个普遍现象，在中国和世界文坛，尽管有父子作家母女作家兄弟作家姐妹作家传为美谈，而数量和整个作家的庞大数字构不成一个比例。这仍然属于那根对文字是否敏感的神经的话题。作为作家的父亲或母亲，如果能给儿子或女儿遗传下来一根和他们一样乃至超过他们对文字敏感程度的神经，他们的这个儿子或女儿不仅会成为作家，文学创作成就可能超越父亲或母亲也是合理的。然而，眼见的这样好事太少太少，绝大多数作家包括杰出的文学大家，其子承父业的事都不曾发生，又可见“熏陶说”的先决条件，在于有无那根对文字敏感的神经。

陕西临潼骊山的脚下，上世纪五十年代初出过一位享誉文坛的农民诗人王老九，自年轻时便以随口随性撂出几句顺口溜而在乡里闻名，多是穷人受欺压的泄愤之作，和他一样受欺压的老百姓在传诵他的诗句过程中得到一种报复的快感。解放后，王老九被陕西文艺界扶植，这个粗识文字的农民诗人的诗歌如泉喷涌，曾经受到毛泽东主席

的接见。我想王老九便是生来具有一根敏感文字的神经的人。他不仅没有书香环境的熏陶，穷得连上学的机会都失掉了，不仅谈不上文化程度，仅仅是粗识一些汉字的半文盲的农民。然而，他有一根对文字尤为敏感的神经，触景生情，遇事更多感动和感慨，便发出吟诵，不图发表也更不为挣稿酬（压根儿没有发表和稿酬的概念），这种即情即景的诵唱，大约和李白杜甫的随感而出的诗歌的途径如出一辙。当然，内含的哲理和诗的意境难以比对，这是作为半文盲的农民诗人的后天性缺失。然而，仅就语言而言，王老九那根敏感于文字的神经，无须导引便贴上了关中民间语言，响亮的爽口的生硬的幽默的含蓄的等口头语言的精华，尽都凝结聚集在他的诗行里。民间称顺口溜，王老九顺口便溜出来，乡民们听到后顺口再溜出去，在乡野马棚里传诵不绝。杜甫李白们的诗歌在社会的知识人群里被顶礼膜拜，千古传诵不衰；王老九的顺口溜或者称快板诗却赢得了社会下层乡民的喜爱，也是传承不衰。

其实，在关中乡村，多有王老九这样的顺口便能溜出生动诙谐而又易记易说的快板的人，只是没有王老九的机遇和广泛影响罢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我在家乡农村工作的时候，在灞河川道和白鹿原坡的三十多个自然村下乡跑动，发现好多村子里都有一个能顺口溜出易记易懂的民间诗句的人，其中最有名的一位，名气和影响已经溢泛出我工作的公社（即当今的乡镇）。此人其貌不仅不扬，而确凿有点丑陋，不足一米六的个头且不说，细窄的脸庞上布满大大小小的黑斑，一只眼总是眯着，另一只眼睛似乎歪斜着看物盯人，在以体力劳动为主的生产队里，身单力薄的他很难挣得较多的工分，生活之状况就可想而知了。似乎谁也不在乎他的存在，却总是在人群聚拢的场合喜欢他说顺口溜。他兴致好时说，受窝囊气时更爱说，尤其是有人当面做出不尊重他的话语和行为，他当即便溜出一串挖苦对方的有韵律的快

板来，尽是对方的生理缺陷和性格弱点，不仅引得乡民哄笑，更使对方脸红耳赤尴尬不堪。有一位有心人曾收集过他随时随地撂出的顺口溜，却不敢出手，多是挖苦乡党的内容，更有对生产队某些干部和不公的事情的讽刺，收集者担心会出“政治问题”，便不再费心劳神做下去。记得有一年临近春节，公社（乡或镇）派干部到各个村子给过不了年的困难户发放救济款和救济粮，这位顺口溜先生闻讯，很想得到救济粮款，却又硬着性子不找干部申求，竟然弄来两绺红纸，给自家的简易土门楼贴了一副对联。上联：人家过年咱不过；下联：没有菜也没有馍；横联四字：申请救济。很快便聚拢来一群村民看稀罕，嬉笑声议论声稀里哗啦。一位有心人悄悄跑到支部书记家告知此事，完全出于好心，怕他的这副对联一旦“上纲上线”，就会惹出“攻击社会主义”的政治麻烦来。支部书记正在和下乡来的公社干部商量救济对象，闻讯吓得变了脸色，当即奔来，把贴对联的人狠狠训了一通，言下之意，你狗东西不仅得不到救济粮款，还可能因“攻击大好形势”的错误而上批斗会。这位农民诗人当即撕了对联。到傍晚时，支书陪着公社干部把一份救济粮款送到他家……我很熟悉这位堪为农民诗人的乡党，曾经多次在看着他顺口溜出妙词儿的时候突生遗憾，如果他有机缘接受中学教育（且不敢奢望大学中文），发展成为一个当代诗人是合理也合情的，那根敏感于文字的神经，和那些顺口溜出的韵词儿悄无声息地淹没了，真可惜了上帝赐给他的那根敏感文字的神经。

同样敏感文字的神经，后天如何敏感文字，敏感出怎样的文字景观，想来令人大开眼界，甚至不无惊心动魄。即以同代人而论，鲁迅创造的博大精深而又经典化的文学高峰，沈从文怡情湘西山水的另一番堪为经典的文学景象，还有别一番耽于男女情爱的鸳鸯蝴蝶派的张恨水，等等。我便看到，那根敏感于文字的神经所创造的文学景观，差异太大了，就人通常能想到的形成这种差异的因素，有作家生存的

环境，家园和山水，接受的教育和阅读的书籍，尤其是后来形成的独立思想和艺术审美的情趣，决定着那根敏感文字的神经发挥的倾向和倾情了……这是一个太过复杂的话题，姑妄涉及，不敢也无力深究，便自觉作罢。其实，我只是对天才的一种物质化的猜想，而敏感于文字的那根神经后天如何展示各自的文学景观，已是另一个话题了。

缺乏人体生理常识，生发出一根敏感文字的神经，经不得科学考证，便作猜想。

2011年7月30日 二府庄

饭事记趣

几位朋友聚餐，没有任何正经话题，全是随心所欲，即兴发挥，难免东拉西扯，却多为逗笑开心的生活趣事逸闻。记不得谁说到自己幼年时期经历的艰难生活，为争食半碗锅底铲下的锅巴，曾和长自己两岁的哥哥动手厮打。这种锅巴我也喜食，那是用很细的苞谷糁子熬烧稀饭时，大铁锅底留下的一层沉积糁子，被烙得金黄，用锅铲铲下来，多成卷儿状，味道甘美且不论，在“三年困难”时期，一天三顿喝苞谷糁子的情状里，吃不上面条，更见不到馍，这种半干的锅巴则耐得住饥饿；父母把这种稀罕吃食全让给孩子，孩子多的家庭，会分给每人半勺，或轮流吃……

由此引发出我有关吃饭的记忆，便凑热闹说了两三件有关吃饭的事，朋友们甚觉有趣，有人便说，你不妨把这些轶事写出来，挺有点意思。这话倒让我记住了，而且又触发出几则吃饭的事。我想，人一生要吃多少顿饭，吃过也就忘了；而吃过几年乃至几十年的几顿饭难以忘记，这几顿饭就在人生行程中留下印痕。这种多属饥饿年代的有关吃饭的事，会让今天以营养成分调配吃食的读者感到好笑，也不顾忌了，索性让大家笑一回，何妨……

确凿记得是一九六七年五月末的事。这是“文革”派性闹得最疯狂的时月。我供职的公社（即乡镇）农业中学早已停止上课，学生虽然也搞成两派造反组织，却在本公社社区无甚影响，多数学生早回家了。七八个教师也是去留自便，常来的人没有谁夸奖你坚守岗位，常常不来的人也没有谁计较你失职。到了五月末，“靠边站”（即罢官）的校长突然挺身而出，通知所有教师返校，他要安排学校收割麦子的

事。农业中学属社办公助性质，学校搞勤工俭学，在学校西南边的荒坡上开荒种地，播种了几亩麦子，还栽下不少果树。这方坡地在白鹿原西头的北坡上，紧依着汉文帝的倚坡而建的陵墓，史称灞陵，因坡根下流淌的灞河得名，白鹿原由此也称灞陵原。灞陵的坡形，东西两边有着几处基本对称的凸出和凹进的地形，活脱如展翅飞翔的凤凰，灞陵的民间名称为凤凰嘴。就在凤凰嘴的东侧，有农业中学师生开荒播种的麦田。这方地域向阳，又因坡高缺水，麦子便早熟了。校长尽管作为当权派被冷置着，却操心已经基本黄熟的麦子，着急了。

且不说这七八位教师怎样汗流浃背地收割麦子，再翻沟过梁人背车拉运送麦子，以及人做畜牲拽着碌碡碾打麦子，单说开镰之日的第一顿饭。教师们聚集在离灶房最近的一座教室里，炊事员老头把刚刚蒸熟的馍端到教室里，当众揭去大蒸笼里的垫布，一片冒着热气的白花花的馍晾现出来。校长宣布：大家割麦运麦要出大力气，这馍就随便咥（吃）。这个主意是我拿的，如果违反粮食政策被追查的话，我负责，处罚就处罚我，与大家无关。校长话音刚落，教师们便动手掂起纯麦子面馍咥起来，就着咸菜，喝着稀米汤。我也不甘落后，早掂来一个馍咬下去了，竟顾不得吃咸菜，白面馍本身香味的巨大诱惑，让我心无他顾，三下五除二就把一个馍吞咽下去了。大家几乎腾不出嘴来说话，自顾自地吞咬咀嚼着馍，教室里一片静寂，咀嚼馍块的或轻或重的吧唧声便突显出来。大约在大家吃到八九成饱的时候，才有人说起笑话，是以某位先生吞咬馍块的怪异表情为由头，随即引发笑声和互相调侃的轻松气氛。多少有点“文革”派别不同“政见”的隐性纠葛，在猛吃狂咥的放浪形骸的欢愉氛围里，暂且忘却了。

有人突然提议，各人自报咥了几个馍，并解释其意图，既不收粮票也不收钱纯属白咥，所以希望如实招来咥了几个。说完，此兄把眼

光盯住了我，哈哈着命令：你先报！

我顺口报出：七个。

似乎稍有惊讶之音，却不强烈。随之一个个都报出数来，却没有一个超过我的，连持平的也一个没有，只有一个人报了六个。多数人都报了五个，男教师只有一个人吃得最少，四个。两个女教师都说吃了三个。我当了一回冠军，平生仅此一回。参加过几次篮球、乒乓球和象棋赛事，从来没拿过冠军；一顿咥七个馍的纪录，在农业中学教师的范围内未曾被人打破，我自己后来也未能再刷新。

饭后便提着镰刀到凤凰嘴东侧的坡地上割麦子。我感觉到胃里很撑，也很沉。那时候的馍都习惯以二两为规格，再加一碗稀米汤，我的胃里至少装着两三斤重的食物，馍的计量标准的二两，是指干面粉，和水蒸成馍，不会少于四两。当我挥动镰刀割麦子的时候，感觉到了难受，也就伴之而生悔意，吃得太多了。这种因为贪吃而发生的身体负担以及后悔情绪，在我却是久违了的别一番感慨。许多年来，吃饭已经形成习惯，就是抑制住饥饿便罢手也闭口，很少有吃到一满饱的机遇。每月三十斤粮食定量，我通常是以三四四来分配一天三顿伙食的数量的，计量单位是两。这样的配额，连半饱似乎都勉强，自我感觉就是仅仅“压住了饥饿”。尽管这样，三十斤粮票仍然维持不到月底，便从家里蹭来吃食弥补亏空……

我现在的工作点有餐厅，在我看到吃剩的大半个馍和小半碗干面条或米饭被倒入垃圾桶的时候，常常会泛出曾经咥过七个馍的往事来。且不说可惜了粮食这种陈年老话，我也不无庆幸，中国人不仅告别了如我四十多年前丑陋的食量和吃相，而且可以随意扔掉吃剩的馍、米饭和面条，连眼皮也不会眨一眨。

大约是我被抽调到公社（乡或镇）协助工作的第二年冬天，我跟一位领导到白鹿原北坡上的一个村子去驻队，还有当地驻军（军校）的一位教员和一个战士，四个人组成一个工作组，单项任务是重建生产大队一级的党组织——党支部。“文革”把各级党委和基层党支部全部搁浅了，现在要恢复重建。这个村子派性比较复杂，更深层的渊源是三大姓氏的由来已久的积怨。如何化解矛盾，争取在上级规定的时限内，完成党支部重建的任务，说来话长，不是本文的主旨，这里只说一件轻松有趣的一顿饭的事。

下乡驻队在我已经成为习惯性工作，且不说公社机关对干部下乡纪律的严格规范，单就常识而言，到农民家吃派饭不能有任何要求，农民日常吃什么，也就给我等下乡干部吃什么。其实许多人家在轮到为下乡干部管饭的一天，总要比自家平时的饭食做得更好一点，他们平时多吃汤水面条，给干部做一碗干面条；平时他们多以苞谷面做馍，给干部吃的馍里，总要掺进一些麦子面粉。这是当地传统习俗，不能慢待客人。每遇到这种优待饭食，我便对主人说，下顿不要这样了，却收效甚微。这回下乡搞建党支部的这个村子，地理环境缺水，每遇干旱便难保收成，村民的粮食多数吃不到新粮下来，我们工作组的几位干部也就更自觉地接受粗食淡饭了。

关中乡村自古一天三顿饭，与别的地区无差异，差异在吃饭的时间。农民天明便起身下地干活，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农业合作化之前的个体经营时期是这样，农业合作化集体经营时期依旧遵循着这种生产和生活秩序，干活大约到九点十点（冬夏差别）回家吃早饭，午饭大约在两三点钟，晚饭就是天黑收工以后才吃的。我和工作组的人也是入乡随俗，改变了在公社机关早晨起来先吃早点之后才上班的习惯。这一顿记忆颇深的饭是一顿早饭。

我们四人分成两组，主要考虑农民家庭一次管四个人吃饭负担太重，我和领导为一组，从村子西头到东头一家接一家往过吃；两位军人为一组，从村子东头到西头一家接一家往过吃。无论吃得好吃得差，我们从来不议论，其实没有谁规定不许议论吃食的好坏，也没有人提醒，却都闭口不提，似乎是一种忌讳。那天早晨到早饭时，一位穿戴整齐的青年来叫我吃饭，干净整洁的中山装，浓密油黑的头发梳理得很整齐，谦和的笑容里显示着彬彬有礼，截然区别于农民，尽管难以判断其职业，却可以肯定是一位吃商品粮挣工资的公家人。在靠挣工分生活的绝大多数农民家庭中，谁家有一个能有固定月工资收入的公家人，就意味着这户人家在普遍贫穷的村民中优裕的经济地位。我和我的领导——工作组组长，跟这位公家人去他家吃早饭。

一个老式方桌，周围摆着条凳，我和组长坐下，陪坐也陪吃的就是这位公家人。组长说，让家里人一起来吃嘛！公家人说，你不用管，他们吃他们的。组长也不再勉强。我却有点敏感，大约是为我们做了好吃食，却不多，只供我和组长以及公家人吃，其他人包括他的父母和姐妹兄弟都不上桌了，是为着节省。这种情况遇见过不止一户人家，也确实令我吃着不自在。公家人先端来一大碟酸菜和一盘红苕，又端来两大碗苞谷糁稀饭，继之又为自己也端来一碗稀饭，热情地招呼我和组长，吃！快吃！天冷得很，小心饭凉了。我先喝稀饭，稀饭稀到筷子上挂不住苞谷糁。我再吃红苕，全是如同未剥皮的花生那样大的堪称袖珍红苕。吃红苕一般要剥去薄皮，这小红苕捏在指间，尤为难剥，我索性连皮吃了。这些未发育长成的小红苕，内里多丝，那丝如同纤维，韧性很强，咀嚼不碎，又不好意思吐出，我便囫囵咽下了。我吃饭的心情有点不好。我家也在农村，每个村子都种植红苕，因为红苕产量大，可以充饥，在困难时期的农村，每个生产队都扩大了红苕种植面积，家家都挖着一口储存红苕的地窖，从初冬一

直可以吃到来年初夏即将接上新麦。乡民说，一年到头，红苕坐庄。更有说得损的话，红苕是救命的爷。生产队大量种植多产的红苕，不仅成为村民锅里碗里的主食，红苕的叶子可以窝制酸菜，红苕的蔓和根是喂猪的上佳饲料。我在公家人餐桌上所吃的袖珍红苕，其实是红苕根上不值得采揪的舍弃物，通常都是和根蔓一起晒干粉碎后喂猪的。我猜想这些袖珍红苕的来路，是从生产队分配给他家作饲料用的红苕根上摘下的，或是从挖过红苕的地里捡拾的遗弃物。可见这是一个很节俭的人家。公家人一直陪着组长和我吃饭，不断地招呼我们吃饱吃好。直到我们放下筷子说吃好了，他仍然礼让我和组长再吃几个红苕。

出了公家人的大门来到了村巷，组长说要到老支书家说事，我便跟着他走，谁也不说这顿早饭吃得如何，已成习惯。走进老支书家的大门，迎面看见他正跷着腿坐在方桌旁，捉着一根烟袋抽旱烟，走近了又看到尚未收拾的碗筷和菜碟，还有一盘馍。未等组长开口说事，老支书抢先问：吃好了没？我和组长异口同声说，吃好了。老支书很惊讶地说，哎呀，算你俩有福。我能听出他话里的异味，却仍然说，好着哩好着哩。他哈哈一笑，说，自解放到现在，来到村上的干部，在这家管饭时，谁也甭想吃一顿好饭。组长也笑着说，好着哩。老支书说，不好你也不说不好——你有纪律哩。老支书说，曾经在某年有某个下乡干部在这户人家吃派饭，喝的是挂不上筷子的稀溜溜苞谷糁子，还没有馍，干部喝了一肚子稀汤，不到午饭就饿得撑持不住，跑到他家来，二话不说就伸手在装馍的笼子里抓馍吃。他说他曾经提醒过这户人家的主人，却不奏效，后来便不让他家给外来干部管饭，人家还不依。老支书解释说，干部吃派饭交钱又交粮票，仍怕村民吃亏，生产队给管饭的人家再发一份补贴粮，少则每天一斤，多则二斤，会有余头的，所以村民一般都争着给下乡干部管饭。说到这儿，

老支书又问：有馍吃没有？我觉得既不好说没有，也不宜说谎说有，比我老到的组长笑着把话题转移开来，说起工作的事项。老支书还不尽兴，继续说，这户人家在村子里是日子过得相对窝逸的，家里大人都不少挣工分，又特别节俭，尤其是有一位挣钱的公家人，“文革”发生前的大学毕业生，月工资听说在六十块上下……组长再次把话题岔开。老支书末了还说，这是这家人的家风，我说了你俩就不见怪了。要是肚子饿了耐不到晌午饭，就到我这儿来拿馍……午饭和晚饭依旧，无须赘述。

顺便说一下这位老支书。这是解放后乡村里发展的最早一批中共党员，历任乡村各种干部和支部书记，刚刚进入中年，俗称老支书。老字不指年龄，而是指任期比较长久，“四清”运动整得死去活来，却没有任何问题，最后仍为支部书记。“四清”运动结束不到一年，“文革”又开火了，他又被当作“走资派”打倒了。这个人性格中有一种天然的幽默智慧，面对灾难善于自我解脱，便是自己调侃自己：“四清”运动把我打倒了，又把我拽起来；我还没站稳哩，“文革”又把我日倒了……组长心里有数，这个村子的支部书记非他莫属，关键是化解派性，做好党员和群众工作……喝一顿太稀的稀饭吃一些过碎的红苕，算什么了不得的事嘛。

粉碎“四人帮”之后第二年，刚过完春节上班不久，我被公社（现今的乡或镇）派到一个生产大队（村子）去驻队，任务单纯，调查一个在“四清”运动中被打倒开除党籍的前支部书记的案情。调查小组由三人组成，我被任命为组长，另两位组员都是公社党委从农村临时抽调参与这项工作的，一位是一个村子的现任党支部书记，男性，比我长几岁，另一位是回乡高中毕业生，年龄虽小，有一定文字能力，是做笔录等文字工作不可或缺的人手。这个临时组成的专案小组，是受

上级（市和区）的指示做出的，对“四清”运动中被整被打倒被处分的大批干部选几个对象，重新调查其案情，作为试点。这件事非同小可，我们三人小组刚刚入驻那个村子，便惹起一片风声，纷传陈某人要给“四清”中被打倒的某某人翻案了。任谁都能想到这村那寨“四清”中受到打击和处治的干部对这件事的关切之情。

就我亲历的上世纪六十年代农村的风风雨雨而言，一直留有一种也许是偏颇的印象，“四清”运动对集体所有制时期的乡村社会的破坏程度，不仅前所未有，甚至超过后来的“文革”。“文革”的矛盾焦点主要指向公社以上的政府机关，农村里村村都有造反队，首当其冲的自然是生产大队的党支部和大队长，而主管生产决定春播秋收和粮食分配多寡的却是生产小队，造反派一般瞅不上生产队长那个太小的官位。野心大点的造反派先夺公社的党政大权，野心更大的造反派头子再夺区或县以至市和省的大权，绝大多数男女社员依旧干农活儿挣工分过日子。“四清”运动之前，对乡村社会破坏最厉害的是“大跃进”吃大锅饭，直接导致“三年困难”民不聊生的惨景。然而经过中央及时而又务实的政策调整和纠正，农业生产很快得到恢复，到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多数生产队基本解决了吃饭问题，呈现出毛泽东此时写的一首词里所说的“莺歌燕舞”的气氛。然而，好景不长，莺尚未歌到尽情处，燕亦未舞到尽兴时，“四清”运动由试点到全面很快推开，大兵团的人马浩浩荡荡进驻到大大小小的村庄，生产大队和生产队包括会计出纳在内的干部全部被推上被斗席。历时半年的“四清”运动结束，生产大队和生产队的主要干部至少十有七八都被整下台去，撤职不算最重的处罚，更有被开除党籍，还有被经济退赔时连房子也折价抵账的惨事，且有人自杀。我后来看到了更为严重的后遗症，许多村子的生产遭到难以弥补的破坏和损失，这个时期被打倒被处罚的干部，尤其是生产大队的书记和大队长，多是从解放初锻炼成长起来的一批主宰

农业合作社的优秀骨干，能力弱或品行差的人早淘汰了。“四清”运动的最后结局，用农民的一句话概括，把那些好干部“一竿子全扫光了”。农村比不得国家机关和工厂企业，可以调换领导干部，而一个村子要成长一个主要的树得起威望的领导干部，确非易事。我所看到的事实是，许多村子在“四清”后安排的新干部，因为能力或品行太差难以胜任而自动辞职；有的不甘辞职却指挥不灵，村子里的各项工作和生产搞得一团糟。这种局面不是一年两年所能改变，说遗患无穷似不过分。我到这个村子来复查那位被开除党籍的原支部书记的案情，在我确是一种踊跃心态。

这位复查对象，原是本公社的一位先进典型人物，到“四清”运动发生之前，他早已是在本区和西安市都挂了号的模范干部。我做乡村民办教师那几年，已闻知他的大名，却难得接触，不料在他被打倒十余年后，由我来复查他的案情。我也明白，对此人案情的复查，是上级抓的一个“点”，不仅关涉他一个人的命运，更关涉无以计数的“四清”运动中被处治的“四不清”干部的命运，我不仅踊跃，更为谨慎。正是在这次长达两三个月的驻队时月里，我吃了一顿至今难忘的饭。

在公社工作已有十个年头，每个村子都吃过派饭，无论吃得好或差的饭，吃过也都忘记了，我可以自信的是，我从来没有弹嫌过谁家的饭不好吃，倒是对有些特别照顾而做的好饭，我提醒主人不要为我浪费白面。记得有一次吃派饭，竹篮里盛着香气弥散的纯白面锅盔，男主人陪我吃饭，女主人和孩子却不闪面，我也不在意，关中风俗多见如此，自然属男尊女卑的封建遗风。喝完一碗稀饭，还想再喝半碗，陪我的男主人要去为我舀饭，我二话不说便自己闯入灶房去了，眼前的景象令我吃惊：女主人和两个未成年的孩子在灶房里围着一个小桌吃饭，手里拿着纯苞谷面的馍。我的心里就撞了一下，我舀了半

碗苞谷糁子稀饭出了灶房，便把装着白面锅盔的竹篮再端进灶房，让两个孩子吃锅盔。两个孩子瞅着白面锅盔，又瞅着他母亲，又瞅着跟脚进来的他父亲的脸，却仍然不伸手抓锅盔。无论男主人和女主人怎样礼让，我已坚决拒绝再吃锅盔，甚至影响了我的食欲。我小时候亲身经历过这种完全类同的情景，轮到我家给下乡的某位干部管饭，也是由父亲陪干部吃专门待客的好饭，只有在干部吃罢告辞之后，我才得以分享剩下的白面锅盔或馍。似乎不完全是好面子的事，是说不清从哪朝哪代传留下来的乡风民俗，在越是穷困的生活里，总要尽力让客人吃得好一点……我说此事似有自我表扬之嫌。其实，不单是干部自律，还有我小时候的那种隐秘的记忆，却在这一户人家里重现了，竟有某种触碰的痛感。

又到乡村早饭时辰，一位中年男人来叫我们吃饭。进村不少日子了，这位男人却显得陌生。他家在村子东头，没有围墙也就没有门楼，敞院里坐西向东两间厦房，台阶上放着镢头铁锨等几样常用的农具。进得厦房，男主人招呼我们三人坐下，是三只粗陋不堪的小木凳，没有小饭桌，一碟自家窝制的酸菜和一碟辣椒摆在脚地上。我在坐下前，或者说踏进厦屋门的一瞬，便颇感惊讶：家徒四壁，一览无余，厦屋北头是连接着锅灶的土炕，西墙根有一个用砖块垫着的破损的木柜，再不见一样家具。锅台有一块案板，上边摆着几个碗和擀杖。男主人从操勺的女主人手里接过舀满稀饭的大碗，再一一端给我们三人，然后自己也端着碗在一边陪吃，坐在一块破砖头上。我把稀饭碗搁在不大平整的脚地上，先掂起馍就着酸菜吃，心里却在猜想，这家人怎么把光景过得如此恓惶？这是一个以蔬菜种植为主业的生产大队，绝大多数土地都是有机井保证灌溉的平地，种植着各种时令蔬菜，定点供应西安的某家蔬菜公司，尽管属于统购统销的计划经营，收入远非那些以粮食和棉花为主业的生产队所可比拟。粮棉队几十个

村子，工分值高不过五六毛钱，差劲的许多村子仅只一两毛；而几个以蔬菜种植为主业的村子，工分值最低也不下一块，况且，这些蔬菜生产队由国家供应至少半年的粮食，不愁碗里的稀稠和有无。那些相对贫穷的粮棉生产队的女孩，托亲靠友多想嫁到优裕的蔬菜生产队。这户人家的惨淡光景，是我们进入这个村子近月以来最令人惊讶的一户。我一时想不明白，他们夫妻二人不残不呆，看模样也不会是偷懒怕干活的人，只要出工干活，就有工分，就会分红，怎么弄得这样一副穷光景？我便和他拉家常，问一句，他说一句，或者只说半句，后半句没说出来就不再说了。从木木的神情上判断，他不仅不善言语，确凿属于木讷短语的人，但这并不影响出工干活挣工分。我想问他的身体状况，刚开了口，他不回答，突然转过身，把端着小碗蹲在我和他之间的小儿子抱离开去，我看见小家伙蹲过的地方留下一摊稀屎。我不便再看，男主人的一个举动却把我惊住了，他顺手从墙根下抓过两只破旧的布鞋，从两边刮擦到中间，把那一摊稀屎刮到鞋里，三两步跨出屋门，扔到院子里去了。我瞥了一眼，用鞋刮过的地方还留着一些稀屎，刮在鞋上的稀屎滴溜在脚地上。主人的这种举动是少见也少有的，一般家庭里多有小孩随地拉屎的事发生，大人通常用一把灶灰掩盖，再用铁锨铲除，很干净的。这个木讷的男主人此时才想到用灰撒到残留的屎摊上……我已经感觉到胃里有反应了，隐隐有点恶心。我端起碗，把剩下的半碗苞谷糁子稀饭喝了下去，企图把胃里的恶心压住，似乎收效甚微。我当即采取断然措施，让那两位同伙消停吃，我已吃饱先走一步。

走出厦屋门，很快便走进村子中间的主街道，胃里有了更激烈的响动，我越是用心压制，响动反而越是厉害，走到一个堆积牲畜粪的很大的粪堆旁，便爆发出声音很大的呕吐。刚刚吃下的一个馍和一碗苞谷糁子稀饭，全部倾泻出来。我擦了嘴，警惕地往四周看了一圈，

倒是没有人，我才放心地走回房东家的住处。待那两位组员回来，见面问我怎么吃得那么少，我含糊其词地岔开了话题，更没有提呕吐的事。我担心由此事演绎出陈某吃不惯贫下中农的饭食，这可是感情甚至上纲为立场的大问题。

空着肚子工作到午饭时间，我们三人一起到那户人家去吃午饭，熟路熟门又是熟人，仍然是坐在小木凳上，盛辣子的小碟和盛盐和醋的小碗仍摆在脚地上，是纯粹的白面做成的汤面条，我连着吃了两碗，感觉到一种满足。出门的时候，似乎胃里又有隐隐的响动，我和两位组员说笑话，企图把注意力岔开，把胃里的不好反应抑压下去。在走到村中那个粪堆旁，胃里一阵天翻地覆的搅动，哇啦一声又倾泻而出，把两位同行的组员吓得一愣，忙问怎么回事。我谎称胃出了点毛病。待我定睛一看，正是早饭后呕吐的那块地方，早晨呕吐的残痕仍在。回到住处，两位组员担心我空着肚子耐不到晚饭。我说胃里空一空也有好处。关中农村的晚饭都是天黑时吃，两位组员提醒我该吃晚饭了。我推辞不用，并说胃需要再空一空。他俩不信。近月来三人一起吃饭，没发现我的胃有什么毛病嘛。连着追问之下，我便说了缘由，担心吃了晚饭再吐可受不了。他们便张罗如何解决我的晚餐，想到离此村不过三四里地有一家工厂，厂里有一家小门面的营业食堂，他们自告奋勇要去为我买两个烧饼，我坚决制止了。我怕由此惹出事来，说陈某人吃不下贫下中农的饭，吃了呕吐，到食堂里买饭吃。资产阶级作风和感情的帽子谁戴得起。我不仅坚决制止了他们去买烧饼的举动，而且提醒他们两人坚守秘密，不许把我两次呕吐的事道及外人。我开玩笑说，空着肚子再熬一夜不算什么问题，我已经有“三年困难”饿肚子的抗饿功夫了……

让我始料不及的好事接着发生了。公社一位和我年龄相仿的干部突然登门，说是周六放假回家顺路来看我。我这时才想到周末，为了赶规定时间办完此案调查，我们自觉放弃了休假。朋友闲聊间，一位组员向这位朋友说了我饿肚子的事。这位朋友不由分说，便拽着我到他家去。他家和我驻队的村子是邻村，不过两里路。我们三人装作到他家走闲的样子，进门便由他给老婆下令做饭。来不及发酵面团，用死面烙了一张饼子，我吃得确如狼吞虎咽。饭毕，大家约定，不向外人道及老陈吃饭的事，以免造成挑食的不好影响……

调查那位被打倒的“四不清”干部的案情如期完成。这位被冤枉了十余年的老支书被宣布平反，恢复党籍。此后不过两三年，“四清”被整被处分的干部几乎全部平反了。我其实在做了那项调查之后的第二年夏天，调离了工作过十余年的家乡，到西安南郊的文化馆工作。我已感知到文艺复兴的令人鼓舞的气氛，创作的欲望潮涨起来了。

许多年后，和那两位组员以及那位公社干部偶然相遇，便说我的吃饭的故经……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受邀第一次访问美国，在耶鲁和哈佛有两次文学创作讲座，算得上正经事，其余时间便是游山逛景了。一个神秘了大半生的美国，在自东往西的车轮加脚步的匆匆一览里，自然说不上深或透的了解，神秘的帷幕却还是扯去了。姑且不说观后感，只说一顿难忘的晚餐。

这顿饭是一位姓杨的女士邀请的，我没有推辞，概出于她和陕西关中一种非同寻常的亲情渊源。此前一年或两年，她到西安时曾得以谋面，她说到来西安的意图时，且不说我惊诧之类的夸张的话，确凿是万万料想不到的。她说她是来寻根，更是拜祖。初听这些话时我毫

不惊讶，国门打开之后已有多年，海外华人尤其是台湾同乡回来的人络绎不绝，在我已司空见惯。然而，杨女士说明她寻的祖宗时，我当下竟惊讶得回不上话来。她所寻的祖宗，竟然是隋朝开国皇帝杨坚。杨坚是五岳之一的华山脚下华阴县人，早已了无踪迹，墓葬在关中西府的扶风县。她虽然没有看到有关始祖杨坚的蛛丝马迹，却也未见多少遗憾，心里早有预料，着重在想感知作为皇帝祖宗曾经生活的一方地域的地脉天象。同在华山脚下的华阴县五方乡，却有为杨坚开创隋朝立下汗马功劳的文武全才的杨素将军的坟墓。杨素不仅善于统军打仗，且是一位诗人，隋朝建立后被隋文帝杨坚封为赤泉侯。然而，杨素和杨坚虽都姓杨，却无血缘宗族脉络，杨素的祖宗上溯到西汉时代的杨喜，曾被汉高祖刘邦封为大将军。五方乡的杨素氏族，现存十八座坟墓。这些有关杨姓两家的简况，是我后来获知的。我更惊讶杨女士的乡土情结，从隋朝到现在多少年了，他们一代一代祖传着关中华阴这个“根”；单是她自己，从台湾再到美国，成为美籍华人，却终于实现了到皇帝祖宗诞生的华山脚下走一回的夙愿了。

我按时赴约，是一家中餐馆。我看一眼已经到齐的人，竟然全部都是女性，多为中年，自然都是华人。她先介绍我之后，便一一介绍由她约来的朋友，几乎全是从台湾到美国定居的文化人，多数都出版过散文、小说和诗歌集子，只是名声尚不及我认识的於梨华。都是喜欢写作的人，气氛很快便轻松活跃起来，有人说到她喜欢大陆某作家的作品，有人说到她结识的大陆某位作家，自然也免不了说到她们读《白鹿原》的事。在轻松的气氛里，不觉间过去了近两个小时，饭早已吃完了。在散席前发生的一幕，让我不仅出乎预料，而且惊诧了。

杨女士说了句“那就到这儿”意思的话，在座的女士们，有的翻手提包，有的掏口袋，把一张张美元掏出来放到自己面前的桌面上，杨

女士自己也不例外地掏出钱来。我在短暂的发愣的一瞬间便明白了，这顿饭是由进餐者分摊其花费的，也就赶紧掏自己的口袋。杨女士坐在我右边，压住了我往桌子上放钱的手，笑说：你是我们大家请来的客人，你绝不能。在我据理辩解的几句话还没说完，她打断说，在大陆你可能不习惯这样分摊餐费的方式，在这儿（美国）却是通常的事儿，大家想聚会了，或是接待一位朋友，都是这样做的，唯有被请的客人不能付款，这种分摊餐费的方式，说明你是大家的朋友……

我在回到住处后，心里仍不能淡忘每位进餐者纷纷掏钱包的情景。除了杨女士说的“你是大家的朋友”之外，我又想到她们可能没有报销的途径。她是一个民间文艺团体的主事人，没有公款，她的会员可能只交象征性的一点会费，只能作公务性的开销，更多的却是显示对自己参与的这个文艺团体的尊重。我没有问她，仅是我的猜想。

这种猜想又一次得到了验证，是随后在另一家华文文化团体搞过一次创作讲座，讲完后听众就散去了，留下十来个团体的骨干人物，和我共进午餐。就在讲座大厅旁边的一个小屋子和通道上，十来个男女朋友纷纷拎来自己的提袋，从里面掏出早已备好的菜和面包，每人都带着盒装的菜，都是在自己家里做好带来的，几乎没有重样儿，一齐摆到桌子上，任由各人挑拣品尝，不时爆出某男或某女大声的惊叫，说某种菜太好吃了，虽不无夸张，却酿成一种即使高档餐馆也难得的融和气氛。我被重点照顾，让我尝一口这种菜，再尝那种菜……我很自然想到，这个文化团体同样没有经费来源，要搞什么活动而避免不了共餐，便是这种办法……回去的路上，我和同行的朋友说，还是社会主义好。

平生吃过多少回饭，粗粮野菜也罢，鱿鱼海参也罢，多不记得了。上述几顿饭却总也难以忘记，如实写来，供有兴趣阅读的读者一

晒。

2011年8月25日 二府庄

我们村的关老爷

在我尚不知晓关羽或关云长为何人的童稚时期，却已知道关老爷这尊神。岂止知道，而且和关老爷左右为邻，距离不过五六十步。自我有记事能力，便记着我家是村子西头第二家，头一家的院墙西边紧挨着一条颇深的沟，是下雨排水的天然洪道。这条沟的西沿上，坐落着一幢比普通农家更讲究的庙，方砖砌墙表面，琉璃小瓦苫顶，房脊高高耸起，砖头上有雕刻的吉祥图纹，这座庙俗称关老爷庙。村民平常简称为老爷庙，敬奉着关羽。我一出自家土门楼，第一眼便看见关老爷庙；从村子里走回家去，直对着我视线的也是这座关老爷庙；关老爷庙的北墙根下，是走出村子的西口，村民下地干活或出村办事，都从关老爷的庙墙根下走过。不仅是我，整个村子里的男女老幼都和关老爷朝夕相处，低头不见抬头见，几乎谈不上距离。

我后来才知道，在民间传说里，关羽谢世升天后，被玉皇大帝封为管民间风雨的职司，任何一方地域的干旱雨涝或风调雨顺，全在这位风雨神的掌控之中。无须考究这个传说起自何时何方，既成的事实却非同小可。即如我眼见的灞河流域密集的大村小寨，几乎每个村子都修建着一座关公庙，敬奉着这位职司风雨的神。我生活的村子到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时，不过三十多户人家，却不知早在多少年前已经修建起这座关公庙来，推想那时大约不过十几或二十几户农家，肯定由每户分摊建庙和雕塑关公神像的不菲的费用，可以想见村民踊跃情态里的虔诚。其实不难理解，以种植庄稼为唯一生存依靠的村民，决定粮食棉花收成丰欠也决定他们碗里吃食的稀稠乃至有无和身上穿戴的厚薄的关键一条，便是雨水，风似乎倒在其次。渭河平原这块沃土，庄稼生长最致命的制约因素，便是干旱。我查阅过西安周边三个

县的县志，造成多次饥馑灾荒的原因，都是久旱不雨。敬奉关公祈求风调雨顺是村民们共同的心愿。

每年农历大年三十后晌，村子里的主事人便打开常年挂着铁锁的关公庙门，让几位村民打扫卫生，擦拭关老爷和护卒头上身上的尘土，点上两支又粗又长的红色蜡烛，再敬上三支香，然后跪拜叩头，再说几句祈求风调雨顺的话。接着，整个村子里的成年男人都来焚香跪拜祈祷来年有及时雨降下。我和小伙伴们围在庙门口，看着一个个年长的年轻的爷辈父辈的再熟悉不过的男人们，无论家道或富或贫无论性情属刚属蔫，站到关老爷塑像面前先鞠躬再跪拜时的表情，都是至诚至敬的。关老爷端坐庙堂正中，长耳几乎垂肩，浓眉大眼高鼻梁，满脸红色，黑色的胡须直垂到胸膛，威武里透着慈善，不动声色地看着一茬一茬跪拜他的村民。到得末了，主事人把我等在庙门口围观的小男孩一齐叫进庙去，教大伙抱拳鞠躬，再跪地叩头者三，最后让大伙跟着他齐声说，关老爷爱民如子，给俺多下及时雨……应该说，关公是我平生最早跪拜过的神。

每年农历二月二日，是民间传统传说里的龙抬头的日子，也是冬去春来农事铺开的一个标志性时日。村子的主事人一早又去打开关老爷的庙门，打扫卫生再点蜡焚香，敲锣打鼓和拍铙钹的好手早已敲打得震天价响，村子里的男人们闻声赶来，长辈人跪在庙里，年轻的晚辈跪在庙门外边，我等小伙伴们随意择空当处跪下，叩头三次，然后一齐仰面对着关老爷的塑像，跟着主事人齐声祈祷，祈盼雨顺风调……那声音是浑厚的，也是震动庙宇发生回声的庄严的声响，更是虔诚的心愿之声。

干旱却几乎年年都在发生，有小旱，也有大旱，多在秋苗生长的关键时月，即伏旱。小旱修渠引水可以抗御，大旱就几乎面临绝收，

村子的主事人便召集村民商议，用一种激烈悲壮的方式祈雨，当地人叫“伐马角”。同样是在职司风雨的关公庙里庙外举行，点蜡焚香烧表，庙外锣鼓铙钹敲打着激烈紧凑的曲牌，男人们聚在庙里庙外，身上都披着象征下雨的稻草编织的蓑衣，自然都是长跪在地。突然会有一人跳起，从火盆里抽出一根烧得通红的细钢条，大吼一声，吾乃关老爷“通全”的黑乌梢，随之便把通红的细钢条从右腮戳到左腮……黑乌梢是说一种黑色的蛇，蛇是龙的民间化身，即取水地点在南山的黑龙潭。于是，整个村子的人便跟着那个“通全”了神灵的人到南山去，到黑龙潭里“取水”……我等一帮小伙伴聚在一旁，反复诵念两句民谣：云往西，关老爷骑马戴帽披蓑衣。帽是指遮雨的草帽，蓑衣也是遮雨的，都是预示着甘露降临。应验落雨甚少，依旧干旱居多，灾荒和饥馑避免不过。然而，每年农历大年三十和二月二对关老爷的虔诚祭拜，依旧进行，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破除迷信明令禁止，这种传承了不知几百年的仪式才被废止了。

关羽忠勇孝义，在民间的影响也很广泛，却是隐性的，不像他职司风雨直接关涉千家万户每一个村民的生存。这样，村民们很少说或不说关公庙关帝庙，而通称关老爷庙或简称老爷庙，已显示着一种亲近的情感。

说来有趣，每当在媒体上看到当地驻军在天旱时节向天空发炮催雨成功的消息，我就会从记忆深处泛出村民敬祭关老爷的画面……

2011年9月6日 二府庄

一个人的邮政代办点

每当和媒体记者或纯粹的朋友叙旧，对我当年窝居乡下十年写作的生活形态多有兴趣，其中和外部世界的沟通方式是一个常被问到的话题，我便如实相告，主要依赖一条邮路，无论写信说事或投寄刚刚写成的小说稿，都是到一个邮政代办点去办理。这是一个仅有一人撑持业务的“邮局”，在我却铸成永久的记忆。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在获得专业创作的自以为人生的最佳境地的同时，便决定回归乡下祖居的老家，求得一个耳目清静的环境，却不是陶渊明式的避世隐居。我在这里可以坐下来潜心阅读业已解禁的世界名著；可以平心静气回嚼二十年乡村生活，形成新的作品。我几乎本能地关注着生活运动尤其是乡村世界的变化，自然缺少不得一份报纸，能否每天看到当日的地方报纸，成为一个小小的却也揪心的问题。多年来每天读报的积习已经成瘾，不读似乎就有一种缺失或亏欠。读报之所以成为一个问题，我居住的老家的地理环境的制约是根本原因。

我祖居的村子虽然距西安不过五十华里，却是一个被地理环境限制着的“死角”。村庄位于白鹿原北坡根下，再往北不过两三公里便是闻名古今的骊山南麓，形成一条狭窄的川道，其间自东往西流过一条被秦始皇曾祖改名的灞河（原名滋水）。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才开通了一条沙石公路，我的祖居的村子是这条公路的终点，尽管十天半月也未必能驶来一辆汽车，但是乡民出行推车挑担骑自行车毕竟方便得多了。我回到这样环境的老屋里，首先想到如何能读到当天的报纸。得知这里的邮递员仍旧是我熟悉的那位姓史的乡党，便找到他

商量。他做这方地域的邮递员已经多年了，仍然属于邮局聘用的农民工，未能获得邮局正式职工的资格。他负责我所在的这个乡镇东半部的十余个村庄的报纸和信件的投递业务，半边是白鹿原的北坡上的村庄，下边是坡根下一排小村庄，每天要上坡下川跑一圈儿，可以想见其辛苦。和他说明订报的意图，他笑着解释，东边三个村子没有一户报纸订户，只是在有重要信件时，他才骑车去某个村子。我当即明白，如果我要每天读到当日报纸，就意味着他必须比往常多跑五里路，仅仅是为了给我送一张报纸。我确实于心不忍，便和他商量了一个省事的办法，把我所订的报纸投送到他每天必经的村子的我的一位亲戚家，由我走读上中学的儿子放晚学时顺便捎回来。这样，每天傍晚儿子回家，正好是我停歇工作的时候，坐在祖居的小院里，借着尚未暗淡的天光，打开《参考消息》，看世界的这个和那个角落又发生了什么值得关注的大事和趣闻；还有贴近我生活的《西安晚报》，既有国家大事的新闻，更有城市和乡村的新鲜事和某些人的劣行。我曾在该报上读到一位农村女人首创家庭养鸡场的新闻报道，竟然兴奋不已，随之便搭乘汽车追到西安西边的户县，花了两天时间进行采访，先写了一篇报告文学发表在《西安晚报》，后又以其某些事迹演绎成八万字的中篇小说《四妹子》，这是我写农村体制改革最用心也最得意的一部小说。

每有或长或短的小说或散文写成，或者要投寄一封信，我便骑自行车赶到八华里远的邮政代办点。这个邮政代办点设在一所军事大学里。这所军事大学始建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地址选在白鹿原北坡向里深凹的一个大豁口里，据说可以隐蔽空中侦察。军事大学于六十年代初开学，为了这所规模非凡的军事院校通邮的方便，邮政局便在校内设立了一个邮政代办点。这样，我生活的这方地域，破天荒地有了

一个可以订阅报纸也可以寄信寄物的邮政机构，当地近十公里内的乡民跟着军校沾光了。我也是受益者之一。

邮政代办点设在军校大门内右侧的一排平房里，仅仅只占一间小平房。我把自行车撑在路边，便拿出要寄的稿件或信件，走到开着的窗口，便看见一张熟悉的面孔，不笑也不惊讶，却在眼神里显示出“你来了”的意象。我便先开口说我要办的事，如果是寄信，便说要几张邮票；如果是邮寄稿件，便把封好的信递给他，让他在桌旁的磅秤上称一下重量，然后在算盘上算出邮资的钱数，我交了钱，他撕下邮票给我。我用他摆在窗台上的糨糊贴好邮票，再把装着文稿的信封给他。他砸上有“挂号”字样的邮戳，仍然不说话，眉宇和眼神里显示出“办妥了”的意象，我也不便多嘴，点点头便告辞了。

我至今依然记得那张面孔，以及那脸上的表情。那张面孔的脸色微黄偏白，很洁净；眼睛不大也不小，永远是一种平和的神色；鼻梁不高不细更不歪，端正而庄重。他的形象和他的神态，完全专注于案头的工作，多余一句客套话都不说，更不会有东拉西扯的闲话乃至废话了。有一次交办完邮件离开他的窗口时突然想到，他是和我短言少语呢，还是对所有人都如此这般？我便侧立一旁抽烟观望。一位穿戴整齐的军校女学员走到窗口，手里拿着一个包扎规整的邮包送进窗口，肯定是称重量，然后看见她从窗口接过邮包，很认真地贴邮票，之后就把邮包再送进窗口，转身离开了。我大约只听见一两句简短的对话，是说多少邮资的话。一位同样年轻的男军人走到窗口，和那位女军人的过程如出一辙。接着看到一位穿戴不凡的中年女人走到窗口，从衣着打扮和走路的太过自信的姿势，我猜测这是一位军校高干的夫人（此军校属军级级别）。她走到窗口，却不邮寄任何东西（如需邮寄东西，肯定有通讯员代办），只听她嗓门很响亮地向窗口内询

问，只听见她的问话声，却听不到窗口里的他的声音，约略可以听得出来，她给远方老家的邮件，怎么还没收到？需要多少日子才能到达××省××县××公社××村子？不会丢吧……从她离开窗口时的表情判断，得到的是肯定的可以放心的答复，咣当响着的皮鞋敲击水泥路面的声音也是欢愉的。我便跨上自行车走了……这人就是不爱说话。

约略记得一次例外，在我接过邮票往信封上抹糨糊再粘贴的时候，他却主动开口了："你前日在报上登了一篇文章？"我颇惊讶，他竟关注我的写作了，便毫不迟疑地以"噢"予以肯定。他接着又说了一句："昨日回局里参加政治学习，我听大家说的。"他没说邮局里的人如何说我这篇小说或散文，倒是我很想听的话题。他却闭口再不说了，也没说他看没看那篇文章。我尽管很想听文学圈外诸如邮局的读者对拙作的看法，看着他已没有再议此事的兴趣，我也压住了想问的话不再问。

在我窝居乡下祖屋写作的十年里，每有或长或短的小说写成，便骑上自行车，骑过后来被车碾得坑坑洼洼的沙石公路，心情却是一种踊跃，每有一篇新作写成，无论是篇幅较大的中篇小说，抑或是短篇小说，乃至三两千字的散文，在送到邮政代办点的这八华里的路途中，都是一种踊跃着的心情，沙石公路上坑坑洼洼致成的连续性颠簸，不仅破坏不了踊跃的好心情，反倒激发着踊跃的连续性。乃至赶到熟悉的邮政代办点的窗口前，和那张熟悉的脸孔对面时，领会到那眼神里又现出"你又来了"的意象，我也不说一句客套话，只把邮件送进窗口，照前办理……我已记不清十年间经他的手寄出过多少文稿和信件，却可以肯定，那十年间的文稿和信件十有八九都是经他的手办理的，寄往本省和外省的编辑朋友。更准确也很难能的是，无论稿件或信件，从来没有丢失过。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初，邮寄

通讯几乎是我唯一和外部世界交流的渠道，且不说乡村里不敢奢望电话，城市家庭也是稀罕物。邮政代办点的这位代办员，便成为我实现和外部世界沟通的最可靠的桥梁。

新的世纪刚刚到来，我又回到离别了七八年之久的原下的屋院，一个人住了两年，夜晚坐在院子里看从东原渐渐移向西原的月亮，早晨常常是被飞到屋檐或院中树梢上的鸟叫声唤醒，在我是一种在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找不到的最踏实也最美好的感觉。写作的欲望潮起时，便在那间小书屋里铺开稿纸。每有或长或短的文章写成，依照七八年前的轻车熟路——轻便自如的自行车和大半生走得最多也最熟悉的家乡路——赶到距家八华里远的军校大门内的邮政代办点，依旧是那间门口墙上挂着绿色邮箱的平房，依旧是打开着的窗户下层的窗口，窗里桌后依旧坐着那位微黄偏白面孔的代办员，变化仅仅只是他的头顶出现了白色的头发，毕竟过去七八年了。他在看见我的一瞬，眉眼里现出一缕不易觉察却仍被我觉察到了的诧异的神色，问：“你不是进城了吗？”我答：“我又回来了。”之后再无话。我交办了寄件，点点头便告辞了。这两年时间里，我到这个一个人操作的邮政代办点的次数，比之前的那十年的频繁来去少得多了，我已有了手机，家里也安装了电话，无论公事或私事，急事或闲事，随时便用话机说清了，几乎不再使用写信的交流手段了，不写信也就不寄信了，只有写成新的文稿，必须赶到一个人操作着的这个邮政代办点的窗口前。我至今不会使用轻便快捷的电子文稿的传递方法，还依赖于原始的邮寄手写稿件的途径。

到了我重回乡下祖居屋院的第二年，记不清是哪个季节，我又一次骑自行车赶到那个熟悉的邮政代办点的窗口前，交办了要邮寄的稿件，刚转过身要离开的时候，窗口里的他说话了，让我等一下。我再

转回身，就看见那张向来平静到不动声色的面孔，呈现着谦谦的微笑，对我说："麻烦你办点事。"我自然欣然接受，等待他说事。他依旧是少见的谦谦的微笑，以平静而又达观的语气告诉我，他很快要退休了。我不觉一愣，看不出这张呈现着中年人气色的脸，已经年逾花甲了。我在发愣的一瞬，感到了心头的微微一震，顿生难舍的眷眷之情。我随之问："你竟然要退休了？看去顶多五十岁。"他却不做辩解，依旧谦谦笑着告诉我，他的孩子知道他认识我，便买了我的两本书，让他再见我的时候给书上签名。他说他退休后就难得和我见面了。我自然应诺。他破例拉开那间平房的门板，让我进屋；他把我的两本书摆在桌子上，侍立一旁，让我坐在他的椅子上。我习惯用自己的钢笔，在那两本书上签下我的名字。这应该是我最用心最认真的签名之一。他连着说了两声感谢的话。我为认识和不认识的朋友和读者不知签过多少万册书了，却不敢接受他的感谢的话。我和他握手告别。他竟破例走出门来，在我推起自行车的时候，我又握住了他的手，有点不忍松开。

2011年11月2日 二府庄

依然品尝你的咖啡

作家王观胜突然走了，电话里听到这个噩耗的一瞬，不由得发出呃呀一声痛楚的叹惜，还有不敢相信的感觉。不过在一个多月前，他约我和几位朋友聚餐，说文学说书法更说奇闻轶事，妙语迭出，全是观胜式的对艺术对生活事相的审视，不时语惊四座，凸显着不俗的性格和性情。尽管我早已熟知他的独特禀赋，依旧为他的个性化话语称奇。这样一个鲜活的人，说走突然就走了；昨天的妙语绝句还响在耳畔，今天便不能再和他对话了；一个留给我豪爽且硬气的关中汉子，生命却如此脆弱。

我和王观胜结识，真可谓未见其人先闻其声。这声不是他说话的声音，而是他的小说处女作《猎户星座》在《延河》发表时引发的非同凡响的声浪。那是一九八二年的事，其实我还在灞桥区文化馆工作，收到编辑部赠寄的《延河》杂志，读到这篇佳作，颇为惊诧。我之所以感到惊诧，在于一九八二年这个非同寻常的年份，正是农村分田分地全面铺开的关键性一年，《陕西日报》为农村经济体制改革的大势推波助澜，专门在文艺版组织了征文评奖活动，我那时候正热切地关注乡村社会的变化，写了几篇反映体制改革引起的乡村各色人物心理情感波澜的小说。其实，岂止是我，整个文学界都形成一波迭过一波的写农民从昨天到今天的心理变化的浪潮。在这样的文学潮流里，王观胜的《猎户星座》却写了一个老猎人和一只老狼和小狼的故事，又不是简单的人与动物和谐相处，而是开掘到一种令人惊悚的哲思的深度。我之所以在初读时发生惊诧（且不说震撼）的少有的感觉，在于《猎户星座》是一缕天籁之音，或者说空谷绝唱。我很自然地发问，这是一个什么人，竟然能如此超凡脱俗发出这样一声绝唱。

及至我随后到《延河》编辑部开会或送稿的时候，谜底才揭开。有意思的是，未及我发问，编辑先问我看过《猎户星座》没有？我给予肯定的回答，便打问王观胜是哪里的作者。在我猜想，当属一位高瞻远瞩且富于哲思的老先生，不料，却是一个刚过三十岁的青年，在天山下当过几年兵，复转后在三原文化馆搞群众文化工作，也在闷头创作，和我一样也是中学毕业生。我向编辑坦陈了读《猎户星座》的惊喜，尤其是具有开阔艺术视野的那种惊诧。编辑赞同我的感觉不错，又告诉我这篇小说刚刚面世不久，业已造成普遍好评，不断有文学里手和普通读者打电话或写信，称赞《猎户星座》，刚创刊不久的《小说月报》等两三家刊物已电告要转载《猎户星座》……又一个青年作家跃然新时期中国文坛了。

我已记不清在什么场合和王观胜第一次见面，他的大脑袋尤其是阔大的前额给我留下甚为突出的印象，还有一双突出的单皮大眼睛，显示着一种智慧，也显示着一种坚韧的气象，我感觉到一条汉子的独立禀赋。两三年后，王观胜被调入《延河》编辑部做小说编辑，我和他见面就很方便了。许多年里，他编发过我的小说，我读过他频频发表的短篇或中篇小说，见面时，我说他编的我的小说的意见，我也说到我读过的他的新作的感受，都是坦诚表述，容不得客套。许多往事都已淡忘，而他的高档咖啡却留下美好且难泯的记忆。

我那时住在白鹿原北坡下祖居的老屋，每逢省作协开会才进城，或是买面粉买蜂窝煤，当时属于按人或按户定量供应的物质，我也得进城办理。开完会办妥事后的午休时间，我便很自然地走进王观胜宿办合一的屋子，其实只有半间房，一张办公桌和一张床占据了房间的绝大空间，我多是坐在床沿上聊天。聊得兴起时，他便从立柜里取出一瓶雀巢咖啡，为我冲上一杯，我也不客气，便品尝起这绝佳的洋货

饮品。他也品着自己的一杯，说这种在当时称得上高档饮品的来路，是他的某个已居高位的战友送的，或是某位收入不菲的作者感谢他对作品的赏识之情，专意送给他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正是世界文学多种流派一波接着一波潮涌中国文坛的最热闹的时期，自然成为闲聊的话题，相对封闭在乡野的我，常常从他这儿获得许多文学新潮流的信息。文学新潮还挟裹着一些洋气的生活习性，喝咖啡便是其中之一，素来讲究喝茶的中国人开始品咂洋饮品了，我也是较早换一种口味的试探者之一。引发我试探咖啡兴趣的人便是王观胜，他说喝咖啡比喝茶能更快地兴奋神经，尤其是早晨和午休起床后喝上一杯，便能很快激发起精神来。我便到西安当时几家国营食品商店去买咖啡，却只有需要煎煮的生咖啡豆，倒是正适宜我的消费水平。我在火炉上煮咖啡，连喝三杯，果然很快便从早起或午休后的困倦状态里清醒到跃跃欲动，进入写作。然而，那些生咖啡豆煮出来的咖啡的味道，远不及观胜冲给我的名牌雀巢的难以准确描写的香味，我也领会了高档和低档的差别。

在咖啡的余味里，我听着观胜说文学，尤其是俄罗斯文学（当时称苏联文学），许多新的作家和新的作品，有的我知道或者读过（我订阅着《苏联文学》和《俄苏文学》两本专门介绍苏联作家作品的杂志），交流阅读感受的话题便会很投机，至今想来仍是一种难得的享受；有的新翻译过来的某位作家的作品我尚未见过，他便介绍给我，我到书店寻找购买，又会成为下一回见面时闲聊的话题。在我的印象里，他对当时的苏联文学兴趣极高，十分推崇，在我正可谓趣味相投。新时期才被介绍进中国的艾特玛托夫的中篇小说和长篇小说，杰出的短篇小说作家舒克申，等等，是我们尤为赞赏的两位大家。品着一杯雀巢咖啡时的这种对苏联文学的学习感受的交流，功利全在提升

自己的写作；我更多的时候是从他的说辞里获得启迪，当属比咖啡更耐得咀嚼品味的教益。

观胜的半间房子里，我更多见到的情景是“人满为患”，几位资深的《延河》老编辑也到这里来闲聊，椅子和床上都坐满了人，占不上座位的人甘愿站着。闲聊很少涉及家长里短，多是中国文学的最新动向，对某位作家某篇作品的议论，自然有欣赏也有不赏；尤其是刚刚出现的某些非文学因素，常常会引发甚为激烈的议论。在大家你一言我一语七嘴八舌议论着的时候，王观胜突然不温不火地撂出一句：“球不顶。”便引发一阵哄然大笑。一句“球不顶”，把热烈议论着的话题给予总结，既然那些非文学现象于文学创作本身球事也不顶用，大家顿然明白连议论的必要都没有了。很快，由此便转换出另一个新鲜话题。我便记住了王观胜用纯正的关中腹地三原语音蔫蔫地说出的“球不顶”的话，也由此话感知到他对某些非文学现象的不齿，对他理想的文学的坚守和自信……每当人多的时候，他只供茶水，免去了上好的雀巢咖啡，他供不起。

路遥是观胜半间屋的常客。尽管我十天半月才进一回城，却几乎每回都能在观胜的屋子里见到路遥。路遥如果不外出，“早晨从中午开始”的第一站，往往是踅摸到这半间屋子，或是写作以及编稿（《延河》编辑）累了需要缓解片刻，也就轻足熟路蹿进来。我在这间屋子遇见路遥，常见的姿势是斜躺在观胜的单人床上，即使有空闲的椅子他也不坐，自我解释说看稿（或写稿）坐得腰疼，需要放松一下。我却猜想还有一个原因，日渐突出隆起的下腹已成为累赘，躺着比坐着肯定舒服。路遥的文学见解和对见解的坚信令我感佩，《平凡的世界》对现实主义的体现足以证明，且不赘述；他对世界某个地区发生的异变的独特判断总是会令我大开眼界；更有对改革开放初期某些社

会现象的观察和透视，力度和角度都要深过一般庸常的说法；他也是苏联文学的热心人，常常由此对照中国文坛的某些非文学现象，便用观胜的“球不顶”的话调侃了之。“球不顶”由路遥以陕北话说出来，我忍不住笑，观胜也开心地笑起来。他的“语录”被路遥引用，似乎乐见其说，此时便会打开柜子，取出他自己平时也舍不得享用的雀巢咖啡来，为每人冲一杯，记得路遥曾调笑说，观胜这间屋子是“闲话店”，也是“二流堂”（上世纪三十年代成都文化人相聚的一家茶社，调侃之称），却不是贬义，是人气最旺的一方所在，《延河》编辑部的领导和编辑，无论长幼，业已喜欢到成为惯性地在此聚合，成为交流信息、抒怀见解而又可以无所顾忌的一方自由且自在的小小空间，显然不是一杯咖啡或茶的诱惑。

和同时代作家相比，观胜的创作数量相对较少，多以短篇小说见长。他的短篇小说一旦出手，多不会自生自灭，而是落地有声，被后来几种选刊争相转载，在文坛传诵热议，诸如《放马天山》《北方之北》《汗腾格里》《北方，我的北方》等，都成为浩如烟海的短篇小说世界俏丽一枝的名篇。在我的印象里，他没有过对自己作品的宣传举动，甚至连一次研讨会这种常见的形式也不做。我曾给他建议，应该搞一次研讨，不仅听听多路专家的意见，也是一种扩大影响的途径。我甚至为他解释其必要性，过去说“酒好不怕巷子深”，那是酒的品种太少，当今各种酒类铺天盖地推向市场的时候，且不说藏在深巷里的酒，摆在十字路口的酒都被不做一顾。他淡淡地笑笑，仍是说着那句老话：“球不顶。”在当今文坛，能如此傲视非文学现象而只凭作品说话的个性化禀赋的人，王观胜是我亲历的一位，也见出我的庸俗了，便不再开口建议他做什么“球不顶”的事了。

这位钟情天山、大漠和北方的关中汉子，告别了这个世界，高蹈的精神和自由不羁的灵魂，将更为自在地遨游他的天山，他的大漠和他的北方的天地了。

2011年11月11日 二府庄

缺失斋号

有朋友来我的工作室，闲聊间随意问，你的斋号叫什么。我稍觉意外，随即回应没有斋号。朋友说他看到我的文章末尾所注明的写作时间下边，有“原下”、“二府庄”等字样，以为是斋号，却又不大像。我便解释，那是写作某篇文章的地点名称，公用的地名算不得斋号。朋友走后，我还想着斋号的话题，不仅现在没有斋号，过去也没有过命名斋号的事，似乎从来就没有动过要取一个斋号的念头。

在我的潜意识里，斋号多是古代学富五车的文人雅士标示自己做人作文的追求的形象化符号，从斋号就可以领略其不同于别人的个性化心境和情趣。我虽喜欢写作，却从来缺失古代文人的这种意识和兴致。从客观环境来说，似乎不容我发生自取斋号的任何诱因。我大半生都住着公家的办公室，先是学校后是机关再后是文化行政单位，许多时月里还是两人合用一间办公室，不可能把两个人合用的宿办合一的房间为自己取一个斋号。再从个人心理上说，缺少古代文人自我标示的自信，致命在于没有接受系统的高等教育的机会，依靠自学而获得的文学知识，多是写作的实用性常识，自然是残缺不全的。再说，我的写作学习多为当代文学，阅读也主要是当代作品，且以翻译作品更为偏重，很难发生命名斋号的兴趣。

想来倒是有一次例外，细究起来很难算得斋号。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用积攒了七八年的稿酬，在祖居老屋的前院盖起一幢新房，为我隔出半间约七八平方米的书房，平生第一次有了一方读书写作的领地，却也未曾动过要取斋号的念头。其实在房子的主体建成后，乡村的建筑师问我，要不要在房子前檐的门框上方雕一方刻字的

条形框格。我略有筹思之后告诉他，光秃秃的墙壁应该有件装饰，不过不要搞在前檐，雕在后门上方挺好。我在做出确定答复的同时，便想出刻字的内容：白鹿园。我在当地乡村见惯了屋院门楼上诸如“耕读传家”之类的题款，因其既老又旧难以欣赏，我在此时刚刚开始注目祖居屋院背后倚靠的这座古原，对已经失传的白鹿的名字和关于白鹿神奇的传说开始引发兴趣，便想到把白鹿的吉祥引入这个家园，就取了和“原”谐音的“园”，这是自己的一方小小家园，不是阔大雄奇的白鹿古原。乡村工匠颇为用心地雕塑出由我用毛笔书写的“白鹿园”三个字。每当在小院里转悠，不经意间看见后檐墙上涂成红色的白鹿园，尽管书写的某一个笔画看起来有点蹩脚，却遮蔽不住顿然浮现在脑海里的神鹿的风采。后来过了大约不足一年，用水泥雕塑的那三个字先后脱落，我虽然遗憾，却也没有劳神费事再作弥补。然而，偶尔抬头看到脱落了字体的条形小框，白鹿的逼真的影像依旧会飘浮在眼前。尽管如此，却从来没有发生过把“白鹿园”作为斋号的意识，无非是在写完一篇或长或短的小说或散文后，附上写作的时间和地点时，用上“白鹿园”，取代了往常所附的我所祖居的蒋村的字样。后来，多有读者以为我是白鹿原上人，甚至几次发现有人写文章也误传我生活在原上，逢着机会我便纠正，我是自幼生活在白鹿原北坡根下一个小村庄里。由此便自称为“白鹿原下人”，简称“原下人”，再简约为“原下”，仍然算不得斋号，不过标示着我的来路而已。

想到那位朋友把写作地点误认为斋号的事，我却意识到另一个有趣的现象，在我几乎所有的作品末尾所附的写作地点，几乎全部都是一个又一个乡村的名字，其实后来的几处写作地点都在西安城里。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从原下祖居的屋院回到城里的作家协会，作协大门在一条商店和单位栉比鳞次的繁华大街上，通往家属院的巷道有一个古旧却纯属城市标记的名字，然而这方地域还有一个乡村色彩的名

字——雍村。似乎依着某种潜意识的自然驱使，在写完某篇文章时便附上“于雍村”或“雍村”，没有一次用过街巷或单位的名字。近年间我蜗居在一所高校的住宅院内，周边是日渐加密且增高的楼群，却在院墙外有一个名为“二府庄”的村子，村子里已经见不到一位荷锄挑担的农民，更见不着种植麦子或玉米的土地，然而村子的名字依旧着乡村的标记，我便于文章的末尾附上二府庄的写作地点。梳理新时期以来的写作，文章末尾所附的写作地点，依时间顺序是小寨、灞桥、蒋村、白鹿园、雍村、二府庄、原下等等，竟然没有一次注明城市标志的字样。

直到此刻，我才顿然醒悟，潜意识里依然亲和着乡村；尽管住在城市也有不少年头了，却拒绝把什么街什么路什么巷作为文章末尾的写作地点，乐于附上什么村什么寨什么庄这些乡村的名字；这种亲和和拒绝的意向，却是潜意识更是无意识的自然行为。我由此也明白了，我还是一个乡下人。

2012年2月21日 二府庄

白墙无字

熟悉的或初识的朋友到我的工作点来，看着屋子里不挂一纸的光光净净的墙壁，常有好奇者问，你号称文人，墙上却不见墨痕。有的甚至佯装慨叹，真可谓家徒四壁呀！我也不作解释，只说是习惯使然。近日因写有关斋号的短文，引发了这个话题。

自进入社会开始工作直到今天，不觉间竟有五十个年头了，无论换过多少单位的办公室，或是乡下和城里的住宅，还有现在工作的房子里，除了几样简单的办公和生活用具，四面墙壁从来都不曾挂一方纸页。想来似乎还不是有意为之，纯粹属于一种无意识的习性驱使下的习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高考名落孙山回到原下老家，应聘为本村初级小学的民办教师，同时开始了写作的自修，心诚且意专，很想把当下的心境表述出来，按中国人的传统方式，用毛笔书写一方古人或今人为学的精辟语录置于书桌前的墙壁上，以便时时警示。然而犹豫再三而没有去做，却又于心不甘，最后选择了一个变通的方式，找了一二指宽的硬质纸，把自己喜欢的“不问收获，但问耕耘”的格言写上，贴在墙壁和书桌的接触处，外人进屋不大留意这个小小角落，我在桌前坐着读书或写字时，抬头便会看见这个自己信奉的警句，添一分踏实。由此事开端直到今天的五十年间，无论工作环境和职业发生过多少次变化，所有住过的屋子都不曾张贴一纸笔墨，真可谓积习难改。

确有一次破例的事。那是在“文革”初起时，和“语录”热同时潮起的种种向毛主席表忠心的社会风气，不胜枚举，其中之一是家家都敬奉一尊毛泽东的石膏塑像，或贴一张标准照，连农民家里都普及了，

作为公社农业中学教师的我也不甘落伍，在办公桌上敬奉着一尊毛泽东的半身石膏塑像。大约是中学教师都会写字的方便，大家不约而同都用红纸抄写了一段毛主席语录，贴在办公桌前的墙上。我也趁热写了一张，因为办公桌对着窗户，不能张贴，便贴在卧床上边的墙上，每天早晨醒来睁开眼睛，第一个看到的目击物，就是当时通用的词汇——“最高指示”；每晚上床落枕时最后看到的物象，自然还是这幅写着毛泽东语录的红纸；每天出出进进这间两人合居的宿办合一的房间，便会看到它，已经不是“吾日三省吾身”，而是几十次省身警示了。遗憾的是时过境迁太久太远，敲着脑袋也想不起来那句话的内容了。

新时期伊始，我迁居到古人折柳送别的灞河岸边的灞桥古镇上，有了一间一人独占的办公室，正热衷于刚刚兴起的农村改革题材的写作，墙上仍然不贴一纸。正当灞河岸边的柳絮如雪花漫天飘飞的某一天后晌，我敬仰的大诗人戈壁舟一行四五人不期而至，我屋子里的椅子都不够用了，着急处从隔壁同志房子借来安顿稀客坐下。戈老先生一行趁着关中绝美的春色出游，看过秦始皇兵马俑，接着在广袤的田野踏青，又在杨贵妃洗浴的临潼温泉净了身，回城时路过灞桥，便乘余兴来到我供职的文化馆。记得他的兴致甚高，满口地道的川腔不时引发大家的笑声，随意所说的话题我已无记，使我完全意料不及的是，他突然从提袋里抽出一幅装裱精美的书法作品来。展开之后，是他挥洒的自己的语录，自然是颇富哲理的诗性话语，他的同行和我的同志，纷纷赞赏他的诗句和他的书法，我却更为惊奇他在书法作品上竟然写着赠送给我的字样，可见他在起程之前就确定了要到我的住处。热心的同志找来钉子，当即挂在我的墙上，每天都可以欣赏他的个性化笔墨和个性化独到语言。大约不足一年，我又搬家另住，却把戈老的赠书存入书柜，墙上又依旧是四壁皆空。此后的三十多年间，

我的乡下和城市的几处工作室，再没有贴挂过一张纸，有朋友赠送书画作品，欣赏之后便存入书柜；更没有自己题写座右铭之类的兴趣了。

想来大约是幼年所受的影响，那是父亲的行为规范。记不清我说了什么轻狂的话，随后父亲在一个恰当的时间对我说，不要先说话后做事，要先做事后说话；想做的事做成了，还可以不说话。他未做解释，我后来约略能够理解说与做的关系，先说要做的事如果做成了做好了，自然再好不过；如果说了要做的事（尤其是大事）而做不成功，就会造成吹牛（当地人说谝大嘴）的负面印象；一个人特别是年轻人，如果总是发生说大话而又总是做不到的事，谁也就不在乎你说的话了，可信度就在乡民中丧失了。如果更有某个说着好话而做着鬼事的人，乡民对其归结有一句俗话，嘴上念佛哩，心里咥活哩。咥活是当地方言，多指干坏事，是对某人心口不一的形象化写照。

这种幼年所接受的行为规范，竟然成为一种难以改易的习性，且不说说和做的语言和行为的先后，后来竟形成墙上不贴不挂自己欣赏的做人做事的格言警句，多少还有一点隐蔽着的心理，其实是为自己留着一条后路。格言警句贴在墙上，任谁都能看到，而自己一旦违犯，且不说别人会如何做出挂羊头卖狗肉的不屑表情，自己的尴尬也难以平复。想做的事和自己认可的行为准则，努力去做努力追寻就可以了，万一实现不了或发生错失，自己总结自我反省，也可以避免吹牛和言行不一的尴尬……我的墙壁依旧空白着。

2012年2月26日 二府庄

难忘的一声喝彩

——我与上海文艺出版社

在我的创作历程中，有几个打着颇为浓重的情感色彩的感叹号的年份，其中之一是一九八二年。这年开春，我试写了第一部中篇小说《初夏》，投寄给《当代》的已可称朋友的编辑老何，他肯定了小说的优长，也直言其中的亏缺，希望再修改。我一时竟感觉修改难以下手，便放下了，待冷却之后再重新上手。第一次写中篇小说，写的又是我熟悉不过的与生活同步的农村改革题材，却出手不顺，便有一种挫伤的失败情绪。从新时期文艺复兴到这年开春，我已写了三年多短篇小说，刚刚编成第一本短篇小说集《乡村》后，便跃跃欲试较大篇幅的中篇小说的创作了，不料却如此窝心，尚不属窝气，这个夏天便感觉格外闷热难挨。

待到立秋过后，关中地域的午间虽然依旧酷热，早晨和晚间却清爽可人，我在此间构思完成了又一个中篇小说《康家小院》，写了草稿，接着又写了正式稿，写得很顺畅，自我感觉挺好。在我有点担心的是，这部中篇的生活背景是刚刚解放的关中乡村，离当代生活较远。我截至《康》文之前的几乎所有小说，都是与当下生活发展同步的有感而作，第一次从社会热议着的乡村改革生活转过头去，把眼睛投注到业已冷寂的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的乡村小院，便担心读者尤其是编辑会不会有兴趣。这个时段，恰好接到《小说界》编辑魏心宏的约稿信，便把《康》稿给他寄去。寄走了稿件，心却一直悬着，不敢设想再来一次需得修改的回信，更不要说“不宜刊用”的结果了。如果再一再二发生这种情况，无疑对我试图较大篇幅的中篇小说的创作是一

个很大的挫折。大约过了半月，接到魏心宏的来信，拆信时竟然心跳加速。及至很快阅完信，心跳愈加加速，却是令我振奋的抑制不住的痛快淋漓的感受，往日的担心就在这一瞬间全部化释了。他在信中说了许多好话，很喜欢《康》文，同时已确定次年前期即见诸《小说界》。

《康》文的顺利出手，无疑给我难以表述的鼓舞，以中篇小说创作为主的打算便确定下来，而且付诸实施，当即回过头来再重写《初夏》，从原先的六万字写到八万字，再得老何的审视和指点，又写到了十二万多字，才得他的首肯。我稍有安慰的是，不仅在于我可以把握十二万字篇幅的小说结构了，更在于对中国乡村的历史性变革，留下了我直接而又颇为动情的文字。这里不能忽视的一点，就自己的创作实践而言，确是得了魏心宏对《康》的欣赏的鼓舞，终于把写得不甚顺利的《初夏》写成了，而且对中篇小说的写作更为专注了。到一九八三年末或一九八四年初，《小说界》搞了第一届评奖，《康》文有幸获奖，魏心宏来信告知这个消息的时候，无疑对于正专注于中篇创作的我，又注入一剂无形的却又强烈的精神补养。一九八四年春天，我趁颁奖的机缘，第一次看到了上海；第一次品尝了鳝鱼的美味，真可惜我们村子稻田里的黄鳝白白生长了；第一次买了皮鞋，是明光锃亮的皮子，自己看着都有点耀眼了；且不说和文学朋友交流获益匪浅的话。

在《小说界》的那次颁奖聚会时，我结识了上海文艺出版社的老大姐编辑张贺琴。她来和我约稿，为我出中篇小说集。我几乎没有任何思考便脱口而出答应了，而且真诚地感动亦感谢她的美意，在我另有一种潜在的意识，便是上海文艺出版社在我心中的分量，能在这家出版社出书，是可以引为自信且骄傲的事，可惜我发表的中篇小说仅

有《康》一部，我便和她约定，待我写作的中篇小说可以编一本集子的时候便送她。之后未过两年，这本定名《初夏》的中篇小说集的书稿送到她手上了。这是我的第一部中篇小说集，能在我潜意识里颇有敬重感的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无疑是深以为幸运的事。

说来还有一件缺憾的事，张贺琴在编辑我的《初夏》集之后，曾约过我的长篇小说。我后来写成《白鹿原》，之所以没有给她，确实是与人民文学出版社何启治别有一番渊源。“文革”中后期，人民文学出版社开始恢复出版工作，老何到陕西来组织一位知识青年写作的长篇小说稿，看到了我在《陕西文艺》（即原来的《延河》）发表的短篇小说《接班以后》，便找到我，让我把这篇短篇小说放开来写，完全可以写成一部十多万字的长篇小说。我几乎被吓住了，这是我平生发表的第一篇小说，连想也从来没敢想过写长篇小说的事，自然不敢应诺。到新时期文艺复兴伊始，老何仍记着约我写长篇小说的事，我和他便私下形成一个君子协议，如果我日后能写成长篇小说，便送他。从第一次见面约稿到写成《白鹿原》，几近二十年，算是我对何兄没有食言。然而，张贺琴后来一直和我约稿，我却再无长篇小说写作，直到她从编辑岗位上退休，我便留下了一种无以言说的缺憾。

直到二〇〇九年初夏，我写完了《白鹿原》创作手记——《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十四五万字，可以出一个单行本，首先想到的便是上海文艺出版社，似乎约略可以弥补积存心中十余年的缺憾。可惜张贺琴已退休多年，我便决定送给修晓林。修晓林是我结识多年的一位资深编辑，乐于为作家做嫁衣，我已记不清是哪年哪月和他结识，却留下一种可资信赖的踏实印象；许多年来虽然算不得频繁的接触，仍留下敬业更乐其编辑之业的印象。我把此稿通报给他，满口热情的话，随之在很短的时间便看到样书了。在我有一句没说出口的话，便

是对张贺琴的约稿的缺憾，在修晓林这里得以少小的弥补。《寻》书出版时，正赶上上海图书节开幕，约我到图书节开幕式后为读者签名售书，也作为《寻》的首发仪式。我不敢怠慢，应召前往，心里却有点不踏实，想到这种谈创作的小册子，阅读范围太狭窄，文学圈外的读者难得发生阅读兴趣，我自然就有遭遇冷场的尴尬的担心。令我欣慰也大出意料的是，在我走进签名的场子时，看到排着那样长的一列读者，担心顿然消失了，限定的一个小时的签名时间，能为这么多的读者签完怀中所抱的书——《寻》和别的小说、散文集——就很好了。我只顾签名，几乎没有抬头的余暇，偶尔遇到提问，或是自报家门为在上海工作的陕西乡党，我才和他们说两句话。不觉间一个小时的签名时间已经到点了，签名台上要换另一位签名了，可是我的面前仍然排着一行长长的读者队伍，主办方和我一样不忍看读者失望的脸色，当即作出举措，在签字台的左角临时摆置一张小桌子，由我继续为读者签名。签完最后一个读者的最后一本书，我看了手表，又是整整一个小时。随后有记者追问，其中有一个问题说有人说上海完全是一个商业化的城市，少有人读书，甚至比喻为文化沙漠，问我怎么看。我当即回应，我不大了解上海，不敢附和“沙漠说”；就我今天签名的真实而又直接的感受，上海是文化的绿地，不单是我签名的读者比较多，整个书市里人头攒动，各类书柜书架前都围满了男女读者，中青年男女居多，不乏满头银装的老先生，更有少年读者，都在选择自己喜欢的书籍。“文化沙漠说”和这里的气氛不搭调。

偶有机缘到上海，便和上海文艺出版社的几位朋友相聚叙旧，无疑是一件愉快的事。魏心宏仍记得他编发的《康》文，而且问到有没有人把《康》改编电影，我只能遗憾地说没有。他在刊发《康》之后就说过可以改编电影的话，后来每有见面的机缘，都说到这个话题，我便开玩笑说可惜你不搞电影。修晓林永远是平和的乐观，编了什么

好书感受到好的风景，便发来一条信息，我还忍不住要询问他的乒乓球又拿了什么比赛的奖牌。还有郑宗培的一篓螃蟹，至今令我感念。那年到上海，正当鲜蟹上市时节，晚餐后，郑宗培开车接我到上海郊外一条批发也零售螃蟹的大路边，为我买下一篓乱爬乱翻的螃蟹。看着执意的他挑拣螃蟹的举动，我的感动是难以表述的，作为上海文艺出版社的总编，未必有此耐心为自家来干这种劳神的事。

2012年3月6日 二府庄

有关《白鹿原》手稿的话

一

大约是去年初冬，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位我尚未接触过的编辑电话告知，社里决定出版《白鹿原》手稿影印本，询问手稿是否还保存在我手里。我一时竟反应不及，搞不清手稿影印本是什么样的版本。其实也不怪我孤陋寡闻，我至今尚未见过哪部小说手稿影印的版本。经她用心解说，我才得知是要把《白鹿原》的手稿一页一页影印出来，装订成书，而且着重说明，是用国画家和书法家画画写字的宣纸印刷。这是我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出的事。在《白鹿原》面世近二十年的时月里，先后出版过十多种版本，无非是各个不同的设计包装的平装本和精装本，内里却都是铅字印刷和后来无铅印刷的相同的文字。唯一有点出我意料也有点新鲜感的，是作家出版社谋划了几年于前不久刚刚面世的线装竖排版本，我看到样书时，尽管有一种古香古色的稀奇感，却也觉得可能只是一种摆设物，恐怕很难发挥一般书籍的阅读功能，不仅是那种柔软的宣纸耐不住反复翻揭，而且对于习惯横排文字阅读的今天的读者，竖排的文字读起来颇为别扭；我试读了两页，便发生很不适应的别扭感，有亲身体验在，便自然怀疑阅读的实用性功能。

在听明白了手稿影印本的大体设想之后，我的顾虑随即发生，便直言相告，稿纸上写的手稿，每张大约三百字，五十万字的手稿一千五六百页，影印出来会有很厚一摞，而且要用宣纸影印，造价将是很高的，除非那些搞古董收藏的人可能会感兴趣，普通读者肯定会“望本却步”的。再说这种手稿的影印本，更难发生阅读的实用性功能，很难

设想谁有耐心阅读手稿里的那些称不得良好的钢笔字体。我为这种版本的销路发生疑问，让出版社赔钱出书，我于心不忍。编辑却不为我的担心而改变主意，似乎对图书市场做过调查，颇为乐观，只要我同意出版手稿影印本，其他事就不用我操心了。我便松口气开玩笑说，《白》书为贵社赚了些钱，即就手稿影印本亏了本钱，也可以相抵……

近日，正在操作手稿影印本的编辑打电话来，让我写点有关手稿的旧事，或长或短都不设限，我随口便应诺下来。

二

这个手稿是《白鹿原》唯一的正式稿。

此稿的写作是比较踏实的。踏实感在于心里基本有数，就是已经写成了草拟稿。我之所以不说草稿而称为草拟稿，似乎称不得以往中短篇小说写作时曾经写过的草稿。草拟稿的写作用意很简单，就是为了给这部长篇小说搭建一个合理的结构框架，因为构思里的人物比较多，时间跨度长，事件也比较多，要让业已跃跃于胸的各色人物展示各自的生命轨迹，结构框架便成为最直接的命题；还有人物的个性化的生活细节，这是我所信奉的现实主义创作的至为关键的要素，一些涉及人物命运转折的重要情节和细节已经在胸，而每个人物一现一隐的个性化行为细节，不可能完全了然于胸，需得写作过程中生发和把握，所以先写了草拟稿。为着缓解第一次写长篇小说的紧张和局促，我索性不用稿纸，而是选用了一个大十六开的硬皮笔记本；为了求得一种舒缓的写作心态，避开通常写作所用的桌子和椅子，而是坐在乡村木匠为我刚刚打制完成的沙发上，把笔记本架在膝盖上开始了草拟稿的写作。许是两年的酝酿比较充分，草拟稿进行得很顺利，大约不

足八个月便完成了，粗略算来有四十余万字。这是我写作量最大的一年，可惜仅仅只是草拟稿。有了这个写在两本大十六开笔记本上的草拟稿，我的心里彻底放松了，写正式稿的踏实感便形成了。

在动笔写作正式稿之前，便确定必须一遍成稿，不能再写第二遍。原因很简单，这部小说比较长，字数预计约五十万上下，如果再写第二遍正式稿，不单费时太久，更在于这种反复写作很可能把我对人物的新鲜感磨平了，对于我的写作习惯往往是致命的。以往写中短篇小说有过此类现象，再三反复写一篇东西，对人物和情节的新鲜感就发生减弱以至消失，很难冒出生动恰切的文字。尽管这种写作习惯有违“文不厌改”的古训，我却仍然积习难改。这样，便为自己立下一条硬杠子，集中心力和精力，一遍过手，一次成稿。在我所能做出的唯一选择，就是冷静叙述，首先取决于面对小说人物的事件和命运，叙述要冷静；面对各个人物的叙述角度的把握要准确，同样需要冷静；只有冷静的叙述，才能保持笔下书写文字的基本工整和清晰。

以这样的心态写作，总体而言比较顺畅，也难免发生一些反复，一种情况是某一章的某一个情节或细节，写得过头而缺失含蓄，或者是写得粗疏而不够充分，一经发觉便重新斟酌之后撕毁重写。还有一种意料不及的现象也发生过几次，即写到某个人物的命运发生重大转折和灾变的情节或细节时，我的心态也随着人物起伏，情绪发生失控，笔下的文字也潦草起来。待写过之后冷静下来，便重新抄写一遍。这种情况发生过几次，鹿三杀死小娥的写作过程记忆犹新。在小娥被鹿三从背后捅进梭镖刃子时，猛然回头喊了一声“大呀”，我的眼睛顿时发黑了。待失控的情绪重归冷静，只好把呈现着太过潦草的两页手稿重新抄写。

经过两年多的时间写完全稿，且不说这部小说的命运如何，单就字迹而言，基本保持着清晰工整的字样，不必再过一遍手抄写了。

三

在我终于决定可以把《白鹿原》稿投送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时候，却心生隐忧，万一发生什么意外，丢失了或者毁坏了这一厚摞手稿，那对我来说是不可设想的灾难。恰好有一位在当地区政府机关工作的作者朋友到我家里，得知我已完稿，便想到应该留一份复印稿，以防万一发生不测。他说区政府刚刚购置了一台复印机，他可以帮我复印一份手稿。这种现代化的办公设备，我听说过尚未见过，省作家协会还没有添置这种据说相当昂贵的设备，我尚想象不出它的神秘的形状。我听到他的话很高兴也颇感动，在于他能替我想到。我便道出正为此事束手无策的隐忧。

其时，我正在作手稿的最后梳理，没有大改，只是细部疏忽的弥补，做起来很轻松。他把我已经梳理过的手稿就带走了。过了几天，他把原稿和复印稿送过来，看到用硬质纸复印的一页页稿件，我在心里踏实的同时，甚为惊叹科学技术的神奇功能。确凿无疑地说，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看见的复印机复印出来的文字，自然也是我的第一份复印的手稿。他又带走了我梳理完毕的一部分手稿。

在他未送回手稿和复印稿这段时日，我继续梳理后半部手稿，又一位作者朋友来到我的乡下老屋，他也在另一个区的机关工作。这回是我开口了，询问区机关有没有复印机，得到肯定答复之后，我便提出让他帮忙复印后半部手稿的事。他很痛快应承下来，而且说他和管理复印机的人是铁哥们，言下之意是干这种“私活儿”没有问题。我的担心正在这里，那位作者朋友第二次拿走手稿之后，我就想到复印完

全部手稿，他还得再往返两次，一千五六百页的手稿，复印数量太大了，肯定会让人烦，且不说是否违犯规定的事，须知那个时候的复印机是很稀罕的物件，况且有俗话说的可再一再二，不可再三再四。我曾对他说过咱可以交复印费用的话。他说区机关的办公用具不可能收费。这回我便直言应该交付复印费的话，只要能顺利留下一份复印稿就好了。这位作者朋友连连摆手，言下之意这么点小事不在话下……当这位作者朋友把最后一部分手稿和复印稿送来的时候，我的担心完全解除了，自然免不了真诚的感谢。

在我把《白鹿原》的一摞手稿交给来到西安的人民文学出版社两位比我更年轻的编辑高贤均和洪清波时，便集中纠结着这部小说未来的命运，无论如何，却压根不再担心手稿发生遗失或毁坏的意外事故了。

四

大约是在小说《白鹿原》出版半年后，该书责编老何把手稿交还给我，我看到手稿纸页上写着画着不同笔体的修改字样，包括删节的符号。我辨不清那些字或符号是哪位责编的手迹，却感动他们的用心和辛苦。然而，这个手稿本身，在我心中似乎已经失去了存在的意义，《白鹿原》已出版，且连续印刷多次，肯定不会绝版了，那么这个手稿的用途也就到此为止了，我自然就不会太在意它了。这种心理是长期的习惯形成的不自觉状态，此前写过的所有小说散文手稿，直接投寄给杂志社或报纸，发表出来便收存印刷文本，无论杂志或报纸，只寄样本或样报，没有寄回手稿的事，除非夹着一绺“本刊（或本报）不宜刊用”字条的退稿，才能再看到手稿，然而比不退稿而只寄样

刊或样报的心情差得远了。《白鹿原》出版了，退还或不退还手稿，在我确是一种无所谓的心态。

记不得哪一年的哪一天，有位陌生人找到我，提出收购《白鹿原》书手稿的意图，说他喜欢收藏，很坦诚地让我开价。这是一个意料不及的事。我略有迟顿之后，便婉言谢绝。在那一刻，我似乎才意识到保存这一摞手稿是有必要的，不单是可以卖个较好的价钱，而是应当由我自己来收藏，尽管我向来没有一丝收藏古董的兴趣。

之后，还遇到过两三位提出收藏意向的客人，其中一位印象颇深，在于他很爽快，很真诚，口气也就很大，让我不要难为情，不要不好意思说钱，并让我放开口要价。我表示了无意出售的意向后，客人还不改辙，而且报出一个让我吓了一跳的数字。稍作缓和之后，我便开玩笑说，《白鹿原》印量不少，我也进入“万元户”行列了，吃饭穿衣已经无须再操心；而今社会商业竞争很厉害，说不定到什么年月，竞争挫伤了儿女们的生存，日子过不下去的当儿，让他或她去叫卖老父的这一摞手稿……这一摞手稿便保存下来。

《白鹿原》手稿用皮实的厚纸包裹着，再用绳子捆扎，放在书柜里近二十年了，我自己几乎再没有打开看过一次。其间打开过三四次，多是几家电视台为我拍片，执意要拍摄手稿的镜头画面，我不能拒绝。直到去年秋末或初冬，人民文学出版社编辑提出要出《白鹿原》手稿版本的时候，我才觉得保存的这一摞手稿，又派上了用场，尽管是我完全想象不到的用场。同时也想到，如若当初把手稿卖给某位收藏家，现在要从收藏家手里借来影印，可能要费口舌，乃至涉及借用的要价，那将是追悔莫及的事。

从写完《白鹿原》手稿的一九九三年三月，到我写这篇有关手稿的短文的今天，近二十年了。再看已经变色发黄的手稿纸页上的字迹，且莫说岁月沧桑的套话。唯可欣然的是，现在用黑色碳素笔写下的汉字，比当年用钢笔和碳素墨汁所写的《白鹿原》手稿的字体略有进步，也更相信字要多写才出功夫的古训，且不说文字的内蕴的优或劣。

2012年3月18日 二府庄

年年柳色

时令刚刚进入关中的初春季节，冷气却依旧凛冽，冬天御寒的衣服一件也减不下来。某天早晨出门，无意间的一瞥，路边的柳树枝条上泛出一片鹅黄的嫩叶，毕竟是春天了，这是瞬间发生的一种本能的心理反应。几乎同时映现于脑际的景致，便是家乡灞河岸边独成一景的柳色，还有回响于心头的李白的词句，年年柳色，灞陵伤别……

在灞河岸边生活和工作了大半生，柳色已储成永久的鲜活的记忆，确凿捺不住初春时节那一抹鹅黄色的嫩叶的诱惑，约一二乡友回到灞河滩上，在瞥见那一派柳色的瞬间，我顿生遗憾，不过迟来了三五天，柳树枝条上的叶子已经转换成绿色了。河岸边的柳林，恣意纵横伸张着的粗干和细枝上，都缀满刚刚由鹅黄转换为嫩绿的新叶；没有一丝风，连接成一道绿色浮云似的柳叶纹丝不动，沐浴着午后温柔的阳光。我还是看到了一团夹杂在望不到头的绿叶中的鹅黄色嫩叶，大约是柳树种族中的一株异类，或者类同双胞胎中的那个后生孩儿，却让我感受到鹅黄嫩色的无可替代的诗意。也许明天或后天，那一团鹅黄色的嫩色就转换为绿色，和漫空的绿云融为一体，成为今年的灞桥柳色了。

眼前的灞河和河上的桥，以及河边桥头的柳色，既不是李白们千古吟诵的柳色，也不是我记忆里的柳色。我无能想象千古诗家词人眼里所见和笔墨所吟的柳色，却淡漠不了我曾经看惯也依旧鲜活的柳色。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我在灞桥南头的中学读书，学校的北围墙紧贴灞河河堤的南坡。河堤向水的一面，不过百米便有一道青石垒筑的挡水坝，坝与坝之间全蓬勃着一株株合抱粗的柳树，无

疑也是为着减弱洪水对河堤的冲击力。站在灞桥上远眺，柳树的绿叶顺河而上而下绵延三五十里，成为一种令人惊诧又浮泛诗意的独特景象，自然可以理解历朝历代的诗家词人，何以会留下无以数计的吟诵灞河柳色的诗章。而我所亲历的柳树下的风景，是我的同学在河堤上柳荫下读书，或是于微明中在河堤上跑步做早操。却几乎看不到单男独女谈情说爱的场景，其实灞河水畔柳荫之下野草丛中最是卿卿我我的佳地。在我印象最深的是，每逢周六下午回家，出学校后门便跨上河堤，打开我正在阅读着的小说，一路读过去，不用操心脚下的绊磕，更不用担心撞人碰车，那个时代的汽车很少，连拖拉机也是稀罕的机械，偶尔有人骑自行车过往，总是骑车人绕着步行者。这道于解放前修建的灞河长堤，堤面上可以对开汽车，属于那个国穷民更穷的战乱年代的非凡工程了。照例，周日下午返校时，一踏上河堤，便接着读小说，享受在柳荫里，却几乎全没有感觉了。

也有令人痛切的记忆，我在这儿读高中的三年，正遭遇着共和国历史上最不堪的“三年困难”时期，饥饿的感觉是那个时代人的共同体验。每到鹅黄的柳叶刚刚冒出，不仅村里和镇上的居民争相捋取，我和同学也爬树攀枝，很小心地捋下嫩不堪捋的叶片，在一位当地同学的家里煮熟，用温水浸泡一夜，把柳叶里的苦汁排除，再一勺一勺分配给全班每一个同学。作为农村出身的学生，自幼年我就吃惯了多种野菜野果，却从来也没听说过柳树叶子可以当作饭菜吃的事。想来也很自然，寻常那些诸如荠荠菜、灰灰菜和洋槐花儿、构树絮儿、榆钱儿等野生物，早成为饥饿年月的抢手货，被抢挖抢摘一空，便把肚子的填充物扩大到柳树枝上的叶子。当我攀枝捋采柳叶以及嚼食变成黑色的柳叶时，完全缺失了“年年柳色”的诗性浪漫，只有肠胃得到填充的满足。

匆匆间二十年过去，交上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又回到灞桥古镇。曾经读书的母校在灞桥的南桥头，后来供职的文化馆在灞桥北头的古镇上。刚进灞桥古镇不久，便遇上早春河堤上一派鹅黄的柳色，傍晚时分就散漫在河堤上沙滩里，眼看着那鹅黄的柳叶一天天变得金黄，变成浅绿，又变成深绿色。有文学朋友来，我便以柳色喧哗，招引他到河堤上散漫，无论说正经事无论闲聊，无论是鹅黄的柳叶抑或是绿云般的柳色，都令朋友陶醉。然而，好景不长，大约是我到古镇的第二或第三年，我发现柳树的叶子发生了异变，一棵又一棵柳树的叶子由深绿变成一种枯焦的黄色，刚刚入秋便落叶了，第二年就再也吐不出那诱人的鹅黄了。每当我周六回家和周日下午返回灞桥，骑着自行车在灞河南岸的长堤上行进时，便看到一种惨不忍睹的景象，死去的柳树已被人齐根锯断，留下一个圆圆的树茬子；一棵又一棵合抱粗的柳树的庞大的树冠上的叶子，呈现着如同肝病患者的枯黄色，不久也该被锯断了。未过三年，灞河南岸北岸的柳树死光灭绝了。这些柳树是上世纪四十年代筑成这道河堤之后栽下的，三十多年的树龄，又得着灞河水的滋润，棵棵都长到合抱粗的树干，成为守护河堤的天然屏障；庞大的树冠互相连接，构成一道绵延几十里的绿色云雾；壮观而又不失柔美的柳色，年年月月，成为关中地区独有的一道风景。短短的两三年间，灞河的柳色消失了；没有了柳色的灞桥和灞河，如若李白有灵，该会发生怎样的喟叹？我听说受害于某种病毒，也有人说是空气中的有害的工业废气。我似乎凭本能判断偏重于后者，那个时代关于空气污染还是一个陌生的话题。无论如何，灞桥和灞河的柳色却消失了。

我现在和朋友漫步着的灞河长堤，依旧是那道老堤，面目却全非了。这儿已经被改造被装点成公园了，得着灞河水的滋润，正儿八经被命名为“灞河湿地公园”，河堤内外种植着各种花草树木，其中不乏

颇为稀罕的品种，长堤外侧和河堤堤面，是两条笔直规整的通车和行人的大道，多条小径曲里拐弯，从堤外沟通着堤顶，又弯转到内侧的河滩；河边原来的沙滩，也是奇花异草连片相间，栅栏围护的木板小桥通到水边；水边长着密不透风的野生苇子，有水鸟在水中自由自在地凫游。我几乎难以想象，也一时很难从印象里的灞河转换为眼前的景致。

我还是偏重这个时月里的灞河柳色。河堤内侧的滩地上和河水两边的苇丛里，有连片的柳树，还有独撑一方柳色的单株，不像是人为的栽植，而是自然的野生物。我和朋友倚在柳树干上闲话，那一株株柳树已经有半抱粗了，柳叶刚刚从鹅黄转换为嫩绿，散发的清爽之气弥漫在空气中，令我有一种发迷似的陶醉，记忆里缺失的柳色终于得到补偿了……年年又有柳色了。

在灞水岸边柳色之中漫步，和朋友少不得说到李白的词句"年年柳色，灞陵伤别"。汉唐时期的灞桥是长安城的东大门，迎接贵客好友到此等候，以示敬重；送别也送到灞桥桥头，依依不舍挥手；更有那些冒犯者被贬到远方，亲朋好友送别到灞桥，就不仅是伤心伤情的告别，而是撕心裂肺的生离死别了。可以想见几百年的王朝更迭中，灞河的河水里、石桥上、柳荫下落过多少泪水。

站在柳色中的长堤上，隐约可以眺见灞陵。灞陵里安卧着汉文帝，陵墓选在白鹿原西端的北坡上，坡根下便是自东向西倒流着的灞水，史称灞陵，白鹿原随后也有了另一种称谓——灞陵原。灞桥距文帝陵不过三四公里，李白不说灞桥伤别而说灞陵伤别了。《史记》里的灞陵原又称"灞上"，泛指白鹿原以及原下的灞河小河川，灞桥也在其中。

我现在看到的灞河，河水边依依着青春男女，祖孙三代散漫在柳色之中，偶尔碰见多年不见的熟人，握手叙旧，也都是轻松欢悦的腔调，大约谁在这样的柳色里，都不会有撇不开的心事。这里已经没有伤别，依旧着年年柳色。

2012年4月6日 二府庄

删繁就简……

有电话来，如果不自报家门，我便问哪位先生或女士，再问有何事。如果是熟人朋友，不免调侃一句，有何指示。熟人朋友倒好，一般不说虚词套话，开口便直接道出要我做的事儿来。常有半生不熟或完全没有见过听过的陌生人，开口不说有何事要我做，一连串嘘寒问暖的关照话，及至问血压的高或低，胆固醇如何……这种关心令人感觉温暖，可是被问再作答的次数多了，甚至一天要做多次应答，便缺失了耐心，调过话头儿问他有何事相告。对方却口不吐核儿，只说想见一面。我不敢贸然推辞，就问他有何事需要我做，请直说。对方却不说事，仍然坚持要“登门拜访”。我便申明，如果有事要我做，且能够做，我做就是了；如果没有什么事，只是想见见面，我便谢其好意，路不必枉跑了；如果仍然劝阻不住，着急处便自我调侃，被媒体作为共识的这张沟壑纵横的脸没有什么看点，省了你跑路的时间；如果还劝阻不下，情急中便冒出“删繁就简三秋树”的古句来，隐含却也显明着免见的意旨，也不顾及遭骂不识相的后果了。

往往在这种情况下，对方才说出想让我做的事来。我稍作斟酌就做出回应，做不了或做不得的事直言相告，能做的事就答应下来争取做成。只有一事例外，就是为个人或单位所购的我的书籍签名，这是别人无可替代的事，有的是为自己和亲友收藏一本有作者签名的书，有的是作为礼品送各路客人。在我的意念里，读者愿意破费买我的书，这是对我写作最为实在的回报和抚慰，因由再简单不过，写或长或短的文章，都是为着和读者实现交流和沟通。许多年来我辞谢过不少不宜参加的活动，还有仅仅只想见面而无事的人，却基本没有耽搁过要我签名的购书者。签名已成为一种习惯，如果一次要签的书在一

百本以内，可以随时安排时间做成，如果超过一百多到三五百本，便只好摊出一个晚上去干了。

再随意说一件常常多有发生的事，有人打电话要见面，经我再三询问，才说想让我为其即将出版的书作序。我便申明案头还压着几部要写序的书，不能也不敢再接了。有理解者或等不及者便松了口，却退一步提出让我为其大著题写书名。这种事相对简单多了，我却不大自信，当即直言相告，我的毛笔字缺失基本功，写出书名不好看。有人信了我的话，就不再坚持要我写了；有人却不松口，仍然要我写。我也退一步说，我可以写，你和搞封面设计的人再斟酌，宜用则用，不宜用就不必勉强。待书名写成，我便交给办公室一位同志，让他交给那位作者。待拿到我为他题写的书名后，还有人要来见面，表示诚意和谢意，且直言顺便带着某一方地域独有的土特产品来。劝阻的情急之中，我又抖出“删繁就简……”的古句，往往生效。

“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这是郑板桥的名句。得了这个佳句，颇多启示，便一遍成记，却找不到出处，以为是郑氏某首七律中的句子，求助朋友在网上查询（我不会用电脑），才得知是郑板桥挂在自家书房里的一副对联。这两句对仗工整又通俗易记的句子，再形象不过地彰显出这位扬州八怪之一的诗人画家的艺术追求的理想和境界。尽管我属书画界外人，却也见过几位国画名家的作品，有的惜墨如金、寥寥几笔便勾抹出一方意趣无穷的意境；有的却是密集山水，整个画面都被黑色的墨汁涂抹，不留空间，只有浓淡差异，真可谓泼墨，一看就见出崇山峻岭的气魄。画家的不同追求，才有国画艺术的万千气象，姑且不赘。“删繁就简”的着力点，为着“领异标新”，这是艺术创造的关键所在，亦姑且不再赘言。

我想说的“删繁就简”，却是生活范畴的话题。任谁一说到当下的生活，脱口便是浮躁；浮躁的世相被人说了许多年，现在还说是浮躁；几乎谁都讨厌浮躁，似乎谁也改变不了浮躁；按说被公众都腻烦的浮躁，就不会有生存的空间，然而依旧浮躁着。浮躁的种种世相里的一种，便是把简单的事复杂化和繁琐化，一件简单不过的事，乃至只需说三两句话的事，却不用电话说（电话太方便了哇），却要“登门拜访”，以示郑重，甚至破费宴请，酒足饭饱之间才说出事来。于是便多了来来往往，把时间都耗费在本不需耗费的客套和应酬的废话里……我往往于情急处，就搬出郑板桥的语录，宜得“删繁就简……”

2012年5月4日 二府庄

我看老腔

二〇〇六年六月，话剧《白鹿原》由北京人艺演出的一个月时间里，我应邀两次到北京看戏。中场休息时到剧场外的院子里换换空气，有幸不期而遇几位作家朋友，握手问好之间，不说对《白鹿原》的观感，开口便问在剧情中穿插演唱的老腔，多是一种惊喜的口吻，且几乎都用“震撼”或“撞人心胸”之类的词发出由衷的慨叹。他们随后便打问，老腔是什么剧种，从来没听说过呀；民间竟然保存着这样好的原生态的唱腔，真正的艺术瑰宝哇，等等。听着这样热烈至诚的赞叹，我为老腔这种纯民间原生态的剧种而欣慰。这些作家朋友身居北京又走南逛北，自然见识过中外古今各剧种的艺术景观，何以会对陕西关中乡村纯粹的民间班社演出的老腔发生如此强烈的慨叹，这足以见得老腔独具的魅力。听着作家朋友的议论，我也暗生一分窃喜，即我第一次听到老腔时所产生的心灵震撼和撞击的强度，和这几位作家朋友不差上下，由此便可排除我对关中民间艺术的偏爱之局限，原来，看着听着老腔的演唱，大家的感受基本是类同的。

我第一次看老腔演出，不过是在此前两三年的事。二〇〇四年春节的气氛尚未散尽，一位在省政府做经济工作又酷爱文化的官员朋友告知我，春节放假期间，由他联络并组织了一台陕西民间多剧种的演出，当晚开幕，不属商业性质的演出，只供喜欢本土文化的各界人士闭门欣赏。他随口列举出诸如眉户戏、线腔、碗碗腔、阿宫腔、关中道情、同州梆子、老腔等多种关中地区的戏曲剧种（秦腔属于大剧种，反倒不在其列）。这些地方小戏我大都看过演出，也不甚新鲜，只有他最后说到的老腔，在我听来完全陌生。尽管他着重说老腔如何如何，我却很难产生惊诧之类的反应，这是基于一种庸常的判断：我

在关中地区生活了几十年，从来没听说过老腔这个剧种，可见其影响的宽窄了。尽管如此，我还是蛮有兴趣地观看了这台由他热心促成的关中民间小剧种的演出。往日里看过这种小戏或那种小戏，却很难有机缘看到近十种关中小戏同台亮相，真可谓百花齐放，各呈其姿。

开幕演出前的等待中，赵季平也来了，打过招呼握过手，他在我旁边落座。屁股刚挨着椅子，他忽然站起，匆匆离席赶到舞台左侧的台下，和蹲在那儿的一位白头发白眉毛的老汉握手拍肩，异常热乎，又与白发白眉老汉周围的一群人逐个握手问好，想必是打过交道的熟人了。我在入座时也看见了白发白眉老汉和他跟前的十多个人，一眼就能看出他们都是地道的关中乡村人，也就能想到他们是某个剧种的民间演出班社，也未太注意。赵季平重新归位坐定，便很郑重地对我介绍说，这是华阴县的老腔演出班社，老腔是很了不得的一种唱法，曾经在张艺谋的某一部电影中出现过，尤其是那个白毛老汉……我自然能想到，老腔能进入大导演张艺谋的电影，必是得到担任电影作曲的赵季平的赏识，我对老腔便刮目相看了。再看白发白眉老汉，安静地在台角下坐着，我突然生出神秘感来。

这台集中展现关中地区小剧种的“十样锦”式的演出开幕了，参演的演员全部是来自乡村的演出小团队或班社，是他们的衣着装束和眉眼间的气色让我认定的；无论登台演唱的是哪一种“腔”，都唱出一种有别于专业演员太过圆润的另一番韵味儿，我当即联想到曾经在山坡上河滩里乃至马车过后的村路上听过的这种腔那种腔的余韵。

轮到老腔登台了。大约八九个演员刚一从舞台左边走出来，台下观众便响起一阵哄笑声。我也忍不住笑了。笑声是由他们上台的举动引发的。他们一只手抱着各自的乐器，另一只手提着一只小木凳，木凳有方形有条形的，还有一位肩头架着一条可以坐两三个人的长条板

凳。这些家什在关中乡村每一家农户的院子里、锅灶间都是常见的必备之物，却被他们提着扛着登上了西安的大戏台。他们没有任何舞台动作，用如同在村巷或自家院子里随意走动的脚步，走到戏台中心，各自选一个位置，放下条凳或方凳坐下来，开始调试各自的琴弦，其中的板胡、二胡、喇叭、勾锣、大鼓、铙钹和马锣这些乐器我都见过，秦腔剧也都要用到的，只有坐在前排的白毛老汉和另一位中年演员怀中所抱的乐器我叫不出名称，却很眼熟，大约是一种少数民族的乐器。好在作曲家赵季平坐我身边，肯定知道我不识此器，当即告诉我，白毛老汉抱的是月琴，老腔的主要乐器。

锣鼓敲响，间以两声喇叭嘶鸣，板胡、二胡和月琴便合奏起来，似无太多特点。而当另一位抱着月琴的中年汉子开口刚唱了两句，台下观众便爆出掌声；白毛老汉也是刚刚接唱了两声，那掌声又骤然爆响，有人接连用关中土语高声喝彩，“美得很！”“太斩劲了！”我也是这种感受，也拍着手，只是没喊出来。他们遵照事先的演出安排，唱了两段折子戏，几乎掌声连着掌声，喝彩连着喝彩，无疑成为演出的一个高潮。然而，令人惊讶的一幕出现了，站在最后的一位穿着粗布对门襟的半大老汉扛着长条板凳走到台前，左手拎起长凳一头，另一头支在舞台上，用右手握着的一块木砖，随着乐器的节奏和演员的合唱连续敲击长条板凳。任谁也意料不及的这种举动，竟然把台下的掌声和叫好声震哑了，出现了鸦雀无声的静场。短暂的静默之后，掌声和欢呼声骤然爆响，经久不息，直到把已走进后台的演出班社再唤回来，又加演了一折唱段……

我在这腔调里沉迷且陷入遐想，这是发自雄浑的关中大地深处的声响，抑或是渭水波浪的涛声，也像是骤雨拍击无边秋禾的啸响，亦

不无知时节的好雨润泽秦川初春返青麦苗的细近于无的柔声，甚至让我想到柴烟弥漫的村巷里牛哞马叫的声音……

气势磅礴，粗犷豪放，慷慨激昂，雄浑奔放，苍莽苍凉，悲壮的气韵里却也不无婉约的余韵，我能想到的这些词汇，似乎还是难以表述老腔撼人胸腑的神韵；听来酣畅淋漓，久久难以平复，我却生出相见恨晚的不无懊丧自责的心绪。这样富于艺术魅力的老腔，此前却从未听说过，也就缺失了老腔旋律的熏陶，设想心底如若有老腔的旋律不时响动，肯定会影响到我对关中乡村生活的感受和体味，也会影响到笔下文字的色调和质地。后来，有作家朋友看过老腔的演出，不无遗憾地对我说过这样的话，小说《白鹿原》里要是有一笔老腔的画面就好了。我却想到，不单是一笔或几笔画面，而是整个叙述文字里如果有老腔的气韵弥漫……

后来还想再听老腔，却难得如愿。听说这个演出班社完全是业余的松散组合，仅在华山脚下的华阴县活动，多是为这个村那个村的乡民家庭的红事和白事演出，也应约到一些庙会祭日赶场子，毕竟是少有出场，平时就在自家的责任田里劳作。这样，我就很难再次享受到那种撞击胸腑的腔儿。直到两年之后，正在筹备话剧《白鹿原》的北京人民艺术剧院导演林兆华电告，让我挑选并联系几位秦腔演员，在《白鹿原》话剧的情节中插唱几段。他特别强调，不要剧团的专业演员，就要那些纯粹的乡村里喜欢唱秦腔的演员。我当即满口应承，这事不难，关中乡村唱得一嗓子好戏的人太多了。后来的通话中，我告诉他还约了几位老腔演员试唱，供他根据剧情的构想进行选择。他表示乐于“看看”，却不甚迫切，尽管我做了坦诚的介绍，他仍是不太热烈地作“看看再说”的回应。待我在灞桥区文化局工作的朋友帮忙物色到十余位乡村秦腔唱家，我也联系约定好了华阴老腔演出班社，林兆

华专程到西安来验收了。且不赘述他对秦腔演员的选择，到他看老腔班社演出的时候，我却独生一分担心：老腔的腔调不知能否切合他构想中的剧情需要。白毛老汉来了，另一位弹月琴唱主角的张喜民自然不可或缺，还有那位用木砖砸长条板凳的张四季等十余位演员都来了。在一个小会议室里，他们仍然依着习惯蹲在地板上，或是坐在作为演员道具的小凳上。他们开唱伊始，我已不能专注于欣赏，而是观察林兆华导演的反应。一折戏尚未唱完，我发现林兆华老兄的两只锐利的眼睛发直了。这是我当时的第一反应，用关中俗话说，那种眼神的确叫发直。我至今依旧记着那种发直的眼神。我在发现那种眼神的一瞬，竟有一种得意的释然，林兄不仅相中了，而且被镇住了。果然，老腔班社刚演唱完两个小折子戏，正准备再演唱第三折，不料林兆华导演离席，三五步走到老腔演员跟前，一把攥住白毛老汉的手说，这就定啦！随之和在他身边的张喜民等握手又拍肩。最后才转过身对我说，真棒！那眼神已经活跃起来，而且溢出颇为少见的光亮……这样，老腔便登上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舞台。

且不说话剧《白鹿原》的演出，穿插在剧情中的老腔的几次亮相却是产生了轰动性效应。我最早感知那种效应是在首演，无论是老腔班社集体出场演出，抑或是白毛老汉怀抱月琴一人独奏独唱，剧场里屏声静息，当他们短暂的插演结束离去时，便爆出暴风骤雨般的掌声，间以噢噢哟哟的浩叹。尤其是张四季扛着长条板凳走到台前，一边吼唱着一边掀起板凳一头，右手攥着木砖把板凳砸得咣咣响的时候，观众席发出惊诧的呼应，当是一种沉浸其中的忘情境界。其实，老腔班社演出的小折子唱段，与话剧《白鹿原》的情节毫无关联，全是他们素常演出的传统剧目中的唱段，自然是纯正的关中东府地方的发音，观众能听懂多少内容可想而知，何以会有如此强烈的呼应和感染力？我想到的是旋律，一种发自久远时空的绝响，又饱含着关中大

地深厚的神韵，把当代人潜存在心灵底层的那一根尚未被各种或高雅或通俗的音律所淹没的神经撞响了，这几乎是本能地呼应着这种堪为大美的民间原生形态的心灵旋律。观众是社会各种职业的人群，对华山脚下的老腔能发生共鸣，我便有如此推想。在我颇为有幸的是，也为老腔提供了两句唱词。这是在话剧《白鹿原》筹备阶段，编剧孟冰要为老腔创作一首作为主题曲的唱词，电话嘱我提供关中民间歌谣。我几乎本能地想到几句流传甚广的既能唱也能顺口溜出的词儿来：他大舅他二舅都是他舅。高桌子低板凳都是木头。走一步退两步全当没走。前奔颅（前额）后马勺（后脑）都有骨头。金圪垯银圪垯还嫌不够，天在上地在下你娃甭牛……孟冰甚感兴趣，这样结实的大实话似乎只有在关中这块土地上才会产生。他随后引用了前两句，且依此民谣编了几句关涉白鹿原人生活形态的唱词。话剧《白鹿原》的主题曲由白毛老汉他们唱响了，颇具反响效应。孟冰把我的名字作为词作者打在屏幕上，未所料及，向他申明予以纠正，竟不能，我就有了平生第一首剧词儿，它能被老腔吼唱出来，深以为幸。

我再一次去北京人艺，是一位工作人员电话告知这是濮存昕团长的指令。我想我已经看过《白鹿原》的首演，接连又陪贵宾和文友看过两场，再去看的兴头尚未潮起，自然就想到可能有什么相关的事由需要商量，电话里人家不说有何事，我也不多问，就按濮团长指令的时间去了。见到濮存昕，他说《白鹿原》休演两晚，他整了一台老腔和秦腔演员的专场演出，定在中山音乐堂，让我来欣赏。这是一个惊喜。他说话剧《白鹿原》演出半个多月以来，观众对剧中插演的老腔和秦腔唱段反响强烈，因为剧中的插演主要为着烘托剧情的气氛，有的插演仅仅唱一句两句，观众似乎很不过瘾，他便想利用话剧休演的这个晚上，搞一场秦腔和老腔的专场演出，让那些专业人员和倾心的观众一饱眼福和耳福……我说我也在期待眼福和耳福的受众之中，我

此前看老腔演出不过三次（包括话剧《白鹿原》），每次不过两三小折唱段，也未曾过足瘾，这回可如愿了。

那晚在中山音乐堂的演出，可谓别开生面，濮存昕一人坐镇，优雅自如而又自信地担当节目主持人，介绍演出的话语郑重而又幽默，让我充分感知到这位艺术家对来自民间的艺术演员的敬重之情。我无论如何也想不到，竟然会坐在中山音乐堂里看这些乡党的演出，那些来自白鹿原和灞河两岸的秦腔演员，从来也没有登过大戏台，他们在乡村田野里扶犁吆牛耕地的时候，尽着性情吼唱秦腔，顶得意的是春节期间组织排练，在村头广场上搭台演出，年过完了，又扛着锄头下滩或上坡干活去了。老腔演出班社也类似，多为有红白喜事的人家出演，抑或是被邀到传统的庙会上演皮影戏，算不得高台。对我来说，乡野里吼唱的秦腔早已耳熟，倒是真过足了老腔的瘾。由濮存昕精心安排，秦腔和老腔交替出台，我看到的老腔的演出，都是较为完整的有大段唱词的折子戏，无论白毛老汉，还是张喜民等演员，都是尽兴尽情完全投入地演唱，把老腔的独特魅力发挥到最好的程度（且不说极致），台下观众一阵强过一阵的掌声，当属一种心灵的应和。我在那一刻颇为感慨，他们——无论秦腔或老腔——原本就这么唱着，也许从宋代就唱着，无论元、明、清，以至民国到解放，直到现在，一直在乡野在村舍在庙会就这样唱着，直到今晚，在中山音乐堂演唱。我想和台上的乡党拉开更大的距离，便从前排座位离开，在剧场最后找到一个空位，远距离欣赏这些乡党的演唱，企图排除因乡党乡情而生出的难以避免的偏爱。这似乎还有一定的效应，确凿是那腔儿自身所产生的震撼人的心灵的艺术魅力……在我陷入那种拉开间距的纯粹品赏的意境时，濮存昕却做出了一个令全场哗然的非常举动，他由台角的主持人位置快步走到台前，从正在吼唱的张四季手中夺下长条板凳，又从他高举着的右手中夺取木砖，自己在长条板凳上猛砸起来，

接着扬起木砖，高声吼唱。观众席顿时沸腾起来。这位声名显赫的濮存昕已经和老腔融和了，我顿然意识到自己拉开间距，寻求客观欣赏的举措是多余的。

据音乐专家考证，老腔的源头远自西汉。华阴县地处黄河、渭河和洛河三条河流的交汇地带，西汉王朝在这里首开通往长安的漕运通道，张喜民家所在的村子背后即是西汉王府的一个超大粮仓遗址。船夫和码头劳工的号子与帮声，逐渐演化出一种拉坡腔，推想当属老腔最早的源头。我对老腔形成的太过悠长的历史略作了解，不甚用心细究，更关注它的生存危机和传承。老腔的领班党安华告诉我，华阴仅存这一个较为拿得出手的老腔班社，而过去计不准有多少活跃在乡村的自演自乐的或紧凑或松散的班社，究其原因，关键的一条是经济效益太差，演出收入低微，不仅年轻人看不上这个行当，过去那些颇具演唱天赋的老艺人也另寻生活途径去了。党安华是县文化局干部，正为老腔的后继无人乃至断档而揪心。出人意料的好事不期而至，且不说在陕西当地被邀频频出场，自参与话剧《白鹿原》演出结束到当年年末，老腔第一次登上了中央电视台“千秋华宴——二〇〇七春节戏曲晚会”的高台，同时又受邀参加中国文联于人民大会堂举办的“百花迎春”春节联欢晚会的现场演出。紧随其后，又赴上海、成都、深圳、香港、湖北、苏州等省市演出；著名歌手任贤齐赶到华阴跟白毛老汉等人学唱老腔；韩国国家电视台追到华阴碨峪乡双泉村，不惜费时一周拍摄老腔艺术专题片；不止一次到我国的香港、台湾演出；随国家文化部的安排，先后到日本、德国、美国献演。我难以想象，那些听惯了交响乐曲的欧美人的耳朵，在听到张四季用木砖砸得长条板凳哐哐哐咣咣咣的声响时，会是怎样一种表情……

令人更为欣慰的是，华阴老腔空前活跃起来，不仅重新组织起不少演出班社，许多具备演出天资的年轻人也亮开了嗓子，党安华、白毛老汉们不再担心断档的事了……生活原本不可或缺老腔的腔儿。

2012年6月23日 二府庄

沉默的翻译家孔保尔

写下翻译家孔保尔这几个字，心里竟有点非同寻常的感觉。平素和文学圈里的朋友说作家和作品，已经司空见惯，作家这个头衔已不稀奇。中国作家协会的会员已接近五位数，翻译家（仅搞文学作品翻译）有多少人，我无法估计，而和我打过交道的不会超过两位数，孔保尔无疑是离我最近且相识多年的一位翻译家。孔保尔搞英文翻译的事，我知道得早了，却没有产生翻译家这个概念，直到大约一年前，我才从一份资料上获悉，他翻译出版的长篇小说有七部，短篇小说近二百篇，堪称翻译家了。

认识孔保尔，大约是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那时住在乡下老屋，每有会议或办理柴（应为煤）米之事才进城，午间休息依着惯例到《延河》编辑王观胜宿办兼用的屋子闲聊，多次遇见孔保尔。那时候他大约二十出头，一张好脸，黑白分明的大眼睛，不宽不窄不长不短的脸面上，有一个端正更显得秀气的鼻子，嘴巴也是大小适度。初见他第一面时，竟有似曾相识的感觉，然而此前确凿未曾谋面，略作筹思，却是我意念里头《红楼梦》里的贾宝玉（相异于电视剧里的那位贾宝玉）。另一个个性化的印象是他脸上的笑，他见面打招呼时便笑眯眯的，聊天时也多见那种自然的笑浮出来；似乎见不到他的愁苦表情，更难见怒容了；偶尔说到颇为严重的受伤害的事，竟然是带着满脸的笑容给同座者叙说，可见其旷达，这显然和贾宝玉相去甚远了。

在我的印象里，大家和孔保尔说话都是直呼其名，几乎没听到过带着姓氏的全称，粗心的我竟然好长时月不知他尊姓孔，可见他和文

学朋友的融洽。最初认识时，他在一所中学当英语教师，时间不长，调到省上一家大旅行社任英语导游。我想那样一张周正的脸和那自然而又阳光的笑容，肯定会和陕西的历史文物与地理风光一样让欧美游客沉迷。上世纪九十年代，他调到西安电视台从事《英语新闻》播音员，直到今日已经成为《今日西安》栏目的制片人、大型活动部主任兼总导演。我罗列他的生活和工作历程，不在炫耀他的晋升，而是要显现他一直都在具体而又不容疏忽的岗位上工作，几百万字的翻译作品，都是在业余时间完成的。所谓业余，无非是礼拜天和节假日，更多的当属夜晚。我能想象并钦佩保尔的毅力，促成这毅力几十年不见松弛的动因，就是对欧美优秀文学作品的痴迷。

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保尔做英语导游的时候，已经翻译了美国作家的两部长篇小说《魔鬼的罗网》和《绑架总统》，前者是畅销书作家西德尼·谢尔顿的杰作，不仅在美国畅销，保尔翻译该作出版后在中国大陆也发行三十多万册，可见同样赢得了中国读者的阅读兴趣。我现在遗憾的是当年竟没有发现这部作品，说来有因，就是在当时，我曾经寻找并买到过谢尔顿两三部长篇小说，是为着正在酝酿的《白鹿原》的写作如何能引发读者阅读兴趣的难题。我选读谢尔顿的作品，就在于他的小说在美国的长销和畅销，读过之后才知道，他的作品并非一般意义上的畅销书，其中有甚为丰厚甚至尖锐的社会内容。保尔翻译的《魔鬼的罗网》，我却错失了阅读的机缘。

其后，他陆续翻译出版了《绑架总统》《地球上的最后一座小镇》《儿戏》《隐讳》《挖掘》《金门惊魂》六部长篇小说，都是在美国和英国文坛引起非同凡响的佳作。仅以二〇〇九年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地球上的最后一座小镇》而言，这是美国作家托马斯·马伦的处女作，出版后一举成名，连续四年高居美国畅销书榜首，遂被译为三

十多种文字。小说以一九一八年夺去世界一亿多人口的西班牙大流感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为背景，选取美国西部一个与世隔绝的小镇，人们在自保和救人的两难之中痛苦选择，深刻地揭示了疾病和战争这种谁也躲避不开的苦难对人生活和心灵的伤害以至毁灭，也揭示出人性这样一个普遍性命题。马伦笔下的这个地球上的最后一个小镇，有别于那些通常所见的怪异的生活习俗的状写，而是以人性这个大命题，触动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不同肤色人群的灵魂颤动，当属文学杰作基本的也是至高的品格。

保尔还翻译了欧美几位堪称大师的作家的短篇小说，其中对英国作家多丽丝·莱辛和美国作家欧文·肖的短篇小说是集束式的译介，一次都是五六篇，在《译林》和《外国文艺》杂志上集中发表，无疑都是这两位大家的不同风格的代表作。莱辛是二〇〇七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保尔在二〇〇八年的《译林》杂志两次翻译发表了她的七篇短篇小说，让中国读者及时领略到这位刚获得诺奖的炙手可热的作家的艺术风貌。其中的《一个未婚男人的传奇故事》是一篇堪称经典的短篇小说，小说中涉及一个重大命题：南非的种族歧视政策以及白人对黑人尤其是对黑人女性的非人道伤害，这个短篇小说的精神负载就具有了超常的容量。其艺术手法更是别出心裁，完全颠覆了传统的叙事套路，环环设套，大故事中套进小故事，叙事视角多有变化，把一篇短篇小说写得变幻无穷而又淋漓尽致。欧文·肖是美国现实主义作家，著作浩繁足可等身，独到之处在于他是黑色幽默的开山鼻祖。他的作品无论长篇小说或中短篇小说，均切近现实生活，让异国读者产生故事和人物就在自己身边的真实感受；文字简洁精确，故事引人入胜，美国评论界把他推到海明威的艺术境界。保尔在《外国文艺》上一次翻译了欧文·肖五篇小说，让读者可以感知这位大师的艺术景观之一斑。

美国作家乔伊斯·卡罗尔·欧茨是一位著作等身的女作家，属于文学范畴的诸多门径她都涉猎过，且都有独特卓越的见解。我印象最深的是她的意识流小说，这是我最早见识的意识流小说的范本，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至九十年代初的中国文学复兴时期，西方的各种文学流派都引入中国，意识流小说是最热门的一个话题，我在订阅的《世界文学》上读到过她的短篇小说，直接见识到欧茨的艺术风貌之一味。后来得知，她不囚于一种意识流，而在象征主义、神秘主义等方面都有探索，美国评论界对她的创作定论仍是以现实主义为根基。保尔译介了她具有代表性的短篇小说《约会》，这被公认为是她的经典之作，也是她意识流小说的杰作之一。作品直接揭示当代美国人的精神困惑和女性悲剧，其社会生活的容量在一个短篇小说的有限篇幅里达到了难能实现的丰厚；加之以自由自如的意识流笔法，《约会》成为一篇出类拔萃的经典之作。也许是早年初读欧茨作品的难忘印象，我便企盼保尔能多译介一些她的作品。我也曾给他建议，把那些短篇小说汇集成册出版，让如我一样的读者阅读方便，不知因为何故，至今未见出书，难免遗憾。

谈到翻译，作为英语盲的我很自然会想到最现实的困难，欧美不同国家有不同的历史背景，有不同的社会风情，包括方言，等等，都是文学翻译最需要解决的基本课题。保尔告诉我，他是通过阅读来解决。他读书涉猎广泛，知识面很宽，举凡美国英国这些国家的政治、历史、风俗以至医疗等生活习俗，都有了解。这是他搞翻译必做的基本功课，他做得颇扎实。保尔的翻译作品已引起较为广泛的反响，有评论家对保尔的翻译作品做了多角度的评价和论说。

我很感佩保尔的专注精神，至今他仍然任职于西安电视台，工作繁重，却依旧在休假日和夜晚翻译着英美文学作品，累计超过四百余

万字，可以想见其辛劳和专注的精神。保尔从来不张扬不喧哗，更不必说炒作了，似乎少有人知道他在文学翻译领域的成就。保尔几十年默默伏案，把优秀英语小说包括世界名著翻译为汉语文字，以飨中国读者；译著不断出版，且引起好评，当属最切实最可靠的劳动回报，想来他从中获得心理慰藉，也获得依旧默默伏案再译新著的力量。

2012年7月5日 二府庄

难忘一种鸟叫声

在乡村生活和工作的几十年里，每到公历五月中下旬的初夏时节，无论是行走在乡间土路上，抑或是坐在月光朦胧的自家小院里，都会听到“算黄算割——算黄算割”的鸟叫声。在乡村叫得上和叫不上名字的诸多鸟儿中，最让人亲切的鸟叫声，莫过于这种被乡人称作“算黄算割”的鸟儿了。没有任何神秘的因由，这种鸟叫声提醒庄稼人，麦子黄熟一点就要及时收割一点，不能等得整块麦子全黄熟了才收割。那样往往会被骤来的暴风雨毁了成熟的也是即将到口的麦子。其实，麦子一边黄熟一边收割，这是任何一个庄稼人都明白的常识，谁也不会太在乎空中响着的这种“提醒”。然而，人们对“算黄算割”的鸟鸣声和对这种鸟儿的亲切感，在于它传达的小麦即将成熟的喜讯。对于喝了一个冬天又一个春天的苞谷糁子的庄稼人来说，麦子成熟最切实的意义，便是碗里可以挑出美味的面条了，锅里可以烙出酥脆的白面锅盔了。尤其是那些日子过得紧巴到吃上顿愁下顿的人家，早已瞪着眼瞅着麦苗返青，拔节，吐穗，扬花，再由绿变黄，“算黄算割”的鸟叫声，既撩拨着他们急不可待的心，也搅动着他们亏欠太久的饱腹的欲望。

在我幼年的记忆里，虽然没有饥饿，却对纯粹的白面馍馍有一种本能的期盼，盼到过年，可以吃到白面包子、饺子和臊子面，过罢初五，就换成苞谷面馍了。再盼到收割麦子，打下新麦，直到地净场光，大约半个月左右，馍和面条都是新麦磨下的纯白面做的，之后又以苞谷、豌豆等杂粮为生了，正所谓“跟着碾麦子的碌碡过个年”。打下第一场新麦，磨下白面，母亲总要先烙一张焦黄酥脆的锅盔，为割麦子拉运麦子碾打麦子没黑没白劳作的父亲改善生活。我却早已迫不

及待地守候在锅台边，看着母亲把擀好的白面锅盔放进锅里，当即发出吱吱吱的响声，便有香味弥散开来。及至三翻三扣，满屋满院都漫浮着锅盔的香气儿，我早已口水连连下咽了。母亲把烫手的锅盔从锅里拎起，旋即摆放到案板上，拿起切面刀切成大小匀称的方块。我急不可待从她刀下抓过一块还有点烫手的锅盔，咬出嘎嘣脆响的声音，那是美味香甜到刻骨铭心的吃食了……我对“算黄算割”鸟叫声的敏感，源自幼年的生存感受，即使活到这把年纪，每到初夏时节，在城市的街巷里听到树梢上一声连一声的“算黄算割”的叫声，脑子里便浮出在案板上从母亲刀下抓过锅盔的情景，口中似乎有口水溢出……

同时浮现于脑际的图像却有点不堪，那是在收割过麦子的麦茬地里搂拾遗丢的麦穗的情景。父亲和母亲收割完一块地里的麦子，母亲回家做饭，父亲用木轮推车把一捆捆麦子拉运回麦场上，麦茬地里遗丢的零散麦穗，要用竹篾或铁丝制作的一个大筢子搂拾，这是我要干的活。其实不单是我，凡能拖动那把筢子的农村男孩，都要干这种劳动。其实那筢子的分量并不重，搂拾的麦秆麦穗也已晒干，没有多少重量，难耐的是头顶火辣辣的太阳，直晒得裸露的胳膊由红变黑，再脱下一层层白色的皮来。在河川的小块水田里，地头有白杨树，搂到地头可以在树荫下乘一会儿凉，还可以从水渠里撩水洗脸。最难受的是在坡地上，地块大，周边见不到一棵树，更见不到一滴水，拖着筢子从地这头搂到那头，再从那头搂到这头，头顶的大太阳晒着，脚下的麦茬地也像火烤一样，满脸满身都流出汗水，直到没有汗水可以流出，喉咙里也似乎有一种着火的焦灼。这是我幼年从事的劳动项目中最不堪的一种。父亲又拉着空车到地里来装麦捆，大约看到我不堪忍受乃至气急败坏的脸色，没有安慰或劝导，只是平静地说一句，这会儿你想一想白面锅盔就好办了……

后来上了中学，读到唐诗“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我不是听人教诲之后才得知，而是在能拖动那把摟拾麦穗的竹筢的幼年就知道了“粒粒皆辛苦”的道理，是用流尽汗水再无汗水流出的切身感受获得的生存道理，盘中的餐更具体为母亲案板上的一块锅盔，或一碗纯粹麦子白面做成的面条。我对这位已记不得名字的诗人产生了敬重和亲近感。

记不清哪年看到一幅画，是一个拾麦穗的女孩，扎着羊角辫儿，穿着红兜肚，模样是天然的好看，正在收割过麦子的麦茬地里捡拾麦穗。我看见这幅画面，当即想到我拖着筢子摟拾麦穗的情景。我体会到的不堪和画面上那阳光而又富于诗情的美形成反差。我拾麦和摟麦是生活真实，画面上拾麦穗的女孩形象展现的是艺术化了的生活，未必要把拾穗者被太阳炙烤得淋漓的汗水和脱皮的肌肤的不雅画出来，那样就缺少诗性的浪漫诗性的美了。

生活真实和艺术真实是个大命题，我从喜欢上文学就面对这个命题了，几十年过来，依旧朦朦胧胧莫衷一是，姑且不赘。倒是宁可淡忘幼年摟麦穗拾麦穗的记忆，多欣赏画中所洋溢的诗性韵味，当会有一种解脱的轻松。

2012年7月31日 二府庄

接通地脉，只因乡村情感

拙作散文随笔集《接通地脉》（作家出版社）出版不足一月，很多人询问有关这本书的事，且不约而同都对书名感兴趣，直言现在正提倡走基层，不能断了地气，你怎么在五六年前就意识到要“接通地脉”？第一次面对这个发问竟有点发愣，半晌回答不出所以然来，随之便如实相告，那是我生活的真实体验和感受。

作为集子名称的《接通地脉》这篇散文，写于二〇〇七年的元旦节假期间，无疑是新的一年的开篇之作。现在完全记不起这篇散文写作的诱因。依我已成习性的写作，无论一个短篇小说，无论一篇散文的写作欲望，大都有某个始料不及的生活事件或某种世象的触发，包括记忆里的陈年旧事，乃至一种自然景色，触动情感和思维的某根神经，便发生一吐为快的笔墨抒发。然而，时过五六年之久，怎么也想不起《接通地脉》这篇散文因为何事而触发了写作的欲望，姑且不究，倒是由此话题引发出新的命题，涉及我的乡村情感。

这种乡村情感或者说情结，在我的生活历程中经历过一个U字形的历程。我大约直到初中毕业的年龄，才有关于个人未来人生前途的设想，最理想也最基本的人生目标，便是进入城市，能当上一个技术工人就很满足了；后来因为未能录入专业技校而误入高中，竟然闹过一段情绪；企图进入大学接受高等教育的强烈而又专一的欲念，那是在高中安下心来就注定了的。无论想当一个技术工人或进入高校，一个最基本的出发点，就是脱离农村进入城市，吃一碗不倚赖土地更不关天旱雨涝决定稀或稠乃至有或无的好饭。这几乎是所有农村学生读书的目的，我不仅不能脱俗，而且欲望颇为强烈。道理不仅不言自

明，而且很富刺激性，那就是城市与乡村、工人与农民、脑力劳动与体力劳动的巨大差别。而当高考名落孙山，在我就有天塌地陷般的毁灭感。

我后来有幸从乡村学校进入最基层的乡镇（当时称公社）机关工作，而且不间断地工作了整整十年；更有幸的是在我家乡的乡镇，即白鹿原北坡和原下的灞河（古称滋水）小川道这一方地域；十年时间没有挪窝，各个村子的干部和一些乡民家的前门后门我都熟悉了。我对乡村和农民生活形态的了解，或者说体验，当属这十年形成的。如实说来，我那时候接触乡村干部和乡民，完全是出于各种乡村工作的用意，而不是作家为了创作而深入生活。我后来成为专业作家，才意识到这十年乡村基层工作对我写作的决定性意义，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对乡村和农民世界的了解和感知，是作为基层干部做乡村工作的无意识的收获。在我获得专业写作的最理想的工作的同时，便决定回归白鹿原北坡下祖居的屋院，其中一个重要因素，便是乡村情结。

尽管我已经不再扶犁执锄种庄稼，住在乡村祖居的屋院，可以听到狗叫牛哞，出门便看到河川和原坡上麦田和苞谷地里的绿色，可以闻到弥漫在村巷和屋院四季不断变换着的各种野花野草和杂树的花香，也缺少不了东家西家那些熟悉不过的男人女人的家事和纠葛。我也只是在成为以写作为职业的角色而要进入城市的时候，才甚为强烈地意识到我和乡村业已铸就的情结难以割舍，便有了索性回归祖居老屋的取向。住在祖传的屋院里，我的整体感觉是自如而又自在，却也有小小的缺失，在村巷里看着牵牛扛犁走向田野的乡党时，我会发生想要一手扶犁一手执鞭吆喝黄牛耕翻土地的欲念；看着他们用木推车从坡地或河川拉回一捆捆麦子进入打麦场间，我也发生想用镰刀刈割麦子的心动……我尽管住在乡村里，却不是靠土地吃饭的人了，少年

青年时期的生活理想实现以后，却感到某种缺失，这是意料不及的事，也让我意识到身在其中却仍然有某种隔膜。村主任让我继续耕种那两分地，我便有了挥镢舞锄的“用武之地”，更有接通地脉尤为舒畅的感觉。无论读书，无论写作，在小书屋里窝蜷一天，于傍晚夕阳灿烂之时，我到那两分地里或挥镢挖地，或执锄除草，或赤脚踏泥用自流水浇灌禾苗，完全是一种享受。偶尔会遇到一位路过的乡党，坐在田埂上东拉西扯说闲话，我才真实感受到隔膜的消失，是完全的融合，是地脉的接通。

到《白鹿原》发表的一九九二年末，我离开祖居的屋院进城了。在城里待了七八年，在一种迫切到不堪的情感里，我重回原下祖居的屋院，当年栽植的食指粗的法桐树，竟然长到半合抱粗了，我竟有自虐式的感慨，时光容易把人抛，壮了梧桐，我却老了！我一个人住在祖居的屋院，自己烧水煮面条，自己捅火炉取暖。村主任让我耕种的那两分地已分配给一位村民，栽植的樱桃树已经开花挂果了。然而，我可以到灞河沙滩上漫步，伏天就在河水里洗涮汗斑；或者走上屋后白鹿原的北坡，享受顺坡而下的清风，那清风里变化着各种野花的香味。我又有接通地脉的踏实感觉。我在这里待了两年，终究被洗锅刷碗的事搞得颇烦，顺势应邀到一处朋友安排的较为清静的工作室去了。

这个工作室在城郊。四周日渐崛起如树林般的高楼，却在我的窗外还保存着一方农田，我常常站在窗前，看田地里的男人女人移植菜苗，或施肥，或锄草，或引井水浇灌，一个个悠然而又专注，我看得入神而沉迷。大约两三年后，这方田地上冒出齐摆摆多幢住宅楼房，且都是高层，离我最近的一块庄稼地消失了。

每有机缘回乡或者上原，出西安老城和扩展的新城，在一堆又一堆楼群中穿过，一当车过浐河桥，我的心脏便有了超常的响动，处于一种亢奋状态。浐河是我大半生生活和工作的地域的一条划界性质的河流。一条路一座桥通白鹿原上，另一条路一座桥通白鹿原北坡下我的祖居的村子，无论走哪一条路，无论过哪一座桥，每当车过浐河的时候，我的心跳便加速了，既是心理反应，也是生理反应，无可抑止。

尽管不能每天都感受地脉，能有感受地脉的哪怕短暂的一次机会，也会从生理到心理全身心地接受。

2012年8月14日 二府庄

愿白鹿长驻此原

独寻秋景城东去，白鹿原头信马行。

这是白居易一首七绝中的两句。每有机缘上原，心头便会涌出这首绝句，情绪顿时也会畅朗起来。我无法想象千余年前的白居易纵马白鹿原上寻到的是怎样一幅秋色美景，单是眼前的一派绿色，已经让我沉醉了。

一条新修的宽敞的公路盘旋在西边原坡上，两边是层层叠叠的绿树。刚刚从酷暑进入初秋，尽管杨树柳树槐树等树木的树冠呈现着深色和浅色的小小差异，却依然流露着蓬勃的气象。草木清爽的气味，诱使我连续深呼吸。这里曾经是荒坡和梯田。荒坡上长满枣刺和杂草。梯田里一年只种一料麦子，因为缺水缺肥，麦子长得矮小细瘦如同猴子的黄毛，收割时搭不住镰刀，只能用手薅，民间戏称薅猴毛，产量也就可想而知了。大约不过十年前，那种延续了不知多少年的广种薄收乃至无收的景象中止了，退耕还林，便有了这一派让上原和下原的人心旷神怡的绿色。

上原的路大约走到一半，有一道平台，自南到北散落着一个个或大或小的村庄，俗称二道原。民办大学思源学院已成气候，随坡倚势建造成一幢幢楼房，校园里如同精心构设的花园，四季轮番开放的花草和花树，弥漫着种种诱人的香气。这里活跃着来自全国各地的两万余名学子，避开了都市的喧嚣，在这一方天地汲取知识。校方扶持建立了白鹿书院，我常和一些文学朋友到书院交流，尽管他们多是走南闯北见惯了奇山异水的人，也多感佩这一方地域独有的脉象。大约十

年前，这所大学的创始人周先生约我参加一个座谈会，把他想在白鹿原的二道原上创办一所民办大学的意图坦陈出来，让大家论证。我那时竟然很激动，一时尚不敢估计这座古原破天荒建立的第一所高等院校的深远影响，却也想到不仅是每年能有多少年轻人完成高等学业，更有对原上乡民文化意识的潜移默化的启示。十年过去，这所学院不仅被评为全国十大民办大学，而且让民办大学由二道原扩展到白鹿原上，挂着种种专业校牌的民办大学已建成十余所，形成了一个颇具规模的民办大学城。就我粗略的印象，一九四九年新中国成立前，这道原上大约只有两三所新式小学；截止到上世纪九十年代，仅有三四所中学，分属三个区县督管；到今天不过十年时间，这里已经形成拥有十余万学子的民办大学城了。从这些民办大学门前经过的时候，我常有不可思议的感慨，变化之快几乎让我不敢相信，随之也生出生不逢时的自怜，如若晚生许多年，就不会留下缺失高等教育的人生遗憾了。

原的西部已经几乎看不到庄稼，传统的麦田消失了，蓬勃着一眼望不透的樱桃树。种植樱桃和小麦的悬殊的收益，是任谁都不会拒绝对樱桃的选择。每到五月樱桃成熟时节，原上原下和原坡的万亩樱桃园里，笑语喧哗，那是西安城里人或呼朋唤友或扶老携幼上原摘樱桃时忘情的声浪。秋天刚刚来到原上，葡萄又熟了。樱桃几乎是家家户户都有种植，而葡萄却是规模化的集中栽培。原上先后建起三家较大规模的果园，两家既种樱桃又种葡萄，还有一家是专门种植葡萄的园子，种植面积有几百亩到过千亩，都是以最严格也最规范的技术措施栽培管理。我曾有幸参观，可谓大开眼界，且不说那些颇为深奥的技术措施，外行的我看到细水浸润的滴灌设施，顿然感知到现代农业和粗放管理的农业的差异来。为了保证果品的品质，一概不用化肥，连复合型的肥料也不用，而是从内蒙古草原收购牧民的牛羊粪，集中窝

沤，使其熟化，再从千里外的内蒙古草原运回原上，单是这项投入的工本就令我咋舌了。这样培植的樱桃和葡萄，不仅味美，更让消费者放心，价格也就高出普通果园的樱桃、葡萄几倍。我走在这家葡萄园里，满眼都是紫红的葡萄串儿，嘴里就有口水溢泛。这位种植园主是我的同乡，一位卓有建树的农民科学家，曾获得国务院的褒奖，那是他向乡民传授各种果树管理技术赢得的奖励。他在原上亲自种植葡萄，更带有示范的效应。我更多感佩的却是这道原的变化，自古以来白鹿原缺水，向来不植一株果树，即使庄稼，也只能保证一料小麦的收成，多有的伏旱，秋天的作物十有九年都无收获。更甚者，生活用水都很困难，原下人调侃原上人说，早晨起来，夫妻对面吐唾沫儿洗脸。现在，每个村子都有深井，自来水通到家家户户，果园也就蓬勃起来了。白鹿原高过渭河平原二百米，昼夜温差大，无论樱桃无论葡萄的甜蜜就享有天时地利的优势了。

绿树掩映着的一个个或大或小的村庄，既是古老的，又是新生的，古老到和这道原的历史一样悠久，新生在于现在的村庄已经完全改换出一派新的风貌，一幢幢二层小楼或平房，从绿树的空隙间显露出来。如果走进村巷，便会看到甚为讲究的一个个农家院的门楼上都有题款。几乎看不到土坯垒墙的传承了千年的厦房了。沟通每一个村庄的道路全部实现了硬化——水泥路面，永久性地告别了泥泞小路。我曾陪《白鹿原》剧组的朋友踏访原上村庄寻找外景地，失望而归，上世纪的白鹿村的影像荡然无存。我不为剧组的失望而失望，倒为原上的乡党而庆幸，他们终于获得了安逸富足的生活，既不为锅里缺米缺面而熬煎，也不为屋漏而愁肠百结了。

写到这里，我突然意识到，每触及一景，便牵出这一景地昨天的景象来。似乎不是有意为之，而是一种自然的不可违逆的心理反应，

昨天的贫瘠景象铸存太久，而今天焕然一新的景象来得太快，作为这道原的亲历者，发生今天与昨天的鲜明而又强烈的对比，欣然的感触和感慨就是本能的心理反应了。

因为一只白鹿的出现，这道原便有了象征着吉祥安泰的白鹿的名称。随后，汉文帝葬在白鹿原西北的原坡上，原坡根下流淌着灞水，文史典籍称为灞陵，这道原也被改名为灞陵原，民间却少有人说。自北宋大将军狄青在原上屯兵驯马，这道原又被改换为狄寨原，一直沿用至今，白鹿原的名字早已湮灭以至消亡了。近年间，因为拙作《白鹿原》的发行，这个富于诗意也象征着吉祥安泰的白鹿原的名字又复活了。白鹿原名称的重新复归，恰当其时，多少代人期盼向往的富裕和平的日子已经实现，却是改革开放的科学而又务实的富民国策实施的结果。

愿白鹿长驻此原。

2012年9月27日 二府庄

感受历史的生动和鲜活

这是一组古树的彩色照片。逐一欣赏的过程，不无惊诧地慨叹竟然连连发生，真可谓叹为观止。一株在秦岭山中生长了一千二百年的云杉，其顶天立地巍然屹立的姿态，让我感知到大气磅礴壮志凌云的气度，更有一种内蕴的谦谦风韵。我端详着从根到梢的绿叶所彰示的蓬勃生机，几乎不敢想象这是具有一千二百年树龄的生命活力。再如楼观台的那株业已枯死而仍然挺立的古柏，不知死过多少年了，树皮业已脱光，依然如柱般坚劲。富于形象化想象的人为它存留的三根枯枝模拟出栖立枝头姿态各异的苍鹰，颇得神韵。一株生长于广仁寺里的紫荆，满树的紫红色鲜花，呈现着一派热烈奔放一派灿烂浪漫的风采，许是得了佛寺这一方圣洁的净土的滋润，又回报给这方宁静孤寂的圣地一派热烈和灿烂。这样孤立的一株紫荆既能惹得人眼热心跳，设想成片的紫荆当会是怎样一派盛景？非我徒生奢望，户县太平峪里便有满山遍野恣意烂漫着的紫荆花，蔚为大观。这些紫荆散漫于各色杂树之间，或扎根在慢坡，或峭立于石缝；或单株独立，或成丛成片；不见人为痕迹，自由自在的生存形态，便呈现着一种天然的美。在我刚刚看到这紫荆花云的一瞬，便陡生向往，如若能徜徉其中，或倚坐在某株紫荆花树下，当会进入怎样一种陶醉的怡然……

这里有几株古树，远远超出了我对一般意义上的古树的概念，几乎是令我不敢相信的远古之树。树龄在一千余年的古树，有周至县厚畛子的云杉；长安区酒务头村的一株柏树，相传唐王李世民狩猎回程途中在此柏树下歇息饮酒；传说唐代大将军尉迟敬德征战途中曾经拴马休憩的银杏树，依然蓬勃在长安区的百塔寺内；临潼区华清池里的两株皂荚树，相传为唐明皇和杨贵妃合伙栽植，且跪倒树下对天盟

誓，诗曰“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尽管后来的悲剧令人嘘叹，这两株皂荚树却成并蒂；相传隐居辋川的王维所植的银杏树，和他的诗歌一样生命持久，被历朝历代以至今天的文人墨客前往观瞻；周至县厚畛子镇八斗河村的一株号称玉兰王的玉兰树，曾任周至县尉的白居易拜观之后赋诗以抒怀；临潼区晏寨乡胡王小学院内一株树龄在两千三百余年的古槐，更有刘邦鸿门宴上落荒而逃得此古槐遮掩的神奇传说；这些古树中树龄最大的一株是银杏树，已过两千六百余年，相传是老子在楼观台传经布道时亲手所植。我在列举这些古树的时候，除了这些不同树种的独特魅力，还在于弥漫在这些古树枝干上绿叶上和花朵上的神秘神奇的传说，这些传说令人着迷，而不介意其可靠性，似乎这样古老的树下，本就应该发生不同凡响的故事；有了这些传奇故事，更见得此树的古。我甚为感慨的是王维在辋川所植的银杏树和白居易观赏过的玉兰王，却不是传说而是真实发生过的事，王维因亲植银杏树而把自己的别墅题为“文杏馆”，且赋五绝一首；白居易在观赏玉兰王时也诗兴波涌，吟成七绝：“紫粉笔含尖火焰，红脂胭染小莲花。芳情香思知多少，恼得山僧悔出家。”诗人白居易观花触发的情思真是难得估计有“多少”，却以己推人把山僧调侃一回。无论传说，无论王维、白居易的诗证，都让这些一千两千多年的古树平添了神奇和浪漫，给观赏者以无限的美好想象，反嚼不尽。

观赏这些古树，让我很自然地生发悠远的历史性慨叹。墨写的史书难免虫蛀纸朽，而这些古树主干和绿叶以及鲜花上所彰显的中国历史，却是活生生的生动。王朝更迭，人世沧桑，却有这些远至两千多年前的古树依然蓬勃，让今人在一干一枝一叶一花上领略且感知一缕历史的生动和鲜活，这是老的和新的教科书上都难得感知的体验。看着那些古树枝条上缀着的红绸条儿，当属青春男女的心的情结，寄托

且誓示着他们的爱情，像古树一样久远不枯，又给这些古树继续蓬勃下去以情感的滋润。

看着一株一株百年千年的诸种古树，我当即想起了我家隔壁门前的一棵古槐，大约有三搂抱粗，庞大的树冠下是一大片树荫，成为夏日酷暑里乡党歇凉谝闲话的聚集之地。这棵古槐已经空心，我和小伙伴常常在下雨时躲进空心的槐树里避雨。在我读书到初中三年级，周六回家时，未进家门便发现古槐树没有了，顿然感觉到一种巨大的空缺。后来得知，村子里刚刚建成不久的供全村人吃饭的大食堂的人，挖了这棵古槐，破碎了树干和树枝，晒干后当作烧饭的木柴烧掉了。一棵起码和村子的历史一样久远的古槐化作灰烬消失了，初见时的门外的巨大空缺，随之便铸成心理感受上无法弥补的空缺。在我看着这些古树照片的时候，尤其是那几株古槐，似乎心理的那种隐存了几十年的空缺得到了弥补，重新感知到那古槐浓荫之下的逸趣。我便对这些古树的守护者顿生敬意。

2012年10月12日 二府庄

儿时的原

这道原·那道原

李巍打电话来，竟有瞬间的惊诧。重温那独有的说着普通话的口音，便感知到一种重逢的欣然，是伴着惊诧的欣然。大约有几年不通音信，依旧储存着这位彩云之南的老朋友的别致的口音，久别重逢的欣然就自然地发生了。他约我散文稿。我不仅贸然应允，而且随口提出让他命题，在我的生活范围内，看他对什么话题有兴趣；如果我确凿也有生活体验，便可谋篇。他说让他想想再说。他想过之后便点题了，让我写少年时期所经历的和白鹿原相关的生活。我当即应诺。这自然是地理概念的白鹿原。原是西北地区特有的一种地理地貌，实际就是一方小小的平原，大约因为规模太小而不能称为通常意义上的平原，故叫作原。有好事者为了区别原与平原，给"原"字左边添加一个"土"字变成了"塬"。其实古人都没有多此一举，白居易一首七绝写到白鹿原："宠辱忧欢不到情，任他朝市自营营。独寻秋景城东去，白鹿原头信马行。"且不究什么人干龌龊事惹得诗人心烦要到白鹿原上扬鞭驱马畅快抒情。单是说这"原"字原本就没有画蛇添足似的"土"字作偏旁。再如毛泽东的名作《沁园春·雪》里的"原驰蜡象"的"原"字，也未有"土"字作偏旁，而陕北地区也有规模大小不等的多种原，毛泽东把大雪覆盖的一道原拟为蜡象，足见得诗人的情怀和气魄。

西安周边有好多道原，城北有龙首原，自然是因其地形像一条扬头的龙而得名。据说汉高祖刘邦之所以把皇都圈定此地，要借龙脉之气象便是诸种因素中最重要的一点。从西安城端直往南靠近终南山的神禾原，传说远古时生长双穗的谷子，便有了神禾原的名称。曾经的

西北王胡宗南在此原为蒋介石修建一座阔绰的行宫，老蒋曾站在原头观望原下的灞河小平原和背倚的终南山的风光。作家柳青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相中此地，在原头一座废弃的破庙里安家落户，兼职深入生活，一住就有十四年，创作出史诗著作《创业史》。悲剧也发生在这道原上，他的夫人熬不住“文革”的迫害，跳入井里饮恨而去了。神禾原东边是少陵原，两原之间有潏河流过。少陵原上有汉宣帝刘询和他的许皇后的陵墓，两座陵墓相隔一段距离，许皇后的陵墓规模较小，便有少陵之谓，且成为这道原的名称。此地在秦时曾设杜县，汉宣帝的陵墓被称作杜陵。然而，此原却是依其皇后的小陵墓而得名少陵原，竟然比皇帝刘询还风光。少陵原东边便是白鹿原，两原之间有颇为宽阔的河谷，发源自终南山的浐河自南朝北流过，河川里曾经有五六千年前的新石器时期母系氏族的人群在此渔猎，也种谷，村落遗址被称为“半坡遗址”。遗址旁边的村庄称半坡，位置在白鹿原的西边坡根下。白鹿原的北坡下，也是一道河川，有灞河自东向西流过，是发源地秦岭的山势造成的倒流河。灞河原称滋水，一个让人感觉温馨的名字，却被要称王称霸的秦穆公改为霸河，以显示其统一中国称霸天下的壮志和野心，后人为霸字添加了三滴水，成为灞河。

汉文帝把他的陵墓选定在灞河河畔的白鹿原西头的北坡上，史称霸陵，亦称霸陵原。“沛公军霸上”即是说刘邦和项羽争夺咸阳时驻军在霸陵原上。霸陵原多见于史籍，民间尚未流行。北宋时，大将狄青在白鹿原西部屯兵养马，从此便将白鹿原改名为狄寨原，一直延续到今天，一个古老的镇子也称为狄寨镇。这道原东西长约五十华里，南北宽约三十多华里，自东向西纵断着一条深沟，把此原割裂为南原和北原。我的家在北原的北坡根下，是一个五六十户人家的小村子。出了我家祖屋后门不过十来步，便是白鹿原的北坡坡根；走出我家前门不过五六百米，便可以掬灞河水洗脸了。在我从少年到成年的甚为漫

长的岁月里，只知此原叫狄寨原，竟然不知诗性烂漫的白鹿原这个好名称。小说《白鹿原》出版二十年了，褒贬且不论，却把尘封在《竹书纪年》里的白鹿原的名称复活叫响了……

割草·搂麦

出生在农家屋院里的男孩子，从小小年纪就帮父母干农活了。我却记不准自己究竟是从几岁开始动手干活的，按乡村人归结的普通规律，说男娃子一顿能吃完一个馍馍，就是好帮手了。我据此判断，当在我六七岁的时候。我同样记不清先学会的是哪一种农活，却笼统记得我能干的农活有拔草、割草、搂柴火、搂麦穗、掰苞谷和剥苞谷等。幼年从事的这些农活，有的是我喜欢干的，留下了愉快的记忆；有的是难以承受的不想干却不得不干的，便铸成一种伤痛。

我最喜欢干的农活是割草。我家和隔壁一家同族本门人家合养一头黄牛。牛喜食青草。每当春天青草长出来，我便背上柳条编织的小号笼子，提上割草的短把儿镰刀，下到灞河河川或上到白鹿原坡去割草了。当时不知白鹿原的名称，只说上坡割草。割草总是结伴去，几乎没有一个人独自行动的行为，除了结伴搭伙儿热闹有趣，还有至关重要的一条，便是安全。那时候沟梁纵横的原坡上还有狼族活跃其间，常常就有某人在某道坡梁或某条沟谷里撞见了狼，甚至还有某村的小孩被狼叼走的骇人听闻的灾祸发生。父亲总是在我出门割草时提醒，不要单个上坡，找俩伴儿一搭去。

村子里和我同龄或不差上下年岁的伙伴不过三四个，今日我找他，明日他会来找我，三四个人聚齐了，便商量确定到哪一条沟或哪一道梁去割草，说着谝着嘻嘻哈哈便走出村子了。麦子收罢进入伏天的酷热季节，阳光如喷火，伙伴们不约而同在坡梁下的沟道里遮蔽了

阳光的背阴处坐下来，玩一种抓掷石子的游戏，或者打扑克，直玩到太阳西斜，才抓起短把镰刀去割草。最富诱惑的快活事儿是逮蚂蚱。蚂蚱有麦蚂蚱和秋蚂蚱，前者是生长在麦子地里的，到麦子成熟时也发育完成了，趴在麦穗上发出吱吱吱的叫声，我曾和小伙伴们在麦子地里逮蚂蚱，着急处就忘记了已经黄熟的麦子，踏倒了麦子，招来麦田主人的叫骂。不过，这种麦蚂蚱叫声很单调，很快就把兴趣转移到秋蚂蚱这灵虫上来了。所谓秋蚂蚱，是相对麦蚂蚱而言的，在麦蚂蚱完成三次脱壳可以鸣叫的时候，秋蚂蚱才从埋在地皮下的卵蛋里化育成虫钻出来，满体嫩绿如同刚刚脱壳的绿豆。秋蚂蚱生长在长满酸枣刺棘的田坎上、荒坡上和坟地里，捕捉很难。我和伙伴们根本等不得它完成三次脱壳羽化为可以鸣叫的蚂蚱，就在刺棘丛中寻找，常常被刺棘的尖刺刺得脚面和小腿布满血印也不在乎。逮着小小的秋蚂蚱，装进竹篾编的蚂蚱笼子里，每天喂它野谷苗的内芯。眼看着它在小笼子里一天天长大，完成三次脱壳成为一只羽翼丰满的蚂蚱，发出铃铛一样响亮有节奏的歌唱，我常常陷入一种沉醉。这种秋蚂蚱生命力很强，如果喂养精到，往往可以鸣叫到深秋以至霜冻时节才会完结，给平静也显孤寂的农家院子添一缕欢乐的声响……逮秋蚂蚱太专注也太投入，往往忘记了割草，无论逮着秋蚂蚱的兴奋或逮不着的懊丧，都会在拾起短把镰刀开始割草不久便淡化了，只畏怯草割得太少父亲那责备的眼色。

印象里最不愿干却不得不干的农活是搂麦子。我家有十六七亩土地，绝大多数分散在原坡上，只有三五亩可以浇灌的水田分作四五块散布在灞河川道里。养牛积攒的土肥，单是施到一年可收两料的麦子和苞谷的水田里都不够，原坡上的单料麦子根本施不上一次土肥，那麦子长得黄不拉叽的样子，收割时几乎搭不住镰刀，散落在麦茬地里的遗穗就很多了。村子里乡民把这种成色的麦子称作猴毛，把小小的

麦穗称作蝇子洒（苍蝇头），把割这种麦子称作薅猴毛。父亲把一块又一块全是猴毛似的麦子薅过，我紧跟其后用粗铁丝做筢刺儿的大筢子把遗落的猴毛搂起来。至今印象最深的是在离村子最远的称作唐家坡顶的那块地，这是我家在原坡上最大的一块地，大约两亩还多，周边没有一棵树。我拖着足有一米宽的粗铁丝作筢刺儿的大筢子，一筢紧挨着一筢从东往西搂过去，再从西往东搂过来，却也如同为这块刚刚薅过猴毛的猴子梳头又梳身。这个铁丝筢子倒也不太重，拖起来也不太累，关键是坡地上滚动的热浪太难忍受了，火盆似的太阳就在头顶喷火，被晒了大半天的麦茬子热气蒸腾，拖着筢子过去再拖着筢子过来的过程，是被翻来覆去的炙烤。尽管头顶戴着草帽，头皮和脸皮仍然感觉到难耐的烘烤的灼伤，身上和裸露的小腿更不用说了。从家里带来的沙果叶茶水早已喝光，汗水似乎已经淌干流尽，口干到连一口唾沫儿也吐不出，看着还有一大半尚未搂过的麦茬地，有种想哭却哭不出来的无奈。看到远处一块坡地上有一个同龄的伙伴也在搂着，心里似乎有一种安慰，农家娃娃都得做这种活儿，且谈不到劳动的单调和无趣，那时候还不懂这些高雅的词汇，尽管切实地承受着……而当某天晚上和父亲坐在院子里吃晚饭，抓起母亲刚刚蒸熟端到跟前的白面馍馍咬下一口时，父亲顺口便会说，白面馍馍香不香？香。爱吃不爱吃？爱吃。明年搂麦子，再甭嘴噘脸吊的了，搂麦子受苦招架不住的那阵儿，想到吃白面馍馍，你就有劲了……这是我最初接受的关于劳动的教诲。

祭祖

我生活的村子叫西蒋村，解放初仅三十七户人家，村子东头有一条沟，流着清凌凌的发源自原坡上的泉水，供全村人饮水、洗衣，也浇灌小块田地。沟那边有一个东蒋村，更小，不过二十七户人家，村

子之间的距离不足二里路。两个以蒋姓作村名的村子却没有一户姓蒋的人家，我问父亲，父亲说不清楚，问比父亲更年长的老爷爷，竟没有一个人说得清白。我生活的西蒋村几乎全是陈姓，只有两户郑姓的人家。陈姓共有一个老祖宗，我却搞不清老祖宗的大名了，然而，这个陈姓老祖宗当属三十五户陈姓人家的始祖，也当是第一个在西蒋村这块地盘上落脚的人，有族谱为证。

每到大年三十后晌，陈姓的成年男子领着虽然尚未成年却已懂人事的男孩齐聚我家，迎神拜祖。父亲早已把不大平整的上房中间的地面用湿土垫平砸实，清扫干净，把我家那张方桌擦洗得一尘不染，放置到后墙中间开着后门的位置；方桌上已经摆置了蜡台和香炉，还有四盘令人馋涎欲滴的油炸的馃子和点心；那幅族谱——俗称神轴——就摆在方桌上，近乎一丈长，平时架放在木楼上，到此时父亲把它拿下来了。待全村陈姓男人聚齐，由陈姓一位辈分最高年龄最长的老者主持仪式，开首是：点蜡上香。这项指令实际是老者发给自己的，话音刚落，他便拿起点燃的火纸，猛吹一口气，那自燃的火纸便冒出火焰来，老者先点着左边的插在蜡台上的紫红色蜡烛，再点着右边一支，再撮三根紫色的香，在蜡烛上点燃，一根一根又一根插入盛着细沙的香炉，双手抱拳，跪拜三匝，然后退居方桌旁边。在老者发出“点蜡上香”的指令时，侍立在方桌两边的父亲和另一位男子便举起族谱——神轴，缓缓地展开，再挂到墙上。也就在此同时，我家街门外便响起鞭炮的响声，夹杂着雷子炮的震天轰响。侍立供桌前的陈姓男人们，依着辈分的高低，一个一个走到供桌前，从香炉里抽出一根紫香（只有主持的老者上头一道香拿三根），在蜡烛跳跃着的火焰上点燃，双手掬着插入香炉，再双手抱拳举到额头鞠躬，然后跪地三叩首。有领着儿子的人，儿子在他右首照着他的动作做下来。我父亲在陈姓的辈分最低，我自然更低一辈了，轮到父亲朝拜列祖列宗的时

候，已经剩下不足十来个人了（拜过的人都回家去了），我跟着父亲一起鞠躬跪拜，心里顿然也会潮起一种肃穆的感觉。

在我们家祭拜陈氏祖宗的事，据说有两个因由，一是我们家有一幢三间大房，尽管这幢房子已经分为两半，我家和叔父家各占一半，但作为敬奉祖宗展挂神轴却是宽展的，几乎是别无选择的。大约到一九四九年解放，村子里仅仅只有两三幢这种被称作大房的房子，多数村民都住着单面流水的比较窄小的厦房，厦房既供不起长宽都过一丈的神轴，也容不下祭拜的陈姓族人。再一个因由，据说是我爷爷曾经是村子里说话很有分量的人，尽管辈分低，却不影响他说话的分量，由他保存神轴年终祭拜祖宗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爷爷大约在父亲刚刚成年时便英年早逝了，尽管父亲不再具备爷爷说话的分量，保护神轴祭拜祖宗的活动依旧在我家顺延。在我有资格跟着父亲跪拜祖宗不过两三次之后，这幅神轴转移到另一户人家，这户陈姓人家盖起了宽敞的三间新瓦房，而我家的老房子已经漏雨了，积雪融化滴溜的水滴浸洇了神轴——陈姓列祖列宗神圣到顶礼膜拜的族谱——那是不可饶恕的罪孽。在我跟着父亲到这户祭奉祖宗神轴的房子里去跪拜的时候，对祖宗的虔诚已发生自觉，却也因不在我家里而隐隐感到一缕空虚……再没过几年，在破除封建迷信的“大跃进”年头里，神轴——陈姓族谱据说被焚毁了，大年三十后晌公祭的事再没有举办过。我也留下了无法补救的遗憾，搞不清陈姓四辈往上的祖宗，更不知进入西蒋村的陈姓始祖的大名了。

原上有个名叫窑村的村子，乡民多姓陈，是从我们村子迁居到原上的窑村的一户陈姓人家繁衍的族群，每到大年初一，他们搭帮结伙从原上下来，到我家（后来到另一家）祭拜祖宗，原上原下两个村子的陈姓后裔相聚一堂。嘘寒问暖，说收成、谝笑话，其乐融融，我和

那些跟随父亲来祭拜祖宗的男娃子们，已经结伙玩耍了，同宗同祖的血缘，似乎确有某种亲情的天然纽带相系结。

卖菜

白鹿原上的这村那寨和白鹿原下的这寨那村的人家，多有亲戚关系，原上的姑娘嫁到原下或原坡上的某户人家，也多有原下的姑娘嫁到原上某个村寨的人家，亲戚间的往来就很频繁。单就我们这个不足四十户人家的小村庄说，竟然有六七户人家都和原上有这种最亲近的亲戚关系，而我母亲的娘家（我的舅舅家）就在白鹿原西头的五坊村，两个姨妈家也在原上的两个很大的村子。这样，在我尚未懂事也爬不动坡上很陡的土路的时候，据说是由父亲背着我上原，每年正月头上去向舅爷舅奶舅舅舅母拜年。到我能走得动的时候，一大清早起来便跟着父亲母亲出门上路了，从我们村子通舅家的原上的村子有一条斜路，大约七八里，尽管天气很冷，走上原头的时候早已浑身淌汗了。

走上原头的感觉是奇异而又新鲜的。天太宽阔了，直到眼睛所能抵达的模模糊糊的终南山的群峰（那时候尚不知终南山的称谓，当地乡民只说南山）；往北看，对面的北岭（即骊山的南端，同样在那时尚不知骊山的称谓，当地乡民只说北岭），竟然遮挡不住天了；原上一马平川，远远近近散落着大大小小的村寨，无论如何望不见东边原的尽头，便有一种神秘感。我之所以会有这种感觉，完全是我生活的小村庄所在的特定地域造成的。我们的村子紧紧倚靠着白鹿原的北坡，站在村子的任何一个角度，满眼都是熟悉不过的坡坎和峁梁，刀裁一样的原顶遮住了天空，往北看，便是骊山的南麓，同样遮住了天空；在南原和北岭之间，蓝的天或阴的天，永远都是窄窄的一条长绺

的天空，当地乡民自我调侃说，生在咱这地方，一辈子只看一绺绺天。绺绺，通常是说布条的，一绺布条。在我能够独立走上白鹿原的时候，宽阔的天和平坦无边的地让我发生奇异的感觉就不足为奇了。

在我更生动鲜活的记忆，是上原卖菜。

在我考上中学的时候，家庭的经济来源没有了，父亲种树卖树供我们兄弟俩上学，无奈树长得太慢，供给不上两个中学生的学杂费；村子里已经建立了农业合作社，即使劳动有盈余，也得等到年终合作社决算后才能分配，况且多数人家都是倒贴户。我在父亲完全无法可想的困局里，上完初一第一学期便休学了，后来在政府的帮助下复学，却错过了一个年级。记得是在复学读完初一的那年暑假，出现了学生卖菜挣学费的新鲜事，而且很快形成了一股风气。那些和我一样先后考入初级中学的乡村学生，其实大多数的家境相差不了多少，十个有九个都上不起每月大约要花费十元钱的学生灶，都是背着一袋子馍上学，每天三顿都是开水泡馍，伴着辣椒酱或咸菜。即使如此节俭，每学期开学的十多元学杂费仍然成为每个学生家长的重而又重的负担。这一年的暑假，不知由哪个村子的哪位脑门活泛又灵动的学生闯出一条挣学费的生财之道，从原下的农业合作社的菜园里趸下时令蔬菜，第二天一早挑着菜担上原，到原上的镇子上去卖，赚下钱来，到暑假结束便高高兴兴交学费了。我很快就加入到这个刚刚形成的学生卖菜的不大不小的群体中了，心劲颇高，不用再担心失学了。

白鹿原上自古缺水，俗称旱原。无论大村小寨的乡民，吃水是最大的困难，靠人力打下的深井，水多不旺，而且是人力所能挖到的极限深层了。吃水历来困难，种庄稼自不待说是靠天吃饭，每年只种一料麦子，不种秋田，在于秋禾更费水，而当地的气候特征恰恰是十年有九年的伏天都缺雨水，蔬菜就更谈不上种植了。原下人调侃原上人

说，宁可给你一个馍，不舍得给你一碗水。更有甚者说，原上人早晨起来，为节省洗脸水，夫妻兄弟姊妹面对面吐唾沫儿洗脸……原下的一个又一个村庄，门前流着丰沛的灞河清流，每个村子都有引灞河水自流浇灌的水田，还有不少稻地。在个体经营时代，几乎每个村子都有一两户心灵手巧善于抚育蔬菜的农民，便有了收入强过普通庄稼的菜园；到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农业合作社建立后，每个社里都有相当规模的蔬菜种植地块，作为合作社的副业。我们村子就有五亩地种植着传统的韭菜、大葱、蒜苗、茄子、辣椒和刚刚引进的洋柿子（西红柿）等，合作社社员把这些蔬菜挑到原上的镇子去卖。原上人自古以来就吃着原下人种的菜。

我在我们村子的合作社的菜园里趸下时令蔬菜，多是大葱、韭菜、茄子和西红柿，总量一般不超过五十斤，这是十五岁的我挑菜上原所能承受的极限重量。

我和村子里的小伙伴一起挑菜上原。天微明便爬起来挑着装满蔬菜的竹笼出门了，走不过一里平地便上坡，目的地是狄寨镇——我尚不知是用北宋大将军名字命名的镇子，大约十华里远，上原后到镇子还有约三华里平路，上原的陡坡路占过大半。我挑着蔬菜，出村子时尚不觉得压迫，很快走过一里平地开始踏上上原的坡路的时候，那装着蔬菜的两只竹条笼便沉重起来，出气也急促了，汗水也冒出来了，直到肩膀疼痛不堪双脚也难以跨步的时候，便招呼伙伴歇一歇……从出家门到上到原顶，少说也要歇四五回，上到原顶的那一刻，肩头的担子几乎是扔到地上的，当即躺倒在地，汗水似乎汹涌而出，喘着粗气的嘴连叫妈的气力都没有了。然而，心里却是一种成功的轻松，最难的坡路爬上来了。待喘息初定，便拿出用布包着的馍来，肚子也咕咕叫起来，吃完一个馍，便挑起两笼蔬菜直奔狄寨镇了。

狄寨镇街道的两边，任由各种商贩自选位置，先到者便先占得街道中间人来人往最稠密的一方地盘。我选定地盘放下装菜的竹条笼，把各色蔬菜都亮出来，便坐在地上迎接买菜的顾客。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的蔬菜价格，我从合作社趸来的时候，韭菜大约五分钱一斤，大葱一角钱，西红柿七八分钱，挑到镇子卖出时的价格都要翻一倍，开始时咬紧牙关不给购菜者讨价还价的机会，如果销售不顺利，便只好忍痛降低售价了。印象深的事是算账麻烦，那时候还用的是十六两为一斤的秤，买主如果买整数的蔬菜很好结账，如果一斤二斤又带着三两四两，结算就犯难了，我便用小木棍在地上划拉乘法运算，往往惹得那些大叔小婶瘪着嘴笑，逗我说这个“土算盘”算的账准不准？然后才掏出钱来付我。如果卖得顺利，到人去集散的时候卖完最后一秤菜，挑起空笼走出集市的时候，便有一种想喊想唱的快乐；如果眼看着街道上的人越来越稀，笼里的蔬菜还剩下不少，便着慌了，很自然地减价，而且大声呼喊着“便宜了减价了快来买呀”之类的吆喝；如果仍然无人问津，便只好和同样没有卖完菜的伙伴重新挑起菜笼，到镇子周边的村子去叫卖，肯定会贴本儿，这是令人丧气的事。

从初中一年级到高中一年级，每年暑假都是以割草和卖菜为主要劳动项目。原上有三个较大的集镇，各有各的集日，除过一个距家太远的集镇，另两个集镇每逢集日，除过下雨天，我都会挑着两笼蔬菜去赶集，多数时日里都可以赚一元上下的人民币，也有赚不到钱乃至亏本的倒霉事。无论如何，每到暑假结束背着一袋子馍上学去的时候，口袋里装着我自己卖菜挣来的学杂费，是一种坦然，乃至骄傲。有一年卖菜收入颇丰，母亲竟到供销社买来机织的“洋布”，在镇上的裁衣店为我做了一件四兜的制服，我平生第一次穿上了制服。

木板·秧歌

一九五〇年春节过后的一个晚上，父亲把我叫到方桌前，郑重却也平和地说，你明日格去上学。我也不觉得太惊奇，上学的事在年前已经说过不止一回了，只是明天就要走进学堂的时候，还是有一种说不清楚是紧张或是受制约的异样的感觉。我没有说话。父亲接着把一支新买的毛笔递给我，还有一沓写大字的仿纸，说，你跟你哥合用一个砚台。我哥早我两年上学，笔墨纸砚备全，我接过写大字的毛笔。拔下那个竹筒笔帽儿，毛笔的竹竿尖头是一撮紫红色动物毛做的笔头，我当即联想到在原坡上割草时撞见的狐狸尾巴的毛，据说好毛笔都是用狐狸的尾巴制作的，称鸡狼毫。

学校设在村子东头的一孔窑洞里。我们的村子倚着白鹿原北坡的坡根自东向西排列，我家是西头倒数第二家，后门外的坡地却是河卵石和河沙的沉积层，这是不知几千乃至几万年前，灞河曾经流过的河床。村子东头却是黄土崖，不见一粒沙石，村民便在崖根下凿成冬暖夏凉的窑洞。这里的窑洞又高又深且宽阔，里边用土坯垒成隔墙，一家两代乃至三代共住一孔窑内。作为学堂的这孔窑，是村子里有房子住的一户人家放置杂物的闲置的窑洞，提供给乡民作学堂，已经使用许多年了。这孔窑洞学堂容纳着二三十个学童，是我村和东蒋村以及处于原坡上的仅有十多户人家的史家坡三个村子的求学的子弟。请来的教书先生的报酬，由上学的学童的家庭分摊，那时候不论钱而论麦子，大约是解放前国民党纸币贬值得和废纸一样，人们常说背一口袋纸币买不来一口袋麦子，乡民们的交易便是以物易物，无论卖地卖树嫁女儿，都以麦子或苞谷为易物。聘请来的教书先生，也是议定一学季给多少斤麦子，具体给多少，我那时不用关心。

我拿着父亲昨晚交给我的毛笔和一沓写大字的仿纸，拘束而紧张地走进那孔窑洞，在自家的方桌旁的自家的长条凳上坐下来。那个时

候的乡村学堂，没有公用桌凳，由学童搬来自家的方桌或条桌和凳子上学，有的学童的家长约定合用一张桌子，我家的方桌四边可以坐八个学童，我和我哥之外，另有四五个同村的学童共用一桌。

紧靠窗户是一个土坯垒成的炕。紧靠炕边支着一个方桌。桌上摆着一摞书和一摞纸，还有一个插着粗杆细杆毛笔的笔筒，还有磨墨的砚台。先生正襟危坐在桌边的椅子上。先生很年轻，穿一件淡蓝色长袍，正在给学童写影格。初入学的学童先把先生写好的影格垫在仿纸下面，然后按着影格上的字的笔画在仿纸上照写。我不敢到先生的方桌跟前去，由我哥把一方仿纸送到先生桌上，要求为我写一方影格。约略记得是从一到十最简单的十余个字，我把影格铺到仿纸下，模模糊糊可以看到仿纸下的笔画，用蘸了墨汁的毛笔照写起来，尽管横笔不直竖笔歪扭，却总算是我捉笔写出的第一张汉字了。

印象里的先生眉目清秀，却不苟言笑，看去和善的脸上，一旦被哪个学童惹得生起气来，也够怕人的，顺手便抓起摆放在方桌上的足有三尺长的窄木板，抽打那个学童的手掌，打得学童尖声哭叫，他也不会饶恕，说打五板绝不少打一板。我确凿怯惧那把木板，窝着贪玩的野性子，避免了木板击掌的惩罚。我已记不清学习课目的内容，却记得这种延续到一九五〇年春天的老式乡村学堂的格局到秋季就废止了。据说穿蓝袍的先生被政府收编，集中培训去了。人民政府派来了一位新老师，穿着四个兜的干部服，个头高大且粗壮。他到处向乡民申明他是人民教师，要称他是×老师，不许再称他先生；对入学的孩子要称学生，不能称学童了；最让乡民们新鲜的是，这位人民教师的报酬由政府每月发给，不用学生家庭分摊，村民们惊喜地说，娃娃念书不掏钱，新社会真好。

我上学的第二个春天，村子里实行了土地改革，我们村子没有划定一户地主或富农的农户，比我们村子少一小半农户的东蒋村划定一户地主成分的人家，土地和财物被分配给穷人了，作为三合院的坐庄建筑——三间大房，收归为公有，议定为初级小学的学校。这样，一九五一年的下学期，我和同学们就在这幢宽敞的大房子里上课了。教室宽敞了，光线也比窑洞亮堂了，却要出村子跑远路上学了，东、西蒋村之间纵着一道不太高的土梁，梁的两边是两条不太深的沟。那时候一天上三次学，我和西蒋村同学便来回翻六次沟和梁，却也从来不觉得累或苦。也是从这学期起始，教室里有了女学生，都是老师耐着心到乡民家里说服开导，应该让女娃上学识字，女学生逐渐多起来了，还有十六七岁的大姑娘也认字求学来了。

每天下午，这位老师领着我们在农民的打麦场上扭秧歌，双手上下轮换甩动，高过肩膀，三步一跳，左右扭摆腰身，动作不复杂，很容易做到，难的是排列的两队不仅要步调节奏一致，而且两队要互相交叉变换队形。后来老师又教给我们一种竹竿秧歌，因为多数学生家里没有竹竿，老师变通为柳条，我们从灞河滩到处都有的柳树上砍下擀面杖粗细的柳树枝，剥掉皮，是洁白的柳杆，再用红颜料涂成红白相间的彩色。按照老师教的竹竿秧歌的舞步跳起来，仍然是三步一跳，右手拿着的竹（柳）竿合着脚步击打左肩再击打右肩，最后击打跳起来的脚掌。同学们个个都练得认真，跳得满头大汗也乐在其中，尤其是打麦场边有许多男女村民和小孩围观的时候，大家跳得更认真了，吹着哨子伴着节奏的老师也更来劲了。

教育局的管理部门组织了一场秧歌赛，分片举行，原坡地区的初级小学会聚在中心小学，我们的竹（柳）竿秧歌别具一姿，独领风骚，随后被安排到原坡和原上的村子里去表演（还有另外几所学校的

秧歌队）。每有节日庆祝活动，我们的竹（柳）竿秧歌都受邀表演。我大约刚交上十岁，跟着老师和同学，攥着一根磨得溜光的竹（柳）竿，扭遍了原下原坡和原上的大寨小村，兜里装着自家的馍或锅盔，所到之处的村子或学校供给开水，歇息下来便吃馍喝水，依旧劲头十足地扭。

直扭到四年级毕业，在当年考高级小学难似考秀才的升学考试中，我竟考中了。当时学习的情况已经基本无记，只留下竹（柳）竿秧歌的记忆。在我后来到原上或原坡的这村那庄走动的时候，偶尔竟会泛出少年时到这里扭秧歌的情景。

2012年12月17日 咸宁居

回家 回家

祖居的屋院在白鹿原北坡根下的一个小村子里，距西安城不过五十华里。得着路程近的方便，有事要做很快就能回到那个小院，无事也常常想回去便回去了。其实，无论有事无事，就是想在那个曾经生活过五十多年的屋院里坐一坐，到门前的灞河沙滩上遛一遛，似乎心理上的某些亏缺就获得了补偿。这种感受只有在这一方小小的地域才会发生，回家走走就成为永无遏止、永无满足的欲念潜存心底。

近日我又回到原坡下祖居的屋院。车子在愈加稠密的高楼之间的公路上行驶，不觉间便驶上浐河大桥。我的心在那一瞬便发生微妙的变化，顿然亢奋起来，这是走世界上任何一条路、过任何一座桥都不曾发生的一种心理和情绪的反应；更为奇异的是，每次回归老家，车子刚刚驶上这座大桥，我的情绪便发生这种亢奋的变化，几乎没有一次例外。我至今说不准这是一种生理反应，抑或是一种心理反应？我唯一能想到的因由，大约在我的潜意识里，这是我回家的桥，或者说是离我家最近的一座桥，过了这座桥，便进入我大半生都跑跑颠颠于其中的一方地域了。

这条浐河发源自横亘在关中平原南部的终南山，自南向北从白鹿原西坡根下流过，形成一道最适宜人类生存的河川，新石器时代的一个人类聚居的村庄——“半坡遗址”就在河岸东边；晴朗无霾的天气里，站在浐河岸边，可以看到白鹿原西坡上绿树掩映下的白墙红瓦。过了浐河桥不过三四里地，就进入白鹿原北坡下的灞河川道了，北坡上和河川里排列着稠如藤叶似的一个个或大或小的村庄。无论作为乡村教师或基层干部，抑或后来有幸成为专业作家，我在浐河灞河两道

河川和白鹿原上整整跑跑颠颠了三十多年，在进入传统习惯所划的老年年龄区段时进入西安城。在城里待过几年，在新世纪到来的时候，却也难以抑压灞河岸边家园的诱惑，决然一人回到那个祖居的屋院，读书写字，煮一碗妻子在城里擀成藏在冰箱的面条，日落的霞光里到灞河水边的沙滩上散步，不觉间竟有两年……

我后来才意识到，白鹿原西坡根下的浐河和北坡根下的灞河，真是天造地设鬼斧神工的好水滋润着一道好原。我有幸出生在这原下且在这里生活过大半生，先是为这里的乡村孩子教授识文断字，后来组织乡民造梯田修河堤，再用笔叙写对这原这川里的历史和现实的体验和感受，这样的人生经历就很难用通常所说的情感纠结来表述了，反倒是每次车上浐河桥的一瞬所发生的那种微妙的亢奋情绪，才是最真实最准确的难以分清生理或心理的本能性反应，这是在任何地方不曾有过的。

回到祖居的屋院，烧一壶源自村中深井的自来水，三五下清扫了院中走道上的积尘和落叶，坐在院中喝一口茶，在车过浐河桥时发生且持续到开锁进院时的那种亢奋情绪，顿然消失了，不觉间转换为一种沉静，既区别于在城市住室里的沉静，也区别于过去常住这里时的那种沉静，当属重新回归时独有的一种沉静。这种独有的沉静心境也是只有坐在这个小院里才会发生。在城市待得久了，少不得忙忙乱乱，也多有来来去去，有得意也难免懊丧，在走进祖居的屋院坐在小院里抿一口茶的时候，似乎“宠辱”被荡涤得丝毫不留了，任何欲望也都隐退无痕了……这种独有的沉静，就成为回归祖居屋院的诱惑，一种永难满足更难得淡化的念想潜存心底。

随意到村子里走走，就会发现变化，这里原本是两间窄小的厦屋和那边撑立了几十年的破旧漏雨的小安间房的房址上，都建起了颇为

排场的两层楼房，迎面墙壁都是雪白的瓷片，却依然延续着关中乡村传统建筑的格式，大门门框上方镶嵌一方砖雕刻字的立家宣言，既有传统的“耕读传家”，也有时兴的“满院春光”等等。不觉间村子里全建起了水泥砖瓦结构的房屋，那些还保存着的土坯垒墙的破旧屋院，几乎全是迁居本省和外省的人家留存的空院。我总是会被勾起往时的记忆。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之前的十几年间，这个村子只有一户人家盖起了三间瓦房，不仅成为本村人热议羡慕的“高档建筑”，甚至成为连邻村人都纷纷跑来参观的一道景致。这户人家的主人有一个在高寒荒漠做勘探工作的儿子，收入丰厚，这是任何一家农户（公社社员）难以望其项背的。在我能解知人事时所记忆的村子，竟然没有一户拥有三间瓦房的人家，且不说这个小村庄有几百或千余年的历史，自然可以理解村人对这幢三间瓦房的惊羡情态了。即如我这个有干部身份也有固定工资的人，也是挨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才建起三间新房，也就再不用每到雨天便把盒盒罐罐都搬出来接房顶漏下的雨水了……现在，无论谁家盖房建楼，已经不会引发热议，更不会有惊羡的眼光和议论，在于家家都有宽敞的新房了。

我总是想到村前的灞河边上遛遛。走出家门再下一道小坎，便是村人赖以生存的旱涝保收的田地了。在我幼年的记忆里，河川田地有三道灌渠，引灞河水自流浇灌禾苗，如果不是百年一遇的一年两年滴雨不下及至灞水断流的特大旱灾，这方地域的庄稼总有收成。然而，现在的河川里几乎看不到麦子和苞谷苗了，整体变成了樱桃园。村子背倚的白鹿原北坡，凡是可以植栽树木的梯田和坡地，也满是樱桃树了。如果清明前后回家，沿路满眼看到的都是粉白的樱桃花；再过一个月到五月初，坡原河川的樱桃树上都挂满紫红的淡黄的樱桃，西安城里的居民，或扶老携幼或搭帮结伙到原上原下和原坡来摘樱桃，车拥人挤，盛况持续大半月。乡民喜不自胜地说，城里人给乡下人送钱

来了……那一幢幢装潢讲究的两层住宅楼的开销，绝对一个多数是从樱桃树上获得的收益。无论在村巷无论在河川，碰到一位乡党，拉起闲话便说到樱桃，两棵樱桃树的收入超过一亩地麦子的价值。用乡党的结实话说，只要不是瓜（傻）子，谁都会算这笔账，自然就不种麦子苞谷全种樱桃了……我几乎每年五月都会上原摘樱桃，既为品尝这北方第一料成熟的鲜果，更在看那些乡党往钱袋里塞钱时生动的喜悦脸色……

这是冬天，我又漫步在灞河边上，冷风飕飕，河水清透见底，我的心里愈加沉静。我走过一些名山大河，多是以观赏的眼光去看的，新鲜的惊喜是自然发生的，也曾把那种感受诉诸文字。然而，那些感受完全区别于面向眼前这条灞河的沉静心态。这是家园。回归家园所发生的沉静心态，是在家园之外的别处不曾有过的。

哦，我的家园。

2013年1月20日 二府庄

闲心一例

手机的诸多功能中，每天下午定时有一次第二天的天气预报，一看便知晓明天的阴晴雨雪和风力风向。每每看到手机上天气预报，总是会和当下的农时农事相照应，这几乎是一种本能性反应，自然难以回避。尽管我现在生活在城市好多年了，早已与农事无涉，即如俗话说的天旱雨涝已经不影响碗里的稀稠乃至有无的城里人了。然而，天气状况于农事的有益或有害，依旧是敏感到某种本能性的心理反应。

去年冬天到今年初夏，关中地区没有下过一场透雨，天气预报的几次小雨，果真也都是仅仅打湿地皮的雨丝。报载驻军向云层打炮，以期雨点能降得大点儿密点儿，却收效甚微。这样，关中地区尤其是人口和车辆密集的西安城里，浮尘笼罩，空气干燥，以致患呼吸道疾病的人骤增，城管部门采取应急措施，增加洒水车多多洒水，似乎仅仅弥补于万一。盼雨盼雪已形成一种市声，熟人见面握手之后便慨叹天气太干燥了，太难受了，老天爷瞪着眼把雨雪忘记了。我听着这些话，也有同感，然而几乎同时想到的，却是麦子生长会遇到灾害了，关中平原有水利设施的地区可以及时冬灌，而整个渭北高原缺失水源的麦田，肯定影响小麦的分蘖，也影响收成的多寡了。即如我的家乡白鹿原，自古都是靠天吃饭，近年间借靠各方援助凿打深井，仅仅只是解决了乡民吃水难题，小麦收成的丰歉仍旧依赖雨雪的多少和及时与否。

大约是三月末四月初下了一场小雨，熟人见面握手之后，不约而同以欢悦的声调庆幸好雨降下。我也感受到春雨滋润的舒服，同时泛起于心底的话语还有，这场雨对小麦返青真可谓及时，所产生的经济

效益无法估量，说一滴雨就是一枚钢镚儿也不为过。然而，我随即又生发一种矛盾心理，这场雨对正在开花授粉的樱桃却是灾害。白鹿原西头的原上原坡和原下的灞河河川，已经变成樱桃园了，乡民受益于这种每年第一料成熟的鲜果的好价钱，不种小麦不种玉米全部栽植樱桃了。三月末四月初樱桃开花，最担心雨或雪降至，乡民称为雨水灌花，不能完成授粉，影响产量乃至绝收。对小麦是及时雨，对樱桃却是倒霉不过的灾。前不久我和几位朋友上原摘樱桃，乡民说今年樱桃挂果不及往年，就是那场雨灌花招的祸。

预报的天气变化对农事的有益或有害，我往往会言不由衷溜出口来，朋友偶尔听见会显出惊讶，你老兄还操那闲心干啥！我自知操这份闲心什么意义也没有，然而却无法不发生这种反应。我其实也清楚，只是由来已久，根深蒂固。大约在我略知人事的少小年纪，便常常听到的是村人乡党对阴晴雨雪的话语，天旱得久了，村人见面就哀怨天气，老天爷真是要收生了哇！“收生”是说饿死人的意思。在我刚入中学的一九五六年，六月初麦子黄熟收割时节，关中出现百年不遇的连阴雨，直下得麦穗里的麦粒冒出淡黄色的嫩芽来；麦田里被雨水浸泡得稀软的土地脚踩不住，无法收割，乡民徒叹奈何，眼瞅着到嘴的麦子统统被毁了。之后直到第二年收割麦子的整整一年时间里，几乎家家户户一天三顿都是苞谷馍馍苞谷稀饭和苞谷面做成的俗称糨糊的搅团。天旱雨涝的灾难性记忆，是从略知人事的幼年便铸就了的。乃至成年后到公社（即现今乡或镇）工作，纲领是“抓革命促生产”，革命多指一个时段的中心运动，生产却是年年重复的夏秋两料麦子和苞谷的播种、管理和收获。上述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下得麦穗上的麦粒发芽的霏霏霪雨，在夏季的关中地区确实少见，而伏天的干旱却几乎年年发生，差异仅在干旱的程度。这样，麦子收割完毕，一边碾打，一边及时抢种苞谷，此时如有透雨落下，乡村里便涌起播种苞谷的紧

张、欢快以及庆幸的声浪。然而，这种天遂人愿的好事不常发生，一天连着一天的晴天大日头，把土地晒得裂口，有井水和引灞河水灌溉的水田，引水浇地再播种，而白鹿原上和原坡地区便只好仰天叹惋了。这个时节，我和公社干部分头跑到各个村子，督促抓紧抗旱播种，甚至白天晚上轮流浇水，所谓人歇水流不断；偶尔还会发生两个村子争水的群殴事件，我得去劝架去调和；矛盾解决后，双方干部握手言和之时，常常会调侃解嘲一句，老天爷要是有一场好雨，啥纠纷都不会发生……作为分管生产的干部，粮食生产的丰或歉，成为年复一年常悬于我心头的一个大事，而获得丰收至关重要的先决因素便是风调雨顺。这种对天气变化的关注，久而久之，就形成某种本能性的心理反应。

进城多年了，自身既不再赖土地生存，也远离农事工作岗位很久了，而对于天气变化的本能性心理反应，却依旧发生；尤其是对一些灾害性的气候异变，甚为敏感。自己明白这是操闲心，自忖也算不得乡村情感，不过是乡村生活残留在心底的一缕本能的“结”吧。虽于农事无补，亦无害，倒是由此而常常让我忆及乡村田野四季色彩的生动……

2013年5月27日 二府庄

文盲体验

每逢报纸或刊物的编辑电话约稿，如若我能应约，断话之后不久，随即就会收到那位编辑通过手机发来的信息，告知他的电子邮箱。我当即再拨通他的电话，颇为抱歉地告知对方，我至今不会使用电脑，自然不会有电子文本，我仍然依赖一支钢笔一张稿纸作文……末了往往忍不住自我调侃一句，我还停留在“半坡人”时代……

我之所以自比半坡人，虽不无自我调侃的意味，却也是真实的感受。六七千年前，在我的家乡浐河岸边的半坡村，生活着一群已经能够种植稻谷也能捕鱼亦能建造房屋的真正的人，且形成一个颇具规模的氏族聚居的村落。对照今天业已机械化和电器化了的浐河岸边的乡民的生产和生活形态，看到半坡先民粗放的耕作和简陋的坑凹式房屋，任谁都会顿然感知六七千年前时空距离的遥远，也会感慨先民生产和生活形态的艰难和落后了。我在面对业已普及了的电子文本时，想到自己所依赖的钢笔和稿纸的劳动方式的落后，便联想到家乡的半坡人……

如果说这种自比多属调侃难免夸张之嫌，而文盲的体验却是真实确切的。曾有不多的几次出国观光机遇，无论欧洲无论亚洲某个国家，走在街道上住在宾馆里，路边的匾牌和墙上的图片文字，连一个也认不出来，我的直接体验就是文盲了；每次收到国外寄来的函件，大瞪双眼认不出半个字来，又是一种文盲的体验和感受；尤其是看到自己作品的外文译本，连自己的名字也辨别不出，文盲的体验更是别有一番滋味。每当这种时候，我的心底便会浮泛出沉积已久的意象，一位老头儿或老太婆走进我的乡下院子，从口袋里掏出一封信，那是

他们的儿女或亲友从远方发给他们的，让我读给他们听，往往还会随口抱怨自己是不识一个大字的“睁眼瞎子”，似乎比文盲更具象化。我在给他们读过信后，却也不太在意，乡村里不识字的老年人不在少数，司空见惯，不以为奇。只是怎么也想不到，我在面对外文文本的时候也变成了“睁眼瞎子”，我也拿着国外寄来的函件求助着外国语学院的老师。听着外语老师为我读解信函的时候，我就觉得自己和家乡村子里求我读信的老头儿老太婆一样的文盲了。

然而，如上几例和外文纠葛的事，毕竟为数不多，而要求提供电子文本，却几乎是所有约稿编辑谈妥稿件之事最后都有的叮嘱，或口头或手机信息。这样，我便一次又一次地向对方说明动不了电脑也发不了电子文本，只能提供文字文本，需要他们劳神费事再转化为电子文本，很自然地便说出抱歉的话来。而在抱歉的话说着的时候，心底便会浮出文盲的意象。因为经常有电话约稿，也常有出版社编辑依某种新视角重新编辑出版旧作小说或散文集，我的文盲体验便时不时地反复发生，半坡人的自我调侃大约是一种本能的解脱方式。

电脑刚刚兴起时，有朋友很诚恳地向我介绍用电脑打字省时省力出效率的诸多优长，我竟毫无感觉；直到电脑完全普及的当今，我几乎没有一次动过用电脑敲字的念头；常有热心朋友劝我用电脑写作，说现在的电脑很好用，又举出多位与我同龄甚至比我年长的作家早已使用电脑敲字的范例，意在解除我因年龄已高的心理障碍，我依旧不听善意，毫无动心。过后偶尔也发生自问，为啥对电脑敲字这样优越的写作工具写作方式不能产生兴趣，连自己也说不出一条因由。

我依旧是一支钢笔一沓稿纸。那些报刊或出版社与我打交道的编辑，在得知我不能提供电子文本只有文字文本的时候，都很宽容大度，连连说着没关系的话，且爽快地告诉我由他们来解决文字文本转

化电子文本的事，我便在说着抱歉的话的同时，意识里又出现了文盲。偶有一次颇为难堪的意外，我给一位曾经打过交道的杂志编辑邮寄约写的稿件之前打电话告知此事，不料对方却说该刊物已经不再接收文字文本，让我把文字文本转化为电子文本发过去。我只好再求助于人，在我把文字文本交给一位会敲电脑的朋友时，文盲的体验尤为逼真。

我也不止一次想过，对于省时方便又出写作效率的电脑为什么没有兴趣，竟一时两时也说不出因由。曾经听说某位拒绝使用电脑写作的作家说过，他面对电脑很难进入形象思维，只有握着钢笔面对稿纸的时候，他意念里的人物和场景便生动起来。我没有摸过电脑，也就难以验证同类感觉。有一点倒是真实无误，我从来没有摸过电脑，似乎没有摸它试它的一丝兴致。这样，我便想到生理因素，大约缺失一根对机械敏感的神经，倒不是握着钢笔执意要坚守什么；这种难能改易的先天性缺陷，在我面对一次又一次电脑电子文本的要求时，反复发生的文盲体验就难以避免了，自我调侃的半坡人也就是很自然的比拟了。

偶尔也有令人动心的一刻。某位熟识的编辑在约稿话题完结之后，突然提出一个要求，让我把手写的原稿寄去，不要复印稿，申明因由是有收藏作家手稿的嗜好，况且如今作家的手稿很少能遇到了，我在答应的同时，心头顿然掠过奇货可居的欣然，自然不是文字内容的奇，而是手写的钢笔字成为少有的奇货了。欣然之情稍纵即逝，随之又是文盲的体验……

2013年11月9日 二府庄

神秘神圣的文学圣地

我第一次和陕西作家协会发生联系，诱因是文学刊物《延河》，这是一九五七年我读初中二年级发生的事。我在语文老师车老师的自选题目的作文课上，写了平生的第一篇小说《桃园风波》，时年十五岁。之后的某天早晨上早操时，车老师到操场上来找我，示意我跟他走。我心里不无忐忑，会不会哪儿出了错被领去训斥，尚未走出操场，车老师的一只手搭在我的臂膀上，这个亲昵动作且不说让我受宠若惊到有些慌乱，倒是瞬间便化解了犯错受训斥的疑虑了。车老师却不说话，领着我走进语文教研室。

刚刚踏进语文教研室，看见四五位男女老师坐在自己的办公桌前，突然听到他们接连说出两三个怪里怪气的人名，顿时爆发出哄堂大笑，我顿时被吓得蒙住了。引发他们哄笑的三个人名字，是我在作文本上写的小说《桃园风波》里的几个人物的绰号。我那时刚刚读过赵树理的几部小说，他的小说里的人物大都有一个别致的绰号，正在热衷到崇拜赵树理的我，很自然地也为我写的第一篇小说里的人物起了绰号。能引发几位语文老师的开怀大笑，可以见得那几个绰号还有点意思吧。这是我事后的估计，当时却愣着蒙着站在教研室里动也不敢动了，车老师随即把我叫到他的办公桌前。

车老师告诉我，西安市要搞一次中学生作文比赛，要求每个学校推荐两篇作文，一篇叙事文，一篇议论文，本校语文教研室已选定《桃园风波》作为叙事文参赛。这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令人鼓舞的事，姑且不赘。说完这话，当我准备离开之际，车老师又接着说，他想把《桃》文投寄给《延河》。我又是发蒙。车老师料知我对此举的

无知，当即解释说，《延河》是省上办的文学刊物，发表小说诗歌散文等文学作品。我听得似懂非懂，却是随车老师觉得怎么做就做吧。车老师末了又说，你的钢笔字不大行，我另用稿纸抄一份寄去。我当时尚不会说感谢之类的话，依旧站着。车老师用稍低的声音又对我说，要是能刊登，会有稿费的……

我便知道且记住了《延河》。当时的省作家协会叫什么名称，我已无记忆，却一直记着《延河》，也大略知道了投稿；如果稿子能发表，会给稿费，第一次听说写小说能挣钱。我后来想到，车老师最后说给我的“会给稿费”的话，大约不是诱惑，而且出于怜悯，我到城里读中学的两年里，一日三餐吃的是开水泡馍，相伴的是咸菜，绝大多数时月里用开水泡的是死硬死硬的苞谷面馍……如若车老师说的话能落实，我就可以吃上白馍了。尽管此事再无下文，我却记住了《延河》。

一九五九年春天读书到初中最后一学期，我已转学到离家稍近的东郊一所中学，从学校的阅报亭的某种报纸上看到一条消息，柳青的长篇小说《创业史》即将在《延河》连载。我此时已经知道陕西的包括柳青在内的几位大作家，却没有读过他的作品。随之到学校附近的邮局探问是否有《延河》零售，得到肯定答复，我便把家里给的买咸菜的两毛钱存在口袋里，随后便买到了柳青的《创业史》首发的《延河》。那时尚不能称《创业史》，名为《稻地风波》。第一次发表的是《稻地风波》的篇幅不小的《题叙》，一读便入迷了。之后每月盼到《延河》在邮局首发的日子，我便买回一本，迫不及待地在宿舍阅读起来。我的崇拜不知不觉间从赵树理转移到柳青，且不说两位作家作品的各自优长，单是把《稻地风波》对关中生活语言艺术升华的魅力，就令我倾倒入迷了。我也是从《延河》的版权页上得知，这是陕

西作家协会所办的文学刊物，在西安建国路。随之在《延河》上读到杜鹏程、王汶石的小说，我对柳、杜、王的崇拜便形成了。崇拜情感里便隐约着神圣，文学的神圣，有柳、杜、王等令我崇拜的大作家坐镇的陕西作家协会，也有了神秘亦神圣的文学圣地的感知。

再次和陕西作家协会发生关系，已经是十多年后的一九七二年末或一九七三年初了。文学朋友徐剑铭给我写信，告知一条重大新闻，“文革”中被砸烂的省作家协会开始恢复工作，不许沿用作为旧名称的作协，改称为“文艺创作研究室”，坐镇的仍然是获得“解放”的柳、杜、王等老作家和老编辑。刚刚开过一个以工农兵业余作者为主体的会议，要出版的文学刊物《陕西文艺》实则是《延河》的代称，《延河》作为“封资修”的标本不许再用。编辑们向参会的业余作者约稿，徐剑铭在应诺自己写稿之后，向主持人推荐了我，随后又把我在《郊区文艺》上发表的散文《水库情深》送给《陕西文艺》的编辑。我很感动徐剑铭的推荐。不久就接到署名路萌的来信，内附《水库情深》的用红色钢笔修改多处的稿子。此稿发表在《陕西文艺》试刊的第一期。手里捧着印着我习作和名字的《陕西文艺》，终于在“《延河》”上露面了，兴奋之情无以言表。尽管手里捧着的是《陕西文艺》，心里浮现的却是《延河》……想来颇有趣，给《延河》的两次投稿，均非我为之，一次是我的语文教师车老师，一次是文学朋友徐剑铭，真可谓良师益友。尽管我尚未踏进过陕西作家协会的大门（此时已改称陕西文艺创作研究室），然而似乎已经消解了那种不无神秘的距离。

第一次走进作家协会的大门，约略是一九七三年的春末。我借用在郊区党校参加一个学习班早起晚睡的时间，写成一篇万余字的短篇小说《接班以后》，投寄给《陕西文艺》，不久便接到电话，对《接》基本肯定，还有一些需要修改的意见，我便利用到城里开会的

机会，第一次踏进作家协会的大门。不过不是原本的陕西作家协会的大门，而是陕西戏剧家协会的大门；陕西作协设在建国路的大院，据说被什么军管会占据，刚设置不久的陕西文艺创作研究室，被安排到东木头市的陕西剧协院里办公。在我意识里没有差别，见到《陕西文艺》的编辑，就算进了陕西作协的门了。记得当时给我谈修改意见的是已经在电话上说过话的路萌，随之又见到了董得理，肯定地告诉我，将在第三期《陕西文艺》刊出，免不了鼓励性的好话……这是我平生发表的第一篇小说。此后，已经记不得那年那月，我再到《陕西文艺》编辑部去说什么事时，老董拿出刊有我《接》文的刊物，小说的第一节有不少修改的字迹，老董让我一处一处看过，最后才神秘地对我说，这是柳青修改的。说他和编辑部的人去看望病中的柳青，带去了新出的《陕西文艺》，随之又得到柳青修改的文本。我在那一刻有点迷茫，这是意料不及的惊喜所发生的反应，须知我自初中三年级读《创业史》起直到那个时候，柳青如大山一样在心里崇敬崇拜着，却没有单独拜见的机缘。看着柳青对《接》第一节的多处修改的字迹，那种崇敬崇拜的心理又注入一种亲近的情感。

新时期伊始，陕西作家协会回归自己原有的建国路大院，陕西文创室的名字和“文革”一起被废弃了，堂堂正正的陕西作家协会的白底黑字的牌子挂在大门立柱上。《陕西文艺》也自然地终结了，《延河》重现其本真的风采。我已记不准何年何时踏进建国路的陕西作协的大门，却无可怀疑的是去得比较频繁了，或是送新创作的文稿，或是应召到此开各种文学话题的会议。难忘的一件事，发生在一九七九年初夏，我已经从公社（即今时乡镇）调动到西安郊区文化馆，比之事务杂乱的公社，到文化馆读书写作的时间太多了。我的一个短篇小说《信任》在《陕西日报》发表，王汶石当即给《人民文学》前来向他约稿的编辑向前推荐转载，这是向前见到我的时候告知的。之后一

两日，我到《西安晚报》参加一个座谈会，在门口遇见也来参会的杜鹏程，一见面就说，你的《信任》我看了，写得挺好。王汶石和杜鹏程都是我久仰的老师，高中时我和三四位喜欢文学的同学组织了一个文学小组，曾经在课余时间到学校旁边的灞河沙滩上反复讨论他刚刚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短篇小说《沙滩上》。两位前辈对一个后来者的习作的关注，其文品人品的高尚就成为我的直接的情感记忆了。

刚交上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因行政区划变更回到离家更近的设在灞桥镇的灞桥区文化馆。不过一年多时光，我得知陕西作协党组决定调进包括我在内的三个青年作家，到专业创作组搞创作。能有幸进陕西作协大院搞专业创作，在我自有不胜荣幸的欣喜，却也潜存忧虑，万一创作难再发展提升，坐在那个专业位置上的滋味是很别扭的。在我刚刚得知这个消息不过几天时间，西安市文联一位素未谋面的领导驱车来到灞桥文化馆，见面握手之后便直言相告，要调我到他供职的市文联去。尚未等得我表态，他又直言不讳地说，他已经得知省作协要调我去的消息，当即和相关领导交换意见，要调我去他那里。我也当即表示不愿去他那里。他听后呵呵一笑，说他早预料我的这种态度。接着说，他已经给人事局交办过了，不许放走我；说我既不愿去他那里，也去不了省作协。我第一次和他见面，却被他的坦白直率的性情所折服。便随之回话，那我待在文化馆也挺好。我说的倒是真话，调回到灞桥区伊始，区委领导在一次干部大会上宣布各个部门干部任职的时候，任命我为文化局副局长兼文化馆副馆长，并作出特别例外的规定，让我只参与文化局和文化馆的大事议定，不安排具体工作，把主要精力投到写作上。我曾经很感动，有这样关心一个作者的党政领导，在我是幸运的，其实我和专业创作没多少差别。我对这位初次见面的坦率无掩的市文联领导竟无抱怨，反倒觉得在文化馆不会

产生到作家协会写不出东西的心理压迫。这样，我便心安意静地在故乡灞桥古镇上继续着读书和写作。

时光不觉间匆匆过去近两年。秋末的一个晚上，一位在灞桥区委工作的老同学到文化馆来很高兴地告诉我，市上要求下属区县为市上推荐两名年轻的备选干部，本区推荐的人中有我。他向我祝贺，无疑是一个难得的提升的良机。他走后我却陷入慌乱，早已确定以写作为主业的我，根本不想再回到行政部门。我担心一旦一纸调令下达就麻烦了，当即决定到省作协通报此事，原先要调我到作协的事还有效么？第二天一早便乘公交车进城，找到时任作协秘书长的王绳武说明原委。王秘书长很热情，又说了他到市人事局调人遭拒的事，一时似无良策可循。意想不到的幸运随之到来，记不得哪位朋友道出一条途径，说王汶石的老师大作曲家张寒晖的夫人是市人事局局长，可找王汶石给其说说话或写封信。王秘书长当即找到王汶石老师。果然，此事很快就办妥了，我在当年十一月调入省作家协会，安排到专业创作组从事写作。我进入意识里早已储存着的神秘神圣的文学圣地了。

这无疑是我最理想的人生位置，也是后半生的位置。在我过去不敢设想现在确已进入的这个位置之后，欣喜之情很快过去，原有的压迫感占据了意识和心理的主导位置，挂着专业作家的牌号，不要说写不出作品，而是说写不出好点的作品，那样的日子将会不堪设想怎么过。我自然会想到年龄，正好年过四十，勉强还被称作青年作家；再说自家底细，缺失正规的高等教育，依靠自学获得的知识难免残缺；我不能再耽误时间，既想抓紧写作，又需要继续学习弥补先天性知识空缺……大约在跨进省作家协会大门的同时，便决定回归原下老屋，那是一个清静的所在，有利于读书，也有利于回嚼曾经经历的生活。

我从此就回到白鹿原北坡下灞河岸边的祖居的小院，不觉间竟有十年……

2014年3月31日 二府庄

不能忘却的追忆

走进小岗村

至今依然记得，六年前的清明节刚刚过去，我随中国作家访问团走进安徽省小岗村时，心情很不平静。这个小小的小岗村，悬在我心里足足有三十年了，今日终于得着机缘走进来了。

我说小岗村悬在心中三十年，不是夸张。三十年前的一九七八年，秋末冬初，我从一场规模很大的修建“大寨田”的会战工地上下来，调进区文化馆这种比较轻闲也更显松散的文化单位，已经基本确定要把文学创作作为主业的人生志向。桌子上、枕头旁摊开着契诃夫和莫泊桑的书，而睡梦里常常冒出我在平整土地或是修筑防洪河堤工地上的这事那事，一时尚不能从我在人民公社（即今乡镇）工作过整整十年的感觉里调整到这安静的书桌上来。大约就是这个时候，我听到私下里窃窃议论着的一个小道消息，说安徽省已经在农村实施包产到户的“大包干”政策了。直白说来就是“分田到户”了，再透彻说来就是恢复到上世纪五十年代农业合作化之前的单家独户种庄稼的形态了，习惯称呼为“单干”。这个小道消息不胫而走，不仅在农业这个系统工作的人议论纷纷，不仰仗土地吃饭的城里人也纷纷热议，对生活在公社体制下的农民的心理瓦解更是不言而喻的。我那时候尚不知道小岗村，窃窃私议发展到沸沸扬扬的小道消息，只是笼统地说着安徽，有的说正在搞“大包干——分田到户”的试验；有的说是农民自发搞“分田到户”，安徽省官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默许农民的越轨行为；还有的说法很夸张，安徽省已全面推行“分田到户”了……之后不过两三年，小道消息已经作为中央一号文件下达了，“农业生产责任制”在

全国农村实行。我也曾作为落实“责任制”的工作组成员驻到渭河边一个村子里，让农民把生产队饲养室的骡马和黄牛牵回家去，把大块土地切割成一条一块划归一家一户……那时候，我记住了小岗村。这个向中国农村近三十年的集体化体制——从农业生产合作社到人民公社——发出挑战的小岗村，引发了随后被称作“农业生产责任制”的堪称翻天覆地的伟大改革。

在小岗村村外的田野上，我们一行来到一座别致的展览馆门前，上书“大包干展览馆”。我看到这个名称便怦然心跳了，及至走进展馆，在看到那幅被放大了的秘密盟约时，竟有一种屏息的感觉。秘密盟约仅有两三行文字，即要搞分田到户的“大包干”，上面有这个不足二十户人家的生产队的十八个干部和社员的签名，而且每人都按上了自己的指印。我反复默读着那几行简短的文字，久久凝视着那十八个签名和指印，心中涌起的是一种神圣的景仰。秘密盟约最后一句文字申明，如果此举暴露而招致某人坐牢或杀头，其子女由所有签名者共同帮助抚养到十八岁。这无疑是一个生死盟约。生死盟约的十八个结盟人，在签写自己的名字再按上手印的那一刻，都有了坐牢乃至杀头的心理准备。而能促使这个不足二十户的小村庄的十八户当家男人豁出命来要搞土地“大包干”，任谁都会想到他们的光景怎样难以为继……姑且不评说其精神和意义。

我的眼光最后停驻在“严俊昌”的名字上，他当时是小岗村的生产队长，秘密联盟是他一手策划的，由他亲自向各家各户的男主人征求意见，获得呼应，就形成了这个堪称共生死的约定。任谁都会想到，一旦“大包干”的秘密盟约暴露，首当问罪的肯定就是他严俊昌了。任谁也都会想到，小岗村一旦分田到户，土地分割成一块一绺，一家一户的男女主人在自家分得的田块里耕耙、播种、除草，与集体化的大

帮人群劳动的场景相对照，不几天秘密盟约就会大白于天下，这是无法掩盖更无法保密的事。严俊昌难道连这样简单的事都会马虎吗？显然不会。这就让我想到，明知遮掩不住却仍然要做，就是冒死心态了。看着秘密盟约上严俊昌的名字，我的心里已经泛溢出伟大的感觉。

见到这位伟大的农民严俊昌，是在第二天的座谈会上。一张方正的脸，一双明澈的眼睛，还有尤为突出的大脑门，头顶是基本全白的头发，我便看到一个睿智却也更为坚实的形象。他已六十六岁，我看到他的服装，是质地不错的西装，当属今天的农民普及了的服饰，我在欣慰的同时，更多的是恍如隔世的感慨。

我们村的安徽菜贩

自进入小岗村，或许自下火车踏上安徽省的大地，我的脑海里便浮现出一个安徽人来。掐指算来，竟然是近五十年前的事了。

这是习惯上称作“三年时期”的一年，即一九六〇年。我正读高中一年级，某个星期六从学校回到家里，在村子里遇见一个挑着空筐的陌生人，看样子是刚刚在集市上卖完菜归来。我也不大在意，村子里有陌生男女过往是常有的事。而这个挑着空筐的陌生人连连和我的两三个乡党打招呼，而且是一种让我听来十分生涩的外地口音，让我难免好奇，便问和他说话的乡党，这是哪里来的菜贩子。乡党随口说是安徽人，又着重加一句，难民。

我随后就知道这是一个不远千里从安徽逃难来到我们村子的难民。据说他先找到我们村子的主事人——党支部书记和生产队长，想从我们生产队的蔬菜地里趸菜卖菜，书记和队长都同意了。据说俩人

同意接纳这个安徽人的因由基本一致，于公事说，生产队每天可以少派一个赶集卖菜的劳力。顺便说明一事，自从实行农业合作社以来，我们村这个独立生产队就开辟了一块七八亩的蔬菜种植地，种植时令蔬菜，春夏有韭菜、菠菜、茄子、大葱、洋葱、豆角、西红柿、芹菜、辣椒、大蒜等，秋冬有白萝卜、红萝卜、白菜、冬葱、香菜等。少量给社员分配享用，主要是给生产队增加收入。我们村周边的河川和白鹿原上有三四个规模大小不等的集镇，几乎每天都有逢集的镇子可以销售蔬菜，生产队每天都要派出六七个甚至十多个社员挑着各种蔬菜上原或过灞河赶集去卖菜。这个安徽人从菜园里趸买了蔬菜，生产队每天就可以节省一个卖菜的劳动力了，但也不能不说我们生产队的当家人对这位安徽“难民”的恻隐之心。这个安徽人便在我们村住下来，每天傍晚从集镇上卖完菜回来，马不停蹄直接进入菜园，趸买两筐各种蔬菜，第二天一早就挑着菜筐赶集去了……他竟然在我们村子一住就是四五年。

我约略了解他，是在他到我们村不久的那年暑假。我从学校放暑假回到家中，几乎每天都能看到这个早上挑着装满蔬菜的竹筐出村、傍晚挑着空筐回村的安徽人。我家门前不过三五十步就有一面小坡坎，坡坎下有一孔年代久远的窑洞，曾经是我家隔壁一户人家的磨坊，一个圆形的石磨盘，两块同为圆形的磨石，曾经是村民磨麦子的好去处。不知何年何月窑洞的后壁发生坍塌，便没有人再进这孔危窑磨麦了。多年过去，尽管这孔危窑再没有发生坍塌，却也没人来磨麦了。这个安徽菜贩就住在这孔废弃的窑洞里，他每天出门卖菜、傍晚回来，都要经过我家门前。暑假里我可以参加生产队劳动挣工分了，每逢阴雨天不能出工，便有同村伙伴相约打扑克，往往选中这孔窑洞。阴雨天安徽菜贩也不能赶集卖菜，就只好待在窑里。我曾和他聊天，他尽管姿态很谦诚，却总是不多说一句话。我其实也就问一些无

关痛痒的话，譬如，你跑这么远路到我们这儿来买菜卖菜，何不在自家村子做这买卖？他大约支吾着说，他的老家生意不好做之类的话；搪塞一下。我大约也问过这样的事——你一年四季不在生产队出工劳动，生产队会允许你出门卖菜给自己挣钱吗？会不会扣下分给你的口粮？他依旧支吾着说他们那里的生产队管得不严，可以外出，不指望生产队分粮了。我之所以会问这些，是依着我们当地的政策戒律产生的疑问，当地的农业生产队不允许社员私自出门做任何为自己挣钱的事，如有违犯，就不给他乃至全家人分配口粮。我仍不死心，又把曾经听说他是逃难的"难民"的话题提出。他没有否认，却仍然支支吾吾着说是先遭旱灾又遭水灾，颗粒无收……我大体相信了他的说辞，那时不仅安徽省遭灾，整个中国已经陷入"三年困难时期"，自然灾害是一个重要原因，我们村子也陷入饥馑年月，瓜菜代食，谷糠充饥，且不赘述。

二十多年过去，这个早已被遗忘的安徽菜贩，突然在某一天从记忆深处浮现出来，竟让我惊讶半日。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某日，我到区上开会，主题是学习和落实中共中央一号文件，即在全国农村实行"农业生产责任制"。会上放映了一部中国农村发展现状的资料纪录片，其中有一组镜头是拍摄"三年困难时期"安徽省某些村子的景象，整个村庄已人去村空，村子中的道路上长满荒草，一个特写镜头映现的是一户人家围墙里的秆状野草，竟然长到高过围墙高过围墙里的房子的窗户，快要接上房檐屋瓦了，这样荒芜的屋院连成一片……低沉的解说词告诉观众，村民全部逃荒要饭讨活路去了，尽管没有说饿死人的事，观众大约都会想到这是不可避免的。我在看着那一组令我惊诧的惨景时，突然想到毛泽东的两句诗——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这是毛泽东在得知消灭了血吸虫病的喜报后乘兴写下的七律《送瘟神》中的两句。他老人家大约怎么也想不到，血吸虫病造成

的那种惨不忍睹的景象，几年之后又在中国乡村出现了。自然灾害是一个因素，更重要更直接的因素当数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是乡村不识字的乡民都明白的事……我在看到安徽乡村村巷和屋院里的荒芜景象时，就想到那个安徽农民，甚至想象他也许就是纪录片中某个院子的主人……

我已不记得这个安徽农民的名和姓了，却还有他的粗略印象，大约四十出头，中等个头，扁平脸膛，光头，那双眼睛从来也未见过怒色。他和村子里的人碰面，点头说一句客气话便不停脚步地走过去了。他傍晚在菜园里选购几种蔬菜，需得淘洗的就在地头的水车井边淘洗干净，再挑回那孔窑洞，第二天早晨便挑着装满蔬菜的两只竹筐上原或过河赶集去了。他的这种营生持续了四五年，和我们这个不足五十户人家的小村子的男女老少都再熟悉不过了，却突然在某一段时日，村人发现这个安徽人不见了，似乎缺失了什么，互相打问他的去向。他是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某一天悄没声息离去的，据说是包括我们村子在内的地区即将开始搞"四清运动"的诸多传闻风声鹤唳，"三年困难时期"稍得宽松的农村政策又收紧了，阶级斗争的锋芒又显露了，安徽人胆怯了，溜走了……我和村人一样不大在意他的离去。现在在我看到纪录片上那些长满荒草的村巷和屋院时，不仅想到这个安徽菜贩，而且很自然地想到他的家庭，他的父母妻儿到哪里去了，我尽管不敢猜想他们的结局，却不由得心里发冷。

看着严俊昌领头搞的秘密盟约，及至第二天见到已着西装的严俊昌本人，我都想着那个安徽人。前者冒死联名密约分田到户，后者隐身逃难到千里之外的村子里贩菜谋生。他们在生存危机来临时各自选择了求生的途径，也让我加深了对他们的理解，尤其是对严俊昌这位伟大的农民。

惊天动地“万言书”

在我走进小岗村“大包干展览馆”，看到秘密盟约时，我的脑袋里还浮现着陕西户县农民杨伟名。严俊昌是一九七八年要搞分田到户的，采取的是秘密结盟的方式，盟约文字不过两三行。而杨伟名是公开地建议，把一份名曰《当前形势怀感》（亦称《一叶知秋》）的万言书投递给各级政府和相关领导，从最底层的人民公社直送到市、省以至中央，文章里不乏哲思色彩的辩证和具体建议。座谈会上见到严俊昌时，杨伟名因为那份“万言书”而被迫自杀的惨象浮现在我眼前。这一刻，我顿然悟到一个尤为关键的时间概念，即一九七八年这个非同寻常的年份。严俊昌们的幸运就在于秘密结盟在一九七八年，而杨伟名的悲剧概出于一九六二年这个特殊的年份，及至更不堪的随后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一九六八年，他已陷入绝境，只好吞下毒药……

在走进小岗村之前的二〇〇五年岁末的寒冬时月，我曾到陕西户县寻访杨伟名这位被许多高人称为“伟大的农民思想家”的足迹。

此事发端于一九六二年春天。这是时称“三年困难时期”最困难的年月，且不赘述乡民吃糠咽菜甚至剥树皮捋树叶拔野草填腹充饥的惨景。杨伟名时任陕西省户县城关公社七一大队党支部委员，担任大队文书、会计和调解主任，在“三年困难时期”，他和支部书记贾生财、大队长赵振离多次交谈如何摆脱困境。他们尽管也相信中央关于造成“三年困难”的几条原因，却也有自己最直接的疑问。在水丰土厚的渭河流域的关中平原，除非百年才可能遇到的特大旱灾能够导致广泛的生存绝望，一般不会发生如此普遍且持久的饥荒，人们记忆里最近的一次旱灾，已经是近半个世纪之前的事了。况且在民间早就流传着“金周至银户县”的民谣，户县在关中平原都算得上白菜心的好地区，今年

的旱灾虽有发生，但灾害程度根本比不得三十多年前那场连续三年滴雨未下的灾难。他们三人在商议如何尽快走出困境的时候，自觉或不自觉地都看到了公社体制的问题和弊端，尤其是“干活不计工分，吃饭（集体食堂）不要钱”的“共产主义”。几经交谈几经讨论，他们三人形成了走出困境的几条举措，决定由杨伟名写成文字稿。

这里对杨伟名做一点儿简要介绍：一九二二年农历年末出生在户县北街一个小磨坊家庭，十到十四岁先后在县城两家私塾馆就读，从《三字经》《幼学琼林》等读起，又熟习“四书”“五经”中的《书经》《诗经》等，生性聪慧，背记古文五十余篇，奠定了深厚的文字基础。即使因贫穷辍学，他也一边种庄稼一边借来邻居好友的高小、初中、师范和农业专科学校的课本自学。一九四六年七月，闻一多被国民党当局杀害，时为乡村邮递员的杨伟名在《陕西商报》发表悼念文章。一九四九年初加入中国共产党，西安解放后，党组织选派他到咸阳地干班学习培训，无疑是进入地方基层队伍的途径，却被妻子抱住双腿不得离家，随之脱离了党组织。解放后，杨伟名积极参与并组建互助组和初级、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一九五七年再次加入中国共产党。直到大跃进和农村实行人民公社化，他一直任会计、文书，后来当选支部委员。从互助组到人民公社，他都是积极参与并组织建设，而且把自家较为宽裕的房子腾出来，给村子里做食堂。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体制开始出现许多问题时，他依然以负责任的姿态绝不盲从，写文章予以纠正。比如针对当时发生的不仅反科学也近乎不懂常识的“小麦密植”，他写下《谈谈小麦播种量》予以纠正。“三年困难时期”发生的“物资供应困难”，他写成七千余字的《关于处理目前“物资供应困难”问题的建议》，不仅提出良好意见，而且一针见血地指出造成困难的主要原因是“人为因素”。针对党政机关不重视人民来信来访的现象，他写成《致县委信》，指出作为“脑”的领导机构，应当重视作为

“耳目”的基层干部和群众的意见。一九六二年四月写《目前农村工作十谈》时，他已经写下十余篇针对农村人民公社各种偏颇现象的建议文章。他的《目前农村工作十谈》刚写完三谈，便停止下来，开始写作《当前形势怀感》这篇近万言的文章，于五月十日完成。内有十三个小标题，分别为：前言、忆“撤退延安”、处方、腰带、改造与节制、恢复单干、进与退、走后门、市场管理、烦琐的哲学、双程轨道、提建议有感、后记。

麻烦和后来的自杀悲剧，概出于这篇《当前形势怀感》亦称《一叶知秋》的文章。

包括《当前形势怀感》以及杨伟名此前的十余篇文章，都收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的《一叶知秋——杨伟名文存》一书中，我不必再赘述其全部内容，仅点出《怀感》一文中令我尤为感动到惊讶的两点。一是他竟然敢于提出“恢复单干”，即包田到户，这是任谁都知道碰刀刃的事，他却直白地呈报各级党政领导。联想到十六年后严俊昌秘密结盟的事，是做了杀头坐牢的精神准备的，杨伟名等三人却敢于把《怀感》送到从公社到中央的各级领导手中，难道没有考虑如严俊昌们的严重后果吗？再一点是，他关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认识，提出了“社会主义初期建设任务”的概念，也与今天科学论定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相类似。

杨伟名把《怀感》寄出后，很快就引发了用今天的话说是“正能量”的积极反响。中共陕西省委办公厅在《人民来信来访反映》内刊上予以选载，陕西省委宣传部的机关刊物《宣传动态》也摘要刊登，无疑是给各级领导作为决策的参考。尤其值得一提的是，时任咸阳地区专员的王世俊很赞同《怀感》，亲自给杨伟名回信说“感谢你对国家大事的关怀”，告诉他“这封信连日前一封建议信一并印发各有关部门和

同志，供他们研究问题时参考……”而且把《怀感》和附信印发给咸阳地区的几位领导参阅，破例把杨伟名这个农民聘为该地区政策研究室研究员。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也有非常举动，指示西北局办公厅主任陶信镛专门到户县和有关人士谈话，并聘请杨伟名为西北局机关刊物《西北建设》杂志通讯员。由此可以判断，刘澜涛肯定读过《怀感》，尽管没有见到他的表态话语，也未能得知陶信镛和户县有关人士传达的刘澜涛书记的指示内容，但仅就聘请杨伟名为《西北建设》杂志通讯员而猜测，起码是很重视杨伟名《怀感》的建议，也颇关心农民杨伟名这个人才。然而，恰恰是刘澜涛关于杨伟名《怀感》的相关资料，竟然在随后的“文化大革命”中导致另一个毫不相干的年轻人的灾难，也成为杨伟名的致命一击……

杨伟名和《怀感》的命运，不久就发生了逆转，不是一般的逆转，而是惊天动地的逆转。在《怀感》写成并寄出之后的同年八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召开中央工作会议，且不说会议的主旨，单说毛泽东主席的一段讲话，直接点到杨伟名的《怀感》。毛泽东以文章中有“一叶知秋，易地皆然”的话题说：“一叶知秋，也可以知冬，更重要的是知春、知夏……任何一个阶级都讲自己有希望。户县城关公社写信的同志也讲希望……”毛泽东主席又问对户县三个党员的来信回答了没有，并甚为郑重地申明“共产党员在这些问题上不能无动于衷”。我读到毛泽东这段讲话时，首先敏感于其中“任何一个阶级都讲自己有希望”这句致命的定性语言，这无疑是把杨伟名等三个党员的来信看成是另一个敌对阶级的声音了。有了毛泽东主席的指示，八月份的北戴河会议刚一结束，九月初就有处理此事的工作组进驻杨伟名所在的户县七一大队了，而且是一个由省、市、县、社四级党委负责人组成的工作组，对杨伟名等三名写信人开始教育纠正的工作。

一九六二年八月上旬，在北戴河参加中央会议的陕西省省长赵伯平给陕西省委打电话，询问杨伟名等三人《一叶知秋》的事，当属他亲自聆听了毛泽东主席讲话后的反应。

一九六二年八月十六日，省委办公厅《人民来信来访反映》随即全文刊登《怀感》，送省委常委阅读。前次该刊所作的摘编，是供各位领导克服“三年困难”决策的参考，此次全文刊登显然是供批判之用。

一九六二年九月七日，省委一位副秘书长和省委宣传部一位副部长，与咸阳专署一位副专员，以及户县县委书记四人一起和杨伟名等三人谈话，且有四次，指出《一叶知秋》的错误。

一九六二年九月十三日，中共户县县委将《一叶知秋》印发给县级机关和城关公社机关支部，明确在通知中指明其在“两条道路斗争”中的观点、立场是非常错误的。

在这样由省到县的连番谈话纠正错误的过程中，三人中最年轻的大队长据说没经历过如此严峻的大场面，最早表态认识错误了。支部书记贾生财起初尚想不通自己所犯的错误，在各级领导的连番谈话指明其错误的过程中，也表示知错认错了。杨伟名在最初一次谈话时，竟然神情自若且甚为自信地表示自己认识无错。工作组把杨伟名视为重点对象，不仅和他谈话，而且和村里的所有党员谈话，在普通社员中召开座谈会，指出单干的错误导向，党员和大多数社员一致表态集体化不能分解为“单干”，杨伟名陷入孤立。经过甚为艰难的思考，他写下了一纸检讨书，名曰《亲切的教导，深刻的一课》。

在三个写信人先后认识错误之后，接着便是程序化的关于这个事件处理意见的汇报。户县县委对地委、地委对省委宣传部、省委宣传部对省委、省委对西北局以及中央就三个写信人的处理意见，共同的观点是三个党员主张“恢复资本主义道路，是严重的政治立场错误”。之后，各级领导在各种会议上都有涉及这个事件的讲话，指出其错误是“退到资本主义道路”，最严厉的是省委第一书记在省委一次全会上说：“杨伟名们分田到户的观点是十分荒谬的，十分反动的。”就我能见到的各级文件和领导人的言论，这一句是最严厉且最严重的，即“荒谬”和“反动”，而且足足是“十分”。

在处理杨伟名等三人的最后结论形成时，从县委、地委到省委的监委会意见完全一致：“杨伟名等三名党员对自己的错误做了检讨，认识很好，且他们只是向组织反映情况，没有实际行动……党内不给纪律处分。”此事终算了结，支部书记贾生财调离七一大队，到竹器社任厂长；原大队长赵振离接任支部书记；杨伟名大约依旧做原来的文书、会计等工作。写到这里，我竟有一种感动，一封惊动毛泽东主席的户县三个党员的来信，也已被毛主席定性为“另一个敌对阶级的声音”，这个事件搞得从户县到咸阳专署到陕西省委再到西北局几乎“手忙脚乱”，况且有省委第一书记“十分荒谬十分反动”的定性，处理意见却是“不给党内纪律处分”。我感觉到一种温情，一种包容的温情，也应该是处于“三年困难”特殊时期各级党委和领导人对此前狂热的“大跃进”造成的灾难的反思的效应。

杨伟名从此再未写过一篇文章，尽管仍继续着读书看报的爱好，却不写字了，似可理解。他也再无出奇之举，平静地生活着，颇动兴致地为一张全家照赋诗一首：“一胎两女喜孪生，不幸离母襁褓中。居鳏孤楚难抚养，乳娘分忧感衷情。流水光阴匆匆过，双双各长十齿

龄。今朝依傍欣合影，愁絮收敛露笑容。”这首诗大体体现着杨伟名此一时段的心情，前妻所生的孩子已长到十岁，他忽然动情赋诗，着意在不幸中遇到的后妻对孩子的“乳娘分忧感衷情”，“愁絮”表面是说丧妻后无人养育孩子的忧愁，内里显然也更有《一叶知秋》引来的麻烦到此时基本淡静，能够将“愁絮收敛”且可以“露笑容”了的宽慰。我揣测他能在这样短的时间里调整到可以“露笑容”的良好状态的因由，自然在于他本人的襟怀和自信，也在于他贤惠的妻子在此间尤为知心尤为小心的照料和关爱，然而，更关键的一点当在于各级党组织结论里的“不给党内纪律处分”的决定。

我在户县杨伟名的村子搜集他的素材时，人们讲了他的诸多趣事轶闻，仅述一例。某年他和队干部没收了一户社员的边角地，那位社员堵到他家门前破口大骂。杨伟名不仅既劝又压妻子的火气，而且别出心裁地端了一壶茶水送出门去放到骂人者面前，不言自明的意思是：你尽管骂吧，骂得口干舌燥了，喝口茶再接着骂……后来被一些高人誉为“农民思想家”的杨伟名，生活中是这样宽怀柔肠，也当是他能很快走出《一叶知秋》招致的麻烦的个性因素。

相对平静地过了四五年，“文化大革命”开始了，成为他无法逃躲的致命灾难，却是因为一桩他意料之外的事件。

绝望终未绝

“文革”伊始，贾生财和赵振离成为“走资派”，被批斗被夺权。而基本不在党政权力范畴内的杨伟名也未能幸免，就因为他的那份《一叶知秋》。他被造反派定性为修正主义分子，又升级为反革命分子，大门上被贴上办丧事才写的白纸对联：单干单干，才能发家致富；修正修正，赫鲁晓夫祖宗。被游街又被批斗，随之实行无产阶级专政，

把他和“地富反坏右”排在一列的位置。在此大灾大难面前，杨伟名的心态如何，无疑是我顶关注的一点。他的儿子杨新民告诉我一件事，过春节时，杨伟名把造反派贴在他家大门两边的阴纸对联撕掉，清洗干净，写下鲁迅先生的“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诗句，自然用的是喜庆的红纸。不仅如此，他在大门两边的围墙上也贴出了他的“大字报”，南边是毛泽东主席的七律《送瘟神》，北边是自赋七绝一首：“砥柱触天立中流，时光如涛荡泥土。无私无畏即自由，真理在胸笑在手。”我钦佩杨伟名的情愫，概出于如此灾难性逆境中的“砥柱中流”的刚烈和胆魄，也就无需再猜想他面对游街、批斗和与“地富反坏右”五类敌对分子为伍的心情了。时过不久，造反派们把心思集中于夺权，一个农村生产大队的权已不能满足造反派们的胃口，目标转移向公社这个党政机关，更在乎户县这个地方性的大机关。顺便说一句，作为咸阳地区一把手的王世俊，已经被斗被整得死去活来，其中一条罪状就是支持杨伟名万言书建议的包产到户，是“为复辟资本主义大造舆论”等。此间，无权的杨伟名作为“五类分子”的“死老虎”，已不在造反派们心急火燎夺权的焦点之内，反倒被“冷清”地搁置一边去了。杨伟名冷眼观看，静观运动的态势，但他大约丝毫也预料不到的一件事发生了。一个造反派大学生找他来了，进而酿成两人撼天动地泣鬼神的悲剧。

这位大学生名叫刘景华，是西安冶金建筑学院的学生，也是“西安地区大专院校红卫兵统一指挥部”下的一个造反派成员。该组织授命他组建一个调查团，调查整理并形成对西北地区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且有叛徒之说的刘澜涛的定罪材料。刘景华曾有文字坦言：“我出身于穷苦人家，是毛主席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打下了江山，我一个农民的儿子才得以上大学……我就无条件地站在以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一边，一颗红心两只手，党叫干啥就干啥。党叫

我领导红卫兵调查‘走资派’的罪行，是对我的信任，我坚决执行。”于是，他很快组建起十二人的调查团，来到西安南郊长安县细柳公社姜仁村，开始着手调查。姜仁村是一九六四年“四清运动”时刘澜涛选择的“蹲点村”，三年后的一九六七年九月，刘澜涛已被“军管会”拘押，且押到姜仁村接受造反派的调查。刘景华带领他的十二名团员赶到姜仁村来了，这个满怀“忠心”的红卫兵调查团领队刘景华，在翻阅了作为西北地区头号“走资派”兼叛徒的刘澜涛的揭露材料后，首先对刘澜涛最致命的叛徒问题产生了怀疑。尽管他未说明怀疑的具体事件，但是我推想，肯定是那些揭露材料多属“莫须有”和虚妄之作，缺失最基本的可靠性，也就缺失了可信性。他的怀疑成为一桩颇揪心的困惑，想找人交流却又不能，因为谁都会意识到这是为刘澜涛翻案的大忌讳，况且他的身份是调查团的团长。刘景华隐匿着不无痛楚的怀疑，继续翻阅刘澜涛的罪恶材料，其中有一条涉及包庇户县反革命分子杨伟名的事件。他得知刘澜涛不仅没有处分杨伟名，而且指派西北局办公厅主任陶信镛亲自到户县和有关人士谈话，不仅把杨伟名的《怀感》刊登在《西北建设》杂志上，还破例聘请杨伟名为该杂志的农民通讯员。刘澜涛当年这种作为高级领导人尊重人才的美德和眼睛向下的良好作风曾经成为美谈，现在却成为罪恶。关键在于刘景华对此事发生极大兴趣，怀着已有的疑问，当即找到《怀感》阅读。他自述的读后感是这样的：“我认为这篇文章本质地分析了当时我国农村的经济形势，一针见血地指出了造成这种困难局面的原因，并提出了解决困难的办法……”刘景华就“决定去户县见见杨伟名”。几日前，在对刘澜涛的叛徒问题产生怀疑后，刘景华曾急于和人交谈辩白此事而不能，且郁闷郁结，随之看到杨伟名《怀感》事件也竟然牵涉到刘澜涛的罪证材料时，他终于遇到了一个可以交谈乃至倾吐衷情的对象。他肯定知道这是一个叛逆的决定和行为，不堪设想的后果也是明摆在眼前的。我便尤为感动、感慨于这位难得的独立思考者——刘景华的大无

畏精神，尤其是在“文革”最疯狂的夺权背景下。这是从陕西贫困山区走出且怀着感恩忠心的大学生刘景华的反叛，面对的是铺天盖地的“刘澜涛不投降就叫他灭亡”的叫嚣，他要去找杨伟名，这就注定了他年轻的生命别无选择亦无可逃遁的悲剧。

刘景华只身来到户县，两次找过杨伟名。第一次是在七一村的大队办公室里（此时的杨伟名是被判为“死老虎的五类分子”，何以会待在大队办公地，我猜大约是被看管），刘景华和杨伟名竟然一见如故，有资料说“促膝相谈”（我猜想刘景华大约是以造反红卫兵的身份为伪装，才可能有与杨伟名谈话的机会）。两人“促膝相谈”一个上午还不能尽兴，杨伟名领着刘景华到他家吃了午饭又接着谈。第二次仍然是刘景华赶到杨伟名家里长谈。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交谈的间歇，发生了一件大事，红卫兵造反组织正式给刘澜涛形成“叛徒走资派”的结论时，不仅专案组和造反头目意见完全一致，“中央文革”也已有了明确的表态，但刘景华竟然发言说“刘澜涛不是叛徒”。刘澜涛被定性为叛徒的材料上报中央，刘景华当时被严重警告。刘景华不服气，又到户县和杨伟名交谈倾诉。还是在他们两次会面的间隔期，两人还有多次通信交流，可见他们达到怎样相见恨晚水乳交融的状态。然而，他们谈话的内容只有他们自己知道，信件也在后来的灾变中被家人焚毁了。仅我能看到的资料，只笼统地说到杨伟名此时已不顾个人安危，公然指出“文革”是“盲人骑瞎马，夜半临深池”，说学习《毛选》的口号“急用先学、立竿见影”是教条主义，说“阶级斗争”“反修防修”和“文化大革命”是极左路线的极端发展。这是杨伟名和刘景华交谈和信件的只言片语，总算留下了一些见出杨伟名的思想锋芒的珍贵文字。我想杨、刘两人能如此投机，当属“英雄所见略同”，而对刘澜涛定性“叛徒”的反对意见，便是刘景华的思想导致的行动。他的这种行动仍不能倾泄义愤，竟而拍案而起，他把由刘澜涛莫须有的叛徒冤案引发的对

“文革”的彻底否定和反对，写成十余张大字报，张贴到古城西安的钟楼上，这是西安的心脏部位。大字报引发惊天动地的反响，很快被公安人员揭走。刘景华被逮捕，判处死刑，但不知因何故没有立即执行。刘景华被囚整整八年，到粉碎“四人帮”后才获释平反。

由刘景华案的牵涉，杨伟名陷入灭顶之灾。原本他已不在造反派夺权焦点之内，甚至造反派懒得再批再斗这只“死老虎”。但刘景华被逮捕后，他和杨伟名来往和通信的事也露了底儿，以他所在学校西安冶金建筑学院为主的造反派追到户县，联合户县的造反派，对杨伟名展开前所未有的“武斗”。造反派给杨伟名认定的罪名是“反革命分子刘景华的黑后台”，又是“杨刘反革命集团”。之前杨伟名被本地红卫兵批斗时，据说只有低头弯腰的惩罚措施，尚未动用武力。但这回被大学生造反派批斗时，由“文斗”兼加“武斗”了。批斗地点选定在城关公社院内，造反派质问并声讨他和刘景华的“反革命言论”，却不准许他回答，更不允许他申辩，干脆不容他开口。红卫兵造反派要他向毛主席下跪，他不跪。造反派扇他耳光，用拳头捶打他，用脚踢他，从背后踢到他膝盖弯里，他跌倒了也跪下了。杨伟名的妻子放心不下，又去不了批斗现场，只好让女儿杨新慧去。杨新慧不敢到批斗现场，偷偷躲在后窗，看到这样一幕：杨伟名膝盖跪着的竟是铡草的铡墩（底座），而且垫着烧焦的煤渣。女儿看到乱拳乱脚乱打乱踢的景象，吓得逃走了。这样的批斗连续两场，时在一九六八年五月五日和五月六日。和批斗中被打罚跪等身体所受的折磨摧残相比，更致命的是杨伟名在造反派的叫嚣声中得知，刘景华已被逮捕，且判了死刑。

杨伟名和妻子当晚双双自杀，这是一九六八年五月六日夜发生的悲剧。

杨伟名的儿子杨新民和两个女儿至今清楚地记着当晚发生惨剧的过程和细节。杨新民告诉我，五月六日傍晚，被整整批斗了一天的父亲回到家中，吩咐他把两个出嫁的姐姐叫回来，却不说有何事。妻子已做好晚饭，杨伟名不吃。杨伟名夫妇和两个出嫁的女儿、儿子杨新民在一个简短的全家团圆见面之后，他便安排三个儿女到右边卧室休息睡觉，他们夫妇常住左边隔间卧室。杨伟名的女儿告诉我，弟弟新民尚未成年，父母让睡就睡着了。姊妹俩觉得蹊跷，根本无法入眠，随后听到厨房有拉风箱烧锅的响动，她俩便来到厨房，见母亲在灶下烧锅，问母亲天这么晚了烧锅干啥。母亲说烧开水。她俩更奇怪了，说电壶（暖水瓶）里有开水呀。母亲便不耐烦，让她俩少管闲事快去睡觉。姊妹俩也未再追问便回屋去了，却依旧难得入眠。不久又听到木楼上有响动，姊妹俩又问谁在楼上干啥。母亲说她取个东西，又催她俩睡觉。到半夜时分，刚刚入睡的姊妹俩被一阵很痛苦也很大的呻唤声惊醒，慌忙爬起来跑到父母卧室前，但是推门推不开，门闩反插着，煤油灯也被风吹灭了。大女儿杨彩英情急之下从后门出去爬上后窗，砸破窗玻璃进入屋内，闻见呛人的农药味，慌乱中点亮煤油灯，就看见父亲杨伟名和母亲刘淑贞并排躺在炕上，已无声息，两人的胳膊还挽在一起……我听到此，做记录的手抖得写不成字。

姊妹俩随后才明白，母亲烧水是为了净身，父母的卧室地面上还留着泼洒的水痕，父母都从内到外换穿了一身干净衣服。母亲上楼是取剧毒农药，木楼是作为生产队的保管室沿用着，既存有种子，也有杂物，还有杀虫除菌的剧毒农药。姊妹俩懊悔不迭，曾有疑心，却仍然粗心大意，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惨剧。从杨伟名被批斗完回家，到他和妻子双双烧水净身换干净衣服，再到他们夫妇喝下剧毒农药，整日整夜都下着雨。第二天，在某个公社造反派干部吆喝着“杨伟名是自

绝于人民自绝于党”的声响里潦草下葬的时候，雨下得更大更猛了，真可谓天公垂泪。

在我理解，杨伟名的自杀选择，无疑是一种绝望，一种彻底的绝望。一纸补天济世的《怀感》，把自己弄到这种死不下活不旺的处境姑且不论，而且把一个从穷山沟里跨进高等学府的刘景华害苦了——不是一般的惩戒处罚，而是坐以待毙！杨伟名曾有对《怀感》理论坚持不改的精神自信，也有面对批斗乃至跪铡墩等忍受肉体折磨的刚强，却承受不了彻底的绝望，且不说以生命之躯对“文化大革命”的控诉……我在户县采访结束时，想去杨伟名的墓前致礼，掬一捧黄土撒上他的坟冢。杨新民无奈地告诉我，原本潦草埋葬的坟堆，后来被一家小工厂征地建厂时抹去了，连他也找不到准确位置了。我便退一步想到，把杨伟名的思想和品格以及由此发生的时代性悲剧形成文字，权且当作那一抔无处抛撒的黄土。

这是二〇〇五年岁末月初，已经是天寒地冻的隆冬时节。从户县回到西安，我便急于寻访刘景华。我多方打问，得知刘景华平反后一直在广州某高校任教，电话联系倒也未有周折。我说明前往拜访意图，他很爽快地应诺，只是时间稍微推后，他正忙于学生期末考试，还要阅卷。他说春节要回老家，到时可以见面，也免去我劳神费事跑远路的折腾。我便和他约定待他春节期间回来见面。我等待他的电话，想到他从远方归来，又是春节，亲朋好友难得一聚，但我怎么也想不到，农历大年初二晚上接到他打来的电话，竟然说他检查出肺癌。我一下惊呆了。他又缓缓地告诉我，已经做过手术，恢复尚好，只是回不了老家了。我哪儿还有“纠缠”他的心思，连连劝他专心养护身体，采访之事暂且不管。他说手术做得很成功，术后恢复很好，约我一月后去广州见面。

刘景华家住广州老城区一条窄巴的巷道里，临街两边全是卖各种生活品的小铺。几经打问，终于找到一幢平顶住宅楼房，抬头看见楼台上站着一位男子往街巷张望，看见我时便问是不是西安客人。我当即招手应声。我走到他站立的平台，握手问好之际，看见他满头稀疏花白的头发，胖瘦适中的脸上呈现着沉稳平和的气色。我依旧难以抑制激动的情绪。他领我走进他的屋子，住室很宽敞，家具摆饰不见豪华，质朴实用。我和他坐下交谈，他谈到往事，不仅神闲气静，而且更显得淡漠。我意识到不单是时移世易痛定之后的超然，更当属他对把整个民族和国家陷入灾难的“文化大革命”的蔑视。他说话断断续续，我已经不再提问，不忍心看他说话的艰难，也怕过细地谈到曾经遭受的折磨使他伤心动情，肯定会影响正在恢复的病体。我能见到他已经很荣幸。告别时握着他的手，再看着那稀疏花白的头发，脑海中又浮现出那个在西安钟楼张贴声讨“文化大革命”檄文的风华正茂的刘景华，竟有泪水涌出……

2014年7月19日 二府庄

又及：近十年前，先后寻访了杨伟名和刘景华，原想写块稍大的东西，却终未成事。遗憾且不论，这两位陕西乡党的伟迹一直搁在心底，竟成一种纠结。近日发生自我宽宥心思，作退一步想，把就我所知的他们的事迹记述下来，既向他们致敬，也注入我的文字存留。

言论

我们没有史诗，是思想缺乏力度

我是从报刊的统计数字里知道长篇小说创作出版的巨大数字的，也从我周边的生活环境能亲自感觉到。这种繁荣景象起码证明了一点，那些敏感于文字进而喜欢创作的人获得了表述的空间，把文学创作的神秘化自然而然淡化了。

我想谁也不会对文学创作的繁荣持异议，而在于对高水准长篇小说的比例太小不大满意。专家和普通读者都期待令人耳目一新的大作品出现。

从题材来说，上个世纪中国的一百年历史，其剧烈演变的复杂过程，在世界上是没有哪个国家所能比拟的。亲身经历并参与其中任何一个段落的有思想的人，抑或从资料获得具体而又鲜活的生活史实的作家，很难摆脱对这个民族近代以来命运的思考，也很难舍弃在独立思考里形成的生活体验或生命体验，会潮起一种强烈的表述欲望，自然就会有小说创作。这一百年应该反复写，应该有许多作家去写，各自以其独立的思维和独特的体验，对这个民族百余年来反复的心里剥离的痛苦和欢乐，就会有各自不同的异彩呈现的艺术景观展示，留给这个民族的子孙，也展示给世界各个民族。

作家们现在获得了独立思考和独立体验的社会氛围，不再受制于某些极左思想限定的狭窄小径，有勇气也有责任面对自己先辈所打开

的百年变迁的历史了。

我想不明白中国为什么没有像《静静的顿河》《约翰·克利斯朵夫》《复活》《铁皮鼓》《百年孤独》这样有史诗品格的长篇小说。

这似乎与经济的发达程度和物质的文明高低没有直接关系。这些史诗作品，都是在旧俄的农业时代完成的。《静静的顿河》产生时，苏联正处于物质最贫乏的战争恢复期。《百年孤独》的作者马尔克斯生活的哥伦比亚，用我们的话说也是一个属于发展中的国家。

对于当代长篇小说的研究和讨论，一直都在持续着。多家评论杂志和文学专业报纸，有许多认真的研究文章阐发着种种见解，我从中曾获得很富于启示的收益。在诸多观点和诸多因素里，有一个主和次的判断，在我看来，主要在于思想的软弱，缺乏穿透历史和现实纷繁烟云的力度。

说到思想，似乎是一个容易敏感的词汇。思想似乎沾惹到政治，说到政治，似乎又很容易招惹令人厌恶的极左或平庸的教条。我想应该早就排除极左政治的阴影了，尤其不能把极左政治等同于政治，不能因噎废食。富于理论高度和深度的政治，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命运的光明之灯。应该从对极左政治的厌恶情绪里摆脱出来，恢复对建设性的政治的热情。既然作家都关注民族命运，就不可能脱离系着民族命运的政治。

作家的思想还不完全等同于政治。这是常识。作家独立独自的思想，对生活——历史的或现实的——就会发生独特的体验，这种体验决定着作品的品相。思想的深刻性准确性和独特性，注定着作家从生活体验到生命体验的独到的深刻性。这也应该是文学创作的常识。

我以为急不得。首先是繁荣提供了一个雄厚的阵势，那么多作家都持续在进行探索和创造，大作和精品肯定会出现。我想这个过程应该宽容。

2010年1月13日 二府庄

珠联璧合说吴、罗

闻知吴三大和罗国士二位仁兄联手搞书画展览，我的第一反应真乃珠联璧合。

吴三大的名字早已泛出大文化圈而响亮于三秦民间，城市打工族乃至山野人家，工棚墙上和山居新屋正厅中堂都挂着吴兄三大的真笔书法作品。我也是从民间角度认识并记住了三大这个颇耐得咀嚼的名字，那是在西安四条大街的独具一格的匾牌上发现的，说来已过三十年了。及至后来有缘握手，一见便感到一派不凡的大气象，顿悟那一笔好字出于这人手里是自然的。诚如书法评论家解读吴兄笔墨，横笔生波，竖笔腾浪，捺笔则蝶，收笔回锋，壮美矫健里透现曼靡柔韧，完全抵达自由不羁的个性化挥洒。

认识罗兄国士稍晚，却也是赏其画便仰慕其人。他的一幅《灞柳飞雪》不仅尽传长安八景之一的神韵，在我更勾起绵绵的诗性的乡情，不禁感慨连连，我的灞河柳絮的神韵，竟让一个外乡人尽领了。罗兄国士擅画月季，号誉中国“月季王”，被域外欧洲人惊叹为“魔手画笔”，千姿百态又栩栩如生的花卉，不仅欧美民间乐于收藏，且以礼品赠送多国总统，亦如国画诠家评罗兄国画，出意纯净，却内涵丰富；情调古朴，却恣意汪洋；空灵恬静，却弥漫诗性乡愁；继承中国画传统手法，却漫泛着西方现代艺术的韵致。

三大仁兄书法超绝，国画泼墨也不俗。国士仁兄国画独成一家，书法功夫也是了得。这是吴、罗两位仁兄艺术创造主与次的异和同。更有令我意料不及之事，年轻时同在省人艺供职，精于篮球技艺，吴

司中场组织，罗为前锋神投，两人联手的球队，竟然征战三秦无敌手。我便想到珠联璧合不仅在书法绘画的艺术创造领域，更在生命活力尽得张扬的篮球场上。

人生难得的珠联璧合。我羡慕吴、罗二位仁兄。

2010年1月16日 二府庄

难得一种渴望性阅读

文史典籍和民间村巷，多有“八水绕长安”的文字记述和歌谣传诵，不单营造出这座古城气象万千的诗情画意，在更切实的物质层面上标示着一个基本事实，地处中国西北的这个“千古帝王都”的长安，有八条河流环绕，虽不及江南港汊纵横，却不缺水。八条河流流经西安四方城郊，不仅灌溉禾田，更多天光水色的稻田，颇类江南景象，吃水从来不成为一个问题。然而，虽然境未迁而时过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八条环绕西安的河流流量骤减，多数在旱季里完全断流，水田变成旱地，稻田自然消失了。更为严峻到刻不容缓的大事突兀地横到西安城里家家户户的面前，自来水管断水了。源自西安城郊的自来水的抽水井，因为河水断流水位下降而抽不出水来，家家户户吃水、用水便成为横在眼前的头等大事。

西安城里的水荒越来越严重，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到九十年代头几年，已经不缺米面的居民却为吃水、用水犯愁。不必列举用水紧张的世相和传闻，仅说我的一次亲身体验。我是一九九三年初住进西安城的一个小院的，到这年的夏天，供水的钟点已经不能保证本来就很短促的时间，断水已经成为街谈巷议甚为激烈的话题。记得一个三伏天的晚上，燥热难耐，汗流不止，想洗一把脸却舍不得水桶里所剩不多的那点水。这时从楼下传来一声吆喝，说邻近一个家属院的公用水管有水，我几乎从座椅上弹起来，拎起一只空桶便下楼去了。刚走出住宅院大门，便看见从对面那个家属院排列到街巷大路上来的队列，我当即接排在最后一个人后头。眨眼工夫，我的身后又接排上了几个人。我把水桶托付给身后的人，走到队列最前头，看到一个接在地皮上的水龙头，流出一股不过小拇指般的细流，流速慢到随时都可能断

流。我便作最简单的盘算，即使不断流，轮到我接水的时候，肯定到明天早晨了。然而我没有动摇，以少见的又是巨大的耐心排下去，站累了蹲一会儿，蹲得腿脚发麻了再站起来走走步。到东方发亮黎明到来的时候，我终于接满了一桶水，不仅没有怨言，倒庆幸那股细流没有断止……

忽然有一天，水管里喷涌而出哗哗哗响亮着的清流，而且一天二十四小时随时打开龙头，都是这动听的水声和清亮的水流，因水而绷紧了几年的那根神经顿然松弛了，人们在欣喜的吁叹里传递且记住了一条河的名字——黑河。黑河水库和黑河引水工程完成了。成倍骤增的西安城市居民家庭用上了黑河的上佳品位的水，那些用来存储生活用水的水缸、水桶全都变成了多余的废物。这条本不在环绕西安的八水之中的黑河，顿然响亮过了八水中的任何一条河流，当是很自然也是必然的事，家家户户的水管里涌流着黑河河水，男女老少身体里储藏着的生命之水源自黑河。西安某人可能忘记自己的年岁，大约不会忘记这条滋养生命之水——黑河。

这是一本写黑河的书。

这是一本在我意料不及甚至大为惊讶之好的书。这种阅读感受也出于自身的直接体验。我曾经有机缘参观过黑河引水工程，莽莽秦岭山中，汇聚起一潭清水。这个水潭大得令我畏怯，转过一座山，是水；再转过一架和多架山，还是水；山峰像是从水潭里冒出的一个个巨型蘑菇。我在那一刻的直接感觉加感慨却是最实际的，包括我在内的西安人可以畅快地用水了；自然也缺少不了赏景的快活，层层叠叠的绿色的秦岭群峰之间，铺展开清幽到呈现绿色的水面，水鸟起落，不尽的诗情画意。这两种感受和印象，其实也不过如此，任谁去了看了都会发生的。直到近日读过王安泉先生写的《黑河》书稿，我才更

切实地感知到我的走马观花式的印象，浮皮潦草到连皮毛也不得一二的程度。这种感觉的发生还有一个纯主观的偏颇性猜断，以为《黑河》是写黑河引水工程的纪实性文章。依着这种先入为主的阅读心理摊开书稿，当即便意识到自己想当然的习惯性思维的荒谬了。《黑河》不过是以黑河引水工程为由头，把从秦岭山中流出的这条过去几乎名不见经传，现在却流淌在几百万西安人肌肤里的河流的历史人文和自然景观，以诗性的激情展示出来，让我看到的可以说是一个民族的简编的百科全书——姑且搁置大禹治水自黑河流域起步这样的传说，单是有可靠史实的影响过这个民族和国家历史进程的人物，读来真令我震惊，周文王曾把黑河流域划为他的王朝的京畿之地；周穆王干脆在黑河口住下办公，案牍公务间隙听歌赏舞，于今想来该是何等潇洒浪漫；秦朝在黑河植竹，竹子已是一种杀伐的利器；汉武帝继续在此扩大种植竹林，更新添了射熊的打猎游戏；李渊被押为人质的平阳公主，却成为钉进隋朝心脏的一颗钉子，在黑河流域网织人马，为李渊灭隋建立大唐的关键战役中突出奇兵……更有老子自函谷关移居黑河支流田峪河之滨的楼观台演绎他的道家学说，至今仍为灵光圣地；孙思邈在秦岭山中黑河谷地采药时，配制药方刹绝了山村中蔓延的瘟疫；诗人李白、柳宗元、苏轼都在黑河流域发出吟诵；尤其是白居易，到黑河西岸的周至县任职时，对关中平原烈日下收割麦子的农民大动肝肠，写下至今读来仍令人心恸的《观刈麦》，还有在黑河口的仙游寺喷涌而出的千古绝唱《长恨歌》。几年前我到仙游寺观光时，看到毛泽东手书的《长恨歌》的刻石碑，顿时想到“完美”这个词汇，天才的诗人白居易和一千多年后的天才的诗人兼书法家毛泽东完美地结合在这一方石碑上了。我在那一刻才真切地感知并理解了天才的真实意蕴……

《黑河》作者王安泉竟然搜寻到崖壁上远古人类刻画的四个文字符号，至今未能破解；他踏寻了陕西近代水利专家李仪祉造福民众的黑河灌溉工程黑惠渠，当年可灌十三万亩田地的大渠至今依旧发挥着效益；作者寻找到红军在黑河的足迹，完成了最虔诚的凭吊和膜拜；还有德国专家于上世纪二十年代多次进入黑河流域的秦岭山中调研森林的史实，其中有一次是由陕籍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作陪；王安泉更多地扫描到当今秦岭山区黑河流域的各色男女的生活情状，采药为生的药农的传奇生活、割漆匠的专注不二、女“知青”的传奇性案情、猕猴桃的试栽、秦腔名角侯红琴在乡村大戏台上演出的轰动场面……作为秦岭最高峰的太白山积雪融水形成的黑河，上至三皇五帝，下到当今生活世相，被王安泉一支笔纵横捭阖，读来便产生一个民族简编的百科全书的印象。因由不言自明，上述那些帝王和诗家在秦岭山中黑河水畔演绎的故事，其意义远不局限更不属于秦岭和黑河，也不局限不属于陕西关中，而是这个民族和国家的历史，仅仅只是发生在黑河流域罢了。既然在小小的黑河流域发生了这个民族和国家的历史上如此重大的事件，黑河这方地域就不是一般的奇山妙水层面上的意义了。

我读《黑河》的另一个强烈的感受，竟是一种急切的渴望性阅读心态。这种阅读心态通常很难在散文的阅读过程中发生，多在那些独出心裁甚为精彩的小说的阅读中才会发生，可见《黑河》是一部引人入胜的散文。用引人入胜来说一部散文的阅读直感，起码在我是极难亦极少发生的。掩卷梳理这种颇为奇特的阅读感受，我便对《黑河》作者王安泉刮目相看了。

王安泉是喝黑河水长大的。他的情感世界被黑河网织着。用他的话说：“黑河波纹漫过心际，好像黑河对我说：你的一生只有两天，一天遇见黑河，一天是再也不能错过黑河。”他的情感所凝结的“两天”的

不尽内蕴，顿然让我感知到我说他和黑河的情感的文字平淡而庸俗。这个人把自己的生命历程归结为“两天”，一天踏入黑河，另一天全都行走在黑河上。这种形象化的喻示，唯王安泉独有，属于最难得也是最独特的体验的理性凝结。在黑河流域生活过和正在生活着无以数计的古人和今人，各人对故乡的河流当有各自的情感记忆，而王安泉的“两天”的情感归结，竟令我发生不无惊悸这种难得的阅读享受。换到王安泉的立场和角度，能获得“两天”这样独特的人生体验的归结，必有其非同寻常的思考和举动。

王安泉先生先后十余回踏进黑河源头——秦岭的最高峰太白山，足见乐山爱水的天性了，非天性很难进入这种痴迷的程度。然而，他却不是一般喜欢游山逛景陶醉其中的纯享受型意趣，而是有着多重追寻的甚为神圣的专注。他结束了在西安美术学院的专业学习，便背着画板走进太白山，踏遍黑河河谷，奇峰异景，水光山色，尽着性情涂抹在纸上，当是一双非同寻常的善于发现的年轻艺术家的眼睛；他做过《周至县志》和《太白山志》的主编，这又是一种严密到容不得半点浪漫也容不得丝毫艺术夸张的工作，而且要求通晓天文、地理、人文、历史，乃至动物、植物和中草药知识，还缺不得民俗风情，如此等等。在我的意识里，地方史志其实就是一方地域的百科全书，其主编非等闲之辈所可担当。由此可以想见王安泉闷头读了多少太白山和黑河的相关资料，查寻翻检了多少典籍史料，更不能或缺山里山外的实际踏访，才可能做到既不遗漏，又实现去伪存真，给今人一部可资信赖的周至县和太白山的百科全书。我从文字中得知这位年轻的画家又做着地方史志的主编时，又是一番惊奇，在如我一类常人的印象里，画家多为形象思维的浪漫色彩的人，而史志编著者不仅要求知识专长，尤其要求严谨，又容不得丝毫的浪漫和夸张，王安泉却把这两种相去甚远的角色融为一身，刮目相看的感觉便自然发生了。他曾经

为中央电视台和西安电视台所聘请，拍摄太白山专题片，我庆幸两家电视台找到了最佳人选，一个对太白山地黑河流域的历史沿革物事世相烂熟于心又有新鲜发现的学者，难得独禀一双画家的艺术慧眼，可以想见专题片肯定会拍摄得出色亮彩了……读着《黑河》书稿，文字里浮现着王安泉的另一副面孔，作家。相对于写生画画和地方史志编辑而言，散文创作独有其不可置替的优势，可以尽情尽兴抒发了，画笔勾勒的或写实或抽象的线条，有巨大的想象空间供欣赏者展开思维驰骋，却难能实现太白山地黑河流域历史演变人文轶事的阐述；散文写作还可以挣破史志的文风的束缚，任由想象的翅膀飞翔，任由诗性的激情抒发。这样，让我又看到一个作家王安泉的不俗的表述能力。《黑河》之所以让我发生急切的渴望性阅读心理，就在于作者王安泉先生兼着画家、学者和作家的多重修养，画家使他有一双察看山水的诗性的眼睛，学者的知识使他把太白山黑河水久融于心，作为作家倾情书写的时候，便把一道独特体验的山（太白）水（黑河）风景推到如我一伙读者眼前了。读来令人沉迷。

《黑河》的文字语言也是令我沉迷的一个重要诱因。简洁明快，通畅而又扎实，一句一词都有鲜活逼真的景物推到读者眼前；甚好地把传统文字表述形式和已成习惯的西式表述形式熔铸一炉，不留痕迹，形成了作家王安泉先生个性化的语言标征；更难得的一点，大量的关中生活口语，运用于叙事状物的文字之中，不仅呈现出语言的鲜活，而且铸成语言的硬度和韧性，足见文字修养功夫。整部《黑河》的叙述和描写，可以用自如随兴来概括。无论叙事状物，无论道古说今，腾挪转换，自然自如，不留硬痕，读来畅达而有舒悦，不见丝毫隔膜，依着笔者习作的体会说，难能如此。尤其值得一说的是，王安泉先生的这部散文《黑河》，颇多起伏又生动的情节，往往让我有陷

入小说阅读的错觉，无疑是急切的渴望性阅读心理发生的又一个诱因。随便抽出一小节：

有人高声对黑水生喊："昨晚又和你老婆咋睡来？"

黑水生说："搂上睡来。"

几个婆娘一齐停下锄，尖声轻蔑地喊："老骚情！"

黑水生说："眼红了？"

一片笑声盖过了黑河、渭河的水声。

这样的情节，确像小说里的情景，却比某些缺乏生活体验的小说还显得生动和真实。这里的简洁，却更传神，调侃的双方的音容笑貌尽可在简短的对话里感知得到，而无须再用文字去描写。《黑河》的语言随叙述内容而变换，写到某件史实或现实景物时，作者又呈现出密实的语言，犹如风吹绿野，一波一浪涌来，读来顿生激烈澎湃的美感。

我和王安泉先生虽有过几次接触，然而，只有在读过《黑河》书稿之后，才领略到一种深厚而又鲜活的性情。无论小说、诗歌，抑或是散文，都是某个作家关于世界关于人生的体验的展示，尤其是散文，多是直抒个人的生活体验；读着泼洒到纸上的心语，作者的性情和心灵就坦荡无遗了，尤其是那些容量大、体验深的作品，《黑河》即如此品位。还有一点黑河情结，便是年年月月日日都喝着黑河的好水，再读《黑河》，更有一缕非同寻常的意味和韵味了。

2010年3月8日 二府庄

感知躬行者的履迹声响

一

平生乱读书，其中包括一些人物传记读本，有的是影响乃至改变一个国家历史进程和民族命运的人，有的甚至是影响世界格局和数以亿计的多种民族命运的人，也有在自然科学和文学艺术领域卓有建树的人，自然对我认识世界不断校正自己人生的脚步都发生过启迪的效益。

我之所以开篇便说此事，也是话出有因，便是读《躬行集——我的回忆录》所触发。以上所说的人物传记里的人，业已成为历史记忆里的一个符号，于今读来尽管仍不失某种震撼人心的效应，却也仅仅只是一种久远的业已沉寂的历史的回声；更有时空和地理的隔膜，难得消解难得跨越，便留下阅读的小小遗憾。依着既往的这种阅读感受进入《躬行集》的阅读，却发生了决然不同的感受，一种颇为急切的探秘的阅读欲望，其实早在揭开书稿之前就酝酿于内了。

这种阅读心理的发生，说来也很自然。这本名为回忆录实为自传的传主牟玲生，是我读过的各种传记的传主中离我距离最近的一位，没有时空隔膜，尽管长我几岁，各自生活经历的社会大背景却几乎完全一致；更没有地理距离，他家在关中西府，我在东府，后来又都先后迁入古城西安；早在二十多年前我就认识他了，连陌生感都不存在，何以会发生“探秘”的阅读心态？恰恰在于我认识他的非常环境，他是作为一个省的重要领导人在台上做报告发指示，我是坐在台下大厅里聆听领会报告和指示的众多受众之一；台上的他客观地俯视着台

下，台下的我也客观地仰视着台上的他。在我第一次仰视他的时候就曾经想到，这位走上一个几千万人口的省的重要领导岗位的人，曾经有过怎样平凡的人生经历，以及超乎寻常的个人意志和品质，神秘感很自然地发生了。就我隐约所知，那个时候党内似乎有甚为严格的纪律，限制对省级领导人的个人色彩的宣传。这样，那种神秘感便潜存心底，竟有二十多年，直到揭开《躬行集》书稿的时候，那种“探秘”的阅读心态便自然发生了，颇为急切。

揭开《躬行集》书稿，我看到的是一个距我最近却也显得陌生的我的领导的人生履迹，坚定而又艰难，果决却又沉重，甚至不无凶险。正是在这样的人生履迹中，彰显着牟玲生人生追求的崇高的精神境界，一种难能可贵的独立的人格品相。

二

读完《躬行集》书稿，我有诸多感受和感动，归结一句话，这是一个把毕生精力和智慧都投入且专注于革命事业和革命工作的人。

牟玲生的少年时期所经历的艰难困苦，是超出我的想象的。他来到人间仅仅半岁，便跟父母开始了逃荒求生之路，远及甘肃平凉，历时三年之久，其间要饭、打工、破庙栖身，能够顽强地活下来确属万幸。然而更让我意料不及的是，牟玲生小小年纪便参与地下革命活动。年仅十五岁的少年掩护三个地下党的大学生躲过国民党特务追捕的劫难，也把自己投入到地下革命的斗争之中，不仅没有动摇，而且不惧凶险。我读到他少年时期参加地下革命斗争的事迹时，感到是很自然发生的事。略一思索，似乎有两大因由，一是直接的诱因，他的哥哥牟富生已经是负有重要使命的西府地区地下党的一员了，给他以直接的影响，而且完全信赖地吩咐给他以任务，牟玲生都忠诚致力地

完成了。二是牟玲生本身的反叛性格的形成，主要是反动而又腐朽的社会压迫。他一来到人世便逃荒要饭，侥幸活了性命，这在堪比天府之国的关中西府，令人不可思议；他几度上学，又几度失学，全都因为一个穷困而难以为继；他亲眼看见催捐抓丁的国民党地方爪牙拳打脚踢父亲，也看到只能忍气吞声默默流泪的父亲痛苦而又无奈的脸色，仇恨便激发为抗争和反叛。我同时也能想到，人口稠密自然环境甚好的关中地区，恰恰是国民党军、警、宪、特重点布防的关键部位，留给革命者搞地下斗争的空间很小，风险亦更大，少年牟玲生投身地下革命斗争，这种毅然决然的人生选择，必有一个最基本的也是最坏的估计，把生死置之度外了。

一个把生死置之度外以大无畏精神投身神圣的革命事业的人，永远令后来者敬重；尤其是一个尚未成年的牟玲生，在人生的初始阶段，便奠基了为被压迫被剥削者争生存求解放的宏大的人生志向，而且投身其中，为后来的人生打下了难得改易难得动摇的坚实基础。他的《躬行集》书稿所呈现的人生履迹，也印证了他人生志向和人生价值追求的一贯性目标，即党的事业和人民的利益。仅看他人生历程中重要几步的声响——

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二年实行土地改革，年仅十八岁的牟玲生担任一个乡土改工作组组长，却能严密地把握土改政策，没有发生扩大打击面的事，那时候全国不少地方发生过打击面过宽的“左”倾偏激事件。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期，牟玲生获得留学苏联的难得机遇，努力克服文化基础薄弱的多重困难，留学取得优异成绩，俄语达到可以简单对话的水平。关键在于一点，新中国的建设事业既需要马列主义理论

修养，也需要专业知识，为着这样一个崇高的目的学习，不仅劲头十足，智商也获得超常的扩展和提升。

“大跃进”的一九五八年，刚刚留苏归来的牟玲生，作为下放劳动锻炼队的队长来到略阳山区，像当地农民一样干农活务庄稼，又给当地乡民普及文化科学知识。更难得的是，他以试验田的两度失败，验证了“大跃进”年代高产量的虚假和荒唐。

在长达十年的“文革”浩劫中，牟玲生经受了严峻的考验，在扑朔迷离的社会背景里，在派系斗争尖锐对立的漩流中，他始终保持甚为清醒的思路，艰难地坚守着对真理的不二忠诚和对谎言的拒绝。由此而受到惩罚也不改辙易径，宁可接受“勒令”到陕北农村劳动，也不顺从邪恶。在那样险恶的环境里，突显出一个人真正的党性原则，更见识难得的人格风骨和道德操守。

“文革”后期，牟玲生调到宜川县，先任县委副书记，两年后任县委书记。这个时期，正是“四人帮”抢班夺权作恶多端为害最烈的几年，也是各级干部里具有党心和良心的正派人最难立身的时期，牟玲生却在宜川县成就了兴利一方的务实业绩。他没有可能改变险恶多变的社会环境，却有清醒的辨识政治风向的头脑和善恶判断的能力，又兼着坚定不移的党性原则和道德操守，便可以决定自己不说什么不做什么，更可以决定自己要说什么要干什么。我看到，在“四人帮”翻云覆雨的政治环境里，牟玲生在宜川团结县委一班人，做农田基本建设，改土治水、植树造林，既改变千古以来的缺水又跑水的生产环境，又颇具远见的生态环境建设的眼光。他又善于总结经验，以科学审视的思维排除“农业学大寨”运动中几成灾难的条条框框，在宜川推行更切实际的“玉米壕田种植法”，而且倡导尚不普及的化肥施肥方

法，亲身示范。那些经过改造的台田，不仅在当年国穷民饥的动乱年代造福一方民众，而且至今依然发挥着保水保肥的永久性效益。

一九七八年，牟玲生第二次回到省委工作，任省委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这是省委的中枢神经。无须申述其重要性，也无须赘述其千头万绪到事无巨细的严密，这是任谁都可以想象的。这里我只引述牟玲生进入这个重要角色后，便给自己也给工作人员定下“四不让”的条律，便可以判断他主事的办公厅和秘书工作的办事效率和处事质量了。“四不让”为：不让领导交办的任何一件事在我手里贻误，不让正在交流的任何一项信息在我手里中断，不让任何一个差错和失误在我手里发生，不让任何一个来机关办事的同志在我这里受到冷遇。我自然可以推想，要做到这“四不让”，确非易事。然而，他们做到了，关键在于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的牟玲生自始至终都保持着一种以身垂范的姿态。完全可以相信办公厅和秘书工作的办事效率和质量。我突发感想，有牟玲生做秘书长和办公厅主任，既可放心，亦可省去许多烦心。

牟玲生走上陕西省最高领导岗位，出任省委副书记，主管农村工作和宣传文教工作，长达八年。同样无须赘述《躬行集》书稿里的诸多叙事，仅举一例便可看到作为一个省的重要领导人的思想和作风，这就是牟玲生在陕西省延安市召开的种草种树会议上所做的主题报告，是他冒着陕北零下二十度的严寒，带领调查组下乡镇、走山野，跑遍五六个县，不仅搞座谈搞调查，而且亲身走到亲眼观看，更难能可贵在亲自下手执笔，几经修改，拿出一篇既切合陕北实际亦合乎科学的种草种树的规划报告。我又忍不住感慨，在主席台上做这样的主题报告的牟玲生，当会是既充满自信，也满怀感情的；自信来自于这

个报告产生的实际性和科学性，感情当是自身亲自调查又亲自操刀完成心血之作的……

我把牟玲生人生历程中具有重要意义的几个履迹摆列出来，在于呈现一个曾经被饥饿和瘟疫威胁过的关中乡村孩子，如何走上一个有几千万人的省的领导岗位的。他的思想发展的成熟过程，他的工作能力不断提升的经历，他对党的思想和原则的坚守，尤其是在鱼龙混杂荒谬逞凶的特殊环境里不惜性命的坚守，他的视野的逐步扩展，还有自我道德的恪守和完善……不仅于他是一种人生归结，更在于对后来者的启迪和示范，人就应该这样面对生活面对世界，就应该这样面对自己足下的生命旅程，无论在社会的哪种位置上。

三

阅读《躬行集》书稿，我突兀地感知到一个人对崇高信仰的不懈追求，和伴随始终的言行一致的精神坚守。

牟玲生不是先接受马列主义学说而投身共产主义革命实践的，恰恰是在几乎没有革命理论准备的少小年纪，就已经进行革命的行动了。他对共产党革命的信奉，得助于从事地下革命的哥哥的直接影响。那个时代关中地区严酷的白色恐怖，再加之尚为乡村少年的年龄局限，很难实现共产主义革命理论的系统学习。即使在共和国成立后的和平环境到来时，百废待兴的革命大局势不仅不可能提供给他坐下来研读马列著作的机会，而是把一个土改工作组组长的重担压在了年仅十八岁的牟玲生肩上。他学习和钻研的理论课本是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的文件，既要领会文件精神，更要在实践过程中准确把握政策分寸。从书稿中所述的他所负责的几个村子的土改全过程来看，完全体现了中央文件的精神和政策，尤其是对情况较为复杂又有特殊因素

纠缠的魏考祺家庭成分的划分，确凿可以见出牟玲生这位年轻的老革命的清醒和冷静。这种清醒和冷静，在于政策把握的准确，以及对中央文件精神的高度自觉，这对于一个十八岁的人，委实难能可贵。然而，这个时期的牟玲生的理论学习和修养，主要体现在中央关于某项中心工作的指导文件上，这是结合中国国情的体现着马列主义精神的理论，也是不可或缺的。

牟玲生终于有幸获得学习马列主义原著的机遇，不仅是长达一年的专业学习，而且是出国到苏联留学。对于仅在关中西府乡村学校断断续续读过几年书的牟玲生来说，可以想见其艰难，却被他强烈的求知欲和顽强的学习精神所化解。在苏联老师的指导下，他学习了《共产党宣言》《反杜林论》《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资本论》《做什么》《进一步，退两步》等马、恩、列、斯的原著。牟玲生总结这次学习收获时说："这是我生平中最难忘的经历之一。我第一次比较系统地阅读了马列主义的经典原著，学习了马列主义基本原理。"在我理解，这种对马列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和对马列主义基本原理的领会和掌握，之所以会成为"我生平中最难忘的经历"，就在于他完成了一次思想的升华和精神的飞跃，这是具有非同寻常意义的大事。年仅二十五岁却有十年革命经历的牟玲生，绝大多数岁月里都在做着具体的革命工作，对于这样一个忠诚革命又有丰富的革命经验的人来说，对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真理的领会和掌握，就会从个人受压迫求解放的心理层面，升华为对人类未来进入大同世界的思考，也从哲学层面实现了一次精神的飞跃。这种思想的升华和精神的飞跃，不仅对自己正在从事的具体工作的意义的理解发生全新的提升，还在于对自己从事的共产主义理想的信仰更为坚信了，成为人生价值意义上的唯一追求。

这种从马列主义原理高度上发生的对共产主义事业的信仰，必然的效应就是对真理的坚守，甚至可以说是一种至死不渝的品格，我仅从牟玲生发生在“文革”的一件事，就感知到了这一点。牟玲生在“文革”的派系斗争最激烈的岁月里，仍然不参与任何一派，这种行为本身就显示着他对这场祸害国家的运动的清醒认识。我也经历过“文革”，深知能保持这样不随波逐流不卷入恶性伤害的人，是要冒政治风险的，甚至有生命危险。牟玲生几经胁逼，绝不参与派系斗争；在专案组中，他坚持实事求是，决不做陷害人的材料，迫使军宣队一怒之下解散了专案组；直到造反派使出狠招，把他下放到榆林农村去劳动，甚至把爱人和孩子的西安户籍也注销了。我读到此，便想到了一个人的骨气和独立人格，只有对真理的坚信，才有辨识即使如“文革”这样人妖颠倒的复杂浊流的清醒理性，也才有坚守真理的勇气，才有宁可遭遇压迫、遭遇灾难而不改的骨气和人格。

更令我感动的是，在被作为惩罚的下放劳动中，他却以主人的姿态很快融合到农民群体之中，和村子里的农民一起下地干农活，推车挑担抡镢头，一天三晌和农民一样出工干活。遇到干旱威胁，他和农民一起挑水浇苗，仍不能奏效时，他竟跑回西安，向有关部门申请调拨了一台柴油发电机组，如此等等。用我们通常的习惯用语，确是“急农民之所急”。他在榆林这个村子下放劳动，时间长达三年，竟然成为农民舍不得放走的人了。我又忍不住感动和感慨，一个被惩罚被“贬谪”到边远乡村长达三年的人，却能做到不理会加害者的原本意图，仍然为当地民众做好事谋福利，这种自信到完全踏实的心理状态，不是任谁都能达到的，通常所见的多有丧气灰心难以摆脱消极。牟玲生超常的自信，我想当属对真理的信奉和坚守，客观上也形成对得逞一时作孽一时的邪恶势力的不屑式蔑视。

四

阅读《躬行集》书稿，我突出地感知到一个人凡事求真的科学精神和务实的工作作风。

随意举几例。

一九五〇年任土改工作组组长时，一个富裕农民怕被定为地主成分，偷偷给一位工作组干部行贿，引起不小的公愤，贫农代表大会几乎一致通过给他定为地主成分。作为土改工作组组长的牟玲生意识到不妥，行贿行为是一码事，而他家的实际情况是另一码事，行贿行为尽管恶劣，却不是他的家庭该定何种成分的关键因素。他便几经磋商，仍然给这户人家定位富农成分。在当年农村颇为激烈的土地改革运动中，能保持这样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确实难得。

再如一九五八年他被下放到略阳劳动锻炼期间，正是“大跃进”的浮夸风刮得最猛的时候，报载亩产水稻过万斤、小麦亩产几万斤的高产纪录。他与下放干部和当地群众先后做了水稻、红薯、玉米和小麦的高产实验，以红薯六千多斤和玉米八九百斤的高产成功和水稻、小麦密植的彻底失败，亲手验证了反科学的浮夸风的荒谬，也使自己“增长了不少知识，明白了报上所说的万斤粮之类的报道，只不过是浮夸而已”。这种亲自动手所获得的经验，足以拂去任何动听的谎言。

这里着重说一下牟玲生在宜川县六年期间的政绩，更集中体现着他求真务实的精神和作风。这是一九七二年到一九七八年，正是学大寨运动搞得癫狂的年月，浮夸风和形式主义成为不可抵挡的风气。牟玲生到宜川县工作，先任县委副书记再任书记。初到宜川，他便下马观花，调查研究，费时几个月，把宜川的历史、人文、民风、民俗大

略弄个明白，尤其着重于宜川的山、原、川、水等自然环境和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的掌握，更用心听取各级干部和当地群众关于改变穷困面貌的意见，终于做到胸中有数，拿出一个切合宜川实际的工作计划和治穷致富的可行性方案。

他看准了宜川地阔人稀产量低的两个主要原因，一是跑水跑肥的山坡薄田，二是缺水致成的低产量乃至绝收的靠天吃饭的被动生存现状，便集中力量花几年时间改造坡地为平整梯田，又下大力气解决灌溉难题。无须赘述他的缜密计划和实施过程，单看他带领干部群众实干六年之后的成果，便一目了然。几十年后，宜川已是闻名省内外的优质苹果生产大县，那些经他们修整的保水保肥梯田或埝地，给苹果的栽植和生长提供了绝佳的条件。他三十年后再到宜川探访时，那些苹果种植户获得良好的经济效益，仍念念不忘他们当年改造田地兴修水利所带来的永久性好处。此刻他产生的欣慰，当属“桃李无言，下自成蹊”。

难得还在于他力推科学种田的思路和坚定不移的主张。前述已说过，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的“农业学大寨”运动已经搞得浮夸而又离谱，牟玲生却倡导科学种田，推行良种提高产量，而且推行农民尚不习惯也不大相信的化肥和农药，包括请各路专业技术人员向农民普及农业科学知识。他抓植树造林绿化荒山的计划可谓宏大，而且具体，逐一落实，不仅人工栽树，而且动用飞机撒播树种，足以见出他的前瞻性。

我曾经在农村基层公社工作过十年，对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后期“学大寨”运动的浮夸风和形式主义深有感受，因而对牟玲生在宜川因地制宜求真务实的做法深感难得，既要有一种符合科学的思维，更要有拒绝浮夸风和形式主义的胆量和气魄，他的“唯实不唯上”的坚定信念，

是做好了被摘乌纱帽的心理准备的。读到这些往事，仍令我感动，钦敬也自然而生。

五

阅读《躬行集》书稿，我不无震惊地感受到一个人绝不宽容自己过失的自省精神。

读着《躬行集》书稿，往往会发生让我意料不及的情景，就是牟玲生对自己工作中的几次失误的自责和反省。许多事已因时过境迁而被生活淡化以至淡忘，而牟玲生却积久难忘，更不宽恕自己，一件一件诉诸自传体的文本，词恳意切地检讨和反省，读来不仅感动，且不无震撼。一个人敢于面对自己的过失，也就敢于面对业已成为历史的过去，更有面对未来的踏实和自信。

"'文化大革命'中，受极'左'思潮影响，我也盲目地批判过所谓的'陕西民主革命不彻底'。现在想起来，深感愧疚。"引自《躬行集》书稿的这段自我反省的文字的社会背景，严格说是始自"文革"爆发前两年开始的"四清"运动，是当时陕西对"四清"运动的基本指导思想之一，即"陕西民主革命不彻底"，要通过"四清"运动实现"民主革命补课"。在这种主导思想下开展的农村"四清"运动，最直接的后果是把一大批乡村干部错定为"四不清"干部，把许多中农农户补定为地主或富农成分。到新时期纠正冤假错案时，那些被错定的"四不清"干部和补定的地主富农成分的农户，几乎全部平反纠正了。

那场"四清"运动的社会背景，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毛泽东重提阶级斗争问题之后发生的事，全国都搞了，主要在农村，大约从一九六四年起始，分期分批一个县一个县接连搞着，直到一九六六年"文革"

爆发而停止。在西北和陕西，把“民主革命不彻底”作为开展“四清”运动的指导思想之一，也是“狠抓阶级斗争”切中西北和陕西的特殊命题。牟玲生作为蓝田县“四清”工作组的负责人之一，执行这样的指导思想和方针是很自然的事，也是不容怀疑的事。当年全国搞过“四清”运动的干部当以百万计，至今仍怀“愧疚”心情而反省自己“盲目”执行极“左”路线和政策的牟玲生，就令我感动了。

牟玲生至今仍感到“遗憾”也感到“有辱使命”的事，发生在他任宜川县主要领导的时候。那一年（一九七三）周恩来总理回到延安，看到革命圣地的延安人民在革命胜利二十多年后仍然缺吃少穿，流下了伤心的眼泪，并当众公开检讨自己没有当好总理。随之，周总理提出“三年变面貌，五年（粮食产量）翻一番”的目标，包括牟玲生在内的延安地区和所辖县区的领导都立下了军令状，保证实现总理的嘱托。直到牟玲生六年后调离宜川县，粮食亩产量提高了，人均粮食数量也增加了，然而却没有达到“翻一番”的目标，一种“有辱使命的感觉”一直潜存心底。

牟玲生没有说未能实现“翻一番”的客观因素，不著为自己开脱的一词一字，却纯粹自责为“有辱使命”。我所能想到的有两点，一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文革”发生的一场接一场的中心运动，已经闹到全国都民不聊生怨声载道的地步，尤其是大批特批“唯生产力论”所发生的怪论，“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各级领导干部要抓生产反而成为过错。在这种背景下，牟玲生仍然顶着压力在宜川修田、治水、植树、造林（不赘前述），使宜川农业生产的基本条件得到永久性的改善……然而，他却既不做客观辩解更不为自己开脱，把潜存心底的“有辱使命”的“遗憾”留在自己的人生脚印里。这种境界令我感动。

把“两个失误的教训”作为醒目的标题列为一节，可见牟玲生反省的郑重性。一个失误事件，是在宜川搞了劳民伤财的八个“小高抽”水利工程，另一个是在“一批两打”运动中发生过火斗争致人自杀的事件。前者犯了“决策不符合实际”的错误，而后者却是他作为县委一把手应负的责任。尽管他再三强调工作方法防止过激行为，却仍然发生了过激行为致人自杀的惨事，他便揽起作为自己的过失，作为教训，自责至今。

写到这里，我发觉在涉及牟玲生自责反省的几件过失时，我不自觉地都叙说了这几件事发生的社会背景，似乎有为牟玲生辩解或开脱之嫌。然而，我却不能不说，因为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才会发生这种过失，常见的现象是，许多人把类似的个人责任都推给社会大背景里去了，唯独牟玲生却不宽容更不为自己开脱，而是严格地自律、自责，实现自省。我的由意料不及的震撼里发生的感动，就很自然；敬重一种人格境界，也很自然。

六

读完《躬行集》书稿，那个坐在主席台上做报告，我在台下聆听并仰视的牟玲生不再是陌生的熟人，而是让我有一种知根知叶知外又见里的人了。

牟玲生少年时便投身革命，冒着生命危险而不退缩；牟玲生刚刚成年，从基层工作做起，之后多年变换多种工作，积累了丰富的工作经验；牟玲生有机会留学苏联学习马列主义原著，精神和思想完成了飞跃和升华；牟玲生工作历程的许多时月，都是在我们国家极“左”思潮愈演愈烈的困难局面里走过的，却能保持基本清醒的头脑而不随波

逐流；牟玲生严于律己的自省精神，显示出一种坦诚的人生境界……我在前文中所说的感动和敬重，是由阅读引发的真实的情感。

我想到，年近八十岁的牟玲生，回首往事凝结成《躬行集》书稿的时候，如此坦然面对人生的行程的履痕，如此坦然面对自己生活和工作的脚下这块土地和人民，该当是骄傲的，自信的。然而，只有对这块土地和人民鞠躬尽瘁，才能获得面对人生履迹的坦然。

2010年6月5日 二府庄

话说陕西人

赵乐际书记《在省文联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的讲话》，充分肯定了近年间我省文艺工作者在戏剧、电影、电视、文学、绘画和书法等领域取得的令人瞩目的成果，对作家艺术家的创造性劳动无疑是一种真诚而富于力度的鼓舞。

《讲话》号召并期望文学艺术工作者在攀登文艺精品的创作时，“多角度描绘陕西人勤劳质朴、宽厚包容、尚德重礼、务实进取的典型形象……”这是对陕西人地域性共性的概括。作为陕西人，我一直关注和探索这块土地上的今人和前人的精神和气质的共性，以及由前人到今人的演进演变的心路历程。听到赵乐际书记的概括，之所以引起包括我在内的与会者的共鸣，就在于这种概括的准确。唯其精确，才能引发热烈的共鸣，随之而来的自然是思考。这四句十六个字的概括，既呈现了陕西人的性格特征，也揭示出陕西人的精神气质和心理形态，以及作为精神、心理、个性气象底蕴的传统道德规范的德和礼的遗风。我之所以说准确，就在于这种概括切合着陕西人的脉象，自然也是我多年生活在这块土地上的直接感受和感知。

这种准确概括必然会激发艺术家和作家的思考，陕西人的这种共性是如何形成的，其历史和文化的渊源该当做出探索和解析，尤其对历史人物的创作极富启示性意义；在近百年来历史演变和生活演进的骤烈而又复杂的漫长岁月里，陕西这一方地域的一代又一代陕西人，在完成精神和心理裂变的过程中，为何能够依然保持着这种独有的地域性特质；更具切近到不可回避的当下现实生活，经济高速发展物质日渐丰富的主流中，同时浮泛着庸俗乃至腐朽的理念，陕西人也面临

着应该坚守什么，如何坚守，力戒什么，如何拒绝，才能使这方地域上的人的独有的品格传之久远……除了党政学校这些社会重要因素之外，文学艺术的张扬和感染力，是无可替代的，作家和艺术家以各自擅长的艺术形式，努力探索揭示各自理解和体验到的陕西人，塑造出坚守和继承着这种品格的令人耳目一新且具心灵震撼的陕西人形象，既是作为陕西领导人赵乐际书记的希望，也是陕西乃至中国观众和读者的期待。

2010年8月9日 二府庄

简说柏峰散文

认识柏峰，大约三十年了，那时候他正在大学读书，有缘相识。几十年过去，虽然过从疏淡，却幸未断止，不敢自命为淡淡如水的君子之交，却也可自信庸常无益的来来往往拉拉扯扯不曾发生，便形成一种简约却也明晰的印象。初见柏峰时的学生气儿，渐变为一种谦谦的书生气儿，再变就成为颇不随俗的学者气象了。印象里，柏峰似乎言语不多，更难见夸夸其谈，每有话说，却倒也坦荡直率；许多年自囚于渭南一隅，凭窗读书，锲而不舍，自得其乐，如此恬心静气的治学风范，在喧嚣的当今生活潮中弥足珍贵。

柏峰长期从事语文研究，这是他的主业，在语文界已是资深且卓有建树的研究者，已出版过几部专著，仍不断发表新的研究论文，颇负盛名。他酷爱读书，涉猎面广，更善钻研，对现代哲学和文学理论兴趣很浓，对古典文学和艺术亦有长盛不衰的爱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研究成果。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期，柏峰就获得过陕西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去年又获得首届陕西文艺理论奖。获奖是对他学术探索的肯定，也是对他苦心孤诣问学精神的鼓舞，自然也可见他学术造诣的功底和不可或缺的价值了。

更难能可贵的是，柏峰还擅长散文创作，而且已形成独立个性的品格。迄今为止，柏峰已出版了《野涧散墨》《枫窗新月》《月在东篱》《柔软的心灵》《归梦绕家山》等散文集。单看这些散文集的书名，约略便可感知作者的性情，以及文章的品相了。柏峰自家写着散文，同时还在思考研究散文这种文体，出版了散文理论专著《二十世纪中国散文》《论中国散文精神》等。同样，单看这两部散文研究专

著的书名，顿生肃然，二十世纪一百年间，从新散文诞生到世纪末的散文大繁荣，出了多少堪称伟大的散文作家和堪称经典的散文作品，要做出独立见解而又能服众的一家之言，谈何容易。然而，柏峰做成了。要对整个中国散文作品的精神做出论断，必有一副高蹈群峰又点石成金的眼力，才可能从精神的层面上阐释百年以来的五彩缤纷的散文诸家，这更谈何容易。然而，柏峰也做成了。说到柏峰的散文，阅读中处处可以感知其思想的力度，那里泛溢着新人文主义精神的另一种韵致，无疑是追求高远、和谐和文明的境界。在艺术上，他独辟蹊径，寻求把古典语言和现代语言有机融汇的属于自己的语言，追求典雅清新却又鲜活生动的艺术效果，业已独成风景。

无论是致力于哲学社会科学，抑或是文学创作（散文为偏重）艺术的研究，都在促进并促成他的散文创作的高起点和高境界的自然实现，这是柏峰自己蹚开的适宜自己艺术创造理想的途径。柏峰正当盛年，相信会在自己独辟的艺术途径上继续探寻，获得更高的艺术境地，当是个性独具的“又一村”。

2010年8月14日 二府庄

想起了杰克·伦敦

在《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的新闻发布会上，听到主讲人阐明这项前所未有的（陕西）文学书籍出版计划的基本思路时，美国作家杰克·伦敦竟然从我的记忆深处浮泛出来。

杰克·伦敦年轻时穷困，穷困到不惜冒险参与海盗行径。干着海盗营生的杰克·伦敦发生了良知反省，更重要的是发生了想写小说的欲望，而且这欲望强烈到不仅不可压抑，而且急切到刻不容缓，他便逃离了海盗团伙，栖居在海边小镇上一个小屋里写起小说来。写成一部小说，跑了几家出版社，不仅没有一家出版商看中小说，倒是看到一家比一家翻得更白的白眼，嘲讽的言辞也是一个比一个更尖刻。杰克·伦敦却不仅痴心不改，更加倾心更加专注于新的小说的构思创作。我已记不准杰克·伦敦的哪一部书稿，终于得到一家出版社老板有点勉强的认可，决定出版。杰克·伦敦喜不自胜，连出版社老板明显带有欺侮和坑人的十美元的一口价都接受了。他拿着说不清是稿酬还是版费的十美元酬金，来不及回家，直接到当铺把自己的一辆自行车赎了回来，再把剩余的几美元全部买成最粗劣也最便宜的面包，堆在屋子里，又潜心静气进入一部小说的写作了，一天三顿都是吃面包喝开水。直到面包吃完缺失下一顿的时候，他又把那辆作为唯一财产的自行车送到当铺里，换几个美元再买一抱粗而劣却也便宜的面包，继续他的长篇小说的写作……直到他走红并响亮于美国文坛，直到他的作品很快被广泛的普通读者所热衷，直到他的作品被众多出版社预约、争购、抢购，甚至高价收购。这样，一个享誉美国又享誉世界的伟大作家终于铸成不朽，他是杰克·伦敦。

在《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即将启程的庄重而又令我鼓舞的仪式上，我想着杰克·伦敦如果生在当代中国陕西，肯定会进入《西风烈》图书出版系列，就不会发生把自行车抵押当铺换面包吃的艰难困苦的事了，而且完全可能早几年就破土而出了。然而，在商业利益驱使下的美国出版界，眼睛紧盯着知名的又走红的几个作家，本属正常的也是司空见惯的生活世相，又逢着美国的经济大萧条时期，出版业本身不景气，杰克·伦敦这样的旷世奇才不被淹没不被摧折已属奇迹，亦属万幸。《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的声势浩大的出版工程的决策，正是基于目前中国文学图书出版现状做出的。任谁都能看到，文艺书籍的出版呈现着一热一冷的现象，名家的作品成为抢手货，本省难得留住，多数流向省外出版社出版；而众多的尚未成名的青年作家，写出作品却少有人问津，出书成为普遍性困难。这是实施市场经济运作的出版业必然发生的现象。出于扶植和培养有才华有潜力的新一代陕西青年作家，便促成了《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出版工程的实施。

面对“不相信眼泪”的图书出版市场，能够做出这样大气魄大动作的出版工程的决策，无疑出自一种富于远见的大思路大眼光，为着尚未破土而出也尚未成名的陕西的杰克·伦敦们铺桥修路的，也就是为着陕西未来的文学事业的灿烂前景的。这样切实的扶持青年作家创作的图书出版工程，在杰克·伦敦时代的美国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在今天的任何国家的出版业界仍然是做梦也不会梦到的事。然而，这样的事在当代中国的陕西发生了，且已付诸实施了。我便忍不住感动，毕竟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体制，既实行图书出版业的市场运作，却也绝不无视市场运作过程中的冷脸，即对无名作家的轻视；在市场运作主导图书出版的现实里，能够正视这种现实里的冷脸，而把关注的眼光投向那些正在跃跃欲试正待破土而出的青年作家，可以感知一种富

于远见的眼光，一种专注陕西文学事业的大思路，还有一种关爱后来者的至诚情怀，才有这样令人感到振奋的图书出版计划的创立和实施。

陕西基本被公认为文学重镇。中国“十七年文学”有陕西作家的重要建树，新时期文艺复兴以来的当代中国文学，也有陕西作家不同凡响的声音。无论当代文学界，尤其是陕西文坛，甚至在陕西文坛之外的各界读者群体，似乎都在关注陕西文学的未来，更偏重于三十岁以下的青年作家的成长和前景。能引起各方各界读者的关注，深以为幸，也是一种催发的力量。在我看来，这个《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的出版工程的实施，便是最务实的扶植青年作家成长发展的举措。得着这样有力的扶持，陕西的青年作家将减除杰克·伦敦当年的苦苦挣扎，能够缩短破土而出峭立未来中国文坛的时间，不仅创造陕西文学的新风景，也将成就中国文学别具一格的景观。

我为进入《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的青年作家庆祝，并期待不同凡响的新作问世。

我为《西风烈——陕西百名作家集体出征》的创立者和实施者诚表钦敬之意。你们的思路你们的用心，都是为着神圣的文学事业的。

2010年8月27日 二府庄

说给云儒三句话

云儒过七十岁生日，各界人士拥集，场面庞大而又热烈。对于一个大半生都从事原本属于冷寂的文学评论工作的人来说，足以见得社会影响的广泛，远远超越了文学界。云儒约我说话，正中我表现欲念，连任何客套都不曾发生，我便踊跃而出，瞬即形成三句话，说给云儒。

第一句话，云儒是我的老师。这话不是客套，更不是恭维，而是真实的事实。

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西安市群众艺术馆为文学爱好者搞文学讲座，我是虔诚的一个听众。周六下午走到纺织城东边的水沟村，花两角钱在农民的家庭客店歇脚，天不明起身赶到西安聆听各种选题的讲座。约略记得是那年春末夏初的一个周日，我在讲堂里看到了走上讲台的肖云儒，竟然由惊诧而瞬间浮泛出悲哀沮丧的情绪来，概出于他那一张脸孔。不单是那张脸的俊气，关键在那张脸所标志的太过年轻的年龄，看去好像比我还要小几岁，我的沮丧以至悲哀便发生了，这样年轻的人登上讲台做讲座，而自我感觉比他还长过几岁的我坐在台下接受他的文学启蒙，还梦想搞文学创作，未免太晚了……

我还是耐心听讲。他的讲题是《散文散谈》。就是在这次讲座上，我亲耳聆听到他对散文这种文体的概括——“形散而神不散”。这句堪称精湛的概括，在我一遍成记。我那时正学习散文写作，这句话便悬在心中。几十年后的今天，云儒关于散文的“形散而神不散”的概括，不仅随处被人引用，业已成为学界公认的关于散文写作最精到也

最传神的概括，似可称为肖氏语录。而这样精准的概括，是他在二十出头的年纪作出的，足见其学养之不俗，以及横溢的才气。

我视他为老师，源出于此。尽管见面握手时直呼其名，老师的印记一直悬在心中。

新时期文艺复兴潮头伊始，陕西应运而出一茬青年作家，作品引起整个文坛的关注。几乎与此同时，陕西的中青年评论家组成一个纯民间性质的《笔耕》评论组，紧盯着刚刚跃上新时期文坛的这一茬陕西青年作家的创作变化和发展，对他们的作品进行品评，对他们的创作起到了促进作用。云儒是《笔耕》评论组年龄偏轻却最敏锐的评家，他的笔锋触及每一个作家的作品，赢得了作家们的钦服和珍重。我也是受益者之一，不仅在他肯定意见所给予的鼓励，更在对作品弱点的严肃的批评。记得我的《信任》获一九七九年全国短篇小说奖时，得到的几乎是一口腔的称赞，猛乍听到他毫不掩遮的批评，而且是甚为致命的否定性批评。他既不管你获什么全国奖的影响，而且是在一个小型创作座谈会上正对着我说的。我虽然没有申辩，却基本不予接受。直到几年又几年之后，自我感觉实现了一次又一次创作突破之后，我才一次又一次更深地理解了他的批评。确实说来，是一个生活真实与艺术真实的老话题，也是创作的一个大命题。我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对于创作的理解和感知，尚不能理解他的批评；反之，他对文学创作的理念和审美，超出了我当时的接受的可能性；当我后来的创作有所突破，大约才一步一步接近了他的那个文学理念和审美准则，钦佩便发生了，敬重也就是很自然的事。

听到也看到一些看人看脸却不看作品成色甚至掂红包轻重的评论的传闻，常会想起仁兄云儒直对着我面的毫不口软的批评，愈觉难能

可贵。隐藏在心中三十年的这第二句话，在仁兄庆贺七十华诞的场合说出，在我算得是一个最恰当的机遇。

第三句话，是我刚刚意识到的，即云儒已经进入人生的又一个新的境界——达观。

生日庆典仪式的同时，云儒的散文随笔集《雩山》首发。我先读《雩山》自序，直感便是云儒已进入达观这种人生的高境界。我觉得尤为难得，人活七十现在并不难，难得的是进入生命体验里的达观境界。

我约略可以看到云儒抵达达观境界的一条途径，从文学评论形成广泛影响之后，即到新的世纪伊始，他的言论已经不再局限于文学作品，而是涉及社会、政治、经济、文化、历史和现实，完全成为一个视野宽泛且有独立见解的学者。说来有趣，每当有机缘听他发言，或在报刊上看到他的文章，还有电视上听他侃侃而谈某个话题，都是一种新颖的理念，敏锐的思维；甚至刚刚流行的新鲜语汇，在他说来如道家常。在我这个受众的感觉里，既有对新理念的启蒙，也有新鲜语汇的普及……这种情景里，我突然会意识到，我还是近五十年前坐在文学讲座讲堂里的听众，是学生；他依然是登上讲台讲演的先生、老师。差别仅仅在于——

云儒已是进入达观境界的人了。

2010年8月31日 二府庄

老到少年陈奕博

我把颇为神秘的文学天才，物质化为一根对文字敏感的神经。陈奕博无疑与生俱来便拥有这样一根对文字尤为敏感的神经。在同龄人为一篇作文冥思苦索到抓耳挠腮的时候，陈奕博却要出版第二部散文随笔集了，可见其那根神经对文字敏感的程度，且不说天才。

陈奕博的散文随笔触及社会生活种种世相，直言不讳到露出见解的锋芒；有对山河大地自然风光的描摹，却不是浅表的吟诵，常有甚为独特的体验的韵味；更难得在他的笔锋竟然涉及历史上的文学大家，经典著作，以及地域人文，在继承和学习中，常常发出独立思考所获得的独具一格的体验；还有甚为老到的文字。我真不敢相信这是一个少年笔下所倾注的思维和体验的笔墨。

2010年9月4日 二府庄

独得一笔活字

近一时期有缘多见到雷涛的书法作品，确已加深并形成一个基本印象，雷涛已从毛笔字升华为书法了。我说的毛笔字，顾名思义，就是用毛笔写的字，尚称不得书法；书法尽管也是用毛笔写的字，却是可以称为艺术的书法作品了。两者的差别如同学生作文和文学作品，毛笔字如同学生作文，尽管也有优劣差异，却难以进入艺术创造的层面去品评；书法如同正经发表或出版的文学作品，尽管也有高下之分，却都进入艺术创造的层面了。前几年见过雷涛的题字，我的印象是毛笔字；几年不见，今年在几种场合看到他的各种题字，一次又一次地发生眼前一亮的惊诧之后，便意识到雷涛已由毛笔字升华到书法艺术的高档了。不觉间油然而生惭愧，自己依旧停滞在毛笔字的低档。

上述每次看到雷涛书法作品所发生的眼前一亮和伴之而生的惊讶，无疑来自直观的冲击，即视像给我感官的意料不及的冲击，惊诧和惊喜便是自然发生的心理反应了。对一种艺术品的这种甚为强烈而新鲜的反应，是我艺术欣赏的基本的心理期待，却不是经常能够获得的享受。我略做梳理，引发这种感官和心理反应的直接因由，便是雷涛书法作品的率性，一种挥洒自如到自由不羁的率气，扑面而来；笔墨起落里的灵气和动感，使整幅书法画面弥漫着也张扬着一种活力。难得就在把字写活了，只有注入书家的率性和率气，才可能有鲜活的气韵泛溢出来。在摆置着诸家的书法作品之中，不看落款署名，我搭眼一瞅便会认出雷涛的作品来，便是那种独有的率性率气所凝聚在笔墨里的灵气和活力。这当属书法艺术的个性，独禀的个性化艺术气质。

书法能形成一种独禀的艺术气质和气象，无疑标示着书法者已跨入自己独辟的艺术境界，这是很难的事，雷涛却抵达了。难在需得持久不懈的基本功的练习，各路名家名帖的楷书、隶书等的临摹，自不消说。尽管都下足了基本功夫，能否独辟蹊径进入一种个性化的艺术创造境界，却大约只占下功夫练基本功者的一个很小的比例。我看雷涛能抵达独成一景的艺术境界，大约有这样两个因素，首先是文化积淀和文化构成，对书家雷涛内在气质的决定性影响。在我的印象里，雷涛对以国学为本体的传统文化的承继颇为深厚，这是作为中国独门的书法艺术的基础和底蕴，不可或缺；难得在他同时兼备当代最新的文化理念，也拥有最活跃的独立思考的思维。这种兼容着古典传统和现代理念的思维，铸成他的个性化气质，体现在书法笔画结构和墨汁浓淡里的气韵，便独成一番景象了。不少书家注重国学传统而轻视现代理念，有的甚至拒绝现代理念，往往下足了功夫却难以摆脱匠气，那字看去也挺好，却独缺了灵气，是死字。再，当属书家雷涛的个人禀性或者说性格了，刚劲而不粗莽，机敏而不轻泛，这种个性化的禀赋决定着笔锋的运动，就是我所看到的一幅幅充满灵动的活字。

雷涛的书法已独成一景。雷涛进入自己独辟蹊径的书法艺术境界，更开阔和更幽微的艺术天地有待再探，必有更令我眼睛一亮和发生更大的惊诧的书法艺术作品创造出来。

2010年9月29日 二府庄

探索与创造者的礼赞

视角·视野

读着陈若星即将出版的报告文学散文随笔集《夏花秋叶》书稿，我不由暗暗惊诧，这人写了多少人的速写式的报告文学作品呀。尽管认识陈若星也有近十年了，也知道她主笔陕西唯一一家纯文化艺术报纸，是陕西文化文学艺术信息量最大也最新鲜活泼的一家周报，无疑也是我获得文化艺术信息结识艺术新人的一条重要渠道。《文化艺术报》办得好，主编陈若星自然功不可没，自然可以想见她是办报的里手，以及全身心的投入。然而，如实说来，我多年间只是零星看到过她写的署名文章，没有太强太深的印象。再，依着庸常心理推想，主编的主要职能在于不断更新办报的思路，赢得读者阅读的兴致，更有严峻的经济效益的压迫，似乎谁也不会要求主编亲自动笔写文章了。及至读完书稿，我的不断发生着的惊诧却释然了，在于我庸常推想的心理不仅发生错失，而且是大谬了。

先说阅读直感，陈若星的报告文学涉及多少人啊！陕西文学艺术圈里我认识的许多作家、艺术家，都被她的一支笔扫描过了，而这些人的独到的创造和创造过程里的动人的细节，在我却不甚了了，读她的文章便有对这些作家、艺术家更深一层理解的效应，也对他们痴心艺术创造的精神油然而生钦敬。陈彦的佳作《大树西迁》，我曾先后两次看过演出，每一次都被感动得流泪；然而只有在读过陈若星的《大树下的话题》，才了解了陈彦为这部剧作曾几次到上海采访，并住在上海交通大学体验生活，构思、创作，征求意见，修改，几经打磨推敲；初演后又经过大的修改，终于成就了一部深受观众喜爱，又

获得专家普遍好评的好戏。再如陈孝英主编的一部汉俄双语对照的中俄友谊散文集《情系俄罗斯》，其中收编了我的访俄散记，我也参加过这本书的研讨会，却不甚了解陈孝英为编这部书所费的艰辛周折，还有这位俄语专家的感情投入，更有这部富于创意的汉俄双语散文集出版后的良好反响。尤其是为着这部书的序言，陈孝英两易其稿，二稿还是在医院病床上忍受着病痛完成的。当我曾经不无欣幸地看着我不认识的俄文印刷的我的文字，却未想到成就这一件涉及中俄文化交流的好事的陈孝英，默默地付出了无以量化的劳动和用心。我对许多作家、艺术家的创造活动有了更多的了解和理解，距离缩短了，钦敬也加深了。

陈若星报告文学的又一显著特点，在于叙述的对象多有那些在文学和艺术上初露锋芒的新人，像刚刚推出长篇小说《血色高原》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高鸿，集歌唱家、作曲家、指挥家于一身的王胜利，甚至连在网上引起热议的《驻村日记》的作者——一位在秦巴山区下乡的省政府干部也不轻易放过，写成一篇令人深思深省的生活观察大命题的文章。这里让我甚为强烈地感知到陈若星的视角，不似当下多种媒体只盯着明星的脚步和屁股，寻找可以热卖的逸闻趣事，而是满怀激情地把一批文艺新苗推到读者面前，对于这些刚刚破土而出的新人的创造自信的树立，尤其对他们开创未来的艺术道路和艺术天地的勇气和信心，具有非常的意义。在陈若星独到的视觉观照里，许多富于艺术创造天才的年轻人被推到前台，对于一个省的文学艺术的未来发展前景，具有不可估量的意义。作为为艺术新人起程而鼓与呼的陈若星，她的这种富于远见的视角，在当今世风里尤为可贵。

还有陈若星的视野，其开阔的程度同样令我惊诧，近十年来陕西文学和艺术界的重要事件，一部有特色的书籍的出版，一部杰出话

剧、歌剧、秦腔的演出，一部不同凡响的电影、电视剧的面世，等等，都成为她深度采访之后形成的有思想、有见解且有扎实内容的报告文学作品。这些可看作是她文化艺术视野里的主要观照对象，姑且不赘。她的视野还旁及一个偌大的泛文化范畴，她把一位富于文化思维的医学院的党委书记叶孟理推出来，他在专业性太强到令人有冷峻感的医学人才的骨质里，洇渗了温暖的文化底蕴；更为冷僻的动物研究专家吴晓民，对于珍奇动物的研究和保护，成就卓著，却鲜为人知，陈若星把这位无名的功勋人物彰扬于世；陈若星的视野远及域外，把在中国家喻户晓的电影《望乡》的成因揭示出来，也把一位极富人道而且敢于揭露日本侵略兽行的女性史学家山崎朋子介绍给中国读者；陈若星的视野聚焦于生活中的非常事件的时候，更显现着一种义勇的气概，汶川和陕南发生地震，她以大病初愈之身亲赴灾区扶难兼采访……

编入《夏花秋叶》里的报告文学七十三篇，显然不是她写作的全部，这样速写式的报告文学，当为陕西近十年来文学艺术以及宽泛的文化领域的大事记。我阅读中感知到陈若星的独立个性的视角，以及开阔的视野，成就了这样一部作为一个省的文学艺术大事记式的著作，珍贵在其可靠的史料价值，时间愈久愈显珍贵。我猜想陈若星一路走来，一路热情而又敏锐地扫描、速写这些宽泛到文化领域的人和事的时候，大约只想着把他们非凡的创造活动和创造成果张扬给整个社会，却未必考虑到多年以后所显示的史料价值，尤其是翔实可靠而又鲜活生动的第一手资料。

一个人看取社会的视角和视野的决定性因素，当数思想。思想决定着一个人的内在气质和精神气象，也制约着行径的选择，看取社会的视角就有了独立的个性化特质。由此可以见出陈若星颇不寻常的精

神内里的大气象了。这一点，她自己大约也未必有清醒的意识，而是这些报告文学呈现出来的，一个自然而又浑成一体的气象，倒避免了清醒意识里刻意追求时往往容易发生的矫饰。

倾情·倾向

“想到此，我的眼泪‘哗’的一下就流了出来，久久不能释怀。”

这是《黄土崖上绽放的璀璨之花》一文中的一个细节。“哗”的流出热泪且“久久不能释怀”的人，不是这篇报告文学叙写的对象，而是作者陈若星本人。作者这一笔文字，却让我甚为敏感。这是写主演话剧《郭双印连他乡党》的史丰的报告文学，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人物特写。这部话剧里的郭双印的生活原型叫郭秀明，他的真实事迹不知感动得多少人落泪，话剧里的郭双印也感动得不知多少观众热泪涌流，主演史丰多次深入郭秀明生前奋斗的村子体验生活时，触景生情而泪洒热土，他饰演的话剧里的郭双印又感动得南方北方的观众难禁一掬热泪，我也曾热泪涌流。这些人的眼泪，我能理解，却不惊奇，而作为特写作者的陈若星的眼泪，却让我敏感了，这不是话剧演出现场，也不是生活原型郭秀明奋斗的村子的实景实物的触发，仅仅只是史丰说到他近期又一次去看望了郭秀明那个村子的乡党，生活已获得很大改善，可以说过上小康的日子了……人物特写的作者陈若星刚听到此，便发生了热泪涌流且“久久不能释怀”的情感反应。我的敏感在于，作为对一部话剧主演史丰的采访写作，却对话剧人物原型所奋斗的村子的变化能感动落泪，可见陈若星的情感已经和那个村子里的乡民融为一体了，当属一掬欣慰的热泪；更难得的一点在于，这掬热泪更是为着这个村子的领头人郭秀明洒下的，他生前奋斗多年的理想终

于实现了。我便感知到陈若星对郭秀明崇高精神的钦敬与崇尚，已经在不觉间转化为情感倾向了。难得的精神崇尚！

对人的精神崇尚，几乎突显于每一篇以写人为主的报告文学里，我随意举出几例。在《激情燃烧的岁月》里，以短短的文字，向读者推出一个立体而又富于质感的音乐家崔炳元。这位富于音乐天赋的人参军之后，为各路驻军演出，足迹遍及兰州军区所涉及的西北的每一处关隘，沙漠、草原、山地、河谷，风餐露宿，冬雪夏暑，整整十年，任劳任怨，倾心倾情为战士服务；他的音乐天赋很快获得倾泻般的释放，一年竟然编创二百多首歌曲，又为歌剧、电视连续剧谱曲，多为激扬悲壮、慷慨苍劲的令人热血沸腾的基调；他始终保持着一个军人的风范，豪情而不失严谨，无私而呈现真情，为着军队建设，也为着倾情的艺术，向来不计个人得失。《月照西城》写了一位别具一格的回族领导干部兼书法家乌思尧，也是集中于一个人精神品相的展示和张扬。这位在工厂干过十八年车工、钳工、统计等实活的回族青年，以其一贯的出色的工作和优秀的品德获得普遍的赞誉和好评，被选拔到莲湖区做行政工作，分管民族宗教事务，直到担任莲湖区人大副主任，依旧呈现着高尚的精神品相，诸如作风正派，刚直不阿，一尘不染等公论民议的一致性好口碑，在时下纷繁的世风里独成一景。他自幼喜爱书法，修业养性，终于修成正果，书法作品独成一格，个人的修养也卓尔不群，不为书道里待价而沽的嘈杂声浪而移情，让我感知到一个通体透亮的回族汉子的精神风采。陈若星对人的精神品相的敏感和推崇，几乎涉及她采访再书写的每一个对象，让人看到诸多坚守在本省文学艺术以及泛文化领域的大家的风骨，而仅有的两个域外采访并介绍的人选，也突显着精神和思想的倾向。一位是日本历史学家兼社会学家山崎朋子，她以冷峻的笔墨揭开日本现代史上最丑恶到不堪的一页，即明治维新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许多年，日本数

以万计的女性到世界许多国家，尤其大多到东南亚各国卖身做妓女的惨痛史实，以翔实到铁定的笔墨铸成纪实文学《山打根八号娼馆》，在日本社会引起的震惊自不待言了。陈若星对这个作家山崎朋子的这种非常举动的介绍，不是花絮或猎奇式的思路，而是着意在她的精神，即她对日本侵略和奴役别个民族的丑恶历史的批判思想。思想决定人的精神，也决定人的生命价值取向的选择，没有对日本那一段历史黑幕进行审视的思想，就不可能发生坚定不移揭示黑幕的力量。尤其是在接触到尚存人世的昔日妓女阿崎婆之后，和她“同吃同住”在非人生活的破茅棚里，竟长达三周之久，了解到无以数计的日本妓女中的“这一个”的悲惨人生。山崎朋子的行为是自己选择的，不似中国作家响应号召才去深入工厂、农村体验生活的。山崎朋子和阿崎婆“同吃同住”的日子里，不仅达到了探索历史的目的，更在和这位残喘人生的被侮辱、被损害的阿崎婆达到了深层的理解和情感的融合。这种理解和融合，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同情或怜悯，而是一个堪称伟大的思想者的自觉到本能的行为，且不说感人之类。山崎朋子高蹈的精神和思想，既体现在对日本最不堪的历史黑幕的严峻的审视的眼光上，也体现在她对阿崎婆一类被黑幕遮掩的受害者的细微细节里。陈若星把一个具有独立思想、高尚精神境界的日本学者山崎朋子介绍给中国读者，无疑具有示范的意义。另一位外籍人士是美国建国初期的重要人物艾伦·伯尔，却是一个林彪式的人物。此人堪称旷世稀有的人才，十二岁便开始接受大学教育，智商之高非同寻常；此人在军队面临绝境里屡建奇功，可谓文武双全；此人曾经被美国开国总统华盛顿选为自己的军事秘书，及至随后登上副总统的显赫位置；此人又兼有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本性，为争名逐利不惜杀害美国历史上另一位同样杰出的人物汉密尔顿……这位旷世稀有的天才人物，缺失的是精神和思想，品德自然无从谈起了，当个人的出人头地的欲望膨胀到不惜大开杀戒时，他不仅成为精神的矮子、思想的愚氓，在道德层面已滑落到

流氓无赖和罪犯了。山崎朋子和艾伦·伯尔并列在这部书中，不管陈若星是有意抑或凑巧，都昭示着天地正气和阴霾龌龊的强烈反差，即精神和思想对一个人的立身的灵魂性意义。无论社会地位，无论天生之智商，这两个人几乎没有可比的一个基数，然而面对本国民众，面对世界，一个精神和思想的巨擘和矮子昭然于世了。

写到这里，我就对作家陈若星刮目相看了。

在七十三篇报告文学和人物特写的作品里，展示的是文学艺术以及文化界各路精英的精神境界、独立思想和高尚品德，让我这个读者很自然地看到本书作者陈若星的审美倾向了。作者推崇什么，张扬什么，无可例外地显示着作者自己的审美倾向，这不仅是常识，也是作家自身难以违拗的事，我们阅读小说、报告文学以及散文，都是在文字的行间里看到作者的审美倾向的。这些报告文学和人物特写的写作时间，前后历时近十年。这就是说，在这十年的写作中，陈若星一直坚守着对人的精神和思想境界的审视和畅扬，不仅难得，而是令我敬重了。任谁都能看到，这十年里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一波迭过一波的纷繁复杂的生活世相，尤其是打着文化这块牌子的娱乐场合里层出不穷的种种花样，赤裸裸呈现着被金钱驱使着的癫狂和迷乱，影响到向来被视为神圣的文学艺术和更宽泛的文化领域，利益诱惑到一些作家、艺术家和文化学者再也坐不住冷板凳，进入制造快餐文化的市场了。直到前不久，胡锦涛总书记在政治局会议集体学习时，发出了“坚决抵制庸俗、低俗、媚俗之风”的指示，当为振聋发聩之声。当此之时，读陈若星这一篇篇为那些稳坐冷板凳痴情不移于自己精神向度的艺术家的礼赞文章，作者陈若星的审美倾向和精神坚守，不移不易，可见其清醒和冷静，还有操守，非此都难以十年里不移不易且愈

加坚定的精神守护，尤其是在恶俗泛滥的时代里。有感于此，我说令我敬重的话，不是客套，而是真实的心理感应了。

我说对陈若星刮目相看的话，也是出于实情而非客套或恭维溢美。在我粗疏的印象里，陈若星是位谦谦君子，在公众场合多是默坐一隅做聆听状，几乎没有听到过她对某个话题的论说。我便形成一个印象，这是一位含而不露的报纸主编，那张《文化艺术报》办得丰富高雅，是一位很有修养的职业编辑，这也与平素较少看到她的文章有关。这次集中阅读了她的报告文学散文随笔集，我才看到一个颇具思想锋芒和精神高蹈的陈若星，不仅刮目相看，敬重就很自然地发生了。

激情·婉约

我说陈若星的报告文学是速写式，在于篇幅都不大，然而却不像一般速写速记的轻泛，而是每篇都有充实的颇具分量的内容。一篇篇不过三五千字的报告文学或人物特写，竟然能把一个个从事多种事业追求的人物风采展示出来，不仅让我看到这些人物的精神世界，而且可以感知到一个个鲜活而生动的个性，从写作艺术和笔底功夫说，不仅不易，而且突显出陈若星的独具一格的表述风格。

最突出的印象是语言的简洁明快，几乎不见闲笔，更不见为了某种语言风格的追求，反而造成矫饰或装腔或忸怩的别扭，她都是直指事象核心部位的揭示和叙述，被书写的对象的精神气质和个性便卓然而立。陈若星的语言有一个显著特点，便是长句，给阅读者的我以强烈的冲击，如同波浪迭起的潮流，酣畅淋漓直抒胸臆，极富感染力。随意举一例，“在这段对于山崎朋子来说具有决定意义的三周时光里，她时刻提醒自己：你打算与阿崎婆同吃同住，才来天草访问的。如果

你不能每天三顿吃麦饭、坐在腐烂的榻榻米上，睡在几千个异国男人躺过的棉褥子上，不能在崖下挖坑大小便的话，她能把你看成是同一立场的人吗……”这一段叙述语言，直接叙述的是山崎朋子的心理活动，颇见尖锐和激烈的情感波澜，姑且不赘。单是从语言风格说，这种动态的叙述长句，生动而鲜活地状写了叙述对象的真实心态，如若换成白描语言，不知要多过几倍的字数。叙述语言要达到形象化，确非易事。从这种语言的质感说，足以见出作者陈若星的内里情态，激情而近乎昂扬，舒展而又倾情，似乎与她谦谦而含蓄的表象不大合拍，然而却是一个甚为完美的统一。这种富于激情的叙述文字，是适应被书写对象的禀性气质所做的选择，被书写者多是精神追求和事业追求的顽强分子，这种简洁而富于激情的叙述语言，不仅合拍合辙，更合着被书写者的精神和心态。

在为数不多的散文篇章里，我才看到陈若星柔情甚至柔弱的一脉文字。《伦敦德里小调》旋律里，展现的是她踏过人生泥泞的温馨，却仍不见悲观绝望。即使在“文革”大灾难中被逼到山野草房栖居，却没有常见的那种控诉式文字，也没有渲染任谁都能想到的艰难困窘，却把笔墨集中到房东婆婆的笑脸和腼腆而实在的儿子的助人的行为上，许是那种最不堪的困窘里的温情最可珍贵，也见出作者的情怀，即珍重阴霾人生中的人性善的一缕阳光，正是对邪恶的不屑，这也是一种境界，一种情怀。这些篇章里的文字，简约而清丽，一种情怀的抒写，不见任何夸饰，尤为动人。我便向陈若星建议，这类纯情而又温情的散文，不妨多写一些，以飨如我一样期待阅读的读者。

2010年9月30日 二府庄

回首山路，槲叶依然灿烂

读董淑珍著《槲叶山路六十年》书稿，很快便进入一种陷入性阅读状态。这是我阅读生活里早已形成的习惯性心理期待，然而却很少发生。我对《槲》的陷入性阅读，说来有点始料不及，著者董淑珍不在文学圈内，素常也不见舞文弄墨，退休后写下自己人生履痕的《槲》，却让我一下子进入陷入性的阅读状态，完成了一次阅读期待，实现了阅读期待里的满足和享受。这种陷入性阅读的情态，在我就是不能轻易放过一行一句的文字，往往还发生对某些情节的再读和品咂；《槲》稿里的诸多情节直接撞冲到我业已沉寂的久远的生活记忆，时不时就会引发本能性的人生慨叹，甚至不得不暂且中止阅读；更有许多精彩到令人忍俊不禁捶拳或畅怀大笑的情节和细节……我已经陷入《槲》书阅读的忘情状态了。

精彩到堪为经典的细节

我想先从《槲》稿里精彩纷呈的生活细节说起。尽管明知这是不合文章章法的事，因为大凡评说一部著作，多是总体印象的概括论说，再条分缕析。我之所以先说《槲》的细节，确属情感驱使，那些密集到让我目不暇接的生活细节，确实太精彩了。

我随意举一令我震撼的细节。民国初年发生饥荒，家道富裕的外祖父不仅给乞食的饥民吃馍，而且嫌“一回拿几个馍，跑得麻烦。就拿一个大盆子往外拾”。乞食者越聚越多，这位外祖父便领着他们到村前的大河里修筑防洪的堤坝，并宣布：“谁来谁走我不管，干多干少我不管，干活没工钱，吃饭没饭钱。”任谁都能想到，修筑防洪堤坝，受益

的是整个村子里的乡民，而付出的吃饭的粮食却是外祖父家的；同样任谁都会想到，饥荒年月里的一个馍一碗饭，是救命的无价之宝，外祖父为群聚的饥民要白白付出多少粮食？他对不理解这种举动的二外祖父解释说，“给寻些活干，他们吃饭就觉得应该；要不，整天给他们管饭，他们心里也觉得不自在。”……

我读到这里，不由得哦了一声，心头有一种被撞击的感觉，模糊的外祖父的形象顿时如大树一般撑立起来。对饥民的慷慨施舍在我并不惊奇，惊奇乃至震撼我的正是他的这两句话，他被迫道出的施舍义举的主观意图，不仅要让濒临死亡边沿的饥民获得救助，而且还要让他们不失受济时的人格尊严，也避免了受济者通常都会发生的感恩情感的负面阴影，同时获得作为受济者的自尊。我便推想，这位外祖父肯定见多了求乞者低眉耷眼的羞赧神色，体察并感知到人的尊严的溃崩，于是便想出修筑防洪堤坝的举措，让受济者避免人格尊严的受损。我读到此，便想到这位外祖父不仅是位对人体察入微的心理学家，更是一位自觉尊重他人尤其是受济者人格的乡村思想家，与通常所见所说的行善施舍的人划开了截然的档次。这位尊崇孔子的外祖父，身体力行着孔老先生的教诲，在上世纪初的乱世中，能在饥寒交迫的商洛山区的一隅张扬人格尊严的精神旗帜，我说有如大树撑立的感觉，不属夸张。即使到新世纪的今天，让每个中国人有尊严地活着，仍然是一个热门而又新鲜的话题，便可以感知近百年前窝居商洛山区那位乡村思想家外祖父的精神质地了。写到这里，仍想赘述几句，初读这个生活细节时，我当即想到拙著《白鹿原》里的白嘉轩，似乎和董淑珍的外祖父的精神和心理气象是相通的，可惜我未能拥有外祖父以修筑防洪堤坝实施救济穷人的经典细节。

还有这位外祖父的一个生活细节，是其外祖母身患重病时，他日夜守护在床前，竟然焦虑得眼睛生成了白内障，双目失明了，这种情况在我可以想象，也可以理解；让我完全意想不到的是，在外祖母去世后，这位外祖父竟然日夜守护在安葬着外祖母的坟头，由家里人送饭来，他先将饭食敬献给逝者，跪拜叩首者三，待意念里的夫人吃过之后，他才动筷子吃饭，竟然如此坚守到一百天这个隆重的乡村祭礼完成的时候，跳崖自杀了。这个细节令我震撼到本能地闭上了眼睛，肯定将会铸成永久的记忆。

如果说外祖父以修筑防洪堤坝让受济者获得人格尊严的举动，可以见出这位乡村思想家的精神气象，那么，他在逝去的夫人的新坟前守护一百个日日夜夜的行为，便可见出这位乡村思想家的情感世界了。单是这两个细节，便把一个堪称典型的乡村人物形象雕铸成型了。难能可贵的更在他不是作家创造的艺术形象，而是一个真实的外祖父。

精彩的生活细节充实着这部书稿，不胜枚举，而作为细节的另一种形态的人物语言，在《槲》稿里呈现出各个人物的个性化活力。董淑珍家在“文革”初的“民主补课”运动中被补划为富农，这是作为敌对阶级重点打击和专政的对象，受到的外伤和内伤难以诉说。然而在经过纠“左”得到平反之后，董淑珍的母亲不仅没有哭诉抱怨，反而说：“我说么，还是共产党好，错了就改。国民党把人杀了，也不会说杀错了……”需要说明的是这位老大娘说这些话的场合，不是公开场合的会议式表态，也不是说给某一级干部的光面子话，而是在自家屋里和自己的丈夫以及女儿（即作者）说的，当属真实的肺腑之言。我凭常情推想，在自家屋里这个自由空间，诉一诉几年来被专政的屈辱、苦情和怨气，乃至骂几声娘也合情理。然而这位老大娘却是以德报怨。此

情此境里的文章，也仅是为自己“和人一样了，再不叫人低眼下看了”而庆幸，同样没有枉受屈辱的积怨和泄恨的言辞，然而两人的心态仍然显示着个性化的差异。我读到这些话语，更多的感慨却是，要知道中国的老百姓是怎样的老百姓，这就是。我正是在读到这些作为人物心声的话语时，几乎本能地发生连连的慨叹。

更为传神的一个细节语言不忍舍弃。《槲》稿作者的儿子在“眼巴巴看着”妹妹吃奶奶留给她的偏食时，“看着看着便生气了，就开始骂了，‘吃，吃，好好吃，把你咋不吃死呢……’”我读到此，便畅怀大笑了，自言自语“刘卫平猴急了”。这连着四个“吃”字，把少年刘卫平的猴急的情状跃然纸上了。笑罢却有点心酸，那些年月里在乡村所谓好吃的偏食，不过是一块麦子面馍或饼子，让作为哥哥的刘卫平当真猴急了。我想到而今作为堂堂的古典文学教授的刘炜评（刘卫平后用名），读到这些往事也会笑一场的，当不会轻易淡忘；人生历程中有为一块饼子猴急的体验垫底，却可能终生获益。

《槲》稿通篇都是以无可置疑的情节和鲜活生动的细节完成叙述的，对我便发生陷入性的阅读魅力。我自然会想到作者董淑珍，拥有那样坎坷而丰富的人生阅历，在我似乎并不太惊奇，我见过听过的比她更惨更苦遭遇的人和事也不少了。我的惊异在于董淑珍的记忆力如此之强，对于少年和青年时期家族亲友和周边人群的生活灾变，竟然有如此犹新的记忆，尤其是那些细微的生活细节，诉诸文字依然呈现着独具的活力。我便想到不全是记忆力强或弱的事，而是作者对生活世相里的细节有一根尤为敏感的神经。

我对天才有一个物质化的理解，便是对社会事相的某种事有一根尤为敏感的神经。有一根对色彩敏感的神经的人，便爱好画画儿；有一根对音律敏感的神经的人，可能成为音乐家；有一根对数字计算敏

感的神经的人，可能会成为数学家；同样，有一根对文字尤为敏感的神经的人，便会喜好文学成为作家。作家那根对文字敏感的神经，几乎同时兼备对生活世相里的细节的敏锐感受能力，才有独自的发现，形成独有的品性，笔下的人物就不会雷同于别一个了。由我的这种理解看本书作者董淑珍，无疑是有一根敏感生活细节的神经，因而才可能发现并累积下如此丰富传神亦独特的生活细节。《槲》稿里简约地提到一笔，她在小学和中学（未读完）的作文多得老师赞赏，且预言她会成为一个作家的。生活的灾难性遭际，迫使她连初中学业也未能完成，我便为拥有既敏感文字又敏感生活世相细节的董淑珍甚为遗憾了，把一个完全可能有造就的作家淹没了。然而，有《槲》稿的成功，不仅可以告慰那份天赋之才，也足以告慰自己的人生了。

宽容，坦诚阔大的襟怀

《槲》稿是董淑珍六十余年的人生笔记。从她被生母视为多余人的被嫌弃的角色来到人世写起，历经在我这个同龄人也往往意料不及甚至不可思议的诸多灾难，社会的和家庭的，自然环境的和更多人为的，涉及她的生存、她的婚姻、她的前途，乃至她的生命，常常让我忍不住扼腕；在她一次又一次面对接踵而来的有幸和更多的不幸，包括几次跨越死亡之涧，我的眼前便突显出一个襟怀坦诚而又阔大的独立禀赋的女性形象。面对这位大半生都坚守在山区最偏远也最艰苦的乡村小学教师的生命履迹的时候，我感知到一种平凡人生里的不平凡到堪为崇高的精神气象和人格品性。我尚未和董淑珍谋面，纯粹是阅读她的人生笔记《槲》稿形成了新鲜而又强烈的感受，更确信人的精神和人格，不是以社会职业更不是以社会位置决定其品相的。《槲》稿里展现着董淑珍丰富而又个性化的心灵风景。

董淑珍的敬业精神，是我深为钦佩的。她的敬业，不是通常意义上所见的一丝不苟做好自己的工作，而是在困难到几近绝境里的自我奋斗，不仅不抱怨不诉苦，而是在困境里坚守，且默不作声。她在自己村子里做挣工分的队办教师，因为教学成绩突出而被公社（即乡镇）选拔出来，安排到环境更艰苦的一个又一个初级小学去。她到上扒大队小学去的时候，抱着出生不足百日的女儿，又引着五岁的儿子，让五岁的儿子管护女儿，她给学生备课、上课、批改作业，晚上还要为孩子缝补衣服。村民和干部全都看在眼里，更为彻夜不熄的灯光所感动，决定每月奖励给她三斤点灯的煤油。在那个普遍贫穷时代的山区生产队能有如此慷慨义举，足见感人之深了。董淑珍被调到幢沟小学，一个人承担着一到四年级的复式班教学，可以想象繁忙和负重的程度了，竟然还领着学生搞玉米种植试验田获得成功，引来不少参观者。她再被调到东胜小学的时候，上级意图就很明朗了，这个学校的教学质量在公社地区落后；董淑珍到校一年，东胜小学在本地区统考中名列第一。无须赘述她如何把一个落后小学提升为全公社（乡镇）第一的过程和举措，任谁都会想到她的用心和用力，用心是非凡的智慧所创造的切合学生实际的教学措施，用力当是包括情感和体能的全部投入了。我又想到董淑珍的学历，因为“三年困难”致使初级师范学校“下马”（停办），她仅读过一年就无奈失学了，受正规教育的学历就是相当初级中学一年级。她后来能在一个又一个乡村小学创立优秀到令人瞩目咋舌的成绩，可以想象她的自修所获得的难以用文凭衡量的提升，更有对小学包括复式班教学艺术的探索。我说她的敬业精神的个性化品格令我钦敬，不是虚话，是真实感知。

董淑珍的个性化襟怀，不仅令我钦佩，更有深一层的感情撞击了。单说她由民办教师转为公办教师又退回民办教师的事。董淑珍在做了近十年民办教师的时候，因为教学成绩优秀而被转为拿公家工资

俗称“铁饭碗”的公办教师，既是对她十年辛苦的应得报偿，也是她人生历程的跳出“农门”跨入国家干部行列的关键一步。然而，好事刚过一年，新的政策不期而至，因为转干指标“突破”，又要把她这一批刚刚转为公办教师的人重新退回为民办教师的编制。我读到这里，顿然发生本能性的心理撞击，是我也曾有过十年的民办教师的经历，转为公家正式干部的艰难漫长的过程，曾经成为精神和心理的一坨阴影。我替董淑珍惋惜连连，她却似乎不大在乎，第一个发言表态愿意接受这项退回民办教师编制的政策了。我读到此，本能性地反躬自问，如果是我当会如何？沮丧的心情肯定会持续很长时月……正是在人生的完全相同的境遇里，我看到董淑珍精神境界起码高于我的患得患失一个不小的档次。我也是在这一瞬，看到一个人坦诚而阔大的襟怀，在一个女教师来说尤为难能。

这种坦诚阔大的襟怀，更多地体现在与包括家庭亲友和社会各界人士的往来关系中，便是宽容。董淑珍的婆婆“是一个特别有心眼、很少说实话、空里来雾里去的女主人”。连婆婆自己也毫不讳言地说：“谁想叫我给她说一句实话，想死都没有。”可以想见董淑珍和这位婆婆相处的困难了。在接待一个年轻教师的时候，这位婆婆居然说出一句难听到令我瞠目且不想在此引用的难听话，董淑珍被委屈得流泪，却没有和婆婆翻脸，连一句分辩的话都没说；为了一元钱的急用，婆婆答应借她，却睁着眼把她虚晃过去了，如此等等。然而在十七年的相处中，董淑珍一如既往尊敬婆婆，且以实心爱意对待婆婆的虚话假话。直到婆婆谢世之前的弥留之际，她把婆婆抱在怀里几个小时，直到咽下最后一口气。董淑珍痛哭，从灵前哭到坟头，下葬完结丧事结束仍然抑制不住哭声，可见真爱和真情。她向人所道及的话，全部是婆婆的好话，以及对婆婆人生不幸的深度同情。这种宽容的底蕴是善良，一种天性中的善良。董淑珍处人处世的宽容，更呈现为一种对人

的至深至诚而又理性的理解，随之便做出在常人几乎想也不会想到的非常亦非凡的举措。在“文革”动乱里，作为贫农且为五保户的董家，一夜之间被划入剥削阶级的富农成分了，可谓灭顶之灾。董淑珍看到父亲母亲被批斗、被打骂、被凌辱的惨状，却无法救助；她能想到作为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人，是被划入另册的，将会给自己带来怎样不可预测的灾祸；然而，她却首先想到并担心的是丈夫，她身背的富农成分肯定会给丈夫的处境罩上阴影，而且是敌对阶级的政治阴影。为了不给丈夫造成伤害，她竟然想到离婚，而且意志坚决。在我的生活经历中所遇所闻的此类事也不少，几乎全部都是被划入剥削阶级成分的一方遭遇遗弃，造成许多家庭裂变的悲剧。董淑珍的非凡举措里，我深切地感知到她对丈夫以及孩子的爱，表现为决意牺牲自己的一切，让所爱的人走出阴影沐浴阳光。这种宽容，绝非一般意义上的宽容，更非某些姿态性的宽容，而是某种自背十字架，让亲人获得自由天地的宗教般的虔诚。

董淑珍的宽容，既是一贯的基本的处人处事的姿态，更是一种稳定不变的个性化的品格，凡是和她有缘相遇的人，都能感知得到。她的姐夫是个坏脾气的人，姐姐和外甥难免遭遇伤害，在姐夫晚年日落西山的困境里，她努力劝导外甥要记住父亲的恩情，而不要计较父亲的什么不周之处，尽好孝道。她的堂兄嫂尤其嫂子年轻时是位趋利到近乎刻薄的人，既受到董淑珍父母的关照和爱护，却竟然嫉妒能有机会上小学的小妹董淑珍。董淑珍小小年纪多蒙委屈，成年后却不计前嫌，关照这两位堂兄嫂，直到他和她终于自愧自悔而道歉，读来令我感动而又感佩。以这样宽容的襟怀面对生活交人处世，董淑珍的朋友自然拥集，不必赘述列举。我看到这个宽容别人的人，却“斤斤计较”又念念不忘着对她有过帮助的人。在董淑珍刚刚做民办教师的时候，正值饥饿的所谓“三年困难时期”，她的生活也是最艰难的，竟有三个

农村妇女常来她任教的学校，送来米、面、馍和油炸食品。这三位女朋友已谢世二三十年了，董淑珍不仅依旧感念她们的接济之恩，而且因为未能报答而成为心理情感的一个结。能够永记不忘帮助过自己的人，是董淑珍宽容的相辅相成的另一面。生活世相里多见的是宽容自己而苛刻别人，更极端者即是所谓恩将仇报的白眼狼。这样，我看到一个人的内里世界的两面，对人宽容，对己却是“斤斤计较”着好心人的帮助，且要回报。这就可以见出董淑珍的襟怀里的清爽世界了。

灾难体验的反向升华及其他

致成我对《槲》稿的陷入性阅读的一个特殊的诱因，是我在董淑珍的人生履痕里，不时引发自己的业已久远的生命的回音，陷入便是不可抑制的事了。董淑珍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做挣工分的队请民办教师，我也是在此时以队请民办小学教师的身份开始由学生变为社会工作人员的；董一人带过四个年级的复式班学生的全部课程，我带的是两个班级的复式班学生的课程；她辗转多所简陋的山区小学，我也是在一幢孤零零的装不起窗户玻璃的房子里给乡村孩子讲了语文再教算术；她大约在任教十年后转为国家编制的公办教师，我比她还要晚一二年才进入吃商品粮拿公家工资的干部队列；她是多次荣获褒奖的优秀教师，我也有此荣幸。然而看到董淑珍比我更为艰难的教学环境，还有她倾心倾力地投入，我便想到如若在同一个公社（乡镇）下属的小学任教，评选先进或优秀教师肯定是她而没有我的份了（不是玩笑）……在我看到她的案头的煤油灯的亮光时，便想到我用墨水瓶改装的煤油灯的火苗，还有熏得鼻孔发黑的煤油灯的灯烟，竟有一抹淡淡的诗意。

董淑珍的少年时期，不仅妄谈诗意，而是近于残酷。即使在我这个同龄人的感知里，确属不可思议的残酷。在她正读小学的少年时期，因为父亲失去体力劳动的能力，母亲也因体质不支而不能下地劳作，一家人的生存便几乎陷入绝境。父母竟然把出路瞅到她的身上，逼她招赘招夫以养家。我读到这些情节，不仅脊背顿生凉气，而且不能想象这种事是真实的。须知这是新中国成立后讲究妇女解放、婚姻自由的特定的生活背景，竟然还会有此等不可思议之事发生。然而却在不幸的董淑珍这里真实地发生了。少年的董淑珍难能违抗父命，却以自己的反抗方式，成功地挣脱了命运强加给她的这种残酷的枷锁，而且是一而再的两次。少年董淑珍尚不可能有什么巧妙的心计，而是以本能的情感作持久的对抗，不说一句话，甚至连和对方对视的一眼也没有，进出一个家门却形同陌路，直至对方终于意识到不可能成为夫妻而自觉离去。且不赘述第二招赘夫婿尴尬走人的过程，倒是可以想到董淑珍的自觉反叛的意识和果决的反叛行为了。董淑珍遭遇过这些在同代人感到不可思议的委屈乃至屈辱的事件，而且是在少不更事的少年时代，心理和情感上造成怎样的伤害，这是作为读者的我确也难以估量的事，姑且不论。然而，进入社会进入教师角色以后的董淑珍，二十余年沉潜在最底层的多所山区小学，真可谓既默默无闻又功勋卓著。看到她在一所比一所更艰难的乡村小学里的倾情和投入的工作姿态，我常常会想到她少年时代的心灵伤害，竟然在她的课堂上和煤油灯下看不到一丝消极情绪；更有她的以善良为底蕴的宽容的处世处人的襟怀，与她不幸的少年时代的遭遇构成一个很大的反差。依着通常多见的生活现象而言，少年时代的太过糟糕的遭遇，多会造成终生也难得弥补也难得改易的情感挫伤，多会形成某种褊狭或消极情绪。我所看到的董淑珍，不仅不留任何被伤害的负面阴影，而是走向人生最为难得的宽容境界，当属完全背反的一个个例。我便推想，当社会或家庭的不幸强加到董淑珍头上的时候，大约是她以自身的痛苦

体验获得一种生活哲理，把善和美的阳光洒给世界，才有宽以待人的胸襟，包括宽容那些有性格缺陷的人。

《槲》稿展示的尽管是董淑珍的人生履痕，而这履痕却呈现着当代中国生活演变和社会跌宕起伏的掠影式的真实影像。这大约未必是作者有心着意的意图，反倒留下真实的笔墨。正是那种不着意夸张亦不掩饰的原生态的叙写，才不断触发我的生活记忆。董家曾是显赫一隅的大家富户，却被父亲的一根烟枪一把骰子搞得精光；我的祖上也有类似过程，反倒因祸得福，新中国成立后落下一个比什么都重要的贫农成分。董淑珍在商洛经历的合作化、反右、“三年困难”、“文革”以及改革开放的关键性转折，在自己生活和工作范围里的诸种反响和个人姿态，在我多有类似的经历和相近的感受，不觉间便陷入了。她写到“文革”初期自己“早请示晚汇报”之后才端碗吃饭，而且颇为自愿地推行到家庭。我读到此，不禁哑然失笑，我也有过这样的行为举动，还跳过表忠心的忠字舞。这些业已被生活判为愚昧而可笑的行为，经历者多不愿提及，提及时也多是反讽的口吻。董淑珍却如实写来，她为卧病在床的婆婆诵读毛泽东著作“老三篇”，她把在公社（乡镇）会议上推行的“早请示晚汇报”和歌颂毛泽东的歌曲普及到自家屋院里，不是社会强制，而是个人的自觉自愿的行为。这种敢于把自己当年的可笑行为展现给后人，不仅不文过饰非，更见着一种襟怀坦白的反省，敢于面对世界，也敢于面对自己……《槲》稿文字中展示给今人的昨天的阴晴风雨，可贵在于其原生的真实形态，较之文艺作品的夸张和局限，更具独立而不可替及的价值。

《槲》稿的语言简洁而又形象，颇具阅读诱惑。

作者叙事状物，言简意赅，许多甚为复杂的社会世相、家庭变故和更多的个人经历，都写得简洁明快，脉络清晰，几乎不见多余的一

句废话，叙事状物能达到一种形象化，而且甚为准确生动，足见文字功力之不俗；更为难得的是客观却不呆板的叙述所造成的可信度，给如我一样的读者阅读的踏实感，当属基本的诱惑（常见的文艺类作品的不恰当渲染，往往使读者产生阅读的排斥感）；生活语言的生动和传神，是《槲》的文字的内在活力；人物在多种遭遇情境里的对话语言，非亲耳闻听所得而难以编造。我钦佩董淑珍良好的记忆能力，也惊诧她对这些个性化说词的生动再现的能力。

有《槲》书即将问世，董淑珍完全可以不在意错失写作这个行当的遗憾了。

2010年11月27日 二府庄

思考和思想，是精神活力与精神脊梁

张艳茜成了作家了。

这是我读张艳茜即将出版的散文集《城墙根下》书稿过程中形成的一个截然新鲜的印象。

这种甚为强烈而不无诧异的感觉之所以发生，概出于积久且已定型的旧有的印象，她是一个职业编辑，专注而卓有建树却默默为人做嫁衣的文学杂志的编辑，且乐此不疲。在我不太准确的记忆里，大约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张艳茜走出西北大学中文系的门槛，便走进了陕西作家协会的深宅老院，坐在《延河》文学月刊编辑部稿件堆积如山的一张桌子前，开始了她的职业编辑的人生之旅。在那个不无破败气氛的陈年老院里，聚集着一伙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硝烟里走过来的蜚声文坛的作家和诗人，还有一茬《延河》创刊的老编辑，大多年纪不轻，难免有老成持重里的沉闷。在先后进入这个老宅深院的年轻人里，张艳茜是唯一一位女性，不仅年轻，而且靓丽，性格又很开朗，响亮的笑声给那个老屋旧院平添了鲜活的生气，浮动着勃勃生机，与当时正在潮涌着的文艺复兴的氛围相呼应。不觉间二十多年过去了，张艳茜从编辑做到了小说组组长，又做到了《延河》月刊的常务副主编，无疑已是一位既富文学审美眼光又富办刊经验的职业编辑了。当年的年轻人已步入中年，而我似乎没有意识到这种职位和年龄的变化，依旧习惯称呼她小张。许多年来，在一些报刊上零星读到过张艳茜的随感类散文，却从来也没有改变过我对她的职业编辑的印象。《城墙根下》的阅读，张艳茜以作家的姿态站立在我的面前了。

我读《城墙根下》集子里的篇章，不无惊讶地看到一个独立思考着的张艳茜，对生活世相、社会变迁、人生际遇的种种感受和体验，别有一番独到而颇令我惊叹的深刻之处。依我的理解，作家面对现实，面对历史，及至面对自己，都在寻求着独自独有的发现，形成纯属自己的独特体验，发出既不类同前人也不混同今人的声音。决定这声音轻与重的诸多因素中，思想当属至关重要的因素。道理再简单不过，思想决定着作家体验的深与浅，重与轻，独到与平庸。在张艳茜的散文中，领受那些独有的颇为深刻的体验，我感知到一种思想的锋芒。《那双褐色的眼睛》是一篇让我读完却不能放手的佳作，对其中的部分情节和细节再次品读，不是吟诵山水的诗性抒情，也非黑色或灰色幽默的情趣，更不是荒冢残碑前的呻吟，而是揭示出一种确凿令我惊悚到不敢相信却不能不信的情感隐秘。一个如花似玉的知识女性，却甘愿被一个霸道的已婚男人所占有，既不为官场升迁亦不为商场利益等任何欲念，纯粹着一种痴迷许多年的爱。在我，难以理解的是，她所倾心倾情的那个男人的独尊达到一种少见的霸道的程度，她是看得清楚而又明白，然而却丝毫也不在意，更不计较，且心甘情愿接受对方霸道行为带给她的某些屈辱。直到许多年后，她和那个男人在机场不期而遇，“突然感觉，他是一个多么平常的男人啊。”回家后便剪掉了为他一直留着的又长又粗的辫子。我读到此，不觉间呼出一口气来，一个美好的心灵终于自由了。张艳茜在这篇散文中有发人深思的议论，是从复杂的情感世界直接体验而获得的：“小叶抗拒庸常的同时，却又渴望着庸常。”对庸常的抗拒和渴望，是人的精神追求和心理构建的矛盾性和复杂性的呈现，往往很难阐释清楚。张艳茜从小叶的情感遭遇获得的这种生活哲理，却是人类普遍存在的心理形态。张艳茜从直接的情感体验获得的带有普遍性的生活哲理，是善于思考且富于思想力度的思考的结果。另，文中虽然着墨不多的那个霸道的男人，却被勾勒得活灵活现，让人看到一种天性里的恶与劣，还有相辅

着的俗不可耐。我读罢此篇，掩卷而顿生奢望，以这样深层的人性体验写一篇小说，起码是别开生面的一页，小叶和那个霸道而又俗不可耐的男人都显示着这一个和那一个的生活真实的典型性。

读着《城墙根下》散文集中的篇章，关于思考的话题逐渐凸显出来，张艳茜总是对社会世相发生着思考。我首先习惯性地想到善于思考或勤于思考这些常用词汇，却明显感觉到用在张艳茜身上不大恰切，前者是偏重于一个人喜欢思考的意指，后者则偏重于要多多思考的强调，或重或轻都带有应该如此的意向，而张艳茜的思考几乎是本能性的心理反应。她的眼睛看到的各色男女和社会世相，认识的或不认识的，远的或近的，动的或静的，都会引发那根敏于思考的神经的颤动，更不必说诸多亲自参与的各种公事和私事触发的种种思考了。她住在东城墙根下的时候，常常在护城河边的环城公园跑步，不仅健壮身体，更在缓解某些"灰暗的日子"造成的心理挫伤。即使在这样多有障碍的心绪里，那根敏于观察也敏于思索的神经依然敏感，对于司空见惯到眼熟能详的城墙的一抹白雪，依然生发着诗性的感触，"层层灰色的墙砖落上了洁白的雪花，衬托出城墙威严之下的典雅与少有的柔美。"当是这种诗性的情怀化释消解着被挫伤的心境里的灰暗。她看到我也熟悉的文学朋友田长山舞剑的雄姿，忽一日却发现这个人从城墙根下消失了，及至他不幸谢世的惨事发生。读到这些文字，引发我的竟是恍如隔世般的沧桑。我也见过田长山在城墙根下舞剑的英姿。我依然存储着灰色古砖的城墙根下一身白衫白裤舞动长剑的田长山的鲜活形象，不料由张艳茜的文字诱发出沧桑感来。我更赞同张艳茜对田长山"是真正的勇士"的归结，我再补充一句，在他的生命里呈现着一个文学圣徒的道德和良知。张艳茜对田长山的人格人品的敬重，自然映现着她本身的审美倾向和道德判断。

张艳茜从东城墙根下移居西城墙根下，尽管继续着“孤寂冷清的日子”“拉长了的折磨”，那根敏感的神经导致的思索却依旧活跃。正在修葺的西门城楼开始显现的“鲜艳的色彩”，竟然发生出“不舒服，与两侧城墙的沧桑、古朴很不相称”。由此引申到关于家庭、关于新旧、关于人与人乃至国家与国家的相处之间的和谐或者说磨合的重大命题，须知这是一个正在持续着精神和心灵“折磨”的人的思索。张艳茜在西城墙根下的散漫游走中，多次在同一地点看到一对拥吻的恋人，几年后又在同一地点看到携着一个小孩儿的夫妻，便联想到曾经多次看见的拥吻的恋人，并从心底祝福这一对终成亲眷的有情人。一个自身遭遇着家庭不幸的人，如此深情且虔诚地看待并祝愿着有情人进入美好的情感殿堂，也见出张艳茜心底温馨善良的土壤。我便获得一种理解，当是这温馨善良的心灵质地，更有那种天性里的习惯性思考，抵御着也消解着持续的“孤寂冷清的日子”给她的“折磨”，尽管不可避免“折磨”里的伤害，却减轻了伤害的程度，没有沉沦，更没有垮塌，终于走出了“折磨”困境的泥淖，赢得了新的精神世界。我便想说，有思想好，有思考好，这是人的精神脊梁。

张艳茜眼里的生活世相，总是带有审视和拷问的或重或轻的力度。她几次到医院看望就医的二姐，却勾勒出病房里一幅又一幅生动逼真的人物素描，“一个个头不高，长相凶悍，大腹便便的男人”，粗劣的行为和冷漠的态度，让我竟然替那位临产的妻子操起心来。病房里再换了一个手术后的女患者，侍候她的“废物男人却默不作声，手里拿着个苹果咯�咯吃地吃着，发出老鼠啃啮食物的闹心声音”。仅有的一笔，便把这一个没心没肺的“废物”男人的废相描画出来，而且不忘那位刚刚做完手术的女患者的再三申求，想要换一张价码更便宜的病床，让人顿生一种并不陌生的贫穷里的窘况，即使重病状态下，依然是不能摆脱的心理压迫。由此可以见出目击者张艳茜看人看事着力的

焦点，对弱者的关爱和怜悯。《能否坦然走过》比较集中地展示了张艳茜关爱弱者的情怀，在路边，在车站，甚至在她的工作室里，面对乞求的男孩儿女孩儿，她都会送给对方一块或几块钱的，而向来不在意求乞者诉求话语里的虚假，且不说欺骗；她对一位找到她工作的编辑室里借钱的陌生人，也没有拒绝，事过一月这位借钱的人来还钱的时候，她竟被他的行为感动了，竟然自责当时借给他的钱太少了。我读到这篇短文，顿时想起了鲁迅先生的《一件小事》。今天的生活世相远远不是鲁迅先生所处时代的风气了，单是以种种假象搞欺骗性行乞的事频频发生，张艳茜自然不会耳目清静到世外桃源的隔离，她明知其中可能有诈，却依然向求乞者递上钞票。她只专享于一点："我只图我心里那一刻的踏实，别的随他去吧。"这种面对行乞者的心态，是一种善的自我的完成，而不在意求乞者的真与假。她也许在某次给予的过程中被骗了，却避免了鲁迅先生在"一件小事"过后的自我谴责。张艳茜的这几件小事，正显现着她以善和怜悯面对弱者的情怀，当属一种令我敬重的境界。人和人的差别就在这里。这些谁都会遇见的小事，处理的方式各不相同，张艳茜的方式显示着的，不仅仅是个性，更在前述的那方心灵土壤的质地。

在我的也许偏颇的意念里，散文是一种直接展示作家思想、感情、情趣、审美等的文体，作者的个性化气质全部都昭然于文字之中。即使是那些虚情假意或无病呻吟乃至心里想着黑却表达着白的文字，也只能是作者的一厢情愿，瞒不过读者的眼睛的审视；而那些体现着作家独自发现、独特体验的散文，无论是深刻到惊世骇俗的大思维，抑或是屑小细微的一缕人生情趣，都会引发或大或小的不同层面的读者的阅读回应。如果说虚假的小说还有一定的蒙蔽现象，而散文却很难产生这种效应。这样说来，被看作好写的散文是一种误解，好的散文的写作同样不易。

如上一番感慨，是由张艳茜的散文阅读所触发的。我在上述的文字里，表述了我在《城墙根下》的散文中看到了颇觉陌生的张艳茜，即习惯性思考着的张艳茜。然而，这只是张艳茜个性秉性里最主要的一面，还有另一面便是她的情感世界，在她的散文中展示得真实动人，更凸显出不同别一个的个性里的丰富和生动。文集中的《海上琴声》和《我要寻找的朋友》两篇，是写她少年时期生活的两篇散文，不是常见的捉蚂蚱、打水仗、偷杏桃乃至恶作剧的童年情趣，而是至今依旧不能释怀的忏悔性表白。《海上琴声》展示的是一个小女孩儿眼里的“文革”时期的景象，逼真的环境、逼真的生活氛围和逼真的人物形态，都是不可重演的那个特殊年代的景观。作者只是一种客观的记忆印象的再现，着意是在一位从上海被贬弃到山沟小学的音乐教师，几笔文字便把一个遭遇灾难且独立禀赋的小提琴家的形象跃然纸上，更着力在作品中“我”对音乐老师的误解和可以想象的伤害。情节很简单，跟着音乐老师学习小提琴的“我”，听信了家长们关于音乐老师有过“作风问题”的传言，不仅断然舍弃了小提琴的爱好，而且视音乐老师为最令人不齿的流氓而唯恐躲避不及了。凡经历过那个非常年代的人，谁都知道“作风问题”会使一个人处于怎样活不如死的状态，对于一个未谙世事的小女孩儿的如此决绝的举动，当不会问责的。然而张艳茜却和自己过不去。当“文革”灾难结束，尤其是她接受了文明的观念，却对自己幼年的行为可能对音乐老师造成的精神伤害耿耿于怀，足以见得张艳茜心灵世界的纯粹了。《我要寻找的朋友》一文，更为强烈也更为感人地显示着作者纯粹无染的情感世界。初中一年级时，一位来校搞军训的牛排长喜欢为歌唱队打拍子的张艳茜，接触稍多了点，写得一手好钢笔字的牛排长又教她写字……不可思议的猜疑便发生了，音乐老师（新调来的一位年轻女性）找她谈话：“我好心提醒你，不要和牛排长走得太近，要注意影响。”任谁都会想到所谓“影响”的不堪内容了。甚至包括母亲都郑重地向她发出警告性的训示。她

又一次陷入困境，尤其是“我觉得人们看我的目光总是有些异样”的无形压迫之下，断然划开了和牛排长的界限，连正常不过的招呼都没有了，连对视一眼都回避了。同样在她成年且有了自己的思想之后，自责便日复一日强烈起来，而且无所畏惧地寻找牛排长，要当面致歉，以抚慰那位被伤害的军人，自己也获得一份心灵的安慰。寻找不见，她又按照打听到的住址给当年的牛排长写信，没有回应，便只有借一纸笔墨倾述难得消解的愧疚了……我读到此，除了感动，便看到一个人纤尘都不容污染的情感世界；即使被迫发生污染，也绝不接受，这是张艳茜个性的又一面。

我最后想说关于“瓜女子”这个话题了。这个话题不完全是阅读《“瓜女子”的坚持》这篇散文所触发，更多的是出于我对一个人的理解，以及新的认识。

我记忆中有着“瓜女子”的说法，却从未当真。不仅不以为张艳茜是个“瓜女子”，而且也不完全是同事间的玩笑，却是一种赞扬。这里用到她头上的“瓜”，实际是含有正派和真实的褒扬意味的，强调着的另一面，自然是虚与假，更不必说算计诡计之类了。这种“瓜”在当今多所浑浊的生活潮中，确属难能可贵。可贵在一种精神品格的坚守，且不为世风所动。

我想说的是另一层意思。即前文已涉及的令我发生陌生感的另一个张艳茜，而不是“瓜”或“不瓜”的事。在我的几成确定的印象里，张艳茜是一位职业编辑，而且专注到某种以命相托的痴情到痴迷的状态，无论是在漏雨的老房子里，无论是在新办公楼的编辑室里，她面对的都是一摞一摞稿件，面对的都是一本生存愈来愈艰难的《延河》，却从来也没有跳槽另投到一家更能获益的门庭。尽管这种可能的诱惑不止一次有过，她都没有动心。这是我熟悉不过的张艳茜。当

我读完《城墙根下》中的散文，顿然意识到这个职业编辑的另一副面孔——作家。这个作家的个性化特质，是习惯性思考的人，她已形成自己独立的绝不人云亦云的思想，对生活世相颇具穿透力的思想，才使我有陌生的感觉。何“瓜”之有?

一个天性里习惯思考的张艳茜，已经进入人生的黄金阶段，她的思想不仅成熟，更会发展，必然会发生独有的生活体验和生命体验，必然有不同凡响的作品创造出来。我期待，且相信。

2010年12月26日 二府庄

一方独特的艺术风景

我读安黎的《时间的面孔》，有这样几点阅读直感。第一点，我读这部小说的总体感觉，它是当代中国的百态世相图。这部小说从一个小小的渭北麻子村写起，一直写到省上，中间还有县，还有镇，从村子到省上这一条长链里，都有人物活跃在这部书里头。单是这一点，就我感觉而言，它对于当代社会各个层面的涉猎与扫描，面已经很宽了。想一想，从一个乡村里很小的麻子村，一直到省上那个大院，每个环节，每个级别，都有人物在这部作品里出现，它把整个社会里很重要的一面展示给了读者，这是很开阔也有纵深感的一面。这部小说，不仅从乡村到省上都有各色人物在作品里展示，而且把社会的各行各业也都展示在作品中，政界、商界、教育界、新闻界、宗教界、医疗界等，各类职业行业中的人都穿梭在作品中。这样，这部书呈现给我的，就是当代生活进行时的社会百态的种种世相，种种人物，而且是最现实的。这是我感觉最强烈的一点。

第二点，我感觉尤为突出的印象，就是作品中十有八九的人物，无论从事哪种职业的人物，都是悲剧性的结局。尤其是这个麻子村，即后来改成撒克鲁的村子里的人物，一个接一个地死去，导致死亡的祸因和死亡的方式都不一样，却都是令人心理上很难承受的那种残酷。好一点的人，还不敢完全说是正面人物这样死去的——为啥说不完全是正面人物？因为据我的阅读，在安黎的这部小说里，没有一个像我们素常阅读的作品里那种完全的正面人物或反面人物；他的《时间的面孔》里，都是这种很难用正面或反面定性的一群人。这些特性模糊却个性鲜活的人物，贯穿于作品的始终，营造出一种几乎无可置疑的生活真实。从美国回来的立本，最后的结局是死亡，而且是自

杀，是他的空想图画彻底破灭之后的无可选择的归结。这个麻子村里的种种人，一人一种死法。这个村子里总共死了多少个人，我没详细地数。包括跟立本从美国一块儿回来的康圆圆，被社会上难以想象的一些丑恶纠缠，生气，郁闷，无可奈何，最后得癌症死去，且不说作品中出现的麻子村的那些人的死亡。悲剧性的生命结局，几乎是作品中所有人都难以逃遁的一个共同的结局。尽管导致各个人死亡的具体原因虽然不一样，我却感知到一个共同的却是无形的东西，那就是裂变着的生活的逼迫和挤压，而不是纯粹个人的生理因素，比如普遍都在发生的生老病死。若那样，就无任何意义了。作品里人物的悲剧性结局，都是社会本身造成的，起码可以说是麻子村这个典型环境里的人普遍的社会悲剧。这部书里写的这一群人物，我的直观感受就是赤裸裸的欲望着的各色人物。书里展现的完全是一种被利害冲突挟持着的这个人或者那个人，亲兄弟也罢，包含各级官员也罢，乡党邻里也罢，概莫能超出被物质利益挟持的状态。这样的冲突所展示出来的这种生活世相，让我这个当代人往往都感觉到很吃惊。也许我脱离农村的时间比较长了，起码跟我所经历过的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的中国乡村的社会秩序，人的普遍性情绪，变化已经非常大了。《时间的面孔》里对我几乎带有刺激性的两个人物，一个是刘奇，一个是立本。刘奇简直就是个恶棍啊！一般的乡村恶棍，任何时代都不会绝种，我也见过。不仅生活中见过，小说阅读中也领略过，不会太过惊讶的。安黎笔下的这个恶棍刘奇，却是一乡之长，就让我惊诧连连了。作家安黎写透了这个人物。这个人的所有行为，包括语言、作为等，都带有“这一个”的鲜明的个性。读到这个人出奇的行为，让人大跌眼镜的话语，往往让我有一种不堪承受的撞击，阅读时要把书合了起来想半天。刘奇的典型性和荒诞性，却又是一种逼真性。刘奇这么一个小小的乡长，他眼睛里的社会，包含他眼睛里的官场，包含他眼睛里的民众，决定着他的流氓恶棍的行为。我被这个陌生的恶棍吸引着，总想

看看他最后的结局。不料作者没有直接写刘奇被处死，只是后来一笔带过这个恶贯满盈的家伙被枪毙。刘奇吸引我的还有一个很直接的原因，和我的生活经历有关。我在乡政府（当年称人民公社）干过十年，但我没当过正乡长，职位只相当于副乡长。那时候还是“文革”时期，处处都在搞“阶级斗争”，整人最厉害，都很难找到像刘奇这样横行霸道为所欲为的一个恶棍乡长。但是阅读这部小说，刘奇这个乡长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则呈现着一种生活的又是艺术的巨大的真实感，让我不能不信。这样，这个人物给我留下了相当典型的一个印象。再有一个人物就是立本。这个立本从美国拿了那么多钱回来，自己身体里有一个致命的疾病，而且还是很丑陋部位的疾病。这个人物对他的家乡怀有那样一份至爱，那种虔诚，那种用心，直到把麻子村搞成一个撒克鲁，最后以完全的彻底的失败告终。失败造成他个人毁灭性的灾难，最终是被他倾心倾力倾情以及倾尽财力关爱着的村里人群体围打，一直到最后自杀。这个企图创造理想“王国”的痴情者的彻底破灭，大约蕴含着作家安黎深层而又独特的关于生活的思考。作者写了最典型的两个精神和人性的两种极端的人物的悲剧性结局，似乎也隐喻着安黎关于当今生活、关于这个民族的多重思考。作品中还有很多人物都是各种各样的悲剧性结局。这些人没有自然性的死亡，都是遭遇了这样的创伤、那样的打击，包括陷害造成的死亡。作品中涉及乡村中各种类型的人物，涉及家庭中父子的、夫妻的、兄弟姊妹的亲情和更为广阔的社会关系，展现了当代中国各色人等的生活世相，而且是只有在当今中国才会发生才会演绎的不无惊心动魄的清浊混流的世相。包括因贪污受贿被打进监狱的县委书记，也是这世相中不独为奇的一相。就我现在的阅读感受而言，一部作品能给阅读者留下强烈印象而不能忘记的人物，只要有一个，这部作品就已经很了不起了。而安黎的这部《时间的面孔》，起码刘奇和立本这两个人物形象，已经给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且缓说他们是否具有典型性。

第三点，关于这部作品的艺术形态，有人说这个主义，那个主义，而我则是感觉到了一种荒诞的真实。就这部小说的每一个细节，每一个情节，每一个人物的语言和行为而言，它无疑是纯粹而又严格的现实主义，呈现着逼真的现实主义。这种来源于生活本身的真实，令我对每一个人物的言语行为，不会产生任何怀疑。细节情节上是逼真的现实主义，但大的事项，大的情节，主要人物的命运走向，却让我感觉到一种荒诞。这种真实与荒诞的交错，构成了一种姑且称为荒诞的现实主义。我不大懂文学理论，不知道有没有一个荒诞的现实主义。我确实强烈地感受到了一种荒诞，尤其是立本这个人物，他是从麻子村走出去的人，从美国拿回来了那么多的钱，要在家乡搞一个像美国的别墅式的农民生活居所撒克鲁，而且还真的实现了，最后的结局却是全部破灭。从立本开始要做这件大事的时候，我便意识到，它不就是我们过去所说的"空想社会主义"吗？想在麻子村这里搞一个像美国别墅式的住宅区，这个人的思想很坚定，遇到任何挫折都不回头的特别专注的行为，要把中国土厦房里的农民改造成美国别墅区的公民，我感觉到一种"空想社会主义"色彩的理想。立本的构想与实践的彻底失败和破产，当属空中楼阁式的必然结局，他自己最后人生悲剧自杀的发生，在我却有意料不及的震撼。我一开始看到立本的行为，就觉得有点可笑。空想，太空想了！在中国那么贫穷的山村，怎么可能通过那样的办法对农村进行改造？我猜想，作家安黎大约也是以这种眼光来写立本的行为的。安黎写到立本把麻子村改造成撒克鲁以后，住在别墅区里的乡民，依然是中国的乡民而不是美国的公民。他们的生活方式、思维方式、处事方式依然沿袭着麻子村久有的习惯，没有任何改变。而且因为失去土地，没有正常的生存手段，没有工资，造成了人与人之间的冲突，比原先麻子村原始形态的生活方式更富于悲剧性。至此便可看到，安黎是站在自己独特的角度，用独特的

目光，审视与打量着社会荒诞式的变迁，这是很富于警示也值得思考之所在。

第四点，我看到这部作品所写的当下的现实生活，也看到作家的思考。这部作品所写的当下的现实生活使我很惊讶。这个安黎悄没声息，一年我也见不了他一面两面，自然不了解他的工作和创作动向。《时间的面孔》所展现的中国乡村社会，可以说是全景式的，从一个小小的麻子村一直到省长这一高层，中间的乡镇、区、县、市都有人物活跃在其中，各个阶层的运作程序、生活氛围，以作品中出现的面目各异的人物为标征，让我看到了当代社会的一种运动方式、运动形态，这个很难得。我一边读着一边还很惊讶，安黎对各级地方政府生活运作的形态，写得相当的逼真呀！单就这些生活的拥有而言，应该说是安黎巨大的创作宝库。我的惊讶就发生在这里：安黎似乎没有在什么地方兼职体验生活的经历，何以会对当代生活如此熟悉于心？就我自己而言，想要了解省一级的人物那种工作和生活形态，我也感觉不自信。因为咱没在那种大院里工作过。安黎却写得让我这个读者有如身临其境的真实感。譬如，省长到麻子村来的情节，那种氛围的描写是生动而真实的。另外，我看到了一个思考者的安黎。这部作品中写的社会世相，各色人等，从一个小村庄的村民，到各级政府的人员在改革时代的种种行为，让我看到安黎痛苦到不无悲观的思考，而且带有思想家的锋芒。没有思想的锋芒，是不会发生如此深刻的体验的。对于一个严肃的作家，难得的是他的思考带着他的思想锋芒和思想的独立性。只有独立的思想，才可能对生活产生独有的感受和体验；如果没有思想的独立性和独特性，那么感受到的就是普遍的，一般的，谁都可能都会发生的浅表的感觉。在这一点上，我觉得安黎具有独立而独特的思想，才造就了《时间的面孔》这样一方独特的艺术

风景。这部《时间的面孔》就已经给我们勾勒出了一方独特的、令人不无惊讶和悲伤的风景。

《时间的面孔》的语言也独成一番景观。这是安黎的语言。可以说安黎形成了自己独有的语言表述形态，通畅而又具象，没有矫情做作，一读便进入人物环境和人物性情，这非常不易，也非常难得。尤其是人物的对话语言，那种个性化的突显，对于各个人物精神和心灵的揭示，常有一种神来之笔的感觉。这又不完全是单纯的语言的事了，是作家对各色人物个性化的准确把握，再有如此娴熟的语言功力，才得以甚为完美地表述。

如果要说不足，就是这个小小的麻子村，死了那么多人，一个一个悲剧性地死亡，而且死亡的方式都不一样。读完以后，我再反过来想，这可能吗？似乎又回到荒诞与真实这个话题上来了。这就是我的阅读直感，仅存疑。

2010年12月19日草

2011年2月6日修改 二府庄

说者与被说者，相通着的境界和操守

秦腔是我来到这个世界接受的第一支旋律，那是少不更事时在乡村戏台下注入生命的，后来竟成为音乐欣赏兴趣里无可替代的主旋律，直到现在依旧难改。无论是在设备豪华的剧院里看秦腔名家各具特色的演唱，抑或是在原坡河川里听到几声野嗓门的吼喊，都有一种过瘾的感觉。然而，如实说来，我也仅仅只是爱看爱听秦腔，却从来也没有在秦腔艺术上用过心，且不敢说那些卓有建树的秦腔剧作家和秦腔表演艺术家，即使比之那些痴情到痴迷的秦腔戏迷，充其量我只算得一个“半迷儿”。这样，阅读剧作家陈彦的书稿《说戏》，在我就有颇不寻常却又甚为切实的收益，为我补上了一堂秦腔艺术的基础课，让我明晰了这个古老悠远又依然焕发着艺术生命魅力的剧种创立和发展的历史渊源和脉络，领略到秦腔艺术发展历程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几位艺术大家的天赋和风骨。其中有业已铸就经典剧本的堪称伟大的剧作家，有传诵古今享誉城乡的表演艺术家，他们独具天赋的艺术创作和别具一格的艺术表演，他们视秦腔艺术为神圣的终生不懈的倾心倾情的追求，他们特立独行绝不混尘的人格魅力，都让我这个“半迷儿”戏迷发生高山仰止的真诚的折服和敬重。

陈彦用一种极富力度的辩证式叙述文字，把一个又一个卓有建树的秦腔剧作家和秦腔表演艺术家推到读者面前，尽管其中多位已经作古，而他们留在秦腔艺术殿堂里的脚步履迹，让我读来仍然有惊心动魄的感受。秦腔男旦演员魏长生三次进皇都北京演出，两次被驱逐出来，因由在今天看来既不可思议，却也合当时的中国国情。初次进北京演出，用今天的话说是轰动效应，当时的社会舆论公认为是“一杆独高”，“连皇亲贵族也有‘一时不得识交魏三者，无以为人’的感叹”，市

民群体观看秦腔几成倾国倾城的风潮就自然形成了，以致把南北晋京汇演各路戏曲的台下观众拉空了。由此而引发了中国戏曲发展历程中的“花”与“雅”的生死存亡的比拼争斗。雅是贵族化戏曲，花是平民化剧种，为了挽救皇家贵族雅曲的存活，竟以行政手段将魏长生和他的秦腔演出团赶出京城了事。官家手中的权力棍棒毫无疑问可以撵走花部的杰出表演艺术家魏长生，却终究挽救不了雅部濒临湮灭的命运。直到几年后魏长生二返皇都，盛况空前到整个京城“到处笙箫，尽唱魏三（魏长生别号）之句”，开创了秦腔鼎盛时代，连乾隆皇帝也按捺不住诱惑，带着妃子乔装为平民偷看过魏长生的一场演出。然而，在“正统之声再次发难”时，魏长生又被驱逐出皇都京城。几年后魏长生第三次进京演出，又掀起“魏旋风”，直到他在唱完最后一句秦腔剧词走罢最后一脚台步进入幕后，便悄然倒下了。剧团用座椅抬着已经闭气的魏长生到前台谢幕，观众尚不知悲剧已经发生。我的惊心动魄的冲击就在这一刻发生。一个伟大的艺术生命以巧合剧终的最完美的方式落下人生大幕，旷古少见，却铸成了永久。

《说戏》里还说到几位杰出的秦腔表演艺术家，他们各具特色的艺术途径，他们各具特色又富于开创性的唱腔和表演，不仅成为秦腔大观园里不可复制的独立景观，更在于拓宽了秦腔艺术未来发展的无限空间。我的白鹿原上的乡党李正敏，是第一个把秦腔灌制成唱片的秦腔艺术家，而且形成独具魅力的“敏腔”；被作者誉为“农民领袖”的秦腔演员任哲中，也是富于开创意义并形成一腔的秦腔表演艺术大家，在关中几乎家喻户晓，老少都迷醉他那个余韵无穷的腔调儿；同样享誉城乡的喜剧丑角阎振俗，也在于其几乎不可模拟仿照的独创性，陈彦称其为天才，我以为恰当。《说戏》里写到十余位各具艺术个性的秦腔表演艺术家，构成一幅秦腔发展群星璀璨的艺术景观。

相对于上述那些秦腔表演名家，几位创作过经典秦腔剧本的堪为大师的剧作家，却寂寞冷清到被忘却、被湮没的情状。秦腔迷们只顾欣赏品咂声情并茂的演唱，似乎很少有谁问津这个或那个百看不厌的戏本是谁写的。再加之时间岁月的无情，即如我这种喜欢秦腔也算得文艺圈里的人，却是两三年前在一本杂志上读到《说戏》里的《话说李十三》，才知道这位可与世界戏剧大师比肩的剧作家李十三的大名。他于逝世前的十年间写过十大本秦腔剧本，几乎被全国几十种戏曲剧种移植演出，其中的《火焰驹》成为搬上电影银幕的秦腔第一剧。《火焰驹》电影上演时，在城市是万人空巷，在乡村更是家家闭户锁门携幼扶老赶到十余里外的村子去看，正读中学的我也是乡村野场子银幕前的一个观赏者。直到六十多岁偶读陈彦的《话说李十三》，才知晓三百年前陕西渭北乡村出过一个伟大的剧作家李十三；他被嘉庆皇帝派来拘捕他的刑役吓得吐血而亡，那时他正在和老伴推磨磨面。我的第一次惊心动魄到几乎闭气的心理并生理反应，就在那一刻发生了，且不自责相识恨晚、孤陋寡闻的缺失。还有一位堪为伟大的秦腔剧作家范紫东，一生写过六十八九部剧本，已经不是著作等身，而是远远冒过身高了。他的剧作产量大而质量高，仅举《三滴血》而言，近百年间常演常火，也是最早被搬上电影银幕的名作。难得的更在于这是一部“思想与科学双重启蒙”的破冰之作，把传承了两千余年的“先验论”迷信的荒唐愚昧的老底展现得淋漓尽致。然而，谢世不过几年的范紫东和李十三的名字一样，仅仅只局限于很小的专业戏剧工作者的圈子里，其他社会人群就鲜有人知了。尽管这样的现象也属正常，即如今天的演艺界依旧如此，电影电视里演员的社会知名度，远非他或她所演的剧目的编剧所可比拟。然而，也许是我多所感佩，便想到起码应该有更多的陕西人知道这几位具备非凡创造智慧的天才人物。这样说来，陈彦的《说戏》，不仅为我补上了一堂秦腔艺术的基础课，也补偿了我的这一心愿，相信有缘读到《说戏》的读

者，会对创造过经典剧本的李十三、范紫东、马健翎们心生敬重的同时，也会对产生过这样堪称伟大的剧作家的三秦大地涨起一分自豪和骄傲。

我自然能想到《说戏》作者陈彦写这部书的用意和用心，正在于此。《说戏》里收录的二十二篇文章，篇幅不长，每篇集中述写一位杰出的秦腔演员或名垂青史的剧作家，一部秦腔大剧产生的生活背景或一家百年秦腔剧社艰辛的发展历程和精神坚守，还有对秦腔竭力尽心关爱的艺术界领导，等等。任谁都能想到，要把业已成为颇为久远的历史中的人和事考据清楚，需得花费多少时间查阅资料和亲历采访，再作考证鉴别去伪存真，才得以把这些杰出人物推到读者面前。须知演艺界的人和事向来缺乏完整详实的资料，多为民间传闻轶事，可以想见其难度。然而，陈彦《说戏》里不仅考据确凿，而且有许多鲜活生动的牵涉人物重大命运转折的生活细节也被他钩沉出彩，诸如“农民领袖”任哲中“文革”中被打断肋骨和在山野放牛时面对群山偷唱的生活细节，与李十三这位剧作家推磨磨面时被皇帝的通缉令气得吐血的细节有“异曲同工”之绝，把这些杰出的艺术家的心理、气质、精神、人格展现得淋漓尽致，一个个独立禀赋卓尔不群的艺术家的形象便活脱脱跃立于我的眼前。这里暂且缓议陈彦叙事写人的功力和才气，更让我感知强烈的是他的道德崇尚和情感倾向。

感知陈彦道德崇尚和由此而自然发生情感倾向的一个重要因素，首当他对这些艺术家富于独创意义的艺术成果、艺术成就的敬重。他对魏长生的舞台艺术的概括，是提升到我们民族的戏曲发展史上予以定位的：“应该说他的一生，本身就包含了民族戏曲的全部生长形态和因素……他的实践，之于民族戏曲，具有恒定的认识价值和象征意义。”他对“农民领袖”任哲中的艺术的理解和感知，是用有别于通常所

见的专业套话的语言表述的："他（任哲中）的周仁也就具有了谁都无法望其项背的生命活性和独特性。"这是对任哲中的深层而又贴切的理解。陈彦这里所说的"生命活性"，在我感知里当属生命体验，是说任哲中已经达到一种由生活体验升华为生命体验的艺术状态。我以为这种理解是准确的，也是难能的，是一个有思想的年轻的艺术家对一位老艺术家的透彻而又透亮的理解。陈彦叙述了任哲中"文革"中被罚到山里放牛放声秦腔的细节后，很自然地发出了这一段理论式的概括。这里我强调了"思想"，是以为具有深刻思想的人，才会对一个演员在山野吼唱秦腔的行为，达到一种生命体验的理解；通常情况下，人们不过以为那是演员习以为常的行为。作家的思想决定着作家对生活、对人理解的深度和发现生活命题的敏锐度，由此可见陈彦思想光彩之一斑。

陈彦对几位陕西古今剧作家的敬重，也令我感动。他对范紫东戏剧创作的成就给予充足而又客观的评价，尤其着重介绍了经典剧本《三滴血》创作的渊源和范紫东的新思维；不仅写出了这部秦腔剧久演不衰的艺术魅力，更在于剧作家范紫东超前的思想意识，是对"先验论"实施批判的"当之无愧的第一人……先一步拉开了破冰的序幕，敲响了进军的鼓点，不能不说是一种堪称伟大的觉醒与创新"。陈彦对范紫东创作《三滴血》的理解，已不单是艺术范畴的话语，更在对范紫东唯物意识的评说，提高到对全民族思想启蒙的意义上予以肯定和赞美。对剧作家李十三创作活动的研究，对其不朽的艺术成果的中肯而又高度的评论，不仅庄严地奠定李十三戏剧创作的世界性品位，也把这位几乎湮没的杰出人物推到当代人眼前。马健翎是当代剧作家，是陈彦现在工作且领班的陕西戏曲研究院的首创者，应该是陕西以现代生活为题材创作并演出秦腔剧本的第一人，以《血泪仇》为代表作的剧本，从解放区演到共和国成立，直到现在依旧为观众所乐于观赏，

陈彦称其为“红色经典”当为恰切的定位。马健翎的古典戏曲创作和改编，同样取得了重大成就，《赵氏孤儿》《窦娥冤》《游西湖》等同样堪为经典。在某些以古典戏剧创作成就抵消现代题材创作成就的言论出现时，陈彦毫不含糊地表示：“我以为恰恰是对现代戏的开创性贡献，才更加奠定了马健翎作为戏剧大家的不朽历史地位。”

陈彦对这些秦腔表演艺术家和剧作家的创造性劳动的敬重，自然影响着他的道德崇尚和情感倾向。不单是我引用的他的几段文字，涉及每一位叙写对象的艺术探索和艺术成就的文字，都是泛溢着真诚和激情，都是对他们独到的艺术个性的准确评价，虔诚的崇拜以至高山仰止的倾慕之情毫不掩饰。我想到时不时发生的一些轻狂到令人惊诧的声音，连新文学的开创者鲁迅、茅盾等先辈大师都不在话下。陈彦对秦腔先辈艺术家的敬重，不单是个人修养的品行话题，而是对艺术创造的理解，敬重先辈的杰出创造成就，也就神圣着自己所从事创造的这一支笔了。

对诸多秦腔艺术大家人格质地的敬重，可以看出是陈彦道德崇尚和情感倾向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在他的叙写文字中，对那些杰出的秦腔艺术家的人格操守的开掘，占有很大的篇幅。他对魏长生“纵有金钱不轻至”而坚守人格尊严的行为，推崇备至，是作为“中国戏曲史上的一个奇迹”来定位的，无疑对今天演艺界的商品化时弊，具有警示和参照的意义。他对易俗社的创始人和剧作家李桐轩、孙仁玉、高培支等人的事业心和廉洁自持的品格的赞誉是由衷的，并对这个百年剧社的集体精神推崇备至，以致“每每从易俗社门口走过，我都要产生一种高山仰止的崇敬”。由此真诚的情感表白，可以见出陈彦的道德崇尚了。对于一个省属大剧院的领班，又兼着剧作家的陈彦来说，这种道德崇尚和情感倾向，是成就剧院未来发展和个人创作前景的又一方坚实的

础石。他对柯仲平一生投身革命文艺的开创和建设的丰功伟绩的景仰，是由衷之情，不见虚词，更无“官话”。他对柯老终生都不脱离基层群众的作风——似属不合时宜的话题，却不仅坚持，而且多有感佩，且由柯老与农民交换烟斗的生活细节，检讨出自己下乡的浮躁行为来。即使是戏剧里的情节和人物，在正义遭遇凌辱和义士陷入不堪时，作为剧作家的陈彦和普通观众一样“替古人担忧”。在每次看到《赵氏孤儿》的“献子”情节时，“都禁不住潸然泪下，无论看多少遍，情感浓度不减，这大概就是真正的经典悲剧的力量”。经典悲剧的力量是无法估量的，但仍受限于受众的心理质地，引发强烈的心理呼应和情感波澜的，是向善的人；奸邪或者趋利忘义之辈，是很难触动那一窝污浊之血的；陈彦每次都被感动得“潸然泪下”，足见出一个真汉子大丈夫心灵质地之软的一面。我随意举出如上一些人和事，是陈彦的文章里的点滴内容，我在被他所叙写的那些秦腔艺术家的成就和品格感动的同时，自然想到作者陈彦面对前辈秦腔艺术家的虔诚姿态和精神倾向了，同样令我感动。对于一个正值创作盛季且成就卓著的年轻剧作家而言，这样深刻而独立的思想见解，这样畅达疏朗的精神情怀，这样向善求美的人格品相，无疑成为新的创作境界探索的坚实基础，将使那根敏感于文字的神经得到充分乃至超常的发挥，且缓说天才。

读着《说戏》书稿，时不时地会读到颇为精辟的辩证性质的论述。我在本文开头所说《说戏》是一种“极富力度的辩证式叙述文字”，概出于这种阅读直感。作者在叙述一些人的一些事的重要情节时，便发出自己的议论，多则几行，少则一句，不仅有点睛的奇异效果，更见出陈彦直言不讳的声音，有些是近年间乃至时下颇为热门的莫衷一是的话题，陈彦都有独立的见解，其中常能感到一种凛然之

气。我做了粗略的梳理，他的辩证言词涉及诸多戏剧专业乃至广泛的艺术范畴的话题。

关于秦腔这门艺术存在和未来前景的辩证。《生命的呐喊》一文开篇便发出击案般的坚定之声：“截至目前我还没有发现哪一门艺术能如此酣畅淋漓地表达一个人的生命渴望，如此深入腠理地宣泄一个人的生命悲苦，那就是秦腔……总之是我行我素，处变不惊，全然一副‘铜豌豆’做派。”这样斩钉截铁的话，是针对近年间出现的多种流行娱乐花样环境下，秦腔还有没有发展空间乃至存亡的大命题，我约略也听到过一些悲观性的议论。陈彦发出凛然的声响，便从秦腔久远的历史辩说，尤其是秦腔无可替及的艺术品性和独有的表现生命的艺术魅力。不仅让我信服，也感到一种淋漓的痛快……这是一篇对秦腔的礼赞。

关于质疑秦腔花脸唱腔的辩证。作者把花脸的独一无二的唱腔的形成，追溯到秦腔诞生的这块土地悠远而又沉重的历史，更在于这块土地上人的群体性气质，“是阳刚气质对人的血性补充的绝对需要”，而花脸唱腔则“是秦腔艺术的制高点”，也是秦腔这个大剧种的最富于艺术标征的唱腔。如果消解了甚至软化了花脸的唱腔，秦腔肯定缺失了独具的艺术个性；如以陈彦调侃的“二姨子腔”代替了花脸唱腔，秦腔大约就不姓秦了。

关于传统与现代的辩证。这个应该说是一个很大也很宽泛的艺术命题，不只局限在秦腔或其他传统地方剧种，甚至文学创作也涉及了。陈彦是以《铡美案》到《陈世美喊冤》引发这个话题的。作者以风趣调侃却又不无凛然的事例和语言把涉及传统戏曲的一些基本的甚至属常识性的道理确立起来。作者列举的某些挂着现代派皮毛的浅层

思维，将会弄出一个教导受害者秦香莲自强自立的现代派包文正来，让人啼笑皆非的可笑的也是不堪的后果。

关于戏曲的娱乐化和教化功能的辩证。这同样是不局限于戏曲的大命题，文学和其他许多艺术也都发生且依旧存在着争论的话题。作者以秦腔《三娘教子》说起，对照着韩剧《大长今》在中国热播的现象，郑重坚信“艺术的本质是对人类进行严肃而深入膝理的思考”，“‘观众进剧场就是来找乐’的纯娱乐化论调……是导致戏曲更加低俗的砒霜、敌敌畏、‘三步倒’。”善哉此言，诚哉此语。很难听到看到如此坚守信念的理性话语了。陈彦对流行话语的至理思考，并有截然分明的看法，不仅不盲从，而是连一句半句含糊其词的话也没有；不仅坚守着自己戏剧创作的理念和独到独立的感知，更在被自己成功的创作实践印证过的踏实和自信，还有对戏剧艺术不断深化着的严肃的思考。

陈彦辩证的话题涉及诸多方面。关于传统剧目常常出现的鬼神的事，被某些替今人担忧的人贬斥为“宣传封建迷信”，不过是一种简单到愚蠢的看法。陈彦辩证说：“我想《天雷报》之‘报应’，即是对人世险恶的无奈，借助神力摧毁人间恶行。”封建时代里没有公平的法制，借助天神乃至正义之鬼惩恶扬善，况且也生添了艺术想象的无限空间，现代人却竟然简单地歪看前人。关于现代戏剧创作时弊的辩证，这是由堪称伟大的清代剧作家李十三的创作实践和创作成就引发的话题：“仅追求刻意写作，一生故意为之，就容易形成只可供人把玩的‘器物’，精致，机巧，却缺乏具有独特生命印记的骨质与活性。当下的戏剧创作不是已经显现出这种精到而又缺血的症候了吗？”这种“精到而又缺血的症候”，可谓一矢中的，切中戏剧以及戏剧之外的文艺创作的时弊，缺失“骨质与活性”又“缺血”的任何形式的艺术作品，

其实不过是塑料制品，再逼真再精致也难得生命的活力。关于艺术家在名利和信仰问题上的辩证，陈彦在做了理论阐释后，用民间最结实的话语发出警示：“一个人一旦狂妄得面对崇拜、追捧，不敬不畏，甚至受之无愧时，离‘暗箭’、‘黑砖’、‘塌火’、‘崩盘’也就不远了。”又如：“当一切离开了信仰的轨道，只在金钱驱使下疲于奔命时，演艺就堕落为逗猫遛犬玩猴，耍把戏了。”这些撞击我心理的再扎实不过的语言，显示着作者对艺术界某些丑恶现象的蔑视，也展示出作者自己信仰操守的凛然之气，无疑有警示的意义。我读这些文字，顿生感佩和敬重，不在作者年轻我许多。

《说戏》说得好，这是我的阅读直感。好在语言的坦率与鲜活，不见装腔，更无一丝一缕的忸怩；说人叙事，严密客观；论事辩理，鞭辟入里，时见义正辞严的凛然之气，又见汪洋恣肆的洒脱，让我读得不仅信服，更有一种阅读的痛快享受。我想文章能写到如此状态，尤其是钩沉那些故人旧事，不仅要花工夫搜集翔实可靠的资料，更兼有一份对自己仰慕的艺术家的真实感情，还难得于个人见解的思想锋芒。陈彦这一组文章中，常常出现一些最扎实最生动的生活语言，夹杂在叙事辩理的“雅”文字之间，添了诸多诙谐的调侃色彩，也增加了语言的硬度，更见出作者文字的潇洒不羁，营造出一种严密和鲜活的艺术效应，可谓陈彦的个性化文字。

和陈彦相识相交，是从观赏他的戏剧创作开始并加深的。十余年来，我有幸看过他创作的《留下真情》《迟开的玫瑰》《大树西迁》和前不久刚刚上演的《西京故事》四部现代戏，还有一部由他精心改编的青春版《杨门女将》。依着我的记忆，那四部以现实生活创作的大戏，每一部都感动得我泪流不止，擦湿几块纸巾；非是我感情太过脆弱，我的泪是合着剧场里不时起伏的呜咽声而涌流着的，确凿是剧

中人物的美的心灵，触撞得包括我在内的几乎所有观众都承受不住情感的震颤，接受一次人性善和人性美的洗礼，便是水到渠成洗涤灵魂的很自然的过程了。这几部现代戏剧，十余年来连演不衰，尤其是《迟开的玫瑰》，演遍了南北中国，演到哪里，便成趋鹜之状，剧场里流泪唏嘘呜咽和西安剧场里一样此起彼伏，地方戏剧里的地方语言的障碍完全化释了。在艺术界同样获得连连好评，专家的高见和普通观众的感受达到一致，确属难能，更属难得。《迟开的玫瑰》和《大树西迁》，两次获得国家舞台艺术精品工程“十大精品剧目”奖，两次获得“曹禺戏剧文学奖”，两次获得政府“文化编剧奖”。戏剧创作的几项国家级大奖都获得了，且是一得再得，面对年轻的陈彦，早在几年前获得这些喜讯时，我不仅感慨，而且肃然了。

眼见着陈彦戏剧创作的丰沛卓著的成就，我在心底却潜存着一个不大亦不小的谜团，不是神秘的天才说，也不是对他戏剧创作道路的探询，恰恰是他面对戏剧创作和面对当代生活的姿态和视角，面对各种流派纷呈的戏剧舞台，陈彦依然执着于现实主义的创作；面对着除腐更新却也纷繁喧嚣的现实生活，不仅不回避生活世相里的矛盾以至灾变，更难得在专注于发现并张扬人性和人德之大美，而且获得了卓著的艺术成果。陈彦何以能有如此坚定的追求？我终于在《说戏》里获知了答案，他在说戏说事说人时的审美意向意趣，就不仅决定着他的创作的艺术审美境界的追求，更在于他对当代生活的发现和开掘的意义指向了。前文已多所涉及，不赘。我终于部分地理解了这位独立思想的年轻的剧作家陈彦。

我写此文之际，陈彦又一部表现底层进城乡民生活的大戏《西京故事》刚刚上演，我又一次被迷醉也被震撼了……

2011年3月30日 二府庄

一次探秘性阅读

翻开《我的读书故事》书稿，看到目录中排列的收入文章的作者的名字，我便发生惊讶，活跃在当代陕西文学界的各个年龄档的学者、理论家和作家，竟有近四十位之多，他们有的是学富五车卓有建树且享誉国内外的学者型文化人，有的是专事文学评论已成一家之言的人；更多的是作家，有新时期文艺复兴刚刚潮起时便跃上潮头且著作等身的大家，有刚刚崭露头角发出不同凡响声音的青年作家；能把这么多人的读书故事收拢一书，颇令我惊讶。惊讶的同时伴生着好奇，或者说是探秘心理，这些时常见面且令人敬重的学者和作家，他们是怎样读书的，他们都读过什么书，才使他们攀登到各自艺术创造的高峰，探秘的兴致便自然发生了。

《我的读书故事》集子里收录的首篇《缅怀往昔论读书》的作者霍松林老先生，是一位学贯中西更贯通中国古今的大学者，在我素来就有高山仰止却也莫知底里的神秘感，读罢他写的这篇读书记事，我才见到冰山神秘的一角。霍老先生从三岁起便读《三字经》《弟子规》《千字文》，在今天看来几乎是不可思议的事，即使普遍重视孩子智力开发的当今，三岁的孩子多是从看图识字开始启蒙，可见霍老先生幼时的早慧。到了上学年纪，恰逢新学兴起，父亲不屑于“大狗叫小狗跳”这样粗浅的识字课文，竟然把他关在家里实施家教，让他背诵了《论语》《孟子》《大学》《中庸》《诗经》《古文观止》《唐诗三百首》等十余种国学经典，而且阅读了《三国演义》《水浒传》《聊斋志异》等古典名著小说，这是在十二岁以前完成的。我几乎不敢想象更难以估量，一个扎扎实实趸下这么多传统文化古典艺术经典文本的年仅十二岁的少年，为后来的创造性思维打下了怎样坚实的基

础，令我辈生畏。上学到小学高年级再升入初中，他把新文学兴起时的鲁迅、胡适、郭沫若等十几位大家的主要作品都读过了；此间又大量阅读了外国文学作品，从古希腊史诗《伊里亚特》和《奥德赛》，但丁的《神曲》和莎士比亚的几部剧作，直读到苏联时期的高尔基等大家的长篇小说，我约略数算了一下，大约不下百部（篇）。我又一次感动感慨，却仍不敢想象更难以估量，一个装满中国古典、中国现代文学和世界文学的初中学生的霍松林，他的艺术视野扩展到怎样幽远和开阔的空间？眼见的事实是一位卓有建树享誉国内国外的大学者霍松林。

霍老先生的重要启示，在于做读书笔记，又写读书感想和札记，似乎有普遍的参考价值，做读书笔记既可加深记忆，又可采撷精华；做读书感想或札记，就是思考和辩证了，既融汇了所得的知识，也磨砺了自己思想的锋刃。还有霍老先生背书的经验，我不知现在是否适应时尚，在我却以为受益无穷，博学多才是相对于学浅才疏，尤其是中国古典那些经典文本，我因自己的错失而至今抱憾。说到这里，还有年轻的学者型教授炜评可堪钦佩，一个年轻的中国古典文学的学者，竟然是在“文革”批判孔子的运动中接触《论语》，却兴趣十足地背诵起来；天生一种好记性，装了满脑袋“之乎者也”，成为一个古典文学教授，说事辩理，信口便是经典句子。炜评又善于思考，独立见解自成一家，本书收入的《“风流宝鉴”〈世说新语〉》和《〈论语〉的读解》两篇随笔，可见一斑。

在《我的读书故事》一书中，我饶有兴趣地读到几位堪称大腕作家青年或少年时期偷书的轶事，贾平凹、莫伸、孙见喜等都写出了当年的“不轨”行为。贾平凹和孙见喜的偷书经历有相同的背景，都是“文革”毁灭文学书籍的非常时期发生的事，差别仅在前者是在初级中学遭

毁的图书室里偷，后者是在大学的图书馆里偷。如果以偷而论，贾、孙不过是顺手牵羊，而真正有预谋更有冒险精神的偷书行为，却是眉清目秀堪称俊男的莫伸干出的。不必赘述他们大同小异的偷书过程，我却感知到他们三人共同的一点，便是对文学书籍的浓厚兴趣和强烈的阅读欲望，都是发自带有先天性的敏感文字的神经，因为这些行为都是在无人诱导的少年时期发生的。当新时期文艺复兴的潮声初起，莫伸的《窗口》和贾平凹的《满月儿》两篇小说发生重大反响的时候，文学界却纷纷发问这两人来自何方，竟有如此杰作爆响，及至后来获得第一届全国短篇小说奖。殊不知他们从少年时期——尽管属毁灭文学的“文革”——就已经嗜读如命接受艺术熏陶且练笔写作了。

读书可以重新激发起艺术创造面临枯竭时的清波。这是我从张虹的文章《〈沉船〉拯救我的灵感》得到的启示。她说在上世纪末，“正是我步入中年，出效率出成果的时候，可是，我却突然文思枯竭，失去了艺术灵感。”后来通过阅读泰戈尔的长篇小说《沉船》，竟然发生了始料不及的神奇效应，“灵感已像日出照耀黑暗那样突然来临”。阅读激发激活的创作灵感，在张虹而言，不仅是小说创作的再度恢复，更在于作品的质的裂变。尽管张虹把“失去灵感”造成的“文思枯竭”现象似乎说得有失夸张，在我理解却是一个作家创作发展中的正常现象，也是国内国外的大家都遭遇过的事，甚至不止一回，即阶段性出现的面临突破而尚未完成突破之前的困惑，以至不堪的痛苦，甚至常有人以为自己江郎才尽而陷入绝境。一当完成突破，便是“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别一番艺术创造的绝妙境界了。不同的作家实现创作突破的途径殊多不同，而阅读包括政治、历史、哲学和文学等书籍，似乎在不少作家的创作实践中都发生过如此神奇的效应。张虹的这篇短文又是一个生动的验证。

这部《我的读书故事》收入肖云儒先生六篇关于读书的短文，都是这位同代人从莘莘学子到具有广泛影响的文学评论家，再到富于创造思维的文化学者历程中，几种对他发生过重要启迪的书籍，有最早出版的十卷本《鲁迅三十年集》，有幼年时期阅读的马卡连柯的《教育诗》，有青春时期引发强烈阅读兴趣的杰克·伦敦的几部长篇小说，而且在多年后的“关键时刻”，发生了“杰克·伦敦救我”的惊险经历。他读了俄罗斯被他奉为“很大很大又各有不同”的三个“大斯基”的著作，读到车尔尼雪夫斯基《怎么办？》里的某个细节，他竟然“我哭了，灵魂大恸而涕泪横流”。这是他读高中二年级时的阅读经历。任谁都会想到，这种阅读对一个处于少年到青年交接处的人的灵魂的审美锻铸。

这里我想着重说几句肖云儒著《流连在美的历史长廊中》一文。他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时，读到了李泽厚先生的专著《美的历程》，且先后通读过四遍，“进入了中华民族美学精神的深处”；且“把《美的历程》当作中国文化史和中国美学史的字典，随时查阅、翻读”，“一直延用了二十年”。我便想到，作为评论家和学者的肖云儒是怎样丰富自己的知识，怎样扩展自己的艺术视野的，有了今天的成就当属必然。他在这篇短文中谈到一个真切的又极富启示意义的感受，“随时用作者的创造性观点点燃自己的再创造思维，也随时用自己的思索去延伸、丰富他人的论述”。诚哉斯言。无论自然科学，无论文学艺术，那些卓有建树的人，无不都是先接收前人在某一领域所创造的成果，然后再进行自己新的开创性的创造活动，把自然科学推进到一个又一个新的尚未认知的境界，把文学和艺术推进到别一番新鲜而又陌生的“桃花源”，我以为都是借助巨人的肩膀，探索再抵达自己的创造天地。

据我所知，《我的读书故事》里收入的这些文章，都是由西安财经学院《西安财经报》约稿，在《我的读书故事》专栏发表的。我颇

多感慨，一张大学学报开辟读书专栏，且持续五年，把西安地区的名家几乎一网揽入（此网非电脑彼网），既可见得良好用心，又能见得持之以恒的韧劲，才把这样一部好书呈现给读者，这是本书编者严琳成就的一件好事。

2011年4月25日 二府庄

难得敏捷与坦诚

读着即将出版的《朱雀门下》书稿，眼前总是映现着本书著者曹军华的生动面孔，耳畔更伴有他的反应敏捷的快语。读他的文章，就像和他对面坐着听他说话。尽管和这位年轻朋友的接触称不得频繁，多是仨月乃至半年才有一次机遇，从见第一面的交谈，便留下快人快语的个性印象。后来的几次接触，这种印象愈加突出，往往是同座相聚者有心或随意涉及十分宽泛的诸种话题，曹军华常常能迅即做出回应，说出自己的看法。我自然想到，之所以能如此快语，在于思维敏捷，敏捷到一旦触及便能发出反应，连任何哪怕一瞬间的思一下或想一下的过程都没有。这种敏捷思维的基础，当属拥有十分宽泛的知识面，才可能对诸多话题做出反应，对一个完全不了解某项专业的人来说，就只能有聆听的份儿了。能够快语，足见快人，亦足为快人，这就是禀性或者说个性化的曹军华了。常见的现象是有人也知道某项话题，却不多说或根本不说，那就属别一种性情的人了。

我之所以先说曹军华快人快语的个性印象，是读他书稿里的文章引发的。他的文字的突出特点，也是快人快语。无论写人写景写生活世相，无论叙事，无论抒情，无论议论，都是快人快语，便凸显出别具一格简洁明快的语言风采。无论散文或随笔，一旦涉题，便直抒胸臆，把最真实的感觉、感动和感慨，准确而坦诚地表述出来，呈现着思维的敏锐和鲜活，时有令我颇为惊诧的可谓鞭辟入里的文字。不见忸怩，不见作态，更不见装深沉的假斯文。这样，我便有畅快淋漓的阅读直感，也就有如当面聆听快人快语的幻象了……真可谓文如其人。

《朱雀门下》集子里，曹军华写画家和书法家的文章占了很大篇幅，我甚为惊讶他结交了那么多书画界的朋友，有的是当今陕西书画界的泰斗式人物。像创立黄土画派的刘文西，当代山水画坛的领衔人物崔振宽，独俏一枝的书法家钟明善，等等。这些书画界的老先生，和曹军华有生命年轮上的很大差距，又都别具个性，然而都乐于和这个年轻人相交，且视为忘年交，实属难得。在诸多因素中，曹军华对这些堪称书画界大家的深层理解当属最重要的一点，对他们艺术追求和艺术创造的深层理解，才可能打破一般的仰慕和敬重，进而达到心通神交的无碍状态，年龄差别就淡释了。我看到他对崔振宽艺术创造的理解，颇为惊讶："画画到一定阶段，就是画思想、画修养、画境界。关于这一点，在崔振宽先生身上又一次得到了极好的证明。"对于一个成就卓著的山水画家通过艺术追求和艺术突破而抵达完美境界的理解，突出思想这个关键因素，不敢说唯一，起码属于非同寻常的一种深层的理解。我想老崔能得到这种理解，不仅欣然，也许会慨叹"知我者小曹也！"我却又想到，能对这些大艺术家形成深层理解的曹军华，也需具备一个基础，便是思想；只有独立思想而不人云亦云的人，才能发生对艺术大家深层的也必然是独到的理解。

曹军华笔触所涉及的书画界人物，竟有几十位之多，不仅有上述的多位书法和绘画大家，也展示出更多的已成气候独成一家的书家和画家的艺术创造景观，更有对刚刚露出不俗头角的年轻画家的倾情关注。《心中丘壑现笔端》一文中所述写的结识青年画家刘瑜的过程，读来令人感动。他是先见画而后来才结识画家刘瑜的。他被署名为刘瑜的《秦岭锦绣》的山水画"吸引和震撼"，这幅八尺山水画展现的"秦岭巍峨风姿的不凡构图，和那雄健而苍润的笔墨"，在他看来是"展现秦岭风韵与魂魄的为数不多的画作中"，"当立其中"的一幅杰作。这幅杰作留在心中，仍不甘心，便多方打听画家刘瑜，见面却是颇富传奇

色彩的不期而遇。曹军华十分简练的一小段文字，把个儒雅的年轻画家刘瑜的形象勾描得颇为传神。他们一谈便成知己。我更感动他的这种自然到类近本能的倾情艺术的一份痴情，纯属艺术，在物欲膨胀、利欲熏心的书画市场，能有如此纯粹的艺术情结，令我感佩，也当属曹军华之所以能和书坛、画坛大家新秀结识相交的主脉，且不说人缘人格魅力。

《朱雀门下》集子里收入一组散文，作者命题为《山水风光闲情篇》。观赏山光水色的自然气象，感受北方南国大漠奇峰里的截然不同的气韵，是人之常情。然而，不同心性的人所发生的感受，尤其是独特的感受，就有了很大的质地的差异。军华喜奇石，和雷龙璋结伙在太白山的小河中采集奇石，写得轻松爽气又情趣盎然，确也称得"闲情篇"。然而即如这种闲情逸致的文字里，作者仍然赞美雷龙璋的一种美好情怀，"闲情"便不闲了。再如《太湖等雨》，对江南的山光水色的感受，让阅读者的我有如身临其境，似乎也感知到太湖水气清风对内里的润湿了。等雨不及，作者余暇远眺灵山大佛，及至大雨倾盆，绘声绘色地状叙太湖雨景的时候，苏东坡写西湖雨景的绝句顿时泛上心来，确也称得一笔闲情逸致的文字。然而，更多的收入此集中的文章，赏山阅水尤其是追寻古人先贤足迹的过程中，常常会发出颇为尖锐的诘问，还有绝非"闲情"的思考。读到《闪亮不应黯淡——长沙谒曾侯墓》时，我感觉不到"闲情"，反而颇多沉重。作者写到曾国藩一个细节，"当他的总督座船在长江上被弹丸小国日本的小火轮一溜烟甩在身后的时候，他竟在一声沉重的哀叹后气得昏厥过去。"这是堪为经典的一个细节。它不是作家的想象和创作，而是发生在曾国藩身上的真实事件，一个承担着国家重大使命的曾国藩的心理气质，便突兀地呈现在读者眼前。这个人生前的"家书"正在读者中广泛传播，影响着许多当代人。然而死后的落寞和孤寂，引发的是曹军华沉重的慨然之

情。我由此而理解了曹军华的内里世界，其波澜不仅不是“闲情”，而是一种承载的激情了。

曹军华确也有“闲情”，多体现在他的广泛的兴趣上，譬如对各个朝代瓦当的爱好和收藏，沉浸在一种别样的历史文化的情趣之中。尽管我是外行，却也能感知痴迷者的曹军华的丰富的内里世界的另一脉了。

2011年6月30日 二府庄

马蹄溅落的诗行

灞桥乡党陈瑞华编著完成《孙蔚如将军诗词与书法》集书稿，约我作序。我颇多踌躇。自知古典文学在我是一个大的缺欠，向来不敢说长论短；书法亦未入门，虽然也常写毛笔字，不过是用毛笔写的字罢了，称不得书法。这样，要论说我敬重又敬仰的孙蔚如将军的诗词和书法，便有心虚气短的本能性反应。然而，我又不忍心推辞，概出于一种隐隐的诱因——

七年前，徐剑铭等三位作家写成纪实文学《立马中条》书稿，约我作序，多是想到孙蔚如将军是我仰慕的灞桥前辈乡党。在《立马中条》书稿的阅读中，我强烈地感知到这位横刀立马中条山、给倭寇致命打击的大将军顶天立地的脊梁和凛然的风骨，曾经感动得忍不住把其中一个感天地泣鬼神的细节演绎成短篇小说，当作我对这位将军乡党迟到的礼赞。现在，有幸阅读将军的诗词，展示将军的内里精神世界，我将会感知这位儒将的襟怀。出于这样的期待，我不揣冒昧接手这部书稿，用心解读，领略这位令我钦敬、令我骄傲的将军乡党的精神情怀。

孙蔚如将军年轻时投身国民革命，便胸怀着国家和民族的命运，可谓少年壮志；他毅然投笔从戎，起始的动因不是个人的前途，而是以个人的生命之躯报效国家，便奠定了一种忠诚和勇毅。一九二二年秋天，年方二十八岁的孙蔚如在三原疗养臂伤，住在一个颇为幽静的花园里，桂香馥郁，心中却仍然驰骋着疆场上的“青骢”。诗曰：“小园日暖桂花风，徐步优游清水东。但向此中寻乐趣，疆场不复试青骢。”字面上的“不复”，似可看作对和平的期愿，而非现实所可行，从写于

同时期的《直捣黄龙迎二帝》一诗中，可以看到将军此时的抱负。这是孙蔚如赴北京疗伤途经河南安阳，拜谒岳飞庙时触景生情，咏出“若非十二金牌召，千古无人拜鄂王”的历史悲剧的慨叹。在近百年后的今天读来，我便感知到孙蔚如作为国民革命军的一员的精神气象了，就是一个忠与奸的截然划界；面对国家和民族的未来命运，在错综复杂的历史大转折时期，他心头悬着作为耻辱象征的宋高宗召回岳飞的十二道金牌；有民族英雄岳飞垫在心底，孙蔚如的人生道路选择和个人品质，就铸成一种难得改易难得动摇的基础；他后来的辉煌历程，尽管多所挫折和危难，更显示着他的人生选择的坚定性，也显现着熠熠闪光的品德。

孙将军这种激烈壮怀的另一脉，恰是对处于军阀混战之中的民间疾苦的痛切关怀。孙蔚如所在的杨虎城部队改编为国民军后，于一九二五年春，他代表杨虎城到潼关参加一个军事会议，同时迎接国民军入陕，在遍地泥泞的雨中赶了六百多里路，沿途看多了乡村的凋敝景象和民不聊生的惨状，隐忍不住便发出心声，在五律《投鞭念佛陀》一诗中呼吁“应怜民疾苦”，足以见得跃马疆场的将军真切的柔肠。作者真诚的期愿溢于文字：“海内升平日，投鞭念佛陀”，很坦诚也很直白地表示，只要和平、安宁、国泰、民乐的社会实现了，自己可以扔掉象征着战争的马鞭，到古寺里去诵经念佛，而不计个人的任何得失，这是怎样一种光明磊落的襟怀。孙将军身在军中，却厌恶不义之战争，在于他看到军阀混战给国家和人民造成的巨大灾难。在七律《司马台前感怀》一诗中，发出“遍野哀鸿剧可伤”的哀叹；末尾两句“建国未成人遽死，凭谁继起系苍桑”，是说孙中山先生突然谢世，谁来承担救国救民的历史重任呢！可以见得孙将军忧国忧民的悲壮情怀，更可以见得他戎装跃马的使命了。

一九二六年，军阀刘镇华围攻西安达十个月之久，杨虎城和李虎臣坚守西安，所谓“二虎守长安”的艰苦卓绝的历史性一幕，永不磨灭地铸成西安人的历史性记忆。作为杨虎城将军的忠诚而又得力的干将的孙蔚如，负责西安古城东北城隅的守护，寸土不失。西安城里的军民遭遇着骇人听闻的灾难，孙将军有感而发的七律《坚守长安》一诗中，留下了西安军民艰难到超出忍受极限的生存困境的文字写照：“菜色载途怜饿莩（殍），马肝充食悯兵饥”。这两句高度概括的诗文里所隐伏着的惨不忍睹的景象，是不仅树叶树皮被揪被扒光了，包括马骡爱犬等牲畜也被杀了充饥，甚至连皮革制品也煮了吃了，战死饿死的军人民众多达数万，作为国民军立足的古城西安终于巍然屹立。诗句中一个“怜”字又一个“悯”字，足以见得这位坚挺在血火西安的将军的悲悯情怀。

在中条山的抗日战场，孙将军横刀立马，把不可一世的日本鬼子堵在潼关之外，不仅让企图进入关中的日本侵略者的美梦破灭，这方古老文明的土地免遭蹂躏，而且打得鬼子兵伤亡惨重，把以关中子弟为主体的西北军的威风张扬起来。孙将军在中条山留下了几首血战的诗篇，诗文里记录着当时的抗战局势，战争的惨烈，暗示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剿共内战造成的恶果，更张扬着这个民族不屈不挠的精神。《抗敌歌》当可看作孙将军立马中条时的誓词，其中“铁骑纵横气如山，不教胡马渡榆关”，显示着将军的凛然壮气；“伫看铙歌齐奏凯，风物如绘旭日暄”则展现着将军必胜的期盼和信心。将军于一九三九年作的《满江红·立马中条》一词，更是壮怀激烈，一句“怒毗裂”，可见将军的英武气派；怒视里的侵略者不过是“岛夷小丑”；信念里坚信着的是“挽狂澜，作个中流砥柱”，孙将军的不可轻蔑更不可战胜的民族英雄形象，跃然纸上。我读此词，便想到岳飞和他的《满江红·写怀》一词。这里引录于右任写的《越调·天净沙·为中条山抗战书赠孙蔚如将

军》：“中条雪压云垂，黄河浪卷冰澌，血染将军战史。北方豪士，手擒多少胡儿！”一句“血染将军战史”，是对孙蔚如将军戎马生涯的客观而形象的概括；一句“手擒多少胡儿”，则把孙蔚如将军的民族英雄的气派彰显出来。

孙蔚如将军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诗作，截然是一种欢欣而又鼓舞的美好情怀的表述，这是可以理解的。将军一生都在追求而且实践着国家和民族的光明和新生，当新中国成立以后，身为陕西省副省长的孙蔚如将军，诗句里洋溢着阳光的明媚，是真实心怀的抒发，诸如“和平世界从今始，马列精神万古传”。孙将军自幼追求光明和进步，倾情革命，当这种心愿实现的时候，激情便溢满诗文字句了。有一首写他到青海慰问人民解放军骑兵团的即兴之作：“应策腾空气似虹，欃枪扫尽仰雄风。和平建设从今起，万族欢歌庆大同。”孙将军的诗，真正体现着“言志”的本真。

咏读孙蔚如将军的诗词，可见艺术造诣之深，尤其突出的一点，旁征博引了许多历史人文的典故，足以见出将军古典文学修养之丰富厚实。说来惭愧，诗中所涉及的不少典故，在我完全陌生，不看注释就难以领会其深意。孙将军数量不算太多的诗词，多是戎马倥偬间内心情感的倾泻，可谓马蹄溅落的诗行，却依然对仗工整，采词造句深奥而又儒雅，显示着儒将的风采和风骨。

书稿里收录孙将军诗词手迹十九幅，更见得儒将独成一格的书法风韵，尽现挥洒自如不拘一格的雄风率性。我在品赏这些堪为笔走龙蛇潇洒自然的笔墨时，突然想到，将军的一笔一画不是为着当书法家而为之，完全是一种率性的书写，毛笔和毛笔里所蘸的墨汁，纯粹是为着情感抒发的需要而倾注到白纸上，倒让我看到了作为传统的书写工具独有的个性化魅力，而排除了为着书法的难得避免的匠气，更显

现着真正的作为书写工具的毛笔字的神韵。这种韵，是孙将军个人独有的禀性铸就的。

2011年7月15日 二府庄

期待交流

第一眼看到马安平先生翻译的我的散文英文稿，瞬间的惊讶之后，心头竟泛起一缕酸楚。看着那些连一个字母也读不出的英文文稿，我顿然意识到我是一个文盲了。出自自己笔下的文字，变成英文以后，自己连一个字都读不出来了。我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读中学时学的是俄语，可以进行简单的俄语对话，几十年过去，已经几乎忘光了。英语热遍中国的多年里，我无机缘接触，纯粹是一个外语文盲了，缺失的遗憾也无法补救了。

马安平先生约我作自序，我当即应承。其实，我给一百多位作家朋友的小说散文作品写过序，却很少为自己的小说或散文集作序，也许出于一种偏颇心理，以为作家的体验都倾注在每一篇作品的字里行间了，尽可以让读者去品味，再没有文章之外啰唆解释的必要了。这样，我出版过的不下七十种小说、散文选本，大约只写过四五次自序，多是套书规定非写自序不可的统一体例。唯一一次自己张罗写下的后记（仍不是序），是平生出版第一本书——短篇小说集《乡村》编成时写下的。道理无须解释。第一次出版作品集的新鲜到情不自禁的兴奋。这回之所以欣然接受马安平先生要我作自序的事，概出于类近第一次出书时的心理感受，虽然《白鹿原》已有几种语言的翻译文本，都未作自序，而散文作品集以英语翻译出版（即将由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版），在我却是第一次，想到英语读者读我的散文，便有一种兴奋和新鲜感。我总是对第一次发生的事产生新鲜和兴奋，尤其是写作中经历的第一次。

我看过马安平先生选编的我的散文集的汉字目录，二十篇散文，大致可归为三类，一是写风土人情的篇章，二是吟诵自然山水的文章，三是涉及文学创作的感受之作。这些散文选目，大致体现了我多年来散文写作的风貌，应该说是马安平先生很有眼光的挑选。

我写这个序文的时候，仍然是一种兴奋和欣慰的感受，概出于我几十年来依然继续着的对创作的理解，作家把自己对生活的体验诉诸文字，就是想与读者进行交流；喜欢阅读你的作品的读者越多，验证着作家体验的独特性，才能引发读者的心灵呼应。想到我的散文即将与英语读者实现交流，新鲜和兴奋的同时也伴随着忐忑，我在散文中叙述的生活体验和人生感受，能在多大的读者层面上引发心灵呼应，确凿是既令人期待更令人不安的事。无论如何，我拭目以待。

约略记得是两三年前，我和马安平先生与西安工业大学校长刘江南教授相聚聊天时，刘江南校长提议马安平先生翻译我的散文英语文本，在我感觉偶然，在刘江南校长当属“蓄谋已久”。所幸马安平先生对此提议很感兴趣，当即应承愿做此事，我很感动。当这本英语散文文本即将面世的时候，我对马安平先生翻译的辛劳诚表慰问，为他的认真表示钦敬，为刘江南先生的美意的实现表示谢忱。

2011年10月27日 二府庄

略说党宪宗

欣闻党宪宗的新作《沉重的回报》召开研讨会，谨表真诚的祝贺。

我读《沉重的回报》，每读一篇，精神和心理便经历一次沉重到不堪的折磨。我真切地感知到“沉重”这个词汇的无以估量的重压，以致压迫得我不敢再接着读下一篇，却又忍不住掐不断阅读的欲望。一部作品能对我这个老读者产生这样奇异到少有的阅读感受，足见其惊世骇俗的功力。这功力不单是文字，更多的是倾注其中的党宪宗的凛然的道德审视。关于《沉重的母爱》和《沉重的回报》的阅读感受，我已在和李康美先生合写的序言里作过表述，不再赘写，倒是想对作家党宪宗多说几句。

我和党宪宗认识甚早，来往却稀少。印象里是一位创作古典诗词的高手，不料在年过六旬之后，一改斟字酌句的老夫子形象，把笔尖对着生活世相里最不堪的一面，进行持久连续的审视和灵魂的净化的写作，引发强烈的社会反响。在我平庸的意念里，六十岁是一个老年的年龄标志，孔老先生说“六十耳顺”多为国人接受。党宪宗却恰在六十过后，面对道德和良知沦丧的某些生活世相，不仅难以“耳顺”，而且仗义执言起来，其痛楚到不无义愤的怒火，尽现在文字之中。这种情感，当属一种二度青春现象，是党宪宗这个个体生命独有的。我向党宪宗致以敬意，为他的创作成就，更为他的道德良知，还有他勃勃的生命活力。

2011年12月17日 二府庄

四位才子，共舞心灵绿地

王锋拿来即将付梓的《坐卧终南》的样本，乍一看这个书名，脑子里当即映现出王维的影像来。王维隐居终南山中，吟诗作画，和终南山水已经融为一体，无论诗，无论画，都是进入生命体验的独得的艺术景观，也是自古至今独立不群的一种人生境界。这本集诗、文、书法、国画和治印艺术为一体的集子中的作家、诗人、书画家，正当青年和壮年的黄金年龄区段，都处于艺术创造的最活跃状态，无论他们的艺术个性和艺术追求有怎样不同的意趣，精神境界却趋向一致，便是或坐或卧于终南山水之中。在物欲催促而形成的浮躁到癫狂的种种世相的当今，这四位诗人画家却要坐卧终南，我便直接感知到一种超凡脱俗的人生境界，自然也就发生敬重的肃然。尽管他们没有像王维独居于终南山中的某个草舍，而能有坐卧终南的向往，便见出一种清纯洁净的心境，一片心灵绿地，已经难能而可贵了。我说肃然起敬的话，不是虚奉，而是真实感知。

在《坐卧终南》的四位入选者中，我最熟悉的一位是诗人兼书法家王锋。他的古体诗词创作，早已形成气候，文学圈内及至泛文化领域都已产生不俗的影响。他的古体诗词，即兴而成诵，所谓触景生情便吟诵成绝句或律诗，得意时常常会发到我的手机上，品读之后便对他说出我的阅读感受。且不赘述我的评价，更有高人王蒙先生对他诗作的高档定位。我颇感慨，能入得王蒙的阅读视野已很难得，而能获得王蒙的品评和赞赏，足见王锋诗词的品位了；王蒙和王锋多有即兴唱酬佳作，又见得年龄相差几近一倍的老王和小王的忘年之交，是以诗性交融而忘却了年龄差别的，这是最可珍贵的情谊。

我认识王锋很早，引起我关注的是他很富个性也独具见解的一些涉及陕西和全国的文学创作的话题，尤其是前几年在《华商报》主持过“一周文坛演义会馆”，持续一百期，蔚为一时之盛。他的并不太大的眼睛，却纵横当代中国文坛，几乎一览无余；又有一杆幽默而犀利的文笔，准确而又生动地展示得淋漓尽致。我曾经是他“文坛演义”的热心读者，不单获得许多文学信息，更想过一把他的极富智慧的文字瘾。我曾建议他把出过百期的“文坛演义”的奇文出一本书，不然就太可惜了。我也曾经多有惊诧，平时缺言少语的王锋，动笔成文便见出别一番风流。我曾赠他一首诗《王锋印象》：“在河之洲一少年，不逑淑女迷诗篇。踏遍北原南岭地，阅尽春花秋霜天。唇里纳言蕴默雷，笔底演义起狼烟。思逐风云年华好，独立独秀独扬帆。”这是我印象里的这位才气横溢的诗人王锋，在堪称独秀古体诗坛一枝奇葩的王锋面前，尽管有班门弄斧的忐忑，也顾不得了……平时几乎没有见过王锋的书法作品，这次看到，又是惊诧，从来不见张扬的书法，既见得功夫，又见出个性，亦有飘逸不羁的帅气率性在。

范伟自取一个范樵父的笔名，初看有古香古色的气韵，再看便感知到精神追求的取向和人生境界的自我定位。樵父大约是樵夫中年龄稍大的长者，无论樵夫或樵父，都是深山老林中以打柴为生的人，在范樵父来说肯定是在终南山里挥斧挑柴自得其乐的；既定位为樵父，便让我想到一种天然到本性的淡泊自守，看花开花落云聚云散。当王锋偕范樵父和我握手时，看着这位总是满脸笑容略显单薄的年轻人，我就想感知樵夫的独特气质，似乎不太明显，手掌上也没有樵夫的硬茧，而当打开画册领略他的一幅幅书法作品，我才意识到我的偏差，这个范樵父手中挥舞的不是樵夫的斧头，而是一杆重过斧头却挥洒自如的毛笔，创造出一派苍劲的书法艺术景观。看来他是渗透了散翁的

萧散风骨，又感知于这个时代的雄博气象，我这个书法外行，不敢乱作评说，相信书界大家的评价，也只有欣赏的欣幸了。

集子中收录的范樵父的散文随笔，多属他的感性生活随记，给我突出的阅读感受，便是信手拈来，不事雕琢，看似没有着意用力，却尽现真实而又自如的生活情态和人的心理情态；清朗散淡的文脉气韵，呈现着樵夫面对青山流水的平和与达观。这是范樵父独有的散文意境，大约得益于樵夫的那种情怀。

看王松的山水画，我的直观感受是一种亲近和亲和，甚至产生一种进入且散漫其中的欲念。这应该是作为画家王松作品的受众的我少有的感受。作为一个画界之外的普通受众，往常里难得深究各路画家的师承渊源和个人独辟蹊径所抵达的艺术新境，更多关注的是阅读的直接感受，有喜欢的，有不大喜欢的，有令人震惊的，也有令人轻松开怀的，等等。然而，让我发生亲近亲和以想散漫其中领受那种雾山清流的欲念，却是王松笔下的山水。形成这种阅读情感，也许与我印象里的终南山、商山、丹江、金丝峡等有关，我几次进过秦岭，也有幸领略金丝峡谷的原生态景观，还有不无惊险的丹江漂流，当我在王松的画作里重温那些天然景象时，却是一种升华和幻化的感觉，只有达到一种美的艺境，才可能对受众发生如此的感受。再，画秦岭画商山画黄土高原画丹江的人不少，画作也各呈其艺术景象，而王松的画作能让受众的我发生进入的欲念，至关重要的一点，我猜想在于他是秦岭山中的子民，生于斯，长于斯，幼小的心灵在无意识的情状里接受着青山绿水的滋润（且不说陶冶），那种独有的情感、独有的体验，是区别于外来的写生者的，自然是得天独厚的；在他成为画家展示家门周边的山水时，那种独有的情感和体验，便洇入笔下的墨痕和色彩之中了，这是非技法所能实现的艺术潜质，才会让如我一类受众

发生一种想进入其中的亲近亲和的感受。读王松的创作自述和程征先生的评说文章，都是专业化的独立见解，颇多启示，作为画外人的我，更不敢妄言了，只能说欣赏感受。

魏杰和我是一墙之隔的邻居，他在墙北的赫赫有名的西安美术学院，我借居墙南的一隅窝居，却没有互相穿墙走动的事。古人说隔行如隔山，此话早已不灵，在传媒几乎铺天盖地无处不染的当今，即使低调如魏杰先生者，在我早已闻得大名，他的治印艺术已在全国闻名，于治印世界更是成就沛然。然而就我的印象，治印在种种艺术门类中，确属冷门。人说写作是寂寞的事，但稍有成就，便声名鹊起；再有杰作出手，声名会传播于市民阶层。治印相对来说就难得相比了，普通民众对治印艺术的兴趣，远不及对一部一篇好小说的普遍。我的感动正在于此。我很难体会的是，一个人捏着几把细小的刻刀，守着大不过手掌小到小拇指指尖的各色治印的石头，奇思异想，刻制出一方又一方汉字的独特风景，这需要怎样的专注精神？这种刀下的艺术景观，很难在公众媒体上展示，他的艺术匠心也很难与民众实现共赏的交流，这需要怎样强大的心理坚守？魏杰已年届五十，依旧在各色石头上实现着创造着自己的艺术景观，在如我这样的业外人想来，似乎难以理解，却也能理解，便是个人兴趣，这是与生俱有的个体兴趣，如同作家对文字发生敏感引发写作兴趣，如同画家对色彩发生敏感引发绘画兴趣，魏杰对石头上的文字发生敏感而引发动手动刀的兴趣，便是自然的事。这样，当他掂起一块石料再动刻刀的时候，便是一种创造的强烈意趣，以及创造理想实现之后的无以表述的幸福感。不仅没有外行人推想的冷寂，而是被一次又一次在各色大小石料上的艺术创造的成功所陶醉，乐在其中是自自然然的事。但愿且相信，魏杰对印石的天然兴趣持久不减，在东方独有的治印艺术里开创出新的艺术景观。

四位都算得才气横溢的艺术家，虽然追求的艺术门类不同，精神操守和人格修养的境界却趋同一致，便是坐卧终南。有这样的精神和人格，可以相信他们在各自的艺术领域，不断攀升和开拓新的艺术境界，把自己的艺术天才发挥到极致，面对终南的坐姿或卧姿，当属最坚实最可靠的人生姿态。

2012年5月12日 二府庄

慢说解读 且释摹写

初看到这部小说散文集的编者所取的书名《陈忠实解读陕西人》，我的第一感觉是不大恰当，在于“陕西人”这个概念太过宽泛，不仅为我的写作能力所不及，而且也不大切合我已经发表过的作品的实际，我的作品尤其是小说，主要写的是关中人，这是顺理成章更是难得违拗的事。我是关中平原边沿白鹿原下灞河川道人，生于斯，长于斯，工作于斯，脚踏的是关中平原的土地，吃的是这方土地生产的苞谷和小麦，打交道的对象自然也是以这个村子、那个村子的关中人为主，对生活的体验也是由他们而发生，或短或长的小说里的各色人物，自然都带有关中平原人的色彩和质地。如果书名取为陈某人解读关中人，似乎更为恰当。

我之所以会发生这种“不恰当”的感觉，更重要的一点，是我对陕西版图上三大板块的差异性解释。以黄土高原和毛乌素沙漠为主体的陕北，历来以半农半畜和完全的畜牧业为乡民的生活形态；关中平原则是我们国家最早的农业开发区域之一；秦岭南边的汉水流域的汉中和安康，却更具南国水乡的风情和民俗了。这三大板块呈现着截然不同的地理风貌，更呈现着截然迥异的乡风民俗，突显着一方地域的人的群体性的气质特征。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一方人便被这一方水土养成了独有的气性风貌，且不细究文化和历史演变的更为重要的影响因素。关中人相异于陕北人，也相异于汉水流域的人，我写的主要是关中乡村的各色人物，笼统说成陕西人，在我就难免发生不踏实亦不恰当的感觉了。

略作筹思，又有了为自己开脱的余地，有一些作品涉及陕北人和陕南人，并非纯一色的关中人，其中一部篇幅较大的中篇小说《四妹子》，其主角四妹子就是陕北人，我把她从陕北嫁到关中乡村的一家农户，就是要展示不同地域文化引发的心理冲突。另有短篇小说《一个人的生命体验》，主要写的是作家柳青。柳青是陕北人，是中国当代卓有建树的作家，也是我崇拜的偶像。我写了他在“大跃进”和“文革”这两个非常时期的两个生活细节，彰显的是作为人民艺术家的精神坚守和道德底线，与我的另一篇短篇小说《李十三推磨》中的堪称伟大的剧作家、关中渭南人李十三是相通的。他们高尚的精神追求和道德人格的坚守，无论面对的是极“左”造成的毁灭性灾难，抑或是封建皇权的威压，都突显出宁折而不弯的品格。这种品格不因地域文化和生活习俗的差异而改变，不仅是陕西人共有的品德，也是这个民族的精神脊梁。如此想来，我便接受了陈某“解读陕西人”这个书名。

这本集子中收编了三篇“三秦人物摹写”的短篇小说，是我意识里异常明确的要面对陕西人的写作。先说三秦这个地理概念，是战国时代雄踞关中的秦国某个国王，把关中平原分为西、中、东三块，封给他的三个儿子统领，便有了三秦。陕西人至今仍习惯把陕西省称作三秦大地，概念已不是秦国时代的区划了，而是指陕北、关中和陕南三大板块，三秦实际已经成为陕西的别称。再说有关“三秦人物摹写”这三篇短篇小说写作时的心态，却是完全不同于以往那些小说的写作。以往的小说，多是对生活的发现和体验而谋思成篇，尽管不无感动的激情，然而，面对笔下的男女人物，却很难发生像面对“三秦人物摹写”里的三个人物时的忐忑不安到惶恐的心态。

这三位是真实的陕西人，更堪称顶天立地铁骨铮铮的三个陕西人，一位是我的灞桥乡党孙蔚如将军，他助杨虎城、张学良发动“西安

事变”，之后率领西北军立马中条山，打出了声威，堵死了倭寇西进的途径，让关中父老免遭日本鬼子的蹂躏。诸多的血战姑且不叙，单是八百关中子弟在被逼到黄河边的绝境时，纷纷从悬崖上跳入黄河，没有一人投降，这种惊天地泣鬼神的惨烈场景，闻之便有屏息闭气的压迫。我在获得这个真实的撼人心跳的细节直到写成《娃的心，娃的胆》，八百抗日壮士跳进黄河的画面一直萦绕于脑际，至今也未消弭。另两位都是文人，一位是陕北籍当代作家柳青，一位是关中籍古典剧作家李十三。且不说他们卓越的艺术创造成就，单是他们面对扭曲人格乃至生命危机时的精神坚守，却一样凛然，也让我发生忐忑不安、心跳加骤久久不能平静的震撼。柳青在“大跃进”年代被逼要放创作“卫星”的声浪里，咬紧牙关对抗着浮夸到疯狂的世风，竟然把自己的手指头抠得鲜血淋漓而浑然不觉得疼痛；李十三这位堪称伟大的剧作家穷困到自己推石磨磨麦子的状态，却被清朝皇帝以“莫须有”的罪名问罪，气得一口又一口鲜血喷吐出来……

面对这三位陕西人，在忐忑不安、心跳加骤久久不能平静的状态里的写作，是一种前所未有的诚惶诚恐的仰视神圣的心态，我想到一个切合这种写作心态的词汇：摹写。摹写是一种在我少有的写作姿态，敬仰、崇拜，唯恐不及，更担心传达不出他们高蹈的精神境界和凛然独立的人格。稍感安慰的是，这几篇摹写我敬仰的陕西人的杰出代表的小说，见诸报刊后引起广泛反响，我不仅没有以往某篇作品得到好评的得意，却是那种忐忑不安到诚惶诚恐的心态得以平复，我的笔墨没有玷污他们精诚的鲜血。

仅就这三篇短篇小说的人物，不属“解读”，是摹写，是敬仰和崇拜情态下的摹写。

其余小说和散文，可以说“解读”。

2012年5月27日 二府庄

不敢妄言经典

闲聊时常听到经典也说到经典这个词儿，阅读中更频繁地遇到过不知多少回，而当何锐先生要我写一篇对于经典的理解的短文时，却感到茫然，关于经典的较为准确的定义，竟说不出所以然来。然而对经典的阅读感觉，却是真实鲜活而且经久不变的，便是那种顶礼膜拜到高山仰止的独特的阅读感受。

仅就短篇小说而言，一些堪称经典的作品，一读便铸成永久性记忆，历久弥新，对我能发生如此影响的短篇小说，在我就视为经典作品了。我首先想到的是都德的《最后一课》，这是我在初级中学语文课本上读到的，距今五十多年过去了，想象哈默尔先生写在黑板上的“法兰西万岁”，以及他用手势向学生表示的“课上完了……去吧”的最后一句话，却在我的记忆里存留至今。且不赘述这篇小说的艺术，也不必在意法国和德国有关这个故事发生地的领土归属的争议，单就一篇很短的短篇小说而言，能对一个中国学生的我发生如此久远的记忆，确不多有。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的中国文艺复兴发生，我在集中阅读一批短篇小说大家的作品时，又想到了这篇《最后一课》，找来读了，更多的是想看看这样少的文字，又是一个毫不起眼的小学教室，且是以一个比我还年幼的小学生（我读此文时是中学生）的视角和感受，却把一个国家沦亡的大悲剧呈现给世界……

还有一个《孔乙己》里的孔乙己，同样是在中学课本上得以见识这位潦倒的乡村旧知识分子的尊容的，同样是一见便不能忘，至今依然惊异鲁迅先生入木三分而又传神的笔墨，令我望尘莫及……前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我集中阅读了契诃夫和莫泊桑的短篇小说，意在以

真正的文学涤除极左的文艺思想对自己的影响。在甚为专注的阅读中，常常忍俊不禁而发出一声“噢呀”的惊叫，或是笑出声来，一个个人物形象活脱脱呈现于眼前，竟然没有异国异族的隔膜……这就是经典，顶礼膜拜到高山仰止的情感便自然地发生了。

《日子》发表已有十多年了，其间被各种短篇小说选本收录过，也被评论家多有提及，在我自然是颇感欣慰的事。然而，何锐先生在他编辑的名为经典短篇小说选本中要收入《日子》，初闻此讯竟有点忐忑，拙作《日子》未必能算得上经典，但作为对经典的一种回应，我又有几分自信。几经思量，《日子》总还算得一篇优秀小说吧，不然不会有多种短篇小说选本都相中它。何锐热心至诚地选编《回应经典》这本短篇小说集，自有他的初衷和标准，《日子》有幸入选，我自然高兴，却依然自我定位为较为优秀之作，且不敢妄言经典。

2012年6月5日 二府庄

横空出世 非同凡响

集中几天时间阅读了冷梦的长篇小说《西榴城》，形成"横空出世、非同凡响"的直接感受。这是少有的阅读感受，即使有个人偏爱可能产生的偏颇，然而却是真实发生的阅读直感，颇为强烈。

所谓横空出世，在于《西榴城》这部长篇小说所体现的思维形态，即关于业已成为过去的历史和正在发生着的现实生活的思维，已不拘泥于生活演进的时序，甚至有意作了模糊化的回避。我猜想冷梦之所以如此，不是巧设迷幻，而是使自己的思维挣脱生活时序和生活真实的羁绊，进入一种既是高蹈又成俯瞰的自由状态。这样，呈现在我眼前的几位主要人物多带有神秘莫测一时难辨其真实面目的神秘色彩，甚至让我一直在阅读过程中都发生着神秘莫测的疑问，这个人为什么这么说、这么做？这个人和那个人到底有着怎样的心理纠结？他们一个个都依各自的心理在西榴城里来来往往，互相纠葛却很难因对方的影响而改变自我。这些人物一言一行都是可知可感的、真实的个性化行为，却总让我同时又有一种扑朔迷离的陌生感；这些人物所生活的时代，似乎让我有切近的熟悉，却又有"不知秦汉"的某种玄虚感；这些人物生活的西榴城，让我猜想到西北的某个古老的具有悠久历史文化的古城，却又产生遥不可及的一方神秘所在。大约是如上所述的这些阅读直感，便看到冷梦凌空俯视西榴城里芸芸众生的理性而又冷峻的眼光，也就造成《西榴城》横空出世非同凡响的艺术景观。

小说《西榴城》的主线事件是一桩历史谜案，即涉及一百二十名游击队员生死的一罐银元，错综复杂，纠葛近半个世纪而难得揭破真相。为节省笔墨，恕我不再赘述其情节。约略说来，这桩太过残酷的

历史冤案，牵涉两组或者说三个家族两代人的命运；从横的方面看，是社会与家族构成的一方颇为特殊的网络。这些人物从纵的层面到横的层面演绎到最后，形成一种令我震惊到齿冷的丑陋险恶的人性之一面，我才意识到冷梦的着力点，在于人性的审视。冷梦展示的错综复杂的情节，不无扑朔迷离的人物行踪，其实都是构成人性险恶的遮蔽的物象。这些遮蔽的物象之所以难得揭开，既有社会在某个时段的客观因素，更在于作恶的丑类挖空心思到无所不用其极的掩饰手段，使这宗冤案曲折迷离，不仅使原来涉及的受冤者不能鸣冤，而且波及他的家族同胞和后来的人。这样的惨剧，更见出人性的恶，让我不由得产生后脊背冰冷的不堪承受的感觉。关于人性这个话题已不新鲜，而能演绎到如此深刻的程度，可以见出《西榴城》作者冷梦独到的思考，也使小说呈现出大手笔的风貌。

和这种人性恶相对应的是人性善。《西榴城》里的人性善和人性美，尽管其人物的行为多有扑朔迷离的色调，甚至不无“怪异”的细节，却是一种坚贞不渝到圣洁的程度。这种人性的善和美，是以一个家族两代人的命运展现出来的，有默默忍受的几乎望不到头的屈辱，不止一人的生命代价，是一个家族两代十几口人，都为着人性善和人性美的坚守。其精神之光让我感到生活的希望。

《西榴城》演绎着人性善与人性恶、人性美与人性丑，在很长的时空里，恶和丑不仅残害着善与美，而且在弥天谎话即将漏底之际，所谓的“丑类”不仅没有反省和忏悔，而且毫无人性地置自己的父亲于死地。这是小说最后的令我心颤的一个情节。作为法官的陈虹刚到牢房去找甫和民，甫和民知道陈虹刚是自己的儿子，陈虹刚也知道甫和民是自己的生父。陈虹刚不仅硬着嘴黑着心不承认生父甫和民，而且明知这是一桩历史冤案，仍然不顾法理要置甫和民于死地。这里发生

的甫、陈两人面对面的交锋，把人性善和人性恶展示到令我不堪承受的残酷。这桩历史冤案的制造者陈济时绝不可能忏悔，在我可以理解，即他致一百二十名游击队员死亡的罪孽当属死有余辜，他是承受不起的，且不说身败名裂的后果。我更寒心的是陈济时的儿子陈虹刚，他已经是堂堂的法官，他已经知道养父陈济时的深重罪孽；他和养父同在一处不期而遇，面对同一个淫乱对象竟能化解尴尬；他已知道生父是甫和民，竟然要把养父制造的冤案办成铁案，要让生父甫和民冤死在他的枪口之下……这个作为第二代的年轻人的心、这个已经发生了精神变异的陈虹刚，我已难以判断其黑的程度、冷酷的程度了。

初读《西榴城》，我还一时不能适应其叙述方式，觉得冷梦怎么也魔幻起来了。到读完作品，才意识到写这样的题材和这样的人物，这是艺术探索上最好的选择，让我感觉着荒诞的同时，又感受到生活真实的逼真。冷梦把荒诞建立在生活真实的基础之上，更在于对人物精神、人物思想、人物情感的准确透析和把握，这是《西榴城》给我造成阅读冲击的艺术效果。冷梦荒诞或魔幻了一回，竟不留生硬的痕迹。

在我的印象里，冷梦多年以来一直写着纪实文学，已出版过《黄河大移民》《高西沟调查》《百战将星·肖永银》等长篇报告文学，且获得过鲁迅文学奖。她已探索长篇小说的创作，《天国葬礼》和《特别谍案》也有不俗的反响。《西榴城》是第三部长篇小说，不仅与前两部小说在艺术品相上展现出很大的陌生感，而且与之前纪实文学的一事一人，乃至一句话的严密严谨更不可比对了。我便看到作为作家的冷梦的变化，变化里显示着的探索精神，也显示着艺术创造的活力。

2012年9月4日 二府庄

独立个性的声音

阅读《困惑与催生——雷涛文学演讲录》，明显区别于小说、散文的欣赏性阅读，而是一种聆听，听一个人说话，说他对文学的见解，说他对发展陕西文学的意见，说他对一些作家和作品的看法，还有对某些泛文化话题的见解，也涉及对正在发生的生活世象直言不讳的点评。我之所以产生聆听式的阅读这种生动感，不单是其中的一些演讲发表时，我本身就是现场的受众之一，重读这些演讲内容，便有一种曾经的映像再现的生动；更重要的一点，是这些演讲文稿的个性化特质，不是素常见惯也听惯了的某些报告或讲话，多是公共话语，不署名便很难辨别是谁讲的。

雷涛的演讲稿能让我感知到明显的个性化特质，直观的首先是演讲的话语，往往是直入话题，切中内里，既有理论阐释，又依事实为据，显示着客观、理性而又科学的语言力度，少有司空见惯的大话套话，便形成生动的个性话语。在我看来，这不单是讲话习惯或者说是讲话风格，更内在的基本因素是对文学创作的理解，既符合文学创作的普遍规律，又有自己的独立见解，讲话才有一种自信，独成一景的话语风格便是自然的了。十年前在“文学管理体制的创新”座谈会上的录音稿《文学的困惑与催生》，对“十七年”陕西文学和新时期陕西文学的估量，不仅客观亦切中实际，而且从整个中国文学的平台所做的评述是热情却又理性，令人信服。单从这一点来说，对陕西文学准确的把脉和深层的了解、理解，作为一个省的文学事业的领导者来说，难能可贵。

在这篇演讲稿中，对陕西文学面临的问题和形成这些问题的归因分析，也是切中实际的，是“市场经济的发展，对文学提出了新的要求”。在市场经济这种大的社会背景里，“出现了文学作品内涵上的‘三多三少’……”对陕西作家队伍群体的不足，即知识构成的缺陷和缺失，观念的陈旧和思维方式的滞后，都是制约作家发生独特体验和艺术创造活力的致命性障碍。由于把脉准确，对进一步发展和繁荣陕西文学所提的思路和举措，是积极而富于创见的，诸如在作家不断强化知识结构的同时，更强调作家要“具备高尚的人格、健康的情感，才能写出好的作品”。在我理解，作家的人格和情感，不单是自身修养的事，而是影响作家生活体验以至生命体验的敏感和体验的质地，这是容易被忽视却不可忽视的至为重要的一点。另，面对开放的中国社会，面对刚刚兴起的市场经济掀起的汹涌的商潮对各项社会事业的冲击和影响，文学事业和作家的发展不可能循着老路旧规亦步亦趋，雷涛敏锐而清晰地看到创新的使命，及时提出适应性的举措，既切合文学的规律，也是寻找在新的社会背景下文学发展的更富活力的途径，新的观念和锐意进取的思维，彰显着一种活力。其中对于文学新人创作发展的举措，由“养”到“签约”的更富激励效应的新机制的创立，是富于创造性的思维，也为后来文学新人的涌现和优秀作品的迭出不穷所体现。

在这部演讲录中，我多处看到他对作家思想的强调，尤其是在培华学院的演讲稿里直言不讳地说：“作品的平庸是作家思想的平庸。”我对此观点不仅信服，而且颇多感触。大约在上世纪八十到九十年代思想解放最活跃的时期，关于文学创作的各种思潮一波迭过一波，其中有一种不大也不小的言说，作家创作不要政治，也就可以不要思想。无须赘论此说的偏颇，在于早被业已形成的共识所纠正，即作家

的思想对于创作的发展具有决定性意义。让我感佩的是在那样的思潮里或余波中，雷涛如此清醒，没有丝毫游移。

在这部演讲稿里，我能充分感知一个人对文学事业的热心热情以至倾情，对作家的佳作所生发的由衷的喜悦，可以说溢于言而显于情。在签约作家新闻发布会上的演讲，对于一种更富活力的新的体制开始运作的欣然和自信，不仅让我感知到探索作家协会体制改革的勇气，更让我感受到一种倾情于文学事业的诗性激情。对于一个省的文学事业的领导者来说，这是难得的感情投向；对文学的喜爱到倾情投入，这是区别于一般的文学官员的领导职能的，我之所以说“难得”，之所以看重这一点，就是有感于此。

这种诗性的倾情，也表现在对本省作家有优秀作品问世的诸多事例上，仅说他对吴克敬小说《状元羊》的令人感动的非常举动。且不赘述他对这部小说的赞赏之词，令我感动到惊奇的是，他难以抑止阅读的兴奋和欣喜，竟然于三更半夜“急切地拨通了吴克敬的电话（读完小说是深夜二时），向他表达了我当时的心情和对作品的最初印象”。对一部佳作达到如此类近狂喜的情态，足以见得倾情。这里似乎不完全属于领导对属下创作的关切，更生动着作家与作家的朋友情谊。再，雷涛对《状元羊》的阅读感受，没有受到别人评说的影响，纯粹属于个人的阅读直感，可见欣赏视角之独特和不俗，并且为《状元羊》后来获得的广泛好评以至荣获鲁迅文学奖所验证……难得在倾情，可贵在倾情。再如，陕西女性作家作品丛书的出版和首届陕西女作家创作研讨会的召开，是他在一次小范围的闲聊中发现的命题，即应该加强对陕西女性作家创作情状的关注和创作成就的张扬，且随之形成切实的举措，也显示着对陕西文学另半边天的倾情。

这种倾情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对作家的理解。不仅是对作家创作劳动、创作追求、创作状态的理解，而且体察到作家的生活方式乃至个人的情感世界，他对路遥写作和患病期间的一些细节的钩沉，至今读来仍令我有不由自主的感动。

阅读这部演讲稿，让我充分感知一个人的个性化声音、个性化表述。

一种坦率。没有含糊，没有模棱两可，没有回避，直诉己见，观点和审美意向直接端出，这是我在《文化的认同与存异——在中韩文学交流会上》演讲中的甚为强烈的感知。

一种直白。对王浩然的人生姿态的礼赞，是由衷的，也是直白的。对王浩然的纯洁高尚的精神礼赞，彰显着礼赞者本身的道德崇尚，不见忸怩，不见虚词，直白既是对真知的最好表述，也是个人情怀的坦诚宣示。

一种操守。“最重要的就在做人要以德行为先，这是立身的基础，也是事业有成的先决条件。”演讲者由对葛炎的道德和作风的由衷钦佩，引发出如上至理真话，也是自我立身的基础。于当今颇显纷繁的生活世象里，能发出如此唯一不二的郑重宣示，也令作为读者的我钦佩。

2012年11月12日 二府庄

借助一双敏锐的眼睛

阅读这部英伦三岛游记的书稿，初读不久便发生甚为浓厚的阅读兴趣，不单是我未去过英国自然会有新鲜乃至新奇的感觉，更重要的因由是我在文字里发现了一双敏锐的眼睛。这是一双刚刚由少年跨入成年人的眼睛，尚未脱尽稚气和天真，却更显现着尤为敏锐的眼睛。

这双敏锐的眼睛所观察到的一个陌生国家生活世象的细微细密，似乎不是刻意为之，更显示着一种天生的敏感，不经意间便能捕捉到一般人常常容易粗略疏忽的细节。她在苏格兰风笛表演的围观人群中，发现并记录下“原本很矜持的行人，都会脚随着节奏左右摆动”。捕捉到受众的这种无意识的肢体动作，足以让读者感知其沉迷的心理状态，也让读者能感知风笛这种民间表演的独特魅力。这双敏锐的眼睛每触及异国异地的自然景色，都有新鲜的发现，且有独特的感受。随意举出作者对北桥的月亮的观感，便是只有在北桥才会出现的不同于别一方地域的月色，而且“有了月色的韵律”。能感受到“月色的韵律”，可以见得这双眼睛的敏锐不单是天然的生理机能，而是一种心灵感知。

这双敏锐的眼睛所触及的英伦三岛的自然景色，社会风情，诉诸文字，让我有如身临其境的逼真和生动，得益于不作夸张的描绘，尤注重准确，一种细微到丝丝缕缕的准确描写，状景就逼真生动了。不仅让我感知到作者质朴的文风，更见出笔头不俗的文字功力。作者对“原本也没有太多特色的小镇”温德米尔的状写，却让读者的我感知到独特的特色：“已经长满了花苞的藤条顺着矮墙散落开来，露出石砖上的青苔……点点初绽的花朵将藤条装饰得春意盎然。”作为一个游人，

对异地小镇上的石墙上的青苔也能揽入文字，可见那双眼睛的敏锐，又见出栩栩如生的景观，文字准确的表述得心应手。作者写人，也是文字出彩，看似并非刻意为之，却更显见其文字功力。且看作者对一家庭旅馆店主的描写：“稀拉的白发搭了下来，弯弯的鼻子，稀落的牙齿，裹在松垮袍子里的干瘪身躯……”“看起来很像是英国文学里的女巫”。读到这里，即使作者不说“像是英国文学里的女巫”，我已经看见一个活灵活现的女巫了。我颇感佩的是，作者几笔简约的文字，有如速写画家手中的铅笔勾勒的线条，把一个女巫似的英国老太婆的肖像活脱脱地跃然纸上。我随意举出这两小段文字，一是状物写景，一是写人，文字简约而准确，效应是逼真也生动，让我有如身临其境的感觉。其实，这本游记通篇都是这种文风，我说的不俗的文字功力，是这种文字阅读的突出的直感。

在这本游记中，多处读到作者对社会世象的议论，对人生诸多话题的态度，对常见的和刚刚出现的生活现象的思考，都有毫不含糊的自我判断，也都有明确的价值取向，没有人云亦云，没有虚词朦胧，而是简捷明快地直抒己见。这些见解让我看到一个富于独立思想的青年，也就有了个性化的光彩。关于追求幸福这个极为普遍的生活话题，作者议论说：“追求别人眼中的幸福，很难说是不是对自己的否定，否定自己的梦想，否定自己的能力，否定自己的情绪，否定自己的选择，最后否定了自己的人生。”读着这样的文字，我感知到的是作者对自己梦想的坚定不移的追求，对自己能力的自信，对自己情绪的守护，对自己选择的人生道路确信不疑。归结一点，即追求属于自己的人生。可以想见这种自己的人生，是绝不随波逐流的独立的人生，每一步都要也都会踏出自己声响的人生。在作者刚刚从少年进入青年这样的人生区段，能有如此明朗的关于人生的宣示，已经是颇见独立思维更见独立个性的声音了。其实，由关于人生话题的延伸，作者已

经正面做出了人生的坚定选择：“一直都有两种人的存在，挑战生活的和顺应生活的；结果无非也就是三种，生活的主人、奴隶和背弃者。选择顺应生活也就注定了其成功是做高等级的奴隶，而挑战生活的风险却很难估量，主人和背弃者也就一念之间。”读着这些颇富人生哲理的文字，我感知到一种严峻的警示意味。如果不了解作者，很容易想到这是阅历丰富的人的人生体验的归结。然而，我知道作者是涉世未深的小青年，能有如此深刻的关于人生的议论，就让我在惊诧之际，意识到她的思想的力度了。

这本英国游记的阅读，让我感知到作者颇为丰厚乃至渊博的知识储备。作者进入英伦三岛的许多偏远之地，在备细录记一景一物的同时，如数家珍地插叙这方地域的历史渊源，宗教习俗，及至别具一格的民间传说，等等。我以常理推想，作者不仅读书多，而且善于在民间捕获知识。作者走到爱丁堡，对这座古城的历史，曾经发生过的重大事件，都在现实景观的描写中予以插叙，圣十字架修道院的传说，让人感知到神秘的同时，也联想到中国不乏类似的传说。另如爱尔兰的“巨人之路”的神奇传说，作者叙述了这个传说之后，再以专业的知识解释“‘巨人之路’是由火山熔岩的多次溢出结晶而成”，显示着知识的宽泛。作者到北威尔士的卡那封城，对这座城市历史渊源的简略叙写，勾勒出一座古城延续至今的重大事变的脉络，传奇的却是真实的。散漫于这本游记中的英国各地的历史、现实和传说，让我感知到作者知识渊博的同时，也理解记叙文字游刃有余的成因。

这部游记的书稿里涉及许多流行话语，作者都阐述了自己的见解。诸如：活着的意义，有关成功与失败尤其是失败，关于自由，关于女性资本，等等。这些话题几乎是人人都回避不去的普遍性话题，而面对这些话题的人生姿态，却呈现着各各不同乃至相去甚远的差

别，也就呈现着让小说家挖掘不尽的众生相。作者面对这些话题，不仅没有回避，而且是直接辩证。她所申辩的看法和观点，我信，也赞同。

读这部英国游记，借助一双敏锐的眼睛，仿佛走了一趟英国，甚至比我亲身前往看到的景致还要丰富。这不是虚词，是真实的阅读感受，我自知既没有如作者那样敏锐的眼睛，也没有对英伦三岛的常识性了解……尤为感慨的是，看到了一个独立个性的青年。

2012年11月23日夜 咸宁

记忆抒雁

春节期间难免懈怠慵惰，正月初五早晨又比往常起床晚了。待坐下来打开手机，便看到北京一位文学朋友发来的短信，告知雷抒雁在当日一时三十一分去世的噩耗，我失声呼出一声“抒雁啊……”顿然陷入一种意料不及的重创后的失语状态，脑子里一片空白。

随后就有一位熟悉的记者打电话来询问我对抒雁去世的感想，我脱口而出：“一个伟大诗人谢世了！”惋惜和伤痛的话语且不赘述。之后稍微沉静下来，我便想到刚刚说过的“伟大诗人”于抒雁会不会过誉？却也很快释然，这是我的感知和理解，应该容得哪怕是“一家之言”。第二天早晨，我看到《西安晚报》文化版通栏黑体大字的标题：中国当代一位伟大的诗人走了。顿时感到心被重重地撞击，看来不是我的偏爱，因为问询我的那位记者供职的是另一家媒体，这是北京和西安几位文学界人士共同的慨叹之声！

其实，对雷抒雁“伟大诗人”的印象，始于三十多年前的一九七九年。准确地说，是在《光明日报》读到长诗《小草在歌唱》时，“伟大诗人”这个超乎寻常的概念就在我脑中萌生了。我那时候刚刚从基层农村调动到西安郊区文化馆，刚刚写了几篇短篇小说，尤为关注刚刚潮起的新时期文学的发展脉动，也更敏感于思想解放以及必然发生的对祸害国家和民众的极左思想的批判和清算。在这一决定着国家和民族未来命运的时代背景里，猛乍读到《小草在歌唱》这样令人振聋发聩的风暴般的诗句，便有“伟大诗人”的慨叹自心底涌出。在《小草在歌唱》的阅读中，我感知到诗人雷抒雁强大而深邃的思想力度，唯此才能对张志新精神品格深刻感知，进而升华，才会产生如此真诚的景

仰、如此真切的惋惜，才会发出强烈而富于力度的对极左思潮进行批判的“雷声”。由此，引发社会各个层面的人的共鸣便是必然而自然的效应了。以这种强大深邃的思想审视社会的同时，雷抒雁对自我的审视是清醒而又严厉的，这种自审意识让我感觉到羞愧，说痛彻心脾也不过分。面对张志新，雷抒雁坦率地喊出：“我恨我自己，竟睡得那样死，像喝过魔鬼的迷魂汤，让辚辚囚车，碾过我僵死的心脏！我是军人，却不能挺身而出……我惭愧我自己，我是共产党员，却不如小草，让她的血液流进脉管，日里夜里，不停歌唱……”我也喝过极左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迷魂汤，而且写过几篇图解这种迷魂汤理论的小说。读到《小草在歌唱》的时候，我也正处于自我反思的情境中，说羞愧到痛彻心脾确是当时的真实心态。我后来把这种自我反思称作“剥离”——不仅是对极左的文艺理论的剥离，更是思想的弃敝图真的剥离。抒雁自我审视的精神，强化了我的精神、思想和心灵剥离的力度，还有审视昨天“喝迷魂汤”的勇气……《小草在歌唱》和伟大诗人雷抒雁便铸成了我永久的记忆，尽管我尚不认识这位乡党。

虽然尚未和这位乡党谋面，他的名字却早在距今五十年前被我记住了。那是上世纪六十年代初，高考落榜的我回到白鹿原北坡根下的那个小村庄，在一所初级小学当民办教师，正热衷着业余文学写作，不惜破费订阅了陕西作家协会主办的文学刊物《延河》。记不清是哪一年的哪一期《延河》杂志上，刊登着一篇小篇幅的报告文学《槽头春秋》，两位署名作者之一是我高中的一位同学，另一位就是雷抒雁。看到那位和我同读三年颇为熟悉的同学的名字，我的情绪竟有点波动，愈发为没能挤进大学门坎而懊丧。从文章或是附记中得知，雷抒雁和我这位同学同在西北大学中文系读书，一起到礼泉县一个全国挂名的先进生产大队去采访，写了一位忠于职守爱社如家的饲养员的优秀事迹。且不说《槽头春秋》写得如何，我懊丧的情绪，源于对他

们能接受大学系统的文学教育的欣羡。我最清楚不过的事实是，一九六二年是三年困难时期的代表性年份，许多在校的大学生至少放一年长假回家谋生去了，那年高考招生的指标一缩再缩，少到一个空前绝后的量。这一年能考上大学的学生，不说千里挑一也肯定是百里挑一，非得是勤苦攻读又兼着天资聪颖的“人尖儿”。我的同学，以及和他同进西北大学中文系的雷抒雁无疑都是佼佼的“人尖儿”……我后来读到评说雷抒雁诗歌成就兼及他创作道路的文章，涉及他在中学和大学读书时就发表过诗作，无疑属少年天才诗人等等，却没有人提及他写的报告文学《槽头春秋》。而我正是在读《槽》文时记住了颇富诗意的抒雁这个名字。直到十余年后再读《小草在歌唱》的时候，顿时想到，歌唱着小草的雷抒雁已经是一棵令人瞩目的大树了，“伟大诗人”的感慨便自然产生了，便有结识这位乡党的欲念。

我已记不清是在哪年哪月，在什么环境里和这位乡党雷抒雁握手结识的。许多年来，没有过纯粹个人的你来我往，多是中国作协开会时才有谋面的机缘。大约是他在鲁迅文学院主持工作不久，曾邀我和他的学员作过一次关于小说写作的对话和交流。那个时期，他身负其责，又很敬业，忙于鲁迅文学院的种种改革，很少有机会回到他的故乡关中来。大约在他年过花甲卸下鲁迅文学院常务副院长的挑担之后，回乡的机会才一年比一年频繁，我和他接触见面的机缘也就多了。

说不清是哪年哪个季节，也说不准是白天或是夜晚，手机里突然发出“我是抒雁”那个再熟悉不过的声音，我当即兴奋起来。他说他回到了西安，约我谝谝（聊天）。我当即和他约定时间和地点，便漫无边际地谝起来了。没有什么正经事，均为触景生情的东拉西扯。无论触及什么话题，他都有非同一般的独特言说，常常令我一愣一乍地觉

得新奇。他说到某些社会病相，一般不用理论辨析，多是用关中民间那些传承不知多少年的乡俗俚语，把病相的虚妄一戳见底，令我感到轻松。也免不了涉及当时文坛的某些话题，同样如此。我享受着一个人的睿智和独特话语的魅力。我往往尽量少说，以便多听他的连珠妙语，或者引出话题，再听他的意料不及的评说。记不清前两三年在哪种报纸上读到他的一篇散文，是写他的家乡泾阳县的乡风民俗，我读得很有兴趣，在于那里的民间生活花絮和我生活的西安东郊的乡村少有差异，在他的文字里能感受到一种美好的乡土情结。其中有一个细节，他说关中无螃蟹，我忍不住笑了。待他又回西安电话召我去谝谝的时候，我便揭他的“官僚”错觉。我说，你应该说你们泾阳县无螃蟹，不可扩大到关中，我的家乡灞河里不仅有螃蟹，还有草虾、鱼和鳖等，只是当地人从来不吃这些东西。倒是在三年困难时期我读高中时，一位四川籍老师刚入学的儿子，从学校后门外灞河边的稻田里抓鱼捉鳖还有螃蟹，在他家房门外的火炉上烧烤，引得我们这些北方学生惊讶不已，这是我平生第一次看见人吃螃蟹。抒雁听罢哈哈一笑，大约默认了他的“官僚”……他和我谝闲话的时候，满口地道的关中话，偶尔会漏出一句两句带着关中腔儿的普通话，随即又改换成关中话，而且自我解嘲似的说，还是说咱的关中话解馋。随即引发出对关中方言土语中诸多词句的见解，说它们不仅不土，而且在古文史籍中都可以找到出处，比如关中人把“吃”说“咥”，吃了一顿好饭常说咥了一顿好饭。古文中也多处都有“咥”字，恕不赘述。由此，他提出应有一部考证关中方言的专著。我当即告诉他，我已见到过三种不同版本的关中方言研究的著作，并应诺为他寄去。匆促间我忽略了这个承诺，不料他竟走了，我便有了无法弥补的自责。

前年他回到西安，电话召我谝谝。闲谝间我提出让他到白鹿原上的民办大学思源学院为中文系学生作报告，他欣然应允。在西安诸多

事项的间隙，有一个下午的空档，不料正是这个时间，正好与思源学院所设的白鹿书院的年会相冲突，我就失去了聆听他报告的机会。我接他上原作报告，报告完毕想请他吃白鹿原地道的农家风味的饭，他却早已另有安排，只好送他下原去做他的事。过后我打问了他为中文系学生报告的内容，约略读到三大要点：当前诗歌创作的现状总体呈现繁荣，却也隐存两类毛病，一是大而空，二是小而细；再，关于古典诗歌的学习；第三点说到人民性和时代气息应是诗歌不可缺失的主调。主持这场报告会的先生给我说，整个演讲过程，生动幽默，会场气氛热烈，多次掌声……

雁过留声。雷抒雁这只雁留给中国当代文学的不是庸常的声响，而是新时期文学的洪钟大吕之声。我尤为庆幸的是，他的声音也留在白鹿原上，留在了原上莘莘学子的心中。

2013年3月28日 二府庄

因为感动作后记

在我电话询问李娜如何送交这部集子的稿样时，她回应说她来取，当即就来。令我颇感意外的是，她和西安出版社社长张军孝一起来了，我感到不安。这么一部拙作集子的书稿，竟劳顿社长亲自跑路，不安的心绪里自然多有感动。交代了这部集子的相关事宜之后，便把一厚摞剪贴的稿样交给李娜，并由衷地表示歉意。在当今电脑化时代里，电子文本是最快捷的处理书稿的普及了的手段，我仍然只能靠剪贴稿样这一种自嘲为半坡人时代的原始方式，肯定给编辑增添了再处理为电子文本的麻烦。交稿了，也抱歉了，突然又想起一件事，这部集子还要写一篇后记，容待随后交稿。

自己主动想为一本书写后记一类文字的举动，有违我许久以来的习惯。我出过不少集子，极少有自序和后记的写作，约略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出版平生第一部小说集《乡村》时，曾经有按捺不住的兴奋，无论如何，我竟然有一本书行之于世了，兴奋之中写了一篇后记，却也不足千字。后来再出版的小说集或散文集，便没有写自序或后记的打算，除非是某家出版社相约出版几位、十几位作家的系列书籍，规定每位入选者必须写一篇自序，我不能破统一的体例，便自序短文。我之所以不写自序和后记，在于一种也许不无偏颇的成见，无论小说、散文或随笔，作者要表述的意思已经在文字中尽情展示了，相信读者会有自己的阅读感知，作者便没有多此一举的言说了。这次想写后记，同样不涉及集子里的内容，而在令我颇为感动亦感慨的一点情感因素，略作赘记。

大约是去年冬天一次朋友聚会时，西安出版社社长张军孝送给每人一部方英文的散文随笔集《情人夜宴》，这是经他的手精心包装的一本书。书中的少数篇章，我曾在最初发表的报刊上读过，对于英文别具一格、天然幽默的文字我有一种欣赏的兴致和享受，尤其是他的那些“不循常规”的思路，让我有一种惊诧的欣然。有《情人夜宴》集子，便可以从多重视角领略方先生的奇思妙想了。张军孝告诉我，他已连续出版了陕西十余位作家的书，也想为我出一本。在我尚未来得及回答的时候，他又补说一句：我明年就到站了，退休之前能给你出一本书……他的话尚未说完，我当即应诺，手头正有一堆书稿，可以编一本集子……便一言为定了。此前曾有外地出版社相约，仅有口头承诺，尚未有出版合同的制约，我便断然决定交给张军孝出版了。这点小纠结，我没说给他。

我是被他即将到站的话感动了，说震也不算夸张。一个把自己的智慧和精力投入到被人常说的“为别人做嫁衣”的编辑出版事业上的人，忙忙碌碌紧紧张张干了大半生，在即将进入花甲之年，也将从编辑座椅上告退的时候，依旧在为陕西诸位作家编书出书，而且还未忘记我。说来我和张军孝结识多年，不仅谈不上过从甚密，倒是疏于谋面，仅就他在即将到站之前依旧为作家朋友热情出书的举动，也让我感知到一个人的襟怀，且不说敬业以及事业心的话。依我的惯常心理而言，许多即将离退的人，多是考虑下一步怎么走的纠结事儿，也难免离开实际工作岗位的空虚和失落。军孝却依旧做他想做的事，这种坦然的情怀显得自然而本色，让我于感动的同时，也顿生钦敬了。

说到西安出版社，我又想起一桩往事，那是整整二十年前的一九九三年，《白鹿原》刚刚面世不久，有一男一女走进我的办公室，男的自报为我的灞桥乡党，在西安市委宣传部工作，大名晏朝。容不得

我和他拉乡党的家乡话，晏朝便直接说明来意，拟为我出版两本书。一为短篇小说集，一为中篇小说集。我当即表示同意。之后，我才说出他们的顾虑，怕我眼头高瞅不中一个新挂牌的市级出版社。我说你想过头了，给我出书是我的荣幸，况且，以我的名字命名出书，在我之前的出版物中尚未发生过，多少迎合了我的隐存的虚荣心理……大约是读者对《白》书的阅读兴趣的余兴，后来又获得某项国家图书奖，我高兴；责任编辑寇崇珧打电话时的情绪也让我感到他比我还兴奋。这是我和西安出版社第一次合作，双方都很愉快。

现在，我又一次和西安出版社牵手了，是社长张军孝的真诚而又热情的手。我对他和李娜简要说明，这是二〇〇〇年至二〇一二年期间所写的散文、散笔和言说，属第一次合集出书。因为内容庞杂，一时尚难定下书名，初拟以其中一篇散文《白墙无字》作书名，征求他们意见。军孝略作筹思，便予以肯定，于是就确定下来。

在我写这篇后记时，颇感人生匆促，不觉间二十年过去，但就我在西安出版社的两次出书而言，几位热心编辑先后退休，寇崇珧退休多年，乡党晏朝也从省委宣传部退居人大任职，张军孝即将退休，且不能说那些未能结识的编辑。我自然想到，一拨又一拨为别人做嫁衣的男女编辑，成就了多少作家，也撑起了一家影响日渐声隆的出版社的门脸，其智慧和心血尽都洇浸在无以数计的书籍的墨香里。但愿这本拙作《白墙无字》，能成为我和张军孝的友谊之桥。

2013年4月16日 二府庄

难得热诚，更难得慧眼

——《谷溪序文集》序

接到谷溪寄来的五本《谷溪序文集》文稿，我着实出乎意外，且不说吃惊。在我铸定的印象里，这是一位激情昂扬而又独立人格的诗人，即使年过七旬，依然诗潮汹涌诗性情怀不衰的诗人，的确意料不到他竟然写下这么一厚摞序文。我数了一下，七十余篇，序文对象包括小说、散文、诗歌。仅就小说而言，对几位作家的长篇小说作序，也有对几位作家的中、短篇小说集作序，还有对一些单篇中篇小说和短篇小说的评说文章；散文和诗歌部分，有对作家、诗人的散文集、诗歌集的序文，也有对某篇某首散文、诗歌佳作的专论。我约略估计，由他作序的这七十余部（篇、首）的小说、散文和诗歌，少说也有千万余字吧，这是一个很大的阅读量，对于一个诗人来说，肯定要舍弃他的不少诗歌创作时间；更难得的是他写的序文，都是他认真阅读作品的真知灼见，无论一部长篇小说，乃至一首诗歌，他都能切中作品的独特品性，道出作家和诗人的独特体验。这不仅显现着谷溪鉴赏作品的独特品位，我更感佩他阅读的老实和认真，不仅是对序文作品和作者的尊重，也见得他对文学艺术的始终不渝的虔诚和神圣。看了这些序文的写作时间，且不说他在年富力强的年龄区段里写的或长或短的文字，我更感佩的是他近年间的序文写作，一个年过七旬的陕北老汉，依旧在认真地阅读长篇小说和散文、诗歌，依旧激情不减地写作他的阅读感受。从他的序文文字里，处处都可以感知他的思维的敏锐和一如既往的激情，我便不由地感慨自语，这个陕北老汉不见老啊——许多年前，我戏称谷溪“陕北老汉”，他还我以“关中老汉”，到了真正成为老汉的今天，我读谷溪为诸多作家、诗人所写的序文，却

感知到他的思维依然保持着既往如青年时代的活力，那根敏感文字的神经依然敏锐。

阅读谷溪所写的一篇篇序文，领略他对那些小说、散文和诗歌的精到而又坦诚的评说，不仅令我信服，而且诱发起我对那些作品的阅读欲望。与此同时，我甚为强烈地感知到序文著者谷溪对他脚下的那方地域——陕北的情感色彩，这种堪称浓到化解不开的情感，是一种不自觉到自然的流露，浸洇在文字之中。须知这些序文多是写给那些以陕北的历史和现实生活为题材的小说、散文和诗歌，而非谷溪自己直抒对陕北这块大地的情感和体验的散文和诗歌，依旧能让我甚为强烈地感知他对自己足下那方地域的情感。我便想到，但凡涉及陕北这块大地的文字笔墨，无论作者是他的新朋老友，抑或是素不相识的陌生人，都会触发他的情感激情。他为知青作家许复强的长篇小说《情感之恩》所作的序文《深播高原的爱，破土萌发》一文中，叙述了许复强“怀胎十年”或者说“十年磨一剑”的矢志不移的精神写成长篇小说《情感之恩》，也作出精当而又令人信服的评论。然而，让我尤为感动的是他的情感。许复强是一位到陕北插队的北京知青，谷溪曾在延川当过专管北京插队知青工作的专职干部，并不认识在另一个县插队的许复强。直到三十多年后的二〇一一年，谷溪接到“一个陌生的长途电话”，是许复强邀他为刚刚写成的长篇小说《情感之恩》作序。他说：“作为一个年逾古稀的文艺工作者，曾一次又一次地下决心不再写序文之类的文字了……我还有什么托辞的理由呢？我的‘知青情结’驱使我不仅爽快地答应了他的请求，并告诉他正要赴京开会，届时一见。”

我甚为敏感谷溪的“知青情结”，不单是作为“知青专干”和北京插队知青的情感，业已凝结成为一种“情结”，更让我感知到他对陕北的

情感，已经扩展到在陕北经历过风雨的北京知青身上，成为他乡土情结的另一个载体。似乎可以说，但凡与陕北这方地域有关系的人和事，都能触发他那根情系乡土的神经，既是本能的，又是自觉的。

谷溪这种乡土情感，在对诸多陕北籍作家和诗人的作品的序文里随处可以感受得到，他把对这方地域的情感很自然地转化为对陕北作家诗人真诚的关爱和扶助。在给女作家魏常瑛的长篇小说《大山深处》所作的《令人在灵魂深处隐隐作痛的土地》序文里，谷溪由衷地感慨："为什么陕北的后生们强悍耿直，姑娘们漂亮而灵秀？为什么在那赤裸裸的山沟里总弥漫着一种古老而神秘的文化气息……"在他沉浸在陕北山沟里的"古老而神秘的文化气息"里的时候，顿然惊悟："一说陕北，话头就长。"可见陕北在谷溪心中的分量以及迷恋的状态。他对女作家魏常瑛由发现到写这篇序文，竟有二十余年的连续而直接的关注和扶助，最初发现她的一首小诗和一篇散文，由他推荐发表在《榆林日报》和由他主编的《延安文学》上，直到二十年后为她的长篇小说《大山深处》作序，就把一个痴情文学的陕北女子导引为可以自由挥洒笔墨的作家，他对《大山深处》的成功面世，对其艺术创作的独特魅力的点评，似乎比自己某篇作品的出手更欢欣鼓舞。

在对兰一斐的中篇小说《龙冢》的点评里，由这部中篇小说题材所涉及陕北大地历史渊源这个独特视角的诱发，谷溪便以诗人的敏感由衷抒怀："山穷水瘦的陕北高原古老神秘，充盈着浩瀚的沧桑感和原始的韵致，每每使人感动，却又令人难以尽解其中底蕴……"因为《龙冢》成功开掘到"其中底蕴"，它不仅赞赏《龙冢》的"多义性象征的叙述体系""开放性的召唤结构"，也抒发他对这方神秘而又神奇土地的诗性情怀。再如点评王冠的中篇小说《黑衣鼓手》时，对陕北一种源自狼皮做的鼓的传承，鼓手和鼓道的深远的历史文化渊源和精神的揭

示，都使谷溪发生连连赞美和赞叹。在对赵秉宙的小说创作所写的述评里，谈到《黄土冲动》里陕北汉子走西口的生活，我看到谷溪已经不像是在评点一部小说，而是对陕北高原和高原上的人在呐喊……我在文头所说的谷溪对陕北高原有浓到化解不开的情感，是我最直接的阅读感受。

在谷溪序文的阅读中，我的又一种甚为突出的感受，是他对作家和诗人的个性化艺术追求的敏感和推崇。任谁都晓得，艺术都是以独具个性的魅力才呈现其生命力的，个性化的艺术创作本身的含义便是独辟蹊径，即创造。既有对历史和现实生活的独立发现独到理解独特体验，也不可或缺艺术风景的别具一格的新鲜。谷溪不仅深谙此创作规律，而且尤为关注作家和诗人的个性化特质，对他序文的写作对象的个性化艺术的发现和强调，不仅让我看到他对创作的深刻理解，也会使序文写作的对象受到启迪，进而坚定业已呈现的个性化创作的信心和勇气。

《背着爱与亲情去偿还爱》这篇序文，是写给青年作家常胜国的小说集《以生的名义》的一篇评论。他对常胜国的小说逐篇做了点评之后，便发生了“为什么同样的故事，由不同的人讲出来，效果差别甚大”的思考，及至和常胜国交谈时，常胜国道出自己信奉且“常常品味海因里希·伯尔的一句话，‘经过许多磨练，后来才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表达方式。’”在这里，谷溪完全意识到这位青年作家的个性化艺术追求的难能和可贵，便欣然坦言：“我以为‘强烈的个性色彩’不仅是画家的追求，也应该是一个作家的追求……”可见谷溪已经领略到创作的真谛，不仅自己循此创作，也和青年作家形成共识。写到这里，我也颇多感触，我很信服海明威关于自己的创作概括为“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的语录，与谷溪和常胜国信奉的海因里希·伯尔的“找到属于自己的

表达方式”不仅英雄所见略同，连语录的文字都相似。对于散文写作，谷溪同样尤为关注作家的个性化气质，包括语言。他赞赏刘凤珍的散文正是基于这一点：“如果说美学理想是作家美学追求的目标，那么审美情趣则是作家个性化风格的集中展示。”正是在刘凤珍的散文中敏感到“个性化风格”，便涌出洋洋洒洒的欣赏和赞扬的评说文字。仅从他对常胜国的小说和刘凤珍的散文创作的个性化艺术的发现而言，可以看出正是谷溪对作家的深层理解得准确，才显出识才的慧眼，颇令我钦佩敬重。

早已耳闻谷溪关爱文学作者的动人佳话，却只有在读过他的序文集才明白其底里，他不是通常所见的热心热情抑或关照等等，而是对作者作品的理解。理解作品才是对作家的最可贵也最难得的关爱。道理很简单，无论初登文坛的青年作者，抑或痴志不改几十年的中、老年作家，他们最感开心最为欣慰的事，莫过于新作出手便能被一位编辑或朋友理解其中的用心，常会发出“知我者某某也”的酣畅的人生慨叹，较之饥与饱，冷与暖等生活关照相去甚远。无论做《延安文学》主编时长年累月审阅文稿，无论接待各方诗朋文友切磋艺术，及至年过七旬依然为他欣赏到欣喜的长篇小说《情感之恩》作序，便可见得对文学的痴情。痴情表现最为重要的关键一点，便是对作家作品的理解的慧眼和慧心。这是谷溪赢得老少男女文朋诗友称赞的关键，也是难得的一点。

《亮开一个陕北女子的心灵世界》这篇序文，是写给耿永飞仔的小说散文集《恣意盛放》一书的。这是一位八〇后的青年女作家。谷溪对这位在他看来“与生俱来的文学天赋”的作家的作品集逐篇点评，尤其欣赏中篇小说《恣意盛放》，给出了切贴而又非同寻常的评价：“作者在用法律、道德、情操的准则去审视、掂量生命的价值与意义。

更重要的是，作者自觉不自觉地向人类灵魂提出了严正的质疑和拷问。”我推想小说作者耿永飞仔读到这些评说文字，会有一种被理解的欣慰和舒悦。他对名不见经传的青年作者胡同的发现，亦是从他的非同凡响的中篇小说《村政》发生的。面对一位“清癯的陕北后生”送来的几部中篇小说手稿，也面对缺乏资金而难以付印的《延安文学》的困境，他不惜版面（刊物八十页码）头条推出中篇小说《村政》。“《村政》的刊发，在国内一度引起不小的争议和关注，许多读者纷纷打来电话，询问作者情况，索要他的联络地址。评论界人士也很快写来评论文章……”关于这部小说的评论，请读谷溪序文原文，我不再赘述，让我感动的仍是谷溪对《村政》的理解。若要证明谷溪这种理解的准确，是作品面世后的强烈反响；一个地级市的文学刊物的一篇小说能引发全国读者的阅读兴趣和评论家的关注，确非易事。我替青年作家胡同庆幸，他遇到一位能理解其杰作即识货的谷溪，便破土而出了。如果说对胡同的发现是他编辑职责范畴的事，而对张志远作品的敏感和理解却是一个偶然，他到周至楼观台看望一位朋友时，朋友说到当地一位“酷爱写作的人”张志远，晚上便热心地翻阅张志远的小说稿，“虽然有些地方显得粗糙，可是取材新颖，构思奇巧，字里行间喷发着一种惊人的力量。有一股匪气、霸气和山野之气，扑面而来……”这是他初读的印象，可以说是独具慧眼独特感知的印象，由此而断定，“他是一块急待打磨、抛光的玉”。谷溪便用心着力“打磨抛光”张志远这块内蕴文学创作天赋的玉，一年后推出他的短篇小说《塔里木叔叔》，成为他叩开文学之门的第一块敲门砖，之后便有中篇小说短篇小说不断出手，这块玉就亮出其独有的光彩和魅力了。谷溪对高安侠散文集《弱水三千》所写的序文《弱水心中流》，本身就是一篇动人的散文。谷溪对一位获得生命体验的作者的散文佳作的领会与感动，形成倾泻般的激情文字，既是对一位创作者的才华的赞赏，更在为难能进入深层的生命体验的散文佳作的面世而倾洒激情的文字。其

实，谷溪这种沉迷的阅读在多篇序文和编稿手记的短文中都有流露，那种对作品理解和赏识的文字行间，让我时时都能看到一双智慧的文学眼睛。

读谷溪所写的序文，我不仅有如上几点感想，竟而发生感动，这是少有的乃至仅有的阅读现象。被一篇小说、散文或一首诗感动是常有的事，而被评说作品的序文感动，却也难得发生。况且，在人们通常的印象和意识里，序文多是连篇累牍的溢美文字，读者甚至宁可读原文而避开序文，使序文丧失了公信力。谷溪的序文不仅让人深信不疑，而且让我发生陷入性的阅读，这其中的魅力不单是诗性文字，更是他的真诚。他对作家个性化艺术气质的敏感和对作品的深刻而独到的理解，也异常鲜明地呈现出序文作者谷溪的独特禀赋，序文的个性化文采就令我进入沉迷性阅读了。

为作家朋友的新作写序，我也写过多回。而为一部序文集写序，在我却是唯一的一次。这篇序文之序，举例多涉及谷溪序文中提到的小说和散文，而未涉及诗人和诗歌，留一点遗憾，其实在谷溪的序文中都是相通的。

2013年5月5日 二府庄

新时期最具影响力的文学评论家——雷达

雷达是新时期最具影响力的文学评论家之一，他的文学评论影响了新时期以来文学创作的发展，成就也已注定。雷达的文学评论能将历史的、文化的和美学的批评熔为一炉，评论风格独特，富有建树，在当代文学评论界和作家中有着广泛而良好的影响。

雷达的文学评论具有独立的批评精神，有宏阔的历史和文化视野，艺术观察敏锐，文本剖析细致，总能切入主题，非常富于激情，文字很有诗性。这就是他的评论，既能获人眼目，又很耐人寻味，尤其会对作家产生启示性效应。

雷达的文学评论有一个特点，就是他的评论不仅仅是谈理论，他还特别注重理论联系实际，特别关注并发掘作家本身的特点和作品的特色。总是力求以真诚的态度面对作家和作品，通过深入细致的作品阅读，揭示作品的思想底蕴和艺术价值，总结作家创作的特点和风格，继而发掘当代文学思潮性的东西，寻找文学创作的规律和一般性特征。由于他的评论与创作密切相关，所以他常常能发现一些真问题，并在对问题的剖析和评论中提出自己独特的见解。这样的评论对作家的创作特别富于启示作用，对当代文学的发展极有促进作用。

雷达是甘肃天水人，自古秦陇一家，他的乡土情结很重，在关注全国文学创作发展态势的同时，也特别关注西部作家和创作，我的小说创作就得到了他的特别关注。《白鹿原》出来不久，他就写了长达接近二万字的文学评论，《废墟上的精魂》发表在一九九三年第六期的《文学评论》上，不仅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至今还是关于《白鹿

原》评论的最为扎实、中肯和最有理论见地的评论之一。二〇〇八年一月，由雷达先生点评的《白鹿原（评点本）》，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至今仍是《白鹿原》各种发行版本中最受欢迎的版本之一。他对《白鹿原》的评论和点评，对于我这个作者来说，在思想和艺术的很多地方都有启示和触动，真的使我受益匪浅。

2013年6月 二府庄

超越文学的史料品格

——《一号文件》读记

第一眼看到《一号文件》这部书的名字，我竟不无心颤地惊诧。且不说我是写农村题材，自然到本能地关注农村现实的作家，即使作为当代社会的任何一种角色，都会对“一号文件”产生敏感。这是因为，一九八二年中央第一次发出“一号文件”，彻底结束了中国农村延续近三十年的旧体制，为亿万农民打开了一条活路，也奏响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先声。连续五年的五个“一号文件”，都是关于农村改革的切合实际的指导方针，对于农村的发展乃至对整个社会改革的促进和影响，其意义无可估量。三十年后回看纪实文学《一号文件》，我更多了一种经历者的万千感慨，由衷地对成就这部具有历史意义的杰作深感钦佩。我之所以“且不说”作家的身份，是因为一九八二年的第一个“一号文件”下达时，我是贯彻和实施“一号文件”的一名政府工作人员。一九八二年春节过后，我被灞桥区政府派到渭河边一个公社（即现今乡镇）宣传并实施“一号文件”精神。我和另一位干部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地宣讲“一号文件”，然后再一个村子接一个村子地把土地分给农户耕种，把集体饲养的牲畜分给农户单独喂养……今天再读莫伸的《一号文件》，三十年前在渭河边走村串户“分田分地分牛马真忙”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难免发生既是个人人生，又是生活演变的历史性概叹。

纪实文学《一号文件》里所写的，多是这样一些人：他们对极左僵化的公社体制下，农业生产停滞不前乃至屡遭破坏，多了一分思考且提出改善意见。然而他们却几乎无一例外地遭遇打击迫害，以至死

亡，酿成人生悲剧。这不仅是他们个人的悲剧，更广泛的意义上是民族和国家的悲剧。设想户县的陈冋台和后来的杨伟名的建设性意见若能获得采纳且得到推广，所谓“三年困难”饿死无以数计的人的悲剧性灾难，肯定会减轻几分……我读到这些典型的人和事的时候，很自然地意识到，恰恰是他们和他们当年实事求是的科学思维和无所畏惧的行为，使得“一号文件”的诞生和实施成为必然，尽管那是在三十年之后。

“一号文件”把中国乡村发展的出路，导引到了符合中国实情的也是科学思维的道路上来。纪实文学《一号文件》里记述的诸多典型的人和事，都以其鲜活生动，尤其是无可置疑的真实性，证明了中共中央“一号文件”决策的英明。这样也就奠定了《一号文件》这部纪实文学独有的史料性品格和价值，对于当代和未来那些想了解中国发展道路的人来说，它将是一份珍贵的原生态资料。从这个意义上来说，莫伸成就了超越文学的功勋性创作。

读着纪实文学《一号文件》，我曾几次发生某种颇为刺激的自愧性心理反应。莫伸写到的几个人和几件事，我也曾接触过，原想做点文章，却未能做成，留下遗憾。譬如他写到万里在安徽率先搞农村体制革命，我也曾去那里作过采访；再如姚生泉的日记体著作《中国农村变革实录》，我也曾认真阅读过，尽管获益匪浅，却无作为。尤其是莫伸在《一号文件》开篇首章所写到的户县杨伟名的事迹，让我竟有一种冲撞性的感受。几年前我曾专程住到户县了解杨伟名的事迹，确也获得了许多珍贵的资料，却终于未能有所作为，至今觉得遗憾。读到《一号文件》里关于杨伟名的文字，我感到欣慰，一个具有科学思维又兼无畏品格的堪称伟大的关中农民杨伟名，得到了张扬，我因此而感谢且钦敬莫伸。

读着这部六十余万字的著作，我又想，莫伸该下了多少功夫！他审视一个个写作对象时的缜密思维，他严谨的文字，姑且不论，单是要搜集如此丰富翔实的资料，得跑多少路，翻多少档案，找多少人叙谈——况且多是业已过去多年的生活事件，纪实文学又容不得一个想当然的细节，单是能够摊出如此功夫具备如此毅力，单是他的创造精神，就令我钦佩敬重了。再，在我的印象里，莫伸不在农村题材写作的作家行列，突然拿出一部中国农村发展历程的《一号文件》，足以见得他的知识的宽泛，也足以见得他“为生民立命”的精神境界。

2013年7月2日 二府庄

感佩一双眼睛

虽然年龄相差一大截子，结识杨小兵却很久了，准确时日尽管糊涂无记，却清楚无误地记得第一次谋面握手，便知道他是一位专职摄影记者，那是胸前挂着的作为职业标志的甚为高档的照相机告知我的。许多年里，未断来往，却称不上密集。近日他送来一集照片，翻阅赏读之际，竟令我浮想多多，不仅见识到某些陌生的生活图景，更多的是勾起曾经经历过的生活记忆，发生某种非自觉的陷入与沉浸。我竟而独自感慨，尽管那张浓眉大眼的四方脸上的谦谦笑意依然自在，印象里的摄影记者杨小兵，业已成为别具一格的摄影艺术家了。原来印象里的杨小兵供职新闻媒体，自然是一年四季都在东奔西颠抢拍新闻镜头，而他送给我的这一集照片，新闻气象虽不能说全无，却也淡薄，而让我感受到的是浓郁的民间民生情态，我的陷入与沉浸便非自觉地发生了。

这一集泛滥着浓郁的民间生活情态生活世相的照片，观照的多是城市底层的诸多生活层面各色人群的生活情态，用时令词汇说当属原生态的情状，便有一种逼真的撞击读者的强力，也是摄影艺术独有的魅力。翻阅这些照片，不同的人物不同的场景所构成的原生态的画面，竟然让我的感受不断发生变化，喜了忧了，甜了酸了，远了近了，说五味杂陈也不算夸张。有一幅公交车抛锚男女老少乘客推车的画面，各个人物各不相同的身姿动作，在这一瞬间凝聚为一个共同的也是最简单的心愿，让车重新跑起来。看到这幅生动的画面，我不由哑然失笑。另有一幅抓拍的是一个在环城公园滑雪摔倒爬地的小男孩的镜头，虽然不无“狼狈”，却让人感知到只有童年才会发生的这种甚为金贵的尽情尽兴的“表演”，同样让我忍俊不禁。还有一幅大学生抬

着老师入洞房的照片，让我忆起来电影《红高粱》里抬轿子的情景，却似乎更见得抬着老师的学生的溢于满脸的欢欣里的真诚。在我被这些鲜活、生动而又轻松的画面感染着的时候，又看到一个小男孩在街头夜市弹琴卖唱的照片，尽现童稚却不见羞涩的小圆脸，却让我同样是忍俊不禁地咋舌了；与其相对应的另一幅照片，是一个年龄不差上下的小姑娘坐在路边读报的镜头，身旁坐着以捡破烂为生的年轻的父亲，年轻父亲瞅着女儿读报时的欣然笑意，却让我在感受一种亲情的温馨的同时，心头泛起一缕酸酸的感觉；还有与上述父女相类似的一幅照片，两个女孩和爷爷蹲在路边卖嫩玉米棒子，爷孙三人都洋溢着笑，我却更添酸酸的感觉了。我是在这些画面里看到了现实生活未经任何修饰的最为真实真切的情景，且不说艰难，小兵的照片显现的恰恰是艰难里的笑的温馨，更见其不尽的意蕴了。

看到一幅足球迷纵情欢呼的照片，我相信只有铁心铁杆的球迷才会在自己喜欢的球队进球的瞬间爆发出如此癫狂的表情，即使走红的影视明星也难得表演到如此逼真；另一幅夜总会里集体舞蹈着的男女青年如林般高扬的手臂，让我感受到挟裹着的激情的青春旋风，似乎要破顶冲天了。在我替房顶操着闲心的时候，再翻到一幅画面，突然有一种情感跌落的顿挫到回不过神来的感受。这是两位中年农村妇女，并排推着自行车行走，一位的自行车后座和车头上架满了大蒜辫子，另一位的自行车后座两边搭绑着两只大竹筐，装着冒顶的干辣椒。她俩大约是同村乡党，结伴到城里来出售自家责任田里的农副产品。两个人的面部表情虽然稍有差异，主调却都是木然。足球场上和舞厅里癫狂到忘我的笑颜和这两位农妇木然的神情，就让我发生回不过神来的跌落顿挫的感觉。我无须做任何评说，只说我的感觉，那些人是那样生活着，即如球迷和舞者；这些人是这样生活着，即如进城卖大蒜和辣椒的农妇……茶艺师表演茶道的类似软功武术的动作，竟

让我这个每日都缺不得绿茶的人，吓得不想或不敢喝绿茶了；看着贾平凹拿着一个烤红苕往卖红苕的农妇手持的秤盘里放下过秤的瞬间，也喜好这一口的我顿时溢出口水来；城门洞墙根下两位驻足闲聊的老人，其脸上和整个身姿都泛溢着闲适平和的心态，当属这个年龄段的人最佳的状态了；迁了村再迁庙的杂乱现场，一瞅便发生嘘叹，又一个村子从地球上消失了……消失了的村子，留在小兵的照片里，还有上述的社会底层各个层面各色人物的瞬间情态，也在小兵的照片里铸成永久。这些昨天发生过的令我五味杂陈的生活图景，似乎有着既切近又远逝的矛盾感受，也便自然想到，再过若干年，人们再阅读这些照片的时候，想必会有历史演变的沧桑感吧！

看着一幅幅定格在照片里的社会底层各个角落里的男人女人老人小孩的生活情态，在发生五味杂陈的直观感受的同时，很自然地想到摄影的杨小兵的眼睛，何以会投注到这些司空见惯却也不会被谁多看一眼的人身上？我便想到杨小兵的意识和思想里，有颇为自信颇为强烈的一种倾向，致使他把关注和聚焦的对象盯住了如上所见的那些人。在我理解，这种行为既是自觉的，也有本能的因素，独立的思想和独有的意识所选择的关注对象，无疑是自觉的；而自觉的坚守积久不改，便成为一种类近本能的自由状态了。我因此而发生对这位年轻的摄影家朋友的感佩和敬重。

这部摄影集里的不少照片所抓拍的生活世相，诸如夜市里光着膀子享受生活的小伙子，在大街上卖唱的盲人乐队，在小巷里爆米花的手艺人，等等，我也都遇见过，再在杨小兵的摄影集里看到这些场景，顿然意识到我的麻木，同时也意识到小兵的敏感。小兵聚焦的神经的敏感，当属他的独立的思想和独有的意识致成的，愿他这根敏感

的神经永远敏感，捕捉更多的鲜活而生动的生活图像，为正在经历着的生活留下印记，那是有别于文字也是文字难以取代的历史印迹。

和摄影艺术相隔太大，不敢冒然评说小兵摄影的艺术层面的话，待专家去品评，我作为阅读者，仅说到这集子里的原生态生活画面的直观感受，供小兵参考。

2013年7月18日 二府庄

燃烧的生命

——《张剑颖烈士纪念文集》阅读感知

读着《张剑颖烈士纪念文集》书稿，一个堪称伟大的革命烈士张剑颖的伟岸而又生动鲜活的形象树立在我的眼前。尽管《文集》中收录的介绍张剑颖生平事迹的《张剑颖传略》不足四万文字，却让我发生这样强烈的阅读感动和感慨，似乎某些长篇大卷的形象化纪实文字也难能发生这样的阅读效应。我便想到一个基本的因由，即是张剑颖烈士短暂的生命历程中所创造的非凡的英雄业绩；他把整个生命投入到中国革命的艰苦卓绝且又漫长的事业中，他的生命激情他的生命智慧，是一种全身心的投入，一种忘我的投入，竟而至于燃烧殆尽，也无怨无悔……对这位伟大的革命烈士的崇敬也就自然产生了。

纵观烈士张剑颖短暂的生命历程，他做的工作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按照革命事业的需要，亦即党组织的安排，做着具体的又是几经变换的工作，而且干得有声有色。再一是以戏剧为主的文学创作，成就卓著，在解放区的部队和乡村民众之中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也是令人感动且颇有些诧异的事，一个在严酷的革命战争环境里做着可以想象的，艰难到不无生命危险的事项的人，竟然不断有剧本和快板创作出来，无疑是不可多有的生命奇迹。

我很感动也很敬重他的革命精神。张剑颖二十一岁从西安单级师范学校毕业就投入陕西靖国军杨虎城部任副营长，参与了反抗窃国大盗袁世凯和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一介书生由此便开始了他的戎马生涯。初入杨虎城部不久，张剑颖被调入杨虎城在栎阳筹建的兵工厂，

为了尽快制造出当时最先进的79步枪“汉阳造”，他两次秘密南下汉阳，不仅“偷”回了造枪的关键机械设备，而且挖来了一位全能技艺的老工人。更令人惊异的是，他再去汉阳又“盗”取了制造79步枪的关键一环——“枣核”，成功地制造出了“栎阳造”品牌的79步枪，为杨虎城部武装的更新立下功劳。我便发生惊讶和感慨，一个刚出校门进入军营的张剑颖，一出手便打出非同凡响一拳，既显示着这个年龄段的初出茅庐的少小青年难得的成熟老练，更显示着非凡的智慧。由此开始历经十六年，张剑颖在杨虎城部转战不息，历任副营长、教官、制造局建设会主任，西安电话局局长，孤儿教养院院长、秘书长及甘肃省府秘书等职。如果就个人生计包括命运，张剑颖当属甚为丰裕也甚为响亮的，然而，他却从甘肃省府秘书的显要位置上辞职回到家乡栎阳镇，到栎阳小学去当了一个收入无法与省府秘书可比的教师。不是在官场失意，更不是犯错受贬，而是自动辞官辞职，概出于纯属个人高蹈的精神情怀：“一心胸怀报国之志的张剑颖看不惯官场的尔虞我诈，钩心斗角，更不想搅入到官场的是是非非中去，于是便毅然辞去……”（《张剑颖传略》）这就是张剑颖。

张剑颖回到栎阳镇，便接触到地下党组织，在地下党员杨宜翰的安排下，到栎阳镇小学教书。由此开始，张剑颖便迈出了他人生的第二个堪称辉煌的生命行程的一步。在我理解，在腐朽至极黑暗至极的上世纪三十年代的中国，觉醒了的一批知识青年，早已开创出一片又一片尽管弱小却充满光明的天地，无数受压迫受迫害的工人尤其是农民，进入到革命根据地，扛起了推翻腐朽王朝解放受压迫人民的重任，尽管还是星星之火，却呈现着必然燎原的趋势。在这样的时势背景里，对于张剑颖这样有着高远人生志向的热血青年，走进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阵营，无疑是必然到自然的理想选择。

张剑颖工作的栎阳学校成为地下党的秘密交通站。张剑颖被渭北工委派使到瓦窑堡向刚刚长征到达陕北的党中央汇报工作。张剑颖经谢觉哉和毛泽民的夫人钱希均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张剑颖在中共关中分区委员会任三科科长。张剑颖在中共关中分区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习仲勋任书记的分委委员。张剑颖任关中分区教育科长，又任培养大批优秀干部的边区师范副校长。张剑颖调任关中地委建设科科长。张剑颖亲自参与解放区水利设施以及造纸、纺织工厂的设计和劳动。抗日战争胜利后不久，张剑颖任关中地委宣传部副部长再部长。一九四八年九月十四日，张剑颖病逝于延安。这位把一切都献给中国革命的志士，仅仅是因为淋雨发病而倒下，再也没有站立起来。任谁都能想到，淋雨发生感冒之类的疾病，绝非致命的主要的因由。关键在于他的超负荷的奉献与付出，尤其是一次紧急撤退中心脏受到严重损伤，而淋雨发病不过是身心疲惫的一个诱因。我读到此处，深为惋惜，一个为革命理想倾心倾力到完全忘我的张剑颖，却在革命即将胜利的前夜谢世了。我在此罗列了他进入革命阵营直到去世时所承担过的多种革命工作，未作具体叙述，不再重复《传略》文本。我的总体的而又强烈的感觉，无论党组织把他安排到哪个环节上，他不仅没有任何个人选择的想法，而且全都是满腔热情的接受和全身心的投入，及至亲自挥镢打井，扬鞭扶犁，执镰收割……这里我又想提及他在甘肃省府秘书这个所得不菲的位置上辞职的事，足以见得一个人的舍与取，不是为着个人的快活，而是全心全意为着国家和人民的美好未来而甘愿的付出。这个人的人生追求，这个人为理想追求所作的至恭至诚的忘我工作姿态，在我读来便自然地产生伟大的概括。这是张剑颖的精神和人格的恰当定位。

张剑颖辉煌人生的另一面是以戏剧为主的文艺创作。这是让我甚为惊异到难以想象的事。他投身革命，无论换调哪个岗位，承担多重

的责任，都是具体的第一线的甚至时时都有生命危险的严酷的使命担当，怎么可能“悠闲”下来遣词作句编写戏剧？然而，在我难以想象的事，张剑颖却令人信服地做成了。不仅做了，而且创作数量之大品位之高更令我钦佩。我便想到张剑颖的生命是燃烧着的能量巨大的火焰，其创造激情创造才华非常人所能比拟。

张剑颖的戏剧和快板书的创作，多是在他参加革命的不同时段的应时顺势之作，即革命形势发展到某个重要关头，他一边挥枪打仗，一边执笔为革命鼓呼。这种鼓呼的戏剧和快板，对于宣传革命对于发动群众对于敌方阵营的瓦解，都有枪炮所难以替及的巨大作用。在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的上世纪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国民党连续发动两次反共高潮，国民党驻陕的胡宗南进犯延安革命根据地遭遇失败，张剑颖和习仲勋一起领导军民开展了对国民党的反摩擦斗争。在此严峻的背景里，张剑颖创作了秦腔剧本《关中炮火》，揭露国民党破坏抗战屠戮人民的真反共的虚伪面目，讴歌关中军民在血与火的战争中的顽强战斗精神。这样的戏剧所产生的影响，是人心向背，是枪炮所不能代替的。张剑颖还创作了大量的快板书，更快捷更方便传播到部队和社会各个层面，无异于匕首投枪，为革命发出义正词严的呐喊。一九四六年抗日战争刚刚胜利，国民党便发动反共内战，张剑颖创作了《反内战三字经》《百子图》和《陕西民谣》等快板书予以揭露，民众传诵，蒋管区的乡民也多能背熟，对于群众的开启性影响不可估量。

说到为革命鼓与呼的创作，大约归属遵命文学，而张剑颖全然没有遵命的意向，完全是一种自觉的创作行为。再，对于为革命鼓与呼的遵命文学，容易发生习惯性误解，以为这样的创作，无论小说、诗歌或戏剧，多有艺术性不足的缺失。这种既有的成见始发自何时何

事，虽一时说不大清楚却是真实存在。如果这种看法有几分道理，而张剑颖当属一个例外，他现存的十余部创作或改编的现代戏和古典剧，多是常演不衰极富舞台艺术魅力的佳作，有的剧目如《黄花岗》，被专家公推为秦腔经典。我读到《文集》中收编的十余位评论家所写的对张剑颖戏剧创作的评论文章，不仅赞同，而且对我这个戏剧外行解读欣赏这些戏剧佳作内蕴的艺术魅力多有启示，便不再赘述。这里仅就他的快板书补说几句，这些快板书的规整风范，语言的生动鲜活，内容的扎实丰富，令我不觉间读出声来。这种适宜民间传播的快板，似乎向来登不得文学艺术的大雅之堂，然而我却由此感受到张剑颖的文字功底的扎实雄厚非同一般，还有对关中方言和生活语言的稔熟，升华为独具魅力的艺术语言，诸如《百子图》等一批作品，更见出他潜存的艺术创造的活力。

张剑颖创作的被公认为经典的秦腔剧本《黄花岗》，写成于一九二一年，他刚刚二十五岁。我便想到这是一位天才的剧作家，也想到我曾有对天才的物质化解释，即与生俱来有一根对文字尤为敏感的神经。张剑颖有幸在雨金高小读书时，独得戏剧大家孙仁玉的教诲和关爱，便使他的那根敏感文字的神经更为敏感，且进入戏剧创造的最佳状态。由此开端，无论在革命队伍的哪个岗位上，他的那根敏感文字的神经，都会对时势发出独立独特的声音，就是一部又一部戏剧，以及更顺手更适宜宣传群众的快板……我之所以说他非遵命而纯属自觉的创作，即在此内在因缘，那根敏感文字的神经，在他处于复杂艰难的革命形势里，便有鼓与呼的文字涌出，留给今天的我们感知当年革命的鲜活形态，也让我们加深理解张剑颖的革命和创作的丰富人生。

我为张剑颖的早逝深感痛惜，在共和国即将成立之际，在他的革命理想即将实现的前夜，在他正当艺术创作最佳的生命时段，却溘然

去世。且不说在共和国成立后可能的新的使命的责任和担当，单就艺术创作而言，在和平年月的美好环境里，这位戎马倥偬半生的作家张剑颖，该会有怎样的精彩华章创作出来……

2014年3月16日 二府庄

欣慰与感动

——“田小娥命运大家谈”感言

走进“田小娥命运大家谈”征文颁奖会会场，我竟发生感动亦感慨的情绪波动。

说来有因。去年三月伊始，《文化艺术报》与西安市三八红旗手联谊会联合举办以田小娥命运为主旨的征文活动，我得知此事时曾不无担心，《白鹿原》出版已经二十多年了，作为小说中的一个非主要人物，还会有人对其感兴趣吗？还会有话要说吗？我甚至难以把握，还有人会记得这个原上的女人么？时光毕竟过去了确也不短的二十多年了，一个虚构的女人会在读者的记忆里储存多久，确也不敢乐观。

征文开始见报的第一次所发的四篇文章，我一一读过，直到五月一日最后收尾的三篇评论，两个月里大约刊出近三十篇评论文章，几乎每期都占两块整版，所有评说田小娥命运的文章我都拜读了。我的担心早已消解，且已被一篇又一篇评论文章所感动，每一篇文章都有一个透视田小娥这个人物的独特视角，足以见出各位评家眼里的田小娥的声色气象。作为田小娥这个形象的“始作俑者”，我不仅感到一种被理解的欣慰，而且还有一些论述观点是我尚未完全料及的，可以说对我所写的这位女性的再理解不无启示。

在见诸各篇评说文章末尾的作者简介中，评说文章的作者多是陕西籍贯，也有几位中国南方北方的评家。而从作者从事的职业说，有工科大学的教授、法律工作者、报刊编辑、行政部门的干部、小学中学教师、公司老总，更令我惊讶的是有几位在校大学生，还有一位农

民……几乎当今从事诸种职业的人都参与了，都对近一个世纪前的不幸的原上女人田小娥的命运发出独立见解的声音，我想田小娥曾经时隐时现在原上的鬼魂幽灵该当自消了。

我看到获奖作者中有一位九〇后的在校大学生路楮楮，刚刚跨过二十岁，甚为惊喜。从诸多媒体所作的读者读书的社会调查报告留给我的印象，尤其是年轻人多沉迷于网络流行话语的阅览，还有通俗类的各种图书；对纯文学作品乃至世界名著阅读的人群比例越来越小，连连发出多读中国和世界名著的呼吁。路楮楮读了《白鹿原》，而且对田小娥的命运发出自己的声音。暂且不说其评论文章，单是她能够参与讨论这个举动就令我感动且感慨了，一个九〇后小姑娘和近一个世纪前的悲剧女性对话，也就把相隔近一个世纪的昨天和今天贯通了，这是白鹿原的昨天和今天，或多或少总也映现出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昨天到今天的精神心理的艰涩历程。在发表评论文章的作者里，和路楮楮一样正在大学读书的学子，还有甘肃农业大学的南莉娜、西安工业大学的刘诗萌，大约都属九〇后。她们对近一个世纪前的被损害与被侮辱的乡村女人田小娥的关注，我在感动感慨的同时，也甚觉欣慰。

颁奖会组织者安排我给特等奖获奖者雯馨儿（真名樊亚惠）颁奖。我已知晓她是一位残疾人，却不知具体的身体状况，颁奖会主持人介绍雯馨儿，原是一位法律工作者，正当青春年华开始人生之旅的梦幻时刻，却发生灾难性病变，致命在关键的脑部，以至致残。她不甘亦不屈命运的不幸，以超人的顽强意志与命运抗争。她读书写作，收获颇丰，连续有佳作发表，不久前刚刚完成一部近二十万字的作品，即将出版。她的母亲用轮椅推着她走上颁奖台，我给她颁发了获奖证书。我在和樊亚惠（雯馨儿）握手的时候，看见她涌流的眼泪，

和我说话的声音是哽咽着的。我同时感觉到她的和我相握的手很有力，竟然令我很是感动，须知这双手因为脑部病变而僵硬，她以怎样超乎常人想象的毅力叩击电脑，使手指恢复活力，也敲出了她文学创作和人生理想追求的华章……

2014年3月26日 二府庄

父子冲突的社会内涵与文化意蕴

——谈《西京故事》里的几个人物

一

读着陈彦的长篇小说《西京故事》，我便进入了西京城郊一个既陌生却又似曾相识的村庄——文庙村。这个村庄里的各色人物的生活形态，与我记忆里昔日关中乡村发生的看似矛盾却也合理的生活运动发生了必然联系。及至读完这部五十万言的宏篇大著，矛盾的感觉便完全消解，不禁沉浸在文庙村的种种人情纠葛之中，为这个或那个原住民或外来户的男人和女人着起急来。这种自然发生的几乎是无意识的情感陷入，是一种阅读享受，尤其难遇，无疑是《西京故事》独特独有的艺术魅力给予我的。

掩卷之际有一个直接的感知，文庙村是一个小社会，是一个非同寻常的小村庄构成的小社会，它是大社会大世界的缩影，更可贵之处，它是与正在行进着的当代生活发生同步声响的艺术世界。《西京故事》里的文庙村，呈现出令人屡屡感到心理纠结以至悲怆的生活世相，这是著者对生活的客观再现和对生活本真的还原，因此自然产生出更富感染力的艺术效果，这足以见出作者非凡的从生活到艺术创造的深厚功力。

文庙村是一个特异的乡村，迅猛扩展的城市蔓延覆盖了麦子和蔬菜生长的土地，已经不依赖土地谋生的村民却仍然继续着农民的身份；四面八方的外来男女农民聚集文庙村寻求生路，形成这个时代特

有的“农民工”“打工族”群体，这在中国是一个数以亿计的庞大群体；由原住民和外来打工的乡民聚居的文庙村，由这些人物的诸种社会和家族关系，将触角伸向西京城城市和乡村的各个层面，诸如高等学府、官场和商界、医院以及不无色情霓虹的娱乐场合；这种只有在当今才会形成的文庙村的景观，当属一种甚为典型的环境了。

在这方典型环境里，著者陈彦集中叙述了两组人物的生存形态，一是外来户罗天福一家，一是原住民西门锁一家。他们的生存理念及梦想在其各自追寻的步履里，欢欣或痛楚，得意或失意，都活脱脱显现出一个个鲜活而又迥然各异的个性形象，这些人物的命运遭际让我情感纠结，以致发生少有的陷入性阅读，且缓说其典型性。

二

我在文庙村感知到了强烈和浓郁的文化象征韵味。文化，已成为当今社会生活无处不在的话题，既有着对社会生活各个层面的健康的或曰正能量的积极影响，也有把文化当招牌作广告词乱粘乱贴的庸俗化现象相伴而出，及至一些文学作品也多见“为赋新词强说愁”的粘贴文化的现象。《西京故事》里的文化蕴藏，与文庙村这个村子的历史渊源包括这个以文化立庙的专注于文化象征的名字不无关系，然而也仍然只是一种表征性崇尚，让我更贴切地感知到的是，小说人物精神心灵世界里浓厚得难以淡释的文化底蕴，这也决定了这种文化的本真质地。这些人物中首先得数罗天福。

罗天福是从山区来到文庙村打工的一个农民，是为着供养先后考上大学的女儿和儿子的单纯却更令其心劲高涨的目的；他的生活阅历也很简单，在山区老家的村子里当过民办小学教师，后来又当过多年本村的党支部书记，其身份依旧是农民；无论是仅有的中等教育资质

的民办教师，抑或是作为中共在一个小村庄的支部书记，都是毫不起眼的普通不过的身份，然而正是这种谁也不会太在意的一个农民，他的精神和灵魂里的文化底蕴，铸定着他的行为方式，无论在纷繁的谋生市场，还是在家庭频发的诸多事变中，罗天福都在坚持着一种道德操守。随便举一个小说情节。房东家的不无无赖品相的小崽子金锁竟然死乞白赖地缠住罗天福的女儿罗甲秀求爱，且是抱着甲秀的腿死缠不放，罗甲成不堪忍受其对姐姐的这种侮辱行为，愤怒地用脚踹踢又抡扁担抽打金锁，致其受伤住院。且不说两家人由此引发的纠纷，作者的叙事焦点却集中到罗家父子之间。父亲罗天福不仅真诚道歉，而且主动接受医疗费用等赔偿，不仅不惜拿出靠打饼积攒的不足万元钱来还，还打算卖掉祖传的珍稀古树，由此而引发与拒不认错更不想赔偿的儿子罗甲成的父子冲突；罗甲成摔门而去，意在对抗以至发泄对父亲“软弱”的不满。罗天福遭遇的不仅是儿子甲成造成的血汗钱的损失，更在于难以估量的心理伤害，这种伤害由心理外溢到生理病变，潜存于肢体的老病根突然爆发而致其躺倒了。我看到这种自然到几乎是本能的心理和生理的反应，便感知到道德在罗天福的身体与心灵的完全融通，也就不会发生审视和判断之后才有定夺的过程了，倒是他的处世做人的道德被损害时，才会有这种本能性的强烈反应。

上述父子冲突由儿子甲成的悔悟很快得到缓解，而甲成根深蒂固的心理欠缺继续发酵，直至做出非同寻常的几近身败名裂的错事，致使罗天福陷入失望到崩溃的境地。我看到这个处处待人接物都恪守着宽容心态的农民罗天福爆发了，直接诱因是对儿子甲成的彻底失望，深层的乃至致命的情由，当是他坚守的道德底线被儿子甲成踢踏无着了。他竟而至于痛骂儿子“你滚！滚！”的决断的话，在于罗天福“觉得人老几辈子，甚至几百年，几千年的那些基本活法和真理，在罗甲成那里已经变得一钱不值了……罗天福一生坚守着一个信念：以诚实的

劳动安身立命。反正饭得一口口吃，事得一点点做。无论吃什么饭，做多大的事，都得是自己凭双手刨来的，挣来的，而不是从别人碗里抢来的，空中挖抓来的，不择手段巧取豪夺来的。但罗甲成已经模糊了这些基本概念，只想一夜改变自己，至于用什么方法，已经不愿意去更多追究和思考了，这是他觉得自己已经彻底不能驾驭自己亲生儿子的根本所在”。作者陈彦对此情此境里的罗天福的心理情态的叙述，何妨看成是罗天福坚守的生活信念崩溃时的心灵独白。

我在感知罗天福精神信念的坚守所遭遇的几近破灭的痛苦时，也感知到作为这个民族传统精神和传统美德所面对的危机；罗天福的痛苦，当属今日商品社会诸种世相冲击传统道德底线必然发生的事，逃躲不了的事，且不是罗天福这个作为艺术形象独自发生的事，而是无以数计的民族精神坚守者都会遭遇的痛苦的事。难得的是作者陈彦对罗天福这个人物的身份定位，一个既做过民办教师又做过乡村支部书记的人，原来仍是一位农民，这个农民对民族精神传统道德的痛苦坚守，也就有别于知识阶层从理论意义上的探索乃至疾呼，更见出民族精神传统道德在社会底层的蕴藏和面临的危机。我便感知到罗天福这个人物形象的社会基础之阔大和涵盖意义之深广典型。自以为不属过誉，罗天福的生存空间里，显示着人文人性人情的审美剖析与审视，是一种贴近的现实感与崇高的审美感的汇聚与融合。由此可见作者陈彦对当代生活的倾心关注和敏锐发现，也见出独有的深刻思考和难得的生命体验。

三

《西京故事》里的诸多人物，都在各自的生存空间、生活范畴里以自己的信念和习惯过着各自的日子，几乎没有涉及重大的事变和剧

烈动荡的事件，多为琐细的日常生活形态，却发生着让读者的我时不时感到心灵撞击的震动，这是一个个人物性格的甚为巨大的变异引发的，让我感知到各个人物精神心理的丰富性、复杂性、多面性，也就显现出一个又一个的“这一个”。

首当数得罗甲成“这一个”。罗甲成的生活位置，牵涉到家庭和社会的多个层面。他是从山区刚刚进入西京城里一所名牌大学的新生，新的环境和新的人生位置，致使他的精神和心理发生大约连他自己也始料不及的变异。他的根系仍扎在父母打工卖饼子的社会底层的文庙村，而他倚栖的是名牌大学的高校；他既脱离不开维系他生存的打工族这个弱势群体聚集的一方最不堪的角落，又要时时处处面对身边各种优裕者不无得意的面孔，单是和他同居一舍的三位同窗的优越的家庭和社会背景，构成的巨大反差就形成一种无法摆脱的又令他忌恨的压迫；他悄然萌生的爱情的对象，却是一位学术名人的千金，那种巨大的反差致使他始终不敢把爱字说出口来，倒也让读者的我看到高级知识阶层颇为神秘的一隅的人生景观。

置身于这种反差极为悬殊的社会背景和生活位置里的罗甲成，由于他的个性，即自信与自卑这个难得调和的矛盾构建的精神和心理形态，致使他发生了异乎寻常的心理裂变。在山区乡村和学校那种生活状态差别不大的环境里，他的聪明天赋促成的独秀学业以及进入名牌大学，无疑助长着他的自信，却也使自卑隐匿不显，而当进入反差悬殊的新的社会生活环境时，自卑心理几乎是一夜之间突显出来，形成自信和自卑胶结着的心理，一时获得得意，一时又陷入痛苦。在进入文庙村的第一夜，他翻来覆去睡不着觉，因为父亲“租住的这个地方，让他感到很不舒服”。堂堂的高校学子和父亲睡在无异于贫民窟的地铺上，这种矛盾纠结的心理便初露端倪了。随之就看到他不时地与父亲

罗天福发生或大或小的冲撞和抵牾，根源无非是父亲低下的社会地位使他难得张扬起自信，也失掉自尊，陷入自卑；在与同舍三位或为官二代或为富商二代的同学相处不久，最直接的也是躲避不开的是他们言语行为里有意识或无意识的刺耳又刺目的炫耀，使他不仅不能接受不能容忍，而且在心底里产生一种本能性的排斥和反感，于是便陷入与电脑为友的自我封闭状态；这种矛盾纠结——自信与自卑——的一种外在的派生物，是极端的爱面子心理，他对姐姐甲秀在校园里捡废品卖钱的自助行为不能容忍，劝阻无效后又采取粗暴的手段予以制止；大约更具心理挫伤的事，是他暗恋着的同学童薇薇和他的社会地位的天壤似的差别，童薇薇在假期可以和高知父亲到欧洲去旅游，他却只能去打工挣取学费，如果说他对同舍三个同学的言行还能抵抗，而对童的初恋的情感的挫伤不仅不能承受，而且成为无法化解的压迫和痛苦；基于如此多重因素，在学生会选举中所发生的身败名裂的非常事件就是合理的了。之所以说合理，还是源于那个自信自尊和自卑的心理纠结，是为了挣脱这种纠结而失去理性的举措，也是自信自尊到自我膨胀的荒谬的选择。我在读到罗甲成陷入人生毁溃的境地时，油然而生扼腕慨叹，竟有相惜之情发生，我曾在一篇散文中写过，穿着一身粗布衣裤背馍进城念书时的心态，是时时处处都感觉到的自卑。我能感知罗甲成的自信与自卑纠结的心理，也想到这当属处于社会底层的人群的普遍心理形态。罗甲成的人生轨迹之所以能引发读者甚为强烈的呼应，也就是很自然的事了，这个人物也就不是一个孤立的形象，而是一个时期普遍的社会心理的涵盖；在庞大的弱势群体尚不能短时期内改变生存状况的时势里，罗甲成的这种焦灼的心态就不会缺失呼应者，一个艺术形象的生命力就会久远。

四

以上我着重写了对罗家父子这两个人物的阅读感受和理解，自然就想到作者何以能写出这样两个非同寻常的艺术形象，或者说用什么样的神秘而又高超的手法创造出陌生而又鲜活的“这一个”和“那一个”，我以为作者准确地也专注地把握着人物的文化心理结构。

罗天福既做过乡村民办教师，也做过山村中共党支部书记，似无任何特殊或者说出奇之处，在中国乡村有这样生活经历和资质身份的人无以胜数，而罗天福这个业已进入城市边沿依赖打烧饼谋生的普通不过的农民，之所以能对我发生震撼性的阅读效应，就在于他的文化心理结构的独特性，这使他区别于现实生活中南方或者北方的农民，也区别于既有的中国和译介小说中的农民形象。罗天福继承着传统文化的最优秀的本质精髓，便是仁和义，便是对善的坚守和对恶的拒绝。他尚谈不到像理论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精细的研究，却是把传统文化的精髓不仅作为做人准则，而且完全融入血脉的一个人。这样的农民罗天福，传统文化已经成为他独特的心理结构形态。作者陈彦准确地把握着罗天福这种独特的心理结构，个性化的“这一个”就呈现于他的笔下、读者眼前了。我从罗天福的身上，感知到我们民族传统的优质文化在民间的深厚蕴藏，且相信这不是“最后一个渔佬儿”。罗天福是作为一个艺术形象被我看到的，自然可以推想那些和他一样从事各种职业打工谋生或继续在乡村依赖土地春播秋收的农民群体中，不乏与罗天福一样恪守着传统文化且融入血脉的默默无闻的人。

在罗家父子时断时续愈演愈烈的矛盾冲突中，透过表层的这样或那样的具体事由，我看到的仍然是精神追求和精神信奉的难以调和的冲突，也就是不同的文化心理结构的冲突。儿子甲成既缺失传统文化的修养，似乎现代文明和优秀文化也很淡薄，支撑他自信自尊到欲望膨胀的一点优长，仅是聪颖的天资。这样，他和父亲罗天福的冲突，

就是截然相异的两种文化心理结构的冲突。作者陈彦以解构人物文化心理结构这把钥匙，打开的是深入人物灵魂的各个隐秘的角落。再看颇具神秘色彩的另一个人物东方雨老人，更见得传统文化所结构的心理极为传神的形象，他与罗天福素昧平生，只是在文庙村不期而遇，即进入相识且相通又相知的状态，是他们对传统文化的继承和信奉所形成的无隔和融合。尽管他们在文庙村的生活位置颇多差别，个性里的情趣和行为也各具一格，却丝毫也不影响由精神心理的相通形成的相互的敬重。及至罗天福把处于精神崩溃状态的儿子甲成送进东方雨老人的神秘的院子，罗甲成才终于找到了精神和灵魂的栖息之地，即对传统文化的归属感，未来的罗甲成如何完成自我的精神剥离以及重新建构健全的文化心理结构，完全可以期待。这里我想引述东方雨对罗天福的一段评说文字："罗天福在我心中的形象变化，是与这个时代的价值倒错一道与日俱增的。罗天福是一个小人物，但他也是鲁迅所说的那些民族脊梁之一。他以诚实劳动，合法收入，推进着他的城市梦想；他以最卑微的人生，最苦焦的劳作，坚持着一些大人物已不具有的光亮人格。我对他挫折频出的梦想充满期待，那两个来自乡村的孩子，如若不被城市急功近利的超级利己主义臭气所熏染，而以父亲的人格理想做依托，一点点去丰满自己的羽毛，我就觉得罗天福的西京梦是有价值的……"罗甲成面对这些评说自己父亲的文字，对他以往印象里业已定型的"窝囊的父亲"当会发生警示性影响，这也是我前述的对他未来人生"完全可以期待"的重要因素之一。

罗天福这个人物丰厚的文化心理蕴藏，必然会对周边的各色人物发生影响，诸如上述的对东方雨和儿子罗甲成等横和纵的社会层面的精神向度的波及，乃至辐射似的无形亦无可估量的力度。然而，却也存在不及的角落，房东郑阳娇是颇为典型的一例。她的宝贝儿子金锁骚扰纠缠家教老师罗甲秀——罗天福的女儿时，被愤怒的罗甲成揍打

致成轻伤。郑阳娇索赔漫天要价，甚至连丈夫西门锁也觉得过头的情况下，她还不无得意地宣称："我要拿美名熬驴胶呀，老娘一不想当先进，二不想出风头，老娘就认钱，钱才是最美最好的硬通货。"仅此一句直白的宣示，我便看到一个人的精神空白，文化的空白。罗天福的文化心理决定着他在文庙村这个小社会和家庭中的个性行为，郑阳娇以金钱结构的心理也就决定着她在文庙村和家庭里的别一种个性行为，这个市侩女人的一言一行，往往让我感觉到恐惧。陈彦准确地把握住了罗天福等人物的文化心理结构形态，也准确把握住了郑阳娇等人物缺失文化的心理形态，便创造出一个个独具个性的人物。单就罗天福而言，当属当代文学作品中独得的"这一个"。

2014年4月27日 二府庄

难忘一个人的响动

——忆吴天明

天明谢世有两个月了，他极具个性禀赋的形象和声音，时不时地就会浮现在眼前和耳畔。依着曾经来往时说话互相直呼名字而略去姓氏的习惯，我仍只说天明不带他的吴姓。

结识天明，电影是媒体，算来已经是四十年前的事了。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刚刚写成并发表第一个短篇小说《接班以后》，被西安电影制片厂的编导们相中，约我改编电影剧本，便住进西影厂后边一排平房的招待所里，就和天明结识了。他尽管长我几岁，也不过三十出头，生龙活虎干脆利落的一个小伙子，说话特爽快。他被安排为这部正在筹拍的电影的导演助理或副导演，涉及电影剧本改编的这事那事总由他和我交办。不料，时不过月余，天明又被安排去接另一部电影，约略记得是一部儿童剧，由他独立执导，自然也就不再和我来来往往了。尽管我对这位刚结识不久却能说得来的朋友的离去甚觉不舍，却也为他祝贺，能单独执导一部电影，对他这样的年轻人机遇难得……且不赘述我的那部电影后来怎样成了影界大腕的笑料，天明的那部儿童剧电影似乎也没了下文，我之后便回到我工作的公社，当即学大寨修梯田去了，一晃多年过去，难得谋面。

再得知天明的动静，却是如雷贯耳的响亮和猛烈。这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我看过天明执导的电影《人生》，又一次被震撼了。之所以说又一次，是在读路遥的《人生》小说时已经发生过震撼。我既为《人生》遇到了一位能深刻理解其内蕴的导演而庆幸，也为天明的

导演艺术所折服所钦佩，更庆幸天明所展现的卓尔不群的禀赋气象。随后便见他佳作不断，进入艺术创造的辉煌时期，其艺术才华如日中天。尽管与影视界不在一个圈内，天明的非凡的响动却时有所闻，不单是他的新作电影，更在于他把一个原本不大起眼的小制片厂，几年间变成一个声震中外影坛的西安电影制片厂了。在他的既善于包容的胸怀和慧眼识人亦爱才的魅力的诱惑中，一批杰出的演员和导演脱颖而出，成为中国电影发展史上耀眼的人物，像张艺谋等。

转眼到了上世纪九十年代。某天中午，一个陌生人找到我的办公室，自我介绍说他是天明的弟弟。我当即询问天明的近况。他告诉我天明仍滞留美国，不久即将回国，却是肯定无疑的事。我感到很欣慰。他很郑重地告诉我，是天明托他来找我说《白鹿原》改编电影的事。他说天明在美国已经读过此书，当即电告他找我商议改编电影的事。此时小说《白》刚出版不久，尚无人有改编电影的动议，我没有任何犹疑，便答应由天明改编电影，完全相信他能做成且做好此事。他说需要我写一纸改编电影委托书，正式合同待他哥哥天明回来后再办理。我遵嘱写了委托书，他很高兴地告别了。之后不几天，谢晋工作室一位负责人打电话来，说谢晋要将《白》改编电影。我便告诉他，已将改编权交给天明了。我信守诺言。再过了不几天，有关《白》书在内的所谓陕军东征的几部小说出了麻烦……不要将《白》改编为别的艺术形式出现等，唯一令我稍觉安慰的是可以继续印刷发行，当时将这种处理意见称为冷处理。又过不几日，一位相关负责人回答记者提问时称，《白》不许改编电影和电视剧等，这是公之于众的公开指示。不仅天明，谁也做不成任何艺术形式改编的事了。

到我见到天明说到此事，大家哈哈一笑了之。这是第二年年末的事。天明刚刚从美国归来，几位朋友相约在老孙家吃羊肉泡馍，多年

不见，相见甚欢，自不必说。时过二十余年，相见时的情景已经无记，幸亏一幅照片留住了当年的他和我以及张子良相聚的情景。这张照片我已无存，突然看到《西安晚报》报道天明谢世的消息所配发的这张照片，让我不禁唏嘘慨叹。经问询才知是马治权先生拍摄。照片上三人围坐，剧作家张子良居左，咧嘴畅笑；我坐右侧，也张着嘴龇着牙大笑；天明居中正面照，也在笑，半张着嘴在说话；能惹得张子良和我同时大笑，肯定是他在说着什么有趣乃至滑稽的事。三人面前的桌子上，摆着三只大号老碗，无疑是只有吃羊肉泡馍才用得上的大碗。碗里却空着，大约是只顾着听天明说话，尚顾不上掰馍……二十年前的天明，满头浓密黑发，尚未发福变胖，谈吐有一种个性化的神采，定格在一幅照片上，也铸定在我的心里。

天明后来在北京重新开创自己的电影事业，成就卓著。几次回到西安，抽空找我，还说想做《白》的电影改编，依然是好事多磨更难成。他在西安还做过几项与影视相关的文化活动，我记得大约有两次约我参加，电话里还是很结实的关中民间话语：“你来给老哥轰摊子！”“轰摊子”也说“轰场子”，凑热闹气氛的用语。我自然都去了，真是为他的文化活动轰摊子去了。心里其实隐约着一种弥补心意，即他想将《白》改编电影终究不能如愿的遗憾。

天明突然谢世，撂下他正在图谋的新的艺术创造的事，多为遗憾。然想到事业型的人大都在一息尚存时，总是淡漠不了新的追求；依着他已经创造过的堪称辉煌的业绩，足以告慰人生了。

2014年5月5日 二府庄

生命禁区里的生命壮歌

——我读《阿里生死缘》

初拿到《阿里生死缘》这部纪实文学书稿，顿然便生发出神秘的感觉，大约是我对那方太过偏远的地域的陌生化反应，也可能是曾经听说过的相关阿里的点滴传闻留下的印象。及至读过谢恩主所著《阿里生死缘》，那种神秘的感觉不仅没有淡释，反而愈觉浓密了；我随着作者的足迹进入阿里的每一步，都是神秘里相伴着的惊奇、惊讶，甚至不无惊心动魄。

阿里是如我一样的常人所难以想象的地域。那里被科学家和人类学家断定为“生命禁区”，即使非亲身体验和感受，也能大体猜想生活其中的艰难。海拔四千五百米，高寒缺氧，一年里的八个月都是冬季，最低气温零下四十多度，空气中的含氧量只有西安的百分之四十。作为人生存的片刻也不能缺失的氧气，竟然稀薄寡淡到这种状况，外来人多有各种疾病出现，心肺肝肾都会发生病变，以至丧生。在这方三十四五万平方公里的“生命禁区”里，尽管人烟稀少到几百公里都见不到一个人，然而却仍然有九万人生活在这方地域的荒原和沙漠里。恶劣的自然环境注定了他们生存的艰难，与内地人快速提升的生活水准拉长了距离和差异，甚至依旧在原始的生存方式里挣扎，贫穷是普遍的生存状态。中央对西藏有对口支援的战略决策，陕西的援助对象是阿里地区，近二十年里向阿里派遣七批援藏干部，有力地促进了阿里地区经济的发展，使当地的藏族为主的群众的生存状态有了很大改善，生活得到提高，促成了该地区的社会和谐稳定和发展进步。谢恩主是陕西派往阿里的第六届援藏干部，三年时间里，走遍了

那方地域的各个角落，经历过不无生命危险的艰难困苦，创造了艰苦卓绝也称得上卓越非凡的业绩。我随着他的足迹笔墨，见识也感知着他的行为和胸怀，一种钦佩和敬重的心理情绪便自然发生了，且愈加深重，就是这位年轻干部的高尚精神。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钦佩和敬重的情绪的发生，年龄的差距不构成障碍，这是我面对尚未谋面的谢恩主这位年轻人的真实感悟。这种感悟自然来自《阿里生死缘》的阅读。我的阅读感想有别于通常意义上的对文艺作品的理解，更强烈的是一个人的精神境界的不俗，乃至高尚。

在如我一般常人的意识里，面对如阿里这样的“生命禁区”，多视为畏途，如果是作为一种体验式的短暂的观光走动，似无不可，而要到那里常驻三年，开展工作，经受在内地难以想象的困难，包括生理性灾变，更不要说照顾家室的事了。然而，谢恩主却是“兴冲冲地报了名”，要去西藏阿里作援藏人选。他几乎是毫不犹豫地作出这样的抉择，是出于这样的动机：“太安逸的生活总会慢慢消磨掉人的斗志，如今有机会，我何不给自己一个可能，去更难苦的环境中历练自己。这样即使老了想起来，也会觉得不枉此生。”这完全是一种自觉自愿到渴望性的选择，接受艰苦生活和工作环境的锻炼和磨砺，在今天普遍喧嚣着的享受生活乃至巧取豪夺的时风里，谢恩主的这种人生选择就见出一种高尚的精神，一种非同寻常的超脱平庸世俗的人生追求，确属难能可贵。正是出乎这样的精神主宰着的心理出使阿里，便有了克服和战胜不可预知的艰难困苦的思想准备；以这样自觉的高尚的精神作基础的思想准备，无疑强过任何物质的支撑，也完全可以信赖他的尔后的面对艰苦事象的行为决不会退缩。我尤为钦佩这种精神。

于是，我便看到谢恩主的独具个性魅力的作为，更见出一种对事业忠诚的情怀。他刚到阿里半个多月，噶尔县城加木村暴雨造成的洪

水致使三处毁坝决堤，淹没蔬菜基地和苗圃，县城机关驻地部队职工住房以及粮库都大面积遭遇水淹。在这样突如其来的灾害面前，谢恩主不听劝阻，也忘记了自己尚未适应高原气候的身体，不仅参与指挥防洪，而且身先士卒，“我赶紧跑过去帮忙，两个人抬着沉沉的袋子，把沙袋往车上搬……没有完全适应（指身体）但碰到这样的情况，干劲都非常足，劲儿仿佛一下子就比平时多了好几倍。”在险情刚刚被排除后，却发现同来的八个人缺少了三个，人说他们到别一河段去了，他坚持要找到他们同来同回，终于在河心的沙堆上发现被困的三人。他不无冒险地断然指定汽车到水浅处救出五人（另有两人）。这里，我看见的他已不是一位堂堂的宣传部长，确凿成为一个搬沙袋堵漏堤的劳工了。难能的是他不是作为一种姿态，而是本能性的反应所发生的行为，说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不受损害的意向，在他已是一种没有任何含糊的潜意识的本能性反应，而不是一时的激情，足以见出一个人的心灵的忠诚的本色质地。这种对党的事业的忠诚的体现，是他对工作一贯的一丝不苟的认真。党的十八大召开后，他受命带领援藏干部到札达、普兰、日土、噶尔四县的机关、学校、寺庙、乡村以及地直机关宣传十八大精神，深入到高寒地带的牧村，即使有牛粪火炉，仍然冻得手脚打颤，加了被子刚睡着又被冻醒。在这样恶劣的环境里，他点着蜡烛，又一再修改自己的宣讲稿。无论听众是机关、学校的知识人，抑或是少有文化的牧民，他都是一丝不苟地宣讲，单是他本人就宣讲过七场，受众达三千余人。为此他放弃了给援藏干部的休假。夜里盖三床被子仍然被冻醒，生理不适到牙龈充血，在内地人难以想象的艰苦到恶劣的自然环境里，依然保持着坚毅的精神和一丝不苟的工作作风，执着地把十八大党的声音传达到每一个干部、工人、牧民的心中，难得的认真。

这种对党的事业的忠诚，直接渗透在他的情感世界。为了从基础上惠及民生的务实策略的实施，谢恩主申请到一个纯牧区的羌变村驻队。这里的老百姓素以牛羊肉和藏巴酥油茶为主食，很少吃米面蔬菜，而素来不吃任何动物肉食的谢恩主，可以想见其生活的难。这且不论，他的用心却倾注到当地的牧民身上，他在调查养老院时，面对一位拉着他手的无依无靠的藏族老年妇人，他“被她拉得一阵心酸，我看她实在可怜，便把身上的两百块钱都掏出来给了她”。这个羌变村所在地区是一个严重的高寒干旱地区，吃水成为首要难题。他看到“一个小男孩拿手一下下缓缓从井里往外拉水的身影。一个藏族老妇人背着装水的木桶在山间踽踽独行的身影，不断地交错出现，渐渐模糊了我的视线”。我在这里颇为欣慰地看到，谢恩主面对当地牧民饮水的困境，亲自向上级打报告，积极争取，获得包括打井、种草等改善生存环境以及开办手工店等项目的三百万资金，任谁都会想到当地牧民即将绽放的笑颜。这里令我深为感触的是两个生活细节，一是给敬老院藏族老妇人赠送钱时的“一阵心酸”，一是面对藏族小孩和老妇人拉水背水情景时“渐渐模糊了我的视线”。面对生活在贫穷线上窘困无助的人民，作者“一阵心酸”又泪眼模糊，这既是一种生理本能的反应，更应是一种高尚的精神心理所驱使下的情感反应，太可纯洁也太可珍贵了。任谁都能感知到当今生活时风里对利益疯狂的追求和对弱势群体的冷漠。谢恩主既有个人掏腰包的资助，也有鼎力申报援助资金的举措，于私于公既显示着善意爱心，也显示着公务员承担的为人民服务的使命和责任。在当今各级党政干部普遍履行“接地气”的新的施政举措风潮里，我尤为感佩谢恩主的如上所述的两个细节，他和底层的地气不仅未曾隔断，而且接通的是心气和血脉。

谢恩主不仅写了自己在阿里援助乡民发展地方生产的经历，更多地记录了许多援藏干部和各项事业的工作人员的感人事迹。随便举两

项事例，一是阿里地区医疗卫生设施不健全，缺医缺药更缺血库，常常在发生需要给失血过多处于生命危急关头的病人输血时，由援藏干部献血，凡能与病人血型对上号的人，几乎没有人吝惜自己的鲜血。谢恩主在《白衣天使》中叙写了地区医院妇产科援藏大夫罗蒙的感人事迹，他也在危急时刻为病人献血。且不复述罗蒙的感人事迹，我却为谢恩主的笔墨呈现的胸怀感动，他总是关注罗蒙等援藏干部、医生等人的奉献精神和积极主动克服种种困难的事迹，可以见出作者自己的心境，说虚怀若谷当属恰当。再如《流动法庭》一篇里所记述的援藏干部中的法律工作者的事迹，让我看到，作者谢恩主总是能看到同行的一个又一个援藏工作者的种种优点，他们适应艰难环境里富于创造性的工作业绩，不仅赞赏，且十分敏感，足以见得作者本人见贤思齐的襟怀。

乐观的情感在极其恶劣的生存环境里尤为难得，也令人感动，在长冬无夏的阿里地区，出汗竟成了一项生理难事，洗澡没有条件，偶得洗澡或桑拿的机会，却因气压和缺氧造成有气难喘的痛苦，他却到种植蔬菜的大棚里蒸了一回桑拿，痛快淋漓地出了汗，而且幽默了一回："你为阿里做贡献（暖棚），我们靠你出大汗。"在他的驻地周围，全是石头和沙漠，在工作之余的闲暇时间，他的异想诗趣萌动起来，要种草栽花了，不惜到十几里之外抱土、刨沙翻地，竟然长出一片绿草，向日葵也开花了……一个全心奉献的援藏干部的精神胸怀是丰富多彩的，对绿色生命的精心培植，泛溢着浪漫诗意的乐观情调，可以见出谢恩主精神和内心的丰富，也是在阿里那个"生命禁区"里始终保持一种昂扬进取的姿态，且能创造卓有成效的业绩的一个重要因素，精神心理因素，是任何优裕的物质因素难得比拟的。

在《英雄之光》这一组纪实文学中，作者写了几位英雄和模范人物，有一九五〇年“进藏先遣连”总指挥的李狄三，曾被毛主席盛赞为“盖世英雄人民功臣”。有两次进藏工作且献身的孔繁森，就是在阿里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的。有和作者一起援藏的同志和朋友的张宇，给我的阅读印象是又一个孔繁森。有在西藏工作了二十三年的张建林，对西藏已经形成化解不开的情结，尽管长期与父母妻儿不能团聚，依然无怨无悔。有几位在西藏阿里工作的女干部，她们要克服较男同志更多的困难和麻烦，却都是兢兢业业恪尽职守。

我在阅读这些英雄的事迹时，感动是自然的，却又想到书写他们的谢恩主的文字里的深情。他对这些解放西藏、建设西藏（集中在阿里地区）的英雄模范人物的景仰之情，真挚浓重。我感知到谢恩主的精神崇尚和追求，对于那些为阿里人民做出卓越贡献和牺牲的英雄模范的人格的敬重和仰慕；即使是对普通的默默无闻的基层女干部，都怀着一种虔诚诉诸文字。这里，我看到书写者谢恩主的精神境界，是远离世俗流行的种种庸俗的高尚。

在《雪域风情》一组纪实作品里，作者写出了令我意料不及想象不到的阿里地区的社会风情和迷人的自然风光，藏民家中的传统摆饰，吃和喝的妙趣横生的风俗；神山、圣湖和鬼湖的神秘气氛里，蕴藏的是洗刷心灵污垢的向善的意韵；马背骑手的风姿和女人节、男人节的轻松浪漫的氛围，等等，读来如临其境，却也忍不住顿生惊诧，让我见识了一方地域独特美好的社会和家庭的形态，也对藏族同胞更多了解了。这里我又看到作者谢恩主的笔墨里呈现的细心。观察的敏锐，似乎更显见着艺术家的眼力。及至《高原精灵》这一组集中于高原各种家养和野生的动物的传奇性记叙和描绘，生动鲜活到如观实景，更难得在极尽动物各种情趣的描述中，弥漫着作者的爱心和悲悯

情怀……作者既得助于一双敏锐的文学的慧眼，亦得力于一支笔底的文字功夫，如此生动如此准确地又是绘声绘色地记叙描写，留下了独具个性观察和体验的一笔。

我颇觉欣慰，曾经向往西藏而终未成行的遗憾，在《阿里生死缘》的阅读里得到弥补，且相信比我走马观花式的匆匆去来获益更为丰富。

（引用文字均出自《阿里生死缘》。）

2014年5月27日 二府庄

哲思的诗性抒怀

——读张立散文集《树荣》笔记

拿到《树荣》散文集书稿，未开始阅读先有一番感叹，亦不无惊诧，因由全在我自身。认识且多有交谊也很久了，平时我读过张立的一些散文篇章，却是零散的，更是不经意间在某种报纸或刊物上“碰见”的，读时也觉得鲜活，颇有张立的个性化体验。然而，毕竟因为零散，也因为“碰见”的机会有限，便很难形成一种理性的总体的印象。想不到他竟要出版这样一大本散文集，又纠正了另一种错觉，总以为他忙于他的报纸副刊和文化的几个版面，自己的创作被挤对得很少，我在敬重他的敬业精神的同时，也为他太少的创作而抱憾。现在看到《树荣》书稿，不仅是慨叹之后的释然和欣然，也更有对他在繁忙的编务之余勤奋创作的敬重了。这是说他的编辑和创作的成就，心底里还隐约着一种乡情。他是蓝田县人，我生活的村子是市属灞桥区最东头的一个小村子，北边东边南边都是蓝田县辖的几个村子，和蓝田人打交道的机会似乎更多，包括我在小学的两年高小就是在蓝田县属下的一所高级小学读完的，我曾玩笑也很真诚地说过我算半个蓝田人，和张立就可以称得乡党了。他家居秦岭浅山，门前有自东向西的倒流着的灞河流过，不过二十公里便流到我家门前，确凿是同饮一河水了，这个乡党又生添了别一番情意。

更切实的惊诧和感慨，是对《树荣》书稿阅读的本能到情不自禁的反应，且伴随着整个阅读过程，无论是走南逛北的游记，抑或是素描体的人物速写，常有富于哲思的文字流泻出来，十分自然，成为一篇美文佳作的点睛之笔，也让读者的我顿然领悟作者铺叙到此的用

心。更让我发生上述的惊诧和感慨的，是这种叙事状物过程中显现的思想，即见出这是一个敏于事象不断发生思考的人，更在于这种思考的个性化特质，即属于独特发现并产生的独立体验，就决定了这种体验区别于庸常的鲜活性，也就注定了这些文字的生命力。任谁都知道，无论何种体裁的文本，无论多少万言的长篇大作，抑或千把字的短文，致命往往就在于作者生活体验乃至生命体验的独特和深刻。张立的《树荣》便显示着这颇为难能亦难得的亮点。在《家乡的炊烟》里，张立以诗性的文字倾情于“老家屋顶上袅袅的炊烟”，暂待后说那文字的诗性之美，而当我沉浸那乡村炊烟的神韵且唤起我儿时的记忆的时候，突然读到这样的文字：“人生在世，几十年光景，如果没有让炊烟濡染过，那才叫遗憾，至少人生是不完整的，生命的历程就少了一些根须，生活的情趣就打了折扣，怀旧的话题就索然无味……”老屋顶上弥漫的炊烟，成为生命的根须，这显然已经是张立独有的体验了，当属于从生活体验的层面深入到难得的生命体验了。在我有限的涉及家乡炊烟的文字接触的记忆里，似乎尚未见谁把家屋上飘浮的炊烟视若生命的根须。有了这样独特的体验，张立“老家屋院上的袅袅炊烟”就有了区别一切文字中的炊烟的个性化神韵了。再如怀念父亲的《父亲留给我的那把老镢》，其中作为作者集中叙写的父亲的那把老镢，也是农村出身的人家家户户都不会缺失的劳动工具，包括我自己，司空见惯别无新鲜。然而，张立在把父亲的整个人生凝眸在一把老镢上的时候，突然笔锋一转，父亲的那把老镢已经幻化为自己手中的一支钢笔了。他坦率而又直白：“如今，谁问我是干啥的？我大声告诉他，扛着镢头进城打工的农民！”我便看到他意识深处的人生底座，是父亲的那把老镢；依这把老镢作为人生底座，且不说创造和成就，单是人生的步履，当可相信不会旁逸斜出了。面对自己崇高的事业，依然是父亲那把老镢的精神：“我把报纸当作一块土地去耕耘……感到自己又成了扶着犁，吆着牛的一个农民……”由父亲的老镢，联想到扶

犁吆牛耕耘土地的农民，这也属于作为报纸编辑的张立的独特体验了，读者尽可以理解他的敬业精神和创造性思维了。这种思想的火花，即使在游山逛景的文字中也时时迸出，诸如两组写新疆山水风情和西藏等地地域特色的散文，处处可见张立敏锐思维所结晶的颇有力度的精彩的哲思文字。

《树荣》集里有一组素描体的人物速写，多为文学艺术界卓有建树的大家，国画家赵振川，资深文学编辑张守仁和吕震岳，文艺理论家肖云儒，作家方英文，摄影艺术家杨小兵等。让我颇为兴奋且感幸运的是，如上列举的这几位大家，在我不仅耳熟能详，而且多为交谊甚久的朋友，未读张立描述他们的文字之前，他们已经生动在我的眼前了。我的阅读兴趣的兴奋点便骤然发热，张立所写的某某和我印象里的某某有何差异，尤其是他还写了那些我尚不知的有关某某的趣事秘闻。我的阅读期待得到了满足，他笔下描写这几位大家的文字，把他们各具风采的个性化形象跃然纸上，不仅加深了我原有的印象，更感受到生动鲜活的人格魅力。（于是我突然想到，有如此刻画人物的文字功力，写小说当会如何？就我的偏见而言，小说人物的刻画，比之真实人物的描写的空间更自由更阔大，可惜张立这一支笔了，暂且不赘。）再有一点，是对这几位大家艺术创造的成就，有一种高屋建瓴的评说和概括，着重他们各自的艺术追求的个性化特质，以及在某领域所获得的别开生面也别具一格的开创性艺术成就。张立在叙写这几位大家的艺术成就的同时，写到他们各自走过的不同的艺术追求的途径，而矢志不移的唯艺术为神圣的精神心理却是相通的，每个人都是几十年的坚守，坚守的是各自追求的艺术境界和艺术理想，不断调整不断跨越的脚步，历经的艰难自不必说，抵达一种新的创造境地的成就就会使我一次又一次感动了。我不再复述这几位大家的创造事迹，有张立的文字在。我却在张立叙写这几位大家的文字里，领悟到

张立对人（几位大家）的理解，所显现的写作者的精神和道德崇尚的倾向。

《消逝的与未曾消逝的》写的是作家兼翻译家张守仁和编辑吕震岳的往事，不是全面记述其人生业绩，仅以张守仁得吕震岳扶助发表散文处女作《杜城抒情》攀上文坛为话题，既写了张守仁成为作家兼翻译家仍深念吕震岳的知遇之恩的感人的感恩情怀，也写到吕震岳一贯倾心倾情地发现年轻作家的编辑作风，我也是受益受惠者之一。张立对张守仁和吕震岳的品格定位为“他们身上闪烁着传统道德情操的优秀品质”。面对张守仁和吕震岳，张立反躬自审，关于人生的哲思可以说是振聋发聩：“时光犹如逝水一去不会复返，即使记忆过滤掉生活里曾经发生过的许许多多的东西，然而，过滤不掉珍藏在心灵深处的时常给人以希望和力量的人和事，消逝的就是不该保留的，而留下的却永远不会消逝，这也是生活的辩证法。”这是张立的道德倾向，不见一丝含糊。在《肖云儒的那根香肠》里，张立以简约的文字叙述了文化学者肖云儒学术研究的非同寻常的足迹和堪称辉煌的成就，归结为一句形象化的比拟：“他像一节意大利香肠，被人一节节切去，现在所剩无几了，将来只剩下一点绳子了。”这是肖云儒自拟的喻体说给张立的，我和张立一样深有感慨。然而，我这里更感动张立对肖云儒这节“意大利香肠”的理解，是对一个专注于学术探索也倾情于为大众奉献的人（即肖先生）深层的理解；而能发生这种深层的理解，也就见出张立对事业追求和奉献社会大众的精神倾向了，也让我理解了他如前述“把报纸当作一块土地去耕耘”的情愫了。一个是甘愿被一节节切去的香肠，一个是自觉把报纸当作土地精耕细作的农夫，他们的精神境界和心理情怀是相通的。在《实力派方英文写真》和《瞬间凝固的情味》两篇人物速写中，张立似乎以信手拈来的一个又一个独具个性化的真实生活细节，把作家方英文和摄影艺术家杨小兵活脱脱推到我的

面前，那些意料不到的语言和行为的细节令我哑然失笑。（这里我又忍不住要说张立对人的观察和书写的敏感和文字的功力，创作小说当属水到渠成的事，姑且缓说。）我在这两篇人物速写中，依然感知到张立对书写对象方英文和杨小兵的理解，真诚而又凝重，却是那些令人失笑的生活细节酿成的别一种艺术效应。大约是他和方、杨两位供职在同一个媒体单位，朝夕相处，互相了解自不必说，可贵在于对同事所从事的事业所取得的成就的敬重，以及对他们追求创造的精神的深层理解。他说他读方英文的小说，“读了便有种惘惘然的感觉，委实因了其情绪的漾动思维的魅力以及字里行间深蕴着潜伏着某种意趣。故而，读着他的小说，心头老是充斥着什么，激动而难以平静……”我以为这是张立独有的阅读感受，也是真实而又达到心知意会的深层感受，较之那些早已令人不耐烦的廉价吹捧文字更可靠……读着这一组人物速写，加深了我对这些并不陌生的作家艺术家成就和创造精神的了解，也领悟到写作者张立面对生活面对艺术的精神追求和审美倾向，更有人格，对张立的感知也深了一层。

《树荣》集的文字色彩，近乎让我有着迷的阅读享受。过去靠“碰”在报刊上尝读张立散文随笔，虽有一时的阅读快感，终难形成总体印象。这次对《树荣》集的阅读，直接感受是着迷是享受，确非溢美，而是真实的阅读感受，自然也就对张立的语言有感知了，稍作梳理，便见得这种张氏语言的几种美的色彩。

一种精微细密的语言文字，多见于形象的描写，逼真的景象呈现到读者眼前。譬如《树荣》里的那株老槐树，从根到茎到枝到叶，都有不同于别一棵槐树的独特姿态；细密处可见到“皲裂……翻卷着”的树皮，更有寄生其中的“蚂蚁、蜘蛛、蛾子，还有吊线虫……”这自然得自于作者细心的观察眼力，更得益于精微精到的文字。在这样的描

写文字中，我感受到一种语言的动感，即把作者自己触及的老槐树的每一细节时的感知和想象一并展示，这样不仅避免了常见的写景状物时的文字僵硬的弊端，也甚为鲜明地张扬起张立的个性。一种诗性浪漫的语言文字，多见于大漠荒原草地湖山的描写。随着张立的文字所展现的脚步，我也如同走进新疆、西藏那些“遥远的地方”，我强烈地感知到一种诗性激情的喷涌式抒情。面对沙漠，面对胡杨林，面对草原，面对天山，面对……作者处处都有诗性的文字直抒出来。作者的这种诗性语言，更得益一种形象化的比拟，随意举一例，同样是南疆的两条河，对塔里木河，张立的感受是“一条伟大的母亲河”，而对孔雀河，却拟人为“是一位健康、活泼、泼辣、自信的黑皮肤维吾尔族姑娘”。敏锐的文字神经所激涌的诗性语言，也就展示出作者的内里情怀。一种平实质朴的语言文字，却又隐存着幽默和睿智。平实质朴也是一种语言美，张立文字的平实和质朴，有一种如同和人当面对话的感觉，少有修饰，如实道来，这也是一种难得的语言境界文字功夫，《陕西补胎人》中尤为体现。正是这样平实质朴的短短几行文字，把一个在路边靠补胎谋生的陕籍妇人写得活灵活现。在这种平实质朴的文字叙述中，让我意料不及的是，突兀出现的一串极富幽默韵味也极显睿智的文字，如同缓流中暴起的浪花，往往令我哑然失笑，之后又忍不住再品读那些幽默睿智的文字，《藏路心影》等篇里也多有这种妙语。一种儒雅别致的语言文字，恰切地适应着描写对象的气质。试读不足两千字的《肖云儒的那根香肠》，姑且不论用如此简短的文字概括了肖云儒这位学者的生活历程（前文已涉及），这里要说的是张立的另一种笔墨，即儒雅之气，这无疑是书写对象致成的文字选择。

我对《树荣》集的语言文字有如上四种阅读感受。同样是张立一支笔，不同的篇章呈现着各自不同的文字风采，让我又一次相信某种创作规律，面对不同的各种各样的自然景象社会风情和社会角色，作

家自觉乃至本能地就会选择适宜其景其情其人的语言去书写；而能写出种种适宜其描写或叙述对象的优美文字，当属一个作家成熟且富独立个性的创造的体现。我倒是顿生期待之情，愿这样多姿多色的美文，能更多地从张立笔下诞生。

2014年8月5日 二府庄

我去你来无尽意……

——怀念贤亮

贤亮谢世已有两月，他的影像和声音，仍然时不时地映现在眼前鸣响在耳边。往常里没有这样频繁现象，确凿是在得知他不幸谢世的那一瞬，心脏和大脑顿时发生轰然崩塌的感觉之后，他的到老依然不失俊俏的面孔和耳熟能详的声音便频频出现。

再再追溯记忆，还是难得确定何年何月在什么地方有幸结识这位仰慕已久的作家，却清楚地记着阅读他的发轫之作的情景。那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的事，他的《灵与肉》《绿化树》等作品相继发表，我都是他最虔诚的读者。我说虔诚而不想说震撼，是想避讳这个业已被滥用的词汇，尽管这种撞击心灵的震撼常常让我闭目掩卷，且独自沉吟着竟然这样竟然这样……我不必对他的小说再做评说，多年来专业和业余的评论家早已有定论；我只想说阅读他的小说在我产生某种意料不及的心理反应，再不诉说自己生活历程中遭遇的挫折以及难忘的饥饿记忆。道理再简单不过，看到他作为右派被改造时的灾难，我的那些挫折就算不得什么了；他在那样不堪的境遇里竟然钻研马克思的《资本论》，而我却在挫折发生时自暴自弃，把玩车、马、炮打发时日，精神境界之高下和胸襟之宽窄的对照，就令我不仅汗颜不仅难得自容，最直接的心理反应就是再不要说自己遭遇的那点挫折和困窘了。再，我在他的文字里，处处能够感受到一种诗性的天才的神韵。随举一例，章永璘在接过马缨花给他的一个死面馒头时，他发现了她留在馒头表皮上的指痕，且有这样的文字描写：“它就印在白面馍馍的表皮上，非常非常的清晰，从它的大小，我甚至能辨

认出来它是个中指的指印……”我读到此，颇生诧异，年复一年都处在食不果腹饥肠辘辘的章永璘，在得到白面馍馍时该当是猛咬大嚼才对，怎么会有别一番怡情的发现和欣赏？如若是我，早已迫不及待地吞嚼了。稍过片刻便有意会，这个章永璘不妨当作张贤亮，大约只有张贤亮才会有此发现有此怡情，在于他有一根对文字对异性美尤为敏感的神经，对白面馍馍表皮上的马缨花的指纹的发现就是很自然的事了，欣赏的怡情也就泛溢出诗性的浪漫了。我便为张贤亮庆幸，那样不堪的凌辱与折磨，摧残着他的肉体和心灵，而那一根敏感文字的神经（通常说天才）依然保持着敏感，不仅深化着他的生命体验，也使他在摘帽翻身的几乎同一时刻，便能抓起笔来书写出独特体验的文字……

和贤亮结识的许多年里，每年至少有两次聚首见面的机缘，即中国作家协会每年年头召开的全委会和年中召开的主席团会，印象里他很少缺席。印象深的一点是，无论会议讨论什么议题，他都有令人耳目一新的见解，会场顿时便呈现静寂的气氛，足见得他的话语有非同凡响的效应；又会突兀爆出一阵哄堂大笑，那是他的一句幽默妙语激发出来的。印象深的另一点，他是烟民，常常在烟瘾发作时到会场外的抽烟区去过烟瘾，我也就有和他相聚的更自在的空间。不单是我，烟民们和他在抽烟区相遇，很自然地便形成了他的话语中心，随意聊着的多是生活现象的话题，他一插话发表看法，多以幽默的话语发出别开生面的见解，令人在哄笑声中感知一种个性化的智慧……在匆匆而过的时月里，有幸和贤亮有过两次较长时间的相聚，可称作我去他来。

我去是说我去宁夏。一九九八年秋天，宁夏文联秘书长余光慧电话相邀，宁夏省委宣传部和宁夏文联宁夏作协召开创作座谈会，邀我

参加这个会议并和与会作者交流创作，在我尚未回应之际，余光慧已搬出张贤亮的名字，说她代张贤亮约我。我便玩笑说，有贤亮发话，我不敢不去。其实还暗藏私心，有机缘到贤亮的领地和他相聚，定会有收益；况且已闻他在宁夏镇北堡开发出一座影视城，我想开开眼界。我便去了和陕西“连墙”的宁夏。我遵照会议安排和宁夏与会的作家朋友和在校的文科大学生座谈文学创作，姑且不赘。某一日，贤亮约我到他已具规模的影视城参观，他开口便说他开发的影视城是：出卖荒凉。乘车沿途便看到沙漠地上一眼望不到边的荒蒿杂草。他大约说过，你们陕西有兵马俑有大雁塔有曲江池有法门寺有钟鼓楼有……可以坐收海内外游客的票子，我在这儿却“出卖荒凉”。他领我参观了曾经在此拍摄过的多部电影电视剧留存的景观，说了一件件拍摄时发生的轶闻趣事，言谈间洋溢着成功地出卖荒凉的得意与自信。他很得意他的出卖荒凉的思路，几乎是不断重复申述出卖荒凉这个纯属他的思维创造的词汇。他领我来到一架摄影机前，是中央电视台的一位记者要报道他的镇北堡影视基地，也说影视城，让我说说观感。我便由他的出卖荒凉的思维谈我的感受，这是张贤亮的思维，一种超常的独有的思维，当属别开生面的创造性思维了。通常的包括我在内的面对这种荒凉时的感受，多是一种无奈的慨叹，很难想到会有出卖的价值。贤亮开玩笑说，感谢给他做了一次广告。我也玩笑说，尽管免费为你做广告，我却要感谢出卖荒凉思维的启示。

大约在这天夜里，我写了《贤亮印象》的一首诗：千里驱车我拜佛，白沙尽头涌绿波。绿化树下人变鬼，菩提荫里血祭国。游遍千山自成仙，爱到极处生恨歌。且唱且走塞北地，大风再起过黄河。尽管浅白不敢称七律，却见得真诚和钦敬。其中的“绿化树下”“菩提荫里”是说他的大作《绿化树》和《我的菩提树》，末尾的“大风再起”是说

导致他罹难的发轫之作《大风歌》。这首即兴拙作，当时是否给他看过，已完全无记，今日公布，愿他在天之灵一笑了之。

他来是说他来西安。这是七年后的二〇〇五年六月下旬，西安几位文化人策划成立“白鹿书院”业已完成，让我约几位熟悉的作家朋友莅临成立仪式，并在“白鹿论坛”讲演，主题是文化，那时刚刚兴起文化热，便有这样的主题。邀请外省的作家和文化学者中，主办人让我邀约张贤亮、从维熙、熊召政和张曰凯，我很忐忑，知道他们都是忙人，不知大驾能否光临这个民间文化论坛。让我庆幸的是，四位大家都乐意来，我在兴奋中也觉得颇有面子了。四位作家无疑是整个活动中最受关注的亮点人物，其中重要一项活动是在刚刚开设的“白鹿论坛”发表关于文化的讲演。“白鹿论坛”设在地理上的白鹿原上的一所民办大学里，四位作家和所有与会学者乘车上了白鹿原，对于西北这种特殊的“原”的概念就不再陌生了。四位作家各具演讲风采，阐述自己对文化尤其是传统的儒家文化的独到见解，赢得听众的理解和赞赏，这里只说贤亮的精彩演说观点。

贤亮不拿讲稿，侃侃而谈，先问“究竟什么是文化”，然后不无调侃地自答：“从羊肉泡馍到葫芦头也都是文化”，“现在文化特别泛滥，文化是个筐，什么都往里面装……”他直言不讳地指出文化热里泥沙混杂的现象，然后坦率标示自己的观点，“我得出的文化是一个时代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产生的一种思维方式。”他强调“文化对民族很重要。文化是一个民族的DNA，一个民族的基因”。他以历史上蒙古打败西夏国后不是对西夏民族在肉体上的消灭，“而是把所有文化载体全给活埋了”的史实鉴证，西夏的党项族便融入了汉族和回族等民族，可见文化乃是“一个民族的基因”。他对中华民族的文化演变的历史是高屋建瓴的概括，“具有活力和再生能力，我们的汉族曾被许多民族统治

过，而所有的外族都曾被我们的民族文化同化；我们又吸收了许多外族文化，形成一个中华民族的文化，得到了更新的发展。”他又从近代以来国势衰弱而导致的文化危机，指出“我们的DNA文化基因非常脆弱”，“现在所面临的种种问题全部都在我们的文化基因上……易染病症……带着它所决定的思维方式和行为方式”。关于我们文化的现状，他认为：“现在我们的文化DNA处于重组阶段，是百川争流，各显风骚的阶段。”关于我们文化的未来前景，他认为：“所幸的是，我们开始在西方文化、传统文化中摸索我们的文化。”他在此谈到他在某次传统文化研讨会上听到一种观点：“传统文化没有什么可讨论的，中国的落后就是由传统文化造成的，因为传统文化是农耕文化。”这些完全彻底否定传统文化的说辞，是贤亮引用的。他直言不讳指明“这话有一定的问题”。进而申明自己对传统文化的观点：“中国的仁人志士，包括鲁迅所说的中华民族的脊梁，每个人都是传统文化培育出来的。”他指出现代的人“既差传统文化，又差西方文明”，重组而且构建传统文化的DNA，是“建设一个和谐社会和现代化的中国”必不可缺的……

且不说他的见解对我的启示，更直接的是情感因素，即是把一位在我敬重的堪称伟大的作家的声音熔铸进古老的白鹿原上。

贤亮那次来西安，除了参与“白鹿书院”成立和“白鹿论坛”的活动，更多的是被社会各界邀请参加多种专题集会，多家媒体的采访对话，所到之处，读者拥挤，末了乘兴为主办者挥毫题辞，在西安曾引发一种社会轰动的效应。我在几次陪同的场合，感受到的却是他的作品的深层影响，更是无可估量的广泛，人们是和我一样读过《绿化树》等杰作之后就认识并记住了他。这样，我便在悲伤他离去的同时，也增欣慰，他和他的章永璘们早已储入万千读者的记忆，永远不朽。

2014年11月30日 二府庄

路遥和他的《平凡的世界》

路遥最重要的文学作品《平凡的世界》，随着电视剧的热播，再一次进入大众视野，而且迅即受到广大观众和读者的欣赏和呼应，这是一件值得深思的事情。《平凡的世界》所描写的年轻人生活成长的基本环境与今天相比，已经有很大的甚至质的不同，却依旧能引发今天的乡村和城市广大读者观众的情感共鸣，并对他们发生价值和情感的双层影响，这样就奠定了《平凡的世界》的史诗品格，抑或说经典性作品。

坚持现实主义创作精神，丰富并开拓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是路遥始终不渝的艺术创作理想。路遥说过："现实主义在文学中的表现，决不仅仅是一个创作方法问题，而主要应该是一种精神。"这种精神在我理解就是依循现实的客观逻辑，再现和表现生活直面人生。早在他创作《平凡的世界》之前的一九八三年春天，我们一起到河北涿县参加中国作协举办的"农村题材小说创作座谈会"，路遥在大会交流发言中阐释他的现实主义创作主张，末了有一句让我至今不忘的警句："我不相信全世界都养一种澳大利亚羊。"这句话的社会背景是，刚刚开放不久的中国文坛，一下子把近一个世纪的各种文学流派招引进来，现实主义开始遭遇被看作是落后过时的创作方法。路遥这句机智幽默的比喻，不仅见得他的睿智，更见出他对世界追求的独立个性和禀赋。几年之后《平凡的世界》的面世，在读者中引发了广泛共鸣，而且更难得它在三十余年中经久不衰，足以见得现实主义的活力和魅力。路遥的《平凡的世界》不仅是他的现实主义创作理想的完美实现，更在于对当代文学的现实主义创作提供了标本和示范，极大地丰富和发展了现实主义的内涵。

生活是文学艺术创作的源泉，路遥用自己的整个创作生命书写了这句至理名言。我们习惯说陕北路遥和路遥的陕北，那是他的生生之地，体验是直接的；更难得的是他在个人身份发生变化之后依然扎根立足陕北，从乡村到县城，从窑洞到矿井，继续着他的体验，这种直接的体验无疑是路遥独得独有的，也是成就他创作的独特风景的关键。在创作《平凡的世界》的准备阶段，他读过近百部各种风格的长篇小说，无疑是汲取营养，丰富现实主义；又翻阅了十年来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参考消息》等资料，系统了解历史、政治、经济、文化的纵横脉络，以便理解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发展脚步……这样，便铸成了不朽的史诗《平凡的世界》。

2015年3月24日二府庄

对话

作家要有使命感

——答裔兆宏问

裔兆宏：您在《白鹿原》之后，几乎没有新的长篇小说问世。而现在一些网络写手，三个月就能出长篇；出版界更是如此，一部看似洋洋大观的读物不足一个月就可推向市场。您认为当今的中国文学作品还是否需要底蕴、厚重、深度?

陈忠实：我觉得对于作家来说，文学作品，尤其是长篇小说，应该是源自于个人的生活体验。《白鹿原》凝结了很多我个人的生活经验，可以说，它是我生命的提炼。当然写作是很自由的状态，不同的作者有不同的创作方式，我不想评论别人的写作方式好不好。我只能说，让我三个月就出一本书，我做不到。

至于底蕴、厚重、深度这些词，我想它们都跟我们这个民族的历史有关。中华民族号称五千年的文明史，这段五千年的文明史实际上是一部沉重的历史。从“三皇五帝”的神话传说到秦始皇统一中国，从“五代十国”再到元明清时代，中华民族不断发生的分裂、统一过程，这个历史本身就很沉重。即使到了近现代，这种状况依然存在，从鸦片战争到辛亥革命，从五四运动到抗日战争，从新民主主义革命到十年动乱的“文革”，几乎在二十世纪前半叶的中华大地上，所发生的事件本身就是沉重的历史。作为一个有使命感、责任感的作家，如果要

涉及民族命运，你要写这样的过程就不可能轻松。这是因为不是你要沉重，而是民族本身就沉痛、沉重，我起码是这样的感觉。

畜兆宏：您曾说过《白鹿原》是没有续集的，那《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创作手记》产生的背景是什么?

陈忠实：我是不会写《白鹿原》续集的，因为我对那段历史的感受已经完成了。我一直认为，作家在作品写完之后，就不该再说作品之外的话。在我已经出版的六十多种小说、散文、选本和文集之中，除了编辑要求，我很少写序言和后记。作品就让读者去看吧，文学圈内的作家、评论家，也任他们去审读。作品里头所包含的东西，相信读者和评论家都能理解，都能完成这个交流，所以没必要再写了。但在朋友们的劝说下，我还是在《白鹿原》出版十六年后，写下了这本《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白鹿原〉创作手记》。

实际上在《白鹿原》出版以后，就不断有人跟我约稿，希望我将《白鹿原》背后的故事写出来，也有出版社邀请我写自传，但我一直没有动笔。我认为，作家生命的意义就是创作，作品就是作家的传记。但在盛情难却之下，我答应试着写一下创作手记。对创作的理解，作家和读者的角度是不同的。作家把人生体验形成一本作品——跟读者交流的作品。如果你的作品没有表述出来的东西通过其他方式表述出来，那不算数，因为作品没有表述出来，读者感受不到。当时我还有一个心理，就是和我同时代的每一个人都经历过国家的经济困难和政治灾难。在农村，这种苦难可能就更深重了。我高中时的好多同学，吃的苦不比我少，有的写作能力也不比我差，但是没有人去找他们写自传，让他们把自己受的苦表达出来。为什么要找我陈忠实写自传？无非就是因为我写了几篇小说嘛。所以我觉得没有必要这么做。

我对于《白鹿原》的创作激情是至今难以忘记的。一九八五年，我开始创作中篇小说《蓝袍先生》的时候，开头写的是解放前一个关中乡村的小知识分子的家庭。这个乡村私塾教师家庭的背景，把我幼年乡村生活的记忆一下子就打开了！这些回忆给我带来了很大冲击，朦胧地意识到其中有着挖掘不尽的故事，于是我就萌生了创作长篇小说的想法。此后，我开始研究西安周边一些县城的县志。解放前蓝田县最后一部县志的主编，就是《白鹿原》中的朱先生。县志中有五六卷是记载贞妇烈女的。第一页记载的是某某氏，她十六岁结婚，十七岁生子，十八岁丧夫，然后就是抚养孩子，伺候公婆，完成一生。这是我记忆里的妇女生命史。往后的一个比一个文字少了，排在最后的竟然没有任何事实的记载，仅列一个人名字。翻了几页，我就推开了。可是，就在推开的一瞬间，我突然意识到，这些女性，用她们的整个生命过程，才换取了她们在县志上就四五厘米长的位置。可悲的是，后来的人没有谁愿意翻开它。随后，我又把县志拿过来，一页一页地翻过去。当时，我就想算是向她们行一个注目礼吧。

很多生活中其他方面的事情，时间长了我都会淡忘，不过有关写作，特别是《白鹿原》的准备、写作过程，我不敢说是刻骨铭心，但过了十几年淘汰不掉的，都成了永久的记忆。

《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这本书只是我写作的感受，距离自传很远，因为基本没写个人的生活经历，最多就是涉及《白鹿原》创作时的一些生活。

裔兆宏：您认为文学创作经历过程中最痛苦的是什么?

陈忠实：每一个不同阶段，都有不一样的痛苦。我感觉在选择新的艺术创作之前、还没有找到途径的时候，那就是最痛苦的时候。这

在我的中短篇的写作过程中也都发生过。

裔兆宏：有很多社会职业是遗传的。比如我们发现最多的是画家，最少的则是作家。为什么作家承传这个职业的很少，木匠等工匠都很多？您的三个孩子中有没有当作家的？

陈忠实：最重要的原因是我发现文学创作不是技术，应该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仅凭一种概念上的学习是不可能的，它更多的是凭个人对社会生活的感悟和体验。我的理解是，作家的天才是一个很难理解的概念，我把它物质化一下，就是一个人对文字敏感的神经，这根神经可能从很小的时候就产生了。

是父母给了子女那根对文字敏感的神经。要知道，一个对数字敏感的人很可能是对科学有兴趣的，而对色彩敏感的人可能会成为画家。像钱锺书考大学时，他的数学成绩极差，但考大学的文章却写得很好，可见他对文字是敏感的，对数字是麻木的。你要让钱锺书当数学家，他的世界就不会精彩。还有一个例证，作家的许多子女之中，可能会有一个成为作家的，不是父母对那个孩子的影响的结果，而是他生来就有一根对文字敏感的神经，那根神经就是天才的物质化。鲁迅、茅盾、巴金、郭沫若等大家子女的人生选择都是如此。即使是画家的遗传人，如果没有创造性，那也是不能成为真正的画家的。所以我的子女中没有人成为作家也就不奇怪了。

2010年4月 二府庄

作家都在思考这个时代

——答《江南》杂志黎峰问

一、《白鹿原》每年都在印刷

黎峰：《白鹿原》刚刚出版时，洛阳纸贵，书店很难购得。据说当时西安街头，汽车司机如果违章，驾驶员只要送上一本《白鹿原》，交警便马上放行。能给我们谈谈《白鹿原》当年热卖的情况吗?

陈忠实：要说当年《白鹿原》热销的事，在我既有恍若隔世又有如在昨天的感觉。应该感谢西安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他们在一九九二年第六期《当代》上看到《白鹿原》书稿的前半部分时，便决定播出，于一九九三年春天一前一后播出，听众反响很大，无疑是最好的宣传。我可以负责任地说，在《白鹿原》出版前，只在《陕西日报》发表不过两百字的消息，告诉读者关于《白鹿原》在《当代》发表和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书的时间，再没有任何的宣传手段，更说不上炒作。到一九九三年八月初，《白鹿原》在西安上市时，新华书店约我为读者签名售书，正值西安酷暑时月。我赶到书店门口时，看到排着望不见尾的购书队列。从早晨八时许签到中午一时，简单吃过午饭接着再签，直到下午五时左右收场。这是我平生签名时间最长、签得最多的一次。我不仅不感觉疲劳，反倒感觉在乡下祖屋从构思到完成这部小说的六年时间里所聚集的期望，在这一天完全实现了。此后热销恕不一一叙说，倒是可以列举印刷数字来看看当年的情景，初版初印不过一万四千八百五十册，这是全国征订数字，

接着便五万册再十万册连续印刷，到年末大约连印七八次。盗版书是在《白鹿原》书面世不到半月出现的，随之便摆满了大街小巷的个体书店，包括街头书摊，也包括公家开设的国营书店。那时候我常为找上门来的热心读者签名，在我接待签名的书中，各种盗版本约占七成。起初我坚持不为盗版本签名，后又想到读者是无辜的，我便改变态度照签不误。我前后大约收集到二十余种《白鹿原》书盗版本，乃至我的所有中、短篇小说的盗版集子。令我更为欣慰的是《白鹿原》的长销，进入新世纪的十年，几家出版社出的几种版本的《白鹿原》书，每年都在印刷，通常在五六万册。去年是印刷量较多的一年，大约十余万册，起码证明读者尚未厌倦这部小说，这是我最为欣慰的事。

黎峰：《白鹿原》的成就不言而喻，今天连最边远的农村小镇都能买到《白鹿原》。到现在为止《白鹿原》卖出了多少册？大陆以外的版本有哪些，反响如何?

陈忠实：我一时难以累计各种版本的数字，正版书大约有二百万册。大陆以外的版本，最早出版的是香港一家出版社出的竖排繁体字版本，大约在《白鹿原》面世后两三个月就出版了。我在一九九五年访美国时，在两家华人开的书店里都看到这种港版本的《白鹿原》，同时也摆着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的《白鹿原》。台湾先后有两家出版社出版过《白鹿原》。外文版最早翻译出版的是日本一家据说较大的出版社，日文版《白鹿原》分为上下两册，精装本。随后，韩国翻译出版，竟分为五册，厚厚一摞。越南一家出版社出了越文版，未与我打招呼，是我认识的一位在北京留学的越南学生给我带来一本越南文本《白鹿原》。越南那时尚未加入世界版权公约，如同我们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一样，可以翻译出版世界上任何作家的作品。法国一位华裔

学者正在用法文翻译《白鹿原》，前不久电话告知剩下最后三四章，翻译完成还需再修改，乐观地估计年末出法文版《白鹿原》，可靠说来就明年了。英文版在美国翻译出版很不顺利，有两三家出版社谈过，曾有一家出版社想出，待看过前两章翻译文字后（一位美国女汉学家翻译），便谢辞了。给我解释的因由，是《白鹿原》书文字太长，翻译成英文后文字至少增加一倍，出上下两部会有较贵的售价，担心亏本。我却想到还有另外的因由，不便告诉我，用销售市场的前景估计这个话推辞，大约是为作者我易于接受。

黎峰：二〇〇七年，我参加全国青创会，南方某家大型文学刊物的编辑对我说，当代的中国作家留给后世，传承下去的作品屈指可数。他说《白鹿原》在中国当代文坛上，毫无疑问是小说丛林中的一棵大树，是文坛上一座风光无限的高峰，至少能再传一百年。对于这部作品的广泛的社会影响和它今天的地位，作为作家自己你怎么看?

陈忠实：我不敢设想一百年后的事。依着近十年来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简直不敢设想二十年后的中国的城市和农村是怎样一番景象。经济的快速发展，直接影响的是人的物质生活质量，也影响更广泛的人群文化教育的提升，人的审美和情趣必然会发生很难预料的变化。上世纪九十年代我曾为自己买了一辆可心的自行车而兴奋不已，现在即使一个乡村青年也不会对任何名牌自行车感兴趣了，买汽车已司空见惯，更要看牌子。我还是幸运的，《白鹿原》书出版十七年了，读者还愿意买它读它，近十年仍以每年五万到十余万册的销量继续印刷发行，我已很欣慰了。起码可以说明，现今的读者还没有舍弃《白鹿原》。再过许多年后，读者还会不会问津《白鹿原》，在我真是不敢奢望的事。

黎峰：一直有消息说《白鹿原》将拍成电影和电视连续剧，大家也很期待。这个事情现在进行得怎么样了？上次魏心宏也说一直觉得你的《康家小院》要是改编出来，一定会是好的影视作品。请问陈老师对作品改编成影视剧的看法，对作家写影视剧本的看法。

陈忠实：《白鹿原》书改编电影和电视剧的事，说来话长，姑且不说。现在刚刚获得电影拍摄的批文，我祝他们成功。魏心宏很喜欢《康家小院》，多次对我说过适宜拍电视剧，却未被影视公司看中，也罢。我的几篇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都被改编成电视剧，反响平平。我不拒绝小说被改编成影视剧，变一种传播的方式，也是好事。就我写作的目的，总是希望多一个读者，改为影视作品，无疑扩展了和读者交流的渠道。作家写影视剧本是好事，也是作家多种才华的展示，但不是人人都能做。我做过，却做不好。

二、为自己造一部死时可以垫棺作枕的书

黎峰：你在《白鹿原》的题记上写了一句巴尔扎克的话："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白鹿原》出来后，评论家们说这是一部渭河平原五十年变迁的雄奇史诗。你怎么理解巴尔扎克说的"秘史"这两个字？在《白鹿原》的创作里如何实现了史诗的写作？

陈忠实：在我理解，秘史是相对于正史而言。正史是一个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的确切而又可资信赖的历史。秘史当为正史在这个民族的男女人群心灵上的投影，以及引发的各个不同的心理裂变，相对稳定的心理结构的破碎、颠覆，以及完成新的心理结构的平衡。这是一个痛苦的剥离过程，也是精神世界完成更新的过程。其中的痛苦和快乐，不是个别人的偶然事象，而是整个群体普遍发生的事。既然是精神和心理世界发生的裂变，就不会像正史考证史实那样判别是或非，

而是纷繁和多样，不同阶层乃至同一阶层的人，都会有各个不同的心理征象，更多地呈现着一种心灵的隐秘。小说大约就是揭示那种隐秘的。巴尔扎克把它称为一个民族的秘史。“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这句话，我是在《白鹿原》书接近完成时，读一篇论述巴尔扎克创作的文章里获知的。许是这句话正好切中我正在写作的《白鹿原》的意旨，许是又暗含着我当时的写作心态，所以竟然一遍成记，到写完《白鹿原》书要送出书稿时，便把巴尔扎克这句话题在书前。由此可见，我在构思和整个写作过程中，尚无明确的秘史这个概念，只是我对上世纪前五十年的白鹿原地区的生活体验和思考，暗合了秘史的意蕴。关于史诗，这是《白鹿原》出版后的一些评说。在我至今依旧不敢领受这样的好评。我可以坦白地说，在《白鹿原》从构思到写作完成的六年时间里，从来没有想过要写史诗的事。我要把史诗一开始横在脑袋里，肯定压得我就难以写作了。我说过“想为自己造一部死时可以垫棺作枕的书”的话，完全是为着大半生不能舍弃的写作兴趣，自然是面对自己的。我那时的心思只集中到一点，把我已经发生的关于这个民族命运的体验表达出来，以一种新获得的艺术体验去实现，不要因匆促非文学因素而留下遗憾。

黎峰：写作《白鹿原》你回到了乡下老家，我在一些你的访谈里看到你说你回到乡下是要“远离尘嚣”“耳根清净”等词，当时你要回避的是什么？

陈忠实：我想回到乡下老家的决定，是获得专业写作条件的一九八二年冬天做出的，不是为了写作《白鹿原》才回祖屋的老屋院。专业写作条件的荣幸得到，我的第一反应是时间可以由我支配了，写作从此将成为主业。我同时也意识到压力，作为专业作家如果写不出像样的作品，且不说别人如何议论，自己的脸上也难以承受。我要抓紧

这难得的专业写作的机遇，争取写出较好的作品。我在新时期出现的一茬陕西青年作家中，年龄偏大，就更浪费不起时间，便决定回乡下祖屋的屋院读书写作。城市比之乡村，既引领着最新的生活潮流，也杂拌着喧哗；即使文艺圈内，也难免厚此薄彼的是是非非，七长八短的议论，听了容易分心。我回到原下祖居的屋院，可以静心读书，更可以回嚼在乡村工作二十年的体验，形成作品。却不是清高。

黎峰：冒昧问一下，当《白鹿原》还没有写出来的时候，你在陕西文坛是否受重视？当时你的内心是否惶恐?

陈忠实：我一直受到前辈陕西作协领导和作家的关心，这不仅毋庸置疑，而且给我创作形成心理压力，写不出像样的作品，会使他们失望，压力很直接地转化为探索创作的动力。“惶恐”的心理反应出现过，那是在读过路遥的《人生》这部中篇小说之后发生的。我的直接感受是，这个比我小六七岁的同院朋友，已经把我拉开了很长一段距离。我那时正热心农村实行生产责任制之后农民心理的演变，而路遥却触摸到乡村青年更为普遍的人生追求。我由此而发生了对自己的创作思路的甚为严峻的反省。

黎峰：有个故事说你在创作《白鹿原》之前，对妻子说不弄个东西出来就回家喂鸡，是这样吗？你在《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里也写到，李星曾经激你说，再写不出长篇你就跳楼算了。

陈忠实：传言难免走形。关于回不回家养鸡的话，不是说在写《白鹿原》之初，恰恰是在写完之后。当时连我也有点六神无主，难以判断审稿的结果如何，妻子问我，如果发表不了咋办？我顺口说，那就办个养鸡场。其实这是我早已揪着心的事，养鸡也不是纯粹开玩笑的话，而是此前想到过的事。我已想过，年届五十了，写出的小说

（长篇）如果发表不了，那就很为自己这个作家难为情了。我想办个养鸡场，不仅增加经济收入改善生活，更重要的是对自己生活角色的调整，把写作重新调整到业余的位置，于脸面于心理会更平和。李星确实说过这句话，那是在一次会议上。那天早上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公布了“茅盾文学奖”获奖篇目，我尚未听到这个消息。会场里，我和李星坐在路遥的左边和右边。李星从路遥（正在发言）背后告诉我《平凡的世界》获奖的喜讯。隔过几分钟后，他又从路遥背后跟我说，你今年要是还把长篇（小说）写不完，就从这楼上跳下去。我一时被噎住，却也感动了我，他比我更着急。

黎峰：《白鹿原》应该是你创作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了，能请你谈谈在《白鹿原》里写作的一些技巧吗？你如何保持了那种大气、顺畅的感觉？

陈忠实：回想起来，在这部小说的构思和创作过程中，我几乎没有想到过“技巧”这个词。我竭尽全力着意在作品人物，前面已涉及这个问题，即每个人物的心理结构形态，能否准确把握不同的文化心理结构在白鹿原社会的重大事变中所发生的异变，才是外在性格的内在基础，它不仅呈现人物性格的差异性和生动性，更注定某种性格的合理性和可信度，且不敢想典型性。我把绝大的用心花在这方面了。自然还有情节的安排，也是循着人物心理结构变化的动向，给每个人物展示心理动向的一个恰当的机会。恰当在于合乎情理，却也可以偶然露出意料不及的横空一现。我在写作中常常斟酌，不同的心理结构的人物在其重大或者细微的情节里，写到怎样的程度才算恰到好处，什么情境下要不惜笔墨充分展示，什么情境下戛然而止不赘一词一句才不留下画蛇添足的蠢事，全在一种自我感觉中完成，很难用技巧的术语规范做量化的伸或缩。同样出于着重在作品人物的文化心理结构形

态的把握，我几乎没有明确给自己规范要写得“大气、顺畅”。在我对小说创作的体验而言，一部或一篇小说呈现的风貌，大气或者秀气，顺畅或者晦涩，制约性因素是作者要写的人物的精神品相所决定的，不是不管不顾人物而要独出心裁追求某种表达形式。自然还有人物生存的社会背景和生活环境，也是决定作品气象的重要因素，这些因素甚至决定作家对语言的选择。我是从鲁迅先生的作品中得到启发的。鲁迅小说的每一部，无论中篇小说还是短篇小说，其气象风貌不仅不雷同，而且独成一景。《狂人日记》的气象和祥林嫂的生命气场各自独成风景，这是各个人物不同的文化心理结构所决定的。不同文化心理结构的人物，直接影响到作家的语言选择，即必须找到一种最切合人物性情的语言。同样是鲁迅给我以启发，不可设想用写阿Q的语言再写狂人，更不可能写祥林嫂。鲁迅的散文，同样呈现着不同的语言景象，也是先生不同时期不同心境的语言形态。准确把握要写的人物的文化心理结构形态，寻找一种适宜表达这种形态的方式，包括语言，才可能使作家把独特的体验充分展示。这大约就是创造。

黎峰：你觉得长篇小说的创作跟年龄有关系吗？现在很多年轻人上来就写长篇，你有什么样的忠告？

陈忠实：一般的也是普通的现象，作家随着年龄的增长，知识积累会更丰富，生活体验和生命体验会更深刻，艺术以至笔墨会更老到。然而却不尽然，国外国内都有这样的创作先例发生，即某个作家恰恰是二十岁左右的时候完成了惊世之作，也造成了他一生的艺术创作高峰，不说别人，自己在随后的许多年创作中也难得跨越，像肖洛霍夫和他的《静静的顿河》。年轻人写长篇，着重在体验的深浅和独特发现，自然缺失不得艺术功力。这种事我不甚了解，还是作者自己

把握自己较为恰切。我不仅不能随便提意见，更不敢说忠告之类的话了。

黎峰：关于“陕军东征”当时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况？外界也有一些说法，说这是我们省上的自娱自乐活动，当时其实没有特别的影响。也正是因为有了你的《白鹿原》，后来“陕军东征”这个话题才被人常常地拿来说事。

陈忠实：就我所闻，一九九三年初在北京召开了一位陕西作家的作品研讨会，一位与会的评论家获悉有几位陕西作家的长篇小说相继在北京几家出版社出版，随口玩笑一句，这简直是“陕军东征”嘛。到会的《光明日报》记者也兼作家的韩小蕙女士，随之写的通讯文章的标题里就用了“陕军东征”这个提法，在《光明日报》发表后引起关注，也引起议论。我是从《陕西日报》转载的韩小蕙的文章得知这条消息的。我读后自然很高兴，为陕西文学创作的新收获庆祝。我对评论家说出“陕军东征”的口头表述完全理解，作为文学传播，我敏感到可能会有负作用，就在于那个“军”字，尤其是那个“征”字，可能会使人读来撑眼。无论陕西作家，无论南方北方的作家，大家都是文朋诗友，各自展示自己的作品，不存在谁征谁的事，我当即找到本单位（作协）几位有话语能力的人交换意见，并统一看法，我们自己不用“军”和“征”这两个字，用陕西文学繁荣或别的词汇表示。然而几乎无济于事，媒体和个人都在用“陕军东征”，我也只能徒叹奈何。我约略听到一些负面消息，也只能继续徒叹奈何，又不便释疑。

黎峰：看到近期的报道，说太白社准备出你的《李十三推磨》，这是一部新的长篇吗?

陈忠实：这是一本短篇小说集，收入新世纪以来我写的短篇小说。《李十三推磨》是其中一篇。这篇小说写的是清代一位堪称伟大的剧作家李十三的两个生活细节，也是被文字狱致死的细节。

三、行政级别的升迁对我诱惑甚微

黎峰：曾经看到一个书上说你的生活习惯是朝茶晚酒。能请你谈谈现在的日程安排和生活习惯吗?

陈忠实：茶还在喝。还是喝陕西绿茶。二十多年前内火旺，某些器官常发炎症，牙疼，大夫建议喝绿茶调节，并点名陕西绿茶。一试果然有效。一喝便喝到现在。酒在十年前戒掉了，改喝啤酒，习惯百威牌的味道。现在是早上七点钟起床，冬天晚半小时。起床后第一口是烟，第二口是茶。缓解过来后便到工作点上，写稿或读书，读的多是要写序或召开研讨会的书。晚上十二时睡觉，睡眠很好。参加一些社会公益活动，还有文学活动，力避以文化包装的商业活动，难免被多种因素挟裹，却还算迫不得已的少量。

黎峰：我现在还住在东郊的空工院，离陈老师老家西蒋村就六七华里，那里山清水秀，但离城市太远，常常也让人觉得是被城市隔绝了。陈老师少年时代那里是什么样的景象?

陈忠实：我家紧依偎着白鹿原的北坡坡根。上世纪五十年代全村不足四十户人家。村庄背后的原坡上，是一台一台的梯田，只种一料麦子。春天无疑是最富诗意的季节，麦苗的绿色呈现着起伏的波浪，荒坡上也是绿草。到六月收割过麦子，直到九月末再种麦子，长时间都是赤裸的土地。因为缺水源，收麦后种不得秋苗。山坡上是我的开心之地，给牛割草的后晌，常常陶醉在逮蚂蚱的快活之中。家门前是

灞河和不大宽阔的河川。这是养育生命的宝地，收罢麦子又种苞谷，一年两料基本保收，有灞河水的引灌作保证。灞河在平时清澈见底，游泳洗澡再好不过，可惜我没学会浮水。

黎峰：农村生活给你写作提供了什么？那时候生活和精神状态是个什么样子?

陈忠实：农村生活首先提供给我的是生存依托，依靠收获土地上的麦谷生存。传统文化、传统道德、传统习惯和风俗，完全在不知不觉，又不留任何痕迹的无意识状态下完成对我的影响和传承。我在少年时期没有任何自觉的反叛行为。我在进入高中读书以后，尤其是接触了国内外的文学作品后，往往会引发对我生活的乡村的人和事的反观。我和乡村人一样生活着，承受着生活的艰难，也有乡情友谊的欢欣。我后来进入社会，环境也是乡村。尤其是在最基层的公社（乡镇）工作了十年，还是在家乡的地盘上。我是一个最底层的干部，走出公社（乡镇）大门，看见的就是男女老少的乡村人的面孔。我那时候是完完全全的专职乡村干部，接触多种性格的乡村干部和群众，对家乡农村的了解和理解逐渐丰富。那个时候正是“文革”期间，我早已断了文学创作的爱好。这样反而因祸得福，我在乡村专心致志做事，做事的过程也就加深了对乡村生活的积累，倒是避免了以作家的角色深入生活、体验生活的局外人之弊端。新时期文艺复兴伊始，我预感到写作可以作为人生追求的事业来干的时候，便调离到相对比较轻松的文化馆工作，致力于写作这个人生兴趣。这时候和这之后，我越来越感觉到二十年基层工作尤其是十年公社（乡镇）工作经历的宝贵。我甚至感到，如果没有那十年公社（乡镇）工作的经历，很难设想我后来的文学创作是怎样一种景象，也很难设想会不会有《白鹿原》的创作。

黎峰：你是一个很谦和、很亲切的人，你保持着说关中话，比如你经常说“乡党”这个词，是什么样的意思？你觉得陕西方言有些什么韵味？

陈忠实：乡党就是乡亲，泛指老乡，一个村子的人称为乡党，出了省界整个陕西人都可以称乡党。陕西方言太过宽泛，陕西因差异甚大的地理环境分为三大块，陕北有游牧乃至匈奴的较为奔放的生活习性，秦岭南边的汉中和安康又类近于南方的风情了，渭河流域的关中是我的家乡。三大板块的人群生活习惯差异明显，说话的口音也相去甚远，方言也自成一体。我说的是关中话。我原以为关中话很土，后来却渐次发现许多方言的无可替代的韵味。文学写作的表述语言中掺进方言，有如混凝土里添加石子，会强化语言的硬度和韧性。我后来渐次明确，从字面上让外地读者猜不出七成意思的方言，坚决舍弃不用，用了反倒成了阅读障碍。近年间，我收到几种关中方言的考证文本，许多看似土得掉渣的方言俚语，竟然被语言学者在古籍文章中一一考证出来。我便感知到关中方言土语，当属中国语言的活化石，还存留在这方地域当代人的口语中。

黎峰：您的人生丰富多彩，早年高考的失败，后来当上了教师，后来又当上了国家干部。作为我们从农村出来的人来讲，这些都很不错了。那么你是怎样走上了文学创作这条道路？

陈忠实：我在初中二年级喜欢上了文学，并在作文本上写下平生的第一篇小说《桃园风波》，直到现在对文学创作都没有厌倦，依旧兴趣十足。一九六二年高考名落孙山，痛定思痛后决定，自修文学。人获得知识的途径，最理想也最便捷的途径就是接受高等教育，缺失了这个条件的我，只能选择自修，同样可以获得自己想要的知识，只是比正规的高等教育的途径更艰难许多。我那时给自己订下一个目

标，自修四年发表文学作品，我发表的处女作就是大学毕业结业证。我的努力没有白费，到一九六五年春天发表了散文处女作《夜过流沙沟》，提前一年多实现目标。我在“文革”中间放弃了文学创作，迫于无奈。新时期文艺复兴的一九七八年冬，我发表了短篇小说《南北寨》，一九七九年大约写了十余篇小说，其中《信任》获得年度全国短篇小说奖。我在一九八二年冬获得专业作家的称号，并调入陕西省作家协会专业创作组。自此时起，文学创作成为我的专业，也成为我的人生理想、人生追求的主业。

黎峰：那么当时你就想到了自己一定会成为很有威望的大作家吗？上次魏心宏来西安，说一直想约请你写自传，你有过这样的想法吗？

陈忠实：我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看到当地报刊上经常出现几位工人和农民业余作家的名字，很羡慕，想着自己如果能够像他们一样发表短诗、小散文或者小小说就好了。那时候，我读着《创业史》《风雪之夜》《保卫延安》等几部陕西作家的作品，连想也不敢想我会成为作家，能成为一个发表作品的业余作家就很好了。新时期文艺复兴，连续发表了许多短篇小说和中篇小说，且获得了不少好评，我的信心也鼓舞起来了，直到进入《白鹿原》的写作并完成。我是一个偏于保守的人，向来不敢说大话，更不敢吹牛。写作的事，是走过一步，再选择下一步；在下一步尚未踩踏稳当之前，我不敢宣言说一定会踏上下一步的那个台阶。

黎峰：你在基层公社干了十年党委书记、革委会副主任，差不多是经历了一个完整的“文革”时代，你现在回想起这段经历，能告诉我们一些你的看法吗？

陈忠实：我是一九六八年末临时抽调到公社。此前中央文件指示刚刚成立的各级革命委员会搞一个中心运动，清理阶级队伍。我所在的那个不过万人的公社，竟然清理出来几百个“阶级敌人”。年末又有中央文件指示，要对被清理出来的“阶级敌人”落实政策，便抽调出七八个社属中、小学教师组成专案组，公社领导做组长，经过近一年逐村逐单位一个一个落实定案，过程且不赘言，结果是没有定性一个“阶级敌人”。原因很简单，取消了造反队的多个村子，潜存的派性更难消除，那些被当作“阶级敌人”揪出来的人，多是派性的受害者。紧接着一个中心工作，是恢复各个村子里被“文革”造反搞瘫痪了的党支部，难度也很大，主要障碍还是派性。费时近一年，把各个生产大队的党支部建立起来，最后是公社党委的建立。这项工作结束，我和另一位中学团委书记留下来在公社工作。我之所以被选在公社协助工作，我想主要原因是文字能力，为领导写讲话稿，写年度或阶段工作总结等。领导留我时有一次简短的谈话，很斟酌地肯定留我的原因，把握政策较稳当，人还可靠。直到一九七三年，我才正式调入公社，解决了公职。因为我在公社里是最年轻的干部，也因为有了四年多的农村工作实践，此时“学大寨”运动已成为公社持久性的工作，我总是被安排到重点工程去完成任务，我也乐于干实事。我曾协助一位主管农业的公社领导，在原坡缺水地区建设小型蓄水库塘，使每个生产队都有了多少不同的水浇地，曾经被上级推广过经验。我独立搞过两次农田基本建设大会战，一次是在麦收后和种麦子之间的两个月时间里，完成八百亩跑水跑肥的山坡地改造为平整梯田。这些被改造的平整梯田，至今也是一劳永逸地发挥着效益。又一次是为家乡灞河修筑了八华里河堤，得到上级拨款资助，临水面有水泥板护贴。从先一年入冬动工，到第二年发生涨水之前完工，这条可以对开汽车的河堤修成了，三十多年来再未发生过灞河涨水冲毁农田的灾害。这两项较大的工程，都发生过平均摊派任务的问题，然而那个时候却不犯政策之

忌，后来不久被纠正了。现在在个体生产的乡村，是连想都不敢想的事。我在这里有自我表彰之嫌。我在乡村工作中接触多种人，也了解了乡村，为后来的文学创作提供了方便，却是当时没有想到的事。

黎峰：“文革”期间，当你在西安看到柳青、杜鹏程被游街批斗时，你是什么心情？这些影响到了你的文学理想吗？

陈忠实：我在“文革”初期被划为保皇派，惩罚措施是养猪（农业中学种地也养猪）。我拉架子车到西安一家面粉厂买分配给学校的饲料麸皮时，恰好遇见文艺界的游街队伍，看到被游的柳青等我崇拜的作家。我的直接感觉是，中国连柳青这样的作家都不要了，我还想干什么。我基本不再想文学创作的事，后来到公社工作，就专心于乡村与农民打交道的事了。到“文革”后期，一些文化艺术单位恢复工作，偏重于鼓励“工农兵业余作者”写作，我是被激发起来的一个，我才发现文学创作的喜好没有消亡。然而很清醒，文学创作当不得正事干。我只是在十分想写或又相对有一段清闲的时间，便写一篇，四年写过四篇短篇小说。我把这种写作自我定义为“过瘾”，过一回文字表述的瘾。

黎峰：二〇〇八年省上开青年作家创作会，贾平凹老师提到你们当年曾经组织了一个“群木”文学社，我还在一个资料上看到，当年包括你在内的陕西八名知名作家曾经成立了一个影视创作的工作室，能否请你谈谈你跟陕西几代作家，包括柳青他们老一辈的，跟你同时代的，以及后来的这几代作家的交往。

陈忠实：这个话题太宽泛了，待有机会时专门说这个话题。仅说你提到的二三事。一九八〇年初，我在家乡灞桥区文化馆做群众文化工作，业余搞创作。文化馆的业务上级是西安市群众艺术馆。市群艺

馆专事辅导文学创作的干部，很关注本市几位写作的青年作者，便有意把这几个人组合到一起，互相切磋，交流心得，互相促进，再得提高。他先找到贾平凹再找到我，大家都赞成，而且贾平凹已提出一个“群木”作为文学社的名字，并有解释，一群幼树互相拥挤，竞争竞长，志在天空。我当即表态赞成，善哉！并尤为欣赏“群木”的社名和意蕴，树木成片成林便会竞长，前途在广阔的天空，互不伤害。文学社成立后，我大约参加了两三回聚会。问题发生在我住在灞桥古镇，离城较远，公交车下午六时就停运，安排在晚上的活动就没有机会参加了。那时候没有经费，没有会场也没有餐费，更没有交通工具，我损失了不少交流机会。影视工作室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成立的，以著名编剧张子良和杨争光牵头，我是一个不会编剧的成员，充数而已。柳青生前我见过两三面，第一回是他在游街时。第二回是他刚获得“解放”，被邀请到一个出版会议上向业余作者讲创作，我在听讲者之列，看到一个惨不忍睹的动作，正讲到某个问题的关键处，柳青停止说话，顺手从衣袋里掏出一个球状喷雾器，把尖头塞进嘴里，一捏一放球状物体，便往喉咙里喷进一股一股白色气体，发出哧啦哧啦的声音。听说柳青是在喘不上气时，便用医生配给的这种器具缓解呼吸之难。我几乎不忍心看那惨象。第三次是在省文化厅举办的一次创作会议上，大约是在一九七四年六月，请柳青来给业余作者辅导创作，仍然离不得那只喷雾器。那时候正学习一条“反潮流”的最新指示，柳青借题发挥：“能不能识别潮流错误，是认识水平问题；能识别错误潮流，反或不反，是个品质问题。”我至今记得这句话。我很想拜访柳青，却缺乏勇气，这是我的弱点。同代作家接触太多，待有机会时说，不然，篇幅太大了。

黎峰：你当了十余年作协主席，这与你一向低调不想为官是否相悖？体会如何？作家做官有何利弊？我们知道，你在任期干了很多大

事，干这些事是否影响了你的创作?

陈忠实：其实也不相悖，人在一种意料不及的环境下，是会从一种别的角度选择取舍的，我即一例。早在陕西作协换届前两年已经内定路遥为作协主席人选，我当时还在原下老家写《白鹿原》的书稿。我完全赞成路遥作为未来的主席。我曾在此间两次给领导写信，坚辞推卸将我安排到另一个文艺团体做党组书记的意向。我那时倾心于写作，《白鹿原》尚未完稿，行政级别的升迁对我诱惑甚微。不是我清高。我向来未曾表白过自己清高的话。自一九八二年末成为专业作家，我就意识到已经进入人生的最理想境地，同时也意识到，能否写出较好的小说，全在自己的本事了。不然，连怨天尤人的理由也没有了。我因此而回到原下老屋，就是为了能专心于写作的探索，致志于从少年时期发生的至今不能舍弃的文学爱好。专心致志与写作爱好，有别于一般的清高。正在筹备陕西作协换届的时候，路遥却病倒了，竟不治而谢世了。陕西文学界及至社会各界，都深为这位富有才华的中年作家惋惜不已，同时也把作家普遍存在的生活窘困的事象暴露出来。陕西作协办公院里的房子，墙倾屋漏，人们开玩笑说这是拍《聊斋》鬼狐影视最好的外景地。希望改善作家生活和办公环境的呼声高涨。大半年后换届，我被推上主席这个位置，没有拒绝，确实也是被那种希望改善生活和办公环境的热切议论所感染……至于做了什么事，已成过去，恕不一一列举。至于体会，一言以蔽之，我尽我有限的能力做了一些事，也有当做而未做成或未做完满之事。我向来不说是否影响了我的创作的话，尽管这是经常被问到的话，我都不敢说是，连默认也没有。确实的事实是，我的写作兴趣由小说转向散文，竟许久都难以再转回小说创作。作家当官，肯定有利有弊，而且个人的利与弊又各不相同，难能一概而论。我对此事缺乏用心，难以判断。我做了一些事，很难称大，多为文学范围的事，也有跑门子要钱

的事，更免不了一些应酬场面的事。事已过，不赘述。向来不说影响创作的话，如前面所答。

四、每个作家都在思考这个时代

黎峰：这些年来我们每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大概在两千部左右。在数量上我们已经很强了，但好像我们并没有在国外很有影响力的作品。像一位美籍阿富汗作家写的《追风筝的人》，据说全球热销六百万册，创下出版奇迹。我们中国作家的作品在国外没有市场，你觉得主要原因是什么?

陈忠实：我也从媒体上看到过这样的信息，也见到过分析不能畅销的原因，想必你也看到过，不赘述。我难以判断外国人为什么不买不读中国作家作品的原因。我想到过欧美人的阅读兴趣是否和我们有差异；也想到过我们的小说作品所写的内容，尤其是写当代生活变迁的作品，是不是与欧美人的生活习俗相差太远，不好理解，且不说几十年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所造成的灾难，单是那些政治运动的口号和特殊用语，在欧美人恐怕都难以领会其含义。因为这样的运动和术语，只有在中国发生过使用过，中国人耳熟能详，洋人们大约会陷入莫名其妙的迷糊莫辨，也就减弱了阅读的兴趣，这不过是我的猜测而已。

黎峰：有人说，国内小说比国外落后将近五十年，作为中国的文学大师，你觉得当代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处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

陈忠实：先纠正你的“大师”的误传。我不是大师，不是谦虚，是远远不及大师的格。我只认我是个作家，这是一个职业符号。无论说中国文学落后世界文学多少年，都是很难具体计算的，说落后三十年

或落后五十年，都很难做出确切的论证，更难做出具体数字的量化比较。文学作品比不得某项科学技术，后者完全可以得出具体的量化对比，文学作品就难了。依我从媒体上获知的信息形成的印象，近年间中国作家的文学作品翻译到国外的数量已有起色，然而与我们翻译出版的外国文学作品的数量，几乎构不成一个比例；有幸翻译成外文出版的小说很难畅销欧美国家的图书市场，不能成为这些地方读者争相阅读的读物，也和我们国内不断形成的某个外国作家某部小说畅销且热读的现象形成鲜明的对照。可见，在世界文坛上，我们仍然是一个很大的“输入国”，“输出”和“输入”几乎难以构成比例。你说的“位置”，我难以做出具体的排位，“输出”和“输入”的文学作品的不成比例，大体上就可以看出其格局了。

黎峰：你对当代中国文学，包括陕西文学的现状有何忧虑？对前景有什么期待？

陈忠实：没有忧虑。没有发生过任何忧虑。不是我天性乐观，也不是无所用心，是出于我对文学创作现象的理解，也许褊狭。一部优秀作品的出现，总是让世人意料不及，这部作品的作者也就从无名到著名了。人们通常的想法是他会越来越成熟，体验会越来越深刻，笔法会越来越老辣，这样发展的作家不少见，然而，似乎逆反这种通常现象的作家也不在少数。肖洛霍夫很年轻时写成了史诗《静静的顿河》，后来又写成了《被开垦的处女地》，当年也算得佳作，但似乎与《静静的顿河》难以比肩，现在几乎销声匿迹。之后几乎再没有稍大规模的作品出世。出人意料的是，在他的晚年，一部大短篇或小中篇小说《一个人的遭遇》，却震撼了当年的苏联文坛，也传播到世界很多国家。类似的作家的创作现象起码不属个别。我就能理解，一个作家的出现，创作的发展，是很难预料的事，远远比不得今天的天气

预报的准确度，甚至连作家自己都难以自主操控……我忧虑有何用？没有必要。同样的道理，一个地区、一方地域在一个时期文学创作的发展，也是很难实现主观操控以期如愿的。某个时期，突然涌现几位令人瞩目的作家，难以预料；某个时期，相对比较平淡，没有引起广泛关注的作品出现，也难以预料，更难以采取立竿见影的措施扭转局面。在我理解，一部作品的品相完全决定于作家体验的深或浅，这是很难以外在因素促成的事……我即使有忧虑，也没有任何积极意义。我相信会有惊世佳作出现。

黎峰：现在是个经济社会。写作是很多年轻人的梦想，但因为不能养家糊口，也就只能是一个梦想。特别是现在一般人的作品在刊物发表很难，就是发表了，一个中篇小说大概也就两千元左右的稿费。就是一个长篇小说，三年五年写下来，正常出版了也就十多万的版税，养活自己很成问题。不知道陈老师们当年写作的时候有没有碰到不能养活自己的问题。

陈忠实：我在《白鹿原》书写到一半的时候，经济压力突显出来，三个孩子读书相继进入中学和大学，学费比较猛地涨起来；再加之集中写作《白鹿原》，没有写中短篇小说，基本上断了稿酬收入，仅凭当时的一百多元工资收入，就发生了难以支撑的困境。给我以榜样力量的是杰克·伦敦。我此前读过一本写他传记的书《马背上的水手》，其中写到一个细节，杰克·伦敦倾心致力创作小说，作品却难以出版。美国没有政府出资供养的专业作家，似乎也没有谁愿意资助他的小说创作，常常闹到连一块面包都没有的断顿儿困境。他的唯一财产是一辆半旧的自行车，便送入当铺，换几个买面包的钱继续伏案写作。他的一部小说好不容易被一家出版社看中，但仅出价十美元买断版权，杰克·伦敦尽管明知被坑，仍然接受了。他要的是作品不再积压

这种结果，终于有了面世的机会。他拿着十美元赎回自行车，把剩下的钱全部买成面包，继续写作。一个只能吃干面包的杰克·伦敦，是不敢想营养成分的，更遑论其余物质需要了。他再发生断顿儿时，又把自行车送入当铺，换几个买面包的钱。直到他的作品畅销，出版商以十倍百倍的版权费争购他的新作的景观出现，一个杰出的作家杰克·伦敦在美国出现了，自然不会只啃干面包了。当时我尽管发生经济困难，但比杰克·伦敦好到天上了。我不愁饭吃，是比单一的干面包好得多的面条，一月可以吃两次肉，改善生活。直到《白鹿原》书出版，初版领到一万元版费，一下子成了万元户了。我说的杰克·伦敦的事，以及我的困窘，都是陈年老话了。当今世界，多方竞争日见激烈，环境和人心也是今非昔比了，喜欢写作和挣钱过日子的矛盾却依然困扰着尚未发达起来的作家，相信他们各自都会找到较为适宜自己生存，而又兼及创作爱好的途径，至少不至于弄到杰克·伦敦当自行车买面包的困境。

黎峰：写小说的人还因为写故事而拥有多一些的读者，拥有多一些的出版、被阅读以及被改编的机会的话，诗歌相对于小说就更艰难得多。对于现在的诗歌困境，主要是对于写作者经济上的压力和无望，您怎么看？在这方面，诗歌作者有什么更好的出路么？同样，对于现在孤独的写作者们来说，他们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在经济社会如何去求得生存和写作的自由？这是一个全世界写作者所必须直面的问题。如果不解决这个问题，就很难去指责媚俗，也难以挽回许多优秀写作者的流失。

陈忠实：我较少接触诗人，但听说过诗人的困境。诗歌在近年间很难形成热诵的现象，当年雷抒雁的《小草在歌唱》被整个社会诵读的动人情景再没有发生过。我听说诗歌集出版甚难，也能想到单凭写

诗的稿酬很难过日子。艰难可能在年轻诗人群体里比较突出，因为年龄稍长的诗人大多都有职业，也就有一份稳定收入，起码生活不成为问题。据说不少年轻诗人没有固定工作，收入也难保证，收入就发生时紧时松的情状。我能想到的办法是，先兼一份工作，有保证基本生活的收入，把写诗排在业余。其实小说作家也多是这样，靠写作不能养家糊口的时候，就得先找到能养家糊口的途径。写作——无论小说或诗歌——暂且先放在业余操练。发展到靠写作不仅可以养家，而且收入甚丰的时候，自然就以写作为专业了，且不需谁批准。听说欧美的作家大都如此。仅供参考。在经济社会如何去求得生存和写作的自由，主要是中国的写作者面临的一个新问题，这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实施和运行日渐突显出来的。西方国家一直运行的是市场经济，作家们从来面对的就是靠写作能否过日子的问题，靠写作的收入不能养家糊口，自己就会找到可以挣钱过日子的各种社会职业，把写作的爱好摆到业余，这是无须谁教谁的本能选择。我在美国乘火车时看到一种景观，火车站有小小的售书台，许多乘客扔几枚硬币便选一本便于口袋装进的很小的书，上车后便坐下读，到站后顺手就扔到车门旁的一只桶里。据说那里有不少专写这类供乘客解闷的随读随扔的书的作家。然而，并不担心杰克·伦敦为了不吃干面包而选择这类书的写作。经济利益肯定会驱使一些人进入“媚俗”写作，但不会是全部，也不会是大部。在我理解，作家对社会人生的体验决定着作家写作笔头的指向，不完全是经济利益的驱使所能决定。我相信对历史或现实生活有独特的深刻的体验的作家，肯定不会放弃此而改辙追彼。自然，有许多写作娱乐性读物的作家，也无可厚非，既是这些作家的兴趣和特长，社会也需要这样读来轻松的读物。

黎峰：任何一部文学作品都不能脱离时代，但是又要有普遍性、共通性。西方提出文学作品要有“永恒的人性”。在当今中国的经济社

会，文学恐怕也不能脱离时代自行存在。那么今天的作家该如何反映这个时代的真实情况?

陈忠实：我遇到一个回答不了的问题。每个作家都在思考这个时代。每个作家对这个时代都有自己独特的体验。每个作家都在寻找反映这个时代的真实的而又只属于自己的句子。每个作家的大脑里都有一方独立的秘而不宣的艺术天地。只有在展示出某部作品的时候，我们才能获得答案，哦，这个家伙竟然如此独出心裁。如果有一个大家都可以适用的"反映这个时代真实"的途径，那么一百个作家写出的作品就会是一副面孔。况且，同一个作家在不同时段，也会发生新的体验和另一种表述方式。

黎峰：讲故事是文学的一项特殊功能，在这个快餐文化盛行的时代，如何能讲好一个故事，真实的、有责任心的故事，让读者能看下去，并引起思考、感慨、共鸣、震动?

陈忠实：这又是一个让我回答不出的问题。依我的阅读感受，富于创造意义的小说，不同的作家各有自己的叙事策略和叙述方式，叙述的故事都发生了"引人思考、感慨、共鸣、震动"的艺术效果。譬如《悲惨世界》《无名的裘德》《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等等。不会存在一个大家都能适用的"讲好一个故事"的办法。如何把自己业已成型的故事讲出来，能够让读者发生"思考、感慨、共鸣、震动"的阅读效果，每个作家都得费尽智慧，不惜险招和奇招，力求达到那样的艺术效果，这就是创作。也就是创造的意义。

黎峰：现在我们传统作家出版的图书卖得很少。书印上两三万本出版社就冒汗了，但另一方面，像盗墓小说"鬼吹灯系列"、职场小说《杜拉拉升职记》、纯爱小说《山楂树之恋》等网络小说在网上又有

很高的点击率，让作者一夜成名，甚至暴富。网络文学无疑是良莠不齐的，准确地说，是“草盛豆苗稀”。但经过数十年的磨砺，也出现了闪光的金子。对于传统作家来说，“无视”网络显然不是很好的解决问题的办法。您认为传统作者会逐渐向网络写作靠近么?

陈忠实：首先需向你致遗憾并致歉意，我至今没有机会接触网络文学。不是我无视网络小说的存在，在于我不会使用电脑。我至今仍旧用钢笔写字，依赖报纸刊物和电视获取新闻，阅读依旧是书刊。我听说网络文学五彩缤纷，徒叹奈何。你所列举的几部很受欢迎的网络小说，我在报纸上看到过宣传文章，遗憾的是没有读到。我向这几部书的作者遥致祝福，能写出万众“点击”热议不减的小说，我的基本的判断，便是作者有独特的体验，能引发众多的读者点击，证明了读者的阅读兴趣，也证明了读者阅读引发的共鸣。没有独特的体验和独特的艺术表达形式，是很难引发阅读兴趣的，更谈不到共鸣的效应了。小说的生命力本就在这里，传统的文本小说是这样，网络小说也是这样。我刚刚给一位朋友打电话得知《杜拉拉升职记》和《山楂树之恋》已经有文字图书出版，我会买来阅读，那么多人喜欢的小说，我不读将会觉得遗憾。你说的网络文学是“草盛豆苗稀”的现象，也不奇怪，传统文学的出版物，杂志或者书籍，都有一套甚为严格的审稿程序，不要说“草”，即使是“豆苗”，不大旺实的也会被淘汰。这样就使难以估计的大批来稿浮不上水面。网络小说似乎没有审稿机构，写下就上，自然难免良莠不齐的局面了。我又设想，报纸、刊物和出版社审阅后放弃的那些书稿数量之大，大约不比网络小说中你说的“草”少太多。网络给那么多喜欢写作的人提供了一个不需审稿就可以发表作品的广阔而又自由的平台，相信会有很多作者经过演练而成长起来。今天种“草”的作者，明年或明天也许会孕育出奇葩来。你所说的网络媒体和网络写作的优势，我都能接受，不无羡慕之情。传统作家是否

会向网络写作靠拢，我难以判断，这是个人兴趣所做出的选择。只是可以肯定地告诉你，我无法靠拢网络写作的方式，尽管羡慕，却难以接近——我不会打电脑。

黎峰：从前曾经有过青铜时代、铁器时代，那么现在毫无疑问是信息时代。从大的方向来说，信息时代对于文学作品的创作和传播，应该是大有裨益的。但信息时代的弊端也在于信息太多了，人们没有耐心来听你讲一个故事，作家也似乎没有耐心来讲一个故事。在这样的时代，创作者们应该坚守什么？应该放弃什么？如果需要放弃的话。

陈忠实：你说的“人们没有耐心来听你讲一个故事”的话，你可能有读者调查依据，我没有这方面的稍微可靠的资料，所以不敢判断。你又说的“作家似乎也没有耐心来讲一个故事”的话，我却要分辩几句。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每年都有两千多部长篇小说出版的繁荣景象，已经持续了多年，去年竟然已经发展到了三千余部，且不说数以万计的中短篇小说的发表。就我的印象而言，中国现时的长篇小说，都在叙述着当代和古老的故事。上世纪八十年代曾经有过一些无故事无情节甚至无人物的号称“三无”的小说，领一时风骚，却不是缺乏耐心讲故事，而是寻求一种新的表述方式的探索，近年间几乎不见“三无”作品了。从中国传说中的皇帝到封建帝制的瓦解，许多历史人物和大的历史事件，几乎被当代作家都写了，仅以陕西而言，我看到名气不大的一位黄陵县的作家出版了写黄帝的小说，孙皓晖先生出版了十一大本五百万字的《大秦帝国》。辛亥革命到共和国成立，解放后的新中国到时下，各个大的历史变迁的时段和平民生活，数不清被多少作家写过了，现在依然兴趣不减，继续在写。这些小说大都有动人的故事，许多历史小说的故事惊心动魄。我便觉得当代作家不仅更有耐

心讲故事，而且在历史和现实的故事中，努力开掘不同风格的意蕴，常常给人启迪。同样，我说不了应该坚守什么又放弃什么。这是作家个人思想探索、艺术求变的个性化选择。我只是毫不含糊地相信，每个作家都在努力探索，以求艺术创造的新境界，必然会坚持自己信奉的东西，舍弃不再感兴趣的东西，追寻自己需要的东西。

黎峰：目前，年轻一代的写作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一些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生的也开始写长篇了。您能结合自己的写作经历谈谈想法吗？您对这些后起之秀有何建议？

陈忠实：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生的小孩写小说写诗歌，我觉得很正常。就我所知，绝大多数作家的文学爱好和写作兴趣都是从少年时代就发生的。我对这种现象有自己的一个小小发现，作家和其他专业人群的差别，就是与生俱来一根对文字尤为敏感的神经，这是父母给的。在有机会接触文字，尤其是文学作品的文字时，这根神经便会兴奋起来，便会发生人生喜好的兴趣性倾向，就会喜欢读文学作品，就会动手写诗或者小说，是很自然的现象。有些具备对文字敏感的神经的人，却没有机会接触文字，几乎是文盲，然而那根敏感文字的神经不仅不闲置，也不萎缩，而是发生着一些纯自然的释放，我对那些生动传神的民间诗人就是这样解读的。如果他们起码能接受高中教育，完全可能成为一位卓有建树的诗人。这样的人在我生活的地区几乎每个村子都有一个，可惜大都是文盲，他们见事就顺口而出有韵律的民歌民谣来，传诵一时。人和人的个性差异，就在于具有一根对什么事物敏感的神经。有一根对色彩敏感的神经的人，很自然地倾向于绘画；有一根对音响敏感的神经的人，也就从少小年纪倾向于音乐；有一根对数字敏感的神经的人，不仅数学课学得轻松，且有乐趣，而且有可能成为数学家，如此等等。人群中那些生有一根对于文字敏感的

神经的人，多是从少年时代便发生兴趣性倾向，不仅喜欢读文学作品，读着读着便动手写作了，时下涌现的不少的少年作家就源于此因。即如中国当代作家，人皆共知已故的刘绍棠，上世纪五十年代上中学时就发表小说作品了，被誉为神童。那个时候，和刘绍棠同代的少年文学爱好者写作者到处都有，不过不及刘绍棠杰出罢了。所以可以说，上世纪九十年代出生的少年作家是一个正常的社会现象，有勇气写长篇也很好，即使失败，也是一种磨炼。具有对文字敏感的神经的人中，未来创作的前景和成就很难做出估计，各个喜爱文学创作的人，生活阅历的差异，阅读的差异，接受社会和家庭影响的差异，更有个性的差异，等等因素，都影响着各个少年写作者创作的发展。可以说，那根对文字敏感的神经能发挥到怎样的状态，全在个人后天的努力。我向来很畏怯对青年作者“建议”一类的事。以我的体验，任由各人去摸索，去闯荡，即使某些导致失败的弯路，体验一下也没有坏处。我所说的那根对文字敏感的神经，是我对“天才”这个太多神秘色彩的词汇的物质化解读。

黎峰：写作者们通常都是在不断地阅读，好的创作一定离不开丰富的阅读，在这方面，陈老师您有什么特殊的阅读喜好么？能给读者推荐一下您认为优秀的作品么？

陈忠实：你说得很对，截至今天，我还没遇到也没有听过不读书的作家。阅读开阔视野，阅读启迪智慧（即开启那根对于文字敏感的神经），阅读也丰富艺术天地，阅读更深化思维……说不尽的好处。所以人说开卷有益，以创作为乐事的人更如此。我不好向人推荐作品，因为各人的意趣差异很大。由各人去选择，即使买了读不出兴趣的书，放下不读，再换一种，总会找到爱不释手的书的。我往往就是这样选择读书的。

黎峰：如果请您对我国文化事业的发展做一个前瞻的话，您怎么看？比如说二十、三十年后，我们的文学、文化将会怎样？

陈忠实：这完全是一个难以想象的问题。我之所以觉得难以想象，是今天文学繁荣的景观，在三十年前的我来说，就是根本没有想象得到的。况且，如今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所引起的社会每个领域的快速变化，未来的经济和其他社会事业的发展国家都有战略计划，唯有文学创作难以制订可供实施性的计划。我们的文学将会是怎样繁荣的景象，难以想象，却可以肯定繁荣，也当有进入世界多个地区并被广泛的读者喜欢阅读的一批中国小说。文化范畴太宽太大，不敢妄说。

黎峰：最后，我知道，您是准球迷。听说你在当年创作《白鹿原》时，还经常到空工院看球。前段时间的“足坛扫黑风暴”，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对此您怎么看？

陈忠实：上世纪八十年代没有卫星传递电视信息技术，靠发射塔传输，我住在白鹿原北坡下，正好处于电视信号传递的阴影里，电视机只相当于半导体收音机的功能，平时看不到电视也就罢了，每逢有中国队的国际比赛便坐卧不宁。我常在夜间骑自行车赶到七八里外的接收信号好的村子，到亲戚和朋友家看足球转播，有两次赶到你工作的空工院熟人家里去看。如果当年认识你就好了，多一个看电视的好地方。“足坛扫黑风暴”在我的最初直感里，是大快我心。但这种感觉很短暂，随之便说不出话来，无话可说，抑或是话太多反而倒不想再说一句。岂止是我，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中国有多少球迷倾心中国足球走出亚洲走向世界，结果三十年过去了，现在连南亚那些国家的足球队都难对付。黑幕撕开了，却是一伙利用足球给自己谋

财的人把球迷涮了……真是让人伤心到不想说一句话。中国足球从头开始，但愿能尽早给中国球迷带来欣喜，抚慰被伤得太过不堪的心。

2010年4月25日 二府庄

作家生命的意义在写作

——答《辽沈晚报》陈妍妮问

记者：您是球迷，前一段世界杯比赛都看了吧？您最喜欢哪个球队，他们在世界杯上的表现您还满意不？

陈忠实：四年一届的世界杯，无疑是球迷的狂欢月，我自不例外。我喜欢并看好的球队是巴西、阿根廷、德国和荷兰，结果先后都淘汰了，只有荷兰进入决赛，却输给了西班牙。事过再不必说满意与否的话，只是惊讶我的判断和预测的智商，尚不及那只章鱼保罗。

记者：有时间还会经常回到白鹿原看看不？最近回去过吗？白鹿原是个怎样的地方？现在还是老样子吗？都变了吗？

陈忠实：总是要上原的。多是参加原上的社会活动，也经常陪对白鹿原感兴趣的国内和国外的客人上原。陕西有许多原，就是独成一方的小平原，仅西安周围就有好几道原，城北边的龙首原，是西汉皇宫所在地，唐代的大明宫紧靠东侧；城南有少陵原和神禾原，作家柳青深入生活和创作小说《创业史》，在神禾原住过十三年；城的东北边有铜人原，是秦始皇焚书坑儒的地方；城东南有白鹿原，汉文帝葬于原的北坡，坡下是灞河，故称灞陵，此原又有了灞陵原的名称。白鹿原东西长约五十华里，南北宽约四十华里，曾独立设县。现在的白鹿原盛产樱桃，原上原下都是樱桃林；已有高等级公路四通八达；或大或小的村庄已经焕然一新，成片的小楼房各呈其姿，传统的瓦房和土坯房少有遗存。

记者：据说《白鹿原》刚刚出版时，洛阳纸贵，书店很难购得。当时西安街头，汽车司机如果违章，驾驶员只要送上一本《白鹿原》，交警便立马放行。这对于我简直不能想象，就像是听故事，但又确实发生了。当时，《白鹿原》的热卖是怎样一种场面？

陈忠实：你听到的是民间传闻，无法证实，可信亦可不信，全当是传闻。《白鹿原》的畅销是事实，仅以我亲历的事为可靠，《白鹿原》在西安上市首日，书店约我为读者签名，我看到了看不见队尾的队列，从早晨八时许签到下午一时，简单吃了点东西，再接着签，直到下午五时许结束，这是签名时间最长的一次，记不得签了多少本书。

记者：您在书的扉页上写道"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现在这句话还在被很多人不断提及。您当时落笔之前就想好了，想要写一部史诗一样的作品吗？写作之前就定好了这个主题和目标？

陈忠实：巴尔扎克的这句话，是我正在《白鹿原》的写作过程中在一篇文章中读到的，十分投合我当时的心意，便一遍成记，待书稿写完时，便引用在扉页上了。《白鹿原》的构思和写作过程中，悬在我心里的一个愿望，就是写出一部死时可以垫棺作枕的书。这种心理完全是指向自己的，即从少年时期便喜欢写作，到死时连一本自己满意的书都没有，真不敢想是几重悲哀。这种纯粹出于对文学创作爱好的愿望，只能由自己实现，而不旁及其余，"史诗"之说是连想也不敢想也确凿未想过的事。我只专注于一点，把截止到一九八七年末业已体验到的这个民族的命运展示出来，不要因匆促而留下遗憾。至于读者会怎样评说，喜欢或否，我尚无把握。

记者：您说生命的意义就是写作。但是这个过程一定是很艰辛的。您在创作中都遭遇过哪些困难？怎样去克服？

陈忠实：生命的意义就是写作，这是仅作家这个职业而言。写作的过程是艰辛的，却也是快乐的，往往会快乐到忘我的境地，快乐到感觉不到辛苦。如果创作中一直由艰难辛苦伴随，我想是难以为继的，尤其是篇幅较大费时较长的作品的创作。我遭遇的困难首先是写作本身，构思中的犹豫不决和不尽人意；写作过程中遇到的翻越不过的坎儿，多是构思时不符合人物个性的设计，一时又想不到更好的情节，如此等等，自然都只能更冷静地思考，甚至等待灵光一现的新的途径的出现。生活上也会出现一些困难，记得最严重的一次是《白鹿原》的写作最后一年，孩子学费起涨，物价也涨，我因《白鹿原》的持续四年的写作，而没有短稿出手，断了稿酬收入，仅凭月工资难以应付开销。我的办法不高明，首先是生活节俭，省下钱来；再就是得一位友人相助，借给我钱，到《白鹿原》的稿酬到手后，才还了这笔救助的款项。

记者：有评论说，当代的中国作家留给后世、传承下去的作品屈指可数。《白鹿原》毫无疑问是文坛上一座风光无限的高峰。对于这部作品的广泛的社会影响和它今天的地位，您作为作家本人怎么看？

陈忠实：说“风光无限”显然有夸张、溢美之嫌，任何事物都有自己独具的风光的优长一面，却都是有限的，何至于一部小说。“高峰”的话我也在一些媒体的文章中看到过，除过直觉上发生的忐忑之后，基本还能保持一种自我审视的冷静，不可当真。不是我佯装谦虚，而是我经历过太过残酷的事实成为贴近的参照。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且不说我对《创业史》的倾心折服，文学界公认为当代文学的一座丰碑，一部史诗。然而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化，文学观念也迅速发生着剥

离和更新，我几乎不忍心看到对《创业史》的诸多质疑乃至批评文章。柳青在《创业史》里所讴歌的农业合作社，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就一哇声地在中国乡村解体了，这是柳青无论如何也始料不及的。这是《创业史》评价的致命之处，尽管书里的几个堪称典型的乡村人物依然鲜活。我自然类推到《白鹿原》，再过十年、二十年，随着改革开放的一步又一步深化，读者的审美兴趣和评论家的审视视角的变化，如何看取《白鹿原》，我就很难预料了……《白鹿原》书出版十七八年来，能得到评论家的关注，还有持续着的销量，已深为感动和欣慰。

记者：除了资料的准备，听说您在写作之前还在门前种了一棵法国梧桐，现在很多人用这个树的繁茂比喻您在文学创作上的收获，说《白鹿原》就是当代小说丛林中的一棵参天大树。这棵树现在还在吗？您当时怎么想到种下这棵树的？

陈忠实：我在一九八八年清明前栽下这棵法国梧桐。此时刚开笔起草《白鹿原》稿，完全是无意识的巧合。一九八六年我在祖居的宅院的前院空地上，盖起了三间水泥板盖顶的新房，原打算一九八七年就要栽树的，却没有买到法国梧桐树苗。一九八八年早春，我先后托付了几个赶庙会的村人给我买，终于买到了两棵指头粗细的一年生法国梧桐树苗。栽下后许久，都未发芽，后来发现细杆已经干枯了，我大失所望。不料又过了数日，有一棵干死的树苗的根部冒出地皮一个新芽，我大喜过望，精心管护，当年便长高到超过我的头顶。时过二十二年，这棵法国梧桐已长得很高了，树身粗到差不多有一搂抱，当属村子里最高最粗的几棵大树之一了。

我喜欢栽树，远远胜过栽花种草。我自小便跟着爱栽树的父亲栽树。父亲在自家地头的水渠岸上喜栽长得极快的白杨树，速成后砍伐

卖钱，为我和哥哥交学费。我后来栽树已淡漠了卖钱的意识，纯粹是为在自家院里院外添一道道绿荫风景。我在后院的坡坎上栽了许多棵洋槐树，槐花的香气弥漫到屋院里来；我在中院栽了枣树，又栽了紫丁香，不同的花香灌进窗户；我在前院栽了火晶柿子树，每年十月初能摘下几筐香甜的柿子，还有一棵紫薇树，早已高过屋脊，满树的紫红色花朵连续开放，花期长达三个多月；我在大门外栽下香椿树，又栽了法国梧桐，香椿树上爬满一种俗称椿媳妇的蛾子，撒尿如小雨，随后便把香椿树挖掉了，梧桐树的浓荫下，常招来闲聊闲谝的村人。我写过一组《我的树》的散文，其中就有这棵梧桐树栽植和发展的趣事。

记者：您当初是怎么对文学产生兴趣的？哪个作家和哪部作品让您感受到了文学的魅力。哪些作家对您的创作产生了影响？您欣赏他们什么？

陈忠实：我在初中二年级的文学课本上学到了赵树理的《田寡妇看瓜》，很惊讶，这样的乡村中司空见惯的人和事也能写成小说，我也能写，便在作文课上写下我平生的第一篇小说《桃园风波》。从此便开始了我的文学爱好，终生竟然都难以舍弃。对我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作家有赵树理、柳青、鲁迅、茅盾和巴金等，他们的主要作品我都读过。俄罗斯和前苏联作家的书我读得较多，尤其是肖洛霍夫、高尔基、柯切托夫、舒克申等作家的作品。以马尔克斯为代表的几位拉美作家的代表作我也读了，还有捷克作家米兰·昆德拉的作品，能买到的都读了。他们对生活的开掘和独具的艺术表述方式，都启发过我，也鼓舞我努力“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海明威语录）。还有几位美国作家的作品，对我都有影响。

记者：《白鹿原》书中哪个人物是您最喜欢、最在意的？您在创作这些人物的时候都想到了什么？

陈忠实：我在《白鹿原》书中写到的人物，都是最喜欢、最在意的，即使出场仅一两次的人物，也不能随意马虎。道理很简单，既需要他或她出场，就必须写出他或她的不可或缺来。无论主要人物或次要人物，尽管花费的笔墨多少有差别，对待他们的态度却一视同仁，就是要把这个人物的个性写出来。

记者：现在，《白鹿原》电影就要开拍了，您对请哪位演员扮演哪个角色有自己的想法吗?

陈忠实：我没有任何想法，不单是我对演艺界甚为隔膜，关键在于电影是另一种表述形式，导演独具选择演员的慧眼，不仅从成名的演员中选择适宜电影人物的角色，更绝在往往从芸芸众生中发现具有天赋的演员。我不操这份心，操心也是白操心，甚至可能坏事，让王全安导演斟酌吧。

记者：看到报道说您可能会在电影中扮演冷先生？确有其事吗?好像很多书迷也都很期待您能在影片中客串。

陈忠实：你说的话我也是从当地报纸上看到的，玩笑而已。西安一家报纸记者问我这个话题，我也开了一通玩笑，要是非逼我出场，倒是可以试演老年的鹿三，唯一的优势，我有一张布满皱纹的脸，不需费劲化妆，就是老长工鹿三的脸了。然而不能单凭形似，关键在神似，我就出不了场了。谢谢读者朋友的热心关注。

记者：这次您是否参与了剧本的创作，对剧本的改编有什么建议？

陈忠实：我对原编剧芦苇谈过小说人物创作的动机，以及我对小说人物心理演变的阐释，供他改编剧本时参考，以便把握各个人物。电影剧本的改编，是另一种艺术形式的再度创作，我无成功的经验，完全相信芦苇会改编成功，他是卓有建树的一位电影剧作家。再说，我曾经三四次改编过自己的小说，有电影也有电视剧，均反应平平，这次便完全依赖芦苇了。

2010年8月12日 二府庄

自我定位，无异自作自受

——和中国国际广播电台邱晓雨谈话

邱晓雨旁白：各位好，这里是环球名人坊，我是邱晓雨。本期《作家与世界》系列深度访谈中，我将对话的是陈忠实。在大部分读者的印象里，陈忠实的名字和一部长篇小说相连，这就是被誉为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国文学重要收获之一的《白鹿原》。

这部渭河平原五十年变迁的雄奇史诗，是作家陈忠实的成名作。写出这部小说的时候，正是陈忠实知天命的年份。而在此之前的五十年中，陈忠实经历了什么？之前那些没有《白鹿原》出名的文学作品，又描摹出他怎样的心路历程，折射了中国社会的哪些变迁？下面，我们会用两期节目，走进这位年近七旬的西北作家。

《白鹿原》之前的写作都是练笔

邱晓雨：陈忠实先生，你好，欢迎光临《环球名人坊》。

陈忠实：你好。

邱晓雨：我今天进门之前，不知道为什么有一个印象，以前看《白鹿原》的时候，对这个书有印象，没有仔细地想你是什么样感觉的一个人，后来看《立身篇》，看《初夏》，看《猪的故事》，我不知道为什么心里特别害怕你。

陈忠实：我没有想到你看过我这么多作品。

邱晓雨：对《白鹿原》感兴趣，之后就会再去找其他的作品看。

陈忠实：你刚才说的那些中短篇小说，都是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之前写的，《白鹿原》写作之前的，作为练笔的作品。

邱晓雨：用《白鹿原》对比《立身篇》那样的作品，有点让我觉得不像是一个人写的。

陈忠实：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们那个时候的文学正处于一种反思，即反思十七年文学尤其是到“文革”，排解了对于文学和艺术的那些极左的东西，来寻求真正的文学，真实意义上的文学。

邱晓雨：等于有一个转向？

陈忠实：嗯，从一九七八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就是这个过程。

邱晓雨：《白鹿原》就是真正文学意义上的写作。

陈忠实：嗯，那已经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末，我才进入这个创作，那应该就是我基本完成了对文学狭隘的、僵化的带有极左色彩的那些理念的排解，接受了一些真正意义上的文学理念，也就涨起了探索的勇气和力量。

邱晓雨：所以，像《初夏》，我记得是一九八五年的时候最后修订的，那时候还有一点点痕迹，可是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末，《白鹿原》就完全已进入到你说的这种文学的境界了。

陈忠实：对，是，是。

邱晓雨：现在你不光是作家，也是领导。有篇文章当中好像写到你的话，说“作协主席，这是一个由嫉妒和阴谋导致的职务，目的在于终止一个作家业已取得的辉煌，并且决不允许他继续辉煌”。真的么?

陈忠实：纠正一下，这不是我的话，这是一个很年轻的作家朋友他写我的文章里的话。

邱晓雨：说到你?

陈忠实：嗯，他是这样来看这个问题。

邱晓雨：那你是怎么看的?

陈忠实：这显然是一个矛盾，因为在我当陕西作家协会主席的那个时候，正是我们陕西作家协会最困难的时候，作家和机关干部生存环境最糟糕的时候，房子都是上世纪三十年代建的小平房，那是一个起义了的国民党军官的宅院，解放以后，他把这个宅院捐献给人民政府，人民政府把作家协会就安排在这个宅院里头。到我进入作协去工作的时候，这个宅院里的房子已很残破，房顶塌陷，几乎每一个房子都漏雨。所以我当作协主席以后，一个很重要的任务就是要改善作家和机关的办公环境，办公条件。当时在西安文化界，包括市民中间，有一句很形象的概括我们作家协会的话，说要拍《聊斋》，就不用搭外景，到作家协会那个院去就是自然的环境。

邱晓雨：是说看上去就很残破，像有鬼的那样。

陈忠实：嗯，就是鬼狐出没的地方，你就可以想见那个破烂。

邱晓雨：是为了让作家有想象力。

陈忠实：那都是文艺界人开玩笑说的。大家要求太强烈，我一当上主席，就给承诺了一件事，我说要改善办公条件，经过了大概五年才把那个办公楼盖起来，这个当然要花费很多时间。改善机关条件，改善大家的生活和工作环境，那应该是我的一种责任。

定义自己：自作自受

邱晓雨：如果用几个词儿定位你自己，会是什么?

陈忠实：自作、自受。

邱晓雨：自作自受?

陈忠实：嗯。

邱晓雨：为什么这么说呢，有点感觉像惩罚一样?

陈忠实：没有，自作，就是我喜欢作，比如说创作，我自己做，我自己去探索，成功了，我享受欢乐；失败了，我承受痛苦，自作自受，俩词儿就够了。

邱晓雨：很简洁地就定位了。

陈忠实：嗯。

邱晓雨：这次来重庆，我在看天气。我记得你因为出生的时候没下雨，好像常说下雨好像就能改善命运。

陈忠实：我出生时候的状况都是母亲告诉我的，我自己不可能有感觉。我生日是农历的六月二十二，后来找到公历对照，是公历一九

四二年的八月三日，这是西安最酷热的时候，三伏，要是不下雨，西安那个高温，室外温度和室内温度常常达到四十多度。我母亲说我生下来的时候，全身就起痱子泡，从头到脚整个是把我包裹着，那没有办法，那个时候也没有空调，她就是只能拿扇子给我扇，但不可能从早扇到晚，所以我出生时候，就体验了干旱和酷热，所以对雨特别敏感，一到下雨就特别舒服。

邱晓雨：会影响你写作。

陈忠实：心情好了，写作当然就好了。

不同的人离开这个世界的方式和途径都不一样

邱晓雨：这道题提出来之前，我都会先说，如果你觉得不愿意回答可以不答，你希望以什么样的方式死去？

陈忠实：死亡是任何一个人都不可逃避的，每个人都有一个归终，我倒是常常庆幸，比如说跟我同时代的人已经去世了，尤其是我们文学界的人，患了不治之症，我去参加追悼会的时候，常常就有一种感叹，我说上帝对我是宽容的，起码比对他更宽容。

邱晓雨：那你会觉得想起来很恐惧吗？因为我一般觉得写东西的人，在自己的小说作品当中，会一遍一遍地涉及这个话题，是不是比普通不写的时候，比我们，其实相对有更宽阔的那种感觉？

陈忠实：就我而言，以往小说里头写死亡的很少，但《白鹿原》里头写死亡的比较多，许多读者和评论家对我写那些人物的死亡方式很感兴趣，不同的人离开这个世界的方式和途径都不一样，尤其像朱先生最后神话似的那种死亡方式。

邱晓雨：而且很智慧的那种。

陈忠实：而且有预感要死亡了，鹿三也是那样一种有预感的死亡方式。小娥就更不用说了，如黑娃，都有各自不相同的一种死亡方式。他们人生轨迹的最后归结，决定着他们的死亡方式。

邱晓雨：你认为他的归宿应该是这样的？

陈忠实：嗯，除了自然的因素之外，像得不治之症，这是任何人都可能得的。我在作品里头更多的是写他们的社会因素，社会因素跟他们死亡的关系，对人死亡形式的影响。

我无所谓，因为现在就我的生命历程而言，比之我的同代人，不说其他各界的，单是文学界的朋友，我已经送走了好多人。每一次送他们的时候，我都有一种庆幸，上帝对我比对他们更宽容，能宽容到什么时候，这是上帝的事，我决定不了。

邱晓雨：所以你已经在心理上，比我们来说，面对它没有那么恐惧？

陈忠实：你们现在还不应该想这个问题，你想这个问题不好，这么年轻，正应该是闯自己事业的时候，涉及这个问题，大约都应该是进入老年期以后的人，很难免考虑这个问题。

邱晓雨：这个问题可能就是每个人对死亡的态度，并不是真的说，大家决定想去怎么死。那如果你死后要转世成一种动物或者植物，你会选什么？

陈忠实：如果要转化为一种植物，我觉得就转化成一棵树，一种树。什么树，我都不太在意，只要是一种属于绿色的生命形体，在这

个土壤里头生存，在我的意识里头，每一种植物都有它们生存的意义。

邱晓雨：各有各的灵气。

陈忠实：嗯，跟人一样。人在这个世界上，各种形态的人，就跟自然界、植物界一样。

邱晓雨：如果能选的话，你是愿意做白鹿原上的一棵树，还是你写到过的青海高原上那种经历练的树？

陈忠实：我最好还是在我的家乡做一棵树，可能更亲切，更自在。

邱晓雨：我听说你写《白鹿原》的时候，好像还种了一棵树，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

陈忠实：我种了很多树，后来写了一组散文，副标题就叫《我的树》，我很喜欢种树。

白鹿原上最难写的朱先生

邱晓雨：你看你对树有这么多研究，也写它们，刚才你说到人，我想起《白鹿原》里有各种各样的人，他们的经历不同，我特别想知道，就是这些人，你刚才说到每个人的死亡，你会有一个设定，包括什么样的社会关系，决定他有这个归宿。但是写的时候，谁是你觉得比较吃力的人物？

陈忠实：一个人物，就是这个朱先生。我在最初构思，包括开始写作的时候，心里最不踏实的，包括有一种畏怯感的，就是朱先生。

邱晓雨：他好像是有一个原型的，是吧?

陈忠实：嗯，关键就在于他有一个原型，这个朱先生是《白鹿原》里头，对于生活原型依赖最重的一个人物。这个人物，我告诉你他是清朝废止科举制度最末一茬的举人，他是儒家学说的关中理学学派的最末的一个代表性人物。这个人物在我们当地，在我们陕西，尤其是关中地区，几乎是家喻户晓。我还没有上学的时候，就听我父亲讲这个人的传说，他有很多神秘化的传说。这个神秘传说，我们过去可以把它说成迷信，后来我理解，是因为这个人知识渊博，包括对自然天象的观察和判断，有时候都能判断出来什么时候下雨，什么时候天晴。

邱晓雨：有点像诸葛亮。

陈忠实：嗯，民间关于他的传说全是神乎其神的，带有迷信色彩的。实际上我理解，他懂得自然天象，所以这个人在民间就传播很广。因为我写其他人物，没有生活参照，无非就是你这个人物写得好，写得生动，或者写得不生动。而这个人物有一个活生生的，在老百姓的脑海里头既定的一个印象，他们一看，说你写的这个人物根本不像原来的牛先生。这个生活原型姓牛，我在下边添了一个“人”字，就变成了一个“朱”，最担心就是这个人物，能不能得到陕西观众读者的认可。

邱晓雨：后来你这个作品出来之后，他的家人跟你有交流吗?

陈忠实：我后来在一次文学活动上，就是那个小说刚出来以后，认识到他一个孙子。他这个孙子是《西安晚报》的副主编，我们俩一握手以后，我第一句话就问，我说我对老先生的刻画没有不公吧，你

能认可吗？那个人非常高兴地说：非常好。我很感动，因为他可能也没有见过他的爷爷，他也是听传说，听家里他父亲和周围的人说。

让作者落泪的田小娥

邱晓雨：我特别关心小娥，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是写《白鹿原》之前，你在脑子里就开始勾画这个形象了吗？

陈忠实：这个是我构思《白鹿原》最早出现的人物之一。是我在蓝田县查阅县志，其中有三卷还是四卷，全部记载的是蓝田县有史以来的贞妇烈女的名字。

邱晓雨：贞妇烈女？

陈忠实：某某村，某某氏，那个时候女人都没有名字。

邱晓雨：某某氏，只是她丈夫的姓氏。

陈忠实：丈夫的姓和她的姓结合在一块，最后加一个氏，我老婆跟我，对她称呼就是陈王氏，我姓陈，她姓王，陈王氏。

邱晓雨：对，这种方式。

陈忠实：她没有真实名字，没有一个妇女有真实名字。第一册上，对那些最典型的贞妇烈女还有几百字的介绍，比如说十五岁嫁人，十六岁生子，十七岁丧夫，然后就在这个家庭里头坚守一辈子。抚养孩子，伺候公婆，最后村里头的人给挂一个贞节匾，这就是最典型的。到第二本，大概连这个都没有了，就全部记的是某某村，某某氏，就这么两句话，我突然有种感觉，我说这些人，这些女人，你想想她们十五六岁出嫁，十六七岁生子，丧夫之后，毅然在这个家庭生

活一辈子，一个女人抚养孩子，伺候公婆，对于她个人而言，就没有任何享受，那么这些人的生命和心理的承受力，可能是中国活得最痛苦的一种人，甚至不如一死了之，全部是为别人活着。就在这一刹那，我说我要写一个反叛这些人的人，田小娥就出现了。

邱晓雨：田小娥。

陈忠实：嗯，她没有任何思想启蒙，也没有任何人生理论，纯粹就是作为一个自然人应该在社会中获得的最基本的生存理念。

邱晓雨：但她天性是解放的。

陈忠实：她应该这样生存。社会应该给女人一种怎样的生存，最基本的合理的生存。对于“贞妇烈女”卷里头那些女人来说，她们从小被灌输的、继承的就是从一而终，丈夫死了就守节，这个残忍的程度不符合人性——最基本的人性。我们且不说其他理论，就是在这种禁锢下，为追求基本合理的生存权利，而对强大的道德枷锁进行反叛，就产生了田小娥这个形象。

那个时代里头，进行过反叛的人，也不是三个五个，也有一个相当数量的数字。在民间有很多所谓荡妇淫娃的传说，我都听过很多。那么民间对于所谓荡妇淫娃的那些传说，和县志上所记载的，刻记下来的东西，形成一个相当强烈的对比。

我说我要写这样一个女性，纯粹出于自身生存本能进行了一定反抗的一个女性，以及悲剧性的结局，因为在那个时代，她不可能是完美的结局。

邱晓雨：对，她虽然有你期待的那种反叛，她按人性来做自己的事情，但是你也写过她“生的痛苦，活的痛苦，死的痛苦”。

陈忠实：白灵的婚姻，她的反叛就是在接受一种新的思想而实现觉悟的情况下，自觉的反叛。田小娥的反叛，纯粹是一种生理需求的自然的反叛，我着重就是写这两个女人不一样，白灵，家里也给她定了亲，很小就给她定了亲，她一接受共产主义的新思想，就完成了一个很自然的坚决的反叛，而且是成功的。

邱晓雨：而且在价值观上选择和自己是相同的人。

陈忠实：嗯，跟兆鹏那种完美的结合。

邱晓雨：有瘟疫了以后，鹿三被小娥附身，按理说，你在笔下是很喜欢田小娥这个人物的，但是最终还是拿镇妖塔把她给镇住了，选择这种方式，我在想是不是一个美丽的女人就像妖孽一样？

陈忠实：不，这不是我镇她，是那个社会要镇她，封建礼教、封建道德绝对不能容忍。而且跟一些迷信传说有关，本来瘟疫是自然发生的，现在我们就算发生了什么……

邱晓雨：也不用镇谁。

陈忠实：还有瘟疫，那个时候瘟疫发生的时候，人们没有科学见识，那是那个社会形态形成的一种愚昧想法。缺乏基本的科学常识，他就把这个弄到神鬼上去了，既敬神，又敬鬼，最后要镇压这个邪恶的鬼，就把田小娥给镇压了。

邱晓雨：田小娥是一个境界，她已经追求自由了，追求自己人性的解放。白灵是新时期的，她思想不一样。

陈忠实：对。

邱晓雨：再往后没有这种镇妖塔了，社会都进步了。可后来像你写到四妹子，砸不烂的，那种打不趴下的这么个女孩，我觉得就这些女孩子也还都是很像小娥的。是不是在农村那种环境里，这种不太安分的，想要往前进步的女性，面临的困难往往会特别多？

陈忠实：那当然，顺从的人，逆来顺受的人，当然就稍微要好点。敢于闯荡的，所谓出格的，自然就要遇到各种社会给的压力，这个是自然的。

邱晓雨：嗯，应该说每个人，包括你小说里的人，现实生活里的人，都会遇到一定的困难，看自己是不是愿意去挣扎，然后一直实现自己想要的东西。

陈忠实：是，是，对。

土茅房里头把日记一页一页撕下来烧成灰

邱晓雨：关于写作，你有没有想到过放弃？如果有，当时是什么样的原因？

陈忠实：我有过放弃，那就是在“文革”，那是自然的放弃。我是“文革”前一年一九六五年，我二十三岁开始在地方报纸上发表小散文了，当时很兴奋，也没有想到还能写长篇小说，当时的感觉是，我能经常发点小散文就不错了。

邱晓雨：就铅字的豆腐块就可以。

陈忠实：嗯，一般都是一千、两千字的小散文，就感觉很高兴了。从一九六五年初到“文革”在次年的六月份发生，所有报纸都停止了副刊，我大约发了七八篇散文吧，当时都已经感觉甚好了，到“文革”一开始，那个声势就把我吓坏了。我当时是一个民办中学教师，包括郭沫若都说，他读了《欧阳海之歌》，应该把他的全部文学创作都烧毁，扔了。

邱晓雨：否定自己。

陈忠实：嗯，就是“文革”刚一开始，我在报纸上亲自看的，“文革”开始“破四旧”的时候，把我吓坏了，因为当时对于中国的文学作品，现代的文学作品，解放后的文学作品，几乎是全部否定批判的。尽管我当时生活很困难，但总还买了一些文学书，我那个时候有一个很好的习惯，就是每天必须记日记，记了这么厚一摞。还写生活笔记，在生活中观察一些生活事象，一些生活细节，都记下来。“文革”风声一起，我首先想到的就是我那些日记和生活记事。

邱晓雨：很危险。

陈忠实：那个家伙若叫人翻出来，就不得了，那些生活记事，既有社会的光明的东西，更多的还是社会生活细节中的一些丑恶的东西。我说这个家伙要被人翻出来，我就活不了了。我在一个礼拜天回到家，农村的那个家，都是土茅房。我就在我家的土茅房里头把日记一页一页撕下来，全部烧，烧成灰，用黄土把它再一覆盖。

邱晓雨：多难受啊。

陈忠实：从此我就再不记日记了，不敢记日记，好多人出事都是把日记翻出来惹的祸。

邱晓雨：或者是信。

陈忠实：嗯，信上头说两句什么什么调侃的话，还不要说对党的政策满不满的事，根本谈不上这个，就被打成反革命。这个时候对写作的放弃，那是被迫的放弃，你不想放弃也得放弃啊。

爱好和生存，生存总应该是第一

邱晓雨：写东西就意味着有可能有危险，是吧?

陈忠实：还不完全是这个。整个文学杂志都停刊了，作家协会都砸烂了，把作家、编辑全都赶到山区劳动改造去了，从中国作家协会到地方的作家协会全部砸烂了。我们陕西作协那个机关，就刚才说的那院里头是驻军进去的，是部队把那院子占领了，把那些老编辑、老作家，全都弄到了陕南陕北农村去劳动改造了，刊物不办了。所以我不可能再写作，也确实感觉到一种危险，"文革"中间，对于你文字的挑剔，置人于死地的那个程度，历史上可能都没有过。

我们陕西有一位很有名的短篇小说家，上世纪五十年代的作家，在全国影响很大的一个短篇小说家，叫王汶石，他的短篇小说写得相当好，我很崇拜他。他在一篇小说里头写到自然景色的时候，我跟你说关中三伏天的太阳，那很厉害，照在人头上就跟火烧一样。他写这个太阳怎么强烈，照得小白杨树的叶子都耷拉下来，这自然景色描写很自然，这是他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期的作品。到"文革"中间，造反派就拿这句话把他打成反革命，说太阳是毛主席的象征，你写太阳把白杨树的叶子都照得耷拉下来，可见你对太阳的仇恨到了什么程度，就这样，给他兴文字狱了。哎呀，人都吓得跟什么似的，我说这景色就没有办法写了。

邱晓雨：压力太大了，每个人都会很恐惧。

陈忠实：爱好和生存，生存总应该是第一，生存安全才是第一。

谁也不可能跨越当时那个时代

邱晓雨：在你心理上，会真的觉得，郭沫若他都觉得自己写的东西，和一些比如说《欧阳海之歌》这样的东西，价值观上可能有不一样。你很早就看小说《静静的顿河》那一类很有人性的东西，在那个时候你会真的在内心觉得自己的认识是错的，"文革"初期带来那样的东西是对的吗?

陈忠实：因为我读过很多苏联文学作品，最早读《静静的顿河》，后来读过很多苏联文学作品，也读过少数几个西方作家的作品。我在那个时候形成一个什么概念呢，就是西方这些文学作品，人家之所以那么写，那是西方的文学观念；我们是社会主义中国的文学，我们是按毛泽东的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来写的，西方那些文学理念对我们不适宜，我们不能那么写，这在当时就形成很明确的这一种信念。

邱晓雨：真的在思维里头是有这种信念的?

陈忠实：嗯，你不可能按西方那些文艺手法去写，因为我们的文学批判从解放一直不断，一直批判资产阶级文艺观，发展到"文革"中间，江青搞的"三突出"，它有一个发展基础。我记得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文坛上兴起批判"中间人物论"，一个不大不小的文学批判风潮。

邱晓雨：还不是上面给的力量，是自己。

陈忠实：嗯，那纯粹是文坛上兴起来的，批判“中间人物”。什么叫“中间人物”，当时有个特殊的概念，就是不好不坏，亦好亦坏，不上不下的中不溜人物，连这种人物都不能写。只有在“文革”前的中国文坛上才会出现所谓“中间人物”这种特殊的概念，连这种人都不允许作家去写，写了就说你不塑造英雄人物，这就是文学实际存在的问题。

邱晓雨：我觉得作为一个年轻人，当时写东西，又对文学有热情，是不是很难不被这个环境带动，因为它的大方向导向是这样，你必须按它的标准来要求自己？

陈忠实：是。

邱晓雨：从不让写的不能写，到后来包括很多人对极左的迎合态度，也一起进入到这个风潮里面了。就是因为整个大的文学环境，给你的是这样一种压力对么？

陈忠实：从专业作家到刚刚学习写作的业余作者，都在努力探索怎样塑造英雄人物。因为你不这样，你的作品永远都不可能发表，就这么简单直接。我们的舆论媒体，都是文学杂志、报纸。对文学的要求就是这样，你走到任何文学团体，也都是这样要求的。

邱晓雨：因为只有这一种被承认。

陈忠实：只有写英雄人物这一种观念，是对文学创作绝对的要求，你不可能有其他想法。

邱晓雨：文学观念其实在《白鹿原》那会儿就已经转变过来了，那你今天，再回头看看那时候发表的东西，内心不会觉得挺那样的？

陈忠实：“文革”前？现在看那个时候，都是经历过的，都是真实的，也没有什么后悔不后悔。因为你不可能逃避。经过“文革”那十年的折腾，不止是我一个作家，任何一个人都是经历这个过程过来的，你不可逃避，要不你就放弃文学。

邱晓雨：就是你过不了这个坎儿，你就永远到不了那边。

陈忠实：嗯，不可能逾越，谁也不可能跨越当时那个时代。

知青题材背后的城乡差别

邱晓雨（旁白）：在进入作协后，陈忠实做出过一个决定，那就是回家进行创作。今天，他依然怀念那一段拥着火炉吃着烤馍，和村民下棋的日子。在十年的创作生涯里，陈忠实一直住在农村。因为家庭经济条件并不好，他曾表示如果小说不能出版，就准备去养鸡谋生。来自农村的陈忠实除了描写深受中国封建传统影响的乡土生活，还涉及过城乡之间的题材。在他早期的小说《打字机嗒嗒响——写给康君》中，有这样一段主人公的语言：“狗屁小说，写知青下乡简直跟下地狱一样。那么，像我这号祖祖辈辈都在乡下的人咋办？一辈子都在地狱生活？谁替我喊苦叫冤？所以说，我最痛恨的就是那些心安理得吃商品粮还要骂我们农民的城里人。”

邱晓雨：这是你一部小说里的内容，你还能记起来这段吗?

陈忠实：那是我小说中人物的话。

邱晓雨：对，人物的话。

陈忠实：《打字机嗒嗒响》。

邱晓雨：对，《写给康君》。

陈忠实：《写给康君》。

邱晓雨：但其实我看到这个，我在想，是不是确实在农村会有很多人真的会这么想，这肯定的吧?

陈忠实：这个就是所谓的差别，城乡差别。这个差别差在被差的这一方就是乡村人，处处都显着差别，这个我就不用说了，这个生活世象太多了。城里人有商品粮，尽管粮食不是太充足，但是能保证供应。还有油，每个月尽管很少，还有几两油，还有半斤肉，乡村人什么也不给啊，国家就跟农民要公购粮，粮食一拿走，农民什么都没有。你地里庄稼种得好，粮食打得多，生产队就分粮多一点，生活就好一点。你的庄稼长得不好，粮食打得少，分得少，不够吃，饿肚子，那是你们的事。国家的救济粮是很有限的，所谓粮食"不过关"，主要是对农村而言，这个城乡差别太明显了。

包括很敏感的知青题材，很多知识青年下到农村以为很苦，跟下地狱一样。包括后来很多文学作品都有这方面的反映，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很多写知青生活的作品，都是带有控诉性的，知青到农村多么苦多么苦，多么灾难。可是农村青年呢？甚至在同一个中学念书，高考落榜和高考停止以后，不用政府往下压，他们自觉就回到农村家里去了，我就是其中之一。

好多此类题材的影视剧，包括文学作品都写这个。可是回乡的农村青年绝不比城市下乡青年少，为什么没有这个情绪呢，他们已经成为自然，心里有那个承受力，回农村是必然的、自然的，不用谁说，更不用政府去做工作。

邱晓雨：其实应该也反映了在农村的很多人，内心真的就是这种感受。

陈忠实：对。

邱晓雨：看到知青下乡，听到知青对当时社会的控诉、抱怨，但是他意识到自己其实没有抱怨的权利，好像是这样的。

陈忠实：是，是。

邱晓雨：《写给康君》里面还有一个题材，可能我们从古代就有陈世美这样的人，很多人为了发展，一定要去一个更好的地方，家里面的爱人他也要舍弃。文学作品当中你们是一种这样的态度，那现实生活当中大家会怎么看待这样的人呢？

陈忠实：现实生活里头，两种理念，传统理念是糟糠之妻不可废。无论男人和女人，按照我们传统的道德要求就是从一而终，对女人是从一而终，对男人就是要对这个女人负责一生，不能离异，包括到上世纪五十年代离婚的都非常非常少。到八十年代，性解放，这个概念出来以后，冲击很大。其实这个里面掩盖了很多非道德的东西。

男女双方，原来“文革”甚至改革开放初期受过苦，受过灾难的人，生活也艰难，艰难时期组成的家庭，好像这个矛盾不突出，一旦一方的社会地位，包括经济能力得到大的改善以后，社会关注度就多了，个人的心理和情感上也会发生很多变化。当他在面对新的环境里边的男男女女们的时候，就是面对所谓花花世界的时候，还能不能坚守住原有的婚姻道德那个情感承诺，就可能形成一个问题，这是一种。

另外一种就是原来在艰难环境下，甚至吃不饱，穿不暖，个人生活不稳定，在这种艰难环境下组成的家庭，可能也未必都是完全满意的，可能多少都带有一些凑合的成分，没有选择的权利。这种婚姻很多，当新的社会环境形成，他在社会上的地位，包括经济地位都发生了大的改变的时候，对原来的配偶不满意成分就会突然扩大了，就想改变，这样子造成很多家庭的悲剧。

邱晓雨：所以从城市进入乡村，一方面是争取更好的自己想要的生活环境，去实现理想，一方面还要经历这种考验才可以。

陈忠实：是，是。

问我能不能跨越《白鹿原》，我不敢保证

邱晓雨：你作品很多，大家可能最熟悉的是《白鹿原》。

陈忠实：对。

邱晓雨：现在如果向全世界的人推荐你的一部作品，我想知道还是《白鹿原》吗?

陈忠实：对。

邱晓雨：但是有一个问题，写《白鹿原》的时候，你就说过，希望这是一本以后能在棺材里枕着的书。我是想起《初夏》最后一句话写着："生活在不断的死亡，生活在不断的新生。"但是像现在，你已经有一本在棺材里都能枕着的这么大一本书了，在创作上还会考虑怎么来保持新生吗?

陈忠实：这是由各种因素造成的，我说垫棺做枕之书。

邱晓雨：垫在棺材里面做枕头。

陈忠实：那纯粹是指向我自己，跟别人无关。你可以把它看作是一种对文学的神圣，但显然也还不完全是一种文学创作。因为就我理解，作家的创作是有各种追求的，我起码要追求到我自己满意的一部作品，且不说别人认为它能形成什么样的影响，我能满意，它就可以垫棺做枕了，全部是指向自己内心。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因为我太喜欢文学创作了，跟朋友开玩笑说了这一句话，后来就广为传播。

邱晓雨：但从某种意义上我觉得《白鹿原》可以说是你个人的《立身篇》。

陈忠实：对。

邱晓雨：你自己会不会也觉得想超越《白鹿原》，已经给自己设定了一定的难度？因为太多人喜欢它。

陈忠实：是，我的回答一直就是，是。不光是我，就我知道的一些名作家，国外的和国内的，他某个时期创作一部产生巨大影响的作品，后来写的作品，好像再没有产生那样具有社会影响的效应。

不光是一个作家，好多人都是这样子。甚至有的作品是三部，而社会评价最好的往往只是第一部，一部比一部差。作为一个连贯性的三部的作品，后两部都保证不了跟第一部同样产生那样强烈的影响，何况你另外的题材的创作，就更难了。只有托尔斯泰做到了，托尔斯泰一部比一部写得好，这是世界文坛上绝无仅有的。

你们问我能不能跨越这个，我不敢保证。我作为一个作家，就只能把一个时期的体验，尽可能不留下遗憾地表述出来就行了，至于它

能达到什么程度，那你勉强不得啊。

我想去看一下杜甫 给他送一斗小麦

邱晓雨：像关中这个地方，其实自古就是各个朝代的都城，这种渲染对你来说有多大程度的影响？这个地方其实有这个地方的独特性，有你的文化土壤。

陈忠实：对于我来说，我觉得不要把这个东西神秘化。关中这一块土地，历史上所创造的辉煌到了我这一代人的时候，全部变成了破砖烂瓦，埋在地下，你看都看不见。直到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国家财力比较雄厚了，人的文化意识、历史文化意识强烈了，才开始不断地整治文物。

历史上遗留下来的，不要说现在，就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在人的整个意识里头，李世民离我们太遥远了，不要说对乡村人，对城市人而言，粮食吃不到月底，油只有四两，生活的困境和紧张，是每个家庭里头的首要问题，且不说阶级斗争搞得人人自危，谁去想李世民干什么，谁想杨贵妃干什么。我们今天吃饱喝足，穿着各种时装，才有闲心追寻历史文化，才有了这么一点情调。

对当代人的影响是一两千年历史形成的，传播在这块土地上的封建政治理念、封建道德演化成民风、民俗，对人形成影响和心理制约。我一直在关中生活，后来才意识到，哪怕是一些文盲，从小教育自己的孩子，都是我们的封建道德中规范的那些东西，一代一代传下来。

至于秦始皇陵，一个土堆堆在那儿，我们现在重视这个历史文物，旅游参观，看的人很多。过去堆在那儿，老百姓连看都不看，谁看啊，看它解决不了肚子饿的问题。

邱晓雨：这个题应该挺好答的，作为丈夫，你给自己的分数是多少？

陈忠实：我该打高分，我不说具体分。

邱晓雨：高分？

陈忠实：因为我这个家庭是一个农村家庭，我夫人是农民，我是乡镇（当时称公社）的一个基层干部，工资很低，三十几块钱。结婚后连续生了三个孩子，她抚养孩子，生产队劳动都不能参加，工分挣不来，全部生活就靠我那一点工资和包括养猪什么的，这些来支撑，她抚养了孩子。到新时期，工资一步一步往高升的时候，家庭经济状况也改善了，我尽我的努力，至于他们的感觉如何，我不敢评价。

邱晓雨：他们对你的小说怎么评价，你家里的人？

陈忠实：我们一般在家里都不说文学，只说生活。

邱晓雨：如果没有时空的妨碍，不论朝代，不论国家，你最想去的地儿是哪儿？

陈忠实：我最想去的还是我们长安，而且是唐代的长安。

邱晓雨：唐代的长安城？

陈忠实：嗯。

邱晓雨：那儿有大明宫?

陈忠实：嗯。我哪怕到唐长安城边上。其实，我那个家就是唐长安城旁边二十多公里的一个乡村。盛世之下，老百姓应该是活得最滋润的时候，但我心里也畏惧覆亡时的长安的凄凉，所以不愿意在那个时候。

邱晓雨：所以要到唐朝，但不能太晚，不能到晚唐。

陈忠实：对。

邱晓雨：我们后面一个题，说你可以跟这个世界上任何一个活着的或者死了的、真有的或者虚构的，就是你没有正式接触过的人相约，你会选谁喝茶聊天?

陈忠实：我想去看一下杜甫，如果我家里有粮食的话，给他送一斗小麦，他太凄凉。

邱晓雨：这是你想见的人，不光是喝茶聊天，是希望让他过得在当时能好一点。

陈忠实：嗯，因为他最后的凄凉给我的刺激太深，如果我们家庭有饭吃，我会给他送一斗麦子去。

邱晓雨：希望杜甫能听到。

始终把握性描写的准则

邱晓雨：我记得你写小说时说过，凡是涉及性描写，是不做诱饵为原则的。

陈忠实：对。

邱晓雨：性描写也是体现中国民族文化的一个环节，怎么去把握中国文化的背景？考虑的时候，真的是信笔写下来，觉得心里想写就写？还是会考虑到中国人很多东西是跟外国人，或者其他不是这个地方的人，是不一样的？会有这个意识么？

陈忠实：我把握性描写的一个准则，就是出于作品里头设置这个人物的生命历程中，他的爱情，包括他的性，对这个人的生命的影响。爱情和性成为他生命所不可逾越的一道坎的时候，造成他生命的痛苦或者欢乐，我就得把它准确地写出来。如果性跟这个人物的生命历程没有关系，那么就是非必要，那就没有必要写了，写多或者写少，都是以此来把握的；还决定于这个人物的个性心理，再深一层说就是这个人物的心理结构形态。

邱晓雨：能感觉到，因为整个在《白鹿原》那么大的背景里面，性描写它是有一种很严肃的背景，人物的命运，包括整体文化形态也能显现出来。但是你比如说看《白鹿原》的有一些人，你是不把它当诱饵来写，但有一些特别偏好这一块的读者。你会怎么看，你是会喜欢他们，还是不喜欢他们?

陈忠实：我谈不上喜欢或者不喜欢，这个我就决定不了了，文学作品面对不同兴趣的读者，就有不同的看法，这是很正常的。

邱晓雨：作家对一定范畴的文化是有影响的，你期待出现更多什么样的读者，什么样的评论者，什么样的声音?

陈忠实：这个我没想过。

邱晓雨：这个就是比较大了。

陈忠实：这个我也决定不了，社会的发展和存在，谁也决定不了。包括我们的人群，发展到今天这个状态，涉及创作界和评论界，各个人都以自己的追求和喜好在这个文坛上做着自己的事，谁要影响谁很难。所以我索性就不想这件事。

邱晓雨：所以你会做实事，用五年把作协的房子修好，给他们一个好的环境。

陈忠实：嗯，这是我的事，别人未必都喜欢这样做，如果我当时在作协创作和生活环境好的话，矛盾不尖锐，我也不会去做这个事，都是因时因地而决定做什么的选择。

我喜欢赵本山的小品

邱晓雨：我不知道你看春节晚会吗，春晚?

陈忠实：看。

邱晓雨：如果说春晚邀请像你这样的作家，创作一个小品，你更期待是一个什么题材的小品?

陈忠实：小品的时间限制得很少。

邱晓雨：对。

陈忠实：一个智慧的小品，又能涉及我们生活正在发生的民众关注的一些问题，所以我喜欢赵本山的小品，原因也在这儿，他总是涉及最直接的生活现象，又包含思想。

邱晓雨：什么最让你恐惧，在这个世界上？

陈忠实：意料不及的创伤，是最令人恐惧的。生活环境里头，比如你行走着，一辆汽车撞到你的后腰上，这是最恐惧的。我们的社会生活，人生经历中间，也有类似的情况，让你感到恐惧，而你毫无防范之心的时候，这是最恐惧的。

邱晓雨：你觉得幸福是什么？

陈忠实：做成了自己想做的事，在我来说，就是写作。不要说《白鹿原》，就是一篇两篇三篇自己的散文，当第一眼看到发表的报纸，或者是杂志的时候，那一刻是最幸福的。

邱晓雨：你现在仍然是？

陈忠实：还是这种心理。

邱晓雨：最后，你随便说什么都行，作为这个节目的结尾。

陈忠实：通过你这个媒体，希望能够完成我跟读者的交流，对我的写作，尤其是不足的部分，希望得到你们的反馈。

邱晓雨：好，我们一定尽力。

邱晓雨（旁白）：作为一个已经担任中国作协副主席的知名作家，我以为陈忠实不会再像当年那样，对于发表一样东西感到那么兴奋。但是尽管年近七旬，尽管为了陕西省作协和全国作协不得不负的责任，陈忠实甘愿腾出自己大量的创作时间和精力，尽管他认为最巅峰的状态是勉强不来的，我还是惊讶地发现，那种自从他初涉文坛就有的对创作的热望，一直没有因为时光的流逝和职位的变化而变淡。

这是我采访的作家里，目前唯一一位说道，会在第一眼看到自己发表的东西，会觉得幸福的人。我以前以为这个职业的人，都会因此幸福。但是确定的给我这个答复的人，只有陈忠实一个。所以我很希望，他能像自己所说的那样，把这一个时期的体验，做尽可能不留下遗憾的表述。

每个时代也都有自己的遗憾，让这些作家的文字来留住它们吧。文字尽管不是完全的历史，但是毕竟让我们认识和记住了很多东西。对于一个民族来说，这必不可少。

2010年8月18日 太原

有关我的创作

——答《黄河文学》和歌问

和歌：陈老师，如果说在读其他小说的时候，感觉是读了一个故事，它们截录了生活的一些片段的话，读《白鹿原》的感觉却是，它是一个世界，它包含了很多故事，但又不仅是一个故事，而是一部史诗。《白鹿原》里所描绘的一切，作为一个世界存在在那里，又不像真实的世界随着时间消逝，而是获得了永恒。您觉得如何给《白鹿原》定位更合适呢?

陈忠实：感谢你对《白鹿原》“它是一个世界”的概括。

我至今没有想过给《白鹿原》定位的事。当初构思和写作这部小说，目的很明确，就是想写出封建帝制解体后，以根深蒂固的封建文化、封建理念结构着心理形态的白鹿原上的男人和女人，面对迎面而来的新的思想、新的文化、新的理念的冲击，原有的文化心理结构被搅乱被打碎，以新的文化、新的思想重新完成心理结构的新生的艰难痛苦。我把这个过程称作心理剥离。人的文化心理结构的打碎和重建的剥离过程，很难一次完成，每个人物在这个过程中都会经历起码不止“一个故事”。白鹿原这一方社会，整个都在发生着打碎和重构的过程，更不会是一次性的完成。这样，这道原在近五十年间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事件，这道原上的人也必然经受一次又一次的精神和心理的剥离过程，故事就一桩接一桩地发生了。

《白鹿原》一书发表近二十年来，受到读者的关爱，从热销进入长销状态，现在每年以十万至十五万的印数销售，我亦不仅深感欣

慰，早已超出我当初写成时的愿望了。尽管如此，我仍然想到岁月淘汰的无情，《白鹿原》依然还要经受新的读者的审读的过程，被淘汰的可能也就存在着。这样，更免说“史诗”了。

和歌：《白鹿原》里面有一个完整的道德体系，其中，如果说朱先生是个大儒的话，那白嘉轩就是一个行动中的体现者。这其中体现出的道德观念，我们中国人都不陌生，但也没有想到会这么具体，这么直观。《乡约》是从文字上把它具体化了。您以前有没有意识到自己对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念有如此深入的了解？对于这样的道德观您是持什么样的态度?

陈忠实：对中国传统价值观念，我不仅不了解，而且自年轻时就持一种批判乃至轻蔑的姿态。我是一九五〇年上学，学的自然是解放后编的新课本，及至高中毕业，语文课本都是遵循“厚今薄古”的主导原则编选内容，古文占很小的比例，更谈不上系统的国学基础了。我自初中喜欢文学，多是读当代中国作家的作品，后来更偏重到偏颇地阅读翻译文本，尤其是苏联文学。受那个时代总体潮流的影响，把传统文化和国学一概斥之为封建糟粕。当我第一次面对我生活着的白鹿原上世纪前五十年的历史时，有一个人便跃到眼前，就是朱先生的生活原型牛兆濂先生。

牛兆濂是清朝废除科举制之前最后一届得中的举人，他是白鹿原下灞河北岸人，距我南岸的家不过七八里路。他在蓝田县开办书院，不仅有南方北方的学子，而且有朝鲜半岛的留学生。他钻研并教授的是张载的关中学派的理学。我在蓝田查阅县志和相关历史资料时，发现了《乡约》。这个曾经传播中国南北乡村作为宗族守则的《乡约》，是北宋哲学家吕大临的杰作。吕大临也是蓝田人，曾拜师张载的书院，后来不仅成为北宋的宰相，而且有多种著述。他的“合二而

一”哲学观，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初被杨献珍发掘并阐释，不料遭毛泽东点名批评，着重要害是“阶级调和”论，由此而掀起一场批判“合二而一”、张扬“一分为二”哲学观的运动。我在读到《乡约》条文时，不仅惊喜，确曾有一种震撼发生。我的直接感受是，我获得了透视白鹿原地区人的心理结构的途径。作为国学的儒家思想，传播过程中有一个致命的障碍，便是社会底层的广大乡村以及城市的贫民阶层多为文盲，很难领受“之乎者也”的儒学。吕大临的《乡约》大约就是为着打破这道障碍而制作的，文字直白通俗，易懂易记，规范人的行为十分具体，不仅可以作为所有乡村家族教化族人的守则，而且可以成为家庭规范子弟儿孙的做人准则。前文所说到的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就是《乡约》里的一条一款为竖挂横梁构建而成的。我曾自我调侃说，我过去看中国人和欧美人的差别，是谁的皮肤白了黄了，谁的眼睛深了浅了蓝了黑了，谁的头发黄了黑了卷了直了，谁的胸毛稠了稀了……现在我才发现，中国人和欧美人最大的差异在文化心理结构上，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是以《乡约》架构的，欧美各国人的文化心理结构的构件无论怎样大同又有小异，却绝无《乡约》里的一木一瓦。

我不惜篇幅，把《乡约》的前几条照抄到《白鹿原》书里，寓意即在于此。

关于传统道德，我是在面对传统文化的大命题时，不可回避地也有了自己的审视和选择，无须表态，我把对包括传统道德在内的传统文化的理解，都浇铸到朱先生和白嘉轩的身上了。许多年后，令我欣喜的事发生了，温家宝总理在一次演讲中引用了理学关中学派创始人张载的语录：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

平。作为理学关中学派的最后一个传人牛兆濂，是一个身体力行着的白鹿原人。

和歌：同时它也是一个传统生活的演示。里面对于婚丧嫁娶、读书耕地等一应的大事小情该如何处理，本着什么样的原则，都有非常详细的演绎。同时也包括了革命与叛逆、贞节与淫荡。简直是一本百科全书。还写出了儒家文化在一段历史时期的表现和经受的挑战。如果它是几千年的沉淀的话，您如何看待这种文化对于我们现在生活的影响？根据您的意见，这种传统将来会是什么样的轨迹？

陈忠实：我所看到的生活现象，已经是今非昔比了。浸淫着儒家文化色彩的生活习俗，已经从当代人的生活中悄无声息地消亡了。譬如婚礼仪式，城市里流行一种既不完全仿效西方也非中国传统的程序，服饰打扮走过红地毯以及当众拥抱等行为，有点洋气，而婚礼主持人从头到尾倾泻而出的半是正经半是挑逗还有夹带的酸词浪语，却承继着中国老式婚礼主持人的满嘴顺口溜的习俗……真可谓土洋结合的成功范例。乡村青年的婚礼也效仿城市婚礼的程序操办。《白鹿原》书里写到的乡村生活习俗，已经基本消隐了，《乡约》规范的做人行为准则早已作为“四旧”破除了。孩子从小接受学校教育，先生们以革命接班人的规范教育学生，家长以自己的做人准则培养孩子，似乎更多关注的是学业成绩，我很难估计传统文化对当今生活发生着怎样的影响。

我更难判断这种传统文化将会以怎样的轨迹演进。

和歌：您觉得您是发现了一个这样的世界还是创造了一个这样的世界？

陈忠实：《白鹿原》这个世界的存在是客观的，人类在这道原上和原下繁衍生息了不知几千年。这道原东边不过十公里处是距今一百余万年的蓝田猿人的发现地，西边坡下是距今六千多年的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典型代表的半坡人生活的遗址，原上也有此一时期人类生活的遗物的发现。我长期生活和工作在这道原的北坡根下，却熟视无睹，只是关注着原上原下人在公社体制解体前和解体后的生活变化，希望在这里能够发现一个“上城的陈奂生”或是“造屋的李顺大”。我真正把探视的眼光集中到这道原的昨天的历史，是一九八五年发生的。可以说我发现了现实生活里的白鹿原这个非同寻常的世界。尽我的理解和感受，写成了小说《白鹿原》。这自然是我构建的一道原了，且不敢说是创造。

和歌：我一直对您写作的视角很感兴趣。这部作品的另一个伟大之处在于，它并没有遵从官方的视角、意识形态的视角，而是从更超脱、更悲悯也更高的角度来叙事。与此前您的中篇的风格差异很大。这个跨越是质的跨越，以至于有人说这是有如神助。《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里提到“剥离”，是不是指您创作《白鹿原》的一个重要的心理转折？从此前创作农村题材的小说，到写出一个史诗般的作品的重要转折。这个奇妙的过程您能不能再说说?

陈忠实：其实这个过程说不上奇妙，更说不到“有如神助”了，我的创作过程是一个学习的甚为漫长的过程。一九七三年我创作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接班以后》，尽管也逃脱不了演绎和图解政策的时病，但对生活的描写和人物性格的刻画，赢得了甚为强烈的反响，有人甚至猜疑柳青换了一个名字写作了。相对于八年前我发表的千把字的处女作散文，也当属“有如神助”。关于“剥离”和“文化心理结构”对我写作发生的重要转折，前两个论题已经涉及，不必重复。就我自己

所经历的探索过程而言，《蓝袍先生》这部中篇是对此前中短篇小说写作的一次突破。这部中篇小说发表不久，评论家王仲生觉察到了我的变化，曾写过一篇很有见地的评论，在我的印象里，除了极个别的一出手便铸成不朽的青年文学天才之外，绝大多数作家都是循序渐进，完成一次又一次思想和艺术的突破，抵达一个独立的创造高峰。我印象最深的是和我住一栋楼的路遥于一九八二年发表中篇小说《人生》，不仅实现了个人艺术创作的重大突破，也使一个时期农村题材小说创作发生突破性的意义。想到八年前路遥发表的小说处女作《优胜红旗》，确也用得上“有如神助”而发生了重要转折。在我理解，这是路遥不断学习不断探索所获得的一次非凡的艺术突破。

和歌：我读了您的那本《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是写完《白鹿原》后的创作手记，印象很深。因为创作手记一般来说，是作者对于写作的过程和为什么这么写的一个资料性和理论性的东西。但在我看来这本书已经自成一体了。很少有作家能如此系统地理性地分析自己的作品的成因和人物的产生过程，有的作家会故弄玄虚，归之于灵感。但你却不是这样。你说这是有一天突然发现了自己有着丰富的不为自己以前所知的积淀。这是不是反映了您那个时候的内心的成长和写作能力的成长呢?

陈忠实：你对《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的赞赏，让我欣慰。《寻找属于自己的句子》中谈到对记忆深处积淀着的生活记忆的发现，进而触发了我对一九四九年以前乡村生活演变的极大兴趣，且有一种神秘感。新时期文艺复兴以来我的所有作品，都是对瞬息裂变着的乡村生活的直接感受的表述，几乎没有兴趣也难得悠闲之心关注那些陈年旧事。在中篇小说《蓝袍先生》的写作时，撞开了旧中国乡村记忆的木门，陡然涨起探询的强烈欲念，想写一部长篇小说的欲望便发生

了。我完全没有意识到你说的“内心的成长和写作能力的成长”的事，只是一种创作欲望的发生。

和歌：当然，每个写作者都有一个自我认识、自我提高的过程，都有一个神秘的宝库，而恰当的挖掘和表达却很难做到。达到这个是需要机缘还是自己的求索呢？我觉得自己的探索有落入形式上的标新立异的危险，您的体会是什么？

陈忠实：机缘是存在的不可或缺的。譬如作为新时期文艺复兴的标志作品的《班主任》，没有改革开放的大机缘是很难出世的；随之而来的新时期文艺复兴的繁荣景观，也是不可能发生的。还有一种纯属个人写作的小机缘，大多数作家都不止一次发生过，我也因这种机缘的发生而兴奋和庆幸。

我更看重求索。创作的“创”字就主要体现着新的求索。创作最忌讳重复，既不能重复别人，也不能重复自己；不重复就得创新，创新就意味着求索新的途径。求索或者说探索，在我理解主要有两点，首先是作品要写什么，即作家对生活发生了什么独自的体验和发现，必欲展现而后快。这里我强调“独自”，即是说作家自己对生活的体验和发现，别人不曾也尚未体验和发现的东西，既不会重复自己也不会重复别人，探索便获得了最高意义的成果，这种新体验和发现，既可能是尚未触及过的生活领域，也可能是自己抑或别人业已触及甚至写过的生活领域，因为发生了既不同于自己也不同于别人的新的体验，就更富于深层发现和体验的新鲜性和独特性。再，当属艺术形式的创新。在我理解，艺术形式的创新或选择，是以前者即内容决定的，包括语言。以怎样的叙述或描写的形式，才能充分展现业已体验到的内容，艺术就富于个性特色了。鲁迅先生的作品是足以为范例的。无论《狂人日记》或《阿Q正传》，包括短篇小说《祝福》或《药》，鲁

迅先生的叙述方式或者说艺术形式差异太大了，仅语言而论，不敢想象用写阿Q的那种语言怎么可能写狂人和祥林嫂。这样，我便相信，艺术形式包括语言的选择，都是为作家业已体验到的内容而苦心求索的。离开了内容而选择一种新的艺术形式，或者没有对生活新鲜而独自的体验，单是展示一种自己感兴趣的新的艺术形式，很难获得期望的效果。

探索自然免不了失败的危险，那么就重新探索，终有获得成功的时候。

和歌：《白鹿原》有一种大美，这种美是源自它的丰富和独特。比如日常语言，把它们非常妥帖地转换成了书面语言，或者说使我们知道我们的口语中原来有许多用语其实是古雅的，是很有内涵的，从而对自己的语言更多了一些了解。您平时很注意这种积累吗？对于日常语言的这种领会，跟您身处关中有很大的关系吧。

陈忠实：你对《白鹿原》的语言的赞赏，给我更增一份自信。我真的没有对关中生活语言做过收集或积累的功夫。我是关中东府人，关中话是我的唯一一种交流工具，好话瞎话丑话酸话都会说，这是自学会说话便逐渐“积累”下来的。然而，作为文学语言，我却经历了一个甚为漫长的演练过程，不无弯路。初学创作阶段，看到南方北方一些我敬佩的作家的作品，尤其是写农村题材的小说，我看到不同地域许多生动传神的方言土语，很自然地就在我的习作中写进关中方言土话，把许多生僻的土话用了进去，以为这就是生活气息和语言特色，效果自然适得其反。道理很简单，语言是完成交流的工具，一切生僻到让关中以外的人读了感觉莫名其妙的土语，反倒成了交流的障碍，肯定倒了读者的胃口。

及至《白鹿原》的写作，我对生活语言的选择已有一个基本的法则，那些从字面上可以让外地读者领会至少六七成含义的词汇才用；如果从字面上让人连一半意思都揣摩不来的词汇，坚决舍弃；人物对话语言，尽可能生活化，更争取个性化。我在《白鹿原》的叙述语言里，用了许多生活语言，主要是为了叙述的生动和逼真，避免了任谁都不陌生的纯文学语言的平庸。再，就我对叙述语言的探索体会，在叙述语言里用上生活语言，有如混凝土里添加的石子和钢筋，增加了语言的硬度和韧性。

和歌：美国作家亨利·詹姆斯在评价一个作家的时候说过，他具有一种伟大的能力，那就是“全面体会日常生活的能力”，以及把它们纳入作品中，使它们从整体上散发出诗意的光彩。觉得难能可贵的是您这部长篇，也很适用这句话。史诗般的作品，却有那么精致的准确的细节。比如说，鹿子霖第一次从田小娥那儿走的时候，让她下次把炕上铺得软和点儿，一句话点出了两个人生活状态的差异；还有就是孝义的媳妇借精生子，她的婆婆因为受道德上的影响而在心理上产生了厌恶，最后郁郁而终的事。诸如此类的细节很多，很准确，又很精妙，是您观察所得还是写作时的必然发展？您对细节在作品中的作用有什么看法?

陈忠实：记不清哪位大家说过，情节可以任由作家编造，而细节却必须真实。我信服这句至理名言，至今依旧。我读或长或短的小说，如果接连读到两三个生编乱捏让人不可置信的细节，便会发生强烈的排斥感，放弃阅读。细节在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中，对于人物刻画是至关重要到致命的关键环节。一个个性化的细节对人物心理隐秘的揭示，胜过千言的平面介绍。多年前读过某一部小说，许多情节乃至人物都记不清了，却记得某个人物的一两个细节。好的细节的艺术效

应甚至是多层面的，即如你举的鹿子霖离开田小娥窑洞时说的那句话，“点出了两个人生活状态的差异”，在我实施写作时的更为务实的效果，节省了许多描写田小娥窑洞生活一贫如洗之情状的笔墨。

我对细节已经形成了依赖心理，想写一个短篇小说，如果没有至少一两个绝妙的细节，我就涨不起写作的自信来。我在生活中发现一个令人惊心的细节，难以淡忘，常常会依此酿制出一个短篇小说来。几年前写的《日子》和《李十三推磨》，都是由亲历的和闻听的动人细节而生发出来的。

和歌：《白鹿原》中有一些超现实的因素，比如说白鹿的出现、预言和风水，等等。但您并没有把它们的特质扩大，相反只作为一种“点”，这您在创作时是如何考虑的？受没受到您多次提到的拉美文学的影响？

陈忠实：我是《百年孤独》最早的一批中国读者之一。该书译文在《十月》发表时我就读到了，那是一九八三年的事。随后多年，我陆续读了拉美几个国家最具影响的代表性作家的作品译本。《百年孤独》对我的影响，不是魔幻，而是让我把紧盯着现实生活的眼睛分出几分来，投向我生活着的以白鹿原为标志的地域的昨天。这方地域的历史远非拉美诸国可比，单是魔幻这种艺术形式，只会在拉美的土地上被马尔克斯创造出来，欧美没有发生，中国也难得发生。道理再简单不过，中国民间似无魔幻传闻，更多的是神和鬼。玉皇大帝且不说，关公是农民最感亲切的神，他死后据说被封为单管风雨的神，关中乡村差不多每个村子都建筑着一座关公庙，为着祈雨。每户农家的墙壁上都设有敬奉土地爷（神）的土地堂，为着庄稼的好收成；更有灶神爷敬在家家户户的厨房正墙上。鬼不属中国独有，欧洲、美洲也有，有人居的地方都有鬼的传闻，所以也不足以当作魔幻论。马尔克

斯的魔幻色彩的标征，是家族的一个孩子竟然长出一根尾巴。如果以此仿效出中国人屁股上或身体其他部位也长出一个什么东西来，或者演绎出人变狗等传奇，这种照猫画虎的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白鹿原》里写了白鹿的传说，写了神，也写了鬼，却不是魔幻，是白鹿原乡村的生活。

和歌：您有没有想到过修改它？有没有觉得有遗憾的地方？

陈忠实：这部小说写得很慢，酝酿和构思整整两年，写作用了四年，把我所能意识到的东西基本表述出来了，所以没有遗憾。没有遗憾，也就没有再作修改的打算。

和歌：您说《白鹿原》是垫棺之作，但我觉得那是一个写作的高峰，从那之后您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状态。读您后来的散文，觉得您有一个从容的状态、达观的态度。比方说，您又回过头来看到您种的树了，河湾里的白鹭，小外孙的童言稚语等。《白鹿原》的写作完成和得到如潮的好评，对您此后的人生状态有什么样的影响？最初写作是出于生计和自己兴趣的考虑，但如果您现在写作的话，是为什么写作？创作会赋予您内心什么样的状态？

陈忠实：现在是一种触发式的写作，无论散文，无论短篇小说，都是生活事项触及某一根神经，便发生创作欲望，说不吐不快也合实际。《白鹿原》之后的为数不少的散文和为数不多的短篇小说，都是这样写成的。另一种写作可称为遵命文学，是遵文学朋友之命为其著作写序，我比读文学名著还用心，感知他的思想和艺术魅力，溢美是溢他作品所独有的美，不是滥说好话。约略想来，我大约为近百位作

家朋友写过序了。写序不仅让我看到作家朋友的情怀和追求，也让我更了解了这位作家立身的品行。

无论哪一种写作，完成一篇或长或短的文章，画上最后一个标点符号的那一刻，都是我感觉最幸福的时刻。

和歌：从您的文中处处可以感觉到您对于贫困的坦然，对于俭朴生活的安然，所谓安贫乐道的人生态度。如果回到过去的生活，回到农村，您还能习惯吗？简单生活其实不仅是一种习惯，也是一种生活态度的表达？

陈忠实：现在回到农村，不仅习惯，而且成为想回去却回不去的缺憾。我曾在二〇〇一到二〇〇二年回到白鹿原北坡根下祖居的屋院，一个人住守了两年，重新过起少年时期背馍进城上学的生活，差别是从城里把馍背回乡下。妻子在城里为我蒸了馍，擀好面条，我拿回老家，吃完了再进城去背，这是我生活和写作情绪最自在的两年。读书或写作的时候，时有多种鸟儿的叫声传入屋子，抬眼一看，窗外小院里的枣树上有这种或那种鸟在缠绵。关键在于，这时候的乡村生活，远非少年和青年时期贫困交加的生活所可比较，我从十三岁起背着苞谷面馍到距家五十华里远的西安读初中，一天三顿都是开水泡馍，到冬天馍就冻成掰也掰不开的冰疙瘩；到“三年困难”时期，连这种苞谷面馍也成了稀罕吃食了。不单是我，我们村子里的乡党，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土地下户以后就告别了苞谷面为主食的生活，过去只有过年才能吃几天麦子面馍（所谓白馍），现在从年头吃到年尾。乡党们由衷感谢邓小平的好政策，说土地下户以后的日子是天天都在过年。

有青少年时期的艰难到挨饿以至休学的经历垫底儿，我也和乡党有同样的感觉，现在的日常生活是过去过年也享受不到的好日子。当苞谷、小米等粗粮被视为保健食品推向宴席也推向家庭餐桌的时候，我常有一种苦涩溢泛于心。也是因为曾经的艰难，很难养成论着营养成分吃饭的文明行为，倒是更喜欢郑板桥的两句诗：“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郑板桥说的是他的艺术追求，在我却联想到生活，宜得“删繁就简”，才可能更有利于艺术追求的“标新立异”。

和歌：从您的文字中，总是能感受到您对于生活的感恩。您现在的生活梦想是什么？写作梦想是什么？

陈忠实：梦想在我现在这个年龄基本没有了。少年和青年时期，首先焦灼的一个生活命题，或者说梦想，就是想成为一个有固定和保障收入的公家人。高考名落孙山之后，便想得更实际也更具体，能当上一个国营工厂的工人，就算进入天堂了；当了民办教师，便梦想着转正为吃商品粮领月薪的公办教师；后来被吸纳为公社干部，已经超出我的梦想了。就生活梦想而言，我早已不做了，约略想来，当是一九八二年被陕西作家协会吸纳为专业作家那一时起，我的直接感受是进入人生的理想位置了，不敢做的梦居然成真了。及至六十岁，朋友为我过生日时，我真诚感言：每个人来到这个世界的方式大同小异，而离开这个世界的方式却大相径庭。我唯一乞求上帝的是，哪怕给我任何途径都可以接受，只要给我保持一个清醒的头脑就好了……现在依旧，却难称梦想。

和歌：在《白鹿原》中，还有一些中篇里，您写过爱情，有过很精彩的性描写，您理解的爱情是什么？哪种爱情是您比较欣赏的？您是如何处理作品中人物的爱情和性的关系问题的？在这个问题上，您对于其他写作者有没有什么建议？

陈忠实：我理解的爱情自然是爱，由爱而发生的情才是纯真可靠的。我欣赏的爱情就是由爱而发生的情。这种爱情首先是对一个人的爱，对一个人的性格、气质、品德也包括才能和形象发生的倾慕之情。如果能恪守这种纯真的爱，而能抵御金钱和地位的诱惑，在物欲横流到横行的当今时世，这样的爱情尤为珍贵。我在很长一段时间的小说创作中，几乎没有以女性为主体的作品，不少作品中都是纯粹的男性的世界，最具这方面代表的是《徐家园三老汉》。文学朋友对我说，你最拿手的是写农村老汉。在我却成为写作中不容回避的课题，因为男人只构成生活的一半。我试图打破这个障碍，写过几篇男女爱情的小说，发表后无人喝彩，反应平平，我便知道女性世界的障碍仍未打通。及到中篇小说《四妹子》和《地窖》，爱情包括性的探索才有了一些令我鼓舞的读者反应。而到《白鹿原》的写作，我梳理出那个时代存在着的几种幸福和灾难的婚姻形态，不可避免要涉及性，这在我当时视为严峻的一个命题。我给自己确定了写爱和性的“三原则”：不回避，撕开写，不作诱饵。

这个“三原则”的产生，源自两年前在蓝田县查阅县志时，我看到了记录着贞妇烈女名字的文本，那些少小年纪嫁人结婚之后的女性，不幸丧夫，守寡终生为着守节，任谁都难以体会她们精神和心理的损害。因此而发生“不回避，撕开写”的甚为强烈的冲动。“不作诱饵”，就为自己划开一个界线，写爱写性都不能作为吊读者胃口的诱饵，而是为着揭示作为传统文化中最腐朽最缺人性的对女人的苛律；也是我前述的把脉人物文化心理结构形态，也把握了和她相关的男人的心理结构形态。如果不蕴含人物的心理负载和文化心理形态而单纯写性，就会流于滥情，就失去了写爱和性的意义。

以上是我对写爱和性的发展过程和最后的定位，仅供参考。每个作家都有各自的思考，我不敢妄作建议。

和歌：在哪个时期，您的写作从内心、从文字的呈现来说更自由？不仅是忠实地表达自己，更能无障碍地表达自己？

陈忠实：你所说的这种创作境界，我却没有作为一个话题认真想过。今天想来，应该是在《白鹿原》的写作过程中实现的。我把对《白鹿原》所写的那段历史的体验与理解，尽我的表述能力作了书写，不要做尔后遗憾或遗恨的事。我在刚刚写完的时候，曾经不打算拿出来，是顾忌到当时某种“左”的时风。某天早晨听新闻广播，突然听到邓小平南行讲话的几段语录，我喜不自胜，意识到改革大业将会更开放地发展了，文学和艺术自然会更加破除禁忌，便决定可以投稿了，当即加快了修改的速度。

随后以散文为主的写作，更直接地抒发我对生活的体验和感受，几无障碍。虽然体验的深浅不一，却基本保持真实。

和歌：请您给《黄河文学》的读者们说一句话吧。

陈忠实：愿《黄河文学》的读者，情感如黄河一样，于平流无石处悠游舒缓，也不可或缺如壶口瀑布般壮怀激情的时刻。

和歌：非常感谢您这样坦诚地接受我的采访。

2011年8月9日 二府庄

没上大学是人生的遗憾

——与西安工业大学人文学院院长冯希哲对话

冯希哲：陈老师，很感谢您能抽出宝贵的时间接受我的采访。《白鹿原》是当代最优秀的长篇小说之一，而且被教育部列为中文专业大学生必读的百部书目之一，很多大学生都看过《白鹿原》，也很喜欢。您觉得《白鹿原》所讲述的心理层面的民族历史最值得大学生关注的是什么?

陈忠实：作家要反映历史，要从人的心理层面和精神层面，来考察那段历史，那些大的历史事件发生的时候，是对这个民族普遍的人，而不是个别的人的心理造成怎样的影响？对社会各个阶层的人，城市的、乡村的，社会高层的、社会低层的，造成怎样的心理影响？使原来的心理结构形态，在这种历史事件的冲击和影响之下，发生了怎样的裂变以至质变？从而使他的精神和心理达到一个新的对世界对生活的结构方式、认识方式。

冯希哲：《白鹿原》展示了一个个普通人的命运。您究竟如何看待命运？对于年轻人来说应该怎样面对自己的命运?

陈忠实：从历史的角度，像《白鹿原》写的封建制度解体，新的社会制度尚未完全建立，这个艰难而又充满了各种灾难在内的社会裂变过程中，作为那个时代的各种命运无不受到社会变迁的重大冲击和影响。能迎着这种社会变革而上的，代表着新的潮流，他们在争取他们所理想的那个新的社会形态形成过程中努力奋斗，他们个人的命运就与这个民族和国家的命运是一致的。在和平时期，包括我们现在，

改革本身在一定意义上也是革命，要革除旧的，寻求新的发展途径。在这个时代潮流下，我们的大学生当然应该从大的思想取向上，和这个国家这个民族保持一致，在这个大的背景下来争取自己个人的命运，这也应该是和这个国家的民族的发展命运是一致的。个人争取自己的命运的时候，包括个人命运的有所成就，也是对国家大的背景的一种促进。

冯希哲：对于写作，您曾形象地用蒸馍来比喻："馍蒸到一半，最害怕啥？最害怕揭锅盖。因为锅盖一揭，气就放了，所以，馍就生了。"对于那些希望通过不断跳槽来实现自己价值的大学生，您有什么看法或者好的建议?

陈忠实：我觉得跳槽不应该一概否定。因为人在这个社会中间总是要寻找自己的位置，寻找哪个位置最适宜发挥自己的智慧。我高中毕业后，之所以选择做小学民办教师，角度可能和别人有差异。纯粹的体力劳动，干一天活到晚上就非常累，就想早早睡觉，没有自修文学的精力和时间。我选择民办教师，不是纯体力劳动，白天都贡献给学校贡献给孩子，努力做好教师，到晚上就属于自己，尤其是冬天晚上更长，可以有四个小时的时间来自修。现代社会提供给青年人的选择太多了，每个人无非都是要选择自己喜欢的一个职业去做，当然也有利害的考虑，这不能排除，也不能说不好，都无可厚非。搞专业的能选择到自己专业的那个岗位当然最好了。问题的关键是既然选择了一个部门一个位置就应当全身心投入，要努力做好。所以，问题的关键是为了什么跳槽？如果仅仅是看到一时一地的经济效益好，我觉得还是要冷静对待，慎重选择。经济效益好点的，或者充满诱惑的，未必适合自己的智慧和才能。

冯希哲：您曾说作家不应淡泊名利，怎样理解这句话?

陈忠实：所谓淡泊名利，我的理解是清高，不在乎所得。这在历史上是传统文人经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但真正考察历史，毫不在意名和利的，能数出几个人来？陶渊明是一个，但是他是对官场失望之后才归隐田园的。所以我索性就不说这个话。一个人成就了自己的事业，甚至给人类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变化，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名利自然会来的，譬如钱学森、陈景润、袁隆平等科学家，他们为自己的事业奋斗，取得了举世瞩目的突出成就，你即便再不讲究名利，名利也是会随之而来的。关键问题是人在发挥自己的才能和智慧的时候为了什么？为了一个国家一个事业，取得了突破性的成就，那就不是个人名利的问题，而是影响着一个时代生活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那么人民对他们发自内心地敬重和热爱，那是必然的。所以我觉得首要的应该把自己的智慧和精力，集中在社会需要自己所选择的事业探索中去。追求事业的成就可以促进国家民族以及社会的发展，起码不是障碍，你即便不追求名利，名利也是推不掉的。

冯希哲：您曾与大学失之交臂，上大学一直是您的梦想。从您个人体会来看，没有上大学是不是您的人生遗憾？

陈忠实：我毫不避讳，没有上大学是我人生的遗憾。我常与大学生交流，当走到每一个大学门口，看到校牌的时候，我心里都要咯噔一下。在没有最好的高等教育这个求知条件之后，我便选择了自修。就我理解而言，人获得知识途径有两条道路，一条是上学，上大学是获取知识最快捷也是最好的道路；另一条路是自学。我在未能进入大学之后，便选择了泥泞而艰难的自学途径，那也是获得知识的一条途径，因此也就有了长达二十年的乡村基层工作，接触了农村和农民。如果上了大学，那就是另一个我了，就有可能命运是另外一种情况，那就要和农民隔上一层，我后来的生活道路都不可设想。这是因祸得

福。因为喜欢文学，又有长期的乡村工作经历，所以我无可选择的都是农村题材。

冯希哲：那么您觉得大学生应该以怎样的态度来对待学习？

陈忠实：大学是干什么的，就是获取知识的场合，而且是人生旅途中最重要的一个驿站。小学中学都不是决定性的，只有进入大学才能进入人生最重要的一个驿站。在大学所获取的知识是可以直接应用到社会，也可以直接发挥自己的智慧，所以要争取在大学期间把自己喜欢的专业学好学精，这对一个人的一生来说都有不可估量的意义。

冯希哲：您的座右铭是："只问耕耘，不问收获。"这句话是表明您真的不在乎收获还是您相信，只要耕耘，就不怕没有收获？收获对人生的意义是怎样的？

陈忠实：这是我一个时期的一段座右铭，不能在耕耘的过程中间总问收获，不能总在那掂量我付出了多少劳动，这往往成为自己继续付出和继续奋斗的一个巨大的障碍，只有埋头苦干，努力去耕耘，相信收获是自然的，是必然的。但问题还有它的另一面，你努力耕耘了，未必百分之百都有收获。所以在耕耘的时候，我之所以不问收获，就是尽自己的可能先把功夫下到，收获一个大的颗粒也行，收获一个小的颗粒也行，不要因为耕耘不到，而把可能取得的一个大颗粒的收获，而变成一个小的颗粒的收获，甚至没有收获。

冯希哲：您认为现代的大学生应该有什么样的情怀与视野？大学生应该怎样规划自己的人生？

陈忠实：珍惜上大学的机会，不要浪费这个良机，获取最可能多的知识，来进入社会，来投入自己喜欢的事业。

2010年12月20日

有关体验及其他

——和《陕西日报》张立的对话

记者：陈忠实先生，您好！在去年刚刚闭幕的全国第八次作代会上，您再次当选为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又一次证明了您仍然是我国当代很具有影响力的长篇小说作家，事实也是这样的。您能谈谈您在当选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后，今后有什么新的创作打算?

陈忠实：我的写作与我的社会任职基本没有多少关系。自上个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我以散文随笔的写作为主，也写了数量较多的读书感想，多是为作家朋友的书作序。这两类文章的字数，不会少于我小说字数的总量，偶尔也写一些短篇小说。我仍然会继续这种写作状态，无论散文、随笔或短篇小说，有感觉就写，有话非说不可就说，留下我对生活的感受，或对往事新的理解。我的守则是不写不想写的文字，即就是不写没有真实体验的虚而又俗的文字。我依然神圣着自己至今不能淡漠的文学！

记者：由著名导演王全安执导的电影《白鹿原》目前已经处于杀青阶段，有网友认为电影《白鹿原》注定超越不了原著，因为，原著写得实在太好了，您认为这种意见有道理吗?

陈忠实：我不会上网，感谢你把网友的看法传达给我。我能理解网友的意见，多是出自于对《白鹿原》的喜爱，便断言电影“注定超越不了原著”，似乎把话说得太绝对了。就我的印象而言，中国有不少依据小说改编得很成功的电影，譬如《秋菊打官司》，还有路遥的《人生》，都是从优秀的小说改编的很成功的电影。还有依据世界名著改

编成堪称经典的影片，不仅未使原著减色，而且在某些方面升华且超越了原著，关键在于导演。同样一部小说，A导演可能改编失败，B导演可能取得突破性的成功，这方面的先例也不少。且拭目以待王全安导演的亮彩。

记者：不管怎么说，电影也好，戏剧也好，还是其他的艺术形式，相对于原著来说，都属于二度创作，也都和原著既有联系也有再创作者自己的思想和认识以及审美趋向，不仅仅是把原著搬上银屏或者舞台就完事了，亦步亦趋地对原著进行天衣无缝般的浓缩，更重要的是在二度创作中折射出一种新颖的东西，更加贴近当代人的审美需求，您说呢?

陈忠实：你说的很对。由小说改编的诸如电影、戏剧等其他艺术形式，完全属于编剧和导演的二度创作。既是创作，就特别忌讳依葫芦画瓢，事实上，完全照搬原著也是不可能的。其他艺术形式的编剧或导演，之所以相中了某部（篇）小说而进行电影或戏剧的改编，肯定是这部（篇）小说的某几个或着重一个东西触发了他艺术思维的最敏感的神经，能够给他进行艺术再创造带来开阔的也是更富深意的空间，他才会有再创造的信心和激情。就我有限的关于电影的印象，有的改编者和导演的主题取向和原著基本一致，以具象化的画面强化原著的主题思想；有的改编者和导演却放过原著的主题，恰恰更感兴趣在原著的某个隐存的处于侧面的话题，进行开掘和引申。这两种改编都有成功的范例，也不乏失色的遗憾。无论哪一种改编，再创造的意念是改编者的主导精神，不应局限于原著，而应有一种超越的自信，才能充分展示自己的艺术理想和艺术才华。

记者：陈忠实先生，过去，著名现代女性作家丁玲曾经提倡“一本书主义”，事实上，一个人一生能创作出一部经典之作就相当了不起

了。例如，曹雪芹的《红楼梦》，还有您比较欣赏的肖洛霍夫也只创作出《静静的顿河》这么一部特具震撼力的小说，最近获得二〇一一年诺贝尔文学奖的瑞典诗人托马斯，其作品仅仅是一些短诗，但却具有恒久的思想和艺术价值！如果超越不了自己已经达到的艺术高度，宁肯选择不再写作，或者不再涉猎长篇小说领域，其实，这是一种对艺术负责任的态度，您说是吗?

陈忠实：“一本书主义”确是丁玲说的话。其实，作为以写作为生命、视文学为神圣的一代又一代作家，谁都在追求着创作一部恒久不泯的小说，且不敢提高到太高的“经典”的档位；哪位作家也不想自己耗时熬夜精心写作的作品无人问津以致湮灭。丁玲不过是把别的作家不好意思出口的话直白地倡扬出来了。严酷的现实是经典的目标太难抵达了。我国漫长的古典文学史上，仅仅只筛选出包括《红楼梦》在内的“四大名著”，其间不知道有多少作家在点灯熬油捻断青丝或白发而徒叹奈何……当代文学的繁荣景观令人鼓舞，年产两千到三千部长篇小说堪称为世界第一，相信这样大的小说出版量持续发展，肯定会有惊世之作出现。

然而，写作是有别于科技的一种创造活动，没有具体而精确的指标，也不像某些体育项目都有其最新的量化指数，不能超越不能打破便是无效劳动。“一本书主义”是作家的创作理想。为了这个理想，作家一部接着一部进行创作探索和艺术实践，这是普遍现象，也更符合创作这项少数人从事的较为特殊劳动的性质，即把对生活的体验和生命的体验表述出来，所谓不吐不快。至于能否成为“经典”，已不能成为写与不写的抉择因素了。在我的理解，尚不属“对艺术负责任”与否的话题，如托马斯这样的诗人的创作现象是一个个例，类似者甚少。即如往届诺贝尔文学获奖作家而言，多属于多产作家，代表作或者说

经典之作大约也只有一部。再如我喜欢的米兰·昆德拉，我最看中的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其后的几部小说我都读了，虽各有所长，然总体而言，似乎没有超过这部书，但是他却一本一本写着，并没有因为不能超越《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而停笔，关键在于他有新的艺术体验要展示。

记者：您的《白鹿原》是我国当代文学长篇小说的重大收获，从问世到目前，一直是最受人们欢迎和推崇的文学作品，而且也一直畅销不衰。这说明了一个问题：真正深刻地反映了社会生活本质的文学作品，其思想和艺术就一定会达到时代认识和时代精神的高度，您是这样认为的吗?

陈忠实：我同意你的看法，多年来一直对此说深信不疑。艺术表述的独特性不可或缺，关键在于作家的思想。思想的深刻或浮浅，直接决定着作家感受和体验生活的层次。我曾以炼钢为喻体，先进的冶炼手段能炼出精钢，而粗陋的炼钢设备只能制造粗钢。作家有独立而深刻的思想，对生活的体验可能深化到生命体验的层面，不仅不会发生雷同的现象，而且会形成一道独特的文学风景。我前述的米兰·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堪为范例，《百年孤独》更不用说了。前者所体验到的生命不能承受之轻，就独俏于常见的多为表现不能承受之重的小说了；马尔克斯面对拉美百年历史所体验到的“孤独”和米兰·昆德拉的“轻”，同属于独有的深层的生命体验，超凡脱俗而独俏一枝了。在我理解，他们的“轻”和“孤独”的体验，得之于他们独立的思想。

记者：您的《白鹿原》，实现了您最初立志创作出一部可以当作民族生活的当代史和风俗史一般的小说的艺术设想，而今已经过去十几个年头了，您觉得您这样的小说审美追求，还具有当下意义么?

陈忠实：就你的“当下”这个很具体的时空划界而言，似乎“意义”还存在。我的判断是这本书的销量，依然持续着一个令我欣慰的数字，在诸种版本中，人民文学出版社的茅盾文学奖书系中的《白鹿原》，仅二〇一一年竟然印刷了三次；十月文艺出版社的那种精装本继续在印刷，前不久又推出了一种重新包装的版本。这种情况显示一个最基本、最可靠的事实，截至你所说的“当下”，读者尚未厌倦《白鹿原》，这部“小说审美追求”，仍然为读者所感兴趣，它的“当下意义”也就存在着。至于往后的岁月，读者对《白鹿原》的兴趣还能持续多久，我就不敢预测更不能做出判断了。

记者：陕西是文化强省，就文学艺术生产来说，一直处于全国前列，路遥的《平凡的世界》、您的《白鹿原》和贾平凹的《秦腔》都先后获得了茅盾文学奖；中篇小说、报告文学和散文也不断获得鲁迅文学奖和冰心散文奖，特别是出现了在全国具有一定影响的一大批中青年作家，冯积岐、朱鸿、邢小利、方英文、柏峰、庞进等一些小说和散文以及文艺评论家，其创作实绩推进了陕西文学持续发展，前景非常广阔，您看是吗?

陈忠实：对陕西文学未来的发展前景，我和你一样坚信而且乐观。你所列举的几位小说、散文和评论家的作品，我都读过（不是全部），曾经被感动乃至震惊其独到的创造，我对其中几位的作品读过也写过我的阅读感受。借此机缘想表述一种遗憾，就是冯积岐的长篇小说《村子》，没有获得与其成就相称的评价和声誉。《村子》是写乡村社会由旧体制转化为现体制过程中很具深刻性和鲜活性的一部杰作，由此我颇感慨“好酒真怕巷子深”了。

在我的印象里，除你列举的几位作家之外，还可以列出一长串作家的名字，他们有的在本省已蜚声文坛，有的已在全国文学界产生影

响。我在一些国家级文学报刊上常能看到他们的作品被着重推出，确实令人鼓舞。他们都处于最富创造活力的年龄阶段，且都基本形成了独特的艺术个性，其未来的创作前景完全可以期待，会有非同凡响的大作品创造出来。

记者：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决定全力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特别是学习落实胡锦涛总书记在全国第八次文代会和全国第九次作代会的重要讲话，这必将促进文学艺术事业又一个春天的到来，陈忠实先生，请您谈谈您的感想好吗?

陈忠实：十七届六中全会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大繁荣大发展的决议，具有开创性的不可估量的意义。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巨大成就。在这个令人鼓舞的雄厚国力的坚实基础上，推进文化事业的发展和繁荣，正当其时。文化对于一个国家至关重要的意义，在于对人的精神和素质的建构和提升。人的精神和素质，是受其接受的文化奠基的；文化决定着人的心理结构形态，自然也决定着人的思维和价值取向。依着先进文化建构的人的心理形态，便会使民众的精神和素质得到升华。至于文化产业的发展，更具有无可估量的巨大的空间。

我赞成你说的文学艺术发展的春天已经到来的观点。中国文学已经呈现出繁荣的景象：单是长篇小说每年出版超过两千部，还有每年出版的不少思想深度和艺术水平都显示出高水平的散文作品，仅就其出版数量而言，堪称世界第一的文学大国。文学界以及社会各界，都在关注着文学——我相信文学艺术的春天已经到来，也必将更加绚丽多彩！

2012年1月10日 二府庄

关于电影《白鹿原》

——和《文艺报》记者李晓晨的对话

电影《白鹿原》自筹拍以来就受到极大关注，它是影视与文学的又一次联姻，小说再次支撑起电影之魂。陈忠实在小说的扉页写道，“小说被认为是一个民族的秘史”，那么当它被改编成电影之后还能保留原作的神韵吗？二〇一二年三月三十一日，这部电影获得了由国家广电总局电影管理局颁发的公映许可证，预计将于今年下半年上映，至此这部“十二年磨一剑”的电影终于可以同观众见面了。此前，该影片曾在第六十二届柏林电影节上亮相，并在第三十六届香港电影节上作为闭幕影片播映。日前，记者采访了陈忠实，说起小说以外的话题，他说得最多的是——我是个外行！

记者：电影终于可以公映了，据您所知，一些提前观赏到《白鹿原》的文艺界人士对电影评价如何？

陈忠实：评价众说纷纭，主要有三种。第一种观点认为这部电影震撼人心，尤其在今天影视剧过度娱乐化、庸俗化、类型化，满眼都是打打闹闹、穿越戏说的环境下，《白鹿原》所散发出来的那种震撼人心的精神力量和历史厚重感十分难得。电影比较真实地展现了我们民族某个历史阶段的命运变迁，以及那个时代中人的生活。第二种观点是觉得电影没让小说的读者满意，电影削弱了小说厚重的思想性和历史性，把那个时代的革命活动、白鹿两家故事里蕴涵的民族精神性的东西打薄了。原来复杂的叙事线索变成了单线条叙事，电影的核心

人物成了田小娥，白嘉轩、白孝文、黑娃、鹿子霖的命运都因为她发生转折。还有一种意见觉得，这部影片能做到这样已经不错了。

记者：电影主要对小说做了哪些较大的改动呢?

陈忠实：电影最后删减为一百五十分钟，到一九三八年日本飞机轰炸白鹿原就结束了，具体到人物就是以把田小娥的灵魂镇压在镇妖塔下结束。之前还有一个三小时的版本一直到新中国成立才结束。对小说改动较大的有几处。在人物设置上，主要人物从二十多个缩减到七八个，朱先生、白灵都没出现，冷先生也基本没有戏份。从叙事上来看，多条线最后成了单条线，毕竟不可能在两个多小时里把所有我在小说里想表达的东西都展现给观众。

记者：关于电影对小说的改编，您认为哪些部分比较满意，哪些觉得还有遗憾?

陈忠实：我最满意的是电影呈现给观众的历史氛围是基本真实的，人的生存形态也是真实的，这点非常重要。因为历史氛围的真实决定了人物命运和人物情感的真实。我写的是上个世纪初的故事，要让观众觉得合情合理，电影必须保证历史的真实。乡村的伦理道德、沿袭已久的民间文化习俗等影响着当时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一旦这些习俗、规则遭到破坏就会产生矛盾，进而影响人物情感的真实性。无论小说还是电影都要反映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的真实情感，人物与时代都是血肉相连的。现在的许多小说和影视剧，人物和时代明显脱节，让观众觉得不可理解。解决好历史真实、艺术真实和生活真实的关系很重要。

说到遗憾，我总希望电影能更充分、更准确地通过直接的视觉画面把小说的全部传达给观众，总希望小说里的人物更充分、更集中地与观众交流，但受到不同艺术形式的时空限制，留下了遗憾。

记者：大片的麦浪、地道的关中方言、原生态的地方戏，使电影《白鹿原》具有浓郁的地域特色，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当初您会觉得大量使用地方戏和方言是一种冒险吗?

陈忠实：贯穿电影始终的唱腔是在关中地区一种几乎失传的民间艺术——“老腔”，演唱者都是地道的农民，平时就靠在红白事上唱戏谋生。之所以把“老腔”用到电影里还有些渊源，几年前西安一个文化热心人约我去看一场民间艺术演出，唱“老腔”的演员一开口我就被镇住了，那种震撼好像只有第一次听《黄河大合唱》时才有。后来北京人艺要排话剧《白鹿原》，林兆华托我找些会唱秦腔的民间艺人，我一下想到了他们，林兆华听了也被镇住了，这几个人就这么走上了话剧舞台，后来又出现在电影中。这算不上冒险，我想大家会喜欢这种原汁原味的音乐，也就是农民们说的“野嗓子”。

至于用方言对话，一开始我建议弄两个版本，一个配方言，一个配普通话，但最后导演还是选择只用方言。方言是生活和时代背景的重要组成部分，关中方言许多都是咱们民族的原始语言，古语中的很多词句用法都在其中保留了下来。我在写小说时对使用方言有自己的把握尺度，一直坚持要让其他地方的读者能从字面上把握词句百分之七十的意义，否则我不会使用。电影在方言的使用上走得更远，但他们也听从我的建议删掉了许多粗话和特别生僻的用法。

记者：把地方文化植入影视作品似乎已经司空见惯，“地域元素”成了影视剧创作的一个法宝，您觉得这部电影在这方面处理得怎样?

陈忠实：这部电影的确有浓郁、鲜明的关中特色，但它没有简单地为影片贴标签，没有刻意离开故事情节和人物形象单纯表现文化符号，这样看上去比较融洽。这些人物就生活在这块土地上，他们的矛盾、纠葛都与这块土地有关，所以不可能脱离这里的语言和风俗。

记者：《白鹿原》从小说到剧本，再到电影，您在这个过程中主要做了什么?

陈忠实：不管电影、话剧、电视剧，我都是个外行，我就是给编剧、导演讲创作体会，帮助他们更深入地理解人物、事件。他们都很用心，都非常努力地呈现小说。

记者：除电影以外，《白鹿原》还被改编成话剧、秦腔、舞剧、广播剧等，同名电视剧目前也已进入了剧本创作阶段，能否简单评价一下它们?

陈忠实：话剧、秦腔、舞剧、电影可以说各有千秋。秦腔基本是单线条化，唱腔、唱词、舞美比较有吸引力。话剧基本上全面展示了小说的故事，时间从上世纪初一直到新中国成立，保留了所有人物，但在两个多小时中它没法演明白这么多内容，只能通过人物对话交代大的历史事件和人物命运，它做到了有头有尾，但没有看过小说的人就很难看明白。舞剧就更简单、纯粹了，主要表现黑娃和田小娥的爱情，用舞蹈展现出当时的社会对他们爱情的扼杀，反而不受小说情节的限制，优美的舞姿也能吸引观众。

记者：这部小说改编的难度很大，却吸引了众多编剧和导演积极尝试。现在大家都说缺少好剧本，今年广电总局还设立奖金重奖优秀剧本，您认为文学作品可以为“剧本荒”提供什么?

陈忠实：他们喜欢这部小说，希望在各自的艺术领域里表现这个故事。讲好这个故事确实很难，人物多、情节多，没有集中的故事冲突，一系列大事件都是以人物为中心展开。不是所有好小说都适合改编成其他艺术形式。

文学和影视最大的差异是，小说通过文字和读者交流，它的优势在于可以充分描写，可以充分展示作家对人物的把握；影视是以直观的形象与观众交流，它的优势是能把文学形象具体化、生动化，比如王全安选了张丰毅，林兆华选了濮存昕，在观众心中白嘉轩就是他们的样子。读者普遍认可的好小说都能成为好剧本的脚本，比如《红岩》《林海雪原》等，但也有些好小说是改不成电影的，那些有完整的情节、鲜明的人物和强烈的冲突的小说更容易改编。编剧、导演、演员对原著的理解是否准确、到位，是影响他们能否创作出优秀作品的重要因素。

记者：现在许多作家都改行当编剧，还有的写小说时老琢磨着怎么能更适合改编成影视剧剧本，您如何看这种现象？

陈忠实：对那些本身具备编剧天赋和才能的作家，当编剧是件好事，但不是每个作家都能当编剧，像我，即便写一集给我一百万，我也写不出来。我不赞同在写小说时老惦记着改编成剧本，这违背了文学创作的规律。如果老想着怎么能把情节写得离奇、惊险，甚至硬要加一些所谓有戏剧性的冲突，这就损害了小说的艺术性。

记者：被寄予厚望的《白鹿原》没能拿到“金熊奖”，这让许多人感到失望。我们好像特别着急在国际上获奖，用国际标准衡量我们的艺术创作。

陈忠实：当时剧组给我发了条短信，说没获奖的原因是“有头无尾”，大概评委觉得电影前半部分对人物命运展示得比较充分，到结尾时很多人物却不见了。能在国际上获奖当然是好事，这不光是中国作家、电影人的想法，各国都如此。但这应该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不能勉强。达不到获奖标准，干着急也没有用。每年诺贝尔文学奖公布时，获奖者本人都很惊讶，所以我觉得“获奖”是不可期盼的，希望越强烈反而越容易失望。我们就踏实搞自己的艺术创作，获奖固然好，获不了也没啥遗憾的，眼睛总盯着奖杯是很难受的。

2012年4月11日 北京

和作家秦岭说水

时间：2012年7月5日晚9：00

地点：中国·西安

主题：饮水安全与中国农民的命运

对话人：陈忠实（中国作协副主席、陕西省作协名誉主席）

秦岭（作家）

对话内容：

秦岭：首先感谢您给中国文学史提供了《白鹿原》这样具有标志性的文学作品，也感谢您多年来对我个人创作的关心和支持。两个月前刚刚在西安和您以及陕西的作家们探讨过中国农村文学与中国农村现实的一系列话题，两个月后的今天，又在西安与您探讨中国农村饮水安全与中国农民命运，似乎不像巧合，倒像是事关农村、农业和农民话题的延伸，冥冥中，有种注定的意味。

陈忠实：到了我这个古稀年龄，身体也时有不适，社会活动参加得越来越少。但是你这个话题与中国农民的命运有关，还是引起了我的注意，你一个电话过来，我觉得回避就是不妥当的。农民要过日子，就需要喝水，问题是，中国农村的饮水不安全因素这么多，问题这么严峻和残酷，直接影响到中国农民的命运，这就不是一个单纯的水利方面的话题，而是涉及农民生活、生存、生态的方方面面，文学如果回避这一现实背景，就不可能摸清中国农民生活的本相。我不清

楚水利部、中国作协委托你来写这本书，到底是让你写中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中的好人好事呢，还是写饮水安全带给乡村物质、心灵、精神层面的反应与变化？如果是前者，那就意思不大，如果是后者，可见水利部是有眼光的。你知道，我多年前就在《小说月报》上看过你有关粮食题材的小说，那是我第一次注意到你，几千年的粮食制度，被你用一个很小的刀片就切进去了，我欣赏你反思历史和观察生活的角度。这次，你如果能把握好农村饮水在农民生活、人性层面的点滴故事，以小见大，那么，这部书就有了成功的可能。

秦岭：当然是后者，我会朝这个方向努力。我可以实事求是地告诉您，水利部有关领导与我座谈、对话的时候，谁也没有给我安排既定的主题、既定的题目、既定的采访对象，更没有刻意安排让我采访中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中涌现出来的先进集体、先进个人。他们根据中国农村饮水的状况和现实，只是建议我把重点采访的区域放在大西南和大西北，另外，根据我考察的需要，可以前往全国任何一个省份。他们就一个希望，让我从作家的角度，到一线去，到最偏远的农村去，到农民中间去，直接从最基层的水利干部和农民中找故事。什么感兴趣就写什么，什么打动我就表现什么，所有的梳理与提炼、剖析与反思，他们不做任何干涉，让我尽量发挥主观能动性。他们十分尊重我个人的视角、发现和观察，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触摸到中国农民生活乃至情感层面的形态与变化。如果是前者的话，他们就不会相中我了，他们有的是调研人员和专业记者。

陈忠实：如此看来，水利部是在用一种历史的、务实的态度委托你做这次饮水安全考察。中国熟悉乡村的作家很多，但是水利部与中国作协偏偏委托你到乡村大地去“找故事”，一定是深思熟虑了的，一方面体现了他们对你在社会层面、知识层面、创作层面的充分信任，

另一方面说明他们对全国农村饮水状况和饮水安全工作心中有数。这几年经常有作家寄来所谓的纪实文学让我看，我多数读不下去，特别是一些主题先行、命题明确的应景随俗之作，有纪实，没文学，显然违背了纪实文学的基本规律，屈从于某些方面的意志和意图，看不到作家的主观意识和思想层面的独立创造。你这次考察回避了这些顽疾，我相信会搞出一个有特色的纪实读本。纪实要客观公正，文学要能够走进农民真实的心灵和错综复杂的情感，这样，一本书出来，才算得上丰富、饱满，有分量。

秦岭：我十分理解您的观点和忠告，本次考察，从重庆、贵州、广西、云南的偏远山区一路走来，农村饮水触目惊心的现状在不断改变着我的观察视角、创作思路，之前的一些创作设想甚至彻底颠覆。无论是完善还是颠覆，对我最终的开掘都是有益的。陕西是我大西北之行的第一站，下一站会去宁夏和我的老家甘肃，我相信，我思考的触角将会有更多的拓延。我记得，您的许多作品，包括《白鹿原》在内，多有对农村饮水状况的描述，饮水作为农民生活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任何一位作家写到农民，大概都难以避免。在现实中，您个人有关水的记忆是怎样的?

陈忠实：我小时候生活的那个村子，属于西安市灞桥区霸陵乡，叫西蒋村，在原的北坡根下，村子东边有一道沟，沟里有一条小溪，比较大，从东流到西。家家门前也有活水。村子有开挖的涝池，洗衣服、淘粮食、饮牲口都能用。涝坝上接出两片瓦，农民可以在下面接水，按当时的标准，算是比较干净了，如果按照现在的标准，肯定是有问题的。那个年代，能吃上水，就不错了，啥叫饮水安全，很少有人认真考虑过。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上游想修个水库，把水截了，结果没成功，变成一个潭，那阵子缺乏管理，牲口饮水、洗衣全在那

里，潭里杂草很多，沤出了味儿。村民只好自己打井取水，但是，好景不长。由于灌溉和气候因素，不久，水位急剧下降，灞河上也开始形成淘沙、卖沙的产业链，有些井水也就干了，吃水越来越困难了。人们开始找水、挑水，挑来的水，都是稠泥浆，光沉淀都要好半天。明知这水有问题，但是还得照常饮用。周边许多地方，特别是山区、原上，祖祖辈辈喝水更加困难。农民喝水有什么样的困难，就有什么样的命运，水和农民的命运，几乎是相辅相成的。比照困难的，我们那里的村民还会有什么奢望呢，能够生活在灞河边，就已经很幸福了。

秦岭：黄土高原，在一定程度上早就成为水资源匮乏的代名词了，而全中国，尚有三点二亿多农民在长年缺水的困境中苦苦挣扎。在一个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号称“大国崛起”“强国”的国度，不少地方的公民还在因缺水而悲愤自杀、因抢水而械斗流血、因找水而离乡背井、因求水而膜拜鬼神、因污水而残疾终生、因喝水而卖血换钱。凯歌声中，如何理解来自大地上喊渴的声音。我在甘肃天水农村的时候，对水的困境，可以说有切肤之痛。今天来感受陕西农村的饮水状况，作为西北人，我有一种重温疼痛的感觉。在向陕北出发之前，很想听听您个人对农村饮水状况的体验，我想说的是，相对您生活过的灞河之畔，那些更为缺水的地方，您是否前往实地感受过？作为一个对生活和艺术高度敏感的作家，您一定有自己的感受。

陈忠实：全球化时代，一个国家的农民缺水喝，不仅仅是一个尊严的问题。让农民喝到水，维护的不仅仅是喝水人的尊严，更是一个民族的尊严。我当公社干部以后，去过一些乡村，真切感受到了农民缺水的严酷性。当时周边一些地方，背水、驮水、拉水，有的几里路，有的十几里路，许多劳动力深陷在水的营生上，每一个家庭的生

活、日子都会因为水而发生变化，一天下来，当喝水成为最艰难的门坎，听着让人揪心。“文革”后期，有次，省上组织我们公社干部到渭北缺水地区参观解决饮水工作的经验，看了以后十分震撼。那个地方的经验是：家家户户挖一个和土炕差不多大的水窖，把雨水集流到水窖里，存储起来，说是有卫生措施，也能定期消毒，但是据说成本很高。实际上，在那里的农村，要确保水质没有污染，是不可能的。你想想，遇到干旱天气，一两个月不下雨，水窖里的水又不是活水，放也放坏了。那年头，放坏了，农民也舍不得放弃，只能喝那些变质的水。但是，在当时，水窖尽管仅仅是农民的权宜之计，发挥的作用仍然是很大的。有水，比没水好，至于水质如何，就顾不上了。如今，农村修建的水窖很多，在保证水质的技术上也比以前成熟了许多，用你这次考察的术语，就是安全了许多。但是在当时，特别是在“文革”后期，水窖是个很新鲜的名词，所以对当时的印象，我至今难以忘怀。

秦岭：国外的知识分子，包括作家在内，多是民生意识、社会意识很强的人士，他们遍布各阶层，随时随地就能与最底层的心灵连接，许多中国知识分子也在反思这个问题。我曾经听陕西的农民讲，在饮水的事情上，您还直接帮助过饮水十分困难的乡亲，这样的话题对于一名德高望重的中国作家来说，更像一段文学之外的传说，因为作家和农村饮水，似乎并没有话题上的关联。您能具体谈谈吗?

陈忠实：平时我很少说这个事儿，我也是农民出身，农民帮助农民，没有啥值得大惊小怪的。不过今天咱俩一起聊这个话题，还真是让我感慨。在我的印象里，你是第一个跟我聊起中国农民喝水问题的作家。现在文学界都在讲关注现实，真正的现实在哪里，在我理解，民生问题，才是中国农村最大的现实。那么，中国农民的民生问题最

突出、最普遍的是什么，我认为是喝水。喝水不仅与发展有关，更与农民的日子有关。关于我帮助乡亲打井的事，那是八九年前的事情了，大概是二〇〇三年那阵吧。当时我离开西安，在村里写作，当时全村的吃水问题已经十分突出，村干部找我，问我有没有办法解决村民的吃水问题。听到村民的呼声，我心里不是个滋味儿。我是一个作家，既没权，又没技术，但是，村民偏偏找到了我，既然村民把喝水的希望寄托在了我的身上，我就有责任想办法，该能尽力的，就尽量尽力。我是个很少求人的人，思来想去，我就给省有关部门的一位领导谈了这个事情，这个领导也热爱写作，有文人情怀，他听了我的介绍，觉得也符合政策上倾斜的条件，于是拨了一些钱。有了资金，当时村干部立即行动起来，打了一口八九十米深的井，二〇〇四年上边派人对水质进行了化验，水质不错，又清又甜，没有发现有害物质。不久，地方政府和水利部门又修建了一个水塔，给家家户户安装了自来水，西蒋村终于改变了以往干旱没水吃、天涝吃泥水的状况。简单情况就是这样的，我没有参与具体的事情，只是从中间起到了穿针引线的作用而已。现在听说陕西农村到处都在搞饮水安全，饮水的标准也提高了，农民喝水方便了许多，安全了许多。但愿饮水不再困扰农民的生活，像生活在城市的公民一样，不要为水而发愁。就生活质量而言，农民和城市居民的重要区别之一，就是水，农民的命运要改变，首要的问题是解决水的问题。

秦岭：关于您帮助村民打井的故事，您始终保持了低调，用您的话说，就是仅仅发挥了“穿针引线”的作用，但是，据我所知，村民对您的这一善举，看得非常重，在他们眼里，已经把您的民生情怀与地方的井水文化联系了起来。在他们眼里，您作为一个大名鼎鼎的作家，面对农民喝水难的状况，不仅没有回避，而且直面应对，最终实

实在在地让干渴的农民喝上了水。有人告诉我，您此善举，在一个村子的饮水史上，有里程碑的意义。您怎么看这个话题?

陈忠实：面对这样的话题，我的心情很复杂，也很沉重。面对农民，我真的没有做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情。这件事情，村民对我十分感激，有人也找我采写这个事情，我婉言谢绝了。说穿了，只不过是一口井，却引起了来自方方面面的注意。中国社会，特别是飞速发展的今天，这么一个小事情引起注意，是不正常的。中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民占了绝大多数。新民主主义政权建立以来，农民对国家做出的巨大贡献、付出的艰辛和牺牲，这是一本大账。供给制时代，农民节衣缩食、勒紧裤腰带对国家城市工业的支撑，对城市居民生活必需品的提供，哪个稍有良心的中国人会忘记？“饮水思源”，谁要真不懂这个简单的道理，我估计，这样的人，连喝水也不会感觉自己多么幸福。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谁都要喝水，在国家财力的支持下，城市居民喝水都很坦然，而我们的农民却因为得到了一口水，就感恩谢德，这让我很不习惯。你想一想，几千年过去了，我们的农民还为喝水发愁，新中国成立也几十年了，大多数农民喝水的问题不但没有解决，这些年由于各种因素，反而更加严峻，怎么思考这个问题？难道简单地归于农民的宿命。所以，你提到的农村饮水安全工程，我觉得很必要，也很及时，如果这项工程在全国全面铺开，并且取得成效，中国农民都得到实惠，都能喝上方便的水、安全的水，那么，像“一口井”这样的小事情，就不再是农民的大话题。在我看来，在现代社会，农民需要的不仅仅是很现实的一滴水、一碗水、一缸水、一口井，他们应该有更高的需求，符合发展的需求，符合时代的需求，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需求，有关方面和整个社会应该关注农民的这些需求，创造条件去实现这些需求，否则，这个社会就无法和谐，无法公平，无法实现真正的进步。

秦岭：您说得很对，饮水之困，绝对不能简单地归于农民的宿命。您还提到了农民“更高的需求”，这是一个现实命题，也是一个时代命题，中国要发展，中国的农村首先要发展。在我前期采访考察过的六十多个县、乡和村子中，农民们也在深深地思考这个问题。在农村饮水安全工程中得到实惠的农民，他们对于生活的品质已经不再停留在仅仅能喝上水这一层面，产业结构的调整，农村劳动力的回归、转移以及对精神文化的需求，日益突出。“水兴则农兴”。这句古老的农谚，如今听起来仍然那么的充满历史的穿透力。在饮水问题上，农民的命运似乎从来没有摆脱历史和时代的交叉点，作为一个写作者，我时而钻进历史，时而落脚现实，时而又不知不觉地进入农民灵魂最幽微的所在，时而自己的心灵又被安放在农民精神家园的天平上接受考量，置身于这种错综复杂的兴奋与峰峦叠嶂的矛盾之中，我个人的收获真是太大了。

陈忠实：我完全理解，你所说的收获大意味着什么。我参加过许多采风团，中国作协每年也要组织各种采风活动，我估计你也参加了不少。但是像你这样一种单枪匹马面向全国范围的采风考察，是不多见的，一是具体的采访对象由你自己去寻找；二是你随时可以根据自己的兴奋点选择你的考察路线；三是你有选择考察方式的自由以及和老百姓面对面的机会。有了这几点，对一位有良知的作家而言，极其宝贵，因为这不同于浮光掠影，不同于走马观花，而是能够真正地沉下去，面对真实、真诚与真相；面对真正的状态、真正的矛盾和真正的气息。喝水，是农民祖祖辈辈念的一本经，你现在要把这本经写出来，那些最基层的人、最基层的生活、最基层的烟火味儿给你秦岭的精神世界造成的冲击力必然是巨大的、直接的、原生态的。中国作家不缺技术和才华，缺的恰恰就是这种被冲击的外力。我们一直倡导关注现实，问题是，有些人会关注，有些人并不会关注。在我看来，关

注现实从来都是双向的，观察者和被观察者必须能够在心灵上产生交锋和融汇，否则作为作家，即便长十双眼睛，也看不懂现实，而现实即便张开渔网一样的怀抱，也会把作家漏掉。我想，你有这样的机会利用长达几十天的时间，在中国农村最边缘的地方行走，时时刻刻在感受、触摸水资源背景下中国农民的命运，这是上帝对你的恩赐，更是对你文学生命的恩赐。你的小说主要以农村题材为主，这次行走给你补充的生活营养，够你消化一阵子，也够你写一阵子。纪实文学专著出版后，一定能够产生副产品——生活气息浓郁的小说。文学之所以能为历史发声的，就是因为与人的命运有关，如果关于农村饮水的小说写好了，说不定就会倒过来，成为正产品。我期待你这部纪实文学的同时，也期待你相关题材的小说。

秦岭：十分感谢老前辈对我的期望，其实二十多天前在重庆和广西的田间地头考察的时候，小说创作的灵感就已经在脑海里频频闪动。这些年，我写小说冷静了许多，此行的观察所得，我会更加冷静地沉淀，特别是对中国农民命运的思考，我会让自己思考的方式更加靠近炊烟、沟渠和乡村的心灵。记得几年前《文学界》杂志约请我写您的印象记，我拟的题目叫《圪蹴在白鹿原上的老汉》，我今天仍然要说，面对乡村大地，我会让自己圪蹴下来，与乡村默默对视。

陈忠实：我相信你能把水和农民的关系搞清楚，把水和农民的命运表达好。“命运”这个词，对于文学来说是个了不得的概念。你这次走一圈回来，对中国农村社会必然有新的认识和理解，所以对这次难得的行走，要更加讲究智慧，把自己的长处好好发挥出来，展现出来，要尽量从大地走向心灵，走进农民心中的秘密。

秦岭：我会好好争取的，力争让这本书乃至今后的小说创作，尽量抵达我文学的理想。您对话中的有些观点，我也会带给水利部。西

安已经很热了，您多注意身体，今后有机会，您再不吝赐教。

陈忠实：对我，你不用客气，对话的前提是有话可说。下次到西安来，咱吃羊肉泡馍。

作家秦岭受命国家水利部和中国作协，写成专著《在水一方——中国农村饮水安全工程纪实》，其中一章是和我的对话，涉及饮水安全和中国农民的命运的话题。

2012年7月5日

文学的心脏，不可或缺

——与《解放日报·周末刊》高慎盈的对话

对电影《白鹿原》，总体上是满意的，却也不无遗憾

记者：您比我们先睹电影《白鹿原》，看后感想如何?

陈忠实：就现在剪定的两个半小时的电影而言，我确凿感知到导演和演员的难能可贵。这部电影展示小说所写的时代生活是准确的，人物的各个不同的心理轨迹和命运是富于时代色彩的，也各具个性化的特质。

记者：总体上是满意的?

陈忠实：对。却也不无遗憾。有一种遗憾是早有料定且心知肚明的——小说《白鹿原》时间跨度长，人物众多，事件也多且复杂，而无论秦腔、话剧、舞剧和电影，都受制于有限的时空，不可能容纳小说里的全部人物和主要情节。即使如原先构想的做上下集，仍然要舍弃包括朱先生等甚为重要的角色。对此，我不仅能理解，更尊重导演的选择。

另一种遗憾却是始料未及的。原先作为上下部的剪辑样片，约三小时二十分钟，和我一起观赏样片的作家朋友，评价甚高，我也有同感。后来剪辑到两个半小时的样片，大约结束在抗日战争日本鬼子飞机轰炸西安，距小说结尾的共和国成立尚有七八年时间，而且关涉几乎所有人物的结局都没有了，遗憾就发生了。

记者：当初想把《白鹿原》搬上大银幕的导演很多。据说您最初属意吴天明来拍摄?

陈忠实：小说《白鹿原》刚面世时，身在国外的吴天明托他弟找我谈定拍摄电影的事，受制于说不清的因素而未能如愿。后来，王全安获得了拍摄《白鹿原》的批件。

记者：你们是否就改编进行过交流?

陈忠实：拍摄前他曾找我谈过，我向他阐释了作为小说背景的那段历史，也介绍了几位主要人物的文化心理结构差异，利于他的电影制作。电影拍摄期间，我到两个外景内景地各去过一次，看看拍摄现场，和几位演员见面聊天，完全是“走马观戏”。我不懂电影拍摄，倒是开了眼界。

记者：现在看来，这部电影是否达到了您的预期?

陈忠实：可以说达到了我的预期，只是后来缩减到两个半小时的片子，颇为遗憾；更遗憾的还是王全安自己。

我写的人物我都喜欢，没有主次之分

记者：电影讲述的是清末至一九四九年之间发生在陕西一片黄土原上的历史。您觉得，城市观众能有兴趣、能产生共鸣么?

陈忠实：且先不说共鸣。一九四九年以前的黄土原上的、业已久远的生活故事的小说《白鹿原》，能否引发当今读者的阅读兴趣，就曾经是我的担心。

小说出版后的畅销和近二十年来持续的长销，当属对我的最大也是最切实的慰藉。读者不仅对《白鹿原》所写的乡村历史故事不觉隔膜，且颇感兴趣。电影是依小说改编的，读者和观众的兴趣同出一源。你说的“共鸣”，最好不要由我说话，倒是你我多听听读者的、观众的看法。

记者：《白鹿原》算得上是中国最难改编的小说，但奇特的是，不断有人试图搬上舞台、银幕，原因何在?

陈忠实：这同样是一个应该让导演们回答的话题。我想大约是对作品里的主要人物感兴趣，才想把这些人物的人生形态以立体化的表演展示出来。

记者：众多人物中，您最喜欢哪一个?

陈忠实：我写的人物我都喜欢，不受主次之分，即使出面一两次的非主要角色，我也努力让他在有限的文字里显示出不同别人的个性。如果一定要说出一个“最喜欢的人物”，当数白嘉轩。尽管我尤其喜欢，却也浓笔重墨着他的腐朽的思想色彩。

记者：当您写《白鹿原》时，是否有种跟着人物走的感觉?

陈忠实：可以说是“跟着人物走”。对每一个人物在此情此景或彼情彼景下的行为和说话的个性化把握，要达到准确，只有循他或她的文化心理结构的途径来实现，比中医把脉还准确。

记者：您从文化心理结构学说的角度，描摹白鹿原半个多世纪的风土人物、性格心理、命运变迁。《白鹿原》预告片中则突出了“中国式欲望”这一主题，您认同这一概括吗?

陈忠实：你说的预告片是发在网上的吧？我不会用电脑更遗憾不能从网上获得信息。“中国式欲望”的表述，我对这一提法颇觉新鲜。

我理解，这一提法强调的是“中国式”，也就是区别于别一个民族别一个国家的“欲望”，自然属于中国人的独有的“欲望”了。所谓“中国式欲望”，是一种概括式的泛指，如果缩小到白鹿原上，这里所说的“欲望”却是种种形态。同辈人的白嘉轩和鹿子霖的“欲望”大相径庭，鹿兆鹏和白孝文的生存“欲望”也相去甚远；更不要说“代沟”式的巨大差异了。白灵和她父亲白嘉轩的生存“欲望”，不仅完全对立，而且闹到“就当她死了”（白嘉轩语）的地步。这里应当有一个时限，它在多大程度上能概括为“中国式”，这需要读者和观众的认可。

再，“中国式欲望”会不会被我“认可”，着重在导演和演员是否对各个角色循着不同的文化心理结构来展示其心路历程。不同的角色的“欲望”，是各自文化心理的直观展现；如果展现得准确，让观众能看到各个不同的文化心理结构形态及其裂变的轨迹，那就会感知到“中国式欲望”的根基和实指了。在我看来，这种“中国式欲望”的概括，基本循着各个人物不同的文化心理结构演示着。

农村里日常见惯的人和事居然都可以写成小说？我想那我也能写

记者：您上个月刚过七十大寿，“人生七十古来稀”，此时回顾您一生的创作历程，有哪些感受？

陈忠实：我的创作大体分为三个阶段性的历程。从喜欢文学到走向“死胡同”，是第一个阶段。

记者：您的启蒙作家是谁?

陈忠实：赵树理。初中二年级，我在课本上学到赵树理的《田寡妇看瓜》，一个很短的短篇小说。读完之后把我农村生活的经历一下都激活了。这些农村里日常见惯的人和事，尤其是乡村人的语言，居然都可以写小说，还能进入中学课本？！我很惊讶，我想那我也能写。随之就到学校图书馆里借赵树理的小说。我的文学兴趣就从这儿发生了。

记者：在此之前没有读过小说，更没写过?

陈忠实：都没有，就只有课堂上写作文。看了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文学兴趣就激发起来了。随之就在作文课上写小说。

我第一篇小说是在作文本上写的《桃园风波》。我们家也有桃园，那时候正好是农业合作化转入高级社的时候，要将农民最后拥有的果园都收归集体所有，发生了很多矛盾。我每个礼拜天从学校回去都能听到很多这些事，于是就写了一篇。老师给我的评语居然写了作文本的近两页，都是让人心跳的好话。那时候计分制的满分是五分。老师给我评了一个五分，并且在右上角画了一个加号。我就受到了很大的鼓励。紧接着，又写了一篇小说《堤》，写我们合作社里建大坝、蓄水灌田中的一些矛盾纠纷。老师又对我赞赏有加。学校提供两个名额去参加西安市的作文比赛。一篇就是我的这篇小说。

记者：结果如何?

陈忠实：最后没结果。这位老师非常热心，他将我的《堤》抄写一遍，投给《延河》。我那时候根本都不知道有文学杂志。老师跟我说，要是发表了会给你稿费。

记者：有多少稿费？

陈忠实：没发表。我那时候生活很困难，从家里背一个礼拜吃的馍到学校，学校还给我些助学金。老师说如果发表了，可以改善生活。这个老师特别好，姓车，我后来写过一篇文章怀念这个老师。

记者：从喜欢上文学到正式发表作品，这应该算是一个比较大的转折吧？

陈忠实：对。一九六五年初，我高中毕业回乡以后当民办教师，发表了第一篇散文叫《夜过流沙沟》。到“文革”开始，一共发表了六七篇散文，两首诗歌，都在地方报纸。然后“文革”开始了，老作家都被打垮了，像我们这样的业余小作者就更加不用说了。

到“文革”后期，报纸有副刊了，文学杂志也开始恢复了。大约一九七三年前后，《延河》改为《陕西文艺》，重新出版。他们要扶持工农兵作者，一个和我要好的业余作者向《陕西文艺》的编辑推荐，说西安东郊有一个作者叫陈忠实，这个人写得不错。他们约我，我就将我的一篇散文给他们，在《陕西文艺》第一期上发表。紧接着，我写了我第一篇小说《接班以后》，在《陕西文艺》上发表后，产生了很大的反响。

由于我那时候已经在公社工作，后来又被提拔成为公社副主任，分管很多工作，整天在生产队跑，但写作这个兴趣还是压不下去。

记者：您的小说都是工作之余写的？

陈忠实：对。有一次办了个两三个礼拜的学习班。相对就比较轻松，我写了第一篇小说。到一九七四年，我去了南泥湾五七干校锻炼

半年，利用节假日、晚上，我又写了第二篇小说。

我把我的创作转到接受真正的文学，第一次完成了“剥离”

记者：十年浩劫后，以《伤痕》《班主任》为代表的伤痕文学在社会上产生了极大反响，是否也影响了您的创作？

陈忠实：一九七八年夏天，我正在给家乡的灞河修建防洪河堤，有天晚上，打开《人民文学》，躺在地铺上看一篇小说《班主任》。我在这篇万把字的小说的阅读中竟然有心惊肉跳的感觉：小说敢这样写了！

一九七八年末，我调离公社到文化馆，我感到，文学创作可以当作事业来干的时候已经到来了。当时我比较担忧的是我所接受的文学概念。尽管我读过很多世界名著，但接受的主要是极“左”的文艺思想。

记者：比如，文艺是为专政服务的，正面人物“高大全”……

陈忠实：对。我就意识到我需要真正接受一次文学的洗礼。我暂时没有动手写作。我借了一些文学名著来读，以真正的文学来荡涤我已经形成的极“左”的文艺概念。

最后我选择了两个作家，一个是莫泊桑，一个是契诃夫。我把文化馆所存的这两个作家的短篇集都找来，最后在这两个作家中选择了莫泊桑。为什么呢？因为契诃夫是以人物来谋篇布局的，我觉得我当时的水平还达不到。莫泊桑是以情节来谋篇的，每个短篇都有一个很

好的情节。所以我在莫泊桑的短篇里又选择了十到二十个短篇，反复阅读。

记者：一种解剖式的学习？

陈忠实：对。就是一种解剖式的读法，是一种纯粹的学习，谋篇布局、遣词造句等等。经过一个冬天的阅读，一九七九年到来的时候，我的自信心就增强了。我就开始写我的短篇。一九七九年，我写了近十个短篇，其中一篇《信任》获了全国短篇小说奖。这就进入了我的第二个写作过程。我称之为“剥离”。

记者：怎么个“剥离”法？

陈忠实：我是从西安郊区一个搞种子研究的人身上得到的启示。他要不断淘汰劣质的植物品种，就要搞种子分离。联系到写作上，尤其我自身的创作上，我觉得人的精神也有一个分离的过程，但稍有差别，我称之为“剥离”——剥除旧的观念，不仅思想上而且艺术上。

我把我的创作从“四人帮”极“左”的文艺观念转到接受真正的文学，这是我第一次完成了“剥离”。后来，“剥离”的概念不断升华，从短篇到中篇、到《白鹿原》的写作之前，我写了五六十个短篇、九个中篇。写作量不是太大，但保持对生活、创作的理解继续着“剥离”的状态。这应该是我创作的第二个阶段。

直到《白鹿原》的创作，对生活、生命，包括革命、历史，包括我个人的艺术理解，又进入了一个新的过程，这是进入了第三个阶段。

大树底下好乘凉，但另一面就很残酷——大树底下不长苗

记者：您刚才说，对您影响最大的作家是莫泊桑和契诃夫。

陈忠实：不。影响我的作家是不断变化的。最初是赵树理，紧接着是柳青，后来是山西籍的王汶石。一九五〇年到上世纪六十年代初，王汶石在全国都堪称是短篇小说大师。他的短篇把陕西关中的风情、人物的个性描写得太精到了、太漂亮了。

柳青的《创业史》是我阅读量最大的一部书。我前后买过九本《创业史》，我去南泥湾五七干校，就带了两本书，《毛泽东选集》非带不可，另一本就是《创业史》。

我的短篇小说《接班以后》一发表，居然在陕西文化圈产生很大影响。有人议论："哎呀，怎么柳青的文章给换了一个陈忠实的名字？"因为当时谁都不知道陈忠实，大家都猜测是不是柳青"文革"之后改名字了，因为太像了。

记者：这种"像"，是有意识的模仿还是无意识的深受影响?

陈忠实：那是喜欢，喜欢到不能摆脱。柳青获得声誉其实是在《创业史》之前的《铜墙铁壁》，写陕北的解放战争。这个小说我读过几次都没有读完，陕北方言我读不进去，战争题材我也不太喜欢。我读《创业史》是初中三年级，那是一九五九年开始在《延河》上连载，我去邮局买了一本，一读一下子就进入了。

记者：因为小说描写的是您熟悉的生活?

陈忠实：太熟悉了。他把关中乡村生活写得那个到位，包括语言，包括人的性格。那个时候我家每个礼拜给我两毛钱买咸菜吃，我都不吃咸菜了，开水泡馍，用两毛钱去买一本《延河》，一直买到初中毕业，还没有连载完。紧接着我上了高中，听说《创业史》要在上海的《收获》杂志全文转载，我求我在城里当工人的舅舅在西安给我买了一本《收获》送到学校，我才把《创业史》全文读完。那个印象是几十年都不能摆脱的。

记者：热爱到不能自拔。

陈忠实：对。太喜欢了。后来就是一种随意性的阅读，随便把《创业史》打开到哪一章节都可以往下读。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的，不自觉的。到我写短篇小说的时候，语言风格受到了很大影响。

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到中期，我才意识到，必须形成自己的风格。“大树底下好乘凉”，我们倚靠它可以获益匪浅；但另一面就很残酷——“大树底下不长苗”，尤其文学，必须形成自己的个性。就像我刚才说的“剥离”，除了思想观念，在艺术上也要有一个剥离过程，要从大树的阴影之下寻找自己的天空、阳光。

记者：这和其他艺术是一样的，从模仿到成为一个真正的艺术家也是一种“剥离”。

陈忠实：一样的。我是从自然界受到这种启示，开始寻找自己，形成自己的创作风格。

从文学爱好者到职业作家，我这个转变经历了二十五年

记者：您刚刚说的至少说明了两点。第一是时代对作家的创作和命运起到很大影响。像“文化大革命”期间您就停笔了。“文革”后，在“解放思想”的时代大背景下，面对一些新的思潮和新的观念的兴起，进行“回嚼”或“反思”，完成思想观念的转变。这种“剥离”也是紧跟时代的步伐，实现精神上的新生和艺术上的回春。

第二点是，创作还是来自于现实生活。像您，最早就是一个在基层摸爬滚打的农村干部。从一个业余的文学爱好者到职业作家，经历了很漫长的过程。

陈忠实：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八二年，二十五年。

记者：您这个身份的转变，花了二十五年。人们对如今的作协把一些作家养起来的做法有质疑，您怎么看?

陈忠实：养起来也是一种办法，但作家必须要解决写作和生活的关系。陕西作协这点做得比较好，成为专业作家之后，让作家兼职。像我，一九八二年，作协让我在灞桥当基层干部，我就可以在那一片随便跑。

记者：这不是“体验生活”，而是直接参与进去，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陈忠实：对。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是农村改革最激烈的时候。我被分配到渭河边上给农民分土地，把土地、牲口从集体分到一家一户。这是很深刻的体验。

我们就两个人做这项工作。因为没有经验，就在一个村子搞了试点。我记得，当时牲口少、农户多，没有办法平均，于是采取抓阄的

方式。分完牲口以后，矛盾还一直持续到晚上十二点。一直做了两三个月，才把土地分好。

分完土地之后，深夜我一个人骑自行车回住处，到莲池旁边的时候，我突然意识到：我跟柳青构成了“反动”——柳青当时是一个村子一个村子地去宣传农业合作化，一家一户地说服农民，把私有土地和牲口收上来，建立了农业合作社。二十多年后，我在渭河边上，说服农民，把柳青当年合并的土地分还给农民。

柳青是我崇拜的作家，而二十多年后，我和他做的刚好是相反的事情！这不能不引起我的思考，而且这思考和一般干部落实工作任务不可同日而语，和领导表扬我的工作做得好不好的感觉是完全不一样的。这就是直接的生活经验。

记者：直接参与生活，参与社会发展，参与历史进程。在这个过程中，激发创作热情。

陈忠实：对。直接获得一种生活体验，然后进入理性的思考。

我把作家的思想喻为炼钢，磨砺思想锋芒是很费工夫的

记者：上世纪九十年代，您进入了个人写作的第三个阶段。《白鹿原》问世后，震动非常大，被称为难得一见的史诗性巨著。您在写作时，是否带有一种为民族作史诗的使命感?

陈忠实：我曾经在多年前说过，《白鹿原》的写作是为自己死时有一本垫棺作枕的书。这主要是为着从幼年就喜欢文学的那个至今难得改易的兴趣。

在《白鹿原》的构思阶段，我粗略计算了一下时间，到完成这部小说时，就接上乡村人习惯上所划的老汉的年龄界限——五十岁了。我对人生中的生命短促的紧迫感发生了；伴之而来的是一种压迫感——从喜欢到迷恋文学大半生，没有写出一部自己完全满意的小说，这是任何荣誉和金钱都难以补偿的缺憾。

在一次和文学朋友喝酒喝得亢奋时，朋友问到这个话题，我把在心中沉郁许久的话说了出来："我想为自己写一本死时可以垫棺作枕的书。"依此可以作证，这部小说的写作，完全是自己对文学创作的一种宿愿，是指向自己的。至于后来产生的较大反响，起码超出了自我宿愿实现的目的，我自然获得慰藉。

记者：有评论家认为，作家每写一部作品，都要从良知出发，都要有一种使命感，作品才能对人民对社会有用。

陈忠实："使命感"这种东西，有则更好。关键在于寻找个人创作的突破口，生活体验以至生命体验的独特性，还有包括文字这种表述的基本功力在内的艺术形态，都得有自己的独特追求。否则，"使命感"不仅构成一种压迫心理，而且很可能落空。

记者：您似乎很少谈作家的"使命感"。

陈忠实：我大约没有说过"使命感"的话。这不是我清高，而是我对小说创作的理解。

我从初学写作到后来的长篇小说《白鹿原》的创作，越来越相信作家生活体验的独特性，更难能可贵的是进入一种生命体验的状态。我越来越相信，决定生活体验和生命体验的独特性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思想。

我曾把作家的思想喻为炼钢，深刻而独立的思想有如最先进的炼钢设备，能够把矿石冶炼出精钢来；而肤浅平庸的思想有如低劣的炼钢设备，面对同样的矿石却只能炼出粗钢。磨砺思想锋芒，这是很费工夫的事。不然，很难实现“使命”。即便说，也是空喊。

我当了十几年作协主席，从来不用“培养”这个词

记者：除了“使命感”，还有一个文学创作者和评论者都十分关心的话题——文学天才。

陈忠实：文学创作的天才，确实是一个颇为神秘的话题，也是在我喜欢上文学便感到困惑以至压迫的一个话题。

创作需要天才，又如何验证自己是否具备创作的天才呢？无法验证。我看到外国和中国的许多作家和诗人，多是在青年甚至少年时期便有佳作问世，自然对我形成压迫，如果自己不具备创作天才，用功将成为白费，可能连适合自己能干的事也耽误了。

记者：“天才”问题也曾困扰您?

陈忠实：是啊。但我尽管心里存在天才这个阴影的压迫，却无法舍弃或改变这个爱好，即使在“文革”对文学创作几乎一扫而光的严酷背景里，我仍然偷读意外获得的世界名著《悲惨世界》《无名的裘德》等，哪怕放弃了文学写作的业余爱好，纯粹是一种欣赏性阅读。

记者：您现在觉得，什么样的人是文学天才?

陈忠实：我后来对困惑自己的文学天才，有了一个物质化的理解，即某个被称作文学创作天才的人，生来就有一根对文字尤为敏感

的神经。少小年纪接触到文学语言，那根敏感文字的神经就兴奋起来，促成他的偏好，以致成为终生难以改变的追求。

依此可以推想，中学都没有读完的华罗庚能成为大数学家，当是那根对数字尤为敏感的神经，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效应，当然不可或缺钻研的勤奋。这样，我就能够理解，生长于同一书香门庭的兄弟姊妹，可能有人对文学发生兴趣，有人对机械发生兴趣，有人对什么事都缺乏特别的兴趣，决定因素便是那根神经的有无或偏向。

记者：所以您曾说，当了十几年作协主席，从来不用一个词“培养”。

陈忠实：从来不用，如果作家能培养，我为啥不把自己的儿子培养成为作家?

据我所知，现当代作家中，子承父业或子承母业的现象不是没有，而是一个极小的比例。仅就离我最近的陕西文学界而言，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享誉中国文坛的十余位小说家、诗人、散文家和文学评论家，他们的儿女中几乎没有一个是以文学为职业的人。而画家和书法家，还有秦腔等地方戏曲的表演艺术家，子承父业、女承母业的人却不少。我便想到文学创作的这种现象，很难说培养。

我又看到另一种现象，许多作家出身于农民家庭，父母甚至是文盲，没有书香的熏染，却从小对文学发生兴趣了，以至成为当代文坛的骁将，比如路遥、邹志安等。他们是文学创作的天生之人才，生命里注定要选择文学创作。

生活和文学的自然法则，容不得任何人投机

记者：您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文学领军人物。也正是在九十年代，金钱裹挟下的欲望开始泛滥文坛。文学领域中出现了许多新名词，从痞子文学到身体写作等等。

陈忠实：你所说的这种种文学现象，前些年发生着的时候，我在媒体上都看到过，也看到对这几种小说写作的议论和评价。我基本保持着这属于文学创作领域的正常现象乃至必有现象的看法。

记者：包容的态度？

陈忠实：不是我包容，而是基于对小说创作的理解。不同的作家，对小说创作的艺术理想差异很大，生活体验差异很大，思想差异也很大，笔下所展示的文字差异就很正常了。即如上世纪初中国新文学的发端时期，有鲁迅等直面民族精神和命运的奠基性史诗的写作，也不无风花雪月等形态的作品。

记者：消遣小说、“尿布文学”等等，也是一种形态的作品？

陈忠实：这种东西社会也需要。他的生活经历可能就局限于这种生活体验，他只能写这种作品而且乐在其中。

记者：但文学创作不应该与时代的脉搏相连吗？

陈忠实：肯定是有扣着时代的脉搏写作的人。但是谁也代替不了谁，谁也改变不了谁。可能有一天，他写“尿布文学”不满足了，他要走出自己的圈子了，去进入社会了。

现在就我能了解到的，大多数的作家写作还是面向社会、面向现实的，还是在思考时代命运的。队伍里出现一些另类写作，也不奇怪。“身体写作”前几年比较热，现在基本也没什么影响了。这是生活

本身，包括文学本身，一种自然的、无情的淘汰。这个法则是无法改变的。如果靠色情去俘获读者、提高发行量的话，这是写作者的悲哀。

记者：法则会教育人，生活会教育人。

陈忠实：生活和文学的自然法则是容不得任何人投机的，投机了一时但不可能永久。

记者：所以我们的文学还是要忠于生活体验和生命体验。

陈忠实：这是已经被国内外的文学大师无数次证明了的。

记者：证明了文学还是需要“心脏”的。

陈忠实：当然。没有文学的心脏，跳动是不持久的。

不可能大家都去写《百年孤独》，如果这样文学就太孤独了

记者：进入二十一世纪后，越来越多的作家走上了“文学创作的影视之路”。文学作品改编成影视剧，成为当下很重要的一个文学现象。

陈忠实：这个我觉得不是中国独有的现象。作家写出小说，电影、电视剧的导演希望以一种比较形象化的表述来展示给观众。这样就对小说家所要张扬的东西给了一个更具象化的表述。

这和文字阅读是两种感受。文字阅读，是包括读者自己的想象的。而具象化的表述，把所有人物都展现在读者面前。比如，张丰毅就是白嘉轩，白嘉轩就是张丰毅。电影有它自己的优势。它把文学圈

里的阅读扩展到整个社会，市民、农民阶层能进行直观的欣赏。这应该是对小说创作的扩展和延伸。

记者：改编成影视后也有利于扩大作家的影响力。

陈忠实：包括一些原本在读者中没有太大反响的作品，成功改编成影视作品后，产生了非常大的效应，这也不在少数。

记者：如果某些作家明确自己的目标就是快速进入商业通道，会不会对文学带来伤害?

陈忠实：这样的作家，可能会有，但不会是全部。有为影视改编提供方便的现象存在。但影视的诱惑不会影响作为作家的坚持，大多数作家还是坚守文学的风骨。就像是张贤亮，给他再多利益，他也不会为了改编成电影而写小说。而且，社会有时候也还需要这些东西。

记者：不可能大家都去写《百年孤独》。

陈忠实：那是不可能的。否则，那就真的太“孤独”了，文学太孤独了。应该有适合不同兴趣层面的读者的写作。不可能每个人都去写《百年孤独》。

实际上，有些人，就算文学再神圣，他也孤独不起来，他进入不到孤独的境界，只喜欢娱乐性的电影、电视这种写作。作家之间的差异很大。反过来，利润再丰厚，诱惑再大，马尔克斯也写不了纯商业的东西。一个是他不愿意，另一个是他可能就做不来。

文学的本质，是作家对社会对人生的独特体验

记者：更进一步说，您认为商业化时代会对文学带来多大的影响?

陈忠实：商业时代汹涌的商潮，会对文学产生冲击性影响，但不会改变文学的基本属性。

其实这种影响业已发生，在泛文化尤其是艺术界，商业利益驱动的低俗平庸乃至不堪入目的影像、表演等，早已司空见惯。文学领域也很难独清一池，娱乐性、猎奇性和色情性的写作，应商潮而生，而且很有市场。

欧美地区似乎早已如此，然而并未影响大作家大作品的出现和出版。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我到美国有两次乘火车的经历，在火车进站口有一个售书台，出售多种报纸、杂志和书籍，尤其是那种包装简陋售价很便宜的小说，专售乘客在火车上的消遣性阅读。我看到有男性和女性在火车上的阅读，也看到他们到站下车时，便把读本顺便丢在车厢门口的纸篓里了。

后来我得知，有不少专写这类读物的写作者，据说收入不菲。然而，并不影响美国出现一个又一个优秀作家。他们神圣着的纯文学精神依然神圣，文学的本质不仅未见异化或改变，而且更深化了。欧美的市场经济已过两百年，纯粹的文学依然发展。

记者：您理解中，文学的本质是什么?

陈忠实：我所理解的文学的本质，是作家对社会对人生的独特体验，用一种新颖而又恰切的表述形式展现出来。所谓独特体验，就是独有的体验，而且能引发较大层面读者的心灵呼应，发生对某个特定时代的思考，也发生对人生人性的理解和思考。

譬如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在于他从通常所说的生命不能承受的重，而深刻到不能承受之轻，不仅是他独有独特的体验，而且从生活体验升华为生命体验了。这种体验引发的心灵呼应，不仅是本国读者，而且是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读者；不仅是有过此类生活经历的会发生心理呼应，未经历过此类生活遭遇的读者也会发生关于生命思考的心理呼应。

记者：一些文学作品脱离现实，在一个虚无的基础上展开故事。这样的作品能不能算是文学?

陈忠实：你提的这个问题，其实你已经有了一个否定性的结论，这是文学常识。

我要说的是，在我不无偏颇的关于创作的理解，是作家对生活的体验需要展示，这是文学创作的原始动因。诗人触景生情便有歌吟，李白面对庐山瀑布，发生"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的浪漫诗句；杜甫面对民不聊生饿殍载道的惨相，发出"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的悲叹。小说创作更是如此，无论面对现实生活，无论面对已成昨天的过去的生活，抑或甚为久远的历史，作家发生独有的体验，生活体验或难得的生命体验，便激起不可抑止的创作欲望，就有令读者感动以至杰作出现。这是创作的基本路数，似难违拗。

缺少高水准长篇小说，主要在于思想软弱，缺乏穿透历史和现实烟云的力度

记者：对中国当代小说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德国汉学家顾彬称"中国小说都是垃圾"，另一种是说"中国小说离诺贝尔文学奖不远了"。您怎么看?

陈忠实：说中国小说都是垃圾，显然以偏概全了。他可能主要是指当代小说，他起码不敢说鲁迅的作品是垃圾吧。他应该对中国小说有更全面的了解。我们的文学创作能成熟到什么程度，能被外国读者接受到什么程度，还可以再讨论。

记者：更极端的是，有人甚至说“文学已死”。比方说，文学杂志越来越难以为继。像《大家》杂志甚至用同一个刊号出版两种期刊，收费登载各种论文。

陈忠实：就我知道的，全国各地的文学刊物还都存在着，停刊的很少。现在文学刊物普遍采取的生存方式是为财团做一些服务性的宣传，财团提供资金，这样就基本解决了生存的资金。单纯靠发行赚钱的文学刊物，少之又少。

记者：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文学刊物风靡一时，像《萌芽》杂志都要排队去买。那时，文学成为时代的号角，现在，文学似乎进入了平常化状态。

陈忠实：我是这样理解这个过程的——这是个特殊年代的特殊现象。毕竟我们经历了“文革”十年，很多人受迫害，话说不出来。这时，文学成了一个时代的先声，理论上还没有解决的问题，作家通过文学作品将民众的积怨抒发出来了，所以他赢得的是人的心灵的呼应，这不是我们一般概念上的文学欣赏。

记者：所以这是一个特殊时代的特殊现象，并不具有文学创作的普遍意义？

陈忠实：不具备。那个时期，对文学没有兴趣的人，听说哪篇文章如何如何，都去争购作品。到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这个现象

就没有了。政治上把很多东西都解决了，很多受冤枉的人都平反了。大家一口气出了，心里就平静了。

记者：文学也归于平静了。所以不能用那个时代的突然热闹来和现在比较。因此，您对当前的文学现状并没有过多忧虑。

陈忠实：我所知道的文学创作态势，是空前繁荣。前几年每年有两千部长篇小说出版，近两年的长篇小说出版量已突破三千部。有人做过统计，“文革”前十七年出版的长篇小说不足二百部，参照对比，当今中国文学创作繁荣到超出想象的景象了。“文学已死”的话，起码不符合当前长篇小说创作的态势。

记者：但是，在“量”的繁荣中，有没有“质”的提升?

陈忠实：中国是缺少高水准长篇小说的。在我看来，主要在于思想的软弱，缺乏穿透历史和现实纷繁烟云的力度。

作家独立的思想，对生活——历史的或现实的，会发生独特的体验，这种体验决定着作品的品相。思想的深刻性、准确性和独特性，注定着作家从生活体验到生命体验的独到的深刻性。这也应该是文学创作的常识。

所以我以为，急不得。首先是繁荣提供了一个雄厚的阵势，那么多作家都持续在进行探索和创造，大作和精品肯定会出现，我想对这个过程应该宽容。

对于诺贝尔文学奖，我想都不想

记者：至于“诺奖”，早已经成了文坛的一个情结。我们离它真的不远了么？

陈忠实：“诺奖”吵吵了好多年了。且不说“诺奖”对中国文学有什么偏颇看法，在我的印象中，“诺奖”是很难让人预料的。每年“诺奖”一公布，记者采访获奖者。每一个获奖者都表示“出乎意料”，根本没有这个思想准备。

记者：据说，诺贝尔文学奖依据六条标准来评价：是否表达了高尚的理想和对真理的追求；是否表达了对人类的同情和深厚的人道主义精神；是否捕捉了时代的重大主题，写出了人类面临的困难和命运，或者特别突出了人类的精神困惑等等。这是否给了我们一些启发？

陈忠实：这六条标准，并不陌生，可以说是作家们耳熟能详的创作命题。就我有限的阅读，当代中国作家的不少作品都涉及其中这个或那个甚至不止一个两个命题。

这六条命题，是作家面对生活必然会发生的思考。如果不涉及这六条命题的思考，那就只有娱乐功能的地摊读物了。关键在于思考的深或浅的层面，这决定着生活体验和生命体验的独特性，自然决定着作品的质地和品相。鲁迅先生未必知道这六条标准，而他关于民族命运的思考所形成的体验，铸成狂人、阿Q、孔乙己等典型人物，依旧鲜活在读者心里。

面对这六条并不陌生的命题，我想应该不断深化思想，形成独立独特的生活体验和生命体验，才可能有独秀一枝的作品产生。创作者尽可能完美地展示自己的体验，别想那个“诺奖”。每年“诺奖”公布之

后，获奖者谈到感受时，几乎无一例外都说到“没有想到”。可见他们原本不是瞅着“诺奖”写作的。

记者：所以，中国的作品离“诺奖”远不远也很难说。

陈忠实：对，很难说。所以我认为就索性不要想，他给更好，不给我们就继续创作。

记者：也就是那句话：走自己的路，让人家去说吧。

陈忠实：让人家去评吧。

记者：这几年“诺奖”的获奖作品您都看吗?

陈忠实：大部分我都看过他们的代表作。我觉得都不错，都有特点。

记者：在您眼中，这些文学作品的共同特点是什么?

陈忠实：都是各成一体，很难看到他们之间有类似或者相同的东西。这是对我很大的启示。今年年初，我读土耳其帕慕克的《我的名字叫红》，他的写作就很不一样。一个人一道艺术风景，很难看到谁跟谁近似的东西。他们的个人体验、生活体验差异性非常大。这给我们的启示很大——就是要写自己独立的、独特的生活体验，甚至生命体验。

记者：有人说，《白鹿原》是中国版的《百年孤独》，是中国最有希望得“诺奖”的。

陈忠实：不敢当不敢当。我就是写了一九四九年前的那五十年我对那一段中国社会和生活的理解，受到读者的喜爱对我来说都非常安慰了。对于“诺奖”，我想都不想。

记者：您是否会写一部自传或出本传记?

陈忠实：《白鹿原》出版十余年来，有多家出版社约我写自传，或让我口述，由人代笔，我都辞谢而未做。我对某些自我评功摆好以至自吹的自传，阅读的感觉是无言，警示我别做这类蠢活儿。

记者：忽然想到，您这个“陈忠实”的名字有什么寓意吗?

陈忠实：这是我父亲取的。我家那个村子叫西蒋村，但没有人姓蒋，百分之九十五都是姓陈的。我排到了“忠”字辈，所以我父亲给我取个“忠实”。

记者：父亲给您取“忠实”，是想让您做一个真实、实在、踏实的人。

陈忠实：但是这个名字给我的最初印象是我不喜欢。为什么呢?我从上小学到初中，常遇到一个问题，包括老师也会跟我开玩笑：“你名字叫陈忠实，那你忠实不忠实呀。”

这尽管是玩笑，但从很小的年纪就警示着我不能说谎，必须诚实。别人可以说假话，我不可以，因为我叫陈忠实。包括同学之间开玩笑，“你这个陈忠实，你不忠实呀”。虽然是玩笑话，但是这个比毛主席语录还有作用。

记者：作为生活中的陈忠实来说，是要忠诚老实；作为作家的陈忠实来说，则是要忠实于生活，忠实于生活体验和生命体验。可不可

以这样去理解“陈忠实”?

陈忠实：谢谢你的理解和表扬。

2012年8月25日 西安

白鹿原上的文化守望

——与《中国文化报》记者杨晓华的对话

杨晓华：《白鹿原》出版以来，持续受到读者的喜爱，就您掌握的情况，现在有没有一个包括外文版在内的发行数的准确统计？

陈忠实：《白鹿原》具体发行了多少本，我也不知道。反正是几种版本一直都在发行。电影《白鹿原》上映，又一下子发行了六七十万册。去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举行了《白鹿原》出版二十周年纪念活动，他们说，这个小说从一九九二年出版到二〇一二年，一开始就热销，后来持续每年各种版本发行十多万册，这在当代文学中是很少的。我自己也很惊讶。二十年，两三代人啦，这对我来说是最大的安慰。

《白鹿原》最早翻译成日语，接着是韩语，再后是越南语，去年是法语。英语的翻译来谈的很多，但有一个问题卡住了。法文版签合同时，他们出版社的总编提出还要代理其他语种，还有德语、西班牙语等，他们号称法国第二大出版社，和各国出版社都有往来，对其他语言的翻译出版有好处。我就直接签合同了。所以，现在各种语言要翻译，我都不能谈了，得和法国出版社的代理商谈。

杨晓华：雷达先生在《废墟上的精魂》一文中，认为《白鹿原》正面观照了中华文化精神和文化养育的人格，从而探究民族文化命运和历史命运，是新时期文学、现实主义文学的一次飞跃。您是什么时候产生这种浓郁的文化意识的？是什么样的契机和动力促使您要从文化心理结构上对传统社会做一个史诗性的观察和描述？

陈忠实：应该说，就是创作《蓝袍先生》引发的。在《蓝袍先生》之前，我主要是写当代农村生活的变革，写农村实行责任制之后的思想、家庭、人际关系的演变。我发表的第一个中篇小说《康家小院》写到了现代生活潮流对乡村传统文化的撞击，但是文化的意识并不明确。到《蓝袍先生》，这个意识就较为明确了，我就是要写一个人的精神裂变，写精神裂变过程中的社会和人的命运。正是因为这个中篇触及文化心理结构的问题，我才感到这是个深不可测的一个大的人物活动的背景。后来就开始关注那一段历史，就是一九四九年以前，从封建社会解体到共和国成立这一段历史，我们传统文化和现代思潮的关系问题。

杨晓华：如果说您之前的创作，重心都集中在单个人物的刻画上，到了《白鹿原》面对的是受到类似文化心理结构影响的人物群体，这个挑战是很大的。

陈忠实：我从来以为我对农村是最了解的，因为我生在农村，长在农村，工作在农村，前后几十年。我不像柳青，他挂职县委副书记去深入生活，实际上就是深入我这样的生活，我本身就是这种生活的人，我的这种体验是最直接的。但是写一九四九年以前的时候，我突然感觉到一种不自信。对一九四九年之前的农村太不了解了，尽管有些感性经验，但那是很幼小的生活记忆，所以我就渴望了解这块土地的昨天。

当时我还有一个逆反心理。我本来对寻根文学很感兴趣，但是后来看到几个人写的东西都是写荒山野岭、荒无人烟的地方，写小土匪，小酒店发生的怪事情，我就感觉到，寻根寻到最末梢去了，这个不好，应该寻民族文化的根，民族文化的根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一个城

市或者古镇，因为一个城市或古镇，是一个地方工业、商业包括文化发展最具代表性的地方，民族文化的根应在这里，而不在荒山野岭。

有了以上这几种因素，我就开始全面了解白鹿原。白鹿原只是一个具体的小原，实际上西安周围的几个县都有原。先开始查县志，西安周围三个县长安、蓝田，还有已经消失的最古老的咸宁县的县志（辛亥革命后和长安县合并）。一边不停地查，一边一笔一笔抄，抄了厚厚一本子。我还搜集了后来很多人写的革命回忆录。蓝田这个地方的山里头有过一个红军的根据地，红二十五军，红十五军都待过，出了很多革命家，一个小小的蓝田县，解放后光部长级、军级干部就四五个。中国共产党一九二一年成立，一九二六年白鹿原上的一个镇就建了党支部。我感慨，过去光知道瑞金是红区，延安是红区，从来没有想到我生活的白鹿原上也是最早闹过革命的地方，我就有一种震撼的感觉。这些回忆录给我提供了丰富的素材。有好多事件后来都写到小说中了，当然都化成我的人物了。

我想西安周围农村的变化和西安和全国的变化是紧密联系的，所以我读了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我想把关中的事件和大的背景联接融合起来，那就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至于到原上，到民间去找村子里的，包括我们村的那些老人聊天、调查，那就多啦。这个过程中，很多人物情节就开始冒出来了，大概有两年的酝酿，人物关系和结构就浮出水面了。

杨晓华：后来在创作《白鹿原》的时候，您是从白嘉轩娶七房女人的描写开始的。小说发表的当时很有争议。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很多作家和评论家都提出“身体叙事学”“身体文化学”“身体社会学”，回头再看，《白鹿原》当初从这个角度入手开启作品，是很深刻的。我甚至觉得这是整个作品的一个具有很大文化隐喻功能的结构性安排。

陈忠实：对我来说，当时没有太复杂的考虑，很简单，在白嘉轩这个刚刚进入社会的具体的人身上，他父亲去世使他遭遇了家庭灾难，尽管事前事后他开始承继族长。但纯粹说他的家庭灾难，意义不是很大，这个灾难可以集中体现在连续死几个女人这个事情上。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在白嘉轩这样的一个人看来，女人在男人的心目中到底是个什么？在封建社会的乡村，妇女是一个什么样的概念？在当时社会中是怎样一个存在形态？写了那么好几个女人，各有各的不幸，连白嘉轩自己也丧气，说要不要再缓一段，他妈说：女人就是糊窗户的纸，破了烂了，再糊一层。女人心目中的女人就是一张破纸！演绎几个女人的形象，就是要让白嘉轩的母亲说出这个话来，就是要告诉读者，在封建社会里头，女人的社会生存是什么形态。这是一层意义。

还有一层更切近的意义就是，在封建社会，对一个家庭来说，最大的悲剧就是绝后，“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男权社会你没有儿子继承，你就是有万贯家财，死了以后没人继承，就变成别人的了，就旁落了，你还有什么心思去积累财产？所以对男人来说，最大的人生恐惧就是绝后，所以必须要有人继承，他才有再生产的劲头，这是一个很简单很核心的社会理念，是宗法社会的关键支柱。

所以，是人物的精神心理结构决定了这样一个开头。我没有想到其他的开头方式。而且，一旦完成这样一个对人物心理特点的塑造，我就再也没有写白嘉轩和他后来的夫人怎么样。

杨晓华：您在讲文化视角的时候，用得更多的是“传统文化”，没有用“儒家文化”这个词。关于传统与现代文化的关系问题，一直存在争议，作为一个作家，您在自己的作品里也进行了深入的剖析和呈现，可否谈谈您的看法?

陈忠实：传统文化主要就是儒家文化。儒家文化在宋代出现了学派林立的现象。其中张载以关中为基地讲学育人，号称“关学”，历宋元至明清以后，“关学”已经成为深入八百里秦川的文化心理。为了创作《白鹿原》，我查县志，看到了北宋神宗熙宁九年（公元一〇七六年）所制定的我国历史上最早的“村规民约”——吕氏《乡约》，我大为震动。这个乡约，用来指导乡民做人、做事、处世，是关中人精神心理上的一个纲领似的东西。吕氏《乡约》在这块土地诞生，后来传播到南北各地，成为明清乡村治理的精神纲领。吕氏《乡约》的作者就是关中大儒张载的嫡传弟子、号称“蓝田四吕”的吕大忠、吕大钧、吕大临、吕大防兄弟。

我当时就想，刚解放后的五十年代初，各级政府要给每个农民家庭订立爱国条约，在关中农村，每个家庭的门楼旁边，没有门楼也要在房子的墙上用白灰抹出一个小方块来，让有文化的人写五条爱国条约，比如热爱祖国、热爱人民、勤劳勇敢什么的，家家都有。你看，宋代的儒家给农民定下乡约，那个内涵要比我们的简单的五条丰厚得多，而且很具体，容易教化民众，所以这个乡约就成为我理解那个时代原上人精神心理结构的纲领性的东西。

我并不研究儒家，我的作品也主要不是评价儒家，我主要是关注我们民族的精神历程。封建社会解体，辛亥革命完成以后，中国的传统文化，在乡村是怎样影响着、制约着人们的精神心理，这些乡村的乡绅和村民的心理是怎样构架的？当国民革命、共产主义革命在生活中发生的时候，这些以传统文化为心理结构的各种人，发生了怎样的精神变异或者裂变？不仅是大的社会运动的内容，更深层的是人的心理结构被打乱，甚至被打散。我是写这个的。实际上不要说那个时代的人，就是解放后很长一段时间，一般民众的精神心理上，仍然没有

完全解构那些传统思想。不管是传统文化中美好的，还是腐朽的东西，都仍然在支撑着中国人的心理结构。

杨晓华：改革开放、市场经济的发展，使得中国社会的价值缺失和紊乱问题凸现出来，社会上不断有人呼吁重建传统文化、回归传统文化。对此您是怎样认识的?

陈忠实：儒家文化的命运在中国现代历史上经过了几个阶段的变化。我的理解，“五四”主要是否定这个东西。解放以后，一味要接受新思想，我们整个文化系统都是厚今薄古，发展到后来就是全面批判儒家，尤其是“林彪事件”发生后，把孔子都不叫孔子，叫“孔老二”了。从学校到家庭教育，传统文化几乎都断裂了。“文革”期间，那种残酷的批斗，把我们文化中美德的东西几乎全部毁掉了，真是惨不忍睹。这种摧残可以说比战争还厉害，战争主要是物质上的，死很多人，但对活着的人没多大影响，可是“文革”对活着的人进行精神上的打击和折磨，后患无穷。我们辛辛苦苦建立的共产主义道德体系在“文革”期间也受到破坏。新时期一开始以经济为中心，大家很自然就被商业利益驱使，很多干部贪污腐败，数量之大，不可思议。我确实也看到很多人提倡传统文化的东西，但这个构建相当困难。

杨晓华：新时期以来的作家，在语言上都格外追求创新，您对自己的文学语言也是下过很大功夫，有着高度自觉的，这种思维习惯是如何培养起来的?

陈忠实：这有一个发展过程。我小时候看的第一篇小说就是赵树理的。看完后，我也开始在作文本上写小说，我看赵树理那些人物都有外号，就也给我的每个人物起个外号。后来，柳青的《创业史》，开始在《延河》上连载，我当时在初中三年级，认为柳青把关中的语

言提炼到了最迷人的程度，所以一下子又很崇尚柳青的语言，不自觉地受到影响。上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以后，我意识到一个作家必须要在包括语言在内的整个创作上形成自己的风格。“大树底下好乘凉”，但是“大树底下不长苗”，大树的叶子把阳光都遮住了。在这种个性化语言的形成中，鲁迅对我启发很大。作家不可能用一种语言去写他的所有生活体验，他必须根据他体验到的内容和人物，作品人物的气质独特性，决定选择什么样的语言。鲁迅写阿Q的语言不可能用来写祥林嫂。作家语言的决定因素是人物的精神气质。作家必须找到适宜于他要表现的那个人物的精神气质的一种语言。这应该是语言创造最生动的东西。

《白鹿原》的写作过程中，对语言我也是下了功夫的。比如，描写语言和叙述性语言的取舍问题。描写语言容易把作品写长，叙述语言凝结性比较强。不管写人写事情，如果用描写语言写，需要一百字，如果用叙述语言可能一句话就形象化地叙述出来了，这是我选择《白鹿原》语言方式的最要害之处。用白描语言去写，《白鹿原》起码要写两部，九一年、九二年，中国文学开始冷下来了，如果有两三部那么长，读者读起来容易厌倦。所以我就想通过各种途径压缩篇幅，其中最重要的就是使用叙述语言。为此，在写小说之前，我还写过两三个短篇，纯粹用叙述语言，其中一篇，从开篇一直到完一万多字，只有两三句对话。叙述语言难度更大，如果功夫不过硬，不能做生动形象的叙述，那就干巴巴的，味同嚼蜡了。

2013年2月25日 二府庄

从话剧《白鹿原》再演说起

——答《陕西日报》记者高山 蔡思雨问

二十年魅力不减，多形式表现各有千秋

记者：阔别七年，当得知新版话剧《白鹿原》上演时您有什么样的期待或感想?

陈忠实：这个当时很难预料。毕竟《白鹿原》七年前已经演过，且不说去年电影也刚刚放过了，不管评价如何但观众还是很踊跃。我担心电影放映以后，观众还有没有兴趣再看话剧。结果话剧演出仍然是观众踊跃，所以我很感动，说明电影放映并没有太影响或冲击观众们对话剧的兴趣。

记者：这应该归于原著的魅力对大家的吸引吧?

陈忠实：主要还有演员的魅力。因为舞台表演跟小说是两回事，但作为原著作者，我也感到很欣慰，毕竟它就是《白鹿原》嘛，无论是电影还是话剧，观众对它的兴趣未减，那就是对作者最大的安慰了。

记者：自小说《白鹿原》问世以来，其实已经有过秦腔、话剧、舞剧、电影等多种艺术形式的改编，您觉得哪个更能展现原著的韵味?

陈忠实：这些我都看过，各有所长。像秦腔，它的优势就是可以把小说里的、一些在舞台上无法表现的大情节大事变用唱词交代出来。舞剧的局限比较大，它就集中在表现黑娃和田小娥的爱情上，对于社会各个阶层的碰撞完全是依照肢体语言，人们通过舞剧主要是欣赏演员的肢体语言，这也是它的优势。电影的遗憾在于后来的删节，像朱先生这样重要的人物都进不去，但电影的长处就是直观性非常强。话剧从第一次演出时观众的热情应该就是一种很大的肯定，几个人物的个性、精神、心理基本反映出来了，也克服了舞台的局限。

无论哪一种艺术形式都存在一个很难解决的问题，就是小说人物太多，情节多，跨度长，作为舞台艺术时空局限太大，所以不可能把那个大的历史事件、那么多的人物命运转折全部反映出来。不过，电视剧正在紧张筹拍中，据说要拍五十集，我估计电视剧能表现得更充分一些。

《白鹿原》与华阴老腔的不解情缘

记者：当初为什么选择华阴老腔，而不是陕西的文化符号——秦腔来表现《白鹿原》呢?

陈忠实：其实排话剧之初，导演林兆华只知道陕西有秦腔，所以想在话剧中插几段秦腔清唱，就让我给他找几个秦腔演员，而且声明不要专业的。后来在寻找民间演员的过程中，我突想到在此前一年被人邀请去看过一次陕西民间演出，就是陕西各种戏剧的清唱晚会，那是我第一次听到老腔，非常震撼。我就跟林兆华导演说，这个插在《白鹿原》中间可能效果不亚于秦腔。于是，我给找了几个秦腔演员，同时把华阴老腔演员也找来，专门让演员一人演一段，给林兆华听。当老腔刚唱了第一段后，我发现林兆华的眼睛都直了，也应该是

一种震撼的感觉。这是一种生存在民间、流传在民间最原始的秦人的吼声，可以感天动地的一种戏曲。最后，老腔在话剧中也收到了强烈的演出效果。

记者：您觉得华阴老腔对《白鹿原》有怎样的烘托效果?

陈忠实：老腔是在这一片土地上产生的一种剧种，带着这一块土地的韵味，而且可能更具代表性的韵味，所以跟那个时代里头的白鹿原人的生活、情感、心理应该是互相应和的。尽管它在戏里演出的内容，跟戏剧本身的情节没有任何瓜葛，但它和那个时代、那种地域性的情感韵味是吻合的，所以对于话剧来讲，它张扬了那个时代的一种民间的生活氛围，也是那个时代的关中乡村人的一种心理呼喊。

记者：有人认为《白鹿原》对华阴老腔这一古老剧种发挥了拯救与发扬的作用，您怎么看?

陈忠实：算是机遇吧，它正好上了北京舞台，如果首演在西安可能未必有那么大的影响。在北京一演出，那些看惯了洋戏、洋舞的观众，突然发现我们民族还有这么震撼人心的一种民间演出形式，所以就得到了一种精神的张扬。

过去没有老腔的专职演出，要么是乡村过会上演，要么就是民间的红白喜事给人家请去演出，而且不在高台上演，都是在地上拉一条幕布就算是舞台了。

那一年，老腔因为话剧舞台上的亮彩一下子在全国火了起来，被全国好多省市春节晚会邀请演出，后来又甚至出国演出。就这样，这个濒临灭绝的剧种又重新得到了人们的喜爱和发展。因为话剧产生广泛影响后，也产生了比较好的经济效益，据说当初为了生计放弃老腔

表演的演员们又恢复演出了，现在还有很多年轻人学这个，可以说老腔表演后继有人了。

大家的认可、甚高的评说，是作者最大的幸福

记者：据说在小说《白鹿原》最初完成时，您还一直担心能否出版?

陈忠实：当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两个编辑从北京来拿稿的时候，作为我来说心里面还很不安，不知道他们会是什么看法。按通常的习惯，一篇五十万字的长篇要叫编辑们看完要经过小说组组长还有出版社的领导层层审阅，最后给你一个公开表态，对这个书能出或者不能出，评价如何，估计最少得两个月以上。但是我完全没有料想到，在他们从西安拿走书稿以后刚刚过了二十天，我就接到了回信，而且评价很好、很高，这也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他们对这个小说的首肯和甚高的评说，对于一个创作者就觉得自己的全部用心、用意都被理解了，就是完全得到了一种共鸣，这应该是一个作家最幸福的时刻。

记者：当时您说"如果不能出版，就回家养鸡了"。这应该是句玩笑话吧?

陈忠实：这是真事。说这话，我不完全是开玩笑，出于三个原因。一个是家庭，因为我闷头写这个长篇写了四年，其间几乎再没有写其他文章，所以稿费收入基本就没有了，家里生活一下会陷入困窘状态。再一个，当时农村刚刚兴起养殖专业户，收入都很好，很鼓动人，我说得改善一下生活了。更重要的一点，我写完这个小说就五十岁了，我自己也考虑，作为一个作家，写作到五十岁，长篇不能出版，那么我就想把创作再放到业余位置上，然后干一下物质生产。给

社会贡献不了长篇小说，可以贡献鸡蛋嘛！当然，这个也仅仅是很短暂的时刻，因为不过二十天就收到回信了，这些话就成笑谈了。

记者：时隔这么多年，小说《白鹿原》依然受到广大读者的追捧和热爱，畅销不衰。对这一现象您怎么看?

陈忠实：从一九九三年六月正式出版发行到现在，我也没有想到它会处于一种畅销状态。这二十年里，仅一九九三年一年就印了六七十万册，后来就是几乎每年都印七八万到十万册之间，截止到去年，因为电影《白鹿原》上映，去年一年大概能印五十多万册。而且在我签名售书的时候，看见来的有各个年龄层次的读者，有时候参加一些座谈会各个年龄档次的都有。这是我没有预料到的。

写自己所想，实现自己的文学梦

记者：小说《白鹿原》不仅获得了中国长篇小说最高荣誉，而且一直被读者们认可和喜爱，能不能说《白鹿原》是您的巅峰之作?

陈忠实：现在看来可以这么说，我写的作品里目前反响最大、最持久的就是这个长篇小说了。二十年里，这个书还没有被遗忘，能够被几代读者所喜欢，这应该是对作家最好的褒奖，我也感到安慰。

记者：还记得您曾说要创作一部作品作为您的“垫棺压枕”之作，那《白鹿原》所取得的成绩是不是圆了您当初这个梦想?

陈忠实：我喜欢了一辈子文学。从初中二年级就喜欢文学，一直到五十岁才写完一个长篇，那么在要写这个长篇的时候心里就寄托很重，不说是为国为民，而是自己做了大半生的文学梦。起码这个长篇写成，应该算是我一生喜欢文学的心理安慰，用民间的俗话来说，就

是可以垫棺做枕，不留遗憾吧。正是这一种写作心理，所以感觉都到这一步了也不要着急，尽自己所能体验到的生活和艺术去写完这个作品，把这些东西都充分表示出来就可以了。

记者：说到梦想，当下，“中国梦”成为各行业的热门话题和奋斗目标。能谈谈您对“中国梦”的理解吗?

陈忠实：梦么，就是一种理想，一种人生理想。中国梦，就是中国国家发展的理想，未来中国世界的理想，最美好的理想。

作为个人来说，每个人都在做建筑自己理想的梦。各人有各人的梦，农民也有他的梦，首先是吃饱穿暖，能盖一个二层小洋楼，能给娃及时娶上个媳妇，在信用社能有个存款单，生老病死再不成为一种人生的大灾难。

作为作家，从喜欢上文学到后来意识要当一个作家，这就是人生理想，用现在流行话说叫作家梦。但是，这个作家梦能实现到哪一种地步，那是作家后来对于世界的理解、对于文学的理解。这个差异就很大了，尽管都是文学梦，作家很多，每个作家都有自己的文学梦。

记者：在如今民族复兴、文艺复兴的有利时代背景下，您觉得作为全国文学重镇的陕西应该以什么样的姿态来追求我们的“文学梦”“中国梦”?

陈忠实：不同的作家对社会、对现实、对历史有不同的体验，对于艺术有不同的感受，所以不同的作家对艺术追求，包括对生活的体验的程度差异都很大，他们都在追求自己的文学理想，所以别人很难替代，也很难为他下什么决心。

艺术生产跟其他工业、农业生产是不一样的，它不是以共性见长而是以个性见长。个性主要靠作家自己的生活体验，甚至到更深一步的生命体验，还有艺术体验，形成一种独立的、独特的艺术风貌，建构一种自己的文学圣地。

一个作家，一个个性。努力去实现自己的独特体验，无论是艺术的、生活的甚至是生命的，不断加深自己的体验，独有、独特，又能得到共鸣的这样一种体验，写自己所想，表达自己就可以。

2013年6月

再说《白鹿原》

——与陕西广播电视台主持人、西北大学文学博士刘睿对话

刘睿（以下简称刘）：任何一部作品的诞生离不开文学的传统，这部小说数十万字，波澜壮阔，在创作中，对前人著作，借鉴最多的是哪些?

陈忠实（以下简称陈）：这在我是很难做出判断的事。我喜欢文学的诱因，是在初中二年级语文课上学到的赵树理的短篇小说《田寡妇看瓜》，这应该是我平生读到的第一篇写农村生活的小说，不仅喜欢，而且惊讶，这样的乡村人和事都能写进小说，还选入中学生文学课本，我耳闻目睹的乡村人和事也不少，于是就在自选作文课上写下平生第一篇小说《桃园风波》。这个时期我把学校图书馆里所有赵树理的作品都借来读了，赵树理无疑是我崇拜的中国最伟大的作家，我也很自然地模仿他给小说人物取绰号的做法。

我随之又崇拜起柳青来，这是在读初三最后一学期时适逢《创业史》在《延河》上连载，一读便入迷为之倾倒。之后十余年间，先后购买过九部《创业史》，甚至在“文革”中《创业史》书遭禁的不堪时月，我给《创业史》包装上《毛泽东选集》的红色塑料封皮，偷偷阅读。我最初发表的几篇小说，被很多读者误认为是柳青另附笔名的作品，主要是说作品有柳青味儿。

新时期伊始，我集中阅读了契诃夫和莫泊桑两位短篇小说顶级大家的小说，不仅要尽快排剔极左文艺的影响，更要学习他们短篇小说的创作艺术。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读了多位苏联作家的小说，诸

如杰出的短篇小说家舒克申和长篇小说家柯切托夫等翻译成中文的所有作品。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中期，魔幻现实主义的开创人和杰出的代表作家卡彭铁尔和马尔克斯的代表作《人间王国》《百年孤独》《霍乱时期的爱情》等都读过……这些中外作家的作品都对我学习文学创作产生过重要影响，不同年龄段对不同作家的作品的阅读，对那个时段的创作探索都发生过启迪，要说一个“最”的人，一时尚不好排出。

刘：从创作的角度谈，创作《白鹿原》时最原始的动机是什么？是《蓝袍先生》创作时的一点触动，还是有自觉的意识去写“一个民族的秘史”，还是有一个别样的创作出发点？有没有对一些社会问题的反思促使您进行创作，有没有在八九十年代社会文化思潮的碰撞中，在复杂内心的矛盾中，促使您反观传统文化的因素在？

陈：你的所有问句，我都给予肯定的答复。唯一稍作调整的一句话是，《白鹿原》的创作是由《蓝袍先生》写作过程中触发的，随之就发展为你所说的“自觉的意识去写‘一个民族的秘史’”。

刘：陕西小说界有个认识，就是创作水平的高低取决你有没有成功的长篇小说，您如何评价这种认识？这是不是您《白鹿原》创作的一个动力？

陈：这种以长篇小说评判作家创作水平的看法，大约不单在陕西文学界存在，而是较为普遍的一种观念。这种看法显然是偏颇的。前述的契诃夫和莫泊桑、苏联时代的安东诺夫和舒克申，都是享誉世界文坛的经久不没的文学大家，他们一生专注于短篇小说。再如鲁迅先生，他的短篇小说成为新文学的经典。在我来说，无论短篇小说、中篇小说、长篇小说，致命的问题在于作品本身。

我可以坦白地说，《白鹿原》的创作动力不在于此。一九八五年夏天，陕西作协在陕北召开“长篇小说促进会”时，我表态尚无长篇小说创作的打算，这是实情。不料就在当年初冬，因中篇小说《蓝袍先生》的创作而触发了长篇小说创作的欲望，几经筹备，直到动手写作，也没有想到“创作水平高低”的事，而是为自己做一个“死时垫棺作枕”的东西，告慰自己一生的文学梦。这种“枕头”之说，完全是面向自我的。

刘：《白鹿原》留给我最深的印象是：史诗般的构建；醇厚的关中乡土气息；人物形象的生动；魔幻手法；隐含的社会政治反思。这些是否是创作时有意识要传达给读者的，还是水到渠成？另外，还有其他的什么想传达给读者？

陈：谢谢你对《白鹿原》书的评说。关于“史诗”，尽管有多位评论家说过，我仍然心虚，常识告诉我，时间是无情却又公正的考官，未来的读者是否还会对《白鹿原》发生阅读兴趣，自不敢断言。《白鹿原》书里所包含的思想，自然是我的生活体验，书写出来得以出版，就会实现和读者的交流。至于“魔幻手法”，当属错觉，“魔幻”的最为表象的特点是人的多变，诸如人变成动物等。《白鹿原》书里写了几场鬼事，鬼是中国民间最常见常遇的事，还有风脉，建屋修墓都要请风水先生把握好风脉，这些都算不得“魔幻”。

刘：探求“地域文化心理结构”，您认为关中的“文化心理结构”是什么？等级观念、封建保守？

陈：在我有幸接触“文化心理结构”学说之后，有一种茅塞顿开的感觉，一个地域与另一个地域的人群的普遍性差异，表象是风俗习惯、服饰以及语言，而本质本色的差异在于不同文化影响铸成的心理

结构。我曾阐述过自己对关中人的文化心理结构的看法，是以儒家文化为底蕴的结构形态，这是由关中这方地域在中国历史上的特殊地位所决定的，关中人至今自豪自己生活的地域是帝王之都，有多少大的小的封建王朝都在此立都。无论哪个王朝，尤其如汉和唐这样的大王朝，都要在自己宫墙外围造就知书达礼更兼和顺的乡民，儒家文化被学人衍化成乡规民约，教化百姓，便建构了这一方地域一代又一代乡民的文化心理结构形态，有传统文化的优质，也有封建糟粕。

刘：文学的创作，提倡“为情造文”，不太主张“为文造情”，小说当然有生活现实的沉淀，但虚构的成分似乎也多得很，要达到传神的境界，难度极高。您在创作的过程中遇到的最大困难是什么？

陈：我在学习创作的不同时段有不同的难题，深化生活体验是一个相对而言一直存在且也一直追求解决的困难，由生活事象出发而产生的创作欲念，如何使其具有鲜活而尤其是独特的内蕴，是一直追求且也一直感觉不能完全满意的事。

刘：您的小说《白鹿原》通过渭北平原农村近半个世纪的风雨变迁折射了中国近现代悲壮的农村变迁史，其中尤为重要的是渗透着您对农民生命际遇的深切关怀，您能不能谈谈朱先生这个人物给予着您什么样的文化理想？

陈：朱先生是我意念里的学人。他承载的是我们传统文化的精神、境界、风骨等。他所处的时代，决定了他的命运悲剧。我没有回避他的思想意识中的封建糟粕。然而，我更主要的是想让他彰显出传统文化的美。

刘：在十三朝帝都文化的影响下，是不是有男权中心思想在？方志中的贞妇烈女，唤起了您要通过田小娥这个形象发出一声呐喊，体现出您的女性观，您是否赞同？同时，性描写似乎又有一种对女性把玩的态度在其中，似乎体现了您在女性观上的矛盾性，您如何评价？

陈：“男权中心思想”是在中国长期的封建制度下的一个普遍现象，在有着十三个大小王朝立都的关中地区尤甚。田小娥这个形象，诚如你所说的是为被奴化被伤害的女性的“呐喊”。《白鹿原》书中设计的性描写，在我是一个再三斟酌的重要命题，尤其是田小娥这个形象所涉及的婚姻、家庭和性。我最终为自己确定一个框子或者说戒律，即揭示人物精神心理必不可缺的性，一定写透，不涉及此的性文字，争取一句也不要写。为此我曾归结了十个字的写性三原则，即“不回避，撕开写，不做诱饵”，且用小纸条写下来贴在案头。你所说的“对女性把玩”的阅读印象，可能是我在具体写作时仍然把握不准，多写了几句，造成读者有此阅读感觉。如实说来，我倒没有“女性观上的矛盾性”。

刘：《白鹿原》开头，是不是受《安娜·卡列尼娜》的影响，一定要有一个吸引人的好开头。于是对“白嘉轩后来引以为豪壮的是一生里娶过七房女人”一句，有人评价，是为了博人眼球，有噱头的意味，您如何认为？

陈：《白鹿原》的开头是我的开头，蓄谋甚久确定的一个开头。

这个开头写了白嘉轩娶了七房女人的事，意在为白秉德临终前的那句话作铺垫，即：过了四房娶五房……哪怕卖牛卖马卖地卖房卖光卖净……致命在“不孝有三无后为大”。白嘉轩的母亲说得比白秉德更直白更露骨：女人不过是糊窗子的纸，破了烂了揭掉了再糊一层新

的。死了五个我准备给你再娶五个……这里不仅见出那个时代“无后为大”的孝的观念根深蒂固，也见出你前一个问题中所涉及的“男权中心”，不仅白秉德这个男人把死去一个儿媳续娶一个视为“再卖一匹骡子”，其母亲则更视女人不过是“糊窗子的纸”。一个女人在另一个女人（母亲）的心里的价值可见低贱到怎样不堪的程度。“博眼球说”和“噱头说”，大约只注意了白嘉轩娶妻丧妻的情节，而忽略了白秉德夫妇对此事的态度……不宜再说，再说就有违我不阐释人物和情节的自我约律了。

刘：“文革”中，您在西安见到柳青游街，对《白鹿原》中白灵被活埋，黑娃被枪毙，白孝文投机革命，以及朱先生的“鏊子说”，有没有影响？是不是有政治的反思在其中？这些人物的结局，似乎有了一种从生活体验到生命体验的跃进，您如何认为？

陈：这是一个在我很难判断的问题。反思是肯定的，上世纪八十年代全民族都在反思，拨乱反正，我也有自己的反思，包括对社会命题之外的文学。我崇尚作家的生命体验，然而是否获得并进入生命体验的层面，尚不敢吹。

刘：在阅读过程中，《白鹿原》和《静静的顿河》相比，有一个明显的感受就是环境的描摹较少，您是怎么考虑的？

陈：这是出于对《白鹿原》的篇幅的考虑。初始构思时，考虑到所写的内容比较多，拟写成上下部，字数多少就不成为一个问题，肯定会为景物描写留有较大空间。最后构思基本完成时，已确定限定单本一部，字数控制在四十多万字，风景描写的文字就成为首当节减的“多余”了。再，最后确定放弃描写语言，选用叙述语言，一种人物角度的语言叙述，主要是比描写语言省了字数，一句形象化叙述语句，

可以包容几句乃至十余句白描语言的内容。风景描写只能在叙述中点到。

刘：卡彭铁尔开创的魔幻现实主义手法在小说的前半部表现较多，后半部表现很少，是不是发现一旦脱离白鹿原的独特文化环境，这种手法就失去了它的根基，还是有其他的考虑?

陈：前边涉及魔幻现实主义话题时我已说过，《白鹿原》书中无魔幻。在我的意念里，魔幻大约只是拉美地区乡民创造的神奇事象。中国民间只有鬼和神的诸多传说，我在《白鹿原》里写了一些鬼和神的神神秘秘的传闻，没有魔幻事象。

刘：《白鹿原》二十年来一直为人们津津乐道。在您心目中，《白鹿原》在什么状态下就可以成为经典了?

陈：这是一个谁也回答不了的问题。尽管《白鹿原》出版二十多年来获得超出我意料的好评，也一直处于不错的长销状态，然而我不想经典这个虚妄之事。常识告诉我，经典无论在学界，抑或在普通受众的群体中，都具有长说长读的不衰不弃的恒久魅力。《白鹿原》书出版仅仅二十年，很难设想再过二十年，还有多少人会对它感兴趣。话说到此，可见不是客气，是实话。

刘：任何一种文学作品都无法独立于特定的社会历史以及社会形态之外，伊格尔顿指出，即使是莎士比亚这样的经典作家，也不过是文学或文化机构的一种任命。在《白鹿原》经典化的过程中，是否感受到了这种“任命”？您如何评价?

陈：我既然如前述看待经典，就不会有关于经典“任命”的感受，也就不作“评价”了。

刘：《白鹿原》出版已经二十多年，现今回过头再看自己的作品，您认为还有什么不足之处?

陈：《白鹿原》基本表述了当年的思考和艺术理想，企望更完美，却局限于当年的生活体验和艺术体验，仅能如此。今天回头看，有一些情节和细节仍有增强或削减的余地。

刘：现在中国的城市化进程在快速发展，面对城市文学有了新的面貌，您觉得陕西作家应该调整创作姿态，还是继续保持乡土文学的创作势头？进一步，在城市化进程中乡土文学应该有怎样的时代使命?

陈：依我粗略的印象，仅就小说创作（无论短篇小说中篇小说以及长篇小说）的数量而言，写城市各种人群生活的小说，早已超过了写农村题材的小说。我有多种赠阅的文学刊物，单看小说类，写农村题材的作品占不到百分之十，这是全国文学创作的态势，陕西文学创作也莫能例外。何以如此，有待考究。在这样的创作态势里，我觉得不存在或者说不必强求“作家应该调整创作姿态”，抑或是“继续保持乡土文学的创作势头”的命题，道理很简单，作家是依赖生活体验及至生命体验实现创作的。无论城市，无论乡村，无论现实生活，抑或历史生活，作家发生了独特独有的体验，就产生创作欲望，随着体验的深化，就会完成构思，再完成创作。生活在城市各个角落的作家，熟悉城市，对城市生活的变迁，对城市各个阶层的男女的心态裂变发生感应，这是自然不过的事，新的创作由此发端。再有一种现象，出生乡村且素以乡村为书写对象的所谓农村题材作家，后来进入城市且生活日久，随之写出城市题材的甚为优秀的作品，也当属一种扩展了的体验的展示。我意不必人为“调整”，依各个作家自己的创作兴趣而做出选择。

你说到的“乡土文学应该有怎样的时代使命”，这是一个太大的命题，颇觉惶然，且姑妄谈一点个人偏见。在书写乡村各种人物各种风情的小说里，不可或缺那种深刻揭示并展现乡村生活运动发展具有时代鲜活而真实印痕的作品，尤其是当代，新中国成立六十余年的中国乡村的演变，中国农民命运的有幸和不幸，当有史诗产生。

2014年7月5日 二府庄

附：诗词23首

小重山·创作感怀

春来寒去复重重。撂下秃笔时，桃正红。独自掩卷默无声。却想哭，鼻涩泪不涌。　单是图利名？怎堪这四载，煎熬情。注目南原觅白鹿。绿无涯，似闻呦呦鸣。

1992年夏

青玉案·滋水[1]

涌出石门[2]归无路，反向西，倒着流。杨柳列岸风香透。鹿原峙左，骊山踞右，夹得一线瘦。　倒着走便倒着走，独开水道也风流。自古青山遮不住。过了灞桥，昂然掉头，东去一拂袖。

1992年夏

踏莎行·人民大厦四十年

柳丝情长，春草不老。宾客来去知多少？遂心圆梦到三秦，四十誉满长安道。　来也微笑，去也微笑。犹存汉唐高格调。一掬深情寄四海，五洲尽是相思鸟。

1993年6月19日西安

阳关引·梨花[3]

春风撩拨久，梨花一夜开。露珠如银，纤尘绝。晨光里，看团团凝脂，恰冰清玉澈。四年矣，终究等到清明节。　便手舞足蹈，歌一阕。自信千古，有耕耘，就收获。依旧谢浮华，还过愚人节。花无言，魂系沃土香益烈。

1994年3月西安

七律·和宁夏张其玮先生

文坛百态毋需忧，

我行我素静如初。

凄风苦雨蚀斯民，

旧礼新潮划亲仇。

拭目扪心史为鉴，

破禁放足不作囚。

国事家事生死事，

同舟共济到尽头。

1995年元月15日作

附：张其玮原诗：

文坛寂寥窘悠忧，三秦原上一声吼。

淳风幽土滋刁民，善主良奴刃亲仇。

情解白灵赤子鉴，憾凝黑娃红中囚。

卜问先生人间事，别有滋味在心头。

七律·和路友为先生诗

欣慰拙著有人传，沟连两心是古原。

稚少痴梦艺苑里，老大醉耕不计年。

遭遇灾变谁无哭？醒来沉静我有缘。

寄语情钟白鹿人，体验未深不谋篇。

1995年1月15日作

附：路友为原诗：

壮哉秦风妙手传，如史如诗白鹿原。

笔意纵横八百里，墨痕点染五十年。

但听滋水歌当哭，难解白鹿情与缘。

敢问雍村枕书人，方志续修更几篇？

七律二首·故乡

其一

云垂雨疏柳如烟，桃杏含苞又经年。

轻车碾醒少年梦，乡风吹皱老客颜。

来来去去故乡路，翻翻复复笔墨缘。

踏过泥泞五十秋，何论春暖与春寒。

其二

忆昔悄然归故园，无意出世图清闲。

骊山北眺熄烽火，古原南倚灼血幡。

魂系绿野跃白鹿，身浸滋水濯汗斑。

从来浮尘难化铁，十年无言还无言。

1996年清明

酹江月·香港回归感赋

云开飞虹，神州望，钟声撩拨心声。分分秒秒，重如槌，教我泪纷血涌。北国南海，演歌练舞，期盼七月同庆。铁栅断处，血脉一日接通。　难诉百五十年，屈辱一页，兽行到寿终。“一国两制”大思维，主权不可议争。壮哉斯言！纵有铁腕，难续旧梦。何须再问，“丧钟为谁而鸣”！

1997年6月20日作

贤亮印象

千里驱车我拜佛，白沙尽头涌绿波。

绿化树下人变鬼，菩提荫里血祭国。[4]

游遍千山自成仙，爱到极处生恨歌。

且唱且走塞北地，大风再起过黄河。[5]

1998年8月10日银川

菊花诗二首

家菊

含露凝香铺地开，小院金菊报秋来。

秋风秋雨秋阳好，顿生诗情上高崖。

野菊

何事争春斗妍态，不与桃杏一时开。

伏花凋谢香色去，抖出遍山黄花来。

2001年9月28日于原下

七律·百年柯老

彩云之南一少年，一路呼啸到延安。

身卷狂飙唱大风，脚踩火焰铸诗篇。

曾经囚狱终不悔，却蒙委屈一泫然。

诗歌还诵戏还唱，声声柯老祭百年。

2002年1月25日昆明即席

红梅傲雪

——题骞国政藏白灵壁奇石

奇石出灵壁，颗颗有灵气。

白灵壁上梅，怡然成雅趣。

久纳日月光，复承地脉育。

血魂凝红梅，地脂孕玉体。

卓尔不混尘，超然脱俗媚。

一见便成记，不见常相忆。

2002年3月17日原下

墨洇点点润屐痕

——读郭加水诗文集感诵

秋风细雨洗躁氛，清茶伴我读美文。

诗赋政论启心智，思绪潮声逐风云。

挥毫纵论天下事，坚辞利刃辩古今。

盛衰兴亡史作鉴，贪官庸僚不为群。

谋政一方重纲纪，恪守绿地难染尘。

清醒如许堪垂范，不觉捶拳意沉沉。

山涌眼底碑峰立，水入胸襟诗泉喷。

笔点秦巴群岭翠，墨落汉江气象纷。

锐劲经纶铸大业，慷慨陈词图布新。

难得句句衷肠话，一掬热泪酬斯民。

唇焦只为稻桑事，殷殷爱意扶弱贫。

好诗从来和血出，孺子牛知孺子心。

北国有树移岭南，不择冷热绿成荫。

窑炕落生小米养，壮筋强骨黄土魂。

修身励志开视镜，位卑位尊都躬身。

高位负重时勤政，柔肠不改唯觅韵。

诗文篇篇铸心路，墨泅点点润屐痕。

苍山如海无须问，掩卷华章才识君。

2002年9月15日汉中

致柴达木油田工人

——步王昌龄《从军行》韵

豪情直抵昆仑山，

壮士眼前无阳关。

平生纵歌大漠地，

鬓毛未霜不思还。

2004年秋柴达木

白鹿书院成立感赋

——步炜评诗韵

原上原下有前贤，

白鹿风骨一脉连。

吕氏创立二一论，

杨生阐释一命悬。[6]

精舍曾经播南北，

蓝川无奈归冷弦。[7]

院门重开鹿鸣地，

群鹿争鸣铸新篇。

2005年6月29日曲江即席

附：刘炜评诗：

谈经说法待群贤，

大道千秋一脉连。

白鹿长鸣动天地，

为呼风雅谱新篇。

致熊召政[8]

林涛断止蕴默雷，

隐身青史面残碑。

十年长卷惊时世，

却问熊氏曾是谁？

2005年11月1日 二府庄

凤栖原

凤栖原上凤又鸣，

玛瑙鲜桃次第红。

神笔点染满原绿，

长安女子乐农耕。

2006年7月汉风台

渭滨夜聚

——和张陇得先生诗韵

人生有诚才结缘，

老友新朋总新鲜。

真话直抒不说悟，

矫情虚掩难称谦。

感时论世未数更，

读书写字又经年。

常忆渭滨初春夜，

叟言忘忌亦忘原[9]。

2007年4月17日夜初拟

2010年8月16日成稿

附：张陇得诗

幸会陈忠实

促膝品茗幸有缘，

喜啜新叶龙井鲜。

妙语藏禅后生悟，

成容露蔼睿者谦。

神聊天地未入更，

似读诗书胜十年。

春风轻漾陈仓夜，

我心已驰白鹿原。

少陵原

——《少陵原之风》感赋

少陵原畔说兴亡，

终南无语雾苍茫。

一步一踩钩陈事，

一阕一章动肝肠。

鉴史最是亡国恨，

兴邦恰需创纪方。

诗文百篇凝一愿，

原上原下无城乡。

2007年6月16日雍村

王锋印象[10]

在河之洲一少年，

不述淑女迷诗篇。

踏遍北原南岭地，

阅尽春花秋霜天。

唇里纳言蕴默雷，

笔底演义起狼烟。

思逐风云年华好，

独立独秀独扬帆。

2007年8月1日 二府庄

致魏明伦[11]

剧坛大家独一声，

敢为金莲重塑身。

随笔杂谈任挥洒，

鬼才鬼话却威雄。

2010年10月15日二府庄

---

[1] 滋水：灞河古谓滋水，秦孝公为显霸业，改为霸河，偏旁“氵”为后人所加。

[2] 石门：灞河发源地，倒流河。

[3] 友人送梨树苗，植于小院里，四年后的清明节，梨花开放，其景其情至今难忘，以记。

[4] 《绿化树》《我的菩提树》均为贤亮小说名。

[5] 《大风歌》为其发轫诗作，并招致灾难。

[6] 蓝田吕大临为宋代哲学家，创立“合二而一”哲学论。杨献珍于上世纪六十年代重新发掘阐释此论，遭批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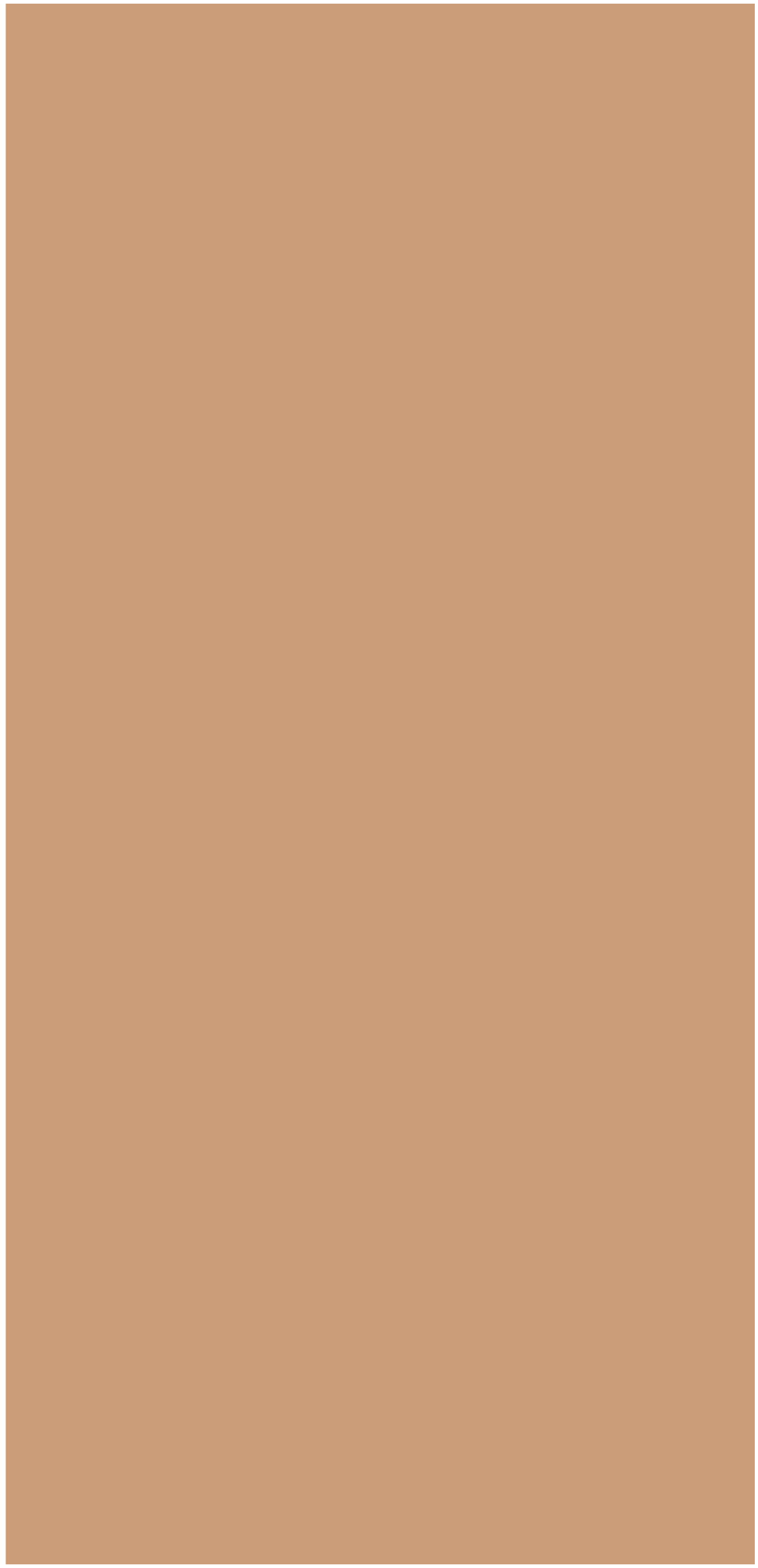
[7] 蓝田儒人牛兆濂，号蓝川，曾主持芸阁学舍书院，学子满门，后被新学冲淡冷落关门。

[8] 熊召政以“举起你森林般的手，制止”长诗轰响上世纪八十年代文坛，随之遭冷处理，之后便销声匿迹。十年后百万长卷《张居正》问世，文坛朋友竞相疑问，这个熊召政是不是原来那熊……

[9] 原，即白鹿原。

[10] 王锋，合阳人。语出《诗经》：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在河之洲”即合阳洽水河川。

[11] 魏明伦从事文艺六十年庆祝周，约我参加，不能前往，写此诗表示祝福。



第1卷　1978—1982

第2卷　1983—1984

第3卷　1985—1986

第4卷　白鹿原

第5卷　1987—1994

第6卷　1995—2000

第7卷　2001—2003

第8卷　2004—2006

第9卷　2007—2009

第10卷　2010—2015

ISBN 978-7-02-016743-2

9 787020 167432 >

定价：580.00元

（全十卷）